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1945.1—1949.2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编辑委员会

主编 沈志华

副主编 李丹慧 牛军

编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宪良 崔海智 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 李丹慧 刘洋

娜丝佳(Anastasiya Bayok) 牛军 沈志华

译校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桦 曹介民 曹盟 陈春华 陈宪良 陈云卿 崔海智

戴怀亮 邓莹 丁宝源 丁明 樊家骝 方琼 冯峥

高增训 耿葆贞 巩丽娜 古继坤 顾镜清 蒋华杰 李丹慧

李木兰 李肃 李晓亮 李亚男 李娅妮 李永庆 李越常

刘令仪 刘名子 刘淑春 刘洋 刘志青 刘仲亨 卢睿

吕雪峰 吕允连 马善平 娜丝佳 牛军 彭兴中 强正德

沈凌云 沈志华 师建军 宋雪 邵浴日 唐松波 王宏达

王会朋 王前 王洋 王谊民 王英杰 吴安迪 肖瑜

谢载福 徐晓村 严巧丽 杨世招 杨希钺 游览 张好雨

张坚 张建民 张健荣 张玲玲 张倩茹 张颂超 张秀钰

章若男 赵国顺 甄佳伟 钟舞春 周绍珩 朱丽云

本书由布克书屋整理，www.bukebook.cn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更多好书、新书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布克布克

十万图书 等你来取



扫码关注公众号：布克布克

出版前言

本档案集是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俄国中苏关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DLS002)的研究成果,首席专家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该课题已于2013年3月提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结项,专家鉴定意见为“优秀”。

收入本档案集的俄罗斯解密档案共有主文件2262件,列为附件的有363件,总计2625件。实际上,有关俄罗斯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至今历时近20年。收入档案集的文件,是从我们收集和整理的4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档案中挑选出来,并译成中文的。

这些档案文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945年至1949年,即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国共双方对战后相互关系的设想和构建,反映了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的对华政策及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二)1949年至1957年,即中苏两党、两国结成紧密同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密切合作——苏联为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巨大援助,而中共则在政治上给予苏共支持和帮助。(三)1958年至1979年,即中苏从两党分歧走向同盟破裂并最终导致两国严重对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矛盾何以产生,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论战,以及中苏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四)1980年至1991年,即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最终走向正常化并因苏联解体而完结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以及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演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档案解密期的限制,第四阶段即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的文件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苏关系不仅十分重要,也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中苏两国关系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密不可分;二是冷战前期,两国存在着紧密的同盟关系,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国

家。这使得这套档案的内容不仅涉及两国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且大量涉及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双方的文化交流问题，等等。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中苏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苏两国与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中，美国始终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套档案也有不少反映中美关系、苏美关系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动的内容。此外，印度既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和苏联竭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中印关系的内容。

文件的形式包括：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及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照会；中苏两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及互访人员之间的会谈记录和谈话纪要等；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决议、指令、通知等；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和访华代表团呈送上级或党政领导机构的报告、请示、情报、通报等；苏共中央与东欧各国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共产党有关部门之间的会谈记录、会议记录；苏联政府或苏共领导人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和纪要；等等。

所有档案统一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排序，分为12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1945年1月至1949年2月)：抗战结束前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国共美苏四角关系、外蒙古独立问题、国共谈判、东北问题、国共停战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内战、美苏关于中国形势的讨论、苏联在东北地区对中共的援助、美国对华政策、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东北军管后各国领事馆问题等。

第二卷(1949年3月至1950年7月)：中国革命形势、苏联对华援助、中共与美国的接触、中国新政府筹备、中苏建交、新政府机构设置、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湾问题、中苏友好往来、毛泽东访苏、中朝关系、中蒙关系、中苏条约谈判、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

第三卷(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朝鲜战争、中朝关系、中蒙关系、苏联对华援助等。

第四卷(1951年9月至1954年1月)：朝鲜战争、对日和约问题、朝鲜停战谈判、中苏关于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的谈判、“一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中苏两党通报各自内部情况、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问题、缅甸共产党实行土改等情况。

第五卷(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高饶事件、日内瓦会议、制定1954年宪法、中苏贸易和苏联援华、胡风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万隆会议、筹备中共八大、留学生工作等。

第六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苏联援建长江大桥、苏联参与修筑新疆铁路、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苏共二十大、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西藏民主改革、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中朝关系等。

第七卷(1956年10月至1958年3月)：波匈事件、中苏朝三角关系、“双百”方针、中共整风与知识分子问题、苏共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事件、中越关系、莫斯科会议、中蒙边界谈判、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关于台湾问题的情报、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

第八卷(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七大、苏南关系、中东局势、经互会和华约情况通报、中日关系通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建设海军、赫鲁晓夫两次访华、华沙大使级会谈通报、中蒙关系和中朝关系、苏联援华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关系、美苏关系通报、中苏科技合作、中国援助蒙古和朝鲜等。

第九卷(1959年10月至1962年12月)：中印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布加勒斯特会议、中朝苏三角关系、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纠纷、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中国经济困难、苏联对华援助、1960年莫斯科会议、各国共产党对中苏分歧的反应等。

第十卷(1963年1月至1964年11月)：中苏分歧加剧、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苏两党论战、各国共产党对论战的反应、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访苏、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等。

第十一卷(1964年12月至1969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争端、中朝关系恶化、苏共二十三大、国

际共运问题、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文革”初期的中苏外交、中国“文革”情况、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冲突等。

第十二卷(1969年7月至1991年12月)：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调查与分析、中苏边界冲突、中美苏三角关系、印度支那和结束越战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文革”后中国的形势和外交政策、澳门问题、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延长《中苏同盟条约》问题、苏共中央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中苏会谈、苏联事变后的中苏关系走向等。

关于本档案集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档案出处

本档案集所收入的文件主要出自以下俄罗斯档案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TsKhSD)，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原中央党务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后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RGAN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RGAE)，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RGASP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РАН(ARAN)，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AVPRF)，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 РФ(TsAMORF)，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档案馆，АНБ РФ(ANBRF)，Архи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 ГАРФ(GARF)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 АПРФ(APRF) ,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 РЦХИДНИ(RTsKhIDNI) ,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前的文件) , 1999年3
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 ГАХК(GAKhK)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 , ЦГАРК(TsGARK)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 , ЦГАКР(TsGAKR)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二、档案收集

这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从1995年开始的。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跟踪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开放和公布的进程，并注意从各种渠
道收集有关的解密文件。其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在俄罗斯档案馆复制(主要是复印，也有少量手抄)的档案，
这包括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
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
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等。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我们得到俄
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2.在收集俄罗斯档案方面，美国学术机构是领先的，它们投入重金
大量复制并收藏俄罗斯档案，其中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相关档案的收
藏，主要集中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哈佛大

学拉蒙特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Lamont Library)。在我们收集档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俄国档案的开放政策收缩以后,这些学术机构收藏的纸质文件和缩微胶卷就成为重要的来源。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okkaido University)、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一批相关的俄罗斯档案。

3.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对其档案馆的管制愈加严格和保守,使用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已经很难在那里寻找和复制文件。所幸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机构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的档案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主要有(以出版时间为序):

Вартанов В.Н.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1953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7(关于1950—1953年在朝鲜的战争:文献资料);

Волков В.К.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苏联与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文件集);

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9(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文件与当事人的见证);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37-1945гг., Книга 1: 1937-1944гг.; Книга 2: 1945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20世纪俄中关系史:文献与资料,第四卷);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年,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1954—1964年,第一卷);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Том V ,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1946-февраль1950 , Книга 1 : 1946-1948гг. , Книга 2 : 1949-февраль1950гг. ,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 2005(20世纪俄中关系史 : 文献与资料 , 第五卷) ;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 Том 2 ,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4-1958 ,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 20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 1954—1958年) ;

Артизов А.Н.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осква : МФД , 2007(赫鲁晓夫 , 1964年 :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 ;

Стаф Т.А.(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Годы разрядки 1969-1976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Том 1 , 1969-май 1972 , Книга 2 , январь-май 1972 , Москва : Междуна 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2007(缓和年代的苏美关系 , 第一卷) ;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 Том 3.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9-1964 ,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 200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 1959 1964年) ;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т. 1 , 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 2009(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文件集 , 第一卷) ;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т.2 ,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 2010(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文件集 , 第二卷)。

此外 , 在俄罗斯学术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的专题档案文献 , 其中不少涉及中苏关系。这主要是《史料》(Источник)、《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等。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冷战国际史的权威刊物，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HP Bulletin)及网站也公布了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原始档案。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出版物及网站已经成为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收藏的俄国档案毫无保留地提供我们，如中国大陆学者李静杰，中国台湾学者余敏玲，俄国学者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A. Radchenko)、谢尔盖·贡恰罗夫(Sergei N. Goncharov)，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马意莉(Elizabeth McGuire)、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orenz M. Luthi)，日本学者下斗米伸夫(Nobuo Shimotomai)，匈牙利学者王俊义(Peter Vamos)，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Cavoski)，以及旅美华人学者刘晓东等。

三、编辑体例

1.文件编号

每个主文件前面都标有编号(№)，这是在收集档案时的随机编号，以便于在翻译和编辑时查找档案原文，而与档案的编排顺序无关。

2.文件标题

每个主文件的标题都是编者根据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编写的，其原则是通过标题即可了解该档案的大意。

3.文件日期

每个主文件的日期都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确定的，其原则是以文件产生的时间为准，如会议的召开、决议的做出、函电(指令、通知)的发出、报告的提交(或完成)等。对于无法确定的日期，则根据具体内容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

4.人名翻译

外国人名翻译，主要依据以下工具书：辛华编《俄语姓名译名手

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新华通讯社编《苏联人物资料》(1972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的人名(主要是朝鲜、越南、泰国、印尼等国的人名),按照音译。

中国人名的翻译,音译后对照以下工具书进行确定: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5、6卷及附卷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或无法确定的人名,按照音译,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所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均作为附录列入人名译名对照表,以便读者核查。

5.地名翻译

地名的翻译,主要依据《苏联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俄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俄汉地名形容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且无法确认的地名,按照音译处理,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6.注释

在原始档案(主要是专题报告)中含有少量注释,均移入正文相应位置的括号中。

出版物中发表的档案,原编者加有不少注释,我们根据需要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注释中以“原注”标示。

译者所加注释标示为“译注”,主要用于说明翻译的情况。

本档案集编辑时所加的注释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对原文和译文处理的说明,一类用于对人物、事件或专有名词的必要解释,均标示为“编注”。

7.批注

档案文献中有大量的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该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可惜的是，批注意见都是手写的，大多数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我们尽可能地把批注的内容翻译出来，以“手写批注”的方式置于文件末尾。

8.文件出处

所有文件最后都标有出处，但情况有所不同。多数文件标示的是原始档案的馆藏号，但也有一些文件的馆藏号缺失，其原因：一是在收集档案的初期缺乏经验，没有专门复印或抄录馆藏号；一是俄罗斯或美国出版物公布该档案时未附馆藏号。对于前者，我们将所有收集来的原始档案散件(包括部分出版物公布的档案)均按照时间和专题进行了整理，并已编印成册，即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卷)，故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这些复印件汇编的卷次和页码。对于后者，则标示的是原出版物的刊号和页码。此外，还有少数从网站下载的档案，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公布该档案的网址。总之，这里刊出的档案译文，无论是否附有原始档案馆藏号，都标明了其出处，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复制件，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免费对外开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刊出的档案文件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庞杂，且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虽经两次校对及统稿编辑，但在翻译和编排方面，肯定仍存在不少舛误和缺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为相关教学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如果在研究中需要引用这些文件，请务必核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5月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沈志华

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最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破裂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亚洲的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的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自身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19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2]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3]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纸杂志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根本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1991年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4] 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罗斯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罗斯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罗斯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俄罗斯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5]，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6]，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7]，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8]，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9]，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10]，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1]，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2]，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13]。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罗斯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14] 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15]，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罗斯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罗斯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中苏关系，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文件^[16]；有些本身就是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为主题的。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四卷第二册，2004年又编辑出版了第五卷(分两册)，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17] 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18] 此外，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2002年出版

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 [19] , 2007年出版了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 [20] , 2003—2008年分三卷出版了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 [21] , 其中有不少文件是有关中国或中共问题的。显然, 这些档案对于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 2009年和2010年, 远东所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文献集《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部是涉及中苏关系的苏联文件资料。 [22]

第三, 俄罗斯档案馆开放初期, 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 尤其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 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罗斯历史档案, 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 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 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罗斯档案。笔者1993年放弃生意、返回学界时, 听到俄罗斯档案开放的消息, 便倡议中国的历史研究者, 特别是苏联史研究者, 立即着手收集俄罗斯档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 笔者与李丹慧、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数次自费前往俄罗斯和美国, 专程收集俄罗斯解密档案。由于俄罗斯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 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 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 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 把握机会极为不易。

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 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25]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26]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

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手下博士生已将这些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利用。 [27] 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上陆续发表。 [28]

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冷战史领域研究的热点。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东方历史学会的前身)、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6个国家的近30名学者。会议上，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打开了冷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的历程。会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次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 [29]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关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并于2007年和2009年再次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集中了世界各国研究中苏关系史前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并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文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30]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充分利用俄国解密档案考察中苏关系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在俄罗斯，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苏共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以往苏联政策进行辩护的。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31] 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中苏边界问题 [32]，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 [33] 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不过总体看来，俄罗斯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老一辈学者在支撑，很少看到有青年学者跟进，故颇有青黄不接之虞。

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过程的讨论，最为详尽地使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 [34] 美国学者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所使用的主要也是俄罗斯档案。 [35] 几年前，以英文出版了两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集中讨论中苏关系的专

著，很有学术分量，即丹麦学者吕德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和俄罗斯学者拉琴科(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天有二日：中苏对领导权的争夺》，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 [36] 此外，笔者还看到两部很有意思的未刊英文书稿，其作者都是美国的年轻学者。马蕙莉通过发掘有关中国早期革命的俄罗斯档案，广泛利用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对伊万诺娃国际儿童院的实地考察，讲述了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而对中国革命如何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李滨则利用大量俄罗斯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档案材料，讨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 [37]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且成为他们研究中苏关系的主要史料来源。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有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以及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 [38]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苏联专家和朝鲜战争的专题性研究著作。 [39]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苏关系史乃至整个冷战国际史研究至今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19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档案革命”，其次才是学者的努力。为了推动中国学界有关中苏关系史以及国际共运史、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笔者与李丹慧、牛军提出了收集、整理和翻译相关俄罗斯解密档案的课题，并于2009年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作为上海市的重大课题立项。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课题组对收集到的4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解密档案进行了整理，主要是确定文件的时间及相互间的从属关系，然后挑出其中2500多个文件(含附件)组织了中文翻译。考虑到在中国已有研究机构正在从事涉及1945年以前中苏关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们所选文件的时间跨度确定为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至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内容上讲，则主要是挑选那些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档案。

这批以中文形式出版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对中国学界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苏关系史、冷战国际史乃至当代中国史，无疑将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实际上，作为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我们在组

织整理和翻译这批档案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开始了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牛军完成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写作，笔者完成了《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写作，李丹慧则即将完成《无悔的分手：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60—1973)》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写作。在我们看来，由于过去历史叙述存在的诸多舛误和片面性，史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历史的过程梳理清楚。否则，其他一切讨论和分析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因为大量使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自然也会结合对中国档案文献的考察)，作者在研究中苏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过程中才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看法或解释。

有关中苏同盟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笔者提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1.在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过程中，美、苏与国、共三国四方在中国大陆的争斗，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与人们的想象和成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这三国四方相互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不过，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由此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并非中苏结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2.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所谓“失去机会”讨论，在此前参与讨论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同样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中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当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

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49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斯大林开始对中共采取积极的立场，毛泽东也愈来愈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即中共与苏联的同盟)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并长期在党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为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取得政权建立了合法化的基础，此时此地，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了，所以到1949年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和解的“机会”。

3.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根本谈不上强大)以及他们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其实斯大林在本质上并不承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了。恰恰相反，笔者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目标。恰在此时，白宫表明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的立场，加之金日成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从而除却了斯大林内心的最大忌惮，至少使他感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所以，笔者认为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同盟建立本身的必然要求，而是在这一同盟建立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4.如何解释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万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非要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考虑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从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一般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出兵能够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是出战必胜，否则作战的结果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不安全的因素，而一般中国领导人反对出兵的理由恰恰是认为与美国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考虑的是亚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况且他对朝鲜前途和亚洲革命还负有直接的责任。至于国家利益，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这个国家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而当时能够保证中共革命政权的就是中苏同盟，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

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内心对绑架中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在苏联和朝鲜需要中国出兵时，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毛泽东都不得不做出兵朝鲜的决断。唯其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5.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只是单方面接受苏共的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6.与以往人们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中共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7.1957年莫斯科会议对于中苏关系的意义，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笔者的考察，不仅厘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从建立国际机构向举办国际会议的转变过程，而且指出了这次会议在中苏同盟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峰，而中苏之间的分歧也由此发端。引起苏共和东欧各党不满的主要有两点，即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的高傲的态度，以及对世

界大战和核战争前景的“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

8.从逻辑上讲，中苏同盟的破裂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最初并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心存不满和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而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莫斯科十分恼怒，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当毛泽东和中共处于政治上升期，并对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时，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9.作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苏两党，事实上并无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只是在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分歧时，双方根据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强调马列主义经典的某一方面，试图以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由此而发生了所谓的“原则”之争。在这一争执中，双方均不能做出让步，因为这关系到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领袖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理论观点的分歧只是政策方针分歧的表现，而且这种分歧是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双方都意识到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都明白中苏分裂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和方向由谁来主导。当问题发展到这一步时，已经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正像他们当初对于结盟的选择一样，中苏两党面临分歧日益加重的困境时，放弃同盟似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有关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同盟的破裂，李丹慧提出了如下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

1.1960—1973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为：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恶化到同盟关系终结并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逐渐发生变化，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其一，1962年。是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和同盟关系的终结奠定了思

想基础。其二，1964年。这一年，毛泽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军事防御战略上，将苏联确立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在政治发展战略上，把防备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确立为首要目标，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酝酿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实行反帝反修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中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内容，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以对美战备为主的同时，加入了对苏战备的新成分。其三，1969年。是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国关系由敌对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中苏同盟终结。

2.关于中苏两党分歧的公之于众，过去中国方面一直指责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保持中立，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由此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苏联方面则对中国公开发表康生在1960年2月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关于普遍裁军协议对中国无约束力的发言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这种认识均有失片面，前者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且不乏先例；后者中国代表不要苏联在裁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的表态，其实是为社会主义阵营核武器政策的运用留下了回旋余地。两者都并不表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实质性分歧。实际上，中苏领导通过报刊文章等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到1960年4月中共三篇纪念列宁诞辰文章的发表，这种分歧已十分引人注目。不过，第一次在世界国际群众性组织论坛上正式公布中苏两党重大理论和方针分歧的，还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工会代表团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并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反帝反殖的提案。这一情况招致西方关注，美国中情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世工联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中国代表团在世工联北京会议上对苏联代表团发动的突然袭击，直接导致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3.从1959年10月中苏两党领导人激烈争吵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

二大召开，这两年是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此阶段实际为中苏两党提供了一个有可能达成新的团结的机遇。其特点为：其一，两党都有实现新的团结的愿望。缓和两党关系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经过一年多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中共需要苏联的帮助，不能与之把关系搞僵。其二，布加勒斯特会议及苏联撤走专家之后，毛泽东对苏共的路线纲领采取了一种“大容忍”的态度，中共的对苏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这一“暂栖身”式的让步政策，在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是首次出现，这种让步政策为中苏关系的缓和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三，1960年中后期至1961年后期，中苏两党在宣传论调、方针上出现了某种趋同倾向。这是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这种趋同是有意识的主观上的作为，其有别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向传统马列主义回归而造成的与中国的趋同。当然，此情况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诸如中国的天灾人祸，毛的容忍退让，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尴尬等。如果中苏双方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主要是中共能够将对苏政策的灵活性继续保留下去，淡化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那么，中苏关系的缓和期应该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倘若两党关系渐趋稳定，中苏关系的发展或许还可以有另一种前景。

4.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由于苏党新纲领的发布及苏共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打压等问题，中苏关系的缓和转为冷淡、僵滞状态。此后至1962年10月，以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中苏的斗争为起点，中苏关系的缓和期正式结束。导致中共于1962年末结束对苏缓和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为经济因素。中共中央总结前一阶段政策失误的教训时，暴露出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倾向，这触动和超越了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二为政治因素。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彭德怀里通外国、勾结苏联一事，实际激起了毛泽东对中共政权不稳的敏感。6月和8月彭德怀连续上书和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据此批判“翻案风”，开始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三为意识形态因素。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纲全民党、全民国家思想的提出及其将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前景，超过了毛泽东所能容忍、让步的理论底线。中共此时结束让步政策还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形成。这种变化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同苏共进行斗争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令中共要做国际共运旗手的心理出现膨胀。如此内政外交互动的结果是，中共于1962年末在内部做出了中苏关系是敌我关

系的新的定性。毛泽东开始将对苏方针的基点由以缓和、让步为主，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主。苏联方面察觉到了这种变化，认为中国国内开始了对苏联的新的敌对行动。继之，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启动。

5.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范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先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国际共运中的各党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进行口诛笔伐的最基本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在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确定了两党分手的大局。中苏论战

导致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

6.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给中苏关系的和解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事实上，中苏两党在对缓和双方关系的评估中，仍然继续坚持认为自己的立场代表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与此相应，双方和解的基础实际也依旧是各自的原则立场。差距只在于双方寻求和解的目标有所不同：苏方以为导致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苏共搬开了这块绊脚石，苏中关系的改善即应大有希望，苏共接受求同存异的团结方式。此为一种务实的和解方针。中方则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中共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苏共有可能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向中共的轨道靠拢。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共运的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中苏和解的底线已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苏共新领导集团改弦更张向中共的正确路线纲领趋同。毛泽东要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被动局面，使世界革命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的路线发展。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肯定苏共一党的会议，并将对二十大的高度评价写入会议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之中，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受羁绊的被动境地。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因此，就毛泽东而言，与其说是尝试寻求与苏共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要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改弦更张，国际共运能以中共的路线纲领为指导，则中共将留在国际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7.中国开始脱离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轨道，寻求做世界革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确立的方针：一是领导左派党从事国际共运，进行世界革命。其主要步骤为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共运左派党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鼓励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部左派分子闹分裂，支持国际共运左派分裂势力，与苏共唱对台戏。二是强调世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拓展国际共运的范畴，争取更多的亚非拉要求独立的国家，树立世界革命运动领袖的形象。其主要步骤为坚决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排斥苏联参与亚

非事务；加强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援助。事实上，1964年中期至1965年中期，中国反对苏联召集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举行会议与中国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同步演进的。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举行，这次会议使苏联成为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支持和援助越南抗美斗争的领导人，而中国则因抵制会议而陷于被动。以中共抵制参加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分裂。毛泽东立意另辟新途，领导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援越抗美，而第二次亚非会议正好为中国领导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和舞台。事实上，毛泽东决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通过这种形式，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国家，孤立苏联。中苏双方实际借越战升级之机，以越南的抗美斗争为典范，通过第二次亚非会议这个论坛，争夺对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随着亚非国家的分裂，毛泽东将争取的重点放在了争夺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左翼政治领导人、政党和革命力量上面，并试图以这些国家为基点，扩大影响，展开其世界革命的宏图。这期间，世界反帝斗争呈现出两个中心的特点。这种状况实际并不利于越战升级后越南的抗美斗争，其不仅为中越关系埋下了隐患，也使中国的形象大打折扣。苏联这时利用共运国际会议和筹备亚非会议之机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中国则是步步被动，拒绝出席莫斯科三月会议，国际共运分裂；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亚非国家为此分裂。在苏联抓住越战升级这个机遇做足团结反帝文章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两次陷入被动境地，只能在领导国际共运少数左派党的同时，继续领导第三世界少数激进的国家进行反帝反殖运动和世界革命。

8.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底线为：必须提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苏方承认这一点，中方可以放弃争议地区。当中苏两国代表团在磋商中暂时搁置不平等条约的原则分歧，苏方实际做出重大让步，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出现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后，毛泽东于7月10日向日本社会党人士发表了同苏联算领土账问题的著名谈话，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起到了破坏谈判进程的作用。考察毛泽东设立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为了保证他自己设计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就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

的苏联政府来说，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是其无法接受的条件。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愈益被政治化，边界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中苏双方在边界斗争上，从谨慎、克制，发展到主动反击，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同盟关系终结。

9.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重兵压境的威胁，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考虑选择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实现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战略目标。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中国南部的压力在客观上减轻的现实，则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因深陷印支战场而力量削弱，苏联势力的扩展已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尼克松政府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越战、借助中国力量与苏联抗衡，扭转与苏竞争中的被动局面。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中美高层会晤中，双方在共同抗衡苏联的扩张问题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两国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围绕苏联问题，两国领导人互通情报、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双方还在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1973年初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飞机及定位导航系统，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初步合作由此开始。尼克松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实际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有关中苏关系与新中国外交缘起之间的互动，牛军提出了如下一些引人注意的解释：

1.提出冷战、革命—建国与革命意识形态这三个历史因素构成了理解、分析和叙述冷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缘起这个历史过程的起点、基本线索和基本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是在外部世界的冷战与内部的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的互动中发生和演变的，并逐步建构出一

套理念、话语和外交行为方式，以及形成了一些影响相当久远的重要特征。从历史进程看，1949—1955年的“新中国外交”即是革命和建国相互重叠时期的外交，它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基本形势就是冷战。进一步说，中国外交在从“革命”向“建国”演进的过程及其中的种种曲折变化，同冷战早期阶段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从尖锐对抗到趋向缓和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需要回应美苏全球战略博弈造成的有时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内部面对的不仅是革命运动的诉求，还有从革命向建国过渡时期必然出现的各种基本诉求。这些内部的基本诉求也在决定着中国人对外部冷战形势做出何种反应。因此，确立研究和解读这段中国外交历史的结构对于揭示其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2.建国时期的外交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这个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是同中共领导人在冷战早期阶段向苏联“一边倒”这个选择互为因果的。这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表明，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上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国际体系来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受到中苏结盟过程的巨大影响。从这个时期的结局看，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行为对新国家的身份建构和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其开始阶段即迅速完成了国家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其中外交所起的作用之巨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它为新国家建构了三个基本身份和认同，即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和新兴民族国家(后来统称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中国后来(有些甚至持续到今天)诸多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这为如何界定和评价早期冷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如何进一步评价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以及界定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等，提出了新的视角和领域。

3.通过同时考察了中共决定“一边倒”和处理对美关系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与美国的交往及其结果。在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人是在两个领域思考和处理对美关系的，它们分别是防止美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和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这两个问题因为中共的革命和建国之间紧密连接和重叠而同时出现，这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冲突的矛盾导致了中共中央有关思考和决定的起伏与变化，有关政策被证明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同中共与苏联的互动有复杂的联系。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1950年初中苏结盟，是朝鲜战争使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格局固定下来，并从此开始持续了20年，成为东亚冷战的中心问题和左右东亚国际政治走势的最为严峻的事态。存在这样一个

变化的过程说明，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即便中苏结盟，中美的和解也很有可能大大提前。

4.指出冷战与中国外交互动对中国东亚地区政策的特殊影响。建国初期在东亚毗邻地区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采取的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冷战中美苏对抗比较尖锐的时期，以致中国领导人当时都没有将它们看作是地区范围的冲突。他们当时将中国同这个地区各国家的双边问题等，都同冷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全球性思考、战略设想及战略选择联系在一起，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发生在中国革命方才奠定胜局和方才选择同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的阶段，从而导致了在这两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中包含了大量中国领导人对冷战下的世界政治之本质的理解，对这个时期的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产生超出中国边界的更大影响的期待。这种战略思考，导致中国在整个冷战中几乎都没有形成专门的东亚地区政策，对外战略缺乏必要的层次和清晰度。

5.将中国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置于同一结构中进行比较叙述，揭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特点对这个时期中国重大决策的影响。从同盟的角度看，在中苏两国战略认识比较一致的地区或问题上，中国有很强的支配力，如在印度支那地区和后来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在中苏战略互信比较低的时期和问题上，中国影响力就会比较低，例如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正是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导致同盟中出现了“尾巴摇狗”的情况，金日成实际上利用了中苏结盟中的缝隙，通过操弄抬高了朝鲜的影响力，这是朝鲜战争在违背中国意愿情况下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苏同盟中，中国外交对苏联的依赖度。

6.指出以1951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为标志，中国的基本安全态势已经隐然成形，此后在早期冷战逐步走向缓解的同时，建国初期重大决策中的地缘战略考虑也日渐突出。在这两个重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策逐步转向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屏障，并为此推动周边事态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套处理周边国际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基本经验，即“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后来的历史证明它们在被反复应用，至今未变。从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初印度支那的战争升级到夏季日内瓦会议达成恢复和平的协议，以及随后立即出现的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然后到1955年夏季，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从军事冲突走向缓和的循环，直到1955年夏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才

基本结束。在这个军事较量和外交折冲交替出现的阶段，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决策最终为中国塑造了独特的安全环境：在北部和西北部倚靠苏联，在东南沿海方向以及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等地区，处于与美国间接军事对峙的局面。冷战中的东亚地缘安全格局也因此而基本成形，即中苏同盟为中心的东亚陆地军事集团与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主要是海上国家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抗。这大致反映了中国塑造地区安全形势的能力和局限。

7.指出毛泽东在1954年夏季重提并解释“中间地带”思想的重大影响。1954年7月上旬，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其结果是在建国之初因与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后，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决心去开辟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战略空间。在此时刻，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如同当年走上井冈山，终于找到了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毛泽东认为“中间地带”有着影响世界政治前途的巨大潜力，是他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版图而找到的新的战略空间，他相信中国需要也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另一方面，这里对中国也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中国需要在这里阻击美国的扩张。总之，这里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战略竞争的舞台，中国领导人从此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了新的外交战场，他们试图由此打开重塑东亚冷战的道路，结果中国外交实际上成了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从历史的深层看，这次转变也反映了中国外交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即作为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一过渡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考和决策。总之，到1955年这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刻，中国已经在为挑战冷战国际体系开辟新的基础，并有意无意地迈出了改造冷战的步伐。与此同时，也埋下了导致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种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由于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其间的空白和缺漏仍然不在少数。由于俄罗斯档案政策的紧缩，目前还有许多重要文件和史料没有公布，这种状况对学术研究自然起到了限制的作用。就中苏关系史而言，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即使是在政治、外交等目前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领域，仍然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例如，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目前尚未看到，这里涉及两

个重大问题：其一，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谈起中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的？这关系到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起源问题，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不同的说法 [40]。其二，关于中国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初协议规定的人数又是多少？这关系到后来终止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派遣劳工协议的原因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忆、俄罗斯学者的说法与中国省市档案的记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41] 其他还有很多，如1957年7—9月，赫鲁晓夫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有关会议的讨论情况；1959年5—6月彭德怀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的内容，尤其是涉及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问题；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和原子弹样品前其内部讨论的情况；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工作专家前其内部讨论的情况等。

总之，可以预言，随着俄罗斯以及中国档案文献的继续解密和开放，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必定还会有重大的进步。

[1] 例如：R.L.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London, 1966; C.J.Zablocki (ed.), *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1966; R.A.Rupen and R.Farrell (eds.),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7; M.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1967; W.C.Jr.Clemens, *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Stanford, 1968.

[2]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 -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3]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中央两位官员的化名著作：Борисов О.Б., Колосков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80, 中译本见：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鲍里索夫即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О.Б.罗满宁，科洛斯科夫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Б.Т.库利克。

[4] 关于俄罗斯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Mark Kramer, “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 Progress and Pitfall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3, Fall 1993, pp. 18-39; 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5] Мясников В.С.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тся сложным*, 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 1946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4-13 ;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000 , №6 , с.117-122 ;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Еще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В.Сталину от 30 ноября 1947 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001 , №5 , с.119-122.

[6]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0//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1994 , №4-5 , с.132-140.

[7] 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995 , №2 , с.96-111 ; №3 , с.94-105.

[8]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996 , №4 , с.66-83 ; №5 , с.84-94.

[9]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1997 , №1 , с.23-47 ;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12 советов И.В.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4 , №1 , с.125-131.

[10] 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талин ,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 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5 , №5 , с.79-113.

[11] Бухерт В.Г.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Сталину и Н.С.Хрущеву , 1951-1957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 2006 , №4 , с.14-28 ; Григорьев А. , Зазерская Т.Мао Цзэдун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 .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994 , №5 , с.101-111.

[12] Зубок В.М.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 №1 , 100-128 ; №2 , с.94-106.

[13] Мясников В.С.Ваше письмо зовет к сплочению—и это хорошо.Из служеб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КНР С.В.Червоненко , 1960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 2006 , №5 , с.3-11 ; Прозументчиков М.Ю.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Неув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к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 1964-1965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 2006 , №5 , с.12-27 ; 2007 , №1 , с.3-24.

[14]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三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5] 例如，列多夫斯基关于米高扬秘密访华的文章发表后，因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中共曾提出掌握政权后将把民主党派赶下政治舞台的说法，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便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

疑，甚至直接否认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见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详见《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二节。

[16]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2 ; Волков 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1998.值得提到的是，利用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的文件编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也有许多涉及中国和中共问题的重要资料。见Димитров Г.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вари 1949), София :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издателство“Св.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17]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гг.,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1950, К. 1 : 1946-1948гг. ; К. 2 : 1949-февраль1950гг.,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18] CWINP Bulletin, Issues 16, Winter 2007/2008, pp.113-177.

[19] Хлевнюк О.В., Горлицкий Й.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2.直到1952年10月十九大召开前，苏共的正式名称应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为叙述方便，本书在一般情况下都使用“苏共”一词。

[20] Артизов А.Н.и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 МФД, 2007.

[21]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3 ; Том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6 ; Том3.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8.

[22]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1, Взгляд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т.2,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9、2010.

[23]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24] 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25] 原中央党务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26]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27] 其中包括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卷)、《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卷)。这些原始文件汇编均未出版，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

[28] 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世界历史年刊》1997年号；《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7辑(1998年9月)；《〈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2002年5月)；《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29] 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 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0] 这两次讨论中苏关系历史的会议均有论文集，一本正在编辑中，一本已经出版了中文本，见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1] Брежнев А.А.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Москва：НИМ РАН，199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Рахманин О.Б.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2。

[32] Ткаченко Б.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Уссури，1999；Мясников В.С.，Степанов Е.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1；Попов И.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300 лет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Рябушкин Д.С. Мифы Дама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Ивасита А. 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6.

[33] Бармин В.А. Сын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СПбГУ, 2000; Мартыненко В.П. (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5.

[34] 原文为德文, 中译本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 张文武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35]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36]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 C. &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7] Elizabeth McGuire, *The Sino-Soviet Romance: How Chinese Communists Fell in Love With Russia, Russian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Douglas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7*.

[38]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39]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1948—1953》,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 2000年版;《苏联专家在中国》(修订版),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40] 参见师哲回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李海文整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目前尚无有关的档案文献可以对此进行验证。

[41] 有的说，是毛泽东首先提议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有的说是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的建议；最初提出的劳工人数，有的说是1000万，有的说是100万或150万；至于协议中确定的赴苏联的中国劳工人数，有的说是20万，有的说是8万。详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5—389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с.216; Ващук А.С., КрушановаЛ.А.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пополнения труд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СССР, 1945-1950 гг.//Росс и яиАТР, 2006, №1, с.5-13; КрушановаЛ.А.Китайские рабочие в СССР(1945-1960-е годы)||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7, №3, с.118-122; Дацышен В.Китай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2008, №5, с.99-104; 国务院致山东等省电, 1955年2月12日, 山西省档案馆, C55-1007-92, 第6页; 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赴苏工作组的报告, 1955年9月6日, 河北省档案馆, 932-1-294, 第11—28页。

目录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编辑委员会

出版前言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第一卷(1945.1—1949.2)

1945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
(1945年7月7日)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
(1945年7月9日)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
(1945年7月10日)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
(1945年9月6日)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
(1945年10月5日)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
(1945年11月7日)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
(1945年11月17日)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

12月30日)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946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1946年7月24日)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1947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
(1947年6月12日)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
(1947年7月14日)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
(1947年12月10日)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7年12月11日)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
(1947年12月30日)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1月3日)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1948年3月30日)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1948年4月2日)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8年4月22日)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1948年5月10日)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1948年5月10日)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6月21日)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

月2日)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1948年7月14日)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1948年7月14日)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1948年9月

28日)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1948年10月6日)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1948年10月16日)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1948年10月17日)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1948年10月17日)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1948年10月17日)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1948年10月30日)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1948年11月6日)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11月23日)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1948年11月26日)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1948年12月7日)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2月9日)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1948年12月10日)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

月27日)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1948年12月27日)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
(1948年12月28日)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
(1948年12月29日)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
12月30日)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
月31日)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
12月31日)

1949年

№1605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
(1949年1月1日)

№09023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
(1949年1月5日)

№164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
月6日)

№16442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
议(1949年1月7日)

№09026 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
系(1949年1月8日)

№1644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1949年1
月8日)

№16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1949年1月
9日)

№16446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
对策(1949年1月10日)

№16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1949年1月
10日)

№025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
月10日)

№025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
月11日)

№1605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1949年1月

11日)

№164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1949年1月11日)

№025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1 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1949年1月13日)

№025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4日)

№02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949年1月14日)

№164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5日)

№16453 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1949年1月15日)

№09045 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1949年1月17日)

№1645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1949年1月17日)

№16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1949年1月17日)

№16461 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1949年1月17日以后)

№343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1949年1月23日)

№10238 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1949年1月27日)

№34385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1949年1月28日)

№3438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1949年1月28日)

№343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1949年1月30日)

№16465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1949年1月30日)

№09028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1949年1月31日)

№3439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

№1646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

№09029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2月1日)

№3439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1949年2月1日)

№34393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1949年2月1日)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1949年2月2日)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1949年2月3日)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

(1949年2月3日)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1949年2月4日)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1949年2月4日)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
(1949年2月6日)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
(1949年2月6日)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1949
年2月6日)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1949年2
月7日)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年2月7日)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
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
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
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
(1949年2月16日)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
(1949年2月20日)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
月21日)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
活动(1949年2月27日)

第二卷(1949.3—1950.7)

1949年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
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并统一
货币(1949年3月13日)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
(1949年3月15日)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1949年3月
18日)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
(1949年3月18日)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

题(1949年3月22日)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问题(1949年4月1日)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1949年4月28日)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9日)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1949年5月23日)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1949年5月25日)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2日)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1949年6月17日)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提供经

费(1949年6月18日)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1949年6月27日)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1949年6月30日)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1949年7月22日)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1949年8月2日)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1949年8月3日)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1949年8月5日)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联
(1949年9月9日)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
(1949年9月10日)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
(1949年9月12日)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1949年9月15日)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
(1949年9月19日)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
(1949年9月20日)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
(1949年9月22日)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2日)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1949年10月3日)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3日)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
(1949年10月3日)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
(1949年10月5日)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
(1949年10月7日)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
(1949年10月7日)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

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1949年10月16日)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1949年10月20日)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1949年10月24日)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0月25日)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1949年10月28日)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1949年10月28日)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1949年11月1日)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11808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转交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0日)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1949年11月17日)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13865 什捷缅科、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领馆事务(1949年12月1日)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2月12日)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1949年12月13日)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

校(1949年12月24日)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1949年12月28日)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侑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1949年12月29日)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49年12月30日)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1949年12月31日)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950年

№13808 关于苏联代表团在亚澳工会北京会议表现的材料(1950年1月)

№09915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与印度、缅甸建交问题(1950年1月1日)

№09083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对华政策(1950年1月1日)

№133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对华贸易问题(1950年1月2日)

№1657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求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1950年1月2日)

№1657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1月2日)

№16577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邀请周恩来访苏(1950年1月4日)

№05131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

稿)(1950年1月5日)

№09914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小丰满水电站等问题
(1950年1月6日)

№16578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访苏安排和英国承认中国
(1950年1月6日)

№1658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1950年1月6日)

№1332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小丰满水电站问题
(1950年1月7日)

№14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供应燃料
(1950年1月7日)

№16579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与毛泽东会谈情况(1950年1月7日)

№133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周恩来访苏安排
(1950年1月7日)

№00257 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8日)

№16581 斯大林致科托夫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50年1月8日)

№05132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第二稿)(1950年1月9日)

№05133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第三稿)(1950年1月10日)

№00258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同意接收朝鲜籍部队回国
(1950年1月11日)

№05134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第四稿)(1950年1月12日)

№1658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要求访问列宁格勒
(1950年1月12日)

№13806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1月13日)

№05135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备忘录：关于条约的吸收问题(1950年1月13日)

№05136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第五稿)(1950年1月15日)

№09091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援助、越南、日共等情况(1950年1月16日)

№09092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遣送越境中国军人等问题(1950年1月16日)

№07353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1950年1月16日)

№05137 苏联外交部将提交给中方的有关条约谈判的文件草案(1950年1月16日)

№24796 会议讨论记录：在中国放映苏联影片及对华广播问题(节录)(1950年1月16日)

№133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派遣教师(1950年1月17日)

№00606 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艾奇逊的演说(1950年1月17日)

№09074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1950年1月17日)

№05138 苏联交通部的建议：关于长春铁路和大连港协定草案(1950年1月19日)

№05139 苏联交通部的备忘录：关于长春铁路新旧协定的对比(1950年1月19—20日)

№16595 缅希科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苏联与中国的贸易(1950年1月20日)

№0514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议定书(1950年1月21日)

№00260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问题(1950年1月22日)

№16002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22日)

№05142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草案(1950年1月22日)

№133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23日)

№05145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1950年1月24日)

№09075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间谍学校(1950年1月24日)

№05147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方文本的修改意见(1950年1月26日)

№05148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1950年1月

26日)

№05149 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

№07354 葛罗米柯与刘亚楼谈话记录：苏方提交航空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05155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

№05156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9日)

№133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30日)

№133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1950年1月30日)

№05151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1950年1月31日)

№05157 中方针对苏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修改稿提出的文本(1950年1月31日)

№05161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的中方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05162 中方提交的对苏方关于贷款的协定和议定书的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09088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新华社批驳美国的谣言(1950年2月[142])

№0060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谈判情况(1950年2月1日)

№0060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50年2月2日)

№05163 苏方最后提交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1950年2月2日)

№16583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1950年2月2日)

№00610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3日)

№16585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3日)

№133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党务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4日)

№09077 克鲁季科夫致外交部报告：1949年美国的对华政策
(1950年2月6日)

№09848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
(1950年2月6日)

№24797 加里宁致冯文彬函：转交苏联的体育资料(1950年2月9日)

№09849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
(1950年2月11日)

№00611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1950年2月12日)

№00612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股份公司和专家报酬等
(1950年2月12日)

№00613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和内容等(1950年2月13日)

№07355 维辛斯基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等
(1950年2月13日)

№24798 安德烈耶夫对中共文件《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述
(1950年2月13日)

№124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
(1950年2月15日)

№139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转交印度共产党的资料
(1950年2月15日)

№16593 史白夫与刘少奇和李克农谈话纪要：中苏签约招待会
(1950年2月15日)

№05166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中苏关于贸易协定草案的谈判
(1950年2月17日)

№24799 佩列韦尔泰洛致科舍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的工作(1950年2月22日)

№124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塔斯社北京总社
(1950年2月25日)

№124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一些新疆苏联公民的国籍(1950年2月26日)

№124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将空难人员骨灰运回新疆(1950年2月26日)

№09117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对溥仪等人及其贵重物品处置意见(1950年3月3日)

№124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闭驻北京的苏联总领事

馆(1950年3月7日)

№124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补偿在华苏联军士的开支(1950年3月7日)

№200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米高扬的任命(1950年3月7日)

№07356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1950年3月8日)

№09118 外交部和内务部呈斯大林请示：对溥仪等人及其物品的处置意见(1950年3月9日)

№09851 史白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苏中合营公司协定(1950年3月9日)

№09852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台湾驻日使团等问题(1950年3月9日)

№24801 苏联向中苏友协旅大分部转交的教材和文学作品清单(1950年3月16日)

№124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1950年3月17日)

№124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国驻苏使馆代表越南利益(1950年3月17日)

№124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德日战俘问题(1950年3月17日)

№09850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召开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18日)

№09853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0日)

№11416 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

№124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保共同管理中长铁路(1950年3月22日)

№124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签署苏中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22日)

№124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在华苏联专家的待遇(1950年3月22日)

№13002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协定的中方草案(1950年3月22日)

№0985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3日)

№124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0年3月25日)

№124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签署民航公司协定公报(1950年3月27日)

№12490 关于中苏签署成立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1950年3月27日)

№24802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3月30日)

№26316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请求派专家去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1950年3月30日)

№12486 苏联政府致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指令：确定中苏共管财产范围(1950年4月)

№12491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批准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1950年4月)

№24803 杰尼索夫与萧三会谈纪要：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1950年4月4日)

№124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苏中条约和协定(1950年4月7日)

№124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开设中国领事馆问题(1950年4月7日)

№124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1950年4月7日)

№124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财产移交委员会苏方人员组成(1950年4月7日)

№24802 2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1950年4月8日)

№00274 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1950年4月10日)

№124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日梅霍夫等人在华逗留期限(1950年4月13日)

№124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1950年4月17日)

№124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1950年4月21日)

№124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阿尔希波夫任经济参赞(1950年4月24日)

№12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中文字幕

(1950年4月25日)

№124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出席万国邮政联盟会议问题(1950年4月27日)

№09085 通金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援助中国救灾问题(1950年4月28日)

№24802 1 苏联专家菲利波夫的报告：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5月2日)

№00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1950年5月3日)

№12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临时代管中国在阿富汗使馆的财产(1950年5月5日)

№124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黄鼐来苏联治病(1950年5月5日)

№124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1950年5月11日)

№0027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访华计划(1950年5月12日)

№09079 中共中央情报部通报：美、日、蒋的反共计划(1950年5月12日)

№124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宗教代表团访华(1950年5月12日)

№24796 2 季托夫致叶罗费耶夫通报：关于苏联对华广播(1950年5月12日)

№00278 罗申致莫斯科电：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5月13日)

№0027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1950年5月14日)

№1456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朝鲜局势的评价(1950年5月14日)

№139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统一后与中国签约(1950年5月16日)

№124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1950年5月17日)

№125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允许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休假(1950年5月18日)

№125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政府移交财产事宜(1950年5月18日)

№24805 苏方向旅大地区中苏友协转交的资料清单(1950年5月18日)

№1250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各国文字(1950年5月23日)

№09080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66号通报：美国在东京安置的人员(1950年5月29日)

№24806 张仲实致科舍廖夫函：关于苏联无线电广播问题(1950年5月30日)

№24807 塔拉索夫的报告：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1950年6月[199])

№1659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中共代表团的感谢信(1950年6月19日)

№13276 奥尔洛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代表团赠送礼物(1950年6月21日)

№13287 科瓦廖夫致罗迈进函：对中国书籍提意见(1950年6月30日)

№00281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领导人的政治情绪(1950年7月2日)

№00284 斯大林致罗申电：关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的问题(1950年7月5日)

№00285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经中国东北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7月6日)

№09121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溥仪战犯(1950年7月6日)

№00287 斯大林致罗申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1950年7月8日)

№2006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经中国铁路运送武器等事(1950年7月8日)

№00293 斯大林致罗申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1950年7月13日)

№2006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1950年7月15日)

№20067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

№0029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中朝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1950年7月22日)

№00296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同意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0

年7月25日)

№09123 维辛斯基和谢罗夫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战犯(1950年7月26日以前)

№13285 罗迈进致帕利古诺夫函：关于中国土地法令的资料(1950年7月27日)

№24808-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1950年7月27日)

第三卷(1950.8—1951.8)

1950年

№25834 普里霍多夫致葛罗米柯函：呈送贾尔卡赛汗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记录(1950年8月15日)

№24808 博尔德列夫报告：在中国举行的讲座和座谈(1950年8月18日)

№20069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请求提供国际空军援助(1950年8月19日)

№09125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移交战俘执行情况(1950年8月23日)

№09855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整风等问题(1950年8月26日)

№00298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防空专家(1950年8月27日)

№14571 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1950年8月27日)

№20071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1950年8月28日)

№20072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

№0029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与金日成会晤的情况(1950年8月30日)

№20074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关于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1950年8月31日)

№13288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1950年9月)

№20075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向旅顺地区增派空军(1950年9月13日)

№20250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对朝鲜战事的建议(1950年9月18日)

№24810 格里戈良致莫洛托夫报告：在东方学研究所组建中国部(1950年9月18日)

№11816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美军仁川登陆后应采取的对策(1950年9月20日)

№00304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空军问题(1950年9月21日)

№13286 罗迈进致塔尔科夫斯基函：鉴定中文版译著的质量(1950年9月21日)

№20081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

№20252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谈朝鲜和中国国内情况(1950年9月21日)

№2008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9月22日)

№20251 罗申致斯大林电：刘少奇谈中国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1950年9月22日)

№20253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美国在朝鲜的意图(1950年9月22日)

№2481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1950年9月22日)

№00305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歼击机团事宜(1950年9月23日)

№13289 周扬等致帕利古诺夫函：感谢塔斯社的帮助并咨询(1950年9月25日)

№003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马特维耶夫的指示(1950年9月30日)

№0031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

№11417 中国长春铁路局苏方局长的命令：移交中长路财产(1950年9月30日)

№00315 斯大林致罗申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1950年10月1日)

№07346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1日)

№118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1950年10月1日)

№00316 罗申致斯大林电：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见(1950年10月3日)

№00317 罗申致斯大林电：尤金帮助筹备《毛泽东选集》出版情况(1950年10月4日)

№118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考虑(1950年10月5日)

№24812 苏中铁路代表会谈纪要：关于建立直通铁路运输(1950年10月6日)

№20088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决策的情况(1950年10月7日)

№11821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10月7日)

№00322 斯大林致金日成函：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1950年10月8日)

№160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8日)

№2009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已得到中国将出兵的通报(1950年10月8日)

№20091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部署中国军队的意见(1950年10月8日)

№2009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感到前途光明(1950年10月8日)

№16008 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放弃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50年10月11日)

№1600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暂不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160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2日)

№16011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电：立即组织朝鲜政府撤退(1950年10月12日)

№20093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入朝计划(1950年10月12日)

№16012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3日)

№00326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及对苏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

№0032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再次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13日)

№0033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决定执行撤退计划
(1950年10月14日)

№0033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停止执行撤退的计划(1950年10月14日)

№20095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报告：苏军将在中国东北集结(1950年10月19日以前)

№003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0年10月27日)

№20102 巴季茨基的报告：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将开往中国
(1950年10月28日)

№003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1950年10月29日)

№14149 普希金致斯大林报告：美国对朝鲜海岸实行封锁
(1950年10月29日)

№2010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航空兵部队集结并开往中国(1950年10月30日)

№00338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朝鲜人民军到中国进行整编的情况(1950年10月31日)

№20232 波卢博亚罗夫致什捷缅科报告：对移交中国的坦克装备维护问题(1950年11月3日)

№20109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
(1950年11月5日)

№26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帮助(1950年11月6日)

№003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11月7日)

№00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
(1950年11月9日)

№11418 哈尔滨工业大学苏联专家的报告：哈工大情况介绍
(1950年11月11日)

№125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来苏学习
(1950年11月13日)

№003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加强空军的建议(1950年11月15日)

№003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1950年11月16日)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中长铁路监事会苏方

主席(1950年11月16日)

№20114 库德里亚夫采夫致军事部报告：向中国提交苏军用中文地图(1950年11月16日)

№26130 阿巴库莫夫致斯大林特别报告：在中国逮捕俄国侨民问题(1950年11月16日)

№00349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抽调驻旅大地区苏军的汽车(1950年11月17日)

№003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1950年11月17日)

№20115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彭德怀与金日成讨论前线形势和对策(1950年11月17日)

№20116 索科洛夫致军事部报告：苏联坦克部队在中国部署和培训任务(1950年11月20日)

№2011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1950年11月20日)

№26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逮捕俄罗斯侨民问题(1950年11月20日)

№20119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第五十歼击航空师转场至鞍山(1950年11月21日)

№2481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1日)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健医生(1950年11月22日)

№2481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同意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1950年11月22日)

№20121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关于第一六二轰炸航空师组建情况(1950年11月22日)第1104082号

№1250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粟裕来苏治病问题(1950年11月23日)

№2481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派篮球运动员去中国进行示范表演(1950年11月23日)

№2012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同金日成讨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50年11月24日)

№24817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1950年11月24日)

№20123 朝鲜致苏联照会：请求派军事专家到中国培训朝鲜飞行员(1950年11月27日)

№003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遣朝鲜大学生去中国东北
(1950年11月28日)

№2012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请求允许其访华
(1950年11月29日)

№20125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关于向中国派遣空军部队的情况(1950年11月30日)

№2012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向中国发送部队及武器弹药情况(1950年11月30日)

№003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12月1日)

№20128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同意中朝联军由中国统一指挥
(1950年12月1日)

№09127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防空专家
(1950年12月2日)

№20234 苏军总参谋部二局报告：前往中国和朝鲜执行任务的人员情况(1950年12月2日)

№2481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
(1950年12月3日)

№00361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征求苏联对和谈的意见
(1950年12月4日)

№20132 苏联空军参谋部致总参报告：关于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4日)

№00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950年12月5日)

№20129 拉祖瓦耶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谈访华结果(1950年12月5日)

№00363 罗申致莫斯科电：中国政府关于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00364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00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停战问题的指示
(1950年12月7日)

№20235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在华苏联空军和坦克部队人员情况(1950年12月7日)

№00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评美英领导人的联合声明
(1950年12月9日)

№125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苏联杂志发表毛泽东的

文章(1950年12月10日)

№125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0年12月12日)

№24821 特里福诺夫致波兹杰耶夫函：关于驻上海新闻处的工作(1950年12月12日)

№124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薪金问题(1950年12月13日)

№125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几位大学生毕业后回国(1950年12月13日)

№125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美英政府的照会(1950年12月13日)

№20135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进攻迟缓不满(1950年12月13日)

№125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大连财产问题(1950年12月14日)

№2013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14日)

№12271 戈尔拉乔夫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1950年12月15日)

№20137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向中国发送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15日)

№125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国作家付稿酬(1950年12月18日)

№125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塔斯社驻北京分社副社长(1950年12月18日)

№20138 卢基扬琴科的报告：关于培训中国坦克部队情况(1950年12月18日)

№12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中国马戏团在苏期限(1950年12月21日)

№20140 马兰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24日)

№31211 罗申与罗瑞卿会谈纪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1950年12月25日)

№12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塔斯社驻北京记者人选(1950年12月25日)

№20141 拉祖瓦耶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不满(1950年12月30日)

№20142 巴季茨基的报告：派往中国的空军各师、团指挥人员名单(1950年12月30日)

№20143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同金日成讨论作战计划的情况(1950年12月31日)

№23386 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的问题：请教苏联农业如何组织领导(1951年前后)

1951年

№20057 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同中国协商转交航空师装备的问题(1951年1月)

№003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1951年1月4日)

№24823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为《人民中国》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5日)

№003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及行动计划(1951年1月7日)

№202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1951年1月8日)

№20148 第六十四歼击机空军报告：1950年11—12月的作战情况(1951年1月9日)

№24823-1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9日)

№09856 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纪要：给予中国技术援助事宜(1951年1月10日)

№133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转交大连等地资产(1951年1月12日)

№00369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转交给毛泽东的电报(1951年1月13日)第15451号

№00370 罗申致维辛斯基电：关于毛泽东将与金日成会谈(1951年1月13日)

№003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询问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4日)

№003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1951年1月15日)

№133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批准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人选(1951年1月15日)

№20149 克拉索夫斯基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空军1951年作战和培训计划(1951年1月16日)

№133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出差
(1951年1月17日)

№00373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9日)

№133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李周新来苏治病
(1951年1月19日)

№20001 尤金致斯大林报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1951年1月20日)\r\n

№003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1951年1月26日)

№00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
(1951年1月28日)

№003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1951年1月30日)

№003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问题(1951年1月30日)

№11523 高岗在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2月)

№26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影片《三次会见》的汉语配音(1951年2月2日)

№003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
(1951年2月8日)

№10217 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
(1951年2月9日)

№0038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12日)

№00385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派遣空军顾问去中国(1951年2月16日)

№00386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的问题
(1951年2月17日)

№133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在苏联科学院实习(1951年2月21日)

№0038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购买航空技术装备等问题(1951年2月23日)

№00388 罗申致苏联外交部等部门电：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比价问题(1951年2月24日)

№133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工会理事会工作小组

前往中国(1951年2月27日)

№09097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综述报告：关于1951年2月前的战争情况(1951年3月[74])

№25966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关于香港的简要情况(1951年3月)

№003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1日)

№003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1951年3月3日)

№24803 1 叶罗费耶夫与萧三谈话纪要：芭蕾舞剧《红罂粟花》(1951年3月6日)

№13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1951年3月14日)

№24826 帕利古诺夫与新华社驻苏代表会谈纪要：要求塔斯社提供消息(1951年3月14日)

№003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增派苏联歼击机师去中国(1951年3月15日)

№133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政府任命张闻天为大使(1951年3月16日)

№0039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3月18日)

№2482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中苏货币汇率问题(1951年3月22日)

№0039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调苏联高炮部队掩护志愿军后方(1951年3月23日)发自北京，1951年3月23日17时40分收到

№133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苏参加五一节活动(1951年3月24日)

№1178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铁路运输交志愿军管理(1951年3月25日)

№0039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海军装备(1951年3月27日)

№24828 萨夫罗诺夫的通报：中国报纸对苏联材料的利用(1951年3月27日)

№133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1年3月28日)

№00395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4月1日)

№2022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组建高炮和探照灯部队派往中国(1951年4月11日)

№20222 索科洛夫斯基的指令：第十探照灯团前往中国的行程安排(1951年4月11日)

№00396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1951年4月12日)

№133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张瑞华来苏治病(1951年4月13日)

№13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1951年4月18日)

№09857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1951年4月25日)

№133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长春铁路苏方领导人和代表(1951年4月28日)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003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发放武器和弹药生产许可证(1951年4月28日)发自北京，1951年4月30日3时40分收到

№125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1951年4月30日)

№003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1951年5月6日)

№00399 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1951年5月7日)

№133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1951年5月8日)

№24829 苏联科学院致联共(布)中央报告：与中国科学院的联系(1951年5月9日)

№133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文艺演出(1951年5月10日)

№1334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1951年5月16日)

№133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期限(1951年5月17日)

№20153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派遣航空军部队(1951年5月19日)

№20154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2日)

№004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2日)

№20155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1951年5月24日)

№0040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5日)

№24827-1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1951年5月26日)

№133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来苏参加夏令营(1951年5月26日)

№004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
(1951年5月26日)

№004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7日)

№0040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1951年5月29日)

№133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代表处(1951年5月30日)

№133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缩减中苏船舶公司经营期限(1951年6月2日)

№09947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中国出现大面积蝗灾(1951年6月4日)

№00407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彭德怀谈机动防御作战问题(1951年6月4日)

№0040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转发志司关于防御问题的指示(1951年6月4日)

№0040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1951年6月5日)

№004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赴苏问题
(1951年6月5日)发自北京，1951年6月5日18时30分收到

№0041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访苏问题
(1951年6月7日)

№004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
(1951年6月9日)

№133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学生回国度假
(1951年6月11日)

№100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处理蝗灾问题

(1951年6月12日)

№133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电影放映设备(1951年6月13日)

№029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对日共中央拨款10万美元(1951年6月13日)

№004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5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关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6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13日)

№00413 罗申转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20156 什捷缅科的指示：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情况(1951年6月14日)

№00417 高岗、金日成致斯大林函：请求接见和指示(1951年6月14日)

№0041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空军的状况和要求(1951年6月15日)

№13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刘少奇的电报问题(1951年6月16日)

№12273 科切爾金致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关于中国军队情况(1951年6月16日)

№004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1951年6月21日)

№00420 索科洛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关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1年6月23日)

№133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1951年6月23日)

№004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1年6月24日)

№00422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6日)

№133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1951年6月26日)

№00423 葛罗米柯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27日)

№24831 凯洛夫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要求与苏联中学生通信
(1951年6月27日)

№00424 美国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时递交的问题清单
(1951年6月27日)

№133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在
华期限(1951年6月28日)

№00425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
题(1951年6月28日)

№0042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
30日)

№0042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询问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
度(1951年6月30日)

№0042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
30日)

№0042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
30日)

№00430 苏联驻联大代表致外交部函：转交有关举行朝鲜停战
谈判的文件(1951年6月30日)

№1335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派尤金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00431 拉祖瓦耶夫致什捷缅科电：朝鲜对停战谈判问题的考
虑(1951年7月1日)

№02543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朝鲜政府应与中国协商
(1951年7月2日)

№004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建议
(1951年7月3日)

№0043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
(1951年7月3日)

№004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的中方建议(1951
年7月3日)

№004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建议的意见(1951
年7月3日)

№004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协议的草案(1951年7月
5日)

№24831-1 波诺马廖夫致苏斯洛夫函：对凯洛夫请求的答复
(1951年7月5日)

№004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联络官会议情况(1951

年7月10日)

№00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0043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号简报(1951年7月11日)

№004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感谢提供停战谈判情报(1951年7月12日)

№0044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3号简报(1951年7月13日)

№004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记者到开城地区(1951年7月13日)

№0044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7月13日)

№0044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谈判策略(1951年7月14日)

№00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区问题(1951年7月14日)

№133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记录：关于苏联公民前往中国事宜(1951年7月16日)

№004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4号简报(1951年7月16日)

№00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中南日发言(1951年7月16日)

№0044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建立开城中立区的谈判方案(1951年7月16日)

№09858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1951年7月17日)

№004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5号简报(1951年7月17日)密码电报第21936号

№0045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议程等问题的方针(1951年7月18日)

№0045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6号简报(1951年7月19日)

№004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策略问题(1951年7月20日)

№0045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7号简报(1951年7月20日)

№0045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1951年7月20日)

№0045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关于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1日)

№004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军列入议程(1951年7月21日)

№09928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朝鲜战争前景及中国政治形势(1951年7月24日)

№09868 罗申与董必武会谈纪要：中国的国内局势(1951年7月25日)

№00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6日)

№0045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9号简报(1951年7月26日)

№0045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0号简报(1951年7月27日)

№0046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停战谈判中应严厉驳斥美方(1951年7月28日)

№0046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2号简报(1951年7月29日)

№0046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3号简报(1951年7月30日)

№004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补发美方对缓冲区的意见(1951年7月30日)

№31213 罗申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需求(1951年7月30日)

№20159 别洛夫的作战命令：掩护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目标(1951年7月31日)

№0046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4号简报(1951年7月31日)密码电报第22366号

№004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在停战谈判中的发言(1951年7月31日)

№133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驻中国记者回国(1951年7月31日)

№13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杨少玉来苏治病(1951年8月1日)

№004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5号简报(1951

年8月1日)

№133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2日)

№004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6号简报(1951年8月2日)

№0046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1951年8月2日)

№248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苏联派遣大学生和工作人员(1951年8月2日)

№13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中国部主任回国(1951年8月3日)

№004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7号简报(1951年8月3日)

№24833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苏(1951年8月4日)

№004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8号简报(1951年8月4日)

№004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1951年8月5日)

№0047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9号简报(1951年8月5日)

№13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林立和舒林来苏治病(1951年8月6日)

№13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1951年8月7日)

№0047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0号简报(1951年8月11日)

№004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确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策略(1951年8月11日)

№11863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通知中国苏联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1951年8月12日)

№004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1号简报(1951年8月12日)

№0047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发言(1951年8月12日)

№0047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停战谈判最终目标的考虑(1951年8月13日)

№0047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斗争的策略(1951年8月13日)

№0048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2号简报(1951年8月13日)

№133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13日)

№133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1951年8月14日)

№0048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3号简报(1951年8月14日)

№004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4号简报(1951年8月15日)

№0048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缓冲区界线问题(1951年8月15日)

№0048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5号简报(1951年8月16日)

№0048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小组委员会问题(1951年8月16日)

№133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国际奖(1951年8月16日)

№004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6号简报(1951年8月17日)

№02949 金日成致拉祖瓦耶夫函：请求苏联提供军工生产设备(1951年8月17日)

№00487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8月17日)

№24834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8月17日)

№004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7号简报(1951年8月20日)

№133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了解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1951年8月20日)

№133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0日)

№1337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苏联电影(1951年8月23日)

№133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

况(1951年8月24日)

№125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苏方董事(1951年8月25日)

№20160 别洛夫的指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1951年8月25日)

№004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因敌破坏活动宣布暂停谈判(1951年8月27日)

№24826-2 帕利古诺夫与邱杜易会谈纪要：驻外记者的豁免权问题(1951年8月27日)

№125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7日)

№125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刘竞雄来苏联治病(1951年8月28日)

№125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1951年8月28日)

№143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8月29日)

№004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朝方面的谈判立场(1951年8月29日)

№0049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暂不邀请中立国代表参加谈判(1951年8月30日)

№00492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函：关于美英打捞米格飞机事件(1951年8月30日)

№133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1年8月31日)

第四卷(1951.9—1954.1)

1951年

№20161 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1951年9月)

№11528 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1951年9月)

№133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1951年9月1日)

№125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1951年9月1日)

№12985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12984 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13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1951年9月6日)

№133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9月6日)

№0049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1951年9月8日)

№004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0日)

№1182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1951年9月10日)

№248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9月10日)

№004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1951年9月12日)

№248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1951年9月16日)

№133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1951年9月18日)

№004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0日)

№133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1951年9月22日)

№133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1951年9月24日)

№133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51年9月25日)

№004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6日)

№133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1951年9月29日)

№1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1951年9月30日)

№20003 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1951年9—10月)

№24839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1951年10月)

№20162 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1951年10月)

№133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2日)

№10777 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10月3日)

№0049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4日)

№133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1951年10月4日)

№20042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1951年10月5日)

№133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5日)

№261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1951年10月5日)

№23388 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正本(1951年10月5日)

№134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7日)

№133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1951年10月7日)

№133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1951年10月7日)

№005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7日)

№24837 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1951年10月15日)

№0050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1951年10月18日)

№005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1951年10月24日)

№0050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1951年10月25日)

№005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0050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

(1951年10月25日)

№005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1951年10月25日)

№005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1951年10月26日)

№0050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1951年10月26日)

№24838 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1951年10月26日)

№005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1951年10月31日)

№005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1951年10月31日)

№261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1951年10月31日)

№005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1951年11月1日)

№005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1951年11月1日)

№0051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1年11月13日)

№24840 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1951年11月13日)

№0051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1951年11月14日)

№00520 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1951年11月19日)

№005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1951年11月19日)

№200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1951年11月19日)

№02544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1951年11月20日)

№00523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1951年11月21日)

№0052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1951年11月22日)

№00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1951年11月22日)

№11419 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1951年11月23日)

№202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1951年11月24日)

№0052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1951年11月27日)

№05295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1951年12月1日)

№0529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1951年12月1日)

№00527 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1951年12月9日)

№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1951年12月12日)

№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1951年12月12日)

№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1951年12月28日)

1952年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1952年1月7日)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1952年1月12日)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1952年1月12日)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1952年1月22日)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1952年1月28日)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1952年1月31日)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
(1952年2月3日)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
(1952年2月8日)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1日)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
(1952年2月23日)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
(1952年2月23日)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
(1952年3月3日)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
(1952年3月8日)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8日)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

年3月10日)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
(1952年3月12日)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
年3月14日)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
铁路(1952年3月15日)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18日)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
(1952年3月20日)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1952年3月21日)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
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
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1952
年3月31日)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
(1952年4月2日)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1952
年4月4日)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
(1952年4月5日)

№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2
年4月9日)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
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1952年4
月17日)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1952年4月22日)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1952年7月18日)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

(1952年7月24日)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1952年9月17日)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1953年

№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1953年1月3日)

№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3年1月7日)

№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1月12日)

№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1953年1月15日)

№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1953年1月17日)

№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1953年1月18日)

№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1953年1月21日)

№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1953年1月27日)

№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1953年1月29日)

№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4日)

№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23日)

№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1953年3月4日)

№24869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1953年3月7日)

№12245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1953年3月14日)

№0057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1953年3月19日)

№12280 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1953年3月21日)

№21322 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1953年3月23日)

№09994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1953年3月29日)

№2487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1953年4月)

№23756 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1953年4月13日)

№21323 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1953年4月17日)

№23756-1 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1953年4月29日)

№25948 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1953年5月7日)

№20023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1953年5月11日)

№21338 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1953年5月27日)

№21339 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1953年6月9日)

№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1953年6月15日)

№20203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1953年7月3日)

№005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1953年7月4日)

№00580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1953年7月4日)

№23759 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

(1953年7月8日)

№0996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1953年7月17日)

№20205 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1953年7月22日)

№0058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1953年7月23日)

№0058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1953年7月24日)

№0986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1953年7月27日)

№09995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1953年7月29日)

№09862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1953年7月30日)

№23733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1953年8月6日)

№25108 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1953年8月10日)

№23818 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1953年8月11日)

№20207 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3年9月以后)

№005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的结果(1953年9月1日)

№25109 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1日)

№21350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1953年9月12日)

№24873 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1953年9月15日)

№00593 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1953年9月29日)

№11423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的信(1953年10月10日)

№23762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1953年10月15日)

№21357 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1953年10月30日)

№20219 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1953年11月3日)

№24875 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1953年11月5日)

№21358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17日)

№11424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1953年11月17日)

№25110 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1953年11月21日)

№11425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1953年11月23日)

№20220 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1953年11月24日)

№213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26日)

№2487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1953年12月3日)

№11426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1953年12月8日)

№23828 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1953年12月16日)

№11427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1953年12月17日)

№2136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1953年12月17日)

№23826 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1953年12月24日)

№13729 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1953年12月30日)

№05304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1953年12月31日)

1954年 №24883 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1954年)

№13014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

(1954年1月4日)

№21367-1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
通讯员(1954年1月14日以前)

№21367 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
草案(1954年1月21日)

第五卷(1954.2—1955.7)

1954年

№13405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饶漱石
事件(1954年2月2日)

№13406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
全会情况(1954年2月13日)

№25967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
事演习(1954年2月21日)

№10128 尤金与黄文欢谈话纪要：越南抗法斗争局势(1954年3
月5日)

№2137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
(1954年3月5日)

№2074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
瓦会议(1954年3月6日)

№14580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
草案(1954年3月17日)

№21405 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草案
(1954年3月19日)

№21407 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1954年3月20日)

№21408 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
(1954年3月20日)

№13015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1954
年3月26日)

№14582 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
举问题(1954年4月)

№21409 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21411 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21406 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1954年4月13
日)

№21410 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14日)

№2141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关于中国宪法草案的结论(1954年4月14日)

№14581 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

№09863 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4年4月15日)

№08809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苏联考察边防工作(1954年5月11日)

№25152 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1954年6月15日)

№09931 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1954年6月17日)

№09929 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1954年6月28日)

№09930 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1954年7月5日)

№21415 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1954年6月30日)

№13016 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

№24880 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1954年7月7日)

№09973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1954年7月8日)

№2075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6日)

№20750-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7日)

№25144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5145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5146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20751 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1954年7月19日)

№10189 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1954年7月29日)

№20752 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提上日程(1954年7月29日)

№10151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1954年8月)

№08096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1954年8月)

№08097 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1954年8月5日)

№21381 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和考察的问题(1954年8月11日)

№21418 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1954年9月)

№21418-1 1950—1954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21418-2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21418-3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统计(1954年9月7日)

№21418-4 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1954年9月7日)

№08101 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9日)

№08098 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15日)

№25149 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1954年9月24日)

№24884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1954年9月25日)

№08100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10月12日以前)

№10219 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1954年10月21日)

№10207 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1954年11月3日)

№10208 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1954年11月5日)

№2139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的问题(1954年11月18日)

№21393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1954年12月3日)

№09932 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1954年12月11日以前)

№09864 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1954年12月27日)

№24888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12月28日)

1955年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和对外政策
(1955年1月8日)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
(1955年1月13日)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1955年1月28日)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1955年1月28日)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
(1955年1月29日)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
(1955年1月29日)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
(1955年1月30日)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
(1955年1月31日)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
(1955年1月31日)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
(1955年2月)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
(1955年2月1日)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
(1955年2月2日)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6日)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
(1955年2月8日)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
(1955年2月8日)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1955年2月8日)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
(1955年2月11日)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

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1955年2月22日)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1955年3月14日)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1955年3月30日)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3月31日)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4月6日)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1955年4月11日)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2日)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1955年4月28日)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

(1955年5月25日)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爾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

题(1955年7月9日)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1955年7月14日)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8日)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1955年7月18日)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第六卷(1955.8—1956.9)

1955年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1955年9月23日)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1955年12月10日)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1956年

№21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1956年1月10日)

№25946 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1956年1月10日)

№21457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月10日)

№20371 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1956年1月12日)

№20370 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1956年1月15日)

№21456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1956年1月19日)

№23065 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1956年1月19日)

№20370-1 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
(1956年1月20日)

№23953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6年1月20日)

№25169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
(1956年1月21日)

№20372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1956年1月24日)

№223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1956年1月30日)

№25176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1956年1月31日)

№20758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
各党交换意见(1956年2月7日)

№214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
联公民共度春节(1956年2月8日)

№25045 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1956年2月
9日)

№21835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
党协商的问题(1956年2月9日)

№25969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1956年3月2日)

№138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
题(1956年3月16日)

№21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
题(1956年3月16日)

№1260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
(1956年3月20日)

№12600 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
改造(1956年3月21日)

№23992 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
东方研究所的问题(1956年3月22日)

№25197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
(1956年3月24日)

№23936 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
国问题上的帮助(1956年3月26日)

№20760 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

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21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23060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1956年3月28日)

№23935 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1956年3月30日)

№1046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

№23064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5日)

№31225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1956年4月5日)

№02852 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1956年4月7日)

№02853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1956年4月9日)

№09840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6年4月9日)

№23027 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56年4月9日)

№09836 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1956年4月11日)

№21460 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1956年4月11日)

№20378 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1956年4月12日)

№21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1956年4月13日)

№21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

№31226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1956年4月17日)

№11449 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1956年4月27日)

№21462 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1956年4月27日)

№02856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1956年4月28日)

№2146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1956年4月30日)

№081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1956年5月2日)

№20373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1956年5月5日)

№24916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1956年5月7日)

№21463 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1956年5月10日)

№20374 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1956年5月17日)

№02860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1956年5月24日)

№25200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中苏补充协定(1956年5月29日)

№09834 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1956年6月6日)

№09842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1956年6月7日)

№21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1956年6月21日)

№21466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1956年6月27日)

№223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1956年6月29日)

№1037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1956年7月6日)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

№08812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19日)

№02862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1956年7月20日)

№21474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1956年7月26日)

№23029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1956年8月2日)

№20554 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3日)

№23028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1956年8月8日)

№20555-7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17日)

№1038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1956年8月20日)

№24925 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1956年8月22日)

№09835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8月22日)

№09839 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6年8月23日)

№21475 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1956年8月23日)

№09838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1956年8月25日)

№20761 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1956年8月25日)

№138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21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2185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1956年8月31日)

№20555-2 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1956年9月1日)

№20555-3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1956年9月4日)

№0991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1956年9月4日)

№09837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5日)

№21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1956年9月6日)

№138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1956年9月6日)

№20550 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1956年9月10日)

№0984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1956年9月11日)

№1038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9月14日)

№23063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1956年9月18日)

№20375 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1956年9月19日)

№103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1956年9月21日)

№25377 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1956年9月25日)

№21476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1956年9月27日)

№20590-1 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20590-2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9月28日)

第七卷(1956.10—1958.3)

1956年

№20590-3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1日)

№138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1956年10月4日)

№2055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

№2059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8日)

№20552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1956年10月15日)

№23030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

定一谈话纪要(1956年10月16日)

№0409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1956年10月18日)

№040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097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0409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1日)

№252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1956年10月22日)

№040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25203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1956年10月23日)

№097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0409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

№21477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1956年10月24日)

№20585-1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1956年10月26日)

№0409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1956年10月26日)

№097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28日)

№1605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1956年10月30日)

№097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

№25204 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1956年10月30日)

№097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1956年10月30日)

№097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1月1日)

№20586-1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5日)

№20376 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1956年11月6日)

№11453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1956年11月10日)

№223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1956年11月13日)

№20560-1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1956年11月19日)

№21487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1956年11月21日)

№20560-3 伊万诺夫与朴义琬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22日)

№23062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1月24日)

№16686-3 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1956年11月26日)

№2056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1956年11月28日)

№20560-5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1956年11月28日)

№21479 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1956年12月4日)

№10495 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1956年12月12日)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

№16686-4 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1957年)

1957年

№10181 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1957年1月4日)

№16683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1957年1月5日)

№21485 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1957年1月5日)

№25205 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1957年1月19日)

№138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1957年2月2日)

№207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1957年2月2日)

№21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1957年2月6日)

№21481 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1957年2月14日)

№24932 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7年2月22日)

№16686 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3月8日)

№20593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1957年3月9日)

№1049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1957年3月13日)

№25208 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1957年3月14日)

№16686-2 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1957年3月14日)

№24024 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1957年3月20日)

№24023 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1957年3月22日)

№138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1957年4月4日)

№25209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1957年4月8日)

№2059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57年4月9日)

№20596-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4月10日)

№24933 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1957年4月11日)

№20597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

国(1957年4月13日)

№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

№23032 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1957年4月23日)

№103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1957年4月24日)

№24934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1957年4月29日)

№25210 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7年5月17日)

№20599-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0日)

№20599-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2日)

№25211 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

№20599-3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3日)

№20599-4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6日)

№20599-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9日)

№20764 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1957年5月31日)

№16686-1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1957年6月1日)

№20600-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1957年6月4日)

№24936 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1957年6月5日)

№1180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1957年6月7日)

№20600-2 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6月11日)

№25212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1957年6月11日)

№09981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1957年7月3日)

№20601-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1957年7月5日)

№138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1957年7月8日)

№218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1957年7月8日)

№20602-1 普扎诺夫与朴义琬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1957年7月12日)

№20602-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1957年7月16日)

№20602-4 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1957年7月29日)

№08851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1957年7月31日)

№0885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1957年8月7日)

№25213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1957年8月8日)

№24937 《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1957年8月9日)

№2060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1957年8月9日)

№2060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年8月16日)

№20604-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1957年8月20日)

№20604-3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1957年8月23日)

№08877 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1957年8月27日)

№20604-4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7年8月28—30日)

№11455 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1957年9月18日)

№20608-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1957年10月7日)

№2521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

(1957年10月11日)

№20608-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1957年10月16日)

№24939 《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1957年10月18日)

№20607 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10月19日)

№20608-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1957年10月23日)

№0888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1957年10月28日)

№03372 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

№1382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1957年11月2日)

№2076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11月2日)

№200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1957年11月9日)

№138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1957年11月10日)

№2076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0日)

№1382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1957年11月12日)

№2076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2日)

№20606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1957年11月12日)

№08881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1957年11月19日)

№26346 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1957年11月19日)

№24940 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1957年11月23日)

№20609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1957年11月26日)

№20422 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1957年11月29日)

№08873 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1957年12月8日)

№10497 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1957年12月14日)

№08876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1957年12月16日)

№2061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17日)

№2061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20日)

№23033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1957年12月27日)

№23034 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1957年12月29日以后)

1958年

№09843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1958年1月10日)

№09890 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1958年1月20日)

№25081 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1月20日)

№24030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1958年1月28日)

№09889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1958年2月1日)

№20423 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1958年2月5日)

№24943 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1958年2月5日)

№2186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1958年2月13日)

№24050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1958年2月14日)

№20614-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15日)

№2521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1958年2月16日)

№20614-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1958年2月20日)

№20614-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22日)

№138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1958年2月27日)

№09888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1958年2月28日)

№20379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1958年3月1日)

№23035 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1958年3月8日)

№09887 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1958年3月9日)

№24035 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1958年3月13日)

№24037 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1958年3月21日)

第八卷(1958.4—1959.10)

1958年

№20380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1958年4月4日)

№0988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1958年4月5日)

№09886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1958年4月9日)

№20381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1958年4月10日)

№2061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1958年4月10日)

№20617-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1958年4月12日)

№0988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1958年4月12日)

№0988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

(1958年4月15日)

№10202 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1958年4月16日)

№03964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1958年4月17日)

№25220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1958年5月2日)

№20382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1958年5月7日)

№26361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1958年5月9日)

№0988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1958年5月9日)

№218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1958年5月12日前)

№26363 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1958年5月14日)

№26364 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1958年5月16日)

№24044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24044-1 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25221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1958年6月3日)

№20383 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1958年6月4日)

№20384 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58年6月4日)

№20385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1958年6月7日)

№20386 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1958年6月15日)

№20387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18日)

№1038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1958年6月19日)

№20388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20日)

№24944 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1958年6月24日)

№20389 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7月1日)

№26368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1958年7月3日以后)

№20390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1958年7月9日)

№13731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1958年7月11日)

№1382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1958年7月15日)

№204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1958年7月19日)

№204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1958年7月19日)

№1382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1958年7月24日)

№218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1958年7月24日)

№25080 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7月25日)

№09901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

№26367 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1958年7月28日)

№2039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1958年7月29日)

№11667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

№2041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

№2042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

№20392 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

会与中国的交涉(1958年8月2日)

№1166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1958年8月3日)

№138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1958年8月4日)

№218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1958年8月4日)

№20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1958年8月4日)

№09879 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1958年8月5日)

№20414 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1958年8月5日)

№09891 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1958年8月8日)

№2522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1958年8月16日)

№09878 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1958年8月26日)

№20679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1958年8月29日)

№24945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1958年9月)

№20680 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1958年9月3日)

№20393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1958年9月4日)

№20394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1958年9月5日)

№25971 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9月5日)

№09876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1958年9月6日)

№25227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1958年9月8日)

№2062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1958年9月9日)

№20395 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9月10日)

№08827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1958年9月11日)

№13734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1958年9月11日)

№20624-1 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3日)

№20415 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1958年9月15日)

№20624-2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7—19日)

№2039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8日)

№25228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1958年9月18日)

№13735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9日)

№20397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1958年9月21日)

№20398 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1958年9月23日)

№1382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1958年9月25日)

№20624-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1958年9月26日)

№138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10300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1958年9月27日)

№20399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1958年9月27日)

№218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20624-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1958年9月28日)

№20400 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20401 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1958年10月3日)

№20625-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1958年10月4日)

№2062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1958年10月5日)

№20402 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1958年10月7日)

№11428 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1958年10月9日)

№11780 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1958年10月10日)

№20403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20404 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20405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1958年10月20日)

№20406 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1958年10月20日)

№24093 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10月20日)

№20407 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1958年10月21日)

№20408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1958年10月22日)

№20410 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8年10月27日)

№138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8年10月30日)

№20411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1958年11月10日)

№20412 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1958年11月12日)

№24962 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1958年11月15日)

№20413 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1958年11月19日)

№26373 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1958年11月30日)

№24963 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1958年12月5日)

№09875 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1958年12月16日)

№20693 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1958年12月24日)

№20694 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1958年12月25日)

№20695 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1958年12月29日)

№25232 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1958年12月31日)

1959年

№26585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1959年1月1日以后)

№1038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俄语广播(1959年1月8日)

№24829-1 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1959年1月14日)

№20630-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9年1月15日)

№20630-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1959年1月16日)

№2658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月17日)

№24101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1959年1月21日)

№2063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1959年1月25日)

№24946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1959年1月25日)

№09910 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1958年科技合作状况(1959年1月27日)

№26587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1959年2月26日)

№26588 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1959年7月4日以后)

№2063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1959年3月3日)

№09874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1959年3月31日)

№08828 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1959年4月6日)

№24948 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1959年4月18日)

№25236 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1959年4月20日)

№25237 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1959年4月23日)

№25238 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1959年5月4日)

№25239 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1959年5月4日)

№25240 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1959年5月5日)

№24978 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1959年5月6日)

№13580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1959年5月6日)

№20633-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7日)

№25241 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1959年5月8日)

№24949 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1959年5月9日)

№24950 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1959年5月14日)

№0987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1959年5月27日)

№2524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

问题(1959年6月1日)

№25244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
(1959年6月2日)

№24980 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
(1959年6月3日)

№103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
(1959年6月10日)

№20634 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1959年6月17日)

№09872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

№20700 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
(1959年7月4日)

№25245 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1959年7月7日)

№20635-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
(1959年7月9—12日)

№13582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
(1959年7月9日)

№2524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7月22日)

№20635-2 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
(1959年7月23日)

№20635-3 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9年7月24日)

№25247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1959年7月24日)

№24952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1959年7月27日)

№24953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1959年7月31日)

№26589 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1959年8月4日)

№13583 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1959年8月10日)

№24955 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1959年8月11日)

№25249 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1959年8月27日)

№25250 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1959年8月28日)

№1358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8月29日)

№13590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9月9日)

№23036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

№206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59年9月18日)

№13586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1959年9月25日)

№25250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1959年9月25日)

№24956 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1959年10月)

№20706 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59年10月2日)

№1166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1959年10月2日)

№20636-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1959年10月3日)

№26590 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26591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26592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第九卷(1959.10—1962.12)

1959年

№26593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0月12日)

№26594 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1959年10月12日以后)

№099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

系(1959年10月14日)

№1383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207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1358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1959年10月20日)

№26595 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1959年10月20日以后)

№24972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1959年10月22日)

№13587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1959年10月26日)

№20637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1959年10月27日)

№09871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1959年11月4日)

№09970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1959年11月6日)

№13589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1959年11月13日)

№24792 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1959年12月)

№20638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1959年12月1日)

№10462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1959年12月8日)

№24957 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1959年12月11日)

№26596 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959年12月12日)

№0906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1959年12月14日)

№08103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

№26597 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1959年12月18日)

№26598 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1959年12月30日以前)

№16669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1959年12月31日)

№26599 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31日以后)

1960年

№2072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1960年1月15日)

№24959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1960年2月2日)

№20726-1 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1960年2月7日)

№20726-2 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1960年2月10日)

№13401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4日)

№16670 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1960年2月24日)

№24931-1 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1960年3月)

№03967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1960年5月17日)

№13402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5月28日)

№13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

№2188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1960年6月2日)

№2073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1960年6月5日)

№20734-2 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7日)

№23038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1960年6月13日)

№16671 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1960年6月13日)

№20735-1 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1960年6月15日)

№2073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1960年6月16日)

№20735-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60年6月17日)

№20735-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1960年6月18日)

№20735-5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1960年6月25日)

№03968 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1960年7月1日)

№08104 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1960年7月13日)

№230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1960年7月15日)

№23008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

№23009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1960年7月16日)

№09979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960年7月18日)

№03969 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1960年7月21日)

№207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1960年7月24—26日)

№20736-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960年7月30日)

№20736-3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1960年7月31日)

№13732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1960年8月4日)

№2073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1960年8月11日)

№20737-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1960年8月13日)

№03978 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

(1960年8月17日)

№0397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1960年8月17日)

№20737-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1960年8月18日)

№03972 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1960年8月23日)

№20738 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960年8月25日)

№16674 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8月25日)

№25606 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1960年8月26日)

№16673 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1960年8月28日)

№0397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1960年9月3日)

№03971 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

№03973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1960年9月12日)

№03975 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1960年9月14日)

№10279 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1960年9月17—20日)

№00597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1960年9月22日)

№24149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贺信(1960年9月23日以前)

№2303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

№20739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1960年9月29日)

№03976 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1960年9月30日)

№20740-1 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60年10月7日)

№20740-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1960年10月8日)

№1038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1960年10月18日)

№09880 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1960年11月26日)

№03977 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1960年11月29日)

№03979 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1960年11月30日)

№03460 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1960年11月30日)

№25284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1960年12月9日)

№13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1960年12月13日)

№25285 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1960年12月14日)

№099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1960年12月26日)

№25288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1960年12月27日)

№13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0年12月30日)

1961年

№20813-8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1961年1月18日)

№24165 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1961年2月18日)

№25293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1961年2月23日)

№1383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2月24日)

№25300 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1961年3月23日)

№25301 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1961年3月24日)

№25302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1961年3月31日)

№21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61年4月6日)

№21896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1961年5月16日)

№218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5月17日)

№21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1961年5月17日)

№138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1961年5月17日)

№0810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1961年6月5日)

№1373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

№20280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1年8月17日)

№20281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1961年8月19日)

№130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961年9月15日)

№13008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1961年9月22日)

№09881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1961年9月30日)

№138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10月7日)

№11459 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1961年10月17日)

№13009 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1961年10月31日)

№11460 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1961年11月17日)

№25314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飞机技术援助(1961年11月30日)

№10203 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

(1961年12月22日)

№20789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1961年12月26日)

№20790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1961年12月26日)

№207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1961年12月28日)

№219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13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1962年

№10285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1962年1月17日)

№10286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1962年1月27日)

№20005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1962年3月1日)

№207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09984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1962年4月9日)

№20793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1962年4月9日)

№207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4月14日)

№13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2年4月17日)

№13737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1962年4月17日)

№25954 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1962年4月26日)

№25958 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1962年5月4日)

№13745 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1962年5月19日)

№207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年5月31日)

№13746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1962年6月6日)

№13750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1962年7月7日)

№13751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7月14日)

№13752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1962年7月26日)

№20027 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1962年8月14日)

№13754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8月26日)

№13756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1962年9月4日)

№13760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1962年10月1日)

№13759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1962年10月2日)

№24203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1962年10月5日)

№103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2年10月9日)

№10287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1962年10月10日)

№1383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1962年10月11日)

№1384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1962年10月14日)

№24196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1962年10月15日)

№1376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1962年10月15日)

№25605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1962年10月17日)

№13762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18日)

№207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1962年10月18日)

№13763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1962年10月22日)

№13765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1962年10月24日)

№13766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24日)

№1028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1962年10月26日)

№1371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1962年10月30日)

№1028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1962年11月2日)

№1371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1962年11月4日)

№1371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1962年11月5日)

№13716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1月13日)

№1371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1962年11月14日)

№13718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1962年11月14日)

№13729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1962年11月23日)

№24201 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1962年12月7日)

№13731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1962年12月12日)

№137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1962年12月27日)

第十卷(1963.1—1964.11)

1963年

1963年 №25607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1963年1月1日)

№13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年1月2日)

№13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1963年1月29日)

№20798 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1963年2月14日)

№1384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2079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215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1963年2月23日)

№24299 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1963年3月11日)

№13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1963年3月12日)

№219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1963年3月13日)

№16675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1963年3月21日)

№13733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1963年3月24日)

№23458 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1963年4月15日)

№103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1963年4月16日)

№1384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1963年5月3日)

№16681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1963年5月4日)

№09903 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1963年5月17日)

№138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1963年6月10日)

№103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3年7月6日)

№08107 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1963年7月6日)

№08108 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
(1963年7月8日)

№13011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年7月10日)

№08109 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0日)

№08110 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1963
年7月12日)

№08111 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3日)

№13012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
(1963年7月15日)

№13013 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
织(1963年7月15日)

№08112 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1963年7
月15日)

№08113 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7日)

№24296 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
的几份声明(1963年8月10日)

№08114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1963年7
月19日)

№08115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
的发言(1963年7月20日)

№13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
来临(1963年7月23日)

№138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
(1963年9月10日)

№13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
(1963年9月10日)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
工人(1963年9月13日)

№25623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
活动(1963年9月17日)

№25624 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
评论(1963年9月18日)

№25625 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

调兵(1963年9月20日)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1963年9月23日)

№23051 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1963年9月24日)

№25626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1963年10月3日)

№25628 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1963年10月16日)

№13734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1963年10月18日)

№138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1963年10月21日)

№207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1963年10月23日)

№2192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1963年10月22日)

№103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1963年10月25日)

№13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1963年11月10日)

№138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1963年11月26日)

№25630 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1963年11月28日)

№10397 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1963年12月)

№10396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1963年12月)

№10395 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1963年12月)

№23016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

№099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1963年12月13日)

№2301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63年12月13日)

№20821-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
(1963年12月13日)

№0990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1963年12月16日)

1964年

№25531 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1964年1月14日)

№2578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年1月14日)

№25530 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1964年1月25日)

№25533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4年1月28日)

№20278 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1964年1月30日)

№10400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1964年2月14日)

№25777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
(1964年2月14日)

№25776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1964年2月15日)

№23019 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
(1964年2月15日)

№23020 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
(1964年2月15日)

№2553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1964年2月18日)

№25774 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1964年3月23日)

№1039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4年4月13日)

№25762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1964年4月14日)

№25790 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1964年5月29日)

№21930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回复(1964年6月1日以前)

№21931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1964年6月1日以前)

№21932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1964年6月1日以前)

№138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208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1039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1964年6月8日)

№23047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1964年6月24日)

№21934 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1964年6月27日)

№2193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1964年8月19日)

№13854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8月19日)

№25973 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1964年8月29日)

№25786 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1964年9月14日)

№20803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1日)

№20806 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1964年9月22日)

№2080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38 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40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39 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1964年9月23日)

№2080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1964年9月25日)

№1385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1964

年9月25日)

№20805 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964年9月30日)

№20770 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1964年10月3日)

№25632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1964年10月7日)

№25635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1964年10月7日)

№25636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1964年10月8日)

№13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4年10月8日)

№219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1964年10月8日)

№25637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1964年10月9日)

№10273 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以前)

№20286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1964年10月14日以后)

№20006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5日)

№25399 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6日)

№25763 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1964年10月21日)

№25764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1964年10月27日)

№20771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1964年10月28日)

№25640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1964年10月29日)

№207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1964年10月29日)

№200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1964年10月30日)

№20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964年10月30日)

№2000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1964年10月31日)

№21171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1964年11月2日)

№10141 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1964年11月3日)

№25406 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3日)

№09907 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1964年11月4日)

№25407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5日)

№16677 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8日)

№20773 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1964年11月8日)

№2234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1964年11月9日)

№2077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1964年11月13日)

№20010(25734)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1964年11月14日)

№25920 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1964年11月16日)

№2077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1964年11月16日)

第十一卷(1964.12—1969.6)

1964年

№16678 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1964年12月12日)

№20776-1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1964年12月15日)

№207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1964年12月23日)

1965年

№207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1965年1月14日)

№207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1965年1月14日)

№25559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1965年1月14日)

№207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1965年1月28日)

№25767 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1965年2月6日)

№11466 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
(1965年2月10日以后)

№13866 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1965年2月11日)

№25648 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1965年2月12日)

№25679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1965年3月16日)

№25950 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1965年3月22日)

№25681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
(1965年3月23日)

№08116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1965年3月26日)

№20826-3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
(1965年3月26日)

№23049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1965年3月29日)

№25685 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1965年4月[22])

№25682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
(1965年4月5日)

№25684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
(1965年4月8日)

№25686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
(1965年4月10日)

№25687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

等(1965年4月13日)

№25778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1965年4月20日以后[32])

№25688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1965年4月21日)

№25689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1965年4月23日)

№25757 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1965年4月27—29日)

№25690 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1965年4月30日)

№25691 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1965年5月8日)

№25692 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1965年5月15日)

№2305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1965年5月18日)

№23052 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1965年5月24日)

№16679 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1965年5月27日)

№25693 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1965年5月31日)

№24354 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1965年6月2日)

№25655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1965年6月4日)

№24353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1965年6月17日)

№24351 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1965年6月18日)

№24352 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1965年6月18日)

№11467 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1965年7月27日)

№25754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1965年9月7日)

№25695 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
(1965年9月14日)

№25696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1965年9月19日)

№25697 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
(1965年9月21日)

№24368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1965年9月27日)

№24330 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
(1965年10月1日)

№24355 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
(1965年10月16日)

№24357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1965年10月18日)

№24358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1965年10月18日)

№25698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
(1965年10月19日)

№24356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1965年10月28日)

№2569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1965年11月5日)

№25700 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965年11月6日)

№24370 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1965年11月6日)

№25631 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交流活动(1965年11月9日)

№24333 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1965年11月27日)

№21167 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1965年12月20日)

№24334 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1965年12月20日)

1966年

№24381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1966年2月1日)

№24376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1966年2月14日)

№25972 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66年2月16日)

№23022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1966年2月19日)

№20282 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1966年4月11日)

№16680 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1966年4月20日)

№104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1966年4月20日)

№128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1966年6月24日)

№255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1966年5月27日)

№25473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1966年6月27日)

№2595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1966年7月8日)

№11469 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1966年7月9日以后)

№11468 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1966年7月18日)

№25952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1966年7月20日)

№2594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1966年7月25日)

№11783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

№10254 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1966年8月23日)

№25716 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1966年8月26日)

№1040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1966年9月1日)

№25474 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

(1966年9月21日)

№25470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1966年10月17日)

№25951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6年10月21日)

№25717 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1966年10月27日)

№25475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1966年11月1日)

№25482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1966年11月26日)

№25546 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1966年11月底)

№25705 1966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1966年12月[77])

№25471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1966年12月1日)

№25547 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1966年12月2日)

№25668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1966年12月2日)

№25548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1966年12月6日)

№25472 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1966年12月12日)

№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

№22988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2298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22986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1966年12月13日)

№25980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1966年12月20日)

№25554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1966年12月24日)

№25555 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1966年12月26日)

№10403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1966年12月28日)

1967年

№2571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1967年1月10日)

№25478 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1967年1月12日)

№25484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1967年1月20日)

№25704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1967年1月25日)

№25721 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1967年1月25日)

№25975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1967年2月3日)

№25707 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1967年2月4日)

№25738 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1967年2月4日)

№25710 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1967年2月6日)

№25959 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1967年2月15日)

№25962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1967年2月16日)

№25723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年1—2月中国的反苏运动(1967年2月25日)

№2548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1967年3月1日)

№25961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1967年3月2日)

№25677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1967年3月7日)

№25974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1967年3月14日)

№25976 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1967年3月22日)

№25726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1967年3月28日)

№25977 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

№25978 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29日)

№25979 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1967年6月10日)

№25982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1967年8月3日)

№25620 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1967年9月25日)

№2572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1967年11月5日)

№25719 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1967年11月20日)

№25720 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1967年11月20日)

№2572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1967年11月28日)

1968年

№106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1968年2月28日)

№1040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1968年3月12日)

№10257 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1968年4月5日)

№22993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22994 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22991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1968年4月10日)

№25772 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1968年5月12日)

№25771 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1968年7月22日)

№1040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1968年12月4日)

1969年 №10406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1969年1月21日)

№01843 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1969年1月23日)

№10256 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1969年2月21日)

№10282 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1969年3月8日)

№2289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1969年3月11日)

№25956 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1969年3月24日)

№10463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69年4月[126])

№10277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1969年4月[128])

№2289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1969年4月2日)

№2595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1969年4月3日)

№25957 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1969年4月16日)

№1040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1969年4月28日)

№10408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1969年5月13日)

№22347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1969年5月28日)

№2289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1969年6月11日)

№208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969年6月26日)

1969年

№01841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年7月19日)

№1040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1969年8月6日)

№11882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年8月15日)

№11883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年9月1日)

№25457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1969年9月11日)

№10284 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69年9月11日)

№13862 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1969年9月22日)

№1041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
(1969年9月24日)

№11959 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1969年9月25日)

№01838 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1969年9月29日)

№21507 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1969年10月2日)

№2289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1969年10月9日)

№2299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
(1969年12月15日)

№2289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1969年12月20日)

1970年

№1041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1970年7月29日)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1970年8月28日)

1971年

№2290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1971年1月9日)

№1159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971年2月12日)

№1041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1971年2月12日)

№01830 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1971年3月17日)

№2290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中美苏三极格局(1971年5月10日)

№01829 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1971年5月21日)

№22907 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1971年6月8日)

№22908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1971年6月30日)

№22947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1971年7月17日)

№22910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1971年7月19日)

№2291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1971年7月22日)

№2291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1年7月27日)

№2294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1971年7月29日)

№2291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1971年8月9日)

№22916 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9月7日)

№22917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1971年9月26日)

№22919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1971年9月29日)

№22920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1971年9月30日)

№2292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1971年10月4日)

№2292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

安排等(1971年10月15日)

№2292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1971年10月30日)

№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

1972年

№2292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苏联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1972年1月21日)

№2293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中美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1972年1月26日)

№2293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苏高层会晤、中美会谈等(1972年1月28日)

№2293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及印象(1972年3月1日)

№22936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估(1972年3月8日)

№2293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1972年3月9日)

№22938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美苏关系及越南问题(1972年4月21日)

№22941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记录：如何结束在越南的战争(1972年5月24日)

№06767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美苏解决越南问题的讨论(1972年5月27—28日)

№10413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1972年10月20日)

№06768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谈话记录：越南通报与美国谈判情况(1972年12月27日)

1973年

№1041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商中国问题(1973年4月9日)

№06770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的会谈记录：巴黎会谈情况及越南局势(1973年6月14日)

1975年

№24836-2 雅科夫列维奇的回忆：关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1975年)

№25984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澳门情况及中国的立场

(1975年5月5日)

№16061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议(1975年6月13日)

1977年

№08117 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1977年1月17日)

№08118 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1977年4月11日以前)

№25985 驻葡使馆致梅德韦多夫斯基函：澳门和东帝汶的法律地位(1977年8月23日)

№08119 苏共中央致兄弟党领导人通报：关于中国新领导的政策(1977年9月)

№13723 葛罗米柯与卡特谈话记录：美中关系正常化等问题(1977年9月23日)

1978年

№1372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国际局势(1978年6月8日)

№1042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批准联络部反击中国领土要求的措施(1978年6月13日)

1979年

№06018 马纳索夫同李善一谈话记录：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续签问题(1979年4月10日)

№06039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1979年10月11日以后)

1980年

№137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1980年2月1日)

№1668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揭露中国亲美方针的指示(1980年5月8日)

№1668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对抗美中军事合作的指示(1980年10月2日)

№25987 苏共中央决议：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1980年12月15日)

№25963 塔斯社记者发自喀布尔的电报：中国人在阿富汗(1982年1月30日)

1982年

№26580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5月21日)[30]

№26581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7月10日)

№2658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8月7日)

№1192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缓和苏中关系及国际局势的讨论(1982年9月9日)

№26583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9月11日)

№26584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10月2日)

1983年

№16691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1983年5月31日)

№25988 驻英使馆的情报：英国对待中英关系的态度及其趋向(1983年6月20日)

1984年

№21961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会议记录：恢复苏中友协活动的决定(1984年1月29日)

№25990 拉古林的报告：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84年7月21日)

№21960 乔尔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哈巴罗夫斯克与中国恢复往来情况(1984年11月1日)

№21962 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1984年11月12日)

№25991 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的报告：澳门回归问题谈判(1986年11月27日)

1987年

№25869 卢金的报告：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1987年12月16日)

1988年

№25941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苏联要求中国关注越南的照会(1988年3月30日)

№25863 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印度支那各国与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1988年5月4日)

№25870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

作的可能性(1988年6月6日)

№25936 法捷耶夫与李凤林会谈纪要：通报阿富汗的局势
(1988年6月22日)

№25945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中国决定与苏联举行
高层会晤(1988年11月11日)

1989年

№25871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保障苏联在亚太地
区的利益(1989年4月12日)

№2599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计划
(1990年2月22日)

1990年

№25845 卢金与潘占林、李辉会谈纪要：俄罗斯联邦与台湾的
关系问题(1990年10月31日)

1991年

№25866 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报告：中苏关于台湾问
题的磋商(1991年4月15日)

№25917 库纳泽与于洪亮会谈记录：寻找中俄两国接触的共同
点(1991年10月8日)

№25890 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1991年12
月13日以后)

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第一卷(1945.1—1949.2)

1945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机密

由于赫尔利向蒋介石递交了委任国书，今天我正式拜访了他。赫尔利在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接待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您的秘书应该事先通知我您生病了，那么，我就不会打扰您了，我完全可以过两三天来祝贺您递交国书。”赫尔利说，他根本没有生病，躺在床上，只是为了不去参加英国大使举行的午宴。

赫尔利说，最近周恩来将要到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到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赫尔利说，蒋介石曾经断然驳回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转达的那些建议，宋子文也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协定。但是现在，蒋介石却在实施中共建议，并谎称这些建议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宋子文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大使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赫尔利说，他已经知道了宋子文即将出访莫斯科，他非常关注宋的这次出行。“因为在宋子文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晤期间，将解决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赫尔利打算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回美国。在返回中国时，他打算途经莫斯科。赫尔利希望在莫斯科与我们的领导人会面。

接下来，赫尔利狠狠地骂了英国人一顿。然后他说要预先通告我一个天大的秘密。赫尔利说，英国请求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能够组编两个航空大队的B-24轰炸机，以便将这两个航空大队部署在昆明。英国人还请求提供水陆两用飞机。他们请求提供轰炸机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队在实施“夺取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时，必须借助这些轰炸机的帮助。赫尔利对于“夺取泰国”这一表述极其愤怒，他称英国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想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泰国。赫尔利说，华盛顿已经就向英国提供用于组建部署在昆明的航空大队轰炸机

事宜征求了他的意见。按照赫尔利的说法，他既反对允许英国人进入昆明，也反对向英国人提供那些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赫尔利还讲述说，英国大使塞穆尔称他是“红军的先进代理人”，就因为他对红军做出了高度评价。赫尔利说，塞穆尔还散布谣言，说我们大使馆正在从事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赫尔利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希望这顿午餐成为苏美友好的午餐。但是，他不愿意邀请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出席这样的午餐，“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我的看法是：

1.中国人已经把宋子文即将出访苏联的事情通报给赫尔利。也可能，中国人还请求美国人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支持他们。鉴于这一点，赫尔利打算去找罗斯福，并向他提出在莫斯科谈判时支持宋子文。由于不希望宋子文脱离自己的控制，赫尔利计划返回中国的时候经过苏联，并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一直逗留在那里。也可能，赫尔利还打算参与宋子文与我们的谈判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利用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自己也一直逗留在那里，赫尔利希望制造一种三方谈判的印象，中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达到宣传的目的。

2.一方面美国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同在华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美国人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赫尔利今天接待我的时候，以“生病”的理由拒绝了与英国人共进午餐，这是有意强调与我们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6, п.244, д.14, л.56-58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

形势(1945年2月3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B.M.莫洛托夫同志：

谨以此函，向您汇报1945年1月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和现象。

一、1945年1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海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有鉴于此，国民党领导层做了许多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使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联合政府问题上转移开的某种组织。对国民党一些著名活动家(王世杰等人)的建议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可各派2名代表，再加上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政治委员会中，只有4名委员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因为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是从那些与国民党分子志同道合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按照国民党的意图，这个委员会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

1945年1月15日，国民党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希望尽快使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生效。蒋介石在当天(即1月15日)邀请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和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左舜生(他还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等参加自己的午宴，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建立由上述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当左舜生弄清政治委员会将是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且只能是一个协商性质的机关，它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获得一系列机关的批准之后，他声明说，他不能同意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这个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分子进一步劝说左舜生派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民党只是极力争取民主同盟参加这个委员会，而同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国民党打算争取民主同盟的同意且公开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会，然后再建议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拒绝参加委员会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

延安方面立即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1月24日周恩来同志飞抵重庆。在抵达重庆之后，周恩来发表了声明，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的。周恩来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建议，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该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预备性协商会议。他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几点要求：1.取消国民党一党制专政；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司令部；3.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4.取消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各项法律；5.取缔特工机关(国民党的情报机关)；6.释放政治犯；7.承认一切抗日的队伍；8.取消对特区的封锁；9.承认各解放区以民主方式成立的政府。

这个声明还被刊登在1945年1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就其实质来说是重复了周恩来声明的头7条内容。此外还提出了如下要求：1.取消集中营和法西斯组织；2.实行公开的金融政策，由代表机关讨论和批准财政预算；3.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增加军饷，帮助灾区的居民；4.立即停止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化；5.加强与苏联的友谊，加强与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的声明，还是民主同盟的宣言，就其实质来说，都反对国民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国民党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周恩来到此就是为了进行反对建立政治委员会的斗争的。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毫无疑问，国民党报刊坚决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声明，证明蒋介石已经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斗争。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竭尽全力地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之前达成某种协定。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没有达成协定，罗斯福是不会来中国的。

目前，国民党的观点是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千方百计地辱骂那些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说明按国民党计划的构想建立政治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

二、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自己的各级组织下达了

一系列指示，加强反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所有自由活动家的工作，并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通报》，通报重复了国民党在15年期间一直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本报告的这个月，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自己的反共活动，在一些地方展开了逮捕活动，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小分队的事情。

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对反共宣传活动的加强，是为了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尖锐化。

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在1945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预定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下问题：1.修订抗战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规划；2.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态度；3.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法；4.选举领导机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将赶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

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迫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成员将是那些早在1936年就被国民党指派或者网罗到一起的人。大会的这些组成人员将不会反映出人民的想法，因此，中国的进步阶层要求对国民大会的成员进行重新选举。

四、1945年1月上旬，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又恢复了战事。在南方，日本军队从广州方向，沿广州—汉口铁路线采取了进攻行动。1月26日占领了广东省政府的驻地——韶关(广东)。这批日本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打算与那些从河南方向南移的日本军队汇合。大概，这些日本人将在最近的2—3周内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汉口的整个铁路线将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下。目前，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空降兵部队可能于1945年3—4月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登陆。日本军队开始从河南向东部进攻，企图清除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人的作战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中国政府声明说，日本人的这些战斗行动对它来说并不可怕。由于中印公路的开放，中国总的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沿着这条公路他们

每月将会获得10万吨军用物资。这条公路的开放在中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五、1月份，日本在重庆的间谍分子加紧了破坏行动。目前这些活动是针对美国机关的：1月19日他们焚烧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1月22日焚烧了无线电台和美驻华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办公处所。

六、中国报界极其关注即将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的领导人会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附带制订出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国人写到，在临近会议召开时(指的是1945年2月底)，欧洲战争将会结束，苏联将会表明自己对于参加对日战争的立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散布谣言，说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与日本的战争了。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具有说服力，他们还声明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调运。远东的红军舰队，正在进行演习，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为了对付苏联的行动，日本人也在向东北地区频繁地调集部队。

七、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绝大多数活动家、外国外交人员和中国报界极其广泛、热烈的评论和称赞。^[1]在这些赞扬中也能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红军将会第一个冲进柏林。实际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冲进柏林。

八、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中国人，尤其是受蒋介石委托前往新疆调查哈萨克人起义原因的卜道明，在自己朋友的小圈子内声明说，起义分子从苏联获得了武器，其中包括小口径步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希望就新疆省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此附上的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卜道明新疆之行的产物。中国人非常清楚，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满足新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他们希望将我们的货物运入新疆，以此来减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3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机密

周恩来同志今天在大使馆用过早餐。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在就各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之后，马上询问他这次来重庆取得了什么成果。周恩来把自己起草的关于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总结的声明草案给了我，以此作为对我的答复。草案内容如下：

“我在重庆逗留了3个星期。这段时间，我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博士、王世杰博士和张治中将军，进行了多次交谈。

为了动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抗日力量，使他们努力与我们盟友的行动协调一致，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同时，为了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我还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以政府的名义召开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讨论和决定关于以何种方式取消国内一党制的管理、如何将目前的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同时制定共同的纲领，以便使国民政府利用类似的措施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

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和组织的合法存在，确保人民应有的一切自由，承认一切抗日队伍和以民主选举方式在解放区和占领区成立的地方抗日政府，真诚地支持华盛顿公约、莫斯科宣言以及开罗会议所制订的使日本遭到彻底失败的计划，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以上这些无疑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政治内容。

国民政府的代表只是接受各党派代表会议的形式，但是改变了其名称。至于在代表大会的内容(工作)方面，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提议的程序可归纳如下：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

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程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是各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吸引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到由一党(即国民党)管理的政府中，召开国民大会，其成员是在去年就已经选举好的，并通过以前制定的宪法或者对其进行修改。这种程序是一党制专政的继续。

如果一党专政不被取缔，那么，政治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在这个党的管理下，无论策略有何种改变，也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分歧，我应该返回延安，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在谈判期间，我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建议，为了改变目前的政治状况，国民政府首先应该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宣布取消一切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停止特务机关的一切活动，撤出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但是，从国民政府代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签署协定之后才能研究这类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此次谈判中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军事形势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应该立即联合起来，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因为如果目前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慌。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政党，一定会找到尽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的。

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在近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热情的帮助，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直到目前为止，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使美国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这份声明草案，周恩来同志补充说，昨天，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这场谈判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种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并

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

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代表的是人民。蒋介石回应的是，这些政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周恩来同志说，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

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之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ЧжунТяньсинь)、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按周恩来同志的话说，于右任和冯玉祥持动摇不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宋子文。他称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并指出，宋子文经常出现在赫尔利的住所里，在与赫尔利交谈时，他担心孙科的竞争力，说孙是亲苏分子(关于这一点是赫尔利告诉周恩来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今后将如何开展民主化管理运动。他的回答可归纳为：有3个因素能够把政府推向民主化，即：1.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2.人民的要求；3.国际局势。

就此结束了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大约进行了5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14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3, л.66-70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

(1945年3月2日)

今天孙科是在大使馆里用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在会客厅里我说，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推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表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孙科回答说，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做出将不进行任何让步的样子，但是，形势将迫使他向民主主义分子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接着，孙科指出，最近周恩来和董必武应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随后，孙科说，今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探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的关于他将前往莫斯科的说法是否正确。按照孙科的话，他是这样答复王若飞的：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此后孙科指出，先前大家都知道宋子文将于2月底访问莫斯科，但是现在他似乎又不去了。孙科问我：关于这件事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已经通知傅秉常大使，由于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大元帅需要在前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国政府表示最理想的是，宋子文能够在4月下旬或5月份来莫斯科。

孙科问我在什么报刊上发表了克赖诺夫关于批评中国目前局势的文章。我回答他，这篇文章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2] 孙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苏联报刊上多刊登一些关于批评中国缺乏民主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将会给国内的民主运动以很大的帮助。对此他还补充说，美国也批判中国缺乏民主，并且比苏联报刊批评的还要尖锐。孙科说，苏联报刊最好是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3月1日)上的讲话，发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孙科还叙述了自己的构想：在苏联报刊的批判性文章中，不应该表明自己倾向和同情哪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从对两个党派态度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

孙科还问我，B.M.莫洛托夫是否参加旧金山会议。我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本次谈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这些。

文件共3份，抄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29, п.205, д.11, л.82-83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 (1945年4月15日)

斯大林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Э.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大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1936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

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入去做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借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

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5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800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越过150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3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36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国总共将拥有约40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5%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300—400人，而汉族人有600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

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 [3] 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 [4] 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少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 (1945年5月10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我对赫尔利进行正式访问时，经过短暂的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向我讲述了如下内容(以下援引的是赫尔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我是一名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反对派。在战争最初日本人进攻的战斗中，我两次负伤。此后，我回到美国，并反对总统采取的关于‘先欧洲，后亚洲’的决定。我曾坚信，战争首先应该从亚洲展开，因为使日本人有机会巩固自己在所占领的太平洋国家里的地位，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今后无法将日本人从这些国家驱逐出去。我考虑的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仇恨欧洲人，仇恨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欧洲人所实施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制度。一部分居民会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第二，如果给日本人时间使他们建立起对那些被占领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制度并开发和利用这些国家最丰富的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战胜它。我向罗斯福总统坦率地讲述了这一切，从我担任军事部长职务时起我就非常了解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对我说，虽然你的话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在政策方面将不可能有任何变动。我回答罗斯福总统：虽然我根本不赞同所做出的决策，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将支持总统。于是，罗斯福建议我到苏联走一趟。总统说，关于红军、关于它的战斗力以及苏联领导人想的是什么，我们缺乏足够可信的信息。总统还建议我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

我是1942年底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毫不拘束地向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看法。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做的那些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很多方面成

功地说服了我。现在，我应该说，当时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准确地应验了。根据我对事态的理解，有许多还在不断地被证实。首先，斯大林大元帅向我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情况，并使我确信，我对日本未来实力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没有德国，日本是无法发展军事工业的，尤其是飞机制造和核潜艇制造工业。第二，斯大林大元帅完全同意我的关于太平洋国家居民憎恨白种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并指出，我又过高地估计了日本人在这些国家建立剥削制度和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居民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我成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支持者。在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斯大林大元帅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众所周知，那时英国自己几乎没有武器，他们购买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英国人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因此，我与斯大林大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将一条叫特兰斯的伊朗公路直接控制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不能让英国人经手，否则的话，供给苏联的武器就会被英国人扣留。

第二天早晨，当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时，元帅问我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作为一名士兵，我非常希望参观红军队伍，并且是到您打算包围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斯大林大元帅对此非常吃惊，并问我我是从哪里知道俄国人打算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德国人的。我告诉他我是猜测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这个问题使我坚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斯大林大元帅打开了挂在他办公室里的军事地图的帷幕，并向我展示了即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的摧毁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大元帅对我说，我是他允许参观正在作战的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外国人。第二天早晨，在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我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员，我还到达了距德国人160公里处的后方坦克部队阵地，我对红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十分赞赏。我亲眼看到，红军是如何直接消灭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他们是如何有力地攻击德国人的。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大元帅又一次接见了，他再一次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一看在您和德国人之间你们所保留下的石油产区。斯大林大元帅向我保证说，俄国人从美国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已经很好地使用在将德国人与石油产地隔开的那一小块地区。现在，大元帅已经不再担心高加索石油区的安全了。第二天，我又乘机飞抵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美国的飞机，并参加了一次红军从侧翼打击进攻的德国人的战役。同样，

以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心情返回了莫斯科。我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并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向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印象，并高度评价了红军的战斗能力。随后，罗斯福总统致电斯大林大元帅，感谢元帅对我的热情款待。我强烈坚持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但是，丘吉尔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战斗行动在非洲开始了。我认为在非洲开始的行动是最愚蠢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责任归于顽固的丘吉尔。这场战役耗掉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许多物资，并使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正如目前已经清楚的那样，如果不进行这场战役，如果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意大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在我们的手里。

不久，总统又一次召见我，并对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与俄国人保持联系，我们完全不了解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总统建议我再一次前往莫斯科，弄清楚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及俄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拜见斯大林大元帅，但与莫洛托夫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我无法保证在此完全准确地引用莫洛托夫先生说过的话，但是，可以将他对形势分析的大意归纳如下：第一，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极力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还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中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正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第二，俄国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第三，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国民党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第四，虽然蒋介石有这样的举动，俄国在原则上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返回华盛顿之后，我向总统汇报了莫洛托夫先生所做的这些分析。

此后不久，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听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陈立夫等人多次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于是，我向他们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我到延安去？这样我就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证实了，莫洛托夫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我了解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统一，并正在进行干涉和破坏这种统一的工作。通过与驻在重庆的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进行会谈，我核实了自己获得的这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是完全可靠的，这种破坏中国联合力量的

工作正在进行着。我返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汇报。罗斯福总统建议我前往伦敦，并就此问题与丘吉尔进行商谈。丘吉尔对我所说的话向我表明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仅不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对我是非常坦率的，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英国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它变成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兴趣。当我问他——英国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回答说，有他活着就休想。于是，我向丘吉尔声明说，我不去中国，而是要返回美国，在那里我将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在远东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允诺：停止破坏中国统一的工作，虽然我没有成功地争取到他对美国关于中国统一的政策给予任何支持。在会谈结束时，丘吉尔嘲笑地对我说：‘您真是一个怪人。他们在5000年时间里都没能够统一，您想在3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从伦敦直接飞抵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接见了，我非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与丘吉尔会谈的整个过程，然后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向我保证说，这也正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我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苏联将会永远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怀着这样的情绪我来到了中国，并考虑，为实现中国统一，目前我将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我们是不能强迫中国实现统一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统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与你们共同的路线。我坚信，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结束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赫尔利突然请求我向他讲述一下，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情报，并表示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

赫尔利向我保证说，他将会立即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涉及苏联的或对苏联有利的任何情报。赫尔利说，在讨论有关苏联和美国在中国共同行动方面的任何问题时，他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接着，赫尔利说，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请求我，下次会晤时，以同样的坦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感谢赫尔利的诚恳，并说，下次我们将变换角色。

会谈到此结束。

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B.C.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5月10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7日

AB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120-125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对我进行了回访。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将军就说，他这次拜访我，其目的就是使我对与蒋介石的会谈有个思想准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即将与蒋进行会谈。

赫尔利向我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三次会谈的内容，尤其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态度的那些解释，即在第一次就此题目与B.M.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向他解释的那些内容。接着，赫尔利说，他坚信这些话是真实和诚恳的。“这样一来，我就了解了苏联的立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因为应该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先生和驻华的苏联大使。但是，我一直都在劝说蒋介石，放弃自己在苏联对华政策问题上抱有的偏见。”

第一次出使中国时，赫尔利将军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在重庆，尤其是在延安，他证实了，正如B.M.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克服蒋介石

石那具有成见的想法。赫尔利说，他坚定地向蒋介石证明做出政治让步的必要性：“自然，在这个政治党派里存在着武装力量，是不能令人愉快的。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础来消除这种状况，以便使共产党人融洽地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帮助他。”

在赫尔利看来，无论是在对待苏联，还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的立场都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他(指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固执和难以接近了，也没有过多地、一味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将归属于国民党将军指挥的话，那么，他将同意承认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人只承认统一的、中立的指挥机关，也就是由美国指挥机关指挥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由国民党来指挥的话，他们的军队将会在前线被日益消耗掉，他们将不会得到充足的和公平的供给。

赫尔利声明说，他为争取达成协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同苏联一样，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美国自然不能武装一个政党，去对抗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此，赫尔利指出，由于出版自由，在一些外国报刊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中，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内容。自然，报纸也并不了解一切事情，某些记者指责他(赫尔利)，说他只是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这些报纸的这种举动是挑拨性的行为，其宗旨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情报。作为自己努力对双方施加影响的例子，赫尔利指出，在决定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问题时，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电报，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4名代表列入代表团的组成中。蒋介石列入了其中的1名代表——董必武，毕竟这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中央政府。赫尔利说，他曾多次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会谈，或者通过他的儿子、表侄和政府其他成员与其进行对话。

对于我的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和中国统一可能发展的问题，赫尔利将军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话，随后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必须加强统一，实行民主的措施，继续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因此，赫尔利认为，今后蒋介石将会预先采取相应的步骤，尤其是，赫尔利还预料说，近期蒋介石会邀请他——赫尔利，在谈判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在谈到这一点时，赫尔利强调说，无论是宋子文，还是王世杰，都不可能直接同蒋介石说，也不可能

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劝告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赫尔利称自己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备我参加解决这个问题之需，并作为我即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给予的忠告，赫尔利说，在会谈之初，蒋介石讲话可能会很紧张、很冷淡，因为他是如此害怕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赫尔利建议我，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要委婉和慎重。接着他说，对蒋介石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绝不能对他过分地软弱(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是：“甜言蜜语地”)，当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时候，绝不能对他随声附和。接着，赫尔利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他通报自己与蒋的会谈情况。作为个人，赫尔利答应将不断向我通报他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事态的发展情况。他确信，蒋介石一定会向他(赫尔利)通报与我的会谈内容。赫尔利声明说，在驻华的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之间，保持真诚和相互接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两国在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描述了在改善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方面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后，赫尔利说，作为对他所做的保证的答复，宋子文有一次声称，据说他(赫尔利)对情况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他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体验。按赫尔利的话，他曾经对中国人说，苏联和美国将是战后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友好和亲近的关系，美国不仅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高兴。对于中国人提出的他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赫尔利回答说，应该派一个人前往莫斯科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赫尔利指明说，他曾有机会就蒙古、旅顺港和大连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对于我的问题即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赫尔利回答说，他(赫尔利)赞成在蒙古维持现状 [\[5\]](#)，但蒋介石的立场应该由他自己来说明。赫尔利还指出，他曾向蒋介石证明，必须向俄国人提供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俄国应该拥有一个不冻港——旅顺港或大连。蒋介石似乎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又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说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关于所有这一切，赫尔利仿佛直接对丘吉尔说过。在中国，蒋介石将会竭力争取英国放弃香港；美国，也可能还有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强国，都将会

支持他，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应该直接对蒋介石这样说。让蒋介石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吧。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认为，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主权在那里应该得到保证。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物质利益和安全。

我向赫尔利声明说，非常高兴与他会晤，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人，并表示赞同，我们有必要在工作上保持经常接触。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K.A.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5月23日

文件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3, д.8, л.140-143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 (1945年5月24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就一般性的话题交谈之后，魏德迈 [6] 将军回答了我的有关问题。他说，如果给中国的士兵以良好的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话，他们是很会作战的，可惜中国的军队人数太多了，目前正在努力裁减，以使它变得更好，更有战斗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蒋介石已经答应给予帮助和合作，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做了。目前现有的军官学校、陆军学校和炮兵学校正在培训军事干部。

接着，魏德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如何，他还问我是否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他说，共产党人主

要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关于未来局势，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魏德迈问我，是否掌握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装备情况的材料。

我对魏德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可能知道得比我要多，因为在延安有美国军队的代表。

魏德迈答复说，驻在延安的美国人，主要负责确保美国空军关于天气状况的常规情报。接着，他说，他很想去看延安一趟，在那里逗留7—10天，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他非常忙。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K.A.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抄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134-135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7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按照他的话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就中苏关系问题与我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白崇禧开始谈到，他是苏联的老朋友，总是高度地评价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以及对中国在各方面的真诚相待。白崇禧简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于在1926年北伐时期和抗战最初阶段我们给予中国的帮助做了应有的评价。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

化的迹象。白崇禧说，他非常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最坦率的谈话：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关于中苏友好的话题不致成为空谈，而确实变为真正的友谊。白崇禧强调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个人的建议，并且我的建议未必会无果而终。”我答复将军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不融洽，在此未必需要阐述迫使苏联停止对中国帮助的原因。我指出，苏联政府将欢迎中国政府为在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

白崇禧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说，我只能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苏联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上统一的、民主的主权国家。

白崇禧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整个政策，我们对于这些原则就会理解。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极度不安，我希望能得到您，一位带着友好使命再次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坦诚的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大使先生，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您可能会说，您是一名外交官，国际关系问题是您的工作，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您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您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奇怪。而我们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听到您最坦率的意见：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我们完全不清楚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我认为，对此问题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对于两国都有益处。”

因为我急于出席一个招待会，不得不中断谈话，我答应白崇禧将军另找时间继续我们的会谈。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B.C.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

1945年6月14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3, д.3, л.128-129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 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将军说，他到我这里来带着两个问题。第一，他感兴趣的是，我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我与蒋是否进行了某种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是否出现了某种重大的分歧，这次会晤的气氛如何。赫尔利补充说，在这个星期里，可能是星期日，蒋介石将接见他。因此，他希望事先了解一下可能会出现哪方面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我与蒋介石会晤时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第二，赫尔利向我通报说，他打算到延安去，以便继续进行关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统一的谈判，并希望邀请我与他一同前往。

我说，是的，我会见了蒋介石总统，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向总统表达了我们的、赫尔利也清楚的、关于必须保持和发展中苏之间睦邻关系的立场。

赫尔利开始证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在华的目的是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中国统一。赫尔利认为，我应该同他一起到延安去，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共产党人共同讨论形势，提出需要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同前往延安，世界将会为之而惊奇！”赫尔利说。

在回答赫尔利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这个问题之前，我问他，是谁倡议恢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的。他说，国民党向共产党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并以此表示，延安不会再相信国民党了。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政府多次背叛和欺骗了他们。

赫尔利讲述他收到了毛泽东邀请他前往延安的电报。按他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不想再与国民政府对话，但对美国代表不会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他(赫尔利)，因为他曾经帮助共产党人派他们的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共产党人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会与我交谈，”赫尔利声明说。接着，他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大体上是关于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些话是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统一中国，但他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将军的指挥；他们同意服从中立的指挥机构——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但不是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答复赫尔利与他一同前往延安的邀请时，我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有利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赫尔利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我认为干涉这件事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赫尔利指明说，不久之前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方面他是有错误的，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我回答说，虽然他在这方面有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指责他在不久前为调解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

接着，赫尔利开始长时间地、详细地论证自己的策略。他说，当他在伊朗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也曾经遇到来自伊朗政府的许多责难。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便组织好向苏联供应武器的工作。赫尔利继续说：“当我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军事危机。因此，我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这不是干涉内部事务，而是干涉军事状况，干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进程。干涉内政就是干涉战争，这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况且我们政府向我提出了请求——我能否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一致，而共产党人请求我——能否调和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而罗斯福总统说：您自己看吧，可否为中国统一做点什么，能否调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能否使中国的所有队伍联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统一的指挥。”赫尔利声明说，这种干涉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战后，因为和平时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接着，赫尔利回忆起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会谈的情景，在这些会谈过程中，他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评价以及关于苏联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赫尔利再一次证明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仿佛已经对杜鲁门总统声明过，无论

旧金山会议上出现什么争端，无论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什么矛盾，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是不会有任争端和矛盾的。

在稍微停顿之后，赫尔利突然地、仿佛是无意中问到——我是否知道魏德迈将军打算到北部去。对于我的问题，即魏德迈出行的目的，赫尔利解释说：魏德迈前往北部是为了与苏联代表会晤；也可能，他还会访问延安。赫尔利补充说，对此应该严格保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让我了解最新情况。魏德迈从重庆起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问赫尔利——他打算何时到延安去。他回答说，可能在6月底，但也不一定；他力争拖延行期，是为了到那里时有较多的资本——来自政府方面更多的让步和建议。赫尔利不想两手空空地起程，像第一次那样，当时政府只对他说：“试着公平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他打算先与政府进行谈判。赫尔利说，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宋子文、王世杰、程潜将军都对他说过的，共产党人是不遵守诺言的，过去国民党曾经多次受到共产党人的欺骗。

赫尔利声称说，他将尝试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到重庆去。像从前一样，他打算劝说他们做出让步，同意在政府中担任提供给他们职务，不管其数量如何。在赫尔利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双方的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以便使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赫尔利补充道，毛泽东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并不反对蒋介石。

在结束会谈时，赫尔利问我，是否看了今天关于逮捕谢伟思和其他在华工作的5个美国人的报道，报道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说，这大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将会进行审讯并对他们做出判决。最终，这种判决将会反映出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

赫尔利称这6个人是小青年，他们干了既危险又愚蠢的事情——他们盗窃了机密文件，写文章咒骂美国政策，他们还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推翻这个政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希望保护日本，他发表演说反对彻底摧毁日本。这些人觉得自己是“上帝”和“救世主”，他们希望拯救中国和日本。

赫尔利指出，在报纸上针对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内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偷来的文件中的一些思想被歪曲了，为表明

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公之于众。在美国，由于出版自由，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到发表。赫尔利还特别尖锐地谴责了《时报》记者艾萨克斯和其他报刊的记者。赫尔利声明说，指责他因某些权威人士在中国问题上持一些独立看法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是不公平的。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武官K.A.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6月8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6日

AB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2, л.130-133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19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其目的是继续6月7日的谈话。会谈一开始，将军就向我提出了请求：根据在上次会谈结束时我的允诺，答复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问将军，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将军回答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具有国际意义。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说明一下，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的评价以及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做了如下答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我觉得，将军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认为，将军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我从报刊上了解到的更详细。我非常关注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份报纸足以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观点。尤其是不久前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加充分

地阐明了这些。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能够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将在国内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加强反对日本的战争。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苏联，而且全世界一切联合的国家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涉及苏联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目前状况的看法，它已经反映在最近苏联报刊公布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里，这些文章证明了苏联人非常关心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您说的全部内容。

作为个人，现在我想请将军说明一下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关于目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国共关系的前景问题，关于在开始反攻行动和从中国驱逐日本人时这些党派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问题。

白崇禧将军回答说：“您要知道，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历史，谈到今天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可能不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众所周知，还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当苏联四面受敌的时候，当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敌人的时候，孙逸仙总理从自己的祖国，从桂林市给列宁发出了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封电报不可能不使列宁振奋，因为他看到在围攻俄国的众多敌人中，出现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当时已经能够理解苏维埃的实质了。不久，苏联的第一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孙逸仙总理面前。后来，在北伐运动期间，为了帮助中国，苏联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顾问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样，政治顾问是由鲍罗廷而军事顾问是由布柳赫尔领导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有真诚合作的立场，还通过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可以把那个时期评定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真正合作和在外交领域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后来，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开始向东部——上海和南京方面进军。我当时是首先攻入上海的那支部队的总指挥，因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并掌握着充分的情报资料。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300万人的农民军队和一定数量的红军部队，并开始酝酿推翻现政府的计划。这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分裂。接着，就开始了的对日战争。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进行防御战争。共产党人在山

西和延安也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支持防御战争和在军事政治领域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们自然乐意同意这种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和扩大力量以便同日本人进行斗争。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摩擦，仍然可以认为，在武汉政府时期这种国共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共产党人认为政府离他们远了，无法管理他们了，于是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袭击国民政府军，解除他们的武装，取缔地方政府机关。例如，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的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被共产党人抓获，后来被释放了。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很遗憾，这就是造成目前中国国内困难状况和难以评定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对此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的军队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切保持着沉默，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经常表现出不满，认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

我指出，分析历史事实会把我们拉得很远，我请求将军更详细地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冲突。

白崇禧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回答说：“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大约有3万人的军队，他们越过了黄河并向西部进军。第二大冲突地区是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有2万多人，他们强渡过长江，占领了一个县级城市。由于这些军队的逼近，在从潮州市向北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共军部队也积极活动起来。除此之外，冲突还发生在从高州向北的广东省西部地区，在浙江省的西部，沿北平—合肥铁路向西，在安徽省的东部地区也有大规模的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冲突新的发生地，而像在江苏省、山东省和北方原有的冲突地区，我就不说了。在那些地区小规模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90万人的常规部队、300万人的民兵。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的确，目前，共产党人拥有30多万支步枪，包括破旧的和老式的品种。应该说，在开始防御战争的时候，他们

只有大约3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的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而共产党人竭力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共产党人经常扬言说，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与日本人作战。这只是宣传，因为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自动化武器，与日本人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众所周知，在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是准备进行战斗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此我向将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先发起进攻行动的。

将军回答说：“叶挺没有执行把自己的部队向北部撤退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向南方调动。国民军封锁了他的去路，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被打败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解除地方部队和国民政府军的武装，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组建共产党的部队。”

我回答将军说，我很难弄懂中国目前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局势，我非常感谢将军，他能够按照地图给我讲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

白崇禧将军问道：“大使先生，您这次路过了新疆。您的关于新疆混乱的意见令我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也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我仍然很了解一下，归您领导的各地领事人员和那些客观视察员们是如何评价在新疆出现的那些事件的。”

我回答说：“根据我从领事们那里获得的情报，目前新疆的秩序非常混乱，在穆斯林人(哈萨克及其他民族)和中国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白崇禧说：“新疆暴动的核心力量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众所周知，数万名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革命期间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新疆安顿下来，并利用了盛世才。这是一些极具军事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关心的是，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持有何种立场。苏联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苏联，是否还把他们看作是苏联公民？”

我回答说：“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的立场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不承认这些人是苏联公民。我们只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清白的人返回

苏联，我们破例接受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白崇禧问：“苏联对于外蒙古持有何种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们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会谈结束时白崇禧说：“我非常关注世界和苏联的报刊，您在今天会谈时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我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文章：第一，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第二，观点非常偏颇。让我来列举一下事实。文章中断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同日本人作战，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人进行着真正的斗争。请看一看我们在缅甸的远征军，看一看我们那些从云南向缅甸进攻的军队取得的成绩吧，请看一看在海南西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作战情况吧。文章中还断言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的军队实施进攻。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自然，我们的军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也会进行抵抗。如果文章中说的是相互的冲突，那么还情有可原；可是，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实行进攻行动，那么，这就是极大地歪曲了事实。当然，我多半指的是英美的报刊。我明白，不应该提出关于大使为新闻记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苏联报刊能够客观地评价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友好事业服务，并有助于吸引4.5亿中国人民倾向于苏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那就太好了。”

接着，白崇禧向我讲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事宜。他说：“涉及恢复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重庆期间，共产党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解散现政府和建立统一指挥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在军政阶段结束之后，已经转入了宪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命运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国民党的肩上，在转入民主阶段(民主政治)之前，任何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统一指挥部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不可能还建立什么统一的指挥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大元帅驳回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谈判暂时中断了。目前，国民党正在努力争取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大约在10天以前，已经给延安发出了电报，建议恢复谈判。据我所知，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筹备前往延安的行程。我们努力追求恢复谈判。我个人希望，很快就在今年的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届时国民党将把政权移交

给人民，国民大会将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B.C.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25日

AB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151-157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机密

6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们使馆，并通报了如下内容。昨天，他与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赫尔利声明说，最近两天蒋介石接见了并向他表示，同意向共产党人做出政治让步，以便使中国达到统一。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准备改组目前的政府，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加入政府，并希望就此问题与延安开始谈判。作为个人来说，赫尔利打算劝说蒋介石成立最高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应该有国民党的3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3位代表以及其他党派的3位或者是3人以上的代表。令赫尔利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接受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重庆继续已经中断的谈判。王同志回答说，在赫尔利从美国返回，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之后，延安已经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了。因为这个声明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中最反动的部分。感到自己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了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在赫尔利的声明发表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挑衅性事件频繁发生，目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冲突。

接着，王若飞同志对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感到失望和惊奇。他提醒赫尔利，在他访问延安的时候，是他(赫尔利)本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其中包括5项内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这份草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赫尔利本人又放弃了它，上述提到的他于今年4月2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尔利回答王同志，在这方面发生了误会，是新闻记者哄骗了他，他们所发表的赫尔利的声明是经过歪曲的。至于他本人提出的那份协定草案，正如赫尔利说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这份草案，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坚持这份协定草案。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将这一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尔利的答复是肯定的。赫尔利声明说，他赞成实行原来的草案，这份草案一定会被实现的，只是不能立即，而是要逐步实现。

正如赫尔利向王同志声明的那样，蒋介石原则上是同意这份草案的，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措词。例如，蒋介石建议用“各党派的政府”取代“联合”政府的说法。

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劝说蒋介石首先实现上述草案的4点内容，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的先决条件：1.给予言论、报刊、集会等方面的自由；2.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3.取消对边区的封锁；4.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赫尔利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并声明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着王同志讲述了在与赫尔利会谈之后，他又与邵力子和王世杰见了面。邵力子对他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召开的例行会议表示不满(赫尔利也通报了蒋介石对此有些不安)，并劝说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大会代表。接着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蒋介石关于谈判的建议。王世杰声明说必须立即开始谈判，并请求尽快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王若飞回答王世杰，在这方面他将不可能做任何实际工作，因为没有谈论任何具体的内容。

在与赫尔利和王世杰会谈的情况中，王若飞同志得出了以下结论：蒋介石实际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

判，以便做出一种样子，即为实现中国统一，他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指望对外使用这个政治花招，并正好安排在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柏林会晤之际，因为在那里会晤的重要问题之一，必定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借此表明，中国的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王若飞同志说：“赫尔利如此卖力地帮助蒋介石上演这场新的闹剧，是因为美国想扶持蒋介石，并加强他的地位。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是扼杀中国共产党。”

接着，王若飞同志讲述了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抨击国民党，但同时并不超越一定的界线：不威胁推翻当局。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争取与国民党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将发展国内的民主运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委员会。其目的是：第一，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给予坚决的回击；第二，使蒋介石明白，如果他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找到其他方法实现改革的。随后，王若飞同志讲述了自己与孙科的会谈情况。

在这次会谈中，孙科通报了宋子文与我们的大使已经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20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1周以后签署。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他就曾预测：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关于远东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的。签署这个条约的想法是罗斯福提出来的，他向斯大林同志做了这样的建议。按照孙科的话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正式转告蒋介石和苏美驻重庆大使馆人员的。根据孙科的推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定将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一、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的领袖。

二、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

三、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苏联军队将进入东北地区。解放后，东北将移交给中央政府。该协定还有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附属文件：

- 1.在结束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之后，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北地区。

- 2.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 3.在东北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权利和利益，即1904—1905年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在该地区享有的那些权利和利益。

- 4.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将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

- 5.旅顺港将租赁给苏联。将宣布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此外，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还达成了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协定：

- (1)苏联和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在驱逐朝鲜的日本人之后，将对朝鲜建立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三国保护制度。

- (2)苏联军队占领日本的北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南部。

- (3)将萨哈林南部地区归还给苏联。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反对如下两点内容：1.蒋介石不同意以租赁的方式将旅顺港转交给苏联，因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先例；2.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是反对将这一点写入任何一种文件里。

按照王若飞的话说，孙科断言说，短期内在莫斯科一定会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王若飞反对孙科所说的以下两点内容：1.苏联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唯一的领袖；2.苏联对日宣战，将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若飞同志证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及其类似方面，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话，苏联是不可能通过这两点内容的。

王若飞问到，在莫斯科是否真的将会签署孙科所说的那个中苏条约。我回答他说，看来，宋子文在莫斯科将会提出关于签署条约的问题，但是话题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我们这里还不清楚。

随后，王说，孙科在与他会谈时，表达了今年下半年在远东地区即将发生决定性事件的看法。王同志声明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号召全体党员加强思想准备，迎接这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关于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王若飞同志声明说，国民党加紧准备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只能说明：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前，国民党感到非常虚弱和害怕。国民党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能战胜我们的话，那么，今后他们就更无法对付我们了。

会谈是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阿纳尼耶夫同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6月29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30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99-103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绝密

1945年7月2日

苏中莫斯科谈判期间И.В.斯大林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宋子文)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其他)与会者：

苏方：B.M.莫洛托夫、C.A.洛佐夫斯基、A.A.彼得罗夫和B.H.帕夫洛夫；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宋子文答，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该协议的内容。另外美国人还向中国通报了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所指的是否就是由蒋经国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所转达的那些内容。

宋进一步明确道，自己所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的确是他的看法，不过，自己的这一观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付诸行动，那就是中国政府接受自己在克里米亚会议协议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

宋说，自己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苏联大使已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会谈，苏联政府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会谈的内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了，我们目前还无法来解决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还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古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道，甚至在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仍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军国主义再也不会复兴了。可是仅仅过了15—17年，德国就重新恢复了军力。与此类似，日本即使表面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效仿德国和重复德国的所作所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另外，斯大林接着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

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斯大林同志说，当在克里米亚三巨头会议上签署相关协议时，苏联政府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为了加强自身反对日本战略地位，苏联打算联合中国，以两国之力共同打败日本。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旅顺港、中东铁路、南萨哈林岛和外蒙古，等等。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使苏联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盟友。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还是中东铁路，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想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战略地位。二是苏联人民已经征战了4个年头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自身受到攻击之时，才有必要投入战争。而在没有受到他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无缘无故地首先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人民是不会参与的。如今，我们要进攻日本，这就要首先取得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在打了这么多年仗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休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理由。而关于这些理由，斯大林同志认为，也就是他在克里米亚协议的相关文件中所列举的和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斯大林同志强调，上述两点思想便是他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向宋子文指出的。

宋子文说，自己认为斯大林大元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外蒙古问题在当前中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在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宋子文说：“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像俗语所说的，让这条睡着的狗继续睡着吧。”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此，宋子文援引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过的话，即他希望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

综上所述，宋子文请求斯大林不要再给中国雪上加霜了。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目前不愿意涉及外蒙古方面的问题。

不过，宋子文又说，中国支持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对南萨哈林及其附属岛屿的处理意见。宋问斯大林，其所提出的关于大连国际化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说，我的意思是该港口应成为国际性的口岸，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该港停泊，但苏联享有优先权。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达成一个特别协议。

宋子文问，确保苏联的优越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的优越地位主要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为苏联船只设立专门性港埠等方面。而中苏两国就这一问题所签署的新协议应当是对1898年中俄协定内容的完善和重复。斯大林说，为此，我们最好都事先对1898年协定有所了解，以便在谈判中能对其内容做些许修改。 [7]

宋子文说，自己曾问过杜鲁门，关于克里米亚协议的意思是不是将中国大连港设定为自由港。对此，后者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连港的行政管理就应当采取中方管理或俄—中共管的模式。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港口的主人应当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而所有涉及大连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均应在两国所签署的特别协议中有所体现。

宋子文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已起草了相关文件。

斯大林做了否定的答复并再次强调，必须采用旧的协议文本，并对其中内容做必要的修改。

宋子文说，旧的协定业已过期，再者该协议文件是中国与沙俄签署的。中方的想法是，把大连港作为一个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港口。援引苏联多次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承认，宋子文宣称，大连港的行政权理应属于中方。

宋询问道，苏联所谓的关于应确保苏联在该港口的优先权是指什么呢？是与谁相比较才这么说呢？

斯大林答，自然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宋子文道，如果按您上面的说法，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斯大林同志说，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

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同志是否打算由俄国来负责和组建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机构。斯大林同志答，自己的意思是组建某种类似于苏中联合会的机构，该机构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至于港口的经营收入则由两国平分。斯大林同志强调，苏联并不赞成在大连建立俄国租界，而是想与中方一道共同负责该港口的行政管理活动。宋子文指出，港口未必会成为赢利性质的企业，因此所谓两国平均分配运营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起初我们必然要为港口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进行投资，之后就将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在打败了日本之后，中国将会出现商品荒。日本已不可能向中国输入商品，因为它所遭到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薄弱，而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尚需10—15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限的，苏联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在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每个港口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便包括大连港。它不但要承担进口苏联商品的工作，而且还要担当将中国的某些原料出口到苏联的重任。因此，那时大连港毫无疑问将在中苏贸易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子文说，中方认为该港口应当从事贸易，但未必会赢利。斯大林同志说，由此可见中国对获得利润不感兴趣，对此，宋回答说，他对获得利润感兴趣，但利润不是来自港口，而是来自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宋解释说，由于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我们无法在那里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

斯大林同志指出，据他所知，海关税和其他税收是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又说，关于大连的问题双方还需进一步商议。

宋子文说，在开放的港口我们可以征取一些税务，但数量非常有限，目的只是为了维持港口所属设施的正常运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克里米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大连将是一个自由港，只涉及其国际化问题，即该港口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予以开放。

宋子文问，如果能够对经过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务的话，那么这些

商品税无疑会对中国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这些收入将在中俄两国间平均分配，对此我们将签署相关协议。

不过，宋子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对经过大连港的商品征税的话，那么，大连也就无所谓开放型的贸易港口了。因为中国其他港口也完全可以担当大连港同样的职能——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出口中国商品。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并没有一下子便把大连港的职能限定死，即仅作为贸易性质的港口，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尚需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接下来，宋子文提出了关于旅顺口的租赁问题。他希望签署关于中俄双方共同经营该港口的协议。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非常不愿意租赁旅顺口，但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该军港。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蒋介石大元帅的意见，关于该军港的使用问题他正考虑采用其他模式。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提出的意见绝不会对中国不利。

接着，宋子文问，苏方关于成立(中俄)联合公司负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事务的意图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该公司将负责上述铁路的运营。针对宋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答，谁建筑了铁路，铁路的所有权便属于谁。

宋问，是否仍维持1924年旧协议中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规定，即从铁路建筑完成之日起60年后该铁路的所有权将归中国。宋子文还提醒道，根据该已有协议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赎买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8]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为了明确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和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有必要成立苏中联合公司，而所有经营收入由两国平均分配。

而对于宋子文再次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答，在中方赎买以前该铁路的所有者是苏联，之后其所有者将是中国。斯大林同志强调，在中东铁路的建筑过程中，中国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莫洛托夫同志也插话道，当时中方的投资只占该铁路建筑总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又补充道，在中方赎买前，该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关于宋子文提出的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期限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应当延长旅顺口的使用期限和压缩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以便将这两处的期限统一规定为40—50年。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的问题他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宋子文接着问，苏方所谓应保证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使用上的优先权具体指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说，这与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不过，确保苏联使用上述铁路的优先权不应被理解为苏联可以优先利用其来运输本国军队。

宋子文问，难道斯大林大元帅不打算用这些铁路来运输苏联军队吗？

斯大林同志答，在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使用其来运输苏联军队。

宋子文说，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会欢迎苏联使用这些铁路来运输其军队。我关心的是苏方在和平条件下是否还会使用其来运兵。

斯大林同志说，和平条件下便没有这个必要了。只是当日本军力恢复再次向苏联发动进攻、苏中两国已签署了互助条约并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苏联才会经东北铁路派兵。

宋子文对斯大林的上述答复表示同意，并指出双方应就以上所述签署相关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宋先生不担心苏联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占领北京吗？……

宋子文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回敬道，在这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已经有了与外国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随后，双方的谈判转入下一个议题——关于千岛群岛。宋子文说，

中国非常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将该群岛重归苏联版图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千岛群岛归属苏联，那么福摩萨 [9] 和其他领土也将重归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钳制住日本。

宋子文接着说，在苏中两国最终将要签署的协议中，中方不希望看到其中的第二条，即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日本所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丧失的那些权益。因为原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赁期限已过，而中东铁路也已被当时的沙俄政府卖给了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该关于恢复苏联权益的条款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朴次茅斯条约。主要是为了更猛烈地反对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那里目前都是由日本人在统治着。我们并不是想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而只是希望苏中两国在其他一些基础上再来签署一个条约。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签署的文件并不是条约性质的，而将这一条款列入文件中也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日本。

宋子文指出，1924年苏维埃俄国首次承认中国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作霖当年要拘捕中东铁路经理的理由了。此举可能也就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殊方式了。

作为对宋子文所提问题的答复，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缩短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但要稍微延长苏联租用旅顺口的期限，以便将苏联使用它们的期限统一确定为40—50年。期限一到，所有的就都结束了。

宋子文说，有必要准备一张旅顺口的地图以便在上面标明苏联所使用区域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尽快准备这样的地图。

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确定为20—25年。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这样的期限有点太短了，要考虑到我们还要在旅顺口建造基地，为港口安装各种设备和设施，这些都需要时间。斯大林同志指出，沙皇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所签订的为期25年的协定实际上是

一个骗局，并已有了提前延长这一期限的打算。沙皇政府计划在旅顺口站稳脚跟之后再实施下一步行动。而苏联并没有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关于两国签署友好同盟条约方面，并说中国非常希望与苏联签署此类条约。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以前便提过关于此类条约的事，但当时我们还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而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签署该条约的可能。

作为答复，宋子文询问苏方目前是否已有了现成的条约草案。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这首先得看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如今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只有在中方接受苏联建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着手准备相应的条约草案。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中方尚需要苏方对所提建议逐一做出解释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就自己所提建议的每一点当然都要对你们做出解释。他本人也做好了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准备，但双方至少有必要首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

宋子文将话题重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并问道，为何斯大林认为不能让中方独立负责铁路的行政管理？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方一定会确保苏联的全部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斯大林强调，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并没有说让俄国人独立负责铁路所属区域的行政职能，而是俄—中双方共管。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此举可能涉及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我的问题并不涉及东北，而只涉及那些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将组建什么行政机构来管理东北呢？到时候是否在那里会出现一个省政府，是否还会像张作霖时期一样，在东北出现中央政府和奉天政府共治的局面？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因此是不会允许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存在的。

宋子文问，苏方想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干线，是否还包括相关的铁路支线呢？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考虑到要向这些铁路干线供应所需要的煤炭，那么在必要情况下苏中联合公司也会经营相关的铁路支线。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煤矿可以独立经营而其所生产的煤炭可向铁路出售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答，双方应协商联合使用相关铁路支线的问题，并将协商结果写入协议。

宋子文说，如果上述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那么双方都会极力促进铁路的正常工作和业务繁荣，因而煤炭的供应是绝不会出现问题的。

随后，宋子文又将谈判话题转到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上。他说，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宋子文问斯大林：为何苏联政府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指出，是蒙古人自己不想并入中国版图。斯大林强调，自己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另外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并非是中国不能克服的。要知道，苏联政府已在关于旅顺口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了，而中国人也理应在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向苏方做出相应的让步才是。

宋子文强调，在中国目前是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在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时双方应充分和全面地考虑所有问题。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坚信如果外蒙古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对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当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时，苏联就有权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外蒙古领土。因此，斯大林同志说：“不应该留下这个小脓疮，现在就应该把它除掉。”

宋子文指出，这个小脓疮的存在并不会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中国从来没有对苏联派兵进入蒙古领土表示过抗议。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而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都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

针对宋子文的一再要求——苏联方面应认真考虑中国政府对外蒙古

问题的态度，斯大林同志说，他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则可以放到打败日本之后再说。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日本的战败中国将获得一些新领土，到那时再宣布关于蒙古独立的事就不会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了。

宋子文说，自己会将这一问题面呈蒋介石，并再次请求苏联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充分考虑和体谅中国政府解决蒙古问题的苦衷。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的独立问题可能会立刻引发如何处理西藏的问题。例如，在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关于解决西藏独立问题的建议，而当时在场的宋子文被迫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再次强调，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的领土上一直保留自己的军队的，如果我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口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更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宋子文问，苏联方面是否欢迎被派遣到苏联军队中的中国政府代表，这些人将参加在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同志答，蒋介石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以便在东北地区组建和开展中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斯大林同志询问道，国民党是否打算吸收中国社会中其他进步阶层的代表参与政府的工作。

宋子文宣称，关于这一问题，他希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外交家来完全坦诚而公开地与苏方交换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今后这种变化将会更多。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曾经打算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建议成立某种类似于军事内阁的机构，并邀请国民党以及中共党员共同参与主持该内阁的日常工作。平心而论，国民党是很想促成此事的，因为斯大林大元

帅也曾对赫尔利说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和极力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爱国者。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一些很不错的爱国者。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在对待吸引国内民主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是严肃和认真的，自己便曾有过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的打算，但共产党却不想进行此类谈判。宋子文说，国民党希望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共能满足中央政府的上述要求，那么中央政府便自然会邀请其参加军事内阁，并允许其在政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提出的关于吸引进步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并不是只针对共产党人而言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内部一批新的社会和自由主义力量会成长起来，这些人都应当被吸收和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中国应当有一个以国民党的影响居主要地位的政府，但仅靠国民党将难以应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因此，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国民党在领导政府的同时，最好还能让其他一些民主分子参与政府的活动。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自己只不过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谈一点个人意见。宋子文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意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吸引国内自由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只是国民党希望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国民党希望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是合乎常理的，这一愿望是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当然中国也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政党组织。

双方的话题转入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宋子文说，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斯大林同志对该体制持何意见。

应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对上述问题做了答复。他说，宋子文多数情况下也参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知道该想法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莫洛托夫本人对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即托管或者由个别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来实施。具体就朝鲜领土的托管而言，美国人建议由四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负责。莫洛托夫本人对此有些看法。他认为，由上述四国对朝鲜领土实施联合托管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为此就必须在实际执行中另辟蹊径。不过，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过关于朝鲜的事，并陈述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即在实施托管制度的情况下外国军队不得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实施托管制就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那是他无法接受的。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为了确保外国军队不进入朝鲜，将由上述四国代表组建一个小组以监督和确保朝鲜的政治发展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斯大林同志指出，托管制只具有临时性质，目的只是为朝鲜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关于朝鲜问题我们还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宋子文问，将由谁来负责维持朝鲜国内的秩序，是否需要组建某种类似于警察局的机构，因为该国可能目前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该国的国内秩序目前由朝鲜人自己承担。

宋子文说，他对朝鲜人目前是否有能力实现独立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朝鲜领土实行托管。斯大林同志问，未来中国是否有意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宋子文答，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民族，它自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醒说，他反对在朝鲜组建警察组织和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在对托管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与英—美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这是通向朝鲜国家最终独立的一个步骤，而英国人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朝鲜的殖民化，美国人(如罗斯福)对托管制的理解与我们的比较类似。至于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持何态度，斯大林说，他还不清楚，目前美国

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已与英国有些接近了。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只有中国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领土托管的草案中，把独立作为领土托管的目的，这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得到通过的。

宋子文说，罗斯福似乎要求对所有殖民地都实行托管制。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这一说法并指出，赫尔利还在1943年10月便提出了与此观点类似的文件草案，但相关国家断然拒绝讨论其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闻听这一草案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起初虽然在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如今又走了回头路，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与在野的共和党所持立场有关。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道，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尔利便曾建议讨论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但该建议遭到艾登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时间了。当时，苏联代表团已有讨论该问题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对杜鲁门的印象如何？

宋子文答，杜鲁门给他的印象是坦诚、平易近人，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可能应当比罗斯福更为果敢，虽然后者的政治眼界无疑比前者更为宽广。

斯大林同志又问宋对斯退丁纽斯有何印象。

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斯退丁纽斯已经离开了国会，其职务由贝尔纳斯接任。后者是美国政府中比较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宋，对斯退丁纽斯的个人能力有何评价？

宋子文再次强调，斯退丁纽斯的伦敦之行实际上已经表明其政治生涯宣告彻底终结。

此次会谈持续2小时15分。

会谈记录：A.彼得罗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3-17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年7月5日)

摘自И.А.伊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乔巴山元帅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5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之后，乔巴山请我去他居住的别墅，以便详细谈一下已举行的会谈情况，并解释一下会谈中他尚不太清楚的个别地方。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乔巴山已完全且准确地理解了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

当讨论到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苏中两国声明草案——关于承认蒙古的国家独立时，乔巴山说：“是的，我们需要国家独立，但我们不想与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民族。他们曾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烧和抢劫我们的蒙古包，打死我们的牧民。如今在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他们仍然在对蒙古人做这样的事。”乔巴山说：“我明白关于与中国人合作的宣言中所写的那些话，话都是好话，经过斯大林同志的修改后其内容会更好。”

在详细讨论了宣言草案之后，乔巴山声称：“我很清楚宣言的意思。我们将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当年是怎么欺侮我们；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在继续欺侮仍留在他们那里的蒙古人的。”

当话题转到军队和即将前往蒙古的普利耶夫将军时，乔巴山表示希望让鲁宾将军的军队也留在蒙古，因为自己与他在工作上已有了相当的

默契，而他对蒙古军队及其军官也相当了解。

乔巴山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尤其是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印象。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地激动过。在机场我认出了莫洛托夫同志——就在他向我走来的时候。当经过仪仗队时，我的腿和手都在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在克里姆林宫，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平时完全两样的斯大林。他一直坐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同志的脸。于是，我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而我的答话也经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苏联驻蒙古公使

И.А.伊扎诺夫(签名)

文件3份，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档案室

АВПРФ, ф.6, оп.7, пап.38, д.560, л.4-5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乔巴山

1945年7月7日，И.В.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名单参见附录 [10])。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АВПРФ, ф.6, оп.7, пап.38, д.560, л.6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绝密

参加此次会谈的出席者：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苏方——B.M.莫洛托夫、C.A.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和帕夫洛夫。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宋子文答，自己向蒋介石通报了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斯大林同志关于希望消除中苏之间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以便两国从现在开始在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的条件下展开友好合作等情况。宋子文说，今天才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在向苏方通报蒋介石的回电内容之前，宋子文想首先介绍一下与此次谈判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便斯大林大元帅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蒋介石向苏方做出的那些难得的让步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当宋子文离开华盛顿回国之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中苏两国谈判中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他曾对杜鲁门说过，中国和苏联可以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解决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当时他对“现状”的理解就是：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外蒙古的主权，所有的问题只是在于中国无法实施这一主权。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均对宋子文关于“维持现状”一词的解释表示赞同。在重庆时，宋子文也与蒋介石讨论过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竟然会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宋子文认为，在涉及有关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的问题时，斯大林大元帅应当充分体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宋子文说，他并不想把蒙古和东北相提并论，但这里只想列举一个事实以表明中国对领土的一贯态度。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比是较弱的，中国也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奢望。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做过任何让

步。1933年，当宋子文刚刚从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上回来，日本天皇便邀请其去他那里讨论关于东北的问题。天皇说，如果中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并从此与中国相安无事。宋子文当即便拒绝了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为达到目的，又专门派遣当时担任日本外务次长的重光葵前往横滨，企图说服宋子文再次去东京。但宋子文拒绝了这一行程。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一点，即中国人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对这种民族本能意识的背离，从而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不顾。宋子文指出，以上所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斯大林大元帅能够正确评估蒋介石为苏中友好的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那些牺牲。

接下来，宋子文朗读了蒋介石的来电内容：“在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之后，为了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在未来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带着最诚挚的意愿，积极地谋求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消除两国间所存在的一切分歧和纷争。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并要求在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管理的完整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表现出自己的支持，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对中国的如下三点建议做出完全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一、中国政府将对斯大林大元帅履行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义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难道中国政府还会期待对东北持其他态度吗？”

宋子文继续翻译并朗读电报：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共同使用旅顺港，以便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中国准备使大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期限为20年。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理应由中国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保持中国东北领土的完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主要干线可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所得经营利润两国均分，但上述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于中国。至于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均不属于两国联合经营的范围。两国联合经营上述铁路的期限为20年。

“二、去年，新疆发生了叛乱，结果导致中苏之间的联系中断。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仍无法正常进行。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间的正常贸易联系。至于阿勒泰山脉，它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该省的一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我们希望，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

“鉴于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充分体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政府的诚意——以此牺牲来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关系。”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手上应当有一份翻译成俄文的蒋介石的电报，以便对其所提建议认真考虑。

宋子文答应今晚便将该电报的译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否会把满洲和蒙古做比较。

宋子文答，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比较。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实际上是将它们做了比较的。

斯大林同志说，是不能把满洲和蒙古进行比较的，因为满洲都是中国人，而在蒙古并没有中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就意味着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为它从1921年起便像独立国家一样存在着。苏联希望维持“现状”的意义，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宋子文说，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宋子文强调中方的观点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对这部分中国土地拥有主权。

斯大林指出，可您所谓的主权实际上已停止存在24年了。

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就蒋介石电报中的各主要内容逐一做了分析。关于东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着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铁路的使用期限问题，我认为上述20年期限不能使我们满意，有点太短了。我们准备做一些让步，将这一期限确定为30年，这也是我们的最后决定。至于旅顺口的行政管理问题，这需要加以认真考虑。港口的主人理应只有一个。旅顺口形式上可以被纳入与其相邻的辽东半岛的辖区范围，但港口本身的主人应当只有一个。

宋子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只涉及旅顺口，并不包括辽东半岛。

斯大林同志解释道，自己指的是与旅顺口有关的固定区域。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所包括区域的边界应依据1898年中俄协定所划定的范围来加以确定。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该协定旅顺口共包括有两个区：其一，直接隶属于旅顺口的区域；其二，所谓的中立区域。我们拒绝承认中立区，但是我们想保持这个区域，使其归属于旅顺港。就上述整个区域而言，其行政负责人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这里我们指的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卫戍部队司令，等等。关于铁路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交由中方管理，而蒋介石在来电中正好违背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原则。要知道，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用的都是俄国人的金钱。中国人的投资只在铁路总投资中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在铁路建筑完工之后返还的。

宋子文指出，我们已经说定，关于业已过去的事实在不应当再提。大家都知道，最初俄国拥有上述铁路的期限被确定为80年，随后该

期限又被缩减为60年。如果以后者为限，从开始之日起算至今，60年满期也仅剩几年了。再者，众所周知的是，这些铁路已被苏联卖给了日本。 [11]

宋子文继续道，很遗憾，面对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无能为力的。两国其实都无权使用上述铁路，虽然两国现任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无辜的。

斯大林同志说，根据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我们对这些铁路已没有任何权利了，反而是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使用这些铁路的机会，就像是给予恩赐。可事实是，当年这些铁路都是用俄国的钱建造的。不过，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是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即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斯大林同志接着谈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公决问题。他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

宋子文指出，举行该民意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并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您所提到的关于外蒙古的旧地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答，中国人有这样的老地图，上面明确显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希望展示这样的地图的请求，宋子文答，自己参加此次谈判时并没有随身携带这样的地图，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老地图上所标注的旧边界与新边界有何区别？

宋子文再次表示遗憾，并说此次莫斯科之行并未携带这份老地图，随后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转交给中方的那些关于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和协议的草案，中国代表团有何意见？

宋子文答，上述条约和协议的各条款中有很多地方与蒋介石在来电

中所提出的诸原则有出入。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能准备自己的相关草案。关于两国友好和互助条约草案，苏联和中国所提草案的差别并不太大，看来只需双方批准即可。关键在于，根据中国的宪法，条约生效并非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而是从两国互换批准证书之时起算。关于中国自己所编制的草案，宋子文说，中国代表团借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和内容。

斯大林同志将话题又转到外蒙古问题上。他问道，中方建议把对蒙古独立的承认延至打败日本之后，对此如何理解。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曾建议中方应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将宣布之日放到日本被打败之后。

宋子文说，在打败日本之后才举行公决，尔后再由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宋子文强调，这就是说，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必要做认真研究。宋子文保证，中国政府在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绝没有跟苏联耍滑头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里并不涉及诚信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双方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如果现在能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我们就会与中方一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如何计划的，是否现在就打算与苏方达成协议，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延期进行？宋子文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是很想现在就与苏方把所有问题都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还有3天时间，因为12日以后他就必须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斯大林同志问，如果宋子文不反对的话，本次谈判将由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方继续进行。

宋子文答，对此他这方面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是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斯大林同志会面和商谈。

接下来，会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上。

宋子文提出关于煤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将会保证上述铁路的燃料供给，因此就没有必要将煤矿也划入上述铁路的辖区范围。

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都不能与

这些铁路分隔开来。斯大林同志又说，在上次会谈期间他已经讲过，苏方并不觊觎使用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但他并没有指那些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苏中两国关于铁路的协议应当以双方共同拥有这些铁路的原则为基础。中国人与俄国人一样都可以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而经过30年之后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完全拥有了这些铁路的所有权之后，与这些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也都将归属中国。斯大林同志个人认为，中方理应只对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营感兴趣，因此没有理由对他的上述观点表示异议。

宋子文说，中国人认为铁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交通类的企业，其主要职能便是确保苏联与大连和旅顺口相联系的一个通道。而所有其他为这些铁路提供服务和物资供给的企业理应由中国人掌握。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认为究竟哪些企业无法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分离的问题，他答应稍后再向中方提供这些企业的清单。

随后，宋子文将谈判的话题转到关于铁路的维护方面。他认为，保卫铁路的责任理应由中方承担，因为如果由苏联政府组建自己的护路队来负责铁路的保卫工作，实际上已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了东北境内。

斯大林同志对宋子文的上述说法做了纠正。他说，我们用以护路的人并不是军队，而是铁路宪兵。

宋子文说，中方坚持认为这些铁路应当由中国人来护卫，否则中国的主权便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为了保护铁路，苏方应当派遣苏联指挥人员和少量俄国护卫，以便与中国人一起承担起护路的职责。

宋子文指出，如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周围驻扎着俄国军队或宪兵，就必然会引发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最终导致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斯大林同志指出，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范围，因此根本就不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苏方组织铁路护卫队也根本不会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铁路交通秩序是应当加以维护的，铁路上的资产也应当有人去保卫。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区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区域内，中国的司法权也是仍然会发挥应有效力的。斯大林

接着又说，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中国铁路护卫人员纪律性很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宋子文向斯大林同志保证道，我们一定会完整地确保上述铁路的安全，中国政府将会用自己最好的士兵来组建护路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至少在初期，比如1—2年间，铁路护路队的指挥人员应当是苏联人。

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本国领土上保留有外国军队。宋子文特别请求苏方研究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并充分考虑蒋介石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问，斯大林同志对新疆持何态度，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来消除新疆境内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问，您所谓的帮助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希望苏联派遣军队去新疆？

宋子文说，目前新疆境内存在大量的匪帮，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苏联边境地区。中国希望剿灭这些匪徒。

斯大林同志说，这些消息未必正确。他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给予新疆当地居民一定的权利。

宋子文答，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打算。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疆的局势严重到何等程度的问题，宋子文答，这些包括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叛乱者们占领了伊犁边疆区。中方目前正极力解放那些被叛乱者们占据的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政府的愿望是完全合法的。不过，斯大林自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最佳手段还是给予新疆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权利。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拥有——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必要的，否则新疆便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宋子文对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并说当前中国政府希望首先夺回被叛乱者所占据的国土。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这些叛乱者们是否想脱离中国，宋

子文答，他们想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或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些在边境地区的叛乱者果真如此作为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宋子文指出，叛乱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精良，这些武器甚至连中国都没有。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武器是不是印度输入到那里的？宋子文答，中方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只知道其所使用的武器均来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这也未必，有必要认真核实一下。

宋子文请求斯大林同志向他保证，苏方将会尽全力阻止叛乱者从苏联境内获得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能这些武器都是中国官员自己贩卖的，因为这些交易往往利润都较高。

宋子文答，叛乱者所使用的武器质量都比中国官员的好，我们现在已拿到了叛乱者所使用武器的子弹。这些弹药中国根本没有。

宋子文接着问，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同志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如何作为呢？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不要武装中共，并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

宋子文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他同意这样做并问，是否中国政府还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呢？

宋子文说，如果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荒唐了。宋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极力试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

宋子文说，中央政府正极力促成国内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愿望，因为一个国家中理应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宋子文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问，这种道义上的帮助具体指什么呢？

宋子文答，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宋子文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

宋子文指出，我们可以就有关限制本国新闻媒介的问题相互协商。

记录：A.彼得罗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28-38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A.A.彼得罗夫，1945年7月10日。

译自英文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 二、中国共产党；
- 三、新疆。

A.彼得罗夫译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 ф.06, оп.7, п.35, д.506, л.33-34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苏联元帅A.M.华西列夫斯基(1945年7月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的摘录

1.截至1945年8月25日的第八十八旅 [\[12\]](#)：

军官，149人

军士，358人

士兵，1847人 [\[13\]](#)

总计，1354人

2.民族属性：

中国，373人

朝鲜，103人

那乃，416人 [14]

俄罗斯，462人

3.请从由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第88)旅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

4.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 [15] 的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 [16]

5.从94名苏联籍中国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红军部队的翻译，其余上了年纪的人复员。

6.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 [17]

7.请旅负责人派下列人员到卫戍司令部任副职：

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

张寿箴——少校、政治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

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 [18] ；

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

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

金策 [19] ——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

兴市；

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

8.请对下属人员给予颁发国家勋章、奖章的奖励：50名游击队员因其在抗日斗争中的积极表现；25人因其培训该旅中国和朝鲜军官的忘我工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因其协助满洲游击队抗日并将他们组建为红军的下属兵团。

9.请允许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国和朝鲜的士兵提升为军官，而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则授予更高的军衔。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丘维林少将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上校

已选派下列人员供各部队司令部使用：

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

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

ЦАМО РФ, ф.2, оп.19121, д.2, л.3-5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第034号，1945年8月27日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

鉴于游击队在对满洲里日军进行积极、长期的斗争，在人员培养上认真而英勇的工作及在军事训练、政治素质上的突出表现，对第八十八

旅的军官、准尉、军士和列兵给予表彰：

——授予18人“红旗”勋章，包括：1.旅参谋长米林斯基中校；2.旅长周保中；3.营长金日成大尉。

——授予6人“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反侦处(锄奸)处长拉科夫斯基少校。

——授予22人“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旅部第一支队长波利卡尔波夫少校、政治处副处长马利杰夫。

——授予48人“红星”勋章，包括连长阿法纳先科夫上尉。

——授予31人“勇敢”奖章。

——授予131人“战斗功勋”奖章。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

注：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9月9日的嘉奖令于当日执行。

ЦАМОФ, ф.32, оп.11473, д.45, л.173-177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 (1945年8月30日)

机密

在互致问候和就共同的话题进行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关于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前景的问题时，周恩来声明说，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目前，蒋介石已经开始竭力缓和国民党极端‘右

派’分子的强烈反应，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共产党人有利，但是，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

接着，周恩来同志向我通报说，国民党指派了4人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双方通过了如下日程和谈判程序：

一、国家改造的共同问题

二、急需解决的问题

- 1.接受日本投降；
- 2.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
- 3.调解何应钦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三、共同的政治问题

- 1.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
- 2.关于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的问题；
- 3.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 4.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 5.关于军队的问题。

四、决定通过的会晤和谈判程序

- 1.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预备性的谈判；
- 2.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会面；
- 3.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可能进行会谈；
- 4.根据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会谈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和王若

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会晤。

8月29日，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般性会谈之外，周恩来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还进行了会谈，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周恩来说：“张治中向我声明，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的军队将改组为国防军，未来国防军的总数量应该是20个(或40个)师。他说，与此同时，还规定改组共产党的军队。对于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军队应该由几个师组成，张治中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不过目前已经决定，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和装备，这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还触及了边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张群指出，国民政府计划将边区变成单独的省，同时保留它的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我的问题——关于对待敌后解放区的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决定的，张群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随后，周恩来讲述了张群就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向他阐述的三个观点。

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

“(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

“(2)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

“(3)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

与此同时，张群还强调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就此问题预先达成完全的理解，避免大党(国民党)给小党(中国共产党)以压力以及小党可能制造的反对大党的骚乱。应该加入到政府中，而不是推翻政府。

除此而外，还触及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张群声明说，关于政府名称的问题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联合政府’这一名称。张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关于这个政府的性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两种类型——英国的和美国的，即在保留一党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反对党加入政府。更具体地说，这指

的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成立战时内阁类型的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管理国家，在国民党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指的是在日本投降和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

在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初步会谈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甚至是那些初步的和大概的草案，也能使人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大概已经决定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但是，现在就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谈判才刚刚开始。

周恩来强调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18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周恩来指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我说，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同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和说明，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根据条约、协定的条款和章节原本的含义作了相应的解释。对于他的问题——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H.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8月30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8月30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205-208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丘维林致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罗金中将函

苏联武装力量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向贵处派遣了前满洲游击队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游击队近3年来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旅的一部分。

在苏联占领满洲国和北朝鲜期间，为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区的秩序，并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在省会和县城卫戍司令部的合法机构中担任军事代表的副手，也加入地方保安团，或者只是作为当地的居民。

共给您派了80人。

丘维林

1945年9月2日

ЦАМО РФ, ф.2, оп.17582, д.2, л.23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亲爱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1.请原谅我们与你们进行这种横向联系。我们是1941年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194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行动，我们与上级的联系渠道被切断，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我们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不清楚是否仍应开展地下斗争，或者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鉴于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

2.在红军进入东北之后，当地国民党分子便开始散布关于红军和中共的谣言，称共产党员为匪帮。在哈尔滨，目前这些国民党分子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动武装进攻，其目的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党组织。因此，我们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以保护党组织。

此外，我们请求兄弟党能允许我们前往中共中央以获得相应的指示和指令。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那就请让我们通过电话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3.我们正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中—苏文化关系协会。

4.在我们城市的三棵树区有一座满洲所属工厂。目前，该工厂已被我们的人所控制。为了保卫工厂，我们现在手中有10支步枪，但要持有这些枪械需要得到红军的批准。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请求兄弟党批准我们拥有这些枪支。

5.我们的领导干部均配有武器，但兄弟党不允许有人佩带武装，为了避免与红军发生误会，请就此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指示。

6.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宣传工作，但我们没有编辑部，也没有印刷厂。兄弟党是否指示编辑发行机关，以便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7.联共(布)党员同志，红军指战员初次来东北，因此对当地的风土民俗不是太熟悉，为了有利于你们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我们的干部。我们已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8.鉴于部分红军战士违反纪律，并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居民恐慌的事，我们的干部是否可以就促进当地形势、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威望等问题向你们反映自己的意见？

衷心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

向斯克沃佐夫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第三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

1945年9月2日

No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我拜访了赫尔利。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我请求赫尔利告诉我关于目前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赫尔利指出，当他与毛泽东一起从延安返回时，中国人认为，他(赫尔利)将交给他们一份准备好的关于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计划，但是，他(赫尔利)认为，对谈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好一些。

按照他的话，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补充说，在他去延安旅行期间，他在那里会见了一位英国人林迈可，此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执行的是自己的传统的政策：“分而治之。”

赫尔利说，他收到了哈里曼的电报，电报中说哈里曼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似乎声明，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建议说，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某些大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赫尔利回答说，他希望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在赫尔利看来，谈判薄弱的环节是，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

赫尔利再一次重申，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M.贾丕才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8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2, л.218-219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

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10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

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48个师(或者是60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12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12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48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25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H.B.罗申和H.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3, л.220-224

No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机密

9月7日，蒋经国拜访了我。

蒋经国说，按照蒋介石总裁的请求，他希望就一系列问题与我进行交谈，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双方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军队和行政管理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军队的问题，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通过改组和部分转业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拥有12个师。与此同时，这些师应该服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由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给养和武器。共产党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并坚持共产党的部队应该由48个师组成。按照蒋经国的话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共产党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共产党人那里，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行政管理问题，共产党人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的省长应该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而在黄河以南的各省里，副省长和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应该由共产党人担任。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这些要求正好代表着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到政府中，同时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允许他们参加省、区、县政府以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部门。但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共产党人在所有部门里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很好地合作。蒋经国说，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坚持，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司令部的副指挥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蒋经国说，目前双方已经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尽管如此，谈判仍然有希望获得圆满结束，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蒋经国问我，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谈判过程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我回答说，昨天毛泽东拜访了我，并向我通报了关于谈判的大致情况。对于蒋经国的问题——我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我说，根据我的看法，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双方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二、蒋经国通报说，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新疆的令人惊慌的消息。整个阿勒泰地区已经被暴动分子占领。暴动分子还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新疆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迪化(乌鲁木齐)以西的乌苏地区，频繁地

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朱绍良将军的通报，暴动分子在乌苏地区使用了炮兵和空军。与此同时，他们的两架飞机于9月5日轰炸了乌苏城。朱绍良通报说，他已经掌握了暴动分子使用的炮弹和手榴弹的样品，这些样品证明，这些武器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说，此外，暴动分子没有飞机。他以此来暗示，轰炸乌苏地区的那两架飞机也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提请注意，双方应该关注尽可能快速地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双方需要商量一下，如何解决局势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系列改善新疆省行政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还有协助消灭新疆省的暴乱行动的目的。蒋经国还援引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谈内容，在会谈时大元帅曾经允诺，苏联当局将同走私运输武器经过中苏边界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否认了仿佛在暴动分子那边活动着的是苏联飞机的怀疑，并对蒋经国说，对于新疆事件，苏联将严格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5章的内容，以及关于三个问题的著名信函中的条款，其中记录了新疆事件纯属中华民国内部事务，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

三、蒋经国问，罗申将军是否将前往南京，以便出席驻华的日本军队投降书的签字仪式，这个仪式将于9月9日举行。与此同时，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非常希望苏联代表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我对蒋经国说，罗申打算前往南京，并于9月3日到了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接着，罗申就病倒了。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我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四、蒋经国通报说，近日，中国当局的代表和东北地区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算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所在地。蒋经国请求，让苏联驻东北地区的军事当局在上述人员的行程方面给予协助。尤其理想的是，苏联当局能够向他们提供飞机，利用这些飞机可以从北平向长春、沈阳和东北的其他城市调动一批行政管理人员。蒋经国说，国民党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答应给予可能的协助，并向驻东北地区的苏联军事当局通报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的行程以及给予他们相应帮助的必要性。

五、我向蒋经国通报说，今天夜间，重庆的一小股匪徒对苏联武官的办公室和武官助手安德烈耶夫的住宅进行了偷袭，其结果是诸如打字机一类的东西被偷走。我对这股匪徒偷袭苏联机关的无耻行径表示震惊，并请求蒋经国召集重庆最优秀的侦察人员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蒋经

国答应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9月7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20日

AB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3, л.226-229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 工作(1945年10月5日)

今年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来访，我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周恩来应我的要求，概述了当前国共谈判的结果，讲述了国共双方代表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的内容。谈判纪要反映了现在谈判中双方讨论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不论是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还是仍有争议的问题，都逐条做了记录。周恩来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

我问，依他之见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1.签署谈判纪要；2.发表联合公报；3.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国共关于达成谅解和协议的联合声明，对龙云的表现和云南的事态会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回答。从另一方面说，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

周恩来说：“然而，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

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评论当前政治局势时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

周恩来指出：“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会公开宣布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或内战已经开始。如果期待蒋介石方面的行动很不顺利是不对的。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例如，不排除蒋介石下令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某一地区或重要交通干线。如果我们稍有怠慢，将被看作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军令。蒋介石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可以开始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将是内战的开战。”

周恩来强调说，尽管如此，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

周恩来继续说：“在南京地区有日伪军27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不超过3.5万人。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算派军队到华北和东北去，而且要挑选精锐的军队派到那里去。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从哪里调遣军队。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能够搜集到必要的军队，那么又会出现第二个困难，即运输问题。重庆政府研究了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上述地区需要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不能不考虑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的很不稳定的局面。不应忘记，龙云有7个师的军队驻扎在云南边境以外，而且其中一个师是他亲生儿子指挥的。当然，现在很难设想这些军队今后的态度如何。考虑到昆明的混乱局面，绝对不会令人放心的。在谈论国民党的弱点时，还应当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接着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周恩来把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在评价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然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我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又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我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我，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停留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我们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参加谈话的有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和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РФ, ф.0100, оп.40, п.248, д.7, л.120-123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 (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

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

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

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РФ, ф.0100, оп.40, п.248, д.7, л.39-44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远东第一方面军党的政治工作部

目录

前言 第3—4页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第5—13页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第14—17页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第18—22页

附件 卫戍司令第一号命令，第23页

前言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于1931年被日本占领。从那时起，日本就对此地进行掠夺，并控制了这里的所有经济。日本金融资本将此地变成日本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日本利用满洲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当地建立起反苏军事桥头堡。

英勇的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的奴役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是中国军队无法单独战胜敌人，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战无不胜的红军及其伟大的盟国一道支援中国。友好的中国人民通过红军获得了大量援助。

红军在满洲、在东方举起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他们同中国、美国、英国的军队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投降。

满洲在关东军被击溃及摆脱日本的奴役之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在最初的日子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头几批红军解放者代表肩负着建立满洲解放区安定秩序的光荣任务。

本手册就是要阐释卫戍司令的任务和责任。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

卫戍司令的岗位。在国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岗位。卫戍司令的责任是：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隶属。(城市)居民点的卫戍司令，由集团军、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派，并负责处理与军事警备区指挥员的联络。

卫戍司令直属卫戍司令管理部。

如果(城市)居民点已处于方面军的后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卫戍司令则转属方面军，或者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人代替。

卫戍司令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担任红军解放城市的卫戍司令是当地第一批苏联军事部门、民政部门的代表。

卫戍司令的任务是：

1.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备注：为此，卫戍司令成立了城市排雷总部，任务是查清所有布雷区，并采取排雷的紧急措施。工程兵受其指挥。

7.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备注：为此建立了与城市驻军指挥部各执勤分队的联系。

8.提供防火措施。

9.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备注：保护这些目标的任务交由卫戍司令直属部队。

卫戍司令因上述责任而具有以下权力：

1.颁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指示。

2.追究命令、指示违反者的责任。

卫戍部队条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在工农红军军人中的权力。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对地方居民的权力。

卫戍司令的建筑物悬挂苏联国旗。

卫戍司令颁布的主要文件。在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任务的卫戍司令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应当阐述红军对该国家的主要政策，

并具体规定苏军占领区居民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城市或其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应在命令中简洁明了地提到对当地政权和居民的所有要求，以及遵守法令规定的举措。

首批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一切实际活动，包括：

履行自己的责任。

解散一切亲日政治团体及其组织。其所有成员都要接受卫戍司令的核查。命令中要指出，拒绝核查将被视为与间谍、破坏活动同罪的敌对活动。

所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非军事化组织须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无卫戍司令部就向红军驻军登记。拒不登记者将被逮捕。

没收已被解散团体的所有资产问题。包括逃避红军并隐藏起来的团体领袖、成员、职员的个人财产。

企图隐匿、销毁或攫取属于上述团体和个人所有财产的人，将以战时法令对其实行惩处。

所有以前敌方的军人都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接受审核，拒不执行者将按间谍和破坏罪论处。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收藏、购置或生产刀械、枪炮、炸药和无线电设备。

所有公民都应检举旧制度下的帮凶。隐匿、破坏军事代表的命令和知情不报者将追究同谋罪。

卫戍司令的所有命令都应当执行，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反红军的敌对行为。所有工商业、经济部门的领导及其员工都应留在原处继续其活动，否则将受到怠工、战时法令的制裁。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允许各类必需的营养品可按红军到来前的价格自由贸易，禁止投机倒把。

同时，卫戍司令应当严令取缔各类走私及走私品交易。

卫戍司令应当与驻军指挥官(有驻军司令部的地方)一道设立防止指战员与当地居民过度接触和交往的制度，以防军队疫情的发生。

卫戍司令规范所在居民点的公民行为，并制定相应的惩治措施。

卫戍司令应当限制居民的外出时间。没有卫戍司令认可，居民不得在城市(居民点)之间流动。卫戍司令应当采取防范各族居民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不和的措施。

卫戍司令与除奸机关应在邮电局警察员的协助下检查邮局、电报信函。

卫戍司令应当组织当地居民修理道路、桥梁，拆除受损建筑，清洁城市，重建面包房、电站、输水管等基础设施。为此，卫戍司令应发布旨在吸引居民参加劳动的专门法令。其中应当指出：

1.何种年龄、何种性别的居民参加。

2.报到时间和集合地点。

3.随身之物中哪些应被征用。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

弃置资产的考察。卫戍司令必须尽快查清城市及附近农村敌人的弃置资产。查明价值后应立即对其加以保护，以防偷盗。

可通过调查居民点、寻访卫戍司令部辖区乡村的方式进行。为此要就地招收熟悉本地情况和资产状况的居民。参与调查的人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副手、助手，以及经过他们授权的人。

弃置资产的审核。如果说我方专门的军事代表负责审核、转运战利品(军事设备)，那么居民点卫戍司令部则要负责核查、保存和正确使用其他一切资产。包括原料仓库、粮食、燃料、工厂设备、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以及日本人、满洲当局及随同其外逃者的资产。准确核查所有这些资产有助于这些资产的正确使用并防止被盗。

弃置资产的使用。卫戍司令应制定在红军所需的诸如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电站、修理厂、银行、理发店、食品厂、贸易机构等机关

和企业开展工作的措施。

为此，应当查明和立即招收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专家。

在农村，需要收集所有遗留下来的牲畜，招收当地居民加以照料。

卫戍司令按照集团军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现有资源保障地方居民的粮食供应。

防火机关。卫戍司令应采取灭火、防火的紧急措施。他要组建当地的消防队，维修、封闭、保护消防水龙头，保证消防水道畅通。

医疗措施。卫戍司令应当：1.采取清洁街道、院落的紧急措施。2.建设流行病医疗站。3.隔离所有流行病患者并将其安置到医院。4.监测水库并对其加以维护，注意配水站的情况。

工作中对居民的使用。为保证这些工作，卫戍司令应招收地方居民和留在城市中的专家参加工作。

招收可采取征召的方式，并发布命令。招收居民的目的是清理道路、桥梁、拆除街垒和路障，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保证城市交通。

安置红军部队宿营。按照部署计划，在有卫戍司令部的城市部署的部队，应在卫戍司令的帮助下行事。

卫戍司令应登记所有不在城市中的部队，并设定其宿营地点。如需将军队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军事代表就要组织当地居民搬迁到专门划拨出来的住处。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

揭露敌人的宣传。卫戍司令的首要工作是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为此，卫戍司令应当与在居民中有专项工作任务的集团军或方面军的政治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集会、会议、讲座、谈话，通过大功率扩音器宣传红军在满洲的解放目标。

卫戍司令要协助我国政治机关颁发出版物(报纸、传单、小册子)，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阐述我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卫戍司令应采取措施，消灭敌人张贴的标语等。

积极分子的选拔。卫戍司令应当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积极分子。可从下列人等中产生：

- 1.旧制度下的受迫害者(政治犯等)。
- 2.反对旧制度的民主活动家。
- 3.积极支持红军对敌斗争的游击队员。

选拔积极分子应当同“除奸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会留下间谍，掩护在册嫌疑犯和被镇压者。

积极分子的使用。可以在卫戍司令的一切活动中使用甄选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

- 1.在当地居民中开展宣传。
- 2.查明敌视红军的人。
- 3.帮助难民和当地贫困者。
- 4.进行经济重建。

需要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对他们宣讲红军对他们国家的政策、任务、措施的本质等。

应对积极分子的所有工作加以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措施。卫戍司令应当与红军政治机关合作，在当地居民中开展以下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集会、会议、报告、放电影、音乐会、戏剧表演、分发报刊传单小册子等。卫戍司令应当随时准确知道集会的地点及其举办者、集会任务，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禁止没有红军代表参加的集会和会议。

用城市现有的乐手组建乐队。

召开音乐会、戏剧表演，需经卫戍司令认可。节目内容要经卫戍司令审查批准。

应以放映反映苏联生活、红军斗争的苏联文献片和苏联文艺片为

主。

应当组织红军文艺活动音乐会。

旧制度下的城市报纸已经封闭，其资产和印刷基地由卫戍司令没收并转交新成立的报纸机构。

应当收养孤儿并送交保育院。

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是红军上级机关的事情。但如果居民点有无线电中心站和转播网，卫戍司令就可以加以利用以便传送命令和指令。未得到特别指示不得进行其他广播。

关于宗教和神职人员问题。卫戍司令的命令中的第一特别条款中规定，可以到任何寺庙和教堂祈祷。

附件：

第一号命令

为了(某市、县、村镇、乡村)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某市、县、村镇、乡村)卫戍司令命令：

- 1.所有民事机关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
- 2.所有商业、企业主继续其经营。商品、食品的价格维持其在红军到来前的价格。没有特别法令不得出售酒类。
- 3.地方机关和居民应为学校、医院、诊所和其他文化、交通机关和企业提供和平支持。
- 4.寺庙、教堂的祈祷活动照常。
- 5.当地居民应当向卫戍司令部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资产以及无线电设备。
- 6.属于日本人及其军事当局的所有仓库及其现有财物应当交苏联指挥部管理。
- 7.外出时间是当地时间5时至21时。
- 8.夜间有必要的灯火管制。

卫戍司令

ЦАМО РФ, ф.32, оп.11318, д.196, л.90-102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第793号

И.希金给联共(布)中央Г.М.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并建立由友好协会管理的文化宫的合理性问题。

如今，在东北一系列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均建立了一些苏中友好协会。

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联系，并在东北居民中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工作。该协会的纲领和章程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揭露亲日分子的虚伪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科学、文化和艺术。

首批协会组织于今年8月末和9月在东北建立。目前，这些协会已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和宣传工作。例如，在沈阳市组织的协会会议上便有120位该市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学生、工业家、商人、工人、大学生、医生和职员。与会者们一致拥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宣言，阐明了协会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选举了组织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作家、艺术家、中学教师和工人。

今年10月10日，在长春市，当地苏中友好协议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一个群众集会，以庆祝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34周年，与会者达到8000人。

就在同一天，沈阳市也召集了一个有25000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会。各阶层代表在发言中均对红军解放沈阳表示了感谢，并强调必须密切与苏联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与会者们向斯大林同志和蒋介石发送了慰问电，并决定将沈阳市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改名为斯大林元帅、红军、孙逸仙和蒋介石，等等。

在赤峰市由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达到15000人以上。

鉴于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东北，因而有必要在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文化宫。这些文化宫已成为我们对东北居民施加影响的载体，因而最好能由苏中友好协会负责管理。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可依靠这些文化宫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如长春，苏中友好协会已拥有一些巨大的楼房设施，完全适合在这些地方设立文化宫。

我们认为，应当指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东北比较大的城市设立此类文化宫，因为这些城市既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居民中也拥有大量的(拥护苏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И.В.希金 [20]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6, д.42, л.4-5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机密

11月17日我拜访了孙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庆祝孙逸仙诞辰80周年。

在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孙科谈到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他声明说：“当他两天前从南京返回重庆时，接到通报说，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了。按照熊式辉的话说，苏联军队早于按计划拟定的期限提前撤离了营口，非政府军队已经进入那里。长春机场也处于非政府军队的控制下。最终，北平—沈阳的铁路线已经不能工作。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向东北地区调动国民军队了。据说，非政府军甚至已经潜入长春。他们切断了电线，封锁了供水管道，以此中断蒋介石行营的水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被迫从东北召回了行营的全体工作人员。”

接着孙科说：“熊式辉向我通报说，在他到东北的最初几天里，也就是10月13—25日期间，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但是，自10月26日起，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逐渐恶化了。原来，一些没有受任何人委托的人企图在东北组建军队，这种情况引起了苏军司令部的不满。熊式辉向我声明说，他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人的行为不负责任。”

强调自己对目前的局势已绞尽脑汁，孙科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应该更换那些被派往东北工作的人员，因为熊式辉和他的同僚们没有胜任赋予他们的使命。他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还没有对蒋介石说。

对于我的问题——在孙科看来，是什么导致东北局势的尖锐化，孙

科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此尖锐化的局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歧的结果。

孙科问我，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

孙科说，他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随后，他触及关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孙科说，国共谈判没有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两党之间互不信任。

接着他强调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就连接受日本军队投降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孙科说：“国内战争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应该停止流血事件。我赞成一切争端问题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孙科回答说，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建立类似国共统一阵线那样的某种组织。

反过来，他关切地问，我是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的。

我说，我同意他的关于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意见。我补充说，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两党还有希望就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我强调指出，目前只好期待政治协商会议会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阻止国内战争。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M.C.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11月17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机密

11月25日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他请求我向他通报一下谈判的细节，正如报刊报道的那样，苏联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我说，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东北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对此王若飞强调说，显然，他们之间进行过某种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11月17日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

我声明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并强调说，与东北有关的一切问题，按工作程序应该在当地，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熊式辉将军之间解决，我建议王若飞直接找王世杰弄清楚这些问题。

随后，王若飞又关切地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将会进入东北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

我说，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很难下结论。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涉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状况，王若飞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向葫芦岛靠近。在该地区的战斗中，国民党投入了4个军6万多人。目前，共产党的军队集结在绥中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最残酷的战斗正在山东、苏北和河南地区进行着。王世杰曾经在自己亲信的小圈子里说，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蒋介石打算给共产党的军队几次沉重的打击，以此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共产党人正在准备给予还击。不仅如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将进

行几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遏制蒋介石。

随后，王若飞讲述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 [21] (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在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青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现在辽北)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拥有4万人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地方队伍)。王若飞问到，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允许国民党向那里派驻自己的警备队伍。

我说，根据中苏间的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线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强调说，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好不要这样做(即占领长春铁路)。

在会谈结束时王若飞说，尽管目前的局势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但是，共产党人并不害怕。的确，美国人帮助国民党，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

作为结束语，我请王若飞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考虑国内现有的局势，试图与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和其他机构建立直接的联系。我提请注意：这种做法会引起有关机构的注意，他们一直在紧紧监视着共产党人的行动，我建议王若飞据此做出应有的结论。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M.C.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米克拉舍夫斯基

1945年11月25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 (1945年12月29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东北的政治局势、日本在东北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东北的开发、将整个东北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东北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

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东北。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东北。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东北的经济开发，不向东北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东北进行渗透。蒋介石已由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22] 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资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款。否则，无法

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 [23] 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24]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东北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东北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东北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两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四、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东北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因此我国必须：

1. 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东北企业的苏中公司。

2. 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 加速设立为全东北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 制订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

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

C.洛佐夫斯基

АПРФ, ф.3, оп.86, д.146, л.20-26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

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

[25]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 [26] 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 [27] 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

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 [28] 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 [29] 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

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

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會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

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 [30]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

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的，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 [31]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

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

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50—60万军官以及大约12000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B.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98-121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5年12月31日)

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及夫人为欢迎马歇尔举行了午宴，同时邀请了我及其他苏联客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费德林)出席。午宴结束之后，他请我们留在他的官邸里。一杯茶过后，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谈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对会议的工作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32\]](#)

对于我的通报，即蒋经国于1945年12月30日受到了И.В.斯大林的接见，出席会晤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傅秉常，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同时他还表明自己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谢意，感谢他在确保中国军队接受东北地区的行动中给予的帮助。

随后，根据他自己的倡议，蒋介石希望谈谈中国国内的局势问题。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便争取停止国内的武装斗争，恢复交通线路和确保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工作的顺利结束。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蒋介石指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其出发点是：国民党仿佛极力追求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绝不追求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区别的就是，在中国各政党和派别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我们允许东北军、西北军存在——它们的革命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着，蒋介石声明说，各种军队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即“一切武装力量，不管其属性和派别如何，都应该严格地、准确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国内军事上的团结统一”。

谈到目前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

关于马歇尔将军的使命蒋介石从纯军事角度做了解释：据说，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

蒋介石问我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前景的。

我说，苏联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中，同时我还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试图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严格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的话，那么，这将为它开辟一条参加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道路。对此，蒋介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说，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就是说该委员会有可能改组为“高级政治机关”，以及参加行政院。但是，蒋介石不能不承认，对于他们参加上述机关的比例问题“还没有具体的说法”。

A.彼得罗夫

1945年12月3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 п.248, д.Ки-032, л.1-3

1946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机密

194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参谋部首长叶剑英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大使馆。大使委托我接待了他们，对此，我解释说大使因病不能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时间不长的会谈。

他们声称，他们刚刚收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停止内战建议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蒋介石建议双方讨论有关停止内战问题，并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的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同时，他们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书面答复)。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面临一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同意参加与马歇尔的谈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共产党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马歇尔将努力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向蒋介石让步。这个问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中讨论了很久，但代表团什么决定都没有做出。在迅速向延安请求指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决定同时与苏联大使商量。

叶同志和王同志声称，想从大使馆得到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判断马歇尔与周恩来最近一次会谈，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

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后，再三请求将这件事报告大使，并请给他们极其需要的忠告，因为与中央政府代表的会见就要在第二天举行。

我向大使报告此事后，根据指示向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传达说，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征求意见，听取指示。看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

题。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有关东北的问题，我对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声称，谈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太早，正因为中央政府也好，马歇尔也好，尚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会谈进行了30分钟。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A.列多夫斯基(签名)

1946年1月1日

文件送：C.A.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3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20-21

№16063 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

机密

1946年1月2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iao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題，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 [33] 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

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关于苏联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这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日

АВІ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6, л.22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И.В.同志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会谈记录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

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

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

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蒋介石的政策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

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 [34] 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

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

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 [35]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公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公有发达的工业，那里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公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

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B.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123-140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 [36] 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

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

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АПРФ, ф.3, оп.65, д.695, л.30-36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1946年1月8日)

机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務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

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的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微不足道。民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盟的组织性薄弱是不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

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H.T.费德林(签名)

文件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9日

ABПPΦ,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34-36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机密

今年1月14日在我们大使馆接待时，我和东北社会活动家阎宝航进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我问，在重庆有哪些东北的组织。阎宝航回答说，他参加了两个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东北文化协会，这两个组织是进步的和民主的组织。阎宝航还指出，其他像“恢复和平时期东北协会”等那样一些组织，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是按CC派集团的授意工作的。

对于我的提问，阎宝航说，东北政治建设协会领导小组，包括他自己，应该在今年1月15日拜访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在了解了领导小组对东北目前形势的观点以后，请这个小组去会谈。阎宝航声称，在自己给马歇尔的书面请求中，这个小组提出了下列几个要求：

- (1)停止用武力接收东北；
- (2)给东北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
- (3)从东北撤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 (4)在东北建立民兵；

(5)释放张学良。

关于张学良，阎宝航强调说，熊式辉在蒋介石第一次来东北作报告时，他就要蒋注意，张学良的命运继续使东北人不安，东北的很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熊式辉提出有关张学良今后地位的问题，他们不掩盖自己希望张学良回到东北的愿望。蒋介石当时说，张学良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阎宝航声称，当马占山将军拜访蒋介石，并问他张学良命运问题时，蒋介石并未把它当一回事。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5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0, л.4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 (1946年1月16日)

机密

对于我的问题——“停火”命令发布后，在前线是否停止了进攻和战斗，周恩来回答说，战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某些方向和个别地方，国民党部队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部队弱的地方可以看到，如傅作义的军队从西面进入了热河省，第九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部队继续从东面向赤峰和多伦方向挺进。在山东省，那里共产党部队比较强，国民党停止了军事活动。

我问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了没有，周恩来答，军调部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了部署部队和将命令传到战场第一线司令部，派了15架飞机到各个不同的地点，但有1架这样的飞机在赤峰上空飞行时，于1月15日降落在赤峰机场，被红军的部队扣留了。为此，周恩来迫切要求向红军指挥部告知这一事实并释放这架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种会议上证明，在赤峰驻有红军部队，并控制着赤峰和多

论。飞机被红军部队扣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

有关中国共产党执行停止军事活动命令情况，周恩来指出，他们的薄弱环节是延安与自己在前线部队的无线电联系。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干部，以及军队的分散性，无法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马歇尔对国民党部队在某些方面继续进攻和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如何反应，周恩来答，他(周恩来)也就这个问题与马歇尔会谈过，马歇尔对他说，他(马歇尔)也获得了有关共产党同样活动的消息。周说，在前线还是继续有部队在活动，在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而在一些地区不经战斗就夺取了一些据点。但是，马歇尔说，所有有关这些情况他已经都报告了蒋介石。除此之外，周还指出，国民党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将军(侦查厅厅长)，对情况非常了解，他拥有与所有部队的通畅的联络网，并利用这个优势向蒋介石和马歇尔报告共产党部队违反命令，他总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周还说，美国的上校伯劳乌特通知说，目前双方都有错，都违反命令。尽管命令在1946年1月13日晚上生效，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收到了命令。因此，个别部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周声称，1月13日他收到延安的通知，说国民党正在进攻热河和其他一些地方，而共产党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也有共产党部队转为进攻并占领某些居民点的情况。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国民党政权从他们侵占的居民点里赶走，周说，尽管如此，战斗行动基本上已停止了，而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最重要居民点的意图。因此，在山西、山东、热河，国民党部队继续向前行进。周恩来说，他已经给延安发电报，要司令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不违犯命令，以便共产党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收回那些国民党部队在命令发出后占领的居民点，这样还可以促使国内军事政治状况的稳定。

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状况的问题时，周强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大，这就使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分散，武装力量分散。

部队散在广阔的地区，会导致纪律松懈，并在一些战线引起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降低了共产党部队的战斗力。如果说以前这些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中，共产党部队能顺利地打击国民党军队，那么现在这些军队则在一系列前线地段遭到了失败。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大，但是缺

少炮兵和其他武装，不能够坚守住已攻占的阵地，只有在组建了强大突击部队的地区才有可能进行进攻战役。

缺乏经过技术培训的军官，使共产党甚至没有能力使用最近获得的武器、大炮和坦克。

在评价重庆的状况时周强调，国民党企图稍为打开一点未来民主大厅的门，但是进入这个大厅的必经之路，是要解除共产党武装。玩弄民主辞藻现在成为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国民党企图用“改组国民政府”、“以民主人士补充各级政府组织”、“提供地方自治”等辞藻来获得国内和国外社会舆论的好感。但是，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周声称，蒋介石不得不讲民主是因为外界对他有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国际舆论、国内各种党派和组织、中国社会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蒋介石必须做出某些让步，周举例说，当蒋介石不想在把赤峰和多伦留给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上让步时，马歇尔是这样给他压力的：在蒋介石坚决拒绝退出这些居民点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申明，如果他不让步，内战将不能停止，这样就会引起三大强国的干涉。结果，蒋介石好像当即就签署了将赤峰和多伦让给共产党部队的命令。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周强调，民盟坚决站在敦促蒋介石实现其宣布的诺言的立场上。民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党对此所持立场的问题时，周回答说，国民党除颁布声明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提出。但颁布的东西则表明，国民党企图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保存绝对多数。如果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应该在所有政府机关中实施，那么国民党却主张民主只能在某些改组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实施。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分子参加。这就是现在进行中的会议的幕后背景。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宪法，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应该进行民主改造。但国民党企图

保持五五宪法，这个宪法实质上是一部专制的宪法。根据幕后谈判判断，国民党倾向于做出某些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与国民党对立的具体纲领，周回答说，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很清楚：(1)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法；(2)实现政治军事分治，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利；(3)给予省级政府自治权；(4)同意中国共产党有20个步兵师。

中国共产党在不提高自己军事方面要求的同时，将为实现扩大政治纲领而斗争。因此，将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周指出，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而青年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对罗申的提问——马歇尔将军是什么立场，周回答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关心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事都很在行，但目前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周说，根据他的观点，马歇尔正等待军事命令的结果，看来，有了结果他会开始显示有关政治问题的极大积极性。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这个军队将由9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组成。军队的总人数为180万人，其中40万人是军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

周指出，张群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兵力对比应是1：6，他暗示共产党军队应该是16个师，而不是20个师。周补充说，张群和张治中现在还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说中国军队的改组应该在6个月的期限里完成，而共产党军队的改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

我问，政治协商会议有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做出什么具体的决议。周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议。现在还在进行辩论。有鉴于此，成立了5个小组，从事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提出建议。

我问，国民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怎样看待，周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但在他们的代表中出现了让步的倾向，

允许在8个解放区进行县长的选举，或许还允许选举边区的全权代表。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声明。

对于我的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周声称，为了以政治手段开始进攻和保卫民主权利，现在正在试探国民党的弱点，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住赤峰和多伦。至于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则在察哈尔和热河省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在山东和河北获得了参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想保留某些边区的行政权。如果蒋介石不想把察哈尔和热河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和河北参与行政管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为赢得胜利而斗争。

在回答周的提问——对目前形势如何评价时，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

周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同时对美国人更加特别小心。周说，他非常清楚，美国人过去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必须绕过的暗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美国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问题。接着周强调，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例如，他们认为红军应该进入东北，并把它转交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他们不懂得所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即使了解，也极其肤浅。周说，当他在延安看到那些电文时，就更加清楚了。

在会谈结束时，周声称到1946年10月 [37]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增强，在那时与蒋介石讨论各种各样问题都比较容易。那时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开来，并遭到了失败。现在的作用起了变化。现在不得不寻找所有的道路，以便达到折中地解决问题。周强调说中国的形势很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工作和努力。

H.B.罗申、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H.T.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8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0, л.5-11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30日)

机密

1月3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共产党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我请求郭沫若与我交换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印象，讲述一下在协商会议上各种不同党派和组织代表的表现。

郭沫若评价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时说，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及其工作开展，现在正呈现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折时刻。现在可以断定具有一系列民主措施这一事实，至少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的正式记录。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

但是，郭沫若强调，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持续进步的，而是带有临时性和局限性，因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

郭沫若声称，现在的民主是表面的，是外来的，是外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压的直接结果。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团到中国，在蒋介石周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国际条件，并使他面对必须拒绝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将导致国民党制度的彻底毁灭，但是在马歇尔使团面前却摆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的加强，担心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可能性的美国的统治阶层，不能不采取应急措施，来预防对他们极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马歇尔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对美国来说是主要的危险，因此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

主分子的活动，支持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马歇尔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主要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结果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的民主改革只是表面的，相对的。他们的虚假民主和表面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

其次，国民党保持自己具有作为老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因此可以保证自己在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

第三，在武装力量国家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因为蒋介石为自己保留了90个师的正规军，这些师都是由经过考验、最忠于他的部队组成的，而对这些部队而言，“在军队中禁止党派活动”却是一句空话。

第四，在任命政府重要负责岗位时，国民党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各部部长的职位，如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这样，即使那些次要的各部都由民盟的代表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干部手中，因此领导只是形式上的。

这样，郭沫若强调说，民主阵线实际上争取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表面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符合民主运动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指出，尽管存在着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了。现在蒋介石不仅被看做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袖，而且被看做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首脑。国内外社会舆论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承认，为他获取其他大国，首先是获取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获得这些援助将会稳定国内的经济局势，也会使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

在评价各种党派和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时，郭沫若指出，除国民党9名代表外，对国民政府的纲领表示支持的有：青年党(5人)，这个党，根据可靠消息，得到了张群的一大笔贿赂；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钱永铭、莫德惠、李烛尘。在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只有一个邵从恩除外，他采取独立的立场。

郭沫若说，民盟代表团的成员有：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勱，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统一立场上，在为民主纲领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0, д.32, л.47-49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机密

2月6日，我接待了周恩来，并与他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满意。周恩来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决议，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收获。周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正式的看法。朱德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已阐述了这些看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正式的指示，其中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摧毁国民党专政的开始，今后民主运动便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因而，必须改变工作的形式和工作的方法。周强调说，从一些文件来看，这些决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些成果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巩固。不能不承认，今后在实践中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还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果的原因，周恩来指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只是因为外部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压力。如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应该做什么；马歇尔将军在重庆也对蒋介石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口袋里装着20亿美元的借款支票，发放5个师的装备以及为中国提供若干飞机和船只的命令。

讲到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周恩来指出，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克服的有一系列困难，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国民党在最近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在1月30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CC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蒋介石声称，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客观上共产党是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假如没有共产党，不知道国民党将会怎样；假如没有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督促国民党，不知道国民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甚至不能排除国民党瓦解的可能性。今年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样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向民主派做这样大的让步。谷正纲、张道藩、朱家骅等人的发言极端尖锐，谷正纲声称国民党将没有前途，国民党代表团背叛了孙逸仙的原则，等等，张道藩也做了类似的发言。比这更大的喧闹是在2月4日的会议上，这次会议蒋介石没有参加。CC派代表感受到了自由，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但是最后，会议参加者还是得出结论，目前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决议是蒋介石批准的，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孙科、邵力子、张群、王世杰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谴责他们背叛了孙逸仙的学说，特别是张道藩的发言毫不妥协。当有人说，这些决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时，张道藩和萧同兹问答说，对蒋介石也要“刮胡子”。^[38]从发言者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蒋介石仍然留在领导位置上，那么不知道，他的其他战友会怎样……

周恩来讲，不久之前，陈果夫拜访蒋介石，并请他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么大的退让。蒋介石好像回答说，退让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综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行动，周恩来说，很可能再过两至三个月他们又会再次抬起头。

我问，他们会不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活动。周恩来说，在这个全会上，大概会大打出手，但他们不会成功的。但是，周恩来指出，在马歇尔离开以后，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行动。现在他们开始活动，收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签名，作为对全会的准备。这些签名不仅在重庆收集，而且在偏远地区收集。任务在于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之前将这一切提供给蒋介石。

按周恩来的说法，军人集团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毫不逊色。例如，胡宗南在西安召集他的将军们，试图搞清楚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和

态度。当他听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协商会议表示赞同时，立刻严厉批评、谩骂他们。后来，胡宗南又召集了相当数量的各级军官，并要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人举手，结果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当他要反对的人举手时，只有几十个人举手。胡宗南大骂所有出席的人，骂他们是寄生虫，不懂得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周恩来指出，这并不表示在军队中没有人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现在在上海和南京地区正在召开军事领导人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徐永昌、顾祝同、胡宗南等人。他们集中在那里，是为了研究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怎样对军队实行控制。对于他们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保持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统一；

(2)在和平时期保留对一些地区和剿匪司令部的指挥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与“匪徒”做斗争，并稳定解放区的秩序；

(3)不允许其他党派的代表到国防部、征募局、作战局去，不仅不能领导这些机构，而且也不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

(4)保留国民党军事院校。

这样一来，周恩来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那么现在共产党则要求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国家化。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保密局人员所采取的措施。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些机构应该废除。因此，国民党现在正在迅速改头换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部队，如警察部队、交通警察等。有些国民党员提出在“特务”中建立政党、协会等。特别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20万人。

周指出，国民党右翼斗争的积极方法之一还应算上这一招，即他们那些维护者企图把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等人排挤出领导层。共产党方面就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施。周说，他2月1日拜访了蒋介石，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已经做出的决议。周指出，共产党准备重新改组自己的军队，将其数量减少到20个师，并取消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周要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准备真诚地、经常地与国民党合作。周表示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重要问题上互相交换情况。接着周强调，有关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共产党希望还能参加各省

的政府。蒋介石对周声称，在他去延安前，他(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应该拟订一个解决军事问题的草案。

会谈中周请求在国务会议的组成中，共产党应该有10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否决权。然后，周对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停止敌对宣传，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双方困难。周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及其他组织的不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困难，这不会对国民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周对蒋介石说，困难越少，他(蒋介石)就越容易领导国家和人民。

蒋介石回答说，国民党准备长期合作，不会允许改变决议。他强调说，这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之所以有可能获得，就是因为是他(蒋介石)渴求达到的。蒋介石说，如果中国走上新的道路，那么就会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周说，他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王世杰与他谈话时说到，在周与蒋介石会谈时，“双方相互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国民党代表个人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时的活动的评价，周说，王世杰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执著，不急于做出决定，能清醒地进行评判并善于做出让步。张群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他要么大大退让，要么顽固到什么让步的话也听不进去。邵力子——没有实权，没有什么靠山，因而他缺乏独立性和勇气。

讲到拟订国务会议成员名单的问题时，周说，大概位置的排列，看来是共产党8个，民盟5个，青年党3个，无党派人士4个。周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给共产党10个名额。然后，他强调说，国民党在选拔自己的代表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是否让国民党元老进入国务会议的问题上，蒋介石进退两难，例如，孙科、于右任、冯玉祥、孙逸仙夫人等，因为他们的左倾观点会令蒋介石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周声称，共产党努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前公布名单，并坚决主张国民党也公布名单。

关于部长的分配问题，周说，目前尚无肯定的意见，但是对于无党派，国民党好像准备给3个位置；司法部、教育部和农林部和一个委员会；除部长外，还将建立4个不管部部长职位。

对于我的提问——按周恩来的看法，蒋介石是打算实现政治协商会

议决议，还是会拖延这些决议的实现，周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将依赖下面事实的发展：如果能够促使蒋介石退让的国际压力继续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削弱自己的努力，那么他将继续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去实施会议的决议。如果说压力消除，共产党又削弱了自己的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则加强了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能排除蒋介石将从已确定的道路上转向。如果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努力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并感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压力，那么，他未必会抛弃自己的决定和诺言。

接着，周说，从马歇尔的行为来看，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做得很好，他们努力帮助中国整顿秩序，制止混乱。在这方面，他们既帮助了国民党，又帮助了共产党。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事情表面的和暂时的一面。他们(美国人)竭力想为自己将来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利用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看起来在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至于如何评价马歇尔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在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和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么积极地介入，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停火。在美国人帮助下，周强调说，共产党保住了赤峰。

周告诉我，马歇尔拟订了下列各种计划：在和平时期改编军队，组成50个师的计划；在和平时期应征措施法草案；以军团为独立单位集中供应军需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军需供应计划。周指出，马歇尔对他说过一个想法，为了部署共产党军队，应该事先考虑到他们主要驻扎在中国北方，部分在东北、中原和南方。马歇尔想建议蒋介石，用以下方式作为试验：一个军团以共产党2个师和国民党1个师组成，由共产党指挥；一个军团以国民党2个师和共产党1个师组成，由国民党指挥。

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周恩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歇尔的建议是这样，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

对我的提问——蒋介石对马歇尔是否满意，周回答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说，他认为马歇尔为人客观，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对我的插问——蒋介石想不想念赫尔利，周回答说，这不大可能。赫尔利是一个

市会，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商人。周说，从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月20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声称，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看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结果，而他(马歇尔)很快就要回国了。蒋介石对他说，结果会有的。但马歇尔刚刚离开，蒋介石就大发雷霆，用拳头狠狠地敲打桌子。如果这件事，再加上由陈果夫为蒋介石起草的声明，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即美国是真的给了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T.B.宋作为总理 [39]，实际上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什么积极作用，这如何解释。周回答说，现在T.B.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济事业上，与政治相比，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个人收入。周说，T.B.宋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在国外获得荣耀和为自己增加资本。有材料说，在改组政府时，他未必能保持自己的位置。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言，他可以作为特别大使到美国去，因为要在那里解决贷款问题。

大使馆顾问J.I.M.米克拉舍夫斯基、武官少将H.B.罗申和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1月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0, л.16-22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 (1946年2月12日)

机密

今年2月12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周恩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讲述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上。他说，CC派煽动在国民党里组织新的派别，自称“革新派”。这个派别为首的是谷正

纲、张道藩、萧铮、赖琰、萧同兹、胡宗南及其他附和CC派的人。那些“革新派”拥护者举行了座谈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度，蒋介石除了中华民国主席外，不应该再担任党的领袖。

(2)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3)重新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4)限制国民党元老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

周指出，“革新派”企图在今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纲领。除此之外，周恩来强调，“革新派”拥护者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这种斗争简直就是流氓行为。举例来说，今年2月10日，应该在重庆一个广场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群众大会，被CC派领导的秘密警察的流氓干涉所阻挠。

至于蒋介石对“革新派”的态度，周声称，蒋介石的立场是双重态度：他不反对反共活动，但反对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赞成各种派别在国民党内活动，但不得越过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决议的界限。

接着周恩来对我讲了有关他和张嘉璈的谈话。他指出，总的来说，张嘉璈的表现比熊式辉好。周发现，当叶剑英在北平访问熊式辉，想与他商谈东北问题的时候，后者却强调，这个问题带有外交性质，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当张嘉璈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也涉及东北问题，前者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张嘉璈对周恩来说，东北的形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事情本身要求双方不可避免地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政策的评价，张嘉璈强调，苏联对解决东北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不急于撤出自己的军队。苏联得到了自己在远东边界线的安全和长期不受侵犯的保证。

对于红军部队拖延从东北撤离，张嘉璈指出，这不会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特别反对，因为苏联军队的过早撤离可以被共产党和其他武

装力量利用去占领地盘，并在东北造成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复杂的状况。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红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会拖延，因为根据蒋介石给张嘉璈的批示，蒋不准备在苏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解决政治问题。

谈到中苏经济谈判，张嘉璈说，在苏联做了那些很大让步之后，蒋介石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唯一困难的只剩下发电站的管理问题了。现在经济合作的问题已递交蒋介石，蒋让经济部来研究，这个部应该综合处理整个东北经济问题，并做出最后的结论。

周恩来告诉我，张嘉璈对共产党关于东北军事政治问题解决道路的观点感兴趣。周恩来对张说，这些问题应该按双方协商的道路来解决。其中包括，共产党不反对派遣由军调部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小组到营口去实地搞清情况。关于政治问题，共产党建议改组蒋介石在长春的行辕下属的政治委员会，重新考虑9省省长问题，并进行县级领导的全民选举。周还指出，尽管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国民党至今为止尚未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派军事小组到营口去的问题。

有鉴于此，张嘉璈声称，国民党拖延回答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合法化和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不感兴趣；其次，国民党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派这样组成的小组去营口。至于政治问题，张嘉璈强调说，那就应该遵守基本的条件，即要保持蒋介石的面子，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应该是互让的。因此，张嘉璈说，共产党不应该拒绝暂时的妥协，然后可以继续重新考虑所采取的决定。

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2月14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0, л.24-26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 (1946年2月21日)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和红军在这领地上的进驻，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政治状况，并掀起了当地居民广泛的民主运动。解散了所有日本和亲日本的组织，形成了当地的政权机关，共产党组织合法化，建立了群众民主联盟和协会：有工人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的，妇女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开始出版了25种报纸、6种杂志和3种通讯刊物。

以友好态度对待苏联的最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东北11个城市里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团结了2.5万名成员。这些协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普及苏联和红军的影响。这些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4份报纸、3份杂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分发和传播书本、小册子和苏联领导人照片。

在东北的我军政治机关在帮助当地民主组织的工作时，还在中国和苏联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散发了将近1亿份传单、标语、条幅、小册子、肖像和明信片。在城市和农业区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关于苏联和红军的几百场报告会和演讲。在东北所有的城市里放映苏联电影。红军歌舞团在居民中进行演出。

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在东北的影响大大增长。居民基本群众都对红军和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国民党分子在这段时间里对民主组织的活动，特别对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制造了很多障碍。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分子活跃起来，积极从事反动的和反苏的活动。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宣传，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对民主组织，特别对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采取威胁、逮捕和暗杀的手段。在四平出现了传单，国民党分子要求取消中苏友好协会。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传播谣言说，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所有协会的积极分子都要被消灭。结果，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明显地收缩了。

考虑到我们的军队将从东北撤离，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在那里的政

治影响，建议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用吸收在东北的苏联公民和中国社会的著名人士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并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这些友好协会的正式联系。

2.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沈阳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文化宫。通过这些文化宫在中国居民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巩固苏中友好和普及对苏联生活的知识。

3.在中长铁路管理局的苏联机构下设文化教育部，其目的是为东北的中国和苏联居民出版中文和俄文报纸，登载东北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关苏联的新闻，并出版有助于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报纸。

4.苏联新闻局加速在东北各大城市建立代表处。

5.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中文版的苏联文学期刊，以及优秀文艺、经济和政治类书籍，并且在大连市也出版上列书籍。

6.由于莫斯科对华广播听不清，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无线电推广和无线电广播事业委员会，应加速建立从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无线电台的对华广播。

7.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电影摄影事业委员会应加速用中文字幕和华语配制苏联电影，并大大增加寄往东北的影片。

8.派遣某些著名的苏联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苏联艺术家到东北去公开讲演和演出。

9.责成国际书店联合公司在东北各城市出售俄文版苏联报纸、杂志以及文艺、经济、政治书籍。

呈此报告，请您决定。

И.В.希金

印章：洛佐夫斯基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B.M.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

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人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她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許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签名)

РЦХИДНИ，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 (1946年2月22日)

关于解散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的情况说明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部(PO)部长1945年10月12日的电报，我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接管第八十八旅。

抵达前实员：军官197人，中士、列兵662人。其中长期在外256人(在满洲的中国人)。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应复员211人。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1945年10月15日第046/042号令解散这支部

队。

按照组织动员处的计划，解散前队伍中的全部人员派往其他部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大机场、哈巴罗夫斯克第100号仓库)工作。军官则由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管理；政工人员受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管理。

在满洲的军官、中士和列兵(中国同志)复员。按照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部队的公文、档案和关于游击运动的信函转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

关于驻扎区维亚茨科耶村所有粮食和资产的登记册及解散部队的文件转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部队的旗帜送往莫斯科市博物馆。

部队于1945年12月11日彻底解散。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成员——该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代参谋长亚特采列夫签署的两份解散命令已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

委员会主席、中校

阿尼金

1946年2月22日

ЦАМОРФ, ф.2, оп.12378, д.1, л.68-69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 (1946年4月10日)

机密

今年4月1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在谈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时，郭沫若指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事实，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军事和政治问题展开的。他指出，这一斗争的根据，仍然是中国民主化的原则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并且阻止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现在，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新的武装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在华北，特别是在东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不能缓和

这种白热化的气氛，反而给国民党提供了加强反共斗争的条件。

郭沫若指出，马歇尔和魏德迈离华返美以及给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美国贷款，为国民党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如果美国不能把中国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那么它至少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反动分子的反苏活动问题时，郭沫若讲述了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于1946年4月8日为重庆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作的报告。朱经农在报告中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即英国模式的白色帝国主义和“苏联赤色帝国主义”。朱经农在叙述“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时，力求使听众相信，红军在东北的恶劣行径，使中世纪的可怕暴行为之黯然失色…… [40]

针对朱经农教授这种对苏联的恶意污蔑和伪科学的诽谤，郭沫若撰文揭露了他们为其党的利益而利用其在政府中的高位进行粗暴诽谤的行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第一远东司、大使馆档案室

AB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5-16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机密

4月26日，周恩来到访。周恩来说，近日举行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声称，他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攻打长春，目前在长春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在美军帮助下，他们往东北调遣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往北平调遣了另外2个军。据周恩来说，共产党军队正在加强四平—长春一线，但是如果国民党把更多部队增派到长春，那么形势可能会更复杂。

至于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蒋介石坚决表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拿下长春的时候，他才会同共产党谈判。俞大维、徐永昌和秦德纯力图说服马歇尔，如果长春继续留在共产党手里，那么他们将巩固自己的阵地，到时候东北的大门不仅会对国民党而且也会对美国人关上。4月25日马歇尔邀请周恩来并问道，他能否为改善东北的状况提出具体办法。马歇尔设想，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北的某些地方由国民党军队控制，那么他会更有把握达成国共和平协定。然而，周恩来说，他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周指出，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东北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再做出让步。况且，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对1946年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中规定的东北国共力量比例不满意。延安方面认为，将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应当是对等的。

马歇尔由于担心完不成他的使命，美国也“丢面子”，决定通过张君勱、张澜及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他请他们说服中共不要想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目前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中共并不打算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们不允许把东北变成反共的基地。他强调，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铁路交通问题。

马歇尔深信，国共两党都不愿意互相做出让步。马歇尔于4月23日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蒋介石否认了这一草案，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向马歇尔表示，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他们坚持要完全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他们认为草案第一项中所说的“将对停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调动提出进一步的指令，下述情况除外”一句中“下述情况除外”字样应删除。

共产党方面认为，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应当重新修订。因此，草案第二项所说的“关于东北地区各方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要根据1946年2月25日改组计划做出。占领地带将由‘三人小组’确定。派往东北的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调动将告结束”，这段话应改成：“关于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将由‘三人小组’决定。”

周恩来表示，现在说不上接收主权，因为苏联军队已撤出东北。因

此，共产党方面提议从草案第三项中删除“为了接收主权和保证主要铁路的安全”的字样。草案第三项应该表述为：“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今后的调动必须得到‘三人小组’的特批。”

草案第四项共产党方面完全同意。

马歇尔先对周恩来对第三项的意见给予回应。他说，草案中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调动是为了接收主权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一调动只有得到“三人小组”同意才能进行。

接着，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

我问周恩来，目前蒋介石对苏联、中共和美国持什么态度。

周恩来说，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问周恩来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的情况。

周恩来说，美国原则上同意借给中国5.6亿美元，但是在国共两党内战停战之前，他们大概不会提供这笔借款。

周恩来说，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将撤离中国北方。马歇尔建议让国军调两个军到中国北方以便接收因美军撤退而留下的据点。共产党方面反对国军两个军调往北方。

周恩来说：“美国人大概真的将从中国撤离，因为他们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方法支援蒋介石。”

谈话最后涉及张学良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在东北建立临时政府，并在改组蒋介石东北行辕及其属下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之后，释放张学良。周恩来不久前收到了莫德惠转来的张学良的信。根据来信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很好。周补充说，无论如何，在原东北的高官和将军中，张学良最正派，而且可以说，他对中共和苏联都持友好态度。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二等秘书贾丕才。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4月16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43-47

№13270 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1946年5月4日)

机密

致A.C.潘友新同志：

《调查报告》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人员数量：

(1)截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共计为121万人(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据1946年4月16日《时事》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为20000人。

(3)朝鲜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60000人。其中30000人在南朝鲜(根据苏联驻汉城的总领事于1946年2月10日的通报)，30000人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政治管理总局第7局1946年3月1日的通报材料)。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41] 太平洋司司长

E.科瓦廖夫

1946年5月4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13, л.41

№13271 格緬德爾致科瓦廖夫報告：滿洲政治局勢尖銳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 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 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格緬德爾(簽名)

1946年5月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 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 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 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 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据中国方面的资料, 长春约有50万人口。政府军由第一军、第六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四军组成, 驻扎在沈阳, 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通过这条铁路, 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 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七军、第五军、第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这样, 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 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 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 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 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 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此外, 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 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护, 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 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去年11—12月, 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 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 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今年在南满发生的冲突中, 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 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 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4月9日, 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 第六军的第十四师被全歼。4月16日, 在塔湾(Тава)战役中, 第八十七师被全歼。而在4月26日, 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4月19日, 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 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 俘虏7000余人。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 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 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 都被蒋介石拒绝了, 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 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42]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 这一杜撰的

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存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诚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1月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阳市府中还有原‘满

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这样，在1946年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中国共产党东北局

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 [43] 招募到自己身边。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通化市公安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1946年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

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1946年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在19—24岁。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灭遗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1月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

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4月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5日到达沈阳。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 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引自1946年3月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5月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13, л.42-69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 (1946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A.C.潘友新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向您作如下内容的通报。

1.在红军部队离开沈阳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在3个方向上向中国共共产党的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沿沈阳、长春经过四平(重点打击的地方)的铁路线；沿沈阳、海龙、吉林经过抚顺(煤矿)的铁路线以及在安东 [44] 和营口的主要方向上，以打通沈阳至大连(大连港)的铁路。

参加这次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军队的进攻行动的国民党7个军的兵力，呈楔形状态部署，其最高点在四平市，左翼在热河市的东南地区，右翼在营口地区。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线，环绕着这个楔形通过。

目前，最重大和最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四平地区和本溪湖方向上。

2.国民党军队兵临四平市，并占领了沈阳和营口的铁路，参加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

除此而外，借助于美国海军的帮助，国民党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东北地区的这几个方向上，以实施针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

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例如，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葫芦岛、锦州和沈阳地区。北平、天津，包括塘沽港地区，也处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占据着这些地区，美国人阻碍八路军华北队伍与自己在东北地区的部队的联系。

3.除了上述所说的占据着沈阳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之外，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法途径，组建了由“满洲国”军队的残余分子、红胡子分子(地方对匪徒分子的称呼)和所有亲日分子参加的队伍，这些亲日分子由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曾经受到人民政权的打击。这些国民党的非法队伍被召唤同东北民主力量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他们还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各地方建立国民党政权，并给在东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

由所谓的东北光复军司令部，对在东北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力量的工作实施总的领导。现已查明这支队伍是由地方的军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组成的。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独立的支队组成的，他们分散在东北广阔的地域里，主要是矿区，尤其是东北的东部地区。

目前，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封锁。这些非法武装力量总计有8—8.5万人。

附东北地区地图——只给收件人。

上校莱基奇科

1946年5月11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13, л.70-72

№16135 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1946年6月24日)

外交部获悉，由于东北地区的国内战争，辽东半岛的原料和燃料运输在3个月前已中断，因此，担负20%任务的大连市工业企业被迫停止生产。5万名从业工人中近期有1万名下岗。近70%的工人失业。苏军司令部已指示工厂厂长要给下岗人员尽可能保留一半工资和粮食配额。粮食供应状况依然紧张。目前辽东半岛仅有居民半个月的粮食储备。希望从山东省(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区)通过中国商人用工业品交换获得数千吨

粮食，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美国军舰帮助下成功包围山东，那么这条获取粮食的通道将被关闭。大量失业、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造成辽东半岛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当地的困难进行反苏宣传。

请告诉我们，外贸部在给大连运送粮食、原料和燃料方面有些什么办法。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РРФ, ф.0100, оп.34, п.254, д.32, л.66-66об

№16137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1946年6月27日)

机密

6月27日周恩来到访，我与周恩来会谈内容如下：

谈到中国国内局势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类似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状况：苏联力图保护小民主国家的利益，而英国和美国却拉后腿；中国共产党保护解放区的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消灭解放区，况且在国民党反对中共的斗争中，美国完全站在蒋介石一方。

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所说中共曾向美国提出要求为其军队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我问周恩来上述声明是否属实。

周恩来回答说，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军队重组纲要时提出来的，当时谈到国民党军队缩减到50个师，而共产党军队缩减到10个师，并提出对总共60个师提供同等援助的问题。然而，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反对，这一问题并没得到解决。

后来中共没有再提这一问题。当提出对中国军援的法律草案时，现在又谈起上述问题。美国官方人士关于援助扩大到共产党10个师的声明，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似乎很需要这种援助的中共的公正态度，并以此为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辩解。

我表示想了解周恩来对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一方面同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借助武装力量对中共施加压

力，以达到使其把军队撤离主要铁路干线地区和大城市的目的。他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往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的荒漠地区，使他们失去哈尔滨、牡丹江、白河、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威海卫、烟台、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在此前提下，他同意把延安、张家口地区、山西东南部、山东省的泰安和临沂地区留给中共。蒋介石的计划其用意是切断中共的交通线，割裂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并剥夺解放区人民已获得的自由权利。

中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同意接受停战的建议，把部队撤离前线20里，并恢复交通，但其前提条件是目前掌握在中共手中的交通线仍由其控制。国民党政府可以实施这些交通线的一般管理，但不能派去军队。

国民党提出赋予美国人仲裁权，尽管它清楚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它企图挑起中共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识破了国民党的这一伎俩，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否决了关于仲裁的建议，共产党人对美国人做出了小的让步，是为了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方面。例如，同意赋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成员在某个调停组发生分歧时向军调部和“三人小组”报告的权利，调查争议问题的权利以及对军调部命令执行情况检查的权利。国共谈判中的障碍是军队的改组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中共不同意把军队部署到国民党建议的那些地区，那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中共同意重新部署自己部队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军队撤出的那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留在中共手里，直到改组政府和建立民主体制，同时国民党不派部队到这些地区。例如，中共将从烟台撤出自己的军队，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把自己的军队派进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离这个港口不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制止国民党夺取这一港口的企图。共产党人也可以同意把江苏北部的驻军减少到2个师，但不允许国民党往那儿派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认为中共的这一计划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周恩来声明：中共中央准备向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只有哈尔滨，无论如何不包括东北的其他地区。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强攻夺取哈尔滨不会成功。林彪将军6月6日前已准备好撤离哈尔滨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成功地争取到停战，因此至今哈尔滨仍在中共手中。现在中共同意放弃哈尔滨，而国民党不得派军队进驻。市长必须是

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应当包括当地市民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弃哈尔滨对中共不会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它因此能保住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洮南。

马歇尔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可以同意三省(兴安、嫩江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考虑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至少由当地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两省——合江和松江省政府主席。

接着谈到东北各方军队力量对比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允许其在东北拥有5个师(根据重组军队协定是1个军含3个师)，而国民党有5个军。

综上所述，周恩来表示，国民党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按国民党的计划，共产党人必须让出苏北地区、山东半岛、热河和察哈尔以及通往北平、天津、安东、牡丹江等地的要冲。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国民党将采取武力。

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地区和苏北。实施这些战役将由汤恩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部队来承担；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说到东北，首先攻击的是哈尔滨，也可能是安东。

周恩来接着说，马歇尔非常清楚，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他还知道，内战重起可能导致三个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因此，他既对中共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他们互相做出让步。共产党人准备对国民党做出某些让步，这也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并强调它不想考虑马歇尔的意见。这样，破坏谈判的责任就要由蒋介石承担。然而，蒋介石未必会在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前就开始全面内战。他对他的军队是否能顺利完成摧毁中共军队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蒋介石在向中共发起进攻之后还会力图留有后路。

我询问国共在东北以及在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

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省，国民党军队将遭到重创。在热河省和苏北，共产党军队将受到挤压。蒋介石最终能拿下哈尔滨，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将力图收复一些其他城市。

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完成期限为5个月。周恩来承认蒋介石能夺取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但他不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会谈接着又涉及国民党各派别对内战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将领赞成内战。他们把内战视为自己的救星，因为军队整编将使他们失去地盘。主张内战的还有CC派分子和部分三青团员。政学系人士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他们反对内战，因为战争的延续会使国内经济状况更糟。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政治上施压以获得中共的让步。至于孙科，他一般采取犹豫不决、摇摇摆摆的态度。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例如，冯玉祥表示，共产党人要准备内战并打消蒋介石打仗的念头。他建议那些立场动摇的所谓“灰色”将领们要以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即转身中共方面。

我问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准备出国。

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政府想邀请蒋介石访美，马歇尔将军的顾问司徒雷登曾问起中共对蒋介石出国的看法。周恩来当时回答，蒋介石一旦出国，那么反动分子会立即重开内战。

对于我关于宋子文状况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宋子文受到来自CC派、政学系和孔祥熙方面的攻击。然而，蒋介石不大可能除掉宋子文，因为宋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关于可能罢免王世杰的传闻也没有根据。王世杰的确不断受到CC派分子的攻击，但他得到宋子文和陈诚的支持。过去王世杰是中国政府中亲英派的首领，现在他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现在是中国亲英美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各界对解决新疆冲突的反映的问题时说，政府人士不反对同伊宁达成的协议。但是，在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下，过分强调这一问题对国民党不利。

周恩来对张治中给予肯定地说，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正派的人之一。张治中前往乌鲁木齐对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上是一大损失，他在谈判中起了正面作用。蒋介石可能把他召回南京，以便让他找到国共之间的共同语言。

会谈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以及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档案室

1946年7月8日

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7, л.86-91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45] (1946年7月24日)

.....

苏联内务部通过谍报手段，获得了以下关于东北军事行动的情报。

根据今年7月20日的情报，八路军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在6月下半月和7月里，在与苏联交界的东北黑河、东安(Дунань)等地区继续与国民党军激战。此外，在三江、牡丹江和间岛等地区也在进行个别军事行动。

结果，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收复了国民党以前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其他居民点，完全控制了上述各地区。

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遁入森林，进行土匪活动，反对人民革命军。

黑河地区

根据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区边防军境外谍报，国民党对黑河市(省会)和瑗珲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南30公里)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部队在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指挥下占领了黑山和东宁镇(绥芬河车站以南40公里)，带着大批东西退回哈尔滨。

位于牡丹江(省会)的人民革命军军校学员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间岛地区

今年6月底，人民革命军部队在纳尔干(Нарькан)和瓦克米克(Вакмик)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西150公里)发起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八师。

西满各地区

根据内务部边防军太平洋谍报机关的情报，从今年6月底起，在哈尔滨市和佳木斯市(三江地区中心，离西南方向的哈尔滨290公里)地区发现，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向牡丹江地区调动。在哈尔滨—牡丹江一线(沃罗雷洛夫市西北195公里)集结的人民革命军部队达20万人。

在吉林的长春(新京)也发现类似调动，部队调向间岛地区。今年6月24日，从上述地区向珲春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130公里)调去约3万人民革命军部队，带有技术装备、弹药和工厂设备。

经过连续战斗，人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同江市(比罗比詹市西南110公里)。

6月底，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新山镇(比罗比詹市西南225公里)粉碎了国民党部队。

现在，人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驻新山镇。城里部队10000人。其中4000—6000人是战斗之后从长春(新京)调来的。

东安地区

根据内务部太平洋地区边防军的谍报，人民革命军正在东安地区进行激战，目的是夺得国民党的根据地。

ГАРФ, 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В.Сталина, д.138, л.291-294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机密

7月25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我与司徒雷登会谈内容如下：

司徒雷登说，他已经与蒋介石谈过，并了解他的心情，在采取行动

之前他想同周恩来谈一次。他补充说，他应在7月25日与周恩来见面，但是后者提出推迟会见，因为他从开封回来后感到很累，在那里他参加了黄河改道问题的谈判。同时，在昆明爆发并扬言扩展到上海的恐怖浪潮引起的神经紧张，导致陶行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心情也不好。

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保证，在解决军事问题之后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怀疑共产党方面是否会相信政府的诚意。

我说，依我看，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议不能不引起哪怕缺乏经验的政治家的怀疑。

司徒雷登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并没受到反动分子的很大影响。他想建议蒋介石独立行事，但是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似乎不能违反众所周知的规则，并建议他拿下某个反动人物。

我说，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虽然国民党内有不少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中国的政策正在受到一帮反动分子的强烈影响。

司徒雷登说，看来问题在于，这些反动分子更接近蒋介石，因此他们能对他施加自己的影响。

接着，谈到陈立夫的问题。司徒雷登说，陈立夫未必能持续其反动活动：或许他会看到自己在国外名声不好而放弃原来的观点，或许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忠实信徒带给他的弊大于利而抛弃他，或者至少不再听他的意见。

我问司徒雷登如何评价孙中山夫人不久前的讲话。

司徒雷登回答说，孙夫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这一讲话反映了由于国内政治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各界的担忧。

对我所说孙夫人在国内外尤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孙中山夫人的知名度没有蒋介石夫人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因此她似乎淡出了美国舆论的视野。

会谈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将走出困境，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与日本人一类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也不必再与清王朝打交道，而只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针对上述说法，我说，正因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纯粹的中国问题，所以最好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对我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大使馆档案室

АВІ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 (1946年7月31日)

机密

7月31日我应约接待了周恩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谈话：

周恩来谈到中国各个战场总的情况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战斗在4个地区展开：苏北、湖北、山西和山东。苏北3周的战事表明，国民党不能进行持久战。国民党的5个军与淮安以南的共军作战，3周时间伤亡万余人，仅夺取了3个大的居民点。

在湖北省，国民党的11个军企图包围和消灭6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后者冲出包围，撤退到该省西北部，并在那里休整。

在山东省，国民党军队挤压当地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部队，并占领了胶济铁路线(青岛—济南)三分之二的地区。

在山西省，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对阎锡山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重创了胡宗南的3个旅并夺取了6个大的居民点。

此外，在松花江地区，国共军队也进行了交战。在河北省北部、在北平—沈阳铁路沿线还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战的事件。周声明，美国人的这些赤裸裸的行为有明显的威胁性和挑衅性。周说，完全有理由断定，内战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热河省调集了大量军队，并将在古

北口地区以及从朝阳地区向承德发起进攻。

周恩来接着指出，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军队从以下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赶走：大运河地区、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承德等。这样，蒋介石可能感到更自信，到那时再同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蒋介石，如果他们撤退，那么同时也要占领一批其他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具有持久性，并会暴露出国民党的弱点。蒋介石开始明白，国民党军队不够强大。有关这一点，在他不久前于桂林召开的政府公务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说：“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未必能活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涉及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要求尽快无条件停止内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政府改组后才谈得上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周强调，蒋介石在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

谈到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按照马歇尔的意见，目前状况是可以容忍的，并给予了双方考验自己力量的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国民党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些重要据点，那就应给它机会借助武装力量争取达到目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在两党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指出，总有一天共产党人会向马歇尔说：“您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平没有成为现实。您必须寻找到停止内战的其他办法。”

周恩来说，需要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觉到，他们的现行政策不会带来好结果：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蒋介石准备靠武力夺取的那些战略据点。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使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会一败涂地，马歇尔知道，他的使命面临威胁，但他的态度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决定的。

周恩来回应说，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即在他从共产党手中拿下一些重要据点之前他是不会放心的。共产党人想告诉马歇尔，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这些据点。他(马歇尔)为什么允许蒋介石去冒这个险？周恩来说，共产党人会谨慎行事。他又补充说，他已对司徒雷登说，如果中国取得和平，美国人也有面子；如果美国的

调停无果而终，这对它的威信将是重大打击，如此等等。

据周恩来说，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感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司徒雷登相信，蒋介石关于和平的承诺将会实现。他曾问过周恩来，共产党军队能否撤离苏北，周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又有一次，他建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阵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并由美军进驻，周恩来认为这不现实，并回绝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补充说，在与司徒雷登谈话中有时涉及一些大的问题。有一次，司徒雷登问周恩来，要使蒋介石不害怕实现和平，应当做些什么。周恩来回答：“至今你们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而现在你们帮助中共争取和平。你们要对蒋介石施加一定压力，促使他走向和平。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周恩来，马歇尔是否对蒋介石施加了一定压力，以使他更容易沟通。周恩来回答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以便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停止内战，从而导致蒋介石的敌人的强大。

谈到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说，原则上蒋介石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但也不排除他有些“任性”，特别是当美国人对施加压力时。周恩来补充说，有一次马歇尔对他说，他认为不宜对蒋介石施加太大压力，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意外的“任性”。但是周恩来指出，从马歇尔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害怕对蒋介石的过分压力会促使后者出访莫斯科。

接着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把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苏美英外长会议或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

我问，共产党人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办这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将以中共名义或通过某些民主组织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来做此事。周恩来补充说，中共方面想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王世杰声称，中国派往和会的不是代表团，而只有一个代表。现在看来，共产党人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要求有权向和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况且，这位代表可以向各国宣告，当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的圆桌旁时，在中国正进行着内战。

最后，由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没有得到履行，可以把问题提交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非常害怕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国际机构讨论。于是，陶希圣受蒋介石之托在《力行日报》(Лисин Жибао)发表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公报》表示担心，现在国外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说，周恩来谈及的问题很大，需要全面考虑。

会谈时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91-95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司徒雷登在私人助手傅泾波陪同下主动来找我。

简单聊了几句后，司徒雷登说，他一直记住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即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并让我了解中国国内政治谈判的进程。但是过去的一个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没感到必要谈这个问题。接着司徒雷登说，近几天出现了局势改善的迹象，因为蒋介石接受了他和马歇尔的关于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会议应当解决改组行政院和改组政府相关的问题。司徒雷登指出：“召集上述‘五人委员会’对我们来说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非常复杂和危急的状态，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五人委员会”工作的前景。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认为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成立“五人委员会”是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保证，而一个月前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在桂林见面时

蒋介石还不同意这一建议。当时司徒雷登还要求有机会与每方各两名权威代表见面，并一起具体逐一讨论存在的分歧。司徒雷登指出：“目前还难以确定将会有有什么结果，但我希望局面会有所进展。”

我问司徒雷登，对于政府改组的重要政治谈判将在日益加剧的内战条件下展开这一情况，他是否感到有些奇怪。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将开始谈判的条件是完全不正常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他说，我们为制止军事行动已经做了许多，6月份两次宣布停火。局势已很危急，为了取得进展，应当做些什么。司徒雷登指出，我早就想试一试我参与下的双边谈判方式。我们将讨论具体问题。首先要解决各个小党代表数量比例的争议问题。先要找到国共两党协商的基础，然后就比较容易与另外3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商谈了。司徒雷登总结说，这样，整个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总统对未来的谈判是什么态度，召开“五人委员会”是否意味着总统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变化：蒋介石已准备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顺利解决国会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已经有了保证，那么原先的军事方面的要求是否已被总统取消。

司徒雷登回答说，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他不清楚。以前最高统帅关于共产党军队从各地撤出提出了五点。司徒雷登说，据我理解，蒋介石在其8月14日的讲话中至少完全放弃了五点中的最后一点，即关于东北的一点。司徒雷登强调说，他和马歇尔一直力图说服蒋介石让他们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蒋介石对我们说：“你们干吧。”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建立国务委员会后将容易改组政府，一旦建立起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能自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机构均受其管辖。

我问司徒雷登，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在国内不仅没有完全的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宣布停火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他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些条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但遗憾的是，现在要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办法。问题是，由于多年的斗争，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几乎不可能消除互相猜疑和担心。他们在各方面互不信任，并力

图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对方的意外攻击。现在蒋介石要保证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安全。他提出的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理由。共产党人不想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相信，随后又会要求他们在别处做出让步。共产党人死死盯住，不让对政治协商会议(ПКО)决议进行修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上做出让步，那么随后就会要求他们在另一些决议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条件下，需要争取有所变化以促进整个气氛的改善。只有出现这种转机，才能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司徒雷登总结说，我们找不到恢复中国所有需要的其他和平办法。

我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大家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

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立即插话说，司徒雷登将很高兴得到我的有关谈判的某些建议或忠告。

我说，对中国局势的观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打算对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提出什么忠告，他们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和马歇尔执行华盛顿的指令，竭尽全力改变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中国人做有益的事，对他们给予友好援助，但至今未施加任何压力。

司徒雷登指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人联合起来。

我表示将第一批庆贺中国敌对党派和解和全国联合，我问司徒雷登，共产党人对召开“五人委员会”的计划持什么态度？

司徒雷登回答说：“现在大家希望和平，只是需要克服猜疑。”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一个月前赞成他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只是等待蒋介石同意这一计划。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大使馆三等秘书K.A.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No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 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机密

9月10日周恩来到访。

应我的请求，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周恩来表示，中共的基本任务不是保卫像承德市这样一些据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周说，中共在这方面任务完成得不错，近两个月来，在同中共军队作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20万。主要战役在5个区域开展：在江苏北部进行了7大战役，消灭了8万多国民党官兵；在陇海铁路一带不久前打垮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并包围了近一个师；在胶济铁路沿线；在山西和(北)平—(天)津铁路以东地区。

周说，共产党人自己放弃了承德，因为如想保住承德，则会造成军队在侧翼的重大损失。

周指出，近期国民党准备在徐州和开封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地区将遭重创。在热河省共产党军队将采取行动摧毁国民党在承德、朝阳和古北口之间的交通线。

周说，据延安统计，国民党用了160万军队对付中共，也就是说，动用了85%的军队。中共指挥部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6个月内消灭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军队有生力量的补充，在1000名国民党军队预备役人员中，能上前线的一般不超过500人，这些由预备役人员组建的师，很容易被共产党人消灭。

周说，除了李先念的部队着实被打散之外，国民党军队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能重创过中共军队的一个排以上。国民党报纸关于中共军队倒向国民党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会谈时在座的罗申少将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进攻张家口，并在这条战线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还补充说，国民党从山东调来了部队，并从台湾调来一个师。周恩来说，为了开始对张家口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必须在热河省以南筑好防御工事，并补充预备役人员。

综上所述，周指出，中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稳固的。会谈接着涉及“五人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提出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时，无论国民党还是美国，都没有保证停止内战。而且，尽管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蒋介石实质上并没有放弃五项要求，并继续坚持要中共军队撤离一系列重要地区。

周恩来说，9月10日马歇尔提出新的建议让中共讨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蒋介石五项要求的翻版。

周恩来把马歇尔给他的信转交给我，那封信里谈到这些新建议。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少将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27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946年9月19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

我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下述会谈：

司徒雷登说，他为争取中国和平尽了全力，但这方面令他很失望。尽管他有许多理由，共产党方面还是拒绝参加“五人委员会”，该会议是他(司徒雷登)为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而建议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坚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为此召开“三人小组”。然而，蒋介石总统表示，只有在“五人委员会”达成改组政府协议的条件下，他才会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对苏联将与美国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失去信心。

我表示，苏联不可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严格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我强调，苏联认为上述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应执行这一决议，中国政府也应关注这一决议。

我指出，坦率地说，如果双方处在同等情况下，那么中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国民党不断得到第三方的援助这一情况，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内战加剧。

接着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华莱士 [46] 最近一次讲话？司徒雷登说，他完全同意华莱士讲话中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内容。他指出，美国人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例如，在讨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他们会忘记，如果苏联提出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国际托管，他们会很不高兴。

我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象力不够，而在于美国不愿意理解苏联的目标和切身利益，苏联只是致力于一个目标：保证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其中包括自己领土的安全。

会谈的实质部分如上所述。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25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 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马立克同志：

今年10月3日，中国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代表团从东北到达格拉芙斯

克村(边疆区伊曼市以西4公里)，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共产党安东省委书记吴瑞辉(ВуЖ унхэн)、第三旅政委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团长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以及中国民主联军总参谋部军工处副处长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受中国民主联军东北军司令员林彪的全权委托通报，在放弃哈尔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近日到达鸡西市。牡丹江市、东安市和鸡西市将成为中国民主联军的主要战略基地。

同时，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还请求给予他们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的援助。

做出上述表示后，中国民主联军的代表返回了东北。

中将斯达汉诺夫 [47] (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4, д.30, л.27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14日)

机密

10月14日司徒雷登进行了以下会谈：

司徒雷登应我的请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他说，国共谈判可能在近期恢复。近日蒋介石会发表呼吁书，将提出较为温和和合理的建议。司徒雷登指出，另一方面，不仅我们美国人，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的其他小党都坚持要让周恩来到南京。与听美国人意见相比，周恩来更会听取这些小党的意见。

司徒雷登补充说，谈判一旦恢复，他和马歇尔将只起顾问作用而不会积极参与谈判。

谈及蒋介石最近的建议，我指出，所有人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停火建议发表仅仅过了两天，在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就发起进攻并拿下了张家口。

针对我的上述意见，司徒雷登谈了以下内容：

10月6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承诺一旦周恩来回到南京继续谈判，他就发布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同时蒋介石表示，一旦关于国务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他即发布全国范围内停战的命令。但是，周恩来坚决拒绝接受张家口地区停火的建议。会谈接着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司徒雷登说，周恩来在其声明中提出关于恢复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建议。然而，司徒雷登指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还存在一系列严重分歧。有些成员坚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另一些成员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实行各省的自治。关于行政院是否必须向立法院汇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据司徒雷登说，该委员会主席张君勱对他宣布，宪法草案80%已经完成。司徒雷登说，如果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委员会成员认为11月初之前来不及完成宪法起草工作，那么国民大会就可能延期召开。司徒雷登强调，最主要的是要停止军事行动，并迫使所有政治派别在和平与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已成熟的问题。

会谈最后我问起报纸关于近期将签订中美贸易协定的报道是否属实。

司徒雷登回答说，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之前该贸易协定就已经准备签订了。

他补充说，他(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谈判，只是建议该条约必须在全国停火后签订。

会谈时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233-235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4日)**

机密

10月24日，在司徒雷登为我举行午宴前，我与他进行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的会谈。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当前形势，并告诉我，共产党代表和“第三势力”代表从上海回到了首都，这表明谈判有了显著进展，尽管谈判目前仍带有非正式性质。

司徒雷登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前期材料，“谈判参加者没有重大分歧”，且“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条与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十一条没有多大区别”。司徒雷登强调：“我和马歇尔在蒋介石最高统帅做出让步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第三势力”代表对这些条件也是满意的。司徒雷登认为，主要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关于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务会议上席位的数量，关于政府改组和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司徒雷登说，国务会议席位分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除了中共和民盟12名代表之外，国务会议的4名无党派人士中的2名由一贯执行政协会议协议的人士担任。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地强调，政府和共产党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大，谈判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怀疑和互不信任。司徒雷登特别强调，马歇尔和他现在力图保持中立：“我们努力促使谈判成功，但不进行干预。不过，我和马歇尔时刻准备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委员会’。”

我指出，离国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不多了，我问司徒雷登，他对国民大会召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回答说，国民大会看来将正式召开，但他认为，大会将推迟到谈判结束。同时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认为他定的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先例并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先例就是，司徒雷登说，最高统帅蒋介石定下国民大会在今年5月5日召开，这是去年年底做出的决定，并得到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况且在所定日期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根据惯例已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此外，总统没有可能与政协党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协商，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都停止活动了。

我问，这样会不会使国民大会变成一党召开的会议？司徒雷登回答：“是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将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各方要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希望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大会。”

我援引了报刊相互矛盾的解释后问道，他如何评价在中共和民盟代

表到达南京进行谈判当天蒋介石出走台湾这件事。司徒雷登解释说，蒋介石早就想去台湾，只是因为等候周恩来而推迟了一些时间。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曾会见过各党派的代表，今后谈判他可能不参加，何况再过几天蒋介石就回到首都了。司徒雷登补充说，马歇尔随时可能发电报给蒋介石，谈他回到首都的必要性。

我表示惊奇的是，在政治谈判这么关键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进攻。我指出，政府军的军事计划与军事行动自然只会加剧怀疑和担忧，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阻碍谈判成功的怀疑和担忧。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说马歇尔将军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扩大。同时司徒雷登试图证明，美方千方百计努力制止国民党扩大战火并停止给政府军援。司徒雷登表示，当马歇尔3月份回美国时，他认为他能解决中国问题。马歇尔力图在华盛顿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援助中国。司徒雷登说，然而后来情况再一次恶化，战火重燃，我们运用了手中所有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50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提供，近几年来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武器。尽管不久前签订了将“美国剩余物资”移交中国的协定，实际上近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物资运往中国，已经购买的船只也要过几个月才会移交。司徒雷登说，关于“美国剩余物资”的协定在3—4月间就已签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拖延着，等待形势的改善，等到情况明朗。中国可能完全失去这些物资。

司徒雷登强调，在中国的美军数量很少，总共近1.3万人。

会谈至此中断，因为客人应邀入座就餐。

大使馆三等秘书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213-216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6日)**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己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盟)的要求。

2.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国民党要求我们承诺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 1.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 2.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 3.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 4.在平(京)汉铁路；
- 5.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是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从短期看，军事优势仍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它依靠军事力量，并提到美国的支持。不过近期国民党遇到了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依靠人民群众，中共军队的基本作战方法是运动战，而国民党坚持阵地战。周说，其原因不在于我军不善于打阵地战，而是在于我们弹药不足。例如，在四平我们坚持了40天，但为此消耗了大量弹药，以这样的代价坚守四平不值得。我们拿下了大同，但每个战士只剩下了三粒子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运动战战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包围和消灭其小股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3个月来，在苏北、华北、陇海铁路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这些战斗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组建的25个旅。

周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仅在于武器方面，他们的士气很低。中共军队真正的受挫是在与傅作义部队作战中，我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周说，国民党军队最薄弱的一点是人员补充不足。目前，国民党已经开始在60个征募区征召60万人。

中共军队的主要困难是供应匮乏。周指出，中共军事上的挫折在军事方面不具有特别意义。不过，他强调，失去一片地区还是会给农民群众的情绪带来影响。国民党的优势是美国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只是物资方面的援助。美国人直接参与作战的情况很少见，除了同美海军陆战队的接触外，其他情况没有发生过。美国空军或其他军种的人员直接参战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重要因素，否则国民党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周恩来总结说，这样，国民党和中共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持久性。国民党和美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却指望打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安东、烟台，甚至可能放弃延安。

我指出，由于现在军事行动发展迅速并不利于中共，我很想听听他

对双方实际军事力量的看法。周援引说，他只掌握老的数据，他说，国民党军力不超过200万人。至于中共的力量，他则闭口不谈。

参加会谈的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队能否占领山东、安东、哈尔滨，然后集中兵力占领延安？需要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在3个月之内可能占领延安。

罗申同志说，根据他的计算，国民党在主要战线有85万人，包括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投入这些战线战斗的有250架飞机，这些飞机将从北平、开封、太原、天津和徐州等机场调来。飞机全部装上炸弹，而且地面部队配备好弹药，需要4个月。

针对罗申同志所说的国民党一旦拿下烟台、安东等地将得到很大的军事优势，而中共将遭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损失，周恩来表示，所有这些地区的丧失只对后方地区和国际舆论有政治意义，而对中共及其军队不会有影响，因为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并不是由于它不能守住，而是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中共军队将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士气。所有这些城市共产党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日本投降后占领的，甚至延安是西安事变后获得的。周说，中共不过是回到不掌握任何城市的老样子。他又补充说，如果出现妥协的可能，那我们会签订协议，如果妥协成为不可能，而且敌人想继续打，我们将奉陪。我已向“第三势力”代表声明，所提出的妥协方案比我们通过战斗得到的少。

我问，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是如报刊所说的那样，这是最终的态度吗？周回答说，中共中央没研究过其他建议，中央的要求甚至比他在南京所讲的还要高；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归结为两点：恢复1月13日前的阵地和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要打，我们奉陪，而一年以后形势定会起变化。关于改组军队的决议可能被撕毁，现在不能提出废除决议的问题。

接着，周强调，中共不可能再作任何让步。他说，中央已经两次召回他，但他还是留下来，为的是做好离去的准备(人员安排等)。

周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一年或几年，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不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国民党的180个旅不可能覆盖全国，我们将在其所有薄弱的地方进行打击。

我问周恩来，他如何评价没有战火的四川、云南等后方省份的形势。

周回答说，在这些省份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征召入伍和收税。现在中共在这些省份还不能展示自己，但是在谈判破裂之后，共产党将在那里开展活动。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析，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对当前国际形势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提出关于陈立夫近期献媚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人只帮助蒋夫人、宋子文和陈诚；陈立夫感到屈辱，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亲苏”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

我指出，近来，连国民党报刊也表露出对美国对日政策的不满，我

问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回答说，国民党自认为是美国的老儿子，但麦克阿瑟却将这一角色给了日本，因此国民党对麦克阿瑟的这一政策深表不满。

会谈时在座的有武官罗申少将、大使馆一等秘书B.C.伊萨延科和三等秘书H.A.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AB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97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A.M.列多夫斯基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分部工作人员叶剑英将军1946年11月11日会谈的备忘录。

在我们总领事馆的午餐会上，叶剑英说：

一、共产党决定不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二、蒋介石发布的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预先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该命令已经发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称，他们不承认该命令，因为命令上没有周恩来和马歇尔的签名。美方也没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也与中国共产党持同样的意见，即这一命令是单方面的，所以其他方没有执行的义务。

三、中国共产党此时对停止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叶剑英断言说，尽管丢失了许多城市，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态势改善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按共产

党指挥部的计划，每3个师要消灭国民党的1个师。共产党人正在顺利地
完成此项计划。经过4个月的战斗，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34个师。用运
动战的战术时，共产党有可能打算放弃占领的某些城市。指挥部选择这
种战术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考虑到
这种情势，共产党军队总部决定：(1)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决不
为了个别地区采用大规模的防御战；(2)尽量使国民党军队分散开；(3)
在某些国民党指挥比较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分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总部在北平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战役。

共产党军队总部向自己提出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蒋介石60个师，以
使军事力量的优势转到自己方面来。

这一计划已经趋向完成——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34个师。

叶剑英后来还说，共产党人的武装比以往大有改善，因为他们在与
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北平的军调部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对吉伦的任命使美国分部的编
制更大了。到今天为止，在吉伦的指挥下共有4000名美国人，其中大
多数是海军陆战队。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与国民党合作，并帮助国民
党分子与共产党作战。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A.列多夫斯基(签名)

АВГ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6, л.10-11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 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1月15日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就要到延安去了，希望和我见面。

我问了有关民盟和党外人士参加国民大会的事。周恩来回答，政治
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邵从恩和郭沫若拒绝参加会议。民盟也不参加大
会，甚至中国青年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出自己的代表名册。周补充说，
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参加大会，但一方面迟迟不交名单，想以

此在国民党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如果其他政党不参加大会，他们就会显得很难堪，所以他们在努力劝说张君勱及其支持者成为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讲，张君勱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勱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比如说经济部，有人建议分成两个——贸易部和矿业部，交通部分为铁道部和邮电部，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水利部。11月14日，张君勱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自己政党的要员会议。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要参加大会。张知道，如果开会时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坐在身旁，他会感到不愉快。所以他满怀犹豫地去了上海，想和上海的拥护支持者商量一下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反对参加大会的是张东荪，他是该党在华北地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主同盟声明，不必特别害怕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使同盟巩固，使同盟摆脱动摇分子。当然，周恩来指出，要继续努力，制止张君勱。但假如他决意要分裂，也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我问了关于黄炎培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黄炎培与同盟的立场相同，他不参加大会。

谈到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行动问题，周说，共产党人的立场简单明了——他们不承认这个大会，认为它的召开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了停战协定和军队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协议的破坏者就是所有同意参加大会的人。周宣布，我们肯定地说，10个月来我们虽然在争取和平和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现在很清楚，事情正走向继续和扩大国内战争。以前的会议基础被破坏了，现在正面临着战斗。假如有可能恢复谈判，那么只可能新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基础就是召开新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青年党和参加过大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代表的作用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马歇尔谈。

对于是否可以认为现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

裂的问题，周恩来回回答说，彻底破裂还没有，但一切都将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立场。

周补充说，如果国民党对延安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董必武留在南京的问题需要斟酌了。

对于参加谈话的罗申少将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北面和黄河北岸集结的消息是否确切，周恩来回说，在西安北面地区集结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七师和第二十七师，而往延长(Яньцзы)方向运动着的有马鸿逵的5个骑兵旅。

周恩来反问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可能性。罗申同志回答，根据手头现有的信息，战斗预备队已就地集中，兵员补充到百分之百。然而，他指出，有消息说，国民党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压制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可能国民党部队不会接到转入进攻的命令，而只是守卫已占领的阵地。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显然会采取封锁、施压以及和平谈判的手段，当一切徒劳无效时就会开始进攻，在很多方面国民党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美国。

对于我问的最近马歇尔的表现情况，周回答，马歇尔努力劝说无党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大会，向他们允诺将停止战争，通过民主宪法。司徒雷登设了个大骗局，当他说服胡霖(《大公报》的出版人)提出参加大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时，允诺大会延期开幕。胡霖不想参加大会，但给他的压力有来自美国人的，也有来自蒋介石和政学系一伙人的，他和这伙人的关系密切。因为担心《大公报》的命运，结果胡霖投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像其他“无党派”代表一样，没有亲自登记，而是委托雷震去的。

在分析“无党派”代表立场的同时，周讲述了拜访蒋介石请求改期召开大会的事。当莫德惠、胡霖和其他代表(共6人)来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板着脸冲着他们叫，你们的改期要求意味着扼杀国家。当时代表们都慌了神，但莫德惠还是代表大家开始请求改期，并引证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破裂。这时蒋介石“软了下来”，并宣布他同意让步，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参加大会，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次拜访后，所有到过蒋介石那里的代表分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处，他们抱怨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问到傅斯年的立场时，周回答说，他公开支持国民党，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此，连胡霖也骂了他。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现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内阁的时机来到了。因此张群紧急动身回国，张嘉璈也在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指望建立“联合”政府，政府中的在野党由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首先，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联合政府将纯粹是个假象，因为上面所讲到的两个党没有任何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在野党。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CC派和黄埔派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成立这样的政府。周补充说，此外，“政学系”错误地期望美国方面的支持。

对于周提出的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形势的问题，我回答，形势相当严峻，最成问题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和平与民主。我说，无论国民党在大会上通过怎样的宪法，宪法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将都会相当困难。我指出，我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在南京是好现象。

周说，看来中国还要经历武装斗争和稳定中国形势的时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国际形势。

我说，从与周恩来的一系列谈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总是能正确评估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的。周回答，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是有害的，然而在计算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区别其纸上的力量和实际的力量。譬如，交通系统的破坏，动员号召能力薄弱，给养困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差以及战斗士气低下，这一切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

周接着说，回延安以后，他将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观点，形势的发展预计有两种可能：

(1)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大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在那里建有军事堡垒，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力量薄弱，想占领是困难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转向持久的游击战。这是下策。

(2)继续执行消耗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术。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共计消灭50—60个国民党旅(蒋介石全部军队的1/3)，这样，达到某种平衡后，就转入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是共产党人被赶往农村，转为反攻将会比较复杂，为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许多年，直至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周说，他看不到与蒋介石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要是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同意参加大会，那么他们就要负起新的政治责任，而蒋介石反正要继续发动内战，共产党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罗申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一系列战役情况，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侦察不差，但战术侦察很弱。对此，周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仔细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现代化军队，它现在正处于转折阶段。况且，它的武器装备很落后。至今在军队里游击思想占主宰地位，大同、张家口和四平的战斗就说明了一切。周补充道，关于城市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一事实起着一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提出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地夺取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在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前，共产党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这些城市——尚未决定，所以我们的军队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此外，周恩来指出，我们没有保卫城市的基础，因为补充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俘虏，而只有在野外的战场上才能获得俘虏。关于周恩来的离开时间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能性问题，周回答，如今他不会请求马歇尔派飞机飞往延安，至于迫害问题，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已有准备。按他的说法，迫害只能涉及地下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蒋介石还不敢碰。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大使馆二等秘书弗拉迪金和塔斯社驻南

京办事处主任H.普罗岑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Г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72-178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在我们总领事馆吃午饭时，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

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实际意义的。

吉伦以肯定的语气叙述了关于美国军队在德国与苏联军队会面时的感想，并强调了必须巩固苏美友谊。他宣称，苏美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世界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列多夫斯基(签名)

文件送：马立克、第一远东司、彼得罗夫同志、总领事馆档案室

АВН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 д.264, л.16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今年12月4日我邀请马歇尔将军共用午餐。用餐后我们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了短暂交谈。

我问马歇尔，他对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开端做得很好，因为国民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与1936年的草案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歇尔指出，现在很难预见最后的结果，国民大会如今的工作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谈及了大会上的所谓“反对派”。马歇尔强调，反对派成员是CC派和黄埔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确定的任务是达到通过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并坚决反对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基础上议定的新草案。马歇尔说，法西斯化的军界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捍卫自己的旧立场。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和平谈判，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寻求折衷的道路。马歇尔指出，这些反动势力一开始就力

图破坏他(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使命。现在以陈立夫和孔庚为首的反动分子反对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因为新宪法会削弱他们现有的势力。

接着我询问了一下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援引中国报界相互矛盾的报道，我问马歇尔，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指出，虽然召开了国民大会，但重开谈判的道路还是敞开的。确实，马歇尔说，共产党的行为仍然不明。他强调，两星期前左右他给周恩来发出了备忘录。当时周正准备去延安，在备忘录中，马歇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共产党认为他(马歇尔)是否还有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的必要。但至今，马歇尔说，他没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同时，马歇尔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且彼此猜忌的屏障已无法逾越。然而，马歇尔强调，共产党人在散播对美国调停人的不信任。马歇尔说，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心理疾病，这会给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带来严重破坏。

我说，类似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并不都是毫无依据的。对此马歇尔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是合理的，那么对美国调停人的态度未必能证明是正确的。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指的是批评他的使命)，总的来说是不公正的。接着马歇尔说，很遗憾，共产党人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未经查证的目标开火。例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时候，他(马歇尔)是坚决反对进攻的，并努力使他们停止进攻，要求蒋介石取消进攻的命令。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他的意见。马歇尔说，他不得不请求杜鲁门立即将他从中国召回去。同时，他指出，共产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马歇尔)认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去辩解是多余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一点也不能促进敌对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本人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今年12月5日，中外汉语通在中央图书馆会面时，我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起初我们讨论了关于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举行国民大会的问题。我强调，中国报界并未清晰地反映国民大会的现实情况。通常，报纸新闻带有片面性，编辑部的文章只是反映政府的观点。

司徒雷登说，不管报界的行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为国民大会能通过民主宪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问他，怎么评价提供国民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说，这个草案超过了他的预想，总的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它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地说，比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的原则更民主、更先进。对于我提出的国民大会会有怎样的最后结果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新草案引起了最有政治影响力的CC派以及与其结盟的以孔庚为首的保守派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最反动分子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者共有400人，组成了强烈的反对派，并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蒋介石所捍卫的民主原则。大会的工作进行得很活跃，完全可以期待非常好的结果。中国报界现在正大写特写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援引报界的话，询问这些党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司徒雷登指出，由于双方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产生分歧而暂时中断谈判，不能视为双方关系的决裂以及和平谈判的终止。他强调，很多事情将取决于国民大会正要通过的宪法的性质，取决于双方是否进一步努力以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司徒雷登说，人们可以乐观地评价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这次和谈应该可以从讨论国会问题开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ABIP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2, л.22-23

1947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我邀请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董必武回答说，决定这个形势的基本因素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按不久前从延安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了对特区的进攻给予反击。对特区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11月12日到20日，但后来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并作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延安的危险过去了。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系列战役迫使胡宗南从主要进攻路线上将自己的军队抽回一部分。没有了补充，没有了增援，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开始重大的进攻战役。即使胡宗南开始进攻，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成果。董必武说，我们注视着所有的力量调动，破坏他集中军队的计划。除此以外，胡宗南的大问题是后方不巩固。由于苛捐杂税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在高涨。同样需要指出，共产党李先念将军与陕豫湘边境地区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已调整好了。因为不满中央的政策，这些地方武装不阻止共产党军队通过他们占领的地区，这就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境况。

我的意见认为，按照董必武的话分析，对边区不存在直接的威胁，蒋介石不会展开进攻，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出于自己薄弱的军力考虑。董必武回答，事情正是这样的。

谈到现时蒋介石的政策问题，董必武说，通过了宪法以后就需要等待。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个“民主”中国，蒋介石会重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他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他打算在改组后的政府里给共产党好位置。

对于我的关于不久前政府公布的大赦意义的问题，董必武回答说，这个大赦与通过的宪法一样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不涉及政治犯。过

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Цзинь Жэн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邵力子和张嘉璈声明，如果他们感到没有能力达到释放这些人的目的，那么最好不要向国民党当局说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名字，因为这会引起对他们的迫害。事情如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除了金任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长春外，其他人都遭到杀害。董必武顺便告诉我，现在国民党俘虏中不仅有中将，甚至还有上将。

我问董必武，有关改组政府、谁参加政府的问题，他的意见如何。董必武回答，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时还有不少无党派社会人士，肯定会参加政府。这种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改组未必会在中国有政治效果，但是在国外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迷惑某些人。

我问，国民党在恢复与共产党和谈和改组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董必武回答，自从周恩来回延安后，有关恢复和谈问题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哪怕是口头形式。

董必武告诉我，1月7日他要拜访张治中，感谢张把去年被盛世才逮捕的几十个中共党员释放并送往延安。然后，董必武谈到了莫德惠的立场，并叙述了他试图进行斡旋的想法。

被蒋介石抓住话柄的莫德惠没有出席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主席团。但国民党还是迫使他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不久前与董必武谈话时，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董必武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鲜明的，它的观点是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时的战场状况。董必武问他，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莫德惠不得不承认，他不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并说，看来和他谈过话的张群也不清楚。后来董必武建议，莫德惠最好别卷入这件事，因为不仅他，甚至与蒋介石亲近的张群也什么都不知道。

谈到共产党的立场，董必武表示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置于不可能再退让的境地。国民党力求恢复主要铁路干线：津浦路、平汉路、胶济路和陇海路。控制了这些铁路后，国民党就有可能自由调动军队和运送武器装备，还可

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割裂开，分隔成孤立的几小块。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它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不让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使其无法准备后备力量和得到美国人的补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相当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1月2—4日山东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有两个旅被困，一个旅已被歼，另一个旅将在短时间内被消灭。国民党将自己最后的预备力量调往前线。不久前有一个旅从海南岛调到了山东，第六十四师(过去的军)从广东开往北方，一个师从台湾开往苏北。

我问，最近马歇尔是否还采取过某种步骤使双方接近。董必武回答，周恩来离开后，他和马歇尔没有见过面，只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司徒雷登说，他不理解中共的立场，不理解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而中共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共产党不参加三方委员会。董必武回答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司徒雷登企图把继续国内战争的罪责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真正的罪人是国民党。它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现在又在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拟订宪法。至于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的问题，司徒雷登在讲这种话前应该先问问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真的停止了吗？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

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这一点从杜鲁门12月19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在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董必武接着说，如果说以前蒋介石表现得充满自信，想在美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因此。对共产党说来，危机时刻已过去。美国人知道蒋介石已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蒋介石

石本人对此也清楚。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被过分夸张了。因为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而主动放弃的。1946年最近6个月来国民党军队死、伤和被俘的损失达40万人，再加上逃跑的部分共6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补充的一共只有16万人，而且训练水平很差。在国民党军队训练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由于道路状况不好，无法保证弹药供应，这种有效程度更进一步降低了。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评价中苏关系。董必武说，由于出现了反美游行，某些国民党分子企图把这运动引向反苏运动。很多人把现在的反美学生运动硬加在共产党身上。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学校中有影响，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运动团体。在许多学校里国民党分子企图破坏反美游行，建议他们“扩大”运动，提出了把所有外国军队从中国召回去的要求。特别是傅斯年在不久前的讲话中就讲了这一点。按董必武的看法，现在国民党达不到目的，他们想同去年一样玩弄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他们引向反苏运动。尽管如此，董必武指出，来自国民党的挑拨完全可能存在，特别在东北。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董必武作了如下讲话：

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与CC派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中国劳动联合会主要依靠国际工会组织的帮助生存着，在其走上国际舞台后，朱学范一方面努力把联合会做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开始逐渐离开CC派分子，甚至将自己的组织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因为他清楚，让联合会完全服从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导致国际援助停止。此外，对他的行动影响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来自联合会工作人员核心小组，这些人员中有不少进步分子。CC派分子看到联合会正在脱离他们的监督，就开始对朱学范施加压力。当这一步不能如愿时，他们就确定了消灭这个组织的方针。在社会事务部系统里有个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联合会与它合并。朱学范自己只是被选为委员会理事会的候补委员。他仍旧拒绝服从CC派分子。这时CC派分子就着手成立消灭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先从重庆组织开始，在那里逮捕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而那里的资产由委员会的机构“接收”。在许多城市里他们都这样做了。朱学范表示了抗议，被捕者释放了，但是资产没有返还。由于不断地施压，朱学范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遭到CC派特工暗杀未遂。在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后，联合

会被“改组”了，实质上意味着被消灭了。现在朱学范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劳动联合会新的中心。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1, л.26-34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机密

1月28日我回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经过礼节性的谈话后，我问司徒雷登，他怎样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司徒雷登说，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从马歇尔那里收到因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和谈的努力明显失败而发出的新指示。司徒雷登指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期望和计划。他说，双方从内心深处诚恳地希望马上实现和平、团结，但他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非常肤浅”。按司徒雷登的看法，双方更多的是忙于有关未来的安全、地盘等方面的交易，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害怕、怀疑，结果使得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斗争复杂化了。

我问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尚不知道国民党与小党之间最近谈判的结果。最近政府将改组，吸收小党代表参加。这时司徒雷登说，在蒋介石会谈时他多次表示赞同，在改组时要把好的、有能力的人引进政府，但希望蒋介石不要阻挠大部分小党加入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这样改组只是初步措施，并不具有重要性，在共产党没进政府前，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我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国民党迈出了“和平”的步伐，但军事

行动正在加剧。司徒雷登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现在十分被动。

后来司徒雷登指出，很可能过几个月后，情况将会改善，那时候双方将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就香港问题谈了其个人看法。他说，英国人应该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将香港归还中国。从他们方面来说，这应该是明智的、有远见的举措。在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这一举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他们可以用20年过渡期作为条件，只要慢慢地放弃各种各样的特权。司徒雷登说出了自己的预想，英国人很可能无法将香港控制到20年期限结束。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谈话时出席的有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1月3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60-61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 (1947年2月20日)

机密

2月20日司徒雷登来拜访我，他说，他来是因为就要出发去中国南方(广东、香港、海南岛)。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主动说，至今他未收到马歇尔将军的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指令和评述。他说，按其个人的估计，马歇尔将军现在正在仔细权衡中国问题，考虑美国人的情绪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情况，然后再做出他的决定。

司徒雷登接着强调说，中国政府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需要美国的

大量援助。

对于我所问的中国政府在克服危机方面采取的特别措施的有效性问题的，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事支出照样无法弥补。照他的说法，国民党领导人现在已不像10天前那样被经济崩溃的威胁所惊吓，不过，防止全面崩溃还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政府还能真正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只能将结局推迟几周或几个月。司徒雷登指出，政府希望到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确定下来，它就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我指出，因为顾维钧访问马歇尔将军，记者们已经提出美国援助的建议，特别是大量借款的梦想。

司徒雷登说，除了报纸的报道，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自己经常开导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地争取解决国内问题，不管有无外部援助。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这是为克服互相怀疑，保证各方合作所必需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时，司徒雷登说，虽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他感到，双方有恢复谈判的愿望。所以最终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中国人很会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正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司徒雷登补充说，双方特别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莫斯科外长会议。

我问司徒雷登，他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哪怕是非正式地讨论一下中国问题。司徒雷登说，他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不讨论反倒奇怪了。他附带说明了一下，这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司徒雷登还说，马歇尔将军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讨论所有与苏美有关的国际问题。司徒雷登最后说，如果苏美之间能达成完全的、真正的互相谅解，那么中国问题就可以看得乐观一些了。

谈话时在场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 (1947年3月3日)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 [48] 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盟想弄清，如果民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

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14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

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做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盟的立场报告给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参加政府。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 and 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道，马歇尔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变化的声明中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勱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勱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勱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勱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勱，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勱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勱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

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勱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有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得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以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

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1052—1060页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费德洛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准备进攻四平事宜，四平街乃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中共包围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巴拉诺夫

致巴拉诺夫同志：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东北中共军队指挥部正重新部署部队，并准备进攻四平市(一个在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的重要据点)，拟定于本年6月13—15日攻克该市。

在攻克四平的战役中，中共部队将有5万名官兵参加，与此同时，将有7万名士兵被派去阻击可能从长春和沈阳去支援四平驻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这支四平驻军由常规军5个团、2个保安团组成。拿下四平之后，共产党部队准备攻打吉林，接着攻打长春。如果这些战役取得成功，共产党军队将有15万人进攻东北南部。

东北中共部队副总指挥高岗坚决要求把弹药交给共产党部队使用，特别是日式75毫米、41毫米、38毫米、91毫米炮弹。为了接受这些弹药，高岗准备亲临任何一个边境站点。按他的话说，为了进行所有战役，中共部队指挥部应需拥有1000发炮弹，否则不能保证进攻成功。同时，不能中断进攻，因为国民党司令部会利用喘息机会，调遣增援部队，组织对北满的反攻。

И.费德洛夫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 [49]：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 [50]

1947年6月15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3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 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机密

就议定的题目谈话之后，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估计中国的当前形势。司徒雷登回答说，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状况在军事、经济、心理各方面都能观察到。经济危机日益加重，金融困难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的增长本身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影响着军事力量，在政府的圈子内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这样，所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觉察到，当前好像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状态。司徒雷登从自己的角度说，国大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两条包含着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第三条是对国大常务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提交行政院，行政院应该制订较为广泛和具体的方案。如果下次会议(看来在6月20日)能形成明智的决定，而在决定中将审议中共党人能接受的条件，那么，到那时将打开通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司徒雷登附带说明，他对此仅抱着微

弱的希望，尽管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谈到中国内政事件的发展前途时，司徒雷登指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蒋介石可能会走激进改革方案，致使各党派有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回到共同合作。如果蒋介石真的具有洞察力、勇气和决心，他现在做还不迟，应该快一点走这一条路。第二，无党派的活动家，如胡霖、胡适等人号召国民党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建立联合体制。第三，内战不结束，经济危机将变得愈来愈深刻，国内产生一片混乱，有一些强悍的行政长官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等等。

我指出，可以估计政府未必打算走第一条路，因为，如关闭自由派报刊、镇压大学生运动等事实，正好证明了他们与此相反的行径。

司徒雷登同意这个意见。他又说，中国有强大的反对党，与此同时，中国有另一个弱点：中立的中间派组织一盘散沙、无组织性并相互矛盾。

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看待新改建的张群政府。司徒雷登回答说，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精明能干并保持独立的人士，但仍和过去一样，蒋介石控制着所有的人。接着，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表示，蒋介石应该进行坚决的、实质性的改革，否则，他应该让位于其他人，而自己去国外或隐退。

顺便谈到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时，司徒雷登说，当前条件下，美国被迫拒绝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此，我说，根据各方人士的说法，得出一个印象，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很快就能实现。我指出，在美国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这些看法，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

司徒雷登说，围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在美国进行着尖锐的争论，并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赞成给中国政府援助，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即使鼓舞一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帮助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克服失败情绪，也需要给中国政府援助。对此问题，司徒雷登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我说，从马歇尔前不久的声明中看出，他也主张给中国援助。司徒雷登回答说，马歇尔的确很想给中国援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这个援助。美国政府仍然主张给整个中国

援助，但只能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

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出席了这次谈话。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Я.А.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185-187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 (1947年7月1日)

致捷列宾：

您有关毛泽东的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1.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 [51]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7月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4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局长Ф.П.贝斯特罗夫同志

苏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副局长B.B.拉夫罗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不反对用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同志建议的方式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

但是，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认为，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必须办理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

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后，所需捷克克朗款项将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在布拉格支付给东北青年代表团，或根据该团需要，一部分款额将以克朗现金方式在莫斯科支付。

该团最后如需把捷克克朗带出，必须具备苏联财政部的许可证。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主任

В.特鲁边科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73, д.114, л.15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年7月4日)

呈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向我们提出要求：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50人)途径莫斯科前往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本人认为，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请求可以满足。

该代表团所需费用约20万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缺少有效外汇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本人认为，同意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苏联外贸部和苏联国家银行按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款额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法结算是恰当的。外贸部和国家银行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法，但是，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拨给以上捷克克朗和苏联卢布款额，必须具备政府的许可证。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有关的命令草案。

请您指示。 [52]

Я.马立克

1947年7月4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号

1947年7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与北满东兴公司的合同，以提供货物形式，向派往布拉格国际青年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拨出20万苏联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

2.预先通知苏联外贸部，在7月份的外汇计划中支付177.55万捷克克朗，把它补充到1947年第三季度计划中。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73, д.114, л.11-12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年7月5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馆领事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请求，希望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7人)路经苏联去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认为，应该满足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要求，同意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路过。

代表团的费用约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尚无有效货币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我认为较为合理的是，同意该司令部按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从东北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式进行结算。苏联外贸部和国家银行都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式。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支付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必须有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草案。

听候您的指示。

Я.马立克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号

1947年7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签订的条约，用货物结算形式，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支付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

2.规定苏联外贸部于7月份的货币计划中补拨40万捷克克朗到1947年第三季度的计划中。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73, д.114, л.13-14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要求各部 and 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2.要求汽车工业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运送400辆吉斯—5运输汽车，可减少1947年5月7日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1428号决议审定的、由联盟中央分配到各州售予集体农庄的数量。该条款按附件二执行。

3.要求外贸部从1947年第三季度进口款项中向橡胶工业部运送300吨天然橡胶，用来制造计划外的汽车外壳，可减少向国家后勤部提供的该原料数。

4.要求苏联交通部和国防部按附件一和附件二，凭交通部通知，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提供货物。

5.批准对外贸易部为全苏粮食出口公司驻满洲代表处和分公司确定的1947年人员编制为35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附件一：

拨给苏联外贸部储备外售予东北的

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1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套，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2.5万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4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支

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版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附件二：

1947年减少出售给各州及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的汽车总额清单

	原定数量	减少数量
车里亚宾斯克州	256	30
库尔斯州	626	40
巴什基尔州	350	25
契加洛夫州	488	40
古比雪夫州	368	26
萨拉托夫州	500	36
沃龙涅日州	400	20
罗斯托夫州	606	30
库尔斯克州	500	25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577	36
鄂木斯克州	700	35
新西伯利亚州	700	35
斯大林格勒州	500	22
共 计		400

附件三：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7月21日)

提供给东北的苏联原材料和货物清单

(支付价值为200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马合烟)，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附件四：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1.52万件

汽车附件，价值1910卢布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2.38万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1.084万吨

油和润滑油，1.183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070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47.8万米

动力电缆，41.8万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削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15万米

棉花，1.5万吨

羊毛短袜，100万双

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5580卢布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波马兹涅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4

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同志：

兹送上驻北平总领事和华北民主同盟领导人张东荪和吴晗两位教授会谈纪要。

附上述所提内容3页。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И.齐赫文斯基

附件：

应我们的邀请，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教授在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分部主席成员吴晗教授陪同下，拜访了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在与总领事的会谈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要把中国的内战夸张成国际冲突。不能排除国民党内的极端派分子对大连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挑起中苏的冲突，把问题交给联合国审议，以及把美国拉进对苏联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所有的报刊上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特别注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苏宣传。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消极态度，国民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比如，1946年2月国民党人在掀起的反苏运动中，有两次成功地把中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争取到自己一边：

(1)昆明西南联大的130名教授里有110名在国民党人起草的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决议上签了名；

(2)北平几乎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出席了纪念在东北被打死的张莘夫工程师的追悼会，同意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运走的工业设备。

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宣传旨在破坏苏联对外政策的威信，希望社会舆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反苏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是知识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是非常同情苏联的，他们团结在民盟中，内心反对国民党，只是又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然而，对于苏联1947年3月以后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消极方针，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离开了苏联以前在三国外长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的政策——旨在在中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而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这些进步分子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可能还是要拖到1949年初。这是在美国不给国民党积极援助的情况之下，反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则可能要到更迟些时候才会来临。

眼看中国人民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损耗着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我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要求尽快地看见中国的和平——不是美国式、国民党式

的和平，而是民主的和平，最终要迫使国民党放弃自己的独裁专政。

故而，我们把全部目光投向苏联，在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为和平而斗争赢得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热烈称赞。

我们认为，苏联改变自己对华的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而且能让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制造的反苏舆论全面地、一致地转向对苏友好。

我们所提出的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建议，实质如下：

由于正在举行对日和会，苏联应公开照会美国指出，必须由民主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而不是由曾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12月共同谴责的、缺乏民主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那个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故而，苏联应要求美国同意共同落实第一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旨在制止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内战的对华决议。即使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它还是会让中国人民知晓，并且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并掀起新的反美运动。

在苏联政府同意这样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民盟尽早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在上海和北平对美苏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建议获得赞许和欢迎。

这个建议目前只是由我们二人提出，但是我们保证它会得到民盟的一致通过。

我答应张东荪和吴晗教授，把他们的和我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通报给苏联外交部。我同时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自1945年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对中国主权以及严格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尊重。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秘书季托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签名)

1947年9月26日

文件共3份，送：马立克、通金、档案室

1947年10月27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3, л.59-62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 (1947年9月29日)

机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1947年9月1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浦夫的。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

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34万人。总计112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派出218个旅，人数为160万和约50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30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地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112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运动战将会成功，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憎恨国民党制度。

3.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我们一定会胜利。

4.至今年8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南线有157个旅，在北线有70个旅，在国民党后方有21个旅。总计仍是248个旅。正规军150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120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100万人。总共为370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117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63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仅有54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32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1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33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12个旅。只有7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东北的26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16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12个旅中，有8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

在傅作义集团军的10个旅中，有2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15个旅中，有9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21个旅。其中8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7个旅在四川和西康，2个旅在云南，2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2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100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8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96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7月和8月里已经消灭了16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2月在莱芜、7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量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和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和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 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3-9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
(1947年10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本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致函驻哈尔滨苏联总领馆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高岗请求临时从苏联派遣神经病理学家和心血管疾病专家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

本人认为，支持高岗的请求并派遣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教研室主任Ш.И.拉特纳教授和新西伯利亚医学院Д.Т.库伊莫夫教授前往哈尔滨是合适的。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这两位同志名誉的信息。

以上事宜已取得苏联卫生部长Е.И.斯米尔诺夫同意。

附上决定草案。 [53]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Л.巴拉诺夫

АПРФ，ф.39，оп.1，д.31，л.8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我们从情报总局在中国边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捷列宾那里得到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一、人民解放军(从7月至10月)4个月的反攻结果是38.5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的损失是45.2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俘虏了53名将军。因而，敌人平均每个月损失9.5个旅，或者11.3万人。截至上个月，即今年7月份以前，敌人每个月损失8个旅，或将近9.3万人。

二、在整个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进攻战暂时停止了。我军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我们以为，我们将会保障军队的冬衣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依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储备食品来完成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靠缴获的物资来保障的。有生力量的补充是依靠俘虏并部分地依靠我后方的预备队。

三、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军驻扎在下列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大别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江苏、山东和安徽三省的交界处，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野战兵团驻扎在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处。

近几个月，其任务是：

(一)切断平汉路、津浦路及陇海路的铁路线，并将其毗邻的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在明年秋天之前准备好下一步的渡江(长江)战役的条件。

四、西部的3个省——陕西、甘肃、宁夏以及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况已有很大好转。

整个西北部地区，除了甘肃省东部的2个县和同宁夏交界的3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之外，敌人都被我们肃清了。在这一战线上，我军有10个旅，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甘肃省南部渭河战线上转入了进攻。

在江苏省的北部苏北游击区，我们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6个旅不仅能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将迫使敌人退却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们收复。山东省东部地区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在这里，我们有15个旅的正规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收复我们失去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地区。

在南部战线，在山西省的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还剩下少数城镇在敌人手中。在这里，我们有2个旅，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些城镇。

五、在南部战线敌人共计有162个旅。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击

溃。这些军队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沉，军官们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这些军队中最有作战能力的是蒋介石的第五师、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广西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这几个师中，只有第七十四师被我们歼灭了。其余的4个师(11个旅)没有和我们进行过大的战役。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却没有能力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在中长铁路、北平—奉天铁路、北平—绥远铁路和北平—汉口铁路的北部地区沿线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最近几个月，这70个旅遭受了重创，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将不能投入战斗。在上述地区，我们有55个旅。其任务是切断北平—奉天和北平—绥远铁路线并将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区域。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国民党的后方地区，驻扎着16个旅。还有20个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并得到了美国人的装备。

六、人民解放军有140个旅的正规军，90万人。地方部队为6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有50万人。共计200万人。

国民党部队总共有248个正规旅，总人数为150万人，地方部队和包括海军在内的特种部队共12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为100万人。共计370万人。

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党组织成功地领导了群众性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海南岛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省及安徽省的南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对立情绪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 and 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

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54]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过去，中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抱有错误的观点和期望，认为美国将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倾向于只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被消灭。因此，中国将会形成两权对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接下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还有解决当前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拥护我党。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

1947年11月30日”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3-17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机密

12月11日在我们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邵力子之间进行了如下谈话。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

邵说，尽管政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寻找出路、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几乎全部失败，国民党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很多国民党领袖十分害怕，如果共产党人达到合法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就会夺取全部权力。邵补充道，无论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坏，还是发动全面内战，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所造成的。

我继续问：他对选举国大代表的看法如何。邵答道：虽然还没有最后总结，但是已经举行的选举情况清楚表明，人民对选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不用说是多添了一条理由，说明要在指定的日期里召集国民大会是没有可能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思的。

接着，我表示想知道一下邵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着重指出，中国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动荡：因为外汇亏缺不可能继续进口洋货，在许多稻米产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中国货币灾难性地贬值，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切正在引起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至于战局的情况，邵承认，共产党军队不久之前的进攻战役使他们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而使政府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邵指出，中共的这一暂时性的优势也可能产生消极性的后果：目前，如果恢复和平谈判的话，中共会比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问邵：他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前途。邵说，他深信内战停不下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国内和平也恢复不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可观的抑或全面的优势，并顺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调停斗争双方的美国的威望又不够。要恢复中国的和平，邵着重指出，只有在苏联参与和友好促进之下才有可能。

我指出，我们从来不会拒绝加强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如同我们从来就是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样。而在中国国内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奉行的是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

对此，邵在答话时指出，这里讲的并非是干涉内政的话，只是对友好关系的促进。根据邵的思路，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中国国内政局才具备的这一特点，考虑到这一点，苏联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自己的影响。“我应该承认，”他补充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批评，虽则很可能这个批评是完全公正的。”

我仅指出，不能接受客观的批评未必是一件好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1, л.229-231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6日)

致捷列宾：

关于毛泽东1948年访问莫斯科的通报请对毛泽东答复如下：

“苏联政府将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对于他同中国的通讯联络和个人的无线电自然会予以保障。”

收到电报和毛泽东对该电报的反应，请从速电告。

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6日

АВ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5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7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报告如下：

1.电报于当地时间12月17日零点35分(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9点35分)收到。

2.我于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7点30分，未带翻译，亲自向毛泽东本人转达了所嘱托事宜。

3.毛泽东对转达的情况十分满意。他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或半年。”他说，他54岁了，他早就想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他问我，有无指示让我和他同行。

在我提出还有什么要问的以及有关拟定他的动身日期的问题时，他答道，无须再问什么了。

至于动身日期，他说在占领平绥路之后，那时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能让蒋有喘息的机会，要击溃他。接着，他转到当地的一些话题上去了。谈话至此结束。在交谈时他十分活跃，神情很满意。他建议我还是留在这里。

捷列宾

1947年12月17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6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

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相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附件：

请愿书 [55]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6] 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的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生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之仗义〔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1947年12月9日

ГАРФ , 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В.Сталина , д.171 , л.523-528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1月3日)

致马立克同志：

按照您的委托，我研究了兹韦列夫 [57] 同志给米高扬同志的信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整顿辽东半岛货币流通的决议草案。

鉴于目前辽东半岛流通的货币极度疲软，不能再用作支付手段，同时因为必须健全货币流通以使其适应商品流转的需要，苏联财政部关于发行新的货币和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不会引起异议。

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条件问题，要在苏联财政部提出具体拟定的建议之后才可能给出结论。

A. 奇斯佳科夫 [58]

手写批注：

给通金同志——经济司和奇斯佳科夫同志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请搞清情况，抓紧在今天1月5日提出建议。

马立克

1月5日

ABIPPO, ф.0100, оп.41, п.278, д.59, л.1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巴拉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以下资料：《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共36页，2份。

H.普霍洛夫

1948年1月23日

手写批注：

送E.Φ.科瓦廖夫同志。

..... [59] , 1948年1月23日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的影响的情况说明。
第二份附件已经在工作中销毁。

E.科瓦廖夫

1948年2月17日

附件：

禁止公开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前言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民主阵营，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和政治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具备公开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只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才提出了这个目标。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7年7月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攻行动。但是，它的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宣言，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布的。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完全消灭封建的和大富农以及教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时，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以及神职人员和与土地私有制有关系的小官吏，还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一系列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倾向于民主阵营的要求。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这些人与反动派阵营加强了团结。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贫雇农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租赁土地的中农们，都坚决地加入了土地革命最积极的骨干分子阵营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实力。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的共

产党人没有能力推翻蒋介石。现在他们仍然确信自己的非常错误的打算。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帮助蒋介石了。目前，在“更有效地”使用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财政贷款事务方面，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监督。为使国民党中国的一切资源隶属于自己，他们正在狂热地寻找着帮助蒋介石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必然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加重对中国的奴役，将会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以，这些方法的结果是更加促进中国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高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削弱反动派的阵营，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展开进攻行动。

一、反响和宣传工作

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的一切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公告、宣言和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协议的全文。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电台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新华社的每日国际述评，阐述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和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情报局。其中谈到：

“宣言、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在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是对争取和平斗争的事业的最伟大的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华沙会议是对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走狗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会议使他们陷入惊慌，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嚎叫——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他们不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起到过如此伟大历史作用。如果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那么，在目前来说这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摘自1947年10月16日的《大连日报》）

10月20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出版的其他民主刊物里，发表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提出的名为“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在这份宣传材料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中伤，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答复：1.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2.为什么解散共产国际？3.九国共产党会议是不是共产国际的复兴？4.为什么要建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例如，在回答第3个问题谈到：“参加会议的仅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仅局限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呢？为什么情报会议只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是因为，这九个国家在地域上相互联系，此外，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直接处于来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的最恶毒的威胁。至于说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本国人民利益的最忠诚和最有力的保护者。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建立了情报局以交换情报和交流经验，以便保卫和平，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自己国家活动的机会。情报局并不具备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除参加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之外，它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关系。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发生。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呢？”

1947年10月26日，东北地区的所有刊物都发表了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编写的。该提纲分为如下章节：1.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2.帝国主义阵营；3.民主主义阵营；4.全世界人民的任务；5.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例如，在最后一章中谈到：

“在关于欧洲九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报道发表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的报刊也掀起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复兴’的喧嚣。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吃惊的。第一，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分子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只能暴露他们是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第二，各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九国共产党不可以召开自己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呢？难道只有反动力量可以为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联合起来吗？难道进步力量不应该为交流经验和阻止侵略而联合起来吗？第三，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公报明确地谈到，情报局的成立完全不意味着恢复具有中央领导权的某种世界共产主义机关，即类似于从前的共产国际的组织。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组织于1943年就被解散了。实践证明，它的解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所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积极发展。如果恢复共产国际组织，那么，这就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这正是反动派集团不可能也不想明白的。”

在提纲中，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会议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人过去和今后将永远是为争取自由、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最忠诚最可靠的战士。2.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九国共产党会议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了他们手中造谣和欺骗的武器，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因此，这次会议是对以奴役各民族为目的帝国主义政策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攻击，都证明他们受到了极其痛苦的打击。3.华尔街老奸巨猾的政客们决定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其他各个国家的反动派集团紧随其后。全世界人民应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全世界的和平。因此，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民主和和平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这项事业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计划的首要保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欢迎这种联合的原因。4.九国共产党会议明确指出了：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周围，这些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今后将会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顺利地发展。”

在1947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期间，在中国解放区的一切共产主义和民主刊物上，都发表了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除此之外，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地区的其他刊物上，都公布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反响。在解放区的民主报刊上，每周都发表新华社题为“欧洲局势”的述评。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例如，在1947年10月9日的述评中，表明了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规模，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在西德进行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同时还系统地阐明了希腊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殖民地和从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解放区出版的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也无法评价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在这些地区的宣传情况。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总结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口头宣传的工作情况的材料(演讲、小组会议、军队里的政治学习、群众集会，等等)。也可能，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看来，在那些共产党和民主报刊被禁止的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在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是非法的，任何群众聚会和会议都会遭到禁止。10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中，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不加注解的全文(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些杂志的编辑部远离党的中央机关，不可能表达出党对会议的正式意见，没有来自党中央的立场)。

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

次会议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国民党分子开始进行“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情报电讯社立即效法这种虚假的宣传。与官方的诽谤宣传相反，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乔木，于1947年11月22日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国民党报刊的这种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例如，《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于1947年11月29日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报》（Jiebao，在上海发行）于12月19日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以至于在上海的美国机构都承认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的谣言，并表示意见：“成立这样情报局的同时，一定会发表政治声明，因为它的使命是进行公开的工作和宣传。”（塔斯社，1947年1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显然是为了把中国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说成是“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美国是最慷慨的。

而中国的民主同盟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复了国民党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的诽谤性宣传。

反映中国“中立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是最大型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立场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含意。在1947年10月18日的那一期中，在涉及关于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会议公报的内容时，这张报纸写道：“实际上，不幸的事件是，随着胜利而来的是美国 and 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实力政策。美国想利用自己的美元和原子弹统治全世界，而同时苏联又以它的斗争意志，试图扩大自己的‘铁幕’范围，它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做出丝毫的让步。”

在把成立情报局描绘成是“共产国际的复兴”的同时，《大公报》还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因此，它具有反美的性质。”《大公报》重复了关于“共产国际复兴”的诽谤性谣言，但是，同时又在同一期发表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和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全文。如果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禁止一切民主刊物出版，广大读者多亏了《大公报》才读到这些辉煌的文件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就非常明确了。《大公报》在上海出版10万份，此外在其他一系列国民党的后方城市里也独立发行。

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九国共产党会议对于中国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产生了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1947年12月25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目前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党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密切结合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号召，勇敢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如下词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

“反帝阵营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欧洲九国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并发出了斗争的号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计划给予坚决的抵抗。这些号召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坚定了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这些斗争的号召，使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摘自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塔斯社

1948年1月3—5日的报道。)

1947年10月中旬，在发表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有关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全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献给1911年中国革命36周年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力量公开开始了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政治进攻行动。

宣言指出：

“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的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根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实现在农民中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大的一步，这是进行反帝和民主革命的基础。正是因此，关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3亿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和坚决的解决。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在中国的所有解放区里，召开了土地大会，拥护1947年9月中旬通过的“主要的土地纲领”，在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1000万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都分得了地主、寺院和教堂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富农分子的土地和资产。这个因素极大地瓦解了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并促进了国民党后方各省的人民起义运动。中国报刊报道了人民起义运动的发源地：广西省南部、江西省和广东省交界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北部和南部、云南省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浙江省的南部、四川省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能力镇压这些运动。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对国统区的军事进攻行动，这些行动变得更加积极，主要是政治目的更加明确了。从10月中旬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宣言的发表(参见上文)，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进攻行动中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推行土地革命，占领长江流域的关键性战略要地，为最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0月至1月)，人民解放军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吉林和长春，并攻占了其重要堡垒——沈阳。夺取沈阳就预先注定了蒋介石在南满地区整个集团军的命运。正如北平所报道的那样(塔斯社1月20日消息)，蒋介石第五军的2个师，带着自己的全部武器和指挥官，转向了沈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战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战区司令部军事观察员于今年1月19日通报说：“由于12月份这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行动，不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被切断了，而且就连河南省的首府开封也陷入孤立境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已经直接逼进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指挥中心，除此而外，在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基地许昌、洛河和驻马店战斗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3万多人……在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国民党的整个第五兵团已经被击溃，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观察员还强调指出了在这个最重要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被大规模地瓦解的情况。“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以整排、整连甚至是整团的方式投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被击溃和被瓦解的第三师第八团的整个队伍，在平汉铁路地区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位于汉口的东北部地区)的封锁线，歼灭了国民党士兵和军官8000多人，攻占了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相毗邻的地区以及与南京相毗邻的地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大批队伍从河南的西部地区挺进四川省，另一些队伍强渡长江，进入了湖南和江西省境内。”

这样一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行动的结果是，夺取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略要地，为确保今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

九国共产党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新的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过去的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密切了。这种情况不仅与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我们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那个总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种政治局势可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评定。现在，人民已经看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目前，少数民族也坚定不移地加入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中。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泽 [60] 在自己的新年讲话中，号召内蒙古人民在1948年实现平均分配土地，根除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以便改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水平，组织自由牧场。与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力量共同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应该完善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全体内蒙古人民的财政、经济和实力，应该用于推翻蒋介石的专政制度，从而达到解放内蒙古人民的目的。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农工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 and 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民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三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

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同盟似乎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国民党保密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3.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4.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5.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6.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文汇报》1947年1月8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轨道上。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年6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2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1947年7月11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19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1947年11月5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但是，第二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11月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10月28日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接着他还说：“最奇怪

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施“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民盟主席张澜在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南华早报》1947年11月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民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体团”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九龙的胡作非为的刺激（杀害了两名抵抗英国警察的中国人，英国警察强行驱赶居民离开指定为英国机场的地区），1月16—18日，在上海和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1月18日在上海，有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口号：“英国军队滚出九龙！”“美国军队滚出中国！”“我们要为九龙遇难的弟兄报仇！”“打倒不保护自己人民的政府！”“中国的美国将军越多，中国人民就牺牲得越多！”“我们反对剥夺我们人民权利的美国人！”“我们反对出卖福摩萨！”“打倒叛徒！”“和平万岁！”“打倒腐败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专制！”1月16日，游行活动在广州市的沙面地区形成了高潮，焚烧和破坏了许多英国的建筑。其结果是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大楼、英国情报部机构、英国“巴特菲尔菲尔德·安德斯瓦耶尔”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的大楼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几个英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受伤。

这些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信号，即华北地区的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目前已经得到华南地区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补充，全国范围内的伟大革命的转折已经来临。

四、对苏联好感的增强

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极大地增强了，不仅是在中国的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在中国的解放区里，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共产党的报刊和一切宣传工具，经常系统地报道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详细地说明苏联的和平政策。除此之外，4500万的东北居民和内蒙古居民还经常记得：是苏联和苏联红军把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解放区的整个社会各界，极其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这一天，解放区的所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苏联的热爱和好感。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在增强，而在这些地区国民党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每日都在诽谤苏联，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对苏联的仇视。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对苏联好感极大增强的证据，都是取自于《大公报》读者的回应文章以及读者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来信，很难说这些读者属于共产党或者与苏联有什么联系。例如，有一位化名为“C.O.C.”的读者，在1947年11月15日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地方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刊，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的文章中，都竭力绕开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苏联工业已经达到了1940年时的水平，也就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和破坏，给苏联的一些重大工业中心和农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社会主义制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苏联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它在战争中损失的物质财产和人员伤亡，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无论是敌国还是盟国。当别人都在谈论原子弹的秘密时，我写的则是像工业化这样的‘小’问题，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工业化比所有的原子弹和秘密武器起的作用都大。俄国的原子能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力量的。这个秘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发现。应该在1950年完成的苏联五年改造计划取得的成绩，对于全世界来说，比任何计划、学说、会议和集团都重要。”（《中国每周评论》1947年11月15日）。该杂志还通报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周年的时候，中国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报刊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强调改善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大公报》在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希望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的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了。苏联已经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建立和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当然，它应该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努力继续进步。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和理解苏联，我们不应该介入美苏的矛盾中，以便能够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桥梁，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拯救整个人类。”

五、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中国的新局势令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惊恐不安，更不用说在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和救助的国民党反动派了。

美国政府在8月底向中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他的特别任务是弄清国民党政府的现状。在外出巡视活动结束后，魏德迈向美国国务卿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并坚持给蒋介石政府以援助。

按照新加坡1947年11月14日《华侨日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话来说，魏德迈报告中有以下两点内容：

“1.必须强行建设亚洲大陆铁路线，从广州湾半岛（广东省的南部地区），经兰州（甘肃省），到达新疆省的乌鲁木齐市。按照魏德迈的意见，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可利用这条铁路线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运送武器和粮食，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北部的港口可能会被封锁。

“2.广东省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了华南地区粮食和工业

产品的供应，为中国政府进行肃清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全面进攻行动提供帮助。”

继魏德迈之后，美国的一系列“顾问”、“外交使团”、“代表团”、国会议员、实业家和反动派活动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作为“专家”和新战争贩子，威廉·布里特访问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建议向中国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些款项应该在3年期限内拨给蒋介石，以用于“针对苏联采取措施，预防它夺取中国”。

1947年10月8日，洛艾维尔·鲁克斯中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负责人——来到上海，1945年11月前，他一直担任盟军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与张群和蒋介石就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设备和粮食等物资的新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已经是在取消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

1947年10月11日，以国会装备委员会主席斯特林格·库尔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中国。

《南华早报》写道，他们的任务还包括“视察美国陆军和海军基地及设施”。

库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在报刊上发表通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是现实的”。同其他“观察员”一样，他要求美国立即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并以此“挽救中国，使其远离共产主义”。

10月29日，“观察员”瓦尔特·扎特——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后，扎特于11月10日向美国报界通报了自己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内容。正如《南华早报》于1947年11月12日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向扎特声明了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扎特本人也声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决定和没有最后明确之前，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我们应该监督亚洲的秩序，否则，美国不得不在日本保留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扎特说，“我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彻底地失去日本和朝鲜。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地找到解决自己对华政策的方法。”

在魏德迈和其他“顾问”向国务卿提交了建议之后，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在没有美国紧急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能力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数额为40.83亿美元的援助。除这笔款项之外，美国还按照1946年7月国会通过的计划，转给蒋介石政府271艘军舰。正如1947年12月14日在青岛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报的那样，美国海军司令库克海军上将“已经在1947年向中国转交了100艘舰只，今后还将转交271艘”。

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美国的资金用于装备了南京、上海、成都、北平、天津、西安、昆明、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小组也从1000人增加到5500人。

美国人在台湾岛为蒋介石训练了10个师的新部队，此外还在南京、汉口、西安和韶关训练了20个“自卫”旅。1947年夏季，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了1.3亿发子弹，而在1947年12月，又把美国在天津、大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仓库所储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转交给了蒋介石政府。

12月8日签署了美中“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应把自己“多余的”军舰和干船坞转交给蒋介石政府。这些舰只的一部分已经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了中国海军舰队。这个协议规定，应向美国海军提供租借权。这个协议还规定，美国应提供价格优惠的技术，并提供在中国组建和供养海军机构方面的咨询。

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刘师舜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关于援华的中美协议”。

该协议由10章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奴役。在这个协议的第一章写道：“将给予中国援助的那个计划，包括了这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规定了这些物资

的购买、保存和与此相关的运输服务和航运服务，上述各项由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于1947年5月31日第80次会议通过的第8号法令以及对其修改和补充文件来确定。援助的物资包括粮食、药品、成衣、制衣材料、化肥、燃料、种子，等等。”

在第三条中指出，“美国政府机关应保证美国货物的购买、保存、运输，并抵达中国。一切物资均应在美国购买，只有美国政府专门批准的商品，可在美国境外购买”。

第二章的第一条指出：“美国代表对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协议提供的一切物资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第二条指出：“用于援助而进口的美国的一切商品，免除税收，包括这些商品在各地出售之前的海关税。”

第三章的第三条写道：“在中国所收入的资金将用于那样一些目的，即由美国政府确定的那些项目。”

第五章的第二条说：“中国政府将允许并将千方百计地协助美国代表监督物资的分配工作，将允许并协助这些代表为视察目的而进行的旅行。”

第六章的第一条指出：“中国政府将允许美国报界和无线电广播界的代表，不受新闻机关检查，自由报道关于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情况的消息。”

第七章的第二条指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提供与其援助有关的任何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情报。”

这个协议证明：美国已经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因此，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利，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

关于这方面还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1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抵达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并继续向这个地区增补兵力。很有可能，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胶济线铁路。

2.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库克海军上将，最近在为蒋介石制定“准备中国海军舰队”的各种计划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1月17日召开的蒋介石参谋部会议上，他提交了这些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作为水路交通命脉的长江的防御”问题。不难猜到，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美国军舰打着“中国海军舰队”的旗号进入长江流域。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在12月8日签署了“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将把“多余的”美国军舰转交给中国，这个协议为上述措施预先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1927年英、美、日的军舰进入长江流域，这在镇压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这个措施是作为“保卫”蒋介石在上海 [\[61\]](#)、南京和汉口的重要基地来实施的。

此外，为反对人民解放军，还准备了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登陆战役，并在台湾专门培训了日本陆战部队。

3.1947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给蒋介石拨出了1947年第三季度的石油产品定额，数量是137295950升，其中航空汽油756000升，汽车汽油56700升，煤油37800000升，汽油和酒精12199950升，液体燃料的副产品29840000升。（《南华早报》，1947年11月28日）

这些巨大数量的燃料并非蒋介石军队的需求，而是为在中国聚集和储备美国武装力量所必需的燃料。

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渗透。1947年10月，国民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教育组织”的协议。美国人把这个“教育组织”的管理和财政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该组织的委员会由2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在华的美国实业界人士组成，总负责人是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国民党政府向这个“委员会”派出了5名自己的顾问人员，但是，他们在该组织的活动方面是

没有发言权的。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有权在中国的中等和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教育活动，他们还准备了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代理机构。作为教师在中国院校里工作的有美国的传教士，他们其中许多人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按照使中国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像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沈阳、北平、昆明、台北(在台湾岛上)这样的城市里以及其他地方，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工作时享有特权。这些美国情报机关的情报，不受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新闻检查。在中国，像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都设有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站。

目前，美国的电影在中国占垄断地位。仅第四季度(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就有80多万米的电影胶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和省会城市里播放。

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里，充斥了许多侦探、淫秽和其他内容的“作品”，美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传播这些东西来愚弄中国居民。在中国还大批量地发行了《时代》、《幸福》、《科利尔》^[62]等杂志及其他刊物。在上海和青岛及其他大城市里，还出版了由美国实业界和政治界控制的报纸。在上海出版了《上海邮政晚报》和其他一些刊物。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美国当局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同盟和“革命委员会”这些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民主组织的人士进行迫害。

美国报刊提出了关于冯玉祥命运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在美国的避难权，并打算把他交给国民党当局，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查封了“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发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政治声明的民主团体。

由于担心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在保持对蒋介石“正常的”态度的同时，还支持在香港的李济深，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压制蒋介石。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专门代表蒋介石前往香港，以便“预防国民党的分裂”。他与在香港的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要求制止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团体在香港的活动。此后，国民党的分裂还是发生了，并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而香港当局尽管禁止民主团体在香港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明，但仍然允许他们公布自己的纲领。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就是李济深的“革命委员会”不支持中国人于1月16—18日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反英国当局的游行活动(参见上文)。这说明了他们对英国当局持某种友好的态度。

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国民党的报刊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关于广州“事件”和谴责这一“事件”的通报，英国驻华代表仍然声明，保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利益”的权利。

六、蒋介石的计划

至于蒋介石根据新形势制定的计划，除了把赌注押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上之外，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 试图依靠地主和富农分子加强各省的地方“自卫”，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纲领，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大的、小的)已经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2. 他从居住在西康、云南、青海、贵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新的力量，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契约，而这些部落的人数在全中国也只有3000万人。

问题在于，这些部族是最落后和最黑暗的。在他们那里占优势的是畜牧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说到最使这些部落感到不安的民族问题，蒋介石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的契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蒋打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这些部落的一位代表陈季楚(Чень Ди-чжу)专

门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打算利用这些部落“镇压共产主义的暴乱”。南京政府于1月18日下达命令：批准这些部落“加入镇压共匪行动的委员会中”。

3.国民党委员会在所有的城市里，开展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精神”和“使人民参加到镇压共匪的运动中”。

根据以下事实，就能够评定这个运动的结果：1月19日，也就是1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第二天，国民党在上海进行了“鼓舞人民精神”的游行活动。正如国民党电讯社“中央新闻社”所报道的那样，所有民主人士乘坐三辆大卡车，沿着全城散发国民党的传单。

结论

1.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并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行动。

2.在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它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首先扩大了规模，其次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转入实现新的土地纲领——虽然土地革命开始于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也就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但是，按其质来说，这种转折仍然与会议提出的任务密切相关，况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公布新的土地纲领的(10月10日)。

3.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所谓的“第三势力”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它被迫转向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大大增强了。

4.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给蒋介石提供的“一般性的”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已经不可能挽救他了，而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编制与李济深及其集团有关的某种暂不明朗的计划。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可以清楚，他们已经考虑到蒋介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了。

5.蒋介石指望那些地主和富农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土地纲领之后加入了蒋的阵营里，并试图把中农中的上层分子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但是，这也并不能补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中国农村里占极少数，不可能用他们组成一支军队。同样，蒋介石还指望利用土著民族，作为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的炮灰，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6.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的宣传情况，可以说，它对会议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它还利用会议的文件，更广泛地动员自己的人民，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

但是，宣传工作的安排，还不能满足国内革命运动高潮新阶段的任务。尤其是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一切民主刊物都被禁止了。

应该指出，(共产)党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回击。显然，这是因为党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这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说明的那样。

科甘(签名)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63])

А.И.米高扬同志：

现就卡尔金 [64] 和先科夫两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东北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建议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二)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应恢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东方学研究所(1932—1933年关闭)，该所最近几年是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三)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东北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东北的工作

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似应：

(一)为在东北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二)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三)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20%—25%。

(四)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五)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东北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先科夫两位同志历数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东北，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1945年8月14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

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单位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的任命等)。

六、“其他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东北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东北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15—20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东北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M.斯拉德科夫斯基

ABПРФ, ф.0100, оп.42a, п.301, д.1, л.3-6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

戈列夫同志：

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汇7000美元去巴黎给中国驻国际工会联盟代表刘宁一。汇款可以转入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

请通知苏联国家银行能否接受该交托事宜。

苏联外交副部长

B.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ABПРФ，Φ0100，оп.41，п.278，д.55，л.1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 (1948年3月30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我现将我们在中国特区的工作人员捷列宾同志转交的毛泽东致菲利浦夫同志的电报报告如下：

中国的局势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审查党的队伍，反对我们党内的右倾，特别是党内的“左”倾。

众所周知，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发生右倾，在和国民党决裂时期发生“左”倾，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变得复杂了。“左”倾目前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中农、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上，在那些再次被解放的地区，对孤立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工会运动中片面突出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拒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党

派及进步绅士的合作。在工作中草率行事，并企图超越阶段。去年，在所有的解放区均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左”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带有危险性和冒险性。但是纠正这些错误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严重困难，近几个月，这些错误已基本消除。

右倾主要表现在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害怕美国方面会一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害怕战争拖延下去，对国际民主力量估计不足，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些人没有发现我们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也没有看见他们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但是这个倾向不是主要的。对于走上这条路的党员，比较容易使他们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在发动的几个战役，在自己部队的新式练兵，在扩大新解放区，在土改，在审查和清理我们党的队伍，以及在争取小党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些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部分都已消除了。

这一切让我们有可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寄予一定的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要走某种第三条道路才能解决国内这场危机。正是这样，使他们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同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它们完全不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的工作，脱离群众，结果这些党派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一阶层从自己的视野中放过。我们应该把它

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1—2个最大的城市，当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各个地区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1949年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在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渤海(山东)地区联合起来，使它们处于一个党的机构(中央华北局)、一个政府和一个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之下。这一广阔领土包括了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和以西、平绥铁路以南和山东渤海各地区，居民人数近5000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进行了联合，在最近期间里将最终完成。石家庄市将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这一切都让我们有可能把一系列领导干部投入到新解放区去。

四、我们的南线军队。

山东纵队——9个旅，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谭震林。

苏北兵团——7个旅，司令员韦国清 [65]，副司令员陈丕显 [66]。

在黄淮地区的部队——21个旅，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在豫鄂陕地区的部队——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谢富治。

在江淮和汉水地区的部队——19个旅，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邓小平。

西北野战军——12个旅，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贺龙。

在晋南和豫北的部队——12个旅，司令员徐向前。

1947年12月，我们在20个月的战斗行动以来初次得以让部队休

整，除了刘伯承的部队由于白崇禧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强大的兵团对大别山进攻还留守在阵地上。直到2月底，刘伯承的部分军队才撤到淮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这段时间用来开展党政工作和进行部队的战斗准备。向部队解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国民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和苦难，开展对军队的社会成分和部队战斗力的审查，对士兵和军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对部分地主、富农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再教育或清除出军队。我们提高了部队工作的民主作风，提高了作战的战略、战术水平，围绕我们在土改、工业、贸易和对知识分子关系方面的政治措施，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这一切使得我们能把我们军队的革命积极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

目前，除了刘伯承那几支在2月底、3月初撤出休整的部队之外，所有部队都已开始新一轮的战役了，在2个星期的战斗里已经粉碎了9个国民党旅。

东北野战军——46个旅，司令员林彪。

晋察冀部队——18个旅，司令员聂荣臻。

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李井泉。 [67]

冬季期间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打过仗，而其余的进行了休整。

东北部队在3个月期间顺利地打了几仗，粉碎了8个国民党旅，而在敌人的一个师里，由于开展工作的结果发动了起义。这几仗，占领了以下几个城市：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四平街，并收复了吉林。整支部队在稍事休整后将长春或北平、沈阳铁路沿线另外一些战略重点发动进攻，然后紧接着进攻沈阳。现在我们让敌人有可能重新占领我们早已夺取的平沈铁路山海关—辽阳 [68] 段沿线的几个据点，以便今后更利于把敌人歼灭。

晋察冀部队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开始了在平绥铁路地区的战役。

晋绥部队组成人数不多，它的活动仅限于牵制阎锡山的部队。

目前我们的军队有50个纵队或256个旅，总数为1322353人(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整编师，而一个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整编旅)。每1个旅由

3个团组成，平均约为8000人。

此外，还有民兵、警卫部队、后方军队机关和军事学校等，总数为1168968人(他们中战斗编制为80万人)。

我们军队总共有2491321人。1946年7月前我们只有28个纵队或118个旅的正规军，总数为71.2万人和66.5万人的非正规军，总共为127.8万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扩大了，旅的数量扩增不是很多，而旅的人员构成大大增加了(从5000到8000人)。

国民党的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7月，即从发动内战起，到去年夏季，只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现在国民党有104个师或279个旅。

国民党军队的配置：

在北线。

在第一线占去了29个师或93个旅，他们中在东北13个师或45个旅，司令卫立煌，大本营在沈阳；在北方11个师或33个旅，司令傅作义，大本营在北平；在山西5个师或15个旅，司令阎锡山，大本营在太原。

在南线。

在第一线总共66个师或158个旅。他们中有：顾祝同兵团38个师或86个旅，大本营在郑州；白崇禧兵团14个师或33个旅，大本营在九江[69]；胡宗南兵团14个师或39个旅，大本营在西安。

在北方和南方战线的第一线国民党总共有106万人。

国民党在第二战线有9个师或28个旅。他们中有：在西北(兰州以西)有4个师或8个旅；在西南(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有4个师或10个旅；在东南(长江以南各省)有8个旅；在台湾岛有1个师(2个旅)。国民党第二线总共有19.6万人。

国民党旅和师的扩增是靠改编自己的地方傀儡部队为正规的师和旅。这些改编而来的师和旅分配在以下各兵团：

卫立煌兵团扩增了3个师(14个旅)，傅作义的部队扩增了2个师(6个旅)。

顾祝同兵团扩增6个师(9个旅)，胡宗南部队扩增2个旅。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不是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是104个师或279个旅的原因。

至1948年3月15日前的最近数月的战斗中，我们消灭了6个师或29个旅，他们恢复不起来了，国民党也未必能给他们补充人员和武器。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拥有98个师或250个旅。和去年夏季比较，国民党军队实际扩增了5个师和2个旅。

从国民党现有的250个旅来看，仅有118个旅没有受到过我们军队的重创。余下的132个旅不断遭受过毁灭性打击，他们现在的战斗力也是很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大大缩减了。如果1946年7月前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30.5万的话(正规部队200万人，后方部队73.8万人，特种部队36.7万人，海军和空军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101万人)，那到1948年2月就变为365万人(正规部队181万人，后方部队56万人，特种部队28万人，海空军部队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为81万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减少了66.5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19个月里(自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损失了197.7万人(2月和3月份上半个月的资料没有计算在内，但损失约合18万人)。这意味着，在同我们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不仅丧失了战时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100多万新兵)，而且还丧失了相当多的原有兵力。而国民党正在采取一些与我们相反的措施，即他们不是为一些旅补充兵员，而是增加旅的数量。1946年国民党每个旅平均有8000人，而现在每个旅平均人数不超过6000人。其结果是，随着我军解放的地方的领土扩大，为国民党军提供有生力量和粮食供给的基地将会不断缩小。

我们估计，再打一年仗，即到明年春天，蒋介石和中共的军队在数量方面将接近相等。

五、我们的任务和措施。

增长自己的力量，做到不依赖外援(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

援)。要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去打仗，不追求战线上的快速成功，力求每个月平均消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达到100个旅(实际上，去年秋天我们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今后我们可能将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在5年里，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敌人很消极，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战线上都受我们的打击。只是在大别山区那里，敌人集中了14个机动旅，淮河以北集中了12个机动旅，在这些地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在那一带能发动进攻性的战役。这是因为我们从部署在淮河以北的我军编制里抽调了9个旅投入到其他战线去了。

在东北、西北、苏北和平汉线以西，从郑州到武汉的广阔地区，以及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都形成了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为了尽快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和在南方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打算今夏实施早先制订好的对南方的秋季攻势计划。为此要从陈毅在陇海线上的主力编制里抽调9个旅，近9万人的部队。我们计划在5—6月强渡长江，展开在浙江、福建和江西各省的战役。此外，从大别山和汉水地区抽调2个旅，1.5万人的部队，在5—6月里必须开进湖南省。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实现我们设计的方案，并且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将能够强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会将15个旅向南移至长江以南的地区。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两个地区的主动权。

毛泽东

1948年3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

АПРФ，ф.45，оп.1，п.330，л.18-28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 (1948年4月2日)

Я.А.马立克同志：

现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和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简报呈上。

正文共5页。

H.罗申

1948年4月2日

关于中国国内局势问题的简报

一、军事方面

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和直接参与下，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大约两年前发动了内战，内战已经蔓延到全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向战场投入了500万兵力反对民主力量。

在15个月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全部武器装备。在今后的作战中，主动权将继续属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只能进行防御战术目的非常有限的个别战役。

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预见到将要撤离首都，他与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正在华南建立根据地。最忠于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宋子文已被派往华南执行这一任务。

二、内政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乐观的估计，在时间上，战争还要打一年半至两年。

蒋介石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失败，对军事胜利的无望，以及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国民党和政府阵营内部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摩擦。发展到今天，他们的机构内部已经有了敌对情绪、内讧，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法统一。

席卷国民党统治区所有经济部门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不可遏制地加剧，高达2.25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庞大的内战

开支，使得国民党反动政权更加不稳定。

因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阶级、中下层国家机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极其艰难，军队中的条件十分艰苦，广大民众各阶层对现政权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在不断增长。为了对付民主力量，蒋介石加强了特务机构、反间谍组织、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但是，尽管如此，华中地区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力量和在南洋诸国处于合法状态的民主力量，成功地进行着巩固和扩大自己组织的工作。

三、外交方面

国民党反动政权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因此，这一政府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

美帝国主义见蒋介石面临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的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

1948年4月_日

附件：

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

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会见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谈到苏中关系时仅限于指出，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已故的列宁和孙逸仙都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同志在和中国人谈话时也多次指出这一点。根据1945年的条约，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

二、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不稳固及各种弊端，必须注意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在其政策中玩弄种种手腕。据此，要求你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军事和经济潜力状况、财政状况以及这些方面的种种变化。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报告和通报及时向外交部通报情况，是大使最为重要的任务。

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内的不同意见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弄清各派系的动向及其政治目的。

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中关系，重点是美国人在以下方面采取的措施：1.和蒋介石携手对付民主力量，通过种种渠道和隐蔽途径援助蒋介石政权；2.美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美帝国

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奴役；3.准备把中国变成反苏军事基地；4.为巩固蒋介石政府准备力量，做个别政治人物和团体的工作；5.美国和国民党的组织联手限制我们在华的权益、搞反苏运动和采取反苏措施。

五、关注英美在华的关系，英美在远东问题、东南亚问题上的合作和矛盾。关注英帝国主义保护和维持自己在中国、远东和东南亚利益的努力。

六、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及其领导人奉行的政策、表现和采取的措施，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而且能够大力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七、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签订对日合约方面的立场以及在确定这一立场时美国人所起的作用。在与中国各种人士的谈话中，历数日本侵略的事实和日本按美国的计划在军事上东山再起对中国的害处，强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八、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问题的具体人士、团体和组织。若个别政府人士提出这一问题，大使应根据1945年条约、旅顺口协定和大连协定，坚决提出抗议，揭露这些人奉行的政策。

九、力争通过各种政府机构甚至通过间接途径，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偿还供货债务的问题。与此同时，寻求与中国政府公司和私人公司发展贸易的途径。

十、关于新疆问题，争取让中国政府履行1946年6月6日与新疆伊宁人签订的协定。

十一、依据1924年的条约，坚决保持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的资产以及维护在华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和资产。

十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国际书店和苏联电影出口公司等组织，积极在中国宣传苏联的生活和政策。

十三、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分化白俄联合会，其目的是使有可能参加苏联侨民协会的那部分侨民脱离白俄联合会。

十四、巩固和团结苏联侨民协会，注意加强在苏联公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采取措施防止苏联犹太公民脱离苏联侨民协会，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十五、根据中央的指示，利用进步民主报刊揭露美国人和蒋介石政府中形形色色的反苏人士和团体在中国搞的敌视苏联的活动。

十六、密切注视中国的战事进程，研究国民党统帅部的计划和措施。

十七、就上述所有问题并根据外交部的任务，系统并及时地向苏联外交部通报情况。

АВПРФ, ф.018, оп.10, п.24, д.21, л.9-14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 (1948年4月2日)

译自英文，打字文本

根据1948年3月1日美国新闻处公报，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和贷款有：

- 1.借贷(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7年6月30日), 777638292美元。
 - 2.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提供), 465800000美元。
 - 3.美国对外援助, 向中国提供款额, 45700000美元。
 - 4.联合国救济儿童国际基金(美国提供), 2065000美元。
 - 5.进出口银行贷款, 82800000美元。
 - 6.根据中美合作机构协定转交的装备弹药, 17660929美元。
 - 7.美国在中国西部的军事剩余物资, 20000000美元。
 - 8.美国在上海和青岛的造船设备转交给中国, 4000000美元。
 - 9.美国在战争期间建造的商船等剩余物资, 16600600美元。
 - 10.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结束后的开支, 4700000美元。
 - 11.美国撤退时留在华北的船只和弹药(1947年4—9月), 84000000美元。(注A)
 - 12.亚洲的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军用剩余物资, 824000000美元。(注B)
 - 13.国会交付的271艘船舶, 800000000美元。(注C)
 - 14.1.3亿套轻武器用的弹药, 6566589美元。(注D)
 - 15.太平洋群岛上标有“卖”给中国的物资, 48000000美元。(注E)
 - 16.标有“卖”字样的150架运输机, 41400000美元。(注F)
 - 17.国会贷款, 1947年9月19日, 18000000美元。(注G)
 - 18.1948年的援华决定, 400000000美元。(注H)
- 总共, 3658836810美元。

社会舆论认为, 上述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数字被故意夸大了。例如, 商船的价格(见第9项)达2200万美元, 根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计

算，美国政府的统计夸大了550万美元。太平洋群岛和亚洲的军用剩余物资的价格(第12项)美国政府算成8.24亿美元。但1945年9月27日的《纽约时报》公布的公告说，在第12项范围内军用剩余物资，即在缅甸—印度区域内交给中国的剩余物资数目为5亿美元。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太平洋群岛与地区的剩余物资是8.65亿美元，总共加起来是13.65亿美元，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可能大了5.41亿美元。根据这个统计数字，上述范围内的总数应为4205336810美元。

此外，在美国新闻处的上述公告中提到的两项的价格漏了。这两项是：

19.在马利亚纳群岛上的弹药剩余物资，根据1947年1月7日签署的协定，以百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中国。

20.太平洋群岛上的军用剩余物资，根据上述1948年1月31日签署的协定的补充协定第15条，卖给了中国空军。

此外，至少还有4项，美国公开承认是给蒋介石的援助，但在美国提出的军事拨款中仍要支付。其中两项是这样计算的：

21.美国向中国提供港口设置的海军贷款，1500万美元。(注D [70])

22.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支出——1947年内的调停、培训和警卫任务等，1.1亿美元(注Y [71])。

其他两项的价格未计，这两项是：

23.国民党第九军调往华北和东北的运输费用。(注K)

24.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在中国的费用。

这样，除了那些保密项目外，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大大超过了43亿美元。

注：

A.统计的价格已在1947年5月8日国会的专门公告中公布。

B.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卖给蒋介石。两个数字都公布在国会新闻处的公告中。

C. 1947年2月5日，美联社援引的国会提供的数字。

D.以656589美元或者总值的10%卖给蒋介石。这两个数字都出现在国会新闻处的公报里。

E.以600万美元卖给蒋介石，根据国会新闻处的公报，占总值的12.5%。

F.以每架飞机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蒋介石，但国会新闻处指出，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7.6万美元。

G.应马歇尔的请求，1947年12月19日由国会提供。

H.据1947年7月3日中美双边协议，蒋介石用1.25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军事剩余物资，用2.75亿美元进口商品。1948年10月12日国会的声明说，军事剩余物资——飞机以10%或更低的价格卖给南京政府。这一协议使南京政府至少获得125万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

I.国会于1947年11月15日公布。

J.由出版的《锻造新中国》做出的统计，由外蒙古协会发表。

K.统计数字发表在1948年4月2日的上海《大公报》上。

翻译：沃洛霍夫、彼得罗夫、苏什科。

АВПРФ, ф.434, оп.3, д.45, л.21, л.19-23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 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机密

对1948年3月31日第306/1ДВ号函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同志：

我们已向内务部外贝加尔区边防军首长发出指示，允许中国工会代表团的一批印刷品和其他物资从哈尔滨越过苏联国境运送到巴黎去。

为了保证这批物质在代表团离开苏联出境时能获得放行，请通知我们，代表团大致打算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境。

斯达汉诺夫中将 [72] (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3, л.6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机密

第343/ДВ号

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А.В.赫鲁廖夫同志苏联财政部副部长А.А.波斯科诺夫同志：

今年4月1日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给你们电报 [73] 通知说，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给驻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 [74] 的苏军司令部写信，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问题。

请将你们在执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的决议时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对韩光提出进行货币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告知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

1948年4月1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9, л.18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机密

对1948年4月12日第343/1ДВ号信函的答复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Я.А.马立克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5/144С号决议要求苏军司令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月下旬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商议出一套关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纸币的样本和制造纸币的订单等提案。责成苏联财政部在1948年7月1日之前，按苏军司令部和关东地区管理局共同取得的样本和尺寸制造新的纸币。

在两次电报提醒要从速寄出上述的提案、样本和订单后，比留佐夫同志在1948年4月2日发出3624号电报，通报了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信中关于纸币兑换的条件。

1948年4月8日А.Н.柯西金同志发75号电报给比留佐夫同志，要求他立即将纸币兑换条件的提案、新的纸币样本及其订单寄出，同时还派遣区自治管理局代表来确认纸币样本的印刷方案，并签订订单。

关于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的提案将在收到比留佐夫同志寄出的提案后再作定论。

苏联财政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И.Д.兹洛宾

АВГ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9, л.19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 (1948年4月20日)

绝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

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年4月20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8-29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8年4月22日)**

来自捷列宾同志：

我报告：

4月22日傍晚，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知：5月初毛泽东要到莫斯科去，出于保密，将不到朱德和刘少奇那里去。他将借口生病和休养在这里休息。

与毛泽东一起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师哲。开始先乘车走，在敌占区10—15天内骑马，再乘车。

大概不到东北首府去，而是停在附近一个居民点，在那里召集一些负责人开会。他们问我：对此行程，我有什么指示，我去不去。他们请求以我的名义向您询问这件事。

我问，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他没有讲过什么。周恩来和任弼时认为不必去，要保证与您的联系。他们补充说，梅利尼科夫在这里当医生，我们需要医生，何况从保密角度看，这样更方便些。

把已经运抵目的地的无线电台立即运往这里。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近日要到刘少奇那里去。请您迅速做出指示，因为他们预计5月4—5日动身。

捷列宾

1948年4月22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7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

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4.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100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10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1936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我们计划访问1—3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以便在途中及时联系”，这是他说到的而不是写的。——捷列宾)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1948年4月26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0 31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年4月29日)

毛泽东同志：

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两位俄国医生应该与您一起来。我们同意留一部无线电台在哈尔滨。有关其他问题我们面谈。

斯大林

1948年4月29日

АПРФ, ф.38, оп.1, д.31, л.32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 (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义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3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

(1948年5月10日)

1.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立场应该是稳重的，而且与中国政府及其机构的关系是严格限定在政府方面的。大使、大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政府及外交部的代表们的交往不应该越出官方的范畴。

2.为了使有关维护苏联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大使应与政府集团中的进步活动家保持关系，这不排除有可能通过他们对与他们有来往的政府官员中的领导人物施加影响。

3.遇到一些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派情绪的活动家找大使求助，而一些政府方面的人士，要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中立等问题，也来找大使。这时大使限定只能这样回答——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根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来确定的。

4.大使应该坚定地捍卫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面保持警惕性。

(1)在政治方面：

个别人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和攻击要及时给予反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

(2)在经济方面：

通过政府机构，包括在某些场合亲自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按1945年与苏联签订的商务协定负起责任。

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1924年的合同捍卫俄罗斯宗教使团在中国的资产，同时要维护居住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法律权益和私人资产。

5.在对日合约的问题上，大使应当在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中都要反复强调，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是十分

必要的。

6.考虑到一些民主的和进步的组织目前处于不合法地位，在与这些民主和进步人士会见时，要非常谨慎小心。在与这些人士会谈中，要以谨慎的形式来表露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在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

7.要注意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要注意按以下几个问题把资料 and 事实揭露出来：

(1)在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美国人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其中。

(2)美国资本往中国渗透的形式和数额。

(3)在中国的反苏军事基地。

(4)以损害苏联在中国和在远东利益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组织合作(合作的实质、形式和方法)，同时还组织敌视苏联的组织活动，及其他措施。

同时，大使还应关注美国的政策和中、美、英之间存在的矛盾。

9. [75] 更广泛地运用中苏文化协会、中俄文报刊、杂志、国际书店代表处、“全苏影片出口联合公司”及其他组织，以便对苏联的生活和政策在中国适当地进行报道。

10.停办白俄在上海和天津的报社。

11.认真和系统地研究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中国的军事、经济情况和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些问题要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12.不要回避与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们交往，要与他们保持政府方面的有礼貌的关系。有关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我们不与他们争论，不必对他们开诚布公。在所有场合都声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4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机密

今年5月27日，在印度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印度大使帕尼卡尔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谈话。

在会谈中，帕尼卡尔大使感谢我们新闻社给他寄来英文版的新闻简报。据他说，他一直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份报纸。利用这个机会，我问大使，苏、美两国的国务活动家就苏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此有什么看法。大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他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美国对这个问题会始终不渝。美国目前感到失魂落魄地恐怖，可能，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到苏联的真正强大，还不如说是感到来自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威胁。帕尼卡尔接着说，尽管害怕别的思想的人的行动有多可笑，尽管由于别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产生恐怖是多么愚蠢，但对于现代的美国掌权集团来说，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问，他对中国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什么印象。帕尼卡尔说，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听到美苏谈判这一消息时，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的活动家们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帕尼卡尔强调说，以他的观点看，美苏调整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国民党希望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便取得美国人帮助的计划落空了。国民党要继续进行反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中国报纸上说，中国对调整美苏关系很感兴趣，并准备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等各种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口是心非。在这些虚情假意后面隐藏着他们暗中的打算和计划。

随后，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帕尼卡尔问我，对李宗仁集团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在中外报刊上发表的政治纲领具有民主性质。尽管如此，对这帮人很难评论，至今谁都没有掌握有关李宗仁及其组织的实际力量及其能力的可靠信息。

接着我问帕尼卡尔，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有什么评价，帕尼卡尔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可以和我一起交换自己在这方面的观感。不久之前，他和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教授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刊物上发表了民主纲领宣言的教授们，座谈了一次。与这些教授的座谈中，帕尼卡尔接着说，他得以搞清楚：这个思想本身，将这个思想付诸行动，组织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干的。尽管蒋介石的内政方针是指靠美国的，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往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司徒大使对蒋介石的影响还未能达到美国人想要的程度。就是说，蒋介石还没有全面地、无保留地执行美国在中国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和人士来协助，包括李宗仁借美国的积极支持当选为中国的副总统——这已不是秘密，美国在中国的代表还对自由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运动表示了同样的支持。并非只有这些南京的教授们发表宣言，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同样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行动。另一方面，帕尼卡尔补充道，美国人努力把中国极端主义分子的首领陈立夫赶到美国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

这时谈话被打断。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25-27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机密

6月4日我拜访了司徒雷登。在礼节性寒暄之后，我们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我表示对司徒雷登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回答说，最近几个月来总的局势，特别是军事形势，明显地恶化了，并在继续恶化，而且不可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会改变。关于改组政府，司徒雷登声称，在新政府里很少有新人，所做的更改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新总理翁文灏，毫无疑问，是一个诚实、有才华的活动家，是个绝对聪明和出色的学者。他担当起自己这样一个艰巨的职务是因为早就对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可能期待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会创造奇迹，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扮演一个命令执行着的角色。在中国，实际上还是保持着那个决定一切政策的人的个人专政。

当我说，我对那个新的行政院副院长不熟悉时，司徒雷登说，顾孟余是个优秀的活动家、有名的学者，战前他曾在许多部任过职。后来，因与国民党领导人有摩擦而离开政坛。因此，司徒雷登说，很高兴又看到这个人在政府里工作。我说，看来，现在他们把副总统李宗仁搁在了次要地位。

对这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不满意是人所共知的。按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正好说明了李宗仁在那时是很有力量和积极的人物，而蒋介石身边需要的是消极被动且听话的人。众所周知，没有给副总统委派任何职权。因此，他只能等待时机，看什么时候这总统的位置能空出来。

如果蒋介石有点瞧不起李宗仁和其他人，那他这样做，按司徒雷登

的看法，不是出于亚洲人所固有的那种对有潜力的人的敌视，而是依据对自己坚定的信念——只有他(蒋介石)一个人才能承担起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他的责任就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碍他的使命取得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消除那些违背他的意志的人。司徒雷登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就是他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按司徒雷登说法，蒋介石往往对现实失去感觉，而开始相信他自己的一套计划，以为真的能在4个月内取得胜利，而不了解在国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必要性。司徒雷登已多次对蒋介石说过，不管美国给中国政府多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不可能使他打垮共产党，因为要取得胜利，政府必须进行深刻的、能使整个生活全面更新的改革。蒋介石总是同意司徒雷登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什么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是否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知道事实，至少表面上知道事实真相，但不知道引起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因为其下属把不可能隐瞒的事告诉了他，但避而不谈事情的真正起因。这样一来，蒋介石周围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大祸害。

后来，我问司徒雷登，他到台湾和南方之行后印象如何。提到这些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之后，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虽然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成绩还不太大，因为到处都能感觉到工作组织得不好。宋子文在中国南部做了很多事，宋子文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依靠广东人，而不是中央派去的人。司徒雷登回答我另一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南方的收成一定会很好。

会谈快结束时，我对司徒雷登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说，依他个人的见解，过分的担心和猜疑是主要的祸害。这妨碍了克服出现的各种困难，他(司徒雷登)知道，美国人民不想打仗，看来，苏联也同样不想打仗。因此，必须要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我指出了美国报刊和个别新战争贩子的挑衅性宣传，我说，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苏联人民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为和平而努力，以完成战后建设的任务。司徒雷登说，他个人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报刊的立场是错误的，而某些人的发言中包含有荒谬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双边关系的总的气氛所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已形成的僵局中找出一条路来。他指出，苏联政府为改善苏美关系和解决最重大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时我问司徒雷登，依他所见，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苏美关系。司徒雷登回答说，看来，B.M.莫洛托夫或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应该向马歇尔提出个人的真诚建议，讨论改善相互关系的途径。司徒雷登解释自己的观点说，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而杜鲁门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司徒雷登)完全相信，马歇尔是千方百计想和苏联达成协议的，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可能的话。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K.A.克鲁季科夫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签名)

分送3份：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AB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39-42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 事(1948年6月21日)

机密

1948年6月21日

第一远东司

第689/1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A.H.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拨给他们16万苏联卢布，以便东北的青年工人代表团能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中国人想在奥特波尔车站拿到这笔钱。

苏联外交部请求对外贸易部能允许把上述这笔款子划入苏联与东北之间易货贸易费用支出账上。

苏联对外贸易部对这样的结算方式没有异议。

请审核提供建议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方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

文件共3份，送：给应给的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问题已与米古诺夫(苏联外贸部)和契楚林(国家银行)达成协议。

Г.通金

附件一：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号

1948年6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对外贸易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订立的合同，将16万苏联卢布划入供货账上，发给东北要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团。

附件二：

第一远东司

1948年6月26日

第706/1ДВ号

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

斯达汉诺夫中将：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能让东北青年代表团不受阻拦地越过苏联国境，随团带的有官方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奖章、摄影展览、中国地图、书籍、600面小旗、标题为《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的黏土模型，还有几盒药品(药箱)。东北青年代表团在今年7月底从哈尔滨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苏联外交部支持东北民主政府的请求。请你(斯达汉诺夫中将)向边防战士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C.戈伦斯基 [76]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7月2日)

机密

B.M.莫洛托夫同志：

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第375—144c号决议，建议苏军指挥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0天期限内，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协商出一份有关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兑换的具体条件、新货币的样本、新货币的制造和订货等事宜的提案。

是年6月9日，比留佐夫同志发来第548/ΠЭО号电报，通过与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韩光商谈，达成协议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

决定的草案规定：

1.以关东银行的名义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新货币。

2.把流通中的货币以1：1的比值兑换成新货币。

3.给在本地区内长期居住的居民，各个国家和社会组织，以及在本地区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企业兑换货币。

4.停止已破损旧货币的流通，不得把旧货币兑换成新货币，销毁全部收回的货币。

比留佐夫同志同意地区管理局的方案，并支持他们关于向苏联财政部提出制造数额为100亿元的新货币的请求。在这笔款项中，通过兑换旧货币将65亿元投放流通，而35亿元留置作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准备金。

比留佐夫同志提出的一套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兑换的条件，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因为按1：1的比值来兑换流通中的钱，不可能改善地区内货币流通的状况，实质上仅是把旧货币换成新货币的技术上的更换而已。

依据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第373—142c决定，货币改革除了采取一些一般性改善在协议区的经济情况的措施外，其目标应该是健全地区内的财经状况，稳定新货币，同时要稳定物价，进一步降低物价。我考虑到，按1948年5月收到的样版制造的新币要在10月份才能制成。我认为，建议比留佐夫同志在1个月的期限内，按以上指定目标把修订好的关东地区管理局在合同所在地区进行货币改革决定的方案呈交给政府，是比较适宜的。

在地区管理局的货币改革方案中，应该考虑到元的贬值和区的经济在支付资金上的需求，来确定新货币以什么比值来兑换目前正在流通的旧货币。

除此之外，向居民、企业和机构兑换新货币的数额，宜限定相应的数量。其中对居民应按照其所在的团体而对企业和机构应按他们开展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为限额。

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应拟订一些措施来整顿一下关东地区管理局的税收体系和财政工作。

同时，我认为检查一下进行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工作是适宜的。为此，委托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的期限内把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3—142c号《关于1948年辽东半岛协议区经济问题》决定的过程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

A.柯西金

手写批注：

通金同志、A.斯米尔诺夫同志，请给予建议。

B.莫洛托夫

7月2日

ABПP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0-21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
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1.从实质上说，对A.柯西金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的方法和条件没有异议。

我们认为，应该给比留佐夫同志发指令，让他根据苏联财政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提出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新建议，没有必要颁布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新决定。附上给比留佐夫同志的草案。 [77]

2.整顿在协议区的货币流通与完成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第373—142c号决议中规定的经济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鉴于此，应当在对有关推行货币改革的程序和条件的建议予以讨论之前，掌握这一决议执行情况的材料。

既然对完成上述所指决定进行监督的工作落在赫鲁廖夫肩上，A.柯西金同志建议，要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内向苏联部长会议呈送有关完成这一决定过程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个问题发布的命令草案。 [78]

A.斯米尔诺夫(签名)

Г.通金(签名)

АВР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9, л.23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 [79] 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Эршилибу)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2224米，从东到西宽368米，起飞跑道长2000米，宽96米。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6—7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15—20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Жунчэн)、俚岛(Лидао)或石岛(Шидао)，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由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15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1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2—3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25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15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15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8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20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3000多公

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2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48年7月4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5-36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

斯大林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7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兹报告：

7月14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7月14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8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也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

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9-40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1

№11415 马列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年7月30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公民：

死者身后遗留财产的继承权，世界各国都有。苏联也不例外。苏联宪法(第十条)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且以此为根据，苏联民法中有一个特别部分讨论了继承法问题。

1945年正式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14日的命令，加强并扩大了继承权。

在苏联，可以依照法律和遗嘱实行继承。

依法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苏联公民死后，首先有权继承的是子女(其中包括收养的子女)、配偶、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其无劳动能力并由死者在最后一年抚养的人员。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优先于其他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应由前者平均分配。

第二顺序继承者是死者的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最后，如果在活着的继承者中没有上述两类继承者或者上述两类继承者不接受遗产，那么第三顺序继承者应是兄弟姐妹。

在苏联，依法享有继承者的人员就是这些。

不在遗产所在地的继承者可以亲自去接收遗产或通过代理人接收遗产。

依照遗嘱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任何当遗嘱没有改变继承的情况下都实行依法继承。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或部分遗产留给拥有依法继承权的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

但是，立遗嘱人不得剥夺自己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无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们应得的那份遗产。

当没有依法继承人时，可向任何人就遗产问题立下遗嘱。

遗嘱应由立遗嘱人签字并报送公证机关以便做出公证。

当遗产无人继承并需要管理时，公证机关可指定负责人照管上述遗产。

在继承人不出席以及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遗产被认为无人继承并交给苏联政府支配。

苏联有关继承权的法律就简述这些。

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适用于全体苏联人民，无论他们的所在地如何，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住在苏联境内还是住在国外。

根据现有的国际协议，无继承人时，根据惯例和实践，国家一向在继承权问题上使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今年8月5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关于使用外国法律的条例”。完全执行这一原则。

甚至与苏联敌对的伪满洲国政府也执行这一制度。

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要实现其在境外发现的财产继承权，由直属外交部的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和相关的苏联领事馆承办。

律师协会委托当地的律师在领事馆的监督下直接办理。

领事馆采取措施，保护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为此对有关的组织或某些公民予以授权。

必要时，领事馆发给某些公民办理事务和出庭发言的全权证书。

领事馆有权接收那些通过法定程序被公认为属于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的财产，以便将其送往苏联，转交受益人。

如果法定继承人没有去接收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那么这份遗产就应转交给领事馆处理，以便在找到继承人之前照管好这份遗产。

哈尔滨特别市的法庭在审理苏联公民的继承权案件中，最近越来越不按上述规定办事，不定期地拖延审理这些案件，同时在一些实质非常明显的问题上设置令人费解的障碍。

我认为，从当地民主法院对我们的态度上看，这一切纯属误解，因此请允许我向您表明自己的愿望：

一、必须恢复早先存在的制度，在办理继承权案件中应运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二、对继承人是苏联公民而被法院拖延办理的继承案，应使用上述原则迅速解决；

三、必须允许律师，或者一般苏联公民，作为在苏联境内的继承人代表参加审理这些案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出具对律师授权的证明；

四、在继承人未去接收已故苏联公民的遗产之前，必须将这些遗产转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照管。

向您致以热诚的敬意！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1948年7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1—1274页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致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朱其文：

根据我们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就保护在满洲的苏联公民继承权以及当地律师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戈兰斯基和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涅格列维奇今后在这一工作中继续使用由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授予的全权这一问题的谈话精神，我请您，市长公民，将上述人士作为该委员会的代理人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提供有权不受阻碍地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在当地中国民主法院办理一切案件的相关文件。

我方可以证明，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很熟悉戈兰斯基和涅格列维奇，他们每个人都代表该委员会工作了13—14年。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5页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通过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请求拨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16万卢布，以后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销账。与此同时，又报告说代表团随身带有5500美元。

代表团团长蒋南翔到了莫斯科后，请求苏联国家银行把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用以支付代表团应付的款项。同时他表明，代表团所需要的兹罗提一个也没有，而代表团带的美元要用作交纳给世界青年联合会的会费。

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发来的第10225pc号命令中规定，拨给代表团16万卢布，但关于把这笔款子，或者其中一部分兑换成兹罗提，或把它汇到华沙，却只字未提。因为民主政权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我们认为可能代表团现有的5500美元是预定用作在华沙的开销费用的。

我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在哈尔滨的民主政权会用提供货物来抵偿。我认为可以接受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要求，将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可以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得到的苏联卢布来清偿这笔汇款。

请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这一草案是我与契楚林(国家银行)及米古诺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共同协商过的。

B.佐林

手写批注：

致B.佐林同志：不反对，要送到部长会议去。

B.M.莫洛托夫

1948年8月7日

已经寄给佐林同志(连附件)第4829M号。

决定：给斯克沃尔佐夫，要关注部长会议的决定。

8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号

1948年8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5, л.6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 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拨划16万卢布，此款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抵偿(今年7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由于没有外币，团长请求以上述16万卢布抵偿，兑换成150万波兰兹罗提汇往华沙。

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由哈尔滨民主政府以供应货物来清偿，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允许苏联国家银行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承办把数额150万的兹罗提汇至华沙，然后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获得的卢布来抵偿汇款。

苏联外贸部米古诺夫和苏联国家银行契楚林对此无异议。

这问题已与B.M.莫洛托夫同志商定过。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B.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号

1948年8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5, л.9 10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机密

B.A.佐林同志：

对苏联邮电部呈报的关于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书没有异议。但是条约—法律司认为协定的我方，应该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为妥。苏联与中国官方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以邮电部的名义签订不合适。

附上给И.Д.普苏尔采夫同志的信稿。 [80]

C.戈伦斯基

手写批注：

同意。

B.佐林

1948年9月10日

把信寄出。

1948年9月1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72, л.19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号)，派И.В.科瓦廖夫 [81] 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该命令草案是И.В.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已于今年5月13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已于5月15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领导小组组长

Х.М.科马罗夫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9, л.1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机密

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

对您呈报的关于在苏联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草案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外交部认为应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协议为妥。

佐林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72, л.20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为证实我今年9月10日的电报(№300)，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上文所提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从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收)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了4200万人口。敌占区被迫缩小，敌人现仅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负隅顽抗，已被我军分割包围。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到毁坏的铁路路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到毁坏的程度以及进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遭毁坏的重要线路总长1800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500吨道钉、1000吨电话线、3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需2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

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实施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加强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 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 7.纺织专家5人；
- 8.采金专家4人；
- 9.水泥专家4人；
- 10.造纸专家4人；
-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 12.财政专家4人；
- 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9月8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6-11

АПРФ, ф.3, оп.65, д.444, л.3-11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 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利宁同志来自哈尔滨的报告(1948年8月25日电报第28661号)，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过境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以(东北)元来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东北，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年共达500万卢布左右。

卢布/元的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年8月这一汇率是：1246元/1卢布)。

M.缅希科夫 [82]

第2-5/27848号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1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 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机密

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A.Д.帕诺夫同志：

由于要拟订东北1949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东北民主政权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请求援助。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资料。

请通知苏联外交部是否可以把东北民主政权感兴趣的材料寄给他们。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

AB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10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同志：

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转账到莫斯科9.5万卢布给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代表刘宁一和一群从中国来莫斯科学习的孩子。

根据苏联外交部在赤塔的外交代表叶廖明的通知，中国孩子已经到了赤塔，但是他们到莫斯科还缺1.2万卢布。

请求转账到赤塔外交代表叶廖明名下，以便将这些钱转交给所提到那群孩子们。

请告知随后的有关情况。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1948年9月20日

AB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5, л.11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用于支付在苏联学习的儿童的费用以及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提供给他们款项。

缅希科夫同志建议满足中国人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并同意以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

我认为，对东北民主政权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应该予以满足。但是，对于缅希科夫同志关于让中国人用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的建议，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通报资料(契楚林同志)，按照政府批准的外汇计划，1948年东北元的进项将超出我们在东北的开支。100万卢布兑换成我们并不缺乏的东北币，对于我们并不合算。

根据以上所述，我建议提供给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并以提供货物的方式清偿这一数额，同时补充条件是：我们有权要求，按照苏联国家银行在我们收取款项时的外汇比价，收取上述指明的我们所要求的东北元数额。

Г.通金

1948年9月23日

手写批注：

莫洛托夫同志已阅。

АВІ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2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83\]](#) **(1948年9月28日)**

9.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1948年9月28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2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B.A.佐林同志：

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今年9月30日电报通知说，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提出，请求将属于中长铁路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处在已解放的南段(石河—辽阳)的车厢和蒸汽机车接去进行修复，并拨出20节质量上乘的客车车厢给客运列车，同时为恢复在东北铁路南段的供水系统，修复大连生产的作为备用的10部全套供水联合机组，并转交给他们作为中长铁路资产。

对已解放的东北铁路南段的技术帮助，完全可能对中长铁路大连段现在的工作不造成损失，并且也是保证即将在瓦房店和烟台煤矿区进行共同采煤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6月21日的第9868pc号命令，现在正进行与民主政权的谈判。20节客车车厢和修理货运车皮和机车的转交条件和运营和修理费用的支付方法，将由中长铁路大连段领导与辽阳铁路局领导之间相应的协定决定。

请您根据这一问题的实质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对中国人类似的请求，苏联外交部在今年春天曾给予否定的答复。1948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出指令，委托中长铁路局领导人与东北民主政权谈判并签订“共同恢复和经营抚顺和杨台(Яньтай)煤矿的协议”。协议是中长铁路管理局与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业部之间签订的。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1948年10月4日

А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67, л.11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
(1948年10月6日)**

斯大林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少于100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如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月5日，9人小组在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多数量的专家小组，目前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一、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三、由我们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委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保持联系。

四、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他商量。

请批示。

B.莫洛托夫

手写批注：

副本送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444, л.1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2-5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
(1948年10月16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为了在东北发展纺织工业，以满足我们军队和居民的需求，请求您允许在1949年运送2万吨棉花到东北来。否则，我们这里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因此，恳请您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一要求，这将给我们很大帮助。致共产主义敬礼

高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第一远东司

第6353M号

手写批注：

决定：有理由完全满足这一申请。

决定：费德林，请打电话给对外贸易部，米高扬查询前几年供应棉花的情况，看来，有可能提出一个在1.3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供应的问题（最初方案）。

М.Я.马立克

12月7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11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 (1948年10月17日)

联共(布)中央

Л.А.洛吉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

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列宁同志以密码电报第30433号于今年9月10日传来。

对林彪信的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第20696号)发往哈尔滨。

附件一，林彪信的中文原文； [\[84\]](#)

附件二，林彪信的俄文译文。 [\[85\]](#)

部长高级助理

波采罗布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列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1948年9月28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会很高兴于11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3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

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4 45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6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机密

1.批准苏联财政部划拨给北满中国民主机构100万卢布，用于在苏联的中国儿童学习费用和给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

这笔款项的50%用东北元来销账，另50%用粮食商品来抵偿。

苏联货币按外贸部的申请单，将1948年度收支平衡表上未动用的预支拨款来拨给。

2.批准国家银行为在哈尔滨的苏联机构接受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缴纳的东北元，按国家银行确定的汇率结算出50万卢布相抵的数额，与之结清。

3.责成外贸部与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谈妥关于他们要以供应粮食商品来抵消剩下的50万卢布的账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1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部长A.H.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拨给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中国东北解放区代表团12万卢布。

早些时候中国人曾经提出过请求给他们在苏联国家银行开一个100万卢布活期账户的问题。这个问题苏联部长会议正在解决中。

苏联外交部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指示，给上述的那个代表团拨12万卢布的同时，让他们在解决给东北民主政权提供100万卢布问题之后，把这笔款项清偿。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急件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5, л.15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 情况(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B.M.莫洛托夫同志：

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期间，日本人投资建造了各种企业、住房和办公楼。

日本人撤退之后，遗留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不动产至今未完全清理好。同时，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已被当地的权力机构或一些个人占有了，或者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他们侵占关东地区期间抢占了相当数量的属于常住在这一地区的苏联公民的企业、楼房和建筑物。这样就使他们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至今尚未清算。

由于必须准备好在对日和谈会议上讨论战时赔款问题所需要的资料，我们认为恰当的做法是：

1.着手清点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所有日本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和办公楼及其他建筑物)，不管是谁占有了这些资产。

2.查明并着手登记居住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苏联公民因其资产被日本人侵占而遭受的损失，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

3.查明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期间被日本人掠夺而至今尚未归还的苏联公民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及其他建筑物)，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这些资产归还其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委托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民政局，会同外交部

在当地的领事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1)把在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所有日本不动产编写成册，吸引当地的苏联公民参加这项工作，在名册中应对不动产、财产有详细说明，表明其状况和价值，说明以前它们是属于谁的资产，而在登记时又为谁占有。编制该名册时不要中国人参加。

(2)查明苏联公民被日本人掠夺去的资产，并把他们的损失、亏损及索赔款项一一登记入册。

(3)查明所有未归还的资产(企业、楼房及其他建筑物)，并采取措施把它们归还给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在1949年5月1日之前做好上述工作。

恳请您能同意。

大将A.赫鲁廖夫 [86]

手写批注：

交佐林同志审核。

莫洛托夫

11月8日

已发送佐林同志。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94, д.99, л.1 2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海运部部长H.B.诺维科夫同志副本送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A.B.赫鲁廖夫同志：

根据滨海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同志的通知，关东地区管理局奉东北民主政权的命令，给旅顺港的苏军指挥部去信，恳求：

1.利用苏联远东航运局的运输工具帮助转运中国货物。在1948年第四季度要把5万吨货物从拉辛港运到大连港，并把4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2.促成与苏联航运局签订一份合同，在1949年度把37万吨中国货物从拉辛港转运到大连港，再把29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3.组建大连苏中轮船公司，沿着大连到拉辛的航线转运货物，为此目的中方可以交出2艘排水量为2000吨和6000吨的轮船和货运量为2000吨的几条小船(共计1万吨货运量)，同时希望苏方也能拨出总排水量不少于1万吨的船只。

4.卖给民主政权10艘快艇(航速每小时不少于20海里)。每条船的货运量从100到200吨。

考虑到辽东半岛、北满和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同时大连和北朝鲜之间的货运量也在扩大。比留佐夫同志建议：

1.按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规定，把1艘货运量为6000吨的转交给专营在北朝鲜港与大连港之间转运朝鲜与中国货物业务的苏朝“海运”股份公司，因为“海运”公司现在所掌控的载重量(吨位)已不能保证完成在1949年的转运业务。

2.建议远东航运局协助关东地区管理局完成把货物往返于拉辛港和大连港之间的转运业务。要注意的是，在第四季度北方地区航运期会缩短。

3.为避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纠葛，我们反对把快艇卖给民主政权，也不组建远东苏中轮船公司。

请对东北民主政权和比留佐夫的请求提出您的建议。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第1、2份给收件人，第3份给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12-12об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 (1948年11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B.A.佐林同志：

为了给中国的长春铁路组织营运工作提供切实的援助，科瓦廖夫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和交通部请求派遣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长春铁路来出差一年，由局长茹拉夫廖夫来调遣使用。

交通部请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手写批注：

给通金，请回复，送给葛罗米柯同志。

B.A.佐林

11月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67, л.5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 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在组建铁道部队，组织恢复东北的道路交通和运送军队(这促进了国民党在东北军队的覆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林彪同志赠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每人一辆缴获的汽车。

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您同意我们对上述两位同志的奖励。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年11月17日

于哈尔滨市

АПРФ, ф.3, оп.65, д.144, л.18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绝密

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长春后的情况报告。

附件，共9页。

苏联驻长春总领馆副总领事

波格丹诺夫(签名)

兹报告：

1948年10月22日，苏联驻长春总领馆波格丹诺夫同志、总领馆秘书罗满宁同志、总领馆司机乌格留莫夫(当地的苏联公民)来到长春市。与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还有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译员萨茨同志、秋林公司分管干部的副董事长克赖涅夫同志(苏联外贸机构资产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由14位当地苏联公民组成，分别代表以下机构：商务代表处、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苏联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1948年10月中，在沈阳的蒋介石下达了给守卫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城市，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个命令是从飞机上掷下的。接到这个命令后，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召开了军事首长会议，研究执行命令的措施。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没有出席会议，他派了自己的参谋长去参加。他同时派出两位军官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提出如能得到投降的优惠条件，第六十军可以起义。人民解放军总部接受了曾泽生条件。

17日晨，第六十军举行了起义，让出了自己的防地，即把半个城市让给了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第六十军司令部也把这事告知了第七军，请他们一同起义，但郑洞国拒绝了。见到大势已去，第七军的大部分军队也在10月18日至19日暗地里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让出了自己的阵地。郑洞国和300—400名军官和军士在自己的司令部——原中央银行大楼内负隅顽抗。第七军的其余部队于10月19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就在同一天，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已陷入绝境。最初该军进行了抵抗，后来，到了20日晚间，他们提出将朝天开枪，让解放军将他们俘虏。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们投降一事登报，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要装作忠于蒋介石的样子。

10月20日清晨6时，郑洞国一部死伤30—50人后投降了。这样，即20日，整个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在整个这场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十军被俘3万人，第七军被俘2.45万人。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第七军原有2.75万人，近3000名士兵和军官在城里逃散了。第六十军连同全体军官一起编入人民解放军。应该说，这是临时性措施，考虑到沈阳也有相似情况，这一措施具有宣传性质。以后，预计会对军官进行清洗。部分国民党的部队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投降。据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公告，有近万人(主要是宪兵、警察、秘密特务等)逃散了，看来还留在城市里。10月21、22、23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继续捉拿国民党的军官和其他骨干分子，其中包括长春市市长等人均已被捕获。某些机构和人员企图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首长进行恐怖袭击。例如，市警察局局长的别墅受到扫射，有1名警卫受伤。警察局长的1名司机被打死，汽车被偷走。

这些以及其他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解放军在夺取城市的时候组织不力，也就是对一些房屋和其他设施进行的检查和搜寻工作不够，因此一些重要的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人经常继续在这些房子内居住。对可疑人物和证件疏于检查。所幸各区域已严格戒严，这在以前几乎没有做过。现在情况已有根本改变，市内已相对平静，尽管禁止晚上5点以后在市内走动。

起初，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整个城市几乎空无一人，留下来的居民不敢进城。

市中心未受重大破坏。郊区某些地方有些损失。宽城子要塞和铁路沿线居住点几乎全被毁坏。全市的照明、水和供暖都停止了，因为这些

设施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很多建筑被完全毁坏。部分机关、住房也遭破坏，长春铁路枢纽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自11月1日铁路各站间的交通恢复之后，长春—吉林的旅客列车已正常行驶。预计，在11月24—25日将恢复长春至哈尔滨的直通列车。

市领导机构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管辖。邹大鹏(ЧжоуЛипэн)被任命为市长。10月22日同我们一起到达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程子华、长春市委书记朱光等人。稍后还将有其他干部到达。

1948年11月1日前，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领导机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均由军事委员会发布。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命令，通告居民不要破坏建筑、工业企业和装备，它们应被尽快投入使用。

全体工人和职员应往市管理局登记，并尽快上班。城市已转到民主政府手中的消息，已用命令向居民通告。第2号命令是关于国民党飞机袭击城市、组织防空的情况。随后的命令涉及建立城市秩序等其他措施。军事委员会和市政府已掌握了足够的食品(4800吨)，主要是大米、食盐、玉米粉等。起初，对饥饿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由于当局的有力工作，10月24—27日市区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照明，实际上首先是机关的照明。10月底，某些地区已恢复供水，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国民党把相当部分的供水系统破坏了。城市的供暖，尤其是机关的供暖，几乎都被破坏，起初是缺煤，后来是因为缺水，供暖系统被损坏，缺乏维修骨干。10月30日，市内8公里长的新的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市内的邮局、电报已启用，国际、国内电话已开通。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不过，中国当局还向秋林公司的代表提出了运进和供应面粉、食盐、灯泡、服饰用品等日用必需品的请求。近期，秋林公司将在这里开设分部。由于废止国民党的货币和发行人民币的原因，市内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商人和小商贩不了解哈尔滨的价格，不敢贸然抛售商品，以防吃亏。起初，商品和食品的价格都乱开，而且所有价格都比哈尔滨的市价高2倍。特别贵重的商品和黄金没有市价，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市价。

市场上各种日用必需品几乎都有。旧货市场特别热闹，原国民党的

士兵和军官在那里出售服装，主要是美国货(连衫裤、制服上衣、皮鞋、睡袋等)。

当局对私人贸易评价较高，它活跃了市场，补充了粮食供应。随着客运的开通，贸易有望进一步活跃。

现在市内有大量难民，主要是在封锁期间逃往附近农村的长春市居民。当局在埋葬居民和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封锁和挨饿的日子里，无助和饥饿的居民被国民党军队赶出市内。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了避免疾病流行和防止特务潜入，也没让这些居民回到住地。这样，在城市附近形成了所谓“死亡地带”。据中方领导人称，在这一地带有近10万具死尸，其中包括病故和被枪杀的。为了防止瘟疫的流传，迄今已掩埋了2万多具尸体。国民党也曾掩埋了近3.5万具尸体。

通过传单和《长春新报》等，市内居民对中共的政策和前方的胜利都颇有了解。11月1日以前，市内的驻军将完全调出。军事委员会也将停止工作，城市的政权都移交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市政府，因为长春市是“特别市”。

在检查总领馆馆址(以前是关东军司令官的别墅)时发现，所有地下室和部分副楼堆满了炮弹和其他弹药。按中方军官所说，要运走这些弹药，需要上百辆汽车。据中方人员称，总领馆大楼显然已经被装置了炸弹。大楼里一片狼藉，所有房间都塞满了杂物、武器、文件、装备、砂土等。不少房间的玻璃都被打碎，门窗受到破坏。有些地方用固定的隔墙或临时的隔板作了改造。修复大楼的具体预算另报。大楼的外表依旧。总领馆的院子很大，堆满了杂物，尽管有些地方遭到破坏，但总体上说依然完整。总领馆内部的建筑(值班亭和两个警卫室)全被破坏，车库已被改建，需要重新修建。总领馆内没有住房，仅有总领事的1套住宅。在1945—1946年间，在距总领馆主楼100—200公尺的地方，为总领馆的其他官员修建了住房。这些住房全部被毁坏，只剩下残壁和管道。仅有1幢有两套住房的别墅多少还算完整，但也需彻底检修。

10月24日，在检查了总领馆馆址后，我们会见了市长。经过谈判后，市长给总领馆派来了警卫，还答应近期将运走馆内的所有弹药。同时，我们向市长提出请求，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临时场所，我们提出要

1945—1946年间中长铁路副董事长卡尔金同志曾居住过的那幢别墅。据了解，这幢别墅已拨给中国恢复工作管理局使用，管理局当天就已根据命令进驻。由于市内局势不稳，当局在门口派了武装警卫。

除了总领馆的几幢大楼外，我们还视察了原沙皇时期的领馆大楼和馆址，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别墅和原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沙皇时期的原领事馆馆址内共有13幢建筑。沙皇时期的原领馆是1座两层楼的建筑，在国民党占领时期和现在均为医院。靠近领馆另有6幢楼，其中4幢大一些的是兵营，2幢小楼是辅助设施(这里曾进驻军队和作为领馆工作人员的住所)。这些建筑约有50%被保存了下来。

在这个区域内，日本人建造了7幢军营式的平房。这些房子现在只剩下残壁。这个区域坐落在远离城区的中国人居住区内(岗东路和镇虎屯街角)，因此，我们和苏联的其他机构对此都不会有兴趣。所以，我们认为，待我们的所有权确定后(这是无疑的和无可争辩的)，要使这些建筑免遭破坏，必须把他们租给中国当局。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现为市卫戍司令部占用。原张景惠别墅现为部队占据。建筑物已很破旧，但整修后仍可使用。

尽管中国当局承诺要把总领馆内的弹药加以清理，并检查是否埋有地雷，但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怕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缺乏富有经验的扫雷人员。

据估计，要恢复领馆所属的大楼的正常工作，需要花费大笔钱——约50万外汇卢布。此外，总领馆的地区，虽从位置来看十分方便，但范围太大，需要大量警卫力量，至少要有3—4个24小时的岗哨。

我们现在占用的中长铁路别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里面还有些家具，照明和其他设施都正常。在这个建筑内完全可以满足办公和居住的需要。这幢别墅离市中心不远。

苏联在长春的贸易机构现在打算开设1间不大的秋林公司的商店，3家电影院和1所远东银行的分支机构。在长春的中长铁路沿线将设立5个营业区。

长春有个苏联侨民协会，与20位当地的苏联侨民有联系，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我们来后，给他们提供了粮食、燃料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安排到苏联机构(中长铁路、秋林公司)去工作。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利克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订瓦房店和杨台(Яньтай)的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第9868pc号)同东北民主政权进行谈判。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段主任和辽阳铁路主任协商确定。

我认为，可以满足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В.佐林(签名)

1948年11月8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9, л.2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通金同志：

来信谈谈中国长春铁路中苏股份公司挑选干部和把干部班子配齐的事。

经过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中国人民民主联军把国民党的军队从东北赶了出去。中国长春铁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不久火车就能通行无阻地从哈尔滨直达大连。在长春铁路沿线，那些以前被国民党盘踞的区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没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到把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也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监管保护好，也无法确定由于战乱给中长铁路造成的物质损失。

中国的人民民主联军毫无疑问会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铁路区段，并使用中长铁路的资产，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遵循保障苏联利益的途径来进行。

在中长铁路的主管以及少量的苏联铁路工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民主联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中长铁路的北段，他们使用这段铁路两年的经验使得双方应有的相互理解得以确立，并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关于民主政权根据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上使用中长铁路财产的问题。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基本上保住了，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铁路运营正常。

中长铁路在南部区段的资产比在北部区段的要重要好几倍，因为在这一区域内铁路的交叉点很多，如长春、沈阳、四平街、大石桥、苏家屯等。集中了比较大型和有价值的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管理机构和各区的楼房、医院、大专院校、煤矿井等。

这种情况暂时要求苏方根据中长路北段现行的原则和相互理解的经验，保证对中长铁路南段资产的监管，以防它们被盗窃、破坏或者瓜分。

为了保证这个任务，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派不少于500个有各种专长的苏联铁路员工来中长铁路主管手下工作，这些人同时还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就像在东北北部地区那样。

派遣苏联铁路员工到中长铁路南区段来，将由他们领导的主要企业、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等组成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除了保证保障好这些资产不被损坏、偷盗之外，还保证了苏方的指挥站点，以后中长铁路产业的管理权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并防止苏方的资产份额蒙受巨大亏损。

恳请您将以上提出的问题向外交部的领导报告，以便给交通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发出必要的指示。

中将卡尔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67, л.3-4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11月中旬启程，在11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12月份动身，即12月中旬或12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1948年11月21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7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机密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

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询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件)。

考虑到已经向东北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去东北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A.葛罗米柯

1948年11月23日

文件送：波特鲁巴奇、葛罗米柯(附上附件)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给以答复，外交部不反对。

莫洛托夫

11月24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д.67, л.6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9, л.3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 (1948年11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3号

续第50016号密码电报

情况说明

上述(11月)23日电文的开头有如下内容：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1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年11月23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8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机密

苏联交通部副部长

Л.П.马利克维奇：

回复您今年11月6日发来的第4 2660c号信。

苏联外交部同意满足科瓦廖夫同志的请求，派出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中国长春铁路局出差一年，他们的工作由铁路局主管茹拉夫廖夫同志安排。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2, д.67, л.7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
(1948年11月25日)**

苏联外交部

莫洛托夫同志：

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东北后，南满的主要工业基地全部转入东北政治行政委员会的手中。

现在，东北的民主政府掌握了通化、抚顺、本溪湖和公主岭地区的黑色金属和煤矿的最大型基地。

根据现有的远非完整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通化地区的铁矿石蕴藏量有12亿吨。矿石的含铁量平均达35%—65%。这个铁矿石基地日本人未能全部开采。1944年，通化地区开采了45万吨铁矿石，差不多全部运往离通化350—500公里的鞍山和沈阳的冶炼厂去加工。

如果不算2个10—15吨的高炉和1个电炉(他们是用作生产实验和为了当地矿场的需要而开设的)，通化没有大型的冶炼厂和高炉。

特别要提到的是，离铁矿石产地4—5公里就有巨大的焦煤矿床，据日本人的资料，其蕴藏量达2.3亿吨。这就有可能在通化建设大型高炉的冶金工厂，可就地生产铁和钢。抚顺煤矿拥有5.5亿吨的蕴藏量，还有50亿吨的沥青。1944年，日本人开采了646.2万吨煤，占整个东北煤产量的25%。

日本人在抚顺煤矿附近建立了东北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把沥青加工成各种技术用油和汽油。1944年，联合企业生产了19.1万吨原料油、6万重油、2.3万吨石蜡、1.2万吨硫酸铵和3800吨汽油。

机械厂为煤矿生产了各种机器、装置、电气机车、客车车厢和运货车厢。

这一年，化工厂生产了2.34亿立方米蒙德煤气、1975吨杂酚、80吨氧、23吨氢、30吨焦炭和500万立方米的城市用气等。

火药厂生产了1700吨硝酸火药。

除了上述工厂外，还修建了铝厂、电灯泡厂和生产橡胶制品的工厂。

在本溪湖地区，铁矿石的蕴藏量达3.4亿吨，含铁量平均达32%。那里还蕴藏有1.9亿吨焦煤，铁矿石全部在本溪湖和沈阳的冶炼厂里加工。

公主岭铁矿矿床(在沈阳西北方200公里处)的蕴藏量近10亿吨。

除了上述铁矿和煤炭矿床外，在民主政府影响所及地区内还有鞍山、安东和沈阳等地的大型炼铁、炼钢厂、金属加工厂和机械制造厂。

由于在东北进行了3年的内战，相当数量的炼铁、煤炭和其他工业企业停止了生产，重要的装备和设施被国民党运往华北和华中地区，或者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和毁灭。

通化的铁矿和煤矿矿井大部分被水淹没，或遭到破坏，矿井机械设备几乎全都不能工作。

目前，虽然部分保存下来的矿井每昼夜可以开采300—400吨矿石，但开采铁矿的工作未恢复。现在，通化每昼夜采煤不超过400—500吨。通化地区的资料详见附件。

抚顺煤矿的全部地下矿井都遭水淹。其中30%—40%曾遭地下火灾害。露天矿场也被水淹近半。这里1948年每昼夜的采煤量曾达1500—2000吨。矿井里的机械设备都遭水淹，可移动设备(电子机车、翻斗车和小型货车厢)需要修理和恢复。

据所获资料，机械厂、铝厂、煤气厂和车厢厂以及加工机械保养用油的综合厂的设施和装备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国民党由于没有硫酸铵、硫铁矿、铸铁件和矾土等原料和物资，未能使这些工厂投产。

只有车厢制造厂、汽车修理厂为完成军事订货而曾经开工。此外，焦煤厂和炼油厂的几个机组曾定期开工。

国民党人曾使抚顺联合企业的发电站恢复投产，这厂现在仍在发电，完全可以满足生产用电的需求。

抚顺联合企业曾花了2年时间专门在图里窝(Тури́во)、新台窝(Синтайво)和罗锅袋(Рокодай)等地(在沈阳以南)的田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但都被国民党以军需为由而砍光。现在，煤矿企业将面临建矿和塔脚手架所用木材严重缺乏的困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7月，国民党的工业部曾将抚顺联合企业转给私营的煤炭工业公司生产(这家公司有美国人参与)。该公司便着手从被淹的矿井中抽水，而且已经开始采煤，每昼夜达2000吨。

1948年8月中旬，为了研究抚顺联合工厂赢利的可能性，派来了一个以名叫罗杰斯的美国人为首的委员会，还有381名曾在这个联合厂工作过的日本人。这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厂，似乎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想要使联合工厂开足马力，在1948年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意义，因为回收投资需要10—14年才行。

有关公主岭、本溪湖的铁矿和煤矿井，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以及它们遭到破坏程度的详细资料，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我们将会采取措施，获取这些资料，以后再补充上报。

除了拥有大量的铁矿、煤炭以及其他矿藏外，必须指出，东北，特别是在它的北部，还有丰富的黄金矿藏，估计可达3780吨。这些资料说明，在东北发展黄金工业的前景十分诱人。北满一带产量较高的地区有：

1. 呼伦贝尔以北，中长铁路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
2. 黑龙江省北部，阿里呼里—阿林(Альхури—Алинь)大片地区。
3. 松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穆棱河和松花江上游的绥芬河流域。

恢复东北的庞大工业和铁路需要大量的木材，北满有大量的木材资源，达37.16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有14.766亿立方米，阔叶林有22.424亿立方米。

虽然东北的木材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木材的采伐工业很薄弱。运往中长铁路各企业的大量建筑木材，目前完全用于修复铁路。1949年铁路对木材的需求量达145万立方米。仅仅中长铁路的木材需求都无法保证，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况且这些木材仅够用6—7年。因此，特别需要同中国人在汉西雄(Ханси—Хсюн)地区和牡丹江的木材企业进行合作。

由于北满的民主政府中没有大型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企业，所以南满工业的恢复问题对巩固东北的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不止一次地说，南满是东北的鲁尔 [87]。不恢复南满的经济，就无法使

整个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

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因为，第一，他们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其次，他们需要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并加紧准备在近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进步党派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亲美的派别，也将参加政府。这些亲美人士无疑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

据说，美、英把在沈阳的总领事馆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也不感到意外。这些领馆无疑将是推行上述工作的基地。

为了防止英、美在东北的扩张，为了巩固我们在这里的经济阵地，我们认为，应及时在这里同中方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向他们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

根据苏联同中国民主政权已经签署的关于合力修复瓦房店和抚顺煤矿并使之投产的协议的例子，我们深信双方都乐意共同建立这类企业。

从我方来说，我们的注意力似应首先集中在诸如通化地区的铁矿、煤矿，抚顺的煤炭联合企业，鞍山的冶金联合企业，以及黄金工业、森林工业等东北的这类关键经济项目上。

如果上述问题能引起重视，我们认为最好能尽快向东北派出我们的高级专家，包括经济、地质、冶金、机械制造、采煤、林业等专家，让他们就地详细了解我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情况，并为我方政府做出相应决定提供必要的资料。

附件，34页。 [88]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列宁(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秘书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2—935页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随函向您呈上高岗转交给我的：

1.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把汽车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同志作为礼物的原信(及俄文译文)。

2.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一组专家完成铁路恢复运营及组建了铁道部队事宜做出决议的副本。

3.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采取措施修复东北公路的决议副本。

第三条关于中国共产党人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信息，容我随后向您补充报告。

随文附录。 [89]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ВПРФ , ф.3 , оп.65 , д.606 , л.17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莫洛托夫同志：

在11月26日给您的电报(直接接收)中，科瓦廖夫同志(在此之前同专家小组在东北)请求来莫斯科几天。从电报中看出，科瓦廖夫同志已在赤

塔。所以，此问题应当立即解决。

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 诊断(1948年11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对向哈尔滨派去医生以帮助确诊林彪病情这一问题尽快做出决定。 [90]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古谢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1份收件人、2份档案室

АВПРФ, ф.3, оп.65, д.582, л.145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 作(1948年12月7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1946年11月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人张治中向我们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想让苏联和新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外贸部认为此建议可行，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贸易方面，中方建议苏方的贸易业务由苏联的商务代办来办理，而中方的业务由政府的商务机构和私营公司来操作。这些经营外贸业务的公司须由政府核准。贸易可以用易货的方式，或者用共同协定的货币

来进行。所买卖货物的清单双方应该预先商定好。除了要限定与我们进行贸易的公司的范围这一条件外，这一建议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1947年4月对外贸易部对恢复与新疆的经济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提案。但是既然外交部认为此时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合适的，外贸部就没有把提案呈交给政府。

在1947—1948年期间，在新疆的中国高级官员遇见我们的总领事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与我们恢复贸易这个问题。在遇到我们驻新疆的商务代办时，他们也如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今年1月，在新疆的中国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注意到商务代办的意见，即他认为现在就与新疆政府的商务机构开始做几宗易货贸易是不合适的，因而说出了这样的话：“看来苏方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不会很快回复的。”

今年11月1日南疆部队司令部政治参谋蔡汉新(ЦайХаньсин)告诉我们在喀什的总领事说：“新疆政府已经同意在这个地区组建3—5个与苏联和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商务机构。”

今年11月底，很多有名的商人到乌鲁木齐来向我们商务代办处提议要把羊毛、生丝、制革原料、毛皮卖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在此情况下他们还引证说，他们一定能拿到新疆省当局签发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贸易的许可证。

中方对与我们进行贸易如此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被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所以可以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做出让步，我们一定可以按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进行与他们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

虽然张治中现在在南京，但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新疆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可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全权外交代表刘泽荣先开始进行。此人在张治中在新疆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提出，要尽快答复中国政府对这问题提出的建议。

外贸部认为，不应该再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了，因为继续拖延未必对我们有利。

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新疆的地位，使我们和新疆居民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门在新疆阿勒泰和伊犁边境地区

进行稀有金属的开采合法化。

除此以外，在商品方面，现在我们在边境地区采购的商品，今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商品从新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换来5000—6000吨牛羊肉、约3000吨羊毛、约60万张小块皮革、40—50万根肠衣以及干果和其他一些的商品，同时在这些货物中，部分商品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

外贸部建议与中国人的谈判依照以下的原则进行：

在经济合作方面，同意中方提议的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要做到，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上有锡、钨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讲妥除了要满足新疆内部需要的那部分产品外，我们还权收购公司生产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产品。

在贸易方面，基本上采纳中方提出的建议，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外贸机构提供自由选择客户的权力。在预先与中方谈妥与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后，最近一年期的相关协议和与新疆的贸易额的计划草案会呈报给你们的。

与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谈判事宜可以委托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А.И.萨维利耶夫和我们在新疆商务代办的А.Н.伊夫琴科。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91]

米高扬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达成协议。

В.莫洛托夫

12月15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8, л.8-11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年12月9日)**

12月9日，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休假回来后来拜访我。

史蒂文森告诉我，关于给阿列尼切夫发到香港去的签证的问题，目前伦敦不会给他以签证的。他借口说，一些英国代表因为他们的轮船和货物的缘故在摩尔曼斯克发生了一些急待解决的事，外交部拒绝了给他们发到摩尔曼斯克去的签证。

我问史蒂文森，我们的轮船来香港运货要卸下2辆小汽车，我是否可以期望香港当局会给这些小汽车发许可证，这些小车是要从香港开到广东去的。史蒂文森感兴趣了：为何目的要让小汽车到广东去。我回答说，外交使团的领导通知所有的代表说，中国政府要迁往广东，为保证自己的汽车运输，我要预先把车子送到那儿去。他感到奇怪，提了个问题：“大使馆真的要搬到广东去？”这下轮到我问他了：“英国大使馆会随政府一起搬过去吗？”对此，他们以坚决的口气申明：他绝不从南京搬迁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政府真的迁往广东，那他也只限于把自己的秘书和参赞派到那里去，或者把大使馆的职权委托给英国驻广东的总领馆。回答我的问题——什么理由让他这样做时，史蒂文森解释道：第一，中国政府迁离南京，将来形势境况如何是完全不可知的。第二，什么政府迁往广东？据他所知，各种不同的元(纸币)被运送到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各个不同的部门，有搬到重庆去的，到台湾去的，也有到湖南去的。第三，在广东绝对不可能为使馆找到合适的处所，而住在指定的旅馆里他可不愿意——这种旅馆里没有电，没有电梯，总的来说，任何要用电的其他舒适设备都没有。第四，他申明，认为如果南京将被遗弃不顾的话，那么很难相信现任的中国政府还会存在下去。主要原因是，如果在南京将组建新的联合政府，那么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入境许可，而这还与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在当地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接着史蒂文森问我，在蒋介石周围的人中，谁能劝他离开中国。我回答说，在他身边的人中未必能找出这样一个人来，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这时，史蒂文森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大群国民党的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选出几个人当代表到蒋介石那儿去，并且这个代表团直接向他宣布：“英国不再给我们提供援助，我们已经四面楚歌，在这样的状况下，您也很难干下去了。您累了，因此您也该去休息一阵子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代表团应当按照中国的

所有仪式行事，吴铁城可以担任这一代表团的领头人。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不论吴铁城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未必能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总的说来，这个代表团未必能获得成功。蒋介石是站在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上的，而他周围的CC派集团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所以蒋介石是不会接受任何谈话和建议的。这时我问史蒂文森，是否可能，美国会给蒋介石一大笔借款，或用军备来帮助他。他回答说，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再也拿不到什么了。蒋介石夫人这次美国之行是以一无所获告终的。

说完这个，史蒂文森问道，孙科是否能组成新内阁？我回答，已经过了两个星期，目前他还躺在医院里，任何一个部的部长候选人都还未选好。这时我问他，按他的意见，谁可以入选孙科内阁？史蒂文森回答，新的候选人他也不知道，而且孙科没有蒋介石帮助不见得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了。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82-84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 物品(1948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给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

该把花瓶交给谁。

И.科瓦廖夫

手写批注：

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莫洛托夫

12月20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3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
(1948年12月13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派专家，支援设备及为恢复在东北的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清单。

清单是中国人编制的，为证实他们以上的需求，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我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这些方面给予援助。

呈上清单(已从中文译出)，请予指示。

附件，5页。 [92]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手写批注：

送给葛罗米柯(加上附件)，附件有5页。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62

No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 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台机车、3000节货车车厢和20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同时把解放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东北派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2540节、客车车厢342节、车头114个。它们是1946年春天从作战地区疏散到大连的。

如果铁路段恢复，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大连中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营目标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50个车头、1500节货车车厢和13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解放军正加紧在东北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956个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复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东北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1000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东北北部提供；

把1946年从东北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东北，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66台，货车车厢842节，客车车厢112节，此外还有20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他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措施：

一、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50台机车、130节客运车厢给东北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给东北民主政权。

二、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

(二)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东北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三)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东北铁路交换车辆；

(四)给东北再派170名铁路员工。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批准。

1948年12月16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的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东北民主政权以组织东北铁路的运营；

(二)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东北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三)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东北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四)从中长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二、批准苏联交通部：

(一)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1946年从东北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东北铁路北段；

(二)另增派170名具有专业的苏联铁路员工交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pc号)和1948年12月13日命令(第18 593pc号)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三、第二(二)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9月3日的命令(第12717号)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四、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东北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五、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25-30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奥特波尔—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东北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一、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二、铁道兵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他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东北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三、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四、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该机构和编制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 [93] 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的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的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东北，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向您报告，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一、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二、修复东北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东北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三、恢复奉天和东北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小丰满大型水

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五、向军队派遣组织和训练的顾问以及部队后勤建设的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东北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专家，包括计划人员、工程和工业恢复的人员以及开工组织的人员。

其中，燃料和电能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订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委托该小组：

一、研究与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及交通的有关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二、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1948年12月16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84-94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向东北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二、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东北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草案。

三、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东北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四、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东北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东北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五、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证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东北所用。我认为，对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是，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 [94] 同志同意这种意见。

六、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二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来，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7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2-14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东北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东北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以科瓦廖夫同志为

首的苏联专家组以及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列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至于打算赠予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给中央信件的草案。 [95]

A.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8日

AB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6-17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 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11月1日的决定(第16107号)，在东北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人，其期限到1949年1月1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在集中精力恢复东北至华北前线的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延长到1949年3月。

И.科瓦廖夫

1948年12月20日

第308/1-c号

AB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5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

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机密

葛罗米柯同志：

10月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第12078/III号电报说，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云同志请求让56名搞计划的苏联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

我认为，现在正在审议林彪请求派搞计划方面的苏联专家的总的申请书(报告已呈交莫洛托夫)，那么，对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那份电报，就不应另外再作任何处理了。

附上给斯米尔秋科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 [96]

请予指示。

费德林

1948年12月22日

АВРФ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67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 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告知，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东北铁路运营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们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予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一、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二、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

B.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8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pc号)，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21人(来自科瓦廖夫同志小组)，将在东北停留到1949年1月1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必须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B.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号)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9-20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 [97] (1948年12月27日)

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

.....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

.....美国人所支持的军阀起的是压力机的作用，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受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不加入这一联合，这将帮合法政府和在它周围联合起来的军阀的忙。美国人镇压共产党人的计划就是这样。

.....准备共产党人到来，把自己的外交代表和侨民留在解放区，这表明美国人准备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仍继续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现在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保持这个国家互相残杀的形势，让反革命分子同民主派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共产党胜利后将留在民主派里，他们的代表将力图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学专家还断言，共产党的胜利不能很快使中国统一，在中国，地方军阀和阴谋家将和地方反革命匪徒一起长期活动。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化瓦解，认为中共具有土改党的特殊性质。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经济政策是这种分化的思想毒剂。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还表现在把其255名侨民留在被包围的北平这一事实上，其中87人是领事馆和经济合作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里还留下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汉语学校。燕京和清

华大学的13名美国人留在了被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

鉴于共产党关闭了美国人在奉天的无线电台，一名副官毫不掩饰地指出，留下这个电台不是为了进行侦察活动，而是企图同中共取得联系。很明显，这种直接接触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想促成和平谈判。对此，傅作义在北平附近和塘沽努力避免交战，还有其他一些征兆，已经表明了意图。

美国人加紧收集有关解放区形势的情报，对中共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国资本的政策很感兴趣。12月初，从开封来的传教士通报了情况；美国领事馆全体人员、军事顾问组、海军武官都听了通报。传教士对共产党的行动给予了肯定。

早就同中国有联系和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许多美国活动家现在积极地说服政府改变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振兴和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欧文·拉铁摩尔就是其中之一，12月18日他在《中国评论周刊》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兴趣。著名女作家比尔·巴克主张援助整个中国，反对支持反人民分子。由于英国资本家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经济联系上的明确立场，美国实业界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美联社12月15日在(在华盛顿)报道中指出，尽管国务院对商界的要求继续保持沉默，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问题正在认真讨论中，“国务院官员表明了一种观点，即为了美国的利益，所有同全中国可能的新主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终究将得到支持”。

积极主张发展美中贸易联系的人在新的条件下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将是美国工业的市场，西方文化的目标，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处于这种关系中，并且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研究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战方法的学者们近来也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言论。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以前严重依赖外国贸易，现在中国特别依赖美向中国出口。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美国可在中国市场上控制一定的局面，诱发商品短缺或经济危机。那时共产党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资产阶级，而反动派的政治阵地就会加强。除此之外，共产党也不能进行工业和交通建设，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土地改革后产量的增长。此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在共产党上台后，美国停止援助，国家商业中心将出现严峻的形势。美国人在经济封锁中国的计划中，完全没考虑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苏联的

进口可取替资本主义的进口。

这里，美国的中国学专家认为，尽管共产党胜利了，但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它的贸易政策将是国家生活和国家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是作为影响中国政治界的一种手段而谋划出来的，这一阶层中有直接接受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人，也有暗地追随这种文化的人。美国间谍机关急忙发展间谍网，到处准备渠道，与民主制度的敌人取得联系和提供帮助。

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问题，即他们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在经济前景上，这里有一个失误，它同美国人在预测中共与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所犯的失误类似，即他们轻视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巨大经验和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

其他较为客观的观点是，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性质，美国不能充分地实施自己经济封锁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有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第二，有英国向这一市场的进攻；第三，复苏的日本工业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最后，美国垄断集团自身方面的原因：由于世界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集团面临危机形势的压力，政府出口调节的压力也会逐步增大。

苏联驻中国(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

A.马卢欣

1948年12月27日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7-23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98] (1948年12月27日)

马利宁同志：

12月6日函敬悉。关于松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苏侨公粮减免问题，经本局派员与松江省府、尚志县府联合调查，业已圆满解决。该地苏侨甚为满意。除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请参考外，相继函达，即祈查照为荷。

此致

敬礼

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1件。

东北粮食总局(印章)

12月27日

石头河区苏侨调查报告

该侨民住所为宝山村二十三里屯，距石头河区45里，共41户。人口：男41口，女26口，小孩19口，计86口。乳牛33头，马19匹，车19辆，蜂子65箱。耕地面积33垧 [99]，内有菜地2垧，麦地2垧半，大麦1垧..... [100] 8垧，其余是苞米、黄豆。

该屯在1945年〔被〕日寇焚毁，住户(中苏)搬出该屯，1946年、1947年开始搬回原处耕种土地。但苏侨搬回该屯后，大部平地及熟地老早已被耕种，今年我县市民到该屯时，熟地仅有9垧。今年土评工作，因中苏言语不通，仅将苏侨土地丈量，并未评论等级。

此次出纳粮时，由侨民会代表保保夫已实际报到区公所，按每户耕作面积计34垧。因为此次地并未评等级，按苏侨代表保保夫报来共计产量1369布袋(每布袋30斤)，平均每垧打40布袋，合41070斤。按此产量合成税分20.54分，因中国人的每税分650斤，因此也按每税分来分配公粮，计13351斤，并未实际调查灾荒减免。此次粮总来人，与本县派人前往调查，协同侨民代表保保夫到二十三里屯，实际了解并处理办如下：

实际耕地面积33垧，减去今年开荒8垧，大麦1垧，菜地2垧，自吃用麦地3.5垧，并未收成，全部免征。下余19.5垧，内有别哥宝夫等3人独身，老年人2.05垧，全部免征；口路不洛夫3名因年老地被灾，免征1垧6.5亩；阿哈马拉也夫3亩，因残废免征，共计4垧。另有别里米诺夫6名，因年老无劳动力，地也弄不好，请求免征一半，计5.3垧减半(2垧6.5亩)。净应征粮12垧9亩。因苏侨都是好地，按该地区之中等级(该地土七级至十级)，八级算9厘5分，每垧应拿618斤，20.6布袋，折交苞米803斤。因为苏联种地不得法，不如我们种得好，因此，全都要求少交点。结果，每垧地只交750斤苞米。因他们都种的苞米，共计12垧9亩，

共征9675斤。

苏联人民没袋子，由仓库供100条袋子，5日内交齐。以上完全取得苏侨同意。

尚志县政府粮食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4—347页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1948年12月2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中国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提出建议，建议苏联和东北签订有关建立电报通讯的临时协定，而且已提出这一协定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是盼望之中的事。邮电部看了中国人提出的协定草案后，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苏联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和民主政权代表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对同苏联建立电报通讯感兴趣，而且对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建立电报联系感兴趣，那里有各种中国民主组织。但在中国人提交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出经过苏联建立过境通信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的兴趣，我认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建立苏联与东北之间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东北之间的邮政联系已于1947年12月建立。东北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联系的时机，我认为还不成熟。

但是，同东北签订关于建立电报联系的书面协定，可能被用来反对苏联，所以我认为宜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同东北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先达成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口头协定。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通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通讯的问题，应对他们声明，这个问题特殊，可将来再讨论。

同苏联邮电部商量过的苏联与东北建立通信的条件草案附后。

如您同意，外交部可将此事通知邮电部，指出，它应给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相应提案。

请您指示。

A.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28日

附件：

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条件(草案)

一、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经过绥芬河站)和赤塔—满洲里站建立电报通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双方协商建立其他电报交换站。

二、双方各自领土上的设备、线路和电报机修理费用由各自负担。

三、电报通讯24小时(昼夜)营业。

四、国际电信条约决定及其电报操作规程也适用于苏联与东北之间的电报交换，如果两者与本协定条件不矛盾。

五、在电报交换中，允许使用俄语、汉语、法语和英语。

明码电报应以拉丁字母拼写。密码电报只许政府间使用。

六、电报费用按字计算。由苏联发往东北和由东北发往苏联的电报按以下定价收费：每个字65金生丁，其中40金生丁归苏联所有，25金生丁归东北所有。

所指法郎为金法郎(1法郎等于100生丁)，重10/31克，纯度0.900。

临时以当地货币收取的发报费全部保留在递交地电报机关，条约双方之间不进行结算。

政府间电报按普通电话定价低50%收费，而报刊社的电话、电报则低75%。

缔约双方之间交流的政府电报应在备注栏内有如下标志：

USSR，表示苏联

CHG，表示中国东北

七、条约双方邮局和电报局间的公务电报以及气象电报免费。

八、条约双方及其电报机关之间的文件、相互来信用俄文书就。

九、条约双方根据以后电报通讯的发展，有权通过相互协商修改和补充这一电报交换规定。

十、本临时协定一经条约双方达成协议立即生效，一直到被另外的协定取代为止。条约双方中的一方，可宣布本协定作废，但需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必须协商解决。

1949年1月1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14-16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1948年12月29日)

机密

11月29日，托卡尔准将 [101] 偕夫人来访问我。在谈话中他告诉我，目前在徐州地区形成了对国军非常严峻的局势。最新的报道说，似乎国民党的军队被装在两只口袋里：第一只口袋是徐州地区，那里共产党人包围了4个兵团；第二只口袋在宿县—蚌埠，在那里2个兵团被包围了。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被包围了。接着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除了报纸上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凭借报纸来判断战役的进展太困难了。我马上又问他，他对孙科被委任行政院长有何评价。托卡尔回答说，这样做绝对不会带来什么新气象，还是那么些人，那些体制。同时他补充说，他听说，好像美国人也有要组建联合内阁的意图，而且，似乎这个联合政府要比至今为止所有的政府都要强得多。

我问，新的联合政体又将追逐什么目标，致力于什么使命？而蒋介石会不会是新联合政体中的一员呢？

将军说，当然，那里没有蒋介石的位子。至于说新的联合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将是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努力的。

我问，那么是些什么人物进入这个新的联合政体呢？将军回答说，一些广西人是主要人物，其成员有教授、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人士及许多其他人。

接着托尔卡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现在大家议论的都是关于孙科内阁的事，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候选人。有人指出：陈立夫、张群、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一系列的党的工作人员要参加到新内阁里来。

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这时赴美是什么目的，托卡尔说，目的只有一个——要钱，要装备。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是否能期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她的使命是否能顺利完成，将军回答说：现在美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问题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蒋介石还剩下几个师。美国人测算下来看到，这些师已所剩不多了。这才是决定是否提供金钱和装备的主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如果蒋介石现在还拥有在实力和士气上与共产党数量相当的军队，那么援助是不会停止的。很简单，美国人是会拨款、送装备过去的。而如今问题是，后备队没有了，那么武器又该给谁呢？

双方感谢这次会谈，谈话至此结束。

H.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80-81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您11月28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 [102] 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2.徐州战役成功的战绩比我们原先期望的大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35个整编师，其中包括4个起义并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师，剩下在杜聿明指挥下的国民党19个师，已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徐州的西南地区。他们有可能逃脱，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把他们彻底消灭。

从蚌埠沿北方向赶来支援的国民党部队整个兵团已被我军击退，并已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蚌埠地区的残敌正在准备逃窜。

徐州、淮阴以及黄河以北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完全处在我军的掌控之中。

杜聿明的部队有10多万人，盘踞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他们已被我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住。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的2个兵团，计60万人，以及来支援前方的民兵60万人，总共120万人左右。这次战役是以前在南方战线上进行过的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部分敌人已被我们击溃了，正处于被我们歼灭状态下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已不再有一流的部队了。

3.为了不让傅作义的48个师从平绥路战线逃跑，我们不等东北的部队休整好，就命令他们提前进军南方，协助我们华北的部队包围傅作义的军队，并把他们消灭掉。

到目前为止，傅作义军队中15个师已被我们消灭掉。已收复了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和其他广阔的地区，在北平、天津和塘沽(海港)，傅作义的主力(33个师)，还需要一个月，就可以消灭。

在这个战役中，我们使用了军队约90万人，为前线服务的民兵约40万人。这次战役是在北方战线所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中最大的一场战役。

在9—10月在东北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我们使用了支前民兵共90万人之多。

4.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已经不是先前预计的(从1946年算起)在5年内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可以在3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采取确有把握的行动措施。

在徐州、北平、天津等几个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部队的主力应该休整3个月，并占领孤城太原，然后向长江流域和辽阔的南方地区挺进。

5.我们已挑选了5500名干部，目前正在培训他们，以便在那些新开辟的地区进行工作。这项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下去，我们有信心能把工作做好。

6.在党员干部中间要进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和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具体政治措施的强化教育工作。中国革命发展越快，我们越是感到这项干部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7.国民党的统治已很难维持了，它的内部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内广大群众日益倾向我们。自由资产阶级越来越开始动摇，

在我们这里为自己找出路，追随国民党的人数日益减少。

8.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占领一系列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里的秩序很好，我们的各项政治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9.中国民主联军的纪律大大提高了，增长了斗志，指挥员们对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满怀信心。国民党的纪律涣散，国民党军队中叛变者的数量日渐增多。

在徐州、北平两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将不复存在，军队的数量将减少到170个师，其中大多数的师是重新编组的，且战斗力低下。

10.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12.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1949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1949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1948年12月30日

手写批注：

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是以化名菲利波夫为收件人的。这样写是为了保密。(档案保管员)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9-52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贝利亚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26658лб号

手写批注：

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

1949年1月4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15, д.231, л.1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M8579C号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通知瓦休凯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

1949年1月2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15, д.231, л.2

1949年

№1605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1949年1月1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国东北地区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建议，签订关于建立苏联与东北地区电报通讯的临时协议，并提出了此项协议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恢复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电报通讯是需要的，在审查了中国人提出的协议草案后，邮电部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同志与东北民主政权的代表就此问题举行的会谈中看出，中国人关注的不仅是要与苏联恢复电报通讯，而且要与3个国家(即法国、英国、美国等)恢复电报通讯，在这3个国家中有中国各种民主组织的代表。然而，在中国人提出的协议草案中，没有经由苏联实现过境通信的条款。

考虑到恢复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电报通讯对我们有利，我以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关于恢复苏联与东北地区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该地区的邮政通信已于1947年12月恢复。

我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与某些第三国建立经由苏联的电报通讯不合时宜。

然而，鉴于与中国人缔结建立电报通讯的协议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苏联，我认为恰当的做法是：责成我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与中国东北地区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以口头形式达成关于建立苏联与中国东北地区之间电报通讯的协议。

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有关经由苏联的过境通讯问题，应向他们声明，这是个特殊问题，可以另做研究。

现附上苏联邮电部同意的恢复苏联和中国东北地区通信的条件草案。

如果您同意，外交部可以通知邮电部，因为邮电部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请您指示。

A.葛罗米柯(签名)

1949年1月1日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协商。

B.莫洛托夫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第113期(2006年9月)，第237—238页

№09023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1949年1月5日)

斯大林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审阅他们制定的1949年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的计划，并请求帮助完成这一计划，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支持。

根据东北政权计算，为制定彻底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和组织生产的计划，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能源40人，冶金和化学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铁路和通讯116人，造纸和林业20人，建材业20人，轻纺20人，食品20人，地方手工业6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包括教授和学院、学校教师)65人，卫生保健55名医生，财政信贷20人，外贸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预算平衡6人，统计和会计10人。

对设备和材料大体需求如下：

军事工业

为完成1949年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计划，必须建立山炮和野炮制造厂并保障其设备，生产能力需达到日产炮10门；必须提供TNT炸药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0吨，特种金属1万吨，自动车床150台，

炮身钢管300吨，钨100吨，钼50吨，钼700吨，电线2500米，电缆线5万米，皮线10万米，超强度线4万米和其他物资。

此外，中国同志要求满足他们1948年1月所提出的军事工业所需各种仪器和材料的要求。

冶金工业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提出的计划，1949年要恢复和利用42个矿山冶金企业(其中7个是铜工业企业)。首先恢复鞍山和本溪的冶金企业，到1950年生产能力要达到年产40万吨钢、1.2万吨纯铜。

为了完成这一明显提高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其中需把拆除运往苏联的鞍山钢厂的第一、第二车间，大型轧钢车间和小型轧板车间运回来，而且还需运来专门材料：炸药900吨，铝100吨，工具钢300吨，润滑油500吨，绝缘线2万米，橡胶管2万米，传送带(皮的和帆布的)6万米，滚珠轴承200根，钢锯5000米，电线6000米及其他。

煤炭工业

民主政权计划1949年恢复22座矿井，采煤1000万吨，炼焦10万吨。

为了这一目的需提供某些设备和器材：电力泵60台，涂橡胶皮带46000米，电力车23台，滚珠轴承60000个，钻机用的各种型号钢管51000米，3立方米挖土机等。

交通运输

计划1949年完成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部分中长铁路，长春—四平街—奉天和义县—承德—北平线。此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还制订了修复中国内地铁路的计划，其中包括：山海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徐州—南京—上海，北平—开封—汉口，北平—张家口—太原—西安。共长90500公里。完成这一计划需要：

一、另外建立3个铁道兵旅，铁道兵总人数将达到5万人。

我们准备了3万铁道兵部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又拨给了1万人，用这些人成立了2个铁道兵旅。余下的1万人在1949年1—2月间将派往铁

道兵部队。

二、为帮助领导中国东北和内地铁路修复工作和训练新编铁道兵部队，需派100多名铁路修复专家来此。

三、按照中国同志提出的申请提供设备和物资。在摸清内地钢轨情况之前暂不提供钢轨。申请中所列其他物资，必须在1—2季度提供。

电力工业

为满足1949年东北工业需求，需要50万千瓦电力。现在东北电站发电能力近30万千瓦。

民主政权首先要求帮助恢复小丰满水电站。为此需派20名苏联工程师来，把拆下来运往苏联的两个涡轮机组(共发电能力15万千瓦)、发电机、18个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导线、灯、蓄电池等运回来。

对林业、造纸、纺织、轻工业、农业来说，也提出了类似的设备和物资申请。

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订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我认为，最好暂时不要讨论他们的计划和申请，先派一个苏联专家组来东北调查军事、冶金、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化工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责成该小组到东北后用一个月的时间给苏联部长会议拿出方案。

联共(布)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附后。

至于对铁路设备和材料的申请，除钢轨一项需要核实，这一申请是现实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予讨论和满足。

И.科瓦廖夫

附件一：

联共(布)中央关于援助东北恢复工业的决定

一、任命___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

___任命以下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

___为冶金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为军事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为燃料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为电力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副全权代表；

___为造纸和森林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为交通副全权代表。

二、责成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到位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冶金、军事、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工业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措施方案。

三、委托Г.М.马林科夫同志在两周时间里审阅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按第一条任命)科瓦廖夫同志关于100名苏联专家小组(按照所附名单)的提案。该小组将被派往东北，归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执行第二条所列任务。

四、出差人员在华全部时间工资及其家属薪水支付按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命令(第5970pc号)、1948年10月20日命令(第15188pc号)和1948年8月31日命令(第12138pc号)办理。

五、援助东北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措施通过中长铁路管理局实施。

附件二：

派往东北并由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的苏联专家清单

一、冶金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高炉专家2人、炼焦专家2人、采矿专家2人、轧钢专家2人、铸铁专家1人、鼓风机机械师1名(以上凡所指2人处，其中有1名技术专家、1名机械师)。

二、煤炭专家6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露天采矿专家2人、矿井采矿专家2人。

三、电机专家4人、生产计划专家2人、水电站专家2人、火电站专家1人。

四、武器装备和弹药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炮专家2人、炮弹专家1人、引信和雷管专家2人、装备专家1人、火药专家2人、火药纤维素专家1人、炸药专家1人、子弹专家2人。[\[103\]](#)

五、机械制造专家5人、编制生产计划专家2人、设备专家3人。

采矿和精炼专家3人、耐火材料专家1人、校准专家1人、厂内运输专家2人。

有色冶金共8名专家，其中生产计划专家1人、采矿专家2人、冶铜专家2人、轧材专家1人、铅专家2人。

森林造纸业专家4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

交通运输专家12人(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其中：计划专家6人(铁路运输计划专家4人、水运计划专家1人、公路运输计划专家1人)，水路和公路工程师6人。

轻工业：计划专家2人。食品工业：计划专家1人。

财政：专家2人。

综合和预算平衡：普通专家4人，统计专家6人。

卫生保健医生5人，其中：计划1人、内科1人、外科医生1人、鼠疫学家1人。

翻译——精通中文者10人。

技术机构、全权代表及其副职的工作人员12人，其中：秘书9人、速记—打字员1人、司机2人。

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15, д.231, л.3 6、7 8、9-10

№164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致捷列宾

复第1号文件

请转达毛泽东：

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感谢您提供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并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府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促使中国民主力量更进一步，有更大的发展。

您在电报中提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的日期定于夏季之事，我们有些疑问。是否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些民主政治人士吸引过去，以此影响他们团结在中国北方人民解放力量的周围。国民党可能会走这一步棋，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企图让自己的爪牙参加民主协商会议以及以后的民主联合政治的阴谋遭到失败的时候。

因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事不宜拖延到夏季，而应该在解放北平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这样就会把一直在策划建立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乱。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斯大林

1949年1月6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53

№16442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1949年1月7日)

机密

我赞成通金同志的建议。在目前形势下，不宜召开中国在1948年8月24日照会中提出的苏中联合会议。 [104]

请指示。

A.葛罗米柯(签名)

1949年1月7日

手写批注：

决定：致A.葛罗米柯。莫洛托夫已同意。

波采罗布

1949年1月7日，第9ar号

AB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3，л.10

№09026 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1949年1月8日)

第一远东司司长H.T.费德林同志：

由于美国使馆一再请求——美国代办科列尔在1949年1月4日来信中已陈述过，请求提供奉天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信息和利用我们同奉天的通信渠道，兹请您告诉我们您对美国大使馆这一请求的看法。

外交部美国司司长

Ф.奥列霍夫(签名)

ABПРФ，ф.100，оп.42，п.292，д.73，л.1

№1644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1949年1月8日)

斯大林同志，您好！

十分感谢您派科瓦廖夫同志前来帮助我们恢复铁路和其他经济工作！

在科瓦廖夫同志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满洲的铁路交通基本恢复。日前科瓦廖夫同志和中国同志制订了整个中国北部铁路，即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的铁路，1949年的修复计划。如果在今年冬季之前这个计划能实现，那么我们将有1.8万公里铁路(包括满洲的铁路)可以运营。为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系列最必要的材料，也需要机车、机器、工具、油和其他修复中国北部铁路的材料。除了我们自己能保证供应的以外，我们迫切需要得到你们的援助，即从你们那里得到大量上述材料，这样，我们才能开始铁路的修复工作。

随附两份订单，我们需要的这些材料上面已经提及。请您审阅这些订单，如能得到您的应允，并指示以贷款方式尽快装车发货，我们将不胜感激。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敬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49年1月8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7, л.1

№16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 (1949年1月9日)

斯大林同志！

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为了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

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

如果您认为技术准备时间不够，可以延后几天。飞机到达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您决定，然后告诉我。

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到达上述地点的时间最好是清晨。

与和我一起访问的有21人。

毛泽东

1949年1月9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6, л.59

№16446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转达1949年1月7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主要内容。

毛泽东听了第0100号文件 [105] 内容的传达。他在读完该文件的译文后说，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占领北平之后召开协商会议，然后，建立联合政府之事，可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和其他城市之后，在秋季或冬季进行。

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的：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在1月20日我想去莫斯科，争取在月底到那里。

在莫斯科我准备待上1个月，要谈许多问题，包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贸易和其他问题。

2月底我准备返回中国，准备3月份召开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4月份举行协商会议，但是最好有1个月的休息，为5月份会议的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夏季组建联合政府。

这项工作可能最好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和其他城市以后完成。我们有信心，今年秋季或冬季一定能做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逃离大陆，首都将归属于我们。此时全国人民都已经看到，在中国只有我们的政府，苏联在外交方面可以更便于第一个承认我们的政府。这一切我们将在莫斯科进行最后商谈。

如果国民党要建立联合政府，我们也不害怕。也许，这甚至会更好一些。民主人士中不会有人靠向国民党这一边。国民党会像1946—1947年两次召开国民大会那样打出自己的牌，摊出自己的牌。

我们的牌则捏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也许有人会设想，猜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但他们绝不会知道具体内容。我们会把手里的牌藏好。

目前，民主组织及其领袖不支持蒋介石的和平叫嚣，他们袖手旁观，不发表意见。

当前大多数民主人士在我们的区域内，他们愿意待在那里并向我们靠拢。如果在过去，我们邀请他们过来，他们是不愿意的，如今在我军取得胜利之后，只要稍作暗示，他们就会立刻过来。

如今上海只留下三个右翼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后两人也想过来，但我们暂时没有邀请。

目前有许多著名的国民党人士，特别是搞情报的专家，设法找我们联系。

白崇禧问过我们，中共如有什么指示，他立即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只是口头上暗示他，希望他在汉口稳住自己的军队，不要影响我们的进攻。

我们对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刘汝明讲过，留守在国民党指示的那个区里，我部队进攻时放我们过去。

汤恩伯也在找我们联系。

钟杰民(ЧжунЦземинь)也想跟我们建立联系。

我们在西康省的无线电台好久没有广播，而现在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每天找我们的人了解中共有哪些指示。

我们跟长江内河区舰队的许多战舰也有联系，进攻时他们会转向我方(关于傅作义，下面详谈)。

许多著名的情报人员，特别在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之后，为了保住自

己的生命，把重要的消息发给我们。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向他们做出指示，那将会发生许多反蒋的起义，他们都会转向我方。就目前情况来说，这对我们不利，因为那时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太多，很麻烦。况且，这些高级将领都想猎取高位，这些人不可靠。

甚至美国人也想跟我们接触，更不要说许多在香港的美国(和英国的)记者以及从北京转向我方的这些人，都要求允许他们去解放区看看，我们都拒绝了。但司徒雷登在前不久，即在载有美军的登陆艇进入上海之前，曾派人到香港找过我们。

来人说的话像是暗示，实际上就是要打听，中共是否允许将美国军队引进上海。我们拒绝了转达类似的请求，直接回答，中共总的来说原则上反对在中国境内驻扎外国军队。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步兵，要比国民党军队强。

此时我插话说，斯大林说过，步兵是战神。毛泽东马上回答说，我们向斯大林学习。

话题又转入了第0100号文件。他们在写文章，很好。这就是说，他们在关心我们，希望早日成立政府。我将跟领导人——周恩来、西弗、库图兹 [106] 和任弼时讨论这个问题。

我代表苏联谈到过对他们的帮助，举了一个例子。在满洲的苏联代表十分明确地提到，为何您不要求派遣铁路方面的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刚拍发完电报，人已经到了。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想着我们，关心我们。(这里我看见了两辆吉斯150新型汽车。)

真的，我们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需要援助，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会上我对大家说，希望他们跟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不过，我们卖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都是一些苏联不需要的东西。

关于傅作义(我把谈话中提及关于傅的事归在了一起，整个谈话集中到这件事上)：

我们经常与傅作义进行无线电话联系，跟他进行谈判，并指出应该派谁来谈判。

当傅作义的10个师被击溃和他被列为战犯以后，他们情绪非常低落。他认为自己中了圈套，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是傻瓜(混蛋)。可是当我们向他口头(没有交给任何书面材料)传达六点(具体哪六点毛泽东没有说)后，他心中的石头落下了。

我们向他解释了为何要把他列入战犯名单的原因。

傅作义在中国东北做了许多坏事，人民仇恨他。如果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蒋介石会怀疑他跟我们有联系。

可是，如果傅作义能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会向人民交代，他有功，人民会原谅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删去。

中共的基本要求是：

傅作义应该让中共军队通过自己的阵地进入北平，不破坏城市。以后他剩下的4个师编成1个军，从北平撤离到指定地点。他的军队不会受到攻击。

可是傅作义抓住了我们弱点，即我们不想破坏城市，他就跟我们讨价还价。因此，我们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天津则是另一回事，必须攻占。

毛泽东设想，占领天津，消灭杜聿明被围困的部分部队安排在1月份，夺取北平在2月份。然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其他问题上。他说，外面到处都在说他是独裁者(这点他过去也跟我讲过)，是的，我就是独裁者。

“我、周恩来、西弗、库图兹、任弼时都是领导人，”他说，“离开延安后，国内大事是我们三人(我、周恩来、任弼时)负责。”

晚餐以后，毛泽东谈了1927年和1931年中共所遭受的许多困难。

他说，由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做出的错误决定，中共占领的领土有十分之九丧失了，大部分军队受到挫折；他又说到，后来党员的人数因此大大减少了。

他说，有人攻击他，企图逮捕他、杀害他；他还说到，这种情况叶剑英已经提醒过。

提到党内斗争和党内分歧时，他说，只是到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才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稳固的。告别时他感谢给他作了通报。他答应将与领导们一起进行讨论。

科洛廖娃(指毛泽东夫人)请我去她那里。她告诉我，她有许多病。后来我听到周恩来、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家，就在他家开会讨论。

捷列宾

1949年1月10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54-58

№16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1949年1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1.你1月6日的电报已收到。[107]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各种真正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建立联合政府，不会有重大影响。我们的联合政府可能在夏季建立，也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即春季，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2.我军已彻底消灭了被围困在徐州附近的杜聿明指挥下19个师的国民党精锐部队。

3.占领天津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现决定：1月13日攻打天津，占领天津后开始进攻北平，然后进攻太原和大同。

4.今年春季我军主力将作休整，夏季可以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他们在战斗意志和技术装备方面都将超过国民党军队。

到秋冬季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可以占领9个省，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以下城市：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

江、苏州、无锡、福州、西安。

至于上海，问题不在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定能在今年冬季占领上海。问题在于燃料、粮食的供应和保障方面。是否采用强攻，我们还得考虑。

5.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弼时和高岗等21人组成。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49年1月10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0-62

№025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南京政府尚未得到上述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还未予答复。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做大致如此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

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如你们有不同意见，请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至于说到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抱歉，我们以为，鉴于上述情况，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当然，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都是不利的。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95-96

№025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1日)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他们不能污蔑中共蓄意继续国内战争。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1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97

№1605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1949年1月11日)

根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来自东北的粮食货运转载的电报所述，现向您报告：交通部已向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尔及滨海铁路局长发出指示，责成他们保证昼夜不停地转载并以直达列车发送400节车厢的东北粮食，其中绥芬河车站100节车厢，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将在绥芬河车站和满洲里车站等待转运的中国载粮车厢限期卸完，允许从交通部的备用车厢中抽用1500节带篷的空车厢，同时责成他们在装车前加紧组织好车厢的挑选、准备和修理。

交通部长

贝舍夫(签名)

1949年1月11日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第113期(2006年9月)，第240—241页

№164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1949年1月11日)

致毛泽东：

现转交南京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

“忠于爱好和平传统的中国人民一贯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国内和平。只有当他面临残酷侵略时，才会被迫采取自卫，因此，全中国人民奋起武装抗日。在中国人民与同盟国的紧密合作下，最终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胜利前夕，中国希望为全世界奠定和平的基础，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与同盟国一起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组建工作。因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维护和平，才能真正保证人类文明的继续和发展。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后来在马歇尔将军的帮助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可是最后由于双方观点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很遗憾，军事行动又恢复了。虽然和平的努力暂时受到了挫折，

可是我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对和平失去希望。

在三年中，由于战争灾难在继续，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因此我政府无法实现在抗战期间考虑好的所有恢复和改造计划。如今，在人民受苦和生产下降的情况下，恢复和谈确实刻不容缓。当前世界，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和平和世界的稳定。

一个国家的内部不稳定未必只影响这个国家。因此，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避免由于中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而阻碍全世界和平的进步。

中华民国总统对此十分担忧。他在新年咨文中毫不犹豫地声明要恢复和谈。总统咨文公布之后，全国人民拍发了不计其数的电报支持咨文，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和平的真正愿望。苏联政府过去很友善地关心中国问题，多次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共同的努力。

中国政府谨此向苏联政府声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并希望了解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上述愿望的观点。如果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将万分感谢。中国政府后来又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

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如能尽快做出答复，中国政府将感谢不尽。”

南京政府认为这个建议不宜公布。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1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3-64

№025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

菲利波夫同志：

1月10日电收悉。

一、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二、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尽管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从而达到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

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因此，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殷切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三、关于是否允许南京政府人员，包括战犯在内，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还需斟酌一番。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与我们一道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这刚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而这样做却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也会使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遭到严重损害。

自1947年7月以来，我们一直细心地注意到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求进行谈判，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

令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种骗局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将迫使我们再一次做出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说不能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暂缓建立联合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使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打出他们所有的王牌，而我们则是在最后时刻才打出自己的王牌。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战犯名单，共计43人，是以非正式形式(权威人士声明)公布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出缉拿这些战犯的逮捕令。

1月1日，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议。对此我们同样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记者评论)作了回答。

总之，我们已为转折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何反应。

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四、感谢您就如此重大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若您不同意我的上述意见，或您对之有何修改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1949年1月1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00-103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5-67

No16451 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1949年1月12日)

摘自B.M.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月14日

傅秉常说，今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吴铁城向驻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递交了备忘录，提到中国政府准备接受这些国家的有助于尽快恢复中国和平的善意帮助。日前傅秉常收到行政院长孙科和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的指示，要我亲自秘密通知莫洛托夫下列事项：

1.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和平的呼吁书写得很具体。蒋介石总统的新年咨文是为了团结国内的舆论界。目前在国民党内部经过多次协商，对和平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2.中国政府分发给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关于请求真诚援助中国恢复和平的呼吁书在行政院的会议上得到一致赞同。

3.上述4个国家政府为恢复中国和平所作的真诚援助(这点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书中已提到)不一定采取共同行动的形式。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单独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谈问题上做出友善的帮助的话，中国政府将不胜感激。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收到了南京方面的备忘录原件，对此傅秉常已提及。该文件说，同类的声明发给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他(莫洛托夫)想问大使，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对这份呼吁书的反应如何。

傅秉常回答说，很遗憾，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可是他可以问问政府。

莫洛托夫说，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知晓中国政府给4个国家政府的呼吁书。

傅秉常回答说，他想，中国共产党应该知道这份呼吁书，因为在南京人们都谈起此事。可是他不知道共产党对此的反应如何。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这份呼吁书是秘密的。

傅秉常肯定这一点，但重复地说，在南京对这份呼吁书议论很多。

莫洛托夫指出，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共产党是否知道，他们对此反应如何，连你大使都不知道。

傅秉常回答说，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信息。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收到这个备忘录之后，认为必须认真研究研究。现在他们正在研究这个备忘录。

傅秉常希望苏联政府仔细研究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在方便的第一时间里把答复告诉他。

莫洛托夫说，他会汇报中国大使的这个愿望，持续15分钟的会谈结束。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罗申(南京)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255, д.15, л.1-3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7, л.3-5

№1645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 (1949年1月13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这是答复的最重要内容。

毛泽东谈得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

现在国民党会同意一切条件，但是谈判还是无法进行。

关于莫斯科之行。

看来，如果毛泽东在近期，最早1月底前，不能成行的话，可能他就无法去莫斯科了。

师哲讲得直截了当。

捷列宾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8

№025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4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长电收悉。

一、倘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和平建议，倘若美国搞的这套和谈花招根本都不存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显然，这套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造成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它的存在是个事实，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予以重视。

二、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南京方面事实上并不想同中共和谈，与中共和谈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放弃其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基本政策，就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灭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其次，他们懂得，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其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

那么，南京方面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并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最起码他们的企图是要阻挠共产党将国民党军队彻底击垮。

这就是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核心。

三、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

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并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你们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你们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而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你们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无法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就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我们认为，对待忠诚的朋友采用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方式是恰当的，可是，如果与南京政府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回答可能是危险的。

是否可以采用另一种回答方式。这便是：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第二，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第三，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第四，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当立即停止。

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

但假定——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共产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呢？

第一，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要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

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会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四、以上便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及给你们的建议。或许我们在前电中没能把我们的建议完完全全地表述清楚。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五、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六、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4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9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10-113

№02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1月11日续电收悉，我感到十分欣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

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在其和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108\]](#)

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43个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没有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

二、因捷列宾同志的无线电台很忙，请您吩咐你们在沈阳的同志把我们的声明转交给您。

三、在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慌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人民大规模地要求国民党恢复和平，谴责国民党提出的条件甚为苛刻。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匆忙出来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为什么必须掌握军队。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局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

1949年1月14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73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04-105

№164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刚收到了您发来的简短电报，知悉我们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就是说，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109\]](#)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5日

№16453 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1949年1月15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机密

1月15日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陈进的要求，我接见了。

陈进声称，他受委托口头转达中国政府下列声明：

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可能要迁移到南方。此时驻华的所有外国外交使团将会提前收到通知。为了让外国大使馆及使团能和政府一起迁离南京，我们将为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必需的交通工具。如果某使团认为有必要留在南京、上海、天津或北平以保护自己的公民和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政府不会反对。我们已经在广州为外国使团准备了相当方便的住房，迁移是免费的。

转达完声明之后，陈进请我就此事向苏联外交部汇报一下。我答应了。

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记录性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三等秘书A.A.奥尔洛夫同志。

苏联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H.T.费德林(签名)

维辛斯基秘书处(印章)

速交(波采罗布)同志，应分发给..... [110]

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同志，档案室

№09045 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1949年1月17日)

摘自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22点我把傅秉常请到我处，受B.M.莫洛托夫的委托，向他转交了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调停的答复。大使允诺立即报告中国政府。我们的答复让傅秉常感到沮丧。他慌慌张张地三次重复同一句话“我将转告政府”。

会谈继续了大约30分钟。

帕斯托耶夫同志参加了会谈。

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等同志，第一远东司、第二欧洲司、美国司、第一欧洲司、档案室

手写批注：

维辛斯基已递交傅秉常，1949年1月17日。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7，л.6-7

№1645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1949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呈上中国政府关于调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请审阅。

莫洛托夫(签名)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

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附件一：

给中国政府复函草案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希望苏联政府调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中国政府也向法国、英国、美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苏联政府看过中国政府的呼吁书以后认为，有必要在此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____的。 [111]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____ [112] 的国家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实现统一而不受外国干涉。 [113]

附件二：

苏联给中国政府请求的复函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呼吁苏联政府参加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和谈的调停。中国政府同时也通知，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详细地研究了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后，认为有必要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适宜的。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通过自己内部的努力，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手写批注：

批准。

B.M.莫洛托夫

1月17日

附件三：

英国和美国拒绝调停中国内政

南京，1月16日(塔斯社)。据报刊报道，中国政府向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政府呼吁，请求它们参加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和谈。最新消息，英国、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调停请求。

手写批注：

送报刊、电台(今天)。

B.M.莫洛托夫

№16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1949年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 1.您1月14、15日拍发的两份电报均已收到。
- 2.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
- 3.我们非常欢迎您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

石家庄是他到达的最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隐蔽，由此可直接到达我党中央驻地。在那里可以就一系列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5位同志进行交谈。

石家庄到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尚未恢复，石家庄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至少需要20天。有许多民主党派代表住在沈阳，如果途经沈阳的话，势必不能做到保密。因此你们的同志乘飞机来石家庄比较容易保密。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最好让他在1月底或2月初来。

毛泽东

1949年1月17日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75

№16461 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1949年1月17日以后 [114])

中国哈尔滨

铁林大街11号

李立三收：

值此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请

您组织毛泽东同志的贺词，并确认已收到我们的邀请函。

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沃伊诺娃(签名)

手写批注：

致高岗。请了解，毛泽东同志能否参加今年1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请告之。

АВ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39, л.6

№343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 (1949年1月23日)

绝密

斯大林1949年1月2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毛泽东：

在我们的电报中提到，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你们那里。他将抵达您在自己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个城市。

你们在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派送。

斯大林

1949年1月23日

АВРФ, ф.3, оп.65, д.606, л.54

№10238 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1949年1月27日)

1949年2月5日

第345号

谈话是在远东委员会办公楼由马克·科伊将军主动提出的。

马克·科伊简要介绍了远东委员会讨论战争赔偿问题的历史。他说，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已讨论了近两年。除了在委员会内及委员会下属的各委员会讨论外，这个问题还是美国和苏联政府间双边谈判的题目。尽管谈了这么长时间，委员会内外的讨论都没有带来积极的成果。马克·科伊宣称，一段时间之前，当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明显进入死胡同的时候，马克·科伊曾建议自己的政府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交远东委员会审议，希望这样的建议能成为远东委员会达成一致决定的基础。美国代表团于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马克·科伊指的是FEC 278号文件)。马克·科伊指出，他认为，战争赔偿问题之所以没有进展，似乎完全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意见分歧的缘故。其他国家，比如英国，也不同意美国的建议。他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曾与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个别谈判，但这些谈判也没导致积极成果。随后马克·科伊宣称，他理解苏联代表团的立场似乎是，从日本获得战争赔偿对苏联没有多大作用。他基本上相信，苏联是不会取走这些设备的，甚至“即使用银盘装着送到它跟前”，它也不会要。美国也对从实物上获得战争赔偿不感兴趣。

马克·科伊认为，这样，苏联和美国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立场首先都是从维护国家威望的考虑出发的。随后马克·科伊说，美国政府试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基础也遭到了失败。但是，让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是不行的。其他国家希望快一点获得赔偿，然而用于赔偿的设备却纹丝不动躺在那里，正在变为一堆废铁。马克·科伊将军结束谈话时宣称，他认为推动战争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只有一条出路。他认为，现在轮到苏联，它作为一个大国应争取主动，以提出一个新建议的行动做出一个勇敢姿态。当然，这样的建议要求做出一定的自我牺牲，但却会使远东委员会其余所有成员国刮目相看，并成为解决整个问题的开端。

在作这番声明时马克·科伊将军数次重复说，他不是作为美国代表，而是作为远东委员会主席说这番话的。

在回答马克·科伊将军时我宣称，从讨论战争赔偿问题一开始，苏联的立场就不是要使其他国家为难。众所周知，苏联对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有充分理由获得所有战争赔偿的14%，即不到七分之一。遗憾的是，在讨论过程中发现，远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份额。尽管苏联消灭了整个日本军队的三分之一，因而它有权坚持自己的要求，但苏联代表团为尽快解决问题，这时仍迎合其他国家而把自己的份额降低到了12%。苏联代表团至今都不明白，为

什么美国代表在自己的建议中要把对苏联的份额定得那么微小，先是2%，后来也只有4%。难道能把苏联对打败日本事业的贡献与诸如印度、法国、荷兰或者和英国相比吗？即使对这些国家，美国定的数字也比苏联的数字高得多。

对此马克·科伊回答，他本人没有参加美国政府内部在制订该建议时的讨论。但是，他推测，对苏联定的这个数字不是作为对苏联最公平的份额提出来的，而是考虑到，这个数字最接近其他国家为苏联定的数字。马克·科伊说，他判断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苏联为自己参加对日作战已经获得某种报偿了，即苏联得到了萨哈林、千岛群岛以及日本在东北的国外资产。他本人作为远东委员会的主席，极力将日本的国外资产问题“保持在冻结状态”。他指出，对苏联定的份额本身并不是要给苏联抹黑。随后，马克·科伊宣称，目前战争赔偿问题已经以全新的形式摆在世人面前了，所以向苏联提供了做一个勇敢姿态的很好机会，这样的姿态不仅将对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和美国社会舆论产生良好印象，而且将提高苏联威信。所以他建议苏联代表团采取主动，以新方式提出战争赔偿问题，从而使提出的方案能为所有国家接受。马克·科伊认为，只有苏联才有能力提出这种建议。马克·科伊重申，他不是作为美国代表，而是作为一个中立人士在这里讲话。

对此，我向马克·科伊宣称，远东委员会之所以不能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其原因恰恰在于，美国代表团从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采取了完全不正确的立场，给苏联定了2%的赔偿份额。美国代表团在对苏联获得赔偿份额问题上的这种立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科伊刚才谈的可悲结局。

我还宣称，我认为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在远东委员会提出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新方案。我认为必须使美国代表团改变自己关于苏联获得赔偿份额的先入为主的立场，并诚实地、客观地看待苏联完全合法的、公道的要求。美国还应该在分配战争赔偿时对其他一些国家持客观立场，因为他们明显地过分夸大了自己在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那么这将是摆脱目前远东委员会所处僵局的唯一出路。

我声称，至于涉及萨哈林南部及日本在东北的资产的意见和谈话，那么，这类说法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事物本质，而且会搅乱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众所周知，关于萨哈林及

其他领土的问题早已在雅尔塔会议就已决定，它不属于远东委员会的权限，至于在东北的资产，不过是苏联军队缴获的战利品。美国军队也在日本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对这些战利品，任何人，包括苏联在内，都不打算暗中计算它的数量。我希望，不管是美国代表团还是任何别的国家和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不要把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利品问题搅到一起。

对此马克·科伊回答，国会已经对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但没能对自己的立场做出其余代表团都能接受的改变。马克·科伊说，他坚信，现在只能采取某种快刀斩乱麻的勇敢姿态，并且只有苏联代表团能做出这种姿态。至于苏联代表关于美国代表团必须改善自己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立场之意见，他(马克·科伊)将报告自己的政府。

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A.潘友新(签名)

文本共5份，送：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马立克同志、第二远东司、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391—1396页

№34385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于今天即28日抵达大连。他的姓氏是米高扬，党内代号是安德烈耶夫。他的姓氏需要保密。

斯大林

1949年1月28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55

№343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

时间和地点(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毛泽东1949年1月2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特别请求你们的代表于2月2日至5日抵达石家庄。这样较为妥当，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

毛泽东

1949年1月28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56

№3438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经在路上了，并将于1月29日或者30日抵达他们那里。〈RTS〉

斯大林

1949年1月28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57 〈/RTS〉

№343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急电

毛泽东1949年1月2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指定的时间，你们的代表即在1月29日或30日到来。

关于民主人士的访问计划，我们可以另行安排。

中央书记处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迎接他。

毛泽东

1949年1月28日17时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58

№3438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1949年1月30日)

А.И.米高扬1949年1月30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 [\[115\]](#)：

抵达石家庄

今天，1月30日，一大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机场着陆了。机场是带水泥跑道、日军样式的。飞机马上就向远东地区返航了。

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主任任弼时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迎接了我们。

同毛泽东的会面

在乡间土道上颠簸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

毛泽东在询问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健康之后，把政治局委员叫到了自己这里，向我介绍了他们。他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

除了毛泽东，书记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

此外，在吃饭期间和饭后进行了会谈。关于会谈的内容另行告知。

米高扬

1949年1月30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59

№16465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1949年1月30日)

绝密

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是在1949年1月30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我方И.科瓦廖夫 [116] 和E.科瓦廖夫 [117] 也参加了会谈。

几句有关旅途情况的简短问答以后，毛泽东主动详尽地谈起了中国的军事状况。

中国的军事状况

毛泽东声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可以算是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口有2.6亿人，解放区有2.1亿人。共产党军队有220万人，其中120万人在南京地区，90万人(林彪部队)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总共只有110万人，而且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等地区，因此机动部队很少。除了4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军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缴械投降。在武汉驻军的白崇禧曾派自己的代表到共产党的三个地方代表驻地进行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白崇禧将两个师派到上海和南京，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职务。我们知道，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的职务交给孙科，是为了将来他退休后，可以在幕后操纵政府。从共产党掌握的文件资料来看，蒋介石在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西安。国民党将在南方和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反抗，不会再坚守南京和上海。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

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的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也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2万人进行培训。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还需要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人民解放军对南京的占领要推迟到4月份。当然，可以现在进攻，但成功的机会只有80%。到4月份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为了在南京、上海地区取得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北平的情况较复杂，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巩固。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4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4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傅作义的部队有20万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调到南京 [118] 的东北方向，另一部分调到南京的西南方向，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改编。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击溃，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第二阶段，将反动透顶的军官清除出各师，声名狼藉者开除出军队，其他人送到政治训练班，一部分用于培训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将被遣送回家。第三阶段进行真正的改编，目的是将被改编队

伍中的国民党分子打乱，掺和到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3个原国民党分子安排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2—3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关于共产党对待自己的错误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说，他想跟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说：“请注意，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补充说，他们经常犯错误，但也经常改正错误，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46年却忘了。如果在1946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1946年再版了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年 [119] 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中国比俄国落后，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所有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觉悟。”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12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就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12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这是否正确。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为斯大林健康干杯时，他强调指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是现今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毛泽东指出，在他们那里，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16

的问题(1949年1月31日)

美国司司长Ф.Т.奥列霍夫同志：

对于科列尔今年1月4日的来信我认为宜这样处理：

一、暂不给予回答，至少在一个月內。

如果他再提及此事，可以这样告诉他，就说苏联外交部还未收到现在在奉天的苏联代表的回音，他们还未告知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情况。

二、上述期限过后，可以答复科列尔，复信应局限于这种意见：我们收到了有关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平安无事的消息。

要拒绝科列尔向美国领事馆传递通讯报道的请求，推说没有满足这种请求的可能性。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1949年1月31日17时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2, д.73, л.3

№3439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1月31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现把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会谈的内容通报给您。我们方面出席会谈的有翻译科瓦廖夫和我们负责中长铁路经济事务的全权代表科瓦廖夫。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和科瓦廖夫同志进行了翻译。在就这次旅程进行了简短的询问之后，毛泽东主动开始详细谈论关于中国的军事

形势。

关于军事形势、中共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

关于军事局势，毛泽东谈了如下内容：事实上，应该认为，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

国统区有2.6亿居民，而在解放区有2.1亿居民。

中共有220万军队，其中130万人在南京地区，90万人(林彪部)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军队共有110万人，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沿线，因此不易动员。除了4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国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最精锐的一些师，要么被消灭了，要么被俘虏了。

在武汉地区部署了部队的白崇禧向中共在3个不同地区的代表那里派遣了自己的代表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白崇禧在把他的两个师往上海和南京地区调遣。他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的职务。

蒋介石的作用

我们知道，蒋介石让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是为了在自己退休之后依靠孙科掌握政府的实际权力。共产党人有一些材料证明，蒋介石在退休后继续领导着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将在南部的浙江沿海地区组织防御。

关于南京和上海市

国民党将不会为南京和上海奋力而战。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

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

关于进攻的准备

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得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2万人进行培训。

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还需要一些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关于夺取南京

人民解放军应当把夺取南京推迟到4月。当然，现在可以转入进攻，但获胜的机会将达到80%。在4月份获胜的机会将是100%。

为了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

北平地区的局势，对傅作义军队的改编

北平的局势是复杂的，需要一些时间来巩固这里。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

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4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一个由7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4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0多万人的傅作义部队将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调遣到北平的东北，一部分调遣到北平的西南，应在这里对他们进行改编。

由于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摧毁，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这一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

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

此后进入第二阶段，这时将把较为反动的军官从各师中排除出去。声名狼藉者应立刻从军队中开除出去，而其他人要被送往政治培训班，然后大部分人被遣送回家，而部分人可以用于对后备力量进行培训。

第三阶段将进行真正的改编，以便把国民党人混编、融入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人和人民解放军的比例为3：8。

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进攻的暂停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2—3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

毛泽东说，还需要3周的时间进行准备，来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以便在此之后把北平作为首都，组建联合政府。

我当时问他，在南京解放之后，是不是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

毛泽东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首先是因为还不知道，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第二，转到他们一边的9/10的活动家都认为，北平，而不是南京最适宜作为首都。第三，在同斯大林的通信中他得到了建议，应遵照这一建议，即在解放北平后在这里组建政府，不应拖延。

我说，我知道这封信，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那么他对此是同意的。因此我请求毛泽东说出自己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

我说，尽管取得的胜利和北平的解放使得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把联合政府的组建等到南京的解放，但如果在解放另一个首都之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话，在道德上的威望会更高一些。这不排除，北平而不是南京可以成为常设的首都。

毛泽东回答说，他本人支持我的看法，最好把联合政府的组建推迟到解放南京之后，在6—7月组建联合政府。

我回答他说，如果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联合政府，会增强其在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力量，那么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必要的拖延会削弱革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中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威望，能够对非党的群众具有号召力，也不能解决可以颁布法律的国家权力问题，而这是一切所必需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些看法，并说，4月可以夺取南京，5月或者6月可以组建联合政府。哪怕国民党人自己试图在此之前组建自己的联合政府，这也不会给共产党人带来损害，不能妨碍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组建。

关于联合政府组建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我们会再次讨论。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指示的话，请通知我。

关于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的常设代表

毛泽东问我，是否会在这里待很久。

我回答说，我认为，用4—5天来讨论问题就够了。

他问我，是否会任命一名联共(布)的常驻代表。

我回答说，我们的联共(布)中央同意满足您的请求，近期会任命常驻代表，并派往你们这里。我的这次到访是因为，为了共同的事业，你现在的访问被取消了，但你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一些问题希望现在就予

以解决，不要拖延。

因此，我请求他谈谈他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一些问题，我将通报给我们的联共(布)，我们现在就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这种途径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解决。

关于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

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想在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之后到莫斯科去访问。

关于中共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

现在他想同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他说：“请考虑到，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

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

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

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毛泽东补充说，对于确实犯下的错误他们会切实地改正，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46年却忘了。如果在1946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1946年再版了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

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

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年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

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如下一句话：“尽管中国落后于俄国，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工人和英国的许多工人都觉悟。”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12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就问毛泽东，他认为是否正确，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12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

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之后，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中国革命取得目前的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

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

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

毛泽东指出，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米高扬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60-67

№1646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

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是在1949年1月31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谈了下面的事：

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说，成立政府的准备工作与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有关，此项工作需要3周左右时间，然后才能在作为首都的北平组织联合政府。

我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南京解放之后，是不是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对此，毛泽东作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理由是：首先，不知道这是否有好处；其次，转到他们一边的9/10的活动家都认为，北平，而不是南京最适宜作为首都；第三，在同斯大林的通信中他得到了建议，应遵照这一建议，即在解放北平后在这里组建政府，不应拖延。我说，我知道这封信，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那么他对此是同意的。因此我请求毛泽东

说出自己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我说，尽管取得的胜利和北平的解放使得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把联合政府的组建等到南京解放，但如果在解放另一个首都之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话，在道德上的威望会更高一些。这不排除，北平而不是南京可以成为常设的首都。

毛泽东回答说，他本人赞同如下看法：最好把联合政府的成立推迟到南京解放之后，在6—7月份成立。我回答他说，如果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联合政府，会增强其在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力量，那么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必要的拖延会削弱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中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威望，能够对非党的群众具有号召力，也不能解决可以颁布法律的国家权力问题，而这是一切所必须的。毛泽东同意这些看法，并说，4月可以夺取南京，5月或者6月可以组建联合政府。哪怕国民党人自己试图在此之前组建自己的联合政府，这也不会给共产党人带来损害，不能妨碍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组建。

关于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

稍稍休息后，毛泽东提出了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的问题。他要求派遣政治上成熟的同志作为代表，这样可以与他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他要求给该代表处配备10人，其中有懂得汉语的同志，以便能够对中共中央发送的材料进行研究。

我回答说，我们的中央原则上同意设立这样的代表机构，现在正在挑选干部。

接下来毛泽东说，我在这里待4—5天时间太短了，他们要我在他们那里待上10天。但我回答说，争取在5天之内同他们结束所有问题的讨论。这时我告诉毛泽东，有两名定时炸弹和窃听装置的苏联专家同我一起到来，以便为中共提供帮助。毛泽东对我的这一通报非常满意，并感谢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

国内战争前线的局势和中共的武装力量

在谈到在汉口战场上的白崇禧部队时，毛泽东说，白崇禧是一个最阴险的将军，跟他斗比跟傅作义斗更复杂。但是我们准备战胜他，况且他对蒋介石采取两面派的政策。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他想要在离开汉口时不被人认为，他是撤退或者投降了。因此在我们包围他之前，他会自己把汉口地区让出来，撤到广西省。他的代表与我们有联络，我们对白

崇禧的心态有所了解。

后来毛泽东指着地图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战场的战斗情况，重复了昨天会谈中的一些事实。他说，目前他们的武装力量人数超过300万，如果加上经过政治训练的被俘的傅作义的部队，他们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310万。其中220万人是正规军。驻扎在北平—天津的林彪部队共有90万人，约有130万人在南京战场上。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何时准备拿下太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将在今年2月底攻打阎锡山部队。

我问，他们何时准备强攻西安，毛泽东回答说，他们打算在攻占太原之后再进攻西安。他补充说，他们在前线的个别地区可以强攻，并很快夺取城市。但使情况复杂的是，他们急缺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以便通过他们控制新的地区。

毛泽东说，他们正着手强攻长江的准备工作。打算调90万兵力到上海—南京战场，汉口战场也调90万人，35万人调到西安。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组建军事行政机关他们是如何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准备建立军事部。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他们有3条战线：林彪部队作战的华北战线，陈毅领导的南京—上海战线，陈赓指挥的西安战线。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是哪个组织协调各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是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毛泽东又回到前线的问题，他说，3条战线共有4个野战军，其中包括14个兵团或57个军。每个兵团平均由3个军组成，每个军有3个师，而东北各军除外，在那里每个军有4个师。总共有181个师。军中的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领导。每个军、师和团里都有党的委员会。部队里中共党员的人数约占30%。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和政治状况是健康的，没有发现有转向国民党的现象。当然，部队中也有缺点，表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这是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在对此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我们召开党的会议，对发现的缺点进行尖锐的批评，不管对威望是否会有所损害。

军区的领导

毛泽东说，他们有5个中央局。

1.中共中央东北局；2.中共中央华北局；3.中共中央华东局；4.中共中央华中局；5.中共中央西南局。

根据对党组织的这种划分，组建了5个军区，以便于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军区的领导工作通常由中共中央相应的局来抓。

国民党的海军力量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福摩萨 [120] 的局势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在建立海军基地。但是蒋介石的这种企图遭到岛上600万人民的反对。为了巩固自己影响，蒋介石把以陈诚省长为首的备受信任的人员派到了台湾。毛泽东相信国民党的海军和空军迟早会转到人民解放军这一边。他说，已经派代表到国民党海军，特别是长江海军部队。已经有8架国民党飞机转向我们，其中有一架B34型的重型轰炸机于晚间在石家庄地区降落。在轰炸机的指挥人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在葫芦岛上是否有国民党海军的问题，毛泽东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说，现在国民党的海军基地在青岛、上海、广东、福摩萨和福州。

工人状况及其作用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上海和广州都有，但人数不多。

我问起上海的工人状况及其作用，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在农村中有深远的影响，在那里没有竞争者。但城市中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说在学生中共共产党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工人阶级中国民党的影响要超过共产党。例如，日本在上海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合法地工作，它对上海工人的影响是这样的：在上海的50万工人中有20万人受共产党的影响，其他30万人则受国民党的影响。

干部

现在主要问题是干部。我们挑选了约5.3万人，打算把他们派往前不久解放的地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无法管理城市的经济，因此不必急于占领上海。

我说，他只看到管理上海的困难，没有发现占领上海后的许多益处，到时候中国工业中心的一支50万人的工人大军将为共产党工作，他没有看到，这一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许多宝贵的、对党忠诚的干部来加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地，对落后的中国产生影响。对此，毛泽东无言以答。

工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毛泽东说，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取得这样的优势。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我的这些话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青年、妇女工作

我问起了青年、妇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最薄弱的部分。借此机会，我援引苏联的经验强调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对革命的重大意义。对此，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青年、妇女工作。

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随后毛泽东提起了即将与南京政府进行的和谈问题。他说这件事不急，代表团尚未选派，成员名单也没有通知国民党政府。因为谈判的地点确定在北平，北平的傅作义投降部队还未清理完毕，整顿城市的秩序还需两周时间。事实上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2月底可以开始。代表团将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但他们打算与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协商，这是以前预先商量好的。中共中央大约在2月20日前迁到北平。

毛泽东说，去年11月份他们曾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人民解放军将在两年半时间内消灭国民党。就在最近6个月内，虽然我们还没有全部消灭国民党，但国民党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国民党彻底脱离了人民，威信扫地。它的和谈建议，是不得已而为之，耍手腕，是要得到暂时喘息，以便积蓄力量与我们对抗。我们真诚地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他们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跑到奉化，李宗仁接替他的位子，就是明证。国民党政府已名存实亡。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分别逃往各处，如在上海的孙科。CC派在加强对国民党的社会舆论的操弄。至于美国，似乎可以感到，他们不倾向支持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李宗仁、邵力子和张治中身上。国民党政府领导人逃离的这个事实，使英国、美国和法国只得声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声称，他们在等待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已站在我们这一边。

国民党想与我们谈判，但和谈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关于战犯的问题就吓坏了他们，在战犯名单中列出了100多人，而且还不限于名单中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八个条件(李宗仁说他会接受)，我们就委托他们执行这些条件。如果他们不接受关于战犯这一条，就免谈。

为了塑造出民主的形象，讨好我们，李宗仁提出了出版自由。但我们不会上当，我们清楚，斗争在继续，蒋介石背着李宗仁，通过参谋长顾祝同继续与我们作战。汤恩伯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仍然部署在上海—南京战线，陈诚在福摩萨岛准备军事基地，胡宗南部部署在西安，白崇禧部在汉口战场。我们知道，国民党不能组织起坚强的战线，但我们不能不估计局势，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

关于外贸

毛泽东说，未来的联合政府将面临对外贸易的问题。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合同。

我说，这种考虑是正确的，并补充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理解为这是干涉民主国家的内政。可结果是民主国家在市场上相互干扰，直到他们请求我们通过相互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调整贸易关系。我简要地谈了莫斯科六国会议 [121] 取得的成果。

回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

但对外贸易要被垄断。我们首先要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只有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产品，才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

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

后来毛泽东转到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对外联系，毛泽东指出，当时这种联系局限于与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特别是与美国记者的被动交往。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诸如沈阳、天津和北平这样的城市，那里实际上面临着如何与所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领事馆建立关系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把他们当做是与我们有一定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机构的代表。因此我们只限于保证领事馆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当侨民来看待。

此后毛泽东提到在中国境内限制外国电讯社和出版社的权利的问题。禁止电讯社独自活动，外文报刊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社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注册。

毛泽东指出，这些限制牵涉到苏联出版社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他想跟我们商量，以便使这些出版社的领导在名义上是中国的，实际工作由苏联公民负责。

在讲到外国企业时，毛泽东强调说，外国企业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它们的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他提醒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定。原则上这个决定仍有效，但实行时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

毛泽东说，毫无疑问应该禁止外国人使用无线电台，但个别情况可以例外。他举了一个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无线电台的例子：电台的密码我们已经掌握，再禁止使用对他们已经不利了。

毛泽东说，随着南京的占领会产生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问题在于立即接受承认还是拖上一年半载之后。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延缓时间对我们有利，这样我们可以放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使我们更加巩固起来，而接受承认则使美国、英国更便于进行破坏活动。为了赢得时间，我们不会要求美国、英国立即承认。

在继续谈论关于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可能性的想法时，毛泽东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毛泽东补充道，有消息说，美国准备承认我们，英国肯定跟在他们后面。这些国家承认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同时为了和我们做生意。承认的益处到底何在？这将为我们打开通向别国和通向联合国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第一种道路，即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拖延一些时间，巩固自己。

最后，毛泽东请我根据共同事业的利益来阐明苏联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实质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 ф.39 , оп.1 , д.39 , л.7-16

№09029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1949年2月1日)

美国司司长Ф.Т.奥列霍夫同志：

兹通知您，我们对1949年1月31日17时的信(第83/1ДВ号)作以下补充：第一远东司认为必须拒绝美国大使馆在1949年1月17日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请求——帮助美国驻大连领事馆代表乘车去奉天，理由是苏联当局没有授权可允许乘火车去东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第88/1ДВ号

АПРФ , ф.100 , оп.42 , п.292 , д.73 , л.4

№3439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2月1日)

绝密

急电

斯大林：

军事问题、承认联合政府问题

我尽力在我最近几次的通报中详细地转述谈话内容，但是，由于解码的困难，来不及解码，尽管有两个人为此工作。因此，接下来我不得不通报得更加简略一些。

1月31日，从晚上6点到凌晨2点我同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详细地解释了军事问题，但重复谈了很多，谈论了军队的建设、在国内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的 strategic 计划，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国外大国对联合政府的承认问题，这明显是在说服我们在这一联合政府成立以后马上就予以承认。还谈论了其他的对外政策问题。

由于已经很晚了，并且为了对所提问题好好进行考虑，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请求第二天再进行会谈。

详细情况另外电报告知。

关于联共(布)驻中共的代表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关于设立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处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请求派遣一名负责的政治代表，同其可以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希望代表处能有1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会汉语的人员，以便对中共中央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我回答说，我们的联共(布)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了组建代表处，正在挑选干部。

看起来，是出于东方的礼节，毛泽东说，我到这里4—5天太短了，希望能够待上10天。

我回答说，希望在5天内结束对所有问题的讨论。

米高扬

2月1日

№3439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 (1949年2月1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1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

现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报告。

今天上午12点，毛泽东的助手周恩来和朱德到了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倦，他感到不舒服，请求把原定的会谈推迟一天，而今天则同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阐述了中共同国外大国、主要是同美国对外交往的历史，阐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他们应该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奉行友好政策。

昨天毛泽东和今天周恩来阐述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主要归结如下：

1.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暂时不提他们的特权，但被国民党没收的日本的财产除外，这一点仍然有效。

3.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

正如他所表示的，尽力用铁幕把毫不相干的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除外。

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今后禁止国外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

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

国外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

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外交人员除外。

8.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9.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

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14.关于对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承认问题，应当在两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关于这一点他们会征询我们的意见。

关于对新政府的承认

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 and 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些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在这一问题上使他们惊奇的是，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让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让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以后再争取他们承认。

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我们的联共(布)中央报告一切情况，中央会讨论并做出答复。而且时间紧迫。

关于对外国财产的态度

在昨天的会谈中，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这些企业要谨慎，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他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财产的决议，并在当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落实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

在谈话的开始，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在昨天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财产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把日本的、法国的财产收归国有，也可以把英国的财产收归国有。

对美国的财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以便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態度再作决定。

在我谈了这些话之后，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预先采取的立场的构想，根据这个构想，在新政府成立初期，不打算把外国财产收归国有。

关于罗申之行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并把部分使馆机构留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中共期待我们联共(布)中央对所提上述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需要在我离开前后作出答复，因为事态紧急。

米高扬

№34393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1949年2月1日)

A.И.米高扬1949年2月1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同南京政府的谈判、关于中共中央迁往北平

在1月31日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到了关于同南京的和平谈判问题。

中共对此事不急。正式的代表团还没有任命，关于人员的组成也没有向南京方面通报。

因为谈判的地点定在北平，因此谈判暂时还不能开始，因为还需要2—3周使北平恢复秩序。

事实上谈判将在2月底开始。

代表团将只有共产党人组成。关于和谈，将同与中国进行联合的党派进行磋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相关代表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还通报说，中共中央将在2月20日迁往北平。

关于定时炸弹和装置的苏联专家

我通报说，有两名定时炸弹和装置的苏联专家同我一起到来，以便帮助中共。对此毛泽东非常满意。

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表示了感谢，感谢其对中共的关切。

米高扬

2月1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74-75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白天，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和翻译师哲到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惫，他感觉不舒服，请求将例会改天举行，而今天继续与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里，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与外国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对外关系，谈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它们应当在平等和互相 [\[122\]](#) 的基础上奉行友好合作的政策。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在详尽通报中共的对外关系时，周恩来说，战争期间，直到1944年他们都没有对外联系。1944年美国史迪威将军派了一批美国观察员到延安，他们从1944年4月一直待到1946年3月延安沦陷之前。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已经奉行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对待马歇尔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例如我们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因委员会受美国控制。此种情况下，我们要求遵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在与马歇尔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美国想控制我们的部队。我们(在1946年2月)与美国缔结了改编军队的协议，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遭到破坏，国内战争又打起来了，我们的代表处撤离了南京。此时起我们开始有力地揭露美国。虽然我们中断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们还不断通过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士想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也只限于听取美国人同我们建立关系的愿望。

至于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受到的损失比国民党大，我们只得到其提供给中国的所有物资的2%(5万吨)，尽管我们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物资。我们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氮肥来制

造弹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有许多间谍，但也有帮助我们的人。

此后周恩来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众所周知，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基地。苏军到达东北以后，日本投降了。美国开始逐步召回自己的观察员，后来从中国撤军了，可是它在军事上继续帮助国民党。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我们打死了一些参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美国人。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期间。魏德迈得知一个美国士兵被打死后，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可我们回答说了解不这回事。第二次是在天津的近郊，一队美国兵借口寻找丢失的士兵，进行间谍活动。我军向他们开火。这次事件我们立刻通过无线电广播出去了，可美国人否认这一事实。第三次发生在天津—北平的道路上，当时美国兵蓄意进入我地区。互射中一个美国兵被打死。马歇尔向我们提出了抗议。第四次是在青岛地区，在与一群间谍分子的互击中一个美国兵被击毙，另外三个被俘。美国又向我们提出抗议，后来前来同我们谈判，签署了文件，承认他方应承担责任。第五次是在去年，一架美国侦察机想送一位美国少将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少将被我们俘虏了，自1947年5月份起他一直被关在山东，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将军。美国人装作不了解这一事件。第六次与美国人冲突是在天津机场地区，美国人那里当国民党教官。我们的游击队员破坏了机场的军事目标。之后美国人召回了自己的代表。

总结上述事件时，周恩来说，我们不应挑衅美国人，但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在报刊上骂美国，因为这有助于用我们需要的精神对群众(工人、农民、学生)进行教育。

后来周恩来说，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诚然，也有部分人，甚至是部分进步人士还害怕美国的力量。

周恩来接着说，当我军去年占领沈阳后，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清楚，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对苏联和我们搞间谍活动。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在采取措施孤立他们，给他们制造一些难以忍受的条件，迫使他们撤离沈阳。今后我们将提出关于在对等基础上建立领事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说，总之，我们要把美国攥得紧紧的，因为“我们与他们打仗，不与其他大国打”。美国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孤立他们。

关于对联合政府的承认

此时周恩来的发言转向对未来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他先请我解释苏联大使罗申为何去广州。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留下部分使馆机构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后来周恩来继续谈外国大国承认未来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请求我们对承认联合政府的两个方案提出建议，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和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按民主党派的意见）他们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苏联要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它们承认。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同时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党中央汇报所有这些情况，中央会讨论并作出答复。

关于处理外国资产

在昨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

这些企业要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周恩来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议，对这个决议当时共产国际是同意的。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执行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资产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对日本、法国的资产实现国有化，尽可能也包括英国的资产。至于对美国的资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的再作决定。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政策的预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外国资产不实行国有化。

对外政策的原则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论点阐明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原则。

1.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保护外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暂不提他们的特许权)，除已经没收的国民党资产外，这个政策继续有效。

3.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尽力用铁幕把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除外。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今后禁止外国人、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国外教会学

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8.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除外交人员外。

9.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谈到外贸，周恩来说，首先他们将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产品供应给这些国家，而多余的供应给资本主义国家。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想和日本进行贸易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尚未讨论过，但要认真考虑，并同我们商量。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哪个党负责外交部工作的问题时，周恩来肯定地说，部长一定由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非

党人士。因此，周恩来说，他们在天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各种对外政策的文件进行研究，以便外交部对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17-24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 (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晚，周恩来和朱德就军事问题向我通报情况，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中方还有翻译师哲参加，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伊斯兰教徒问题

会谈一开始提出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和个别国民党伊斯兰教徒将军特别是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是谁在对他们进行支持的问题，周恩来在回答说，这些伊斯兰教徒将军得到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支持。美国人想向青海和甘肃省的伊斯兰教地区渗透。随着我们取得了胜利，伊斯兰教将军和他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不稳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是否有一些要求，周恩来回答说，伊斯兰教徒想获得自治权；他又说，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谨慎对待他们的宗教，他们会与我们合作。

周恩来着重指出，伊斯兰教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表现在伊斯兰教将军的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是伊斯兰教徒，而普通士兵则是汉族人。对伊斯兰教部队我们目前采取的政策是：先是保存，后是逐步解散。我们无论如何不准备将他们建成民族部队。这一点只能在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工作以后，才能提出来。

对内蒙古的政策

周恩来在讲到傅作义时说，显然他属于西北军阀集团，但他的部队

里大多数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为了高价将北平和平地出让给我们，现在他正和我们讨价还价。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内蒙政策很容易被当地的蒙古居民接受。高岗曾受特别委托到蒙古去过，他因党组织所犯的错误的，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错误在于对当地的蒙古亲王和喇嘛采取了“左”倾路线，没收了亲王上层人物的土地，至今他们手中没有大权和武装力量。可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让亲王参加蒙古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年轻贵族的代表，我们还了解到，甚至有些年轻亲王还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内蒙有资格成立自治区。

国民党海军

蒋介石的海军基地在台湾(省长陈诚手下有2万人的部队)、福州、广州。海军有271艘舰艇，都是美国送的。

从接下来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没有一艘海军战舰，也没有一艘战舰转向他们一方。

国民党部队

接下来周恩来对各条战线的国民党部队作了一番评述。他说国民党的主力在上海—芜湖—南京战场。这里集中了约58个师，约有38万人。蒋介石尚未撤退，但已经准备由此向南，朝汉口和南昌方向逃离。这个战场的总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将军。

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战场在汉口地区，由白崇禧将军率领。有32个师，近21万人归他统率。白崇禧也准备通过长江撤到南方。

国民党部队的第三战场在西安地区，由胡宗南统率，有36个师或19万人。

蒋介石就依靠这些部队，总共120个师或80万人。因此，如果我们投入181个师即200万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经不起我们攻打的。

对国民党领导人(宋子文、张治中、邵力子)的评价

谈到宋子文，周恩来说，他在广州避风头，因为他不是军人，对我们来说不构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他准备逃往美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大发横财。蒋介石对他不满，因为他没有完成在南方组建6个师的任务，而我们则在海南岛建立了游击区并在那里控制了5—7个县。我们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都有游击基地。

在评价张治中将军时，周恩来说，他当然是蒋介石的人，但正义迫使他改变；虽然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可是他脑子非常清楚，他不能不看到新生力量的必然胜利。1927年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时，他离开了蒋介石并公开声明，他不会反对共产党。日本投降之后，他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又重申了这个声明。他考虑到苏联的力量，知道苏联是不好惹的，所以一直讨好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利用了他的“亲苏”情绪。我们知道张治中急切想去兰州，其目的是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力量，与我们联系，为自己在即将建立的联合政府中留个位子。他能否参加联合政府要看他是否肯交出自己的部队。如果交出，我们把他作为投诚我方的人员吸引过来。我们对他不抱幻想，我们知道，他是正统的国民党分子，如果他转到我们方面，可以预料，他将成为吸引不满分子的核心。应该注意，这个人千方百计想在苏联心目中造成良好的印象。

原驻苏大使邵力子比张治中好些，但也是蒋介石的追随者。他对苏联有些了解，但总的来说，摇摆不定。

我们与新疆民主团体没有联系。当时在新疆的共产党人都被盛世才逮捕了。现在我们派了一个不大的党员干部小组去那里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提到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时，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统一的后勤部和军需部，我们准备进行整顿。首先从统一军事工业开始。1948年起军事工业才开始发展，且主要在东北。军火弹药工厂主要在沈阳和太原。我们现在生产炸弹、炮弹、炸药、山炮、机枪和榴霰弹。弹药最主要由沈阳的军火工厂供应。与过去几年相比，弹药生产增加了50%。有些弹药我们从北朝鲜得到。

我们现在约有90万支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约8万挺重机枪，约6万支自动机枪，1万多门加农炮和6000多门迫击炮。我们现在缺少山炮和高射炮，高射炮我们仅有108门。因此我们希望苏联能供应我们一定

数量的日式、德式或捷式高射炮及弹药，以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

人民解放军的军需申请

周恩来说，我们感到缺少大量的反坦克炮，总共只有150门，因此请苏联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坦克的情况也不佳。现有的坦克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我们缴获了70辆坦克，大多数都受损严重。原料也缺乏，我们想从苏联进口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我们还希望苏联派遣专家，供应生产武器的设备，同时希望派遣组织军队、组建军事院校、建立后勤部门(包括军事工业方面)的顾问。

我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同意在组织武器生产、派遣顾问等方面给予帮助，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还不能表态，我将汇报给莫斯科进行研究。

周恩来继续说，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钢轨、汽油、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一些物资。对此我回答说，这些申请要向我们的政府提出。

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工作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说，在对军事战役的领导中，情报工作特别是无线电截听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与国民党相比，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周恩来说，我们能破译国民党，甚至美国的密码。

关于组织军事部

关于组织军事部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打算是，在军事部中安排共产党员，可能军事委员会中会有部分国民党将军，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周恩来说，所有的军事问题将在不久以后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讨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 ф.39 , оп.1 , д.39 , л.25-30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0)

(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米高扬：

现把我们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转告给你，并把对其他问题的答复推迟到你返回莫斯科之后。请让毛泽东知晓我们的答复。

第一，在对各种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在对中国同志的看法进行了了解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组建政府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这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

第二，中国同志通报说，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是比南京更适合的首都，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当然，从战略上来说，相比南京，北平是更适合的首都。如果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较适合的话，那么就应把北平作为首都。若干年后，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把罗申派往广州是为了进行侦察，以便他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关于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況。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一些次要的人员派往了广州，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局势原本就是了解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大使派往广州，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大使派往中共的地区，当然，是作为自己的情报人员派去的。我们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四，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

如果能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对苏联机构的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建议就

好了。

第五，关于其他问题在米高扬返回莫斯科后进行答复。

斯大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76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

向您通报关于工会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问题。

在会谈中，毛泽东抱怨说，在夺取大城市和大片的领土之后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在解放区流通9种货币。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对这件事非常不了解，更不要说，由于缺乏纸张，来不及印制货币。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反对投机、怎样稳定价格，该怎样实行票证制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指出，拥有正确的货币体系和银行机构，对于管理经济都是重要的，并且表示，我们愿意派遣货币和银行体系方面的专家提供帮助。

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关于罢工

我就此指出，必须关心工人的需求。工人希望新政权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在此方面共产党应帮助工人。

不应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不是由其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的阶级——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未来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它将不断成长，在社会中的意义不断增长，而其他阶级的影响将不断减少。

没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动，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毛泽东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他满意地强调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有的，在这里没有竞争者。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如果说共产党在大学生中有强烈的影响，那么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比共产党大。

比如，在上海，在战胜日本之后，当共产党合法活动之后，它对50万工人中的大约20万有影响，其余工人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关于对工会的领导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在这一问题上他指出，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

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中取得这样的优势。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能够，而且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

这部分谈话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反驳，并且觉得，这是中共最大的弱点。

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要求共产党人转向城市，一刻也不要耽搁。

我们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将以自己所有的威望来帮助中共，帮助他们改进对城市的政策和对工人阶级的政策。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77-80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在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

斯大林同志：

2月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和朱德用3个小时向我通报了军事问题。

我将把这些信息带回莫斯科。

总的来说，他们的请求归结如下：

1.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炮和炮弹，以便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现在他们有108门高射炮。

2.我们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他们现在共有150门反坦克炮。

3.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器。

4.在商品流通中列入一些原料，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

5.提供一些顾问来组建军队、军校，来组织后方，其中包括军事工业。

我回答说，我们在原则上同意对武器生产的组织提供帮助，并提供顾问，关于提供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问题无法答复，我将向莫斯科报告，进行商议。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1-82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 (1949年2月2日)

绝密

1949年2月2日白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向我详细通报了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政策问题。

对方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我方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任弼时把他报告的经济问题材料分为四个部分：(1)财政；(2)商业；(3)工业；(4)农业。

一、财政

征税

任弼时在谈到解放区的财政状况时说，解放区有2.09亿人。纳税人是1.84亿人，其他人不纳税是因为他们住在与国民党的交界地区，或者住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有548万人(成年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占纳税人总数的3%。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任弼时说，纳税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从事非

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将达到600万人。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员中有400万是军人以及对其提供服务的机关的人员，有200万人是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干部。工人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以上所述，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人数的比例是在3%左右。如果超过这个百分比，我们就不能弥补开支。我们觉得，人民的纳税负担还很重，但是战争的需要使我们增加了开支。

他们认为，由于解放区的基本纳税人是农民，他们每年要从平均年收成的200公斤左右小米中拨出30公斤上交(按人头计算)。

谈到征税问题，任弼时说，他们过去采用累进税，现今，随着土地分配的实行，正在采用级差税。在实施级差税的过程中，要估算近5年来的经济总收入和平均收成。税收按实物计算，以小米的价值为计量单位，以粮食、纺织品和牲畜(很少情况下)交税。一般来说，很少用肉来交税，因为畜牧业不发达。给士兵的肉的数量很少，每人每月500克，东北是800克，油每天2克。中国士兵的配给量实在太低，一个美国士兵的开支可以养活20个中国士兵一年。

税款收入项目有农民税——59.50%，商业税——13.9%，企业收入——19.8%，战利品收入——8.6%。他们认为，解放区现有的税收较高，比国民党的税收稍低一点。解放区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的城市税收低好几成。烟草、盐、火柴等物品的间接税收开展得还不够，因为他们现在才开始抓城市经济。

总的来说，解放区纳税人负担比国民党统治区要轻些。任弼时说东北的烟草税收是其价值的50%，而国民党统治区是80%。国民党地区盐的税收是其价值的10倍以上。

任弼时说，近几年来他们顺利地酒类实行了垄断，他们准备对盐和烟草也实行垄断。

预算

任弼时说，预算收入我们是根据小米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货币来计算的。1949年国家的所有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是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即亏空2.5亿美元(根据实际时价)。用小米计算的方法只在解放区，不在国民党地区实行，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小米被认为是较为稳定的货物。

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下列3种来源实现(没有说明来源多少和来源种类)：

1.增加城市的税收；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内债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在美国无法借到外债，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发行了4次纸币。几乎每个解放区都发行了纸币。结果在华北解放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4倍，在东北增加了25倍。因此物价飞涨，例如在东北物价提高了7倍，华东地区6倍多，西南地区8倍。

我提出了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货币的问题，任弼时回答说，国民党地区流通两种纸币：老法币和1948年8月19日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流通的金圆券。根据国民党的法令，从1949年1月1日起法币停止流通，金圆券作为合法的纸币。起先，金圆券的汇率是1美元等于4金圆券。现在金圆券大大贬值。我们储备金圆券，任弼时说，是为了在国民党地区购买我们必需的物资。

国民党地区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货币改革到现在价格涨了1250倍。国民党地区发行金圆券是为了榨取人民手中的黄金，但是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任弼时重新回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问题，他说，过去几乎所有的解放区都发行了八九种纸币，而且几乎在每个解放区，这八九种纸币又分成不同地方流通的纸币。当然，这对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48年12月通过了将解放区(除东北以外)流通的纸币兑换成解放区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的决定，这个决定已经实施。换算的方法是：山东省一个新元换算100旧元，西北地区一个新元换算2000旧元。这样换算所有旧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的预算赤字得不到弥补的话，那么新元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新元将贬值2/3以上。他们认为，尽管解放区纸币价格下跌，但是解放区的下跌的程度比国民党地区小，人民还乐意接受。

由于必须发行纸币，他们感到缺少大量的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

年需要1万吨纸张，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二、商业

任弼时说，他们准备没收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商业企业，虽然他们尚不清楚这些企业的数量。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企业在天津、青岛和北平，属于谁的，数量有多少不了解，但知道宋子文在天津的纺织厂有32万个纺锤。

我问，他们是否有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任弼时回答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料，要没收哪些企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

谈到对外贸易时任弼时说，如果说直到前不久他们的对外贸易仅仅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使对外贸易服务于恢复经济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目前解放区正在通过东北与苏联、朝鲜和香港(通过大连港和北朝鲜)进行贸易。仅仅在1947—1948年，各种货物(主要是粮食、肉类、蛋类)的出口量就达到59.8万吨，占总出口量的58.6%，而进口额是293亿东北元，64%进口货物用于军需，铁路和工业设备占8%，民用需要占28%。1948年解放区进口了3000台机器。

任弼时说，解放区的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将运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它们不感兴趣的商品才供给资本主义国家，调换所需的货物。他们需要进口的商品的金额很大，这些金额可以用自己的商品换取。1949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我们感兴趣的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在现在的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任弼时举山东省为例来说明1949年有些解放区准备出口的商品。1949年上半年山东省各种出口商品的总额将达到660万美元。出口品种：花生油——28%，烟草——14%，黄金——11%，其他商品是粮食、鬃、海货和淀粉。

此后任弼时说，他们打算垄断外贸，主要的商品交易通过国家组织进行，在大的港口城市也允许进口业务通过私营企业进行，但必须在国

家的监督下。在初期他们不准备签订国家之间的商业合同，只进行部分的贸易业务或易货业务。他们请我们派遣顾问，帮助进行外贸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犯错误。

我问，他们打算何时实行外贸垄断。任弼时回答说，很可能要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在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的原则方面，我说，应该与莫斯科六国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原则相符。

三、工业

然后任弼时转到对中国解放区工业的评述。他说，根据约略的计算，全中国的煤蕴藏量为2650亿吨，铁矿蕴藏量40亿吨。煤和铁主要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些地区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东北的铁矿蕴藏量占全国的78%，山西煤的蕴藏量在占全国的51%。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全国80%的煤和75%的铁。

1948年我们在东北开采了4000吨铁矿，在华北开采了1.6万吨。

[125] 1949年我们计划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开采更多的铁矿和煤。

我们手中掌握了77万多个纱锭，即全国纱锭的15%。我们拥有1.18万台纺织机，占全国纺机的23.9%。

过去东北每年的铁矿开采量为200万吨，而现在是15万吨；[126] 过去煤的开采量为2600万吨，而现在是1000万吨。

全国森林面积的3/4(33亿立方米)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开采了600万立方米。今年准备开采350万立方米森林。

任弼时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很重视东北，想把它变成全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东北应该能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同时他还说，在发展东北工业的工作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列举了下列几种援助方式：

- 1.建立苏中经济联合体；
- 2.向苏联借款；

3.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

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附近以及热河省的稀有金属如铀、锰、铜和铝等需要苏联的援助。以前被日本人夺走了1吨铀。如果苏联对这些矿物感兴趣，我们可以提出共同开采或者租让给苏联。

任弼时强调说，开发东北工业需要业务水平较高的专家。在鞍山冶金联合厂他们只得利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说，我们请求苏联为我们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专家。

四、农业

任弼时简要地叙述了解放区的农业状况。他说，1948年粮食种植面积是3500万公顷，收成是4120万吨，如果按农业人口1.07亿人计算，每人平均3亩(1/16公顷)地的播种面积，每亩的收成为245公斤小米。

任弼时说，华北是主要产棉区，有1200万亩棉花地。1948年棉花种植面积为62万公顷，1949年为75万公顷，据我们平均统计，1公顷地可生产240公斤棉花。

任弼时强调指出，棉花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作用。棉花缺少，我们只得从美国进口。例如我们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

对此我说，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表示完全同意。

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棉花的产量增加到1.8亿公斤。

在讲到东北的农业时，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该地区的农业收成提高12%。

他们设想1949年在下列各地粮食作物收成达到：华北——1185万吨，山东——610万吨，东北——1400万吨，察哈尔—热河省——260万吨，共计3430万吨，[\[127\]](#)比1948年增加250万吨。

会谈就此结束。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在1949年2月3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2)

(关于对大城市和脱离群众的担心、关于武器弹药的请求)

米高扬：

请把这封电报的内容转告毛泽东。

第一，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同志获得了大多数农民和大学生的支持，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少同大工业中心打交道。

无论如何都应消除这种不足。大城市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不仅不需要害怕大城市，而且相反，应努力尽快夺取它们，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堡垒。工业化是中国独立的基础，而如果没有掌握大城市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

根据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若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并对其进行领导。需要在工厂、铁路组建工人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需要打开门户，接受劳动知识分子中可靠的工人和职员加入共产党。需要不通过罢工或者借助罢工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对工人的生病、伤残和年迈进行保障。工会领导人应是经受考验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抛弃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些人，并将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工会应当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你们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制定劳动法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无论怎样都应获得工农青年的支持，掌握妇女解放运动。在

青年工作方面可以建立类似“青年爱国者联盟”的组织，在妇女运动方面可以组建“妇女民族联盟”这样的组织。

第三，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

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9/10的干部或者都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需要把更多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把青年军官送往学校或者送往对工业、农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大城市等进行管理的特别的学习班进行学习。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学校，需要尽快建立。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当然，最初的时候俄国专家会帮助你们管理好国家。但俄国专家只是沧海一粟。你们需要千千万万中国自己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管理国家。你们赢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干部，你们无疑会失去中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一些人到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类专业。

第四，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我们会尽量帮助。三硝基甲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斯大林

1949年2月3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3-84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128\]](#)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3)

(关于南京方面把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撤离区运往南方)

米高扬：

提请毛泽东注意如下问题：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南京方面正在把银行和其他机构中的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各撤离区和城市运往南方。最好对南京方面提出一项谈判条件，无条件返还所有这些贵重物品，将其转交给人民解放民主政权。 [129]

斯大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5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电(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0830和№0833号电报的执行)

斯大林同志：

您的第0830和第0833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关于中国同志对苏联机构的建议另行电告。

米高扬

1949年2月3日19时10分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6-88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 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A.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关于向苏联供应食品)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就对外贸易问题阐述了一些主要的原则，在另外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在第三次会谈中，受毛泽东的委托，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实际计划。

他们谈话的主要意思可归结如下：

1.中国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只有他们不感兴趣的出口商品才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以换取中国需要的商品。

2.他们需要很大金额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可以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

3.今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

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

我们感兴趣的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4.他们打算对对外贸易进行垄断，主要的贸易活动通过国有组织进行，但也允许一些大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通过在国家监督下的一些私人组织进行。

5.最初不打算签署国家间的贸易条约，这指的是进行单独的贸易和商品交换。

6.他们请求我们的顾问对对外贸易进行组织。他们担心自己会犯许多错误。

关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原则，我说，这些原则与在苏联召开的六国会议协商的原则是吻合的。我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工作情况。

我拒绝对1949年相互供货的清单进行讨论，我说，当他们向我们转达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其进行审议。

米高扬

2月3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6-88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白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和任弼时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没收四大家族、帝国主义、战犯的企业及外国企业

会谈一开始刘少奇就说，他们的经济政策首先要没收四大家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的资产和工业企业。

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四大家族资产总量的资料，对此刘少奇作了否定的答复。接着他说，他们还准备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战犯的部分资产。对外国企业，他们考虑实行没收和赎买政策。刘少奇强调说，对外国企业马上实行没收政策有些困难，因此需要逐步进行。他说，对于外国军工企业，例如在青岛的军工企业，或许我们会较快地没收。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说，他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接着刘少奇说，没收的外国企业以及四大家族企业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谈到英国人管辖的开滦煤矿时，他说，煤矿一年内可以开采500万吨煤。那里约有6000名工人，今年与英国签订的开采合同到期，因此，英国人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要求帮他们协调煤矿的事，帮助他们把煤运出开滦。这说明英国企图与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才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没有可能。

我问，他们是如何区别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刘少奇回答说，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包含租让企业，这些企业使用国家的原料，但出产的产品要交给国家。东北有一些私营烟草企业，由于我们实现了烟草垄断，所以全部产品就交给国家。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将努力通过条约将外国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外国人不愿出卖自己的企业，我们将按照法律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赎买银行和全长约600多公里的昆明—海峰(Хайфонг)铁路。

我问，是否有外国军工企业。刘少奇回答说，直接生产军火的外国企业没有，但与军事工业有间接关系的外国企业不少，特别是冶金和化工等其他企业。美国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和从出口到美国的电缆都应归入军工企业。大部分外国企业都应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对待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问，他们打算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对此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过，但他们认为，目前对他们要谨慎些，不要过分地触动他们。以后，等到我们壮大了，我们就会向他们发起进攻。现阶段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总政策是：不赶走他们。将来我们占领了沿海的省份，我们的干部成长了，国内的总形势明朗了，我们将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到那时候，我们会编制一个应予没收的企业名单。但现在我们认为，对买办资产阶级应谨慎。

刘少奇说，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由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一年半以后就可以提出收归国有的问题了。

我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谨慎政策是正确的。暂时不必提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国有化的事，最好习惯他们，等政权巩固了，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强调指出，政策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但是目标不变。

刘少奇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再次强调，没收买办资产阶级资产的问题还要再考虑考虑。

我问，哪些人属买办资产阶级。刘少奇回答说，官僚资本也属于这个范畴。

解放区的经济成分

刘少奇说，中国解放区的经济中含有5种经济成分：

- 1.国营成分；
- 2.合作社成分；
-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 4.私营资本主义成分；
- 5.具有自然性和半封建性的小商品经济。

他们认为，小商品经济占最大的比重。合作社经济所占比例不大，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远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例也不大，但会大大发展。他们认为，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达到约10%，尽管它所占比重不大，但是，按他们意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起主导作用。他们把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列入国有经济。

在对合作化进行评价的时候，刘少奇说，它带有参加者互助的性质。

我问，有没有参加合作社人数的数据资料。刘少奇回答说，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也没有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中心机构。他说，目前合作化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计划召开合作社代表大会作为巩固合作化运动的首要措施。刘少奇说，我们已经制订了合作化决议草案，正在建立培训数以千计合作社干部的学校，在组建这类学校方面刘少奇请求委派有经验的苏联合作社工作人员来校讲课。

刘少奇说，我们正在发展下列几种合作社形式：

- 1.消费合作社；
- 2.农业合作社(供应和销售)；
- 3.手工业合作社。

在解释初级农业合作社形式时，刘少奇说，他们指的是在土地和生

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最简单的农民共同耕作联合体。

手工业合作社有农村的供销社，也有城市的供销社。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

刘少奇说，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比起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过渡时期要长得多。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生产者的小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我们认为，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发展经济的各个部门，只限制那些对人民没有益处的部门。因此，我们重点放在发展国营经济上面。同时我们觉得，需要支持个体生产，促使它走合作化的道路。我们也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鼓励有利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有益的。官僚资本的垄断经济应该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

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时间和斗争的残酷性来看，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我们也面临着当时列宁提出的谁胜谁负的问题。

我们估计，向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全面进攻需要等上10—15年，然后我们将把工商企业交到国家手中，以此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刘少奇说，只有在农业拥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将农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国营商业

商业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国营商业，而且它在农村地区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在城市它才刚刚出现。我们对国营商业管理得不好，国营合作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出现了竞争，而国营组织、合作商业组织与私营商业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不良交易。

我们认为，部队工作人员的供应要实行票证制，同时要调整价格，采取措施将私商挤出商业领域。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工业基础

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帮助应对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想，这种帮助的形式可以是：

- 1.传授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的经验；
- 2.提供相关的书籍，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 3.向我们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有了苏联的帮助，刘少奇说，我们会很快到达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要犯错误。我们很清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能恢复东北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了解苏联可能提供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这种援助。

经济建设的错误

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尚未克服自发性和无计划性等重大错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业务水平不高也是缺点。在执行经济政策时，我们的干部把城市的商业企业分给工人，工人们将企业拆分当做商品卖掉，这样的错误不足为怪。实行土地改革时，我们有些人采取了对地主清算的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现在已被禁止。

我问，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的农民占多少比例，刘少奇回答说，解放区约有50%农民得到了土地。土改后封建制度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感到，他们有自己的选举出来的、信得过的政权。这个政权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和免费教育。

刘少奇回到1947年年底在土改中所犯错误的问题，他强调说，有些干部把中农划为富农，没收了他们多余的资产和土地。受非法伤害的富农有4%—5%，地主有1%—2%。

刘少奇说，应该区别对待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和地主。在老解放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产，没收了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资产。可是还给地主和富农留下与农民同样份额的土地和资产。

老解放区全部实行土地改革，而新解放区里只是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在老解放区周围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在今年秋季进行。在不久前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过两年进行。在新解放区目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在谈到关于城市中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时，刘少奇指出了提高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资的错误政策。结果，我们要求私营企业主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就把店门关闭，工人就失业了。在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这样处理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又要有利于企业主。这些错误我们正在改正，但是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错误说明了一种危险倾向。首先，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尽量发展资本主义，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让步，对资本主义投降。这部分人想把中国建成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恢复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制度。其次党内有些有“左”倾倾向的人，他们倾向于冒险地、匆忙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某些人不考虑我们的能力，制订了毫无根据的计划。结果这些倾向损害了工农联盟。刘少奇说，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请苏联为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关于土地国有化

对于是否考虑过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得再考虑考虑。现在我们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我们清楚，如果不限制这种买卖，那就会让资本主义抬头。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刘少奇说，我们没有触动原先的富农，这些富农从性质上讲与地主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趋向：由于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并使他们有权买卖土地，这就会滋生新型的富农。

关于币制改革

我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准备在解放区推行币制改革。刘少奇回答说，要在他们占领全国一年之后进行，暂时他们打算使用现有的纸币。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39-46

(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晚上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翻译师哲也参加了。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等同志。

关于国共谈判中外国调停的问题

互相问候之后会谈开始。我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和法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得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怕丢脸，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再次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

南斯拉夫问题

然后，应毛泽东的请求我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毛泽东问，南斯拉夫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者。毛泽东说，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

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行动的协调

随后，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协调行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看法。他们支持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

作都是通过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因此，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尽早成立像欧洲共产党局 [130] 那样的亚洲国家共产党局。这个问题可以在我军占领了中国南方地区，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

毛泽东继续指出，北朝鲜、印度和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其后力量较强的属日本共产党。在谈到日本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众所周知，1946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野坂参三)坚持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日共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观点。最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所好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还支持美国，但日本人民中的反美情绪高涨。

毛泽东回到成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的问题，他告诉大家，据他们所知，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机构。先由几个亚洲国家，不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亚洲国家局比较合适。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量还不够，而且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问题，毛泽东说，要事先与其交换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提醒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这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中有许多美国和英国间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交往时要小心谨慎。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的共产党进行联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后来毛泽东开始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把党史分成四个阶段：

- 1.北伐；
- 2.苏维埃运动；

3.抗日战争；

4.战后的国内战争。

在谈党史的第一阶段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形成的，那么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时间要晚许多，即1921年。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从1921年到1927年，我们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当时我懂得不多，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努力。虽然中国共产党英勇战斗，得到工农的支持，但是它的基础不牢固。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

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是1927—1936年。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阶段(1921—1927年)党员的人数是5万人，而1928年党员的数量缩小到了1万人。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其他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脱党了。虽然当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党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1930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1928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 [\[131\]](#) 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们的举动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受影响，况且，他们没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讨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他们反对一切，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称刘少奇为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是工会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求作组织上的撤退。1931—1934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甚至夺取了地下党组织和苏区的领导权，指责我(毛泽东)是机会主义

者，把我当做党的右倾路线代表。

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经历了17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至今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在是中共中央第三、第四次全会上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增补的委员中有同王明集团保持联系的非法钻进中央的博古和洛甫。

1930—1931年这个集团发表了小册子，断言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源于他们。后来在我们的批评下，这个集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并不彻底，但这没有影响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

1946年博古参加了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同年4月他与叶挺和王若飞在飞机失事时遇难。洛甫现在东北。他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另外他这个人喜欢饶舌。

关于王明，毛泽东说，至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尽力以说服的方法来影响他。毛泽东说，他有资产阶级的习性。抗日战争期间他犯了特别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没有正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他硬说，当时我军力量很强大，但实际上还是很弱的。他夸大了党的力量，没有考虑那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主张将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那种地位。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转而信任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政治路线。1937年12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召开了武汉会议，1938年3月印发了小册子，号召党脱离中央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

在继续对党史的第二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时他们还得跟叛徒张国焘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以及后来，苏联党的思想帮助我们。例如，1946年斯大林就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上校写了一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132]但是在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撤退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6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3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抗日战争前夕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了3万多人。因此，王明肯定地说，这些力量和日本斗是不够的，坚持要将他们融入到国民党部队里。现在清楚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3万人的骨干，后来造就了目前3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王明的这些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并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还知道李立三、博古和洛甫的错误，他们要求不把他们选进中央。可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过去许多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认识到了错误，退居第二线。党内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争论——是否将王明、李立三、博古和洛甫选进中央，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党的力量，还是推选了他们。

现在李立三在搞工会工作，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对革命的贡献比王明大。他同刘少奇一起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他从未讲过苏联一句坏话，现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是，中共中央与王明之间仍有隔阂。

后来毛泽东说，1936年中国共产党拥有4万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入党的。目前党内已有300多万党员，中央委员44名，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党的队伍里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毛泽东回答说，当然，还发现有，但在党的领导层里要少一些。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47-53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
(1949年2月4日)**

绝密

A.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海军)

斯大林同志：

现就海军问题进行报告。

从与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会谈可以看出，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

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把在长江的这支舰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同海军没有任何联系，连一条军舰都没有，也没有机会使军舰转到共产党一边。

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只限于获得信息。

米高扬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89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
(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米高扬离开中国)

斯大林同志：

2月4日晚上结束了同毛泽东就所有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些信息将另外发送给您。对中国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您转交给我的答复可以不经过我通报给他们。2月5日之后，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他还没有给我们新的委托的话。

我打算在5日离开这里，应毛泽东的请求推迟了一天。

如果对我们没有新的指示的话，我在2月6日拂晓前到达大连。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0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133\]](#)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1)

米高扬：

如果局势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并留在毛泽东那里，至少等到2月8日。

斯大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1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推迟离开)

斯大林同志：

收到了您的第0861号电报，我把自己离开的日期推迟到2月8日。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2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电报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指出，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对从你那里得到的电报的内容都非常满意，在整个晚上进行的长时间的会谈中，他们的情绪都非常好。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3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A.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国外对国共的调停、关于保密问题

在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我向他通报说：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英、美、法企图由自己对国共进行调停。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得知，苏

联和中共反对国外进行调停，这些国家不想使自己难堪，就改变了立场，拒绝调停。

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

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

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

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 [\[134\]](#)

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对此，提请您注意如下情况：在同我单独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我说，当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常驻的美国代表处，其中有情报人员和记者。在从延安迁出之后，在中共中央机关的编辑部里，有一名美国记者同他们一起工作，该记者通晓汉语，娶了一名中国妻子。

我们从捷列宾同志那里弄清了这一事实，捷列宾确认了这名美国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

用他的话来说，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到了中国。

捷列宾同志通报说，当时他通过自己这条渠道通报了关于他的到来。

捷列宾同志还通报说，几天前，有一名美国记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我们到来的几天前他去了北平和满洲地区。

我们委托捷列宾同志对与李敦白和上述美国人有关的所有材料进行

详细的查证，挑选出必要的信息，并向在莫斯科的Ф.库兹涅佐夫进行报告，因为这两名美国人很令人怀疑。

米高扬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4-95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4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927)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和А.Л.斯特朗)

米高扬：

该电请向毛泽东通报。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

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

斯大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6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组建政府的准备)

(关于从苏联派遣顾问帮助组建政府机构)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向您通报，感到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各部的基础。这里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它们今后会被保留下来。

尽管组建政府的期限现在有所推迟，但目前中共方面必须着手采取一些准备措施，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组建一些可以成为各部基础的机构。要让被联合的各党派面临已有这样的机构和准备好的各部骨干的事实，这是必需的。

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

在现有的军事委员会(与我们的国防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之下组建一些关于国家各领域工作的部或局。

这些部或局的领导人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应被任命为未来的部长，如果部长为其他党派的话，共产党人应为副部长。在一个月內从苏联派遣顾问为这些部门的组织提供帮助。这需要事先挑选一些共产党员，以对国家的工作进行领导，应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新工作，应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挑选可靠的干部，这不必都同其他党派进行协商。但如果在联合政府组建之后再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进行协商。各部应在北平组建。

是否要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请指示。

第76号电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7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
(1949年2月4日)**

A.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斯大林同志：

昨天，2月3日，在应毛泽东的请求同他举行的会谈中，我根据在莫斯科规定的精神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

毛泽东只是询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

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反苏主义者。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9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1949年2月4日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民族问题

我转告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通过让少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

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

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新疆问题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毛泽东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

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关于新疆的铁路建设

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共同防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我们需要两方面的顾问：经济方面的和财政方面的。

我回答说，И.科瓦廖夫同志是苏联部长会议经济问题的特派代表，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我补充说，他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的编制，但实际上他的活动遍及全中国。

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将听从他的指挥表示感谢。他继续说，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北平以后，我们的关系将在党和外交这两方面发展。他希望在苏联大使馆里有党务工作的顾问。

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顾问时表示，希望他能更加接近中共，以便可以经常同他交换意见，虽然对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与联共(布)中央联系。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主要问题应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

关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将定期和短期派人到莫斯科，以便得到相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1937年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7月他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我们这里。这些指示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符合的，有助于我们克服错误。

关于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谢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每当我们求助于苏联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苏联无法援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有怨言。在去莫斯科前，罗荣桓问我，如何向苏联提出援助的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自己的处境说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对东北的援助。1947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苏联援助的一切一定得偿还，除此之外，还得靠国民党地区解决某些物资缺乏的问题。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地使用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对东北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我们全部援助的1/4，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以后毛泽东把问题转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

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毛泽东强调说，而不是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的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将来国民党将解散，假如我们现在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加强宣传，目的是揭露国民党，以后解散国民党，像当年列宁召开立宪会议和解散立宪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项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谈判的基础。如果国民党员同意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我们就委托他们抓捕战犯。我们的条件中规定改编国民党军队，成立没有反动分子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律，特别是废除关于国民党地位的法律。当然，国民党员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中会坚持要参加政府，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会反对。现在不会有人再保护国民党。它已不能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国民党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公开反对它。这样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关于个别国民党的领导人，像白崇禧，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他的军队必须完全消灭。

毛泽东说，许多人认为，战犯名单的公布会使我们孤立于其他政治党派之外，但我觉得，这张名单会给国民党有力的打击。面对这张名单，他们不敢联合起来，担心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白崇禧声明，他赞成与我们谈判，李宗仁也坚持这个立场，他准备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众所周知，傅作义向我们交出了部队。我们把他当做战犯。如果他协助我们改编这些部队，我们可以对人民说出谅解他的理由。

关于张治中，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他归入战犯名单，虽然他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谈到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策略时，毛泽东赞成中断与中央政府进行的总的谈判，支持地方谈判。对待国民党要采取分散打击的办法。我们知道，原驻苏大使颜惠庆准备到北平进行和平解放上海的谈判。毛泽东说，这一切说明国民党屡次遭到失败，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独自与我们联系。例如，当傅作义与我们谈判时，北平派来了一个10人代表团，其中有市长、CC派分子何思源和立法院成员。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回到张治中的立场问题，毛泽东说，有关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他们吸收过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他们

背叛了国民党，可以吸收。譬如，如果张治中向我们交出了部队，那可以考虑吸收他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如果邵力子转到我们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工作。但是，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人不得人心，人民不喜欢他们。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关于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参加委员会的23个组织名单尚未公布，但已与有关党派协商过。名单中有下列组织：

- 1.中国共产党；
- 2.人民解放军；
- 3.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4.民主促进会；
- 5.中国民主同盟会；
- 6.救国会；
- 7.第三党(工农民主党)；
- 8.上海民主促进会；
- 9.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10.中国民主改造协会；
- 11.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 12.中国农民联合会；
- 13.中国青年组织；
- 14.中国大学生联合会；
- 15.全国妇女联合会；

16.中国民主人士联合会；

17.上海工业企业联合会；

18.教育工作者；

19.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

20.少数民族代表；

21.中国东南亚华侨代表(陈嘉庚等)；

22.美国华侨代表；

23.孙逸仙研究会。

上述组织和团体选派3—4人参加筹备委员会，但不管代表人数多少，每个组织只有一席投票权。委员会里共产党员将有9名，共产党的支持者5名，中间分子4名，民主人士5名。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员占2/3席位。筹备委员会在3月初召开，准备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会议的日程。政治协商会议上将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共同政治纲领；二是成立联合政府。

接着毛泽东说，在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们在民主人士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我们向他们公开解释我们的政策(对外政策、土地政策、对内政策等)。他们喜欢我们的坦诚。这就保证了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未来政权的性质

谈到未来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说，这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领导。我们说，人民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因为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个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我们要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进行解释，他们还害怕专政这个词。

关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135]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关系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他们将公开表示亲苏。他援引了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所说的话，他们强调说，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我们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54-62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A.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关于内外蒙古的合并

今天，2月4日，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我转告他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为了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而允许少数民族独立，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

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

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

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

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新疆问题、关于独立运动、关于经过新疆的铁路的建设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

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那里有共产党。

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即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

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因此，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双方的国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关于建造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

尽管在另一次联络中已经谈到过，但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同苏中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之前，他们将开展大量的解释工作，寻求支持。他特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要求的理解。

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蒋介石政府还签订了一些爱国条约，例如：

-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性的根据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这也是依据。

毛泽东继续说，我对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能保卫自己。

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港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

等中国足够巩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也不会再需要待在旅顺港了。

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宣称，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在旅顺港的基地，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米高扬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100-103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绝密

A.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历史的四个时期

在几次会谈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共自建立以来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讲述了党的目前状况及其领导方法。

这些谈话的记录我将带回莫斯科。我认为，需要在电报中阐述一些要点。

毛泽东把中共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开始成立(1921年)到1927年，当时党在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之后，由于右倾领导(陈独秀)而在1927年遭受了失败。当时毛泽东被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个时期是所谓的苏维埃时期，这是党在从第一次失败后恢复起来之后，再次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苏区，以及自己的政府和红军。

但由于在1935年之前的四年内，党的领导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在李立三手中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掌握在王明一派的手中)，党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损失了9/10的苏区和9/10的党和军队，而在国统区党则被完全摧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1935年1月中央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看法在中央内重获支持，党开始健康发展和巩固。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央内是孤立的，另一名中央委员刘少奇(现在是他的副手)提出了和他类似的看法。

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期党在内部得到了巩固，思想上成熟起来并达到了团结。

第四个时期是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时期，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当毛泽东是少数的时候，他被开除出党，三次被撤销红军指挥官的职位，甚至有人试图逮捕他。

尽管如此，在最后两个时期对党进行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对犯错的人实行排挤的路线。他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职位，尽管他们犯了错误，他尽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机会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不同时期同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保留在中央内(1945年党的七大特别有助于党的团结)。所有人都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忠诚地进行党的领导工作，但两个人除外。

一个是张国焘，他背叛党并转投到了蒋介石一边(现在他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福摩萨 [\[136\]](#) 工作)。第二个人是王明，他现在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于李立三和王明派别

在讲述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异常多地提到了李立三，他原是左派(被共产国际谴责)的引路人，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是工联副主席。

在此之前我对他说过，不允许让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工会。

这一看法对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想证明，李立三的左派对党危害了3个月，是对党造成了短暂危害的一个痼疾。

掌握党的领导4年之久的王明派别的危害更大。李立三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战时和战后推行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在忠诚地工作。他被任命到工会工作，因为他有在工人中工作的经验，他很愿意离开工会参加地方工作。

李立三当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但不久后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国后，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苏联的坏话，没有隐瞒过任何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在一次会谈中，我解释了我们中央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性质的看法，及其同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

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们中央的看法，这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求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斯大林同志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这一帮助和其他各种帮助。

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

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自己的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对人民的民主，保证了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

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据此，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消退，但是最完善和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我们暂时还不能采取。因此，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就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劝我们不要多谈、多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

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

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关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军事战略的小册子，关于党的任务(1939年)的小册子、关于新民主主义(1940年)的小册子和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

在谈到1945年所写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白天与毛泽东举行了例行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压迫中心，自1840年以来的100年中，中国受到诸多国家的压迫，它不同于印度，那里主要是英国的压迫，也不同于印度支那，那里是法国的压迫。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后来的孙逸仙，都提出了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可是当时的党派在人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都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接受过教育，他们无意中成了这些国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渠道。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就是在我国工作的两名苏联医生感到孤立的原因。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同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很多的交往。当然，他们汉语讲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随后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把中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1月8日的决议译成了俄文，并将通过奥尔洛夫转交给我们。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实际上

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政治纲领。地方党组织要求对许多迫切的问题做出答复，因此我们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全会。[\[137\]](#)

我说，显然这次全会应使党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具有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1945年6月召开的。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开始进行全会召开的筹备工作。高岗、林彪、陈毅、林伯渠、薄一波都参加了关于全会问题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会议开了4天。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了林伯渠一个人。林伯渠已经63岁了，当年他曾跟孙逸仙一起工作过。他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起的作用，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点像已故的加里宁同志。林伯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及现在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13人。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时，毛泽东把其分为4个时期：

1.北伐；2.土地革命；3.抗日战争；4.国内战争。

我党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毛泽东说，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我们都特别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最尖锐的武器。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思想残余。在我们军队中有时有军官殴打士兵，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人们解释说，他们的行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地方干部有时脱离群众，开展的土地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内坚持全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检查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的目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使得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监督。

我说，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其威力就在于此。富有朝气的民主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检验的基础，对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过。

毛泽东说，党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

我指出，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对党施加压力，如果在应有的高度上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如果党脱离群众，党的个别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由于近来许多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范围不仅触及农村，还需顾及城市。

党在军队中的任务

谈到党在军队中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逐步实行民主化。我们的基层指挥人员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上级指挥机关批准。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军官也参加，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干部。军队是人民很好的政治学校，战后我们准备派部队干部到国民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中去工作。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土改时领到土地的战士是我军可靠的支柱。我们也没有忽视国民党士兵，他们作为战俘，我们在努力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原国民党士兵的大会上讲述了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着重讲述了新民主政权分配给他们土地，这对原国民党士兵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印了各种小册子，其中提供了我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比较材料，我们在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专横。我们在用这些方法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改造。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军队中的民主政策让士兵甚至可以批评军官。例如，经常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战役开始之前召开基层战斗单位的会议，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进行讨论。会上指挥官有时提出撤退计划，而战士则相反，提出进攻计划。在战士批评意见的影响下，指挥官会采纳进攻的计划。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9年2月3日，我军开进北平，几乎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进驻北平的军队全副美式武器装备，这次，我们不用苏式武器，完全用美式武器装备军队，这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是在如何向我们提供美国装备的。人民也欢迎开进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一切都说明，人民支持我们，同时也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他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上出现对比悬殊的现象，例如大工业中心的上海与落后的农村。在苏联国家建设之初也出现过这样的悬殊，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评述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10%，东北除外，那里的工业占53%。

利用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我强调指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容易地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土地改革扫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但没有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点，他说，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攻的速度将比苏联慢一些。

我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因为苏联在成立初期不得不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总之，毛泽东说，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关于对待外国资产的态度

我问他们有没有工业国有化的计划，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计划还没有。

根据提出的问题，我阐明了我们对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态度。我说，在外国资产问题上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对美国的资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

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可以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形势和美国人的表现再作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它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阵地。消灭地主和国民党并未解决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前者，即地主和国民党，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我说，在摧毁国内的外国阵地的同时，你们也因此会改善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

然后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我党中央的观点。

我说，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中国并不适合，因为中国的条件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我指出了促使欧洲国家人民民主胜利的两个因素：

- 1.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德国占领者，因此红军打进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逃跑了。

- 2.红军的进入并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共产党人更容易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说，在中国没有这些因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推进的，应该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点：俄国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俄国革命不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长期的，因此中国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

谈到中国未来的制度，我说，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未来的制度是没有苏维埃的人民民主。列宁在1917年2月提出过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1917年10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或许，在中国能实现纯粹的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应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

我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权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虽然不是

真正意义上履行。这些职能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而你们没有这些职能，更适合你们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也会这样想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党中央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关于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我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帮助。

此后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一切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会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保证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其中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去了，但是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暂时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所以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都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劝我们说，不要提及，也不要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

题。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 [138] 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关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1936年)、党的任务(1939年)、新民主主义(1940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在谈到最后一本小册子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满意。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毛泽东接着说，对他们而言，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的哲学观点批判，对巩固党的队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党的心目中，这次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度。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总之，毛泽东说，我们对党员教育的要求落后了，因为我们掌握一定政权之后，首先抓的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还是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准备。当我们组建了党校以后，其中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身在中共中央机关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我曾经特别在1940年向党和中央提出过警告，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清楚，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必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并以此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过去党内小团体和派别(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政治错误。由于这些小团体和派别的错误，我们失去了9/10的受我们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和9/10的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是我党有些领导人动摇不定的思想作祟。后来在对待这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同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思想斗争的政策，但在组织结论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言论就采用开除出党的办法，而这促进了我们最近的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争论了，虽然在前不久的土改时和城市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央很快就纠正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团结的出发点。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晚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党内形势

毛泽东继续谈论白天开始的关于党内形势问题。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党内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丧失了将近9/10的领土和党员。

1941—1945年期间党员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为1945年召开团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目前仍在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说，诚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无纪律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党内已经没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相互竞争的派别。这一切为自己作为一个团结的党登上当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不然，工作会很难做。知识分子不再跟我们竞争。国民党仍然在和我们竞争，但它在政治上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小。

工人问题

利用间歇时间，我传达了菲利波夫同志关于工人问题的电报内容。我说，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工人阶级是新的阶级，是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扩大。

关于不应禁止罢工的问题使毛泽东和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困惑。

电报建议要在工人、青年、妇女中进行工作，要培养中国干部，其

内容我已向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总的来说，这些电报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传达电报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连声说是，毛泽东也说，将会执行这些建议。

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此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军事形势分成两个阶段：

- 1.现阶段的国内战争。
- 2.国内战争以后的防御措施。

谈到现阶段的国内战争时毛泽东说，目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战役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现在，纯粹的军事作战逐步被和平地向国民党的大城市进行进攻所代替。他援引解放北平的和平结局作为例子说，在那里我们建议傅作义的军队投诚。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在南京、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大规模战役，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作进攻战役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对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打过像现在这样的大战役。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会对解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况且现在所有力量都放在先粉碎敌人，后搞经济方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共歼灭了13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表面上看，我们尚未完全取胜，因为只占领了中国的一半，但是事实上战争正在结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党的主要工作将是经济建设。要彻底消灭敌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壮大。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计划作相当的调整，紧缩开支和稳定财政状况。我们应当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争，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的军队应当继续进攻，夺取城市，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不能忘记，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要培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部，解释我们的政策措施，准备解决工人问题、市场关系，对新条件下的农村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说，我们的军队不仅应该会打仗，而且也应为和平时期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继续陈述军事措施的时候，毛泽东说最近两三个月内我们要为满怀信心挺进华南，夺取华南广大地区和经济上有价值的地区做好准备。

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应该在从北平到广州的战线上开展战斗。

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最近，当我军开始占领大城市的时候，在城市方面面临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大工业城市，(苏联)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感谢红军，感谢它把哈尔滨和东北的其他城市归还给我们。苏军不仅帮助我们收回了城市，而且还在城市的恢复工作中向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我们应该开发长春、本溪、鞍山、张家口、芝罘、北平、天津等其他城市。近期在西安、上海和汉口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任务。或许，今年冬季我军就能攻克广州和桂林。

关于李敦白和马海德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是的!是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我通报苏联情况和国际局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对我通报的信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听得非常仔细。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74-77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绝密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通知您，有关全苏远东外资处远东联合公司向列

宁格勒厂厂长函询为东北生产无线电台事宜已收到答复：无线电台将整套装运。

联合公司将给东北寄去两份无线电台使用说明并附施工图。

装配完顾后(估计在今年2月)无线电台的安装工程师将去哈尔滨。

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局副局长

科贝良斯基(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47, л.2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 (1949年2月6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6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0927号和№0862号电报的执行

您的第0927号和第0862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它们对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发来正是时候。应注意他们的如下看法。

关于美国人李敦白和马海德

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举荐留下的。

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加入了这里的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

美国人的这件事情使他们非常吃惊，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地说：是的！是的！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

关于就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及关于中国干部的培养工作提出建议的电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他们都将执行。

关于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

毛泽东问道，能否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关于建设的困难

毛泽东说，当然需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状况是矛盾而艰难的。需要供养一支约350万人的庞大军队，需要供养国家机关，减少解放区居民的税收，而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有商品。

给了农民土地，而不能提供任何商品。

预算的赤字很大。价格不断上涨，货币在贬值，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印制货币。

关于今后停止动员参军并削减弹药的生产

当然，今后军队的数量将不再增加，不会进行任何的动员，不再把被俘的国民党人编入军队。也将缩减弹药的生产，因为不会再有像在沈阳、天津和徐州那么大型的战役了，尽管我们在为这样的情况做准备。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和平时期的准备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对其进行教育，以便通过军队来采取一些民事生活的措施，解决经济任务。

战争事实上在结束，现在主要是尽快恢复经济，处理好城市中的工作，巩固金融，组织起对国家的管理。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北平的阅兵

毛泽东高兴得一时喘不过气来，开始谈论在北平的入城阅兵式，参加这次阅兵的有一支以美国武器和汽车装备精良的部队。苏式的和其他类型的汽车和武器事先从参加阅兵的部队中撤出。这次阅兵给居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毛泽东请我做一個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关于这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坚决地请求过。我满足了他的请求，做了必要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我将在莫斯科的时候进行汇报。

米高扬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110-112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 毛泽东(1949年2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6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2月3日我们给你发送了一份有4条内容的长篇密码电报，要求你向毛泽东转达。迄今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关于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并将其内容转告给毛泽东的报告。

要求马上答复。

斯大林

1949年2月6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113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 务(1949年2月6日)

绝密

1949年2月6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和我方И.В.科瓦廖夫、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外蒙古

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和И.В.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3000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

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系紧张。1934—1935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5000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300—400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600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200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14个民族，300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

上把我们和苏联连在一起。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10%，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中国经济的其余90%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3.6亿，农户有9000万，其中67%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3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10%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10%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私人资本在这10%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12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要限制什么？

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

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组织工会。

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

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 [139] 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9个

省。中国将成立9个行政区，即：

- 1.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 2.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 3.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 4.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 5.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 6.西南局，中心在昆明；
- 7.川康局(四川—西康)，中心在成都；
- 8.西北局，中心在西安；
- 9.新疆局，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毛泽东说，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不把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

华北政府已经组建，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看起来，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2/3席位。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

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完全服从我们，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虽然她接近共产党，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Лiu Бочэн) [140]。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

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100万军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5.3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90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90万人，西安战场上有30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500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3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贷款。他们想从1949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1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3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

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3000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

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1万吨纸。

中共中央1949年2—3月的计划

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1949年2—3月的计划。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3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4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90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4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

3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4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关于青年运动

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

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78-88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 (1949年2月6日)

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2月6日第1550pc号命令

1.责成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局在10天之内在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挥下按附件内容将储备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发送到中长铁路。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全苏联联合公司全苏远东外贸处按现有的贷款供货出境方式与汽车、汽车零件和器材供货商进行结算。

允许苏联财政部按1949年度对外贸易部根据收支平衡而规定的拨款形式支付这笔贷款。

2.责成苏联财政部给交通部拨付去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费578万

卢布，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包括387.9万卢布苏联外汇，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

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在И.В.科瓦廖夫指挥下于1949年向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经费相当于240.1万卢布的东北元。

3.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全部开支由苏联机构按任务单完成情况、规定期限和货物品种进行结算。

4.保留И.В.科瓦廖夫同志东北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苏的职务以及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第5970号，1948年8月31日第12138号及1948年10月20日第15188号命令规定的权利、优惠和外汇及卢布的支付条件。

5.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根据他们去东北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

6.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工作组人员东北出入境手续简便，只须凭И.В.科瓦廖夫签字名单即可。

7.责成将军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予И.В.科瓦廖夫援助，为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以及翻译、司机、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以保证工作组全体人员健康。

8.责成И.В.科瓦廖夫同志在一个月之内提出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

附件：

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示发送东北的器材明细表

	单 位	数 量	偿还来源	供货单位
ГАЗ-67 型汽车	辆	15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汽车配件	套	3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零件箱、盘	套	5	准备金	化学工业部
胜利牌汽车	辆	15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汽车配件	套	2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零件箱、盘	套	3	准备金	化学工业部
车用汽油(容器装)	套	50	准备金	石油工业部
车用汽油(容器装)	套	5	准备金	石油工业部

АПРФ, ф.3, оп.65, д.444, л.32-34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 (1949年2月7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7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对您的第76号电报的复电。

无疑，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斯大林

1949年2月7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98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 问题(1949年2月7日)

绝密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毛泽东请我与政治局委员们谈谈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政策计划作详细的通报和阐述。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听了两组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组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经济政策问题，另一组是任弼时和朱德的实际经济问题(贸易、财政)。

然后我们在毛泽东那里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必须指出，中国同志们都是根据准备好的，显然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书面报告作汇报的，因为他们在会谈时总是看着报告，尽量不脱离书面材料。

还要指出的是，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他们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例如，没有掌握战后国民党没收日本资产的任何材料，不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企业是哪些，这些企业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活动的资料，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上述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还不了解哪些企业属于官僚资本，是他们想要没收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在解放区，情况怎样。他们不清楚北平和天津的银行在解放以后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只是一般指示，缺乏具体指导，甚至在他们控制下的解放区也是这样。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关于1949年的预算(只限中国的解放区)

由于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价值下跌，价值还不确定，因此他们制定的预算不是以货币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小米来换算。根据这个预算，1949年所有的国家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仅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按他们的结算，赤字的数额是2.5亿美元(按实际时价)。他们说，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来源弥补，但没有说明弥补多少和通过哪个来源。

1.增加城市的税收，因为他们认为农村中现行的税收已经很高了，虽然没有国民党的高，但也只是稍低一点。但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好几成。除此以外，在解放区自解放之日起一年半内没有收过税，这是为了不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不能向美国借，只有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借。

货币流通

1948年12月3日他们通过了决议，现正在把解放区(东北除外)流通的、已经得到不同程度贬值的货币兑换成统一的货币：山东省100旧元折算成1新元，中国西北部2000旧元折算成1新元。这样兑换所有钱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预算赤字不弥补，新币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一年之内贬值了2/3以上。总之，他们肯定地说，尽管共产党发行的纸币贬值得较快，但贬得仍然不多，比起国民党的钱币，居民更乐意接受。

现在感到印制纸币非常困难，这是由于缺少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经济成分

他们认为在解放了的中国有下列经济成分：

- 1.国营成分；
- 2.合作社成分；
-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 4.私人资本主义成分；
- 5.带实物交换形式和半父权制交换形式的小商品成分。

小商品经济占最大比重。合作社经济占一小部分，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重也很小，但有可能增大比例。他们认为，国营经济在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将占整个经济的10%左右。他们也认为，尽管国营经济比重不大，但它起主导作用，铁路、轮船、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都属于国营经济。东北的情况不一样，整个工业占53%，而国营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7%。

在会谈的过程中终于弄清，他们没有具体计划，指的是他们准备掌握哪些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他们没有关于私

人银行和国家银行数量的资料。

他们指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这些银行在全国都有分行，分行分布在哪里，交易量多少他们尚不清楚。

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错误

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指出了自己的如下缺点：

- 1.国营组织和合作社商业组织之间存在竞争。
- 2.这些组织和私人商业组织存在不正当的交易。

对于这些缺点，他们的解释是对自己的干部的培训做得不够。

在夺取城市的时候也犯了错误。比如，他们将没收的商业企业交给了工人，工人们则私分了这些企业的商品，出售了它们，拆毁了房屋。

土改时在农村也犯了错误——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资产，也没收了中农的全部资产，不给他们留下最低限量的资产。

刘少奇说，只有在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和发展重工业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将农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此之前他们将仅限于在农村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其基础是在保留生产资料和土地个人所有的条件下共同耕作土地。

关于没收资本

他们认为，在最终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应立即没收的只限于那些属于中国军阀的企业，没收所谓的官僚买办资本、为支持国民党而建造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外国军事企业以及港口和铁路。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大型非军事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认为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以后，根据国内外的局势才可以考虑没收。

关于对待外国企业的态度

刘少奇问，对外国银行、煤矿，特别是属于英国的银行和煤矿应该

采取什么措施。

将来中国同志们打算对外国企业采取如下措施：

- 1.没收；
- 2.监督；
- 3.赎买。

对盐、烟草和酒将实行国家垄断。

两种危险的倾向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时候，刘少奇说，在党内，甚至是在主要的共产党干部中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个别同志希望发展资本主义，欲将中国变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种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认为已经可以马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考虑中国有无实现这个目的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没有指明这些同志的姓名，他说，党将与这些倾向作斗争。

过渡时期

刘少奇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新民主国家更长一些。只有依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将我国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帮助表现在三个方面：

- 1.传授经验；
- 2.提供文献、教材和技术情报；
- 3.提供设备供应这种形式的贷款、货币贷款和实行经济互助。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政策做了概括，他说，中国工业只占10%，90%是个体、分散的半宗法式的经济，这些经济在解放前受到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有9000万农户，3.6亿农民，其中10%是贫农，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给农民分发了土地，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我们自己也很少。

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无法供给他们商品，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领导。

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很高兴，但只靠外来的帮助，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以便降低物价；通过向工人和城市居民出售粮食、燃料和商品)和农村贫农的利益(通过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我们也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得到发展。

我们打算使用孙逸仙提出的两个口号：

- 1.用控制达到节制资本；
- 2.排挤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还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但不能犯急性病。

俄国在革命前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7万多公里铁路，而我们4.7亿人口的中国只有2.6万公里铁路，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苏联在废除专制制度12年以后才创造条件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

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有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才能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2年)、每年1亿美元、总额为3亿美元的付息贷款。我们也想得到用于购买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稳定人民币所必须的白银的借贷。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89-95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机密

今天我和伊夫琴科 [141] 接见了中国代表，开始关于苏联和新疆的经济贸易合作的谈判。

着手工作时，刘泽荣声明，苏方提出的建议已经及时地转交给张将军 [142]。张将军在南京逗留期间，行政院长孙科同意他参见谈判。刘泽荣肯定地说，中方接受苏方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今天在座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刘泽荣说，希望讨论苏联的建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方代表在对我们提议作补充和修正的时候，希望在协议中规定他们的权力：

- 一、在苏联境内进行贸易业务；
- 二、限制苏方自由选择客户；
- 三、调整商品的进出口；
- 四、在新疆的苏联贸易组织应服从中国法律；
- 五、在股份公司中确定优先地位。

对我们建议的修正和补充参见附注。

我们对中方代表建议的实质提出了概括性的意见，认为应适时地声明，中方的建议离同意进行谈判的条件相差甚远。例如，他们提出要求严格限制苏联和新疆商品流转的正常发展。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中方忽视苏方关于在均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的建议，这一点背离了张将军的初衷。

在回答这一点的时候，中方代表声明，他们是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建议的，但他们希望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共识。

中方代表强调说，他们将竭尽全力加快谈判过程，并建议进一步讨论双方提出的条件。

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的这一建议，但是我们指出，中方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建议需要时间来研究。

双方约定，下次2月10日见面时，中方代表团应准备好与外国签订协议书直接有关的中国法律的主要资料。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附件：

中方的补充和修改

一、贸易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建议：

“双方应遵守：

(1)双方国家法律要求的禁止和限制。

(2)正常发展新疆经济所必需的限制。

(3)海关手续。”

修改第二条和第三条，注意下列要求：

(1)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服从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2)在新疆和苏联进行贸易业务的中方机构是：政府贸易机构、依法注册的贸易公司和商业联合企业。

(3)双方签订贸易契约手续及其条件不应违背当地的现行法律，如果在新疆的交易发生争议，则通过中国法庭解决。

(4)新疆的商品进出口应服务于新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补充第四条：“双方在关税税收方面的措施应基于互惠原则。”

二、经济合作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的新内容：

两大股份公司应按中国法律建立。股份公司以及职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解释“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开列出苏联所指的所有金属。

第二条，该条指明：

(1)股份公司的活动地区范围应由双方商定。

(2)勘查和勘查成果的研究工作应由中苏两方共同进行。

第三条补充：

“交给股份公司任何一方的物品和贵重物品，计入股份资本支付份额，其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这些物品和贵重物品的评价由双方共同进行。”

对第四条做下列补充：

(1)“正常利润”的概念要由双方确定。

(2)收购的金属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3)苏方意欲出售的部分收购石油产品，首先应提供给新疆省政府。

第五条，修改增补：

(1)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的职务由中方充任。

(2)各级股份公司的职员人数由双方平均充任。

(3)调整两大股份公司业务的规章制度应由双方制定和商讨。

第六条，修改并用下列提法：

(1)股份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定为20年。

(2)双方商定在业务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再处理股份公司的资产。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55, д.22, л.55-60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 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机密

今天在与中国代表的谈判中涉及了经济问题。

中国代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这次会上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

中国代表特别坚持的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他们要求向他们提出苏方打算勘查和开采的金属和矿物的明细表。

二、为取得中方配合，告知他们在新疆哪些地方可以勘查和开采金属和石油。

三、中方代表建议取消我方提出的允许苏方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勘查开采公司采购各种产品的权利。中方代表提出，这种权力应双方共有。同时他们坚持“收购金属的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换言之，中方希望事先商定好，苏方和中方准备收购哪些金属，比例是多少。中方代表指的是，他们收购到的商品不仅用来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而且还可能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四、中方希望我方事先同意共同确定转让股份公司的设备和物资的

价格和名称。

五、然后中方引用了目前的法律，提出由中方任命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

刘泽荣此时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违背张将军的建议，因为中方始终认为，董事长和常务董事都可参见股份公司的行政机关。

双方交换意见以后，中方提出了新的建议。他们同意将董事长的职位让给苏方，自己保留常务董事的职位。

六、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争论。中方代表不肯让步，根据采矿工业法，类似的股份公司活动年限不得超过20年。

由于出现分歧，决定不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合作条件问题。中方代表允诺下次会见之前再考虑自己的建议。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A.萨维利耶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22, л.63-64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机密

今天我们和中方代表继续就贸易的初步条件补充进行了讨论。

中方代表在维护自己观点的同时，最终放弃了他们以前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们用下列提法表示接受初步条件：

一、苏中双方有义务促进苏联和新疆之间贸易扩展，除两国法律明令禁止和限制外，对商品进出口不做禁止和限制。

二、贸易业务通过苏方在新疆的商务代办处和苏联外贸机构与中方的商业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和商业公司来实现。

三、苏联在华的商务代表处的权力和作用适用于苏联驻新疆的商务

代办处。

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其他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在当地遵守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四、商务代办处和苏联的外贸机构有权在新疆地区进行贸易业务。

商品的收购和出售条件由买卖双方自由协商决定。

在新疆贸易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第三国法庭或中国政府法庭解决，但第三国法庭应按中国法庭组织。

五、双方应彼此履行海关手续。

向苏联贸易机构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和税收以及新疆地区的营业税不应高于、重于新疆政府贸易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公司和商人缴纳的税款。

六、在新疆出口商品时双方应以正常发展新疆经济的利益以及新疆人民的利益为重。双方应对这类商品交换给予最大的优惠。

七、贸易协议的期限为3年，可考虑延长。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A.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AB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22, л.68-69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1949年2月16日)

受莫斯科的委托，请向毛泽东口头转达下列事项：

“苏联政府已向在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及满洲里的苏联领事发出了指示。

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

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建议您：

1.在收到特殊指示以前，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看作与此无关的个人。

2.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非正式关系的联系，必须在相关民主政权向您提出了请求或受外交部专门委托的情况下由领事或副领事处理。

3.负责哈尔滨、天津和其他解放区苏联刊物出版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领事挑选，他们应该到当地的中国行政机构妥善地办理刊物的登记工作。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

4.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应该停止自己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在接受民主政权的要求时，必须与他们谈妥，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信息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并将收集到的中国政权机构有关信息转送到莫斯科。

5.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正式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来自莫斯科的课题和有关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些通讯报道。”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菲利波夫

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29-130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1949年2月20日)

摘自H.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4月4日

今天我对薛岳做了礼节性的访问，此人是在重庆认识的。

会谈中，薛岳诉说了他出任广东省省长以后遇到的许多困难。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内战争，过去繁荣的广东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工业衰落，原料和粮食不足。北方流亡者大量流入和金圆券灾难性的贬值使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大家都对尽快建立和平寄予希望。

薛岳问我怎样评估中国的和平前景，是否愿意尽快促进中国实现和平。我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大国调停的答复对他说，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不受外国干涉的中国内政取得和平的道路是最理想的。苏联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尽快实现和平。

薛岳声明，他完全同意苏方的观点。

我问，我们的商务代办处代表如果来广东的话，是否能与当地的实业界开展贸易活动。薛岳回答说，这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本人竭诚欢迎苏联和中国南方开展贸易业务。

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4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 (1949年2月21日)

机密

今天，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我应邀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李问，我在广东就职后，贵使馆在新地方有否感到不便。我感谢李的关照，说大使馆安置得还不错，就是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房有些紧

张。外交部答应解决，可是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至今尚无结果。

李说，他将指示外交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代总统准备在广州待几天。李答，2月22日他准备飞往桂林，然后在2月23日取道长沙和汉口回南京。

由于当地报刊刊登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正面和反面的消息很多，以及本人暂时没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我慎重地请李代总统谈些实际情况。

李代总统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谈了下列情况：蒋介石离任之后，政府官员中有一小部分人企图对抗和平事业，但最终他们遭到了失败。目前，政府一致要求尽快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有关代总统和孙科之间似乎存在分歧的传闻缺乏根据。孙科同意代总统的政策，近期他将返回南京。

李代总统坚定表示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的决心。他声称，和平调停的前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目前在北平的和平代表团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近期邵力子可能亲自与毛泽东接触。

李代总统坚决驳斥了蒋介石似乎还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他也驳斥了有关广东和广西之间似乎存在着严重分歧的说法。

谈到乌鲁木齐的谈判，我指出，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对苏方提出的许多条款持反对意见，这会使谈判过程复杂化，时间延长。我强调指出，顺利进行谈判符合苏联、中国两国的利益。

会谈持续了3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和李宗仁的私人顾问甘介侯。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签名)

文件共4份，送：维辛斯基同志、佐林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9-11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

行违法活动(1949年2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获悉，中华民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和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以他们机关的名义呼吁中国公民离开苏联返回中国。从呼吁书中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号召不仅针对中国公民，也针对无国籍人士、中国公民家属的苏联公民以及汉族苏联公民。中国政府的领事们同时建议苏联公民将苏联护照归还给当地警察机关，要求发给他们收回苏联护照的收据。中国领事们允诺凭这些收据发给他们返回中国的护照。

我受委托，提请中国大使馆注意，不允许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事们和中国驻赤塔的领事进行类似的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立即让中国的正式代表们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АВІ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8, л.15

[1]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编注

[2] 指П.克赖诺夫在1944年12月1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的局势》。——编注

[3]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年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4] 萨佩格，波兰著名宗教领袖，1946年任红衣主教。——编注

[5] 在后来(1945年7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谈判中，双方对在蒙古问题上“维持现状”的理解并不一致。中国人认为，“现状”即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苏联人认为，“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见№07910文件。——编注

[6] 魏德迈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后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编注

[7] 1898年3月，中国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1—742页。——编注

[8]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中东铁路主权在中国，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资产，并将该铁路一切股票、债券移归中国。同日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管理办法规定：中东铁路设10人理事会，中苏各派5人，理事长由中方选派；设5人监事会，中方2人，苏方3人，会长由中方选派；设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

[9] 即台湾。——原注

[10]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1] 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于1905年9月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线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经过长期交涉，苏联政府不顾中国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于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以1.4亿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洲国，而伪满政府则将铁路委托日本人经营。参见郑长椿：《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77—292页。——编注

[12] 第八十八旅，全称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主要成员是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残部，成立于1942年7月。周保中任旅长，张寿钱(李兆麟)任政委，崔庸健任参谋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属4个营。——编注

[13] 原文如此，似应为847人。——译注

[14] 那乃人，即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赫哲族人。——编注

[15] 指伪满洲国，全书同。——编注

[16]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8] 报告摘录者在此处加了一个说明，认为原报告作者将Хэйдзио(汉城)错读为Хэйдзио(平壤)。

[19] 原文为Цзинь Чэ，是中文的音译，一般俄文写作Ким Чак。——编注

[20] 希金，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编注

[21] 原文拼写为Ли Дучунь，疑俄文原档案笔误。——编注

[22] 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原注

[23] 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编注

[24] 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

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原注

[25] 指1945年7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编注

[26] 这里所说的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化名孙平)、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弗拉基米罗夫1942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奥尔洛夫和梅利尼科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1946年1月飞抵延安。他们于1949年11月奉命回国。美国驻延安代表是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编注

[27]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应为联共(布)中央，下同。——编注

[28]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29]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30] 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原注

[31]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原注

[32] 此处的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编注

[33] 指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各一人和马歇尔组成的委员会。——编注

[34]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195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编注

[35] 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编注

[36]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共联系时经常使用的化名。——编注

[37] 原文如此，应为1945年10月。——编注

[38] “刮胡子”，原文“сбрить усы”。俄文没有这种说法，估计是文件作者直接引用发言者的用语或手势，即“刮脸”——替他感到害臊。——编注

[39] 原文如此。T.B.宋指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编注

[40] 原文如此。——原注

[41]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联共(布)中央(1952年10月以后改称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机构，其名称及分工变化比较复杂，据查，基本情况如下：1943—1957年，称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ВКП(б))和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在此期间，其名称又有变化，1943年6月13日至1945年12月29日称联共(布)中央国际政策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 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5年12月29日至1948年7月10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8年7月10日至1949年3月12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ЦК ВКП(б))，1949年3月12日至1952年10月13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ВКП(б))，1952年10月13日至1952年10月27日称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1952年10月27日至1953年3月19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3年3月19日至1957年2月21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7年2月以后该部一分为二，负责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1958年10月改成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而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简称苏共中央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又称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оцстранам)，苏共中央第二国际部(2о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ОтделЦККПСС)。

[42]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均以删节号标示。——译注

[43] 田友是藤田实彦的别名，曾任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的参谋长，又称“大胡子参谋长”。——编注

[44] 今丹东，下同。——编注

[45]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华莱士(Henry Wallace)，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47] Н.П.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总局局长。——编注

[48]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缺行或字迹不清，无法译出，均以省略号表示。——译注

[49] 捷列宾，А.Я.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
——编注

[50]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编注

[51] 原文到此结束。——编注

[52] 1947年7月10日，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获得批准。——原注

[5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草案。——编注

[54] 在这段话的旁边，斯大林在阅读时加有双重竖线。——原注

[55]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编注

[56] 原文如此，现在通常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同。——编注

[57] 兹韦列夫，时任苏联财政部长。——编注

[58] 奇斯佳科夫，时任苏联外交部经济司副司长。——编注

[59]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0] 云泽，即乌兰夫。——编注

[61] 原文是Манхой，按照文意应是指上海(Шанхай)，这里疑为俄文打字错误。
——编注

[62] 《科利尔》(Collier's Weekly)，美国人彼得·科利尔于1888年创办的周刊，以调查性新闻报道为主。——编注

[6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64] 卡尔金，时任中长铁路副董事长。——编注

[65] 原文Вэй Юци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6] 原文Чэнь Пиюа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7] 原文如此。李井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委、晋绥军区政委。——编注

[68] 原文Лоя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9] 原文Цзяцзя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70]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I”。——编注

[71]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J”。——编注

[72] 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编注

[73] 该电报尚未公布。——原注

[74] 所谓辽东半岛协议区，指旅大地区，即苏联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实际占领和管理的地区。——编注

[75] 俄文原件即缺第八条。——译注

[76] 戈伦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编注

[77] 在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原注

[78] 在公布的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79] 潍县，今潍坊。——编注

[80] 参见以下№16397文件。——编注

[81] 科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编注

[82] 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部长。——编注

[83]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84] 档案收集者在档案馆没有找到林彪的中文信件。——编注

[85] 参见以上№08998文件。——编注

[86] 赫鲁廖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编注

[87] 鲁尔，德国的重要工业区。——编注

[88]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9]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录。——原注

[90] 参见以上№20269文件。——编注

[91]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2]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3]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编注

[94]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编注

[95] 参见以下№09004文件。——编注

[96]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该信函。——原注

[97]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99] 垧，中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1垧一般合1公顷(15市亩)。——编注

[100] 原件此处一词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编注

[101] 托卡尔，时任印度驻华大使馆武官。——编注

[102] 参见以上№16424文件。——编注

[103] 原文如此，人数疑有误。——编注

[104] 中方在照会中提出了重建中苏航空公司的问题。——编注

[105] 即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6] 西弗，刘少奇的化名；库图兹，朱德的化名。——编注

[107] 参见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8] 毛泽东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编注

[109]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反应，可参考如下事实：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编注

[110] 原文如此。——编注

[111] 斯大林在空白处手写加上了“适宜的”。——原注

[112] 空白处原来的词被删去，斯大林手写加上了“爱好和平”。——原注

[113] 在此处有斯大林手写的补充：“通过双方直接谈判，通过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原注

[11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原注

[115] 在西柏坡访问期间，为了保密，米高扬与斯大林的往来电报使用的都是代名，菲利波夫代表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代表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访问西柏坡的报告(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第九卷)中，附上了这些往来电报，其中的称呼和署名均已恢复。本卷所有关于西柏坡访问期间米高扬与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都是按照这些附件翻译的。——编注

[116] И.科瓦廖夫，1948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编注

[117] Е.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译员。——编注

[118]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见文件№34390。——编注

[119]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120] 原文如此，即台湾，下同。——编注

[121] 1949年1月苏、保、匈、波、罗、捷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为了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必须设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编注

[122]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独立”，见文件№34392。——编注

[12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4] 收集的档案中缺页——编注

[125] 原文如此。——编注

[126] 原文如此。——编注

[127] 原文如此。——编注

[128]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9] 原文如此。——编注

[130] 指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编注

[131]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笔名。——编注

[132] 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给拉辛的信，见《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5—461页。——编注

[13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34] 这里的俄文是Риттенберге，即美国记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早期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来到中国，1946年10月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李敦白便被逮捕关押，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恢复工作。——编注

[135] 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鼓励损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条约的实质是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

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编注

[136] 原文如此。——编注

[137] 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召开。
——编注

[138] 西米奇，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编注

[139] 此处档案原文为Кита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编注

[140] 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是林伯渠。——编注

[141] 伊夫琴科，时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务代表。——编注

[142] 即张治中。——编注

第二卷(1949.3—1950.7)

1949年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 [1] 会谈备忘录：苏联 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机密

相互寒暄之后刘泽荣先生说，中方想就上次会谈(指1949年2月22日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准备好回答的几个经济问题向苏方做出答复。

刘泽荣声明说：

一、对苏方建议的第四条，中方提出两种说法供讨论：

1.中方同意苏方第四条的提法，但须将“为了新疆内部需要”改为“为了中方内部需要”。

2.缔约双方有权按成本加正常利润(确定为____%)收购这两个公司50%的产品。

苏方向上述两公司收购的产品份额，可自己斟酌卖给新疆或运到苏联，两公司另一半份额的产品，如果缔约一方有意出售，这部分产品首先应该卖给缔约方。同时，缔约双方不得将上述公司购买的商品卖给第三国。

二、关于第五条。中方提出建议供讨论：“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的董事长由苏方任命，而副董事则由中方任命。”

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公司董事会决定从中国公民中产生，常务副董事长从苏联公民中产生。

总稽核由苏方任命，副总稽核由中方任命。

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在石油勘探开采公司中担任的职位与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相互调换。

每个股份公司中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各类职员的比例相同。

如果处长、科长或组长是中国公民，副处长、副科长或副组长由苏联公民担任，或相反。

三、对于第六条，刘泽荣说，我们的建议是，中方同意上述两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确定为25年，如果缔约双方同意的话，期限还可再延长25年。

四、刘泽荣说，中方希望，在协议中附带说明一下，“本协议中遗漏之处，公司将按中华民国的相关法规行事”。

五、接着中方想对第三条作些补充：“如果一方的全额款项少于另一方的全额款项，则这部分差额以货币缴款方式补偿。”

六、刘泽荣先生请苏方说明一下，怎样理解“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最后刘泽荣说，中方1946年建议建立一个股份公司，现在我们谈的是组建两个公司，因此，中方要求根据两个公司完全均等的原则。

听完中方上述答复，伊夫琴科同志声明，中方新的提法与旧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则上背离了双方商定的谈判基础。因此我们希望中方提出的建议不要在原则上背离已商定好的基础。刘泽荣说，他们再考虑考虑自己的观点。

参加会谈的有萨维利耶夫、伊夫琴科、阿尔扎尼科夫。

苏联代表团成员

阿尔扎尼科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22, л.105-107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
并统一货币(1949年3月13日)**

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

第52829号密码电报

莫洛托夫同志：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提出了两个问题：

1.中国同志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资本家同意在短期内供应必需的商品，以调换5万吨粮食。

陈云同志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条约上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在香港采购的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橡胶制品、点焊条、铜网、青霉素、链霉素、鞣料和人造革)。

2.又提出关于在全东北和大连实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同时他补充说，为维持中国人在大连开办的企业工人和行政人员的生活，除了煤、粮供应以外，每年还要补付10万两黄金(5000公斤黄金)。我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和想法都持不同的意见。

盼指示。

科瓦廖夫

1949年3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布尔加宁同志、柯西金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档案室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 2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1949年3月15日)

机密

维辛斯基同志：

接卡尔金和桑科夫同志(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保证为开展正常工作做好一切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目前对中长铁路正常工作还没有做好准备，同时，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过。如果我们决定共同经营中长铁路，我们无法立即派出相应的干部(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监察委员会成员，铁路和地方机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去东北。由于培养干部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抓紧时间。为此，应责成苏联有关各部拨出一定数量的干部。

派去东北的干部在政治上和技术方面都应该有素养，有汉语基础，了解该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此外，在为中长铁路培养干部的高等交通院校里要开设一些中文基础课和国情课，在东方学学院里建立一些与交通运输业有关的学习小组。

为了激励苏联公民在东北努力工作，必须对派去中长铁路工作的所有人员创造一些优惠条件，在东北为他们的孩子开办使用苏联学校教学大纲的铁路学校。

至于中长铁路董事会、监察委员会苏方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归苏联交通部领导。卡尔金认为中长铁路应该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管理，但我觉得不妥当。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没有铁路干部，也没有中长铁路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而仅仅是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苏方和苏联交通部之间的一个转发各方建议的机构。苏联交通部应该加强对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苏方工作的领导。为此必须在苏联交通部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中央管理权的独立的局。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2]

盼指示。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62, л.2-3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 (1949年3月18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上毛泽东给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安德烈耶夫^②同志走后，[\[3\]](#) 收到您的几次复件。这些邮件我早在2月初就已收到。我们将按照您的意思办。

在今年年内，我们还不能制订货币的改革计划，所以今年可能不会使用你们的白银。

向你们派出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在我们开完政治协商会议和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会议大概在今年6—7月份间召开，也在攻下南京以后。

7月以前，由于任弼时同志工作繁忙，无法脱身，所以向你们派出的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到7月或8月。

王稼祥同志已从东北来到中央。我们想让他在这段时间内熟悉中国总的形势，然后派他和任弼时去你们那儿，王稼祥将常驻莫斯科。

不久以前，我们集中力量召开了二中全会。全会开了8天，认真地检查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出席全会的有来自各地的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有20位委员和候补委员因工作繁忙而缺席)。现在委员们均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会仍在安德烈耶夫到过的那个村子里召开的。

我们打算几天后迁去北平。

我们决定4月初在北平同南京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

我们决定用210万正规军分三批进攻。

第一批——陈毅和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共90万人。4月1日前必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估计在4月10日在芜湖—南京—镇江一带渡过长江，向这一线屡次进攻，向这地区以南的国民党60个师(蒋介石的嫡系)进攻，以占领南京。

第二批——林彪的部队，90万人。

由于林彪的部队要改编傅作义的和国民党的20万军队，部队要在4月中旬才能离开北平附近的驻地开赴前线。

到6月初部队才能在汉口以西的地区分散驻防。但其中12万人在2月

底已经开拔。到4月底他们就有可能到达汉口以北，支援我军在当地的10万部队。这对于牵制白崇禧的军队已经足够了。白崇禧是不敢调动他的军队去支援南京的。

我们决定采取联合白崇禧反对蒋介石的方针。

这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批——30万人，由彭德怀统率。这支部队进攻西安。由于2万多人要用来首先攻打太原，然后即使不经过休整，进攻西安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到6月或7月。

参加4月20日巴黎代表大会的民间组织代表团正在组织。

毛泽东

3月18日”

捷列宾

3月18日

第241号

РГАСПИ，ф.538，оп.1，д.331，л.5-7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3月18日)

维辛斯基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提出请求，希望对《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该条例作为这个问题的统一行政法规将予公布，以保障外国人的安全。

草案的基本条款如下：……(阐述基本条款的内容——A.A. [\[4\]](#))

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同意草案。对草案的个别意见，我们在给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信稿中作了阐述。根据葛罗米柯的指示，我们把这个草案送您，请予审核。

H.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副司长

M.布耶夫

1949年3月18日

手写批注：

要有各条例的内容，否则无法审核修改意见。

A.维辛斯基

3月2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4, д.97, л.4-5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 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机密

1949年3月1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电报，介绍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会谈的情况。在讨论恢复工业和生产武器问题时，陈云提出，希望在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 [5] 实行统一货币。

苏联财政部认为陈云提出的意见为时过早，因为：

过去三年以来东北的民主政权在恢复工业和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由于战事的关系，尽管取得了这些成绩，东北的财政和货币流通仍处于混乱状态。仅1948年货币贬值就达到了很大数额。这一点可用最低生活费的增长来说明，1948年1月最低生活费是34万元，到1949年1月达到663万元，几乎增加近20倍，也可用美元在这段时间里从8000元到15万元的行市比价增长来说明。

1949年2月1日由苏联国家银行规定的用来支付东北苏方工作人员工资的卢布和元的比价为100元 = 1.8戈比，或者1卢布 = 5.560元。

当时辽东半岛协议区由于苏联和苏中企业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关

东地区管理局的财政收支情况是收入超过支出的。1948年11月这个地区进行了货币改革以后，货币流通得到整顿，主要的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了。目前，比东北的价格水平低得多。

因此，在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辽东半岛协议区，不采取整顿财政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措施而实行货币统一，会使财政和货币流通造成混乱。苏联非常关心这些方面的稳定，因为在辽东半岛驻有苏军、苏联企业、苏中合资企业，并存在相互的外贸结算活动。

苏联财政部认为，暂时存在两种货币不会影响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紧密经济联系的建立以及大连市中国企业的商品、武器和弹药生产的发展。

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在规定两种货币的相应比价以后可以正常进行。如果由于东北元贬值过大，所有的商品交换可以根据协议区货币价格进行结算。

苏联财政部长

兹韦列夫

1949年3月2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9, л.5-6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据科瓦廖夫同志提供消息，中共中央委员陈云提出了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地区建立统一货币的建议，其理由是，由于协议区有了特殊的货币，中国民主政府缺乏资金，无法维持自己的军工企业，因此只得压缩生产。

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实行现有的东北货币势必会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因为东北货币不稳定，并且对协议区和人民解放军控制下的东北来说，实行统一货币可能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利用，以对抗苏联。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实行统一货币为时过早。维持辽东半岛经济区民主政权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从东北

多运商品到协议区的方法解决。协议区和东北可用东北货币和协议区货币来结算。

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草稿附后。

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决定：致莫洛托夫同志。我认为兹韦列夫和科瓦廖夫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可能要在与您讨论后再做决定。

A.维辛斯基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9, л.4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机密

兹因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正式书面申请，请求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M.A.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手写批注：

B.M., 3月25日。 [6]

致费德林同志。需要给斯大林同志写报告，并与财政部商量。

B.佐林

3月25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4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 (1949年3月26日)

机密

兹有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提供代表团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A.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命令

1.准许苏联财政部部长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过境苏联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中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6-7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 (1949年3月26日)

加急，机密

中国民主政权向苏联外交部提出申请，请求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以供应苏联粮食的方式偿还。

由于为东北民主政府解决贷款问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请指示将25

万卢布汇到奥特波尔车站，作为代表团在苏联境内的路费，这笔款项计入1948年10月向东北民主政府的100万卢布贷款内。

上述代表团于今年3月底离开东北。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3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绝密

1.准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联过境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文件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维辛斯基、梅利尼科夫、兹韦列夫等同志，货币委员会，第一处(第一段)

АІРФ, ф.3, оп.65, д.363, л.4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

问题(1949年4月1日)

机密

目前条约法律司正在进行苏中条约有关材料的核对工作，准备就将来谈判是否延期举行或中止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条约法律司请您对苏中协议提出意见。

一、关于1940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和新疆省政府签订的租赁条约。这条约的条款是否适用，如果适用，是否要保留到将来。

二、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于1945年12月11日签订的财政问题协议。红军司令部发放的流通货币的总量问题是否通知过中国政府，中国提出的日本赔款数额是否已经确定。

现寄上根据条约法律司资料编制的苏中协议清单一份。 [7]

请告知，除了清单中已经指明的，苏中之间是否还要签署其他协议，对已经列入清单的协议是否还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

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C.戈伦斯基(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48, л.27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渠道(沙罗夫同志)从他们的账户中为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划拨每人每月150卢布(20人)。

请从支付结算中将2.7万卢布转拨到国家银行莫斯科市管辖行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专用往来账户，发给这些孩子每人每月150卢布，直到今年年底。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H.T.费德林

文件3份，送：2份送收件人、1份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9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费德林同志、布耶夫同志：

你们的方案就是对1948年4月15日第119号电报的答复。你们难道不认为，过了一年再答复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已经太迟了吗？……也可能解决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参与？也可能由于一年来形势的变化，问题已不复存在？

说实在的，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类条例没有颁布的必要。

不过，对情况要加以说明，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期限——7日内进行质询并提出最后的建议。

A.维辛斯基

4月4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4, д.97, л.1-2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机密

4月6日我接见了前来进行告别拜访的中国大使傅秉常。

会谈前傅秉常询问了维辛斯基同志的健康情况，想在4月8日离开之前与维辛斯基同志会见一次。

我说，维辛斯基同志身体好了些，可能明天去工作。我建议大使通过礼宾司了解一下。

傅秉常请我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同志和苏联政府其他同志转达谢意和良好的祝愿，他们在我担任6年大使期间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您大概知道，他继续说，中国政府召我回国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这件事，他补充说，事先没有征求我意见。国家现在的局势很严重，特别是国内的局势。回国后，我想说服在政府中的我的朋友，不要将我推上这个职位。况且，在这6年中我跟中国人民接触不多，所以这些困难对我来说更大。可是我担心，我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如果接受，我将竭尽全力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转达我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

我对中国大使、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首席使节的合作诚意也表示了感谢，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就。

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对大使说，没有理由多考虑困难，全体苏联人民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傅秉常希望正在北平进行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他对谈判的成功寄予希望。大使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战结束后的3年中处在内战状态，遭受了很大损失。他希望北平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这样，可以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

希望是这样，我说。

大使问我有什么要转托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我请大使向驻华大使转达敬意，并希望中国外交部与苏联大使的合作比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大使的合作更成功。

傅秉常同意这一看法，他说，罗申在中国的威望很高。

最后我祝傅秉常一路平安。

会谈进行了25分钟。

会谈内容由И.沃连科翻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费德林等同志，中国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7, л.9-10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宾

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3月9日第2680pc号命令，请划拨2.7万卢布到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在苏联国家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局的第371245账号，记入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往来账户，发放给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作生活费。

2.7万卢布由中国民主政府以供应商品粮食的形式偿还。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12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急件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正如从马利宁同志1948年12月18日的报告(附第457号电报)中所看到的：东北的民主政府还是需要有个《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他们在等我们的意见”。

由于东北有大量外国侨民，颁布一个条例是合适的，以便规范在东北地区居留的外国人。

我们拒绝向民主政府提出建议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指望我们的帮助。

Н.费德林

1949年4月8日

手写批注：

在副部长的会议上讨论。

维辛斯基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4, д.97, л.12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机密

请您在5天之内就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拨款226万外汇卢布给中国东北民主政权以便其上缴巴黎国际工会基金会的信件做出批示意见，偿还条件是提供与款额相等的粮食。

附上述1949年4月9日第3 5/12398信件的副本2页。 [8]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波马兹涅夫(签名)

手写批注：

T.费德林同志，请报告维辛斯基。

佐林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 (1949年4月13日)

绝密

菲利波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

4月9日与毛泽东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

会谈中毛泽东同志简短地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 1.评估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 2.关于苏联提供的贷款；
- 3.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 4.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 5.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和平谈判的进程；
- 6.关于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

毛泽东同志说，全会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除了王明，中央委员都积极发言，发言的内容也很丰富。王明作了几次发言，中央委员们坚决要求他承认自己以前的所有错误，但他的发言始终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

毛泽东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联共(布)中央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也希望向中国解放区的苏共领导人介绍全会的决议。

关于贷款

毛泽东说，我们感谢联共(布)，首先是菲利波夫，对中国共产党的

巨大援助。贷款将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体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毛泽东同志请求为他们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重要部门的计划。眼下，他补充说，我们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想给我们提供1亿—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认为，毛泽东说，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帮助美国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与马歇尔计划一样)和奴役中国人民。这种交易绝非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正像他们在国民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

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打败了，因此战争结束了。跟国民党军队的大战役不会有了。长江将属于我们，强渡长江依旧不会有大的战斗。我们的结论有下列几个根据：

第一，长江北岸我军的兵力是国民党守卫长江和南京、上海、汉口的兵力的2.5倍。

第二，国民党军队中已无统一指挥。有些军官，像拥有32个师的白崇禧，已经跟我方联系，准备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那样，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某些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首先是李宗仁、何应钦，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能否击退我军强渡长江的进攻没有信心，因此他们跟我们联系，愿意去北平商谈移交中央政府和南京、上海事宜。

后来毛泽东指出，参加和平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和中共中央谈判时，或者刊物上受到尖锐批评之后，改变了开始谈判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

在正式会议上他们的表现同以往一样，但私下跟我们会见时，各自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声明在战犯这一条中希望不要提具体的名字。

他们同意人民解放军应该强渡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但希望和平谈判结束之后进行。

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即使国民党军队在我们强渡长江时进行反抗，我们还是要强渡，占领南京和上海。

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外国资本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集中地，是国民党和外国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及情报机关的中心。

上海及其市郊有800多万人。大工业、发电厂(20万千瓦)、自来水厂、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几乎都属于美国资本家。所以我们，毛泽东说，担心如果情况复杂，美国会让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

我们这种担心同我们缺乏管理这样大城市的经验有关。我们没有管理和经营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纺织厂和其他企业方面的专家。我们很担心这一点，毛泽东说，因此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

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如果可能的话，派专家支援我们，在我们占领上海前派遣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

我们也请求派遣反间谍活动方面的专家。如果因故不能派遣，我们不会有怨言。我们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只会有利于革命利益。

南京和上海占领后，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能力很强的党干部，在莫斯科学习过两年)担任。我跟他见过面，与他谈话的情况将作专门报告。

上海市市长由陈毅将军担任，南京市市长由刘伯承将军担任。

毛泽东同志担忧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因为只靠铁路运送粮食是不行的，而海军他们又没有，他请求向您通报此事。

关于国民党代表的和平谈判的进程

根据和平谈判的进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移交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条约关系中规定的一切(包括共产党接见外交使团、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有关上海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

如果从前我们奉行的是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的外交代表的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外交，那么现在，当我们掌握了中央政权以后(同时也考虑到在上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只得选择半独立自主的外交，即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的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的手续。

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利益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但我们倾向于以此作为我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方面的政治方针。

我认为必须就下列问题向您汇报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同志对战役和和平谈判过于乐观。持有这种情绪的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也表示，强渡长江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中共有些领导人对和平谈判成功、强渡长江以及按北平方式不打一枪一炮占领南京、上海、汉口的这些看法，我想提请您注意国民党和司令部下列活动的事实。

(1)国民党在长江以南沿线正在加紧构筑工事，而且向纵深发展。构筑大小不同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还有卫戍部队守卫。还在征兵、强制征粮。

(2)长江以北的所有河口都已堵塞，不让小船进入长江，因为担心这些小船在强渡时可能用来当渡船。

(3)在前线纵深150公里的地方，国民党的侦察机航空兵、强击机航空兵、轰炸机航空兵正在积极行动，扫射人民解放军部队，轰炸军事目标，特别在寻觅渡河工具、船只等。

(4)按白崇禧将军(正在与中共联系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命令，正在毁坏铁路桥梁和铁路隧道。

特别是北平—汉口段武陟站(Ушэньчуань)附近的黄河大桥受毁，全长500米的大桥，14个桥墩中有12个遭到破坏。荥阳站附近跨越黄河的桥梁也严重损坏，所有9个桥墩全部遭到破坏。

4月2日北平开始和谈期间，在上关站附近的隧道遭到破坏，隧道内两辆装载石头的列车对面相撞，结果把隧道堵塞，进出口都遭到损坏。

对于因执行白崇禧将军命令导致桥梁和隧道被破坏的事件，我问朱德同志，他是怎样评估白崇禧的行动。

朱德同志回答说，他是一个最反动、最狡猾的将军。这样的人在中国，朱德同志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傅作义，另一个是白崇禧。

二、国民党的代表们(按周恩来同志的声明)在正式的和谈会议上不敢谈出自己的观点，只是照本宣读上级委托的指示。在报刊上他们还是宣称不会对共产党让步。可是有些和谈代表团成员私下强烈要求我们单独接见他们，接见时他们一反常态，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

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他们一方面害怕蒋介石和美国人，因而在正式场合采取强硬态度；可另一方面在单独跟共产党打交道时，却试图让共产党高抬贵手，在国民党遭到失败的情况下给予特殊的优惠条件。

三、美帝国主义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其证明不仅仅是通过花旗银行提出贷款的建议。

例如，4月9日，10个美国商业联合公司(据说是通过华莱士 [9] 的介绍)从香港联合发表电报，要求与接见萨乌斯-米尔斯的代表进行贸易谈判。中共中央对电报未予理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为了深入研究他在会谈时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和以后几天我将会见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

每次会谈的情况我将分别向您汇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5-21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致科瓦廖夫：

与毛泽东会见时请转达下列事项：

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想把中国分割成南、中、北三部分，成立三个政府。同时，它支持华南国民党政府、华中国国民党政府，看来也不反对支持华北民主政府，目的是让这些政府内讧，削弱中国，美国可以从中渔利。因此，如果你们想得到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应该只与那些拒绝支援国民党广东、南京集团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贷款和贸易条件中不给中国附加限制中国民主政府的民族主权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即可。

三、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问题，我们通知你们如下：与中国的易货贸易我们照常进行，不需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决议。至于贷款，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必须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而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反对给中国贷款，但需要有一个中国和苏联代表签订的贷款协议。没有这个文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无权同意贷款。如果你们不能派代表来莫斯科签订贷款协议，那么我们全权委派科瓦廖夫同志同中共中央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协议草案，如双方同意，就由代表签约。这样以后我们就认为，贷款已经提供，你们既可获得设备，又可请到俄国专家。

菲利波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24-25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维辛斯基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送上给莫洛托夫同志的信稿以及给马利宁同志的信稿。

请指示。

H.费德林

1949年4月21日

附件：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马利宁同志(驻哈尔滨总领事)送来《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请我们提出意见。

我们就上述草案提出了意见，在给马利宁的这封信件的附件中进行了阐述。 [10]

我认为，这些意见还是通过这位马利宁同志转给高岗。

给马利宁同志的相应指示显然应该通过党的系统转达。

请指示。

手写批注：

缓办，告马利宁，看不到现在就研究这问题的必要性。如十分必要，望告。

维辛斯基

1949年4月22日

АВПРФ, оп.42, п.294, д.97, л.22-23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绝密

致科瓦廖夫：

沈阳，第43号

请转告陈云，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

产阶级，而应把它当作反帝的一股力量吸引过来，一起合作。因此我们建议你们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譬如说与香港或其他外国资本家的贸易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决定买什么货，卖什么货。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3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 (1949年4月28日)

禁止翻印 绝密

加急电报

密码电报第53993号

1949年4月28日19点05分从中国解放区发来

1949年4月28日19点45分送来解码

致扎哈罗夫同志：

我转呈上周恩来写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

“菲利波夫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江青和他的女儿李讷 [\[11\]](#) 需要赴苏联就诊和治疗。鉴于在中国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请您为此目的批准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在梅利尼科夫医生的伴随下赴莫斯科。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请求，那么我请您叫人派一架专机到大连来把他们接送到莫斯科去。

同时请求随同这架飞机一起派一位负责同志和一个翻译来，他们将陪同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女儿到莫斯科去。

小组人员共有4名，行李的总重量约为900公斤。他们有可能在5月10日以后从大连起飞。准确的起飞日期将会在当地同负责人、梅利尼科夫和江青一起加以确定。

江青同志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将在医疗诊断后得到确定。

周恩来

1949年4月28日”

捷列宾

4月28日

第385号

文件共5份，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 [\[12\]](#)、莫洛托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第八局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2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 (1949年4月29日)

机密

第139/1ДВ号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

回复您的4月15日第119号和1948年12月18日第457号电报，特告知：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不宜对《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

如果中方再次要求对上述草案提出意见，请告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费德林

1949年4月29日

АВПРФ, оп.42, п.294, д.97, л.27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2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2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pc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МПФ , ф.0100 , оп.42 , п.291 , д.38 , л.25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3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3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pc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МПФ , ф.0100 , оп.42 , п.291 , д.58 , л.26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绝密

第18项 关于苏联国家银行问题。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受苏联对外贸易部委托，划拨给新华社记者吴文涛(УВЭНЬТАО)16万卢布的捷克克朗和5.3万卢布的英镑，记入1948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5577pc号命令批准给北满民主机构划拨的款项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6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第12项 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问题。

1.委托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女儿李讷在逗留苏联期间的安置、生活服务和保卫工作。

2.责成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克鲁平同志)确保给予江青和李讷等同志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40, л.183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5月14日会议第69号记录

绝密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1.允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200万卢布，用于其重要领导人前来苏联治病。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这笔费用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申请从出口资助的预算拨款中支出。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这笔费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缅希科夫、波马兹涅夫等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9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问题(指由在满洲的朝鲜人组成的师)。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

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持。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4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

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

朱德询问了朝鲜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可以支持朝鲜粮食，同时也请朝方支持中国肥料。

在返国途中，金一会见了高岗。高岗说，他已接到毛泽东关于2个朝鲜师的指示。他表示希望同金日成建立联系。金一问高岗，他能否到朝鲜去。高岗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去。

金一拟于5月底在平壤与高岗会晤。

金一通报说，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朝鲜代表前来访问表示满意，并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

什特科夫

1949年5月15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9, л.51-55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5月12日会见了毛泽东。当天晚些时间会见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也在场。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中央委员王稼祥。

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叙述了战事的进程。他说陈毅将军的部队俘虏了10万名国民党官兵，解放军只损失了6000人。同时他补充说：“我军主力正在不停地向南方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部分转入上海，消灭已被我包围的国民党部队。解放军部队将进逼长江口，从海上切断过往上海的通道。包围以后，我军部队将采取观望态度。”

他们不准备在敌人作最后微弱的抵抗之前夺取上海，虽然保卫上海的是那个已经失去战斗力的防御部队，目前已经不堪一击。

他说：“目前我们不夺取上海，是为了唤起上海的民众对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同时在这段时间可以更好地做好管理上海的准备工作。”

他指出：“我们胜利的顺利取得，证实了1月份提出的关于对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役已经结束，我们面临的是局部的小规模战役的设想实现了。”

目前的战争局势是：林彪部队强攻长江的日期将比计划提前15—20天，过去认为必须等林彪部队全部集中在渡口才能进行。

现在敌人正在节节败退，渡口处敌人兵力不足。强攻长江可以根据林彪部队到达渡口处的情况，逐步进行。过去没有考虑今年占领南方的各省，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些省份可以在最近3个月之内占领。

占领新疆有些难度，这并不是因为有敌人的反抗，而是因为新疆远离解放军部队的驻地，跨越大片沙漠地带会有一定的困难。

他说：“在与强大的、狡猾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公开武装斗争中，我们即将取得胜利。这些胜利我们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没有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苏联，就没有1917—1921年击溃反动势力的胜利，就不可能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粉碎德国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动势力，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有这一切，我们和兄弟的共产党都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的崇高威望是革命力量的象征，没有这样的威望，就无法领导、团结多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没有这样的威望，革命力量就会遭受失败，帝国主义就会壮大，反动势力就会取得胜利。

如果把帝国主义描绘成狮子，在目前形势下，这只狮子的头和身体已经被强大的革命力量和苏联钳住。钳住狮子头部的是东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欧洲的共产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夹住了“狮子的尾巴，正在把它砍断。我们想，砍断了尾巴就会削弱集中在狮子头部的帝国主义力量”。

后来，毛泽东同志转入经济问题。他说，不久前他跟民主人士座谈过，他们表示：“你们共产党有政治、军事中心，这是你们力量的所在，但是你们没有经济中心，这是你们的弱点。”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也感觉得到，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

我们好像是个将要出嫁的姑娘，知道自己会生孩子，可不知怎么生，但她知道出嫁后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总的方向，怎样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朝这方向努力，结果怎样，我们说不清，因为心中没有底。我们要加快建立经济中心。”

“参加这个经济领导核心的应该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代表将来民主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委员会委员陈云以及作为苏联代表的您。”他说，“通过您，我将参与经济的领导工作，并施加压力。”

经济领导机构的确定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代表团最晚能在6月2日之前去莫斯科。

毛泽东同志后来把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将来当陈云同志的副手)等同志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他说：“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来自基层，当过工人，领导过15年的工人运动，是通晓理论的人。在党领导的整个活动中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他思想深刻、谨慎小心、善于深入事物的本质，享有很高的威望，曾作为第一批人员访问过苏联。

陈云同志过去曾当过大书商的店员，有机会学习，受到了教育，他是个有文化、深思熟虑、有才能的人，包括对经济问题，举止谨慎，享有威信。

薄一波同志是华北局书记，是一个忠诚、有才能的人，但缺少经验。”

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王明、李立三和其他同志。

他对我说：“您将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像李立三那样的职业活动家打交道。我们收到过来自莫斯科对李立三的评价，说他如果工作踏实些，就不会犯政治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1930年，他没有经过选举就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他采取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次错

误以后，他被撤职，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待了16年，直到1946年。他曾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捕过，后来获释，结论是他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李立三回国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苏联和苏联同志态度诚恳。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可以留任总工会副主席。陈云同志担任总工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担任总工会政治领导人。如果发现李立三犯错误，刘少奇、陈云同志就会及时干预、纠正。”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李立三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我对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能找他谈谈。我必须向您汇报，李立三是毛泽东的同乡，他们从小就相互了解，因此在中国盛行乡情、友情的氛围影响下，他一直坚决支持李立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王明的作用和作风。他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陈独秀倾向，第二种是斯特拉霍夫(李立三)倾向，第三种是王明倾向。第一个时期——右倾时期，由于陈独秀的路线，党员人数从5万人减少到1万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于粉碎了陈独秀集团，党的威望提高了，党员人数增加到了40万人，军队也从1万人增加到30万人。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党的队伍从40万人削减到4万人，军队30万人缩减到3万人，10个解放区只剩下了1个，国民党区域内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因为王明用共产国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活动，宣称“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所以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王稼祥都支持他。博古和洛甫是王明的积极扶持者。

虽然周恩来、王稼祥和洛甫他们犯了错误，但能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错误。王明在这三四年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很少学习，对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仍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勉强承认自己的错误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因此1949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家要求王明彻底地、公开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多次发言中，王明并没有揭示自己错误的根源。全会结束以后要他对自己的错误活动做出书面检查。他答应做到，看来要等到身体恢复以后才会写。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王明写出书面声明以后，跟他认识一下，找他谈谈。

一、如果李立三或者王明找我，我能否与他们见面？

二、从5月12日至5月17日5天之内，陈云、王稼祥同志和我在一起商量的未来行政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方面的同志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请我在交换意见以后对未来的行政核心提出一个框架。

大致的框架已制定，今年5月17日在政治局对此框架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王稼祥和薄一波等同志都参加了。

他们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决定再花几天工夫进行加工。毛泽东同志希望就建立经济领导中心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经济领导中心的结构我稍后就给您呈上。请您为中国同志提出建议。

科瓦廖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0-51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949年5月18日16时17分收到

1949年5月18日17时55分译出

菲利波夫同志：

昨天(5月17日)，毛泽东同志请我向您通报：

一、朝鲜军队政治部主任金一同志(他和金日成同志一起参加过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从北朝鲜来到这里。他受全权委托同中共中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东方形势；

(二)关于成立情报局；

(三)关于援助北朝鲜的军队干部和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问题还不成熟。在东方12

个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目前只同5个国家有联系，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而同其他国家，甚至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建立经常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情况知道甚少。因此，他说，最好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而现在则限于互相建立电讯联系，借以交换对所发生的具体问题的看法。

二、至于说到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可以提供这种援助。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万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过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当朝鲜同志现在暂时不需要时，我们负责全面保障和训练这些师。此外，我们还训练了200名军官，他们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

朝鲜同志认为，美军在最近期间可能撤出南朝鲜，但他们担心日本人来接替美军，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

我们劝他们反击这些军队，但这时要估计南朝鲜军队中有无日军。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

我们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

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

当然，毛泽东同志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三、关于同北朝鲜建立贸易联系以及解决利用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电力问题，我们建议金一同志到沈阳去，就这些问题同高岗同志协商。

毛泽东同志通报时在座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和薄一波。

科瓦廖夫

1949年5月18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9-61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 (1949年5月23日)

兹有幸通知您，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近期我将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在我缺任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领导工作由大使馆参赞B.B.瓦西科夫先生临时代办。

请接受我向您——代理外交部长阁下的敬意。

Н.罗申(签名)

И.萨夫罗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100, оп.36а, п.150, д.13, л.11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 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现在向您汇报：5月22日政治局继续对未来的经济领导核心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采纳了我提的几点建议：

1.目前只研究了经济领导核心中央机关的结构，而部级的结构问题要进行专门研究，建议这些部门领导人或未来的领导人负责制订局级的经济领导结构，送中央审批。

2.部级经济领导核心和局级领导核心的结构暂且只能算作草案，要

与局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商量后最后确定。审查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战事的进程；

二是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1)关于战事，毛泽东同志说，战事发展很顺利，人民解放军没有遭到强烈的抵抗。由于战事顺利发展，副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又试图与我们开始关于停战和关于在势力范围内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用无线电与他们保持联系，让白崇禧抱有幻想，问题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让他不要把部队带到南方和他决定的更远的地方——印度支那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就能包围和消灭他的部队。”

“我们不想跟他们(李宗仁和白崇禧)进行什么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假如他逃到印度支那去，那我们有理由打到印度支那消灭他和其他反动势力。”此时，毛泽东说，与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林彪的两个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正在迅速向南挺进，到6月15日前还有6个军将渡过长江。林彪的这些主力部队将穷追猛打，将白崇禧的部队彻底消灭。

后来，他说，上海已被人民解放军部队包围，5月27日将攻打上海，看来，上海像我们以前估计的那样，不打不会投降，那里集中了22个师，总人数15万人，除此以外集中了整个海军和空军力量，构筑了大型工事，集中了大炮和迫击炮。保卫上海之战由蒋介石在舰上遥控指挥，有美国顾问为他参谋。

英国从新加坡调遣军舰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已有2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海军一起参加了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国民党3艘军舰和英国2艘军舰的炮火击毁了我人民解放军2个团的阵地，我受到了巨大损失。毛泽东说，因此，我们已下令在作战区和长江沿线扫射一切外国船只，不作警告，包括未经允许在长江航行的非军事船只。

(2)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就下列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制度——国民党政府；

关于美国从中国撤军；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同志说，司徒雷登表示，他们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制度。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英国、法国和其他大使馆仿效了美国。

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他说，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进入城市(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

司徒雷登同时也请求考虑这个情况，美国人在上海的资产有2亿美元，为了保护这些资产，美国政府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一部分军队。

司徒雷登希望，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国内民主人士的代表尽量广泛些。

全国人民支持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司徒雷登说，这个政府会得到大家的承认，会有许多国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知说，7月份他准备回美国，他的离开与中国的局势有关。

关于跟司徒雷登的会谈，毛泽东同志说，他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相矛盾。不久前麦克阿瑟的2个团的兵力已登陆青岛，同时还在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也许司徒雷登说谎，也许麦克阿瑟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允许。

司徒雷登同时还说谎，毛泽东同志说，好像美国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我们得到的消息正好相反，他们还在积极支持国民党。

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呐。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 (1949年5月25日)

现一并呈上高岗写给您——菲利波夫同志的信以及写给我要求为司令员林彪、刘亚楼提供飞机的信。

副领事

雷斯科夫(签名)

附件：

高岗用俄文和中文写的信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请转送我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和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心脏病。他需要在伏罗希洛夫市附近的什马科夫治疗，为期半个月。

请您调拨一架飞机到大连，以便送他去伏罗希洛夫。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菲利波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要求到伏罗希洛夫市治疗。几天以前我曾请求您允许刘亚楼到伏罗希洛夫市去治疗。如果您同意让他去那里，请您给我回电，因为他很快就要去汉口工作。

高岗(签名)

手写批注：

АВПРФ, ф.100, оп.36, п.140, д.1, л.13 16, 20, 21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 (1949年5月26日)

绝密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下列事项：

第一，建立经济领导核心的思想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制订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结构草案，我们有几点看法：

(1)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

(2)海关和边防军保卫边境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海关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因此这件事应交给专门的部门主管。

(3)中国的私人企业不能与外国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相提并论，应该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哪些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觉得，中共中央比我们更了解。

第二，中国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因此科瓦廖夫不应加入这一核心组织。是否让科瓦廖夫当中共中央的顾问？如果需要，可以同时兼任经济领导核心的顾问。

第三，我们至今还未收到中共中央需要为协助上海组织经济领导核心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苏联专家名单。我们请中共中央和科瓦廖夫同志一起制订一个名单后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派遣苏联专家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我们认为，苏联专家可以担任评审员，确定委派哪些中国同志到合适的岗位。

第四，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宣传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宣传安排在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中国民主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时较为合适。

第五，我们不反对中国民主人士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如果中

共中央觉得合适，这个代表团甚至可以安排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

第六，我们建议不要再推迟中国民主政府成立的日期。现在中国已无政府。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中国没有政府，从对内政策观点来看是很危险的，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也是很危险的。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

第七，人民解放军成就辉煌，我们为之感到高兴。我们认为，战役并没有结束。英国、法国、美国不会不懂，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南中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我们建议：

(1)不必急于认真准备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

(2)从向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增加这些地区的兵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

(3)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

第八，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同意他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第九，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出的意见。

第十，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通报。

文件两份，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73-75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

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维辛斯基同志：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苏联内务部的特别监狱里关押着被扣留的原伪满政府部长和将军们，他们递交了一份呈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感谢苏联宽待他们这些俘虏。

被扣留的原伪满的部长和将军们同意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提出了建立中国..... [14] 的任务。 [15] 他们发誓，如允许他们回国，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尽自己所有的公民义务。

提到自己过去的行为，这些被扣留的人在声明中指出，以往14年他们在满洲国的工作是为叛国者服务的，承认自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玩物。

内务部呈上原伪满36名部长和将军声明的俄文译文，请你们审阅。

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附件：

中国，北京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1945年8月，苏联军队解放了东北。同时，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与日本军官一起来到苏联待罪。

在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了苏联的宽容对待，没受任何歧视。在这里，我们第一

次相信了，苏联是实现了普遍平等的国家，不以社会出身、民族和种族为转移。由于这一原则，苏联博得了全人类的爱戴。这一原则是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全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

通过联共(布)的历史看出，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所取得的成绩使它能够战胜武装干涉，粉碎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英明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宪法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劳动群众和农民满怀无限的忠诚，保护和支持共产党，每一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沿着共产党所指引的大道前进。

我们是苏联战后完成“五年计划”取得惊人成就的见证人。这些成就令我们肃然起敬。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之后30多年所取得的结果都不能同苏联的这些成就相比。

张景惠及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1948年12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东北，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16]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不久前我们阅读了委员会委员任弼时 [17]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他指出了中国青年所面临的任务和青年工作的方向。任弼时讲，为了使中国完全独立，必须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只有那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经济独立。这就是说，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

现在中国的民族…… [18] 正在逐步恢复，通过实现几个“五年计划”，便可顺利地达到让中国人过上富裕日子的目的。中国人民面前确实展现出幸福和繁荣的前景。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同时我们祝您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向首都南京进军！

1949年5月4日

- 1.张景惠，原伪满洲国总理，将军；
- 2.熙洽，原伪满宫内府大臣；
- 3.南欣(Нам Син)，将军，原伪满护国大臣；

- 4.邢士廉，上将，原伪满军事部大臣；
- 5.于镜涛，原伪满勤劳奉公部大臣；
- 6.金名世，原伪满厚生部大臣；
- 7.卢元善，原伪满文教部大臣；
- 8.阮振铎，原伪满外交部大臣；
- 9.阎传绂，原伪满司法部大臣；
- 10.于静远，原伪满经济部大臣；
- 11.黄富俊，原伪满兴农部大臣；
- 12.谷次亨，原伪满交通部大臣；
- 13.李儿济特巴德玛拉布坦，原伪满蒙政部大臣；
- 14.佟衡，上将，原伪满总参谋长；
- 15.张文强(Чжан Вин-чжан)，少将，原伪满宪兵训练学校校长；
- 16.王之佑，上将，原伪满奉天军区司令官；
- 17.曹玉仁(Сао Юй-жэ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参谋长；
- 18.刘利林(Лю Рын-льы)，少将，原伪满通信队队长；
- 19.向全(Сянь Цао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卫生局局长；
- 20.王光宁(Ван Гуан-ньи)，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法庭庭长；
- 21.乔北汉(Чжао Пе-хан)，中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司令；
- 22.任光图(Жань Гуан-ту)，少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参谋长；
- 23.李广龙，中将，原伪满哈尔滨军区司令；
- 24.韩乾祖，少将，牡丹江军区兽医局局长；
- 25.周大鲁，中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司令；
- 26.赵白(Чжао Вэй)，少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参谋长；
- 27.甘珠尔扎布，中将，原伪满通辽军区司令；
- 28.郭文林，中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司令；
- 29.真珠尔扎布，少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参谋长；
- 30.饶文森(НАО Вин-сэн)，少将，原伪满江河舰队司令；
- 31.赵景强(Чжао Цзин-чан)，少将，原伪满..... [19] 区舰队司令；
- 32.吴国贵(У Го-гуй)，少将，原伪满海军学校校长；
- 33.张英伏(Чжан Инь-фу)，少将，原伪满第二步兵旅旅长；
- 34.刘斌(Лю Бинь)，少将，原伪满第三步兵旅旅长；
- 35.杜蒙仁(Ду Мун-жань)，少将，原伪满第十三步兵旅旅长；
- 36.刘孝亮(Лю Сянь-лян)，少将，原伪满第十七步兵旅旅长。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密码电报第54991号

绝密(严禁复印)

致菲利波夫：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第525号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1 , л.98-99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

版(1949年6月12日)

绝密(严禁复印)

六天之内必须返还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相关部门

1949年6月12日

密码电报第2624号，急电

致捷列宾

第525号复电：

请转告中共中央如下内容：

“已收到你们提出的关于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请求。

我们在收到你们经作者校对的新版本之后，再着手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共3份，发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发送人普雷夫金娜，第3387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97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
(1949年6月12日)**

绝密

兹报告：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将他的报告转交给您。

下面是报告的全文：

一、您5月26日通过科瓦廖夫转来的电报收到。

除了已经请科瓦廖夫同志转交给您的报告外，我再给您写一份正式报告。从今年3月19日和21日给您写了报告以后，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向您汇报，请给予指示。

二、关于建立政府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在今年8—9月份建立政府。一切筹备工作在8月中旬完成。8月中旬或下旬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政府。

筹备工作的内容如下：

1.全国范围内有44个党派、社会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这些组织中将选出500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来宾。

2.制订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和权力。

3.编制协商会议一般政治纲领草案，并预先进行讨论。

4.在事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协商会议的结构、组织基础和组成。由于长江以南区域的许多省份很快将归入我管辖地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和组织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广泛。因此，协商会议将代表中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民。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过去根据以夺取战争胜利为重点而制订的一般政治纲领应该重新审查，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制订。

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应该围绕解决这个任务进行研究。一切筹备工作将在8月中旬加紧完成。因此，协商会议可以在9月中旬或下旬召开。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时间是合适的。

各界人士希望这次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圆满。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认为，会议应该在夺取广州和重庆之后召开，现今他们不再坚持了。

三、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年冬季占领广州、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青海、宁夏等城市和地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大国可能采取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尽快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残余。这是最主要的。如果

中国大陆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将难以或无法实现经济封锁和干涉。

2.建立沿海地区的防卫。

3.做好经济自助的工作，摆脱一切可能的经济封锁。

四、事情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快。过去部队没有后方的供给，依靠地方的资源(人员补充、弹药、粮食、军服等)，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遇到的这些困难比我们估计的少多了。

国民党的反抗力量大大地减少了，除了那些有20多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些战斗力外，其他部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国民党部队的分崩离析是一大特点。

从4月21日至今的50天战斗中，我军以6万人员伤亡的代价消灭了国民党部队58万人。

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军共计消灭了559万人。现在国民党军队包括常规军和非常规军、后勤机关、军事学校等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50万人。国民党兵力已经为数不多了。消灭他们，指日可待。

除个别部队外，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性总体来说很强。在革命高潮中我们的部队表现出了民族英雄主义，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援，在解放区受到隆重欢迎。我军的战斗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民解放军在今年春季进行的3个月政治和军事训练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军庄严、坚决、顺利地向前挺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军事远征。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某些动摇的右翼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一致支持我党、我军。

我军将要到达的地方，大部分国民党成员脱离反动组织，留在原地，保卫政府机关、企业、文教机关，等待我们的到来，以便将这些机构交到我们手中，并帮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

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和农村游击队有效地把自己的行动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役、接收城市企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一切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就地顺利解决供应困难问题，而不完全依靠后方。

五、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有可能超过以前规划所确定的军事战役规模。以前的规划我曾于今年2月份亲自对安德烈耶夫说过，我们准备在今年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甘肃9个省。可是从4月21日起50天之内我们已经占领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陕西5个省以及江西、福建省的部分地区。

根据时间和兵力的计算，今年冬季还可以再占领8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

如果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不战而逃至云南省，那么云南省的占领可能安排在明年春季。西藏的局势特殊，明年可能还不能解决。

假如我们按此计划行事，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战争的时间，加快清除大陆上的帝国主义走狗。那时，人民解放军的三个野战军今年秋季和冬季都不会闲着，215万常规军的粮食问题将得到顺利的解决，因为粮食供应问题将由16个省来解决，而不是以前计划中的10个省。

六、为了建立沿海防御阵地、加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我们对部队作了调防，并准备再作调防。

1.调一个军到秦皇岛—塘沽海滨前线的北平、天津、秦皇岛地区，那里已有4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坦克团在执行驻防勤务(这个军是拥有11万人的3个步兵常规军中的一个，占领太原之后驻扎在张家口和大同地区)。

其他两个军的主力将部署在张家口—大同地区。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任何时间调去沿海一带支援。这个地区是聂荣臻指挥的军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属这个军区。这里驻防勤务的力量相当强。

2.我们在青岛地区部署了地方部队的一个军，命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负责武装和补充这支归军区管辖的军队，使它成为一支常规军，能执行青岛地区的驻防勤务。

属华东军区范围的省份是：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台湾。山东省是我们的坚实的根据地，帝国主义想通过山东侵入中国绝非易事。

3.陈毅的第三野战军有15个军，6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20万国民党士兵)。其部署的情况是：3个军将于6月下旬撤出上海，准备在8月或9月占领福建省。福建省内只有5万人的残余敌对势力，要消灭这批残余，3个军绰绰有余。以后这三支军队将在福建省执行驻防勤务，重点放在福州。

4个军在浙江省驻防，重点在杭州。

2个军在南京地区驻防，5个军在上海地区驻防。

1个军在苏州驻防。需要的时候，在任何时间内可以调去青岛或连云港以加强力量。

将从每个军中抽调一些部队去消灭反革命集团、维护社会秩序。主力部队要进行整训。我们占领了福建省以后，陈毅野战军的战斗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他的军队将转入国防，那时我们将不会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

台湾孤立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

4.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驻扎在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省的交界处，有9个军，3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10万国民党士兵)。第二野战军已经完成这个地区的战斗任务。已命令他们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今年8月或9月这支军队要开拔西挺，在4—5个月内到达并占领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贵州省地区。以后第二野战军将控制这两个省，并准备下一步骤——占领西康和西藏。

5.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有13个军，90万人。调出一个军驻扎在河南省及其中心郑州。

其他12个军在6月中旬可以调遣到湖北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江西省的北部。

6月底或7月初第四野战军将从3个方面向白崇禧部队发起总攻(白崇禧手下有20万人，其中8万人具有战斗力)。首先，第四野战军要占领河南和江西省，这项任务应该在今年夏季完成。其次，要占领广东、广西和云南省，这项任务应该在秋冬之际完成。

林彪统率的12个军中5个军拥有炮兵部队和战斗力强的部队，在消灭敌人之后将被部署到湖北、湖南、江西省执行驻防勤务。

其他7个军在他们到达湖南和江西南部(8月份能到达)后休整1—2个月就挺进广东、广西省。

这7个军在广东、广西取得战斗胜利之后，将有1—2个军队调去占领昆明市，然后他们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执行驻防勤务和保卫国家边境。

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省有广大的游击运动地区，游击队员人数超过5万人。林彪手下的7个军在占领这3个省份时不会碰到特殊的困难。

我们估计，我军进攻这3个省份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一定会在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和暹罗加强军事防御措施。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打算越过自己的国境。

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归还中国的要求。

在这样的局势下，英、法、美军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即使他们派出军队占领了汕头和广州，或从印度支那侵入，我们还是有能力对付他们的。总之，对待国内外敌人，我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则必胜。对每一个战役充满胜利的信心，这是我军战斗行动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坚持。因此我们不吃亏。

6.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有12个军，35万人。6月中下旬第一野战军可能集结在西安的西部，在整个夏季他们将消灭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联军(总人数超过20万)。估计，在这个地区会打几个硬仗(马步芳、马鸿逵部队还是有点战斗力的)。如果这里的几仗能取胜，那么在秋冬之际可以攻下兰州、青海和宁夏。

七、如果在冬季之前能实现以上计划，那么中国大陆的战争时期基本上告一段落，从明年春季可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这样的局势对编制经济建设计划和开展南方各省和西北各省以及今后的工作极具重要意义。

八、今年完成上述计划的困难不是打仗，而是缺乏干部。我们过去在9个省培养的5.3万名干部不能满足新计划的要求，新计划内确定要占

领16个省。

克服困难采取办法：

1.从5.3万名干部抽调一部分人去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青海、宁夏工作。

2.广东、广西、云南省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区应该自己培养大量满足自身需要的干部，这个任务能够完成。

3.再调派一批在北方老区工作过的同志。

4.当我军进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后，他们不要急于占领这几个省的所有领地，暂时只要占领其省会和主要交通线即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干部的需求。除此以外，他们应就地为自己培养干部，以便为明年扩大占领区直到全部占领这5个省做好准备。

九、如果实现了迅速消灭国民党兵力的计划，我们就能开始计划和调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可以着手制订经济建设计划。

十、目前我们不但不能削减军队的人数，相反，由于在新解放的省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建立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的人数要达到150万。

因此，如果加上直属中央的部队和北方老区地方部队215万人以及常规部队150万人(包括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我军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缩减部队的数量。到那时，中国有300万人的部队(包括常规军和地方卫戍部队)就够了。

目前我们要缩减的不是部队，而是军事工业。

在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我们拥有160个军工厂，有10万名工人和职员。

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来看，现在不需要生产武器和弹药。我们野战军打仗完全可以依靠战利品和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军事工业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开始缩减军事工业，将军事工业转入生产民用产品。否则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对我们没有好

处。

为了建立国家的永久国防，需要在经济总计划中考虑列入建立符合国防目的的新军事工业的适当规划。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专家们的帮助。

十一、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

这样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于正式办理贷款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合同手续，同时将促使苏联专家们能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

政府将在8月成立，而民主人士要和我们一起在6—7月份召开协商会议，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十分紧张)。因此，赴苏事宜只得推迟，到政府成立之后再行。此事我们还没有与他们交换过意见。

十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未来的中国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不宜庞大，要灵活，应该适合中国国情。

十三、关于我们需要的苏联专家人数及其专业清单，我们6月9日已通过电报给您寄去。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49年6月11日

给斯大林同志，第55420号密码电报

1949年6月14日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1 , л.101-111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
(1949年6月17日)**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31日决定的关于租用外国船只从黑海给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事宜。

根据6月17日的情况，我们租用了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

第一艘船载重量为1.2万吨，6月29、30日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7月30日。

第二艘船载重量为8000吨，7月5—7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8月7日。

除此之外，达成了租用第三艘油船的协议(船主尚未最后确认)，其载重量为1.5万吨，7月10—12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大约在8月10日。

还有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在最近三四天内可以租借。

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П.库梅金(签名)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12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绝密

请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您的关于组织政府和进一步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战役计划我们认为合情合理的。不能认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干涉和封锁已经排除，因此我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好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坏的一面，以保证自己能对付偶然事件，不致措手不及。

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新疆石油蕴藏量丰富，还有棉花。缺少石油，您会感到寸步难行。如果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到新疆开展工作，

过2—3年后就可以有自己的石油了。

可以从石油开采和加工区铺设一条输油管到锦州站 [20]，再从锦州通过水路或铁路将石油输送到全国各地。因此，占领新疆事不宜迟。派一个军就可以解决了。对马步芳的兵力，您估计得过高了一些。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并没有那样强大。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19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 提供经费(1949年6月18日)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从国家银行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划拨外汇126万卢布的请求。(以支付中国工会代表团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米兰参加第二届世界工会大会的差旅费，及其向世界工会联盟缴纳的会费。)

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40, л.201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 (1949年6月27日)

莫斯科，1949年7月28日

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爾斯基(即师哲，翻译)和И.В.科瓦廖夫。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

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21]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提高。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民主国家不同。东欧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 [22]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

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和制度。我们想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他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

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同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 [23] 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 他们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的请求。同意再过三四天开会，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 [24]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 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 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去各种值得参观的企业。

中国同志表示，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1-7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 [25] **(1949年6月30日)**

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从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与苏联之间、中共与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

.....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29-36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1949年5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2.75亿 [26]，占全国总人口的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

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2000个县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9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还有空军7500人，海军7700人。〔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 [27]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新疆向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

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将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 现在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28]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随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包括党派14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组织，510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

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3/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4/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5/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还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今年2月安德烈耶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建议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29] 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不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

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10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3万人，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有没有买办集团？〕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

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向我们靠拢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德烈耶夫同志今年2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改装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 四、用许多方法接近中国共产党，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一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对。〕

[30]

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6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英国占有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将来在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构。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 [31]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12/对。〕 [32] 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各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12万人，其中上海有65000多人，东北有54000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13/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14/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

〔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15/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33]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16/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34] 〔好。〕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而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我们来帮助进行。〕 [35]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通过与它们的直接谈判。〕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20/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

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之间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的相互理解。〔22/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23/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予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24/还有白银呢?〕 [36]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联共(布)中央

И.В.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的战争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它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一)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二)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们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四)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38\]](#)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1—2个工厂、1—2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1—2个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39]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3—4个月。^[40]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增长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遣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有关建立苏中之间的邮政、电报联系，^[41] 苏中之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42]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80万—100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

(二)关于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为了促进大连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大连的工业。

(三)关于开放大连港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43]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我们能否利用大连港进出口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大连港？

(四)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报纸、杂志和发行书籍

等方面的工作。 [44]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

在7月5、6日的会谈中，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等同志请我向您报告下列事宜：

1.他们请您对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的问题做出指示和提出建议，报告已呈送给您。

2.他们希望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内了解：

(1)联共(布)的机构和党的机关工作；

(2)苏联国家的结构；

(3)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国家经济的管理；

(4)国内教育、文化工作的安排；

(5)群众组织(工会、志愿团体等)的结构和工作；

(6)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

3.他们请求派遣各专业的苏联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授)去中国高等院校讲课,但首先希望:

(1)派遣一批重要的经济管理干部(总局的领导人、厂长)来苏联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学习具体工业部门的工作;

(2)在苏联为中国建立一个专业的高等院校,学习人数1000人。培养对象为:一、领导干部、工程师、技术员,学制为1年;二、中层领导干部,学制为2年;三、青年人,学制可达5年。这类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

4.代表团希望解决几个与东北有关的问题:

(1)关于通过易货贸易供应机械制造厂的重型机床;

(2)他们希望明确苏联与东北的贸易远景规划,商品名称、价格、商品交换方式和期限;

(3)他们希望为东北引进不少于300名工业各部门的专家,以替代在冶金工业、军事工业、航空工业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需要电厂的专家和医院的医生。

他们提到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表示希望苏军不要按条约 [\[45\]](#) 规定在那里驻扎30年,而是60年,但希望改变东北和大连相互关系的现状。

(1)允许自由进入港口输出煤和盐,接收运往东北的货物;

(2)在东北实行统一货币,否则无法维持大连的军工企业,只能被迫关闭。这样会造成失业,引起工人的不满。这项统一货币的措施他们想在1949年9月实行。

5.他们提出请求,在利用鸭绿江电站的50%电力方面(按他们的说法,该电站的总发电量为40万千瓦)希望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他们提到,在建造该电站时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他们试图单独与朝鲜协商,但没有成功,朝鲜只给他们输送2万千瓦。

6.他们问,可否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遣的捷商务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为5人,2名是“斯科达”工厂的代表,2名来自“巴佳”康采恩,另1名是纺织企业的领导人。

7.代表团要我向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请求，请您对国际局势问题，特别是战争是否可能发生、何时发生等问题把自己的看法告知代表团。

8.代表团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拟订物资供应抵补贷款的协议草案。由于财政经济机构尚未成立，加上没有专家、资料和所需设备的计算依据，他提出等苏联专家到中国研究工业状况之后，就地编制一份需用设备的订单。在电报中他指出，贷款主要(50%)用于东北；其次用于中国北方地区；再次，用于西北地区，以恢复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电站、铁路和安排开采、加工石油。

代表团表示，他们可以全权代表签订贷款协议，不需再与中共中央协商。

科瓦廖夫(签名)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20-23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致苏联副外长A.A.葛罗米柯：

6月8日关于俄罗斯在华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希望去莫斯科面见阿列克赛牧首电收悉。现送上维克多给我的信件副本以及大司祭丹尼尔·贺在哈尔滨写给维克多信的副本。两信说明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教事相当混乱。

附两信复制件，共7页。① [\[46\]](#)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

1949年7月8日

附件：

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

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

按照俄罗斯古老的传统，公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应该永远恪守的古训是“勿为己求，勿为己谋，毅然肩负起繁重而艰巨的使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不得不违反这一古训。我就是这样。

今年4月14日，在未等到调令或至圣^②派 [47] 来北京的情况下，我即致函至圣阿列克赛，贸然提出去莫斯科当面报告传教士团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愿您不致认为我的信是强人所难的不礼貌行为，也不致因此责怪我，因为您比任何人更了解传教士团光荣的过去，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的现状。令我们更为欣喜的是，您对传教士团光明美好的未来，对其造福于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事业蓬勃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您会把4月14日我致牧首阿列克赛的信视为当务之急。

都主教因诺肯季为捍卫教规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但由于俄皇采取了强制措施，中东铁路地段的教堂脱离了传教士团。后来，这些教堂组成了哈尔滨教区。1941年，即在我任传教士团团长的時候，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东北地区传教士团的会馆和教堂、军人墓地和全体神职人员均临时划归哈尔滨教区。

最近，根据涅斯托尔都主教的指示，东北地区俄罗斯传教士团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传教士团。一位原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大司祭丹尼尔·贺被任命为团长。

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所会馆拨给他作为办公用房。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位传教士团团长：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中国人。

大司祭丹尼尔·贺深感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在中国的中国传教士团团长？！”作为团长，他深知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力。他在写给我的几封信中一再抱怨，哈尔滨教区对他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关心，毫不顾及他的威信。

我们双方正经历一个过渡期，相互关系是很脆弱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一个复杂情况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东北如此，在华北、华南、西北传教士团的生活以及东正教徒们的境遇也因战乱更加艰难。在邮政和电讯长期中断后，神甫罗果任自上海电告：“我们正在为收回教堂和传教士团的财产而奔波。”

青岛、汉口、香港无任何消息。同西北地区的教徒也无任何联系。承蒙您的帮助，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只有北京和天津传教士团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传教士团当前正处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我认为，传教士团痛苦的解体过程已经结束。由于中国解放军不断向前推进，承蒙上帝的恩典，重整传教士团，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心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开展统一的宗教活动并在苏中共同的思想战线上进行文教工作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总之，在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恢复东正教代表机构——俄罗斯传教士团——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对当前的问题采取不慎重态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误解，导致北京教区和哈尔滨教区俄中教徒之间关系疏远，造成教区之间的摩擦，传教士团的事业不仅不能复兴，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同胞知道自己身处异国，却未能同当地人民密切交往，对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他们也缺乏友爱之情。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只注意当地人的性格、习俗和生活等方面的缺点，只知道官吏、警察和土匪横行，厨师和女佣偷盗，商人和小贩欺骗，牲畜少得可怜，“加起来不值八个铜子儿”。

十几年来，俄罗斯人在中国的境遇很不好。他们颠沛流离、无人保护、贫困潦倒、饱受中国官吏和警察的欺侮，处境可谓一落千丈。外国人在中国大肆推行掠夺性政策，他们过着随心所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地人却贫困不堪，欧洲人在这里已名声扫地。在此情况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更文明，处处优于外国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大国主义情绪也不足为怪了。我们恰恰应该思考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俄罗斯东正教徒同中国人之间的和睦与友

爱。

现在，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中世纪的藩篱已经彻底坍塌，在全世界阔步前进的潮流中人们已经觉醒。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才刚刚平定，此时此刻，保持自彼得大帝以来传教士团在这里的领导地位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丢掉自己的优势，就丢掉了传教士团，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东正教徒将成为天主教徒或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徒们的俘虏。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正在把贪婪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中国，他们一有机会就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工商和教育施加有害的影响。

时不我待。生活正在前进。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心理日趋成熟，不久将在建设中顽强寻求自己的位置和事业，如果我们那时竟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新生活就会离我们而去。那时，“中国传教士团团长”必欲取代俄罗斯传教士团，他是中国人，当局肯定会支持自己人，矛盾和相互不满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传教士团的义务是在苏中两国人民之间播撒平等与友爱的建设性思想，在友好的伟大邻邦传播我们伟大祖国无往不胜的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切实关心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地位，准确规定传教士团的权利和义务，对其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地位加以界定。

我觉得，即使频繁的信件往来也难以充分说明传教士团当前在中国所处的复杂情况，更难对其未来做出安排。只有关心此事的人，特别是传教士团团长亲自向至圣报告，才能提供详尽的材料。正因为如此，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才大胆向至圣的牧首阿列克赛提出请求，允许我去莫斯科当面汇报俄罗斯传教士团面临的迫切问题。

同您谈话后我明白，您对我上述想法不持异议，因此，我希望您，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对我的莫斯科之行予以促进。

愿上帝保佑您尊贵的全家。

忠于您和感谢您的大主教

维克多

AB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43, л.39-44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机密

关于成立中苏友好协会

HB.AB.10002, 北平, 7月17日。

据新华社报道，昨天在北平举行了集会，会上成立了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协会的发起人是：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和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的698名人士。

该协会的698名发起人的声明书中说明：中苏友好协会的任务是建

立和巩固中苏两国间的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学习苏联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利用苏联科技成就，巩固两国间的友谊。声明中强调，“苏联选择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筹备委员会有81名人员，包括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董必武、李济深、谭平山、黄炎培、蔡廷锴、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邵力子和张治中。

在会议大厅里悬挂着标语：“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列宁、斯大林、孙逸仙和毛泽东的肖像。大会开始前演奏了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苏联国歌。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书记钱俊瑞说，巩固中苏两国友谊是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他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7月8日钱俊瑞接着说，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会上通过了联合中国全体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因此，他补充说，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筹备会成立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冯玉祥夫人、茅盾、邵力子和其他人都发了言。他们都表示，苏联不仅与中国平等相处，而且非常同情关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给予援助。中苏的友谊，他们说，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发言的代表同时强调，中苏友好协会应该在全国有自己的分支，应该变成群众性的组织，以巩固具有30余年历史的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

1949年7月18日塔斯社发布。

АВРРФ, ф.58 59, оп.16, п.410, д.210, л.58-59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机密

致费德林：

现告知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拨付中方资金中未被使用的余额

为28.8万卢布(据苏联对外贸易部资料统计至1949年7月21日)。

除此以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14日第6703号命令，允许给中方提供200万卢布医疗费。这笔款项中暂时支付了3万卢布。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33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 (1949年7月22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部长会议

А.И.米高扬同志：

请您就下列问题跟我们谈谈：

关于组织国内市场商业网；

关于组织对外贸易(与国外的贸易)及其经验；

关于合作化各方面的问题；

关于苏联、中国和东北的贸易问题。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2日

АІРФ, ф.39, оп.6, д.38, л.166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 年7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7月25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25日

电报全文如下 [48]：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 [49] 目前，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7万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26日我们由10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指挥的10多万人的6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 [50]、凉州 [51]、肃州。因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 [52] 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它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

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待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科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也有可能在美国和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攻占

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年7月2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译自中文

А.И.米高扬同志：

请将本人与您在会晤时您答应过的《苏中贸易条约》副本寄给我。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5日

于莫斯科

АПРФ, ф.39, оп.1, д.38, л.168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16时会见了。他。

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四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外汇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15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95%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

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本的和平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我们应当力求由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11或12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实现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

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此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翻译师哲(卡爾斯基)以及И.В.科瓦廖夫和H.T.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3小时。

A.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500, л.167-172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 (1949年8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1949年8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И.В.科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 [53] 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 [54]

为了给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 [55]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1-2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机密

齐赫文斯基同志在今年4月20日的信中提出，在中国新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与其交涉对杀害中国东北和北方地区苏联公民的罪犯实施逮捕及组织审判事宜。第一远东司建议不必等新民主政府成立，就将国民党分子对苏联公民犯下罪行的材料分发给当地民主政权。

由于中国民主政府尚未成立，无法在中国对国民党分子实行审判，许多犯罪分子至今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因此我们认为，齐赫文斯基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我们还认为，最好推迟一下第一远东司的建议，因为许多罪犯不掌握在中国地方民主政权手中，分发给民主政权有关战犯的材料现在不会收到实际的效果。

建议第一远东司对掌握在各领事馆和外交部手中材料作一个统计和选择，以便将来提出这一问题。

弗兰采夫(签名)

库尔久科夫(签名)

布耶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3, д.88, л.5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 (1949年8月3日)

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刘少奇同志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斯大林同志：

我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来信。他要我回国，留下王稼祥同志，让他帮助近日来莫斯科办理建立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事宜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这项工作结束以后，大约在8月中旬或下旬，王稼祥同志要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之后再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很希望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部分将到中国参加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苏联专家可随同王稼祥同志赴华。

为使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有时间做启程准备，我想在8月10日左右离开莫斯科，请您对赴华苏联专家如何加快准备工作做些指示。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会见一些苏联同志以外，我准备完成您的任何任务，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请指示。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签名)

副本，打字文本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1-2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 (1949年8月5日)

А.И.米高扬同志！

为了更好地为苏联专家服务，中共中央请求向苏联购买汽车，款项记入东北和苏联的商品交换账户。随信附上请购单。

中共中央也想了解汽车的价格。请告知每辆汽车的美元价格。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附件：

请求购买的汽车清单

(记入东北和苏联交换账户)

胜利牌轿车30辆

莫斯科人牌轿车10辆

15—20座位客车20辆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摘自B.B.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今天叶公超请我去他处，并交给我一份正式照会，抗议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贸易协定(附照会原文)。

读完B.M.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交换照会的段落后，叶公超口头声明：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和东北贸易协定》违背1945年《苏中条约》的内容和总的精神，因此我怀着深深遗憾和无奈的心情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叶公超接着声明，尽管中国社会舆论界某些人士和中国报刊批评1945年的条约，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捍卫和巩固这个条约。叶公超强调说，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和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严格履行1945年条约规定的义务。

最后叶公超请我尽快将照会的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我回答说，照会的内容以及外交部部长的口头声明将立即转达到莫斯科。

会谈继续了将近2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A.M.马卢欣同志、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

照会于1949年8月6日递交。

苏联驻中华民国临时代办

B.B.瓦西科夫(签名)

附件：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给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B.B.瓦西科夫的照会

临时代办先生：

本人有幸告知阁下，自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以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和苏联之间传统友好关系，主动承担起条约的义务。中国政府期望苏联政府在条约义务方面对维护和尊重条件、严格履行通过的义务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可是实际情况使中国政府很失望。中国政府多次提请苏联驻中国的大使注意苏联政府没有履行条约的事实。1948年8月25日原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为此与罗申大使先生进行了真诚的会谈，指出苏联政府违反和破坏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一系列事实。会谈中希望巩固苏中友好关系，提请苏联政府尽快停止一切错误行动。从那时起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依然一贯地、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可苏联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改变自己立场的迹象，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深的遗憾。根据中国政府得到的消息，苏联政府不久前在莫斯科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一年的相互贸易协定。

当时，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的第一段中说：“苏联同意对中国给予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方面的援助和帮助，而且这种援助和帮助完全是为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与苏联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的所谓“东北人民民主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武力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叛乱组织，上面提到的照会第二段中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绝对主权，承认他们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现今苏联政府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签订的贸易协定完全忽视了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

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对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条约的蓄意破坏。

鉴于上述所说，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严肃地声明：苏联政府违背和粗暴地破坏条约的后果完全由苏联政府承担。

临时代办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敬意。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政务副部长

叶公超

文件4份，送：A.维辛斯基同志、A.A.葛罗米柯同志、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7，оп.27а，п.13，д.198，л.23，13-14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 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49年7月26日曾两次通知苏联外交部，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总领事馆、驻赤塔市和安集延市的领事馆。行使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安集延使馆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КунСяндо)及其秘书黄赞直(ХуанЦзэнчжи)被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任总领事和秘书，安集延的领

事刘赞远(ЛюЧжэнъюй)和赤塔的副领事李翰奋(ЛиХаньфэн)被召回国。

这些照会的内容已通知了苏联国家全部和苏联内务部。内务部已作了答复，关于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调动以及领事馆调换地区为中国公民服务等方面没有异议。苏联国家全部不反对职务调动及将安集延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但认为将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赤塔市的领事馆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在给国家全部的信中将哈巴罗夫斯克写成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在给赖赫曼同志的电话中又确认指的是哈巴罗夫斯克)是不妥当的，建议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为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由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来行使。

给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塔什干、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和安集延的指示及给大使馆复函的草稿另附。

苏联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

И.Б.孔茹科夫(签名)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草案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贵使馆今年7月25日第38号照会。我部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馆、赤塔和安集延领事馆关闭以及维护在安集延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市总领事馆等事宜。至于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的利益事宜，移交给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较为适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1949年7月25日第38—316号照会，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先生及其秘书黄赞直先生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及秘书以及安集延市领事刘赞远和赤塔副领事李翰奋被召回国事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2, д.72, л.9-11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

联(1949年9月9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译文。

溥仪在其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的宽大和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放出来。溥仪要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想在苏联“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

溥仪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特此报告，请你们定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9月9日

ГАРФ, ф. Р 940I, оп.2, д.236, л.179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9年9月10日)

机密

应柯克的请求我于20点接见了。大使说，他收到自己政府授权递交照会的指示，照会中请求苏联政府支持美政府关闭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所采取的措施。大使说他的政府很重视这项措施，尽快关闭领事馆事宜非常重要。因此在给大使的指示中，甚至希望外交部立即做出答复。

我对大使说，在做出“立即答复”之前，必须研究这个文件，我答应做到。柯克表示感谢，并简要地将照会的内容向我介绍了一下(另附照会)，再一次强调了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希望尽快得到答

复。

我对柯克说，政府授权大使亲自递交这份照会，就足以证明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然后我婉转地指出他在这一问题上未免行事仓促。大使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会谈继续了15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陪同大使的是一等秘书瑟维斯。

附件：

照会

副部长阁下：

我有幸通知您，由于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职能发挥受阻，包括人员调动、信使工作、发送供应物资和资金等方面都感到极度困难或者无法进行，我政府指示大连领事帕多克关闭领事馆，立即与随从人员撤离大连。

为此我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指示你们在大连的工作人员为关闭的美国领事馆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撤离给予方便。

我政府特别请求苏联政府在为领事保罗·帕多克、副领事卡尔维尔·格列斯津和领事馆的中国工作人员发放撤离许可证时给予合作。帕多克领事和格列斯津副领事作为信使撤离，我政府将为他们发放身份证明文件。

当然，他们的个人行李和官方行李将是免受海关检查的，上面提到的中国工作人员在他们离开大连以后将安排美国领事工作的其他岗位。那些没有有效中国护照的中国职员，因为与大连联络有困难，将由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发放适当的身份证明代替护照。

至于离开大连使用的交通工具，如果苏联政府能尽快通知我国政府帕多克领事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乘用哪些船只——苏联船只，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美国政府非武装船只——我国政府将万分感激。如果乘用苏联船只或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请苏联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使用上述第三种船只，那必须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苏联其他港口，请苏联政府发放相应的过境签证、通行证和信使证。

如果使用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建议使用巴拿马船只，据悉，目前该船只正在大连装运苏联货物。

请阁下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阿兰·柯克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美国司，档案室

会谈附件译自英文，第518号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7, л.13-17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1949年9月12日)

密码电报，第3715号

绝密

请通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除一吨奎宁寄往北平外，已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发送990公斤疟疾平、66公斤抗疟素和500瓶新肺炎纳明。

文件共4份，送：斯大林(2份)，莫洛托夫、巴林科夫各1份

第5699号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2, л.21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56\]](#) (1949年9月15日)

美国与新的民主的中国

.....

其他许多人建议国务院暂时放慢在中国的侵略步伐，以便好好观察周围的动静；行动应特别谨慎：不能让国民党听天由命，而不给它一点儿援助，但也不能冒过大的风险，应少给它一些钱和武器，但不要引起中国、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的关注；同中国新政权进行接触，细心观察他们，寻找其弱点，研究他们对美国的立场，查明能否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努力用他们现在最感不足的金钱和物资引诱他们，以便博得他们的好感，并向中共党员队伍、党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广泛派遣间谍，依靠他们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民主政权，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把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枷锁重新套在中国身上。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1949年9月19日)

绝密

文本第7份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机关：

指挥人员15人

顾问4人

服务人员6人

翻译3人

共计28人

(2)空军(6个空军学校)：

指挥人员42人

教官96人

飞行员—教官84人

军官—教官238人

准尉、中士—教官278人

翻译42人

共计780人

(3)海军(1个海军学校)：

指挥人员5人

教官75人

翻译6人

共计86人

(4)炮兵：

指挥人员1人

军官—教官20人

共计21人

2.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cc号决议。

3.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根据附件一的标准免费向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发放军服和民用服装。

4.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生活费以及他们的着装费、往返中国的费用均由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

5.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

(1)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

Як18型教练机68架

Як-11和УТБ-2改进型飞机84架

УТИ、Ла-9、УТУ-2型战斗教练机84架

Ла-9和Ту-2型战斗机84架

Як-12型通信机12架

Ля-2型运输机2架

共计334架

(2)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

85毫米120门

37毫米240门

共计360门

(3)高射炮用炮弹，每门3箱弹药基数。

(4)7.9毫米高射机枪360挺，100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6.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发放飞机、高射炮、机枪时随时各附一套使用说明书。

7.委托科瓦廖夫同志告知毛泽东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军事专家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送武器装备事宜，责成科瓦廖夫就地商谈：

(1)根据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cc号决议中的一些条款说明，有关派往中国工作的军事专家的工资支付方式问题以及非军人专家的工资问题；

(2)关于发放的武器装备支付问题，可用实物向苏联结算，也可用自由流通货币或黄金结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

8.根据附件二批准对派往中国的苏联将军、军官和其他军人的指令。

附件一：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cc号决议附件

表一 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军的军服

序 号	服 装 名 称	数 量 级	注
1	全毛浅绿色大沿军帽	1 顶	
2	高筒羊皮将军帽	1 顶	
3	厚呢军大衣	1 件	
4	风衣呢大衣披风 135 型	1 件	
5	全毛浅褐绿色制服	1 件	
6	深蓝色全毛长裤	1 条	
7	浅蓝色全毛马裤	1 条	
8	锦糕革皮鞋	1 双	
9	橡皮底山羊皮鞋	1 双	
10	日常着装	1 套	
11	冬季皮手套	1 双	
12	夏季皮手套	1 双	
13	丝袜	2 双	
14	皮箱	1 只	
15	将军肩章	4 副	

表二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军官的军服

序 号	服 装 名 称	数 量	注
1	全毛浅褐绿色大沿军帽	1 顶	
2	高筒羊皮上校帽	1 顶	
3	卡拉库尔羊羔皮护耳帽	1 顶	

续表

序 号	服 装 名 称	数 量	注
4	厚呢军大衣	1 件	
5	风衣呢或贡斜放大衣披风	1 件	
6	全毛浅褐绿色制服	1 件	
7	深蓝色全毛长裤	1 条	
8	深蓝色全毛长裤	1 条	
9	锦糕革皮鞋	1 双	
10	锦糕革皮鞋	1 双	
11	日常着装	1 套	
12	丝袜或棉袜	1 双	
13	皮箱	1 只	
14	肩章	3 副	

注：计划外一次性免费发放军服，如果出差时间少于一年，则列入计划之内。

表三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普通着装

序 号	服 装 名 称	数 量	注
1	全毛服装	1 套	
2	丝袜衫	1 件	
3	棉鞋革或软山羊皮鞋	1 双	
4	夹大衣或夏季全毛大衣	1 件	
5	帽子	1 顶	
6	围巾	1 条	
7	领罩	1 条	
8	领扣	1 套	
9	丝袜	2 双	
10	工作服	1 套	

工作服发给做辅助工作的人。

附件二：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 1624cc号决议附件

对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指令：

1.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有责任帮助中国将领和军官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军事和专业训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和各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及各级学校训练班的学员进行教育。

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研究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和军事问题方面的政策。苏联将领和军官必须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依据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和巩固的经验，在组织武装力量、军事训练和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方面给予中国将领和军官最大的实际援助。

3.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各部队、军事院校和其他军事组织中工作时，必须牢记，领导军队和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和军官才是这些单位资产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应在工作中尽力帮助他们。

4.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解决问题和提出建议、咨询时，必须考虑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必须研究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领导某一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军官和具有军事科学专业知识的军事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各种情

况下最后决定问题和实际处理的权力属中国军事指挥家和军事专家。

5.当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对有关问题发生争论，或者对中国将领和军官制订和执行措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通过科托夫同志将这些问题转交给中国相应的上级军事部门。

6.每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必须牢记，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仇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专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军事代表，他们曾经奴役和压迫中国。同时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苏联和他们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神圣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苏联武装力量代表的职责和荣誉，应该时刻牢记，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勤恳的工作将为苏联国家增光，必须友好地对待民主中国的军人。苏联将领和军官的任何轻视和高傲的表现都是不可容忍的。

7.在生活和文化方面，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人的生活应该起表率作用，是朴素的。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

8.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顾问和教官的全体苏联将领和军官要服从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尤其要遵循他的指示。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印章)

文件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418, л.413-422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1949年9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俄文译文和声明复印件。

溥仪在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的宽大对待，感谢苏联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救出来。溥仪同时请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请求留下来的动机是为苏联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工作和劳动。

溥仪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声明，苏联内务部已在1946年1月11日中向您报告过。（第78/K号）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附件：

申请书 [57]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8]

莫斯科克里穆〔姆〕林宫

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给您写这封信我觉得非常光荣，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打扰您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素日对您衷心爱慕和至深感恩，并且我最希望居住在苏联，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

我以前在满洲时代处在日本军阀层层监视之下，不能同人民自由联络，即个人之生活亦是受他们限制的。因此我对于苏联的真实情形是不可能知晓的。所知皆是片面的虚伪宣传。一到苏联之后，我方知道苏联真实的面貌，因此更明白日本人对人民和我作如何的斯〔欺〕蒙。

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我想起1945年苏联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军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心想虽然所谓“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岁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卫国战争》一书极启发我的见识。您英明地预判德国希特拉〔勒〕匪帮的必然崩溃，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苏联政府宣布废止死刑，这是维护人道上空世界上空前的新继〔纪〕元。在战后制定“五年计划”与诸般复兴事业几超过战前水平，又屡次降低物价，苏联人民在物质上的丰裕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全体人民享受着真正自由民族平等、幸福的权利。各种不同民族在苏联内如同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并且苏联对于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援助并种种不能列举的功绩，早印在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每个人的心里。兹举一例，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亦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关心和尽心

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内。

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

我敬祝全苏联人民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溥仪于伯力市

1949年7月29日

ГАРФ, ф. Р 940I, оп.2, д.236, л.174-178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据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电报称：中共中央代表请求(苏联)向北平发运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信号弹，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兹请求批准根据科瓦廖夫同志在来电中所要求的信号枪和信号弹的数量向中国发运上述物资。

附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内容。

第228cc号

华西列夫斯基(签名)

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中央请苏联发运的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各色信号弹将由别洛博罗多夫负责从旅顺港发送给你们。

菲利波夫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 (1949年10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进行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A.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意见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 (1949年10月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确认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年10月1日的公告和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议。

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与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关系的、深信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代表者的苏联政府向您通报：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建立苏中关系和互换大使的决定。

受苏联政府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A.葛罗米柯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 关系(1949年10月2日)

鉴于中国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广东的阎锡山先生政府不再执掌全国的政权，而沦为广东省的政府，丧失了代表中国与外国实现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和外国的外交关系的终止。

苏联政府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东的外交关系已经结束，决定召回广东的外交使节。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

(1949年10月2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A.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决议

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 (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苏联与广东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终止了外交关系，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已从广东撤回，并向英国政府提出，让他们承担起保护我们在广东的利益的责任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在广东我们还有一栋带有附属建筑物的楼房、全部家具、4部车和其他一些财产，总价值在10万美元以上。

除此而外，目前在广东还有数十名苏联公民，我们使馆撤回后他们将处于没有任何保护的境地。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A.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3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任务

同意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通过苏联在伦敦的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让它承担起保护苏联在广东利益的责任的问题。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 ф.07, оп.22а, п.13, д.198, л.27-30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 (1949年10月3日)

优先拍发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拜会外务相或副相并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至于建交时间的问题，莫斯科认为越快越好。

电告执行情况。

第463号

菲利波夫

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58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将10月3日收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事宜的电报全文呈送。

外交部认为，周恩来的电报内容宜刊登在今年10月4日出版的中央大报的头版。

附决议草案如下。 [59]

请审阅。

A.葛罗米柯

现送上新闻稿以代替原稿。 [60]

A.葛罗米柯

附件：

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通告的回复电报已收悉，该电报表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深怀敬意。

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同意获积极答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关于中国对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先生任命的同意。在获得我方同意后，王稼祥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塔斯社)

简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和全权大使。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手写批注：

同意。..... [61]

АВІРФ, ф.07, оп.22а, п.13, д.198, л.3, 9-10, 7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苏联外交部：

荣幸地告知，我收到了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报委托我和贵方外交部进行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程序。现呈送我方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为独立附件)，同时希望得到贵方外交部之大力协助。

另见第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

戈宝权

附件：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业已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且苏联已与广东中山政府方面断交，为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中央人民政府正派出驻莫斯科大使，并将派出驻苏联各地的领事。

各位作为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应无条件地保管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的档案和所有财产，静候转交事宜。我认为，各位凡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若发生破坏性的行为或破坏性的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将依法对犯罪者追究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同时委托临时代办戈宝权立即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协商保管和转交事宜。

望各位和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当即为此电报中的命令负责，同时，交接过程中若有任何相关意见，各位应立即予以报告。

АВПРФ, ф.100, оп.36а, п.150, д.2, л.29, 31-32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1949年10月5日)

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问题

(调查报告)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供

1949年10月5日

一、苏联的立场

苏军为中国解放了东北，而这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进犯苏联的前哨阵地。苏联获得了日本军事战利品，并有权完全使用。但是，苏联可以考虑不完全使用这些战利品，而是同中国分享。

1945年1月21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宣布，考虑到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苏中股份公司，来经营开发日本人为满足关东军需求而在东北开办的企业。而且，苏联政府还同意将这些企业的一半资产让给中国政府。苏联大使还说：“此外，为了满足由蒋经国先生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的您(蒋介石)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很大一部分日本企业的全部资产交给中国政府。”

苏联建议组建以平均分配为原则的苏中合资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从中方代表中产生，副董事长由苏方代表中产生。

苏联政府的建议如下：

1.为关东军服务的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是苏联的资产。

2.考虑到特别情况，苏联将东北的部分日本企业的所有权让给中国。

3.东北的其他日本企业纳入苏中股份公司，这些企业总资金的一半由苏联让给中国，作为中国在这个股份企业中的股份。

苏中股份公司的有效期为30年，期满后，全部企业无偿交给中国政府。

可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中方没有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方提出了使苏联政府无法接受的反建议(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一节)。

美方除了直接向中方施压外，还企图向我们施压。国会通过自己在莫斯科的代办就此问题向莫洛托夫提出质询，其实质是美方赤裸裸地企图中止我们的谈判，把“门户开放”政策强加给我们。

在1946年3月4日给美国代办的照会中，莫洛托夫就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问题回答说：“你们2月1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就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企业的谈判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上述谈判涉及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以经营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日本企业问题，这些企业是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后所获得的战利品。

由于这是战争胜利的财产，所以你们在照会中提出的关于苏中谈判中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日本赔款的建议是无法同意的，因为赔款问题要与战利品问题分开，单独加以研究。”

1946年3月9日，美国的代办又给B.M.莫洛托夫写信，信中更加蛮横地重复了中止与中方谈判的企图(见“美国的立场”一节)。

A.维辛斯基就美国代办1946年3月9日的信和1946年4月22日的照会明确地答复说，苏联政府关于战利品问题的立场在3月4日的信中已作了论述，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3月4日的信进行补充：信中关于战利品的情况完全符合苏、美、英于1944年10月28日与保加利亚、1946年1月20日与匈牙利签订的停战协定中关于“战利品”的概念。因此，美国政府声称，苏联政府的要求似乎“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所承认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1945年12月21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对苏联大使A.A.彼得罗夫声称，中国政府不反对苏中共同经营部分东北的重工业企业，但中方无论

如何不能同意将这些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蒋经国还说，蒋介石认为，考虑到苏联在把日本人从东北赶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向苏联“转让”一半资产，并建议共同经营。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的这一建议也是迫于国内的社会舆论。

1月15日，蒋经国在同A.A.彼得罗夫谈话时说，蒋介石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企业是在苏联领土上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红军的战利品来对待，但事情的实质没有变化，不是苏方让出企业的50%产权，而是相反，中方让出50%。

1946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同A.A.彼得罗夫会谈时说，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马上就公布了《敌产处理方式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所有日方的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都由政府没收，作为日本人给中国造成损失的补偿。

王世杰又说，考虑到苏联在解放东北中的作用，中国政府不反对把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东北企业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但是这些企业的数量和性质应该协商。

1946年2月19日王世杰在同A.A.彼得罗夫会谈时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之间的观点有分歧，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很接近。一方面，苏联政府把敌产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同时，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中国政府，另一部分建议共同经营。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敌产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但也同意将一定数量的企业交由苏中共同经营。

1946年3月25日，王世杰在同A.A.彼得罗夫会谈时指出，正如他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东北经济方面的合作谈判的困难是，首先在于双方对东北的日本工业看法的分歧。苏方认为这些工业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而中方则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其次是苏方把一些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

1946年6月1日，王世杰把一份东北经济合作的建议方案交给了A.A.彼得罗夫。同时声称，在远东赔偿委员会解决日本赔偿问题时，中国政府将坚持在东北的所有日本企业均为日本对中国赔偿的一部分。王世杰还说，苏方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在经济谈判中，中国政府碰到两个严重困难，其一，是苏联把部分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其二，中国

社会认为，《苏中友好联盟条约》及其附属的协定将解决苏中关系中所有政治、经济问题，新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社会舆论方面完全负面的反响。

在上面提到的中方方案中还说：

所有共同经营的企业的股份，不管是属于日本政府的也好，还是日方私人的也好，都应视为日方向中方赔偿的一部分，都应算进日方向中方赔偿的总数。

苏方在共同经营的企业中的行动应由中国政府安排。

苏方必须归还被苏方拆卸并运走的全部企业装备。

由于东北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进一步的谈判已经停止。

三、美国的立场

美国代办在1946年3月9日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政府不同意把工业企业或其他设施，例如东北的日本企业等，当作战利品的说法，所以它不能接受苏联政府的观点，正如中国政府所告知的那样，把工业企业看作战利品。

这份照会还说，美国政府认为，俄国人把东北的为日军服务的企业当作红军的战利品的说法，是没有先例的。

Н.费德林

1949年10月11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95, д.110, л.69-76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 [62] (1949年10月7日)

.....

提到原国民党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原国民党驻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问题，戈宝权说，他同大使馆工作人员谈了话，结果表明，他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但使馆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人(武官)愿留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使馆里工作，其余的人表示愿离开苏联。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7, л.20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1949年10月7日)

机密

戈宝权向我通报了他本人与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面情况。今日戈宝权召集了大使馆全体人员，其中有使馆武官和工作人员。其间到莫斯科的有来自塔什干和安集延的原领事。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原代办陈进，都表现得得体。表示希望留在大使馆的有刘随员(刘泽荣的侄子)，还有刘泽荣的孩子。陈进和其他一些官员打算去瑞典。

陈进和其他原国民党外交官多次向戈宝权询问，如果打算留下，他们本人的职位能否保留。戈宝权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均模棱两可，说这些问题将由北京方面决定。来自塔什干的领事报告戈宝权说，之前在塔什干曾收到刘泽荣原地留下的命令。戈宝权说，刘泽荣和乌鲁木齐的人员属于地方政府，如今一切命令均来自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戈宝权的讲法，陈进已完全准备好把所有的财产和文件转交给前者。他们已谈好转交程序将于10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戈宝权见到了档案，并认为档案处于有序状态。一些年代较长的档案保存得特别完好，但是近年的一些档案有很大缺损。在讨论关于印章、护照(约有2000本)和密码的转交时，陈进声明，这些应转交给广东政府，而且，这里不再需要这些物品。戈回答说，北京方面会查问这些物品。

戈感兴趣的是，我方能否提供关于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其中包括刘官员的以及在原使馆内工作过的苏联公民的情况。我答应在近日提供所需的情况。

戈说，在转交事宜结束后，他将召集所有工作人员，除了已经去往国外的人员，建议他们暂时按照原来方式工作。

我询问，是否有来自各领事的消息。戈回答，没有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新西伯利亚的任何信息。我问戈是否给领事馆下过任何指令，戈回答，他曾给北京发过电报，建议从何处着手向所有的领事馆下达指

令。至于戈自己，他同时给所有领事馆发了电报，称自己开始执行职务，各领事对保存领事馆的财产和档案承担责任。

戈说，已同陈进谈好，让后者给他准备好各领事馆现有人员的名单。由于发现从陈进那里获知的情况不太多，戈请求提供我方掌握的有关材料。

戈说，他每星期向北京报告自己的行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说，他现在不清楚大使和其他工作人员何时到达。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判断，大使感兴趣的问题是接收原中国使馆的案卷和财产。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8, л.7-9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斯大林1949年10月11日通知科瓦廖夫 [63]：

在关于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问题上，高岗同志是错误的，而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无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如此简单，我甚至感到惊讶：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关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必须重视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上，高岗同志也是错误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无疑是正确的。

请向高岗说明这一切，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请向刘少奇和其他同志说明这些。总之，应该说，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

附件：

科瓦廖夫就此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10月10日科瓦廖夫写道：

高岗来到我这里，谈话又涉及了关于悬挂肖像的方法问题。他说，就这个问题已经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交谈过。关于通过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的理由，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

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毛泽东声明说，那个时刻会来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昨天，科瓦廖夫继续给斯大林写道，毛泽东签发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谈到，应该在所有党务机关里，在苏联军队的驻地上，在苏维埃学校里，在苏联公民密集的地方，在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在苏中友好协会的驻地，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谈到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下达这个指示时，高岗说，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大资本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在关于自己东北之行的报告中，挑衅性地对他(毛泽东)说，在东北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但是，却没有悬挂他的肖像。陈嘉庚哭着向毛泽东讲述了这一点。

按照高岗的话说，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与毛泽东谈了这个问题。谈话的内容高岗不清楚。其结果是对高岗进行了批评，尽管没有提他的名字。

科瓦廖夫写道，高岗说，刘少奇打算就这个问题与我(科瓦廖夫)谈谈。

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通报说：他在这封电报之后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寄发给他的，同时请求他向苏联同志解释这个决议。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477—1478页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第393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问题。

1.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A.A.伊万诺夫和П.С.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

2.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

“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安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

菲利波夫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 (1949年10月16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05号

10月16日北京时间17时整，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中方出席仪式的有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苏方出席仪式的除大使外还有使馆和武官处的10名工作人员。递交国书是在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邀请大使和外交部长周恩来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表示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并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接着，毛泽东对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派遣大使表示感谢，他表示深信，今后中苏间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由两国政府本着真诚友好的精神加以解决。

在与大使谈到1945年在重庆他和大使的最后一次见面时，毛指出，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和全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阵营不断巩固。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和平与安全事业的新贡献，苏联和新兴民主国家如此迅速地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非偶然。

毛接着说，甚至南斯拉夫也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国外交部没有向南斯拉夫政府发去任何要求承认的函电。毛说，中国政府决定不理睬南斯拉夫政府关于承认的决定，不对它作任何答复。

大使问毛，是否知道通过中国外交部转达的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立场。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保证，中国政府不会给南斯拉夫政府任何答复，将不理睬南斯拉夫与中国拉关系的一切企图。大使说，

这个问题完全由中国政府定夺。

然后，毛又将话题转回到和平与民主阵营取得新胜利的问题上，谈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他强调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从斯大林同志亲自致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毛谈到他看过的这封信的内容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函电而感到非常难过。毛在谈话中多次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晚成立12天。

接着，毛说中国政府打算在苏联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立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过，他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想得到关于中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

在谈话的最后，我就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一事向毛表示祝贺，并为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他的身体健康举杯祝贺。

毛在举杯答谢时祝我在巩固我们两大民族友谊的工作中取得成绩，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允诺给我全面的协助和支持。

与毛的谈话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长周恩来、翻译师哲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打印6份，送：А.Я.维辛斯基同志、А.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存档2份

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48-51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28-31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18日

1949年10月17日我应戈宝权的请求会见了了他。

戈宝权说，原中国大使馆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进和原使馆其他外交人员今天撤离莫斯科。同时他指出，根据他收到的北京指示，允许陈进随身携带会计账册、使馆印章和已经众所周知的密码。

戈宝权告诉我，在所有原国民党使馆的外交人员中留在莫斯科的只有武官刘广才(Лю Гуанцзэ)和刘泽荣的孩子们。刘广才按戈宝权的建议暂时在使馆工作，刘泽荣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

戈宝权请求向他解释，原中国驻赤塔副领事李翰奋(Ли Ханьфыэнь)希望去新疆，应该如何获取签证。戈宝权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反对李翰奋去新疆。

我告诉戈，他应该把李翰奋与妻子的护照和相关附函送到苏联外交部的领事处。

戈宝权强调，他获得关于使用某些原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工作的北京的指示，他请求加快对他提供有关正在中国使馆工作的苏方和中方职员的信息。其中，他感兴趣的有随员刘广才、侍从赵朱琴(Чжао Чжучэнь)、司机李云申(Ли Юнжэнь)和张玉香(Чжан Юйсянь)、厨师王福(Ван Фу)和苏方所有使馆工作人员。

我答应办理相关证明。

戈宝权请求给他建议，他如何对待刘泽荣的孩子，而刘是原中国外交部在新疆的全权代表。

我回答，此问题宜由中国政府自行解决。

后来，戈宝权说，今年8月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曾同苏联邮电部谈好，说将在赤塔举行关于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邮件和电报联系的谈判。戈说，中方已指派好3人参加同苏方的谈判，请求通知谈判在何处(莫斯科还是赤塔)、何时举行。

我告诉戈宝权，我方将弄清邮电部就此问题的想法，然后向他报告情况。

然后，戈宝权交给我一封信(随附 [64])，信中请求给5位英国共产党员新闻记者签发转境签证，后者被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赴中国工作。

我答应向领导报告这封信的内容。

戈宝权通知说，他获北京指示要求搞清新使馆与国内政府在密码联系中使用何种通讯方式。他谨慎地询问道，可否在使馆内通过建立无线电站而进行直接的无线电通信。

我仅回答说，通过电报机的联系方式是密码联系的合法途径。

最后戈宝权说，他们获王稼祥指示须准备好地方以供30个工作人员使用，后者将同王一起来莫斯科。另外，他说，使馆的房子需要整修。

我建议他就此问题去找外交大楼服务处，并说明，该处会给相关指示。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随员奥西波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贾丕才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弗拉索夫同志、档案室1949年10月17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8, л.10-12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 (1949年10月20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0号

10月20日20时，大使应邀到国家元首毛泽东处赴宴。大使趁此机会向他通报了苏联外交部第154号关于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电报内容。毛泽东表示了感谢并说，中国政府已经发了贺电，明天就讨论承认问题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互换外交使团问题。

然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他们至今没有来自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任何消息，他们也想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

他还说，希望你能把我们的意见转告苏联政府。我当即回答说，我将立即上报此事。

在宴会上，毛泽东三次带头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还带头为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举杯。毛泽东还为和平、民主、进步和革命阵营的彻底胜利，为战争、反动和反革命阵营的彻底崩溃，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指出，形势在不断地加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路程，根据各种计算这段路需要走2—3年。

毛泽东在宴会上一直显得非常友好，情绪很高，开玩笑，讲中国历史趣闻，其中还讲了汉朝时在匈奴人那里过了20年俘虏生活的中国使节苏武的故事。

大使也举杯答谢，建议为毛泽东的健康、为政府的成立、为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干杯。宴会21时30分结束，宴会结束后大使立即赶到火车站，为22时动身赴莫斯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送行。

出席宴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高岗、刘少奇、聂荣臻、林祖涵 [65]、李克农、王稼祥、师哲(卡爾斯基)，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已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新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湖南将军程潜。

由于后三者在场，毛泽东同志避开了严肃的政治话题。我方出席宴会的还有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和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谢廖金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25日

第1121/1号

机密

今天按戈宝权的请求我会见了她。

对于我方询问，戈宝权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有5种尺寸：

288cm × 192cm, 240cm × 160cm, 192cm × 126cm,
144cm × 96cm, 96cm × 64cm。

在国旗的左上方的四分之一处有五颗星：中间一颗是大星，另外四颗小星呈半圆形排列在大星的右方。

我询问了星的具体尺寸。

戈宝权答应送来数据。

后来，代办询问我关于王稼祥接见在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大学生、军官等)的可能性。

我回答，这是代办的事情，并补充道，我方没有任何异议。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茹科夫同志。

贾丕才(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86, д.18, л.17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 (1949年10月24日)

1949年11月7日

第68号

绝密

1949年10月24日16时整，大使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朱德进行了友好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朱德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线战役的发展十分令人满意。如果今后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到今年年底四川省就会完全解放。

四川的地方军阀中有很明显的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的趋势，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步骤。

在中国西南部，人民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完全由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日平均步行速度决定，因为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路上遇不到任何重大反抗。在华南作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不能充分利用汽车运输，因为需要大量汽油。国民党早就将全部燃料油运到海南岛去了，人民解放军无法利用缴获的汽油来进行汽车运输。

二、在东北和华北全速筹建人民解放军的新兵种，其中包括防空火炮部队。最近将5个高炮团调至上海、南京、杭州等华东城市。

在这项工作中以及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调动的工作中，人民解放军总部得到了苏联同志巨大的宝贵的帮助。

三、在谈到苏联下一步对华援助的性质问题时，朱德专门谈了新疆的情况。他说，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应当尽快扎下根来，搞自己的经济，达到完全自给自足，丝毫不损害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的利益。朱德认为，为了使人民解放军部队能够顺利地进行春播，政府应当专门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向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提供大功率拖拉机、机引犁以及其他农业工具和机械，使军队一方面能够直观地向当地群众显示机械耕作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能够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这也是对中苏

友好事业的宝贵贡献和苏联对华援助的体现。朱德多次提醒大使说，他谈的建议纯属个人意见，在政府中还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四、关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朱德说，总参谋部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徐向前将军是总参谋长，他是中国共产党资深的军事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前，他指挥中国苏区的第四方面军。现在他重病在身，由聂荣臻将军代他行使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没有足够的将领和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因为战争还在继续，胜负是在前线决定的，现在从前线召回一些将领和军官到总参谋部工作为时过早。不过，不久的将来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是要从前线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总参谋部工作的。

与朱德的谈话进行了1小时30分，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谈话由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4-36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 (1949年10月2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69号

绝密

1949年10月25日晚8时，大使在中南海(北京的“克里姆林宫”)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应刘少奇的邀请)。

在谈过礼节性的问题后，大使和刘少奇就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战事前景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友好坦诚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刘

少奇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极为有利。人民解放军总部认为，除台湾外，人民解放军在任何地区都不会遇到国民党军队任何真正的反抗。解放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只是时间问题。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是分两路向中国西南各省进军：刘伯承将率50万军队经桂林和贵州直取昆明，以切断国民党驻四川军队向中缅和中越边界的退路。陕西省西南部战线司令员贺龙将军将率10万军队由北面向四川进军。

虽然四川军阀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大多数军阀都表示，一旦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他们就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四川人对蒋介石集团不满也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许多川军将领已经派代表到解放军指挥部，声明他们决心投向人民解放军。在四川只有胡宗南部和朱绍良部有可能进行某种抵抗。

驻台湾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数量大约在25万人上下，而且技术保障相当好。

二、中国南部的经济形势出乎意料，并非那么糟糕。今年湖南省的水稻收成很好，广东省部分稻田有可能水量过大，由于夏季发生水灾有些地方几乎绝收。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在广东省没有搞像在湖南省长沙至郴州一线那样的大破坏。例如，广州至郴州的铁路路基依然完好，这一条线上的所有桥梁中只有一座二级桥被炸毁。现在政府的任务是尽快恢复粤汉线的铁路交通和发展中国南部的工商业，其中包括对港贸易。

三、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据了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说实在话，所有这些政党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因为所有这些政党在全中国的党员总数只有3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有100多万党员。但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政府又有意创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种种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将来这些党派会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10—15年，10—15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

四、现在政府非常需要地方干部，战争结束前完全满足需要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和华南的战役完成得比原计划早得多，因

此，为新解放区培训行政干部的工作没有及时进行。为了给华中紧急培训干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华北和华中招收了约2万名大学生，他们在4个月的政治进修班结业后就被派去做实际工作。但是，这些干部远远不够。当年东北三省进行“土改”时，中国共产党将2万名党的优秀工作者派往农村。现在为华中和华南找这么多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这些省人口众多，这一数量即2万人，对华中和华南来说，无异于沧海一粟。

五、中国共产党除大量培训干部外，还在进行提高共产党员思想水平的工作。例如，宣传干部的培训受到特别重视。政治学习分成几个班：高级班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12本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几本著作；中级班学员只学习12本经典著作中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最为重要的著作；而初级班学员绝大多数为文盲，他们只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像土地改革、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党的城市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

六、缺乏足够数量的干部阻挠了在华中和华南搞土地改革。只有过2—3年后，当复员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回乡后，那里才能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到2—3年，这些地区的农民会开始自发的分田运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领导这一运动。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政府在农村依靠过去的贫农，他们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现在准备诚心诚意地帮助政府，向政府交公粮、纳税。

另外，东北三省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农民阶层，即所谓的“新富农”。他们是从最贫穷的农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分到地主的土地后，努力耕作，而且雇佣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现在这些“新富农”完全站在分给他们土地的政府一边，帮助政府提高农业产量，积极协助贯彻政府的农村政策。但是，并不排除以后农村会出现雇农和这些“新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七、现在，巩固中苏友谊也是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刘少奇说：我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保证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

全体共产党员：要经常帮助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如果大使需要什么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生活中某一方面情况的材料，我们愿意满足大使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这些材料不能在大范围公开。我们还准备向使馆工作人员提供我们优秀的教授和专家，就苏联朋友关心的专题举办讲座。

大使对刘少奇的谈话和对苏联同志的友好态度表示了感谢，答应以后接受中国朋友的盛情邀请，并保证自己一方要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苏中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

谈话由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Р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7-43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 (1949年10月26日)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在此，呈上对毛泽东同志就朝鲜问题给菲利波夫同志电报的答复草稿(参见科瓦廖夫同志第234号电报)。

В.莫洛托夫

1949年10月26日

北京

致科瓦廖夫、罗申：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同志对其10月21日电报的答复内容：“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不应该采纳他们拟定的关于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的计划，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发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66]

葛罗米柯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2, л.47-48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2号

绝密

1949年10月27日上午10点，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沈钧儒和大使进行了下列谈话。

由于现阶段忠诚于政府的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才大量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检察机关在组织筹备期间面临困难。同时，由于新的法律至今尚未制定，地方政府经常不顾革命法纪擅自主张解决问题。

1.为研究苏联立法机关和苏联法院的情况，沈钧儒早先打算访问苏联，而现在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希望，苏方尽快派有经验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来华，以帮助中国的司法机关。

2.他对自己的老朋友——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罗申的任命表示热烈欢迎。大使在华10年的工作经验和在中国社交界各阶层代表的广泛的友好关系网，有助于大使本人完成所肩负的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对此沈钧儒满怀希望。

沈钧儒从个人角度向大使保证给予永远友好诚挚的帮助。

会谈持续4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打印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53-54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 (1949年10月28日)

绝密

第4份

今年10月28日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主席黄炎培。黄炎培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会见了大使。在礼节性寒暄后，黄炎培和大使进行了无拘束的会谈。其间应大使的请求，黄炎培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阐述了下列观点。

黄炎培认为，不仅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面，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因为与美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不一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两种典型特点，正是由于这两种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和将来一直都和中国人民走在一起，不会在国家危机时刻抛弃后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典型特点就是：1.中国资产阶级素来热爱自己的劳动者同胞，素来怀有行善之心；2.中国资产阶级非常热爱自己的子女、亲属，与之分享自己挣来的财富。由

于上述特点，在中国当今没有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

目前，一些著名的中国工商业界代表正准备返回上海，他们在今年年初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近日，从香港回到北京的两位有名的中国资本家——刘鸿生和吴云丘(УЮНЬЧУ)，就中国工业发展前景曾同黄炎培聚谈过。黄炎培建议他们对一些工业和商业部门制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方案，对此，他们早有准备，并同意制定。

应大使要求，黄炎培对恢复中国工业的前景做出了评价。黄炎培回答这一问题时得出下列结论。首先，黄炎培认为，必须恢复走下坡路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像丝织品、瓷器制品、制茶业等，必须对手工业投入现代化的工具和设备，以适应减轻劳力和增加生产的要求。

其次，必须恢复建设大型国有企业，像橡胶业。但是，要促使其与所属区域内小型手工业进行合作，以便向不同厂家提供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各种部件和零件。

当黄炎培问起大使对此问题的看法时，大使回答，中国政府方面有相应的行动方案。

黄炎培请求大使帮助他挑选有关苏联经济的材料，大使答应对此问题给予协助。

会谈持续5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1949年11月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66-68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
(1949年10月28日)**

1949年11月7日

第74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1时整，大使在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位于朝阳门大街的办公处接待室，拜会了陈云同志。

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陈云进行了轻松友好的交谈。谈话中，陈云应大使的请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目前，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复杂、困难。由于国内战争还在继续，政府不得不靠国库养活700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国防工业工人。由于沿海被封锁，对外贸易处于半停顿状态；在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全部港口中，只有天津港还有进出口业务，而且数量很小，每月大约为300万美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商船，其中包括在长江运输货物的船只。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拥有的船舶吨位只有3.2万吨。

政府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止食品、日用品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对付物价上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政府为了弥补军事开支发行了比应发行数量多2倍的纸币。

尽管税收总额不断增加，但是各省征收的货币税甚至不抵需求的极小一部分(货币税占政府征税总额的25%，其余75%为粮食税)。

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是出口茶叶和丝绸的生产现在还没有搞好。

由于国民党飞机不断空袭以及海运和河运瘫痪，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使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前，就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暂时还不打算在上海投资，他们仍然对新的人民政府持观望立场。

负责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管部做协调工作的财经委员会，现在采取了一切措施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和恢复生产能力。

为了克服中国工业发展中至今存在的地区分割状态，最近政府数次组织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到华北和东北考察，组织天津和东北的工业界人士到汉口和上海考察，以便研究市场，进行业务接触和联系。

人民政府正在制订1950年恢复生产能力的纲要，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搞好中国各原料地区和工业地区的经济联系方面。过去它们互相脱节，彼此分割。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2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在银行职员和金融专家中反动分子特别多。现在有些地方就已经发现专家怠工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会把赌注压在人为扩大我们的经济困难上，压在搞经济怠工、捣乱和破坏活动上。以下事实可以说明中国技术干部的匮乏：在最大的鞍山炼钢公司(在东北)，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敌视所有中国人尤其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人。

在人民解放军中搞后勤和军需的同志转业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经济干部的不足；我们现在只好完全依赖国民党留给我们的那些专家。

尽管有上述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信，在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下，他们定能顺利地克服困难，将数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的落后中国的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应陈云的要求，大使向他讲述了当前苏联经济建设战线的形势，详细描绘了农村集体农庄发生的巨大变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多；城乡差别正在逐步消失；培养出了自己的十分宝贵的专家，如农艺师、医生、电气技师，同时，他们又会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陈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大使讲述前不久他在北哈萨克斯坦他父亲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农庄里参观的情况。

在谈话的最后，陈云很有把握地对大使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学习苏联农业和工业的榜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代就要到来。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在座的还有财经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共产党员)、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И.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Н.罗申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
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58-62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 (1949年10月28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7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3时整，大使在勤政殿接待厅正式拜会了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董必武进行了轻松友好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董必武应大使请求对中国已解放省份的政治形势作了如下概括：

中央人民政府在各省享有绝对威望。现在我們正在进行挑选中央各部中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全部的30个部和总局拟于11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

在政法委员会下属的内务部和公安部，我们有很好的协调一致的机关，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而在其他的部，如司法部和法规制订总委员会等，我们广泛吸收联合政府中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由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没有停止秘密破坏活动，公安部和内务部的工作在现阶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不久，北京附近的石景山电厂发生过几起破坏活动，还发生过几起纵火烧军用仓库和割电话线的事件。近日，在绥远省我们有2名共产党员同志被恐怖分子杀害。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清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工作，在华北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发现并没收了200多个非法电台、大量的武器和外汇，等等。可以说有组织的国民党地下活动在华北已经不复存在。在上海地区，尽管陈毅将军采取的措施取得了胜利，但情况还是比华北差得多。

现在，华北所有悔过自新的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原工作人员共2000人，正在北京附近的劳改营劳动改造，在那里加紧进行政治学习。湖南省还有组织得很好、势力很大的国民党潜伏力量，那里的几支国民党溃散军队的武装匪帮还没有抓获。还有广州，那里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小组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头子、广东省人(海南岛人)郑介民亲自安排的。

董必武说，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政府深信，很快就能抓获所有在中国积极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和美国特务，因为政府依靠的是人民的全面同情和支持。

在谈话的最后董必武表示，深信中苏友谊会日益巩固。

谈话持续了30分钟，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69-71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9号

绝密

1949年10月31日17时30分，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大楼正式回访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总理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谈话：

一、周恩来通报说，据中国政府收到的最新报告，由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地区开始的鼠疫流行病已向绥远省和大同地区蔓延。政府采取了加强隔离的措施，向鼠疫可能爆发地的邻近地区增派了部队。

大使根据他从沈阳收到的高频电话，向周恩来通报了关于迈斯博士的防鼠疫队以及来自哈尔滨的20名鼠疫病医生的情况。周恩来也向大使通报了中国政府就尽快将苏联医生由北京送往疫区所采取的措施。

二、大使询问周恩来，如果利用丹麦方由上海至长崎和由长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底电报电缆，建立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长期电报联系，中国政府持什么意见。

周恩来允诺向邮电部了解此事在技术方面的问题，还要与上海联系，了解那里有没有丹麦方的代表以及上海至长崎段电缆的技术状况。

三、大使询问周恩来对苏联海运公司船只在中国东海和南海航行以及可能进入青岛港、上海港和香港问题的意见。周恩来说，依他之见，现在苏联船只进入青岛和上海港是冒险的，因为国民党对中国港口积极搞空中和海上封锁；至于苏联船只进入香港，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分子不敢对苏联船只进行任何阻挠，即使苏联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人民解放军的对台登陆战役不会早于1950年春季开始，在此之前，从军事行动方面来说，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不会有任何妨碍。

四、周恩来请大使与苏联政府联系，询问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能否进入大连港。

据周恩来讲，中国人民政府想从香港获得一些物资，这些物资可能由同情和帮助他们的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轮船运到大连。根据现行的规定，大连的苏方当局不准来自香港的中国轮船自由驶入该港。

如果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些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话，周恩来请大使将这些船只驶入大连港的具体条件通知中国政府。

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预先表示，准备向大连苏方当局提供进港船只的全部情况：它们的吨位、货物名称、船长和船员的姓名，等等。这些船上的船员全部是中国人，船主也是中国人。这些船只驶入辽东半岛水域时将升起五星红旗。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请求准许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理由是，东北三省和华北的所有港口中，大连港是最适于停泊和卸货的港口。在其他港口共产党人没有足够的港口设备。

大使允诺将中国政府的请求上报苏联外交部。

谈话持续了35分钟，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的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74-77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 (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80号

绝密

10月31日16时，张治中将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访问了大使。在会见大使时，张治中告知，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个人，请张担任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政府的领导人。有鉴于此，11月5日张治中将从北京飞往兰州，然后飞往乌鲁木齐考察情况。

由于已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和军事人民革命委员会成员，同时即将担当西北五省的领导工作，张治中前来大使馆请大使相信，他对苏联的友好之情是不变的，并表达了尽全力巩固中苏关系的决心。在会谈中，张治中谈到目前中央人民政府的困难时指出，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干部和经济干部，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经济困难。

张治中说，由于国民党对上海持续的轰炸，上海的工业生产水平继续下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在军事行动之前已把所有资金转移到了香港，他们与从前一样采取观望态度，暂时不敢把资金拿回中国，也不敢

在恢复中国经济方面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合作。

至于那些原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服务过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张治中说，部分人员工作认真负责，并完全站在人民政府的立场上，部分人员持等待观望立场，还有部分人员公开怠工，但是这样的人是少数，对后者的教育性政治工作正在进行。

关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张治中说，蒋介石的许多特务活动和黑帮分子留在了上海，但是，当地权力机关正在成功地清洗和捕捉这些分子。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国民党地下活动已经基本消灭，但也有个别的破坏性活动发生。

同张治中一起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翻译了整个会谈的内容。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45-47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 (1949年11月1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4日

第196号

机密

王稼祥就即将进行的递交国书事宜向我作了礼节性访问。

在会谈之初我向大使通报说，大使夫人与前来莫斯科参加国庆节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行正在赤塔，近日代表团将乘飞机回莫斯科。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

在强调中国人民对巩固苏中友好关系的热切期望时，大使说，中国对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极为高兴。大使说，对表明苏中友谊的这一举动中国人民非常感激。

我回答，苏联人民对两国人民的密切友好关系完全有同感，苏联人民非常高兴地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王稼祥继续说道，他对自己身为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感到荣幸。他说，鉴于目前他必须开创新事业，他期望得到我方的帮助。

在强调目前中国从事外交的是一批新手的不利情况时，我对王稼祥说，我方会尽力给他帮助。

在感谢我答应将来工作给予帮助时，大使说，苏联是中国的老师，中国人民是苏联人民的学生。

对此我回答，苏联人民较早开始了发展道路，正如大使所说，我方的许多经验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然后我说，中国人民在自己争取新生活的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此，王稼祥回答，中国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只是近百年来中国由于列强的侵略而大为落后了。但是，由于取得了胜利并且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会飞速发展。大使重申了苏中友谊的重要性。

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干部问题时，王稼祥说，鉴于干部人手不够，他们打算在苏联只留下三处领馆(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阿拉木图)。

在指出中国工作人员前往苏联遇到的某些困难时，王稼祥告诉我，希望国际旅行社在北京和沈阳开设分部。我答应大使研究此项问题，然后给予回复。

大使向我递交了国书的副本和他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讲话(见附件)。王稼祥说，他对递交国书程序的个别之处不甚清楚，他请求让礼宾司向他作补充说明。我答应给予相关说明。

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等同志，第一远东司，礼宾司，总秘书处，驻北京大使馆，档案室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致词

主席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的荣幸向您递交国书，该国书中我国政府委任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别大使和全权大使。

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第一个与我国政府确立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此高度满意并极为高兴，因为，我们两国之间巩固友谊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还符合全世界范围的长远利益。

请主席先生您相信我，我将尽一切努力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友好关系。同时，我希望，在我完成如此使命时能获得主席先生您的个人协助以及贵方政府的协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个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祝愿贵国繁荣昌盛。

附件二：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阁下的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之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即第一个表达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确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对此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满意和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切欢迎尽快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密切友好的外交关系，并确信确立和巩固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还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特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公民王稼祥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命令其向您递交国书。

主席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您厚待王稼祥先生，并对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事给予充分信任。

主席先生阁下，谨此以个人名义祝您身体健康，并祝贵国富足繁荣。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署签名和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绝密

为保证中苏合作飞行技术学校和高射炮团的组织筹备及正常开展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1.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货，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以超额完成1949年9个月计划的方式，向外贸部供应吉斯151型汽车360辆和吉斯150型汽车140辆，以减少向建设和筑路机器制造部供货的方式向中国供应C 80型拖拉机12台。

2.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1)根据附件一向中国补充派送人数为97人的全体成员；

(2)拨出6架里2型教练飞机；

(3)根据附件二将备用航空发动机、特种车辆、流动电影放映车、流动航空维修车归入流动基金。

3.责成航空工业部(赫鲁尼切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额外向苏联武装力量部供应34台备用M11ΦP航空发动机、51台АШ82ΦHред.11/16减压器，并由苏联武装力量部储备金承担费用提供2500升润滑油加油器14台。

4.责成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部(帕尔申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由该部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24台汽车汽油加油器、14台油槽汽车、6台AK3C 40型补氧台。

5.责成肉制品和奶制品加工业(库兹明内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向苏联武装力量部额外供应6台油槽汽车。

6.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由该部载货汽车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12台嘎斯0330载客汽车，并供应油槽汽车配套部分——6台嘎斯51型汽车底盘。

7.对那些根据该决议派往中国飞行技术学校工作的全体人员，实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号决议所规定的工资支付制度。

8.责成外贸部(缅希科夫同志)，按现行决议的器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结算。

文件送：布尔加宁、波斯克列贝舍夫、华西列夫斯基、缅希科夫等同志

附件一：

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全体人员的补充选派清单

- 1.空军政治部高级顾问副职1人
- 2.高等学校高级助理1人
- 3.物质技术保障和机场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 4.医疗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 5.歼机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 6.轰炸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 7.领航员准备监督员1人
- 8.技术人员准备监督员1人
- 9.航空通讯监督员1人
- 10.司令部军官1人
- 11.公文处理负责人1人
- 12.翻译1人
- 13.打字员1人
- 14.里2飞机机组指挥官2人
- 15.里2飞机飞行员2人
- 16.里2飞机领航员2人
- 17.里2飞机随航技术员2人
- 18.里2飞机航空机械师2人
- 19.里2飞机航空发动机工2人
- 20.里2飞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2人
- 21.里2教练机机组指挥官6人
- 22.里2教练机飞行员6人

- 23.里2教练机领航员6人
 - 24.里2教练机随航技术员6人
 - 25.里2教练机航空机械师6人
 - 26.里2教练机航空发动机工6人
 - 27.里2教练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6人
 - 28.航空发动机理论和结构教师2人
 - 29.射击射炮武器教官2人
 - 30.飞机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设备教官2人
 - 31.飞机使用技术实习训练教官2人
 - 32.飞机特种仪器实习训练教官2人
 - 33.学校政治部首长副职6人
 - 34.学校高级医生6人
 - 35.高级军医6人
- 共计97人

附件二：

分派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的器材清单

- 1.归入流动储备金的备用航空发动机91台

其中包括：

АШ21发动机43台

АШ62ИР发动机8台

其中4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4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АШ82ФН9/16发动机40台

其中15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25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2.А3С蓄电池充电器6台

3.АКC2压缩机6台

4.ПАРМ1流动航空维修车6台

5.流动电影放映车6台

АПРФ , ф.3 , оп.65 , д.418 , л.34-38

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第20475号

收到时间：1949年11月5日2时50分

发出时间：1949年11月5日3时55分

绝密

禁止复印

专号：第198号

密码电报

北京 科瓦廖夫收

优先拍发

特档

请将菲利波夫对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如下答复函转交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5日

打印5份，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第十司，副本1份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摘自A.И.拉夫连季耶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2份

1949年11月10日

今天根据王稼祥的要求接见了。

1.在会谈过程中王稼祥声明说，他受毛泽东委托，要会见斯大林，面交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并同斯大林商谈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说：“斯大林大元帅现正在休假期间，在莫斯科城外休息。我问大使，他是否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部把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转过去。”

王稼祥回答说，既然斯大林现在不在莫斯科，他准备转交这封信，并阐明毛泽东交给他这个任务的实质内容。

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莫斯科的深切愿望。他委托大使去商谈自己去苏联的时间。毛泽东想尽快来莫斯科，但是，看来11月份毛泽东无法离开北京成行。他可能于12月初或者再迟一点，在莫斯科认为合适的时候前往。

大使指出，毛泽东的访问不只是对中苏友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事件。因此毛泽东认为，他去莫斯科的时间应当由苏联政府来决定。

王稼祥接着说，他受命还有一个问题要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原先准备与毛泽东同来莫斯科。但是，目前正值组建全国政权之际，两位主要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总理同时离开中国，可能会影响工作。因此委托王稼祥来征询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应该一起前来，还是周恩来可以晚些时候再来。

我答应大使转达他的问题。

在会谈之后，王稼祥很快把毛泽东的信送交外交部转呈斯大林。

2.王稼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红场上的盛大检阅和游行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苏联人民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人们发出欢呼声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肖像的尊敬。

3.王稼祥说，在离开北京前，他告诉毛泽东，他对外交活动缺乏经验。就此问题毛泽东向他提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而在苏联必须认真地注重苏联同志的建议和指示。毛泽东着重指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外交家，其工作将更加艰巨。外交部长周恩来有意派遣若干今后将委派去各个国家任大使或公使的人在莫斯科大使馆见习。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在这里大概不仅要组织他们见习，而且还要为他们上外交史的课程。

王稼祥指出他自己和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学习外交史，他请求给大使馆提供能讲授外交史以及对外交见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的教员和专家。

我回答王稼祥说：“在这件事情上外交部将给予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拉夫连季耶夫(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等同志，档案室。3份寄送：卡冈诺维奇、佐林同志及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7, л.27-29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1949年12月1日

第111号

绝密

今年11月10日下午5时，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动来大使馆拜会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受毛泽东委托谈了以下情况，并要求转告苏联政府：

一、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今年夏季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赴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想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刚进北京，还没有组建政府，面临大量的组织工作，若毛泽东不在就无法进行，因此毛泽东留在了北京。此外，刘少奇之行带有非正式性质，是以高岗的东北代表团作掩护的。

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想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科瓦廖夫在今年11月5日的谈话中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态度。毛泽东在会见科瓦廖夫时，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了他想于今年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以便亲自向斯大林同志祝寿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这一天，全世界对苏友好国家的代表团都将到莫斯科，因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

1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莫斯科发了类似内容的电报。

今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拜会大使，将毛泽东想拜会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大使，并请大使将此事转告莫斯科。

我问，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属什么性质，中国政府人士中谁陪同他。周恩来回答说，访问时除了与斯大林同志建立个人友好接触外，看来毛泽东同志还想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没有人和毛泽东一起去莫斯科，如果毛泽东同志访问时要制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立即坐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一条约。

接着周恩来问大使，大使是否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使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去做。

二、周恩来问，有没有苏联政府关于不承认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问题的答复。大使作了否定的回答，不过允诺就该问题再次询问苏联外交部。

三、接着，周恩来通报说，昨天中国政府情报机关从香港得到的情报称，白崇禧的部队正退往越南境内，法国当局让他们在那里换上了保大 [67] 军队的服装。中国政府拟就此事专门发表声明，提醒法国政府，中国人民政府认为，利用化装的白崇禧部队镇压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将由法国政府承担责任。虽然这一声明不直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越过边境线追击白崇禧部队，但是声明会明显暗示这一点。政府还打算对其他可能收留退往泰国、缅甸和印度的国民党军队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类似的警告声明。

周恩来认为，这些声明会对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影响，他们会害怕放国民党军队越过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国境线。如果白崇禧部队在印度支那获得避难所，人民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研究。周恩来询问大使，中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是否妥当。大使回答说，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涉及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我无可奉告，我认为须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同意大使的看法，请大使就这一问题请示苏联外交部。 [68]

四、周恩来还通知说，据政府获悉，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现在法国的宋子文，力图在印度支那保留自己的主力，正就利用国民党军队对付越南革命运动一事与法国人进行谈判。

大使回答说，今年夏季，当他在广州时就获得过类似的情报。

五、在谈话的最后，大使请周恩来协助尽快解决使馆由南京迁北京和由塘口(Танку, 广州东部)来北京的铁路运费问题，因为至今没有收到全部账单，不能支付运费。此外，两次寄来的账单完全不同。

周恩来说，他将就此事下达有关指示。

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81-85

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96, д.220, л.52-56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11月10日在与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如下两个问题：

一、他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是否应该同毛泽东一起来莫斯科，或者是否周恩来可以晚一点来。同时他还说，目前正在组建整个国家机关，同时有两名主要领导人离开中国，北京方面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工作。

二、王稼祥还通报说，周恩来打算派几个人到莫斯科大使馆进行实习，然后将把他们派到各个国家担任大使和公使。王稼祥介绍说，他本人以及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外交史研究的，他请求给大使馆派一名教师和顾问，他们能够讲授外交史的课程以及就外交实践方面的问题答疑。

苏联外交部认为，对王稼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以给他口头答复，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已经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从北京来苏联是否合适感到担心，苏联政府准备同意就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的任何一种决定。

至于王稼祥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选派一名外交史方面的教师和外交实践问题的顾问帮助大使馆，苏联外交部将在近期内为此挑选相应专业的工作人员。

决议草案附上。 [69]

请审批。

1949年11月1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ABПРФ, ф.07, оп.22а, п.13, д.198, л.29-30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 (1949年11月15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2号

今年11月15日下午5时，大使拜见了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系列中国政府感兴趣的问题转达莫斯科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已以电报形式及时转达苏联外交部)。谈过这些问题之后，应大使请求，周恩来通报了最近的中国国内形势和战争形势。周恩来说：

一、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其中包括11月初出现的所有物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绝不是不可预见和不可克服的。11月上旬物价飞涨(约5—6倍)的直接原因是：

(一)大量纸币投放市场。这是财政部对所采取的措施考虑不周的结果。尽管所发行的纸币总额不算太大，今后政府还要印发纸币，但如果纸币是逐渐投放市场，物价就不会如此飞涨，而现在政府却是一下子把纸币的半年储备量投放市场。在1949年，这是按计划第三次大批发行货币了。人民银行第一次补充投放纸币是在今年4月，第二次是在7月底、8月初，第三次——最大的一次，是在11月初。正是这最后一次发行推动了物价灾难性的上涨。如果不让物价如此急剧飞涨，我们财政部的同志就应按月逐渐地把货币投放市场。但财政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们认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暂时控制进一步发行货币，从而制止物价进一步上涨是适宜的。也许这是正确的。况且，为保障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棉花、茶叶、蚕茧等)，保障农民扩大播种面积预付

款以及保障对现在新组建的空军和海军拨款，发行如此大量的货币也是必要的。

(二)投放大量货币明显动摇了居民的信心，破坏了这些货币的购买力。农民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之后，想立即让这些货币脱手，便急忙购买布匹、食盐和农具等。由于需求增加，这些货物的价格便猛涨。价格猛涨，首先吃亏的是工人、军队和职员，他们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增长。为了保障这些人的生活，国家被迫按定量供给他们粮食、煤炭和布匹。

(三)察哈尔省鼠疫的流行和对内蒙古通往华北的各条道路实行检疫，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因为按惯例每年秋天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粮食都销往北京和天津，而今完全停止了。

由于政府采取了同近来抬头的奸商作斗争的措施以及为了稳定物价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粮食价格有所回落。但政府预见，明年，即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会上涨一倍。

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毫无疑问，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部机关要比国民党政府当时相应的机关庞大得多。例如，国民党时邮电部职工有5万人，而我们仅老解放区邮政职工就有4万人。由于我们的政权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准备把邮政业务不仅普及到城市，而且要普及到农村。这样，国家邮电职员人数将不断增长，现在我们的邮电职员有8万人。我们党政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平均1/3是从部队中抽调组成的。

尽管我们经受着财政经济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与国民党所经受的困难，甚至与其统治最巩固的时期即1935—1936年所经受的困难，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几年，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总额为15亿银元，国库券有5亿银元。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是20亿银元。如今我们流通中的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总额也相当于20亿银元。但我们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要比1935—1936年国民党政权下的领土和人口多得多。我们认为，发行的纸币远没有耗

尽我们的全部资源，1951—1952年间，我们准备把纸币发行量增加到相当于40亿—50亿银元。

为保障我们货币的坚挺，我们还将通过发行国内债券和扩大税收逐步回笼一部分货币。我们打算在最近两年时间里(1951年和1952年)调整好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在东北和华北现在正在进行土改，那里有农民1.3亿。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将在华中和华南进行土改，这将涉及2亿农民。1952年将在西南进行土改，那里有人口1.45亿。土改的进行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稳定物价。农民信赖政府和政府发行的货币，部分流通中的货币将转为国家银行的储蓄。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打算使国民党关闭的所有工厂和企业重新开业，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在政府所收的全部税款中，60%来自农民，40%来自城市。在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农民把自己收成的20%交给国家。农民乐意交付这一税收，因为在土改前，他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根据这种情况，在华南，我们将以税收形式征收地主全部土地收入的40%—50%。

我们相信，经过两年时间，我们将全部解决我们的财政经济困难。

二、人民解放军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在11月20日之前，刘伯承将军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将占领贵州省会贵阳，然后分兵两路向前挺进：一路攻重庆，在12月底占领之；一路出昆明，在那里估计不会遇到严重抵抗。在广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阻止白崇禧的部队向法属印度支那撤退。白崇禧目光极其短浅，他正在桂林收拾自己的财物，现在尚未决定向何处逃跑。

在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控制所有川滇公路之后，彭德怀将军的部队将进攻陕南的胡宗南部——汉中兵团，然后直出成都。届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答应率其两个师起义。1950年1月，我们计划全歼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航空公司(KHAK)和中央航空公司(KATK)的60架飞机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后，很难想象，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还能从重庆向何处跑。

四川和西康解放之后，我们将立即向西藏进军。我们计划3月份在海南岛登陆，多年以来，那里有我们的大批游击队在活动。我们指挥部的下一步计划是：1950年春季为台湾登陆战役做准备，1950年夏天实

施登陆。我们认为这一战役应在做好海、空联合打击的准备之后才能实施。

在实施台湾登陆战役时，我们绝对应该吸取金门战斗的惨痛经验，在这次不大的登陆战斗中，我损失了3个半团的兵力(7000名战士)。

三、中央政府的行动将逐步得到调整，并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但参加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在积极地工作。我指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司法部长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而且还有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以及积极在水利部工作的傅作义将军。但是也有一部分进入政府的所谓的“民主党派领袖”，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首先，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物；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党派领袖”中的极右分子，暂时还受到我们的信任，能够出席各种会议，而在战争最后阶段才归附我们的刘步董(Лю Бу-гун)、何思源等，则被送往华北大学接受政治训练。

四、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现在他们正在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顺便指出，民盟和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现在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两个代表大会上，只讨论自身的组织问题，扩大或缩小该党的问题，改变其名称或变更其领导岗位的问题，其他任何政治问题都不涉及。所有这些党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共同的统一战线纲领，承认中共的领导，赞成国家的基本政治路线——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最高的权威机关，甚至邀请中共帮助解决他们内部的组织问题。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眼下对我们还持观望态度。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妥协，并要求他们明确地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中国许多资本家都还没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对他们的活动提出了限定的条件：某一企业和商业组织的工作首先是为国家提供收入或收益，其次才是所有者的利益。我们限制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最高利润，同时告诉他们，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他们应更加节俭，限制自己的利益。我们想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

五、我们有许多党的工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加入政府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态度不正确。这些同志宣传“关门主义”政策，反对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代表进入政府机关。我们反对这种倾向，并向他们阐明巩固与各民主党派联盟的重要性。还有另一种危险，就是容许把那

些未经检查和未经充分考察过的民主党派活动家安排到责任重大的岗位上来，我们也必须同这种倾向做斗争。

六、我们现在还没能实现提拔工人到国家机关领导岗位，因为中国工人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绝大部分是文盲。我们仅在沈阳、上海和天津个别地方提拔了一些工人到市里工作。在各个工厂里，我们有不少先进工人、争创高劳动效率的倡议者和劳动模范，但中国工人没有学会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自己的同志们和其他劳动人民讲话。

七、新中国的特点在于：我们努力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使加入联合政府的所有民主党派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作斗争，促使他们的部队协助进行土改。

对后一个问题需要给予一下说明：现在我们正把傅作义、陈明仁将军这些军阀的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还准备改编四川和西康以及其他地方的军阀部队。一些同志建议，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应该遣散这些部队，令其回乡。但我们认为，如果遣散这些部队，他们就会搞武装抢劫，在这些省搞土改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当反革命的支柱。所以我们认为在土改结束前不遣散这些部队是正确的。

结束时，大使对周恩来坦诚而友好的谈话表示感谢。会谈持续1小时45分钟。出席会谈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文件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57-66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莱克萨克塞斯，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转交

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尔洛斯·罗慕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目前在全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将被消灭，也不再能全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拒绝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派遣以蒋廷黻率领的代表团驻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团不能代表中国，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出现在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

10月1日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建立那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目前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领土和各个民族，同时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其军队残余即将被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完全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法律基础。

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成为一小撮丧家之犬的武器，完全无权代表中国人民。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依照中国人民的愿望，依照联合国宪章，进一步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的全部权利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佐林、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НПФ, ф.47, оп.36, п.140, д.3, л.46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 [70] (1949年11月17日)

.....

李克农应大使要求，介绍了以下美国情报机关在华活动的特点。

现在美国的侦察中心已由其驻中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美国人建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所”。

以往美国在中国实施侦察的所有计划和阴谋都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比如，马歇尔关于利用执行司令部加强美国军事集团控制中国的方案，关于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司徒雷登计划，最后，美国务院在“白皮书”中论述的所谓依靠“民主个性”的计划，全部破产了。

现在美国情报机关将它在中国的一切力量都用来破坏中苏友谊。

上面提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侦察中心——“远东问题研究所”给它在中国的骨干力量和美国派往中国的间谍提出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诋毁苏联在华专家的名誉，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和东北的一切机器设备——通过上述手段破坏中苏友谊。美国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地下力量已开始积极地着手完成其主子所下达的任务。

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留学的中国人。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

中共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查明，他们之中一些人公开发泄对中国新制度的不满。

例如，北京美国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教授通过熟人给美国写信，其中说，燕京大学所有进步民主的教授和学生已处于被经常监督的状况中，已失去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共安全机关还查明，美国人利用各种贸易公司，尤其是同日本、南朝鲜和香港通商的进出口公司做掩护，往华北派遣自己的人。我们机关已经查出一批美国间谍，他们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钻进天津的，其目的是破坏中苏友好。他们之中有：李仲勤(Ли Чжунчэн)，过去的附敌分子，参加过汪精卫的亲日政府；李桥华(Ли Чао-хуа)，曾多年住在美国；郑伊万(Чжи И-ван)，朝鲜族出身；郭化邦(Го Хуа-бан)等。

最近在华北，政府发现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宗教人士在积极活动，他们的活动令人怀疑，人们举行祈祷、礼拜活动，许多郊区的中国人都来参加。

此外，还发现一大批中南和华南的黑社会分子来到北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民主人士，经常出没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家中，企图通过亲友钻进政府机构。

由于生活必需品涨价，在中南和华北发现了武装盗匪抢劫，不能排除此中没有美国间谍机关插手。

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侦察人员发现了许多地下电台。经过搜查，查明和逮捕了近200名国民党和美国间谍。在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 [71] 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保卫部门逮捕了20多名可疑的围着代表团乱转的人。

我们预料，将来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间谍机关在中国会更加猖獗地活动。尽管美国人为了麻痹我们的警惕性，从中国召回了自己声名狼藉的间谍人员，首先是军事航空运输和海上运输机构里的美国军人。我们清楚地知道，等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会以外交人员的名义向中国派遣更有经验的间谍人员以完成其基本任务——离间中苏关系，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我们中国的侦察人员和反间谍人员绝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我们十分注意有关反苏活动和言论的征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个别在中国的苏联同志行为不检点，给美国人的反苏宣传提供了方便。例如，今年11月初，在塘沽，从两艘苏联船和一艘朝鲜船上下来的一帮水手在城里大

撒酒疯，殴打当地居民和政府人员，强奸妇女。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化解事端，但不能排除美国间谍会利用此事搞反苏宣传。

谈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政府的合作问题，李克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完全相信政府，一方面由于习惯于美国的保护，担心没有美国的支持，不能恢复中国经济。对此，李克农举了中国两个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经理的例子，这两个公司是不久前才转到人民政府一边的。两位经理担心，没有美国的帮助，他们搞不好中国民航的工作，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飞机制造厂、燃料和机场设备。对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他们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美国反苏宣传的影响。等他们来到停有苏联运输机的北京机场后，他们对陪同他们的中央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们坚信，没有美国人，中国民航完全能够搞好。为了防止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把飞机开走或破坏飞机(这两个公司里共有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400人)，人民政府雇用了他们。刚停在香港和九龙的70架飞机将转场到内地机场，人民政府推说没有航空汽油，暂停使用两个航空公司的机场设施，而外国工作人员将集中到条件差的小县城去；为离开这些偏僻的地方，外国人必须彻底从公司辞职，而这正是政府所盼望的事。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九龙和香港的英国人不仅没有阻碍这两个公司的飞机向新中国转场，而且帮助九龙的飞机尽快离开，提供汽油和备件。英国人这样逢迎我们，为的是我们不为英国人在开滦办的煤矿设置障碍。

中国政府已收到香港中国船业公司的具体建议：把这些公司的船全部交给政府管辖。但我们只是原则上同意，还没决定把这些船转泊到内地港口，这是因为担心这些船停泊在我们港口会被国民党飞机炸沉。我们甚至允许这些公司的船运送国民党部队去台湾，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国民党当局强行没收这些船，假如他们知道这些船主要转到我们一边。

等再过半年左右我们解放台湾时，又可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船。

H. 罗申

АВІ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96-102

АВІ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67-73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毛泽东即将来莫斯科，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意见，应该召我们驻中国的大使罗申同志回莫斯科临时出差。罗申同志回来的问题在得到明确决定时，他必须同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一起动身。

附上决议草案。

请审批。

A.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外交部决议(草案)

决议(关于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鉴于毛泽东同志将来莫斯科，召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返回莫斯科。罗申同志应该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动身，陪同他前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 , ф.07 , оп.22а , п.13 , д.198 , л.32-36

№13865 什捷缅科 [72] 、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副本

Г.М.马林科夫同志：

根据政治局鉴于扎赫瓦塔耶夫同志11月25日的电报(第40/324号)所下达的指示，现把给扎赫瓦塔耶夫同志的命令草案寄出。

已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C.什捷缅科

1949年11月26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附件：

给扎赫瓦塔耶夫的命令

答复第40/324号电报。根据韩光 [73] 和任坤一(Жен Кун-и)与民政局负责人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您应该通报，我们同意以下内容：

- 1.向中国当局提供关于统计1949年计划完成情况的资料和1950年计划的数据。
- 2.允许中国人在苏联和苏中企业里生产电影胶片。
- 3.开设大连至哈尔滨之间的客运线。

C.什捷缅科

A.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51—1552页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 领馆事务 [74] (1949年12月1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

会谈一开始，曾涌泉问我在北京和沈阳开设旅行社分社的进展情况。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最近即将解决。

曾涌泉请求尽快在北京和沈阳开设苏联国际旅行社分社，因为中国人到苏联来有不少困难。

我答应帮助弄清这个问题办到了什么程度。

曾涌泉请求驻满洲里车站的苏联领事和赤塔市的苏联外交部代表给来苏联的中国人以帮助，并把他们到来的消息报告苏联外交部，以便外

交部转告大使馆。

我回答说，领事和外交部代表可以把中国代表到来的消息告诉外交部，但中国代表必须亲自告诉他们自己到来的消息。

曾涌泉通知，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ЧжанГуань)由使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过7—10天将到新西伯利亚、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解决原国民党领事处的问题。

曾涌泉问，能否指示当地政府保卫上述临时关闭的领事馆的财产。

我回答说，可以下达这样的指示。

曾涌泉问，张光到达上述城市后应该找谁，能否先给他安排旅馆，因为他不愿住在原中国领事馆里。

我回答说，张光应找外交部代表或执行这一使命的人。安排旅馆的问题我建议找国际旅行社，其他问题找领事处。

曾涌泉说，原中国大使馆参赞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学校当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给他们发放同意他们在苏联继续学习的证明。曾涌泉说，大使馆不反对这些孩子继续学习，并问我们是否反对或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回答说，这种问题应由大使馆自己解决，我们不反对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大学里学习。同时我答应过问一下这个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 and 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8, л.24-25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31日

第200号

绝密

12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本人的提议正式拜访了他。

周恩来在通报了毛泽东的启程日期以及他们全体随行人员之后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安装电台，因为往来公文的数量和解决问题的急迫性要求这样。电报局不可能保证这种需求，此外，发送电报的花费相当大。

随后，周恩来表示，希望尽快恢复上海领事馆的工作，并在广州和沈阳开设领事馆。

有关支付从南京运输苏联大使馆财产的费用问题，周恩来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免收运输费。

接着，外交部长简略地讲了一下某些方面的形势问题。

他通报说，12月2日几路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重庆。之后，逗留在四川北部的胡宗南兵团要么逃往西康，要么投降，除此别无出路。重庆解放之后，西部和西南的战役将更加顺利开展，毫无疑问，1月或2月底前将彻底结束。此后留给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任务是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至于西藏和海南岛，这不是很费力的战役，这完全取决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推进的程度。面临的任何抗拒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台湾战役是很艰巨的。

当前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加紧准备这个战役，解放台湾只有在进行充分准备登陆部队以及海军舰队和空军机队之后。战役的日期，看来将安排在1950年9—10月间。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在4天时间里政府人员讨论了1950年的收支预算(概算)，总数计30亿元或20亿美元多一点。

他指出，收入部分将有19%赤字。这一赤字将用胜利债券补偿6.6%，其次用征税补偿2%—3%，其余11%以发行货币补偿。当然，

这将构成一个庞大的数目，因为1元等于中国(纸币)1.4万元。由于汇率在增长，可能发行更多的货币。发行货币要逐步进行，不能再犯我们所犯过的错误。

H.B. 罗申(签名)

АВІРФ, ф.100, оп.42, п.288, д.19, л.103-104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1月31日

第15号

绝密

1949年12月9日23时，我去周恩来府邸拜会了他。

一见面我就声明，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支113人的中国军事小分队越过蒙古边界的声明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宣读了声明全文)。对于声明中所说该小分队是奉董必武的指示调查兰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行踪，周恩来表示怀疑。周恩来说，这可能是将原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名字同董必武的名字弄混了。

宣读完声明之后，我对周恩来说，我们可以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答复转告蒙古政府。

周恩来说，他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详细的答复至少得在1—2天之后，因为对此还需进行相应的调查。同时周恩来请我通过苏联外交部转达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它扣留了该小分队，并将此事通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请求转达，请蒙古原谅该小分队侵犯了蒙古边界，尽管他现在尚不清楚，究竟是谁侵犯了蒙古边界——是国民党分子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他请求蒙古政府对被扣留的小分队进行监视。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我讲了他收到的消息。12月9日14时，毛泽东和大使罗申跨过了中苏边界，当天18时李克农和С.Л.齐赫文斯基回到北京。周恩来说，中国方面想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前往苏联以及他将于12月17—18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

接下来周恩来向我通报说，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指出，今天报纸上已出现这方面的消息，同时问他——他所说的是否依据这些报纸的报道。周回答说，他拥有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为可靠的消息。

周恩来感兴趣地问，斯大林诞辰70周年之际，使馆是否举行正式招待会。我回答，暂时还未收到外交部的有关指示。

到此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И.Г.卡拉布霍夫同志。

周恩来亲热地送我到汽车旁，尽管我请他不要送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57-59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2月12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3日

第232号

机密

根据王稼祥的请求接见了。

王稼祥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目前已在苏联境内之后，要求定

期通知大使馆有关列车的进程，以便大使馆把情况告知北京。

我答应将向大使馆提供有关列车进程的情报。

王稼祥接着说，他打算到基洛夫市去迎接毛泽东。大使要求对这次出行给予协助。

我答应提供必要的帮助。

大使指出，大使馆的居处很不理想，要求提供一处新的地方，随后问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大使馆的要求可以满足，马上去寻找一处新的住处。

大使接着说，他们将把大使馆范围里类似房屋中的一幢，用作外交使团服务管理的仓库。大使馆已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要求把房子移交给他们，因为这可以让大使馆用于各种业务目的和建立俱乐部。王稼祥询问，能否在最近期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能提供有关大使馆要求的情况。我答应大使研究这个问题并满足大使馆的要求，假如有可能的话。

关于大使问А.Я.维辛斯基同志回到莫斯科的时间，我回答说А.Я.维辛斯基同志定于周末前来。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古谢夫、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9, д.17, л.35-36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 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49年12月13日

第32项 关于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

(根据1949年12月9日第472号决议，п.44 с)

接受苏联武装力量部关于批准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助理武官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10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 [75] (1949年12月13日)

.....

斯帕诺说，起初他想同科瓦廖夫见面，但得知他离开了中国，于是决定同我谈。斯帕诺提醒说，他同我谈话，不是同外交官谈话，而是同一名联共(布)党员谈话。他还强调，他同我谈话完全是坦诚的，他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名工作者同我谈话的。

斯帕诺说，他到中国好长时间了，到过华中、华南好多地方，城市农村都去了，他想就他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印象同我交换意见。斯帕诺还强调，他对中国的形势有许多担心，他想谈谈这些担心。

斯帕诺从他到天津谈起，那里给他的印象很不好。比如，用斯帕诺的话说，天津的一个英国大公司在此之前还存在，可那里出现了这样的阴谋：这样一个大单位，作为租让企业是消灭了，但它落到了某些英国公民的手里，换句话说，被分成好多份，资本落到了英国人手里。斯帕诺同志就这个问题同天津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后者对他说，中央是这样指示的。后来斯帕诺就这一英国租赁企业问题同北京中央工作人员座谈过，他们对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几天前，斯帕诺同志同华北局书记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谈了6个小时。斯帕诺想向薄一波指出城市和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对工人阶级估计不足以及其他缺点。薄一波无视斯帕诺同志所引的列宁当时所提出的方针，回答说：

一、一点儿也不担心农村出现新型富农，因为他们是从新政权那里得到的财产，他们完全支持新政权。按照薄一波的话讲，新富农在内心

是革命的。

二、在新中国，私有企业里不准许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必须给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文化，没有觉悟，所以暂时还不能让它进行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未来的问题，大约过5年党才搞这个问题。斯帕诺说列宁有过指示，要教育工人阶级，要勇敢地推动它前进，对此薄一波回答说，他知道列宁这些指示，但他们不符合中国的特殊条件。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劳动部长李立三大致以类似的精神同斯帕诺进行了谈话。李立三也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觉悟是不高的，现在不能让他们搞任何阶级斗争。按照李立三的话讲，党确实关心工人阶级还得过3—5年。……领导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或者俄国走过的路。对此斯帕诺举了下面一个例子：在同薄一波谈话时，薄通知说毛泽东已去苏联访问。对此斯帕诺同志表示了明显的高兴。对斯帕诺的情绪，薄一波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兴奋的地方。

三、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议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

四、中共领导人不理解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进行任何斗争以防止其复辟。……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加强城市工作的好措施，其中一部分措施开始落实。我表示了自己这样的观点：我没看到中国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然后我告诉斯帕诺，必须给中国同志以经常帮助，同时我表达了自己这样的认识，斯帕诺同薄一波和李立三的谈话看来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他们不同意他的结论。（斯帕诺立刻肯定了这一点。）然后我指出，看来斯帕诺也清楚，中国同志请求帮助他们解决师资问题以便办学。如果通过这一决定，这将对中国同志带来很大帮助。……斯帕诺感谢我同他谈话，并重新强调，他希望我们这次谈话只局限在我们两人之间。我请他相信这一点。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乌鲁木齐

致苏联领事：

第380号。不应该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但是，你们要让地方当局明白，最好应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关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对这个问题，只有在批准了相应的职务后我们才能给予明确答复。

A.葛罗米柯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1949年1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72页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对苏联来说，实现和平已有4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能够得到保障不仅是5—10年的问题了，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 and 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 and 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

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也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同志：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

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提供舰只。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舰只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这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经靠近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和印度支那。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

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回避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员或代理人吗？

毛泽东同志：有的。我们在清查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费德林、师哲(卡爾斯基)等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摘自И.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2日

第7号

机密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

曾涌泉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周恩来总理祝贺斯大林70岁生日的贺词亲手交给我。

然后曾涌泉说，他想以预先安排好的顺序来讨论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的问题。曾涌泉补充说明，大使馆暂时还不研究和筹备正式安排的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签订一个专门协议。

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也研究这个问题。

我答应关心这个问题，并希望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一份具体的建议。

曾涌泉接着说，中共党员的一些子女长期在苏联居住和学习，其中有些人已经获得苏联的国籍。现在他们在苏联的大学里学习，毕业后他们将是很有用的专家。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没有从事中国研究，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概念非常模糊。大使馆认为，必须设置专门课程，但是想同苏联外交部有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口头协议。曾涌泉提到大学生们时常向大使馆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随后问道：大使馆能不能关心一下这些大学生，可不可以提出让这些中国学生退出苏联国籍问题，而他们是在必要的时候取得苏联国籍的。他指出，大使馆直到现在拒绝审批这些大学生的申请。因为还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谈及签订口头协议的事情。

曾涌泉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大使馆暂时没有大学生的确切名单，现在正在收集完整的资料。

我答应着手处理有关这些大学生的问题后，要求曾涌泉提供有关他

们的信息。 [76]

曾涌泉告知最近有许多杰出的中国活动家来到苏联就读，今后还将有一些领导同志来就读，之后问我，该不该签订一份调度安排车辆、供应服务、结算费用等问题的专门协议。曾涌泉通知说，今后只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派送病员来苏联就医，但是送来就医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曾涌泉通知说，作曲家黄舜(Хуан Шунь)逝世后，在苏联有他的作品遗留下来。大使馆收到中共中央发来收集黄舜尚未出版的作品指示。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给予协助。

我答应查明情况，满足这个要求的可能性。

会谈末了，曾涌泉问及给大使馆提供新房子的事，以及现在被外交使团管理处用作仓库的办公用房的情况怎样了。他说，最近的房子可能用于办公需要和车库，因为部分汽车现在只能停在露天。

我回答说，马上采取措施寻找新房子。

出席会谈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等同志，总秘书处，领事司，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9, д.18, л.28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 (1949年12月24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向您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政策和实践的若干问题。

1.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些资料

您曾建议中国领导人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那部分工业。

有必要指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除了东北，整个国家经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比最高产量年份的水平低得多。例如，与具有5870万吨的最大开采量的年份(1942年)相比，1949年的煤炭开采量只有3350万吨，或者说是其57%。

在中国主要的冶金基地——东北的冶金工厂，生铁的产量不超过15万—17万吨，或者不超过发挥出工厂能力最高生产水平年份(1942年)的7%，相应的钢产量为12万—15万吨，或者不超过炼钢设备效率的11%。

东北发电站的发电量超过中国当时总发电量的50%，1949年不超过140万千瓦/时，或者是1944年最大发电量的31%。

其他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乐观。

刚建立起来的各个工业部尚未着手管理国营企业，不了解工厂的设备、工厂生产的产品性质和数量，尚未清查搁置港口和仓库未被启用的设备及几千台车床(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尚未采取任何措施对私营企业的经营建立起国家监督和检查。

1949年的农业，由于旱灾和水灾，收成减产40%，这给居民供应食品方面造成粮食极其紧缺，城市里的供应情况尤其紧张，也使出口潜力急剧缩减。

铁路运输方面的状况要好一些，1949年修复了2650公里铁路和总长度13500米的1355座桥梁，这就保证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总长9700公里线路上的列车畅行无阻，也保证了恢复人民解放军在最重要战线上的通行。同时，保证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与华中、华南地区的联系。

商品贸易的批发和零售，除了东北，基本上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失去了对市场及零售价格的影响力，在为国民提供商品的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种子的供应，为投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国家和合作社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的比重只有5%—8%。

关于扩大和由国家掌握批发销售以及扩大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的措施，还没有实施。

国家对外贸易只对商品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监督。

国家金融和货币流通完全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信贷和货币体系。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各个经济地区没有统一的地区预算，只是每个地方权力机构有各自的预算。上述的这些预算具有巨额赤字，而以发行纸币进行弥补。

例如，在1949年的9个月里，东北的预算赤字占支出总额的11%，而在华北是35.1%。

1949年全年的预算赤字，华北地区达到29.2%，西北则是43.2%。

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在解放区有10种不同种类的货币在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东北银行的货币，解放区银行以前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广东省银行的货币，新疆元，中国银元，港币，还有没停止兑换的国民党货币)。

还没有采取调整货币流通的措施，还在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根据1949年11月1日统计的情况，在流通的货币中，有1401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9472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而且仅1949年10月就发行了664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1129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1949年11月更是大规模地发行货币。

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发行的货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并导致外汇汇率的降低。

到1949年11月1日，1公斤小米的价格与1949年4月1日的价格相比，在北京上涨了15.3倍，在天津上涨了14倍；而米价，北京上涨13.8倍，天津上涨11.5倍。上述提到的城市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所有其他粮食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

在11月，与1949年10月末相比，粮食产品的价格又上涨了3—4倍，工业产品的价格则上涨了2—3倍。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比价，与1949年4月15日开盘那天相比，北京和天津均下跌到原来的1/16。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预算有非常大的赤字，相当于562.38万吨小米，或者是支出总额的18.9%。其中相当于215万吨谷物的赤字依靠发行国债，剩下的则依靠发行纸币来弥补。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预算的总支出中，军费支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38.6%，行政管理支出——21.4%。很明显，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还没有打算缩减武装力量，现在已经严重膨胀的国家机关甚至还要增加150万人，其理由是避免失业人数的增加。

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证实了，在1950年中央政府没有建立必要的调整货币流通的经济条件。

在银行的业务领域里，尚未采取严格措施来限制私人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活动。

2.关于工人阶级

您在1949年1月份曾经建议：“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要特别重视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加强政治工作，创造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使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是领导阶级，处在执掌政权的位置上。”

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性的措施。在东北地区，各个国家企业、铁路运输部门、矿山和冶金工厂等工人阶级的情况略有改善。

在其他地区，因为蒋介石体制的崩溃，工人阶级得到了政治自由，但并没有感到物质状况的提高，和以前一样处在半饥饿条件之下。1949年12月初发表的劳动法令，规定了工作日的劳动时间为12个小时以内。法令中写道，“在新解放的城市，企业主必须遵循解放前3个月以来原有的工资额标准”，“在效益不好的企业里，工人们不能要求奖金”。这样，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改变，和以前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质。比如，最低的工资是在煤矿和冶金工业，最高的则是在邮电和纺织行业。

到目前为止，尚未制定有关工人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至于

由全国劳动联合会1949年11月通过的“协调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规定”，不仅没有发展政协总纲领强调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质上否定了它们。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工人到中等和高等学校进修以及在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骨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仍然存在着对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变革中起的作用估计不足。

3.关于农民和土地改革

1926年您曾说过，“在国民党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存在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农村开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担心农民的加入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认识。中国的反帝战线，只有在农民更积极、更坚实地参与下才会更强大、更有力”。

在很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作为主要力量以及人民解放军建立的基础和军队物质供给的来源，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革命活动也表现出犹豫不决和担心。

到目前为止，土地改革的实行还只限于东北和早期解放的、有1亿多人口的华北等几个地区。

其他地区不但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连高额地租也没有降低，直到现在地主还向农民收租。

领导机关打算2—3年之后组织实施有限的土地改革。

因此，有些地方的农民不等中央政权的允许就开始重新分配土地。这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

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层中流传了这样一个“理论”，即那些在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支持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

4.关于党

您曾建议，“……用加强城市群众政治工作的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工厂和铁路建立坚固的党组织”。

但是，工人阶级在党内力量的增强到目前为止还是微不足道的。在各级党组织中，任何吸收工人入党的积极工作都没有开展。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混入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很多地区，党组织不加区分地进行吸收党员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料，党员中的80%是农民。在华东地区，所有24836个党支部中只有214个是工厂的工人党支部。在华北地区，只有4.1%的党员是工人，而85%是农民。仅山东的一个党组织里就有1万多名地主、富农和商人。

按照党龄，中国共产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年轻的，是在日本溃败和投降之后入党的。在华北，54%的党员是在1945年之后入党的。

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的文化水平相当低。在华北，60%的党员完全就是文盲，13.6%是半文盲，只有18.7%是初小毕业。

在党的队伍中，包括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一些过去在感情上是亲美反苏的人，现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支持。比如，彭真——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党委书记，中央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林枫——中共中央委员，东北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富春——东北政府副主席；李立三——劳动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其他人。当时在高岗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但是高岗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这次批判是由刘少奇组织和领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两次提高了货物运输的铁路价格(每次提高200%)，这就导致了需要铁路运输的29种商品中的12种商品没有任何利润，其中包括大部分粮食产品和生活日用品，也造成了铁路运输利用不足，城市粮食紧张，粮价再次上涨。

劳动部部长、以“托派分子”闻名的李立三，在1949年6月建议成立企业主同盟，目的是有组织地保障他们的利益，理由是工人们普遍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1949年11月，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出席的有刘少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Л.Н.索洛维约夫和我本人，李立三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工会联盟委员会。

作为全国劳动联合会副会长的李立三，是允许和建议在报纸上发表“调整劳资关系准则”的发起人之一，这些准则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总纲领是背道而驰，并恶化了工人在私人企业中的状况。

5.关于报刊、出版物

从1949年9月起，报刊上关于党的生活、党组织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和实现国内革命措施的报道急剧减少。这是出于安抚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的目的。

6.关于国家机关

您在1949年6月曾建议，“不要推迟成立中央政府……中国现在还没有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危险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同样是危险的”。

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各民主党派和组织的联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共设37个部和其他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其中22个由共产党主持，15个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持，其中还包括这样的反动分子，如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

共产党人控制了主要的部委和中央机关：国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劳动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情报总署、新闻总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法律起草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主持的机关有：邮电部、卫生部、华侨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派人士主持的是交通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总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主持，教育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持，轻工业部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主持。其余的5个部——农业部、林业部、文化部、水利部和文教委员会，形式上由无党派民主人士管理。

在所有副部长和中央政府机关领导人中，有57名共产党员和35名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套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大多数部委和中央机关中人员的配备甚至不足一半，而在一些部委，比如，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林业部、劳动部，除了部长和副部长，没有其他任何工作人员。

国家政权机关在地方上还没有建立。那里或者是前线军事管理机关在继续执行权力，或者是由大多数国民党分子组成的前政权机关在实行管理。

如此看来，权力执行机关的领导班子尚未建立起来，中央政府还无法对整个国家实施中央领导。政府的很多决定目前只能停留在宣言上。

7.关于军队

您建议目前不要裁军。您对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正在实施。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相当的增长，已经有约500万名官兵。

但是必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前国民党军人，他们或者是被俘虏，或者整个部队投诚到人民解放军一方。

国民党军人的数量，比如，在陈毅将军和刘伯承将军的军队中，就达到了70%—80%，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并没有分散在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部队中，而是原封不动地基本保留了他们被俘时部队的样子。在这些前国民党部队里派去少量人民解放军的基层政治指导员，从武装力量对革命事业坚定和忠诚的观点来看，像上述那种情况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8.关于知识分子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为了全面掌握政权，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学校里教书，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农民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持观望态度，在等待新政府的最初举措。这种立场部分说明，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去寻找运用自己知识的途

径，而工作上基本的物质条件也还没有满足。技术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和技术一般的工人的工资是一样，甚至还要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物质生活不能得到保证，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晚上还要去做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做一些小生意和一些商业活动。一些知识分子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他们无法找到用武之地，并且他们新的体制下将被排除在积极的创作活动之外。在吸收全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创造性活动方面的工作开展缓慢，为这种错误认识提供了基础，并为反对派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针对新制度的敌对活动提供了有利土壤。那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校里学成的专家依旧指望美国，指望他们的技术，而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持怀疑态度。

中共中央尚未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学校目前不接收工人，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还不够成熟，文化水平不够高，政治上落后，没有积极参加革命。

9.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您曾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不要丢开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引导他们进行合作，就像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他们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一样。建议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

您给中共中央的这个建议在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正在仔细观察新政府的活动，并对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权利是否会受到限制持怀疑态度。其表现是，他们在工业和贸易活动中使用自己的资本时十分谨慎和小心，担心会被国有化。因此，导致生产的局部缩减、商业贸易活动的萎缩以及隐瞒商品的实际价值等。另一方面，某些针对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措施的消失加强了其积极的反抗行为。甚至是1949年不高的贸易税，已经10个月没有在所有新解放区征收，其中包括北京。国家对盐、烟草、酒精和白酒的专卖还没有实行，没有与反对派和投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10.关于对国外资本的态度

您曾建议，“在没有可以用来限制民族主权和窒息中国民族工业以及给中国带来经济和财政上附加义务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

必须要汇报的是，中国工商业已经准备好和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

润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对国际贸易以及国内与外国人的交易做出任何限制。而且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及贸易公司实行的是灵活的政策，没有给予任何税务压力或者其他限制措施。外国企业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与民族工商业企业一样的条件，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做法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上海，政权移交给中央政府之后，掌握着能源企业的美国公司把中国民族企业使用的电力价格提高了2倍，而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则没有改变价格。

11.关于阶级斗争

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构成相当大威胁的是近期在党员中流传的一种说法——在军事前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在与国民的所有阶层进行经济合作，其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刘少奇也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很多事实都说明：在各个领域里阶级斗争都在急剧地尖锐化。

与新生力量的阶级斗争正在经济领域展开。新政府还没有掌握有效手段来控制市场关系，一些阶级敌对分子利用这一点哄抬物价，制造了人为的商品短缺，收购并将粮食藏起来，令人民非常不满，破坏了新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份发放6640亿纸币，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破坏活动，不但起不了任何正面的作用，反而会引起货币流通混乱，商品价格急剧上涨，首先是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应该把短期内铁路运价上涨4倍同样归咎于敌人的攻击，其目的是制造铁路运输和正常货运的混乱。

9月份，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国营发电厂的大功率涡轮机发生故障。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天，吉林发电厂全国最大的、功率7万千瓦的涡轮机发生故障。1949年5月1日北京市电车厂有人纵火。在天津的弹药库也发生爆炸。只有某些政治上盲目的中国同志才会按照他们的认识而把这些事实当作纯然是偶然发生的。

还关于反动分子转向暗杀方面的一些材料。10月份台湾派遣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并携带武器和毒药的暗杀组织来到中国的中心地区，目的

是刺杀党和国家干部。在北京已经杀害了两名公安人员，有很多关于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以及通过食品毒害战士的材料。

最近在天津火车站，在毛泽东即将奔赴莫斯科的最后时刻，一些人被抓获，因为在他们口袋里发现了炸弹和其他爆炸物。

12.关于外交政策

您建议新政府不应该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提供任何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

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曾积极支持并仍在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49年10月以前，曾产生过资本主义国家会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幻想。

作为这种情绪的反映，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其他英美同盟控制之下并与其有关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以免触怒英国和美国。

还有一件事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态度，即在南斯拉夫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的事情上故意保持沉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回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谴责他们的政策，那么会有人问——当南斯拉夫的主人美国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种情绪还表现在，周恩来反对派苏联专家到上海和天津，因为在这些地方集中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情绪是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对中央委员会施压的结果，他们曾希望并正希望美国 and 英国尽快承认新中国，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防止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这样就会阻止巩固和扩大中苏之间的友谊。

И.科瓦廖夫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长A.Я.维辛斯基：

根据从乌鲁木齐电传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们提出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新疆之间的协议草案，第一远东司有下列说明：

一、草案几乎与1949年5月31日第2228 865号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赞同的那份协议草案一模一样，而那份协议草案是我们代表团根据在乌鲁木齐的谈判交给为签订协议在新疆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的。

二、草案里序言加进了新说法，这种说法正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变化。

三、草案里明显有技术上错误的结果，第七条有遗漏，应是从“规定的中苏机构……”这几个字开始的。

没有要求答复乌鲁木齐的电报，因为根据萨维利耶夫同志的报告，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已把协议草案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审查和核准。

苏联与新疆协议草案

草案包含下列条款：

序言

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缔约双方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通商协议，并指派各自的债权代表签约：……双方以适当形式和规定顺序交换全权证书之后，同意下列条款：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尽力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扩大商品流转，除了基于双方法律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之外，双方对其他商

品流转将不采取任何专门的禁止和限制。

第二条 贸易业务将以省政府的贸易限制为准，由新疆方面实现。至于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由他们来实现本协议中的贸易业务需要相应主管机关的许可。苏联方面的贸易业务将由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来实现。

第三条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享有在新疆境内实现贸易业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商品的条件根据买卖双方自由协议来确定。

第四条 相应的新疆机构和苏联机构将自由发放进出口商品的许可证。对这些商品需要有相关的许可证。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将有权在新疆境内运送苏联商品。

第五条 中国方面同意，苏联商品进口到新疆，新疆商品出口到苏联，鉴于贸易业务在新疆境内进行，向苏联外贸机构征收的关税或税收，将不会比向新疆政府贸易机构、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所征收的税收更高、更重。

第六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新疆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拥有自己的商务代办办事处。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在伊宁(库里扎)、塔城(丘古恰克)、承化(阿尔泰)、哈密、焉耆(喀喇沙尔)、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尔羌)和田等城市可以拥有自己的全权代表。

第七条 相应的中苏机构将适当加快程序办理，结合旅行实现贸易业务，进出新疆和苏联的签证以及驮子、兽力车、汽车和水路运输将简化审批手续。苏联和新疆边境发放通行证，或者为护送运输的人发放签证。

第八条 本协议自签订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3年。

假如任何一方在规定期限前满3个月没有提出书面声明，本协议自任何一方声明废除之日起至3个月期满止仍然有效。

1949年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签订的.....两个原件，每个原件分别用汉语与俄语书就，而且两种文本同样有效。

1949年12月24日

文件送：第一远东司、档案室(手写本)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48, л.55, 51-54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校(1949年12月24日)

今年11月1日，中苏友协开办的芭蕾舞音乐学校在大连市苏中友协俱乐部开学了。该校是一所夜校，对招生的学员有名额限制，学员不用脱产学习。

该校校长声称，学校的任务是对熟悉苏联音乐和芭蕾舞文化的音乐干部、舞蹈干部和歌唱干部进行培养，以便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随后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融入中国民族的文化当中，促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该校的目的是吸引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和大学生代表，提高他们的音乐水平或者使他们获得这种能力，以培养从事群众工作的音乐干部。因此，该校主要关注的人群是：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民族舞蹈家，手风琴演奏者，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者。为此，学校组建了合唱团、交响乐队和舞蹈团。

学校的校长是周琴(Чжоу Цзинь, 女，中苏友协干部处处长)，她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所学专业是古典交响乐；副校长是马思祖(Ма Сыцзюй, 女，毕业于上海的中国高等音乐学校，专业为古典钢琴和大提琴)。教学部主任是当地的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她是一名钢琴家和作曲家，受过高等音乐教育(教学人员的名单附于后)。

学校暂时设置在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大楼内，并使用俱乐部的器材。学校开设了如下班组：钢琴班62人，声乐班22人，小提琴班50人，二胡班4人，键盘式手风琴班19人，民族舞蹈班59人，指挥班15人，音乐知识班25人，作曲班8人，中国音乐知识班35人，古典舞蹈班6人。

截至1950年1月1日，该校共有296名学员。事实上，在学校学习的学员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他们都是工人和大学生，因此，学校的学费也

很低(每月400元、200元或100元，相当于每月40卢布、20卢布或10卢布)。学校收缴的学费都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学校的开支纳入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开支计划中。该校仅有2名在编的工作人员——周琴校长和马思祖副校长，她们作为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领取工资，其余人员是其他一些中国机构、苏中合作机构和苏联机构的兼职人员。

该校非常缺乏音乐器材和乐谱(清单附于后)。

该校正处于筹建时期，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所授课程的连续性、所学知识的程度、学位的发放等问题。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

附件：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教师名单

钢琴教师：马思祖，当地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Э.Б.格尔什戈林娜、М.Н.杰费里杰

小提琴教师：彭祖秀(Пан Цзуншу)，当地苏联公民В.Т.克罗哈列夫、Г.С.列别杰夫

女中音教师：王巧波(Ван Дзябо)

大提琴教师：马思祖

声乐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М.安东诺娃、Н.В.古谢娃

音乐知识(中国普遍使用的数字乐谱体系)教师：范庆明(Фан Цинмин)

音乐知识(欧洲)教师：鲁露(Лу Лу)

合唱管理教师：马思祖、А.Б.阿巴扎

指挥和作曲教师：А.Б.阿巴扎

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Е.А.库德里亚夫采娃、苏军少校卡尔波夫

古典舞蹈：当地苏联公民М.В.古谢娃

键盘式手风琴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亚历山大

中国民间乐器(二胡)教师：鲁露

管乐器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博德鲁日内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必需的音乐器材清单

1.演奏钢琴 1架

2.立式钢琴 1架

3.小提琴 50把

4.中音乐器 10件

5.大提琴 5架

6.低音提琴 3把

7.短笛 1支

8.长笛 2支

9.单簧管 2支

10.大管 2支

11.圆号 4支

12.竖琴 2架

13.长号 3支

14.定音鼓 2个

15.小号(喇叭) 1支

16.键盘式手风琴 2台

17.储备乐器器件：各类乐器的弦、弦轴，各种木制乐器的簧片等。

ГАРФ, ф.Р5283, оп.1, д.104, л.146-149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8日

第140号

绝密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晚10时邀请我到中南海他那里会谈。

在同我会面时，刘少奇通报说，他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 [\[77\]](#) 上的讲话稿当时已交给罗戈夫同志，让他转给莫斯科。他在会议上的讲话译文以及会议决议和宣言当时已交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同志。现在，由于莫斯科要求提供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会议呼吁书和决议的审核译文，刘少奇答应把他审核后的这些文件的译文提供给大使馆。

然后刘少奇谈了他对亚洲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工作的评价。

中国的同志一开始就反对在北京召开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同志已于2月份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

我们当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的基本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北京城还没有解放；

二、无论是工会运动还是妇女运动，中国当时的水平都还非常低；

三、我们认为这些会议只能在极严格的保密条件下召开，因为任何公开的会议都会导致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这些会议，加紧镇压亚洲国家的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此外，我们当时认为，这种会议的任何决议都可能带有严格的保密性质，因为我们必将触及同帝国主义分子——亚洲国家的实际主人的公开武装斗争问题。

然而，与中国同志的反对意见相反，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妇女联合会作出了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上述会议的决定。

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发言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形式就是武装斗争，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

众所周知，他的发言对出席会议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全体成员产生了负面的印象，他们不同意该讲话中所提出的原则，建议刘少奇不要发表他的讲话。

刘少奇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他不同意这一决定。此后莫斯科干预了这件事，认为刘少奇的发言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发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

使他们害怕的首先是，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

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衷心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欧洲的条件，但很少懂得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傀儡政府压迫之下的亚洲各国的特点。不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不推翻帝国主义政权，在亚洲国家便谈不上争取8小时工作制，谈不上争取社会保险、争取平等工资以及其他民主自由。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亚洲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实现民主自由而斗争，但害怕号召他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而且，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必要给联合国脸上贴金——号召亚洲国家的劳动群众给联合国写控诉书，抱怨自己没有权利和物质生活艰难的状况。看来世界工作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害怕公开讲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是担心这种号召会给他们在巴黎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刘少奇的讲话按照莫斯科的建议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之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的同志们又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分歧，这次是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问题。

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刘少奇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要求亚洲国家的政府实行8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以及呼吁联合国追究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在这些国家惨无人道地剥削劳动群众的责任，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因为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所起草的亚洲国家代表会议决议中，没有提出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口号——号召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

当刘少奇声明反对上述决议草案时，世界工联执委会的同志们建议他拟定一个草案，于是他这样做了。

他在自己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工会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已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没建立这些军队的

国家应为这些军队的建立而奋斗。在决议中，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同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问题，因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条件下，要想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处境是可笑的。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赛扬 [78]，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其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

尽管他们投票赞成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决议，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同意决议中所包含的原则。中国的同志同意这一决议仅仅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原则的错误。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决议不好，它不会给亚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会议工作结束时，我们还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开始时所反对的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亚洲国家联络局。我们同意这一建议仅仅是由于世界工联执委会承认，这一联络局中的领导作用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们。这一联络局的工作应按极保密的原则组织，以便保护亚洲工会运动活动人士免遭帝国主义分子一切可能的镇压。刘少奇说，看来，他们在巴黎对亚洲各国的形势，甚至欧洲的形势，都不太了解。

然后刘少奇转到世界妇女代表会议 [79] 问题上，他说：

世界妇联执委会到北京来是为了召开自己的会议并组织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这表明，它对亚洲国家的形势很不了解。世界妇联执委会委员、法国人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和多列士的妻子让纳特·维美徐表现得非常保守，不想弄清亚洲国家妇女运动的真正形势，且不说这两位法国代表对待中国同志的态度不是很有分寸。刘少奇指出，她们根本就不想了解与欧洲有着很大不同的亚洲国家的特点。在处于帝国主义分子统治之下的亚洲国家中，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只能以极保密的状态存在，否则就会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消灭。

世界妇联执委会要求中国的同志把那些亚洲国家妇女必须公开、合法地进行斗争才能实行的条款写进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在世界妇

联执委会提出的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草案中有这样一些条款，如绝对地立即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妇女劳动、社会保障、免费教育、消灭歧视妇女劳动等。

中国的同志们甚至现在，在战胜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条件下，都不能拒绝童工劳动，因为通过立法完全禁止童工劳动就会使几百万儿童挨饿、遭受贫困的命运。在亚洲国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统治的条件下，提出废除童工劳动的要求纯属幻想、不切实际。

接着，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建议，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交涉，抗议亚洲国家中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中国的同志认为，世界妇联执委会成员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交涉的建议是白白地在亚洲妇女的心灵中撒下无用而幻想的种子：指望联合国的无所不能，从而让她们脱离斗争。中国的同志指出了世界妇联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基本错误是，草案中没有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条款，没有号召亚洲妇女千方百计支持这些国家里的人民解放军的条款，没有需要同帝国主义进行非法形式的斗争和亚洲妇女广泛参加这一斗争的条款。

这样，正如刘少奇说的，世界民主妇女联盟重复了世界工会联盟的错误，表明它不知道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各国的特殊条件。在那里，想以合法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分子做出某些让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些国家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斗争问题。法国代表团的妇女指责中国的同志，说她们有意在亚洲会议文件中拒绝强调苏联的作用。当邓颖超(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员之一)带着自己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找到刘少奇时，刘少奇有意识地删去了她从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摘录的一段话，在这段引文中毛泽东写道，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胜利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从邓颖超的报告中删去这句话，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的劳动妇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援助或胜利了的中国革命方面的援助上，是为了让她们把希望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之上。刘少奇指出，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也说过，俄国完全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需等待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胜利。只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才谈到世界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所给予的伟大支持。

中国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也没讲过苏联方面的援助。而且，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 [80] 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号召中国的同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而应该完全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只是在今年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才认为可以公开宣布苏联援助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杰出作用。

所以，刘少奇认为，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不应提苏联和胜利了的革命的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妇女产生盲目乐观和依靠外援的情绪，让她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给人留下说苏联或中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

但是，世界妇联执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认为这是中国的同志不想承认苏联在保障亚洲国家人民解放运动胜利方面所起的世界性的历史作用。

为了驳斥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被迫同意在邓颖超的讲话里加上毛泽东同志文章中的上述那段引文。

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在离开北京去上海之前给刘少奇寄去了一些问题的单子，要求他给她们以答复。按照刘少奇的话讲，这些问题表明，尽管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结束了，而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至今还未理解亚洲条件的特点。她们在书面问题中问刘少奇，为什么中国的同志认为把诸如立即取消童工劳动、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呼吁联合国对亚洲国家野蛮对待妇女和儿童提出抗议等要求写进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是不正确的。

对她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刘少奇准备给予详尽的回答，不能让她们带着怀疑和误会离去。

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妇女联络局，认为这是超前行为，原因是：

一、在受帝国主义分子压迫的亚洲国家里，民主的妇女组织不能公开地活动，否则就会立即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镇压。

二、至于成立亚洲国家非法形式斗争统一领导中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还未成长起来，它目前在中国领土上还经受着许多困难。……

[81] 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感谢他通报了已结束的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大会的消息。然后刘少奇主动告诉我，前不久越共中央两名代表从越南胡志明那里来到北京，带来了胡志明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建议苏联和中国承认胡志明政府。刘少奇已将此信电告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同志。中国的同志还作出了加强同胡志明联系的决定，为此将秘密往胡志明处派去一个自己人的小组，装备有电台和密码。

谈到华南和西南的军事形势，刘少奇说，同胡宗南部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最近两三天内将完成部署，待稍事休整，便开始对被合围的胡宗南部队发起总攻。胡宗南部队突围逃跑已无可能。

在云南省，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共3万人)曾企图攻占云南省会昆明市，但该省主席卢汉阻止住了国民党分子的进攻，卢汉于不久前已声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部队现在撤到了中印边界。

据刘少奇掌握的情报，已有2万国民党部队逃到印度支那，那里的当地政权缴了他们的械。谈到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刘少奇指出，这一战役将在1950年夏季实施，将和平解放拉萨，西藏回归未必顺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利用青海的班禅喇嘛来挑起西藏宗教纠纷，动摇英国走狗达赖喇嘛在阿里的威信。

会谈结束时，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

他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我的，非常热情，很朴实。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临时代办С.Л.齐赫文斯基。

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18-30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 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949年12月27日

第86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决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内安装无线电台。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23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曾涌泉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27日)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

曾涌泉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协助解决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的电力供应困难。

鞍山—辽阳地区对电力的最高需求目前达到2.5万千瓦，这种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个地区以自己的力量只能发出8000千瓦电力，水丰水电站还给这一地区输电8000千瓦。电力如此严重不足，正大大影响着该地区工业企业的运转。

为了满足南满对电力的迫切需求，东北政府向大连市提出有关发电站开工的建议。这个发电站能提供2万千瓦(东北将供应发电站使用的煤)，目的是为了水丰水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

我答应查明这个问题。

曾涌泉谈到上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大学生的问题。然后，他告

知说，在苏联有20个大学生是中国革命家庭的孩子，他们在苏联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是苏联公民，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红十字会帮助他们。现在红十字会通知大学生们，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停止帮助。因此，这些大学生向大使馆提请援助。曾涌泉告知说，大使认为，如果苏联当局不允许，大使馆就不能援助已是苏联公民的中国人。曾涌泉提交了希望恢复中国国籍的中国大学生名单。

我指出，必须提供有关这些大学生的更加详细的资料。

曾涌泉答应提供这样的资料。

然后我向曾涌泉告知下列情况：

鉴于苏联人民对中国文化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打算在莫斯科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型艺术展览会。在委员会管辖下有少数几件属于中国古代的陈列品。最好能在展览会上划出一块较大的地方，展出反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艺术作品。

从这个意图出发，委员会要求了解为组织展览会从中国获得展览品的可能性。展览品运到苏联的全部费用当然将由苏联支付。

曾涌泉答应把这请求报告大使，并通知北京。

会谈结束时，我向曾涌泉转达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转来中国公民林铨(Лин Нао)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封信。

出席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副司长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8, л.30-31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 [82] (1949年12月28日)

П.史白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会见了李克农，就满洲里站—奥

特波尔站和绥芬河站—格罗杰科沃站中国铁路线建设问题举行了会谈。

在同李克农会谈之前，他曾就这个问题说过，铁路问题属铁道部管，他答应同铁道部商量这个问题。

这次为了会谈，李克农邀来了铁道部长滕代远。我简要地向滕介绍了苏联外交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滕代远回答说，中国方面原则上不反对修建上述铁路线。但有关这一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即铁轨、枕木和劳力问题，中苏双方还需进一步讨论。李克农补充说，中国外交部也原则上同意修建上述铁路，因为这样可使中苏联系得更紧密。

李克农和滕代远答应，在他们给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这个问题之后，再用电话告诉对苏联政府这一要求的最后答复。

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滕代远告辞了。我继续同李克农一个人会谈。

.....

АВІРФ, ф.100, оп.43, п.10, д.302, л.53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现将中央军委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的电报稿转给您。

请您批示。

聂荣臻

1949年12月29日

电报稿：

根据最近的资料，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族军人已经达到16000多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族军人外，还有4个营、

27个连和9个排完全是朝鲜族军人。在现役中，有师长2人、团长5人、营长87人、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人。所有这些军人都是在人民解放军中锻炼成长的，并且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战士在实际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进行政治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干部培养。在我军转移到华南以后，又一次发生了小规模骚动，表现为个别人要求返回祖国。但绝大多数还是绝对服从指挥和命令，坚决向南挺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考虑到朝鲜族军人的利益，我们打算派这些预备干部回国(如果愿意留下的我们也欢迎留下)。请求中央讨论并且通知我们，关于他们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朝方是否愿意他们回国的意见。如果问题可以顺利解决，我们打算集中组织1个师和4—5个常规团，进行短暂的培训后送他们回国。

请批示。

林彪

邓子恢

谭政

1949年12月2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п.334, л.8-9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侑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 [83] (1949年12月29日)

今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俄语翻译局局长张锡侑，又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古依斯基，求见了，他把同刘少奇同志商定的《亚洲国家工会告亚洲国家劳动群众书》的副本交给了我。同时，他主动以肯定的口气告诉我，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拟承认胡志明越南政府的电报；

二、在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

三、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问题；

.....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通过了专门成立“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的决议，服务局在满洲里车站设分部。

古依斯基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苏联专家继续来到北京，可中国有关部门并未事先得到通知。如近几天9名苏联女同志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中国方面一直未得到通知。

昨天来了两名苏联专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同志当中竟没有一人知道此事。

为了及时做好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保证他们在北京的住处，决定成立上面所说的服务局。现在苏联专家都安排在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苏联专家差不多快把饭店住满了。由于北京住处有限，以后服务局还要想其他办法安排苏联专家。

关于第三个问题——人民大学问题，起初通过的决议要邀请更多的苏联教授和讲师来校讲学，后来压缩到90人，最后通过的决议是邀请50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碰到的主要困难是住处问题以及为苏联专家配翻译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的翻译。如果说给苏联专家——工程师还可以配备同专业的掌握俄语差些的中国专家做翻译——一些技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手势或通过图纸说清楚，那么给人文科学老师和语言老师配翻译，那就非有高水平的干部不可。

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用苏联老师时，决定只限于50人，现在正忙着为他们选配高水平的翻译。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С.И.齐赫文斯基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10, д.302, л.50 52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12月28日我与贾拓夫 [84] 同志一起来到北京，就在当天晚上，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疆形势的报告。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我

向您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并请给予指示。

一、新疆的军事政治形势

在陶峙岳 [85] 的部队被改组成第二十二兵团之后，成立了军管区。拟定了彻底改造这支部队的措施，同时用民族民主方式改组省政府，省里的形势开始稳定了。根据我们的看法，陶峙岳部队大规模叛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发生小小波动的可能性。张治中来到新疆，在改组和改造陶峙岳部队的事情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

在新疆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掩盖着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新疆，虽然土地集中极其严重，剥削比中国本土残酷得多，然而在那里土地改革应当以比较缓慢的方式进行。这必须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民族干部以及与人民解放军紧密接触的基础上来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犯错误。目前在干部中有一种可能导致犯“左”倾错误和急躁情绪的倾向，必须注意到这种倾向。

三、目前新疆最严重的问题是财经问题。其原因有下列几种：

1.关于我们进入新疆的部队人数，一同进入的有民族军部队、陶峙岳部队以及行政机关等，共有24万多人，对于他们的财政经济需要，新疆政府自身提供只能满足30%，而70%必须依靠中央补足；

2.新疆地域广阔，而运输和通信情况很不好，难以给新疆提供援助的不只是从中国自身一边，而且难以从南疆更加肥沃的农业区运输粮食到北疆的缺粮地区，因为运送粮食需要艰难跋涉2000多公里，为了从南疆运送1公担粮食到北疆，所需的运费要10公担以上粮食的价值。现在供应部署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田地区的(第六兵团的两个师、陶峙岳的两个师、民族军的部队以及省政府机关、学校等)10万多人的粮食只够2个月；

3.自从盛世才 [86] 走上反苏道路起，已有5年多与苏联停止了贸易，毛皮、山羊、棉花、蚕丝的生产陷于衰落状态。按总的生产价值，已缩减了一半多。极其遥远的距离和艰难的交通道路阻碍了省内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日用必需品严重匮乏和经济急剧衰退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产

生了不良影响；

4.由于上述原因，从新疆解放开始，财政就出现了严重波动。在这段时间里，物价上涨了100多倍。如果在财政和贸易方面不采取措施，将不可能在新疆执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不可能解决明年给部队供应生产工具的问题；

5.我深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大力解决新疆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不仅会影响我们已来到这里的部队的命运，也影响新疆的民族问题，影响我们军队和民族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改造陶峙岳的部队。目前已在各个部队中展开生产运动，但这仅能帮助部分地解决1951年的粮食问题，而其他困难问题还要3年才能逐步解决。

四、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生产上的困难以及新疆今后的困难，请求苏联大力支援必需的东西。具体说明如下：

1.关于保证给新疆的部队供应服装、工程材料、交通工具等问题，由于中国自身在运输方面的困难，必须借助苏联的帮助来解决；

2.为了新疆能够用本地产品交换苏联生产的日用必需品，需尽快建立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正常贸易；

3.为了同时逐渐动用和发展自己的物质资源，实现新疆与苏联之间的地方经济合作。去年，在张治中来到新疆那个时期，与苏联进行了关于建立中苏石油公司和开采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公司的谈判，并且已经起草了协议草案。对于这两个公司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很希望与苏联进行谈判；

4.西北地区幅员广阔、交通不便，给这里的领导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这一情况，必须与苏联举行关于延长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哈密的民用航空线的谈判，正如协议中规定的，这条航空线将延长到兰州、西安和北京。

我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否正确，请您尽可能快地给予指示。我在北京大约逗留一个星期，此后我必须为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回西安去。

彭德怀

1949年12月29日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 (1949年12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文：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培训飞行员的计划，关于由苏联提供奥赫金牌汽油的口头协议：高级的9.3万吨，低级的3.8万吨，10%用作润滑油，同样数量的用作其他材料。

鉴于航空学校现在已经开始上飞行课了，我请求能尽快把上述材料发送过来。

我请求告知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

刘少奇

1949年12月3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3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 (1949年12月31日)

机密

中国大使馆参赞曾涌泉在12月24日与我会谈中，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援助，保证给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供应电力。

东北政府建议，现在暂时停工的具有2万千瓦功率的“大连”发电站开工，以便水丰水力发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市。

第一远东司认为，因大连市的发电站是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管理的，因此如果管理总局没有异议，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

信稿附寄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949年12月31日，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87]的官邸拜会了他，并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通知他下列情况：

苏联部长会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派遣海军专家团去中国的要求，以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打捞沉没的“重庆号”巡洋舰的可能性，确定必需的工具以及与打捞有关的一切措施。为此目的，12月30—31日苏联专家海军少将工程师格里戈里耶夫、上尉工程师丘古诺夫、少尉涅斯捷罗夫和海军准尉苏斯洛夫已经沿绥芬河—哈尔滨—沈阳路线乘车去往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请求，几天前，9名苏联教师已被派往中国，到北京的人民大学任教。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安装无线电台的请求。

周恩来感谢我上述的信息，随后向我讲述下列情况：

1949年12月30日，印度外交部以外交部长尼赫鲁^[88]为代表，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印度政府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中国外交部准备作出的答复，类似12月23日给缅甸政府的答复。在那个答复中，建议首先要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然后为预备谈判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印度将声明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下列国家将随印度之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如锡兰、巴基斯坦。

胡志明的民主政府准备向世界各国发表声明，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国。这个声明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立即承认胡志明政府。

已经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去莫斯科。既然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已在苏联，从国际事务的角度考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毛泽东之后再去是不适宜的。只有在实际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才去莫斯科。

会谈持续了30分钟。

出席会谈并进行翻译的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同志。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22, д.10, л.47 49

1950年

№13808 关于苏联代表团在亚澳工会北京会议表现的材料(1950年1月 [\[89\]](#))

1949年12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亚非国家工会代表国际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的团长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Л.Н.索洛维约夫。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详细、鲜明地表达了激进的革命方针，号召亚非国家工会组织激励劳动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反动派和剥削者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一些外国代表团认为这个讲话过于革命了，没有考虑到这个会议不是政党的会议，而是工会的会议，其中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团认为，中国代表在会议参加者面前应该只作简短的带有祝贺性质的讲话，尤其不应该谈到政治，不应该提出革命斗争的尖锐问题和进行斗争的号召。经过商量，很多外国代表团表示，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苏联代表团也持这种立场。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方面相当激烈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赞成刘少奇的讲话，并决定在报刊上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

得知这种情况之后，斯大林立即给在北京的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他(索洛维约夫)表示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这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强调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斯大林命令索洛维约夫立即改正所犯的错误，通知中国代表团，同意中方关于发表刘少奇讲话稿的意见，并把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斯大林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

附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在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90\]](#)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15—1620页

№09915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与印度、缅甸建交问

题(1950年1月1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机密

遵照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我于1月1日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在祝贺新年和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在友好热情的谈话中，毛泽东讲述了如下内容：

最近几天，他从北京得到消息，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这样的：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它们真心诚意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它们在正式宣布这件事之后，首先应当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一切关系，断然拒绝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在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印度和缅甸政府可以派它们的代表来北京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也有消息说，最近英国及英联邦的其他国家看来要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局势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全部主力已被歼灭。在四川和西康省，约有40万国民党军队被俘和投诚到人民解放军方面来。3万—4万人的胡宗南残部企图撤退到西藏和南方的所有通道已被切断，他们最近就会被消灭。在云南省还有不足3万的国民党军队分成几部向昆明西南逃窜，他们的结局已定。

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继续逗留在莫斯科的计划，毛泽东同志请求转告苏联政府领导人：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健康状况，在休息了两星期后已经好些了。最近4天，我的睡眠已经正常了，每天睡8小时，没有服用专门的安眠药。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多了，但出去散步时，在户外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就会头晕。因此，我打算再完全静养休息一个星期，使睡眠彻底恢复正常。”

他接着指出，经过一星期的休息之后，他想拜访什维尔尼克、莫洛

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等同志。这种会见应该是一般性的交谈。拜访时将不进行任何专题讨论，也不进行工作问题的讨论。拜访应该是一天一次，时间不要太长，而且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他希望能会见斯大林，进行工作交谈。

进行工作交谈后，他打算在动身前剩下的时间内，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下铁道，去几个集体农庄和剧院看看，并就此结束他的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去参观工厂，不会见大众，不做公开讲演，因为这将会使他感到疲劳，会再次打乱他的睡眠，再犯头晕病。他原打算去苏联各地参观，但现在由于自己健康的原因，他不去苏联各地了，因为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回家路途。

从北京动身出来时，他打算在苏联待3个月。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情况使他不得不把在这里的时间缩短为2个月。考虑到回北京有11天的路程，他打算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预计2月6日可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情况后我表示，关于他的所有这些意愿，我明天就向政府报告。

随后，我问毛泽东同志是否知道苏联政府在11月份表示的愿望，要与中国政府移交几百名日本军人，以追究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毛泽东同志表示，关于这件事，在他离开北京时就知道了。但由于他们忙于准备访问莫斯科的事，所以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没能认真着手办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原则上要接收这些罪犯，并审判他们的一切罪行。但是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方面，而且中国的诉讼程序还没准备好，在人民对此还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不能在最近的时间里开始审判工作，因为这样做达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此外，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应准备好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工作。

毛泽东说：考虑到这一切，我预计从苏联国土上接收战犯一事，可以在半年之后进行。我请苏联政府将这些战犯在苏联国土上关押到1950年上半年。如果可能，多搜集些对他们的审讯材料。从下半年开始，我

们就将接受他们，并进行审判。

工作性谈话到此结束。会谈之后，毛泽东同志邀请我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我接受了邀请。

会谈是由师哲(卡爾斯基)翻译的。

和毛泽东同志告别之后，我和卡爾斯基留下来等汽车。卡爾斯基说，已经3天了，毛泽东同志感觉自己好多了，睡眠正常，不用服药。和大家交谈时很健谈，爱开玩笑，很愉快，但还像以前一样不能在户外多待，他的头还是晕。毛泽东同志决定再休息一个星期，哪儿也不去。1月2日医生将做会诊。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签名)

文件送：1份给维辛斯基，1份给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1-4

№09083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 和美国对华政策 [91] (1950年1月1日)

.....

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日本外务相，但没欢迎毛泽东，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刺说，毛泽东是“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贺耀祖(ХэЯо цзу)说，从斯大林或苏联人的观点看，毛泽东是老憨，只精通中国的事，国际问题就不灵了。周尚白(ЧжоуШань-пэй)对报道中所说斯大林接见了毛泽东这句话中的“接见”两字表示不满。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由此可以看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和接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

分子当中还很普遍。

.....

南京、上海解放之后，美帝国主义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把其重心从以往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转移到从内部瓦解革命事业上来。

在当前的对华政策中，美帝国主义除了象征性地支持蒋介石和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采取忍耐的态度外，竭尽全力在中国建立和支持作为“第五纵队”的“第三势力”，这一力量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主要工具。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分子鼓励国民党内部的“杰出分子”和“民主活动家”脱离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努力在我们党内建立“第三势力”。这两股力量互相支持或联合成一股新的力量。

下面是实施这一基本政策的事实：

一、以香港为中心，美国务院在那里建立了秘密代表处，同各种军国主义分子、政治阴谋家建立秘密联系，为所有能够独自建立反共武装力量的人提供武器和技术器材。至目前为止，美国人已向香港运送价值250万美元的武器。

已先后同董朝(ДунДжао，在他去台湾见蒋介石的时候)、白崇禧、宋希濂、李福林(ЛиФу-лин，原广东军阀)、张保英(Чжан Бо-ин，原河南军人)等人建立联系。但由于美国人怀疑他们的现实能力或由于这些人暂时不想行动，至今还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二、司徒雷登同郑介民签订了建立国民党—美国间谍组织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第五纵队”，在新中国进行颠覆活动。郑介民已建立秘密组织，现在正研究工作方法，已向国民党递送情报。美国人间谍活动的重点是武装我后方的土匪和建立间谍网，以便破坏我经济建设，制造经济困难，挑动农民闹事，最后达到推翻我政府的目的。

三、为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地下组织，余彬(Юй Бин)在西班牙得到了一大笔经费(同天主教没有联系)。钻进我机关的这些组织的成员坚持“左”的观点，遵守党的政策，在党内建立过激分子网以煽动社会动乱。在国际变动时刻(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行动。

四、责成国民党外交人员进行直接的分裂活动和挑衅活动，反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建立所谓的反动派，此外，还向经济机关派间谍，搜集经济情报。美国间谍舍里(美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负责领导这一工作。

五、除这些活动外，美国人还企图更广泛地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台湾。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05, д.32, л.1-9

№133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对华贸易问题 (1950年1月2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2日

第119项 关于H.A.奥布拉兹佐夫和A.B.戈卢布科夫等同志。

1.关于解除H.A.奥布拉兹佐夫同志担任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贸易代表的职务。

2.关于任命A.B.戈卢布科夫同志担任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贸易代表的职务。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29-30

№1657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求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 (1950年1月2日)

斯大林同志：

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有崩塌的危险。问题具有极其严重的性质。急需苏联帮助维修这个水电站，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是日本人在1944年修建的。水电站是由8台7万千瓦功率的水力发电机装备建成的。堤坝长1080米，高91米。水力涡轮发电机吸水能力69米。

由于堤坝是用劣质水泥建成的，所以不断遭到损坏——化合石灰发生碱化及混凝土出现损坏。

在最近两年中，上述损坏过程加剧了2倍，目前形成许多裂缝，通过这些裂缝，堤坝每秒钟要流失500立方米水。

这一堤坝没有建好——在修建大坝时少浇灌了20万立方米混凝土。

这个堤坝的损坏正在导致东北工业区丧失电力供应的危险，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危险，而在松花江河谷生活着好几百万人，同时也造成哈尔滨和吉林等城市被淹的危险。

鉴于上述情况，我请求您给相应的苏联机构发指示，尽快指派苏联堤坝专家和水力发电专家研究这一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能否满足上述请求，请您酌情处理。

毛泽东(签名)

1950年1月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п.334, л.15

№1657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1950年1月2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

按照您的指示，1月1日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会谈中他讲了下列情况：

他说，关于塔斯社记者的采访，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明和补充。

鉴于在“答记者问”中报道，说我打算访问苏联几个地区和城市，我肯定要去访问列宁格勒。根据我以前说到的愿望，想去的几个城市或地区，看来未必有可能前去，因为我打算在莫斯科住到1月22—25日，在这段时间，为了讨论上述答记者问中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想与斯大林

同志会晤几次。想要讨论的问题还包括预算问题以及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在给我的电报中提到的有关新疆的问题。在这份电报中，彭德怀同志提出了稳定新疆经济的问题，与苏联签订开采石油协议的可能性问题以及贸易问题等。

毛泽东同志要求向您报告，正如前面他说过的，他想去拜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并想与维辛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位同志会晤。他要求听听您的建议，是否与每个同志单独会见或是一起会见。他还想与陶里亚蒂 [92] 会见并谈话。

晚餐时毛泽东举杯祝您身体健康，并说感谢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在中国进行革命方面给予的大力援助。他声明说，斯大林提出的对德国共产党的“十二条”和《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的指导指南。这些文件帮助粉碎了王明领导时期的“左”、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中国共产党变得强大和统一。他举杯祝词结束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没有联共(布)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革命胜利。列宁、斯大林主义万岁!”

晚餐之后，翻译卡尔斯基私下告诉我，任何一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别墅看望毛泽东，他都会感到很高兴。

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533, л.61-62

№16577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邀请周恩来访苏 (1950年1月4日)

1950年1月4日17时，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拜访大使馆，并通知如下：

1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莫洛托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见，在会见期间，决定邀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以便谈判和签订与协议相关的问题：

关于中苏同盟友好条约；

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

关于签订通商条约；

关于签订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几个其他问题。

1月3日周恩来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关于上述情况的电报，随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决议派遣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已电告毛泽东。

周恩来告知说，与他一起前去的还有10—15人，包括贸易部长叶季壮，要与周恩来一起前去的人员的全部名单过两天通知我们。

周恩来要求为赴苏人员办理签证，又问，对他本人需不需要证明文件和签证。

此外，周恩来需要了解商务代表米古诺夫那里有哪些有关贸易问题的具体建议以及是否与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讨论通商条约的问题。

会谈进行了15分钟。

大使馆一等秘书A.列多夫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П.史白夫

АВН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45-46

№05131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第一稿)(1950年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固有的友好关系，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心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援助，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相出示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消除侵略者的任何威胁。

为此目的，缔约国双方将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证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另一方应给予全面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单独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日本现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不放弃任何侵略打算的其他一切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彼此协

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坚信，苏中人民之间的安全和繁荣要求巩固和发展牢固持久的友谊，双方将依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原则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

第八条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尽快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一经批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3-14

№09914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小丰满水电站等问题(1950年1月6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今年1月6日我拜会了毛泽东，在互致问候和礼节性的简短交谈之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谈话：

一、我通知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请求，

在排除吉林水电站 [93] 故障方面给予帮助，苏联政府已决定在5天期限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一个月。这些专家会对水电站设备情况作出鉴定，并且就排除吉林水电站故障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拿出方案。

毛泽东表示感谢苏联政府给予的帮助，并指出，苏联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给予的帮助，对于中国全国的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通知毛泽东，关于刘少奇请求苏联提供飞行员训练用航空燃料的电报，拟作如下答复：我们的专家经计算后确定，根据苏联军队的标准定额，用于上述目的，燃料的总需求量为：高辛烷值汽油13400吨、低辛烷值汽油5270吨、航空润滑油1315吨、P 9产品26吨。

苏联政府将命令按上面提到的燃料数量，从1月份开始在上半年期间内发往中国。至于中国对所供燃料的支付程序和条件问题，最好能在1950年的换货谈判中决定。

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个答复，并对苏联政府的这一帮助表示感谢。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我们的人喜欢搞多多益善”，还说应该严格地监督他们。他感谢苏联政府，说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计算，他完全同意这样做。毛泽东补充说，在燃料消耗这件事情上，确实需要精打细算，因为这对中国自己也是有利的。中国有责任更节省地消费外援物资。毛泽东请求把电报的文稿给他留下。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把他们赶出安理会。苏联方面也拟支持这样一个声明，并且要求安理会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开除出安理会。如果安理会保留国民党代表，苏联代表将声明，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副本，可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

我指出，这个问题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之后，我会把这个建议提交苏联政府审议。

四、毛泽东对我说，鉴于苏联政府在日本战犯(971人)问题上向中国人民政府打过招呼，他想通知如下：

(一)原则上日本战犯无疑应交中国审判。

(二)但是，中国政府打算在审判国民党战犯的同时，审判日本战犯。组织这样的审判大体上定在1951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所以，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日本战犯暂时(预计在1950年下半年以前)关押在苏联。

我指出，因为苏联政府承担着有关的义务——在1950年1月份以前把所有的日本战犯遣返回国，也许我们应该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是正式认定日本战犯已移交中国，但实际上是暂时留在苏联国土上的。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更适宜。

五、毛泽东说，他越来越坚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说，我们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是因为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关系。重新审理现有的协定更加必要，因为这个条约中像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重要因素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作为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而国民党也已被打垮。此外，众所周知，一部分中国人对现有的中苏条约不满意。所以，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和同盟条约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我在回答毛泽东的话时说，我想新条约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签订新的条约，或者重新审议现有条约并对其做某些修改，都可能被美国人或英国人利用，以此为借口，去重新审议并改变条约中那些一经改变就会给苏联和中国带来损失的部分。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也是不允许的。

毛泽东指出，这一情况在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提法时毫无疑问应该予以考虑。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卡爾斯基)同志。

谈话进行了大约45分钟。

A.维辛斯基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佐林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波采罗布

№16578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访苏安排和英国承认中国(1950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下午4时30分，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官邸——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并通知他，11日满洲里车站将为周恩来以及他的随行人员提供专列，在边境将有苏联外交部秘书长波采罗布前来迎接。同时我告诉周恩来，与他同去莫斯科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而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陪送他到满洲里车站。

周恩来同志要求向苏联外交部以及维辛斯基同志本人为组织这次旅行工作转达他深深的谢意。他把离开北京的日子拟定在今年1月10日晚上9时。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周恩来主动告诉我关于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在北京的英国总领事格莱赫姆拜访了中国外交部。他受到中国外交部主管兼非洲和欧洲司司长的接见，并向他们递交有贝文[94] 签署的英国政府电报。电报中说，英国政府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定现在南京的赫奇逊为英国驻华的临时代办。格莱赫姆口头补充说，英国政府已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关于这情况已经通知在伦敦的前国民党大使。格莱赫姆同时通知说，赫奇逊准备随时前往北京谈判。

周恩来告知说，按他的意见，没有必要急于与英国人开始谈判，因为考虑到与他们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谈，包括香港问题。

会谈持续了30分钟。

出席会谈并进行翻译的是大使馆参赞B.瓦西科夫。

№16580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 (1950年1月6日)

毛泽东同志：

1.收到您送来的来自中国的电报，希望苏联提供各类商品。又收到关于新疆的电报以及您关于松花江水电站的信。所有这些问题正由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我深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2.前几天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越南和胡志明同志的材料，他是能干的共产党人，专心致志领导自己的事业，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

此致

敬礼

斯大林

1950年1月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16

№1332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小丰满水电站 问题(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201项 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吉林水电站事故的问题。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吉林水电站事故的决议案(见附录 [\[95\]](#))。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45、159-162

№14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供应燃料(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202项 关于向中国提供燃料的问题。

1.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提交的关于1950年上半年向中国供应燃料的决议(见附录1 [\[96\]](#))。

2.批准刘少奇在电报中提出的向中国供应燃料的问题(见附录2 [\[97\]](#))。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45

№16579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与毛泽东会谈情况(1950年1月7日)

斯大林同志：

昨天，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谈中宣称：

英国、印度、缅甸以及另外一些从属于美英的国家承认中国，将使美国处于孤立地位，从这个观点看，它们承认中国可能被视为是正确的。但是英国、缅甸、印度以及另外一些从属于美英的国家承认中国首先是为了保护它们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也是为了从事反对新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它们在美国的领导下企图分裂中国的联合政府，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建立第三种势力，并企图借助这股势力消灭民主制度。在这种破坏活动中，它们现在已经依靠具有亲美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因此，在粉碎蒋介石国民党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是中国的主要危险，我们要努力把他們孤立于群众之外。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将推迟与承认我国的这些国家交换外交使团。毛泽东说，我们想，只有等到与苏联签订了友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同盟条约以及贷款协定、通商条约等之后，再批准外交使团来我国。全

体中国人民都积极支持这些条约，只有具有亲美影响的资产阶级右翼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被孤立起来。依靠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我们能够很快着手修改和废除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塔斯社记者通讯报道说，毛泽东为解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贷款及通商条约有关的问题前来苏联，这个报道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毛泽东说：我本来想借与斯大林同志第一次会见的机会向他汇报上述这些问题，并与他进行讨论。

И.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7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14-15

№133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周恩来访苏安排(1950年1月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7日

第194项 与周恩来出访莫斯科有关的问题。

鉴于周恩来即将来访：

1.责成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确保在今年1月10日前，为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向奥特波尔车站调动一列专门列车，该专列应该由两节豪华车厢、一节一级国际列车车厢、一节软卧车厢、一节餐车和一节冷藏车厢组成，并负责代表团从边境到莫斯科的往返行程。

2.委托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当局就解决关于派专列从满洲里站到奥特波尔车站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3.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确保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在自边境到莫斯科往返途中的食品供应和服务，并确保他们的安全。

4.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根据其考虑，安置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下榻在“扎列奇耶”郊外别墅里，并确保其饮食和服务。

安置周恩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下榻在国际旅行社宾馆，并确保其饮食和服务。

5.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为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调拨4辆吉斯110轿车和5辆胜利牌轿车供其使用。

6.派苏联外交部秘书长Б.Ф.波采罗布同志、赤塔州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外贝加尔军区副司令员福缅科将军前往边境地区(奥特波尔车站)迎接周恩来。

在奥特波尔车站进行迎接时，要进行阅兵式和升国旗。

7.在莫斯科迎接代表团的人员有：А.И.米高扬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М.А.缅希科夫同志、Н.В.罗申同志、И.В.科瓦廖夫同志、Т.А.谢利瓦诺夫同志和К.Р.西尼洛夫同志。

在车站迎接时，要举行阅兵式，升国旗，奏国歌。

8.与中国代表团出访和在苏联逗留期间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承担。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为此目的，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基金中，给苏联外交部划拨出必要数额的款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3-44

№00257 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1950年1月8日)

绝密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中有16000名朝鲜族军人，并且还有一些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计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

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

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出现情绪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人合并为1个师或4—5团，派至朝鲜。

请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请电告执行情况。 [98]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37页

№16581 斯大林致科托夫电：同意为中国提供航空用油 (1950年1月8日)

北京

致科托夫 [99]：

请拜会刘少奇并给他转达下列电报：

“刘少奇同志，收到您关于为培训飞行员由苏联提供液体燃料的电报。待我们的专家进行核算后，制定供应标准。您的电报中所述为培训飞行员所需要的一切液体燃料，按苏联军队中实施的标准确定如下数量：高辛烷值汽油13400吨、低辛烷值汽油5270吨、航空润滑油1.3315吨、P-9产品26吨。

根据这个核算，我们命令把上述数量的液体燃料在上半年内，从1月份开始给您送去。

中国支付我们所提供液体燃料的程序和条件，建议在1950年中苏贸易协议中确定。

菲利波夫”

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10份分别标上葛罗米柯、

佐林、莫洛托夫、波采罗布、库尔久科夫等同志的名字

АПРФ, ф.45, оп.65, д.364, л.17

№05132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草案)》(第二稿)(1950年1月9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受您的委托向您呈上我们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请审阅。

格利巴诺夫 [100] (签名)

费德林(签名)

Н.罗申(签名)

布耶夫(签名)

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0年1月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普遍和平与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现日本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其他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独立与主权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25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6-19

№05133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第三稿)(1950年1月10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现呈上根据您的指示修改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请您审阅。

条约第一页第一段我们拟定了两种方案。

格利巴诺夫

库尔久科夫

1950年1月1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

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全面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独立与主权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军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的期满后应重新修订。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20-22

№00258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朝鲜同意接收朝鲜籍部队回国(1950年1月11日)

绝密

发自平壤 [101]

1950年1月9日，我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他会晤。金日成告诉我，他接

到中国贸易代表交来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 [102] 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接着，金日成说了官兵人数，并请教怎样答复中方。我遵照您的指示告诉金日成，我从莫斯科接到指示同他会谈此事。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

金日成的意见是：

一、把中国人民军中上述数量的朝鲜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

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

什特科夫

1950年1月11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14-115

№05134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草案)》(第四稿)(1950年1月12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

在此呈上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А.Я. [103]

1950年1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依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面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

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停泊在)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在规定期满后重新修订。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1-33

№1658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要求访问列宁格勒(1950年1月12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1.毛泽东同志要求于1月13日晚上送他去列宁格勒，预计14日清晨2时到达目的地。他希望参观市容、斯莫尔尼宫、冬宫、一家工厂，如果来得及，还想参观喀琅施塔得要塞。

计划1月15日晚上回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有陈伯达教授、王稼祥大使、少将副官 [104]、翻译卡尔斯基、梅利尼科夫医生和中方服务人员。

2.毛泽东同志要求向您报告，过三五天将完成制定冲破封锁上海战役和占领台湾岛的规划。

这个规划将由刘亚楼将军带来莫斯科。毛泽东要求批准4位苏联将军，即顾问科托夫、普罗特科夫、阿夫西耶维奇和海军将军库兹明与刘亚楼将军一起来莫斯科。

他想在离开列宁格勒前把回信寄往北京。

И.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1月1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73

№13806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1月13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绝密

在互致问候和礼节性的简短交谈之后，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一、我向毛泽东通报，在中国人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中是非法的声明后，我们成功做到在安理会讨论中国问题时，蒋廷黻 [105] 将不能担任会议主席。的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代表不得不声明，反对蒋廷黻非法留在安理会，并宣布退出安理会，直到蒋廷黻放弃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出现在那里才返回会场。

有鉴于此，并为了把我们的斗争进行到底，我问毛泽东，他认为这

样做是否合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和向联合国大会主席及联合国秘书长通报这一点，以此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具体的日程上。

毛泽东回答说，他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他只是关心两个细节问题：第一，应该派谁作为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第二，从法律角度，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同时，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上述职位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他曾经在美国求学。但是，毛泽东接着又说，任命驻安理会的代表未必能解决问题，因为在缺少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支持我们的情况下，我们所任命的代表可能在法律上不是合法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待在北京了。

我说，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薄弱的地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派自己在安理会的代表，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我还补充道，目前，安理会某些成员国对业已形成的局势非常担心，因为蒋廷黻这具国民党的僵尸继续留在安理会，是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工作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

毛泽东问，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怎样的，它们是否非常关心联合国的存在或崩溃。

我说，美国和英国自然关心保留联合国这个组织，因为，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它们利用这个组织作为挡箭牌，以掩盖自己帝国主义计划的实行。联合国垮台将会暴露它们的所有意图和计划，它们将失去这个能够帮助它们掩盖自己侵略计划和欺骗国际舆论的工具。

毛泽东又重复说，他原则上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的建议，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就这个措施的所有方面与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应该于1月19—20日抵达莫斯科。

对于毛泽东可否允许拖延一下的问题，我回答说，尽管这个问题非常紧急，但是，既然他认为必须与周恩来商量，那么，此事可以暂缓。

二、毛泽东说，美国拖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对国内秩序进行应有的整顿。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打算在国内采取两个措施：第一，为

满足自身需要收回在北京的外国军队占据的营房，这些营房的使用权是外国人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第二，没收在上海所谓经济援助合作署的粮食和财产，众所周知，美国人通过这个组织给蒋介石提供帮助。实施这两项措施，将使中国能够收回包括美国驻北京和其他城市在内的总领事馆的房屋，把美国领事馆的代表从这些地方驱逐出去，并没收上述所说的在上海机构的大量粮食储备。

我们认为，毛泽东指出，实施这些措施，将会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情绪高涨，将有助于继续孤立中国有亲美情绪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我说，尽管不排除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但是，应该充分地研究如何实现这些措施。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还应该考虑到美国所遵循的政治目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正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个看法。

三、我向毛泽东通报，在我们上次会谈时我已经简短告知苏联政府的决定：派4名苏联专家前往中国，调查吉林水电站事故情况并准备相应措施。在这方面，我已经通过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给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发了电报，在此，我想补充的是，除了派4名苏联专家之外，近期内，我们还将派出7名苏联专家，协商和领导消除吉林水电站事故的工作。

毛泽东对苏联政府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会谈进行了1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费德林和师哲(卡爾斯基)。

A.维辛斯基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3, оп.45, д.364, л.94-98

№05135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备忘录：关于条约

的吸收问题(1950年1月13日)

A.Я.维辛斯基同志：

我找出了有一次受戈伦斯基同志委托所做的笔记，现附上，此笔记已做了补充整理。

对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一资料和可能得出的结论，较之我根据记忆产生的设想要更好一些。

B.杜尔杰涅夫斯基 [106]

1950年1月13—14日

关于条约的吸收问题(笔记)

一、关于后来的条约对以前的条约的吸收问题，在理论上几乎还未涉及。“国际条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家们，如弗兰古利斯在其同名著作中就没有谈到，在一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它会被后来的另一个条约所吸收。

现代国际惯例的记录《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也没有提及条约吸收的问题(附摘录)。

二、但是，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前一个条约被后另一个条约的内容“覆盖”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赔款的所谓道威斯和扬格计划，就是这样的例子；1904、1910、1921年关于与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也是这样的例子；1890年和1906年中英的西藏协定，也是这样的例子。在苏联的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例子：1935年5月2日与法国的互助条约和1944年12月10日与法国的互助条约；还有1941年4月5日与南斯拉夫(当时是王国)的友好条约和1945年4月11日与该国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都是这样的例子。由此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后来的条约吸收了以前条约的内容，并替代了前一个条约，而前一个条约如果不是在后来条约文本中被明文取消了，也是被无声无息地取消了。

不过，实践并没有证实，一个条约的内容被另一个条约所吸收就是取消它：在众所周知的、上述所指的情况下，完全吸收是极少见的，与其说是纯粹吸收，还不如说是内容相似；新条约中未加修改或没有列入

的旧条约条款，仍然有效；这就是说，条约是在另一个基础上形成的。

三、即便对签约的同一方，在没有直接取消和废除的情况下，内容被覆盖了的多边条约原则上仍然具有并行效力。关于毒品的协定、关于同贩卖妇女作斗争的协定、关于捕鲸业的协定，都是这种情况。当1946年捕鲸业协定的签约者希望废除较早的1937年协定时，他们(美国、英国、挪威、冰岛)就宣布废除这一协定，尽管他们当时也可能考虑过该协定是可以被吸收的。

至于双边条约，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了，但严格地讲，对其应采取同样原则：如果条约没有被取消和废除，该条约应被认为是并行有效的。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会，双方有时还要作一些补充说明，原来的一个或一些条约仍然有效，因为新签订的条约没有改变以前的决定(如上面提到的1906年的中英公约)。

在苏联的实践中，1932年与法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和1944年与法国的互助条约都被认为是有效的条约，尽管在逻辑上讲，互助本身就是不允许侵犯，而且严格地讲，如果不是因为许多条款涉及当时的国际联盟(现在已经解散)，1935年 [\[107\]](#) 的互不侵犯条约本来也是可以并行发生效力的。

因此，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的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原来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

杜尔杰涅夫斯基

1950年1月13日

附件：

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

十四、条约效力终止：

- 1.当完成它规定的义务时；
- 2.超出它所规定的有效期；
- 3.具备取消(或作出决议)的条件；

- 4.根据双方的商议；
- 5.由于条约的签订只有利于一方，另一方拒绝接受；
- 6.因为条约全部或部分被废除；
- 7.当条约不可能被完成时。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17-121

№05136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草案)》(第五稿)(1950年1月1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作为对1945年8月14日苏中条约的补充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合作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决心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有益于两国伟大的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普遍和平和安全，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声明，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

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达成协议，关于现有的大连港和旅顺口协定的问题将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予以友善的审议。

双方还商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缩减或撤出。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55—1658页

№09091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援助、越南、日共等情况 [108] (1950年1月16日)

.....

史白夫1950年1月16日在中南海就下列事宜会见了刘少奇：

1.“我.....根据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向刘少奇通报了苏联政府就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恢复吉林水电站方面给予帮助的请求的决定。”

2.胡志明电告中共请求帮助。刘少奇说：“当前中国在边界的军事机构已经同越南民主政权建立了紧密的接触。”

3.送代表团去联合国。

4.由于日本共产党最近的事件，中国共产党赞同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并在自己的报刊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文章。

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12, д.126, л.35-37

№09092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遣送越境中国军人等问题 [109] (1950年1月16日)

.....

一、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把被扣押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武装分队遣送到张家口。

二、为修理界河额尔古纳河上的航标和进行清理河道污泥、沙石工作，非常希望从事这项工作的苏联工人有权上到中国岸边，因为河道很长的距离是沿中国岸边通过的。为此我们请求中国外交部允许苏联工人在大修航标期间到中国河岸上作业。

李克农回答，他原则上不反对。他答应把这一问题报告刘少奇，17日给我们正式答复。

三、李克农宣布，他收到了来自美国的尚需证实的情报：今年7月美国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先从太平洋打起，为此要利用日本、台湾和南朝鲜。李克农还强调，由于这些情报不十分可靠，一开始他考虑不能告诉我们。

.....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10, д.302, л.38-44

№07353 杜尔杰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1950年1月16日)

А.Я.维辛斯基同志：

一、关于蒙古的问题向您报告如下：

关于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1945年11月22日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过了，摘录已为您准备好了。

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附上3份文件的副本。在我呈上1946年1月7日转来的中方照书文本的那天，又收到了一些图片。

二、关于菲律宾人的问题报告如下：

您谈到的那份文件是有的，大概是1944年6月29日会议的联合决议案，规定向菲律宾人提供基础(承认他们独立的条件下)。美国司在中央图书馆的协助下正在寻找这份决议，如果找到了，就将文本呈给您。

杜尔杰涅夫斯基

1950年1月16日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д.235, л.123

№05137 苏联外交部将提交给中方的有关条约谈判的文件草案(1950年1月16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向您呈上与中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和宣言草案以及条约签字时补充说明的草案。

A.维辛斯基

1950年1月1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并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

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打算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

缔约国双方还同意，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

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订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予以重新审议。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本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签字的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二、本议定书为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作为上述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0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

声明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为准确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法律地位，协议双方政府就此声明：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

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本声明由缔约国双方的全权代表签字确认，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并予以发表。

1950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签字

条约签字时的补充条款(草案)

鉴于本条约的签订，缔约国双方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АВІ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 6

№24796 会议讨论记录：在中国放映苏联影片及对华广播问题(节录)(1950年1月16日)

关于在放映苏联影片和加强对华广播方面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而召开的会议的速记记录 [\[110\]](#)

.....

全苏影片进出口管理局莫斯科执行部：中国全国共有700台电影放映设备，其中200台在沈阳和远东，而且并不是这700台都能使用。其中大部分在大城市，比如在上海有50台、天津23台、北京20台。在广大地区完全没有电影，这些地区的居民从来就没有看过电影。在比较大的市中心社区中才有电影，而工人的社区中则没有。因此，尽管对苏联的影片有巨大的兴趣，根据不完全统计的资料，1949年我们只有1600万观众。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是太少了。中国大型影片的储备有2500部，其中的605部用汉语配了音。1949年下半年中国从莫斯科引进了1026部大型故事片。考虑到去年苏联发行的大部分电影都没有放映，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在发送新的影片的同时也发送去年的影片。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影片的数量。如果说每部影片以前在全国发行8—10份的话，那么现在每部影片则发行25—40份。同时向中国发送更多的材料、剧本、关于电影的作品，并且这项工作要一直进行下去。

全苏影片进出口公司认为，放映用汉语配音的苏联影片非常重要，

在莫斯科用汉语配音的故事片有：《青年近卫军》、《西伯利亚交响曲》、《远方的新娘》、《石花》、《米柯卢哈米克拉伊》、《神马》、《会师易北河》和《荣誉法庭》。去年重庆电影制片厂试着对《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配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苏联电影的配音可以在中国进行。莫斯科将把这项工作转交给重庆电影制片厂。在影片《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配音完成之后，《俄罗斯问题》和《伟大的转折》也将被译制成汉语。影片《俄罗斯问题》的译制片前天在北京放映了。

为了进一步在中国进行译制苏联影片的工作，已经向中国发送了关于影片《康斯坦丁·扎斯罗诺夫》、《莱尼斯》、《敌人》、《来自郊区的小男孩》的材料，近期将会发送关于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乡村女教师》、《凯旋》的材料。

1950年预计在中国译制32部苏联电影。在2—4月，如下影片将各送一部给中国，诸如《攻克柏林》、《伟大的力量》、《我们有自己的祖国》、《库班的哈萨克》、《愉快的会见》，除了发送影片之外，还会发送供重庆译制这些影片的材料。

最近，如下影片在译制好之后将被发往中国：《和平的青年时代》、《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竞技之荣》、《新土地》以及一些科普小电影。这些电影将在莫斯科译制。 [111]

考虑到苏联观众非常想在银屏上看到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业领导人也希望在苏联放映中国电影，现在准备在苏联的银屏上放映中国影片《桥》，并且准备得到《中华儿女》这部电影，格拉西莫夫给予这部影片很高的评价，还有《归队》这部电影。此外，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小组将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苏联影片，可以进行更多的放映，但扩大苏联电影放映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电影网太少了。为了扩大电影网和苏联电影的放映量，我们希望并且建议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可以建议其购买足够的电影放映设备。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7000套放映设备，但是放映设备以及其他的仪器和材料的供应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政府进行谈判。这需要中国人自己主动提出这一问题。

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人培养电影放映员，建立

电影放映员学校，为中国的电影网培养干部。因此，中国人需要技术援助。可以考虑，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训练电影放映员。可以向中国派遣我们的专家小组。现在出现了新技术，但是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技术仍然是旧的。

苏联部长会议广播委员会副主席拉宾说，现在我们对中国的广播量显著增加。10月底以来，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是4小时10分钟，而以前的广播时间是2小时45分钟。我们每天共计用汉语播出6个节目。这些节目的内容是关于目前局势的消息，关于我国和国际的一些问题的政治评论以及报纸的材料。每天两次向中国广播中央报纸的概述、中央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重大国际局势问题的评论以及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我们认为必须让中国舆论界知晓的内容。同时还使用了《新时代》杂志上的材料，使用了《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上的观察材料以及该报上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文章。当然，也播放了对中国《星火》杂志的评论。对于其他各种直接对中国有利的内容，我们也在努力广播。

在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人生活的材料中，我们所广播的一些题材，在我们看来，是令中国居民感到激动的。我们尽力展示的是我国的工业力量，因为英美的宣传尽力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苏联在工业上是落后的。播放了关于描述苏联教育经验的材料，关于群众干部培养经验的材料，还播放了关于战后铁路恢复的系列节目，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等。我们努力播放关于中国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内容。播放了我们报纸发表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所有材料，政治局成员的所有文章都被翻译成汉语并进行了广播。同共产党情报局有关的所有材料等也翻译成汉语进行了广播。

关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的确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112] 首先，我们的节目在上海和中国南方的收听效果不好。华北地区的收听效果马马虎虎。前不久同中国广播界的一位领导人李灿(Ли Цань)进行了会谈，他前来莫斯科签署关于通讯问题的协议。他说，在北京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只有在使用带有短波的较好的收音机的情况下才行。改善物质条件、加强技术手段应该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央委员会就改革广播事业通过的决议中，就改善广播的技术手段提出了许多措施，但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远东地区。现在这些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我们曾提请邮电部考虑提供一些直接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甚至连答复也没有得到。广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答应我们使用他们储备的一台无

线电发射器，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现在同中国签署类似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签署条约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签署了这一条约，那么向中国人提供信息、各种材料和评论等的机会就更多了。现在还没有提出签署这一条约的问题。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应该由广播信息委员会来做。对外政策委员会应该向我们提供帮助。普津同志应该着手签署这一条约。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广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可以前往，但是这件事情应该尽快来做。

这些客观上的困难和问题不仅仅同邮电部门有关。也有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有关。我们对中国广播的一个重大不足在于，我们使用的播音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方的省份。现在我们只有一名北京口音很好的翻译，其余的都是北方人，完全没有广东人。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的翻译干部很久都没有到过中国了，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用其他人取代这些人。对于培训干部来说，这未必可行。如果解决了这些干部的培训问题，用来自中国的图书和从中国收到的信件培训他们，那么，我们就可以培训我们的翻译，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扩大他们的现代专业术语知识，了解中国出现的最新术语，也就是把他们的专业素质提高到现在必需的水平。我们应该提供帮助、培养播音员干部。

现在谈谈西部新的地区。我们增加了蒙古语的节目量，我指的是在蒙古居民居住的地区。我们努力使这些广播节目不具特别的性质，尽力使其适用于各地区。回族语节目从塔什干播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拥有巨大的机会：通过电传打字机我们同塔什干保持着联系，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加强这一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并确定正确的进行广播节目的政策。至于对哈萨克族的广播节目，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哈萨克斯坦开始用哈萨克斯坦语进行广播，而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对这一广播进行控制。

1950年1月16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178, л.276 279、285 286、302-305

№133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向中国派遣教师(1950年1月1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950年1月17日

第272项 关于向中国派遣教师的问题。

为满足中共中央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杰尼索夫同志)和苏联高教部(卡夫塔诺夫同志)负责于1950年上半年向中国派遣授课教师，为期1—2个月。这些教师的名单具体如下：苏联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B.C.克梅诺夫、生物学博士H.И.努日金、历史学博士C.B.基谢廖夫教授、经济学副博士M.Ф.马卡罗夫、法学副博士A.A.阿斯科罗夫、经济学副博士Б.Г.博尔德列夫和哲学副博士Д.И.切斯诺科夫。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62

№00606 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艾奇逊的演说(1950年1月17日)

摘自B.M.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作了演讲，其中涉及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企图欺骗舆论。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自己辩解，不惜使用欺骗手段。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在中国发生了下列情况：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这一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也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其最愉快的消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4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

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这篇讲话的全文(据塔斯社上午的电讯)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 [\[113\]](#) 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作出反应。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月14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是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正好相反。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作出反应。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因此，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意见，并在研究艾奇逊的讲话后，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再将其交给我们征求意见和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正在行使部长职责的外交部副部长公布这一声明。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声明中，他一定揭露艾奇逊的反苏诽谤。 [\[114\]](#)

毛泽东还问，在我们看来，艾奇逊的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

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我说，美国人在其对华政策失败后，总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隔阂。我还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侵略计划。与此同时，我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在中国人民政府关于艾奇逊讲话的声明中应该指明：美国国务卿的谣言是在侮辱中国，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让别人统治或管理中国的任何地方。中国人民应揭穿艾奇逊的谎言。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建议，并立即起草声明草案。同时，他还请求将艾奇逊的讲话文稿和华德给记者的声明转给北京新华社。我答应今天晚上就办此事，并立即和维辛斯基谈妥了此事。

随后毛泽东说，最近几天，美国人加强了其代理人的活动，以探听与中国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例如，几天以前，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问毛泽东，他将如何对待著名的美国远东事务专家杰塞普到北京来谈判这件事。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上海传来的消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着手采取措施，以便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同意，派代表到香港同杰塞普谈判。毛泽东说，不过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理睬的。

毛泽东接着说，正如他以前对维辛斯基同志说的，中国人民政府要采取一些旨在把美国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的措施。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在国内整顿秩序，因此，我们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今年的1月14日，北京地方政府向前美国领事声明，他们因自己的需要打算收回外国军队的营房，这些营房是外国人过去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占领上述这些房屋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领事将失去他现在占用的房子，并迫使他离开北京。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始对中国当局威胁说，为了表示抗议，将不得不召回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所有领事代表。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样，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要保证国内状况的稳定，对此我们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二、我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非法

的、蒋廷黻应被驱除出安理会的声明以及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同时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混乱，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敌人的队伍乱了阵脚。但是，为了将在联合国中已开始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是适宜的。并且，最好尽快派遣。

毛泽东回答说，他同维辛斯基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并完全同意这种建议。但是，毛泽东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技术困难，即挑选候选人。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尽管他在这方面稍微弱了一些。关于任命章汉夫的事，在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时，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周恩来尚在途中，可以同他在高频电话中谈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意利用高频电话与周恩来联系，并立即商谈了这个问题。

三、随后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仿佛打算脱离国民党，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个消息是否可信没有把握，此外我们对朱世明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很难对他作出明确的结论。所以，我们想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并要弄清楚，是否应该等待朱世明自己声明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不等到这一时刻，就要求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开除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说，从他的观点看，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郑廷焯来办这件事比较合适些。不久前这位秘书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 [115] 寄来一封信，提及了他正在进行有关上述代表团在东京的工作人员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当对朱世明施加影响，推动他转到我们方面来，这将使我们能更平稳地解决派遣我们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的问题。

毛泽东说，他将起草对郑廷焯来信的复信，并将其寄给我们，转交东京的收信人。

我说，这个建议可以采纳，我们可以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将毛泽东的答复转给郑廷焯。

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H.T.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B.莫洛托夫(签名)

1950年1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同志

АВПРФ , ф.07 , оп.23а , п.18 , д.234 , л.1-7

№09074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 [116] (1950年1月17日)

译自中文

第0034号秘密情报

.....

根据可靠情报：

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在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它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所建立的独立自由的经济体系可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时美国的经济威胁。所以美国人现在非常注意以下问题：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能否实现；中国是否只保持现在的工业水平，并成为苏联和东欧普通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在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承认以后，受苏联的影响，中国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同美国和英国进行大规模贸易；苏联是否通过中国获得欧洲和美国生产的军事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现在美国正通过英国帝国主义承认中国的机会，把它作为试探的一步，来弄清上述问题。美国人将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把他们作为桥梁，以建立未来同人民政府的关系。

.....

三、美国人打算吸引在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从他们中选人建立美国的间谍网，因为平常获得入美签证很难，而向学生发放这样的签证比较自由。正如报道所说，为了获得签证，大学生需要通过口试和笔试，审查家庭状况和政治观点。看来，在英国人承认中国政府以后，美国在签证时将加强审查，以防止我们的人进入美国。

四、现在在广州有120多名军事情报机关的人员，70多名CC派系的特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打算袭击苏联专家，以制造影响。

.....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53-54

№05138 苏联交通部的建议：关于长春铁路和大连港协定草案(1950年1月19日)

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现将呈报莫洛托夫同志的关于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草案的几点建议的信函呈给您。

交通部部长

В.贝舍夫(签名)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В.М.莫洛托夫同志：

依照您的委托，现呈上我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草案涉及交通部的一些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主要建议是：

一、明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协定的第一条，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

以前的文本未把铁路的资产组成，特别是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这一条款。

新修订的条款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须的

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对于由中国和苏联人员担任的铁路局局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铁路总稽核等职务以及他们的副职实行轮换制，每3年轮换一次。

三、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规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达铁路交通线。

其余建议可见具体条款行文中更加详细的说明。

附上第七(a)、十一(a)、十六(a)条补充条款和重新修改的第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三条的草案及其说明。

关于大连港协定：

根据上述协定，大连港未被列入中国长春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该协定的第三条中已经指明港口的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交通部认为，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大连港协定的某些条款也应作部分的修改和明确。

同时，交通部向您汇报下列情况：

一、作为中国长春铁路的组成部分，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

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产生上述数额的利润。关闭共同经营的正常路段，使公司失去了这部分利润，其数额在4年之内大约是6.5亿卢布。

二、战时(1946—1948年)，中国长春铁路的经营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其中所有的复线都被拆除了。

要修复至1950年1月1日仍未修复的铁路复线及其他设施，按1945年的苏联价格计算，需10亿卢布。

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上。

这条铁路现有单线地段的运输能力目前已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

因此，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上的复线是最近一个时期的迫切任务。

交通部长B.贝舍夫

1950年1月19日

附件一：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补充和修改条款草案

第一条

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即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两条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中国长春铁路，归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除此之外，属于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还有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和中苏共同管理时期购买和建设的土地和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建设的铁路支线以及一些直接服务于这些铁路的辅助工厂。上述铁路将在中国主权控制下通过统一管理方式、作为纯商业运输企业实现共同经营。

其余的铁路支线、附属企业和土地将完全归中国政府所有。

第四条

中国政府在第一个3年里应从中籍理事中指派理事长及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将在同一时期从苏籍理事中指派副理事长及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理事会的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未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缔约国双方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第五条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委派，3人由苏联政府委派，监事长在第一个3年中应由苏联政府从苏籍监事中推选，同一时期副监事长应由中国政府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为5人。

第六条

为管理铁路及其企业的日常工作，铁路局理事会应在第一个3年中从苏联人员中选派1人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的局长，副局长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局长的两名助手分别由一名中国人员和一名苏联人员担任。

第七条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一人，在第一个3年中，总稽核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总稽核从苏联人员中选派。

第七(a)条(补充条款)

自本协定签字之日3年期满时，中国政府应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副总稽核，而苏联政府则从苏联人员中选派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稽核。

上述职务的任职每3年轮换一次。

第八条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非等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均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根据铁路局局长的推荐委任。

当正职为中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苏方人员。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正职为苏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中方人员。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非等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应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从中、苏人员中选派。

第九条

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长铁路以及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的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使其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还应维持铁路的正常秩序。关于执行本条款铁路警察局的人员数量和职责问题，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之。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

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和机关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其中包括地方税。

第十三条

中国长春铁路应像中国政府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第十六(a)条(补充条款)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本协定签字后3个月之内，在适宜于缔约国双方的条件下签订中苏直达铁路线的补充协定。

附件二：

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补充和修改条款草案的说明

第一条：1945年8月14日的协定文本中没有明确可以将日本人修建和改建的一些工厂，特别是铁路南线(哈尔滨—大连)附属的企业列入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部分。

新修改的条款规定，将一系列主要的和附属的、一切确保铁路正常运营必不可少和密切相关的企业，无论它们是何时修建的，都列入中苏共同拥有的资产。

第四、五、六、七条规定，在条约有效期(30年)内，铁路局长和监事长的职务由苏联委派。

中方相应的权利是委派理事长和总稽核。

为对双方平等，并能更正确地选派中、苏人员担任上述职务，实行每3年轮换一次的制度，

为此在协定中对第七条做了补充。

确定3年期是根据苏联工作人员到中国长春铁路工作的条件，并且依据了1949年8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

第六条除了削弱铁路局长和副局长的作用外，也没有设置局长助理的职务，而这是铁路正常运营必不可少的干部。

第八条：根据铁路的机构和编制明确了理事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选举的程序。

第九条：没有考虑位于中国境内的苏联铁路路段(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保卫工作，在铁路警察局的人员编制中没有确定苏方应参加。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规定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第十三条：没有指明征收与中国其他国有铁路同等数额的铁路税。

第十六(a)(补充条款)：规定在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参与下，签订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直达铁路的协定。

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理事运输处

上校经理И.科兹洛夫

АВГ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4 7、8-13

№05139 苏联交通部的备忘录：关于长春铁路新旧协定的对比(1950年1月19—20日)

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一些条款的对比

第一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将日本军队驱出中国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苏联和中华民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述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的附属企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企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上述铁路之共同经营，应在中国主权之下，由一单独机构办理，并为纯粹商业性质的运输企业。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即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两条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中国长春铁路，归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除此之外，属于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还有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和中苏共同管理时期购买和建设的土地和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建设的铁路支线以及一些直接服务于这些铁路的辅助工厂。上述铁路将在中国主权控制下通过统一管理方式、作为纯商业运输企业实现共同经营。

其余的铁路支线、附属企业和土地将完全归中国政府所有。

第四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中国政府应在中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理事长、1人为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应在苏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副理事长、1人为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理事会之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不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两缔约国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政府在第一个3年里应从中籍理事中指派理事长及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将在同一时期从苏籍理事中指派副理事长及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理事会的法定人数为7人。

理事会未能达成协议的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缔约国双方政府予以审议，并以公平、友好的精神解决之。

第五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派任，3人

由苏联政府派任，监事长应在苏籍监事中推选，副监事长应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监事会之法定人数为5人。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铁路局设监事会，由监事6人组成，其中3人由中国政府委派，3人由苏联政府委派，监事长在第一个3年中应由苏联政府从苏籍监事中推选，同一时期副监事长应由中国政府在中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的投票按两票计算，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为5人。

第六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1人，由苏联人员中遴选，副局长1人，由中籍人员中遴选。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为管理铁路及其企业的日常工作，铁路局理事会应在第一个3年中从苏联人员中选派1人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的局长，副局长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局长的两名助手分别由1名中国人员和1名苏联人员担任。

第七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1人，总稽核由中籍人员中遴选，副总稽核由苏籍人员中遴选。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1人，在第一个3年中，总稽核由中籍人员中遴选，副总稽核由苏籍人员中遴选。

第七(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自本协定签字之日3年期满时，中国政府应从中国人员中选派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长和副总稽核，而苏联政府则从苏联人员中选派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稽核。

上述职务的任职每3年轮换一次。

第八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上述铁路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和重要车站的站长，应由理事会委任，铁路局长有权推荐上项职务之人选，理事会各理事亦可在征得局长同意后推荐上项人选。

处长和科长为中籍人员时，副处长和副科长应为苏籍人员，处长和科长为苏籍人员时，副处长和副科长应为中籍人员。

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和站长应依照中苏两国人员平均担任的原则任用。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特级和一级车站站长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根据铁路局局长的推荐委任。

当正职为中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苏方人员。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正职为苏方人员时，其副职应是中方人员。

铁路局的各处处长、科长及其副职，处总工程师，各地段和大型运营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副职，特级和一级车站站长应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从中、苏人员中选派。

第九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中国政府负责上述铁路之保护。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之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并应维持铁路之正常秩序。关于铁路警察执行本条款规定之职

责，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国长春铁路以及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之房屋、设备及其他产业和货运免受毁坏、损失和抢劫，该铁路警察并应维持铁路之正常秩序。关于执行本条款铁路警察局的人员数量和职责问题，由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决定。

第十一(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和机关的进口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其中包括地方税。

第十三条

1945年8月14日的条款：

上述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第十六(a)条(补充条款)

建议新修订的条款：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本协定签字后3个月之内，在适宜于缔约国双方的条件下签订苏联和中国之间直达铁路线的补充协定。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17-19

№16595 缅希科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苏联与中国的贸易(1950年1月20日)

对外贸易部向您报告苏联与人民民主中国的贸易情况。与中国解放区的贸易是从1946年12月开始的。

苏联的外贸机构同人民民主政权或中国当局授权的中国公司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合同，贸易通常用不需外汇的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根据它们的请求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赠送给中国的代表机构代表团的苏联货币和外汇，不包括在内。

中国方面用提供商品的形式来偿还这类债务。苏联的外贸机构则出售部分商品，收取中国货币(元)，以满足国家银行在解放区的苏联代表机构的需求。

同东北的贸易，以元为单位结算。下面提供的资料，其换算标准为：1卢布=188.7元，或1美元=1000元。

同民主中国(东北、华北)的贸易额为：

	苏方提供	中方供货和劳务
1947年(含1946年12月)	1.51亿卢布	1.701亿卢布
1948年东北	3.354亿卢布	3.148亿卢布

从上表可以看出，1947年苏方供货不足部分，在1948年用增加供货150万卢布来补足，这是1948年双方结算后计算出来的。

1949年与人民民主中国的相互供货情况如下(到1950年1月止)：

	苏方供货(百万卢布)	中方供货及劳务(中转)
合计	420.6	436.3
包括相互供货	417.4	421.5

续表

	苏方供货(百万卢布)	中方供货及劳务(中转)
往年追加	1.5	
根据交通运输量计算	1.2	14.3
为建立储备金而销售	0.5	0.5

注：在苏方供货一栏内未包括向中方代表和代表团提供的现金790万卢布(附录一 [117])

苏联所欠1570万卢布主要是支付从朝鲜经东北支出的货物的运输或

转运费用(1310万卢布)。这是根据中方提供的单据支付的，他们将用提供商品来结算。

1949年的资料是初步的、不完整的，有待进一步完善。

(1)根据1949年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武装力量部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根据外贸部的大致计算，总共为1.258亿卢布。

至1950年1月，在上述决议的项目中，已运走装备合7790万卢布，包括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的费用(67万卢布)。

根据上述决议科瓦廖夫同志该与对方商定支付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用向苏联提供商品的办法，结算自由浮动外汇和黄金。

科瓦廖夫报告说，他已同中国领导人在当地就根据政府决定供货的可能性达成协议。但由于没有武装力量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必要资料和数据，无法就价格供货数量和商品在当地进行谈判。

(2)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4日的决定，武装力量部和对外贸易部提供了教练机、航空技术装备和汽车，价格为2800万卢布。

至1950年1月1日，在上述决定的项目下，已运送的货物计1350万卢布。

(3)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2月3日、19日及1950年1月7日的决定，对外贸易必须提供1.87万吨航空汽油、1000吨汽车汽油、1400吨航空润滑油、P 9产品26吨和电子管1080万卢布。

另外，根据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的特别指示和其他指示，运送了伞降物资和机场装备、航空汽油2000吨，价值170万卢布。根据上述各项决定，共提供了1.663亿卢布的货物。

其中，到1950年1月1日为止提供9310万卢布。

在1949年的资料中，未列入中方供货数字..... [118]

中方提供的商品(小米和钨)共9250万卢布，其中至1950年1月1日前

提供了310万卢布.....

(报告说,中方解释这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困难造成的。报告还说,到1950年1月1日止,苏联共欠中方5230万卢布。根据上述决定,苏方的供货任务尚未完成,要延续到1950年第一季度。)

那么,根据对外贸易部已知的双方情况和合同尚未规定的情况,这些数字如下:

苏方供货共1.663亿卢布。

中方供货共5280万卢布。

(报告还说,除了用双边贸易的办法提供苏联货物外,还提供了贷款。)

根据政府1948年5月17日、10月9日和1949年2月6日的决定,交通部和其他部通过科瓦廖夫同志的小组向中国提供了装备和材料,还对中长铁路范围内修复铁路线和桥梁提供了技术援助。提供的装备和材料的价值达1030万卢布。而提供的劳务达160万卢布,总共为1190万卢布。用贷款来偿还上述1949年欠款的谈判还未结束。外贸部认为,这个问题最好提交即将举行的与中国政府的贷款谈判加以讨论。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9日的决议,外贸部向中国提供了500公里的宽型钢轨和铆钉(5.56万吨),价值3330万卢布。以此作为依据1949年5月30日 [\[119\]](#) 的协议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

新提供的装备、材料和用贷款形式提供的劳务的清单附后(附录二 [\[120\]](#))。

依据部长会议1948年12月28日的命令,交通部应向东北的民主政府出售86辆火车机车和1000节车厢(从战利品中拨出),总价值近4400万卢布。根据部长会议1949年9月7日的另一命令,外贸部应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建议中方用东北的粮食在5年内支付火车机车和车厢的欠款。中方还未就这一问题作出最终的答复。协议尚未达成。

为了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23日“关于建立苏中民用航空公司”的决议,除外贸部外,武装力量部也运送了航空技术装备。根据上述决议,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的装备将算是我方投入公司的资金。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0月3日“关于建立北京—兰州—甘州航线”的决议，武装力量部在建立中苏民用航空公司时，必须考虑与派遣一个汽车运输团及其工作所需相关费用的补偿，也要考虑所提供的装备和材料的补偿。

所有上述资料都不包括向辽东半岛条约协定地区运入商品的费用，同样也不包括运出的费用。由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和苏联企业界运入货物的费用，也不包括在内，因为当前这些运输与中国政府的相互结算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同新疆的贸易，因为这类贸易是同当地商人直接用货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

在附录三和附录四内，列出了对东北和华北进出口商品的详细清单。 [121]

关于对华贸易的价格问题，我要向您报告的是在1947年和1948年的部分时间内，我们向中国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低于世界的价格，其原因是，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大豆、高粱、玉米和肉制品的质量未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且世界市场(美国)的价格在那几年对东北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在1949年，同东北的贸易条件已经正常，由商品质量和市场来决定，价格与供货条件符合世界贸易水平。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A.M. 缅希科夫

1950年1月2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6—939页

№0514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中国长春铁路协定和 议定书(1950年1月21日)

В.М. 莫洛托夫同志

А.И. 米高扬同志

А.Я. 维辛斯基同志：

受委托呈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

附：

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长铁路决议的草案

二、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

三、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

A.葛罗米柯(签名)

Б.贝舍夫(签名)

И.科瓦廖夫(签名)

Н.罗申(签名)

И.科兹洛夫(签名)

И.罗季奥诺夫(签名)

1950年1月21日

附件一：

机密

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1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确定将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附件一 [\[122\]](#))

二、关于从1950年2月____日开始恢复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事宜，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就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四、五、六、七条的问题，必须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3年轮换一次。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在第一个3年中，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同时规定，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四、在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建议将铁路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

为全面确定将资产转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拥有，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十六条，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有A.Φ.茹拉夫廖夫(主席)、H.A.格鲁尼切夫(副主席)和A.M.捷列尼诺夫等同志。

五、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关于护路的第九条和关于保证铁路木材供应的第十二条做某些必要的修改，具体情形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苏属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科夫的铁路地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八、关于该协定的第二、三、四、五、六、七条，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专门的议定书，议定书的草案附在本决议后(附件二 [\[123\]](#))。

九、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和交通部(贝舍夫、叶罗戈夫同志)就本决议的第一、第八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M.波马兹涅夫

附件二：

附件1

草案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签字双方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重申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同规定的完全一样，同时，根据签约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协定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__月____日，于莫斯科

附件三：

附件2

机密

草案

议定书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____月____日签订的
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两国政府决定签订补充议定书如下：

一、自1950年2月____日起恢复中国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

二、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四、五、六、七条，确定理事长、
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
担任，每隔3年轮换一次。

在第一个3年中，理事长及其助理、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
言而喻，副理事长及其助理、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

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三、将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
有(附件1)。

为了充分确定转交给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资产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
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属于共同经营的资产，应不晚于1950年3月1日成立由缔约国
双方各3位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哈尔滨市。

委员会应于1950年5月1日前结束工作并提交自己的方案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认。

四、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并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附件2)。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承担下列义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苏属外贝加尔
斯克和普里莫尔斯科夫的铁路地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
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附件1：

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和转交给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的清单

一、双方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及其附属专用线。

(一)干线：

- 1.满洲里—哈尔滨；
- 2.哈尔滨—边境站(绥芬河)；
- 3.哈尔滨—大连—旅顺口。

(二)双方共同使用的支线：

- 1.锦州—陈相屯；
- 2.南关岭—甘井子；
- 3.大石桥—营口；
- 4.大房身—柳树屯；
- 5.苏家屯—抚顺。

(三)附属专用线：

露天采掘场的支线。

二、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枢纽的分界线。

(一)考虑到中国铁路线上火车的通行能力，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枢纽站不在中国长春铁路的范围内。

(二)中国长春铁路枢纽站的准确分界线由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确定。

三、机车车辆修理厂。

(一)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二)附带扳道设备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的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

四、机务段。

(一)位于下列车站的机务段：

- 1.满洲里；
- 2.海拉尔；
- 3.博克图；
- 4.昂昂溪；
- 5.安达；
- 6.哈尔滨；

..... [\[124\]](#)

机车库的财产还包括为机车供应装备和给水的各类设施。

(二)在以下各机务段的修车库：

1.满洲里；2.海拉尔；3.博克图；4.昂昂溪；5.哈尔滨；6.牡丹江；7.绥芬河；8.长春；9.四平街；10.沈阳(有两个库)；11.苏家屯；12.大石桥；13.大连(有两个库)。

五、机车车辆。

确定中国长春铁路机车车辆数量的依据是：中国长春铁路段1950年计划的工作量占东北铁路和整个东北地区机车库、修车库截至1950年1月1日的总工作量的比重。

六、发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

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所有发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以及铁路所需的一切服务设施。

七、通讯线路、电报电话局、信号集中和闭塞设施。

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所有通讯线路、电报电话局、信号集中和闭塞设施以及位于铁路站境外的、属于铁路必需的服务性专门建筑物。

八、物资仓库。

位于整个中长铁路线上的主要的和区段的物资仓库及其所需的服务性设施。

九、住宅。

为确保铁路员工居住面积而建造的住宅，以及附属与中国长春铁路站的各城市和村庄里的住宅，除了以下各枢纽站的住宅外——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和沈阳。这些住宅的基金是以中国长春铁路和东北其他铁路的员工与在这些枢纽站工作的铁路员工的人数比例来分配的。

十、民用设施，技术服务性设施，医疗、合作社、文化设施和学校。

民用设施，技术服务性设施，医疗、合作社、文化设施和学校以及中国长春铁路所需要的服务性设施。

十一、附属企业。

扎兰屯和穆稜的煤矿，哈尔滨和大连的印刷厂，乔尔—戈里格尔(Чол-Горигол)木材加工厂，海拉尔和牙克石的乌尔金奇汉(Уркичиханскиет)木材厂、亚多尔斯克(Ядорские)木材厂以及归属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财产。

十二、土地资源。

中国长春铁路的土地资源包括：沿本清单第一条中列举的干线和支线划归铁路用的地带以及铁路职工的住宅、民用和技术设施所占用的那些土地和宅旁园地。

附件2：

在属于共同使用的中国长春铁路的财产组成中，下列财产不包括在内，应立即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 1.哈尔滨工业大学；
- 2.大连工业大学；
- 3.大连细菌研究所；
- 4.大连化学研究所；
- 5.大连信号设备厂；
- 6.大连无线电实验室；

7.哈尔滨方志博物馆；

8.大连方志和工业博物馆；

9.沈阳、长春和锦州的医院，大连的桐树(Туншу)医院；

10.大连、沈阳和长春宾馆；

11.大连中央图书馆；

12.松花江的航运权；

13.杨台(Яньтай)和瓦房店的煤矿使用权；

14.由中长铁路原已购买或获得的，位于铁路隔离带以外，未建筑有属于中长铁路的行政、技术服务和生活居住等设施的士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08-21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20-28

№00260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问题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东北、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

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

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5年缩短到3—4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1950年1月1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125]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东北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东北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东北呢？

周恩来：对东北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东北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东北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10000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卡爾斯基)。

№16002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朝鲜族部队回国问题 (1950年1月22日)

机密

译自中文

刘少奇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电报

中共中央的电报

毛主席：

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官兵有14000人。金日成派出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为首的3名代表来接收这批朝鲜官兵。他们请求把这些朝鲜士兵组成一个师和直属该师的支队，还要带走所有装备：步枪12000支、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左轮手枪120支、掷弹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毫米火箭炮36门，还有弹药。林彪同志同意这一要求。

请您就这一问题给予指示。

刘少奇

1950年1月22日

完全同意满足这一要求。

毛泽东

1950年1月25日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4 , л.22

№05142 联共(布)中央决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草案(1950年1月22日)

斯大林同志：

现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草案呈上，请予审批。

一、《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二、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

三、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四、代替1949年7月30日协定的苏中贷款协定；

五、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

六、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议定书；

七、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八、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

九、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

十、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

十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东北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

十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

上述草案已同有关各部协商。

已决定将上述第1、2、3项文件拟公布于众。涉及中长铁路的问

题，除应公布的议定书外，不应公布的协定也将签字，其中将明确几个实际问题(恢复双方共同管理铁路的期限等)。相应文件的草案将由委员会进一步提出。

上述列举的其他一些文件的文稿或者内容的公布问题要进行专门审核。

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B.莫洛托夫

A.米高扬

A.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2日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

批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草案如下：[\[126\]](#)

一、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附件一)；

二、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二)；

三、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三)；

四、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以供给中国设备和其他货物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草案(附件四)；

五、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五)；

六、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六)；

七、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七)；

八、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草案(附件八)；

九、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决议草案(附件九)；

十、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草案(附件十)；

十一、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合营股份公司管理的东北和辽东半岛地区不动产的决议草案(附件十一)；

十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附件十二)。

附件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原则，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附件二：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订议定书

签字双方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期内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并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以及苏联政府表示的意愿，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重新审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

二、目前处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将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的2—3年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从1950年开始。

三、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

附件三：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订议定书

签字双方分别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重申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所规定的有效期。同时，根据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__月__日，于莫斯科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2-50

№133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 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23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23日

第321项 关于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问题。

1.满足高岗的请求，同意中共新疆省政府委员会妇女部部长——彭锦秋(Пэн Цзинцю)来苏治病。

2.责成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彭锦秋的接待和生活服务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其治疗工作。

№05145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方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份文件 [127] 是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于1月24日23时递交给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的。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我们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译自中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这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同上述国家发生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不经互相协商不单独或同其他国家一起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翻译：克鲁季科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

АВІРФ, ф.07, оп.23а, д.235, л.38-40

№09075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间谍学校 [128] (1950年1月24日)

第37号秘密情报

.....

据1月21日消息，美国人在关岛建立了美中间谍学校，该学校从国民党秘密组织中挑选工作人员以继续培养。最近，已通知福建省沿海的保安总队，要它派50人——年龄18—25岁，小学或中学毕业——到该校学习。

АВІРФ, ф.100, оп.43, л.315, д.142, л.59

№05147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方文本的修改意见(1950年1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再一次发动的侵略战争。

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决心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稳固的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另一方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派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通过需要的形式以及严格的程序后，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被卷入同上述国家的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被卷入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这一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经互相协商，不参加与日本的谈判，不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加强和巩固和平和安全利益的原则，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谊和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八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1950年1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手写批注：

“针对中方草案的我们的草案。”

波采罗布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73-76

№05148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А.И.米高扬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

呈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А.葛罗米柯

1950年1月26日

关于大连港

为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缔约国双方同意以下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根据单独的协定，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

二、从境外运进大连港和沿中国长春铁路直接运往苏联境内的货物，从苏联沿指定铁路经过大连港出口的货物，或从苏联运来的为港口设施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免征关税。上述货物应采用封闭车厢运输。

三、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以后未经双方协商确定采用其他任职方式，则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同时，在第一个两年中，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员担任。

四、在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

五、本大连港协定直到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一直有效，此后将重新审议。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5-37

№05149 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 (1950年1月2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1月26日15时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草案。

А.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本着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决定缔结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根据目前所形成的中苏之间新的合作状况，苏联政府声明，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苏联政府的上述声明。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苏联军队将立即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3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因此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缔约国双方政府将协商苏军撤出的程序和方法。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而出现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敌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处于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出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但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例如，如果第一个期限内铁路局局长职务由中国人员担任，那么，副局长应由苏联人

员担任，而第二个期限内，铁路局局长应是苏联人员，副局长则是中国人员，其他职务也实行同样办法。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议生效已超过3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那么苏联政府应立即将中长铁路以及属于该铁路的所有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涉及移交的具体方法，将进行商议并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定。

第五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8 55

№07354 葛罗米柯与刘亚楼谈话记录：苏方提交航空协定草案(1950年1月26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有：A.葛罗米柯、C.扎沃龙科夫 [130]、A.阿夫谢耶维奇 [131] 等同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有：刘亚楼将军和大使馆参赞徐介藩。

葛罗米柯：根据中国代表昨天所表达的愿望，我现将我们专家准备的协定草案转交给你们。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个草案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汇报，自然，还没有得到赞同，而且，外交部长也没有看过这份草案。因此，我要重复一下，草案作为专家准备的文件必须还要进行审批。

刘亚楼：我们感谢贵方转交的草案，下一次协商会议之前，我们将对草案进行研究。当我们准备好对这份草案进行讨论时，立即通知你们。

徐介藩：既然你们也了解草案的内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份

专家准备的草案也反映了你们的观点？

葛罗米柯：我应该再重复一次，这完全是一份初步的工作文件，苏联政府和外交部的领导人对它还没有进行研究。

阿夫谢耶维奇：中方今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刘亚楼：关于昨天协商会的情况我们已经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之间早已有了一般性协议。为了准备具体的措施，阿夫谢耶维奇将军还去了中国。现在我们剩下的事情只是要讨论阿夫谢耶维奇准备的建议。我觉得，以这些准备好的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是最正确的。葛罗米柯：那么，就让我们约定，等中国同志研究了专家准备的草案后，我们再重新讨论。刘亚楼：这也符合我们的愿望。

A.葛罗米柯

C.扎沃龙科夫

A.阿夫谢耶维奇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库尔久科夫同志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8, л.6-7

№05155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 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

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长春铁路的协定。 [132]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对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

在苏军撤出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出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存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国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月____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议定书

(1950年2月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一、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

何税收。

二、上述第一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在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三、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74-79

№05156 苏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9日)

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33\]](#)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9日12时40分

草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心通过加强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在侵略行为中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愿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

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法顺延之。

1950年1月____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已交毛泽东和周恩来。1月29日。

А.Я.维辛斯基(签名)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84-88

№133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意中共干部 来苏联治病(1950年1月30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30日

第371项 关于李常青同志来苏治病的问题。

1.满足高岗同志的请求，同意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同志来苏治病。

2.责成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李常青同志(在苏期间)的接待和生活服务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其治疗工作。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82

№133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哈巴罗夫斯克 诉讼案件(1950年1月30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1月30日

第373项 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 [\[134\]](#) 的结果向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发出的照会草案。

1.批准苏联外交部就哈巴罗夫斯克诉讼案件的结果而提交给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的照会草案(见附件 [135])。

2.至于远东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政府(除菲律宾外)，则通过这些国家驻华盛顿的代表转交照会的复印件。

3.公布照会内容。

РЦХИДНИ , ф.17 , оп.3 , д.1079 , л.83、213-228

№05151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 (1950年1月31日)

周恩来的草案 [136]

互换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照会

尊敬的部长先生：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谨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

部长先生，请接受本人最崇高的敬意。

1950年2月____日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16

№05157 中方针对苏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修改稿提出的文本(1950年1月31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心通过加强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谊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日本或以任何一种方式与日本在侵略行为中结成联盟的其他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愿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友谊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尽快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条约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以此法顺延之。

1950年2月____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8-15

**№05161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的
中方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实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诸问题的可能性。

苏中两国政府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2月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议定书

(1950年2月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39]以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中苏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一、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不受阻碍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

算。

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三、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四、上述第三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沿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17-22

№05162 中方提交的对苏方关于贷款的协定和议定书的 修改稿(1950年1月31日)

周恩来的草案 [\[14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3亿美元，系以35美元作为1盎司纯金。

鉴于中国因艰苦战争而引起的财政困难，苏联政府同意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5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1/5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和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种、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的价格来确定。

在年度期限内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度。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工业品、黄金、美元偿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和工业品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的价格来确定。

贷款的偿还以10年为期，每年偿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1/10，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第一期偿还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最后一次偿还于1963年12月31日前完成。

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际数额，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1950年2月____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根据1950年2月____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两国政府达成以下协议：

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而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23-26

№09088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新华社批驳美国的谣言 **[141] (1950年2月 [142])**

.....

1月31日(1950年)，新华社发表声明严厉批驳美国国务院企图破坏中苏友谊。新华社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在1月12日的发言中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诬蔑攻击破产之后，美国国会于1月25日又公布了所谓的“非官方材料”，目的在于继续进行无耻的诬蔑。

美国国会不知“羞耻”二字，并且越来越表现出极大的厚颜无耻，所谓的“材料”从一开始就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称作“虚构的事物”，同时闭口不谈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得到美利坚合众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

然后，把一系列恶毒的谰言指向中国的东北。散布关于中国东北的诽谤“材料”的动机很容易从以下的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当年是苏联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苏联恪守在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的合同义务。

此外，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和大连港，为的是防止日本及其帮凶发动新的侵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存在深厚友谊是很自然的。也正因如此，这一友谊为鼓励日本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所仇视。

接着，新华社批驳了美国国会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占主导地位的无耻谰言。而且新华社引用了原美国驻奉天领事华德1月14日的声明，该声明说，他没看到任何苏联控制东北的迹象，东北完全处于中央人民政府监督之下。新华社无情嘲笑了国务院“材料”中所引用的早已不存在的由苏联控制的东北企业“沙河岗”的所谓“证据”。

“美国国会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引用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所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断言什么似乎‘从东北向苏联出口粮食造成了粮食短缺’。然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东北过去一直向国外销售大豆，其中包括向苏联出口，同时还把自己多余的粮食运往内地市场和遭受饥荒的华北和华东地区。”

.....

艾奇逊为什么如此匆忙地制造这些谎言呢？这是因为，艾奇逊企图通过这些诬蔑和谎言来破坏中苏友谊及其相互援助。

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在迅速增长，中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友谊的珍贵，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联社1月25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明确指出，“国务卿艾奇逊最终指望能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进楔子”，但这家通讯社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至今为止，艾奇逊的所有企图全都落空了。——在声明中，新华社最后这样指出。

类似揭露美国反动派企图在中国读者和听众中破坏苏联和中苏友谊声誉的材料，在中国报纸编辑的文章中以及中国国际问题评论员和宣传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

.....

苏联驻华使馆二等秘书

A.马卢欣

АВНРФ, ф.100, оп.43, п.312, д.126, л.89-90

**№0060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谈判情况
(1950年2月1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在1月31日同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我们的草案提出了下列修改意见：

一、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在条约序言的第二段中，以“友好与合作”代替“友好关系与合作”。

(二)在第二条，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替“在战争期间”。

(三)在第六条，以“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代替“签字后立即生效”。

关于第(一)点，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措词比较合适。

关于第(二)、(三)点我们不反对。

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

(一)给协议书的标题以如下措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二)给我们草案序言的第一段加上下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使中国联合成统一的国家，并证明)统一了全中国，实行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并证明了 自己是有能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的人民政府。”

(三)在第一条“无偿地移交”一句话后加上“政府”一词。

(四)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以下列方式表述：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五)第二条第一段用下列方式表述：“缔约国双方代表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应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应撤出共同使用 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同一条的第二段开头这样表述：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 前的一段时期。”

(六)在第三条第二段，以“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隶属于中国”。

在上述第(二)、(四)、(五)点中，周恩来建议增加画有着重线的词，而去掉括号中的词。 [143]

关于上述第(一)、(三)、(四)、(五)、(六)点我们表示，从我方来讲大概不会反对，但答应以后给予答复。至于第(二)点，我们坚持我们的措词。

讨论的结果是周恩来表示，他将不坚持自己的措词，答应考虑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一)序言以下列方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二)把我们草案的第三点变为第一点。

(三)补充新的第二点如下：

“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以上画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我们不反对第(一)和第(二)点中的修改。至于周恩来提出的新的第二点，我们答应以后给予答复。

四、关于贷款的协定。

(一)协定的标题这样表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二)在第一条的第二段中，以“鉴于中国因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代替“由于中国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在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以下同原文本。

(三)在第三条中，在“供应原料”一词后加上“工业品”，在“原料的价格”一词中加上“工业品的”。

(四)在第五条中，加上“应经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第(一)、(二)和(四)点中所指出的修改我们不反对。有关第(三)点的修改，我们答应以后答复。

五、关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在第2段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代替“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10—12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

画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剩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将部分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此，周恩来又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购买一定数量的钨(1600吨之内)。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中国将不再使用的剩余产品。

我们答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告知我们的最后意见。

周恩来在提到航空协定的问题时说，提交给他的、我们的草案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将其简化。周恩来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协定是否能让中国人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

米高扬同志说，他还没研究我们专家的草案，所以不能就此问题表示最后的意见，并补充说，他觉得周恩来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审议这个草案时一定会予以考虑。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互换关于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和协定已失效的照会。

附上周恩来拟定的照会草案以及条约和协定的草案。 [144]

经与A.И.米高扬同志协商，由我呈上报告。

A.维辛斯基

2月1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9, л.1 6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д.234, п.19, л.8-13

№0060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情况 (1950年2月2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1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会晤时我们交给周恩来：

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二、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三、贷款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四、互换照会草案。

文件附上。 [145]

米高扬同志说，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采纳了中方的修改意见。

接着，米高扬提请周恩来注意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议定书的第一条，指出：根据中方愿望该条列为第一条，但作了如下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苏方的建议是这样的：经满洲里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动苏军可以缩短一半的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一建议是非常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无需证明，这是指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中方关于从东北到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不能说是这样的。

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一种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特殊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行走1000公里的路才到乌鲁木齐，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

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

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我还指出，列入第二条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感到尴尬，他开始详细地解释第二条的含义，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这种调动是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逻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一旦有必要，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中方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在我们的草案中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第二条，即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东北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

此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开支和时间。

米高扬同志再次提请注意，中长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较之苏联境内从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短得多。至于说到沿苏联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米高扬同志说，这并没有实际需要。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从东北运输粮食和货物，因为这样是非常昂贵的，而粮食也可以在新疆境内买到，就像现在做的一样。

米高扬同志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10年。

[146] 周恩来声明，还是新修改的第一条要好一些，即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可以沿中长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对此他不反对，但要向毛泽东报告。他不同意米高扬同志重新讨论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问题的建议。

关于偿还苏联用于自1945年以来旅顺口的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问题，周恩来建议将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第二条中的“偿还

苏联的费用……”一句改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苏联的费用……”我们同意周恩来的这一修改。

对贷款协定草案中其他的修改部分，周恩来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了解了新的贷款协订定书草案的内容后，请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20000吨，因此中国还不得不进口铅。

关于钨、锑、锡的供给数量，周恩来说，虽然全部提供这一数量是可能的，但中国担心在开始的两年是否能保证确切地履行这一职责。他建议在议定书中加一个补充说明，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首先把多余的上述原料供给苏联，或说明在我们草案中所指定的最初两年的数量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并未提出自己的条文，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米高扬同志问，对议定书草案还有什么意见，周恩来回答，议定书原来的草案指明是国际市场价格，修改后的文本没有说明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议定书草案中讲的是按年度易货协定供货，自然，这些供货将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两国之间的易货也将以这个价格为基础。所以在议定书草案中没有提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方坚持要指明价格问题，我方也不反对。

维辛斯基同志把经苏方修改的中方的互换照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

[147]

周恩来对修改的部分表示同意。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解释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应规定航空运输合营公司的飞机可以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的建议是正确的。

此报告经与A.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

A.维辛斯基

1950年2月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

№05163 苏方最后提交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 (1950年2月2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略。 [\[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实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诸问题的可能性。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唯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立即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施进行恢复和修建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有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资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资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____月____日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议定书

(1950年____月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中苏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一、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为了尽快调动苏联军队，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二、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三、上述第二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境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沿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贷款的协定

略。 [\[149\]](#)

议定书

根据1950年____月____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两国政府达成以下协议：

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卖给苏联钨、锑、铅、锡，从1950年开始，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

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

从1955年开始，上述金属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

互换照会

略。 [150]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39-49

№16583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学习(1950年2月2日)

绝密

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我给您送去中共中央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菲利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组织由张秀山 [151] 率领的代表团打算于2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苏联。

代表团由42人组成，其中包括翻译和技术工作人员。他们是全国最重要区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工作者，包括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者。

代表团的目的是学习联共(布)组织工作的经验。

除听取联共(布)有经验工作者的报告之外，还打算参观几个联共(布)的党组织。打算在苏联逗留3个月。

中共中央请您向联共(布)了解一下，是否允许这代表团于2月15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的住宿饮食费用联共(布)能否承担。盼望答复。

本电报同时发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

1950年2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科瓦廖夫同志

扩大3倍，发送10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8

№00610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1950年2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2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周恩来声明，中方已分析了2月1日转交给他们的条约和协定草案，并对这些草案进行了研究，现通报如下：

赞成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没有任何修改。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可以接受，不作修改。中方建议，在该协定义定书第三条中，将第一点并入第二点。

我们同意这一修改。

周恩来又说，除了与议定书草案有关的问题，他还想谈一下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

米高扬同志说，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

米高扬同志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说，苏联政府考虑了中方关于取消议定书中供应铅的条款的请求，决定满足这一请求。至于钨，我们同意开头两年将钨的供给量，从8000吨减少到7000吨。

周恩来援引从本国贸易部长那里获得的详细情况声明说，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供应8000吨钨。但他们请求将锡的供应量第一个两年从7000吨减至5000吨，第二个两年减至6000吨，以后的十年保持按每年10000吨供应。周恩来对这一请求做出的解释是，产锡的云南省刚解放不久，同时根据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锡矿开采区进行了破坏。他还补充说，如果苏联给予援助，他们就能较快地扩大开采量，到时就可以按苏联需要的数量完成供应任务。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如果中方提出具体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谈到供应锑的问题，周恩来说，锑的开采地区位于湖南省，但是，无论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地区都遭到了破坏。因此，要完成苏方指定的订货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中方请求在第一个两年里将锑供应量降至4000吨，在第二个两年里减至5000吨，在以后的十年保持每年8000吨的数字。但如果苏方能在这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帮助，苏方的订货是可以完成的。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数量并准备给予帮助，只要你们说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米高扬同志还强调，保持这些数量将刺激中方去扩大这一对中方本身也有利害关系的原料的开采量。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履行协定承担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中方对这种原料的开采量还不清楚，为了弄清情况，已经给北京拍了电报加以询问，至今还没得到答复。因此，中方请求等收到答复后，可以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一次。在没收到肯定答复时，不得不缩减供货数量。

我们不反对收到答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议定书最后一段谈到偿还贷款的期限时，不写1955年，应注明为1954年，贷款协定第三条是这种更改的根据。 [152]

我们不反对。

对于所有的文件，中方再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2月3日最后审定条约和协定的中、俄文两种文本。

我们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谈起在新疆开采石油和金属的问题。他指出中方有当年张治中同苏方讨论这些协议的草案。^[153]中方希望利用这些草案，在乌鲁木齐重新开始这个问题的谈判。但是，鉴于新疆代表团已到达莫斯科，他认为，最好是能在莫斯科开始预备讨论，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154]

周恩来补充说，按照他的意见，双方的法定资本应是均等的。合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应与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流担任职务的原则。拟定中的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应比航空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更长。

周恩来谈到在大连的企业的问题时指出，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生效后，中苏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企业将归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米高扬同志问，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企业，周恩来对此问题答复说，首先就是船舶修配厂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属共同经营的范围之内。

双方谈妥，周恩来所提及的问题将由中苏双方代表进行预备性讨论，我方将由葛罗米柯同志参加。

谈到贸易条约时，周恩来建议近日应结束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附件的审议工作。有关贸易条约的下一步工作(具体订货数量、价格及其他)，中方将责成贸易部长^[155]负责，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后，他将与一组中国专家留在这里。

我们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问，在4—5天时间里能否结束贸易协议主要文件的讨论工作。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这一点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

周恩来又提出，是否应该把空运部队工作结算的议定书看成是航空

协定的附件。对这一问题我们解释说，这个议定书应看作是单独的，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同航空协定没有任何关系。

周恩来说，关于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有一些新的建议。因此他问，他能否会见科瓦廖夫同志。

双方商定，有关专家问题的讨论将通过外交部进行。

周恩来表示，如果这样，他将就此问题专写一封信给维辛斯基同志。

以前，毛泽东曾请求苏联政府向新疆省提供棉种和农业机具。周恩来指出，曾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同志写过信。斯大林同志把这一请求归入第二类问题。因为在新疆3月份将开始播种，因此最好不要迟于2月份收到上面提到的农业机具和棉种。

米高扬同志指出，必须要有关于棉种数量和农机具清单的具体申请。

周恩来问，可否以单独清单的形式递交这个申请单。

米高扬作了肯定的回答。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最近几天组织他们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博物馆等的愿望，这是考虑到代表团的回国日期预定在2月8—9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问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愿望和他拟定参观的具体项目。

我邀请周恩来共进早餐，并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

周恩来表示感谢，接受了共进早餐的邀请，至于是否看芭蕾舞剧，他应允以后告之。

经同A.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此报告。

A.维辛斯基

1950年2月3日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50-55

№16585 斯大林致刘少奇电：中共领导工作者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3日)

绝密

拜会刘少奇同志并转交下列回信：

“刘少奇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者代表团可以于2月份来莫斯科。有关代表团在苏联的费用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承担。

菲利波夫”

请证实已收到。

请电报告知已执行。

维辛斯基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19

№133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党务代表团访苏(1950年2月4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50年2月4日

第402项 关于中国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苏联的问题。

1.满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允许由4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来苏联访问，期限为3个月，以研究联共(布)在党务和

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2.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杰多夫同志(党务、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和波波夫同志(宣传鼓动部)，制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进行审批。

3.委托格里戈良同志和杰多夫同志，负责完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一起工作的计划。

4.委托联共(布)中央办公厅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的接待和服务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В.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9, л.89

№09077 克鲁季科夫致外交部报告：1949年美国的对华政策 [156] (1950年2月6日)

.....

他们(美国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他们决心给自己留下行动自由，在可逆转的事态进程中巧妙地进行机动。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代表在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区活动就是这种策略的反映。他们的任务是同新政权接触，研究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寻找其弱点，查明在新的条件下保证美国影响和颠覆民主力量的可能性。

正如资产阶级报刊和其他材料表明的，美国人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中国有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所以想恢复在中国的阵地。在强调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时，美国的中国专家们指出，“中国就是中国，与其他共产党员相比，中国共产党员更像中国人”。

.....除了了解新的经济形势和展开颠覆新政权的工作之外，司徒雷登和留在解放区的美国人还企图让人们相信，有通过施加经济压力保持自己经济阵地和对新制度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美国的实业界和国务院相信，不同美国进行贸易，任何中国政府也无法着手恢复中国经济。所以，新政权将被迫向美国人提供明显的优惠。

.....在以“经济合作”引诱民主政权方面，司徒雷登及其同伙没有成功。民主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对美国和一切外国资本没有表示丝毫的让步。这同中国人民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表示公开愤怒是一致的。因此，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伙相信了，他们不能指望他们的卑鄙伎俩和破坏活动在中国能迅速取得成效。

美国人现在明白了，新中国不打算在两个体系之间起缓冲作用，因此不可能把新中国拉入反动阵营以帮助国民党。所以司徒雷登提出自己的实验计划后回美国去了。

白皮书里有许多自我揭露的地方。企图以此恢复自己在沃尔斯特里特主人面前的荣誉，表明正是现在的美国当政者以较好的形式实现沃尔斯特里特在远东的目标——对于这一目标，美国各种集团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美国人)盼望中国从苏联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援助。例如.....乔治·凯南宣布，“在共产主义领袖还未碰到他们所必须解决的实际困难之前，这一共产主义的实验结果是不会清楚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否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吧”。

.....

美国决定千方百计对中国恢复经济制造困难。按照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国民党同美国人勾结封锁海岸。而且美国人通过限制贸易，给贸易制造困难，使封锁变得更有效。即使解除封锁之后，中国所需物资也不能从美国和马歇尔化的国家运往中国。比如，现在正为从西德购买铁路设备设置障碍，这些设备是当年国民党当局的订货。1949年中期，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因为形势表明，美国对中国设置阻力的前景并不乐观。

美国间谍机构也没有放弃把中国共产党拉上铁托道路的幻想，它为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是煽动中共、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正如李克农对罗申同志说的，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竭尽全力破坏中苏友谊，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挑衅性地把苏中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财物，败坏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名声。

.....白皮书、杜鲁门和艾奇逊1950年1月5日关于台湾的声明、艾奇逊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以及美国人的其他宣言和行动表明，现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所有可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促使拖延国内战争，支持国民党残余力量，首先是台湾的力量；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封锁中国，给中国经济制造困难。

支持反动势力，在中国内部建立美国的第五纵队。

对中国建立敌对包围圈，同时，这一包围圈应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对东南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柱。

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K.克鲁季科夫

АВРФ, ф.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83-103

№09848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苏事宜(1950年2月6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第53号

绝密

当地时间下午4时，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府邸拜会了他，并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电报：

“刘少奇同志，鉴于您的请求，中共代表团可于2月抵莫斯科。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费用由联共(布)中央承担。”

刘少奇同志要我转告莫斯科，他对这一决定深表谢意，同时他通知说，中共代表团一行42—45人，将于2月15日从北京启程。代表团名单他另通过中国外交部告我。

然后刘少奇给我讲了以下事情：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把日本战犯裕仁等人交付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提案，并且将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照会全文公布在自己的报刊上，同时动员舆论支持这一照会。

刘少奇说，他已指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起草中国政府的答复照会，以支持苏联政府的提案。中国政府打算把自己的答复照会递交苏联和英国政府。由于美国 and 法国还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故答复照会将通过英国政府转交。 [157]

刘少奇请我帮助中国外交部起草答复照会，因为中国外交部还没有经验，还未拟定过类似的文件。

二、今天，他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莫斯科谈判的过程，并通报他，2月11—12日将签署6个谈判结果文件，这些文件毛泽东将另外电告刘少奇。

谈话未了，刘少奇感谢我给他的波尔若米矿泉水(100瓶只剩52瓶没碎)。他说，他一天喝两瓶，已经产生疗效，食欲比以前增加了。

会谈持续30分钟。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И.史白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60-61

№24797 加里宁致冯文彬函：转交苏联的体育资料 (1950年2月9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158]：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体育委员会国际体育交流部现向你们发送一些有关各种体育运动的资料。如果这批资料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运动有所帮助，我们将非常高兴。

借此机会，请求您，主席先生，接受我对您深深的敬意。

苏联体育委员会国际体育交流部代理部长H.加里宁

1950年2月9日

附：

向中国发送的体育资料的清单：[\[159\]](#)

М.Ф.伊万尼茨基教授：《人体解剖学》，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体育爱好者指南》，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49年；

М.Д.托瓦洛夫斯基：《足球》，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举重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网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体操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传统摔跤和自由摔跤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桑勃式摔跤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手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П.М.采特林：《篮球》，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游泳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Г.马祖罗夫：《跳水》，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Н.М.萨尔基佐夫谢拉季尼：《体育锻炼》，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1947年体育年鉴》，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医疗检查问题》，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体育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体育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В.С.杰尼索夫：《拳击》，体育运动出版社，1949年；

《摩托车运动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篮球竞赛规则》，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普罗塔耶夫和尤任：《登山运动》，体育运动出版社，1947年；

阿列克谢·马列因诺夫：《山地滑雪运动》，体育运动出版社，1948年；

关于体育运动的一套招贴画。

ГАРФ, ф.Р7576, оп.2, д.527, л.2-3

№09849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共党务代表团访 苏事宜(1950年2月11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城里住所拜会了他并通知他，2月16日在奥特波尔车站，为前往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提供两节卧铺车厢，并有一名同志陪同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时我还告诉刘少奇，金(Дин)和陪伴他的人已于2月9日提前到达莫斯科。

刘少奇对向他提供情况和为代表团提供卧铺车厢表示感谢，但请求如有可能最好把卧铺车开到满洲里，以免代表团换两次车。他答应将下达指示允许车厢通过边界。刘少奇讲，代表团将于2月15日从北京启程，2月17日抵达满洲里。

然后我通报刘少奇，今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刘少奇的名义请求我用飞机把一份文件紧急送到莫斯科，以便在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前把文件送到他手上。我解释说，从北京到苏联只有2月13日有航班，我指出，如果文件万分紧急，我可同莫斯科联系，请求派专机运送文件。

刘少奇对我们的关心表示了感谢，并说，如果2月13日从北京到苏联的飞机能捎走文件，那完全可以。刘少奇接下来说，这份文件是印度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全文(关于这篇文章我已电告苏联外交部，见今年2月6日第212号电报)。刘少奇说，通过仔细地研究这篇文章，他认为，印度共产党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党内有“左”的倾向，这可能导致党的覆没。印度共产党走的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它奉行的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冒险主义的任务。刘少奇同志估计，在毛泽东收到这篇文章之后，可能要同斯大林同志商量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按刘少奇的话讲，他将把这篇文章的实质电告毛泽东。 [160]

我答应刘少奇，2月13日将用飞机把文章带走。

会谈持续了20分钟。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И.史白夫

No00611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报告：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1950年2月12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一、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

二、周恩来说，最好是贸易协定同所有文件一起同时签字。

我们回答，这将取决于中方。

关于申请单，米高扬同志说，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申请单。同时，在申请单上有这样一些机械和设备，比如轧钢机、蒸汽涡轮机等，中方希望在1950年得到这些机械和设备。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就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专家们正在确定生产这种设备的时间和可能性，在近期内，我们就可以告之，在什么期限内可以提供什么设备。

关于价格问题，中方显然是不熟悉情况的。根据外贸部的资料，一

些价格是不符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外贸部拥有国际市场所有价格的全部资料，并可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代表团来得及了解这些材料，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就可以更快地得到研究。

周恩来回答，如果对申请单的研究要推迟，那么最好是能先签署贸易协定。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委托贸易部长和其他专家们进行审议。

米高扬同志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提交中方进行审议。

三、周恩来接着说，他认为航空协定草案已经达成了协议。

四、周恩来说，他希望确切弄清楚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该条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米高扬同志和我都进一步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自然，这是通过苏联政府进行的。

然后周恩来又说，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同志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

周恩来问，这个协议是否涉及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师和伊万诺夫专家组)？

我回答：根据对协议的理解，它包括各类专家。

周恩来问，可不可以标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我们解释说，在同中国的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1年，但有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周恩来答应将把他们对这一草案的修改稿通知我们。

五、周恩来说，中方希望准备签字的文件最好能在2月14日或者2月18日签字，因为从2月16日开始是我们中国的新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将有3天不出版报纸。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贸易合同草案准备好了，也应该在2月18日签署。

双方商定，日期问题通过大使再进一步协商。

六、接着，周恩来转而谈到2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问题。他问，他们能否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同时，周恩来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出席全体招待会，那么，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全体招待会前能参观中国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恳请将这一请求转告斯大林同志。

我们答应一定做到。

七、周恩来请求尽快开始同新疆代表团进行谈判。

米高扬同志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代表的主动性。

周恩来说，中方请求葛罗米柯同志明天同中方代表会面。

我们同意。

经与A.И.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会谈纪要。

A.维辛斯基

1950年2月1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附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障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 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00612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股份公司和专家报酬等(1950年2月12日)

摘自H.罗申的工作日记

绝密

2月12日早上4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会晤。

一、就与新疆省代表的会晤问题周恩来通报说，中国一方准备于2月12日17时与葛罗米柯会晤。中国一方出席的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C.阿济佐夫 [16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新疆的全权代表邓力群和中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

二、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苏联一方把在东北的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应该以下列形式进行：

两国政府间必须签署一份苏联向中国政府移交财产的简要协定。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其形式类似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协定中规定的联合委员会，以便移交财产。

为了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双方共同经营，协定中应该规定一项，中国政府将移交部分财产。

企业的具体名单目前苏联一方或是中国一方都无法确定，这必须委托给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待其工作结束后再把有关情况向双方政府汇报。

周恩来提出要求，由苏联外交部起草上述协定草案，并于2月12日转递给中国大使馆。

三、周恩来请求我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下列情况：

关于不容许各种外国公司和机构在东北和新疆境内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出，如何处理目前住在东北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住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的、巴基斯坦的)。周恩来说：“我们考虑，我们将以各种税收逐渐排挤住在东北和新疆的商人，目的是让他们紧缩自己的活动。对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将迫使他们迁走，察觉到那些进行侦察活动的可疑分子我们将给予逮捕，而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将以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措施与其斗争。比较难对付的是那些住在新疆南部的畜牧者，但是对这些人我们将逐步迫使他们迁走。我要求苏联一方的代表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请于与我们会晤时表达一下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四、周恩来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两位同志转达，他与他们会晤之后回到住处，又再次仔细思考协定第4项，关于专家的报酬问题，并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苏联专家的报酬预先规定作为补偿企业的亏损，按月每位2000—4000卢布，而用美金支付给苏联政府，这将使中国政府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着重指出，每位苏联专家的价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每月将花费1万斤小米，那时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副主席每月的报酬只有3400斤小米，而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补偿亏损将以提供各种原料和商品的方式进行，对中国一方而言将比用美金结算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联一方将注意到这些情况。此外，我们要求让我们大致计算一下每位专家的价值，并计算用美金结算报酬和用各种原料基于卢布的价值，采取以任何一种商品的国际价格来结算报酬。”

五、接着周恩来同志要求转达，2月14日18时签订文件是最合适的日子和时间。在上述日期签订已准备好的文件之后，中国一方有可能于14日在北京通过广播发布简要公报、文件等。而2月15日可能将在全中国的报纸上全部给予刊登，2月16日在中国开始农历新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庆祝新年。在华北庆祝活动将持续三天；至于华中和华南，那里这种庆祝活动将持续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忙于各种庆祝活动，忙于履行各种传统仪式。因此他们再次要求苏联一方能配合他们。

H.罗申(签名)

№00613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和内容等(1950年2月13日)

摘自A.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互致问候后，双方对共同议题就下列内容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说，根据他与毛泽东取得的一致意见，将在莫斯科签订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协定应该公布。同时周恩来补充说，通商协定、航空航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开采石油和有色金属协定不能签订，是由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在某些方面要求有更详细的说明和取得一致意见。

周恩来声称，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的汉语文本将被送往北京，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而且，如果某些签订的协定没有公布，那必须向政务院作专门解说。周恩来着重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公布全部签订的协定既是为中苏的利益，也是为了所有民主国家的利益，因为这里也将提高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威望。”

我对周恩来说，虽然他叙述的意图表达得相当清楚，但是双方尚未就公布全部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任何一个文件的问题必须讨论。这个问题我必须报告苏联政府。关于苏联政府的决议我会及时通知周恩来的。

会谈进行了30分钟，出席会谈的有：葛罗米柯、费德林和王稼祥。

A.维辛斯基

ABПPФ , ф.0100 , оп.43 , п.302 , д.8 , л.18-19

ABПPФ , ф.07 , оп.23a , п.18 , д.234 , л.75-76

№07355 维辛斯基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中苏条约签约程序等(1950年2月13日)

摘自A.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绝密

互致问候以及对议题作简短交谈之后就下列内容进行了会谈：

王稼祥说，周恩来委托他弄清楚签约的程序，因为这种签约仪式是他生平第一次。

我告诉王稼祥签约程序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并向他讲述了我们签订类似文件的现行制度。

提到准备签订的条约与协定时，王稼祥说，周恩来对另外几个文件，就是通商协定与航空协定有顾虑。还有，在新疆开采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协定，中国一方在2月14日前不可能准备好，因为这些协定在有些方面要求有更详细的说明。

我说，如果这些文件尚未准备好签订，看来只能局限于草签。

王稼祥同意这样做。

会谈进行了20分钟。

出席会谈的还有И.Ф.库尔久科夫。

A.维辛斯基

分送下列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第一远东司

1950年2月14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8, л.17

№24798 安德烈耶夫对中共文件《关于中国经济形势》 的评述(1950年2月13日)

机密

该报告是供内部使用的中共文件，其中包含了194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一些时间段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材料。

工业占中国国内经济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轻工业的比重高于重工业。在1935年，工业部门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占据5.5%，而消

费资料的生产占据94.5%。

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国有工业的比重达到60%。国有成分在煤炭工业中占70%，在铁矿石行业中占60%，钢铁行业中占90%，电力行业中占78%，电子设备行业中占36%，纺织业中占43%，水泥生产中占60%。所有的铁路都控制在国家手中。

农业具有私有小生产的性质。农业改革只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推行。在商品流通中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国外资本，主要是英美资本，保持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外国银行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上海的电站、电报局、电车都有国外资本，外国资本占据港口52%的仓库以及所有的石油业；英国在华北的开滦煤矿公司占据55%的投资，该公司开采的煤炭占据中国的14%；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都有英美的烟草公司，而且这些工厂占据上海烟草生产的三分之一，占据天津烟草生产的一半；上海和南方港口70%的对外商品流通是通过外国轮船运输的。中国还在其他一些国家发行债券，其中包括进行铁路建设的债券。

1949年中国工业的主要指数为：铁矿石开采将近50万吨(占战前产量的20%)；煤开采2800万吨(1942年是5500万吨)；生产铁15万吨(1943年生产18万吨)；生产钢10万吨(1943年生产90万吨)；纺织工业生产了450万锭；丝织业生产了15万锭。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在最近2—3年内使工业恢复到其历史的最高水平，并建设一般的机械制造厂和农业机械制造厂。

农业生产为1065.6万吨，也就是达到了战前农业生产的80%，基本满足国内居民的需求。棉花的总产量为1133万担，也就是战前产量的78%。为了满足纺织工业和居民的需求，尚需要467万担棉花(一担是59.6公斤 [162])。同1937年相比，牲畜的数量减少了36%。

战前的1943年，中国有26000公里的铁路。到1949年上半年末，恢复了16606公里的铁路网。

1949年7月，在中国解放区的水域有217艘船舶，吨位为138732吨。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船舶的总吨位为120万吨。大部分船舶都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

1949年上半年解放区的进出口总额将近8000万美元。进出口基本相当。

1949年的预算支出为20亿银元，而收入为15亿银元。赤字为5亿银元。1949年50%以上的开支用于军事需求(1948年用于军事上的开支占70%—89%)。用于工业恢复的开支开始增长，特别是用于东北和华北工业恢复的开支。预算中的巨大赤字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货膨胀。

C.安德烈耶夫

1950年2月13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407, л.51-53

№124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1950年2月1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15日

第9项 关于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9项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礼物的决议

1950年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赠送如下礼物：

向毛泽东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毛泽东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向周恩来赠送一辆吉斯110牌汽车作为专车；

赠给周恩来的夫人一件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大衣；

赠给陈伯达教授一套采用斑岩制作的书写用具；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刘亚楼将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政治秘书师哲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外交部秘书处处长赖亚力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重工业部技术顾问沈鸿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贸易部技术顾问肖荣泉(СяЛун□чуань)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局局长柴树藩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电业管理局局长程明升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鞍山钢铁工业公司副经理王勋(Ван Сюнь)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Не Чунь-юн)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煤炭局计划处处长罗伟(Лю Вэь)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陈燕清(Чэн Янь-цин)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毛泽东的副官汪东兴少将 [\[163\]](#) 一个金制烟盒；

赠给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叶子龙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周恩来的私人秘书何谦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翻译马列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译电员陈江新(Чен Цзян-син)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速记员陈邦臣(Чен Бан-чен)大衣料子和西服料子各一块；

赠给警卫人员李家珍(Ли Ця-цзе)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厨师耿树宾(Ген Шу-бин)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阿济佐夫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邓力群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军队的政工干部马寒冰一块带有金链的金表；

赠给农业银行行长胡萨因·穆拉托夫一个镶珐琅的银制烟盒；

赠给翻译陈锡华一块带有银链的银表。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作为对苏联部长会议预算的增补，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拨出用于支付本决议列举的那些礼品所必需的款项。

3. 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于1950年3月向苏联外交部拨出本决议第一条中指明的车辆，以便把这些车辆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4, 106-108

№139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转交印度共产党的资料(1950年2月15日)

斯大林同志：

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把译自中文的我所收到的刘少奇同志的两份电报的译本发给您。

至于我们用印度共产党的资料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我已吩咐王稼祥同志在收到小册子后把它译成俄文再转交给您。

致敬！

毛泽东(签名)

1950年2月15日

附件：

译自中文

刘少奇关于印度共产党的“左”倾路线错误所发电报 [\[164\]](#)

毛主席！

前不久，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1949年2—6月间印度共产党的材料。目前，这些材料已译成中文并被印成了小册子。今年2月13日，该小册子由乘机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外交信

使带给王稼祥，并由他转交给您。在看了这些材料以后，请您与斯大林同志交换一下意见，以便我们随后就该问题能够坚定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目前印度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是一条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该路线的拥护者们不但反对印度共产党自身内部的正确意见，而且还对所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路线，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进行指责。他们对印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估计不足，却对印度资产阶级反对印度资本主义的斗争过于强调。总之，他们既混淆了印度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混淆了印度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斗争策略方面，他们认为，推翻尼赫鲁政府只能采取全面罢工的方式，反对在印度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和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极端的、明显的“左”倾错误的表现，与我们党当年所犯的“左”倾错误如出一辙。

我认为，应当仔细研究这个材料，并必须对其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刘少奇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201、103-104

№16593 史白夫与刘少奇和李克农谈话纪要：中苏签约招待会(1950年2月15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3月7日

第58号

绝密

1950年2月15日刘少奇为庆祝签订中苏条约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我分别同刘少奇和李克农进行了交谈。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很关心在莫斯科哪座建筑里签订条约，签订时有谁参加。

李克农对我说，斯大林同志出席王稼祥大使的宴会说明了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特别友好和关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出席过其他国家大使的宴会。

李克农继而主动向我讲述，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在王稼祥的宴会上很快乐，但喝得不多，却一直以葛罗米柯比自己年轻得多为借口，让葛罗米柯同志喝酒。

交谈时间很短。大使馆礼宾处处长、三等秘书萨夫罗诺夫担任翻译。

附注：这些材料说，王稼祥大使显然极其详细地甚至连细节都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刘少奇知道2月15日(宴会后第二天)在王稼祥举办的宴会上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王稼祥那里了解这些情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П.史白夫(签名)

分送3份：葛罗米柯、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72-73

№05166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中苏关于贸易协定草案的谈判(1950年2月17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2月16日与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谈。

周说，他已仔细审阅了苏方的贸易协定草案，他认为，中方对基本问题没有反对意见。但是，还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和问题。

一、中方草案中，规定每4个月进行一次结算，而苏方草案中却规定6个月进行一次。

二、苏方草案第六条的最后一段没指明用货物偿还贷款，而中方草案中指明了这一点。

三、中方草案中(第七条)规定，贸易不仅可以在国家机关之间进行，还可以在两国的各种公司之间进行。苏方草案中却没有这一条。

听完周的话，我们回答说，以4个月的期限结算一次太不方便，按半年结算一次比较简单、方便，而且实际上已经过去2个月了，现在的问题是只剩下4个月，但这个问题关系不大。至于第六条，苏方草案中规定了用货物支付。

中方草案第七条的内容完全反映在苏方草案的第一条和第十条中。此外，苏方草案中“贸易团体”这一概念是很广泛的。

№24799 佩列韦尔泰洛致科舍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的工作(1950年2月22日)

致苏联总领事馆

А.И.科舍廖夫 [166] 同志：

我们期待您对我们11月11日的第1582号信件做出详细的答复，其中包括您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代表处在新的条件下的工作。

请通知我们，你们同报刊编辑部是怎样联系的，同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我们期待您最近能够把同你们有业务联系的报刊的性质、首先应当向它们发送什么样的材料、需要为它们提供哪些选题都通报给我们。在你们具体的通报中通常必须都要指出，是为哪些杂志提供文章。我们的计划是按季度制订的，因此，希望在计划制订之前能够得到通报，也就是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中旬提供通报。但是，在每季度提供通报的同时，不排除根据需要进行的事件提供日常例行的通报(业务上的通报)。

我们还必须了解，每月应当向你们发送的文章的数量是多少，要考虑的是，这些文章都能真正发表。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怎样处理我们现在通过黑尔系统 [167] 发送给你们的那批材料。从你们的答复判断，我们的文章和材料远不是都能发表。对于我们通过黑尔系统以及其他渠道发送的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发送给你们的这些从苏联中央报刊上摘选的文章和材料是否需要？

我们还非常需要了解的是，你们是否能够把发送给你们的材料向中国其他地区推广，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较为紧迫的材料(通过电报、航空邮件或者其他渠道邮寄的)，如果可以的话是以什么方法推广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新华社或者其他地方机构能否提供帮助。请通报一下，你们可以把什么样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送往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你们不能超出邮电开支的预算。

为了做好工作，提高发送给你们的文章的质量，我们必须得到各地对这些文章的反响和批评，其中包括得到中国报纸和机关的反响和批评。如果一些文章由于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而不能被采用的话，把这些文章通报给我们，并指出其主要的不足。比如，你们没有使用我们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的一些重要文章(梅利尼科夫：《苏联为统一的、热爱和平的、民主的德国而斗争》，12月17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德拉雅舍夫：《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是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样板》，12月22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梅利尼科夫：《和平拥护者的强大力量》，12月17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特列季亚科夫：《战后苏联工业的增长》，12月20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兹维亚金：《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2月1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德拉雅舍夫：《帝国主义者保加利亚的阴谋的破产》，12月6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弗拉索夫：《斯大林是苏联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12月9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克列缅季斯：《苏捷同盟条约六周年纪念》，12月12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罗戈夫：《南斯拉夫人民反对铁托叛徒集团的斗争》，12月13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恰普雷金：《罪恶阴谋的破产》，12月20日通过黑尔系统发送；等等)。这些文章没有被采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转交给你们的维辛斯基同志的发言以及苏斯洛夫《保卫和平，同战争贩子作斗争》的报告，我们也没有得到关于被采用的通知。

请你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详细的答复，并把你们关于我们在准备文章的时候应该予以考虑的所有想法都告诉我们。

对于你们在1949年12月10日的信件中提出的问题作如下通告：邮电费现在不可能调整，只能在预算的范围内使用；电报纸条和油墨早在1949年12月初就送给了你们；至于办公场所的维护以及购置家具的费用，这些开支也应当在实现这些目的的预算范围内。

苏联远东各加盟共和国新闻局报刊部主任

A.C.佩列韦尔泰洛

1950年2月22日

哈尔滨

ГАРФ, ф.Р8581, оп.1, д.430, л.29-31

№124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塔斯社北京总

社(1950年2月2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25日

第84项 关于设立塔斯社北京总社的问题。

- 1.把驻北京的塔斯社新闻记者站改组为塔斯社中国总社。
- 2.把驻上海和南京的塔斯社分社改组为塔斯社新闻记者站。
- 3.委托塔斯社驻北京总社负责：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莫斯科转送新闻；

(2)以集中的方式，通过中国的新闻机关新华社，用中文提供塔斯社关于国际和国内的情报信息；

(3)领导《时代》出版社的工作，允许将这个出版社从上海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保留其分支机构。

4.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编制委员会(库津同志)制定塔斯社北京总社以及塔斯社上海和南京新闻记者站的编制，以便使塔斯社在中国的这3个办事处的总人数不超过32人(其中苏联工作人员为12人，其余2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5.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在1950年上半年，给塔斯社拨出一台无线电发射机，以便通过无线电传向中国转送情报信息。

6.责成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在1950年第一季度内，向《时代》出版社提供200吨印刷用纸。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19

№124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一些新疆苏联公民的国籍(1950年2月26日)

1950年2月26日

第8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关于取消现新疆省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在新疆政府机关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下述苏联公民的苏联国籍的建议。这些人员是：赛福鼎·阿济佐夫 [168]、阿斯哈特·伊斯哈科夫、法捷伊·伊万诺维奇·列斯金、安瓦尔·汉巴巴耶夫、加宁·巴德尔、安瓦尔·贾库林、卡尤姆贝克·哈基姆贝科夫、雅库别克·哈桑巴耶夫、胡萨因·穆拉托夫、马德日特·肯金、卡马列特金·萨德科夫、阿布杜尔·扎基洛夫、阿布德拉赫曼·哈萨诺夫、努苏普汗·本巴耶夫、阿利姆占·哈基姆巴耶夫和安瓦尔·穆萨巴耶夫。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20

№124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将空难人员骨灰运回新疆(1950年2月26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2月26日

第94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一、允许从乌兰乌德 [169] (布里亚特—蒙古交界)把在1949年8月空难中牺牲的卡西莫夫·艾哈迈德、莫努诺夫·伊斯哈姆别克、苏古尔巴也夫·达列力汗、阿巴索夫·阿不都克里木、罗志、纳斯洛夫·乌斯满、伊敏诺夫·阿不都拉希特和克利莫夫·加尼的骨灰运送回新疆，运送所需费用由中国方面支付。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按照第一个问题的指示同新疆省政府进行谈判。

三、在达成协议后，委托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为运送骨灰提供单独车厢。

四、委托情报委员会(萨夫琴科同志)组织从乌兰乌德向新疆运送骨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1

№09117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对溥仪等人及其贵重物品处置意见 [170] (1950年3月3日)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维辛斯基同志：

1945年苏联部队在东北扣留了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与溥仪一起被扣留的还有他的8名家属和亲友、14名以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原伪满政府的部长、23名中国将军和12名外交部官员，共58人。

这些被扣留的人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集中营。

1946年5月10日溥仪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溥仪声明的译文，苏联内务部已于1946年6月12日呈报给您。

这些贵重物品(按“首饰、钟表、贵金属和宝石贸易经理部”1946年收购价格值47.3万卢布)以及属于原伪满政府部长和官员的贵重物品(按上述估价值47.6万卢布)现存苏联内务部。

上述物品包括金银制品(镯子、坠子、项链、戒指、表、餐具和茶具等)、珠宝、部分镶嵌有宝石的物品、珍珠和人造宝石制品。

苏联内务部建议妥善的处理办法是：

1.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把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情况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关心把这些人转交给中国政府；

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之后，立即把这58名被扣留的中国人，按所附名单连同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转交中国政府管辖。

请您批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1853—1854页

№124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闭驻北京的苏联

总领事馆(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7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如下建议：

1.把驻中国的苏联大使馆迁移到北京，关闭驻北京的苏联总领事馆。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愿望，决定在沈阳和广州开设苏联领事馆。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

№124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补偿在华苏联军士的开支(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80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对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队的军士，实行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决议为苏联专家规定的工资条件，以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按每名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士每月1500卢布支付给苏联政府，用于补偿上述指明的决议中的第二条规定的开支。

2.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队的士兵的全部生活费用，并补偿与往返旅途中(无论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有关的开支以及士兵应具备的行李的费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42

№200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米高扬的任命 (1950年3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7日

第159项 关于对外贸易部的问题。

任命米高扬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全权代表，确保完成向中国供应苏联设备的任务，并利用苏联给中国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任命缅希科夫同志为米高扬同志在这项工作上的助手。

РГАСПИ, ф.17, оп.3, д.1080, л.38

№07356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1950年3月8日)

摘自A.A.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第62号

绝密

接见了王稼祥，陪同他的有刘亚楼将军和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

王稼祥通报说，由于刘亚楼将军3月10日将返回中国，如果苏方不反对，航空协定将由他(王稼祥)签字。

我回答，谁将代表中国签署协定的事情应由中方决定。

话题转到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问题上，王稼祥问，我们是否同意中方缩短这个协定名称的建议，即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来替代我们的草案中的下列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派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

关、组织和企业工作及其支付条件的协定”。

我说，协定的原标题能更清楚地反映双方的义务。不过，我们将考虑王稼祥的建议，然后给予最终的答复。

王稼祥说，第三款的第二段，规定中国政府将补偿给苏联出差专家的费用，这一条款可理解为：这些费用，一种情况是补偿给苏联政府的，而另一种情况是支付给苏联专家本人的。

我指出，我们的支付给“苏联”的表述是包括以上这两种情况的。

王稼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文最好是用“补偿苏方”来代替“补偿给苏联”。

我回答说，我们坚持认为这是纯俄文的表达方式，而中方对这个表述进行翻译时要慎重处理。

接着，王稼祥说，对第四款他还有两个问题，根据这一条款，中国应每个月按每位专家1500—3000卢布支付给苏联政府。

因为这些支付是用卢布进行的，所以必须确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这些支付的资金储备。周恩来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莫斯科后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与米高扬同志谈话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因为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详细讨论。显然，支付专家的方式问题需要进行补充讨论。

王稼祥指出，中方打算通过出售大豆的途径来建立苏联的货币储备，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讨论这个建议。

我说，类似这样的建议是属于贸易谈判范围的。

王稼祥说，周恩来在与米高扬同志谈到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必要性时，指明了他们面临的3项任务：制定贷款双方结算的协定，解决贸易协定支付方面存在的问题，决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的支付方式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与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目前只讨论了第一个问题。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们说，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还

没有接到通知。因此，受政府的委托，他(王稼祥)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们下达指示，讨论苏联专家的支付问题以及就这个问题中方的有关建议。

我说，大使的这个请求，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答复后告。

根据协定，中国向苏联政府支付专家工作的费用，除此以外，还要支付给专家本人数目相当于相应的中国工作人员的工资，王稼祥注意到，这份工资不够专家养活自己在中国的人口很多的家庭。王稼祥强调说，中国政府很关心，专家们是否能将其家属带到中国，如果这样他们就会更长久、更好地工作。

王稼祥问，是否能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那部分(指补偿损失的那部分，1500—3000卢布)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王稼祥还说，一些苏联军事工作人员本人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修改。专家们将自己决定，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本人的收入情况，他们是否应该携带家属。

王稼祥又问，是否可以答复他以前提出的关于军士和普通士兵的工资支付问题。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说，按照支付条件我们准备把军士的工资提高到同低级专家一样，即作为补偿损失每月支付1500卢布。我们甚至赞同，对于普通的士兵，中方也应支付他们的实际生活费用，而这笔费用不能算在应该补偿他们的差旅费之中。

王稼祥说，苏联顾问中军士的数量占大部分，这样，支付军士的将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按照王稼祥的意见，给教师和技术专家的支付与给军士的支付有些不相称。王稼祥确认，军士在苏联只能收入500—600卢布，因此，是不应该把规定给其他专家的条件扩展到这部分军人身上。王稼祥还说，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1500卢布的标准太高了。

我说，这个数字的确定考虑到了很多因素，而我们的立场又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

王稼祥问，是否应该转而讨论苏联军事专家来中国工作的具体条件，其中包括军士和士兵，因为主管这个问题的刘亚楼将军将要离开莫

斯科了。王稼祥还暗示，他希望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

我答复说，我没有被授权对这个问题表示同意，并再一次重申了我们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条件，且列举了这些条件的依据。

王稼祥允诺向自己的政府汇报我们关于支付军事专家问题的意见。

王稼祥还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胡志明的请求，即中国大使馆可以暂时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而持何种意见。

我回答说，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王稼祥通报说，对于在新疆建立苏中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方将在近一两天内作出答复。

指出这个答复已拖延了很久后，我表示希望尽快得到答复。同时，我还指出，这种长时间的拖延破坏了我们1950年的计划。

出席会谈的还有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代理副司长库尔久科夫同志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 葛罗米柯

打印16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古谢夫、拉夫连季耶夫等同志，总秘书处，第一远东司，档案室(3份)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8, л.36-40

№09118 外交部和内务部呈斯大林请示：对溥仪等人及其物品的处置意见 [\[171\]](#) (1950年3月9日)

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内务部集中营关押的人当中有被扣留的原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的家属和亲友，原伪满政府部长，中国将军和伪满政府外交官员，共58人。

苏联内务部保存着溥仪及其随员的个人贵重物品，主要是珠宝、金银、首饰制品，根据1946年“首饰、钟表、贵金属和宝石贸易经理部”的收购价格，价值94.9万卢布。

上述情况，苏联内务部已于1950年3月3日向您报告过。(第826CC/K号)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妥善的处理办法是，把上述人员和属于他们个人的贵重物品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置。

附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请您批准。

A.维辛斯基、C.克鲁格洛夫

1950年3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0年3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把处于苏联的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随员，原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58人，在中国政府同意接收上述人员的情况下，按所附名单，根据协商之后的程序和期限，交中国当局处理。

在交接上述人员时，同时把在苏联内务部保管的溥仪及其下属人员的贵重物品交给中国当局。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在确定了把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员及其财物移交中国当局的程序和期限之后，实施这一移交。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8卷，第1881—1883页

№09851 史白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苏中合营公司 协定(1950年3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4号

绝密

1950年3月9日23时30分，我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府邸拜会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8日第187号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事情：3月2日，中国大使王稼祥在外交部就成立联合公司开采新疆金属和石油问题举行会谈时通报说，他期待你们(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沈阳给他下达训令，指望3月3—4日能收到训令。王稼祥至今还未通报中国政府关于把上述协定草案交给他的答复。

我接下来说，我们请尽快给予答复，否则我们1950年的计划将因此事耽搁而受到破坏。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研究了这个问题，3月8日已给莫斯科王稼祥发去相应的指示。同意协定草案，其中只作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毛泽东表示抱歉，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耽误了一些时间。他风趣地补充说，这样，维辛斯基同志对顺利完成苏联工业“五年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对于我祝贺他顺利归来和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表示了谢意，感谢他在苏联期间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他说，他现在很健康，比去苏联之前的感觉好多了。

会谈持续了15分钟。出席会谈的还有周恩来、朱德。我方出席会议并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No09852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台湾驻日使团等问题(1950年3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1号

绝密

我到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府邸拜会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8日第186号指示向他通报了以下事宜：据从我驻日本东京代表那里得到的消息，朱世明认为，在进步分子，尤其是中间阶层和年轻人的支持下，近几个月在改变使团氛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朱世明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可采取决定性步骤的阶段。朱世明认为，在台湾政府还未对他施加压力之前，他可采取中立立场。

朱世明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将尽全力在现在的岗位上留下来，一直到不需要时为止。但他个人倾向于，一旦有离去的可能性，他便立即离去。他想在获得新的任命之前，首先去北京。

接下来，为执行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9日第189—193号指示，我对周恩来通报说，朱世明通过我驻东京代表给他(周恩来)转来一封信。我补充说，在从东京收到该信之后将把信的全文转交周恩来，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朱世明同野坂和其他人商量之后的计划是：其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到达日本之前继续占据现有的岗位(集体的和个人的)；其二，在采取坚决、公开的行动之前，把他们从事秘密工作被暴露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信中指出，朱世明及其小组的基本思想是，为发表公开声明和真正实现顺利地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边，选择最佳时机。

二、万一朱世明小组没有及时行动，考虑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按照朱世明的看法，可能出现以下事情：

(一)实际上无法重新任命人员以占据相关职位和完成相应的任务；

(二)立即任命反动小组的代表；

(三)使团里出现内部分裂和公开冲突，这必将导致麦克阿瑟以武力干涉。如果需要这样干的话，最不好的结果是被强行驱逐出境。最先出现的后果将是秘密计划暴露，使地下工作者失去至今为止所受到的庇护。

三、朱世明写道，直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不能过早地采取行动。所谓有利条件，他指的是在安理会和远东委员会取得席位，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承认以及解放台湾。

朱世明同时指出，如果在上述事件出现之前采取预计的行动，他们不能保障立即取得成功。

四、朱世明建议，在期限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之后，作为预先步骤，应正式声明，重新任命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成员及所有顾问。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不久从北京向日本派去一名这样的秘密代表，他有权担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副手的职位，还应授予这位代表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建立代表团机构和改组外交使团的权力。

朱世明建议以密令形式特别提醒这位代表注意：

(一)现有全体人员，平民也好，军队也好，包括以前各个部派来的临时人员(反动分子和变节分子除外)以及同秘密勤务有关的人员，都应得到一定期限的重新任命。

(二)所有军警应该保留，应在新的使团里继续服役。

朱世明还建议，以密令规定为在日本的中国侨民提供保障，为在日本的大学生提供援助，为部分在日本的中国商人提供优惠和同大陆通商的机会，为在日本的各个政府代办处的职员提供在新政府里谋取职位的保证，如果他们坚决同台湾反动政权决裂的话(上述各种代办处指“中国银行”、“中国国家航空公司”、“中央新闻社”)。

五、朱世明在信中解释，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委员由国家元首任命，外交使团团长根据外交部长的推荐由总理任命。使团团长派驻麦克阿瑟那里，他的委派需事先征得麦克阿瑟的同意。朱世明还指出，中国

是唯一一个任命了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国家。目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王新琼(Ван Син-Чун)(日本问题专家)，朱世明请求在新的任命保留王的这一职务。

六、朱世明再次请求，希望在发表重新任命正式声明和他们发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的时间上，预先商定好。

了解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周恩来对我表示了感谢，他说，这封信有重要意义。他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准备予以答复，答复通过我们转告东京。

然后周恩来对我讲，最近，赖伊就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相应组织机构问题，对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发出呼吁，中国对此给予密切关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赖伊的呼吁、艾奇逊声明，美国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设置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他在莫斯科时，曾多次同维辛斯基讨论美国的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讲，今后中国外交部在这些问题上要征求维辛斯基同志的意见。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请我征求一下维辛斯基同志的意见，看赖伊和艾奇逊的讲话里面是否隐藏着什么鬼把戏，关于这些讲话，维辛斯基同志对中国外交部是否有什么建议。

我答应周恩来，立即把他们的请求报告给维辛斯基同志。

会谈持续45分钟。

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出席会谈并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92-96

№24801 苏联向中苏友协旅大分部转交的教材和文学作品清单(1950年3月16日)

我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和中苏友协旅顺大连地区分部副主席王勤(Ван Цюнь)签署了如下文件，由格鲁舍茨基转交如下材料，而王勤接受这些材料：

一、书籍和教材

1. М.С.伊赫捷依曼：《护士教程》第一册，1本
2. М.С.伊赫捷依曼：《护士教程》第二册，1本
3. А.Н.韦利克列茨基：《外科教程》，1本
4. 《鼻外科》，1本
5. Г.Ф.伊万诺夫：《人体解剖的标准和基础》，1本
6. А.М.久科夫教授：《传染病》，1本
7. А.З.索尔金：《骨结核》，1本
8. Л.Г.列卡列夫：《农村医疗区段》，1本
9. С.Я.弗赖德林：《医疗保健站工作的组织》，1本
10. А.Г.卡普拉洛夫：《护理员基本知识》，1本
11. Г.В.舍列伊霍夫斯基：《南方城市的小气候》，1本
12. 《工业污水》，1本
13. А.А.波洛温金：《自然地理概况》(供大学教师使用的教材)，10本
14. Г.И.伊万诺夫、А.С.多布罗夫：《世界地理》(供7年制6年级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15. И.А.维特韦尔：《国外经济地理学》(供中学9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9本
16. Н.Н.巴兰斯基：《苏联的经济地理学》(供中学8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8本

17.C.B.切夫拉诺夫：《苏联地理》(供7年制7年级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教材)，9本

18.A.C.巴尔科夫、A.A.波洛温金：《自然地理学》(供中学5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19.H.E.维特科维奇：《地理学》(供初级中学4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10本

20.《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6本

21.C.И.达斯卡罗夫：《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共和国》，1本

22.B.A.杰格佳廖夫：《我的生平》，1本

23.马丁·安德森·涅科谢：《小说精选》，1本

24.米哈伊尔·科奇耶夫：《桦树的主人》，1本

25.A.И.库普林：《短篇小说集》，3本

26.M.伊林：《新边区》，3本

27.彼得·科马罗夫：《诗歌选集》，3本

二、乐谱

1.A.B.亚历山德罗夫：《斯大林颂》(供大管乐队使用)，4份

2.A.B.亚历山德罗夫和M.伊纽什金：《斯大林颂》(供混合唱、俄罗斯民间乐队使用)，1份

3.A.哈恰图良、民间诗人米尔扎和塔乌兹：《斯大林史诗》(供大型交响乐队和混合演唱团使用)，1份

4.瓦诺·穆拉德里、A.苏尔科夫：《斯大林的意志引导我们》(男中音歌曲、混合合唱)，4份

5.B.Л.扎哈罗夫、M.伊萨科夫斯基：《祝福斯大林》，4份

三、文章

- 1.Д.别列尼卡娅：《苏联的急救站》，1份
- 2.《欢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现》，1份
- 3.Ф.马卡连科夫：《苏联在培育新的畜牧品种上取得的成就》，1份
- 4.В.亚历山德罗娃：《帕博罗·聂鲁达在苏联》(6张照片)，1份
- 5.И.切布舍夫：《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水利设施》，1份
- 6.А.兹古里季：《苏联的电影科学和教学》，1份
- 7.Н.亚特诺：《对孩子进行艺术教育的中央艺术宫》(5张照片)，1份
- 8.В.苏林：《各民族国家的电影业》，1份
- 9.А.尼基福罗夫：《列宁和斯大林论民族自决权：纪念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1份
- 10.彼得·奥尔洛夫：《以斯大林的名义》，1份
- 11.А.阿拉克良：《苏联的社会所有制》，1份
- 12.Н.帕申：《繁荣的乌克兰苏维埃艺术》，1份
- 13.《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第12期)，1份
- 14.《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公报》，1949年第58期(英语)，43份

转交人：格鲁舍茨基

接收人：王勤

1950年3月16日

大连市

№124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1.认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关于确定无线电广播短波的会议是适宜的。

2.批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С.Н.斯托亚诺夫(代表团团长)、В.И.西福罗夫、В.Ф.热列佐娃、Н.И.戈卢别夫、Б.М.希姆萨、А.А.戈尔布诺夫、Г.М.乌斯片斯基、С.С.米哈伊洛夫(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赞)。

3.批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见附件 [\[172\]](#))。

4.委托苏联代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声明，声明从大会的组成中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同时还要指出：否则，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会议的工作，苏联将拒绝承认会议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合法的。

5.在会议清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之前，苏联代表团不应该参加会议的工作。

6.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向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通报苏联对于这次会议的态度。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56

№124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国驻苏使馆代表越南利益(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6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可代表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56

№124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德日战俘问题 (1950年3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17日

第257项 关于德国和日本战俘的问题。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德国和日本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塔斯社关于遣返战俘工作结束的通报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257项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第4号附件

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原日本军队战俘(将军)的名单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军 衔
1	原弘志	1894 年	中將①
2	佐佐木到一	1886 年	中將
3	栗藤美夫	1890 年	少將
4	盐津辰巳	1893 年	少將
5	上坂胜	1892 年	少將
6	铃木启久	1890 年	中將
7	岸信雄一	1888 年	中將
8	佐佐真之助	1893 年	中將
9	下枝龙男	1892 年	少將
10	渊谷启	1889 年	中將

①原文如此。经查，原弘志，伪满铁路警备队参谋长，军衔为少将。——编注

续表

序 号	姓 名	出 生	军 衔
11	有藤多罗尾	1890 年	少將
12	长岛勋	1888 年	少將
13	藤田茂	1889 年	中將
14	佐古龙佑	1892 年	少將
15	武部六藏	1893 年	伪满洲国总务大臣
16	古海忠之	1900 年	伪满洲国总务署庶务助理
17	饭盛重任	1906 年	长春高等法院法官

草案

塔斯社关于结束从苏联遣返日本战俘工作的通报

1949年5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的声明通报说，临近1949年5月，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已经被从苏联遣返回日本，除了因为犯有战争罪行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之外，剩余的95000名战俘应该在1949年内遣返完毕。

塔斯社被授权通报，目前，苏联机关已经结束了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在1949年5月20日声明中提到的那些日本战俘的遣返工作。1487名日本战俘、被判决有罪的人和因为犯有战争罪行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没有被遣返，6名日本战俘应该在结束治疗后被遣返回国，还有971名日本战俘因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将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处理。

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向日本遣返了总共510417名战俘，这个数字不包括在军事行动地区当场释放的70880名战俘。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56、189、191

№09850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召开电信联盟 国际会议(1950年3月18日)

1950年4月3日

第97号

绝密

在武官科托夫将军举行的使馆招待会上，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今年3月14日第205号和17日第211号)我向周恩来通报，4月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无线电广播各国短波划分的国际行政代表会议。受国际电信联盟的委托，意大利政府已发出请柬。我指出，据我们的情报，国民党分子想参加这次会议，我想知道周恩来如何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回答说， he 已从李克农那里听说了这次会议(见我同李克农1950年3月15日的会谈记录)，并决定这样做：

一、如果会议属于联合国组织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政府则要求驱逐国民党分子而任命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

二、如果会议不属于联合国组织的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只要求驱逐国民党分子，而不派出自己的代表。

但周恩来这时又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维辛斯基同志建议中国派出代表，那么他们就这样做。

我答应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苏联外交部。

会议持续10分钟。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78-79

№09853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出席电信联盟

国际会议(1950年3月20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8号

绝密

今年3月20日18时，我到中南海周恩来府邸拜访了他，并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14日的第207号指示向他简要通报了维辛斯基对周恩来所问关于赖伊声明一事的答复。

周恩来感谢对他的通报。

然后，根据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19日的第218号指示，我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任命自己出席4月1日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无线电广播短波分配会议的代表是适宜的。

已委托苏联的会议代表在会议召开时发表关于开除蒋介石集团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声明，并指出如不这样，苏联将不参加会议工作。没有苏联参加，苏联将不承认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在从会议上驱逐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会议工作。

听了这一消息，周恩来说，他将同毛泽东商量他们出席佛罗伦萨会议代表的人选，他们要求以自己的代表取代国民党的代表，过两三天就通知我出席会议的人选名单。周恩来同时指出，他们只提出出席会议的人选姓名，但其人并不实际出席会议，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合适人选，另一方面现在派代表显然已经晚了。

周恩来请求我帮助迅速查明，短波分配会议同联合国有什么关系；他应该给谁写信，以抗议国民党代表出席会议且要求任命自己的代表。

我答应周恩来帮助查清此事，然后通知他。

在以后的会谈过程中，周恩来主动给我讲了以下事情：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经结束了与在北京的印度代表——印度驻中国临时代办雁谒森的谈判。今天中国外交部已正式表示同意潘尼迦(原印度驻国民党南京大使)为印度驻华大使。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通知印度政府，任命袁仲贤为中国驻印大使。周恩来风趣地指出，英国将不大同意这一任命，因为袁仲贤以前在浙江前线 [173] 指挥时曾击伤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中方同英国人为此举行过谈判。

二、在北京的原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胡阶森，现在是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代办，他是一个很不友好又很狡猾的人。他不是外交人员，而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代表。

按照周恩来的话说，原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未必会重回中国。周恩来认为，现在英国人不会把有阅历的外交人员(史蒂文森属老学派)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会派大批有经验的情报人员来。周恩来认为，将会任命现在的英国外交部远东局局长出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名有经验的情报人员。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通金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75-77

№11416 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

..... [174]

三、某些企业家和商家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天津毛呢纺织公司经理宋秉卿、面粉公司经理孙运茹(СуньЮн□жу)等认为，中苏条约对中国人民非常有利，但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他们说，条约将加快中国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发展得越快，私人资本的前途就越渺茫。那些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的进出口商人首先对贸易问题感到不安。例如，隋绍京(СыШао□тин)企图到处打听政府是否允许私人商家同苏联做生意。毕明齐(БиМин□ци)认为，

将不会允许个体商人同苏联做生意，但是为了积存外汇，政府大概在今后加强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他非常担忧的是，政府将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华侨中的某些投机商，如在菲律宾的郑群璧(ЧжэнЧун-би)说，政府的政策向一个方向倾斜是不明智的。他们担心今后个体商人无前途。

四、对条约本身怀疑或不满。

(一)关于旅顺、大连问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在上海，有些人认为，既然旅顺和大连实际上属于中国并应公正地还给中国，那么就应该表示某种感谢。其次，协议条款规定，中国应向苏联提供补偿1950年之后旅顺设施的建筑费用，但如果补偿的数额巨大，难道不是等于赎回旅顺？

在福州，某些人认为，延期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同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相矛盾的。有些人认为，有关1952年年底归还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条款，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种宣传，因为过2—3年之后还不知道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一部分教授、华侨和民主人士当时也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条约中解决大连问题和解决旅顺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而且条约对这种方法作了明显的强调。他们预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个令人担心的秘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条款，部分民主人士，其中包括刘叔模、陈序经等人都说，这是涉及民族感情的问题，会给人留下不悦的感觉。部分归国华侨也表示怀疑：西藏和新疆会不会以蒙古模式宣布独立呢？

(二)关于援华设备问题。

上海工商界询问，如果现在许多现有企业都不开工，那么运来的机器又怎么使用？另外，买机器的贷款还要用粮食去偿还，这也许会导致中国严重缺粮。邵力子还对把粮食运往苏联的条款表示不满。一些在中国的英国侨民和印度侨民企图贬低向中国提供工业设备带来的好处。英国人乔斯(上海海关关税司司长)声称，设备援助是“远水救近火”。印度的一位侨民声称，苏联援助中国的设备是从东北运来的。国民党特务也在散布类似的谣言。

(三)关于贷款问题。

数额太少：上海、天津和北京都有很多关于贷款数额太少的反应，

用于战后恢复而提供无偿援助的贷款也太少，更不用说搞建设了。据有关消息，早在条约公布之前就在上海工商界传出消息说，毛泽东要30亿美元，而斯大林只给3亿美元，对此双方都不满意。当公布的条约中贷款数额正好与3亿相符合时，上海的人士对有关贷款的传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利息高：上海金融界认为，年息1%，是相当高的利率，贷款绝不是按优惠条件提供的。西安有些人说，苏联贷款的年息超过外国提供给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贷款的年息。天津金属制品企业的一家厂长问，如果苏联是在帮助中国，那么为什么它还要规定利息？（注：国民党外债的年息为5%—7%，纽约国际银行贷款的年息都超过苏联贷款的好多倍。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意见，是因为以前按另外的方式计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错误地把1%当成10%。）

不应该用美元计算贷款：许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为什么现在用美元计算贷款。福州的某些工商界人士和南开大学的一些教授得出结论说，苏联认为美国货币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所以才以美元计算贷款。天津的进出口商人们说，这样使苏联“丢面子”，他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坚持这样做的，显然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上海有些人认为，这会损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驻在上海的美国人则认为，1盎司黄金按35美元结算是公正的。天津、青岛和上海的某些人士认为，这样的结算是公正的，因为1盎司美国黄金值50美元。如果苏联要求用黄金替代原料，那中国就要受损失。

五、反动分子的谣言。

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部分商人听了“美国之音”和国民党电台的无线电广播后，有意无意地也散布了一些谣言。条约公布后，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谣言的制造者们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苏联吞并新疆和东北”、“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国民党特务甚至还利用条约公布当天上海、汉口等一些城市的报纸未能及时报道一事制造谣言。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犹太商人异口同声地制造惊慌的战争气氛。某些商人和国民党的旧官员在武汉和北京散布国民党广播电台播发的谣言，比如：“轰炸远东地区最大的、美国在上海的发电厂是与美国开始战争的信号，而且，如果

共产党人不离开，那么人民的财产安全就没有任何保障”，“美国和英国在两周之内可以结束战争，它们将全面使用原子武器作战，将有2000万人牺牲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阵营的高层人士在自己的挑拨性宣传中运用了最为狡猾的手腕。美国驻香港大使馆法律参赞何一俊(ХэйИ Цзюнь, 燕京大学前秘书)表示，从条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的困难而不敢担负苏联向他提出的领导远东和东南亚国家革命运动的国际任务。因此在今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应依靠自己的力量。香港政府政治顾问斯密特在称赞条约的平等互利精神的同时指出，“毛泽东在解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问题中并没有放弃民族立场”。

(苏共中央情报部1950年3月20日提供的第54号文件)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30—135页

№124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确保共同管理中长铁路(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2日

第274项 关于确保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协同苏联交通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确保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274项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确保

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决议

第____号

1950年3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950年2月14日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并以双边议定书的形式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1) 关于自1950年4月15日起，恢复对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管理的问题。

(2) 关于铁路局、铁路董事会和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中苏之间的分配问题，其方法如下：在第一阶段中，董事会主席应该由中国代表担任，铁路局局长由苏联代表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由苏联代表担任，总监察员由中国代表担任。

自铁路恢复共同管理之时起，一年之后，双方代表应该轮流担任上述领导职务。

(3) 关于中方应在1950年4月1日前，选举出董事会成员和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铁路局副局长和总监察员职务候选人员的问题。

(4) 关于就中长铁路股份公司的章程和铁路财产的组成进行谈判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到，不晚于1950年5月1日完成对铁路股份公司的章程和铁路财产的组成、周转资金以及铁路干部的审核工作。

(5)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在与中国铁路同样条件下的物资和技术保障问题；关于中长铁路的修复和新建工程的拨款问题，其款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按中国政府审批的计划所进行的国家预算负担；关于免除为中长铁路所需而运入的货物的海关税和其他税收问题。

2. 赞成苏联交通部提交的《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和《中国长春铁路财产组成的提案》，并将其作为给参与中方谈判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责成中长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苏联代表，同中方进行关于股份公司的章程和股份公司财产组成问题的谈判。允许交通部长贝舍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商一致之后，在谈判过程中对上述指示的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

3. 责成苏联交通部(贝舍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商之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就关于签署中苏铁路交通协定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4. 批准由H.A. 格鲁尼切夫同志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的职务，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同时应A.Φ. 茹拉夫廖夫同志个人的请求，免去其铁路局局长的职务。

5. 批准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中，苏联方面的组成人员如下：

M.C. 叶罗戈夫担任董事会副主席，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

M.C. 涅斯捷罗夫担任董事会副主席助理；

A.И. 普里别金、И.В. 科兹洛夫、Д.П. 特万丘克担任董事会成员。

6. 批准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中，苏联方面的组成人员如下：

M.И. 古谢夫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50年起任期为一年；

H.M. 克拉奇科夫、Г.Н. 科列罗夫担任监察委员会委员。

7. 责成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于1950年3月前往哈尔滨市。

责成A.Я. 维辛斯基同志和Б.П. 贝舍夫同志，在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前往中国之前，向他们下达指示。

8. 允许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苏联国家新技术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协商之后，向哈尔滨市运送中长铁路工程所必需的

技术资料、技术文件和技术规章以及从莫斯科市和赤塔市调运出铁路具体工作所必备的中长铁路的档案材料。

9.责成苏联国家供应局拨出2台吉斯110牌、3台胜利牌和10台莫斯科人牌汽车，供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和中国长春铁路苏中股份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使用。

允许中国长春铁路苏联管理局，依靠现有的在沿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军备运输业务中所获得的收入(苏联货币)，支付购买和运送这些车辆的费用。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61、192-195

№124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签署苏中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第27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一、委托А.Я.维辛斯基同志代表苏联政府签署如下协定：

- 1.关于在新疆省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
- 2.关于在新疆省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 3.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协定。

以上协定见附件。

二、批准关于签署上述第1、2条指明的协定的通报草案。

三、所拟定的通报将在协定签订2—3日后予以发表。

附件一：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协定双方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所在地区组建苏中股份公司，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为“苏中金属公司”，中文缩写为“中苏金属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领土上从事寻找、勘探、采掘及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但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不适用于珍贵金属：黄金、银、铂。

这些贵重金属不属于以上预先规定的采掘对象，如果这些金属被伴随采掘出来的话，那么，将按照公正的补偿原则把这些金属转交给中方。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将按照现协定和公司章程从事经营活动，待本协定签署一个月期限内，公司将按照必要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注册。

第二条 公司初期经营活动的地界——供查找、地质勘探和爆破工作以及同采掘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相关的工程、厂房和建筑——在协定双方签署的地图上标明，地图附属于协定，是该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件 [175])。

本协定生效的最初5年时间里，公司依据本条款第一段的规定选择供寻找、勘探和采掘有色金属与稀有金属生产工作所需要的土地。

用于公司经营所必需的土地地段(见第一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现协定生效后予以划拨。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划拨给公司的土地地段，在这块土地对公司已无必要后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三条 苏中股份公司的创办者是：

1.苏方

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

2.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

第四条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2800万卢布，苏方和中方各出资50%。

公司的经营取决于发展情况，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定予以增加，此时，苏方资本和中方资本的均等情况将保持不变。

公司的利润将由双方平均分配。

公司的股份采取实名制。股份的转让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第五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厂房、工程、设备、交通设备、地质勘探的开支、原材料和公司经营所需其他商品材料费用，总额1400万卢布，根据账单进行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中方：

开采所需的新疆省的土地(参见第二条)、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加工品和工程、住宅建设所需的建筑材料等费用，总额1400万卢布，其中对上述中方投入的自己的份额的估价，待本协定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双方协定，可以以相应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注资。

第六条 双方将就增补注资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协商，双方将把这些补充注资用于地质勘探工作、拓展公司的经营活动，关于补偿资金的来源：依靠直接投资、贷款、折旧提成和公司利润，其中双方将按照对等的原则进行注资，也就是各50%。

第七条 双方将指派对等的管理人员进入公司管理层，每方各派3名代表。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3年，上一个3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更换为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公司董事会所在地——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八条 为保障本协议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 1.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查找、勘探、采掘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 2.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建设、建造企业、附属企业、生活住宅和其他公司所需的建筑和工程；
- 3.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和不动产，让渡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 4.在企业经营区域修建铁路线、公路线和公司企业所需要的广播线，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 5.运输公民从事经营活动、公司建造企业和住宅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在为中国的国营企业确定的程序和条件下进行；
- 6.按照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费率使用新疆省的公用通讯和交通设施，而在公司企业内部安装自己的电话和电报线路，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 7.为公司工人、职员及其家属提供商业合作社、学习培训、医疗保健网和生活辅助金等服务；
- 8.维持对公司建筑和工程的内部保护；公司外部的企业和物资的保护工作由中国当局依靠其自己的开支负责。

第九条 相应地，苏联和中国机关将适当地在正常的条件下为驮运、兽力车、汽车和水运运输发放越过中苏边界的许可证，或者为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人发放签证。

第十条 公司的服务人员从苏联和中国公司中平均指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应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应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从事寻找、勘探活动以及对寻找和勘探的结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时，由苏联和中国专家在公司办公地点共同进行，在工作时专家们要彼此联系。

第十一条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对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免征进口税。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是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商品和货物，而是公司自己所用的私人消费品和文化生活用品，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应法律予以征收进口税。

第十三条 对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条件问题，其中包括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对公司课以实物税和关税，公司将按照适用于或即将适用于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样的条件执行。

第十四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双方股东将上缴他们所得股息收入总额的20%。

苏方股东将有权自由使用他们剩余的所得到的股息收入，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把这些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五条 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公司可以自由使用，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第十六条 协定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公司50%的产品。

协定中的另一方如果想出售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应首先出售给另一方。

苏联方面购买的50%份额的产品，将无障碍地运到苏联，无需课税或征收关税。

如果苏联方面购买中国份额的产品，并把它运到苏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对这部分产品征收关税。

第十七条 为了培训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干部，公司将有权组织安排必要的课程和学校。

第十八条 公司的经营活动期限确定为30年。活动期限满后，双方再协商公司下一步经营活动的问题。

第十九条 本协定待签署和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后立即生效。近期将在北京交换批复文本。

1950年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是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其中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附件二：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在新疆建立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协定双方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所在地区组建新疆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为“苏中石油公司”，中文缩写为“中苏石油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领土上从事寻找、勘探、采掘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土地上对这些产品进行加工。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将按照现协定和公司章程从事经营活动，待本协定签署一个月期限内，公司将按照必要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注册。

第二条 用于公司初期经营活动及地质研究的土地界线在协定双方签署的地图上标明，地图附属于协定，是该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件 [176])。

本协议生效的最初5年时间里，公司在地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本条款第一段的规定选择供寻找、勘探、采掘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所需要的土地。

用于公司经营所必需的土地地段(见第一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现协定生效后予以划拨。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划拨给公司的土地地段，在这块土地对公司已无必要后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三条 苏中股份公司的创办者是：

1.苏方

苏联石油和天然气矿床勘探托拉斯；

2.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

第四条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4600万卢布，苏方和中方各出资50%。

公司的经营取决于发展情况，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定予以增加，此时，苏方资本和中方资本的均等情况将保持不变。

公司的利润将由双方平均分配。

公司的股份采取实名制。股份的转让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第五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交通器材和工具，总额2300万卢布，根据账单进行估价，待本协议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中方：

开采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所需的土地(参见第二条)、前“独山子”石油公司所有的厂房和工程及生活住宅，总额2300万卢布，其中对上述中方投入的自己的份额的估价，待本协议生效3个月内由协定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双方协定，可以以相应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注资。

第六条 双方将就增补注资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协商，双方将把这些补充注资用于地质勘探工作、拓展公司的经营活动。关于补偿资金的来源：依靠直接投资、贷款、折旧提成和公司利润，其中双方将按照对等的原则进行注资，也就是各50%。

第七条 双方将指派对等的管理人员进入公司管理层，每方各派3名代表。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3年，上一个3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改换由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

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公司董事会所在地——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八条 为保障本协议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 1.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查找、勘探、采掘石油、天然气和伴随的石油产品及加工；
- 2.在公司活动区域从事建设、建造企业、附属企业、生活住宅和其他公司所需的建筑和工程；
- 3.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和不动产，让渡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 4.在企业经营区域修建铁路线、公路线和公司企业所需要的广播线，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 5.运输公民从事经营活动和公司建造企业和住宅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在为中国的国营企业确定的程序和条件下进行；
- 6.按照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费率使用新疆省的公用通讯和交通设施，而在公司内部安装自己的电话和电报线路，每一种情况都要征得中国当局的准许；
- 7.为公司工人、职员及其家属提供商业合作社、学习培训、医疗保健网和生活辅助金等服务；
- 8.维持对公司建筑和工程的内部保护；公司外部的企业和物资的保护工作由中国当局依靠自己的开支负责。

第九条 相应地，苏联和中国机关将适当地在正常的条件下为驮运、兽力车、汽车和水运运输发放越过中苏边界的许可证，或者为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人发放签证。

第十条 公司的服务人员从苏联和中国公司中平均指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应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一处、科或者某一工作队的首长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应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从事寻找、勘探活动以及对寻找和勘探的结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时，由苏联和中国专家在公司办公地点共同进行，在工作时专家们要彼此联系。

第十一条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对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免征进口税。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是供公司生产活动和公司从事企业建设和住宅建设所必需的商品和货物，而是公司自己所用的私人消费品和文化生活用品，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法律予以征收进口税。

第十三条 对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条件问题，其中包括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对公司课以实物税和关税，公司将按照适用于或即将适用于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样的条件执行。

第十四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双方股东将上缴他们所得股息收入总额的20%。

苏方股东将有权自由使用他们剩余的所得到的股息的收入，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把这些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五条 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公司可以自由使用，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第十六条 协定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公司50%的产品。

协定中的另一方如果想出售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应首先出售给另一方。

苏联方面购买的50%份额的产品，将无障碍地运到苏联，无需课税或征收关税。

如果苏联方面购买中国份额的产品，并把它运到苏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对这部分产品征收关税。

第十七条 为了培训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干部，公司将有权组织安排必要的课程和学校。

第十八条 公司的经营活动期限确定为30年。活动期限满后，双方再协商公司下一步经营活动的问题。

第十九条 本协定待签署和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后立即生效。近期将在北京交换批复文本。

1950年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是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附件三：

苏联与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民用航空公司的协定(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表达的愿望出发，为了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促进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认为两国建立空中联系符合双方的利益，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条 协定双方组建民用航空公司，本协定下文简称“公司”。

公司名称的俄文缩写是“苏中民航公司”，中文缩写是“中苏民航公司”。

公司将依据本协定和公司章程活动。

公司将在本协定签署1个月期限内，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这两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进行注册。

公司所在地：北京。

第二条 公司的目的是开办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

- 1.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
- 2.北京—太原—西安—兰州—哈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
- 3.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

沿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飞行的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时，协定双方要征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

根据双方协定，公司可以组织和经营其他航线。

第三条 公司的创建者是：苏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用航空总局；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民用航空总局。

第四条 公司按照平均分摊的原则创立，即公司50%的资本属于苏方，50%的资本属于中方。

第五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定为3000万卢布。

公司所有股份都是实名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公司拓展经营活动需要增补资本时，将按照协定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增补注资。在此条件下，苏方和中方均摊的原则保持不变。

第六条 苏中哈密航空公司中止自己的活动。

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都转归苏中民用航空股份公司。

第七条 协定双方把自己股份的支付情况记在公司的账目上：

苏方：

飞机、发动机、通讯器材、汽车运输、修理厂和机场的维修设备，以及各种公司活动所必需的设备，在公司存在的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全权或非全权使用坐落在苏联领土上的机场、空港、航空客站、各种大楼和建筑、公务和生活住宅、仓库，由双方协商列入账单，其中，这批物资的总值为1500万卢布；360万卢布为苏方在哈密航空公司资本中所占的份额，240万卢布为现金。

中方：

修理厂、航空手提设备、通讯工具以及在公司存在的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全权或非全权使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机场、空港、航空客站、各种大楼和建筑、公务和生活住宅、设备和器材，由双方协商列入账单，其中这批物资的总值为1500万卢布，360万卢布为中方在哈密航空公司资本中所占的份额，240万卢布为现金。

账单所列作为投入资本的物资由创立者在6个月内转交给公司，而作为投入资本的现金由创立者在本协定签署1个月期限内转入。

第八条 对于作为自己的投入资本转交给公司归双方使用的一些物资和工程进行估价的问题，从这批物资事实上已转交或公司双方有权使用的那一天起，在3个月期限内由双方等额代表在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协商鉴定。

第九条 待估价最终完成后，如果协定中的一方投入的设备和其他材料的价值没能补偿该参加者股票资本份额，那么，后者将从物资事实上已转交或公司双方有权使用那一天起，在6个月期限内以美元或双方协定的其他货币，向公司账户补交投入资本的不足部分。

第十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保证记在自己账户下的位于它们领土上的设备、大楼和所有转交给公司使用的工程完好，并保证为保障空中航线正常运营需要对机场、大楼和工程进行重新装备和维修工作所花费的资金记在自己的账户下，而对大楼和工程的日常维修所花费的资金则记在公司的账户下。

第十一条 双方将等额提供董事会成员进入董事会，每方各出3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他们将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出。

董事会任命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两年内，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中的中方成员选出，董事会副主席由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中选出。总经理由苏联公民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

此后每隔两年，上一个两年担任职务的苏方代表和苏联公民改换由中方代表和中国公民继任。反之亦然。

董事会和经理处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的章程明确。

没有列入协定的问题董事会不能解决，由公司股东协商处理，当股东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转交双方政府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为保障本协议第一条指出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赋予公司如下权利：

1.为了取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流动资产，公司拥有通过签订条约获取贷款和借款的权利；

2.开设公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商业代办处、代表处、修理厂和仓库；

3.在个别情况下，经协定方政府允许可在公司活动区域建造和建设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大楼和工程，取得这些不动产和让渡这些物资、办公附属企业和建造为保障公司的空中航线飞行安全所必需的广播站和通讯设施；

4.为苏联或中国国营企业确定的相应税率适用于本公司，使用通讯设施和公共交通。

第十三条 协定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相应地承担：

1.保护飞机、工程、仓库和公司其他房舍和物资；

2.提供本协议第二条指定的空中航线的气象服务。

第十四条 公司全体服务人员、飞行员、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一律从苏联和中国公民中招募。

在公司经营活动需要的条件下，公司为中方培训来自中国公民的航空专业人才。

第十五条 在苏联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时，公司相应地遵守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也相应地享有苏联和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权利和优惠待遇。

对苏联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有效的相应法律和法规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飞机、机组和乘客。

公司可以自由地使用归公司所有的货币资金用于任何花费和支出。

在向中国人民银行出售和购买外汇时，公司将享有不低于银行给予中国其他公司、国营企业和组织的优惠条件。公司将不受阻碍地从中国当局取得外汇作为公司的经营活动开支，在国外为公司购买飞机、设备、燃滑油料和其他材料，所花费用由公司通过自己的业务收回。

第十六条 公司将每年提取利润的20%给协定双方，以此代替纳税、关税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现有的各种税以及将来可能新增的税，包括公司、附属公司和代办处的注册税。这一数额将在双方之间按照协定双方在各自领土上的航运里程数的比例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苏方股东有权自由使用他们所得到的股息，其中包括购买中国出产的商品，在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把这些购买的商品运到苏联。

第十八条 协定双方将相互免征关税、赋税和免除对在它们领土上的飞机、发动机、设备、材料、运输、机械设备、燃滑油料和其他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物资进行征税。

第十九条 使用公司航线运送乘客、行李、货物和邮品，由公司董事会确定运价。

如果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亏损状态，那么，协定双方将按照在协定双方领土上的航运里程比例向公司提供亏损补助金。

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所发生的亏损部分，将由双方均摊。

第二十条 公司飞机将印有公司的标识：俄语为СКОГА，汉语为中苏民航公司。

第二十一条 根据苏联法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公司的创建者向机组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证件，这些工作人员在协定双方领土上的航线从事飞行和为跑道和技术设备进行服务时，他们的证件有效。

第二十二条 所有从苏联运往中国的邮品或者从中国运往苏联的邮品，都归入协定双方政府邮政部门之间协商的特殊物品。

第二十三条 本协定签订后有效期为10年。

如果协定中的一方，在本协定有效期满至少6个月前，不使用书面形式把自己关于废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另一方，那么，协定继续生效5年，并且今后每到这个时候，当协定中的一方在5年延续期满至少6个月前，不使用书面形式事先通知关于自己中止协定的打算时，都是如此。

第二十四条 本协定在签署后立即生效。

1950年____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分别为俄语文本和汉语文本，两种文本具有相同的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61、213 221、222 230、
231-240

№124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在华苏联专家的待遇(1950年3月22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第282项 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和薪金的条件问题。

对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和1950年3月7日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决议修改如下：

1.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协定草案第八条)，自上述协定生效之日起，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

2.关于上述协定第四条规定的中国政府在苏联军士开支方面对苏联政府的补偿，确定为每位军士每月1000卢布；

3.接受中国政府就上述协定草案第三条的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向苏联专家支付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样工作岗位和技术级别的专家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方补偿为派遣苏联专家而付出的下列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途中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行李托运费(每人限80公斤)和相当于派遣前在苏联的1个月工资的出差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直接以中国货币支付专家及其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相当于在中国1个月工资的休假补助费(在中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休假补助费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63

№13002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协定的中方草案 (1950年3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和报酬的条件之协定

(1950年3月22日)

鉴于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帮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联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机构和组织工作。

第二条 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期限确定为1年。关于在华工作期限的延长需经双方审定。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召回需经双方负责机关商定，如某位工作不满6个月的苏联专家并非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原因而被提前召回，费用由苏方承担。苏方并有义务派另一位来接替提前召回

的苏联专家。与此召回、替换相关的费用由苏方承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向苏联专家支付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样工作岗位和技术级别的专家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方补偿为派遣苏联专家而付出的下列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途中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行李托运费(每人限80公斤)和相当于派遣前在苏联的1个月工资的出差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直接以中国货币支付专家及其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交通费、零用钱、一昼夜的住宿费和工资以及相当于在中国1个月工资的休假补助费(在中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休假补助费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将为每位苏联专家(不论其级别)向苏联政府每月支付1500—2000卢布作为对苏联相关机构或企业因派遣专家到国外而蒙受损失的补偿。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将为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免费提供带有家具、暖气和照明的住房，或支付相应的住房租金。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义务在苏联专家不超过3个月的整个患病期间不停发工资。如果一位专家生病超过3个月，苏联政府有义务派另一位同级别的专家来接替。

第七条 任何有关本协定的争议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第八条 本协定规定的苏联专家的劳动工资条件也适用于在本条约签订前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组织和企业中工作的苏联专家。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生效，在任何一方将自己打算终止执行该协议的要求通知对方之日起6个月后，将结束其有效性。

1950年____签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51-53

№0985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出席电信联盟国际会议(1950年3月23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4月3日

第92号

绝密

1950年3月23日23时50分，我到中南海周恩来府邸拜会了他，根据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21日第224号指示，我对同他的前次谈话(见3月20日会谈纪要)进行了补充，向他通报了以下事宜：

佛罗伦萨短波分配会议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该联盟与联合国有协定，被其认为是特别机构之一。关于召回国民党代表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而代之的呼吁书，可寄给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国际电信同盟总部驻在日内瓦。希望将这一呼吁书副本寄给意大利政府，因为请柬是经国际电信联盟授权由意大利政府发出的。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也已获悉，会议是由国际通信组织召开的。国民党中国在这一组织中有3名代表，其中2名是新制度的拥护者，现在已在北京，第3名是代表团团长，现在住在香港。

中国政府已决定任命电信总局局长李强为会议代表团团长，现在他正在莫斯科参加主要谈判。

近几天，中国政府将给日内瓦和意大利外交部发去关于开除国民党代表和任命李强为自己的代表(取代国民党代表)的电报。周恩来答应寄给我这一电报的副本。

为执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3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从5

月1日至12日，在曼谷将召开工商委员会会议。此后远东经济委员会第6次会议将开始工作。我问周恩来，中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求任命自己的代表以取代国民党的代表。

周恩来回答说，这些会议的问题将报告毛泽东，最近政府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补充说，由于这些组织属于联合国，它们对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看来，政府将通过决定任命自己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并呼吁召回国民党代表。

为履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2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在国际登记局的编成里，国民党的王代表还留在那里，他是工程师，是1948年1月1日被任命为登记局成员的，是一个地道的亲美分子。

周恩来说，他们知道王德广(即王)，他是国民党分子和亲美分子。中国政府已提出要求，把他从登记局开除出去。

为履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21日第220号关于瑞士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指示，在谈判过程中，我对中国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同瑞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报表示了关注。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同挪威、瑞典和缅甸正就交换外交代表问题举行谈判。看来，这些谈判最近将顺利结束。中国政府已致函瑞士政府，表示同意就互相交换外交代表问题进行谈判。但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看来它无人可派，也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近几天，中国打算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后，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看来荷兰将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决定不急于同英国交换外交代表，而要首先解决对上述国家的关系问题，然后，正如周恩来说的，再回到英国问题上来。

接下来，为履行苏联外交部1950年3月11日第195号指示，我告诉周恩来，5月2—12日，国际红十字会将召开例行会议，国民党红十字会是其成员之一，国民党代表还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执行委员。我问周恩来他对国民党红十字会这一组织的意见，我还说，这个问题我已同李克农讲过，他答应研究这件事，然后再把意见告诉我。

周恩来回答说，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表面上不属于政府，他

们决定先把国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组织，然后再委托新的协会理事会挑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同时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问题。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10日之前解决。

然后我向周恩来谈了我同李克农谈论权友湖(ЧуанЮ Xy)中校的事(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3日第177号指示)，权友湖被推选为国际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委员会的成员。我指出，如果权友湖是国民党分子，则苏联水文气象总局打算抗议他当选上述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回答说，权友湖这个人他不清楚，但他认为，权是国民党分子。周恩来答应查清此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在往下的会谈中，为执行苏联外交部今年3月18日第214号指示(关于中国政府对把伪满皇帝溥仪交给他们的意见问题)，我趁周恩来情绪很好(在同我们会谈前，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客人举行了晚宴，因此接待我们很晚)，同他谈起了北京郊区的名胜和皇帝的行宫。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所谈到的这座宫殿以前属于谁，以前哪些皇帝在这里住过。周恩来非常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皇帝在这里住过，其中就有溥仪的父亲。我顺便问道，溥仪长得什么样，多大岁数了，受过什么教育。周恩来回答说，溥仪现在在苏联，他还不到50岁。他在日本受过不错的教育。周恩来说溥仪生性软弱、愚昧，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得不到任何支持。我插话问，溥仪是不是战犯，以后怎么处置他。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把溥仪看成是战犯，溥仪在中国犯下了罪行，从政治上讲，把溥仪交给中国是正确的。

对周恩来的这一声明我没作任何表示(这样做很容易，因为谈话是经过齐赫文斯基同志翻译进行的，他也积极地参与了会谈)，我把谈话又拉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谈论北京皇帝的夏宫，北京近郊休养胜地，中南海漂亮的花园和湖水等。我们再没谈溥仪的问题。

在会谈末了，周恩来强调要十分保密，强调十分相信我们。他说，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决定：今后中央和政府所有领导人员星期天不工作。

会谈持续一小时。周恩来很高兴，很好客，一直把我们送上汽车。齐赫文斯基同志出席会谈并担任翻译。

№124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驻华使馆武官助理(1950年3月25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5日

第290项 关于E.A.加尔金和A.A.伊萨耶夫同志。(1950年3月21日第494号记录第55条)

批准苏联军事部如下建议：

1.鉴于E.A.加尔金中校将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免除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助理的职务；

2.批准A.A.伊萨耶夫少校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助理。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65

№124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签署民航公司协定公报(1950年3月2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3月27日

第291项 关于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见附件)。

附件：

关于苏联与中国政府之间签署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

3月____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联合股份公司的协定。该股份公司是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航空工业的发展，加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该协定规定建立并投入运营的民航空中线路是：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斯克、北京—阿拉木图。

股份公司的一切开支和所获得的利润，均由双方平均分配。

股份公司的领导职务，按照轮换制原则由双方代表担任。

协定中还指出，股份公司第一个两年工作中，其董事会主席职务选举中方代表担任，而副主席由苏联代表担任；公司总经理从苏联公民中选出，而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担任。上述职务每过两年轮换一次，其相应职务由另一方代表担任。

公司职员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挑选。

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谈判依据相互充分理解的精神，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在协定上签字的人是：

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5、252

№12490 关于中苏签署成立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草案)(1950年3月27日)

3月____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成立两个苏中股分公司——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两个苏中股份公司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加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合营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寻找、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合营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省内寻找、勘探和开采有色金属资源。

上述两个股份公司的产品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平均分配。以同样的方法，股份公司的一切开支由双方均摊，所获取的利润平均分配。

股份公司的领导职务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

在协定中还指出，在公司第一个3年的活动期间，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从中方代表中选出，而副主席从苏方代表中选出，公司总经理由苏方代表担任，副总经理由中方公民担任。每下一个3年中，上述职务由另一方代表替换上一个3年中的一方的代表。

股份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的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任，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职务轮换制原则。

协定的有效期限是30年。

谈判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依据相互充分理解的精神进行的。

在协定上签字的人是：

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部长А.Я.维辛斯基；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41-242

№24802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 (1950年3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的北京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60名教授和教师。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已经就这个问题给您本人写了信件，其中阐述了需要派遣的教师的职业技能。现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已经招收了3000多名大学生，并且已经开始上课。但是该校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的考虑是，一些课程将由苏联教师讲授。因此，如果没有苏联教师，该校就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我们请求您根据我们的计划尽快安排和挑选一些教授和教师，并尽快把他们派往中国。为了完成此项工作，我们打算把现在正在北京的菲利波夫教授派往莫斯科，来协助办理此事。

请您告知我们，能否满足上述所提请求。

毛泽东

№26316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请求派专家去帮助出版 《毛泽东选集》(1950年3月30日)

加急

转去中共中央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最近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您曾答应派一位理论强的同志来帮助我们做这件工作。请告诉我们，这位同志什么时候来。

中共中央”

罗申

1950年3月30日

打印12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格里戈良

3月30日24时，尼基金发出

АВ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45

№12486 苏联政府致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指令：确 定中苏共管财产范围(1950年4月 [\[177\]](#))

苏联政府关于确定苏中共管铁路财产给中苏中长铁路协会理事会苏方代表的指令 [\[178\]](#)

一、在就中长铁路的财产构成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时，中苏中长铁路协会理事会苏方代表应将以下清单中所列财产归入苏中共管财产范围：

(一)双方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及其附属专用线

干线：

- 1.满洲里—哈尔滨
- 2.哈尔滨—边境站(绥芬河)
- 3.哈尔滨—大连—旅顺港

双方共用的支线：

- 1.锦州—陈相屯
- 2.南关岭—甘井子
- 3.大石桥—营口
- 4.大房身—柳树屯
- 5.苏家屯—抚顺

附属专用线：

专用线和通向林业采伐区、煤矿和露天煤矿的支线。

(二)中长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在交通枢纽处的界线

中长铁路在昂昂溪、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沈阳、苏家屯和辽阳等铁路枢纽与其他中国铁路的分界线可就地勘定。

当在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等铁路枢纽勘定中长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的分界线时，既应保证中国铁路列车的正常通过，也不得越界进入中国长春铁路境内。

(三)蒸汽机车—车辆修理厂

- 1.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 2.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及其所属板道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

(四)蒸汽机车和车辆仓库

主要蒸汽机车库房和拆返段具体分布在如下站点：

1.满洲里；2.海拉尔；3.免渡河；4.博克图；5.扎兰屯；6.昂昂溪；7.安达；8.哈尔滨；9.一面坡；10.横道河子；11.牡丹江；12.穆棱；13.边境站(绥芬河)；14.陶赖昭；15.长春；16.四平街；17.铁岭；18.沈阳；19.苏家屯；20.大石桥；21.瓦房店；22.大连。

蒸汽机车库的财产包括：在铁路枢纽和线路上为机车供应装备和给水的各类设施。

车辆仓库主要分布在以下站点：

1.满洲里；2.海拉尔；3.博克图；4.昂昂溪；5.哈尔滨；6.牡丹江；7.边境站(绥芬河)；8.长春；9.四平街；10.沈阳；11.苏家屯；12.大石桥；13.大连。

(五)移动资产构成

中长铁路的移动资产数量可根据中长铁路段在1950年东北铁路总工作量计划中所占比重以及截至1950年1月1日中长铁路所拥有的蒸汽机车和车辆在东北铁路机车和车辆总量中所占比重来加以确定。

(六)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

中长铁路沿线的电站、变电站和配电站应能够满足铁路的需要。

(七)通讯线路、电话和电报站、信号装置以及铁路中心站的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

中长铁路沿线的通讯线路、电话—电报站、信号装置、铁路中心站的道岔和信号控制系统以及各站点区域内为满足铁路所需而专门建造的处所。

(八)物资仓库

为满足中长铁路运营需要而分布在铁路辖区范围内的主要和区段物资仓库。

(九)居住设施

分布在中长铁路各站点所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居住设施；此外，位于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四平街和沈阳的居住设施由中长铁路和其他

东北铁路根据各自在这些站点工作的铁路职工和公务员的人数按比例加以分配。

(十)民用、技术服务、医疗、合作社、文化—教育机构、大楼和设施

为满足中长铁路需要而设立和建造的民用、技术服务、医疗、合作社、文化—教育机构，大楼和设施。

(十一)附属企业

扎兰屯和穆棱的煤矿，哈尔滨和大连的印刷厂，乔尔戈里格尔(Чол-Горигол)木材加工厂，海拉尔和牙克石的乌尔金奇汉(Уркичиханскиет)木材厂、亚多尔斯克(Ядорские)木材厂以及归属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财产。

(十二)土地资源

归中长铁路所有的土地资源包括：在本清单第一款所列铁路干线和支线沿途两侧的隔离带以及建有铁路职工住宅和其他民用、技术服务设施的土地和宅旁园地。

二、在属于共同使用的中国长春铁路的财产组成中，下列财产不包括在内，应立即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 1.哈尔滨政治技术学院
- 2.大连政治技术学院
- 3.大连细菌研究所
- 4.大连化学研究所
- 5.大连信号设备厂
- 6.大连无线电实验室
- 7.哈尔滨方志博物馆
- 8.大连方志和工业博物馆

9.哈尔滨、长春和锦州的医院及大连的桐树(Туншу)医院

10.大连、沈阳和长春的宾馆

11.大连中央图书馆

12.松花江轮船公司及其航运权

13.杨台(Яньтай)和瓦房店的煤矿所有权

14.由中长铁路原购买或获得的位于铁路隔离带以外，未建筑有属于中长铁路的行政、技术服务和生活居住等设施的土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208-212

№12491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批准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1950年4月 [\[179\]](#))

批准由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并提交批准的、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如下条约和协定：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50年4月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261

№24803 杰尼索夫与萧三会谈纪要：对外文化协会的工

作(1950年4月4日)

1950年4月4日，应中国作家萧三的请求接见了。参与会谈的人员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Г.М.卡利希扬同志、东方人民共和国副主任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礼宾部副部长奇卡列夫同志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萨维尼奇同志。

萧三代表中苏友协理事会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对中苏友协的关照表示了感谢，并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提供了关于苏联文学界领导人在中国访问期间的照片以及中苏友协为纪念苏联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访问而出版的5本书作为礼物。

接着，萧三通报说，中国正在着手组建一些特别的组织来同国外进行文化联系，并请求告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结构。我强调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社会性，也讲述了关于对外文化协会的职能及其工作。

在谈到中苏友协的工作的时候，萧三指出，中苏友协现在大概有200万成员，已就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工作。关于这一点，萧三列举了西蒙诺夫、索夫罗诺夫和考涅楚克以及苏联其他戏剧家的话剧，他说，这些话剧在中国剧院的演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对中国剧作家的话剧没有在苏联剧院上演，萧三也表示了遗憾。关于这一点萧三还说，1949年11月到莫斯科进行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归国后向他们谈论了关于在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红罂粟花》给他们留下的极为消极的印象。萧三接着说，一些看过《红罂粟花》芭蕾舞剧的中国同志认为，该剧歪曲了中国人民摆脱封建压迫、争取独立的事实，从民族色彩和风俗习惯(衣着、面貌、外表等)的角度来说，中国人的形象也被歪曲了，该剧中的音乐和舞蹈同中国人民的音乐和舞蹈毫无共同之处，而一些关于中国人民风俗习惯的情节，简直是由引人发笑的外行杜撰出来的，让人感到厌恶。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还有莫斯科戏剧院演出的剧目《深水小木船》。

在谈话的最后，萧三再次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予中苏友协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说，相信中苏友协将会越来越壮大，而其工作也将会越来越富有成果。

我答复萧三说，我完全赞同萧三的上述看法，并请求萧三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如下礼物：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出版

的《И.В.斯大林》相册以及普希金的10卷本著作。

萧三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我曾在周恩来同志那里看到过《И.В.斯大林》相册，坦白地说，我非常羡慕他。你们给了我非常贵重的礼物。”

同萧三的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A.杰尼索夫

1950年4月8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178, л.96 97

№124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苏中条约和协定(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77项 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的问题。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协定的决议(草案)》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批准上述文件的命令草案(见附件)。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以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协定的决议

(第____号)

1950年4月__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批：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上述文件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82、260

№124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开设中国领事馆问题(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79项 关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中国领事馆的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苏联政府同意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中国领事馆。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83

№124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80项 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问题。

1.批准所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决议(草案)》。

2.责成联共(布)中央前往境外事务委员会(A.M.伊万诺夫同志), 加快审理关于到中国出差的教授和讲师的问题。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第380项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出差的决议

第____号

1950年4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 派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前往中国, 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工作。

2.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C.B.卡夫塔诺夫同志)、俄罗斯联邦教育部(И.А.凯洛夫同志)和对外贸易部(М.А.维希科夫同志), 在1950年5月15日前, 挑选出42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前往中国工作, 并确保他们到达工作地点。

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按如下学科挑选26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共3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1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

国家法规和国家制度理论——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讲师;

合作化商业组织、消费和生产合作社——共2人, 其中包括1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

国民经济计划学——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统计学——1名教授;

金融和货币流通——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货币、信用和贷款——1名讲师;

政治经济学——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会计核算学理论——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货币流通和银行贷款——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工业企业的组织和计划——共2人, 其中包括1名教授和1名副教授;

逻辑学——1名副教授。

根据与苏联外交部长的协商, 挑选1名国际法方面(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的教授和领事馆事务方面的1名讲师;

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按如下学科挑选14人:

俄语——共8人, 其中包括2名副教授和6名讲师;

教育学——2名副教授；

俄语教学法——1名副教授；

生物学——2名讲师；

学前教育学——1名讲师；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按如下学科挑选2人：

海关税和税收——1名副教授；

对外贸易垄断——1名讲师；

以上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出差期限定为2年。

3.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122c号决议中，关于到中国出差的工作人员物质保障的内容，适用于上述到中国出差的苏联教授、副教授和讲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83, 262-264

№124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财产移交委员会苏方人员组成(1950年4月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7日

第382项 关于在向中国移交财产和建筑物的中苏委员会中苏方代表团的组成问题。

1.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东北财产的中苏委员会中，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В.П.博伊科(苏联对外贸易部)——主席

П.Т.扎博罗夫斯基(苏联外交部)

М.Б.米尔曼(国外资产管理总局)

2.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财产的中苏委员会中，苏

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И.Ф.巴拉诺夫(苏联外交部)——主席

Е.П.热尔托夫斯基(苏联海运部)

В.Н.里亚布琴科(国外资产管理总局)

А.А.巴格达萨罗夫(苏联对外贸易部)——鉴定专家

В.А.拉琴科(苏联无线电工业部或渔业部)——鉴定专家

3.批准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北京原军营的中苏委员会中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В.А.希巴耶夫——主席

В.Н.杜布洛维奇上校

Н.И.季莫费耶夫

4.由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协同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国外资产管理总局(梅尔库洛夫同志)，负责上述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83-84

№24802 2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向中国派遣苏联教师 (1950年4月8日)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为北京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派遣教授和教师的信件我已收到。今年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42名教授和教师，关于挑选这些教授和教师的指示已经下达。我希望，挑选的大部分教师最近能够到达中国。我认为可以把菲利波夫教授派往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4月8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53

№00274 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1950年4月10日)

绝密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 [180] 通知我以下事项：

一、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其中谈到，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李周渊。

在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时，根据后者的提议讨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与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对于会晤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李周渊借口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未作具体答复。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二、金策通知说，朝鲜南方游击队领导人金达三4月3日从南朝鲜来平壤。南方报界和电台曾多次正式宣布，他在与南朝鲜军讨伐队作战时被击毙。金达三来北朝鲜汇报南朝鲜游击队运动的形势并接受对此问题的指示。

金策请我把上述各事通过什特科夫同志转告金日成。 [181]

伊格纳季耶夫 [182]

1950年4月10日

№124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日梅霍夫等人 在华逗留期限(1950年4月13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13日

第417项 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问题。

通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延长И.Н.日梅霍夫同志、В.С.戈列金同志和И.П.马尔科夫同志在中国逗留的期限至1950年11月15日的建议，允许他们在1950年4月15日到7月1日期间回国一次。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90

№124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苏联青年代表 团访华(1950年4月17日)

摘自1950年2月11日至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记录

1950年4月17日

第454项 关于派苏联青年代表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1.批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今年4月份派出一个苏联青年代表团，参加中国青年的民族节日，期限为1个月。苏联青年代表团的组成如下：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代表团负责人)、И.Н.科热杜布同志、П.М.马谢罗夫同志、Н.Т.西佐夫同志、Л.С.济金娜同志、М.М.佩斯利亚克同志、М.Т.格里申同志、Р.М.茹科娃同志、С.Н.梅尔格良同志、З.П.图马诺娃同志、Г.Г.舍韦尔同志、Б.М.孔采利泽同志、М.И.罗日涅娃同志、А.П.沙什科夫同志、С.С.德米特里耶夫同志、А.К.卡纳平同志、В.И.马利舍娃同志、А.В.塔拉索夫同志、А.Т.贡恰尔同志、Е.В.里亚博娃同志、Н.М.李维诺娃同志、Е.И.基塔耶娃同志、Г.П.沙杜诺夫同志、А.А.拉波辛同志、В.И.弗拉基米罗夫同志、М.И.赫梅尔科同志。

2.允许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派出一个以А.И.阿尼西莫夫为领导的、由20名青年演员组成的小组，与苏联青年代表团一起前往中国，期限为1个月。

由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和П.И.列别杰夫同志负责挑选派往中国的青年演员，并负责确定这个小组的演出节目。

3.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使用联邦预算储备金，补偿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由于该青年演员小组前往中国发生的一切开支。

4.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确保苏联青年代表团和演员小组访问中国往返所需要的飞机。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97-98

№124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1950年4月21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1日

第七项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问题。

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如下建议：

一、董事会制定的年度、季度和月份生产—财务计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批。

二、设立铁路特命全权代表职务，以便解决关于“中长铁路与其他铁路协调一致”和“协调长春铁路与其他铁路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自1950年4月25日起恢复中长铁路联合委员会，并在1950年5月10日前审批该委员会的章程。

№124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阿尔希波夫任经济参赞(1950年4月24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4日

第16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1950年4月20日决议, 第500号记录, 第71 C条)。

一、通过苏联部长会议的如下决议：

(1)关于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和批准由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担任这个职务。

(2)关于授予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二等特命全权公使的外交官衔。

二、保留阿尔希波夫同志在原工作岗位上的一切物质待遇。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5-6

№12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中文字幕(1950年4月2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5日

第37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1950年4月21日决议, 第500号记录, 第513 C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博利沙科夫同志)：

1.制作用汉语配音的电影拷贝：《宣誓》、《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莱尼斯》、《乡村女教师》、《一个侦察兵的功勋》、《皮罗

戈夫》、《团的儿子》、《凯旋》、《蓝色交通线》、《十五岁的船长》、《阿利舍尔·纳沃伊》、《达维德·古拉米什维利》、《成吉思汗的后代》。

2.在中国制作电影拷贝，但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高质量。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9

№124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出席万国邮政联盟会议问题(1950年4月27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4月27日

第61项 关于万国邮政联盟执行与联络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1.认为苏联参加万国邮政联盟执行与联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因为委员会成员中有国民党集团的代表。

2.委托驻瑞士的苏联公使馆参赞科留金同志，在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一个关于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委员会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的声明。同时宣布，如果国民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苏联代表团就不会参加这一工作，并且苏联将不承认委员会在这种人员组成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决议是合法的。

3.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苏联对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态度。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14

№09085 通金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援助中国救灾问题(1950年4月28日)

第612号

A.A.葛罗米柯同志：

罗申同志报告，上海失业人数有15万，由于歉收和自然灾害，中国许多地区闹粮荒。他建议通过苏联工会募捐援助上海失业人员和欠收地区的群众。

我认为，应该根据以下考虑拒绝接受罗申的建议：

一、我们现在提供援助可能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威望。这一

援助可能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加强攻击和诬蔑中国经济崩溃和中国民主政权没有能力组织国内经济生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请求我们援助。而且，在同我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在谈到饥荒和中国遭灾地区居民的严重形势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承认中国的严重形势，但每次都强调，中国政府自己能克服这些困难。

附给北京的电报草稿。 [183]

Г.通金

АВІРФ, ф.100, оп.43, п.305, д.32, л.12

№24802 1 苏联专家菲利波夫的报告：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大学 [184] (1950年5月2日)

.....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费先科和我于1949年8月28日前往北京，以便帮助中国的同志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在到达北京之后，刘少奇同志向我们提出了组建人民大学的任务，该校是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干部的。刘少奇同志谈论了该校将要设立的系、学习期限以及学生的数量。他说，该校将主要由苏联教授任教，教师的总数为300—400人，教学中应使用苏联教材，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应该利用苏联最为丰富的经验。当时已经组建了筹建该大学的委员会，中央委员陆定一任委员会主席。我们也参加了委员会，担任委员会成员。在得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之后，委员会开始着手工作。首先了解了北京和天津高校的状况，熟悉了组建人民大学的基本材料。在对组建新的大学的问题经各方讨论之后，通过了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各系的计划：外交系和法律系，学制4年；经济系、设计系、金融系、贸易系、合作化系，学制3年；企业厂长系，学制2年。制定了1年的教学计划。第一学年学生的人数确定为3000人。此外，还打算在大学开设俄语班，学员定额为550人，并打算在各系开设为期6个月的学习班，以便使教师得到进修。各年级学生的数量确定为3000人，其中1000人为脱产学习。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提交的关于组建人民大学的计划。但是，考虑到财政上的困难和没有足够的教学场所，考虑到缺少必需的翻译人员和教学参考书不足，

决定把一年级学生的数量缩减为1400人，同时把苏联教授的数量缩减为50人。苏联教师应当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俄语教研室、法学教研室、金融学教研室和经济学教研室，并担任领导工作。

人民大学预定在2月1日开学，后改为2月10日。但是没有因为缺乏苏联教师而推迟到很晚。这纯属偶然，原因在于，10名俄语教师到了人民大学(他们预计担任附属于中共中央的俄语学校的教师)，在1月份俄语班开始上课，他们不是根据任命来这里的。到1月底招收了2687名大学生，但由于苏联教师延迟到来，大学正式开学日期被推迟了。2月13日大学开始授课，以便在苏联教师到来之前给学生上课。教授的科目有：俄语、新人民民主、中国革命史、数学和物理。

苏联教师按时到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提前制订自己所授科目的教学计划，熟悉大学的环境，准备把大量的教学材料翻译成汉语以便学生能够用母语阅读这些材料，需要事先同自己所授科目的口语翻译人员以及同年级的中国教师进行接触。

很显然，本学年的工作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现在非常需要苏联教师到来，以不致于最终破坏本学年的工作，而重要的是可以为新学年做准备。

我在人民大学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就大学工作的各个问题提供咨询，这些问题涉及工会的组织、党的工作、青年工作，我尽可能参加各次会议，并作一些报告。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5，л.62-64

№0027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专家、朝鲜和印共等问题(1950年5月3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毛泽东下述事项：

“致毛泽东同志：

一、您有关空军器材、海军器材和顾问的申请单已收到。王稼祥应已告知您，这些申请单将尽快落实。

二、在与罗申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刘少奇提出，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有些人中国已经不需要了。请将这些专家的名字告知，以便我们能尽快将他们召回。

三、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

四、王稼祥转来您寄来的有关印度问题的材料。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印度的同志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认为，此后不必专门发表批驳这些同志的文章。需要的只是观察他们是否确实在自己的政策中实现了明显的转变。

向朋友们致敬

5月3日 菲利波夫”

又及：

罗申同志，请您将本电第二项内容转告阿尔希波夫。

菲利波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4

№12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临时代管中国在阿富汗使馆的财产(1950年5月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5日

第89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由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接管原国民党在喀布尔的使团的财产，并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富汗的利益。

№124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黄鼐来苏联治病(1950年5月5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0年5月5日会议第74号记录摘录

第101项 关于黄鼐(Хуан Нэй)同志来苏联治病的问题。

1.满足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人员黄鼐同志来苏联治病。

2.接待和安置黄鼐同志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负责，而治疗工作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叶戈罗夫同志)负责。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25

№124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股份公司的章程(1950年5月11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1日

第131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的协定：

一、批准将苏联外交部协同苏联冶金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和苏联民航总局提交的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作为与中方谈判的依据(见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

二、批准苏联冶金工业部(库兹明同志)、苏联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

夫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保持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对上述第一条中列举的股份公司的章程草案作一些非原则性的变动和修改。

三、批准以下人员作为苏方代表参加股东大会：

- 1.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B.И.先诺夫；
- 2.苏中石油股份公司——C.И.阿加耶夫；
- 3.苏中民航股份公司——A.A.阿夫谢耶维奇。

四、批准下列人员作为上述股份公司领导机构中的苏方代表：

1.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 B.И.先诺夫——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 B.П.潘克拉托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 И.А.斯米尔诺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 К.И.希马诺夫——公司总经理。

2.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 C.И.阿加耶夫——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 Л.И.格尔泽洛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 Л.Л.叶西科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 Д.И.涅列京——公司总经理。

3.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 A.A.阿夫谢耶维奇——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 A.И.伊万诺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 Н.И.克柳奇尼科夫——公司董事会成员；

B.A.谢德利亚列维奇——公司总经理。

五、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领导机构中苏联代表的领导工作，分别由苏联冶金工业部(库兹明同志)、苏联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负责。

附件一：

苏中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以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为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为另一方，双方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写为“苏中金属公司”，中文简写为“中苏金属公司”。

公司的所在地是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二条 附在本章程第一条所指的协定后的地图，已经标注了被指定作为公司最初进行勘查、地质勘探和生产工作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有关的设施、建筑和工地的占地界线。

在第一个5年活动期间，公司将在本条款第一段指明的区域内，挑选出用于进行寻找、勘探、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作的地区。

公司进行活动所必需的土地，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公司提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给公司的土地，在公司不再需要这些土地的情况下，将由公司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3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2800万卢布，共分为56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2800股总额为1400万卢布属于苏方——苏联冶金工业部(新西伯利亚第二分厂)，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2800股总额为1400万卢布属于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

苏方根据创办人之间商定好的清单和价格，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房屋建筑、

设施、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查工作的花费、物资以及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其他货物和材料，总额为1400万卢布。

中方：

中方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向公司转交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所必需的新疆省境内的土地，建造工业设施和住宅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额为1400万卢布，与此同时，对于上述所列的中方投资部分的财产估价，应该取得双方的一致认可。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任何一方向公司转交相应数量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投资份额。

第六条

1.公司的股票将是记名的。转让股票只能在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的利润将在苏方和中方之间平均分配。

2.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3.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开展自己的工作。

第九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条指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1.在公司活动地区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2.建造和构筑工业的、辅助性的、日常居住用的和公司所必需的其他建筑和设施；

3.购买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动产和不动产，有权将这些财产割让，有权签署借款和贷款合同；

4.公司在自己企业的所在地区内，铺设企业所必需的铁路专用线，修筑公路和架设输电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5.免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公司开展生产活动以及按照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制度和条件，建造公司工业和住宅建筑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和物品，不是用于开展生产工作和为公司建造工业及住宅建筑，而是属于个人消费品和公司职员的文化用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交纳进口税；

6.按照为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使用新疆省境内的公共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在公司企业所在地区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7.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花费；

8.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公司的工人和职工开办商店、医疗机构以及俱乐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

构；

9.建立内部警卫队保护公司的建筑和设施；公司的企业和财产的外部保护，由中国当局自己支付费用来完成；

10.开设短训班和学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挑选和培养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干部。

第十条 在公司开展活动的条件方面，尤其是在交纳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和关税方面，将向公司提供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同的条件。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 1.股东大会；
- 2.董事会；
-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 1.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 2.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指示；
- 3.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 4.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五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七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八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十九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3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3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规定他们的奖金；
-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作出决定：购买、割让和抵押不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二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而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三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与此同时，公司不动产的购买、割让和抵押，只有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这一点的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第二十四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者是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派。当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寻找、勘探、研究工作以及确定寻找和勘探结果的工作，由在公司任职的苏联和中国专家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完成。

营业年度

第二十七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结论性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双方将就公司继续开展活动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十九条 公司章程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注册。

附件二：

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以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苏联石油工业部(全苏石油天然气产地勘探托拉斯)为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为另一方，双方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称为“苏中石油公司”，中文简称为“中苏石油公司”。

公司的所在地是迪化市(乌鲁木齐)。

第二条 附在本章程第一条所指的协定后的地图上，已经标注了被指定作为公司最初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活动区域界线。

在第一个5年活动期间，公司将在指定地域内的地质勘探基础上，挑选出用于进行寻找、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工作的地区。

公司进行活动所必需的土地，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公司提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给公司的土地，在公司不再需要这些土地的情况下，将由公司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3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4600万卢布，共分为92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600股总额为2300万卢布属于苏方——苏联石油工业部(全苏石油天然气产地勘探托拉斯)，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600股总额为2300万卢布属于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

苏方根据创办人之间商定好的清单和价格，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设备和运输工具，总数额为2300万卢布。

中方：

中方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向公司转交开采和加工石油、天然气和石油衍生品所必需的新疆省的土地；原“独山子”石油联合公司的房屋和建筑设施以及为公司建造工业设施和住宅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数额为2300万卢布，与此同时，对于上述所列的中方投资部分的财产估价，应该取得双方的一致认可。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任何一方向公司转交相应数量的货币，作为自己的投资份额。

第六条

1.公司的股票将是记名的。转让股票只能在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的利润将在苏方和中方之间平均分配；

2.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3.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开展自己的工作。

第九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条指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

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 1.在公司活动地区内，寻找、勘探和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伴生品，并对其进行加工生产；
 - 2.建造和构筑工业的、辅助性的、日常居住用的和公司所必需的其他建筑和设施；
 - 3.购买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动产和不动产，有权将这些财产割让，有权签署借款和贷款合同；
 - 4.公司在自己企业的所在地区内，敷设企业所必需的铁路专用线，修筑公路和架设输电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 5.免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公司开展生产活动以及按照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制度和条件，建造公司工业和住宅建筑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
- 公司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和物品，不是用于开展生产工作和为公司建造工业及住宅建筑，而是属于个人消费品和公司职员的文化用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交纳进口税；
- 6.按照为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使用新疆省境内的公共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在公司企业所在地区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下需要中国当局的批准；
 - 7.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花费；
 - 8.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公司的工人和职工开办商店、医疗机构以及俱乐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
 - 9.建立内部警卫队保护公司的建筑和设施，公司的企业和财产的外部保护由中国当局自己支付费用来完成；
 - 10.开设短训班和学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挑选和培养公司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干部。

第十条 在公司开展活动的条件方面，尤其是在交纳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和关税方面，将向公司提供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同的条件。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一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 1.股东大会；
- 2.董事会；
-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1. 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2. 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的指示；
3. 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4. 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五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七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八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十九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3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3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而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并规定他们的奖金；
-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做出决定：购买、割让和抵押不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二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3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而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三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与此同时，公司不动产的购买、割让和抵押，只有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这一点的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第二十四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五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由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职员按人数均等原则，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选派。当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苏联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中国公民担任；反之，如果某个部门、分部和工作人员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国公民时，其副职就应该由苏联公民担任。

公司寻找、勘探、研究工作以及确定寻找和勘探结果的工作，由在公司任职的苏联和中国专家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完成。

营业年度

第二十七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结论性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双方将就公司继续开展活动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十九条 公司章程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注册。

附件三：

苏中航股份公司的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活动对象

第一条 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成立苏中航股份公司的协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航管理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管理局，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成立苏中航股份公司，其名称俄文简称为“苏中航公司”，中文简称为“中苏民航公司”，公司的所在地是北京市。

第二条 组织开通和运营民用空中航线是本公司的宗旨。

- 1.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
- 2.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肃州—哈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
- 3.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

公司的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沿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的飞行，应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获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之后，方可进行。

公司还可以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组织开通和运营其他空中航线。

公司的活动期限

第三条 公司活动的期限确定为10年。

公司的股份资本

第四条

1.确定公司的股份资本总额为4200万卢布，公司的股份资本分为8400股，每股票面价值为5000卢布；

2.公司股份按如下方式分配：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200股总额为2100万卢布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航管理总局，全部股份的50%或者是4200股总额为2100万卢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管理局；

3.公司的股份资本可以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协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和中方的平等份额将保持不变。

第五条

1.作为支付自己在公司股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创办人应向公司转交：

苏方创办人向公司转交：

飞机、发动机、无线电设备、汽车运输设备、维修厂和机场设备以及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任何设备，公司在其活动期限内，根据创办人之间协商一致的名单，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苏联境内的机场、航空站、航空客站、各种建筑和设施、办公室、住宅和库房，以上财产的总

价值是1500万卢布；苏方在哈阿航空公司法定资金中所占的份额为360万卢布以及240万卢布的现金。

中方创办人向公司转交：

修理厂、机场的可挪动的设备、通讯工具，公司在其活动期限内，根据创办人之间协商一致的名单，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场、航空站、航空客站、各种建筑、设施、办公室、住宅、库房和他们的所有设备及工具，以上财产的总价值是1500万卢布；中方在哈阿航空公司法定资金中所占的份额为360万卢布以及240万卢布的现金；

2.创办人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公司转交作为自己股份资本的财产和现金；

3.有关对创办人作为自己的股份资本，向公司转交的每一种品种的财产和工程的估价问题，那么应该自这些财产实际转交之日或公司有权使用它们之日起，在3个月期限内，由人数均等的双方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4.如果在最终评估之后确定，创办人的一方向公司转交的设备和物质财产，其价值不够抵补自己股份资本的份额，那么，它应该自这些财产实际转交之日或公司有权使用这部分数额不够的资本之日起，在6个月期限内，向公司交纳根据双方协商的美元或者是其他货币的现金，补足自己缺少的那部分股份资本。

第六条

1.公司的所有股票都将是记名的。未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不得将这些股票转让给第三者；

2.公司的股票采用俄、中两种文字发行，票面带有号码、日期、公司名称、公司的印鉴和获取股息的息票；

3.公司的股票由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以及公司总会计签字。

第七条

1.公司通过对纯利润的1%进行提留的途径建立储备资金，这种利润提留一直实行到储备资金总额达到公司法定资本总额为止；

2.公司还可以设立其他基金，其数额由股东大会共同确定。

公司的活动制度

第八条 公司无论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自己的活动时，应该服从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公司的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也应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的法律和法规。

第九条

公司的飞机上将用中俄两种文字涂上公司的识别标志——СКОГА和“中苏民航”。

第十条 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本章程第一和第二条指出的工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公司提供如下权利：

1.按照公司所开通的空中航线运送旅客、邮件和货物，考察、设计和建立新的航线，公司将根据本章程第二条的规定批准这些航线的运营；

2.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苏联和中国国有企业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和优越性，包括使用为苏联或中国国有企业规定的价目、公共通讯设施和运输工具；

3.购买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动产，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

4.在每一单独的情况下，经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公司的活动地区内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房屋和设施；购买不动产和割让这些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建立确保公司飞机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

5.签发规定的运输文件，开展货物保管业务，签发仓库存单和抵押单据，接受关于货物应支付的税金和海关税的委托；

6.可自由使用属于公司的货币进行任何支付和开支；

7.在向中国人民银行买卖外汇时，公司将享有不少于银行给予其他中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及组织的优惠条件。公司将毫不困难地从中国当局得到外汇，用于支付公司在外国开展活动的花费以及购买飞机、设备、燃油油料和其他材料，这些款项均出自于公司营运业务的收益中；

8.有权免除任何税收向苏联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口飞机、发动机、设备、材料、运输设备、机械工具、燃油油料和公司正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其他财物；

9.公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经营汽车运输和货物运输业务。

第十一条 公司每年将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上交公司利润的20%，作为支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的以及将来可能规定的各项税收，包括公司及其办事处和代理机构注册应缴纳的税金。这个数目将在双方之间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航行的公里里程数按比例分配。

公司的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公司的管理机构如下：

1.股东大会；

2.董事会；

3.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公司有自己的印章，上面标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字样和将由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的图形标志。

股东大会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

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下，均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营业年结束之后不晚于两个月内召开。

非正常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自身的意图或者是任何一位股东的要求组织召开。在提交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的申请书里，应该准确地指明需要大会讨论的问题。

自提交召开大会的申请书之日起，应在不晚于3周的期限内对该要求予以满足。

第十四条 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属于公司业务范畴的一切问题，同时股东大会还必须管理：

1.审理关于变更和补充公司章程的问题；

2.选举董事会成员，规定给董事会成员的奖励以及批准和变更给公司管理机构的指示；

3.审核和批准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计划和财务营运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决算和收支平衡；

4.分配利润和确定补偿上一年度亏损的方法。

第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以书面函件的形式，在大会召开之前3周之内通知各位股东，并通告大会召开的地点和会议日程。

董事会关于拟定讨论的问题的报告，最低限度应该在会议召开的前7天之内，提交各位股东审查。

第十六条 应该在股东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正是通过董事会提出的，为此，希望在大会上提出某种建议的股东，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向董事会通报自己的建议。

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主席主持召开。

在董事会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主持召开。

在股东大会上，苏方和中方的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

第十八条 对于股东大会的决定应该一致通过。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理。

第十九条 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将形成一份会议记录，其中应该指明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出席大会的各位股东，简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定。

会议记录文件应该由出席会议的苏中双方代表签字。

董事会

第二十条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两年，由6名成员组成，其中的3名成员是从苏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另外3名是从中方代表中按自己的提议选举出的。

董事会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在公司最初两年的活动期间，董事会主席从董事会中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副主席从董事会苏方代表中按其提议选举产生。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中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而苏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视需要召开会议，但是，一年之中不能少于两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会主席召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副主席主持。

为了确定董事会会议真实有效，要求至少有4名董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必须在董事会苏方和中方代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予以通过。

董事会的每一次会议都将形成会议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都将在记录文件上签字。

董事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会议。

在董事会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该交给股东们审理，而在股东之间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提交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审理。

第二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而以下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管理：

- 1.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规定他们的奖金；
- 2.对总经理的工作实施监督；
- 3.审理和初步批准由总经理提交给公司的决算报告；

4.对于由它专门管理的业务作出决定：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建设和设施，购买和割让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况下获得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建立确保飞机沿公司的航线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设立公司的办事处和代理处；签署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合同；规定沿公司航线运送旅客、货物和邮件的价目；

5.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理的问题；

6.召开日常和非常股东大会。

总经理、副总经理

第二十三条 由董事会任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在公司活动的最初两年里，总经理根据苏联方面的提议，从苏联公民中选派，而副总经理根据中方的提议从中国公民中选出。

在每一个接下来的3年里，上一个3年中苏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将由中方代表接替，而中方代表担任的职务，将由苏方代表接替。

第二十四条 在没有得到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除由于本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或者是董事会专门管辖的事务之外，总经理领导公司的全部工作，管理所有日常事务、财产和公司的资金。

将向总经理提供如下权利：签署合同，对一切日常事务承担责任，购买、租赁、抵押、割让任何种类的动产和不动产；建设主要的和辅助的企业；毫无例外地实现一切日常的银行和信贷业务；代表公司签发委托书，包括管理公司办事处和代办处的委托书；确定企业运营的制度和规章；接纳和开除公司的工人和职工，规定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劳动条件，提出起诉，负责答复对公司提出的起诉。

建造和构筑公司开展活动所必需的建设和设施，购买和割让不动产，开设辅助企业，建立确保按公司的空中航线进行安全飞行所必需的无线电站和无线电导航设施，所有这一切活动只有在董事会在每个单独情况下作出决定之后才能进行。

第二十五条 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委托给他的职责，而在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副总经理将代行总经理的职责。

第二十六条 期票和其他借据应该由总经理签字，或者是副总经理和公司的总会计共同签字。

公司的人员编制

第二十七条 公司所有的地勤人员、飞行员、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从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中挑选。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培训中国公民，为公司提供必需的航空专业人员。

营业年度

第二十八条 营业年度自每年的1月1日开始，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

第一个营业年度自公司注册之日开始，于1950年12月31日结束。

亏损的补偿

第二十九条 如果公司的业务出现亏损，那么，将依靠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航行的公里数成比例地获得补助金，抵补出现的亏损。

公司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那部分亏损，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均地进行补偿。

结论性的决定

第三十条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1950年3月27日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协定有效期限内，公司将一直保持自己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公司将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注册。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31-32、116-126、127-138、
139-152

№0027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访华计划 (1950年5月12日)

绝密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 [185] 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李周渊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与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

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一、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二、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三、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以及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四、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3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90-94

АВПРФ, ф.0102, оп.6, п.22, д.49, л.49-67

№09079 中共中央情报部通报：美、日、蒋的反共计划

[186] (1950年5月12日)

卡拉布霍夫译自中文

第62号通报

美国人、日本人和国民党分子的反共计划

根据获得的情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希尔曼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1月31日从美国来到日本，以便与麦克阿瑟进行协商，并且决定将解决远东的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交给麦克阿瑟.....在这以后，共同草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计划。

.....

4.把中国分成6个区：东北、北部、中部、南部、西北和西南，并且建立情报和反宣传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应该在日本人的协助下由中国人来完成，仍然由美国人实施领导。

5.当日本将自己的军队派往中国时，决定用100多个师(每个师计有10000人)的兵力从朝鲜向东北进攻。在东北，主要由日本军队在美国海军和空军协助下展开行动。

.....

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176-177

№124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宗教代表团访华(1950年5月12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2日

第152项 关于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提出的如下建议：

1.满足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请求，允许由库尔斯基·涅斯托尔主教(西多鲁克·格奥尔基·马丁诺维奇)和莫斯科市大司祭焦尔诺夫·米哈伊尔·维肯季耶维奇组成的宗教代表团前往中国(北京和其他城市)，期限为1个月，以便考察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在中国的宗教使团的活动情况。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向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发放6000卢布的外汇资金，用于支付涅斯托尔主教和焦尔诺夫大司祭的旅途费用。

3.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卡尔波夫同志)，按照苏联卢布的相应兑换率，偿清上述所说数额的外汇款项。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35-36

№24796 2 季托夫致叶罗费耶夫通报：关于苏联对华广播(1950年5月12日)

..... [187]

根据我们对在中国的天津和青岛居民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的收听情况进行的的研究，可以确定：

一、只有很少人收听苏联为中国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收听这些节目的主要是公职人员。而且他们也不经常收听。.....

二、根据天津广播站工作人员的数据，天津居民大约有10万台收音机。但主要是日本的三灯型标准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有7万多台，在日本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期间，这类收音机比较流行。通过这样的收音机是不能收听到莫斯科播出的节目的。这类收音机是用于收听地方的广播节目的。.....

三、通常，能够收听到苏联为中国播出的节目的比较好的收音机，只有比较富裕的居民——资本家(商人、企业家、银行家等)才有，这类人比较喜欢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或者其他国家的音乐节目，而不是苏联的广播节目。工人和职员没有这样的收音机，因此，他们不可能收听

苏联为中国播出的广播节目。.....

四、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青岛，都没有在实践上组织群众，集体收听苏联播出的汉语广播节目。中苏友好协会领导干部已经答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五、根据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领导人的看法，收听苏联对华广播节目的听众人数少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居民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以及对广播节目应有的兴趣。.....

对于我们为中国听众播出的广播节目的意见，可以归结如下：1.苏联在天津为中国播放的广播节目在波段379.3、422.5和16.65收听效果最好。.....2.播音员的播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听明白，但不能完全听明白。尽管女播音员的播音要好于男播音员的播音，但她的播音也不是纯粹的北京口音，而是混杂有山东口音。播音的速度也应该稍慢一点，特别是在对一些特别的字和名称进行播音的时候。3.苏联广播节目的选题，特别是新闻节目的选题中都包含有一些中国的广播台播出内容。因此，广播节目的一些听众对这些节目没有兴趣。许多收听我们对中国广播节目的听众请求播出更多关于苏联在生产、经济和文化建设各方面的生活和取得的成就的一些特别的文章、谈话和讲座。他们请求对这些节目的选题事先进行通知，以便可以集体组织收听或者通过当地的广播站转播这些节目。4.我们广播节目的时间安排有些不合理。最为合适的播出时间段为当地时间(同莫斯科时间的时差为5个小时)12—14时和18—20时。

.....

A.季托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178，л.347-349

№00278 罗申致莫斯科电：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 (1950年5月13日)

绝密

发自北京

立即报告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5月13日23时30分，周恩来来我处，并根据毛泽东委托转告以下事项：

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年5月13日来北京。

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三、朝鲜同志将在北京停留两天。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根据罗申同志转来的菲利波夫同志的上一封电报，本应在近几天内就接到说明。

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Н.罗申

1950年5月13日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1 , л.52-53

АВГРФ , ф.059а , оп.5а , п.11 , д.3 , л.100-103

№0027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1950年5月14日)

1950年5月14日4时10分收到

1950年5月14日5时30分发出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菲利波夫”

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维辛斯基(签名)

1950年5月14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复件存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5

№1456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对朝鲜局势的评价(1950年5月14日)

机密

发自北京

急件

特件

菲利波夫同志：

5月14日14时40分，我拜访了毛泽东，并将您的电报面交给他。毛泽东同志对回电表示感谢，并说，5月13日晚，朝鲜同志同他交谈时详细地向他通报了国内局势以及同您谈话的情况。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同意他们对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毛泽东继而指出，他告诉朝鲜同志，(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

能作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

Н.罗申

1950年5月14日

分送下列同志圈阅：斯大林、斯大林 [188]、莫洛托夫、马林科夫、
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ГР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34 , л.56

№139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统一后与中国签约(1950年5月16日)

绝密

密码电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1950年5月16日优先拍发

特件

“请转告毛泽东，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朝鲜统一后与其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维辛斯基

1950年5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4 , л.136

РГ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34 , л.57

№124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1950年5月17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7日

第189项 关于中国电影工作者来苏联的问题。

采纳苏联电影部的提议，并准许苏联外交部把入境签证发给8名中国电影创作人员，好让他们来参加苏联电影制片厂制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的工作。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44

№125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允许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休假(1950年5月18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8日

第198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允许14名大学生和苏联机关的2名工作人员——苏联公民、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在暑假期间前往中国休假(名单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第198项

希望到中国休假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公民)的名单

1.朱敏(齐英)，1928年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同志的女儿。1941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一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乌萨切夫大街64栋62室。

2.刘允斌·克里姆，1925年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1939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

习。住在莫斯科市斯特罗梅克大街32栋294室。

3. 壮壮·阿尼亚(蔡壮壮)，1928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和森同志的女儿。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四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B.雅基曼卡大街40栋35/2室。

4. 大宝·弗拉基米尔(郭志成)，1925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郭亮同志的儿子。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热力工程系五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

5. 张芝明，1927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太雷同志的儿子。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6. 特特·罗莎，[189] 1925年出生，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蔡畅同志的女儿。1938年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利斯特温林荫大道16栋3单元308室。

7. 格拉西莫娃·玛娅(张玛娅)，1926年在苏联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学院无线电广播系五年级大学生。住在莫斯科阿维阿莫托尔大街109-a东655室。

8. 索科洛夫·马扬(宣马扬) [190]，1928年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刘鼎[191] 同志的儿子。莫斯科财政学院财会系三年级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9. 陈保罗(陈印)，1928年出生，1941年来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ЧжанФань) [192] 同志的儿子。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

10. 陈梅利(陈辉)，1931年出生，1941年来到苏联，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 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一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

11. 克鲁普尼克·然娜(乔克祥，ЦяоКэ□сян)，1930年出生在莫斯科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工作人员乔伯臣(ЦяоБэ□чен) 同志的女儿(其母Ф.Е. 克鲁普尼克是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的校对员)。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习。住在莫斯科市新巴斯曼纳亚大街10/2栋123室。

12. 陈祖涛·雅沙，1927年出生，1939年来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陈臧沪(ЧенЦанхоу) 同志的儿子。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机械工艺系五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10栋50室。

13. 什帕托夫·谢尔盖(赵世克)，1928年生于苏联，中国妇女联合会工作人员赵世炎同志[193] 的儿子。莫斯科大林钢铁学院五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市。

14. 涅维罗夫·沃娃 [194]，1926年生于莫斯科，民主人士沈志远(沈观澜) 的儿子。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四年级学生。住在列宁格勒市。

希望前往中国休假和探望自己的双亲——中国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苏联机关工作人员的名单

1. 林琳·奥莉加，1924年出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祖涵) 的女儿，曾经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接受教育，在无线电广播委员会里担任播音员，苏联公民。居住地址是：莫斯科市佩斯查纳亚大街700巷3栋30室。

2. 继飞·弗拉基米尔，[195] 1926年出生，已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若飞 [196] 的儿子，其母亲住在北京市；曾经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的学生，苏联公民；在外国文学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居住地址是：莫斯科市祖博夫林荫路21栋。

№125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政府移交财产事宜(1950年5月18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18日

第202项 关于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移交东北和大连市财产的苏中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的指示。

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审理由维辛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和梅尔库洛夫同志提交的、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移交东北和大连市财产的苏中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的指示草案。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47

№24805 苏方向旅大地区中苏友协转交的资料清单 (1950年5月18日)

我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和中苏友协旅顺大连地区副主席王勤(ВанЦюнь)，完成了如下工作：格鲁舍茨基转交了如下材料，而王勤接受了这些材料：

一、展览照片

《莫斯科庆祝1950年五一节》(21副照片)，一份

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公报》(英语)

1.1949年第58期，60份

2.1949年第59期，60份

三、书籍(中文)

1.斯大林：《论列宁》，5本

- 2.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8本
- 3.戈尔巴托夫：《没有被征服的》，18本
- 4.列宁：《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俄语版，4本
- 5.A.П.契诃夫：《短篇和中篇小说集》，5本
- 6.《勇士之路》，5本
- 7.A.沃尔科夫：《两兄弟》，5本
- 8.Ю.利别京斯基：《被流放的勇士及其朋友和敌人》，6本
- 9.Б.莫吉列夫斯基：《И.И.梅奇尼科夫》，6本
- 10.A.阿列克辛：《31天》，4本
- 11.M.伊林：《征服自然》，6本
- 12.叶甫根尼·佩尔米亚克：《旅行的艺术》，7本
- 13.瓦赫坦·阿纳尼亚：《在塞凡河岸》，6本
- 14.Л.沃龙科娃：《雪飘》，4本
- 15.A.佩尔菲利耶夫：《大家族》，5本
- 16.《年复一年》，1本
- 17.B.马雅可夫斯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11本
- 18.A.盖达尔：《楚克和黑克》，4本
- 19.西伯利亚人Д.Н.马明：《傻猎人》，4本
- 20.Д.米罗诺娃：《佩图什基美丽的山脊》，5本
- 21.C.米哈尔科夫：《兔子奇遇记》，4本
- 22.И.С.屠格涅夫：《雌鹌鹑》，3本

23.《1950年儿童工作进程表》，1本

24.A.H.托尔斯泰：《伊万王子和大灰狼》，4本

25.C.波戈列洛夫斯基：《“五一”节》，4本

26.III.佩罗：《神秘的人》，4本

27.C.马尔沙克：《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5本

转交人：格鲁舍茨基

接收人：王勤

1950年5月18日

于大连市

ГАРФ, ф.Р5283, оп.18, д.104, л.21-22

№1250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苏联电影配各国文字(1950年5月23日)

摘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

1950年5月23日

第221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准许苏联电影部：

1.制作电影《必遭灭亡者的阴谋》用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汉语、朝鲜语和德语配音的译制拷贝；

2.确保工作的高质量，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中国、朝鲜和德国的电影制片厂里制作电影的配制拷贝。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09080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66号通报：美国在东京安置的人员(1950年5月29日)

译自中文

第66号情报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邻国安置人员以加强反华的间谍活动

现已获悉，在东京担任麦克阿瑟顾问的工作人员中，有前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前驻上海总领事马康卫(地位不详)，担任麦克阿瑟政治顾问的有前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处主任切依斯。

卡拉布霍夫

1950年5月29日

АВІРФ, ф.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182

№24806 张仲实致科舍廖夫函：关于苏联无线电广播问题(1950年5月30日)

А.И.科舍廖夫 [197] 先生：

特别请求您挑选如下材料，并对所提问题作出答复。如果不能满足所提请求，那么请告知。

中原大学图书馆需要一批关于马列主义问题的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教学材料。请告知我们，以什么方式能得到这些书籍和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管理处需要如下材料：

1.同广播问题(无线电工业、广播和无线电管理等)有关的书籍、杂志和报纸；

2.《真理报》、《红星报》等；

3.在莫斯科广播站广播汉语节目；

4.关于苏联音乐和戏剧的书籍与报纸。

此外，请求回答如下问题：请简单介绍一下苏联广播站的发展，苏联广播站是怎样科学地进行领导的，苏联广播站怎样制作广播节目，怎样同群众保持联系，怎样组织节目。

此致

敬礼！

北京，中苏友协

张仲实

1950年5月30日

ГАРФ, ф.Р8581, оп.1, д.430, л.109

№24807 塔拉索夫的报告：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 **[198] (1950年6月 [199])**

.....

今年4—5月，应中国青年新民主联盟的邀请，苏联青年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将近1个月时间内，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了22个城市和一些农村。在华北，苏联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和曲阜，在华东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在华南访问了汉口、武昌、长沙、广东，在东北访问了沈阳、哈尔滨、抚顺、鞍山、吉林、长春、安东、大连和旅顺。

代表团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参加了196次各类群众集会，有76.3万名中国青年男女参加了这些集会。在同中国青年进行会见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向他们详细地阐述了苏联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同中国青年会见的形式是群众集会、作报告和进行谈话。还就苏联体育运动和文化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谈话，这样的谈话进行了6次。

我在本报告的后面还附有如下报告：1.关于向新中国体育运动提供援助的建议的报告，其中也提出了向中国发送的体育作品和体育用品的

大致清单。2.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在1949年10月26日召开的中国体育爱好者会议上作的报告。3.体育比赛的素描画。

.....

A.B.塔拉索夫

ГАРФ, ф.Р7576, оп.2, д.527, л.41-50

№1659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中共代表团的感谢信 (1950年6月19日)

斯大林同志：

送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给您的中文信的译件。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2人在苏联待了3个月。

这一段时间，代表团的成员听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了解了联共(布)党组织的经验和实践。

6月18日，在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后，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已回国。

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的中文信件。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6月19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第25 C 1023号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荣誉，派我们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学习由列宁和您培育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

在学习期间，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更加深刻和具体地学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以及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这给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后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亲眼看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

永垂不朽的列宁曾经生活和工作的莫斯科以及您作为列宁事业最忠诚、最杰出的继承者工作的地方莫斯科，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中心，而且是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

我们访问了以永垂不朽的列宁命名的英雄城市，它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与列宁决定人的命运的伟大事业相关的历史古迹以及卫国战争时期英雄的列宁格勒的战场和其他文化、艺术文物。

我们还访问了另一座英雄城市，它两次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国内战争时期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里保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座城市是用您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在那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勇战斗痕迹，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快速前进的、规模宏大的恢复和建设成果。

我们还访问了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它的首都塔什干。在那里，我们亲眼看到了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地区在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在短期内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共和国。这是由您领导下和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突出成果。

所到之处，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和文化生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和首创精神。这一切再一次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和永垂不朽。这一切都是联共(布)的政策的结果，而这些政策则是苏维埃社会和您英明、天才的领导力量的结果。

我们到处得到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孩子们的热情接待和关怀。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怀有很大的兴趣。这证明，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在离开你们国家之际，我们衷心地向您，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领袖和导师，并向您所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在我们学习期间给予的关心、照顾和帮助。

回国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全力运用丰富而珍贵的学习成果，在为夺取中国人民新胜利的斗争中、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您的最忠诚的、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道路。”我们将忠实地执行您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请允许我们祝您身体健康。

中国和苏联人民的永恒友谊与团结万岁！

世界民主力量的堡垒、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苏联万岁！

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旗帜——联共(布)万岁！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

张秀山 钟明(Чжун Мин)

王福(Ван Фу) 陈鹏(Чэнь Пэн)

王友善(Ван Яошань) 苏江一(Су Цянъи)

金洁群(Цзинь Тецюнь) 谢逊(Се Сюнь)

于斌(Юй Бин) 曾学坤(Цзэ Сюэгун)

马伟茹(Ма Вэньжуй) 杨士杰

刘谦(Лю Циэнь) 赵世晨(Чжао Шичжень)

王宝金(Ван Боцзинь) 张凡时(Чжан Фынши)

王大军(Ван Дацзюнь) 范如深(Фань Жушэн)

包晨际(Бао Чэнцзи) 张友渔(Чжан Яоюй)

于杰(Юй Цзэ) 杨卫华(Ян Вэньхай)

李晨廷(Ли Чжентин) 王杰(Ван Цзэ)

胡一鸣(Ху Иминь) 袁致勤(Юань Чжицин)

曹敏新(Чжао Минсинь) 邵天任(Шао Тяньжэнь)

朱烈(Чжу Ле) 陈秀莲(Чэнь Сюлян)

鲁金茹(Лу Цзинжу) 李军(Ли Цзюнь)

赵民新(Чжао Минсинь) 高旗云(Гао Циюнь)

李在旺(Ли Цзэван) 杨义臣(Ян Ичэнь)

刘环占(Лю Хуанчжань) 谢本芝(Се Банчжи)

王新华(Ван Синхуа) 蒋斌(Тянь Пин)

孙西岐(Сунь Сици) 肖斌杰(Сяо Бинцзэ)

何哲(Хэ Цзай)

АПРРФ , ф.3 , оп.65 , д.195 , л.113-116

№13276 奥尔洛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代表团赠送礼物 (1950年6月21日)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在启程回中国的那一天，留下了一些送给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国立列宁图书馆、东方文化博物馆的礼物以及给计量器厂和三山纺织联合企业的97包茶叶。同时，代表团还留下了一些私人礼物。

代表团的领导请求按照指定的名单转交这些礼物。

我认为代表团的请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请求您的同意。

附收礼人的名单。

A.奥尔洛夫(签名)

1950年6月21日

附件：

中共党务工作者代表团拟定的收礼者名单

给私人的礼物

- 1.格里戈良同志——4枚徽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肖像，1幅狮子形象丝绣品。
- 2.奥尔洛夫同志——1幅老虎形象丝绣品。
- 3.科瓦廖夫同志——2幅丝绣品。
- 4.拉希莫夫同志——1幅丝绣品。
- 5.谢尔巴科夫同志——1幅狮子形象丝绣品。
- 6.波波夫同志——1幅丝绣品。
- 7.西季赫梅洛夫同志——1幅丝绣品。
- 8.无名氏——2幅丝绣品。
- 9.无名氏——1幅丝绣品。
- 10.无名氏——1幅丝绣品。

给组织的礼物

- 11.东方学研究所——1包书。
- 12.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风景照片，毛泽东、刘少奇的肖像，军队的…… [200]，8只绣花枕套。
- 13.…… [201]
- 14.东方学研究所——1包中文的文学作品。
- 15.东方学研究所——1包中文的杂志。
- 16.地方文化博物馆——照片，1件刺绣品，4本书。
- 17.列宁图书馆——5本书。
- 18.茶叶——22块砖茶，预先包装好，共75包。

1950年6月21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94, л.23-25

**№13287 科瓦廖夫致罗迈进函：对中国书籍提意见
(1950年6月30日)**

Я.М.罗迈进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寄来201本中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并请我们对这些书的质量提出意见。

我们认为要我们对这些书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建议把这些文学作品转交给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

请求您同意。

Е.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6月30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94, л.48

№00281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领导人的政治情绪 (1950年7月2日)

1950年7月2日4时发自平壤

1950年7月2日5时47分收到

1950年7月2日5时55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冯西 [202] 同志：

复362号电。

向您报告美国人武装干涉后北朝鲜的政治情绪。

随着人民军战斗开始获胜，特别是解放了汉城之后，居民表现出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

解放区的大部分居民热烈地迎接人民军并多方协助军队行动。到处在建立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和社会政治组织)，安排生产和贸易。在这段时间，甚至反动分子都没有公开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军的活动。

人民军的胜利进攻加快了游击队员的活动，目前在南朝鲜军队的后方游击队运动在广泛开展。

然而，由于美国的广播大规模开展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宣传，美国空军频繁袭击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居民点、生产设施和军事目标，居民的政治情绪有些沮丧。

个别人开始不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情绪低落，而在解放区，少部分居民持观望态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的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朴一禹 [203]、金策 [204]、崔庸健 [205]、姜健 [206])对朝鲜目前的军事政治形势持有正确评价，有信心获取全胜并全力以赴进一步扩大向南朝鲜的进攻。

金日成和朴宪永明白因美国人参加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给朝鲜带来的种种困难，正采取必要措施稳定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供应。

金日成打算再组建一些步兵部队、坦克部队和海军部队。他们打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

然而，有些领导人(其中有金科奉 [207]、洪命熹 [208])认为靠朝鲜军队进行反美战争有困难，并以谨慎的方式向金日成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关于金科奉、洪命熹同金日成谈话的这些情况，是金日成的秘书告诉我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中的右派活动家和中间派活动家支持政府的所有措施，然而他们目前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动员自己的党在南方开展活动。

我已告知金日成，苏联政府将满足其对武器和弹药的申请。

朝鲜人民政府中总的状况仍然良好，可以继续保障人民军的积极进攻。

什特科夫

1950年7月1日

第423号密码电报

№00284 斯大林致罗申电：关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集结的问题(1950年7月5日)

1950年7月5日23时45分收到

1950年7月6日0时55分发出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一、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二、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三、您关于苏联飞机在中国东北领空飞行的消息未得到证实。已下令禁止此类飞行。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79

АВГ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115

№00285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经中国东北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1950年7月6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同志

复第439号密码电报

一、武器将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 [209]

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三、我们全部供给2个师、2个坦克旅和12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以及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12000人。必须在各师建立征兵机构，负责补充兵员并对其加以审查和训练，然后补充到各师。这才是最重要的。

冯西

1950年7月6日

第374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40

АВРФ, ф.059a, оп.5a, п.11, д.3, л.116

№09121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溥仪战犯(1950年7月6日)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已于1950年3月9日(№978/сск)向您报告过，把内务部集中营所关押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他的家属和亲友、原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中国将军和其他官员，共58人，以及属于溥仪及其随员的个人财宝(价值94.9万卢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适宜的。

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接收溥仪，如果苏联政府能为此抽出时间的话。

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准备把溥仪及其随员移交中国，因此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自己

关于把这些人移交中国当局的地点、时间和考虑。

附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

请您批示。

C.克鲁格洛夫

A.葛罗米柯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7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将正在苏联的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侍从、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其他官员共58人交由中国当局支配，并协商将他们移交中国当局的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属于溥仪及其随从人员的价值94.9万卢布的各种珠宝首饰也将移交中国当局。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向中国当局移交上述被扣留的中国人及属于他们的珍贵物品。

ГАРФ, ф. Р 940I, оп.2, д.269, л.356-358

№00287 斯大林致罗申电：中国应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 (1950年7月8日)

1950年7月8日18时40分收到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

第379号密码电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82

АВГ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117

№2006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经中国铁路运送武器等事(1950年7月8日)

第477号

1950年7月7日，根据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

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问道：嘿，苏联顾问的事情进展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汉城？我答道，近两天我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至今仍未接到上级关于苏联顾问可以到三八线以南的指示。

金日成说，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向他询问苏联顾问是否与自己一同前往南部。金日成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于是姜健声称，如果苏联顾问不到汉城来，自己便什么也干不成。因为没有苏联顾问，自己便无法指挥部队。

我再次答道，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金日成说，如果苏联顾问不去汉城，那就意味着失败，再说一次，就是崩溃。金日成接着说，姜健请他立刻正式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其允许苏联顾问前往汉城，到各军团领导小组中去，自己将保证苏联顾问的安全，不会让他们当敌人的俘虏。

随后，金日成又让我向他解释成立预备役兵团，对其中人员进行培训和组建步兵营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的意义。

我向他作了详细的说明。

会谈期间我通知金日成，朝鲜最近预订的空军设备、武器和弹药已装运，将于7月8日运抵边境口岸。我问他，关于这些货物经中国铁路转

运至朝鲜境内之事是否已与中国人达成协议。

他答，正式的协议还没有。不过，他已给高岗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与此同时，金日成带着明显的不满说道，没有人可以和他签订协议，因为在平壤没有中国代表。最后，金日成再次请我加快关于苏联顾问问题的答复。

金日成接着说，各地区均给他打电话，都是关于美国空军的空袭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今天美国人炸毁了一个铁路枢纽，咸兴地区被敌机摧毁的多座铁路桥仍未恢复。

在我与金日成的多次会面中，这是我首次看到他的心绪如此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193-194

№00293 斯大林致罗申电：准备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 (1950年7月13日)

1950年7月13日5时50分

第5426号

请将下列意见转达给周恩来或毛泽东：

“一、英国人通过其驻莫斯科使节向我发出正式声明，鉴于安理会相关决议，他们暂且无法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当然，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自己的军队撤回三八线，那么这可能会有助于加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英国人请苏联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

苏联政府认为英国人的这一要求是无礼和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应这样答复，即在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朝鲜问题已严重复杂化了。如此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有苏联、中国和朝鲜代表参加的安理会，并认真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才可能得以解决。

请通报你们的看法。

至于印度大使的声明，我们决定不予以答复，因为我们已经获悉，这个声明只是该大使的个人观点，与印度政府没有关系。

二、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地区部署9个师的兵力。如果你们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派遣携有124架喷气式飞机的歼击航空师去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们认为，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飞行员经过2—3个月的培训，我们再将所有空军方面的物资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这样，你们便可完成在上海组建空军师的工作。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请电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85

№2006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政府要求中国给予 军事援助(1950年7月15日)

1950年7月15日

第586号

根据金日成7月13日的邀请，我与他会了面。会谈一开始金日成便通报说，他已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石同敏(Сигунмя)。

受周恩来的委托，中国代办向金日成转达道，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

该代办接着说，周恩来在与他谈话中声称，中国人认为，不能容忍美国人对朝鲜发生的战争的干预。

中国代办请金日成向他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100000、

1：200000、1：500000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为此，他将从使馆派两个人(都是上校)，专门负责与国防部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代办要求金日成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

接下来，金日成又说，汉城有150万居民，很多人都失了业，工厂暂时又无法开工。有鉴于此，他打算让政府通过关于征招汉城工人到北朝鲜工厂工作的决议，而将另一部分(汉城)人迁移到农村。金日成指出，在北京的中国人也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并就此征询了我的意见。

我答，这是一项有益和合理的举措，如果他们能组织得力的话。

接着，金日成又将话题转向前线战况。他说，由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美国空军的活动，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他心情很沉重。因而他想派朴宪永或金科奉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量关于朝鲜今后该怎么办的问题。金日成认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我有意回避了他的这一问题，只是对他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

金日成没有重复上述问题，只是说，为了加强对南方的领导，他准备派以朴宪永为首的领导小组去汉城。

由于您的电报，我与金日成再次会面时，他也没再重提那个问题。

什特科夫

ЦАМО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03-305

№20067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

1950年7月20日2时30分(发报时间)

第649号

冯西同志：

7月19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

会谈伊始，金日成谈了前线战况。他生气地说，战局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对我们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一切变故都是由于美国空军。没有人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金日成说，他今天已经两次责骂了前线指挥官金策和前线司令部负责人姜健，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法理解整个形势的政治意义。

全世界都在关注：看我们将占领大田，还是将因此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

目前已有3个美军师进入这一地区。这些美军的到来使整个战局变得复杂化了，可他们(人民军前线指挥员们)仍不能明白这一点。

接着，金日成又指出，根据我方无线电台所截获的情报显示，美国人已命令：无论如何要阻止北方人的进攻，不让其突入安东和尚州地区。

我已再次向前线指挥员下达了命令，可他们没有有效地组织和执行我的命令。其借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空军，白天无法展开行动，而晚上又不便于采取行动。

接下来，金日成问我，应当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才能扭转目前前线的战局。

我指出，他应当比我更了解前线的情况。我说，根据苏联顾问的通报，人民军部队借口空军问题，近期实际上已停止了作战行动。要知道，美国空军的空袭活动是有时间间隔的，如早上6—7点钟，人民军部队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来进行作战行动。我方部队的进攻完全可以从早上4点就开始，但人民军各军和前线指挥部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战斗命令。

金日成说，自己想亲自去汉城，就地与各军和前线指挥部的高级将领交谈，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并警告他们，促使其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承担起对民族应负的责任。

我答，这是您的事。

接着，金日成又对我说，他想向我报告关于他的代表去中国的结

果。

在与中国代办会谈后，金日成决定派贸易省副相去中国，请求其给予武器和马匹方面的援助，因为北朝鲜目前急需这方面的物资。

中国人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

金日成又说，他的代表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对朝鲜战事很感兴趣。但他的代表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对战争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朝鲜同志怎么看——美国人是否将在朝鲜长期参战。在此，毛还加了这么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完全撤离朝鲜的，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会向朝鲜投入很多自己的军队。

金日成是否想过这样一问题，如何撤退，从哪里开始后撤，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

毛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是否想过向其他国家求助，以便后者派自己的部队来援助朝鲜。如果有过这样的请求，那么中国人也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

如果我们以外籍军团的方式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朝鲜，那么，就不会因此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金日成仔细考虑一下，并于8月10日以前向我们通报自己的意见。

金日成接着说，毛泽东请我们派一个了解目前朝鲜战争状况的军事代表去中国，并要求该代表必须在8月1日以前抵达中国。

金日成问我，派谁去中国合适呢，姜健是不能去的，他想派崔庸健（民族保卫相）去。

我回避答复这个问题，并声称，这是您的事。

金日成将话题转到关于外籍军团的问题上，他问，斯大林同志对此有何意见。

我答，关于斯大林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何见解，我目前一无所知。

于是，金日成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谈的只是自己的想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与斯大林同志协商过。

我再次答复道，我对此一点都不知道。

会谈最后，金日成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并说，这是周恩来的来信，其中罗列了中国人将援助朝鲜的武器清单。

金日成又补充道，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来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前来很困难。于是，他们请我们派军事代表去中国。

这样，此次会谈便结束了。

请通知我，中央是否将就上述所涉问题给我指示，如果下次见面时，金日成再提出这些问题，我将何以应对。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52-355

№0029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中朝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1950年7月22日)

发自北京，1950年7月22日20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7月22日14时30分从周恩来那里收到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收。

关于为中朝边境线地区我军部队提供空军掩护、我航空兵改装喷气式飞机并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的全部武器装备的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对于您的这一提议特表欢迎，并对您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关于我歼击机改装喷气式飞机问题，拟按以下方法加以解决。在巴季茨基 [210] 喷气机航空团的基地上于近两个月内建立一个改装训练中心。

为培养160名机组人员，以便使用你方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我方拟首先对混成航空兵旅现有65名歼击机机组人员进行改装训练。待其改装训练即将结束时，即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联合飞行技术航校1月份的毕业生中挑选人员进行第二批改装训练(100名机组人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于1951年3—4月内完成接收新式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完全能够在这一时限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为及时实现预定的改装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对60人同时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并要为其提供训练器材、直观教具及最必需数量的教练人员。为实际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派我空军代表及首席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空军少将前往莫斯科就此相商，是适当的。

请将您的决定告知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备注：在即将给您发出该电时，收到了苏联军事部 [211] 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给军事总顾问 [212] 和巴季茨基同志关于进行改装训练，并将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朋友的指示。有鉴于此，总参谋部已同我军事顾问共同准备了一个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中国的一个混成航空兵旅集中到上海、南京、苏州地区进行改装训练。所缺飞行员由哈尔滨—锦州联合航校抽调。有关飞机的转场和人员的集中工作将于1950年11月完成。

今天，此一计划将由中国政府审定并作出最后决定。看来毛泽东同志会将这一情况补充电告您。

Н.罗申

1950年7月22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4 , л.88-89

**№00296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同意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
(1950年7月25日)**

1950年7月25日4时30分收到

1950年7月25日5时55分发出

特档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Н.罗申：

复1503号电。

受菲利波夫委托，请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拟议的训练中国的喷气式飞机飞行员的方式和期限，已经同意。

请电告执行情况。

维辛斯基

1950年7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复件留底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4 , л.90

**№09123 维辛斯基和谢罗夫呈斯大林请示：向中国移交
战犯 [213] (1950年7月26日以前)**

绝密

第9号

И.В.斯大林同志：

在被审讯的日本战俘和被扣押在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集中营的人中，有24名中国国籍的蒙古人，对他们的审讯结果是，没有获得追究其刑事责任所需的足够材料。

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外交部认为，将这24名蒙古人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是适宜的。

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和蒙古人的名单附后。 [214]

请您决定。

A.维辛斯基

И.谢罗夫 [215]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7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准备将扣押在苏联境内的24名中国国籍的蒙古人移交中国当局管辖。根据后附的名单，在中国政府同意接收名单上人员的情况下，协商将他们移交中国当局的办法和日期。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谢罗夫同志)在上述蒙古人移交中国当局的办法和日期确定之后，组织实施移交工作。

ГАРФ, ф. Р 940I, оп.2, д.269, л.375-376

**№13285 罗迈进致帕利古诺夫函：关于中国土地法令的
资料(1950年7月27日)**

Н.Г.帕利古诺夫 [216] 同志：

我根据协议把关于已被发现的塔斯社在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令和新华社1950年6月30日的报道时的曲解之处的材料发给您。

附件1页。

Я.罗迈进

1950年7月27日

附件：

塔斯社7月1日的《远东公务信息通报》(第1页)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令。

在塔斯社的转载中，法令第30条条款说，法令承认“土地的主人完全有权自由地利用土地，但是不能出售和出租土地”。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6月30日所刊登的法令，用中文本校对塔斯社转载的文本，发现该条款应该读成：

“将承认土地的主人完全有权自由地开垦、买卖和出租土地。”

在塔斯社7月2日的另一篇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进行整党的决议》的报道中，也发现了与新华社报道大相径庭的地方。

塔斯社的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进行整党和首先是在领导人员中整党的决议。”

然而，刊登在7月2日《东北日报》上的新华社6月30日的报道中所说的，不是要进行整党，而是中共中央决定要进行一场“严肃整顿全党的工作作风和首先是干部的工作作风”的大运动。

土地改革法第30条内容和新华社6月30日的报道的曲解文字，刊登于7月3日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他报纸上。

Е.科瓦廖夫(签名)

1950年7月27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94, л.39-40

№24808-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1950年7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希望扩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的工作，并向中国派遣一些高水平的、能够对中苏友好的

工作提供帮助的干部，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罗申同志提出了关于在中国组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的问题以及在上海、广州和沈阳开办苏联文化宫的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同意罗申同志提出的关于在中国设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的建议，并请求批准Б.Г.博尔德列夫同志(经济学副博士，掌握英语，1949年前担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部门主任)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的代表，Е.Т.尤尔奇克同志(东方学专家，掌握英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工作)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的副代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认为，关于在上海、广州和沈阳开办苏联文化宫的问题应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处开展工作之后解决。

我认为可以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的提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7月27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手写批注：

不必收回。

莫洛托夫

9月6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32

[1] 1945年初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编注

[2] 该决议草案未公布。——原注

[3] 安德烈耶夫，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使用的化名。——编注

[4] 指A.葛罗米柯。——原注

[5] 指通过1945年8月中苏条约认定的由苏军管辖的旅顺、大连地区。——编注

[6] 这是莫洛托夫的签名。——原注

[7]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清单。——编注

[8] 附件随第368/ДВ文件已退回，4月15日。——原注

[9] 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10] 参见以下文件№20265。——编注

[11] 原文为Лилла，有误。——译注

[12] 给斯大林的文件是两份。以下同。——译注

[13] 即M.加里宁。——原注

[14] 原文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5] 1949年4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报告指出，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进步青年的积极分子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它的社会基础“应当比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编注

[16] 毛泽东给傅作义复电的时间是4月2日，电报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幡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472页。——编注

[17] 原文如此。当时任弼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编注

[18] 原文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20] 原文如此。——编注

[21]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是斯大林加的，正文中的着重线也是斯大林画的。——原注

[22] 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编注

[23]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原注

[24]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编注

[25] 文件为档案收集者摘抄件。——编注

[26]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画，下同。——原注

[27] 六角括号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原注

[28]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29]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0]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1]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2]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3]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双重竖线。——原注

[34]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5]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6]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括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编注

[37]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8]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39]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0]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1]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画的。下同。——原注

[42]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3]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4]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45] 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编注

[46] 所收集到的俄国档案只有前一封信。——编注

[47] 至圣，俄罗斯东正教对牧首的尊称，意为“神圣而至高无上的”。——编注

[4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贷款协定的。电报说：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见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编注

[49] 邓力群当时是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编注

[50] 今张掖。——编注

[51] 今武威。——编注

[5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均任副司令员。——编注

[53] 8月14日，科瓦廖夫与220名苏联专家和刘少奇同车离开莫斯科，8月25日到达沈阳。——编注

[54] 大林阅读文件时在以上两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55]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这段话旁边画有竖线。——原注

[56] 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7]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六角括弧内为编者校正的文字。——编注

[58] 原文如此，一般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编注

[5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文件。——编注

[6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文件。——编注

[61] 在档案原件中这里的手写签名难以辨认。——档案发布者原注

[62]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3] 收集到的该文件为打印草稿，文本中有一些删节之处。——编注

[64] 俄国公布该档案时未附戈宝权的信。——编注

[65] 林祖涵，即林伯渠的原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编注

[66] 该电报并未发出，经修改后，于11月5日发出，参见以下№11808文件。——编注

[67] 保大，越南皇帝的年号，保大皇帝原名阮福永瑞，1949—1955年担任越南国家元首。——编注

[68] 1949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周恩来11月29日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在目前迅速地继续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匪军、解放了我华南与西南广大地区的情况下，正日益接近我国的西南国境。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等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匪帮，正在把他们的希望转向越南及其他和中国国境毗连的地方，企图把这些地方作为他们的残兵败将的逋逃所，并准备把它们作为等待时机以便卷土重来的基地。为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法国政府及和中国国境毗连的各国政府郑重指出：彻底消灭国民党所有反动武装力量，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编注

[6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决议草案。——编注

[7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1] 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当时都是苏联著名的文学家。——编注

[72] 什捷缅科，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编注

[73] 韩光，时任旅大市市长，中共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编注

[74]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5]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以下№09065文件。——编注

[77] 原文如此，准确的名称应为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下同。——编注

[78] 路易·赛扬，时任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编注

[79] 原文如此，准确的名称应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下同。——编注

[80] 原文如此，应为1947年。——编注

[81] 档案原文复印件中此处一行字迹不清，无法译出。——编注

[82]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4] 贾拓夫，时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编注

[85] 陶峙岳，原国民政府新疆警备部队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时任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编注

[86] 盛世才，地方军阀，1933—1944年掌控新疆，曾一度推行依靠苏联、支持

中共的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投靠蒋介石，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1944年被调离新疆。——编注

[87] 原文这里用的是Кремль一词，即中南海，下同。——编注

[88] 即贾瓦哈尔·潘迪特·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编注

[8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90] 该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9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陶里亚蒂，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93] 吉林水电站即小丰满水电站。——编注

[94]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45—1951年出任艾德礼工党内阁的外交大臣。——编注

[95]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96]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97] 见以上№16572文件。——编注

[98] 所收集的该档案为草稿，文件中未标明发报人。——编注

[99]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军事顾问。——编注

[100] 格利巴诺夫，时任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编注

[101] 该档案中未标明发报人。——编注

[102]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103] 根据签字的笔迹判断，此件是维辛斯基呈报的。——编注

[104] 原文如此，即汪东兴。——编注

[105] 蒋廷黻，1936—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1947年出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编注

[106] 杜尔杰涅夫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法司专家。——编注

[107] 原文如此，应为1932年。——编注

[108]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9]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0]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11] 1951年苏联银屏上放映了C.尤特克维奇的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在对这部影片进行汉语配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以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良不得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原注

[112] 1950年5月12日，苏联驻天津领事馆负责人A.季托夫就苏联对华广播节目问题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远东部主任叶罗费耶夫作了报告。——原注

[113] 原文如此，应是国务卿。下同。——编注

[114] 1950年1月19日，毛泽东将他起草的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发给刘少奇，并指示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编注

[115]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时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编注

[116]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7]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附录一。——原注

[118] 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下同。——编注

[119] 笔误，正确的日期应为6月30日。——原注

[120]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附录二。——原注

[121] 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个附录。——原注

[122] 即上述信函所说的附件二：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见后。——编注

[123] 即上述信函所说的附件三，即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见后。
——编注

[124]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编注

[125]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共和苏共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编注

[126] 目前收集到的只有前3个附件。——编注

[12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发现了由库尔久科夫、费德林、克鲁季科夫等人翻译的这份文件的两个俄文译稿，译文略有差别，这里均未收入。收入的是下面提交给斯大林的此三人共同翻译的最后译稿。——编注

[128]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反映苏方修改意见的文件。一份是在中方文本译稿上进行修改的文件，文件抬头附有说明：“括号内是我们加入的部分，画线的部分是删除的。”此件未收入。这里收入的文件是对前一个文件整理后形成的，文件未注

明时间。但中国的材料显示，1月27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草案，并将会议同意这一草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且1月27日中苏双方再次讨论条约草案，由此判断，该文本是在1月26日提交给中方的。——编注

[130] C.扎沃龙科夫，时任苏联民航总局局长。——编注

[131] A.阿夫谢耶维奇，时任苏联民航总局副局长，后出任中苏民航股份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编注

[132] 在档案中还有三份苏方对中方这一协定的修改稿，上面删改的地方非常多，而且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但字迹潦草模糊，不易辨认，所以没有收入本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苏方对中方提出的这一协定草案最初是有很不同意见的，并且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这里收入的协定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编注

[133] 在档案中还有两份苏方对中方这一条约草案的修改稿(时间应在26日和29日之间)，上面有大量的删改意见，但字迹潦草模糊，不易辨认，所以未收入。不过可以认为，苏方对这一条约是进行了多次推敲和修改的。这里收入的一份文件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编注

[134] 1949年12月25—29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了日本战犯，确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编注

[135]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苏联政府发给中国、美国和英国政府照会的内容是，提议设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裕仁等日本细菌战犯。——编注

[136]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根据俄国档案文件的馆藏排列序号，判断中方起草的这一照会是与条约、协定等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37] 此后，苏方再次审议中方修改后的文本。编者在档案中发现了与此有关的三份文件：一份是标明“周恩来的草案”的打字稿，即此件；一份是维辛斯基2月2日呈交米高扬的文本，上面仅在个别文字旁边写了修改意见(如将苏联和中国的简称改为全称)，并删去了落款中的“2月”一词，但对文本没作任何改动；一份是米高扬2月2日签署“同意”的文本，除在中方改动的地方画了几道线外，与周恩来转来的中方修改后的文本完全一样(只是落款中没有“2月”一词)。——编注

[138]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鉴于1月31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贷款协定”的谈判，而俄国档案中在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文本上标有“中国的，1950年1月31日，周恩来”等字样，故判断此协定亦是中方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39] 此处“互助”一词的俄国档案原文是“合作”(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但在中苏双方提出本条约时的用语均为“互助”(взаимная помощь)，故有此译法。——编注

[140] 档案文件上未注明日期，鉴于1月31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贷款协定”的谈判，而俄

国档案中在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修改文本上标有“中国的，1950年1月31日，周恩来”等字样，故判断此协定和议定书的修改稿亦是中方同时提交给苏方的。——编注

[14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42]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43] 第(五)点中，原文即五括号，只有一行手写文字，但档案复印件字迹模糊。——编注

[144] 见此前各文件。——编注

[145] 见此下№05163文件。——编注

[146] 1945年中苏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规定其有效期为30年，这次中苏谈判时已经按中方的意见规定，苏联将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底无偿归还中长铁路。米高扬现在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在这个基础上把归还中长铁路的期限再延长10年。——编注

[147] 指中苏双方承认蒙古独立和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编注

[148] 苏方最后提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与中方提出的修改稿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以上№05157文件及注释。——编注

[149] 苏方最后提出的贷款协定除了将第三条中“工业品”一词改为“茶叶”外，与中方的文本没有区别。参见以上№05162文件。——编注

[150] 苏方提出的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与中方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在第一条“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后，加了“并根据该条约和协定的内容”一句。参见以上№05151文件。——编注

[151] 张秀山，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兼组织部长。——编注

[152] 贷款协定第三条规定，中国第一期还贷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编注

[153] 这里是指1946年11月4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耶夫递交的《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苏联政府对该建议迟迟未作答复，直到1949年1月24日，苏方才提出愿意就张治中的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提出了苏方的建议。1949年7月5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但协定草案上报中央政府后，外交部对其中部分条款不满，故拖延未批。——编注

[154] 以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是1950年1月30日到达莫斯科的。——编注

[155] 当时中国的贸易部长是叶季壮，他是随同周恩来一起到达莫斯科的。——编注

[156]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57] 参见以上№13329文件。——编注

[158] 即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原注

[159] 该信件通过苏联外交部发送。1956年2月28日，外交部通知苏联部长会议体育文化事务委员会说，关于发送上述文献的问题必须事先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进行商量。1950年3月7日，体育文化事务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发送了信函，并得到了许可。1950年3月13日，这些文献材料被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ГАРФ, ф.Р7576, оп.2, д.527, л.2 3.)——原注

[160] 参见以下№13952文件。——编注

[161] 即赛福鼎。——编注

[162] 原文如此。——译注

[163] 原文如此。——译注

[164] 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这一份电报。——编注

[165]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根据会谈内容估计报告者是米高扬。——编注

[166] 科舍廖夫，时任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代表。——原注

[167] 黑尔(Хэлл)，是德国人黑尔(Heil)发明的一种电报系统。——编注

[168] 此处档案原文СайфутдинГазизов，疑俄文拼写有误，应为СайфутдинАзизов。——编注

[169] 乌兰乌德为苏联城市，自1923年起成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编注

[170]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1] 该文件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2]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3] 原文如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江苏省的扬州至镇江之间的江面。——编注

[174] 所收集的档案以上缺页。——编注

[17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6]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7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78] 所收集的该档案没有标明时间，标题中的时间是编者根据文件内容所加。
参见以上№05141文件。——编注

[17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80] 即金策。——编注

[181] 此时，什特科夫陪同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编注

[182] 伊格纳季耶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编注

[183] 该档案系收集者在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在档案馆未发现该附件。——编
注

[184]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85] 朴宪永，时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编注

[18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
注

[187] 该文件系苏联驻天津领事馆负责人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远东部主任叶罗费
耶夫的报告节选，删节号是档案公布者所加，下同。——编注

[188] 送斯大林的电报为两份。——编注

[189] 经核查，中文原名李特特。——编注

[190] 经核查，中文原名刘莫阳。——编注

[191] 原文如此，中国并没有军事工业部，当时刘鼎出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主管
军工生产。——编注

[192]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调查部的前身)。刘进忠(对外通用的
姓名为方文)是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未曾担任过部长之职。下同。——编注

[193] 档案原文ЧжаоТа□те，疑俄文拼写有误。——编注

[194] 经核查，中文原名沈林如。——编注

[195] 经核查，中文原名王继飞。——编注

[196] 档案原文ВаниФей，疑俄文拼写有误。——编注

[197] 科舍廖夫，时任苏联新闻局驻哈尔滨代表。——原注

[198]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9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00] 档案原件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01] 档案原件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02] 冯西，斯大林在与朝鲜领导人联系时常用的一个化名。——编注

[203] 朴一禹，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后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编注

[204] 金策，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兼工业相，后任前线总司令。——编注

[205] 崔庸健，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编注

[206] 姜健，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编注

[207] 金科奉，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编注

[208] 洪命熹，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朝鲜民主独立党领导人。——编注

[209] 6月25日之前，苏联援助给朝鲜的武器装备均不经中国领土运送。——编注

[210] П.Ф.巴季茨基，时任莫斯科军区防空军参谋长，1950年初率苏联一个防空集团军进驻徐州和上海，协助中国沿海地区的空防。随后回国出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编注

[211] 即原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年2月改称苏联军事部。——编注

[212] 指С.А.克拉索夫斯基，曾任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空军集团军司令等职。时任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编注

[213] 该档案系收集者在俄国档案馆记录的手抄件。——编注

[214]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215] 谢罗夫，时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编注

[216] Н.Г.帕利古诺夫，时任苏联塔斯社社长。——编注

第三卷(1950.8—1951.8)

1950年

№25834 普里霍多夫致葛罗米柯函：呈送贾尔卡赛汗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记录(1950年8月15日)

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志：

兹呈上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贾尔卡赛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副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与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的会谈记录副本。

因上述会谈中涉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

附件13页。

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普里霍多夫

1950年8月15日

附件一：

副本(译自蒙文)

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会谈记录

1950年7月7日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大使，回来以后身体好吗？

贾尔卡赛汗：很好。

刘：您从乌兰巴托途经苏联过来的吗？

贾尔卡赛汗：我乘飞机直接过来的。

刘：乔巴山元帅身体好吗？

贾尔卡赛汗：很好。

刘：请允许我举杯为乔巴山元帅的健康干杯！

最近蒙古的形势怎么样？

贾尔卡赛汗：我国目前的形势很好，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自由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东方民主的胜利有很大的帮助。对我国自由发展有很大的支援。我国人民就因为这个对中国人民的胜利都感到兴高采烈。

刘：现在蒙古的人口有多少？

贾尔卡赛汗：100万。

刘：蒙古的人口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贾尔卡赛汗：是的，革命期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人民保健工作得到了发展。

刘：这很好！

您见到乌兰夫了吗？

贾尔卡赛汗：没有，没见到。

刘：要跟他见见面。应该互相帮助。内蒙古得到外蒙古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蒙古人有100万到200万。现在内蒙古得到了自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苦。

蒙古帮助我们抓住内蒙古的敌人德王和李守信。

你们还把他们关着？

贾尔卡赛汗：我不知道德王被抓，我只知道他的亲信被抓。

刘：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您会说俄语吗？

贾尔卡赛汗：我会说俄语。

刘：今后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边境线很长，我国新疆省的边境上有乌斯满匪帮。等中国方开始打击这股匪徒，他们就逃到蒙古；一旦蒙古要打他们，他们就窜到中国。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强盗。如果我们两股力量联合起来，那很容易消灭他。

在我们的边疆某些地段还有匪徒在活动。

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边境会好起来，就像当时中苏边境一样。蒙古位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因此看来，你们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贾尔卡赛汗：是的，我们国家比较太平。当年日本在我们东面的边境时，局势相当紧张。我们把所有力量都用在上面。这样影响了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的人民很清楚我们能自由生活，这种趋势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力量强大的条件之下，因为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而得到强化。

因此，中国人民的胜利对我们国家也是极大的支援。

刘：你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贾尔卡赛汗：经济基础是畜牧业。工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只有副业的意义。工业、畜牧业、农业的发展都根据“五年计划”的要求。在这方面苏联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

我们在增加牲畜数量、生产饲料和牲畜防治流行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刘：你们有没有新型的牧场，有没有羊、马、牛的繁殖场地？

贾尔卡赛汗：有国营农场，那里从事畜牧业、农业，有养羊场、养马场。今后国营农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把它们变为发展畜牧业的典范。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有些地方主要发展养羊业，有些地方——养马业，另一些地方——大牲畜和骆驼。

刘：孩子们都能上学吗？学校的网点宽吗？

贾尔卡赛汗：文化和教育也在发展。人民的文理通顺在增加。在我们国家孩子们都能上学。每个乡有小学，每个盟都有中学，在乌兰巴托市有国立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技术学校。国立大学里有师范(物理和数学)系、兽医学系、畜牧学系、医学系、语文系，还有社会科学系。科学和艺术也得到了发展。

刘：小学的人数是多少？识字人的比例占多少？

贾尔卡赛汗：革命前基本上没有识字的农牧民。革命初期识字的人数占10%—15%，现在超过50%。今年成年人识字人数达到100%。由于在对农牧民进行教学时，旧的文字教起来有些困难，近年来我们采用了新的文字。现在小学里上课的学生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

刘：学习的人数占全体人口的3%。在识字方面蒙古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这里识字的人数只占20%。其他80%的人仍然是文盲。

你们新的文字里用的是什么字母表？

贾尔卡赛汗：新文字基本上采用了俄文字母，稍作修改。

刘：这适合不适合我们的蒙古族人用？

贾尔卡赛汗：在我国使用得很顺利。完全适合蒙古人的口语。

刘：这样的话，我们蒙古族人也可以用了。最好用课本。为了提高当地蒙古族人的文化水平，最好能派些人去蒙古学习。

贾尔卡赛汗：我们那里有课本，能找到课本。

刘：很好。

你们那里有没有喇嘛和寺院？

贾尔卡赛汗：喇嘛和寺院都有。它们的数量不比从前多。主要的寺院在乌兰巴托。过去这地方全是寺院。目前这已经变成历史了。

刘：信喇嘛的人多吗？

贾尔卡赛汗：信教的很少。青年人中没有信喇嘛教的。当然，中老年人中旧的习俗不易改变。

刘：迷信和喇嘛对人民很有害。满洲人给蒙古族人带来了宗教和喇嘛教，这对蒙古族人的危害很大。

贾尔卡赛汗：是的，这很正确。

谢谢您的殷勤接待。

会谈结束我和他告了别。他把我送到他的住宅的客厅。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拉姆苏伦

1950年7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谈话记录

1950年7月10日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造好了吗？现在的交通状况不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的扩大，因此说，要一下子扩大经济联系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文化方面的联系。我们想派些人去你们国家学习，让你们帮助培养一些扫盲教师和兽医。

北京有个民族学校，希望你们派人(你们大使馆的人员)到那里去授课或者讲解蒙古革命的历史。

贾尔卡赛汗：我支持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派人来授课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们会设法安排。

刘：过去我们有过贸易交往，什么时候停止交往了？你们老年人都喜欢喝中国的茶，停止贸易往来以后他们是否觉得茶少了？

贾尔卡赛汗：1928年以前我们的贸易交往比较频繁。贸易停止以后，我们没有感觉到缺乏茶叶。伟大的苏联一直向我们供应茶叶，苏联的格鲁吉亚茶叶质量很好。我们的老人很喜欢喝。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格鲁吉亚的茶叶，是由很多植物混成的，而我们的茶叶成分只有一种，因此我们的茶是上品的茶。

北京有个民族委员会。我们希望你们与它保持联系。

刘：成吉思汗的遗骨在青海湖地区被发现，已运至甘肃。有人提出移至张家口 ^[1]，有人主张运往北方，内蒙的蒙古族人很崇拜他，特别是牧民。你们那里是否有拜祭成吉思汗的习俗？

贾尔卡赛汗：过去有些地方举行过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

刘：您去过长城吗？

贾尔卡赛汗：我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见到过长城。

刘：这座城墙见证了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关系。

贾尔卡赛汗：过去蒙古的反动派除了压迫本国人民以外，还奴役别国人民，同样中国的反动派除了压迫中国人民以外，也奴役、剥削小民族。

现在我们两国已经消灭了这些反动势力，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两国人民建立了真正的友好关系。

因此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

刘：我们蒙古族有200万人，你们那里有多少人移居在苏联？

贾尔卡赛汗：不太多，那里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有多少？识字人多吗？

贾尔卡赛汗：每个乡有小学，每个盟有1—2个中学，学生有3万多人。

1949年识字人数占50%，今年在成年人中普及识字。

周：50%是个大数目。50%的人达到识字需要相当长时间。

你们那里有没有农民，乌兰巴托种些什么作物？

贾尔卡赛汗：只搞农业的人数很少，主要是搞畜牧业。他们除了畜牧以外，还种种地。在乌兰巴托种的主要是大麦、小麦、燕麦等作物。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拉姆苏伦

1950年7月31日

附件三：

副本(译自蒙文)

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同志和拉姆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0年8月10日

谈话时间：当天12时45分至1时20分。

吉雅泰：最近大使馆一等秘书德尔干偕同夫人和大使馆经济部主任来访。德尔干对贵国外交部，特别是您在苏赫巴托的全权代表从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全程陪同，表示感谢。对此我也表示谢意。

拉姆苏伦：您的秘书路途顺利吗？他过去搞过外事工作吗？

吉雅泰：路上很顺利。他没有搞过外事工作。过去他是个军人。德尔干是某军一师的政治干部。德王逃跑以后，他参加过追捕乌格林(У Гэ-лин)残余部队的战斗。他是蒙古人，年纪很轻。

拉姆苏伦：怎样？蒙古包您满意吗？您住过蒙古包吗？

吉雅泰：很大，很好，很舒服。谢谢您给我找到了这样好的蒙古包。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我来这里以前，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到了蒙古以后要为我国的公民做些工作。了解那里的人口数量，了解那里愿意回国的人数。同时他指出，这项工作不能心急，如果蒙古缺少中国的劳动力的话，可以逐步进行。中国的蒙古族人有许多人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手工业工作，他们在许多行业有专门的特长。

他说，如果蒙古的工厂缺少劳动力的话可以把张家口地区的失业工人派一些去那里。

除此以外，乌兰达兰也说，如果蒙古感到劳动力缺乏的话，我们可以派一些工人过去。我想，我们可以在劳动力方面助一臂之力。

这次我想跟您谈谈我国公民的事。在蒙古的中国工人主要分布在各工业部门，他们是骨干力量。一部分人年岁已经很大了，另一部分人是1945年重新回来的，这部分人要区别对待。一部分人是自觉自愿过来的，另一部分人是从德王部队俘虏过来的。1945年过来的人大多数想回国。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可以派遣其他工人来代替1945年8月份回来的同胞，如果蒙古还需要劳动力的话。至于那些战俘，我们单独谈。现在我要谈的是那些1945年回来的蒙古族人。请你们在乌兰巴托和胡东(Худон)两处分别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希望当地工会、当地的民警组织给予协助..... [2]

АВПРФ, ф.0111, оп.32, п.215, д.5, л.1-11

№24808 博尔德列夫报告：在中国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3] (1950年8月18日)

.....

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4月3日。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是在政法大学进行的。听众总数为1500人，提出了大约100个问题。

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广播发言。

4月4日。作了题为“苏联对外贸易的垄断及关税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是应海关总署署长的特别请求，在关税管理局作的。出席该报告的有60人，提出了11个问题。

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是在辅仁大学作的，有1500人出席报告会，提出了50多个问题。

4月5日。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座谈。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7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出席座谈的将近80人。座谈中谈到了如下问题：苏联高等教育体系、苏联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组织以及一些关于苏联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其他问题。座谈中提出了30个问题。

在财政部税务局举行了以“苏联的税收体系”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提出了25个问题。

4月6日。在经济协会举行了以“苏联国家银行的信贷计划、货币发行和流通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

4月7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讲座是在辅仁大学举行的，总计有2000名听众。讲座中提出了50个问题。

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以“莫斯科大学以及苏联其他一些高校是如何组织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为题的座谈会。座谈中谈论了关于系、教研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的工作问题。谈论了教学的方法问题、课堂讨论问题、考试问题，关于对大学生的活动、对教授和教师的科研工作进行监督的组织问题等。出席这次座谈的有40人。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办公场所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这次讲座的听众总计700人。

4月8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2000

人出席了这次讲座，提出了20个问题。

在财政部举行了以“苏联的国家预算”为题的座谈会。财政部的领导干部和预算局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人数大约有100人，提出了20多个问题。

4月9日。在公园的露天剧院举行了以“人民民主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为题的讲座，这次讲座总计有5000名听众。

4月10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举行了以“苏联的货币信贷和货币流通”为题的座谈会。大约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30个问题。

4月3—10日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8次、座谈6次、广播1次，共计15次。听众的总数为15250人。

在上海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4月13日。在“大师”影剧院举行了以“苏联的税收体系”为题的讲座。出席这次讲座的总人数大约为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10个问题。

4月14日。在“大师”影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参加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多人，讲座中提出了20个问题。

4月15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将近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11个问题。

4月16日。同上海报刊的代表举行了座谈。这次座谈由苏中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组织。《解放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四大报刊的记者参加了这次座谈。座谈中谈论了苏联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4月17日。作了题为“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人，讲座中提出了8个问题。

在商学院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1000多人。

应苏联领事馆副领事魏列夏金同志的请求，在苏联大使馆作了题

为“人民民主国家的金融”的讲座。大约70人出席了讲座。

4月18日。同财经委员会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总计8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5个问题，涉及苏联的税收、预算、金融监控、信贷和货币流通。

4月19日。同上海高校的教授和教师举行了座谈。座谈中就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工作量、教学与教研室工作体系等提出了大约30个问题。

从4月12—19日在上海进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6次，座谈3次。听众的总数为9250人。

在广东举行的讲座和座谈(今年4月23日到，4月28日离开)：

4月24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总计大约有800名听众。

同中山大学的科学工作者和教授举行了座谈。大约50人出席了座谈，座谈中提出了大约20个问题。

在中山大学为该校经济系和法律系的大学生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大约300人出席了这次讲座。

在广州市举办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苏联在经济和金融上取得的成就”的讲座。1500人出席了讲座。

4月25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讲座共计有大约800名听众。

在南方大学(为中国南方地区培养经济干部的高校)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的讲座。5000人出席了讲座。

4月26日。在军政委员会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听众的总数为800人。

同南方大学的教授和管理干部举行了座谈。谈论了关于苏联高校的形势问题。15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0个问题。

4月27日。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会。大约50人出席

了这次座谈。座谈的题目是“苏联国家金融管理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基础”。座谈中提出了15个问题。

4月23—28日在广东期间进行的讲座和谈话总结：讲座6次，谈话3次。听众总数为9300人。

在汉口举行的讲座和座谈(从1950年4月29日到5月3日)：

4月30日。在武汉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讲座。讲座听众总计有1500人。

举行了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问题的座谈。有8人参与了这次座谈。

5月1日。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作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800人出席了这次讲座。

5月2日。在武汉剧院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信贷”的讲座。听众的总数为1500人。

同武汉大学的教师们举行了座谈。座谈中谈论了关于苏联的金融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不同以及苏联金融体系的优越性问题。总计100人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提出了10个问题。

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座谈中讨论了关于苏联的税收体系、预算体系和信贷体系的问题。出席这次座谈的将近80人，座谈中提出了30多个问题。

5月3日。作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金融机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讲座，讲座的总人数为1500人。

同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座谈。有10人(负责的领导干部)出席了这次座谈。座谈中讨论了关于地方的税务问题，座谈中提出了大约20个问题。

从5月29—30日举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总结：讲座4次，座谈4次。听众人数总计5500人。

在天津举行的讲座和座谈(5月11日到，5月12日离开)：

5月11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总数为2000多人，讲座中提出了将近20个问题。

举办了题为“苏联的国家预算”的讲座。财政部门和经济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出席了讲座。出席讲座的总人数为2000多人。

5月11—12日在天津期间举行的讲座总结：共举行了3次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共计5500人。

在北京举行的讲座和座谈：

5月13日。在人民大学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共计4000人。

5月14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协的成员举行了题为“苏联的金融体系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的优势”的讲座。出席讲座的听众将近700人。

5月15日。举行了题为“苏联的税收体系”的座谈。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座谈。共计20多人出席了座谈，座谈中提出了25个问题。

Б.Г.博尔德列夫

1950年8月18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405, л.213-217

№20069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请求提供国际空军援助(1950年8月19日)

1950年8月19日21时(收报时间)

第902号

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苏联朝鲜族人)来找我，并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个秘密问题。

我问是什么问题。文日说，正卧病在床的金日成把他找去，并以忧心如焚的心情告诉他，自己收到前线指挥部负责人姜健一份问题非常严

重的报告。

文日说，报告中讲到，敌人开始用重型飞机对我军实施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我们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遭到了这样的轰炸。

敌机以30—40架为一编队，向我部队上空投掷了许多箱子，这些箱子在空中打开，从中散落下许多小型炸弹。

由于这样的轰炸，我方部队，不论是有生力量，还是武器装备，均遭受了重大损失。

1950年8月18日，由于受到这样的空袭，我第四师几乎无人生还，该师师部被摧毁，师长牺牲。

第三师和第十二师也遇到同样情况，由于受到敌机轰炸，他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阵地。

接着，文日补充道，他从来未见过金日成的心情如此沮丧。

文日又说，金日成派他来，除向我通报此事之外，还想询问一个问题，即朝鲜人民军是否能得到帮助。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

我问，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人的报告中，是否有因敌机轰炸而造成的部队损失情况的相关资料。

文日答，报告中没有写这方面的情况，但前线指挥员许诺将派专人送来。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我无话可说。我以半玩笑式的口吻指出，前线指挥官夸大了美国空军炸弹的威力。关于美国空军的炸弹，一位英国记者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他认为，其威力不大。

我接着指出，离灭亡越近，敌人的抵抗也就愈加疯狂，美国陆军表现不佳，美国人只好让空军参加地面作战。

美国人有可能对前沿阵地实施轰炸，因为近期人民军部队向前推进不多，前线阵地比较固定。

应当要求金日成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

快向前推进，从而减少因敌机轰炸给部队造成的损失。

我又指出，我们苏联军队在1941年时没少挨过德国人的轰炸，但我们的士兵依然在战斗中表现优秀。人民军部队也是好样的，只是需要好的指挥和领导。如果指挥得好，他们也将表现神勇，美国空军是不可能对他们的前进形成阻碍的。

文日答应将向金日成转达我的意见。

最近，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

他对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的)工业设施和铁路交通非常担忧，声称，美国人将摧毁北朝鲜的所有工业，我们将长时间无法重建这些工厂。

如今美国人对人民军部队空袭的加强，更增加了他的忧虑，因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看来，他是对人民军部队的思想心理状况，对他们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

在以前我与军队的同志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曾对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摧毁朝鲜的交通和工业颇有微词。

兹按情报程序报告。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621-623

№09125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移交战俘执行情况(1950年8月23日)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苏联内务部就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关押在内务部集中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日本战俘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1950年3月17日第1109—397cc号决议，关于将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侍从人

员、前伪满洲国部长、将军和官吏以及溥仪与侍从人员的贵重财物移交中国当局的1950年7月14日第3143—1302cc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今年7月18日，在绥芬河车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鲁西(Лыси)移交了969名日本战俘，其中有17名将军。这是按交接文书和名单进行移交的，并附有每个人的审讯材料。有2名应移交的日本战俘由于重病不治，死于哈巴罗夫斯克专科医院里。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一代表移交了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前伪满洲国政府部长、将军和官吏共计58人及属于他们的私人物品。

在移交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和属于他们的财物时，以及在移交日本战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鲁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在溥仪及其随从人员从哈巴罗夫斯克起程之前，曾收到谍报，说溥仪担心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十分神经质，并表达了想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怂恿他这么干的。

鉴于这种情况，将溥仪与其亲属、其余战俘和拘押者隔离开来，并在加强监视下送到向中国当局的移交地。

在到达绥芬河车站时，溥仪写了以下内容的感谢信：

“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苏联政府方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帅本人的关怀。

现在，在我即将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我对你们对我表现出的良好态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谢。

祝愿苏联人民永远繁荣昌盛，祝愿斯大林大元帅健康长寿。

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感谢信的中文原件，保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1950年8月23日

№09855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整风等问题 (1950年8月26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0年9月21日

第295号

绝密

8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接见了我。

相互问候之后，我向他通报了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关于邀请中国中央杂技团访苏演出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邀请中国体育领导人的决定。

同时我请求帮助我同党中央推荐的、到莫斯科广播委员会做编辑和汉语广播员的中国同志们取得联系，请他派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同我们一起确定被推荐做广播工作的同志们的教育资格、身体状况，主要是受训练程度。

之后，我请刘少奇同志，如他有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生活中的几个问题。一共是3个问题：

一、整风运动实际意味着什么。

二、怎样迎接农村新的土改法。

三、今天的民主党派是一种什么力量，他们参加联合政府，同中共真诚合作到什么程度。刘少奇同志欣然同意，详细地回答了这3个问题，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第三次整风运动。我们党第一次整风是在1943年。当时共产党内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缺点：党组织里缺乏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评价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上存在各种流派，一些党员在评价时局上存在不少偏差，存在各种倾向，尤其是“左”倾倾向。

这一时期党遭受了最严重的困难…… [4] 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下进行整风运动。实际上这一工作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

党中央首先在领导积极分子当中开展这一工作。党中央把部分同志或一小部分领导积极分子召到延安，在同他们的座谈中摸清，同志们怎样和为什么对中央路线产生了不理解、动摇和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中央也注意该同志的社会问题，他的联系和其他与其自传材料和实际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时中央下达了指示，需要解释清楚。如果该同志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缺点，对缺点有了正确的认识，那么在得到了详细指示之后，他便复返工作岗位，或党中央把他派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贯彻中央同他谈话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还查明了一些党员……这些同志被揭露行为不端，社会影响很坏，这些人被清除出党。

在这一运动最紧要的时期，在事情完全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党中央从侧面发现了自己工作的严重缺点。我们发现，我们的情报机关避开中央，不经中央批准和监督就对党内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缺点的同志进行审查。但情报机关许多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没有受过充分训练，他们不作认真分析，便对大批党的积极分子追究责任，把他们的行为定为敌对行为、反革命行为、反党中央和反党行为。对所有党的积极分子，甚至对中央工作人员都进行卡片登记，搜集各种材料，尤其是缺点方面。

此外，情报机关开始逮捕、惩处一些党的工作人员，有些人被直接投入监狱。

……中央干预了这件事，立即要求情报机关遵守程序，中央开始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许多同志被释放出狱，一些人被撤销处分，一大批人被恢复党籍。

这是党内的严重时期，我们没能以应有的方式进行党内整风。在这一运动中，不仅包含了清查党的队伍的成分，同时还出现了反常现象，使我们付出了牺牲。

运动在1945年结束。

我党七大(1945年4月)对整风工作进行了总结，其中指出，尽管出现了偏差和错误，整风运动还是收到了积极的结果。我党以团结的面貌迎来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保证了大会决定被一致通过和尔后的贯彻执行，保证了我党的胜利。

第二次党内整风运动是在1947年。这次整风的任务是纠正地方党的工作者在东北土改中所犯的错误，同时为其他解放区的土改培养干部。

在我党中央作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

“左”倾错误非常严重，除了中央的极端指令，地方的工作人员们也允许实施消灭地主的措施。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

第二次整风主要目的是纠正这些错误。在整风过程中，右倾和“左”倾的代表受到严格审查，其中恶劣分子被开除出党，因为审查表明，他们是混进党内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们怀着某种敌对目的，故意干坏事。

这样，第二次整风运动，不仅带有纠正错误的性质，而且还具有通过审查个别成员纯洁性和巩固党的队伍的任务。……

第二次整风之后，我们党大大巩固了，队伍纯洁了，清除了敌对分子和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使全党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使领导干部明白，他们应该怎样工作、学习和贯彻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也变得坚强了，提高了纪律性和团结，而这使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能够为未来的战斗更好地做好准备。总的说来，整风起了特殊的政治作用，帮

助党顺利地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改任务。

现在的整风运动是第三次。为什么搞这次运动？它是由相应的原因引起的。

在消灭国民党集团、解放了全国领土、成立人民政府和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组织之后，我们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情基本上已经做完，现在该好好地休息一番了。在当上各级党政机关的首长和领导之后，他们开始发号施令，同时自身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偏差。有时出现这种情况，行政甚至党的工作人员打骂农民、职员，关人禁闭，收取贿赂，提前1—2年征收税收，损公肥私，营私舞弊。最为卑劣的是，许多领导干部不干工作，陷入官僚主义泥潭，忘记了政治学习。许多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胜利了，政权在人民手中，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所有这些现象导致工作人员开始脱离群众，在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影响下开始失去自己的党性。党中央在其一系列指示中指出了这些缺点，采取了纠正他们的相应措施，但收效甚微，最后党中央作出了整风的决定。实际上这次运动是这样进行的：

中央成立了审查组，对中央领导人员和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这一环节我们没发现重大问题。审查工作只限于审理、研究、解释过去下发的有关指示，下达关于克服各地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以及整顿政治学习的指示。在这之后，各地中央局成立自己的审查组，着手自身党组织的工作。

这次运动的主要方面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大城市，成立了市委审查组，着手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工作。审查组把企业领导人(如果他是党员)、党委书记召集来，同他们一起研究企业党组织里的形势，如发现错误，则查明错误来自哪里，什么原因。如认为这些同志理解了错误，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则事情只局限于下达指示。在此之后，审查组成员下到机关和企业里，就地召开大会，组织党员和非党群众在会上发言，揭露各种缺点。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格审查。如发现他们有严重错误和败坏名声的材料，他们则被开除出党。

这样，在目前的整风中，我们看到其中有审查我们队伍的成分，但这绝对不能称作清党。此次运动持续一冬，应对我们党的状况产生良好

的影响。它帮助我们纯洁了党，通过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广泛参加运动清除投机分子和混入党内的人。它帮助我们密切我党和领导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它帮助我们搞好党的教育，改善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在运动中，党依靠群众，全体党员参加大会，但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原则。

简单说来，我党历次整风的历史因素和意义就是这样。这些运动不是清党，但在运动当中，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追求审查我们的队伍和纯洁党的目的，把偶尔混进党的队伍的分子清除出去。

第二个问题，刘少奇说，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不仅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想描述一下那年春天农村的形势。

正如您所知，我们的报刊上一直不断刊登土改问题，当全国基本解放之后，华中、华南、西南和西部中国的地主都等待着进行土改。地主们利用时机，用各种办法企图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友。他们将其耕畜和生产工具也进行这样的处理，部分卖掉，部分分给亲友。他们解雇长工，有时简直是驱逐，他们对长工们说，到新政权那里去找工作吧。富农效法地主，也这样干。中农摇摆，听信地主和富农的宣传，采取观望态度。

这样，到春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地主和富农对分配土地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害怕把自己攒的土地全都给夺走，而中农种的只够自家吃就行了。租赁大大减少了，失业雇农大军扩大了。出现了播种面积大大减少，这种威胁可导致稻谷、小米和其他谷物产量的减少，迫使政府从国外购买粮食。同时还应考虑到土匪的存在，他们有100—200万人。所有这些情况迫使我党考虑如何走出这种困难形势。所以在4月份，党中央开始制定新的措施，制定新的土改法令。

在5月1日前夕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在北京召开)，中央委托我讲当时中央已经批准的在新解放地区进行土改的政策。在这次会议上，我特别强调，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这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党的组织和我们在农村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宣传工作，孤立农村的地主。当中农坚定地相信不会动他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在农村贯彻所有预定措施和1950年秋季实行土改的积极助手。在经过做大量工作之后，富农也不再害怕，开始召回雇工，集中农具，积极准备耕种。地主表现不一。城里有财产和加入了某种商业和工业公司的地主，在经过新土改政策的解释之后，开始催促地方机关实行土改。同城市没有联系，是农村

主要主人的那部分地主进行敌对活动，其中包括帮助和组织土匪活动。他们散布恶毒谣言，秘密串联，煽动其他农民不要相信新土改政策，说这完全是欺骗。但农村基本群众相信我们的解释，跟我们走。富农和中农耕种自己的土地，精心田间管理。积肥多了，失业雇农人数少了……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同时应该指出，赞成这一法令的还有四川、云南、西康和其他省的大地主。在公布这一法令之后，农村的基本群众——贫农、中农和富农开始彻底相信我们的新法令并跟我们走了。这样，地主孤立了。

新土地法还受到城市工商资本家的欢迎，这使我们把地主孤立于城市工商资产阶级圈子之外。这是很大的政策胜利，它使我们有根据认为，我们原来预定的全国实行土改的期限看来可以缩短了。

现在经过广泛的宣传解释，我们看到，新解放区的基本农民群众非常欢迎土改法令。现在基本农民群众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我们看到主要农业省份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使我们相信今年可收获充足的粮食……地主不仅反抗，而且还将组织和进行各种敌对行动，其中包括组织土匪武装以实施破坏行动。在地主反抗我们的地区，我们将派部队去消灭他们，不是按新土地法，而是按反抗人民、反抗政府的敌人对待他们。依靠基本农民群众，利用训练有素的土改工作队伍，加强农民协会，开展对贫农和中农的工作，按照计划，严格遵照中央政府批准的法律，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彻底地完成土改。

我们认为，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和期限进行土改，将使我们夺取伟大的政治胜利——消灭中国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势力。

然后刘少奇解释了第三个问题。他指出，如果谈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力量，那么这个问题应全面地看。

主要的民主党派，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农工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人数不多。他们在中国内地的人数未必能超过5万人。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现在住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和昆明这些大城市。在其他城市，这些组织寥寥无几。

这些党派在北京的人数约有1万人。在同我们合作中，他们的头头对我们，对我们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态度还算真诚。这些组织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大学的工会成员有错误，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不正确，

编造各种政治谣言，背后批评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有时在讲课中和与学生谈话中直接进行攻击。这样的人不多，所有的人都我们都清楚。

李济深奉行十分暧昧的策略。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有明显的敌意。在民主首领周围有……而某些成员甚至被怀疑有间谍行为，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

对于一般成员，我们耐心做工作，通过政治教育让他们同他们的领导划清界限，站到我们这边来。在他们各地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中，我们已顺利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组织单纯地看成是脱离群众的一帮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如果我们从工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整个角度来看问题，则它是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不考虑它。

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这个问题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确，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加入民主党派的代表同西欧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中国的民主党派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也完全不同。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西欧的资产阶级走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认识了这一发展的实质，它成了整个进步的、真正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有过出卖本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利益的丰富实践，是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明显的帮凶。

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另一个样子。它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国家之中。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它处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帝国主义强盗的压迫和欺侮之下。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有这样的情况，为避免遭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消灭，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曾和我们结盟，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组织了各种进步的联盟和党派，目的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民主观点和各种流派是通过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西方传入这些党派的。这些党派中没有一个是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广泛展开的纲领，假如有，也是由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各种纲领拼凑而成的，从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抄袭孙中山、国民党甚至共产党著作的痕迹。所以，在中国，这些组织虽说有20多个，但其人数都不多，

同农民和工人群众都无联系。这就是这些组织的弱点之所在。

由于今天在我国同私有资本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同这些组织——这个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实行真正的合作。

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是真正的合作，现在我们党正同我党个别党员轻视同民主党派及其加入我地方民主政府的成员合作的过火行为进行斗争……

我们认为，在中国，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力争在这一合作中不犯错误，把事情办好，巩固关系，使这些组织的头头不是形式上而是真诚地同我们合作。

今天他们相信我们。他们看到，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利益，致力于使中国在各方面强大起来。他们还看到，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很多时间，但他们也亲眼看到，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巩固财政经济形势、改善工业、交通工作方面已取得无可争辩的成就；他们已看到在东北和华北实行土改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完全支持。他们还帮助我们解决同私人资本合作的问题，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些人。

他们最为满意的是我们努力加强国防，建设我们的军队。所有这些措施他们都支持。

这样，通过努力在他们中间做解释工作，吸收他们参与国家行政活动，我们将逐步前进。

对于他们当中那些表示敌意和从事某种破坏活动的人，我们能制服他们、孤立他们并得到他们内部人的支持。

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问题就是这样。为了迫使私人资本同我们合作和在巩固我们的经济当中利用这一合作，我们还需做很多工作。

在谈话末了，刘少奇同志说，我们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感谢他及时地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建议。

我感谢刘少奇同志给予了长时间的宝贵的谈话，对此他指出，如果将来对他们国家的政治形势还有什么问题，他一定努力抽时间和我们座谈并给予详细的解释。

我再次感谢刘少奇的招待，会谈就此结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157-179

№00298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防空专家(1950年8月27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科托夫同志

复第1726号电

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

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38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 [5]、莫洛托夫同志

№14571 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关于苏联退出安理会(1950年8月27日)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 [6] 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及随后事态的发展，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拖着中国去为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

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62, л.71-72

№20071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1950年8月28日)

1950年8月28日

第283608号

兹报告：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1日决议第3201—1334号，截至今年8月10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已彻底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的集结任务。

鉴于今年8月27日美国飞机曾对(东北)中国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过空袭和扫射，我们请求允许让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承担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该师目前已完成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集结，并继续肩负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

综上所述，我们将下达给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的命令草案，并请求上级批准。

附件：

沈阳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别洛夫(收)

文件送：北京 科托夫同志(收)

莫斯科

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负责人日加列夫同志(收)

地图 (比例尺)1：1000000——1942年

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境线。

三、与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

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

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

五、接到(上级)指示时必须(回电)确认，在完成战斗准备时亦必须(向上级)报告。

手写批注：

退还A.M.华西列夫斯基。

布尔加宁

8月29日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2

№20072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1950年8月29日)

1950年8月29日3时(文件打印时间)

第981号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政府电话向我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

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

最后在电话中金日成要求我晚上与他和朴宪永见个面，谈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表示同意。

我们没有预定见面的时间。

当地时间20点整，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打来电话，请求来见我。

我表示同意。

文日来了以后便说，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决定任命共和国副检察长为反间谍部队负责人，劳动党平安道书记为内务副相(此两人均为苏联朝鲜族人)。文日问我，苏联方面是否对此持异议。

我答，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两个人工作都很踏实，有工作能力。

然后，文日在准备离开之时，又对我说了下面一些话：今天白天，金日成叫他去。金一边审视地图研究着前线的形势，一边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前线的局势很艰难。

金日成问文日，是否知道捷连季·福米奇(即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文日答，他对我的观点一无所知。

金日成接着说，他想与捷连季·福米奇(即我)见个面，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信，信中谈谈朝鲜的局势，并请斯大林对朝鲜今后的行动提些建议。

文日似乎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正在对朝鲜的局势进行研究。

金日成又谈了关于自己仍然想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的前线状况目前太困难了。但他想事先了解一下捷连季·福米奇(即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文日几次强调了关于金日成打算给斯大林同志写信的事。

随后，文日说，金日成想把这一问题提交政治委员会，并与各位委员交流意见。

我安静地听完文日的话，说道，金日成工作太重，近期过于劳累。文日和其他助手们应当给他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他能得到休息。

看来，文日已明白，我不想与他讨论他刚提到的那个问题。于是，他便说道，关于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给我听的。似乎，金日成已请他不要对我讲这些。

谈话到此结束。

我的观点：金日成原打算与我见面时提出这些问题，但不能决定是否由自己亲自把这些问题向我当面提出，于是便决定派文日来探探我的口风。

原定我与金日成和朴宪永的会面最终并未进行，因为金日成后来再未就这一问题给我电话。

近期，由于前线迟滞不前和美国空军不断对人民军部队、北朝鲜交通线实施攻击，大量工业企业遭到严重破坏，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他多次试图征得我的同意，以便其去请求中国人用军队来帮助朝鲜。

什特科夫

ЦАМОФ, ф.5, оп.918795, д.1227, л.666-669

№0029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与金日成会晤的情况 (1950年8月30日)

发自平壤

1950年8月31日11时32分收到

1950年8月31日17时27分送达

致冯西：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1950年8月29日拜会了金日成并通报了电报内

容。金日成听了我的转述后，请求笔录电报内容，我又向他转述了一遍。 [8]

金日成对您的信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一再强调这封信太好了。

此后，他请求我同意召朴宪永来，把您的电报念给他听。

和朴宪永交换意见之后，他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传达。他说，这封信很重要，应该将内容传达给他们，因为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

我回答，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这样做。

金日成答，他明天就召集政治局会议，宣读这封信的内容。

什特科夫

1950年8月30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米高扬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总参八部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12-13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59-160

№20074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关于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1950年8月31日)

1950年8月31日

第283644号

兹报告：

根据政府关于派遣喷气机师掩护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决定，我们向东北派遣了整编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截至今年8月10日前，该师已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区完成集结任务，并开始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

根据原计划，此次培训的结束日期为1951年1月25日。

鉴于今年8月27日美国飞机曾对东北地区的居民点和火车站进行了空袭和扫射，是否有必要命令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 [9]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不得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边界。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这一决定，我们将向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下达这一命令。我们将把该命令草案送交您审批。 [10]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4-5

№13288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 (1950年9月 [11])

参观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者小组名单

- 1.周扬——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小组的领导人。
- 2.金城——中共河北省党委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小组的副组长。
- 3.梅益——中国中央政府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小组的副组长。
- 4.张仲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处主任、《中苏友好报》主编。
- 5.丁华(Дин Ху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 6.石潘(Ши Пан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 7.严复(Ян Фу)——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学处主任。
- 8.赵守义——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主任。
- 9.张非垢——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

- 10.于林——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厅主任。
- 11.陶鲁笏——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 12.袁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 13.蓬飞——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 14.赵守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
- 15.盛华——中共苏北地委宣传部部长。
- 16.杜心源——中共川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 17.康敏庄——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部长。
- 18.夏征农——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 19.张增敬——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 20.刘异云——中共鞍山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 21.安岗——《人民日报》副总编。
- 22.胡绩伟——西安市《群众日报》副社长。
- 23.常芝青——重庆市《新华日报》副社长、总编。
- 24.陈楚——汉口市《长江日报》副社长、总编。
- 25.王揖——沈阳市《东北日报》总编。
- 26.朱济乾(Чжу Цзи-цян)——北京市《热北日报(Жэбэйжибао)》社长、总编。
- 27.包之静——济南市《大众日报》社社长。
- 28.艾青——北京市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副主编。
- 29.韦君宜——北京市《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 30.陈希卫(Чэнь Си-вэнь)——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刷部门主任。

- 31.陈江都(Чэнь Цзянь-ту)——中央政府新闻局局长。 [12]
- 32.朱穆之——新华通讯社副总编。
- 33.高戈——新华通讯社东北分社社长。
- 34.吴全衡——新华通讯社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分社社长。
- 35.孟奇玉(Мэн Чи-юй)——北京市中央无线电广播电台无线电广播部主任。
- 36.黄洛峰——中国中央政府出版署署长。
- 37.陈波儿——中国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 38.张庚——北京市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 39.邹鲁风——东北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 40.程今吾——中国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
- 41.瞿杜翼(Цюй Ду-и)——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 42.李何——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 43.岑石武(Чень Шы-у)——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
- 44.华君武——《人民日报》撰稿者。
- 45.马贞(Ма Цинь)——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 46.刘舒(Лю Шуй)——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 47.陈林(Чэнь Линь)——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
- 48.瞿红(Цюй Хун)——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
- 49.刘莎——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翻译。
- 50.朱列(Чжу Ле)——上海时代出版社俄语科编辑。
- 51.陈道生(Чэнь Дао-шэн)——哈尔滨外语学院学生。

陪同人员：

1.尼古拉耶夫·达尼尔·尼古拉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科员。

2.波波夫·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初级科员。

3.卡尔图诺娃·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初级科员。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94, л.49-51

№20075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向旅顺地区增派空军(1950年9月13日)

1950年9月13日

第283781号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13日命令，兹报告向旅顺地区增派歼击航空兵的新计划。

为了加速米格15歼击机航空团在旅顺地区的集结，建议将原部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三〇三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航空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调往该地。

该团在旅顺地区集结的最后日期为今年10月6日，并于10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截至1951年3月1日前，该团将扩编为一个米格15歼击航空师，其中其他两个团及其指挥机关全部均来自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后者将于1951年2月1日前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工作。

建议任命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副师长哈鲁金上校为第一七七歼击航空团团团长。此人一贯表现良好，经验丰富，而且跟该团所有指战员都很熟悉。

当该团扩编为师级编制后，哈鲁金将被任命为该师师长。

请研究和确认我们就这一问题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决议草案。^[13]

华西列夫斯基

马兰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70-171

№20250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对朝鲜战事的建议 **^[14] (1950年9月18日)**

.....

今天我同军事顾问科托夫和孔诺夫应邀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询问是否知道1950年9月15日美国海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除了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或平壤电台的报道，中国领导人不掌握任何其他情报。

周恩来指出，同北朝鲜领导关于军事问题的交流很少。中国知道北朝鲜缺乏干部，但完全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尝试向北朝鲜派遣一些中国的军事技术人员到战场实地勘察情况，但至今平壤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复。

中国总理又进而抱怨北朝鲜不理睬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建议和预测。

周恩来说，中国驻朝鲜大使没办法得到关于战争形势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及时通报给北京。

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不知道美国是否在仁川登陆，中国政府只能根据官方消息提出一般性建议：

1.如果北朝鲜在汉城和平壤之间有10万人的后备队，那么他们就能够也应该消灭登陆的敌人。如果没有那些后备队，就应该在前线留下部分部队坚守，而将主力部队北撤。应该将美国部队挤压出防区，迫使他们分散在正面地带，进而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

2.必须建立主力突击队，并将之隐蔽起来，等到决战时使用。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如果掌握更多的准确情报，

请务必通知他们。

周恩来还指出，朝鲜最近的事件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而坚决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领导人想咨询一下，在情势复杂的今天，中国应该何去何从。

北京认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人都会坚持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针。但如果这条方针发生变化，那么中国代表团将准备前往参加联合国大会。

周恩来进而又说，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很担心苏联和中国加入到朝鲜的军事冲突中，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应付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此时中国方面从南方向东北的调动军队，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周恩来要求立刻将他的话转达给苏联政府，并尽快得到回复。

我让他们放心，一定会这样做，并建议他们，为了消除误会，可派出一位负责干部到北朝鲜了解情况。

.....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3-126

№24810 格里戈良致莫洛托夫报告：在东方学研究所组建中国部(1950年9月18日)

机密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科研工作，培养高水平的中国学干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负责科学工作的部门联合召开了几次预备会议，苏联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参加了这些会议。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就这个问题召开了范围更大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B.A.马斯连尼科夫教授、B.И.阿夫季耶夫教授、И.М.奥沙宁教授、H.M.西萨基扬教授、B.K.帕什科夫教授、H.C.什韦佐夫教授、B.П.苏霍京教授、通讯院士A.Д.乌达利佐夫、历史学副教授M.B.波波夫以及

经济学副教授Г.В.阿斯塔菲耶夫。

鉴于交换的意见，大会确定：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仍然非常落后，与现代国际局势提出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任务以及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差距很大。迄今为止，一些中国学家们仍然脱离现代的一些主要问题。苏联的中国学家没有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和国外汉学家的反动“理论”进行积极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开展科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就对中国进行科学的研究开展广泛的讨论，没有就苏联中国学的个别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

培养中国学干部的工作开展得严重不足，面临着一些实质性的困难。同时，正如以往一样，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不懂汉语，而掌握汉语的一些工作者则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很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懂专业的中国学干部，保存在各个图书馆的关于中国的俄语书籍和汉语书籍一直都没有得到利用。

所有上述情况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迫切需要扩大和加强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

为了建设苏联的中国学，顺利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下设一个中国室是远远不够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科学院组建更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必须把苏联分散的中国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力量弱小的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改组为中国部，以便该部今后能够成为独立的苏联中国学研究中心。

应该把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的部门改组为中国部，并设立如下部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的部门；研究中国历史的部门和研究汉语文学的部门。为此，该部的工作人员应该达到20人。

应该责成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就当代中国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准备出版专著和集体著作；大力加强俄汉辞典、语法和汉语教材的准备工作；系统地开展关于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讨论，并吸引高校和其他部门的中国学家参与其中；就苏联的中国学问题展开有益的讨论。在1950年11—12月召开全苏中国学科学研讨会，讨论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主要问题。加强中国学科研干部的培养工作，为此1950—1951年应该使中国部的研究生的数量达到20人。另外拨给苏联科学院5000卢布外汇，定期出版刊物和书籍。为了充实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应从苏联

科学院各机构和部门向该部调派一些资深的中国学专家，其中包括M.H.科瓦廖夫(社会科学院)、B.H.尼基福罗夫和Л.В.西蒙诺夫斯基(莫斯科大学)以及费德林(外交部)教授。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9月18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9, л.55-57

№11816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美军仁川登陆后应采取的 对策(1950年9月20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9月18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金日成没有定期向你们提供情报，那么这应该解释为与前线的联系薄弱，而并非是朝鲜同志不想这样做。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由于朝鲜人民军目前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以及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应该记住，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共产党都过于年轻，他们总共才只有3个月的战争经验。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会对朝鲜人民军在与外国标准化武装军队的战斗中取得的重大成绩感到惊奇。

第二，失掉仁川，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说明朝鲜人民军不仅要与李承晚军队作战，而且还要与英美军队以及他们的空军和海

军作战，这就造成了许多新的额外的困难。毫无疑问，如果朝鲜人民军只是与国内的李承晚军队打交道，如果不失掉仁川的话，朝鲜早就肃清反动分子了。

第三，关于周恩来所阐述的中国同志的意见，即采取措施消灭登陆的敌人并依靠从前线向北撤回大量兵力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集团军，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供应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四，涉及可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人民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五，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中国人民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受上级的委托

葛罗米柯

草稿 [15]

北京

致苏联大使：

鉴于您与周恩来9月18日就朝鲜军事形势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您应该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根据莫斯科的委托向周恩来转达如下内容：

“第一，从周恩来与罗申同志、科托夫同志和孔诺夫同志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朝鲜朋友没有向中国同志认真地通报朝鲜的军事形势以及朝鲜军队指挥部和朝鲜政府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金日成必须改正这一点。

很遗憾，莫斯科通过自己驻平壤的大使所收到的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情报也是不全面的和过时的。显然，这是朝鲜领导人与自己的军队联系薄弱的结果，还由于朝鲜同志没有及时认真地分析前线的形势。

第二，涉及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即周恩来就消灭登陆的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集团军队以便将主力部队从前线撤回到北方的措施方面所阐述的那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打算是正确的。

在我们看来：

(一)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在汉城地区采取的措施，说明他们对敌人采取的行动的整个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应该认为，敌人开始的这次行动，仅限于第一批登陆人员的这些数量。大批的船只可使敌人不断地加强自己在汉城地区部队的实力，其目的是摧毁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并以此来切断主要战线与食品基地的联系；

(二)在业已形成的严重局势下，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调集一些独立营和团并利用这些力量的战略计划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这些营和团被分批地消灭，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

(三)消除目前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可通过立即将主要战线的部队大批调到汉城地区，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形成主要战场的方法来实现；

(四)东南地区的部队应该转入积极的防御状态，其任务是阻止向汉城战场突击的敌人。

我们已经将自己的这些意图通过我们在平壤的苏联大使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第三，涉及可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觉得，最近由于空降兵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的军事形势复杂化，使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也接到了指示，坚决捍卫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第四，我们同中国同志一样，都认为，美国人将继续坚持不让人民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的代表团已经得到指示：坚决将国民党帮派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

请电告您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果。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6卷，第841—847页

№00304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空军问题(1950年9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关于调遣空军雅克9歼击机航空团去保卫平壤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为加快调动，我认为派遣第一四七航空师第三十四歼击机团最合适。该团配备有40架雅克9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的伏罗希洛夫地区。该团可飞经中国境内，沿延吉—安东—平壤航线前往。该团的飞行需要两天。组织飞行时需要考虑在安东—平壤地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空战。

二、我们非常仔细地向什特科夫同志询问了以下问题：

由于敌方飞机的猛烈袭击，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平壤地区的机场是否适宜飞机降落。

在这些机场是否有航空服务人员、汽油和弹药。

三、如果朝鲜人没有地勤人员，就需要在该团出发以前，把这个团的航空技术营223人及机场技术设备用铁路经安东运往平壤。考虑到要在安东地区渡过鸭绿江，该营的调动需要5—6天。

如果朝鲜人没有弹药和燃料，还要随技术营向平壤运去这些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团在平壤进入最后的准备状态，考虑到人员的调派，需要8—10天。

四、考虑到朝鲜人在平壤地区没有对空监测和报警系统，为了给我们的歼击机团创造正常的作战条件，我们认为有必要随团运去几部雷达和一个通讯小分队，以便发现敌机并组织雷达站与机场之间的通讯联系。否则，我们的飞机在机场上将会遭受敌机的突然袭击。

五、请允许我们在弄清朝鲜方面与派遣空军歼击机团有关的问题后，立即报告向平壤派出该团的全部计划。那时也将向您报告我们关于在该团驻扎的机场组织防空火力的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

1950年9月2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79-80

№13286 罗迈进致塔尔科夫斯基函：鉴定中文版译著的质量(1950年9月21日)

致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所长Д.И.塔尔科夫斯基：

我按照所附的清单发给您197本中文版的书。

请对下列书的译文质量作出鉴定：

1.弗·伊·列宁的《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论文和作品集)。

2.《И.В.斯大林传略》。

3.И.В.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

4.И.В.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Я.罗迈进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94, л.47

№20081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

1950年9月21日3时45分(收到)

第1238号

1950年9月20日，应金日成的邀请我与他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朴宪永。

会谈伊始，金日成便指着汉城战争形势图说，敌人正在强渡汉江。

据悉，汉城西南战线局势稳定，但在金浦地区，由于敌人强渡汉江，形势严重。

这时，金日成问我，是否还可以预先采取一些措施来消灭渡河的敌人。

我答道，目前应当做的是：迅速将上述各师从主阵地上调往汉城地区。

此举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城地区前线的局势。我问金日成，目前这些部队都在什么位置。

金日成答，他已经向这些部队下达调往汉城地区的命令，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位置，自己也不清楚。

这时，朴宪永向我们读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发来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通报说，周恩来召见了他们，并询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关于美军在仁川地区登陆，周恩来问李周渊，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朴宪永接着报告说，中国大使去了他那里，并告诉他：根据中国政府所获情报，在仁川登陆的是由两个师组成的美军第十军和李承晚军队的一个旅。

关于周恩来就朝鲜政府给中国的建议而对李周渊所提的问题，金日成解释道：周恩来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仁川或镇南浦或元山登陆，他们——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问我，您认为应如何答复中国人。

我答，关于这一问题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战争经验。但到了我们这里，在如此众多的美国飞机不间断地对部队进行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表现出何表现，真的很难说。

此时，金科奉(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走上前来，并说道：他们有军队，部队作战也很勇敢。但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会给他们(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自己曾与很多从前线回来的朝鲜军官和士兵交谈过。据他们说，美国空军的活动给朝鲜人民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

这里，大家都说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进行得相当艰难。

显而易见的是，朴宪永很想了解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即使至今他们仍坚持认为，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如果中国军队有参与，那么目前朝鲜战场上这种困难的局面就会有所改观。

朴宪永又指出，希望能让中国到朝鲜来参战，况且中国已与苏联有约在先。

对这一问题我避而未答。

№20252 罗申致斯大林电：周恩来谈朝鲜和中国国内情况 [16] (1950年9月21日)

.....

周恩来对收到电报表示感谢，并且对关于朝鲜形势的评估符合实际而表示满意。他表示，9月19日他们已经向平壤发去了建议，其内容已经于9月18日同苏联代表谈过了。19日当天，中国驻平壤大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

周恩来进而又指出，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接纳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南方边境，因为美国人已积极图谋向那里派遣国民党特务。

关于中国国内社会对朝鲜事件态度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总体上是正面的”。民主党派领袖们认为，美英没有准备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一些民主人士表示，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争将延长，这必然让中国蒙受一定的损失。

.....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1

№2008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2日20时30分(收到)

第1258号

1950年9月21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哥而(苏联朝鲜族人)来

找我。

会谈伊始，许哥而便说，他想向我通报一下关于1950年9月21日举行的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此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议题：如何答复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鉴于朝鲜局势复杂化而给朝鲜政府的建议。

金日成在会上读了朝鲜大使李周渊关于自己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的报告，并询问了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朴宪永、金科奉和朴一禹在发言中均认为，局势很严重，他们显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

随后发言的金日成说，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

金日成接着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加入朝鲜一方参战后，会不会导致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这里，金日成似乎引用了毛泽东曾说过的话：中国与任何国际条约都无关，也未参加联合国，因而可以帮这个忙。

金日成声称，虽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因朝鲜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朝鲜——正如美帝国主义者所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因而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

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问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我们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以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

金日成接着说，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加速组建新部队，那么，就不求助中国人了。不过，他们担心，已经没有时间了。

此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许哥而在谈话结束时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对此避而未答。

在我看来，许哥而来向我通报上述内容，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了金日成的委托来探听我的想法。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5, л.89-91

№20251 罗申致斯大林电：刘少奇谈中国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1日，罗申参加了刘少奇为表彰尤金院士在中俄友好协会举行的午宴。午餐开始之前，刘少奇详细地向苏联大使讲述了中国社会各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9月22日罗申向莫斯科汇报了刘少奇讲话的主要内容。^[17]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国民党人指望朝鲜战争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将取得最终胜利，蒋介石将回到大陆。这是居民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但“显然是少数”。

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大资产阶级逐渐进入政治生活并开始将资金从香港转移到大陆。最近的事件意味着战争时间将被延长，这导致了资金转移规模有所下降。现在大资产阶级开始深思，一方面他们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敢把资金转移到大陆，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战争一旦爆发，香港将成为第一个受打击的靶子，因此又不愿意转移所有资金了。一些人想移民到国外，但这是少数。

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认为，北朝鲜人曾长期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现在如果必要，中国就应该帮助他们。在这其中，大部分人都“仇恨美帝国主义”。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持观望态度。

他们赞成政府的决定，并帮助政府做解释工作，但背地里也表现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并表示中国面临着很多烦恼。

在进行了解释动员工作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官兵心态很好，战斗热情高涨，他们准备如果有必要，就去抗击美帝国主义。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人认为，美国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不是很高，各个方面都不如日本人，所以他们无疑会遭到失败。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不应该牵扯进朝鲜事件，想在长期作战之后早日回家，部分年轻战士想着解决个人问题。类似的情绪在极少数官兵身上有所体现。

中共领导层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结束这一进程还需要几年。同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会加速最终胜利的到来，因为美国必将遭受决定性失败。大家认为，如果美国威胁消灭北朝鲜人，那么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

刘少奇评价，总体上中国社会仇视美帝国主义，如有必要，将顺利完成与之战斗的任务。所有试图阻止我们的敌人都将被打倒。

.....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3-135

№20253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美国在朝鲜的意图 (1950年9月22日)

1950年9月22日尤金院士向斯大林汇报了同毛泽东在其寓所进行的谈话。 [18]

.....毛泽东强调说，杜鲁门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6月底宣布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这样杜鲁门就扩大了美国侵略的范围。

这一举措将英国置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因为一方面英国应该支持美国在朝鲜的方针，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支持美国反对中国。考虑再三，英国不断督促美国寻求应对亚洲复杂局势的途径。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表明，美国并不打算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种实力探测，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将如何反应，国际舆论将会如何。

为此毛泽东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美国将努力在“不丢面子”的

情况下，以妥协方式寻求平息朝鲜半岛局势的方法。为此，美英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寻找机会恢复中国的席位。这只是假设，不过，这对美英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使得像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都反对美帝国主义。

接下来毛泽东指出，美国明白，暂时不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暂时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国的手脚就是自由的，可以有更多作为，不拘泥于形式，在亚洲采用各种措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如果中国以某种形式与美英有所联系，那么这将束缚它的行动，就会给中国带上了枷锁。此外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务和间谍活动就会借助大使馆和外交使团活跃起来。

在中国加入到联合国后，就会在安理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组织中出现一些变化，因为那里将出现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大国。这无疑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好处。

.....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6-138

№24811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1950年9月22日)

绝密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通报说，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年10月5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中苏友协全国代表大会，庆祝中苏友协成立1周年。

中苏友协理事会表示，希望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的全权代表能够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文化联系的报告，并且希望中苏友协能够收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一些礼物(电影放映机、书、影片等)。

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全权代表已经被免除了职务，在中国没有全权代表，因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认为，最好让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在大会上作简短的发言，表示祝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还认为，应当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向大会发送一封贺信。至于给中苏友协的礼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经准备向中国赠送5辆配备

了流动电影放映机设备的汽车以及一些收音机。此外，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请求，让苏联电影部另外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划拨10台流动电影放映机和15部故事片，让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另外划拨1—2台磁带录音机，以此作为赠送给中国朋友的礼物。

我认为，可以同意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提出的这些建议。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9月22日

附件：

庆祝中苏友协成立1周年向其赠送的礼物清单 [\[19\]](#)

- 1.嘎斯0330汽车，配备流动电影放映设备、发电机和无线电接收装置，5辆
- 2.录音机，2台
- 3.磁带(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穆索尔格斯基、博罗金等人的作品)，可以播放20个小时
- 4.带发电机的流动电影放映机，10台
- 5.故事片，15部：
 - 《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一和第二集)，汉语配音
 - 《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汉语配音
 - 《他们有自己的祖国》，汉语配音
 - 《侦察员的功勋》，汉语配音
 - 《和平的青年时代》，汉语配音
 - 《列宁在十月》，汉语配音
 - 《列宁在一九一八》，汉语配音
 - 《攻克柏林》，汉语配音
 - 《库班的哈萨克》，汉语配音
 - 《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汉语配音
 - 《秘密使命》，汉语配音
 - 《勇敢的人们》，汉语配音

№00305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朝鲜派遣歼击机团事宜(1950年9月23日)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滨海边疆区派遣空军拉9歼击机团去保卫平壤的措施。

一、为此，我们已决定派出空军第三十二歼击机航空师第三〇四团，该团配备有40架拉9飞机，现部署在滨海边疆区斯帕斯克机场。

该团将于10月1日和2日飞经中国境内，沿斯帕斯克—东宁—延吉—通化—安东—平壤航线前往。

我们将认真制定，并由该团飞行员认真研究飞行计划，特别是在安东—平壤地区的飞行计划。

二、我们从获得的朝鲜资料得知，平壤地区的机场适于工作。

这些机场现在没有地勤人员，他们已被派往汉城以南的机场，在平壤地区也没有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

因此，我们将在9月25日至30日期间用铁路经安东从滨海边疆区运送：

该团的技术服务小分队和最必要的机场设备；

一支配有4部雷达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小分队，以便搜索敌机并为我方飞机导航；

一个高射炮师，由3个85毫米高炮营和一个37毫米高炮营组成，共有16门高炮，任务是保卫机场；

15个燃料基数的燃料和15个弹药基数的弹药。

三、为了接收该团和组织其战斗，9月24日，空军军长诺加上校乘坐汽车从滨海到了平壤，他将在安东同该团会合，下达战斗任务，并将

指挥该团飞往平壤。

四、10月3日该团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

五、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

华西列夫斯基

1950年9月23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7, л.81-82

№13289 周扬等致帕利古诺夫函：感谢塔斯社的帮助并 咨询(1950年9月25日)

致H.Г.帕利古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目前逗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者代表团领导人给您的信函。

附件共4页。

E.科瓦廖夫

1950年10月10日

附件：

尊敬的帕利古诺夫同志和切尔内绍夫同志！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以及与我们进行的交谈。

新华通讯社，作为政府的电讯社，建立只有1年的时间，因此在工作 and 组织机构方面还缺乏经验。

以前塔斯社的消息给了我们以帮助，而这些交谈对于完善新华通讯社的工作，将会给予更大的帮助。我们已经占用了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但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次与你们会面。

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们请求你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塔斯社4个主要编辑部和资料编辑部的工作和组织机构情况，并请转告我们：你们所认为的最适合于我们工作的那种经验。

请详细说明以下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将把这些问题附在后面。

对于你们所给予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地表示感谢！

敬礼！

代表团团长周扬

代表团副团长梅益、秦川

新华社副总编朱穆之

1950年9月25日

附件：

恳请介绍以下几个主要编辑部的工作和组织情况：综合信息部、国际信息部、地方新闻、境外信息以及资料编辑部，其涉及的问题如下：

综合信息编辑部

1.综合信息编辑部分为哪几个部门？除了编辑和转发通讯之外，这些部门还进行哪些日常工作？

2.除了季度工作计划之外，还有哪些日常工作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什么？怎样编制计划？

3.通讯(信息)的工作程序，从其接收一直到转发为止。有什么样的程序、特别信息内容和转发方法？综合信息部提供给中央各报刊和地方新闻编辑部的通报，是否能做到完全在各地方转播？中央和地方报刊利用这些信息的数量如何？

4.你们是如何领导、检查和总结各部门以及塔斯社记者的工作的？塔斯社是否与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一起，对加盟共和国通讯社的工作共同实行领导？

5.如何实行责任制？各级编辑和记者对转交给他们的信息资料承担何种责任，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国际新闻编辑部

1.新华社境外分支机构和记者缺乏工作经验。因此，请求你们能够尽可能多地讲述和介绍一下你们的境外分支机构和记者的工作情况以及领导他们的经验。

2.塔斯社与外国新闻社交换信息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3.国际新闻编辑部在编辑新闻时是如何考虑境外新闻编辑部、地方新闻编辑部和中央各报刊的不同需求的？

4.在国际新闻编辑部的各部门中是否有翻译人员，或者是把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部门？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境外新闻编辑部

1.组织结构和境外新闻编辑部转交新闻的程序。

2.你们是如何根据境外读者的要求编写新闻稿的？请讲述一下你们的经验。

3.什么样的新闻可以用俄语向境外转发，而无需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转交给境外的综合信息和国际信息的比例如何？

4.你们是如何组织莫斯科的记者站、分支机构和各地的记者站向境外转发信息的？

5.你们采用何种语言向东欧国家转发信息？你们采用何种语言向其他国家转发信息？

地方新闻编辑部

1.地方新闻编辑部的组织机构。

2.综合新闻和国际新闻的选择和编辑过程。选择新闻的原则。

3.你们是如何了解地方报刊读者的要求以及地方报刊是如何使用你们提供的新闻的？

资料编辑部

在资料编辑工作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请详细介绍一下资料编辑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恳请你们列举出一些重要资料作为实例，向我们讲述一下整理和统计资料的过程。

№003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马特维耶夫的指示(1950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

1950年9月30日决议

第118项 马特维耶夫 [20] 同志的第1298号电报。

批准所附对马特维耶夫同志第1298号电报的复电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18项

平壤

致马特维耶夫

对第1298号电报的复电

我们认为，金日成在同您谈话中作出的关于把最高司令官和军事部长 [21] 的职务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决定，关于成立最高司令官直属的参谋部的决定，关于组建6个师和从南朝鲜撤出后备人员的决定是正确的。

必须加快6个师的组建。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将在10月5日至20日期间提供。至于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是否合适的问题，你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主意。

根据上级委托。

常福 [22]

文件送：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 , ф.3 , оп.65 , д.827 , л.100-101

No0031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1950年9月30日)

1950年9月30日20时35分发自平壤

1950年9月30日23时32分收到

1950年9月30日23时40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

A.葛罗米柯同志：转呈我收到的金日成和朴宪永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译自朝文)。

此信是朴宪永同志亲自交给我的。

什特科夫

附件：

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给斯大林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我们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向您，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您经常对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我国人民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在这封信中想简要地向您通报目前我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前线的局势。

在美军发动仁川登陆战役前，战场形势不能说对我们不利。

那时敌人接连失败，一直被赶到南朝鲜最南端的一块不大的地区，我们很有可能取得决战的胜利。这种局势大大动摇了美国军队的威望。

这时美国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为了实现无论如何要夺取朝鲜作为自己军事战略基地的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它动员了太平洋的几乎全部陆海空军，于今年9月16日实施登陆战役，在仁川地区登陆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敌人占领仁川后，正在汉城内进行巷战。

形势十分危急。

人民军各部队正英勇地抗击着向前推进的登陆之敌。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敌人各种型号的近千架飞机，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夺取了制空权，对我前线和后方实行昼夜不间断的空袭。在前线，敌机械化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无障碍地进行机动作战，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同时，敌机肆无忌惮地轰炸铁路、公路，摧毁电报电话线路、通信设施和其他目标，破坏我军给养供应，瓦解我军的作战意志，使我们无法

适时展开反击作战。我们在整个战线都面临这种困难。

敌军在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所有联系之后，已使仁川登陆的和突破我南部防线的这两支部队会合，从而使汉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南部作战的人民军各部队已被敌人从北面加以分割，处于南部的人民军目前无法补充弹药、给养和干粮。此外，一些部队已失去联系，有些已被敌人包围。

显然，敌人只要一攻占整个汉城，就将向北朝鲜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上述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美国的侵略最终将获胜。

为了保证军队能得到一切必需品和不断向前线运送给养，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空中力量。然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有信心克服面临的困难，决不让朝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我们果断地采取坚决的措施：组建和训练一些新的师；把在南朝鲜动员来的10余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更有利的作战地区；武装全民，准备打持久战。

尽管如此，如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措施，而且还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

因而，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

我们的上述建议妥否，请您给予指示。

顺致敬意！

朝鲜劳动党中央

金日成 朴宪永

1950年9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葛罗米柯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41-45

№11417 中国长春铁路局苏方局长的命令：移交中长路财产(1950年9月30日)

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命令

第306/H号

关于将未列入中长铁路的中长铁路财产转交中国东北政府的问题

根据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1950年9月7日第185/kco号指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1950年9月2日信件的精神，我命令：

一、由中长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马卡罗夫同志将下列设施转交给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同志：

(一)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哈尔滨博物馆；

(三)中长铁路公司苏联方面对松花江船厂及河运的权利。

二、由中长铁路煤炭工业处副处长科尔沙克同志将良种马厰转交给哈尔滨农业科学院院长刘清栋(Лю Чен-дун)同志。

三、由中长铁路沈阳分局副局长杜拉索夫同志

(一)将沈阳医院转交给卫生局局长王..... [23] 同志；

(二)将沈阳市宾馆转交给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处处长李贵山(Ли Гуи-шэн)同志。

四、大连铁路分局局长科罗利同志将下列设施转交给旅顺—大连地区政府主席韩光同志：

(一)大连工业学院；

(二)大连细菌研究所；

(三)大连化学研究所；

(四)大连信号厂；

(五)大连无线电试验室；

(六)大连博物馆；

№00315 斯大林致罗申电：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 (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97-98

№07346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1日)

平壤

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9月30日和10月1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断。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保卫共和国的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韩国 [24] 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

1950年10月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00—901页

№118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1950年10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

第78号会议记录第138项

1950年10月1日

致马林科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

1950年10月1日决议

第138项 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通过所提交的致A.Я.维辛斯基同志的电报文本(附件一)。

二、询问金日成和毛泽东对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批准致平壤(附件二)和北京(附件三 [25])的电报文本。

三、在收到平壤和北京的答复之后发出致维辛斯基同志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38项

绝密

纽约

致维辛斯基：

第一，您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您基本上是重复了苏联代表团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安理会上提出的那个建议。在目前的条件下，代表团应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建议，以补充我们原来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那些要求，并利用自己的关于朝鲜问题的积极纲领性措施来对抗英美的计划。

至于英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代表团提出的议案，大体上没有被通过，因为议案中规定由外国军队占领整个朝鲜领土。

第二，您应该将以下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关于朝鲜问题的议案。

注意到：朝鲜人民渴望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朝鲜国家的合法要求，至今尚未实现；

出发点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和平手段，根据国际法和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可能导致共同和平被破坏的争端；

为了遵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目标，联合国大会建议：

一、在朝鲜的交战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即将自己的军队从朝鲜撤出，并以此建立这样一些条件，即确保朝鲜人民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主权，自由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

三、在外国军队撤离之后，为建立独立统一的朝鲜国家的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立即进行朝鲜全民的国会选举，其基础应该是朝鲜居民意志的自由表达。

四、为了组织和进行整个朝鲜国会的自由选举活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会代表联席大会上，选举出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人数均等的委员会。”

附件二：

政治局会议第78号记录第138项

绝密

平壤

致苏联大使：

立即拜会金日成并通知他如下内容：

“鉴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即将讨论英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等国代表团就朝鲜问题提出的议案，我们认为必须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如下议案，用于抗衡以上国家的议案：

‘注意到：朝鲜人民渴望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朝鲜国家的合法要求，至今尚未实现；

出发点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和平手段，根据国际法和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可能导致共同和平被破坏的争端；

为了遵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目标，联合国大会建议：

一、在朝鲜的交战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立即将自己的军队从朝鲜撤出，并以此建立这样一些条件，即确保朝鲜人民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主权，自由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该研究关于接收朝鲜为联合国组织成员的问题。’

请通告您的意见。”

受上级的委托。

A.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6卷，第891—895页

№00316 罗申致斯大林电：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H.罗申

1950年10月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105-106

№00317 罗申致斯大林电：尤金帮助筹备《毛泽东选集》出版情况(1950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4日16时25分收到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1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作报告。这约需用3个月左右的

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4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1月底或2月底。

可否，请复。

毛泽东”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个3卷的《毛泽东选集》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已详细地研究了 my 建议，并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目前正由毛泽东审订。已转告我：他将于近日内约见我，以研究我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我以前报告过的，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约有30—40个印刷页码。

对于由翻译译出的300多页新的译文，我已收到了(约有一半为新的文章)，也研究过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给文章的作者。翻译要将余下的文章译出，约需用1个半月的时间。

毛泽东多次请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走一走，并请我给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为翻译正在译那些新的文章。这次到这些城市旅行，约需用2至3周的时间。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2至3周的时间即可完成对余下文章的审订工作。

由此看来，到12月底，我根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

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H. 罗申

1950年10月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格里戈良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107-109

№1182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考虑 (1950年10月5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毛泽东：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

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它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 and 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将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5日

附件：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报的初稿 [\[26\]](#)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认为能够向您提出关于派出5—6个师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前往朝鲜的问题，是因为我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即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准备出动自己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支援朝鲜同志(众所周知，敌人已经越过了，在三八线附近的几个地方)。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国同志的这些声明，我是不可能向您提出以上所述的问题的。

同时遵循了国际局势方面的如下意图：1.正如朝鲜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并没有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战争；2.日本的军国主义力量还没有复活，他们还不能给美国任何军事帮助；3.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做出让步，也就是同意在有利于朝鲜的那些条件下解决朝鲜问题；4.美国不得不将台湾归还给中国；5.美国将不得不拒绝与日本反动分子缔结单独的条约，放弃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将日本变成自己的仆从国的打算；6.美国将被迫同意出席..... [27] 不进行尖锐的斗争和重新展示自己的力量，中国是不能得到这些让步的，而且也得不到台湾，美国人将会把台湾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将它作为自己的和明天军国主义日本的基地，而不是蒋介石的——他没有任何可能获胜的机会。

尽管可能性很少，也不排除派出5—6个师的部队会将中国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中，与此同时，也将苏联卷入战争，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有相互援助的条约。但是，对此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强大，而欧洲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德国的情况下，已经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德国目前不可能给美国任何帮助。

当我向您询问关于5—6个师的事宜以及认为您将找到机会向朝鲜派出这些师时，我遵循的就是这些对外政策的意图，因为您在此之前就已经声明准备派中国的武装力量前往朝鲜。

但是，您在给我的复函中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的新情况，在我看来，这种新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这意味着，中国从其国内形势出发不准备参加新的战争。对于像中国这样偌大的国家来说，人民的命运不是由对外政策，而是由国内局势决定的。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比您更加了解中国国内的局势了。如果中国国内局势不允许做这样的冒险，也就是采取能够导致新的战争的那些步骤的话，那么，就应该考虑是否值得做这样的冒险。因此，我完全理解您和您的立场。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将与他们交谈。

菲利浦夫

1950年10月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09—916页

№24812 苏中铁路代表会谈纪要：关于建立直通铁路运输(1950年10月6日)

从1950年7月18日到10月6日，苏联交通部代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有：A.A.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团团长)、T.Г.叶尔马科夫、Л.М.安东诺夫、И.В.科兹洛夫、С.Н.奥西片科、

П.А.马尔克洛夫、Ю.Ю.普里斯科；中国铁道部代表团成员有：吕正操（代表团团长）、闵勇（Ми Юн）、庄玲（Чжуан Лин）、朱绍田（Чжу Шаотянь）、蒋英玲（Цянь Инлин）、周夏冰（Чжоу Сяпин）、张英志（Чжан Инчи）。

会议审议和协商了如下问题：(1)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的协议；(2)边境铁路协议；(3)旅客运载和货物运输的规则；(4)关于这些规则的业务指导；(5)关于核算和制作财务报表的规则；(6)上述文件的所有附件。

会议谈判的结果是，商定并草签了上述几个文件及其附件。

在签署该备忘录的同时，双方还就如下几点达成了一致：

1.如果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的协议生效，在执行该协议时，为了避免在进行核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麻烦，卢布和元之间将不确立正式的比率，并向该国权威的金融机构请求，以便确立两国铁路运输的核算方法。

2.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从中国经过苏联向第三国运输货物以及从苏联经中国向第三国运输货物的规则草案，由于涉及第三国的利益，应对该草案另外进行研究，以便在签署关于苏中之间建立直通铁路运输协议的同时，就该草案最终达成一致。

该备忘录于1950年10月6日在北京拟定和签署，备忘录有两份文本，一份俄语文本，一份中文文本。

两份文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苏联交通部全权代表

中国铁道部全权代表

РГАЭ，ф.1884，оп.60，д.169，л.301-302

№20088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出兵决策的情况(1950年10月7日)

1950年10月7日1点50分(发出)

第1425号

兹报告如下：根据我们现掌握资料显示，内务相朴一禹已于1950年10月5日从北京返回朝鲜。1950年10月6日劳动党政治局开了一个会。

在这次会议上朴一禹通报说，他在北京期间再次受到了毛泽东和5位(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接见。第一次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第二次6个小时。

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提供帮助，但就是不能派军队。原因在于，如果中国(派军队)帮助朝鲜，那么此举实际上就会将苏联也拖入这场战争。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这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却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建议朝鲜人继续在前线和后方坚持斗争，并着重强调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金日成可以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后方。

在讨论了目前朝鲜的战争形势后，劳动党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使在得不到外部武力援助的情况下，也将在山区继续坚持战斗，还可以在中国组织突击军团，从而为以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由李承英具体负责。在北朝鲜，在发生撤退的情况下，也将展开游击斗争，领导人为朴一禹。

朝鲜方面目前仍未向我们通报关于朴一禹从北京回国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马特维耶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05-706

**№11821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态度
(1950年10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7日11时55分收到

第1份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4676号电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5—6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9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108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1个军(3个师)就有大约15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1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4倍的兵力和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只有2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10月8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1950年10月7日

第2318号

译电：阿拉乌希金第9—10号，第八局

1950年10月7日，13时00分

第8609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20—922页

№00322 斯大林致金日成函：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的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了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原，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 and 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6个师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

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65-67

№160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通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 (1950年10月8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

尔加宁同志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9日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现在向您报告我在北京时间22点30分收到的毛泽东给您的电报的内容，以此作为对我2318号电报的补充：

“菲利波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的回电。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月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部队大约能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

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

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8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

根据我从民航获得的消息，周恩来一行已于17时43分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

H.罗申

第2332号电10月8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32

№2009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已得到中国将出兵的通报(1950年10月8日)

第1436号

1950年10月8日

1950年10月8日金日成请我到 he 那里去，并通报说， he 已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后者在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援助朝鲜人民。

中国方面已确定了前线指挥员的人选，并要求朝方派一个代表来，以便通报朝鲜战争形势和协商中国军队入朝的相关事宜。

今天晚上(朝鲜)内务部长朴一禹便将启程前往沈阳与中方前线指挥

员会面。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11

№20091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部署中国军队的意见(1950年10月8日)

第1437号

1950年10月8日16时30分(电报发出时间)

1950年10月8日当地时间12时30分金日成邀我和什特科夫去会谈。

会谈期间，金日成说，1950年10月8日6时他的朋友们派来一名信使，并转交了一封密码电报。电报很短：

- 1.朋友要出兵，具体兵力不详。
- 2.请金日成派代表来沈阳解决与朋友的决定有关的事宜。
- 3.说明前线的战况和朋友军队可以集结的地区。

(中国入朝军队的)指挥员是彭德怀。

金日成立即派遣朴一禹前往沈阳以解决上述问题。后者将于1950年10月10日抵达沈阳。

金日成认为，朋友入朝参战的兵力不会少于12个师。

有鉴于此，他决定，请朋友的3个师以混合编队的行军方式从通化—辑安方向进驻元山—咸兴地区。

3个师进入安州地区，其任务是保卫这些地区的海岸线，防止敌人海军登陆。

6个师暂且全部集结在安州东北部地区。待其完成集结后，再根据战争形势安排任务。

目前还很难确定这些军队的集结期限。大致预计，在安州地区部队的集结需要7—10天。在元山—咸兴地区部队的集结不少于12天。

为了保证朋友的军队能够有组织地投入战斗，我们能否这样安排，即我带自己的小组去安东，以便向朋友提供帮助。

在安东我们可以用“博多”电报机与莫斯科保持通讯联络。

马特维耶夫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12-713

№2009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感到前途光明 (1950年10月8日)

第1443号，1950年10月8日11时20分

10月8日我去拜会了金日成，并给他读了您的信。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朴宪永，他翻译了信的内容。

金日成将信中所言均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中。

信中内容给金日成和朴宪永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明显看出，他们对此很满意。

金日成说：“现在我们有了光明的前途。”

金日成转身对朴宪永说，我们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加强前线和加速后备部队的建立。

什特科夫

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20

№16008 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放弃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50年10月11日)

绝密

驻北京的苏联使馆立即转告毛泽东同志：

贵国代表已于今日到达，我们联共(布)的领导同志与贵国代表一起讨论了贵国已知的那些问题。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2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2.如在一个月內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入侵占。

3.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1.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2.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3.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调入东北，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

等待您的决定。

菲利波夫(签名)

周恩来(签名)

1950年10月11日

报告执行情况

打印1份送斯大林同志

РГ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34 , л.134-135

**№16009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暂不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2日

优先拍发

菲利波夫：

北京时间15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4784号电报。毛泽东同志请

我向您转告：

“您和周恩来签名的电报已收悉。同意你们的决定。”

Н.罗申

1950年10月12日

第2390号电

打印两份2号件送第八局

РГ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34 , л.140

№160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已下令停止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1950年10月12日

发自北京

菲利波夫同志：

此件是对我2390号电报的补充。

22时12分我收到毛泽东发给您的如下电报：

“致菲利波夫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我同意10月11日电报的意见。

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 [\[28\]](#)

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准备新的工作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

毛泽东”

H.罗申

1950年12月12日

第2395号电

打印两份，第二份归档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1

№16011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电：立即组织 朝鲜政府撤退(1950年10月12日)

绝密

密码电报第75511号

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同志：

请向金日成宣读以下内容：

“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

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2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这至少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

鉴于周恩来通报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只有在6个月后才可能出兵援助。

因为这样的援助已为时太晚，那时美国军队可能已占领北朝鲜，所以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

鉴于这些情况，由中苏双方的中央代表召开的这次会议建议：

1.立即开始对平壤等重要据点进行疏散，不要惊慌；

2.朝鲜人民军边作战边向北方撤离，牵制敌军，防止其迅速向北方深入；

3.一部分军队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山区集结，在那里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另一部分军队要组成小分队进入敌后打游击；

4.为组建新的后备师而应征入伍的朝鲜人要分批经中国边境进入东北，在那里组建师团(中国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5.利用已到货的、朝鲜军队尚未使用的苏联武器来装备在东北组建的朝鲜师团；

6.派所有在苏联学习过飞行的朝鲜人去执行飞行任务并在东北把他

们整编成航空兵部队，所用飞机由苏联提供；

7.对于所有苏联顾问，要么派他们回苏联，要么利用他们在东北组建新的朝鲜师团——一切都由金日成酌定。

还要向您通报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

冯西

1950年10月12日

第4/8737号电

文件送：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同志、第八局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2-144

№20093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入朝计划(1950年10月12日)

第1459号

1950年10月12日5时

1950年10月11日，我与金日成见了一次面。

朝方参加会谈的还有朴宪永、金策和朴一禹。

我方有瓦西里耶夫。

谈话伊始，金日成便通报了前线的战况，并就如何才能稳定战线和加强平壤市的防务等问题咨询了我们的意见。

在交换了意见之后，双方商定：当务之急是要起草一个给各部队的命令，其中要说明当前的局势和明确人民军的任务。

派遣由中央和政府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前线去，开展相应的政治宣传工作。

责成朝鲜人民军总司令与瓦西里耶夫一起采取相应举措，以加强对作战部队的管理、战线的防务和建设。

金日成亲口告诉我说，朴一禹已从中国返回，他在那里与高岗见了面，后者被任命为入朝中国军队的司令员。 [29]

据朴一禹通报，中国军队将于今年10月15日从三个方向越过中朝边界，并于今年10月20日在预定地区集结。这些地区包括：博川、熙川和江界。

中国军队总人数将有26万人。

金日成继续说，会谈中高岗向朴一禹解释了中国政府派军队入朝参战的政治意义，其内容与金日成所收到的冯西的来信内容是一致的。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35-736

№16012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1950年10月13日)

绝密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3日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10月13日21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

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

现将谈话的详细内容随本电报一起发出。

H.罗申

第2406号电

打印9份，第9号文件送第八局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5

№00326 罗申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决定出兵及对苏联的要求(1950年10月1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4日1时38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2时译出

1950年10月14日3时30分送出

菲利波夫同志：作为对我的第2406号电(包括在第25612号电内)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Н.罗申

10月13日

第240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2

№00327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中国再次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1950年10月13日)

绝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八局

密码电报第75525号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我刚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再次对时局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尽管中国军队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对朝鲜同志予以军事援助。

我正在等待毛泽东有关此事的详细通报。

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

冯西

1950年10月13日

第4/6759号电

打印3份：

第一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二份送——

第三份送—— [\[30\]](#)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75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50

№0033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决定执行撤退计划(1950年10月14日)

1950年10月14日3时15分发自平壤

1950年10月14日6时36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7时10分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

致冯西：

按照您的指示，1950年10月13日拜会了金日成。

会见时朴宪永在座，我宣读了您的电报全文。电报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

金日成说，对此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但既然有这样的建议，他们一定执行。

金日成请求我谈一些具体建议，并让朴宪永做记录。

他请我们帮助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实施措施的计划。

什特科夫

1950年10月14日

第1476号密码电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3

№00331 斯大林致金日成电：停止执行撤退的计划 (1950年10月14日)

平壤

致苏联大使向金日成转达：

经历犹豫和若干暂时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作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

我为终于作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

有鉴于此，您要注意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中国军队所需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祝您成功!

冯西

1950年10月1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77

**№20095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报告：苏军将在中国
东北集结(1950年10月19日以前)**

兹报告关于派往中国沈阳地区的空军和坦克兵的整编和集结期限等事宜。

关于歼击航空兵

截至今年11月3日，部署在中国境内的米格15歼击机第一五一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

其中一个米格15航空师有可能在短期内全部配备中国飞行员和后勤技术人员。这些飞行员中既有在沈阳地区培训的，还有从上海专门调拨过来的。

在米格9防空歼击航空兵第三二八师和一四四师的基础上组建4个歼击航空师，每个师共2个团，每个团有飞机30架。截至今年10月24日前，这4个师中的2个师将在其现驻防地完成整编，其余2个师——根据指示，将在抵达中国境内之后再完成扩编。为这2个师提供后勤保障和服务的部队和一个歼击航空团也将整装随之一同从苏联发往中国。

通过铁路将上述所有部队运往中国需用40个专列。

专列首发日期确定在今年10月24日，平均每昼夜5个专列。发运截止日期为11月3日。列车换装将在满洲里站进行，期限为今年11月11—20日之间。因为满洲里车站每昼夜只能换装5个专列。[\[31\]](#)

这样，上述部队在沈阳地区集结的日期为今年11月28日。在苏联已完成整编的2个航空师将于12月5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而尚需在中国境内完成扩编的2个师，则需延迟至今年12月15日前。

关于强击航空兵

在后贝加尔军区空军第四十五军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的基础上，截至今年10月31日前将组建如下部队：

一个由2个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每个团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一个强击航空团，拥有伊尔10型飞机30架。

这些新组建的强击航空师和强击航空团的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将于今年11月12—17日间经铁路用10个专列发往中国，11月14—20日间在

满洲里站换装，今年11月25日前在沈阳地区集结。

所有飞行人员将于今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间，即所属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在沈阳集结完毕后，空运至沈阳。

关于坦克兵

由后贝加尔军区第六近卫机械化军的2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师组建10个坦克团，平均每个团配备装有85毫米炮的T 34中型坦克30辆、ИС2重型坦克6辆和ИСУ122自行火炮发射装置4台。

ИС2重型坦克将于今年10月21日从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布伊(Буй)等地区的坦克后备基地启程，发往满洲里站。

鉴于这些新组建的坦克部队距满洲里站只有120—160公里，因此它们可自行前往该车站，抵达目的地的日期应是今年11月1日，并于11月3日直接在这里换装，经铁路运往沈阳。

运输这些坦克共需56个专列。该车站每昼夜可装载坦克5个专列。坦克的运送将分两个阶段进行：11月3—9日发送35个专列；11月20—24日发送其余21个专列。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在于11月10—20日间运输歼击机和强击机航空师的专列要在满洲里站换装。

截至今年11月30日，10个坦克团将最终完成在沈阳地区的集结。

综上所述，我们将在中国境内集结的部队如下：

截至11月28日——若干歼击航空师；

截至12月1日——1个强击歼击航空师和1个强击航空团；

截至11月30日——10个坦克团。

现驻防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将于今年11月3日前改编成两个师。

上述空军师和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组建和集结活动由苏军总参负责监督，并向各站点派遣有专人负责的工作组。

№003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1950年10月27日)

急电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28日19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10月27日收到毛泽东致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

因此，我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同志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随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两同志。

上述事项请您研究，并给予适当答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7日”

备注：扎哈罗夫同志 [\[32\]](#) 看过该电报后认为，海军司令员随同库兹明一起赴莫斯科谈判是必要的。

H.罗申

1950年10月28日

第262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62-63

№20102 巴季茨基的报告：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将开往中国(1950年10月28日)

第1103550号

为落实苏联军事部长的第284089号命令，自1950年10月14日起，我们相继组建了第一四四、第十七、第三二八和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并配备了相应的人员和物资。所有这些部队将被发往新的目的地。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0月28日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54

№003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萧劲光等来莫斯科(1950年10月29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海军问题的电报已收到。同意萧劲光等同志来莫斯科。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64

№14149 普希金致斯大林报告：美国对朝鲜海岸实行封锁(1950年10月29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共中央主席团外交事务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苏联外交部报告下列情况。

9月27日，所谓驻朝鲜联合国武装力量司令员克拉克将军宣布，美国海军部在朝鲜周围建立了“海上防御地带”。防御地带沿着朝鲜海岸向北延伸到位于距苏联南部边界12海里的地点，并沿着西海岸延伸到位于距中国边界12海里的地点。按照克拉克的声明，进入封锁区的任何一艘船只，不分国籍，都将受到搜查。克拉克还宣布，防御地带将处于远东的美国海军司令的管辖之下。

克拉克的声明并没有转交给报刊去刊登。美国报纸只刊登了这一声明的摘要。

克拉克的声明所说的是，美国司令部正在扩大美国人于1950年7月所确定的对朝鲜海岸的封锁范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50年7月4日用照会通知苏联外交部，美国总统已下令对朝鲜海岸实行海上封锁。

苏联外交部于1950年7月6日发给美国大使馆一份回答的照会，照会中指出：

“封锁朝鲜乃是一种新的侵略行动。这一封锁行动如同美国在朝鲜的整个武装干涉一样是同联合国的原则极不相容的。

鉴于上述原因，苏联政府将会认为，美国政府要对这一行动的全部后果和因实行上述封锁行动而可能给苏联的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

根据1950年7月9日第2918—1676c号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苏联船只已不再被派到朝鲜的各个港口去了。

鉴于克拉克的声明，苏联外交部认为给美国政府发一份照会是合理之举，该照会中要宣布，建立上面所指出的“海上防御地带”实质上乃是美国于1950年7月对朝鲜所实行的海上封锁的扩大化，因此也是美国在

远东的新的侵略行动，美国政府要对这一行动的全部后果和可能会对苏联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负全部责任。

附上中央决议的草案。 [33]

请审阅。

Г.普希金 [34] (签名)

1950年10月2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马林科夫同志(2份)、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萨布罗夫同志、别尔乌辛同志、存档(4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7 , л.39-40

№2010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航空兵部队集结并开往中国(1950年10月30日)

根据政府决议，最先发运的8个歼击航空团必须于11月28日前在中国境内集结，3个强击航空团和10个坦克团将于今年11月30日前集结。

根据既定计划，针对拥有两个团(每团有飞机30架)编制的空军师中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改组工作已于10月24日结束，并于当天经铁路开始发运。

截至今年10月30日，运送这些部队的总共55个专列中已有35列装载完毕且已发出。整个运输工作均按计划正常进行。

坦克部队也已完成组建工作，并将按既定计划发往满洲里站，直接在该站换装。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0年10月30日

ЦАМО РФ , ф.16 , оп.3139 , д.16 , л.174

No00338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朝鲜人民军到中国进行整编的情况(1950年10月31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并转上级：

您的指示我们已在严格执行。各兵团中的所有顾问都已召回并在新义州集中，于2—3日内送往沈阳听候您的命令。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上级作如下汇报：

我们的朝鲜朋友按照已有的建议以及同中国人的协议，已将9个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

到1950年10月30日越过朝中边境去到所在地区的有：

一、到湾沟地区的有3个步兵师——第六十九、六十八、六十七师，每师10000人，及特种部队5000人。这一地区共35000人。

二、到和龙地区的有第三十二、七十五师，每师10000人。派往这一地区的共29000人。从江界再补派6000人，其中特种部队5000人。

三、1950年11月5日前在延吉地区将集中3个步兵师，每师10000人，及特种部队5000人。

四、在通化地区有一个5000人的步兵学校和一个1500人的政治学校。

五、在汪清地区有1500人的坦克训练团，近期内将增至3500人。

六、在延吉地区有2600人的航空学校。

为领导这些军队的训练工作，成立了以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为首的指挥部。为此目的还成立了3个军指挥部。每个军指挥部下属3个分部。所有指挥部在1950年11月3日以前出发去东北。

新组建的师的指挥官都很年轻，在训练部队方面没有经验。

有鉴于此，我再次向上级请求留下90名苏联军官帮助朝鲜朋友整编并训练上述各师在军校中工作的所有顾问。

如果在这些师及军校里没有我们的苏联军官作顾问，朝鲜人用一年时间也无法把他们训练出来去进行战斗。

请您决定。

什特科夫

1950年10月31日

第1566号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81-83

№20232 波卢博亚罗夫致什捷缅科报告：对移交中国的 坦克装备维护问题(1950年11月3日)

第205641号

兹报告：

根据军事部长1950年10月17日发布的第Спр(4)383897号命令，为了更好地对作战装备进行保养和维护，强化全体指战员的战备训练，就地组织维修从后贝加尔军区发出的执行特殊任务的装甲机械，我认为理应采取如下举措：

1.在我坦克部队全体人员结束培训工作并返回苏联后，应在各坦克团保留1—2名军官，作为我方派驻(中国)的负责装甲机械维修和使用相关问题的顾问，为期6个月。

2.命令法卡诺夫中将同志，在坦克部队驻防的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建立坦克机械维修基地(能承担中、大修任务)。

3.为了给各坦克团的未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问题，即关于成立一个培养装甲专业军官的坦克学校和一个用于培训坦克乘务组的坦克教导团(营)。

请求您的指示。

坦克兵上将

1950年11月3日

手写批注：

责成H.A.洛莫夫 [35] 同志就第2、3条款内容起草给扎哈罗夫同志的询问函。

什捷缅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96

№20109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苏军的进展情况(1950年11月5日)

第284283号

兹报告关于发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进程情况：

截至今年11月5日所有首批发送的歼击航空兵各团及其军用保障物资已装车，目前正在苏联境内经铁路运往中国。

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当这些歼击航空团在中国境内集中后，当作如下部署：两个航空团在上海，一个航空团在砀山(徐州地区)，两个航空团在北京，两个航空团在鞍山(沈阳地区)。

计划发运的10个坦克团中已有6个目前正在中国境内经铁路运往目的地，其余4个将于明天，即11月6日抵达中国。

这些坦克团在中国境内的部署情况如下：3个团——北京，2个团——四平，1个团——吉林，1个团——哈尔滨，1个团——长春，2个团——徐州。

什捷缅科

1950年11月5日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25-126

№261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国家安全机

关提供帮助(1950年11月6日)

第440项 中国问题。

1.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B.И.库列绍夫和A.И.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携必要技术设备)、边境部门工作人员Д.А.阿尔杰费耶娃同志和警察机关工作人员3.А.法季扬诺夫同志,以援助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工作。

2.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如下电报草案:致毛泽东同志:

应您关于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边防工作人员和警务工作者的请求,兹派遣两名携必要技术设备之电台专家,以及一位边防事务工作人员和一位警务工作人员前往你们那里。

所有这些人将于近日抵京。

菲利波夫

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44, л.138

№003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 (1950年11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1月8日0时2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12个军，计36个师，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 一、苏式步枪14万支。
- 二、步枪子弹5800万发。
- 三、苏式自动枪26000支。
- 四、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
- 五、苏式轻机枪7000挺。
- 六、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
- 七、苏式重机枪2000挺。
- 八、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
- 九、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

十、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

十一、梯恩梯炸药1000吨。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知我。 [36]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0年11月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5 , л.80-81

№00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1950年11月9日)

1950年11月9日决议

第448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所附关于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给罗申同志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葛罗米柯给苏联大使的电报稿

北京

致苏联大使转交周恩来：

您请求就中国出席安理会问题进行协商的电报收悉。

我们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以同样的方式拒绝接受安理会提出的邀请。理由是该邀请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讨论中国最迫切问题，即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台湾问题的权利，因为它规定中国只有权参与审议麦克阿瑟的报告。

第二方案：接受邀请并委托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就上述问题发言，把问题的讨论变成为

对美国的声讨。如果不让中国代表团充分阐明其立场，中国代表团就离开会场并拒绝只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

我们认为，第一方案更为妥当。 [37] 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投票赞成英国代表德雷布议案的行为不应束缚你们的行动，况且，我们内部讲，苏联代表马立克并没有得到投票赞同英国议案的指示，给他的直接指示只是在苏联议案遭到否决的情况下行使否决权。看来，马立克对他终于迫使美国人赞成邀请中国着了迷，但他没有考虑到安理会通过的邀请形式会把中国置于不利地位。

请电告执行情况。

A.葛罗米柯

1950年11月10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71, л.4-5

№11418 哈尔滨工业大学苏联专家的报告：哈工大情况介绍(1950年11月11日)

一、情 况

1.(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法律地位和财政状况

根据中长铁路合营公司事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1950年9月7日的指示和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信件精神及中长铁路局局长1950年9月30日的命令，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于1950年10月15日前转交给哈尔滨市市长。

现在转交工作尚未进行。

自1949年6月14日起，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和教育部为大学拨款(见附后的预算)。

在1940年6月14日以前，为大学拨款的全是中长铁路局。1949年后至1950年11月1日前，中长铁路仍旧免费给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作人员提供：铁路交通车票、(部分工作人员的)住房、燃料和医疗服务。此外，中长铁路局继续给该校副校长、学校的一位教师(科瓦利斯卡娅同志)、东北铁路局铁道学院的一位教师(编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伊万诺娃同志)等人发放工资。

现在，中长铁路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人员在校工作不支付任何报

酬。

2.住房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土坯院内(预备系的职工和学生宿舍)和绿荫市场区(一栋学生宿舍楼)有一些自己的住房,而在绿荫市场外还有3幢日本人建造的楼房(朝土坯院方向)现正进行维修。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部分员工(约有90人)仍住着属于中长铁路局的房子。

3.教师

在该大学任教的共有152人,其中有70人为在编教师,其他的均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行政人员中的兼职教师以及从外部聘请来的教师。大多数任课教师都是中长铁路局的职员。从苏联派往中长铁路的专家中有13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现在约有8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有10名教师从苏联抵达这里。

截至今年3月份之前,苏联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来任教的人员工资一直由中长铁路局发放。现在,工资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教师级别表即“专家”表,按课时任务发给。

二、应解决的问题

1.鉴于学校正处于移交过程中

(1)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的法律地位

在此之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全体员工都是铁路员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铁路系统都工作了3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长铁路局长的命令可以被解释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财产的转移(见后附命令 [38])。

(2)住房

学校不能向住在中长铁路局住宅里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提供住房。

应当指出,在最近3—4个月,中长铁路局市区公务段加紧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员工迁到其他更远的(面积较小的)住宅里,根本不考虑学校

的需要(例如，楼房管理员被迁到了离学校3公里远的地方，学校车库主任的住宅被占，等等)，而且有的还被迁出学校(如副校长格里戈罗维奇教授)。

(3)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的燃料

命令发布之日是取暖季节的开始，但是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员工免费发放用煤却遭到拒绝(总共才500吨)。

哈尔滨工业大学没有用于发放免费燃料的拨款，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员工们处境艰难。

(4)医疗救护

中长铁路局医院(通过卫生部门)预先发出通知：自1950年9月15日起停止接诊员工和学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拨出的资金都用在医疗诊所的日常维持上，而用于住院治疗的资金极为短缺。

(5)老师即中长铁路局的员工

新学年开始以来，有些经济单位的领导(如哈尔滨机车制造和修理工厂厂长希利克维奇同志等)禁止老师们离开工作岗位。为了答复我们去铁路局的要求而发了一道批准令，但是要求干满工时。其实批准令只是个形式，实质上它要裁减兼职教师。

2.关于把我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问题

(1)是哪个部为我办理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的手续的？什么时候办理手续？

(2)是谁、如何给我发工资？工资标准如何？

(3)把我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多久？

1950年11月1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042—2045页

№125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接受中国青年来苏学习(1950年11月13日)

1950年11月13日

第3项 关于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到中央共青团学校参加学习班的问题。

1.满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冯文彬同志的请求，允许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共青团学校举办的为期9个月的学习班。

2.与培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20名工作人员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支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2

№003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加强空军的建议 (1950年11月15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通过给中国补充两批共120架米格15飞机来加强别洛夫空军师的力量，并建立航空兵指挥部。

至于东北各机场全面加强防空措施的问题，我们将与扎哈罗夫同志一起解决。

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祝您一切顺利!

毛泽东

1950年11月15日

又及：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您的电报已于11月15日当地时间20点30分送出。 [39]

第2910号电

扎哈罗夫

1950年11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16

АВ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89

№003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汽油等问题 (1950年11月16日)

特急

菲利波夫同志：

现在，我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已由6个军18个师增至9个军30个师。此外，我们还有3个军9个师作为预备队。因此，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关于汽车问题，苏联政府已同意在12月15日以前为我们提供3000辆。

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汽油和润滑油的问题。我请求您批准按以下数量提供汽油和润滑油：

一、新的订货：汽油10000吨，机油2720桶(容量53加仑，下同)，后轴箱润滑油220桶，刹车油110桶，黄油(润滑脂)144桶。

二、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向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的订单规定，提供下列油料：汽油7000吨，机油2380桶，后轴箱润滑油190桶，刹车油95桶，黄油(润滑脂)126桶。

三、必须从苏联购买的各类油料(第一、二两项相加)总数为：汽油17000吨，机油5100桶，后轴箱润滑油410桶，刹车油205桶，黄油(润滑脂)270桶。

请您在12月底以前先提供上述汽油和润滑油的50%，另外50%请在1951年1月20日以前提供。

上述内容是否需要另行提出详细报告？

盼复。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0年11月16日14时

第291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17-118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换中长铁路监会 会苏方主席(1950年11月16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19项 关于М.И.古谢夫同志和Н.Г.瓦西里耶夫同志。(1950年11月13日第538号记录第209c条)

批准交通部的如下建议：

1.免除М.И.古谢夫同志中长铁路中苏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2.批准H.Г.瓦西里耶夫同志担任中长铁路中苏股份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免除他莫斯科梁赞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职务。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

№20114 库德里亚夫采夫致军事部报告：向中国提交苏 军用中文地图(1950年11月16日)

第461514号

根据苏军总参谋长1949年的指示，我们依据示意图所标识地区印制了比例尺为1：100000和1：300000的地形图，所用文字为中文。

这些地图均根据中国资料印制，未采用苏联地图资料。

在这些地图印出之后，少量比例尺为1：300000的地图共计38500册，于1949年2月用飞机运往哈巴罗夫斯克市，并交给了远东军总司令。其余用中文印制的比例尺为1：300000的地图39500册和比例尺为1：100000的地图741000册现保存在莫斯科市第822军事基地。

鉴于中将科托夫同志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图匮乏，我认为，应将我们现有的用中文印制的地图780500册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

请求您的指示。

附注：一页示意图只给收件人。 [\[40\]](#)

苏军总参军事地形图管理局局长

库德里亚夫采夫中将

1950年11月16日

手写批注：

我认为应当将这些地图转交给中国的司令部，但首先要征询扎哈罗夫同志的意见。

H.洛莫夫

№26130 阿巴库莫夫致斯大林特别报告：在中国逮捕俄国侨民问题(1950年11月16日)

第7279/a号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目前在中国境内，主要是上海和满洲诸城市居住有4万多白俄侨民，其中多数已于1945—1947年间获得中国国籍。通过整理1945年苏联军队在满洲缴获的日本档案，依据间谍情报资料和战后从中国以侨民身份进入苏联的被捕间谍的口供，苏联国家安全部机关从居住在中国的白俄侨民中发现了470名外国特务。战争期间，这些间谍依照日本情报部门的指令积极从事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战后其中大部又受雇于美国 and 英国情况机关。目前，这些人仍继续进行着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中国的间谍活动。苏联国家安全部认为，有必要通过中国公安部门逐渐逮捕这些白俄侨民中的外国特务，并将其押回苏联进行仔细调查。

兹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该问题所作决议草案。

请您作出裁决。

В.С.阿巴库莫夫

АПРФ, ф.3, оп.313958, д.285, л.90

№00349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抽调驻旅大地区苏军的汽车(1950年1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据彭德怀和高岗报告，我们从事后方运输的车辆不足，敌机给运输汽车造成了损失，而当地人力资源和物资也同样无法保障供给，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到敌机轰炸。

江水开始封冻，因而无法架设暗桥和浮桥。所以在大江尚未封住，汽车尚不能从冰上通过之前，我们必须在最近八九天内，以极快的速度运输粮食、冬装和弹药。否则，将影响下一阶段战役的完成。

因此，除了动员东北一切可以动员上前线的车辆，我们最多能从中国北方动员200辆汽车并迅速将其派往前线以解燃眉之急外，我恳求您命令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部给我军运送500辆汽车。这500辆汽车将从您答应于11月25日至12月25日发来的那批为数3000辆汽车中抽出归还。

您能否满足我的请求？请您尽快给予答复。 [41]

顺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0年11月17日10时

第2933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22-123

№003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紧急向中国提供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关于请求紧急提供500辆汽车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将满足您的要求。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的汽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的旧车辆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站交付新的汽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5辆汽车，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汽车。

其余的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

1950年11月1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124

№20115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彭德怀与金日成讨论 前线形势和对策(1950年11月17日)

第7号

1950年11月17日9时35分(苏联外交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根据您的指示，11月14日我参加了金日成、高岗和彭德怀等所举行的会议。

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国志愿军指挥部，共持续了6个小时。

朝鲜方面除金日成外，与会的还有朝鲜内务部长和朝鲜驻中国志愿军在朝司令部的代表朴一禹，担任中译俄和俄译中翻译任务的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会议伊始，彭德怀简要介绍了前线战局，(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人民在朝鲜第一次战役的战果。

此次发言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在其第二次发言中又作了复述。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继彭德怀之后发言的是高岗。他指出，此次会议应协商如下问题：如何能够经过细致的组织和安排，以达到摧毁敌人的目标；我们下一步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

高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因而应当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接着发言的是金日成。期间他详细地介绍了朝鲜战争的进程，并通报了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军司令部所实施的举措。

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军经过良好的训练，武器精良，完全可以承担摧毁李承晚军队的任务。

而当美国人参战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尤其是在空军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金日成强调，由于苏联对朝鲜人民军的巨大援助，战争期间人民军的一切必需都能得到保障，苏联从未拒绝向朝鲜提供援助。

在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因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南方，根本没有力量来组织对登陆之敌的抵抗。

而当敌人占领了汉城和挺进三八线之时，他(金日成)曾请求毛泽东给予朝鲜军队援助。他原指望在敌人占领平壤前能获得这种援助。

随着汉城的丢失和敌人向北方的推进，尤其是平壤的失陷，战局急剧恶化。人民军信心动摇，失败情绪和朝鲜人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等言论广泛传播。

金日成感谢中国同志所给予的帮助，并指出，中国军队的进攻是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中国军队阻止了敌人的推进，使朝鲜人民军有机会重新集结和组织部队，并在中国境内积蓄后备资源。不论是朝鲜军队，还是朝鲜民众中都重新燃起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谈了根据朝鲜政府和人民军司令部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正在采取的相关举措。他们对撤退回来的朝鲜人民军各师进行了重新编组；组建了9个现役师，并已开始对之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飞行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为此将人民军第二军团司令部留在了铁原地区，还准备向敌占区派遣3—4个师。

金日成指出，由于分布有国家主要生产部门的地区和粮产区业已丧失，他们目前在物质方面极其匮乏。

应当说明的是，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故意回避了关于中朝军队作战中的从属关系问题。

金日成之后，彭德怀又发了言，共持续了近2个小时。

一开始彭德怀又简要叙述了一下朝鲜战争的形势。他指出，中国军队成功地执行了第一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包围并消

灭了10个团以上的敌人。

敌人被打死和被俘人数共计10000—12000人，近10000人被击溃，至今仍散落在大山里。

彭德怀指出，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及时的。在敌人越过三八线以前是不应当让中国军队入朝的。因为中国一些政治民主人士对此持异议。

而当美国人越过了三八线，并开始向中国边境进逼，为了保卫祖国，所有中国政治活动家都赞成派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再晚一点派中国军队入朝也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当美国军队已进击到中朝边境，中国军队的入朝举动就将被解释为侵犯朝鲜领土。

在评估敌人的力量时，彭德怀指出，美国人及其一伙都夸大了自己在朝鲜的军队数量。实际上，如果不算李承晚的军队，其目前在朝军队只有近12万人。

彭德怀强调，目前在朝鲜的美军各师，包括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战时司令部全部人马以及其他参战师部分兵力，共计只有约24000人。

英国向朝鲜补派了第二十九旅，目前其在朝两个旅，共计18000人。

彭德怀声明，不排除这种可能，即蒋介石会向朝鲜派遣10—20万人。

总之，彭德怀说，我们要面对的将是强大的，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

彭德怀尤其对美国空军的行动作了着重强调。他指出，美国空军会使用大量飞机实施集群式作战，向我军使用包括燃烧弹在内的大规模轰炸。美国空军通过向山林、山地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来点燃地面的杂草树木，从而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巨大人员伤亡。

鉴于敌人空军行动频繁，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被迫只能在夜间展开作战行动。因为中国军队现代化装备很少，坦克和空军几乎没有。因而，看来，我们只能进行持久战——延长战争时间1—2年，甚至可能3年。

彭德怀认为，朝鲜战争需要作打3年的计划。他说，如果能早点结束，那当然更好。

彭德怀再次指出，对中国军队的主要威胁将来自美国空军。

彭德怀说，中国战士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朝鲜没有苏联飞行员？

紧接着，彭德怀谈了中国志司关于朝鲜战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具体内容如下：

1.1950年11月，打算实施新的进攻。此次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3个师，将战线推进到安州—咸兴一线。

在这次战役中，打算派一个军深入到敌人后方，其他部队则准备打防御战和安排过冬。

2.继续为反攻作准备。反攻的时间预计在3月份。

彭德怀详细地谈了关于朝鲜人民军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在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政治工作在朝鲜人民军部队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之后，彭德怀又详细谈了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和实施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的必要性问题。

关于群众工作，彭德怀指出，这方面工作主要得依靠农民出身的朝鲜同志来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敌人与农村隔离开来，迫使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城市，然后歼灭之。

在指出中国军队在弹药和粮食供应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之后，彭德怀指出，这些困难主要源于汽车运输不足，朝鲜道路状况不好和铁路运输工作不能尽如人意。

他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队得不到任何人的协助，因为朝鲜地方政权机关都跑到中国境内去了。

最后结束时，彭德怀指出，中朝军队必须更紧密地协同作战。他建议，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应当经常开会，以便就作战有关问题进

行讨论。

彭德怀之后发言的是高岗。

他按照冯西给毛泽东的去信的精神简述和评价了朝鲜形势。

高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中国军队入朝参战赋予重大意义，因而任命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司令员。

高岗说，贪婪的美帝国主义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朝鲜。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它将策动蒋介石派军队到朝鲜来，甚至还会把蒋介石的军队空投到中国边境地区，如东北。

实践表明，美国和其他在朝鲜的敌人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太强。不过，仍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他们可能会派日本军队入朝，后者可是一支相当顽强的军队。

鉴于以上所述，他们(中方)将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便是军队的训练。高岗指出，准备完成战役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部队已经入朝，第二次战役打算于11月份进行。

他们(中方)目前感兴趣的问题是敌人是否转入进攻。如果敌人不这样做，那么他们自己将发起进攻，以便完成既定任务。

关于战役的第三阶段行动，即实施反攻，计划于1951年3月开始。他们(中方)已准备了用苏联军事技术重新武装起来的好几个新的军。

像彭德怀一样，高岗也指出入朝中国军队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朝鲜公路状况不尽如人意等。他请求帮助，以改善路况，并建议朝鲜铁路管理部门应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紧密联系。

高岗详细谈了游击运动的任务问题，并指出，金日成关于向敌后派遣几个朝鲜师的决定是正确的。

高岗对在朝鲜境内和中国境内的朝鲜预备役师的训练问题作了特别强调。他指出，他已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为在东北的朝鲜各师做好粮食、被服和住房方面的各项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请金日成向那里派遣作风优秀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工

作者，以加强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工作。

随后，高岗还谈了关于有必要加强对朝鲜民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与群众的联系，关心群众的物质保障等问题。他认为，朝鲜同志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不足之处。

他建议把一部分朝鲜老人和儿童送往中国，以便给予其必要的帮助。

高岗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例如，毛泽东就曾指出，在现有复杂的形势下朝鲜(党组织内部)可能会存在各种思想分歧，这就更有必要确保党的统一，保证党和人民都能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的周围。

接着，高岗又谈了关于朝中军队最高指挥机关之间在作战行动中应保持紧密合作的问题。他指出，有必要考虑一下双方合作的模式问题。

最后高岗希望，金日成、什特科夫和彭德怀能经常碰头，以便相互协商。

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借此，朝鲜和中国同志才有机会讨论一些相关重大问题，而我也对朝鲜战争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对战前朝鲜军队的情况作了说明之后，我指出，部队配发了崭新的制服，配备了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42]

美国人参战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朝鲜同志没能及时准备必要的后备力量。

随后我指出，苏联和斯大林本人向朝鲜提供了帮助，从而使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在武器和弹药的供应方面遇到什么困难。

我指出，在一般情况下，金日成在物资供应方面的要求总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斯大林同志也已向金日成说过，苏联可以向朝鲜提供它所需要的飞机，要多少给多少。

我还指出，由于组织和管理不善，朝鲜人民军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而这些都落到了敌人手中。

关于苏联飞行员入朝参战问题，中国同志与我一样清楚他们不能参

战的原因。中国同志自己也是不会赞成苏联飞行员来朝参战的。

我认为，扩大游击运动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关于朝中司令部协同作战的问题，我指出，这两个最高指挥部之间必须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个人认为，部队的作战行动应当有一个统一指挥机关。

会议结束时，高岗和彭德怀宣布，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可以在第二次战役，即11月战役实施之后再作决定。

请求您的指示，我是否应当参加此类会议，如果我得到他们的邀请的话。

什特科夫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18, л.50-59

№20116 索科洛夫致军事部报告：苏联坦克部队在中国 部署和培训任务(1950年11月20日)

1.根据苏军总参今年10月17日第опг/4/383897号指令，(我们)在后贝加尔军区组建了10个独立坦克团，其中：

5个属于第五近卫军坦克师(第一四六、一五一、一五四、一五七和一六三团)；

4个属于第十一坦克师(第一六八、一七四、一七九、一八二团)；

1个属于第十四机械化师(第一八七团)。

上述各团编号分别为：第一四六、一五一、一五四、一五七、一六三、一六八、一七四、一七九、一八二和一八七团。

战斗人员构成：

军官——82人

军士——185人

士兵——175人

共计——442人

T 34型坦克(装有85毫米火炮)——30辆

ИC型坦克——6辆

122毫米自行火炮——4辆

共计——40辆

2.所有坦克团抵达中国的期限为11月8—17日间，部署情况如下：

1个在哈尔滨——第一五一团；

1个在吉林——第一八七团；

1个在长春——第一五四团；

2个在四平——第一七九、一八二团；

3个在北京——第一六八、一七四、一四六团；

2个在徐州——第一五七、一六三团。

与此同时，随这些坦克团一起发往中国的还有弹药和加油车。平均每个团有5个弹药基数和加油车5辆。

3.计划发往中国的这10个团组建成如下部队：

(1)在现有的使用缴获的旧式装备的3个坦克旅的基础上成立3个坦克师。每个坦克师由2个坦克团(拥有8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装置)、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组成。每个师的总人数约5500人。分布地区：北京、徐州和四平。

(2)3个独立坦克团，分布地区：哈尔滨、吉林和长春。

(3)1个坦克团用作坦克学校的教学基地和教学中心，分布在北京。

4.另外，利用现有210水陆两用坦克(缴获美国的战利品)在徐州组建

1个独立坦克旅。

——用85辆M3A3型坦克组建3个独立坦克营，每营坦克21辆，其余20辆留作储备。

——用68辆日本的T97和T100型坦克组建3个独立坦克营。

所有上述9个坦克营均编入部署在边境地区的9个步兵师，以增强反登陆防御能力。

根据坦克驾驶员的改装训练结业时间——1951年3月1日，准备再组建3个坦克师和3个独立坦克团。

5.为了培养坦克手骨干，培养计划如下：

——坦克军官学校培训期限2—3年；

——坦克乘务组培训中心，学期6个月，每期2000人；共计划培训8000人。

6.计划建立一个维修基地——3个修理厂，因而有必要补充2名专业顾问。

索科洛夫少将

1950年11月20日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221-222

№2011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1950年11月20日)

第4680 2019号

关于苏联军事部的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负责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运部队的工作，具体任务如下：

(1)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上述诸师是在巴库地区防空军歼击航空师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接替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移驻巴库地区的部队将是来自撒马尔罕地区的土耳其斯坦军区空军第73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该师新配备的飞机为米格15。

(2)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部队。其所使用的飞机为米格15型。每师由两个歼击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上述新建诸师的原单位为：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和部署在旅顺地区的滨海军区空军第54军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3)不带飞机，发运一个由两个团组成的使用拉9型的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服务部队。该师组建前的原单位为：后贝加尔军区防空军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和滨海军区空军第54军第32师第304歼击航空团。

(4)一个驾驶图2型飞机的轰炸机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服务部队。该师由两个轰炸机航空团组成，每团有飞机30架。在外贝加尔已准备了30架图2型飞机，以便与该师一同发往中国。该师组建前原单位为：喀尔巴阡山军区空军第57军第一六二轰炸机航空师。

(5)发运62架飞机以及两个歼击航空团和一个师机关的全套装备。

(6)10个弹药基数，10部航空加油车和相应数量的航空油料均以空运方式运输。

2.空军各师的发送均须遵照如下期限实施：

第50和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最迟须在今年11月20日以前；

其余各师和军事装备——今年11月16—21日之间，并须在1951年1月10日前完成在中国境内的集结。

3.为确保发运这些部队的机密不致泄露，整个行动必须严格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3月22日颁布的第1146420号保密教导手册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4.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穿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即改穿中国军装。

苏联飞机上的标志必须在其发运前便彻底清除。

5.必须让前往中国的全体官兵非常清楚地了解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号和1949年10月3日第4200 1743号诸决议的内容。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1950年11月20日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67-169

№261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逮捕俄罗斯侨民问题(1950年11月20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3号记录

第49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问题。

1.允许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逐步对在中国居住的俄罗斯侨民中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进行逮捕,并将其送至苏联境内予以严密调查。

2.责成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与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43\]](#) 协商此问题。

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45, л.15

№20119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第五十歼击航空师转场至鞍山(1950年11月21日)

第1083812号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共有两个团——第二十九歼击航空团和第一七

七歼击航空团，米格15飞机62架。该师已于1950年11月20日转场至鞍山，归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 [44] 指挥。

在此次基地迁移过程中，所有机组均顺利抵达目的地。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1月21日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98

№24814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我们感觉天然橡胶严重不足。我们生产了足够的人造橡胶，但是用其来生产橡胶制品的话，每百万吨人造橡胶需要混合30万吨天然橡胶。不进行这样的混合的话，人造橡胶就不适合于工业应用。

前不久我们向垄断天然橡胶的英国人购买了天然橡胶，但是，现在英国人不再向我们出售天然橡胶了，哪怕是最少量的规模。这就为我们的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将使我们的工业面临缺少橡胶制品的威胁。

我的请求是，请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适的途径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转给苏联。如果最近能购买50000吨天然橡胶就很好了。我们当然会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通过香港或者其他方购买，那么至少需要购买8000吨和10000吨。

能否满足我的这一请求，请告知。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1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5, л.128

№125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中央派遣保

健医生(1950年11月22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81项 关于派H.C.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X.瓦西连科同志到中国出差的问题。

1.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管理局(叶戈罗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格里戈良同志)的建议,派苏联教授H.C.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X.瓦西连科同志前往中国,作为医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限为一年。

2.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 122c号决议的规定,确定到中国工作的苏联教授H.C.切特韦里科夫同志和B.X.瓦西连科同志的物质保障。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16

№24815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 同意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菲利波夫同志!

收到了您在11月21日的来信。现在我们有18000吨天然橡胶。我已经向贸易部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按照购买的价格立刻向苏联政府提供8000吨天然橡胶。

我们希望从苏联获得与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等值的新闻纸和棉布。

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在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继续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运往天津市。我们现在可以为苏联政府购买5万吨其急需的天然橡胶,甚至更多,达7万吨,但需要用美元或者英镑支付。现在天然橡胶的价格提高到了每吨1200美元。

供应天然橡胶的期限近几个月会确定下来。

关于天然橡胶的供应及其今后的采购问题我们将责成对外贸易部的叶季壮同志同苏联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古诺夫同志直接进行谈判。请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相关的指示。

毛泽东

1950年11月22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5, л.134-135

№20121 巴季茨基致军事部报告：关于第一六二轰炸航空师组建情况(1950年11月22日)第1104082号

为落实苏联军事部长1950年10月24日第284159号指令，兹报告关于轰炸机航空师的组建情况：

1.第一六二轰炸机航空师由第八三八和第九七〇两个轰炸机航空团组成，各团均含所属部队和分队。该师现已完成整编，并根据新标准配备了人员和物资。

2.该师将经铁路发往新的部署目的地。除第八三八轰炸机航空团飞行员所乘专列外，该师其他人员的铁路运输均在1950年11月21—24日间进行。

3.第八三八轰炸机航空团飞行员专列的运输将于1950年11月25—26日间按既定路线进行。

中将巴季茨基

1950年11月22日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00

№1250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粟裕来苏治病问题(1950年11月2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83项 关于栗裕同志来苏联治病的问题。

1.满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中共中央委员栗裕同志携其家属和他的陪同人员刘晓秋(Людская Цзюэ)以及由刘贵良(Людский Лян)陪同的林彪同志的子女,前来苏联治病。

批准给刘少奇同志的答复电报的文本(见附件)。

2.接待和安置栗裕同志及其家属和他的陪同人员刘晓秋,林彪同志的子女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刘贵良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负责(克鲁平同志),而治疗工作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负责(叶戈罗夫同志)。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83项

北京

致罗申

复第2401号电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达如下内容:

“致刘少奇同志:

您的电报已经收到。栗裕同志和家属及其副官以及林彪同志的子女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刘贵良,可以随时来苏联。我们将向他们提供治疗和休养的一切必要条件。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电报后请给予确认,并电告执行情况。请及时通知电报中所列举的人员起程的时间。

葛罗米柯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17、177

№24816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派篮球运动员去中国进行示范表演(1950年11月23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访问的中国体育运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冯同志 [45] 向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求,向中国派遣一些苏联的篮球运动员进行示范表演,并同中国的篮球运动员进行一些友谊赛。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通报说，中国领导人欢迎苏联篮球运动员前往中国。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阿波隆诺夫同志)认为，应该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上述建议，并请求允许在今年11月份派遣两队男子篮球运动员(24人)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5天的示范性表演，并在此期间同中国的运动员进行友谊赛，苏联男子篮球队以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A.O. 罗曼诺夫为领队。

对外政策委员会认为，可以接受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提出的上述建议。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46]

请审议。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0年11月23日

РГАСПИ，ф.87，оп.2，д.1260，л.103

№20122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同金日成讨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50年11月24日)

第60号

1950年11月24日23时40分(外交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复第22353号文件

1950年11月24日我与金日成见了一面，与会者还有朴宪永。

会谈伊始，我便请金日成原谅，由于我的过失而将冯西同志给他的电报拖延了7天。之后，我便向他读了电报的全文。

金日成请求允许他将电报内容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指出，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他将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向所有委员公开这

份电报的内容。电报将有助于他加强(党内的)纪律。

金日成将电报全文都记录在自己的工作日记本上。随后，金日成说，他不明白中国人，他们想要怎样。他(金日成)从来没有反对过建立联合司令部，并曾经责成朴一禹(朝鲜内务部长，金日成在中国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与彭德怀协商过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后者并未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而在(朴一禹)与高岗的会谈中后者声称，联合司令部可以在11月份中国人所发动的战役结束之后再成立。

接下来，金日成看来是想听一下我的意见。他说，他们已在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应当任命谁担任中国(军队)副司令更好一些的问题。最终决定的人选是金策。但在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看来，对金策的任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虽然曾担任过前线司令员，却没有执行关于三个师的命令。而要是任命朴一禹去，他可能也有些不适合，因为他不是军人，任命金雄(人民军总参谋长)——也不太适合，让自己(金日成)去担任这样的副职——这也不太好，因为这样他将不得不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

怎样能较好地处理这件事，现在他(金日成)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声明，这是你们的事。

金日成说，他将在政治委员会上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他接着说，看来，毛泽东根本不了解他(金日成)。因而他必须派朴宪永去向毛泽东当面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并协商有关(朝中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

金日成又说，他们决定于12月上半月就国内、外形势和今后党的任务等问题召开劳动党中央全会。他们正在编写全会报告，并请我协助起草报告草案。我表示同意。至此，会谈结束。

与此同时，我请您向上级报告我对如下问题的本质的认识。

在我收到的第5584号电报中(上级)要求，把给(朝鲜)领导人的第5583号密码电报内容补充到本次(即第5584号)电文中。

但这封电报，并未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指示我把电报当面交给金日成。

对此，我与(苏联驻朝鲜)使馆顾问通金商议，并告诉他，我收到了一封给金日成的重要的电报，但却没有得到(上级)关于将这封电报面交金日成的指示。

经过协商，我们得到结论，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上级)并未明确指示这封电报是否面交金日成。

于是，我带着第5583号电报去见金日成，以便向他通报电报内容。

会谈伊始，金日成便对我说，他收到了一封冯西发来的电报。他简要地叙述了电报内容。

我这才明白，类似的电报还用密码发给了瓦西里耶夫将军，而后者已将电报面交了金日成。

很显然，(上级)没有给我关于将电报面交金日成的指示并不是出于技术原因，而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让这封电报不经过我的手，而是通过瓦西里耶夫将军交给金日成。

我请求瓦西里耶夫将军让我了解一下电报内容。

通读了电报之后，我发现这封电报的内容与我所接到的电报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这再次提醒了我，并得到结论：我不应将自己所收到电报面交金日成，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上级并未给我直接指示。

我很想请(上级)明示，再碰到这种问题我将何以应对，但下不了决心。因为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不合适。

11月18日瓦西里耶夫将军通知我说，机要部门收到(上级)指示，如果没有向金日成面交(我所收到的)那封电报，那就不要再交给(金日成)了，直接销毁掉。

我认为，自己的过失在于，没有向上级请求补充指令。

以前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不能精确地完成上级的指令。

第3394号来电，1950年11月25日2时30分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4, л.326-329

№24817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您通报说，已经命令中国贸易部立即从自己的储备中以购入价格向苏联提供8000吨橡胶，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通报。我对您做出的这一决定表示感谢。我们同意向中国提供新闻纸和棉布，来补偿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其中天然橡胶价值的三分之一用于提供棉布。

第二，我们希望，除了向苏联供应8000吨天然橡胶之外，不是购买5万吨，而是购买7万吨的天然橡胶，购买的这些天然橡胶只能用英镑支付，因为我们的美元不足。您通报的价格我们认为可以接受。

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在以小批量组织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出现投机行为。必须特别注意，所购买的天然橡胶主要都应该是上等品——特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三等品的数量不超过20%—30%，因为我们可以用人造橡胶来替代低等的天然橡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一些四等品和五等品的天然橡胶，但这类橡胶的供应量不应超过5%—10%。

橡胶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请求对于购买的天然橡胶应该进行质量检查，因为在供货的时候橡胶投机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

第三，将就购买天然橡胶问题向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下达必要的指示。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4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5, л.139-140

No20123 朝鲜致苏联照会：请求派军事专家到中国培训 朝鲜飞行员(1950年11月27日)

尊敬的大使 [47]，我荣幸地向您通报如下内容：

朝鲜政府决定向苏联政府提出如下请求：

1. 请向飞行学校(位于延吉市)补充派遣苏联教官20人，以培训驾驶拉9型飞机的飞行员，培训雅克9型飞机飞行员10人，伊尔10型飞机飞行员10人。

2. 为培养飞机技术人员请向延吉市派遣：

——1名技术工程师；

——3名高级技师；

——3名高级武器技师；

——2名无线电技师；

——1名无线电导航服务工程师。

3. 我们派往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90人中，30人——请培训其使用图2型飞机，60人——米格15型飞机。

4. 请从在滨海地区的朝鲜人中挑选45名轰炸机飞行员，让其余67人学习驾驶拉9型飞机。

5. 鉴于我们将准备建立轰炸机航空团，请为我们培训45名强击机飞行员，而非我们在上次照会中所提到的30人。

我们已就挑选进入(苏联)空军学校学习的(朝鲜)大学生的标准和派遣方式向朝鲜驻苏联大使朱宁河同志作了相应指示。

请您，尊敬的大使，将上述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

致敬

1950年11月27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97-100

№003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遣朝鲜大学生去中国东北(1950年11月28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0年12月5日前向中国东北派遣在苏联民用高等院校学习的朝鲜籍大学生200人。派遣费用由苏联武装力量部的资金支付。

二、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以简化的手续，通过当地警察局直接给朝鲜大学生办理出境签证。

三、责成苏联外贸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办理与派遣朝鲜学生去中国东北有关费用的结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АПРФ, ф.3, оп.65, д.776, л.171

№2012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请求允许其访华(1950年11月29日)

1950年11月28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给我打电话。他以金日成的名义，还使用暗语说，金日成打算派朴宪永或朴一禹去见毛泽东，但中国同志通过朴一禹表示，希望金日成能亲自来中国。就这一问题金日成打算今天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应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和派谁去中国。

文日说，关于莫斯科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金日成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

我牢记(上级的)指示，答道：这是他的事，如果他自己也想去一趟，那当然好了。

什特科夫

1950年11月29日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秘书处

第14446号，1950年11月30日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4, л.429

№20125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关于向中国派遣空军部队的情况(1950年11月30日)

编号	空军师编号	飞机类型及数量	在何基地组建，来自何军区	发送时间	抵达目的地的时间	主要部署地区	空军师编号及其组建期限	备注
一、歼击航空兵								另外，还有一个原来在上海的自动炮台和一部新的朝鲜航空师。
1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	62架，米格-9、PIL-20发动机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基地，来自白俄罗斯军区	10月23日	11月20日	沈阳	第十一歼击航空师，6月15日(2)	
2	第二十歼击航空师	62架，米格-9、PIL-20发动机	第15和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基地，来自莫斯科军区	10月25日	11月19日	唐山	第十二歼击航空师，10月10日(3)	

续表

编号	空军师 编号	飞机类型 及数量	在何基地组建， 来自何军区	发送 时间	抵达目的 地的时间	主要部 署地区	空军师编号 及其组建期限	备注	
一、歼击航空兵									
3	第二十八 歼 击 航 空师	62架，米格- 15、PZL-45 发动机	第一五一歼击航 空师基地，	当地	当地	青岛	第四歼击航空师， 12月1日(1)	另外，还有一个 原来部署在上 海的中国自动 火炮旅和一个 部署在新义州 的朝鲜航空师。	
4	第五十歼 击航空师	62架，米格- 15、BK-1发 动机	来自滨海军区	11月21日	11月20日	鞍山-安 东	第十五歼击航空 师，10月10日(3)		
5	第六十五 歼 击 航 空 师	62架，米格- 9、PZL-20发 动机	第三〇九歼击航 空师基地，来自外 高加索军区	11月19日	12月	广东	第十六歼击航空 师，10月10日(3)		
6	第一四四 歼 击 航 空师	62架，米格- 9、PZL-20发 动机	来自白俄罗斯 军区	10月26日	11月19日	上海	第十歼击航空师， 6月15日(2)		
7	第一五一 歼 击 航 空 师	62架，米格- 15、PZL-45 发动机	来自莫斯科军区	当地	8月10日	沈阳	第三歼击航空师， 1951年1月25日 (1)		
8	第二九七 歼 击 航 空师	62架，拉-9	第297和第32歼 击航空师基地，来 自后贝加尔军区	11月20日	12月18日	吉 林， 哈尔滨	第十八歼击航空 师，7月15日(2)		
9	第三二四 歼 击 航 空 师	62架，米格- 15和PZL- 45发动机	来自莫斯科军区		12月23日	东泰	第十四歼击航空 师，6月20日(2)		
10	第三二八 歼 击 航 空师	62架，米格- 9、PZL-20发 动机	来自彼得格勒军 区莫斯科区	10月21日	11月14日	北京	第九歼击航空师， 6月15日(2)		
11	第三〇九 歼 击 航 空师	62架，米格- 9、PZL-20发 动机	来自外高加索 军区	11月15日	12月10日	公主岭	第十七歼击航空 师，10月10日(3)		
12	第三〇三 歼 击 航 空师	91架，米格- 15、BK-1发 动机	来自滨海军区	1951年3 月25日	1951年4 月1日	沈阳	参加了战斗		
二、强击航空兵									
13	第一八六强 击航空师	62架，伊 尔-10	来自外贝加尔 军区	11月14日	11月25日	开原	第五强击航空师， 1951年3月15日(1)		
14	第六四六 独立强击 航空师	30架，伊 尔-10	第一八六强击航 空师基地，来自外 贝加尔军区	11月14日	11月20日	徐州	第六强击航空师， 1951年6月15日 (1)		
三、轰炸机航空兵									
15	第一六二 轰炸机师	62架，图-2	来自喀尔巴阡军 区，还有30架飞 机来自外贝加尔 军区的空军第45 军事学院	11月21日	12月	四平	第八轰炸机师， 1951年2月1日 (1)		
16	第十二轰 炸机师第 四独立旅 (中国的) 第十一歼 击航空师	图-2 米格-15				南京 上海	第七轰炸机师， 1951年3月1日 (1) 第二歼击航空师， 1951年2月15日 (1)		

附注：

(1)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装备了62架米格15型飞机，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培训后移交给中方。

(2)在发送这些航空师的同时，还为每个师配备了10辆TCM加油车、5个弹药基数和1个月的粮食储备。

索科洛夫少将

手写批注：

另外，第十九歼击航空师组建于鞍山，所用飞机为米格15型。

№2012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向中国发送部队及武器弹药情况(1950年11月30日)

第284504号

兹报告截至今年11月30日连续5天以来向中国发送空军、火炮、弹药和汽车等相关情况。

1.根据第一批发送的空军各师团的上报材料，以空运方式发送的最后一个驾驶伊尔10型战斗机的由两个团和一个独立团组成的强击航空师已完成在徐州和开原等地点的集结，以铁路专列方式发送的空军各团也已完全到达预定地区。

2.第二批发送的空军各师目前位置：

驾驶拉9机型的空军师的全体人员已完成在吉林的集结。

根据运送计划，驾驶米格9型战机的分别由两个团组成的两个航空师在苏联境内将经铁路发运。目前运送该部队的第一辆专列已经过了乌兰乌德市。

驾驶米格15型战机的由两个团组成的一个航空师将用10个铁路专列运送。其第一辆专列已经过了新西伯利亚。其中一个专列将用客车于12月8日起运。

按计划，一个航空师的62架米格15型战机在苏联境内用铁路运送，目前其头车已经过了伊尔库茨克。

驾驶图2型飞机的一个轰炸机师由两个团组成。该师所有飞机将飞往中国，其中，38架目前分布在基辅—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空中航线的沿线各机场，其余的位于赤塔。该师所属人员将经铁路专列发送，目前首列车已经过了新西伯利亚。

3.为别洛夫部队组建的歼击机集团军行政管理机关人员已全部抵达沈阳。该集团军通讯连已在中国境内，正经铁路前往目的地。

4.截至今年12月15日前总共应发往中国的汽车4500辆中，已有1098辆运抵满洲里车站；3089辆仍在苏联境内，经铁路发送途中；其余313辆将于12月1日装运。总之，装运发往中国的汽车的工作将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天结束。至于这些汽车在满洲里车站交接过程中发生的滞留情况，则完全是由于中方对这些汽车的换装和空车皮的供应上管理不善所致。

5.关于向中国政府转交的火炮和弹药情况：7毫米ДШК12型机枪——360挺，37毫米高射炮——360门，76毫米高射炮——48门，76毫米山炮——100门，76毫米师团加农炮——258门，107毫米山地迫击炮——68门，122毫米榴弹炮——72门，152毫米榴弹炮——42门，БМ13型火箭炮——54门，3 15 4型探照灯装置——140个，РАП150无线电发射装置——5个，计划转交给中国的弹药1275车皮中已交付了650车皮。

已彻底完成预定转交计划的武器装备包括：76毫米火炮、152毫米榴弹炮、107毫米山地迫击炮以及所配备的相应弹药；37毫米和85毫米高射炮，76毫米、122毫米和152毫米火炮，以及手榴弹和防步兵地雷。

其余武器和弹药正经后贝加尔铁路运往中国，目前已快到达目的地。

6.拟派往中国的122名火炮专家目前位置：75人正从苏联境内经火车前往中国的途中；其余47人准备从远东各部队出发。

什捷缅科

1950年11月30日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81-183

№003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1950年12月1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的第3153号电报。

感谢您告知中国国内情况，并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地展开攻势。

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为之振奋。请允许我向您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们在抗击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并变成为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1日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5

№20128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同意中朝联军由中国统一指挥(1950年12月1日)

第1729号

1950年12月1日3时45分

苏军总参谋部收到电报的时间为1950年12月2日

兹转交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敬爱的冯西同志：

您1950年11月15日发来的信我已收到。

信的内容已在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在会上所有政治委员会委员均一致认为，您的指示是正确的，契合了朝鲜当前的复杂形势。

1.朝鲜人民军部队的管理问题，我们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以改善部队的管理。我们对部队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进行了重新调整，对高级指挥员进行了培训，对部队的通讯联络进行了整顿。

2.您关于(中朝联合部队)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由朝鲜人担任。

为了协商与动员、培训朝鲜后备人员有关的问题以及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我将于1950年12月2日前往北京与毛泽东同志会面。

3.我认为，您在纪律方面所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我决定对这一问题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我们将在加强人民军各级部队的军事纪律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

例如，

(1)我们撤销了军队文化教育工作管理总局局长的职务，将之改组为政治管理总局，并用一些党的老同志来加强该机关的干部队伍。

(2)因违反军事纪律被撤销职务的有：前线司令员、第二军团司令员及一些师的师长等人。

其中一部分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另一部分被降低了职务和军衔。

(3)此外，我们还对一些作战行动进行了分析，严肃追究了一些违反军事纪律者的责任；对在战斗中表现优秀者给予了表彰和奖励；我们正在努力提高高级和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要求各级指挥员自觉、严格地执行人民军的纪律条令。

4.关于加强敌后游击运动问题，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1)指示仍留在朝鲜南部的人民军部队在敌后积极活动。

(2)命令第二军团越过三八线进入三八线以南地区，在敌人的纵深地

带开展活动；加强和扩展劳动党地下组织所领导的小型游击队的活动。

命令第五军团在平壤以南和东北地区活动。每个军团的人数都有30000人。

命令各游击军司令和支队指挥员立即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我们正在培训工兵，并打算将他们派往敌后。

5.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形势要求、各地区的特点和敌人的战术规律，我们正在对部队、指挥机关和军官们进行战斗训练。

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和您的忠实追随者，已把您的指示和意见作为自己今后工作的行动指南。

非常感谢您，亲爱的冯西同志，以如此及时的建议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今后能经常得到您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指示和意见。它们将使我们，年轻的活动家们更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此致

敬礼

您的金日成

1950年12月1日”

B.H.拉祖瓦耶夫 [48]

ЦАМОФ, ф.5, оп.918795, д.124, л.499-501

№09127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派遣防空专家(1950年12月2日)

第5371号

1950年12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为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1月23日第4705 2034cc号决议，挑选并于今年11月30日向中国派遣了本土防空专家小组。

上述专家于今年12月2日抵达伊尔库茨克，并于当天飞抵北京，听候扎哈罗夫同志调遣。专家小组由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总局副局长工程技术勤务少将И.И.米罗什尼科夫同志率领。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1950年12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7卷，第984页

№20234 苏军总参谋部二局报告：前往中国和朝鲜执行任务的人员情况(1950年12月2日)

第566673号

国家			顾问		教 官				翻 译				服务人员				前往执行个别任务	
					士官			士官		临时雇用人员		士官		临时雇用人员				
					非常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		非常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			非常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					
中国	17	381	—	588	17	374	—	50	—	15	12	—	3	13	7	10		
北朝鲜	2	142	—	—	—	—	1	12	—	—	9	—	—	1	—	10		

苏军总参第二总局第十干部处代理处长

索科洛夫上校

1950年12月2日

ЦАМОРФ , ф.16 , оп.3139 , д.16 , л.133-134

№2481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设备和物资的期限(1950年12月3日)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9日要求供应甲板、油罐、设备和物资的信件我收到了。我们将满足您的请求。但是所有您请求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很难在第一

季度供应。因为必须向我们的工厂额外要求订货，也需要一些时间改变以前下达的任务计划，对于你们请求的设备和物资的供应我们确定了如下期限：

1.12000吨轧钢将在1951年1、2、3月份提供，每月供应量相同；

2.10000吨用于建设跨桥的物资在6月1日之前的5个月内供应；

3.300个50吨的铁路油罐、200个50吨的火车甲板、10台45吨蒸汽起重机以及10套仪器在1、2、3和4月份供应；

4.6座移动发电站以及80辆自卸卡车在1月份供应；

5.2个锅炉在1月份和2月份供应。

其余设备将在5月1日之前供应。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3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6，л.15

№00361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征求苏联对和谈的意见(1950年12月4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0年12月5日

1950年12月4日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

应王稼祥的请求接见了她。

王稼祥说，他是来辞行的，12月6日他因事要回北京，时间为一个半月。

在随后的谈话中王稼祥询问，是否可以认为，美国人在朝鲜遭到失败和杜鲁门最近发表一次声明以后，在英美阵营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美国政府陷入了困境。

我回答说，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有根据的。我指出在外国报刊中出现了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分歧的报道，并且指出近来在美国越来越经常地传出批评麦克阿瑟及其行为和批评杜鲁门政策的声音。我指出，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王稼祥表示想知道我对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

我回答，关于这个问题只能猜测，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

王稼祥在事先声明同我的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自己的看法以后问我，按照我的看法，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

我指出只发表个人看法以后回答说，我认为，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

接着王稼祥问道，是否应当考虑到美国人会进行新的冒险，例如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同蒋介石一起派空降兵在华南登陆。

我回答，不掌握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在这方面只能谈谈设想。

王稼祥指出，现在中国甚至小民主党派都情绪高涨，他们不久前对朝鲜事件还表现出某些动摇。

王稼祥援引朝鲜前线的来信说，美国人是很差的士兵，中国同志认为，他们作战远不如日本人。

王稼祥想知道召开讨论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的前景。

我回答，现在还没有收到对我们照会的答复，美国、英国和法国还在讨论如何回答苏联政府建议问题。他们的处境不轻松，他们自己也不隐瞒这一点。

然后王稼祥请我帮助加快中国海军司令员同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谈判。王稼祥指出司令员在莫斯科已经一个多月了，并说海军司令员应当

尽快回国，因为舰队也要参加一些军事行动，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建筑海岸工事的工作。

我说，不了解上述谈判进程，答应报告大使的请求。

在谈话结束时，王稼祥问我，鉴于他要回北京，我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请他转达我对周恩来的问候并说没有问题了。

我祝愿王稼祥一路顺风尽快返回。

参加谈话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张光(ЧжанГуань)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葛罗米柯(签名)

АПРФ, ф.3, оп.65, д.515, л.35-37

№20132 苏联空军参谋部致总参报告：关于派往中国的 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 [\[49\]](#) (1950年12月4日)

第六十四航空军指挥部和第八十一独立连：军官47人，军士29人，士兵47人，共123人。飞机2架，雅克12通讯机。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7人，军士449人(其中超期服役23人)，士兵516人，共1312人。飞机72架，米格15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1架，雅克11教练机6架，雅克12运输机3架。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2人，军士550人(其中超期服役36人)，士兵425人，共1317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3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五十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28人，军士540人(其中超期服役60人)，士兵427人，共1295人。飞机62架，米格15战斗机62架。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1人，军士530人(其中超期服役38人)，士兵417人，共1288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十七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4人，军士536人(其中超期服役40人)，士兵424人，共1304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兵师：军官273人，军士461人(其中超期服役41人)，士兵250人，共984人。

第二十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33人，军士550人(其中超期服役49人)，士兵425人，共1308人。飞机72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雅克12运输机1架，波2通讯机1架。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兵师：军官376人，军士716人(其中超期服役31人)，士兵669人，共1761人。飞机101架，伊尔10战斗机92架，伊尔10教练机6架，雅克12通讯机3架。

第一六二歼击航空兵师：军官400人，军士562人(其中超期服役42人)，士兵517人，共1479人。飞机71架，图2战斗机62架，图2教练机6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50人，军士453人(其中超期服役31人)，士兵515人，共1318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兵师：军官349人，军士444人(其中超期服役18人)，士兵524人，共1317人。飞机71架，米格9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4架，雅克11教练机2架，波2通讯机3架。

第一五一和二十八歼击航空兵师：军官510人，军士701人(其中超期服役36人)，士兵778人，共2009人。飞机201架，米格15战斗机124架(其中4架已毁)，米格15战斗机62架，雅克17教练机15架。

为6所飞行技术和航天学校派遣人员以及应个人要求派遣的人员：军官723人(其中将军5人)，军士403人，共1126人。

根据1949年与朝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应发送的飞机340架：图2战斗机24架，拉9战斗机60架，图2轰炸教练机24架，图2战斗教练机24架，里2教练机6架，雅克11教练机60架，拉9教练机60架，雅克18教练机68架，里2运输机2架，雅克12通讯机12架。

根据1950年与朝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应发送的飞机212架：图2战斗机24架，拉9战斗机7架，图2轰炸教练机5架，图2战斗教练机5架，拉9教练机10架，雅克18教练机20架，雅克11教练机18架，拉7滑翔机12架，雅克11教练机10架，伊尔12运输机12架，雅克12通讯机14架。

1950年12月将要发送的飞机50架：图2战斗教练机5架，图2轰炸教练机5架，拉9教练机10架，伊尔12运输机30架。

从斯柳萨列夫将军集团军转交的飞机115架：拉11战斗机40架，伊尔10战斗机25架，图2战斗机10架，米格15战斗机40架。

共计：

人员17950人：军官5063人(将军5人)，军士6934人，士兵5944人，文职人员9名。

飞机1653架：米格15战斗机350架，米格9战斗机372架，拉11战斗机40架，伊尔10战斗机117架，图2战斗机132架，拉9战斗机130架；雅克17教练机40架，雅克11教练机106架，伊尔10教练机6架，图2战斗教练机40架，图2轰炸教练机34架，拉9教练机80架，里2运输教练机6架，雅克18教练机88架，拉7滑翔机12架；伊尔12运输机42架，里2运输机2架；雅克12通讯机35架，波2通讯机21架。

苏联空军总参谋部参谋长、中将

巴季茨基

苏联空军总参谋部组织动员部部长、空军少将

索尼里尼克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30-132

№00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5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5日的决议

第167条 维辛斯基同志的第802号电报。

批准给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稿(附件一)和给罗申同志的指示稿(附件二)。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葛罗米柯给维辛斯基的电报稿

纽约

维辛斯基：

现受政治局委托逐项答复如下：

第一，同意您的建议，但不要做您所提出的那种附加说明，即如果安理会不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完成自己的职责，联合国大会无权审议侵略问题。这样的附加说明意味着我们承认11月3日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而对于这项决议苏联代表团曾声明，它有悖于联合国宪章，是不合法的。

第二，同意您的建议。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事，在接到我们的补充指示前，暂时不要提出邀请的提案。当我们向中国政府问明他们认为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此问题是否恰当之后，我们将发出补充指示。

第三，同意您的建议。

奉上级指示致电

A.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5日

附件二：

葛罗米柯给罗申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访周恩来并通报以下情况：

据维辛斯基同志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意见：是否认为其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是恰当的。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

A.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5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19-21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4-6

№20129 拉祖瓦耶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谈访华结果 (1950年12月5日)

第1775号

1950年12月5日21时金日成从北京返回朝鲜。

在私人交谈中他对我说：

1.谈了关于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但毛泽东建议此事不要急。关于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双方已达成协议。

2.还谈了关于军队活动的问题。朝鲜人的主要任务：在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运动，并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3.中国人不同意让部队打到三八线便停下来。

4.毛泽东建议(朝鲜劳动党)召集中央全会，以批评所犯的错误。金日成对此表示同意。

5.1950年12月6日清晨金日成将要到中国军队司令员彭德怀那里去。金日成邀我一同前往。

请求指示。

拉祖瓦耶夫

1950年12月5日

情况说明：就这一问题，拉祖瓦耶夫同志曾于12月5日咨询了(苏联)军事部，并得到上级批准(即可以去彭德怀那里)。类似上述密码电报中所述问题已由军事部向政府各委员散发。

№00363 罗申致莫斯科电：中国政府关于停止在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2月7日6时55分收到 [\[50\]](#)

特急

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我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传达了下述事项：

近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

他们的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在不利的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将下述说明交伍修权，以答复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和特里格夫·赖伊：

“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果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

周恩来以书面方式转交了上述条件。

周恩来接着说，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恳切地要求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希望今天就得到答复。

我告诉周恩来，对于他转达的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和有关答复的请求，将尽快呈报苏联政府。

Н.罗申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36, л.17-19

АВГ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193-195

№00364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1950年12月7日)

特急

1950年12月7日19时10分收到

1950年12月7日20时4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51]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第十司，副本存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6, л.20-21

АВПРФ, ф.059a, оп.5a, п.11, д.3, л.196-197

№00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停战问题的指示(1950年12月7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189条 关于维辛斯基同志的第823号电报。

批准所附给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葛罗米柯给维辛斯基的电报稿

纽约

维辛斯基：

目前的形势是，美国军队连续遭到失败，美国人为赢得时间并避免美军的彻底失败，越来越经常地提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

苏联代表团的方案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 一、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
- 二、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对您的序言部分没有不同意见。

奉上级指示致电。

葛罗米柯

1950年12月7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23-24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7-8

№20235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在华苏联空军和坦克部队人员情况(1950年12月7日)

部队名称	部队全体人员						临时雇用人员
	将 军	军 官	士 官		士 兵	总 计	
			现役军士	超期服役军士			
航空部队	—	4 340	445	6 086	5 944	16 815	9
坦克团	—	815	77	1 570	1 960	4 422	—
总 计		5 155	522	7 656	7 904	21 237	9

索科洛夫少将

1950年12月7日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45

№00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评美英领导人的联合声明(1950年12月9日)

决定将“评杜鲁门、艾德礼联合声明”一文在《真理报》上作为第二篇社论发表。

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0年12月9日通过

投票赞成者有：贝利亚、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附件：

评杜鲁门、艾德礼联合声明

1950年12月9日

由于美国在朝鲜的侵略战争失败，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结果，一篇作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联合声明的公报昨日见报。

公报并不证明，美国政府希望结束他们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恰恰相反，杜鲁门和艾德礼已商定将这场毫无指望的冒险继续下去。更有甚者，杜鲁门艾德礼会谈的全部含义原来包含在公报里谈到的两个结论中，它们表明当今英美准备新战争的计划走得有多远。第一，他们商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二，进一步加强武器生产。正如所见，所有这些让人想起，侵略国政府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做了些什么。

公报多次重申英美政府力求和平解决现存问题，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的冒险战争计划的注意，特别是转移人们对英美在朝鲜、台湾等地的侵略行动的注意的无谓挣扎。

尽人皆知，不是朝鲜人进攻美国，而是美国政府的军队侵犯朝鲜领土，好几个月以来，不断毁坏朝鲜的城市和乡村，不让朝鲜人民恢复和平生活以及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内部事务。尽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对美利坚合众国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52] 尽管如此，美国武装力量却侵占了中国有数百万居民的台湾岛，美国军用飞机经常侵犯中国的边界，美国政府训练蒋介石匪帮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新的进攻。

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是真正在保卫自己民族的和平及独立生存的权利？假如杜鲁门和艾德礼真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就像解决其他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那样，他们现在就可以干脆地结束自己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事实却与此相反。

公报也谈到英美联盟内部的矛盾。公报不能不说，两国政府对联合国中中国代表权的意见有分歧。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继续固执己见，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得到实现，同时阻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他指望在中国有一个“自己的”，即“适合”美国当局的，类似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的蒋介石集团那样的政府。公报中再次谈到美国的这一政策，却又虚伪地声称“尊重一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然而，杜鲁门也利用与艾德礼的会谈进一步加强对英国的压力。现在，不仅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已经背弃了自己签署的有关台湾属于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继美国傀儡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失败，杜鲁门在朝鲜的冒险行为也已失败，因此他在向中国人民报复。现在他和艾德礼勾结起来，企图使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台湾岛脱离中国。这又一次证明，杜鲁门和艾德礼所说“尊重一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这句话价值几何。

对于杜鲁门和艾德礼公报的最初报纸反应表明，即使是对那些仅仅指望美英政府至少尽快摆脱毫无指望的远东冒险的人来说，会谈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甚至杜鲁门和艾德礼政策的许多支持者也懂得这一点。

从另一方面说，越来越清楚的是，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极力按照自己的心愿利用现有情况。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在许多场合被杜鲁门、麦克阿瑟、哈里曼、艾奇逊和他们的朋友们，用来进一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战争狂热，以便让美国垄断资本得到大量高额利润的军事订货。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会谈公报正是为此目的进一步服务的。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现在正照此行事，既不考虑美国和英国人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要求。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44-47

№125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苏联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文章(1950年12月10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32项 关于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的问题。

责成《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在下一期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实践论》(1937年7月)。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45

№125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1950年12月12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58项 关于延长24名翻译在中国逗留期限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24名翻译在中国的逗留期限延长1年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58项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延长24名翻译在中国逗留期限的决议

第__号

1950年12月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所附名单中列出的24名翻译在中国的逗留期限延长一年的请求。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第__号决议

延长在华逗留期限一年的中文和英文翻译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和父称 委派单位

- 1.Э.Я.波格丹诺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2.Г.Г.别洛乌索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 3.В.Н.维尔凯耶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4.Г.И.杜布罗维茨卡娅，苏联高等教育部
- 5.С.И.叶梅利亚诺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 6.Т.В.扎伊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7.Н.М.卡柳日纳亚，苏联高等教育部
- 8.В.А.克里夫佐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 9.Э.Р.克里希扬，苏联高等教育部
- 10.М.А.列维娜，苏联高等教育部
- 11.В.С.马努欣，苏联高等教育部
- 12.Т.Г.马约罗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13.И.И.莫申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14.В.Л.穆萨托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15.М.Л.鲁多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 16.Р.Н.西卡切娃，苏联高等教育部

17.О.Ф.西罗秋克，苏联高等教育部

18.А.Н.斯特凡斯卡娅，苏联高等教育部

19.Л.Г.苏霍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0.А.А.季什科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1.М.А.特尔洛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2.Н.К.切卡诺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3.Л.С.切尔内绍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24.М.И.谢尔巴托夫，苏联高等教育部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8、201 202

№24821 特里福诺夫致波兹杰耶夫函：关于驻上海新闻处的工作(1950年12月12日)

致苏联新闻局局长Л.А.波兹杰耶夫：

您1950年10月11日的信件我们收到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关注和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在这封信件中我们将尽力回答您提出的一些问题。

文章的发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发往上海报纸的材料都只有通过华东代表处的广播事业局发送的，其中包括通过广播事业局局长姚溱同志发送。当然，如果能够同报纸编辑有直接的联系，那就好多了。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什么时候有这种机会，现在还不知道。前不久在同外交部一名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后者告诉我说，我们的文章在上海报纸的发行要和以前一样，也就是通过华东代表处的广播事业局进行。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文章的发表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其原因我们也不完全确信。但是该怎么办呢？为了改善文章的发表状况，我们做了一切努力。从我们的答复可以看出，每月文章的发表都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所有一切都是由于中国的国内生活和国际局势。比如，中国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爱国主义高潮。经常会有一些群众集会和游行支持伍修权提出的要求，所有报纸上发表的言论都是群众集会上发出的一些口号。前不久召开了劳动英模大会。两周以来所有的报纸发表的都是关于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今年12月9日前夕，接连几天刊登了纪念一二·九运动15周年的材料。在这一运动中，国民党警察对北京大学生的游行进行了镇压，这

些大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抵抗等。在同广播事业局局长、同外交部代表以及同报社编辑的代表进行的谈话中，他们所有人都指出，我们发送的文章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这只是由于没有版面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文章的发表状况是不可能的。报社编辑的代表说，目前的国际局势直接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现在所有报纸的焦点都指向了揭露美国对朝鲜和对远东的侵略。正如在同报社编辑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尽量多地发送一些揭露美帝国主义真实目的的文章。报社的编辑没有直接指出，但是他暗示我，由于国际局势，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暂时在读者中没有很大的需求。在我们看来，这是他们刊登的其他文章比刊登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刊登诸如H.罗曼诺夫的文章《斯大林时代伟大的建设》、H.乌戈利科夫的文章《以高速度建设》等等。至于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刊登得不错。而一些还没有刊登的文章，将会很快刊登。

你们问道，什么报纸可以刊登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答复，因为所有的报纸都遵循《解放日报》的计划。该报发表了什么文章，其余报纸也会跟着发表。只有《大公报》经常刊登我们的文章，即使在《解放日报》根本就不发表它们的情况下。还有一份《农民报》。我们无法同其编辑取得联系，而广播事业局局长不知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文章送往那里。这份报纸的发行量非常小。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发表。

为了使我们在工作中对《新生活》报的关注更多一些，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您的任何指示。我们向他们发送了文章，他们就发表了。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为这一机构服务，而是为中国的报纸服务的。关于这份报纸应该说的是，正如尤金教授所指出的，“这份报纸不是‘新生活’，而是‘旧生活’”。对所有重要材料的刊登都很晚，有时候会歪曲文章的意思，并且经常使用一些过时的词汇。该份报纸主要刊登塔斯社的材料。

很快我们将失去另一个机构，这就是《苏联知识》杂志，这份杂志就要停刊了。将会继续出版的一份杂志是《中苏人民的友谊》。这份杂志在北京出版，并将在北京发行，而在上海的中苏友协使用的将只是这份杂志的材料。

您请求我们阐述关于每一篇文章的命运，这非常困难。首先，我们

不可能把您发来的文章都翻译出来；第二，不可能刊登所有的文章。因此许多文章被束之高阁，没有采用。一个月内我们最多能翻译30—31篇文章。如果加上在莫斯科的一些部门翻译的文章，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会收到大约40—50篇文章。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月我们能把这些文章的95%发表出来。11月份向我们送来了145篇文章。因此，90篇到100篇文章是不能发表出来的。当然，如果我们每天发送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2篇或3篇文章，那么情况会好一些。到时候编辑会从其中的三篇中挑选一篇发表，但我们的翻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说早先时候外交部翻译部门的翻译能够帮助我们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则失去了这种帮助，因为其中的大部分翻译都被派往北京工作了。

因此，我们向您提出如下请求：让相关部门尽可能多地把文章翻译成汉语，但文章的质量不应该仅仅取决于翻译。如果把一些理论性的文章用俄语发送给我们将会好一些，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些文章翻译起来容易一些。其余的大部分文章必须在莫斯科翻译。

我们非常希望，文章的作者在文中指出他们所用引文的来源，这一点甚至是必需的。这是因为，引用的斯大林和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必须查找翻译成汉语的原文。为了找出一些引文，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你的来信能够做出的所有答复。当然，我们发出的所有抱怨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推卸我们在工作中的责任。我们付出了努力，今后将继续努力，以便使我们的文章，首先使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的发表有实质性的增加。

此致

敬礼

苏联新闻局驻上海代表处副代表

B.特里福诺夫

1950年12月12日

ГАРФ, ф.Р8581, оп.1, д.495, л.1-5

№124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薪

金问题(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74项 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薪金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883cc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的决议草案(附件)。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74条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第__号

1950年12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 883cc号

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的决议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把1950年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264 883cc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951年。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1、208

№125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几位大学生毕业后回国(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62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的问题。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在下列苏联公民大学毕业之后，派他们前往中国由中国当局支配：

- 1.刘允斌·克里姆，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化学系学生。
- 2.大宝·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热力工程系学生。
- 3.谢尔盖·什帕托夫，莫斯科斯大林钢铁学院学生。
- 4.陈祖涛·雅沙，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机械工艺系学生。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49

№125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美英政府的照会 (1950年12月13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65项 关于苏联外交部的的问题。

1.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致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照会草案(见附件一)。由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转交照会文本。

2.委托苏联外交部把上述照会副本同时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之外的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的代表。

3.在报刊上发表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见附件二)。

附件一：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65条

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给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与此相同)

大约在10个月之前，也就是1950年的2月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关于1949年12月25—30日期间，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争罪犯山田乙三、梶塚隆二、川岛清以及其他战犯进行公开审理的结果的照会，法庭还查明：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当局，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反对苏联、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细菌战争，这是一种最惨无人道的侵略武器。

这份照会还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指出，参加细菌战争准备工作的梶塚隆二和川岛清的供词

表明：日本裕仁天皇是准备细菌战争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根据裕仁专门的绝密的指示，在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建立了日本军队准备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美国军队和其他国家的细菌战争的基地。在准备实施这些犯罪阴谋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对成千上万人，主要是中国和苏联公民，进行了致命的细菌实验活动。

在上述提到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诉讼过程中还查明：在实行自己的侵略计划过程中，日本战犯不仅准备，而且还多次使用了细菌武器：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进行了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战争 [53]；在1940—1942年发动反对中国战争期间，由于日本军队在那些地区进行了细菌实验，导致那里发生了流行病——鼠疫和伤寒热。

在苏联政府的照会中还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重要组织者和鼓舞者日本裕仁天皇的罪恶行为，粗暴地破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尤其是违背了1925年6月17日的日内瓦协定，即禁止使用很久以前就被作为有损于人类荣誉和尊严的、最严重的罪行而遭到文明民族谴责的细菌武器。

美国、英国和中国于1945年签署的、后来苏联也加入的波茨坦公告声明说，对所有战争罪犯都应该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外，根据远东委员会1946年4月3日决定第五条的a点规定：为审理远东地区的战犯案件，盟国总司令应该“指定特别国际法庭”。苏联政府从以上所说的内容出发，在自己1950年2月1日的照会中向美国政府建议：指定特别国际法庭和将已经被证明犯有反人类的最严重罪行的日本天皇裕仁、原日本军队的将军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笠原吉，作为战争罪犯交付这个特别国际法庭。同时苏联政府也向英国政府作了这样的建议。

尽管自1950年2月1日起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苏联政府在今年的5月30日就此问题再一次照会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至今仍没有答复苏联政府1950年2月1日的照会，这自然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各阶层的疑惑不解，他们对被揭发准备和进行了毫无人性的细菌战争的罪犯纵容和庇护行为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苏联政府认为应该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同意苏联政府在今年2月1日照会中提出的建议。

苏联政府期待着，美国政府依据自己所承担的把战争罪犯交付法庭的责任，对于苏联政府1950年2月1日关于把裕仁天皇和上述指明的已经被揭露犯有准备细菌战争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其他战犯，交付特别军事法庭的照会给予答复。 [54]

附件二：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65条

用于发表的通报文本

苏联政府致美国 and 英国政府的照会

今年12月__日，受苏联政府的委托，驻华盛顿和伦敦的苏联大使，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递交了关于将裕仁天皇和其他几名日本将军交付国际法庭的照会。

以下发表的是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文本(接下来是照会文本的内容)。

同时该照会的副本已经寄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除此而外，上述所说照会的副本还转交给了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政府：澳大利亚、缅甸、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法国。

№20135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进攻迟缓不满(1950年12月13日)

第1845号

1950年12月13日17时12分(苏军总参谋部接收和打印电报的时间)

1950年12月12日朝鲜政府收到了特里格夫·赖伊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传达了13个国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北朝鲜政权”的致函。

特里格夫·赖伊要求朝方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便回电)予以确认。

朝鲜朋友询问我的意见——(朝方)是否有必要答复这封电报，如果有必要，如何答复。

金日成认为，应当与北京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感到，金日成对中国人的作战推进速度并不很满意。

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

——中国军队自1950年12月5日至1950年12月12日期间一直按兵不动，即休息了7天；

1950年12月13日，金日成对我说，中国人在打到三八线之前一直进行局部性作战行动。而在打到三八线以后预计又要停一段时间。如果敌人不越过三八线，估计他们的这种战斗间歇仍会发生。

——在三八线以南的人民军游击队发展太慢，因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援。

按金日成的话说，中国军队战斗进展迟缓，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有关指令。

请您立刻就特里格夫·赖伊的电报问题给我指示。

拉祖瓦耶夫

№125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大连财产问题(1950年12月14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第280项 批准苏中联合委员会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财产问题的协定。

批准由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批准中苏联合委员会就确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市现有的、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管理或者是租赁的财产的具体方法的协定的决议草案。

附件：

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第280项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50年12月__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批准中苏联合委员会就确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大连市现有的、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管理或者是租赁的财产的具体方法的协定。

2.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境外苏联财产管理总局，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于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上述协定中所说的财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予苏中联合委员会中苏方代表以相应的指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52、213

№20136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1950年12月14日)

第284686号

1950年12月14日14时05分 1.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十三兵团仍在原地区集结。关于该军团向平壤地区的进攻情

况还未得到有关报告；

——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及第二十六军之先头部队在咸兴西北地区发生了战斗。该兵团第二十军仍驻防原地区。

2.朝鲜人民军部队：

——第一军团仍集结在原来的地区；

——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第一步兵师继续在咸兴以北和东北方向战斗，关于该军团第五、第十五步兵师和第一〇五坦克师的情况仍未得到相关报告；

——第四军团(第四十一步兵师和海军陆战旅)已突入坪里(Пхенгни，利原西南20公里处)地区；

——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在向三八线以南敌后运动的同时，还在金川、春川以北和东北地区与敌人交了火。

3.据无线电侦察资料显示：

——敌人已将主力部队退往三八线以南地区，并加紧组织防御，巩固已有阵地。从临津江至新邑里一线的防御由美军负责，由此往东至海岸线——南朝鲜军队；

——来自议政府地区的美第二十四步兵师已调至仁川，美第一炮兵营和英第二十九步兵旅已从三八线撤往汉城；

——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继续经海路从咸兴撤往釜山。

4.美国空军对安州地区的第十三兵团部队实施空袭，轰炸平壤和大同江渡口。

11月1日至12月13日期间我歼击航空兵在空战中共击落美军飞机46架，其中，B 29轰炸机12架、B 45轰炸机1架、F 84歼击机3架、F 80歼击机19架、F 51歼击机11架。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12271 戈尔拉乔夫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情况(1950年12月15日)

一、1950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第十三兵团在云山、熙川地区粉碎了南朝鲜第二军的进攻。

根据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开始时的决心，为歼灭南朝鲜第二军，集中了4个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共12个师)。这几个军实施了穿插合围。兵力平均部署在整个战线上。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

经过4天激战，向正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向前推进了25公里，在进攻过程中为追剿后退之敌，两军转角90°折而向南进攻。向西南方向进攻的第三十八军，击退了南朝鲜第八步兵师，向前推进了50公里。第四十二军改变了先前的决定，以主力攻咸兴，仅以第一二五师一个师的兵力向西南方向进攻。

在战斗过程中，敌为使南朝鲜第二军摆脱第十三兵团的攻击并向南撤退，同时又把美第一骑兵师调往这一方向，以对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右翼实施攻击，这也是第三十九军及第四十军两军折而向南的原因之一。

在进攻过程中，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做出了消灭清川江以北美军主力的决定。为此又使用了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共12个步兵师)。这次兵力平均摆在整个战线上，没组织突击集团。3个军对飞虎山(博川)实施围攻。在迂回左翼进攻的只有第三十八军(3个师)。这次战役没有组织第二梯队。

在7天的进攻战斗中，集群迂回部队向前推进了20公里，几次把敌人压向清川江以南。敌猜透第十三兵团指挥部的意图，把部队撤出战斗，退到南东方向调整部署，并于11月7日转入进攻。

二、1950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第十三兵团歼灭安州地区美军部队的进攻战役。

依据敌之行动特点，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制定了两个行动方案。他决定歼灭安州地区的美军进攻部队。但部队部署仍和11月24日战斗过程中的部署一样。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向不同的方向进攻(似乎是穿插分割)，目的是在清川江以北粉碎这些军的南面之敌，只以左翼第四十二军一个军(3个师)对敌之右翼实施迂回突击，前出到安州地区敌之后方。

按照中国最高指挥部的命令，4个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折而向东，因此实施进攻推迟了一昼夜。但在实施转向之后，兵力仍平均分布在整个战线上。

根据新的决定，右翼3个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第三十九军)推迟了一昼夜转入进攻，实施正面突击，目的是牵制敌人，不让它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左翼3个军实施迂回突击，任务是前出到美军主力部队之后方。

部队布阵纵深不大，没有第二战役梯队。

在6天的进攻战斗中，第十三兵团的部队歼灭了美第二步兵师、南朝鲜第二军(第七步兵师、第八步兵师)主力；几乎全歼土耳其旅；重创美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二十五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南朝鲜第一步兵师和英国第二十七步兵旅。但没有达到战役的主要目的——聚歼美主力部队。敌摆脱了第十三兵团的进攻部队，后撤到平壤方向，然后又撤回三八线以南。

三、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第九兵团歼灭美第一海军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的战役。

第九兵团司令员做出决定，以两个军之兵力(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七军，共8个师)对下碣隅里、古土里(Гудинни)地区之敌实施包围突击，然后歼灭之。为对敌实施直接突击(敌第一海军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只使用了5个师；3个师从南面和东北面保障战役的实施。第二十六军(4个步兵师)留作预备队，但在战斗过程中被用来歼灭被围之敌。

在这一持续13昼夜的战役中，中国部队行动不坚决，在敌可能从外部进行打击的方面，兵力部署薄弱。在战役之初，第二十六军未被用来向咸兴突击，以控制此地，并前出到在东海岸活动的敌军之后方。故敌虽遭到重创，还是于12月10日冲破包围，退到咸兴。

总的结论：

一、在上述3次战役中，兵力和装备沿全线平均部署，没组织突击集团，各军都是在独立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在敌之薄弱环节没实施强大突击。

二、第十三兵团在两次战役中没组织第二战役梯队，结果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没得到发展，战役没有达到目的。

三、部队行动不坚决，尤其是正面进攻部队。这使敌人有机可乘，毫无阻力地后撤并重新部署。

四、第十三兵团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在敌最危急时刻——其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之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以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之兵力很容易包抄敌人。

五、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六军及第二十七军，在合围敌人后，行动迟缓而不坚决。留作预备队的第二十军未被用来对咸兴方向实施突击以建立以便在外部形成包围圈。

上校戈尔拉乔夫 [55]

1950年1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8卷，第1007—1011页

№20137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向中国发送空军部队及装备情况(1950年12月15日)

我们报告到今年12月15日为止向中国发送飞机、汽车、火炮的5日情况。

1.2个米格9歼击航空师中的1个到达部署地区——公主岭，另一个则沿着中国铁路到达指定区——广东。

两个团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部队乘坐3列专列抵达东奉机场，1列专列走中国铁路，5列专列走外贝加尔铁路，1列专列走东西伯利亚铁路。

拥有2个图2航空团的轰炸机航空师飞经中国，在库尔茨克伊尔库茨

克空中航线的38架飞机中，23架抵达赤塔，另外的15架在继续飞行。

这样，赤塔有53架准备继续飞行的飞机。

轰炸机航空师地面部队乘坐4列专列抵达指定地点——四平，还有4列专列走外贝加尔铁路。

为1个师准备的62架米格15中，31架已到达指定地点——青岛，31架还在沿中国铁路运送的途中。

2.应于今年12月15日以前交付的4500辆汽车，全部在满洲里车站交付给中国代表。

3.最后80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БМ13火箭炮正在去往满洲里站的途中。其他所有火炮、弹药已全部交给中国政府。

4.派往中国的122名炮兵顾问已抵达指定地点。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88-189

№125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国作家付稿酬 (1950年12月18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18日

第301项 关于付给曹敏(ЦаоМин)稿酬事宜。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印刷出版总局(格拉乔夫同志)为中国女作家曹敏在苏联出版的中篇小说《推动力》而付给她数额为6030卢布的稿费。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55

№125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塔斯社驻北京分社副社长(1950年12月18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18日

第320条 塔斯社关于同意皮缅诺夫同志担任驻北京的塔斯社副社长的决议。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批准B.C.皮缅诺夫在留任苏联军队干部的同时担任塔斯社驻北京(中国)分社副社长的提议。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59

№20138 卢基扬琴科的报告：关于培训中国坦克部队情况(1950年12月18日)

本报告是12月16—17日根据第11039和11073号密码本编制的。
(..... [56])

1.针对(中国)坦克手的培训是在坦克教学基地和坦克学校进行的，共计10个坦克团。

编号	培训点	所培养的专家数量							培训结业期限
		坦克连和排指挥官	坦克技师	坦克指挥员	机械驾驶员	火炮指挥员	填弹手	无线电信兵机枪手	
1	第一五一坦克团(哈尔滨)								
2	第一八七坦克团(吉林)								

续表

编号	培训点	所培养的专家数量							培训结业期限	
		坦克连和排指挥官	坦克技师	坦克指挥员	机械驾驶员	火炮指挥员	填弹手	无线电机枪手		总共计划培训 10 个坦克团
3	第一五四坦克团(长春)									
4	第一七九、一八二坦克团(四平)	—	—	400	400	400	400	400	2 000 人或 400 个乘务组	1951 年 2 月中旬
5	第一六八、一七四、一四六坦克团(北京)									
6	第一五七、一六三坦克团(新义州)									
7	各坦克团在承担主要培训任务时,所培训的其他一些人员,作为预备队	—	—	160	240	—	—	—	400	1951 年 2 月 15 日
8	坦克教学基地(北京)	—	—	500	500	500	—	150	1 650	1951 年 6 月
9	坦克学校(北京)	600	300	—	—	—	—	—	900	1951 年 12 月
10	坦克学校附属军官进修班(计划有组织地对 200 名步兵军官进行再培训)	200	—	—	—	—	—	—	200	
	共 计	800	300	1 060	1 140	900	400	550	5 150	

2.截至12月15日所有坦克团的专业培训课程基本结束，带自动控制系统的坦克乘务组的培训课也即将完成。

3.经考试证明，学员对所学课程的掌握程度，尤其是在实战操作方面，成绩非常令人满意。

中将卢基扬琴科 [57]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92-193

№12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中国马戏团在苏期限(1950年12月21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21日

第381条 关于延长中国马戏团演员在苏联的逗留期限问题。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列别杰夫同志)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杂技演员在苏联的逗留时间延长到两个月的提议。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68

№20140 马兰金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朝鲜战场的情况 (1950年12月24日)

第284802号

1950年12月24日12时50分

1.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三八线挺进，已突入的地区包括：

第三十八军——朔宁(Сакуней，铁原以西25公里处)，新溪；

第四十二军——五里亭(Горитей)、沙镇(Сютен，铁原西北12—18公里处两个据点)；

第六十六军——利川和该据点以北。

关于12月23日以后该兵团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的战况还未收到相关报告。

——第九兵团主力仍驻守原地区，其先头部队配合朝鲜部队继续争夺兴南(咸兴东南15公里处)港。

2.朝鲜人民军部队：

——第一、第三、第四十一步兵师和海军陆战旅配合第十三兵团继续争夺兴南港；

——其他部队仍留守原地区。

3.据无线电侦察资料：

——美第三和第七步兵师剩余部队继续从兴南港经海路撤退；

——南朝鲜第五和第八步兵师继续在春川东北和麟蹄以南地区与进攻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战斗；

——南朝鲜首都步兵师在运至三秀关(Сансиока)后，又调入江陵西北25—30公里处的前线。

4.美空军对第十三兵团部队和交通线实施空袭，并继续掩护自己的部队从兴南港撤退。

美空军歼击机在安州和安东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

12月22日在宣川和阳册关(Риосьяккан，新义州东南25公里处)地区的两次空战中第五十歼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们击落了美军5架F 86歼击机。

我们的损失：

被击落1架米格15，飞行员跳伞生还；在执行作战任务过程中大尉巴尔谢吉扬未归。

苏军副总参谋长、大将

马兰金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100-101

№31211 罗申与罗瑞卿会谈纪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1950年12月25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绝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H.B.罗申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会谈纪要

1950年12月25日

今天同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举行了会谈。

在正式的外交礼节之后，我向罗瑞卿转达了苏联有关部门关于向苏联审判机关移交因在天津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瓦尔福洛梅耶夫夫妇的请求。罗瑞卿表示，他原则上不反对在审讯结束后向苏联审判机关移交瓦尔福洛梅耶夫夫妇。关于移交的期限和方式，罗瑞卿答应同伊万诺夫同志进行商谈。

随后应我的要求，罗瑞卿简要地向我通报了中国的形势。罗说，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于教育中国广大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运动期间，那些对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存在不正确的观念、在美帝国主义分子面前感到害怕的人，他们的恐慌情绪降低了。在朝鲜取得对美国军队的胜利后，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国际主义方面、在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了解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经验。

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运动给国民党分子和国外特工的活动造成了困难，使得同这些特工的斗争变得更为容易。例如，在10月和11月，公安机关逮捕了一千多名国民党特务。

罗瑞卿告知，公安机关侦破了与绥远第36军军长和两个师师长有牵连的国民党残余匪帮的阴谋，第36军军长和两个师的师长都被逮捕。通过对绥远36军进行改编的决定。该军部队已被调往他处。

至于外国人的渗透活动，中国政府通过了关于逐渐肃清诸如在满洲、青岛和新疆地区的外国人的决定。如果出现紧张局势，那就把最危险的外国人关进劳改营。如果形势许可，就准许外国人分批回国。罗说，中国当局希望首先中止英国驻新疆领事馆的活动。

我对罗瑞卿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

至此我们结束了会谈。会谈持续了近40分钟。

大使馆一秘卡拉布霍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В.罗申

№12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塔斯社驻北京 记者人选(1950年12月25日)

摘自1950年11月13日至1951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1950年12月25日

第439项 关于批准克雷姆金同志担任驻北京的塔斯社记者的问题。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批准Н.И.克雷姆金同志任塔斯社驻北京(中国)分社记者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79

№20141 拉祖瓦耶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对志愿军的 作战计划不满(1950年12月30日)

第1954号

1950年12月30日2时25分

1950年12月31日(苏联外交部收到电报的时间)

1950年12月29日，朴宪永在与顾问马尔琴科的私人交谈中说，金日成现在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迟缓不满。金日成如今对中国人的作战活动似乎已另有看法，这与他刚从北京回来时不一样。关于这一点，朴宪永也曾对我说过。那天，当研究中国人目前的作战计划时，金日成对其即将实施的计划表示了不满，原因在于：

1.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在实施了有限的作战行动之后，又再度打算停顿至3月份，即春季来临前夕。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情报我们已向(苏联)军事部长作了汇

报。

1950年12月30日15时，朴宪永在与我的私人谈话中说，中国驻朝鲜代办从各国使馆所在地的满浦(平壤以北400公里处)来找正在指挥所(位于平壤地区)的金日成，并带给他一封毛泽东的信。他(朴宪永)对我说，这位中国代办是一名军人。 [58]

这位代办过去就曾对金日成说过，自己应当待在苏联军事总顾问住的地方。

金日成建议他住在离(苏联军事总顾问)4—5公里处的一个地方。

同时参加上述(中国代办与金日成)会谈的还有我的副手马尔琴科上校。

就在当天的21时，金日成请我到他那里面谈。

会谈期间金日成向我介绍毛泽东来信的内容。

根据金日成所述的译文，毛泽东的信的内容如下：

“1.在此次战役结束后，朝鲜第二和第五军团所有部队将撤至合适地区休整1—2个月。部队需要休息，补充人员、粮食和弹药；总结战斗经验和战果；维护道路；整顿军纪；改善中朝军队之间的关系，改善对人民、工作和群众的态度；解决民众的疾苦；激发所有民众和军队的斗争积极性。让其清楚地认识到：不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不会重返故土和获得所失去的一切。

2.从11月起，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已撤至三七线至三八线的中间地带，其所有部队均以集团方式集结。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他们各个击破。如果(朝鲜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深入敌后，那么，敌人就可能收缩兵力，这样，我们要想打击他就很困难。而且，我们的交通补给线也会因此而延长。

3.我们都应当明白一个道理，即没有(充分的)准备就无法战斗。

4.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场持久战。

5.速胜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

以上就是对金日成口述全部内容的译文。

在接到毛泽东此信的同时，金日成还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关于后一封信的详细译文，没有给我。但(金日成)说，彭德怀在信中说，打算将人民军第二和第五军团撤至三八线以北地区。

在中国人建议人民军第二和第五军团北撤之时，人民军第二军团已推进到了三八线以南30—40公里处。至于中国军队目前所处位置，看来，战役纵深并不很大。关于此金日成避而不谈。

关于朝鲜军队的作战行动问题，金日成请我提出建议。

可是，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如当前战役的意图；将朝鲜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撤至三八线以北指定地区的原因何在；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等等。

我应如何答复金日成的问题，请求您的指示。

拉祖瓦耶夫

附注：此电报未经维辛斯基同志转交。

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4, л.750-752

№20142 巴季茨基的报告：派往中国的空军各师、团指挥人员名单(1950年12月30日)

第2015408号

1950年12月30日

各空军师师长、参谋长和各空军团团长名单

编号	职 务	军衔、姓、名和父称	前往中国前 在哪个部队服役
1	2	3	4
1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扎瓦卢辛·巴维尔·菲利波维奇	防空军第十五歼击航空师
2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近卫军少校,科卡列夫·卢基扬·伊万诺维奇	防空军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
3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三团团长	少校,车尔沃奇科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三团
4	第十七歼击航空师第四五团团长	苏联英雄,中校,霍洛多夫·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防空军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
5	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索特尼科夫·谢尔盖·列昂契耶维奇	防空军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
6	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上校,卡特科夫·伊万·库兹米奇	防空军第三一七歼击航空师
7	第二十歼击航空师第五十七近卫团团长	近卫军中校,拉波特金·尼古拉·彼得洛维奇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
8	第二十歼击航空师第一八〇近卫团团长	中校,亚斯库里斯基·维肯基·伊万诺维奇	防空军第一八〇歼击航空团
9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师长	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上校,阿列柳欣·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
10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中校,斯克沃尔佐夫·瓦西里·伊里奇。	
11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第六十七近卫团团长	中校,日姆丘果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续表

编号	职 务	军衔、姓、名和父称	前往中国前 在哪个部队服役
12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第一三九近卫团团长	中校,托尔卡切夫·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	
13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师长	苏联英雄,上校 帕什盖维奇·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维奇	第二十九近卫歼击航空团
14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中校,科马罗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15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团团长	中校,捷联契耶夫·瓦西里。	
16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近卫团团长	少校,维里奇·吉姆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莫斯科军区空军
17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潘克拉托夫·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
18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上校,弗拉索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
19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师第七十团团长	苏联英雄,中校,沙布林·彼得·伊万诺维奇	第九〇七歼击航空团
20	第六十五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二团团长	中校,什特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第一七二歼击航空团
21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涅果达·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防空军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
22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近卫军中校,拉扎连科·伊万·尼基佛洛维奇	防空军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
23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第三八三团团长	中校,库拉金·米扎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防空军第三八三歼击航空团
24	第一四四歼击航空师第四三九团团长	中校,瓦西里琴科·康斯坦丁·蔑尔库里耶维奇	防空军第四三九歼击航空团
25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	中校,萨波日尼科夫·阿列克谢·雅科夫列维奇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
26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参谋长	上校,蔑尔捷里金·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	
27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二十八近卫团团长	少校,柯良金·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	
28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七十二近卫团团长	中校,沃尔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代理 少校,姆辛·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①

①原文如此,疑为制表时填错。——编注

续表

编号	职 务	军衔、姓、名和父称	前往中国前 在哪个部队服役
29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 斯米尔诺夫·阿尔卡基·费 奥多罗维奇	第一四六歼击航空师
30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参 谋长	上校, 斯科里普尼克·阿尔谢尼· 伊万诺维奇	防空军第二十九歼击航 空师
31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第四 〇一团团长	中校, 舍甫琴科·斯捷潘·安德烈 耶维	防空军第九三九歼击航 空团
32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第三 〇四团团长	苏联英雄, 中校, 科罗廖夫·维塔 利·伊万诺维奇	第三〇四歼击航空团
33	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师长	中校, 斯塔特科维奇·尼古拉·伊 格纳齐耶维奇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
34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参 谋长	上校, 库切罗夫·亚历山大·费奥 多罗维奇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
35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第四 十九团团长	少校, 巴里奥诺夫·德米特里·尼 古拉耶维奇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第四 十九团
36	第三〇九歼击航空师第一 六二团团长	少校, 拉斯托维茨基·谢尔盖·费 奥多罗维奇	第一六二歼击航空团
3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师长	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中校, 科 日杜博·伊万·尼基托维奇	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三二四 歼击航空师
38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参 谋长	上校, 马列瓦内·伊万·斯捷潘诺 维奇	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三二四 歼击航空师
39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第一 九六团团长	中校, 佩佩良耶夫·叶甫盖尼·格 奥尔基耶维奇	莫斯科军区空军第一九六 歼击航空团
40	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师第三 二四团团长	中校, 克什里·安德烈·谢苗诺 维奇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第一 七六近卫团
41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	苏联英雄, 上校, 马茨耶维奇·瓦 西里·安东诺维奇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
42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参 谋长	中校, 索洛维耶夫·伊万·费奥多 罗维奇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
43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第一 二六团团长	近卫军中校, 马尔蒂诺夫·尼古 拉·阿法纳西耶维奇	防空军第一四七歼击航 空团
44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第一 三七团团长	近卫军中校, 瓦西连科·维克托 夫·马克西莫维奇	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第一 三七团
45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师长	上校, 扎诺兹德拉·弗拉基米尔· 格里高利耶维奇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

续表

编号	职 务	军衔、姓、名和父称	前往中国前 在哪个部队服役
46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参谋长	上校,特罗菲莫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
47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七十六团团长	中校,扎利科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七十六团
48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二五八团团长	中校,沃洛布耶夫·瓦西里·尼基佛洛维奇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二五八团
49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八四九团团长	中校,扎福金·伊万·伊奥西佛维奇	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八四九团
50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师长	上校,帕夫连科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
51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参谋长	中校,马祖罗夫·瓦西里·伊格纳齐耶维奇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
52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第八三八团团长	中校,西罗特金·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第八三八团
53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第九七〇团团长	苏联英雄,中校,阿尔先耶夫·尼古拉·拉夫连契耶维奇	第一六二轰炸机师第九七〇团

(带*者的姓名是后来手写上去的。这些空白处有П.Ф.巴季茨基手写如下内容：“以后我将再作补充报告。巴季茨基”)

备注：

按顺序，第10、11、12、15、26、27等栏目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未填写所在部队。已向别洛夫上校咨询，收到他的回复后再报告。

空军干部处副处长、近卫军上校

马特拉霍夫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6, л.200-204

№20143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同金日成讨论作战计划的情况(1950年12月31日)

第1976号

1950年12月31日1时05分

1951年1月1日(苏军总参谋部收到电报的时间)

兹报告：

1950年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来信，金日成邀请我去研究目前的军事行动计划。

鉴于尚未就这一问题得到(上级的)指示，我并未向他提出直接的建议，并声明，自己对如下问题存在疑问：

——如何向已成功推进到南方的人民军第二军团解释关于把部队拉回到北方的问题；

——什么时间实施作战行动更好——是春季还是冬季，要知道，春季时节稻田里都是灌满了水的；

——中国军队的战役意图是什么；

——为什么非要让(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撤到三八线以北地区，而不是稳固现有战线；

——我对中国军队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

将部队撤至指定防线无疑对保证春季战役的顺利实施有好处，但此时至春季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就成了战争的间歇期。

部队整体士气的高昂说明，我们必须实施一场打过三八线的战役。

——我对中朝军队之间关系的恶化情况不了解；

——部队粮食方面的困难到底有多严重，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就上述所提问题，我并没有从当时在场的朴一禹那里得到完整的答复，后者只是说了如下一些内容：

1.中国军队人员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兵员和休整。

2.朝中军队之间以及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彭德怀和高岗都发布了相关命令。因此，即使存在个别问题也不能说(朝中军队间)整体关系不好。

3.为了向部队运送各种物资，就必须有交通方面的切实保障，否则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部队就很难坚持战斗。

之后，金日成又拿出了彭德怀于1950年12月28日给毛泽东发去的密码电报。彭在电报中说，有必要在后续战役中消灭李承晚2—3个师，然后撤至开城、汶山、加平(Капхен)、洪川、江陵一带防线(根据比例尺

为1：1000000的地图)。

将部队撤至上述指定防线将确保(来年)春季战役的顺利实施。而从此时起至春季到来之前之间属于战争的间歇期。

中朝部队士气普遍高涨，表明我们有必要发动一场战役——打过三八线。

毛泽东对上述密码电报表示赞同。此次战役的开始时间预定在1950年12月31日。

金日成也对有必要实施一场目的有限的战役，然后再休整至来年春季的作战计划表示赞许。

关于该战争间歇期的利用问题，其计划如下：

——在三八线以南和三七线之间地区开展游击运动；

——已前突的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不再撤回至洪川江陵防线，而是仍驻守在原地，训练部队，对敌后实施袭扰，等待第四次战役的开始；

——加速训练第一、第三、第四军团的进程，随着武器配置的到位，陆续将这些军队从东北拉回朝鲜参战。

拉祖瓦耶夫

ЦАМО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879-881

№23386 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的问题：请教苏联农业如何组织领导 [59] (1951年前后)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组织领导中几个问题的请教

一、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土地是国有化了，是不是把一切人的土地都国有化？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国有化？列宁在1920年7月20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曾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全大农自己的土地，只有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的情况下，才实行没收这些土地。”这样可见，当时大、中农的土地

并没有被没收。土地国有化以后是不是还给农民平分土地。

二、苏联的共耕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劳动组合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我们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的组织形式，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不是也有过？

四、苏联在农业上，现在除了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组织形式，如有，叫什么名字，内容是什么？

五、集体农庄有入庄费吗？如有，按照什么标准缴纳？

六、集体农庄所需要的土地，国家按照什么标准给他？是按照人口或是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时，国家是不是多给他们土地？

七、集体农庄的农民劳动果实是怎样分配的？劳动者有强有弱，有男有女，技术有好有坏，是否在报酬上有区别？

八、红军家属，老、弱、病、残者，在集体农庄中的待遇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怎样发生关系？

十、拖拉机站组织情况怎样？拖拉机站怎样经营？

十一、集体农庄一年的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比例怎样？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少？

十二、集体农庄可以自由参加、自由退出吗？

十三、集体农庄与消费合作社的关系怎样？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机构如何？有些什么部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1—343页

1951年

№20057 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同中国协商转交航空师装备的问题(1951年1月 [\[60\]](#))

苏联政府已与中国政府商定：我们派往中国的航空师以及目前已在
中国境内的别洛夫航空师均以贷款的方式归中国所有(指物质方面)。这
些部队将从属于中国空军，并戴着中国军队标志。所有俄罗斯飞行员在
对中国同志的培训任务结束后，便可返回苏联。

鉴此，您应与中国政府协商上述航空师物资装备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事宜。具体操作如下：

物资装备的交接将根据苏中双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会议协议办理。

苏方委员会主席为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其他委员：苏军司令部司
令、参谋长、后勤部长和空军工程师。该委员会将负责将上述物资的产
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协议签署之时起，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这些物资装备在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消耗，包括我们所供应的燃料在内，均由中国政府
承担。

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2月14日协议，移交中
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这部分物资，均以苏联给中国信贷的方式来结算，
所有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的价值均依据实际交
接之日的技术性能状况来估算。

此类支付活动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书面议项。

各航空师的物资移交活动应分别进行，所移交物资均编制相应清
单，一式三份。在办理完物资交接手续之后，双方委员会代表将在三份
清单上签字，其中两份将由你们转交苏联军事部长审阅，一份留给中
方。

与此同时，您还应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根据上述条件和方式向中国

移交诸坦克团的问题。如果中国同志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将任命法卡诺夫中将来担任苏方坦克移交委员会的主席。

您将总体负责此类移交事务。另外，您还应与中国政府就我方全体人员的生活费用相关问题达成协议。我们的要求如下：苏方对中国同志的培训是免费的，但中国政府应根据我们的口粮标准和为别洛夫部队所制定的相关规定支付苏方全体人员的生活费用，提供免费饮食、发放新制服和配备各项公共服务设施。中方应根据为别洛夫部队所制定的那些规定，向苏方全体人员支付旅途往返和滞留中国期间的交通费。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上述建议，请及时做出报告。

涉及军队交接的报告均须使用密码。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6, л.137-139

№003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 (1951年1月4日)

第15120号

致菲利波夫：

兹将1951年1月3日20时彭德怀同志给我的电报副本发给您。请查收。

“毛泽东同志：

电文副本已发给高岗同志

一、自从我军挺进到东至襄阳、西至汶山宽约225公里一线以后，敌人在该地区建有纵深数十公里的防线，在高浪浦里永平地区，我军已突破敌人防线，敌军已开始全线崩溃。敌军抵抗不强，敌人正迅速向南溃逃，估计损失不大。

至1951年1月3日12时，仅俘获3000人。

已缴获汽车和坦克150辆，火炮100余门。

但是，由于部分敌人已被我部队追击和包围，故可能成功地将这部分敌军阻截和歼灭。

二、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正从洪川东北的亭子里进抵洪川东南的横城。1951年1月1日，第二军团第12步兵师已拿下洪川西南的新岱里。

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正在进攻洪川，意在切断敌军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军第198步兵师已强行渡过北汉江，在追击敌军同时，已进抵春川以东10—15公里处。

第六十六军主力于1月3日夜完成强渡北汉江，将往洪川方向追击敌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124步兵师1月2日晚强渡北汉江后，已进抵洪川以西桓谷里地区，正向洪川推进。

第四十二军主力可于1月3日夜全部渡过北汉江。

志愿军第四十军的一个师于1月3日夜朝清平里方向强渡北汉江，将向杨平发起进攻。

第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军主力正积极准备，以便在弄清汉城地区和杨平地区情况后，利用有利时机，在清平里地区、磨石隅里地区强渡北汉江。

第五十军经过高阳向汉城方向进行战斗侦察。如果敌人继续向南方撤退，第五十军将予以追击，到达水原后，将遵照进一步作战命令行动。

在此次战役的结果，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邑、杨平和洪川之后，我军将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改编。 [61]

彭德怀

1月3日20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24823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为《人民中国》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5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将出版《人民中国》杂志，每月出版2期，并且希望出版一些有关中国的俄文小册子，以便苏联读者了解中国的生活。但是，我们缺乏有经验的、有牢靠的政治水平的俄语编辑，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该杂志的编辑也不满意。

为了创办这份杂志以及其他的俄语出版物，我请求您派遣一名高素质的、有足够理论水平的俄语编辑，该编辑应能够从英语(或者汉语)翻译成俄语，他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工作。此外，请您向我们派遣一名俄语校对人员。

能否满足我的上述请求，请告知。

毛泽东

1951年1月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6，л.84-85

№003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报告的朝鲜战况及行动计划(1951年1月7日)

第15227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彭德怀、金雄 [\[62\]](#) 和朴一禹 [\[63\]](#) 同志1月4日24时给金日成的电报副本。请了解其内容。

“致金日成首相，并同时将副本发给各兵团及军的指挥员韩先楚、吴瑞林、周彪、方虎山军团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东北军区司令部：

一、第一一六步兵师及第一一七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今日(1月4日)占领了汉城。守卫汉城的敌军退到汉江南岸。春川1月3日也被我六十六军

部队攻克。

敌军退到洪川地区以及这一据点以南地区。

预计敌军下步的意图是防守自仁川、金浦、杨平地区到沿汉江南岸经原州、平昌至江陵一线。

敌人可能会借助汉江及山区的自然地形，收集残部，拖延时间，进行新的战斗行动的准备。

另一可能是，敌人在我军进一步更大的打击之下向南方撤退。

二、如果让敌人有可能继续占据沿汉江南岸的防线，控制金浦机场并利用仁川港供给军需给养，那么虽然汉城将在我们手中，但它将处于敌人空中及地面炮火的经常威胁之下，这对于我军准备春季攻势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我军再加强一步攻势并取得胜利，再消灭一部分敌军部队，迫使敌人自汉江南岸撤退，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巩固汉城，且可攻占金浦机场，控制仁川港，为我军准备春季攻势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制订如下计划：

一、人民军第一军团留下一个师守备汉城。军团主要力量将部署在麤坞、土坪里、仁仓里、墨洞一带。

在休息、整编之后，他们必须在3日之内准备好强渡汉江，并于有利时机攻取金浦机场、仁川港，并在那里固守。

二、右翼部队依旧受韩先楚的统一指挥。

第五十军继续向弘济内里、馆洞、九龟洞及这些据点西北地区挺进。该军立即派出强有力的小分队控制汉江大桥(力争用反冲锋占领汉江南岸的桥头堡)。这支小分队要探明情况，进行强渡汉江的积极准备，在南岸攻击敌人并继续与主力部队配合进行战斗。

如果敌人将继续向南方撤退，那么应当跟踪追击，占领水原，并等候进一步指示。

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之内的分界线经过黑石里、龟山、弘济

内里。这一线以及以西地区属于第五十军，以东地区属于人民军第一军团。

第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军正在休整部队3天(到1月7日止)，准备在清平川上游及下游强渡北汉江。他们将首先在杨平地区攻击敌人，然后自东南向西北方向敌人在利川、广州、水原、永登浦的阵地展开进攻。

详细计划由韩先楚同志制订。

三、在吴瑞林和周彪统一指挥下的第四十二军和第六十六军以及在方虎山指挥下的人民军第二及第五军团，遵照原订计划合力歼灭洪川、横城地区敌人，之后待命行动。

所有上述部队必须向位于其前线方向的敌军部队派出侦察兵及警戒哨。

在右翼部队开始新的攻势时，这些部队必须准备支援。

彭德怀、金雄、朴一禹

1月4日24时”

致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7日

АПРФ, ф.3, оп.1, д.336, л.88-89

№202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 (1951年1月8日)

..... [64]

看到了彭德怀以及其他同志1月4日给金日成的指示。我认为指示是正确的，并且已经付诸实行。

衷心地祝贺你们占领了汉城。这是人民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20148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报告：1950年11—12月的作战情况(1951年1月9日)

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军部关于1950年11—12月战况的报告

1951年1月9日

第136号

..... [65]

一、战斗编队和基地

1950年8月，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抵达沈阳，其任务是保护中国东北设施、培训中国空军航空飞行部队，下设(配备飞行勤务营的)第二十八、第七十二、第一三九歼击机团。

到8月11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全部集结于沈阳机场。配备了技术装备后，调整了航空团驻地：第七十二歼击机团在鞍山，第一三九歼击机团在辽阳，第二十八歼击机团在沈阳西部。9月25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开始用喷气式歼击机培训中国空军航空部队。

根据武装力量部部长1950年10月18日命令，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为基础组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它包括：由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其他团的技术飞行员组成的第一三九歼击机团、第六十七歼击机团。到11月1日，随着航空师全部进驻辽阳机场，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整编结束。

经过整编，两个师各有两个团，每个团有30架米格15飞机。

1950年11月20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上海移师鞍山，它下设第五十、第一五一歼击机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

1950年11月27日，第二十八、第五十、第一五一歼击机团合并成第六十四歼击机军，仍驻扎在原机场。

战斗中，为了使第六十四歼击机军靠近战斗地区，驻地进行了调

整：12月3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安东；12月7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七十二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沈阳北部；12月25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从鞍山调往安东。

12月15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在完成重建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并向其移交技术设备后，不再是驻扎青岛歼击机军的部队。

1950年12月25日，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进驻东风机场并成为歼击机军的部队，它下设第一七六、第一九六歼击机团，每个团有30架米格15飞机。

二、歼击机军航空军部队的作战任务

自进入中国东北后，歼击机军各团面临的任务：防止美国空军对沈阳、鞍山、安东、辑安、东风的政治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工业目标、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其他重要目标进行空中打击和侦查，特别要保护跨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

起初，我歼击机部队到达前线的最远距离定在鸭绿江。11月6日决定将航空兵的前线地区设在北朝鲜境内。

航空兵部队的机场为保证完成作战任务实行白天战斗值勤。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从9月3日起执行，其他空军部队自其抵达战区时开始实行。

航空兵部队歼击机部队与防空部队航空兵部队合作完成掩护中国东北沈阳目标的任务。

1950年12月3日起，除了完成基本作战任务外，歼击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到安州、萨塔杨基(Сатахянги)一带的交通线”。

12月3日起，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专司此项任务。歼击机军的其他部队因驻地距离战区较远(220—300公里)而没有参与其中。在变更各自在安东机场的驻地之前，第二十八、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是歼击机军的预备队，任务是保卫各自在中国东北的战区免遭敌空军的密集袭击，加强第二十八歼击机团、第五十歼击师空战力量。

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不仅要作战，还要用喷气式飞机培训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飞行部队、培养技术人员和机场勤务人员。为此，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各团都调拨出一个配备了经验丰富教练员的空军大队。12月12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完成对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的组建。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完成对中国空军第三歼击航空师的组建要到1951年1月10日前。

12月底抵达的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任务是重建朝鲜空军，这项任务应从1951年1月5日开始。

12月26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得到新的任务：使中国空军第四歼击航空师飞行员投入实战。为此，中国飞行员以该师飞队战斗人员身份进行2—3次战斗出航。这项任务到1951年1月10日完成。

三、空军作战行动

1950年11月以来，我空军反击敌空军的行动更加频繁，我歼击机军锋已经推至北朝鲜。根据无线电站指挥引导所(安东)的报告，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分别从辽阳、鞍山和沈阳机场，对中朝边境地区特别是安东、新义州地区敌军发动袭击。

此时，敌空军正针对北朝鲜后方的目标开展积极活动，特别是新义州的有关后备力量、交通线和跨鸭绿江大桥。

我歼击机作战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进攻性质。敌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11月，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击落敌机31架，自己损失3架飞机。

到12月，空军作战受到基地距离战场遥远的限制。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移师安东机场后，作战区域明显扩大，我歼击机的行动更加活跃。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12月1日开始作战，并且是在天气条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11月，敌在空战中损失严重，从12月6日起，敌人开始使用航空兵力量，12月17日以来，还投入了F 86新型喷气式歼击机对付我米格15飞机。同时，敌人还将其编队歼击机增至20—24架，若干编队同时行动并在高空形成梯队。

这些都对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作战产生了不利影响。到12月15日，该

师在安东机场共有28架战斗机，有战斗能力的飞行员不超过20—24名。为加强力量，第二十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第一七七歼击机团起初在12月15日以一个大队、后于12月20日全体移师该机场。在当时复杂的空战条件下，这是完全正确的措施。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一七七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前，很少出现针对第二十九歼击机团空战力量实施的战术飞行，而且由于驻地距离作战区域遥远，所有飞行一般限于对安东、新义州地区的临时巡逻，没有遇到敌机。

第一七七歼击机团移师安东机场后，行动开始活跃起来，仅在12月22日和24日，该团飞行员就击落9架F 86飞机。

仅12月，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就在空战中击落37架敌机，自己仅损失4架飞机。

空中环境的变化，对我歼击机作战的性质和结果影响重大。11月1日到12月6日，敌人的老式轰炸机和歼击机在我歼击机设防区活动，歼击机军出动488架次，在战斗中击落48架敌机，其中包括4架F 84新型歼击机。12月7—31日，敌航空兵出来活动，最新型F86歼击机参战。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出动385架次，击落敌26架喷气式歼击机(其中18架是F 84、F 86)。这样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我出动11架次战斗机就可击毙敌人一架飞机，第二阶段我出动飞机架次比的数量增加了，主要是由于拦截敌人的高速及机动性强的飞机出现了困难。

敌机战术和技术设备尽管有所改进，但在空战中损失比例仍为1：8。

歼击机军主要的作战任务是掩护安东地区的渡口和电站、中国东北的其他设施。歼击机军胜利完成了上述任务，在整个作战时期，敌机未能接近这些目标。

歼击机军只是部分地完成了保护北朝鲜后方交通线和其他设施的任务。敌空军有计划地对铁路、机车和行进中的部队实施了猛烈攻击。

我歼击机未能有效保护北朝鲜设施的主要原因在于：

- 1.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安东，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从这里开展

行动。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所在驻地距离中国边境太远。

为增强战斗力，从上述机场升空的歼击机未能按时抵达作战区域。

2.负责截击的我编队未能与敌机相遇。比如，1950年12月21日就启动了26架次，只有4架米格15飞机与8架F 86交火。1950年12月18日、26日、28日，启动74架次，却没有找到敌人。

总的说来，在12月，我歼击机将近40%的起飞都没有找到敌机。

3.缺少实用的雷达定位、空中侦察、预报天气的系统。实际上，歼击机军空军只能从安东雷达站得到天气预报，但是该站仅能预告安东周边不到130公里地区的天气。空军指挥员既不了解敌区，也对自己所在区域的多数地带的天气缺少了解。

也无法了解敌机低空飞行(在雷达站监视范围之外)直接接近安东的情况。

多数“空弹”飞行(即我截击歼击机编队无法找到敌机)表明：

1.正常情况下，敌F 84、F 86飞机避免与我歼击机相遇。当我歼击机到达对方活动区域时，敌机立即快速返回自己的驻地。追逐战中敌我飞机的速度有些差距，但是敌机要想很快地逃出我无线雷达网的监控也不是总能成功的。

2.无线电指挥引导所在敌机活动频繁时的搜寻工作不明确，主要是因为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

3.此外，困难还在于搜寻和截击快速行进飞机。上述空战中击落1架敌机需要起飞的架次说明了这一点。

4.有时候，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师长延误了我歼击机的起飞，这样我歼击机无法追赶逃敌，自然降低了截击成效。

空战中，我歼击机基本采用8架飞机的编队，通常，这些编队成群进攻某个目标。由于搜寻系统问题、战斗组织不充分以及在地面组织空战，编队间的合作未能充分得到发挥。之后抵达作战地区的后续编队，常常因为遇不到敌人而不能提供支持。比如：

——12月24日，发现敌2个飞机编队，每个编队有12架歼击机。30架米格15飞机从安东机场起飞进行截击。4架米格15、8架F-86飞机参战，其他我方飞机并未参战。

——12月30日，18架米格15截击16架F-86。我方由4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截击敌机，双方发生不对称的战斗。战斗中，我方1架飞机被毁，其他飞机因在空战中未与敌机相遇而未参战。1950年11—12月歼击机军的作战情况见下表：

1950年11—12月歼击机军作战情况

序号	名 目	11 月		12 月	总 计
		第二十八航空师	第一五一航空师	第五十航空师	
1	出动架次	151	251	677	1 079
2	空战编队	718		33	58

续表

序号	名 目	11 月		12 月	总 计
		第二十八航空师	第一五一航空师	第五十航空师	
3	击落敌机	16	15	37	68
	其中：				
	B-29	61		5	12
	PB-45	—	—	1	1
	F-47	2	—	—	2
	F-51	18		—	9
	F-80	74		11	22
	F-84	—	2	8	10
	F-86	—		12	12
4	我方损失：				
	飞行员	21		4	7
	米格-15	21		6	9

战斗是紧张的，每位飞行员要起飞122架次。造成如此大的压力是因为空战通常在高空进行，容易导致飞行员高度紧张。有些时候，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无法飞行的人数达到10—13名，12月平均每天7人。

四、作战指挥

歼击机军航空指挥部设在本部队驻地，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在辽阳，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沈阳、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在鞍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东风。总部成立之前，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师长及其本部负责指挥第二十八、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作战。

空军指挥员指挥部建立了航空兵雷达站。为对在北朝鲜作战的苏联歼击机部队进行指挥，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内部通讯设备(空中指挥所)搬入安东。我歼击机作战任务最多时，该师师长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安东。

12月1日起，由歼击机军军长及其指挥部、总部指挥空军作战。歼击机军军部从此时起设在沈阳，歼击机军师长指挥部设在安东。

12月3日起，歼击机军军长将其指挥部迁到北朝鲜，起初在龟城(Кидзйю，安东东南75公里)，12月30日转到海川(Кайсен)。与此同时，12月3日，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师长将其指挥部从鞍山移到安东。

歼击航空师雷达站的无线电设备和通讯设备很好。在北朝鲜的各个歼击航空师，其师长指挥部都有2个无线电站和1个雷达站。通讯无线电站不够，特别是空中通讯联络系统。第五十歼击航空师雷达站(在安东)主要从事搜寻，到12月底它有1个无线电探测站运转，还有1个备用无线电探测站。因此，在寻常天气条件下，第五十歼击航空师指挥引导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空中同时出现敌人的几个编队，指挥引导站就无法用自己的探测搜寻敌机。

当我歼击机编队纷纷起飞截击时，由于与指挥引导站缺少联系，常常只有1个编队能找到部分敌人，不能发现其余的敌人。前述第五十歼击航空师作战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在歼击机截击敌机时可以归因于搜寻不准、编队间缺少协调，但在喷气歼击机短短的交火进程中却是重要的因素。对于在复杂天气条件下作战，指挥引导站的编队就缺少训练了。

米格15飞机上没有敌我识别器、缺少远程飞机通讯雷达，也是我歼击机难以发现敌机的原因。

歼击机军的作战经验表明，进行截击时，喷气式歼击机将以分队等编队方式行动，各个编队将在高空、纵深组成强大的梯队，相互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引导站搜寻的不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包括所有后继部队。因此，为喷气式歼击机搜寻敌机特别是快速行进敌机，应当对航空兵指挥引导站提出更高要求，甚至在歼击机上安装相应的雷达设备(敌我识别器、引导雷达等)。

结论

1.1950年11—12月，第六十四歼击机军各部队的任务是：

——掩护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工业中心、铁路枢纽、桥梁、机场和其他设施，防止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和侦查；

——掩护朝鲜中国志愿军主力部队的后方目标。

2.第六十四歼击机军全体部队完成了掩护中国东北地区目标的任务，其方式是从“机场勤务”转入起飞。位于安东前线机场的第五十歼击航空师第二十九歼击机团负责掩护朝鲜中国志愿军的任务。第一七七歼击机团驻扎鞍山机场，其任务是加强第二十九歼击机团的空战实力。1950年12月25日起，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全体移师安东机场。

3.歼击机飞往朝鲜，通过米格15大队战术行动区、在6000—8000米高空，在没有前站(距离驻地机场不到100公里)的条件下进行。

4.在安东的第五十歼击航空师指挥部负责作战指挥，它使用2个无线电探测站，定期使用歼击机军在价川的雷达站，该所有1台无线电探测站。

5.负责安东机场驻地安全的是，师部的小口径高射炮、12门37毫米火炮，及在白天保持一级戒备状态的歼击机执勤组。

6.米格15飞机作战性能优越，在最大水平速度、爬高能力、火力等方面远超过对手所有型号的歼击机。尽管如此，空战中还是发现了如下问题：

——米格15飞机的活动空间是：速度每小时900公里，高度在1万米以上；

——与敌机比，燃料储备不足，特别是在5000米以下高度；

——高度操纵杆强度不够；

——缺少对飞行员前冲的装甲保护；

——制动设备不太好用。

7.在8000米以下高度作战时，米格15飞机较敌歼击机超负荷7—8个指数。所以，需要向飞行员供应抗重力服。

ЦАМОРФ , ф.64.иак , оп.173543 , д.95 , л.138 147、 153 157

№24823-1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人民中国》杂志派遣俄语编辑(1951年1月9日)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提出的请求，为了做好《人民中国》杂志的工作，将派遣一名编辑和一名校对人员。所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将在近期通告。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9日

РГ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36 , л.91

№09856 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纪要：给予中国技术援助事宜(1951年1月10日)

今天我接见了今年1月9日从北京来莫斯科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

何长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感谢苏联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大批援助，并根据中国政府的委托提出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苏联紧急援助中国建立飞机修理企业的问题。为此，需要苏联援助专家和技术以及各种设备、材料、备件，等等。

二、为建设生产嘎斯51型汽车装配厂提供人力和技术援助。这种汽车在中国战争中性能表现良好。

三、谈到来莫斯科之前曾同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谈话，何提出，司令员请他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加速关于加快向中国海军提供已经向苏联订购的各种设备和材料的问题。

四、谈到周恩来的请求，何请求苏联方面为他提供机会，利用他(何长工)在莫斯科期间参观苏联工业企业，尤其是飞机制造厂和飞机修理

厂、降落伞制造厂、汽车制造厂以及各种重工业学校。

何说，如能尽快解决他提出的问题，他将不胜感激，他认为，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在两周时间里，定能充分完成他来莫斯科的使命。

我对何对苏联提供的援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了感谢，我说，何一定能感觉到苏联方面的全力支持和援助，帮他顺利地、尽快地完成他来莫斯科的使命。

我答应帮助何同苏联有关部门和机关的代表取得联系。我指出，当然，如能在两周时间里完成所有工作并签署协议，这很好，但考虑到苏联和中国代表面前的客观的复杂情况，毫无疑问，在完成这些工作当中会遇到不少困难。

何表示同意这点。

在会谈结束时，何表示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去列宁格勒参观。

我回答说，参观列宁格勒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他方便，任何时间都可组织。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副司长瓦西科夫同志和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曾涌泉。

维辛斯基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1, л.1-3

№1333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转交大连等地资产(1951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第6项 关于苏联向中国转交资产的问题。

批准关于苏联向中国转交资产的公报和就此问题给罗申同志的电报草案(附件)。

附件一：

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资产的问题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950年2月14日关于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以及同一日期交换的照会规定：无偿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由苏联方面在大连支配或租赁的资产，苏联经济组织从日本私有者手中购置的在东北地区的资产以及所有的位于北京的原军事建筑物。

为此目的而成立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目前已经全面地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在1950年期间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转交了上述所说的全部资产。

附件二：

绝密

致北京苏联大使：

第2649项 我们不反对公布转交资产的联合通报。我们建议对文本再做一次修改后公布(随后发送联合公报的文本)。

请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公布通报日期的意见。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3、100-101

№00369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转交给毛泽东的电报 (1951年1月13日)第15451号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您今年1月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已于今年1月12日当地时间23时交周恩来。

扎哈罗夫

АПРФ, ф.3, оп.65, д.336, л.121

№00370 罗申致维辛斯基电：关于毛泽东将与金日成会谈(1951年1月13日)

您的第48号来电已执行。周恩来请我向菲利波夫转达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建议和咨询。他接着说，将通报朝鲜同志。此外，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和彭德怀，请他们来北京作短时间逗留以讨论一系列问题。在他们逗留北京期间，毛泽东将就备忘录中涉及的问题，与金日成谈判。

H.罗申

1951年1月13日

说明：维辛斯基同志1951年1月13日第48号(不包括在第837号电中)来电建议拜会周恩来，并向他转交菲利波夫同志关于中国政府备忘录发来的电报。

АПРФ, ф.3, оп.65, д.336, л.122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13

№003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询问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16日14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1951年1月4日电报已经收到。

我完全同意您的电报中所做出的所有安排，感谢您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

二、我们已对军事贷款协定草案进行了研究。

我们完全同意该协定草案，但第3条第1和第2款除外，我们根据您今年1月4日电报已对两款做出了修改，并请扎哈罗夫同志转告您。

有关该协定的签订问题，将由周恩来同志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加以解决。

三、您在您的电报中称，在1950年前10个半月期间，苏联政府根据

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不久前，王稼祥同志带回了2月和5月军事物资申请单，这两份申请单，他是从外贸部军事工程局得到的，其总价值为237548103.64卢布，其中2月申请单为114415274.67卢布，5月申请单为123132828.97卢布。

我方电报中所列出的军用物资供货总价值为9750万多卢布，因此这一总额低于2月和5月申请单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

由此可否认为，申请单中所订购的军用物资尚未完全到货？这一差额是否将于1951年补上？请您将此告我。

四、您已确定了1951年军事贷款数额，这非常好。待我们对前两份申请单作一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将拟定1951年军用物资申请单，并对这些军用物资的价值作仔细核算，以使其总价值不致超过您所确定的4亿卢布的数额，使苏联政府不致因完成我们的军事订货而负担过重。

五、对您做出的关于根据军事贷款协定用军事贷款方式向我们提供铁路设备并将这种设备减价25%的决定，我深表感谢。

六、我们同意对1950年已提供的5000辆汽车及将于1951年提供的12000辆汽车要按商品流通付款的意见。我希望，您对我的请求进行研究，并对提前提供其余12000辆汽车以满足前线需要一事做出答复。

七、请告知我们，1950年10月19日发出的军用物资申请单中所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汽车汽油和航空汽油，是否已将其列入军事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军用物资之中？军事贷款协定是否适用于上述汽油？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

№003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 (1951年1月15日)

密码电报第15603号

发自北京，1951年1月16日14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1月14日致彭德怀同志转交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副本给您送去。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彭德怀同志并请将该电报的内容转告金日成同志：

正在中国东北受训的约10万朝鲜新兵，在今后2—3个月休整期间之内要编入人民军各军团，以使人民军各师的连队达到人员满员。每个连必须达到100多人，每个师必须达到1万—1.5万人。

朝鲜军队中师和旅一类的部队过多。应将其全部人员大体上编为15个师，并给其配备苏制武器，使朝鲜军队这些师在春季攻势(4—5月)期间能配合中国志愿军，给其以很大支援，以期最终解决朝鲜问题。

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

预计敌军下一步可能采取以下两种军事行动方案：

一、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

果真如此，那么这将是我们所进行的全面准备的结果，因为敌人得知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工作后，将确信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增强了，才会知难而退。

二、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很好的准备，这样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

还有一种可能：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2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对这一点也必须考虑到。然而，如果不发生此种情况，如前所述，在2—3个月之内彻底完成必要准备工作之后，进行最后一项决定性战役，则是必要的和切合实际的。

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

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3

АПРФ, ф.3, оп.1, д.336, л.125-127

№133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批准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人选(1951年1月15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1月15日

第21项 关于П.И.科索拉波夫通知的问题。

采纳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的关于批准科索拉波夫同志任塔斯社

№20149 克拉索夫斯基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951年作战和培训计划(1951年1月16日)

第52号

1951年1月16日

在收到苏联空军总司令关于1951年战斗训练的指示之前，我已(对各部队)明确了如下主要任务：

1.各歼击航空师继续处于高度战斗戒备状态和根据战时计划，对所保护的目标提供有效掩护。

2.对全体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实施考核，使各航空兵大队和团的战斗训练水平达到1950年末的标准。

3.完善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使各航空兵大队能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

4.歼击航空师根据战斗经验以分队为单位组织2—3次空战实践。

5.以核算方式制订飞行训练计划：平均每月每个飞行员的飞行时间：歼击航空师3—4小时，轰炸机和强击机师2—3小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第五十歼击航空师和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一部配合中朝空军继续对三八线以北的部队后方和安东、平壤、辑安等地区的铁路、桥梁提供空中掩护。

2.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应结束向中国同志移交物资(米格15飞机)和技术设施的工作，并准备对中国飞行员实施改装训练。

3.截至1951年1月5日前，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完成各类飞机的装配和试飞活动，并在1951年1月20日前对全体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实施考

核，对各飞行分队和大队实施战斗序列训练，参考近期的空战经验安排2—3次空战实践，进一步完善驾驶技术和作战能力。

4.第一六二轰炸机师：

(1)用新来人员补充中国飞行员人数，以组建中国航空团和师，考核驾驶技术和实施双人、分队和大队作战训练，培训整个飞行大队在白天一般气象条件下中等高度的作战能力。

(2)截至1951年1月1日前编制针对全体中国飞行员的作战计划和课目，并在1951年1月15日前提交我审批。

5.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第十五强击航空团——训练所有中国飞行员独立驾驶伊尔10飞机，根据个人要求，允许其用伊尔10飞机独立实习。

第十三强击航空团继续完善全体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和双人、分队和大队编队飞行技能，训练单人和双人实战能力。

继续完善自己以分队和大队为单位的飞行员在白天和夜晚，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驾驶技术和实战能力，此类飞行训练仅针对飞行骨干。

6.第一八六强击航空师A部：

(1)继续完善自己全体飞行员骨干以分队、大队和团为单位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驾驶技术和实战能力。

(2)截至1951年1月15日前作好接收中国飞行员的准备。在中国飞行员到来后，成立教学小组，进行理论培训，并进而转入飞行实践。

挑选并组成飞行技术班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学习第二十八和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的教学经验和方法。

7.第十七、第一四四和第三二八歼击航空师对(中国)飞行员进行系统的驾驶技术培训。以大队各分队为单位编制中、高空战斗序列。在骨干飞行员的陪同下让学员继续在教学飞机上练习夜间飞行和以大队为单位的夜航技能。

准备接收和改装训练中国年轻飞行员。

正接收第二批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的航空兵各师的任务是：试飞，考核飞行员的驾驶技能，为各分队和大队编制战斗序列，并重视对各分队和大队的中、高空空战训练。

继续用教学战斗机练习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能。

8.第二九七歼击航空师：

(1)截至1951年1月15日以前结束物资接收和利用拉9飞机对第四〇一歼击航空团的改装训练工作。

(2)继续对所有飞行员实施训练以巩固其在1950年末所达到的战斗训练水平。

继续利用拉9教练机和拉9飞机练习以大队为单位的夜间飞行技能。

9.截至1951年1月15日制订出针对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飞行着陆教学计划，并提交我审批。

于1951年1月20日作好接收和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准备工作。

地勤培训

1.以向各部队发出战斗警报的方式，检查各机场和空防保护设施地面防御计划的实用性。

2.各歼击航空师在各地区空防部队的协助下制订针对所保卫设施的防空计划，完成各指挥所的设备安装工作。1月份指挥部将要实施的训练科目：“空防歼击航空师保卫大型工业设施和城市的实战能力”，然后再进行与这任务相关的飞行战术训练，以检测为处于一级和二级战备状态的飞机发出警报和引导飞机起飞系统的性能。

飞行战术训练过程中将使用带有“敌人”标识的飞机。这些“敌人”飞机将根据我的指令由其他部队调拨。

3.编制指挥部训练和飞行战术训练科目，在具体实施这些科目前10日内将其交我审批。

4.所有航空师的地面培训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均需严格遵照飞行训练

的既定任务来进行，以预防各部队中飞行事故的发生和避免战斗训练超负荷的情况出现。

5.在对全体学员进行地面培训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要求学员必须非常熟悉飞行工作相关操作条例和规范；

——结合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了解飞机的性能、地面和空中使用、保养等方面的知识；

——了解实战和武器状态下美军和英军飞机的飞行战术资料；

——对朝鲜、台湾和日本的机场分布网络以及实际作战空域加以认真研究；

——了解(敌我双方)空军活动的方面、路线和方式等。

6.对学员的马列主义和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安排应严格遵照总司令部的相关指定计划予以实施。

7.针对空军各部队参谋部军官的培训应注重：专业知识、敌我飞机战术技术资料和行动战术视野的拓展等科目的训练。

8.独立汽车运输营公职人员培训：

——对后方作战区域加以研究，根据各地特点，研究哪些地区可能用作空军的物资保障基地；

——有计划地挑选军官和部分士官来担当培训中国同志的工作；

——分别对中国同志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并注意搜集和研究战斗技巧，完善自身的作战战术素养。

9.任何情况下均须根据苏军内务章程相关规定为各部队制定作息时间。

10.所有军官均须严于律己和尊重上级，不得违反军纪，凡有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

(驻华)空军作战组组长

№133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出差(1951年1月17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第42项 关于A.C.佩列威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前往中国出差的决定。

1.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A.C.佩列威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作为《人民中国》杂志俄文版的编辑前往北京。

2.关于到中国出差的A.C.佩列威尔泰洛同志和Г.Т.伊万诺夫同志的物质待遇问题，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cc号决议和1950年1月30日第387122c号决议的规定执行。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9

№00373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问题(1951年1月19日)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今年1月14日致电菲利波夫同志，要求准确说明军事贷款协定草案第3条，详细解释中国政府2月和5月的申请单中所列物资的供应数字，并要求尽快得到其余12000辆汽车和询问能否将提供的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列入军事贷款项下。

因此，我们将给毛泽东的复电草稿和给扎哈罗夫与米古诺夫同志电文草案呈上，请您审阅。

按毛泽东所提问题，报告如下：

一、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由外贸部负责与中国政府结算军事部所提供的物资，外贸部工程技术局已于1950年11月将总数为2.375亿卢布的两份军用物资清单交给驻莫斯科中国大使王稼祥，这里指的是贸易结算，并已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中。

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卢布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古诺夫同志。

二、在1950年2—5月中国政府申请的军用物资项下，军事部和海军部按照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已移交给中国属于1950年供货的军用物资不包括26艘海军舰艇(2艘扫雷艇，6艘大型猎潜舰，18艘鱼雷艇)。

按5月的决议未提供的204架飞机、118台飞机发动机、专用运输车辆零件和飞机备用零件，已按比1950年末我国空军师编制大得多的数量提供给中国政府了。

由于毛泽东告知，中国政府打算按1951年提供的军事贷款，编制新的军用物资申请单，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地要告知他，按中国政府以前的申请单，我们已规定1951年除3500万卢布的铁路装备外，以军事贷款提供的军用物资总数近1亿卢布。

三、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指明1951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提供汽车的期限。

四、按1950年10月19日以后苏联部长会议所作的决议，总数为1140万卢布的车用汽油、航空汽油和其他燃料润滑油，已运往中国以外，按1950年10月以前的商品流通协议和各个决议所规定的石油产品，已于1950年运往中国。

在答复毛泽东的电稿中，建议告知，石油产品的供货列在商品流通项下。

五、军事贷款协议第3条第2款的措词已取得周恩来同意，而第1款

的措词在给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古诺夫同志的电稿中做了说明。我方这一款的文本与中国政府提供的措词不同之处在于，其中规定，所提供的1950年10月19日以后生产的军用物资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商品流通项下，目的在于不与中国赴朝作战发生直接的联系。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

1951年1月19日

附件：

华西列夫斯基给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的电报

北京

扎哈罗夫和米古诺夫同志：

据你们的第15453号来电及今年1月14日转你们的菲利波夫同志致毛泽东的复电，请遵循下述方针：

一、考虑到周恩来的意见，第3条第1款可用下列措词：

“按现在的协议，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

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的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

你们提出的第3条第2款已经周恩来同意。

二、可以告知周恩来，1951年1月9日缅希科夫在给米古诺夫同志电报中所报告的军用物资清单：1950年运去的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项下的军用物资，总价值1.4亿卢布，列入商品流通项下的是1.25亿卢布。

已拟定于1951年提供的，列入军事贷款的总数为1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清单，将由外贸部另电告你们。这份清单请交周恩来。

三、关于2月和5月的申请，请按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复电执行。

华西列夫斯基

缅希科夫

1951年1月1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26 28、34-35

№133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李周新来苏治

病(1951年1月19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1月19日

第63项 关于李周新(ЛиЧжоу Синь)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共中央的请求，并准许天津市税务局局长李周新同志到苏联来治病。

2.迎接和招待李周新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3.批准所附给刘少奇同志的复函文本。

附件：

北京

罗申：

请转告刘少奇同志，根据他的请求，李周新同志可以到莫斯科治病。将为李周新同志创造所有的治疗和休养条件。

维辛斯基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13、106

**№20001 尤金致斯大林报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
(1951年1月20日)\r\n**

\r\n 1951年1月20日\r\n

莫斯科

И.В.斯大林同志：

兹向您报告关于我与中共领导者们近期一些会面的情况。

一、1950年12月31日在与毛泽东共晚餐期间(新年团拜会，当时在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遗憾的是，美国人不想打大战。我们原以为，美国人会在三八线一带与我们大打一场，可他们却几乎没有抵抗地撤退了，现在甚至连汉城也匆忙地放弃了。我们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消灭美国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并不反对使这场战争拖延下去。只要美军在朝鲜待一天，美国就不得安宁，美帝统治集团里就会有斗争，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

毛泽东对他们能够为自己朝鲜的军队提供一切必要的后勤保障感到满意。战争初期，虽然中国军队的位置靠近中国边境，但在自己军队的后勤供给方面组织得很不得力。他说，通过在朝鲜战争中的经验，他们将在如何组织现代战争，如何与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晚餐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离席，并邀请我与他们进行了一场短暂的会谈。期间，毛泽东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说，自己的血压下降得很厉害，疲劳过度，甚至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程度。他准备近期到某地去休息两个月左右。

随后，毛泽东说，现在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要求给他们以建议和帮助，北京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的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但仅我们一家处理这方面事务有困难。

另外，毛泽东还说，我们中国出现了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我们真诚希望联共(布)中央也能对我们的问题和工作加以研究。

据上所述，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下有一个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这位联共(布)中央代表应配备几名自己的助手，以便能与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亚洲问题，并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这些问题，以便我们共同加以解决。毛泽东告诉刘少奇，希望他能与我会谈，并向我通报他所了解的关于亚洲各共产党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说，他对我没有机会了解中国所有地区的情况感到遗憾。他希望，当他的选集俄文版出版后，我能再次来中国。他询问我对

此如何看。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这一问题应由联共(布)中央决定。毛泽东说，他将就这一问题请示斯大林同志。

二、1951年1月3日刘少奇请我到中共中央。会谈期间，他重复了毛泽东的话，即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在中共中央有常驻代表。其中一些，如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共产党内部各集团之间还怀有相互敌视的情绪。他说，这些政党的代表都是自己来的，没有经过事先许可，因为这些国家的边境把守不严。刘少奇说，在与他们进行谈判之前，我们尽量事先对他们进行审查。印度共产党要求该党中央领导层内部两个存在纷争的集团的代表都能来中国。我们暂且没有答复，因为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

刘少奇首先谈了日本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有日共的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等同志。我们正在研究日共的情况。刘少奇说，他已与此两人见了两次面。还准备再举行几次会谈，目前正在翻译一些日语文件。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对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刘说，非常明显的是，目前日共内部存在着分裂。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五位中央委员组织了一个新中央，来反对以上述两人为首的原中央。日共中央目前主要是组织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将那些为反对派提供支持的组织整体开除出党。而反对派则指责中央没有彻底承认情报局机关报上所指出的其当年所犯的错误。

刘少奇说，他们今年9月份便在中共党的机关报上就有关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维护党的统一的必要性和日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将美帝国主义驱逐出日本，为日本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等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这篇文章对日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说，他们想请日本共产党反对派的代表来北京，让他们与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会谈，详细搞清双方分歧的实质，并制定出日共统一的行动纲领。

刘少奇着重谈了印度共产党的情况。他说，该党内部不断发生分裂，领导人更迭频繁。其中一个集团一旦成为党的领导，便将前领导集团的拥护者开除出党。战后印共党员数量为20万，而如今仅剩不到4万人。

刘少奇认为，只有大力强调印度在彻底消灭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所

发挥的巨大作用，才可能有助于巩固印共的内部团结。

刘少奇特意请我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印共的现状问题，以便其采取相应举措来巩固该党。他说，关于这一问题中共的观点是：有必要请印共代表来北京或去莫斯科，详细研究该党的现状，并制定出印共的政治路线，为该党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在这方面，印共是无法凭自身力量完成这一任务的。印共目前所处的困境，只会对英、美帝国主义有利。

刘少奇说，近期即将举行越南共产党大会。看来，在这次会议上胡志明将会进入中央领导层，担任中央主席或总书记的职位。迄今为止胡志明没有进入中央领导层，没有在任何机构中担任职务，但他的地位却高于中央，是越南人民的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在所有问题上均征询胡志明的意见，后者实质上领导着越共中央的活动。

刘少奇说，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共产党内均存在着派别斗争。不过，关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情况，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在会谈的最后，刘少奇也提出了毛泽东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关于有必要在北京设立中共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处。刘认为，联共(布)中央代表处应以5人为宜，如果他们不是亚洲问题专家，但至少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熟悉。中共中央方面也将调拨相应人手来配合该代表处人员的工作。他还补充道，他们正在搞一个有400人的培训班，以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他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联共(布)中央的帮助，联共(布)中央驻中国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便可提供这一帮助。刘说，他对在中国建立由中共中央领导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处的问题寄予厚望。

三、1951年1月4日周恩来造访我的住所。他的话题主要涉及：朝鲜战事、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正在中国开展的反美运动。关于朝鲜问题，周所言与毛泽东的没有太大区别。关于国内经济状况，周指出，今年他们的粮食收成不错。粮食储备不仅足以保障包括驻朝中国军队在内的国内需求，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而且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关于目前中共经济发展的困难，周指出，主要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专业骨干人才匮乏。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和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允许派遣大量中国大学生去他们的大学和学院学习。不过，这方面我们也存在困难，即目前我们外汇有限。我们想请求这些国家允许我们延期支付中国留学生的留

学费用。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关于中国正在开展的反美帝国主义运动的情况。他指出，他们已在这场运动中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甚至多数城市资产阶级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运动之中。他说，这可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现象。如果我们将不得不与美国开战，我们将让我们的人民认真地做好一切准备。

周恩来还谈到了亚洲各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的现状问题。他基本重复了刘少奇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内容，并再次详尽地强调：印度应当在彻底消灭世界帝国主义发挥作用；有必要建立强大的印度共产党。

П.尤金

附录里有一封我关于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情况而给毛泽东所发的信件。当我旅行回来之时，恰逢毛泽东患病。陈伯达告诉我，如果我就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情况给毛写一封信，毛泽东一定会喜欢。

П.Ю. [66]

附录

П.Ф.尤金给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想就自己在1950年10月29日至12月3日期间，对中国一些城市的观感向您作一简短的汇报。旅行期间，我在一些城市——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汉口、武汉、西安等作了一系列报告。另外，在上述每个城市我都与当地的知识界举行了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与会者均在100—200人左右，持续4个多小时）。每次都会有人向我提出15—20个问题，我当然都会一一解答。我参观了位于汉口、上海、广州和武汉的几所大学，去了上海和汉口的一些工厂。向大学生和教授发表演讲，与工人们交谈，参观了一个村庄，与农民们谈话。我还参观了许多历史名城，参观了中国许多的名胜古迹。

此次中国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感谢您，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这次难得的机会以及旅途中为我所创造的那些便利条件。

根据我所看到和观察到的情况，并通过与知识界和广大党的积极分子的所有会面，在讲课和演讲期间与大学生交流（期间我的听众至少有25000人），我总体上形成了如下一些极其强烈的感受：首先，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组织，它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团结在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周围。我高兴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在所有地方都未遇到任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广大党员、群众的团结一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党关于与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政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样，我便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团结中国广大民众，并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兄弟党的党员，我确信自己能够并将证明，为了祖国的独

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一定会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一年或者更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成功地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在各省稳固地建立了承认由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已成为世人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它将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先进的国家之列。

我曾多次与自己所去的各地、省的领导者交谈，这些人给我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他们都经过正规的党校和军校教育，在广大党员和非党员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如饶漱石、陈毅、叶剑英等)都是党和国家卓越的活动家，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

通过与大量知识分子干部的交谈，我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基本群众在政治方面是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并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工作。但在理论方面，知识分子则很不统一。根据我与知识分子交谈中他们向我所提出问题以及其发言的性质，我将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如下一些类型：

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每个大城市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和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在所有座谈会上都有人向我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称辩证法有三个规律，其中之一便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而斯大林著作中却说辩证法有四个规律，但却不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经常有人询问有关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如何理解形式逻辑理论，其意义何在。还有人问：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还有几个问题与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相关。有人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以及关于朝鲜事件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国大城市中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核心。虽然这些人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但他们应当而且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用于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党的委员会的重视，在多大程度上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被用于各项实际工作。当我与知识分子举行一系列座谈会的过程中，当地党的领导干部往往缺席。从这一情况来判断，可以说明，党的领导干部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希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的知识分子。看来，对于此类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此类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包括：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如何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苏联是如何改造旧知识分子的，等等。此类知识分子在我的交谈者中占多数，他们接受的是旧式教育，有时他们也真诚地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给北京民主人士所作的演讲之后，在与其交谈期间，有人告诉我，这些民主社会活动家中的一位正试图将未来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可以认为，此人这样做是出于一片真心的，他想以此来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此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给予其积极的帮助。这是共产党干部的应尽职责，他们应当尽可能地把这方面工作做好。

三、第三类知识分子——几乎公开地敌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且不想承认马克思主义。此类知识分子，我是在位于汉口和广州的(美国)教会大学中遇到的。他们明确地声称，最高级的文化是美国文化；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这些大学教育学生仇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在汉口教会大学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教授们外，还有几十个大学生的。我问那些教授，大学生们对美国侵略朝鲜持何种态度，一位教研室主任答，这一问题应当由大学生自己来回答。我对他说，我们身为对大学生实施培养的教授，理应了解他们的政治倾向，但他始终也未正面回答我的提问。此时，一位学生开始发言，他说，一部分同学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另一部分认为，中国应当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中立。至于自己的观点，该学生没有说。于是，我便问他，他究竟持何种立场呢？他勉强地答道，自己支持朝鲜人民。

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中学生的情绪，并不能代表国立大学中学生的看法。我曾在广州政治学院、武汉国立大学和汉口国立中学为广大学生演讲。这些学校的学生们的爱国情绪极高，并积极支持人民政府。我不认为，那么几所教会大学就能培养出中国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不过，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他们所培养的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和新中国的政治反对派。

在参观工厂期间，通过与党的干部交谈，我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地方上党的领导机关不太注重工人的政治素质教育。领导干部很少下基层，很少与工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企业中的党组织也很薄弱(如汉口纺织厂有2000多人，而党员只有26人，且主要都是一般工作人员)。11月7日该厂召开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工人大会，会上作报告的是一位妇女——当地工会工作者。

11月中，西安一家纺织厂组织了罢工。关于罢工的准备活动，没有一个党组织事先知道。西北局至今仍说不清，谁是此次罢工的倡议者和组织者。

在与镇江市党务工作者座谈期间了解到，该市三个小型工厂都是从上海迁来的。在这些工厂的工人中，有人从事反动活动，至今到了夜里便有人在墙上涂写反动标语，撕毁共产主义宣传画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或在上面涂写反动标记，很多工人怀有不良政治倾向。当我与党的工作人员谈到关于工人阶级的话题时，其中很多人都大致如此作答：我们这里工人少，政治觉悟低，我们工人实际上并不是领导力量，等等。于是，我不得不向这些同志解释，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与其他阶级相比，工人阶级更有可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不过，这些先进思想应当向工人灌输，对其实施政治教育。如果我们不去教育工人，他们自己是不会迅速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敌人便会占领这一阵地。我认为，无论如何应着力加强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工人中的工作，对工人实施阶级教育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中国而言，土地改革是真正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事件。我去的那个村庄，不久前才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座谈会上，来的农民约有几百人。期间，妇女们发言倒很踊跃。其中一位说道，土地改革在农村妇女中掀起了一场与大米害虫作斗争的全面运动。村里成立了一系列群众性组织，农民们积极参与其中，所有村民都对新生活充满希望。不过，农村的政治领导工作也需要加强。在苏联，当内战结束时，农民们感到自己已拥有了土地，地主不会再卷土重来，党即开展了针对农民的大规模政治教育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面向农村”。城市中的每个党员积极分子都有义务到农村去，在农民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如果城市中的领导者和其他党员积极分子能够定期去农村作政治报告，与农民交流，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效。苏联在从事这项工作时，还带有城市支援农村的性质，各个企业和机关都有固定的农村帮扶对象，他们帮助农村开展文化工作，向农村发送书籍、报纸、电影，演员、学者和其他文化活动家都下到农村基层去。这项工作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极大地巩固了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

与各省党的领导干部交谈，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地主反抗农业改革的程度估计不足，对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估计不足。可当我们去了一个县，与县城中的党员干部交谈后，就立刻感到省级领导与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阶级斗争评价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后者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斗争的激烈。我认为，在关于与地主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应当加强宣传工作。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牢记一点：作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地主一定要被消灭。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自愿走下历史舞台，他们会全力抵抗到最后一刻，越感到末日临近，他们的反抗就会越激烈。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与您(毛泽东同志)交流，即关于广州和香港的边界问题。从香港每天来广州共有4列客车。人口自由往来，既没有相关部门的边检，也不查护照等证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旅客当中一定会隐藏着几十个，甚至数百个间谍、特务和破坏分子。叶剑英同志说，近几个月广州接收香港移民达6万人，那么这些移民中有多少敌人——谁也说不清。看来，如果不能关闭香港广州的边境的话，我们最合理的做法，至少应当实施最严格的通行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不经中国政府的特别允许，任何人均不能进入广州。

这便是我就自己在中国旅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几点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П.尤金

1950年12月15日

АРАН, ф.1636, оп.1, д.194, л.9-20

№003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情况 (1951年1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月27日19时3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1951年1月19日给我的电报副本给您寄去。

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我于1951年1月16日晚抵金日成首相同志处，1951年1月18日晚离开那里返回。

现将我们会谈结果向您报告：

一、金日成同志及其同志们认为，仅靠朝鲜人民军单方面的力量追击向南方退却的美军和伪军，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带有冒险性。

他们表示，政治局会议认为：我方提出的为了今后小心谨慎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虽然朴宪永同志曾有他自己的看法，但经我1月17日再次向他做了解释，说明不经准备而贸然实施进攻和做好准备小心谨慎地实施进攻两者的利弊得失之后，他对此感到满意。

苏联顾问也同意以下看法：下一次战役乃是决定性战役，因此只有得到朝鲜政治局的赞同，这一战役才能更好地实施。

二、沿海地区防御问题。

金日成同志和拉祖瓦耶夫同志提出了以下意见：第二十六旅将驻防镇南浦，第二十三旅驻防海州，第二十四旅驻防元山，第六十三旅驻防北清，第六十九旅驻防江陵；这些旅将以营为单位沿西部和东部滨海地区占领防御地段，担负警戒任务。平均每旅约为3000人，且战斗力不强。

此外，新组建的3个军团(第六、第七、第八军团)将用以控制以下地区：第六军团负责控制安州，第七军团负责控制谷山，第八军团负责控制咸兴。关于将哪些部队留驻汉城和仁川的决定尚未做出。他们还提出从中国志愿军中抽调1个军留下，作为其骨干。我们已同意留下1个军驻防铁原。

已从苏联得到1000枚水雷和20万发反坦克及其他类型炮弹。暂定将其中10万发炮弹用于滨海地区防御，水雷则布设于各最重要港口。水原三陟一线以南滨海地区的防御任务已由前沿部队担任。至于对位于新义州地区的龙岩浦港的防御，他们请中国东北军区部队担任(为此有1个团就足够了)，我基本上已同意上述沿海地区的防御计划。

请您研究审定。

三、5个军团的补充问题。

已确定每个军团由3个师编成。所有5个军团，除第一军团外，现均由3—5个师编成，但其人员不满员，各师人数为3000人、4000人、5000人不等。计划用各军团内部第4个师的人员将其余3个师的人员补齐。这样，每个师大约可达到7000人。我提出了将俘获的20000名南朝鲜军队士兵分配给5个军团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至于我提出的关于用新组建的3个军团补充现有各军团的建议，他们也未采纳。这一建议虽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我认为今后不宜再坚持这一意见。他们正计划使其新组建的3个军团参加下一次战役。

四、为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尚未准备足够数量的干部。

汉城原有人口为150万人，现估计尚有约100万人。目前在粮食和燃料方面正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向难民和失业者提供任何帮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粮食很吃紧。开城以西和沙里院以南地区已出现大股土匪，这些土匪甚至已占领了一些居民点。我们已派人民军1个团

另4个营的兵力去消灭这些土匪。此外，已决定调第三十九军的1个师到临津江以西地区给予支援。这些土匪一经消灭，我们就能获得几十吨粮食。

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巩固控制区；瓦解敌人；北朝鲜做好春耕准备；帮助难民；局部恢复一些工厂的生产；在美军和伪军暂时占领区开展攻势；建立武工队，将党和行政工作人员、群众组织领导人编入其中，渗入敌后，在武工队武装部队的掩护之下在各地开展组织工作；把合法斗争形式与地下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打击最反动的分子，支持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采取上述措施的各种方法。经过讨论，双方已就上述问题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究竟如何有目的地和在正确调配干部的条件下组织贯彻这些措施，尚有待今后进一步予以明确。

彭德怀

1951年1月19日12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2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37-40

№00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第四次战役作战计划问题(1951年1月28日)

发自北京，1951年1月29日18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目前美军正企图向汉江南岸通往汉城和仁川的地区实施进攻。已形成情况是：我军已无法继续进行休整，被迫立即准备第四次战役。现将我1951年1月28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寄给您，请您一阅。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请将您的看法告我。

“彭德怀同志：

一、你1951年1月27日的电报及给各军关于准备实施军事行动的命

令，均已收悉。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万—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三、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州安东方向发展进攻。

四、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正希望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敌)能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但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尚未得到人员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方向突击，消灭部分美军和4—5个南朝鲜师。

请你在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

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以后，必须再进行2—3个月的准备，此后才能实施带有决定性的最后一次即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来看，这较为有利。

八、第九兵团必须于最近转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地区，以便进行休整。同时，该兵团必须担负防守该地区的任务，以防止敌军在仁川和镇南浦登陆。在第五次战役期间，该兵团必须参加前线西段的战斗行动。

九、在进行第四次战役期间，请您考虑将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携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部队负责完成突破，将敌军追

击到一定地区，而第二梯队部队则负责继续追击敌人，以使战役能持续10—12天时间，并利用这一时间尽量歼灭更多的敌军。

你意如何，盼复。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19时”

第478号电

毛泽东

1951年1月28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41-43

№0037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第四次战役作战方针 (1951年1月30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28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已收到。同意您的看法。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正确的。

第60号密码电报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44

№003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人民军建设问题 (1951年1月30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兹送去我给拉祖瓦耶夫的电报副本。望告知您的意见。

“致拉祖瓦耶夫同志：

请您与金日成同志及其亲密的朋友商讨下列电报，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一、可以认为无可争议的是，现有的朝鲜师在作战能力上，不如去年夏季原有的师。原因在于，当时朝鲜人有10个师，它们编制齐全，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训练有素的。而现在，朝鲜人有28个师，其中19个师在前线，9个师在中国东北。显然，对于数目如此庞大的师，朝鲜人无法保证配齐各级军官。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每个师有8000人，至少必须有800名军官，士官还不算在内。我指的是有能力把一个师凝聚在一起的真正的军官，而不是匆忙中授予军官称号的人。显然，朝鲜人还没有这么多的军官。所以，现在的朝鲜师是稀松的、不坚强的和缺乏战斗力的。朝鲜人只追求军队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军队的质量。

二、在目前情况下，朝鲜军队以不超过23个师为宜，因为精简下来的5个师的军官可以补充到其他编制不全的师中去，而士兵则用来作为预备部队，这将加强各师的力量，削减开支，在装备上也会占有优势。对于4个缺乏战斗力的朝鲜陆战旅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它们的军官和士兵补充到各个师里去。

三、在现阶段，组织军团的指挥系统不合适，因为能够领导军团的指挥员，目前还没有或者是几乎没有，而军团的指挥机构已经有了。最好组织5个军团的指挥机构，每一军团辖4个师，以便军团的指挥机关能亲自直接地领导下属各师。在此情况下，朝鲜武装力量可有5个军团的编制(总计20个师)，而3个师可以作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以便在战役过程中支援最迫切需要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指挥员们成长起来了，指挥员的数量充足了，也学会了指挥师的联合作战时，就可以转向军团的建制。

当然，上述改编并非现在就要进行，而是在战役以后休整时期再做。

请你们讨论这些建议，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

冯西”

菲利波夫

1951年1月3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47-48

№11523 高岗在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2月 [\[67\]](#))

我在这里作为志愿军后勤工作人员讲几句话。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实施了所向无敌的三大战役。鉴于在后方一些同志不了解前线的局势，我认为有必要讲一讲并对最近的事件作一些说明。

你们都知道敌人进犯到清川江北部地区并迫近鸭绿江时的局势。

当时朝鲜处境十分严重，由于敌人兵力的巨大优势及别的一些原因，朝鲜劳动党的人民军已经退到清川江以北，如果你们注意当时的局势，你们是不难回想起来的。

至于中国，当时龟缩在台湾的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十分高兴，认为很快就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草山召开了紧急会议，开始了积极的准备活动，成立了以陈诚为司令的部队，以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

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的所谓“地下军”蠢蠢欲动，极力开始自己的冒险活动，开始在电影院撒传单。我们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先让反动派暴露出来，然后把外国特务一个一个地抓起来，这样很快就消灭了他们的核心。国民党甚至急急忙忙地任命和配置了财产接收大员(期待着侵入东北)，不久前才实行土改地区的地主活跃起来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害怕地动摇起来，然后变得十分恐惧。他们开始在中央和各个地区宣扬说，美国是个强国，有许多飞机，而中国则刚取得胜利，还没有巩固，所以玩火是危险的，必须全力埋头于建设并巩固国家的基础。

资产阶级中的商人开始囤积居奇并往市场上大量投入货币，物价急剧上涨。棉布开始脱销，所有的有价证券都在市场上堆积起来。沈阳和东北本来有550多万吨粮食，所以粮食价格本来不应上涨，但是几天之内，一斤粮食从4000元涨到了8500元，棉布的价格上涨了70%。主要的事实在于，劳动人民由于听到各种关于局势不稳的谣言产生了误解，产生了怀疑，“他们的几亩地还能不能保障”，“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如果说朝鲜处境严重，那么中国也是同样处境。

至于帝国主义方面，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举行的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求朝鲜无条件投降，开始从飞机上撒传单并进行恬不知耻的反苏宣传，要求中国在鸭绿江北部建立缓冲地带。还在讨论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然后分五路向鸭绿江突击时，某些强盗就提出了要建立缓冲地带。而麦克阿瑟则宣称，这没有必要，如果需要建立这样的缓冲区的话，那只能在鸭绿江北。

同时帝国主义者还表现出特别傲慢和咄咄逼人，麦克阿瑟打算完成钳形包围，到11月底就能得胜回家。美帝国主义夸耀自己武装力量的优势，声称麦克阿瑟是天才的统帅和战略家。

像走狗一样跟美国人跑的仆从国，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赞美有加。超级反动派丘吉尔宣称，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会议的官方报告的突出特点是有充分说明力，为此许多报纸对他大肆吹捧。对于仆从国来说，会议的决定意味着你派一团兵，我派一艘军舰，这样就可以拼凑出一支扩展我们威力所必需的强盗军队。

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对朝鲜的局势十分关切。当战斗打到南方时，他们高兴，当战线逼近鸭绿江时，他们难过。华沙的物价飞涨。胡志明整天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朝鲜新闻，众所周知，他是个不喜欢听无线电广播的人。

苏联也对朝鲜的事件特别关心。

你们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出兵或者拖延出兵，在这种条件下朝鲜会是个什么局势，你们就会承认，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朝鲜的民主力量不复存在，中国能够埋头进行建设吗？还必须记住，朝鲜的存在就是中国的存在，因为我们同处一个阵营。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管某些部队的出发比较仓促，这也是形势所迫。

由于前线的胜利，今天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个很好的报告，金日成首相也作了个很好的报告。准确地评估了形势，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对于朝鲜方面来说，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美国妄图占领和奴役朝鲜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朝鲜赶走敌人，或者在朝鲜歼灭敌人，已成定局。由于前线的胜利和国际条件及力量优势，这一点已经成为可能。当然，也不能说，既然局势已经确定了，就可以安心睡大觉，敌人会自己滚蛋。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必须认真准备，顽强作战，做出更大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比如运输方面的困难——道路太长，黑夜很短，而白天又有敌机袭击。如果两国的军队能够克服困难，通过顽强的斗争，并在客观上不犯错误，就能最终取得胜利。

人民军变得更加强大了，正如刚才金日成首相所说，它积累了丰富经验，它的部队更加坚强了。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前线的胜利，使朝鲜人民决战决胜的信念空前高涨。战争也教育了人民。5年建设的成果使群众认识到，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道路，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极力想破坏。因此加深了人民的愤怒，提高了人民的战斗精神。人民政权也积累了经验。在这种胜利的条件下，获得解放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民主阵线的基础加强和巩固了，因为这种胜利使各阶层居民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综上所述，赶走敌人或者在朝鲜消灭它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当敌人到达毗邻清川江北的地区时，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和平与民主阵营的胜利。

你们在这里取得了胜利，我们在后方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只是没有流血。东北有12万宣传员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全国基本肃清了亲美或者恐美的意识形态，并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所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是赞美英雄和抨击反动分子的。由于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工人们3天就为9个步兵团缝制了2万套绗过的棉衣，农民积极参军，使队伍上增加了10万名新战士。一次就动员了36万人并通过了严格的检查。21天之内就完全结束了交公粮的任务。83%的大学生申请到军事学校学习，东北工学院也有80%的大学生表达了这种愿望，中央机关68%的干部申请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中央只批准了2000人。工业资本家称赞毛泽东主席，说他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伟人。北京、天津、沈

阳、哈尔滨、大连的工商界人士组织了游行，呼口号：“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万岁！”并且自己做出决议不进行扰乱市场的投机倒把、不囤积居奇。如果违背了这一点甘愿根据做出的决议受罚。

天主教会开展了旨在独立维持生活费、独立进行传教活动和独立教育的改造运动。

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财产被监督起来了或者被没收，教会学校成了我们自己的。物价没有上涨，税收增加了。开始还担心，由于城市挨榨税收会减少，但结果证明收税收到了24.7万亿元。在春耕开始之前，有1亿3千万人口的地区完全实行了土地改革。国防建设空前加强了。

在动员了10万新兵后又动员了2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机场维修支队等。如果说朝鲜取得了胜利，那么中国的事情也进行得很顺利，各个阶层的人民团结得更紧密了。

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宣称：“反攻大陆时机还没到”，否则“就是不了解当前形势”。国内的地下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沉重打击，仅仅逮捕的就有10万人，枪毙的有4万—5万人。

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有一个叫李普曼的美国人写道，“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一个亚洲问题都解决不了”。世界各国人民热烈欢迎中朝人民。中国出席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莫斯科被欢迎的人群抬了起来。在联合国，维辛斯基建议欢迎以伍修权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时，大厅里许多人都鼓了掌，向代表团献的鲜花堆满了一屋子。

胡志明说：“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会在越南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将鼓舞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阵营的恐慌越来越大，内讧增多了。“天才”的麦克阿瑟变成了历史的笨蛋，变成了一个没有健全思维的人，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

人们要求麦克阿瑟、杜鲁门、艾奇逊下台。

在谈到联合国没有接受关于“中国是侵略者”的观点时，联合通讯社也承认，说“这是联合国成立5年以来，美国遭到的第一个最悲惨的失败”。

胡佛也承认，“鉴于美国的失败，必须重新考虑政策，否则将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国也感觉到，如果他们继续追随美国，他们就有陷于巨大灾难的危险。在清川江失败后，英国和法国又派了兵。而菲律宾则因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并出现了政权崩溃的明显迹象，所以他们犹豫不决，想把部队撤回去。美帝国主义骂这些国家“忘恩负义”，称这是美帝国主义“最大的耻辱”。

美国费城的《新闻报》(中文译名)骂英国时写道：“借此机会(指中国对印度的答复)，想把它变成又一件武器来威胁中国。这确实叫人恶心!”

纽约的《每日镜报》骂英国“阴险狡猾，使用狡猾的诡计使美国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指责它“利用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来干不能公开干的事情”。

这就是帝国主义阵营的狗咬狗。

直接决定这些变化的就是胜利。应当记住，为此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付出了4000万美元，而美帝国主义付出了1.2亿美元。

光荣属于前线指挥员、劳动人民、英勇牺牲的战士，受伤的英雄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英雄。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让我们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

彭德怀司令员在论述胜利的原因时，讲的三点都非常好。

我想补充的是，有强大苏联的存在，有伟大的斯大林指引道路，有英明的毛泽东领导我们——是他做出了出兵的决定，这些都是胜利的原因。

尚需再夺取几个胜利，敌人才会很快完蛋，在这时候难道可以想回国的事吗？

不能，因为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任务，什

么时候我们回家。否则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你们说，在朝鲜住房太难解决，朝鲜话太难懂了，但是你们克服了困难，这确是你们一大成绩。

只要一消灭敌人，你们就可以立即回国。如果敌人再来，那你们又再回来。

所以今后一切任务都归结于消灭敌人。

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将军对以后的战役讲得很好。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和平谈判的问题。

应该怎样理解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在取得胜利后才来谈和平谈判的问题？

因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力量很大，帝国主义很害怕，他们没有准备好，要利用和谈来准备力量。

我们力量大，我们不怕战争，也不怕拒绝和谈。我们是胜利者，和谈不会给我们造成损失，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准备打仗。和谈是次要的事情。如果谈判进行得不好，我们就打。我们准备得很好。任何时候都可以派作战飞机去消灭敌人。

不能有一丁点儿幻想。

一个是关于作战的问题。

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有士兵，需要衣服和食物，需要弹药。

否则，任何天才的指挥都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在兵源方面不成问题。除了已到部队的新兵和已经招募的新兵，还从中国本土原有的部队中调来了14万士兵。

现在在中国本土又开始了第二次动员新兵的工作。

1951年，准备了54万头猪，油水方面也不成问题，为每个人购了

10双鞋。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和一套内衣。

这样，关于士兵方面不是问题。物资方面也不是问题，士兵的训练、情报、通信等，也不成问题，因为彭德怀司令员在这些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

所以准备工作的中心在于，以什么方式实行物资的运输。为进行这项工作，东北局派出了6名成员，东北政府派出了4名部长。

我们后勤部的任务就是解决有关所需物资的运输问题。

今后，9个师的大炮、飞机、坦克、9种燃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仔细计算和很好地组织。

今后应该怎么办？中央委员会曾决定在东北培训1000名技师，而我们已经培训了11000人。中央已经抽调了9个运输团，但这方面的困难仍然很大。这些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产生的，比如司机缺乏在山地开车的经验，道路太长，黑夜短，雨季，道路滑。大家应该预先讨论这个问题。

构筑飞机场也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情。修建一个飞机场需要15万吨石子和4万吨水泥。为建飞机场动员了400万人。已经维修了8个飞机场。尽管困难很大，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修建了6万吨容积的汽油库。除此而外，还修建了可以通行坦克的桥梁，维修了铁道。刚才金日成同志说得完全对，必须动员朝鲜人民参加修理和修建飞机场和道路的工作。

手推车的问题也特别尖锐。现在已经生产了两万辆，而需要……万辆(此处有遗漏)。

我们已经具备了彻底消灭敌人的一切必要条件——人力、武器和物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切。

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同志正确地阐述了进军南朝鲜以后志愿军对各阶层居民的态度问题。

战争的胜利和劳动党5年来取得的成就教育了人民。劳动党、政府和领导人的威望在人民眼中提高了。因此在居民各阶层中发生了变化。撤退期间，动摇的人立场更加动摇，中立的人开始右倾。胜利期间他们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朝鲜各阶层居民的情绪就是这样。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

在敌人进攻期间资产阶级向右倒。部分资产阶级与敌人一道进攻。必须对这些反动分子进行打击。现在这些人正与敌人一道撤退。必须没收他们的财产。

至于那些不和敌人一起进攻一起撤退而只是表现出一定程度右倾的人，则必须保护他们，并促使他们进步，如果他们还保存有哪怕不多的民族觉悟和爱国主义感情的话。

我们志愿军的口号是：所有拥护朝鲜解放的人，都应该集中自己的力量，以粉碎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这一点刚才金日成同志讲得很好，以这种方式行动，我们就能挫败敌人的阴险企图，团结一切渴望看见朝鲜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国家的人。他们中间可能有两面派和隐蔽的敌人，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粉碎主要敌人。所有那些顽固地不愿意懂得这一点的人，都应该靠边站。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希望，希望志愿军遵守纪律，执行命令，热爱朝鲜的党、政府和人民。

志愿军团结一致，彻底解放朝鲜。朝鲜人民最终会起来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的、伟大的朝鲜。

这是我作为一个后勤工作者在这里就所讨论的问题发表的一点想法。

РЦХИДНИ, ф.27, оп.137, д.947, л.5-22

№26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影片《三次会见》的汉语配音(1951年2月2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2日

第155项 关于为影片《三次会见》进行汉语配音。

允许苏联电影部为影片《三次会见》进行汉语配音。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30

№003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1951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9日1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1951年2月5日13时给我的电报副本给您发去。

请您了解该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1951年2月4日晚，我已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

金日成同志完全同意关于以现有全部兵力和装备阻止敌人的这次进攻、恢复有利于我的军事态势、加紧进行长期大规模作战准备的计划。同时，金日成同志说，在过去三次战役中因轻而易举取胜所暂时激起的情绪，目前已不复存在。

关于解散5个师以其补充人民军各军团的工作，将于当前这次战役结束后进行。在实施当前这次战役之后，金日成同志拟同我一起前往北京。

彭德怀

1951年2月5日13时”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2月8日

第667号电

№10217 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收到了。我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然后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许，你们会感到奇怪，我们总是在晚上举行会谈。我们白天很忙，要不断工作，晚上6点才能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

或许，你们感到奇怪，会谈要持续这么长时间。但遗憾的是，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中央委托我们亲自接见你们，向你们提出一些建议，对你们的党进行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党了解得很少，对于你们也了解不多。对于这一任务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我们承担起提供建议的职责，那么，我们也就以此承担起了在道义上对你们的党负责的义务，而我们也不能轻率的提出建议。我们希望熟悉材料，了解你们，然后给出建议。

你们或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询问。但是我们所处的状况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材料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情况，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没有办法。局势要求必须这样。让我们转入实质性的讨论。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

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 [68] 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此就进行了反驳，指出，印度将会经历中国的道路，也就是将经历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以如下方式建设自己的革命阵线：鼓舞所有的农民和富农起来反对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农民都鼓舞起来孤立封建主义者。应该把社会舆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进步阶层都鼓舞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孤立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集团。你们经常说，应该通过一次性的打击，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英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都驱逐出去。不能够建立这样的阵线。在全民族阵线中，迫切的问题应该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让其他的帝国主义者，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你们不会触及他们。为了不使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你们，为了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这样做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自己插了进来，那么，那时候印度的统一战线就应该把矛头也转向他们。

高士 [69]：我们不明白，当前美帝国主义者被认为是反民主的阵营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同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只反对英帝国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非常简单。为了建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了获得民族独立，需要反对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你们的民族特点。由于谁印度才处于半独立状态？是由于英国而不是美国。印度存在的状况是：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而是在同英国人合作。你们军队中的一些军人和专家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够摆脱的。我想说的是，党不应把所有的任务都承担起来，不应承担起同全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需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摆脱英帝国主义。这是印度的民族任务。对于封建主也是一样。当然，富农是敌人。但是，反对富农和封建主是不明智的。承担起反对富农和封建主这两项沉重的任务是不明智的。应当这样组建阵线，以便被孤立的不是你们，

而是敌人。这可以说是减轻共产党斗争压力的一种战略。如果某人是明智的，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到自己肩上。应当承担起的一项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和英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孤立封建主、消灭封建主，消灭英帝国主义，其他的帝国主义暂时先不要碰。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工作的阻力。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插了进来，那么也应当同他们作斗争，但人们将会了解，不是你们，而是他们发动了进攻。当然，也会轮到反对美国人和富农，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顺序。

高士：我现在明白了。

丹吉 [70]：但这不会妨碍开展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同他们作斗争的宣传吗？

斯大林同志：对于敌人应当明智地予以孤立。你们进行的革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而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行了干涉，那么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拉奥 [71]：富农中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封建剥削，他们出租土地，也放高利贷。他们通常站在把土地出租给农场主的大地主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这不意味着什么。同消灭封建主这一总的艰巨任务相比，这只是部分任务。你们在自己的宣传中需要反对封建主，但不要反对富裕的农民。而你们也不应把富农推往一边，使其同封建主建立联盟。不应该使封建主得到自己的盟友。富农在农村中有巨大的影响，农民认为，富农之所以出人头地是由于自己的能力等。不应该给富农分裂农民的机会。在你们国家，封建主中有贵族吗？

拉奥：有的。

斯大林同志：农民不喜欢贵族。应当抓住这一点，使封建主没有机会在农民中建立联盟。

布尼亚 [72]：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还有一些混乱。应当怎样理解民族资产阶级？

斯大林同志：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别的国家的政策。难道你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考虑去掠夺别的国家吗？现在掠夺印度的是英帝国主义

者。民族资产阶级，这指的是印度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剥削者。应该说，你们不要反对他们，而要反对现在的敌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人是赞同你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但他们只是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会很多。资产阶级对你们的支持主要在于，他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他们的兴趣还在于，消灭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良好的市场，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将会产生国内市场，将会产生能够购买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报刊进行解释。如果资产阶级不站在英国人一边，对你们将是有利的。你们应该这样做：要使英帝国主义者不能在印度获得新的盟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至于印度的革命，完全是英国人发动的骗人的把戏。如果你们制定了行动纲领，那么你们应当在纲领中说明，你们需要建立巴基斯坦、印度和锡兰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这三个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国家将会接近。结果将是这些国家的联合。你们应当提出这些国家需要接近的想法，而人民将会支持你们。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上层将会反对，但是人民将会对他们产生怀疑。从孟加拉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为的分割达到了什么程度。孟加拉省首先脱离了巴基斯坦。

丹吉：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上我们经常受如下精神的教导：中等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转向了英帝国主义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在印度有纯粹的英国银行吗？

丹吉：是的，在印度有英国银行，也有同英国人合办的银行。在我们的纲领中有民族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是官僚资本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这不是官僚资本。这是工商业资本。中国的官僚资本成了国有资产的积累。这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同工业的关系很少。它依赖宋氏等家族同美国人签署的优惠合同得到钱财。至于中国大的工商业，它们是完整的。我建议你们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如果他们

仍然同美英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话。最好大声地说，那些公开地转向敌人一边的人将会丧失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如果你们的革命达到了高潮，将会对部分的大资本家进行打击。到那时候宣布他们为叛徒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而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同英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这我就不再建议了。就要像中国做的那样。如果在你们的纲领中有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要求，那么应该删除这一点。应该制定新的纲领或者行动纲领。中立大资产阶级并使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百分之九十脱离其影响对你们是非常有利的。你们不必人为地为自己制造新的敌人。何况你们的敌人已经很多了。以后你们着手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时机到来的。应该分阶段地解决革命的问题。不应把所有的阶段都混在一起。应当分阶段地解决问题，应当部分地消灭敌人：今天消灭一些，明天消灭一些，而当巩固的时候，可以消灭所有的敌人，而现在你们还很弱。你们中有人模仿我国的革命。但这是不同的阶段。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应当批判性地接受，并且这种经验应当与印度本地的条件相结合。你们会被批评太左，不要害怕。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曾批评列宁太左，但他们被证明是可笑的。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现在谈论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我已经谈过了，这就是农业革命。这涉及武装斗争，但是应该说，中国人没有谈论武装斗争，他们谈的是武装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同解放区和同解放军一起进行的游击战争。这意味着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武装革命和游击战争，而不是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说法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报纸中经常刊登。武装斗争的含义要大于游击战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革命是怎么开始的呢？

1926—1927年，中共的同志脱离了国民党。他们组建了另一阵营，并组建了4—5万人的军队反对国民党。这支军队主要开展游击战。他们隐藏在森林和山地，远离城市和铁路。当然，那里设有中共中央，主要的干部也在这里。中国的军队不能在城市建立根据地，在城市他们很容易被包围，为了不被包围和消灭，他们继续远离城市和铁路，驻在了一些游击队解放区。在被包围的时候，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放弃了原来的解放区，建立了新的解放区，并尽力不进行战斗，越这样进行下

去，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脱离了工人和城市。毛泽东当然不希望中断同工人的联系，但游击战道路的结果是，导致了他脱离了城市。这是苦恼的，但也是必需的。最终，他们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防守。他们把农民吸引到了自己的一边，并武装了他们，开展农业革命，壮大自己的军队，并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避免一些损失，这种损失是游击战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游击队解放区呢？它仍然是国家中的孤岛，在这些地区没有后方，它会被包围和封锁；它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事情就是这样。延安被包围了，而中国共产党离开了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而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决定转移到东北的话。在转入东北以后，他们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状况，获得了以友好国家为代表的后方。现在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孤岛了，而像是一部分深入到苏联的半岛。在此之后，蒋介石不再有机会包围中国的游击队。而只有在中国同志得到休整之后，他们才得到了自北向南发动进攻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非常有益于革命。在此方面，中国人对革命的实践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当然，在农民占80%—90%的国家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牢记这种斗争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从中国同志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解放区进行的游击战争有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于，游击区总是很容易被包围。要想克服这种包围并取得胜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为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还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游击战没有拥有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如果游击战有可以依靠的友好邻国，那么一定会取得胜利。非常典型的是，在向东北转移之前，中国同志不愿发动进攻，他们害怕被包围，只是在转移到东北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动进攻，并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游击战争的缺陷应该被考虑到。你们经常说，要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游击战就足够了。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条件要比印度有利。中国已经培养了人民解放军。而你们没有培养军队。中国没有像印度这样密集的铁路网，这对中国的游击队是非常有利的。相比中国，你们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机会要小一些。工业方面，印度比中国发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是，从游击战的角度来说就不好了。无论你们建立什么样的队伍，建立什么样的解放区，都将会被孤立。你们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

阿富汗、伊朗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到达的西藏，都不是像苏联这样的后方。缅甸？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只有陆上边界，而其余国家都只有海上边界。因此，应该寻找出路。

需要游击战争吗？当然需要。

你们是否会有解放区和解放军？

你们将会有这样的解放区，也可能会有解放军。但要取得胜利这还不够。应该把游击战同工人的革命进攻结合起来。不这样，单凭游击战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如果印度同志能够组织大规模的铁路罢工，那么这会对政府和国家生活产生影响，会对游击战争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以农民为例，如果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游击战争，有了它就有了一切，那么农民们就会问：为什么你们把斗争的重担仅放在我们农民身上呢？工人们将会做什么呢？把革命的重担仅放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明白，所有的罪恶都来自城市——税收等等。他们希望在城市中有盟友。

如果对他们说，他们将同工人们一起斗争，他们将会明白并接受这一点。在我们俄国也是这样。你们不应该只在农民中开展斗争，不应该只建立游击队，还应该在工人中开展大量的工作，获得他们的信任，赢得工人中的多数，你们也需要在工人中建立武装力量，培训准备罢工的工人、铁路工人，在城市中建立工人队伍。

只有把这两股力量汇聚起来，才可以认为胜利是有保证的。你们知道，在1905年的俄国，沙皇向人民做出了让步，建立了杜马，给予了一系列其他的自由。沙皇是被迫让步的。

什么使沙皇这么恐惧？是铁路罢工！首都同国家的其他部分被隔绝了，铁路工人只允许工人代表进入圣彼得堡，既不允许商人，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

铁路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这也对游击队产生帮助。

然后在卫队中、在士兵中开展工作。1917年，整个卫队都站在了我们一边，而在此之前我们向士兵们进行了宣传。

以什么来武装士兵呢？关于土地的问题。

土地是这样一种重要的武器，如果反对它即使哈萨克——沙皇的近卫军也不能坚守得住。如果推行了正确的政策，那么就可以撒播革命的情绪，并在反动的势力中引起分歧。

中国的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对印度人来说是不够的，印度需要把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一些人认为，中国同志反对这样的结合。这是不对的。

如果上海的工人们罢工了，或者在进攻南京的时候，军工厂的工人们罢工了，难道毛泽东不高兴吗？当然，不会的。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毛泽东同城市失去了联系。如果铁路工人罢工了，蒋介石不能取得弹药，那么毛泽东是会高兴的。但是，缺乏同工人的联系，这是悲哀的，也是必需的，但不是理想的。如果你们取得了中国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把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那么这样就理想了。

丹吉：我们几乎把没有工人参加的游击战争转变成了一种理论。

斯大林同志：如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一点，他会咒骂你们的(笑声)。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能否把尼赫鲁政府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就像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就像把现在的普列文(保加利亚城市，某州首府)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

在我看来，当蒋介石在中国还有基础的时候，不能认为他是傀儡。当他转入福摩萨的时候，他就成了傀儡。我不能把尼赫鲁政府看作傀儡。他在人民中仍然有自己的基础。这不是保大政府，保大确实是傀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能把游击战看作是印度主要的斗争形式，或许应该说，是最高的斗争形式。在走向最高的斗争形式中有各种斗争形式。农民的斗争形式：抵制地主，农业工人罢工，拒绝佃户的工作，同地主进行个别的冲突，夺取地主的土地，然后把游击战作为最高的斗争形式。工人的斗争形式也一样：地方性的罢工，行业性的罢工，政治性的罢工，举行政治总罢工，把其作为起义的前夜，然后举行武装起义，把其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战是国内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下论断也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内战争正处于高潮。这是不正确

的，现在还没有国内革命的高潮。在特伦嘉(Теленган)人民夺取了土地，但这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这只是进行公开斗争的开端，但不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对此印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当在如下一些小的问题上教导农民进行斗争：减少租金，减少要交付给地主的粮食税，等等。应当在这些不太重大的问题上教育干部，而不要马上就谈论进行武装斗争。如果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那么你们将会出现重大的困难，因为你们的党是弱小的。

要使党的力量强大，在需要的方面开展群众斗争，而有时还要抑制群众。1917年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在陆军、海军中有许多同情者，我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苏维埃。但是我们制止了举行工人起义的决议。有人提出了赶走临时政府的要求。但这当时还不在于我们的计划中，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7月，有4—5万名工人的布吉罗夫斯基工厂的工人开始游行，海员、士兵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并前往中央大楼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制止了他们，因为还没有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大规模的起义。出现了起义的客观因素——当时群众在向前冲，但还没有举行起义的客观因素——党还没有准备好。

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我们在9月一个月内在提了出来。决定举行起义，但这是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当时政治局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报刊发表了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声明，他们认为这是在冒险。列宁宣布他们是叛徒，并且说，他们成了我们敌人的俘虏。因此，关于举行武装起义是不能批评的，起义是非常突然的。

拉奥同志会说，让我们向人民发表演说，询问他们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是不能这样做的，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计划，你们所有人都会被逮捕的。允许我假设一下，农民们会说：好，应该起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跟着人民走，拍人民的马屁。领导人就是要使人们跟随自己。人民有时候会说，他准备举行起义，他考虑的只是本地区的事实和事态，而不是从全国举行起义的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虑。中央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

印度同志：是的，明白了。

斯大林同志：你们问道，对于被怀疑背叛的党员，党组织能否宣判死刑。

不能。列宁总是教导说，中央能够做出的最高的惩罚形式就是开除出党，但如果党掌握了政权，某一党员违背了革命的纪律，那么政府可以追究其责任。从你们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同志们经常倾向于对敌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如果你们向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询问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对你们说，在我们的党中，总是以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如果人民自己开展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同地主进行的冲突中杀死了地主，那么我们不认为这是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在这一冲突中参与的是群众。如果为了杀死地主，党组织自己组织了恐怖小组，并且没有群众的参与，那么我们通常是反对的，正如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一样。在群众消极的情况下，个别恐怖分子的这种激进的行为会扼杀群众的独立精神，会使群众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对此人民会这样认为——我们不必行动，有英雄为我们代劳。因此，存在英雄的时候，另一方面就存在不参与斗争的群众。从培养和组织群众积极分子的角度来说，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俄国就曾存在这样的党——社会革命党，这个党有特别的队伍，对一些主要的部长实施恐怖行为。我们一直反对这个党。他们在群众中丧失了任何威信，我们反对英雄主义理论和群众主义理论。

你们也许会问，现在应该怎样提出关于印度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在现阶段你们不应该提出这一要求。不能一方面提出划分地主土地的要求，同时说，土地应该转交国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从来都没有宣布过土地国有化，更不要说在中国了。人民民主国家是怎样做的呢？这些国家都禁止买卖土地。这就是对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只有国家才能拥有土地。禁止私人购置土地。现在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对你们不利。

你们中的一些同志现在认为，印度正在进行内战。关于这一点言之尚早。你们正在酝酿内战的条件，但这种条件还尚未成熟。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有了纲领，或者说有了行动纲领就好了。当然，你们会有分歧。我们也曾有分歧，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由多数人决定，这

是不变的法则。即使那些不同意多数决定的同志，也要认真地执行决议，因为党应该有统一的意志。你们都愿意进行讨论。在和平时期这是允许的，但在你们那里，革命的局势正在加剧，你们不能讲究这些。何况你们的党员数量是如此的少，你们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会使群众误入歧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03—1912年期间公开进行了讨论，因为这在沙皇的条件下是允许的，以便驱逐出孟什维克，当时我们制定了分裂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内有敌人。我们在1912年驱逐了孟什维克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摆脱了孟什维克的党，党成了纯洁的党。当时也存在分歧，但是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问题，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大家都开始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托洛茨基使党陷入了我们不愿意进行的一场讨论，但不得不进行这场讨论，因为托洛茨基挑衅性地断言，党不愿意进行讨论是由于党害怕真理。我们进行了讨论，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在这场讨论中，反对托洛茨基的是整个党。如果党在某种程度上纯洁了，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那么该党就不需要进行讨论了。讨论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大多数人的决定就是法则。

高士：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了。

斯大林同志问道，在印度共产党内是否有关于共产党同情者的组织？

拉奥、丹吉：没有，我们只有党员。

斯大林同志：我们党有560万党员和80万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愿意入党的人，我们在其入党之前，对其进行考验。对一些人的考验要进行4年、5年，并对其进行教导。许多人希望入党，但他们首先要经受考验，其次，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其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必需的，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接受其入党。在我们的实践中，这种候补党员的制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党的周围我们有共产党同情者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也不应使党过度增加新党员，不应过度扩充党。关键的是提高已被接收入党的人员的素质，而不是党员的数量。

你们也问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开始游击战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击战争没有大的意义。游击战在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在落后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很难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有许多大城市，发达的铁路网和工业区，在这种条件下，游击队很快就会

失败。要让人民群众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把英雄视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以便使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对敌人。但是，不应该只是指望游击战争。当然，游击战会有所帮助，但是游击战本身也需要帮助。应该在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开展更多的工作。如果在工人中间存在武装，那么在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夺取政府机关。我们在列宁格勒曾建立了工人近卫军，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夺取了冬宫。我们的农民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总之，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农民最忠实于工人阶级。应当把两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工人游行。

你们记得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印尼有很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他们受到挑唆，过早地发动了起义。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优秀的、勇敢的人，但是被挑唆起来（发动了起义），并且牺牲了。

你们最好有纲领或者行动纲领。把这一纲领或农业革命的纲领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你们也向我询问关于尼赫鲁对外政策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游戏和手腕，他企图显示，好像他们是反对美国的政策的。事实上，尼赫鲁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游戏。

拉奥、丹吉、高士和布尼亚同志对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表示了感谢，并说，他们将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自己的整个活动重新进行审议，并将根据这些指示行动。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向你们做出任何指示，我所说的只是建议，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你们也可以不接受这些建议。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

В．格里戈良记录

1951年2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0，л．71-86

**№0038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空军顾问来华
(1951年2月12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13日20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中国政府正在组建航空兵的一个军，将用以参加当前的朝鲜战役。为了帮助计划和领导该军的战斗行动，请您向中国派出以下顾问人员：

- 一、航空军司令员顾问1人
- 二、军参谋长顾问1人
- 三、作战处处长顾问1人
- 四、情报处处长顾问1人
- 五、机械工程师顾问1人
- 六、专用设备和无线电工程师顾问1人
- 七、军械工程师顾问1人
- 八、野战修理工程师顾问1人
- 九、军后勤部长顾问1人
- 十、后勤参谋长顾问1人
- 十一、专用汽车部主任顾问1人
- 十二、技术处处长顾问1人
- 十三、地面导航站主任顾问1人
- 十四、地面导航设备主任顾问1人
- 十五、通信处处长顾问1人

共15人，切盼顾问人员于1951年2月底抵达中国。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1年2月12日

第75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58-59

**№00385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派遣空军顾问去中国
(1951年2月16日)**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您关于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的请求将予以满足。我认为，给您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是合适的。将由扎哈罗夫大将手下的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总司令的顾问。

其余顾问的名单将随后告知。

菲利波夫

1951年2月16日

第635037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60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26

**№00386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的
问题(1951年2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兹报告如下：

一、您1951年2月16日关于为友军空军指派顾问问题的电报，已于今年2月17日当地时间19时30分面交周恩来。

二、周恩来告知，将要组建的空军指挥机关，同时也将是中朝前线空军的联合司令部。

扎哈罗夫

1951年2月17日

第830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61

№133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在苏联科学院实习(1951年2月21日)

摘自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21日

第325项 关于接受中国学者来苏联科学院实习的问题。

1.批准苏联科学院接受中国科学工作者来实习。来苏联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人员情况如下：米丘林生物学——2人，冶金学——1人，农艺学——1人。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催化剂化学研究所的有1人。

2.委托苏联科学院(托普奇耶夫同志)，在与苏联外交部协商一致之后，就同意接受上述第一条中指明的中国学者来实习答复中国科学院。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64

№0038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购买航空技术装备等问题(1951年2月23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24日19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1951年4月初，中国空军将以10个航空团(4个米格15歼击机团、1个拉11歼击机团、3个图2轰炸机团、2个伊尔10强击机团)参加朝鲜的军事行动。

为了对这10个航空团及各坦克团和汽车团实施战斗保障以及为了保障1951年上半年空军部队的战斗训练和现有6个航校飞行员的培训，特请允许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购买航空技术装备、弹药和燃滑油料。

为对10个航空团实施战斗保障，需购：

一、米格15飞机5架、PД15Φ发动机44台、AШ82ΦH9/16发动机28台、AM42 24发动机24台。

二、弹药：图2航空团弹药基数32个、米格15航空团弹药基数240个、拉11航空团弹药基数60个、伊尔10航空团弹药基数20个。26毫米信号弹：红光8800发、绿光4400发、黄光4400发、白光4400发；米格15飞机用电击发动机心座5000个；ППВ-17电点火管360个；发烟罐：黑烟2600个、白烟500个、橙黄烟2600个。

三、专用汽车：K3-200汽车44辆、M3-51汽车20辆、加油车66辆、C-80拖拉机20辆、AΠM-90探照灯车1辆、MΠCЛ燃滑油料化验车10辆、消防车8辆、ΠAPM-1野战航空修理车5辆、ΠAPM4野战航空修理车4辆、ΠAPM-10野战航空修理车1辆；AKC-2航空空气压缩车12辆、AKДC-12制氧车6辆、AK3C-40充氧车6辆；A3C-4加油车6辆、油泵汽车10辆。

四、通信器材：航空照相电台10个；轰炸指挥电台10个；雷达6部；Л6-/3滑座10个、Л-3/2滑座10个；航空照相电台和轰炸指挥电台用无线电电子管各10套、雷达用43A无线电电子管6套。

五、燃滑油料：T-1航空煤油，3月提供10000吨，4月提供20000吨；B 95/130航空煤油，3月提供60000吨，4月提供60000吨；B 70航空煤油，3月提供1000吨；P9石油产品10吨；MC-20石油产品，3月提供340吨，4月提供200吨；变压器油14.4吨；HK-50变压器油，3月提供5吨，4月提供5吨；HK-30变压器油，3月提供5吨，4月提供5吨；59润滑油1吨；ГОИ-54润滑油4吨；工业用凡士林5吨；甘油酯8吨；ГМЦ-2滑油0.5吨；骨髓油0.2吨；硬脂酸14公斤；枪油4吨；碱4吨；锭子油2吨。

为坦克团和汽车运输需提供：

4月1日前，汽车汽油10000吨、汽车滑油500吨、黑机油100吨、黄

油120吨、制动液200吨、柴油130吨。

为保障1951年上半年部队的战斗训练和飞行员的培训，需提供：

雅克11飞机12架、雅克18飞机28架、图2教练机3架、图2轰炸教练机3架、图2飞机10架；PД10-A发动机20台、M11ΦP发动机40台、AИИ-21发动机40台。飞机全套起落架主支柱和前支柱：米格15型2套、雅克17型2套。飞机起落架缓冲支柱备件：拉11型6套、图2型10套、伊尔10型12套、雅克11型25套、雅克18型25套。

飞机尾轮缓冲支柱：拉11型4套、图2型10套、雅克10型7套、雅克18型10套。

飞机减速板筒、着陆襟翼筒、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米格15型20套、雅克17型6套。

飞机起落架收放动作筒、尾轮动作筒、襟翼动作筒：拉11型4套、图2型5套、伊尔11型15套、雅克18型15套。

飞机起落架和着陆襟翼收放开关：米格15型20套、拉11型4套、伊尔10型10套、雅克17型10套。

图2飞机起落架、着陆襟翼、炸弹舱门操纵台4套；起落架、着陆襟翼、制动系统收放软管：米格15型50套、拉11型10套、伊尔10型30套、雅克17型12套。

图-2飞机起落架侧支柱10套，伊尔-10飞机起落架可折支柱10套。图-2飞机液压系统单向活门10套，ПУ-7活门40个，ПУ-8活门40个，П6活门和ПУ-1活门50个。

ПУ-7和ПУ-8活门橡皮膜50套。图-2飞机ПН-1增压泵5个。

图-2飞机连通开关12个，图-2飞机滑油散热器10个，液压蓄压器振动膜25个，图-2飞机炸弹舱门5套，图-2飞机起落架和尾轮液压收放动作筒15套，图-2飞机发动机舱5套。

米格-15飞机起动板15套，液压蓄压器20个，ГА-13电动起动机20台，自动卸荷活门20个，APT-1燃料分配器15个，ПН-2Φ高压燃油泵25个，ПН-3Φ高压燃油泵25个，CT-2电动起动机15台，滑油滤芯15个，

带M-102电动机的起动泵10个，燃油软管50个。

米格-15飞机副煤油箱3600个，米格15飞机2号和3号煤油箱15套，雅克-17飞机2号和3号煤油箱6套，伊尔-10飞机水散热器10个，伊尔-10飞机蛇形油管10套，伊尔-10飞机起落架轮盘和开关橡皮阀50套。

汽油箱：拉11型5套、图-2型10套、雅克-10型15套、伊尔-10型3套。

飞机滑油箱：拉11型6个、图-2轰炸教练机型20个。

飞机螺旋桨及螺旋桨盘：图-2型10个、雅克-11型40个、图-2轰炸教练机型30个。

空气螺旋桨：AB-5-167型15个、AB-5Л-124型10个、ВИШ-111В-20型30个、В-501Д-81型30个。用于В-501Д-81桨壳的滚柱轴承和滚珠轴承100套。雅克-11飞机发动机整流罩和整流环5套及头罩百叶窗5套。雅克-11飞机发动机架10个，雅克-18飞机发动机架5个。

起落架轮：660×160型30套、800×260型20套、400×150型20套、1100×395型20套、600×180型25套、500×150型25套、570×140型12套、255×110型15套、200×80型40套、530×230型10套。

外胎和内胎：660×160型400套、800×260型50套、1100×395型40套、530×230型40套、400×150型50套、600×180型200套、255×110型60套、500×150型200套、570×140型30套。

发动机成套备件：M11ΦP1发动机10套、AIII21发动机10套。飞机用电嘴：AC-170型2000个、AC130型4000个。拉-11、雅克-18、雅克-11飞机用发动机三针指示器各40个。

12A-5蓄电池型60个，12-A-10蓄电池50个。

ГСН-3000发电机10台，ГСК-1500发电机40台，ГС-10-350-M发电机20台。

飞机专用设备检测仪器5套。飞机用电气设备、领航仪表和无线电：米格15型10套、拉-11型4套、图-2型10套、伊尔-10型10套、雅

克-11型10套、雅克-18型10套。

请将上述航空物资器材于1951年4月1日前送抵中国。

除上述物资外，关于其他必需的航空技术物资和备件申请单，用航邮寄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2月2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7 , л.62 65

№00388 罗申致苏联外交部等部门电：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比价问题(1951年2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财政部、苏联国家银行：

近几个月来，由于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和一系列其他原因，导致美元购买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一方面人民币坚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4次降低美元汇率。1950年12月19日，美元购入价是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12月26日兑换27360元，1951年1月5日兑换24900元，1月20日兑换22890元。

因为卢布和人民币的汇价是按美元计算的，那么，美元汇率的降低将自动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12月19日，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12月26日为6850元，1月5日为6230元，1月20日为5720元。在中国，美元汇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卢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也进一步降低。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的含金量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现1两(合31.25克)黄金的价格：在北京、天津、上海是95万元人民币；在广州、汉口、西安和重庆是100万元。

据现有消息，这个价格是人民银行按含纯金98%的纯金锭确定的。

1951年2月15日，黑市金价：北京为133万元人民币，天津为134万元，上海为137万元，汉口为116万元，广州为111.2万元，重庆为108万元，西安为132万元。1951年1—2月间，上述城市黑市黄金价格的波动不超过10%。

中国东北不同于其他地区，那里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1951年2月初，沈阳黄金价格每两(合35克)约合东北币1700万元。

据苏联国家银行黄金买入价(4.45卢布购1克黄金)和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买入价，卢布同人民币的比价按北京、天津、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买入价计算是6830元人民币兑换1卢布，而按上述7个城市人民银行黄金平均买入价计算是7030元人民币兑换1卢布。如果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根据苏联国家银行黄金买入价和1951年2月15日每两黄金124.45万元人民币的中国黑市平均价格，则这个比价将超过8900元兑换1卢布。

因此，很显然，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大约低20%。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价的降低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且不说它将导致苏联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实际工资的下降，还需要给苏联驻中国的机构的其他开支追加卢布拨款。顺便说一句，我注意到，在我与各人民民主国家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卢布在中国与美元挂钩和随美元下跌而表示不解。

考虑到上述情况，并同时注意到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中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卢布结算这个情况，我们认为，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按照中苏之间已缔结的非贸易付款结算协议，同中国人民银行就确定的、不受美元波动影响的、按黄金价格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比价进行谈判是合适的。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我。

H.罗申

1951年2月24日

№133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工会理事会工作小组前往中国(1951年2月2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2月17日

第386项 关于派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前往中国的决定。

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决定派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于今年3月前往中国。小组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М.Е.叶夫斯特拉托夫(小组负责人)、И.С.祖布里林、В.В.库什涅鲁克和А.С.谢苗诺夫，以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期限为3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7, л.78

№09097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综述报告：关于1951年2月前的战争情况 [73] (1951年3月 [74])

从9月25日至10月5日期间，美国侵略者集中其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兵力，不顾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平壤及东海岸许多其他大城市，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方向挺进，直接威胁到中国安宁市。

人民军后撤，在清川江西北地区重新布防，于10月底制止了敌人的进攻。

在此期间，战斗主要在两个战役方向展开——西北方向(沿鸭绿江，在中朝边界接壤地)和北部方向(沿东海岸，在咸兴以北地区)。

西北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这一地带交通网络发达，直接通向中国东北的沈阳地区。美国侵略者的主要打击方向是中国东北——整个中国

的工业基地。

对中国领土的直接威胁震惊了中国人民。中国公民表示愿意援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绝不许把侵略扩大到中国领土。中国公民开始自愿报名加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第4阶段。朝鲜人民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下，在安州西北和咸兴以北地区经过激烈的防御战斗，制止住了美国侵略者的推进，并从11月20日起，对敌人实施了有力的反突击。

二、对1950年11月25日至1951年2月1日军事行动的概述

在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实施防御战期间(10月28至11月8日)，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反突击，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部队从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地区赶向南方。同时，在10月25日至11月17日消灭和俘虏敌军官兵16000人。缴获了500门各种型号大炮、500辆汽车、269挺轻重机枪和其他战利品。

这一反突击是人民军斗争的转折点。这是因为：

第一，美国侵略者尽管实施了残酷的进攻，但仍未能如愿夺取进入中国领土的桥头堡。

第二，朝鲜人民军保住了两江之间的地区，把它作为前线，后来成了转入全面反攻的出发阵地。

因行动失败而恼羞成怒的军事冒险家麦克阿瑟害怕漫长的冬季作战，不顾夺取两江中间地带和向鸭绿江推进时的惨重牺牲，于11月24日下达了所谓在朝鲜发起“总进攻”的命令，企图一举歼灭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出到整个中朝边界，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并答应届时让美国士兵回家。

进攻同时在两个隔绝的战役方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上展开。

在宽达100公里的西北战线上，在安州德川基地集中了美第八集团军，编成是美第二、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一个英国独立步兵旅；一个土耳其步兵旅；3个李承晚师。总兵力近10万人。

东北战役方向集中了美第十军，编成有美国第七步兵师，一个海军

陆战师；一个英国步兵旅；李承晚第三步兵师，一个警备师和另外两个步兵师。总兵力9万人。

由于北朝鲜多山，敌人在这一地段未配置密集队形，每一个师都在独立的方向上作战，与友邻部队保持着战术上的联系。

在西北战役方向，第八集团军的作战企图主要是：通过从安州—德川地区实施集中突击，合围和消灭同其对峙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兵团。

第二天午后，也就是临近1950年11月25日时，美军在左翼前进了20公里，在右翼前进了10公里。战线西段前出到元兴、新高道、云山、泰川、定州一线。

敌在东段战线前出到咸兴、赴战岭、长津水库一线。

人民军和志愿军以反击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到11月25日结束时，这次反击保障了人民军和志愿军对美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与李承晚军(第七师和第八师)之间的接合部实施强行突击。

11月25日反击持续了一夜，到次日凌晨，李承晚第七和第八师的阵地被攻陷，这两个师遭受了重创，从清川江被赶出25公里，于是美第八集团军右翼的第二十五步兵师之右翼暴露出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攻击集团冲入缺口，于11月27日早晨给第八集团军造成了实际威胁。人民军和志愿军第二攻击集团也加入了追击，向元山东南方向猛攻，与活跃在元山西南地区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进行了紧密的协同作战，因此完全破坏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的协同动作和联系。这样，到11月27日，敌人的整个战线崩溃了，其部队开始仓皇南逃。

第5阶段。人民军和志愿军利用反突击的战术成果，转入了全面反攻，后来又发展成了对敌人的战役追击。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为了保障自己部队从清川江西岸撤退，企图对人民军和志愿军实施反击，但由于第二步兵师、第二十七步兵旅和土耳其旅部队遭受重创，于是又往南遁逃。人民军和志愿军在追击敌人过程中，重创了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师，英澳第二十七独立

步兵旅，几乎全歼土耳其步兵“志愿”独立旅。在德川以南，合围并几乎全歼第二十五步兵师一个团，其中一个连115人全部被俘(中国指挥部做过相应工作后又将他们放回)。

与此同时，在东北方向，美第十军和第二十军部队在11月28日之前仍在继续北进，前出到了罗南、赴战岭地区。11月28日，供给美第十军和第二十军的路上交通线全被切断，这些部队开始靠空投和海运供给给养。在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打击下，东线第十和第二十军部队从11月28日起开始向咸兴惊慌逃窜，而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七步兵师在长津水库被围，大部分被歼。

仅11月25日至12月1日，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毙、伤和俘虏敌之官兵23700多人，缴获21门大炮、464挺轻重机枪、55辆坦克、1架飞机、4700支步枪、1953辆汽车以及其他装备和弹药。解放了许多城镇。

突击实施得如此勇猛，以致敌人都未曾企图控制一些中间地带。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先遣部队在追击敌人过程中，于12月6日突进平壤，于14时平壤完全解放。

与此同时，在东线，歼灭被围之敌的战斗和肃清罗南等地区敌人的战斗也在进行。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敌之部队，害怕完全被围，惊慌向咸兴地区败退，从长津地区突围出来的敌人也退到这里。

从12月12日开始，在咸兴地区，歼灭此处之敌(将近5个师)的战斗打响。敌人放弃了咸兴，将部队集中到日本海海岸，在飞机和军舰炮火的掩护下，通过海路开始把部队向南朝鲜各港口疏散。至12月24日，部队撤退完毕。

这样，至12月24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遣部队前出到三八线，北朝鲜领土上的敌人全部被肃清。

敌人利用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部队前进距离拉得过长，到12月底站住了脚跟，沿三八线从临津江口至东海岸建起了防御。战斗队形分两个梯队，在第一梯队，建立防御的是.....部队 [75]，其右翼是美军第3步兵师部队，第二梯队是第八集团军。

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主力12月6日至16日集中在平壤地区，而部分

部队开始向三八线挺进.....

12月31日17时，部队在全线转入进攻，日终时，在许多地段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开始以每昼夜15公里的速度向南挺进。为发展右翼战果，人民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前出到汉城东南。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从正面进入汉城。1月5日，敌人向南撤退，在右翼固守江陵地区。

人民军和志愿军部队追击敌人，到1月15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南诸多城市和村镇，前出到水原、云山、利川、江陵一线。右翼推进了130公里，左翼推进了110公里。

人民军和志愿军主力1月21日前集中于：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的兵力，集中在原州、横城、洪川等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军，朝鲜人民军的第一军团，集中在加平、汉城、仁川和水原地区。

从1月17日起，敌人开始积极行动，到1951年1月30日，强劲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水原、利川，在东海岸前出到三八线的大斗里地区。在这些地区，1月30日和31日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在消灭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敌人后方的游击队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通往汉城的西北和南方的交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白天通过需有重兵护送，晚上几乎已停止通行。

朝鲜游击队主要在大邱金泉南浦地区行动。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积极行动迫使美军指挥部派出有限的预备队，主要是雇佣军和李承晚分子应付游击队。第十一步兵师主要用来保卫交通线，防止游击队破坏。

为制止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进攻和挽救自己的残余部队，麦克阿瑟昼夜使用自己的远东航空兵，对人民军的战斗队形和交通线进行袭击，每天多达几百架次，然而这并未挽救侵略者被歼的命运。

敌军编成(2月1日)

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美第八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第一、第九、第十步兵师)。

第一军的编成是：

南朝鲜第一步兵师(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步兵团)；

美第一骑兵师(第五、第七、第八骑兵团)；

美第二十四步兵师(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三十四、第五步兵团)；

美第二十七步兵旅。

第九军的编成是：

美第二步兵师(第九、第.....、第八步兵团)；

美第二十登陆师(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步兵团)。

第十军的编成是：

美第一海军陆战师(第五、第七、第十一步兵团)；

美第七步兵师(第十七、第.....步兵团)；

美第八步兵师(第七、第十五、第三十五步兵团)；

美第十一空降师(第一三八、第五一一空降团)；

英第二十步兵旅。

.....

ЦАМО РФ, ф.20571, оп.174045СС, д.16, л.73-77

№25966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关于香港的简要情况(1951年3月)

机密

1951年3月__日

第__号/第一远东司

香港

(简报)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坐落在中国的东南海岸。殖民地的核心是香港岛(82平方公里)，它位于距广州东南144公里的深圳河口附近。属于殖民地的有：被一条狭窄的海峡与香港隔开的九龙半岛，以及位于九龙北部的一块不太大的领土及其附属岛屿，包括蓝岛(Ланьдао)、米尔斯湾和深圳湾水域(即所谓的“新界”，面积925平方公里，是中国长期租借给英国的)。

殖民地香港的领土面积总共为1013平方公里，人口185.7万人，其中99%为华人。

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是位于香港岛北岸的香港或维多利亚(50万人口)。维多利亚的对面是九龙(40万人口)，中间隔着一个海峡。

香港是英国在西太平洋最为重要的贸易和军事航运基地，在从欧洲、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到远东各国的航线中占有极为有利的贸易和战略地位。

1841年1月，在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被英国人占领。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在上述条约第三条中说：中国割让香港岛归英国永久使用，以使英国人拥有自己的港口，供船舶停靠和修缮之用。

1843年4月5日，香港被正式宣布为“英国的殖民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国得到九龙湾的“永久使用权”。在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英中条约第六条中说，中国同意把九龙湾让给英国，以便维护香港及其近郊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在英国吞并了“新界”后，殖民地扩展到了现今的界址。根据1898年6月9日签订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说，为了保护和守卫殖民地香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在租赁原则的基础上拓展香港的领土。该条约附录地图记载了领土租赁的面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1941年12月25日)，直到在1945年8月30日才被英国人收回。

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正式提出关于把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问题。例如，在1943年1月11日在签订英中条约涉及豁免治外法权问题

时，中国政府提出把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迫切要求遭到英国拒绝。有鉴于此，在条约签订那天，中国政府在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保留将来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1943年8月，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伦敦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个要求，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1943年9月7日，华盛顿中央通讯社记者报道：“9月4日，英国驻华盛顿外交代表表示，英国不准备讨论自己的租界和殖民地的未来命运问题，例如香港问题。”

1943年8—9月，中国报纸广泛开展了关于香港和九龙回归中国的运动。

1947—1948年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开展反美和反英游行示威期间，中国的大学生们提出了使香港和九龙归还中国的要求。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临近广东和殖民地香港的边界，英国人开始越来越担心这一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殖民地的命运。英国政府开始匆忙巩固香港的防务能力，扩充那里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香港守卫部队人数达到4万人。

香港当局加强了对在香港华人居民的监督和镇压。1950年4月28日，法新社香港记者报道说，香港总督“已下达了从5月1日起废止入境香港的一切法规的命令。这样，也就废止了英中条约中关于允许中国公民在英国这一殖民地自由进入和活动的內容。从5月1日起，所有没有进入香港的中国居民都将依据为外国人设定的通用法律对待”。

1950年5月3日，香港总督宣布这一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据法国电台报道，“该命令赋予当局全权，有权禁止旨在组织总罢工或制造骚乱的各种性质的集会”。

还应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香港当局在转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投诚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70架运输机的问题上持不友好态度。

此外，在1950年8月和12月，香港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大规模降低向中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决定。目前，美国在迫使英国完全停

止同中国的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暂时没有正式提出香港和九龙的归还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在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代办希巴耶夫会谈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不急于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为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

近来，美国加强了在香港的活动，打算利用香港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和从事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的间谍基地。

1950年1月，在从中国召回自己的外交代表后，美国向香港派遣了大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特工，香港成为美国从事反华秘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美国在香港建立了各种情报机构，均由美国职业特工领导。

除了美国特工外，在香港还有英国的、国民党的和美国国民党的特工；这些特工所从事的一切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都是事先得到准许的。

据通讯社记者1950年3月17日从西贡发回的消息，“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从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这些人都是设在香港的英美国国民党联合司令部派遣的和相互沟通过的。各类公司和传教士都被利用从事间谍活动”。

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调遣外国军队进入朝鲜的中转站。

香港的主要工业是船舶制造、纺织工业、金属加工、水泥生产，以及捕鱼业。

1949年中国通过这个港口的商品出口额达到59.35亿港币(占香港出口总额的21.6%)，而进口额——58.46亿港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25.2%)。1950年1—11月，出口额仅为76.04亿港币(占香港出口总额的19.5%)，而进口额——128.38亿港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38.6%)。1949年香港自身的进出口总额为51亿港币，而在1950年1—11月就达到67亿港币。

香港进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大米、糖、棉花、棉纺织品和棉线、机

器、钢、铁、电子产品、化学制品、橡胶等。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专员

H.马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п.338, д.147, л.1-7

№003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准备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1951年3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3月2日2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来京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确定的一些意见告知您。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军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占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了其中的60%—70%，而其余30%—40%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重新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10个军(计30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由中国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3个军(将于最近得到补充，其中2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9个军(27个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4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6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6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4个军，共计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6月左右用于前线。

鉴于第三番志愿部队10个军中有4个军在5个月过程中已参加作战，需作休整，因此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抵达前线之后，这4个军将调到平壤和元山地区休整，并在此地负责完成沿海地带的防御任务。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其余2个军将撤回中国休整。

中国志愿军在前4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10万多人。为了弥补此一损失，需要用12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30万人。因此，还需要有30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至于朝鲜人民军，彭德怀同志已根据您的建议，提请金日成同志将现有的8个军团缩编为6个军团。每个军团宜编3个满员师，每师为10000人，此外，还要组建5个警备旅，用以防守沿海地带和主要城市。

金日成同志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因此，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也可采用轮番作战的方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三、1—2月份的作战经验表明，当我3个军在汉江以北地区因损失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休整时，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此，我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而不能发动胜利的进攻，而当敌人派来援兵时，我又无法同其进行对抗。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向南推进，交通线也就日益延长，供给上的困难也就不断增大，我被迫留下部队以警卫后方。因此，如不大量歼敌，如无空军掩护，那么，当敌过早地被压向南方时，我们将难以各个歼敌。目前的形势是：在第二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9个军于4月上旬抵达前线之前，陆军方面的优势将在敌人那边，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战役进攻。我们必须使用从第一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4个军团，在南汉江以北地区实施防御，以迟滞进攻之敌。

但必须考虑到，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利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第二番志愿部队前出至指定地区以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4月15日到6月底)在三八线

地区歼灭美军和伪军部队数支正规部队，约数万人，尔后再向南汉江以南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彭德怀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如果敌人得以重新占领汉城和再次越过三八线，那么这在政治上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风波，对此我们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6月底将又有6—7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4、5月份，我们将可以使10个航空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根据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6000辆汽车。

有无这种可能，盼复。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78-82

№003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联空军入朝问题 (1951年3月3日)

1951年3月4日1时10分收到

1951年3月4日2时38分转交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

我们同意您关于朝鲜未来战役的看法。

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共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1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4座的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

菲利波夫

1951年3月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89

№24803 1 叶罗费耶夫与萧三谈话纪要：芭蕾舞剧《红罂粟花》(1951年3月6日)

该文件节选自萧三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代理主任叶罗费耶夫的谈话记录。1951年3月16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良把这份会谈记录送给了莫洛托夫。3月17日莫洛托夫批示“呈送苏斯洛夫同志”。^[76]

萧三说：“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同志没有到大剧院观看《红罂粟花》这部芭蕾舞剧，因为《红罂粟花》存在一些缺陷。”萧三认为，该部芭蕾舞剧的名称应当改变，应当考虑到中国人对罂粟花的仇恨，它们是制作鸦片的原料。萧三认为，另外给这部芭蕾舞剧起一个名字，比如《红玫瑰》，要好得多。萧三接着说：“芭蕾舞剧表现的是1926年的事件。众所周知，早在1912年中国的男人们就被禁止留辫子了。但是，在舞台上还有一个人留着辫子。我认为，导演不应该为了追求异国情调而忽视历史事实。芭蕾舞剧中的主角是一名女舞蹈演员。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女舞蹈演员就是妓女。即使女舞蹈演员死去了也不能消除我们对如下事实的否定态度：芭蕾舞中的主角是一个妓女。”在会谈中萧三通告说，在中国的舞台上正在上演诸如《俄罗斯问题》、《俄罗斯人》、《马卡尔·杜布拉瓦》等苏联话剧。萧三说，如果解决了在莫斯科上演中国话剧，比如话剧《白毛女》这个问题，那么，这部话剧就可以由格拉西莫夫担任导演，他对中国的戏剧非常了解。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9, л.100-102

№13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播音员来苏工作(1951年3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月12日至3月14日会议第80号记录

1951年3月14日

第489项 关于杨晓云(ЯньСяоЮнь)、容洪(ЖунХун)和黄一中(ХуанИчжун)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工作。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的提议，并批准杨晓云、容洪和黄一中从中国到苏联来担任委员会汉语编辑部的播音员工作。

№24826 帕利古诺夫与新华社驻苏代表会谈纪要：要求 塔斯社提供消息(1951年3月14日)

3月14日接见了中国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李何和邱杜易(ЦюйДуй)同志。

这两名中国记者应我的邀请前来是为了谈妥如下请求：在3月6日的电话通话中他们向我提到了关于向他们提供一些“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塔斯社报道”的请求。

我假装说，在电话中向我提出的请求不完全明确。我说，很有可能的是，中国记者希望得到的正是那些塔斯社转交给莫斯科的报纸，但是由于各种技术原因，首先是由于报纸的版面不够，莫斯科的报纸没有采用的报道。

邱杜易说，她指的是报刊上没有发表，但塔斯社得到的那些信息，这些信息会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向一些单位提供。

邱杜易补充说：“在我们中国出版的这类公报，在北京的塔斯社记者同中国的记者一样可以得到。”邱杜易补充说：“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向塔斯社驻莫斯科分社提供类似有关国外情报的政府公报，塔斯社感到为难的话，我能将不坚持这个问题。”

我同李何和邱杜易临时商定，塔斯社将向他们提供整套发送给莫斯科报纸的关于国外情报的公报，这些情报的数量大概是每日发行的报纸的3个版面。

李何和邱杜易接着请求向他们提供塔斯社每日用英语对华广播的报道。实践中，在两个通讯社的相互关系中的做法是，代表通讯社的记者，要自动把得到的情报的副本电告给其他通讯社。因此我们商定：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向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发送转发给驻中国的塔斯社的电报的副本，以便在一段时期之后再次同中国的记者们进行会面，并

确定，是否应该继续发送这样的副本。

李何和邱杜易也请求我向他们发送塔斯社新闻局向苏联各州报纸发送的文章。但是，当他们得知，这些文章主要是一些关于理论性和历史性的题目的发言之后，他们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请求了。

在后来的谈话中再次谈论了关于学习外语的特点问题，这些谈话没有引起兴趣。中国同志们对我说，他们定期阅读《莫斯科真理》报，并对其进行研究，从中得到的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很少，他们请求我给出一些建议，苏联哪些州的出版物能引起中国记者们的兴趣。我明白，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要限制外国人订购州级的报纸，因此我拒绝给出建议，而只是说，对于苏联各州其余的报纸来说，中国记者们读到的《莫斯科真理》报是一个典型。

塔斯社社长

Н.Г.帕利古诺夫

1951年3月20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9, л.103-104

№0039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增派苏联歼击机师去中国 (1951年3月15日)

北京

致扎哈罗夫转毛泽东或周恩来：

在朝鲜，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在最近将面临几个大的战役。显然，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你们将需要大量的飞机。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即2个中国歼击机师配置在安东地区，以掩护这一地区。但是，现在我们看出，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1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用于那里的战役。

我们希望您不会反对。

菲利波夫

1951年3月1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24

АВ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202

№133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政府任命 张闻天为大使(1951年3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3月16日

第6项 外交部的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同意张闻天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的任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3

№0039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 (1951年3月18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及第1749号电报，均已收到。对您关于将2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转场到朝鲜境内的决定以及关于再派1个大型歼击机航空师到安东以掩护中朝部队的决定，深表感谢。您在1951年3月3日第1462号电报中建议，我们在朝鲜再建4个混凝土跑道机场。我们现已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和朝鲜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完成这一工程。朝鲜同志现有1个钢板跑道机

场。感谢您关于再提供2条钢板跑道的决定。

我们现正在计算需用多少数量的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的铁路桥。最后计算结果将由周恩来同志补充告知您。

关于您已同意于今年下半年再向我们提供的6000辆汽车，其具体品种、名称将由周恩来同志拟定，并通过扎哈罗夫同志告知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3月18日

第1368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7 , л.126-127

№2482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中苏货币汇率问题 (1951年3月22日)

绝密 禁止复印

特别文件

菲利波夫同志：

您在3月4日的电报已经收到。

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汇比率的确定之后，我们提请苏联政府审议如下解释和建议。

1.苏联的卢布同黄金挂了钩，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我们及时提出就中国人民银行元和卢布之间直接确立汇率达成协议的建议，而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因此，到目前为止元和卢布之间仍然没有确定比率。因此，元和卢布比率的确定是通过美元对元的汇率确定的，也即确定的卢布的汇率是美元对元的价值除以4，因为1美元相当于4卢布。

2.现在的问题是：卢布的价值在不断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元的价值基本上是稳定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在升值。然而，相反的是，美元的价值一直在跌。这种状况使我们必须经常调整元和美元的比率。美元汇率的每一次下跌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对元和卢布的比率产生影响。这种临时性的现象是由于目前元和卢布之间还没有确立直接的比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美元对中国人民银行元的汇率被提高了，而不是低估了。换句话说，今后需要降低美元对元的汇率。

3.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元和卢布比率的确定不要通过美元对元的汇率进行，而直接在卢布黄金含量的基础上和中国黄金的价格进行确定。比如，现在北京的黄金价格是95万元一两(31.25克)黄金，也就是一克黄金值3.004万元。因为一卢布值0.222168克黄金，因此一卢布相当于6753.9元。在通过美元的汇率计算卢布汇率的时候，一卢布只相当于5722.5元。

中国商品的价格稳定下来已经一年了。我们会进行货币改革，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元的黄金含量，并且在两国货币黄金含量的基础上确定元和卢布之间直接的比率。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对朝鲜进行战争提供了援助，货币改革暂时还不能推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元的黄金含量之前，元和卢布的比率以卢布的黄金含量为基础和中国的黄金价值为基础来确定比较合适。

4.从两国的必需品的价格来判断，向我们提出的汇率太高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驻哈尔滨的中长铁路管理处苏军对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计算是：一卢布相当于15600东北元。而中国人民银行一元相当于9.5东北元，那么，这样一来，一卢布相当于1640中国人民银行元，这只是卢布汇率的24%(6753.9中国人民银行元)，卢布在黄金价值的基础上被高估了。同时，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中国的黄金价格相对较高，在国际市场上，只低于曼谷或者孟买的黄金价格。

因此，在卢布黄金含量的基础上和在中国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卢布的汇率，在目前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摆脱困境的方法。

如果您同意上述所述原则，请您指派代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1951年3月2日

把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认为，可以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卢布和元汇率的提议以及关于确立这种汇率的程序。我们认为，应该在苏联的金融机构推广这一程序，在对苏联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其中包括在满洲的苏联工作人员的工资的支付中推广这一程序。同时我请求向国家银行下达指示，向中国发送的汇款只用卢布，而不用美元结算，最近就开始实行。

H.罗申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7, л.134-137

№0039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调苏联高炮部队掩护志愿军后方(1951年3月23日)发自北京，1951年3月23日17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经过对用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铁路桥所需高炮部队问题的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告您：

目前中国仅有4个实力相当于高炮团的小型野战高炮师和2个机动混编高炮团，共计有6个团的兵力。

自从我们根据1951年3月15日申请单得到高炮以后，我高炮数量将增加5个混编高炮团。这些高炮将不足以掩护所有重要铁路桥及在朝鲜境内为苏联和中国航空兵修建的6个机场。

为了确保掩护，我们建议：由位于中国境内的安东到定州—安州铁路沿线的铁路桥以及4个供苏联航空兵使用的机场，由苏联高炮部队加以掩护。

对朝鲜境内其余铁路桥和机场的掩护任务，将由中国高炮部队担任。

请您研究我们的意见，并将您的意见告我。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1951年3月23日

第1437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38-139

№133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来 苏参加五一节活动(1951年3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3月24日

第68项 关于邀请国外对苏友好和文化协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的关于邀请外国代表团于今年4—5月来苏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和了解苏联的成就：

.....(2)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团，期限为3个星期。 [77]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14

№1178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朝鲜铁路运输交志愿 军管理(1951年3月25日)

我们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最近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如下意

见，即为正确组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指挥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支持这个意见，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会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即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顺利进行解放战争起见，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我们一般地认为，为朝鲜本身利益着想，最好能建立起中国和朝鲜间的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斯大林

1951年3月25日

转引自《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24页

№00394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海军装备 (1951年3月27日)

发自北京，1951年3月28日14时4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为建立中国人民海军，曾于1950年11月派萧劲光同志赴莫斯科同苏联海军部长商讨中国海军建设问题以及请求在必要设备方面给以援助和解决其他问题。对于苏联海军部在建立和发展中国海军方面坦率提出的正确方向及决定供给中国海军必要设备，深表感谢。

朝鲜战斗行动仍在继续。

所确定的今年的军事贷款已因朝鲜的军事行动完全用于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且，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超过了军事贷款额。对于超过军事贷款的部分，我们将用外贸的方法弥补开支。因此，我们特请苏联政府将萧劲光同志同苏联海军部所确定的向中国海军提供必需设备的计划，从1951年开始分3年完成。

今年请按申请单先拨给：鱼雷快艇、部分岸炮和舰炮、飞行技校用飞机、声呐员练习所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

请研究我的这一请求，并将您对我们的建议的看法告我(如果这一建议不致给苏联海军部为执行向中国海军分批提供物资计划造成困难的

话)。

1951年请领物资如下：鱼雷快艇12艘，加上1950年供货计划所列的18艘。

鱼雷艇所需的弹药和设备：

高压压缩机(带管道和气瓶)5台；

45-36型鱼雷1号工具箱5个；

45-36型鱼雷2号工具箱7个；

转角装定器工具箱5个；

转角装定器备件箱4个；

用以装载45-36型鱼雷的吊环9个；

转角装定器检测台4个；

高压压力表16个；

鱼雷充气接头8个；

定深器检测台3个；

带起重机的鱼雷车4辆；

汽油输油车4辆；

滑油加油车4辆；

45-36型鱼雷20条；

击发雷管300个；

电发雷管300个；

“高尔姆萨”定装弹250发。

教练飞机：

- 1.图-2型轰炸教练机4架；
- 2.图-2型4架；
- 3.雅克-18型4架；
- 4.伊尔-2型2架。

飞机备件：

雅克-18型飞机发动机4台；

雅克-18型飞机螺旋桨4个；

图-2轰炸教练机发动机4台；

图-2轰炸教练机螺旋桨6个；

图-2型飞机发动机8台；

图-2型飞机螺旋桨10个；

图-2型飞机第二次操纵吊盘2个以及保障飞行技校工作所需的航空仪表、飞机备件各教学设备，其总价值为300万卢布。

机场设备：

滑油加油车4辆；

汽油加油车4辆；

罐车2辆；

鱼雷车4辆；

空气压缩站4个；

回转试验仪1个；

充电机1个；

起重机2台；

压缩机2台。

海军火炮：

海岸炮兵用130毫米加农炮4门；

海岸炮兵用76毫米加农炮54门；

100毫米舰炮8门；

76毫米机关炮16门；

37毫米机关炮20门；

20毫米机关炮50门；

12.7毫米机枪150挺；

探照灯15个；

带中央瞄准的“莫斯科”射击指挥系统2个；

测距仪(其数量按炮连数量计)。

弹药：

130毫米加农炮炮弹800发；

100毫米舰炮炮弹2000发；

76毫米加农炮炮弹18000发；

37毫米机关炮炮弹20000发；

20毫米机关炮炮弹50000发；

12.7毫米机枪子弹200000发。

注：1.弹药数按两个弹药基数计；2.76毫米炮弹，60%为爆破弹，40%为定时榴弹；

实际弹药数：130毫米炮炮弹为300发，100毫米炮炮弹为300发。

教学等设备：

- 1.130毫米炮1门；
- 2.100毫米炮1门；
- 3.带中央瞄准的“莫斯科”射击指挥系统2个；
- 4.炮兵训练靶场用的仪器1套；
- 5.教练鱼雷2条；
- 6.各种教练鱼雷2条；
- 7.КБ型教练水雷3个；
- 8.1908/39型教练水雷3个；
- 9.АМД-500型教练水雷3个；
- 10.通信观察哨用炮队镜30个；
- 11.带通信通话装置的头盔200个；
- 12.无线圈消磁站充电机1台；
- 13.潜水艇人员、鱼雷快艇人员、飞行人员服装样品3套；
- 14.声呐兵练习仪器1台。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3月27日

第152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152-155

№24828 萨夫罗诺夫的通报：中国报纸对苏联材料的利用(1951年3月27日)

现通报如下：我们在北京收到了苏联新闻局的文章和带有图片的材料，根据您的指示，我们把这些文章和图片分发给了中国如下城市各重要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报纸、杂志、学报、公报等)：北京、天津、汉口以及华北和华中的其他一些城市。有14份报纸的编辑部和21份杂志的编辑部以及中苏友协及其北京分会的出版局都收到了我们的材料，中苏友协定期出版一些关于苏联人民的生活及其取得的成就的材料。

我们发送出去的大部分材料都在报刊发表，其余材料被编辑部作为有关社论文章的参考资料。

由于缺乏专门而独立的新闻局的代表，因此新闻局文章的发表会遇到一些组织上的困难，到1950年底才组织了起来，现在，只是在今年1—2月，我们才能确定新闻局的文章的利用程度。

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如下文章：

《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的文章：1月4日，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鼓动员的学习》一文，2月14日发表了Л.杜布拉温的文章《美好的回忆》，2月14日发表了马列西耶夫的文章《强大的联盟》，2月15日发表了Л.瓦尔拉莫夫的文章《文化联系在加强》，2月15日发表了С.格拉西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光明日报》：2月12日发表了А.佩列维尔泰洛的文章《伟大的苏中友谊是巩固各民族和平和安全的强大力量》，2月14日发表了Л.杜布拉温的文章《美好的回忆》，2月14日发表了卡赞采夫的文章《难以忘怀的会见》，2月15日发表了С.格拉西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友谊》，2月15日发表了Л.瓦尔拉莫夫的文章《文化联系在加强》，2月15日发表了菲诺格诺夫的文章《让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得到发展和加强》，2月15日发表了马列西耶夫的文章《强大的联盟》，2月15日发表了叶菲莫夫的文章《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2月23日发表了卡诺尼辛上校的文章《社会主义战无不胜的武装力量》，2月25日发表了奥西波夫的文章《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可耻的历史》。

《天津日报》：2月14日发表了叶菲莫夫的文章《伟大人民的友

谊》，2月14日发表了格拉西莫夫、菲诺格诺夫、卡赞采夫、波波夫、马列西耶夫同志的信件。

《华北解放军报》(华北军区机关报)：2月24日发表了《光辉的道路》一文(关于科涅夫元帅生平的文章)。

《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民主联合会机关报)第19期(1951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科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5年》一文；第3期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会议》、《关于生物的学说》(列佩申斯基教授的文章)。

华北农业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农业机械化的新成就》一文。

《新民报》：2月15日发表了《莫斯科市斯大林区委是怎样帮助本区开展贸易的》一文。

《中国农报》杂志(农业科学杂志)3月份发表了如下文章：《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是怎样修建大费尔干纳渠的》，《苏联农民的冬季农业技术和动物学》，《春夏之交苏联农民是怎样准备工作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强大手段》。

至于图片材料的利用，那么，大部分图片材料都转交给了信息管理局的图片社，该社把这些图片材料在全国印刷和传播。一些照片送给了中苏友协，中苏友协正在出版一些带有插图的关于苏联生活和文化的小册子，同时他们也正在翻印一些照片用来展览，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一些材料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北京分会利用，他们正在举办关于苏联的照片展，打算在文化宫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在市中心的一些街道的橱窗中展出。大部分照片都合乎需求，但一些照片对苏联人民的表现力不够鲜明，给人的感觉是，照片中拍摄的不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人物，而是在作秀(比如，在服装店的照片《斯大林的建议怎样帮助莫斯科市的劳动人民在其居住区进行贸易》以及其他的一些照片)。

希望那些打算用于庆祝重大节日和事件的文章和照片能够更早一些送来，因为有时候会由于路途遥远，材料的发送会被延误。

今后，我们打算同出版社和杂志编辑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以便

使苏联新闻局的材料得到更好的利用。对于从苏联新闻局得到的文章，中国报纸的愿望和反应不外乎是：希望在得到的这类材料中有具体的例子，希望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创新的经验，表现苏联国民经济一些部门中的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工作等。

比如，《人民日报》请求发送一些关于当今国际政治问题的材料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材料，《光明日报》请求发送一些关于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政治的材料，《中国青年》杂志要求发送关于青年工作经验的材料以及一些具体的事例，关于在苏联青年中开展宣传工作的材料，《人民铁路》报要求发送一些关于铁路基层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材料，关于苏联铁路新的工作方法的材料；《中国科学院院报》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科学新发明的材料；文化部对外联络委员会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文化发展的材料(教育、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流派)，《艺术报》(《艺术杂志》)要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艺术家对作品和批判作品进行研究的经验的材料，并请求发送一些关于苏联艺术家最优秀的现代作品的图片，《农报》(农业杂志)请求发送一些关于农业经验和化肥生产的材料，关于农业机械的材料。文化部下属的普及科学知识局要求发送一些关于对企业和农村进行普及科学教学工作经验的材料，关于推广创新经验的材料，关于全苏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普及协会的组织原则和计划。

中国报纸接受的文章的总量大致是报纸底栏文章和杂志文章的总量的1.5—2倍。您送来的文章的数量基本满足了需求。

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拥有自己的翻译人员的中央通讯社，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翻译，这严重阻碍了您发来的文章的推广(只有一些规模大的报社才有自己的1—2名翻译人员)，而得到的一些中文译本经常会遇到翻译上的不足。比如，在我们送给科学知识普及局的一些译文中，“畜牧业”一词被翻译成了“养畜业”。因此，看起来，译者不能找到合适的对应的词。

我们在文章的翻译问题上面临困难，但翻译还能够组织进行，只是需要你们拨出相应的资金。为了在北京雇佣一名高水平的翻译，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每月至少需要向其支付500—600卢布的外汇作为工资。

至于您提出的关于一些专题的剪报，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如果为了更好地说明关于苏联生活的某些问题，您需要挑选并发送一些剪报材料

和杂志材料以及一些相关的正式的材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二等秘书

И.И.萨夫罗诺夫

1951年3月27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723, л.76-81

№133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专家在华 工作期限(1951年3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第90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罗申同志关于22名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自1951年4月1日延期1年以及20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延长4个月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444.请通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将22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工作的苏联工作人员以及20名在大连市各企业和机关工作的苏联公民，自1951年4月1日起，延长其期限分别为1年和4个月。苏联政府还同意在大连出差的苏联某些工作人员继续逗留一个月，以便向中国专家交代工作。

请通报周恩来，苏联工作人员拉琴科无法继续留下工作，因为一系列原因他应该返回祖国。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18、113

№00395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问题 (1951年4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4月2日21时2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决定，2条钢板跑道已运抵中国。我们拟将其用于即将为苏联航空兵修建的机场。

目前，将材料运到朝鲜以修建混凝土跑道机场，困难很大。此外，我们还深感劳动力严重不足。为完成给苏联航空兵修建4个机场的任务，我们已抽调了1个军的兵力。

为保障在较短时间内使中国航空兵有机场，我们恳请苏联政府给我们再提供一条钢板跑道。

您的意见如何。盼告。

如果这样做可行，最好将该跑道于今年4月底提供给中国。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周恩来

1951年4月1日

第1614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1

№2022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组建高炮和探照灯部队 派往中国(1951年4月11日)

第645997号，1951年4月11日

兹命令，截至今年4月25日以前组建(以下部队)：

1.以基辅军区防空第14高炮旅机关和国家防空高炮各部队为基础组成1个高炮师。该师由2个团组成，并根据事先计划配备各口径火炮(其他所缺各类人员将陆续补充)。

2.截至今年4月25日以前为莫斯科军区防空第十高空探照灯团配齐所需人员，装备——РАП150和РАП3 15 4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3.上述新组建的高炮师和完成各项配备的第十探照灯团将准备经铁路发送，前往预定地区执行特殊任务。

具体出发时间另行通知。

4.为确保该高炮师和第十探照灯团的后勤供给，必须准备如下物资：

——85毫米高射炮炮弹，9个弹药基数，37毫米高射炮炮弹，15个弹药基数；

——6辆ГСМ加油车；

——各类武器零配件。

5.高炮师和第十探照灯团全体人员须着装整齐。

6.所有军人家属均留在各高炮部队和第十高空探照灯团原驻地，负责看守营区。

7.上述指令的具体实施由您和国家防空部队总参谋长亲自负责监督。

8.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长、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38, л.3-4

№20222 索科洛夫斯基的指令：第十探照灯团前往中国的行程安排(1951年4月11日)

第646522号，1951年5月19日

1.根据第645997号指令，将已准备就绪的第十探照灯团经铁路发往沈阳地区。

根据事先计划与该团一同发送的还有2个新的П3А无线电报站，6辆加油车和成套零配件。

开始发送日期为今年5月25日。

2.在发送上述部队和物资前所有苏联标志和苏联生产的物资装备上的工厂标识均应清除干净。

所有保密文件、人事档案、军官证件、军人证、履历表和部队番号均根据以前(国家)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清理。

3.应确保所发运部队全体人员旅途中的粮食供给，并为其准备足够维持1个月的战备物资储备。

4.所有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地，负责看守营区。

5.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00396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苏联航空兵部署问题(1951年4月12日)

斯大林同志：

现将我们关于保障别洛夫歼击航空军部署的意见报告如下。

鉴于决定派遣别洛夫军的2个歼击机航空师进驻朝鲜的平壤地区和1个航空师进驻中国的安东地区，必须采取下列最起码的措施，以保证上述各师完成战斗任务：

一、用我们的高炮部队对我歼击机航空师的驻地机场实行空中掩护，为此需派遣2个高炮师，其中1个师为3个团编制(总共有96门85毫米高射炮和72门37毫米高射炮)，用于掩护平壤地区的机场；另1个师为2个团编制(有64门85毫米高射炮和49门37毫米高射炮)，用于掩护安东地区的机场和安东地区的鸭绿江铁路大桥。

此外，再派一个2团编制的高炮师用于掩护安东、平壤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大桥。

二、为我歼击机夜间同敌空军作战提供保障以及夜间对我歼击机基地进行空中掩护，需派遣1个装备拉11战斗机的歼击机航空团进驻中国并部署在鞍山地区。该航空团可从驻扎在旅顺地区的第一五三歼击机航空师抽调。

为了在我驻朝鲜歼击机航空兵基地建立探照灯照射区，需从莫斯科防空区派遣1个探照灯团前往朝鲜。

三、鉴于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员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为保证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战斗力，需要保证休息，做好战斗准备。

为此，每1个歼击机飞行员要有10名后备飞行员，他们可以留在战区以外，根据需要派他们替换到后方休息的飞行员。

四、为了保障别洛夫军的物资技术供应和对其后勤工作的领导，需

向该军派遣：

——带有供应部门的航空技术部队；

——给各高炮师运送弹药和军用物资的独立汽车运输营；

——20辆航空油料加油车和20个航空弹药基数，其中一半放在航空师基地，另一半放在沈阳地区的基地；

——1个月的炮兵弹药储备，即9个85毫米高射炮弹药基数和15个37毫米高射炮弹药基数。

五、为了更可靠地用雷达搜索敌机，给别洛夫军增加2个雷达站。

六、鉴于高射炮兵主要用于掩护我歼击机航空兵，对各高炮师的指挥应全部交给别洛夫。为了直接组织高炮掩护，给别洛夫委派1位高射炮兵指挥副手和1个小型作战机构。

以上报告请予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4月12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140-142

№133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张瑞华来苏治病(1951年4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13日

第213项 关于张瑞华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并准许中共中央委员聂荣臻同志的妻子——张瑞华到苏联来治病。

2.迎接和招待张瑞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波马兹涅夫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3.批准给刘少奇同志的复函草稿。 [78]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46、131

№133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苏(1951年4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18日

第239项 关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事宜。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并准许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邀请由5个人组成的、开完国际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大会就要返回中国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于今年4月到莫斯科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以便按照所提出的名单了解苏联的科学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工作情况。

2.委托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与中国学者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有关的支出预算,并为此而拨给必要的经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给中国学者代表团参观的机关、组织和企业的名单

1.苏联科学院。

2.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

- 3.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
- 4.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
- 5.苏联林业部。
- 6.苏联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
- 7.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护林造林总局。
- 8.莫斯科“橡胶”工厂。
- 9.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高楼大厦建筑。
- 10.莫斯科斯大林铁路运输工程学院。
- 11.莫斯科喀山火车站运输分站。
- 12.莫斯科博罗季诺桥的改建工程。
- 13.莫斯科林业技术学院。
- 14.莫斯科第三家具厂。
- 15.莫斯科第一医学院。
- 16.苏联卫生部的莫斯科“盐酸阿的平”工厂。

此外，代表团将参观列宁墓、博物馆、展览会、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还将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五一”大检阅和大游行。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52、133

№09857 罗申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1951年4月25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1年5月6日

第65号

今天，应我请求刘少奇接见了。

我向他——中苏友好协会主席转交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凯洛夫同志的一封信，信中通报了苏联教育家给中国一所小学赠送礼物(教科书)一事。

刘少奇同志对赠送礼物一事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向他转达了《布尔什维克》编辑关于在该杂志上登载中国土

改方面文章的请求。

刘少奇同志回答说，前不久寄来了陈真(ЧЭНЬ ЧЖЭНЬ)同志为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刘少奇同志看了陈真同志的这篇文章并表示赞同。

我回答说，我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

然后我通报说，鉴于中共成立30周年，苏联报刊机关想收到中国同志撰写的有关文章，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杂志，想收到有权威的同志，比如刘少奇同志本人所写的文章。这一文章将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1期上，因此文章应当在6月初寄到莫斯科。

刘少奇同志同意写一篇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的文章。

然后我请求刘少奇同志为我讲一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情况。

刘少奇同志讲了以下内容：

现在全中国农民正忙于春耕春种。许多地区春播已经完成，一些地区正在进行之中。可以相信，农民，其中包括贫农和原来的雇农，可以播种上土改中所分得的所有土地。在刚刚搞完土改的地区，土地也将得到耕种。

根据掌握的情况，丰收有望。但一些地区由于没有及时下雨影响了春苗的长势。如果在一个月內下雨，那么可有正常年景70%—90%的收成。

谈到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刘少奇指出，镇压敌对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1950年11月到现在已消灭30多万人(地主、外国奸细、国民党特务)。到今年年底，将消灭50多万反革命分子。

最近在城市里广泛地进行肃清敌对分子的活动，因为他们从农村迁到了城市。今年下半年，为肃清钻进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敌人将审查机关和部队中的所有人员。在审查过程中查出的所有敌人和反革命分子都将被逮捕，其中造成危害的将被消灭。

由于进行镇反工作，全国局势非常平静，空气清新。农民和工人看到了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消除了对蒋介石卷土重来的担心。前一个时期敌人为此散布了很多谣言。

今年我们还将审查党的队伍，清除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大概今年我们不能发放党证，因为审查和清党需要很长时间。

7月份将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上将讨论工厂的领导问题。对我们来说，工厂管理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党组织、青年组织、工会和行政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正确地开展工作。

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财政问题。由于朝鲜战争，国家财政很困难。我们将被迫面临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感到了这一点。物价开始上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由于这些原因，全会应当制定实际措施，制止物价飞涨，找到在广泛的范围里制止通货膨胀的途径。

此外，全会还将提出工会工作、审查党的队伍、农村土改总结等问题。

接下来刘少奇通报说，在朝鲜，中国军队开始了凌厉的进攻。最近几天所进行的战斗表明，美国人没有充分坚固的防御，因此中国军队正在顺利地前进。但是，还应该看到另一点，美国人不想陷入严酷的战斗，只要中国部队一企图打击它，它便携带技术装备和武器，弃阵南逃。

谈到蒋介石部队登陆的可能性，刘少奇指出，尽管美国人和蒋介石分子喊得很凶，蒋介石未必反攻大陆。但是，如果蒋介石部队真的反攻大陆，这将很好。我们可以给它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大部分人将投诚到我们这边来。

谈到西藏，刘少奇通报说，西藏代表团将到京。其中一些成员已在北京。我们将同这个代表团举行谈判，希望部队能和平进入西藏。正如预先谈判表明的，西藏代表团将坚持禁止中央军队进入西藏的立场。

拥有200万居民的西藏不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西藏给予多大的反抗。但如果尼泊尔介入西藏问题——尼泊尔有500万人口，其居民不仅在印军里服役，而且在其他军队里服役——问题就可能复杂化。

会谈到此结束。

参加会谈有使馆参赞斯科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3, л.17-22

№133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长春铁路苏方 领导人和代表(1951年4月28日)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 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第327项 外交部的的问题。

1.批准自1951年4月25日开始，由以下人员替换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领导岗位上苏联方面的代表，担任第二年管理局的领导职务：

(1)董事会成员：

М.С.叶戈罗夫——董事会主席

М.С.涅斯捷罗夫——董事会副主席

А.И.普里别金——董事会成员

И.В.科兹洛夫——董事会成员

Н.В.谢列布利亚科夫——董事会成员

(2)监察委员会成员：

Н.Г.瓦西里耶夫——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Н.М.克洛奇科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Г.Н.科列罗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В.И.米海金——总监察员

推荐由H.A.格鲁尼切夫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副局长职务。

2.批准苏联交通部和外交部关于在中国长春铁路第二年共同管理的领导职务方面，实行中苏双方代表轮换制度的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交的照会草案。

附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照会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敬，并有幸通报如下内容。

根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协议的基础上，签署的1950年4月21日会议记录的第二条内容，苏联政府建议：由于1951年4月25日上述铁路双方共同管理的第一年期限已经结束，应该实行中国长春铁路领导职务中苏双方代表轮换制度。

建议在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管理的第二年期间，铁路董事会、监察委员会和铁路管理局的领导职务，按以下方式进行分配：

中国长春铁路董事会主席——苏联代表

董事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总监察员——苏联代表

铁路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铁路局副局长——苏联代表

任命如下人员，作为苏联方面的代表，担任第二年共同管理铁路期间的领导职务：

(1)董事会成员：

M.C.叶戈罗夫——董事会主席

M.C.涅斯捷罗夫——董事会副主席

A.И.普利别金——董事会成员

И.В.科兹洛夫——董事会成员

Н.В.谢列布利亚科夫——董事会成员

(2)监察委员会成员：

Н.Г.瓦西里耶夫——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Н.М.克洛奇科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Г.Н.科列罗夫——监察委员会委员

В.И.米海金——总监察员

推荐由Н.А.格鲁尼切夫担任中国长春铁路副局长职务。

根据1950年4月21日记录第二条内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请求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并通报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候选人员。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72、141-142

№003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发放武器和弹药生产许可证(1951年4月28日)发自北京，1951年4月30日3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及中国兵工厂目前生产陆军步兵武器的能力，我们计划将来发展兵工厂。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要求。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

获得制造各种武器和弹药，首先是为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许可证，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同样的武器。

周恩来同志已于去年10月向您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今年4月，我们也同扎哈罗夫同志讨论过此问题，并请他向苏联政府报告这一问题的实质。为了同由您授以全权的有关部门代表讨论该问题，我们拟派一个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首的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您对该问题的意见如何，盼告。 [79]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4月28日

第2064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62-63

№125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1951年4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4月30日

第343项 关于国家银行就卢布与元的兑换率问题于今年4月5日下达的指示。

1.委托兹韦列夫同志取消国家银行就卢布与用于支付在东北苏联企业工作的员工工资的元的兑换率问题，于今年4月5日下达的错误指示，并根据所采取的卢布与元的兑换率，下达新的指示。

2.因国家银行行长波波夫同志及其副手格拉先科同志下达卢布与元

的兑换率的错误指示，宣布给予警告处分。

3.因财政部缺乏制度，国家银行在下达卢布与元兑换率指示时没有向财政部长通报，宣布给予兹韦列夫同志警告处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3

№003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1951年5月6日)

发自莫斯科

致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

我们已拟定了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并决定于5月8日(星期二)将其送交美国大使。我们于5月6日晨将我们复函的内容给您送去，请迟于5月7日24时前将你们的意见寄我。

我们复函的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我们对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要求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中、苏、美、英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二、我们要求该条约草案中应明文确定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

三、我们认为把日本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是不妥的。

四、我们坚持要仿照同意大利签订和约时的做法，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

五、我们的复函是这样结束的：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决主张尽快同日本签订和约，并且认为，该和约必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强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加以制定，该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政府

共同进行，并吸收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参加这一工作。

据此，苏联政府提出：

第一，1951年7—8月份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代表组成的外长会议，以便起草对日和约，并且要吸收所有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参加制定对日和约的起草工作，然后将该和约草案提交和平会议审定。

第二，对日和约的制定，要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为基础，并遵循以下主要目的：

(一)日本应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二)必须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确保日本国民有民主的权利，不允许有那种以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军事或军事化组织的存在；

(三)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和约中必须规定限制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以使其不致超过自卫需要；

(四)在发展日本和平经济方面不对日本施加任何限制。

第三，该条约中应规定，日本不得参加那些旨在反对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某一国家的联盟。

第四，该条约中应明确规定，自对日和约签订之日起，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第五，还要商定，凡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国家均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菲利浦夫

1951年5月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

№00399 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对日和约复函问题(1951年5月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7日23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转去，其全文如下：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6日电报已收到。完全同意您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1951年5月6日24时”

H.罗申

1951年5月7日

说明：1951年5月6日博戈莫洛夫同志 [80] 转交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77

№1334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发行中国杂志(1951年5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8日

第371项 关于在苏联发行《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的问题。(1951年5月4日会议第562号记录第165项决议)

1.接受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如下建议：

(1)关于在苏联发行中国用俄语出版的半月刊杂志《人民中国》和月刊画报《人民画报》；

(2)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与中国相关组织签署合同，其内容是向苏联发送中国采用俄语出版的《人民中国》，数量为2.5万—3万册，《人民画报》，数量为4万—5万册。

2.委托苏联通讯部(普苏尔采夫同志)，通过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按照登记在苏联零售《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3.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苏联民航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用飞机向苏联运送《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杂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82

№24829 苏联科学院致联共(布)中央报告：与中国科学院的联系(1951年5月9日)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通过发送科学文献、接待中国科学家到苏联科学院科研单位访问，使他们熟悉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的组织和工作方法，1950年期间，苏联科学院同中国科学院科研单位和组织的对外联系明显扩大了。

多年以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没有苏联的文献，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使用的科学文献，都是从英美送往中国的。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和在1949年组建科学院之后，苏联科学院首先增加了苏联科学和科普文献的发送，这些文献涉及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1949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发送了6276册图书以及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发送的大量的通报和标本。

苏联科学院还就各组织问题提供了帮助，并满足了一些学术上的需求。1950年9月13日，中国数学家华 [81] 访问了苏联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在同苏联科学院院士И.М.维诺格拉多夫进行的会谈中谈论了关于科研工作的组织和方法问题。华教授说，中国科学院正处于组建阶段，采用苏联科学院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对中国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И.М.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向华教授转交了10份俄文书籍以及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一些新的材料集。1950年12月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及科学院总学术秘书А.В.托普奇耶夫接待了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杨继池(ЯнЦзицы)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对苏联科学院的结构、苏联的科学计划、科学同实践的联系等问题都很感兴趣。

除了同国外科学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之外，1949年和1950年，科学院还就中国科研单位和个别科学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比如，在长春的中国东北师范学院请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科学院的组织问题、学院教学大纲的组织问题，并请求提供帮助，使他们得到一些教材和地图。师范学院的请求被满足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帮助王哲阳(ВанЧжеянь)老师搞清了各种哲学问题。

苏联科学院经常开展一些工作对中国科学家进行答复。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被我们的科学家漠视、不做出答复。现在，苏联科学院打算接受一批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米丘林生物学、农业、金属业和化工催化剂领域进行科学实践。他们将会有充分的机会熟悉科研工作的组织和最新的科研方法。

1950年底，中国科学院请求苏联科学院定期向中国的科学家和社会界通报关于苏联科学各领域的状况和发展问题的信息。正如中国科学院领导人所宣称的，这将有助于整合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在科技和文化领域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成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中国科学院的请求无疑应该是被满足的，并且为实现这一点准备了相关的措施。为此，苏联科学院的每个分支机构将在每个季度准备相关的信息，通报关于苏联时期(现代的发展方向，某一领域的学科在顺利完成斯大林五年计划中的作用，在实现改造自然的计划中的作用等等)某一领域科学发展的一般问题以及地质学、生物学、工艺、化学、历史和文学方面具体的专门的问题。这样一来，每3个月将会向中国科学院发送15—20篇由苏联在各个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撰写的文章。打算大规模地向中国的科学单位提供咨询，对中国科研单位的工作进行评论，并对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帮助。

今后，苏联科学院将同中国科研单位扩大和加强联系，并在如下方

面提供实际的帮助：1.通过苏联科学家的参与，进行联合的地质考察和考古发掘，帮助中国的科研单位研究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矿藏；2.组织中国的农业学家和苏联的农业学家在报时工作、纬度观测和地震观测领域进行共同工作。为了开展准备工作，1951年苏联农学家代表团打算到中国访问，并邀请中国农学家前来了解苏联科学工作的方针和天文台的观测工作；3.定期向中国的科研单位提供关于苏联科学成就的信息，为中国的科学公报和杂志提供苏联科学家的文章；4.让苏联科学家到中国出差，就各种科学问题(米丘林的学说，巴甫洛夫的生理学，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等问题的著作等)进行授课；5.为中国的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到苏联科学院研究生班学习；6.增加向中国发送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处理好同中国更多的科研单位交换书籍的工作。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外事部

1951年5月9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502，л.23-25

№133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艺术展和文艺演出(1951年5月1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10日

第393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会的问题。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1951年下半年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在阿拉木图、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艺术展相关开支预算。

第394项 关于邀请中国艺术家访问苏联的问题。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请求，允许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别斯帕罗夫同志)在1951年下半年邀请总人数为150人的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的一些城市进行为期4周的演出。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研究和批准苏联外交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与邀请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相关的开支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87

№1334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1951年5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3月15日至5月17日会议第81号记录

1951年5月16日

第443项 关于在莫斯科举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请求。

2.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彼得鲁绍夫同志)于1951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组办中国手工业品展览会。

3.委托苏联手工业合作社中央理事会提交供苏联部长会议核准用的组办中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97

№133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延长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期限(1951年5月17日)

1951年5月17日

第467项 关于延长中苏友好代表团对苏联访问的期限。

1.满足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请求，并采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杰尼索夫同志)关于要把上述代表团在苏联的逗留期延长到今年7月10日的提议。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查和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因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延长在苏逗留期限而提出的追加的支出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102

№20153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派遣航空军部队 (1951年5月19日)

第646523号，1951年5月19日

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负责经铁路向沈阳发送：

1.根据今年5月18日命令已整装待发的第十八航空机械师及其后勤保障部队和第280独立汽车运输营。

起运时间：从今年6月1日开始。速度3级。

2.驾驶拉11型飞机的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一五三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团及为其提供后勤保障的航空技术营。

该团飞行员——乘飞机，其他人员——乘火车。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将于今年6月15日前在鞍山机场集结。

3.20辆航空油料加油车和相应数量的航空油，给第六十四歼击航空

军每师和驾驶拉11飞机的独立航空团配备的20个弹药基数。

4.在发运前所有飞机上的苏联识别标志和飞机配、备件上的苏联生产厂印迹均须清除干净。

所有保密文件和人事档案，军官的身份证，士兵的军人证、履历表和部队番号均须根据以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妥善处理。

5.应确保所发运部队在旅途中的粮食供给，并为其准备一个月的物资储备。

6.军队家属仍留守现所在各基地。

7.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56, л.7-8

№20154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 (1951年5月22日)

一、命令苏防空军总司令：

——于1951年6月1日前从防空军莫斯科战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装备45φ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72架；

——挑选内燃机寿命最长的高质量新型飞机；

——以对外贸易部技术局的名义，从“奥特波尔”站用铁路方式运送飞机，随后中转，在满洲里站转交中国政府接收；

——应将发出的飞机取消苏军使用的约定标记。要认真检查随同技术设备一起交付的(非机密)技术资料(记事本、登记证)，还要把与这些资料在一起的制造厂、基地和发货仓库凭证销毁掉；

——应派有责任心的军官和武装卫队负责上述物品的运送和在满洲里站交付；

——此外，为在指定地点装配飞机的需要，应派6位经验丰富的技师；

——根据总参谋部1950年12月8日第566876号命令，为运送及有关人员配置通行证；

——对飞机的筹备和发送进行监督；

——应于5月25日前向总参谋部提出机车申请。

二、命令空军总司令：

1.应于今年5月25日前划拨：

——50个45φ喷气发动机替换发送飞机耗损或寿命不到50小时的发动机；

——72套飞机外胎和内胎，72套液压系统和驾驶舱密封软管以及其他在防空军现有备件条件下保证器具在发送前保持完好状态所需的部件；

——根据防空军航空兵司令的请求，向机场派遣6个工作组，其中：飞机精加工组2个、飞机粉刷组2个、飞机包皮组2个。

2.按月发送保证这些飞机6个月用的备件。

3.更换必要数量的旧罩衣、旧踏板、旧器具。

三、命令苏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保证在6月20日前将飞机送至满洲里站。

四、命令总参谋长严格监督运送过程。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陆军大将 什捷缅科

№004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2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东北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你们仅需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87

№20155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向中国运送歼击机

(1951年5月24日)

1.命令苏联空军总司令：

从第二十四航空集团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180架装备45φ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180架，期限如下：

——1951年6月10日前，60架该型号飞机；

——1951年7月1日前，120架该型号飞机。

为接替发送的装备45φ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飞机，应首先将5、6月投产的配备有“油闭开关1”的米格15飞机发给防空军第二十四航空集团军和歼击航空兵。为此，应调整飞机供应计划时间，并于今年6月10日前上报我审批。

2.命令苏联防空军总司令：

应于1951年6月20日前从列宁格勒、莫斯科防空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送120架装备45φ喷气发动机的米格15战斗机。

3.应挑选发动机机寿命不少于一半的新型优质飞机，还应配备飞机侧舷器具、机场设备。飞机要更换颜色，还要更换使用过的飞机内胎和外胎，要使飞机处于完全可以使用的状态。同时，按照每10架飞机有1个转向架配发发射架，每30架飞机配置1个液压设备检测车。备件和独立设备应根据新的命令发放。

4.以对外贸易部技术局的名义，从“奥特波尔”站用铁路方式运送飞机，随后中转，在满洲里站转交中国政府接收。

5.应将发出的飞机取消苏军使用的约定标记。要认真检查随同技术设备一起交付的(非机密)技术资料(记事本、登记证)，还要把与这些资料在一起的制造厂、基地和发货仓库凭证销毁掉。

6.应派有责任心的军官和武装卫队负责上述物品的运送和在满洲里站交付。此外，为在指定地点装配飞机的需要，应从空军派6位经验丰富的技师。

7.根据总参谋部1950年12月8日第566876号命令，为运送及有关人

员配置通行证。

8.对飞机的筹备和发送进行监督。

9.发送前10日内向总参谋部提出机车申请。

10.命令苏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在今年8月1日前将300架飞机送至满洲里站。

11.命令总参谋长严格监督运送过程。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苏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

什捷缅科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56, л.9-11

№0040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感谢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6日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第2586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89

№24827-1 斯大林致罗申电：同意签署中苏汇率协议 (1951年5月26日)

特电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同意您关于签署中方提出的关于确定卢布和元的汇率的协议草案的建议，协议草案规定自签署协议之日起，确定一卢布兑换6754元。在签署协议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如下保证：中方不允许歧视苏联的卢布。

菲利浦夫

1951年5月25日 [82]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8, л.90

№133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少先队员 来苏参加夏令营(1951年5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5月26日

第70项 关于邀请中国少先队工作人员来苏联的问题。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邀请由23个人组成的一队中国少先队员到苏联的“阿尔捷克”少先队夏令营来休息两个月和邀请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先队工作人员代表团到苏联来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少先队组织工作经验的学习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0040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1951年5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

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6日

第279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91

№004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7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7日20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给您寄去，请您了解其内容：

“彭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掉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耳其军1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

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也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2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

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并电告。”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7日

第2627号电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95-97

№0040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的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

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第284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8, л.98-99

№133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设立苏中股份公司代表处(1951年5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5月30日

第103项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批准所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处问题

为了改进苏中股份公司——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3月27日签署的

协议而成立的新疆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加强对这些公司苏联方面的工作的领导，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在莫斯科市设立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

二、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负责这些股份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工作。根据公司的规定，确保完成在新疆境内的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寻找和勘探工作，并组织对这些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进行开采和加工。

鉴于已经成立了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研究所，决定取消石油工业部、冶金部和外交部的相关职能。

三、任命Ф.С.波波维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免除其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矿物监督管理总局的工作。

任命Д.Т.杰夏特尼科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作的副全权代表，Ф.А.卡宾科同志为地质勘探工作的副全权代表。

四、责成Ф.С.波波维同志在一周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关于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的条例以及全权代表处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以便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全权代表处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从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和苏联外交部负责新疆股份公司工作的人员中挑选。

五、责成石油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在一周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苏中股份公司(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事务全权代表处划拨用于购买根据1951年上述所说的这些股份公司计划中规定的材料和设备的资金。

六、责成Ф.С.波波维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苏中新疆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新疆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在1951—1953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年度计划)，要着重强调加强这些股份公司在石油、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和开采方面的工作以及采油场、石油加工厂和矿山企业的建设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21、л.134-135

№133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缩减中苏船舶公司经营期限(1951年6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日

第132项 关于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的问题。

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于把苏联方面提出的苏中股份公司“苏中船舶制造股份公司”30年的经营期限，缩减为25年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30

№09947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中国出现大面积蝗灾(1951年6月4日)

摘自斯克沃尔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1年7月26日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伍修权同志在中国外交部约见了我们。

在互相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伍修权同志作了如下声明：

陇海铁路以南安徽省北部宿州地区出现了大面积亚洲蝗虫虫灾，对收成造成严重威胁。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苏联政府火速空运来3台飞机灭蝗撒药设备。灭蝗工作时间紧迫，因为8—10月蝗虫就会变成飞蝗。

伍修权同志说，若不能发运上述设备，中方希望通过传真电报得到该设备的图纸。

伍修权同志请求向苏联政府报告中国政府的请求。

我对伍修权同志说，我将立即向大使报告我们的谈话内容。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

斯克沃尔佐夫

№00407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彭德怀谈机动防御作战问题(1951年6月4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4日18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转上彭德怀同志致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一、我们已就部队的组织与装备问题及兵工厂生产军工产品问题撰写了几条意见。邓华同志，第四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军长及第三十八军政委将于日内赴北京向您汇报上述问题。

二、文登里、金化、铁原地区的地形很好，野战工事也不错。在现时，当敌使用大量炮兵、坦克和航空兵时，这一地区虽无坚固的防御阵地，但如利用积极的机动防御，则可以在规定地段扼守一定时间，并歼灭敌有生力量。在上述一线以南地区，估计可扼守到6月10日。在洪城、下县里、昌道里、平康、玉洞里、安峡、金川一线以南，设有第二道防御阵地，可借此扼守到6月底或7月初。在通川、淮阳、洗浦里、伊川、南川店、青石头里、海州一线以南，设有第三道防御阵地，可借此扼守到7月底。为了在这些防御阵地上阻止住敌人，将使用第九兵团的3个军、第四十二军、第47军和第十九兵团的3个军(后者不满员)。如果这些军能将敌阻止到7月底，我们便可将我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重新投入行动；如果再将杨成武的2个军也投入行动，我们便能可靠地抗击敌人。届时，我步兵、反坦克和高射武器的数量将略有增加，交通线将有所缩短(待运输团到达后，往前线运送物资的困难将有所克服)。同时还要考虑到积极开展游击战。如果敌不会大幅度地增加其部队数量，如果我方不犯意外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保证扼守住元山、平壤一线以南的有利地区，并且防止敌人在元山地区登陆，还需采取措施将敌阻止于文川、马息岭、梧山里(人民军第七军团已构筑了一些工事)。这两条防线均应相继建立。

三、目前的情况是，正面狭窄，交通线长，敌人有大量兵力，兵力

密度高，敌以平行纵队实施进攻，正面没有出现楔子和空隙，敌人拥有大量航空兵、坦克和强大炮兵，英美军的士气较高，而我军则昼间不易进行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今仍未解决各个歼敌的战术问题。

如果有经验丰富的部队，则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机动防御，使有生力量的伤亡比达到有利于我的1：2。但是，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部队，则人员武器和阵地易于损失和失去，有生力量的伤亡比将为1：1。

必须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分散敌人的兵力。目前我们正为此作准备，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还不能将我们的游击部队派往敌后，必须等待时机，待敌人前出至适当地区以后，我们才能将游击队派到敌后。

彭德怀

1951年6月1日”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4-6

№0040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转发志司关于防御问题的指示(1951年6月4日)

菲利波夫同志：

转去彭德怀同志的电报。

“志愿军司令部关于进行战斗阻止敌军前进给各兵团司令员的指示及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本。

由于三八线以南有许多河流(现在雨季正在来临)，而这些河流上的桥梁极不牢固和经常毁坏，同时也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运输工具不足，食品和弹药补给困难，部队十分疲惫，所以，我们继续向南方进攻变得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决定比拟定期限提早就结束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并把我军主力撤至我们开始进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地区，以便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中，休整部队，补充和训练部队，以进行新的战斗行动。

为进行积极的、机动灵活的防御，每个军必须留一部分主力部队，以使用消灭、分散和消耗敌军力量的办法，来保证主力部队有休息和改编所必要的一定时间。

在此期间，志愿军司令部拟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削减不必要的机构，裁减非战斗人员，加强后勤机关工作，改进组织工作。

二、肃清部队中现存的非常严重的右倾情绪。

三、将在朝鲜作战的战术经验加以总结和系统化。

四、力求做到使部分空军、反坦克预备队和高射炮兵参加在朝鲜的战斗。

五、组织和训练敌后游击队的斗争，迫使敌人拉长战线，消耗和分散它的力量，为我军主力在以后的战役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现在，在主力部队撤回北方的条件下，由于某些部队的指挥员对指挥意图理解不够深刻和错误地运用现有力量，所以，这些缺点虽然已经暴露，但未得到及时纠正，各部队之间还出现了已被敌军加以利用的缺口。

自从我军在6—7天内发动进攻以来，开始感到食品、弹药不足和疲惫，敌军则提前准备了大量机械化部队，并利用我军停止进攻和后撤，开始尾随追击。我们对此还不适应。

再者，新入朝的部队在防御敌机械化部队方面尚无足够的经验。此外，某些指挥员自己在最主要的战线上未能跟上部队，不能及时地发布命令，并与主力部队距离很远。

有些根据情报制订的作战计划看起来很好，也没有什么漏洞，但它们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所以，从5月21日至5月28日的几天内，我若干部队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了牢固地守住阵地和保证我军进行休整，从而为以后的作战取得胜利和在积极、灵活机动的防御战中给敌军以打击提供必要的保障，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在公路上阻滞敌运动和消灭机械化部队。如敌军步兵从小路推进和通过山地进攻，则更有利于我给予打击。为此必须集中各种反坦克火器以及重榴弹炮部队，按其火力远近配置于公路两侧的隐蔽处，进行必要的工兵作业；利用有利地形，建立火力系统，做好向公路和敌坦克最可能出现的地方进行射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必须破坏最狭窄地区的山区公路；在我反坦克火力区域和被破坏的道路之间，必须埋设反坦克地雷。这样，如果敌坦克遇到障碍而绕行，他们将触雷。我部队此时应利用炮兵部队射击敌军集结地区。与此同时，装备有反坦克手榴弹的小分队向前方运动。埋伏在道路两边，准备反冲锋的部队利用敌军混乱时机，部分地或全部地击溃敌人。如果敌步兵沿两翼运动企图沿小路迂回攻击我军，那么这将更好。这时，山区没有重武器支援，敌人不得不以步兵队形进攻，容易予以击溃。因此我们必须预先准备好部队和轻型火炮武器(可移动炮、迫击炮)，坚决、勇敢、迅速地消灭敌军。

在打击沿公路运动的机械化部队的同时，打击越过山地沿两翼进攻的敌步兵，我部队必须不分散行动，各部队执行一定的任务。这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我们才能阻止敌人推进并取得战斗胜利。

二、我们部队靠步行无法摆脱敌机械化部队。因此为进行积极战术防御，不仅要有第一线防御，还要有第二线、第三线防御，以便在第一线发生不利于我的情况变化时，我们能够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阻挡敌人。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能平均分配在所有防线上，而要依据防御地区，尤其是铁路和公路地区的重要性而集中部署。在我部队从第一防线撤到第二防线后，第二防线部队必须派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兵小分队迅速而彻底地破坏桥梁、隘路并沿防线埋设地雷，以便阻挡敌人进攻。如果自己的或友邻的部队没有来得及完成撤退，那么为了不使敌机械化部队有机可乘，深入我防线并破坏我作战计划，每一兵团、每一师、每一团都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不惜任何代价阻击并击溃敌部队，从而保障自己的部队和友邻的部队平稳而有组织地后撤到预定地区。虽然执行阻挡敌军、掩护我军任务的部队将蒙受某些损失，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给整个战役将带来巨大好处。

三、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都正确理解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小兵力而在后方防线部署较大兵力的原则以及在前沿防线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组织稍弱火力；并使第一和第二防线结合起来的的原则。必须懂得

在前沿防线部署较小兵力而在后部防线部署重兵，在防御时是必需的，是为了避免过分集中兵力并减少有生力量的损失。因此我军的主要力量必须隐蔽地集中在侧翼和后方，以便在有利时机反击进攻的敌人，予以消灭、驱散，而不是消极地后撤和抵抗。为了用不大的兵力牵制敌人，不仅需要良好的工事，还要有足够的火力支援。因此在前沿防线需要组织强大火力，而在后方防线火力较弱；应该根据火炮性能，纵深配置火力，有间隔地对敌进行突然的、猛烈的射击，以杀伤敌有生力量，支援我步兵反冲锋。各部队都要征询炮兵的意见，帮助炮兵开辟道路，构筑阵地，保障他们准备战斗的必要时间。炮兵方面要克服一切困难，在战斗中积极帮助步兵。

在防御过程中进攻时机的正确选择取决于每一个指挥员独立决策的能力。每一指挥员必须设立观察点随时掌握战场情况，根据敌部队情况的变化，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冲锋，使敌人受到有生力量的巨大伤亡。

各兵种部队必须找到时间把志愿军司令部今年3月8日和今年3月15日的命令以及今年4月6日关于进行防御战斗经验的文件，传达到全体指挥员，对这些文件加以研究学习。每级指挥员学习上述文件后，要向司令部报告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些文件的。

四、要坚决反对指挥员处事的不严肃态度，对上级指挥员命令不重视的态度以及不认真研究情况的态度。

鉴于新到朝鲜的部队没有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战争经验，尤其是进行防御战的经验以及下级指挥员指挥能力较弱，更鉴于参加战斗的兵种数目较以前增加，因此高级指挥员不应把不同兵种部队看作是自己以前的下属部队，而不去想一想他们是否能使用这些部队，是否能指挥这些部队。

全体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应该深入研究高级首长的计划，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研究地形并细致地制订作战计划。在制订第一阶段作战计划之后，必须制订第二阶段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好进行作战，而绝不允许仓促上阵。

与此同时，在目前情况下，上级指挥员必须深入基层，实际进行领导，帮助下级指挥员摆脱困境。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弄清楚下级指挥员对自己首长的意图和计划的态度，纠正下级指挥员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也

要依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计划中不正确之处，避免汇报和实际情况之间的不符之处。这无疑可以提高下属对胜利的信心。

现时在抗击技术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斗争中只凭勇敢是不够的，必须有勇敢而智慧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深入基层，即亲临前线，不仅防御时必要，进攻时也必要。

必须设立良好的指挥点，在主攻方向上随部队移动，及时观察情况，选择有利时机行动。随后必须使计划和汇报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相信，上述指示将在各部队由指挥员贯彻执行，志愿军司令部的行动意图也将以口头形式传达到所有师、团指挥员，务必使所有部队依据总体意图，很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现时要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击溃敌人，削弱敌人，挫败敌人锐气，以便逐步过渡到大批消灭敌人。

我们要求各级指挥员仔细研究情况，妥善部署兵力，组织火力系统，使得每个兵团能够同时消灭一至两个连或一个营的敌正规部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这也是现时在敌人冒险进攻阶段消灭敌人的最有效的指导方针。

我们希望各级指挥员深入研究这些指示，克服一切困难，动员全体部队，尽一切努力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

志愿军司令部

1951年5月31日15时”

第2759号电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10-16

№0040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 (1951年6月5日)

北京

已收到您6月4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

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作战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了三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他们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1951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

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浦夫

1951年6月5日

№004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赴苏问题(1951年6月5日)发自北京，1951年6月5日18时3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朝鲜作战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如下一些严重问题：如财政问题，在前线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敌人有在我后方沿海一带登陆危险的问题。

我们拟于近日内派高岗同志乘机前往莫斯科，向您报告上述问题，请您对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给以指示。

现在，金日成同志刚好也在北京，他希望随高岗同志一同前往，以同您讨论这些问题。可否成行，盼您将您的意见电告。

毛泽东

1951年6月5日

第2787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3

№0041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金日成和高岗访苏问题(1951年6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我们已经收到您关于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的电报。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同志并同他们讨论您电报中指出的问题。

6月8日早晨我们从莫斯科派飞机到北京迎接高岗和金日成同志来莫斯科。飞机将于6月9日抵达北京。

请您指示你们的有关部门让飞机无障碍地飞行并在北京机场迎接飞机。

1951年6月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6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30

№004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1951年6月9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9日19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6月5日和6月7日两封电报，均已收到。

您1951年6月9日派出的专机已抵北京。

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由高岗同志随身带去。

请您对此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因病目前正在大连治疗，申请工作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现在编制申请单的工作才刚刚结束，因此延误的过错应由我们来承担。

由高岗同志带去的申请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编制的。这次申请单所列总价值相当大。

请苏联政府按这些申请单供货，并按半价计入军事贷款，还请延期支付此一款项。请您和高岗同志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将您的决定通过高岗同志告我。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当面向您报告，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第2893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8 29

№133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中国学生回国 度假(1951年6月1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1日

第176项 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关于准许在莫斯科的苏联学校里学习的14名学生和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一名职员——中国负责人员的孩子们到中国去度暑假的提议(附有名单)。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允许在1951年到中国度暑假的人员名单

1.朱敏(齐英), 1928年生,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1941年到苏联, 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二年级学习。

2.允斌·克里姆, 1925年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的儿子。1939年到苏联, 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化学系五年级学习。

3.陈保罗, 1928年生, 1941年到苏联, 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儿子。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艺系三年级学习。

4.陈梅利, 1931年出生, 1941年到苏联, 中共中央社会安全部部长刘进忠(张凡)同志的女儿。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

5.克鲁普尼克·然娜, 1930年出生在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工作人员乔伯臣同志的女儿(其母克鲁普尼克Ф.Е.是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的校对员)。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习。

6.基巴利契科·莫尼亚, 1930年生于苏联, И.Н.基巴利契科(韩铁声, ХанТье-Шен, 原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 现在中国)的儿子。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水电系学生。

7.涅维罗夫·弗拉基米尔，1926年生于莫斯科，民主人士沈志远(沈观澜)的儿子。列宁格勒工学院四年级学生。

8.万南·莉莉(ВаньНаньЛили)，1928年生，1936年到苏联，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五年级学生(医疗系)。已经牺牲的中共干部李世超(ЛиШиЧжао)的女儿。

9.师文·雅科夫(ШиВенЯков)，1929年生，莫斯科莫洛托夫电力学院三年级学生。

10.许琼谢·莉莉(СюТюинСейЛили)，1931年生，1934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习。

11.普罗列塔里耶娃，1926年生于苏联，在莫斯科电力学院无线电广播系五年级学习。

12.张芝明，1927年出生，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同志的儿子。1938年到苏联，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习。

13.卡尔斯卡娅·泰霞(КарскаяТэйся)，1934年生，第635中学9年级学生，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的女儿。

14.卡尔斯基·伊戈尔(КарскийИгорь)，13岁，第170中学六年级学生，师哲的儿子。他母亲琴佐娃·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护照中写有他的名字。

15.齐菲·弗拉基米尔(ТиФейВладимир)，1928年生于上海，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中文编辑部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38、143-144

№100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伍修权谈话纪要：处理蝗灾问题(1951年6月12日)

摘自斯克沃尔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1年6月26日

第119号

我向伍修权同志通报说，中国政府请求的3台飞机喷雾器，已由飞机于1951年6月11日从莫斯科起飞运来，并补充说，关于这些飞机喷雾器结算问题的谈判，将由贸易代表处进行。伍修权同志请求告知他飞机抵达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在机场直接接收。我答应通过电话告知飞机抵达的日期和时间。

接着，我向他提起今年的6月11日在中国上层所进行的谈话，即我们的装有500吨汽油的大驳船，沿松花江溯流而上只能抵达富锦，因为浅滩的水深不超过110厘米，还有由于河水变浅在佳木斯和哈尔滨之间轮船不能定期航行，请求尽快解决沿松花江流域的通航状况问题。伍修

权同志答应采取措施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伍修权同志又说，挑选到苏联学习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正在具体化，什么人去什么学校就读。

..... [83]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斯克沃尔佐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д.14, пап.322, л.38-40

№133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给中共中央划拨轿车和电影放映设备(1951年6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3日

第188项 关于为中共中央划拨轻型汽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

1.满足王稼祥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和苏联电影部(博尔沙科夫同志)在今年6月份按苏联外贸部的凭单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物资把2辆胜利牌轿车、1辆莫斯科人牌轿车和4套КПЦ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运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要与全套备用零件一起运去。

2.提供第一条中所指明的轿车和巡回电影放映设备的工作是按苏中贸易协定来进行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41

№029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对日共中央拨款10万美元(1951年6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第198项 对外政策委员会问题。

1.鉴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德田秋一同志)提出的请求,我认为对日本财政援助款额10万美元是合适的。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拨10万美元给格里戈良同志用于特殊目的。

3.委托情报委员会(佐林同志)把拨款转交给日本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 ф.89, оп.50, д.3, л.1

№0041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 (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罗申：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

第三，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

我在这里不谈细节了，您的代表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8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

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2个或3个米格15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5个或6个米格9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8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他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5—6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7—8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16个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简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13日

第302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31-32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31-32

№00415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关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飞行员培训朝鲜人非常慢，马马虎虎。看来，你和别洛夫将军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5

—6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7—8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

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2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2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13日

第303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47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33

№00416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 (1951年6月13日)

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我已收到你们6月13日的电报。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需要采取防御态势。

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 [84] 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

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四、我们已命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立即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和7月份将加强准备。8月份我们将进行较大的战役。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后方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我们的上述目标就可以达到。如果敌人不向朝鲜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和不派遣空降兵，8月份我们就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五、我们现在正计划向前线调动空军部队。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57-60

№00413 罗申转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1951年6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13日19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续我的电报第2967号电(包括在第20757号电中)。北京时间1951年6月13日22时，我接到了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6月13日的电报，我已收到。

今天我收到了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我已将我们对停战问题的意见电告高岗同志，以便让他将此意见转告您并得到您的指示。关于此事的详情，我这里就不述了。

彭德怀同志非常需要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苏联顾问。希望您能尽早派出。

鉴于有8个歼击机航空师要参加战斗，我已按照您的建议，指示总参谋部制订一个计划。此外，我还向彭德怀同志下达了指示：我军务必固守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的防御阵地，并且为自己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

6月份前线态势将是：我军兵力较弱于敌军。到7月份，我们将强于6月份，而8月份将更强一些。我们准备在8月份给敌以更强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Н.罗申

1951年6月13日

第2974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55-56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34-35

№20156 什捷缅科的指示：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情况(1951年6月14日)

第646851号，1951年6月14日

根据先前所下达的指令为第一五三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团飞行专机和铁路专列，并报告准备情况。

在接到特别指令之前不要发送该团。

大将什捷缅科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56, л.16

№00417 高岗、金日成致斯大林函：请求接见和指示 (1951年6月14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该电，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

高岗

金日成

1951年6月1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7, л.57-60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35-37

№00418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国空军的状况和要求(1951年6月15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现在报告：

一、1951年6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有：6个歼击机师，其中3个米格9战斗机师，2个米格15战斗机师，1个由1个米格15战斗机团和1个拉11战斗机团组成的师，共有歼击机飞行员307名。

2个伊尔10强击机师，共有强击机机组人员107名。

2个图2轰炸机师，其中1个师只有1个团有物质保证。

共有轰炸机机组人员109名，其中14名能夜间飞行。

二、处于改装训练阶段的有：5个中国航空歼击机师，177名飞行员。各师短缺的133名飞行员，要到7月1日才能从空军学校分配来。

正在改装训练的航空歼击机师中，1个米格-15战斗机师将于7月15日准备好参加战斗，1个拉-9战斗机师将于8月1日准备好参加战斗。

其余3个空军歼击机师由于获得了米格-15战斗机，将进行改装训练，并将于10月1日前结束训练计划。

1个朝鲜航空歼击机师共有65名飞行员。8月15日将准备好参加战斗。

三、我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执行您关于训练由8个航空歼击机师组成的空军集团军参加战斗的指示。为此：

按以小时计算的进度表进行夏季空军师改装训练工作。

为了监督和按期完成改装训练计划以及就地给予实际帮助，我亲自负责朝鲜师。

我向将于7月15日结束米格-15战斗机训练的师派出了空军集团军参谋长，并向将于8月1日结束的拉-9战斗机师训练的师派出了负责指挥的军官组。

我正在修改并将于1951年6月20日批准战斗部队和学校训练计划，根据卫国战争的经验，缩短训练期。

向中国司令部提出解决以下问题：

一、加速供其空军驻扎的朝鲜机场的建设。机场建设速度因美国空军对已建好跑道的破坏而受阻。

二、根据机场和敌人部队的情况而使用轰炸机师和强击机师。

三、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工作，因为从1951年4月1日改由中国供应以后，空军技术物资和油料的供应急剧恶化了。

四、请您给予帮助，供应部队：米格-15飞机12架；PД-10发动机40

台，PД-20发动机200台，AM-21发动机30台；米格-9和米格-15飞机内外胎660×160型1200套，雅克飞机内外胎570×140型400套。

根据中国政府的订单加快空军技术物资的发货。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15日

第3004号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61-63

№13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刘少奇的电报问题(1951年6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16日

第220项 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核准附加上的电报文本。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罗申：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根据他的请求，排字工人李国富(ЛиГоофу)近期将前往中国。

佐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47、158

No12273 科切尔金致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关于中国军队情况(1951年6月16日)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 [85] 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

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阵地。如果必须进攻这些阵地，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包围的美军部队。为了避免自己遭受较大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有时甚至给被包围的美军部队提供了逃跑的机会。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只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是在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

统组织不得力。

直到不久以前，为部队运输粮食和弹药直接负责的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不亲自过问后勤问题。直到5月底才决定成立兵团、军、师、团的后勤机构，直到鸭绿江边的广大后方地区都属于彭德怀管辖。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运载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的数量。其中包括，大量生产轻型手推铁轮车。它们应成为保障师、团后方运输的主要手段。

改造后勤系统，增加运输工具的数量，交通线实施防空，这些措施最近将对作战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技术装备差，中国人民军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一)战斗，更不用说部队调动，只在夜间进行，因此部队迅速感到疲惫；

(二)与敌接触的是不大的力量，主力部署在敌炮火够不到的地方和敌坦克不能接近的地区；

(三)防守时不组织密集战线。部队不把守敌之坦克可以攻击的道路，而是在道路两旁的高地设防；

(四)通常进攻不是与敌人近距离遭遇时发起，而是从距敌5—15公里的地方开始；

(五)认为不应进行阵地战，因为这将导致人员损失，迅速消耗弹药。

认为进行运动战最合适(对进攻之敌实施迎面突击)。

由于部队物质保障不力，进攻战役带有以下特点：

(一)持续时间不长(5—6天)，这是因为战士只能带5—6天的给养和弹药；

(二)纵深不大(30—50公里)；

(三)目的有限——主要是战术目的；

(四)不能把取得的战术成果发展成战役成果。在实施5—6天战斗之后，部队需返回基地休整、补充。

在部队战斗行动中以下消极因素值得注意：

(一)简单地组织战斗(进攻的和防守的)，没有进行预先侦察，勘测地形和组织协同动作；

(二)对战斗没进行集中指挥，结果导致战斗自行发展，部队在战场上甚至相互干扰；

(三)在转入进攻前，部队没有先进入出发阵地，没有对敌实施火力侦察；

(四)没有注意保障两翼和接合部；

(五)对经常碰到的部队撤退没有组织给予保障；

(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有充分使用炮兵。主要的炮兵预备队(炮兵师)，由于缺少炮弹和不会密集使用，根本没有动用；

(七)位于朝鲜的3个坦克团，由于害怕损失装备，至今在战斗中没有使用过(现驻在元山和平壤地区)；

(八)没有充分使用障碍物进行防御和在退却时迟滞敌人进攻；

(九)指挥部队是中国人民军最薄弱的环节。早在过去(同蒋介石斗争时期)司令部就不是真正的指挥机关，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在部队中没有威信，直到现在事情也没有好转。

指挥战斗通常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司令部处在后方，在指挥部队上一点儿作用也不起。如在最近一次战役(春季)中，第三兵团司令员在第12军指挥员的指挥所指挥了战斗。兵团司令部留在后方(距前线约100公里)，一点也不知道情况，结果在整个战役期间这个兵团一点情况也未上报。

电台是唯一的通信手段。没有使用其他通信，其中包括移动通信。同部队失去联系后，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订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认为如果总参谋部没有得到一些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对军队的指挥，实际上能够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

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消灭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消灭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86]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错误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就放任这种情况。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以及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科切尔金少将 [87]

1951年6月16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0卷，第1262—1270页

No004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 (1951年6月21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21日21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高岗同志回来后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想马上着手计划。我希望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帮助我们拟订计划。

二、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

高岗同志回来后讲，您认为我们各个师的装备不足并建议各个师加强坦克和火炮。我认为这完全正确。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必需的。

我已致电徐向前同志根据您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谈判。

三、根据徐向前同志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从按苏联总参谋部计算的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今年将只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给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四、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单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滑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五、根据我们的申请单，今年已供应了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苏联总参谋部提议的新编制的部队所必须而目前不足的装备，可以在明年供应。与此同时，我们将按照所供应的装备，选择一些师进行改编。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把60个师改成新编制。

六、由于我们的申请晚了3个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今天却突然带着这么大的数目去找您，并希望能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一切，这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运输方面。不知能否做到这些，请您尽力而为。

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

第3107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64 65

№00420 索科洛夫斯基呈斯大林报告：关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1年6月23日)

斯大林同志：

我们现在报告：

今天，6月23日16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的请求，什捷缅科同志会见了他。

在会见时，徐向前交来了一封毛泽东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中文信，并请求将此信转交给收信人。所附的信的译稿与今年6月21日向您报告的毛泽东电报的内容相同。

递交信件后，徐向前说，毛泽东在所转交的信件中请苏联政府1951年度供应60个步兵师的武器。曾经作为“初步”订单提交给苏军总参谋部，后来根据徐向前的要求被拿回去修改补充的这60个师的订单，他现在已经确认，今天晚上就可交来最后订单。

徐向前还声明，毛泽东认为提出建立步兵师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目前要求的。同时，徐向前请求给他一份苏军总参谋部建议改编步兵师的书面文件，以便在今年6月25日派军官乘飞机带回国向毛泽东报告。

什捷缅科同志回答徐向前，交来的信件将立即呈交给收信人。

关于订单，什捷缅科同志说，我们一收到订单就向政府报告。关于改编步兵师，有关建议已经通报总参谋长，如果有必要，将提出书面文件。

索科洛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6月2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69-70

№133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强行推销苏联图书(1951年6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3日

第303项 关于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在中国发行苏联文学作品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1951年6月20日会议第571号记录第5 c项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和苏联驻华贸易代表处，在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苏国际图书协会擅自确定了1951年明显过多的中文版苏联图书的出口计划，并且没有经过苏联有关部门的同意，就委托自己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从中国的相关组织中获取了根据这个计划出版文学作品的订购单。苏联驻中国的副贸易代表A.B.戈卢布科夫同志和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B.A.格里舍尔同志，在与中国相关组织谈判时，毫不客气地向这些组织强行推销苏联文学作品，指责中国工作人员不了解中国居民对苏联图书的需求，强迫他们几次更改和扩大自己的订购计划。

除此之外，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人强行让中国相关组织订购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其数量达1130万册(76个品种)，而没有考虑到，苏联出版局根本没有完成这个订购单的可能性。

苏联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和库兹明同志)，忽视了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的这个恶劣的行为。不但如此，过高的不现实的在中国销售苏联图书的计划，还被该部机械地列入了外汇计划中。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由于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撤销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副主席C.M.安东诺夫的职务。

给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原主席M.И.杰奥米多夫同志、副主席A.C.谢米伊金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2.给予驻华贸易代表B.П.米古诺夫同志警告处分，因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在中国发行苏联图书问题谈判时所犯的严重错误。

3.给予负责全苏国际图书协会领导工作的苏联对外贸易副部长M.P.库兹明同志警告处分，因其忽视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相互关系中所出现的严重错误。

4.建议对外贸易部长缅希科夫同志：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副贸易代表A.B.戈卢布科夫同志以及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全权代表B.A.格里舍尔同志；

(2)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组织就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问题进行谈判，并改正在这项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在签署关于向中国出口苏联图书的协议书时，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组织将提交的计划为依据；

(3)加强全苏国际图书协会的专业干部队伍，调整其工作中应有的秩序，根除在境外发行苏联图书的具体工作中重犯错误的可能性。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64-65

№004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1年6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一、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 [88] 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二、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关于目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00422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已收到毛泽东的以下电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算向朝鲜派遣配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参加战斗，这将比派遣米格9战斗机师要好得多。因此，必须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将用米格9战斗机武装和训练出来的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歼击机师，用米格15战斗机改装训练，以便在1951年9月将其派往前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您指示在华苏联专家在上述期限内用米格15战斗机改装训练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歼击机师。”

可见，毛泽东不想从中国机场撤下米格9战斗机并将其派往前线，而宁可将其留在当地，在前线只使用米格15战斗机师。请您同毛泽东谈谈，如果我们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可对他说，您的人将负责现在驾驶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改装训练驾驶米格15飞机。我们认为，这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中国人坚持，可以训练他们两个月。

报告执行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6日

№133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1951年6月2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6日

第317项 关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出版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民主!》^[89]的问题。

接受《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编辑米京同志的建议：在该报今年6月29日第6版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文章。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中共中央：苏共中央热烈欢迎和祝贺兄弟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袖——经受考验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在强大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推翻了反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摆脱了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人民首次历史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开展了农业改革，实现了农民数个世纪以来得到地主土地的梦想，开展了其他大规模的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改革，巩固了新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在和平战线上努力工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奴役中国的新的企图作斗争，坚定地捍卫国家的独立，为加强爱好和平的反帝阵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队伍，教育广大党员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武装他们。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都取得成功，以建设一个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维护和平事业。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00423 葛罗米柯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停战谈判问题 (1951年6月27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1年6月27日，接见美国大使柯克。

今天应柯克的要求接见了。他。

一、柯克声明，他是奉华盛顿政府之命前来向我提几个与近来马立克声明有关的问题。美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他(柯克)是指马立克发言中有关朝鲜问题的最后部分。在马立克的发言中使用了“苏联人民相信”这样的词句。他(柯克)想知道，是否可以认为，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

避开了对柯克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说，作为苏联官方代表，马立克的发言无需加以说明。如果柯克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准备尽量做一些解释。

二、通过对他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清楚了。柯克说，他转入其他问题。他说，如果认为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希望知道，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对和平调停采取措施方面给予支持。

我回答，苏联政府永远致力于和平调停朝鲜问题。

对于这一点，只要提起苏联政府根据英国政府1950年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调停朝鲜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足够了。但是，那时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得到美国、英国和其他政府的响应。

三、柯克问，“关于停火和停战”这句话是否包含特殊意义，马立克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是否有区别。

我回答，停止军事行动是参加朝鲜战争各方达成暂时军事协议的结果。

柯克问，是否是指分阶段拟定和平调停。

我回答，显然，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调停的第一步。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暂时军事协议，显然其本身不包括用特殊手段进行调停的政治和领土问题。

柯克问，这是否是指要预见到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比如，对实施停火或停战协议进行监督。我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在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过程中由各方讨论。

四、在柯克宣读了马立克发言中“为此需各方走向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这句话之后，他问：“走向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指苏联的一些具体措施？我首先问：签订停止军事行动的暂时军事协议难道不是和平调停的措施吗？柯克做出了同意的明显表示。

柯克问，苏联政府将要制定哪些具体措施。我回答，对马立克声明中所说的和我已谈到过的，没有什么再可以补充的了。

柯克问，在停火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回答，这是朝鲜军事冲突之外的问题。

五、柯克问，苏联政府是否知道，马立克的声明是否反映了北京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是否有怎样查明北京观点的建议。我回答，我们不知道，如果美国政府想知道，他会有机会去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

六、柯克问，是否应该这样理解马立克的声明：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战场双方司令部代表的会晤，以便讨论足以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关于停火和停战的协议。我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以马立克的声明作为结论。

七、柯克问，交战方谁应该参加这次会晤。我回答，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应由美国和其他参战国联合国司令部的代表、南朝鲜军队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指挥部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参加。

八、柯克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感到满

意。

柯克附带说明，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的明确性没有把握。我指出，我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已经说明问题了，并且对柯克的第一个问题，即马立克的声明是否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也做了回答。柯克当即指出，要知道，马立克是苏联官方代表，随后，他表示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不明确之处。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向我递交了会谈时所提问题的原稿，他避开会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补充问题。

在会谈的最后，柯克询问了维辛斯基的身体状况。我回答，维辛斯基将很快康复。

出席会谈的有美国大使馆的顾问菲利尔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瑟维斯、苏联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帕夫洛夫。

会谈用英语进行。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181-185

№24831 凯洛夫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要求与苏联中学生通信(1951年6月27日)

机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

在联共(布)中央的许可下，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今年3月份向中国发送了一批礼物：26箱直观教具以及中学实验室仪器设备。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通报，我们赠送的仪器通过中苏友协被

转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罗申通报说，该校是中国最好的中学，其中有4000名学生，281名教师。

向中国赠送礼物的仪式凝聚了友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和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的热爱和尊敬。

在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志请求同莫斯科的某一中学建立通信联系和个人联系，以便交流经验，在地理实验室仪器问题上提供帮助，邮寄地图以及一定数量的体育器材。

教育部对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请求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指定莫斯科市的某一中学进行通信，供中国的教师进行访问，挑选一套地理地图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送给北京的中学。

对于上述通报的内容，请求得到您的指示。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И.А.凯洛夫

1951年6月27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24

№00424 美国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时递交的问题清单(1951年6月27日)

用英语交谈。

一、马立克先生使用了“苏联人民相信”的词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

如果是，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对和平调停采取措施方面给予支持？

二、在“关于停火和停战”这句话中，是否包含特殊意义？

马立克先生在区别这两个概念时，他是指什么？

是否指研究分阶段和平调停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规定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原则，例如，对遵守停

火或停战协议进行监督？

三、“走上和平调停朝鲜问题的道路”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是否指苏联政府将采取某些具体措施？

如果是，那么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四、苏联政府是否知道，马立克先生的声明是不是反映了北京政府的观点？

如果不知道，苏联政府认为应如何搞清北京的观点？

五、是否应该这样理解马立克先生的声明，即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战场敌对双方司令部代表的会晤，以讨论包括足以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有关停火或停战的协议？

翻译：B.帕夫洛夫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186-187

№133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延长苏联工会工作人员在华期限(1951年6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28日

第331项 关于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逗留期限的决定。

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决定延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小组在中国的逗留期限至1951年10月1日。小组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М.Е.叶夫斯特拉托夫、И.С.祖布里林、В.В.库什涅鲁克和А.С.谢苗诺夫。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00425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对中国空军部队的训练问题(1951年6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我现在报告：

1951年6月27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举行了会晤。

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了以下意见：用米格9飞机培训出来的第6、第12和第14航空歼击机师在派往前线前，必须进行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改装训练的期限确定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以便这3个师能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役。

对我提出的额外建设3个机场用于中国师驻扎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聂荣臻已代表周总理致电金日成同志，请求在平壤南面选择地点并在最近时间内建设可供喷气机起降的3个机场。

参加会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声明，以后他们将把米格9战斗机用于学校教学和国内防空系统。

我已经发出指示，第十七、第一一四和第三二八航空歼击机师指挥官立即着手根据批准的计划重新培训中国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四航空歼击机师驾驶米格15战斗机。

克拉索夫斯基

1951年6月28日

第3235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85-86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40-41

№0042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1951年6月30日)

发自北京，1951年6月30日11时2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一)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

(二)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二、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 [90] 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

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

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第3260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90-91

№0042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询问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下面是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道中说：

‘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从不断传来的报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道。

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

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

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第3261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92

№0042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并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二、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

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三、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四、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第3267号电

АІРФ, ф.45, оп.1, д.339, л.93-94

АВІ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2-13

№0042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问题(1951年6月3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28日 [91] 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第335号密码电报

№00430 苏联驻联大代表致外交部函：转交有关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1951年6月30日)

发自纽约，1951年6月30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

现转交联合国秘书处6月29日照会的文本及所附格罗斯6月29日给赖伊的信件和该信所附的两个文件。

“联合国秘书长向苏联外交部长致敬，并荣幸地向您提交驻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1951年6月29日的通告，同时附上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通告中所提到文件的副本。”

“我受统一指挥驻朝联合国军的我国政府的委托提交所附的文件，请您参阅，并散发给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

第一个文件阐述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1951年6月27日对美驻苏大使所谈到的看法。

第二个文件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今天日间给驻朝鲜的共产党军队总司令信件的文本。

我的政府还将把这些文件送给调停委员会主席。

我的政府将经常向您通报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

阁下，请接受我对您最深切的敬意！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格罗斯”

“在纽约和莫斯科，美国试图得到关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声明中几点看法的解释。

苏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昨天日间接见了美驻苏大使。在讨论马立克先生的声明时，葛罗米柯先生指出，举行马立克先生声明中指出的停战谈判，必须由联合国军司令部和韩国司令部的军事代表(为一方)，北

朝鲜和中国志愿军的军事代表(为另一方)来进行。像葛罗米柯指出那样，停战，包括停火，应局限于纯军事问题，而不包括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军事代表应讨论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问题。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苏联政府没有就马立克先生所指出的和平调停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葛罗米柯先生指出，要解决朝鲜问题，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他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国对马立克先生声明的看法。

现在国务院正在研究葛罗米柯先生的想法，并同其他在朝鲜拥有隶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武装力量的国家代表进行商讨。”

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6月29日给驻朝共产党军队总司令信件的文本：

“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受命向您转达以下情况：

我被告知，您可以期望举行会晤，目的是讨论停战问题，这种停战应规定，在维持停战状态的必要保证下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在朝鲜武装力量的所有行动。

当从您那里得到期望举行会晤的通知时，我将准备指派我的代表。同时，我还想提议他能与您的代表进行会晤的日期 [\[92\]](#)。我建议这次会晤可在元山港的丹麦医疗船的甲板上举行。”

(翻译：季莫费耶夫、乌兰切夫)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189-191

№1335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派尤金前往中国(1951年6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30日

第368项 关于派遣П.Ф.尤金同志去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П.Ф.尤金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3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如下电文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尤金同志将于今年7月中旬前往北京，为期3个月。

菲利波夫”

收到请回复，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79、175

№00431 拉祖瓦耶夫致什捷缅科电：朝鲜对停战谈判问题的考虑(1951年7月1日)

什捷缅科同志：

我向您报告：

一、我已通过外交部系统将金日成对谈判会晤答复的文本送出，预计1951年7月2—3日给予答复。

急需得到莫斯科的同意。

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计划由3人组成——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外务省副相朴东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三、建议南日说明以下观点：

(一)停火和停止战斗行动的时间；

(二)从三八线向北、南撤军5—10公里；

(三)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

(四)从朝鲜领海撤走海军，解除封锁；

(五)在2个月期限内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

(六)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赶的居民。

金日成同志在等待菲利波夫的有关建议。

请您指示。

拉祖瓦耶夫

1951年7月1日

第1751号电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3-4

№02543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朝鲜政府应与中国协商(1951年7月2日)

1951年7月3日14时45分发出

拉祖瓦耶夫同志：

您于1951年7月1日发来的电报收到。

请转告金日成，朝鲜政府应就电报中所提诸问题同中国政府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从来电中看不出金日成的方案是同毛泽东协商过的。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日

第4/3208号电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5

No004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建议(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2时1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下面是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朝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

一、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

二、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3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

四、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

五、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

六、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

七、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

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

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第3304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67

№0043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3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我致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同对方代表准备和进行谈判的时间大约需要10天至14天。请你们认真地执行以下几点：

一、在现有的10天时间内尽一切努力增加一线部队的人员，尤其是武器弹药的补给。请高岗同志在10天以内将计划调运的人员、武器和弹药从后方调往北朝鲜，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后，上述人员和装备是不能调运的。

二、在此之前要提高警惕，一线部队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和敌空军对我后方猛烈的轰炸，在谈判前或谈判期间敌方可能会以此迫使我们签署对我们不利的协议。

如果敌人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应转入反攻并击溃敌人。

三、必须下命令给杨成武的两个军和第五十军快速进入指定地区，防止敌人趁机在元山登陆。

我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二军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在西海岸进行登陆。

四、请你们考虑一下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协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

毛泽东

1951年7月2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8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14-15

№004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的中方建议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日13时5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五点：

一、“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二、“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三、“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四、“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第一、二、三点的执行情况。

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

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五、“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五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一、“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

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二、“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

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去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所有问题。

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已把金日成同志就这一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5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8-10

№004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建议的意见 (1951年7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三点的第二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四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五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提到的其他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004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协议的草案 (1951年7月5日)

现送上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的文本，供阅。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

在朝鲜交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为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为另一方)，授权派出代表参加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在朝鲜建立和平的会谈。

双方代表在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一、1951年__月__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

二、双方陆、海、空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公里，在三八线向北和向南10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在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三八线以北属于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属于南朝鲜政府管辖。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

四、双方遣送战俘。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期限内，每一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在朝鲜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3个月期限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毛泽东

1951年7月5日

№24831-1 波诺马廖夫致苏斯洛夫函：对凯洛夫请求的答复(1951年7月5日)

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1951年3月向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赠送了一批直观教学参考书作为礼物。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凯洛夫同志)援引中国同志的愿望，请求联共(布)中央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赠送一些供地理办公室使用的设备和体育器材，并挑选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同中国的中学建立通信联系，并且或许还要供中国教师进行参观。

对外政策委员会认为，应当满足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的如下请求：向中国的一所学校赠送礼物，供地理办公室使用的设备以及一些体育器材。

至于挑选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同中国的中学建立通信联系，那么这个问题应该被推迟到关于苏联的机构同人民民主国家的机构互通信件的程序的问题解决以后再予以解决。中国教师对莫斯科的中学进行访问的问题等到访苏教师代表团到来之后在再予以审议。请求您的同意。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波诺马廖夫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723, л.127

№004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联络官会议情况(1951年7月10日)

密码电报第21632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0日1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9日发来的关于1951年7月8日在开城召

开双方联络官会议的情况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毛泽东同志：

我向您报告1951年7月8日联络官会议情况。

一、上午对方的联络官主要就会谈时间、会议地点的安排及交换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问题发了言。

下午我方联络官宣布了会议参加人员的名单，尔后我们就对方联络官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除了在保证平壤到开城走廊安全的问题上存在不大的分歧外，所有问题都得以顺利通过，对方的联络官两次感谢我们关心他们的安全保障和供应。最后他们声明说，希望会议同样也准备得很好。会谈期间双方联络官没有相互欢迎。会议结束后美国人用帽子向我们致意，我们回以同样的方式。

二、会议期间美国人的通信组织得很好。他们3次用无线电同自己的后方进行联系。上午休息期间，他们告诉后方：‘我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未作任何回答。只好等待。’

下午，在得到指示后，对方联络官3次声明，他们的代表每天会议之后将回到云山休息。我方没有立即答复。

会议期间，大约10时，24架美国飞机分两批掠过开城上空进行示威，但我们对此未予理睬。一架飞机总在空中盘旋，看来它在与地面联系并拍照。

三、美国的联络官刚下飞机时极为紧张。进入会议厅后，马上不停地问哪些是我方出席的联络官，李承晚的联络官在桌旁给美国军官让座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美国人在会议期间小心谨慎，且不想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在联络官宣布对方代表的名单之后，没有马上要我们的回答，看来对方联络官后悔由他们首先做这件事，且害怕陷入不利的局面。但后来美国军官不再拘谨，将自己讲话的全文交给翻译宣读。

上午前两个小时会议气氛比较紧张，直到休息前才开始缓和，下午

气氛平静。我方宣布了会议参加人员的名单并因此打消了对方疑虑。尽管有一些分歧的地方，但为数不多。

四、会前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了提问的内容和会议的形式，相互交换了意见。会议期间主要是朝鲜方面的联络官发言。我们的联络官对他们给予了协助并及时作了必要的提示。关系良好。

李克农、乔冠华 [93]

7月9日11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2-24

№00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号简报 (1951年7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168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1日17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7月10日发给我的4份电报的全文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有关会议进程的第1号简报：

5名美国代表和48名服务人员于9时12分乘直升机和汽车来到开城。在他们进行短暂的休息之后，会议于10时开始。

首先双方代表交换进行谈判的公文。对方代表自己提出第一个发言(他讲话的全文单独附后)，我们未予阻止。

南日和邓华同志发言后，美国代表声明：‘我被授权只讨论与朝鲜有

关的军事问题。你们是否同意在本次会议上只讨论关于朝鲜的军事问题？如果你们同意，那么请你们签署有关文件。’（这时他递给我们代表一份早已打好的书面文件，并要求签字）。

南日同志说：‘这没有必要。’

邓华同志补充说：‘我们的3条建议全部是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些建议说出自己的意见。’

美国代表重复道：‘我们只能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因而无权讨论其他问题。你们的建议，除军事问题外含有政治问题。’

南日同志问：‘请您具体指出哪些问题是政治问题？’

对方的代表们未予回答，却出示下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计划，并请求首先通过日程表（计划单独附后）。

邓华同志请对方代表宣布议事日程计划的第四点和第五点。对方代表回答此次会议不应该讨论具体问题，并请我们以书面形式向他们递交我们的3条建议。接着对方代表声明说，如果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议程存在分歧，那么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反建议。

我们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方建议于15时继续开会。我们研究对方代表提出的议程和其他问题。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1时45分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第1号简报的附件一。

美国代表提出的第2次会议的议程计划：

一、通过议程表。

二、确定战俘集中营所在地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参观战俘集中营的权利。

三、在此次和下次会议上只讨论军事性的并仅与朝鲜有关的问题。

四、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前提是，有防止在朝鲜恢复军事行动的保证。

五、达成关于沿朝鲜领土由东向西建立非军事区的协议。

六、停止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权利和职能。

七、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以使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军事观察小组在朝鲜领土上进行观察。

八、上述军事观察小组的职能。

九、有关俘虏的处理。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1时45分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兹呈上第1号简报的附件二。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团长乔伊第一次发言的摘要(1951年7月10日上午)：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现在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以它的名义讲话。

知道此次谈判的结果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我们的代表团将进行有效的和严肃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协议之前，除根据双方协议建立的非军事区外，所有地区的敌对行动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尽自己的努力以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并创造保障不恢复敌对行动的军事条件。我方代表团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代表团将只讨论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我方代表团不讨论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不讨论与朝鲜无关的军事问题。

今天开始的谈判，成败与否将取决于来到这里的代表团的真实意图。在双方具有诚意的前提下，相互理解的气氛是可以形成的。有了这样的气氛，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成功。这样的气氛存在于真理占优势的

地方。

我，作为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直接代表，想清楚地声明，联合国军代表团有最真挚的诚意，以使每一个人，如果他打算故意造成误解的话，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认为，朝中军队的代表们也同样会这么做。在讨论具体的问题之前，联合国军代表团建议，此次会议只限于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根据研究的结果我们打算在7月10日15时的会上提出以下议程(关于会议的结果我们将作补充报告)：

一、通过议程表。

二、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是：以三八线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

三、从朝鲜领土上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

四、就朝鲜停火和停战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五、停止军事行动后对战俘的处理。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12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9 , л.25-28

№0043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号简报 (1951年7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1677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1日17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10日24时发来的第2号简报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进程的第2号简报。

15时会议重新开始。我方代表将上份电报中列的议程带来研究，并批评对方代表提出的议程。

对方代表同意讨论由我们提出的议程中的第一、第四和第五点，但坚决反对提出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第三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外国军队是各个不同的国家派来的，所以该问题只能根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协议进行讨论。他们就这一点不断地提问。

最后对方代表转入一些小的问题(如关于交通自由)，以便拖延时间，并不暴露自己的立场。

他们把我们的议程计划拿走进行研究，此外对方代表建议把服务人员增加到120人，其中包括20名记者。至于来记者的事，我们礼貌地拒绝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

下午会议气氛不错。南日同志在会上表现从容。17时会议结束。

对方代表团乘飞机和汽车离开。明天8时举行新的会谈。今天晚上我们两次讨论了明天的计划。

李克农

1951年7月10日24时”

1951年7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29-30

**№0044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感谢提供停战谈判情报
(1951年7月12日)**

密码电报第4109号

发往北京

毛泽东同志：

感谢您有关停战谈判的情报。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1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39, л.32

**№0044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3号简报
(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2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李克农同志发来的关于会议进程的第3号简报发给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同志：

兹呈上关于会议进程的第3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首先解决了细小问题(交通和通信问题)，主要的斗争与

以前一样围绕三八线和从朝鲜撤军展开。

下面是我整理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乔伊发言的简要记录。1951年7月11日11时，乔伊在发言中说：

‘我想详细叙述一下你方对我方提议的议程提出的批评。共产党代表称我们议程的第2点不适合在本次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关于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集中营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每拖延一天，就会给俘虏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红十字会的活动遍及所有俘虏并对所有俘虏有好处，与其国籍无关。这个协会帮助俘虏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不带有军事意义。交换战俘是军事问题，而红十字会的工作没有任何军事的成分。

1950年7月，北朝鲜政府声明说，他愿意遵守有关俘虏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原则。这个协议的原则之一写道，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准许访问俘虏集中营。朝鲜政府早该遵守这个原则，但没有执行。

至于声明说，你们代表团认为不应把我们提议的第3点，即在本次会议上只限讨论与朝鲜有关的纯军事问题，列入议程的说法，我方代表团提议将这一点列入日程，是为了限制在会上挑选问题，以便不错过或不超出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讨论范围。所以谁都不应反对将这一点列入议程。

你方代表认为，我方提议的第四点和第五点是表面性的。我方所提议程的特点和措词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会议合理地进行。

特别要注意我方所提议程的第四点。在提出关于停止敌对的和武装行动的这一点时，需要保障条件，在此条件下不会恢复敌对的或武装行动。这样的保证是必需的。当然这一点包含许多不可能具体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用了通用的说法。

至于第5点，我们在昨天的会上已做了详细的说明，现在我们再作更加具体的解释。联合国军代表团认为，双方首先应该粗略地在共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提出要具体讨论的共性问题。

譬如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于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你们提议建立明确的分界线和明确的非军事区。我们却认为，首先应该通过一个关于双

方都愿意建立分界线和中立区及能够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决定。然后，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可以转入讨论建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问题，并因而达成协议。

我们不应该抠议程里的细节，因此建立非军事区的决定应该在下次讨论时通过。这个议程没有责成哪一方制定它的细节。

我们知道，双方同意建立非军事区，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列入议程，作为共性问题中的一个。

尽管在下次会议上，按照议程，有可能就非军事区一事达成明确的决议，但必须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对自东而西走向的有条件的分界线毫无兴趣，它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不提供任何保障且与朝鲜的军事形势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句我方代表请对方代表用英语重复了一遍)。

至于我方代表团提议的第6点，你方声称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

依我们看，如果不成立一个由双方相同人数参加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全权委员会，那么就不可能保障不恢复敌对行动，也不可能保证履行停战的条件。

至于我方代表团提议的议程的第7点，关于军事观察小组的问题，这些由双方相同人数参加的小组将是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耳目。不进行观察，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就不可能完成，停战的条件也不可能履行。

至于我方提议的议程上的第8点，这一点讲的是讨论军事观察小组的组织、他们的权力、他们观察的目标以及他们应该向谁报告。在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和没有通过与之相应的决议的情况下，工作中可能会出现拖拉并有可能产生误解。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看作是次要的，而从议程中删去。

至于你方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最高一级政府机构来解决，因为它超出了本次会议应该讨论问题的范围。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反对将这一点列入议程，因为我们无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全权只能从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

至于你方代表团提议的第2点，我们准备接受，建立非军事区是必

需的，但我们认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谈判在军事意义上停止军事行动。我们的理解是，停止军事行动指的是关于双方在规定的条件下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这个军事首长们之间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丝毫没有提到政府可能会就政治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于地图上任何一个对当前形势没有军事意义的有条件的界线都不感兴趣。

就关于有条件的界线的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条界线无论对战术、当前的军事形势，还是对当地的地形都没有任何关系。

（讲完这些话后，乔伊接着说：‘我们只同意将我方提议的观点列入议程。’当我方代表团团长要求重复最后一句话时，乔伊赶紧声明他收回自己的话。）

南日问：

一、我没有完全明白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同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请您解释一下，对于俘虏们来说，红十字会访问他们和尽快回家哪一个更好些？

二、至于你们提议的第3点，规定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问题，那么除了朝鲜的，还有哪些其他问题可以在本次会议上讨论？

三、说到你们议程第四点中写的敌对和武装行动，我没有完全明白你们所指的敌人是谁。

四、分析一下你们的第五点，你们说，在没有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知道在不撤出外国军队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

五、这个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和观察小组是什么？在讨论议程时对这些没有确切的将理解是困难的。（此后很快宣布休会1小时35分，即到13时。）

乔伊说：‘现在我想回答你方代表团团长今天早上提出的问题。您问，对于俘虏来说，是回家还是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他们，哪个更好些。您认为这不应同时去做，这不对。我方代表团坚持提议让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同时让俘虏们返回家园。如果您同意，那么从明天

起，在俘虏们等待遣送回国期间，红十字会的代表就可以访问他们。

1950年7月13日，北朝鲜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表示准备实现日内瓦协议的原则。这些原则中有一条就是允许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俘虏。人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违背自己的决议和人道的原则。

您请求解释什么是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按我们的理解，停止敌对行动意味着停止在朝鲜所有形式的战斗行动，停止武装行动意味着停止增加武装部队的数量(包括他们的计划、调动、更新装备、补给)和武装进攻的威胁。’

南日打断乔伊的讲话：‘我看您并未完全正确的理解我的问题。

我们很理解什么是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我感兴趣的是，您好像有措施和条件保证不恢复在您的发言中所指的敌对行动。’

乔伊说：‘我过一会儿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是在双方统一条件的基础上实施的，但是，有可能允许双方在停战期间增加自己的兵力。所以如果只执行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措施而没有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的条件，那么在停战后恢复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更加残酷。

您问，如果在外国军队不撤出朝鲜的条件下，用什么来保证不恢复敌对行动。我们认为，这个保证包括以下方面：

一、建立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及相应数量的观察小组。

二、建立非军事区。

三、交战双方的部队指挥官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协议(包括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的权力)，以便保证履行双方通过的决议。

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应该根据双方司令的协议建立，由双方派相同数量的代表参加。

委员会的成员在指定地区的边界上应该有权自由走动，以便能够检查双方执行停止军事行动的共同决议。在执行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同时，委员会应该向双方的司令部通报破坏停止军事行动协议的事实。

军事观察小组是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观察双方是

否真正履行停止军事行动协议的条件。’

乔伊说：‘我的理解是，你们不愿意修改你方所提议程中第2点的措词。你们想使它成为共同的认识。’

南日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乔伊说：‘共同的认识，我指的是我方所提议程的第五点，即关于非军事区的一点。你们提议的是一条纬度线，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纬度线。’

南日说：‘我们已向你方提出了自己的纬度线，你们会提出哪一条线？’

乔伊答道：‘我们没有提议任何一条线。因为这已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你们不想改正已有共同认识的你方所提议程的第2点。’

南日说：‘我们的提议已经带有共同的认识。’

乔伊声明：‘至于你方所提议程的第2点，我们是不会同意把你们提议的有关任何一条明确的界线列入议程。关于非军事区的位置和边界问题应该在讨论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时解决。我想再次强调，现在的会议不把解决问题作为目的。例如，与有关这条明确的界线有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会上讨论。’

南日说：‘三八线不是任何一条虚构的线。北纬三十八度线早就存在了。军事行动正是在这条线上开始的。因此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也应该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依据。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列入议程。’

乔伊说：‘您使我清楚地明白了，您拒绝把我们提议的议程纳入共同的认识。我不能用别的意思解释这一点。’

李克农

1951年7月12日1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7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39 , л.35 42

№0044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记者到开城地区 (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57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4时27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我致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原文，以供熟悉情况。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如果恢复谈判时再提出记者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议程问题完全一致之后双方可以派遣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他们不得进入会场。

关于记者的数量，则需要计算我们能够派多少。

我方主要应该派前线记者。甚至可以从北京派一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记者也参加这个组织。

我认为关于议程的斗争问题还会延续几日。当议程问题通过时，我们可以派记者。

毛泽东

1951年7月12日24时”

毛泽东

7月13日，第3510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46

№0044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2175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3日15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在两次会议期间，美国人为了拖延时间、制造舆论、摸清我们的计划，同时达到休会的目的，蓄意提出记者参加会议。但这是愚蠢的把戏。我们坚决坚持，没有双方同意，新闻界的任何记者或代表不得单方强行接近开城以南。

如果美国人一两天后来进行谈判，那么我们想恢复谈判后，首先确定谈判议程，然后确定双方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不允许他们进入会场的问题。如果美国人无耻地破坏双方同意的纪律，没有记者就不来，那么，我们就不顾这些，将坚持自己的决定，不退让。

关于谈判议程的斗争，南日同志在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3条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实际上是我们的倡议，因此，恢复谈判之后由于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和斗争，我们想提出以下总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了实现朝鲜的停火和停战，首先要接受解决双方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的决定。

三、为了防止在朝鲜再出现敌对行动，要接受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决定。

四、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停战和监督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后俘虏的措施。

上述议程在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需要得到美国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意不具体地把建立三八线列入议程，而将这个问题留在讨论议程的具体问题时再谈。与此同时，关于进行监督的共同意见列入议程的第4个问题，而且在讨论它时可以补充其他具体问

题。

如果美国人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那么我就坚持首先对我们提出的5点议程不作改变。要知道，金日成同志告诉李克农，如果双方同意自己的军队撤离三八线，那时可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放置一旁。

但是，根据总的形势，我们认为需要坚持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只是在表达这些问题时需要指出一个总的思想：在从根本上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解决三八线问题。

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可在一个单独阶段实施。

履行监督可以委托没有参战的中立国家，而双方谈判代表团员应该只完成停止军事行动的任务。

关于交换难民的问题，金日成同志研究的结论是，这对北朝鲜不利，因此这一问题未列入议程。

上述是否全都正确？

请您研究之后做出自己的指示。

现在，我们的军队仍然紧张地同敌人斗争着。如果谈判失败，准备在几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使战争向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化。

毛泽东

13时7分

第351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43-45

№0044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谈判策略(1951年7月14日)

密码电报第4153号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于7月13日给菲利波夫的第3511号密电。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同敌方谈判所有事实，一致认为您7月13日电报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菲利波夫

7月14日”

收到即转

1951年7月14日第1118号

只送斯大林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8

№00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区问题(1951年7月14日)

密码电报第21813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4日17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我致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电报原文，以供熟悉情况。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

一、李奇微通知的目的，是以提出关于建立中立区的问题来掩盖自己的想中止会议的不成功行为(曾提出关于记者参加代表会议)。

为了将主动权掌握在手，我们决定同意建立中立区的建议，甚至同意他们把记者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同时要清除敌方设置的一切障碍。

二、请您立即准备解决有关敌方代表团到开城谈判的下列问题：

(一)中立区应该设在哪里？为了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需要考虑能否尽快疏散中立区的居民(万一需要疏散，不应该使居民财产受损失)。

(二)我们应该不应该在撤离武装力量后，在此留非武装代表维持秩序？

(三)关于在板门店实现双方军官联合办公问题。

三、关于答复李奇微通知的函，我们已经修改过并另电发给您。这个电文将在今天20时北京广播。

毛泽东

1951年7月14日7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1-52

№133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记录：关于苏联公民 前往中国事宜(1951年7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7月16日

第492项 关于苏联公民黄平·尤里去中国。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关于中央体育学院的学生苏联公民黄平·尤里去中国的请求。

№004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4号简报 (1951年7月16日)

密码电报第2184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6日5时9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寄上李克农同志的第4号简报，以供熟悉情况。“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的第4号简报。

今天早晨3时，我们通知敌方在6时派代表到板门店取我们复李奇微函。

9时40分，双方同意13时见面继续开会。

会议开始时，美国代表首先提出建立中立区问题。双方交换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后，具体措施委托联络官解决。最后，美国代表建议休息15分钟。

恢复会议后，我们代表团团长南日就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作了发言(将另电发)。随后，美国代表接着发言。

敌方同意删去他们提出的议程的第2点和第3点。但是，对于我们议程第2点关于确定三八线，敌方代表说：

‘你们把三八线问题同缓冲区问题并列起来，你们的议程具有明确的性质，而我们的议程则是总的。军人不对任何分界线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地理线。你们说，战争开始于三八线，因此应该结束于三八线。你们的逻辑不对。我们坚决反对将三八线问题列入议程。’显然，敌方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使我们让步。规定休息的时间到了，15时会议结束。明天

(7月16日)9时继续开会。

今天会议之后，双方联络官见了面。敌方的联络官没有具体提问，只限于总的一句话：‘我们将按会议商议的进行工作’。之后，他们离去。

今天的会议气氛比较好。同敌方代表团一起来了20多个新闻记者。这种形式同以前确定的记者数量一起共30人，如果不认为摄影偶尔破坏了秩序的话，所有记者表现都不错。

作为结论可以说，自从我们掌握了主动性之后，我们感到我方是正确的和充满信心的。敌方的发言正在研究，并寻找反建议。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17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54 55

№00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中南日发言 (1951年7月16日)

密码电报第21877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李克农同志电文，供阅悉。“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给您呈上第4号简报的附件——我方代表团长南日在7月15日会上发言全文。

‘在上次会议上我听取了你对你方提出的议程的说明。在研究了你方议程和你方的说明后，我确信我对你方议程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不能认为你方提出的议程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方提出的议程是恰当的。我建议

采纳我方为以后各次谈判会提出的议程。

为什么你方的议程是不恰当的呢？

会谈议程应当规定哪些问题讨论，哪些问题不必讨论；哪些问题重要，因而要作为单独一项列入议程，哪些问题按其重要程度不必作为单独一项列入议程，尽管这些问题也同需要在此次会谈中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关；尤其要规定哪些重要问题要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哪些问题应当先讨论，哪些第二步讨论。

根据这种简单规则，你方的议程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把问题按主次分类。现在让我按顺序概略谈谈我的意见。

对于你方议程的第2项，我在上次会上曾经问过，战俘营的地点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权利问题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朝鲜停战的主要问题到底有什么重要关系。

即使我方承认，这个问题同我们的停战谈判有某些关系，但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更令人不解的是，你方议程还规定在谈判过程中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不讨论战俘营的地点问题我们就不能就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问题举行谈判，你方把这个问题放在议程的首位，即放在最重要地位，清楚地证明，你方的议程没有把问题按主次分类。难道不是这样吗？

接着，你方议程的第3项提到此次谈判会的性质。在你方第一次发言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十分清楚、明确地回答了你。我说，我们的谈判会议不仅是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会议。在会上必须讨论军事分界线、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停火和实现停战问题。在我的声明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难道这一点还不够清楚吗？

当然，军事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问题。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候，我们自然会涉及政治问题。

在我们的会谈中可以不讨论政治性问题，而把它拿到相应会议上讨论。难道我的这一答复还不够充分吗？然而你方却坚持把这个问题纳入议程。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任何必要。

我请你方准确地回答我，在我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三项建议，即三项重大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有哪一项不是军事问题。把已经解决了的次要问题列入议程，而且把它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怎么也解释不清。

你方议程的第4项、第3项初看起来好像涉及主要问题，但我要向你方指出，你方对问题的提法混淆了主次，颠倒了因果，用一些抽象词句把主要问题说得含糊起来。你方孤立地提出停止朝鲜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的问题。

你方议程第4项规定：‘在具备确保敌对和武装行动不再发生的条件的情况下停止朝鲜的敌对行动和武装行动。’

大家都知道，如果能明确决定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并且达成使军事行动不再发生的某种保证，那么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并实现停战就不会这样困难，也许早就实现了。

然而，为什么至今朝鲜尚未停止军事行动并实现停战呢？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为了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需要某些条件。不具体地讨论这些基本条件，不把这些条件作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并首先予以讨论，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就不会到来。你方没有把这个主要问题作为单独一项首先提出来，而是含糊地说什么确保朝鲜不再发生敌对武装行动的条件，把这个问题放到次要地位，用次要问题代替主要问题，这当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你方议程第5项也提出了缓冲区的问题，可是又脱离开划定军事分界线问题来研究缓冲区问题，这同样意味着颠倒主次。

我方对问题的提法与你方相反。我方首先明确意识到，朝鲜战争的发生而且未能停下来是因为交战一方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永恒军事线即三八线。因此，为了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必须把三八线变成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把这一点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只有商定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朝鲜停战。

建立缓冲区主要是一个相关的技术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朝鲜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未能停止，未能实现和平，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外国军队参加了朝鲜的军事行动，从而导致朝鲜人民不能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为了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并确立和平，必

须要求全部外国军队从朝鲜撤走。在讨论停火和实现朝鲜停战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先讨论这两个问题。

根据这一原则，我方提出把上述两个问题作为进行停止朝鲜军事行动谈判的主要问题，并列入我方议程的第2项和第3项。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你方反对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列入议程，认为这样做的缺点是把太具体的问题同一般问题混淆起来。你方说，应当提出一般性问题，这样对会议的工作有利。但我方认为，三八线问题是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基本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是承认或不承认三八线的问题，用不着谈三七线或三九线。如果承认三八线，那么朝鲜停战就可能实现。如果不承认三八线，那么停战谈判就没有基础。

马立克在6月23日发言中说过，交战双方应当进行停火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并把己方部队撤离三八线。我方认为，双方把军事分界线定在三八线恰恰是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我很想问问你，归根到底你方承认不承认三八线，承认不承认三八线是军事分界线。

至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认为，这也是保证朝鲜停战和恢复朝鲜和平的同样重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进行谈判，不是为了临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是为了恢复朝鲜和平。

如果你方有谈判的诚意，那么你方有什么理由回避讨论这个与停战直接有关的重大问题呢？你说你方司令部未授权你讨论这个与停战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你是否被授权，这是你方内部事务。我方必须把你方看作是交战双方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全权代表团。而且你方也确实是这样的代表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你方就没有理由讨论一个问题，而不讨论另一个问题。因此，我不得不说，你方没有理由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问题。

我方坚持首先讨论两个重要问题：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的问题和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然后可转入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讨论监督停战条件的执行问题，但我方认为，没有必要单独提出这个问题。你方议程的第6、7、8项全部涉

及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

你方把这些措施拟定那么详细、那么具体，似乎根据你方建议设立起一些机构，靠这些机构就能保证战火不再重演并实现朝鲜和平。实际上，没有军事分界线，不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任何机构都不能保证战火不再重起和实现朝鲜和平。

根据以上所述，我方认为，你方的议程是错误的。我方的议程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会议应采纳我方的议程。’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第3565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56-61

№0044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建立开城中立区的谈判方案(1951年7月16日)

第21890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16日15时23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寄上李克农1951年7月15日21时电报，供参考。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彭德怀同志：

在今天的会议上，双方代表同意在以开城市为中心5英里半径内建立中立区。这个地区在会议期间将是中立的。在这个地区只允许有必需的携带轻武器的维持治安部队。

此外，在5英里半径内的会场周围不允许有武装部队，只允许有必需的非武装警卫部队。为了保证达成协议，我请解方 [94] 同志坚持如下几点：

一、我们的第一三九步兵师及人民军第八步兵师坚持原地不动，但迫击炮以上重火器全部撤出中立地区。

二、从会场到板门店的公路沿线部队后撤250米，并在安排的警戒地点部署隐蔽岗哨..... [95]

李克农

1951年7月15日21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1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62-63

№09858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 (1951年7月17日)

摘自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0年7月27日

第13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1年7月17日陈云拜会了我。在会谈过程中，陈云对我所提出的目前中国财政经济形势问题做了如下估计。

中国今年国家开支为39亿—41亿美元，陈云说，其中包括国防开支(63%)。国家收入为31亿美元。为了弥补赤字，政府打算额外发行4亿美元的人民币，动员人民手里资金4亿—6亿美元(通过征收飞机资金费，增加粮食税和其他税)。

即使开支不超过39亿美元，财政形势也将很严重，不能支撑；如果开支超过最高数字41亿美元，那么形势将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被迫缩减对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的拨款，以避免进一步发行货币而保证前线之需。

陈云指出，尽管中国实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朝鲜战争，中国政府还是保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半年来总的指数增长为6%—8%。政府拥有粮食储备，在必要的时候把粮食投入市场，这样保持了价格平稳。今年春天，政府决定对纺织品实行国家专营。私营纺织厂业主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得到原料，生产产品必须交给国家以国家价格销售。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也逐步实行这种制度，这使政府有可能对私人资本实行监督。

政府在最近1个半月至2个月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量棉花，从7月20日开始，原来因原料不足而停产的许多纺织企业将重新开工。的确，一部分农民至今还企图保留一部分棉花。今年的种棉面积比去年略有增加，今年棉花收成可望达到90万—100万吨。

中国工业基本上完成了1951年上半年生产计划。城乡商品流通日益顺畅，在过去的上半年时间里，城乡商品流通额达到4亿美元。

在1951年半年时间里，中美贸易完全停止了。美国公司表示愿意购买中国商品，但什么也不向中国出口。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把中国商品卖给美国人。至于英国人，他们继续同中国做买卖，但禁止向中国出售橡胶。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通过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分别签订了向中国提供4000吨和800吨橡胶的合同。

在会谈结束时，我问中国财政经济机关怎样进行清理。

陈云回答说，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环节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对其余人员的预先审查表明，财政经济机关中敌对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的比重占3%—10%。现在正在清查和消除钻进财政机关中的敌对分子(占全体工作人员的2%)。对怀疑分子和不可靠分子进行观察和研究。随着对他们的进一步审查，将决定是开除还是把他们调到其他单位。财政经济机关的清理将持续1—2个月。

会谈持续1小时45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004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5号简报 (1951年7月17日)密码电报第21936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你发去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第5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5号简报。

会议于9时开始。乔伊继续就议程问题发言，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他仍主要谈三八线问题和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

对于三八线问题乔伊说：‘主要问题是建立缓冲区。但我方仍反对把三八线一项作为解决缓冲区问题的基础列入议程。对于缓冲区问题，你方坚持要设立一个地区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我们有两条线，即北线和南线。对于这两条线应定在何处的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我方同意首先讨论你方建议的议程的一项，但对文字表述作如下修改：‘建立缓冲区是朝鲜停战的基本问题’..... [96] 对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乔伊说：‘我方十分清楚地声明，我方未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此问题应由更高级一级政府机构讨论。这事不属于我方的权限。联合国军司令部也没有这种权限。因此，我方不抱有讨论此问题的目的。’

乔伊再次指出，本会议是谈判停战的会，而不是和会。他说：‘停战的条件按其性质是临时的。因此，我们作为军方代表是为召开解决朝鲜未来问题的和会架桥，而不讨论和平条件，其中包括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属于军方代表讨论的范畴。

昨天你方说，政治问题可挪到相应会议上讨论。我同意这种说法，并且遵守这种意见。’

随后，乔伊提交了议程修改案(另附)。我方接到此案后建议休会。

在下午的会议上，南日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另附)。

乔伊又声称：‘我方无权创造或改变政治环境。这应推到和谈时解决，此事不是由军方代表决定，而由政府高级机构决定。’

同时他说，根据他们的议程第三项，建立停战委员会和军事观察组是保证敌对行动不再发生的最起码条件。

会议结束后乔伊说，今天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提议我们五名代表照相。明天10时继续开会。

李克农

今年7月16日”

1951年7月16日第5号简报附件一：

敌方代表团今年7月16日上午提交的议程修改案。

一、通过议程。

二、建立缓冲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

三、实现停火和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以便在最终和平解决以前防止军事行动再次发生。

(一)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组成权限和职能；

(二)军事观察组及其组成、权限和职能。

四、对待战俘的措施。

1951年7月16日第5号简报附件二：

南日发言全文：

我方预先研究了你们方的议程。我方认为，你们方现在提出的议程比你们方第一个议程有不小的进步。我方希望，稍加讨论以后能就议程取得完全的一致，以便尽快转入讨论具体问题。但我方认为，你们方提出的议程仍有某些不当之处。

现在我依次谈谈我方对你们方议程的初步看法。对第2项，我方绝不放弃我方先前的立场，即沿三八线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是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因此，我方多次建议，必须把这个问题列为议程第2项。

但是，为了对议程达成协议，我方同意在议程上可以不写上这条明确军事分界线，而采纳乔伊将军昨天的建议，只写上一般的军事分界线，因此建议你们方议程第2项采用以下表述方式：

“为了建立缓冲区，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是停止朝鲜敌对行动基本条件。”

在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我方还要提出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往下，你们方再次提出，我方不应当而且可以不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因为你们方总部没有授权你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方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同本会议而不是同和谈有更紧密的联系。我方一直认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即在朝的部队，是朝鲜敌对行动不再重演的最可靠保证。

此外，我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本会议变成通向最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桥梁。因此，必须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放到我们的会议上讨论，并把它放在议程的重要位置。

具体地说，我提议把这个问题列为议程的第3项。

你方议程的第4项同以往的提法相比有了大的进步。进步在于你方以前把停战的观察问题分为三个单项列入议程，现在把它并入第4项。

我昨天发言曾指出，在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时，自然而然地要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分歧不大。

至于你方的第4项，我方可以说，在议程内不必把它提得那么具体。我方打算把这个问题再研究一下并发表我方的看法。

毛泽东

7月1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64 67

№0045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议程等问题的方针(1951年7月18日)

密码电报第21960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17日我给李克农、金日成和彭德怀等同志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彭德怀同志：

7月16日和17日电收悉。

既然我方代表团提出了己方议程，并宣布是正式议程，那么你们就要坚持它，尤其要尖锐地提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是保证朝鲜敌对行动不再重演的必要条件。

我们有充分根据提出这一条。(各个国家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朝鲜来，是为了打仗的，不是闲逛的。为什么停战谈判会有权讨论停战，而无权

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呢？显然，这是解释不通的。因此，我方应当坚持，既然会议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

必须让敌方相信，我们十分坚持这一点。

在最近几天内，我方在建立中立区和记者问题上、在执行停战和监督停战机构等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

敌方可能形成一种错觉，只要继续避而不谈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仍会做出让步。因此，敌方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不应引起你们恐慌。

你们应当继续驳斥敌方拒谈此问题的错误观点，而不同他争论这个问题属于什么问题：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为了不落入敌方故意设置的逻辑圈套，你们就要强调，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

为了敦促敌方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上同意做出一些让步，必须再斗他两三天(如敌方代表不发言，我方就详细说我们提出这一条的正确性)。例如，如果敌方同意停战后立即召开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的会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才能同意考虑修改这一条在议程上的措词。如果敌方不作这种让步，我们就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方不要提议休会和表示打算中断会议，但也不要害怕敌方中断会议。

我们认为停战条件执行机构宜由交战双方代表组成，而观察机构由中立国代表组成，但是，目前还不宜就此问题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毛泽东

1951年7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68-70

№0045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6号简报

(1951年7月19日)

密码电报第22005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今年7月18日20时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6号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6号简报。

在上午的会议上敌方对我方提出的议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己方议程第三个方案(另附)。

敌方仍拒绝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并且声称，他们已多次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再不打算提它了。语气很坚决。

在下午会议上，我方代表在批驳敌方代表的发言和他们提出的议程时坚决要求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我方代表发言全文另附)。

敌方代表重申，他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方以充分的根据批驳了敌方议程第二条的‘若干条线’这句话。这一条写了这样的话：‘划定军事分界线或若干条线。’敌方无话可说，只好同意我方议程第二条的写法。

李克农

1951年7月18日20时”

第6号简报附件一：

在1951年7月18日下午会议上敌方提出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建立缓冲区，划定军事分界线或若干条线作为停止朝鲜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实现停火和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监督停火和停战机构组成，权限和职能。

四、对待战俘的具体措施。

第6号简报附件二：

“我方研究了你们方在上午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和你们方提出的议程。

我认为，在你们方议程与我方昨天提出的议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原则差别。为了就议程迅速达成协议并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我方对议程已作了很大让步。然而，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方无论对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即三八线问题，还是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仍然或者公开拒绝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或者从问题的提法上仍然拒绝承认双方军事分界线即三八线。我认为，正是在这些方面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

对于三八线问题，我方已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意在我方议程内代替‘三八线’采用了一般的即抽象词汇，即‘划定军事分界线’。这种措词的含意十分明确，即我方建议的军事分界线是一条线，即三八线，而不是两条线，更不是三条线。

我认为，沿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是我方议程第二条的最主要内容，也是谈判的基础。一旦把三八线定下来，双方马上就可以解决缓冲区的问题。

当然，缓冲区应当有两条线，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异议。不过，说到这两条线，只有把三八线定为基准线以后，才能确定上述两条线同三八线的关系，即派生关系。就如同你不能把一名父亲同他的两个儿子称作三兄弟一样，也不能把一条稳定的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区的两条线等同看待并把它们叫作多条线或若干条线。根据这一点，我方反对把‘或若干条线’的说法列入议程内关于划定军事分界线的一条。

否则就违反了我方立场，破坏了谈判的基础。我方绝不能同意你们方的措词。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已向你们方作了很大让步，再也不能退让了。

此外，自从会议开始工作以来，我提议由会议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中，最主要的是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是驳不倒的。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达成朝鲜停火和停战以及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这是朝鲜军事行动不再重演的必要的和最可靠的保证。既然我们想进行停火和停战谈判，我们就绝对应当讨论和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面临着实现朝鲜停战的任务，既然我们同意无论如何要防止朝鲜战争重新发生，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讨论和解决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呢？难道停战以后不撤走外国军队能保证朝鲜军事行动不再重演吗？难道可以停战而把外国军队留在朝鲜闲逛吗？不，不行。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朝鲜停战并且要求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朝鲜不再发生军事行动。这个道理是推不倒的。你们方以各种借口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我方一再批驳了你们方经不起一驳的站不住脚的理由。

我觉得，我们坐在这谈判桌上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我们应当说真话，没有任何理由促使我们说假话。如果你方同意这个话，那么，你们方就不该也不能拒绝讨论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

因此，我方坚决要求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作为议程内的主要问题按照我方议程的提法列入议程。

对于监督停战条件执行的机构问题，我方在议程上也作了很大让步并清楚地表明，我方希望讨论建立这种机构的问题。

对于该机构的权限和职能，我方打算在对这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发表我方的看法。

此外，在对此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时我方也想了解你们方的看法。但是，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你们方就此问题发言时说了许多具体事情，给我方造成的印象是，似乎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你们方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方。我方对此是不能同意的。

至于说到双方提出的议程，那么，你们的让步或者只属于不该列入议程的问题，或者只涉

及不该作为单独事项列入议程的问题。

属于第一类让步的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参观战俘营的问题；属于第二类让步的有监督机构的问题。

至于我方的让步，全都是在议程上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例如，为了达成协议，我方放弃在议程中写上‘三八线’一词。

又如，在监督机构问题上，我方采纳了你方的一般性措词并列入了议程。

我们希望，你方同意我方提出的议程，以便双方会议尽快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毛泽东

1951年7月19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71-75

№004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停战谈判中的策略问题 (1951年7月20日)

密码电报第22049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今年7月20日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7月19日第7号简报及附件收悉。我以为，在今天的会议上敌方可能仍然坚持把已达成一致的4点列入议程，必然拒绝讨论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且拒绝回答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问题。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会议拖延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敌方这时可能发动进攻，以迫使我方或是按这4点议程进行谈判，或是表明自己对停战会议的最后态度。

如果敌方未得到我方具体答复，他可能建议休会1—2天，等待我方答复。如果今天的会议出现这种转折，那么，你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被动，为了掌握主动可首先提议休会3天，以便双方研究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停战谈判，这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意愿。

如果今天的会议上出现会议拖延的征候，就不要在乎，而争取再开1—2天会，但绝不能再长了。请灵活运用这些指示。目前，我们在拟定最后的反建议。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第366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83 84

№0045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7号简报 (1951年7月20日)

密码电报第22053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19日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及其附件，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

会议10时开始。

首先南日问乔伊他是否同意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乔伊说：‘双方同意列入议程的4项中足以保证达成停战协议了。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不能说别的新意见了’。

随后，南日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另附)。接着乔伊提议休会。

复会后乔伊声明：‘无论你方用什么手段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我方都不能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

接着南日按照发言内容的精神就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一项提了一连串问题。

敌方代表对他的下列问题无言以答：为什么他们不同意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停战以后外国军队留在朝鲜干什么。

敌方感到十分难堪。

今天南日把问题提得很巧妙。当敌方代表对我方的提问无言以对时，便接连吸烟，以摆脱窘状。有的则不断挠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会上我方代表大胆发言，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而敌方则表现被动。

在今天的会议上，由于准备充分，我方的翻译和发言都比过去有进步。今天的会议持续了2小时20分钟。明天9时继续开会。

李克农

1951年7月19日17时”

会议情况第7号简报附件：

南日发言全文：

“你方仍无理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我方深表遗憾。我希望，你方重新深入、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再次阐明我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为了就议程问题迅速达成协议并尽快转入对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我想耐心地再次详细说明我方对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坚定立场。

我们会议的目的是在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朝鲜停战。此外，我们停战的目的还在于结束朝鲜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从朝鲜全部撤走所有外国军队。只有如此，才能完全实现朝鲜停火，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朝鲜战争重演。

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是朝鲜战争及其持久不停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个主要原因，才能保证朝鲜战争不再重演。

因此，十分明显，出席会议的你方代表一方面反复提议要为防止敌对军事行动的重演提供保证，而另一方面却拒绝在本会议上讨论并且解决保证朝鲜不再重起战火的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这令人有理由认为，回避此问题的一方对停战没有诚意。

还要指出，为了拒绝讨论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你方臆想的一切理由都是站不住的。既然我们会议的使命是讨论和决定停火和停战的问题，那么，停火和停战的目的还在于结束战争、重建和平。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并且解决保证战火不再重演的根本问题，而这恰

恰是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的问题。

你方拒绝讨论和决定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问题，表明你方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诚意。

战争不是闲逛，军队不是游客。如果实现了停火、停战，而军队仍然留下来，那么，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观赏朝鲜美丽的自然风光。我方要坚定地申明，对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的态度是有无和平诚意的试金石。我方认为，在朝鲜停火和停战的目的是结束朝鲜战争，重建朝鲜和平。因此，我方断然坚持把从朝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问题按照我方议程和提法列到议程的重要位置。这是我方不可改变的要求。

我方希望，你方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改变你方立场，以便尽快就议程达成协议并迅速转入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

7月20日

第366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85-87

№0045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 (1951年7月20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5次会议期间，我们与敌人在议程上已达成三项协议。

一、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二、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三、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

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况，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

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

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但是在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把敌人赶出南朝鲜。

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

如果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说明我本人对解决

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

马立克同志说，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

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列入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第3656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88-91

№0045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关于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1日)

密码电报第22073号

发自北京，Г类电文

绝密，不得复制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0日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电文，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1951年7月17日22时和1951年7月20日3时30分电收悉。

一、根据上述两电指示我们开始准备工作。

二、今天本地下暴雨，板门店地区桥梁被毁，美方代表未能到会。

三、从美方代表在前几次会上的发言、艾奇逊今年7月19日声明以及《纽约时报》7月19日社论可以看出，美方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四、估计明天复会后由于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而使会议拖延下去可能性不大。

更为可能的是，敌方重弹老调并且要求按照4项议程讨论实质性问题。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在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方面主动向敌方提出问题。如果敌方有意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将进行有限的斗争，以便拖延一下会议。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敌方只是重复旧话不做任何让步，那么我们就提议休会3天。

在1951年7月25日10时复会后，我们便要求敌方再次研究我方观点，同时声明，我方想研究敌方观点。

然后，在会议结束前我们再次说明，我方坚持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

在说明中我们故意暗示，只要求敌方同意把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而转入讨论后可把这个问题交到另外的会议上讨论。

我方代表发言稿已经拟好，另行交付。

李克农”

毛泽东

1951年7月21日

第367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0045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不把撤军列入议程 (1951年7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7月20日来电收悉。我们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不再坚持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在谈判中你们充分利用撤军一条，一方面显示出你们热爱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敌方不想加快和平进程。现在则可以于事无损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议程。 [97]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21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92

№09928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朝鲜战争前景及中国 政治形势(1951年7月24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1951年7月27日

今年7月24日，我拜会了周恩来，与他最后敲定签署“大连造船厂”合作经营协定的时间问题。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并说协定本月底可以签署。其后，我们又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请周恩来谈谈他对朝鲜谈判前景以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欣然同意，对朝鲜谈判前景和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几个问题谈了以下看法：

周恩来说，在一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损失了15万人，在战争中耗费了100亿至120亿美元，但是他们未能占领北朝鲜，未能打到中国边境，而且也不能保证，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就能战胜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因此，美国人想从朝鲜战争脱身，但是要有多少体面些的条件。

朝鲜谈判中主要的争议问题是美军撤到三八线和从朝鲜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美国人拒绝撤过三八线。同时他们不能不考虑，如果他们拒

绝以和平的方式这样做，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赶过三八线。因此，在三八线问题上看来美国人会做出让步的。

但是，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上，美国人未必会做出让步。他们深知，如果他们的军队撤出朝鲜，那么李承晚政权就会垮台，接着日本的形势也会加剧。只有等美国人改编了李承晚的军队和武装了日本之后，他们才会分批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艾奇逊和马歇尔在他们的讲话中都做过这样的暗示。

考虑到这些情况，朝中司令部将坚持要求美国军队撤到三八线，如果美国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就用武力把他们赶过三八线。但是朝中司令部没有坚持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而是建议在停战后讨论这一问题。

即使在朝鲜达成停战协议，围绕朝鲜问题仍然会有复杂的斗争。靠战争发财的美帝国主义者会竭力利用朝鲜冲突，维护美国的战争狂热，以使他们搞军备竞赛和准备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变得容易些。中国方面将围绕朝鲜问题开展争取和平、反对美国战争贩子的斗争，努力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关心这场斗争。

接着，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对朝鲜冲突的态度时说，中国劳动人民群众决心为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和解放台湾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停战，希望停战能为他们的企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民主党派也希望结束朝鲜战争。但是，这些党派中有两派，接近中国共产党的左派支持政府巩固国防的措施，主张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国武装力量的能力；右派主张尽快结束朝鲜冲突，不要使这场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消耗中国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这些右派中，有一批人当年是亲近蒋介石政权和美国人的。其中一部分搞破坏活动的人已经被揭露。每揭露一次破坏活动，我们会给民主党派拿出无可辩驳的罪证，他们没法反对我们镇压这些分子。另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搞破坏活动罪证的右派分子，已经被孤立起来了，对他们正在进行监视。我们要尽量搞清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

在话题转到国内政治形势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由于成功地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搞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中国的政治形势得到巩固，统一民主阵线得到加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得到提

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内的威望也提高了，人民更加相信政府稳固而且有力量，工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1951年过去的半年是中国激烈进行阶级斗争的半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国内的政治形势巩固了，统一民主阵线巩固了，扩大了。

接着我问周恩来，现在中国政府面临哪些主要困难。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面临两大困难，这两大困难由于战争还在继续而加重了。第一个困难是财政非常紧张。战争开支现在已经消耗了60%以上的预算。同时经济也急需投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但是，周恩来补充说，如果朝鲜战争能结束，那么中国很快就会摆脱这种艰难状况，进行货币改革，增加对经济建设的拨款，提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面临的另一大困难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许多年来中国的革命是在农村发展的，老干部有在农村和军队工作的经验。但是，在500万党员、500万部队官兵和600万职员中，几乎没有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专家。最近几年从大学来的青年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水平。旧国民党技术干部的水平也不符合中国工业化的要求。假若没有朝鲜战争，没有对这场战争的大量拨款，中国政府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战争现在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它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后，我请周恩来概括地讲一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两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盟国家以及曾经或者仍旧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他国家，属于第一类国家。中国同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与他们的驻京代表建立了接触。中国政府尽量以此利用这些国家，为我所用，同时进一步加剧他们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这类国家中，我们只是不与以色列建立关系。中国政府考虑到，与以色列建立关系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这样做会使我们与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关系恶化。至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在一些场合中支持中国。

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瑞士等国属于另一类国家。对这些国家，中国视他们对中国的政府奉行对等的政策。中国始终乐意支持他们的一切友好倡议，同时始终坚决回击他们敌视中国的行动。这些国家中，英国和法国因为担心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命运，害怕把对华

关系搞得过于紧张。同时，如果朝鲜战争结束的话，他们无疑会关心扩大对华贸易。中国可以卖给他们农产品以及其他中国不需要的原材料(战略物资除外)，向他们购买设备和机器。

谈话时在座的有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

АВР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3, л.44-51

№09868 罗申与董必武会谈纪要：中国的国内局势 (1951年7月25日)

7月25日我去拜会了董必武。在会谈过程中我请董必武讲了中国政府最近的新立法文件和各界群众对这些法令的态度。

中国政府最近一年里通过的一个主要法律，董必武说，是基层政权机关组织法。根据这一法律，完成土改的地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和地方人民政府。广大人民群众被吸收参加基层政权机关的工作。基层政权机关的结构得到整顿划一。这些措施使地方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

在中国其他地区，基层人民政权机关将随着土改的进行和地主的被消灭而建立。

去年10月和今年2月颁布了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尽管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总纲中有镇压反革命的条款，但到去年10月之前，并没有同反革命进行严肃的斗争。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具体的镇压反革命的法律，不知所措，不敢对反革命贸然采取镇压措施。所以许多罪犯还逍遥法外，没有受到惩治。

由于美国侵略朝鲜，中国的反革命分子活跃起来，政府面临着加快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在同各民主党派协商之后通过了惩治反革命临时条例。1951年2月21日颁布了新的法律，对这一条例补充了许多具体的条款。这两个政府法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他们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手中镇压反革命的武器。到今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

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分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不至死的犯罪分子也被枪毙了。

今年5月，召开了公安机关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做出了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

同时还做出了减少监狱关押人数的决定。监狱中所关押的100万人，一部分将被枪毙，一部分释放，剩下的罪犯将被放入劳改营改造。减少监狱人数的工作需在今年9月前完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公安部向地方派出了12名领导工作人员。

接下来董必武讲了国家机关的清理。他说，国家机关清理是镇反运动的一部分。在清理过程中，对1947年以后进入这些机关的所有人员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例如，公安部揭露出了一个原国民党宪兵上校，新民盟(新民主青年联盟)中央的一个技术秘书曾企图刺杀冯文炳，但国家机关中这样的敌对分子并不多。

在中国政府其他重要法令中，董必武还提到了高校学生招生和分配制度。董必武补充说，这一措施使有可能理顺大学生的招收和分配工作，扩大高校里工农出身的学生的比重。

此外，国家行政管理委员会还提出了国家预算执行程序法并提交政府审定，其中规定严格遵守预算拨款，完成预算收入，严格执行会计制度。这一法律对稳定国家财政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在会谈结束时，我请董必武给大使馆一本中国政府重要法令汇编。

董必武当场让秘书给我找了一本中国政府重要法令汇编。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一等秘书贾丕才。

共4份，送：葛罗米柯同志、佐林同志、远东司，归档

1951年7月26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3, л.57

№00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李克农停战谈判策略电(1951年7月26日)

密码电报第22209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5日16时李克农同志给我的电文，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

一、根据敌方代表在今天会上的发言，敌方对我方新建议的反建议和提议明天13时继续开会来看，敌方似乎担心会议破裂并且要认真研究我方建议。也许敌方将采纳我方新建议。因此，请您今天暂不发表南日的发言，推迟到明天会议结束后再发表。

二、如果在明天的会上敌方无条件采纳我方建议，那么，会议将会立即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首先应当讨论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坚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到后天上午或下午的会议我们才做某些让步。

三、估计敌方对三八线问题不会马上做出让步。这个问题只有经过三五天的斗争才可能解决。我们力争这个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我们正研究此问题，拟提出自己的理由。

请您对以上各点给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7月25日16时”

毛泽东

第374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98 99

№0045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9号简报 (1951年7月26日)

密码电报第22210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第9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9号简报。

会议于10时开始。乔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谈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由于他的发言中有一个错误论点，认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反而会引起军事行动再次爆发，我方提议休会两小时，以便准备充分批驳这个论点。我们内部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决定补充一下南日的发言稿。

下午复会，南日宣读了发言稿。在上午的会议上，乔伊在发言中对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讲了下面一些话：

‘我方同意在讨论停战措施问题时给你方充分机会，对预定问题，例如对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发表你方的意见。当然，每方代表团都没有义务绝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是适当的，上面这些话并不贬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对解决整个朝鲜问题的重要性。

联合国以及出兵朝鲜的各国政府的公开声明都承认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问题应当由各国政府通过最后决定来解决，而不能在达成停战协议之前或把停战条款付诸实施之前单独讨论。

由于双方已达成相互谅解，即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双方均可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联合国代表团 [98] 看不出扩大议程的必要。我已说过，同意在讨论停战措施时给你方充分机会以发表关于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的意见。’

随后，乔伊提议对4项议程进行实质性讨论。13时复会后南日宣读了自己的发言稿。乔伊索要我方建议正本。我们将英文译本交给他本人。此后敌方建议休会30分钟。

复会后乔伊接连提出几个问题：‘要不要在讨论4项议程并达成协议后马上讨论第5项？换句话说，要不要在对4项议程签订协议后马上讨论第5项？或者说，如果对第5项达不成共识，对4项议程签不签协议，还是在4项议程的协议生效后再讨论第5项？’

南日回答说：‘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实质在于对讨论第5项有无诚意。’

随后，乔伊提议明天13时开会，他将对我方建议给予答复。

李克农

1951年7月25日15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26日

第3749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100-102

№0045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0号简报(1951年7月27日)

密码电报第22244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6日16时20分接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

第10号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0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于13时开始。乔伊首先表示同意把我方提出的第5项列入议程，同时他声明，通过的议程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完全不能对他们起限制作用，但他们对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抱有诚意，以便能达成双方所关注的协议。

随后，全文宣读了我方写的议程并正式通过。

接着，乔伊说：‘根据议程起草的停战协议应当包括以下5点：

一、前言部分；

二、缓冲区；

三、停战的具体措施；

四、战俘；

五、结束语与建议。

这是我方的大体意见。’

我方对此未作任何答复。

乔伊继续发言，提出了起草停战协议草案的具体办法，就是：在双方代表团对列入议程的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应把单项问题的协议文本交给双方参谋人员单独起草停战协议草案，然后双方互换草案文本。如果双方同意采取一份统一的草案，双方代表团应正式通过此草案，如果参谋人员不能草拟出统一的草案，则双方代表团还要讨论此草案。我方宣称，可以试用此种办法。

随后乔伊宣读了预先起草的停战协定前言部分的草案，并把它提交我方研究。

会议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

我方向敌方提议首先从议程第2项开始讨论。

敌方建议明天再提具体意见。

南日宣读了关于我方坚持把三八线作为缓冲区军事分界线的发言稿（见另电）。至此会议结束。

明天9时继续开会。

今天的会议结束前乔伊建议在报界公布对议程达成的协议。公报全文另附。

请研究公布南日在昨天下午会议上的发言，以便让读者充分了解形势。

李克农

7月26日16时”

附件：

南日在7月26日下午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我方坚决主张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和每方从三八线以南和以北撤退10公里以及在该地区建立缓冲区。我方此项建议的理由是举世皆知的：

一、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符合举世公认的历史实际。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实际上是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

二、战争爆发正是因为交战一方首先破坏了三八线这条分界线，而战争未能停下来则因为交战一方不顾朝中人民的抗议，再次破坏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

三、目前的战线不能作为双方分界线。在达成停战协议并付诸执行以前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战线。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在进行战争的地方停止军事行动。

三八线是双方唯一合理的分界线，它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既然双方在三八线以南和以北占领着一定地区，那么，双方从三八线撤走部队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如果划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那么，建立缓冲区问题立即就可以解决。我方建议双方部队从三八线这条军事分界线后撤10公里，就能建立起缓冲区并隔离双方的武装部队。

这样，双方就可以保证避免一方的部队对另一方占领的阵地发动突然进攻。”

毛泽东

1951年7月27日

№0046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停战谈判中应严厉驳斥 美方(1951年7月28日)

密码电报第22265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8日3时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文，供阅悉。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7月27日第11号简报及附上的乔伊发言全文已收到。

一、乔伊的发言是狂妄无理的。他不是进行停战谈判，而像是在叫阵。

你们在下次发言中应当质问乔伊：他想不想实现停战，还是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然后，你们要严厉驳驳他所谓海空军对陆军战斗的影响和在地面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的情况下海空军将继续行动的怪论。

对于海空军对陆军战斗行动的影响，那么在这方面明显的事例是，去年敌军在大邱地区失败后的撤退和今年敌军退到南汉江。

对于在陆军停止作战行动的情况下海空军继续行动，如果敌方真有这种想法，那么这就表明敌方根本没有诚意。

二、根据乔伊的发言，我方必须顽强坚持以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阵地。只有驳回敌方的无理要求才能粉碎敌方以为我们会步步退让的错误观点。

对于这一点，必须给敌方一次机会再争论几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敌方才可能重新考虑这一点。

如果敌方敢在这个问题上使谈判破裂，那么只要把此事公诸报端，他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毛泽东

7月28日3时”

毛泽东

7月28日

第378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114 115

№0046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2号简报(1951年7月29日)

密码电报第22301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8日16时收到的李克农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第12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2号简报。

在上午的会议上南日同志首先发言，驳斥了敌方昨天发言的错误观点。我方代表的发言十分有力、完全有理，敌方表现十分被动。南日发言后，敌方建议休息两个半小时，并派己方代表乘直升机去釜山。显然，他们想受领指示。12时30分复会。

乔伊重复昨天的怪论，强调海空军优势在他们一边，因此，在撤走他们的海空军时，我方也应均衡撤走自己的地面部队。他声称，在上次战争期间他们正是靠自己的海空军战胜日本的。

接着，乔伊说：‘三八线没有军事意义。自从去年联合国军从洛东江一线转入反攻后，现在的战线一直是最稳定的。我们不应从历史的或其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只应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那么你方就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乔伊在结束发言时强调，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必须考虑到海空陆军的行动范围。随后，南日发言批驳了乔伊的发言。今天，双方各持己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斗争还将持续几天。明天，我们继续批驳敌方昨天和今天发言中的怪论。

李克农

7月28日16时”

第12号简报附件一：

南日在1951年7月28日上午会上的发言全文

“昨天，我十分惊讶地听了你方代表团团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意见，看了在你方地图上任何一个人用红蓝黑铅笔都能划得出来的三条线，无疑，其中一条线就是你方建议的军事分界线。然而，我不认为这几条毫无根据地划出来的线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听了你方提出这几条线的理由后，我更感觉到，这几条线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你方的理由是没有道理，是可笑的。为了替你方划的线辩解，你方说了什么呢？你方认为，为了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作为根据，必须研究目前的实际形势，而且不应受有关政治问题和地域问题看法的影响。在研究所谓军事问题过程中你方又提到军事实力问题，认为你方拥有海空军优势。因此，你方便提出必须把陆地的分界线划在你方陆军现在所占地区之前很远的地方。你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实际的军事形势。我方认为，这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军事观点。我方还认为，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必须正确地研究战场的实际军事形势。

然而，我们是把停止军事行动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来争取实现的，而且不想重新打仗。因此，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除了研究目前战场上的实际军事形势外，还要研究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利的因素。在这方面你方发言的总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炫耀你方所谓的军事力量和威力，散布恐怖情绪。你方应当明白，靠这个你们是谁也吓不倒的，相反这只能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即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带来危害，而不会带来好处。

你方说，停止你方海空军行动，即使在我方把部队撤到平壤元山一线的情况对我方也是有利的。我要问一问，你方在拥有海空军掩护的有利条件下，为什么未能守住平壤元山线，而赶忙退到汉江以南地区呢？

我十分真诚地劝告你方，这种不严肃的论调吓唬不了谁，也不会给我们的谈判带来任何好处，今后最好还是不要说这种话。当然，谈到目前战场上的实际军事形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这种军事力量首先是由双方使用的各军种现有兵力组成的。然而，如果仅仅把这一点看作是双方军事力量的完整定义，那就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方一点也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尽管你方使用了你们的空军和海军，但你方的战线却从鸭绿江畔一直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地区。难道这能用某一个军种的力量来解释吗？不，不能。形成军事力量的基础比你方强加于人的所谓各军种实力的肤浅理论要强有力得多。这个基础包括人力资源、军队士气和交战双方的政治条件。

当然，我没有时间讲解军事理论问题。现在我只想谈谈你方3个战场、3个军种(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可笑理论。现在每本《军事教科书》都说，军事力量是各种力量的总和。任何一个军种成绩都依赖于同其他军种的协同。这就是说明，你方陆军所取得的暂时成绩都同海空军的协同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地面的整个形势集中反映了你方陆海空军的总体军事实力。实际上，你方只是靠海空军并通过反人道的、违反国际法的野蛮轰炸，才暂时维持了你方陆军现况。假如没有这种野蛮轰炸的掩护和支援，那么，你方陆军早不知退到哪里去了。

此外，我还要指出，你方海空军的野蛮轰炸给我国和平城乡造成了巨大破坏，炸死炸伤了我国无辜的平民，但根本吓不倒朝鲜人民，也逼不退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方逐步克服了你方轰炸给平民造成的困难并且迅速向前推进。这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你方却鼓吹什么三个独立的战场。在地面你方也曾建立了某些独立王国。只要一停止敌对行动，你方就将付出代价！因此，为了你方的利益，你方提出的军事分界线便远远地划在了我方境内。你方这种逻辑只能欺骗神志不健全的人和疯子。

因此，你方根据这种站不住脚的理论所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毫无基础，从而不屑一顾，不值一谈。相反，我方提出的沿三八线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草案，从军事角度上说，相对反映现阶段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

考虑到我们的谈判应当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该草案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

现阶段的战场特点有哪些呢？从今年开始，战场形势就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自从我军通过进攻到达水原、原州、平昌三八线以南后，战线有时在三八线以南，有时在三八线以北。对于这一点，你方和我方都是清楚的。目前，我方和你方的军队位置也在变化。只要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种情况就将继续下去。

因此，不能认为，目前的战场形势反映了实际军事行动。这类想法(仅把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为划定军事分界线的根据)不能反映实际的军事行动。因此，你方的建议不值得讨论。这就是从朝鲜战场的第一个特点得出的结论。

此外，现阶段战场的另一个特点是战线不断变化，但基本上未越出三八线地区的范围。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清醒的军事观察家或司令官都会承认这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根据最近的形势，必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现阶段，三八线邻近地区反映着双方战场形势。因此，我方根据纯军事的理由认为，划定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是合情合理又切实可行的要求。由此我方具体建议按以下顺序讨论议程的第二项。

一、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二、双方武装部队从三八线后撤10公里；

三、建立20公里宽的地区为缓冲区，双方从缓冲区撤出武装部队。

在我具体批驳了你方昨天的论调以后，我再次质问你方：你方来这里发表这种站不住脚的论调是为了进行和谈还是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我正式请你方回答我这个问题。”

第12号简报附件二：

南日在今年7月28日下午会议的发言全文：

“我对你方昨天的发言进行了必要的批驳。同时我指出，你方站不住脚的论调是可笑的，也提出了我方对停战谈判的正确意见和建议。我未料到，今天你又重复昨天的话，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昨天你讲到了你方海空军对陆军战斗行动的某种影响。我方已指出，你们的海空军除了野蛮轰炸和平居民和破坏和平城镇以外什么也干不成。如果你坚持己见，那么，为什么你们去年在大邱地区撤退，今年又退到汉江地区呢？

在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不断听到你方炮兵疯狂射击，但是，除了打死和平居民、破坏和平乡村以外，它起不了任何作用。

既然你方昨天和今天发言的总体内容都一样，那么，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方，以后最好不

要再说这种话。昨天，你方说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即在地面实现停火的情况下海空军可以不停止行动。今天你又重复了这一点。这无非说明，你方为扩大战争制造借口。因此，你方的和平意愿值得怀疑。

我方出席会议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和鼓吹战争，而是为了进行停战谈判，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架设桥梁。我方本着这种精神，从会议一开始便有理、有节地对待各种问题。

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完全证实了我方对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我方抱着这种态度，是为了停止战争和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要求，而不是追求其他目的。如果你方具有停止朝鲜战争的诚意和愿望，那么你方就不应再重复你方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应认真考虑并且接受我方对议程第二项的合理建议。对于你方的其他建议，如我认为必要，以后将发表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

1951年7月29日

第379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116-122

№0046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3号简报(1951年7月30日)

密码电报第22318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29日16时接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13号简报，供阅悉。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3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继续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展开斗争。南日在上午的会上发了言(附上发言全文 [\[99\]](#))。他坚持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敌方发言反对这一点，并声称，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军事形势，而且保留在战术上有利的阵地，以便双方能防守自己的阵地。

在下午的会议上乔伊称，他仍然坚持标在7月27日地图上的那条军

事分界线。

我方断然坚持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15时5分敌方提议休会。
明天10时继续开会。

目前，我们准备继续驳斥敌方的无理论调。我们认为，在三八线问题上的斗争还将持续几天。

李克农

1951年7月29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30日

第3811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123 124

№004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补发美方对缓冲区的意见 (1951年7月30日)

密码电报第22328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补发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上午会议上的发言全文，供阅悉。

“第11号简报附件一，即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上午会议的发言全文。

‘你方已同意在朝鲜境内建立从东到西的缓冲区，全部武装部队将撤出缓冲区。

我方认为，在划定缓冲区时可从现在的实际军事形势出发，而绝不能让政治问题和地区问题影响此事，这两个问题应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最后决定。

此外，应当仔细地而非表面地研究与双方军事力量有关的一切因素。因此，任何臆想的地理线，如纬线，绝不能用来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希望，在研究缓冲区问题时你方要注意到实际军事形势的某些因素。

在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停战协定中实际上都将反映出三个军种的战场：

一、空中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拥有空军优势。

二、海上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朝鲜周围各海域。

三、陆地战场。联合国军司令部大体控制着从东海岸昌道里地区向西至平康一线以南的山区以及从平康往西南经板门店至海昌里，然后经汉江北岸到汉江口一线以南地区。

必须把陆海空三军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它们的实力。

所有三个军种都对缓冲区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地面缓冲区的划定应当符合海空军的实际力量。

你方十分清楚我方空军和我方海军的力量，因此必须相应地考虑空军对地面战斗行动的影响。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海军已经限制了你方军队的行动自由并给你方陆军人员造成了极大损失。

联合国空军在你方后方的进攻行动已迫使你方把大量部队和炮兵留在后方当作防空。这些部队和炮兵本来是可以直接用在前线的。你方调动部队和部队补给能力也受到限制。

你方部队的空中侦察和空军对陆军的掩护几乎等于零。

至于我方海军力量，那么你方对它也有感受。目前你方已被封锁在陆地上，而联合国军则可在朝鲜邻近水域自由行动。

至于你方使用海上交通线的能力，那是十分有限的。

你方所有滨海铁路和公路均遭受到舰炮的有效射击。

联合国军现有的地面和海上兵力迫使你方在滨海地区控制着大量兵力防止登陆部队上岸的危险。

你方港口的军事设施、交通线和邻近海岸的补给基地都遭到我方海军的随意打击。

相反，南朝鲜却完全未受到海上封锁和你方海军的进攻。

建议你方留心一下那张地图，它从地理上清楚地显示出现在的实际军事形势。

联合国空海军所控制的广大地区覆盖着北朝鲜从前线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全境，而你方在南朝鲜却没有同等情况。

至于陆军，则可认为双方的力量大体是均等的。在这方面我们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仔细地而不是肤浅地讨论与双方在现有阵地上的军队力量有关的各项因素。

现在十分清楚，你方一再提出的划定缓冲区的线同朝鲜整个军事形势毫不相干。它尤其同现在的战线毫无联系，它完全不能反映空海军的力量。何况，它同大致由平壤到元山的分界线以及同整个朝鲜的军事形势毫不相关。

换句话说，你方陆军大体后退到平壤元山一线，无法同我方空海军撤出北朝鲜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你方就占了便宜。

目前双方军队的接触线，无论你方还是我方都十分清楚，不必细说它的位置。如果单就陆军来说，那么军队在目前所处的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也许是对的。然而，这仅仅是部分停止敌对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海军仍将自由封锁和扫射北朝鲜的海岸地区，我方空军则仍在北朝鲜全境上空进行侦察并给它造成损失。如果双方想达成我方陆军、空军和海军对你方武装部队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那么我方就要坚持缓冲区的位置必须根据所有这些因素来相应地划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为协议是合理的。

我方认为而且我本人相信，你方也将认为十分认真地研究所有这些

因素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因素都对缓冲区产生影响。

为了达成合理而有效的停战协定，每当讨论某一方的让步时，都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简而言之，你方必须知道，在目前形势下联合国陆海空军在北朝鲜全境停火同朝中军队停火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让步。

联合国三个军种停火最起码要同北朝鲜和中国陆军撤退到深远后方相等。

缓冲区的宽度必须足以防止在停战期间双方单个人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小规模冲突。

缓冲区是一种简单的预防性措施。每个司令官都有权要求遵守这一条件，同时制止在缓冲区维持行政秩序的复杂化。

我方原则上提议建立约20公里宽缓冲区。

在前几次会议上我方一再指出，建立缓冲区有几种方法。

缓冲区是维持军事秩序的一种暂行办法，其目的是防止可能出现的拖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某些误会。

我方认为，缓冲区应利用明显的天然地区来建立。

鉴于以上所述，我方提出以下建议：

一、停止一切地面军事行动，建立缓冲区并从缓冲区撤出所有部队。我方建议的缓冲区界线已标在我方提交给你方地图上。

二、我方空军停止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到缓冲区南缘地区内的活动。

三、从鸭绿江口到缓冲区南缘的西海岸以及从图们江口到缓冲区南缘的东海岸，停止对朝鲜海岸地区的封锁和扫射。

提交给你方的地图比例尺是1：250000，因此，在该图上无法具体标出缓冲区的界线，因而只标了缓冲区的概略界线。为了核查，以后还要加以订正。’

李克农

7月27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0日

第381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125-129

№31213 罗申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需求(1951年7月30日)

摘自H.B.罗申的工作日记

机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司令朱德的会谈纪要

1951年7月30日

今天，朱德前来拜访我。鉴于我即将回国休假，朱德请求我转达对斯大林同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最近两年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和重整以及建立特殊兵种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的巨大帮助。

我答应满足朱德的要求。

在随后的会谈中朱德表示，在中国发生的战争教会了中国领导人许多东西。以前中国同志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足够强大，能够应付任何敌人。现在不得不承认，没有军事技术就很难与美帝国主义分子作战。在苏联的帮助下，目前已重新装备了60个师。但是，纯粹依靠武器的进口来建设国防是不正确的。中国需要建设自己的飞机制造厂、坦克厂和火炮厂，为国防建设打下稳固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对抗美军。

我说，大批专家已经抵达中国，并着手筹建飞机厂、坦克厂和汽车

厂。

朱德回答说，这只是开端。在建设飞机厂、坦克厂、枪械厂、汽车厂的同时，必须安排生产高质量的钢和开采石油。为了保障国防安全，在5—10年内(越快越好)中国必须生产1000万吨高质量钢和1000万吨石油。在中国计委工作的前国民党专家论证：到1957年中国总共只能生产出200万吨钢和开采出100万吨石油。中国政府对这样的数据感到不满。在制定这些数据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些重要的因素。

因此，朱德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在未来5—10年生产1000万吨钢和开采1000万吨石油的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应该既考虑到物质消耗，也要考虑到专家的数量和专长。中国政府打算在1952—1953年实施这一计划。

朱德指出，由于建立中国武装力量的工业化基础不可能完全依靠苏联贷款来实现，必须进一步扩大中苏贸易，从而确保中国得到足够的货币用以购买必需的苏联设备。中国可以向苏联大量出口有色金属、玉米、棉花、桐油、茶、鬃毛、豆类、水果。例如，中国在扩大橡胶的生产。明年中国可以向苏联或人民民主国家出口20万—30万吨棉花。今后若干年，中国将提高茶叶生产，每年可以向苏联提供约7万吨茶叶。中国有极大的水果生产潜力。为了对苏联出口，中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开采有色金属。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未来几年购买中国这些物资的计划。这样，中国就可以根据苏联的计划从事这些物资的生产。

这样，中国对苏联出口每年可达到30亿卢布。中国会得到足够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苏联的机器、药品、钢材，偿还贷款。此时，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今后几年购买设备和物资的申请，同时，苏联政府可以把这些申请纳入自己的五年计划中。

我告诉朱德，根据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特别备忘录，我们在今后14年内购买中国战略物资的数量会越来越大。

朱德回答说，希望中国向苏联出口的其他物资也能这样达成协议。

最后，朱德请求向政府转达他的请求：帮助中国制订发展炼钢厂和石油企业的计划，以及今后几年扩大两国贸易额的计划，预先向对方提出相应的申请，并把这些申请纳入自己的国民计划中。

我答应朱德向苏联政府报告他的建议。

朱德请求我向斯大林转达衷心的问候。

大使馆一秘M.C.贾丕才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B.罗申

АВИАРФ, ф.0100, оп.44, д.13, л.52-56

№20159 别洛夫的作战命令：掩护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目标(1951年7月31日)

第016号, 1951年7月31日12时

1.敌人空军以4—30架B 29和B 26轰炸机, F 80和F 51强击机所组成的编队, 在60架F 86、F 84“掩护”歼击机和格洛斯特“流星式”歼击机的直接掩护下, 不间断地对从前线到宣川、朔州交界的北朝鲜地区的朝中军队机场、交通线、渡口、居民点和物资储备库等实施密集式和梯次式轰炸。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 敌人以歼击机4—8架为编队和夜间仅以轰炸机为编队仍在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对新义州、朔州和安东沈阳方向的中国边境地区实施侦察。

2.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继续对鸭绿江上的桥梁和渡口, 安东、新义州和朔州地区的电站、机场等后方设施和北朝鲜境内的交通线实施空中掩护, 以避免敌人空军的轰炸和侦察。我空军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未越过平壤和元山一线, 并随时准备对敌人可能对中国东北安东沈阳方向的设施的空袭实施反击。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决定: 动用本军歼击机和地面高炮全力保护安东和新义州地区的设施; 与此同时, 用两个歼击航空师定期对敌人主要的轰炸机和强击机群实施有力打击, 为北朝鲜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 以团和师为单位多批次拦截到达宁郁、安州和顺川一线的中、高空敌机, 以中队为单位和自由搏击方式多批次拦截抵达平壤一线的低空敌机。

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掩护中国东北沈阳、

辽阳和安东地区的设施。

中国高炮部队保卫安东地区的鸭绿江铁路桥，防止敌人的空中打击。

4.自1951年8月1日起，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在白天根据机场值班情况随时准备以团、师为单位的编队起飞，拦截和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宁郁、顺川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以及部分为上述飞机提供掩护的歼击机；以中队为编队通过自由搏击的方式消灭敌人在低空活动并抵达平壤一线的强击机。本军战斗部队的主要任务：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三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160架次，每月——1600架次。

5.自1951年8月1日起，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白天根据机场值班情况随时准备以团、师为单位的编队起飞，消灭敌人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以拦截和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宁郁、顺川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还有部分飞机要同负责掩护的歼击机作战，以中队为编队，通过自由搏击的方式消灭敌人在低空活动并抵达平壤一线的强击机。行动中，在以一般战斗序列出击的同时，还要派出掩护机群与敌“掩护”歼击机和先遣歼击机群作战。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一个团处于三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80架次，每月——600架次。

6.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作为本军第二梯队，自1951年8月1日起，白天以一个团的兵力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空军对北朝鲜宣川、朔州和安东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等地区设施的空袭。行动中在以一般战斗序列出击的同时，还要留有一个预备队，任务是随时准备增援第三〇三和第三〇二歼击航空师。在完成作战任务后，所有飞机均在安东机场降落。

该师每天：一个团处于二级备战状态。

飞行安排：每天——60架次，每月——300架次。

7.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自1951年8月1日起，在夜晚以拉11歼击机单独从安东机场起飞，在探照灯照射区实施空中拦截和巡逻，消灭被地面探照灯发现的接近新义州和安东地区且在地面高炮火力之外的敌机。该机如果要飞出探照灯照射区、进入交战区、着陆和起飞以及进入地面高炮射程范围等，均须经过我方的准许。

值班机组转场至安东机场，须在天黑之前1小时内进行。在完成作战任务后，所有飞机在鞍山机场降落。

飞行安排：每晚——8架次，每月——240架次。

8.第八十七高射炮兵营，自1951年8月1日起，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和庙沟机场的空袭和空中侦察。

9.第九十二高射炮兵营，自1951年8月1日起，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鸭绿江的桥梁和渡口以及新义州机场实施空袭和空中侦察，防止敌人从东北方向靠近安东和庙沟机场。

10.第十探照灯团，自1951年8月1日起，在安东、龙岩浦、车岭关、泽三溪(Дзэсанси)和义州建立探照灯阵地，以确保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消灭夜间靠近安东地区内相关设施的敌机，在照射敌机时至少同时使用三架探照灯。

11.歼击机绝对禁止飞越海岸线和平壤元山一线范围。在我高射炮火力范围活动需根据“协作计划表”进行。

夜间歼击机与地面探照部队的协同作战活动须根据“协作计划表”和协作操作细则实施。

与负责掩护安东地区设施的中国高炮部队的协同作战相关事宜，由第九十二高射炮兵营指挥员负责协调。

12.歼击机的起飞须根据歼击航空军指挥所的指令。

空中歼击机的导航和管理，由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总体负责，歼击航空师指挥所和歼击航空军空中指挥所协助。

高炮部队的火力管理，由高射炮兵营指挥所负责。

在歼击航空兵指挥员的指挥所应配备相应的来自高炮部队的军官，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时通报空中情况和我方歼击机的活动。

13.自1951年8月1日拂晓起，我位于介列树(Телешу)矿区——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我的副手，歼击航空军副司令和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位于歼击航空军后备指挥所——安东机场，歼击航空军一号空中指挥所——富秋里(Фуцйори)，歼击航空军二号空中指挥所——博川。

14.请呈递如下报告：关于我方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情况，关于高炮部队的开火和停火情况，关于用探照灯照射敌人飞机后立即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的情况，关于(飞行)40分钟后的行动结果。在歼击机降落或高炮部队停止开火后，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白天(夜晚)——派信使或用密码电报在22时以前向歼击航空军司令部报告。

空军各部队指挥部必须在拂晓前1小时详细报告各团值班工作计划，并指出各批次飞机的数量，各机群长机的代码和待命值班部队的交接时间，一天内如果工作计划有变，应立即用电话向歼击航空军指挥所报告。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少将

别洛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苏斯林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34, л.31-34

№0046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4号简报(1951年7月31日)密码电报第22366号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1951年7月30日14时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14号会议情况简报。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4号简报。

今天会议10时开始，13时05分结束。这是谈判中最长的一次会议，但对所讨论的问题未取得任何进展，双方各持己见。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方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乔伊首先发言反对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他提出的理由有以下四点：

一、三八线不能反映双方的军事力量，划定原纬线为军事分界线是不合理的。

二、三八线过去是南北朝的分界线，但它从战争一开始就立即消失了而且现在同任何形势都没有关系。

三、虽然近来军队在三八线地区行动，但他们从未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最好划定稳定的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四、在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时，联合国军就要放弃一些有利的防御阵地，这是不合理的，也是错误的。

敌方声称，他在7月29日提出的分界线是合情合理的，请我方同意该线。

南日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批评敌方违反议程第二项的讨论程序，因为敌方未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便直接开始讨论缓冲区问题。

二、批驳敌方所谓海空军优势和建立缓冲区时在陆地上要得到所谓补偿。

三、为我方建议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正确性辩护。

双方代表发言后，乔伊声称：‘你方对我方提出的分界线只可进行小的修改。如果你方提出一条与现在的军事形势有关的线就好了。当然，我方很愿意听取你方的意见，因为这将使双方的停火谈判取得进展。’

显然，敌人想诱惑我方放弃我方关于划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李克农

7月30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7月31日

第3830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130 131

№004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在停战谈判中的发言(1951年7月31日)

密码电报第22386号

发自北京，1951年7月31日20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29日上送的第13号简报的附件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3号简报的附件——南日在1951年7月29日上午会议上发言的全文。

‘我对你昨天下午会上的发言全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不得不直言对你说，我对你的发言不满意。你昨天的发言同你前天的发言毫无二致。

你认为你的建议是合乎逻辑和站得住脚的。但我不能不指出，你提出的建议的理由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想谈一谈你方在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中立区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理由。你方多次声称，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仅应从纯军事考虑出发。

而你方的军事考虑，实际上就是通过大肆吹嘘你方的军事力量和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办法，来取得你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有利态势。

你方既然持有这些观点，那人们就很难相信：你方参加停战谈判会议，能像你方所表示过的那样，是为了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你方在不断吹嘘自己的军事力量，为的是达到较为有利的军事态势。难道这不会给人们造成你们是在准备恢复战争的印象吗？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同你方不是站在同一立场上。

我们认为，停战谈判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而确定军事分

界线则是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军事分界线时，不仅要考虑到战场上实际的军事态势，而且要求公正地及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对此问题的态度，并在这方面将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至于你方的所谓军事考虑，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你方的考虑归纳起来就是，在我军深远后方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为了达到这一众所周知的目的，你们运用了最不正确的“逻辑”来为你们的观点辩护。

你方断言，你方拥有海上和空中优势。既然这里讲的是停止军事行动，那所指的就是停止海、陆、空军的军事行动。如果军事行动一旦停止，那这将对你方海军和空军优势产生不利。因此，你方才坚持要把陆地前线推至我后方，在这里确定军事分界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方才能抵消因停止海军和空军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损失。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你方自己会真的相信自己的论点。请原谅我这样讲，你方的论点也太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昨天的发言中对你方的论点提出了最彻底的批评，恕我不再重复。但是因为你好像是怕我听不懂你的话，又列举了你们空军所起的六大作用，你们海军所发挥的各种威力。我很感谢你这种关心，但是，我要很诚恳地告诉你，在谈到海军和空军的作用时，您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方海军和空军在朝鲜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作用可归结为违反国际法对和平居民、城市和乡村进行灭绝人性和凶残的狂轰滥炸。20世纪的人类都替这一可耻的兽行感到害羞。

我们认为，每一个正派的军人都不会把兽行当作力量，更不会认为这种兽行力量具有合法的意义。

你方也许会问：难道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未对你们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吗？我同样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它们对我方的军事行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克服这一影响，并顺利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

你不断地夸耀你方有陆海空三个军种，而我方则仅有陆军一个军种。我方承认，你这话暂时是对的，但我方的陆军却并不把你方的海军和空军放在眼里，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英勇作战。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方的陆军按其实力纵然不超过但却至少相当于你们三个军种的总和

吗？我昨天已经讲过，你方依仗违背国际法而实施的凶残的狂轰滥炸，才得以勉强地维持你方地面部队的暂时态势。如果失去了用这种凶残的狂轰滥炸达到的支援，那么，你们的陆军早就不知退到哪里去了。

你说你我双方地面部队的态势几乎反映着你我双方陆军的力量对比，但实际上只有在你方海军和空军的支援和掩护下，你方的陆军才得以勉强暂时扼守目前所占领的阵地。而我方的陆军在作战过程中却能克服你方空军和海军凶残的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某些困难，从鸭绿江一线前出到三八线地区。因此，如不计算双方各军兵种的力量，那就不可能在双方陆军力量进行对比时正确地判断军事力量。

军事实力当然首先是由各军兵种力量的总和决定的，但其中陆军则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军事观点来看，海军和空军都只不过是辅助军种，两者均不能单独解决战斗任务。须知，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凡具有起码军事知识的人都懂得这一道理。

例如，一个比较懂得军事的人不久前说过：“任何一种企图使用某些特别是精致武器来作战的构想，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战争可以在空中或海上开始，但战争一旦开始，那就会很快转到陆上。如不实施地面军事行动，就不能占领和扼守住航空基地。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不管达成多么大的战果，都必须用陆军来加以巩固。”

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你方却拒不承认陆军的决定性作用，而坚持海军和空军能单独作战乃至取胜的观点。由于存在这种思想，你方有意无意地犯了一个大错误。你说过，日本在上次战争中之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日本遭到了你们海军和空军的打击。你们却忘记了，粉碎军国主义日本的力量是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国人民的8年武装抵抗、苏联军队对日本关东军的致命性打击及其他盟国实施的抗日行动。中国和苏联陆军的军事行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你们的海军和空军同日本打了近3年，却未能战胜日本。而只是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给日本关东军以致命性打击之后，才最终战胜了日本。难道这些历史事实能轻易加以否定吗？你们自己的行动也否定了你们的理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便认为，只要往朝鲜派去海军和空军，便可有效地干预朝鲜内战，然而，你们的计划很快就破产了。于是，美国政府便决定派自己的陆军到朝鲜参战，这才造成今日的态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已彻底驳倒了你们关于海军和空军起决定

性作用的错误观点，彻底驳倒了你们关于海军和空军可以单独制胜、三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单独作战的站不住脚的理论。

我们认为，对于你们在地图上所标出的分界线可以不予理睬。既然用以替你们所提出的分界线作辩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就更没有必要对这些分界线本身进行讨论。

昨天你讲过，现在的这条战线自洛东江战役结束之日起是最为稳定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里撇开去年战争进程不讲，仅从今年起，战线就从未稳定下来。在今年前7个月过程中，双方军队的战线就曾4次越过了三八线。我军曾两次越过三八线而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目前战场上战线根本不是稳定的吗？此外，还要指出，在过去7个月过程中，我军有近5个月时间位于三八线以南地域，那时我军在两次越过三八线之后位于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时间仅有两个月多一点。

至于我军现时所位于的阵地，我军加以占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难道这能说明战线是稳定的吗？在我军于今年第一次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进抵汉江地区时，我军曾在该地坚守了3个半月时间，即比你方军队位于现占领阵地上的时间还要长一倍多。连我们尚不能说我们所占领的阵地是稳定的，那你方有何理由能说明你方占领还不到两个月的阵地是稳定的呢？

上面所谈到的，这仅是历史事实，它已不符合现时军事形势。昨天我已讲过，目前的战线是不稳定的。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尚未达成协议和将其付诸实施以前，我们不应也没有必要为确定军事分界线而详细研究现时军事形势。在最近7个月过程中，战线在不断变化，但在变化中有这样一个明显情况，即尽管我方已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从纵深和宽度来看已占领了比你方在三八线以北所占领的地区要大，但战斗行动基本上未超过三八线。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完全从现实军事形势出发，三八线也相对地反映着现阶段双方兵力对比，因此必须把三八线作为双方军事分界线。

我们早就说过，军事分界线必须根据实际军事形势加以确定。我方将力争达到停止军事行动以最终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在确定军事分界线过程中，在研究实际军事形势的同时，还必须研究我们的决定，使其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无论如何不致阻碍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一点表明我方关

于按三八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提议具有更大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我方的建议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坚决主张通过这一建议。

我方希望你方能非常认真地研究并接受这一建议。’

李克农

7月29日12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7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0, л.132-138

№133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驻中国记者回国(1951年7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7月31日

第11项 关于М.Ф.雅克沙明同志。(1951年7月27日会议第579号记录第312项决议)

鉴于М.Ф.雅克沙明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通过塔斯社(切尔内绍夫同志)关于免除他的塔斯社驻中国(上海市)记者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4

№1336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准许杨少玉来苏治病(1951年8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日

第16项 关于关于杨少玉(ЯнСао□юй)到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杨少玉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人员来苏联治病。

2.迎接和招待杨少玉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5

№0046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5号简报(1951年8月1日)

密码电报第22409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日15时56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31日14时发来的第15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5号简报。

今日会议于10时开始，11时32分结束。明天会议于10时继续举行。

对方仍坚持其观点。乔伊干脆说：‘我们认为，足够强大的一方可以迫使侵略者放弃侵略意图…… [100] 在三八线地区没有有利于我方的防御阵地。你方顽固坚持以三八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的立场，目的在于使我

方失去有利的防御阵地。只有您和你方领导明白你方为什么要坚持此一立场。’

对方暗示我方为侵略者。明天我们拟对对方发言中所包含的关于侵略者和防御阵地的说法给以狠狠的批判。我们预计，对方将仍坚持其意见，会议将暂处于停滞阶段。如不出现外来压力，对方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为对会上斗争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我，我们已指示我方记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揭露对方无诚意和以战争相威胁的伎俩。同时指出，我方已在议程上做了让步。会议今后是否发展顺利，全看对方有无诚意。

二、相应指出对方最近在加紧进行军事活动，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对方空军和海军可能要对和平居民和城市进行轰炸和扫射，但其兽行并不能反映其有力量。

三、指出对方在加强其防御阵地。这说明对方在千方百计地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四、指出三八线反映着现阶段实际军事形势，三八线是一条反映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正和正确的军事分界线。

请对要不要在北京和平壤开展相应宣传或有无必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迫使对方尽快同意我方建议的问题加以研究。

李克农

1951年7月31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1-2

№133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2日)

1951年8月2日

第33项 关于邀请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20—25个人组成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于今年9月份为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配置和苏联共青团在大学生中间的工作经验而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8

№0046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6号简报(1951年8月2日)

密码电报第22444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日13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日发来的第16号简报送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6号简报。

在今日会上，对方仍坚决反对我方关于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并且又重申阵地的重要性。

同时，对方暗示，其现在的建议方案可以先搁置起来，但为此我方应放弃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由此看来，对方企图以欺骗方法停止在其军队现在所占领地区的军事行动。

今天乔伊说：‘如果你方真心对待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并想永远停止敌对行动，那你方就应接受我方草案，只要对其作些修改即可达成协议…… [101] 你方对于在相互让步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问题上未表现出任何愿望，而我方则坚决而诚心地要做到这一点。’

明天会议于10时继续举行。

我们决心继续揭露对方的意图，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李克农

1951年8月1日13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3 4

№0046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1951年8月2日)

密码电报第22446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日20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7月31日17时给我的电报及我1951年8月1日对该电报的回电送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

一、就议程第2项进行的斗争已持续了6天。在这段时间内，会议几乎陷入僵局。我们估计，即使再过2—3天也难以改变目前状况。

我们必须警惕对方可能借口暂时无法就会议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而要求转而讨论会议第3项议程(关于核查问题)，以便通过对第3项议程的讨论达成对其有利的决定，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第2项议程。

二、从最近收到的情报材料来看，对方对于朝鲜谈判正采取拖延政策。对方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一旦朝鲜问题达成协议，将有可能引发同朝鲜内政和外交问题有关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而使美国陷于不利处境。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7月30日晚报道说，在美参议院就美国防部拨款600亿美元问题展开辩论期间，马歇尔曾声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要持续几周，在最好的情况下，9月初以前不可能会有结果。’

此外，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人还对英国人实行消息封锁。在对方与会代表当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不仅如此，当罗伯逊少将向美国代表团打听谈判进程时，罗伯逊竟未获得任何消息。当对方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确定在其军队目前所占领的阵地以北的地区时，连对方的记者都感到张皇失措。

三、为摆脱僵局，协助我方进行谈判，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动整个新闻界揭露对方对朝鲜谈判毫无诚意；

(二)为得到社会舆论的响应，应在北京和平壤报刊上开展对美国立场的批判；

(三)展开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反击对方空军和海军的兽行。

我的观点是否妥当，请示。

这一电报未抄送金日成同志。

李克农

1951年7月31日17时”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7月31日电报收悉。

在对确定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所展开的6天争论中，我方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南日同志的发言也很好，结果我们达到了有利于我的条件。

我认为，对方可能试图利用已形成的僵局，除了业已展开的我方和他方所提出的两条分界线问题上的斗争以外，迫使我方提出另一条新的分界线，或者迫使我方转而讨论议程的第3项，目的是为其捞到好处，使其能在其国内进行动员和应付其国内各种矛盾。

不管对方有何打算，我们仍应坚持按会议议程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如我们仍将继续处于僵持局面之中，那这也有利于我，因为我方是公开而公正地提出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并把它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而对方则害怕公开宣扬其建议，而只可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

如果僵持状态将长久继续下去，而对方又不撤回自己的建议，仍坚持将在其军队目前所占领的阵地以北地区确定分界线，那就很有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反对他们自己。对方对此是害怕的。

因此，我们始终应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有如此，对方才会或者自行放弃其建议，或者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战。我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情报。

谈判拖延的结果，如果对方不想破坏会议，终会出现转机。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你们给记者的指示。此外，我们还希望你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看采取什么方式通过记者指出对方建议的不公正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会议上进行斗争。

北京广播电台今天已播发了彭德怀的文章，该文对于开展宣传具有重大意义。

今后，要根据记者从开城发回的文章，狠批对方建议的不公正性，对方千方百计拖延谈判及其对达成和平毫无诚意。同时，要阐明我方建议的公正性和诚意。

记者的报道和各种文章必须做出正确的分析，以把社会舆论争取到我方来。

至于平壤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则请金日成同志研究该问题，并给予我们以支持。”

1951年8月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5-8

№2483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苏联派遣大学生和工作人员(1951年8月2日)

绝密，禁止复印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为中国的工业培养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尽管由于战争的破坏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我们仍打算派遣一些大学生和工作人员到苏联学习和实习。最近几天，我们已经请求罗申大使转告我们关于派遣375名大学生到苏联学习的请求，并征求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我们还打算派遣88名工作人员到苏联的工业企业进行为期2年的实习。这些工作人员都有在东北的工业企业工作的经验，他们将用半年的时间学习俄语。实习的工作人员名单将通过罗申大使提供，他打算回苏联度假。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请通知我。今后我们将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就这一问题保持联系。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8月2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1, л.9-10

№13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中国部主任回国(1951年8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3日

第41项 关于B.H.罗戈夫同志。(1951年7月31日第579号会议记录第469条决议)

鉴于B.H.罗戈夫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通过塔斯社(切尔内绍夫同志)关于免除他的塔斯社驻中国部(北京市)主任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0

№004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7号简报(1951年8月3日)

密码电报第22468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3日8时4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2日14时发来的第17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7号简报。

今日会议毫无进展。

南日首先在简短发言中对美国人在最近几次会议上的发言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南日主要指出：美国人极力主张在我军深远后方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这是毫无道理的。

南日还指出，对方回避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混淆了主次。

南日坚决地重申，我方关于按三八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是正

确而可行的。

乔伊对此未作任何答复，仅强调了建立防线的必要性。

乔伊同时问道：‘司令官要不要对自己部队的安全负责？’

乔伊是企图借此骗取我方肯定的回答，作为为其防线理论辩护的一个补充理由。

南日回答说：‘确定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自该线后撤10公里，这无疑会保障安全。’

乔伊说，这不是对他的问题的回答。双方沉默了约10分钟。

南日认为，对方什么也不会说，因此提议休会到明天。

明天会议将于10时继续举行。

明天我方拟继续对美方观点进行系统的驳斥。

李克农

1951年8月2日1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9 20

№24833 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国大学生和工作 人员来苏(1951年8月4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收到了您关于派遣375名大学生前来学习，派88名工人到企业实习的电报。我们不反对你们提出的这些建议。

菲利波夫

№0047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8号简报(1951年8月4日)

密码电报第22526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4日16时3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3日发来的第18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18号简报。

在今天会议上，对方代表首先发言。他重弹老调，坚持其空军和海军在采取具体措施停止军事行动期间要得到补偿的观点，还反对我方按三八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我方代表在自己发言中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对方从今年7月27日即已提出的论点。

我方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为：我方代表否定了对方所坚持的关于必须建立防御阵地和确保军队安全的观点。他指出，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必须建立所谓防御阵地的主张，更不能同意指责我们为侵略者的说法。

此外，我方代表还指出，对方关于其空军和海军必须得到补偿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我方代表指出，从现阶段战场特点及双方态势来看，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我方提出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公正性，还列举具体例子彻底驳斥了对方否定三八线的论点。

发言之后，我方代表给对方提出了3个具体问题，并请其予以回答。对方无法立即作答，因而提议休息20分钟。

在休息时，对方用无线电同釜山联系，并请求给以指示，但在会议重新开始后仍未作答。在散会前，乔伊起身一边挥手一边说：‘你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今天对方认真听取了我方代表的发言，未表现出前两天曾表示出的那种傲慢情绪。”

毛泽东

1951年8月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22-23

№0047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应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 (1951年8月5日)

密码电报第22535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5日3时4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全文寄您，请阅。

“李克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我今年8月2日给你的电报，想已收悉。对于美方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定在我方现有阵地以北地区所提出的非法要求，你是否已指示我驻开城记者发表材料和给予理直气壮的批驳？

我们至今仍未得悉这方面的消息。

今年8月3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尤逊发表了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部的一则消息，对平壤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予以否认，该电台的消息是：联合国军代表要求所确定的分界线应从洪城起，经东海岸的山地，再沿瓮津半岛中部到西海岸。

此外，这位记者还厚颜无耻地写道：‘联合国军从未要求过距三八线

以北如此远的地区建立分界线’…… [102] ‘没有根据证明联合国军曾要求在联合国军现在所占领的阵地以北确定分界线。’

与此同时，该记者报道说，联合国军首席代表认为，‘北朝鲜准备接受联合国方面关于在战线现在所经过的这条线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对方十分害怕的是，其要求将遭到社会舆论猛烈公开的批评。因此为掩饰其要求，对方仍在积极地反对三八线，同时又暗中表示，联合国方面提出在战线目前所经之地确定分界线。由此可见，对方企图以欺骗的手法，迫使我方首先在三八线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再由对方提出在战线现在所经的地区建立分界线。

作为对策，我方会上应始终不渝地坚持三八线的观点，不断地批驳对方的无理要求。在报刊宣传方面，我们应对对方提出的关于从洪城起经东海岸山地再沿瓮津半岛中部到西岸一线建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进行全面揭露，指出在这条线上的主要居民地距三八线甚远，同时要对方在这方面毫无诚意的表现给以彻底的批评，以此来配合我内外斗争，迫使对方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才能考虑提出我方的方案。

1951年8月4日，东京军用无线电台发布了李奇微1951年7月31日在其总司令部发表的声明。其实，这一声明的内容早在1951年8月2日就已由法新社以1951年7月31日通讯稿的形式予以发表。据此也可看出，对方正在进行这种宣传，先是委托法新社公布材料，以观察各界对此作何反应，然后才正式公布，并且事先说明：‘该材料为建立缓冲地带方面的参考材料。’由此可见，通过报刊来揭露对方企图并给以评述，把这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已刻不容缓。

请立即指示我方驻开城记者就这一主要问题多写文章，以动员社会舆论。

毛泽东

1951年8月4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0047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19号简报(1951年8月5日)

密码电报第22536号

菲利波夫同志：

送上1951年8月4日李克农同志发来的第19号简报，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19号简报。

一、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在会议上已讨论了10多天。敌人仍坚决拒绝我们关于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但是从近来敌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想把非军事区南部界线划在现实战线。我认为，敌人还不会在短时间内接受我们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二、今天乔伊表示坚决反对我们确定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同时，对此他指出了改变其建议方案的可能性。

乔伊在发言中声称：‘从来也没有建议过在你们占领的领土上建立我们的防御阵地。在非军事区南部界线将保留我们为数不多的警卫队。我们也不想把我们现在所占领的阵地向前推进。关于我们提出非军事区的一般问题可以调整。’

在上午会议前，乔伊问：‘除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方案外，你们是否想提出另外方案？’我们回答，我们坚持三八线，我们没有其他方案。之后，乔伊提出休息2小时。但是在下午会议开始5分钟后，敌人又提出休息。我认为，敌人在等待指示。

三、乔伊声称，今天12点45分我们的一个步兵连通过了距美国人住处几百码的地方。他说：‘这不仅是破坏了禁止任何武装人员到达距会议大厅半英里的区域的规定，而且破坏了在这一地区禁止驻有警察以外部队的规定。’

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个事实。敌人可能利用此事进行有利于他们的

宣传。我们还准备在此问题上回击敌人。

四、请您针对会谈的举行给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4日15点30分”

毛泽东

1951年8月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27-28

№133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林立和舒林来 苏治病(1951年8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6日

第65项 关于林立和舒林同志来苏联休养和治疗。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人员林立和高岗同志的私人秘书舒林同志来苏联休养和治疗。

2.迎接和招待林立和舒林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 ф.17 , оп.3 , д.1090 , л.14

№1336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 送礼物(1951年8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7日

第68项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问题。

1.批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管理委员会(杰尼索夫同志)，作为礼物，送给中苏友好协会2台带磁膜的磁带录音机和装备了流动电影放映机和无线电转播站的5辆大轿车。

2.责成苏联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赫拉莫夫同志)，在今年的8月份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调拨出5台Г3А651牌轿车，以转交给中苏友好协会。

3.责成苏联贸易部(扎沃龙科夫同志)，不用划拨结算的方式，而是通过贸易渠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5台“拉脱维亚”牌的带扬声器的无线电接收机。

4.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预算，并划拨出必要的资金用于为中苏友好协会购买礼物的支出。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5

№0047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0号简报(1951年8月11日)

密码电报第22767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1日20时5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0日19时15分发来的第20号简报寄您，请阅。

“毛泽东同志，并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第20号简报。

乔伊在今天会上首先发言。

他坚决反对我方关于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并要求停止对此的讨论，指责我方说，我方的方案毫无军事意义，因而是没有根据的。他说，我方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和在军事谈判会议上达到政治上分裂朝鲜的目的。

此外，他还说：‘你方之所以坚持三八线的立场，目的在于迫使人们对我方在达到体面地停战方面是否有诚意抱怀疑态度。’

最后他声称：‘我们必须停止对三八线问题的讨论，对你方那些模棱两可的理由也不应再讨论下去，而应当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我方代表问道，你方所谓‘停止讨论’是什么意思？

乔伊回答说：‘我方希望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并且希望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而不能同意讨论你方所拟的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南日在自己的发言(拟另报)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不把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是绝对不行的。

在南日念完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以后，双方代表在长达两小时过程中都一言未发。

这是在这次整个会议期间从未出现的怪现象。

经过2小时15分钟的沉默之后，乔伊忍不住地说：‘我方不准备讨论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此后他问我方为摆脱已形成的僵局有何新的建议？

南日答道，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接受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同时，南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乔伊见双方都坚持己见，于是便建议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我方代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答复稿。

最后，在提议休会之前，乔伊再次要求我方考虑提出新的建议。我方代表宣称，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决不会改变的。

明天将继续就该问题交换观点。

今天会议从12时30分开始，16时35分结束。这是最长的一次会议。

李克农

1951年8月10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37-39

№0047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确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策略(1951年8月11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951年8月11日7时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全文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8月10日的简报(第20号)已收到。敌方在其关于8月10日会议结果的公报中指责我方‘坚决拒绝讨论下列问题：

一、关于确定以战线作为可能的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二、关于确定以除三八线以外的其他某种界线作为可能的军事分界线的问题；

三、除第2项议程以外的任何其他项议程。’

敌方还在其公报中声称：

‘在南日将军坚持长达2小时15分钟的前所未有的沉默之后，共方拒绝了接受乔伊的一切建议。在此之前，乔伊曾一再充分表达了对下列问题进行讨论的愿望：

一、关于大体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

二、进一步明确上述地区界线的可能性问题。迄今为止，这个地区只不过空有其名。’

从敌方公报的上述两段文字就可看得十分清楚，敌方蓄意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美方曾试图并且表达了大体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愿望，并指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整的可能性，而我方则拒绝商讨除三八线以外的一切问题。敌方的意图就是这样。

你们应当在今天的会议上和公报中揭露敌方的阴谋。应当讲清楚，在确定军事分界线方面，我们从未拒绝对敌方的建议进行商讨，即使在这些建议毫无根据、极不正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改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根据批驳这些建议，并坚持我们提出的关于三八线的建议，唯独美国人试图强迫我们只能讨论他们提出的建议。这就说明美国人没有根据批驳我们关于调整分界线的建议，因此，敌方拒绝讨论我们的建议，是为了通过这种拒绝来破坏双方所接受的议程和对之进行正确的讨论。在我方代表于8月10日进行阐述后，乔伊缄默不语就是拒绝讨论的证明。以后，在敌方这种缄默不语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之进行批评，并揭露其虚伪的宣传。

既然敌方已在其公报中放弃其对分界线的主张，你们就可以在会上质问美国人，他们为什么蓄意提出其毫无根据的建议使已经找到的其他形式的公报无效，并对关于确定大体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问题做出报道？如果敌方承认基本上可确定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且放弃其原先的建议，那你们就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只要敌方放弃其原先提出的毫无根据、极不正确的建议，同意大体以当前的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且同意对这一界线进行调整，那么我方提出的三八线就是进行调整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基本上符合双方当前的军事状况。因此，我方建议确定以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基本军事分界线，并以这一分界线为依据建立缓冲地带。双方军队可以无须一定要后撤10公里，

它们可以以有利地形的地区为依靠。在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东的联合国部队应后撤不足10公里，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的部队则应后撤10公里。驻守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的中朝军队也应后撤不到10公里，而驻守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的部队则应后撤10公里。这样，就可以根据当前战线进行调整。

在采取这一措施时，我们可以表明我们愿意做出让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敌方那里赢得时间，并表明我们力求了解敌方的某些建议，同时批驳其不正确的建议。观察一下，敌方对此将采取何种态度，尔后再决定是否可以提出我们原先准备好的建议。

毛泽东

8月11日7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45-47

№11863 维辛斯基致罗申电：通知中国苏联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1951年8月12日)

拜访周恩来并且告诉他，你受命通知中共政府，苏联政府已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将于今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

苏联政府认为，苏联难以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拒绝将会被公众认为苏联缺乏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诚意。苏联代表将参加旧金山会议并且将努力使苏联建议被接受。

当然，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呼吁邀请中共代表的必要性。没有他们的参与，对日和平条约不能完成。我们将通报中共政府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

АВПРФ , ф.А.Я.Вышинскоео1951г , оп.24 , про.371 , п.32 ,
д.193 , л.38-39

No004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1号简报(1951年8月12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兹将李克农同志8月11日发出的第21号简报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1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依然毫无进展。南日将军发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敌方昨天发言提出的确定所谓的军事分界线‘应以当前的战线为依据’以及‘缓冲地带应建立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内’等问题发问。接着，我方代表询问敌方所提军事分界线的实质究竟何在？

我方代表发言中谈到关于确定三八线以后对缓冲地带具体问题的讨论将会顺利进行这一部分，引起了敌方的兴趣。但敌方没有回答南日在当天上午提出的问题。

敌方代表在其发言中主要谈到我军在中立地区内发生的事件。他之所以提到这一事件是为了强调其关于防御阵地的建议。

12点30分会议继续进行。我方代表再次提出当天上午没有得到答复的关于敌方所提军事分界线的实质这一问题。为了继续掌握主动权，我方代表指出，敌方发表按战线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在战线所在地区内建立缓冲地带的声明，是为了制造混乱。与此同时，我方代表揭露敌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以及当前战线往北移的建议，还有他们试图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是别有用心。此外，我方代表还对敌方提出的补偿其航空兵和舰队兵力而削减陆军部队的荒唐要求予以严厉批驳。

随后，乔伊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冗长的发言稿。他声称，我方对自己所提建议的坚决态度是专横的。接着他就指责我们使谈判陷入僵局。他还历数我们拒绝讨论他们早先提出的建议，轻蔑地把标有缓冲地带的地

图退还给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关于调整缓冲地带的建议，不肯共同商讨标在其地图上的缓冲地带问题，昨天还拒绝商讨第3项和第4项议程。尔后又旨在进行威吓地声称：

‘我相信，拖延会议会使朝鲜人民流血这一点会使你们重新愿意停止敌对行动。如果真能这样，那么谈判的大门就会仍然敞开。’敌方讲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施加压力，把破坏谈判使之陷入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我们正根据您1951年8月11日7时的电报指示研究对抗措施。

李克农

1951年8月11日19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51-52

№0047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南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发言(1951年8月12日)

密码电报第22781号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2日3时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发来的第20号简报的附件寄您，请阅。

“关于会议情况第20号简报的附件——南日在今年8月10日会议上发言全文。

我们的会议竟因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的问题而休会5天半之久，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现在我们复会了，我愿意知道你方是否已经放弃了你们方以前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而准备接受我们的公平合理的建议。我愿对迄今因你们方坚持你们方不合理的方案而尚未获得协议的军事

分界线问题，继续发表意见。

在我已经一再明白和完全地驳斥了你方所建议的方案的理论根据以后，我不能理解何以你方还能够依然坚持你方荒谬狂妄的方案。我的论点的正确和合理，早已应该是所有稍有公正感的人所能了解的了。但是我愿再次申述一遍，以使你方放弃你方荒谬狂妄的方案，而接受我方的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公平合理的方案。

一、你方一再夸耀贵方海空军狂轰滥炸的效能，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在陆地上得到补偿，企图将你方部队大大地推进到三八线北我方阵地之内，而要求我方部队撤出大块土地。我已经一再指出你们海空军这种惨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法的、对无辜居民与和平城镇的狂轰滥炸，是所有有自尊心的军人都应该引以为耻的。而脱离了整个军事形势，孤立地夸张某些配合军种的军事效能，认为它们足以决定战争，应有独立的存在，更不是任何有军事头脑的人所应有的逻辑。

事实上，你方陆军只是依靠了海空军的毫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法的狂轰滥炸，才能勉强地暂时地维持了战场上的现状。假使没有这种狂轰滥炸的支持与掩护，你方陆军早就被驱逐出朝鲜半岛了，更何况朝鲜的海空也决不是你方海空军所能霸占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海空军力量正在增长着，并且已经给予了你方海空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你们自己所承认的海空军的严重损失，就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你在一贯发言中，认为我方似乎根本没有海空军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你们说你们如果中止海空军的作战，将对我方有各种利益，因此你们必须取得补偿。你们难道没有想到过，根据你们的逻辑，如果要我们的举世公认的强大和优越的陆军停止作战，使得你们的部队免于遭受歼灭，不是应该得到更大的补偿，而将军事分界线和中立区推进到洛东江附近吗？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们是不会提出这种不合逻辑的方案的。因为这种方案将和你们的方案一样地荒谬，而不合乎我们在停战谈判中解决问题的精神。

二、你方又一再强调所谓防御阵地和保证部队安全的必要，坚持将你们的防御阵地设在三八线以北现有战线的前方，即我方阵地之内。

我也已经一再指出，单纯的建立防御阵地的观点，根本就不应该作为确定军事分界线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考虑。更不应该以建立防御阵地

为借口，企图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现有战线的前方，即我方阵地之内。

只有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各自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才是保证你我双方部队的安全的最好的办法。

你们说你方并不企图在目前接触线以北寻求防御阵地，而只要求在中立区南缘驻扎一些警卫部队。你们难道没有想到过，根据你们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要求在汉江以南设立警卫部队。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将和你们的要求一样地幼稚，一样地骗不了人，而将无限期地拖延我们的停战谈判。

三、我们建议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各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的主张，确实反映了现阶段中战场上的军事实际，对双方都公平合理，而又同时有利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已经一再指出朝鲜战场的特点和趋势，都明白地证明了我们的建议反映了现阶段中战场上的军事实际。

你们说，你们对于历史没有兴趣，朝鲜战场的特点和趋势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即使你们的最高级的军事人员，也都不能不再承认你们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在三八线维持阵地。

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我方建议，对你我双方都公平合理，因为三八线在目前为你我双方所共有，双方各自在三八线对面占有大小相差不远的地区。你我双方撤离三八线10公里，以建立中立区，是符合平等对待的原则的，对你我双方都不吃亏。

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我方建议，更是有利于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因为这是举世公认的停止朝鲜战争的基础。失去了这一基础，我们就不但不能解决中立区的划分问题，无法讨论停战的其他各项问题，而且也将无法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我诚恳地要求你方郑重地考虑，并接受我方的建议。

你说你方不再讨论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军事分界线。你方究竟为何要这样做？是不是你们决定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剥夺我方提出我方主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认为，对于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坚持我们公平合理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我认为，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来剥夺我们这个权利。

李克农

1951年8月10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40-44

№0047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对停战谈判最终目标的考虑(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于8月12日4时给我的电报拍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一、您8月11日7时来电已收到。

二、敌方在昨天的会议上更加深化其错误观点。敌方认为通过威吓可以迫使我们放弃对三八线问题的讨论。他们已经4次表示愿意根据当前战线和当前军事状况讨论关于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建议。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会议的发言中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对敌方拒绝讨论三八线问题所持的毫无根据的论调予以抨击，同时也试图探知敌方是否有意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

在今天的会议上，敌方对我方发言中试图了解其意图的那一部分表示有一定的兴趣。但在当天下午的发言中，敌方表现得极为荒唐，并企图把谈判陷于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

我们明天的发言将根据您的指示拟定。发言的目的将是粉碎敌方的上述谬误，戳穿敌方的欺骗伎俩，同时提出能迫使敌方更加明显地道出其意图的一些问题。

发言的主要目的是，再次强调指出，如果敌方不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表示我们也愿意修改关于在作为军事分界线的三八线地区内建立缓冲地带的建议，但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敌方必须向我们明确表示愿意放弃其原来提出的建议。

三、在复会以后，敌方的错误观点更加深化，敌方更加坚信我们希望和平，因此可以指望我们做出让步。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但是从整个会议的进程和会外情况总的来看，要使敌方接受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不可能的。在这几天之内，敌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威吓，企图以此迫使我们首先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又做好了会议可能中止的准备。

因此，我们认为，对三八线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决策。

如果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确定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这一原则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只允许做出不大的改变，那我们应考虑到谈判破裂并对此做好准备。

在敌对情况下，我们应有某种有一定妥协的建议。当然，我们过去的建议不可能预见到当前情况可能出现的变化，根据您1951年7月17日电报关于向敌方做出让步以赢得时间的指示所采取的行动，也不可能赢得很多时间。

四、我们(李克农、邓华、解方、乔冠华)认为，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敌方可能同意做出不大的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决定：为三八线斗争并准备谈判终止，还是避免谈判破裂，为停止军事行动进行斗争，并研究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

根据有限的现有资料对世界概况、我国政府的要求和当前朝鲜不能继续进行战争这一情况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而不再为三八线进行斗争，以免导致会议终止。

因此，必须考虑，在讨论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时，可以促使敌人做出一点让步。

这样，就可以保证取得3—5年的时间来准备力量。

当然，如果敌方丝毫不肯放弃其当前所坚持的毫无根据的建议，那我们也就只好考虑选择唯一的破裂途径。

由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情况的研究是肤浅的。渴望得到您对今后行动的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12日4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56-58

№0047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斗争的策略(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给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2日4时电报的复电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8月12日的电报已收到。

一、从近日来敌方在会上发言和会外宣传的矛盾来看，显然敌方是不想接受我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但也不敢就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在我军深远后方建立缓冲地带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仅仅表示了以当前战

线和军事状况为基础，就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问题进行商讨的隐晦的愿望，同时暗示可以做出不大的修改。

由此可见，敌方坚持其原来的建议，只是为了迫使我们就三八线问题做出让步。至于敌方表示愿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且可以对战线做出某些改变，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

如果根据地貌和军事状况考虑，分界线将确定在由三八线向南和向北延伸的区域内，也就是：该线的一部分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内通过，另一部分则在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内通过，则分界线和三八线之间的三八线以南地区和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面积大致相等。

这样一条线就可以称之为军事分界线。也许敌方可以同意它。但敌方自己不想提出这一点。为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敌方希望我方就三八线问题提出修改建议。因此，敌方在其于8月10日发布的关于会议进程的公报中声称，我方拒绝商讨除三八线以外的其他某种分界线。敌方以此暗示，它不拒绝商讨这一问题。现在我方的建议并不十分确切。希望我方谈判代表团对此进行研究，同时请金日成同志也对此问题予以考虑。

二、至于当前进行谈判的策略，则你们应当主要注意对敌方原来的建议展开斗争，并且暂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便迫使敌方回答你们的问题。在争论中，你们可以不重复自己的建议，而主要批驳敌方的建议及其含糊的措辞。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迫使敌方放弃其原来的建议或对之进行修改。

只要敌方再次表示愿意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商讨军事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问题，那你们就应当指出，敌方原来的建议已失去其意义，从而促使敌方提出具体的建议。这时，根据敌方是否放弃其原来的建议或对之进行修改，或提出根据当前战线确定分界线的新建议，你们可以提出我在1951年8月11日7时的电报中所谈到的建议。

不排除敌方仍不接受这一建议的可能。但在争论中我们应当把三八线同当前战线结合起来，甚至把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地带结合起来，以暗示我们随后要提出我们早就拟好的折衷方案。在谈判中采用这种策略可使敌方向我们打算提出的建议靠拢，并在宣传方面失去主动权。”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53-55

№0048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2号简报(1951年8月13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3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的第22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1951年8月12日14时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2号简报。

今天的会议仍然毫无进展。敌方静听南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为了回击敌方的恐吓并戳穿其欺骗伎俩，南日提出了5个问题，促使敌方说明其所提建议的实质。这些问题提得巧妙而严肃，因此敌方不能对之做出充分透彻的答复。

敌方代表接过提出问题的文件，表示他们将仔细研究。同时他还接过我们用线条描下来的敌方绘在其地图上的地图副本。

乔伊继南日之后发言。他在结束其发言时提出休会至明天。乔伊在其发言中声称：今天已是我们对第2项议程进行讨论的第12天了。如果你们不放弃既不现实且不正确的建议，则谈判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方声明，我们将不再讨论你们原来的建议，也不会回答关于该建议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拒绝讨论与当前情况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方再次拒绝接受你们的建议，希望你们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你们尚未准备好新的建议，那么可以先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只要是你们同意讨论其中的一

项，会议就将取得进展。希望得到你们的答复。

南日立即回答，关于三八线的建议仍然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也不想现在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但是为了让敌方首先让步，我们没有立即宣布：如果敌方不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则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李克农

1951年8月12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59-60

№133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访苏(1951年8月1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3日

第103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苏访问。

采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关于邀请由5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于1951年8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21

№133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中国组织电影放映站(1951年8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4日

第122项 关于在中国组建电影放映站。

1.准许苏联电影部在北京组建电影放映站，电影站的工作人员由“苏联电影出口公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名代表组成，这三名代表不计入得到批准的“苏联电影出口公司”海外工作人员的人员编制内。

2.委托苏联外交部就组建驻北京的电影放映站的问题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24

№0048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3号简报(1951年8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3日14时发来的第23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3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乔伊对我方所提5个问题的答复再次强调其无根据和轻率冒失的建议。

说到对前3个问题的回答，则敌方认为，其心目中的缓冲地带应建立在三八线以北当前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

乔伊公开声称，他们从未掩盖他们想把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配置地

区内这一意图，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分界线移到当前战线以北的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

他声称，简单点说，他们在其建议中就已打算在当前战线(从当前战线的南边界线开始)以北建立相应的缓冲地带，以便拥有必要纵深的防御阵地，尔后划定分界线。因此，乔伊在回答第4个和第5个问题时无谓地声称，他们准备在当前战线和当前军事状况的基础上讨论其他某种建议。他试图借此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迫使我们放弃关于三八线的建议。

在乔伊发言之后，南日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此后双方相互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

我方代表发言不十分有力，可能没有达到改变敌方错误观点的目的。因此，我们打算明天对敌方并不高明的论调予以有力抨击，并坚持我们的立场，以期首先粉碎敌人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

1951年8月1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1卷，第1499—1500页

No0048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4号简报(1951年8月15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4日18时发出的第24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4号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再次坚持对我们的建议进行申辩，同时对敌方的威胁和欺骗伎俩进行抨击。因此，我们事先准备了篇幅很长的发言稿，以便痛斥敌方毫无根据且考虑欠妥的建议，并揭露敌方所谓可以改变其建议的真正含义。同时再次强调我们对三八线不可改变的立场。

会议开始后，南日首先发言。尔后乔伊发言，主要讲了3点：

一、企图把谈判陷于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我们。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一)我们坚持三八线；

(二)我们拒绝对敌方建议做出某些修改来促进分界线问题的解决；

(三)我们拒绝先讨论第3项和第4项议程。

二、声称我们提出三八线问题是为了在谈判过程中解决借助军事行动不能解决的朝鲜分界线这一政治问题。我们关于三八线的建议是要他们的军队平均后撤36公里。我们似乎是要把西部在防御方面毫无意义的部分地区给他们，来换取东部防御方面的完整地区。

三、继续炫耀其空、海军的独立兵力以证明其建议的正确性。最后，对我们进行指责，说我们迟迟不采纳其建议，又不提出另一个经过修改的建议。

南日对乔伊的发言提出了简短的批评。尔后，乔伊建议休会到明天10点。

同时，乔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我们时间来准备新的建议。

对此，南日答复说，他希望敌方会后再次考虑其态度，并在下一次会议上放弃其毫无根据的建议。

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仍将坚持我们的建议，并继续抨击敌方，以迫使敌方对其原来的建议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修改。

李克农

1951年8月14日18时”

1951年8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61-62

№0048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缓冲区界线问题(1951年8月15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3日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在今天会议上敌方交来的地图上，他们于1951年7月27日提出的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大体与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相近，至于地图上标示的双方军队接触线，则是在我军阵地配置地区内通过。

这样除上述缓冲地带北边和南边的两条线(1951年7月27日转交的地图上也是这样标划的)以外，在新的地图上还有一条线，敌方认为这一条线标明了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

该线在西部始于延安以南的半岛南端附近(地图比例尺1：200000)，沿汉江北岸通到后井里(开城西南17公里)，再向东北经岭东里(开城以南12公里)、古义里(板门店东南2公里)、高莫古里(板门店东北5公里)、高津里西北1.5公里处的一个居民点，接着经过了354号高地(谷佳里东北8公里)、鸡荣里(柞平南5公里)、百川(昌东里西北6公里)，再经下道洞(铁原西北5公里)、外占里(铁原以北12公里)、平康、西光里(平康东南8公里)、天岩里(金化东北11公里)、外交东里(金城东南15公里)、水洞里(外交东里以东7.5公里)、东北里(华川东北20公里)、梧洞(杨口以北18公里)、高里(单发岭西北8公里)、芦田坪(单发岭以北8公里)、728山隘口西北2公里处高地(单发岭东北10公里)、姑味城

里(沙泉里以北2公里)、希西里(洪城以南19公里)、新岱里(洪城以南14公里)、昌东里(洪城以南7.5公里)，再往东直到海岸。

李克农

1951年8月13日”

毛泽东

1951年8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63-64

№0048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5号简报(1951年8月16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8月15日16时发给我的第25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5号简报。

一、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方代表仍然坚持我方的建议，并再次有力地批驳敌方关于必须补偿其空海军优势的论调及其荒谬的建议。

尔后敌方再次重复其陈词滥调，并提出进行谈判的新方式(细节见其建议)。

二、敌方建议，双方各派1名代表和2名助手(其中包括翻译)组成小组委员会，以便就第2项议程交换意见，并拟订使双方代表团摆脱僵局的建议。

三、敌方这样做是为了借此在会外就解决第2项议程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打算同意敌方的这一建议。

我方代表仍将由朝鲜同志担任。南日已指定李相朝参加该委员会工作，而志愿军司令部则打算指定解方同志和1名翻译参加。

四、在明天的会议上，我们打算更加清楚地阐述对我方关于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中所谈到的缓冲地带进行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一方面，这表明了我们的让步，另一方面，这将促进委员会中我方代表的工作。

五、我们的上述言行是否妥当？

请您速予指示。

李克农

1951年8月15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75-76

№0048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美方所提小组委员会问题(1951年8月16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的简报(第25号)的附件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5号简报的附件。

乔伊发言全文：

‘我们在长时间内未能摆脱对会议第2项议程讨论所形成的僵局。如果谈判还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我们就看不到获得进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建议采用新的方法进行谈判，以便摆脱当前的僵局。

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双方代表团商讨迫切问题时采用过于正式的形式进行谈判。这在有10名代表及其各种名义的助手参加的会议上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交换意见也采取了长篇累牍地发言的矫揉造作的形式。

我们建议，双方各派1名代表组成小组委员会。

我们建议，这2名代表就第2项议程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共同责成该委员会向双方代表团提出摆脱当前僵局的办法。

我们建议，每一方都给代表指定2名助手(包括翻译)。

我们认为，任何一方的代表团都不应被某种隐蔽的条件或具体的协议束缚住，而应采纳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毫无疑问，双方代表团都应批准这种建议。

我们认为，双方代表在该委员会的圆桌会议上自由交谈的过程中会客观地找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比双方代表团去找要好一些。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指定我方代表及其助手。如果你方愿意获得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你们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我们。如果你方原则上同意，但在细节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可以研究你们的草案。’

李克农”

毛泽东

1951年8月1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1336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国际奖(1951年8月1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16日

第140项 关于爱伦堡同志到中国出差。

采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斯科别利岑同志)的关于派遣委员会成员И.Г.爱伦堡同志于今年9月到中国出差一个月去授予中国社会活动家宋庆龄斯大林“巩固民族和平”国际奖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27

№004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6号简报(1951年8月17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17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6日16时的第26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6号的简报。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方代表首先发言。他继续批驳敌方毫无根据的、荒谬的建议。他指出两点：如果敌方不放弃其当前的建议，或不特别注意研究我方的建议，则不管怎样改变谈判方式，都不可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为了表示我们愿意做出让步，也为了促进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我方代表第一次在发言中明确宣告，我方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线的缓冲地带，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并有考虑地予以改变。

我方代表发言的前7点都包含有批驳敌方建议的内容，因此在我方代表发言时敌方不知所措，但随后当听到我们原则上同意建立小组委员会来讨论第2项议程时，敌方立刻感到轻松了。

在我方代表发言后，敌方没有开始发言，也没有提出问题，而是要求休会30分钟来研究我方改变了的意见。毫无疑问，敌方没有料到我方会做出改变而要请示其最高指挥当局。

休会结束后，敌方代表宣布，他们同意我方改变了的意见，他们方面将指派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奇斯为小组委员会代表。其助手尚未指定。其任命将在明天上午10点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

李克农

1951年8月16日16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17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79-80

№02949 金日成致拉祖瓦耶夫函：请求苏联提供军工生产设备(1951年8月17日)

大使先生：

谨此向您，大使先生，奉告以下情况：

为了缩减转运军用物资和发展朝鲜的工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以下生产：

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76毫米和122毫米炮弹，把生产这类

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江界地区秃鲁江水力发电站长期废弃的地下室。

生产迫击炮弹及炮弹的主要设备保存下来了，但其中一部分由于敌人空军的袭击已完全报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1951年2月28日的协议，请求以信贷方式，按照所列安排上述生产的清单和明细表，向朝鲜提供设备、附属设备及工具，同时希望能按期完成供应：

一、1951年11月1日前，提供生产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的设备；

二、1952年1月1日前，提供生产76毫米和122毫米炮弹的设备及其附属设备。

尊敬的大使，请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告知贵国政府。

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谨致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B.H.拉祖瓦耶夫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

于平壤

1951年8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11—1512页

№00487 联共(布)中央致毛泽东电：关于在朝修建机场问题(1951年8月17日)

发自莫斯科，1951年8月17日收到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8月11日发出的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和航空兵转场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您关于在安州地区修建3个机场并在今年10月20日完工以及中朝航空兵于今年11月转移到朝鲜机场以便参加前线战斗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为了直接掩护安州地区机场的建设，我们同意从当前担任安东地区掩护任务的团队中抽调两个苏联高炮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年8月1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82

№24834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8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提议，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的结果制订了计划。我们打算立即着手完成该项计划。

我把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以及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1951年8月11日向我提出的计划发送给您。

请您审核该计划，并做出相应的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17日

在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区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

中共中央，副本

毛泽东同志：

1951年8月2日，财经委员会、林垦部共同召开了会议，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省的代表以及华中军区、西南军区和华东军区军事委员会林业部门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研究了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并制订了在中国大陆性气候区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该计划内容如下：

一、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大陆性气候区：

1. 广东和广西24度纬线到南方海岸的地带可以种植橡胶树，但不包括广东东海岸，那里经常会有台风。广东省22度纬线以南的地区以及广西省23度纬线以南的地区可以种植巴西橡胶树，这种橡胶树也可以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海南岛生长。

现在，在茂名县和灵山县，为了美化环境保留了14棵非常高的巴西橡胶树。在纬度22度和纬度23度以北的地区可以种植印度橡胶树，这种橡胶树比巴西橡胶树出产的橡胶要少30%—40%。在这些地区也有一些为美化环境而保留的印度橡胶树。

在纬度24度到南海岸地区有1000多亩（1亩相当于1 / 16公顷）尚未开发的位于丘陵地带的土地。如果在这些地方种上橡胶树，这不仅不会造成耕地的减少，而且还可以防护土地，防风保水。

2. 云南省北纬25度以南以及东经102度以西的地区。受印度洋暖流的影响，这里的温度很高，有充足的降雨，因此这一地区可以种植橡胶树。抗日战争时期，归国华侨在勐海县（普洱县以南）修建了一座公园，其中种植了5000棵巴西橡胶树。国民党政府没有对这些橡胶树进行保护，因此现在只留下了500棵，其余的都被牲畜践踏了。在龙陵以西的沼泽地区（在越南缅甸公路）有大量的印度橡胶树。就降雨量、气温和土壤来说，在云南省种植橡胶树的条件仅次于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的条件。该地区今后将是我们种植橡胶树的主要地区之一。但缺点是，迄今为止这一地区沼泽太多，疟疾盛行，同时，那里的居民太少，交通不发达。因此，要在这些地区得到橡胶不会比在广东和广西省更快一些。

3. 四川省从长江与泸州之间的谷地到万县。沿长江河岸0.5公顷的地带可以种植印度橡胶树。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郊区种植的橡胶树中保留下来了542棵或大或小的橡胶树。1948年在那里进行的采摘橡胶的实验证明，这些橡胶树的橡胶含量平均为15%，但是从一棵橡胶树每年采摘的橡胶量则要通过今年和明年进行的实验的结果加以确定。

长江峡谷中适合种植橡胶树的面积不大。据计算，这些地区只有

500亩。此外，那里在种植橡胶树的同时必须种植玉米，因此，这些橡胶树只能用来进行试验。

二、树种。巴西橡胶树种可以从海南岛得到，但是，印度橡胶树种不足，进口也很困难。据说，在印度尼西亚，按照法律，一旦偷了橡胶树并把其运往大陆的话，违反法律的人会被枪毙。至于从印度和缅甸进口树种，也不知道，能否从那里自由运出。在越南解放区没有种植橡胶树。因此，在获取印度橡胶树树种方面存在困难。

现在我们正在华南各省寻找印度橡胶树，以培育种苗。如果能找到100棵印度橡胶树，那么就可以用其种子种植大量的橡胶树。

三、栽种橡胶树的速度。橡胶树栽种8年之后将会出产橡胶。如果考虑到开始得到橡胶、确定橡胶的含量和质量所必需的一定的时间，共计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为了尽快得到橡胶，我们不能进行大范围的种植试验，必须马上就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好在现在种植橡胶树不会给现有的耕地造成损失，因此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哪怕我们种植的橡胶树只能产出较少的橡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会花费一些种植橡胶树的资金，但是我们达到了植树造林的目的。

四、在上述所述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同相关专家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上述所述的三个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种植橡胶树。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能够得到橡胶。收获的橡胶的产量无疑将比南海诸岛少得多，甚至少于海南岛的产量，但为了每年得到必须数量的橡胶，我们可以采用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方法，以此生产出必需数量的橡胶。

我们认为，以前没有在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地区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这不是由于橡胶树在这些地区不会生长，而是由于它们出产的橡胶很少，同时国内对橡胶的需求量不大，也不可能同从南海诸岛进口橡胶的外部市场相竞争。但是，现在的国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自己种植橡胶树。

五、基于上述所述，我们建议：

1.今年和明年栽培2万亩橡胶树苗，估计每亩得到1万棵橡胶树苗。同时，决定在1954年在大陆性气候地区种植450万亩的橡胶树，其中在广东省和广西省种植400万亩，在云南省种植50万亩。主要种植巴西橡

胶树。1956年再种植250万亩橡胶树。

在几年的时间内在四川省和福建省南部地区进行试验，种植数十万亩橡胶树。如果每亩种植25棵橡胶树的话，那么将会种植175万棵橡胶树。如果每棵橡胶树每年出产1.5英磅的橡胶，那么10年以后，每年得到的橡胶将会不少于10万吨。如果每棵橡胶树每年出产1英磅橡胶，那么每年仍然可以得到7.08万吨橡胶。

2.在此期间在海南岛种植的橡胶树将达50万亩，现在海南岛有20万亩橡胶树，68万棵。经过10年，每年将会生产10万吨橡胶。在该次会议上特别讨论了关于在大陆性气候地区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在海南岛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将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

六、在短期内如此大规模地在大陆性气候地区和海南岛种植橡胶树，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向那些需要种植橡胶树的地区的党委提出了如下要求：

1.今年必须在海南岛为大陆性气候地区收集62万斤种子。中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政府应该让各省在1951年8月、9月和10月继续努力，寻找印度橡胶树，以培植种苗，寻找的结果要报告给林业和垦荒部，以便统一分配种子。

2.根据该计划第五点中的第1项内容，相关省份应该准备必要的土地种植树苗，得到该种植计划中指定的橡胶树种植面积所必需的树苗。

3.根据该计划第五点中的第1项内容，相关省份应该在1954年春季之前，在指定的区域内划出总面积为145万亩的地块种植橡胶树。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整理出这么大面积的荒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在沿陆地区。因此，相关的省份应该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4.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和垦荒部以及教育部应该同各地区的人民政府一起动员一些大学以及学院林业系的大学生和教师参与种植橡胶树苗的地块的挑选工作以及栽种树苗的荒地地段的挑选工作。

5.应该让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招募那些曾被南海各国驱赶回国的、曾在橡胶园工作过的工人以及那些将会返回国内的橡胶工人，对他们进行培训，并把其派往种植橡胶树的地区工作。

6.为林业部门配备干部，在各省、区和县政府建立特别的种植橡胶的机关，并为种植橡胶树苗培训工作人员。

7.在各省、地区、县和区中指定一名党委委员领导种植橡胶树的工作。

七、这次会议没有机会估算种植橡胶树所必需的资金，也没有机会确定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在几年内在700多万亩荒地种植橡胶树的时候必须合理地利用当地农民作为后备力量。这样，橡胶树的私人所有所占的份额将会比公有的份额要多，或者选择橡胶种植园的私人所有和社会共同所有的形式。因此，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份初步计划，那么，我们请求中央把其分发给中央各局以及相关的省委，以便实地开展工作，完成该计划。

陈云 薄一波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1, л.65-72

№004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7号简报(1951年8月20日)

发自北京，1951年8月20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8月18日23时发给我的第27号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关于会议情况的第27号简报。

一、在昨天和今天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为摆脱当前僵局而对第2项议程进行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原因是，敌方坚持其所谓的空海军优势而要求借此在地面上得到补偿。

最近两天来，敌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它仍然坚持其原来的建议，

并且随时随地都厚颜无耻地企图了解我们的意图。

我们已根据您1951年8月11日的指示提出具体建议，但敌方对此不感兴趣。

敌方声称：‘临津江以西和三八线以南地区在军事上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需要它，你们不应拿已死的母牛来换我们的骏马’。

这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三八线以北的阵地给我们。

二、今天，敌方派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取代勃克来参加小组委员会会议。

克雷奇和霍奇斯在谈判过程中相互配合：一个发言较为礼貌，另一个则蛮横粗野。

在当天下午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再次试图以补偿其空、海军优势的必要性来证明其原先建议的正确性。此外，敌方还声称，我方提出的三八线没有反映出双方军事力量的态势。

此外，敌方还说，既然我们不同意补偿其空、海军兵力，那也就是我们不提出确定以当前战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因。敌方这样说是为了使我们对提出那样的建议感兴趣。

三、如果在今后1—2天敌方仍不做出让步，那我们也不让步，亦即我们不会提出第二方案，因为在敌对情况下，敌方会得寸进尺，从而拖延达成协议的时间。

李克农

8月18日23时”

毛泽东

1951年8月2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84-85

№133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了解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1951年8月2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0日

第190项 关于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情况。

责成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就这一问题向政治局下一次会议提出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38

№133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0日

第191项 关于费德林、瓦日诺夫同志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的电报。

责成由维辛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缅什科夫和贡多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3天期限内就费德林和瓦日诺夫同志的电报向政治局提交建议，同时杜绝用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生活方面的任何多余的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38

№1337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用汉语配制苏

联电影(1951年8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3日

第217项 苏联电影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电影部的关于用汉语配制电影《顿涅茨矿工》和《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43

№133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况(1951年8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4日

第237项 关于改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状况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

一、认为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和扎沃龙科夫同志提交的就该问题的决议草案是不能接受的。

二、责成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和扎沃龙科夫同志，在5天期限内依据交换意见的情况，提交修改过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47

№1255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苏中船舶股份公司苏方董事(1951年8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5日

第246项 关于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1.批准下列人员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董事会中的苏方成员：

И.И.基列耶夫——董事会成员兼任第一个三年中的董事会副主席；

A.C.拉斯卡托夫——董事会成员。

2.批准H.A.科斯坚科为苏中船舶维修和制造股份公司的总经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49

№20160 别洛夫的指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1951年8月25日)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1年8—10月作战计划

(1：500000地图，1941年)

(本文件经驻中国苏联空军行动小组负责人空军上将C.A.克拉索夫斯基批准。)

1951年8月25日

计划

主要任务：

一、为鸭绿江上渡口、铁路桥，安东和朔州地区的电站、机场和后方设施以及北朝鲜地区从平壤一线至海岸线范围内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上述目标实施空袭和空中侦察。

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部队的配合下防止敌空军对沈阳方面中国东北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实施轰炸。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少将

别洛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苏斯林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34, л.30

№0048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因敌破坏活动宣布暂停谈判(1951年8月2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敌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

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

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方施加压力。

当然，这可能是南朝鲜谍报机关破坏谈判的计划，但是除非得到美国同意，否则李承晚不会派飞机袭击在开城地区——他自己主动要求进行谈判的所在地的建筑物。因此，敌人的挑衅行为已迫使我们做出了反击的决定。

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有两个发展可能：

一个是拖向破裂。我们已在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发动的正面军事进攻，同时也严防敌人从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登陆。在近几天敌机侵入中国沿海城市青岛、上海、常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

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海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另一个可能是，敌人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

目前，我们准备在停会期间与敌人进行宣传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罪行，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形势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敌人可能想恢复谈判，这样，我们就主动提出一个能够使谈判发生转机的方法来恢复谈判，并且迫使敌人同意这一办法。

金日成同志建议为了开城中立地带的安全，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作为谈判期间的监察员和证人出席谈判，并以此作为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在将来控制执行停火的组织中发挥作用。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第4279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0 , л.86-88

№24826-2 帕利古诺夫与邱杜易会谈纪要：驻外记者的豁免权问题(1951年8月27日)

..... [103]

邱杜易(ЦюйДуй) [104] 说道：“我们受委托要弄清楚，你们是怎样任命驻伦敦的记者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同新华社任命驻伦敦记者的问题有关)。我们想知道，你们驻伦敦的记者是否享有某种特权。其中包括他们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们是否能够自由活动？”我回答说，正如他可以从英国报纸的言论中得知的，我们驻伦敦的记者被看作是苏联国家机关正式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享有同其地位相称的所有特权。

对此邱杜易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塔斯社驻其他国家的记者，其中包括驻美国的记者也享有这些特权吗？我回答说，在绝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记者不享有这些特权，在每一个国家都实行为外国记者规定的准则制度，而塔斯社在任何地方都不企图为自己谋取特殊的地位。塔斯社驻美国记者也应该到司法部登记。

邱杜易问道：塔斯社是否派记者到那些尚未同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我回答说，在过去，塔斯社曾经向没有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些国家派过一些记者。但是，塔斯社记者现在只到那些同苏联保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

РГАСПИ , ф.17 , оп.137 , д.723 , л.137-138

№125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问题(1951年8月2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7日

第256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1.认为不能接受由维辛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缅希科夫、库兹涅佐夫和贡多宾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

2.委托委员会在3天内提交根据所交换的意见重新制定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51

№125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刘竞雄来苏联治病(1951年8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8日

第270项 关于刘敬雄前来苏联治病问题。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允许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妻子刘竞雄及儿子安民来苏联治病。

2.关于刘竞雄及儿子的接待和安置问题由联共(布)中央总务部负责(克鲁平同志)，而治疗方面的问题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负责(叶戈罗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54

№125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1951年8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8日

第272项 关于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的问题。(1951年8月24日会议第585号记录第2条)

1.接受苏联电影文化部的建议(博利沙科夫同志)：

(1)自1951年10月1日到10日期间，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展，邀请中国电影创作工作者代表团10—12人来苏联参加本次活动，期限是3周。

(2)关于在电影展期间，展出如下中国影片：《中华儿女》、《光芒万丈》、《无形的战场》、《钢铁战士》、《白毛女》、《中国民族大团结》，苏中联合摄制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新北京》、《长江两岸》、《新上海》、《杭州——中华明珠》、《在华南》。

2.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审议并批准关于苏联电影部邀请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预算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54-55

№143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問題(1951年8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8月29日

第290项 关于如何处理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失误的问题。

责成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两天期限内对在相关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做出总结报告，而布尔加宁同志务必事先对就该问题所再次制定的决议草案进行审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58

№0049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朝方面的谈判立场 (1951年8月29日)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你们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9, л.4-5

№0049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暂不邀请中立国代表 参加谈判(1951年8月30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第4358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97

№00492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函：关于美英打捞米格飞机事件(1951年8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给别洛夫以及集团军司令、空军司令、国土防空军司令发去了关于打捞米格15飞机的指示。

华西列夫斯基

1951年8月30日

附件：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的指示

致别洛夫并北京克拉索夫斯基：

一、仅从美、英新闻，而不是从您那获悉，大约一个月前，美国人和英国人从水中打捞出在北朝鲜西海岸的战斗中被击落的米格15飞机。飞机位于新比岛北朝鲜水域的浅水区，在那里英国人发现了它。在北朝鲜和中国部队所占领海岸，在您的航空兵驻扎的机场附近，英国和美国军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地进行了打捞飞机的工作。

您知道美国人和英国人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米格15飞机所表现的兴趣，您不止一次地得到提醒，要采取措施，以免被敌人所获取。

只是由于您的纵容和不尽职，使美国人在您的航空兵鼻子底下及北朝鲜和中国部队的眼前

获得了米格15飞机，这将给我们苏联航空兵和武装力量带来严重危害。

二、现责成您：

(一)给予解释：

为什么您没有及时得到我们被击落的米格15飞机落入北朝鲜海岸附近的海域的消息。

在美国人不仅发现而且打捞之前，为什么您没有采取必要和及时的措施，从水中打捞米格15飞机或将其销毁。

在您的航空兵鼻子底下及北朝鲜和中国部队的眼前，怎么会发生英、美军舰打捞米格15飞机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事情。

(二)报告您将采取什么措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三、除此消息外，我们还知道，在美国人打捞米格15飞机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米格15飞机已损坏的发动机。

请报告，对这个问题您都知道些什么。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1951年8月30日

致集团军司令、军区司令、军区空军司令、苏联空军司令、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

我们获悉，美国人已得到米格15飞机的发动机(我们不知道来源)，他们已在进行认真研究。

你们应明白，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我们质量超过现代外国歼击机的米格15飞机及其发动机，过去和现在所表现出的兴趣，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企图是无论如何要弄到它。

由于此事对我苏联空军和武装力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责成你们：

一、仔细核对和报告，在你们部队或军区空军是否有出卖米格15发动机，而其结果是可能落入美国人之手的事件。

二、根据美国人获得发动机的消息报告，检查和报告你部队或军区空军是否有人泄露了米格15飞机发动机的性能，同时泄露了这方面的秘密资料。

三、采取严厉措施，消除向敌人泄露我们战斗机的技术样品和部件以及有关的任何情报的机会。

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

1951年8月30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8-12

№1337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任命驻华使馆武官 助理(1951年8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

1951年8月31日

第316项 关于Е.А.加尔金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采纳苏联军事部的提议：

1.鉴于加尔金上校将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解除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武官助理的职务；

2.批准福缅科中校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武官助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63

[1] 此处原文为Калган，即蒙古语张家口的俄文发音。——编注

[2] 该档案为手抄件，抄写内容到此结束。——编注

[3]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该档案有多处字迹不清，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5] 给斯大林的文件是两份。——编注

[6] 哥特瓦尔德，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共和国总统。——编注

[7] Г.К.马兰金，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编注

[8] 针对金日成请求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下去。他同时答应再向朝鲜提供200架作战飞机。——编注

[9] 显而易见，后3行文字被Н.А.布尔加宁用笔勾掉了。——原注

[10] 该草案尚未公开。——原注

[1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 原文如此。——编注

[13] 该草案尚未公开。——原注

[14]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5] 该文件是初稿，有大量手写的修改意见。——编注

[16]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7] 俄国公布的该档案只是节选本。这段对文件背景的说明，是档案公布者加的。——编注

[18] 俄国公布的该档案只是节选本。这段对文件背景的说明，是档案公布者加的。——编注

[19] 俄国公布的档案没有决议草案，只有这个清单。——编注

[20] 马特维耶夫，是M.B.扎哈罗夫的化名。扎哈罗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联合国军实行仁川登陆后，作为苏联军事代表被派往朝鲜，了解战争局势。中国出兵朝鲜后，又作为斯大林私人代表被派往中国，并担任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编注

[21] 原文如此。当时，国防部在苏联称军事部，在朝鲜称民族保卫省。——编注

[22] 常福是布尔加宁的化名。——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24] 原文如此。——编注

[25] 所收集的档案没有附件三。——编注

[2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还有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电报稿，时间标明10月4日，估计是该电的初稿。现作为附件刊登于此，以了解斯大林做了哪些修改。——编注

[27] 此处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28] 实际上，毛泽东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53页。——编注

[29] 原文如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宣布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编注

[30] 原文如此。——译注

[31] 因中苏两国铁轨间距不同，故所有过境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满洲里站改换到对方列车。——编注

[32] M.B.扎哈罗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1950年9—10月曾作为斯大林的军事

代表被派往朝鲜。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后，又作为斯大林的私人军事代表被派到北京，后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编注

[33]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34] Г.М.普希金，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35] 洛莫夫，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编注

[36] 当月9日，周恩来会见扎哈罗夫，得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的步兵武器，并将于翌年1—2月内交货。——编注

[37] 当月11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本届安理会主席贝勃勒，声明中国绝不接受安理会本月8日提出的“邀请”中国代表与会参加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的决定，同时要求安理会将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议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在安理会能够同时提出控诉。——编注

[3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39] 11月15日晚扎哈罗夫向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120架米格15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成立空军军一级指挥部。周恩来说：苏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在安东附近再修建一个机场供其使用。——编注

[40] 该示意图未公布。——原注

[41] 当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曾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目前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编注

[42]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不清，无法译出。——编注

[43] 原文如此。——编注

[44] 克拉索夫斯基，苏联空军上将，时任驻华军事空军顾问组组长。扎哈罗夫于1951年4月中旬奉命回国，克拉索夫斯基继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编注

[45] 即冯文彬。——编注

[46] 在俄国学者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47] 即什特科夫。——编注

[48] 此时，拉祖瓦耶夫已经分别接替什特科夫和瓦西里耶夫担任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编注

[49] 该报告在档案原件中是表格形式，但项目繁多，且过于复杂。现摘其主要数据翻译于此。——编注

[50]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编注

[51] 当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出的停战条件的意见。13日，周恩来电示伍修权、乔冠华向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编注

[52] 原档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不清。——译注

[53] 哈拉哈河战役，亦称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编注

[54] 参见以上№13329文件。——编注

[55]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56] 此处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译注

[57]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58] 这里指的是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编注

[5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60]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根据其内容判断为1951年1月。——编注

[61] 在彭德怀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文稿中，这里接下来的还有一句：“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让敌暂时占领，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够。”显然，毛泽东在转给斯大林这封电报时，删去了这句话。——编注

[62] 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兼右翼战线方面军司令员。——编注

[63] 朴一禹，当时担任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朝鲜代表。——编注

[64] 俄国出版物公布的只是文件的片段。——编注

[65] 该报告篇幅较大，这里只节译了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编注

[66] 即尤金。——编注

[67] 原文如此。——编注

[68] 兰纳迪夫，1948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69] 高士，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后担任总书记。——编注

[70]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注

[71] 拉奥，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注

[72] 布尼亚，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注

[73] 此档案在俄罗斯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74]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75] 此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译出，以省略号表示。——编注

[76] 这段话是俄罗斯档案公布者所作的说明。——编注

[77] 原文如此。——编注

[78]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复函草稿。——编注

[79] 5月2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现有装备各种武器、弹药必需的蓝图。5月20日，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告以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及启程日期。——编注

[80] 博戈莫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81] 即华罗庚。——编注

[82] 该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51年5月26日。——原注

[83]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页。——编注

[84] 凯南，1949年出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翌年辞职。1951年5月31日受美国政府委托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会见，提出和平谈判的试探。6月5日马立克再次与他会见，表示苏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编注

[85] 原文如此，即中国人民志愿军，下同。——编注

[86] 此处档案原件字迹不清。——译注

[87]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88] 指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广播节目中提出，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编注

[89] 原文如此。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名称应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注

[90] 李奇微，美国上将，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1951年继麦克阿瑟出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编注

[91] 这里指的是北京时间，按美国东部时间，该声明是29日发表的。——编注

[92] 原文如此，“日期”一词似应为“地点”。——编注

[93] 乔冠华，时任中朝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顾问。——编注

[94] 解方，时任中朝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编注

[95] 档案复印件此处及以下部分字迹不清，无法翻译。——译注

[9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97] 收到斯大林此电后，毛泽东于22日致电金日成就上述看法征询意见。金日成随即复电表示同意。23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今后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编注

[98] 原文如此，似应为联合国军代表团。——编注

[99] 见以下№00466文件。——编注

[100]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01] 原文如此。——译注

[102] 原文如此。——译注

[103]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04] 邱杜易，时任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编注

第四卷(1951.9—1954.1)

1951年

№20161 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1951年9月 [1])

..... [2]

三、对本军各部队作战活动的建议

1.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的把握

我们目前的战斗任务暂且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本军各部队应防止敌空军对安东和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电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

与此同时，本军还应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协助下严防敌空军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可能发动的攻击。

鉴于我方已打算在龟城、安州和开城等地区建设新机场，因此我军未来可能面临的任务就是为这些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上级为我军以前规定的作战范围，即最远平壤元山一线和两侧海岸线之间的区域，以后时期仍将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上述限制性规定导致我军作战时不能充分发挥我战机的良好性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需要强调，即今后在北朝鲜境内的空战行动中，我军仍将继续单独面对美国侵略者，得不到任何来自中国和朝鲜空军方面的支援。因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力，将打击重点集中在敌空军的主要机群方面。

至于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后方设施提供空中掩护，本军将作为第一梯队与敌作战，同时也将获得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是中国空军——的巨大帮助。

我军作战行动的特点是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实施机动飞行，这对我们组织与敌空军的战斗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暂且分布在敌空军的作战区域之外，这相当程度上使我们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任务的过程变得简单了。

以上所列我军作战行动的局限和特点便构成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条件。

我军战机的把握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根据力量构成

本军在第二梯队共有2个师或5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12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在第三梯队有1个师或2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5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我军第三梯队的战机，由于所在机场较远且同时要完成相当的改装训练任务，因而他们只能最远至安东一线定期参加战斗。至于对该界线以南地区设施的掩护任务，他们是无力承担的。第三五歼击航空团主要用作夜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会用其来保卫安东地区的地面设施。

根据战术行动相关规定，我们计算出每名飞行员的工作量：每天起飞2个架次；每月起飞不超过20个架次。近一阶段，我军各部队的实战经验证明，我们的这一计算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在现有条件下，我军指挥部留作第二梯队预备队的兵力至少有两个中队，可同时出击的机组共有100个，每天最大起飞架次为200架次，根据长时段作战的统计，平均每天为75个架次。

根据上述战术行动之规定，我们可能击退的敌机数量也大概是这个数字。

根据我在报告第一节中所列举的敌空军的活动规律和我们的实力，我军的作战可能性具体如下：

——在我地面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在使全军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分批次地、集中地对敌人的空军进行打击，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保护；

——用本军第二梯队战机防止敌空军主力机群对安州和熙川一线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以第二梯队的预备队——2—3个中队

和第二梯队1个师的全部兵力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必要时可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4个团，以防止敌空军个别机群对安州和平壤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攻击，由军指挥部预备队、第一梯队各师其他部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兵力来保卫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和设施。不过，如果要为安州和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完整而可靠的空中掩护，我们的力量还是明显不足。

我们的力量分配计划是固定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它也会根据空战形势而发生一些相应变化。

(2)根据作战半径

根据导航员的计算，米格15战机在6000—7000米高空维持10分钟空战的油耗为所携燃料的20%。

我机群作战半径：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4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00公里。

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7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40公里。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平壤一线以内，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团为单位的机群投入战斗；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只能以中队为单位，在安州一线以内不论带不带副油箱，我们均可以以团为单位组成的机群采取行动。

在低空，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的作战区域均离自己的基地较远。因而我军较合理的参战方式是：沿高空航线飞行，直接降至作战区域参战。

以米格15组成的机群在6000—7000米高空的飞行持续时间为：

——在平壤—宁郁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5分钟，不带副油箱——18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20分钟，不带副油箱——0分钟。

——在安州—开城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50分钟，不带副油箱——30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40分钟，不带副油箱——2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

在任何情况下，我机群飞行高度的选择均应根据具体航线而定。为了增加我机群的续航时间，我们起飞时不应以团为单位，而应以中队为单位，每间隔5—10分钟起飞一个批次，以利我机群力量的增加和替换。

总之，在安州—平壤地区，我以团为单位的机群续航时间平均为20分钟。而利用我第一梯队(4个团)80%的兵力，我们便可为平壤一线以内的地面设施连续提供1个半小时，每天共计3个小时的空中掩护。

(3)空中拦截

我现有对空情报系统可以发现高度6000—7000米，距我安东机场250—270公里范围以内，即汉城方向至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敌机。

如果在我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开始起飞，此时敌轰炸机的高度应在6000—7000米。如果其飞行路线为汉城—平壤—安州—安东，那么我们便可在距安东以下距离对之实施拦截：

——我机群在机场地区便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8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90公里；

——我机群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11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120公里。

当然，即使在刚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立即起飞并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我以团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能对敌机实施有效拦截的极限距离也无法超过安州—熙川一线。在个别情况下，当敌机已在作战区域待了10—15分钟之时，我们可能实施追击性拦截至宁郁一线。

在敌歼击机向安东方向飞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对之实施拦截的区域为新比岛和龟城一线。对敌人以梯队形式参战的歼击机的拦截，有时只能在安州一线对其后续机群实施截击。

有时，针对敌沿安东方向飞来的机群我们只能在海上实施截击，因

为根据实战经验，我们对敌人此类机群的极限拦截距离最远只能在铁山和宣川一线附近。

.....

ЦАМО РФ, ф.64.иак, оп.174045, д.49, л.38-41, 43-44

№11528 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 (1951年9月 [\[3\]](#))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报告

一、谈判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同志在其无线电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调解“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军事冲突问题”的具体建议。根据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作为调解的第一个步骤，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关于停火以及停止向三八线地区互派部队的谈判”。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提出的是如此及时，这个建议不仅在和平民主社会中立即得到了赞许，而且在英美集团的一些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共鸣，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冒险行动是没有希望的。世界社会舆论对侵略者在朝鲜的一系列暴行的愤怒，广泛要求停止侵略的行动，美国的仆从国也明显表现出退出朝鲜战争的意图，——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待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上的立场。美国统治当局在对这个建议做出让步时，他们已经深思熟虑，斟酌再三：如果这样做他们就有可能将社会舆论引入歧途，显示自己的“热爱和平”，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重大的让步，而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就致使谈判破裂，以便轻松地继续扩大受垄断利益驱使的战争。

也不排除，同意参加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局部的和暂时的军事意图的操纵：暴雨季节已经来临，而美军司令部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期，即美国空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天气情况的严重制约时，利用停战谈判阻挠对手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

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拜会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并向他提出了与马立克同志建议有关的一系列

问题。葛罗米柯同志向柯克详细解释了苏联对于在朝鲜确立停战的目的和可能性、军事谈判的性质以及各方代表的立场。

6月30日，联合国驻朝鲜部队司令员李奇微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北朝鲜军队总司令”金日成将军提出了开始停战谈判的建议。在李奇微的呼吁中指明了，他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做出这一举动的。拟定谈判在停泊在元山海湾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进行。

7月1日，我方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李奇微转达了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共同签署的复函。在复函中表示同意，于7月10日和15日期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休战的谈判。

7月3日，李奇微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金日成和彭德怀提出建议，为“确保有效地调解与第一次会晤有关的各种细节”，举行联络官的预先会晤。同时在呼吁书中还指明，关于休战条件的协定应该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签署。这样一来，还是在谈判开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确定了与苏联方面的建议背道而驰的谈判方向。在与李奇微进行会晤时，葛罗米柯同志已经表达了苏联方面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在签署休战协定之前，应该签署一个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临时军事协定。

7月8日，在开城进行了联络官的会晤。会晤的结果是顺利地解决了关于代表团的住所、布置和饮食，关于距会晤地点50公里以内区域的道路修理等方面的行政管理问题。美国人同意了朝鲜人民军联络官的建议，每一方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会晤的结果还明确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第一次会议的程序和时间，决定了关于警卫以及在开城地区建立一个中立区的问题。

应该指出，朝鲜人民军的联络官对会晤所做的准备工作要比美国军官做得好，因而，他们很成功地进行了会晤，并完全坚持了自己的建议。他们还弄清楚了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情况，并回避答复美国人关于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人员组成情况的问题。这给变更事先拟定好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组成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代表的军衔方面都做了调整，将代表团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5人。

任命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为代表团团长，战前他曾担任过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育副相，从来没有服过役。南日与朝鲜人民军的其他任何一位军官一样，对于类似的谈判没有任何经验，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作为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将军，南日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在谈判开始的最初日子里，美国观察家们对中朝代表团的首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够说明的是，南日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如此重要级别的谈判，因而有许多表述不够清楚，有时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不能肯定和含混不清。但是，在我们看来，南日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做得比任何其他一名朝鲜军官都好。

在谈判期间，南日的工作由在场的中国同志领导，这些中国同志是专门从北京派到开城的。

二、开城谈判的进程

交战双方军事代表的第一次会晤，是7月10日举行的停战谈判的开端。

参加谈判的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南日——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侦察管理局局长)；

解方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张平山——朝鲜人民军代表(第一军团参谋长)。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由以下成员组成：

美国海军中将查尔斯·特诺尔·乔伊——代表团团长；

空军少将J.克莱奇；

Г.霍乌斯少将；

海军少将阿里·贝克；

李承晚军队的将军白善烨(第一军指挥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了以下3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相互的协议，双方同时下达关于停止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命令……

第二个问题，应该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应同时将自己的武装部队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的地区。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被双方用来疏散的那些地区，应该宣布为非武装地带，不允许任何一方在这里派驻自己的武装部队或者是进行某种军事行动。这些地区的民事管理方式应该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那种管理方式。同时应该立即开始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

第三个问题，所有外国军队应该在最短的期限内撤离……”(摘自南日在7月10日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1年7月12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只作了一个普通的声明，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建议。乔伊特别强调指出，谈判应该只是针对纯军事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方面的问题。

不去立即着手解决与休战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坚持讨论谈判的日程。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日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地反映出美国人极力拖延谈判，并企图使谈判复杂化。美国人提出的方案包括以下九点：

(一)批准谈判日程。

(二)红十字会的代表应该有权参观战俘营。

(三)关于只讨论军事问题的协定。

(四)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这些条件能够确保这些行动不再发生。

(五)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的协定。

(六)组建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

(七)关于由在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监督员小组实施监督的原则的协定。

(八)组建管制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能。

(九)调解关于交换战俘以及牺牲人员等一系列问题。

正如从美国的日程草案中可以看清楚的那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并被淹没在许多次要的问题中。例如，关于停止军事行动这个主要问题，被作为不合理的问题，放在了次要地位。显然，美国人指望利用像关于红十字会代表的权利这样的问题，作为自己干涉朝鲜内政的辅助工具。除红十字会的代表之外，美国人在草案中还拟定了要成立3个监督机构的计划，企图将北朝鲜置于自己代理人的监督之下。

为反对美国的草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7月1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下日程的方案，这个草案是在现场在会议的间歇时间起草的：

(一)批准谈判日程。

(二)关于沿三八线建立一个分界线以及建立非武装地带——这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四)关于停火以及建立休战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战以及战后的战俘问题。

该会议日程草案的讨论被拖延了整整16天。对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提出的会议日程草案，美国人主要反对的是第二条里的关于确定分界线(三八线)的问题，反对讨论外国军队的撤离问题。反对第二条的真正含义，在乔伊于7月27日会议上发表声明之后完全明朗化了。下面援引这个声明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声明，它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武装干涉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行动的，是根据其政府的命令被派来的，在今后继续的谈判中，应该由这些政府来解决自己军队在朝鲜的逗留问题。

李奇微的代表们拒绝讨论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朝鲜和

中国的宣传机关广泛地利用这一点来揭露美国企图继续占领南朝鲜并将其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人，其中包括艾奇逊，都被迫发表了声明，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并相信他们的声明，在适当时机来临的时候，美国政府将从朝鲜撤回自己的部队。乔伊也在7月25日会议上发表了声明，说美国代表团并不否认，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对于最终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立即又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在晚些时候研究。

在3天的谈判间歇时间里(7月22—24日)，中国和朝鲜领导人讨论了谈判中涉及这个问题所出现的困难，并协商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在7月25日会议上南日阐述了这个建议。该建议的内容是，在直接涉及停战方面的问题之后，还将另外一条列入会议日程，即：“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在他们之中还将讨论关于撤军问题的建议。美国人同意了这个建议，7月26日，谈判日程最终以如下方式商定下来：

(一)通过谈判日程。

(二)建立非武装地带，确定分界线作为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在朝鲜停火和实行休战的具体措施。成立监督机构，对停火和休战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确定该机构的权利和职能。

(四)妥善解决关于战俘的问题。

(五)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

7月27日，双方转入了讨论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和确定分界线的问题。

中朝方面再一次重申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关于确定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和双方将自己的部队撤离到距该线10公里地区的建议。美国代表团声明说，不能接受关于三八线这个建议。

在7月27日会议上，乔伊阐述了美国方面的最后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分界线的走向是：从位于海州市西南的松元洞，经金城地区(海州市的北部)，经长洪里，继续向东北，经长洪屯—德顺台—潘苏洪里—金城

里，在此向北折回，最后一直沿位于三八线以北80公里处的高松北部的朝鲜东部海岸线到底。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根据所设立的这条分界线，非武装地带应向两方纵深20海里(1海里等于1853米)。

美国人所建议的分界线，在北部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目前的战线，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延伸到前线以北的35—40公里处。在这条线与三八线之间的一块领土，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占朝鲜总面积的1/20。美国人已经表示，作为交换这块领土，准备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出翁津半岛南部的领土，虽然这块领土具有某种经济利益(铅矿场)，但是组织防御却很困难(在委员会分会会议上，美国代表霍斯声明说，他们对朝鲜这一地区完全不感兴趣，将它给谁——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澳大利亚，对于他们都无所谓)。

这样一来，美国人已经公开要求向他们做出让步，将北朝鲜的一大块领土割让给他们，这样的让步，首先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打击，并能够加强美国和李承晚政权的威信。此外，上述所说的那块领土，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基地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这将使朝鲜人民军失去最有利的防御线，而敌方将获得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从这里突然封锁和打击朝鲜的防御，并一跃进入中国和苏联的边界——这就是美国关于分界线建议的军事意图。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人所觊觎的这块领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地区有钨矿。的确，目前在这里还未进行地质勘探，美国报刊多次提到的那些巨大的钨矿层目前还没有被发现，也没有钨矿场(也可能，美国人已经掌握了更加准确的地质勘探资料)。除此之外，在这一地区还开采有铁矿、锰矿、硫酸钡、滑石粉、萤石，而在华川还有一个功率为6万千瓦的水电站，该水电站可保证汉城仁川地区的南朝鲜工业对电力的需求。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人至今为止也没有在报刊上具体地阐述自己关于分界线的建议。更有甚者，这一建议却被蓄意地提供给社会舆论，以便让人们判定拟定的这条分界线仿佛与当前的战线相符合。甚至在开城的会议上，美方代表也回避提到这条他们所建议的分界线，而只是展示标有这条线的地图，看来，连美国人自己也明白，他们的战略野心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害怕社会舆论批判他们的立场。

从7月27日乔伊在全体会议上的声明(声明原文附后)以及随后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觊觎北朝鲜领土的理由，似乎是说，

联合国军司令部既然在它拥有充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空中和海上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那么这一种让步就应该得到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方面的某种领土让步作为补偿。照美国人的说法，按北纬三十八度线建立分界线的建议不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并且没有考虑战争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空军和海军的意义和状况。美国代表团一面极力掩饰自己建议的政治意义，一面又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这一建议似乎不是因为它对扩大由它控制的领土感兴趣，而是因为它必须获得合适的防御地域，而在三八线地区却没有这种地域。在8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乔伊断定：

“在停战期间我们关心的是部队的安全保证，而不是领土。为正视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比你们在三八线以南占领的领土多一倍。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对领土不感兴趣。三八线只有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是1945年产生的并消失于1950年。在三八线南部边界长达数公里的地段上，都没有适于防御的阵地，而同时在你方面却有优越的地域。我们所建议的分界线将向双方提供同等的地域。”

美国代表团还特别强调，在停战谈判中不可能注意某些政治见解，包括所讨论的建议对随后在政治方面解决朝鲜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代表团声称，政治问题将由政府来解决，而在停战谈判中只应根据军事的考量并只从今天存在的军事态势出发。美国代表团引用海牙公约断言，停战协定只是临时措施，它不能预先确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未来进程。

美国人就以这种方式妄图为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夺取一大块北朝鲜领土辩解，而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可能被美国人拖延很长时间。显然，美国建议追求的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还有深远的政治目的。

中朝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建议，证明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理由如下：美国的空中和海上优势表现在对和平居民的野蛮轰炸，是破坏国际法的，因此不能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军事因素来考虑。

当前的地面战线是由于各种武器——既有地面的也有空中和海上兵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得不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持，干涉者的军队就不能守住当前的阵地。当然，对战线形势的估价就包含有对所有种类武器作用的估价。所以，像美国代表团建议的那样，把停战问题对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分开来看是不正确的。

在确定分界线的时候，不应仅仅依据目前的、临时的不稳定的战线态势。战线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今年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在三八线两边来回移动了4次。最后一次美军进入北朝鲜领土是在一个月前(摘自南日在7月31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停战不是简单的临时军事措施，而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所以停战谈判应该旨在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是旨在未来军事力量的某种配置。想在现行战线以北建立有利于防御的分界线的要求证明，美方力求获得它未占据的北朝鲜领土以建立有利于自己的阵地是想要战争，而不是想要和平。

中朝方面不仅从政治上也从军事上论证了按三八线设立分界线的理由。战争是从三八线开始的。干涉者越过三八线导致了中国志愿军的参战。开始停战谈判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马立克的建议，马立克的建议规定的是双方军队离开三八线相互后撤。按三八线设置分界线最好地反映了真实的军事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人民军队两次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干涉者的军队也两次越过三八线。

(二)最近7个月来人民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大约5个月，而干涉者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仅两个月多一点。

(三)当前的战线不是稳定的，不能反映真实的军事态势。

(四)人民军队占领的三八线以南领土(3630平方公里，其中含三八线145公里)，基本上相当于干涉者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4630平方公里，内含三八线165公里)。

从7月27日至8月16日举行的所有全体会议都在讨论上述两个建议，并且在谈判中没有任何进展。时而出现美国人打算提出比较温和的建议的迹象。比如，7月31日，李奇微司令部控制的东京电台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建立巩固和平甚至打算放弃部分所占领土”。据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报道，李奇微曾在8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仿佛“建议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但这不是不可协商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的话”。然而，事实上美国代表团任何新建议也没提出，并且也没放弃自己在三八线以北很远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要求。

在8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分委员会以进一步非正式审议分界线的问题。看来，美国代表团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分委员会人员组成比较少，比较容易弄清对手的意图，而谈判级别降低(分委员会一建立全体会议就中止)就提供了把谈判彻底引入死胡同的机会，中朝方面则希望，美国人关于建立分委员会的建议是为寻找合适的妥协而提出的。

美国代表团建议，双方各任命一名代表和两名助手做分委员会的成员，但后来又同意南日的建议任命两名代表。中朝方面任命的是李相朝将军和解方将军，美国方面任命的是霍乌斯少将和贝克海军少将。

分委员会会共开了5次全体会议(8月17、18、19、21日和22日)，分委员会没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分委员会中的美国人仍旧提的是全体会议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即：(一)分界线的设立不应涉及和平会议才解决的领土问题；(二)分界线的设立应依据现有军事局势并不应给双方造成损害(指美国由于单方面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遭受的损害)；对防御地域的考虑应该作为划分分界线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方进攻另一方的情况下保证双方的安全。

在涉及自己7月27日提出的关于分界线的基本建议时，分委员会的美国人仅局限于通过将非军事区的纵深从20海里减到20公里来“更新”它。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指出，非军事区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但这丝毫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中朝方面让美国人明白，为达成协议，双方必须抛弃自己先前关于分界线的建议并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为这种途径，北京早就建议朝鲜人，在必要时同意交出美国人在北朝鲜占领的领土和人民军队在南方占领的领土，将它们置于联合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其条件是从这些领土上撤军。在这件情况下，三八线无疑将成为非军事区的基础。

在8月22日的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朝鲜人民军代表声明：“如果你们放弃自己先前的立场并表现出达成协议的真诚愿望，我们可以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朝鲜人民军代表坚持，美国人必须放弃因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获得补偿的要求以及放弃将现有战线作为基础的建议，因为它不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军事态势。朝鲜人民军代表称：“当前我们拥有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占优势；如

果需要进攻南方，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到。但既然我们希望停战和停止流血，所以我们不这样做。”

美国人口头上同意让步。对于在战线和三八线之间设立分界线的可能性问题，他们在8月21日的会议上是如此回答的：“如果有你们通过在现行战线附近设立分界线的愿望，那就请你们提出建议。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讨论把我们的部队从战线撤往南方的问题。我们不打算在现行战线和三八线之间建立分界线，但请你们提出建议让我们讨论。”

美国人在分委员会中实际上没提出对7月27日的建议进行修改的任何建议。他们显然是希望中朝方面首先做出让步，然后晚些时候再迫使它做出新的让步。

在这种条件下，中朝方面认为改变自己的立场是不适宜的。于是，分委员会的谈判没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人越发暴露出不愿意妥协，转而在开城中立区进行武装挑衅。看来，美国人已确实把中国人极力想结束战争，看成对手的软弱可欺，决定或者吓唬对手并迫使其让步，或者是结束谈判。

还在早些时候，美国人为查清敌人的情绪并拖延谈判，就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在解决这些事件时又采取粗暴的施压和强制的方法。

比如，在谈判的第二天，7月11日快结束时，美国代表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即不提出问题来讨论，要求更改联络军官之间达成的协议规定的程序，并离开会场，声称只要外国记者不被容许来开城，他们就不会举行谈判。7月12日，美国代表不等问题解决，除代表团机关的75名成员外，还试图带大批记者来开城，在他们进入中立区时被中朝警卫部队扣留。借此机会，美国代表也掉头回去了，3天没来参加谈判。

尽管在7月8日联络军官会晤时，正是美方代表金尼上校提议，谈判地区的安全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负责，只容许双方代表及代表团机关的工作人员进入这一地区(金尼通报说美方代表团机关由75人组成)，但美国代表团在发生7月12日事件时却大叫大嚷说“共产党”限制美国代表在开城的行动自由，李奇微将军则要求重新审查7月8日的协议。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答复李奇微时指出，关于记者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不应该成为谈判中止的理由。李奇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谈判于7月15日恢复。

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所报道的，美国人是故意往开城派了大批记者，希望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妄图以这种方式找到中断谈判的借口，其目的是制造相应的政治局势，让国会通过更新军队装备计划的政府法案。

看来，美国人后来在开城制造的事件也是为追求拖延谈判的同一目的。这些事件有：7月16日，美国人控制的李承晚士兵扫射谈判地区的方文村哨所。为此，南日在7月17日的会议上向美方代表团发出口头抗议。

8月7日，40名李承晚士兵用机枪向方文村扫射，然后又用手枪、步枪和卡宾枪向中立区的非武装警卫哨所射击。

同一天，一些美国歼击机向协议规定地打着白旗、发动机部分盖着白色罩的朝鲜人民军代表乘坐的汽车扫射。汽车被击毁。

8月19日，30名李承晚士兵袭击中立区警察分队没有武装的警卫处，打死排长姚庆祥和战士王应元(均为中国人)。

同一天，美国飞机扫射并烧毁了从开城开往平壤、打着白旗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军官乘坐的汽车。

美国人对每一个事件都极力回避责任，对中朝方面的抗议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与此相反，中朝方面则公开承认了自己对8月4日事件的责任，当时中国志愿军的一个武装连队从离会场100米的公路上通过去参加会议(中国人以为美国人已乘不久前开走的直升机离开了开城)。

中朝方面尽管抗议美国人的挑衅，但却没破坏谈判进程，相反，美方利用仅仅武装的中国人在中立区出现这一点就中断会议5天之久(从8月4日至10日)。8月4日的事件被美国宣传机关广泛利用，为中断谈判准备土壤。利用中国人的失误，美国人决定破坏关于谈判地区安全保障的协议。

中朝方面对8月4日事件以后美国人一个接一个的挑衅所提的抗议未能阻止美国人。8月22日夜間，美国飞机破坏中立区，在朝鲜人民军代表团驻地和会议室地区投下了3个油箱和6枚小型炸弹，会议室还遭到飞机机枪扫射。

中朝方面在提出抗议后，被迫中断了谈判。8月25日收到李奇微的答复，他否认美国飞机袭击开城的事实，并以前所未有的挑衅口吻凭空捏造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朝方面出于挑衅的目的杜撰出来的。李奇微的调子不能证明美国人解决事件的意愿，金日成和彭德怀坚持对上述事实进行调查。李奇微坚决拒绝调查，他们之间的通信至今未能导致从8月23日就中断的谈判得以恢复。

并且，美国人9月1日又对开城进行了第二次空袭，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对中朝方面抗议的蔑视。除此之外，美国人于8月29日(对中立区守备部队进行炮击)和8月30日(一架美国B-26飞机在中立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又破坏了中立区。

这样，谈判双方的关系继续紧张，缔结停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

在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下，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急忙停战。根据掌握的情报，他们在加紧准备新的大规模进攻。根据他们的如意算盘，这一进攻将强迫中国人和朝鲜人接受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应当指出，谈判还没有失去达成妥协的一切可能性。其中包括中朝方面打算提出关于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的妥协建议，其条件是建立更宽广的非军事区——纵深不少于10公里，比如60公里，即双方部队均撤离三八线的纵深。如果问题这样解决，朝鲜人民军部队将被迫在元山以北的东翼建立自己的防御，但敌人也应该在战线两端将自己的部队撤到汉城以南。

但是，中朝领导人还没有就非军事区的行政管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把非军事区交给双方司令部的联合委员会管理，甚至同意可以把三八线以北美军占领的地区由美国(李承晚)管理，而人民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南的地区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管理。朝鲜领导人则认为，非军事区领土上的行政管理应该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存在的状况。

结论：

一、停战谈判开始的态势是不利于我们朋友的。

干涉者的部队在此之前占领了相当大一片北朝鲜领土，美国人照旧

拥有无限制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冬季进攻结束后，人民军未能取得战场上的新成就。中国人声称，他们的军队没有受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训练。战场上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人不关心急于缔结停战协定。尽管美国及其仆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部分赞成结束朝鲜战争，在当前的态势下，美国政府看来认为继续战争更为有利，指望通过新的进攻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耻辱的停战条件。不排除，美国打算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利用日本军队来继续进行干涉，那将使朝鲜的局势更为复杂。

二、谈判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关心恢复和平，美帝国主义极力想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更换部队武装的完成，加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拒绝双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也是因为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中国人在谈判期间的表现、北朝鲜方面停止进攻行动被美国人看作对手软弱、被追求和的表现。

三、朝鲜人担心他们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他们对美国人广泛利用日本军队进攻朝鲜的可能性特别感到不安。

中国人拒绝进攻性战役，他们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已经引起了朝鲜方面对他们的明显冷淡。与此同时，朝鲜人对苏联的指望变得越来越坚定而广泛。

四、在谈判的现阶段，双方还没有完全失去达成停战协定的可能性。

朝鲜朋友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

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在停战谈判方面的政治情绪及相互关系将在寄给部长的专门材料中报告。

本材料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B.佩图霍夫编写。

佩图霍夫(签名)

附件：

乔伊在1951年7月27日全体会议上的声明

在你们关于议事日程第二条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中，你们提议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你们说这在历史是有充分依据的，战争在这条纬线上开始，自然战争也应该在这条纬度线上结束。你们说战争是在三八线上开始的，这是正确的。但仅此一点还不是战争就该在同一条线上结束的依据。

如果在一年前缔结停战协定，很难相信你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9月15日之后，当你们的军队败退到鸭绿江地区时，你们也不可能希望我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从历史的角度和军事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从1950年6月爆发战争之时起，就没有了按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的依据。军事分界线或者限制军队向前推进的线，与历史毫无关系。这条线与停止军事行动的善良信念也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你们提出为在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辩护的论据中，没有一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能反映对这么一条线性质的理解。

你们同意非军事区应该横跨朝鲜，所有的武装力量应该由这个区域分开。我们认为，非军事区的边界应该以实际军事考量为依据，他们现时是如何存在的，涉及政府间关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最终协议的考虑完全不应对它有影响。另一方面，对敌对双方军队有军事价值的每个因素都应该得到深入的、无偏见的研究。

这样，像纬度这样的设想中的地理线，对缔结军事停战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

谈到非军事区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希望大家注意某些军事因素。

作为任何一个停战协定，都有三个军事意义的区域：

第一个是空中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自己手中掌握着整个朝鲜上空的制空权。

第二是海上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朝鲜周围所有的海域。

第三是陆地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从草洞里附近到朝鲜东海岸，在西部方向穿过平康以南高地，然后向西南穿过板门店到东场里并沿汉江西岸直到它的河口，三八线以南的全部领土。

空军和海军力量以及地面力量——所有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对地面非军事区的形势有很大影响。换句话说，地面非军事区应该处于它与由空军和海军代表的其他区域关系的焦点，海、空军的打击力量你们已很好地领教过了。此外，还应以应有的方式考虑到空军和海军对地面战役具有的意义。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军和海军能限制你们部队的行动自由并给你们的地面部队造成巨大损失。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对你们后方地区的袭击迫使你们保持大量的部队和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后勤地区，否则这些部队和武器本来可以用在前线的。你们在前线地区集中部队和弹药的能力也大大受限制。你们实际上没有可能保证空中观察以及对你们的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持。

还有，在海军方面你们也完全熟悉现有的局势。当前，你们被禁锢在陆地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自由进出环绕朝鲜的所有海域，而你们却不能自由地利用海上交通线。你们沿两边海岸线的公路和铁路线是海上有效的轰击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拥有实施登陆作战的能力，这迫使你们沿海岸线保持巨大兵力以防登陆的危险。你们的港口、军事设施、交通线和供给仓库我们随时都可以从海上轰炸。与此相反，南朝鲜却不会遭到从海上的封锁和进攻。现存局势的军事因素从地理上在这张地图上清晰可见。你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以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控制的广阔区域。它包括从前线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整个北朝鲜，而在南朝鲜却没有任何类似情况。

如果仅仅观察一个地面局势，那我们的能力可以说近似于打个平手。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是现实主义者，应该深刻和不怀偏见地研究影响敌对双方在他们当前态势下实施战役的每个因素。

现在你们应该清楚了，你们经常建议用来确定非军事区的那条线，完全不符合当前在朝鲜形成的军事局势的所有方面。它甚至不符合当前的地面接触线。它完全不能与空军和海军的作用相适应。它比穿过平壤和元山的分界线更加不符合当前朝鲜形成的总的军事局势。换句话说，你们对我们让步，将你们的地面部队往北撤离穿过平壤和元山那条线的好处，无论如何抵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把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撤出北朝鲜向你们提供的好处。

你们和我们的地面部队当前的接触线，你们和我们都同样清楚，就不必对这条线走向的细节进行讨论了吧。如果只考虑地面部队，就当地所有部队停火达成协议似乎是明智的。然而这意味着仅仅停止部分军事行动。我们的空军就应还有进行侦察和对整个北朝鲜造成军事损失的权利。如果我们要达成我们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都停止针对你们的战役的停战协定，那么我们肯定地说，分界区的设立就应该公道，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你们也这样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最严肃的研究。所有上述因素都影响着地面非军事区的确定。为达成公正而有效的停战协定而进行涉及每一方应提供的军事好处的任何讨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到。

总之，你们应该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在地面、空中和海岸地区同时停火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朝鲜及中国在朝鲜的所有部队在现有条件下的停火。作为对这种让步的补偿，北朝鲜和中国的部队最低限度也要向北方进行大踏步地撤退。

非军事区的纵深应该能够防止在停战期间双方个别人员之间产生虽小但危险的事件。这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够寄予希望的简单的预防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不使区内的行政管理法规不必要地复杂化，我们建议，总的非军事区应有大约20海里(1海里等于1853米)的纵深。正如我们在预备性会议上多次指出的，建立非军事区边界有几种方法。既然这个非军事区是临时的军事手段，为避免可能迟滞朝鲜问题最终解决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个区的边界应该通过地形上容易确定的点。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现在提出如下建议：

一、停止所有地面行动并建立非军事区，所有军事力量都从非军事区撤出。我们建议的这个非军事区就标在我马上就给你们的地图上。

二、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整个领土上空的行动。

三、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口开始沿西海岸、从图们江口开始沿东海岸直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的海上轰炸和封锁。

这张地图的比例尺是1：250000，它提供了非军事区总的轮廓，但它以后用于行政管理目的的细节尚未确定。

就谈这些。

翻译：B.佩图霍夫

АВПРФ, ф.0102, оп.7, п.32, д.65, л.24-63

№133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问题(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

录

1951年9月1日

第340项 关于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不足。

考虑到要交换意见，特委托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最终定稿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66

№125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日

第350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根据现有的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滥用依靠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在1950年3月27日中苏协定中并没有规定，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派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授命他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上述滥用现象。将所采取的措施上报中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68

№12985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接见美国大使柯克

1951年9月6日

根据柯克的请求，于13点30分接见了。大使说他受委托向苏联政府转达照会以及向我递交该照会的文本。大使有预备地宣读了照会的英文本。柯克补充说，这个照会也要发给以下国家的外交部，包括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鉴于美国公众对于这一问题表现出的关注，稍后可能会考虑将照会公之于众。

当我了解了口头翻译成俄语的信函内容时，我发现在他所声明的国家中没有最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柯克说，这是因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我对大使说，这种情况不是..... [4]

苏联政府有没有可能干预，尽管这也可能是美国政府所期待的。

大使开始讲到，他说有很多原因使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涉及在信函中提到的使事态恶化的一系列事件。

我回答说，我支持这一个观点，因为我认为使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不在于某些国内事件，而在于唯一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以及代表差不多5亿人民的是谁，被美国承认的蒋介石政府谁也代表不了。

至于谈到来函中所提到的事件，我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为是正义的。

在谈话的最后，大使通报说，10月他要回美国向本国政府述职，因此请求能给予协调帮助，许可他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

我答应给予他协调帮助的请求。

会谈持续了大约30分钟。出席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1, л.89-90

№12984 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1951年9月6日)

美国政府怀着日益增强的不安情绪观察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美国公民的粗暴和不适当的态度。现在有20多个美国公民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其中的大部分人已在押6个月和6个月以上。有人认为，一个被关押的人已经死在牢里了，还有几个被关押的人正处于身体或物质上的艰难状态。我们得知，约有30个美国公民正处于“被软禁在家”的状态。其他许多人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经常被禁止离开中国，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拘留。我们得知，至少有些在押人员是不准与狱外的任何人保持联系的。

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逮捕或者被逮捕人所在的地点及近况等相关信息是不会给予任何解释的。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采访代表美国利益的公共人物，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是被禁止的。众所周知，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遭到了类似的对待..... [5]

美国政府怀着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关于被随意逮捕的美国人的消息，期望停止对他们的关押，期望对被关押人提供公认的最基本的权利，即允许与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允许接受法律保护，了解原告提出的指控，甚至是有对他们的事件诉诸法庭裁决的权利。但是所有对这些的权利都一直被拒绝，对于他们能很快得到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采取非常手段使其获得自由的希望也不存在。

正是基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有关对待国外公民的准则，甚至处于通用的人道主义，美国政府以他的名义请贵国政府向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他们通报这些在押的美国人的消息和采取必要的步骤，能对于他们的事件开始公正地、快速地运作程序..... [6]

АВНРФ, ф.0100, оп.44, п.322, д.11, л.91-92

№13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6项 关于把当地苏联公民中的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一、责成苏联外交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关于把由伊宁市(新疆省)当地苏联公民组织抚养的161名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二、责成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上述孤儿中的81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80人，并把这些孤儿安置在幼儿园和第30号技工学校。

三、关于接送80名孤儿从阿拉木图到塔什干路程上的一切开销，由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承担。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76

№133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5项 关于克服中苏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缺点。

批准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以确保中苏民航股份公司正常地开展工作，没有向该公司提供作为苏方在该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技术

投入的份额，也没有为该公司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干部，其结果使公司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这是不正确的。

二、为了消除上述缺点，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通过民航股份公司的苏方机关，采取措施以彻底改善公司的状况和工作，并达到如下目的：

1. 在今年的11月1日前，根据附件一的内容向公司提供苏方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资产；

2. 在今年的11月1日前，为公司的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专业干部，使其编制人员达到满额，并更换那些在其专业方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根据附件二)；

3. 为沈阳—赤塔、兰州—阿拉木图航线政治处增设数名副主任。这些工作人员的薪资计在民航管理总局预算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人员津贴项下；

4. 采取措施使公司固定使用的办公和住宅建筑达到要求，并建设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乘客所需要的公共设施；

5. 派国际民航管理总局局长Г.И.斯托利亚罗夫同志、机场事务工程师В.С.伊万诺夫同志、运营技术工程师В.В.雷巴尔金同志及通讯和无线电导航工程师В.Е.诺维科夫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2个月，以便在改进公司工作以及分配和使用拨给公司的技术器材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

三、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今年的12月1日前提交关于采取措施的结果的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机密

关于应该提供给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作为股金的物资清单

- 一、АИИ-62-ИР型航空发动机
- 二、РАФ-КВ-5型固定的无线电台
- 三、ПАР-3型固定的无线电导航台
- 四、ПКВ-49型定向仪
- 五、КВЯ型无线电接收机
- 六、110/220伏硒整流器
- 七、40伏特12安培的硒整流器
- 八、10-15千瓦220伏特的电站
- 九、СТ-144型酸性蓄电池

十、消除定向仪偏差的振荡器

十一、航空无线电试验器材

十二、МІІ-70型30伏特以下的磁电伏特计

十三、分流器分别为3、15、30、75、300安培的磁电电流表

十四、500伏特的迈格表

十五、电压为250伏特以下标度为2兆的欧姆计

十六、鲁维采夫电池试探器

十七、双电极、可调多针避雷器

十八、20、50、100安培的装载电阻

十九、吉斯-150型装载汽车

二十、嘎斯-51型装载汽车

二十一、嘎斯-67型轻型汽车

二十二、莫-20型轻型汽车

二十三、Б3吉斯-150加油车

二十四、加油汽车

二十五、吉斯-150型汽油油槽车

二十六、ДТ-54型拖拉机

二十七、移动制氧站

二十八、PM-30回收设备

二十九、带ДБ-2的汽油电机泵

三十、小砵码分析秤

三十一、马尔登斯宾斯基仪器

三十二、细管直径平均2毫米的奥斯特瓦尔特细管黏度计

三十三、金和斯塔尔克仪器

三十四、乌别洛伊德仪器

三十五、秋勃斯克和什塔梅尔量热器

三十六、列伊德仪器

三十七、理查尔德松中心测量仪

三十八、氢气瓶和乙炔瓶

三十九、2685模式汽车发动机汽缸镗孔立式机床

四十、221模式的带连杆的吉斯和卡斯牌发动机校准仪

四十一、204-1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主轴承镗孔器

四十二、292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镗孔器

四十三、210-1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启动注油器

- 四十四、发电机和启动机电枢检验仪
- 四十五、带有4个规格为100×130阀门的121型磨合手提钻孔机
- 四十六、立式钻孔机床
- 四十七、万能铣床
- 四十八、ЭБ-652型双面金刚砂磨轮
- 四十九、机械刀锯
- 五十、H-940型裁铁用剪刀
- 五十一、ПЫТ-48检查电热测量器的装置
- 五十二、刻度从0到15000千克的测力计
- 五十三、ПЭС-2可移动的电动启动机
- 五十四、ИП-40加热器
- 五十五、КП-22氧化设备
- 五十六、带有上层移动平台的П-452型50吨水压冲床
- 五十七、1Д63А型螺丝车床
- 五十八、Ш-3А型牛头刨床
- 五十九、安装修理工具和飞机维修辅助工具
- 六十、安装电机的4486001试验台
- 六十一、飞机机翼可摘部分4482023支架
- 六十二、运输电机用的4466001小车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附件二：

机密

新更换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名单

- 一、哈密飞机场的负责人Н.А.萨马林同志
- 二、齐齐哈尔飞机场的负责人М.И.萨奇科夫同志
- 三、太原飞机场的负责人И.Н.西马科夫同志
- 四、飞机场管理局经济师П.С.切列诺夫同志
- 五、航空技师：А.В.拉夫金同志、Г.П.列别杰夫同志、Г.А.阿列申同志

补充配备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清单

- 1.飞机场负责人2名

2.地面设备工程师1名

3.办事处负责人1名

4.翻译1名

5.会计师2名

6.飞行指导员1名

7.工程师-电工1名

8.工程师-经济师2名

9.机库负责人1名

10.技术试验设备仓库负责人2名

11.无线电定向仪工程师5名

12.航空机械师6名

13.医师3名

14.无线电技师1名

15.航海长1名

总计：30人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76、252-257

№0049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发自北京，1951年9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二、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

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三、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8日

第449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98-99

№004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

关于是否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加以解决。

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09

№1182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1951年9月10日)

这封信函是1951年10月2日通过外交信使收到的。

由驻朝鲜的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发来。

绝密

1951年9月10日

关于停战谈判出现的政治情绪和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政治情绪

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不过，他们对此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

尽管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理解目前业已形成的局势，也同意必须停战，但是，通过一些私下的观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领导人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的压抑，即这场毁坏了国家的战争，是不能使朝鲜得到统一的，现在他们不得不在最坏的条件下同意恢复战前的状态。

马立克同志的发言 [7] 被朝鲜人认为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金日成在结束了7月份 [8] 的北京之行后，极其沮丧地谈到了这一想法。与此同时，金日成也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力量，它的潜力和利益以及它在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中与

朝鲜的相同作用。在谈到某些同志希望请求苏联提供援助时，金日成多次表示说，苏联是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主要后备军，它目前参加战争还为时过早。

朝鲜社会各个阶层的情绪可分为两种。一种情绪是对于战争感到极其疲倦，希望不再继续进行战争。另一种情绪是普遍出现的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停战看作是对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的破灭。

在马立克同志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于他的建议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情绪的蔓延。只是在李奇微向金日成提出开始谈判的呼吁之后，朝鲜的报刊才针对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个建议表示欢迎。到最近为止，朝鲜的报刊都在依据该建议的精神，定期地报道谈判情况以及与谈判有关的一些问题。

朝鲜人围绕谈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揭露了美国人的侵略立场，号召社会舆论反对他们，对在开城的中朝代表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朝鲜报刊对停战谈判的反应情况，我们在此不作援引，因为苏联的报界已经广泛地报道了这些情况。）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的反停战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快就朝着有利于停战的方向转变了。许多情况促进了这种变化，例如，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对于战争的普遍厌倦、经济遭受破坏、美国空袭的加剧、前线持续的失利、民主主义宣传的影响，等等。在开城谈判期间，朝鲜人已经习惯了战争可能停止的想法，因此，每一次谈判的中断都使他们感到不安和气馁。

马立克的建议在南朝鲜受到了李承晚集团的极端仇视，他们希望在侵略者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政权扩大到整个朝鲜。李承晚分子多次举行反对停战谈判的群众集会。6月底，南朝鲜“国民大会”发表声明，反对在三八线上停止战争。

尽管根据美国人的指示，南朝鲜军队的代表受命加入了出席谈判的代表团，李承晚政府仍然没有停止反对停战的行动。7月31日，李承晚政府在釜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其口号是：“不统一毋宁死！”与此同时，该政府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例如，李承晚政府驻伦敦的公使李安闻(Ли Ан Мук)在8月10日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上宣读了他给英国政府的呼吁书：

“我请求英国政府，不要力求在朝鲜建立虚假的和平。为此应该研究真实的情况。目前，在朝鲜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和平。”李安闻还声明说，他的政府认为必须摧毁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并通过联合国来确保第三国不在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援助北朝鲜。

显然，李承晚分子对于停战谈判的敌视态度，不仅说明他们已经看到停战将毁灭他们占领北朝鲜的计划，而且还说明他们的立场完全符合美国人的要求……①第二， [9] 予那些坚持停战立场的自己的仆从国以压力；第三，在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提高李承晚分子的政治威信。

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谈判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对待谈判的立场上存在着差别。

金日成及朝鲜的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谈判应该这样进行，即不能贬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信，不能破坏它的荣誉。中国人则倾向于向美国人做出让步，只要能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国人并不总是力求及时地、充分地使自己的立场与朝鲜人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常常引起后者明显的恼怒。例如，朝鲜人将自己对李奇微的第一封呼吁书的答复函草案寄给了北京，这个草案在实质上与北京方面的草案没有多大区别。中国人对朝鲜人的草案没有复函，但是在8月1日晚他们却简单地通知说，北京无线电广播将在某某时间转播电报中援引的金日成和彭德怀答复函的文本，平壤无线电台也应该在同一时间转播这些内容。由于电报很晚才发出，平壤无线电台比北京无线电台晚播出了一个小时，美国宣传机构立即报道了此事。自然，金日成对类似的合作方式十分不满。

北京向开城派出了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领导人)为首的、由众多外交官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小组，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乔 [10] (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中国人事先告诫朝鲜人，他们的代表除了应该遵循上级机关的指示以外，还要遵循中朝代表联合工作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这个委员会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的。后来金日成抱怨说，在一系列问题

上他都与李有分歧，李对于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让步。

无论是对乔伊的发言，还是对李奇微的声明，李克农都起草了答复草案。但是，对于他的草案毛泽东并不全部赞同，尤其是最后一份。8月底，毛泽东对李提出了意见，说他所形成的立场让美国人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停战，其结果是降低了谈判成功的希望。

鉴于7月12日事件(关于允许外国记者前往开城和重新研究有关中立地区协定的问题)，金日成起草了给李奇微的答复函，对李奇微的要求做了让步，他同时还揭露了美国人提出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中国人没有征询金日成的意见，只是简单地向他通报了给李奇微的复函内容，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平壤无线电台进行转播。中方的答复令金日成不满，因为中方对于李奇微的纯粹宣传性的演说没有进行批评，实质上是将所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不是美国人破坏了联络官之间的协定，只是没有协商好以及李奇微的要求被作为是合理的和有根据的要求而接受了。但是，金日成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只承认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毛泽东请金日成就此问题通告自己的意见。金日成立即答复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让步意味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严重的政治打击，还因为被美国占领的朝鲜北部地区，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

在答复了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情绪非常不好，在同朴宪永交谈时他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我宁愿重新进行游击战争，而你们准备转入地下状态。反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朝鲜。”显然，这样的独白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民族感情的表露，而且也是一定的政治意图的表露。金日成不倾向于通过有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荣誉的让步来达到停战的目的，他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即最终中国和苏联是不会允许毁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当美国代表提出在朝鲜人民军后方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过分要求之后，毛泽东于7月28日立即给金日成发出一封电报，建议金日成坚决拒绝美国人的要求，同时要以十分尖锐的口气提醒美国人注意，他们在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并不能阻止在大邱和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的

电报使金日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中国人对美国最近在谈判区的挑衅行为采取的坚决立场，也使朝鲜人感到振奋。

不仅如此，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谈判的失败更加强了上述所说的那些情绪。朝鲜领导人认为，第一，由于中国人在谈判时过分暴露了中方和朝方的意图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极大关注，所有这些建议在谈判的开初就以最终的形式提出来，这就使双方失去了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的机会。第二，金日成和朴宪永以谨慎的方式表示，北京执行着一条前后不一的政策。在朝鲜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美国人不可调和的立场，他们极力将侮辱性的停战条件强加于朝鲜人身上。

目前，朝鲜朋友已经表现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停战的意愿。

苏联驻朝鲜大使

B.拉祖瓦耶夫

1951年9月1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92—1598页

**No248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收到了您关于阐述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的电报。

1.为了使我们在天然橡胶这一重要的战略原料上一起最终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认为，计划中应该考虑，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规模至少应能保证每年得到20万吨橡胶。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考虑的是中国、苏联和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需要。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种植橡胶树，以便尽快得到天然橡胶。

2.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橡胶种植园应该属于谁呢？属于国家还是农民？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建立国有的橡胶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考虑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橡胶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需要实行机械化，而这些都是农民所做不到的。在组建国营的橡胶种植园的同时，应该尽力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树。有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农业用地，也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国家提供的相关帮助下，这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橡胶。

至于需要栽培的橡胶树苗，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为此，应当进行特别的组织工作，应该组织专家对种苗的培植工作进行领导，并大规模使用机械化。

3.从你们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海南岛以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可以成为生产橡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而且近年就可以生产出橡胶。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制订计划，着手在海南岛建立大面积的橡胶种植园，这一点非常重要。

4.准备地块，准备在近年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所需要的一些机械：拖拉机、耕地机、中耕机等机械。在此方面我们愿意给予必要的帮助。

5.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一组熟悉林业工作和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专家、熟悉对多沼泽的土壤进行改良的专家、熟悉种苗机械化种植工作以及树木种植工作的专家。

1951年9月10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1, л.110-112

№004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2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

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

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20

№248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 (1951年9月16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关于种植橡胶树的电报我们收到了。

您提出的意见非常好，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可以保证每年得到20万吨天然橡胶：海南岛可以保证10万吨，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保障10万吨。其中的大部分天然橡胶将会供应给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少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正在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以便得到20万吨以上的橡胶的可能性。

您提出的如下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在于，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橡胶种苗的培植将会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

我们非常需要苏联和苏联专家提供技术帮助。

10月下旬，我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会议，对关于种植橡胶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苏联专家能够在10月中旬到达北京，以便参加10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会议。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那么我请求您及时把苏联专家派往中国。

毛泽东

1951年9月16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1, л.123-124

№133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1951年9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8日

第550项 关于向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派出苏联工会代表的问题。

1.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派A.Г.科雷巴诺夫同志前往中国，负责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日常工作。

2.批准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3.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增补外汇预算资金，以用于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工会代表(指A.Г.科雷巴诺夫同志)的开支，并把该同志的工资提高到与大使馆的参赞一样。

附件：

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应该遵循如下指示：

联络部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应该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进行密切的接触，依靠中国工会组织的协助，使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与亚洲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获得关于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会运动发展情况的全面信息；

采取措施加强亚洲各国工会组织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部门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门)的国际联合会的联系以及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

在已经加入和尚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在提高工资、进行社会保险、改善居住条件、消除种族歧视等问题方面，组织他们在亚洲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

对亚洲各国的大工会组织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斗争给予具体的帮助；

在亚洲各国，广泛地宣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与其相邻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活动，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及其他工作形式，广泛地宣传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并结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和条件，促进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的决定在亚洲各国的实现；

系统地揭露所谓的自由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劳工局在亚洲各国工会运动中的有害和分裂的活动；

使亚洲各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地参加和平拥护者运动，扩大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协助在一些还没有建立和平拥护者国家委员会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企业里，建立这些委员会。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103、302-303

№004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1951年9月20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11]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

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订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

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

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向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1/5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

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4/5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

一、85毫米高射炮120门。

二、弹药(发)。

122毫米榴弹炮炮弹：杀伤弹19000发、穿甲弹1000发；

供ЛГ-2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5000发、穿甲弹5000发；

供ЛГУ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1250发、穿甲弹1250发；

76.2毫米加农炮炮弹：杀伤弹40000发、穿甲弹60000发；

85毫米高射炮炮弹：140000发、37毫米高射炮炮弹2000000发；

107毫米迫击炮炮弹：20000发。

三、轮胎(个)。

供122毫米榴弹炮用的50个，供122毫米榴弹炮前车用的50个；

供76.2毫米加农炮用的50个，供76.2毫米加农炮前车用的50个；

供57毫米反坦克炮用的78个，供57毫米反坦克炮前车用的78个；

供85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76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37毫米高射炮用的500个。

四、反坦克手榴弹100000个。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第4726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125 127

№133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1951年9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2日

第598项 关于新疆的石油和矿场的航空摄影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和波波维同志审理该问题，并向政治局提交就此问题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13

№133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1951年9月2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4日

第602项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

通过斯大林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所提出的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北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请您，毛泽东同志，接受我友好的祝贺。

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本人在中国今后的人民民主建设中取得成就。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伟大的友谊在今后更加牢固!它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14, л.334

№133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51年9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5日

第604项 关于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

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共青团中央、苏联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关于今年9—10月间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赴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具体包括以下同志：Л.Н.索洛维约夫(代表团团长)、А.И.奥巴林、В.Г.雅科夫列夫、Д.Б.卡巴列夫斯基、П.А.玛里宁娜、Р.Г.特洛菲缅科、И.С.佐捷拉娃和尤努索夫·萨比尔，访问期限为三个星期。 [\[12\]](#)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14

№004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令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补充贷款(6亿卢布)和1951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9月8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1/5，同时又提供6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

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补充订货，在1951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1/5的军用物资。

但是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1952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和时限。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28-129

№133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 (1951年9月2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

录

1951年9月29日

第646项 关于在1951年派苏联专家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在5天期限内，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政治局提交详细的报告和就此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22

№1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 尤金发电(1951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30日

第655项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

批准所提交的预备给尤金同志发出的电报内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北京

苏联大使转尤金同志：

同意关于在得到作者的同意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的建议。

维辛斯基

№20003 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1951年9—10月)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А.И.奥巴林院士的旅行日记(1951年9—10月) [13]

苏联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А.И.奥巴林曾于1951年和1956年先后两次前往中国。他的第一次中国游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第二次则在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10周年。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奥巴林个人档案中，至今仍保存着他1951年在中国游历时所写的日记，本文将公开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

阿列克桑德罗·伊万诺维奇·奥巴林(1894—1980)，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他以首创地球生命起源理论而载入世界科学史册。该理论以解决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为宗旨，以物质经过长期化学进化导致生命起源的规律性演变为根基。奥巴林理论的最初形成和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始于1922年举行的俄罗斯植物学协会大会。19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生命的起源》。奥巴林终生都在发展、深化和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著作被译成世界上的50多种文字。他的理论为我们有目的地研究生命起源问题提供了可能，并促使各专业领域的学者——生物化学家、古生物病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纷纷就这一课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奥巴林的研究兴趣并非仅局限于地球生命起源理论。关于酶的研究也是其创造性研究活动的重要阶段。奥巴林还与自己的学生——俄罗斯生物化学科学院院士А.Н.巴赫(1857—1946)一起研究了植物的呼吸过程，从而奠定了俄国植物生物化学的基础。奥巴林的另一个科研活动领域是将自己的生物化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他被公认为俄国生物化学技术的奠基人。奥巴林及其助手在生物化学、生物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为俄国茶叶的生产、面包加工、食品工业(啤酒酿制、制酒、乳制品)的生产奠定了理论基础。

奥巴林的主要科研活动都与苏联科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1935年奥巴林与А.Н.巴赫共同组建了生物化学学院，并于1946—1980年间担任院长之职。1948—1955年间他还兼任生物科学系院士及书记职务。

他的教学活动是与莫斯科大学紧密相关的，他也是该校的毕业生（1917）。从1942年至1960年的20年间，他一直负责该校的植物生物教研室，即使在临终前夕他依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科学院士奥巴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1951—1959年间为人民代表，1955—1959年间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1974年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成员，1950—195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他的活动得到了人们一致的肯定。1959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大会荣誉证书。1951年奥巴林被任命为全苏文学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管理局主席。在他替代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负责该协会工作6年之后，又将这一职务转交给了哲学家米京。

奥巴林1951年秋在中国旅行期间所写日记手稿共18页，字体大，整体笔迹清晰，且没有拼写错误。内容主要涉及自己旅途中所遇到的典型事件和内心的深刻感受。可能，他作这些札记原打算是为将来写回忆录积累素材。在1948—1979年间的30年里，奥巴林曾到过20多个国家。显而易见，他于1951年10月29日在全苏对外文化理事会分会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印象》的演说，就是源于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该演说的原始速记现保存在奥巴林个人档案中。其中部分内容，恰可作为本文中所公开的奥巴林日记的注释。关于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到中国的那次旅行，奥巴林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的演说作了如下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是继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大历史事件。中国在人类历史中所取得的意义是广泛而巨大的，我们科学战线上的人绝不应对此视而不见。”^[14]

奥巴林日记在发表时保留了原文的体例风格。缩写均用方格标注。文中有一些人的资料未找到。

史学副博士E.П.库拉波娃

1951年9月26日

约九点钟，我们乘专机从莫斯科起飞。在这里，我们稍微等了一会，因为还有一位从塔什干来的同志^[15]，他刚刚飞来莫斯科。我们的飞机很早就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9月27日

我们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飞的较晚。中途在新西伯利亚稍作停留，然后飞到科拉斯诺雅尔斯克过夜。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手提箱事件。

9月28日

我们的飞机按当地时间7点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起飞，虽然本应当是6点。飞机直接在赤塔降落。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会。尽管天气不佳，但为了不迟到，我们还是飞往边境。当晚在波尔扎过的夜。当地气候寒冷，晚间我们都冻得够呛。

9月29日

我们的飞机又晚点了。由于沈阳和北京的天气不佳，飞机只好在齐齐哈尔降落。不久，飞机再次起飞。当地时间6点我们开始飞往北京。从飞机上我得到了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们飞过东北、黄海。一片片的土地，共同编织成了大地。在机场，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北京时已是夜晚。代表团招待会，中国式的午餐。郭沫若、索洛维约夫以及蒙古、印度、印尼、马来亚、越南、东德、缅甸等国的代表分别致辞。在北京散步。华丽的马戏表演。

9月30日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清晨北京的街道。早点后我们驱车前去拜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玛里宁娜 [16] 耳朵发炎。白天我要准备演讲的讲稿，因此也未跟他们一同去见大使。

晚上毛泽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穿过镶金铁红色宫门，再通过一道机巧的小门，便看到了一条雕梁画栋的中国建筑风格的长廊。我们被引进一个包厢，印度、朝鲜、缅甸、蒙古、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团成员已在那里了。大厅(总共可容纳2000多人)的中央是人民——工人和农民(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很具中国特色的老大爷，毛泽东的战友)。在人民代表的前面是政府席。外国使节和代表团(包括我们在内)均围绕整体大厅依次站立，高呼毛万岁。那种感受永远也难以忘却。在包厢里我与一些朝鲜朋友见了面。另外，经尤金介绍，我还结识了一些中国学者(哲学家和史学家)。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典。我们前去观看在前皇宫前的广场上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来的宫门(装饰得富丽堂皇)如今成了政府要员的观礼台，场面雄伟壮观。我们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均站在右面的看台上。印度、缅甸等国的代表均穿着红色的礼服。

盛大的阅兵式，就像我们在红场上所做的那样，整齐地通过广场。其中有很多重型武器：坦克、火炮，甚至“卡秋莎”。天空有飞机掠过，其中有喷气式。阅兵式之后是游行：首先是被人高举着的领袖肖像，他们很缓慢地通过广场，随后是中学生队伍(他们穿着非常鲜艳，手中高举着绿枝和黄色的花，象征他们就像花儿一样，正在绿色的大地上盛开；覆盖有开着花的树枝的坦克，在蓝色的海波上行进的巡洋舰，等等)。再后面便是铁路工人和其他工厂的工人队伍。场面宏大步调却相当一致。他们手中举着红旗，而队列都是蓝色的。我走下看台，与朝鲜代表团的朋友们交谈。他们的关怀令我感动。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大学生和艺术工作者。他们的穿着相当鲜艳夺目。锣鼓震天。最终，民众排着密集的队列面向观礼台，人们都想往前一些，整个广场人头攒动。

游行过后，我们四人(索洛维约夫、雅科夫列夫、特洛菲缅科和我)一起去尤金那里。那里有一个小花园，房间的布置也很别致。晚上我们到使馆看了电影，然后又返回尤金处，站在房顶看燃放礼花的壮观景象。我们与尤金和随行的中国人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

与昨天一样，今天仍是个艳阳天。游行队伍仍穿着同样的服装，没戴帽子。太阳烤着人们的额头。

10月2日

早晨郭沫若和苏中友好协会的代表来看我们。商定了我们在北京和中国的游览计划。

午餐后，我们驱车去参观“紫禁城”(以前的皇帝宫殿)。我们看到了皇帝的私人花园和皇后的寝宫。一开始先到了皇帝的休息室，我们在这里喝了茶。这里立着一把宝座和一个上写150个相同意思的预祝皇帝万寿无疆的字的屏风，还陈列着一些有意思的钟表。然后，我们顺着过道来到皇后的寝宫。这里有一口井，它是皇妃被淹死的地方。这里摆放着

许多名画、玉制品、古代的青铜器、钟表(能像夜莺那样鸣叫)，等等。还有一个宫殿是皇帝吃斋和贡献祭品的地方，名曰天坛。宫殿的顶都是陶制的，房屋的正面都由涂了漆的红木建造的，上面还镀了金。远远看去，山腰上有三个亭子的地方是那个自杀的皇帝的上吊之处。在园中参观时我们注意到，游人很多——都是普通百姓，因为今天是节日。场面很感人。我们还看到一个盛有中国金鱼的大缸——里面有金色、银色、杂色、透明、黑色等长着凸出眼睛的各种金鱼。

我们晚饭是在中国饭店吃的。

随后又欣赏了中国京剧。其表情和技艺均带有完整的程式化特色。我很喜欢，虽然有点费力。

10月3日

清晨，在中国保卫和平和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开了一个会。该委员会就位于前意大利使馆的大楼内。这里的花园很美。郭沫若作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报告。中国人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的发言。随后发言的还有印度、朝鲜、印尼、缅甸和德国等代表。午饭后，我们去参观皇帝的园林“北海”，现在看来，它已变为民众从事文化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了。这里有一个“永宁”殿，但没让我们看。因为那里现在住有西藏来的喇嘛。里面建有一座白色的西藏塔，从塔上看北京，景色很奇特。湖边有一座小房子。姑娘们在跳舞。还有一个五龙亭，是皇帝钓鱼的地方。我驾船游湖。

晚间，我与卡巴列夫斯基 [17] 去城里转，看到了商贸集市。我们偶然地来到了民间戏院或音乐厅。这里非常有意思，不过，尽管遭到巴列夫斯基的反对，我还是决定离开。

10月4日

一大早，曾昭抡教授便来拜访我，要求我去他们清华大学。他本人是有机化学家。商谈之后我与所有团员一起去了颐和园，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公园里的建筑非常雄伟，共有几十个宫殿，亭子、塔、寺院。这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事件。晚上观看了民族歌舞演唱会，演员表演得生动而欢快。

10月5日

清早，我们参观了铁路工人展览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缺点是，协会没有利用展览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12点前我们驱车来到清华。这是市郊一所很大的大学，是用对“遭受损失的”美国人的赔款建造的。这里就像一座城市，宿舍、体育场、教学楼等样样俱全。校长与我们见了面。我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这里的化学和生物学实验室。实验设备并不太多(学校曾驻扎过日本兵，很多设施都被损坏了)。生物化学的教学都是根据我的教学大纲安排的。我结识了沈彤(Шен Тун)。我们在校长那里吃了午饭。之后与学校的教授们(其中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教授)见了个面。我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晚上是苏中友好协会召集的会议和举办的音乐会，我待的时间很短。

10月6日

早上，我们参观了天坛。这是北京宏伟的建筑之一，或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较高。皇帝每年都要来这里的主殿，向上天贡献祭品。还有一个规模较小，但装饰特别华丽的皇后的宫殿，这里安置着皇帝祖先的牌位。旁边是地坛，它也像天坛一样，位于一个近似圆形的广场上，只是中间是中空的。这里穹顶都建得很漂亮。建筑内的声学现象非常有趣。这个原是皇家公园的建筑，如今也成了大众文化和休息的场所。

午饭后，我们乘车去农业科学院。该坐落于市郊的科研机构共有如下一些系室：农艺、园林和苗圃、植物保护、农业化学和土壤、育种、动物养殖、兽医。翻译和知识传播——两个委员会，还有一个制作标本和模型的小工厂。

了解了一下知识传播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主要是引进科研成果，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学院只能指望农业部实验站的成果。农民的实践经验很有限。了解了从块茎菌中制取的药剂(用于花生的生产)的情况。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展示的草本植物的标本引起了我的兴趣。学院自己也搞生产，主要是第666号杀虫剂(俗称六六粉)。

晚上观看了浙江省的传统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该戏不论是编剧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很优秀，催人泪下。

10月7日

一个早晨都由于一场不必要的谈话给浪费掉了。午餐后去科技知识传播协会开了一个会，结识了许多科技工作者。他们都是科技知识界的上层人物。作了一个关于我们协会工作的报告。匈牙利科学院院长也发了言。

晚间是政府招待会。会谈很有意思。印度、印尼和越南的代表都发了言。

10月8日

清晨，到科学院附属的各学院去了一趟。生物学院虽然不大，但有很多标本。以中国的植物为主，高、低级植物俱全。该校从科马罗夫学院 [18] 得到了很多树叶标本。研究工作仅仅根据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进行。学院附属的植物园不大。昆虫学院以防治蝗虫为主。其极力想与苏联学者建立联系。

晚上在政治知识传播协会作了演讲。该协会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审判长。期间人们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非常有意思。

当晚我们乘火车前往上海。火车包厢真棒。陪同我们的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

10月9日

一整天都在中国的大地上奔驰。田野、各地不同的景观从眼前掠过。深夜，轮船将我们与火车一起都摆渡到了长江对岸。

10月10日

到达上海时已是清晨。欢迎仪式非常热烈。孩子们手里都捧着鲜花。为我们安排的旅馆也很舒适。我与尤努索夫住在一起。午饭后我们去城市玩。这里的街道、服装都很有特点。街上人很多。看到了黄浦江，中国式帆船，人们住在舢板上。银行所在的建筑都很高大。还看到了汽轮。我们登上一座12层的高楼去观看上海的景色——的确很美。晚上参加了一个约有25000人的集会。随后便是用中国民间乐器——琵琶、二胡等演奏的音乐会。

10月11日

早上，参观了工人文化宫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随后我们又去了郊外由孙中山遗孀主办的人民福利协会附属的幼儿园。该园设施很好，孩子们都很乖巧可爱。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土地改革展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地主的习俗和爱好。展览反映了新婚姻法公布后中国农村的情况。

午餐后我们又乘车去一个村庄参观。我们先是乘自己的汽车，之后又改乘当地派来的吉普车。鉴于我们的到来，当地政府专门召集农民开了一个会。我们参观了农舍，了解了这里棉花种植的情况。离开时月亮都已经出来了。

晚上举办了酒宴。

10月12日

从早上开始，我便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实验室。这里有由生物学科科研机构组建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学院、植物和水生生物学学院，还有一系列化学和物理学院校。这里的实验室都组织得很不错。实验仪器和参考书籍均以美国的为主。从事神经传导和一般性神经肌肉活动领域的科学研究。生物化学方面的科研涉及酶——植酸酶、植物磷酸酶和瓜氨酸抗生素，等等。在植物生理学领域——涉及春化处理、光照和微量元素等。这里的学者对苏联的科研成果很熟悉。这里的水生生物研究工作，主要针对湖泊中的生物，只涉及纤毛虫。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强调了中苏学者建立直接联系的必要性。

午饭后在分院一个大教室里，我作了题为《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与会者有400多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他们听得非常认真，并作了笔记。翻译是上海的一位医生，译得非常棒。他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对俄罗斯语言吃得很透。

晚间演的是京剧。与我们在北京所看到的那场戏很相似，只是服装方面有些区别。

10月13日

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的茶叶系。该校位于市郊，占地面积很大，学生共8000人，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茶叶系或组拥有良好的实验设施。人们领我参观了机械系、工艺实验室、农艺系和实验田。观看了各种品种

的茶叶制造工艺：两叶和三叶茶的制作技术，茶叶增香工艺和茶叶的穴窝种植法等。

坐汽船横渡黄浦江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来到杭州。这里号称大米和丝绸的故乡。当晚我们在杭州过夜。外面下起了小雨，但我们在舒适的客房里睡得很香。

10月14日

清晨天气很好。我们环湖旅行。游览了佛寺和皇帝的陵墓。然后又沿着堤坝散步，在湖中荡舟。在各个小岛上我们都稍作停留。在到处都是小山的公园里游玩。这里真像天堂一样。晚上又举行了宴会和舞会。

10月15日

早间，我们驱车返回上海。到上海时已是华灯初上。在南京，我们受到了欢迎，并驱车去参观中山陵。月光下这里优美的风景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宏伟壮观。实际上，整个山都成为了一座纪念碑。我们在墓前奉献了花圈。晚上宴请过后，我们被送上了轮船。当晚我们将渡过长江，然后再坐火车。

10月16日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10月17日

到北京后，与翻译交谈。晚上与杨共同晚餐。

10月18日

早上在中国科学院作了题为《生命起源》的报告。我受到了副院长的接见。报告后是午餐。我与邻座的学者们都相互认识了。谈了关于组建科学院的问题。午餐后我又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招待会。

10月19日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去世15周年而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10月20日

我们返回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有关部门)在和平院为我们代表团的顺利归来举行了宴会。

10月21日

从伊尔库茨克飞往鄂姆斯克。当地也举办了宴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日本等代表团都发了言。

10月22日

飞回莫斯科。

АРАН, ф.1719, оп.1, д.433

№24839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1951年10月 [\[19\]](#))

..... [\[20\]](#)

工资和关于工人物质状况的一些数据。

中国的工资状况仍然非常严重。在谈到工资分发状况的时候，或许，应该把中国分为两个地区。东北的状况明显要好一些，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工资状况，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处于“混乱状况”。

在东北，大部分企业实行八级工资支付制度。早在1951年初，对25%的工人实行的是按件支付，而在1951年，按件支付工资的工人的数量应该达到50%。1951年，中国东北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在中国东北的国营企业实行按件支付工资的临时条例，该条例的主要方针是，应该推广按件支付工资的制度，在这一问题上还考虑到了怎样分发工资(生产定额和时间、类别、估价)。该条例还确定了对生产的质量一般的产品和不合格的产品的支付，规定了对工资额进行再考核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该条例将会使东北的企业更好地支付工资，并在最近对大部分工人都实行计件给资制度。

中国其他地区工资的支付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实行的仍然是在国民党时期实行的、过时的、对各阶层人员进行工资支付的临时政策。在这些地区大量实行的是，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

间，还是在行业内部都实行统一的工资支付制度。

在各单独的工业领域，工人工资的数量的差别很大，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的工资要低于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的工资。比如，根据中国全国工联的数据材料，1951年初的平均工资水平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军事工业 100%

火柴工业 111%

烟草工业 115%

缝纫工业 128%

磨面工业 131%

煤炭工业 133.5%

金属工业 134%

铁路 146%

机器制造 165%

重化工工业 179%

纺织工业 181%

电站 187%

邮电 204%

电报 219%

以下是中国17个行业工人平均工资的表格，数据来源于全国总工会在1951年5月从各企业收集到的数据。

序 号	领域名称	平均工资 (工资分)	平均工资 (元)	与印刷业相 比的百分比
1	印刷业	285	570 000	100
2	皮革	243.5	487 000	85.4
3	电力	241	482 000	84.5
4	纺织业	223.8	447 600	78.5
5	机械制造	209.6	419 200	73.5

续表

序 号	领域名称	平均工资 (工资分)	平均工资 (元)	与印刷业相 比的百分比
6	磨面工业	203	406 000	71.2
7	化工	202.4	404 800	71.0
8	橡胶工业	188.1	376 200	66.0
9	缝纫工业	172	344 000	60.3
10	黑色金属	171.7	343 400	60.2
11	煤炭	164	323 000	57.5
12	机器修理作坊	162	328 000	57.0
13	造纸	156	324 000	54.7
14	有色金属	154.7	309 400	54.2
15	烟草工业	140	280 000	49.1
16	火柴工业	126	252 000	44.2
17	鞋业	67	134 000	23.5

这一表格显示，在皮革、纺织、面粉、印刷这些工业领域的工作要比诸如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橡胶和化工业领域的工资明显要高。

在行业内部也是这种情况。在同一个工业领域，通常小企业的工资要比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企业的工资要高。比如，在上海的“亚洲”金属加工厂，其中共计530名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231工资分，而拥有3253名工人的“石岭山”(Шилиншан)金属加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则为164工资分。

在江西省的天河(Таньхе)煤矿，拥有303名工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210工资分，而最高工资为329工资分。而在湖南省的广益(Гуан - инь)煤矿，拥有工人1770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121工资分，最高工资为167工资分。湖南省煤矿工人的工资为每月121—187工资分，最高工资为每月167—364工资分。

在企业内部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

在许多部门，存在工资不同的现象。比如，住房补贴、饮食补贴。在一些情况下住宿是免费的，而如果该企业的工人不是住在宿舍的话，那么他会得到补助金。而一些地方发放粮食补贴、育儿补贴等。这些补助金的发放通常不是按劳发放，而是按照其他的因素：家庭生活、工龄等因素发放，现在也是这样。在国民党时期，工资的发放经常要同工龄联系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普通的职工得到的工资要高于技术工人——部门主任甚至是管理部门的领导得到的工资。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的工人甚至是女清洁工的工资都要高于专业工人的工资。

在单个的工业领域没有统一的关于同一职业的工资标准。比如，在铁路部门，汉口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397，郑州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213，而在太原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205，而且工资上的这种差距不是根据该地生活条件的差别确定的，而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很早就形成的。

在单个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从20个档次到200个档次，有时档次更多，而且各档之间工资的差距不是很明显。这就阻碍了工人专业技能的提高。比如，在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1951年以前在工人和职员中实行21个档次的工资，但是第21档和第1档的工资的差距仅有1.8倍。

该厂的工人说：“第11档和第12档工资的差距为2个面包，就是回家种白菜也比在这个企业工作要好一些。”

在调整工资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是：没有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的统一的法律规则，比如，关于婚假、停工期间的工资的支付和加班费等。

由于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在一般的情况下，加班费都不支付。在一些企业里，在停工的时候完全不支付工资，而一些企业则正如在工作时间一样全额支付工资。

1.实际工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够维持2—3个人的生活需要。

1950年，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对生活在北京的35个工人和职员的家庭的预算进行了调查，他们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确定了每人每月食品和

工业品的平均需求。

如下一些数据资料表现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家庭人数和养活家庭的工资的规模。

性 别	社 会 状 况	共 计	工 人	职 员
总 计	—	35	20	15
百分比	—	100	57	43
男 性	—	26	13	13
女 性	—	4	2	2

接受调查家庭的成员(按家庭人数)，每个家庭的人数平均为5人。但是，得到的食品和商品是按照4个所谓假定年龄的人的需要进行计算的(各年龄段的孩子的食品的需求另有确定的量)，这种计算方法本身，也就是按年龄计算的方法，我们没能掌握。

应该指出，即使工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为4—5人。但是我们没能取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材料。

2. 以下表格显示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工资分配。

工资的多少		家庭人数	占总数百分比
小米(斤)	纸币(元)		
从 101 到 200	121 200—240 000	1	2.86
从 201 到 300	241 200—360 000	1	2.86
从 301 到 400	361 000—480 000	12	34.28
从 401 到 500	481 000—600 000	5	14.28
从 501 到 600	601 200—720 000	8	22.86
从 601 到 700	721 200—840 000	4	11.43
从 701 到 800	841 200—960 000	1	2.86
从 801 到 900	961 200—1 080 000	1	2.86
从 901 到 1 000	1 081 200—1 200 000	—	—
1 000 以上	1 200 000 以上	2	5.71
总 计		35	100

用小米的重量来计算用货币，也就是用元来支付的工资。工资用小米的斤数来确定，而根据小米的价值用元来计算每月支付的工资。

在上述列举的表格中，每斤小米的总价值为1200元。这一价值现在是稳定的。我们在中国期间，小米的价值几乎都保持这一水平。

以下列举的数据是假定年龄的一个成人每月的粮食和商品标准。这组数据是通过35个家庭的成人的预算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

食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 量	价格(元)	价值(元)
1. 粮食				
大米	斤	4	2 100	8 400
面粉	斤	11	1 700	18 700
小米	斤	13	1 250	16 250
玉米面	斤	16	1 050	16 800
挂面	斤	0.5	3 000	1 500
豆面	斤	2	1 000	2 000
土豆	斤	5	800	4 000
洋白菜	斤	10	1 000	10 000
食用甜菜	斤	2	1 000	2 000
绿豆	斤	1	1 600	1 600
绿豆芽	斤	2	500	1 000
葱	斤	1	600	600
猪肉	斤	1	5 400	5 400
牛肉	斤	0.5	4 400	2 200
大麻油	斤	1	8 000	8 000
大豆油	斤	1.5	1 600	2 400
食盐	斤	0.7	1 000	700

续表

食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 量	价格(元)	价值(元)
西红柿	斤	0.4	2 800	1 120
食糖	斤	0.15	9 000	1 350
茶叶	斤	0.17	38 000	6 460
总计				110 480
2. 布匹				
白棉布	尺	2	3 000	6 000
蓝棉布	尺	2	4 000	8 000
帆布鞋	双	0.5	33 000	16 500
棉袜	双	0.5	4 000	2 000
总计				32 500
3. 其余商品				
毛巾	条	0.3	4 500	13 500 ^②
肥皂	块	2	2 500	5 000
香烟	包	3	2 000	6 000
火柴	盒	2	200	400
总计				12 750
4. 取暖、水电				
煤块	斤	90	110	9 900
木材	斤	9	330	29 700 ^②
电	千瓦/时	2	-	-
水	桶	12	-	-
总计				12 870 ^②
5. 其余开支				
理发	每次	2	5 000	10 000
洗澡	每次	2	-	-
6. 住房	套	1 个家庭		50 000

①②③原文如此，数据有误。——编注

这样，在北京，按1951年8月30日的价格计算，仅食品和工业品方面每人每月至少就需要花费156730元。如果考虑到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那么这些开支为626920元，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公共开支(住房、燃料、照明)，而这些开支甚至是相当多的。

根据工会提供的材料和数据，17个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在250000元到570000元之间。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人工作。

这些数据说明，大部分工人无力购买上述必需的食品。

在访问一些企业的时候，同个别工人进行的谈话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

比如，在同北京的一个汽车修理厂的钳工王喜章(ВанСичжан)同志进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每月的工资为40万元。每月他的家庭大致需要如下食品：

小米 40俄磅 40000元

玉米面 35俄磅 35000元

高粱 15俄磅 10000元

玉米 30俄磅 20000元

各种蔬菜180000元

总计285000元

他每月支付的房租为60000元

根据他的计算，他家购买衣服和食品大概需要90000元。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是怎样弥补预算中的不足的？王喜章同志回答说，靠他的妻子打一些零工。王喜章同志的家庭有5个人：他、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在与“凌道”(Линдао)染料厂的杨奎龙(Янь Куйлун)同志进行谈话的时候他说，他在该工厂工作10年了。每月挣50万元。他家有四口人：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每月养家糊口的费用为30万—35万元。他家的主要食品是：大米、高粱、面粉、蔬菜、豆面。只有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才购买一些肉食和动物油。杨奎龙同志有自己的住房。

在北京近郊门头沟这个小地方的一个煤矿中，在同一名矿工家庭进

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一家有九口人，只有一人工作，他每月挣35万元。据他的家人说，他们每天早餐需要花费2500元，午餐需要花费3500—4000元，晚餐需要花费大约3000元。他们的食物主要是大米稀饭。矿工的妻子为矿工准备的稀饭要稍微稠一些。衣服和鞋子一点也不购买，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甚至光着身子。

在该煤矿每人每天在食堂的饮食的花费是：早餐750元、午餐2000元、晚餐1500元。食物是米饭和一盘蔬菜。

在北京近郊的石景山电厂的食堂大概也是这样的花费：早餐750—800元，其中大米粥200元，鸡蛋400元，热饼150—200元。午餐要花1800元，晚餐花1400元。

在对天津市第四纺织厂的食堂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得知，那里的食堂是合作化的食堂，工人可以得到午餐，午餐是米饭和配菜。这顿午餐提供14天，价值16000元。

该工厂的宿舍也有食堂，工人每月得到价值为90000元的一日三餐，其中早餐和晚餐是蔬菜汤或者是米饭肉汤，不加糖的一杯茶以及两个小饼。午餐除了这份东西之外加一份稠大米粥和配菜。肉每10天吃一次，每次100克。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论的只是关于每个家庭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品和一些商品。为此还必须加上住房、燃料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共开支。这些开支高达每月10万元，有时甚至更多，因为，北京每套(间)住房每月就需要5万—10万元。

北京的医疗费用特别高。比如，在医院治疗一天一夜需要花费1.2万元到5.4万元。在北京的医院一天一夜的住院费是8万元。手术费另算，而且每项手术费平均为60万元。胃或肠透视需要40万元，X光拍片需要1万—1.8万元，腹腔拍片需要8万—14万元，一颗牙1.5万—2.5万元。

中国的工人和职员每年需要为子女上学支付1万—6万元。

通过对得到的一些报告材料进行分析，以及对北京、天津、青岛市的一些企业进行访问，我们确信，中国的工人现在过得非常贫穷。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水平的饮食上的需要。他们的衣着非常朴素。绝大部分外套都是用棉布制成的，鞋是用绳子纳的鞋底为材料

做成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并非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衣服穿，特别是孩子们。

如下情况特别具有说明性。我们参加了北京的五一游行。游行的队伍非常庞大，人非常多，人们也都很兴奋。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参与游行的人的衣着反映了他们都非常贫穷。大部分工人都是仍然穿着工作服走在游行的队伍中。这也说明，大部分中国工人没有能力购买节日的服装。

调整工资方面的工作。两年内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致力于提高劳动人民的工资。制定了关于调整工资条例的总方案，其基础就是实行的八级工资制。这一草案也规定了用统一的单位工资分来计算工资，并确定了单独的工业领域工资的多少，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的工业领域来说，工资水平确定得比较高。

工资分是计算工资的单位，它由5种食品和物品来计算：

米(小米或大米) 0.8斤

白色材料(布) 0.20尺

植物油 0.05斤

盐 0.02斤

煤 2斤

用这5种计量单位举出了26种食品的平均需求。

使用工资分这一计量单位的必要性在于，中国各地区食品的价格是不统一的，也是不稳定的。因此，通常的解决方法是，用工资分计量的食品的价格来计算工资，而用钱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以此希望来解决工资的统一，并在现实中使其稳定。

在该方案中，工业领域按支付工资的多少被分为8个等级，而且规定最高的工资是在那些最为重要的部门。比如，煤炭工业和采矿工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行业被列为第一等级，石油和电力工业被列入第二等级，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被列入第三等级，等等。

由于该方案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同时由于在全中国推行该方案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目前，中国政府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的，因此该方案没能推行，而只是在财政条件许可的一些企业作为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且规定，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工资的增幅不能高于10%—15%，在审议工资的时候，需要削减工资的工人的数量不应超过10%。

这样，根据该方案，工资的调整要由企业开始推行，但是，正如上述所述，需要经上级财政委员会的批准。

现在已经有许多企业开始审议工资。根据非常不充分的数据，这些企业的工人的数量将近37.9万人。应当指出，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地方，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比如，青岛市水压站工人们说：“以前，专业工人和非专业的工人得到的工资一样多。专业技能什么也不值。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来说，实行八级工资制是正确的。有了努力的目标，也有了希望。”

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各企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在审议工资之后，一名钳工在10天内完成了工作计划的300%。工人对加强社会教育和技术水平的兴趣也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工人参加社会教育培训班(不脱产)的出勤率明显提高了，在审议工资之后，所有的工人都开始积极地参加这一培训班。此外，他们还请求为他们安排一些技术课程，购买一些技术资料，请求技术工人解释机械的结构等问题。

在山西省的另一个工厂，去年每本书(初中使用)卖100元。许多工人不愿买这些书。而现在，当按每本2万元出售《机床绘制》一书的时候，300名工人马上就表现出了购买该书的意愿。他们担心，随后这些书就没有了。这说明，随着八级工资制的推行，工资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工人们开始明白专业技能的意义。他们知道，专业技能越高，工资就越高，因此就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正如中国同志自己所承认的，这是工资调整方案中规定的八级工资制的优点之一。

在那些正在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企业，工资通常都在提高。比如，在

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7.58%，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7.63%，职员工资提高了21.71%，平均工资提高了19.19%，而在被批准的时候增加了20%。

在所有的工人中，85.09%的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增加，7.5%的工人的工资保持不变，7.33%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了。

在山西省晋华(Динхва)纺织厂，工人工资增加了15%，在广东省的糖厂和卷烟厂，工人工资增加了15%—20%。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各个企业总工资提高了5%到30%。

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送给中共中央党组关于中国的工资调整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在一些地区进行的工资调整的结果是，使我们更加坚信了改革工资体系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旧的工资制度的逐步改革，工资正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为重要的杠杆。”

应当指出，以个别企业审议工资的经验为基础，一些部门制定了整个工业领域调整工资的方案。目前制定了铁路工人工资的调整方案，该方案已经得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总的来说，铁路工人的工资将提高20%。还制定了调整纺织工业工人工资的方案。该方案已经开始在青岛的纺织工厂实施，以便进行试验。根据这些工厂工会工人的通报，方案得到了赞许，并且，从10月1日开始，将在其他的国营纺织企业实施。

现在，交通运输部正在制订关于调整远洋运输工人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方案。该方案的基础考虑到了苏联海员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的制定原则。打算把工资的多少同工人所在的船队的种类以及船舶的功率或者载重量相挂钩。

其他部门也在调整工资方面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在中国，在审议(调整)工资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以三个原则为基础，这三项原则得到了1950年全中国调整工资筹备委员会与会者的赞同。

这三项原则如下：1.尽可能使劳动工资制更加平等，为全中国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劳动工资奠定初步的基础。2.必须考虑到现实条件。要使

工资的调整得到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支持，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3.要考虑到国家的财经条件。不能使工资的调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为了实现这三项原则，制定了一份总方案，该方案为工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并且规定，第一，不允许降低10%以上的工人的工资，第二，允许总工资的增幅平均不高于10%—15%。

.....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工资问题上提供的帮助。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小组采取如下方式在工资方面对中国同志提供了帮助：通过会谈、提供咨询、授课、参与一些文件的制定工作、参与对工会干部和业务干部进行培养的特别培训班的工作、在访问中国期间就工资问题进行的各类会谈和参加的会议达14次，涉及的人数为240人。参加这些会谈和会议的既有全国工会联合会和工会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业务干部(主要是部局级干部).....在就工资问题开办的培训班上，我们的工作小组上了共计80小时的课程，参与的课堂讨论共计27小时.....应当指出的是学员们听课都很认真.....学员们的另一些特点是坚持不懈，非常乐意而详细地弄明白所听的内容。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对上课之后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在讲授“苏联劳动支付的形式和体系”的课堂上，一些学习小组提出了如下不同的看法：计时工资和计时奖励工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支付的原则。由于在学习小组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同志们请求我们详细解释这些问题，并且在苏联工会经验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在讨论课上我们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还有许多问题都反映出学员们在努力对讲授的材料进行研究。

.....

ГАРФ, ф.Р5451, оп.72, д.879, л.37-58

**№20162 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
(1951年10月 [21])**

..... [22]

二、本军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

根据军事部长的指示，本军的作战任务：为安东—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朝中军队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保护，使其免遭敌人空中打击。

与此同时，该军还应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随时准备对敌人空军可能发动的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的空袭实施反击。

上述战斗任务的完成是由一定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本军才可能采取行动。这些特殊条件具体包括：

——本军的作战活动范围只能在平壤、元山一线和海岸线之内，这一局限就使我们的飞机充分利用战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如果不把敌人对中国境内设施的空袭的反击计算在内的话，我们还必须在面对优势敌人和得不到任何中朝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仅以本军的力量孤身投入战斗。虽然目前已有一些中国空军师投入了战斗，但其对本军部队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作战区域的机场网络配置是我军的最大局限，它完全限制了我军作战的机动能力。这在我方战机前往前线区域作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便于我军完成上述任务的因素在于，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位于敌人空军的活动范围之外。

上述这些特殊条件决定了我军在作战时必须集中兵力来对付敌人的主要机群。因为如果分散兵力来应付所有在作战区域出现的敌机就可能出现无法完成作战任务的局面。

本军由三个歼击航空师以及一个航空兵团独立情报部队和两个高射炮兵营组成，其目前的部署情况如下：

——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掩护，以梯队方式或集约方式攻击敌空军，必要时将动用本军所有力量参战；

——防止敌人主要机群对安州一线以北地区的交通线和后方设施发

动空袭，为此我们将动用第一梯队的两个歼击航空师，其余第一梯队各师的2—3个中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防止敌人个别批次飞机对后方设施和安州、平壤地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为此将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个，或(特殊情况下)4个团。其他——第一梯队各师的剩余部队和整个第二梯队各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基地和设施提供空中保护，严防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如果要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可靠和彻底的保护，本军力量有限。

在第二梯队各师(如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出现保养维修情形，本军的作战能力将有所缩减。

三、本军各部队的作战方式和把握战机的主要原则

事实表明，本军将要与力量占优势的敌方空军作战，在得不到中国和朝鲜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单打独斗式的战斗。这就迫切要求它只能集中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即敌人的轰炸机群，而不能分散使用自己的力量。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军的打击目标不应是每个，甚至小型的敌机编队，而应是定期地集约式地将我们的歼击机组成一个大规模的集群，且只攻击敌空军的主力，其中首先便是其轰炸机和强击机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攻击只能是定期实施的，因为如果经常性地每天都组织这么大的力量，我军没有那样的实力。

此种打击应安排在敌人空军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且我机群应当具有一定规模，至少以团为单位。除自由“搏击”式的出动之外，小规模机群的出击只会导致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白白浪费我歼击机的实力。

总之，我军的任务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以集约式、定期的、事先充分准备好的大规模歼击机集群去打击敌空军的主要机群。

我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

——根据机场值班情况出动大规模机群对敌机实施拦截；

——用小机群(分队、中队)与敌自由“搏击”；

——个别情况下以巡逻方式保卫地面设施。

四、组织管理

歼击机、高射炮和探照灯均由军指挥部统一管理。

根据具体情况，飞机的导航由军指挥部、航空师指挥部和歼击航空军空中指挥所负责。高炮部队的火力和高射探照灯的管理由高炮航空师和探照灯团指挥部负责。

本军指挥部将部署在安东机场地区。各航空师指挥部——自己飞机所在机场区域，各高炮航空师指挥部：第九十二高炮航空师——安东，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博川，第十探照灯团——安东。

歼击航空兵师的空中指挥所组建地区：一号在富秋里地区，二号在博川地区。

预警系统可以发现250—270公里处位于中等高度的敌机。

关于空中目标资料向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的传达可通过以下方式：用无线电台，用机场无线电技术设备——热线直拨电话和A76型超短波无线电台，利用中国雷达站的电话和广播。

向本军各部队通报敌情可经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用广播报告。

为了给我方飞机导航，指明敌机位置，除雷达站外，还可使用分布在车岭关、朔州和宁郁地区的可视无线电导航台。

五、本军作战成果简述

自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9月15日期间我军战斗结果如下表所示：

作战活动类型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	歼击航空军
战斗持续时间(天)	30	68	82	166	131	320
出动战机数量	151	1 196	993	2 731	3 757	8 828
击落敌机数量	16	61	39	82	102	300

续表

作战活动类型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	歼击航空军
我方损失情况						
飞行员	2	5	5	6	7	25
飞机	2	7	6	17	15	47

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6月间，本军只有少量飞机投入战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朝边境地区没有机场，另一方面，本军部分部队要承担中朝飞行员的改装训练任务。

自1951年6月起，当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安东机场同时集中两个师的兵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缩减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

尽管我军的空战条件相当复杂而不利，尤其是敌机数量上总是占据优势，但我军各部队还是担负了大量的战斗任务，并取得了不错的作战成绩，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飞行员均训练有素，我们的米格15战机能优秀，全军指战员忘我的作风及其思想上对所肩负责任的正确认识。我们的飞行员在多数空战中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我们飞机的特点，因此即使在敌人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赢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各部队指挥员及其参谋部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战斗经验，学会了如何能够更正确地对作战工作实施组织和领导。因而近一段时间来本军的作战行动变得更为坚定，军指挥机关，各师、团所制订的作战计划也愈加严谨周密。

由于本军各部队基本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宣川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任务，一段时期敌空军没有对这些设施造成重大的损失。

本军并不完整地完自己所承担的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掩护的任务，直到最近敌空军经常对这些设施实施轰炸机和强击机空袭，从而对中朝部队的后方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本军没有能够完成对上述地区的设施提供保护的主要原因在于：

——本军力量有限，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只能以巡逻的方式来保卫这些目标。

——我们歼击机所在的机场与这些目标距离太远。

——我们对敌机的预警能力有限。我们飞机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机场值班报告以起飞拦截敌机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实施保护的。

——我们很难确定敌机群的真正目标(意图)，且我们的歼击机起飞后必须在指定地区(三八线附近)拦截这些敌机，而敌人只要一飞过这个界线，便已到达了自己的主要作战区域。

——我战机活动区域的局限导致我们只能以自由“搏击”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提供保护。

除了前面所列举的积极成果外，我军各部队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重大不足，其中主要包括：

——我们一些指挥员及其参谋部并非每天都能够深入分析敌空军活动的战术，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我们的歼击机及时提出克服这一战术的新方法和新战术。这种状况导致我们歼击机的战术往往千篇一律、墨守成规，从而不能有效地制服敌人，降低了我军作战的整体效果。个别情况下我们的负责歼击机作战行动的指挥员及其指挥部，未充分详尽和正确地估计敌空军机群的力量和意图，从而导致对敌主力机群的动向判断失误，错误地命令我歼击机起飞和错误地引导其发起攻击，结果白白浪费我们的力量且未给予敌人明显的打击。

——过分地与敌人为轰炸机和强击机提供掩护任务的歼击机进行纠缠，使我们的歼击机主要攻击少量敌机，从而放弃了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消灭敌轰炸机和强击机。

——在很多情况下，在第一阶段只是一味地攻击敌发挥“掩护”作用的歼击机，而未预先与我机群领队研究和制订周密作战计划，从而必然导致最终没有明确的主要攻击目标，从而影响了我们的歼击机的作战效率。目前这方面不足已经被我们克服。

——在地面和空中对我大规模机群和为我几个机群同时导航方面经验不足，这导致我机群在起飞拦截敌机时只有一部分机群遇到敌机并与之发生战斗，而我其他机群虽然当时也在这一区域，却没能遇到敌机，从而无法对我实施攻击的机群提供帮助。

——我们情报部门的工作缺乏必要的精确性。来自空中指挥所和对空情报总站的关于发现敌机的情报数据经常明显带有大量的不确切之处，如未指明敌机的组成及其高度等。多数无线电报站的操作人员，尤其是在具有强大干扰的条件下工作训练不足。

——空战中我中队和团级(领导机群)指挥员对敌机群的力量和构成估计有误，多数情形下其与地面指挥部均会引导我歼击机与力量占优的敌机进行战斗，从而导致我军战斗的失利和不必要的损失。

——还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歼击机群在未占据有利进攻位置的情况下便匆忙迎敌，这一般均会导致原本应当最有效的攻击的失败，进而打乱我机群的阵脚，使其分散成独立的双机，甚至有些飞机常常会彼此失去联系。从而为敌人创造了战机。我方飞机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而损失。

——允许个别飞行员在较远距离、仰角过大和未使用移动式自动瞄准仪的情况下便向敌机开火。这既导致了弹药的无谓浪费，也降低了我歼击机的攻击效率。

——很多情形下对敌人所发动的攻击并未彻底取得胜利，对敌人不是穷追不舍式地追击，从而导致战斗不彻底，即便在形势和力量对比于我有利之时仍不能轻松地赢得战斗的胜利。

——空中战斗的组织和管理还存在不足之处。各机群之间和机群内部的合作经常不到位，中队指挥员，尤其是团级指挥员经常找不到自己在战斗队形中的适当位置，从而导致以分队甚至双机为单位各自为战，个别情形下出现由普通飞行员领导的尴尬局面。

——在寻找和接近敌机过于谨慎，在战斗中经常显得疲弱，导致敌人对我发起突然攻击。

——在撤出战斗时步调不一致，一些飞行员(双机)在机群指挥员退出战斗之后，仍在空战区域与敌纠缠，从而受到敌人的夹击和追击。

——个别战绩优秀的飞行员居功自傲，不顾整个机群的战斗队形，擅自向敌人发起攻击，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一些领导机群在接近敌人时速度过快，动作过于剧烈，导致整

个机群乱了阵脚。

——导航台的工作人员不能完全遵守无线电台的纪律，由于共用同一波段而影响了对我战机的指挥和管理。

为了纠正上述不足和提高我歼击机的作战效率，我们将在各部队实施以下措施：

——提高关于战斗飞行和空战的分析质量；

——制订主要的空战模式，以便各机组据此在地面及时地进行模拟训练；

——召集各部队指挥员会议，专门分析作战行动中的不足，明确空战失利的原因；

——经常，尤其是在非飞行时间，与飞行员们系统地研究敌人空军的战术，总结军内各部队的战斗经验；

——召集各团和各师(第三二四和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甚至全军会议，总结和研究战斗经验，以提高作战素质；

——下大力气改善预警和通报体系，使雷达站和空中指挥所的作战统计系统化，为部队管理部门装备必要的示意图板、通讯设备等。

自1951年6月10日至9月15日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17架；自身损失：阵亡8人，伤27人。

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的不足之处在于：战斗统计零散。各指挥部的统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炮部队的射击效率。目前该部队正在进行补充性专业训练，以逐渐消除这些不足。

六、截至1951年9月15日本军作战部队和人员构成。

空军部队：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米格-15飞机52架。后备发动机48台，飞行员61人，其中：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飞行任务者11人，1人正在接受战斗培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目前该师正向朝鲜

歼击航空师移交自己的所有物资。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米格-15B飞机85架，其中：4架没有助力操纵系统，不能投入战斗。备用发动机48%。飞行员100人，其中21人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7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米格-15B飞机52架。备用发动机49%。飞行员54人，其中22人因身体有病和过于劳累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2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以航空兵大队为单位投入战斗。还有20个机组准备在夜间以双机为单位投入战斗，但此类夜间飞行有5个月的间歇期。

该师已连续作战五个半月，全体飞行员们都很疲劳。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拉-11飞机20架，其中，4架需要修理和更换发动机，备用发动机35.8%。飞行员30人。该团有30个机组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可在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应战的机组有22个，夜间以单机和双机方式投入战斗的机组20个。

全军共有米格-15飞机189架，需要修理的飞机占2%，平均剩余备用发动机48%。零备件不齐整的飞机数量：米格-15——10架，米格-15B——17架，拉-11——1架。

全军各部队的人员出勤率为93.6%，将领和军官的出勤率为93.7%。

全军人员目前的素质状态完全可以确保顺利地完成任务。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

……整体而言，高炮和高炮探照灯部队的战斗准备，全体专家和指挥部备战水平和战斗统计情况均令人满意。物资、技术保障方面也没有不足之处。

.....

八、物资、技术保障

第十八航空机械师包括第六独立汽车运输营、2个航空兵团独立机场技术保障营和1个汽车营。上述部队人员齐整，战斗经验丰富，完全可以胜任本军部队的作战后勤保障工作。

现有航空技术装备的数量、武器、弹药和汽车运输等状况完全可以保证本军部队的教学和作战工作的连续性。

全军人员的住所都位于军营内，房屋为日本时期建造的营房，有平房，也有2层和3层楼房。多数房舍很脏，门窗、玻璃和地面需要整修，墙面需要粉刷。很多楼房没有自来水、下水道和照明设施。很多部队驻地没有教室和俱乐部。多数楼房快到冬天时御寒还没有准备就绪。

本军全体人员的饮食由中方接待部门组织供给。公共饮食服务设施也由中国同志提供。驻扎在朝鲜的警备部和空中指挥所全体人员的粮食供应由安东地区负责。

全军飞行员和飞行、技术人员的服装、鞋和床具均能得到保障。全军的过冬服装将于9月底供给；冬夏季作训服目前已运抵仓库。

九、航空工程部门

本军的工程、技术部队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作战任务。

米格15飞机显示了高超的战斗性能，使用简便，工作故障率低。

在与装备有大口径机关炮的美国飞机进行空中对抗时，我们的米格15即使在遭到严重损坏和燃烧的情况下发动机仍能坚持工作，保证战斗的进行。

我个别飞机即使在中弹30—50发的情况下仍能顺利返回自己的机场。

.....我们飞机上的弹射椅均能保持正常工作，已拯救了18名飞行员的生命。它在任何高度和飞机处于任何情况下(飞机进入螺旋、翻转和以950公里时速俯冲等状态)均能正常使用。

.....我米格-15飞机的飞行距离和持续性.....相关参数：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130公里，带副油箱作战半径190公里；

——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持续飞行时间45分钟，带副油箱持续飞行时间1小时；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平均每小时油耗1160公斤，带副油箱平均每小时油耗1380公斤。

米格-15飞机准备再次作战起飞的平均时间：

——以中队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40分钟，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55分钟；

——以团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1小时，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1小时20分钟；

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且以团为单位的起飞时间2—4分钟，处于二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6—8分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12—14分钟。

十、医疗、卫生保障

在部队组建之初并未想到全体飞行员会如此疲劳，因而在出发前没有对其进行身体状况检查。例如，于1950年8月抵达中国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全体人员出发前未作空勤人员健康检查，而且该部队自1949年3月起便没有人休过假。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出发前也存在同样情况，没有对其全体人员进行治疗检查。

在向飞行部队补充兵源时也未考虑这方面情况，在没有进行身体状况检查的情况下便将人员派遣到了中国，导致很多人在抵达目的地时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胜任飞行任务的医疗文件。

这对部队的作战行动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致使很多人提前退出了飞行员编制。

对飞行员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工作过于繁重。通过对飞行员的疾病状况分析表明，其生病的原因在于：战斗活动过于紧张和劳累，对中国的居住生活条件不适应等。

飞行员在执行高空战斗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氧气及相关呼吸设备，并要求飞机座舱内具有一定的物理、卫生条件，但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从而导致一些飞行员因此而生病。

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的决定性因素有：神经、心理压力过大、劳累、慢性风湿病等。

神经、心理性疾病主要在战斗第一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心理方面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或已表现得不太激烈，疲劳因素成为影响飞行员健康的主要原因。

作战任务的紧张沉重，长期在机场不间断地值勤，每昼夜平均2—3次执行战斗任务，休息和饮食保障没有规律——所有这一切经过一段时间无疑会导致飞行员的身体出现疲劳过度，身体抵抗力降低，慢性病加重。上述情况一般在投入战斗3—4月以后便显现症状，随后病情不断加重，患病人数不断增加。

以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飞行员的健康为例：在经过5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多数人出现了疲劳过度 and 慢性病(肠胃道、心血管系统和耳、鼻、喉等疾病)加剧的现象。该师全部飞行员中，有16%的人需要立即去医院治疗，22%的人需要住院，40%的人出现了疲劳过度症状，只有22%的人身体表现健康。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在经过五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飞行员身体状况如下：健康的占58%，出现过度疲劳症状的占35%，需要住院治疗的占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经过3个月的作战活动之后，最合理的举措便是让飞行员休息一个月。

.....

十二、本军飞机出动的组织方式和贯彻情况

根据对朝鲜战场空中形势的评估，早在我军飞机实施此类作战起飞

之前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歼击机的使用必须以军团为单位，并由军指挥部统一调动。

可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我们不能按照事先在9月初便已制定的战略方针来实施，具体原因如下：

——6月以前，由于在安东地区没有足够数量的机场，从而导致我们能直接参战的部队最多只有3个团，即仅仅一个师。只是到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同时在安东地区集结2个师的兵力。

——整个6月份和7月初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各部队没有参加战斗和实际训练，只有集团军其他各团、师参加了空战。这是根据特别计划而实施的，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担任掩护，最终，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截至7月15日前本军的作战方式：以2个师的兵力同时投入作战，另有3个师作为第二梯队为上述部队提供掩护。但从7月下半期开始至9月初气象条件急剧恶化，从而导致我们完全无法以军为单位出击作战。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利用个别好天气实施了一系列以一个师为单位的出击作战，以便为全军整体出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天气不好的时间在第三〇三、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和全军召开了各团、师级飞行、战术会议，以总结战斗经验。这些会议为我军各部队战斗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如何以军为单位实施空战。

总之，截至9月初，我们已为实施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9月初敌人空军开始系统性地动用轰炸机和强击机对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清川江渡口实施集中轰炸。自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被转移到安州和泰川地区始，敌人空军的攻击重点也同时移至这一地区的交通线。在此类空袭中，平均每批次敌机中便有20架B-29轰炸机，30架以上的歼击机和F-80、F-51型强击机。

在前往宣川、定州和龟城地区实施轰炸的行动中为敌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为40架以上的F-84飞机，作为轰炸机“掩护”的敌歼击机

有30架，个别情形下甚至达到60架F-86飞机。

敌轰炸机的飞行高度为6000—7000米，强击机为4000—2000米，甚至可以超低空飞行，为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飞行高度为6000—8000米，歼击机“掩护”飞行高度为7000—11000米。

敌空军飞行的主要方向：轰炸机——元山、安州、铁原—安州；强击机——汉城—永柔；提供直接掩护的歼击机——从南边经过平壤；歼击机“掩护”——汉城—镇南浦、鹤山(Какусан)车站。在完成战斗任务后敌机群一般会撤向大海方向。敌人每天实施此类飞行共两次。大致时间为：第一次——9—11时，第二次——15—17时。

为了掩护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渡口，我空军第八十七高炮师随着敌人空军打击重心的变化，在新义州、宣川、定州、安州、介州和开城各地区不断迁移。根据空军行动小组负责人克拉索夫斯基同志的指示，在9月9—13日我们组织了6次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其中5次与敌人的强击机和歼击机发生了空战，一次(在1951年9月12日)敌机在我歼击机靠近时无心恋战，逃向大海。而敌人的轰炸机，每当在空中看到我们的歼击机，往往在未达到预定轰炸目标前，便向回逃窜。

我并不想详细描述我们所有出击的经过，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同一个计划实施的，只是在我们歼击机出击的个别行动方式和方法上略有差异。这里我仅以1951年9月9日发动的一次出击为例。……

当时，我军各部队接到的任务如下：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作为突击机群，在攻击敌人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歼击机的同时，消灭在宁郁、金山、坞所里(Осори)、开城、定州和安州地区的敌轰炸机和强击机，不允许其轰炸定州、安州和开城地区的交通线和渡口。一个团作为我军预备队增援前方实施突击的部队和掩护其撤出战斗，对敌机实施干扰。起飞75架次。2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以2个团作为牵制机群，任务是：接触和消灭在宣川、定州、泰川和龟城地区为轰炸机提供“掩护”的敌歼击机，不允许其对我军突击机群实施攻击。起飞43架次，2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携2个团，作为全军预备队，为安东地区的我军降落机场和设施提供掩护，防止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1951年9月7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团转迁至安东机场。起飞44架次。1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1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击退和消灭敌人的轰炸机，防止其可能发动的对安东地区设施的打击。起飞25架次，1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上述部队均需在接到军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在相关区域可能出现敌人空军的“鱼雷”预警信号的30分钟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我歼击机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突击机群——玄马台(Гематан)、朔州、汶山、开城、龟城和安东火车站；干扰机群和空中预备队(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1个团)——文翰里(Уэнхари)、新川、泰川、安州和安东；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鞍山、凤凰城，在收到特别指示之前，该团负责在上述地区空中5000—6000米高度的巡逻任务……

各机群(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中的每个团从不同地点(南、北两个方向)实施起飞，在实施180度转弯之后完成机群的集合过程。机群各团之间的集合以追赶方式进行。突击机群第一个团的起飞时间是固定的。

根据各师指挥部的决定：突击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十七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五二三歼击航空团。干扰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我歼击机的指挥工作采取如下方式：

——根据军指挥部的命令歼击机开始出击；

——我歼击机在空中的指挥和导航由军指挥部、空中指挥所、歼击航空军和歼击航空师指挥部负责。在歼击航空军第二空中指挥所(博川)的是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领航员谢廖金。

为了能够在更远距离处发现向东飞行的敌机，在以军为单位实施作战期间，我们在盈德地区空投了一个П-3-a无线电遥控系统。但该系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由于朝鲜东北部地区多为山区，其远距离发现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在靠近元山一线的地区再空投一个这样的站点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战局很不

稳定。由于最终通过设置远距离站点，以便发现敌人从元山方向出动前往安州和宁郁一线地区的轰炸机的设想并未落实，我空军针对这些敌人的拦截行动并没有充分的把握。

这导致我们的歼击机不得不在敌人作为“掩护”的歼击机一出现之时便提前起飞，以便拦截紧随敌歼击机之后的轰炸机。这些行动并不总是成功，因为很多情形下敌人的轰炸机并未出动。

我军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在行动中以“团为单位”的战斗队形迎敌，各团间隔2—4公里。团与团的接合部均高出200—1000米；各团的战斗队形以“中队为单位蛇形”配置，各单位前后距离800—1500米，相互横向间隔600—800米，各单位前后接合部相差800—1000米；各中队的战斗队形以“分队为单位梯形”配置，前后左右间隔400—600米，接合部相差400—600米。

1951年9月9日的空战情况具体如下：

敌人由4—8架歼击机组成的机群先进行了试探性空中侦察。11时25分至12时35分期间敌人试图对安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的我行军部队和道路上的其他设施实施空袭。

参加空袭的敌F-80和F-51歼击机、强击机达50架以上，其中由8—16架飞机组成的机群沿中、低空飞行。敌人强击机的空袭行动得到了由60架以上F-86歼击机所组成的两个机群“掩护”的掩护。敌歼击机“掩护”比强击机机群早10分钟飞抵定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然后便在9000—12000米高空担任巡逻警戒。

11时25分，敌人第一批歼击机群出现在公州和镇南浦地区。为了拦截和消灭敌机，我们出动的飞机有：11时21分至11时28分——突击机群(由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2个团组成)，54架米格-15战斗机；11时23分至11时27分——掩护机群(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2个团组成)，34架米格-15战斗机；11时45分——预备机群，22架米格-15战斗机。共计米格-15型战斗机110架。

11时40分至11时45分，我干扰机群和突击机群在定州、安州、泰川和汉沽仁(Хакуен)地区与敌“掩护”歼击机遭遇，后者从我歼击机群起飞始便转头飞往东南方向。我机群与之在9000—12000米高空发生战斗。

我掩护机群战斗持续时间20分钟，突击机群——12分钟。

根据各歼击航空师师长的战果报告，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4架，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5架。我方损失情况：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第一九六团飞行员上尉安德留什科因执行作战任务未返回基地。

结论和建议：

1.经过上一阶段的战斗，我军各部队均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我军的计划、组织工作和我歼击机的战略战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过一些小规模机群的战斗实践，如今我们已能够以团、师和军为单位实施集群式作战，并使美、英空军受到了重创。

2.经过长期的作战活动我军各部队在战备水平和战斗能力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

——各部队的战备工作都本着我歼击机群应迅速、准确地起飞，整体步调一致的原则来抓，从而使其空战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于全体飞行员疲劳过度，导致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战斗能力、机组战备水平和质量有所下降。从该师的定员构成来看，能承担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50%。该师需要持续休整，人员和物资方面也需要补充和替换。

——虽然也存在上述原因，但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战斗力下降得还不太明显。该师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战斗任务，但也需要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加以补充。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的战斗能力仍保持原有状态，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3.鉴于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即将返回苏联，因而急需向我军调入一个新航空师。否则，将大大降低我军的战斗能力，从而完全丧失凭借自身力量实施战场机动的可能性。

4.我米格-15型战机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美英空军战机，其使用简便，战斗灵活性强……

5.在和平条件下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以最短的时间练习以团为单位的起飞、集合和飞机的爬高等动作；

——在顺风，风速为20公里/秒，携副油箱和不带副油箱情况下练习飞机的起飞动作；

——让以双机乃至以整团为单位的机群练习以最大速度爬升至飞机最大上升极限的技术；

——练习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机群编组和战斗队形；

——双机飞行时，飞行员应能够完成一整套特技飞行动作，如飞行交叉和半筋斗翻转等；

——训练长时间滞空，并能在13000—15000米高空进行空战的技术；

——练习高速度飞行技术，能够在飞机倾斜至极限“磁方位角”的角度上与敌作战；

——为便于我飞行员确定对敌B-29和B-36型轰炸机实施攻击的最佳距离，应当在实习场和机场上设立敌B-29和B-36模型，大小应与真正的敌机相仿。这样，我飞行员便可在不同角度和距离每日练习对敌机的瞄准动作；

——练习在空中使用移动瞄准镜对敌射击动作；

——我飞行员应掌握在飞机以最大时速飞行时向敌发动攻击的技术；

——练习以80度角长时间俯冲时空中停车的技术；

——能够在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编队中向目标瞄准和开火。

6.为了改善通讯部队的管理和提高其战备水平，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派一个携有必要的仪表测量备件和测量仪器的155 КРАС型移

动修理厂到军里待上2—3个月；

——给第八十七空军高炮师补充一个COH-3K型无线电遥测系统，对现有的14台KAMEHC柴油机和3台ЛИТЦЕР柴油机进行大修；

——给军里一个定员不全的无线电报站配备一个通讯连；

——根据第十八航空机械师的需求，尽快发送通讯配、备件和器材。

为了解决本军各部队的物资技术保障问题，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在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八十航空机械团机关编制内设立运输处，该处人员包括处长、军官和办事员；

——所有受训独立汽车运输营人员均转为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三十三航空机械团独立航空技术保障营编制；

——给每个航空团配备一个AK3C-40型充氧车(平均每个中队一个)和一个能给蓄电池充电的15千瓦电站；

——航空机械师应拥有如下工厂：高炮师光学仪器修理厂；地面火炮武器修理厂；由三个车间——电力、无线电技术和电话—电报等组成的通讯设备修理厂；师汽车修理厂必须应提高现有修车速度，即每月70个中修。

医疗卫生保障：

为确保部队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补充扩建医疗设施：一个医疗卫生营和一个传染病医院；

——经常而及时向部队供给各种药品和消毒器具；

——在军首长领导下建立一个行军X光室和一个配备有必要人手的临床实验室；

——建立一个空军医院附属医院，并配备物理仪器和X光设备；

——在发送那些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之前，应对之全体注射传染病

疫苗。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

近卫空军少将别洛夫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3543, д.73, л.22-69

№133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2日

第665项 关于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采纳苏联作家协会邀请由12—15个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于今年10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和苏联作家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25

№10777 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10月3日)

机密，文本第2号

致苏联外交部美国司代理司长

В.И.巴济金同志：

在此呈上由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二等秘书К.Н.斯米尔诺夫起草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20页。

H.弗拉迪金

华盛顿市

1951年10月3日

共3份，送：通金、巴济金，存档

附在1951年10月11日第1189号密电之后

附件：

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撰稿人：K.H.斯米尔诺夫

机密

仅1份

华盛顿市

1951年9月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调查报告)

一、美国统治集团对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

马立克同志今年6月23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可能性的声明，在美国各阶层居民中得到广泛赞同和支持。由于该声明指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现实道路——这一点即使部分美国反动报刊也承认——在美国人民中赞成和支持结束朝鲜战争的意见骤然加强起来。马立克同志的建议甚至在某些保守分子，包括美国国会议员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比如，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康纳利6月24日称，应该“仔细研究马立克的建议”，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波特(来自密执安州)和民主党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自蒙大拿州)都表示赞成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据美联社6月24日报道)。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联合国各方面人士中也产生了强烈印象。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于6月24日向报界代表称，“马立克的声明是重要的”，将立即采取措施以利用苏联的建议。联合国一系列其他官方代表也发表了声明指出苏联声明的重要性质。

尽管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国会某些议员中引起了积极反应，但美国统治集团方面总体上对它是另一种态度，因为这一建议使他们措手不及，并将其置于困难的境地。众所周知，由于美军在朝鲜的失败，为给进入死胡同的美国外交找到一条出路。杜鲁门政府曾在今年4月对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开始试探。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威信，美国政府倾尽全力想把美国描绘成“胜利者”，而朝鲜人和中国人则是“失败者”。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政府打的算盘是，最终由朝鲜人和中国人来建议或请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会比较容易扮演胜利者的角色，并提出自己的条件。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算计被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打破了。

美国统治集团对苏联建议在美国引起的积极反应表示严重不安。在杜鲁门政府开始全速展开庞大的军事计划并准备让国会通过关于为军需和用于对外国军事援助的巨额拨款法案的时刻，这种反应对美国统治集团十分不利，因为这种反应可能给各种军事措施的实施造成严重困难。

在马立克的声明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威尔逊等人就立即讲话，警告“虚假的安全感觉”，并呼吁不要降低美国的军事准备速度。杜鲁门6月25日在图拉霍姆市的讲话中虚伪地宣称，美国“任何时候都准备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随后就呼吁不要降低军事准备速度，而是更要加速。艾奇逊6月26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讨论对外国军事和经济援助案时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因为朝鲜冲突的解决而削弱对外国的军事援助计划（《相互安全计划》，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23页）。在给杜鲁门的关于第二季度美国军事准备进程的报告中，威尔逊写道，美国“应该继续执行更新部队装备计划，而不管朝鲜的军事行动停止与否”（威尔逊1951年7月15日给杜鲁门的报告，第1页）。

即使在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开始后，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仍然继续发表类似的宣言。这种讲话中最典型的是马歇尔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上讨论对1952年的军事拨款法案时的讲话。马歇尔声称：“最令人苦恼的事实是，他们，俄罗斯人，仅仅凭借一次讲话，就使美国人民的情绪得到了稳定，并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计划。更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宣传的感染，仅仅一次讲话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绪，使我们在国际局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次讲话是个精心的骗局，在美国对这次讲话的反应是一场悲剧。我们不应该改变我们的计划……”（《国防部1952年拨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的听证会，第196—197页）

从上述宣言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保持和维持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对轻易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预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以削弱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引起的巨大效果，并消除建议造成的轻松气氛。他们立即发动了所有宣传机器以散布对苏联建议的怀疑情绪，并千方百计贬低它的意义。为贬低苏联建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甚至不惜采取粗暴的手段，比如在6月26日通过李奇微司令部在东京公布了一份新闻备忘录，其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对苏联建议的杜撰和捏造，包括声称，马立克的建议在华盛顿“被负责的官方人士”看作是苏联企图取得“军事优势”的一个策略。国务院在这份备忘录中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它宣称，马立克的建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说得太直截了当了”——这似乎与苏联先前的行为大相径庭（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然而，美国政府的措施并没取得预期的结果。一些报纸评价国务院备忘录的公布是美国宣传的“一个明显失误”，而把政府对马立克同志建议采取的策略称为“失败的”（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麦克纳）。

美国统治集团从开始就对苏联建议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在做出关于开始停战谈判的决定时，美国的指导思想不是致力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而是如何保持这种紧张局势。所以，还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反映政府观点的美国报刊就预言，谈判将不会导致远东的和平。《华盛顿邮报》7月2日在编辑部文章中写道：“美国人民应该明白，朝鲜的停火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势力与自由世界势力之间的斗争停止……朝鲜即将开始的谈判的结局不是现实的和平，而是新形式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没有人员伤亡，但它在各个方面将更加严重……”

二、美国政府拖延停战谈判的利害关系

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预备性谈判，其目的是要制订一个停战谈判的会议日程。

美国统治集团从自己保持远东紧张局势的计划出发，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消极怠工和拖延的方针。他们认为，这种谈判方针使他们不仅能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而且还会加剧这种紧张，以便吓唬社会舆论，并造成一种有利局势，使美国政府能顺利地让国会通过军事预算、增加税收法案和加强监督法案以及对外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扩大计划。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计划在马歇尔的发言中暴露无遗。今年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上，在回答众

议员马洪(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在拨款法案通过之前朝鲜谈判是否会取得某些成果”的问题时,马歇尔宣称,他不认为,至少在6个月或者更多星期的时间内(即法案通过之前)会取得成果。马歇尔说:“我认为,如果在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前你们(国会)通过法令,将是件有益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法令的通过将非常有助于我们达成我们希望的(停火)协定。”(《国防部1952年拨款》,听证会,第202页)

7月25日,艾奇逊也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艾奇逊宣称:“在朝鲜继续进行反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时,会比较容易地说服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国外的朋友相信迅速巩固我们国防的必要性……”(《1941年 [23] 的相互安全行动》,听证会,第1页)

美国统治集团暗中破坏停战谈判还有其他目的。正如美国报纸指出的,美国极力拖延谈判并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还为了迫使自己的盟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签订与日本的单独媾和条约,以便较为容易地缔结太平洋安全条约和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致力于朝鲜问题的真正和平解决,当前极力把谈判拖延到11月初联合国在巴黎召开的例会开幕。他们这样做的算盘是,如果联合国例会工作期间停战谈判还在继续的话,就可以避免联合国讨论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还希望,由于紧张局势,他们会得以比较容易地快速武装日本,拼凑“团结一致的”侵略性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并准备扩大自己在远东的侵略行动。

美国政府走到停战谈判桌旁来又力图拖延它,还是由朝鲜局势的纯军事方面决定的。美国要求拖延谈判是为了使自己在战斗中严重受挫的部队得到喘息,为部队的整编和调集新的增援部队争取时间。美国报刊的大量报道证明,从停战谈判开始以来,美国往远东地区调集了大量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在朝鲜的美军不论在人员上还是在兵器上得到加强这一事实,记者艾伦在7月2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指出来,他具体地报道了由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州航空大队组成的第一一六歼击轰炸机联队调往远东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9月份)报纸上又报道了军舰调往远东的消息。同时,这一时期美国还加强了对自己盟国、卫星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往朝鲜增派增援部队。8月8日,助理国务卿希克逊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称,美国“正在努力(从盟国)得到派往朝鲜的补充部队”,“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希克逊进一步声称:“我们希望有更多数量的国家往朝鲜派兵,希望那些在朝鲜已有部队的国家加强自己的部队。”(《1951年的相互安全行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听证会,第681页)结果,在美国的压力下泰国、希腊和加拿大政府往朝鲜派了自己的部队。在长期的支援之后,法国和挪威也派了兵。据最近的报道,新的英国部队也到了朝鲜。

应该指出,美国政府向朝鲜派增援部队追求的是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队以进行进一步的、可能更大规模的战役;另一方面,如果停战能够实现,那就在停战之前在朝鲜积聚更多军队,因为在停战协定缔结之后就不可能指望有这样的调动了。

三、美国在开城谈判期间的挑衅行动

为暗中破坏和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政府采取了挑衅和制造各种事端的办法。谈判开始后才过了两天,美军司令部就提出了关于容许联合国记者进开城及关于在开城设立中立区的最后通牒式要求,以此不仅拖延了谈判,而且使谈判受到中断的威胁。美国政府的意图在于人为制造“事件”并利用它来作破坏谈判的宣传。利用记者“事件”掀起的报刊上的喧嚷,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谈判“无诚意”、“不诚实”的指责,明显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意图是想冷却社会舆论对朝鲜谈判寄予的希望,并为他们自己的拖延辩解创造条件。然而,美国政府的这些企图未能得逞:朝鲜人和中国人让了步,在关于容许记者进开城和建立围绕开城的中立区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甚至一系列美国报刊都指出了美国政府企图的破产,它们指出,美军司令部的“挑衅行为”不

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和李奇微司令部看来持另一种意见。他们制造的“事件”得以拖延谈判，而美国宣传是站在向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自己要求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一边的。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让步被美国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并认为他们有可能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承诺。

8月中旬，美国政府转向在开城进行军事挑衅。从8月19日开始，美方多次对开城中立区武装入侵。中立区还遭到了空中来的轰炸和扫射。在答复就这些挑衅提出的抗议和进行调查的要求时，美军司令部不仅公开否认自己对挑衅的直接责任并拒绝调查，而且还极力把罪责推到朝鲜人和中国人头上。李奇微司令部进行的和美国报刊鼓吹的公开否认破坏中立区的事实并指责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合唱，再一次证实了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驱散人们对谈判的任何乐观情绪并在朝鲜制造令人担心的空气以有利于他们继续进行战争行动。在9月20日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立即恢复谈判的建议之后，李奇微先是拖延回答，后又提出关于把会谈移到另一地方的建议，再次证实了美国统治集团在这种局势下的居心。

四、美国的停战条件

还在制定日程的谈判预备性阶段就已清楚，美国政府不希望迅速和公正地解决建立停战有关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它甚至就不打算讨论。

美国代表团在预备性谈判期间拒绝将关于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日程说明，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自己在朝鲜的掠夺计划，它也不希望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许多官方人士的声明以及美国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言论都指出，即使在不仅达成了停战，而且实现了和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比如，艾奇逊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言时称，美国只同意“分阶段地”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艾奇逊说：“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必须巩固南朝鲜武装力量，以便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进行抵抗。”（《相互安全计划》听证会，第45页）今年7月19日，艾奇逊在对新闻界谈话时又重申了美国关于在朝鲜保留自己军队的意图（国务院1951年7月19日第648期新闻稿）。马歇尔在7月24日五角大楼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布莱德利8月19日在电台上也发表了类似言论。美国报刊对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言论特别有代表性。《新闻周刊》杂志在今年7月23日一期中写道：“不要期待朝鲜的和平意味着美国从朝鲜总撤军或者大幅削减这些部队的数量。华盛顿认为，为了占领及为了预防他们，还将留在那里至少两年。”

持续15天的预备性谈判就停战谈判的日程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它包括以下问题：（一）通过议事日程；（二）建立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基本条件的非军事区；（三）制订实际措施以实现停火及在朝鲜范围内停战，包括监督停火和停战条件实施情况之观察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能；（四）关于涉及战俘的措施问题；（五）向双方各有关国家政府的建议。

在双方开始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之后才弄明白，原来美国代表不愿意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设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美国政府的代表先前曾多次宣称，三八线对停战是最合适的一条线。比如，众所周知，早在6月2日，艾奇逊就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举办的“麦克阿瑟案”听证会上发言时称，美国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实现停战。（《远东的军事局势》，听证会，第3卷，第1782页）

但是后来，当关于停战的预备性会谈开始之后，艾奇逊（在7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声称，他当时讲的似乎“不是关于地形测量学的线，而是讲的一段区域”（1951年7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这似乎表明，“联合国武装力量拒绝撤到三八线或者三八线更南以达成停战”。（1951年7月14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尽管美国政府以纯军事理由为自己目前的立场辩解，毫无疑问，美国人抛弃自己关于准备同意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的声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威信的考虑。报刊多次确认，同意以三

八线为基础作战，不能不被世界社会舆论看作美国承认没有能力在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杜鲁门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共和党人“安抚侵略者”的指责，况且，日益逼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迫使政府对此类指责特别敏感。就在最近，《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家鲍尔杜因写道：“退回三八线将会是亚洲共产党宣传的一大胜利。它会被敌人充分利用来损害我们，有可能严重削弱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意志。它将在美国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1951年9月27日《纽约时报》)

美国政府拒绝在三八线停战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谈判期间，美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不沿三八线设立非军事区，而是在远离三八线以北地区，这样北朝鲜将被夺去等于13000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侵占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这里有丰富的矿藏，并且对于展开今后的战役在战略上十分有利，美国人可在很短时间内来到中国和苏联边境。共和党众议员富尔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在7月29日就曾公开地表露了这些侵略计划，他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在美国手里只有朝鲜的农业区深表遗憾，声称，如果美国能够把德川、安州和咸兴一线控制住，那么北朝鲜的整个工业部分和战略上有利地区就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关于北朝鲜的什么东西吸引美国垄断集团的问题，美国兵器全国委员会主席斯摩尔说得更加明确。斯摩尔称：“保持我们今天在朝鲜的地位，不仅从军事角度，而且从我们国防计划的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域之外的钨矿藏的90%都处在美国武装力量现在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对于保证这一地区十分丰富的钨的供应，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参议员马龙(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也在8月23日宣称美国对北朝鲜的钨有兴趣。(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在报纸上也有详细报道，比如，德鲁·皮尔逊8月9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李奇微将军的武装力量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一块领土，储藏有没被利用的丰富钨矿”，这就是李奇微在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所取的“不妥协立场”的原因。

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向公众舆论掩盖自己就分界线提出的要求内容，害怕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负面反应，这一事实是非常典型的。在美国报刊上过去和现在都指出，李奇微司令部的建议似乎仅“限于”当前的战线走势，“最能符合防御的任务”。为了将社会舆论对有关分界线问题讨论现状的认识更加引入歧途，美国报刊还放出风来，似乎美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某些让步。(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但是，最终解决还取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很典型的是，当8月初美国报刊开始有报道说，美国要求甚至在战线以北很远建立分界线时，美军司令部出面否认这些报道并采取措施，极力把这些消息说成是“敌人宣传”的结果。(1951年8月5日《指南针日报》，记者丁)

从美国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讨论停战谈判日程的其他问题时，美国政府将故意提出一方面旨在从停战中捞取最大好处，另一方面更加拖延谈判的要求。正如报刊上指出，在讨论日程上第三个问题，即制定实现停火和在朝鲜范围内停战的实际措施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要求，不但要实施地面检查，还要实施空中检查。接受这个要求，就会给美国人进行侦察活动和进行各种挑衅开辟广泛的可能性。报刊上还指出，在讨论关于涉及战俘的第四个议程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的“建议”。美军司令部的出发点是，这样交换，在它的手里就会留下大批没交换的战俘，因为如报刊所说，美国人手里的战俘比朝鲜人和中国人手里的战俘多。美国司令部计划，这个情况将被用作对朝鲜人和中国人施压的工具。

美国政府企图利用军事措施来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它的要求，这一点特别鲜明地表现为在谈判期间他们加强了对北朝鲜和平城市和村庄的空中和海上轰炸。美国报刊指出，李奇微希望用加紧轰炸来“迫使北朝鲜人最终接受他想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为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人在报刊上散布谣言，说在停战谈判期间似乎已达成在谈判期间军事行动将继续的“相互谅解”。(1951年8月8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肯特)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在朝鲜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不利态度，美国军事新闻检查机关极力隐瞒美国军队在停战谈判期间实施大

规模战役的事实。比如美国军队8月19日发动并持续到9月4日的大规模进攻这一事实。很典型的是，这一进攻是在朝鲜和中国代表宣布就设立非军事区问题将做出妥协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一次进攻，直到它结束美国报刊上都没有任何消息。

在9月4日范弗里特将军正式通报了美军进行的进攻之后，报纸直接指出，是军事新闻检查机构禁止对进行的战斗作任何报道的。9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该报记者麦克纳的一篇报道说：“3个星期之前，在汉城的记者们被告知说，美军司令部不希望我们报道联合国军在和平谈判进行期间参加进攻的消息来惊扰美国的社会舆论。”

结论

一、开城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政府选择的是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策略，为此目的而制造各种“事件”和挑衅。杜鲁门政府之所以拖延谈判，为的是维持紧张气氛，以便它比较容易地在国内和盟国内推行武装计划，并为武装日本和拼凑太平洋军事同盟创造有利局势。

二、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表明，它并不致力于迅速而公正地解决与实现停战有关的问题。它不打算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停战，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诚实地解决涉及交换战俘、监察制度等谈判议程的其他问题。

三、杜鲁门政府用拖延谈判的策略和李奇微司令部的挑衅行动，实际上已中断了开城的谈判。它依旧奉行继续自己在朝鲜的侵略方针。它加强美军，继续对盟国施压以得到补充军队并加紧在整个战线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АВПРФ, ф.0102, оп.7, п.32, д.65, л.65-85

№0049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一、请派5名军事顾问于10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二、请苏联政府于1951年底即10—12月按照我在9月20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9月8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1/5)给我们发出120门85毫米高射炮、7种火炮弹药、6种火炮轮胎和10万颗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同意从10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6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

用物资，待到1952年4—6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三、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1—3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4/5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

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于1952年7月开始发出其余5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

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四、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

不久前，我国贸易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3510辆汽车和1900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一批5个师的军用物资内)。

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60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贷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4日

第4933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134 135

№133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1951年10月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4日

第694项 关于发行《金星英雄》汉语影片。

准许苏联电影部生产用汉语配制的电影《金星英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 ф.17 , оп.3 , д.1090 , л.131

№20042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1951年10月5日)

机密

今年10月5日14点00分，我应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A.Г.柯克的请求接见了。

开始会谈之后，柯克通报了，在从莫斯科启程前往美国，而后是巴黎之前，他希望与我讨论两个问题。首先，他希望告知我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他在今年9月6日与我会谈时阐述的关于苏联政府保护在美国公民的利益请求。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个问题。

柯克声明说，他希望触及关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

合众国政府全权委托他提请H.斯大林大元帅注意这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指明必须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柯克宣读了美国政府的这份声明，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目前最危险的国际问题是关于朝鲜的问题。顺利地完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将有助于妥善解决由于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而引起的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能够确保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无法理解拖延关于停战谈判的原因。北朝鲜军事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就停火路线问题提出的要求，不符合目前现实的军事状况，除此之外，按照大使的意见，上述要求也不符合葛罗米柯今年6月27日针对马立克的声明给他的解释。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感到吃惊的是，朝鲜和中国代表在谈判时坚持的关于停火的分界线，因为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性质和在军事谈判中各方不应该触及政治和领土问题。这类问题应该在停火谈判结束之后与有关政府进行讨论。合众国政府不准备参加与“不相称的人员”就政治问题的谈判。

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现出妥善解决由于在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引起的问题的愿望。苏联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无果而终的话，那么，这将会导致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美国政府以自己的声明和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真诚地追求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完全赞同它的这种立场。

在声明中接着谈到，1950年6月25日侵入南朝鲜的行动，是公开的侵略行动和朝鲜问题已经成为要求立即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评价这件事情的。北朝鲜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向釜山的进军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谁应该为侵略行动承担责任。

大使声明说，他不希望就此问题继续进行辩论，但是，希望提请注意在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的严重性。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北朝鲜人确信必须对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持现实的态度以及政治和领土问题应该由联合国和相关政府进行讨论。

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合众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不安情绪。面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民主国家准备彻底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独立性。目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军事领域采取

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和仅仅是为了防御。

大使有权声明，合众国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正面地结束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将是在创造有助于妥善解决一切未解决问题的条件方面的第一个步骤。不解决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其他任何问题，柯克对此强调说。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将在正面结束朝鲜停战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如果在开城的谈判不能获得正面的结果的话，那么，这将会引起我们两国之间的不愉快。

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也真诚地希望停战谈判能够顺利地结束。但是，经验表明：开城不是进行停战谈判的合适地点。因此，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坚持把谈判地点改为另一个“中立”地点，它不处于任何一方的监督之下和双方都能够方便地到达那里。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不理解，为什么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拒绝关于把谈判地点换成能够排除某一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的另一个地点的建议。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赋予朝鲜停战谈判以巨大的意义和希望最迅速地解决朝鲜问题。它希望苏联政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朝鲜停战谈判顺利地结束和以此为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开辟道路。

听完大使的声明，我问他，是不是能给我提供他宣读的美国政府声明的副本。

柯克回答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指示，他应该口头做出这份声明，而不转交书面的这份声明。他表示相信，我在没有书面形式声明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声明的内容。

我对这种不寻常的转达声明的方式表示吃惊。我说，当然，我肯定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汇报大使声明的内容。但是，在没有大使的书面声明的情况下，我无法承担对准确转达美国政府声明的责任，况且这份声明的内容大约有8页，按照大使的话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赋予在声明中触及的问题以巨大的意义。

柯克还是拒绝了向我提供他所作的声明的副本。

转向声明的实质，我提请柯克注意他所犯的错误和歪曲。我指出了，不是北朝鲜人，而是南朝鲜人和美国人入侵了北朝鲜，可以用苏联

代表团向联合国提交的无可驳斥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苏联政府赞成顺利结束朝鲜停战的谈判，苏联政府是这些谈判的倡议者。涉及关于停火线的问题的话，那么，苏联不能同意：确定作为拥有政治和领土性质的这条界线，不能成为开城谈判的内容；不能同意：北朝鲜代表团应该为这些谈判出现的僵局承担责任。这方面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军事指挥部身上，尤其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李奇微将军，他不仅拖延了谈判，而且还不明原因地坚持把谈判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指出，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使建议为使停战谈判顺利进行，苏联政府可以对北朝鲜政府施压影响。苏联政府并不参加谈判。而直接参加谈判的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朝鲜谈判得以顺利地完

成。

我对柯克关于仿佛苏联政府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声明感到困惑，并请求大使哪怕是列举出任何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这种声明的事实。

涉及大使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无结果可能会导致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事情发生的声明，我说，对此我无法理解大使这个意见，它可能被视为暗示着某种威胁。

柯克连忙解释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赋予自己的关于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话以某种威胁的性质，而只是强调，在战争历史上，有限的战争经常会转化成无限的战争。

对此我说，有限的战争变成无限的战争的这种转化，取决于进行战争的那些人们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就大使的关于美国对苏联及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打算的声明，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这一点。但是，应该确定，遗憾的是，大使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声明说，他想再次强调以下两种情况：

- 1.美国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这个声明是官方的，按照柯克的话说，他有权向苏联政府作这样的声明。

- 2.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如果苏联政府将以自己善意的服务和善

良的意愿提供帮助的话，那么，朝鲜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将为妥善解决一切尚未解决的其他问题提供可能。

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大使的这个声明，但是，应该回答，关于美国政府针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性打算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至于说苏联政府的话，那么，在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它始终坚定地表现出和将继续表现出善良的意愿。

在会谈结束之际，柯克再次请求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美国政府的声明。

我保证说，当然，一定转告。

会谈共持续了50分钟。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卡明和一等秘书麦克苏伊宁。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作为翻译的И.Г.乌萨切夫同志。

A.维辛斯基

АВПРФ, ф.07, оп.26, п.49, д.173, л.30-36

№133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 选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5日

第705项 关于费德林同志的问题。

批准所提交的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复电草案。中共中央曾在来电中请求苏联派费德林同志参加毛泽东同志选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第1567号电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

“中共中央：

你们在今年9月20日的电报收悉。

兹作如下答复：我们不能派遣费德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著作出版委员会工作。费德林同志可以继续在大使馆工作的同时兼职这一工作。

联共(布)中央”

收到请回复。

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1951年10月5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34, 366

№261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 和国民党谍报电台(1951年10月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5号决议

第704项 关于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为中国政府提供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的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的相关数据资料(附件一、附件二)。 [24]

2.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苏联外交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述第1条中提到的在中国的谍报电台的数据资料。

第83号记录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62, д.46, л.83

№23388 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

中文为正本 [25] (1951年10月5日)

馆字第(51)0354号

敬启者：

本大使馆顷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自1951年10月1日起，本大使馆发出之重要公函及文件均以中文为正本，并附俄文译本。特此通知苏联外交部及驻在莫斯科之各大使馆及公使馆。

此致

苏联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印章)

1951年10月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8页

№134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19项 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批准所附给刘少奇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致苏联大使

对第1591号特别电报的回复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交如下电报内容：

“刘少奇同志！

您的来电已收到，在电报中您通报了关于派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打算。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并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代表团成员了解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代表团到来之际，正是十月革命34周年的日子，由于农田工作已经结束，因此可以主要地向代表团介绍一下社会主义畜牧业和水利工作方面的问题

如果代表团在1952年4—5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收到电报后请确认，并按电报要求执行。

维辛斯基

1951年10月7日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36、371

№133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23项 周恩来同志今年9月30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

接受提交的：

(1)对周恩来同志今年9月30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的答复草案。

(2)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黑色轧钢的指示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一：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交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

您的9月30日关于提供2701吨黑色金属轧材的电报已经收到。

将按电报中指明的规格，于1951年第四季度向你们提供1376吨，1952年第一季度向你们提供1325吨，结算方法：根据1950年2月14日协议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年10月7日

附件二：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

1951年10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责成冶金工业部按照附件的规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2701吨黑色金属轧材，其中包括：

1951年第四季度1376吨，其中1007吨使用购买大型轧材的出口基金，369吨使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

1952年第一季度1325吨利用出口基金购买。

对外贸易部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上述所说数量的轧材，费用计入根据1950年2月14日协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项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附件：

应于1951—1952年期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黑色金属轧材规格(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1. 等面角铁			
200×200×20	30	15	15
200×200×16	200	100	100
150×150×16	200	100	100
150×150×12	100	50	50
2. 不等面角铁			
150×100×16	5	5	—
150×100×12	25	10	15
150×100×10	55	25	30
130×90×10	80	40	40
130×90×8	25	15	10
100×75×10	35	20	15
100×75×8	30	15	15

续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90×60×6	12	12	—
75×50×5	10	10	—
3. KP-70 钢轨	200	100	100
4. 工字钢			
第 55A 号	115	55	60
第 45A 号	110	55	55
第 36A 号	30	15	15
第 30A 号	30	15	15
第 24A 号	50	25	25
第 18A 号	100	50	50
5. 槽钢			
第 24A 号	55	30	25
第 20A 号	25	10	15
第 18A 号	25	15	10
第 16A 号	25	10	15
第 14A 号	20	10	10
第 12A 号	410	205	205
第 10 号	45	20	25
6. 厚度为 6 毫米的波纹铁板	120	60	60
7. 第 40 号宽边工字钢	225	110	115
8. 门窗带孔专用钢材(根据订货人提出的规格)			
35×20×4	6	6	—
35×45	18	18	—
55×25×4	13	13	—
90×65×5	22	22	—
75×25×12×2	4	4	—
20×15×1	1	1	—
50×6	1	1	—
9. 第 14CTOC 号工字钢	15	15	—

续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10. 第 36A 到 55ACT3 号工字钢	20	10	10
11. 第 14A 到 20ACT3 号槽钢	75	50	25
12. CTOC 号槽钢	5	5	—
13. 吊车钢轨(苏联国家标准 4121-48)	154	54	100
总计	2 726	1 401	1 325

№133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31项 关于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采纳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关于把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Дун Хундэ)、奥永德尔格尔(Оюндылгер)和纳拉诺夫(Наранов)遣返中国的提议。

2.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同中国政府商定把第1条里所指出的被拘留的中国公民移交给中国当局的事宜。

3.准许苏联内务部(库尔格洛夫同志)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把上述中国公民遣返中国。

4.责成苏联部长会议的负责遣返事务的全权代表(斯莫罗金诺夫同志)从苏联内务部接收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奥永德尔格尔和纳拉诺夫，并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当局。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0, л.138

№005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1年10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

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

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议，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

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议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1951年10月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36-137

№24837 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1951年10月15日)

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现在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团请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把如下文件的副本提供给他们：

1918年1月23日关于教会和国家相分离的法令。

苏联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4月3日关于合并教会的决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求把上述材料的副本转交给中国工会代表团领导人。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K.库兹涅佐夫

1951年10月15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723，л.150

№0050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18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1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10月18日5时30分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18日1时15分的电报已收到。

当前，在联络官会议上，我方应坚持促使迅速恢复会议活动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既不急于求成，也不拖延时间。

为了解决某些次要问题，我们应及时主动提出双方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

至于我们打算改变的方法和次要问题，我们不要立刻提出改变，同时，我们不应在头几次会议上或在报刊上表明我们的观点是绝对不可改变的，相反，我们应为进一步谈判准备条件，以便在进行谈判时不致太感突然，好像我们作了重大让步。

因此，你们打算指示新闻记者，让他们在报刊上声明，我方提出的关于缩小开城云山中立区和两个居民点之间沿途的中立地带的建议是重大让步，这是极为不妥的。

我们提出这一建议不是什么重大让步。

如果敌方不同意，我们愿意进一步缩小中立区。这难道不是在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做出的更大让步吗？因此，在报刊上发表这样的声明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实际上，会议转到板门店，双方负责实施警戒，把中立区扩大到云山，在敌方看来，这些都没有给它带来什么好处。

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敌机不能飞临云山上空，这对敌方是不利的。因此，从10月7日开始，敌方的所有报刊和社会舆论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让步，相反，都认为在板门店开会将会比在开城更加麻烦。

至于敌方，则仍然对利用联络官会议感兴趣，其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进行侦察。

我们也应谨慎行事，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这在今后的会议斗争中对我们有利。

但从敌方提出的4个方案来看，显然敌方尚不完全倾向拒绝恢复会议。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5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005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1951年10月2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将军 [26] 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1个由3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二、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1951年11—12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463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一)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二)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2个侦察机团和2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三)给中国派出1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1个歼击机航空师和2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四)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1个图2轰炸机航空师、1个拉9歼击机航空团和1个里2运输机团，但到1951年12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14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5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24日

第5281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1-143

№0050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2日18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1951年10月22日14时，敌方联络官送来乔伊就批准协议和取得相互谅解问题致南日信以及肯尼上校就复会日期问题给张春山上校的备忘

录。

敌方这么快就批准了联络官达成的协议，并赋予它正式文件形式，乃是因为害怕我方提出尚未解决事件问题。

敌方还提出，复会后立即开始讨论第2项议程。

敌方这样做可能也是为了使我们没有机会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

我们事先研究了乔伊的信，并认为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至在谈判中束缚我们。

尽管他们在信中宣布，联络军官拟定的协议是正式协议，但他们肯定并未批准该协议百分之百是正式的，而无须在会议上再给它补充什么。

尽管他们声称，复会的目的在于讨论第2项议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坚持也不可能坚持在复会后第一次会议上不可以讨论安全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不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而立即提出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不会表示反对讨论这一问题。

但是，考虑到他们高度的神经紧张，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事先考虑到尔后的过渡措施问题，在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讨论上述问题。

如果你们同意，那我们就复信批准联络官拟定的协议，并向敌方建议于1951年10月24日11时复会。

复信应于当天上午或于今年10月23日下午送交敌方。

请您就问题的实质予以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2日”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005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2日2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我10月22日18时的电报料您已收到。

一、我们再次研究了乔伊的信。尽管乔伊在这封信中没有对下述问题表示明确的意见：联络军官协定是否就是双方代表团协定，复会后是否可以不对不涉及到第2项议程的其他问题不进行讨论，但他可能诬指我方答复不够明确，因而建议首先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而不要立即恢复大会活动。

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解决我方可能提出的问题。

如果敌方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在小组委员会上，我们也应提出我们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

二、情况迫使双方代表建立一定的机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机构称之为联络军官联合机构，敌方是会爽快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络军官会议就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举行。

双方联络军官全都参加会议，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某种其他常设机构。

三、在小组委员会开始讨论第2项议程后，我们将坚决坚持让敌方首先提出折中建议。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己见而不提出新的建议，那我们就认为自己取得了主动权，以便探明敌方意图。

过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已得出结论，不妨在开始时提出第1方案，

即双方军队各自向三八线以北和以南后撤，在三八线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但是，考虑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所占地区和三八线以北敌方所占地区的巨大差别(我们占领面积约为2640平方公里，三八线以南和临津江以西的岛屿尚不包括在内，敌人当前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所占地区面积约5364平方公里)，估计敌方不会同意我们的建议。

我们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因此最好是我们立即提出第2方案，该方案包括金日成同志于今年8月16日提出的方案以及你们对这一方案的意见。

在阐述我们的方案时，我们可以指出，其中包括考虑当前战线做出的修改。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拖延时间，尔后我们就提出经过修改的规定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第三方案。

近来，敌人在临津江以东地区有所前进，因此应对第3方案做出修改。过1—2天我们将提出这一方案。

四、请您对上述问题做出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2日23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4-146

№0050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3日22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

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考虑到我军与敌军接触线近来发生的变化，我们决定对我方关于分界线建议的第2方案做出一些修改，以便向敌方表明我们的方案反映了当前的军事状况，从而促使谈判进行发生转折。

一、分界线始于巨津里居民点附近的东海岸，向西经单发岭、林塘里、长坪里(杨口西北10公里)、下甘岭、新望里(铁原西南15公里)、全谷(家南里东南5公里)、马智里(高浪浦里西南10公里)、板门店、交道里(开城以南12公里)、水流道里(开城西南9公里)、安昌、青丹(海州东南22公里)、新道(海州以南6公里)、盐尾岛(瓮津西南22公里)、曲掘里(瓮津西北19公里)到西海岸的阿山里(曲掘里以西10公里)。

二、双方军队将要撤出的地区就成为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内的非军事分界线将由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前在双方所占领的地区内另行划定。

至于交换地区和改变预定作为分界线的军队接触线，则从上流洞居民点开始，以该居民点中心为准，我方军队向西后撤到成源里—谷佳里—板门店地区，而敌军则向东后撤到高浪浦里—药潭—大龙里地区，即双方军队均应后撤约5公里，双方军队所撤出的地区则应归入缓冲地带。

三、当前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我军占领了2460平方公里的地区。根据您的方案，由于军队后撤。则我军所占地区只剩下1880平方公里。敌军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地区面积约为5364平方公里。根据您的方案，由于其军队后撤，则其所占地区面积只剩1944平方公里。

这样，双方剩下的占领区面积大体相等。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所经过的地带考虑到了敌方的“堪萨斯”防线地区内具有良好的地形，免得敌方借口该地区不适于防御而加以反对。

该方案已经过讨论并得到我方代表团赞同。

请您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3日”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1 , л.150 151

№005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10月24日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今年10月22日18时和23时以及今年10月23日22时的电报均已收到。

在南日同志对乔伊的答复中，我们在其前面加了两段文字，说明给谈判制造障碍的责任在敌方，同时也表明我们对缔结协定和取得互相谅解问题所持的态度，以保证在政治方面占优势。

敌方已承认，他们曾两次破坏中立区协议。

敌方什么花招都要过，因而它已在全世界人民舆论面前处于不利地位。

如能达成新的严格的协议并达到相互谅解，我们同意您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复会后，首先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军官联合机构以保证履行协议。

至于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已经发生的尚未解决的事件，则可以暂时不提它。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包括敌方破坏协议在内的过去所有的事件都已完全解决。因此我们应掌握必要时指控敌方可能用得着的武器。

至于分界线问题，则我方可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先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建议。

不管敌方同意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大会会议上讨论问题，我方都可主动建议双方不讨论旧方案，而提出双方可以探讨的分界线新方案。

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其原先提出的把分界线划在我防御纵深内的那个建议，而不同意双方提出新的双方可以讨论的关于分界线的建议，那我们就不要急于提出新的方案，而要推迟几天。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那我方就可提出根据你10月23日电报所示的当前战线划定分界线的经过修改的新方案。

分界线应以下述方式具体划定：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的敌人放弃1944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的我方放弃188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

尔后，双方军队均应从划定的界线各自后撤5公里，并应在这一地区建立缓冲地带。

在缓冲地带内的行政管理职责仍由双方各自单独执行。

分界线通过的具体地点可大体根据你今年10月23日电报所示确定。

根据这一方案同敌方进行斗争的结果，可能达到根据把分界线划在当前战线地区的建议稍加修改而划定分界线的目标。但是我们要与十分狡猾的敌人打交道。

希望复会后你们在谈判过程中仔细思量每一步，尔后经过周密研究后把你们的建议告诉我们。经我们同意可以在会上提出。

请告诉我们金日成同志在复会后对谈判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47-149

№005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5日1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0月25日11时，谈判会议开始。敌方代表团的南朝鲜代表白善焯由李亨根少将取代，其他代表仍然是原来的。

我方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建议。

敌方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并说当天下午给予答复。尔后，敌方询问我方对第2项议程有何方案。

我方建议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敌方要求休会20分钟。

休会以后，敌方表示同意建立我方提出的机构，也同意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会议，但敌方声明，必要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谈判代表会议。

会议于11时53分结束。

规定在14时开始小组委员会工作。敌方参加小组委员会的有霍奇斯和布尔科，我方有李相朝和解方。

李克农

10月25日13时”

毛泽东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56-157

№0050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 (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5日来电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小组委员会于1951年10月25日14时开始工作。双方一开始就互相建议提出分界线新方案。小组委员会开会约1小时，敌方代表建议休会15分钟。

休会之后，敌方代表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提出了新方案的发言稿。此外还出示了标有缓冲地带的大约相距4公里的南北界线的地图。南北界线的中间线基本上与当前战线重合。在有些地方，即在其东部和中央部分，该线处于战线偏南处，而在西边部分，则该线处于开城之北直到临津江出口处。

敌方代表多次重复说，这是他们的最终方案；同时他还说，该方案可以向全世界公布。

我们建议休会到1951年10月26日11时，但敌方要求1951年10月26日10时召开会议。

随后他声明，如果1951年10月26日我方不做出决定，则必须将此通知他们，若是这样，就无须召开会议。

最后决定，1951年10月26日11时，谈判继续进行。今天的会议于15时40分结束。

1951年10月25日18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54-155

№24838 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1951年10月26日)

机密

冯乃超，广东人，中共党员，掌握北京方言和广东方言。他是一名诗人，非常了解俄国经典作品和苏联作家的作品，特别喜欢普希金的作品。曾在延安、沈阳、北京和上海作过几年记者工作。去年，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过莫斯科。返回中国后他作过几场关于苏联的报告，写过几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他对苏联和苏联同志的态度是友好的。在重庆和北京，他同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同费德林同志和科瓦廖夫同志的关系都很好。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冯乃超就中山大学总的特点谈论了如下内容：

中山大学是中国最大和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它占据了广州郊区风景最好的地段。学校面积5000亩，其中有各系(医学系除外，该系在广州市)、宿舍、各体育场、两个大的池塘和菜园。

学校有五个系：文学系、法律系、地理系、工程建设系和农业系。医学系是独立的，事实上它同中山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该系不仅在中国著名，而且还名扬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

文学系有如下专业：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通史和俄语。全系共有206名学生，其中157名男生，49名女生。法律系有如下专业：法律、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会计，该系有363名学生，其中300名男生，63名女生。地理系有如下专业：天文学、高等数学、生物

学、化学和土壤学，该系318名学生，其中男生285人，33名女生。工程建设系有如下专业：土木工程、电子技术、机械和民用建设，该系有730名学生，其中686名男生，44名女生。农业系有12个专业：林业、化肥、灌溉设施、养蜂学等，该系有577名学生，其中431名男生，146名女生。

中山大学(不计医学系)共计有2197名学生，其中1862名男生，335名女生。一年级有808名学生，二年级798名学生，三年级348名学生，四年级243名学生。

各系的学习年限均为5年。

1951年录取了大约900名新生，其中部分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来自其他的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并享受各项保障。学校只向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征收学费(这些学生的父母是地主、商人和企业家)。

中山大学没有关于学生出身的准确的材料。一年级的615名大学生中有114名出身于工人，23人出身贫农，56人出身于中农成分，21人出身于富农，58人出身是地主，314人出身是小资产阶级，29人是海外华侨的子女。高年级班级大体上也是这种状况。该校没有少数民族学生。近来能够看到外来的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主要来自广州、澳门和新加坡)。

该校有大学生联合会，有新青年民主联盟的分会以及中苏友协的分会。新青年民主联盟成员有600多人，工会成员有250人，中苏协会会员500人。

中山大学有306名教授和教师。主要是国民党时期的旧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在广东省出生。北方人不超过10%。教授每月得到150万中国元，老教师、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每月的薪资为100万—150万中国元。普通教师每月80万—100万中国元。

大部分教授和教师都在美国学习过(达70%)，部分在英国(10%)、德国和法国学习过。冯乃超开诚布公地说，中国共产党任命其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是为了整顿学校的秩序，在教授、教师和学生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这一工作是重要的、及时的，因为前不久(大概在1951年3月之前)该校存在不良的气氛，广东人和北方人之间公然相互敌视。现在还

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少多了。广东人坚决反对用北京方言上课，即使现在仍然反对。因此大学在教学时仅用广东方言授课，用北京方言进行上课近来是毫无希望的。冯乃超说，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山大学存在，而且在广东省的其他主要大学也都存在。在广东省各学校，首先在各高校用北京方言进行教学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在几年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南军区教育司(中山大学直接隶属于该教育司并接受其财政拨款)的命令，中山大学在教授和教师中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教授和教师们对改造的接受非常缓慢。现在，该校还有一些教授非常反动，非常亲美。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教授较为反动，难以对他们进行改造。亲美的教授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学校管理层将不会解聘这些教授，而是要继续使用他们，并希望他们今后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改造。

该校党员人数不多。全校共26名中共党员，其中17名是大学生。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广东人。对大学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都很消极。政治学习不经常进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受到了具有反动情绪的人的影响。前不久，冯乃超被任命为该校党组织领导人。此外，该校还有2名民盟成员和1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没有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

教授、教师 and 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的运动：他们募集购买武器的资金、献血、报名参加军校、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但是参加支持土地改革的运动以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要消极一些。参加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及其开展工作的只是那些出身于工人和贫农的教师和大学生。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些教授和大学生(出身于地主家庭)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反对严惩反革命。近来可以发现，参加这三大政治运动的大学生和教师的数量在增加。

该校有500多名中苏友好的成员，但是对关于苏中友好和苏联的各种材料的传播这一工作做得不够。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去年还是今年，该校的教授、教师 and 大学生都没有学习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天才著作。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在广东省解放之后的2年内，中山大学培养出

了700多名专家，他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工作。因为对专家的需求在增长，因此，大学的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在谈话的最后，冯乃超请求我转达他们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的感谢，感谢他们给该校送来一些文献。他同时说，该校急需汉语和英语的科技文献和参考书。

苏联驻广东领事馆副领事

Н.Ф.马特科夫

1951年10月26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723, л.160-164

№005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9日1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10月28日1时30分电报已收到。

10月28日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以当前战线为依据，批评敌方提出的方案，按照该方案划定分界线，敌方只应放弃东海岸洪城地区的122平方公里以及金城以南地区的125平方公里，总共247平方公里，然而，我方则应在洪城地区各凸出部之间地段上和金城地区放弃190平方公里，在金化地区放弃562平方公里，在开城地区放弃520平方公里，总共1272平方公里。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我方比敌方多放弃1025平方公里。

敌方看到我方对当前战线表现出兴趣，因此想利用这一机会迫使我们放弃我方的方案。按照我们的方案，我方应放弃三八线以南西段地

区，而敌方则应放弃东段地区。

对此，敌方提出的理由是，在西海岸地区，我军和敌军之间没有接触线。因此敌方企图以欺骗手段迫使我们同意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因此，在今天的会议上不可能开始对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双方同意明天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并在2个方案的基础上对地区分歧意见进行协调。

在1—2天内可望确定共同承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已经暗示，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分歧意见不大。只要军队接触线一经确定，敌方抢去开城地区的要求就会毫无根据。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的抵制不可能迫使敌方在采纳我方方案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因此对我们来说，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在确定共同承认的接触线之后，我方可主动提议在修改后的方案的基础上休战，也就是说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李克农

1951年10月29日1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58-159

№005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1951年10月25日9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已收到，我同意您在电报中提出的谈判方针。

金日成

1951年10月25日9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1, л.160

№261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部 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1951年10月3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0月31日会议第84号记录

第214项 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决议。

接受华西列夫斯基、伊格纳季耶夫和缅希科夫同志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提议，并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该问题提出的方案。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62, д.47, л.11

№005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1951年10月29日5时的电报已收到。

1951年10月29日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仍然不愿一开始就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然后开始讨论双方提出的方案，而坚持首先根据方案做出决定，尔后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声称，确定双方公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并不困难。

在当天下午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慑于我方压力而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其结果是，问题部分地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敌方对此并不是认真的。可能明天的会议将是今天会议的重演，即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除此之外，在同意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时，敌方同时声称，谈判会议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恢复。

现在，乔伊和唐纳已回到云山。可能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敌方为建议开始谈判会议而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今年10月30日早晨的会议上敌方仍不同意讨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那么我认为，不要等到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我们就提出经过一定程度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

如果在1951年10月30日下午，我们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不能准备好，那么提出这一方案的时间不得迟于今年10月31日。

关于改变不大的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我们认为：

一、该方案必须是能为敌方所接受，亦即最好是我们提出来的方案是最终方案。

二、撤走军队后双方所放弃的地区的面积应当大体相等。显然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公正的。

三、缓冲地带的面积是大是小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确定大面积缓冲地带有利，因为敌军的前线南移，铁原—金化地区成为非军事区，从而消除了该地区对我方阵地的威胁。但是我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按同样长的距离后撤，因此，我方也就放弃了我方军队控制的一些有利阵地，例如，五圣山(金化以北)和其他制高点。

大面积缓冲地带的消极的一面是，停战后在广大地区组建非军事管理机构和进行监督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同意敌方建议的确定缓冲地带宽度为4公里。

四、在地区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后在临津江以西地区内保留阵地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因为从军事观点看该地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五、在军事方面，金化铁原地区划入缓冲地带是有利的。但是，敌方大概会坚决反对这一点。而且我们没有相应的地区来补偿敌方放弃的地区。

因此，只剩下一条：在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时，坚决坚持将金化(这可能是可以实现的)和铁原(这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划入缓冲地带或置于缓冲地带的边缘地带。

六、至于东海岸的洪城地区和巨津里地区前线的凸出部以及凸出部之间的地区，我们只好基本同意敌方的方案。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拟定了在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初步方案(其中对战线作了一些改变)：

一、金化以东地区缓冲地带的界线基本上与1951年10月25日敌方方案所定界线重合。金化以西地区双方军队应从当前战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应当从东到西由大井里经柳松洞、姑味城里以南1公里地区、姑味城里西南4公里高地、海参岱、朴达以北1公里地区、下青松(文登里东北5公里)、那衣里、下溪浦西南1公里居民点、旧

岱里(开城东南18公里)西南1.5公里居民点、寺洞(开城东南14公里)以南1公里居民点、新木洞、金化东北1.5公里无名高地、榆谷里、亭渊里、地域山(铁原东北9公里)、下马山(铁原西北5公里)以南1公里居民点、德山西北1.5公里居民点、葛谷、赤巨里(朔宁东南10.5公里)、桂堂村、葛岷里西北1.5公里居民点、黑松、高浪浦里西北2公里居民点、山后洞西北2公里居民点、后川洞(板门店以东4.5公里)、高岭里东南1公里居民点、智育台、水松以南1公里居民点到洞里(云山西南10公里)。

北边界线在离南边界线4公里处与之平行延伸到最后一点。该线从东到西由水津里(位于东海岸)东南1公里居民点经西希里、1098高地、黑渊里、御牛里、青松里、佳音洞、鱼隐山、边岩洞、旧岱里以北1公里居民点、高洞里东北1公里居民点、间榛岷、上九井、上甘岭、斗浦里西北1公里居民点、塔洞、牧馆闹洞以东2公里居民点、长松洞西北1公里居民点、新开岭、高里店东南1公里居民点、新开岭、溪洞山里东南2公里居民点、清溪山里、鸡荣里西南1.5公里居民点、上甘岭西北1.5公里无名高地、班固台、高津里、高柚里以南2公里居民点、讷水里、山西洞、河顺山里、基成东南2公里居民点、大龙里以北1公里居民点到梨洞西南1公里居民点。

二、根据双方军队当前的实际接触线，洪城以南地区的敌人由于其军队后撤到南边界线而放弃101平方公里，在金城以南地区放弃193平方公里，总共放弃294平方公里。在姑味城里地区——下溪浦西南1.5公里居民点，由于我方军队撤到北边界线，我们将放弃275平方公里。双方军队放弃的地区面积相差不大，而敌人所要撤出的地区是前线的各个凸出部。

三、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基本上是根据1951年10月27日23时志愿军司令部电报所提供的资料确定的。

我认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还会有些争论，但改变不会很大。

如果在我们提出这一方案之后，敌方仍然坚持以洪城以南地区的凸出部和金城、开城地区交换，那我们就直截了当提出在当前双方军队接触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不要求敌方从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内的凸出部地区撤走军队，以避免敌方提出不公正的要求。

请您考虑上述意见并提出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30日2时”

毛泽东

1951年11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2 , л.3-7

№005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0月31日1时30分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30日2时和1951年10月30日21时20分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同意你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在该电报中，你建议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我方主动宣布在已做出某些改变的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如果敌方反对这一建议，并坚持他们于1951年10月25日提出的建议，那么我方应当立即或在当日下午的会议上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发表公报和记者报道，以揭露敌方不愿意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和划定军事分界线，以及敌方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我方的深远后方的企图，以使之成为我们手中的一种武器，从而有利于我们在1951年11月1日或2日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并迫使敌方同意我们的这一方案。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在11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从而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于具体方案。我同意你们提出的6点建议以及南边和北边界线。如果敌方坚持以开城地区换取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则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直接提出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确定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并迫使敌方接受这一建议，而不要就地区交换问题继续进行争论。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1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1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2

№0051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1年11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一、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内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须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需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

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二、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机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机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歼击机航空团的顾问，共计19人。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报：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89

№24840 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1951年11月13日)

致苏联黑色金属部

Н.И.纳雷什金部长：

我非常荣幸地请求您在解决如下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些问题是关于

中国的专家到贵部工厂进行实习的问题。

1.专家苏伟明(Су Веймин)、陈国伟(Чэнь Говей)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实习工作之后，必须转到摇摆式平炉工厂进行实习。

专家杜金龙(Ту Цзеньлунь)、牛英德(Ню Индэ)、胡万光(Ху Вэньгань)在一年半后应该有机会转到其他的金属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铸造的钢种应有别于吉尔吉斯斯坦工厂铸造的钢种。

2.专家黄庆发(Хуан Цзиньфа)在半年之后必须转到另一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无缝管道轧钢的设备。而专家黄丹斌(Хуан Даньпин)在半年以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成块轧钢片的设备。

3.冯伯仲(Фун Боджуин)同志在半年后应该转而至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有生产上等轧钢的设备。

4.杨伟(Ян Вей)同志、江洋清(Цзен Янцин)同志和赵万明(Чжао Вэньминь)同志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学习半年之后，其中一人应该转到一些大型金属联合加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同志在回国后将要担任金属联合加工厂的厂长。

5.根据同您和厂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五名焦炭化工专家在一年之后应该转到扎波罗热炼钢厂工作。

6.王迈(Ван Май)同志和程庆(Чэн Чин)同志(金属物理化学分析专家)在半年之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在转入的工厂他们应该有机会了解用X射线对金属进行分析。

7.请您帮助尽快开设如下专业的夜校学习班：金属生产——7人，学习半年，铸铁生产——6人，学习2年，轧钢——5人，学习2年。用于开设学习班相关的开支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

1951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

РГАЭ，ф.8875，оп.45，д.2，л.3 4

№0051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1—2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3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

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1950年预算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第5631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6-19

№00520 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1951年11月19日)

发自北京 [\[27\]](#)

北京时间11月19日18时受到周恩来接见。他请求向菲利波夫同志转告，毛泽东要求对他的就朝鲜谈判问题给菲利波夫的电报作出答复。这个电报是11月14日经克拉索夫斯基转交的。

周恩来给我看了电报并补充说，在等待菲利波夫同志答复期间，中方已两次推迟了同美方在朝鲜的代表的会晤。

1951年11月19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22

№005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1951年11月1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1—2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议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28, л.42-45

№200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1951年11月19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1月19日会议第84号记录

1951年11月19日的决议

第422项 关于致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第1352号电报。

批准附件中对拉祖瓦耶夫同志的指示。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绝密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拉祖瓦耶夫：

从你的第1352号电报中，我们并不知晓与下述呼吁问题有关的一切情况以及是谁主动挑起了下述呼吁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呼吁，要求加快解决朝鲜问题的速度。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朋友如何看待这件事，因为你在电报中没有传递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正如你的电报中提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发出呼吁：关于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沿前线撤走军队、建立两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以及关于追究那些在朝鲜拖延战争的人的罪责。在目前局势下，即在美国人敲诈勒索的形势下，这样做可能被视为中朝方面软弱的一个迹象，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因此，在没有(朝鲜)呼吁的文本、不知道中国同志的看法，且不知道引导朝鲜朋友的动机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需要劝告朝鲜朋友，在解释清楚前面提及的诸问题之前，取消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解决的呼吁。

我们等待你发回更为详细的报告。

确认收到。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19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同志

АПРФ , ф.3 , оп.65 , д.829 , л.44-45

№02544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1951年11月20日)

Г.М.马林科夫：

现送上给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电报草案。请阅示。

A.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0日

附件：

葛罗米柯给拉祖瓦耶夫的电报稿

1951年11月20日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注意您在朝鲜朋友就加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给联合国的呼吁书一事中表现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

您只是在11月18日(您的1352号电报)报告说朝鲜朋友打算在给联大和安理会的呼吁书中提出以下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请军队撤离前线并建立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对挑起朝鲜战争的罪犯追究责任。同时您询问，这种呼吁书是否会同维辛斯基同志的发言相矛盾。

因为我们对朝鲜朋友的提出了上述要求的呼吁书以及是谁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等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要求您做出解释(我们的1059号电报)。

还没等到对您的电报(即陈述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的电报)做出答复，您又报告我们(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说当天即11月19日将全文广播朴宪永的声明。此外，您在收到我们的询问电报(第1059号)后，就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仅仅报告说，是您主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并再次询问，维辛斯基同志关于从三八线撤军的建议同在开城商定的关于建立分界线的各项议程有没有分歧。关于呼吁书，您也只是报告说，它将在11月19日发表。

可见，无论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中，还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5号电报中，您只是向我们报告朝鲜朋友将要发表自己的呼吁书，尽管在此期间您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指示，并且也没能得到对您的询问的答复。结果，朝鲜朋友在没有同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呼吁书。

可见，您的行为极其轻率。您更大的错误是，您甚至没有努力向朝鲜朋友搞清楚，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的呼吁书这一问题，他们是否同中国朋友协商过。只是在我们直接要求您弄清这一点，并且是在朝鲜朋友发表了呼吁书之后，您才这样去做的。

请今后注意。

№00523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1951年11月21日)

优先拍发

特档

北朝鲜

拉祖瓦耶夫同志：

11月20日向罗申转达了菲利波夫同志的下述指示：

“向毛泽东并通过拉祖瓦耶夫向金日成解释清楚，维辛斯基关于美国军队立即撤离三八线的要求，同中朝同志所声明的关于军队实际接触线的当前立场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为了抗议美国拒绝把自己军队撤离三八线的非正义立场，维辛斯基不能有其他的表示。维辛斯基的这一立场有利于中朝同志，因为这样做一方面表示抗议美国人的贪婪，另一方面展示出为了达到和平而肯做出重大让步的中朝同志的忍让和热爱和平的精神。”

由于罗申同志同您没有联系，因此无法执行菲利波夫指示中通过您向金日成作解释的指令，故由外交部直接向您发出这一指令。

请确认已收到。

立即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1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8, л.44-45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67-68

№0052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关于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会议进程的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于11时开始。我方代表首先发言并提出了我们的方案(附发言全文 [\[28\]](#))。

敌方声称，我们所提方案与我们上次提出的方案互相矛盾，因此不能接受。

敌方之所以反对我方方案，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一、敌方认为，我方方案第1条所述‘确立规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的原则’，其中‘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概念不太明确。

敌方认为，必须指出接触线系指何时的接触线，也就是说，当前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应确定在30天的时限内作为分界线。应当规定30天以后以签署协议那天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因此没有必要加上‘实际’和‘修改’之类的词。

二、还有，在我方方案的第1项中说：‘双方军队各自后撤分界线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敌方认为，只要规定建立缓冲地带的原则在于确定以分界线向南和向北在一定距离上经过的两条平行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因此，不需要加入关于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之类的词句。如果有必要加入这一句，就必须规定后撤时间。

三、关于我方方案第2项所述‘确定以双方同意的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则敌方认为，目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应当称为‘临时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四、关于在我方方案第3项中所述‘敌对行为将继续进行’的词句，敌方一开始就提出把它作为辅助词句，并将其置于建议的末尾，随后敌方又建议将此句单列一段。

我方对敌方提出的问题作了相应的答复，并阐明了我方的观点。

在今天的会议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将于明天11时继续进行。

李克农

11月21日17时”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32-33

№00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方代表1951年11月21日发言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1951年11月17日的方案和你们对它的解释。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所提方案的形式不符合正式协议的形式。同时我们对某些具体规定也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我们认为，根据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的正式形式应当由3部分组成。首先，我们应当解决关于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原则问题。在讨论其他各项议程时不应当改变已确定的原则。

其次，当前我们应当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最后，我们应当解决关于在最终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可能改变的问题。只有以这种形式就第2项议程在会议上提出的协议才是完善的。

二、尽快达成全面停战协议，是我们从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一贯要求，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相信，如果共同努力，经过30天的讨论，在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能够达成全面停战协议。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就可由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确定以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新的分界线，尔后应由双方代表团就此新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也认为，对第2项议程应一次达成协议，没有必要过了30天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重新讨论与该项议程有关的问题。

我们建议：

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那就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关于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原则的基础上给已经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做出一些改变，即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

三、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双方代表就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的第1条中再次强调对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的敌对行为互相谅解。实际上我们之间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从未达成立即停火协议。因此，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互相谅解问题，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单列一条。

因此，我们建议将互相谅解问题列入关于改变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协议中作为辅助词句。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正式向小组委员会建议通过下述协议方案：

‘在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为一方以及以联合国军代表为另一方的小组委员会中，就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主要条件的缓冲地带的第二项议程达成以下协议：

一、制定原则：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双方军队由该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二、双方代表小组委员会应在该协议第1条的基础上立即解决关于目前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以便双方同意确定以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同时确定以离分界线两边各2公里的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北边界线和南边界线。

三、敌对行动可能一直继续到签署停战协议之时。如果在双方代表会议批准该协议以及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规定之后，在30天之内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出现何种改变，已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30天已过尚未就全部议事日程达成协议，则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而对之做出某些改变。’

我们相信，上述协议方案与你方1951年11月17日所提方案原则上没有区别。

我们已正式建议小组委员会立即通过上述协议方案。

我们同意你方意见，考虑到双方同意任何一种方案，双方均应选派参谋来调整当前的接触线，以便事先确定双方代表可能同意的当前军队接触线的具体位置。参谋不能确定接触线的地方，则应在小组委员会上确定该地的接触线。

在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同意军队实际接触线并据以确定缓冲地带以后，则可将小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转呈代表团会议批准。与此同时可向代表团会议建议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34-37

№11419 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1951年11月23日)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敬并谨作如下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0年2月2日照会，苏联外交部已向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出指示：向阿富汗外交部递交照会，请他们担负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及财产的任务。

根据这一指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5月10日向阿富汗外

交部递交了一份有关的照会。1950年10月12日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口头声明，阿富汗政府同意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1950年5月10日照会中所阐述的苏联政府的建议。

中国驻阿富汗使团的财产由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接管保护，但是由于并非苏联驻阿富汗使馆的原因，上述财产接收书于1951年9月5日才签字。

在致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6月19日第1534/1117号和1951年第2385/1744号照会中，阿富汗外交部请求向阿富汗国家银行送去57914阿富汗尼38普尔的款项。照会指出，这笔款包括前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1950年2月1日至1951年1月13日期间的房租费和水电费开支。

苏联外交部为此在发出阿富汗外交部上述照会副本和前中国驻喀布尔使团财产接收书时，请求将上述情况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51年11月23日

于莫斯科

已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莫斯科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03—2104页

№202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 (1951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您发自今年10月24日的电报我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所以给您的回复迟了。

1.我们认为保护北朝鲜交通线应该主要借助歼击机来实现，我们坚决建议迅速在南市(Нанси)和大成(Тайсен)地区建设机场，以使中国空军能尽快在那里着陆。

必须用高射炮掩护最主要的大工程，现在位于安东新义州地区掩护机场枢纽和鸭绿江大桥的两个苏联炮兵师，将实现对朝鲜西北部分南市与大成地区机场建设的掩护。

由于朝鲜形势，这种高射炮掩护是必需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指挥官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射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给一个师分配180门高射炮和一些高射机枪。12月我们将按说好的条件(补充的军事贷款)向你们提供120门85毫米口径高射炮。

2.至于从苏联向中国派遣3个装备米格9的喷气式歼击机的航空师及飞行员以及3个空军技术营，您的这点请求我们无法满足，因为米格9我们已经不生产了，并且我们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有必要继续派遣我军飞行员训练驾驶米格9的中国飞行员，那么可以利用驻扎在广东、殒山、公主岭的3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的教官进行为期3个月的指导，在完成所有训练任务后，这些部队要在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返回苏联。

而关于一个强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训练任务，我方认为，由驻中国第5、第11强击机航空师的军事顾问就能顺利完成。

关于两个中国侦察机航空团的训练，我们将从驻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的军队中的侦察机团中拨派教官完成。

我们将给你们图2型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型歼击机航空团派出19名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的决定，那么我们将下达相关指示。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指示：

您一定要注意，我们临时留下来训练米格9飞行员的空军驾驶员务必按时回国。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24日

密码电报1951年11月14日第6648号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0-11

№0052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1951年11月27日)

什捷缅科同志：

现将金日成给菲利波夫同志的密码电报呈上。

拉祖瓦耶夫

1951年11月27日

第4448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供应朝鲜人民军3个步兵师武器的问题我已问过毛泽东同志，并接到他的回答，内容如下：

“由于朝鲜战场需要补充供应弹药和装备，按计划今年年底应发运出10个步兵师的武器，而苏联只能给我们运出4个师的武器。

明年4月我们将收到余下6个师的武器。已收到的4个步兵师的武器已于9月份转送到我军各部队。

如果在今年内能达成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应返回中国进行改编。

所以我认为，把我们部队留下的苏式武器转交给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是合理的。而给另一个师的武器则要到明年4月份我们得到苏联又一批武器时再转交。

请告知我您的意见。”

考虑到总的形势，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致真挚的敬意！

金日成

1951年11月27日于平壤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8, л.51-52

№05295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1951年12月1日)

致斯大林同志：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建立了隶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该基金会1951年对以下

共产党给予了财政援助：

芬兰共产党，87.4万美元

法国共产党，60万美元

意大利共产党，50万美元

意大利社会党，20万美元

瑞士共产党，2万美元

卢森堡共产党，2万美元

以色列共产党，4.5万美元

丹麦共产党，7.5万美元

希腊共产党，5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2万美元

基金会1951年的153万美元及1950年结余的81.5万美元已全部用完。

这样，附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1951年援助各共产党的数额总共为234.5万美元。

在1951年国际基金会的款额用完后，除去基金会的款额外，从联共(布)资金中援助了：

芬兰共产党，60万美元

日本共产党，10万美元

印度共产党，10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5万美元

奥地利共产党，1400万先令

目前，各国共产党正请求给予财政援助。

参加基金会的各党向援助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属下的左翼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理事会缴纳1952年度的基金是合适的。

把1952年的联合会基金数额确定为250万美元是合适的。其中包括：

联共(布)——85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1/3)

中国共产党——62.5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1/4)

波兰统一工人党——22.5万美元

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每个会员党20万美元。

在与各国共产党谈判充实基金的问题时的合理做法是，向参加基金会的各党通报基金消费的情况，并确认由联共(布)、罗马尼亚工人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1952年基金会理事会。

派遣波诺马廖夫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去同各国共产党谈判这个问题。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和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29]

请审阅。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B.格里戈良

1951年12月1日

ЦХСД, ф.89, оп.38, д.26, л.2-5

№0529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1951年1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日会议第84号记录

绝密

第П84/614号

1951年12月

致格里戈良同志

1951年12月1日决议

第614项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问题。

一、会议认为，把1952年隶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国际工会基金会用于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基金确定为250万美元是适当的。

二、会议决定，由联共(布)向隶属于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支付85万美元。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拨给格里戈良同志85万美元用于特殊目的。

三、会议认为，基金会董事会应向参加基金会各国共产党通报基金会开支情况，并向各党提出交纳1952年应付的会费问题，合理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交纳62.5万美元，波兰统一工人党应交纳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应交纳20万美元。

四、会议决定，委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驻基金会的代表B.B.库兹涅佐夫同志提出关于追加基金会理事会款项的有关建议。

五、会议认为，由联共(布)中央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代表组成1952年的基金会理事会是合适的。

批准库兹涅佐夫同志任联共(布)中央驻基金理事会的代表。

六、会议决定，派波诺马廖夫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出差与各共产党谈判关于1952年的基金问题。

七、会议批准了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文。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联共(布)中央给毛泽东的电报稿

致罗申：

请拜访毛泽东同志，按照上级的委托通知他以下情况：

“如您所知，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下属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的资金目前已用完。

现在必须建立1952年的基金。

鉴于各国共产党呼吁增加援助基金会的资金，建议建立基金会数额为250万美元，并按下列数额捐助基金会：联共(布)捐助85万美元(基金会的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捐助62.5万美元(基金会的四分之一)；波兰统一工人党捐助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捐助20万美元。

请告知您对该问题的意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确认收到电文后，电告执行情况。答复的报告要简短，无须详细叙述。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05—2106页

№00527 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1951年12月9日)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根据您的查询向您通报，在整个战斗中，我在朝鲜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期间，共击落敌机569架。

我歼击机航空兵击落510架，其中：

B-29，40架

B-26，1架

B-45，2架

F-94，8架

F-84，132架

F-86，172架

F-80 , 101架

F-51 , 22架

流星式-4 , 32架

我高射炮兵击落59架

我们损失63架米格-15和米格-15B飞机以及30名飞行员。高射炮部队亡29人，伤53人。

什捷缅科

1951年12月9日

АПРФ , ф.3 , оп.65 , д.829 , л.69-70

№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 (1951年12月12日)

10月14日，在广州解放2周年之后，隆重举办了华南(包括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商品展览会。该展览会同时也是一个展销会，会上签署了大量的商品合同，国营和私营企业、来自华南、华中和全国各地的以及来自香港、澳门和南海各国的私有商人进行了贸易活动。展销会的这些特点说明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地区意义。

展览会的规模和组织。展销会预计进行3个月，但是，地方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该展销会的时间可能会被延长。按照展销会组织者的意图，该展销会将展示两年来人民政权在华南地区各个领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果。为了举办展销会划拨了以前广东最繁华地段的两条商业街，这两条街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美国的空军轰炸得一干二净。4月份通过了举办展销会的决定，并在当月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展销会开办之前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中南军区对举办展销会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后来，广东人民政府和广州市就华南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生产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地商品生产的成果和前景，并且特别注意到了食品的生产问题。从广州向南方各地区派遣了特别成立的小组，对当地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状况以及对商品发展和开展贸易的机遇进行了研究。

以汉口会议关于中南商品的生产以及在当地组织商贸展览会的材料为基础(该会议确定了华南商品生产的具体任务和政策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了在华南举办展销会的计划。

展销会的组织工作从6月初开始。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周围的各中心城市都举行了会议，会上确定了参展企业和地区的规模和具体条件。华南各地区都开始准备展品，其中包括动植物展品：植物、果实、动物、家禽等。

参展展品共计68012件，其中包括568个大小模型和232幅图片和图表。60594件展品是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样品。展品被置于10个特别建造的位于展区的大型橱窗中。这些橱窗如下：中国各省、各地区商品贸易和商品流通联系橱窗、交易橱窗、林产品橱窗、果蔬橱窗、饮品橱窗、海产品橱窗。除了这些橱窗，展览区还建造了接待厅，以便展示华南文化和在艺术领域的发展成就以及各种小摊、小卖部和亭子。还建造有大型的餐厅。其中建造的一个大厅设有1400个座位，该厅曾被用于广州市各界代表召开的一场隆重的会议，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4周年。

展览设施以及开展的为期3个半月的展览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性，显示了具有组织、建设和大规模行动的巨大能力。在这段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清理被摧毁的房屋、建筑、寺庙残留的废墟，腾出地方，规划地块和便道，栽植许多树木，敷设水管，进行了大量的建设以及把展品放置到各个展位。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人超过300名。在这些工作中，广州市各单位派出了1000多人向政府提供了帮助。有100多名各领域的专家对这些工作进行了领导。共计有数百名艺术家、设计师、书法家、雕刻家、青年建筑工人和其他的艺术工作者参与了展览会的艺术和设计工作。超过300多名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参与了对展品的鉴定、分类和安置的工作。在展览会举办之前为开展工作培训了将近1000名的导游和解说人员，向展览会的游客进行解说，并提供咨询。

展览会的展厅有三个单独的展出展品的场所，同时在这些场所进行贸易活动。并且为举办商业会谈和签署合同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地方总是有许多人。早在展览会开办之前就已经签署了74份贸易合同。

根据展览会举办者的设想，该展览会的贸易额总计应为1万亿元。

可以通过如下比较来对这一庞大的贸易规模进行设想。1951年夏，整个广州的居民超过150万人，有188个各类经济部门，31851个贸易单位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达1.024万亿元。由此可知，展览会的贸易活动不仅仅对于华南地区，而且对于整个中国都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展销会的实际贸易额事实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广州市所有的国营和私营的贸易公司、工业企业的资本总和。从1951年11月18日展览会开展以来到12月14日，贸易额已经达到1.1868万亿元(3.3多万亿港币)，展览会还有两天，在12月5日和6日内贸易额增加了5亿元。也就是说，在举办展览会的预定时间刚过一半的时候，其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了预计贸易总额的18%。

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这场展览会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看出华南的经济能力，当局在其制定的关于举办展览会的初步计划中对华南经济的增长做出的评价是非常谨慎的。

展览会引起了广东和其他城市居民以及南方各地农民的巨大兴趣。访问展览会的人数每天都在3万—6万人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广州，都是为了特地了解展览会。为此在沙面的江岸上特地开设了一个码头，开设了一些旅馆和饭店。举办展览会在秋季的几个月都成了广州市生活的中心。

展览会是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的。有来自中国各中心城市，来自华南各市和各地区以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4000多名工商界代表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到广州的客人超过1500人，其中有200多人来自香港，他们是英帝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的28个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报纸也对苏联客人，其中包括对苏联贸易代表处广州分部的代表普辛同志参与展览会开幕式的活动给予了报道。

举办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叶剑英简短的话语来说，举办这场华南商品展览会的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全面研究、全面宣传和全面联系”。

展览会应该使人们熟悉华南的经济能力，应当为研究当地生产状况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改善状况提供土壤。展览会应该是对新制度在经济方面和经济政策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进行宣传的场所，将会明确地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是无效的。

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其成为一个市场，今后提高华南地区的贸易工作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大华南地区同中国其他地区、苏联、新民主国家、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

根据半官方的报纸《新商晚报》在10月14日的社论中表达的中国贸易界和工业界的看法，举办展销会的主要任务是：1.恢复和加强贸易联系，处理好旧的贸易联系并增加新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在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的相互关系方面；2.稳定和调整市场价格，加强商人之间及其与客户的相互信任，为商业关系的正常化奠定基础，消除投机的可能和突发事件；3.使商业活动面向农村，吸引农民对商业的兴趣，为工业产品向农民进行销售奠定良好的基础；4.确保能够全面交换经验，创造条件改善业务领导，使其成为文化、经济活动和企业家的学校，使经济发展较为盈利，使贸易和生产计划更加现实；5.使展销会成为各经济组织、机构和个人为其利益，首先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发展华南工业和贸易领域进行合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开端。

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展销会应该表现出：华南各阶层居民的自觉性和爱国主义情绪迅速得到了提高，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承认工农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盟，广泛推行能够促进国营和私有工业和贸易业得到发展的政策，使城市和农村的合作都能获利，处理好内外市场的相互联系。展销会显示，所有这些都是今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所必需的。

举办展览会的一些主要想法还在于，显示正在进行的以满足内需和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为目的的生产改革，而在解放前华南地区的经济则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展销会的材料包含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利用华南的原料和资源，其中包括利用丰富的矿产来发展一些部门是有利的。

在显示华南农业落后的同时，还可以举出一些明显的事例和证据，证明正在消除农业的落后，努力加强农业生产，正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发生的总转变一样。把消费性的城市转变为生产性的城市是另一个目的，这将是推动民主的中国的城市今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展览会的宣传意义具有内外两个方面。它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回击，并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揭露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展览会以自己深思熟虑的、合理而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这些目的和任务。在举办展览会之前，政府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统计工作、调查工作和组织工作。这在展览会上都有许多表现，许多数据和事实都证明了曾做了许多特别的工作。生产部门和展览品都被提供了相应的展位，而提供的展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些部门的规模及其在地区和全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在展览会的材料中有如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据，比如：1950年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份额占9.7%，城市手工作坊份额占9.5%，矿山开采工业的份额占1.7%，农产品(大米及其他的粮食以及饮品)的生产份额占据34.2%，各地的特产——蔗糖、黄麻、水果和蔬菜、林产品、橡胶产品、松脂等占11.5%的份额，农民手工作坊生产占28.9%的份额，海产品占4.5%份额。

在展销会委员会的宣传单上，写有关于叶剑英就举办展览会的目的的简单的语句，该目的同1951年的财经任务相关(调整资本和商品流通，处理好城市同农村的经济联系，增加当地产品的销售)，此外，他还强调了举办展览会的展示意义和动员意义：华南属于温带气候，在任何季节各种各样的植物都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华南地区水分充足，沿海位于暖流。因此该地区有许多机会增加自然赋予的财富，而且这种机会是无尽的。打破华南对帝国主义市场和生产的依赖是取得经济建设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表现。

该展览会给农民带来什么呢？在广东省和广西省，在有680万农民的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作坊生产明显增长了，这些产品是用于销售的。农民们需要的所有工业品和城市用品都得到了增长。举办展览会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展览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呢？工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质量高的、便宜的商品。处理好同农村的贸易交换，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商品将会创造一些条件，更好地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

展览会将给工业界和贸易界带来什么呢？企业家和商人们希望扩大自己的业务，加强同国营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的合作，增加商品的销售，发展市场关系。展览会的举办有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

因此，展销会的宣传单和展览会委员会都受到了欢迎。

橱窗观察。华南贸易联系以及同国内各地区的交流橱窗设有按地区分出的一些单独的展位，展览着从上述地区运送来的以及在广东和华南其他地区销售的商品。商品比较丰富的展位是华东展位，该展位展出了上海的一些商品。东北展位较差，根据该展位的展品很难判断该工业区的经济及其意义。

对这些展位的展品可以作如下评价。华东展位展出的是纺织工业品以及能够表现旧中国工业生产的其他部门的产品。华北盛产小麦、皮革、毛料。东北是新的重工业区。西北是肉制品原料区、农业区和可以狩猎的地区。西南盛产的药材较为出名。关于上述地区的其他方面的展品在展览会中展出得很少，或者完全就没有展出，这说明，华南地区同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很弱，华南地区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地区的经济能力。

展品的橱窗中同时也进行接待工作，在其中进行各种会谈、谈话和招待活动。这里不仅仅进行谈判、签署商业合同，而且人们也到这里休息，并把自己的印象和愿望写进访客意见簿里。

在工业展品橱窗集中了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加工工业、采矿工业领域的展品、模型和图表。主要有9个领域的代表：纺织、食糖、纸、橡胶、电子设备、皮革、化工、机械制造、采矿。

用各种各样的黄麻编制的粗绳，其中包括编织的袋子和包，这样的展品展出得较为充分，这些产品大量从华南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

糖厂的巨大模型充分展现了从甘蔗生产蔗糖的工艺。经常有成群的大学生、工人和带着笔记本的专家围着这一模型参观。展出的图表展现了当地的甘蔗原料基地蔗糖生产的发展前景。在甘蔗的种植面积方面广东省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该地区甘蔗的生长期是1年，而在中国的其他省份，甘蔗的生长期是1.5—2年。现在蔗糖由家庭手工生产。

在纸业生产的展位展示了新闻纸的样品以及其他的纸张。在广东省有两个造纸厂。一个是广东造纸厂，在停工18年之后于1951年4月投产。该厂只生产新闻纸。广东省生产的主要的纸浆来自许多小的作坊。该厂生产的纸的质量不高，主要是各种包装纸、画纸、硬纸板等。由于对纸的需求不断增长，该厂的生产也在不断增长。

橡胶产品的生产发展非常快。1950年7月广东共计只有50多个橡胶

加工企业并生产橡胶产品，而到1951年初，橡胶加工企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18个。橡胶加工企业最为重要的产品是橡胶底鞋。1950年7月生产了118700双橡胶底鞋，而在12月生产了786800双橡胶底鞋。还生产了大量的橡胶轮胎以及用于其他设备的橡胶产品。

在电子设备领域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带罩的电灯、电灯电池、汽车电瓶以及各种蓄电池。

皮革制品展位的产品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广东省的皮革，特别是广州的皮革是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首先作为原料的毛皮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然后进行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再在中国销售。现在中国市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依赖完全消除了。由于拥有大量的大型牲畜和猪，华南具有继续发展皮革工业的广阔前景。

机械制造是一个新的部门。广州没有什么大的机械制造厂。但是有一些小的企业，它们在协作的基础上生产出一些复杂的机械，比如缝纫机、小功率的摩托车、照相机、各种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

采矿业展位的许多展品表明，华南在稀有金属的开采方面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展出的样品有：钨矿、锡矿、锑矿、钼矿、铜矿、锌矿、硫化铁矿、硫矿以及其他的矿藏。这些展品通常是大量的矿石岩块，还有海南岛的铁矿样品以及其他的矿藏样品。广东省和广西省的主要矿藏是钨矿、锡矿、锑矿、锰矿和硫矿。

矿山模型引起了展览会参观者的注意，这些矿山的设计考虑到了使用电力的新方法用来开发矿藏，考虑到了发展电力来利用水资源，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山区水资源都很丰富。

橡胶产品展位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该展位展出了活灵活现的橡胶植物，展示了生产橡胶产品的流程，然后展现了在橡胶产品半成品之前的加工。

在其他的展品中较为特别的是广州水泥厂的部分模型。

在手工作坊产品橱窗展出的是制作丝袜的丝绸(供热带国家使用)、瓷器和陶器以及各种各样的苇席和用草编织的编织品——草席、篮子、包、帽子，等等。亚麻制品和绣花制品——桌布、刺绣(不同于汕头地区的刺绣)、伞、折扇、装饰品、用象骨制成的制品，在广州享有盛名。对

于象骨雕刻品，在南方的中国人是非常引以为荣的。除了做工精细之外，它们还表现出了如下特点：在半粒米大小的象骨上可以刻上13个文字，在细如发丝的骨头上可以绘上多达23个字的三字经，这些字句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

日用品橱窗给人留下的完整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产品通常都是消费品。华南生产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当地所需求的，以前那些首先用于出口丝绸、亚麻、瓷器、皮革等产品的行业现在也是这样。矿山工业除外，重新发展的一些行业，比如松香及部分制糖工业除外。因此，在日用品橱窗展出了所有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缝纫机和各种鞋、家具和服装、器具和作业本等。参观该橱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居民对日用品的需要。

苏联驻广州领事

A.M.马卢欣

1951年12月12日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723, л.215-228

№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1951年12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1年12月12日

第20项 关于B.X.瓦西科夫、H.C.切特韦里科夫和B.C.特列菲洛夫等同志。

一、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建议：

1.将B.X.瓦西科夫教授从中国召回，派遣医学副博士B.C.特列菲洛夫同志赴中国中共中央从事医务工作，为期1年。

2.将切特韦里科夫教授在中国的工作期限延长1年。

二、特列菲洛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两同志在中国逗留期间的物质保障

问题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 1425cc号和1950年1月30日第357 122c号等决议相关规定加以确定。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5

№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1951年12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1年12月28日

第162项 关于沈越同志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沈越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主任 [\[30\]](#) 来苏联治病。

2.迎接和招待沈越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29

1952年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31\]](#))

对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签署的与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目前除日本外，已得到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的批准。最近杜鲁门也向国会请求批准对日和约。无疑，继美国之后，其他国家也会批准条约，该条约将被他们视为生效。

美国及其支持美国的国家无疑将借口和平条约生效，在最近宣布取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将只剩下苏联的代表。在远东委员会中可能也会形成类似局面。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如今早已无所事事，所以美国也就毫无顾忌地奉行自己的对日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占领”而由我们方面采取主动，宣布停止对日占领和取消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取消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以及要求从日本领土上立即撤走所有占领军并将全部主权交还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就作这样的郑重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很难向社会舆论解释，为什么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却建议取消1945年12月由盟国决议建立起来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美国代表或者其他国家代表提出建议或者发表声明要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活动时，我们驻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不应反对停止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是应该发表简短的声明对美国政府在这些机构中奉行的对日政策进行批评。鉴于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所以我们反对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活动的意见，第一，不能阻止这些机构被取消；第二，必然招致日本本国的不利反应。除此之外，美国人和日本反动派绝不会放过机会，把我们的反对意见说成似乎苏联想继续占领日本并且必然会被英美集团和日本反动派用作煽动敌视苏联的目的。

由于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行将被取消，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以什么方式保留我们在日本的代表处以及我们今后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日本报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日本报刊不久前曾报道，在日本首相吉田与杜勒斯会谈期间曾达成协议，将苏联驻日代表处作为商务代办处保留下来，似乎日本政府打算通过苏联驻日代表将此非正式地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认为，不必等到英美集团的代表宣布停止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之时，现在就采取相应步骤，通过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来与日本建立直接关系是适宜的。之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关系是因为，建立这种关系必然在日本人民中产生良好反应并在相当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的宣传化为乌有。而在日本仅仅保留苏联商务代办处是不够的，因为苏联与日本之间已产生和将产生的不仅是贸易问题，而且还有需要与日本政府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外交部提议授权基斯连科同志以非正式方式弄清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可能性的态度，并将查明的情况上报以获取进一步指示。

如果查明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的态度是积极的，那么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指示基斯连科同志以正式方式向日本人提出这个问题。在与日本政府谈判时要指出，苏联驻日代表处的任务将是就涉及和平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苏日相互关系中将发生的其他问题，与日本政府直接联系。

在办理苏联驻日本代表处手续时，不需要通过天皇裕仁，因为裕仁是被苏联宣布为战争罪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苏联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交换信件就够了。

至于远东委员会，如果提出就它是否停止活动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驻远东委员会的代表就不参加表决投票。

苏联外交部认为，将我们关于建立苏联与日本直接关系的预定措施计划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32]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33])

..... [34]

3.关于高炮部队武器装备及其人员的评估和鉴定

——我第八十七高炮师1951年4月组建于哈尔滨市。该师由2个团(第一五一和一七七高炮团)组成，配备有各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4—12日期间转移至新驻防区——中国安市。

该师各部队人员和武器装备均根据国家相关计划配给。

每团拥有4个营，各营平均有8门85毫米大口径高炮，共计32门，各营平均有6门37毫米小口径高炮，共计24门。

另外，各营还补充了一门57毫米中口径高炮，为各营提供掩护任务，防备敌强击机和俯冲轰炸机空袭。

——我第九十二高炮师1951年4—5月组建于伊尔库茨克市。该师共有3个团(第六六一、第六六六和第六六七高炮团)，拥有各种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1—10日期间该师抵达新驻防地——安市。

其各团装备情况与第八十七高炮师类似。

抵达中国安市我高炮部队构成情况如下：

部队名称	所属团数量	所属营数量		高炮数量		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	炮瞄雷达站 (COH)		环视雷达站 (CKO)		武器弹药基数	
		步兵	机械化兵	步兵	机械化兵		COH-26 型	COH-3K 型	长波	低频机站 C-3	85 毫米	37 毫米
第八十七高炮师	2	8	8	64	56	8	—	8	1	2	18	30
第九十二高炮师	3	12	12	96	84	12	3	9	4	—	9	15
总计	5	20	20	160	140	20	3	17	5	2	18	30

第10高空探照灯团由2个营组成，1951年6月15日抵达新驻防地——安东市。

该团武器情况：

雷达探照灯：

150型雷达探照灯——36台；

3-15-4型雷达探照灯——36台；

长波型环视雷达——1台。

高炮部队的人员配备情况：

——军官，97%；

——士官，86%；

——士兵，102%。

各部队人员不齐的总体比重为3%。

根据政府指令，各部队在出发前的组建时间为1个月。在组建过程中各部队均补充了一些未经培训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其他兵种各部队。

这种情况对各部队参战初期完成保卫相关目标的作战任务增加了一定困难。

中口径高炮营在作战中不能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紧密配合和协作，而各高炮营没有进行过8门高炮的齐射训练。

各部队在火力配置、仪器操作、测距仪和无线电雷达等使用方面均没有与敌机尤其是高速飞行的敌机作战的实际经验和训练。

由于缺乏相关的指导文件、教令和操作细则，均增加了各部队增强军事技能和训练的难度。

于是，我部只能在实战中摸索和利用军官们提供的一些理论知识和经验。1951年7月初从军机关指挥部派来的空防部门的军官对各高炮部队的实际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随后，从1951年7月起，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各部队还是利用作战间歇和一级战备期间组织了大量战备训练。

高炮部队武器装备的技术情况属于一级和二级水平。

高炮部队所装备炮瞄雷达站的雷达3K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设备中替代了许多非标准零部件，因而工作状态很不稳定，往往过2—3个小时就会出现故障。

各高炮部队在武器、弹药和汽车交通运输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各部队自己都有高炮牵引车和交通运输车辆。它们基本上都是些外国产的老牌汽车，由于长期使用，汽车零部件大都老化，可我们的替代零部件储备却很有限。

各部队总体战备技术指数平均为85%。

.....

三、高炮部队作战行动的成果

(1)1951年6—8月期间

在完成作战任务，防止敌空军对鸭绿江铁路桥和安东、庙沟、新义州等地区机场实施空袭的同时，我第九十二和第八十七高炮师还配合歼击机航空部队、防空火箭部队等部队对敌空军白天和夜间的空袭活动实施反击作战。

1951年6—8月间，安东地区高炮部队共对空军实施反击作战45次，其中：

编 号	月 份	空袭数量				总 计
		机群	单机	白天	夜间	
1	6	3	16	4	15	19
2	7	3	9	3	9	12
3	8	2	12	5	9	14
总 计		8	37	12	33	45

期间，我军高炮击中敌机125架，个别高炮部队实施战斗射击260次……

……6月份，高炮部队实施对空射击的次数比7—8月多。原因在于，6月间敌机飞越高炮部队炮火射程控制区域的次数较多，即这一时期敌机在我高炮部队掩护目标范围内活动比较频繁。

高炮部队对空射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间，且主要针对敌B-26轰炸机编队。

例如，当月敌人所实施的45次空袭中完全由轰炸机实施的便有37次，而由敌F-84和F-86以2-4-6-8为编队单位所实施的空袭只有8次。

我高炮部队所实施的260次对空射击中，126次是使用中等口径高炮进行的。其中：夜间84次(针对敌轰炸机)，白天42次(针对敌歼击机)。

使用小口径高炮作战134次，其中：夜间84次，白天5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兵射击数量在7月，尤其在8月份明显减少，原因在于：敌B 26在空袭时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4000米以上。

由于在6月份遭到了我高炮部队的重创(被击毁飞机5架)，敌人放弃了在白天继续使用歼击机来完成本应由强击机和侦察机所承担的任务。与此同时，敌歼击机在我高炮射击区域内也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7000—8000米)，而不像6月份时那样，在气象条件差和我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只在100—1500米范围内飞行。

面对这一情况，我中口径高射炮兵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等部队紧密配合，采用对空齐射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空袭。

我小口径高射炮兵部队在夜间的对空射击只是拦阻性射击。

……以整团为单位投入战斗，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可能。问题

在于，我炮瞄雷达站-3k工作状态还不太稳定，而阻拦性射击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使用。

1951年6月10日至9月1日间，我驻防安东地区高炮部队(不包括运动作战的各营在内)共击毁F-84敌机9架。

击毁敌机的数量、射击方式和炮弹口径等相关情况参见下表：

月份	部 队	击毁敌机数量								弹药消耗	
		中口径高炮部队				防空导弹部队				85 毫米	37 毫米
		雷达	高射炮 射击指挥仪	强击 航空兵	总计	主力 轰炸机	强击 航空兵	俯冲 式轰炸机	总计		
6	九十二高炮师	—	—	2	2	—	1	2	3	1 008	6 925
	八十七高炮师	1	—	—	1	—	—	—	—	340	3 647
	总 计	1	—	2	3	—	1	2	3	1 348	10 572
7	九十二高炮师	—	—	1	1	—	1	1	2	671	2 681
	八十七高炮师	—	—	—	—	—	—	—	—	982	1 796
	总 计	—	—	1	1	—	1	1	2	1 653	4 477
8	九十二高炮师	—	—	—	—	—	—	—	—	610	3 275
	八十七高炮师	—	—	—	—	—	—	—	—	996	6
	总 计	—	—	—	—	—	—	—	—	1 906	3 281
总 计①		1	—	3	4	—	2	3	5	4 907	18 320

①此行数据系6、7、8月份的合计数量，其中18320应为18330。——编注

……高炮部队作战成果

(2)1951年9—12月期间

第九十二高炮师在完成保卫鸭绿江铁路桥及安东、庙沟、新义州和义州等地区各机场的同时，还在1951年9—12月间配合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和防空导弹等部队对敌空军的38次空袭实施了反击作战，其中：白天10次，夜间28次。

期间，我高炮射击共击中敌机99架。该师各部队共实施战斗射击147次。其射击时间，攻击敌空军类型和所用火炮口径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月 份	在我高炮部队火力控制范围内的敌机数量			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						
	轰炸机	歼击机	总 计	中型口径高射炮			小口径高射炮			总计②
				白天	夜间	总计	白天	夜间	总计	
9	2	1	3	2	2	4	—	—	—	4
10	11	1	12	1	34	35	—	6	6	41
11	19	21	40	7	48	55	1	10	11	66
12	20	24	44	10	18	28	—	8	8	36
总计	52	47	99	20	102	122	1	24	25	147

②此列数据应为“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的合计。——编注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的射击次数总量几乎比前3个月(6—8月)减少了2倍。

原因在于：敌空军活动减少；敌机在我高炮防护区域内活动时提升了飞机飞行的高度。

我军在9—12月共实施射击147次。如果以我高炮部队所防卫的43个目标来计算，针对每个防卫目标，我军平均有三个营在实施射击。

在实施射击时，我高炮部队多采用中口径高炮(147次射击中有122次都是使用中口径火炮)，其中：针对敌轰炸机52次，针对敌歼击机47次。

中型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122次，其中：夜间针对轰炸机102次，白天针对歼击机2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25次，其中：夜间24次，白天1次。

在配合友邻部队对敌空军的空袭所实施的38次反击作战中，我高炮部队针对敌B-26轰炸机群的射击就达到24次，针对敌空军集群式空袭所实施的反击性射击14次，其中：夜间6次，白天8次。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击毁敌机数量——无。

在此期间弹药消耗总体情况：

——85毫米，6092发；

——37毫米，2116发。其中：

拦阻性射击：

——85毫米，1160发；

——37毫米，1964发。

在未击毁敌机的情况下消耗如此多的弹药，原因在于：

——敌空军白天活动减少；敌轰炸机白天完全停止活动；

——敌B 26轰炸机在对我设施实施轰炸时飞行高度均保持在8000—9000米；

——当敌轰炸机进入我高炮最大射程范围时，我军炮火火力密度不够.....

.....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副军长、上校

波巴霍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4045, д.123, л.28-31, 50-54, 38-90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 (1952年1月7日)

绝密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以及驻上海和天津的总领事的报告，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部分当地苏联公民长期没有工作，陷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中国当局无力保证当地的苏联公民找到工作。我们的领事多次向中国当局呼吁，请求安排工作，哪怕是部分安排当地苏联公民的工作，这些请求通常都会遭到中国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公民中也存在失业现象。

此外，正如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所指出的，中国当局拒绝为当地苏联公民安排工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政治上对这些同志不信任。中

国当局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允许这些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

根据可靠的资料，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现在共计有大约2500名无业的苏联公民。

由于没有工作，这部分苏联公民被迫向非常敌视苏联的国际救援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以及加拿大、以色列驻中国的领事代表在招募一批苏联公民到其他国家。根据得到的情报，驻中国的国际救援组织分部完全处于英美间谍的控制之下，最近该组织开始积极活动，打算以难民为伪装把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当地的苏联公民和没有苏联国籍的俄罗斯移民送出中国。

拒绝使当地苏联公民返回苏联的同时，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正在从中国被遣返回国，这使生活在中国各地的苏联公民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情绪，并且被我们的敌对势力用来反对苏联。此外，我们拒绝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会想，好像我们很想把这些苏联侨民留在中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以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建议，在1952年春夏之交把那些没有工作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国，遣送的条件正如1947年把在中国的3000名苏联公民遣送回国的条件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还建议，允许国内较为需要的一些苏联公民在1951年返回苏联，其数量为100—150个家庭，他们在苏联应该有亲属，并且同意接收他们。

我们认为，在1952年应该允许250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以及东北返回苏联，还应该允许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认真进行逐个的审查之后，在1952年为100—15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分发返回苏联的签证，这些苏联公民在苏联应该有亲属。为了分发签证，允许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建议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附属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其成员应该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要取得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的同意。

这一问题已经在1951年12月20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一周后再审议该问题。

决议的草案附后。 [35]

请审议。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葛罗米柯

1952年1月7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9, л.132-133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 (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2项 关于毛岸青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政府关于让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青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毛岸青同志及其随行人员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毛岸青同志的工作则委托给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51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 (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4项 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1952年1月20日第604号记录第1-rc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的提议。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51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 [36]

一、本师的作战行动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由师机关、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第三十四航空技术营、第七五五航空技术营、第一一五独立通讯连、第一五八流动航空修理部队(修理车4辆)和第二一八警备营等部队组成。根据苏联军事部长和苏联空军驻中国行动小组负责人的命令，我部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2日间从鞍山机场转场至安东机场，任务是：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的铁路桥、水电站和机场以及朝鲜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线实施空袭。

本师歼击航空兵各团在顺利转场之后，目前已做好准备，并随时可以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有：第一七六近卫歼击航空团29人，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人。已装备武器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战机有：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共30架。另外，师机关还有4名飞行员和2架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飞机。

本师从1951年4月2日起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共有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机组58个，其中：师机关2个，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26个，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个。其他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暂时均不承担飞行任务。

在我师来此之前，驻防安东机场担负保卫北朝鲜交通线和后方设施任务的是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该师现已转场至鞍山机场。

总之，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未曾参加过战斗的情况下，于1951年4月2日开始担负上级所赋予的战斗任务。期间我们只能以自身的力量，即58个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战机的机组来单独对敌。在我师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敌人空军来袭的情况下，其他部队由于基地距我达

175—200公里之遥，根本无法给予我们及时和实质性的帮助。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师作战行动总体情况如下：

实施战斗飞行6269架次，其中，夜间6次，截击敌空军4715次；掩护安东地区目标1282次，自由“搏击”132次，执行其他战斗任务134次；

飞行时间4946小时，其中：在复杂气象条件下——1167小时07分，夜间——5小时36分；

与敌进行大规模空战142次，参战飞行员2201人次。

在空战总数中：

1.以双机为单位作战5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5次，

中队为单位作战36次，

团为单位作战40次，

师为单位作战14次，

军为单位作战42次。

2.与优势敌人作战83次，

与力量相等敌人作战17次，

以优势力量对敌42次。

3.与敌轰炸机作战3次，

与敌侦察机作战2次，

与敌歼击机F-80、F-84、F-94、F-51、“格洛斯特流星-4”作战35次，

与敌歼击机F-86作战102次，

以编队方式作战384次，其中：

以双机为单位作战18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14次，

以中队为单位作战130次，

以团为单位作战122次，

以师为单位作战20次，

以军为单位作战80次。

空战中我师飞行员共击落敌机194架，其中：B-29，12架，B26，1架，PB-45，1架，F-86，97架，F-94，8架，F-80，22架，F-84，36架，F-51，6架，“格洛斯特流星4”，11架。

击落敌机的我师飞行员及其战果：

上校维什尼亚科夫，6架：F-86，2架，F-84，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少校苏博京，10架：B-29，2架，F-86，3架，F-84，2架，F-80，1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少校舍别尔斯托夫，12架：B-29，1架，F-84，7架，F-86，3架，F-51，1架；

大尉克拉马连科，10架：F-80，2架，F-86，6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大尉戈什，8架：B-29，1架，B26，1架，F-86，2架，F-84，1架，F-80，1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苏奇科夫，9架：B-29，2架，F-86，2架，F-84，3架，F-80，2架；

大尉米拉乌什金，13架：B-29，1架，F-86，5架，F-84，3架，“格洛斯特流星4”，4架；

大尉贡恰罗夫，4架：F-86，2架，F-84，1架，F-94，1架；

上尉阿博拉兹佐夫，4架：B-29，1架，F-86，2架，F-84，1架；

上尉普利特金，4架：B-29，1架，F-86，1架，F-51，1架，F-84，1架；

大尉瓦西科，3架：F-86，2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穆罗舍夫，1架：F-86，1架；

上尉戈洛瓦乔夫，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韦尔德什，2架：F-86，1架，F-51，1架；

上尉久兹，2架：F-86，1架，F-84，1架；

上尉戈戈列夫，1架：F-80，1架；

上尉古雷，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祖巴金，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上尉克拉夫佐夫，1架：F-84，1架；

上尉尼库林，1架：F-86，1架；

上尉拉祖金，3架：F-86，2架，F-84，1架；

上尉谢尔久克，1架：F-86，1架；

上尉马洛兹，1架：F-86，1架；

大尉雅博洛科夫，1架：F-86，1架；

少校古利亚耶夫，1架：F-86，1架；

上校佩佩良耶夫，15架：F-86，11架，F-94，2架，F-80，1架，F-84，1架；

中校米图索夫，6架：F-86，4架，F-84，1架，F-80，1架；

大尉伊万诺夫，7架：F-86，5架，F-80，2架；

大尉阿尔费耶夫，7架：F-86，5架，F-80，1架，F-84，1架；

上尉舍巴诺夫，6架：B-29，1架，F-80，5架；

少校舍拉马诺夫，5架：B-45，1架，F-86，1架，F-94，1架，F-80，2架；

大尉博卡奇，5架：F-86，4架，F-84，1架；

大尉阿巴库莫夫，5架：F-86，3架，F-94，1架，F-80，1架；

上尉雷日科夫，4架：F-84，2架，F-86，1架，F-80，1架；

大尉扎布拉夫涅夫，4架：F-86，2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纳扎尔金，3架：B-29，1架，F-94，1架，F-80，1架；

上尉科切加罗夫，3架：B-29，1架，F-86，2架；

上尉傅金，3架：F-86，2架，F-80，1架；

大尉陀思妥耶夫斯基，3架：F-86，1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穆拉维约夫，3架：F-86，2架，F-80，1架；

上尉索斯科维奇，2架：F-86，2架；

上尉布伯科，2架：F-94，2架；

上尉科尔巴科夫，2架：F-84，1架，F-80，1架；

上尉博罗夫科夫，2架：F-86，2架；

上尉基里索夫，1架：F-86，1架；

上尉瓦西里耶夫，1架：F-86，1架；

少校安季波夫，1架：F-84，1架；

上尉奥斯塔片科，1架：F-84，1架；

上尉雷巴斯，1架：F-86，1架；

大尉卡波拉诺夫，1架：F-86，1架；

上尉约夫列夫，1架：F-86，1架；

上尉利特维纽科，1架：F-86，1架。

各部队战果分配情况：

作战类型	部 队			总 计
	机 关	第一七六团	第一九六团	
1. 战斗飞行数量	75	3 114	3 074	6 263
其中：拦截敌空军	43	2 405	2 267	4 715
掩护工业和铁路设施	10	571	701	1 282
自由“搏击”	22	41	69	132
其他	—	97	37	132 ^①

①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续表

作战类型	部 队			总 计
	机 关	第一七六团	第一九六团	
2. 夜间战斗飞行次数	2	—	4	6
3. 空战时间	59.00	2 498	2 389	4 946
其中：夜间空战时间	1.45	—	3.51	5.36 ^②
4. 特殊飞行时间				
云后飞行	15.02	356.24	281.35	653.01 ^②
云中飞行	2.24	47.33	45.00	94.57
能见度差情况下飞行	6.20	154.38	258.11	419.09 ^②
高空飞行	36.09	1 499.36	1 639.00	3 174.45
5. 空战实施情况				142 ^③
以双机为单位	—	4	1	5
以分队为单位	—	4	1	5
以中队为单位	—	21	15	36
以团为单位	—	28	12	40
以师为单位	—	14	13	14 ^④
以军为单位	—	42	40	42 ^⑤
单机空战	12	1 172	1 029	2 201
6. 机群式起飞				
以双机为单位	2	10	6	18
以分队为单位	—	7	7	14
以中队为单位	—	63	67	130
以团为单位	—	58	61	119
以师为单位	—	20	20	20 ^⑥
以军为单位	—	60	80	80 ^⑦
7. 击落敌机数量	1	98	95	194
8. 己方损失：飞行员	—	4	4	8
飞机	—	13	10	23
9. 煤油损耗(吨)	69	3 450	3 195	6 714
10. 弹药消耗：H-37 弹	54	4 170	4 622	8 846
HC-23 弹	120	12 215	15 544	27 879
11. 抛弃副油箱	140	3 880	3 588	7 608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

尽管气象条件复杂多样，但我师飞行员在与敌空军的战斗中表现得坚定果断，战术运用和组织得当，因而仍是取了相当优秀的战果。关于我师的空战，我们可用我部队1951年6月18日、20日和7月8日、11日和21日等的实战情况来举例说明。

1951年6月18日，我师8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在苏博京少校的率领下起飞，拦截敌歼击机。在宣川地区高空9000米处，我机群与敌16架F-86相遇。敌人以“纵队”战斗队形向我迎来飞来。根据形势，在敌力量

多出我一倍的情况下，苏博京少校依然决定向其发起攻击。

苏博京少校果断地率队向敌进攻，一个回合之后敌队形被打乱，一些敌机退出战斗。

在此次空战中，苏博京少校表现得尤其勇敢顽强，并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空中格斗技术。他带领自己的僚机率先向敌分队机群开火，经过近距离三个点射之后，敌1架F-86当即在空中爆炸。

之后，苏博京少校迅速前去帮助我军1架正受到敌2架F-86夹击的战机。虽然此举可能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勇敢地向这2架敌机冲去。他的果断行动迫使敌人放弃了对我军那一架战机的攻击，并退出战斗。

正在这时，另2架敌F-86已成功逼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

苏博京少校极力以大角度俯冲来摆脱敌人，但并未获成功。其中1架敌机已接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50米距离，并不断向其开火。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和赢得这场不对称战斗的胜利，苏博京少校一个空中急刹车向敌机撞去。敌机在与苏博京的飞机相撞的同时，失去平衡，尔后与飞行员一起像石头一样向下栽去。而苏博京少校则在两机相撞的同时用弹射椅将自己弹出，而其被撞碎的飞机则向相反方向跌落。

.....

我师损失情况概述：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在空战中共有8名飞行员阵亡，其中之一为朝鲜高炮部队所伤；损失飞机23架。

12人在飞机战斗中受伤后使用弹射装置逃生，其中9人是因飞机被击伤后操纵失灵，1人因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1人因飞机起火，1人与敌撞机。另有3人跳机后氧气罩脱落，其中2人短暂失去知觉。

我师飞机和飞行员损失的具体情况：

1951年4月3日，在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上尉尼基琴科牺牲，所驾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3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上尉莱伊阿特洛夫斯基的飞机被敌击中，飞行员仍驾机在机场迫降，机身上被击中27弹，但尚能使用，不必大修。

1951年4月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上等飞行员上尉韦尔德什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敌击中，机身中弹45发。飞行员驾机在机场成功迫降。受伤的飞机不用大修。

1951年4月7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伤。由于飞机控制失灵飞行员跳机并顺利着陆。所驾飞机坠毁。在跳机时飞行员左前臂和左胯肌肉被碰伤，住院3个月后康复归队。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中尉Φ.B.斯拉博津牺牲，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中尉涅戈佳耶夫的飞机被击伤。由于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被迫在机场外迫降。飞行员安然无恙，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大尉萨姆辛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生还，并于两天后归队。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4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中队长上尉穆罗舍夫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导致眼睛巩膜充血，腰和颈椎受伤。经1个月住院治疗后，终因外伤性肌炎，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951年5月1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大尉尼库林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他在从高空11500米坠至2000米期间失去知觉。飞行员失去知觉系面部所带氧气罩脱落和供氧器15停止工作所致。他在住院2个月零10天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5月20日，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上尉纳扎尔金的飞机在空战中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在落地时由于地面不平导致其左膝和左胯受伤。飞行员1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18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领航员苏博京少校的飞机在与敌F-86空战中受伤。在所驾飞机与敌机相碰撞的同时我飞行员跳机，导致眼巩膜充血，右肩关节囊扭伤和破裂。飞行员3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大尉普利特金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20天住院观察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涅戈佳耶夫中尉的飞机被朝鲜人民军高炮击毁，飞行员阵亡，飞机坠毁。

1951年7月11日，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政治处副中队长拉里奥诺夫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布拉兹佐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大尉拉里奥诺夫当场牺牲。奥布拉兹佐夫大尉在负重伤情况下丢弃了已降至最低速度并处于半翻转状态的飞机，跳伞着陆。在住院观察期间由于休克导致死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9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中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着陆。在跳机期间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左前臂碰伤，眼巩膜充血，腰椎剧烈拉伤。由于脑震荡、外伤性肌炎、眼巩膜充血住院42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其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0月26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Ф.А.舍巴诺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阵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8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Ф.特拉温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27日，在与敌兵力占优的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韦尔德什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约西普克大尉的飞机被击伤。我两名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韦尔德什大尉左肩扭伤，12天后归队，约西普克大尉左膝关节碰伤，1个月后归队。所驾两架飞机均坠毁。

1951年11月28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尉所驾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其着陆时左

膝关节韧带拉伤，目前尚未归队，仍在疗养院疗养，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5日，在与F-80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Д. 雷日科夫大尉所驾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11日在与敌歼击机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夫钦尼科夫大尉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肩关节脱臼，关节囊撕裂。目前尚未归队，仍在接受治疗。所驾飞机坠毁。

除上所述外，在空战中我方还有43架飞机受伤，其中之一是被敌人一架被击毁的飞机在空中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击伤的。

共有6名飞行员受伤：

1.1951年4月12日，上尉雅科夫列夫在战斗中受伤——右肩胛骨、右手腕和左半部下颌骨大面积创伤。住院20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2.1951年5月1日，飞行员戈洛瓦乔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太阳穴前顶部分弹孔正切式创伤。25天后归队。

3.1951年5月20日，飞行员济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粉碎性创伤。1个月后归队。

4.1951年6月20日，飞行员尼古拉耶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左膝1/3中段粉碎性骨折。45天后归队。

5.1951年11月23日，飞行员缅希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区域和右肩正切弹孔式创伤。至今尚未归队。

6.1951年12月17日，飞行员卡波拉诺夫上尉在战斗中负伤——左手腕贯穿性创伤，5个手指被切除。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关于空战中我军物资损耗情况将在空军工程部门工作一章中再作详细叙述。

.....

结论：

1.第三四歼击航空师所属部队圆满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地区的设施和朝鲜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人空袭的任务。

本师全体飞行员，每天都在一般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积极地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敌机进行着战斗。他们在战斗中共击毁了191架敌机，与此同时自己在物质和人员方面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2.在投入作战的第一个月里，我师所属部队通过与敌激烈战斗，将敌轰炸机和强击机驱逐出了安东和朝鲜西北部地区。

1951年4月12日，我师所有部队发挥我米格-15战机的优势，在空战中击退了敌在大量现代歼击机掩护下的轰炸机群大规模密集式空袭行动。战后总结表明：在我歼击机的攻击下，敌人损失了参战轰炸机总量的25%以上，敌人的空袭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7月21日与敌8架F-94，11月28日与敌30架F-86，12月1日与敌16架“格洛斯特流星-4”和16架F-84等的交战中，我师各部队在数量占优势的敌人面前积极战斗，勇敢机智，最后均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只是在7月21日和12月1日的战斗中有个别敌机逃脱。

3.整个战斗期间我师各部队全体飞行员不怕牺牲，竭尽全力，以期能更好地完成政府所交给的任务。

全师飞行员的作战条件极其艰苦，经常是连续不间断地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其他辅助部队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确保全军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不惜贡献出一切力量。

由于作战勇敢和英勇我师五位飞行员荣获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他们是：少校苏博京、上尉克拉马连科、戈什和阿博拉兹佐夫、大尉舍巴诺夫。

由于在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组织方面表现优异，能力突出，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所担任的任务，我师153人被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其中15名飞行员已是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4.经过9个半月不间断地紧张战斗，我师在保卫我战役纵深地区设施

和防止敌空军轰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我师全体飞行员在以现代化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与敌现代化喷气歼击机和轰炸机大、小机群的作战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我工程技术部队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保障飞行员作战起飞，飞机、发动机、武器和电子特殊设备的保养，以最短时间使飞机再次起飞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经验。经过一年的锻炼，他们还对在野战条件下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对被战斗损坏的飞机装备进行抢修有了大量的实践和认识。

团、师各级指挥部也对在复杂空战条件下如何计划和指导部队投入作战，挫败敌人的大规模空袭，组织我大规模机群同时起飞和降落以及在地面和空中对我歼击机的作战进行现代化的集中管理指挥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军上校

科热杜布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参谋长、近卫军上校

马列文内伊

1952年1月15日

ЦАМОРФ, ф.324.иад, оп.152723, д.3, л.1-5, 54-55, 87-91, 151-153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绝密，禁止复印

急电、特电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在1953年在全国进行货币改革。由于没有能力在我国印制货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为我们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四种货币，印制的总数量为4.66亿张，用苏联的纸张印刷，并带水

纹。

提供面值为5元和10元的货币的总数为450000000张，可以在1953年3—9月份提供，其余货币可以在1954年完成供应。

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将派出专员把货币的样品和关于该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带往莫斯科，以便解决问题。请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知我们。

周恩来

1952年1月22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7-58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年1月28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答复：

“周恩来同志，您在1月22日发送的电报我们收到了。我们同意按照您的请求，为中国印制货币。请通知我们，你们的代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以便在莫斯科就所有的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并完成这一任务。

菲利波夫

1952年1月28日”

执行情况请回电告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9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议。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37])。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

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川、釜山——共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

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5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4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2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1人共2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40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5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16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10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6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8条都涉及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6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73-77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 (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第2项议程：‘规定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1951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38\]](#)

一、确立原则：双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线应成为军事分界线(办法是，根据情况在本协议第2条和第3条做出规定)，按签署后的停战协议规定的时间，双方军队各自由该线后撤2公里，以便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二、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原则立即确定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确定非军事区的中间线。对这一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该协议和以上所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内停战协议签字，则不管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都不得作任何改变。

三、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将继续发生战斗，鉴于这一事实，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本协议以及本协议第2条所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和

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之内尚未签署停战协议，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实际接触线的改变，对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做出改变，以便使改变后的军事分界线确系严格按照当时存在的双方之间的接触线划定的，从而成为休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

第3项议程：‘制定在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其中包括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能。’(1951年10月12—29日达成协议) [39]

一、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武装人员应从停战协议签字之时起24小时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二、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均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除带有警察性质的部队(关于该部队双方专门达成相互协议)外，双方的任何军队从此时起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双方的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对非军事区实施任何武装暴力行为。

根据停战协议条款，双方均应在位于军事分界线属于己方的非军事区地区内处理行政管理事务。

三、处于监督之下各方全部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均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于生效后5天内撤出另一方后方的和沿海的岛屿和水域(原先处于另一方控制下的岛屿和任何其他岛屿另行达成协议)。

如果上述武装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撤出且无任何相互协议和拖延撤出的任何原因，则另一方为保证其安全和秩序有权对武装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四、为保证持久停战，以便双方较高级代表政治会议顺利进行，从而达成和平调解，双方均应保证，一旦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即不向朝鲜运送任何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和弹药。

在相互协定的规模内进行的军事人员的一切轮换均应报告停战委员会，以便受全权委托的中立国观察机构能够执行其任务，对在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内的轮换地点进行观察和监督。

五、双方均应指派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停战协议进行观察和监督，通过谈判对任何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进行调解。正如停战协议所规定，观察和视察的职能应根据下列两点规定进行：

(一)停战委员会应对非军事区负责，它通过直接派出联合小组履行其职责；

(二)在非军事区以外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情况的地点内，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按委托履行职责。

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要求调查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时，它应进行直接视察。

六、双方同意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中立国提出要求他们同意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观察机构。该观察机构由停战委员会授权后，应按第4条和第5条第2款的规定负责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每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请求进行这种调查时，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立即向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或中立区以外发生破坏停战事件的地点派出视察小组，并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并将这种观察和视察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双方均应给这些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视察小组提供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上履行职能所必需的一切交通工具。”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5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68-72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1日

第362项 关于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汉语配音。(1951年1月28日第606号记录第108-гс项)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在保留用俄语演唱的声乐节目的情况下用汉语配音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建议。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75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1952年2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以下复电电文转告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您1月31日有关停战谈判的电报已经收到。

同意您所拟定的计划和您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

关于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观察委员会一事，我们认为应与波、捷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自然会同意的。

致以敬礼！

菲利波夫”

收到电报后请来电确认。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72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78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5日

第380项 斯大林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

通过斯大林同志建议的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即祝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2周年。

附件：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北京

在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2周年之际，请主席同志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希望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与合作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78、216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1952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2年2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发给我的电报和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的内容摘要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的电报：

“一、今年1月16日1时，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曾来我处。他在谈话中

说，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

如果苏联和中国认为继续进行战争有好处，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坚守自己的阵地。

我答复说，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上进行和平调解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还向他说明，在当前军事状况下，我方的有利条件和美国的困难都在增加。因此，停战协议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兵力，以便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朴宪永外务相离开我处时，表示同意我对整个局势的观点，并说他的访问只是一般的会见，他的意见不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意见，而纯粹是个人意见。

二、1951年，朝鲜政府征收农业税粮食计65万吨，其所占总收获量的百分比过大。现在有10%的居民正在挨饿。大多数农民的口粮仅能维持到2—5月。

如不迅速给予援助，则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春耕进行，而且会影响粮食产量。

据说，我国政府已批准给朝鲜政府提供30000吨粮食。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必须在3月份及时提供30000吨谷物给予帮助，以便农民能进行春耕生产。

三、我认为，尽管我们的预算也很紧张，但根据1951年预算年度的援朝计划来看，我们完全应计划拨出16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37亿卢布)来援助朝鲜。这一数字未必能缩减。请尽早将此列入总预算。”

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如下：

“你今年1月22日电报已收到。至于援朝问题，我们已将15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22亿卢布)的经费列入1952年的预算，该数额略微超过中国于1951年提供给朝鲜的贸易贷款、中国提供的紧急修复朝鲜铁路和供养东北境内朝鲜公民的款额。

如果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则可预见援朝经费势必增加。

今年1月底，朝鲜贸易相张时雨同志曾来北京就1952年交货问题进

行谈判。谈判结果是确定由我国提供的货物总值为7000亿人民币(约合1.03亿卢布)。

朝鲜什么也不给我们作为交换，因此上述款额应作为贸易贷款额。

至于申请中规定的粮食将按该申请规定于2—5月份交货。按每月5000吨大米和5000吨小米(总共提供大米和小米40000吨)，每月提供200吨豆油。

此外，在2月份还要提供330万米棉织物。

谈判将于近期内结束。按你的实际观察，如果朝鲜军事行动停止，朝鲜应首先恢复什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恢复公路和农业方面可用劳动力予以支援。除此以外还需要我们提供何种援助？

请你研究这些问题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

1952年2月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81-83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负责“苏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波波维同志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把设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处，并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设立代表处的分支机构，其人员配置为14人。

根据波波维同志的提议，需要委托代表处完成在基地进行货物的装配工作以及一些与苏联工作人员进行出差的登记工作相关的业务管理工作(应该到股份公司出差，并使这些人返回苏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审议了这个问题之后通报说，政府在1951年9月25日决定，同转运往新疆股份公司的货物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全部委托给了对外贸易部。

为了开展工作，对到新疆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并使其返回苏联，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不需要组建特别的代表机构，因为中央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以及在阿拉木图市的相关部和部门应该履行这一职能。

根据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需要对波波维同志就上述问题提出的请求做出答复，而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以及设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的相关基地应该被撤销，国营转运站联盟和上述基地的财产应在1952年1月1日之前转交给对外贸易部。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2月20日

РГАЭ, ф.4372, оп.54, д.1031, л.91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1952年1月28日到2月17日20天的时间内，敌人通过高射炮用飞机8次在朝鲜阵地伊川—平康—朔宁三角区中央地段以及阵线东部的部分地段，向我军阵地投放了三种昆虫：黑苍蝇、跳蚤和虱子。

现在，在上述地区的田野、公路、树林、草地和小河岸都可以发现这三种昆虫，而且一些地区的密度较大，每平方米达到10—15个昆虫。

对从前线得到的这些昆虫进行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昆虫是霍乱和鼠疫。根据从前线得到的报告，已经发现了一些患有霍乱、伤寒、斑前伤寒、脑炎的病人。病人中有2人死亡。

现在正在对死亡者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其死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上述细菌。

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已经派出了医疗队，同这些疾病作斗争，并通过飞机向前线运送了340万份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疫苗以及4000俄磅灭杀昆虫的药粉。

我们得到的秘密情报以及得到的报纸的报道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经常在朝鲜有计划地散播细菌。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提到的5名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其中3人现在在朝鲜，这三人是：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他们随身携带了进行细菌战所必需的装备，其中包括霍乱、鼠疫、能破坏人的血液的毒气以及开展细菌战的其他各种装备。

在美国人的领导下，日本战犯利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进行细菌武器试验。这些战犯在他们制定的报告中谈到了关于怎样在冬季作战的时候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1951年3月，隶属于联合国军总参谋部的卫生部长官、陆军准将赛姆斯乘坐第1091号细菌战登陆艇到了元山港口，然后他访问了巨济岛，在该岛上，在他的监督和领导下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身上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验。美联社的美国记者在1951年5月18日报道了这件事情，该记者曾访问过巨济岛。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散播细菌，这些行动以及行动的方法同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以及其他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日中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和方法相似。

我们首先打算以朝鲜外务省的名义，然后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呼吁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行径。全中国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犯罪行为运动。

我们向您通报了这件事情，并且希望，苏联政府积极帮助我们，也希望得到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2月21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2, л.87 89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1日)

绝密

文本第10份

И.В.斯大林同志：

一、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现在除了日本外，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都已批准。澳大利亚议会和美国国会现在都正在讨论。毫无疑问，其他国家也将在美国 and 澳大利亚之后批准这一条约并将其视为已经生效的条约。

美国及其支持者最近将会公开发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借口是和平条约已生效。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委员会里将只剩下苏联代表了，而在远东委员会可能也会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现在都无事可做了，而美国却不受监督地在实行着自己对日本的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要等美国政府发表“停止对日本的占领”的声明，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盟国委员会，同时也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一郑重的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还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楚，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废除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召开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会议时，将在会上提出

废除这一机构的问题。苏联代表不应该反对废除针对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但是，我国代表在盟国委员会中应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这一建议是美国方面根据非法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而采取的新的非法行动。如果对日盟国委员会会议不举行，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的声明，之后，正如声明所宣布的那样，这一机构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在解决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有关的我国驻日本代表处的问题之后，由于可能取消远东委员会，有关我们给潘友新 [40] 的指示问题另行解决是恰当的。

二、至于我国今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我驻日本代表处的状况，那么显然，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而且战后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但是，苏联当然感兴趣的是，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外交部认为，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是适宜的。作为贸易代表团的我国代表处，既可以履行商务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履行比如像1920—1921年期间我国驻英国的贸易代表团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最好能在这种情况下同日本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也可以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还应注意日本人也可能希望有自己驻苏联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类似的驻莫斯科的代表处。

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在单独和约生效后如何维持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但是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在议会就苏联驻东京代表处今后地位问题发表的谈话应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暗示成立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处的可能性。

鉴于冈崎的谈话，苏联外交部认为利用苏联代表处同日本某些官方人士的有关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必要的。为此，我国的商务代表多姆尼茨基同志最好能邀请日本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

会晤时，副政治参赞鲁诺夫同志应该在场。在同高桥(或副大臣)会晤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后提问：这次谈话是何用意，他可否对此作某些解释？我国代表应当利用这次提问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我方关于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的建议的态度。如果高桥(或者副大臣)也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日本人就应当说清楚。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四、苏联外交部认为，为了查明日本政府在维护苏联与日本今后的关系问题上的意图而预定采取行动的计画，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事先询问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请审阅。

A.葛罗米柯(签名)

1952年2月21日

第108гг号

附件一：

东京

致基斯连科、帕夫雷切夫：

第一，由于最近单独对日和平条约即将生效，显然，废除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会被提出来。当然，苏联反对废除因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些机构是不适宜的。

但是苏联驻盟国委员会的代表不能对废除盟国委员会的建议默不作声，而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的又一非法行动。之所以确定这一行为为非法，是因为它是在违反了以下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是：开罗和波茨坦宣言、雅尔塔协议、远东委员会的一些决议及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

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列举有关的事实，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签单独对日和平条约之前就已经严重违背了几个大国就日本问题一致达成的上述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指出以下问题：

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在实施占领日本时不是去执行使日本民主化的决议，而是帮助建立对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实行警察专制的制度。

还要举出一些事例加以说明，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没有采取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的政策。签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美国政府粗暴地坚持违背它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的继续。这一条约的签订表明，美国政府在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军事桥头堡方面走得有多远。正因为如此，不能不把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和所谓的安全条约看成是在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条约，因为日本正是在这些条约的帮助下，变成从属于美国的国家，使自己的民族利益从属于美国统治者的侵略目标。除了这是一个在远东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之外，再不能对条约作任何其他评价。美国政府旨在粗暴违背自己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的，以废

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而告终。众所周知，尽管盟国委员会远未履行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交部长及中国也派人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决定赋予它的职能，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被提了出来。由于强加给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和上述“安全条约”而使美国军队留在了日本，这就突出了日本的从属地位。事实上日本的状况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变，日本仍处于被占领国的地位，因此这对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消极后果。当然，对这种状况，首先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来负责。苏联政府坚持从日本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参与下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日本问题，苏联政府对业已出现的状况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上述情况，请你们在3天之内将你们在盟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全文起草好并报送莫斯科。

第二，至于我国今后与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官方驻日本代表处地位的问题，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可能建立所谓正常的苏日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苏联和日本间的战后关系仍未得到解决，更不用说吉田政府持公开的对苏联不友好的立场了。但是苏联感兴趣的是，即使在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在日本建立苏联代表处的问题，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是合适的。贸易代表团形式的我国代表处(如果合适，可以叫别的名称)可以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时也可以例如像1920—1921年我国驻英国贸易代表团那样履行其他的某些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同日本达成协议，使苏联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以及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同样也应当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会希望在苏联有他们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代表处。

第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尚未发表任何有关其打算在单独和平条约生效后维持同苏联关系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就今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在议会发表的谈话不是偶然的。(你们126号电报)他在谈话中暗示了在日本设立苏联代表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利用你们同日本官方人士的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适宜的。我们认为，为达此目的，多姆尼茨基可以邀请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在会晤时鲁诺夫应在场。在同高桥(或同副大臣)谈话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询问这一谈话是何用意，他是否可以对此作某种解释。

请你们利用提出此问题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关于我驻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建议所持的态度。如果高桥(或副大臣)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应该说，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有关谈话结果请立即报告我们，以便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第四，你们建议发表声明，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尽快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这是不可取的。向社会舆论还难以解释清，为什么不同意单独和平条约的苏联却建议废除由几个盟国于1945年12月决议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及远东委员会。

请确认是否收到此件。

附件二：

急件

北京

致罗申：

请您拜会周恩来并告诉他：

鉴于单独对日和和平条约近期即将生效，关于废除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的问题显然要被提出来。苏联政府认为反对由于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是不适宜的。同时苏联政府认为，绝不能忽视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新的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破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权利的非法的单独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后果，更不用说它对日本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了。为此，苏联驻对日盟国委员会代表将受权发表相应的声明。

同时，随着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也出现了今后同日本关系的形式问题。现在很明显，尚无可能建立苏联和日本间所谓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原本的战争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苏联感兴趣的自然是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之后，苏联代表处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在日本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要力争同日本政府就苏联驻日代表处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设立达成协议是适宜的。这个代表处既能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也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

估计日本人也有在苏联设立自己的贸易代表处的愿望，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同意在莫斯科有一个这样的日本代表处是可行的。

您可以告诉他(周恩来)，苏联政府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执行情况请电告。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8—2127页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1952年2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23日

第517项 关于公民P.普罗列塔里耶娃赴中国的事宜。

鉴于中国大使馆的请求，现批准苏联公民罗扎·普罗列塔里耶娃前往中国进行长期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2, л.107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

毛泽东同志！

您在2月21日的电报收到了。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全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

苏联方面将会对采取的这些措施予以积极的支持。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2年2月23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92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绝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通告他，您已被授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如下事项：

最近可以预料，鉴于对日本单独和约生效，美国发言人将提出建议：停止对日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对此，苏联政府认为，搞清楚同日本政府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是适宜的。也已向苏联驻日本

的代表发出指示：探明日本政府对相互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的可能性的态度。之所以直接同日本建立关系，是因为需要解决苏联和日本相互关系中现在及将来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建立这种关系将是有利的，日本人民是欢迎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失去作用。

请您也通知中方，不言而喻，同日本建立直接的关系并不改变苏联不承认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和平条约的立场。

请确认此件是否收到。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28页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日

第6项 关于米玉道(Ми Юй дао)、尤开元(Ю Кай-юань)和杜长志(Ду Чжан-чжи)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1.批准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的提议，并准许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作为翻译见习生从中国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2.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杨松同志)于今年4月向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提供莫斯科市里的住所。

3.迎接和招待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的工作委托给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3, л.3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1952年3月3日)

我拜会了周恩来并把两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交给了他。

在会谈过程中，谈到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周恩来来说，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了国家机关不少工作人员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有很大一批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攫取国家资金，把大笔国家的钱用于非生产性措施。

出现这种状况有几方面的原因。1949年之前，革命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所以干部不了解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到城市后，处在全新的条件之下，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被腐蚀而变坏。对干部的政治教育搞得不好。许多工作人员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地主，平分土地。另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将要到来。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许多工作人员被腐蚀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中留有相当数量的原国民党官员，他们带来了不少国民党制度的恶习。

由于一大批工作人员被发现有营私舞弊行为，党为了保护干部不得不逐个审查营私舞弊现象。90%的犯有营私舞弊的工作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仍留岗工作。其余10%严重的受贿分子、贪污分子，将按其罪行受降职处分，并从国家机关开除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被投入监狱，或枪决。

到3月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将在中央机关、县以上大企业和部队连以上单位中结束。最大的贪污犯将被枪毙。在这之后，党要着手解决农村和连以下部队中的贪污、盗窃国库和官僚主义问题。由于农村和部队基层单位也有大量比较轻微营私舞弊现象，同他们做斗争也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动员广大的居民阶层。为了不影响春播，农村和部队中的这一运动将推迟到春播完成之后开始。

然后周恩来指出，反贪污、反盗窃国库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第二阶段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广泛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但看到共产党对它很好，同它进行合作，资产阶级决定利用这一点。然后它看到，同共产党不仅可以合作，而且可以收买其中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使用收买、思想腐蚀、讹诈这些方法，使许多工作人员拜倒在其脚下。通过投机倒把、生产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攫取

国家资金、进行破坏活动、收买经济情报，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阵地。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发现，仅有2%的企业主和商人遵守政府法令进行经营；40%的人攫取了一部分钱——近100万元；53%的人干了各种半合法半违法的勾当；5%的人干了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以高价向国家出售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收买国家职员。这些大的犯罪分子中，4%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和征收复税，使他们的财产回到国家手里。这些资产阶级中其余的犯罪分子(1%)将被投入监狱和被枪毙，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每一个城市都要枪毙几个大的奸商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犯罪分子。

在总结上述发言时，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实施有力的打击，借此使资产阶级名誉扫地，使其孤立于中小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之。至于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要把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

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斗争开展得并不平衡。到3月底，北京和天津将结束这一运动，然后是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是为了积累经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对资产阶级要发动全面进攻，防止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一措施。这种办法乍看起来似乎不妥，好像这会使没有开始运动的地区的资产阶级做好准备，隐瞒自己的罪行。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每一个罪行，毫无疑问，不是这个工人就是那个工人和职员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已充分发动起来同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他们将勇敢、坚决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资产阶级已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行。资产阶级本身也感到了这一点。例如，尽管上海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运动尚未开始，上海的企业主和商人已找到政府，建议赔偿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500亿元，只要政府赦免他们的罪行。

周恩来补充说，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贯彻颠覆国家经济的路线，同美国人和国民党有联系。但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重点。晚些时候，当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政府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参加会谈的有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罗申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 (1952年3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敌人在朝鲜战线和东北领土投放的细菌生物作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流行病，我们在继续加强预防流行病的力量。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向中国派出9名预防流行病的专家：预防流行病小组组长1名，高水平的防疫和细菌微生物学实验医师1名，昆虫微生物学专家1名，生产疫苗，并且了解培植疫苗的细菌专家2名，使疫苗标准化的实验专家2名，消毒和灭鼠专家1名，流行病专家1名。

此外，必须使上述专家，特别是要使细菌学专家在来的时候带上必要的准备和细菌设备，以便进行微生物学的、细菌学的以及其他的研究。

请把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告知我们。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7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2, л.97-98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 (1952年3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8日

第42项 关于中共中央的请求。

1.满足中共中央要陈昌浩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2.责成联共(布)中央属下的出国事务委员会给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办理出苏联国境的手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霍洛德科夫同志)则要安排好送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去中国的工作。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3, л.10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 事(1952年3月8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将以下电文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们得到报告，据称彭德怀打算对美国的一个师采取局部军事行动。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怀疑现在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是否恰当。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2年3月8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00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

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04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10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10日收到

复您第325号电。[\[41\]](#)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的电报转发给您。

“致菲利波夫同志：

3月9日，罗申同志转告联共(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计划对美军1个师进行局部战役以及这一战役在目前不适合的通知。我们没有从彭德怀同志那里收到该战役计划。如果他同苏联顾问谈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认为当前进行这样的战役是不合适的。我们将此意见通知彭德怀。也将此意见通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10日”

1952年3月10日

说明：

葛罗米柯同志指示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收到通知说，彭德怀计划对美军1个师实施局部战役，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战役会引起怀疑。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2, л.102-103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1952年3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12日

第70项 关于胡明同志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1.满足中国外交部关于胡明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妻子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胡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3, л.16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

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百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 д.342, л.190-100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1952年3月15日)

请转告周恩来，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苏联提供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请求我们已经进行了审议，这些请求将被满足。

苏方将提供141.1万吨的石油产品，这些产品将在1952年3—5月期间运往中国。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和氧气设备共计1万辆(件)，这些设备将在1952年运出，每季度的供应量大致相当；关于这个问题，苏方将不提供486辆嘎斯63汽车和844辆吉斯151汽车，但将提供吉斯5和嘎斯51型汽车。

特制汽车将提供258辆，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600辆。不足的342辆特制汽车将另外提供嘎斯51和吉斯5型汽车作为弥补。

苏联贸易代表处有关于上述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详细说明，该贸易代表处被委托同中国进行接触，提供上述货物，并把其列入1952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议的结算中。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2, л.112 113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 张家口铁路(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第二，1951年5月朱德在同费德林进行会谈时表示，应该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能够找到足够的中国人建设铁路，需要苏联政府提供的是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是钢轨、枕木、车厢以及其他的设备。如果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愿意铺设这条铁路。

第三，如果您同意上述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在莫斯科或者在北京进行谈判。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2, л.114 115

No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18日)

3月18日，我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

在转达了给他的电报内容之后，我请他谈了现正在开展的报刊上称之为“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的内容。

刘少奇同志非常详细地谈了该问题：

还在整风和清理国家机关的时候，党中央就掌握了这种情况，一些在地方和中央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表现卑劣。一些人官僚主义；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挥霍国家资金，追求享乐；而有的直接窃取国家金钱或从事奸商活动，倒卖商品和建材等。当时党中央已严肃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0—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中央委托政治局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给会议提供一定的材料。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了认真研究，最后做出了决定：广泛开展同盗窃国库者、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运动。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中央和国务院为开展运动准备有关文件。出于策略考虑，提出了三反的口号。11月份拟定了相应的指示，这个问题还拿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讨论过。

与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还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从12月10日起，运动开始。

为了积累经验和使运动在高政治水平上进行，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中央机关和天津市这一运动的领导。从运动的第一天起便发现，不坚定的工作人员、思想不纯洁和没有受过充分政治教育的人染上了严重的恶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使他们滋生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各种习惯。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期，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害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有某种联系或共事。资产阶级分子的表现也有分寸，他们观察研究问题，看情形如何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民族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员还不算什么坏人，他们提倡合作，努力建立业务联系，而其中一些人不仅建立这种接触，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享乐，与资产阶级建立紧密关系。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钱投入商业和工业企业共同经营。利用这一点，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寻找、接近这部分人

的途径，他们成功地把党的一些干部和行政官员拉到自己一边。接着资产阶级便更大胆地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不坚定分子拖下水，收买他们，腐蚀他们，把他们控制在手里。

利用党政机关中各种思想麻痹的人、官僚主义者、盗窃国家资金者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如此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成了从内部颠覆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最大威胁。所以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这些初步迹象和看到很多腐化分子党龄很长、资深权重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达命令竭尽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清除党内和行政机关中所有变质分子、受贿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为了这一目的，动员起了所有党的组织，工交、建筑企业及其他所有机关的职工开展运动。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特别委员会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坚决开展了这一运动。由于做了大量工作，揭露出了一系列腐败行为；我们发现，我们党的不少重要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而且变成了真正的腐败分子、大贪污犯、骗子，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谋者。他们给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经济情报，从我们揭露出的问题看，个别人不仅将国家资金攫为己有，而且变成了奸商、投机倒把者、企业主，同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刘少奇说，我不一一列举全部事实，这些报上已经公布了。我只指出一点，在同财政经济和钱物打交道的所有国家机关里，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被揭露出存在着滥用职权、腐败、贪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原来，染指这些恶习的不仅是一般的职员和干部，而且有中央、省市机关的重要的工作人员。这些骗子已被揭露，他们有的盗窃不多，有的则高达数百万。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国民党官员(在许多机关中高达40%—50%)由于过去的习惯，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滥用职权行为。

在资历很深、身居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中，我们发现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肮脏勾当，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在人民政权机构建立初期入党的党员中，有5%—7%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肮脏勾当。被腐蚀瓦解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机关、建设单位、同物资和贸易有关的下属经营单位和机关。

这些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这一运动已接近尾声

声。

初步的总结表明，相当一部分职员是通过收取佣金被资产阶级收买的。佣金数额为购货和订货款的5%—10%。在中国，售货的企业或某一贸易组织交纳佣金似乎是合法的。所以人们按照老习惯收取佣金，不顾这样做却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其中一些人甚至这样认为，商人或业主支付佣金，在这里国家并未受损失。但他们谁也没有考虑到，他收取的这5%—10%的佣金，不是商人和业主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因为商人要从国家机关或企业那里多拿5%—10%的钱。另外，更有甚者，他们把通过收取佣金积攒下来的钱再投入商业或企业，这样他们变成了商人和业主的同伙。

另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拼命捞钱，放纵享乐，忘记了共产主义道德，走上了腐化的道路，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肆意挥霍的环境。这些人忘记了家，在外面鬼混聚居，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政治面目，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质分子。

另一部分人不仅收取佣金，还把巨额公款据为己有，盗窃国库资金，挥霍浪费。这些人成了真正的小偷，盗窃国库者，变成了奸商、各种投机倒把者和坏分子的帮凶。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央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分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分子、贪污盗窃分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分子则被枪毙。

伴随这一运动的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另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又不乐意学习，加之这一工作在党内开展得很差，他们也受到了这一恶习的侵袭，变成了与党性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他们利用党员的身份为自己捞好处，争福利。

在三反运动中，我们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在同我们的合作中追逐的是黑心的目的即发财，他们不惜一切手段获取巨额利润。

在我们面前，刘少奇说，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拒绝同它合作，开展反对它的严肃斗争？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

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他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在9.9万家工商企业以及小商小贩、手工业经营者中，有25%遵守法令，依法经营。其余75%的工商企业都不同程度的违法者，或犯有一种或两种甚至五种罪行。然后我们对这75%又进行了研究，发现近40%的工商企业不依法经营，即隐瞒自己的真正经营额。通过收买税务机关，账上做鬼，逃税漏税，即只交他们应交税款的极小一部分。不过这仅是一些小的企业和小店铺，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还不是很大。

比较严重的是中等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对国家偷税漏税，而且收买国家职员，以便对自己的活动提供方便，收买国家职员偷来的东西，替其销赃。这些人在75%中占了30%。

最恶劣的是大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隐瞒自己的经营额，而且偷窃国家巨额资金，给国家企业提供伪劣制品。例如，天津一个厂主为前线提供不合格的铁锹；武汉一家公司为朝鲜前线提供不合格的急救包，其中以染色液体充当碘酒，以最次的棉花充当药用棉；上海一家出售医疗器械的公司，通过收买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得知国家要购买一批外科手

术器械，结果这家公司把所有城市的外科手术器械抢购一空，之后漫天要价将其卖给国家。

在建筑企业里揭露出了不少坑害人的家伙，他们用最次的建筑材料修建楼房，把国家拨给的最好的材料攫为己有。这些人收买国家官员，与他们串通一气干坏事，给国家带来了物质损失。

利用我们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合作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最彻头彻尾的敌对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头面人物。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

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对25%遵守法律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给予自由，我们给他们继续经营的机会。对其余75%中犯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罪行但一般比较轻微的40%的工商企业，我们通过社会法庭和组织让他们受到惩罚；认识比较好的我们予以完全解放，其中一部分必须赔偿损失，这之后我们将给他们提供继续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比较恶劣的部分——占中等资产阶级的30%，我们让他们退回所有隐瞒部分或其中所带来的损失；还让他们交纳一定的罚金，让他们尝受社会的谴责；这之后让他们遵守法律，给他们提供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4%的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我们迫使他们补交所有的偷税漏税和其中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此外，对他们还将处以罚金，要罚到这种程度，即让他们的经营被迫完全停止。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家贸易公司有20亿，则我们罚它25亿，这一公司将被迫终止自己的经营。交纳罚金我们规定一定的期限，到期不交，则财产充公。这一部分人中最恶劣的将被我们投入监狱。根据新制定的法律，他们将被国家追究责任。

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这样，资产阶级在这期间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全部得到补偿。

按照预计，我们可为国家挽回损失2500亿，这等于是1952年我国预算的1/6。这可以弥补我们国家所有的亏损，但不能弥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但失去他们，我们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健康和巩固。

固，使我们能够更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对以上所说进行总结时，刘少奇说，我们看到，五反运动是严肃的政治运动，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对它反动的有重要影响的上层人物的打击。但运动是在五反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他们在各个党派里的代表反对和能够反对这一口号。

这一运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为什么我们能够采取这一决策？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即国民经济中的成绩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除轻工业外，主要的工业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此外，我们可以这样做还由于，在1951年期间对反革命势力、土匪实施了有力的打击，顺利地进行了土改，使全国3.1亿农民有了土地。我们还稳定了财政形势，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发动亿万群众完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人民跟着我们走。我们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在这之前我们不能进行类似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

在北京、天津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正往各大城市派遣政府工作组。从3月20日起我们将在各大城市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已收到消息，上海资产阶级已召开多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请求政府宽恕，向政府赎罪。现在他们打算，如不开展这一运动，给国家财政上交500亿，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在其他城市，运动将继续到4月和5月。全国大约有30万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受到惩处和被消灭。

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

接着刘少奇指出，在县城和农村，三反和五反运动要推迟到春播完了之后进行，而某些地区推到麦收之后进行。

在开展运动期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由于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生产财政计划没有完成。但我们相信，第二季度生产将有增长，城乡交流将会增加，1952年下半年经济将有大的增长。我们相信今年年度计划能够完成。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现在对运动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已开始抵抗。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坚决地进行斗争并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运动。

至此，刘少奇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会谈持续3个半小时。卡尔斯基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 ф.0100, оп.45, п.343, д.12, л.30-42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1952年3月20日)

副本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3月12日，日本政府从李奇微司令部获得了指令：司令部批准日本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武器，军舰和各种类型的飞机以及它们的零配件。3月14日，李奇微司令部通告日本政府关于恢复日本在其领空飞行的权利，除了军用飞机之外。

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的代表们认为：李奇微司令部的这些行动，是单方面取消了远东委员会关于禁止日本生产战争武器的决定，应该通过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的途径，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

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目前对李奇微这些行为提出抗议是不合适的。第一，在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声明了，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和为这些武装力量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苏联外交部认为，我们现在针对美国人提出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在目前的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并把这解释为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民族武装力量。最好是，当美国人向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由于对日单独和约生效而停止该机构的活动的活动时，我们的代表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并在这个声明里谈到美国人这些单方面的、破坏了相应国际协定的行动，包括部分地恢复日本的武装力量。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文本。 [42]

请审理。

A.维辛斯基

1952年3月20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198—199页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1952年3月2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1日

第125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提议：邀请由10—12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逗留期限为3周。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3, л.28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草案

绝密

关于李奇微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武器、军舰和飞机事宜。

批准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指示草案(附件)。

优先拍发

东京

致基斯连科和帕夫雷切夫：

第265项 我们认为目前对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以及恢复日本允许民航飞机在自己的领空飞行的权利提出抗议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已经发表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和生产一定种类的武器。

除此以外，我们对美国的这些行动提出抗议，不仅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在目前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苏联以及将其解释为苏联企图阻止日本拥有国民武装力量。

收到后请确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02页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1952年3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2日

第145项 关于准备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机关审议和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就该问题所提交的提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32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29日收到

菲利浦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求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知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

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1954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

面能否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6-130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1951年12月25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1000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3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25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1951年9月10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5月和6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7—8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31名专家和26名技术工人(共计57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2名机械专家、3名机械工程师，共计5人。希望这组专家在4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1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1名育种专家、3名育苗专家、4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1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4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14人。希望这组专家在5月底到中国。第三组：2名机械专家、10名机械工程师、26名技术修理工，共计38人，希望这组专家在6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清单的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第二项是数量)

1.C-80型拖拉机，77台。

2.ДТ-54型拖拉机，223台，其中带精选推进轴的拖拉机，120台。

3.Д210Б型掘根收根机，21台。

4.适合灌木沼泽地作业的ПКБ2-54型双铧犁，153台。

5.Д174-A型灌木铲除机，48台。

6.УТУГАРП-5-3-5М型的五铧拖拉机，764台。

7.密集耕种的КАП-3型耕种机，223台。

8.ЗИГ-3АГ5Т型钉耙子，764件。

9.П-3-3-П型的三铧深耕犁，252件。

10.К-6型三横梁的拖挂割草机，120台。

11.ГПТ-14和ГПТ-5型的宽幅耙子，120件。

12.ОМП-A型马达喷雾器，50台。

13.ПКБ2-54双铧犁的挂钩，76件。

14.П-3-30-П型三铧犁的挂钩，77件。

15.吉尔(ЗИЛ)-150载重汽车，60辆；嘎斯-51载重汽车，40辆。

16.油罐汽车，40辆。

17.移动维修作坊，20个。

18.在野外条件下维修30台拖拉机及其配备的农业机器所需的整套工具，10套。

19.保证在两个月内维修50台拖拉机的维修作坊的设备，或者在一个作坊内同时修理12台拖拉机的设备，6套。

20.现修和大修拖拉机的储备部件：(1)C-80，77套；(2)ДТ-54，223套。

21.带50千瓦的柴油发动机的发电机，16台。

22.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个。

23.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个。

24.润滑油(桶装)：(1)柴油机润滑油，980吨；(2)汽车润滑油181070吨；(3)拖拉机黑机油，446吨；(4)黄油润滑油，535吨。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和机器的类型；第二项是数量；第三项表示在5月3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第四项表示在7月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

1.C80型拖拉机，77，17，60。

2.吉尔150载重汽车，60，60，0。

3.嘎斯51载重汽车，40，40，0。

4.油罐汽车，40，40，0。

5.移动维修作坊，20，10，10。

6.带50千瓦柴油机的发电机，16，16，0。

7.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10，0。

8.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120，0。

附注：附件一中列出的其余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及附件二中没有列出的机器应该在1952年7月1日之前供货。

润滑油供应计划(形式是：第一项为名称，第二项为总吨数，第三项为在3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第四项为在11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

1.柴油机润滑油，980，490，490。

2.汽车润滑油18，1070，535，535。

3.拖拉机黑机油，446，223，223。

4.黄油润滑油，535，267，268。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2-123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 (1952年3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1日

第190项 外交部的問題。

批准给驻华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向他通报，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处得到的消息，在地方当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盗窃斗争的运动之际，在伊宁地区有一些敌视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坏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个措施。这种现象反映在：在公开的集会上，他们向当地苏联公民中的某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公民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

鉴于此，请问问一下：中国朋友是否认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防止各种反动分子利用伊宁地区进行集会的机会，从事针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曾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的当地苏联公民的活动。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93, л.45、96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1952年4月2日)

密电，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X〉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X〉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2-3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 (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 [43]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

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1952年第四季度和1953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5-6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1952年4月5日)

(译自中文)

对苏联领导社会主义农业若干问题的咨询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土地实现了国有化。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人的土地都已国有化了？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已国有化了呢？列宁在1920年7月20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为农民保留土地，只是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时才没收他们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当时并没有被没收。

土地没收后是否就为农民平分土地呢？

二、共耕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劳动生产队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否有像我们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组织形式？

四、在苏联的农业中现在是否有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以外的其他的组织形式？如果有，那么叫什么？其内容是什么？

五、加入集体农庄时要不要交费？如果要，那么根据什么标准交费的？

六、国家根据什么标准向集体农庄提供所必需的土地？是根据居民的数量还是根据劳动生产率？在集体农庄需要增加土地的情况下，国家会向集体农庄提供土地吗？

七、在集体农庄里，农庄庄员的劳动成果是怎样分配的？在体力、性别、年龄和技能等级上都不同的劳动者，其报酬有没有差别？

八、集体农庄对红军(苏军)军人、年迈者、弱者、病人和残疾人家庭的供给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汽车拖拉机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

十、汽车拖拉机站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如何？

十一、集体农庄的年收入和支出分配比例如何？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大部分？

十二、进出集体农庄自由吗？

十三、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相互关系如何？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哪些机构实现这一领导的？

A.科祖博夫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47—2148页

No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2年4月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 [\[44\]](#)：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被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

结束。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РГАСПИ , ф.558 , оп.11 , д.343 , л.8-9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第45077号，1952年4月14日

你们提出的关于替换洛博夫同志所率领各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应作如下修改：

1.应在今年6月1日前替换第六十四军所属机关，而非你们所建议在5月1日前。

2.根据今年的时间安排，每隔4—6个月对该师各航空师进行替换较为合理。

3.对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中的高炮师和探照灯团的替换可能不会早于今年10月1日。

关于与国家防空部队司令协商和共同制定的洛博夫同志所率各部队的替换计划，你们最迟必须在今年4月25日前向总参提交如下给政府的报告。

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等同志报告，近期美国空军在我空军驻防机场附近的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F-86歼击机来缠住我米格15B机群并对我机场实施封锁，以确保其强击机在战区的活动。敌人所实施的这一战术之所以经常得逞，是因为我军所在的安东和庙沟机场距离朝鲜湾有8—14公里，敌机能够从空中很清楚地看到我空军的活动。

虽然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掩护，但从朝鲜湾方向高速俯冲而来的美国飞机仍能对我正在起飞，尤其是已完成战斗任务而燃料即将耗尽的正在降落的米格15B飞机发动攻击。如果这些发动攻击的敌机遭到我军反击，美国人又会立即向朝鲜湾方向撤退，而其飞回那里总共也只需30—60秒，但我们的飞机根据规定是不得飞入朝鲜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追击飞机被击毁或击伤，飞机和机组人员将落入敌人之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敌人掌握了海上的制空权，而朝鲜湾很多地区都很狭窄，敌机一天内便可轻松抵达。

还应报告的内容包括：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5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F 80和F 84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F 86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沈阳和安东地区部署的10个歼击航空师中实际能与美国空军作战的只有2个师。正因为此，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在战斗中均能在兵力上优于我方，而我们的飞行员则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25, л.13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 (1952年4月17日)

机密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今年4月10日发送的第536号电报中报告说，一些部对苏联部长会议在1951年12月8日做出的关于派遣专家到中国工作的第4991—216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应该向中国派遣共计103名专家。其中73人已经到了中国，14人委员会已经决定把他们派往国外，5人正在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11人正由相关的部和部门挑选(附名单)。

在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往国外的14名专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国的签证，并且近期他们将前往中国(名单附后)。至于11名尚未挑选的专家，已经从相关的部得到证实(苏联农业部和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除外)，这些专家将在1—2周内完成挑选(名单附后)。

苏联外交部也在采取措施，尽快向中国派遣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出的14名专家，并加快尚未选定的11名专家的挑选工作。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上述电报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无论是在一些部应当派遣的专家的数量方面，还是在已经派往中国的专家的数量

方面。比如，上述电报指出，黑色金属部应当向中国派遣15名专家，但是根据上述提到的决议，应该派往中国的是13名专家。电报中通报说，轻工业部没有向中国派出一名专家，但是实际上该部早在今年2月27日就向中国(哈尔滨市)派出了3名专家。

苏联外交部将让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做出必要的解释。

维辛斯基

1952年4月17日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2月8日关于相关部门

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决议履行情况的报告

(拟定日期1952年4月15日)

序号	部门名称	需要派遣人数	前往工作的人数	委员会已决定人数	委员会正在办理	尚未挑选人数
1	煤炭工业部	2		1		1
2	重工业建设部	4	1			3
3	有色金属部	6	4	1		1
4	电力部	4	2	2		
5	轻工业部	3		2		1
6	电力工业部	3	1		2	
7	卫生部	9	6	2		1
8	河运部	1		1		
9	财政部	4	4			
10	交通部	8	7		1	
11	汽车拖拉机工业部	2		1		1
12	高等教育部	13	12		1	
13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	2	1			1
14	农业部	4	3			1

续表

序号	部门名称	需要派遣人数	前往工作的人数	委员会已决定人数	委员会正在办理	尚未挑选人数
15	黑色金属部	13	9	3		1
16	内务部	1	1			
17	国家计划委员会	3	3			
18	国家保障部	1	1			
19	国家银行	3	2	1		
20	轻工业部	4	4			
21	地质部	2	1		1	
22	机器和仪器制造部	1	1			
23	中央统计局	1	1			
24	贸易部	2	2			
25	运载汽车建设部	1	1			
26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设委员会	1	1			
27	机器制造部	4	4			
28	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	1	1			
总计	103	103	73	14	5	11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7, л.65-68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 (1952年4月22日)

发自北京，1952年4月22日19时1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能够装备15个航空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22-23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副本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1.正如4月28日所了解的那样，对日单独和约生效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将停止存在。鉴于此，出现了一个关于苏联在该委员会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联共(布)中央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于2月24日给我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了指示：不能表现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不应该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于日本人。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声明，没有表明它是否打算采取措施，

鉴于单独和约生效而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本政府代表至今只做出了一个声明，说正在研究苏联代表处的地位问题。根据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通报(发自东京的第371号电报)，国务大臣冈崎胜男于4月23日最后一次在国会里发表了这种声明。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冈崎胜男说：“至于说到苏联，那么，与它关于互换代表的谈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它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由于解散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此处理这个代表处的问题。”

2. 尽管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完全表明，它是否打算对苏联代表处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不能排除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代表享用外交官的特权，尤其是使用密码通信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委托基斯连科对类似不合法的行为向吉田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单独和约，而我们不承认这个条约的法律效力。在给基斯连科的信中，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应该指出，苏联代表处的地位不应该有任何改变，因为它的法律基础是由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各国在对日方面的其他协商一致的决议确定的。

鉴于基斯连科同志收到的来自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通告说，自单独和约生效之时，外交公使团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停止使用无线电台的指示，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

3. 由于可能出现以下意外：借口失去了外交特权而对代表处进行搜索，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军事部在今年3月24日，已经指示基斯连科同志销毁代表处里多余的机密文件和密码，仅保留与莫斯科进行紧急联络所必需数量的密码，并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警察的手中。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 [45]

请审批。

A. 维辛斯基

1952年4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51—253页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副本

绝密

鉴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停止活动和我们在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阐明以下意图。

日本政府在关于妥善解决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采取观望的立场。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代表处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尽管日本的某些官方人士声明说，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公使团就没有理由留在日本了。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日本的统治阶层里以及在实业界里，追求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的官方代表也做过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期待着我方的倡议。例如，5月6日，日本外交情报局局长宫崎章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

“日本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不包括和平条约。日本已经与其他一些国家恢复了这种关系，它们也不同意和平条约，没有在旧金山会议上签字(指印度，意大利)。”

在国会里回答这些问题时，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在5月7日声明说，日本将向苏联建议“通过友好国家”解决一系列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在他看来，“苏联也希望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5月15日，吉田首相在国会里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正在就苏联外交使团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回答可能解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他补充说，“共产党国家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任何建议”。在吉田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几家报纸，例如《日本经济新闻》，也援引了

日本外交部的声明说，关于苏联公使团问题的谈判将在近期内开始。根据《共同社》电讯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打算通过瑞士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苏联代表处的问题。

通过日本实业界，对和平解决苏日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探测。5月5日和6日，日本商贸公司的代表拜访了贸易代表处负责人多姆尼茨基同志，他们在与多姆尼茨基同志进行会谈时，通报说，在日本流传着关于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已经抵达的传言以及日本外交部期望苏联提出和平的建议，日本外交部已经挑选了一批商业工作者，在互惠的条件下派往苏联，如果和平条约谈判开始的话。

考虑到以上所述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适宜的是，让我们在日本的代表不要回避与日本官方代表的接触，为此可利用各种理由。目前可成为这方面理由的是：鲁诺夫同志拜会日本外交部相关司的政治顾问，以解决某些业务问题。

在发自东京的电报中，基斯连科同志谈到我们在日本代表处的不正常地位和作为被解散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成员所处的境地，提出了关于把他从日本召回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认为，目前召回基斯连科同志是不适宜的，因为他的离开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利用作为提出在日本的苏联代表处其余工作人员离开的借口。关于基斯连科同志离开的问题，应该视所形成的情况稍晚些时候再做决定。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指示，指示草案附后。 [46]

A. 维辛斯基

1952年5月17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3—264页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

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草案

绝密

认为基斯连科同志离开日本返回苏联是不适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通报基斯连科同志，他奉命留在日本，一直到指示下达之前，同时还应该指出，从基斯连科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得神经紧张，他应该更多地表现出耐心和镇定。

致A.H.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1952年5月19日批准。

请求签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6页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李京文(Ли Цзенвень) [47] 在同苏联电影进出口公司驻中国全权代表斯特罗伊捷列夫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部领导人非常关注对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所进行的研究，为此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进来。在对该片进行审查的时候，就该片在中国的译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意见，为了使外交部了解这一点，文化部已经向他们作了通报。在外交部两名副部长对该片进行审查时候，又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并且被提交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反对就该部影片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情节提出的意见，因此，关于对该片进行中文配音的问题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4月16日该片被提交给毛泽东同志审议。

后来就该片提出了如下三点“不足”：

“1.影片中涉及中国的一些片段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没有支持英国人针对俄国人民代表的那些阴险的诡计，因为当时全中国的人民，其中

包括中国的封建地主，都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仇恨。当时中国也没有像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俄国人民表露出任何敌意。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会伤害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并且会被英美势力利用，来反对新中国和苏联。

2.影片中展现的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现实的。当普尔热瓦利斯基受到了朝鲜人和蒙古人的友好接待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代表无端地对他表示了敌意。一名中国士兵毫无根据地对叶戈罗夫说，‘俄国人和中国人是兄弟’，这句话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塔舍列夫通过镜头向一位中国姑娘解释‘莫斯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的时候，这位中国姑娘听到这个词语后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情节不符合事实，它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强调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饱受屈辱的、不识字的、毫无地位的中国姑娘应该怎样更加自然地表现自己？她能否理解‘莫斯科’这一词语的意思？任何一位中国观众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何况在当时‘莫斯科’这一词语还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意义。

普尔热瓦利斯基下令用大米供养中国的孩子，他的这一友好的和入道主义的姿态不能体现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观众将会把这一姿态看作是一种小恩小惠，帝国主义者经常会采取这种手段，来尽力掩盖其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

3.影片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片段有损中国人民的尊严。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在昂帮(Ам-бань)府邸的大门口，当一些中国农民跪着，对他们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行径表示反对的时候，站在他们前面的一些官员一下子抓住了跪在前面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摧残，而中国人居然没有进行有力的反抗，这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有违历史的正义。在普尔热瓦利斯基来到中国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明，中国的农民是有能力组织起来反对封建地主的。但是影片却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把中国人民贬低为一群默不作声的、无助的、无组织的人。

当普尔热瓦利斯基作为一名陌生人出现在朝鲜的时候，警觉的朝鲜人在迎接他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后来他们得知普尔热瓦利斯基是朝鲜人民的朋友，随后向其讲述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同外国干涉者进行的斗争，其中包括同美国人进行的斗争。

中国的观众完全会发问，为什么在关于中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影片表现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呢？此外，在影片中，中国人民的代表竟然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中国观众会问，为什么在影片中朝鲜人和蒙古人都是穿着如此好的衣服，如此的富足和欢快，但是中国人却是低下的、肮脏的、衣衫褴褛的和饥饿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总是尽量把中国人民当做是贫困无知的，以便为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辩护，好像殖民政策会使殖民地人民富裕起来，使他们更加有文化一样。对于影片把中国人民描绘得如此悲惨，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报告”提出了三点结论：文化部领导人感到疑惑和愤怒的是，影片的导演尤特克维奇没有接受早在该部影片拍摄之前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很显然，尤特克维奇尚未摆脱形式主义，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在苏联是应该公正地遭受批评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尤特克维奇是不信任的。

李京文还通报说，中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大使在发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报告说，“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消极的。这些大使们反对在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放映这部影片。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小组，在从莫斯科写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中对“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中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这些大学生在信件中断言，这部影片的放映会给苏中友好带来伤害。

格里戈良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9, л.193-195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第48321号，1952年5月27日

兹报告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现状、提高该军作战能力的举措及其所属各师的换防等情况。

我们已于今年4月23日至5月17日间对该军的作战工作、各航空师现状和近期损失增加的原因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为此目的，我们曾于今年4月21日派遣苏联空军副司令、空军中将阿卡里佐夫同志、国家空防歼击航空兵司令、空军中将萨维茨基同志和国家空防高炮部队司令、炮兵中将高洛霍夫同志去了洛博夫同志那里。这些人已于今年5月19日从洛博夫同志处返回。

在分析了形势和直接研究了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之后，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就地采取一些措施，以消除我歼击机各师作战行动中的缺陷，并准备在返回之后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结论和意见，以便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了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歼击机师作战行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具体内容如下：

——在作战行动的战术上墨守成规。在敌人已改变战术，转而使用小规模机群作战的情况下，该军和各师级指挥员却不对我们歼击机部队的战术进行相应调整，还是经常以团以上、师以下的大规模机群模式出击，从而导致这一时期我空军在空中的歼击机数量明显劣于美军，作战效率低下。大机群以密集队形投入作战时，飞行中往往只能有少量机组可顺利对敌实施攻击。另外，我歼击机在各个高度都受到了敌歼击机的钳制，因而根本无法突破至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

——很多团级指挥员不参加实际战斗，不熟悉敌人和自己部队的作战性质和作战条件，从而导致其只能根据普通飞行员的判断指挥战斗，在下属中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

——军指挥员对我空军的夜间作战行动缺乏组织和领导。

——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高炮部队对我空军所在机场和基地的掩护存在漏洞。

由于上述不足，该军近3个月来共损失米格-15B飞机48架和16名飞行员，其中23架飞机和7名飞行员，即近50%是被美国歼击机在我机场上空击毁的。

由于作战任务过于繁重，很多飞行员因病不能正常出勤。

为改善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的作战状况，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当即提出了以下措施：

——与各航空师飞行员详细分析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部队的行动战术。

——指示我歼击机飞行员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以双机和分队为单位的参战频率。因此，我歼击机群已可突进到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并击落敌机。

——改善我飞机起降的组织和安全保障工作。

——各歼击机团级指挥员开始参加本团战斗。

——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我空军夜间起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

——规定每个飞行员一天之内战斗起飞不得超过2次。

为提高我歼击机针对美国空军的作战效率，根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中的许多飞行员由于已连续完成了80—90个战斗飞行任务，身体已相当疲劳。因此决定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今年4月抵达沈阳地区的第一三三航空师替换该师。而后者则作为第二梯队进驻鞍山和辽阳机场，担负我安东地区2个空军师的掩护任务。

由于敌机尚未进入沈阳地区，我空军目前在这一地区并未驻扎部队。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将于7月份撤回苏联，替换他们的将是巴库地区的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由来自旅顺口的第三十七航空师替换，时间为1952年6月15日以前，而前者将进驻旅顺口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师更换驻地。

3.在替换飞行员的同时，上述各师所属的技术保障部队的替换也同时进行。

4.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一六、第三十七

和第一三三师)都有两组飞行员。第二组飞行员应由国家防空和空军歼击师调配。

5.该军每个师平均都有10—12架备用米格-15B飞机。

6.为了加强对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所驻机场的高炮掩护工作，我们将于今年6月调遣负责朝鲜境内南市和泰川等地区掩护任务的我第八十七高炮师进入安东和庙沟地区，担任这里机场的保卫工作。

7.为加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指挥部的人力，增强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决定从国家空防和空军司令部抽调训练有素军官来担任该军指挥部内相应的领导职务。

8.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师配备超短波联络装置。因为目前该军只有第九十七歼击机航空师有该通讯装备，从而导致各师之间在空战中无法组织直接的战斗协作行动。

9.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配备“潜望镜”雷达和“白蜡树”指挥装置，但按规定此类装备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10.通过我国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 [48] 总司令提出如下请求：

——为了给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战斗行动创造条件，请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3个带有水泥跑道的机场，以便喷气式歼击机起飞。第一个机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应在7月份，第二个在9月份，第三个在今年底。

——中国歼击航空师应积极行动，配合我空军各师，并参加在朝鲜和安东地区的战斗行动。

11.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说，我米格15B在武器、拉升速度和水平速度上均略胜于美空军的F-86歼击机，只是在飞行距离、滞空时间、水平技术动作、俯冲和射击瞄准方面不如对方。

我飞机配置的BK-1型发动机很少出现故障。由于飞机结构设计方面的局限，使我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不能充分发挥，输出功率时常不超过45%。在作战条件下，飞行员也只能使用发动机最大功率的80%以上。因此，我们应对飞机的结构重新加以设计，以期增加发动机在最大功率

下的工作时间。

上述关于米格-15B飞机和BK-1发动机的意见，目前正由军事部与航空工业部及总设计师共同研究。就这一问题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将在两周内向政府提出报告。

我们将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并请您审查和确认。 [49]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日加列夫

副本已于1952年5月28日发给Г.М.马林科夫、Л.П.贝利亚和H.A.布尔加宁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28-35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绝密

摘自列多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1952年6月2日

第оп6008号

在1952年5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高岗对列多夫斯基同志说道，5月26日通过非官方的私人途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得到通报说，中央决定解除他在东北担任的职务，并调入中央工作，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似乎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不足，必须加强中央机关的领导等等。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北京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人对他不怀好意，决定惩罚他关于农民问题发出的激烈的言论，惩罚他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高岗补充说，对于他对苏联以及在东北工作的苏联专家非常友好的态度，刘少奇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满的。关于这一问题高岗提到了1950年发生的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肖像的政治事件。

高岗说，刘少奇及其亲近的朋友——彭真、薄一波、李立三、李富春等人早就决定解除高岗的东北地区领导人职务，使他起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千方百计地在实际工作中寻找途径。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同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会谈中，这帮人曾多次就中央某些“高级职位”委婉地向他提出建议。高岗说，每次他都委婉地拒绝这样的建议，因为他明白，为了不让他再从事重要的工作，这些人想让他担任一些名称很响亮的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的高级职务(高岗强调说，让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长期处在由高岗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解放区)，而实际上这是徒有虚名的职务。

高岗说，像以前一样，现在他仍然被提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一职位上，他(高岗)将无事可做。高岗说，他不愿做这一工作，并将请求允许他到国土部或者水利部工作。他补充说，这些部门的业务他很熟悉，他将会更为平静地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并将使自己有机会更加深入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高岗的话来说，他也会同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会使他有机会“到全国多走走、多看看”。

高岗指出，他认为不应让他到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领导机构工作，因为在这些机构他将不得不遇到在这些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其中高岗指出了军事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他补充说，以前他曾拒绝到这一机构工作，如果这次再提出这一建议的话，他仍要拒绝，因为实际上不会让他领导军事工作，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和不足的责任都会被推到他的身上。

高岗说，他的职位暂时由他现在的副手林枫担任，林枫曾是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刘少奇现在对他是完全信任的。高岗认为，他以前的副手李富春今后将会被安排担任东北地区的领导人。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他调离东北之后，东北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将会有重大调整。

高岗在谈话的最后指出，关于调离东北的正式通知他还没有收到。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决定或许会在他到北京的时候通知给他，6月2日他将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补充说，中央可能会因他自己的朋友——林彪、陈云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而重新审议这一决议，但高岗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补充说，毛泽东更加相信刘少奇和彭真。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中央的领导机构中主要由两大派别。其中的一个集团是刘少奇、彭真、李立三、李富春、饶漱石。用高岗的话来说，周恩来与这一集团走得很近。高岗对饶漱石的看法非常消极。其中包括他强调说，饶漱石是“书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得不够。用高岗的话来说，这一集团的人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他获得支持的另一个集团的人员组成中，高岗举出了林彪、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高岗对朱德的评价也很好，但他强调说，朱德很消沉。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清查指导员

瓦拉金娜(签名)

1952年9月24日

АПРФ, ф.495, оп.225, д.20, л.79-81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为了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长会议兹做出如下决议：

一、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日加列夫和戈沃罗夫等同志)：

1.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用第一三三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作为第二梯队撤至鞍山、辽阳等机场，担任我驻防安东地区机场各歼击航空师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的掩护任务；在1952年6月15日以后再以巴库地区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替代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2.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旅顺口边境地区空防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

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则改驻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原驻守的旅顺口地

区。

3.在全体飞行员被替换的同时，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所属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也随之一起替换。

4.在派遣过程中，第二一六和第二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在苏联境内时着苏联军服，但当到达中国时将一律改穿中国军装。

5.为第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配备两套飞行员班子，必须于1952年7月15日以前完成配备工作。

所需人员均从苏联空军各歼击航空师和国家空防各歼击空军师调拨。

6.为第三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各配备12架备用米格-15B飞机。

7.规定上述部队的飞行员在洛博夫航空军不超过6个月。

8.在1952年6月10日以前将第八十七高炮师从朝鲜泰川和南市地区调往东北安东和庙沟地区，以加强对洛博夫同志航空军下属各部队所驻机场的掩护。

9.从空军司令部和国家空防司令部调拨经验更加丰富的军官担任洛博夫同志航空军指挥部的领导职务，以增加其司令部中的高级指挥员数量，加强其作战指挥能力。

10.于今年6月为洛博夫同志航空军配备一台“潜望镜”雷达和一台“白蜡树”指挥调度设备，但其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二、根据此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飞行员均可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2月16日第4949—2147号和1951年9月1日第3237—1537号相关决议所规定的标准享受给养津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No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绝密

第2份

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7日第1508—524号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乌兰巴托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上述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1.中国政府保证：以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设从蒙古边界到北京的联络路线；为在二连浩特和淮德(Хуадэ)站点的高频信号加强站提供场所或者建设场所，并为在上述站点工作的苏联专家提供住所；为中国境内的线路和站点提供技术服务并予以保护。

2.苏联政府保证：为高频站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装备；完成高频站点的装配工作；苏联专家为这些站点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还应向中国政府作如下通报：中国政府可以使用高频站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持联系。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了上述第1项条款中的条件，但是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高频线路以及在北京的高频站、在二连浩特和淮德的分站都归中国政府所有；要求在北京的高频站不要设在苏联大使馆内，而是设在中南海(在北京地区，政府所在地)，同时敷设到苏联大使馆的线路，以便在高频站工作的苏联专家可以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规定的条件在中国工作，并且使他们除了在高频站工作之外，还可以培训中国的专家。

国家安全部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如下建议：关于高频站设备的出售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有权使用这些高频站、有权用其训练中国专家的问题，因为同北京的高频联系将会被纳入到总的政府高频联络网中，并安装特别的设备，这对苏联来说是国家秘密。

中国人提出的如下建议也不可接受：让高频站设在中南海。他们的考虑是利用这一线路进行秘密活动，同时不暴露自己的秘密机构。

苏联外交部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并建议不再主动讨论这一问题。一旦中国政府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外交部将另外提出自己的建议。

请审议。

维辛斯基

1952年6月2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7, л.92-93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专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

我希望，这4名专家能够在近期被派往北京。一旦工作完成，他们就可以返回苏联。

请您考虑他们到北京出差的可能性，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52年6月24日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43, л.51-52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第48852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向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发出如下命令：

1.为替换目前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自1952年7月10日24时起从空防巴库地区就地发运苏联空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师机关、3个歼击航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所属后勤保障部队。

该师共有飞行员120人，其中28人为后备飞行员。飞行员缺额由国家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之飞行员补充。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全体人员最迟必须在今年7月15日以前经铁路用客车发运至沈阳，归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洛博夫同志指挥。该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年8月1日。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2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3.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32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32师全班人马。

——部队的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及时确保该师所有飞机和专列顺利通过国界。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人员均须将自己在到达国境线之前旅途中所发差旅费、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人员在到达国境线之前的饮食由所在列车的餐车组织供给，出了国界之后将由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负责安排。

4.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责成苏联空军总司令从国家空防各歼击航空师中为其抽调16名飞行员。

5.最迟于今年7月7日前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责成苏联空军司令：

1.自今年7月10日24时起在国家巴库空防区就地发运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在沈阳地区集结后即编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全体人员均改着中国军装。

3.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自今年9月1日起退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建制，并发往巴库空防区。

4.根据该指令，就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各师在替换过程中应继续保持战备状态，以便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责成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和苏联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的情况。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25, л.15-18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第48853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命令：

1.为替换正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根据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洛博夫同志的指示将用铁路发运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所属师机关、3个歼击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后勤保障各部队。该师共有飞行员120名，其中28人为备用。

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超过今年7月18日。

另外，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从边防空军部队的各歼击航空师中再为其调拨32名飞行员。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0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2.于今年8月15日以前撤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并将之并入第五十四航空军，部署地区为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原驻防的滨海地区各机场。

3.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第一四七歼击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三十二航空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三十二航空师全班人马。

——部队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国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之人员均须将自己的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该师全体人员在旅途中粮食供给均可得到保障。

4.根据该指令，就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5.责成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情况。

6.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25, л.21-23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格里戈良同志：

兹向您送上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请求信的文本，该请求信是戈宝权在今年7月2日拜访苏联外交部时提交的。

请求对如下内容进行通报。

维辛斯基

1952年7月4日

附件：

“由于必须调整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以及中共各地方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决定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特别的培训班，以便培训关于档案工作的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不要推辞，通知各加盟共和国联共(布)，联共

(布)中央将向中国派遣一名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担任教师，为期2年。该专家将列入今年下半年中国邀请的教授和专家的名单。

莫斯科，1952年7月2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945，л.215-216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4日13时2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

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有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

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

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的电报附件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

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电报按下列格式拍发：名称、已订购数量、1952年8—9月运到数量、1952年10—12月运到数量)：

一、弹药(单位：发)

- 1.152毫米全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8000、8000、无。
- 2.152毫米减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2000、2000、无。
- 3.122毫米杀伤榴弹 159000、76320、82680。
- 4.122毫米杀伤爆破榴弹 78500、37680、40820。
- 5.122毫米空心装药榴弹 12500、6000、6500。
- 6.85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150000、70000、80000。
- 7.37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2120000、1000000、1120000。
- 8.107毫米杀伤爆破迫击炮弹 20000、10000、10000。

二、炮兵用润滑油(单位：吨)

- 1.加农炮油(ГОСТ3005 45)40、20、20。
- 2.枪油(ГОСТ3045-45)60、30、30。
- 3.炮弹油(ГОСТ4113-48)10、10、无。
- 4.21号油(ГОСТ3258-46)20、无、20。
- 5.12号油(ГОСТ3334-46)6、6、无。
- 6.衬管油(ГОСТ5078-49)5、5、无。
- 7.锭子油(ГОСТ1642-42)20、10、10。
- 8.索立多尔(炮兵专用、不锈)20、10、10。

三、其他器材(单位：件)

- 1.1939年式85毫米高炮平衡机弹簧 270、135、135。
- 2.1938年式76.2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100、50、50。
- 3.1939年式37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600、300、300。

4.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身 500、250、250。

5.步兵武器整套量规和仪器(发往中国的每种步兵武器)各10套、各10套、无。

毛泽东

1952年7月4日

第194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55-57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B.M.莫洛托夫同志：

一、中朝代表团1952年7月3日就朝鲜和平谈判提出的新建议涉及到战俘问题。

在7月3日会议之前，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坚持自己在战俘问题上的如下立场：

“我们建议，在遵守我方3月21日提出的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就关于协调进行遣返的具体条件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一)应遣返现处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中的联合国军的全部非朝鲜籍战俘及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遣返现处在联合国军中的非朝鲜籍的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及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

(二)应遣返现处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而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以及处于联合国军中而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但希望回到自己原驻地各地区者除外，这些人不必遣返。”

上述建议包含在朝中方面于1952年3月27日参谋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处理原则的协议草案中(1952年5月10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3页)。

1952年7月3日，朝中代表团团长南日将军提出了关于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南日7月3日声明要点归纳如下：

南日宣称，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你方对战俘名单的审核结果不符合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我们始终认为，由于双方保证根据第52条之规定，战俘在遣返之后不参加朝鲜战争，双方战俘“只被允许回家过和平生活”，所以，双方战俘应分为不同类别，战俘名单根据国籍与居住地加以审核。这将简化全部战俘的遣返工作，如同第51条之规定，即被任何一方所俘的外国的(联合国军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人员均应全部遣返；被任何一方所俘的朝鲜的(南朝鲜的和朝鲜人民军的)军事人员，其居住地在对方所辖各地区者，均应全部遣返，而其居住地在俘获方所辖各地区者可允许直接回家，无需遣返(1952年7月4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7—20页)。

这一声明是南日根据所接到的毛泽东的指示做出的，指示内容拉祖瓦耶夫同志已在2118号电报中通报给我们。

二、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如下，即自3月27日至7月3日，中朝代表团坚持签订停战协议后：

(一)非朝鲜籍战俘应全部遣返；

(二)居住地在敌对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自己的居住地；

(三)居住地在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留在这个地区。

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建议，主张朝鲜籍战俘均应回到其居住地，不考虑其本人的愿望。

中朝方面在非朝鲜籍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仍维持不变。

因此，中朝代表团的新建议仅涉及朝鲜籍战俘，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

1952年7月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4卷，第1876—1880页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 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1952年7月17日18时45分发出

1952年7月17日20时50分收到

致A.M.华西列夫斯基同志、A.Я.维辛斯基同志：

呈报金日成1952年7月16日给И.В.斯大林同志的信。

拉祖瓦耶夫

1952年7月17日

第2250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

致尊敬的大使同志，请您告知И.В.斯大林同志下述电文内容：

亲爱的И.В.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报告下述情况：根据对朝鲜状况的总体分析，不排除停战谈判有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6000多人。

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当然，中国朋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然而，为了避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遭受苦难和过多不该蒙受的损失，我们

必须安全地掩护好最重要的设施并转入积极行动。为此希望最好能做到：

一、加强高射炮防御。为此根据我们的估算，需要获得10个高射炮团的补充武器(其中3个团的中口径炮、7个团的小口径炮)。最好能由中国同志提供一半，而朝鲜人民军5个高射炮团的武器则直接从你们那里获得。

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要积极进行夜间战斗。在白天需要由歼击机航空兵掩护北朝鲜，至少掩护到平壤一线。朝鲜人民军空军准备好随时开始积极战斗。此外，近期内有40名图2机组飞行员在苏联完成学业。希望这批飞行员能同图2飞机一起抵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使它们能立即投入对敌方重要设施的积极战斗。

三、进行一系列触动敌方要害的地面战役，以引开敌空军对我后方的行动，并对开城谈判进程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按照我们1952年1月10日照会、1952年7月9日照会以及1951年10月6日照会上对1952年的申请，近期内我们非常需要从你们那里获得你们可能供给的技术装备和材料。

四、同时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改变地面及空中战斗行动的性质，将会对敌方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相应的影响。

相同内容的电报已拍发给毛泽东同志。朝鲜人民无限感激您曾经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无私援助。

我们等待您对上述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祝您为了进步人类的幸福而健康长寿！

致深切的敬意！

您的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于平壤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8, л.65-68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40-43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50] 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 [51] ”

第303号密电

执行情况请电告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69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89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 (1952年7月18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18日12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

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

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

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

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

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

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

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谢您。

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江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江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二、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

(一)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

(二)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

(三)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三、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第2084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72-75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90-93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10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菲利波夫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76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第2527号，1952年8月5日

兹报告：

应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委员会的委托，我们仔细研究了关于将海军部歼击机航空团全体飞行员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的问题。 [52]

最终决定：在不带飞机的情况下将1个团——海军第五舰队(来自海参崴)空军第七歼击航空师第五七八团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

所有飞行员将由洛博夫部队的飞机空运。

该团人员构成如下：

12名团指挥部行动小组成员和4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团长、所有中队长和分队长。

该团的发送工作将于今年8月20日开始进行。

库兹涅佐夫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34, л.7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54-72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由于武器装备部第9号工厂停止了钻铤的生产，乌斯季诺夫同志请求撤销武器装备部对钻铤的出口，同时责成有色金属部在1952年第3季度向中国提供55个六又五分之八型号的钻铤，其中6个是带钻头的，费用从石油工业部储备金中支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武器装备部提出的建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佩罗夫

1952年8月9日

No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今天18时，我会见了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是来我这里做礼节性拜访的。

会谈开始周恩来说，从1950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变化；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谈到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强调，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在稳定经济和财政形势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去年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到1952年底，国家预算将出现顺差。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工业建设，土改接近完成，正在兴修农田水利。

同时，周恩来强调了苏联、苏联人民、联共(布)和斯大林本人所给予中国援助的特殊意义。周恩来说，没有苏联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便不可能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取得和平建设的成就。周恩来指出，斯大林同志为中国取得历史成就起了伟大的作用。正是他的英明指导，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此期间，它从未放弃过最强大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关于人民和革命一定能战胜敌人的科学论断。周恩来指出，依靠这些武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危害和平与民主国家阵营命运的任何敌人。

与此同时，我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了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杰出贡献，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新解放和独立的国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还指出了我们友谊的重要性，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好合作。

然后，周恩来问我他对他在8月18日与费德林同志会谈中所陈述的原则有什么意见。我说，我看了这些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表示，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希望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随时准备同他会面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马列、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

维辛斯基

АВІРФ, ф.0100, оп.45, п.342, д.9, л.6-8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 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第49544号，1952年8月19日

兹报告：

洛博夫同志提议，为了我军顺利完成战斗任务，有必要在凤凰城—辑安沿线建设2—3个新机场。

目前在大孤山、安东、凤凰城和庙沟的4个机场中驻扎了6个歼击航空师，其中有我们2个，中国空军师4个。这非常有利于我军兵力和作战行动的展开和实施。另外，其中三个机场直接临近朝鲜湾。美军歼击机经常从该地区向我发动空袭，而我飞行员却根据相关指令不得到达那一地区。

鉴此，我认为洛博夫同志的建议是合理的。我请您允许，通过我方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军事司令部 [\[53\]](#) 提出请求：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两个适合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带水泥跑道的机场。

索科洛夫斯基

手写批注：

转交B.Д.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同意。

布尔加宁

1952年8月20日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34, л.2

No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54\]](#)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并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斯大林感谢周恩来，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告知，近两年来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并说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斯大林指出，许久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1939年有150万党员，现已将近600万，尽管我们限制接纳党员，但党仍然在发展。

询问代表团旅行情况。

周恩来感谢关照，并回答说，旅途十分顺利，途中代表团得到了一切方便条件。他代表毛泽东为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事业和对敌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援助，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斯大林：不必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状况，难道中国同志不帮助我们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虽然给予援助是应当的，但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我们也应感谢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给我们提供橡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援助，我们也必须感谢中国。

周恩来说，遗憾的是，中国给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你们执政晚，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允许说明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提到毛泽东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的电报，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年的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并指出，正在准备书面报告。中国代表想在提交书面报告后汇报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延长旅顺口协定。

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

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并建议互换照会。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相应请求。

下一个问题是建设从乌兰巴托到蒙中边界的铁路。

斯大林问，中国对这条铁路是否感兴趣？

周恩来指出，新疆的铁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中国政府打算首先建设在蒙古方向出境苏联的铁路。在中国境内铁路长约350公里。预计在1955年6月以前完工。这条铁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打开沟通苏联的直达铁路线，便于从苏联向中国接运工业设备以及向苏联运输中国商品。

斯大林指出：新疆方向从长远目标看是极其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如果中国同志有意修建经过蒙古境内的铁路，那么我们准备从自己一侧援助蒙古境内的建设。这将更快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放弃新疆方向，因为这是一条穿过含油地区的极其重要的铁路。在中国境内肯定会有石油，而蒙古缺少石油。

周恩来指出：在平地泉 [\[55\]](#) 地区有许多铁矿，而且这里将是炼铁和铸钢工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建设新疆铁路的设计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从兰州到哈密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从哈密到苏联边境的铁路。

斯大林赞同这样做，并再次强调新疆铁路对开采石油的长远意义。

周恩来肯定，这条线路上到处有石油。转入橡胶协议。

斯大林指出，原则上问题已经解决。

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转入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说，正在起草有关的书面报告，待整理好报告后，他想会见斯大林同志并亲自对报告做出说明。

斯大林同意这样办。

周恩来请求帮助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转入中国正在筹建的各种工业项目问题，并说他指的是151项工程。他指出，中国需要苏联的设备援助。请求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并且说明苏联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援助并规定期限以及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他强调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给了中国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帮助培养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斯大林：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国有了本国干部的时候，它将牢牢地站稳脚跟。

周恩来通知说，他们希望从苏联得到800名专家。

斯大林说，研究一下这项申请并尽我们所能予以派遣。

周恩来请求再帮助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斯大林说，没有资料当然不行。

周恩来询问，今后能否再派大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向苏联企业派遣实习生。

斯大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谈到国内五年计划的问题，通知说，正准备材料并将提交有关此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武器装备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说，现在是指提供武器装备。他指出，对60个师的事已经有了协议，他还想讨论海军供货问题。他问，在飞机方面能得到多少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不打算建设航空工厂吗？

周恩来说，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得到，特别是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

他指出，掌握飞机制造预计至少5年，而发动机制造要3年。

斯大林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例子，这两国先从装配厂开始。说苏联可向中国运送发动机和其他飞机部件，而中国可在本国进行飞机组装，借此培养干部。装配厂可以变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中国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条道路。先要建立一至二个发动机装配厂。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可在中国组装飞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是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安排，组建装配厂以后，经过3年，也就可以建立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简单、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说，他们已开始懂得这一点，正在组建修理和装配厂，并补充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

斯大林问，苏联向中国运去的供60个师的装备，已用来组建哪些师？

周恩来解释说：他们已经接到10个师的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已交给朝鲜人，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的中国部队。

斯大林问，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即全部装备将用在朝鲜前线。

周恩来确认。他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是这样。他告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60个师装备中的3个师交朝鲜人，42个师准备用于朝鲜.....

斯大林问，中国人使用新装备是否习惯。

周恩来解释说：正在逐步掌握这些新装备，要训练3—4个月。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熟悉新装备和师的编制。这大约需要近6个月的时间。否则，会对武器生疏。此外，利用这段时间检验各种仪器的性能，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把这些部队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在后方，在前线附近，例如在朝鲜，进行这种训练。必须

把一半得到新装备的师留在中国。

周恩来指出，把一些师派到朝鲜去，是因为需要补充已有的损失。

斯大林强调，必须派出接受过训练的师，才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提出援助火炮的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能不能制造炮弹。

周恩来回答说，已经着手这件事。

斯大林指出，最困难的是运炮弹，运火炮要容易些。

周恩来再次提出援助火炮的请求。他强调说，中国人发射1发炮弹，美国人要回击9发。

斯大林：这不好。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人发射9发炮弹，中国人就应发射20发以上。我们就是用炮弹把德国人压下去的。我们每隔2米距离就有1门炮，而德国人在2公里距离上才有1门炮。炮兵可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帮助建立这类工厂。

周恩来指出他们正在改建现有一些工厂并筹建一些新厂。

斯大林：这件事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机床。

周恩来说他们有机床，不过是老机床。

斯大林说，需要有制造122毫米炮弹、3英寸火炮和高炮的机床。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忙。

他补充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炮弹的：有些厂造药筒，有的厂装药。集中在一个工厂做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谈到航空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将按苏联政府的建议行事，并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这项工业。

斯大林强调首先组建装配厂的重要性。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筹划建立坦克厂，即一个是年产1000辆坦克的轻型坦克厂，另一个是中型坦克厂，计划建4—5年。

斯大林仍然建议先建装配厂。他指出，战争时期我们把汽车厂变成了坦克厂。说中国若是有一至两个汽车装配厂就太好了。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长春筹建一个年产2万辆汽车的厂，改建一个年产3000辆车的装配厂，请求帮助再设计一个厂。

斯大林强调，应当在装配厂和修理厂培养干部。对这件事必须关心。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告知说，中国政府正在办这件事。他们有修理厂，现正在组建装配厂；明年这些厂就开始生产。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厂办徒工学校。还补充说，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这种学校。

周恩来承认，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在工厂有训练班。他们吸收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派党员参加。

斯大林指出我们有专门的部，即劳动后备部，有徒工学校。中国若采取某种同样办法就好了。我们每年从这类学校中培训近百万青工。

周恩来问我们有哪些培训中级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解释说，有中等专业学校。

周恩来说想讨论一下有关雷达的问题。

斯大林答应帮助这件事。无线电和雷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建设这方面专业的装配厂。

斯大林强调，以后必须建立雷达设备生产厂。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还不能制造雷达设备。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再次提出专家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不仅想请我们派专家，而且还打算组织培养本国专家。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指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等国也将请求中

国政府派专家。又补充说，中国政府最好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工厂充实提高。

周恩来提出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问题。说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这时，周恩来指出，当然这对苏联是一个负担。

斯大林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执政得早，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中国同志执政得早，那么，我们势必也要请求弥补这类差额。

对此，周恩来指出，莫斯科是鼓舞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接着简要说明了朝鲜局势。他指出，1951年5月以前，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从1951年5月起战线明朗了，战争也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双方力量大体相当。敌人不能进攻作战。出现了一定的均势。但我方也未进行大规模进攻。敌人在15—20公里的纵深加固了自己的阵地，我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坚固地带，并且继续扩大坑道工事。敌人无法摧毁我军的坚固阵地。大约200公里的战线已全部得到加强，左右两翼也有良好坚固的工事。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坚信能。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守住现有阵地。今年的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守住这些阵地。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发动进攻，攻击敌人。过去我们想，我们不一定能进行7天以上的进攻作战。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

斯大林问，你们能不能发动进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可以发动夺取个别阵地的进攻战役，但难以发动全面的进攻。自从战争形成阵地战以后，美军当局极力拖延谈判，不想缔结停战协定。

斯大林说，看来，美国人想多扣留中国战俘，这是因为他们拒绝遣返战俘，也许他们想把战俘送给蒋介石。

周恩来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俘中安插了特务。

斯大林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违反一切国际

法。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其中20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

问及朝鲜的粮食情况如何，说我们还能帮他们什么。

周恩来说，朝鲜在这方面有困难。中国政府知道，苏联援助过朝鲜。说他们也援助过朝鲜并曾告诉金日成，这些若不够，他们还可以提供食品、衣服，他们要什么都可以提供，但无法提供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再给朝鲜一些武器，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

周恩来再次说，同美国谈判时不能让步。

斯大林指出，如果美国做些让步，那么，可以同意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想缔和，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哪怕再打一年。

斯大林肯定，这是对的。

周恩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还补充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起了先锋作用，如能挡住美国对朝鲜的进攻，那么，对把大战推迟15—20年是有利的。到那时，美国就根本发动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有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朝鲜战争以后才根本不能打世界大战。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不让美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斯大林取笑说，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周恩来告知说，如果美国人作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而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同时考虑到可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解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斯大林问，有多少美国战俘。

周恩来解释说，朝、中控制的战俘总数达12000人，其中南朝鲜人7400名。

斯大林不排除按周恩来的建议去解决问题。同时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向报界宣布。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那么就宣布他们可能想把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如果这些建议都不成功，那么就可以采取调解办法。主要的是建议停火。

周恩来说，实际上缔结停战协定，也就是停火。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定出三项办法：第一，先宣布扣留南朝鲜和美国战俘的比例，这个比例与扣留朝中战俘比例一致，这个办法可以谈；第二，由中立国调解；第三，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战俘问题分开，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周恩来转入军事援助问题，说明了朝鲜同志要求向他们提供5个高炮团的问题。我们告诉朝鲜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我们提供5个团。我们答应向他提供。也许中国可以提供5个团？

周恩来再次说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对他们是新东西。

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要找金日成弄清楚。

原已答应的以外，周恩来要求再提供10个团的装备。斯大林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周恩来转告朝鲜同志要求，即要不要对南朝鲜进行轰炸，他们没有把握，这样做对不对。

斯大林解释说，航空兵归国家所有，中国志愿军也不要动用国家航空兵。

周恩来告知，朝鲜同志问，他们能否发动一次新攻势，中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进行战略进攻。

斯大林指出，当正在举行停战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战略进攻还是战术进攻都不要进行，不得进行任何进攻。

周恩来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可否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

斯大林：我乐于同他们谈一谈，但他们离得太远。此外，我不便邀请。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乐于接见他们。

周恩来告知，彭德怀很想来，但还不知道金日成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也许可以同他谈谈这件事。

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周恩来再次说，中国政府认为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延一下是适宜的。但中国也做好了战争可能打2—3年的准备。再次请求提供飞机、火炮和炮弹援助，因为中国自己尚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斯大林宣布，我们能办到的，全部提供。

问朝鲜人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惊慌失措？

周恩来解释说，朝鲜确实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鸭绿江电站被炸以后。这使朝鲜同志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想尽快实现和平。

斯大林说，美国的谋略就是恫吓。但他们吓不倒中国人。能否说，他们也吓不倒朝鲜人？

周恩来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不错。

周恩来补充说，朝鲜人有些动摇，他们的情绪不太稳定。在部分朝鲜领导人员中甚至有些惊慌情绪。

斯大林提到，他从金日成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有这种情绪。

周恩来肯定了这种情况。

问中国代表团下一步如何活动。

斯大林提议现在就着手工作。告知说苏联方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任主席，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库梅金同志。中国代表团可以同莫洛托夫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周恩来感谢通知此事，并请斯大林同志指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形势。

斯大林表示同意，周恩来一准备好书面报告就接见他。

A.维辛斯基、H.费德林记录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54-72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指出，关于双方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中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建议草案。该草案需要修改，或许需要做根本性的修改。请求苏联同志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必须修改的意见。(草案附后)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方将会研究这份草案，如果需要提出意见的话他们将在下一次会谈中提出。

2.关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签署两份协定：公开的原则性的协议和技术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同意。或许，这一原则性的协议内容不多，并且看起来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参与进来。

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的同意，在其境内修建铁路；第二，要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修建铁路的要求。

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原则协议可以是三方签署的，也即是说，该协议在苏联、中国和蒙古政府之间签署。至于技术协议，可以由苏蒙“乌兰巴托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交通部之间签署。或许，在原则性协议中也应该指出双方铁路的结合点。中国方面认为，这一结合点可以是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

莫洛托夫说，中方关于铁路结合点的建议同苏方的看法一致。

布尔加宁问道，关于铁路修建的期限问题中国方面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建议在1952年完成初步的勘查工作，1953年上半年结束勘查工作。预计在1954年年中完成铁路的修建。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铁路轨道的尺寸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从平地泉到中蒙边界的中国路段应该修建宽轨铁路，也即1524毫米。如果是宽轨的话，中苏之间的铁路交通就不用二连浩特换轨，而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换轨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二连浩特是个荒漠。此外，考虑到中国铁路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修建宽轨铁路。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中国铁路的轨道应该和苏联的统一。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不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周恩来指出，中国方面的考虑是，货物运输不应该在中蒙边界或在蒙古换轨，因为这些问题主要由苏联或中国预先决定。因此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或者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应该能够直达。

莫洛托夫问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是否有建议草案。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这样的建议草案，但是在中方的建议草案中有关于各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的条款的概要。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就这个问题准备建议草案。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同意准备这一建议草案，但是希望得到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要，以便能够考虑到中方的意愿。

周恩来说，明天，也就是8月22日中国代表团将就这一问题提出看

法。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的技术合作。周恩来通报说，由于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的协议，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公布这份协议。

莫洛托夫回答说，未必需要公布这一协议。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准备了协议草案。(中国协议草案的翻译本附后)

然后周恩来说，今年8月20日斯大林同志就在新疆建设铁路的问题进行了谈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打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修建从兰州到哈密之间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从哈密到霍尔果斯(苏联)的铁路。关于中国政府修建这一铁路的计划将会提供给苏联方面，以便了解。

莫洛托夫指出，在今天的会议上对三个问题都进行了审议。他问道，关于进行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有什么希望呢？

周恩来回答说，他希望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关于中国的状况，然后讨论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和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同意这样做。

潘友新和费德林记录

1952年8月21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8, л.22-25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 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r\n 关于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56] \r\n

根据政府和苏联政府和军事部长1952年12月15日第641649号决议，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第十六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于1952年12月22日离开卡卢加市，并于1952年1月2日抵达中国境内的安东市，以完成政府交付的特别使命。

1952年1月4—21日期间该师所属部队在安东机场按计划完成了地面训练和投入作战的飞行实习活动，并从1月21日起进入战斗值勤和针对敌空军小型机群的作战状态。

截至1952年2月10日，该部队完成了对敌空军密集空袭的反击作战计划。

我军作战活动的特点如下：部队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即南部飞行边界为平壤、元山和黄海沿岸(朝鲜湾)，我飞行员无权飞越这一边界。这就制约了我机群的作战活动，尤其是在追击敌机的时候，因为后者一旦在空战中失利便会立即逃向大海方向，拉升飞机高度，在占据有利地形之后再进入战斗区域……

二、完成任务和战斗结果的总体情况

1.我部队执行任务情况：

(1)自1952年1月4日至2月10日间，我师所属部队投入战斗。

(2)自1952年1月21日至8月10日间，实施作战，根据作战性质来划分，我师主要任务如下：

白天：

——自1952年1月21日至7月9日，驻防安东和庙沟机场的我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独立和军内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以机场值勤方式起飞拦截敌机，并为安东、义州和朔州地区的设施和渡口，以及安东、义州、安州、开城、泰川和宣川地区的机场、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

——从1952年7月9日至8月10日，驻防沈阳机场，白天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根据军指挥部的要求，与军内友邻部队一起以值班状态防止敌机对沈阳方向的中国东北工业—行政中心和沈阳市实施空中侦察；在敌机对朔州、安东和大孤山地区的目标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时，为我第一梯队战机提供支援，掩护第一梯队米格15飞机的降落。

夜间：

——1952年1月30日至5月16日期间在安东机场，1952年7月22日

至8月10日在沈阳机场，处于一级、二级和三级战备值班状态，起飞拦截敌机，实施机组巡逻，为夜间战斗行动做好准备，防止敌机对安东、义州、铁原和沈阳地区的机场及设施实施轰炸。

在完成主要战斗任务的同时，我部还担负了以下任务：

——在2月份掩护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投入战斗，对敌空军的大规模空袭实施反击。

——我师新补充的飞行员(共33人)也全体投入了战斗。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飞行技术和理论监察员、飞行员对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师15名飞行员进行了从驾驶拉11飞机到驾驶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还对其进行夜战心理素质训练。

——承担了在鞍山、安东机场对补充给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和本军其他部队的米格15战机的卸货、安装和试飞等工作，共安装了116架飞机。

——派遣飞行和技术负责人以监察员身份对中国同志进行了改装训练，其中包括：40名飞行员、75名米格-15飞机和BK-1发动机的技术人员。

根据培训计划对所有班组进行了理论培训，并举行了考核。对飞行员进行了包括全部飞行科目的实战训练。

1952年7月9日以前，我部所完成的部分战斗任务主要是从安东机场起飞的，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952年3月30日至5月5日期间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都是从庙沟机场起飞的(当时该部队属于我军第一梯队，只是从1952年7月9日作为第二梯队起，才开始从沈阳西机场起飞)。

我部参战机组的平均数量为：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6架。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8架。

4—5月间，由于战斗任务过分频繁，加上伤病而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各团参战机组平均数量下降至10—14

架，在个别情形下，由于战斗过于紧张，该平均数量甚至降至6—8架。

整个参战期间我部战斗飞行总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762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418次。

平均每个飞行日战斗起飞架次：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8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2次。

平均每个参战飞行员战斗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61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80次。

2.根据我部所完成战斗任务的性质，整个参战时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2年1月21日至4月末，以团为单位参战，主要目标是针对敌歼击机“掩护”，另外，此类起飞的目的还在于支援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与敌强击机作战。

第二阶段：

1952年4月末至6月末，我部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强击机，一部分力量用于解除敌机对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的封锁，掩护我战机降落。

第三阶段：

自1952年7月初起，我部从安东机场转移至沈阳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所属部队反击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地区地面设施的集群式轰炸和对安东机场的空中封锁，掩护第一梯队飞机降落，即在第三阶段我部作战行动的特点是以我歼击机作为沈阳机场的“掩护”。

另外，根据敌空军作战，我们部队的使用和我歼击机的行动战术等的性质，我部作战的第一阶段又可分为这样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2月份(参见图1) [57]。敌空军每天实施2—3次大规模强击机群的集中式空袭，且几乎每次都有少量歼击机直接为其提供掩护。敌平均每次参战飞机数量150—170架，个别情况下可达到220架。

与强击机一起同时在战区出现的还有敌歼击机“掩护”：

例如，在新比岛地区便有24架F-86；在朔州地区有16架F-86。

参战时敌歼击机“掩护”高度——15000米。

这一阶段敌强击机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安州及其以南地区。

这一时期根据军总体计划我部与其他部队一起行动，起飞时以师为单位，各部队起飞时间稍有间隔，以3—5分钟为标准。

起飞之后我部将飞机拉升到一定高度，在进入朔州地区时完成集结(在同一地点)，突破敌歼击机所制造的“掩护”，进入敌强击机活动区域。一般情况下当我歼击机突破了敌歼击机的“掩护”以后，敌强击机便会向海上或东南方向退却，而敌歼击机“掩护”也会紧随其后向同样方向撤退。

这一时期的空战我们都是同一地区以团或师为单位的大机群投入战斗，高度大都在15000米。

这一时期我们的作战行动存在重大缺陷：

——指挥员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经验不足。

——在同一地区实施大机群作战制约了我战术的发挥和机动性，对战斗进程难以控制，限制了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我殿后机群多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原因：

(1)当敌人发现我整个机群后，其首先会向我负责殿后的部队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下我殿后机群便也首先投入战斗。

(2)当敌发现我先头部队，便企图向其攻击。但他们却常常忽然遭到我殿后机群的攻击。原因在于，从后者所处位置发动的攻击往往具有出敌不意的效果。

不过，我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往往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损失。

于是，飞行员们便开始寻求更好的作战方式，以提高我部的空战效率。我部的作战行动便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第二时期：3月份(参见图2) [58]。敌空军继续保持原有作战方式，只是略微有所变化。

在强击机起飞前20—35分钟，敌歼击机“掩护”率先进入作战区域。

例如，——在朔州(Сакусю)、泽光洞(Дзэгуандонг)(敌主力)地区——敌歼击机F-86达24—36架。

——在尚州(Сиодзйю)地区(从东面或东北方向进入)——F-86达8—12架。

——在新比岛地区——F-86达16架。

敌机作战高度：7000—12000米。敌强击机作战区域与从前一样。

在第二时期开始前夕，我们对上一时期作战行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召集了飞行—战术会议，并讨论了我歼击机作战活动的战术和战斗序列等问题。这对提高我歼击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从3月份开始，我军改变了行动战术：

——在以部分兵力对敌人实施牵制的同时，从广大战线上突破敌歼击机“掩护”(扩大经鸭绿江对敌实施正面突击的我部队之间的间隔，以扇形战斗队形穿过敌机“掩护”)。

——另外，起飞后我部队在进入战区时，一部分向右，一部分向左，以对敌形成夹击态势。

——随机改变我部队的起飞间隔，将作战时间从30—35分钟增加至1小时20分。

——我部队应更多地投入作战，尤其是采用小机群战斗方式。最

初，在一个地区参战时，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然后将各部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到3月末，我们开始以中队甚至分队为单位组织战斗。在作战中，我飞行员将战机高度低至7000—10000米，以利于米格15战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

——根据空军相关规定在地面对飞行员进行训练，以提高其火力准备技能。

——我飞行员已能够在任何时间和气象条件下完成寻敌和作战任务，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校杜特尼琴科所率中队的飞行员们。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

——对敌机实施拦截时，能掌握战斗主动权。

——在广大战线上实施作战。

——各部队指挥员积极参战。

——全体飞行员的作战效果迅速提高(例如，3月份我共击毁敌机17架，而2月份只有9架；弹药消耗下降：击毁一架敌机，3月份消耗弹药280—300发，而2月份是500发)。

——指挥员和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指挥员已能够熟巧地指挥整个机群投入作战，并对小股敌人给予有力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指挥员有：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飞行员巴什曼、现为中队长的上尉克雷洛夫、上尉阿韦林、中校茹拉夫廖夫和少校博伊佐夫等。

——在全天候气象条件下发挥米格15战机的技术优势以相应战术投入作战。

这一时期我军也以师为单位实施了一系列战斗行动。

第三时期：4月份(参见图3) [59]。敌空军在损失惨重、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开始采取如下战术：

——在歼击机“掩护”地区不同高度集中40—50架，甚至更多歼击机，以小机群为单位。

——对我机场地区上空实施封锁。

——在大量歼击机掩护下，以强击机对我安州、定州、宣川和泰川等地区目标实施定期空袭。

——增加对我地面设施的攻击持续时间(2—3小时)，主要采取以缩减其他机群数量而增加参与空袭的机群数量的方式。

这一时期我军的作战方式主要如下：以小机群为单位在我机场空域实施自由“搏击”作战，打破敌人的封锁，并以部分兵力在敌歼击机“掩护”所在地区发动“狩猎”攻势。

我飞行员对每次飞行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以期寻找到新的能够击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新战术。

针对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我们采取了以下战术：

——以小机群在高空组成封闭式防护圈，我机群有时均沿同一方向飞行，有时则相向而飞。

——在中等高度采取沿不同航线飞行的方式，最终各机组将同时在机场上空相遇。

——在飞行过程中以小机群在不同高度对我驻防地区实施掩护。

有时，我们也会同时采用上述所有作战方法。各种战斗方式在实战中不断得到完善。

这一时期是我军作战最困难的时期。我军飞行员在作战过程中从起飞到降落飞行高度落差为：100—7000米。

不过，随着我们找到和不断完善自己的行动战术，到5月末，敌人在遭到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停止了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活动，与我歼击机的作战也变得愈加消极起来。

与3月份击毁敌机17架相比，在4月份我们共击落敌机22架。

第三时期结束之时，我部开始仅针对敌歼击机实施作战，并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提供支援。

第二阶段：从4月末至6月末。

我部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强击机。

在少校米涅尔温、博伊佐夫、巴什曼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的指挥下我团通过与敌强击机群的初期作战，获得了一些实战经验。

为了总结与敌强击机的作战经验和寻找合适的行动战术，1952年5月27日，我们召集全体飞行员开了一个战术会议。在会上我们对与敌强击机的作战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总结，通过与飞行员广泛交流意见，我们归纳出如下一些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战术：

——在从机场起飞时利用机场地面的起伏和坡度，采取(掠地)低空飞行方式。

——在向敌强击机活动区域突击时采取低空(不超过700米)进入方式，给敌歼击机来个出其不意。

——在低空寻找敌强击机。

——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争取第一次攻击便达到摧毁它的目的。在初期攻击的同时极力击破敌强击机防御圈，如果不成功，则争取在后续攻击中消灭敌人。

——以低空方式退出与敌强击机的战斗。

——返回机场和降落时采取掠地落地方式。

——为了迷惑敌低空飞行的歼击机，我所有与敌强击机作战的飞机均涂上与当地植被一样的颜色。

通过会议交流意见和对战斗行动进行详细分析，大大提高了全体飞行员的反敌强击机作战技能，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如少校博伊佐夫、巴什曼、托卡列夫、米涅尔温、杜比诺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等，他们都成为了攻击敌强击机的模范带头人物。

虽然气象条件差，我军战斗飞行数量受到限制(如在6月份我部共实施作战飞行56次，未击毁一架敌机)，但从1952年4月30日至7月1日，各团共击落敌强击机16架，自己损失飞机2架。

我飞行员普遍认为，即使在环境恶劣和机场遭到敌人封锁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成功地战胜敌人的强击机。

第三阶段：从1952年7月1日起，根据军长指示，我师开始投入针对敌歼击机“掩护”的战斗，在7月9日以前（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7月5日以前），我部队在安东机场起落，1952年7月9日以后在沈阳西机场起飞。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师各团的任务——白天和夜间为沈阳市提供空中掩护。

另外，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并增援第一梯队防止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等地区的设施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安东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飞机降落。

我部在从沈阳机场起飞完成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共击毁敌歼击机4架，击伤5架。

我师各团在第一阶段和第一时期的作战行动中都会仔细分析敌空军的战术变化，以期探寻和完善我师的战术和战斗方式，加强各部队的密切配合，提高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3.各机场的战斗值班安排如下：

拂晓前10—15分钟内全体飞行员到机场集合。相关后勤技术部队开始进行飞机的起飞准备工作，借助“躲闪”将飞机拖至战斗值班位置，并按各分队排好。

必要时可将飞机分散放置。各部队在机场值班飞机的停靠都是固定的。如安东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起飞着陆地带，从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滑行线上，南面起飞。

沈阳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北面起飞。

在确定了作战人员之后，根据空中形势，部队同时或依次进入第一、第二、第三级战备状态。

作战人员的参战方式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般条件下和个别复杂条

件下。

部队的战备级别和作战方式由师长把握。是否发出准备战斗或退出战斗准备的信号由师指挥部决定。

各部队从不同状态进入战斗准备的方式：

——从二级、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

战斗准备所需时间：

——从二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4—6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在安东机场需35—45分钟，沈阳机场需15—20分钟。

上述进入战备状态所需时间完全可以确保我军飞机及时起飞，以完成所承担的作战任务。

4.我部完成战斗任务情况：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白天					
1	战斗起飞	9	1 762	2 418	4 189
	其中：拦截	2	1 396	2 009	3 407
	增援	—	—	—	—
	巡逻	—	278	271	549
	自由“搏击”	7	24	54	85
	掩护其他部队	—	54	64	118
	侦察	—	10	20	30
2	机群起飞数量	3	143	212	358
	其中：以师为单位	—	21	21	21
	以团为单位	—	54	78	132
	以中队为单位	—	45	48	93
	以分队为单位	—	15	54	69
	以双机为单位	3	8	11	22
3	作战里程	6, 37	1 480, 48	1 881, 57	3 369, 22
夜间					
1	单机战斗起飞	6	51	75	132
	其中：拦截	6	25	39	70
	巡逻	—	26	36	62
2	作战里程	5, 15	33, 31	64, 40	93, 26

附注：该师机群式起飞总数有21次没有同时起飞，原因在于在以师为单位的起飞行动中有时是两个团同的。

5.我部主要作战方式为：起飞拦截敌机。我部战斗起飞总共4189架次，其中3407架次(81%)是拦截敌机。

起飞拦截作战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1—3月份各团行动时以14、16、18、20架飞机为单位组成飞机编队，随后根据我歼击机行动战术的改变，我16架飞机分别以2、4、6、8、12架为单位组成战斗机群。我部作战初期机群平均飞机数量为16—18架，随后改为8—12架。

以大规模机群参战不利于我军战术机动及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管理，因而制约了各部队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导致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随着我军开始以小机群为单位作战，上述缺陷也迅速被消除。部队的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以小机群为单位实施作战的优势在于：

——迅速起飞，隐蔽地突入敌活动区域，完成战斗任务后返回本部

机场；

——在寻敌和战斗中具有隐蔽性，可以充分发挥机群的灵活、机动性；

——在寻敌和战斗中便于对整个机群实施管理；

——在接近敌活动区域和发动攻击时具有突然性；

——在战斗中有利于增强和充分发挥直接参战机组(即以双机为单位的机组)的火力优势，尤其是在与敌强击机作战过程中，个别情况下每个机组都可方便地选择合适的目标，并对之实施攻击。

以小规模机群参战和将我歼击机的攻击目标集中在敌强击机身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而且自己几乎没有损失。

我部对敌机的拦截作战包括两种类型：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和条件不利的情况下。

在我飞机起飞拦截敌机之时，如果敌机群尚在平壤地区，我方的有利条件如下：

——可及时突入作战区域。

——以战斗队形占据有利地势，便于寻敌。

——便于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天气条件(阳光、云彩、雾和烟)。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因素将确保我顺利寻敌，并取得战斗胜利。

不过，有时由于我机群起飞不及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便会被敌人所利用，从而转化为我军的不利因素，这在4月份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我部起飞时敌歼击机已到了泽光洞、定州和碧坪(Бихен)等地区，有个别敌机甚至出现在我机场区域，并对我机群的起飞实施压制性攻击，这种情况当然无法确保我机群及时赶到作战区域和占据有利作战地形。

如果我机群起飞不及时，有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1952年4月21日由少校塔尔祖津率领的机群在起飞时便有些晚了。当时敌机已位于我机场上空。于是，在塔尔祖津机群起飞到1500—2000米时便遭

到了敌人的攻击，结果导致我飞行员一人牺牲，两架飞机被击毁，一架飞机被击伤。

随后，当再遇到敌机突然出现在我军机场的情况时，我机群的起飞均会得到从其他机场起飞的机群和当时仍在空中的我军飞机的掩护，因起飞而损失飞机和人员的事情再未发生。

6.其他作战方式的运用，如在指定地区巡逻，自由“搏击”，掩护其他部队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只是根据敌人活动的情况和上级所下达的任务随机采用。

自由“搏击”作战主要是在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其他部队起飞和降落时采用，构成机群的飞机数量不等(2—12架飞机)，视空中形势和上级所指派的任务而定。

7.在我部正在作战期间，共实施了358次机群飞行。其中：184次与敌遭遇(比例为55.4%)，174次未遇到敌机(占比重48.6%)。

未遇到敌机的原因如下：

——参战初期，我部还未将重心转入针对敌小机群作战，与其作战没有经验，我部以个别小机群隐蔽起飞，但当升空，选择好高度，突入战区时，已是敌人准备撤退之时，因而遇不到敌机。

——起飞后我部的任务是掩护地面铁路、桥梁、机场和其他部队飞机的起落，多数情况下均遇不到敌机，因为后者往往不会进入我歼击机的巡逻区域，即使有个别敌双机和由4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与我遭遇，也是避而不战。

——在我部初期与敌强击机作战时，我地面导航站所通报的敌强击机活动情报往往不准确或来得较迟，我部飞行员在寻敌方面也缺乏经验。经常是发现有敌强击机经过，但起飞后却找不到或等到发现时敌机已经开始往大海方向撤退。

我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位于低空的敌强击机，这就排除了我部机群与高空区域敌强击机遭遇的可能性。

——当敌人以小机群作战时，一旦发现我部飞机，如果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便会立即撤向鸭绿江口或大海方向，避免与我作战。

以上所述便是我部与敌机遭遇较少的主要原因。

8.我部一个战斗起飞的平均空中持续时间：

(1)白天，从安东机场起飞40—50分钟。

从沈阳机场起飞55分钟至1小时。

在与敌强击机作战情况下27—30分钟。

(2)夜间40—45分钟。

9.每个飞行员的作战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	第一四八歼击航空团
战斗起飞最多次数	87	103
战斗起飞平均次数	61	80

每个飞行员的战果总体情况(参见附录) [\[60\]](#)

10.所实施空战的相关资料：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以机群为单位空战数量	—	69	95	164
	其中：以师团为单位	—	49	62	111
	以中队为单位	—	12	13	25
	以分队为单位	—	5	17	22
	双机	—	3	2	5
	单机	—	—	1	1
2	参加战斗的机组数量	—	976	1 340	2 316
3	与敌遭遇却未开战的次数(以机群为单位)	—	15	26	41
	机群中的机组数量	—	192	340	532
4	单机夜间战斗次数	—	—	—	—

11.我部参战期间所实施的164次以机群为单位的空战中，与敌F-86飞机作战共152次；与敌强击机作战12次。

我部空战中从未与敌轰炸机遭遇，原因在于：敌轰炸机白天从不在

我部作战区域活动。

12.根据参战机组的人员构成，所实施战斗的相关资料：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参与对敌机作战的总次数	1 360	1 661	3 021
2. 我飞行员与敌人作战次数	976	1 340	2 316
3. 与力量相等敌人空战次数	8	12	20
4. 与优势敌人作战次数	45	58	103
5. 我方力量占优情况下空战次数	16	25	41

根据上表所列数据资料显示，参战敌机的总数大多占优，与我军飞机的比例为：1：1.3。

13.实施空战的高度随着敌我空军所使用战术的变化而变化。

在第一时期(即2—3月份)，在战区敌歼击机“掩护”的空中高度均保持在15000米。

我飞行员在作战中经验不足，未充分发挥我米格-15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性能优势，空战高度均继续保持在12000—14000米。

随着我军战术的改变，转入小机群作战，我米格-15战机(在7000—9000米高空)的性能优势逐渐得以体现，我军作战指挥和经验不断得以完善，我飞行员主动将作战高度降至7000—9000米范围。

在这一高度范围内的战斗行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减少了自身的伤亡。从此，在整个与敌歼击机作战的一段时期内我军均保持这一战斗高度。

在个别情况下，我部在与敌歼击机作战时也会将飞机高度降至700米，甚至更低，但这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我战机降落，在我飞行员被迫起飞迎敌和必须返回机场迫降时的不得已之举。

我部与敌强击机的空战活动都在700米或1500—2000米高度进行。由于作战高度较低，因而很难与敌歼击机遭遇，再加上此时我飞机上均涂有与地表植被类似的迷色，敌机从高空很难发现。

实战证明，我米格-15飞机在7000—9000米高度时作战最能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除水平机动性外，在各方面都强于敌F-86歼击机。

14.2—3月份我部与敌遭遇和作战的主要地区——泰川、安州、定州、泽光洞。

这一时期，我部与敌歼击机“掩护”的遭遇和作战主要在朔州、泽光洞和碧坪地区。我部在承担打破敌机对我机场的封锁时的作战主要区域在安东和庙沟。战斗主要在夜间进行，即当敌机结束集中空袭，我部返回机场之时，敌人往往会出动两个批次的F-86飞机(每批4架)对我返回机场、燃料即将耗尽之飞机实施攻击，或对我此时奉命起飞、执行战斗任务之飞机实施封锁。

由于敌人此类攻击，导致我军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了2名飞行员和9架飞机。

我部与敌强击机遭遇主要地区为宣川、定州、泰川和泽光洞。

15.根据敌空军活动规律和上级所下达任务情况，我部机群实施战斗起飞。

在1—2月和3月部分时间里，我部以大规模机群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歼击机“掩护”实施反击。此时我机群一般由18—20架飞机组成，且与其他师、团级机群共同参战。

以大规模机群实施空战具有重大缺陷，具体如下：

——制约了我机群的机动性，不利于作战指挥和先头机群战斗积极性的发挥。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其他人只是参与防御。

——我军所有部队都突入敌人主力集中的同一地区。敌人利用主力与我机群纠缠的时机，派其侧翼部队，挑选适当战机，对我歼击机，尤其是那些与我主力分离的机群实施突然攻击。

在分析了大机群作战的缺陷之后，我军改变了战术——用由4—8—12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在更宽广的战线上向敌发动攻击。

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了我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其战斗更加主动，所有飞行员都踊跃参战，而先头机群则可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气象等有利条件，提高作战能力。

实战经验表明，空战中最能发挥机群战斗力的编队构成为：6—8架飞机。

16.空战结果相关数据资料：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击毁敌机数量	—	26	40	66
	其中：F-86	—	19	30	49
	F-84	—	3	3	6
	F-80	—	4	2	6
	F-51	—	—	4	4
	F-4 y-4	—	—	1	1
2	击伤敌机	—	7	10	17
3	机组射击次数	—	191	209	400
4	消耗弹药	—	10 175	9 273	19 448
	其中：H-37	—	2 320	2 308	4 628
	HC-23	—	7 855	6 965	14 820
5	击毁一架敌机所耗弹药	—	391	332	295*
6	自身损失：飞行员	—	7	2	9
	飞机	—	11	10	21
7	我飞机在战斗中损坏数量	—	15	20	35
8	消耗燃料(吨)	13.8	1 985.3	2 803.1	4 802.2
9	抛弃油箱	6	2 956	4 140	7 102

*原文如此。——编注

17.随着行动战术的完善和全体飞行员对敌空战经验的积累，我部战斗效率得以很大提高。

我部作战效率的提高可从不同时期和阶段飞行员战斗技能的完善和提高上明显看到。下表列举我部作战的各项主要参数：

月份	部 队	击毁敌机	击伤敌机	自身损失		我飞机被击伤	击毁1架敌机的弹药消耗	击毁1架我机的弹药消耗	机组人员射击次数占参战总数的%
				飞行员	飞机				
1—2月	第十六团	6	—	4	4	4	615	245	17
	第一四八团	3	—	—	1	7	521	1 155	9.4
	总计	9	—	4	5	11	617*	278*	13*
3月	第十六团	9	—	1	1	5	268	291	25.2
	第一四八团	8	—	2	4	5	337	153	20.2

续表

月份	部 队	击毁 敌机	击伤 敌机	自身损失		我飞机 被击伤	击毁 1 架 敌机的弹 药消耗	击毁 1 架 我机的弹 药消耗	机组人员射 击次数占参 战总数的%
				飞行员	飞机				
4 月	第十六团	8	3	1	4	4	378	63	22
	第一四八团	14	3	—	1	6	176	337	12
	总计	22	6	1	5	10	243*	118*	18*
5 月	第十六团	1	1	—	—	1	500	—	21.5
6 月	第一四八团	13	5	—	4	2	171	66	38
	总计	14	6	—	4	3	209*	81*	36.5
7 月	第十六团	2	3	1	2	—	724	236	19.8
8 月至 10 月 6 日前	第一四八团	2	2	—	—	—	165	—	15
	总计	4	5	1	2	—	464*	179*	19.2*

原文如此。——编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军击毁敌机的数量逐渐有所增加，但击毁一架敌机所消耗的弹药却较以往有所减少。这些数据说明，在作战过程中我飞行员的对敌作战经验日益丰富，已能够精确地向敌人射击。

5—6月份我击毁敌机数量之所以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我部的作战活动主要集中在5月份，然后就转入针对敌强击机的作战。而这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和积累经验，学会对付敌强击机的作战方式和战术。

.....

在这方面，我军中表现较好的部队主要有：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为塔尔祖津少校，现中队长为少校泽诺夫，政委为博伊佐夫少校。

该中队：

——作战飞行587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0次(作战时间299小时)。

——击毁敌机14架。

——飞行员和物资装备没有损失。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中校杜特尼琴科，现中队长上尉布尔津，前政委巴什曼少校，现政委大尉古林。

该中队：

——战斗飞行560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1次(作战时间500小时)。

——击毁敌机20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无；飞机3架。

我师表现优秀的飞行员：

——少校博伊佐夫，击毁敌机6架。

——少校巴什曼，击毁敌机5架。

——中校巴拉巴伊金，击毁敌机4架。

——上尉克雷洛夫，击毁敌机4架。

——大尉尼基福罗夫，击毁敌机4架。

18.我师作战期间的损失情况：

——飞行员9人。

——飞机21架。

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我部投入战斗初期，目的是对付敌人的集中式空袭，飞行员还不具备对付敌F-86歼击机小机群的实战经验。而敌人在空战区域的F-86歼击机一般均在24—80架左右，因而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仅2月份在此类战斗中我第十六歼击航空团便损失飞行员4名。

——我部在打破敌人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为我起飞和因燃料耗尽、退出战斗并在机场降落之飞机提供掩护时，各部队间缺乏有机配合。导致我军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飞机9架，飞行员2人。

——在与优势敌人进行空战时(尤其是作战初期)，我双机、各分队和各中队间缺乏有效配合。

为防止此类损失再度发生，我们实施了以下措施：

——召集全体飞行员大会，分析和研究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原因；

——以团和中队为单位的机群投入作战应由各师、团及其副职亲自率领；

——召开专门会议，寻找适合小机群和大机群作战的战斗序列，以确保我机群在空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机动性，合理指挥和各部队的紧密协作；

——研究、总结和在全体飞行员中推广优秀飞行员(如杜特尼琴科中校、茹拉夫廖夫中校、巴什曼少校和博伊佐夫少校等)的战斗经验；

——让我歼击机采用有效对付敌人，尤其是在解除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新战术(关于此我们上前面已经提到)；

——与全体飞行员认真分析我飞行员跳机时使用弹射座椅装置的每一个案例。决定：今年在我所有飞机上均安装КАП-3装置，并确保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打开所携伞具，减少因此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我军部有两位飞行员曾因弹射装置失灵而在完全清醒状态下阵亡)。

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大量减少我飞行员的伤亡数量。

关于我部作战结果的结论：

1.在完成军领导所交给的任务的同时，我部还在白天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以及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实施了作战，为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铁路、交通线和中国东北沈阳方向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其实施空袭。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和不同时期的作战行动中，我部飞行员的战斗技能不断得到完善，获得和积累了许多与敌空军作战的新战法和新战术。

在我部作战后期，我们以化整为零的战斗单位，已能够在任何空中形势和各种气象条件下完成任何战斗任务。

2.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敌机。

在作战行动中我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作战方式，如：以巡逻方式、自由“搏击”等为地面设施和友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部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实施战斗起飞，并根据空中形势、上级所下达的任务和气象条件决定以何战斗单位起飞应敌。

3.我部实施空战的机群由2—16架战机构成，高度14000米。根据实战经验，我米格15战机与敌F-86歼击机作战的优势高度应在7000—9000米范围内。

经过在地面和空中根据空中射击勤务相关规定认真练习，我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度已有了相当的进步。如果说，在我部参战第一阶段，我们击毁一架敌机平均需要消耗517发炮弹，那么截至作战后期已缩减到只需209发，在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甚至达到了只需171发炮弹的水平。

4.我部作战期间共损失飞行员9人，飞机21架。

主要原因如下：

——作战战术有误。我部作战初期主要针对的是敌人的大规模集中空袭，但对与敌小规模歼击机群作战没有经验，因而部队损失比较大。

——各部队间在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掩护我飞机在安东机场的起降时缺乏有机配合。

——与敌优势兵力作战，各机群在战斗中(尤其是参战第一阶段)协作不够。

建议：

1.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在有其他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与敌小型歼击机群进行1—2次战斗接触，以取得实战经验。

2.所有飞行员都必须事先进行攻击敌强击机的训练实习。

3.在制定多种战术方案的同时，还应有一个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总体计划，而且各部队都应当有这样的计划。

4.为了对付敌歼击机“猎手”，各部队都应配备2个训练有素的分队专门负责实施自由“搏击”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对这些飞行员的飞行高度和所锁定目标不应加以限制，只为其划定活动范围。

.....

总结：

1.上述时期敌空军的作战目标：摧毁我铁路和公路枢纽，破坏工业企业，消灭战区范围内我有生力量和技术设备，我军各集结点和运输线。

2.敌空军在上述各月份的作战活动次数并不平衡，主要根据气象条件和地面部队的战斗形势而定。

3.敌空军的行动战术和大规模空袭的组织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我米格15歼击机的活动情况而定。

4.在我前线战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敌新型战机出现。

5.在上述时期我部基本完成了上级所下达的任务：保卫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港口，在白天一般、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为沈阳方向的机场和设施提供空中掩护。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团长巴拉巴伊金中校、副政委克拉塔休克中校和团参谋长帕斯图赫中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战果显著：该团共击毁敌机40架；自己损失飞机10架，飞行员2人。

6.在执行战斗任务过程中我部还采用了如下一些作战方法：

——从一级战备状态起飞，对敌机实施拦截，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小机群实施反击；

——以巡逻方式为我地面设施、渡口和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自由“搏击”。

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我部总共4189次战斗起飞中，有3407次是对敌机实施拦截，比例为81%。

起飞并对敌机实施拦截作战的机群由4—24架飞机组成，具体视敌空军活动情况、上级任务和气象条件而定。

我部战斗效果最突出的作战方式是小机群作战，尤其是针对敌强击机作战时这种作战方式效果最为明显。

7.随着战斗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所有飞行员和各部队的作战效率不断提高。在作战经验方面我们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付敌空军的战术不断完善；

——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确度不断提高，例如，1月份我们击毁一架敌机需消耗弹药517发，3月份需300发，4月份需243发，5—6月份需209发。

2月份我共击毁敌机9架，3月份击毁17架，4月份击毁22架。

我飞行员的射击距离不断缩短。

——我部在战斗中对机群的指挥质量不断改善，这尤其体现在对先头机群的指挥和各部队的密切协作方面。

在作战过程中各部队中均涌现出了一批有指挥和组织才干的指挥员，如：中校巴拉巴伊金、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巴什曼、少校博伊佐夫、少校米涅尔温和少校津琴科，等等。

作战实践表明，部队的指挥员是否能带领飞行员完成作战任务，不仅取决于他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和职务，更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能成功地领导部队取得战斗胜利和在战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飞行员战斗减员迅速减少，时至我部作战末期，我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减员率基本为零。

8.根据空战形势和上级指示，我部同时或依次参加战斗。

参战初期，我部主要是反击敌空军大规模机群的集中空袭，此时多采取同时参战方式；随着转入针对敌小机群和强击机作战，我部的参战方式也随即改为各团、分队依次加入战斗。

9.作战活动的指挥和组织主要由军指挥部统一安排。

师首长坐阵指挥部，随时准备行使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

针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等小机群的作战指挥，总体上由军指挥部负责，但多数情况下由各师指挥部领导。

战斗中各机群的参战序列由空中领导小组负责。

10.部队作战活动的物资、技术保障无可挑剔。由于后勤保障原因而导致战斗起飞失败的情况从未发生。

11.我部全体飞行员在政治、精神方面积极向上，斗志昂扬，都能严格遵守军事纪律。

.....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上校

A.舍夫佐夫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副参谋长、中校

B.卡米舍夫

1952年8月21日

ЦАМОФ, ф.97иад, оп.174136, д.1, л.2, 20-47, 51-55, 235-238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转呈收到的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并附有8月24日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如果您同意他们的请求，请您下指示派专机前往北京以非正式形式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同志，共8人。

您的意见如何，请告知。 [\[61\]](#)

致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2年8月25日

附件：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同志：

兹将金日成同志的回电转给你。我认为朴宪永同志去莫斯科是有益的。希望你向斯大林同志请求派专机来接金日成同志及其他5位同志、彭德怀同志和一位中国同志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

1952年8月24日

附件：

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

致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8月23日电报，我们决定由朴宪永同志陪同前往莫斯科。

为了解决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和武器等一系列问题，总顾问拉祖瓦耶夫同志与我们一起前往，他会就上述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批准。我们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此行应当是秘密的。与我同行的还有5位同志。

如果您赞同这一意见，我们打算能立即成行。请您答复。

金日成

1952年8月24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89-90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苏方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和费德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莫洛托夫说道，关于今后继续使用旅顺

海军基地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该草案同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类似，但简练一些。（草案附后 [62]）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指出，总体上来说，苏方的建议草案同中国代表团的草案类似。但是有一些区别：其中包括，在中国代表团的草案中指出，苏联从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的期限是，直到日本不再驻有外国军队。这一点在苏方的草案中没有提出。

莫洛托夫就苏方草案的基础和原则立场进行了解释，并对周恩来对苏方草案提出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周恩来同意莫洛托夫的解释，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建议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以及苏联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修改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更好一些？他强调说，这样表述的立场对中国和苏联在战术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将不会给日本以机会猜测中国和苏联的意图。

莫洛托夫解释说，周恩来表达的看法在1950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中已经包含了，并且解释说，将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建议，但他表示，希望他的看法能被予以研究。他说，中国代表团会对苏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的研究，然后再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2.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草案。（草案附后 [63]）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公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强调说，发表这份公报以及关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照会将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苏联，甚至对全世界来说，联合公报这份特别的文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尽管这一铁路将会完全转交中国所有，但是，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苏联军队运输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他说，应该明确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的技术合作。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草案附后 [64])周恩来指出，应该好好研究这一草案，并建议在下次会谈的时候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1952年8月27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8, л.26-27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协议草案，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

在熟悉了这一草案之后，周恩来谈论了关于建立联合委员会对边界线上的铁路建设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合理性，这一点正如中国代表团在关于中蒙之间的铁路建设问题的想法中所表达的。由于这一协议草案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就必须在另一份协议中，也就是在关于相互之间的技术协议中对此做出规定。

莫洛托夫指出，或许，需要签署另一份协议，也就是路段之间的或部门之间的技术协议。至于具有上述职能的联合委员会，则没有必要成立，因为各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建设轨道尺寸统一的铁路。

周恩来表示同意，但是他指出，该草案中没有反映关于火车相互交流的程序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属于运行的问题和条件，应该在各路段之间签署的技术协议中规定，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签署的协议中规定。

周恩来指出，只有在中国的列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的情况下，在中国领土上才会进行宽轨铁路的建设。否则在中国领土上建设宽轨铁路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因为中国的旧铁路都是在窄轨上运行的。但是该草案中没有指出，中国的火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比如，到达乌兰乌德。

莫洛托夫说，这里不存在问题，中国的火车当然可以进入苏联领土，但是这些细节必须在技术协定中做出规定。

米高扬解释说，可以以苏联和芬兰之间火车的相互交流为例子。

周恩来说，该草案中没有指出各方铁路之间的结合点，因为二连浩特和察梅乌德(Цэмын-Удэ)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明确下来。

周恩来问道，为什么该草案中指出在铁路上要使用内燃机车呢？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蒙古领土上使用内燃机车是由如下条件决定的：该地区缺水。使用内燃机能把铁路上的用水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涉及的只是在蒙古领土上机车的使用。

周恩来指出，他们认为，在中国领土上使用蒸汽机车比较好一些，因为在中国领土上不存在水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那么，草案中关于使用内燃机车的条款可以删除。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然后，他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内容问道，如果草案中规定，在1955年实现直通，那么，蒙古领土上铁路的修建在1954年能否完成？

莫洛托夫解释说，事实上指的是从1955年底开始运行，而且蒙古领土上铁路沿线的一些设施将在1956年完成。

周恩来说，希望协议草案能够把这一点明确下来。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将对该草案进行研究。

2.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就旅

顺海军基地问题提出的草案。在对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仔细修改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把其提交给苏联方面，以便同俄语文本进行比较。

3.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公报草案。在把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修改之后，他将把其提供给苏联方面。

4.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合作的草案，中国方面想弄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说，每年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以保障对苏联的供应，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中国正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中，为中国自己购买橡胶尚存在巨大困难，因此，周恩来建议从协议草案中删除关于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供应苏联的条款。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完成这一义务，因此也就会违背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方面认为，每年向苏联供应1.5万—2万吨橡胶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完成的。因此苏联方面认为不宜从协议中删除上述所指的供应橡胶的数量。

周恩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方面今后将会全力完成在南亚国家为其购买橡胶的请求。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条件，中国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不能保证按上述指定的数量供应橡胶。因此，中国方面希望，协议中不要指出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数量。

莫洛托夫指出，尽管中国方面会存在一些困难，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的橡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苏联需要橡胶。因此，希望在协议中保留关于中国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橡胶的内容。中国可以承担这一义务，因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不能完成的。如果中国积极寻找机会完成这一义务的话，那么是会找到这样的机会的。共产党人正是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而存在的。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将会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周恩来援引协议的第四条说，向苏联供应协议草案中规定的铅是困难的，因为目前中国共计生产了8830吨铅，还不能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因此，希望删除向苏联供应铅的规定，要么指出，第一年内中国将不向苏联供应铅。

莫洛托夫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向苏联供应铅、钨、钼、锡和锑的数量根据每年双方进行的协商确定。因此，不应该改变协议草案中的表述。至于铅的生产，苏联对铅的需求也很多，因此中国应该扩大铅的生产。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

周恩来说，在铅和锌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上，中国政府向苏联请求技术援助。

然后周恩来请求澄清一下，协议草案中有关中国以大的工业规模生产橡胶的规定，应该怎样理解。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指的是中国生产的橡胶量，这种生产量在上次会谈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就告诉苏联方面了。

周恩来说，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栽培橡胶树、采集和生产橡胶以及向苏联供应橡胶的协议草案，中国方面将会另外进行研究。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已经在今年8月30日把关于经济和军事问题的书面报告送给了斯大林同志。他请求告知，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能够接见中国代表团，当面向他进行报告。

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代表团的请求将会被转告给斯大林同志，结果将会通知周恩来。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将在今年9月3—4日提出关于派遣苏联设计师和专家的请求以及关于订货和供应设备的请求。

1952年9月1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8, л.30-34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梅金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相互问候后，双方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问题举行会谈。

斯大林：我们了解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规定年增长率为20%。给工业规定20%的年增长是否高了，或许应在20%里留有余地。

周恩来提醒说，他们对编制计划还经验不足。以往3年的经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预计从苏联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我们编制五年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不可能估计到所有因素。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计划中总是列入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里没有这一点。同时，对计划中规定的全部支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说明。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按各个项目需要提供多少。必须进行计算。在提交的材料里未包含这类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最后意见。为了计算并讲出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

通常我们起草五年计划至少需要1年时间。然后审查准备好的草案还需要2个月，但还是总出差错。

我想，你们应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研究你们的计划，以便答复你们的问题。

其他问题进展怎样？旅顺口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是这样就要决定下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就讨论一下。

中长铁路移交公报草稿好像也没有不同意见了。

第三个问题是橡胶问题。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我们希望至少得到1.5万—2万吨橡胶。卖给我们的橡胶很少，英国控制着橡胶。请你们再考虑一下为我们采购所需数量的橡胶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解决，因为周恩来急着回国。

周恩来说，他很难在这里停留2个月，他想9月中旬返回中国。李富春可以留在这里。

斯大林：好的。

还剩一个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的问题。来过莫斯科的蒙古总理也同意这件事。

这就是说，要同周恩来解决的就剩下4项问题：旅顺口、中长铁路、橡胶和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

周恩来谈到橡胶问题时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一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但他们担心，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可能妨碍彻底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团顾虑，这会被视为违反对苏联的义务。

再次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但在未切实完成供货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说明原因，而且不把这种情况认为他们方面不履行承担的义务。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指出中方将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提供不了商定数量的橡胶，那么，我们只好减少卡车订货。

开玩笑地问，胡志明大经理不能帮忙做这件事吧。

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机会(主要是走私)。

回到建设铁路的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斯大林指出，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发表公告，橡胶问题不公布，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铁路等建成后再公布。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五年计划问题。再次强调，他们对本国能力估计不足。他们同意，对五年计划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说明，因为计划中未列入军事问题，而在拟定军事计划方面他们有许多困难。他们根本不清楚，要不要把军事问题列入总计划。对五年计划要不要公布，

他们原来并不打算公布五年计划，而只公布该计划的基本方针。

斯大林解释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为了让人民了解建设规模，公布计划是必要的。仅仅公布基本方针是不行的。总会有人想了解 and 看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的建设规模。因此，必须把军事建设列入计划，但不必列出各个军工企业，等等。这样比较好。计划应当统一，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工建设。

至于苏联，那么，我们作为供货方也必须知道，需要我们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这些援助。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苏联。但是，我们既要为民用部分，也要对军用部分进行核算。我们必须了解，按各个部分算出的总数是多少。

譬如说，1953年我们提供10—15个师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完成这些订货需要多少钢和其他材料。在1953年同一年我们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设备。这也需要计算。然后得出军用和民用部分两个数字，并且确定，我们能不能按这个数量保证供货。据此再编制每年的计划。中国同志也许认为，这类装备全都现成放置在我们的仓库里。不是的，这些装备都需要现造。

周恩来完全同意斯大林说的所有意见，并想确认一下，60个师的装备怎么办，如果这些装备用贷款付，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确定下来。

毛泽东同志有个想法。如果朝鲜战争再打1—2年，那么，可否把20个师装备的供货期延长到下一年度。

斯大林说，现在还难说。也许不得不缩减，也许不需要缩减。需要核算一下，核算的结果才能说明问题，在此以前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周恩来谈到海军装备的供货时间，是把这类供货列入计划，还是单独分出来。这一类供货大约应在6年内完成。原先的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斯大林：对于军事供货和海军供货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全部有效。但在确定供货的总金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不撤销任何贷款，不拒绝执行任何一项协议。我们认为拒绝执行承担的义务是绝不允许的。既然签订了协议，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一定执行。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将按这个比例编制他们的整个申请单。

斯大林：好的，这个比例可以接受。

周恩来说，最初计划建设151项工业企业，现在他们把这个数目缩小到147项，不包括军工厂(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厂、造船厂)。并解释说，这147个企业都不是军工企业，但可以为军事需要服务。

斯大林：我们通常很少建新企业，尽量扩大老企业。这样比较节约。中国却相反，尽量建新企业，因为那里的老企业不多。战时我们把飞机修理车间变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我们广泛采用了各企业协作的办法，不同的企业制造不同的部件，然后把部件装配起来。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这比建设专业工厂要容易。

周恩来说，内战年代他们也采用协作办法生产轻武器，但现在他们开始生产重装备，为此必须打下基础。

谈到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供货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时说，有3种弥补差额的办法：(1)扩大中国向苏联的出口；(2)支付外汇：美元、英镑、港币、瑞士法郎；(3)贷款。问这3种办法中哪一种更合适。

斯大林：也许，这三种办法全都要用。

周恩来说，他们预定把对苏出口扩大到130亿卢布。我们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品、丝品、矿产、食品(大豆、油脂、茶叶)。

指出在5年内他们可以筹集2亿美元以及16亿英镑、港币和瑞士法郎。

斯大林：最好是美元。英镑流通范围有限。港币问题需要同我们的财政部商量一下。

苏联十分需要铅、钨、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货。

指出我们还可以进口苏联在其他国家采购的柠檬、橘子、菠萝。

周恩来说，他们想从苏联获得的贷款总数为40亿卢布，是这样安排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

斯大林：势必要给，但具体给多少，要算一下。我们提供不了40亿卢布。

周恩来说，这个数字里不包括飞机。飞机的费用他们考虑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问题不在数字上，而在我们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设备。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因此，需要2个月时间。

周恩来转到申请派专家的问题说，从1953年起中国需要190名新的财经专家，417名军事专家，140名医科等学校教师。此外，还需要军工专家，但这些问题还要研究。

斯大林：这个问题要研究，什么专家，哪些专业、部门。我们要派，但派多少难说。

在华苏联专家做出了成效吗？

周恩来回答说，成效极大。

问斯大林同志对提交的报告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印象良好。中国在成长。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

周恩来指出，报告里有一条附注：在停战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建立一支320万人的军队，102个师。

斯大林：这很好。但这是最起码的。中国应当有良好的装备，尤其是空军和海军。

周恩来：我们想保持150个航空团，共13000名飞行员。

斯大林：少了，必须增加，需保持200个航空团。

周恩来：那势必要增加飞行人员。

斯大林：必要。也许要改为3团制师。师属机构少，可以节约。

周恩来问，喷气式歼击机与螺旋桨飞机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比例。

斯大林说，螺旋桨飞机要逐步淘汰，改用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的航速800公里。用螺旋桨飞机训练飞行员，然后改飞喷气式飞机。螺旋桨飞机一两年就要全部淘汰了。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航速1000—1100公里的新式歼击机。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不得。

周恩来提出向中国提供生产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野战炮的技术文件问题。

斯大林说，图纸可以提供。

周恩来问，要不要马上建立坦克厂，还是先建汽车和拖拉机厂，然后将它们转产坦克。

斯大林回答说，应当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这个厂还可以逐步扩大。至于汽车厂，则可多建一些。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修改自己的五年计划并请我们提出意见。修改

后的材料将交给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建议把总增长率规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则规定20%。这样，计划就将留有余地。而对劳动者则必须提出超额完成计划的口号。这样计划就能超额完成。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编制我们的计划，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总有考虑不周之处。

斯大林对中国制造水雷的情况表示关心。

周恩来回答说，正在筹建水雷制造厂。

斯大林指示说，必须保卫中国的海港。

询问澳门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澳门仍然由葡萄牙控制着。

斯大林说，必须把这个留在中国大门口的恶棍赶走。

周恩来说，他们对东南亚各国坚持执行这样的策略，即不派军队，而用和平方式影响这些国家。举缅甸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尽力用和平方式影响该国政府。对西藏也这样。问这种立场对不对。

斯大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必须驻有中国军队，而对缅甸则要谨慎从事。

周恩来说，缅甸政府隐瞒自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但实际上倾向美英，执行反华政策。

斯大林：如果缅甸有一个亲华政府就好了。在缅甸政府中有不少冒充什么活动家的骗子。

周恩来解释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入西藏，现驻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是不成问题的。

强调说，同西藏保持联系就难了。同拉萨联系需要配有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的四引擎运输机。苏联能否提供这种飞机？双引擎飞机只能飞3/5的路程，就不能往前飞了。

斯大林答复说，这件事苏联可以帮忙。

周恩来问，那么，中国能否在苏联订购20架四引擎飞机？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先提供10架，然后再提供10架。

指出，必须修筑进西藏的道路。

周恩来说，目前正在修，修路要用明年一年，一部分要到1954年。

斯大林指出，没有道路就难以在西藏保持应有的秩序。西藏喇嘛谁都可以投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价高，就投靠谁。

周恩来说，喇嘛确实有敌对情绪。今年(2、3、4月)他们策划叛乱，但中国政府把叛乱镇压下去了。

指出，结果达赖喇嘛的弟弟逃到国外去了。

斯大林说，进藏道路必须修，那里必须驻扎中国军队。

会谈结束时，约好9月4日晚9时会见。

A.维辛斯基、H.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3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75-87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

我方——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方和朝鲜方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朴宪永。

翻译人员——师哲、费德林。

斯大林：朝鲜居民的情绪如何？

金日成：情绪很好。

斯大林：朴宪永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朴宪永：是的，情绪很好。

斯大林：那么军队中情绪如何？

金日成：军队中的情绪也很好。

斯大林：彭德怀对此是怎么认为的？

彭德怀：是很好。

金日成：如果不考虑弹药问题的话，总的局势是有利的。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歼击航空部队？

金日成：有一个师。

斯大林：中国将自己的航空部队列入其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志愿军了，而是国家的部队。志愿军没有自己的航空部队。我们的人也会询问：这是否有利于民主主义阵营？在我看来，声明中国的国家部队参与战争是不利的。金日成应该有朝鲜航空部队。

金日成：如果物质条件许可的话，我们是能够组建1—2个航空师部队的。

斯大林：朝鲜人民尽管已经疲于战争，但仍然值得称之为英雄的人民。因为朝鲜人民饱受了灾难，我们准备为朝鲜裁掉自己的1—2个师。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歼击师部队？

金日成：有。

斯大林：可以将它调运过来。

金日成：学校里还有一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我们可以为1—3个师的人员提供物资装备。

金日成：我们能够确保3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那好吧，我们就为3个师提供物资装备。朝鲜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由于敌人不断加强轰炸，我们必须扩大高射炮部队。不久以前我们曾请求援助5个高射炮兵团，但是我们需要10个这样的团。我们向您，斯大林同志，请求了5个，向中国同志请求了5个。毛泽东说，目前中国没有可能满足朝鲜这一请求。因此，我们请求您给予10个高射炮兵团部队。

斯大林：你们有几个陆军师？

金日成：有18个陆军师。

斯大林：有多少炮兵部队？

金日成：我们有几个炮兵团，但是，他们的装备不足。

斯大林：我们的每个炮兵师是由两个炮兵团组成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样的？

金日成：我们实行的也是这种编制。

斯大林：如果你们缺少什么，请编制一份相应的清单。

金日成：这样的清单已经编制好了。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迫击炮？

金日成：有的，122毫米的。

斯大林：我们给你们提供10个高射炮兵团的物资装备。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我们的陆军部队缺乏榴弹炮和其他的武器。过后我们可以提出清单。

斯大林：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目前尤其尖锐的问题是确保工程兵部队和通信兵部队。这些部队有很大的缺额。这种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存在。我们缺少设备和材料，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一个月之后将停止生产口径为122毫米的炮弹。

斯大林：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我们。

金日成：我们已经编制了清单。

斯大林：粮食情况怎么样，白面、大米？

金日成：今年收成很好，但是，在下一年来临之前粮食还不够用。毛泽东已经答应保证我们的粮食和服装供给。

斯大林：你们那里吃不吃小米，或者只是吃大米？

金日成：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斯大林同志，作为礼物给我们运去了5万吨粮食。我们的人民喜欢吃面粉。目前，在克服着困难的同时，朝鲜居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但是，我们的运输工具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的机器、拖拉机和化肥。

斯大林：把相应的清单交给我们。据说，在关于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时如何表达自己意见这一问题上，你们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境十分困难，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中国的同志们也关心这一点。

斯大林：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即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就应该扣留10% [65] 的美国战俘，一直到中国和朝鲜战俘返回为止，或者说，如果他们不将这20%的中朝战俘遣返，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也可能，这种观点更好一些。

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并达成停火协定。关于未返回部分战俘问题的谈

判，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和停火之后继续进行。

我不清楚，对此你们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会确信你们的立场是公正的。

美国人可能会说，20%的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我们对此并不相信。

这种情况下，那20%战俘的问题就会被推迟，而只有80%的战俘会返回。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中国的同志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等待着美国人提新建议，以便修改自己的建议。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金日成：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了什么？

金日成：在与我们交谈时，毛泽东提出了几套方案：第一，继续坚决地坚持遣返回全部战俘；第二，在停战之后解决全体战俘的问题；第三，由于敌人扣留着我们的战俘，我们也应该扣留敌人的相应数量的战俘。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观点就与您，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一致了。

我们认为，这3个方案是最合适的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给出个主意，为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斯大林：在我看来，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内)，应该继续坚持返回全部战俘。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提出20%的问题。这里说的不是方案，而是立场。第一个立场：这就是返回全部战俘；第二个立场：20%的战俘不返回。

确实，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某种新的建议，或者是等着美国人提出新的建议。我认为，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第二个立场对你们以及你们的鼓动工作非常有利。20%的战俘不遣返给你们，你们就不遣返他们的20%战俘。第二个立场将瓦解美国人的阵营。巩固关于返回战俘、停止战争的意见，这将会有利于你们。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们是否很会打仗？

彭德怀：美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士气低落。

斯大林：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斗的：是斗志高昂、勇于善战，还是兵力占优势？

彭德怀：在1—2月份期间，美国人发动了200多次进攻，但是成功率只有1%。我们在这一个月期间进行了大约30次的进攻，其中有80%—90%是成功的。

斯大林：这些成绩表现在哪方面？

彭德怀：我们成功地消灭了敌人的小股部队——排或者是连。

斯大林：金日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金日成：当然同意。

斯大林：美国人的工事是否坚固？

彭德怀：最近他们的工事更加地牢固了，而我们的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工事设施本身并没有我们的工事好，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装备。

斯大林：他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有3条。

斯大林：你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实际上有2条，第3条正在修建中。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地雷场？

彭德怀：我们的地雷和铁丝网都很少。我们在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即指地雷和铁丝网）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敌人。

斯大林：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我们有专门的地图为自己的部队指示通道。我们认为，没有地雷和地雷场是无法打仗的。

彭德怀：在我们的前沿地区和敌人之间有很小的一段距离——总共只有300—500米。

斯大林：显然，你们的前沿地区防线过于靠前了。

彭德怀：也可能，这是由于自4月份开始我们逐渐向前挺进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各条工事防御线之间的距离如何？

彭德怀：距离不大，它取决于地势情况。在某些地方防御线联结在一起，而某些地方距离可达到20公里。目前，我们正在修建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堑壕？

彭德怀：有。

马林科夫：如何解释这一说法，即：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而敌人抓到的很多？

彭德怀：总的来说，我们抓到的俘虏还是比敌人抓到的多。

斯大林：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共有多少人？

彭德怀：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人战俘有12000人，而美国的报道说有20000人。朝鲜人战俘的数量很大，因为在1951年10月之前，美国人成功地抓获了大量的朝鲜人战俘。美国人在实施进攻行动时还俘获了大批后备队人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共俘获了12000名战俘，其中有8000名美国人。李承晚军队的战俘数量是40000人。但是，由于艰难的物质条件，战俘中的许多外国人死掉了。

金日成：根据我们出示的清单，我们总共抓获了12000人，其中有4416名外国人，其余的都是李承晚军队的人。战俘中有300名美国飞行员，他们之中有30多名军官。大约有27000名南朝鲜人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关于这一部分战俘报刊上从来没有报道过。

马林科夫：在前线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否进行换班？

彭德怀：是的。

马林科夫：这意味着中国部队有机会进行训练？

彭德怀：是的。临近1953年8月在朝鲜的全体志愿军部队将进行换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人员(军团的、集团军的、师的)都将经过朝鲜前线(的考验)。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卡秋莎(火箭炮部队)”？

彭德怀：前线有一个师，另外一个在后方。

斯大林：在敌人的后方是否有游击队在活动？

金日成：是的，正在活动，尽管条件非常困难。

斯大林：日本人是否有被俘虏的？

彭德怀：被抓获的只有美国籍的日本人。

马林科夫：该如何解释，在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期间，美国飞机被毁坏的很少？

彭德怀：我们认为，并不少。自战争开始以来，被击毁的美国飞机大约有5800架。

斯大林：中国飞行员能否驾驶喷气式飞机？

彭德怀：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飞机员能够参加战斗行动。

斯大林：为什么，难道他们害怕？

彭德怀：中国飞行员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驾驶技术。

斯大林：应该经常将他们带入空中，只有在空中才能学会驾驶。苏联飞行员有时候也不愿意到空中飞行，他们认为在学校里更好一些。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了飞行，就学会了飞行。现在，我们是按飞行的次数来评定飞行员的。谁飞行的次数多，谁就能够获奖。学校里的授课给予的不多。战斗训练才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经验。不应该害怕空练，而正相反，在空中应该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还应该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否则你们将不会拥有空军部队的。必须建立奖励制度。

你们是否设立了勋章和纪念章制度？

彭德怀：暂时还没有。我们打算在1953年实施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觉得，对于勋章和纪念章这样的制度，他们持有无政府主义的轻蔑态度。他们那里没有将军。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反共产主义的。其实，军队里设立各种军衔、纪念章和奖励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而拥有的只能是游击队。他们已经进行了15年的国内战争，驱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而军队里却没有实行军衔、勋章和纪念章等奖励制度，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在成长，他们的成长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关于这一点应该认真考虑。正规部队应该有良好的保障，应该有奖励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和保障军事干部，为他们建立必需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军事人材。

周恩来：斯大林同志，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因为，近20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国内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组我们的军队，将在军中的供职由自愿变为义务，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目前，我们的军队里共计有430万人，其中有自军士以上的144万名军官。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支由53万人组成的公安部队。自今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军队的改建工作，计划在1954年全部完成军队的改建工作。我们计划将部队裁减到300万人以下，这些考虑应该是在改善部队的装备之后，最终只留下250万人，再加上50万公安部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但是250万人——这是最低的标准了。除了陆军之外，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彭德怀：早些时候我们无法改组我们的军队，因为朝鲜发生了战

争，我们不得不拨出大量的经费供养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目前，由于国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财政状况，我们才能够相对快一些地改组我们的军队，并在部队里实行奖励制度。

金日成：我们将具体与谁就所提出的与军事问题相关的那些请求和清单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

我们计划分别向中国和朝鲜派出一个师的歼击机部队，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周恩来和金日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我想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正式的宴会，他们是公开来到我们这里的。至于那些非公开来这里的同志们，我想为他们举行家庭宴会。

周恩来和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H.费德林记录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5卷，第1932—1943页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说，他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发给维辛斯基的照会苏方没有反对。至于维辛斯基答复周恩来的照会，则不应该是对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的内容进行叙述，而应该是逐字逐句地写

出这一照会。

莫洛托夫说，他接受周恩来的这一建议。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旅顺问题的照会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2.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方接受联合公报的文本。

莫洛托夫说，联合公报的俄语文本作了一些修改：根据中方的文本，用“进行”一词替代了“准备”一词。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就联合公报的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莫洛托夫提醒说，关于输送军队的备忘录仍然有效。

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

周恩来说，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把如下几点确定下来：

建议决定提供的贷款的规模为1亿卢布；

建议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

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表述，建议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弱化这一表述。

该协议第二条提出的贷款问题改在第四条中指出。

莫洛托夫说，关于贷款数量的确定问题，他必须同相关的同志交换意见。他指出，看起来不会有人反对；他也不反对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问题，他也提出了新的表述：“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为此中国政府应该努力从第三国购买。”莫洛托夫还表示，同意在第四条中指出该协议第二条中规定的贷款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文本交给苏方，以便同俄语文本对照。他建议要么把该协议

的附件确定下来，要么就把附件删除。

莫洛托夫同意删除该协议的附件，并再次说，关于贷款的数额将会另行通知。

4.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他建议删除关于内燃机车的表述。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协议文本交给苏方核对。他建议在今年9月15日签署协议。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想弄清楚，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是否同其他的协议一同签署。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同乔巴山协商，因为这份协议应该由三方签署。

周恩来指出，如果乔巴山不方便在9月15日签署协议，那么中国方面同意在今年9月16日签署这份协议。

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周恩来说，在苏联方面提供的关于中国政府请求的援助物资中必须区分两类问题：(1)同朝鲜战争有关的供应，(2)同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关的供应。他强调说，他希望首先考虑关于同朝鲜战争问题有关的供应，并希望在他回国之前能够得到苏联政府的具体答复。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将尽快研究关于1952年同朝鲜战争有关的援助请求。并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至于1953年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因为中国需要的物资太多。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研究关于在中国组建军火厂的特别问题，并把这一问题同其他的一些援助请求区别开来；周恩来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已经在此方面展开了工作，而苏联方面已经派出了以乌达洛夫同志为首的特别的军事专家小组。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必须熟悉提供的材料，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周恩来还请求苏联方面注意关于航空工业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在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莫洛托夫说，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几天时间。

周恩来请求特别研究关于通讯设备的生产问题，特别是关于无线电雷达设备的生产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还很难做出答复，因为还没有对中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周恩来提议，让他和粟裕与布尔加宁同志以及苏联其他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认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他将同布尔加宁进行协商。

6.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的问题。周恩来请求，首先要考虑关于派遣部分苏联专家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急需这些专家。他说，将会提供急需的这些专家的名单。

莫洛托夫说，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在中国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他说，再次请求派往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太多，所以这些请求很难满足。

周恩来再次请求研究关于马上派遣部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强调说，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解释说，中国方面还不善于充分利用苏联专家，他提议，让苏联负责经济问题的总顾问经常就苏联专家的使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中国政府注意，以便使得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更加有效。

莫洛托夫说，一些苏联专家未必都必须在中国工作。

7.关于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

周恩来说，为了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他准备了一些材料，其中阐述了建议提供的商品的规模的主要内容以及相互供应货物的主要内容。

莫洛托夫认为应该做这一工作，他将了解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

周恩来提请苏方注意，最近两年，估计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的总量会超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的总量，随后接下来的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将会显著超过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周恩来阐述了如下可能：要利用最初两年中国向苏联出口货物积累的盈余，以便弥补在随后3年中苏贸易之间的差额。

莫洛托夫说，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之后苏联方面才能做出答复。

然后周恩来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求就五年计划的制定问题同他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作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周恩来表示感谢。

接下来周恩来表示，希望在他从斯大林格勒返回之后安排中国相关的代表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进行一次会谈。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同意。

1952年9月8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8, л.59-64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1950年2月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9月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A.Я.维辛斯基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4页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9月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A.维辛斯基

1952年9月15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5页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年9月16日

附件：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议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

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52年9月1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94-96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 (1952年9月17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有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97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99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对外贸易部在1952年9月2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40112/3214号)，请求允许在中国购买物资建设木质房屋，房屋的居住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造价为75万卢布，在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造价30万卢布，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造价45万卢布。

所建造房屋供海关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作为全苏对外运输企业联合公司办事处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的办公室。

对外贸易部认为，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价值为30万卢布的物资可以用对外贸易联合会在1952年超额的利润购买，据此，对外贸易部请求把1952年的投资计划增加30万卢布。

1951年，苏联对外交通协会在芬兰购买了符合标准的房子，建立了奥特波尔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095卢布，而每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020卢布。1951年，对外交通协会利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的符合标准的房屋建立了格罗迭科沃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373卢布，而每平方米有效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120卢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物资是建设海关和对外交通协会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房屋所需要的，而把这些材料组装起来预计每平方米有效面积需要556卢布，每平方米住宅的有效面积需要926卢布，也就是要便宜2倍多。

此外，没有可能从距离这些站点最近的苏联领土上得到建造房屋的

物资。

鉴于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应该允许对外贸易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当地的中国元购买物资，为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建设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的木屋，建造花费75万卢布，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所需造价30万卢布用对外贸易联合会的额外利润支付，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所需造价45万卢布列入对外贸易部1953年的投资计划。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附后。 [66]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9月18日

РГАЭ, ф.4372, оп.54, д.1031, л.45-46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同志；

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同志。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直接在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议，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接着问道，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不想交出全部战俘，扣留一部分，打算雇佣，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而现在我们每天都抓到被美国投到我方来的几名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借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周恩来说，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条意见，让中国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他仍然保留以前的看法，但要补充一点：除现在的联合国外，要单独建立亚洲、欧洲等洲的联合机构，不是代替联合国，而是与联合国平行。让美国人去建立美洲的机构，欧洲人建立欧洲的机构，亚洲人建立亚洲的机构，但都与联合国并行不悖。

周恩来说，中国与联合国不相干，他们清楚，要在建立大陆机构方面发挥主动。

斯大林强调，联合国是美国的机构，要打破这个联合国，但又保持一种不反对联合国的姿态，在尊重联合国的姿态下干这件事，不明说要打破、要削弱这个机构，而实际上却削弱这个机构。

回忆起在战争时期丘吉尔曾建议组成大陆联合国，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当时，我们缄默不语，听着这场争论，但后来英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于是我们便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

周恩来问，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就此事给毛泽东写封信。

斯大林解释说，最好不写信办成事，说他看见周恩来正在记，而且完全信任他。

周恩来谈到定于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大会时说，现在不得不把会期改在10月初，又说，中国将吸收日本和印度参加这次大会。

斯大林问，巴基斯坦参加吧。

周恩来肯定，巴基斯坦也应参加，巴基斯坦已受到了邀请，但巴基斯坦政府不发给护照。至于印度，印度代表团的部分人已经动身，日本人则由香港入境。

斯大林接着说，现在应当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因为：(1)召开大会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2)这样会更好，因为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

周恩来问，我国代表团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斯大林回答说：和平。

周恩来说起尼赫鲁关于召开苏、中、英、法、美五国会议的建议。

莫洛托夫更明确地说，这是国大党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说，应当支持这项建议。

周恩来强调说，印度当然是同英国一起出席此种会议，但利用这项建议显然是合适的。

斯大林同意此意见。

周恩来说，由于公布关于旅顺口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应持的立场便十分明朗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表明，是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

斯大林补充说，而且还准备侵略，但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

周恩来提出台湾问题，说既然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协定，从而就证明了它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排除了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只要保留与台湾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

斯大林强调，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支持周恩来的看法，即只要保留与蒋介石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指出，日本与蒋介石签约一事只能恶化日本的地位。

周恩来问，在德国问题上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

斯大林说，这难以预料。看来，美国不赞成德国统一。美国人在掠夺德国。如果东西德联合起来。那么，对德国就再也不能掠夺了。因此，美国人不希望德国统一。

周恩来发表意见说，虽然美国在重建西德和日本武装力量，指望利用他们，但这些武装也会调转过来对准美国。

斯大林说，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在以希特勒—纳粹分子领导的德国。

周恩来转到新疆形势问题，说新疆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新疆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同时在非法没收牲畜方面、宗教方面以及减租减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左”倾过火行为。为了纠正这些过火的行为，召开了中央全会，免除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职务并派多名中央委员到当地处理过火行为。总的来看，当地的不满情绪已经平息，外逃包括逃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已被制止。

斯大林说，过火行为是想尽快获得土地和牲畜的反映，于是便没收富人的土地和牲畜。

周恩来指出，改革的消息刚一传开，敌对分子便立即宰杀牲畜。

斯大林指出，当年在我国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后还会出现掠夺行为。

周恩来解释说，土改是在农业区进行，而在其他牧区则进行分配，过火行为是在分配时发生的。既然牧民参加分配，中国领导便决定改善牧民状况，这对改善整个状况也有利。

斯大林说，你们当然了解得更清楚。

周恩来说，刘少奇通知，印尼共产党要派两名代表出席十九大，并询问同他们在莫斯科讨论党的问题是否适时。

斯大林说，现在难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向中央提出此事。指出，印共代表来的时候，就请求帮他们制定党的纲领，当时虽然忙，但还是照办了。

周恩来通知说，日本同志也要来，大概也想商谈党务问题。

斯大林答复说，大哥哥不可拒绝给小弟弟办事。说这件事要同刘少奇谈，他有丰富的经验。询问说，中国对此事有何看法。

周恩来对此指出，刘少奇考虑随身带些有关的资料，以便讨论一系列问题。

斯大林指出，如果中国同志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不想谈，则不必谈。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肯定想谈。

斯大林回答说，那样，时间总可抽出来。

周恩来说，不排除越南同志也要来。

斯大林就此指出，越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

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会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

莫洛托夫在回到军事贷款、支付中国60个师的装备问题上，问道，他对周恩来上次说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对，即60个师的供货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中国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60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

随后提起中国政府代表团给苏联代表的赠礼问题，说赠的礼品太多了。

周恩来解释说，斯大林同志70寿辰时他们未能及时送礼。去礼品博物馆时看到其他国家赠送的礼物，便决定不能不补上他们未及时办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想赠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几辆苏制卧车。说我们有一种“吉姆”车，比“吉斯”小，但很漂亮，我们打算赠送几辆“吉姆”车。

随后提起对宋庆龄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说，她正在加紧自我修养，逐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到他们方面，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说宋庆龄对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感到非常自豪。

会谈从10时30分开始，12时30分结束。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绝密

(特别文件夹)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4月18日第1853—703cc号决议，苏联财政部应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纸币，数量为4.66亿张。

面值为5元和10元的纸币应该准备妥当，并在1953年3—9月期间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面值的纸币在1954年3月提供。

国家货币印制厂根据中国人提供的图纸，已经准备好了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中国纸币的机器印刷样板，并且在9月份已经把上述纸币的样板都转交给了中国人，以便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伪造中国货币，国家货币印制厂采用了带水印和化学保护的特别的纸张；在印制中国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两面的印制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版印刷术、不能通过印刷途径模仿的组纽饰线，还采用了特别的防伪措施：在规定的位置印刷最小的符号、花纹线和图案线，它们的走向是连贯的，由黑到白，由白到黑。

根据中国代表的通报，国家货币印制厂提供的样币不能使中国人满意。今年9月22日，我接见了中国大使，他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请求说，在中国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纸币的印制还应采用苏联货币使用的其中的一项防伪措施(带黑白线的图案)。大使接着说，对样币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今后在中国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中国货币，就必须把使用“黑白线图案防伪”印制货币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

考虑到中国人的请求，考虑到在苏联的货币上除了上述的防伪措施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靠的防伪措施(奥尔洛夫印制法、双重金属线、所谓的涅兹韦茨基防伪法以及在钢网上的照相凹版印刷)，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的货币上采用“黑白线图案”防伪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附后。 [67]

苏联财政部部长

A.Г.兹韦列夫

1952年9月25日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58, л.93-94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第50530号，1952年11月17日

我们的报告如下：

目前在洛博夫同志所率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中包括以下部队：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

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是于1952年编入该军的，目的是替换以前在该军服役的各航空师，而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自1951年6月编入该军以来一直未曾替换。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承担夜间作战，第八十七高炮师负责掩护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第九十二高炮师和第十高空—探照灯团——掩护鸭绿江上各渡口和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安东地区所驻防的各机场。

据洛博夫同志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已连续17个月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指战员身体过于疲劳，各部队战斗力下降，军官、士官和士兵患病者日益增

多。

鉴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身体过于疲惫，病员不断增加，洛博夫同志请求对这些部队予以替换。

我们均同意洛博夫同志的请求。

关于上述部队的替换可于1953年2月1日以前进行。替换部队来源：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在替换时现有全部装备均留于原地，并移交给新到的歼击航空团、各高炮师和高空—探照灯团。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我们将提交相关决议草案，并请求您审阅和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附件：

苏联部队会议决议

第__号

1952年11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责成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3年2月1日以前向驻中国的洛博夫同志发出指令：替换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前往替换的部队：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来自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来自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上述所有部队发送时一律不携带武器装备。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23-26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 (1952年12月17日)

发自北京，1952年12月17日16时3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68]：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当前敌方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19个师、4个旅和7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7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4个旅，李承晚军队的12个师和7个独立团。

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1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团。

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4—5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

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

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云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

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2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

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9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

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58个据点被清除。

在9—11月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11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4万多。

10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4公里的约占3平方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月末，敌人被毙伤达2万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2万多发，有时多达3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

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30门火炮，发射约1万多发炮弹。

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24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110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的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以及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

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1.4万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1.3万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拥有大约2000门苏式大炮。

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

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所以，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16个军、4个榴弹炮师、4个坦克团、5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1953年1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4

个步兵军、1个榴弹炮团、5个坦克团、2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5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

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

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

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一、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152毫米榴弹炮10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122毫米榴弹炮21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76毫米师用炮150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100门，带备用零件；

85毫米高射炮48门，带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管200个；

ACT炮队镜300个；

ПAB炮兵罗盘400个

8倍望远镜2000个；

高射炮指挥镜20个；

BMT炮兵罗盘50个；

牵引车783辆，其中包括152毫米榴弹炮用履带式牵引车135辆；

吉斯151型汽车336辆；

嘎斯63型汽车312辆；

嘎斯67型指挥车151辆。

二、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200发。以上共5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96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45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45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4500发。以上共150000发。

(八)122毫米坦克杀伤炮弹和自控信管14000发。

(九)122毫米坦克穿甲炮弹和自控信管6000发。以上共20000发。

(十)120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一)107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二)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30000发。

(十三)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500000发。以上共630000发。

总计为805000发。

三、请于1953年2—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5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1500发。以上共50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128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60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60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6000发。以上共200000发。

(八)76毫米炮的杀伤弹50000发。

(九)76毫米炮的杀伤爆破弹27000发。

(十)76毫米炮的穿甲弹15000发。

(十一)76毫米炮的次口径炮弹5000发。

(十二)76毫米炮的烟幕弹3000发。以上共100000发。

(十三)85毫米坦克杀伤炮弹32500发。

(十四)85毫米坦克穿甲炮弹12500发。

(十五)85毫米坦克空心炮弹5000发。以上共50000发。

(十六)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50000发。

(十七)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000000发。以上共1150000发。

总计为1550000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

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1952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

至于20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1953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四、请于1953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6种材料：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填装药700吨。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填装药500吨。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填装药100吨。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1953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

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1952年9月3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第23109号的80%和第23119号的80%)应于1953年1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供1166种坦克修理用的材料和62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2月17日

第3541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05-114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12月17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1953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1953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1953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1953年将向您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20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80万发，各式大炮1320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1953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20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12月17日电报申请数的1/4，计：炮弹60万发、各式火炮332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1953年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药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140万发(1952年为112.5万发)、各式火炮1652门(1952年为1056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

1952年12月2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15-116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 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第420985号

鉴于1952年12月14日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发给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同志的第2996号电报，我们现报告如下：

1951年11月由5位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去了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总部。

总顾问中将沙林同志在临行前得到的任务：

——向苏军总参报告有关前线局势和彭德怀司令部的情况；

——不经苏军总参同意顾问团不得就作战问题提出任何建议；

——顾问团的工作仅限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范围，顾问不得到司令部以外的部队中去。

根据相关指示，军事顾问可以向彭德怀提供以下帮助：组织和加强防御，解决司令部范围内的工作，军队的指挥、侦察和战备训练的组织等问题。

鉴于沙林同志的建议和克拉马尔同志因病休假，我们决定让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作为临时总顾问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司令部。

..... [69]

我们请求：

1.让顾问团继续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

2.加快确定候选人名单的速度，并责成其到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接替现任军事顾问所担当的职责。相关候选人名单我们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具体包括：少将莫扎耶夫——敖德萨军区作战管理局局长；坦克部队少将马雷金——基辅军区装甲坦克部队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1952年12月30日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102 105

1953年

№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1953年1月3日)

摘自A.C.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机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A.C.潘友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司令朱德的会谈纪要

1953年1月3日

在礼节性的交谈后，应我的要求朱德讲述了国内和远东的形势。

朱德说，中国政府认为，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开始积极实施在远东的政策。看来，美国人试图在3月份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美国还在竭尽可能快速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组建日本武装部队。

在谈到蒋介石政府的时候，朱德说，美国人也很积极，蒋介石也没有停止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一些小分队从事制造中国紧张局势的活动。朱德指出，即使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大部队，也不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大的威胁，这些空降部队很快就会被消灭。

在再次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朱德指出，尽管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但战况不能令美国人满意，因为战争时间的拖延要求大量的人员，但美国是没有的。而美国仆从国部队即使是使用美国的装备在朝鲜什么也做不了。

朱德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准备把朝鲜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至于五年计划，朱德说，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后，五年计划已重新审订。其中，工业生产的增长由每年增长20%更改为15%。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7日)

发自北京，1953年1月8日11时1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根据朝鲜形势，为了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新进攻，当敌人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时，我们准备向朝鲜派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作为志愿军。

请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否适宜。为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1953年2月根据1952年海军器材申请单向我们提供以下武器：

一、鱼雷快艇及水雷和鱼雷

(一)18艘鱼雷快艇(柴油发动机)和全套备用零部件(1952年申请单报的是12艘)。

(二)上述18艘鱼雷艇的72枚45-YTK鱼雷。

(三)每艘快艇5个油料基数(共90个油料基数)。

(四)2台M-50发动机及全套设备和图纸(为训练专业人员用)。

(五)20枚战斗训练用的45-36K鱼雷。

(六)4套训练用“斯库姆勃里亚”发射机。

(七)4套鱼雷学校用YC4接收机。

(八)180枚K-Б水雷。

(九)270个护雷具。

二、海岸炮兵

(一)3个13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二)3个10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三)36门37毫米火炮(防空用)。

最好所有130和100毫米炮兵连均备有“莫斯科中央瞄准”射击指挥仪，并备有以下测距仪：

1.3个130毫米炮兵连，3个4米测距仪。

2.3个100毫米炮兵连，3个3米测距仪。

3.36门37毫米火炮，9个1米测距仪。

(四)6台“3-15-4”型探照灯(每连1台)。

(五)海岸炮弹药和37毫米火炮的炮弹。

1.130毫米半穿甲弹3000发。

2.130毫米爆破弹1800发。

3.130毫米杀伤爆破弹1800发。

共6600发。

4.100毫米爆破弹2700发。

5.100毫米空炸炮弹2700发。

共5400发。

6.37毫米曳光穿甲弹20000发。

7.37毫米曳光杀伤燃烧弹30000发。

8.配置130和100毫米炮兵连的临时地基方案。

三、海军航空兵

(一)图-2鱼雷飞机(附带全套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部件和工

具)32架。

(二)拉-11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件和工具)35架。

(三)拉-9(或拉-11)歼击教练机4架。

(四)里-2飞机和里-2教练机(附带备份零部件和工具)4架。

(五)雅克-18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6架(1952年申请单中是12架，现再增加4架)。

(六)雅克-11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4架(在1952年申请单中我们没有申请这种型号飞机)。

(七)AШ-82ΦH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20台(1952年申请单中只申请10台，现再增加10台)。

(八)M-11ΦP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10台。

(九)带45-36-AHY弹头的航空鱼雷60枚。

(十)AMД-500水雷160枚。

(十一)假鱼雷20枚。

(十二)ПЛAB-100反潜航空炸弹100枚。

(十三)AMД-500实习水雷20枚。

(十四)45-36-AHY实习鱼雷20枚。

四、顾问和教官

请向中国派遣以下专家：

(一)海军航空兵参谋长顾问1人。

(二)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长顾问1人。

(三)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工程师顾问1人。

(四)水雷鱼雷航空团长顾问1人。

(五)水雷鱼雷航空团和工程师顾问1人。

(六)拉9歼击机航空团长顾问1人。

(七)拉-11歼击机航空团工程师顾问1人。

(八)临时基地海岸炮兵连建设顾问工程师1人。

(九)M-50柴油机工程师1人。

(十)M-50柴油发动机教官3人。

上述顾问和教官最好能在发运武器的同时派到中国来，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部队能在进行两个月战斗训练后派往朝鲜参加战斗行动。

请研究我们的请求，并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7日

第62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 ф.45 , оп.1 , д.343 , л.125-128

№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1月12日)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请求以您的名义为中国提供1953年朝鲜前线所需的装备、弹药和各种军事技术物资。

首先毛泽东请求1—4月份提供：火炮624门，炮弹235.5万发。

根据这个请求，按照您的决定，已通知毛泽东同志，他们所申请装

备、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已超过我们1953年的能力，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为20个步兵师提供装备、弹药和军事物资。但是考虑到电报中列举的情况，已同意提供超过20个师的装备和弹药，年底前提供大约60万发炮弹和332门火炮，而不是毛泽东申请提供的235.5万发炮弹和624门火炮。

在1月4日给您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要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这个数量苏联政府已同意在1953年平均的提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1—2月提供332门火炮和40万发炮弹，其余20万发炮弹3—4月提供。20个师的炮兵装备从3月份开始供货，每个月2个师，1953年底完成。

毛泽东请求，为20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的每月数量如下：

	弹 药	火 炮
1 月	20 万发	166 门
2 月	20 万发	166 门
3 月	18 万发	132 门
4 月	18 万发	132 门
5—9 月	每月 8 万发	132 门

根据我们9月27日关于提供装备和弹药的电报，制定了每个月平均提供的数量：炮弹每月11.65万发，火炮每月138门。

如果您认为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能力，那么我们认为在1953年5月1日前提供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为20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但不是像毛泽东所要求的在3月份，而是在5月份。为此，每月给20个师提供装备的统计如下：

	弹 药	火 炮
1 月	15 万发	166 门
2 月	15 万发	166 门
3 月	15 万发	166 门
4 月	15 万发	166 门
5—9 月	每月 10 万发	165 门

这是我们向毛泽东同志提供的答复方案。

请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1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33-135

№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枚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15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37

№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1953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朝鲜召回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的军事顾问组的

考虑。

鉴于以彭德怀将军为首的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已回到北京和以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行动的指挥领导从北京实施，以沙林同志为首的我军事顾问组织继续留在朝鲜已不合时宜。

在您批准从朝鲜召回沙林同志之后，该顾问组只剩下3人：克拉马尔少将、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和彼得罗夫中校。

在由北京通过在京的彭德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领导的情况下，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责任责成我在华的军事总顾问负责较为合适。

至于我们需要的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继续由拉祖瓦耶夫同志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

请您允许从朝鲜召回我上述军事顾问。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
页

№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函：美国发动细菌战(1953年1月18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

在发送这些信件的同时，我们把“关于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的影片也发送给你们，并且希望，该影片能为贵国的大众放映。

1952年初，美国政府开始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践踏人类道德。美国政府犯下的这些罪行罪证确凿，并且早就被国际组织、被访问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知名人士所证实。1952年6月，由国际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通过实地对所犯罪行进行详细而严格的科学调查，得出了结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是美军进行细菌攻击的牺牲者。

这一事实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证明并揭露了美国政府发动的细菌战。我们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够坚信美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这些卑鄙的罪行。我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平就应当联合起来进行自卫，坚决开展反对细菌战的斗争，以此来制止这些使用细菌武器来毁灭人类的罪行。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1月18日

ГАРФ, ф.Р9539, оп.1, д.246, л.17-18

№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1953年1月21日)

布尔加宁同志：

兹报告现在朝鲜的形势。

在艾森豪威尔1952年12月2—5日访问朝鲜 [70] 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关于克拉克有进攻计划的侦察情报、许多美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的言论以及美国在远东准备进攻朝鲜的实际措施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措施反映在以下方面：

——加紧兵力部署，进一步展开南朝鲜军队。1952年12月，组建了2个步兵师，3个独立步兵团。考虑到这些新组建部队，南朝鲜军的战斗编制最近时间可达到15个步兵师(原有10个师)。

——加强武器和技术装备。南朝鲜每个步兵师都成立了由4个炮兵

营编制的炮兵集团(72门火炮)，校射航空兵分队(8架飞机)和一个坦克连。

——美国要求每一个朝鲜参战国都增加自己的部队。对此，比如土耳其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再往朝鲜增派一个旅。

——美国人在台湾训练和准备了国民党3个师，它们可能被用于朝鲜战场。

——驻在日本和朝鲜的9个师有7个师完成了登陆训练。在日本和朝鲜东海岸实施了总结性的登陆演习，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登陆能力的检验。

——开始在朝鲜准备海军基地和港口：镇海(釜山以西40公里)、釜山和仁川；在北朝鲜西海岸仁川—海州地段诸岛修建基地。在这些岛上发现有增援海军陆战队的美军第二旅分队。

——美国在北朝鲜大大加强了侦察和破坏活动。侦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西海岸安州—海州，东海岸城津—元山段，交通枢纽和装备基地。

——美航空兵加紧轰炸北朝鲜西部的道路、渡口和人民军基地。

——在前线南朝鲜师逐渐替代美军师。1952年12月，3个美军师由第一梯队调为预备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指挥部是这样评述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的：

朝鲜持久战对美国不利。因此为赢得战争他们不得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在朝鲜顺利进行战争的方法可能是实施大规模海上登陆。

美国人将以近7个步兵师的兵力，通过在朝鲜西海岸格松岛—海州段登陆实施主要突击。

同时，美国人还将以1—2个师的兵力，通过在元山地区登陆，实施辅助突击。与此同时，加紧正面进攻。

此外，中国指挥部估计到以1个师的兵力在安州、云山和开城地区空降的可能性。

认为在黄海半岛登陆不大可能，因为这只能拉长战线。

为实施登陆，敌人可能运用11—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从主要前线抽调，5—6个师从外地调(从日本调一个师，从蒋介石那里调2—3个师，从美国调2个师)。

认为登陆时间很可能是在1953年7月。

中国指挥部认为，美国人在实施登陆战役时将使用原子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指挥部决定：

一、加强自己在北朝鲜的兵力部署，把3个军(第一、第十六和第五十四军，共9个师)连带重武器和一个坦克师调往北朝鲜。

此外，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东北辑安和临江地区，于1953年3月集中1个军。

二、调整在朝的兵力部署，重点加强西海岸防御。

从前线抽调优秀部队以加强海岸防御：把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调往西海岸地区，把第十五军调往东海岸地区，第四十七军留作前线预备队。

它们的阵地由缺少战斗经验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四十六和第一军驻守。

由于兵力重新部署，西海岸地区防守兵力将加强到6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数个炮兵部队。

在东段战线，为加大战斗队形密度，规定把朝鲜第七军团配置在第一条线，并由驻在西海岸的朝鲜第四军团取代朝鲜第三军团。

部署调整，其中包括中国境内出兵，计划在很短时间里，至1953年1月20日前完成。

但是，计划中的人民军兵力部署调整，由于中国军队入朝推迟，至今尚未全部结束。

三、为指挥部队成立了西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和东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

西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十六、第四十和第五十军以及朝鲜人的3个军团；东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十二、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三步兵师以及朝鲜人的第二军团、第五军团和第二十四旅。

四、立即着手加固海岸防御工事。

五、在最短的期限里(200天)建成开城—海滨(宁远)—休济岛(Сюдзидо)的铁路，并拓宽主要的公路干线。

六、在1953年实施3次战役，每次1个月，目的是牵制敌人，杀伤敌人，不让其加强登陆部队。

七、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补充伤亡，1953年成立了25万人的预备队。师和军成立了预备营，兵团成立了预备团。

八、为预防敌人在黄海半岛地区登陆，着手组建这一地区的朝鲜游击队。

九、制定的所有反登陆措施，包括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和坑道，计划在1953年3月15日前完成。

我们认为中国指挥部对朝鲜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对在西海岸格松岛—镇南浦一线登陆不利，美国人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即：

——以登陆部队从镇南浦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汉城以北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海州东北人民军部队，然后向平壤、安州进攻；

——以登陆部队从元山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铁原、金化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人民军左翼集团，然后向平壤进攻。

在美国人按照这一方案实施行动的情况下，人民军部队的部署可以保障坚固的防御。

不排除美国人通过登陆部队在黄海半岛登陆后实施部分战役的可能性，其任务是前出到开城地区(海州以东75公里)，夺取人民军右翼部队

的主要交通线。在1952年下半年，美国的谍报—破坏小组不断在这个半岛实施登陆。

为了加强反登陆防御，防止敌人在可能地段登陆，我们已建议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同中国指挥部一起讨论下述问题：

——以驻扎在该方向的第六十四军之兵力加强镇南浦的防御以及以第二梯队兵力实施机动；

——建立军团和兵团反坦克炮兵预备队；

——加强东岸防御部队的炮兵部队。

此外，我们还建议格拉祖诺夫 [71] 同志在近期内向朝鲜派出我们的通信专家和工程专家，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有这方面的要求。

同时我们还准备通过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向中国指挥部提供组织反登陆防御的基本原则。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2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页

№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1953年1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在朝鲜使用中国海军部队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向您提供鱼雷艇、飞机和装备的电报已收到。

您请求告知我们对派中国海军志愿军赴朝是否适宜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大概指的是使用海军陆战队。当然，海军陆战队可以成功地用在沿

岸反登陆防御总体战中以消灭敌人靠岸和登陆时的运输工具和登陆部队。我们认为您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

关于向你们提供海军军需品问题我们已下达了指示：拨给你们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

已向海军部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你们发出上述装备。

关于顾问，我们打算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您邀请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将从目前正在中国的我方海军顾问中派出。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27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39

№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1953年1月29日)

谢苗诺夫同志：

为了保证顺利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登陆战役，中国志愿军部队正在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修筑防御工事，所以我们急需阿芒拿炸药。

目前我们的阿芒拿炸药还无法满足工业和军队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工业上已采取措施节约阿芒拿炸药，并把一部分供应军队的阿芒拿炸药运往前线，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仍不能保证军队需要。

为了保证在2—3月份完成朝鲜沿岸的防御工事，经我们估算，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2—3月份分两批向我们提供3000吨阿芒拿炸药、2400万支雷管和960万米导火线。

请苏联政府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告知决定。

敬礼！

毛泽东

第223号电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3, л.140

**№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1953年2月4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们收到了你们在1月23日发来的电报，现已将国际科学家委员会的30份报告、一份费罗(ФИЛО) [72] 反对使用细菌武器的声明的英文文本复印件以及一套五箱子关于美国战俘供状的材料空运给过去。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2月4日

ГАРФ, ф.Р9539, оп.1, д.246, л.4

**№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
战的材料(1953年2月23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托，有幸就此发送如下材料：1.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信件。2.《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的事实调查》影片。3.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凯文、肯尼斯、伊诺克和奥尼尔的录音。4.30份《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事实的调查报告》。影片、美国被俘飞行员的供状录音以及报告材料都是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赠送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

中国驻苏联大使

张闻天

1953年2月23日

ГАРФ, ф.Р9539, оп.1, д.246, л.14

№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1953年3月4日)

摘自A.C.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1953年3月31日

第29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会谈纪要

今天，3月4日23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高岗同志访问了大使馆。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表示，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在这段艰难的日子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和警惕性，这完全被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应当这样”。

毛泽东表示，真诚地祝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尽快康复。

他说，刘少奇和陈云现在正在医院，因此无法同他们一起前来使馆。

A.潘友新

ABПРФ, ф.0100, оп.46, п.362, д.12, л.32

№24869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 (1953年3月7日)

引言。

对医疗工业总的看法。由于向中国派遣专家这些问题包含了工业的组织问题，因此，必须指出中国医疗工业的总的状况。医疗卫生问题，其中包括医疗工业问题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根据中国现有的状况，特别是由于继续抵抗美国的侵略，并向朝鲜提供帮助，药剂和医疗器械的生产是国家机关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怎样增加生产，也包括进行新的建设。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国有工厂、地方所属工厂和私有企业进行的药剂的生产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对药剂的需求，进口花费了大量的外币，特别是为了购买一些新的和其他的一些有效的治疗制剂，这些制剂在国内是不能生产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轻工业建设领域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些新的化工和药学工厂，并扩大现有的生产。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五年计划的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业建设，对医疗工业建设的拨款在中央政府在轻工业领域的拨款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根据1952—1957年的五年计划，为了保证所有医疗工业项目的建设，拨款的总数量为人民币13800亿元。在合成药剂的生产方面，预计1957年将生产800吨磺胺类合剂、500吨阿司匹林、100多吨非那西丁、15吨氯霉素，打算生产大量的对氨基水杨酸。

在国内的原料能够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力量应该能够完成这些生产。为了满足对葡萄糖和淀粉的需要，同时为了纺织业生产的需要，计划建设一座谷物加工厂，这可以利用一些废料——谷物提取物，这是国内现在所缺乏的，为青霉素和链霉素厂的生产提供保证。在抗生药物的生产方面计划建造一些生产青霉素的工厂，使其在1956—1957年形成12万亿剂青霉素和4000公斤链霉素的生产能力。目前在抗菌药物的生产方面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决定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生产工厂，首期建设可以生产4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现在，中国行政机构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在东北的沈阳、华东的上海、北方的北京附属于轻工业部的中央设计单位进行一些专业化的设计，建设和装配工厂，来组织建设。应当指出，为了完成设计工作，在中国，今年有大量的干部和专家被吸引到了医疗工业企业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中。上海政府根据我们的建议在1952年7月组建了特别的设计组，该设计组有30多名专家，从事对上海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的工作。

在中央轻工业部，1952年底有各种小组在进行工作，其中在投资建设银行就有73人以上，有造纸和制糖工业的工程师、大量的设计工人和实习工人。尽管在设计 and 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大量不足，有经验的中国

专家在领队专家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可完成现在正在建设的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工作。但是，为了对今后需要建设的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特别是为了对链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目前中国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完全熟悉这些生产的干部，无论是在生产工艺还是在设备和生产的组织方面。因为中国青霉素工艺的生产经验有限，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进行试验生产的规模不大，较为妥当的是把现在的状况看作是组织本国青霉素生产的初级阶段。根据五年计划，随着这一建设计划的完成，预计会广泛进行一些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大型工厂的建设。必须大规模地进行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建设，这一点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中得到了承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民族干部被吸引到了这一工作中，扩大了在上海进行的试验生产，也加强了研究工作。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首批大型建设项目之一，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东局都对国有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发展非常重视。

抗生素药剂(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需要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医疗卫生部的材料，可以得到一些不太完整的、关于可以获得免费医疗帮助的中国居民的数量信息。根据这些不太完整的材料有50万居民可以获得医疗帮助。在1952年，预计每千人拥有2.5张病床，在五年计划中这一数据应该增加两倍。

五年计划中规定扩大对居民的医疗帮助，这使得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抗菌药剂生产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通过对目前的状况进行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居民肺结核患病率最近非常高，特别是在城市居民中，在上海，肺结核的患病率达到了5%。如果把中国城市居民的数量看作4000万人，那么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大约为200万人。这就需要链霉素，如果把链霉素看作是治疗肺结核的主要药剂，那么事实上在近几十年对该药剂的需求是无限的，因为每年大规模组织生产20吨链霉素就能满足中国对链霉素的需求。实际上，如果说，1952年以各种形式获得医疗帮助的肺结核患者的数量为10万人，那么就可以确定对链霉素的最低需求为4吨。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必须计划每年至少生产4吨链霉素，每年链霉素的生产能达到6吨就更好了。

为了确定对青霉素的需要就必须注意享受免费医疗的居民的总数，因为青霉素是公认的广泛用于内科病治疗的药剂。根据现行的1952年的法律规定，能够享受免费医疗的是如下人群：人民解放军、工人、教

师、主要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大概不少于1000万人。因此，考虑到目前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对青霉素的最低的需求为4万亿—6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在最近几个五年对居民医疗帮助的增长计划中，最低需求6万亿剂青霉素的需求，这一数据应该增加2倍，因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在1952年为1500万人。最近几年，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将会随着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生产和建设工人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每年青霉素的生产至少应为12万亿剂。

依据1951年的进口数据对中国目前对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需求进行确定的时候，最少的需求还要稍多一些，并且对链霉素的需求为4000公公斤。1951年进口这两种药剂的开支为3千亿元，或者说，换算成苏联货币为每年4500万卢布；这一数目相当于投资一所现代的青霉素工厂。上述所述使得我们可以指出，对于现在的建设是，首批建设项目每年的生产数量应为4万亿剂青霉素和4000公斤链霉素，因此，这些数据是最近两年投资建设计划的基础。在五年计划的投资建设计划中，这些数据得到了增加，其中青霉素增加了4倍。经过对具体的计划和建设项目的清单进行研究之后，将会确定对五年计划的拨款。预计在五年计划的草案中，青霉素的生产将达到16万亿剂；除了这一总计划之外，为了解决主要的问题，政府将批准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工厂，其首批生产的青霉素可以使得在1954年终止对青霉素的进口。

现在的中国居民达到4.75亿人，其中农业居民为4.28亿人，医药生产将会得到发展，其中青霉素、链霉素和其他一些有效制剂的发展事实上是没有限制的。当前，工业建设的能力以及向国内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发展，是对实际需求进行具体确定的基础，这些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指了出来。

目前青霉素的生产状况。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工厂是最大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工厂，其设备是美国人在1948年提供的。在这些设备中应当指出如下一些：4套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功率为15立方米每秒；2套维尔京顿型压缩机。只有部分空气压缩机得到了使用，只有2台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在工作，剩余的设备将用于扩大实验性生产，而部分设备则应当用于进行新的生产。约克型冷冻机4台，其中被使用的2台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15吨冰(这是美国人计量冷冻的方法)。由于立式锅炉的容量不大(有效生产)，最近这些锅炉将会替换成由上海蒸汽锅炉制造

的生产能力为每小时1吨蒸汽的锅炉。发酵部配备的设备是在1952年之前配备4台容量为200美国加仑的机床以及其他相应的设备。上述4台机床中，2台依靠自己的力量被装配到青霉素工厂，其中的一台由普通的钢材制造，其覆盖面为一层薄薄的不锈钢片。另一台机器带有拌合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改变速度，除了有涡轮型的用以改善通风状况之外，发酵器还附带了瓦利多夫型通风设备，该设备的烟囱是不锈钢的，并被牢固地竖立起来。这一机床的详细图纸没有提供，设备也不是标准的，而是从现有的工厂中搜寻到的。总的来说，该设备是用来试验的，以便对搅拌和通风设备的图纸进行研究，至于用来试验的现有设备具体而详细的图纸不应该被当做是标准的指数。1952年底，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程师和工人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在3个月的时间内，以自己的力量安装了2台容量为1500加仑的发酵器，每台发酵器重5吨，这2台机器是在市场上购买的，是用各类进口的普通钢材制作的。设备是根据原生产图纸制作的，图纸非常详细，搅拌器和减速器的驱动装置除外，因为它们都是从现有的设备中安装的。使这两台设备都装备有开放性的涡轮搅拌器，并且使搅拌器驱动装置的速度为每分钟240转到360转，这一点还没有最终解决，因此，作为搅拌器的一个组成设备，它没能使搅拌器达到有更大容量的标准条件。

为了保证消毒条件的实施以及发酵器旋管结构的冷却，设置了3—4个独立的热交换器。这使得可以更好地调解规程，减少蒸汽和水分的消耗。监督测量设备被集中起来，这一设备是美国生产的，可以根据参数的大小、水分的消耗和压力、蒸汽的消耗和压力、气压、空气的消耗和压力对发酵的过程进行管理，可以自动调节温度，但不能自动消除泡沫，对发酵器的管理以及管理过程的调节由看守仪器的值班人员手工完成。为了对监督和测量仪器进行维修和检查，设立了一个不大的实验室以及一名工程师专家。然后应该指出的是，工厂的供水由两口井来保障，每分钟可以供应700加仑的水；来自城市电网的电力保障以及排水设施可以对现有的生产提供保障，并可以扩大生产。

现有的空气渗透程序以及对其进行消毒的工作计划是复杂的：首先，在机械除油净化之后，空气被急剧冷却，除去多余的水分，然后把它放入一个内含普通棉花的总过滤器内进行消毒，然后通过工业棉花过滤器进入发酵器内。其次，在通过棉花进行过滤的时候都要从一个方向经过一层棉花，这就导致在压缩空气的时候造成大量的损失，由此压缩机内被压缩的空气的程度会自动提高，这会增加工厂的电力消耗。

培养液的过滤是根据一般的工作计划来完成的，采用真空鼓过滤器，还有1台生产能力为每小时2吨的仪器；被过滤的培养液被保存在一些涂上了搪瓷釉的钢制罐子里，每个罐子的容量为2000升(美国设备)。过滤器靠2台泵和真空鼓来提供保障，每台泵的功率为每分钟7立方米。

提取处装备有2台拉瓦尔型圆盘式分离器，1台沙尔泊列克斯型圆盘形分离器，以及6台沙尔泊列克斯型筒状离心机。由于发酵器的容量不大，这台设备不经常使用，因此，预计要扩大发酵车间的规模，以便能够充分利用车间的装备提取青霉素。青霉素的分离和青霉素的结晶是在车间的实验室的玻璃容器内手工完成的。晾干设备由两个进行青霉素晾干的基瓦因(Дивайн)烘箱组成，该设备从工厂被拆下来运往北京，来保障北京细菌学研究所的生产，该研究所生产改造的疫苗。上海青霉素厂只生产结晶青霉素，它通过普通途径在烘干箱内晾干。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生产建设项目已经在8个月内完成了，装配工作持续了13个月，也就是整个生产的准备阶段恰好是上海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的2年新生活时期。上海青霉素厂现在被称为第三实验性制药厂，在延安西路第1036号以前的维修汽车的厂房里，位于上海西部，以前是欧洲人租借地的一部分，现在的厂房是一层的生产车间，周围是居住区，空地非常狭小，工厂没有扩张或者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生产面积为2500平方米，可以扩大到3000平方米。根据工厂所在地区的城市建设规划，禁止进行工业建设，因为该地区主要是生活区，因此今后不存在在现有的场地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但是，这种状况不排除通过购买已有的地块组建实验基地来扩大实验性生产的可能。另外一些优势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该厂靠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轻工业部上海研究中心，这就使得该厂今后便于利用附近的科技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对现状进行讨论后，中国政府通过了计划，建议根据第一期青霉素的生产经验扩大生产，并在第二阶段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

这一计划得到了执行，购买了一些空地和新的建筑，作为进行研究和工厂试验的场所。同时，在工厂的生产车间中组建了仪表实验室来收集和计算数据，以便确定生产工艺的指标，这些都是设计新的建设项目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根据制定的生产议程在该实验室进行工作，这是设计新的青霉素工厂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的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是，1952年试验性生产工作明显加强了，北京生科院的研究小组

也被吸引到该工厂的这项工作中，并成立了一个不大的生产试验室来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厂是实验性的，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研究，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生产积累经验。该厂的生产不超过目前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1%—2%，对满足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作用不大，但是该厂的生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里可以培训干部，可以为在上海设计大型的青霉素生产项目提供准备。

中国青霉素工艺生产的计划。尽管拥有一年的生产经验，上海青霉素生产还没有完整的技术资料，原料的挑选和使用量尚不清楚，缺乏生产仪器及其辅助仪表的工作指数。这种状况加剧了设计工作的难度。1952年6—12月，该工厂按照生产工艺规划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在我们的报告中将根据上海青霉素实验性工厂生产200加仑的发酵器生产工艺列举一些材料。应该指出，上海青霉素的生产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短短的一年的工作时间内不可能研究出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进一步完善设备，然而在特殊的国内原料的条件下，有可能制定出利用国内原料生产青霉素的新的计划，上海青霉素制造厂主要根据美英遗留的资产、文献，采用的主要是在国外所描述的哪些生产方法，但对中国的专家来说，非常明显，所获得的材料已经过时，这些文献资料不符合当地具体的生产条件。

因此，在上海青霉素厂进行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材料的检验，以便利用这些材料，利用国内的原料进行生产；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制定了自己的新的生产计划。

青霉素的生产用的是来自美国的青霉素菌种激活体，但是它不局限于一定的菌种，使用的是Q-176青霉菌—黄霉素菌种和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第701号、第133号无色菌种。没有对菌种展开评价工作，但在进行生产的时候对播种材料(种子)进行了一些挑选和选择。除了一般的文献之外，威斯康星大学的报告中对这些菌种都有描述，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些报告附在该报告的后面并转交给全苏抗生素研究所。

在看完工厂的材料之后，可以指出如下几点：在这些菌种中，其中包括在第701号菌种中，可以发现，在多次添加苯醋酸、在精选乳糖玉米的工艺中进行配种时，青霉素的含量提高了，第133号菌种也有这些特点。但是由于不正确的栽培方法和保存方法，菌种的这种良好的性能很快就消失了，工厂使用的是Q-176菌种，认为该菌种在栽培和保存

的时候比较稳定。工厂的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没有采用正确的保存播种菌种方法的情况下菌种的可变性。工厂在栽培菌种的时候采用了琼脂化的环境，没有使用在植物培养基中采用玉米激活体的方法，随后对其烘干的经验。

在多种情况下，上述菌种在精选的乳糖玉米条件下置入200加仑的容器中，并在多次加入苯醋酸的情况下可以生产出活性为每毫升1400—1700单位青霉素的溶液。在采用棉花的情况下，第133号菌种生产的青霉素的结果要比Q-176和第701号菌种在同样条件下生产出的青霉素情况要差一些。为了培养菌种，需要琼脂化的莫伊尔琼脂以及其他组成成分相似的条件，包括糖浆、甘油、玉米提取物。其中，对于第133号菌种来说要采用如下配置：6%的蜜，1%的蛋白胨，2.5%—4%的琼脂。

由于中国缺少国产的玉米提取物和乳糖，生产原料要依赖进口。为了替代玉米提取物采用了发酵的棉籽饼原料。因此，1952年工厂主要采用了如下发酵配置：1.葡萄糖0.5%—1%，乳糖2%—3%，玉米提取物(根据晾干的重量)2%—4%，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5.5；2.葡萄糖0.5%—1%，乳糖2.3%，棉籽饼3%—5%，碳酸钠0.3%—0.35%，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3.8—4.0。

酵母繁殖器内培养播种材料的液体配置成分为：1.葡萄糖4%，玉米提取物2%，碳酸钙0.3%，酸碱度5.2；2.葡萄糖4%，碳酸钙0.3%，棉籽饼2%—3%，蜜0.3%，酸碱度3.8—4.0。为了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纯玉米激活体对青霉素进行生物合成，在播种物质的培养过程中采用了三个阶段：在孢子的环境中生长，然后在第二阶段得到播种微孢，随后把其放入20升的酵母繁殖器，然后再把其放入75—100升的酵母繁殖器内。这种工艺是复杂的，因此在工厂培植孢子，而微孢的培植需要两个阶段，但从原则上来说它的培植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无菌的环境中从玻璃瓶子中夹住悬浮的孢子，把其放入酵母繁殖器内。

青霉素生产所需要的发酵的棉籽饼要从得到的、适合最优地采集青霉素的原料中进行挑选，这种原料可以用来提取和清洗青霉素。在中国，1951—1952年两年的时间里，北京和上海的各实验室获得可靠的证据，证明可以采用棉籽饼的粉末作为生物合成青霉素发酵工艺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在生产中进一步对这些从实验室中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用棉籽饼粉末取代玉米提取物的可能性。这项工作于1952年在

工厂完成了，并得到了肯定的结论，这为在上海建立新的生产青霉素的工厂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在玉米提取物的工艺中，还是在棉籽饼的工艺中，都要多次添加苯醋酸，并把乳糖的含量增加到2%—3%，溶液中青霉素的含量从来都没有低于每升1000个单位，在多次发酵的情况下，溶液的活性可以达到1300—1400单位的青霉素。但是，由于棉籽饼工艺中的生产能力相对于玉米提取物要小，因此生产出结晶的干燥的联苯酰青霉素就要比在玉米提取物工艺中生产出的青霉素少25%。由于近年没有可能得到玉米提取物以生产干燥的青霉素，商业制剂的活性为干重每升1400单位的青霉素，在这种情况下每升可以得到1550—1600单位的纯净的制剂。但是在进行两个阶段的结晶的情况下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至于从棉籽饼工艺下得到的青霉素的质量，联苯酰青霉素的含量相当于从玉米提取物中得到的青霉素的含量。同时，对采用棉籽饼进行的研究不妨碍利用玉米残渣或者利用麸皮进行研究，麸皮在中国个别地区的一些小作坊，在加工玉米、生产玉米面的时候都可以得到。综上所述，棉籽饼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原料，在中国的各地区都是供之不竭的；经过调查证明，可以使用预先水解了的弱酸或者水解了的发酵的细霉菌水稻曲霉来代替棉籽饼粉末，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加工方法的效能是：青霉素增产不多。用酸来水解比事先用棉籽饼来加工也并无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棉籽饼粉末是生产青霉素最为适合的一种原料。

出于研究的目的，尝试着利用移除丝线后得到的产卵废弃物作为生成青霉素的有机环境。在这些缂丝生产的废弃物中有一些氨基酸可以被利用，利用的途径是在移除丝线之后，收集蛆虫的废弃物。利用这种原料来生产青霉素在实践上尚无可能。由于国内有大量的食用的淀粉、纺织工厂和制药厂，可很好地利用棉籽饼，但工厂和部级的中国行政部门都承认，生产青霉素较为有效的原料是玉米提取物——生产玉米面过程中得到的残渣，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计划指出，到1957年底中国将着手建设加工玉米面和玉米葡萄糖的联合加工厂。

在生产青霉素所必需的碳水化合物中，除了葡萄糖之外，还可以使用1%的各种糊精；在试验过程中充分利用糊精的工作都已做完。还认为必须使用乳糖，因为还没有找到其或与其有同等价值的替代物，而现在使用的乳糖是进口的。一小部分乳糖可以在国内得到，其中包括，

1953年可以从海拉尔(内蒙古)得到55吨国产乳糖。在合成工艺中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在中国是没有前景的，这是由于缺乏大量的醋酸生产，此外还缺乏乳酸。在200加仑的棉籽饼粉末发酵器内进行的实验进展顺利，这一试验解决了近期向青霉素的生产提供原料保障的任务，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能够购买到的乳糖的机会不是没有的。

进行生物合成青霉素的生产计划和工艺流程正在全力制定，以便进行实验性生产，但是上海厂现有的计划需要被简化，需要撤掉一些生产线。需要定期进行消毒，而且，为了保证消毒，需要在摄氏120度的环境内持续30分钟。糖、盐水溶液以及碱和蜜的有机成分都需要在一个不大的设备内单独进行消毒。此外如果认为必要的话，还需要对泡沫灭火器、(苯醋酸)的前身进行消毒，这样就会使生产线的环节大增，难以管理，这在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对新的生产线建设计划进行选择的时候，就完善发酵工艺仪器的生产计划形成了一些设想。

同时提请中国专家注意，必须研制出更为合理的发酵工艺来更好地获取青霉素，缩短流程，保证酸碱度环境的良性转变，但在发生酸化的情况下不必增加碱。根据已掌握的数据，发酵持续的过程为90—92个小时，在个别情况下少于90个小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采用的工艺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增加了。在棉籽饼的主要环境中，在大的设备内生物合成青霉素的最长时间为70小时，此外，在这一环境中会产生少许泡沫，由于这些泡沫，混合的程度就更加充分。工厂的泡沫灭火器使用的主要是芝麻油和豆油，尽管认为今后需要转而使用其他更加有效的灭火手段。现有的生产流程内，在对营养液进行消毒工作的准备时会受到感染的警告，其中包括在120摄氏度的温度下对油进行30分钟的消毒是不够的，而在个别的情况下对生产环境和生产线进行的消毒是不够的。

因此，提请中国管理部门注意，对进行消毒的工作指示和规程要作认真的研究，其中已经指出，对油的消毒增加到3—4个小时，由于油的传热性不够，可能会使油更加热，会增加使工艺失去效力的可能性。所作的另一项调查是关于搅拌和通风的问题，工厂现有的经验已得出结论：必须采用瓦利多夫型设备。排烟囱应被安置在带有各种搅拌机的200加仑和1500加仑的设备上。

尽管1952年工厂的工作条件是不同的，对采用瓦利多夫型通风方法进行了相互比较，认为采用瓦利多夫装备是合理的，它可以节省20%的空气中的消耗，搅拌使用的电力增加也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改善青

霉素生产的目的。用于搅拌所需的电力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在生物合成的过程中减少了空气耗费，缩短了生产过程。

由于在没有瓦利多夫型装置的普通发酵期内进行搅拌存在重大的不足，认为应该寻找方法，通过安置排烟囱来改善搅拌工作，尽管这一装置不完全符合所提出的任务。

在通风方面以及在大的整个设备内进行溶液搅拌方面，加强规章制度的工作仍然是不明确的。从所述的材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在工厂生物合成青霉素的规章制度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但是这种状况不能妨碍必要的工艺生产规章的制定，相反，已经提请中国的行政部门注意，必须就生产的各阶段拟定技术文件，以便利用这些材料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根据工厂在1952年现有的工作经验，在考虑到各种损失的情况下，在棉籽饼工艺的基础上得到培养液中每1升有1000单位的青霉素；这一数据可以被用来作为在材料中计算生产的最终的结果。用微生物的方法、用碘量滴定法、用在瓦特曼第1号过滤纸上进行色谱分析法的方法完成了对青霉素的活性进行确定的分析。

根据用过滤纸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数据，联苯酰青霉素在培养液中的含量的总活性在60%—85%之间摇摆，也就是说，这保证了在培养液中青霉素含量的标准的技术指数。

必须特别指出，定期多次添加苯醋酸——联苯酰青霉素的前身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指出，必须使用机器生产出严格符合标准规格的装青霉素的小瓶，这可以使新的上海青霉素工厂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实现分装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对小瓶进行包装的机械化。

在对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工艺图纸进行审视的时候，应当指出，现有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技术资料可作为设计新的建设项目的基础，因为可以认为，生产工艺中的主要内容已经清晰。关于原料的选择、结晶阶段设备的安装、在挑选国内不能生产的工艺设备及其辅助设备中的困难，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成为实现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的障碍。制定技术方案时提出高度的要求，对个别设备的结构进行仔细的检查，根据设计图不间断地组织生产，所有这些，中国专家通过对不断加强

的、现有的上海实验性生产的合理成分进行研究和设计，以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完成。

中国专家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对整套实验性生产进行正确组织的经验和设计工作的经验，但这一困难会被逐步克服；1952年下半年通过建立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再次完成了这些组织工作。

1952年期间，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了400亿剂青霉素，卖出了20万小瓶的结晶青霉素，这些青霉素的质量与进口的最优质的青霉素的质量相当。这些成果可以被看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行国产青霉素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国产青霉素加工的不足，在上海进行的实验性生产的规模不大，面对这种状况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利用现有的实验性生产经验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人和干部，加快在该厂进行新的建设。

扩大青霉素生产问题以及进行新的建设的任务。中国政府关于扩大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的基础是利用实验工厂的设备和生产场所，并提出了如下的增长要素。根据这一计划，打算从1950年5月至1952年的第一阶段安装2台机床，每台机床容量为750公升，每月生产1.2万瓶干燥的青霉素、每瓶20万个单位。预计从1952年2月至1954年2月的第二阶段再安装4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5000公升，每月生产14万瓶干燥的青霉素。

预计在1954年2月至1955年2月的第三阶段再增加4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5000公升，至1954年底每月生产75万瓶青霉素，工厂年生产能力达到18000亿剂干燥的结晶青霉素。根据这一计划，所有的设备，主要是机床都应当在国内生产，因为提取青霉素的压缩工作以及安置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备需要大量的进口材料。根据这一计划，在上海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建设的总投资预计为600亿元，生产出商品1150亿元，或者500万美元。

根据对上海青霉素生产工作进行的调查，中国政府关于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是不充分的，因为现有的生产装备被视为已达到了其扩大生产的极限。实际上合理的生产计划是扩大生产不是达到900万瓶，而是该厂的年生产能力不少于2000万瓶。

现有的实验性生产工厂不能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计划的最

佳生产场所，因此必须进行新的建设，使得扩大生产要不少于第一期建设产出的2倍或者3倍(定为2000万瓶)，或者生产4万亿单位干燥的青霉素。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卫生部的请求，在中国中央轻工业部行政机构的参与下制定了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基本建设计划。

鉴于中国目前的局势，要求加快第一批青霉素工厂的建设，以便停止进口，可以考虑在上海新建一座青霉素工厂，并利用现有的被华东医疗工业管理局长期租赁的前英国啤酒厂的建筑。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前啤酒厂的这些建筑完全适合作为青霉素工厂的生产场所。两栋多层大楼的有效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有两台蒸汽炉和一座变电站，能够保障工厂的电力供应，这就降低了厂房建设、装修的大量开支，而扩大用电业务的长期开支也会不大，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技术方案，并选择技术设备，在18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的生产组织工作。

根据新的扩大方案，可以使其组织者花费最少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1953—1954年的第一期建设中生产4万多亿剂青霉素，而且以后的生产还可以增加到12万亿剂青霉素。预计在上海进行的建设可以完成最初提出的关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投入让国产青霉素保障国内需要的任务，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节省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还可用于进口青霉素这类药剂。

在同中国专家一起研究了生产技术资料的时候，扩大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的新方案得到了赞同，随后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轻工业部的批准。他们承认如下的投资建设计划是比较合理的：

- 1.在上海建立成套的青霉素生产体系，生产各类青霉素，其中主要应该是小瓶装的结晶青霉素。第一期建设预计在1954—1955年生产20万小瓶青霉素，每瓶2000毫克。

- 2.上海将扩大现有工厂进行的青霉素实验性生产，按照工厂管理部门的最初计划，1954年逐步更换工厂的设备，以便生产链霉素，1953年组建一些新的车间，研究链霉素的试验性生产。

- 3.在审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方案的时候，建议在1953—1957年的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16万亿剂的青霉素和4000公斤的链霉素。由于缺乏国

产的谷物提取物，预计在五年计划末期建造一座把谷物加工成淀粉和葡萄糖的工厂，以生产必要的谷物提取物，保证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

在有可能利用苏联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五年计划提出的在中国组织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任务，毫无疑问将会完成。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的生产可以成为为新的建设培训干部的学校，该工厂的工人将能系统地完善技术生产，同时，他们积累的经验将会被利用起来，完成建设新的青霉素工厂的技术方案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出新的建设任务需要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因为中国在生产链霉素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1952年12月底，投资建设计划被附属于国家行政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批准，并准备在1953年进行投资和建设。事先决定向上海青霉素工厂第一期新的建设拨付必要的资金。单个的建设项目应该提出必要的财政预算文件和设计任务，并应当被总的五年计划批准。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建设地点尚未确定。把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场所放在一起的可能性还没有提出来，因为缺乏生产链霉素的技术材料。

中国在抗生素生产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问题。由于在中国进行国产的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的生产已经得到国家在发展医药生产领域的计划的认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进行科研工作，以便对这些药物的生产提供帮助。中国专家们在这类问题上面临的任务已经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有8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沈阳、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轻工业部副部长、华东卫生局长和中央药品管理部官员们的报告。会议分为三部分：关于化学问题、关于生物问题、关于医疗问题，会议审议了对青霉素、链霉素和氯霉素的生产和应用进行研究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制定总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对链霉素和金霉素进行研究。会议对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视，并制定了详细的建议，提交各部审议，也就抗生素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任务和课题计划向科学院院长提出了建议。

为了以技术帮助来保证必要的建设，在组织生产的同时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链霉素的生产问题进行研究，该委员会中有工厂工人、上海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化学药物科研试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根据会议的总的计划，在各部门和研究所之间分配了

任务，在研究的问题中首先是那些比较有前景的和有效的医疗抗生素制剂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决议，扩大了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研究工作，工厂的工人们对工作计划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对各问题进行研究的计划。为了扩大工厂链霉素生产的试验工作，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实验室，来研究链霉素的生产。1952年11月就抗生素问题召开的会议取得的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确定了各研究所、生产单位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根据这一方向，在上海，来自如下机构的专家就抗生素问题展开了工作。上海轻工业部的科学研究所成立了发酵工艺实验室，研究获取柠檬酸和青霉素的技术问题。科学院上海分院做了大量的工作，生理生长研究所和植物学研究所被指定就金霉素问题开展研究。

化学发酵科学实验室完成了在获取纯盐阶段对青霉素进行化学清洗的工作，并对抗生素的合成方法，其中包括对氯霉素的合成方法进行了研究。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及轻工业部化学研究所应当成立一些新的小组，对医疗化学试剂进行研究，也就是对抗生素的化学合成进行研究，建议扩大早先已经完成的对单一的桔霉素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方向。

在工作计划中特别关注在生产中推广青霉素和氯霉素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其生产所进行监督。在沈阳，应当扩大对通过合成途径得到的氯霉素异构体混合剂的分离工作进行的研究。

在北京医药科学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下设有两个不大的从事生物和化学抗生素研究的实验室，主要对青霉素和氯霉素进行研究。

1952年中国各单位的科研工作局限于制定一些小规模的计划，事先进行研究，主要是对青霉素的研究，对氯霉素的研究少一些。共计有30名专家参与了这一工作。今后，当关于抗生素问题的决议实现之后，或许可以期待就各类生物问题和化学工艺问题作有计划的研究会得到发展，可以期待找到国内的原料，并完善获取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和橘霉素的工业方法。

在上海会议上，中国专家了解了苏联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苏联在抗生素方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根据得到的苏联在最近5年出版的总的文献、根据卡什金在1952年出版的《抗生素及其实际应用》一书中对一些

关于抗生素的医疗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把伊姆舍涅茨基关于微生物变异性问题文章翻译出来。

会议的报告指出，对关于抗生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研究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其中包括同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工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会富有成效。

中国专家通过医疗卫生部以公函的形式向苏联提出了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以及提供关于苏联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标准。在1953年1月医疗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对青霉素、链霉素进行微生物分析以及对中国生产的制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从国外进口的制剂质量进行生物检查的工作指示和方法。

对进口的药物作分析是在贸易部设在天津的实验室内进行的以及设在北京的对药剂进行监督的实验室内进行的。

正在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药典准备有关青霉素的词条。在医疗中广泛推广最新的药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们的重要性在1952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医疗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医学工作者会议上得到了承认。

在北京和上海的医药研究机构把对国产青霉素的医学评估纳入到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广泛的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在正确利用医疗部门和工业部门旧的专家方面，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方面，了解苏联的科学经验和医疗体系并加以借鉴起到了重大作用。工厂厂长注意到了对工业中的科研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根据苏联专家在化学药物厂和医疗器械厂厂长会议上作的报告，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技术检查，并在工厂开设实验室。特别应指出的是，近来工厂的工程技术工人越来越注意通过研究先进的苏联工艺和苏联医疗工业经验来完善自己的生产技术。

为了推进技术流程，完善技术资料，一些工厂制订了生产规章。为了医药化学工业企业和青霉素工厂培养大量的具有中等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专家，使其担任车间主任的助手、技师和段长，通过对现有的一所普通的药学校进行改造，在华东的上海组建了一所新的技术学校。根据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决议，在制定这所新技校的教学计划中，需要有统一的组织结构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该技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还为上海

新的、进行青霉素试验性生产的工厂以及新的建设项目培养业务干部。

应当指出，事先进行的一些研究，确定国内生产青霉素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可以使上海的专家小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今后在上海投产新的青霉素生产的保障问题。其中包括，在29种原料中有19种需要进口，但是通过对在上海相近的一些生产进行的研究，有可能把进口的原料缩减到1—2种。这就使得设计时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指标。

结论。

1.目前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状况使得可以利用实验性生产的经验，用于在上海进行新的计划和建设，把以前拆除的啤酒厂的建筑作为生产场所。第一期计划的生产能力是在1954年生产出4万亿剂青霉素。制定出上述建设的规划和设计任务，在1953年上半年将制定出新的建设技术方案。在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局下，设专业的设计小组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生素生产进行的研究任务和课题要事先确定。扩大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实验性工作，组建试验生产链霉素的车间。制定出在棉花中合成青霉素的最优程序。绘制生产青霉素的工艺图纸。

3.专家在出差的工作总结中可以指出，在青霉素生产方面，中国政府正确地解决了准备时期的主要任务。所获得的组织青霉素生产的经验可以使得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利用国内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完成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在所需设备中必须进口提取青霉素的设备，其中包括分离器或者离心机，其余的技术设备可以在国内生产。由于在所需原料中无法获得乳糖以满足青霉素的生产，故而在生产的最初几年， $\frac{3}{4}$ 至 $\frac{1}{2}$ 的乳糖将需要进口。

有必要进口用来检验和测量青霉素生产的设备。

对局势和现有状况进行仔细考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领导人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无论是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工艺设计方面，还是在组织建设问题方面(通过向中国供应其所缺乏的工艺设备和物资)，来完成大量建设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新阶段的任务。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进行新的生产建设，特别是链霉素的生产，

在此方面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根据提出的五年计划发展医疗工业的任务正确地组织所有的设计工作和建设工作。

化学副教授、全苏抗生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Г.М.瓦西里耶夫

1953年3月7日

РГАНТД, ф.279, оп.5 1, д.10, л.2-22, 29-43

№12245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1953年3月14日)

机密

第22号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 [\[73\]](#)

一、美国侵略朝鲜开始前的朝鲜问题

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指出，三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这一宣言1945年7月26日被上述三国波茨坦公告所肯定。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

粉碎日本之后，根据盟军总司令的一号命令，苏联统帅部在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美国统帅部在其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这样在朝鲜形成了两个军事责任区：北朝鲜——占全国57%的领土面积，人口约1100万；南朝鲜——占全国43%的领土面积，人口1700万。

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了成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而为了促使这一政府的成立，决定由苏美驻朝部队指挥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被授权在有临时政府参加和吸收朝鲜各民主组织的情况下制定四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对朝鲜的5年托管条件。

由于驻朝美军指挥部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同朝鲜民主组织协商，朝鲜

临时民主政府未能成立。同时莫斯科会议关于制定四国托管条件的决定也未能实施。

在破坏了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企图将整个朝鲜属于自己，于是于1947年9月把朝鲜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大会议讨论。根据美国的提案，在联大会议上，英美多数国家建议朝鲜在1948年3月31日之前举行“国民会议”选举，以便由“国民会议”成立“朝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建议，联大成立了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共9个成员，该委员会被赋予在整个朝鲜领土上通行的权利。该建议的目的是在朝鲜成立隶属于美国的傀儡政府。

在上述联大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反对联大讨论朝鲜问题，因为该问题是战后调节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不属于联大组织讨论的范围。在联大终于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后，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美国 and 苏联部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和“给朝鲜人民提供自己成立朝鲜民族政府的可能性”的提案。苏联的这一提案遭到了拒绝。苏联关于邀请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提案也遭到拒绝。因此，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美国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乌克兰拒绝参加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在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了所谓的“国民会议”选举。无论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的民主人士都拒绝同委员会合作，没有参加选举。在汉城召开的“国民会议”于1948年12月宣布成立“大韩民国”。

1948年8月，拥有各阶层代表的朝鲜统一民主阵线在北、南朝鲜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在南朝鲜占77.52%。1948年9月成立了最高人民会议，它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高人民会议呼吁美苏政府从朝鲜撤出它们的军队。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满足这一请求并下令在1949年1月1日前从朝鲜撤出苏联军队。1948年10月，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军于1949年6月底撤出了朝鲜。

在1948年和1949年召开的第三届和第四届联大会议上，由于在讨

论朝鲜问题时英美占多数，朝鲜委员会的行动得到“赞许”，并被授权为了“朝鲜的统一”而“加紧”活动，对朝鲜整个事态进程进行监督。

在上述两次联大会议上，苏联提议取消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因为它的活动违反联合国原则，妨碍南北朝鲜的统一事业。

195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应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中央全会请求，决定呼吁南朝鲜“国民会议”，建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民会议”合并为统一的全朝立法机关以使朝鲜统一。该立法机关应通过宪法，建立统一的朝鲜共和国政府。然后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朝鲜立法机关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声明，它准备派代表团去汉城或接待南朝鲜“国民会议”代表团来平壤。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和在其领导下准备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进攻的南朝鲜政府拒绝了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建议。

二、安理会对朝鲜问题的讨论(1950年下半年)

1950年6月25日，即南朝鲜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天，应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破坏和平并呼吁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把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外。因为拒绝了苏联关于驱逐国民党代表退出联合国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提议，苏联当时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1950年6月27日早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进入朝鲜，参与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当天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所必要的援助”。

为此，苏联政府于1950年6月29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安理会6月27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该决议是在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国缺席情况下通过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呼吁苏联政府，请它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南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6月29日苏联政府给予答复，指出朝鲜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南朝鲜军队对北朝鲜边境地区的侵犯，所以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南朝鲜政权和支持它的人来负。苏联政府在答复中还指出，它奉行不允许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

1950年7月4日，美国政府借口安理会6月27日决议，通知苏联政府说要对朝鲜海岸实施海上封锁。苏联政府在对这一通知的答复中向美国政府声明，上述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对朝鲜采取任何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海上封锁的合法依据”。苏联政府还认为封锁朝鲜是新的侵略行为。

1950年7月7日，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提议，安理会通过了给联合国成员国建议书——建议它们出兵朝鲜以反对朝鲜人民，这些军队交由美国任命的“联合司令部”指挥。建议美国政府任命这些军队的总司令。授予联合司令部在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时有使用联合国旗帜的权利。苏联政府在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一决议的通知时声明，这一决议作为预谋的产物，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它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旗帜掩盖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朝鲜人民的直接侵略”。

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请求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以便在安理会范围里或其以外，“通过非正式接触，由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帮助或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和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1950年7月15日斯大林复信尼赫鲁，欢迎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赞成他“通过安理会——必须有5国代表，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调解朝鲜问题的观点”。

美国政府拒绝了尼赫鲁和平调解朝鲜冲突的建议。

1950年7月底，苏联政府通过决定：从8月1日起苏联政府重新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因为这时轮到苏联担任安理会主席。

已指示苏联代表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于1950年8月4日提出了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同时提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苏联代表还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后来，8月8日，苏联代表还把下述提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希望安理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及以后不再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轰炸城市、居民点及从空中扫射朝鲜和平居民。

苏联关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停止野蛮轰炸朝鲜城市 and 居民点的提案被安理会否定。

1950年9月联大会议开始工作。会议议事日程中列入了“朝鲜独立问

题”。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提议邀请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讨论。这一建议遭到美英集团的否定。委员会接受了国民党分子提出的只邀请李承晚政府代表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还提议解散非法机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还呼吁大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用飞机和其他手段轰炸城市 and 居民点以及从空中轰炸朝鲜和平居民。此外，苏联还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恢复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在这一决议草案中建议交战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建议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从朝鲜撤走自己的军队，建议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朝鲜选举，联合国监督委员会里应有朝鲜邻国的代表(未列举这些国家的名称)。

苏联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否定。

与此同时，大会于1950年10月7日通过决议，其中建议采取“相应步骤以保障整个朝鲜的稳定形势”。大会以此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在这一决议的掩护下，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挺进，直抵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

1950年10月7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还规定成立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其组成有澳大利亚、荷兰、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芬兰和智利，想以此取代在这以前存在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美国部队前出到中国边境引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呈递报告，其中称，“联合国军遇到了新的敌人”，“已同中共部队交火……”按照美国的要求，安理会议程上加上了“对侵略大韩民国的控诉问题”。苏联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问题，但未被通过。安理会决定只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中国政府拒绝参加这一报告的讨论。

1950年11月10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把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其中指出，“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建议“所有国家和当局，尤其是对上述行动负责的国家 and 当局，应拒绝援助或鼓励北朝鲜当局，不给自己的公民、某些人士或军队提供援助北朝鲜军队的机会……”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否定了这一决议草案，因为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三、在五届联大会议上的朝鲜问题

在苏联代表恢复参加安理会工作之后，美国已不能利用安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它把朝鲜问题提到了联合国大会。

1950年12月6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坚持下，联大议程上列入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古巴、挪威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了1950年11月10日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该草案陈述部分的一句话“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军队正实施军事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并于1950年12月9日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呼吁注意美军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继续武装干涉朝鲜给和平和人民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为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苏联建议：“1.立即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2.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第一委员会没有讨论苏联的提案。

1950年12月12日，印度代表劳以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在第一个草案里建议成立以大会主席安迪让(伊朗)为首的三人小组，并责成该小组准备提案，以便为“能达成朝鲜停战协定确立基本原则”。第二个草案建议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起草“和平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建议”。1950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了成立“三人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投票反对。除安迪让外，“三人小组”里还有劳和皮尔逊[74]。

“三人小组”请麦克阿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朝鲜停战的条件。1951年1月11日“三人小组”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1)“立即保证停火”；(2)“利用停火之机，继续讨论下一步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步骤”；(3)所有非朝鲜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采取措施，“让朝鲜人民可以在自己未来政府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志”；(4)在完成这些措施之前，采取必要的保障朝鲜“行政管理的措施以维护那里的和平和安全”；(5)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联合国大会应立即成立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组成的机构，其目的是使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席位问题获得调解。这些原则于1951年1月13日得到了第一委员会的赞许。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挪威提议通过了决议，其中委托第一委员会主席把上述原则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它是否讨论这些原则中所包括的作为远东问题调解基础的提议。

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作了答复，指出为了真正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其他涉及亚洲的重要问题，必须：

“（一）为尽快停止朝鲜战争，有关国家的谈判应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内部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之协定的基础上进行。

（二）谈判日程应包括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远东的问题。

（三）参加谈判的应是7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应在这次七国会议上确定之。”

苏联代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案。

1951年1月20日，在第一委员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了决议草案，其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和当局给予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以可能的援助，拒绝“给朝鲜侵略者以任何援助”；还建议责成该委员会采取集体措施，“紧急讨论击退侵略的补充措施并向大会报告这些情况”。

1951年1月22日，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印度代表劳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自己1月17日的通报作了如下说明：

“（一）假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原则得以通过并付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则承诺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二）至于朝鲜战争结束和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分两步走：首先，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可在第一次七国会议上先就暂时停火达成协议。

第二步，为了朝鲜战争彻底停止和东亚和平有保证，所有停战条件

讨论应考虑政治问题，应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必要措施；关于由朝鲜人民自己调解朝鲜内部问题的必要步骤和措施给朝鲜人民的提议；按照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军队；涉及远东的其他问题。

(三)应保证彻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于1951年1月24日提出了新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尽快会晤，以便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它对第一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关于朝鲜问题五项调解原则决议答复的解释。

“十二国提案”于1951年1月30日被第一委员会否定。当天，委员会通过了美国1951年1月20日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批准了这个决议草案。

在大会1951年2月1日通过的决议中，除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措施外，还规定成立由美、英、法、澳、比利时、缅甸、巴西、委内瑞拉、埃及、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和南斯拉夫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命紧急讨论下一步措施问题。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1951年3月8日的会议上，以前未冠名称的委员会决定自称“补充措施委员会”。

1951年5月3日，“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

1951年5月9日，美国代表向“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武器、弹药、石油等禁运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4日，委员会赞同美国提出的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在第一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的问题属于安理会的特别职能，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二款，大会无权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因此，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8日，该决议草案得到大会全会的赞同，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在非法通过这一可耻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这一新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是对安理会职权的侵犯，是蓄意扩大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还指出，这一决议的通过充分证明，“联合国已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服务”。

四、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秘书处组织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发表讲话时，在指出联合国通过了非法决定、事后批准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之后，声明如下：

“苏联人民相信，即使在现在朝鲜军事冲突的时刻，也可以调解最尖锐的问题。对此需要各方做好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准备。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停火谈判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谈判。”

1951年7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拜见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请他对马立克发言中的上述引文做出解释。葛罗米柯同志回答说，谈判应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代表为一方和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为另一方之间进行。葛罗米柯同志说，谈判应只涉及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停火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苏联政府，葛罗米柯同志说，强调的只是签订停战协定，在苏联代表马立克同志的声明中没有规定任何和平调解的其他步骤。但是，葛罗米柯同志补充说，朝鲜交战双方的事情决定着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调解政治和领土问题(1951年6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信)。

1951年6月29日，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建议在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火谈判。1951年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将军，表示同意与其会晤并进行“和平停战谈判”，建议谈判在开城地区三八线上举行。1951年7月4日美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会议直到1951年7月10日才开始进行。

前10次会议讨论谈判议事日程。1951年7月26日，通过了以下谈判日程：

“(一)通过谈判议程。

(二)为建立非军事区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此作为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制定实现朝鲜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停战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编成、权力和职能。

(四)关于战俘问题。

(五)给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

从1951年8月10日开始，按照上述议程举行了谈判，除战俘遣返问题外，达成了停战协定的所有条件。

所达成的停战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军事分界线沿停战协定生效之日双方部队对峙线，即沿“为了建立非军事区双方部队各后撤两公里”的正面前沿划分(停战协定草案第1条)。

(二)军事行动应在停战协定签字12小时后停止(草案第12条)。

(三)应成立停战军事委员会，由10名资深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另外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谈判调解可能出现的对协定的违反问题(第24、25条)。

(四)应成立停战协定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和瑞士的代表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36、37条)。

该委员会可成立由这些国家代表构成的监察小组(第40条)。

中立国家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履行监督职能(第41条)。

中立国家监察小组分别驻在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光州、群山。

(五)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60条)。

1951年12月18日，美军司令部向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递交了美军俘获的132474名俘虏名单。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向美国人递交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11559名战俘名单，其中包括3198名美军俘虏。美方指出，截至1951年12月18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士兵至少有11000人。

正如艾奇逊在1952年10月24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美军司令部手里有17万名俘虏。这些俘虏中，似乎愿意被遣返的只有8.3万人。其余的或是当地居民(37000)，或似乎反对遣返。

在和平谈判中美国代表声明，只能遣返那些同意遣返的战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坚决反对关于滞留一部分战俘的说法，坚决要求遣返所有战俘。

1952年6月9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信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要求“双方所俘获的所有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都应遣返；双方所俘获的朝鲜军人——南朝鲜军人和北朝鲜军人，其出生地在敌对一方的应该遣返，其出生地在擒获其一方的，应允许直接返回故里，无需遣返”。

美国人反对这一建议。同时，他们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居民点与和平企业的空袭，想以此恫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居民，迫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同意美军滞留大部分被美军俘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以便将来利用他们反对北朝鲜和中国。

1952年9月28日在板门店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了以下3点选择性提议：

(一)每一方手中的战俘，在非军事区商定地点验明身份之后都将被认为是“已遣返人员”。任何一名战俘，只要在验明身份时表示愿回到抓获他的一方的领土上去，都应该允许这样做，应该给他保证必要的交通

工具。

所有战俘都应恢复公民生活，再不允许他们参加朝鲜的战斗行动。

验明身份，或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由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由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某种联合组织实施。

(二)所有表示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反对遣返的，应少量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解除各方的军事监督。

然后由双方同意选择的国家的代表或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同他们进行谈话，之后允许这些战俘去他们选择的一方的领土。

如果同意，该程序可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的联合组织实施。

(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愿意留在抓获他们一方的战俘应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并解除任何军事管制。然后允许他们去他们所选择的一方的领土，无需任何谈话、调查和审核。

这件事可在红十字会或联合军事小组监督下实施。

在1952年10月8日的会议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南日将军声明，美国1952年9月28日的提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它是美国人以前强行扣留战俘要求的翻版，它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和双方所有战俘遣返的原则。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哈里逊将军以最后通牒方式声明中止停战谈判，直到通过美国提案时为止，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当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停战谈判不应认为已经终止，它只是拖延一段时间，并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五、在第六、第七届联大上的朝鲜问题

在第六届联大会议上，朝鲜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但实际并未讨

论。美英多数借口联大讨论朝鲜问题会妨碍平壤谈判和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故通过了第六次会议不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呼吁在安理会收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联大特别会议。

苏联代表团坚持在六届联大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以便促使朝鲜停战。

在1952年10月14日开幕的第七届联大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建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会议参与朝鲜问题讨论。这一建议未被通过。

1952年10月24日艾奇逊在会议上发言，他以美国的观点回顾了朝鲜问题，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18个国家的名义提出了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赞同联合国‘代表’，即美国代表为签署公正的体面的朝鲜停战协定所作的努力”。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自愿遣返”战俘的提案。

在1952年10月29日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同志发言，陈述了朝鲜问题的历史，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坚持所谓的战俘自愿遣返，粗暴地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尤其是公约的第118条和第119条。维辛斯基把这一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其中建议成立“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吸收当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没有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采取调解朝鲜问题的措施，指导思想是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实现朝鲜统一”。

1952年11月3日，墨西哥代表团把一项战俘问题决议草案提交第一委员会讨论。该草案建议根据以下原则遣返战俘：

(一)对于“自愿表示要回自己出生地国家”的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应立即遣返。

(二)其余的战俘遣往愿在自己领土上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如果战俘愿意，也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就给他们提供这种遣返的机会。

在1952年11月3日委员会会议上，秘鲁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提议“成立五成员委员会，其中每一方都有1名代表。联合国大会任命2名代表，并呼吁一个未加入联合国的中立国家(指瑞士)给予合作，参加并主持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立即投入遣返战俘的工作，同时要考虑战俘自己的意愿。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中立区受委员会保护”。委员会应尽快向联合国提出“彻底解决它保护之下的战俘命运的妥善措施，注意在愿意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安置他们或在主管国家同意后在托管领土安置他们”。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团对它1952年10月29日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出了补充。补充里规定，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应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在第一委员会辩论朝鲜问题时，美国和美英集团其他国家的报纸上围绕印度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议论纷纷。这似乎表明，英美之间出现了分歧，因为英国赞成印度的提案，而美国反对。1952年11月17日，印度提出了只涉及部分朝鲜问题即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

印度的提案建议成立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朝鲜战俘遣返委员会，将所有战俘交这一委员会管辖。在按照民族和居住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后给他们提供回国的权利。在90天期限里还未归国的战俘问题，交政治会议讨论——该会议按照和平协议草案第60条[75]召开。印度的决议草案还规定，遣返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要根据相互协商的原则进行任命调停人的谈判。如果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后3个星期时间里还未达成任命调停人的协议，这个问题则提交联合国大会”。在遣返委员会里，一切问题都根据简单多数决定。“如果形不成多数，调停人则有决定权……”

这样，印度建议交换的仅是那些“自愿”表示想回故里的战俘，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美国的立场。遣返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归结为调停，就像作为朝鲜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本身那种调停一样。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印度草案中只字未提。

美国代表急忙声明他们支持印度的方案。英国代表艾登在1952年11月20日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欢迎印度的提案，把它看成是走出朝鲜僵局的“建设性一步”。

1952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提出给讨论过的苏联代表团决议草案(作为第1条)补充以下内容：“建议朝鲜交战双方立即全面停火，即根据交战双方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草案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苏联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解决，在那里，问题将由2/3以上的委员会成员决定。”

维辛斯基同志在1952年11月24日发言时指出，印度的决议草案同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矛盾，没有提及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冲突。维辛斯基同志呼吁通过苏联的决议草案，其中呼吁在朝鲜立即停火。

1952年11月26日，根据伊朗代表的提议，第一委员会决定首先讨论印度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对印度的草案提出了修改，这些修改包含了苏联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原则。

1952年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第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完全符合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1952年11月2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苏联的提案“最公正，它旨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完全支持这一提案……”

1952年12月1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对印度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在30天时间里战俘问题在政治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印度草案规定的期限为60天 ^[76])，该问题转交联合国解决。当天，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按照丹麦修正案修改过的印度决议草案。

1952年12月2日第一委员会否决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大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提案的决议的答复之后，委员会再讨论这一问题。

1952年12月3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印度决议草案以54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被通过。

苏联的决议草案以41票反对，5票赞成，12票弃权被否决。

1952年12月5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加拿大人)把大会通过的决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12月14日，周恩来致电皮尔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这一决议不能保证“协定的公正和合理的基本原则”，“接受这一决议——这将意味着在美国粗暴的武力面前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议联大废除这一非法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在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作为第一步先完全停火，然后把所有战俘的遣返问题交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调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致电皮尔逊，要求废除联大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决议，“应根据苏联的提案讨论和通过朝鲜立即停火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需的措施……”

1952年12月20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向大会提交报告，其中包括简短序言、皮尔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长的电报和附件——大会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朝鲜问题决议以及上述中国和北朝鲜外长的答复。

这一报告以及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对六届和七届联大会议的报告和所谓的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报告，在1953年2月24日开幕的七届联大第二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苏联代表团提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但遭到美英集团的拒绝。

美国代表洛奇于2月25日在第一委员会上讲话诬蔑苏联，“苏联为扩大朝鲜战争走得很远了……”，“苏联政府可以停止战争，当它想停的时候”。

1953年3月2日，维辛斯基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回击洛奇，指出，苏联任何时候也不隐瞒，它根据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自己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过、现在也在提供武器。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苏联同它没有友好和互助条约，苏联没有义务向它出售武器，也没有出售，如果不考虑1948年苏联从朝鲜撤军时给其留下了苏军多余的武器。维辛斯基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全面停止朝鲜战争，坚持自己在七届联大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驳斥了美国代表洛奇的谎言，似乎苏联对朝鲜战争的延续

感兴趣。

1953年3月5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菲律宾、丹麦和泰国的代表团提出决议草案，其中大会满意地指出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活动，“请求承诺对联合国恢复朝鲜承担费用的政府尽快履行这一义务”。

草案里没谈停止朝鲜战争的愿望，也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大主席的信和1952年12月3日的联大决议复件的答复。

1953年3月9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苏联关于取缔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的提案被否决。1953年3月11日，第一委员会赞同的决议草案由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苏联代表团投了反对票。七届联大二次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表明，美国不打算立即让联合国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决议。

在讨论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决议草案时，七届联大会议将回到朝鲜问题上来。第一部分涉及朝鲜问题的该决议草案规定迅速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按照国际规则使所有战俘回到祖国，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按照由朝鲜人民实现朝鲜统一的精神对朝鲜问题进行和平调解。

备注：文件(见清单) [\[77\]](#)

B.帕夫洛夫

B.特鲁哈诺夫斯基

A.罗申

1953年3月1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39—2062页

№0057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1953年3月19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批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的信函(附件一)。

此信通过周恩来同志 [78] 和库兹涅佐夫同志 [79] 转交毛泽东同志，通过马立克同志寄给金日成同志，立即发往平壤。

二、批准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附件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目的。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

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在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二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议”。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1952年10月16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议：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议签字12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议草案第1条)。

(二)关于成立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议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判解决破坏停战协议的问题(第24条和第25条)。

(三)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

成(第36条和第37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60条)。

还在协议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议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就必定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修改，并提出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必要的表态。

第六，补充意见。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一、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同志)在即将进行的讨论波兰代表团有关朝鲜问题的提议时，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和声明。

苏联代表应陈明苏联对待交换战俘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应指出以下一点：苏联曾不止一次建议而且仍然主张在朝交战双方立即和全面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苏联的倡议，1951年7月开始了交战双方关于在朝停火和停战的开城谈判。这些谈判使双方就遣返战俘以外的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仍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准则，也符合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关于交换战俘的问题是在朝作战双方谈判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光明磊落的倡议。苏联热情支持恢复朝鲜谈判的建议，以求达成有关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以及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解决停止朝鲜战争和签订和约的协议。

二、责成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作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二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以下文字：“二、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60-71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54-65

№12280 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 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1953年3月21日)

没有副本

致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 [80]：

对第14号(文件)的答复。

关于组织反登陆防御可以向中国志愿军司令部建议以下原则：

——部队反登陆防御的任务是防止敌之登陆部队和空降兵在沿海地区登陆。在敌人登陆的情况下，防守部队应在岸边将其消灭之，不让其有可能站稳脚跟和利用后续登陆梯队以发展其登陆。

——组织反登陆防御的部队应集中主要兵力固守敌人易于登陆的海岸地段和敌人登陆后易于向重要目标方向和陆上主要防御部队集团后方运动的海岸地段。

——组织防御必须依据详细的海岸形势分析：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正常正面防御的原则，在不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宽大正面防御的原则。在难以登陆的地段组织警戒和观察。通常，主要防御地段的前沿选在水线上。

——步兵部队应牢固把守沿岸地区防守阵地。其火力武器应配置在正面的纵深，火力交叉和斜射配置，无论是前沿还是纵深。要特别注意建立各种密集火力以消灭登陆器具。

——在反击登陆之敌时，使用各种火炮直接射击以及使用坦克和自行火炮具有重要的意义。炮兵打击登陆之敌的最好时机是敌换乘登陆器具和乘登陆器具抵达岸边之时。

——在防御工程保障方面，应考虑建立水上和岸上障碍物，为兵器和有生力量建立掩蔽工事以防敌舰炮和飞机的打击。为加固防御，防御目标伪装和建立假工事具有重要意义。防御地区系统的建立应根据陆上防御的原则进行。

——军和师里应有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总预备队、坦克、反坦克炮兵和工程兵预备队)，应有障碍器材。第二梯队和预备队通常配置在防御地区的纵深，其离岸边的距离以其能与第一梯队一起及时实施反突击消灭登陆之敌为宜。

——为了同空降之敌作斗争，应在其可能空投地区组织观察，准备必要的精锐步兵预备队和坦克、高射炮以及保持战备状态的航空兵。

——海岸反登陆防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组织各种兵力和火器的协同动作，因此所通过的防御计划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应到现场进行研究。

为了不中断指挥部队，必须有备用指挥所，备用通信器材，同时还要研究指挥所的替换问题。

远东战线少将主任

索科洛夫(签名)

1953年3月21日

文件送：科托夫 [81] 同志、帕夫洛夫斯基 [82] 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75—2077页

No21322 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

学者情况(1953年3月23日)

第25-c-442号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周恩来同志请求协助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党小组负责人张家福(ЧжанЦзя-фу)同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进行会见。

周恩来同志提到，张家福希望向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汇报一些关于中国学者的必要情况，以使得苏联科学院与这些学者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

我认为可以满足周恩来同志的请求。

请求您的许可。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格里戈良(签名)

1953年3月23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3

№09994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1953年3月29日)

发自平壤

优先拍发

特档

答复您的第359号来电。

在3月29日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

金日成进一步强调，在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实现和平的问题上，从我们一方来说时机是主动的。金说，主动进行军事行动，或者结束战争，两者都是必要的。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整个民主阵营都不利。有关这一点，金指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并且，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在现在的条件下，金说，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

金日成将采取措施为预期的谈判做准备：确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俘里的伤病员数字，准备在板门店谈判的材料，准备一份来自平壤的声明，等等。

按照您的指示(您的第242号电报)，我们与金日成商定，谈判代表(如果他们重新开始的话)仍旧是南日。与此相关，任命南日为外务相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命令将推迟公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务相的职务暂时由李东根担任。金日成将向中国朋友通知这件事。

库兹涅佐夫

费德林

1953年3月29日

1953年3月29日第359号报告

库兹涅佐夫、拉祖瓦耶夫和费德林报告说，3月29日他们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南日将军也参加了，金日成收到了从莫斯科送达的文件，并且他们约定在金日成详细熟悉文件之后，再一次接触。

在1953年3月24日的第242号电报中，莫洛托夫指示向金日成转达，莫斯科建议任命南日任外务相的决定暂缓执行，直到马立克到达，而目前仅限于任命他为代理外务相，以后再任命为外务相。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97-99

АВГ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120-122

№2487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

援助(1953年4月 [83])

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的建设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委托苏联国内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同负责总的供货的各部一起：

一、同中国政府代表就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煤炭企业、石化工业企业、电力企业、汽车制造企业、轻工业企业、军事工业企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企业的设计工作的执行、设备供应以及建设和修复等问题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同意保证设计工作的履行、设备供应，并在建设中提供技术帮助、安装设备，使企业投入生产，援助的总量大约为36亿—42亿卢布，援助的期限根据附件一和附件二 [84] 进行，其中：

对重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2套金属组合器，功率为每台每年生产120万—150万吨钢；

9个有色金属企业，年生产3万吨锡、7.5万吨铝、1万吨精铝、13万吨精钒和3万吨精钨；

8个煤矿和一个露天煤矿，总的开采能力为1990万吨以及3个选矿厂，年生产能力为550万吨；

3座化工厂，年生产能力为6.5万吨合成橡胶和每年9万吨铝锭；

1座石油加工厂，生产能力为每年加工100万吨原油；

3个每年生产7.5万吨金属设备、矿山设备和石油设备的工厂；

1个生产蒸汽涡轮的涡轮生产厂，平均每年生产36万千瓦，并可以扩大到60万千瓦；

2个生产重型和中型机床的机床厂，每年总的生产能力为生产2.6万吨；

1个汽车厂，每年生产6万辆嘎斯51载重汽车；

1个拖拉机厂，每年生产1.5万辆拖拉机；

1个滚珠轴承厂，每年生产1000万个滚珠轴承；

6个电子设备制造厂，其中包括1个生产涡轮发电机的工厂，年总的生产能力为36万千瓦，并可以扩大到60万千瓦；

9座发电站，总的发电能力为31.3万千瓦。

对军工企业提供的援助：

2个生产飞机的工厂；

2个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4个生产机组和航空仪器的工厂；

4个修理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2个生产坦克和柴油机的工厂；

1个生产地雷和深层炸弹的工厂；

2个高射炮工厂；

1个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

7个生产子弹的工厂；

3个生产炸药和爆破材料的工厂；

1个生产防毒气设备的工厂；

1个生产探照灯的工厂；

1个生产雷达的工厂和2个生产无线电设备的工厂。

二、原则上同意中国政府代表完成设计工作，关于设备的总量和供应期限问题的解决如下：

1.附件三中列举的有色金属企业。

企业的数量，其生产能力、设计的期限以及向其提供设备的供应将在苏联在中国的专家对有色金属矿藏储备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确定。

2.制造军舰的工厂——该厂的生产能力、设计期限、设备供应以及对其进行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将在苏联船舶制造专家从中国返回之后确定。

三、向中国政府代表做出如下声明：

1.苏联相关机构完成设计工作，提供设备，并向提出申请的4个工厂(包头、大冶、石景山和本溪)中的2个金属工厂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的总量是每个工厂生产120万—150万吨钢材，一个完整的冶炼周期的期限如下：为一个金属工厂提供的设计工作在1954—1956年进行，供应设备在1956—1958年进行；为第二个金属联合企业提供的设计工作在1955—1957年进行，供应设备在1957—1959年进行。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相关机构应该在1954年第一季度提供关于这4个工厂中的2个工厂的地质调查资料，工厂的建设地点将由中国政府确定。

双方在1个月的时间内协商关于开展地质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计划。

2.对于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苏联相关组织将按照惯例，根据在苏联确立的专业化标准进行设计。关于这一点，附件五中列举的关于部分半成品、产品、成套物资及其辅助材料的生产应该由中国政府在现有的企业组织生产或者重建。

这些半成品、产品和物资的详细清单及其技术性能将会在设计的过程中通报给中国的相关单位。

3.由中国政府划出一些企业进行重组，以生产军工产品，但要同苏方负责供货单位的专家进行磋商。

4.苏联将为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提供所需65%—75%的设备，这些企业所需的其余设备应由中国的工业企业生产。

如果中国的企业在生产这些设备上需要帮助，那么苏联同意提供这些帮助，帮助的途径是转交技术资料以及苏联专家到中国提供咨询。

关于转交的资料的数量和期限以及到中国出差的专家的数量和期限应该由双方另行商定。

关于设计工作的执行问题以及关于向上述企业供应热电站装备，为上述企业提供必要的电力和蒸汽保证的问题，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况下，在任务草案批准之后以及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之后，将由双方另行商议。

5.在苏联的相关单位进行鞍山钢铁联合加工厂2800/1700毫米轧钢机车间的设计工作的时候，将会考虑在这一车间生产铜片，而必须供应的设备的总量和期限根据双方的协商供应。

四、向中国政府代表承诺：

1.向中国政府无偿地转让产品生产的许可权，其中包括附件一和附件二中规定的、打算在企业成批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转交的技术资料(其中包括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产品和特别器材的图纸、工艺生产图、技术条件以及物质生产中采用的特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也是无偿提供的。

2.50名苏联地质专家到中国出差，以补充以前派出的16名地质专家，出差的期限最长2年，以便对地质工作的组织提供帮助，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并在工作中培训中国的地质工作者。

3.根据电气化远景计划、黑色和有色金属发展计划、机械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发展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4.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对拥有的物资进行技术鉴定，并根据综合利用黄河、长江和汉水上的可视能源的设计和勘探工作计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5.接受中国专家到苏联的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实习，这些实习专家的数量和实习期限由双方商定，就此需要指出，每年到苏联实习的中国专家的总数不应超过1000人。

6.在1953—1954年要对内蒙古、东北和西南的森林资源进行航拍，这些森林的总面积大约为2000万公顷，为这项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

五、在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需要商定：

1.中国方面要提供最终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是总的供应设备的单位按时设计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所必需的，并在得到设计资料之后的2至2个半月内批准设计任务和技术方案。

2.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将依靠中国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建设，而苏联方面对这些企业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援助的途径是实地派遣苏联专家，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并就建设、装配、处理好企业投产的各项工作提供咨询，派遣专家的数量由双方协商。

3.中国方面有责任不泄露设计资料和技术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什么样的内容，不把苏联参与军工厂设计和建设的事实转交或转告第三国以及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

六、建议中国方面不要建设中国政府请求建设的新的工厂，而应在现有工厂组织矿井电力机车、电炉、焦炭化学和粉碎设备的生产，还有起重机的生产和金属设备的生产，同意转让技术资料和在上述设备的组织生产中提供咨询。

七、为了完成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中列举的企业的一部分设计工作以及培养本国的设计干部和实施提出的建设计划，建议中国方面设立本国的设计所来设计金属、化学、机械制造以及电力工厂、电站、煤矿和军工企业。

向中国方面声明，上述设计所应该完成的设计工作量不超过上述企业设计工作总量的10%—25%，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苏联政府同意向这些设计所派遣200名苏联专家。

八、关于应该向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向中国企业供应设备的价值的补偿以及设计工作和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的补偿，在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的出发点如下：

1.中国政府应该在1953—1960年向苏联供应价值为36亿—42亿卢布的商品，其数量大致如下：

精钨矿，16万吨

锡，11万吨

精钼矿，3.8万吨

铜，2.5万吨

锑，3万吨

天然橡胶，9万吨

毛皮，5.6万吨

大米，120万吨

根据附件四分别供应这些商品。

2.向中国供应商品的价格和供应条件应当在贸易协议的基础上每年进行确定。

3.在工业企业的设备的价格、设计勘探工作的价格以及其他类型的援助的费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供应的商品的价值也应进行相应的确定；在签署每年的贸易协定的时候将对这些商品的价值进行确定。

九、在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之后的一个月內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谈判的结果，并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РГАЭ，ф.4372，оп.11，д.995，л.26-32

№23756 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甸的资料(1953年4月13日)

第24785号

1953年4月14日

需归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M.A.苏斯洛夫同志：

据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大使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通报，他能够从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那里得到缅甸红旗派和白旗派、人民志愿团体等其他各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

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最好能获得其中最为重要的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

附上电报拟稿。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与国外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A.斯米尔诺夫(签名)

1953年4月13日

第25-c-611号

附件：

仰光

致苏联大使

如果能获得7月共产党联合代表大会材料的话，就将其搞到，同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且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寄回。

РГАНИ , ф.5 , оп.28 , д.91 , л.1-2

№21323 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1953年4月17日)

致M.A.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对1953年3月23日的第19943号文件的复函。

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党组领导人已经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85]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3年4月17日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38 , л.4

№23756-1 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1953年4月29日)

致M.A.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已要求获得缅甸进步党和各组织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给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的电报已发。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3年4月29日

РГАНИ , ф.5 , оп.28 , д.91 , л.3

№25948 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1953年5月7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3年5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B.B.库兹涅佐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会谈纪要

1953年5月7日

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把苏联政府的《备忘

录》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交给了他。

毛泽东就苏联政府在中国五年计划问题方面给予的帮助表达了谢意。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全权委托谁来签订苏中协议以及附属该协议的关于苏联就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备忘录，毛泽东说，中国方面将全权委托李富春签订协议。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没有五年计划，只是现在，在苏联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研究材料，并提出了正确而宝贵的意见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开始制定计划。毛泽东说，今年无法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只能拟定控制数字。在这整个工作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在谈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不足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领导人分析形势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研究和解决个别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不得不同主观主义作许多斗争。毛泽东说，只是到了现在才明白，要想保证胜利，就必须考虑一些基本的条件。现在不得不由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来处理经济问题，他们在建设问题上还没有必要的经验。因此，在中国，近几年还无法从这方面做出安排。毛泽东说，但是中共党员们将会努力把这个时期缩短，因为具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苏联提供的帮助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在努力地工作，积极地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看法，毛泽东说，成功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足还有很多。最大的不足是群众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官僚主义严重，因此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中国的上级机关向下面发布了过多的笼统的建议、指令，但是并没有给执行者提供有效的帮助，对自己的任务的实质也没有解释清楚。下级机关(区级和乡级的干部)尤其深受其害。毛泽东笑道：“往一个干部的头上压了一万项任务，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发现，下面对许多领导干部采取的官僚主义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在一些地区农民们表达了对大量征税的不满。

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在朝鲜进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今天朝中方

面提出了自己新的建议。毛泽东还通报说，昨天也就是5月6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北京使馆参赞(大使当时在上海)并告之，朝中方面在5月7日的平壤谈判中将提出关于战俘问题的第二个方案，并向其解释了这个提议的实质，以便印度政府理解并予以支持。

我对毛泽东提供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使馆参赞B.И.利哈切夫和周恩来的助理马列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B.库兹涅佐夫(签名)

ABПРФ, ф.0100, оп.46, п.362, д.11, л.71-73

№20023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1953年5月11日)

根据1953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212/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带着苏联政府的指示被派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24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报道了。毛还说，在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全国有65万人被处死，而事实上，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被杀掉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相当一些人明显是被冤枉了。

在谈话过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有一些紧张，他抽了很多烟，碾碎烟头，还喝了很多茶。在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笑起来，并且开玩笑，平静了下来。周恩来则表现得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安。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0页

№21338 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1953年5月27日)

《回忆录》为各种记录手稿(日记、墙报文章)的汇编，作者为1934—1936年中国红军长征的参加者，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打仗的同时从南向北步行了13000公里。

汇编于1937年在延安(特区首府)由专门的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统计材料来自各项命令和报告。材料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编辑。

手稿由4卷组成，共819页，汉语。部分文章字迹已经模糊，需要修复。

总务部报告人

齐坦科

1953年5月2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20

№21339 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1953年6月9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务部(雅科夫列夫同志)建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移交保存在该部第五处的名为《长征回忆录》的中文手稿。

上述手稿为1934—1936年从中国南方向北方长征的中国红军参加

者的各种记录、日记、文章等的合编。这些手稿可以作为编订长征史的辅助材料。

中国的同志知道苏联保存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周恩来及其他人)在不同的年代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交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管。中国的同志尚未提出关于将这些资料移交给他们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档案进行整理，之后再从整体上对关于这整批档案的问题进行审议。

请您给予指示。

苏共中央同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纳格拉多夫(签名)

1953年6月9日

第25-c-948号

手写批注：

交书记处苏斯洛夫同志，可以存档。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6月10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21

№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 (1953年6月15日)

代表团由8人组成，1953年4月23日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1953年6月4日返回。1953年4月25日代表团到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86]的首都北京，并在5月1日之前参观了该城市，参观了北京的历史文物和文物单位。对上述地点的访问是根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建议进行的。代表团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在人民游行的时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1953年5月2日第七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召开，5月11日会议闭

幕。我们只是到了5月10日才得知了国外代表团今后的日程和活动计划。在计划规定的各项活动中，苏联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都一起参加。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之外，经代表团领导人И.В.戈罗什金的允许，我个人还完成了一些工作。应中国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请求，我在一些省市的工会进行了座谈，以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为例，谈论了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我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了这样的座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座谈，其中一次是应市委的请求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北京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除了北京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外，天津市工会主席、浙江省工会秘书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出席的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工会部门负责人共计95人，其中北京市40人，上海市30人，杭州市25人。

在所有的谈话中，工会工作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工会实践工作的组织问题。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是：(1)工会应该怎样在实践上总结社会主义竞赛，在对社会主义竞赛的参与者进行评价的问题上是否应当实行等级制。(2)苏联在工业领域有什么样的竞赛形式。(3)在乌拉尔和苏联是否有手工业者，对他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4)文化宫的工作内容。(5)在恢复时期，苏联工会怎样组织工作。(6)苏联工会局怎样在实践上领导工会。(7)工会应当怎样实地进行党的领导。(8)工会委员会应当怎样在实践上对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实施领导。

在工作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上胜任州的工作这一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兴趣。确实，差距是巨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31人，而上海市委工会委员会有400人，100名工人和职员为市工会委员会的大楼提供服务，该市有20个区一级的工会分会，其人员组成不少于1000人，一个市郊的工会分会有10个下属机构，人员配置为500人。上海市的工会工作人员大约是：在139万名工人中有2000人，其中115万名工业和建筑工人。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机关结构如下。市委员会每2年选举一次，直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省级的委员会尚未联合起来。选举出的上海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130人，常务委员会选举出35人。委员会下设的部为：群众组织部，群众文化部，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部，生产部，私营企业部，工资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工会委员会办公厅，总务管理部，财务处，工会工作办公室。

委员会有1名主席，3名副主席，1名秘书长。在上海市，除了广泛

设立的青年组织网络之外，另还有22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具备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部门结构，有98名成员。此外还有流动电影播放设备，附属的工会委员会有70人，编辑报纸的成员23人，工会学校有70名教师，学员有500人。有8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已经有了关于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大会通过的新的章程，以及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贾拓夫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因此，在我的简短报告里解释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述提到的官方材料对这些问题已经解释得非常充分了。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总的工作之外，我还不得不同我们的另一名代表И.Т.索洛维约夫同志(季诺夫斯基机务段机车司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一起会见丰台(在北京市区)机务段的铁路工人，一同到北京市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沈阳市的一些铁路修理厂(事实上是火车车厢修理厂)。关于同铁路工人的这些会见，在索洛维约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阐述得非常详细了。再重复已经阐述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我不得不两次到农村去，因此，我将尽力简短地阐述这一问题。

农村的状况。中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封建地主、富农恶霸的压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和国外资本的沉重剥削。国家对农民课以重税，地主收取高额的地租，农民通常在经济上依赖于富农，房租高得难以置信，而许多其他的支出也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掠夺：日本的地方政权，蒋介石的军队和警察。士兵、军官、警察从农民那里掠夺粮食、财产，然后出售这些掠夺的东西，而得到的钱财用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或者以此为自已聚敛资本。此外，确立起来的地方税收制度还规定要供养村长及其助手，供养社会治安(警察)，供养驻扎在村里的军队。村民们还要担保及时送青年农民参军，但由于农民不愿把自己的儿子送往蒋介石的军队，因此，对于农村中每一位没有参军的青年农民要对农户处于巨额罚款。所有这些数目众多的税收和掠夺使劳动农民陷于困境。农民不能购置劳作的牲畜、器具、机器、生活和生产设施、化肥、种子及灌溉设施。农民大量破产，被迫长期向地主和富农承担义务，永远都陷于被奴役的地位，依赖于地主和富农。农民在经济上遭受压迫，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迫耕种土地，通常都用手工劳动，只有稍富裕

一点的农民才能用骡马和水牛耕地。在农业上缺乏技术的应用，缺乏对土壤进行施肥，而这是保持农业的发展所应该做的，这导致了土地的贫瘠和粮食产量的低下，导致经常出现干旱和洪灾，这使农民深受其害。比如，1931年，在长江谷地的洪水摧毁了550万公顷的农作物和400万所住房，使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年复一年的洪灾和干旱，灾难的规模在不断增加，因为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这些灾害作斗争。1949年，仍然在长江流域淹没了1.2亿亩的农作物，使4000万人受害。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的这种困境，致使他们不能把大米和小麦出售用来缴纳税收、租金和债务。他们吃的是米糠、麸皮、玉米、蔬菜和各类野草。占农民绝大多数的雇农和贫农以及大量的中农不能获得衣物和鞋子，因此穿着衣衫褴褛，而孩子们简直就是一丝不挂。在严寒侵袭农村的时候，会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患病者，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孩子们。这样，就不难把农民发动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因为剥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极限。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这是由于国内确立了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残酷的、反动的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都非常相信如下看法：即“他们的命不好”。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以便消除这一反动的思想，来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巩固的联盟，消灭农村的封建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成功地把各种进步力量都联合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国外资本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决定条件是苏联军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土地改革前提出了农民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地租的斗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农村各种封建关系，把土地分给农民。

随着一些地区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地主、战犯、叛徒、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多余的东西都被没收，并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土地很少的农民。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组建了以贫农和雇农组成的、联合中农的农会。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确立了上述制度，贯彻土地改革。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些地区被国民党的军队夺取之后，土地改革被废除了，农民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成员遭到迫害，但这具有另外的意义，农会成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积极的战士，这

样就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1950年，中国政府批准了新的土地法，根据该法，封建的土地制度被废除了，并开始推行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教堂和教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多余的房屋都应当被充公。所有被没收和征用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通过农会被分配给贫困无地的农民和贫困少地的农民、分配给返回农村的失业的工人以及从人民军队复员的军人。根据这一法律，富农的土地及其财产将不被没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第一，为了使农民的劳作获得大量的商品产量；第二，不使中农经济的增长丧失前景，否则它将破坏同贫农的联盟。

富农经济的继续增长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全国10%的贫农经济被免于征税，其余农民缴纳的税额平均不超过17%，而从地主经济得到的税收是60%—80%。中国基本上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中国的土地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一场伟大的运动，是在农村推行的一场革命。它废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契，它就像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一样，时刻提醒农民，他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由于土地改革的开展，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全国的各个地区每人得到了2—10亩的土地，而整个农民无偿地从人民政府手中得到7亿亩土地。此外，最贫困的农民和以前的雇工得到大量的从事劳作的牲畜、生产工具、住房和生产场所、种子、用于购买日常用具的国家贷款和水利设施建设的贷款。

根据国务院副秘书长廖岭(Ле.Лиень)的说法，仅仅向地主交付地租，农民每年就要缴纳3亿吨谷物、稻子和小麦。

1953年5月4日，在同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苏联代表团一起接见康东(Кэндун)村(距北京市18公里)农民的时候，对于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农民的状况和人民政权时期农民的生活，人民政府主席辛尊易(Син Цун-и)同志做出了如下介绍。以前农村中有18户地主，99口人，拥有1487亩土地，或者说，每户地主有82.6亩地，每户富农和每户中农平均有27亩地，而每户贫农只有0.5亩地。贫农没有院子，没有可能养鸡，更不要说养牲畜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了我们的村庄，在这一年饿死了8口人，而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都有数人由于饥饿死亡。然后蒋介石

石政府到来了，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当局一下子就从村子抓了24人去当兵，针对逃兵建立了一些小队，为供养这些小队确定了24斤的税收，对于每一个不去当兵的人村子还应缴纳301斤小麦，为供养地方政府，每个家庭要缴纳5000元，这还不算国家总的税收和各种租金，缴纳给地主的礼品，士兵和警察夺取的东西。大部分农民的孩子都没有去上学，没有什么可以穿着去上学，缺少衣服和鞋子。以前全村350户人家在过节的时候向店铺的商人购买3头猪，现在过节时每家每户都可以屠杀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猪。现在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村子里有342户人家，人口为1522人，有2814亩地，其中种植稻谷的水田600亩。因此，如果说以前每户贫农有0.5亩地，那么他们现在有2.2亩地，有牲畜、住房以及房舍。

1948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的村子。1949年秋开展了土地改革，从地主那里夺取了1347亩土地，并转交给了农民。1950年开始开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爱国主义运动。人民政府发放了贷款、牲畜、种子，我们一下子就获得了丰收，如果说以前一亩地收获150斤粮食，那么在1950年已经收获了220斤。1951年农民已经能够购买42头牲畜，建造65栋房子，4口水井，在这些方面得到的贷款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农民的收入也开始多了起来。1951年，每亩地已经可以收获300斤庄稼。1952年，每亩地收获达331斤。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就要归功于增加耕地作物，扩大可以灌溉的作物面积。1953年组建了生产合作社，接受了18户家庭，有207亩土地，其中60亩是种植水稻的水田。现在每个家庭每天都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吃一顿白面馒头，这在以前他们是吃不到的。村子里的所有人穿得都很好，所有的孩子都在上学，上学率100%，为成年人开办了夜校，以扫除文盲，有181名成年人参加。1950年组建了供销社。第一年有20种商品，1951年有89种商品，1952年有100多种商品，有大米、白面、糖和其他的商品和食品。

Л.巴尔马索夫

1953年6月15日

ГАРФ, ф.Р5451, оп.72, д.891, л.1-9

**№20203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
(1953年7月3日)**

1953年7月3日23时40分

第1211—1220号

7月3日凌晨3时30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受周恩来的委托，驱车来到使馆交给我一些文件，具体包括：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答复草案(给克拉克的答复草案准备于7月5日发出)；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对和谈现状的评估和就克拉克的来信拟准备采取的相应举措。

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停战谈判的现状以及就克拉克的来信采取的措施

谈判情况。最近12天来，已释放战俘的李承晚开展了反对和谈的运动。而深陷朝鲜战争泥淖的美国则主要是劝导李承晚，以便其弱化自己的反和谈运动，并与之妥协。

为了安抚李承晚，美国人打算与其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该协定将可能使和谈协议得以签署，并使美国人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不过，李承晚的本意是想让美国人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对与美国人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并不满意。因而他继续提出要求：在3个月之内举行政治会议，如果过了这一期限，将重新恢复战争行动；在该会议上他将拥有否决权。李承晚的这一要求与美国人关于停战的决定发生了冲突。因此两天来美国和李承晚关于这一问题上所举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李承晚施加压力。

鉴于上述情况，克拉克出人意料地于6月29日去信回复了金日成和彭德怀。其目的在于：其一，让李承晚明白，美国人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已不可能再作让步。他打算不顾及李承晚的反对而签署停战协议。其二，让我们知道，他(克拉克)能在多大限度内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希望以和平协议的签署来增加自己与李承晚谈判的筹码(和平协议签署后将有利于限制对李承晚的武器供给)和收回关于27000名战俘的问题。其三，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希望结束战争。

可以预知的是，深刻了解美国人弱点的李承晚是不会让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角。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李承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尽管美国和李承晚之间仍

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最终他们依然可能在朝鲜和谈问题上达成妥协。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实现妥协之后李承晚仍将会继续发动一些小规模的挑衅活动。

我们的对策。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的政策会因其国内外在南朝鲜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发生摇摆，我们打算坚持如下方针：

在实现停战方面掌握主动权，在停战问题上与美国取得一致，以便达到打击、孤立李承晚，促使美国对李承晚施压和加剧美方内、外部分歧的目的。与这一方针密切相关，我们打算预先采取如下步骤：

一、起草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的答复信，并于7月5日发出。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恢复和谈，驳斥美方的指责，并指出美国推行纵容(李承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该复信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二、准备在和平协定签署前对李承晚傀儡军队实施打击，将前线向南方推移。在和谈会议恢复后，向对方指出，只是由于李承晚的原因才拖延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和导致了前线形势的变化。而根据双方以前所达成的约定，即根据战场实际状况来划定边界。建议再次修正(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可以预测的是，由于目前谈判对手与李承晚的关系陷于恶化，其将同意我们的这一建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对方不同意让步，并以此作为其对外宣传的口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我们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最终做出妥协，拟以1953年6月17日双方的约定来划分(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

三、准备于7月5日以后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在会议上我们拟向对方提出如下与实现停战协议相关的问题：

1.关于修正分界线；

2.李承晚是否参加停战以及与此相关，他是否会根据停战协议而将自己的军队及时撤出所占地区？

3.李承晚集团是否是停战委员会联合检查小组的成员？

4.关于要求美方负责27000名战俘的遣返工作；如果美方拒绝承担这方面责任，那么我们将有权将这一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讨论；

5.关于保障红十字会联合小组在对战俘及其代表进行讯问和解释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6.关于确保所有坚决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外国战俘不遭受强制性扣留；

7.关于如何保证在运用“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法”解决非直接遣返战俘问题时该法律能得到真正落实和如何动用该委员会军队来保证战俘的**人身安全；

8.关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

9.关于停战协定的效力。

四、在代表团会议重新开始的同时，所属军官——参谋和翻译人员亦应开始进行与停战协定的签署有关的预备工作。其中包括重新修复准备用于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房屋。

五、我们认为，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应在7月15日左右举行。必须说明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及其在中立国观察小组中的副手——20个检查小组中的成员以及他们在最初阶段至少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均将在7月10日左右去北京。鉴此，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便应在代表团会议上将上述情况向对方说明。

附件：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收)

在1953年6月29日的复信中您已经承认，李承晚集团强行释放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并强力扣留这些战俘是严重和悲惨的事件。这是对的。但您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却不能令人满意。

所有事实均明显的证实，联合国军不能完全排除自己对这一事件应担负的责任。人们很早就已看到，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对这一事件是事先作了准备的。而你们对此也是知道的，却未采取任何预防性的举措。即使在事件发生以后，你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来阻止在联合国军监督下的南朝鲜警卫部队的行动。南朝鲜军队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之间)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结果是导致战俘们被迫离开了战俘营。我们在6月12日的去信中已指出，我们将高

度关注这一事件。但您依然允许南朝鲜警卫队继续使用强制手段从战俘营中释放战俘。结果导致被李承晚集团强制扣留的战俘总量达到了27000人以上，其中包括5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在6月18日你方代表团团长哈里逊将军的信中和您在6月29日的复信中均提到，目前应采取措施以遣返战俘中的“逃跑者”。但与此同时，你们在信中又说不可能全部遣返这些战俘。实际中，你们的宪兵队得到的指令是：不采取任何针对“逃跑”战俘的措施。甚至于，在宪兵队的纵容下，这些战俘还被强制性地送进了专门培训李承晚军队的军事基地(中心)。联合国军所采取的上述立场，在军事方面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纵容李承晚集团旨在粗暴破坏双方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和为实现停战设置障碍的行动。

我们在停战谈判开始前便已释放了自己战场上俘获的你方士兵。而您却试图将我广播人道主义做法与南朝鲜警卫队的破坏活动相类比，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须知，后者即使在我们签署了关于战俘的协议之后仍强迫战俘离开战俘营。关于“逃跑”战俘的遣返问题，你们无论如何都应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警告，李承晚集团仍将会继续叫嚣，即要求释放和强制扣留8500多名未被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李承晚集团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密谋要强迫中国志愿军战俘脱离战俘营，并以此来彻底撕毁我们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战俘的协议。我们认为，你们应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您在来信中保证，联合国军将在一些必要的站点采取甚至可能动用预防性的军事手段来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又声明说，自己并不能有效保证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也遵守双方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仍在继续叫喊要“通过武力方式统一朝鲜”。仅从这一声明便已经证明，3年前究竟是谁发动了侵略。如果现在联合国军继续纵容李承晚集团和允许其采取各种破坏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罪恶活动，则将导致：虽然朝鲜停战协定业已签署，但却依然可能随时爆发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力侵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使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能遵守停战协定及其相关其他协议。只有这样，朝鲜的停战才会得到保障和不致遭到破坏。

综上所述，虽然您的答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鉴于你们已表达了致力于迅速达成停战的意愿，我们在关注你们所做出的保证的同时，同意由双方代表团确定会谈的时间和商定如何真正落实停战协定相关问题和提前为签署这一协定作准备。双方会谈的日期应通过联络官由两个代表团团长来决定。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元帅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年7月5日

在当面交付了这些文件之后，伍修权又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向我口头通报了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认为，近期李承晚的挑衅活动有二：一方面，极力想向美国讨价还价，以得到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向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和中国实施恐吓。也正因为此，李承晚坚决要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李承晚还说了一些空话，如他声称，如果美国不满足他的要求，那么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将只会给予李承晚有限的援助。因为美国也担心，如果给李承晚的援助过大，那么后者就可能真的进行军事冒险，并将美国也拖入其中。不论是未来可能被强行拖

入战争，还是目前就远东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冒险，都是违背美国人意愿的。在这方面，美国人的观点与李承晚存在一定的分歧。

关于在未来政治会议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李承晚和美国也不尽相同。李承晚认为，如果会议不接受他(李承晚)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离开大会，重新恢复针对北朝鲜的大规模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畔，即朝中边界。美国人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在政治会议上谈判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终止，即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朝中代表将获得他们凭借武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鉴于以上所述，中国政府认为，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签署停战协定。伍修权开玩笑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场面，好像是我们与美国在共同反对李承晚。”

伍修权接着说，中国政府认为，李承晚只可能会干一些小规模的挑衅和破坏活动，而要采取某种真正颇具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最后，伍修权说，中国政府正在等苏联政府对给克拉克的这一答复草案、报告和他受委托口头传达的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提出意见和建议。

瓦西科夫

1953年7月3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36-147

№005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1953年7月4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П14/1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7月4日会议第14号记录

关于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来信的复函方案

鉴于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委托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中国同志，苏联同意他们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35

№00580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1953年7月4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1953年7月4日20时19分发出

1957年7月4日20时21分收到

绝密

特字第1041—1043号

密电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1211—1220号。拜会伍修权并告知他下述情况：

一、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拟订的措施是正确的。苏联政府同样同意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复函克拉克的方案。

二、苏联政府认为，停战谈判的全过程证明，中朝方面在这次谈判中的战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中朝方面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自己要和平的愿望和在保障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进行谈判和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已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孤立了，现在国际社会舆论认为，美国应对拖延停战谈判和延长朝鲜战争负责。

三、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做的挑拨行径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中最富侵略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由于中朝方面的成功战术，消除了缔结停战协定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从而不仅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使它的国内政策陷于困境，因为这使美国无法为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等找到借口。在现有的局势下，美国统治集团在继续对战争的狂热叫嚣和高额军事订货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难题。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李承晚和他周围

人的叫嚣，以便在美国(不仅在美国)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

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舆论压力是如此强大，从而使美国统治集团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

四、苏联政府认为，再谈一下金日成去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的问题是必要的。不可忽视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该集团可能会对金日成采取某些危险的越轨行动。因此，应当劝告金日成不要前往板门店，而指派另一位负责的朝鲜同志签署协议。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同意这样做。

请电告执行情况。

莫洛托夫

发送8份副本，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等同志，第十司，备份

1953年7月5日

通知：波采罗布、费德林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48-150

№23759 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 公共材料(1953年7月8日)

情况汇报

1952年初从王稼祥处得到评述缅甸国内局势的各种材料12份。主要的材料已翻译，并用于准备有关共产党和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情报。

随附的材料及其译文(按照目录)应予以登记并谨慎归档。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3年7月8日

手写批注：

来自中国的特别邮件。存档。

1953年7月9日

..... [87]

附件：

译自中文

1949年9月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根据中文音译)在共产党中央和农民协会中央联合会议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一、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会议后的情况

(一)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

1949年2月召开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会上解决了土地分配的政策。

在土地问题会议之前完成了下列的工作：

1.1948年4月党中央就采取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召开的会议。

2.1947年10月颁布了由全中国土地会议通过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3.在党的政治方针中增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部分，出版了有关进行土地改革的阐述说明册子。

4.发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工作、收集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和庄稼收割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

5.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48年在山西—绥远解放区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6.获得了在利维什峡村(Ливейшия)和奥西来村(Аосилайцунь)以及山汶诺县(Шаньвэньно)(根据中文音译)进行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和教训。

7.最后，进行了各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共产党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八个县的县代表会议，该会议上讨论了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

甲、中农的定义(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曾用过以下对中农的定义)。

分配土地时对中农与富农的划分极为重要。

中农的定义标准是其生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必须要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公平地分配土地。

乙、以下各项数据是对农民进行分类的标准：

1.贫农：收入少于40个单位(可见这里所说的农民一年的收入，相当于40大桶 [88] 或维德罗 [89] 的粮食)。

2.中农：收入在40到80个单位。

3.富农：收入在80个单位以上。

丙、恢复农民——中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

在土地问题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原则：

- 1.富农、中农和贫农都同等视为中农。
- 2.根据人口数量(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 3.写得不清楚。——译者注 [90]
- 4.对雇农提供优待。
- 5.按照中农以前原有的土地面积分给他们同样面积的土地(有条件的话可增加中农的土地面积)。如果土地不够分配，可以部分削减中农的土地并予以相应的补偿。
- 6.没收地主的田地(以及农具和役畜)。
- 7.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和役畜。
- 8.列入中农的农民，其家庭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保障，并且还有少量余粮，在丰收年时这些余粮可以成为财产(比如那些收入能达到80—100个单位的农民)。
- 9.那些因土地纠纷要求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要废除现时存在的土地所有权。
- 10.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进行土地分配。
- 11.土地分配的限额量为截止到1948年3月28日之前的耕地。
- 12.进行土地改革后保证新农民的经济发展。
- 13.分配土地时，同样也将部分土地划分给军人(解放军)。
- 14.对数量实施仔细的监督(也许是土地的地段)。
- 15.为使农村建设顺利进行，必须向农村委员会转交执行权。

除了上述15点外，土地问题会议还通过了以下决议：

- 1.削减中农的土地时所做的相应补偿应与被削减土地的年收入的价值相符合。
- 2.没收富农所有多余的财产。
- 3.根据当地的情况可以将部分地段的土地进行合并。
- 4.对于一些兼任拥有其他生产的人，必须根据检查确定他们的主要收入(所说的是为了确定税收——译者注)。
- 5.应当分配的是1948年3月28日之前存在的耕地(3月28日以后被开垦的荒地依旧属于去垦荒的人)。
- 6.决定移植果树。
- 7.鱼相对丰富的水库转交给集体使用。
- 8.在得到人民行政委员会批准后才能进行荒地的开垦。

..... [91]

土地会议决议的另一部分内容为：

18. [92] 削减中农的非灌溉土地时应予以赔偿(赔偿数额与被削减地块的年收成相符)。
 - 19.根据当地的条件由农民协会确定雇佣劳动力的工资。
- 对于不从事农业的城市居民，不划分土地。

土地问题会议的不足之处。

会议通过了有关赔偿中农损失的决定，但没有解决如何赔偿小农经济的类似损失的问题。

承认敏建县(Миньцзяньсянь)的方案(地主制度在农村还没有发展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地主方式的结构事实上已经遍及整个缅甸。因此需要将郊泊东峡(Цзяободунся)和敏建县的特殊情况解释一下。

拿破仑 [93] 曾说，先投入战斗，再讨论结果。

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列宁同样教导我们说，与其刊登1000份声明，不如在小范围内实行某些决定。

拿破仑、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主要实质在于，为了坚定不移地实行某项政策，就必须在实践中学习。

因此，在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口号：“更大胆地去分配土地吧”、“在土地分配工作的过程中学习”、“不必怕犯错”、“大胆去工作”、“有错就改”，等等。

(二)土地分配工作的展开。

从以下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县都已经实行了土地分配：

由农民协会进行土地分配工作的山汶诺县，所有土地的一半已经分配。在工作中成绩显著，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在缅甸北部有200多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在缅甸的西部，尽管缺少干部，有80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缅甸南部的土地分配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尽管那里农民协会的组织力量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可仅有14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我们的力量因此而壮大。

(三)农民协会组织。

由于战争前线不断取得的胜利，解放区的区域日益扩大，土地改革进行得也更为广泛，与此同时，各农民协会的组织体系也日益壮大。以下是农民协会组织的有关资料。

序号	地 名	1949 年 2 月农民协会会员人数	农民协会会员的拟定人数	会员人数	百分比(%)
1	山汶诺县	60 000	100 000	92 408	154
2	缅甸南部	150 000	249 000	157 989	104
3	三角洲	143 000	123 000	8 000	6
4	缅甸西部	49 000	84 000	41 000	80.3
5	缅甸北部	117 000	280 000	126 721	100.3
	共 计	519 000	836 000	436 118	85.2

雇农协会的组织问题。

雇农协会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参加农民协会的雇农人数比加入雇农协会的人数多。

例如，山汶诺县的农民协会人数超过68000人，其中雇农多达38000人以上。雇农协会里的人数还不是那么多。在其他地区雇农加入协会组织的情况更为糟糕。这说明了要更加关注雇农协会组织的必要性。

农民协会中还存在着陈旧的组织形式，即协会内部还有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组织。我们必

须抛弃这种陈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要将雇农协会组织划分出来。

(四)经验、错误和极端情况。

1.无原则的执行。

在居民区利维什峡村(根据中文音译)妇女协会为了成为“样板区”，请求划分给她们土地。最初，党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可后来因农民协会反对，党中央也就拒绝了划分土地。共青团组织同样也要求将体育场附近地段划分给他们。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人民军队也可以要求给他们运动场地了。

毫无疑问，不应该将土地划分给任何组织和团体。

2.取消特别优惠。

曾有这样的指示：1948年3月28日之后就可以开垦荒地，地方当局有这项许可，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而后，有过这样的指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家庭成员人数增加给家庭的土地面积，而事实上这也没有执行。

3.经济收入的平等分配。

比方说，为了得到平等分配的经济收入，在给赶马人分配土地时就要将他们的年收入折算成粮食来计算。

认为不可能平等分配收入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能得到平等分配的收入。

4.关于农产品。

那些在土地分配前已经播种在地里的种子，没有归还给土地的主人，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5.关于僧侣们占有的可耕地。

不许将留给僧侣们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可产500吨粮食)在农民中分配。

6.关于地主的服装。

地主的服装，特别是贵重的服装，同样应予没收。

7.关于富农的役畜。

有两对役畜的富农，没收一对役畜，没收时要成对地挑出母牛和公牛。

8.无原则性的宣传。

有这样的宣传，呼吁按照富农被没收的财产对他们进行赔偿。

知洞干(Чжидунгань)和岱敏(Дэеминь)(根据中文音译)居民会议的决议表示，山汶诺县的农民会议决议指示，不改变现有的耕地，可现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委员会还是破坏了这项指示，所以他们要求停止分配土地。党的市级和乡级领导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市级和乡级领导本应该亲自去调查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领导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仅以一篇官僚主义的文章和命令区领导去调查并报告此事，他们就是这样敷衍了事。

一名来自利维什峡的中农说：“统一民主阵线的宣言上说：要满足中农的要求。现在我的要求在于不要划走我拥有的耕地。”后来这位中农承认，自己是受富农的挑唆说了以上这些话的。

在富农的挑唆下和出于富农的利益，尊德北村(Цауньдэбэйцунь)的农民们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召集村里开会，赶走农委会并通报上级机关。

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土地，在土地分配期间就停止了土地耕耘。

二、其他方面的经验

1.如果是流动在外非常住在村里的农民，就不必分给他们土地。

2.土地分配时，按照经济收入一亩“竹林地”相等于七亩水浇地。可农民不要“竹林地”，因为“竹林地”无法加工耕耘。

3.在一些地区，没收来的役畜被完全公有化了。

4.源于组织干部在分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致大部分农民认为将来还要重新分配土地，结果造成农民感到不安。

5.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无端恐吓，以致农委会被藐视。

6.利维什峡的农民因为对土地分配不均感到不满，要与党组织书记进行谈判，书记指责这些农民并答道：“你们话说得太多，该多少就拿多少。”听到这样的答复后，农民再不敢重提这样的话题。

7.为了恢复原先所有的地块(这里指分配前的地块)，农民进行地块交换。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秘密张贴的标语，表示反对土地分配。

在划分中农与富农时不注意当地的情况，而是按照通常的标准(400—500桶谷子)，造成确定富农和中农时出现混乱，经常犯错。

我们一些不善于农村工作的同志经常是用拳头去对付富农，可结果拳头却落在了中农身上。

农民有两头母牛的，没收一头，如果有两个竹筐的，没收其中的一个，有两把大镰刀的，没收一把，以此类推。总而言之，现有的财产一半要没收。

农民不敢与这样的行为抗争，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是党和军队。

“毫无疑问，党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好的，可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不喜欢”——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党深信不疑的人都这样说，但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让雇农成为主人”的口号提高了雇农的地位。幸亏有党和军队的存在，农民以及中农们有点惧怕雇农，不敢去招惹他们。小部分雇农开垦着每一块地(土地——译者注)，不让中农有多余的土地。

有关对待中农方面的错误立场。

“左”倾和违反临时制定的规定。

1.敏建县和什泽县(Шипце)以及缅甸北部，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工作中违反了由农委会制定的原则。他们改变了“保留原先存在的耕地”的基本政策。

2.缅甸南部的同志，尽管专门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案，可在有些地方工作却进行不下去。甚至那些开展了工作的人，也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擅自处理——译者注)。

3.提出的口号“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由于戒严而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实行土地改革和军事行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是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没有军事行动同样也无法进行土地改革。

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分歧。

党内在土地改革方面的观点有分歧，革命拥护者们之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非常大的犹豫。党和组织的志愿者们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中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将雇农从贫农中划分出来，该不该给雇农划分土地，该不该没收部分地主的财产等。

在第二次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以前属于封建领主的已经分配了的土地不动。

——准备好明年要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

——宣布“土地分配”口号。

在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志愿者组织代表就土地改革提出了要求，在解决问题之前，应当征求群众的意见。

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去征求群众的需求，这意味着可能将革命引向失败，所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决地拒绝了志愿者部队代表的要求。

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不仅存在于志愿者之间，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同样也有。东秀县(Дунсюйсянь)农民协会的负责同志就“要不要分地”去征求农民的意见。

像这类的意见必须消除。

党内的观点分歧给反对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合适机会。“过去的革命斗争教训表明，利用领导党最亲近的党内宗派破坏了革命政权并为反革命工作开辟了道路。”(摘自《列宁选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旨在破坏革命的行动，是通往建立反革命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道路的一个政治步骤。”(摘自《列宁选集》)

党内的观点分歧造成了志愿者组织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反对派自由同盟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些不一致。为了阻止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它利用了与党有最密切关系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就是这样做出了消灭革命政权的计划。

志愿者组织能够联合那些对党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不满的农民，不采取公开的政治斗争就能组织起暴动。

在政权属于人民民主主义的地区，如果无法平定暴动，这就将等于为自由同盟德钦努 [95] 的军队开辟了道路。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

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危害。

如今，在农民问题上已经显露出非常大的分歧，导致出现了错误、极端和破坏章程的因素。

某些同志不承认党内的组织问题上存在种种困难，因此也不将它们列入议事日程。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从今后，我们的努力应当用在建立党内观点的一致性上。必须要尽力争取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一致性。

政治纲领

1.讨论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

研究我们的纲领和已完成的工作成为现行会议的一项任务。

在讨论存在的错误时会产生两个问题：(1)是否会出现政策是正确的，而实际工作却是错误的情况？(2)是否会出现错误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同样也是错误的情况？

经过讨论我们在6月所做的工作，我们感到，首先必须对政策问题作全面的修正，然后再讨

论实际工作中的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极端和破坏章程的现象？

(1)当全缅甸的土地分配工作结束时，班汶纳县(Баньвэньнасянь)持摇摆立场的人就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执行指示时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正确”。没有责任感。

(2)对整个缅甸北部来说，其指示为“在工作中根据现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事实上并没改变这项政策)

(3)在缅甸南部：“主要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采用新的政策，在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任何工作不得进行。”

总而言之，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执行所有的指示。

2.在组织问题上也存在混乱。

党内部的观点分歧影响了志愿者的组织，导致的局面是党无法恢复对志愿者组织的领导。

党与志愿者之间在进行土地改革上出现的分歧，导致人民民主阵线搁浅。敌人的自由同盟竭力利用这种局面，但是目前人民民主革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主要的环节在哪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和破坏纪律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们的同志是最恪守纪律的，可为什么他们却可能让党和革命遭受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错误并不仅在于实际的工作中，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基本政策。

党在领导方面的任务

有关党的领导方式，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以下的话：“当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或换句话说，当与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否认为该党还能实现对这些阶级的领导？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权，党应该分析党的政策并加以修改。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为此，我们应该分析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关于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

二月农村问题会议上通过的政策基本要点：

——没收全部土地。

——完全和平等的分配土地。

——赔偿中农在没收土地中的损失。

在讨论以上所说的各点时，我们应该研讨一下我们的基本原则：

1.有关土地国有化。

2.有关对待中农的立场。

3.平等分配的原则。

4.有关土地国有化。

共产党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土地国有化原则。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中有这样的指示。

共产国际认为最为重要的任务如下：

1.推翻国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2.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人民民主专政。

3.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

4.废除外债。

5.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

6.没收地主、寺院和教会的土地。所有土地将归国家所有。

7.实行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8.工农革命军队组织。

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的决议中写道，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同的基本任务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要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它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租界、铁路和银行归国家所有)。

在那些所有地区还没有取得统一的国家，要创建统一，推翻为剥削者服务的帝国主义政权，组织工农联盟和红军，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实现农村革命，把农民从资本主义和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土地国有化，采取有效的方式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3.按照工业和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将会增加，为此就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巩固共产党，使它在劳动大众之间能争取到稳固的领导地位，争取实现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4.建立起民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取消对获得教育的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等等。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纲领)

中国的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制度。

——耕者有其田。

——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满足贫农和中农的需求。

保加利亚的土地改革(摘自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

罗马尼亚的土地改革(罗马尼亚工人党书记在党中央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苏联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在进行土地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

苏联、新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土地改革中所总结的经验是

——废除地主制度。

——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关心贫农和中农的所有权。

——不急于进行土地国有化。

——借助于合作社转为集体农庄。

我们的政策：

——没收所有土地。

——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同样予以没收。

——土地全部分配。

——提供私有财产权。

5.对待中农的立场。

我们对中农问题还没有充分了解清楚。

(1)我们认为农民中的中农是暂时的同盟者，而事实上中农绝对不是暂时的同盟者，而是永久的同盟者(在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关于中农是永久同盟者问题的论述)。

(2)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有人说中农是摇摆的和不定的人，所以他是不可信赖的同盟者。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提出口号要与中农建立起可靠的同盟。

领导摇摆的和不定的人，正是工人阶级的任务。

“领导各个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治权利时应当将摇摆的和不定的人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摘自《列宁选集》)

(3)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斯大林)：

①依靠贫农。

②联合中农。

③消灭富农。

(.....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4)如果以错误的立场对待中农，那么就将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对待中农问题做出以下决议：“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内)，那就不仅是违反苏维埃政权法令，而且是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5)轻视中农是托洛茨基主义和走极端。

“右倾托洛茨基分子在农村看到的只有两个阶级：贫农和富农，并抛弃依靠其他阶级，其中包括中农。”(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6)巩固中农的所有权。

列宁同志在有关农村问题的著作中写道：因为中农具有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这些都直接表现在投机买卖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上，所以私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就展开了冲突。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地租和抵押债务，并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不应当马上废除私有制，它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不仅要保留原有土地，还要扩大他们土地的面积(废除地租)。

(7)我们给中农哪些保障？

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过指示，要保留中农和贫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我们还是没收所有的土地，然后再平等分配土地。我们将遵照应对中农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

关于赔偿中农和贫农的财产，以前列宁同志和恩格斯同志就曾说过，在我们获得政权的时候，将不需要进行这样的没收，就像没收地主财产那样，不管要赔偿还是没有赔偿，将不需要没收小农的财产。

我们对待小农的基本政策如下：将他们的私有财产转为合作制财产，但这不是通过权力方式来实现，而是逐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恩格斯“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

给不给赔偿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不没收财产(关于中农的问题)。

至于“赔偿”中农所遭受的损失，这个问题不值得考虑，因为我们给中农赔偿的契约如同“废纸”，中农对此不屑一顾。

对待贫农，不仅不需要没收土地，而且还要添加土地。

(8)对待富农的立场。

在富农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甚至在大农(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对大农的定义：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通常雇佣几个工人，之所以也能归入“农民”之列，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与农民相同，也亲自参加自己农场里的体力劳动。这是个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译者注)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不可能顺利完成，因为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同样也不具备将农村实行公有化的社会条件。

个别情况下，特殊环境内，可以没收富农部分被出租的土地或特别需要的和毗连小农土地的地块。除此以外，还必须保障小农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偿使用大农的全部农具。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保证大农保留土地所有权。

只有在大农反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对大农进行没收土地。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这个阶层在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后，同样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地缓慢)对捍卫所有劳动者而无情地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当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俄罗斯的大农展开斗争时，这时期的这场斗争便具有了各种复杂而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俄罗斯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后经历了所有农民起来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斗争阶段。

2.城市无产阶级人数少和文化水平低。

3.幅员辽阔和交通不便。

既然各先进国家中没有上述情况造成的阻碍，欧美的无产阶级应当更积极、更迅速、更坚决和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

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之前，农村中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是不会相信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是十分稳固的。

由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存在很强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农民阶级划分过程相当缓慢。但在这些国家市场关系归根结底将发展到那种程度，以致在阶级关系上农民开始有更明确的形式。

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已经能见到农民出身的剥削分子，为了剥削雇农和农民，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如高利贷、贸易，利用雇佣劳动，出租土地，租赁土地，出租役畜和农具。

总而言之，在农民与地主斗争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可以带领所有的农民。

可在斗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中出现的上层分子可能会站到反革命阵营的一边。

无产阶级只有在为满足农民的要求、为完全实现土地改革而斗争之时，只有在领导广大农

民群众、运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之时，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领导者。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报告)

有关中国的富农

在中国与富农的斗争是重要的事。

老富农手里的土地数量超过了总体的平均数量，没收他们多余的土地，不没收新富农的土地。

中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

1.工人阶级共产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20多年的土地改革斗争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同样也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尚未对富农进行彻底的斗争。这一点的解释如下：

1.在有利于建立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众多原因中，尽管不应撇开为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可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红军解放它们时所给予的帮助。

2.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地位比在中国的地位更有力。

3.城市是创建人民民主国家的基础。苏联红军解放了城市，所以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从城市开始的。

4.在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初阶段，农村中没有可靠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农民阶层中没有基础。

缅甸的富农问题

缅甸人民民主革命战争的最初阶段有可能发展为与富农的斗争。

原因如下：

1.缅甸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得到了解放)不同，而与中国相像，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创建了自己的人民解放军。

2.缅甸与那些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不同，而与以农村建设为基础的中国相似。

3.缅甸共产党同样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4.在组织方面，缅甸农民的地位比中国农民要低。

所以我们要废除旧式富农，监管新富农。

没收富农土地时，除留给他们的土地外，所有多余的土地都没收(与没收地主财产不同的是仅没收超过中农的那部分财产)。

绝对平等的土地分配原则。我们在分配土地时坚持“绝对平等的分配原则”，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在有关平等分配土地问题上说过以下内容：

“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农民群众更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分土地原则。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谁就会犯错误。这样的观点是反动的、落后的、投降主义的，我们必须批判。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无需干涉经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

总结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平等分配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赞成“不平等分配原则”。

在进行反封建斗争的进程中，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平等分配”的口号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可在今后这将成为向前发展的阻碍。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平等分配，但绝不主张绝对的平等分配。

在平等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应当依照这个观点。

不应通过武力方式和随后的土地平等分配去没收中农和贫农的土地，而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吸收中农和贫农参加平等的土地分配。如果他们将来参加，就吸收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招惹他们。

就比如，如果中农将不参加土地的平等分配，那他就有比贫农多的土地。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占有权就将不同，可这点还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不主张土地分配的绝对平等。

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土地改革的新旧政策有什么不同？

以前的政策是没收所有的土地和平等的土地分配。

新政策内容如下：

1.没收土地的问题和土地的国有化。目前还没有进行土地国有化。

推翻地主制度。

保护农民所有权。

从合作化转向集体经济。

目前还需要准许私人贸易的自由，但必须不断限制它。

2.没收土地的办法。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保留中农的土地(如有可能，可以从分配的土地中划出部分土地用以增加中农土地的数量)。

贫农的土地，非但不应割让，反而更应增加土地。

其他阶层同样应划分土地。

3.平等分配问题。不必力求绝对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

在给中农与其他阶级分配土地时不应搞平均主义。

4.为什么必须改变政策？

在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基础上，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应该再次加强土地改革的理论研究，然后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确定新的政策。

缅甸北部和南部的同志们也同样同意并承认，这项政策是“我们的政策”。缅甸南部提出的政策不准确。仅仅是刚在错误中找到真理。

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错误政策中找寻划分农民各阶层的正确方式，所以就找不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可我们必须承认，缅甸南部的同志非常细心地寻找正确的政策。

在缅甸北部数量相当多的土地所有者是中农和贫农，所以那里没采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政策。

缅甸北部的同志认同保留农民原有土地的政策。

尽管有些同志感觉政策上有错误，徘徊不前，但也无法准确地指出错误的地方。

在政治局成员中仅只有吴江志(Уцячжи, 根据中文音译)提议修改这项政策。他(吴江志)参加了缅甸南部代表大会并跟我讲述了缅甸会议的要求。并且他还考虑一下中农的土地问题，说在缅甸会议上还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研究后，做出了回答。

5.对农民的阶级划分。

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阶级划分。

最初阶段必须要说明，谁的土地必须没收，谁的土地不没收，用什么方式划分土地等等，然后才进行阶级划分。

有关阶级划分的问题，我们认同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如下：

(1)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劳动”。

农民自己在劳动。

所以在划分地主和农民时(包括富农)主要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是否劳动。

(2)在农民内部划分阶级时，除了本人是否劳动的问题外，还必须遵循这样的标准，是否雇佣劳动力，雇佣多少劳动力。

富农自己劳动，可雇佣大量的劳动力。

中农自己同样也劳动，可不雇佣劳动力。

贫农不雇佣劳动力，自己劳动。

(3)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中农与富农之间的划分。

中农的确定不仅要观察雇佣劳动力的问题，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以下的方式确定中农：

(1).....(略) [96]

结束

1950年8月27日

手写批注：

翻译：..... [97]

1952年12月19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91, л.7, 540-568

№0996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1953年7月17日)

致苏共中央

B.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7月17日、7月27日和7月30日电报的正本。这些电报的俄文本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通过电报拍发过来的。(专线：1385，140度，187 20)

附上述电报共3页(只发给收报人)

A.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8月26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决定，完全赞成苏共中央这一决议，认为清除贝利亚出党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这是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胜利，它给了帝国主义阵营趁斯大林逝世的时候破坏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动企图以严重的打击。

我们在7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完全拥护苏共清除贝利亚的社论，中共中央并已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就《真理报》7月10日社论和《人民日报》7月12日社论进行讨论，并向对此事件不甚了解的人们进行解释工作。我们保证与苏共中央团结一致，并将根据苏共中央决议结合中国情况改善我们党的工作。

二、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现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传阅。这个决议是否可以发给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省委及大城市市委书记以上高级干部阅读，请复。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17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是以前苏共中央收到过的电报的原件。永久保存。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9月4日

ЦХСД，ф.5，оп.28，д.38，л.30-39

遣雷达专家(1953年7月22日)

苏联国防部第五局局长关于必须向中国派遣苏联国防部科研所的雷达专家给苏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的报告

第10688号，1953年7月22日 [98]

根据总参谋部的计划，为П8无线电雷达站配备的两台抗干扰装置已发给了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鉴于斯柳萨列夫同志已就抗干扰装置的使用问题提出给予技术帮助的请求，我请您允许派遣该装置的专家——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代表、工程师—中校B.П.多尔加切夫同志去那里出差，为期一个月。国防部火炮管理总局局长已同意派遣多尔加切夫同志到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多尔加切夫同志也已整装待发，准备到那里就地测试该装置的使用情况，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观察其工作状况。

国防部第五所代理所长、工程师兼上校

P.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69

№0058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195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马林科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就北京来电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的第1356号电文稿。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如经批准，将同时向平壤发去相同的电报。

莫洛托夫

1953年7月23日

附件：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将下列事项通知他：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板门店交换停战协议文本时，金日成和彭德怀不出席的意见。要向美国人指出，每一方要由自己决定在交换协议文本时，由谁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务必要坚持这一点。

但是，必须估计到，鉴于中朝方面坚持这一立场，美国人可能借口谁在板门店作为代表的问题不合常规，而拖延签署协议。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可以同意由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朝方面。当然，在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往板门店时，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关于这项答复，苏联政府将同时照会金日成同志。

请将同周恩来会谈的结果电告。

АПРФ , ф.3 , оп.65 , д.830 , л.167-168

№0058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1953年7月24日)

关于金日成同志参加停战协议签字问题给北朝鲜的电报草案。

批准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同志)送来的就该问题所拟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莫洛托夫给苏兹达列夫的电报稿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下述事项：

苏共中央赞同板门店停战协议朝中方面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副首相和彭德怀签字。作为首相，金日成本人不必亲自签署停战协定。由谁代表朝中方面签署停战协议，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丝毫不应受美国人的压力等所左右。

在当前条件下，由于李承晚分子可能采取某种针对金日成同志的挑衅行为，金日成赴板门店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排除李承晚分子进行这类挑衅的任何一点可能性，而金日成不亲自参加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这一点就可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建议不要对其他任何意见让步，因为在此情况下，这些意见是次要的。但是，金日成拒绝前往板门店当然不应有示威性质。此外，正因为金日成将不去板门店，故彭德怀同志在板门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就十分重要。

苏共中央不认为，金日成不去板门店有可能被美国人用来拖延签署停战协定。由于这个理由而拖延停战协定的签署是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如果金日成不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将会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不良的印象。我们毫不怀疑，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会以应有的方式解释这一点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苏共中央希望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注意到这些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将被重视。

请通报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我们同时还上述意见发给北京的苏联大使，以便使其通报毛泽东和中国朋友们。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69-171

№0986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1953年7月27日)

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曾在7月7日电报中提出请求为北京马列学院增聘教授四人。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一、我们对1952年11月聘请的3位教授舍夫佐夫、契尔特科夫、斯皮里多诺夫的工作很满意，需要他们组织工作，望告他们在休假期满后即来北京。这次提出增聘教授是为了适应学校扩大的需要。二、增聘的四位教授主要是请他们来校讲课。如果其中能有一位或两位有办党校或社会科学学院的经验者最好，这对我们学习苏共经验，把我们的党校办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2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р.5082, л.34-35

№09995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 (1953年7月29日)

发自北京

紧急密电

(关于7月28日会谈的报告)

在接受了苏共中央的问候之后，毛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我向苏共中央转达深切的感谢。毛注意到敌人被迫提出停战不仅迫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最近一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敌人在陆地上不仅不能前进，也不能稳固地保持和守卫前线。中国军队不仅已经开始实施阵地战，也能够打破(敌人的)防线。

在迫使敌人停战的政治原因中，毛提到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上的矛盾和世界反对朝鲜战争的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

关于经济上的原因，毛阐述了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的垄断集团在军火订货和交付中积累了庞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结束，也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运动加强的结果，他们的利润开始急剧地下降。

回到军事问题上，毛指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但再向南方深入，就会冒过分暴露朝鲜东西海岸侧翼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中朝军队的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

谈到停战签字后更进一步的打算，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许多相关问题想和苏联政府商量。大约到8月10日，我们将准备一个有关必须要与苏联政府商量的措施计划的建议。

周恩来出席了会谈。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

АПРФ, ф.3, оп.65, д.830, л.187-189

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5, л.156-158

№09862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1953年7月3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贺电，深为感谢。

在整个朝鲜反侵略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都给了中国和朝鲜人民以重大的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充分的团结一致，保证了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将继续与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年7月30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30

No23733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1953年8月6日)

苏共中央印鉴，第41525号

1953年8月6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H.C.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委托，兹报告关于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特殊学校的情况。

该学校始建于1952年8月。最初，该校为中共下属的马列学院分院，随后才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校。

1952年8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野坂参三曾向苏共中央通报说，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中国成立一所日本特殊学校，并已将这一想法告知了1952年7月正访问莫斯科的德田秋一。野坂参三又说，关于建立这所学校的问题，(自己)已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作了协商。

1953年3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西泽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在给苏共中央的致函中指出，在中国建立的日本特殊学校的学员人数将增至1500人。该校目前位于延安市，但在1953年秋将被迁至离北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另外，在会谈中西泽还通报说，该校学员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日本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中共领导人任命(日本共产党)中央前委员高仓辉为该校校长，该校副校长打算由中国同志担任。

目前，关于这所学校的性质、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苏共中央联络部尚不掌握其他更为详细的情况。

野坂参三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为该日本特殊学校发送一些俄文版和日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书籍。此类书籍(苏联)以前曾向中国发送过。另外，应野坂参三同志的请求，苏共中央已决定向中国的日本特殊学校派遣一位苏共历史教师、一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和2位俄语教师。据日本朋友说，该校将有两个班学习俄语。

截至目前，该校仍未正式开始工作。野坂参三同志于1953年8月1日

向苏共中央通报，已为该校挑选了825名学员，这些人将进入预科班学习。学校计划于1954年1月开始正常工作。

鉴于非常有必要了解该校的管理和人员构成等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派遣一个由苏共中央联络部、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北京。另外，鉴于该校目前尚未正式开始工作以及日本朋友请求我们为该校筹备俄语教科书，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中国和日本朋友询问如下做法的可能性，即是否可以让我们派往北京的上述小组中的工作人员协助该校的组织工作。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斯捷潘诺夫

1953年8月6日

第25-C-1323号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 л.94-95

№25108 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1953年8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的信件发送给您，该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戈宝权在今年8月15日交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件2页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1953年8月25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兹寄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今年7月29日从缅甸共产党中央得到的通报。

1953年7月28日缅甸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决议，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召开的全体会议做出的通报，现在我们把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作一阐述。

一、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完全支持以Г.М.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把贝利亚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贝利亚混入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企图攫取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他企图破坏共产主义建设，恢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缅甸共产党中央也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

二、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使他们感到赞叹的是，以Г.М.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措施，贝利亚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和平和民主事业的敌人。

三、对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揭露是迅速而坚决的，这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牢不可破的团结，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同苏联人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也向世界证明了苏联各民族的力量。

四、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对贝利亚这一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国际资本主义间谍进行的揭露警告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将会一直感激苏联共产党采取的这些措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53年8月10日

于北京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91, л.607 609

№23818 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1953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

今年6月15—2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广泛开展国际运动的决议。

与以往的运动，如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和各大国之间签署和平协定的请愿书所发起的签名运动不同，本次即将开始的这场运动，在内容上强调根据各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进行，如国家退出侵略性集团，撤出外国军队和清除在一些国家境内的外国军事基地等；在运动进行的方式上，要求在各种会议、群众集会、国际会议及自治市政府和社会组织领

导机关会议上讨论保卫和平的问题，通过针对本国政府和议会以及给五大国政府的请愿书，呼吁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一些国家中仍打算继续开展征集签名的运动。

出席本次世界和平大会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介绍了苏联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根据世界和平大会的要求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请求就这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做出指示。与此同时，他们还通报了法国和意大利保卫和平运动领导人所提出的愿望，以便在苏联展开的这场运动能够与其他国家同时进行。

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召开保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会议以及一些单独的群众性集会 and 会议。在此类会议上一些本次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参与者们报告了例会的决议和世界和平大会发出的开展运动的倡议等情况。这些会议和集会均通过了赞成世界和平大会例会决议的决定。最迟在今年8月中旬以前，在这些国家中就将开始广泛的运动。该运动将具有长期性，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部分大国之间就一些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签署协议——即使是部分性质的协议。

为了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苏联国内也应开展相应的运动。其中具体内容包括：

- 1.苏联社会舆论广泛赞同布达佩斯世界和平大会决议所提出的以谈判方式调解国际争端的决议。

- 2.全体苏联人民支持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后者的依据是：“当今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无法在相关国家相互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有争议的、而未解决的问题。”

- 3.表明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该协议的签署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显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 4.揭露敌视和平、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各种势力的阴谋。

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鉴于这场运动所具有的长期性质，苏联公众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将采取的那些具体措施(如苏联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大国外交部长会议的提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

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应对敌视和平势力为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那些具体活动给予回击。

至于开展这场运动的方式，具体如下：可在今年8月下旬举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在9月——举行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并就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等问题作报告；自8月起——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开会议，并作关于当代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报告。这些会议均应在1953年12月以前进行。

此外，还希望苏联各社会组织（工会、妇女和青年等）不约而同地发表支持这场运动的声明。

理应在1953年12月召集全苏拥护和平者第五届大会，期间将讨论A.A.苏尔科夫同志就“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捍卫和平而斗争”问题所作的报告。第四届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是在1952年12月举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和劳动者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反映苏联公众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具体看法。

今年9月9日，将在哥本哈根召集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以讨论那些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这场国际性运动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理应派遣如下苏联代表——H.C.吉洪诺夫、И.Г.爱伦堡、A.A.苏尔科夫和П.В.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就运动开展问题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上。苏联代表们的活动应以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确认的批示以及附录的决议草案中所表述的指示精神为指导。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工作领导，在世界和平大会中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认为，有必要再派一名苏联代表到该秘书处工作。

我们认为，可以采纳这一建议，派遣B.A.索罗金同志到世界和平大

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届时将免去该同志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职务。索罗金同志，1904年生，1927年成为苏共党员，具有丰富的国外工作经验，精通英语，我同意派其到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

有必要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中设立能够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的第二个苏联代表的职务，个人工资为4500卢布。

关于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内容，具体参见附录。

M.苏斯洛夫(签名)

1953年8月11日

附件：

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

苏共中央决议：

一、鉴于世界和平大会所提出的为以谈判方式调解一切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性运动的倡议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于今年8—12月间在苏联广泛展开这一运动。

该运动的主要任务理应如下：

1.苏联劳动者赞成世界和平大会提出的通过谈判方式调解国家间存在的一切国际性问题的要求。

2.苏联全体人民拥护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坚信，当代国际形势中任何有争议的或未解决的问题均可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彼此协商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苏联全体人民支持苏联政府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3.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该协定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展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4.揭露敌视和平势力的阴谋，及其为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可能采取的各种挑拨离间方式(如柏林冒险者们、李承晚的挑拨离间等)。必须针对和平的敌人们为挑起战争和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一切罪恶活动给予有力的回击。

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实现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而采取的具体举措给予支持(例如，苏联政府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代表团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这场运动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苏联各民族，加强其为争取和平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提高其对战争煽动者的阴谋的警惕性，巩固和扩大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国际主义兄弟联系。

二、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应采取以下举措：

1.于今年8月下半期在莫斯科召集由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以讨论如下问题：《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

务》(即H.C.吉洪诺夫同志的报告)。

2.根据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决议,于今年9月召开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扩大全会,参加者包括各地方社会组织的代表,以讨论苏联各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的问题。

3.在8—12月间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集劳动者会议,以听取题目为:《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报告。

4.为了对这场运动的成果进行总结,计划于1953年12月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举行第五届全苏和平拥护者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即A.A.苏尔科夫同志的报告)

责成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最晚于今年11月1日以前就召集上述会议事宜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关草案。

建议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和劳动者会议,根据本决议第一款所提出的这次运动的任务,通过相应的决议。

三、责成苏联社会组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科学院,共青团中央,苏联作家协会管理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苏联作曲家、建筑师和艺术家联盟管理局等——在运动期间的不同期限内发表支持运动的声明。

四、责成各级党组织积极参与这场运动。

责成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根据本决议第一款之要求,确保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劳动者集会的顺利举行。

五、责成中央,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报刊编辑部以及苏联文化部确保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及时报道如下相关资料: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的召开,苏联各社会组织和劳动者为开展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运动而举行的会议。

六、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在全国范围内负责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的领导工作。

七、派遣苏联代表——H.C.吉洪诺夫、И.Г.爱伦堡、A.A.苏尔科夫和И.В.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即将于今年9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会议期限为10天。此次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将讨论,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规模运动的相关问题。届时,苏联代表将依据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批复的指令以及本决议的相关内容,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领导工作,兹责成在世界和平大会机关工作的苏联代表争取实现如下目标,即选举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的B.A.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

计划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定员内设立第二个苏联常驻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的代表职位,其个人薪水每月为4500卢布。

批准B.A.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职务,并免去其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职务。

РГАН И, ф.5, оп.30, д.33, л.64 71

鲜的作战行动(1953年9月以后)

..... [99]

1950年11月，鉴于美国侵略军已逼近中朝边境，我歼击航空师(第二十八和第一五一师)奉命：防止美国空军空袭，掩护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朝鲜人民军后方设施(包括鸭绿江铁路桥、安东地区的机场和朔州地区的水丰水电站)。

我歼击机的作战范围被限制在：鸭绿江沿线和朝鲜湾沿岸。

随着朝鲜和中国军队的向南挺进，我部又接到如下补充任务：掩护北朝鲜境内设施和交通线，作战又向纵深推进了75公里。

1950年11月末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成立，其中包括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十八、第一五一和第五十师。

总的来说，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包括如下部队：2—3个歼击航空师、1个独立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1个高空探照灯团。不过，该军的部队构成并不固定，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至同年8月末该军所属只剩2个歼击航空师、1个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和1个高空探照灯团。

1951年6月以前由于受到中朝边境附近机场分布和本军所肩负的对中朝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的限制，本军实际参战的部队只约有2个团的兵力，60个机组。

只是从1951年7月始，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军才有可能将5个团的兵力(120—150个战斗机组)投入作战。

从我军在朝鲜参战至1951年末，美国空军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是轰炸机(B-29和B26)。根据这一情况我军这一时期的重点打击目标也以敌轰炸机为主。稍后，随着敌人白天的突击力量转变为强击机，我军的打击重点也随即转为主要针对敌强击机作战。

在防止敌轰炸机空袭和为北朝鲜地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过程中，我军不仅要面对敌轰炸机和强击机，而且还要与敌为上述飞机

担当掩护任务的歼击机作战。

为了完成所肩负的战斗任务，我军各部队自1950年11月至1952年1月期间共实施战斗起飞19203架次。

这一期间我军歼击机在白天以机群为单位实施的空战共307次，其中：以双机为单位作战19次，以中队为单位作战112次，以团为单位作战84次，以师为单位作战50次，以军为单位作战42次。

参加空战的机组共7986个，占全军飞行机组总数的比重为43%。

战斗中共击毁敌机562架，其中：B-29——48架，B-26——1架，PB 45——2架，F-47——2架，F-51——20架，F-80——103架，F-84——132架，F-86——218架，F-94——8架，“流星”——25架，F-6和F-5——共3架。

夜间单机空战16次，击毁敌机2架B-26。

自1950年11月至1952年1月，我军空战中共击毁敌机564架。

期间，自身损失：飞行员——34人，飞机——71架。

敌我损失比率：7.9：1。

我军平均实施战斗起飞33架次击毁1架敌机，战斗起飞285架次自身损失1架飞机。

我击毁1架敌机平均消耗弹药212发。

我1个机群平均空战时间：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15分钟，期间我歼击机平均实施攻击2—3次；与敌歼击机——10分钟，平均攻击次数2次。

我歼击机小型和大型机群作战情况。

以高空作战为主：与敌歼击机——8000—12000米，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7000米以下。

此类空战的特点：敌歼击机极力将空战高度保持在8000米和以下，因为敌歼击机F86如果超过8000米以上，其战斗性能便远远不如我米格

15战机。

在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受到我军重创之后，敌人被迫重新审视自身空军的使用问题，并采用了一些新战术，还通过将F-80改装为F-86的方法来加强其歼击机群力量。

从初期的空战实践中敌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其F-80和F-84等歼击机在性能上已不能继续作为歼击机来使用。

随着美军司令部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增加空军力量、改进飞机性能、改变行动战术等，到1952年初，朝鲜战场白天和夜间的空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而我军在1952年上半年的战斗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军战斗部队已缩减为两个歼击航空师(3月份以前为第三二四和第三〇三师，3—6月为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师)。

1952年以后朝鲜空战形势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敌人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已变为强击机；另一方面，此时敌强击机与原先的轰炸机相比，兵力上已约达到原先的4倍。

这一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我部队的战斗力，集中对付敌强击机，我军主要以小机群(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高度保持在8000—14000米之间。这将有利于我以劣势兵力对数量众多的敌歼击机“掩护”在广阔战线上实施干扰作战，从而为我突击机群向敌强击机发动攻击创造条件。

如果1951年我军1875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机群(以团、师、军为单位)为单位的作战共14112次，比重为75%，那么时至1952年，我军白天2353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作战总数则为12529次，比例仅占到53%。

.....

这一时期我夜间战斗起飞共1062架次。

1952年我军歼击机共实施机群式空战868次，其中参战机组共计9014个。

空战中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F-51——8架，F-80——13架，F-84——41架，F-86——315架，“流星”——1架，F-4y4——1架。

夜间单机空战32架次，击毁敌机15架(11架B 29、3架B 26和1架F 94)。

1952年我军共击毁敌机394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51人，飞机——172架。

敌我损失比率：2.2：1。与1951年相比，这一时期的战斗起飞架次大幅增长。1952年我军战斗起飞月平均增至600架次。

鉴于我歼击机战斗积极性不断增加，歼击机和强击机损失惨重，敌空军于1952年末调整了自己的行动战术——不再使用大机群，而是利用安州和开城一线以北地区的复杂气象条件，以小机群在广阔战线上展开活动。

与1951年相比，1952年我军的空战效率也有所下滑。

我歼击机作战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我军空战的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后者在飞行—战术参数上与我米格15相差无几。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些实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1951年在空战中我军共击毁敌机496架，其中F-86歼击机206架，1952年我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歼击机315架。

2.我军在同敌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进行空战中取得胜利的机率明显小于同敌轰炸机作战。

3.1952年在我军与敌空军作战的同时，中国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开始参战。

1952年11月以前，中国空军部队作战时主要是配合我歼击机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小型机群实施攻击。

从1952年11月起，我军司令部开始高度重视让中国空军积极参战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空军指挥部和各部队在作战行动的组织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具体如下：

1.向其传授作战经验，通过开会分析和研究与敌歼击机、强击机作战的协同配合等空战技术。

2.在空军部队的指挥、组织和导航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

中国空军参战主要遵循了如下顺序：先是与敌小机群作战，随后对敌空军的大规模集中空袭实施反击作战。这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空军与我军歼击机协同作战。我部队承担主攻，在安州和开城一线远程空域对敌“掩护”歼击机实施干扰作战；中国空军在定州(Тэйсю)和浦津(Бугдин)地区参战，对我作战行动实施策应；中国空军退出战斗时，由我歼击机群负责掩护。

第二阶段，中国空军参加一线作战，我军歼击机实施策应和掩护其退出战斗。

第三阶段，中国空军独立作战，作战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中国空军部队的作战区域主要是西部沿海；朝鲜空军作战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我军各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根据空战形势随时准备向上述两空军部队提供援助。

至1952年末，中国空军数量已颇具规模。其不仅可配合我军歼击机参加对敌一般机群的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对敌空军大规模空袭的反击作战。

中国空军的积极参战加强了我军与敌空军对抗的实力，激发了我歼击机在远距离关键地区对敌实施作战的积极性，并给予敌人以更重大的打击。

我军不断增加的作战积极性，促使敌人被迫于1952年底对自己的空军机群进行了重新武装——将F-84改装为F-86和F-30。

与此同时，从1953年初起，美军司令部决定让自己的轰炸机在夜间积极行动，对安州和咸兴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空袭，以替代强击机白天在上述地区的活动。

1953年1月上旬，我军歼击机夜间重创了敌轰炸机。空战中共击毁敌B-29轰炸机7架。因此，1月下旬至停战协定签署期间，敌轰炸机只是在气象条件复杂的情况下才敢夜间趁机在朝鲜地区展开活动。

与1951—1952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的作战行动是在更为复杂的空战和气象条件下进行的。

自1953年3月起，美军指挥部开始以F-86和F-30代替强击机参战，针对这一情况，我军的应对之策是：在所掩护地区以小机群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积极作战。

在这一战斗中，我军承担了主要责任。因为此时中国空军对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尚未作好准备。

因此，我军的战斗任务极其繁重，尤其是在1月至停战协定签署之间一段时期。这里有如下数据可以作为佐证：如果1952年的12个月间，我军的战斗起飞为23539架次，平均每月1961个架次，那么仅在1953年的7个月间，白天我军便实施作战起飞18152个架次，平均每月2600架次。1953年的战斗起飞月平均架次比以前增加了650架次，即33%。

为了给我突击机群创造更有利的对敌强击机实施攻击的条件，我军原准备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的歼击机现在均采取小机群作战的方式。1953年的7个月间，我军18152架次战斗起飞中，以双机、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战斗起飞便达到13009架次，达72%。

在我歼击机的积极进攻下，敌歼击机只敢在战术条件有利和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投入战斗。

而美军指挥部，即使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仍无法在空战中为自己的强击机提供有效的保障。为了遏制我歼击机的活动，其加强了在我安东机场地区上空的“猎杀”作战行动。敌人利用一切有利战术条件对我歼击机实施压制性攻击。

1953年白天我军共实施机群式空战508次，其中参战机组达3713个。空战在各个高度上展开——从超低空至米格15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

上述空战我共击毁敌机125架，其中：强击机F-80和F-84——12

架，歼击机——114架。

空战结果显示：我军歼击机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歼击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我军所掩护的地面设施上空，带有偶然性。

我军夜间战斗起飞1373架次，实施单机空战59次，击毁敌机13架，其中：PB-29飞机——1架，B-29飞机——6架，B-26飞机——1架，F-84飞机——2架，F-94飞机——2架，F-3D飞机——1架。

在1953年7个月白天和夜间的空战中，共消灭敌机139架。自身损失：飞行员——25人，米格-15歼击机——76架。1953年敌我损失比率为1.9 : 1。

与1952—1953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在完成了所承担的战斗任务的同时，还在机场值班时的一级和三级战备状态下实施起飞，以巡逻方式对我军负责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须知，此类在机场值班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战斗起飞含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其不能对敌机实施及时的拦截。

我军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共击毁敌机1097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10人，飞机——319架。战争期间的敌我损失比率为3.4 : 1。

结论：

.....从在朝鲜参战开始至停战协定签署，尽管美国空军力量上优于我军，但我们还是没有让其得到摧毁我军所保护的主要设施的机会，而且期间敌各类型空军均遭到了我军的重创。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中将

斯柳萨列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别列日诺伊

ЦАМОРФ, ф.64иак, оп.174045, д.186, л.21-32

№005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

的结果(1953年9月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基本上赞同苏联外交部呈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考虑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 ф.3, оп.65, д.511, л.4

№25109 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1日)

致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苏联外交部转送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全体会议做出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我国的报纸上没有发表。

通报材料将供苏共中央联络部本部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П.格拉德舍夫

1953年9月11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91, л.610

№21350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1953年9月12日)

苏共中央印鉴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A.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刘少奇的信和我们通过苏联驻中国使馆获得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

附以上所述的内容(收件人亲启)

A.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9月12日

第2129/ДВ号

附件：

刘少奇给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同志的信

致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同志：

感谢苏联方面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译稿的校对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如今，该译本已获准并转交给英国同志。不久，该书将在伦敦出版。兹发给你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请你们帮助我们校对这些译稿。

如果你们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英文译稿已校对完毕，那就请把译稿发回给我们。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签名)

1953年8月15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44-45

№24873 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1953年9月15日)

葛罗米柯同志：

对于您在1953年5月25日发来的第087 1/ДВ号信函，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如下通报。

布拉金同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组长，他的报告主要列举了1952年期间中国在计划设计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此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计划设计小组通过提供咨询给予了帮助，有时候则直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比如，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在1952年首次及时完成了计划任务。

苏联专家还对1953年国民经济方案的制订工作提供了帮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的制定提供了帮助。

根据我们专家提出的建议，成立了物质技术保障计划管理局，制定了组建国家物资和粮食储备管理局的方案及1952年的国家商品储备计划。

但是，报告没有阐述苏联专家在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在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向中国的计划单位提供帮助的作用。关于中国的计划单位在中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发展方面向苏联专家提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报告中一点也没有谈到，报告中也没有通报，我们的专家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关于苏联专家主动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一点也没有谈到。从报告中也不能看出，苏联专家在建议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考虑到了中国现今经济状况的特点。

布拉金同志提交的报告不能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工作做出实质性的结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佩罗夫

1953年9月15日

РГАЭ, ф.4372, оп.11, д.995, л.251-252

№00593 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1953年9月29日)

1953年10月1日

第211号

1953年9月29日接见中国大使张闻天

今天4时30分接见了中国大使张闻天，并向他声明如下：

鉴于法国、美国和英国政府9月2日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问题的照会，9月28日苏联外交部向法国、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

在这个照会中，苏联政府建议：

一、在法、英、美、中、苏外长会议上讨论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在法、英、美、苏外长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包括会议筹备过程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而且，这里指的是召开一个外长会议，它应当按上述次序讨论所提出的问题。

我向张闻天递交照会后，请他将照会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照会的态度。

张闻天表示感谢并说将向本国政府报告照会内容和上述声明。根据大使的请求，我把声明文本交给了他。

谈话持续了15分钟。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远东司副司长列多夫斯基同志参加了会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3, оп.65, д.511, л.5

事馆来函给的信(1953年10月10日)

归入第448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H.Г.叶罗费耶夫同志：

现将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馆收到的信函寄给您，请就写信人所感兴趣的问题给他以答复。

附信件全文。 [\[100\]](#)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3页

№23762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1953年10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M.A.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寄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亚洲各国的资料。材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于10月12日转交给苏联外交部。

附上述提及的资料及十二页的资料目录。

A.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10月15日

第2427/OB号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根据收到的资料，请准备一个情况说明。

苏斯洛夫

10月16日

第50045号文件的说明

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同志处收到中文的有关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马来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资料，共有32本小册子(4261页)和29份文件(773页)。

这批材料的绝大部分是对外联络部较早时收到的，并译成了俄语，没有实际意义的部分材料不需要翻译。

收到已译成俄语的材料中，只有部分材料应该是译自缅甸语、越南语和马来语。

因上述情况，我们请求：

- 1.不考虑将小册子转交给对外联络部图书馆。
- 2.装订清单编号为“第一号”上的文件，作长期保存并返还部里翻译。部领导将按翻译的进展通报文件内容。
- 3.清单编号为“第二号”的文件归档。

И.维诺格拉多夫 [101] (签名)

第一号材料清单

需译成俄语的有关越南、缅甸和马来亚方面的中文材料。

一、有关越南的材料

1.1953年2月8日长征(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在国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页。

2.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一些特别问题的第38号指示，5页。

3.1953年4月2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4页。

4.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主席)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5页。

5.1953年6月10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8页。

二、有关缅甸的材料

6.缅甸农民运动简史，7页。

7.缅甸共产党副书记德钦丹东的电报与信件，22页。

8.有关缅甸共产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21页。

9.1952年12月15日各农民联盟会议上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讨论，21页。

10.1952年7月3日批准的缅甸共产党新纲领，18页。

三、有关马来亚的材料

11.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政策与组织情况的报告，337页。

12.关于森林根据地的一些补充意见，4页。

共计481页。

第二号材料清单

应归档保存的有关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日本的中文材料。

一、缅甸

1.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关于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51年9月)，11页。

2.缅甸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给党中央的报告(1951年9月)，19页。

3.有关缅甸人民军的情况(1952年12月), 17页。

4.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传干部问题的报告(1950年9月), 28页。

二、越南

5.关于审判机构法, 6页。

6.土地法草案、人民法院组织的情况、有关惩治犯法地主的临时条例, 15页。

7.党在发动群众运动中的政治方针, 5页。

三、尼泊尔

8.一些有关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材料, 76页。

9.古埃尔(Гуэрли)、巴坎特(Бакэт)和普拉坦哈(Пулатэхань), 76页(根据中文音译)的自传, 9页。

10.古埃尔(Гуэрли)论辛格, 5页。

四、印度尼西亚

11.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争取民族彻底自由的斗争, 25页。

12.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斗争, 艾地的文章, 13页。

13.有关印度尼西亚各政党和其领导材料, 28页。

五、日本

14.日本共产党北京支部有关古(Гу)问题的决议, 8页。

15.有关“促进中日贸易的国会同盟”材料, 9页。

16.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 7页。

17.希达(Сидда)写给宋(Сун)和野坂参三的信, 11页。

共计292页。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92, л.75-80

№21357 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 《毛泽东选集》(1953年10月30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答复经苏共中央转发的中共中央1953年8月来电，我请你们向中共中央转发以下所附电报。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Ф.克拉乌金 [102] (签名)

1953年10月30日

附件：

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致中共中央

北京市

作为对你们于1953年8月21日(给我们)所发电报的回复，兹建议由拉卡萨-路易斯同志及其妻子桑恰-索列达特同志担任著作出版的西班牙语顾问。

上述同志的个人简历如下：

拉卡萨-路易斯，54周岁，自1937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著名建筑师。现以政治侨民身份居住在苏联。目前工作单位为莫斯科市苏联建筑科学院。除西班牙语外，还懂俄、法和德语，也可译英文。不是文学和出版问题专家，但广泛涉猎西班牙文学，在翻译和编辑方面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该同志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桑恰-索列达特，43周岁，自1936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职业为中学教师。自1939年起，以政治侨民身份留居苏联。除西班牙语外，还懂英、俄语和部分法语。该同志并非文学问题专家，但了解西班牙文学，具有师范教育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翻译工作经验。她也是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上述两同志有两个孩子——分别为13和10周岁。父母希望，孩子们能与自己一起前往，从而有可能继续在苏联中学上学。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将派遣这两位同志来完成上述工作，为期2—3年。

致敬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归档

手写批注：

1953年11月5日发给驻中国大使的信，以便其转交中共中央。

И.谢尔巴科夫，1953年11月5日

М.维诺格拉多夫，1953年11月6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55-57

№20219 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1953年11月3日)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和中朝空军联军

1953年6月25日到7月27日作战结果的报告

1953年11月3日

一、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活动

(一)我军歼击航空兵

1.我军开始在朝鲜作战始于1950年11月，期间派出参战的共有10个航空师..... [\[103\]](#)

2.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

实施空战1872次，期间向敌射击的飞行员共计6462人。

3.击毁敌机1106架，其中：

F-86-30——1架

F-86——650架

F-84——178架

F-80——121架

F-4y5——2架

“流星”——28架

F-47——2架

F-51——30架

F-94——13架

B-26——8架

B-29——69架

B-45——2架

其他——2架

4.我军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

(二)我军高炮部队

1.自1951年6月我军高炮部队也参加了作战，担当安东各重要机场和水丰水电站的地面掩护任务。

期间，我2个高空探照灯团、4个高炮师(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五师)或9个高炮团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各师承担此项特殊任务的时间长短不一，从6个月至1年零8个月不等。

2.被我高炮击毁的敌机共计153架，其中：

F-86-30——5架

F-86——35架

F-84——25架

F-80——47架

F-51——5架

B-26——17架

B-29——7架

其他——12架

3.我军高炮部队自身损失——阵亡68人，受伤165人；高炮6门，探照灯1台。

二、我联合空军部队的作战活动(据不完整资料)

1.自1951年12月起中国空军参战，兵力共计2个师(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3月起又增加了3个师(第二、第六和第十五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5月起又增加了2个师。朝鲜空军在1952年初有1个师开始参战，截至1952年底，其兵力增至3个师，其中2个歼击航空师作为联合空军部队参战。

2.中朝空军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期间共击毁敌机271架，其中：

F-86-30——5架

F-86——176架

F-84——27架

F-80——30架

F-4y4——15架

F-51——12架

B-26——1架

“流星”——2架

“野马”——1架

其他——2架

3.联合空军部队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三、共击毁敌机2814架，其中：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航空兵部队——1106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高炮部队——153架。

共计：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259架。

中国和朝鲜空军——271架，

朝鲜人民军陆军——1284架。

总共——1555架。

自身损失：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飞机335架，飞行员120人。

联合空军部队——飞机231架，飞行员126人。

总计——飞机566架，飞行员246人。

第五战区指挥官、少将

莫尔德文采夫

ЦАМО Р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280-283

№24875 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1953年11月5日)

致苏联煤炭工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

M.M.楚库洛夫：

1953年9月8日对地质材料进行的技术鉴定结果和对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矿山开采材料进行检查(这些材料已经得到现有煤炭资源管理总局小矿井的检验)的结果显示，现有的地质资料质量不行，这些资料对于设计中国第11号新的深度(500米)地道矿井是不够的。

开展的钻探工作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完全缺乏关于钻探过的煤田的出口信息，在钻探出的一些样煤含灰量达到40%—60%的情况下，对煤田的钻探程度是不够的。看起来，对一些钻孔钻出的煤进行的取样分析是不够的，其中包括缺少关于含灰量的数据。

对采矿开发工作进行的取样分析的结果也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因为取样地点同采矿点没有关系。

为了保证在第11号深层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中获得所需的完全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就必须另外再进行钻探，必须钻过煤田60%以上的地段，此外还必须从各相关的矿井中进行取样分析，把所有的数据都混合起来纳入矿山测量专家的计划中，并制定地质报告，根据全苏矿藏委员会的请求对煤田的储量进行计算。

在得到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上述材料之前，要着手进行第11号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就不能不请求您向订货单位下达相关的关于进行必要的补充工作的指示。

同时，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认为，考虑到矿产地机械条件复杂，煤炭的质量较低，要把其建设成为一个生产能力较强的矿井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最好向订货单位建议不要加快第11号地道矿井的基建工作，而把其建设延迟到第二期进行。

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院长

A.M.什维尔尼克

1953年11月5日

РГАЭ, ф.8225, оп.27, д.1125, л.214

№21358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1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A.苏斯洛夫同志：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今年8月31日第2019/ДВ号信函的请求，兹给您送去中共中央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其中请求推荐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外语文学作品的顾问。

在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中国使馆还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目前正

在莫斯科的克列门特·达特(巴里姆·达特的兄弟)夫妇正在编辑一本著作，而到今年年底他们就可能结束这方面的工作。鉴此，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苏联)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经相关部门了解一下，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编辑工作之后，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同意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外语文学出版顾问的身份从事编辑工作；另外，再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再向中国派遣一位出版方面的顾问，以从事英文书籍的编辑工作。

Г.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11月17日

第297/АГ号

附件：

伦敦

苏联大使：

请向英国朋友转达如下内容：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经我们请求英国朋友向中国派遣两位英文著作出版方面的顾问。目前，中国朋友已确认了这一请求，并表示希望不是像以前所请求的那样派遣两位，而是三位此类顾问前往中国。请向英国朋友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这一请求并(向我们)通报(相关情况)。

1953年11月1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58-60

№11424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 苏联摄影展览会(1953年11月17日)

归入第610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11月15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应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的邀请参观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之际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展览会设在东北图书馆大楼一层，占据了几个房间。

展览会上展出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寄来的材料，如《乌克兰共和国的建设》、《苏联的工业》、《苏联的选举制度》、《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农业》，展览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东北图书馆馆长杨同志对我们说，每天来参观的有2000多人，他们是各单位集体组织来的。他说，今天早晨来参观展览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苏联工业的机械模型很感兴趣。

中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说，市内共举办6个这样的展览会。我们觉得，在准备寄给中国的苏联人民的文化信息、苏联的图书馆、苏联的剧院等材料时，需要经常有一些反映苏联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发展的画报材料。在东北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会上没有这类材料。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的照片，观看中国的戏剧《白毛女》的观众的照片，去展览有中国作家作品的工厂图书馆的观众的照片等。这些照片在展览会的参观者中都享有盛誉。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4—2205页

№25110 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 交缅共中央贺电(1953年11月21日)

附件是中国驻苏大使馆转交的电报：关于缅甸共产党就十月革命36周年给苏共中央的贺电。送赫鲁晓夫同志书记处舒伊斯基同志：

兹把缅甸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呈送给您，该电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今年11月16日送给苏联外交部的。

上述附件是英语及其翻译文本，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费德林

1953年11月21日

附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36周年之际，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通过苏联共产党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

在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英勇领导下，俄国人民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推翻了帝国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成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奴役、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战争贩子的各族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节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国际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根本转折，是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通往新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功是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它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就宣告了殖民地革命时代的开端。苏联是苏维埃各族人民友谊的支柱，是苏联人民的骄傲，它坚定地支持世界的和平力量，自其成立之日起就举起了为世界各国和平和友谊而斗争的旗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国家经受了各种风浪，经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今天，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在强大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世界1/3的人民正在以苏联人民为榜样，他们也忠于社会主义道路。

缅甸共产党中央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各国和平和友谊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全世界牢不可破的支柱——苏联万岁！

英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共产党万岁！全世界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旗手万岁！

缅甸共产党中央

1953年11月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91, л.802-806

№11425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 苏联电影节(1953年11月23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关于在中国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1月7日至16日在(中国)东北五大城市(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和大连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电影节期间放映的电影有：《科尔季的光明》、《勇敢者的舞

台》、《在大洋的冰层》、《远离莫斯科》以及苏联的一些动画片。

在沈阳市，电影节于11月4日在友谊宫开幕。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市内党、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先进生产者、文学艺术活动家、人民解放军英雄等，总共有600多人。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还有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Б.Н.魏列夏金及一些苏联专家。

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发言的有：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张东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王化南(ВанХуннань)，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刘长东(Лю Чжань-дун)。

在东北其他一些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也是在隆重的气氛中开幕的，出席开幕式的有党组织、社会团体的各行政组织的代表。

苏联电影节举办得非常成功。东北的一些报纸登载了大量的材料，向民众介绍苏联的电影，一致指出，苏联电影对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他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报纸还反映了民众想看到苏联电影的愿望。沈阳报纸《沈阳日报》写道：“电影节开幕后的几天来出现了初寒，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然而在各电影院门前总是有很多人，都是来看苏联电影的。”

在许多单位，人们看过苏联电影之后都举行座谈会。例如东北工业学院(沈阳市)所属工农速成中学就举行了这样的座谈会。劳动英雄姜贵银、马恒昌、郑希申(ЧжэнСишэн)都是这所中学的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以便掌握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鞍山报纸《工人生活》报道说，在讨论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基本建设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叫陈云绍(ЦэйнЮйшао)的说：“苏联人民有高尚的品质，响应祖国的召唤，不怕困难，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当以此为榜样不断地学习。”

在举办电影节的东北五大城市里，观看苏联电影的人数有110多万，其中：沈阳市43.7万人，鞍山市15万人，长春市15.2万人。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签名)

№20220 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1953年11月24日)

1.今年10月26日斯柳萨列夫同志向总参谋长报告说，他已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各部队，一旦在中国东北领空发现入侵飞机，歼击机立即投入战斗，并一直尾追至鸭绿江(不得进入海域)；高炮部队也可立即向其开火。

总参谋长对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建议表示同意，总参谋部还于今年11月6日发布了第557644号指令，对该决定予以确认。

2.与此同时，斯柳萨列夫同志还报告说，联合空军中的中国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必根据任何指令，便可向侵略者实施攻击。

根据波特鲁舍夫斯基同志今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国司令部通报说，联合空军部队已接到了关于可以与入侵飞机开战的命令。

3.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布尔加宁认为，首先与入侵中国边境的飞机作战的应当是中国空军，而我们的歼击机只应在我空军受到直接威胁之时才可投入战斗。

4.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的机场是与联合空军部队中的中国空军在一起的，后者在沈阳、安东地区共驻有7个歼击航空师，驾驶的机型为米格15和米格15B。

在拥有如此兵力的情况下，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完全有能力独立地与入侵敌机作战。

结论：

1.斯柳萨列夫同志应当发出指令，要求与侵犯中国边境的入侵飞机的作战活动应由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机部队来完成。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只是在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即入侵飞机已逼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机场或我飞机在空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可投入

战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飞机也不得越过鸭绿江边界和海岸线。

2.关于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命令已发生部分变更的情况，请通过我最高军事顾问向中国司令部通报。

空军中将

拉科夫宁

1953年11月24日

ЦАМОРФ, ф.16, оп.3139, д.157, л.296-298

№213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 派遣文学顾问(1953年11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M.A.苏斯洛夫同志：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转发一封电报，其中请求向中国派遣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以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方面的工作。

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已发给苏联驻伦敦大使，并于1953年9月7日转交给了Г.波立特 [\[104\]](#) 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在今年11月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又请求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莫斯科从事И.В.斯大林著作选集编辑工作的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愿意前往中国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的工作，另外中国使馆还请求我们了解一下，英国朋友是否可能除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再向中国派遣一位英文著作编辑方面的顾问。

我们认为，英国共产党中央最好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要求。

发送给苏联驻英国使节的电报草案请参见附录。 [\[105\]](#)

我还要请你们允许经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通报如下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派遣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和补充派遣另一位英文著作出

版顾问前往中国的请求，我们已向英国共产党中央作了相应的转达。

Д.维诺格拉多夫

1953年11月26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61

№2487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1953年12月3日)

机密

出席会谈的有：戈宝权、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以及费德林。

张闻天通报说，中国政府同意任命尤金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欢迎他前往中国。

莫洛托夫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

张闻天请求告诉他关于尤金到中国的日期。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同意，并通报说，现在尤金正在柏林交接工作，几天后将会返回莫斯科，以便准备前往中国。

张闻天通报说，最近几天，中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并开始同苏联对外贸易部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国粮食作物(大米、小麦等)和植物油的生产出现了困难，中国对苏联粮食的供应量没有增加，并且，看起来这种供应不得不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中国也不能增加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粮食的供应，尽管他们坚持要求中国增加供应。

由于中国的粮食困难(在城市出现了购买大米和面粉的队伍)，中国政府决定垄断粮食贸易，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看起来，今后将实行供应粮食的票证制度。

莫洛托夫说到，如果粮食困难要求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实行票证制度的话，那么，当然必须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利用苏联在这方面丰富的经验，苏联的票证制度实行过好多次了。关于

这个问题应当注意的一个状况是，实行粮食供应的票证制度的目的应当保障的不是对全体居民的供应，而只是保障对特定人员的供应。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应该坚持阶级的态度和原则，而且也要坚持对个别工人阶级阶层有差别供应的原则，也即是说，首先应当保障对比较重要的、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供应，因为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要由他们来完成，其次还必须对家庭成员实行有差别的供应等等。至于农民，苏联从来就不保障对他们的供应。

张闻天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并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利用苏联丰富的经验。

会谈持续了10分钟。

1953年12月3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146-147

№11426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1953年12月8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在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主要的任务是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此，文建平指出，中苏友好协会希望能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以下材料：苏联是怎样搞工业化的？苏联工人阶级在搞工业化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苏联是如何解决工业化期间的粮食困难的？在工业化方面曾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苏联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卡普拉洛夫

1953年12月8日

№23828 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1953年12月16日)

致H.C.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根据您的委托起草的给毛泽东同志的问候函(一式两份)。

И.波斯佩洛夫

1953年12月16日

附件：

给毛泽东的祝贺函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60寿辰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辉煌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了这场斗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和主导力量。

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目前已成为维护和平和民主的巨大力量。中国劳动者所树立的光辉榜样正鼓舞着东方所有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殖民奴役、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建设新生活，殖民地和依附性国家的成千上万劳动者为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压迫、饥饿和贫困而进行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成功地恢复了国家经济，实行了规模宏大的、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和其他一些最重大的革命民主措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坚定不移地提高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道路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自其无限忠诚于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并创造性地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各方面实践。您在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领域所撰写的杰出著作就是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鲜明范例。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您以自己的伟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诚爱戴和深深敬意。

苏联人民从您的身上已深切地认识到，您是一位忠诚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捍卫者，是一位维护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坚定斗士，是维护亚洲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苏联人民祝愿自己的朋友和盟友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健康、强壮、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发送：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В.М.米高扬同志

手写批注：

文件分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12月17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5, л.199-201

№11427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 歌曲(1953年12月17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Г.叶罗费耶夫同志：

东北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找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请求在获得苏联新歌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方面给他们以帮助。剧院在研究苏联音乐方面工作量很大，许多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正在由剧院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

现请求将苏联作曲家的新歌曲集和俄罗斯民歌集寄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处。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В.卡普拉洛夫(签名)

1953年12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10页

№2136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 中宣部的电报(1953年12月17日)

机密

1953年12月18日

第2834/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以及由中国驻苏联使馆于今年12月16日转交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给《真理报》主编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3页(收件人亲启)。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3年12月17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我们已收到你们于今年10月30日所发电报。中共中央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欢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派遣的拉卡萨·路易斯和桑恰·索列达特等同志来中国从事西班牙文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上述同志可以携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并可以让其在北京的苏联中学里上学。中共中央请求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及时通报上述同志启程的具体日期。

中共中央

1953年12月10日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真理报》主编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已收到谢皮洛夫同志关于邀请5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进行为期3—4个星期的访问，以了解苏联报刊工作经验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收到这一邀请表示深深的感谢。鉴于中国许多大型报刊的编辑部都很期望学习苏联报刊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希望该代表团的组成人数不是5人，而是15人，其中具体包括：来自《人民日报》4人，以下报刊分别为1人——《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上海)、《东北日报》、《长江日报》(汉口)、《新华日报》(重庆)和《群众日报》(西安)等，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管理局——1人以及两名翻译。该代表团团长为《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如果《真理报》编辑部接受我们的上述建议，那么我们的代表团将于1954年1月初启程前往莫斯科。关于访问苏联的具体问题将由邓拓同志与《真理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科任同志直接商议。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3年12月12日

归档

手写批注：

И.谢尔巴科夫

1953年12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л.62-65

№23826 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1953年12月24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指示，兹呈递一份新的给毛泽东同志的六十寿辰贺电草稿，以替代我们于12月23日呈送的那份贺电草稿。 [106]

П.波斯佩洛夫(签名)

1953年12月24日

附件：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的六十寿辰到来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谨向您致以自己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以您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和平与民主阵营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反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斗争的严峻岁月，身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您，始终不渝地在为人民服务和为劳动者而斗争的壮丽事业中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您英明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新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学说。您是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友谊的旗手。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祉和繁荣，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13729 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 [\[107\]](#) (1953年12月30日)

这次会谈是在鞍山回北京的火车车厢里进行的。高岗讲到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及党对待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指出，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在党内个别人和一些派别以言论的形式反对党的路线，并且实践中严重曲解党的路线。他援引薄一波的事作为例子，薄一波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对资本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表现为，在处理商业中的私营企业者时像对待工业中的私营企业者一样，给予优惠（不注重征税，反而向他们优先提供原料等）。根本没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超出了党和政府决议规定的范围，薄一波对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初级形式表现出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化在农村都不会有结果，也不会使农村经济生产有所增长。薄一波甚至还谈，农村经济发展的事必须让农民自己去解决等。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放弃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放任自流。

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薄一波在1953年6—8月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薄一波和追随他的小团体中的人的行为，激起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愤怒，毛泽东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薄一波的路线。薄一波因为所犯的错误被撤掉了财政部长的职位。

谈到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高岗说，东北在土地改革时就已经消灭了原来的富农，土地改革结束之后，80%左右的农民家庭成了中农。但农村中在土改时得到土地的农民中间开始产生新富农。这些富农所占的比重还不小——不超过2%。但值得担心的是，当共产党员也成为富农时，这些党员会开始反对党的路线，特别是反对向国家上交和出售粮食，开始进行投机倒把和放高利贷。高岗指出，不过，在东北富农的力量还不小，因为党从1951年开始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组织。现在80%左右的农户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组织，最主要的是劳动互助组。现在一共有5000多个生产合作社了，国家给这些合作社的农民提供贷款、种子和其他援助。

高岗没有详细地描述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只是说那些地方合作社农民的贷款利率明显比东北的低。

谈到城市里的阶级关系时，高岗说，一部分党员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使他很担心。他说，在党内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成分的作用加强，由于混合型企业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和平阵营的成长，中国的资产阶级大概不会再追随美国人，而是有可能追随中国共产党，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的改造。高岗说，他还很不理解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所以他不太自信这种观点是否准确。高岗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and 团体赞成他的观点。

当高岗谈到城市资产阶级时，他引用了1949年同斯大林的谈话，在谈话中斯大林跟他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高岗强调，按他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在农村，因为在中国有4亿农民——小私有者。他指出，但是，现在党内谁也没有提出加紧消灭富农和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问題。

高岗说，资产阶级在某些领域里不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拥有非常好的设备、技术熟练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特别是在轻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中那些设备老、旧并且已经磨损的领域，资产阶级比较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期望，高岗说，有大约80%的私有资本家加入轻工业部门，大约20%加入重工业部门。

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方面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资产阶级顽强地企图把工人、知识分子、党内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拉到自己一边。为此，开始采用多种手段：随意提高私营工厂工人的工资，使之比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收买和贿赂骨干工人；政策上理论上的分化等等。高岗着重指出，虽然资产阶级事实上没有取得成效，但这些破坏活动的危害不能忽视。

高岗指出，中国企业家中间那些被称作“民主党派的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有组织的对抗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力量。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有可能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甚至会进攻苏联。安全机关应该注意监视加入政府机关和其他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的情况。

那些称作“民主派和无党派”的参加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团体与我们还不是统一的整体。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活动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郭沫若、沈雁冰(茅盾)、李四光、史良和其他人。也有一些人，受到比较多的怀疑，如罗隆基、陈济棠和其他人。还有一些是显出了原形的美国和蒋介石的直接代理人，如梁漱溟。

高岗指出，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代表很多，在22个部中的16个部，其中包括农业部、轻工业部等(外交部、社会安全部、财政部、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和其他关键部除外)，其部长或副部长的职位被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占据。不过，在由民主派人士担任部长的所有部的实际工作都由副部长——共产党员来主持，民主派的部长大部分只履行咨询职能。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人民中不享有声望和信任。由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中共中央委员会需要在地方党组织中作专门指示，为了在选举中资产阶级的代表获得支持和通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之中的人谁也无法当选。

在会谈的结尾，交换了参观鞍山联合企业和在沈阳和抚顺的重工业工厂的感受。

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B.瓦西科夫和高岗的翻译李越然。

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B.瓦西科夫(签名)

АВРФ, ф.0100, оп.47, д.7, л.379, л.3-6

№05304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1953年12月31日)

机密

1953年12月31日

第2975/ДВ号

关于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援助数额的情况调查

一、苏联的援助

(一)根据1953年9月19日的苏朝协议，苏联承担了在两年期限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予无偿援助10亿卢布的义务。在这笔款项下，将对恢复和建设17个工业企业和其他设施进行援助(总共3亿以上卢布)以及提供各种商品及工业设备。

(二)苏联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偿还苏联1949年、1951年和1953年债务的比较优惠的条件。上述信贷的全部数额为2.98亿卢布，这笔信贷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1957年1月1日开始在10年期限内用供应商品来抵偿，收取信贷的年利率为1%(按照1949年的贷款协议应收取的年利率为2%)。

(三)苏联政府按照非贸易付款，在1950—1953年的期限内减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债务的50%(到1953年9月1日上述债务为72888500卢布)。余下的一笔债务按照非贸易支付，从1957年1月1日开始在2年内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清偿。

(四)苏联政府同意在头4年内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回专门的信贷，(根据1951年2月28日的协议)这笔贷款在头4年内是应偿清的(1956—1959年)，苏联政府还缩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上述信贷的偿还数额(远东司不知道按照该协议偿还的总额)。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免除了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的偿付。这项援助为72900亿元(14.5亿卢布，比价为5000元对1卢布)。

(二)在4年期限内(1954—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朝鲜提供的援助总额为80000亿元，即16亿卢布(比价为5000元对1卢布)。1954年将援助30000亿元人民币(6亿卢布)。在这笔款项下，将向朝鲜供应粮食、煤、纺织工业用的原料、建筑材料、一些机器、农业工具、捕鱼船及渔具等。

用于1954年的援助费用，除了供应工业及食品货物外，将建设新的铁路(32公里直达线)，恢复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在线路的3个区段上建设和恢复铁路建筑物，供应1000节货车车厢，修理500个货车车厢和

100个客车车厢及修理80辆机车。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1954—1956年)3年期限内自己负担费用，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儿童以及赡养对这些儿童从事教育工作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总共是31338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签订了经济和文化协议之外，1953年11月23日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议，把这些协议同在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类似协议条件相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例如：

(一)根据中朝关于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期间，仅向他们支付其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的工资，包括出差费用及补助费用以及保证中国专家的医疗费和住宿费，支付他们的交通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担任何其他的费用。

根据苏联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如下：

1.用朝鲜币向派遣来朝鲜的苏联专家支付工资，所支付的工资应与相应职务和技术等级的朝鲜专家的工资相同；

2.要向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补偿路费，补偿每人80公斤的行李运输费，补偿相当于专家派出前在苏联所领取的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补偿相当于一个月工资额的每工作一年未享受例假的补助费，对在高等院校工作的专家在朝鲜每工作一年享受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

3.对于每个被派遣的苏联专家，根据技术等级的情况，每月要向苏联支付2000—4000卢布补偿损失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被派往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损失。

(二)根据中朝关于朝鲜专家在中国进行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接受朝鲜的技术工人及技术员时，将保证他们在实习地享受中国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相同技术等级的供给，包括享受国家

的医疗保障。朝鲜的实习生仅支付中国向他们提供住宿的住宿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仅承担朝鲜实习生来中国往返的差旅费。

在苏联实习的朝鲜专家的费用则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供给，每个专家从政府那里领取1000卢布，用来支付他们的住宿费用和差旅费。此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要向苏联政府提供一笔对指导朝鲜专家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补偿费用，数额为工资的10%—20%，指导实习生的人员主要按照其职务领取的工资(平均每个朝鲜实习生每月支付100—150卢布)。目前有400名朝鲜专家在苏联进行实习。

(三)根据关于朝鲜公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技术学校学习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的开支及朝鲜学员在中国境内旅费的开支。至于谈到教学费用及为朝鲜学员提供的住宿费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了这笔费用。

根据苏朝关于朝鲜公民在普通高等院校学习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向苏联补偿花在朝鲜学员的教学和供给的实际费用的50%，其中包括：教学、住宿、助学金及在苏联境内的差旅费。

结论和远东司的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4—1957年的期限内将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大的援助。从中国向朝鲜供给必需品以及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援助进行建设和恢复铁路与桥梁，实质上补充了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恢复和建设工业项目，供应商品及工业设备、农业化肥等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朝鲜援助的规模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以及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一切条件。

有鉴于此，远东司认为，委托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细心地注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合理利用了这种援助，并向苏联政府通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在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以最快速度恢复国民经济和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方面采取了措施，并是合理的。

二、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接受朝鲜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里实习的比较优惠的条件以及派遣中国专家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也提供了优惠的条件，

这些条件不同于类似的苏朝协议的条件，远东司认为，与苏联财政部一起向苏联部长会议草拟一个关于修改有关的苏朝协议的提议是合理的。按照远东司的意见，免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每个被派往朝鲜的苏联专家向苏联政府支付所谓的补偿损失费2000—4000卢布是合理的(据说，似乎因派遣自己的专家去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这笔损失)；不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朝鲜专家在苏联企业进行生产实习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三、远东司认为，修改有关朝鲜公民在苏联普通高等院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及供给条件的苏朝协议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协议的条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说，负担是不重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朝鲜学员的学习及供给向苏联政府所补偿的50%开支，甚至抵补不了苏联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费用。例如，一名朝鲜大学生在1952年苏联教学及供给方面的总开支为11611卢布，一名朝鲜研究生为16976卢布。而朝鲜政府向苏联支付的补偿费，每名大学生为5805卢布50戈比，每名研究生为8488卢布，与此同时，每名朝鲜大学生每年的助学金为6000卢布，每名研究生为10800卢布。

H.费德林

АВПРФ, ф.0102, оп.7, д.47, л.27, л.115-120

1954年 №24883 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展主题计划(1954年 [108])

苏联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目的是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因此展览会上将展出许多的展品、模型、资料照片、艺术镶嵌板、图片、图表，这些展品应当能够表现：1.苏联的工业能力，以及苏联工业用现代生产手段生产各种产品的高度工艺水平。2.苏联在工业领域、日用品和食品方面的取得的成就。3.苏联在发展铁路、公路和水上运输方面取得的成就。4.苏联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农业生产高度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机械广泛的应用并获得较高的粮食生产。5.在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专家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医疗卫生、体育运动、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苏联展览馆建筑物的顶部，在苏联国徽之上放置“СССР”这些巨大的字母。在国徽下放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字句。在入口处

悬挂用俄语和汉语题写的祝词：“苏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在前厅的中央放置“列宁—斯大林”雕塑群。在前厅放置四个深深的弧形龛，它们是宏大的雕塑镶板，其主题应该展示苏联人民的劳动、休息和学习，同时也以“莫斯科——我们祖国的首都”为主题。在镶板上部弧形的涡卷饰上题写如下标语：“苏联是个自由的、各民族权利平等的联盟——И.斯大林”；“苏联公民享有教育权”；“苏联公民享有休息权”。此外，在通往工业展厅的中央的巨大侧墙上题写如下标语：“我们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全球最大多数的人的赞同。——B.列宁”。

在中央展厅以及与其相邻的展厅的隔板展出机械制造、电子设备、测量和其他仪器、金属样品、石油产品、无烟煤、矿石等展品。

在入口处的木墙上，在苏联国徽(直径4米)下方题写如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的特点和要求大体可以以如下形式表述：通过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断增长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И.斯大林”；“重工业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今后增长的基础，现在重工业的生产几乎是战前1940年的3.5倍”，“重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它们是苏联人民的福祉不断增长的源泉”。

在前厅出口左右边的木墙上可以绘制如下光电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73	285

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00	164	近 250

在与木墙正面邻近的侧墙上也可以绘制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37	183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31.5	39.2	约 47

在大厅的中央放置如下大型展品：金属切削机床(旋床、六角车床、单支柱立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设备、工业缝纫机器、印刷设备。此外，在大厅里安置12个展览台，这些展览台展出的展品要表现出苏联主要工业领域的成就。在展览台的中央可以绘制一些图表，图表的底色可以是色彩鲜艳的镶板。

石油工业展览台。在展览台陈设的石油产品的样品(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油等)要有精美的展览包装。该展览台要有石油工厂和石油加工厂的图片。镶板的底色为海上石油工厂，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业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337	410	642

煤炭工业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经过包装的煤炭和无烟煤样品、气压装置等。该展览台的图片要表现出煤炭工业中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工艺生产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的底色做成矿场大门的样子，上面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工业的增长(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570	897	1 192

矿山原料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包装过的铁矿石、锰矿石、铬矿石、石棉和石棉产品。该展览台的图片要表现出矿场和露天开采矿场中对矿山原料开采的机械化。

黑色和有色金属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黑色金属轧块、有色金属轧块和铝轧块以及作为商品形式出售的相关金属，它们都应被放在特别的挡板内。该展览台的图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技术。镶板的

底色是铸铁和轧钢的情形，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353	455	711

苏联钢铁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433	645	977

测量和切削工具、试验机器和仪器(两个展览台)。在这两个展览台展出的机器是用来测试金属的裂痕和老化以及其他特性；测量仪器和机器，成套的测量工具和切削工具等等。展览台的照片要展现一些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机床自动生产线、金属加工工具车间以及其他的机械车间。在展出以工业为主题的照片的同时，中央大厅展览台靠墙的展品也要展出一些工业领域著名人物的照片。上述原则也适用于绝大多数展览台的商品和图片资料。

在大厅的隔板设置电子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工具和电子通讯设备(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射线装置、开关、避雷针、发电站；功率为100千瓦的涡轮发电机、功率为72千瓦的发电机；焊接设备；高频通讯设备；矿场用转换开关和调度转换器、电报设备、自动收费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有线广播装置)展位。

该展位镶板的底色要精美，要配置光电表格，表现出苏联电力生产的增长，并题写如下标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B. 列宁”。

苏联的电力生产(相对于1913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2 482	4 674	766①

①原文如此，该数字显然有误。——编注

在齐姆良斯克电站、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电站、高压变电站、科研试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下面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正在根据第五个五年计划实施宏大的电气化计划。正在建设的和扩建的电站有711个，

在这些电站建成之后，苏联总的发电能力与上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950年相比，将增加75%。”

交通设备展位。展出桥梁模型、水箱模型和悬臂起重机模型；密集的交通线路、铁路运输的信号化、密码自动闭塞、ИC内燃机车模型、等容的车厢模型、载重量为1万吨的油轮模型、江河拖船模型、地铁车厢模型、自动升降机模型以及其他的一些模型。在该展位还可以放置如下展品：伏尔加—顿河运河全景、“五海之港莫斯科”图画、莫斯科地铁线路图以及一些地铁站的照片，图片下题写如下字句：“莫斯科地铁是最为宏大的建筑，它被认为是服务大众需要的最好形式。”在交通设备展位相应的图片镶板上应题写如下字句：“1954年的铁路运输量同1950年相比增长了42%。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铁路运输量的增长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1954年的公路运输量同1953年相比增长了66%”。

在伏尔加—顿河全景图上题写如下字句：“1952年夏，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运河投入使用，该运河把苏联在欧洲部分的所有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黑海都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水上运输系统。”

电视、电报、无线电展位。展出无线电台、无线电装置、真空管试验仪、电视机的调谐仪器，以及如下电报电话设备：基层通信自动电话交换机、各种各样的转换器、电阻测量仪、质量因数计等等。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无线电事业应要求得到发展，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向他们灌输人类社会最高尚的人文主义原则。——M.加里宁”。该展位的照片要展示无线电技术工业企业、电报和电话局一些方面的工作。

光学仪器展位。展出验电器、微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版印刷术设备、工具设备、万能测量仪、放映机、显微镜的聚光镜、摄谱仪、万能光度计、深度测量仪等。展出高校实验室、农业科学实验室中能够展示光学仪器的实际应用的照片等等。

摄影、摄像设备展位。展出各种各样的摄影设备模型、一套各种各样的镜头和滤光镜、固定的有声电影放映设备等等。该展位应题写如下字句：“电影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最为强大的手段。——И.斯大林”。在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拍摄的相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明星以及最为优秀的电影干部的肖像。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位。展出计算器、穿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等，展出各种工艺的手表。

电子气象仪器展位。展出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特制温度计、计程仪、卷扬机、雨量计和气象计、电流计、反照仪、生产进度表和一览表、高空经纬仪、铸铁水位尺、测位计、海水水样采取器、雨量器等等。在水文气象观测站大厅的墙的中央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水文气象工作者在苏联拥有数千个网络站点，他们被配备国产的仪表设备，顺利地的气候、天气和河流、海洋、湖泊、水库的水文气象条件进行研究，并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供广泛的水文气象服务。”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展示气象仪表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

在与前厅相邻的左右两个大厅设置如下展位：林业和造纸工业展位（撑材、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细木工平板、木质纤维雕塑、各种纸张、火柴）。这些展位的照片应展示木材的加工、运输、合成、制材厂、纸浆联合加工厂。还要展出关于苏联森林的图画，并在图画上题上如下字句：“苏联拥有巨大的森林资源，是世界上木材储备最为丰富的国家。”

化学和林产化学展位。该展位应当展示大量的化学制品、阿尼林染料颜料样品、林产化学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该展位的照片应该展示颜料在化学工业的应用以及一些化学企业的生产。

食品工业设备展位。展出乳脂分离器、用于香肠生产的挤注器、马铃薯去皮机、磨坊机床、冷冻器。还要展出奶制品和肉食企业、磨坊生产以及其他的饮食企业的照片以及公共食堂、企业餐厅的照片以及现代技术装备的照片。

日用工业品生产展位。该展位的大部分展品应放置在位于展厅中央的隔板上。在这些隔板展出布匹（棉布、毛布和丝绸）、成衣、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子、毛皮制品。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47—1954年，苏联共7次降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由此食品和工业品总的价格水平还不及原来的一半。”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当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示他们物质福利的增长，展示一些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一些贸易企业等等。在照片之间题写如下字句：“同1954年相比，苏联国营和合作社零售贸易额增

加了80%。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零售贸易额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部分日用品展品应在展览厅右侧的第一层内展出。在这些地方展出的展品可以是家具、日用家具、住宅装饰品。

家具展位。该展位展出四组家具——餐厅家具、饭店家具、卧室家具、教授或者科研人员完全装修过的办公室内的家具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大学生宿舍内的家具。展出的照片应反映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休息和家庭生活等等。在住宅照片、关于新住宅内外情形的照片上题写如下字句：“战后数年，在苏联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建造了21500万平方米的住宅，在农村地区为集体农庄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建造了447万套房屋。”

家用电器展位。展出电冰箱、电烙铁、电茶壶、咖啡壶、除尘器、电风扇、电动地板打蜡机、电力剪毛机、反射炉、厨用电炉等等。展出的照片应展示苏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电器的使用以及这些电器的生产。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位。展出“世界”牌收音机、“波罗的海”派收音机、“祖国”牌收音机、“莫斯科人”牌收音机、“图拉”牌收音机、“里加-6”型收音机和“里加-10”型收音机、“白俄罗斯”牌收音机、“头牌”收音电唱两用机、“乌拉尔-52”型收音电唱两用机、“卡马”收音电唱两用机、T-2型电视机等。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苏联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使用。

乐器展位。展出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弓弦乐器、拨弦乐器。展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键钮式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和一组民族乐器。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集中表现唱诗班的合唱表演、交响音乐家的表演以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和参与国际竞赛者的表演，表现歌舞演唱、戏剧和芭蕾舞表演和艺术活动，展出演员和艺术家的肖像。

手工艺品、玩具、地毯和地毯制品、家什和水晶玻璃展。展出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纸质做成的手工艺品、密缝刺绣品和钩花制品、赛璐铬制玩具和橡胶玩具、塑料制品、手工制作的地毯和机器制作的地毯。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在狩猎中使用的手工艺品的生产，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

卫生保健品展位。该展位设在中央展出大厅右侧的隔板上。在该展位展出的是手术台、麻醉设备、静脉注射设备、照射灯、水疗所、理疗设备等，展出医疗设备和药物以及以妇幼护理为题材的三组相册，要展示苏联的疗养事业和医疗教育，要有一些传单、招贴画、幻灯片等等。要题写如下字句和图表：“全体苏联居民都享受免费的医疗帮助”，“苏联人民的福利在增长、国家一直注重加强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关心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这使苏联国内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苏联的人口平均每年都增长300多万人”，“苏联现在有350多个疗养地，有2500多个疗养院，建造了大量的疗养网络。向劳动人民发放的疗养证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根据优惠的价格”，“同1953年相比，疗养站和疗养所的数量几乎增加了8000个”，“同1953年相比，药品、医疗设备和医疗工具的生产增长了19%”。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房的增加(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25	150

五年计划中就增加病房的数量提出的任务在四年内提前完成了。

苏联医生数量的增长(相对于1940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75	219

苏联在医疗保健和体育文化事业上的国家预算开支(亿卢布)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90, 35	213, 96	304, 85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的医院、门诊部、疗养院和疗养所，展示儿科咨询所、保育院、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要有一些照片展现东方各加盟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这些照片中要题写如下字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整个医疗机构网络和防疫机构网络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建立起来的。”

体育用品展位。在该展位展出溜冰的冰刀、滑雪板、各种各样的球、运动鞋、哑铃、杠铃、曲棍等。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苏联的体

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健康的手段，是人们争取长寿的积极因素”，“在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苏联运动员获得了38枚金牌、56枚银牌和18枚铜牌，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和12项苏联纪录”。展出的照片要表现各种体育运动，展出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体育比赛中获胜的体育冠军的肖像。

出版物展位。展出政治、经济、科技和艺术著作，展出用俄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艺术作品、国外古典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展出一些艺术复制品、乐谱、招贴画、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该展位设在展览大楼的右侧，被分为两大部分：马克思列宁著作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关于个别科学领域的研究专著；文艺作品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儿童文学。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和题写的字句要表现出苏联各民族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展览台上展出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作品，在这些展品上悬挂一些石印版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犹如钢铁般的团结，它同人民紧密联系，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它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出版物展位的入口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政权时期，全国出版了170亿册图书，其中包括10亿多册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著作”，“1954年，苏联共发行了大约10亿册书籍，超过革命前的俄国出版的书籍”，“苏联政府通过决议，打算在1954—1960年使出版业的能力增加2.5倍，使彩印出版业增长将近3倍”。

在文艺作品展览台的上方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文学和艺术在同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的同时，以新的先进的东西塑造人们的思想，帮助党和国家向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情感”，“苏联的文学作品用苏联70多种民族语言出版，其中的19种语言是在十月革命之前没有自己的书面形式的”。在照片之间题写如下字句：“1954年苏联大约有39万所各类图书馆，拥有的图书数量为12亿册。”

职业教育展位。展出步行式挖土机模型、煤矿联合加工厂模型以及其他的机器，展出技工学校学生和工厂学校学生制作的艺术品，展出中学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该展位位于同出版物展位相邻的一个大厅里。展出的大量照片的主题应该是表现对青年职工的培养，反映技校和工厂学校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从事的体育运动、业余艺术活动等。

“高校为国家培养劳动力后备军，从1946—1954年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输送了470多万年轻的专业工人”，“在苏联，作为劳动力储备的学生得到国家的充分保障：免费提供职业培训，免费提供饮食、被褥、鞋子、宿舍、教科书和直观参考书”。

在“中学”展位、“职业教育”展位、“高校”展位和“技术学校”展位每个展位的连接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接受各类教育的学员的人数在1953年达到5700万人，与1940年相比几乎增加了800多万人。”

高校展位。高校展位位于展览大楼右侧的一个方形大厅内。大厅的中央是国立莫斯科大学主楼模型，该模型高2.5米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主要建设计划。在展览大厅中央正面的墙壁上安装展现苏联高校的电动图片装置，关于高校数量的增长及其大学生和教授数量的增长等方面的一些词句交替出现。在展示图片的同时要配上口述录音机，播出的内容是关于苏联高校以及科研工作总的情况。在图片上题写如下词句：“苏联为青年一代掌握知识、为天才和有能力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1954年在苏联高校(包括函授)有173.2万名大学生，比1953年多出17万人”。

在正面墙壁各高校图片的两侧放置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展览台，以这两个苏联最大的高校为例子展示苏联的科技培养体系。在大厅正墙附设两个不大的展览台，展出苏联另一些较大的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该展厅的其他展位展出一些照片，展现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性质和方法，展现苏联高校和技术学校的科学和艺术。除了展示一些关于教学过程(课堂、讨论课和实验课、实践课等等)的某些方面的图片之外，在展览台还要展出一些关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休息和进行体育运动的图片。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大学生的学习要占据特别的地位。除了在高校展厅中展出图片、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之外，还要在展览台上悬挂俄国科学巨匠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的椭圆形肖像以及俄国科学的奠基者M.B. 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像，半身像应在各高校图片的下方，放在支架上，并且应被着色。

农业和农产品展位。该展位展出的是：粮食和粮食产品、种子和一

捆一捆的各类谷物、搜集到的各类农作物、几株棉花、各种籽棉、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纤维、蚕茧和各类桑树植物叶子的标本、毛皮样品、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模型。该展位设在展览馆的六个大厅内。还要展出一些资料照片、图片、数据和实物展品，展示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国营农场取得的成就，表现党和政府就迅速提高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而提出的任务。

该展位由如下部分组成：前厅展位、粮食展、畜牧产品展、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蔬菜作物展、水果葡萄展、粮食产品展。

前厅展位。用文字、数据、图表、图片和照片阐释集体农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展示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生产先进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以具体的事例展示拖拉机工作站动力装备的增长，展示集体农庄生产中综合机械化的推广以及拖拉机工作站在今后增加粮食、土豆、蔬菜、经济作物生产以及增加畜牧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应分出特别的展览台来展示苏联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工作。在该展厅中应特别展出一些材料，来解释苏联共产党就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制定的纲领。在大厅的中央设置一大束用丙烯酸盐制作的金黄色小麦实物样品。

“粮食作物”大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反映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为今后扩大粮食这一主要的农业领域的生产制定的政策。要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些具体实例展现苏联在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以及在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强调苏共中央1月全体会议决议中提出的任务：在最近五到六年的时间内使粮食总产量达到每年100亿普特。展示正在推行的关于扩大玉米这一最为重要的储备粮食的播种面积而开展的工作，以便增加粮食的总产量和扩大饲料的产量。到1960年，玉米的播种面积应该增加到2800万公顷。要强调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急剧减少农作物损失的任务。在大厅中展出的产品要表现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是丰富的。

畜牧产品展厅。以一些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例子，展示社会主义畜牧业取得的成就，牲畜的数量得到了提高，牛、猪、羊、家禽的产量都得到了提高，在每百公顷土地上这些牲畜的产量都很高。要强调如下一项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使肉食和沙拉(各类)、牛奶的生产在1960年的时候为1954年的2倍，鸡蛋的生产为1954年的2.2倍，毛皮(各类)的生产为1954年的1.8倍。在一些展览台上展出关于为发展畜牧

业组建饲料基地的材料。

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该表现苏联在主要的经济作物和油作物——棉花、亚麻、大麻、洋麻、黄麻、青麻、甜菜、向日葵的生产上取得的成就，表现苏联在发展茶叶和丝织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蔬菜、水果和葡萄展厅。以一些具体的农作物为实例，展示采用的一些先进的栽培土豆和蔬菜(正方形穴播和栽培、使用草炭腐殖质的瓦盆)的方法，展示得到较高的产量，展示大面积播种和栽培这些作物的措施以及发展大棚蔬菜的方法。要详细地说明在发展水果和蔬菜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使用米丘林方法顺利取得较高的产量，要展示一些较为珍贵的葡萄、梨品种以及其他珍贵的水果品种。

粮食产品展厅。该展厅同农业原料展位相邻。展厅展出一些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展出一些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酱、鱼、植物油、果汁、干果、果酱、糖果点心、糖果、维生素、浓缩食品、海产品、伏特加酒、茶叶、烟草和香烟。

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以米高扬的名字命名的肉食品联合加工厂的车间，展示肉产品联合加工厂、糖果点心工厂明亮而宽敞的车间，展示浓缩食品的生产以及茶叶、葡萄、烟草种植园烟叶的采摘等。

该展位要题写如下字句：“同1950年相比，1955年苏联的食品产量将增长84.7%”，在香肠和肉食品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将生产大约300万吨的肉和肉制品，是1950年的2.4倍。”在鱼产品的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的渔业捕捞将增加到3600万公担，是1950年的2.1倍。”在罐头食品展览台题写如下字句：“1956年苏联罐头食品的生产将增加到415万罐，是1950年的2.9倍多。”在糖果点心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55年苏联糖果点心的生产将增加到1825吨，几乎是1950年的2倍。”

造型艺术展厅。该展厅重点突出的标语是：“艺术属于人民，它需要根植到广大劳动群众中，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和喜爱，必须能够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提高，同时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使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B.列宁”。在该展厅应展出苏联彩色写生画大师、线条画大师以及雕塑大师最为优秀的作

品。

建议：括号中标出的一些引用的数据来源，不要在展厅中出现。

РГАЭ, ф.635, оп.1, д.298, л.1-21

№13014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1954年1月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4年1月4日

今天在杭州毛泽东的休假地，我向毛泽东宣读了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判决。在场的还有苏方翻译B.B.瓦西科夫(大使馆官员)和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对判决书中的如下部分提出了一些问题：贝利亚在内战中的变节行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和战争中的变节行为以及在斯大林死后的变节行为。毛泽东对关于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机构的关系也表现出兴趣。毛泽东对贝利亚破坏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表现出强烈愤慨。

在宣读了判决书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对贝利亚的揭露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揭露贝利亚一事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激。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提到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没有蔓延，但是由于这些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因而不对其引起重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某些人试图使政治局中的一部分委员反对另一部分委员。有些人企图把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或者错误公式化，以此来

玷辱这些同志的名誉。毛泽东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时刻把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牢记心头，因为这是完成我党面临的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在草拟一份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特别文件，它不会公开发表。这一文件将在两或三周内完成。毛泽东说这份文件完成后，他将通知我，让我知道其内容。

接下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准备了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份文件。毛允诺将告知我这一文件的内容。

在讨论中，毛表示了将贝利亚事件的判决通报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愿望。毛承诺他将以适当的方式将此事通知刘少奇。

当提及判决书中贝利亚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变节行为时，毛让我注意，在北京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后，中共获得的档案文件显示，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著名叛徒)早在1920年就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收买了。毛还让我注意，1930年王明在上海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王)在当时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共产党活跃分子，但竟能设法出狱。同时，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谈话进行了大约4小时，大使馆官员B.B.瓦西科夫和毛的私人翻译师哲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79, д.7, л.41-43

№21367-1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 设常驻通讯员(1954年1月14日以前)

致H.C.赫鲁晓夫同志：

如今，正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能够在莫斯科设立自己的通讯员。截至目前，《人民日报》通讯员职责由中国《新华》电讯社驻莫斯科代表兼任。

请允许我们在下次与邓拓同志的会谈中向其明确地传达如下信息，

如果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外交部发出希望在莫斯科设立《人民日报》常驻通讯员的请求，那么该请求一定会得到无条件的满足。

Д.谢皮洛夫(签名)

手写批注：

已转告，赫鲁晓夫同志同意。1954年1月14日

谢皮洛夫同志已将答复交给邓拓同志。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2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5, л.5

№21367 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1954年1月21日)

机密

1954年1月21日

第161-с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应В.И.戈尔什科夫同志的请求，兹发出苏联外交部就建立苏中友好协会问题所提交的草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该草案能得到补充和修改。

附草案内容共计4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A.杰尼索夫(签名)

附件：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М.马林科夫同志

Н.С.赫鲁晓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通过广泛采取一系列举措，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中国普及开来。而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将更有利于在中国完成这一任务。目前，该协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组织，并在中国各城市、工业企业、机关和农业地区建有大量分支机构。其拥有自己的文化—教育设施、定期出版物、可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流动放映设备。该协会在开展活动以来的4年间，共出版书籍和小册子近1000万份，举办了约3万次图片展以及9万场关于苏联情况的报告会和讲座。

在苏联国内也有一些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从事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文化合作关系的组织——苏联文化部、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苏联音乐家协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以来的4年间，该组织采取了大量措施以促进和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文化合作，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该协会在落实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任务的水平上仍显得落后。其中问题主要在于，在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承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从而无法对其他社会组织在保持和发展苏中文化合作方面所进行的活动进行整合与协调。

目前，负责与中苏友好协会进行日常事务接触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是，后者同时还承担着扩展和加强苏联和所有外国的文化合作工作，因而我们还没有一个核心组织能够对所有苏联组织在巩固苏中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方面的活动进行整体协调。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更加广泛地发展苏中文化关系和进一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生活情况，以及我们系统地帮助中苏友好协会了解苏联人民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够的，不能满足我们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要求。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苏联外交部认为应当建立独立的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组织。该协会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通过组织展览会、讲座、音乐会、中国艺术联欢会、中国文学和音乐晚会、发行中苏友好协会的出版物和出版自己的杂志等方式，系统地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成就。

2.帮助中苏友好协会在中国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帮助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别活动家，以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编撰与苏联和中国有关的科学著作、普及性刊物、艺术著作以及苏联和中国的戏剧。

3.促进和发展苏联和中国学者、专家之间的科技合作。

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一样，中国与苏联之间也没有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因此，类似这样的合作只能通过科技经验的交流来加以促进。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应当有来自如下苏联社会、文化、科学组织和单位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苏联科学院、苏联对外关系协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协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作家协会等。同时，该理事会也是完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必要

的机构。

为了长期保持与中苏友好协会的联系，全苏苏中友好协会有必要在北京相应设立自己的特派机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该协会应当在莫斯科拥有带有会议厅的建筑物，以召集会议、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协会也应在各共和国首都、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应当由著名苏联国务和社会活动家来担任，因为在中国中苏友好协会的主席为刘少奇，副主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

为了集中精力领导协会的日常工作，凡在该协会担任副主席职务的科技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应当同时被解除在其他方面所担任的职务。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请见附件。

请审批。

苏联外交部

附件：

机密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

一、为了更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兹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二、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如下：

1.系统性地使苏联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2.帮助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促进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相互交流经验和互相帮助，并对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方面情况加以研究。

三、批准____同志为全苏苏中友好协会主席。

四、责成以____(为首)、И.Г.博利沙科夫、А.И.杰尼索夫、В.В.库兹涅佐夫、А.В.科罗博夫和М.А.亚斯诺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1个月期限内就以下情况起草相关提案：关于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结构、人员数量和财政预算；关于该协会管理机关的构成，协会章程草案，应向协会提供那些必要的建筑物以安置协会各机关和成立苏中友谊宫以及建立协会相关的其他物质—经济措施。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外交部对这个问题已经准备了新的建议。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4月12日

[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7] 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苏联人民认为，朝鲜的冲突是能够解决的，“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编注

[8] 原文如此。金日成到达北京，并与毛泽东商定停战谈判的时间是6月初。——编注

[9] 此处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10]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显然是乔冠华，但乔在国内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编注

[11] 9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编注

[12] 据195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前来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已在今日到达北京”，“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索洛维约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团员：雅科夫列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奥巴林，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政治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尤努索夫，乌兹别克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塔什干国立中亚细亚大学教授。卡巴列夫斯基，作曲家，俄罗斯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特洛菲缅科，苏联文化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佐捷拉娃(女)，乔治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玛里宁娜(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关于代表团在中国的观感，参见以下№20003文件。——编注

[13] 以下这篇短文是俄国学者公布奥巴林日记时所写，发表于《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年第4期。——编注

[14] 参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А. И. Опарина на секц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КС 29 октября 1951г,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науч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Китая(АРАН, ф.1719, оп.1, д.437)。——原注

[15] 这是指尤努索夫·萨比尔·尤努索维奇(1909—1995),有机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52)、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9)。出版了多部中亚生物碱化学方面的著作。——原注

[16] П.А.玛里宁娜,集体农庄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原注

[17] 卡巴列夫斯基·德米特里·波利索维奇(1904—1987),音乐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1953)、斯大林奖金(1946、1949、1951)和苏联国家奖金(1980)获得者。——原注

[18] 指苏联科学院В.Л.科马罗夫植物学院。1931年始建于列宁格勒。其历史可追溯到1914年建立的阿博列卡尔斯基养殖园。——原注

[1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0]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2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2]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23] 原文如此,似应为1951年。

[24] 附件未发表。——原注

[2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26] Г.А.洛博夫,接替别洛夫继任苏联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编注

[27]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编注

[28] 见以下№00525文件。——编注

[29] 参见以下文件№05295 1。——编注

[30] 原文如此。经查沈越时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编注

[31]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3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33]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34]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36]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37] 见以下№00532文件。——编注

[38] 这里指的是小组委员会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团会议达成协议的日期是11月27日。——编注

[39] 原文表述有误，实际上第3项议程谈判是1951年11月27日开始，1952年5月2日达成协议。——编注

[40] 潘友新，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52—1953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41]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但根据内容可以判断电报是打给葛罗米柯的。——编注

[42] 见以下№12433文件。——编注

[43]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44] 从内容上看，在此电与4月9日电(№00541文件)之间应该还有一封电报，但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电。——编注

[4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46] 见以下№11600文件。——编注

[47] 李京文，时任中国文化部电影业中央管理局局长。——原注

[48] 原文如此。应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编注

[49] 见以下№20172文件。——编注

[50] 该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中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中方于7月3日和6日提出双方均应遣返全部或绝大部分战俘，但对方于7月13日提出了83000人的遣返数字，其中朝鲜人民军76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中国志愿军仅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我方亦对扩大战争有所准备。——编注

[51] 斯大林这封电报应是17日写的，因为：(1)金日成的信虽然是16日写的，但平壤的报告则是17日发出的(参见文件№00548)；(2)斯大林该电报的档案原件最后注有“7月17日确认”的字样。——编注

[52] 关于将海军歼击航空团并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建议于1952年7月22日由H.T.库兹涅佐夫递交给了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7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H.A.布尔加宁、B.Д.索科洛夫斯基、H.T.库兹涅佐夫和П.Ф.日加列夫研究该问题。——原注

[53] 原文如此。——编注

[54] 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已在莫斯科)、粟裕均是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代表团于8月17日抵达莫斯科。——编注

[55] 集宁旧称，1951年设平地泉镇，1956年改设集宁市。——编注

[56]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57]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58]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59]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60] 该文件尚未公布。——原注

[61] 斯大林表示同意后，商定于8月28日派飞机到北京。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一行于9月1日抵达莫斯科，并于3日与斯大林、周恩来共同讨论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问题。——编注

[6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3]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4]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5] 原文如此，似是20%。——编注

[66]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7]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68] 谢苗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编注

[69] 这里省略了关于对驻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苏联总军事顾问的个人鉴定。
——原注

[70]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韩国。——编注

[71]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72] 查不到这个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此处为音译，大概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名称。——编注

[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决定重新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而莫洛托夫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策划停止朝鲜战争。这个报告就是为他的计划准备的。——编注

[74] 皮尔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后任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编注

[75] 草案第60条规定：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编注

[76] 原文如此，而本文件前引文为90天。——编注

[77]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清单。——编注

[78] 周恩来已于3月8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编注

[79] 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编注

[80] 维诺库罗夫，时任驻华使馆助理武官。——编注

[81]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编注

[82] 帕夫洛夫斯基，时任驻志愿军总部顾问。——编注

[83]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估计为4月。——编注

[84] 俄国在公布该档案时，均未公布附件。——编注

[85] 此处俄文原文系ЗавсекторомОтделаЦККПСС，直译为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处(局)长。在俄国档案文件中凡涉及И.谢尔巴科夫的职务，用的都是这个词。经查，在俄国词典中对谢尔巴科夫的介绍只是说他在苏共中央工作，从未谈到具体部门。从俄国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谢尔巴科夫是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而在中国的有关文献中，则称其为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为了使读者明了其身份，故有此译法。下同。——编注

[86] 原文如此。——译注

[87]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88] 大桶为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40维德罗，相当于480升。——译注

[89] 维德罗，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12.3升或1/40大桶。——译注

[90] 在这段话的旁边有一句中文手写文字：“村长管区，为一分田区。”看起来情况是这样，俄文译者在翻译时看不清这段话的中文，译后由中方补充了这句中文。

——编注

[91] 档案原件此处空一行。——编注

[92]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93] 原文ЧжанПолюнь，显然是拼写有误。——编注

[94] 原文如此。——编注

[95] 德钦努，即后来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努。——编注

[96] 原文如此。——编注

[97]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98] 苏军总参谋长于1953年7月25日发布了命令：同意派遣。——原注

[99]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100]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信件。——编注

[101] 维诺格拉多夫，时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编注

[102] 克拉乌金，按照俄文音译，西班牙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具体职务不详。
——编注

[10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04] 哈里·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105] 参见以上№21358文件。——编注

[106] 在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12月23日贺电草稿。——编注

[107] 该文件系在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编注

[108]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标注的文件时间即如此。——编注

第五卷(1954.2—1955.7)

1954年

№13405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记录：通报高岗— 饶漱石事件(1954年2月2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第143号

今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邀请我就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决议(草案)》进行会谈。刘少奇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昨天已将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转交给我。在这次会谈中，他和其他同志想让我了解迫切准备这样的文件和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事实和原因。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共内部暴露出派别活动，这些活动在较大范围内涉及相应的党的高层工作者。这些派别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就是高岗，然后就是饶漱石(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将对上述人员的宗派活动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刘少奇同时强调，在全会上将不具体指出参与宗派活动人士的姓名，在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中也将同样不提及具体的姓氏。全会的过程将反映出高岗、饶漱石以及与其有联系人士是如何表现的，相应决议的性质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为此，刘少奇说，所涉及的问题由周恩来做更详细、具体的介绍。

周恩来的谈话则由高岗的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对抗中共中央的性质开始。周恩来说，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党是领导军队的力量，应当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组织。而高岗对此认识恰好相反。他在党的高层工作者中广泛散布，似乎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党取决于军队的观

点。高岗就是如此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紧要关头与失败。高岗按自己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党在困难时期的发展历史。高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党的观点不同。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党首先诞生在城市，然后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和在农村的影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城市中许多党的干部遭到残杀，大批党员前往农村，在那里积蓄力量并建立有争议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仍在继续。李立三、王明所执行的错误冒险主义路线使当时党在城市中的地下工作遭受了巨大损失。完全可以说，国民党人当时屠杀了中共在城市中几乎99%的党员。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以及在农村的工作。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斗争的30年代，在陕西 [1] 省建立了大量的“苏区”。以王明(毛泽东同志当时不是党的领导成员)为代表的党的错误领导路线造成“苏区”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移师陕北。长征期间的1935年，在江西 [2]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后，党中央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党内因王明等人活动结果造成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党经历了由张国焘叛徒分裂带来的困难。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战胜了这些困难。

高岗当时在陕北领导着游击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共领导机关也将那里作为根据地，因此在当地建立了最大的解放区。周恩来没有把谈话内容停留在详细介绍这个区的历史上，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以这个区为基地，开始了全面的解放战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强调，高岗不能正确、并错误地认识在革命进程中的自我以及中共的历史。例如，他把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内的正统部分，在解放区内的党的军事组织；另一部分是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犯过各种错误和遭受敌人迫害过的同志。高岗实际上认为似乎存在两个党，而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当时来自解放区军队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清楚，党既不属于高岗的，也不属于王明的，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的。我们没有两个党，而是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存在期间统一的党。党在个别时期内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无论是在地下工作中，还是在解放区的工作中，都遇到了失败和挫折，特别是在叛徒或有偏差的人在党内执政时期。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党的状况朝好的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军队在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自己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武装革命同武装反革命斗争中，尤其

在中国，军队是强大的力量。正因如此，如果军队脱离了党的监督，将会非常危险。毛泽东对此从来都是极为关注的。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众所周知，高岗负责了陕北地区的游击运动，红军主力和党的领导机构在1935年移师那里作为根据地。但高岗试图认为，如果没有他领导的游击区存在，那么党和红军也就没有开展革命的落脚点，革命也就会因此而丧失。在1942—1943年党“整风运动”期间，无论是对解放区，还是对国统区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全面批评。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对党在解放区、敌占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再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此已进行了检讨。七大后，许多新人被推荐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在七大后，高岗违背党的纪律，继续暗地散布党分为两部分的观点，竭力把由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中曾遭到的失败和所犯错误的责任归咎到刘少奇身上。

2.因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竭力煽动对刘少奇臆造的错误，而且这一切不是公开的，是在暗地中。他不愿意同刘少奇见面，进行坦诚的交流，不把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向中共中央提出，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暗地散布对刘少奇的各种臆测和污蔑。高岗的这些行为对党的团结与统一事业带来了危害。为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高岗企图利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在自己周围结成联盟和派系。例如，他企图利用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东北期间犯过严重错误的彭真(政治局委员)、前财经部长薄一波和其他同志。周恩来强调，高岗自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特别是1953年，更变本加厉地散布对刘少奇的污蔑。高岗不仅对刘少奇本人进行污蔑，而且还污蔑其他同志，极力在工作人员之间制造矛盾，搬弄是非。高岗的这些反党活动是为达到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功名主义目的。

3.高岗在党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其中在华北的工作中曾有过不少功绩。中央领导器重并信任了他，但高岗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领导对其良好的态度，为追求个人的功名目的，抬高自己的地位。为突出自己，高岗千方百计地夸大别的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企图利用高层中一些人具有骄傲情绪和功名主义思想情况，而这些人则陷入了高岗的诡计。例如，他向一些人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强调，应当指出，高岗企图劝说的许多人对此曾给予了回击，最终的结果使高岗自己暴露了出来。

谈到高岗如此积极反对刘少奇的原因问题，周恩来强调，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在党内占有更高的位置。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如果得以打倒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就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周恩来说，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显然，刘少奇将会被选举为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现在暴露出来，给党的团结和统一带来了巨大损害。周恩来继续通告，毛泽东准备在12月份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7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当时还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人都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

周恩来强调，作为政府的副主席，高岗认为，这对他来讲还太少。他竭力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然后成为国家元首。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去年夏天召开的财经会议期间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同高岗一起工作的陈云对其宗派活动从前就有所知晓。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曾有广泛表现，但关于他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这一情况，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谈到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周恩来说，饶漱石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他同高岗一样有功名主义倾向，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但与高岗有所不同的是，他做得更隐蔽。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高岗联系，并加入了高岗的宗派集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与该部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对立，指责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副职(安子文)，强加许多臆造的错误并百般加以夸大，是在犯政治错误。尽管刘少奇在政治局中负责组织工作，饶漱石从不向刘少奇汇报任何问题，对其不予理睬，采取躲避中央的做法。特别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1953年9月)，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得以积极地施展。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看法同中央的观点对立，而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导致了会议

气氛的不健康。为改变局面，毛泽东召见饶漱石参加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对其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此后，饶漱石在会议上继续从事宗派活动。周恩来谈到，饶漱石是仅次于高岗的人物。

涉及目前的情况，周恩来说，中央正在对与高岗有联系的人做工作，大部分人开始理解高岗反党活动的危害性，但少部分人至今对高岗反党活动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认识不足。不能不认为，部分同志相信了高岗散布的谣言，以为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因此信以为真。周恩来深信，大部分党的领导工作者认清了高岗的错误路线，少部分受高岗蒙蔽的人迟早会明白，他们受到高岗的欺骗。在追随高岗的人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思想上蜕化和在理论上不成熟的人。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认清高岗反党活动的真相后，最终会反对高岗。谈到高岗、饶漱石宗派活动产生的根源，周恩来指出，在取得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落到了实际工作上，结果削弱了党对许多问题的警惕性，忽略了党内功名主义与追求个人利益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周恩来说，高岗、饶漱石以及其他人的宗派活动，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周恩来通告，全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周恩来说，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地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1951年去世)去的地方。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他同高岗谈话，目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做任何组织结论。周恩来说，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警惕性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中共中央如此严肃地提出高岗的宗派活动问题。

在刘少奇提出，我是否认为有必要就今天通告的信息同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目前没有看到在此问题上的必要性。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周恩来请求将这绝对保密的信息通报给苏共中央。

谈话进行了3个半小时，出席的有朱德、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B.B.瓦西科夫。谈话是由B.B.瓦西科夫担任翻译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79, д.7, л.23-25

№13406 尤金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情况(1954年2月13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第144号

今天，受莫斯科的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我向他们通告，苏共中央对中国同志通报给他们的，有关中共中央就党的团结与统一特别全会的信息表示感谢。刘少奇、周恩来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在回答刘少奇提出的询问时，我向他和周恩来通报了苏共中央对行将到来的斯大林逝世周年所做出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感谢向他们通报此信息，并表示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中央的决定，纪念斯大林逝世1周年。

根据捷沃相 [3] 返回莫斯科前与刘少奇的谈话内容，我通告道，苏联政府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加快对鞍山钢铁公司1150初轧钢机设备的提供；扩大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生产能力。刘少奇、周恩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非常感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请求给予的满足。

后来，刘少奇、周恩来主动向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全会的结果。全会自2月4—9日 [4] 召开了4天，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委员出席了会议。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党的高层工作人员，除9人缺席外，其余52人参加了全会。刘少奇表示，将稍后转交给我报告的内容和决议的最终文本。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全会上做了报告。在讨论后，赞同对拟定决议草案做部分修改，但与会人员对提交的决议草案未提出任何其他重要的修改意见。如同计划的一样，全会没有指出具体姓名，主要是在全会召开前已向许多中央委员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事实，而对其他人是在全会工作过程中通报的。在发言中，有充分根据和原则性地批判了具体的现象，而且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清楚说的是什么，谈的是谁。许多同志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在高岗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自我批评的成分，但很不够彻底。较之高岗，饶漱石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全会结束后，一批中央委员继续同高岗、饶漱石进行谈话，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从原则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至于高岗，直到现在仍然威胁说他准备自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准备好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老百姓。一部分同志指出了高岗执迷不悟，继续从事严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作为对刘少奇的谈话的补充，周恩来强调，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两人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近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但他们企图恶意攻击的这些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而高岗、饶漱石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从整体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没有诚意。

在详细谈到饶漱石的行为时，周恩来说，饶漱石的工作范围一直比高岗小，只限于华东(上海)。现在，当提出饶漱石宗派活动问题时，所有与其在华东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公开斥责他在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宗派活动。考虑到这些，不怀疑他最终将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与高岗不同，饶漱石的问题将会在不久得以解决。话题转到高岗的行为上，周恩来说，就高岗的工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最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中间享有威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

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生命。饶漱石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慌失措。高岗则是另外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迹象。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承认计划打倒刘少奇，并以此为目的，在党的成员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他的位置。高岗承认自己有功名主义倾向，但从整体上说，他不是钻营家。高岗在谈话中表示，按照你们的看法，我是贝利亚，还是张国焘？高岗承认自己存在个人主义成分，但他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

周恩来说，目前正组织一批负责同志一起给高岗保留在他们面前承认错误的机会，这能使高岗在未来停止其在个别人中间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秘密活动。周恩来指出，所有接触过高岗和了解他的人在全会上都拥护中央的路线，只有少数不完全了解高岗宗派活动的与会人员对他的罪行程度有所怀疑。周恩来说，同高岗解决问题要比饶漱石困难、复杂得多。他要么以自杀相要挟，要么散布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和要逮捕他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自己的反党宗派斗争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在他们面前，党不会停止对那些人的逮捕，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功绩。周恩来说，尽管高岗有错误行为，中央在审查他的问题上严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一切犯过错误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应当采取“治病救人”而不是排斥的办法。

谈话进行1个多小时，使馆参赞B.B.瓦西科夫和师哲出席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47, п.379, д.7, л.36-40

№25967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英美法在南中国海进行 联合军事演习(1954年2月21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4年2月21日

关于英美法海空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军事演习的报告

(简报)

从国外报纸获悉，1954年2月14日，在苏联、美国、法国外交部长柏林会议结束之际，英美法驻远东海空军在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南中国海域开始举行第一次大型海空军联合演习，演习代号使用了音乐术语“奏鸣曲”，演习的目的旨在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演习的准备

必须指出，演习的准备工作高度保密，在这一过程中，香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54年1月，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著名军事活动家迅速抵达香港就令人怀疑，从香港报纸获悉：从1月14日起，在10—14天有如下人员访问了香港：

- 1.美国驻檀香山第14海防分队海军少将弗兰克·坎农。
- 2.英军总参谋部副司令达德里·沃德中将。
- 3.法军总参谋部司令克列门特·布兰克大将(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 4.美国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有5名总参谋部军官随行)。

同时，英国驻远东海军司令、海军中将查尔斯·拉姆在香港逗留，1月20日去了澳门。

还要指出的是，12月2日，美国海军部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和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托马斯也来到香港。

自然，如此数量的三国著名军事活动家齐聚香港的目的绝非他们在报纸上宣称的“两天休假”或“官方会晤”。

显然，游戏的幕后动机是准备军事演习。如果考虑到上述军事代表

在会晤期间，参与演习的英国海军的领导人查尔斯·拉姆来到了香港(拉姆的司令部在新加坡)，这就更显而易见了。

1954年2月2日，利用军区俱乐部招待会的有利时机，我询问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是否知道上述高级军事代表会晤的目的。在我们看来，邱会作的表现，要么是对此全然不知，要么是在谈其他的情况。他说，他们会晤是为了协商途经香港运送朝鲜战俘的问题。我国在该军区的军事情报人员不接受这种解释。现在，我国的军事情报人员认为，此次会晤与准备军事演习密切相关。

二、参与演习的人员组成和演习的目的

从报纸获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和空军参加演习。同时我们还从军区内的我国情报人员处获悉，国民党部队也参加了演习。对报纸的报道进行仔细研究后，无法证实国民党参加了此次演习。

必须指出，国民党报刊英文版对演习一事完全保持沉默。香港殖民当局半官方刊物《南华早报》2月10日只是刊登了一则关于英国军舰从新加坡出航参加演习的消息。2月16日和17日，在香港发行的国民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使用大标题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2月16日，《星岛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关于军事演习的消息，使用的大标题是：《三大国海军大型军事演习开始了。在远东同苏联的潜艇作斗争。对封锁的可能性进行探索。此举对在越南的战争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的香港报纸报道说，约有30艘军舰和1万多人参加了军事演习。据英国报纸报道，商船也参加了演习。关于参加演习的空军数量的资料，任何地方也没提过。

依据这些资料，美国方面有2艘驱逐舰和3艘护卫舰参加了演习，英国方面主要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军舰，即“哥萨克”号、“防御”号、“亲王”号、“康斯坦斯”号、“康科德”号和“科凯德”号驱逐舰，“山湾”号、“莫克姆”号护航舰，以及“萨罗”号潜水艇。关于法国部队的资料在报纸上没有出现过。

演习参与者赋予演习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委派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查尔斯·拉姆中将、英国远东空军司令桑德森元帅、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里查德·克鲁森少将和法国驻印度支那海军司令奥博弗托少将来指挥演习便可以看出。

为期10天的演习，其共同目的是完善侦查技术和反潜战。根据报纸消息，演习参加者的出发点是：苏联在远东水域部署了自己三分之一的潜艇舰队，其中大部分驻扎在远东南部水域。演习的目的，如报纸所说，还要探索封锁印度支那和中国沿海的可能性。

从我们的军事顾问卢卡舒克和阿盖耶娃那里得到的谍报资料判断，演习方还有一个任务是在中国南部登陆。

因为演习的目的是完善在南中国海针对苏联潜艇的作战，因此，国民党宣传机关把向“盟友”提供关于苏联在海南岛水域的潜艇的“谍报资料”作为自己的任务。

例如，香港报纸《星岛日报》(国民党办的报纸)2月17日转载了台北的消息，根据国民党情报机关的资料，似乎10艘苏联潜艇已经进驻了(海南岛)榆林港，这些潜艇似乎是在向菲律宾和马来亚运送存放在越南的军火和共产党间谍。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低劣的挑拨者，国民党余孽非常无知。

鉴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国民党分子从2月14日起在中国南部附属岛屿活跃的情况，为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通知我们的军事顾问，中南军区部队已进入战备状态，并向防空部队空军下达了击落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的飞机的命令。

三、结论

根据我们的看法和我国驻南中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看法，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组织者追求的目的是恐吓中国和越南，在中国和越南毗邻地区展示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实力。

在华南的中国同志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提高警惕和做好战斗准备。

苏联驻广州领事

И.卡拉布霍夫(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7, п.338, д.105, л.50-54

(1954年3月5日)

3月5日，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拜访了我，他刚在越南待了4个月，不久前才从越南返回的。在交谈中，越南大使讲述了越南局势，并阐述了自己对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看法。

黄文欢说，目前越南各条战线上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人民军队手中。鉴于除少数地点以外的越南北部地区均已被解放。人民军司令部打算在今后逐步让自己的主力移师越南中部。由于人民军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遇到极大困难。人民军的战略计划在于通过与敌人展开运动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人民军的任务中，暂时还不包括占领像河内、海防、西贡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它还不具备做到这一点的足够力量，特别是技术装备。人民军正规军的数目目前约有20万人，敌人的军队..... [5]

随后越南大使说，他设想，有可能法国政府也会参加关于越南和解的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为，第一，越南不存在确定的战线，所以要划定一条分界线和确定非军事区将特别困难(在越南解放区生活着近80%的居民)；第二，法国人将会为保大争取一定的地位，而人民政府对此则不会同意；第三，美国将会通过向法国政府和保大施加压力力图破坏谈判。

在谈话结束时，越南大使黄文欢请我今后向他通报关于日内瓦会议筹备过程中涉及越南的部分。

谈话由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切卡诺夫同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АВІРФ, ф.079, оп.9, п.7, д.15, л.64-66

№2137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致英共的电报(1954年3月5日)

1954年3月5日

第406/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П.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要求转达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该电报是于今年3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转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两页。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保存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3月6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并请求转交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决定推荐希尔达·科恩或特列沃夫·希尔同志到我们中国从事英文著作的出版顾问工作。你们从上述两位同志中选择任何一位到中国来，我们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希望该同志在我们这里从事《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或在《中国重建》杂志编辑部从事英文编辑、顾问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该同志在从事编辑、顾问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培养编辑骨干。该同志在中国的工作期限为三年。该同志从英国到中国的旅途开销以及在中国居住期间的所有费用，其中包括赡养仍在英国的家庭方面的费用在内，均由我们承担。

我们期待着你们能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并通知我们该同志前往中国的日期，以便我们及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把给该同志的路费转给你们，并通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使馆做好迎接该同志的准备工作。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54年2月19日

北京

No2074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年3月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何宝贤(He Baoxian)和费德林(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出席。

张闻天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其他中共中央成员，让他传达他们对莫洛托夫同志的问候。

莫洛托夫感谢了他们。

张闻天报告说，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支持会议上采纳的召集日内瓦会议的决定。

他说，尽管美国会试图破坏这次会议，但是民主阵营的代表会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积极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认为，如果在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那么在这里的任何成功都很重要，因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条道路正在打开。

莫洛托夫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赞赏。

张闻天说，就日内瓦会议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于3月5日抵达北京。

他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就朝鲜问题准备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最高目标预设了以下几点：

- 1.在平等的基础上，创建代表南北朝鲜的统一朝鲜委员会来统治整个国家，直到朝鲜统一政府建立。

- 2.举行大选。

3.外国军队撤离。

4.统一朝鲜。

万一这个目标的建议不被采纳，那么就提出一个较低目标，即维持现状，逐渐撤离外国军队，规范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关系。

这两个目标都是以苏联代表团在柏林会议上的立场为基础和模范而提出的。

他说印度支那问题更加复杂，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停火线，然而，印度支那结束战争的条件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就此协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莫洛托夫说，根据新闻报道，这个过程将要持续两到三个月，但是新闻里提到国外一些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将一直拖延到11月。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张闻天说，尼赫鲁(印度总理)提议的“停火线”很难被接受，因为结束战争的条件很重要。

他指出，必须停止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援助，否则战争会一直拖延下去。

莫洛托夫说，如果法国想缔结协约，那么当然有必要知道需要什么条件。

张闻天报告说，有建议在北纬16度画一条分界线。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胡志明有利，如果正式提出的话，应该会被接受。

他说，在3月底邀请胡志明来京是明智之举。这时，大使问及邀请胡志明到莫斯科讨论日内瓦会议的立场问题和苏共中央党内问题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赞成邀请胡志明来莫斯科，但是补充说，苏共中央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就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张闻天提到，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的时候，不仅仅要邀请民主越南的代表，还要邀请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而不要把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会包括在越南代表团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邀请这三个民主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对其相关国家的抗衡。

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张闻天探讨了日内瓦会议上可能讨论的其他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重整军备，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协议，还有其他。

莫洛托夫说，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需要研究，但是似乎就他而言，这些可能性绝不会被阻止。

张闻天报告说，考虑到柏林会议上四个外长达成的协议，周恩来正在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这次会议，苏联代表应该是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承认了在柏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协议，并补充道，外长们可能不会全程参与，因为会议可能会延长。

张闻天解释了中国、朝鲜和越南代表团于4月中旬(10日和20日之间)前往莫斯科，对各自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进行协调的可行性。

莫洛托夫说这样的会议是必要的，有利于事态发展。

对中国和朝鲜同志已经做好准备以适当的方式来讨论朝鲜问题，他表达了信心，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是更为知情的。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和越南同志将为印度支那问题做适当准备的信心，因为他们正有合适时机做这些事。

张闻天说，北京的工作已经开始：人员已经选出来了，正在起草建议，等等。他指出，中国同志现在指望苏联方面的援助。

莫洛托夫许诺给以援助，并谈到了联合努力的必要。

张闻天指出自己缺乏经验，要求选出有能力的苏联外交专家来帮助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员，分享他们在国际会议组织工作上的经验以及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方法、技巧上的经验，等等。

莫洛托夫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指出大使可以和(苏联第一副外长)

葛罗米柯同志商量这些问题，葛罗米柯有参加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他说，苏联外交部对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主要由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诺维科夫和费德林等同志负责。

张闻天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授权他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问题和苏联外长保持联系，并且他也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

莫洛托夫表达了赞赏。

张闻天谈到日内瓦会议的程序问题，并且对周恩来是否可能担任会议主席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还谈了其他问题。

莫洛托夫说，日内瓦会议上会出现许多程序问题，主席、全体代表、会址等等，争议和讨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做好适当准备，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张闻天很关心是否可能让中立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印度。

莫洛托夫说，朝鲜问题的参与者的组成已经完全地确定了，但是涉及到印度支那问题，有哪些参与者还不十分明晰，在此还可能有严肃的争论。

关于邀请印度的问题，他说，让印度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的角色地位降低，中国要和其他四个大国并驾齐驱，这是印度无法索要的。然而，他提出，让印度和泰国参加印度支那问题符合其他一些集团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

H.费德林记录

发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

АВПРФ, ф.6, оп.13а, д.25, л.7

№14580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朝鲜问题的指令草案(1954年3月17日)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您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所起草的指令草案。该草案中所涉及的资料由相关委员会提供。 [6]

库兹涅佐夫

1954年3月17日

附件：

为苏联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所起草的关于朝鲜问题指令草案

关于朝鲜问题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如下：最高目标(纲领)——实现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最低目标(纲领)——如果在会谈期间无法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协议，那就采取一切措施以使停战向实际上的和平过渡。

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倡议并提出的。

最高目标(纲领)：提出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的建议

一、在6个月期限内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确保朝鲜人民行使其应有的权利——自由地解决本国内部事务。

二、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国家及其政府，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议如下：

1.在全朝鲜民众自由意愿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举行全民选举。

2.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应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事先必须强调，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以及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和加入民主组织，从而确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该选举法应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的批准。

三、如果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关于成立国际委员会以监督朝鲜选举进程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应援引如下理由：举行选举是朝鲜人自己的事。

四、在朝鲜全政府成立后，(各与会国)理应协助朝鲜加入联合国。

最低目标(纲领)：提出关于采取举措以确保(朝鲜)从停战状态向真正的和平状态过渡的建议

1.如果会议期间没有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等基本问题达成一致，那么在所有相关国家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之前，各与会国理应采取措施以确保朝鲜维持和平状态。为达此目的，会议应讨论如下建议：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维护朝鲜和平的问题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得再重起战端，以便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2.建议将缩减外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数量作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第一步。

3.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均缩减各自的军队数量。

4.建议采取措施以促进南、北朝鲜的亲近(建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并为此目的提出其他相关建议。

5.如果会议期间(与会各方)无法就上述建议(最低目标)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在此次会议后各相关国家继续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这些谈判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在为此目的而专门组建的委员会中,或通过正常外交渠道,等等)。

外交部副部长A.A.葛罗米柯

外交部副部长B.A.佐林

外交部远东司司长H.T.费德林

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司长A.A.索博列夫

外交部南亚和东南亚司司长K.B.诺维科夫

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A.A.索尔达托夫

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A.A.拉夫里谢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佐林、费德林、索博列夫、诺维科夫、索尔达托夫和拉夫里谢夫等同志,档案室

А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9, д.107, л.1-4

№21405 尤金致马林科夫等函:中共要求帮助修改宪法 草案(1954年3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4年3月19日

第247号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

我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苏共中央转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送给你们。刘少奇再次提醒说，中共中央希望得到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全面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手写批注：

文件首页标注“紧急呈送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7]，4月24日。

说明：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最新修改稿，并根据修改稿提出了最终意见，已将建议交给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4月26日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 [8]

手写批注：

打字稿为原稿，手写字体是对中共中央最初文本审议后做出的修改(1954年3月21日)。

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组织和国家机构(国家制度)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构

第五节 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机构)

第六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 [9]

手写批注：

这是第一份稿子。手写字体改动的地方是对第二份稿子做出的修改。 [10]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186 , л.2-61

№21407 卢涅夫致彭真函：苏联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副本(手写)

致彭真同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根据你们的请求，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意见

第2页，在“该宪法体现了人民革命的成果”一处最好加上“并且将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个别条款中包含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材料放到前言中这个问题，比如，把第10条中谈到的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放到前言中。在第4条中也包含有一

些纲领性的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一些章的名称的意见

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最好改为“社会制度”，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通常都是这样表述的。

在第一章中一些条款的顺序能做如下调整就更好了：把第3条替换为第2条；把第17条替换为第3条；把第18条替换为第4条；把第19条替换为第5条。接下来是论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条款。

草案的第二章最好划分为如下一些独立的章。

1.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该章最好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列出一些条款。

2.国家的管理机构。该章最好就国务院、各部和中央机构列出一些条款。我们认为，该章最好对一些部做出法律上的规定。

3.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4.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5.法院和检察院。

应当好好考虑关于在宪法草案中增加新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这个问题。草案中可以把该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自治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的措辞最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

第3条的最后一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26条应该准确一些。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组建”国务院中的“组建”一词应该为“批准”。

第32条应该指出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

第33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发现犯罪，并且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他应当被拘捕。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后者许可对该代表实施逮捕。”

第34条应该指出，选民有权提前撤换人大代表。

第36条第9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38条应该增加“行使选举权”一句。

第45条，最好不要把国务院称为“最高的管理机构”，而称为“最高的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

第46条应该指出，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50条，我们认为该条应该被分为两条。第50条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5条的第5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54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

第61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进行修改。该条的前半部分或许应该修改为：“民族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第64条，专门的法庭不应该被称为特别法庭。其中“专门的法庭”包含特别的法庭。

第75条应该指出，法官的工作应独立于地方权力机构。

第77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79条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

第81条在例举一些保障的同时应该把“住宅不可侵犯”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应该列出一条，或许应该为：“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中应该指出各国家机构颁布的法令的准确名称。根据宪法草案，能够颁布命令的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国务院；(3)部长；(4)地方权力机构。

应该把如下行为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2)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3)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4)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5)地方权力机构做出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宪法草案的意见。

祝好

A.E.卢涅夫

1954年3月20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98-102

No21408 柯妮娜和卢涅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意见(1954年3月20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对前言的修改意见

对于前言有一处措辞上的修正。

第2页提到：“该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体现”，在“体现”一词后加上“并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较能更好地反映实际。

关于把宪法草案的个别条款中包含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材料放到前言部分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比如，第10条的一些内容谈到的是关于国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策。第4条中也包含有一些这样的纲领性内容。

对宪法草案结构和章节名称的意见

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

宪法章节名称的准确和清楚对于宪法文件具有巨大的意义。章节名称应该反映其中包含的条款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这一名称与这种要求是不相符的。这种名称或许适用于前言，但不适合作为第一章的名称，第一章应该包含确定的内容、具体的法律准则，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社会制度。

因此，正如苏联宪法和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把第一章的名称改为“社会制度”较为准确和正确一些。

此外，第一章中载明的一些条款不连贯。首先第1条和第3条谈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从第4条到第17条谈论的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从第17条到第20条再次谈论了关于国家的政治基础。

我们建议把关于国家政治基础的内容集中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把第3条改为第2条，第17条改为第3条，第18条改为第4条，第19条改

为第5条，等等。

对第二章的意见

我们认为，草案中第二章的名称“国家结构和国家机构”需要改一下。

从这一章各条款的内容来看，“国家结构”包含了国家机构总的架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再加上“国家机构”就重复了这一意义。

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机构”不属于“国家结构”，那么国家结构又包含什么呢？

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把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合并到一个章节中这个问题。

为了使宪法更加明确，我们建议把第二章划分为几个单独的章节。

第一章，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

该章中最好有一些包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条款。

第二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该章最好包含一些关于国家最高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条款，同时也应包含一些对各部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确定的条款。我们建议在草案中加入一些条款，来确定各部和中央部门的法律地位。

第三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四章，自治区的权力机构。

第五章，法院和检察院

此外，作为独立的一章，草案中应该加入“国家的制度”一章。

必须有这一章，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自治单位，并且其国内的行政划分非常复杂。

这些自治单位和行政区划都被一些法律准则固定了下来，这些法律准则体现在第2条，第5条和第59条中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些条款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而它们是必须被集中到一起的。

这样做对宪法只会是有益的。这样国家制度的民主原则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

我们建议把这一章放在“社会制度”这一章的后面。在制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参照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章。

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宪法草案可以由如下几章组成：

第一章——社会制度。

第二章——国家制度。

第三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四章——国家的管理机构。

第五章——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

第六章——民族自治地区的国家权力机构。

第七章——法院和检察院。

第八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国旗、国徽和首都。

对个别条款的意见

第3条最好这样编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第3条的最后部分应分为单独的一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进行的整个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原则固定下来。或许，该条的措辞应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都建立在民主集中原则的基础上，并按这一原则行事。”

第25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民主性质。比如，增加的内容可以类似苏联宪法第40条的内容或者波兰人民共

和国宪法的第18条的内容。

希望第26条能够增加一些条款，指明立法应该由谁首先提出。

这一条的第5项内容指出，根据国务院总理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国务院。“组建”一词意味着挑选政府候选人。这项工作由总理完成，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的成员。因此我们建议把“组建”一词改为“批准”。

第32条谈到了代表的质询权。但是在这一条中没有指明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应该对代表的质询做出答复。因此，在该条中应该指明对代表的质询进行答复的期限。

我们认为，这一期限不应该超过10天。

第33条应当准确，其中应该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可侵犯，并指明对其进行逮捕的程序。该条应该同宪法草案的第80条联系起来。第80条不允许不经法官和检察官的判决就逮捕任何人。第80条规定，在得到法官和检察官进行逮捕的许可之前，允许进行3天以内的拘押。第33条还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表明，如果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可以对其进行拘押，然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许可对其进行逮捕。宪法草案第30条可以以如下的形式表述：“在全国人大代表被发现犯罪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拘押。并且应立即报告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经后者许可对人大代表实施逮捕。”

第34条指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法定的程序撤换人大代表”。

这样的表述还不清楚，法定的程序是什么。把这项内容修改为“选民有权提前罢免人大代表”，是不是更好一些？

第36条的第8项内容应该进行补充，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履行本条阐述的职权。

第36条的第9项“组建国防委员会”最好改为“批准国防委员会”。

第38条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年满35周岁的每位公民都可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公民不能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如果把这一点表述如下，将会更加准确一些，即：“年满35周岁的每位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否应该为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确定年龄上的限制呢，而且确定的年龄还是这样的高，这在实际上有必要吗？

第45条的表述应该改善一下。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是最高的管理机构。”

此处，同一机构使用了两个名称。把该条作如下修改是不是更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

第46条需要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国务院的组织地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结论，这一工作可以由人大或常委会按其自身的意愿来完成。根据其他条款的内容，此处有另外的意思。也就是国务院各部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而在人大休会期间由常委会确定。我们认为，宪法中应该这样表述。

第48条的第2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提出建议”，连接词“或”应该替换为“和”。同时指出就哪些问题提出建议也是适当的。

第50条应该被分为单独的两条。第5项内容以前的前半部分最好移入“国家制度”一章中，而第5条的第5项内容保留不变，作为单独的一条。

第54条应该增加一些内容，应该指出地方人民政府由谁选出或任命。

宪法草案的第61条应该准确一些。

该条应该指出，在自治区的自治过程中主要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我们觉得宪法草案第61条的前半部分最好修改为：“自治区自我管理机构活动的具体形式既应该符合该自治民族的利益，也应该符合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利益。”

这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宪法草案的第64条中，不应该以特别的法庭来代替专门的法庭。如

果在该条中使用“专门的法庭”，那么这一概念将概括工业、运输业领域的法庭和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等所有法庭，“专门的法庭”这一概念包含特别的法庭。苏联宪法的第102页在谈到专门的法庭的时候就指出，这也指军事法庭，是苏联专门法庭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宪法草案中的第75条对法官独立原则的确定不够准确。其中没有指出法官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独立于什么样的地方性权力机关。该条的阐述应该与苏联宪法第117页的内容、波兰宪法第56页的内容、匈牙利宪法第44页的内容、罗马尼亚宪法第76页的内容相接近。

在第77条最好写上“全体公民”，而不单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79条应该作一些补充，应该指出，该条中规定的一些权利保障劳动人民及其组织享有出版、印刷的权利和使用公共建筑物的权利等。

第81条在列举一些自由的同时还应该规定“住宅不可侵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最后，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背叛祖国应该被作为一项最严重的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宪法草案没有把国家各机构颁布法律的制度明确确定下来。比如，根据宪法草案，如下机构有权发布命令：(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国务院；(3)部长；(4)地方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地方权力机构一样，也是有权做出决议的。

为了法律的合理性，正如苏联的宪法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也应该载明和确定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发布的法令的名称，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是，常务委员会颁布法律；国务院颁布决议和命令；部长下达命令和指示；地方政府通过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Л.Ф.柯妮娜

A.E.卢涅夫

1954年3月20日

手写批注：

未提交。

这份初稿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法律委员会的苏联法律问题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份稿件没有转交给中国同志，被大使馆认定已放弃。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103-110

№13015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记录：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 (1954年3月2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3月31日

绝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4年3月26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谈到关于召集中国共产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共中央会面，研究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同时向他透露了苏斯洛夫同志信中的内容。我对这两件事情分别做了会谈纪要。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我正要离开，毛让我再待一会儿，他希望像同志那样跟我谈谈。在我先前对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们也经常这样交谈。

一、他说他在杭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疗养。在休假的最后三五天里，他常去爬山。毛泽东说：“在我外出时，他们开始向外散播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谣言，有人说我得了肺结核，还有人说我有心脏病。他们还谣传说，我过世之后，高岗会接替我的职位。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健康得很，离死还差得远呢。”

接着这一话题，他开始谈到高岗。毛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老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就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前一样，觉察到这儿震动一下，那儿震动一下，但就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在去

年的6—7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财经问题的会议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不久，在1953年7—9月间，我强烈地感觉到党内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另一个却隐而不现。震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12月24日在政治局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事情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震动都是从哪儿而来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毛对我详细描述了“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说，在2月份 of 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之后，组织了两个委员会，工作了两个星期，最终澄清了大量的事实。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高岗和饶漱石都曾被逮捕过。他们履历中的某些部分以前很含混不清，但是现在清楚一些了。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很不检点的人。他有很多女人，其中有几个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想弄清高岗究竟和帝国主义者有无联系。很多揭露高岗个人生活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他的秘书们提供的。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在因贝利亚一事飞往莫斯科并返回之后，变得异常活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苏共中央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即宣扬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和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另一事件也很典型，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高岗没有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各省来京出差的党员干部下榻的北京饭店，并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采用了这一策略来进行其秘密活动：声称拥护毛泽东和林彪，但是首先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毛说：“当然，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党的团结的问题。”我说，这是分裂分子通常采取的战术，因为他们无力公开反对毛泽东。毛回答说，正是因为分裂分子借他的名义欺骗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党派斗争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党内迅速蔓延”。高岗事件暴露之后，绝大多数党员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行动，但有些同志会责怪中央的行动稍微迟缓了一些。接着，毛半开玩笑地说，是毛泽东提议让高岗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提名他当中央政府副主席的。现在同志们一方面通过了处理高岗事件的各种办法，一方面询问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件事。毛回答说，显然是因为他自己瞎了眼。于是同志们又问道，既然你眼瞎了，怎么还能工作呢。对此毛回答说，他现在又复明了。在这方面，毛注意到自己在去年年底心情很不好。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有助于中共中央找到一个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恰当方式。那时他怀疑高岗在进行反党活动，但还不是很确定，这是他在与高岗交往时保持警惕的原因。我说，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杭州会议时，当

你要求把贝利亚一事通报给政治局成员，却没有提到高岗。毛说，那时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完全搞清楚。起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后来决定必须召开一次全会。毛说，他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形势的好转。目前不断有关于高岗的新材料揭露出来，很多细节得到了澄清。最后的决定将会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我引用列宁的话说，当一个党清除了自己内部的敌人后，它就巩固了自己，目前中共正是处于一个巩固自己的时期。毛说，这并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现党内分裂分子的可能性。我回答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即使在党内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外表看来党的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其内部并不一定是这样。

后来，提到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朋友，毛问我是否看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看过，但是斯大林同志跟我说过。毛泽东说，这封信在他的手里，他说会给我看，其中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岗暗示的。信的大意是除了高岗，党中央没有一个好同志。当然，在高岗说中共中央的某些委员有亲美倾向，其他一些委员则有反苏意图时，他是在企图误导科瓦廖夫。很明显，高岗心怀叵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毛问科瓦廖夫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曾听说他原来是个铁路工作人员，后来投身政治，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他在中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参加谈话的师哲说，他现在可能是煤炭部的副部长。）

二、然后，毛泽东对我谈到了中央的组织工作。他告诉我，目前他很少处理日常事务，而是交给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去处理。这些同志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会向他征求意见。这样的话，一方面提高了每一位中央委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能抽出精力来研究和准备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毛评论说：“在杭州的最后两个月，我干的事情远比在北京被日常杂务缠住时要多。”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编写了以下文件：(1)关于中共中央工作的一个文件；(2)在中央2月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团结的一个决议；(3)周恩来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篇文章；(4)有关中央2月中央全会的新闻稿；(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毛接着说，最近中央开始推行一种新的做法，毛或者政治局其他委员起草的文件可以交给一些中央委员会领导同志联合审议。这种工作方法效果很好，也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同。毛继续评论组织工作，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把中央的年轻同志放到了第一线，我退居第二线。这就像打仗的时候，如果敌

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居于第二线的同志就会冲上前来坚持战斗。”.....
[11]

АВПРФ, ф.06, оп.13а, п.39, д.227, л.1-5

№14582 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朝鲜的国家统一和全民选举问题(1954年4月 [12])

关于恢复朝鲜民族统一和举行朝鲜全民选举的问题 [13]

一、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1.在朝鲜人民自由意愿的基础上举行全民选举和召集国民大会，并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

2.为了筹备朝鲜国民大会，举行自由的全民选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南北朝鲜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将成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民委员会，其中代表均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大会和大韩民国国民大会自己选举产生。

3.必须事先强调的是，该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起草全民选举法，以便选民能够在自由意愿、没有外国干预、地方政府和地域性集团的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选举，从而确保选举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4.为了恢复朝鲜经济，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保护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全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实现朝鲜的民族统一而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确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具体包括：贸易、财经结算、交通、边境关系的处理、通信往来、文化和科技交流，等等。

二、必须承认，所有外国军队在6个月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领土。

三、所有那些关心和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相关国家，都应当承认并确保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之创造条件，以促进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尽快解决，为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努力。

АВПРФ, ф.06, оп.13, п.69, д.5, л.13-20

№21409 高尔基等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致M.A.苏斯洛夫同志：

我们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A..... [14] (签名)

A.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俄语文本中包含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一些条款的叙述不够明确，编排得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许多问题看起来是由于翻译的质量不行，因此没有必要局限于对个别条款的编排和不够准确性提出意见，或许，这是由于翻译的质量造成的。在就宪法的实质提出建议的同时，必须指出草案中那些编排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会歪曲宪法的意义。

我们认为，宪法草案非常完整，基本上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结构和权限，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第一，总的意见。

1.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实际上阐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基本地位。因此这一章的名称不应是“总纲”，而用“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政治制度”的名称更合适一些，正如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一样。

第18条由于没有宪法条例的一般性质，应该被纳入第三章中，并替换该章中的第88条。

2.宪法草案第二章的名字应该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据此，草案第一章的第2条(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应该被放到第二章的第5节“民族自治区”，并且作为这一节的开头。

3.宪法草案中，应该更加明确地确定和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详细地阐述其中一些机构的权限，以便在对这些机构权限进行界定的条款中消除其含糊不清和一些明显的矛盾。

宪法草案应该更加准确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履行的那些职能。在宪法草案的第41条中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把总理候选人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条中也应该更加明确地说明，只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才有权任命和罢免总理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职务。

宪法草案还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立法权在他们之间是如何分配的。第22条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行使立法权的机构。同时，第36条的第4项内容指出，常务委员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法令”。

鉴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根据第36条的第4项条款，常务委员会有权颁布立法文件，并在随后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据此，应该从第22条中删除“唯一”一词。

更为合理的修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每年召开一届会议。

为了精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并避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职能的重复，或许应当把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合并，可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4.根据宪法草案的第35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处秘书长以及常务委员会委员。根据这一条以及第26条中的第3项内容、第41条中的第6项内容以及其他的条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职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能由一人担任。

5.第41条中的第6项内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但是宪法草案中没有指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它的权限是什么，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国家机构具有什么样的效力。

6.宪法草案的第二章被分为6节，包含了宪法草案98条内容中的56条。宪法草案的其他3章中没有被划分出小节。为了简化宪法草案的结构或许应该把这些节改为单独的章。

第二，对宪法草案一些条款的意见。

第3条。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点最好删除，因为在随后的一些条款中具体地确定了这一原则的内容。

第6条。该条指出，国有成分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该条应该指出，以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大银行等为代表的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也就是属于人民所有。

该条中有一些不甚成熟的表述：“自然资源由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个人开发”。“开发”一词可以用其他词替换，比如替换为“使用”。

第7条。该条指出，劳动人民部分集体所有制是个体农民全民所有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所有制形式不是一种组织。

第8条和第9条。应该删除“根据法律”的词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本身就立法的形式把相关的法令固定了下来。

第10条。“所有制”一词最好换为“所有制形式”。

该条指出，国家禁止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以这种表述提出的要求是不能被作为法律准则的内容的。

第21条。在“权力”一词的前面加上“国家”一词(草案中其他相应的地方也应该作此修改)。

第23条。在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的时候，“建立”一词应该替换为“组成”一词。

第23条中的第1项内容最好以如下形式阐述：“各省人民代表大会按如下准则选举省人大代表：每80万人选举一名人大代表，但是每个省不少于3名人大代表。”

第24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职期限，应该阐述的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行使权力的期限，因为代表的任职期限是由相应选举机构行使权力的期限确定的。

宪法草案中关于地方权力机构行使权限的期限的相关条款必须作这样的修改。

该条款的第二部分应该准确一些，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能够做出关于推迟举行选举的决议。

第26条。应该去掉“职能”一词，因为这一词是“职权”和“权限”的术语所不能替换的，这实际上谈的就是这一条。因此本条的开头建议以如下方式叙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修改和通过法律”等等。对其他确定国家机构权限的条款也应该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第3项内容的表述不能使人明白，谈论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哪个机构。

该条的第6项内容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选举，而不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成员的选举。对第65条也必须作这样的修改，该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法院成员的选举。

考虑到，根据第25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届会议，对行政领土的划分的变更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做出，随后由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变更。

第29条。该条应该删除。可以在宪法草案的第26条(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或任命)指出，全国人大有权罢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第33条。该条应该修改为：“全国人大代表不能未经全国人大的同意，而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不能未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同意就被审判或逮捕。”

宪法中未必必须指出关于对“当场抓捕”的人大代表采取措施这个问题。

第36条。该条中应该删除的内容是，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发挥自己的功能，因为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常委会也能发挥自己的许多功能。

至于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发挥的功能，应该指出，这些功能只是该条第4、5和8项内容中阐述的功能。

此外，在第36条中还必须规定，在全国人大休会期间，常委会可以组建新的部以及中央其他管理机构，并在随后把这些问题递交全国人大会议批准。

第43条。从该条的文本中还不能清楚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在岗位的时候，他的哪些职权可以由副主席行使。

第48条。该条的第2项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应该确定一下，这指的是立法方面的建议，以及关于国家管理方面的建议。在涉及到其他机构的相关条款中也应作类似的修改。

该条的第5项必须指出，国务院可以撤销下级机构做出的决议，其条件是，这些决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关于第二章的第四部分。该部分没有确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形式。如果指的是，地方人大的工作形式是召开会议，那么在宪法中就应该指明这一点，或许还要尽量就每年召开的地方人大会议的人数做出规定。

第61条。该条的文本应该更为准确一些，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的自我管理机构的具体形式指的是什么。

也必须确定，在民族自治区的哪些自我管理机构中每个民族都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还是在地方人民政府中？

第63条。该条的第一句话或许应该删除，因为第60条的第二部分已经包含了其内容。

第62条的第二部分指出，各民族都可以自由地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留或改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该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应该分出列为特别的一条。

第63条。在该条中或许应该指出，民族自治区(省、区或县)的自我管理机构制定关于本自治区(省、区或县)的法律并递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该条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不应该把这一问题同这些自我管理机构履行自己的职能联系起来。

第73条。该条的表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该条应该作另外的表述，应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机构对相关的国家机构严格履行法律的规定进行监督，同时对相关负责人和个别公民进行监督。

A..... [15] (签名)

A.高尔基(签名)

1954年4月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111-118

№21411 戈尔舍宁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7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M.A.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发送给你。

K.戈尔舍宁(签名)

1954年4月7日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该宪法草案也反映了中国在1949—1953年期间的立法。

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宪法草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包含了一些重大的新的条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提供了条件。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纲领性的条款，为中国近期的发展指明了前景。

现行的宪法文件中没有包含的比较重大的新的条款是：

1.宪法草案明确确定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表述了中国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前言，以及草案的第4条)。

2.草案中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新任务：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言)。

3.草案以另外几种方式确定了中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

如果说，迄今为止共同纲领中仍然规定，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行使中国的国家权力，那么宪法草案中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1条)。

已经不再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宪法草案强调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原则，而民族问题不是通过联邦的形式，而是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区的途径来解决(第2条，第59—63条)。

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直至国家的分离，但是无论是在共同纲领中，还是在宪法草案中都已经不再提这一点了。

5.宪法草案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的国有成分要优先发展(第6条)，但是现在提出的却是在中国所有国民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中，国有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

6.宪法草案中首次确定了国家对矿藏、河流、森林和大块荒地的所有权(第6条)。宪法草案同时也巩固了现行的、农民根据1950年通过的相关的土地改革法得到的土地所有权。

7.以另一种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宪法草案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消灭(第8条)，但是现在没有采取措施对富农经济进行限制，更不要说消灭富农经济了。

8.宪法草案中也包含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内容(第10条,禁止投机,限制对工业或商业某部门进行垄断,禁止从事危害社会利益、破坏国家经济和国家经济计划的其他活动)。

9.宪法草案规定,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涉及社会利益的时候,国家可以征用、没收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甚至把其收归国有。

10.现在推行的政策是对对外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施监督,取代这一政策的是,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15条)。

11.对国家最高政府机构的结构进行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条款以及其拥有的非常大的权力(第26条、第41条等),这些条款在以往是没有的。

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确定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取代现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行政委员会。

引人关注的是,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没有设立部级机构,对全国的军事活动进行管理。

中国没有设立军事部或国防部,取而代之的是设立了国防委员会。

12.对于中国的领土行政体系,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变化(第50条)。

宪法草案设立了四级(中央、省、县、乡镇)取代了现有的七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划分,这意味着撤销了大行政区、边区和地区。

13.国家权力机构的选举还不是全面的选举、不是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

14.同现有的关于法院系统的组织和活动的立法相比,宪法草案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首先提出了所有的法院自下而上进行选举,让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

的审理，确立了被告辩护的权利。

人民法院的选举将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但是迄今为止法官仍是任命的。

15.提出了检察院机构进行集权的原则，确定其在履行自己职能时的独立(第75条)。

最近检察院仍然根据双重从属的原则进行建设，并且从属于地方人民政府。

16.宪法草案首次列出了特别的一章(第三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的阐释。

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中，首次确立了劳动权、休息权、在由于年迈、生病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在公民的义务中，引人关注的是提出了公民保护国家财产的义务、缴纳赋税的义务，以及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应当指出，无论是现有的立法，还是宪法草案都没有提出在中国实行全面的义务兵役制。

1949年的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服兵役的制度”。

(二)

应当注意的是，需要对宪法草案作如下补充和修改：

1.宪法草案的前言部分谈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强调说“目前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此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中国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草案的第一章的名称为“总纲”，把其改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较为妥当，因为就其内容来说，本章包含的条款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说明。

3.第1条应当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保留该

条中的其余内容。

应该指出，中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在宪法中的反映是中国人民摆脱了多年以来国外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胜利。

4.第7条的内容指出，在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成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和劳动农民部分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鉴于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不存在诸如“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样的社会经济范畴，中国的宪法草案中使用这样的概念未必合适。

任何一个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也没有使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一概念。

5.第19条是关于对反革命活动给予镇压，惩处反革命分子，如果能够强调，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就更加妥当了。

该条中也应该指出，剥夺政治权利只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6.第20条确定了阶级成分和武装力量的任务，出于政治的需要，应该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保护公民从事和平的劳动和自由”。

7.应该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引入了共和国主席制，在实质上也就是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二章对此作了规定)。

如果说在中国确立主席制应该被承认是必要的，那么，从宪法草案的第41条对其规定的诸多职能来看，应该把第3项内容删除，该项阐述的是共和国主席的如下权力：“任命和罢免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因为这些职务都是选举产生的。

第43条也应该准确一些，该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其部分权限由副主席履行。

应该指出这部分权限，或者省去这一点，或者具体指出，这些权限指的是什么。

8.宪法草案规定(第41条)，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是个什么机构，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它拥有哪些权力和权限。

非常必要的是，诸如最高国务会议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成员组成，其法律地位应该在宪法中规定下来。

9.应该消除第51条中的一些矛盾，该条指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地方权力机构，而同时指出它是管理机构。

较为妥当的表述是，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人民政府是执行和管理机构。

10.宪法草案中有许多条款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这些内容被分为不同的章(第一章，第19条；第二章，第23、34、52条等)。

较为合理的是，在宪法草案中划出专门的一章“选举程序”，把涉及到国家权力建设中一些重要领域的所有准则都集中到一起。

11.宪法草案的第73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其中指出，监察机构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监督，较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监察机构有义务对国家各机构、负责人和公民严格地遵纪守法实施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75条应该准确一些，应该指出，监察机构在履行自己职能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权力机构。

12.宪法草案的第26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总检察官的准则，这一点没有必要。

选举这些负责人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权限，而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122-130

№21406 苏联外交部对中国宪法草案修改意见(1954年4月13日)

致M.A.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准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译本发送给您。

1954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54年3月23日提供)

..... [1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今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赞同并已提交给了立法委员会进行审核。在今年6月，宪法草案将被公布供全国人民讨论，1954年9月，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这部宪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在今年3月中旬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提供了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审议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请求尤金同志和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法学家担任顾问，对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根据尤金同志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新版本，该版本在苏联法律工作者所提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同志同时还通知尤金同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宪法草案提出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宪法草案还考虑到了1949年之后通过的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法律，同时，同现行的法律文件相比，该宪法草案还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这些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成就的条件。

就其类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事实上不同于现行的苏联宪法。如果说苏联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事实上已经得到的和取得的成就固定了下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包含了一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条款。

如果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中国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做出任何指示，那么该宪法草案则直接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打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推行社

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国家的一些主要任务，该宪法草案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该宪法草案非常完整，从总体上正确地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国家机构的体系和权限，同时也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由四章和前言组成。

草案的前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成果、对国内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新民主的实质和过渡时期形成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简短的描述。前言的最后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宪法草案的论述是：“我国已经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起了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友谊。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发展日新月异。为了崇高的世界和平的目的以及人类的进步，我国将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并且将根据权利平等和互惠原则同那些拥护和平以及对我国友好的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总纲”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实质进行了描述。

该宪法草案对国家阶级实质的描述与共同纲领中的描述有所不同。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宪法草案则没有提到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民主力量。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宪法草案中对统一战线的作用的描述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共同纲领指出，人民民主战线行使国家权力，那么在宪法草案中，人民民主战线的作用被确定如下：“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将在我国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是动员全国人民完成我国过渡时期任务的工具。”

宪法草案的第一章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以下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

私人所有制。宪法草案的第七条指出，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根据宪法草案中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今后中国经济不同成分的发展问题。共同纲领只是指出，国有经济起领导作用。宪法草案则强调，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优先发展，国有经济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宪法草案也指出，国家将鼓励并致力于发展合作社经济，认为合作社生产的发展是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小生产者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同时，国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的财产，使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将在生产上给农民以帮助。

现行法律没有对富农经济的发展做出限制。宪法草案规定，“国家对富农所有制推行的政策是逐步予以消除”。

宪法草案宣布，“矿产、河流、森林、大块荒地”都是人民的财产。根据农业改革法，中国的土地属于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根据法律“强行赎买、征用城市和农村中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

宪法草案也确定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正如第10条所规定的，国家根据法律保护民族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国家禁止资本垄断、投机以及资本家从事其他危害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行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政策是为了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资本转变为国家资本，并逐渐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10条的上述规定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同时该条还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如下：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利国利民的积极成分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分和消极作用。”同第10条所列举的上述内容相比，这种表述实质上并没有规定任何新的东西。这种表述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致可能导致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产生错误的解释。

在对外贸易领域宪法草案也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在中国的共同

纲领中，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对国内贸易予以管理。

中国共产党还适时提出了实施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现行的中共党章的纲领部分提出了实行联邦制的要求。但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既没有提到民族自决权，也没有提到实行联邦制。

宪法草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禁止民族分裂活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

关于这个问题，从宪法草案可以看出，民族自治的行政单位可以是乡镇、县、区、省和自治区。自治区和自治省、区和县的管理机构除了拥有地方权力机构的共同职能之外，还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制定自治政策和单独的执行政策，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宪法草案中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结构也作了重大修改。现在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国家行政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其功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

宪法草案规定的国家权力机构如下：(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国务院；(4)最高国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也是唯一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常务委员会并对其负责，常务委员会履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日常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功能基本上与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功能是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务院，是最高的国家管理机构，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间要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就其功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与现行的国家行政委员会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新的组成成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的性质来说，这一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等同于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宪法草案的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行使如下功能：(1)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和法令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2)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3)颁布大赦和特赦法令；(4)颁布国家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宣布处于战争状态，颁布动员法令。

尽管宪法草案规定，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的基础上实现这些功能，但事实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生效的时间都由主席决定。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一些职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些职能的区别还不够明确。

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其他负责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但是，最高国务会议的功能和权限在宪法草案中没有确定。

宪法草案简化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现行的中国行政划分是：包含几个省的大行政区，以及省、边区、县、地区和乡镇。宪法草案规定了四种类型的行政划分：中央、省、县和乡镇；而对那些实行民族自治的省来说划分为五类：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根据宪法草案，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地方性的国家管理机构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由于地方人民政府以及这些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宪法草案中做出如下规定未必是适宜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任命和罢免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宪法草案中包含了一些新的关于司法机构的内容。取代现行法官任命程序的是确立了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法官的制度。规定了法官的独立原则，只能依据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查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它不仅依赖于上级检察机关，而且还要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则规

定了建立集权的检查体系，确定了检察机关对地方政权的独立性。

与苏联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规定全面的服兵役的义务，授予国务院每年在一定的地区征召公民参军的权力。宪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没有列出单独的一章或一节来对选举制度做出规定。这些问题在宪法草案的各章中都有所反映。

宪法草案第19、23、52和第79条中规定的选举制度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有明显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确定的是多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选举制，也没就进行秘密选举做出规定。关于选举代表的名额和选举的程序宪法草案中也没有做出规定，而是由选举法做出规定。

宪法草案规定，海外华侨也可以被选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需要在海外组织选举，这在事实上很难实现。

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依据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或被限制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宪法草案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依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与苏联宪法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没有规定国家同宗教相分离。宪法草案中只是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应该说，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条款不甚清楚，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第74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指出，检察机关“有权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第5条中的“所有制”一词用“所有制形式”来表述更为正确一些。或许，这些不当的表述是由于翻译的错误。

我们认为，可以向中共中央作如下通报：

1.根据中共中央的意愿，苏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

了研究。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正确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从法律上把这些成就固定了下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确定及其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的确定是非常充分的和正确的。

2.如果中共中央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希望能够对如下问题再好好考虑考虑：

(1)宪法草案规定，年满18岁的所有中国公民，无论其民族和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宪法草案没有对选举权进行全面的規定。或许在宪法中应该对选举权做出全面的規定，特别是要强调，对一些剥削阶级的代表政治权利的剥夺具有临时性。

(2)宪法草案的第10条就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了正确的規定。同时，在我们看来，这一条在表述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即“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成份和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成份和消极作用”。或许这一表述应该准确一些。

(3)为了预防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工作中的重复，最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能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同时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和权限做出更加严格的界定。

(4)应该注意，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么在宪法草案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任命和罢免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第41条，第3项)是否合适？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62-97

№21410 鲁坚科对中国宪法草案的修订意见(1954年4月1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M.A.苏斯洛夫同志：

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归还给你，同时把我对该草案的修改意见提供给你。

附2页文本。

P.鲁坚科 [17]

1954年4月14日

附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法律的履行将进行什么样的监督，在对宪法草案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

宪法草案第36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实行实施监督”。但是没有指出，它将借助于那些特别的机构实施这种监督。

宪法草案规定，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并设立总检察长的职务。但是检察院在对法律(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的话)进行监督问题上的作用是不明确的。

第73条指出，监察机构“对政府、政府负责人和公民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监督”。很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正确的(如果翻译准确的话)。检察院不能对犯罪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通过对犯人判刑产生的警示作用，来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同样，检察院也不能对一些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而是采取措施消除这些违法活动。

因此，在论述检察院的功能的时候，应该指出，它们的功能是对所有机构、负责人和个别公民对法律的履行实施监督(或者对法律进行监督)。

苏联宪法对检察院的监督做出了规定，也规定了检察院对严格履行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苏联宪法第113页)。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宪法草案不使用这些术语。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它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建立严格集中的检察机关，对全国法律的严格履行实施监督非常重要，因此这一检查机构应该对法律实施最高的监督。这些都将强调对法律进行监督的功能，强调在国家、集体和其他的组织中贯彻遵纪守法的任务，其他的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也不例外。同样，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

P.鲁坚科

1954年4月14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119 121

法草案的结论(1954年4月14日)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苏联外交部准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递交给您，该宪法草案是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今年3月23日交给我们的。

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最新翻译文本已经在4月12日交给您。 [18]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4月14日

第128BK号

副本

第1655BK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结论

一、对宪法草案以及主要条款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基础是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宪法草案的制定中也考虑到了1951年通过的关于民族自治区国家权力机构建设的规章制度，1953年的选举法。该宪法草案反映了1949—1954年期间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

此外，宪法草案中还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新条款，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提出的一些具有纲领性的任务。

引人注目的是宪法草案中的如下条款：

1.宪法草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如果说，在1949年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曾承认，需要就中国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做出一些指示(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过)，那么，由于人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宪法草案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宪法草案的前言)。

宪法草案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新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2.由于宪法草案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就要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中国不同的经济成分在今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共同纲领规定，所有的社会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应该得到发展，而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只是对其他各种经济成分起领导作用，而宪法草案强调的则是国有经济成分的优先发展(第6条)。

如果说现在只是对私营企业、对工人和职员的剥削作了一些限制，那么宪法草案则规定，逐步消灭各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第4条)。

3.以新的方式确定了对富农经济的政策。

1949—1950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擅自采取措施限制甚至消灭富农经济，1950年6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批评了这种擅自行为，并且指出，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还为时过早。

宪法草案包含了一些新的条款(第8条)，其中指出，“国家对富农剥削制度的政策是对其进行限制，并逐步予以消灭”。

4.宪法草案确认了1950年农业改革法的一些条款，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其转交给农民所有，同时，宪法草案规定，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把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第12条)。

宪法草案首次规定，矿产、水流、森林、大片荒地属于国家，由国家或集体组织受国家的委托开发，或者租给其他人开发(第6条)。

5.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阶级成分的确定问题上，宪法草案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所不同。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

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宪法草案在指出国家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同时，则没有再指出其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宪法草案第1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6.在对外贸易领域的规定有了重大的变化。

共同纲领指出，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监管，但是宪法草案则规定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第15条)。

7.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3条)。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是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

宪法中没有规定，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直至与国家相分离，尽管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直至国家分离，其中包括，这一点被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固定下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宪法草案中没有什么不同于1949年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内容。

8.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把中国统一的人民民主战线保留下来，用其作为“把全国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武器，来完成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前言)。

9.宪法草案中保留了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的政治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第19条)，这一点在1949年就已经做出了规定(这一限制大概涉及2%—3%的选民)。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制度(第19、23、52条)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中规定的选举制度截然不同。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选举权尚不是全面的。从城市和农村居民中选举国家权力机构代表的名额还没有通过法律和宪法固定下来。没有规定进行秘密选举。

中国选举制度的特点在国民党的宪法中也有所表现，也允许一些海外华侨作为特别代表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3条)。这就需要在海外主权国家的领土上组织选举，这在实际上很难办到。

10.宪法草案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的规定有了重大变化。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中央人民政府；(3)国家行政委员会。

取代这些的是，宪法草案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4)国务院；(5)最高国务会议。

宪法草案规定，在国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赋予其职能的性质来说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第35条)，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现行的中央人民政府。

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取代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国务院的职能与原先存在的机构的职能几乎没有区别。

因此，中国政府机构组成的新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

11.根据宪法草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权力和权限，这一制度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主席(总统)制。

正如上述所述，根据第35条，宪法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从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日常工作的机构”。与此同时，宪法草案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做出了规定，就其职权来说，这一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类似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一些职能的重复。

根据宪法草案第41条和其他条款的规定，授予主席的一些权限也是属于其他一些机构的职权。

比如，第41条(第16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全国人大决议的基础上任命和撤换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第26条第5项规定，国务院总理候选人以及国务院的组成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根据第29条的规定，撤换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其他成员也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拥有的一些职权与全国人大的一些职权

是重复的。这不符合宪法草案第21条规定的原则，该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颁布立法文件，颁布大赦和特赦的命令，颁布处于军事状态的命令，以及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第41条第1、4、5项规定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置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上，因为，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和做出的决议的生效的时间都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41条的第3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任命和罢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或自治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根据第51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第41条的第3项内容同第51条相矛盾。

必须注意到，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设立了总统。波兰曾在很长的时间内设立了独立的总统，根据1952年宪法，以集体的机构——国家委员会取而代之。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除了拥有广泛的权限之外，根据第41条的规定，还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还对国家的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建立类似部的从属于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最高的军事管理机构，关于这一点宪法草案中没有规定。迄今为止代替这一机构的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宪法草案规定组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领导的国防军事委员会。

现行的共同纲领也没有规定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根据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情况下召集最高国务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的人员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的负责人，尽管宪法草案没有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和权限进行准确的规定(第41条，第6项)。

13.宪法草案简化了中国现行的行政领土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的行政领土划分包括七个部分(中央、大行政区、省、边区、县、区和乡镇)，取代这七个部分的是，宪法草案中规定了5个部分(中央、省、自治区、县和乡镇)。

14.宪法草案首次规定，国家的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其选

举产生并对其进行监督的机构负责，向其报告自己的工作。宪法草案也规定了撤换当选的代表的权力(第53条)。

15.关于法院和检察院今后的民主化，宪法草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内容。比如，宪法草案规定，法官通过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替现行的对法官进行任命的制度(第59条)。宪法草案宣布了法官的独立原则，规定其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只能依据法律(第71条)。

宪法草案还确定了被告辩护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

16.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机构建立在双重从属的基础上，并且在行使自己职责的时候不仅依赖于上级监察机构，而且还依赖于地方人民政府。宪法草案提出了检察院进行集权建设，并且宣布了监察机构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独立于地方政府(第76条)。

1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草案特别列出了第三章(第78—94条)。

该章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新的权利，这些权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以及在1950—1954年颁布的其他立法文件中都是没有的。宪法草案对公民的新的权利的规定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权；休息权；在年迈、生病或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教育权；上诉的权利。

宪法草案强调，国家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第89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一个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在国外生活着1000多万中国人。

宪法草案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其中包括：保护社会财产的义务；纳税的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义务；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

18.正如以前的宪法文件性一样，宪法草案没有直接规定实行全面服兵役的制度，尽管指出，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职责。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指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

二、结论和建议

宪法草案从总体上考虑到了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建设的经验，指出了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可以作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予以讨论和通过。

可以提出一些需要准确和进行修改的地方。

1.第7条未必需要把个别的合作社经济成分评定为“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中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尽管这些宪法中有关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合作社的概念。

2.宣布实行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以及更加突出对选举权进行临时性的限制，或许会使人们忽视中国同邻国朝鲜和蒙古的不同。

3.第41—44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使主席的职权如此之大，这需要仔细考虑考虑，需要更加准确地界定其同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和职权。

4.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一些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第四部分，没有指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同地方人民政府职权的区别。第51条和第57条谈论的是关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职权是一样的，同时，地方人民政府从属于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

5.根据宪法草案的精神和意义，由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应该把第41条，地方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命和罢免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范围之内。

或许不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人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因为他们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只能批准他们的任命。

6.宪法草案中的个别条款需要准确一些。

(1)让人不清楚的是，根据第48条第2项内容，国务院就什么性质的建议，或者就哪些问题提交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议。

(2)第74条需要准确一些，因为检查机构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它们对法律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并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3)第80条没有指出对自由和民主的保障，但是苏联宪法的重心正是放在对自由的保障问题上。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也是这样。

(4)应当注意的是，宪法草案中缺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条款。或许在第2条中应该谈到这个问题。

(5)第95条和96条谈论的是关于国徽和国旗，其中必须准确说明，五角星指的是什么。

1954年4月14日

第311号

手写批注：

归档。

请把这份文件归入1954年3月23日的第9478号机密文件。

И.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8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6, л.131-145

№14581 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

机密

1954年4月15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五大国会议的问题

(情况报告)

1月25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开幕。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以下问题：

1.关于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和召集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等五国外长会议。

2.德国问题和确保欧洲安全的任务。

3.关于奥地利国家条约。

在会议上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极力回避讨论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坚持要求此次柏林会议只限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经过了两天的协商，最终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还是被与会者采纳。不过，对此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他们接受了苏联代表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并不表明自己同意了日程中诸条款的表述方式及其具体内容。

在坚决要求讨论会议议事日程问题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还提出如下建议，即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世界五大强国外交部长会议是一个早就应该做的事，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所有世界强国只有齐心协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才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里，苏联代表团又指出：联合国安理会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而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安理会的所有重大决定均应当在法、英、美、苏、中——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

苏联代表团指出，目前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上述最重要的条款无法得以履行，原因在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国政府无法以代表的身份进入联合国。由于一个国家——美国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无法恢复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当前，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的、错误的做法已是如此地无法让人容忍了。

苏联代表团还指出了当前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问题，如大规模裁军(尤其是裁减各世界强国的军队)；通过相关决议以禁止生产核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此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督，其中作为禁止此类武器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求各国政府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解决包括恢复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在内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重大意义。因为此举对今后解决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国注意，目前已经有25个大小不同的国家(包括近10亿人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一个

独立的亚洲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政治上的联系，或者至少，不希望调整与中国的政治或经济关系。很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那些隶属于北约的国家在内，也都承认有必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联系。

时至今日，只是在南、北美洲区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下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但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无需过多解释也会一目了然。苏联政府认为这一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苏联代表团声称，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将会大大地有助于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和健康发展。

杜勒斯首先发言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他老调重弹式地继续就朝鲜战争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并称其之为“侵略者”。他还以美国人在朝鲜的损失数据——15万人伤亡——作为论据。

杜勒斯声称，美国不同意出席有中国参加的旨在讨论国际和平问题的五国会议。不过，他也补充道，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并不拒绝与新中国探讨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和在朝鲜板门店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进行谈判。在继续反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同时，杜勒斯极力试图将该会议描绘为似乎是五大国打算借此来领导世界其他国家。

针对杜勒斯的攻讦和对联合国通过的所谓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的引证，苏联代表团回击道，苏联政府继续坚持本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提出的观点，即联合国通过的所谓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错误的、不真实的，这个决议只能对联合国的威望造成损害。

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朝鲜战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IIIIP [19] 的帮助下才得以停止的。正是由于周恩来和金日成于1953年3月底发表了讲话之后，朝鲜战争才得以结束，美、英、中、朝等国的士兵才得以返回祖国。苏联代表团指出，我们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该国在巩固世界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杜勒斯在1月27日的发言中再次声称，美国拒绝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援引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并坚持认为柏林四国会议只能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杜勒斯强调，在解决朝鲜的政治问题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之时才有必要召集此类五国会议。在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其他问题的同时，杜勒斯也表示可以在联合国或者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方式进行关于此类问

题的讨论。杜勒斯建议，本次会议“不对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做出任何决议，而直接转入讨论第二、三项议题，即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等问题”。

虽然与杜勒斯不同，皮杜尔声称，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承认五大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但也重复了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这些大国“在管理世界方面并不拥有特权”。关于中国参加五国会议的问题，皮杜尔认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建立联系或进行谈判，但他反对现在就召集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皮杜尔提出的理由似乎是中国政府“帮助并导致了印度支那战争的久拖不决”，因此“在印度支那的情况未发生变化和中国没有改变自己既定的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之前，法国政府不打算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他补充道，如果(印度支那)情况发生变化，那么法国政府将会“根据新情况”对已有国际形势做出决策。

在重复了法国以往的不拒绝“保持接触和联系”的对华政策的同时，皮杜尔又强调，在亚洲有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朝鲜问题；其二，东南亚问题。皮杜尔声称，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在板门店的谈判；至于第二个——印度支那问题，他认为也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协商的解决方式也适用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皮杜尔补充道，他本人并不拒绝讨论和采用其他可能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引证说，在这方面至今我们还未曾尝试过使用外交手段。

对于上述问题，艾登的立场可归结如下：重复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即此次会谈必须“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入手”。他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即解决和平问题并非五大国的特权。艾登强调，当前亚洲的问题(包括朝鲜和印度支那等问题在内)是导致“世界局势紧张和诸多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根源”。他重复了美国人凭空提出的所谓“缺乏证据”的论断，即无法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会协助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等亚洲问题的诚意。

关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将在五大国会议上讨论各国裁减军队和禁止军备竞赛的声明，艾登声称，自己认为这一问题最好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在指出上述三国代表对召集五国会议的提案提出反对意见和附加条件的做法不合情理的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上述三人杜勒斯、艾登，

尤其是皮杜尔，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均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召集五国会议附加了多种限制和条件。对此，苏联代表团再次强调，在召集五国会议时既应参考上述三人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到会议讨论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亚洲问题，即它应当讨论当前对世界和平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其他国际问题。

在1月28日的讨论过程中，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等人再次试图否定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有利于召集五国会议的证据。为达此目的，杜勒斯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认为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似乎是打算将联合国的所有重要职能都转交由五国会议承担，并以五国会议替代联合国组织。杜勒斯继续发表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敌视性言论，并对周恩来本人提出了指责。最终，在未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杜勒斯便要求开始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

皮杜尔在发言中继续对召集五国会议的合理性问题表示了“疑虑”，并对中国“侵略印度支那”提出谴责。皮杜尔反对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关于裁减武器问题的讨论，并论证说此类问题本应由联合国负责解决。皮杜尔声称，“在世界各地仍存在着战争”的情况下讨论关于裁减武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政府不希望在当前条件和形势下让中国参与五国会议并讨论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关于禁止与中国贸易皮杜尔的解释是：法国人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商品，以便后者可能利用这些商品来反对分布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当然，“如果中国将改变自己的以往立场，法国也会重新考虑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皮杜尔声称，法国政府准备利用任何机会以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和方式结束本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和恢复那里的和平。皮杜尔试图对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作一小结，他说，虽然与会者的立场彼此差异较大，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根本无法协调。

艾登继续表示反对召集五国会议，并援引说举行如此大型的会议是没有“先例”的。他认为，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与大国有关的实际问题”，其讨论都不应当采取召开五大国会议的方式，因为这些国际问题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利益，不应在有限的只有几个国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讨论。艾登表示，应当解决亚洲所存在的政治问题(如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并寻求策略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将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一段时间，而先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因为各方仍需要一些时间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交换意见”，

尔后再重新讨论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

作为答复，苏联代表团指出，上述三人的论断都是不合情理的。后者的意思是：似乎苏联的建议是想以五国会议来取代联合国。苏联代表团声称，苏联坚守联合国宪章，并始终致力于它的真正实现。苏联之所以提出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也是援引了联合国1948年第三次大会和1950年第五次大会对各大国所发出的特别倡议，即各强国应当以集体或其他方式集会，以便对那些可能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和对联合国工作造成阻碍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消除分歧和相互妥协的目的。另外，苏联代表团也注意到，西方强国经常会召集三国外长会议，并且不限制此类会议的议事日程。

针对上述三人提出的关于裁军问题是联合国的职能范围，苏联代表团则以1952年5月美、英、法三国向裁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确定和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的军队数量的建议作为证据，并指出这充分说明上述三国是承认大国在裁军问题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的。苏联代表团还提请与会者注意，在上述美、英、法三国建议中除了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数量作了限定，也对五大国的军队数量作了协议性的规定。

针对杜勒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和攻击，苏联代表团声称，如果中国代表参加了此类会议，那它就必然会对杜勒斯所说的话做出应有的答复。因此后者所发表的此类攻击性言论，纯属无的放矢，既有失公正，也不足为信。苏联代表团还指出，杜勒斯对中国所提出的指责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因为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资料都是源自国民党。苏联代表团声称：中国并不是侵略者，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失误、不足和别人所犯的错误负责。如果说，中国有必要对某些人提出指责，或受了委屈，那倒是确有其事，因为它的确受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后者的不齿做法与苏联与中国之间在平等、相互承认权利的那种友好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代表团提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可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达成基本的一致，即与会者对召集五国会议持不反对态度，虽然召开此类会议的目标尚未达到共识。

杜勒斯表示反对这一结论，并声称“美国不同意召集有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的建议”，虽然美国并不反对与中国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因为后者并不属于五国会议的性质。

皮杜尔赞成以“谈判原则”来解决亚洲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认为关于

此类谈判的性质、谈判的参加者和所要讨论的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协商。对此，他又再次重申必须“确保(对方)在谈判开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苏联代表团指出，看来既然与会者都希望继续通过协商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我们对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事情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参加本次会议的四国外长将根据相关委员会的报告再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讨论。针对苏联代表团的这一提议，杜勒斯、皮杜尔和艾登先后表示，他们不愿意接受关于委员会的决定，但准备近期内四国外长在小范围内举行会面以讨论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点内容。苏联代表团保留了关于在此类会议期间再次提出关于建立上述委员会的问题的权利。

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还建议召集关于全面裁军的世界性会议(该建议内容已提前向中国政府作了相关通报)。

在1月29日的会议上，杜勒斯企图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建议，并提议讨论德国。

作为回应，苏联代表团提请与会者注意裁军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如果其他三国代表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让人难以理解。

杜勒斯以召集此类会议的问题已在联合国作过相关决议为由，坚持会议转入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严重问题”。

皮杜尔提议在会议间隙讨论“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并将美、英、法以前向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委员会提交的提案作为该草案的基础。所有这些提案都包括在已签署的联合国文件：“关于全面性裁军的纲领性协议”；“确保国际监督，只为国家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安全保留必要的军队”，等等。该草案还包括如下内容：要求无条件禁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地谴责一切帮助和支持侵略的活动等。草案建议，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组成的裁军委员会就裁军的一系列主要原则达成一致，以便“在适当条件下根据联合国大会1952年1月11日相关决议有可能召开一次成功的全面的裁军会议”。

在将自己提出的关于召集全面裁军会议的草案与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性提案相互比较之后，皮杜尔建议，自己所提出的草案将与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近期由四国部长举行的特别会议更小范围内进行讨论。

艾登表示不同意接受苏联代表团的提议，理由如下：“裁军的进程”主要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强弱和国际间互信的恢复程度而定。在支持皮杜尔的提议——将法国的提案在部长会议小范围内讨论的同时，艾登坚持要求开始讨论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建议将上述两个提案——苏联的和法国的——都交由小范围内召开的会议上审议。这一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同意。

此次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和召集五大国会议等问题。会议进程表明，西方强国一方面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五国会议的建议，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政治和策略角度出发认为直接拒绝这一建议会对自己不利。

АВІРФ, ф.0100, оп.47, п.389, д.107, л.8-20

№09863 尤金致库兹涅佐夫报告：中国请求在反宣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4年4月15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库兹涅佐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请求苏联在中国同“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和国民党广播电台所进行的反动广播宣传作斗争中给予技术援助。

备忘录是由伍修权同志于1954年4月3日交给瓦西科夫同志的。

附正文3页，存档2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尤金

附件：

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一、根据我国广播事业局报告，“美国之音”及台湾匪帮对我国的反动宣传通过无线电台正在不断地加强。现在在北京用普通五灯收音机接收，可以收听“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及台湾匪帮的广播共35个频率，计“美国之音”3个中波频率，13个短波频率；“联合国军之声”4个中波

频率，2个短波频率；“联合国”无线电台3个短波频率；台湾匪帮广播4个中波频率，6个短波频率。“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无线电广播，不仅进行无耻的造谣诬蔑，并用以指挥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二、我国广播事业局为了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已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济南、厦门、武汉、广州、福州等14个城市设立了小型干扰台，以200余部干扰机对中波波段的“美国之音”和台湾匪帮的反动宣传进行干扰。但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小发射台电力太弱，收效甚微，沿海地区利用无线电晶体收音机即可收听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短波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

三、鉴于同上述有危害性的反动广播宣传进行斗争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必须在沿海地区有重点地建立干扰台，用以干扰上述反动广播宣传，并应采取其他可能的措施。中国方面在对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方面非常缺乏经验，故请求苏联政府考虑在同反动广播宣传的斗争中给予我们技术援助的可能性。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д.52, л.22-25

№08809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派人到 苏联考察边防工作(1954年5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的请求，我报告：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接待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10人)前来考察国家边界守卫的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请审阅。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派中国公安部工作人员小组(8名工作人员，2名翻译)前来苏联学习边防勤务组织经验的请求。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和饮食，给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边防守卫工作人员小组介绍国家边界的守卫组织、检查站工作制度、边防军实施侦察的原则以及其他边防勤务问题。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50, л.359-360

№25152 戈杜诺夫与姚仲明会谈纪要：缅甸政治运动状况(1954年6月1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呈此件介绍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Д.А.戈杜诺夫同志与中国驻缅甸特任全权大使姚仲明的会谈记录。会谈于1954年6月15日举行。

附上述文件——归档，第1479/ЮБА号；第三份文本，其中9页机密和24页非机密；仅送本人。

К.诺维科夫(签名)

第2-3и号

第一份交本人，第二份归档

第737/ЮБА号

1954年7月24日

附件：

摘自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Д.А.戈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7月24日

机密

第226号

同中国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于1956年6月15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会谈纪要

姚仲明在会谈时简要地讲述了缅甸人民民主运动的状况，以及从缅甸共产党领导人的角度谈了有关领导运动的情况。

姚仲明说，众所周知，随着1942年日本人占领缅甸后，那时还颇具影响力的德钦党 [20] 的领导人与日本人妥协并合作，以图彻底结束英国人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进入缅甸之前，有多达30名德钦党人从缅甸逃往中国，但在半路上被日本人截获，并送往东京“学习”。这些人里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昂山将军、波儒昂(Бо Жму Аунг)上校、波塞(Бо Сэ)少校、波昂显

雅(Бо Аунг Зейя)少校(现在是缅甸共产党最具权威的军事专家)等等。所有这些在日本受过训练后的德钦党人与入侵这个国家的日本军队同时来到了缅甸，并在最初阶段就与日本占领者进行了合作。

但是占领缅甸的日本人用新的方式对缅甸人进行压迫和掠夺，比英国殖民统治更为残酷。

结果，所有激进党都与德钦党人一起开始召集力量与日本占领者斗争。

大约在1941年，德钦党和缅甸其他政党及团体中更为激进的人首次成立了缅甸共产党，该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组织民众与日本占领者作斗争。这样的组织成立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和组织一起加入了它的队伍。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民众团体：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АФЛНО)，里面有不下10个不同的政党和团体(左派、温和派、右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任务是与日本法西斯作斗争并解放缅甸。

..... [21]

昂山支持所有改良主义政党和团体，他们是力求坚持在社会改革范围内的运动。

德钦丹东支持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是竭力要扩大运动，并以在缅甸建立人民民族共和国为目标。

最初支持共产党的是当时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和进步运动活动家吴登佩敏(目前他是缅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当时吴登佩敏在缅甸共产党主管财务，并支持德钦丹东的政治方针。缅甸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德钦梭还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阶段就犯了左倾性质的错误，造成党内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存在分裂的随后几年里，对于缅甸运动和斗争性质问题，共产党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更趋明显，这些都加剧了缅甸共产党的内部斗争。

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认为，可以继续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直到他们耗尽自身革命的可能性并将自己暴露在广大民众面前。

德钦梭不同意这样的论点，更倾向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决裂，将缅甸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以组织反对他们的斗争。

可是德钦丹东和吴登佩敏不赞成德钦梭的观点，缅甸共产党领导层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当时领导缅甸共产党活动的印度共产党，本身在其实际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结果是无法及时的、详细的分析.....

.....

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后来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改良主义错误，非常严厉地做了自我批评。1942—1943年间，在一系列会议和与党内同志的私人谈话时，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说“如果我犯了错，就批评我”，但不可能将党的领导权转交给德钦梭，因为他工作一贯采用领袖至上主义。

至于吴登佩敏，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针对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继续为自己进行辩解。

缅甸共产党在运动领导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德钦梭在党内拉帮结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缅甸共产党同样的一个共产党——“红旗党”。同时，他指责德钦丹东，说后者维护“白旗党”的利益。从此以后，仍与德钦丹东在一起的部分缅甸共产党党员开始被称为“白旗党”，以示与“红旗党”的区别。

在如何对待国内运动和对对待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问题上，缅甸共产党内部的最终分裂发生在1946年，即德钦丹东和缅甸共产党党内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仍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为的是能最终揭露同盟的领导人背叛缅甸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将他们吸引到缅甸共产党

这边来。

德钦梭的拥护者要求马上拒绝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并与该组织展开公开的斗争。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知道这些后，通过了将缅甸共产党开除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决定，并付诸实行。德钦丹东深信，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路线方针将危害人民民主运动，他带领缅甸共产党脱离了当时还领导缅甸劳动者统一民族阵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

1952—1953年间，在“白色左派”.....分支基础上创建了第一个政党——人民同志党，该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对国内运动的领导和立场。

如果缅甸共产党在退出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而后再能增强自己的势力，在日益增加的危险面前重新真正的联合起来，从反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下走出来，后者就无法掌握住国内的政权。

还能解释这一点的是，广泛的民族运动在1946—1947年极大地破坏了英国人在缅甸的统治和影响，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右翼社会主义领导人对他们的控制却还刚刚建立。

仅仅是因为英国走狗1947年7月19日在仰光的暗杀行为，结果昂山将军(那时他开始倾向缅甸共产党方面展开民主主义运动)和剩下的6名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政府成员)在总督在场的情况下，在国会大楼里被杀害了，国内的局势对劳动大众方面来说急剧恶化。

在这项针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阴谋之后，来了以德钦努(现在是总理吴努)为首的英国走狗和英国人，这样就掌握了对缅甸行政的控制。

在最后的三四年里，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在缅甸加强了活动，削弱了这种控制，以致缅甸政府的部分成员拒绝与英国接触，越来越倾向与美国巩固关系(吴克迎等人)。

大家都知道，1947年德钦努当时在印度签署了协议。这是英国人强加于缅甸的有关承认缅甸的债务和有关军事、航空和航海的代表团驻留缅甸等协议。

吴努向英国人投降的消息引起了所有正直的缅甸人心中强烈抗议。缅甸共产党利用这样的局面，向人们发出.....

.....

缅甸共产党领导人查明吴登佩敏已成为叛徒，并转为政府服务。他参与对缅甸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但做得很隐蔽，可有时却公开拥护缅甸共产党和国内的进步力量。

至于德钦丹东，在缅甸对他的评价，他就是一位严肃的、颇具影响力的和训练有素的缅甸共产党领导人。在缅甸共产党党内和缅甸广大劳苦大众眼里，他被认为是有一个有作为的人。目前他正率领缅甸的共产党员和劳苦大众与右翼社会主义政府作斗争，领导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解放区的建设，尽管在最近几年有所减少。

如果说吴登佩敏喜欢写更多不同的文章和论文，如果说德钦梭喜欢对运动大肆议论和写“有思想性”的文章，那么，德钦丹东就是更喜欢在党和运动中做实际工作。

话题回到缅甸各派势力在运动中的历史时，姚仲明说，从1948年开始的国内战争最初阶段，尽管缅甸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分裂，但它的势力和影响都颇具规模。

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缅甸共产党任命德钦丹东为党主席。党的机构从这时开始由中央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德钦丹东在上述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进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丹妙(Тан Мьяинг)将军、显雅(Зейя)、赛义津(Сейн

Тин)、梭貌(Со Маунг)、尧东(Йо Хтут)等人。中央组织委员会中有：丹妙、德钦丹东、波尧东(Во Йо Тун)等人。

.....

由于力量分散，缅甸共产党党内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分裂，对运动缺乏统一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以及缅甸共产党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和民众的疲倦，民族运动的势力到了这个阶段渐渐地脱离了党的原则，慢慢地放弃了参加斗争和运动，而无可挽回地继续衰弱下去。

缅甸共产党与“红旗党”之间相互的斗争、与人民志愿者组织的领导和起义运动中的克伦族人、克钦族人、孟族人.....和其他民族派别缺乏实际有效的沟通，这些都削弱了整个为击溃反动势力和创建真正的缅甸人民民主政府的革命势头。

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的局势大约一直持续到1952年的中期，这时的缅甸共产党、“红旗党”和民族志愿者团体的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党必须团结，以及必须要共同指挥和行政上领导解放区和经济基地的组织。

众所周知，1952年3个政党的领导人对此目的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关联合自己所有的力量(党的、军事的、行政上的和经济上的力量)为积极展开反对右翼社会主义政府斗争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决议才过了差不多2年，各进步力量却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到最后时期这些党的队伍都分散了，只能在形成有利于敌人的情况下冒着危险和恐惧孤立地进行游击战。

缅甸右翼社会主义政府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解放区进行围剿，缩小其地域。政府竭力将这些革命队伍驱赶入缺少粮食、群众基础和经济条件很差并且人烟稀少的山区。这导致近来一些零散队伍和起义者团体，甚至缅甸共产党著名的高级人员——郭克朗貌(КоКлангМаунг)等人——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

.....

会谈结束时，对于缅甸共产党领导在组织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各派力量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作斗争方面的失败，姚仲明将其主要原因归结如下：

当运动在军事、政治和管理方面力求有效的统一行动而发现面临分裂的危险时，缅甸共产党至今还在犯严重的错误。此外，每个领导人都在竭力亲自继续对“自己”的党和运动进行领导，以使自己能在人民民主运动历史上留名。

每个领导人竭力将党和运动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下，自身一点不具备谦虚和勇气为了共同的革命任务甘愿服从其他领导，将自己分散的队伍服从于统一的军事指挥，正是这些使民族大众的运动注定无所作为和遭受可能的失败。这些“忘却”了人民民族运动结果的党领导人置个人的成就高于一切，并因此给整个缅甸大众的人民民主运动带来了无法消除的危害。

三个党派的委员会放着实际的、同心合力的工作不做，而是经常在会议上分析自己在运动中犯过的错误，至今没能明白，如果他们现在还不集中自己的努力，不停止分析过去的错误，他们就可能遭受重大的失败，并导致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整个运动走向崩溃。

.....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使用的是中文。

结论：

根据中国大使姚仲明通报的情况，以及苏联大使馆通过官方定期刊物和文件的着重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缅甸共产党目前的情况令人深感担忧，需要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方面与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共同尽快采取协助、建议和帮助的措施。

对此事宜的做法是，尽快在云南(中国)某地组织安排非正式会见，邀请缅甸共产党的领导同

志(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听取他们有关缅甸共产党内部事件的情况,坚决建议缅甸共产党停止党内的意见分歧,采取措施动员所有的力量开展人民民主运动,并以此避免革命队伍的失败,防止党和缅甸整个进步运动面临失败的状况。缅甸共产党的失败和民族民主统一阵线(ЕНДФ)的运动可能将缅甸从一个“中立”国家转变为公开协助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的国家。

备注:会谈时附送有缅甸北部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简要报告,此报告在今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并刊登在亲美的反动英文报《民族报》(Найци)上(今年6月16、17、18、19日),该报纸在仰光出版,通常消息很灵通。苏联大使馆不怀疑这份报告的存在。至于对报告中一系列情况的评论,可以认为是报纸编辑故意所为。报告中对政府不利的章节被修饰或完全删掉,同时.....

但全面评论这份报告可以看到,缅甸共产党政治局的情况.....并要求采取组织措施以使党的队伍健全起来和加强群众工作。

附件共24页,非机密。 [22]

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Д.戈杜诺夫(签名)

打印5份:第一份送部长会议;第二、三份送东南亚司;第四份送图加里诺夫同志;第五份归档

第216号

经办:戈杜诺夫

打印:叶戈罗娃

1954年6月22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资料已在我处工作中使用。

处长..... [23]

9月26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245, л.21-30

№09931 佐林致谢罗夫函:苏联是否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活动(1954年6月17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第074/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А.谢罗夫同志：

据苏联驻阿勒泰 [24] 领事卡瓦列罗夫同志报告，领事馆工作人员别洛夫同志得到指示：恢复无线电台活动，而不必在中国当局登记。您知道，中国政府1950年曾声明，苏联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进行任何侦察活动。有鉴于此，请告知苏联外交部，现在是否确实有必要在阿勒泰恢复无线电台的工作，苏联外交部如何向中国当局解释此事。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佐林(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д.53, л.155

№09929 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 (1954年6月28日)

发文第1/4748号

机密

第1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A.佐林同志：

复1954年5月21日第791/ДВ号文。

苏联驻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在1953年的总结报告关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工作一节中，正确地指出了在领导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以及违反平等原则和该公司某些苏联领导人不正确对待中方领导人的事实。

现将外贸部就改进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活动、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报您。

1954年1月，派E.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今年2月，派了公司总会计师和8名主任会计师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整顿会计工作，今年头5个月，共派遣了79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

差，其中会计人员20人，矿山地质专家14人，选矿工程师4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16人。

为了帮助选矿厂和电厂实际完成安装工程，今年2月向喀什矿务局派遣了专家小组，在他们的帮助下，安装工程已经结束，选矿厂和电厂已于今年4月投产。

今年3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1954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地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1954年拨出1629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427亿元，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1202亿元。

1954年4月，外贸部部委会听取了苏中石油公司和苏中金属公司的工作报告。按照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根据部委会会议对该问题的讨论结果，我们起草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两中苏股份公司生产和财务工作的报告以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4—1957年两公司今后发展前景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了克服公司工作中严重缺点的实际措施。

今年5月24日，我们派了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

此外，我已于5月指示这两个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涅列京同志和沃斯克列夫斯基同志采取相应的措施，今年不得发生过去存在的那种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并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办理工作转移到苏驻乌鲁木齐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Я.尤申 [25]

ЦХСД, ф.5, оп.4, д.136, л.156-157

№09930 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1954年7月5日)

第1007/ДВ号

致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C.H.卡赞斯基同志：

复1954年3月21日第45号电。

据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尤申同志)通报，外贸部已就改善两股份公司工作、消除违反平等原则现象以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在1953年报告中指出的其他问题采取了必要措施。

1954年1月，已派沃斯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1954年2月，又派总会计师和8名主任会计师赴苏中金属公司，今年头5个月，共派遣了79人到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出差，其中会计人员20人，矿山地质专家14人，选矿工程师4人，电器机械部门工程师16人。

1954年3月，苏联国外财产总局生产处因公在中国出差的几名工程师与公司和公司下属企业领导人一起，对公司企业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了检查，并且制订了1954年改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的措施。

为了改善各公司企业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计划规定1954年拨出1629亿元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其中为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拨款247亿元 [26]，为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拨款1202亿元。

今年5月24日，以总局副局长什马科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已赴华，与中方研究公司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初步商定公司的发展前景，采取措施克服股份公司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此外，已指示两公司总经理将苏方机密公文的工作转移到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分部。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费德林

№21415 阿尔希波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关于中国的农业 状况(1954年6月30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4年6月30日

第518号

机密

致苏共中央书记

Н.С.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您的委托兹向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现状。

附上述内容共21页(非机密)。

仅发给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组长

И.阿尔希波夫(签名)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中国现有耕地约1.05亿公顷；估计，国内可以用于耕种和农业生产的土地共计约2亿公顷。但要开发新土地，便需要国家大量投资。

据最新资料，国内现有农户1.134亿，农业人口4.936亿，其中近半数拥有劳动能力。

国内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拥有约0.21公顷耕地，而拥有的尚未开发的土地量大致也是这样。中国各区域人均土地数量差异很大(参见下表：中国各地区农业人口、耕地、未开发土地面积和现有耕地人均数量)。

..... [27]

在中国农业部工作的苏联农业专家小组由4人组成，其中一名农艺师、两名机械工程师和一名高级顾问——农艺畜牧学家。

该小组近期的任务：

研究中国增加耕地，开发生、熟荒地等相关问题。

帮助中国专家采取相应措施以优化灌溉土地的使用、提高灌区农业产量、防治土壤盐碱化和水资源的正确利用。

研究和总结中国先进农业经验，帮助农户广泛采用新的、先进农艺技术；深耕、土壤秋耕管理、新农业机械。

作物密植、农业良种遴选和培育。

作物适时护理、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农家肥的积累、正确保存和使用。

参与制定和实施畜牧业发展举措——引进绵羊人工授精，建立牲畜交配站和畜牧兽医站，组建饲料基地，采取兽医预防措施。

总结国家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经验，帮助农业机关组建一批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并改善其工作；在大型国营农场推广轮作制、农业新工作法和新型农业机械。

研究和总结各种农民联合的农业形式工作经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方面帮助中国朋友，采用先进农艺技术。

在国内农业科学的组织方面予以帮助，充分利用科学机构来提高农业。

苏联驻中国专家组负责人

И.阿尔希波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高级农业顾问

П.巴列京(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53-74

№13016 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

摘自B.B.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8月27日

绝密

今晚7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我通知他说，苏共中央认为，利用法国有利形势的发展来找到一个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在这次接触中，(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将在7月7日抵达日内瓦，计划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我还通知他，苏共中央的意见是，如果周恩来同志能在7月10日之前到达日内瓦，那将是很好的。我还告诉他，通过苏联驻巴黎和伦

敦的大使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将得到通知，B.M.莫洛托夫将在7月10日之前抵达日内瓦，以便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休息几天。

毛泽东说，他认为我们利用法国正在改善的形势来寻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告诉我，周恩来正在柳州(广西省)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武元甲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7月5日应该有个结果。情况好的话，周恩来可能不早于7月6日或7日回到北京，他可能在7月9日或10日从北京飞抵莫斯科，这样，他实际上只能在7月12日或13日到达日内瓦。

随后，在谈话中，毛谈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结束的会晤。毛说，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一篇从7月3日的《真理报》上翻译过来的针对这次会晤的文章。毛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他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了功劳的丘吉尔，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毛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显然，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就连像丘吉尔这样的保守反动人物也开始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了。

至于美国，毛继续说，他们已在全球扩展了他们的势力，但是，如果发生重大的国际纠纷，对他来说也不好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借助他的侵略政策去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然而，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对美国政策的抵制，指望西德和日本对美国来说也是靠不住的。

在会谈期间，鉴于我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把周恩来7月4日从柳州发回来的电报交给了我(我已经把译好的电报电传到莫斯科去了)。

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的，持续了30分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И.И.萨夫罗诺夫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谈。

B.B.瓦西科夫(临时代办)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79, д.7, л.69-70

№24880 贝内迪克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请求购买东北大麻种子(1954年7月7日)

为了履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2年1月12日做出的第1782号决议，苏联农业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俄罗斯中部大麻种植业中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1952年，南方大麻的种植面积是45200公顷，1953年的种植面积是88100公顷，而1954年的种植面积，根据预定的数据将近14万公顷。

苏联中部南方大麻种植的种子主要基地是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的敖德萨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科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州。近年苏联的育种专家引进了能够快速生长的南方大麻品种。1953年和1954年南方大麻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靠的是使用东北的大麻种子，这些种子来自中国，为的是进行试验。

正如1953年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土地返青时播种东北大麻使商品大麻的产量急剧增加，农民种植大麻的收入也急剧增长。比如，在苏联的白俄罗斯，种植东北大麻的比重在1953年是29%，农民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240%。在坦波夫州，在土地返青时播种的作物80%都是东北大麻，农民们完成了大麻收购计划的596%，而在往年，农民们出售的大麻不超过每公顷45公斤。主要的大麻种植区是库尔斯克州、奥尔洛夫州、奔萨州和高尔基州，摩尔多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这些地区的农民在1953年大面积种植了东北的大麻以及其他南方品种的大麻，并且超额完成了大麻的收购计划。

苏联农业部认为，应该在1955年把在土地返青时种植南方大麻的播种面积保持在1954年的水平，也就是种植14万公顷。

考虑到，预计1954年收购的南方大麻作物的种子只能保障1955年不超过5万公顷的大麻播种面积，因此，苏联农业部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9000吨大麻种子到苏联进行种植，所购种子从中国的北方省份收购，由日用工业消费品部在1955年1—2月提供。

[28]

苏联农业部部长

И.А.贝内迪克托夫

1954年7月7日

РГАЭ, ф.4372, оп.54, д.925, л.92-93

№09973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佐林函：阿勒泰市通讯事宜 (1954年7月8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4年7月8日

第4395/c号

对1954年6月17日第074/ДВ号文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A.佐林同志：

在阿勒泰市及其附近的居民点上，分布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各企业、商务代办处的一个分部及其他苏联代办机构，有300多名苏联公民在这些单位工作。由于阿勒泰与阿拉木图距离遥远(相距1000多公里)，并且缺乏良好的通信线路，我们驻在阿勒泰的工作人员与其在阿拉木图的上级联络十分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在阿勒泰市保留一部电台。根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通报，苏联驻阿勒泰的领事也对该电台的工作表示关切。自1953年12月起，由于更换工作人员，电台曾经一度中断工作。

该电台我们已经使用了15年以上，有关机构对它的存在十分清楚。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当地登记此电台，并向中国同志宣布它恢复工作的时间。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 [29] (签名)

1954年7月8日

№2075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7月16日

机密

莫洛托夫称，他想告知周恩来和范文同同志关于7月15日他同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

同艾登进行的会谈

莫洛托夫：在与我的交谈中，艾登说他还没能就我们(苏联、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对法方的宣言草案做出的修改进行仔细研究，但他想要给出如下初步意见：在宣言的文本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艾登看来，它们应当分开并被分别谈及，因为这些国家各自面临的形势是不同的。艾登得到的答复是(这些国家)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艾登强调，他认为给选举设定一个时间是十分困难的。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即将军事问题从宣言草案中拿掉并将其移入到停战协定当中。

艾登接着说，老挝的代表向其抱怨，他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以来向老挝境内转移人员和武器的加剧趋势并对此感到忧虑。我给予艾登的回应是，这件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老挝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同他们的会谈中并未谈及此事。

莫洛托夫：我告诉艾登，我们还没有收到来自法国代表团关于停战的草案宣言，并且法方给我们的是这份文件草案的一部分。艾登说，此事造成了一些延迟，而现在应当加快对文件的准备。

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

莫洛托夫简要地叙述了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的内容，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选举，分界线以及撤离外国军队的期限。

莫洛托夫说，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即法国只会同意在十六度线以北某处划定一条分界线。

莫洛托夫进一步描述了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一个三方代表会议(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的建议以及他对该建议的反应。

莫洛托夫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恩来说，他同莫洛托夫的立场相同。此外，他认为接受孟戴斯弗朗斯关于举行苏、法、英三国代表会议的建议是明智的。周恩来还补充说，我们不欢迎美国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坚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看起来并不合适。

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莫洛托夫谈到了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反对在1955年6月前举行选举，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是否应当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之前的立场，抑或在商谈中提出新的合适的建议。比如建议在1955年举行选举，或采取这样一种方案，即提议双方在1955年6月前解决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举行选举的时间问题。

周恩来表示，对于选举的日期问题，应当采取以下立场：坚持通过会议确定举行选举的一个时间，不要迟于1955年6月。如果这一建议遭到拒绝，那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指出选举要在1955年举行。如果这一建议同样得不到采纳，那么作为最后的姿态，要坚持达成一个决议，即双方内部要确定在1955年6月前解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

范文同称同意周恩来的上述观点。

周恩来强调他将在与胡志明的一次会面中讨论有关举行选举的日期问题的细节。胡志明原则上同意周恩来提到的第三种选择，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解决选举的时间问题。

莫洛托夫随后询问，在今天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范文同打算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他更愿意谈及关于印度支那的主要问题，首要的是选举和分界线。范文同补充说，他将根据我们之间交换的意见，坚持设定举行选举的确切时间，并在十六度线上确定分界线。

周恩来说，在未来几天，我们将有可能就上面谈到的议题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个美国军事集团在东南亚的建立。周恩来强调，有理由怀疑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已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某种协议。如果美国设法将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拖入一个军事集团，那么我们起草的有关阻止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协议将失去我们所期望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还说，在印度和日内瓦分别同尼赫鲁和艾登举行的会谈中，他强调不应当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这三个国家也不应被拖入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周恩来问道，范文同同志是否应当在与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谈及这一问题，并表达我们的立场。

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并说在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的会谈中，我们应当向新闻界表明有关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的可靠传闻，并宣布我们反对这一集团。莫洛托夫问道，是否需要形成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

周恩来说，西方国家的代表将很难同意在任何特别文件中记述这些内容。

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的问题，应当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准备中的印度支那问题宣言文本的过程中提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英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组织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 [30] 的体系，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各国紧密联合的同盟。美国则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反对英国的方案。他们在新加坡五国同盟会议的基础上，主持建立了一个包括泰国、巴基斯坦、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但又不仅限于这五个国家的军事集团。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利用美英在这一做法上存在的分歧，反对在亚洲建立军事集团。

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莫洛托夫询问，在就军队实行整编的时间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

们)是否应当说明,法国军队从越南北部的撤出可以通过海路及铁路、公路共同完成。他强调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依据,坚持缩短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军队整编时间(380天)。

周恩来和范文同说,从整体情势上来看(缺乏良好的公路,部队食品供应的困难等),敌军不可能从越南北部向南方转移。

周恩来接着说,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孟戴斯弗朗斯可能会谈及从越南南部地区撤出法国军队的时间表问题。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希望提请莫洛托夫同志注意一个事实,法国指望在越南南部更久一点保留它的军队。周恩来说,这一推迟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法国在越南的存在可以成为美国人和保大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相互勾结的一个障碍。周恩来还说,当然,法国军队应当在南越大选举行前离开那个地方。

这次会谈持续了3个半小时。

A.列多夫斯基记录

АВІРФ, ф.06, оп.13а, д.25, л.8

№20750-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记录：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7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莫洛托夫询问范文同关于他同艾登和柬埔寨外长狄潘(Tep Phan)举行的会谈。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主要谈到了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外国军事基地以及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艾登和柬埔寨外长共同表示,美国应当没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他们也不愿在自己的领土上出现外国军事基地。在回答有关美国人可能在东南亚策划涉及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集团的问题时,艾登和柬埔寨代表回应说,他们并不赞同美国人的做法,并且在未来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们补充说,如果这三

个“相关国家”遭到侵略，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艾登表示，美国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很长时间，因而将其拿到巴黎来讨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艾登补充说，上面提到的由美国人建立的集团大概只是防御性的。

范文同说，在同艾登和柬埔寨代表的会谈中，他对在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和在东南亚建立军事集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周恩来说，在刚刚收到的来自法方的草案宣言的新文本中，如同最初的版本一样，没有阻止在越南、老挝或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并且这一条款同样没有出现在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草拟文件中。

莫洛托夫说，有必要在这些草案中加入相应的变化。

莫洛托夫问道，今天我们应当讨论什么问题。

范文同说，在他看来，在分界线、选举以及军队整编、监督委员会的组成等许多其他重要问题上，有必要就如何采取行动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而交换相互之间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首先就有关我方立场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讨论已经准备完毕的文件文本。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宣读了主要文件以及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分界线，选举日期，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武器和武装人员在印度支那的撤离和派入，以及对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设立外国军事基地和禁止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军事集团。莫洛托夫然后说，孟戴斯弗朗斯在7月16日的私人会谈中暗示，政治代表应当讨论那些双方都有可能做出相互让步的主要问题。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上述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分界线)问题，并让周恩来和范文同发表一下看法。

周恩来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法国代表团的一个代表吉耶尔马上校告诉王，法国代表团不可能同意共同使用九号公路，并想使其明白，法国将坚持把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

吉耶尔马还说法国代表团将坚持为在印度支那举行的选举设定一个更为遥远的期限，并给出了一个时间——两年。

莫洛托夫询问对于分界线问题我们最终将回归到什么立场上。

范文同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在九号公路问题上对法国做出让步，并同意将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以北某处。他还补充说，有必要要求法国在土伦(岷港)和顺化地区做出让步。范文同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早先曾暗示过做出这种让步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法国在土伦(岷港)和顺化地区做出什么让步。

范文同回答说，他要求法国不要在土伦地区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至于顺化，他还没有任何具体想法，并且(对这个问题)考虑很少。范文同接着表示，有必要要求同法国就设定一个在印度支那举行选举的具体日期达成协议，(作为交换)可以在分界线问题上表示让步。他还补充说，这一日期可以稍微延迟一些，但应当确定，从而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机会在民众中开展一定的组织工作。

周恩来表示，范文同关于分界线问题表明最终态度的建议，符合我方代表团接到的指示，而且(他们)也能够接受。关于土伦问题，周恩来表示，孟戴斯弗朗斯在同他进行的交谈中，暗示了法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周恩来问莫洛托夫，基于他同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进行的会谈，我们能否指望在选举问题上实现某些目标。

莫洛托夫说，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谈了选举问题，并强调有必要为应当举行的选举明确一个具体时间。至于举行选举的确切日期，那么(我们)或许会建议应根据双方主管部门的协议，在当地加以确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的建议。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准备同意在九号公路以北设定分界线，那么，就有必要确定这条线。

范文同说，他将指示军事专家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准备一个标注了上述分界线的合适地图。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东南亚的军事集团问题，并询问周恩来和范文同关于我方意图的看法。

周恩来建议，让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在他们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他们将不允许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并且不会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或集团。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在宣言的文本中加入一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关于不在其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且不会参加军事同盟的义务是可行的。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问题。

周恩来说，在7月16日同梅农(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梅农告诉他，法国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代表在内的监督委员会。梅农赞同这一选择，并对没有让巴基斯坦参加表示满意。周恩来接着说，他在同艾登进行的一次会谈中也谈及了法国的这一选择。艾登对该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不能主动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会让巴基斯坦方面产生不满。

莫洛托夫说，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最好还是坚持我们三国代表团先前的立场。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周恩来建议就委员会的活动范围达成一个协议。他说，如同中越方面所建议的那样，法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个计划，建议国际委员会沿边界(包括陆上和海上)而非在单独的地点进行观察。周恩来认为，这将更加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沿边界的监测，从而能够实现对美国或法国向印度支那境内输入部队或武器的活动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

莫洛托夫建议，在这一问题上继续维持这样的策略——如果法方坚持自己的提议，那么就在表面上做出一个让步，同意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队整编区域的问题。

周恩来和范文同建议作为一个最终姿态，应同意在老挝东北地区建立军队整编区域。

莫洛托夫问，我方将由谁签署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协定。

周恩来和范文同认为应当授权两名代表，分别来自越南人民军和抵抗力量。他们还认为这一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周恩来提出从印度支那撤出外国军队的时间安排问题。他说，(他们)能够同意确定一个240天的周期(不是法国提出的380天)。

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建议就撤出部队和撤出武器分别确定一个周期，并认为撤出武器需要的时间可以比撤出部队的时间略长。

周恩来和范文同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提出讨论草案宣言。

周恩来和范文同同意莫洛托夫关于以法国草案为基础并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建议。

接着莫洛托夫，周恩来和范文同就宣言文本的所有要点及所做的修改交换了意见。

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

A.列多夫斯基记录

ABПPΦ，ф.06，оп.13a，д.25

№25144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老挝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抵抗部队和越南人民军方面与老挝王国军队和法兰西联邦部队方面就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月__日__时开始在老挝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应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月期间从老挝境内完全撤离。训练老挝部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老挝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老挝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在随附地图上的指定区域建立老挝抵抗部队集结区。所有老挝抵抗部队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月内应全部在上述指定地区集结。

四、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老挝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老挝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双方应保证不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

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52, л.192-194

№25145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1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以柬埔寨抵抗部队名义的越南人民军方面与柬埔寨王国军队方面就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月__日__时开始在柬埔寨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所有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在停止敌对行动后的__月期间应从柬埔寨境内完全撤离。训练柬埔寨军队所必需的特定数量的外国军事人员，可以留在该国，但柬埔寨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三、双方承诺，在接到停火和停止交战命令后的__日内在柬埔寨抵抗部队所在地区实行集结；与此同时柬埔寨王国军队不得对柬埔寨抵抗部队进行进攻。柬埔寨王国政府在以普选方式统一国家后，根据柬埔寨

抵抗部队的意愿或者将他们收编入王国军队或地方警察部队，或者让他们复员。

四、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柬埔寨自卫所需的特定种类和数量的武器和弹药除外。

五、双方应在柬埔寨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抵抗部队已复员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52, л.195-197

№25146 中国代表团提交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草案：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1954年7月18日)

1954年7月18日

从中国代表团处获得

(第2稿，修订稿)

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草案

依照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印度支那全面、同时和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协定，法兰西联邦军队方面与越南人民军方面就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如下：

一、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战斗部队和陆、海、空部队的军事人员，应自1954年__月__日__时开始在越南境内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二、为了有效的停止敌对行动，如随附地图所示划出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非军事区。在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__日内，双方部队应做调动并按各自的非军事区驻扎：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南为法兰西联邦军队集结地区。在以普选方式实现越南统一之前，军事分界线北边和南边非军事区和两个集结区的主管代表当局负责管理自己区域内的民事行政事务。

三、双方部队根据上述设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进行的集结和调动，应于关于停火协定生效后的__月期间完成，如果在部队集结和调动时，出现一方集结区的居民中有愿意迁居另一方集结区的，应允许他们迁居并予以协助。

四、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应禁止运入新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弹药。

五、越南境内停止敌对行动后，后者不应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越南境内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六、所有外国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应在各方同意的规定期限内从越南撤出，如果双方之间一致同意的话，作为例外，特定数量的法军可以特定的期限留在一定的地区。

七、双方应在越南境内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后__天期间，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

对战争时期与敌对方合作过的人员和团体，双方应承诺不进行报复和歧视，并保障他们的民主自由权益。应保障所有守法外国侨民的利益。

成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人数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双方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在实现有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

成立由_____代表组成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主席将由印度担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的各项规定，调解(仲裁)双方无法解决的有争议问题。在审议普遍性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遵循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的一票是决定性的。但是当涉及到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行为或因违反行为引起的严重威胁问题时，以及涉及到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的问题时，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应得到一致通过。如国际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时，它应将多数委员和少数委员的报告告知担保人。

按照本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在有关停火协定生效之前的___日内，对将要签署和公布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进行详细的研究。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52, л.198-201

№20751 莫洛托夫与艾登会谈记录：交换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意见(1954年7月19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晚10点于日内瓦别墅。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葛罗米柯、英国常务副外务大臣哈罗德·卡恰以及艾登的首席私人秘书安东尼。

艾登热情欢迎莫洛托夫的到来，并说道，他认为在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中，全权代表们的决议将“从老挝及柬埔寨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议题囊括进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认

为，关于从老挝和柬埔寨撤离一切外国军事力量的问题，以前的对话和谈判中亦曾涉及，而今天的会谈也并未取得重大进展。

莫洛托夫指出，如果忽略不计有关撤离外国军事人员的言论分歧，那么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案和构想之间只存在着极其细小的差别。

艾登对于全权代表们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能够经过谈判并最终通过相关决议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已经尽己所能，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了。

莫洛托夫问道，艾登的意思是否表明部长级会谈已完成其使命，未来的谈判应交付给交战双方。

艾登答复道，他的意思是说，部长级会谈已经完成了在当前阶段的会谈中他们所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在他看来，今后他们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来正式通过和批准全权代表们的决议报告，以及妥善解决诸如监管、安全防卫等问题。

莫洛托夫答复道，这一进展对于日后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正确、至关重要的。

莫洛托夫说，他并不理解当前法国的立场。一方面，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急于谈判，但另一方面，孟戴斯弗朗斯又在国民议会上宣称将在7月20日之前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艾登指出，他也不理解法国的态度。

莫洛托夫认为，很有可能法国议会随后将延长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最后期限。

艾登说，昨天他同孟戴斯弗朗斯通了电话，并向其询问是否计划去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宣称他不能够去日内瓦。因此，艾登继续说道，他已经损失了其所特意安排出来的三天时间。

艾登说，他得知明天周恩来将接见老挝和柬埔寨外交部长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在艾登看来，同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对话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艾登已经同周恩来讲过，他对于越南军队是否仍将如他们近来所做的那样继续发动进攻表示密切关注，这一举动无疑将向那些质疑日内瓦会议的人们提供新的指控和口实，声称胡志明及其追随者是利用

日内瓦的对话作为挡箭牌，企图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艾登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他希望在全权代表们举行会谈期间，范文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不要采取过多的军事行动。

莫洛托夫指出，范文同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文职官员，热衷于战争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他。

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在强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里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越南问题。”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表示，西方代表团们普遍认为，老挝和柬埔寨是一方面，越南问题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有着很大不同。在西方代表团看来，越南内战仍在继续，而此时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艾登再一次表达了对于当前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来开启双方全权代表之间对话的期望：只要他们之间进行谈判对话，就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

莫洛托夫声称，在他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新的挑衅和进攻的行为，而在于那些已经进行了8年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

莫洛托夫问道，是否在艾登看来，孟戴斯弗朗斯升任总理意味着法国正在试图寻求一个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有效方案。

艾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又说，绝不能忘记孟戴斯弗朗斯是不会投降和妥协的，只有在法国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就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达成一致。艾登继续说道，法国将在谈判中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是艾登怀疑，孟戴斯弗朗斯所提出的实现和平的条件将同其前几任的和平条件有着显著的不同。

莫洛托夫指出，没有人要求法国人投降或做出妥协。

莫洛托夫说道，史密斯 [31] 在昨天同他的会谈中，阐述了美国政府日内瓦会议上所讨论的相关问题的立场。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但很显然，美国人非常担心法国人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和妥协，美国政府的立场明确显示，要阻止法国在当前发展的事态中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

路。莫洛托夫说，现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但英国的立场还不确定。

艾登半开玩笑地回答道，英国是没有明确立场的。艾登继续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认为应该由法国人他们自己商定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可接受条件。我们认为由其他人来告诉法国人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是不正确的。很有可能，艾登补充道，美国人的立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基于其作为法国盟友的事实，他们希望法国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利的条件。

莫洛托夫说，同理而言，美国人也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很乐于阻扰法国开展谈判，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们在昨天的会晤中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印象。法国人曾声称，在他们看来，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应该受到足够重视。老挝代表同时也表示，他们的方案应作为谈判的一个基本框架。而饶伯森 [32] 则明确反对法国和老挝的观点。那么对这样一种立场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试图从法国获得比法国人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从老挝获得比老挝人民所期望的更多的利益。

艾登说，昨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伦敦的电报，电报中提到了一位出席苏联大使馆午宴的英国人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之间的会谈。马立克告诉这个英国人，艾登其实同杜勒斯一样坏，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和杜勒斯之间对于双方所扮演的角色已进行了明确分工，杜勒斯负责“唱红脸”，扮演决不妥协的强硬派，而艾登则负责“唱白脸”，扮演息事宁人的温和派。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认为马立克会说这样或者其他类似这样的话。但如果马立克果真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莫洛托夫可以确信他百分之百地错了。

艾登说，他只是顺带告诉莫洛托夫这些，他并不希望马立克因此而遇到什么麻烦。

莫洛托夫表示，他是在私下场合收到这一信息的，因此也只能在私下里对马立克给予适当的警告。莫洛托夫又补充道，杜勒斯在日内瓦仅仅待了几天，而与此同时，艾登则已经在这里待了8周之久。这只能证明二者之间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艾登对此表示赞同。

莫洛托夫表示，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对日内瓦会议没有好感。

艾登指出，杜勒斯同意在柏林召开类似的会议。

莫洛托夫表示，这仍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艾登说，他曾试图劝说杜勒斯不要离开日内瓦，但是显然他的游说依旧没有成功。

艾登同时表示，如果对话能够朝着有利的一面发展，杜勒斯很有可能重返日内瓦。

莫洛托夫说，在昨天史密斯同他的会谈中，史密斯表示，他或是杜勒斯，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确定。

莫洛托夫向艾登问道，在他看来，当前日内瓦会议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登答道，他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3周中，当双方全权代表之间举行对话时，所有现存问题都将暴露出来。但是，艾登认为，当老挝和柬埔寨问题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解决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就集中到了越南问题上。

莫洛托夫表示，所有关于印度支那的问题都是普遍联系的。如果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能够顺利进展，那么有关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也更加容易解决。从另一方面来讲，成功处理好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将有力地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

艾登向莫洛托夫询问，他是否满意军方代表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对话进程。

莫洛托夫回答道，他不能够说十分满意他们之间对话的进程。法国人暴露出控制整个对话进程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的这一举动也是同当前法国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所紧密相连的。

艾登说，法国人曾向他通报，自从拉涅尔 [33] 政府倒台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在艾登看来，如果认为孟戴斯弗朗斯将会采取比其前任更为温和的政策，那就错了。

莫洛托夫说，他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近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因为自从拉涅尔政府倒台以后，双方全权代表之间有关越南问题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最近一次所拟的方案，甚至还是在该政府倒台以前提出的。

艾登就部长级会谈重返日内瓦的可能性征求莫洛托夫的意见。艾登说：“在我看来，在21天后军方代表之间的对话报告就将被提交，那时，我们应当就我们重返日内瓦的问题进行外交磋商。”

莫洛托夫表示，他认为这一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尽管部长们现在也有可能重返日内瓦，但是尚未就举行会谈做好足够充分的相关准备工作。

艾登说，在他近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发现，周恩来积极地致力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妥善解决。

莫洛托夫答复道，他认为也是如此。中国试图稳定和巩固其南部边疆。这毫无疑问是与其切身利益高度一致的。

莫洛托夫对于中英之间在日内瓦建立起了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

艾登表示，关系的建立和改善是同莫洛托夫的帮助密不可分的。

莫洛托夫说，关系的改善首先取决于艾登和周恩来双方的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法国同中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善和进步，但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改变。

艾登说，通过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他可以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是没有野心的，并且有理由相信，两国完全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国军队进驻的情况下，过上同其他中立国家一样安居乐业的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和判断，艾登继续说道：“我坚持留守在日内瓦开展工作，我希望我的判断不会产生偏差。”

莫洛托夫说，在他看来艾登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没有任何野心。但是，莫洛托夫认为，在老挝和柬埔寨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同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广泛存在的人民的利益和诉求相一致的措施和步骤。尽管这是这些国家的内政问题，

但是也需要达成共识。莫洛托夫继续说道：“我通过同周恩来和范文同的谈话，逐渐形成了以下观点，即柬埔寨当前的局势表明，在解决有关该国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将不会遇到重大阻碍和困难。老挝的局势要更为复杂。越南问题也更为复杂。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都一样是非常必要的。”

艾登指出，周恩来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提供帮助。

莫洛托夫说，获得这些帮助其实是法国的一种交易行为。

艾登说，在他看来，假使全权代表之间的对话得以顺利进展，那么有关托管问题的解决就不会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进展困难。

莫洛托夫说，艾登过去过高地估计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看来，他(莫洛托夫)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苏联代表团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夸大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

艾登说，托管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各方之间关系的改善，将更为有利于通过最终的决议。

艾登指出，日后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来协调和统筹日内瓦会议中通过的有关越南以及老挝、柬埔寨问题决议的实施。

莫洛托夫说，法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和积极态度。也许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法国国内的民主政治氛围所致。莫洛托夫希望当前事务能够取得更快的进展。

艾登指出，法国政府不同于(其他政府)，他们只在其出席活动的前几周内显示出了足够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

莫洛托夫说，在起初的几周时间里，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克服当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艾登说，日内瓦会议之前，他主要致力于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然而，他认为，对于缓和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会议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危机仍然存在，但是局势已经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紧张和尖锐了。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日内瓦会议在这

方面上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莫洛托夫似乎是半开玩笑地说道，在接下来的华盛顿之旅中，希望丘吉尔和艾登能够协调和处理好所有问题，给日内瓦会议带来好消息。

艾登答复道，在日内瓦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他和丘吉尔把握在华盛顿对话的进展。

会谈持续了45分钟。

O.特罗扬诺夫斯基记录(签名)

АВПРФ, ф.06, оп.13а, д.25

№10189 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向越南提供帮助的问题(1954年7月29日)

机密

1954年7月29日

第438/ЮБА号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兹就7月27日范文同与我谈话中涉及到的问题的建议提请您审议：

一、关于黄文欢、何文楼等人前往德里参加关于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工作会议的问题。

8月1日之前，这些同志无论如何到不了德里，因为需要数天时间获得经欧洲到印度的过境签证。除此之外，根据经验，经过罗马的飞机行程本身也需要5—7天。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上述同志只能在8月7—10日才能到达德里。

鉴于这些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步骤之一：

1.请求印度政府将会议延期至8月7—10日。预计这个请求可能不会获得赞同，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推迟国际委员会的建立。

2.越南同志会立即准备好自己关于国际委员会问题的建议(委员会驻地, 委员会成员数目, 委员会中代表的级别, 视察小组的数量, 这些委员会中三国代表的数量及级别, 总秘书处等等), 并将这些建议转交波兰同志, 请波兰同志在德里会议上坚持这些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应采取紧急措施把黄文欢、何文楼和其他一些人送往德里。这样才有可能使这些同志在工作会议结束之前到达德里。

二、关于用船只将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从越南南部送往越南北部地区的问题。

为此目的提供苏联船只看来是不适宜的。可以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试一试在印度、法国、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租船。可能波兰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船只。租船运输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实施。

三、关于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小组的问题。

看来, 在最近一段时间往越南派遣这类小组是适宜的。比如, 昨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就曾请求费登科将军在最近即将转交越南民主共和国掌握的大机场的使用和管理上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除此之外, 在履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时会产生许多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需要我们的忠告。为避免与中国同志出现某种复杂化的关系, 可以派遣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 作为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处的工作人员前往。

四、关于在编制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需要的计划中对越南同志进行帮助的问题。

可通知范文同, 不管是从苏联还是从各人民民主国家, 在以适当价格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其所需要的商品方面, 我们将千方百计予以协助。

K. 诺维科夫

1954年7月29日

文件送: 莫洛托夫同志、佐林同志、档案室

1954年7月28日

АВПРФ, ф.06, оп.13а, п.35, д.156, л.1-2

№20752 马林科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重新将解放台湾 提上日程(1954年7月29日)

绝密

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同志接见马林科夫

1954年7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场。

周恩来同志表达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在印度支那的计划遭到挫败后，美国政府试图在远东其他地区策划冲突和矛盾。策划冲突的主要目标即中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非法侵害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抢劫前往中国的船只。中国的海岸也常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

近来，美国将其航空母舰驶向了中国的领海地区。几天前，这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还在海南岛地区附近击落了两架中国飞机。

蒋介石和美国政府正筹备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国人仍没有决定要签署该项条约。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举动将刺激中国依旧强大的反美情绪，并且阻碍在日后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

美国政府仍将致力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反动集团。毫无疑问，这一集团最初将包括以下一系列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也很可能将菲律宾和泰国囊括进去。美国也将继续向举棋不定的印度支那地区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加入到这一阵营中去。

基于这些事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重新将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日程，采取切实有力的步骤，挫败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协约的阴谋。在他，即周恩来到北京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声明：指出当前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只存在于一个地区，即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在海上犯下了一系列的暴行，并且袭击了中国的领空，在各方面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

为保卫中国的海岸线，海军和空军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御。中国军队将随时待命，以阻止任何对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侵略行径。

为挫败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反动的、侵略的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阴谋，就必须打破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并且尽可能地加剧和恶化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Г.М.马林科夫同志对于周恩来的观点表示了充分赞赏，并且说道：关于国际形势的相关措施和判断的问题将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认真讨论并通过决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将得到足够重视。打破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签订协约的目标是极其正确的。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周恩来关于其目的在于加剧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重要说法，他也表示了充分赞同。

周恩来同志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在德里、仰光 and 北京的谈话内容——他们邀请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因为此后需回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周恩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周恩来在日内瓦期间，正在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派其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同周会面，重申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在同印度尼西亚大使们的谈话中，双方达成共识：现在是同中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最佳时机。周恩来提到，这项条约的草案目前正在北京由中国外交部和印度尼西亚大使一同起草，条约很有可能在周恩来访问雅加达时签署。周恩来计划在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Г.М.马林科夫同志祝愿他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他赞同周恩来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评论，并且说，决不允许在东南亚地区勾结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将印度尼西亚拉拢进去。他简明扼要地讲了同克奇鲁 [34] 博士和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约的谈话，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正在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中国与印度之间协定的签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迈出的异常成功的一步。该项协定所确立的原则将在苏联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进行大力宣传。

周恩来同志还向马林科夫通报了他同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谈话。梅农建议在朝鲜和韩国分别进行公投选举，进而确定整个朝鲜国家的国体。梅农试图探求，如果联合国表露出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的意愿，中国将会有何种反应。周恩来向梅农答复道：中国支持联合国召开日内瓦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倡议。他认为，如果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应该扩大与会成员国，应邀请印度来参加会议。

Г.М.马林科夫同志说，梅农在同莫洛托夫同志的会谈中也提及到了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加强沿海防御力量，亟需重新评估和改进现有方案来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周恩来计划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

Г.М.马林科夫同志指出，加强中国沿海防御力量、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针对苏联军方同志有关在中国建立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师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军方的意见是：这种飞机已然过时，而对于远程飞机来说，最好配备喷气式技术。

Г.М.马林科夫同志答复，苏联军方同志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考虑和调查。

周恩来同志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热切盼望苏联同志派出的高级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庆祝活动。如果能够派出这一代表团，中国政府将发出官方正式邀请函。

Г.М.马林科夫同志答复，代表团一定会派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商议决定出访代表团成员的人员组成。

Г.М.马林科夫同志还说，将其诚挚友好的问候带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们。

M.贾丕才记录

1954年8月12日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抄送B.M.莫洛托夫

АВПРФ, ф.06, о.13а, д.25

№10151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1954年8月)

机密

附件1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指示 [35]

同胡志明同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同时是指在必力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国际地位、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越南、全面履行日内瓦的印度支那协定、最迅速地恢复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事业中给予越南朋友以帮助。

在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中要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要对执行日内瓦协定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即履行了协定的有关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的军事条款表示满意。

在同胡志明谈话的过程中要着重指出，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一贯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的团结精神。要声明，苏联政府往后也将在中国朋友的协作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以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必要的支持。

* * *

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一些个别的问题时必须从下列观点出发：

1.履行日内瓦协定。

在指出日内瓦协定的关于越南停战的军事条款已得到顺利执行的同

时，要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也准备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实实在在履行日内瓦协定的政治条款的斗争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协助——筹备和举行1956年7月的越南普选，以及要在1955年7月20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南越当局代表的协商会议，以讨论与这次选举筹备工作有关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上打算提出关于大国方面按日内瓦协定给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调解予以必要的协助的问题。

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已了解越南朋友所准备好的“实现统一的斗争中的总路线、战略和政纲的提纲”，并且依苏共中央之见，这些提纲中所拟定的斗争的目的和战略在南越大体上是正确的。

要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为下述意愿作斗争而所持的肯定态度，即要在南越建立起一个能履行日内瓦协定以在全越南举行普选政府。

2.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问题。

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南越同法国人和亲法人士一起建立一条尽可能更广泛的反美共同战线的意愿表示肯定。要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这些目标中所拟定的措施大体上是正确的：保障在南越的法国人的企业和种植场的工作，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合作。

要声明，苏联政府赞同越南朋友认为增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的社会集团和实业界的代表的联系是合理之举的看法。

鉴于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要越南政府为了简化国家统一问题而发表下述的一个声明的合理性，即关于有可能在统一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南越保留一种有别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参与经济的、放慢民主改革速度的共和制度)，故要向胡志明同志声明，依苏联政府之见，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出于战略考虑在一定时期里可以比北越的速度慢一点，这种情况原则上是可以容许的。

3.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方面的计划。

鉴于美国在印度支那各国关系中的行动是旨在破坏日内瓦协定，故

要说出我们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条印度支那进步势力的广阔战线去进行反对美国干预印度支那各国事务的斗争。要强调指出，依苏联政府之见，应该让越南朋友为反对美国人的影响而致力于在南越各阶层居民中间开展积极的工作。建议在考虑到各教派的领袖对美国人的傀儡吴庭艳的政策感到不满的同时，要更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的宗教教派去增强国内的反帝情绪，首先是反美情绪。

4. 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要从苏联政府赞同旨在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建立越南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出发。应该强调指出，国王的政府与巴特寮进行直接谈判和相互让步是老挝国内的政治调解的最正确的道路。

考虑到美国与柬埔寨于1955年5月16日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是公然与日内瓦协定相对抗的，并且正在遭到柬埔寨的一些政治集团的反对，要建议越南朋友采取一些措施，以组织一场柬埔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这一协定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是与印度的利益相抵触的，故建议采取措施以建立越南与印度在反对美国对老挝和柬埔寨加强影响的斗争中的更密切的合作。

要表达出我们的愿望，希望越南朋友在考虑到上面所指出的情况的同时，从老挝和柬埔寨的内部政治状况出发去加强自己与这些国家里的民主力量的工作。同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可能会给人以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破坏日内瓦协定之口实的那种行动是不应该发生的。

5. 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要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更广泛地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去建立和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最后公报的第一部分第11条，该条款建议民族政府要委派进驻这一会议的参与国的代表，以便为全面扩大与亚非国家的联系而交流信息。

6. 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和苏联的联系的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已形成的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要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对越南朋友来说，在与给予越南以帮助相关联的一些实际问题上，时常向中国朋友咨询和请教是合理的，因为后者更了解越南的情况，还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解决中国不久前已解决或现在正在解决的那些问题。

如果胡志明提出关于在越南设立苏中混合的经济和军事代表团的问题，那就向胡志明说明这种行动是不合理的，因为越南朋友和中国朋友的合作实践已经形成，并且也已证明是有效的，当然不排除苏联方面也会给予越南以技术方面的支援。

7. 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定基础上把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和独立立场的各阶层居民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途径去扩大该统一战线的计划表示同意。要强调指出，尤其重要的是不仅仅依靠的是在解放区，而且还要在南越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要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而更广泛地利用国家统一要求的思想是合理的。要建议胡志明同志分析研究关于建立一个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群众组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该组织会把南北方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都吸引过来，同时在形式上却不是与民族统一战线相关联的。从战略观点出发，如果建立这种组织的主动精神能在南方表现出来，如果第一批这种组织能在南越建立起来，那倒是有利的。

8. 土地改革。

要表态说，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顺利结束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说出我们对劳动党中央关于在1956年7月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决议所持的赞同态度。要对越南朋友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进行土地改革就有可能把极大多数的越南居民团结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周围来，就有可能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这一想法是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吻合的。

9.关于天主教徒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天主教徒从北越疏散到南越去的问题，那就发表意见说，为了使敌对的宣传难以有机会在难民问题上投机，即使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越南朋友或许也不应该阻挠个别的疏散事件。然而，与此同时，依我们之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该坚持不懈地争取南越当局对民众从南方疏散到北方这个问题的类似态度。

建议越南朋友要加强在天主教徒中间的解释工作，并在对待天主教会的态度上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便对抗敌人在天主教徒中间所进行的移居南方的宣传。

苏越关系的问题

1.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无偿的经济与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遭到了破坏，并需要最快地得到恢复，苏联政府在审核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后，决定把3亿卢布作为供1955—1956年使用的一笔无偿贷款拨给共和国政府，以便其恢复经济。

按越南方面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3亿卢布投向：

1.25亿卢布用于重建和建造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一个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一个年产10万吨的过磷酸钙化肥厂、一个年产6万吨的开采黄铁矿的矿场、一个年产3000件不同的机械制品的机械厂、六个总功率为1.8万—2.25万千瓦的发电站、两个鱼品罐头厂、两个茶叶厂。

在上述数额的账上还将给予技术上的援助，援助的方法就是派遣苏联专家进行地质勘察工作，实施同沙眼、疟疾及其他疾病作斗争的防治措施，组织水文气象工作，等等。

1.25亿卢布用于供应商品以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的迫切需求。

5000万卢布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用的储备金。

同时通知胡志明同志，下面列举的协议草案是在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驻苏联的大使的：

(1)“关于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复兴中予以无偿援助的协议”；

(2)“关于被派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提供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的报酬情况的协议”；

(3)“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通过技术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附件)。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的草案的情况下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份协议。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政府关于发展苏联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政府签订贸易协定。贸易协定的草案已在今年4月23日交给了越南驻苏联的大使。

因此苏联政府希望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联商务代表处。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在今年5月18日交给了越南驻莫斯科的大使。

在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的情况下请求他下达签署它们的命令。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外贸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定。

3.关于为越南人民军供应装备和提供贷款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审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供应物质和贷款以满足越南人民军之需要的请求，并决定为此目的而以优惠条件向越南政府提供一笔供1955—1956年使用的数额为3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优惠条件是：所供应的货物按半价偿还，年息2%，从1960年起为期8年。通知胡志明同志，在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的情况下，苏方签署有关的议定书的工作就委托由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办理。

4.关于在苏联帮助越南培训专家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1955年接受300

名越南公民进入苏联的学校学习的请求。

在胡志明同志提出要把1955—1956年间越南大学生在苏联学习的费用列入无偿援助的款项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就同意这个请求。

5.关于顾问和俄语教师事宜的问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政府关于从苏联派遣6位顾问去帮助组织越南高校里的教育工作的请求，同样也同意派遣5位俄语教师到越南去。

6.军事问题。

鉴于胡志明同志提出了希望在越南国防计划的筹备工作中予以帮助和本着这一目的召开越南、苏联和中国的军事代表会议的请求，故宣布，苏联政府同意给予越南这种帮助，并提议实施这一帮助的下列程序：

(1)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与中国军事顾问一起制订一份初步的越南国防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苏联驻越南的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给予帮助。

(2)苏联方面将派2—3名负责军事的专家到北京去，同中国和越南的军事工作人员讨论在越南准备好的初步的国防计划。

7.关于公报的事宜。

商定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中要说明苏联与越南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说明两国对维持和巩固和平的向往，说明履行日内瓦协定所涉及的在印度支那进行政治调解这一部分条款的重要性。公报里要提一下签订苏方在越南的经济复兴中给予经济援助的协定，提一下苏联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协定等。

АВПРФ, ф.022, оп.8, п.117, д.30, л.12-21

№08096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庆祝中国国庆所采取的措施(1954年8月 [36])

鉴于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派苏联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代表团由А.И.米高扬(团长)、М.А.苏斯洛夫、И.Г.卡巴诺夫、Г.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组成。

委托代表团以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在北京国庆盛典大会上发言致贺，宣布按照1953年6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已准备就绪的苏联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会开幕。

二、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国政府 and 中共中央发祝贺电并在报上发表。

(一)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拉木图、塔什干、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和伏龙芝等地组织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

(二)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妇女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给相应的中国组织发去祝贺电，并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去个人贺信。

(三)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材料：《真理报》、《消息报》刊登社论，《共产党人》、《新时代》、《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星火画报》等杂志刊载文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就。

(四)责成苏联文化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全国上映中国电影，组织电台播放中国流行歌曲和音乐、刷写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

2.组织专题报道，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

3.于今年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委托以M.A.苏斯洛夫、Г.Ф.亚历山德罗夫、B.П.斯捷潘诺夫、A.П.杰尼索夫、B.A.佐林、B.A.亚斯诺夫和A.B.科罗博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并向中央提出组织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提案，应重点考虑协会的以下任务：系统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促使中苏友好协会广泛宣传苏联的成就；组织双方文化和社会代表团的相互交流；帮助苏联社会文化组织、学者、国民经济专家、艺术活动家交流经验，进行互相帮助以及研究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54—2255页

№08097 库尔久科夫呈维辛斯基请示：苏联代表团访华 有关事宜(1954年8月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211/ДВ号

致A.Я.维辛斯基同志：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 [37] 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 [38] 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在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港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营

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请您指示。

И.库尔久科夫

1954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致葛罗米柯、佐林同志：

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

库兹涅佐夫

8月5日

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

A.葛罗米柯

8月5日

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佐林

8月10日

葛罗米柯同志：

应该开始认真筹备参加庆祝活动的事情了：外交部派谁参加代表团、访问计划、问题、提纲。请远东司提出建议。

库兹涅佐夫

8月1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3, д.40, л.4-5

№21381 斯捷潘诺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胡乔木要求了解 解和考察的问题(1954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已经结束了治疗，请求苏共中央提供机会了解苏联共产党党的教育组织和对党校的领导工作经验、党对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经验，了解不脱产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的工作，了解杂志《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编辑部的实践工作，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就其工作问题进行会谈，与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就苏联的各民族文字改革的经验进行会谈，以及与在苏联出版中文教科书的作者会谈。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胡乔木同志的请求，并责成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组织党务工作部、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以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同胡乔木同志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与胡乔木同志关于特别问题的会谈可在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和《共产党人》、《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进行。

胡乔木同志提出的问题清单见附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斯捷潘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8月11日

手写批注：

归档。

胡乔木同志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他于8月23日返回北京。

..... [39]

1954年8月28日

附件：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感兴趣的问题清单

关于不脱产学习

1.如何制定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的政治学习大纲。以下的理解是否正确：每个党员都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但是在其按照这个固定的学习大纲学习之前要不要预先学习一些政治理论知识，然后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自学，还是应该在党校的夜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共青团员和无党派志愿者要和党员一样学习吗？

2.如何对那些自学的党员进行管理、检查和帮助？

3.如何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决议和刊物？

4.请允许我简要了解一些关于苏联党校的大体情况。如不同级别的党校学员的情况，他们的年龄界限，学习方案和对他们的管理。

5.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不脱产进行中等和高等学习的人们。

关于这些问题，除了一些基本了解，能否获得以下材料：

(1)一些能够说明关于在岗的人们如何进行继续教育的材料。

(2)举一些单位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们如何边工作边在高等和中等学校学习。

(3)一些夜校和函授学校的情况(它们的历史、学生构成、学习年限等)。

6.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其工资？

7.苏联政府和党有没有做出过提高职工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决定(如果有，能否能够了解一些这些决定)。对于那些业务不熟练的职工，除了将他们从岗位上撤换，党和政府机关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来使领导干部系统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关于党对文化教育组织的监督

1.中央、地方党组织、政府和文化教育单位之间在功能上是如何划分的(如学校和电影制片厂在对文化教育组织干部的管理上如何划分功能)。

2.工作中需要对干部进行考察，但是对干部进行管理的工作和关于对所通过决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区别？比如，对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研究的工作，对报纸行业领导干部进行考察的工作和对报纸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工作等等。

3.在监督决定的执行方面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功能如何划分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协作。如在教育领域、出版业、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工作。

4.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如宣传部、科学文化部)不能通过决定。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不通过任何决定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部门在哪些范围内可以不经书记处批准自己进行工作?能否就此问题做大致说明。

5.中央委员会各部与地方党组织相应部门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如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如何对这些部门的工作和干部情况进行评价。

关于《共产党人》和《党的生活》杂志

1.编辑部的组成和工作方法。

2.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作者及记者的情况。如何管理作者、积极分子以及组织的情况。

3.杂志和党组织的联系。对杂志中刊登的批评和建议的反响。人们如何阅读和讨论其中的内容?

4.来自中央方面的领导。

关于苏联的文字改革

1.十月革命后的俄语文字改革。

2.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尤其是那些没有语音文字的民族,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和语言中有不同方言的民族的文字改革。

3.最好能获得一些东干语的出版物,既包括相对简单的文章,也包括相对复杂的。

4.最好能理解最简要的关于俄语和一两个重要欧洲语言中一些方言的历史以及它们现今的状况,以便在研究汉语方言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

科学院的任务、历史、组成、教学方案(每个年级的教学科目)、教学方法以及如何补充学员。如何考入社科院以及如何毕业。

手写批注:

给斯捷潘诺夫同志。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5, л.46-49

№21418 外贸部关于在华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计划(1954年9月 [\[40\]](#))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一)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954年北京)选题计划

在北京举办苏联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

域的成就。

为举办此次展览会，需要提供大量的陈列品、样本和模型、资料照片、镶板、墙画、一览表，这些物品要展示：

1.苏联的工业力量，苏联企业的高超技术水平，现代生产设备生产的所有品种和消费品。

2.日用品和食品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

3.铁路、水上交通和公路发展取得的成就。

4.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高度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电气化、高收成和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

5.国民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高等院校和专家的培养、医疗保健、体育运动、音乐、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在苏联馆正面的钟楼部分，大写字母CCCP置于苏联国徽的上面，国徽正面使用汉语题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入口处要布置俄语和汉语的欢迎词：

“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二)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部分。前厅的正中央放置参展模型和游览流程。在前厅有4个纵深半圆形的、明亮的壁龛，里面布置大型的、富有形象的壁画，画的主题要反映苏联人的劳动、休息和学习情况，以及以“莫斯科——我国的首都”为主题的大幅壁画。

在圆形的卷边花饰围绕的镶板上方张贴题词，揭示这样的主题：

“苏联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创造力，沿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胜利前进。”——Г.М.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41页。)

“苏联公民有受教育权。”(苏联宪法第121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权。”(苏联宪法第119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权。”(苏联宪法第118条)

此外，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的通道侧面使用如下题词：

“……我国的和平政策得到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列宁
(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0册，第365页)

“……苏联是各平等民族的联盟……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权利平等。”——斯大林(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526页)

(三)

在中心展厅及其附设展厅摆设工业制造企业产品、电力设备、测量仪器和其他一些装置，金属样本、石化产品、无烟煤、矿石等。

在进入工业展厅的影壁墙正对面摆放列宁—斯大林雕像(高3.5米)。

在上述影壁上悬挂苏联国徽(直径4米)，附录社会主义经济法主要内容：

“在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68页)

在离开大厅前厅的影壁墙正对面左右两侧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73	251	294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8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

社1952年版，第3页)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64	219	262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2年1月21日，1953年1月23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在影壁墙侧面书写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37	171	206

(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44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30页)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 单位：百万人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31.5	39.2	44.8	45.1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在通往中心工业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如下题词：

“近28年来苏联工业生产增长了55倍。”(根据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材料，《真理报》1953年8月9日)

在大厅的正中央摆放大型陈列架：金属切割机床(旋床、六角车床、

单立架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机械设备、缝纫机、印刷设备。

此外，在大厅内放置12个展台，陈列品要展现苏联工业领域的成就。

展台的正中央要布置绘声绘影的图表。

石油工业展台

展台内要摆放石油制品样本(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冷却液等)，展台布景用的照片要展示石油和石油制品企业。(注：照片下方的题词取决于照片的题目和内容。没有列入选题计划)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9.0	31.0	37.0	52.0	69.9

煤炭工业展台

展台内摆放煤和无烟煤样品、气动工具等。展台的照片要展示煤炭工业繁重程序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背景为一个煤矿，并附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29	166	261	320	373

矿石原料展台

展台内摆放铁、锰、铬矿石样品，石棉和石棉制品。照片要展示矿山开采和加工过程的机械化。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展台

在展台内的特殊支架上摆放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铝制品和由其材料制成的商品。照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工艺。在示图中描绘生铁和热导材料时使用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4.2	15.0	15.3	21.7	27

苏联钢产量的增长 单位：百万吨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4.2	18.3	27.3	38	44.2

(根据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集会上的竞选演说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1年版，第17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2年1月29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

测量和切割工具，检测机器和仪表展台(2个展台)

展厅内要摆放用于检验金属裂痕、老化以及确定金属其他物理特性的机器；测量仪器和设备，金属测量和切割等成套工具。

照片要展示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车床自动流水线，其他一些金属再加工工具。

照片之间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仅在1950—1953年期间就制造出2200多台新型重要机器和机件。”(根据1954年3月12日萨布罗夫在明斯克选区的竞选演说材料，《真理报》1954年3月13日)

中央大厅靠墙的陈列台摆放的各工业主题照片同各工业领域知名人士的肖像都列入陈列品。

上述用照片材料来装饰商品展台的原则适用于多数展览馆。

(四)

阁楼下展厅的摆设——

电力设备、电力测量设备、电动工具和通讯设备展览馆(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射线装置、断路器、避雷器；功率10万千瓦的发电机、功率为7.2千瓦涡轮发电机模型；焊接设备；高压线路传输设备；矿

井用和调度用整流器、电报机、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无线电转播装置)。

这部分作为背景的墙画使用发光二极管装饰的图表，展现苏联电力增长情况。

使用题词：

“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列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

使用表格：

苏联的电力生产 单位：10亿千瓦/时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1955 年(计划)
1.9	48	90	133	162

(1913年——《苏联政权建立20周年文章选集》，联共(布)中央党的出版社1937年版，第24页；1940年——《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令》；1950年——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1953年——赫鲁晓夫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7日)

在齐姆良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及其他水电站、高压转换器、科学研究实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旁边使用如下题词：

“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实现了电气化的宏伟纲领。建设和扩建了711个电站，这些建设任务完成后，苏联的电力总功率同五年计划之前的1950年相比增长了75%。”(别尔乌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在其中一幅电站照片下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电站发电1330亿千瓦/时，是1913年的68倍。”(别尔乌辛讲话，《真理报》1954年3月12日)

交通设施展馆

(桥梁模型、沉箱、桥式起重机；线路控制系统、机车信号器、自动

闭塞装置，机车头模型、保温车厢、负载量1吨的油轮，湖河用拖揽、地铁车厢、自动梯和其他模型)

该展馆还要摆放：伏尔加—顿河全景图；“莫斯科是五海港口”的图画；莫斯科地铁站运行示意图和其他站的照片，使用题词：

“莫斯科地铁是一项宏伟工程，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最好的榜样。”(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交通设施展馆配置相应的镶板画时使用下列图表：

苏联铁路货运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192.6

苏联海路货运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174.4

苏联汽车运输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3 年
100	350.3

(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60、61页；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伏尔加—顿河全景图

“1952年夏天，以列宁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公司投入运营，把苏联欧洲部分的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和黑海——联合为统一的水运交通体系。”(《真理报》1954年7月11日)

电话、电报、广播展馆

广播站、无线电转播站装置、有效验的灯泡、电视稳定器、电报—电话仪器：民用电话机、各种型号的转换器、校准器、电阻测量仪、Q表等。

该展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广播事业的使命是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灌输人类社会高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意识。”——加里宁(《党的建设》1945年第6期，第8页)

该展馆的照片要展示各无线电企业、电报和电话站等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

光学设备展馆

验电器、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钱、全套工具、大型测量仪器、放映机、显微镜用的照明器材、大型摄谱仪、长度测量仪器等。

大学、科学和农村实验室的照片，要展示光学仪器的实践应用，等等。

电影放映机展馆

各种款式的放映机、全套设备、滤光器、电影放映机固定设备等。

该展馆要使用以下题词：

“电影是鼓动群众的最重要的工具。”——斯大林(摘自斯大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讲话)

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的照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活动家的肖像、制作最优秀的电影的一些干部的照片。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馆

计算机、打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各种技术用途的仪表。

水文气象仪器展馆

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专用温度计、计程仪、绞车、雨量计和气象记录图、检流表、反照仪、铁制水表、测位仪、海洋底质采取器、降水量计、冻土测量仪，等等。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大厅的墙壁上使用如下题词：

“水文气象服务部门为庄稼播种和收割、为航期的开始和结束时期的确定、为水电站规程的确立、为电报电话工作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1950年版)

照片要展示水文气象仪器在国民经济中应用情况。

在大厅的左右两侧靠近前厅的位置是以下部分：

林业和造纸业展馆

支柱、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底板、纤维板、不同等级的纸张、火柴。

这部分要展示苏联林业资源的丰富、林业机械化加工和运输、木材流送、锯木厂、纸浆造纸联合厂。配置苏联森林分布图，使用题词：

“苏联拥有大量的林业资源，是世界林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

在相应的照片下使用如下题词：

“1953年木材采伐厂拥有的林业机器数量同1940年相比增长了3倍，拖拉机增长了6倍，机车增长了7倍。现在林场拥有17000台发电机，12万把电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化学和林产化学工业展馆

这部分要展出大量化学制品、染料色样、林产化学产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

照片要展示染料在纺织企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展示化学企业的部分生产环节。

食品工业设备展馆

乳脂分离器、灌肠注射器、马铃薯去皮机、磨盘、冰激凌机。

牛奶和肉类企业的照片，磨盘和其他一些食品企业的照片，以及公用餐桌和炊具企业的照片，现代技术设备的照片。

(五)

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展馆

这部分的陈列品绝大多数都放在中央展厅上面的阁楼上，展品包括：纺织品(棉布、棉线、棉丝)；连衣裙、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皮革制品。

使用题词：

“从1947—1954年苏联7次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制品的价格，由此价格水平总体上降了2倍多。”

“1953年日用品生产比1950年提高了79.2%。”

(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4月27日)

这部分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质福利增长情况，日用品的部分生产环节，贸易企业等。

照片间使用如下题词：

“仅1953年一年新投产的日用品企业就达300多家。”(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1953年苏联国营和集体贸易额比1940年增长了79%。”(根据米高扬在贸易工作者联盟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24页)

日用品摆放在展览馆右侧第一层陈列架上。这里还摆放家具、日常生活用品、住房用品和装饰品。

家具展馆

该展馆展示四组全套家具：餐桌系列、旅馆系列、卧室系列和教授

或科研工作的办公室系列，房间全套布景，以及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

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休息和家庭情况等，在住宅建设照片中间和新式住宅内部和外部使用题词：

“近年来在苏联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提供了1.83多亿平方米居住面积，而在农村为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技术知识分子建设了400多万套房子。”(根据1954年3月10日布尔加宁在莫斯科选区选民集会上的讲话材料，《真理报》1954年3月11日)

家用电器展馆

电冰箱、电熨斗、电茶壶、咖啡壶、吸尘器、电风扇、电动打蜡机和洗衣机、电烤炉、电炉灶，等等。

照片要展示这些设备在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以及这些器皿的生产环节。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馆

“和平”牌、“波罗的海”牌、“祖国”牌、“莫斯科人牌”、“图拉”牌、“里加6”牌、“里加10牌”、“白俄罗斯”牌收音机，“记录”牌、“乌拉尔52”、“卡马”牌录音机，“T 2”牌电视机，等等。

照片要展示收音机和电视在苏联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音乐器材展馆

三角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提琴和拨弦乐器、大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苏联阿塞拜疆民族乐器。

这部分的照片：音乐会演出、交响乐队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独奏、国际比赛；歌舞团、歌剧和芭蕾舞剧团、文艺活动；演员和艺术活动家的相片。

手工作品、儿童玩具、织毯和手织品、器皿、精制玻璃器皿展馆

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或纸板做的手工制品；密缝刺绣和花边作品；塑料制品；手工和机器制作的毛毯。

照片要展示作为副业的手工业制品生产环节；苏联人民的生活。

(六)

医疗保健展馆

这部分位于中央展厅右方的阁楼上。

这里摆设：手术台、麻醉器械、静脉注射器、医用照射灯、水疗所、理疗器械等；医用器具和医用照相机、三本主题为母亲和儿童的保健相册；苏联的疗养事业和保健事业繁荣情况，传单、宣传画、幻灯片，等等。

使用题词和图表：

苏联全体公民享受免费医疗；

“苏联人民福利的增长、国家关心改善和保护妇幼保健工作，其结果是我国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近三年来，苏联人口净增长900万。”(根据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页)

“苏联现有350多个疗养地、2500多个疗养院，建设了宏大的疗养院网络。劳动人民可以无偿或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这些设施的绝大多数疗养证。”(社论，《真理报》1954年1月10日)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床数量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25	150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党的十九大会议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苏联医生数量增长率(与1940年相比的%)

1940 年	1950 年	1955 年(计划)
100	175	219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1年4月17日；《党的十九大会议

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命令》，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苏联国民收入在医疗保健和物质文化方面的支出额 单位：10亿卢布

1940 年	1950 年	1952 年	1954 年(计划)
9.035	21.396	22.342	29.300

(根据苏联财政部材料，1953年5月15日至7月15日通信。关于1954年度苏联国家预算的法律，《真理报》1954年4月22日)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医院、分科诊所、疗养院和休息室；儿科保健所、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

要有展示苏联东部地区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情况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间使用题词：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医疗保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几乎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了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网络。”

体育器材展馆

冰刀、滑雪板、各种球类、运动鞋、哑铃、杠铃、(打冰球用的)曲棍等，猎枪、自行车、摩托车，等等。

这部分使用如下题词：

“苏联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巩固健康的普及手段，在居民同长寿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

“在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苏联运动员获得38枚金牌、56枚银牌和18枚铜牌，创造2项世界纪录和12项苏联纪录。”

(根据苏联卫生保健事业材料)

这组照片要展示各种体育竞赛情况、在苏联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和胜利者的相片。

(七)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美术文学，艺术书籍、国外经典和现代文学俄译本或苏联各语种译本，名画复制品、乐谱、唱片、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这部分置于展厅的右翼，并且分割为两个分支：一支是马列主义书籍，还包括对这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作品；另一支为文艺书籍，包括儿童文学。

这部分的照片要展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景况。

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品展架的上方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使用题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让我党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开辟新的历史道路，清晰地看到我们前进的目标，快速而又持久地巩固胜利。”——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页)

在摆放科学书籍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

“近15年来，苏联出版了7亿多册各领域的科学书籍。”(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进入出版物展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出版的年度出版物的数量达到9.62亿册，是1940年的2.2倍。使用苏联76种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出版。”(根据联盟书库的消息)

在摆放文艺作品的展架上面使用题词和表格：

“在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中，人民意识到苏联的文学和艺术是新的、正确的，帮助党和国家培养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共产党人》1954年第21期，第14页)

苏联出版的俄国文艺经典作品和革命前的俄国相比较：

	1888—1917 年	1918—1953 年
A. C. 普希金	10,711	65,437
M. Ю. 莱蒙托夫	4,086	18,729
H. B. 果戈里	5,813	28,421
H. A. 涅克拉索夫	254	17,414
Л. Н. 托尔斯泰	10,784	53,965
A. П. 契诃夫	672	38,127
A. M. 高尔基	1,083	73,694
B. B. 马雅可夫斯基	4	20,391

在照片之间使用题词：

“1953年苏联拥有38万家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分布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中，藏书总额达10亿册。”

(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54年1月31日)

(八)

职业教育展馆

步行式挖掘机、联合采煤机等机械模型；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制作的艺术品；中等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具。

这部分展品和出版物放在同一个展厅。两个展厅使用一个题词，写在通往大厅的影壁墙的端面：

“国民收入用于各种教育、干部培训、发展科学和艺术及其他教育方面的投入，1954年的总额达670.1亿卢布，是1940年的3倍。”(根据《1954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法令》，《真理报》1954年4月22日，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情况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版，第71页)

照片要广泛反映培训青年工人的主题，反映手工业学校和工厂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学片断，他们的生活、休息、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等。

这部分使用题词：

“国家劳动资源系统保障为社会主义生产源源不断提供专业化的工人干部队伍。”(《经济问题》1949年第2期)

“从1946年到1953年国家劳动资源学校为工业培训和转交了400多万名青年职业工人。”(中央统计局消息,《真理报》1947年1月21日,1948年1月18日,1949年1月20日,1950年1月18日,1951年1月26日,1952年1月29日,1953年1月23日,1954年1月31日)

“在苏联劳动后备军得到国家全面保障:免费接受职业培训,提供饮食、服装、鞋、宿舍、教科书和直观教具。”

两支分部联为一体:中学、职业教育、大学、技术学校,在两个大厅之间使用一个题词:

“1953年学员数量,包括各种形式的培训,达5700万人,几乎比1940年多800万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市选区选民集会上的演说,1954年3月11日)

(九)

高等院校展馆

高等院校展馆设在展览馆右侧一个正方形大厅内。

大厅的正中央放置模型:莫斯科大学主建筑楼(高2.5米)和莫斯科大学总的建设规划。

大厅纵向陈列台的中间在墙壁正面悬挂苏联一些大学的电子画片和不断切换的题词,介绍大学、大学生和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的增长数量,等等。图片配备录音机,播放的文本介绍关于高等教育的信息和苏联的学术研究活动。

图片的上面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青年一代学习知识、全面发展天分和潜质提供一切可能。”(《真理报》1952年1月14日)

在墙壁的反面,大厅入口的上方使用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苏联科学为利用我国难以计数的财富提供了无限可能……”——马林科夫(马林科夫:《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真理报》1949年11月7日)

在墙面大学图片的两边摆放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两个陈列台，展现这两大综合性大学培养苏联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教育体系。在墙的正面再附加两个不大的展台展示苏联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这个大厅的其他展台上摆放照片，展示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特点和方式，展示苏联大学和技术院校的科学和艺术。此外，还要展示个别教学片断(讲义、课堂讨论和实验课、生产实践，等等)。还要摆放展示大学生生活、休息和体育运动的照片，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留学生的学生情况，特别是中国的。

除了照片，在高等院校展架上还要摆放教科书、教辅用具，在展架上方悬挂俄国科学巨匠的椭圆形肖像：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俄国科学奠基者M.B.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塑像摆放在大学照片的下方，在台架上摆放鲜花。

(十)

农业展馆(注：按照全苏农业展览会编制的农业分类选题展览计划)

该展馆要展示：粮食和粮食产品、各种玉米种子；棉花、不同等级的棉纤维、各种型号的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蚕茧、桑属植物；细毛绵羊织品、杂种兽毛；苏联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的样本，以及按照米丘林方法培育的水果和蔬菜样本，等等。

这部分摆放在展馆的左侧，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在那里展示农业机械。

使用系列照片、图片、数字资料，展现苏联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成就，阐明苏联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艺学的发展，等等。

农业展厅的正中央摆放工农联盟的雕像——全苏农业展览会的浮雕。

农业部分有如下选题：

选题一

开场。苏联农业的任务和取得的成就

1.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时代。

2.近5800公顷的土地转交给苏联集体农庄永久使用。

3.集体农庄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万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农村中的贫困和寒苦现象消失了。

4.“……技术薄弱、依附于富农的无数的小农经济被取代了，现在我们有用了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其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斯大林

5.苏联拥有94000个集体农庄，4835个国营农场，8980个拖拉机工作站。平均每个集体农庄拥有5960公顷土地，每个国营农场拥有19800公顷土地。

6.国家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技术装备保障。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用机器数量 单位：千辆

拖拉机	1 260
粮食收割机	326

1953年农业经济用电量是1940年的4.5倍。

7.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是集体农庄的基本法。“劳动农民志愿联合成为农业组合，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共同劳动建设集体农庄，也就是公有制经济。”(摘自章程第一条)

8.集体农庄公有财产增长率

单位：%

	1940 年	1950 年	1953 年
投 资	100	157	232
货币收入	100	165	240

9.苏联集体农庄的任务：充分满足人民对饮食的增长需求和工业所需原料。

	1926/1927 年	1952/1953 年
粮 食	10,3	40,4
肉(活重)	2,4	5,0
奶	4,3	13,2
马铃薯	3,0	12,5

10.苏联农业是以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先进经验和强大的现代技术为基础根据国家的计划发展的。

11.这个主题要展示农业经济专家的增长数量。

选题二

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力量

列举关于1930年、1940年和1953年拖拉机工作站的数量的材料，关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功率提高的材料。强调拖拉机工作在集体农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展现拖拉机工作站同集体农庄在合同的相互义务规定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列举以老拖拉机手T.I.舍甫琴科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的收成指数，指出拖拉机工作在畜牧业中的工作方式。

选题三

扩大重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

小麦在粮食播种中的比重。品种、机械化耕种。列举各地区和集体农庄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在这个选题中要列举为了提高粮食生产，首先是小麦生产，而开垦的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主要资料。

陈列架上还要摆放关于育种问题的画册。

选题四

扩大稻米生产

指出产量的增长。列举产量创纪录的例子：伊布莱·塔哈耶夫——171普特/公顷，金万山——150普特/公顷。指出金万山使用了稻米农业

技术员培育的种子。

展示：新的灌溉系统，外顿河地区、纳曼干州、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巨人”集体农庄扩大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新品种培育网络，有213个全苏稻谷试验站，强调大米收割的机械化。

选题五

增加食用玉米和饲料玉米的生产

列举在粮食种植和饲料种植中玉米取得高收成的例子。

展示玉米耕种机械化，正方形穴播，垄间距，混种的应用。

选题六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豆种植

近年来，苏联政府成功地把大豆种植推广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豆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先进的例子是基辅国营农场和普里莫尔斯克市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专家保障了大豆取得高收成。

选题七

棉花——苏联主要的经济作物

苏联的棉花种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水浇地播种面积增长情况 单位：千公顷

1913 年	1940 年	1953 年
690	1055	1880

苏联集体农庄棉花收成增长(1953年每公顷平均产棉) 单位：公担

苏 联	20,3
埃 及	17,5
美 国	9,5
印 度	3,3

棉花种植机械化的工作效率：每台棉花收割机可以取代50名收割工人的劳动量。

以如下先进的集体农庄：科京·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赫努巴巴耶夫集体农庄、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基洛夫集体农庄来展示棉花种植广、产量高；这些经济单位棉花种植的收入额。

选题八

新的韧皮纤维作物罗布麻和黄麻在苏联的推广和顺利发展

展示播种这些作物取得的成果和方法，取得高收成的有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下丘亚国营农场，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季米特洛夫集体农庄和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列举这些作物高收入的材料。

选题九

苏联的养蚕业——农业高收入领域

列举苏联蚕茧收入高增长的材料，蚕卵产出增长量，桑树种植面积的增长量。

列举产蚕先进单位：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列宁集体农庄，展示蚕蛾快速成长法。

选题十

苏联的甜菜种植

苏联在甜菜种植和甜菜糖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出示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甜菜糖生产的表格。

苏联产糖甜菜的播种面积和甜菜糖的生产量保持增长。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产糖甜菜高产量。

波尔塔瓦州米丘林集体农庄农业技术员。产糖甜菜的科学研究机构。

选题十一

苏联组织大规模的马铃薯栽培和蔬菜栽培

马铃薯和蔬菜的种植面积。温床和温室作物增长量。制作蔬菜罐头，蔬菜和马铃薯晒成干菜。9月苏共中央关于马铃薯和蔬菜生产的全民决议。蔬菜和马铃薯取得高收成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土地开发和保护方面的先进做法。

正方形穴播和蔬菜与马铃薯的正方形种植方法。在草炭腐殖质营养体栽种秧苗。利用工业企业的热能残料和电能给暖窑和温室供暖。

马铃薯和蔬菜栽培科学成果(马铃薯业研究所、蔬菜业研究所、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格里博夫蔬菜育种站)。

选题十二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畜牧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先进经验

苏联养殖牲畜的类别。在饲养大牲畜方面取得的成绩。在牲畜业生产方面取得高指标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育种站和国营种站。

新的畜牧良种的推广。“卡拉瓦耶夫”集体农庄和其他一些先进经济体在提高畜牧产量方面的经验。

养羊业展台

国内细毛绵羊的主要种类。羊毛质量的改善。一些高产牲畜的指数。卡拉库尔绵羊养殖业的发展。先进单位和养羊户的成绩和经验。

选题十三

苏联的狩猎业、养兽业和鹿茸业

苏联是世界上毛皮资源最为富有的国家，动物种类繁多。在苏联领土上栖息着130多种毛皮类动物，250种有猎取价值的飞禽。

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是140万平方公里。

苏联畜牧业的发展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带来大笔收入。

苏联的鹿茸业和鹿茸生产。

选题十四

苏联的园艺业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果园和葡萄园面积保持增长。

宅旁园地和集体果园。

果实和葡萄取得高收成的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培育果实和葡萄高产的农艺专家。

草莓——高产作物。草莓可以采用正方形窝种法。果实生产程序机械化。果实、干果和葡萄的主要等级。

米丘林中央实验室及其对生产的帮助。

培育新品种作物。远亲植物杂种方法。

选题十五

苏联的茶业生产

茶叶种植面积，茶叶总收成。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茶叶收成指数。茶叶种植机械化。

(十一)

食品展馆

该展馆从理论上讲同农业原料部分相关联。列入展架的有：肉、鱼、水果和蔬菜；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和鱼；植物油、果汁、干果、葡萄干；糖果；糖、维生素、压缩食品；酒类、茶；烟叶和卷烟。

照片要展示米高扬肉制品厂的车间，渔业公司，糖果公司明亮宽敞的车间，浓缩食品生产，茶叶、葡萄的采摘，烟草的种植，等等。

使用题词：

“1955年苏联食品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84.7%。”(根据米高扬在全苏贸易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材料，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

“1953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牛奶和奶制品是1940年的2倍，植物油和其他食用油、奶制品和糖是1940年的2.5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3月21日)

香肠和肉制品展架：

“1956年苏联生产肉和肉制品近300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4倍。”

鱼制品展架：

“1956年苏联捕鱼量达到3600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1倍。”

罐头展架：

“1956年苏联生产罐头41.500万罐，或者说是1950年的2.9倍。”

糖果展架：

“1955年苏联糖果产量达到1825万吨，或者说是1950年的2倍。”

(根据关于苏联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措施的决议，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63、65、73、79页)

蔬菜和糖果展架：

“1953年苏联向居民供应的糖果是1940年的2倍，供应的蔬菜是1940年的1.5倍。”(根据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54年3月21日)

(十二)

造型艺术展厅

这个展厅的主要题词是：

“艺术属于人民。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

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的会谈资料)

这个展厅要展示苏联写生画、线条画、雕塑领域的巨匠作品。

附注：括号里使用的引文出处不列入陈列题词。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179-205

№21418-1 1950—1954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二)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出 口		进 口	
	数量 (百万卢布)	所占 百分比	数量 (百万卢布)	所占 百分比
五年的总额	9 191*	100	7 806	100
机器和设备	2 722	30	142	2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2 281	25	1 665	21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及橡胶产品	199	2	631	8
建筑材料和零件	24	0.3	77	1
动植物原料(粮食除外)	471	5	1 673	21
活的牲畜	12	0.2	—	—
食品生产原料	47	0.5	2 088	27
食品	169	2	1 264	16
民用工业品	288	3	302	4
供应总工程管理局的(专用物资)	2 788	30	—	—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注：(1)出口超过进口13.85亿卢布是因为在出口中包含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提供的总值11.07亿卢布的商品，根据1952年9月15日贷款协议，向种植橡胶提供的总值3500万卢布，剩下的是苏联提供用外汇支付的商品的和用于非商品的开支以及非商业支出的补偿金。
(2)1954年的进出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21418-2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三)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应该供应的)		1950—1954 年总量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总量	1 114.9	100	1 461.3	100	1 857.7	100	2 329.5	100	2 427.5*	100	9 190.9*	100
机器设备	172.6	15.5	427.6	29.3	611	32.9	650	27.9	860.8	35.5	2 722	29.6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186.2	16.7	446.8	30.5	472.6	25.4	545.1	23.4	630.4	26	2 280.6	24.8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及橡胶产品	27.6	2.5	66.7	4.6	42.2	2.3	26.7	1.1	35.3	1.5	198.5	2.2
建筑材料	2.4	0.2	7.3	0.5	5.9	0.3	4.9	0.2	3.1	0.1	23.6	0.3
动植物原料(粮食除外)	46.8	4.2	105.7	7.2	87.9	4.7	80.9	3.5	149.3	6.1	470.6	5.1
活牲畜	6.7	0.6	0.1	0.01	0.2	0.01	2.1	0.1	3.3	0.1	12.4	0.1

续表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应该供应的)		1950—1954 年总量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出口	%
食品生产的原料	46.7	4.2	0.4	0.03							47.1	0.5
食品	106.4	9.5	23.5	1.6	14.7	0.8	14.2	0.6	10.2	0.4	169	1.8
民用工业产品	110.3	9.9	103.8	7.1	38.1	2.1	19.2	0.8	16.8	0.7	288.2	3.1
供应总工程管理局的(专用物资)	409.2	36.7	279.9	19.2	585.5	31.5	986.4	42.4	528.3	21.8	2 788.9	30.4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卢布

商品 种类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应该供应的)		1950— 1954 年总量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总量	765.1	100	1 327.7	100	1 655	100	1 899	100	2 159.5	100	7 806.3	100
机器和设备	45.7	6	28.2	2.2	10.1	0.6	10.3	0.5	47.4	2.2	141.7	1.8
其中：拖车	6.4	9.6							29		45	
燃料、金属、矿物原料	147.4	19.8	244.3	18.4	343.2	20.7	449.2	23.7	480.9	22.3	1 665	21.2
其中：锡	25.2		72.7		96		188.1		180.6		562.6	
钨精矿	28.8		71.9		129.9		153.4		155.4		539.4	
化工产品、肥料、橡胶	26.9	3.5	360.4	27.1	81	4.9	77.3	4.1	85.9	3.9	631.5	8.1
建筑材料与配件	11.4	1.5	10.5	0.8	16	1	21.6	1.1	18.1	0.8	77.6	1
动植物原料	160.6	21	228.3	17.2	412.4	24.9	420.1	22.1	415.4	19.2	1 636.8	21
其中：羊毛	45.6		61.9		69.4		87.7		77.9		342.5	
生丝	17.3		43.5		51.6		76.2		75.9		264.5	
皮革					88.3		97.9		96.3		282.5	
食品生产原料	276	36.1	346.1	26.1	499.3	30.2	488.7	25.7	478.1	22.1	2 088.2	26.8
其中：大豆	194.2		212		213		222.3		213.3		1 054.8	
花生	22.8		43.2		147.2		132.1		131.5		476.8	

续表

商品 种类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应该供应的)		1950— 1954 年总量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进 口	%
食品	87.1	11.4	90.8	6.8	229	13.8	354.7	18.7	502	23.3	1 263.6	16.2
其中：大米	18.3		18.6		61.6		119.3		184.6		402.4	
民用工业品	10	1.3	19.1	1.4	64	3.9	77.1	4.1	131.7	6.2	301.9	3.9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208 209

№21418-3 1950—1954年苏联对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 统计(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四)

机密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五年内的总数	9 190, 9*	百万卢布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	6, 7	千个
锻压设备	0, 3	千个
动力和电力设备	198, 2	百万卢布
矿山机械设备	45, 2	同上
石油开采设备	155, 6	同上
提升运输设备	64, 8	同上

续表

铁路牵引列车和设备	88, 1	同上
泵式压缩机设备	47, 3	同上
化工设备	25, 8	同上
企业的成套设备	823, 8	同上
轴承	3	百万个
拖拉机	2, 5	千台
农业机械	45, 5	百万卢布
自动卸货车、客车、专门的	46	千台
汽车零配件	66, 8	百万卢布
筑路机械	27, 2	同上
仪器	28, 2	同上
石油和石油产品	3, 3	百万吨
其中：原油	0, 5	同上
石油产品	2, 8	同上
黑色金属和轧材	2 005	千吨
其中：黑色金属轧材	1 472	同上
可再加工的产品	113	同上
管道	256	同上
合金铁	26	同上
有色金属和轧材	98	同上
电缆和电缆成品	96, 8	百万卢布
化工产品	121, 6	同上
纸浆	88, 7	千吨
纸张与纸板	240, 8	同上
糖	101	同上
棉织布	70	百万米
医药和医学仪器	39, 3	百万卢布
重要工程处的供应(专用物资)	2 788, 8	同上

*其中包含1954年中国方面备用的额外购买苏方商品的1.9亿卢布。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5年间的出口订购数量9190.9百万卢布的86%。(2)1954年的出口是根据现在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五年(1950—1954)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数量

五年内的总数	7 806.3	百万卢布
其中：锡	49.6	千吨
钨精矿	81.7	同上
钼矿	10.4	同上
锡	34	同上
生铁	802.5	同上
煤	2 478	同上
萤晶石	103.8	同上
滑石粉	92.7	同上
油驳和干货驳船	98	艘
拖车	137	台
橡胶	113.2	千吨
煅烧苏打	153.5	同上
桐油	32.3	同上
大豆	2 702.3	同上
植物油	286.7	同上
花生	608.3	同上
油类籽种	301.6	同上
大米	443.7	同上
猪羊牛肉	211.2	同上
大型牲畜	28.9	活重千吨
小型牲畜	41.9	同上
鸡蛋	167.1	百万个
茶叶	57.5	千吨
苹果	45.6	同上
柑橘	51.7	同上
烟草	86.3	同上
黄麻	40.3	同上
苧麻纤维	39.2	同上
大麻纤维	24.5	同上
粗绵羊毛	48.1	同上
半粗绵羊毛	7	同上
生丝	7.6	同上
麻袋	25.1	百万个
鬃毛	7.2	千吨
细毛原料皮	10.4	百万个
软毛原料皮	29.5	百万卢布
丝绸布	45.5	百万米

注释：(1)上面所列的商品构成5年间的订购的口数量7806.3百万卢布的88%。(2)1954年的进口是根据现在所承担的义务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0—1954年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根据商贸协定年度供货列入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和用于发展种植橡胶的贷款) 单位:百万卢布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总 计	百万卢布	—	1 114.9	—	1 461.3	—	1 857.7	—	2 329.5	—	2 427.5
其中:铁合金	千吨	4.6	5	5.9	8.9	4.6	11.6	7.1	21.7	4.1	20.0
黑色金属轧材	千吨	119.4	56.9	276.7	122.7	320.6	157.2	338.8	162.5	416.1	196.0
其中:普通轧材	千吨	115.9	53.6	268	114.8	307.6	139.6	318.2	139.6	390.8	171.3
其中:梁柱和槽钢	千吨	8.8	3.4	28.9	10.5	43.5	17.2	63.5	25.1	73.3	28.8
型钢	千吨	23.4	9.5	43.1	17.2	29.8	12.6	57.1	23.5	66.4	26.8
普通线材	千吨	0.5	0.2	29.9	11.7	26.7	10.5	9.4	3.7	0.2	0.1
薄板材	千吨	12.3	5.5	21.9	10	120.9	52.7	122.7	54.1	46.9	21.5
厚板材	千吨	22.2	9.6	66.3	28.6	—	—	—	—	88.0	37.8
黑铁皮	千吨	2.2	1.2	2.3	1.3	8.4	4.6	9.8	5.3	9.1	5.0
宽钢轨	千吨	29.9	13.5	53.7	22	46.2	20.9	37.2	16.8	77	34.8
轧线	千吨	11.2	7.8	13.3	9.2	10.8	7.5	4.2	2.9	12.8	8.9
优质轧材	千吨	3.3	3.2	8.6	7.9	13	17.6	20.6	22.9	24.7	24.9
其中:螺纹钢	千吨	1.1	1.1	0.6	0.6	2.5	2.5	5.2	5.0	3.6	3.5
变压钢	千吨	0.7	0.7	2.1	2.2	2.8	3.0	2.6	2.8	4.2	4.6
可再加工的普通轧材产品	千吨	1.8	1.3	11.2	9.6	30.8	21.3	22.2	17.3	46.9	29.1
其中:白铁皮	千吨	0.4	0.4	6.3	6.4	12.6	11.7	9	8.9	10.6	10.1
镀锌铁	千吨	1.3	0.9	3.4	2.3	13	8.4	10.6	6.9	10.9	6.9
管道	千吨	12.1	10.5	42	34.1	58.9	58.9	69	70	74.3	69.1
金属制品	千吨	4.4	4.2	23	18.4	11.8	12.7	19	14.8	10.1	10.6
有色金属和轧材	千吨	5.7	11.5	27.5	66.3	22.7	61.1	17.8	52.0	24.5	81.2
其中:铜	千吨	0.8	1.4	5.2	11.6	5.2	11.8	1.9	4.7	10.4	31.9
铝	千吨	1.0	1.5	3.5	6.3	5.0	8.8	5.3	9.5	6.2	10.9
锌	千吨	1.2	1.1	5.7	10.2	0.1	0.2	0.03	0.06	—	—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钢轧材	千吨	0.5	1.8	3.8	11.6	4.5	13.9	2.6	10.4	2.7	14.0
铝轧材	千吨	0.4	1.2	0.5	1.7	1.1	4.4	1.0	4.7	1.4	6.2
黄铜轧材	千吨	0.2	0.7	1.6	5.8	2.0	7.9	1.7	7.0	2.2	11.2
电缆产品	百万卢布	—	26.2	—	23.5	—	11.8	—	16.5	—	18.8
金属切削机床	个	1813	39.3	770	25.9	1615	41.2	1858	62.4	769	30.9
锻压设备	个	51	1.2	26	1.6	79	1.9	120	4.0	48	1.6
动力和电力设备	百万卢布	—	24.5	—	32.8	—	28.1	—	42.7	—	70.1
其中：活动发电机	个	10	0.3	439	6.1	45	1.1	57	1.3	241	4.9
电动机	个	4830	10.7	5516	7.9	1095	1.5	840	2.4	1215	2.2
各种电炉	个	51	0.9	181	5.8	193	2.6	225	5.1	148	2.5
电源变压器	千瓦	123.8	2.5	103.3	2.5	67.7	1.8	12.4	0.4	21.1	0.5
电源开关	个	344	2.0	135	0.7	53	0.3	162	2.9	97	4.0
矿山机械设备	百万卢布	—	9.3	—	9.6	—	4.5	—	2.7	—	12.1
其中：割矿机	个	43	1.4	14	0.5	61	2.1	10	0.4	12	1.0
联合采煤机	个	2	0.2	—	—	4	0.4	17	1.5	9	0.7
岩石装运车	个	55	2.8	2	0.1	—	—	66	2.0	33	1.1
矿井提升机	个	15	3.8	7	2.6	—	—	—	—	21	5
石油钻井设备	百万卢布	—	7.6	—	9.1	—	46.4	—	56.8	—	35.7
其中：钻井台	个	63	3.4	62	3.4	346	28.7	503	31.3	188	11.7
提升运输设备	百万卢布	—	7.3	—	7.6	—	9.9	—	13.6	—	26.4
其中：自动载重车	台	21	0.3	50	1.1	71	2.2	25	0.6	14	0.5
各种起重机	台	14	1.6	51	3.6	81	5.8	116	6.0	105	7.4
铁路牵引列车和设备	百万卢布	—	1.8	—	36.5	—	34.8	—	9.8	—	5.2
其中：蒸汽机车	个	11	1.1	—	—	35	3.5	—	—	—	—
电气机车	个	—	—	198	25.2	14	0.9	85	7.3	40	5.1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压缩泵设备	百万卢布	—	1.4	—	8.9	—	7.6	—	9.8	—	19.6
其中：泵	个	896	0.5	548	5.8	637	3.8	493	4.1	801	5.9
压缩机	个	46	0.9	60	3.1	132	3.2	165	5.5	328	12.1
化工设备	百万卢布	—	—	—	0.7	—	9.1	—	6.0	—	10.0
货车	台	1 897	18.8	3 843	41.8	12 360	101.6	11 071	93	11 809	108.7
轿车	台	128	0.7	516	2.8	727	3.6	1 334	6.4	1 046	7.9
专用车辆	台	179	3.7	381	8.8	333	9.1	270	10.1	85	2.1
汽车配件	百万卢布	—	4.1	—	21.2	—	15.3	—	13.1	—	13.1
拖拉机	台	305	4.5	259	6.3	643	14.6	812	19.4	430	10.7
农业机械	百万卢布	—	8.1	—	7.9	—	10.2	—	16	—	3.3
其中：联合收割机	台	191	2.4	25	0.4	105	1.6	193	8.0	87	1.2
筑路机	百万卢布	—	1.0	—	1.5	—	4.1	—	11.7	—	8.9
其中：推土机	台	—	—	11	0.5	11	0.5	135	4.9	160	6.2
平土机	台	5	0.05	11	0.2	3	0.1	29	0.8	38	1.7
仪器	百万卢布	—	2.7	—	2.9	—	7.8	—	7.4	—	7.4
轴承	千个	446.7	3.4	291.8	2.2	386.6	4.0	964.9	10.4	940.3	16.2
硬合金	吨	1.3	0.7	3.1	1.0	15	5.2	17	6.6	22.3	8.2
光学仪器	百万卢布	—	0.7	—	2.1	—	2.4	—	4.2	—	2.6
企业全套设备	百万卢布	—	4.0	—	128.9	—	145.7	—	180.3	—	364.9
石油及石油产品	千吨	148.9	35.6	715.2	155.8	607.5	129.0	879.9	178.5	935.2	191
其中：原油	千吨	38.9	5.8	61.4	9.2	102.3	15.3	111.2	16.6	139	20.6
航空汽油	千吨	27.7	8.5	57.5	17.1	66.9	16.0	140.3	32.5	61.4	18.6
车用汽油	千吨	43.0	8.2	223.6	46.7	135	28.5	301.3	61.6	175.9	37.7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柴油	千吨	12.2	2.0	126.4	20.9	19	3.2	60.5	10.3	51.5	8.9
润滑油滑剂	千吨	22.5	10.2	63.0	27.1	68	27.1	39.5	17	45.7	22.0
煤油	千吨	36.9	6.6	86.5	14.7	211.1	36.3	199.5	35.4	134.3	18.4
纸张和纸板	千吨	14.7	15	70.9	44.6	92.2	66.3	42.8	35.7	20.2	35.4
其中: 报纸用纸	千吨	8.5	3.9	50.6	22	48.2	20.9	30.5	12.4	12.5	5.4
钱币用纸	千吨	2.7	9.8	1.6	6.3	2.4	9.7	1.4	14.0	4.3	17.4
纸浆	千吨	13.5	5.9	15.7	9.5	35.7	18.7	23.8	11.1	—	—
橡胶和橡胶产品	百万卢布	—	4.4	—	16.9	—	14.3	—	7.5	—	6.7
其中: 汽车轮胎	千套	7.2	1.2	91.5	14.7	51.6	10.3	26.3	4.9	31.1	5.7
化工产品	百万卢布	—	21.6	—	46.2	—	21.4	—	18.3	—	14.1
医药和医学仪器	百万卢布	—	6.1	—	11.3	—	9.1	—	5.9	—	6.9
棉布	百万米	10.4	14.9	44.1	59.2	8.7	12.9	1.1	1.7	5.5	7.8
糖	千吨	20.7	17.4	19.9	11.8	15.5	9.8	14.3	9.1	31	12.9
供应重要工程处的专用物资	百万卢布	—	409.1	—	279.9	—	585.1	—	986.4	—	528.3
此外的技术援助	百万卢布	—	3.1	—	31.5	—	31.8	—	56.7	—	118.1

在上面供应的商品中

一、列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中的：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 年供应	1951 年供应	1952 年供应	1953 年供应	1954 年应供应
总计	百万卢布	1 200.0	236.1	157.1	315.0	258.7	233.1
企业整套设备和技术援助	#	670.7	0.4	102.1	152.0	163.1	233.1
其中: 设备	#	557.5	0.4	89.7	142.8	144.6	200
技术援助	#	93.2	—	12.4	9.2	38.5	33.1
各种设备和材料	#	529.3	235.7	55.0	163.0	75.6	—
其中: 金属切削机床	台	584	—	—	556	28	—

续表

	计量 单位	预定 供应	1950 年 供应	1951 年 供应	1952 年 供应	1953 年 供应	1954 年 供应
锻压机床设备	个	95	51	18	25	1	—
金属切削和测量仪器	千卢布	4 039	—	—	3 698	341	—
硬合金	公斤	2 057	—	—	1 859	198	—
试用机床和仪表	千卢布	208	—	—	145	63	—
动力和电力设备	°	15 505	992	3 528	4 565	6 420	—
其中：发电机和摩托 发电机	台	3	—	—	3	—	—
电力变压器	千瓦/时	88.8	—	80.8	8.0	—	—
75 马力牵引机	台	10	10	—	—	—	—
蒸汽锅炉和设备	°	3	—	—	3	—	—
移动电站	°	38	—	—	26	12	—
电动机	°	710	—	—	702	8	—
X 光设备	°	13	—	—	7	6	—
电焊机	°	58	—	—	48	10	—
大功率油断路器	°	67	—	—	—	67	—
各种继电器	°	738	—	—	685	53	—
金属水银整流器	千瓦/时	17.2	—	—	4.0	13.2	—
玻璃水银整流器	个	39	—	—	23	16	—
炼钢和铁的电炉	°	12	1	2	3	6	—
各种电炉	°	27	—	—	25	2	—
硒整流器	°	51	—	—	46	5	—
低压机组	°	10	—	—	5	5	—
压缩泵设备	千卢布	2 501	409	1 865	227	—	—
其中：泵	个	182	66	110	4	—	—
压缩机	°	32	5	12	15	—	—
矿山机械设备	千卢布	12 372	6 709	—	2 832	2 831	—
其中：割矿机	个	61	33	—	27	1	—
联合采煤机	°	23	2	—	4	17	—
联合采煤机配件	千卢布	17	—	—	—	17	—
钻孔枪	个	1 216	1 216	—	—	—	—
风镐	°	20	20	—	—	—	—

续表

	计量单位	预定供应	1950 年供应	1951 年供应	1952 年供应	1953 年供应	1954 年供应
装载机	台	102	55	—	17	30	—
立柱凿岩机	#	150	150	—	—	—	—
钻孔机	#	100	100	—	—	—	—
钻采机床	#	40	28	—	—	12	—
矿灯	#	12 500	—	—	12 500	—	—
提升运输设备	千卢布	14 995	10 388	1 164	1 226	2 217	—
其中：各种卷扬机	个	51	49	—	2	—	—
矿井提升机	#	15	15	—	—	—	—
桥式起重机	台	6	—	1	5	—	—
铁路吊车	#	19	10	8	—	1	—
汽车起重机	#	12	—	—	8	4	—
各种运输机	#	92	50	—	7	35	—
各种装卸机	#	35	16	—	—	19	—
汽车装载机	#	31	5	—	15	11	—
电动搬运车	#	19	—	—	—	19	—
铁路设备	千卢布	84 592	11 777	34 215	31 252	7 348	—
其中：工业机车	台	7	—	—	—	7	—
滑接轮机车	#	92	20	60	4	8	—
电瓶机车	#	94	11	3	10	70	—
窄轨机车	台	11	11	—	—	—	—
翻斗车	#	200	—	200	—	—	—
铁路罐车	#	1 086	—	—	1 086	—	—
铁路平板车	#	45	—	—	45	—	—
重车厢	个	5	—	2	3	—	—
重建满洲铁路的设备	千卢布	8 996	8 996	—	—	—	—
石油钻探设备	#	32 288	2 371	1 428	7 849	20 280	—
其中：钻探机床和设备	台	488	335	141	309	—	—
渗碳处理机组	#	4	—	—	4	—	—
冲洗机组	#	2	—	—	2	—	—
延伸杆	千米	75	—	—	75	—	—
管道牵制器	台	1 370	—	—	1 370	—	—

续表

	计量 单位	预定 供应	1950 年 供应	1951 年 供应	1952 年 供应	1953 年 供应	1954 年 供应
套管柱	吨	83.5	—	81	2.5	—	—
钻探设备配件	千卢布	496	5	4	—	487	—
建筑设备	°	15 003	7 012	4 274	661	3 056	—
其中：挖掘机	台	51	28	7	11	5	—
打桩机	°	3	—	—	3	—	—
载重汽车	°	1 350	—	635	715	—	—
各种设备	千卢布	5 374	176	1 233	2 281	1 584	—
其中：超级离心机	台	10	—	5	5	—	—
三轴压延机	°	8	—	—	4	4	—
冷却机组	°	8	—	—	4	4	—
冲洗设备	°	3	—	—	3	—	—
橡胶搅拌机	台	51	4	—	—	—	—
氧气装备	°	4	—	4	—	—	—
硫酸浓缩器	°	2	—	—	2	—	—
热压器	°	9	—	—	7	2	—
反应器	°	12	—	—	2	10	—
黑色金属	千卢布	172 016	54 354	1 845	85 337	30 480	—
其中：带扣件的宽轨	千吨	179.9	85.1*	2.4	43.1	49.3	—
轮箍	°	25.2	11.2	0.1	9.9	4.0	—
车厢和蒸汽机车车轴	°	12.1	—	—	7.4	4.7	—
铁路道岔	套	270	—	—	270	—	—
横梁和槽钢	千吨	35.2	—	0.4	34.7	0.1	—
型钢	°	18.1	—	0.8	17.3	—	—
普通线材	°	9.9	—	—	8.7	1.2	—
叶状铁	°	22.3	—	0.1	21.0	1.2	—
管道	°	25.5	—	0.3	24.0	1.2	—
供应重要工程处的 专用物资	千卢布	140 142	140 142	—	—	—	—

*其中含1949年预支付的5.5万吨。

2.列入1952年9月15日帮助中国种植、收割和生产橡胶贷款协定中的：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 年供应总数(额)	1953 年供应总数(额)
总计	百万卢布	35.6	19.2	16.4
其中：动力和电力设备	千卢布	1 016	877	139
其中：交流电动机	台	52	—	52
电焊变压器	台	15	—	15
电焊仪器	台	4	—	4
移动发电机	台	16	16	—
硒整流器	台	2	—	2
电动机	台	12	—	12
功率计	台	5	—	5
拐角电刷	个	540	—	540
化工设备	千卢布	31	—	31
其中：焊枪	个	4	—	4
乙炔发生器	个	2	—	2
切割器	个	2	—	2
氧气减压器	个	2	—	2
乙炔减压器	个	2	—	2
滑油净化器	个	3	—	3
挖掘机	台	8	—	8
锯木机架	台	2	—	2
汽车运输	千卢布	6 838	2 955	3 883
其中：载重汽车	辆	400	100	300
轻便汽车	辆	80	—	80
汽车配件	千卢布	329	—	329
汽车蓄电池	个	150	—	150
汽车灯	个	1 420	—	1 420
液罐汽车	辆	40	40	—
流动修配厂	个	20	10	10
汽车汽配厂设备	套	6	3	3
筑路机器	千卢布	5 366	2 993	2 373
其中：铲土机	台	15	—	15
平土机	台	15	—	15
挖沟机	台	15	—	15

续表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 年供应总数(额)	1953 年供应总数(额)
牵引压路机	台	5	—	5
推土机	台	15	—	15
灌木铲除机	台	54	48	6
除根机	台	38	21	17
农业机械、拖拉机和配件	千卢布	18 456	10 404	8 052
其中：拖拉机	辆	490	300	190
拖拉机配件	千卢布	2 392	757	1 635
拖拉机的电气设备	千卢布	20	—	20
修理拖拉机的成套仪器	套	10	4	6
汽车拖拉机的装设	公里	8	—	8
各种犁	个	676	556	120
挂钩犁	个	140	140	—
中耕机	辆	84	84	—
播种机	辆	50	—	50
牵引割草机	辆	120	120	—
各种耙	个	990	840	150
宽幅耙草机	辆	120	120	—
马拉喷雾机	个	50	50	—
农机配件	千卢布	494	—	494
拖拉机灯	个	3 360	—	3 360
拖拉机集油槽和灰尘收集器	个	294	—	294
过滤元件	千个	14.5	—	14.5
灯玻璃	个	690	—	690
三合玻璃	平方米	13.3	—	13.3
钢化玻璃	平方米	5.1	—	5.1
修理柴油机器的整套设备	个	10	—	10
橡胶产品	千卢布	35	—	35
其中：成型盖板	个	1 320	—	1 320

续表

	计量单位	已供应总数(额)	1952 年供应总数(额)	1953 年供应总数(额)
汽车拖拉机的软管	个	125	—	125
摩擦离合器圈	个	3 564	—	3 564
针线皮带	个	1 400	—	1 400
针织布皮带	个	1 233	—	1 233
成型橡胶元件	千克	30	—	30
毡制产品	千卢布	2.2	—	2.2
滚珠和滚柱轴承	千个	20.9	—	20.9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5	—	15
木材加工机床	台	5	—	5
水压机	台	5	—	5
“巨人”轮胎	套	2 400	—	2 400
普通轮胎	套	400	—	400
柴油机润滑油	吨	966	966	—
汽车拖拉机黑机油	吨	443	419	24
夏季黄油	吨	330	330	—
汽车润滑油	吨	250	206	44
包装材料成本	千卢布	271	262	9
技术援助(派遣专家)	千卢布	826	700	126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0—1954年苏联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统计表(按年供货)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总计	百万卢布	—	765.1	—	1 327.7	—	1 655	—	1 899	—	2 159.5
其中：锡	千吨	3.8	25.2	6.8	72.7	8.1	96	15.9	188.1	15	180.6
钨精矿	千吨	8	28.8	10.9	71.9	18.1	129.9	21.7	153.4	23	155.14
钼精矿	吨	647	3.1	1 339	8	2 430	14.3	2 940	18.4	3 000	18.3
铍精矿	吨	307	6.3	1 006	12	910	6.4	818	5.7	2 100	13.8
锂精矿	吨	1 800	9.4	706	1.5	3 014	5.6	2 700	4	5 000	7.4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应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锡	吨	4 003	8.6	5 788	12.2	8 600	18.7	9 100	20	6 500	14
生铁	千吨	85.4	15.4	286.7	51.6	150	27	100.4	18.1	180	32.4
煤炭	千吨	972	37.8	148	5.7	159	6.1	439	17.3	750	28.8
萤晶石	千吨	—	—	—	—	16.8	1.8	37	3.9	50	5.2
滑石粉	千吨	6	0.6	18.1	1.8	25.5	2.5	14.1	1.4	29	2.8
菱镁粉矿	千吨	11	1.7	16.1	2.7	45.6	10.9	4	1	—	—
水泥	千吨	113.8	4.3	197	7.5	215.9	13.7	248.5	15.5	250	15.8
液体和干货驳船	艘	10	2.8	—	—	14	4.2	19	7	55	13.5
拖船	艘	50	6.4	75	9.6	—	—	—	—	12	29
浮动船坞	个	—	—	—	—	—	—	—	—	4	3.1
平底驳船	艘	95	6.4	75	5.1	23	1.6	17	1.2	—	—
橡胶	千吨	1.4	6.1	57.6	339.2	13.8	68.3	20.4	60.1	20	57.7
烧碱	千吨	34.1	4.7	26.9	3.7	29.9	4.2	32.6	4.5	30	4.4
火碱	千吨	1.8	0.5	0.5	0.1	—	—	18.5	4.9	11.5	3.1
桐油	千吨	5	10.4	5.1	10.5	7.4	14.8	5.6	11.5	10	14.3
硫化钠	千吨	—	—	—	—	7	4	10.2	5.9	0.1	0.1
粉末涂料	千吨	5.3	2.8	3.5	1.8	3.6	1.9	3.4	1.8	3	1.6
天然奥立夫油	千吨	0.5	0.8	0.5	0.8	0.8	1.3	1	1.6	1.5	2.4
松香	千吨	—	—	2	1.2	2	1.2	—	—	—	—
大豆	千吨	500	194.2	535.8	212	548.7	213	567.8	222.3	550	213.3
植物油	千吨	39.1	40.7	40.6	51.5	53.4	68.1	80.5	99.7	73.1	95.4
花生	千吨	29.9	22.8	55.1	43.2	187.3	147.2	167.8	132.1	168.2	131.5
油菜籽	千吨	4.6	2.6	7.7	4.7	68.9	44	107.1	73.3	113.3	74.9
豆饼	千吨	42.6	10.7	65	17.5	50.4	13.3	15	4.1	15.2	4.1
大米	千吨	8.9	4.6	4	2.1	72	40.4	149.4	83.8	209.4	117.4
小麦	千吨	17.5	4.6	21.9	6.5	11.1	3.9	—	—	7	2.1
面粉	千吨	5.3	2.9	7.5	4.1	24.9	13.7	15.5	7.1	19.7	9
猪牛羊肉	千吨	9.6	18.3	9.5	18.6	32.3	61.6	62.6	119.3	97.2	184.6
大型牲畜	活重千吨	9.6	5.6	4	2.6	8.2	5.4	5.1	3.3	2	1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小型牲畜	活重千吨	13.6	9.7	11.4	8	9.3	7	4.6	3.4	3	2.3
鸡蛋	百万个	13.3	1.6	9.8	1.1	11.2	1.2	32.8	3.5	100	11.2
鲜活鱼	千吨	1.2	0.5	3.5	1.6	2.8	1.3	2.5	1.2	2.1	1
盐	千吨	33.8	1.1	50.6	1.6	91.9	3.6	92.1	3.1	121	3.9
茶叶	千吨	4.3	18.4	12.3	42.8	20.5	76.9	11.8	47.3	8.6	38.3
苹果	千吨	0.3	0.3	3.1	2.1	12.2	8	10	6.6	20	12.5
柑橘	千吨	—	—	0.2	0.2	12.2	9.5	14.3	11	25	19.4
香蕉	千吨	—	—	—	—	0.1	0.1	1.8	1.5	2	1.6
水果罐头	罐	2 250	2.2	1 580	1.5	4 910	4.8	2 995	3	4 413	4.4
淀粉	千吨	—	—	—	—	—	—	5.4	2.9	6.5	3.5
土豆和各种蔬菜	千吨	21.5	3.9	32.5	4.8	33.7	6.9	30	6.5	29.6	5.7
烟草	千吨	—	—	—	—	26.1	88.3	30.2	97.9	30	96.3
黄麻	千吨	—	—	—	—	—	—	20.1	15.7	20.2	14.6
苧麻纤维	千吨	—	—	5	10.3	9.2	18.9	13	26.8	12	24.7
大麻纤维	千吨	—	—	1.4	2.4	6.6	10.8	8.9	14.2	7.5	12.5
粗绵羊毛	千吨	8.2	44.6	7.4	51.6	7.2	49.4	13.3	74.5	12	61.9
半粗绵羊毛	千吨	—	—	1.1	7.9	2.4	17.9	1.5	9.7	2	12.9
驼绒毛	千吨	0.3	1	0.4	2.4	0.3	2.1	0.4	3.5	0.3	3.1
生丝	吨	634	17.3	1 359	43.5	1 617	51.6	1 991	76.3	2 090	75.9
麻袋	百万个	—	—	—	—	—	—	10.1	11.2	15	16.9
猪羊肠	千束	828	0.8	1 070	1	6 239	7	2 069	2.9	2 450	3.6
鸭毛	吨	—	—	—	—	507	4	1 006	7.9	1 500	11.8
鬃	吨	769.7	31.3	1 239	53.6	2 845	94.5	609	20.8	1 718	41.7
细皮料	千个	792	2.2	2 214	5.9	2 368.7	7.5	2 814.7	8.7	2 200	6.2
粗皮料	千个	18	0.2	44	0.7	45	0.7	40.7	1	5.3	0.1
猪皮	千个	—	—	—	—	45.1	0.4	7.3	1.1	—	—
皮毛原料	百万卢布	—	2.6	—	4.7	—	7.9	—	7.5	—	6.8
丝绸布	百万米	—	—	4	14.2	12.5	51.5	13.9	53.4	15.1	61.2
手工艺品	百万卢布	—	—	—	—	—	1.5	—	3.8	—	3

续表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供应)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数量	总额
餐巾和桌布	千套	—	—	4.6	0.1	113.6	1.9	100.3	1.7	86	1.3
地毯	千平方米	—	—	—	—	130.5	3.8	60.1	3.3	58	2.6
珍珠	吨	—	—	227	0.6	227	0.6	181.1	0.5	—	—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210-227

No21418-4 统计资料：苏联出口商品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对比(1954年9月7日)

五年(1950—1954)间苏联对华外贸资料(之五)

关于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及其与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对比

根据1953年5月15日苏联政府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整套设备和技术援助以建设和重建134个企业(根据中方的请求，4个企业停止援建，3个企业列入其他项目)。除此之外，根据补充承担的义务，苏联将提供18个企业的新建和扩建的援助，其中14个是新建的，4个是扩建的，这是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议提供的援助。在1953年协议签订之前苏联已完成了对两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如果苏联履行了上述援建义务，中国政府将具备每年生产主要供应产品的新的生产能力，这个能力和1954年原有企业生产能力的比较数字如下：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黑色冶金业	—	7	—	—
钢	百万吨	4	5.2—5.8	1.8*

续表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有色冶金业	—	11	—	—
铜	千吨	1	30	40.6
铝	#	1	30	—
钨精矿	#	1	7	4.1
钼精矿	#	1	30	26.9
煤炭企业	—	21	—	—
煤	百万吨	18	31.9	76.4
石油工业	—	1	—	—
石油(加工的)	百万吨	1	1	0.9
化学工业	—	7	—	—
硫酸	千吨	2	80	323
火碱	#	1	10	98
合成橡胶	#	1	15	—
机械制造	—	26	—	—
汽车	千台	2	90	—
拖拉机	#	1	15	—
滚珠轴承	百万个	2	20—22	2.2
造纸工业	—	1	—	—
纸张	千吨	1	48—53	404
电站(发电量)	千瓦/时	24	1 631.5	1 984.5**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65万吨。

**到1954年1月1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24.15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铁合金	43.5	千吨
钒钛精矿	130	#
硬质合金	0.5	#
镁	1.2	#
碳化钙	60	#
有机合成染色剂和半成品	50	#
亚硝酸钠	210	#

续表

冶金装备	60	"
采矿设备	20	"
汽轮机	360	千瓦
涡轮发电机	600	"
蒸汽锅炉	3, 6—4	千吨蒸汽/小时
石油工业设备	15	千吨
金属切削机床	46	千吨
高压开关	13	千套
水银整流器	250	千千瓦
油冷凝器	1 000	千千瓦
青霉素	50	万亿剂
链霉素	36	吨

及其他商品和原料

把1950—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商品与该时期中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做一对比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计量单位	1950—1954 年间 苏联供应的产品	1950—1954 年间 中国生产的产品*	苏联供应与中国 生产产品的比较(%)
汽 车	千台	46	—	—
石油和石油产品	千吨	3 272	2 542	129
黑色金属轧材	"	1 472	5 356	27
铝	"	21	—	—
铜	"	23	128	18
锌	"	7	40	18
纸张	"	240	1 549	15

*不包括台湾岛。

注：(1)苏联在1954年根据现有义务向中国提供的商品。(2)中国1954年的生产是按照1954年计划进行的。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228-230

№08101 费德林致葛罗米柯报告：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事宜(1954年9月9日)

机密

1954年9月23日

第1528/ДВ号

A.A.葛罗米柯同志：

由于政府代表团将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我们认为采取下述措施是适宜的：

一、在10月1日前成立苏中友好协会。

关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建立，苏共中央已有决议。现在，苏共中央正在研究协会的章程和编制问题。

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把苏中金属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等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卖给中国。

苏共中央已原则上决定要摸清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外贸部机关已拟定出关于这一问题同中国政府的协定草案，打算让米高扬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签署该协定。协定草案现在卡巴诺夫同志那里。

三、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这一协定草案已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同中国方面谈判并签署这一协定的任务落到了外贸部的头上。外贸部机关准备建议在北京签署该协定。

四、同中国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讨论苏联、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可能的共同措施来应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的问题。尤其希望中国和印尼之间尽快签署协定。（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尼政府邀请周恩来访问雅加达，并提出了中国和印尼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正如周恩来不久前同马林科夫同志会晤时所说的，他曾想8月份完成印尼之行。）

五、就同日本调整关系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

关于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步骤的提案即将向您提出。

存档

第2012号

1954年9月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3, д.40, л.18-19

**№08098 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
华事宜(1954年9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即将赴华，苏联外交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一、发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苏中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同日本关系问题的声明。

二、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7月22日苏联部长会议已做出决议，批准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草案，任命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人选。已委托外贸部长卡巴诺夫同志在协定上签字。

应考虑改变7月22日的决议，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在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中国后在那里签署协定为宜。还希望发表签署协定的联合公报。

三、到1954年10月1日即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

附件：

草案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中国之行有关措施的决议

一、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苏中联合声明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 [41])。

二、改变苏联部长会议7月22日决议(第1511 680c号)第二条规定，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在北京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批准苏中关于签署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的准备文本(附件三 [42])。

三、委托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于今年10月1日在报刊上发布成立全苏中友好协会的消息。

АВРФ, ф.0100, оп.47, п.383, д.40, л.17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66页

№25149 卡巴诺夫致赫鲁晓夫函：苏联与中国、印度、越南贸易的材料(1954年9月24日)

机密

第2-75/19062号

1954年9月24日

苏联对外贸易部

呈苏共中央委员会Н.С.赫鲁晓夫同志秘书处：

兹对先前呈您处的文件材料补充如下：

1.根据截至1954年9月1日相关统计资料编写的有关苏联与中国相互供货状况的资料。

2.关于苏联与印度之间经贸关系的资料。

3.关于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各项协议的资料。

И.卡巴诺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情况说明：材料已用于本部的工作中。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

И.科兹洛夫(签名)

1954年12月8日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熟悉一下情况。

苏斯洛夫

9月29日

归档

B.戈尔布诺夫

12月2日

附件一

..... [\[43\]](#)

附件二

..... [\[44\]](#)

附件三：[\[45\]](#)

苏中之间的贸易供应状况(根据截止1954年9月1日的统计资料)

根据1954年贸易协议，苏中之间商品相互供应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百万卢布

	已签订合同		截至 1954 年 9 月 1 日发运	截至 1954 年 9 月 1 日供应
	共计	其中截至 1954 年 1 月 1 日完成供应		
苏联供应(包括技术援助在内)	2 065.8	1 319.7	1 231.9	1 139.3
中国供应(包括外汇支付在内):				
1) 通过贸易	2 121	1 630.0	1 521.6	1 503.1
2) 偿还贷款	160	94.2	94.2	94.2

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议，1954年苏联应(向中国)提供贷款数量为2.331亿卢布。根据截至今年7月1日的统计数据(每个季度末编制的贷款供应报告)，苏方已向中方提供商品和技术援助共计1.071亿卢布，而根据合同规定今年上半年苏方应向中方提供的贷款总量为1.448亿卢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在今年10月10日以前完成全部供应总额。

根据合同规定的商品供应期限，中国外贸组织有责任在10月1日以前向苏联供应中国商品，其总额将比苏方所供应的总额多出3.1亿卢布。

具体原因如下：

1.根据与中方在合同中所作的相关约定，我们对中方的机器和设备供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进行。而中方向我们供应的大部分商品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原因在于：这些商品——如大豆、大米、花生、肉和肉类加工品、烟草等的生产和采购受季节和交通条件影响较大。

2.在今年1月23日签署贸易协议时，中方储备了2.2亿卢布，以进行补充订货。今年6—7月份中国只使用了上述储备的一部分，只是在今年8月份才用1亿卢布向工程管理总局提出了一笔主要的订货。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满足中国人所要求的补充订货，与此同时中方今年在其他方面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费用，因此截至今年年底双方相互间的贸易供应仍能够保持平衡。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H.希里亚耶夫(签名)

1954年9月24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243, л.1, 13-14

№24884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对华经济援助(1954年9月25日)

绝密

1.根据1953年5月15日达成的协议，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并提供技术援助，建设和扩建134个企业以及24个单独车间、组合机件和机器。

此外，根据额外承担的义务，还要建设或修复14个新的企业，并在今后扩建4个企业，根据1953年5月15日达成的协议，已经开始提供这些援助。到1953年5月15日协议签署时，苏联已完成了对2个企业承担的援助义务。

在附上的企业完整的名单中，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供应设备的企业、设计的企业的完成计划的期限都做了简单的评价，并附上了民用企业的分布地图。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是建设和修复7个黑色金属企业，11个有色金属和矿业，21个煤矿、露天采煤厂和富矿厂，26个一般的机器修理厂，24所电站，42个国防工业企业，15个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上述企业进行援助的总量、性质和基本条件都在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中作了规定。

根据条件，苏联将完成70%—80%的设计工作，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占预定的技术方案中的设备总价值的50%—70%，向中国上述所有企业提供的设备的总价值大约为50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7亿卢布。

1954年，在为23个企业和电站完成设计工作和供应设备的同时，也考虑了根据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协议向中国提供贷款。关于贷款执行情况的报告见第65827/18224号。

苏联对中国政府履行的援助义务的结果是使中国主要工业品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新的规模，1954年的生产规模如下：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黑色冶金业	—	7	—	—
钢	百万吨	4	5.2—5.8	1.8*
有色冶金业	—	11	—	—
铜	千吨	1	30	40.6
铝	“	1	30	—
钨精矿	“	1	7	4.1
钼精矿	“	1	30	26.9
煤炭企业	—	21	—	—
煤	百万吨	18	31.9	76.4
石油工业	—	1	—	—
石油(加工的)	百万吨	1	1	0.9
化学工业	—	7	—	—
硫酸	千吨	2	80	323
火碱	“	1	10	98
合成橡胶	“	1	15	—

续表

	计量单位	提供援助的企业数量	提供援助企业的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力
机械制造	—	26	—	—
汽车	千台	2	90	—
拖拉机	”	1	15	—
滚珠轴承	百万个	2	20—22	2.2
造纸工业	—	1	—	—
纸张	千吨	1	48—53	404
电站(发电量)	千瓦/时	24	1 631.5	1 984.5**

*统计含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现有设备恢复生产的65万吨。

**到1954年1月1日电站发电能力，不计在苏联帮助下的发电量24.15万千瓦/时。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中，中国每年还将生产如下产品：

铁合金	43.5	千吨
钨钛精矿	130	”
硬质合金	0.5	”
镁	1.2	”
碳化钙	60	”
有机合成染色剂和半成品	50	”
氮硝酸钠	210	”
冶金装备	60	”
采矿设备	20	”
汽轮机	360	千瓦
涡轮发电机	600	”
蒸汽锅炉	3.6—4	千吨蒸汽/小时
石油工业设备	15	千吨
金属切削机床	46	千吨
高压开关	13	千套
水银整流器	250	千千瓦
油冷凝器	1 000	千千瓦
青霉素	50	万亿剂
链霉素	36	吨

此外，国防工业企业还可以生产：飞机1500架，其中包括喷气式米格17歼击机1000架；航空发电机3000台；机床1800台；机床发电机2500台；对空大炮、坦克大炮和飞机大炮9300门；瞄准器和其他各种光学仪器25800个；Гром2型高射炮瞄准器、检测器250套；高射炮指挥操作系统300套；炮弹2300万颗；炮弹壳1500万个；地雷300万颗；水雷和深水炸弹6500枚；木棉和硝化甘油炸药5.45万吨；爆炸物品4.1万吨；附带识别器雷达照明设备150套；飞机雷达设备和无线电测高计及识别设备2000套；移动雷达设备400套；复合接收装置7900套；防毒面具5200套。

苏联以直接派遣专家帮助设计企业、提供援助的形式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及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提供的类似援助便宜得多。

2.中国方面向苏联请求的援助超出了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议以及附加的备忘录中苏联所承担的义务。

1952—1953年中国请求完成设计的企业、要求供应设备的企业和提供技术援助进行建设的企业有190个(其中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中国请求提供设备的价值以及为企业进行设计的价值共计110亿卢布，其中设备的价值为95亿卢布(出口价格)。

苏联在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承担对中国的91个工业企业进行援助的同时，还根据早先签署的苏中协议帮助中国建设和修复了50个工业企业。在这141个企业中其中有35个是军事工业企业。在中国政府申请的援助中，在民用工业领域申请的援助总额大约被满足了38%，而申请的军事企业的总额大约被满足了65%。

与中国政府申请的供应设备的期限相比，向大部分企业供应设备的期限都被延长了1—3年。

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没有被完全满足，有以下一些原因。

中国政府指定建设的煤炭工业企业、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没有得到必需的矿藏勘探的充分保障。比如，预计建设的煤矿总生产能力为5370万吨，但只有9个煤矿能够保障共计1990万吨的煤炭储备资料。

中国拥有的铁矿储备大约为60亿吨，但没有建设指定的金属联合加工厂所必需的关于铁矿储备的勘探资料。

中国政府预定开展的勘探工作的规模、工业的发展和建设，没有干部和地质工程师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专业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方面的保障。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组建尚处于初级阶段。

此外，中国政府预定的由苏联方面帮助设计的工作、由苏联方面供应的设备不能不因为本国工业的需要而受到影响。

为了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援助总量，1954—1957年平均每年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大约为16亿卢布，但是1953年向中国提供的企业成套设备只有1.8亿卢布，1954年计划提供3.7亿卢布，1955年打算提供4.6亿

卢布。

根据苏联承担的义务，向中国提供的设计工作的总价值大约为5亿卢布，而预计在1954—1957年向中国提供的设备的价值平均每年为6亿卢布。

1954年7月1日，中国政府请求对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苏中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并且援助中国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苏联政府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请求(见1954年7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但以下各项除外：

为兰州橡胶合成工厂生产硝基丙烯酸和设计合成酒精生产车间并提供设备。这是因为苏联对硝基丙烯酸的生产技术掌握得还不充分，不建设生产合成酒精的车间是为了不使在石油加工厂附近有过多的油气。

为抚顺煤炭联合加工厂的东西部露天煤矿的修复工作进行设计和提供设备。这是由于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已经为该煤炭联合加工厂设计了整套的方案，在此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关于中国方面在今年7月1日提出的为建筑工地之间设计管道问题的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近期已经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3.根据1954年9月1日的情况，自苏中协议生效以来，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的技术援助总额为1.22亿卢布(设计费用以及专家到中国出差安装和调试设备的费用)，并提供了价值6.6亿卢布的设备。

建设完成的3座电站、2个企业以及12个单独项目投入了运行。此外，首批建设的4座电站以及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单个的车间以及抚顺铝联合加工厂投入了生产(投入运行的企业的名单附后)。

到今年9月1日，已经对89个设施、50个建筑以及27个企业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

1954年对8个项目、31个大楼设计、25个项目的技术设计完成了考察以及为28个企业制订了工作计划。

1954年要为44个项目提供总额为3.7亿卢布的设备。到今年9月1日，提供的设备的总额为1.6亿卢布。

为沈阳电缆制造厂、吉斯150汽车制造厂、铝合金加工厂以及其他的一些企业继续提供设备，这些设备的总供应者是苏联机械和仪表制造部、汽车部、拖拉机部和农业器械制造部、有色金属部。

1955年根据供应设备相互协商的条款计划，苏联要向中国的66个项目提供价值为4.6亿卢布的设备。

这些设备主要由18个部门供应，生产这些设备的苏联工厂大约为1200个。

为了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向中国派去了大约1600名苏联专家。目前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有398名，其中包括：安装和调试专家148名，建筑工程师43名，工业企业设计专家29名，测绘专家和防病虫害专家152名，工艺工程师9名，机械工程师4名，地质工程师3名，设计工程师10名。

根据1953年5月15日签署的协议的第3条内容，最近2个月向中国派遣了132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设计单位进行帮助以及为中国的工业设计培养本国的干部。

根据上述协议，每年应该有1000名中国人到苏联进行生产技术训练。在1953—1954年到苏联接受训练的大约有950名中国人。

4.中国人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

(1)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中国主要的8—10个工业建设地区组织大规模的机械化建设；

(2)在建设北京到新疆的铁路问题上加大技术援助的力度；

(3)显著增加派往苏联企业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的数量，以便接受训练；

(4)加强鞍山金属联合加工厂第一期的改组，并对该厂第二期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

(5)帮助设计高射炮试验场，因为这类高射炮不能同其他的大炮一样在大炮试验场的中央进行试验，苏联已经接受了对这类高射炮试验场进行设计的义务。

№08100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 10月12日以前 [46])

机密

附件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公报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于10月 日在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苏联政府授权，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А.И.米高扬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字的是___。按照协定，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领域，通过交换相应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经验，以促进合作的发展。

为制定实施合作的措施和给双方政府提出有关建议，成立了苏中委员会，委员由苏联和中国各派7人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召开。

为保障双方在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上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应地在北京和莫斯科派1名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该协定的期限为5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到达之前1年内，双方均未宣布希望该协定终结，那么该协定将再延长5年。

苏联政府方面任命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H.M.西卢亚诺夫同志，苏联建设部部务委员会委员B.И.奥夫相金同志，苏联国家计委机械制造局副局长H.H.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苏联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A.Л.马尔琴科同志，苏联日用工业品部技术管理局局长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苏联农业部部务委员会

委员A.H.阿斯科琴斯基同志，苏联驻华贸易代表B.П.米古诺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任命的代表是 。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合作事业的新的贡献，其目的是相互帮助和达到共同经济繁荣。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7—2268页

№10219 多勃雷宁与哈什谈话纪要：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1954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__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6日

第__号

摘自苏联驻美国代办A.Ф.多勃雷宁的工作日记

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哈什谈话纪要

1954年10月21日

谈话开始时谈到了许多涉及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哈什声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似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感到强烈不安，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卷入这场远东的冲突。美国政府从来未考虑把福摩萨(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以目前“美国国内存在的情绪”而言，如果现在就把福摩萨(台湾)“交出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控制权力。在说这番话时，哈什肯定地说，军事考虑只在这里起着次要的作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甚至还担心，在这一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第七舰队可能会处于困境，因为第七舰队处在一个狭窄的海峡里，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据哈什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福摩萨仍然是整个中国的“象征”，美国往这里投入了“太多”的美元，美国“现在不可能”失去这个“象征”。

据哈什说，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未考虑把福摩萨“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又不想因为福摩萨而被卷入“大战”之中。蒋介石似乎考虑到了所有上述情况，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前的微妙处境——美国现在正进行激烈的竞选运动，共和党政府在自己的行动中受到某种束缚——以便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袭击除了其他一切原因外，就是为了追求上述目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的直接命令，美国决定立即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派往福摩萨，去“制止”蒋介石有可能采取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挑衅”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此。饶伯森向蒋介石指出，现在，特别是在联合国开会期间，不是积极行动的时候，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点扔炸弹。同时他向蒋介石许诺，美国方面将继续向他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应当指出，哈什在谈话过程中曾数次强调了艾森豪威尔对自己那帮“好战”的参谋长，特别是海军上将雷德福所起的“遏制”作用，雷德福明显地向往拿破仑的战绩。据哈什说，艾森豪威尔已开始越来越坚决地干预外交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完全被杜勒斯所垄断。哈什说，在这方面他“准确地知道”，好几次艾森豪威尔在各种外交问题上不同意杜勒斯意见的情况，而这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对于目前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议，哈什说，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怕法国人和英国人会要求此次会议结束之后到会议通过的协定批准之前的某个时间，举行有苏联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哈什说，这里很清楚，在法国、英国甚至西德存在着一些有影响的集团，他们都赞成在关于德国问题的巴黎协定批准之前举行类似的会议，因为这些集团认为，这类会议可能取得某种成就。据说这是因为，如果这个会议失败的话，苏联“会顾及到”由西方大国制订的有关协定“被批准的威胁”。如果这个会议仍然以失败告终，那么有关国家的议会将比较容易批准巴黎协定。但是美国国会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坚持认为，应当在与苏联举行任何谈判之前批准协定。在协定批准之后，美国“自己就会准备参加有苏联参加的会议”。据哈什说，杜勒斯在巴黎向孟戴斯弗朗斯、艾登和阿登纳宣布了这个意见。

关于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目前国会对这一关系的恶化感到强烈不安，认为这种恶化“太过分”，必须“趁还不是太晚”而暂停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原因。促成国会形成这种

意见的因素之一，是目前尼赫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里正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这一访问。国会现在认为，必须继续“援助”巴基斯坦，但不要过分吵吵嚷嚷，以免“平白无故激怒”印度，同时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哈什说，美国方面可望在最近半年内采取有关步骤。

我就现在正进行的美国竞选运动询问了哈什的意见。哈什说，这个运动中有一些独特的特色：在这次竞选运动中听不到加强反苏政策或加强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有经验的政客考虑到美国居民广大阶层情绪中最近发生的变化，认为以这个题目作文章“当前收效不大”，所以在自己的竞选运动中避免涉及这个问题。选举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麦卡锡主义影响的削弱。比如，只有不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还在试图炫耀自己与麦卡锡的友谊，而大多数候选人则认为，这种炫耀在国内当前的情绪中，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损害而不是益处。近一年来这方面局势变得很厉害，而且不是朝对麦卡锡有利的方向变。

谈到竞选运动的激烈，哈什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说共和党人甚至在这个运动中利用了利比里亚的总统杜伯曼，他们把杜伯曼的来访专门安排在竞选运动最火热的时候以借此争取黑人选民的选票。在华盛顿和纽约给予黑人总统杜伯曼的“豪华接待”以及这种接待被美国报刊广泛地宣扬，毫无疑问具有上述的竞选考虑。共和党领导人向杜伯曼“建议”的“熟悉”美国之行的访问路线，依据的也是这种竞选考虑，这条路线通常是通过有大量黑人居民的城市和州。

谈话是在大使馆共进早餐时进行的。

A.多勃雷宁(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69—2273页

№10207 扎鲁宾与杜勒斯谈话纪要：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1954年11月3日)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1954年11月12日

第889号

与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3日

今天应杜勒斯之邀请拜访了他。

在通常的寒暄之后杜勒斯声称，美国政府已仔细研究了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的备忘录。杜勒斯说，从该备忘录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希望继续与美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在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讲话中阐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谈判。

因为苏联政府同意继续进行上述谈判，所以他杜勒斯才邀请我到这儿来，以便把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交给我。在该备忘录中阐述了他的政府就进行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谈判的进一步程序问题的某些考虑和建议。

然后杜勒斯说，除了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以外，他还想就该问题谈点非正式的意见。美国政府在美苏就原子能问题谈判的初期阶段曾认为，在谈判具有秘密性质的条件下才可以获得更大进展。杜勒斯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了解这一问题，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知识。杜勒斯随后声称，如果顾虑进行原子能谈判的通信今后可能在报刊上发表，那么这种通信在某种程度上就利少弊多。

在就原子能问题交换头一批文件后，苏联政府提议发表所有的来往信件；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他坚持认为，秘密交换意见才更为有益。他杜勒斯想了解一下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此时他又补充道，比如可以达成协议，哪些文件可以发表，哪些文件最好不发表。同时他声称，我们两国间在谈判中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可以发表。

为明确起见我问杜勒斯，我对他的意思理解得是否正确，即美国政府认为，苏美就原子能问题进行的进一步谈判最好是秘密进行，并且某一文件是否发表的问题应当单独决定。杜勒斯回答，他认为可以达成协议，美国与苏联间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进一步通信将是秘密的，或者关于某个文件是否秘密将在每个单独情况下通过协商决定。

我问杜勒斯，他所阐述的进一步谈判的两个办法中哪一个对美国政

府更可取一些——是对随后所有通信都保密呢，还是对某一文件是否保密应每次单独协商。

杜勒斯回答，最好是预先知道某个文件将发表还是不发表，因为这一情况不得不在撰写文件时予以考虑。

我又问杜勒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希望。

杜勒斯宣称，他认为，如果苏美间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今后进行的通信将是秘密的话，那么谈判就可取得更大进展。

我向杜勒斯保证，我将把备忘录文本转交苏联政府，并把他所谈的苏美间今后就该问题进一步谈判的非正式意见一并转告苏联政府。

谈话结束时杜勒斯称，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对关于原子能问题的谈判发表一个声明。国会建议发表以下消息：“国务卿杜勒斯今天接见了苏联大使扎鲁宾，并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这是对苏联9月22日就总统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建议的备忘录的答复。”

谈话时在场的有：美方——梅尔钦特，我方——大使馆一等秘书斯米尔诺夫斯基同志。

谈话持续了15分钟。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2274—2277页

No10208 多勃雷宁与比利谈话纪要：远东局势与美国的政策(1954年1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第902号

1954年12月8日

与英国大使馆参赞比利谈话纪要

1954年11月5日

在谈话过程中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近东和中东的局势

我借口说比利应熟悉近东和中东的局势(他曾在伊拉克担任数年英国代办)，所以向他询问该地区的局势，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作用和英国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比利的谈话很零散，他的意见可以归结为：现在美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逐步扩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公约上，希望有一些单独的阿拉伯国家加入该公约——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总体上反对与土耳其建立紧密的联盟。同时，考虑到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保存至今的这些国家强烈的反土耳其情绪。伊拉克看来是可以期待在比较近的将来加入土耳其—巴基斯坦公约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曾是促成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基本力量之一。但是，目前英国已对该联盟的活动“有些失望”了，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个联盟一直进行了许多“消极的”活动(比如反对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在“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包括建立近东和中东整个地区的集体“防御”问题上，却又太不果断。美国尽管还在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它在将来还可能“有用”，但也不反对伊拉克加入巴基斯坦—土耳其公约，尽管这将削弱阿拉伯国家联盟，因为这个联盟的成员国都反对伊拉克的类似行动。比利在说这番话时是想让我明白，英国认为自己的老“盟友”伊拉克参加巴基斯坦—土耳其集团是有益的，尽管在该集团美国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英国希望有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伊拉克获得对该集团以及对将来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更为广泛的集团施加影响。

当我询问他对英国与埃及缔结关于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看法时，比利说，英国政府认为，条约的7年期(包括其中关于土耳其的条件)是“足够长”的，到这一期限结束之前“还来得及决定，为保卫不列颠在近东的利益应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

关于欧洲集团现在在美国进行的十分活跃的有利于以色列的运动使美国政府受到批评的问题，比利说，这些“叫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竞选运动的缘故。这类“叫喊”在1948年和1950年的选举运动期间也曾

发生过，当时的数量更大。用比利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它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批评并不特别担心的缘故。

二、远东局势

当问到他对远东局势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看法时，比利声称，艾森豪威尔政府及总统本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感到十分不安”。在说这番话时比利证实，去年美国政府和有影响集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上似乎发生了“初看起来不起眼，但意义深远的分歧”，尽管考虑到美国的国内政局，这一分歧无论如何不会被渲染。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坚信，毛泽东政府牢牢掌握着政权，所以对大陆中国只好“不再理会”。比利认为，这一点是“足够明显的”。在刚结束的美国竞选运动中，与以往进行的竞选运动不同的是，这次竞选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关于“解放”中国的问题，而且总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竞选运动中很少被提及。比利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似乎是反映了美国领导集团的相应立场。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尤其是为了对数不清的居住国外的中国居民保留某种“标志”。因为这些人在东南亚各国特别有影响力)也没有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把福摩萨(台湾)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将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它。比利说，正是要“让北京明白这一点”，美国政府决定加紧与蒋介石缔结双边“防御”协定。否则的话，北京就可能会以美国立场“不明朗”为由，对福摩萨采取“冒失”的行动，以至于引起美国的“自动”干预并造成远东大规模冲突的危险，而这似乎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担心并极力避免的。比利在说这番话时重申，美国正在逐步采取使福摩萨“中立化”的方针，就是既保卫它，但同时似乎又“将不允许”蒋介石“向北京挑衅”。在与蒋介石的双边条约的草案中，美国不顾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似乎打算足够明确地奉行一条路线，即这个条约只涉及福摩萨而不涉及大陆中国。在讲述这层意义时，比利重申，如果美国政府的类似立场在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反映出来的话，就意味着美国朝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向有了“一定位移”。比利好像是一带而过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政府的立场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比利却回避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三、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计划

关于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计划和洛奇最近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发言，比利在回答我的有关问题时指出，从各方面情况判断，艾森豪威尔

不得不“大大简化”自己的初步计划，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害怕美国国会可能拒绝批准这样的计划，特别是如果苏联及与苏联友好的国家也将参加该计划的话。当前，在美国与英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间，正就缔结关于原子能问题的双边协定进行谈判。比利认为，这些双边协定应该成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交换原子能情报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进行合作的主要“工具”。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国际原子能同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着国际协定登记局的作用，它登记美国与其他国家间(供货国与收货国之间)缔结的协定以及交换有关上述问题的非秘密情报。

谈话是在我邀请比利共进午餐期间进行的。

A.多勃雷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278—2282页

№21392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 问题(1954年11月18日)

机密

第1876/ДВ号

致M.A.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张闻天转交给苏联外交部的，关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外交部中央和境外机关内党组织工作的问题列表。

附涉及上述问题的列表，共计1页。〈RTS〉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4年11月18日〈/RTS〉

附件：

- 1.苏共中央是如何领导苏联外交部的工作？
- 2.苏共中央是如何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外事活动实施统一领导的？
- 3.苏联部长会议是如何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实施领导和监督的？
- 4.在苏联部长会议中是否存在有这样的机构，如对外政策委员会，以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外交活动？

5.在苏联外交部中除了党的委员会外，是否还存在有党小组？

6.党委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党委的任务和职能是什么？

7.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附属的对外政策事务司和外贸司之间，境外事务司和对外关系司之间关系如何？

8.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

9.苏联使节和使馆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5, л.101-102

№21393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接待张闻天的问题(1954年12月3日)

致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有机会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组织和系统如何配置，以及苏共中央如何对外事和国际活动实施领导等问题。张闻天同志已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列表。

根据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报告，外交部已起草了一个计划，以便张闻天同志了解苏联外交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将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各部门负责人的接待。

张闻天所提出的问题具体涉及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司及出境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情况。关于该问题，苏联外交部已发送给苏共中央审阅(见附件)。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巴拉年科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同志负责接待张闻天同志，并就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4年12月3日

手写批注：

归档。举行会谈的日期为1954年12月11日。

И.维诺格拉多夫

附件：

张闻天提交的问题清单

- 1.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和外贸机关干部各司及出境委员会与苏联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
- 2.苏联境外大使馆和公使馆内的党组织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
- 3.苏联境外使节和使馆内党组织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5, л.103-104

№09932 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 情况(1954年12月11日以前)

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苏中协议，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而成立的。

上述协议规定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为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

苏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房屋、建筑物、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探工作的费用、材料及其他商品物质价值，总计1400万卢布。

中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新疆地区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所必需的土地地段以及工业设施和任务所必需的建筑材料，总值为1400万卢布。

根据苏联和中国政府交换的照会，公司的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一方的资本为5000万卢布。截至1954年4月1日的股份资本额

为：

单位：万卢布

	苏 方	中 方	总 计
总计(其中)	5 077.4	4 993.6	10 071
1. 已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房屋与建筑物	321.7	—	321.7
设备和材料	3 173.1	—	3 173.1
地质勘探工作	164	—	164
现金	204.7	2 284.5	2 489.2
航空地质和航空摄影工作	720.3	—	720.3
运输服务	20.3	—	20.3
设计工作	65	—	65
总计	4 671.1	2 284.5	6 955.6
2. 未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设备和材料	406.3	—	406.3
土地地段和建筑材料	—	1 400	1 400
建筑工作	—	1 309.1	1 309.1
总计	406.3	2 709.1	3 115.4

产量

公司经营期间每年的产品产量如下：

产 品 名 称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一、1951 年计划不变价格的总产值(万卢布)	1 501.6	2 589.48	3 883.13	4 805.1
二、产量(吨)				
1. 绿柱石 10%精矿	873	1 004	1 204	1 300
2. 锂辉石 4%精矿	1 905	3 155	3 863	5 000
3. 钽-铌精矿	0.98	4.1	6.5	5.0
4. 铅 50%精矿	—	—	—	9 000
5. 锌 50%精矿	—	—	—	5 000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19	205	122	100
7. 含铅 15%的铅-锌矿石①	2 100	10 300	18 700	—

①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系判译。——译注

成立公司的协议约定，向苏方提供按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公司的50%产品的权利。在向中方购买其份额的产品并运往苏联时，这些产品应根据中国的法律缴纳出口税。

在公司的各企业中共有8921人，其中进行生产活动的有5970人，进行基本建设的有691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有1750人。在公司工作

的苏方人员共计400人。

基本费用

公司在3年内的基本费用如下：

单位：万卢布

	三年总和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支出总额	5 554.44	681.4	1 716.74	3 156.3	4 083.7
1. 地质勘探工作	1 703.78	203.86	651.72	848.2	1 440.0
2. 工业建设	2 602.38	251.98	478.62	1 871.78	986.78
3. 住宅建设	750.34	151.98	338.14	253.02	487.68
4. 公用事业和 文化生活建设	419.3	56.1	179.9	183.3	435.86
5. 建设采石油 中等技术学校	—	—	—	—	697.56

从上面列出的表格可以看出，在3年内用在工业建设上的费用仅为2602.38万卢布，或者说占总费用的47.3%。

原料基地和生产前景

公司主要有两类企业：开采稀有金属矿床、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精矿和云母一半成品的企业以及生产铅和钨精矿企业。

根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索夫同志的鉴定意见，公司的绿柱石和锂辉石矿床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床之一，并且有很大的工业价值。铅和钨矿床，虽然也富含金属矿石，但它缺乏巨大的..... [47]

截至1954年4月1日按A B C C类计算，矿物的可采储量分别为：绿柱石1.46万吨，锂辉石15.41万吨，云母—工业半成品93.3万吨，铅12.66万吨，钨17.38万吨。

已开采矿床的勘察储量使我们可以根据它来计划今后几年的最低生产量，具体如下表：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按 1951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万卢布)	4 805.1	4 870.0	5 560.0	6 460.0
生产总量(吨)				
1. 绿柱石精矿	1 300	1 400	1 550	1 700

续表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2. 锂辉石精矿	5 000	6 000	8 000	10 000
3. 钽—铌精矿	5.0	6.0	7.0	8.0
4. 铅矿(含量 50%)	6 900	6 900	7 500	7 500
5. 锌矿(含量 45%)	5 000	3 700	4 000	4 000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100	100	—	—

为使产量达到上述规模，公司必须补充基建投资额22480万卢布，其中各年度分别为：

	亿 元	万卢布
1954 年	2 042	4 080
1955 年	3 520	7 040
1956 年	3 180	6 360
1957 年	2 500	5 000

成本及出厂价格

每吨产品的商业成本如下：

单位：卢布/吨

精 矿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1. 绿柱石 10%	11 481	13 472	13 469
2. 锂辉石 4%	800	1 417	1 385
3. 钽—铌	248 800	247 800	287 700
4.①			
5. 锌 45%	—	—	731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3 902②	11 309	10 924
7. 含铅 15%的铅—锌矿石	250.3	250.6	—

①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②原文如此，疑为13902卢布/吨。——编注

上述成本中未包括苏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1953年这一费用为719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334.5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384.5万卢布；1954年第一季度这一费用为159.1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91.9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67.2万卢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公司的产品成本逐年增加。之所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缴纳了公司产品流转税、冲销地质勘探工作费用的数额增加、矿石中金属含量减少(1951、1952年末征收流转税，1953年缴纳流

转税款184.2万卢布，按1954年计划，将缴纳190.4万卢布；地质勘探工作费用1953年冲销产品成本150万卢布，而1954年计划冲销340万卢布；绿柱石矿石含量降低一半，1951年为0.63%，1952年为0.38%，1953年为0.32%)。

公司产品的出厂价格根据贸易协定的价格确定，这一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并显著低于成本，具体数额如下：

单位：卢布/吨

产品名称	1954 年 计划成本	世界市场 参考价	公司 出厂价	苏联工业部门 出厂价	...①
绿柱石 10%精矿	13 469	2 496	7 000	2 000	...
锂辉石 4%精矿	1 865	517	1 487	2 800	...
钽—铌精矿	367 700	40 171	60 000	44 514	...
云母一半成品	10 984	—	18 100	16 078	...
铅 50%精矿	915	585	535	245	...
锌 45%精矿	780	394	412	518	...

①此表最右边一项复印件缺项。——译注

在目前的产品成本和现行的出厂价格情况下，公司经营是亏损的。1953年公司亏损的数额达686.8万卢布，主要是由于自1953年9月1日起提高了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提高了26%，因为对所销售的产品，苏联外贸部全苏联合公司不用人民币支付，于是在稳定出厂价的情况之下，公司对1953年销售的产品就少收了相当于527万卢布的人民币。这样一来，由于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厂价实际上是降低了26%。1954年销售产品的亏损额增加到1446.7万卢布，其中苏方亏损为723.3万卢布，而考虑到给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助工资，苏方1954年的总亏损额为1442.3万卢布。

公司目前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和继续发展生产的美好前景。过去的几年内建立了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铅和锌精矿的采矿工业企业。这些年，公司培训了当地的工人干部并挑选了一些必需的苏联工作干部。

二、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是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组建的。

最初的股份资本数额规定为4600万卢布，后来根据换文增加到2亿

卢布。

根据初步估算，双方各年度投入资金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总 计
双方共投入	4 790.6	6 534.7	7 802.6	1 824.6	20 952.5
其中：苏方	2 490.6	3 357.9	3 834.3	8 681.0	10 550.9
中方	2 300.0	3 176.8	3 968.3	9 565.0	1 0401.1

投入资金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卢布

	总 计	苏 方	中 方
1. 土地地段	1 350.0	—	1 350.0
2. 房产	1 874.7	—	1 874.7
3. 设备和材料	18 777.6	9 274.8	6 508.8
4. 航拍地质工作	1 096.8	1 096.8	—

..... [48] 产品，其加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

各年度钻探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发展情况见以下数据：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钻探总计(千米)	8.5	26.1	34.5	42.0
其中：勘查钻探(千米)	5.8	9.3	19.9	30.0
生产钻探(千米)	2.7	17.8	14.9	12.0
结构钻探(千米)	6.2	2.8	8.4	6.0
物理探矿工作(千平方米)	8.0	26.6	48.8	63.7

由于进行了上述地质勘探工作，业已查明以下可供深层勘查钻探的良好结构：安集海、霍尔果斯、南捷克斯京(Южно-Текстинская)、科桑托凯(Косан-Токайская)、克拉玛依、瓦拉托(Уара-то)。现正在安集海、霍尔果斯、科桑托凯等结构上进行深层勘查钻探。

位于开采区内的独山子矿床第三级采矿层1954年1月1日的石油工业储量为A2 B级，580万吨。

目前正在进行侏罗纪和白垩纪更深采矿层的工业含油量的调查工作。

1953年的石油开采量为70200吨，而1951年仅开采3500吨。

石油开采和加工量的增长情况、轻柴油产品产量及各年的石油总产量见下表：

名 称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石油开采(吨)	3 500	52 100	70 200	75 000
石油加工(吨)	3 500	52 100	70 100	75 000
其中石油产品加工：汽油(吨)	600	11 500	20 400	33 300
煤油(吨)	600	1 600	3 900	7 500
柴油(吨)	300	350	17 500	18 000

全部开采的石油均送到公司的石油加工厂进行加工，而石油产品则通过新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组织在中国国内销售。

1954年新疆的石油产品需求量如下：

单位：万吨

	需求量	供给渠道	
		苏中石油公司	由苏联进口
汽 油	4.75	3.3	1.45
煤 油	0.70	0.70	—
柴 油	2.03	1.80	0.23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苏联石油出口联合公司供给新疆的石油产品的出口价格见下表：

单位：卢布

	1953 年每吨的 商业成本	新疆的每吨 现行出厂价	折合为新疆内部 价格的出口价格(独山子交货)
汽 油	481.1	556.8	494.58
煤 油	240.5	278.4	645.30
柴 油	200.5	231.6	631.86

上述的石油产品商业成本并不反映实际状况，因为其中未包括由苏联预算向苏联工作人员支付的补充工资以及没有把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计算在内。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分别在4年内注销，并且查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花在探查钻探无效部分上的费用为全部探查钻探费用的30%，而当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一费用却分别计划为45%和

75%。

如果将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费用及完全抵消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列入预算，则石油产品的成本增加26%，这时实际出厂价便低于商业成本。

1951—1954年向基建费用的总额达25482.3万卢布。

各年度的基建费用额及其用途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 计
基建费用总额	3 016.6	7 309.4	8 107.3	7 049.0	25 482.3
其中：探查钻探	291.4	904.3	2 061.1	2 741.0	5 997.8
生产钻探	173.3	730.8	961.6	640.0	2 505.7
地质勘探工作	81.7	1 316.2	817.5	650.0	2 865.4
工业建设	2 416.2	4 012.0	3 516.2	2 426.0	12 370.4
其中：石油加工厂	—	720.0	1 051.5	1 889.0	1 960.4
住宅建设	54.0	287.8	450.9	592.0	1 384.7

上述期间基建费用的财政拨款来源是双方同等投入的股份资本和折旧扣除款，二者在总费用数额中的比重分别为91.2%和8.8%。

由于所进行的各种工作，公司已经建立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足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的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山子石油区建造了年产15万吨石油的气压管道和裂化设备，建设了总功率为1500千瓦的发电站3座，修建了装有39台机床的维修机械厂，可保存1.4万立方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油罐，年工作量为2.5万米的修理钻探管的管道基地，奎屯河上的进水装置、黏土厂、重晶石再生和粉碎厂以及建设了总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住房。

为了减少从苏联运送重晶石，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在伊宁布地区组织了对当地的重晶石矿床的开采。

由于公司经营的结果，公司获得如下的利润：

单位：万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 计
总利润	52.0	66.4	239.5	164.4	522.3
苏联分红利	18.7	23.9	86.2	59.2	188.0

各年度苏方投资的效率如下：

单位：%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 计
苏联投资的分红利率	0.75	0.41	0.78	0.56	...①

①此处原文复印件缺字。——译注

应当指出，公司生产成果和投资效率，是计入苏方提供补充工资和全冲销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得出的支出统计结果而确定的。这一支出费用的数额可从下表看出：

单位：万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充工资	65.4	260.8	387.4	410.8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总额	300.0	771.3	434.2	243.1
未考虑到的费用总计	365.4	1 032.1	821.6	653.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仅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一项就显著提高了苏方得到的利润。

截至1954年7月15日，公司共有工作人员56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01人。苏联工作人员的数量为4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65人。1955年计划全体工作人员达到684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496人。全体工作人员中，苏联工作人员为35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255人。

根据已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1955—1957年间的工作量如下：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钻探总计(千米)	75.0	90.0	100.0
其中：探查钻探(千米)	50.0	60.0	70.0
生产钻探(千米)	25.0	30.0	30.0
开采石油(万吨)	10.0	12.5	15.0
加工石油(万吨)	10.0	12.5	15.0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议草案，1955—1957年的基建费用总额双方投资额及利润规定如下：

单位：万卢布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基建费用	9 500	9 800	11 400
双方投资	5 300	5 100	6 000
总利润	252	300	...
苏联红利份额	90.7	108.0	...
苏联投资的利率(%)	0.65	0.65	...①

①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根据石油开采和加工的预计增长情况，1955—1957年可以满足新疆石油产品的如下需求量：

单位：吨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汽油	40 000	52 700	50 000	57 500	60 000	...
煤油	11 500	11 000	12 500	13 500	15 000	...
柴油	20 200	18 000	25 000	22 500	30 000	...②

②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译注

因此，新疆所需的煤油和柴油完全可以满足，而1956—1957年的汽油加工量也接近这一产品的需求量。

苏中石油公司已建立起物质技术基地，足以保证今后3年(1955—1957)进一步发展石油的钻探、开采和加工。

公司已拥有进行当前生产活动的一批苏联和当地的骨干，并正在培训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的当地干部。

虽然在新疆石油的工业储量目前还不太多，但苏中石油公司有能力查明并投资开采当地的矿床，从而准备好较多的有利于深层探查钻探的地质结构，开采独山子矿床…… [49] 和新的前景可观的开采层。

三、苏中造船股份公司

苏中造船股份公司是根据1951年7月28日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成立

的。

协议规定，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建设和修理海船及其他水上工具。

根据1951年7月28日的协议，中国政府将大连市的“大连船坞”造船修船厂作为公司的财产(确定其价值为4660万卢布)并作为公司的股份资本投入该公司。公司股份资本的一半由中方投入，另一半由苏方投入。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辽东—多摩那浦”(Риото-Таманаура)应得的1000万卢布，并通过转账作为自己的股份资本，此外还通过转账从划拨账户上支付现金1300万卢布作为股份资本。

公司1952年的生产计划额定为4960万卢布，完成了94%。1952年总共生产了54艘非自行船只，总载重量为11000吨，经大修、中修、小修的船只共18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180万卢布的订货。

1953年苏中造船股份公司工厂的计划数额为5000万卢布，完成了105.6%。出厂了19艘船只，总载重量为10000吨，修好船只14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3200万卢布的订货。

1954年的计划生产额为6200万卢布，其中苏方为5000万卢布，中方为1200万卢布。

截至7月1日公司总共有：生产工作人员8000人，工程技术人员900人，职员500人，公司中有苏联专家78人。

公司经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利润：1952年332万卢布，1953年985万卢布，1954年计划761.5万卢布。

在1954年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根据中方的申请，确定中方1955年的产品生产计划总额为1800万—2000万卢布。这一计划规定建设20艘运输鱼类的驳船。中方已经交出建造驳船的订货单。因此，为了完成苏联订货单的各项计划，1955年公司仍保持1953—1954年的生产规模。

在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中方同意签订苏联机构根据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扩建和改建企业的设计工作的协议。

目前由6人组成的苏联海运部设计单位的设计工程工作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近日即可来大连市进行工厂设计任务和总体计划的制

订工作。

四、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建立的。

公司完成中国和苏联领土上的下述民航空中航线的经营活动：(1)北京—伊尔库茨克直达运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2)北京—沈阳—赤塔；(3)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12月17日决议开辟了乌鲁木齐至喀什的新的空中航线，该航线于1953年底投入运营。另一条空中航线：乌鲁木齐至阿勒泰，正在建立之中，将于1954年底投入运营。

公司的股份资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每一方均为2100万卢布。

截至1953年3月19日，公司苏方的股份资本2100万卢布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包括所用飞机发动机和其他设备的折款，以及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法定资本中苏方份额计360万卢布，还有现金240万卢布。苏方的所有上述投入均已评估并拟定了相应的文件。

截至1954年4月13日，中方投入公司的股份资本为1691.3万卢布。为抵偿这一数额，中方向公司转交了飞机场、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财产，以及现金240万卢布和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股份资本360万卢布。中方剩下的欠款408.65万卢布由中方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公司共获利29401013859元人民币。

扣除应缴各种税款后拟分给双方的利润部分在双方之间分配，划拨给苏方11426410026元人民币，折合228.5万卢布。

拟划拨给中方的利润份额(包括各种税款)共计308.22万卢布已按中方的意见拨出。

根据决算，1954年第一季度苏中民航经营中共获利240.8万元人民币，折合48.16万卢布。

1954年公司员工总数为896人，其中苏方236人，中方660人。开辟了两条新空中航线：乌鲁木齐—喀什，乌鲁木齐—阿勒泰。

随着对中国公民中的专业人员的培训，公司中的苏方员工逐渐减少，他们将被公司所培养的中国干部取代。

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17名航空站副站长，6名航空技术员，77名航空机械员，2名飞机无线电电气灯光设备和仪器机械员，17名无线电技术员，16名无线电机机械员，36名无线电测向员，53名无线电操作员，6名无线电台发动机工，4名蓄热室工。

所培训出的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因为中国民航深感干部不足。

根据1954年的计划，公司应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培训65名中国同志，其专业如下：无线电技术员10人，航空技术员10人，无线电测向员10人，无线电操作员10人，无线电机机械员10人，航空机械员15人。

公司正在从中国公民中培训10名驾驶员，到1954年底他们将取代10名苏联驾驶员，后者将被派回苏联。

1954年还将替换11名苏联医士。

1955年拟通过开辟包括中国工业地区在内的新航线的办法扩大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把中国民航的某些航线转交给苏中民航公司经营，因为中国民航由于缺少干部和经验，不能胜任这些航线的运输服务方面的工作任务。

伊万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53, д.384

№09864 苏联外交部致尤金函：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事宜(1954年12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同志：

鉴于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于1954年11月25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

一、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附件一、二、三、四)。

二、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附件一和附件二)。

三、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所指企业的能源供应由中国方面保证。

在弄清一些企业所需电站的情况下，为这些电站的建设提供援助的问题由双方另行研究。

四、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一季度给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附件三)。

五、发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13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1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其中包括农业部专家工人，河运部专家工人，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

六、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托拉斯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

七、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按照附件四规定的专业，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订北京市的总计划。

第四、五、六点规定的专家出差，按苏中1950年10月25日的协定条件执行；而第七点规定的顾问出差按1950年3月27日协定规定的条件执行。

八、黑色冶金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对鞍山冶金联合企业轧钢设备的使用能力进行鉴定，意在帮助中国方面确定联合企业整个冶炼周期的设计能力；务必在1955年7月1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九、对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6月23日的决议作部分变动。苏联黑色冶金部必须预先考虑在中国一个冶金厂生产T 54坦克装甲板的能力。最迟在1955年5月前将这一问题的决定报告苏联部长会议。

十、航空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不再承担帮助中国建设伊尔16飞机修理厂的工作。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6月23日和1954年7月31日命令..... [50]

十一、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除按1953年5月15日协定规定的数额外，每年额外接收2000名中国技工来苏联工厂进行生产实习。

十二、受托培养(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苏联各部和机关，必须提高培养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水平，以技能娴熟的人员保证通过同订货人协商所确定的课程(作业)。在能保障学员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地区挑选一批先进的企业作为培训地点。

培训外国工人和专家的企业名单应征得外贸部的同意。

十三、委托对外贸易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同其他工业部协商，确定苏联企业接收和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程序训令。

允许对外贸易部，经过同其他有关部协商，在外国订货人请求的情况下，可延长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训练时间，延长期限可到半年。

十四、鉴于中国政府的申请，允许车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把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7月23日规定的工作期限延长1年，提供设备的期限延长2年。

十五、委托国防部、造船工业部、运输机械制造部、重型机械制造部确定，本决议2号附件中所提起的工厂..... [51] 并在1个月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关于这些武器型号的许可证交给中国方面的提案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十六、建设部、化学工业部、电站部必须根据造船工业部的任务，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苏联建设部)以及设计方案的特别部分，以便及时制定出上述工厂的配套设计。

十七、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

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有关炼油厂改造的问题。

在上述专家回来之后，苏联对外贸易部和石油工业部在1个月的期限内，就帮助中国改造炼油厂以从油母页岩中提炼人造液体燃料的问题同中国举行谈判并给部长会议提出提案。

十八、1953年5月15日的苏中协定和1953年6月23日的部长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原则，适用于总供货人的各部委及在建设附件一和附件二所列企业中与完成相应设计勘察工作、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的有关部委。

十九、委托对外贸易部同中国政府按照本决议签署援助中国议定书，规定按照现行的贸易协定条件实施对中国的援助。

在补充协定中还规定，由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生产驱逐舰和潜水艇的工厂，苏联所承担的军舰建造厂的设计任务(1953年5月15日协定备忘录)自行消失。

以上谨向您通报。

附上述附件，共13页。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费德林

附件一：

由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

齐齐哈尔市特种钢厂(第二批)

该厂的生产能力可达到每年30万—35万吨

在编制课题和收集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帮助，1955年第三季度

设计资料，1956年第二季度

工厂车间的技术方案，1957年

施工图纸，1958年

供应设备，1957—1959年

总供货人——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

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云南省)

开采和加工铜矿

设计工作, 1955年第四季度

会泽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云南省)开采和加工铅锌矿

设计工作, 1956年上半年

设计实验装置

加工被氧化过的铅锌矿, 1956年下半年

供应实验安装设备, 1957年上半年

根据双方协商的期限在进行试验工作中给予技术援助

1. 为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设计工作, 总订货人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总供货人提交具有代表性的铜和铅锌矿样品以及关于这些样品的必要的技术资料。

2. 在完成设计工作并获得总供货人在对截至1956年1月1日工业类矿石储备进行统计确定的材料之后, 将讨论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组成以及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期限的问题。

总供货人——苏联煤炭工业部

抚顺煤矿联合企业东部采矿场, 开采油页岩, 每年产量为300万—400万吨, (一级)有可能扩大产量达每年600万—800万吨油页岩。

收集设计工作用原始资料, 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课题, 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 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 1957年

设备供应, 1957—1958年

依据1953年5月13日签订的苏中协议, 向抚顺煤矿企业……河北省……给予技术援助。

…… [52]

总供货人——苏联机器制造与设备建设部

为援建年产为2.5万吨工厂, 提供石油加工和化工设备。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 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 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 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 1957—1958年

设备供应, 1957—1958年

总供货人——重工机器建设部

援建汽轮机厂

在哈尔滨市(分两级)建立补充生产机构:

1. 生产发电功率为1.2万—2.5万千瓦/时的汽轮机, 供给年发电量为24万千瓦/时的发电厂使

用。

2.生产功率为1.0万—3.6万的轮船用汽轮机，年总功率为56万。

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8—1959年

总供货人——汽车、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制造部

生产小功率拖拉机的工厂

年功率为20000的拖拉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二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上半年

施工图纸，1957年第二季度至1958年

设备供应，1958—1960年

在研究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拖拉机的型号

总供货人——发电站部

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发电功率为..... [53]

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对制订的设计任务进行研究，1955年上半年

设计任务，1956年第四季度

在收集原始资料和对技术方案进行研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1957年

技术方案，1958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自1957年开始，并按照与中方协商好的工作进度表执行

供应设备，1958—1962年

总供货人——电力技术工业部

船舶用电力机械生产车间

附带操纵装置的年生产率达100000千瓦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2—3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四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在制订设计任务时将明确关于在哈尔滨或者上海电力机械制造厂建设这些车间的问题。

附件二：

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国防工业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及履行期限

总供货人——船舶制造工业部

渤海船舶制造厂

年生产能力为8艘驱逐舰和12艘潜艇

规定备用场地用以扩建工厂

在制订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

生产鱼雷的工厂

年生产能力是1200枚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二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上半年

总供货人——高速柴油机工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四季度

技术方案，1956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7年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总供货人——重型机械制造部

年生产能力为320000马力的中速柴油机工厂，同时考虑到扩大生产内燃机车用柴油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6年第一季度

技术方案，1957年第一季度

施工图纸，1957—1958年

设备供应，1957—1959年

总供货人——航空工业部

生产飞机用轮胎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能力可确保2家飞机制造厂的计划需求和5家飞机修理厂的需求)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二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年第二季度

设备供应，1957—1958年

伊尔28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年生产能力为150架飞机(在设计该工厂时，应该考虑到以后能够使工厂从维修转入生产喷气式轰炸机)

为选址提供咨询、为制订任务和收集用于设计的原始材料提供技术援助，1955年第一季度

设计任务，1955年第三季度

施工图纸，1955—1957年第二季度

用于维修飞机的设备供应，1957—1958年

附注：

- 1.在制订设计任务时，确定上述企业的生产能力。
- 2.根据双方协商好的范围和日程表来提交施工图纸。

附件三：

为帮助中国铁路建设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在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由交通建设部于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2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工程名称	专 业 名 称	专家人数
供应宝鸡—绵阳等地段的电力牵引综合设备	设计电力牵引综合设备的各类工程师	4
修建、扩展和改造 15 条铁路(北京、沈阳、郑州、武汉、兰州、西安、哈尔滨、天津等)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总工程师	3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各类工程师	3
	设计编组场的工程师	1
	制定列车运行计划的工程师	1
	制定施工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设计编组场用设备的总工程师	1
在成都等各城市建设新的枕木防腐工厂	枕木防腐工厂防腐技术工艺工程师	1

续表

工程名称	专 业 名 称	专家人数
长春—四平、沈阳—北京地段自动闭塞装置	设计各车站和区网站自动闭塞装置的各类工程师	1
	计算自动闭塞装置牵引功率的工程师	1
在长春、郑州和兰州等城市建设新的蒸汽机车修理厂	蒸汽机车修理厂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1
	蒸汽机车修理厂技术工艺设计工程师	1
建设新的铁路线：宝鸡—绵阳和成都—昆明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1
	设计人工设施的各类工程师	1
	工程地质方面的工程师	1
	设计隧道的工程师	1
	施工设计工程师	1
	综合设计工作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地质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大地测量和计算工作工程师	2
	铁路路基设计工作工程师	1
	人工设施设计工程师	1
	车站设计工程师	1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的工程师	1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1
	设计施工组织工作的工程师	1
	编制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地质学家	1
	水文—地质工程师	1
	设计人工设施的工程师	1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1
	设计车站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的工程师	1
	设计供电站的工程师	1
	设计通讯工程的工程师	1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1
	施工组织设计工作工程师	1
	制定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隧道工程的工程师	1
	桥梁设计工程师	1
	铁路路基工程师	1
	各类岩石爆破工程的工程师	1
	组织施工设计的总工程师	1
	施工机械化工程师	1
总 计		63

附件四：

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协助制定北京市城市建设总计划，由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期限为2年，以下是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专 业 名 称	专家人数
城市设计工作专家	2
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	1
天然气供应工程专家	1
集中供暖工程专家	1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专家(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1
工程设计方面的专家	1
建筑工程专家	1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д.52, л.52-56、57-61、62-64、
65-68、69

№24888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 12月28日)

参加会议的有：

中国方面：中方委员会主席薛暮桥，中方委员会委员李昌、关豪陶(Гуань Хаотао)、张方(Чжан Фан)、王忠义(Ван Чжун-и)、唐南平(Тан Наньпин)、孙大山(Сюй Дашань)——中方委员会代理科学秘书，崔义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部副部长。

苏联方面：苏方委员会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苏方委员会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А.Н.阿斯科琴斯基、В.И.奥夫相金、А.Л.马尔琴科、П.Г.特列季亚科夫、А.В.戈卢布科夫——苏方委员会科学秘书、А.Н.拉夫里谢夫——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局长。

会议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会议秘书：А.В.戈卢布科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次会议的议事日程，具体如下：

批准关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审议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科技经验的问题。

审议双方转交科技资料的程序问题，专家出差的规定以及双方的核算问题。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为基础，在第一次会议审议和讨论了上述议事日程中提出的问题之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1.根据附件一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条款。

2.由于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满足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苏联各部和各部门将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所转交的技术资料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二进行确定。

3.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转交科技经验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和各部门将向苏联相关的机构转交技术资料、工业产品样品、接枝、树苗和农作物种子，并使苏联专家熟悉工农业各领域工作经验的成就，熟悉医药的生产和同各种特别危险的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提供的这些资料、产品的数量和期限根据附件三和附件四进行确定。

4.关于技术资料的转交、专家的出差和费用的核算，双方同意接受如下条款：

(1)双方的出发点和采取的原则是：为技术合作、相互转交技术资料和技术信息奠定基础，正如以前一样，无偿提供的只是根据附件中的第一种形式(附件五)列出的实际花费以及邮寄费。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核算的基础。

如果必须对资料重新进行制定或者对其进行修改和修正的话，双方将根据与这些开支相关的实际费用进行支付。

(2)通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需要根据附件中列出的第二种形式(附件六)签署文件。

上述文件的副本将是进行最终核算的基础。

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根据中苏在1950年10月25日签署的协议和双方在1952年12月31互

换的信件进行支付。

如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预计他们出差的期限多于3个月，苏联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在进行最终的费用核算之前，有权进行中期的费用核算，而中国相关的单位应当予以支付。

(3)应当把与进行科技合作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资料转交给苏联方面，这些资料由在北京市相应的中国单位转交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处任命的苏联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而应当转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由苏联在莫斯科的相关部或部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办公厅的商务参赞。

(4)在双方进行科技合作中相互转交的技术资料及其他的资料 and 情报，不能被相关国家在任何一方的领土之外使用，不应被转交给第三国的法人和自然人，不能不经另一方的同意把这些转交的资料发表或者公开。

该纪要于1954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一式两份，分别为汉语文本和俄语文本，对于任何一方面来说，两份文本中的任何一份文本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附件一：[\[55\]](#)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条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合作协议，该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上述协议采取措施，进行合作，并且双方的代表处要相互提出建议。

2.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由14名成员组成，每方各7名成员。

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都由各方的主席领导。

任何一方委员会主席的更换都要相互告知。

3.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召开由双方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每年召开的次数不少于2次，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召开，而且所召开的会议的秘书由中方委员会或者苏方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担任。

4.在例行的会议召开之前，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应当相互以书面的形式提供得到本国政府赞同的、双方希望列入本次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问题的清单。提交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应当有相关的资料，来确定给予的技术援助的总量和规定。

5.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可以让一些技术顾问参加委员会会议。

6.对于委员会会议中讨论的问题，经协商一致、形成决议的会议纪要要有两份原件，分别为汉语和俄语文本。会议纪要由中方委员会主席和苏方委员会主席签署。

7.中方委员会和苏方委员会每年不少于1次互换他们得到的与中苏科技合作有关的、关于本国对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利用情况的信息。

8.与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和举行相关的费用，由会议举办国支付。

委员会委员、技术专家以及会议的参加者的个人花费由其派遣方支付。

中方委员会主席

苏方委员会主席

1954年12月28日

РГАЭ, ф.9493, оп.1, д.910, л.1-6

1955年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5年1月6日

与陆定一同志的会谈是刘少奇同志安排的。我曾请刘帮助大使馆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情况。

中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秘书胡绳、中宣部文艺司司长林默涵。

大使馆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B.И.利哈乔夫和使馆二秘B.A.克里夫佐夫。

会谈伊始，陆定一便通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宣部就目前意识形态战线进行的争论问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在卷入争议的各组织(中国作协、学院和高校等)进行了讨论，现正在中共中央进行审批。鉴于该决议草案尚未批准，此次会谈仍将依据的是争论材料，而非中央决议。

我说，目前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意识形态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我们过去就曾开展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运动。该运动的目的是要清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和买办思想。但是这一运动只是泛泛地打击了封建和买办思想，而未消除这些不良思想的各种形式在社会意识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当时一些新干部素质依然较低，而那些经验

丰富的老干部因承担着其他工作，无法把运动提高到应有水平。

运动期间曾对艺术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批判了一部道德败坏电影《武训传》，以及作家萧也牧——其作品与左琴科的作品相类似。

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许多复杂、严重问题。中共中央正在对中国意识形态战线的真实情况加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业已成熟，已为辩论准备了条件。围绕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及俞平伯就《红楼梦》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著作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今，关于小说《红楼梦》和俞平伯著作的路线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在这场斗争中又产生了另一问题，即关于批判胡风观点的问题。胡风的艺术观点与目前住在苏联的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的观点相似。

胡风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然而不久便退出，借口是他是个诗人，而共青团活动占用了他许多时间，影响了他的创作。

当时，在北京共青团担任领导职务的陈毅同志曾让胡风去他那里，但后者拒绝前往。

胡风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文学系，之后又到日本学习；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他写了许多各式体裁的文章，均收录在他的八部著作中。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曾在各杂志社做过助理和编辑等多种工作。

目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管理局成员，《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胡风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不仅仅是在无党派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

胡风观点的实质：否定文学的党性，以及党和意识形态领导文学的必要性；反对作家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作家应真诚而自由；应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地反映生活，真诚地描写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即使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风总爱引用巴尔扎克的著作为例，认为后者政治观点虽然反动，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却是蹩脚作家；苏联出版的许多好书，也都是由无党派作家撰写的。

不过，呼吁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胡风本人却对生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作家不应在生活中寻求斗争和参加群众斗争。群众斗争——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因此，作家要反映的并非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只是描写个别英雄和个别事例。

胡风指出，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

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主观精神”。

胡风的特点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问，胡风的哲学观点如何。陆定一说，虽然胡风没有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从他的文学作品可判断，他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1954年，胡风更加活跃，撰写了近30万字的大量材料。他在一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专函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界组织的看法。他主张，作家应围绕杂志工作，否定党对这些杂志的领导。

鉴于胡风的错误，他近期的文章没有刊发。因为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错误并无充分的认识。目前，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文艺报》杂志上用专刊方式发表他的部分新作，以揭露他的真实嘴脸。

中宣部正准备他的专门材料，随后将散发到各地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党内一些人仍在支持胡风，并在辩论中维护他的观点。

与胡风观点的斗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问题在于，胡风一直坚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他实际并非如此。

陆定一同志还谈了中国当前思想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

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观点。

在历史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在建筑领域——主要是批判传统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问题。梁思成过于痴迷于民族艺术形式。他对在建或者由他批准建设的所有建筑均要用中国典型的屋顶来装饰。在新建的集宁—二连铁路沿线所有车站建筑都采用此类屋顶。可这样的屋顶得让国家花大量的钱。此外，梁思成对中国设计师的影响如此之大，没有他人们都不敢搞设计，从而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度。

在语言学中也存在许多尖锐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有三种基本的汉语教科书，但其中对汉语问题的解释各不相同。汉语音标的制定工作也有诸多困难和争议。

在政治经济领域正就当前中国过渡阶段的经济规律问题展开一场广泛的辩论。就该问题，仅《学习》一份杂志便收到70篇文章。但杂志尚未决定是否发表这些文章，因为仍需等待辩论的结果，以便最终发表一些结论性的文章。

上层建筑在中国过渡时期的作用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正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性质问题。部分辩论者认为，中国教育带有人民民主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另外，教育界仍在讨论初中教科书的编写方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现在暴露出来且变得如此尖锐，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的自由辩论尚不发达。无党派人士害怕批评党员；而党员因担心损害统一战线，自然不愿批评无党派人士。

一些杂志不愿刊登那些攻击其编辑部成员的文章。为了就某个问题展开批判，他们总要等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另外，一些同志自认为是某个问题的权威，因而容不得别人的品头论足。在中国辩论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辩论的意义估计不足。

中共中央的结论是有必要展开辩论。鉴此，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自由辩论和反辩论的批示。辩论期间，无党派人士可以批评党内同志，而后者也可以批评无党派人士。辩论过程中少数派不必一定服从多数派。对于那些在辩论期间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不会给予组织结论，保留其职务给予其从事学术活动的机会。例如对俞平伯就未采取任何组织措施。总之，所有人都有机会就所思考的各方面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存在一定错误的书籍也可出版，否则中国就会出现图书出版急剧缩减的危险。

关于目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将之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那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些问题与国家总路线的实施和五年计划的建设密切相关(如建筑领域的错误倾向的问题，等等)，以及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学界就小说《红楼梦》所展开的辩论，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始终处于党的监督之下。必须就这些问题展开广泛和迅速的讨论，并做出相应结论。

另一类属于涉及整个科学领域、带有纯粹理论性质的问题(如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非立刻要求解决，因此可以展开长期的辩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些问题，依据其尖锐程度也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辩论的时机业已成熟；另一类，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展开辩论的前景尚不十分明朗。党要抓好第一类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影响开展广泛的辩论。

与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曾有一些党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前缴了械(如《文艺报》杂志编辑部的一些党员)。

不过，在开展斗争的同时，我们依然应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新闻媒介在辩论期间仍将刊登各种倾向的文章——不论它们观点正确与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欢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的任何进步举动，也不会把那些拒绝放弃自己错误观点的人当作敌人(当然，条件是他们不从事反革命活动)。

中宣部认为，辩论的结论理应由辩论参与者自己来做。一般而言，参加辩论者都是那些有能力对辩论做出必要结论的学者。

陆定一同志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具体表现就是近期对各杂志和报刊的咨询大幅增加。

会谈期间，我对陆定一同志说，跟中国当前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样，苏联当年也曾出现并解决过类似思想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物理、数学、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尤其关注，通报了苏联个别学者在解决辩证法同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问题时所犯的那些错误。

出席这次会谈的中宣部一位工作人员问我，胡风关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不应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论断是否正确。对此，我作了详细解释，认为该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我问陆定一同志，在党组织内部是否也在讨论与辩论相关的那些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党组织正积极讨论辩论的进程。

对于利哈乔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否参加辩论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这些党的党员正在参加辩论。至于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内部关于辩论讨论的问题，只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人数较多的党派内进行(例如，九三学社、民主建设党等)。随后，我问，目前中国国内是否建有党的教育网络。陆定一同志说，目前党的教育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有一些党校，但其数量还远远不够。

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中宣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比苏共中央宣传部更为复杂，因为其中还包括文学部、艺术和科学等部委。

我对这次有意义的会谈向陆定一同志表示感谢，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就各学科的个别具体辩题为苏联使馆组织一些会谈。陆定一同志答应将组织此类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各部门负责人传阅。

B.斯捷潘诺夫

1955年2月1日

文件分送给如下同志：谢尔巴科夫、巴斯卡科夫、别利亚科夫、契尔诺夫、卡宾、果阿洛夫、莫斯托维茨、捷列什金、列萨科夫、别谢金、帕夫洛娃、布赫洛夫、费多谢耶夫

2月2日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第2份

1955年1月8日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递交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一封公函。毛泽东同志接过公函，立即拆开，通过翻译师哲简要地了解了公函的内容。(公函说的是列宁逝世纪念日纪念活动程序)。他请求今天转告苏共中央，感谢给寄来消息。

然后举行了会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他们来讲，面临的最迫切的就是党员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100万是党员干部，150万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100万其他范畴的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记者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少。他们的脑子里完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直接继承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杜威1920—1922年生活在中国，在许多大城市讲过学。

中国现在胡适的继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至今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处在他的影响之下，甚至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党的文艺报编辑部完全站在俞平伯一边。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也站在他一边。站在他一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共产党员教育家。

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当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唯心主义者公开进行自己的宣传时，许多党的

干部尾随其后。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打算，毛泽东同志说，用一年的时间，天天在报刊上积极地系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他说，我们能够认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揭露各种科学之中的其中包括自然知识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如果不在知识分子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历史唯心主义，不做大量工作使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那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带领全体人民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内、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时候才能建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最近他到过上海、长沙等一些城市，同工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工人眼里，比如私营商贩已没有声誉。工人不相信他们，说私商欺骗他们。与此同时，工人相信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一些省份的零售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占70%，私商仅占30%。这明显是超前行为。我们认为，必须限制一下国营零售贸易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挤压私人工商业者，此外，急剧收缩私人贸易还会导致失业。

会谈中还涉及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他正在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经济问题方面，在他们的报刊上已写过些什么和正在写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能够掌握经济知识，能够自觉地管理和领导经济。关于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我们将专门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我们很快就将译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予以付印，初版300万份。该教科书我读过一部分，毛泽东说，从我读过的这部分看，这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它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的雅加达会议。他说，会议开始有很大分歧。印度和缅甸代表发表意见赞成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则坚决反

对，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国会议上，吴努 [56] 坚持了很好的立场。他说，如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那缅甸也不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休会，休息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给巴基斯坦和锡兰代表做了积极的工作，同他们商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我说，吴努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志们给他做了大量工作。这使缅甸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近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是的，我们消除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疑惑和偏见。”

然后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国的朋友们赋予亚非国家会议以很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应大大降低美国在亚非人民之中的威信。美国人害怕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孤立美国，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中。他们(美国人)将千方百计破坏亚非国家会议。大概，巴基斯坦和锡兰将帮他们的忙。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为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 [57]，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看来，他(哈马尔舍尔德)前来的目的是不想同我们达成任何东西，而是反对中国，进一步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现在，毛泽东同志说，哈马尔舍尔德表现得很不好，带有挑衅性。也许，以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在以后而不是现在，才有可能回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来。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说，说实在的，中国对美国承认中国和随之而来的现在加入联合国，兴趣不是太大。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明白，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承认中国也有不少好处。这可以给我们自由，以反美的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再有8—10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当年比现在中国所处的形势还艰难。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6年才承认苏联的，然而苏联并未因美国不承认而灭亡，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从美英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准备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形势。他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形势下不稳定。此时，在东方，他们没有日本不能进行战争，而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现在它也不想同中国和苏联打仗。在西方，没有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发动反对我们阵营的战争，而德国也没做好战争准备。此外，像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形势也不稳定，摇摇欲坠。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日都在颠覆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成了巨大的力量。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国会会议，没有一次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会议不是大骂特骂共产党员。没有一张资产阶级报纸不在天天咒骂共产党。这一切，毛泽东说，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害怕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转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将派郭沫若同志前去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时在座的有师哲同志和T.Φ.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向您提交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材料。

库兹涅佐夫

1955年1月13日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按照委托提交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报告如下内容：

朝鲜同志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发展农业，没有抽出应有的精力去关注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常有表露。朝鲜人民军内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由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薄弱，结果军事纪律和警惕性都下降了。战士和干部队伍中都存在背叛祖国、开小差和其他一些背叛行为的现象。

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变得很无力。最高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权地方机关的选举工作已经拖延了很久。

到目前为止，劳动党中央很少关注南朝鲜的工作，在那边合法的群众组织中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基础。

我们认为，同朝鲜同志讨论朝鲜局势问题是合适的，为此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

我们还认为，把这个事情通告给中国朋友是合适的，询问他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情况有没有什么意见，弄清楚他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同朝鲜同事的商谈。

在此我们提交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德林和苏兹达列夫同志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中阐述的内容基本正确。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

1955年1月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1.认为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取代以前预定的日期——1955年4—5月是合适的，同他们在苏共中共主席团举行会谈。

2.认为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朝鲜局势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意见是合适的。

批准给驻北京大使尤金的指示。

附件：

机密

北京

苏联大使馆

拜访周恩来，向他通报如下内容：

金日成表示希望来莫斯科，以便就起草劳动党党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商谈。

莫斯科对该建议持肯定态度，认为就朝鲜局势问题同朝鲜同志交换意见是合适的。

在这里将讨论如下问题：

制定恢复和发展朝鲜工业的措施，为此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部分农业生产合作化达到了很高速度。朝鲜同志打算近5—6年对所有的农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对此我们很担心。

要让他们自己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预定计划和实行一系列措施时，朝鲜同志对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考虑不够。根据现在材料，朝鲜居民生活很艰苦。

朝鲜同志很少关注在南朝鲜的工作，在目前存在的合法组织中缺乏基础，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鉴于阐述的这些情况，想了解一下中共中央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国同志希望以什么形式参与在莫斯科的协商。

电报告知结果。

附件：

机密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受战争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不完全资料，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20亿元(14亿卢布)。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产值，同1949年相比较，缩减40%以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燃料和化学企业的生产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交通瘫痪。农业遭受严重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

停战后，朝鲜劳动党花了很大精力用于国内经济重建工作。凭借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重建三年计划的任务。采煤、炼钢、制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企业已经开始运转。

但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严重不足，应该引起注意，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朝鲜朋友是以损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

1954年工业品的总产量已达到1949年时的水平，以不变价格计算为297亿元，该年的计划是283亿元。1955年预计工业品生产达到480亿元，按照三年计划，预计1955年工业总产值为374亿元，1956年为468亿元。按照工业品的总产值，三年计划已经完成，并提前两年完成。但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以前一样困难。

与战前年代的1949年相比，1954—1956年以实物体现的基本工业品的产量如下：

			1949 年	1954 年 完成	1955 年 计划	按照三年 计划预计 1956 年的产量	1955 年的 产量及与 1949 年的 比较(%)
	工业总产值	10 亿	29.9	29.7	48	37.4	46.8
1	电力	百万/千瓦/小时	5 924	1 946	3 040	2 700	3 800(65%)
2	石炭	千/吨	4 005	1 872	3 450	2 670	4 020(100.3%)
3	生铁	千/吨	166	—	101	100	180(108.4%)
4	钢	千/吨	144.4	52.7	154.8	106.2	119(82.5%)
5	水泥	千/吨	537	231.5	550	455	650(121%)
6	砖	百万/米	44.8	334	799	663	722(16.3 倍)
7	木材	千/立方米	1 601	1 841	2 853	2 000	2 300(142.8%)
8	矿肥	千/吨	401	21.3	80.2	59	82.6(20.5%)
9	棉布	百万/米	9.4	22	44.2	37.7	47.7(5.1 倍)
10	纺织品	百万/米	3.2	0.8	2.9	1.8	1.98(62.2%)
11	鞋	百万/双	5.8	11.7	14.7	14.4	22.4(8.9 倍)
12	肥皂	千/吨	9.2	1.9	6.3	3.8	4.4(47.5%)
13	成品烟	千/吨	6.0	4.5	6.0	5.2	5.7(95%)
14	捕鱼量	千/吨	273	269	552	418	550(2 倍)

三年计划预计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建设总投入为790亿元(26亿卢布)，其中工业投入374亿元(47%)，农业和水利建设投入56亿元(7%)，这其中的水利建设投入为22亿元，交通运输投入113亿元(14%)，文化生活建设投入141亿元(18%)，这其中的住宅建设投入为90亿元。

1954年国民经济投入总额为240亿元(占预算的26.3%)，原计划为223亿元；1955年达到320亿元(占预算的36%)，原计划为269亿元，1956年计划投入300亿元。

许多企业工程未经充分论证就建在地下。目前有10家地下企业，11家企业正在建设，其中包括大型汽车厂、机床厂、纺织厂等。

朝鲜同志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打算。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指出，1954—1956年国民经济重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全面工业化打基础，打算在接下来的5年“武器等方面的生产要做到经济独立”。在这里关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没有得到反映，以及没有考

考虑到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没有考虑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方针，在1953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等)访问莫斯科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正。

但是，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决议没有得到重新研究，这在金日成的声明中看得出来，这一方针在新党章和1957—196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

此前一段时间，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朝鲜劳动党的政策中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领域，无法保障国内粮食和原料的需求。

同1949年相比，1954—1956年农业情况的特点如下面材料：

	1949 年	1954 年 完成及与 1949 年的 百分比	1955 年 (计划)	1956 年 (按照三年 计划)及与 1949 年的百分比
播种总面积，二次播种 (千町步)	2 386	2 337(98%)	2 443	2 235(96%)
其中：谷类	2 113	2 111	2 140	2 026(96%)
稻米	395	459	485	483(122%)
其他谷类	1 718	1 652	1 655	1 543
玉米	106	60.6	62	74(70%)
蔬菜	46	71.7	110	85(195%)
粮食总收成(千吨)	2 795	2 800(100%)	3 250	3 322(138%)
其中：大米	1 241	1 347	1 550	1 630(131%)
棉花	78	22.8	40	43(55%)
蔬菜	797	1 082	2 250	1 597(200)
水果	54	37	75	75(138%)
出栏牲畜(千头)				
大牲畜	788	480(61%)	640	694(88%)
其中：牛	0.9	0.7	0.95	1.2(134%)
猪	660	846	1 175	934(141%)
羊和山羊	18	48	63	55(4.2倍)

注：1町步=0.99公顷。

考虑到提高了二次播种和新开垦土地，1956年的播种总面积将大大超过计划。

这些材料表明，农业在许多领域都未达到战前水平，仍处于极其落后状态。

目前农业有15马力的耕作拖拉机800台，2/3的农业没有耕作牲畜。1954年得到约5万吨矿肥，1949年时为25万吨。为了掩盖不足，1953年从中国进口粮食20万吨，1954年为13万吨，1955年打算进口17万吨。1948—1949年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完全够供应，不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30%以上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需要国家不间断地援助，不仅需要种子、化肥、农具，还需要粮食。甚至最普通的农具都严重不足。

劳动党中央把在农村成立试验合作社的日期定为1954年1月。在实践中，该方针在1954年成立了超过9000家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到体现。整个农业经济的25%都合作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允许出现了过火行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被破坏。按照金日成的话说，打算到

1956年以前，大约有35%—40%的农业经济联合成立合作社。预计在5—6年时间内全部农业经济实现合作化。

在会议决议中还规定，在近一二年内粮食总收成同1949年相比较提高40%；依靠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播种面积达到32万町步；到1955年末，合作社和农户饲养的大牲畜达到63万头，猪达到100万头；改善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采办机关的工作。

三、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改善北朝鲜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任务对于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朝鲜同志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5%，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取消了农民的实物税。肉类计划交售也予以取消。三年计划提出了大力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和文化生活状况，为取消票证制和从定量供给向全面贸易过渡的任务。

但是，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对广大居民来说仍是高不可及。商品价格比定量供应高出10倍多，市场价格还不断上涨。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月均工资为800—900元，熟练工人的工资为1200—1300元，而一双胶鞋的非配给价格为400—450元，1米棉布的价格为380—400元，一套粗制衣服要2.5万—3万元，棉袄要2000—3000元，日用皂要300元。目前名义上维持着1949年的工资水平，而国家的非配给商品的价格比1949年提高了2—3倍。

1954年计划降低价格275万元，实际上只降低了850万—9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超出计划20亿元(660万卢布)。

1955年财政计划预定为工业品和粮食降价拨款60亿元，32亿元用于1954年降价的补偿。这次降价对于三年计划预定的在近两年内为取消票证制和所有粮食和工业品过渡到按照国家价格自由贸易创造条件来说是不够的。

最迫切的问题是向居民供应粮食。工人主要靠定量供应生活，凭票每天得到600—900克大米，每个家庭得到300—500克小米。肉、油和其他一些食品完全不发放，或者发放的数量不大，而且不经常发放。大米的商业价格达到60—70元/千克，肉——350—400元/千克。

计划预定从农民手中收购27万吨粮食，但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国家没有必备的商品进行交易，采购部门的工作也不令人满意。截止到1954年末只从农民手里收购到约5万吨粮食。朝鲜同志打算加速采购粮食，实质上具有强迫性质，因为不仅征集村庄的粮食，在很多时候还征集农户院子里的粮食。这引起农民的不满。

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个体买卖被禁止，但是，朝鲜当局没有防止粮食投机。为了同投机行为进行斗争，在平壤禁止按商业价格自由出售粮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困难的局面被敌特分子和间谍利用，他们四处散发匿名信和传单，号召抵制政府的粮食收购。

住宅数量恢复得极慢。战争期间有280万平方米住宅被毁，到1954年末只修复了200万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居民和近30%的农村居民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朝鲜同志没有利用国内现有潜力来扩大大众消费品生产。这样，国防部工业企业可能掌握着许多钳工、螺纹和切削工具，挂锁和暗锁，家用器具，小五金，炉具，钉子，螺钉等。在这个部有两个制钉机用于生产螺钉，但开工不足，仅仅是为自己所需生产。同时，手工业合作社也生产钉子和螺钉，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无法满足需求。这样，又从中国和苏联购买了钉子和螺钉。不过，重工业企业、通讯、化学工业、建材、电力和林木加工企业所需要的消费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组织起来了。这些部门的所属企业能够生产很多人民需要的产品，如：铁制器

皿、电器、灯具、手用农具(镰刀、锄、铲等)、家具、黏土和瓷制餐具，等等。

经济重建，特别是提高大众消费品生产，允许在分散的手工业范围内进行，私人资本处在国家的监督下，还可以扶助同南朝鲜开展业务往来。但北朝鲜领导层急于推行彻底消灭私人企业的路线。例如，1949年私人企业占工业生产总量的15%，在1953年时缩减到3.2%，1954年时达到2.5%，而在1955年计划达到1.3%。贸易方面，1949年时私人资本占46.8%，1954年时缩减到22.3%。

四、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预算中，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到31.8%。

截止到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的设备、材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渔船、汽车、拖拉机、农业机器、火车机厢，矿业、纺织和能源企业设备、机床、建筑设备、修路机、电缆制品、检测仪表、试验器材、大学教具、矿肥、石油制品等。

苏联援建的22个工业项目都完成了勘察工作，其中的大部分设计方案均已完成，为开始建设打下了基础。

到1954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建和新建的企业达到100家(其中大型企业30家)，在很大程度上装备了从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型设备。

依靠苏联供应的设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纺织企业的棉布产量，从1954年的221万米增长到1955年的442万米。

1953—1954年共建成20家拖拉机租赁站和113家马匹租赁站，由苏联供应拖拉机和马匹。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苏联给予的援助主要用于获取企业设备和原料，同时在大众消费品开支上节省了10亿卢布。这在其他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也能找到这种情形。

只是近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提出向苏联订购总额约为4亿卢布的棉布和其他一些大众消费品。

根据现有决定，预定1955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总额约为2.4亿卢布的苏联商品(包括成套供应)，其中包括：安瑞(Анжуйский)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所需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类加工厂、纺丝厂、鱼类加工厂的设备；火车机厢和起重机，采矿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设备、石油制品、电缆制品、钢材。

此外，苏联对外贸易部还研究了朝鲜订购总额为2.9亿卢布苏联商品的合同，其中包括8万吨矿肥、950万米棉布、2300吨棉线、1400台拖拉机、1500台播种机，汽车、建筑和交通设备，以及其他一些工业设备。

苏联对外贸易部根据上述合同于今年1月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根据核算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同中包含的设备和材料的价值，包括1955年的合同，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0亿卢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考虑到中国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大地超出了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中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的材料，接近8.5亿卢布。

在供应工业设备和原料(织布机、火车头、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和豆类)、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套棉衣和其他一些商品。1955年将供应粮食和日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铁路修筑、铁路桥梁和机车库建设方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

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总额为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0.65亿卢布，民主德国0.45亿卢布，捷克斯洛伐克0.35亿卢布，匈牙利0.25亿卢布，保加利亚0.2亿卢布，波兰0.19亿卢布。

1953—1954年期间，这些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机床、交通建设设施、电力设备、电缆制品、检测仪表、钢材、..... [58]、棉线和各种原料，总额约为1亿卢布。

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成套设备，在工业和其他一些工程的恢复和建设上提供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援建了砖厂和水泥厂、生产阿斯匹林的药厂。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染料厂、度量衡厂；波兰援建了3个煤矿和2个工厂：火车头和机厢厂；保加利亚援建了2个工厂：砖厂和木材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力设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捐献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羊皮。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取得的设备和材料并不能得到有效使用：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设备运来时(特别是机床)，没能适时地在受援者中进行分配，而是长时间地放在仓库里。

五、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劳动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很薄弱。

在劳动党内和在全国同以前一样，极力宣扬个人崇拜，其中在领导层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不这样做就不行。到目前为止，金日成身兼劳动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职位，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机关。按照惯例，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指示。有时金日成做出了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悖的指示，某些时候会给事业造成损失。例如，曾做出过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同私营企业同等课税的指示。他在没有经过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在江界建设军工厂，未经考虑就支配了多达4600万卢布(2300亿元)从中国收到的给志愿者的生活补充津贴，等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出现许多滥用权力、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现象，单纯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教育。同贪污受贿和盗窃行为作斗争，以及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作斗争，皆进行得很无力。贪污分子侵吞公家财产，在多数时候，既没有追究党内责任，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在许多部门、企业的领导人员中间流行用国家财产组织毫无意义的庆典和宴会。没有抽出必要的精力去巩固对外贸易机关，那里混乱不堪，且无力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最后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被推迟到不确定时间，它的任期在1952年就停止了。地方人民委员会也没有进行选举，这些委员会还是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选出的。截止目前，大多数地方人民机关的领导人员都是上级机关任命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更是薄弱。纪律涣散、警惕性降低。将领和军官酗酒成风，目空一切，对下属粗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背叛祖国、临阵脱逃、自杀现象增多的事实，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队伍中都存在这些犯罪行为。

六、南朝鲜

关于南朝鲜的局势，我们有如下一些材料。

南朝鲜的经济恢复得很慢。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确定，为了恢复经济和保障消费，要求外国在5年内提供12.5亿美元的援助和6.5亿美元贷款，以南朝鲜的国内资源做担保。

1953—1954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了2.8亿美元经济援助。此外，按照联合国的路线在上述年份提供了4200万美元经济援助。

1953—1954年南朝鲜国内收入总额为1.7亿美元，而1954—1955年确定为2.5亿美元。其中1953—1954年用于自己的武装力量(75万人)开支就达到6亿美元。1954—1955年南朝鲜的军事开支确定为2.8亿美元。1953—1954年度财政赤字1.5亿美元，而1954—1955年度赤字确定为2.5亿美元的规模。

南朝鲜资金不足的问题被掩藏起来，主要是通过大量发行钞票的方式。从1953年6月到1954年11月，纸币流通数量增加了3倍(从130亿韩元增加到400亿韩元)。结果，纸币大量发行导致货币贬值，韩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53年的60韩元兑1美元，到1954年年初达到180韩元兑1美元，年末达到250韩元兑1美元。

在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对占人口70%的农民造成严重伤害。

由于工业企业投入不足，原料和电力无法保障，以及由于美国和日本大量大众消费品在居民购买力低下的情况下进入南朝鲜，在1954年时工业仍旧处于停滞状态。

在联合国总代表1954年10月12日关于南朝鲜重建的报告中承认，南朝鲜居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和以前一样，存在粮食、衣服、住宅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

由于李承晚分子在1954年5月举行的南朝鲜国民议会选举期间采取了针对对手的警察措施，议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李承晚自由党的变化。该党在议会203个议席中席位由93增加到120。利用右翼政党的势力，李承晚分子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工联、农民、青年和其他一些组织)中的反对派，使这些组织的活动陷于瘫痪。

分析北朝鲜在对南朝鲜工作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得出结论，朝鲜领导层没有认真地把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列为自己的任务，没有为此采取严肃措施。在南方建立劳动党秘密组织和在当地群众组织中建立基础工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指出，在南朝鲜的政治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六届会议决定通过一年后，党在南方的工作仍没有得到改善。近来，劳动党向南方派遣了党小组从事起义工作，而没有从事争取南朝鲜民众站到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工联和其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牢固基础。

朝鲜同志在开展同南方联系的问题上给自己确定了宣传性的有限目标。但也不善于对南方开展宣传工作。放弃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与李承晚区分开来，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方，放弃了就成立统一的、独立的朝鲜共和国问题进行商谈的路线，继续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进行攻击。由于没能正确地认识南朝鲜的局势，针对南方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达到目标，有时败坏了北朝鲜宣传者的名誉，没有摸清南朝鲜真实情况的能力。

在北朝鲜现有30名1952年被俘的南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其中有1919年反日起义领导人之一吴海永(О Ха Ен)，前上海朝鲜流亡政府首脑安久洪，前南朝鲜民政机关首脑和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一些将会被释放，利用他们同南方建立联系。

没能利用现在北朝鲜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力量，去开展同国家南部地区的联系工作。为了同南方建立联系，祖国统一民主阵线组织利用的也不够。

七、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北朝鲜同志注意以下问题：

1. 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力主保持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确定的速度，在此要提高大众消费的比重。重新审议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的发展工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条件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劝告朝鲜同志目前要克制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要集中精力巩固已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要逐渐地进行农业合作化，要全面和精心准备此事。要让朝鲜朋友注意到，仓促成立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1954年对25%的农业实行了合作化，这已经为国家对其给予援助花费了大量资金。

3.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到迅速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相关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商业价格；(3)为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现实条件；(4)恢复住宅总量。

此时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向南朝鲜展示在北朝鲜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非常重要。这对南朝鲜民众争取统一的斗争来说是个有力的刺激因素。

4.要让金日成注意到改进党和政府集体领导工作方法的必要性，要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应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是不妥的，这会压制其他工作者的主动性。

建议1955年组织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做好准备工作。

必须建议劳动党中央仔细研究军队情况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指战员的作战素质和道德修养。

5.为了争取国内全体爱国者投入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运动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使该组织恢复与南朝鲜群众组织的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加强劳动党在南方当地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中建立基础，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同李承晚制度斗争。还应该恢复劳动党在南朝鲜的秘密组织。

对南朝鲜的宣传应该更专业化，放弃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都进行攻击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力量和反对分子，支持国家统一和成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为此要广泛利用南朝鲜政权高层、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方成立中立性质的秘密爱国组织是合适的，这一组织可能在南北朝鲜之间建立合作，以朝鲜人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组织不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否定意见，当开展合法活动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争取他们投入到在民主的基础上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库兹涅佐夫

斯捷潘诺夫

费德林

苏兹达列夫

1955年1月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24-46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5年1月28日)

英国大使海特转交给B.M.莫洛托夫的信函

1955年1月28日

委托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以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政府通报如下内容：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完全支持新西兰的这一提议，联合王国的这两个政府均同意以下所述观点。

联合王国政府对在这一地区目前所出现的危险局势感到忧虑，并一直就缓和紧张的必要性问题与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深信，自己的目的只是希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不过，正如安东尼·艾登伯爵在其前不久给周恩来的信函中所指出的，如果想推动紧张局势的缓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在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各方都准备齐心协力地朝着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可是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并没有看到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因此便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一方的觊觎活动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经验，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不可能凭借武力获得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通过武力方式只会使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地位更加复杂化，而不会有利于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政府只是依据自己预想，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都不会对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民主主义盟友提供帮助的计划行事，那么情况就非常危险。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如果要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只可能通过和平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因此，其坚持建议相关各方不论是在自己的行动上，还是公开的言论中，都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全面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

联合王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与安理会的讨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打算。此外，联合王国政府将极力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审慎而成熟地思考这一问题，而后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要求我们这样做。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谁对谁错，但当前的局势事实上已对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一危险不再扩大。联合王国政府认为，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动议是希望在不对任何一方的企图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认真而严肃地谋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联合王国政府诚

恳地建议中国政府，在收到邀请的情况下就应接受并参与安理会的讨论。

翻译：O.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л.51-52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

机密

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

北京，1955年1月28日

杜维廉说，外交大臣艾登请他以女王陛下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名义作一个口头声明。新西兰准备就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倡议。倡议将在今天提出。联合王国的女王陛下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倡议，因为它也对沿海岛屿地区的危险局势感到担心。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两国政府都懂得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英国知道，美国希望这个地区安定。艾登想重申他最近所作的声明中的一点，他说，要想在缓和紧张局势中取得进展，只有大家都在现实局势基础上共同为此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英国认为，以为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会对某一方的要求造成损害是没有根据的。英国的观点认为，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用武力把台湾统一到大陆是不可能的。沿海岛屿的地位是另一回事。军事行动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艾登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美国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预，都不会在岛屿问题上帮助他们的盟国的假设上，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了。艾登还认为，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解，那就可能达成对这一问题的和平和满意的解决。英国政府请有关各方注意不仅在声明中，而且在行动中保持克制的重要性，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双方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行动。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新西兰政府，都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安理会的有关提案。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准备同意这个建议。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以便在安理会仔细审议这一事件，正如它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当前的局势，不管谁对谁不对，已经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

益，特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努力使这一危险不要增大。英国政府把新西兰的这一倡议看作是不损害有关各方要求的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认真的尝试。英国政府坚定地请求中国政府接受安理会的邀请。杜维廉说，这一通报的内容与新西兰政府的观点是吻合的。他还声明，他想以自己的名义说几句话。这一通报是以最友好的善意发出的，这是为了敦请中国政府予以合作，而且这是为了和平而作的。杜维廉表示希望，总理阁下能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杜维廉的声明时说，在他上次回答了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改变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59]

尽管在杜维廉今天转达的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言辞，但是依据这一通报和外交大臣艾登在国会的讲话可以看出，自总理与杜维廉上次谈话以来，英国政府的观点一直没变。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和平”的说法，不仅应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谈话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是他们行动的目标。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如果某个国家借助实力侵占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而要使人相信，承认这一侵占就意味着和平，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这正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曾经所持的立场一样，其结果只能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就正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在美国总统致美国国会的特别咨文 [60] 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美国总统的咨文——这是战争咨文，其目的是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务，并强迫中国人民与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实现所谓的“停火”。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实现中国主权的事务。1950年1月5日，甚至杜鲁门也承认这一点，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人民与蒋介石进行停火谈判呢？事实上，这种谈话是被用来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是被用来迫使美国国会授予总统使用武装力量无限制的全权，以使用他们来吓唬中国人民的。有人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或者接受美国方面的战争挑衅，或者是同意与蒋介石停火，并同意经过台湾海峡划一道分界线。美国企图通过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道防线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妄图使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合法化，并获得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件。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威胁说，抵抗就意味着世界大战，换句话说，应该容许他侵占我国

领土并继续他的恐吓。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和平。这不是什么别的，这正是战争。周恩来总理说，不仅中国人民，连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也指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相当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赞同总统咨文，其中某些人被咨文的一些言词蒙蔽。但也还是有一些国会议员明白事情的本质。有一个共和党议员就曾宣布，总统咨文追求的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他不会同意将美国青年送到台湾去为蒋介石作战。另有一个参议员声称，这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三个议员说，这是迈向战争的一步。显然，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说出了真相。除此之外，甚至某些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宣称，艾森豪威尔的咨文包含着美国进攻大陆中国的威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美国总统咨文发表之前和之后，美国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来对中国进行挑衅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以西派遣了4艘航空母舰及一些增补的驱逐舰，这些军舰驶近了中国的沿海岛屿，这难道不是战争挑衅？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过去任何时候也没引起过紧张。中国大陆就是这么解放的，海南岛、舟山群岛、嵎泗列岛等沿海岛屿也这么解放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解放台湾就会造成紧张呢？紧张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从1950年起美国就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相反，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有侵占过美国的领土。恰恰是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拥有一条自己的防线，而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把夏威夷群岛包括在自己的防线内。周恩来总理说，英国政府仍继续重复那种老调，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放到一边，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分清真理与谬误，那就不可能有正义。这无异于承认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或者承认欧洲的慕尼黑协定。侵略者总是要求在事实发生以后承认事实。用承认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导致承认另一个事实。侵略者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加剧战争的威胁，直到最终维护和平变得不可能为止。比如，紧接着承认合并奥地利后就要求承认合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最终爆发了波兰的战争。现在英国政府所使用的论据，正好是张伯伦当时提出的同样的论据，而当时艾登和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的论据的。反对慕尼黑的立场不是中国人民的发明。今天中国坚持的只是过去艾登和丘吉尔所持的立场，而反对的是艾登和丘吉尔重复的当年张伯伦的论据。周恩来说，中国尊重艾登和丘吉尔过去对慕尼黑所持的立场，但中国反对他们现在的论据。即使在当前，英国也还是有些人提出了批评。这一次是艾德礼和贝文了。这是英国自己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但中国人民将说出自己的意见，将会对此加以谴责。

周恩来总理说，当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使中国人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真理已不在世界占统治地位，并且每个人都会受骗。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在前50年中一直被日本侵占。在开罗宣言中，英国和美国与中国一起重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日本投降书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在台湾接受了日本投降，并在那里恢复了中国的行政权力。除此之外，杜鲁门总统自己也曾于1950年1月5日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打算介入，他们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英国政府也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效力，也作过类似的声明。远的不说，1954年8月，英国外交部代表就承认过这个事实，宣称：“开罗宣言宣布，福摩萨应该归还中国政府，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所有这些历史文件和外交文件及声明，都是执政当局的重要官员做出的。

对这些怎么能一笔勾销呢？为了强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认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占领，现在竟然说什么似乎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台湾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尚无定论，甚至说开罗宣言已变为一团废纸。怎么能够批评中国新闻界，说它不该指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背信弃义呢？

至于联合国，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行使解放台湾的主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基本规定，联合国不应干涉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下的事务，而且联合国成员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一方面，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容许美国利用联合国进行实际上是美国为达到侵略目的而采取的干涉活动。对此，中国人民怎么可能同意呢？如果联合国要进行干预，那就应该视为另外一种情况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最后的规定，第七章各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恰恰是美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所以联合国应该管管这件事情。以前苏联代表曾提交议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提出过指控，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径，并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可以解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美国不占领台湾，台湾也会像某些其他沿海岛屿一样，早就被解放了，也不会引发任何战争。战争扩大的原因在于，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行动停止之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加剧了台湾的紧张局势，并唆使蒋介石进行针对中国大陆和沿海

地区的破坏战争，抓捕中国渔船，屠杀和骚扰近海中国渔民，追踪和扣留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进攻中国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对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所做的这一切以及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言不发，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却打算干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事务，其结果它将完全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中，并将配合美国的战争挑衅行事。

周恩来总理宣称，现在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提案，但他还不知道提案的内容，所以他不能做出正式的评价或者表达正式的观点。如果提案涉及的是上述问题，就是说像过去苏联代表提交的一样，是关于美国侵略的，并提出的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指控，那么中国就欢迎它。但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行动，是为了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为了迫使中国同意与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实现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迫使中国人民同意美国的侵略合法化，并容许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划一条自己的防线，如果该提案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为目的的话，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同意的。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希望和平。中国认为，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想反映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愿望；但如果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所提出的措施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观点的，那他们就不是为争取和平的目的服务的，而是相反，只能鼓励美国方面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周恩来总理请杜维廉把中国政府的上述意见转告外交大臣艾登。

杜维廉称，他感谢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政策。随后他又宣称，他想对英国的立场作某些补充解释。他说，在最近一次会见时他曾提到过艾登的意见，认为中国和英国不可避免地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远东问题。但是，为了使这些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应该以友好的方式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显然，中国和英国对某些问题的评价各不相同。英国认为，美国是希望和解的，而中国则持另外的观点。他宣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英国打算在安理会怎样评价这个提案。

英国不认为这个建议是敌视中国政府的，也不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指责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当前已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势。所以最好的出路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杜维廉说，他请周恩来注意在他今天转交的通报中两次使用的句子：“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因此，谈不上英国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自己的某些愿望或者不给中国政府提供按中国政府的观点

讨论局势的可能性。杜维廉还请周恩来注意口头声明中的另一句话，这就是：“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和，那么沿海岛屿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和平和满意的解决。”所谓“满意的解决”，就意味着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解决。正像艾登公开声明的，英国政府理解中国的立场。英国懂得，中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内部性质的争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应该在安理会上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个争论还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中国政府声明，这种争论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英国的立场在于，要注意到现实的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和平解决的措施。这是真诚的努力，而不是偏袒某一方。做出这些努力并不是依据敌对的精神，而是合作的精神。英国认为，在安理会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支持某一种说法，而是要达到和平解决。杜维廉说，他不打算涉及台湾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上次就此问题所作的阐述，目的是解释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他说，周恩来应该注意今天通报中包含的声明。这个声明重申，沿海岛屿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按照国际法来衡量，台湾目前还不是中国的领土，除此之外，英国没有发表过任何其他的意见。他再次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安理会现行的审议程序不会伤害中国政府的愿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理解英国政府支持安理会采取的步骤所依据的精神。英国希望中国政府也能依据这种精神行事，并参加和平谈判，以找到关于沿海岛屿的满意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说，针对杜维廉所转达的，并代表了他自己观点的意见，必须解释中国的立场，以便避免某种误解。

第一，关于沿海岛屿的问题。台湾也是一个岛屿，它与其他沿海岛屿一样，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将台湾岛与沿海岛屿分成性质不同的两类。英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可能安理会的某些成员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企图为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作辩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人民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实现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许联合国或者某个外国干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如果联合国或某个国家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那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是绝不会同意的。

第三，杜维廉声称，当他讲到台湾的地位还待确定时，他依据的仅是国际法准则。但所有的国际协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都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际文件和国际义务。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国际法吗？如果连这些国际义务都不承认，那还能谈什么样的国际义务呢？所以，杜维廉的解释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是颠倒黑白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今天听了过去抗日战争盟友的这种意见，中国人民不仅充满了遗憾之情，而且是满腔愤怒。

第四，如果新西兰政府打算提交的决议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那么它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如果它是以这种方式撰写的，那么最好是不提出。

中国政府不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并对在这种层面上提出这一问题表示抗议。如果有人说，这是为了和平才这样做的，那这完全是谎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及其他岛屿不会为提出紧张局势问题提供借口。更谈不上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远离中国数千海里。真正威胁和平的是美国政策违背了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所作的声明，并且于同年6月侵占了台湾。这就造成了紧张。特别是在去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的。如果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也就获得了解放，和平也就得到了维护。如果新西兰政府提交的决议是要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联合国谴责美国侵略行动的问题以及是为了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问题，那这将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哪个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事情。联合国只应该研究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根据宪章，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新西兰政府的决议是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目的的，那么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它。如果它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侵略的问题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总理请杜维廉把这部分谈话内容也转达给外交大臣艾登。杜维廉声称，他相信，不论是新西兰还是英国都不打算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他甚至还没见到新西兰的提案，但是，提案将建议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现在的局

势，因为那里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局面，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是危险的直接原因。这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与特别困难的问题有关。他希望中国政府在安理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这是促进和平和圆满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还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明白，安理会采取这一步骤是抱着最美好的愿望，即希望这会导致公正的和平。

周恩来宣称，他仍然不能同意杜维廉所说的。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危险。蒋介石的军队侵入了沿海岛屿，中国人民打算解放他们。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涉及的是沿海岛屿问题，那么这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周恩来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此事，他问，如果有某个国家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到英国的沿海岛屿地区，然后宣布，从这时候起在英国沿海岛屿地区产生了紧张局势，应该把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英国政府能够同意吗？与英国沿海岛屿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紧张。紧张的产生是由于美国往岛屿地区派遣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什么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讨论关于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占领台湾的问题，它应该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如果有谁妄图利用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作交易，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这不是为和平事业服务，这是纵容美国的侵略。

杜维廉说，这次谈话十分有益，有助于他理解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细节。今天他通报的目的是说服中国政府必须让安理会了解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杜维廉宣称，今天的谈话之后，他会照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在安理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在中国政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它就能够在安理会提出必须讨论的那些问题。

周恩来请杜维廉提醒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至今都还未恢复。现在盘踞在安理会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但那里没有中国的代表。总理指出，不能忘记这一情况。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关于台湾的问题，这将是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样做。

杜维廉说，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局势，中国大概会同意让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讨论的。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出席安理会怎么办？他强调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没有蒋介石的代表。杜维廉说，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涉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与当前在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涉。

杜维廉说，他收回他刚说的话，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没考虑好。他说，安理会已经有蒋介石的代表，不必专门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周恩来说，这对英国是个难题。一方面，英国重申它不承认蒋介石，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它又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一起在安理会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英国在美国之后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杜维廉说，英国的唯一观点是，既然存在与中国有关的危险局势，中国政府就应该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美国是危险的根源。如果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问题，并且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就赞成，但如果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那么中国就反对。

杜维廉说，他仍然希望中国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答复，因为他首先必须知道要讨论什么。

总理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不愉快的处境，如果英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就总是会有的，这非常令人不快。

杜维廉说，中国和英国之间应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接近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斗争过，为什么现在，当中国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要干涉并且吓唬中国？中国不会忍受这一点。这已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

义的时代了！

杜维廉说，英国没干涉中国的事务，也没吓唬它，而是努力与中国政府合作寻找一条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途径。中国可能认为，英国坚持的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但英国的立场就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现在的政府不是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政府。^[61] 如果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它就应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不是期待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中国不怕军事威胁，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毫无疑问将抵抗到底。中国是说到做到的。

杜维廉对今天的谈话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说，他感谢杜维廉今天的来访，虽然这次谈话是令人不快的。

翻译校对：B.克里夫佐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1-14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 表会议问题(1955年1月2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今天11时30分我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谈话时我通知大使，根据我所拥有的情报，1954年12月26日，即还在茂物会议开幕之前，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那里举行了参加茂物会议的印尼代表团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总理沙斯特罗

阿米佐约、外交部长苏纳约、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尔加尼、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帕蒙恰克、亚太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和其他许多人。会议上讨论的正是印尼代表团在茂物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事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除了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外，全体与会者都表示赞成邀请中国。帕拉尔说，在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会认为，印度尼西亚已归附于世界上现有的两大联盟之一。另一方面，他声称，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似乎是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会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出面去取得有利于中国的让步。

在茂物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坚决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他声称，如果邀请中国，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拒绝参加会议。

接着发言的缅甸总理吴努毫不客气地宣布，如果不邀请中国的话，那么缅甸就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在吴努的这一席发言之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再次发言，并在发言中宣布放弃他之前所提出的反对邀请中国的意见，却提醒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说，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那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

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请求阿里帮助，希望后者给予阿拉伯国家以影响。巴基斯坦人同意实现这一请求。

最后我对大使说，在会议期间，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赞成邀请中国，缅甸总理吴努也对邀请中国之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却对此事犹豫不决。

黄镇感谢了我，并说，该情报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着说，我收到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我国政府决定在伊玛目·邦佐利街(雅加达)上买房子用作苏联大使馆的馆所。因此我问他能否给我介绍一位能帮我们办理文件的可靠的律师。黄镇欣然同意去找一个可靠的人，并且还主动提议要替我去找一位好的建筑师，以便把买到的房子装修得适合于用作大使馆。

谈到1955年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国际经济展览会的时候，黄镇说，

看来中国将会参加展览会的。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有指示要求大使馆做好准备。我说，我暂时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关于苏联参展一事的声音。

谈话持续了1小时，并且是用俄语、汉语和英语进行的。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B.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347—2348页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1955年1月29日)

第181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鉴于即将举行安理会讨论中国台湾及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预先通报了苏联的立场。

周恩来声明了以下几点：

一、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中国问题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此问题之事提交安理会审议。

二、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则中国政府只有在议题的表述使中国代表有可能发言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才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例如“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或“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这一议题的表述。

三、如果议事日程的议题限定得很窄，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停火问题”或“缓和沿海岛屿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则中国政府将不派

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而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美国现在尚未以其武力参加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同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讨论关于中国和美国“停火”的问题。同时，安理会无权讨论中国与蒋介石“停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准备在安理会上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争论，只有在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有可能遭到谴责和揭露的情况下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周恩来同志指出，如果议题是概括性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是适宜的，则中国政府将接受派自己代表的邀请，但是答复这一邀请时要作解释，带有保留条件，就像答复哈马尔舍尔德因美国间谍案访问中国的建议所做的那样。 [62]

周恩来同志请求将上述各点通知莫洛托夫同志。

之后，周恩来同志说，他已经收到关于B.M.莫洛托夫同英国驻苏联大使谈话的塔斯社消息。周恩来十分赞赏B.M.莫洛托夫回答的内容。同时他请罗迈进转告莫洛托夫同志，中国不准备刊登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内容。 [63] 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苏联和英国都是安理会成员国，而中国暂时还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苏联过去也常常公布同英国的会谈内容和往来信件，而在中国至今尚无此先例。

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的秘书交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新西兰关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建议草案。周恩来指出，在这份草案中有两个严重的缺点：

- 一、草案未提及台湾和澎湖列岛；
- 二、在草案中使用了“停火”这一术语。

周恩来强调指出，敌方正准备撤出沿海岛屿，其中包括像大陈、马祖、金门这样一些岛屿，现正忙于自己海军舰队的基地转移。周恩来说，美国人特别害怕被困在远东无望的战争之中，从而失去整个欧洲。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感谢向他通报消息，并再次请求将中国政府对所谈及问题的立场转告B.M.莫洛托夫。

会谈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В.莫丘利斯基。

会谈持续了4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185-187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1955年1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__号

1955年2月__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谈话纪要

1955年1月30日

一、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台湾岛地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决定以及苏联代表将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此问题的提案文本。周恩来表示感谢。

之后，周恩来说，他们已经收到新西兰代表就提请安理会审议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给安理会各成员国信件的正式文本，他指出，看来从一开始就将在此程序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对方将尽一切力量施展诡计，以阻挠审议美国侵略台湾问题。

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分子尚未从这些岛屿撤退，而美国仍在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他指出美国正采用此种办法恐吓中国。

二、我通知周恩来，苏联已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以下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

(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

(2)在军人墓地建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

(3)在城里修建C.O.马卡罗夫海军中将 [64] 纪念碑；

(4)在二号炮台建方尖碑；

(5)在艾烈克特里陡崖上建方尖碑。

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将由苏联出资，并由远东军区司令部承建。

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他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同志的报告中得知。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是建马卡罗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我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列宁同志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我想再一次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我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中商量一下。 [65]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C.捷捷林。

担任谈话翻译的是周恩来的秘书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188-189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1955年1月31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第11852-пс号命令责成金属企业建设部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在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关于在中国生产炮弹的工厂(228-32号项目)的轧钢基地而进行的建设设计、卫生技术设计和电力设计方面的工作。

该项目的建设设计工作和电力设计工作已经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ГССПИ-4)完成，因此，在得知政府在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命令之后，我们马上就在1954年11月10日写信(第871с号)给您，请求您把您的负责人派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来了解设计工作，以便准备完成技术设计。

1954年11月25日我们再次写信(第920с号)重申我们着手进行设计工作的请求，此外，我还亲自告知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副所长纳扎尔别科夫同志和工业装备局局长克拉索夫斯基同志；邀请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和国家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来协调车间的设计计划(有来自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的克里沃鲁奇科夫等同志)。

在1954年12月10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阐述了完成228 32号项目轧钢基地电力保障设计和电力设备设计的任务；在1952年 [66] 12月13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要求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所运送必需的资料。在1954年12月25日的第997с号信件中，我们再次请求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着手进行设计工作。

在得到政府责成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于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设计工作的决议之后，事实上，该研究所直到现在还没有着手工作。

该研究所管理处首先把该项工作委托给了工业设备管理局，然后把其转交给了有色金属局，而到现在，该项工作又被委托给了工业设备局。

该局的工作人员克拉索夫斯基、沃尔恰尼诺夫和沙皮罗通报说，他们还没有对材料进行研究，但是还不能够说，他们还不缺乏这样的材料。对于我提出的关于设计工作的期限问题，这些同志说是3—4个月，也就是大概在1955年4月。

可以认为，对于他们执行政府决议的这种态度完全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请求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设计工作。

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所长

C.C.米罗诺夫

1955年1月31日

РГАЭ, ф.9022, оп.1, д.3241, л.16-17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1955年1月31日)

致《中国建设》杂志发行全权代表刘平(Лю Пин)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您的信件，您在信件中请求谈论一下我们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意见。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67]

你们的《中国建设》杂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以具体的事例展示了在人民政权时期6亿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令人对你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发展有了鲜明的印象。

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般友谊的文章。杂志中列举了非常充分的事实材料，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

《中国建设》杂志展示了中国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觉得，该杂志对这一题目的反映有点弱。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问题就更好了。

请允许我就《中国建设》在苏联订购数量的增长说几句。现在在苏联有各种组织订购你们的杂志，还有一小部分掌握英语的人士。当然，该杂志用英语出版这一事实阻碍了苏联订购用户的增长。此外，用俄语出版的杂志《中国》和《人民中国》在苏联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两本杂志也同你们的杂志一样，对中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然而，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建设》杂志引起了苏联读者的极大兴趣，很有希望使该杂志的订购者得到增长。

对于您送给我们的杂志，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致以深深的敬意！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1955年1月31日

ГАРФ, ф.Р9539, оп.1, д.408, л.18-19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 满洲 [68] 档案(1955年2月)

副本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 [69]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现保存着满洲档案，这些档案是1901年被俄国部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满洲档案共有13000份。其文件资料至今很少得到研究，因为文件全是用古满文和汉文写成的。

根据原来的情报，该档案是1662—1900年间满洲各机关的行政、经济和财政问题文件。此外，还有满洲边防军行轶的材料，奉天政府同俄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俄国军队在满洲行动的资料。

苏联刊物(《档案》杂志1928年第16期)已经公布，在苏联保管着满洲档案。所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对这批档案产生兴趣并请求归还这批档案。

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即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在两个月的期限内详细阅审满洲档案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苏联政府主动把这批档案赠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

附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决议

委托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准备好关于把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所藏满洲档案材料作为礼物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妥善方案。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63, л.140-141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1955年2月1日)

机密

第9号

罗迈进同志从北京以“高频通信”方式传递的报告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2月1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新提案，并已向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

周恩来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提案的支持。他接着说，根据昨天安理会会议情况的最新通报，有一个新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即在安理会(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同时包括了苏联和新西兰的提案。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建议给中国政府发电报，以邀请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安理会会议日程中所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苏联代

表在对上述建议进行表决时所采取的弃权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接着说，在收到哈马尔舍尔德发出的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电报之后，我们将研究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并会把研究结果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

周恩来对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提案——关于清除蒋介石代表参与并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所涉及的台湾地区局势诸问题——表示非常满意。周恩来指出，这一声明更有利于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活动之外。

罗迈进(签名)

1955年2月1日

北京时间18时

报告发送人——罗迈进

接收人——费琳娜

1955年2月1日13时10分

第160/M号

共发出14份，文件送：布尔加宁、瓦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同志

第112-СМ号

1955年2月1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49-50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1955年2月2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绝密

1955年2月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2日

北京时间23点，我应约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知我，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会议详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向安理会提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向我转交了以下计划文本：

“一、哈马尔舍尔德发给我们一封电报，其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定，邀请我们派代表去参加审议新西兰的提议草案。这使我们更加容易拒绝这一邀请，以便采取准备召开远东会议的进一步步骤。

我们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完全支持苏联的提议草案。

(2)批评新西兰的提议草案，并坚决反对这一草案，因为这一草案旨在让联合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3)批评了联合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不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方面。在安理会中由蒋介石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安理会。

(4)综上所述，中国拒绝参加审议新西兰提出的议案。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安理会中的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安理会讨论涉及中国安全以及安理会通过这一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5)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的议案，并且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安理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同意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6)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占领台湾并干涉中国的内政所造成的。中国政府支持旨在缓和由美国在这一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做的一切真诚的努力。

二、建议苏联在中国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后，主动向英国和印度暗示以下各点：

必须缓和并消除由美国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目前在联合国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并纵容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走别的路。为了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最好是由那些与远东局势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苏联、印度和英国，倡议召开远东会议。这一会议可以吸收10个国家参加：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可以于今年2月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只有这样的会议才能有助于远东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和印度试探我们对于苏联这一建议的态度，我们将表示同意并说服英国和印度这样做。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视情况而改变，其成员可以扩大。但是必须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

三、如果能够召开远东会议，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拟在谈判中遵循下述方针：

(1)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行使他们的神圣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这件事。

(2)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应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3)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撤出武装力量之后，解放台湾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四、我们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上述计划的意见。

1955年2月2日”

周恩来请求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通知他。

我答应将上述计划立即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并在得到莫斯科的回答后即告知周恩来。

该计划已用高频电报发往莫斯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03-206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6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Я.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2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章汉夫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2月6日

今日22时30分，章汉夫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邀请我到外交部，并以口头方式向我通报了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同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章汉夫同志说，印度大使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约见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时赖嘉文说，印度认为在台湾地区形成的局势是严重的，他受托转达尼赫鲁的意见并听取周恩来对此问题的看法，赖嘉文转达尼赫鲁的话说，尼赫鲁身在伦敦，他一直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赖嘉文还通知说，尼赫鲁支持周恩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中的基本立场。尼赫鲁认为，美国不打算从台湾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的社会舆论不想关注中国的权利和要求。尼赫鲁说，当前应当避免战争，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

在支持中国对台湾立场的同时，尼赫鲁还主张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要求。尼赫鲁说：必须保留对台湾的权利并赢得时间。

赖嘉文说，尼赫鲁在台湾问题上暂时尚未找到任何措施和做出任何

明确的决定，但是他主张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还主张在这一问题上要取得某种进展。

赖嘉文说，身在伦敦的尼赫鲁不止一次重申他捍卫中国权利的论点，但是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请求询问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回答赖嘉文说，他很高兴尼赫鲁支持中国的立场。

赖嘉文通报说，2月4日尼赫鲁接见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并向他转达了与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相同的内容。周恩来同志说，尼赫鲁在同宦乡谈话时讲了最好召开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的会议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中国支持召开会议的建议，并说苏联已经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周恩来指出，苏联政府了解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支持为讨论整个远东的局势，包括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而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周恩来说，很明显，赖嘉文大使知道苏联政府已同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进行了交谈。章汉夫同志指出，根据赖嘉文的话可以判断，在同宦乡谈话时，尼赫鲁还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驻莫斯科的印度和英国的代表。

在说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周恩来声明：

一、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能上圈套，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指出，新西兰的建议就有这种企图，英国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自己愿望的声明，也是一个圈套，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存在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两个越南。中国的情况与朝鲜、德国和越南的情况不同，但是某些人企图混淆这一问题。

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情况不同于朝鲜、德国和越南。

二、美国应当赞成召开国际会议的谈判，中国不拒绝进行这种谈判。由于美国是台湾地区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他们对此应当担负起责任。想躲在蒋介石背后并将其推向前台的企图，不外乎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说，美国打算从大陈岛撤出军队。美国在台湾及其他岛屿给予蒋介石帮助以及帮助他从大陈岛撤军，乃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证明美国在介入中国国内战争，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也说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制造者的角色已越来越明显。

三、英国不仅纵容美国对中国制造军事威胁，而且自己也参与制造这种威胁。但是这一威胁吓不倒中国。如果他们想尝试一下，那就让他们尝试吧。英国人民不会替美国人流血的。

在概括上述各点时周恩来说：中国绝不会支持任何可能把中国诱入制造两个中国的圈套中去的行为；中国不会参加任何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侵占台湾就已造成并且还在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以战争威胁中国。

中国不侵犯任何人，但是准备抵抗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犯。如果美国进犯中国，那么中国将给予美国以应有的抵抗。让他们试一下吧。如果美国真的愿意缓和紧张局势，那么他们就应该坐在会议桌前，就应当同意苏联和印度的建议，进行谈判。周恩来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理由，不怕坐在谈判桌前讨论这一问题。

章汉夫同志说，周恩来请赖嘉文将上述意见转告尼赫鲁。

之后，赖嘉文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是否允许美国帮助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自己的军队？

周恩来回答说，他没有看到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全文。他还说，大陈岛处在不久前解放的一江山岛上的炮兵控制之下，也处在空军的控制之下，他不知道美国怎么才能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冲突。周恩来说，据我们现有的消息，美国人有一个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接触的秘密命令。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许美国人还有其他的指示，我们尚未搞清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发动进攻，那我们必定反击，我们的话会被事实所证实。

二、预计召开的国际会议何时何地召开，有哪些国家参加？

周恩来同志回答说，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个技术性问题；苏联政

府建议会议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至于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支持苏联和印度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苏联政府建议，由印度、英国和苏联发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苏联、英国和印度认真商讨这一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倡议，这将是有益的。如果印度担负起倡议的使命，这将有益于整个亚洲。

周恩来表示，希望印度能更积极地承担起这件事。

谈到参加会议的国家，周恩来强调说，可以考虑缅甸、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发表的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他同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我允诺立即将谈话的内容通知苏联政府。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外交部的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15-219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1955年2月8日)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您的第230号指示已于2月8日14时完成。此外还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看法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

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走出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二、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2月7日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说，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与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周恩来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够召开。那又有何妨，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三、周恩来通报说，今天凌晨，蒋介石分子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大型军舰都停泊在岛外边，只用小型舰船撤退。照蒋介石的计划，撤退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提前完成。他还通报说，大陈岛上有军队1.2万人，居民1.8万人。岛上从凌晨起就燃起大火，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烧毁所有的房屋，不能烧毁的则炸掉。

周恩来通报说，今天15时30分他应印度大使赖嘉文之约将接见他。

罗迈进

北京市

1955年2月8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22-223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8日

今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根据B.M.莫洛托夫的指示拜访了周恩来，

并向他转交了今年2月7日印度驻苏临时代办B.M.莫洛托夫递交的印度对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答复全文。我同时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意见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意见：

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他们想由安理会向3个国家提出，请求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他们还想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预先进行摸底，并搞清初步的、基本的条件。

周恩来说，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补充说，在宦乡同在伦敦的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他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会召开；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周恩来通报说，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空军部队参加了这一行动。但是美国的大型军用舰船都停泊在大陈岛以外，只有小型船只开近岛屿。

周恩来指出，有消息说，后撤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撤工作将在5天内结束。周恩来还通报说，在大陈岛上国民党军队共有1.2万人。此外，美国人打算从这些岛屿撤走全部居民共计1.8万人。蒋介石给军队下了命令——烧毁所有的建筑物，而不能烧毁的则全部炸掉。在大陈岛上已燃起一片大火。

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今天下午3时30分他将应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请求接见他。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谈话持续了30分钟。马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Г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33-234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1956年2月8日16时40分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19时周恩来邀我去他那里，通报了他同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意见，例如，对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能否作修改。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以平等的权利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事先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与美国保持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大使海特给B.M.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罗迈进

分送以下同志：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伏罗希洛夫、佐林、卡冈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费德林、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第184/M号

AB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24-227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2月

第18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谈话纪要

今日19时周恩来邀请我去他那里，向我通报了他同印度驻中国大使

赖嘉文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请求将此次谈话的内容转告B.M.莫洛托夫。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3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看法，例如是否可以改变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正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着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在同等的权利下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讨论一些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指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而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器，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一些其他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在结束同印度大使的谈话时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目前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他不久前的一次发言中老调重弹，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原则，什么它不能进入联合国。周恩来指出，当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时，英国视而不见。而当中国同侵略者作斗争时，英国却谴责中国。周恩来说，事实说明，英国是跟在美国后边跑的。

周恩来向赖嘉文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坚持这一政策，那么，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不可能解决。

赖嘉文回答说，不久前他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其中尼赫鲁说明了他自己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观点。尼赫鲁认为，口头上英国指责中国并支持美国，而实际上英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按照尼赫鲁的看法，英国人并不奉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周恩来回答赖嘉文说，英国正在重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70] 周恩来同意赖嘉文的以下意见：英国的政策有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地方。周恩来补充说，但是只要美国给英国一点压力，英国马上就同意美国的意见。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感谢周恩来同我谈话之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联大使海特给B.M.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马列担任翻译。谈话持续了1小时15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28-232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1955年2月11日)

副本

1955年2月15日

致H.A.布尔加宁同志(副本给H.C.赫鲁晓夫同志)：

鉴于您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外交部收到了许多贺电，

其中包括：周恩来给您的贺电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照会。

苏联外交部认为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1.以您的名义向周恩来同志发出回电，回电草案详见附件一。(我们)建议电文不要对外公开。

2.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发出回复性照会，详见附件二。

我们还收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给您发来的类似祝贺照会。

3.如果收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和使团发来的相应照会，我们将向其发出答复性照会，照会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三。

B.莫洛托夫

1955年2月11日

附件一：

北京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收到了您的贺电，请您——总理同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我的感谢。

H.布尔加宁

附件二：

草案

第__号

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

苏联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致敬。在布尔加宁同志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您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根据H.A.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Д.阿吉尔必什同志及其使馆全体人员转达布尔加宁同志诚挚的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日

附件三：

致使馆(使团)

苏联外交部向使馆(使团)致敬。在H.A.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贺信(祝贺照会)。根据H.A.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你们转达他的诚挚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日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第П-036/5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致敬，并烦请苏联外交部把附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H.A.布尔加宁。

在此，中国驻苏联使馆预先对满足我们这一要求的苏联外交部表示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10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莫斯科市

译自中文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H.A.布尔加宁同志的电报1955年2月9日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在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形成坚如磐石的统一和团结，并必将在伟大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5年2月9日

1955年2月9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莫斯科 1955年2月9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A.布尔加宁同志

1955年2月9日

无比敬爱的主席同志：

请允许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成员和自己本人的名义对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并衷心祝愿您在伟大苏联——各民族和平、友谊和安全的不可动摇的支柱——政府首脑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们国家与苏联不断增进的友谊将是我们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和繁荣的保证。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您——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夫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派全权大使

Д.阿吉尔必什

1955年2月9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53-59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兹向您报告关于有色金属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义务的履行情况。

抚顺铝厂。12月份工厂建成投产。主要的指数超过设计时的指数。工厂的工作都很协调。1月份发现北大楼的阳面出现了明显的裂隙。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现在消除了这些裂隙。考虑到用于生产阳浆多变的原料成分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完全不足，我认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另外的研究，委托在吉林电子厂的M.Д.格鲁济诺夫同志来做这项工作。

迄今为止，一些设备还没有供应，其中包括向其他工厂借用的用于保障该工厂按时生产的电子设备。这些设备的清单已经送给贸易代表处驻沈阳分部的对外联络处。

吉林电子厂。主要的建设工作在年底完成。锅炉厂投入生产，这就使得可以在冬季的条件下生产炼炉和燃炉的砌块。现在已经生产了大约7000吨耐火砖。

对设计进行修改的设计资料的提交也被拖延了，这些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原设计中的错误，并改善工艺。

由苏联提供的大部分设备都已运送到了工厂。但是，现在还缺少一些关键的设备，没有这些设备工厂是不能投产的。没有提供的设备的准确信息以附件列出。

检测仪器的供应过于滞后。到2月份向工厂提供的仪器仅占设计工作需要的总量的50%。

为工厂配备的苏联专家小组也不齐全。在几个月内感觉到急缺锅炉装配方面的专家、起重机专家、压床专家、电力专家和通风装置的专家。为了避免延误建设，已经从其他的部邀请了一些专家。

由于起重机的装配工作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了。

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正在完成一些附属车间的建设。锻造焊接车间、各组附属车间、车库和仓库近期将会被交付使用。钢筋结构的主楼的装配已经完成了50%。

尽管提交设计资料的期限在1954年就到期了，一些设计资料迄今还没有收到，其中包括：铸造车间的设计、主楼机器大厅的设计、主楼变电站的设计、许多车间电子设备的设计。还缺少电炉的设计，该设计应该根据苏方的草图在中国完成。

设备供应得很慢；在规定的期限内，装配工作没有完成。为了保证建设装配工作计划在1955年完成，就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内供应不少于1万吨的设备。

根据合同，该工厂应有18名专家，但事实上专家小组仅有11人。监督小组专家的配备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仅到了1人)。

金属网制造厂。该厂的建设正在结束。总订货单位希望在1955年第一季度末开工，但由于缺乏部分设备，工厂的投产将要延后。缺少的设备是：拉长机器、圆盘刀、宽度为4米和5米的织布机床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迄今为止一些图纸还没有得到。尚未供应的设备的完整说明以及尚未送交的图纸的清单由韦特卢日斯基专家送往对外联络处。为了准备使工厂投产就必须加速派遣专家小组，首先是专家组组长的到来。

白银场(Байинчанский)硫化铜联合加工厂。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完成。制定了进行设计的计划任务，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批。进行设计所必需的大部分材料都被送往莫斯科。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正在进行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工厂建设计划和生产的产品的规格已经制定，并已提交供总供货单位审批。设计任务将会在3月份得到批准。由于收集初步资料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晚于预定期限而耽误了工作。

杨子张子(Янцзычжанцзы)钼矿。正在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数据对钼矿的储量进行计算。储量的计算预计在4月份完成。与已经得到通过的设计任务相比，可以期待B + C范畴的储量会大量增加，情况如下：

	通过的设计任务			预期		
	矿物 (百万吨)	矿物的 平均含量	钼的储量 (千吨)	矿物量 (百万吨)	矿物平 均含量	钼的储量 (千吨)
戴贝岭(Дайбейлин)	5.3	0.31	16.3	9.8	0.31	31.3
新城	2.5	0.28	7.1	5.9	0.30	17.4
百易(Бей)	10.8	0.18	19.8	18.3	0.16	28.8
共计	18.7	0.23	43.3	34.0	0.22	77.3

个旧锡联合加工厂。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情况，将会在4月份完成对储量的计算。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夏个旧市的金属工厂被淹没，并停止了工作。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的决定正在进行设计工作，并开始了在个旧市进行新的工厂的建设，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年生产1.65万吨锡。这样的决定使得在昆明市建设锡加工厂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设计小组由13人组成，他们在北京有色金属企业设计所工作，从1954年5月份以来该小组就没有常设的领导人，致使该小组的工作存在一些重大不足。请求您提供帮助，加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负责设计小组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以上谈论的只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关于建设状况和工作中的不足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提供的设计资料的不足，设备供应的不足以及专家工作的不足，小组领导人在每月发往对外联络处的报告中都有阐述。

С.扬申

1955年2月12日

РГАЭ, ф.9022, оп.1, д.3241, л.52-55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 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新闻局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1954年工作报告复制件。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共计20页。

苏联新闻局局长И.波兹杰耶夫

1955年2月18日

第157号

归档。苏联新闻局接到指示，有必要就迅速派遣苏联新闻局代表处负责人赴北京问题提交一个提案。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密

1955年2月

关于1954年苏联新闻局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报告

(一)

目前，中国正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该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施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发展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如能源、冶金和机器制造等。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最后建立集体农庄以及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和信贷合作社。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最重要的合作方式。劳动互助组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低级阶段，它是以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本身已具有了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这种互助组组织模

式可以是季节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如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随后的，生产合作社的更高级阶段。虽然，这种农业合作社仍是以土地的私有制为基础建立的，但已处于合作社管理机构的集中领导之下，其部分收入也是按每个社员的劳动来按比例分配。另外，合作社已拥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

私有工商业依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在于，在第一阶段鼓励其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在第二阶段逐渐地最终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企业。

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的宣传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新闻媒介提供帮助呢？在实现政府为国家所提出的任务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呢？中国新闻媒介究竟需要那些资料以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呢？

1.目前，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在投入运营，新的工业仍在不断建设，大量引进新技术，许多生活和公共设施也在建设之中。

因此，最缺乏的是具有生产组织和教育工作经验的行政、工会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熟悉专业和拥有一定文化的技术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首先需要我们提供的是关于生产领导工作的具体经验——包括从负责具体岗位的师傅到工厂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其次，我们主要需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新工人如何工作，如何帮助落后者，如何分配劳动时间，怎样维护劳动纪律(要毫不客气地表明，我们也同样存在不守纪律的工人)，等等。最后，生产过程组织的技术方面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方面问题，如果没有这一项，生产过程便无法进行。在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中都应该说明一长制原则的实践意义。

在为工人读者提供的资料中，我们应当列举一些实例，如苏联工人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勇于改革创新，从而更多地展示苏联工人的思想境界及尽力为国家作贡献的目标追求。尤其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工人通过自学方式提高自身技能的资料。

中国新闻媒介对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应当鼓励人们多读报和文学艺术作品，多看电影。在宣传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展示苏联工会组织如何吸引工人阅读文学作品，组织文艺晚会，建立读报小组，宣传员如何开展工作，等等。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期间指出，许多俱乐部正在开展大量无益于工人思想教育的娱乐活动。因此请求我们提供苏联轻、重工业工厂中俱乐部活动的各方面情况。

2.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报刊很需要苏联集体化时期的资料。《人民日报》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到》，被推荐为由此类资料中挑选并编辑而成的重要指导性参考之一。该文章比任何解释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各编辑部都希望刊登这样体裁的文章：向所有人展示苏联农民在赢得当前富裕生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困难。但我们至今仍无法满足中国报刊的这方面需求。近期，我们开始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文章中进行挑选，但所选出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从组织集体农庄至实现农业机械化——苏联集体农庄社员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和劳动情况。

《人民日报》把上述文章直接给了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有能力帮助中国新闻报刊，并向中国农民解释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实际上，关于苏联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目前生活状况的资料，中国报刊已刊登了许多，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得到补充。我们的报刊在关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以及党和工会工作的新方式，关于文化等内容方面，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同志完全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挑选适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但在如何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他们能从我们报刊中挑选并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东西却很有限，因为我们很早便经过

了这一发展阶段，人们已记不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

问题很清楚，中国报刊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向我们约定集体化时期的稿件，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而除了我们，他们根本没地方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从反面来看，我们也理解了如下一个事实的原因，即以前《人民日报》请求我们提供的都是关于工会组织实际工作情况的文章，而如今要求我们提供的已是关于工会的理论性文章——仅在10月份该报便从《劳动报》上摘取并刊登了8篇介绍工会组织在生产中各方面工作相关情况的文章。

今后在筹备农业方面资料之时，必须考虑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通报过的内容。例如，在一篇名为《如何正确对待整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文章中，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对河北省26个合作社所作调查，约一半重新入社的农民都是“整批”加入的。这些农民过去主要都是中农，即农业改革之前的中农。他们掌握着相对比较多的生产资料。该文章继续道：“如何对待这些农民的问题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农关系的问题。而这些‘整批’入社的中农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合作社中开展很好的教育工作。”

如今，中国开展农村工作的口号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和逐渐消灭富农。”有鉴于此，我们在自己所提供的资料中也必须贯彻联合中农的思想。

在宣传联合中农的同时，中国农村还在开展提高对富农的警惕性的工作。1957年以前在准备全面实施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运动于1957年结束)，(政府)建议不接收富农加入合作社。

3.中国报刊针对青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主要是向青年宣传：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学业，扩展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视野，掌握科学知识。而之所以要向青年宣传坚持继续自己的学业，是因为多数青年在小学毕业后便不再继续上中学，从而导致青年或中学生的数量明显不足。

在这方面，针对我们的要求是：以生动的形式展现在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活动，并介绍当前苏联共青团组织和个别共青团员的工作情况。虽然中国报刊在约稿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在苏联集体农庄中共青团组织的情况，但我们仍应当向它们发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4.近期，在中国报刊、高校、科研和创作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员——胡适在文艺学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如下内容的文章来对这场斗争提供帮助：关于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以正确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研究作者的阶级立场，反对盲目地崇拜老学者的“权威”；关于必须以爱护的态度培养和勇敢地提拔年轻科技骨干。

5.由于城市人口和工人数量的增长，农业居民商品需求的增加，当前中国正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对商品分配实施更好的监督以及限制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活动，中国国内前不久开始对面粉、大米、食用油和棉布消费实行定量配给。

中国报刊呼吁读者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对待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支持政府的现行举措。

作为克服生活困难和提倡节约的宣传范例，附件中收入了《新闻日报》这样一篇文章：《服从定量配给制度，卖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对中国新闻媒介的帮助，我们可以向其提供这样一些资料：展示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年代工人和农民们所经历的巨大困难和不幸，而只有在克服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除了我们，谁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此类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中国报刊目前最需要的。

当然，中国新闻媒介所需要的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方面。上面我们只是罗列了自

已收到中方的咨询而又没有完全满足其要求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新闻媒介依然需要与苏联有关的如下资料：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及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人民目前的生活情况，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等。

(二)

苏联新闻局代表处或多或少地与位于北京的报社及其30个分社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我们从最重要的报社将收到其下半年所需资料的约稿。在与(北京的)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共同对这些约稿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再将其转交给国内负责这方面事务的部门。另外，各报社编辑部在全年任何时间仍可能向我们约订除上述约稿外的其他资料，从其他报社——主要是省级报刊，我们也会经常收到向我们索取类似题目资料的请求。对此，我们均会通过发送复印件和剪报的方式满足其要求。

去年，我们的代表处与新华社建立了关系，后者向所有报刊的编辑部均散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甚至那些尚未与我们建立直接联系的报刊编辑部也有可能通过该社获得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新华社的通报中我们并不能完全估算出我们资料被刊载的次数，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中国报刊信息仍很不完整。不过，通过所获得的信息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种联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例如，B.拉古杰克的文章《1954年莫斯科的住宅建设》便被7家大的省级报刊转载；B.M.鲁缅采夫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被9家报刊转载；Л.奥帕茨基的《苏联——伟大的工业强国》被13家报刊转载。这些统计数据当然并不完整。在1954年下半年新华社社会简报中共刊登了我们的15篇文章。

10月份，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建立了联系，而在此之前，那里仅使用了7篇我们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7周年的文章。

1954年，我们与《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苏州报》、《当代日报》和《抚顺日报》，以及几个专业性的杂志《美术》、《戏剧报》等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们也开始向我们索取一些专业性的文章。

针对多数北京的编辑部，我们都是直接转交俄语文章，而对所有省级编辑部都是译成中文。在我们代表处工作的两位翻译仅去年便翻译了420篇文章。

1954年，中国报刊共刊载了苏联新闻局的819份资料，其中中央机关刊物338份，地方刊物481份。而发表我们的文章共计580篇。

与1953年相比，1954年中国刊物刊载我们资料的数量略有下降(1953年为856份)，但我们仍可以理由充分地说，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有所改善，其读者群也有所扩大。原因在于，1953年仅1家小的私营报纸《哈尔滨报》发表了我们的216篇文章，占总刊载量的25%，而其他报纸和杂志仅发表了640篇。1954年初，该报(指《哈尔滨报》，为中国最后一家私营报纸)在成功发表了我们的44篇文章后被(政府)关闭。如果说，1953年刊载我们10篇以上文章的省级报刊只有9家，那么到了1954年此类报刊已增至19家。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情况：由于一些较大的行政区被撤销，这些地区内的5家以前的中央机关报被转为省级报刊。而这些报刊任务和规模的改变必然会对其发表我们资料的数量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不同题目，苏联新闻局资料的发表数量具体如下：

(1)苏联建设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167篇；

(2)文化、教育和体育111篇；

(3)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生活情况90篇；

(4)工业、建筑和交通126篇；

(5)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文章(包括第一项中未指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80篇；

(6)为纪念苏中友谊而组织的资料74篇；

(7)农业70篇；

(8)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30篇；

(9)大型建筑26篇；

(10)其他45篇。

所有在苏联刊物上刊载的官方资料及其评论均被中国新闻报刊依据塔斯社、新华社所提供的资料发表。

使用我们所提供照片的主要是中苏友好协会。在拥有此类机构的北京和其他城市这些照片被用于举办流动和固定展览。

报刊通常情况下都是将照片和文章同时刊登，而很少只发照片。

去年，我们收到了穆卡诺夫的手稿《我的共和国——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并将之转交给了《时代》出版社。后者对此反映积极，正准备出版该著作。

正如我前面已提到，中国各编辑部并不积极向我们反映其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可能与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有关，从而导致他们在与我们的谈话和通信中显得过于正式和拘谨。总之，我们从未收到他们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负面反映。

下面，我以《北京日报》为例，我们曾请求其就我们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该报在答复信中写道：

“请允许我们以《北京日报》编辑部及其广大读者的名义向您和整个出版部集体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近两年来为我们报纸所提供的文章。

由于你们的帮助，在1953—1954年间《北京日报》的读者们从由著名苏联作家、专家、工人和农民所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了解了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从而促进了我们人民间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坚定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心。两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来自你们的帮助，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各报刊和杂志编辑部在交谈中也对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个别、简短的意见，具体可归纳如下：

1.在谈及关于苏联国内的先进人物时，中国报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使他们学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关于工、农业先进者的文章和特写中，不仅应当展示其创新精神和劳动热情，而且首先应反映那些能够鼓舞他们为加强祖国经济实力而努力工作，增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或团员及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感的思想动机。我们苏联人通常可能会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却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2.中国报刊的工人人员多次向我们指出，由于中国读者文化水平低，他们很难全面了解苏联的实际生活。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最好只论述一个问题，或一般只讲一个人物。这就要求我们所提供的文章对一个问题作更具体、详细地阐述，并相对减少文章的篇幅，从而适应文化较低的中国读者的需求。在那些为非专业出版物提供的文章中，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一

些科技术语做出注释。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剪报，充满了大量的地理名称或人名，而没有这些是完全可以的。此类文章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难度。还有，在涉及苏联劳动者在经济等方面所获得的物质福利问题时，我们经常会罗列许多以卢布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这样的文章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卢布的购买力情况，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以元为计算单位的，他们对卢布的大小没有概念。因而，如果我们要列举苏联劳动者的收入数据，最好就立即做出如下解释：这些钱能购买多少商品。

3.正如许多中国编辑部所提出的那样，多数中国读者还没有养成阅读严肃文章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生动、引人入胜的特写、小短文甚至诗歌。各中国编辑部都希望在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除了标题和情节吸引人外，还要多一些用朴素语言写成的、没有长句式——中文难以组织的形象鲜明的对话和故事。

各编辑部针对艺术作品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教育意义。与此相关，他们经常要求我们提供抨击不良现象，如官僚主义、粗制滥造、不守纪律以及针对一些国际生活问题的讽刺类作品(如小品文、诗歌和带有插图的小短文)。中国报刊也经常自己主动从我们的报刊和杂志中选择一些此类文章，但他们的选择余地有限，而省级报刊几乎无法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地方刊物来向中国的省级报刊提供帮助。

为了使所提供的资料变得更吸引人，我们就必须扩展其问题的范围。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几乎未涉及一些新建筑领域(除了几座最大型的小电站之外)以及一些吸引人的职业，如地质学家、北极勘察人员、飞行员等，我们也很少写关于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等地区居民生活情况的文章。我们很少为中国一些拥有不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撰写他们能够看得懂的，引人入胜的、关于苏联最新科技成就的科普性文章(我们也曾给苏联《科技新闻》刊物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4.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用塔斯社的资料编写的。而中国报刊也能获得这些资料，而且能够比我们更迅速地译成中文。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自然就不会被其采用。中国各编辑部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由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撰写的、能够对一系列最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尖锐、透彻分析的原创文章。这里，时间因素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作为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我们可以列举B.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文章：《美国在“反共”旗帜下对亚洲的侵略》。

5.就我们所提供的关于苏联人民当前生活状况的所有资料的总体情况来看，其经常存在的不足在于：只展示好的一面，而极力避免提及缺陷。在这些资料中没有涉及到好与坏、新与旧之间斗争的问题。这样一成不变的资料自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只显示好的一面，人们自然是无所适从。

我们已经与《人民日报》编辑交流了意见，期间后者请求我们提供在我们刊物中刊登的一些展示中国不足和批评中国的资料。

我们发往中国的文章与那些发往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文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联的实际情况编造了各种谎言，但我们所发表的文章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东西，只会提供一些实际的经验教训。

(三)

为了改善代表处的工作，我们打算做到如下几点：

1.拓展作者范围。尤其希望吸引那些能够写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小故事和特写等文章的作家；另外，在写当今苏联人民生活内容的文章时，并不只局限于明确一些事实，而且要使作品语言显得生动、鲜明。换言之，我们必须与著名作家们建立合作关系。

2.希望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对所收到的文章的一些地方做些修改、压缩，以便文章的

表述能够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因为在以前，个别、很少的情况下我们已做过这样的改动，并因此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为了促进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我们需要为这些资料配置一些照片。所有中国报刊编辑部都在自己的约稿和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许多以“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照片，但能够与所发文章相搭配的照片很少。

4.我们还不知道，(国家)是否向我们拨付1955年的出差预算费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差费用都不在预算费用计划之列，因此我们想再次事先指出为这方面活动费用制定预算的必要性。

5.近期，出版部对我们所发出的质询的回复变得越来越迅速了。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联系。

6.必须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像现在这样——代表处编辑拥有外交护照，而且代表处的主任也应拥有外交护照。各主要中央报刊的编辑经常会出席外交招待会。由于大家已知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代表处的主任也能够出席此类会议。

为了规范代表处的工作，我们计划：

1.经常就发来的资料向使馆出版部提出自己的评论和意见。

2.与中国安徽、福建、江西等省级机关报建立联系。以前我们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但一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3.由于与使馆出版部建立了业务关系，我们现在获得约稿已不必提前半年，从而使约稿时间相对缩短。这样，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中国宣传媒介的变化做出更迅速地反应。

4.尽可能扩展与新华社的联系，并以此作为更广泛传播苏联新闻局资料的手段。

苏联新闻局驻北京代表处负责人

济金

属实。

特别部负责人

B.杜比宁

附件：

《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

在对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这样说，“今天的苏联便是我们的明天”。大多数人都能听懂这句话。但是，苏联的“昨天”究竟是什么样呢？为了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苏联在“昨天”和“前天”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人却很少。这也是我们当前农村宣传工作中一个严重的不足。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是必要的，但也必须以这种宣传鼓励农民为实现这样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激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

在向农民宣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同志开口便是“随处可见——电(灯)和电话”，闭口又是“照明不用煤油，犁地不用耕牛”。但他们从不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解释如下问题：如何

才能获得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实施的这些措施对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有何意义。而这样宣传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民们开始以为，幸福生活就在自己身边，只要伸手便可得到；但当遇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时，又会对宣传中所说的一切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例如，计划采购和消费体系的实施，必然会伴随着一些对农民有利的社会主义的措施，但这些举措要求农民改变自己的一系列生活习惯。这种情况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产生消极反映，并导致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发生动摇。

农村的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化；第二阶段——机械化。还有一些农村干部虽然听说过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其含义。在对农民宣传合作化时，一些人竟说：“拖拉机很快就会有了，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用自己分的地与合作社交换。”农民们害怕被迫交出好地，而自己单独又没有能力换取拖拉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加入劳动组合。在此类宣传的影响下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就是最近2—3年的事。

在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农民们不仅不想购买新农具，甚至连旧的也不愿修理，并说，“没什么，一切都会好的！过两三年我们就有拖拉机了，谁还需要这些破农具！”因此，还导致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的本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对当前农业技术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在马匹的索具方面采用新工具等持轻视态度。

我们不能把未来的东西看作是业已得到的，因为未来的东西我们只有依据今天的条件并通过的辛勤劳动才可能得到。而没有经历今天的艰难困苦，我们就不可能建成明天的幸福。农民们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全力发展合作化运动，增加生产，帮助国家的工业化。只有随着国家工业和拖拉机、汽油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工业才可能给予农民大量的帮助。这样，后者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只有到那时，美好的未来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只是坐着等待幸福的到来，那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想吃到好樱桃，首先得种好樱桃树。

《人民日报》

《服从定量配给制，卖什么就吃什么——姓姜的一户人家，如何准备过春节》

上海郊区朝阳小区194弄4号居住着的姜丽珍(Цзян Ли-чжэнь)阿姨一家已为自己如何过春节作了打算。姜阿姨与儿子、儿媳决定今年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不为过节买任何多余的东西，只吃市场上卖的。他们想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购买国债，以帮助国家搞建设。

这个由成年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共有7—8口人。儿子和儿媳都在工厂里上班，他们每月都把一些工资存到银行里。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过节时为家里买更多的东西。但今年，姜丽珍并不打算这样做。离过节只剩下三天了，但他们家只准备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如果不困难的话，他们还想再买一些肉和饼，但他们并不打算为此而去排队。

姜丽珍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决定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原因在于：这个家庭里的生活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后，工人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家庭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从前他们几乎见不到肉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每星期都能够买一些。去年下半年，姜阿姨一家吃了几只鸡。姜丽珍知道，现在许多家庭的生活都开始好起来了，目前国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重工业方面，而在食品生产方面的发展仍很有限，因而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尤其表现在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想丰富自己家的餐桌，从而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与困难作斗争，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只吃市场上卖的东西。姜阿姨是小区代表、第四街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因而更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说服其他人尽可能地节俭，不去挤着排队，只买市场上卖的东西。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 事(1955年2月22日)

机密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在2月21日的会谈中，中国参赞温宁通报，中国大使刘晓有一封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建议信。与此相关，温宁询问我的意见：刘晓同志是在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亲自转交这封信件，还是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由其他人来转交。

我答复温宁道，这首先取决于刘晓同志喜欢采用哪种方式。

温宁答，(中国)大使当然希望能够与H.C.赫鲁晓夫同志面谈，但知道他很忙，因此无法做出决定。

我答应温宁了解这一情况并向其通报结果。

请求您的指示。

H.费德林(签名)

1955年2月22日

第337/ДВ号

手写批注：

请赫鲁晓夫同志审阅。

B.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2日

赫鲁晓夫同志于1955年2月23日接见了刘晓同志。

归档。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60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5年2月22日

第2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香港的报告

一、香港经济

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资产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香港所需粮食几乎全部依靠从外面进口。对外贸易对工业企业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商品。

关于1954年度对外贸易的总结

香港的对外贸易的构成如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西欧、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商品再出口服务，以及其他一些途经香港的贸易。例如，现在香港是中国同南海国家贸易的大型转运站。印度尼西亚的糖、咖啡、椰子油，印度萝藤等商品，过境香港输往中国。

香港是日本同英属北婆罗洲(婆罗洲的木材运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再出口公司运往神户和横滨)、菲律宾同泰国(主要是泰国大米)等的贸易中转站。

除了大量进口自己所需的商品(特别是粮食)外，还出口香港的工业品。

1954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同前几年一样)缩减至58.52亿港币，1953年为66.06亿港币。去年贸易总额同1953年相比减少了7.54亿港币，其中出口额减少了4.37亿港币，进口额减少了3.17亿港币。(《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附件1)

去年中国同香港的贸易额急剧减少。同1953年比，1954年从中国进口数额减少了1.65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减少了1.49亿港币(1953年从中国进口额为8.57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为5.4亿港币)。

食品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部类，例如，去年从中国进口：

牛	1 814.7 万港币
猪	8 635.4 万港币
家禽	3 618.6 万港币
蛋	4 749.6 万港币
豆(黄豆除外)	3 362.5 万港币
蔬菜	2 802.6 万港币

香港从中国进口的其他商品部类有：种子、中成药、纸张、鬃毛等(参见附件1)。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农业肥料、染料、药品。去年中国从香港进口硫酸铵总额达1.087亿港币，煤焦油染料0.886亿港币(参见附件2)。至于机器设备，香港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很少。例如，11月份香港运往中国的纺织机总额为0.036亿港币。

去年中国同日本经香港中转的贸易额增长很快。1954年11月，日本经香港向中国出口0.13亿港币，而1953年同期仅为0.045亿港币。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西方的工业品。由于对中国出口减少，造成香港也缩减了从西欧的进口。

同1953年相比，1954年从英国进口商品数额降到1.05亿港币，从西德进口降到0.57亿港币，从法国进口降到0.17亿港币，从意大利进口降到0.46亿港币，从荷兰进口降到0.35亿港币(参见附件3)。

同1953年相比，香港对南海地区的出口锐减：对印度尼西亚——1.47亿港币，对泰国——0.76亿港币，对菲律宾——0.11亿港币(参见附件4)。

对南海国家出口降低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严重的经济局面，由于出口订货额降低，这些国家在采取措施组织出口。

在同多数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及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降低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对香港的进口额出现增长。同1953年相比，1954年美国进口额增长0.57亿港币，日本进口额增长0.8亿港币。美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美国消费品需求的扩大，随后这种需求转到了南朝鲜方面。因此，去年对南朝鲜的出口额增长了3倍(从1953年的0.52亿港币增长到0.17亿港币)。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锐减，导致商品库存持续提高。根据香港报纸《华侨日报》披露的明显缩减的数据，同1953年相比，1954年商品库存提高了5%以上。

香港对外贸易额减少的原因有哪些呢？

1.主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实施禁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缩小。香港不能提供中国实施经济建设计划所需要的商品。

香港总督在美国逗留期间(1954年9—11月)就此问题谈到：“我们的贸易缩减了三成，香港无法生产中国需要的商品。我们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商品均来自其他国家。但是，任何一艘驶抵香港的船只，在到达之前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商品是否是非战略性商品。如果有人想使自己的商品进入中国，这些商品就得绕过香港，很多人都害怕这里的贸易管制。”

由于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失去了自己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通常大量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需要经过香港，现在则直接驶抵中国的港口了。例如，所有被列入所谓战略性的商品(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玉米)都直接驶抵黄埔港、天津港和上海港了。

1月下旬，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出口香港的规定，香港报纸解读为“英国放松了管制”。根据这项规定，从1月17日起，除缩减的禁运商品和紧缺商品清单中列出的战略性商品外，所有向香港出口的商品许可证都被取消了。至于香港的许可证体制则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所有来自英国的商品都需要有进口到香港的许可证。

香港政府还同意参加商品转运许可证制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入

缩减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在商品出口国没有取得商品出口许可证时，不能在香港卸载或过境。

路透社报道说，新的管制体制是为了对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实施监控。新计划对所有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商品都实施监控，而其余的商品则无须监控。有如下一些国家加入了管制体制：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西德、英国和美国。加入这一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在自己领土内对该集团国家输出的战略性商品的运输实施监控。（《南华早报》1955年1月15日）

新管制体制对香港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仍按照旧规则执行。

2.香港贸易额的降低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严重萧条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大众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内部市场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加剧。

现在，日本贸易公司在东南亚和南海国家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对香港的经济产生了影响。战后几年来，日本在香港的贸易网络开始恢复，10多家大型日本股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

英国资本家和香港商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近来一些英国企业主开始组织反对香港商品进入英国市场和英国的活动。前不久有人在下议院说：“香港的针织手套造成利兹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失业现象。”去年香港向缅甸、马来亚、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出口了31万打帽子，成为英国毡帽企业联合会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国人说，他们不相信这些帽子是香港生产的，认为这是日本生产的经香港再出口的帽子。香港企业依靠高强度劳动生产出来的帽子，其低廉的价格令英国企业主非常不安。一位企业主说：“我们的帽子每打售价90—150先令，而香港的帽子每打售价26—66先令。就算是我们不要利润，那我们也无法做到同香港一样的价格。”英国人采取措施给香港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制造困难。来自美国方面的竞争也在加剧。

3.由于一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而无需香港服务，造成香港的贸易周转也出现了缩小趋势。这首先同对中国进行所谓战略性物资贸易实施禁运有关。结果，出售这些商品的国家不可能经香港中转来运送这些物资，而只能直接运往中国。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建立了直接贸

易联系，这为他们节省外汇并以较低价格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

工业情况

香港拥有相对发达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据香港1954年的官方资料，计有2418家注册企业，大约有1000家未注册企业。这样，根据官方资料，企业总数超过3000家。注册企业共有11.2万名工人。大多数工业企业或作坊的工人数量为数十人。大型企业不是很多，主要是造船厂、纺织厂、轻工厂。

去年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加了15%，达到10亿港币，因为1953年的水平并不高。《华侨日报》在列举这些材料时指出，去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比最坏年份增加了20%。（《华侨日报》1955年1月1日）

香港当局提供了关于注册企业增加数量和这些企业中工人数量的资料：

	企业数量	工人数量
1950年12月	1 752	91 896
1951年12月	1961	95 207
1952年12月	2 088	98 216
1953年12月	2 208	100 776
1954年12月	2 418	111 879

官方资料与夸大宣传的材料相一致，似乎香港企业的数量在大幅增长。但是，就算这些资料也驳斥了香港工业高速发展的论据。

根据官方资料，在4年内注册企业的数量增加了666个，从1950年的1752家增加到1954年的2418家。工人数量的资料证实，新企业就其人数来讲都是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增加666个的条件下，工人数量增加了2万人。这样，如果现在每个企业平均有50名工人，那么，平均每个新企业有33名工人。不排除这种情况，一系列所谓的新企业事实上早就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注册，而现在注册了。

香港的重工业主要是船舶制造和船舶修理。1950年计有18家造船厂，工人9700名。1954年造船厂的数量增加到20家，但工人的数量减少至9000人。最大的造船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和“太古船坞有限公司”能够建造排水量8万吨的船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造船厂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海船修理。最近2—3年海船修理的业务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海港的意义有所降低。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业主宁愿去日本修理，因为费用低廉。船企利润逐渐减少。例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1952年利润为0.054亿港币，而1953年利润为0.016亿港币。去年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现在造船企业改变了生产重点——开始建造海船、渔船和驳船。不久前，“太古公司”建成了一艘排水量为6580吨的新船。

香港有几家矿山企业从事铁矿、铅矿、钨矿和石墨的开采。1954年这些企业开采出6053吨矾土，90800吨铁矿石，60033磅精乌矿石，369吨锡。（《华侨日报》1955年1月21日）矿山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铁矿石出口日本、台湾，铅矿石出口欧洲，钨出口美国。

香港还有一些大型轻工业企业。最大的轻工业企业是纺织厂。

香港有13家纺织厂，每年消费1.5亿磅棉花。棉花从巴基斯坦、东非和南美一些国家进口。《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报道说，随着3家新厂投产和纺锤数量增加了5倍，香港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30万纱锭。

香港的纺织工业主要是为出口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和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造成香港纺织厂的商品销售陷入困境。1954年香港纺织品出售的数量比1953年要少，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要少。特别是对南海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出现了下降。1953年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0.56亿港币的纺织品，1954年为0.33亿港币；1953年向巴基斯坦出售了0.2亿港币纺织品，1954年为0.1亿港币。

对外贸易额的减少对其他轻工业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的现象。

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收入的减少，以及与军队和警察相关的开支增多，导致香港政府财政出现困难。从1947年到1953年，收入增长不到2.5倍，而开支提高了3倍。1954年，无论是日常性开支，还是特殊性开支，主要是与警力相关的开支都在进一步提高。

现在，当政府正在编制1955—1956年财政预算方案时（香港的年度

预算从4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3月31日结束)，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开展了提高税收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例如，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发文呼吁提高税收。文章中指出，满足费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旧有税种和开增新税，重新研究税收体制(香港有10个税种，主要是地稅，包括所得税、土地稅和关税)。

香港当局试图依靠加大稅收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二、香港政治形势

香港政府认识到由于禁运导致贸易萧条所引起的经济形势严重，这在香港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首先担心的是由于对外贸易额的减少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去年香港资产阶级的利润同1953年相比下降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赢利”。(《华侨日报》1955年1月22日)

由于贸易不景气造成闲置资本数量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其中的大部分被用来从事各种投机活动。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在香港资产阶级眼里香港越来越失去作为大型贸易中转站的意义，对解决经济领域的困难没有信心。

因此，香港政府对宣传当地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赋予重要意义，在香港报纸中能多次看到关于香港历史的“新阶段”——香港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关于香港贸易的新方向——南海地区的观点。去年年末、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工业展览会。同1953年相比，展地面积增加了1/4，在展览会开幕前英国的许多报纸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香港工业的文章，邀请各国代表团参展。

香港政府还大肆渲染香港建设的“宏伟蓝图”。香港政府建设了一系列行政大楼和工作人员住宅。英国贸易银行计划新建一栋14层的银行大厦，投资0.18亿港币。大量资金投入住宅建设。根据香港政府的资料，从1950年4月到1954年3月，建设新大楼的开支达到4.06亿港币。去年建设投资增长得最快。普通地段的土地价值增长了40%—50%，至于黄金地段则增长了60%—70%，有的地方增长了2倍。根据报纸资料，今年香港将建设1000余栋新楼。(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

在广泛宣传工业领域和住宅“宏伟蓝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香港当局试图加速打造环香港资本主义圈，让与香港保持经常联系的那些国

家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未来。葛量洪 [72] 在从美国返港途中答记者问时表示：“香港不存在紧张形势，也没有出现英国商人对投入的资本的安全感到担心的情况。目前在香港正在建设的一座14层高的大型英国银行就是证明。”（《香港和澳门形势》1954年第9期）

《远东经济评论》周报关于这家银行的建设问题写道：“这是英国和西欧国家关于‘香港的将来是有保障’的观点的新证据。”（《远东经济评论》1954年第14期）

大肆渲染本地工业建设的成就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商品产量有了一些提高，但在香港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对外贸易仍和以前一样逐年回落。香港的工业没有未来，香港没有必备的原料，同时与日本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对英国及其殖民地商品出口的增长招致英国资本家的抵制。英国企业主说香港利用帝国特惠体系不是把自己的而是把日本的商品倾销到英国，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关于香港对外贸易的新方向——南海方面——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同1953年相比，去年同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了下降。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系列进口限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今后这一地区的情况将会向有利于香港的方向改变。今年初，香港报刊报道说，现在南朝鲜正在为进口香港商品设置障碍。

至于建设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香港资产阶级担心股票和货币贬值，把自己的资金用来建设住宅。

香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香港人口中的绝大部分——10万多人在各工业企业工作。建筑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也与此相近。

下列关于特大型企业数量和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数量的表格是依据1953年香港年鉴绘制的，这份资料证实香港的大型企业很少，工人分布在几百个小型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当中。

工业企业	企业数量	工人人数
造船厂	20	9 000
铸造厂	20	1 200
水泥厂	1	260
矿场	1	2 000
纺织厂	13	10 000
织布厂	160	10 000
装饰厂	46	1 000
针织品工厂	273	9 000
搪瓷制品厂	20	2 500
金属制品厂	253	12 000
油漆厂	11	400
食品厂	235	5 000
糖果厂	4	500
手电筒、电池等厂	71	5 500
烟厂	5	1 000
制鞋厂	51	6 000
制绳厂	40	800

续表

工业企业	企业数量	工人人数
火柴厂	4	500
塑料厂	30	800
木材加工厂	30	1 400
印刷厂	30	5 800
化工厂	30	2 000
陶瓷厂	30	1 700
总计	1 257	89 360

特大型企业的工人总数中，妇女占1/3以上。1954年，登记注册的特大型企业共有工人111879人，其中妇女40529人(占36%以上)。近些年来，企业中女性工人的比例增幅很快。1954年，登记注册的企业共雇用了11103名工人，其中男性6303人，女性4800人。

香港有两家彼此对立的工联组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和反动的工团联合会，后者的工作主要由香港政府劳工处指导。工团联合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小，因为他的领导层关心的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大部分工人加入了1949年建立的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是30多个职业组织的联盟。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型工会有：电力工人协会、电车工人协会、燃气工人协会、电话工人协会。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部分工联组织都没有被香港政府登记，也不为地方当局所承认。

香港资产阶级的收入逐步降低，他们试图依靠企业工人的高强度劳动、增加工作日、降低工资来弥补。难怪香港当局就英国企业主对香港帽业涌现出来的不满在官方声明中说，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每人每天比英国多一小时。企业主还广泛使用解雇工人的方法。1955年1月1日，有3000多名船厂工人失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在下降。许多工人吃不饱，因为饥饿有时会选择自杀。

工人阶级加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在动员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培养他们的觉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1日，香港琼森电车公司借口“劳力过剩”裁员31名工人。事实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被解雇人员的工作应由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完成。这导致劳动强度增加和工时紧张，使劳动者筋疲力竭。

裁员消息刚一公布，电车工人立即要求恢复自己同志的工作岗位，要求管理机关同工联代表谈判解决问题。管理机关拒绝接受被解雇工人的要求，甚至拒绝就此问题同工联代表谈判。工联致香港政府劳动局的信也没有任何结果。劳动局表示，电车工人协会未注册，当局不承认该协会，不会向琼森电车公司提出关于解雇工人返岗的问题。

工人多次向劳动局和管理机关呼吁，但没有任何结果。8月31日，工人们宣布停止工作2小时，以此来抗议企业主的蛮横。但是，这无法改变企业主的态度。10月10日，工人全天停止工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谈判。电车工人协会就罢工问题发表声明说：“目前事态的严重性正在加剧，冲突将会给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极大麻烦。琼森公司业主应该判明形势，立即同工人进行谈判。劳动局也应该承担起调解矛盾的使命，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南方日报》1954年10月15日）工会联合会警告琼森公司和劳动局对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10月10日清晨，300多名工人纠察队齐聚在电车车库门口（有1300多名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一些加入资产阶级工会的工人试图进入车库，被工人纠察队挡在门外。（大部分电车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接受工会联合会指导的工人协会，也有部分工人是工团联合会会员，类似的情况在许多企业中都存在。）工人纠察队坚守了一整天。绝大多数电车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只有极少一部分蒋介石分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极力挑拨工人之间的矛盾。

香港工人阶级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在10月10日停止工作15分钟。电力、燃气、电话、船舶制造和其他一些企业的协会建立了支援电车工人的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为罢工工人及失业工人募集粮食和资金的活动，还组织了要求接受被解雇工人返回工人岗位的签名活动。很快就有22万人在呼吁信上签名。这项工作是在民主的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罢工展现了电车公司工人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展现了工人联合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它的号召下，香港和澳门的许多工人都积极响应支持电车工人的号召。但是，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如愿。

11月，中国移民—香港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到支援工人的工作中来。11月9日，举行了关于尽快解决冲突的晚间集会，17个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型组织的代表、39位中国中等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工会工作人员、电影导演、神职人员、律师、医生等参加了集会。11月22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议上发言时，会长高卓雄提出了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要求，他说：“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仅影响到工业，也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南柏(наньбей)公司、香港法国商会等董事会主席在发言时也支持这一要求。

11月28日，电车工人协会在致城市各界的呼吁书中表示，如果当局不能满足电车工人的要求，他们将被迫发动第三次抗议行动。

工人的呼吁书令香港当局非常惊恐。11月26日，警察局长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恐吓说：“当局将采取强力措施防止社会安全和稳定遭到破坏。”(《香港和澳门形势》1955年第9期)

警察局宣布，从11月27日起香港和九龙的全体警员取消休假。同时，蒋介石分子也在积极活动，四处散播谰言，他们试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使各企业工人之间互不信任。

12月1日夜晩，警察逮捕了8名工人。据香港报纸评论，有两名电车工人是因为散播传单被捕的。一名电车督察员发现了工人，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察。警察(100多人)立即赶到并驱散了围在工人外部的人群，逮捕了在他们是“最为可疑”的8个人。

稍后这个电车督察员在出庭作证时说，他在检查电车时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人在那里散发传单，当他走近人群时，人群中出现叫

骂的声音：“看看这条狗！让我们记住这个情报员！”督察员急忙上了电车，当时电车已经离开了，群众追着他叫喊：“大鼻子(华人对在香港的欧洲人的称呼)，有胆你就过来。你可以看看你的脑袋是怎样搬家的。”

第二天，工人受到的指控是“未经香港政府华人事务局的许可非法散发汉语传单”和袭警。警察搬出了18名目击证人。审判持续了一天。根据辩护要求，交保证金释放工人。

现在，电车工人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先锋。在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开展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和被解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斗争。工会联合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援电车工人，鼓舞他们，动员香港广大劳动群众以他们为榜样投入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为了帮助电车工人，工会联合会募集了25万港币，还向他们转交了34批各种商品。有10万多人参加了募捐。

新年前夕，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向电车工人寄慰问信的活动。纺织工人、煤炭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等向电车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四个大型工会的工人——电力企业工人、燃气厂工人、电报电话等企业工人，在自己的信中祝贺电车工人在6个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在信件末尾谈道：“你们的斗争符合香港和九龙全体工人的利益，符合全体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支持你们。被解雇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期待，你们能站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团结，支持工会及其委员会，时刻准备投入行动。”

同时，民主工联的代表来到了新年晚会现场，给工人们带来了礼物——啤酒、水果、香烟、唱片。工联代表和工会联合会代表发言后，电车工会主席陈要财(ЧэньЯоЦай)做了《我们半年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在报告开头陈要财就提出了电车工人目前面临的任务：

- 1.同电车公司经常出现的解雇工人的现象作斗争。
- 2.动员所有工人参加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挡住资本家进攻的道路。
- 3.努力让31名被解雇的工人得到工作和粮食。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前，琼森公司平均每两个月就以15人为一批地解雇工人，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解雇。这一次，从1954年7月2日开始，琼森公司再没有成批地解雇过工人。陈要财说：“最近8—9年来工人不止一次地起来斗争，但斗争的时间从未像电车工人这样长过，也从未如此团结和达到如此规模。”在报告的结尾，报告人谈到了今年工人开展维护自身权利斗争的任务。

第二天，电车工人家属举行了迎新聚会，在聚会上强调了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工人的家属向工会提供的帮助，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在工会联合会举办的迎新年集会上详细讨论了电车工人斗争的经验。加入工联联合会的全体工会代表参加了集会，总共有300多人。

民主的工联对电车工人斗争的支持既表明了工会联合会影响力的增强，也表明了香港和澳门工人阶级的团结。由于广大居民支持电车工人斗争，许多企业主——华侨被迫表示自己赞同电车工人的斗争，反对解雇工人。许多企业主都被迫承认工人的工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在香港的共产党人处于秘密状态，通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饶彰风还说，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国内。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安于在香港工作，因为在香港工作甚至比在国民党专横的国内工作更轻松一些。中国解放后，他们提出了立即驱逐英国人离开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問題。对此饶彰风向这些同志解释说，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开展工作，他们在制定计划时应考虑到工作的长期性。

根据电车工人在罢工期间提出的要求来判断，香港同志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这些要求中没有广泛的一般性的政治口号。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揭露琼森公司资本家的剥削手段来进行的。工人的工联领导人处处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的主要方法。”(摘自电车工会主席《半年来我们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工会联合会不得不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香港工人主要分布在上百个小企业中。香港存在大量国民党的组织——香港工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敌人。

在动员工人参加反对企业主肆意妄为的斗争的同时，民主的工会联

合会把香港工人团结在一起，揭露反动的工联领导层和国民党余孽。

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陆续发生的事件，使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重视香港的重要性。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十个特务组织云集在这里。现在香港有24个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和代办处。

从数量上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特务机构处于第一位。香港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多数是英国的文化组织。英国在香港的政权的工作性质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样，葛量洪在美逗留期间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香港是我们获取中国情报的最佳场所。”（《南华早报》1954年9月26日）

美国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的代表是美国总领事馆、美国各种军事和文化组织、“美国之音”广播站等。（详见：关于香港反动组织的会谈记录，发文号№109，1954年7月24日）美国领事馆共有280名工作人员，其中副领事29人。除了从事情报活动外，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监督香港当局实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执行情况。前工党政府贸易部长威尔逊去年在座谈会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传唤英国商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贩卖某类商品，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在美国的账户也将被冻结。

国民党的情报队也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截止去年年末，香港共有54个美国的和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不算美国领事馆）。美国情报机关积极开展向中国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活动。（参见：美蒋特务在中国南部从事破坏活动的报告，发文号№140，1954年11月5日）

反动组织还加强了对香港居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工作，努力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牢不可破的思想，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他们，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形形色色的反动组织——香港政府、买办资产阶级报纸、天主教会、名目繁多的所谓文化组织、国民党余孽，在这一活动中联合了起来。

香港当局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军事力量和警察队伍。根据官方资料，1954—1955年度警力的开支甚至提高了16%。去年年末，香港政府扩大了警用巡逻车的数量，准备建造6艘警卫船。警察学校扩大了招生人

数。现在，启德机场(九龙)扩建工作已经开始。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把香港打造成军事基地。近来，英国和香港军队提高了军事演习的次数。11月，在九龙半岛毗邻港中边境处举行了为期8昼夜的军事演习。香港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香港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演习。步兵、炮兵、喷气式飞机参加了联合演习。12月中旬，在九龙再次组织了军事演习。

12月12日，在英国驻远东香港地区舰队司令的领导下组织了海军演习。

反动报纸在向居民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时，把它说成是检查“防卫部队”。但是，这些消息无法安抚英国商人和香港的反动派，他们清晰地记得，人数数倍于全体香港居民的国民党军队是怎样被击溃的。因此，反动报纸的主要题目一直是“共产主义危险”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

香港共有90份报纸发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日复一日地开展反对中国和苏联的宣传，说中国用“恐怖”驱赶资产阶级，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建立“兄弟”关系。香港民主派的报纸暂时还不多：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4—5万册，《新闻报》和《周末报》，杂志《经济报道》。这些报纸主要是工商团体、知识分子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创办的。工人很少读这些8个版面的报纸，而香港政府不允许出版适合工人的版面较少的报纸。

香港反动报刊竭力搜寻中国和苏联报纸中刊登的批评性文章中的负面消息，对一些事实进行歪曲，把这些事实描述成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无法纪”的证据。不久前，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反动报刊对大多数居民的意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同反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南方的报刊刊登了关于这一运动进程的详细材料。香港报刊在转载了这些材料后，把它说成是在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企业主和商人进行野蛮镇压。反动报刊欺骗了绝大部分香港居民。争取与中国统一的民主运动在这一时期受到打击。

去年香港当局强化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当局竭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并用自己人替换之。禁止华人学校的学生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今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厅发表了一项声明，按照这份

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当局和各类反动分子在使用镇压和恐吓手段影响群众的同时，也使用了其他手段。当局赋予“街道慈善委员会”的工作以重要意义，目前有23万香港各阶层居民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作。委员会开办免费学校，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和药品，安排儿童体育活动场所，向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紧急帮助，等等。当局和地方负责人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居民实施监控，试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香港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通过自己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开展救灾(主要是火灾)的运动。从1951—1954年，据中国报刊报道，共发生了11起大型火灾，受灾人数达108463人。例如，1955年2月21日就发生了几起火灾，烧毁了270间房子，4000多人无家可归。香港警察局要么是没有找到纵火犯，要么是把火灾归咎于用火不小心。中国同志表示，火灾的原因是英国人想赶走九龙一些地段上的居民，用来建设机场。

反动组织通过四处活动努力从贫困居民中捞取政治资本，顺便摆脱自己与火灾的干系。据香港亲美报纸《星岛日报》(1955年1月22日)的消息，美国慈善组织，主要是天主教会，在香港向32.3万需要援助的家庭分发从美国得到的礼物——2000吨粮食。每人礼物重13磅(1磅奶油、1磅猪肉、6磅大米等)。

美国教会对巩固自己在香港的地位赋予重要意义。1月初，香港接待了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斯佩尔曼特别关注因从事敌特活动被中国和越南驱逐或逃亡的神甫。他说，天主教会将全力支持返回故地。2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基督教联盟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香港为从中国逃亡人员建设住宅和学校的决定。

香港有250万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广西——迁移过去的华人。在香港常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14500人，其中英国人9500人。此外，香港还有4000多美国、欧洲国家、南海国家、日本等国的侨民。

由于香港的主体居民是华人，当局采取措施让那些忠诚于他们的华人中的走狗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同1953年相比，去年有更多的华人得到了英国“为官方忠诚服务”勋章和奖章。

这样，香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教化居民思想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马万驰(МаВаньчжи)在委员会会议发言时对香港形势作了如下阐述：“我们的香港和澳门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中，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诽谤分子经常欺骗和吓唬他们，他们和以前一样对人民政府持怀疑态度。例如，一些人非常害怕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对一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如对我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南方日报》1955年1月31日)

香港的民主组织——主要是工会组织，以一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情况的事实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散布的谣言。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的及一些来自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香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主每天都在打探关于中国经济的成就，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兄弟援助，关于中国在华侨问题上执行的政策。

香港和中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从广东进入香港的人数达2000人，由香港前往广东也是这个人数。

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头目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压迫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一直受到自己同胞的关心和关注。近4年来受灾的香港居民得到了48.1亿元的援助，得到了365吨粮食。(《南京日报》1955年1月30日)

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导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政治地位开始恶化。因此，反动报刊一直在以各种借口讨论关于“红色中国占领香港”的问题。例如，1954年2月6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刊登了题为《台湾局势分析及其对香港的影响》的头版文章。文章中说：“许多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中国不占领台湾，那么就会改变方针，转向香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关心英国方面保持中立。中国还关心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因此，

它希望削弱英国，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文章的结论是，在“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稳固之后，香港今后将面临危险。

关于香港的未来问题，美国报纸一次也没提及过，特别是葛量洪在美国逗留期间。《南华早报》报道说：“葛量洪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占领香港，即使他们想过这样做。”他说，殖民地的防务很“出色”，有空防也有海防。（《南华早报》1954年11月2日）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在香港推行的计划与他们对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乃至全部政策方针的期待相关联。香港当局同英国政府一样，坚持宣传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努力制造中苏关系中的纠纷。去年11月葛量洪在美国的演讲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葛量洪说：“中苏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彼此定会疏远。”按照葛量洪的观点，美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来加速中苏关系分裂。“俄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况且，俄国也无法满足中国所需的工业化设备和工业品。”

应该指出，在揭露这一欺骗性宣传方面，香港民主报纸做了大量工作，日复一日地刊登关于苏联无偿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的情况。例如，有一个关于访问中国归来的一些香港和澳门的华侨讲述鞍山钢铁公司新建三项工程的片段，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因为这三个工程使用的是苏联最新的、全部自动化的设备。据说英国自由党代表团团长艾德礼在参观后说：‘目前英国还没有这种新型设备。’”（《经济报道》1954年第46期）

香港当局强调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为有效和巩固的政权”（《南华早报》1954年10月28日），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抵制对人民政权的无理攻击。

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国民党分子的活动，因为国民党分子的公开言行可能会造成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同时，香港政府同意国民党分子出版大量报纸，不阻碍国民党分子在工联、工商团体等从事秘密破坏活动。

《南华早报》和亲政府报纸努力把英国说成是中国的朋友。例如，《南华早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文章，开头的几句话是：“同往年相比，今年中国共产党人庆祝民族节日有两个重

大事件。一是国家再次有了民族的宪法，二是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艾登先生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新制度光辉孤立的危险，重新打开了外交通道。”文章以香港报刊所惯用的论证来结尾：“中国人选择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对整个亚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没有阻碍香港当局同其主人一样支持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计划，不过，他们努力论证香港的迫切需求，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据香港当局的说法，香港从中国得到所需粮食的一半，另一部分从泰国、菲律宾等地获得。据中国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张云里(ЧжанЮньли)说，香港自己的粮食仅能维持22天。(会谈记录，第41号文，1954年3月5日)

如果中国停止粮食供应，香港当局说，殖民地所需粮食几乎都得从其他国家进口。鉴于上述原因，他们说，西方对香港实施天空和海洋管制是必要的。香港总督在谈美国之行的印象时表示，相信美国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计划”。(《香港和澳门的形势》1954年第9期)

1954年香港政府对类似1953年9月9日的越境事件持克制态度(1953年9月9日，英国舰船和飞机开始对中国的战船施加攻击。英国的一艘舰船被击沉)。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边境防务得到改善。1953年9月9日事件引起了殖民地华人群体对香港当局行动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国敢于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感到自豪。

中国政府格外关注香港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立了一些机构，其中包括新华社，在中国资助下出版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这些出版物在宣传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和揭露帝国主义虚假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香港是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据中国同志说，解放后在美国、东南亚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侨通过香港向自己在国内的亲属寄钱达30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禁止货币由美国直接流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为香港华侨回国制造障碍，也不阻碍他们生活在中国南部省份的亲属前往香港。因为中国人不认为香港是异国领土。在中国南部地区出版的地图上，看不出中国和香港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尽管地图

的比例尺很大(1厘米=10公里)。中国各省之间的界限就很明显，每个省都用确定的色彩来装饰，但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就没有上述标识，在地图上香港和九龙半岛所使用的色彩与广东相同。

结论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逐年缩减，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香港资产阶级被迫替自己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香港政府建议扩大工业投资，但由于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困难，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资产阶级试图依靠降低劳动者工资和强化劳动来弥补由于对外贸易缩减造成的损失，这个做法招致了工人阶级的反抗。电车工人罢工展现了香港和九龙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这一事件还表明，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帝国主义分子在加强香港的地位，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积极在该地区组织陆海军演习。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赋予香港重要意义，把它视为招募和向中国派遣间谍、破坏分子的基地。

香港当局和反动分子努力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居民，诱使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是，香港主要居民不理睬帝国主义的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近来香港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是由于实行禁运政策造成的，这表明香港只有恢复同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才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附件：7页(非机密) [73]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

Б.卡沙洛夫(签名)

1955年5月22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408, д.135, л.16-45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2月23日，我应章汉夫之约拜会了他。

章汉夫向我通报说，2月20日下午他会见了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赖嘉文受尼赫鲁委托作了以下口头声明：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和我们仍在继续互致函电，我认为向您通报有关情况符合您的利益，即使您可能已经获悉有关情况。

在由伦敦回国途中，尼赫鲁总理在开罗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短函，阐述了自己对几个个别问题的观点。我们征求了莫洛托夫对委托安理会呼吁苏、印、英三国提出和平倡议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他同意因问题复杂而需要预先交换意见的看法。他还说，对于他的建议，印度的答复与英国的答复不同，英国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参加。因此，苏联政府尽管意识到该问题的迫切性，但是它需要时间更加充分地研究情况。

莫洛托夫询问了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一条报道的情况，这条报道说，尼赫鲁总理好像说有关各方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代表应当参加国际会议；莫洛托夫还问，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还应提出什么进一步的倡议。

尼赫鲁回国后，又于2月8日指示我们的代办向莫洛托夫更加详细地通报我们总理的观点。以下是委托代办向苏联外长转达的主要内容：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没有坚持国民党参加国际会议的主张。美国拒绝参加没有国民党参加的任何谈判。因此，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可能破产。有鉴于此，应当保持非正式接触，以便找到一条能摆脱目前僵局而且丝毫不损害中国尊严和利益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打算。我们力求：第一，采取能够引向和平谈判的最初步骤；第二，使中国的立场丝毫不受损害。

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际会议应当召开。为了使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双方即中美应当参加，因为没有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未必能召开。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预先进行非正式谈判，以便为国际会议或者为中美直接谈判(如果这种谈判有可能的话)奠定基础。在非正式谈判中，苏联、印度和英国应当试图找到某种能使美国和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道路，并试图缓和两方的紧张状态。但是，不应这样理解我们的立场：似

乎我们提出某种所谓“停火”的建议。

我们认为，应在缓和紧张状态和寻求协商一致的使中国和美国从现实考虑都能参加谈判的基础方面，表现出初步的谋求和平的主动性。我们的建议是：这种谈判应当很快引出召开国际会议的结果，不要搞无谓的拖延。

通过对形势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不采取像我们建议的最初步骤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步骤，那么僵局和冲突就会继续下去。这样会使我们失去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如果初步的和平倡议的程序一商定，我们就应当通过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个别或集体向两方即中美两国呼吁。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持的立场。

据莫洛托夫本人称，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些步骤不应局限于军事问题，也完全可以包括某些政治问题。至于莫洛托夫说英联邦国家会议上不可能制订出共同纲领，这是因为他对这一会议的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英联邦国家会议不作决议，不作为与会国政府联盟表态。召开英联邦国家会议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印度、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就交换过意见。此外，还举行过多次谈判，有时是三国一起谈判，有时是单独谈判。

对整个问题的以及对苏联的建议，印度与英国的立场无疑存在着明显差别。甚至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和美国也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看来，英国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也反对美国的立场。我们应当联合这些力量以及持中间立场的人士，使他们不要对中国的基本权利或者对和平解决方案持不愿和解的立场。美国现在的立场，例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是含糊的，但是可能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因此，我们必须毫不退让，提出和平倡议，作为寻求解决方案的最初步骤。

从我们的观点看，没有必要将英国现在的态度或者英国对苏联政府的答复视为英国参与召开国际会议措施的障碍。

主要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正在等待莫洛托夫答复。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僵局，应当予以消除。总理提请苏联注意，而且在给我的信中也强调，他对找到某种能够消除僵局和避免武装冲突的出路非常关心(原文已通过高频电报传给B.M.莫洛托夫)。”

章汉夫向我转交了赖嘉文谈话记录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并请我将此

上报莫斯科。我允诺照办。

在我动身去中国外交部时，莫斯科发来的关于B.M.莫洛托夫与印度驻苏联代办考尔谈话的电报已处理完毕，电报的部分内容我已经看过。因此，我在对章汉夫通报情况表示感谢后，随即告诉他，B.M.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接见了印度代办考尔，考尔就这一问题作了几乎相同的谈话，稍晚些时候我会将他的谈话全文交给您。

章汉夫说，尼赫鲁回到新德里后感到轻松多了，已经不再坚持邀请蒋介石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

我说同意这一看法，赖嘉文递交的声明与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有很大不同。

谈话进行了25分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Г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0, л.271-276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机密

苏共中央：

以情报的方式提交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察拉普金编写的《美国 and 苏联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的报告。

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8日

附件：

美国和苏联在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美国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在所谓的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反映，这份计划是后者于1946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上阐述的。该计划规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成立国际管制机构，赋予其如下权利和权限：

1.对一切形式的原子原料(铀、钍等)和制成品的所有权，以及对现存全体原子能企业的所有、管理和经营权。

2.对各国在原子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权。禁止个别国家和人士从事国际机构认为是危险的原子能领域的实验活动。

3.科学研究部门在完善原子武器领域的特权要予以禁止，并且个别国家和人士类似的研究也要禁止。这样，巴克鲁计划完全没有规定禁止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能，正相反，规定了要把生产和完善原子武器的工作集中到国际管制机构手里。

4.国际检查机构在所有协定参与国的领土上拥有畅通无阻的检查权。为了进行检查，国际管制机构将被赋予无障碍地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包括一切国家的军事区和任何一个企业，以及一切可能形式的侦查权，包括对各国领土进行航空摄影及其他一些权限等。

5.赋予其在协定参加国领土上的各企业拥有武装防卫权。

6.“既然有必要这么做……就有权过问各个国家原子能机关的活动，以及经济计划，私人、社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7.尽管美国在形式上不否定安理会的作用，并同意在安理会的框架内设立国际管制机关，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建议中却绕过的安理会，赋予管制机构对禁止核武器协定的破坏者以制裁权。在他们的表述中可以找到部分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的计划，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所谓制裁措施的决定的权力。在赋予国际管制机构这样权力的同时，美国还期待这一机构还拥有管制之外的功能。

二、管制制度

巴克鲁计划规定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要分段和分期进行。第一阶段要对原子能原料(铀、钍)实行“严厉”管制。然后进入管制的第二阶段，按照巴克鲁计划，要按照协商次序进行。对生产原子能材料的企业进行管制被列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内容。

这样，巴克鲁计划包含的分段分期地建立国际管制的思想有其自己的目的，首先是想保障美国找到世界核原料(铀、钍)的大门。至于对核原料建立国际管制，巴克鲁计划把它推迟到不确定的限期了。

三、管制开始的时间

美国及其伙伴们在管制开始的时间问题上的立场可归纳如下：首先要在各地设立、组建和部署好，国际机构才开始工作。随后国际机构要发表声明，它可以有效地执行禁止核武器及裁减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这样的活动程序为管制机构以自己的方式拖延执行保障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措施提供了可能。

至于对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措施的监督，在美国的建议中规定在国际管制机构中成立一个裁军部。授权这个机构“监督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半武装力量、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队，各种形式的武器，包括原子武器，还要监督这种迹象和检查工作”。该机构将确定裁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期限和程序，并对这些措施进行监督。

美国“管制”计划的最重要之处在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展现。这些内容不要求改变现状，从美国代表团于1954年5月29日提交给伦敦裁军委员会分会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件涉及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利、权限和功能。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建议赋予国际管制

机构通过关于对破坏协定的国家采取制裁的权力。此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禁止向破坏者供应核原料和关闭这个国家利用核燃料的工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美国人提议的国际管制机构具有超国家性质。在巴克鲁计划中赋予了该机关广泛权力和权限，与联合国宪章相对抗，允许它干涉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巴克鲁计划没有提出国际管制机构体系，以保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任务。该计划旨在保障美国在原子能的生产和使用领域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巴克鲁计划旨在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屈从于美国的命令，这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方针。

苏联的立场

美国关于管制的建议事实上是赋予国际管制机构对所有国家开采原子原料和生产原子材料的企业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与美国不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实现禁止目标建立严厉的管制。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苏联关于对原子能国际管制的问题向联合国提交的建议内容如下：

- 1.对一切从事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的企业及核能建立严厉的国际管制。
- 2.为此目的，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机关，该机关有权实施监督，“包括日常基础性的检查”。

在苏联的最初建议中规定要对各地的原子能企业定期核查和专门跟踪。1952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同意由国际管制机构进行常规检查，但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关于常规核查的细则，苏联在向1954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会议提交的建议中得到明确。该建议规定，常规核查的范围，必须保障使所有国家都执行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裁军。

上述关于常规核查的建议可这样理解：将在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国际核查机构，拥有自己的检查队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障碍地到达一切监督对象。

3.国际管制机构有权跟踪正在经营的开采核材料和生产核能的企业，检查他们的报告，目前核原料、材料和半成品的储备情况，收集和整理关于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及核能的材料，在核查过程中如果出现怀疑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协定被破坏时，将组织专门调查。

4.国际管制机构的代表有权进入任何一家开采、生产和储存核原料和材料，以及经营原子能的企业，在任何一个原子能企业都有权了解为监督原子能的使用和原子能所必需的生产流程，向任何一个国家索要和检查各种性质的关于原子能企业生产的信息和报告，以及与原子能企业活动相关问题的各种说明。

5.国际管制机构还有权提出对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原子能管制协定的破坏者给予警告和制止的措施供安理会研究。机构的决定要多数票才能通过。在这一机构中不设否决权。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苏联支持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和支持赋予国际管制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包括检查、跟踪等。同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管制机构的活动不能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按照苏联的管制计划，通过对某个破坏禁止核武器协定的国家实行制裁的决定权只能交给安理会。

二、管制开始的时间

苏联的建议与美国的立场不同，在苏联的建议中规定在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对氢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也要建立管制。

美国在自己的建议中规定，国际管制在禁止核武器的措施生效之前就开始进行。

三、关于国际管制临时委员会

在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苏联持这样的立场：禁止核武器和裁军这两项措施彼此相关、不分离，应该一起进行。但是，根据策略，苏联在1954年9月30日的建议中同意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纲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部分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第二阶段禁止核武器和进一步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在此，苏联同意管制机构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工作，但是，该机构——临时管制委员会——只是有权从各国得到关于执行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的必要情报，而没有去各处进行检查的权力。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部门，它的权限更大一些，它只有在第二阶段，当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它才能开始工作。

国际组织司司长

察拉普金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6, л.15-22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驻中国的《真理报》记者B.奥夫奇尼科夫就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所做的情况报告的摘录。

我觉得，B.奥夫奇尼科夫的情况报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Д.谢皮洛夫(签名)

1955年3月1日

证明材料

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已经使用了B.奥夫奇尼科夫的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10日

文件送：H.A.布尔加宁同志和B.M.莫洛托夫同志

附件：

《真理报》驻华记者根据中国报刊撰写的通讯摘要

据报刊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2)实行统购统销制度。

前不久，中国仅有1.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已有20万个，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成立了40多万个合作社，到春季大约会有60万个合作社。其意义不仅在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从各地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出，新成员开始“潮水般地”加入已有的合作社。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大部分合作社，前不久“潮水般”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达40%—50%。由此看来，农村的群众性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始，而且像《人民日报》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形式。报纸提醒党的干部不要冒进，不要成立社会主义类型的联合合作社(集体农庄)。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是，逐步减少合作社中按土地股份分配收入的比重，扩大按劳分配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经济单位仅是作为例外成立，用作试验。

数十万个新合作社的成立，大批新成员加入已有的合作社，使正在农村工作的中国同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合作社的巩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报刊现在十分重视为农民劳动联合体培养干部问题，十分重视从组织上巩固新老合作社的问题。

在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和复杂”。

《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专门谈了当前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党的农村政治路线。《人民日报》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占总农户50%—70%的贫农。这一数字包括约占贫农2/3的“新中农”和约占总农户20%的中农，即“老中农”。党对他们仍然实行同盟军政策，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政策。

至于富农，党对他们的政策由土改时期实行的孤立政策改为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

正是被消灭阶级的残余，或者像报纸所写的“最近应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现在积极地反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就在农村大规模合作化的条件下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在省级的各项报刊上被广泛评论。

这篇社论说，最近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地富分子偷偷宰杀牲畜、破坏农具、烧毁粮食和饲料，杀害干部积极分子、散布谣言恫吓农民，迫使他们退社。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合作社就是由于富农的这类活动而解散了。报纸还指出，坏分子竭力打入合作社，爬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破坏组织工作，动摇合作社结构的基本原则。报纸还批评有的工作人员歪曲党的方针，有意吸收富农入社(“他们有好牲畜，工具多，有经验，能写会算”)。

社论指出，农村公安和司法机关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合作社与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农村成立治安委员会，组织民兵昼夜严守合作社的财产。

党的其他文件还指出，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加重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困难。在新解放区，40%—50%的村庄至今没有党小组(党提出了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党员的任务，使每个村至少有10名共产党员)。

还在上个冬季就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环节，是切断城市资本和农村市场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报刊仍在评述实行这一政策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今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征购范围大大扩大。去年征购范围仅限于

粮食，现在已经包括棉花和油料作物。第二，收购余粮不是在农民完成公粮缴纳任务之后进行，而是与其同时进行。第三，组织计划供应不是在收购之后进行，而是与收购同时进行。整个运动是在以下三个口号下进行的：“支援工业化，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台湾！”

对最重要的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是对原有的小商品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考虑到实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阶级敌人的必然反抗，党派出了数百万工作人员向农民解释这一措施的目的和好处。现在，积极分子在县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各地搞这场运动。每户的余粮在会上讨论确定。这项工作今年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户是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领的粮食，互助组和合作社留有相应的记录。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数量也进行核算。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计算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月30斤粮食，每人每年3斤棉花。剩下的则为多余数量。今年的困难在于许多农民去年超定额卖了粮食，当他们需要粮食时，供应部门不能保证他们的需要。因此，报刊一再提醒地方工作人员不要夸大多余数量。这一运动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国家还无力向农民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品以换取他们出售的粮食(购买的主要物品布匹也是定量供应)。因此，在进行宣传时要求农民将卖粮棉换回的钱存入储蓄所或者向合作社投资(年收入的2%—3%)。为了避免犯去年的错误，在征购的同时准确确定缺粮的户数。每户领一张购粮证明，在根据计算自己的粮食吃完的那个月，凭购粮证在国家粮库按固定价格购买所需数量的粮食。

报刊广泛宣传统购政策的巨大成绩：尽管遇到大灾，全国粮价稳定，国家得到了所需数量的商品粮。

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安排粮贩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或者安排他们在国家粮库为国家征购粮食。中国有七八百万人在私营商业中就业。今后他们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把利用和改造粮贩、棉贩的措施作为改造整个商业资本的道路来研究。

在述评的最后我们谈一谈中国现阶段进行的节约运动的特点。《人民日报》的一些社论多次指出，1954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的速度不可能仍然像过去那么快，因为能够恢复的生产能力已经恢复，而新的大型企业现在投产的还很少。此外，原料基地落后于加工工业发展的状况最近越来越严重。重工业某些部门的发展受到金属材料(钢铁，尤其是铜)的限制。而轻工业部门则越来越感到农业的落后。

许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靠节约原料增产。节约是通过降低单位产品原料消耗、利用废料、采用代替品来实现的。因此，报纸对那些流行的保守观点，如节约似乎与质量相矛盾、“好材料做不出差产品”，进行了批评。报纸上称节约是工厂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真理报》记者

奥夫钦尼科夫

1955年2月12日

于北京市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5-33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3月12日

绝密

我今天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在询问和回答了一个协议中的用词之后，我向他通报了关于1955年4月22日举行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的指示，在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将为这个纪念日写文章之后，我说，中央恳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写文章，并在《真理报》上发表。

毛泽东欣然同意写一篇文章，并说文章的题目可能会是“列宁与中国革命”，大概有6000或7000字。他谈到，他将在4月中旬动笔。他最近无法动笔，因为他在整个3月的后半个月都将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谈到这次大会，毛泽东告诉我，将会从各省、地区和市级党组织中选派约300名代表参加。正如毛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意义将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重要，会议将讨论诸如五年计划和高岗——饶漱石事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1945年以来还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党章，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党章允许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提前或推迟举行。在1948年举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仍在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紧急重大的事情也使得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召开，如国家重建工作，朝鲜战争，制定及修改五年计划，等等。下一次(第八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1956年召开。今年的这次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决议，将会减少在1956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在这里，毛泽东暗示说，高岗可能曾和贝利亚阴谋串通，贝利亚的代表曾来到东北并与高岗会过面，而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联系过，他将严肃地调查这个问题。

谈到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时，我说《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同志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怎样纪念这一天。毛泽东说，计划在这一天大力进行宣传纪念活动，如各城市将举行集会，报纸上将刊载文章。毛泽东说，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情况，我应该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表示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

斗争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就这事和陆定一同志谈一谈。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这样的交谈。他说，他要交给我们三个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反对唯心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协调粮食供应紧急措施的指示)，他请我转交苏共中央。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局已经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因巴黎协议(大概是指1954年10月的巴黎协议，这些协议恢复了西德的独立主权并为西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他说，所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再爆发一场战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将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和这个条约草案给一个书面答复。

毛泽东还谈到苏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他说，苏共中央已经对南斯拉夫事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是充分同意这个分析，他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其他人正在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行事，总是高喊他们支持列宁，却反对斯大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不认可斯大林。在卡德尔的演讲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

毛还说，他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待它必须基本上像对待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铁托和卡德尔是不可能信任的，他们已经把自己和帝国主义国家牢固联系起来。当南斯拉夫人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时候，我决不会赞同他们。即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么我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只能被抛弃。

在这里，毛提到了列宁与第二国际和考茨基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以后，列宁才最后与第二国际决裂。尽管考茨基犯了很多错误，列宁也批评过他，但是，列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然把他看作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而没有与他决裂。

毛泽东说，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写了一封信通告各级

党组织。他说，我们慎重地谈到了可能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在信中我们还写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南斯拉夫人在愿意同苏共、中共和各人民民主党和解的道路上走多远。

关于停止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苏共中央在这个事件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会谈中提到了考涅楚克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志访华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问新德里和出席和平大会。听到考涅楚克的名字，毛泽东回想起他的剧本《前线》，并说，剧本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那是在延安，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同志帮助很大。 [74] 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旧军官当中，仍然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已经下达了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上演这个剧本。毛泽东说，他愿意在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从印度返回后与大家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师哲和T.Φ.斯克沃尔佐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Φ.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47, п.379, д.9, л.46-49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第82/cc号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3月9日

今天16时，我按预先约定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在互相问候后，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他离开了雅加达。大使回答，

他访问了日惹和泗水，因为要在这两个城市里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手工业品展览会。他说，展览会在泗水闭幕后将被转移到棉兰(苏门答腊岛)去，他也打算到那儿去。他补充说，展览会既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

接着他告诉我，在去日惹的时候，他与美国大使卡明及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班朋·苏根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大使说，美国大使在旅行时竭力设法突出自己与苏根的友谊。例如，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大使走到苏根身边，并想要同他谈话，但苏根根本就不理睬他。同时苏根却走到黄镇身边，并客气地同他打了招呼。在飞机即将在日惹机场降落之前，欢迎参谋长苏根的仪仗队排好了队。美国大使试图同他一起从仪仗队面前走过去，但被士兵们挤开了。

我问，美国大使的日惹之行与当时正在那儿举行的印尼军队高级军官会议有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问题，黄镇回答，这关系是完全不能被排除的。

接着他告诉我，美国大使是正式应马斯友美党 [75] 第一副主席苏基曼请他参加他(苏基曼)女儿婚礼的邀请抵达日惹的。黄镇说，根据他所拥有的情报，出席婚礼的有300—400个客人，大部分都是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其他一些党的成员，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总书记西迪克·佐约苏加托在婚礼结束前就离开了。黄镇说，因此婚礼是安排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与美国大使之间谈判的一个合适的幌子，根据他的情报，婚礼后就有过这种谈判。黄镇同时还说，遗憾的是他无法确定谈的是什么内容。

返回雅加达时，黄镇与马斯友美党的主席纳席尔同乘一架飞机。飞机在三宝垄迫降时，黄镇与他有过一次谈话。纳席尔在谈话中对中国评价甚好。黄镇说，他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马斯友美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到底是争论哪些问题，大使也没有弄清楚。

接着我简明地向大使通报了自己因苏联红十字会和新月会联合会向援助洪灾难民的基金会提供4万卢比一事在今年2月23日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话的内容。转达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话，他说的是他高度评价苏联政府邀请科伦坡计划的国家参加有关台湾问题的十国会议的提议。我指出，我曾问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是否想要因这一提议而

向苏联政府转告一些什么话，后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对黄镇说，这一情况，还有我已经向大使通报过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的摇摆立场，都使人能得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实行对外政策时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结论。我问大使，他能否解释一下印尼政府持这种立场的原因。

黄镇说，依他个人之见，印尼政府在实行自己的“积极和独立的”对外政策时完全是以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寄很大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它的结果将会给予政府的地位以很大的影响。

黄镇接着说，印尼的经济和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印尼的广大的社会人士赞成扩大与民主阵营各国的经济交流。他们看得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苏联的关于在印度以对印度有利的条件建造大型冶金工厂的提议给印尼的社会人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几乎完全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之中。

就连当地的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着比印度尼西亚人更大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不考虑社会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因为政府有要保住政权的意图。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了，所用的方法正是签订短期的贸易协定和就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进行谈判。的确，印度尼西亚政府暂时还没有对中国政府所表达的要派中国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去继续进行关于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的谈判的意愿做出回应。

印度尼西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只要在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中得到短期的援助。这是因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并不指望长久地守住政权，并担心长期援助的成果会落到另一个政府的手里去。

大使说，在他在日惹逗留时，当地的苏丹布瓦诺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以便在日惹地区建造纺织厂和鞋厂的意愿。黄镇补充说，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中国政府是会给印度尼西亚提供贷款的。按民族而言是华裔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也表示了想要得到中国援助的愿望。

大使说，日惹苏丹布瓦诺多少有点进步的观点。特别是苏丹在1954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拒绝了尼克松发出的访美邀请。

黄镇说，有趣的是，要指出，苏加诺总统在尼克松在印尼国内巡行时精心安排了对他的监督，不让他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或其他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会面。只是在离开之前尼克松才得以会见了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

然后黄镇在涉及印尼对中国的态度时说，印尼政府担心日本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它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与日益强大的日本“相抗衡”的强国。

大使说，他于1955年3月2日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纳约，特别是后者说了，印尼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永远也不会承认台湾政府。黄镇补充说，他原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弄清楚印尼政府对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代表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的提议的意见，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苏纳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黄镇则认为自己不便首先开口问。

接着黄镇说，他与国会礼宾组约定了拜访国会各派别的主席。他已经作过几次这种拜访了，特别是拜访了社会主义党的主席，后者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

最后我说，最近我已经买好了用作大使馆的房子，因此请大使给我介绍一位好的建筑师来改建这些房子，同时还感谢了他在寻找一位办理文件的律师时所给予的帮助。黄镇说出了一位建筑师的姓氏，并补充说，他有自己政府的要给苏联大使以一切可能的协助的指示。

我感谢了大使的很有意思的谈话，并表示希望今后也要举行类似的会谈，以便相互交换各自拥有的信息，大使同意了。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B.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会谈持续两个小时，并且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А.茹科夫(签名)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5年3月12日

第25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H.C.赫鲁晓夫同志

B.M.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你们如下文件：

- 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的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 2.《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 3.《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76]

转交给你们的前两份文件，是依据毛泽东发给苏共中央的指示转交的。

第三份文件——“情报”是由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以便苏联专家了解其中的内容。该文件很有意思，因为它从整体上详细阐述了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附上述内容共计35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手写批注：

说明：这些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5月10日

附件：

译自中文，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17日

当前，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对民主活动家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联盟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宗派倾向。该倾向的突出表现如下：

1.许多省、市的党委组成都是依据很久以前的任命方案，由省、市两级政府的部、局负责人及其副手担任，无党派活动家任职太少，尤其是领导职务。一些省的所有局长，一些市的所有部长都是党员。在个别省份局、部级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但没有民主活动家，而且连来自劳动者的无党派人士也没有。

2.一些地方党组织不重视政治协商机构的工作，不很愿意考虑民主活动家的意见。导致后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协商机关或许不会继续存在。虽然他们已看到，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就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章程、主席团组成和政协常务机关等问题主持了意见交流会，并赞同民主人士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全会开幕式；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自始至终主持和领导了会议；虽然人们明白，中共中央赋予政协和统一战线重要的意义，但依然担心地方党组织会忽视政协机关的工作。一些民主活动家说，中央很重视政协工作，但地方上却对之持完全漠视态度。很少召开或根本不召开地方政协机关会议。各地方党组织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很少或根本不与民主活动家协商。地方上的民主活动家很难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事实表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不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厌恶与民主活动家会面，担心这些会见会招惹麻烦；一些同志则害怕民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同志不明白，我们目前仍处于阶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处于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一直试图颠覆我们国家的严峻环境中。因而，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依然极其尖锐而复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分子并对之进行再教育，而且应坚定地继续联合那些放弃了以前的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并与我们合作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对之开展再教育工作。民主活动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都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为民主活动家均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依据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判断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从而及时出台和灵活地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践中，而通过与民主活动家的合作我们还可对这些人和受到他们影响的相关群众进行再教育。

忽视统一战线和迷信一党制的倾向不符合当前党的总路线、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以及我们目前的历史条件。这种倾向是对我们赢得多数人支持估计不足的冒险主义倾向，是放弃盟友和自我孤立倾向，是忽视现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观主义倾向。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同志在开展工作时依据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情绪。他们忘了，我们要依据总路线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论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还是

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拥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在过渡时期我们就会遇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困难和不便。国内外经验都告诉我们，迷信一党制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瑞金时期我们所有的机构都是由清一色的我们党内人士组成，结果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如今已消灭阶级并在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但苏共中央依然强调在国家机构中共产党和非党人士联合的重要性，反对这些机构均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构成。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许多领导同志依然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省、市级政府的部、局职务均应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担任，这无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

我们党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理应永远与非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这个联盟便是劳动者自身的联盟。另外，在当代中国革命斗争条件下劳动者也应始终保持与非劳动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尤其是共产党和非党劳动者的联盟是我党的基本政策。在解放战争和农业改革时期，不论是非党劳动者代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以及拒绝加入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阵营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就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应极力使我们国家和经济机关(除了一些特别保密机构外)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党员。我们的机关必须根据其组织和性质配置相应数量的民主活动家或非党劳动者。那种关于这些机构只能配置共产党员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伪装的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要无条件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只用纯一色的共产党员来配置我们的各种机构，甚至为此而放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不能为此而放弃共产党与那些诚实工作的非党劳动者，与那些以同志式态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全部事业的无党派工作人员的结盟。

基于上述方针，所有省、市党委均应以适当方式挑选省、市局、部级职务候选人和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加强各地方政协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

1.国务院各部委、委员会等领导人共计35人，其中非党员13人，比重为37.2%。国务院的47人中非党员13人，占国务院总人数的25.5%。^[77]在各省、市局、部级担任领导职务及其副职的非党员比重可能会低于国家各部委、国务院各委员会的比重，但也不能过低。最合适的比例应在25%—20%左右。^[78]如果对工作有利，就可任命著名民主活动家担任领导职务。即使那些对工作不太有利，但也不会妨碍工作的非党活动家也可被任命担任领导职位或其副职。总之，在利用这些人时要把握如下原则：或者对工作有利或者使其不会成为我们工作的阻碍。

2.在全国政协委员会559名委员中，党员比重约27%；在政协常设机关83位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了1/3。各地方政协委员会中党员与无党派活动家的比例也应这样或大致如此。只是此时，对党有一个要求，一方面党要使自己成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自身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格界限，理应尽量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更广泛、更全面的代表。接下来，各地实际负责党务工作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一般情况下应被任命为各地政协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党)能够与非党活动家保持必要接触，并与之进行必要的协商。

3.政协是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它是联系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层、社会组织、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纽带。为了强化政协的作用，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相应会议上就一些最重大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人大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地方政协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展开协商。就最重大问题召集的此类协商会每年至少四次，即一个季度开一次。此外，还有必要就一些个别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会议开幕式应由党的主要领导主持，相关负责人须作内容丰富的报告。还必须提前告知委员会委员们，以便他们能够准备相关草案或提案，并给予其就工作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自由。须重视他们的正确意见或建议，要给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

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不对，我们则必须向其做出解释或开展相应的批判。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所有批评和建议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因此而获益。绝不允许不让非党活动家说话，以及拒绝其批评和建议的做法。

必须始终重视对地方政协委员委员的学习的领导工作。

4.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应邀请居住在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自己的相关会议，并在征得其同意的条件下使其参加一些学习班，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以必要方式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5.各地应始终重视那些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民主活动家、非党劳动群众代表的培养教育问题，并在国家和经济机构以及社会组织机关中保持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应比例。再者，一般情况下不应吸收那些著名的民主活动家入党，即便其已符合入党的条件，但必须培养和帮助他们，并可跟党员一样吸收其参加一些与其工作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党内讨论活动。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再就本机关的工作计划和方针，以及一般政治问题组织讨论时，可邀请本机关非党骨干或相应次要工作人员参与会议讨论活动。

6.必须信任各机构中那些忠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给予其工作上的行动自由，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全力帮助其在各自工作中取得成绩。

7.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强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有必要分析民主活动家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倾向，并在适当时机用相应方式指出其错误所在，在一些情形下还要批判和讨论这些错误以帮助民主人士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改正错误。那种关于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只有团结而不应斗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既要与左倾宗派主义作斗争，也反对与错误思想和平共处的右倾倾向。

8.在得到上述指示后，各省、市党委应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对政府、政协委员会和其他相应机构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在4月底之前把检查结果上报中央。

(该文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属实：A.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文件)发出4份

第367号

1955年3月12日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致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党委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国家机关和部委党组负责人，中国境外使、领馆负责人，政协委员会，军队和各省军区负责人等。

在我们解放了一江山岛后，美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慌作一团。美国政府一方面加紧军事挑衅，另一方面则极力试图通过联合国抛出一个阴险的所谓“停火”计划，以阻挠中国人民

的解放台湾大业。

周恩来同志在1月21日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已严厉而公正地阐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中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2月3日来电的答复中也重申了自己的上述立场。

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大家通报与该问题相关的主要内容，以便大家向省级(在中央机关为部级负责人)和县级以上干部作出口头解释，不得作记录。该文件阅后即行销毁。

1.一江山岛的解放证明了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在没有美国支持和援助的条件下，蒋介石匪帮既不能幻想守住沿岸诸岛，未来也不可能保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一事实暴露了美国在台湾的弱点。一方面，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使其成为自己扩大对中国侵略和在东方准备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基地之一；另一方面，他们既无法把守住台湾的希望只寄托在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援助上，又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又狂热叫嚣世界大战的威胁，想与我们正式开战。

这一矛盾促使美国及其走狗积极制定一个侵略台湾和干涉我们解放台湾大业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以便恐吓我们，迫使我们屈服和放弃解放台湾的斗争；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企图通过“停火”继续占据台湾和积极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极力把自己占领台湾说成是“为了和平事业”，而把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侵略行径”。与此同时，美国采用这种模糊方式的目的就是想恐吓和欺骗各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其与美国一起对我们施压，以便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采取如下步骤：

(1)当总统向国会递交了特别咨文后，美国众议院给予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干涉中国解放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力。

(2)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周边诸岛屿部署军队，举行挑衅性军演。

(3)帮助蒋介石集团从一些位置较远和独岛(目前此类岛屿为大陈岛)撤离，以防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部署在那里的蒋军被歼。

(4)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帮助美国和支持其所谓“停火”计划。

(5)利用恐吓手段把印度、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以便后者承认美国占领台湾的事实；以恐吓和欺骗手段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中国的同情，并进一步向其灌输如下思想，即中国不愿和平。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都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置我们于不利地位。

2.针对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持如下三种不同立场：

(1)美国被迫暂时放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提出的所谓积极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实施“反攻大陆和准备复辟以前制度”等计划；他们基本恢复了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即企图在台湾海峡“划定火线”，以保护蒋介石和继续占据台湾。他们准备以所谓“撤离沿岸诸岛屿”作为“交换条件”，造成“两个中国”，以便自己永远霸占台湾，以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新的战争。

(2)英国及其类似诸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对我持敌视态度的同时，他们也害怕被卷入当前美国正试图在东方挑起的战争。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军队的事实，因为后者可能导致美军与我们的武装冲突和引发世界大战，而东方爆发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这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拥护维持远东地区现状的政策。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计划符合了英国及其类似国家的要求，所以后者都积极拥护。只是与美国相比，他们所采取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背信弃义地宣称，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主权归属尚处于未定状态；不过，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均跟美国一样主张

台湾主权属于蒋介石的所谓“自由中国”。他们公开表示，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不仅有大陈，还包括马祖、金门等)均归还给中国，支持把台湾划为中立区或经联合国授权临时交由蒋介石集团管理。未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两个中国”。

(3)印度、缅甸等国“拥护和平与中立”，害怕战争，保持中立立场。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沿岸岛屿也属中国领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由于我方解放台湾和美方占领台湾而引发战争，因此要求我们暂缓解放台湾，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中立”或“保护”后再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或直接把台湾转交中国或通过公民表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美国利用这些害怕战争的“和平中立”国的软弱，试图继续以威胁和欺骗手段迫使其放弃同情中国的立场。

由此可见，上述三类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三种不同立场。具体表现为：

(1)台湾主权问题。

(2)“两个中国”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他们希望“停火”；

(2)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屿最终归还给中国；

(3)希望，台湾岛问题和澎湖列岛问题分别解决(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其意见不一)。

3.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主要方式可作如下归纳：

(1)制造社会舆论，把我们的内政——解放台湾问题视作“威胁和平”的国际问题，呼吁“国际解决台湾问题”。

(2)为“国际解决(台湾问题)”他们提出四种模式或同时采取不同模式：

①美国和英国挑唆新西兰提出建议并在联合国进行讨论；顽固地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正义斗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坚持要求我们与蒋介石之间“停火”；邀请中国与蒋介石代表一起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并讨论新西兰提出的建议，建立平等讨论模式使“两个中国”合法化，为未来美国以联合国旗帜为掩护的军事干涉作准备。

②利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上次在北京谈判期间与我们建立的关系进行所谓的协调冲突。

③试图借助英国或者印度，或者英、印和加拿大共同协调冲突，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本主义“和平、中立”国均对此类方式寄予着幻想(无法实现的希望)。

④举办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台湾问题。

(3)如果上述方法没有产生效果，他们便会把“不愿和平”的负责推卸到我们头上。最终当美国把蒋介石匪帮的所有军队都从离台湾较远的岛屿和独岛撤离并集中到台湾本岛之后，可以说，他们就可能采用如下方法，如“积极划定停火线”，“积极终止战争行为”等；在高喊和平的同时，加紧军事行为，策划新的政治阴谋以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大业。

4.我们的立场——方针和基本策略。如果我们哪怕对美国教唆的所谓“停火”卑鄙计划寄予丝毫的幻想，或者在其不断加强的军事威胁面前有一丁点恐慌情绪，那么敌人便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的胃口便会更大，就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只有采取果断、坚定和百折不挠的立场，我们才可能迫使敌人退却。

我们的行动纲领：台湾属于中国，不解放台湾我们绝不罢休。我们不可能允许“两个中国”并存，也不会答应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需要和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但

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受到侵略，不会用我们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求得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不会对别国挑起战争，但不怕战争威胁，如果战争冒险家们胆敢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总之，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允许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美国急不可耐地想进攻我们，我们将不怕与之对抗到底。我们不怕原子弹，因为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再说美国也并非原子弹的垄断者。

我们的方针：(1)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国阴险的“停火”计划，也不可能同意所谓台湾的“中立”或“托管”。被六万万中国人民打倒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必将被我们消灭，其现在占据的台湾也终将被中国人民解放。我们与蒋介石匪帮之间根本谈不上停火的事；我们与美国之间尚未发生战争，因而不存在所谓“停火”的问题。那些实施此类阴险计划——如“停火”——的人们，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都违反了联合国章程，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均无权干涉解放台湾问题，因为后者本质上属于中国内部问题。

(2)当前台湾方面的紧张局势完全都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略中国的结果。这种局势对远东和亚洲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应停止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只有美国军队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才可能消除。

基于上述基本方针，我们应对的主要策略如下：集中力量打击美国，揭露其旨在教唆“停火”和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阴谋；抨击英国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主要如“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两个中国”，指出此类背信弃义和不公正要求的真正目的在于不择手段地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他们这样做，只会纵容美国侵略和扩大战争危险，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怒；尽力赢得印度、缅甸等和平、中立国家的同情，及时向其解释事情的真实现状，展示我们公正的立场；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走狗的阴谋和卑鄙计划只能导致侵略和战争，而绝不会是和平。

5.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事日程中就台湾局势问题列入如下两项提案：其一，苏联提出的“关于美国对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屿的侵略行动”；其二，新西兰根据美国授意提出的“关于在中国沿岸附近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两份提案明显彼此矛盾。苏联的提案旨在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新西兰的提案则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美国控制下的安理会如今邀请我们参与讨论新西兰的提案，但条件是由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的席位。

美、英和其他与“停火”相关国家的这一卑鄙伎俩的目的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

有鉴于此，2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的复电中坚定而公正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派代表参加新西兰提案的讨论；只有当讨论苏联的提案且蒋介石集团代表被驱除出安理会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才会以中国名义前往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能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声明，中国人民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支持国际上旨在消除和缓解美国在台湾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形势的各种努力。

当前，苏联提议召集由十个国家——中、美、英、苏、法、印、缅、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内、外进行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支持我们的公正要求，粉碎美国及其仆从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计划，促使全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6.围绕台湾问题在各条战线——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展开斗争。这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只有坚持不屈不挠和谨慎的立场，我们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关于这场斗争未来的发展动向，有如下四种可能：

(1)美国单方面确定“停火”线。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紧解放台湾的斗争。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目前尚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3)进一步紧张导致局势陷入僵局。但美国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紧张也有巨大困难。

(4)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解放。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和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线不断取得胜利，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全力为此前景而斗争。

目前，美帝国主义尚未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好充分准备，世界和平力量与日俱增、不断加强。我们未来的顽强斗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目前，我们应自上而下地向全党和所有非党干部，以及民众积极分子说明提高警惕和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意外事件的必要性。

应向人民说明，帝国主义者的镇压政策不会实现和平。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慕尼黑阴谋就是这方面最直观的实例。因此，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应作好意外事件的准备。只有对意外事件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防患于未然或遭受少量损失；只有我们作好准备，敌人才不敢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我们不作好准备，到时就会惊慌失措并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敌人万一胆敢冒险，必将加速其灭亡，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卒必将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不排除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这样向人民解释只有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危害。

7.我们必须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一场需要动员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复杂而长期的斗争。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侵略台湾属于国际问题范畴。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否则我们便会轻易地落入他们所编造的圈套，即所谓“由于台湾主权未定，所以只能停火”。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善于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以促进全世界人民奋起捍卫远东和平、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必须遵照周恩来同志的1月24日声明及其2月3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的精神，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其间，我们须注意如下四点：

(1)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与被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进行所谓的“停火”。

(2)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中国大陆及其诸多沿海岛屿不会引发远东局势的紧张。台湾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尖锐，都是因为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而占据台湾，与蒋介石匪帮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部署美国军队。紧张局势都是美国造成的，而非中国。只有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才可能彻底消除该地区的紧张。

(3)美国抛出所谓“停火”计划用心险恶，目的就是想永远占据台湾，进而继续扩大和准备新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进行的旨在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行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并对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有真正爱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都应与美国的这些军事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4)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新西兰提出的违反联合国章程并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

当然，中国人民仍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缓解远东紧张局势，支持苏联和国际社会为缓和消除美国在台湾及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的努力。

1955年2月21日

属实：A.诺维科夫(签名)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1955年3月3日)

1.今年2月召集的全国财经问题会议专门研究了农村的现状和国家粮食采购与供应等问题。过去两年间，党中央制定的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这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且理应继续坚定落实。但从各地反映上来的信息显示，当前农村的形势比较紧张，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开始大量杀猪、屠宰牲畜，积肥没有热情，对春耕准备不积极，生产情绪不高。必须指出，虽然目前农村的严峻形势无疑与富农和其他异己分子的破坏和负隅顽抗相关，但从总体形势的性质来看，还是对我们有所警示，即农民——尤其是中农对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有不满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如一些地区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速度太快、工作过粗，所采用的个别举措不完全合理，农村供应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中央各机关目前就是要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和缺陷。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导致农民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集中式采购：农民感觉此类采购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无论他们生产多少粮食，国家都会采购得一点不剩，且不给农民任何好处。农民认为，国家采购的数额过多，而留下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满足农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商品的集中供应不满意：这些商品在城市过剩，而在农村却不够。农民是讲究实际的，如果不亲眼看到好处，就会对增加生产丧失积极性。未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就可能对农业生产、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造成严重影响。

还必须指出的是，粮食战线的紧张形势一定程度上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出现这种紧张形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粮食生产，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所有举措均应围绕这一核心环节，理应以增加生产、促进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重心，而不应以任何方式丝毫影响农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清楚，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联系的具体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得到粮食，同时也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确保国家需要，也要让农民满意。这里，关键是要把我们政策的界线搞明确，即正确地确定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数额。如果集中采购的数额过高，农民所剩的粮食就不够吃，就会没有粮种和饲料，就无法满足他们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不仅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也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如果集中采购数额定得过低，就不仅无法确保国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而且势必无法保证近五千万农民的粮食消费——因为这些农民的粮食产量不够，所在地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上千万农民分布在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混乱，破坏市场价格稳定，并对国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国家在确定粮

食集中采购额和集中供应额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实际的可能性。政府应确定生产额、采购额和供应额，即要在每年春播工作开始前以乡为基本单位确定总体生产计划，向农民公告国家在该乡的采购和供应规模，以便农民明白：他们得给国家上缴多少公粮，得向国家出售多少粮食，自己可以留下多少粮食，多少农户需要国家的粮食供给。总之，农民将明明白白地知道国家所标注的这些数据；当他们心中没有了疑虑，农村的紧张形势自然就会缓解；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从事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粮食采购和供应的监督。

2. 依据上述原则，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本年度(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粮食收购和粮食税额度为900亿斤。该额度仅仅超过去年(自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指定的粮食收购额20亿斤，也就是说本年度的粮食税和粮食收购增收数量仍基本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鉴于如下情况：其一，1955年广大农民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了200多亿斤；其二，1955年那些曾在1954年遭受了自然灾害的省份天气条件正常，从而能够额外向国家交纳近30亿斤粮食，因此实际上今年的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要比去年容易些。依照既定计划，多数省份今年的公粮征收和余粮采购任务有所减少；少数省份——仍维持去年水平；只有那些去年曾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省份和其他个别省份——任务相应有所增加。有鉴于此，中央认为，既定的公粮和粮食采购额度是符合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向农民征收900亿斤粮食的数额并不大，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群众作了让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强化与占农村人口60%以上新、老中农的团结的进一步举措。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但仍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就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与2亿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无法拥有充足的粮食保障。我们一定要坚决避免出现此类情形。

当前，粮食集中采购任务已传达到各省，各省份应细化这些任务，并把任务逐级细化到各乡镇。必须详细地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收成正常，那么在收割结束后粮食税和粮食采购将会依照所公布的相应数额进行。无论农民的生产增收多少，政府既定的公粮和采购额度都不会再发生变动。当然，同时也要向农民说明，如果某个省份或全国范围内整体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那么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粮食税和采购粮征收额度则会相应降低，且受灾农民仍将获得有保障的粮食供应；只是收成好的地区得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即国家将会在收成好的地区采购更多粮食，以确保必要的粮食供给。1954年曾遭受严重灾害的一些省份的经验表明，如果其他收成好的地区不出售更多的粮食，国家就无法得到粮食来帮助受灾省份，数百万受灾农民就无法克服困难，那么就可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最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情形国家就要在收成好的地区额外采购一定数量粮食，而这额外采购的粮食也将列入900亿斤的采购总量中。关于收成好地区的农民，每户额外采购任务以其增产总量的40%计；增产粮的其余60%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既可以将其作为粮食储备，也可出售，或用作牲畜饲料。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支配这些粮食，国家不会干涉，也不会以农民有余粮为借口而增加采购任务。总之，农民增产的粮食越多，自己剩余的可归自由支配的粮食也就越多，这是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切实手段。

3. 在缩减农民粮食税和给国家出售粮食数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供应和分配数量，以及相应的监督举措。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今年(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供应量确定为753亿斤。中央认为，该数量是切合实际的。该数量比去年——1954—1955年的计划少了20亿斤。应当承认，该粮食供应计划是相当紧张的。但由于无法再扩大粮食采购规模，压缩预定用于出口、财政保障和其他必要目的的粮食数量，国家掌握的计划用于供应的储备粮数量已很难根据地区、季节和粮食品种的不同来充分满足与日俱增的正常粮食供应和调节的需求。因为这已是国家为满足向城、乡居民供粮而能够调拨的最大粮食数额了。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数量，就将导致政府无力确保国家的整体供应需求。当然，如果把农民增产的粮食数量考虑在内，那么农户所需粮食数量倒可能减少。另外，去年为了确保遭受了严重水灾地区的粮食供应，国家还额外划拨了30—40亿斤粮食。如果1955年我们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那么这方面的粮食支出自然会相应减少。如果再把粮食消耗的节约举措和粮食正确供应保障工作的改善等因

素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原定的753亿斤粮食供应总量则完全可满足需要。

必须指出的是，粮食供应领域的工作调整和粮耗节约的宣传将在我们粮食战线的未来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两年来，在落实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举措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采购领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如下一个不好的结果，即我们对城、乡粮食集中供应的工作不够重视，因而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各城市均存在对粮食集中供应工作马马虎虎的情形。在机关、军队、企业和学校等地方都可看到不爱惜粮食现象，浪费粮食的情况相当普遍。此类现象已然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必须通过政治教育方式促使城市居民真正了解节约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便其坚定地与浪费粮食的恶习作斗争；继续探寻有效的相应压缩城市粮食供应的可行性举措。在过去两年间，国家在农村出售的粮食占到其在全国销售粮食总量的35%—40%。由于我们对粮食供应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依然存在如下情形，即并非所有地方的粮食供应和组织问题都能尽如人意，从而引起一些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的不满。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不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得到了粮食，而那些本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却得到了最少的粮食供应。据群众反映，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滥用职权，以及针对农民的经济制度宣传不到位等现象。上述情况表明，只有我们组织好粮食供应工作，消除目前粮食供应工作中的不足，农村的粮食供应才能够变得公正而合理。

国家的粮食采购和供应计划业已确定，供应额度已不可能增加。而增加这一额度势必令我们作茧自缚，引发严重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我们只能缩减，而无法提高粮食供应计划。而确保我们不违反供应计划的保证，就是在公正、合理基础上全面地组织好我们的供应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确保所有必要的供应计划不减少；(2)对有可能缩减或节约粮食供应的各地区和消费领域，采取缩减举措。这样做，既可保障消费，同时又可防止浪费。我们还可改善粮食供应体制和工作，动员全国各地区，尤其是国家机关、企业和军队的人们共同与浪费现象作斗争，节约粮食，这样我们就完全能够在不违反供应计划的情况下节约几亿斤粮食。

由于1954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收入减少和粮食供应量增加，我们1955年的粮食供应已开始出现紧张苗头。为了控制3—6月间的粮食供应，未来我们必须重视粮食的集中供应工作。我们注意到，去年许多地方的粮食集中供应工作并非依照应有的方式加以组织。鉴于此，我们必须依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再就粮食集中供应问题作出整齐划一的解释。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违反粮食供应计划的行为。

4.在农村合作化速度放缓的同时，上述举措的实施无疑对缓解当前农村紧张局势，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春播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立即落实上述指令性举措。中央要求各省、市立即研究中央的这一指示，并在收到指令五天内将其连同采购、供应计划下发到各区县；各区县在收到指示十日内则应将相应的采购和供应计划，以及中央的政治方针传达到各乡镇；各乡镇应以最快速度把相关内容告知每个农民，以便其能够积极投入春播工作和安心家庭经营，全力夺取1955年粮食丰收。

(该文件可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并下发到各区县；附表将分别发送到各省、市)。

(1955年3月3日)

属实：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共发送5份

1955年3月11日

第359号

附表

1955—1956年度国家粮食收入和支出复审计划(计算单位：亿/斤)

省市	收 入			供 应			收入和 供应之 差(已 修订)	财政 保障 (已修 订)	出口 (经修 订)	支出 总额 (经修 订)	收入和 支出之差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 通不便 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929.7	900.00	29.70	772.81	753.81	19.00	+146.69	34.00	40.00	827.31	+72.69	43.08
华北	60.70	58.55	2.15	102.50	99.78	2.72	-41.28	4.00	0.30	104.08	-45.58	
北京	0.60	0.50	0.10	16.00	15.50	0.50	-15.0	0.51	—	16.01	-15.51	

续表

省市	收 入			供 应			收入和 供应之 差(已 修订)	财政 保障 (已修 订)	出口 (经修 订)	支出 总额 (经修 订)	收入和 支出之差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 通不便 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天津	1.60	1.55	0.05	14.00	13.61	0.89	-12.06	0.80	—	14.41	-12.86	
河北	35.00	33.80	1.20	55.00	58.61	1.39	-19.81	2.42	0.20	56.28	-22.43	
山西	28.50	22.70	0.80	17.50	17.06	0.44	+5.64	0.27	0.10	17.48	+5.27	0.80
内蒙古	29.50	28.60	0.90	9.70	9.45	0.25	+19.15	0.35	1.20	11.00	+17.60	1.00
东北	168.00	162.50	5.50	180.70	127.39	3.31	+35.11	7.65	24.17	159.21	+8.29	
辽宁	32.00	3.10	1.00	59.00	57.50	1.50	-26.50	4.15	3.50	65.15	-34.15	
吉林	54.00	52.20	1.80	28.60	27.88	0.72	+24.32	1.65	7.60	37.13	+15.07	
黑龙江	71.50	69.20	2.30	37.90	36.94	0.96	+32.26	1.80	12.82	51.56	+17.64	
陕西	10.50	10.10	0.40	5.20	5.07	0.13	+5.03	0.05	0.25	5.37	+4.73	0.40
西北	48.63	47.35	1.28	33.50	32.65	0.85	+14.70	2.50	0.20	35.35	+12.00	9.00
陕西	23.63	23.00	0.63	16.20	15.80	0.40	+7.20	0.60	0.20	16.60	+6.40	
甘肃	16.00	15.60	0.40	11.20	10.90	0.30	+4.70	10.0	—	11.90	+3.70	
青海	1.90	18.5	0.05	1.60	1.55	0.05	+0.30	0.40	—	1.95	-0.10	
新疆	7.10	6.90	0.20	4.50	4.40	0.10	+2.50	0.50	—	4.90	+2.00	
华东	238.17	280.55	207.62	220.91	214.00	4.91	+14.55	10.00	3.80	229.80	+0.75	
上海	0.50	0.45	0.05	27.50	37.50	—	-27.05	0.60	2.50	30.60	-30.15	
山东	53.00	51.30	1.70	50.00	48.73	1.27	+2.57	4.00	0.20	52.93	-1.68	
江苏	73.50	71.10	2.40	61.00	59.45	1.55	+11.65	1.30	0.40	61.15	+9.95	
安徽	50.67	49.30	1.37	36.91	35.97	0.94	+13.33	0.60	0.50	37.07	+12.28	
浙江	40.50	89.20	1.30	29.50	28.75	0.75	+10.45	1.80	0.20	30.75	+8.45	1.00
福建	20.00	19.20	0.80	16.00	15.60	0.40	+8.60	1.70	—	17.30	+1.80	1.20
华中、华南	250.50	242.80	8.20	187.00	182.27	4.73	+69.08	7.00	10.13	199.40	+42.90	
河南	52.00	50.80	1.70	44.00	42.89	1.11	+7.41	0.90	0.68	44.47	+5.83	
湖北	41.00	39.70	1.30	36.50	35.58	0.92	+4.12	1.60	0.40	37.48	+2.22	1.00
湖南	44.50	43.10	1.40	30.00	29.24	0.76	+13.86	0.60	2.70	32.54	+10.56	2.00
江西	32.00	31.00	1.00	20.50	19.98	0.52	+11.02	0.40	—	20.38	+10.62	1.00

续表

省市	收 入			供 应			收入和 供应之 差(已 修订)	财政 保障 (已修 订)	出口 (经修 订)	支出 总额 (经修 订)	收入和 支出之差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原始 计划	复审 计划	减少					经修订	包括交 通不便 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广东	51.00	49.20	1.80	39.50	38.50	1.00	+10.70	2.85	4.30	45.65	+3.55	
广西	30.00	29.00	1.00	16.50	16.08	0.42	+12.92	0.75	2.05	18.88	+20.12	2.00
西藏	134.20	130.15	4.05	88.00	86.77	2.23	+44.38	2.50	0.20	88.47	+41.68	23.68
四川	94.00	91.00	3.00	58.50	57.02	1.48	+33.98	0.87	0.20	58.09	+32.91	
贵州	16.70	16.15	0.55	12.20	11.89	0.31	+4.26	0.28	—	12.17	+3.98	
云南	21.00	20.50	0.50	15.00	14.62	0.38	+5.88	1.20	—	15.82	+4.68	
西藏	2.50	2.50	—	2.30	2.24	0.06	+0.06	0.15	—	2.39	+0.11	

1955年2月27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34-70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 接触(1955年3月14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3月14日

今天11点30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在相互问候以后，大使通知我，埃及驻印尼大使阿里·法赫米·阿尔·阿姆罗乌西不久前礼节性地拜访了他。埃及大使在会谈中对黄镇说，埃及的商务代表团应该到印度尼西亚来，它的任务之一是要达成一份关于埃及商品(棉花和大米)转出口到中国去的协议。接着阿姆罗乌西说，据报纸的报道，以色列打算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去。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中国与以色列的谈判将会给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留下负面的印象，这一点可能会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来。

按黄镇的话来说，他回答埃及大使，中国是在实行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及主权为基础去建立和发展与各国之关系的政策。

黄镇对我说，他向自己的政府汇报了这次拜访的情况，并收到了政府支持结识埃及代表的回音。因此黄镇决定以礼节性拜访的方式回访埃及大使。在查问埃及大使国能否接见中国时，埃及大使馆里的人通知说，埃及大使因公务繁忙而无法在向他提出的那个日子里接见黄镇。不久阿姆罗乌西本人却打电话来请求转告黄镇，身为伊斯兰教代表大会秘书长的埃及不管部部长安瓦尔·阿斯萨达特现在就在印度尼西亚。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重要事情要找中国大使谈谈，并问，中国大使能否在3月20—25日这段时间里访问不管部部长。

黄镇对我说，他拜访我，就是为了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向黄镇提示了我在印度大使的招待会上与埃及大使的那次谈话，当时埃及大使就表示过要与中国大使见面的愿望。接着我说，指出埃及大使不顾礼节地先来拜访黄镇(埃及人早已在雅加达了，而黄镇不久前刚到)这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我补充说，或许埃及政府想要利用黄镇与阿姆罗乌西之间的老相识关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曾作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代表而同时在布达佩斯待过一段时间。我说，在考虑到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坚决要与大使会晤的意向的同时，可以推测到，埃及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途径。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猜想，这次联系是不是为安排预计都会出席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之间的会晤而采取的预备步骤。

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我所说的原因，对他——黄镇而言，与埃及人见面是合理之举。

黄镇表示担心，生怕这次拜访的情况可能会被人在报纸上刊登出来。针对这一点，我对黄镇说，看来应该预先同埃及大使约定，希望他们暂时别提他们之间的这一会晤。我补充说，此外，如果报纸上真的出现一些报道的话，那么这也未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拜访的性质将是礼节性的，而不是正式的。

大使感谢了我的主意。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会谈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会谈期间通报，中共中央打算在1955年3月下半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据毛泽东说，会议将讨论的问题包括：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年计划。2.关于高岗和饶漱石的事。毛泽东还说，这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等同于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即将召开的此次中共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最好询问尤金同志。

附件是给尤金同志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3月19日

第25-c-520号

手写批注：

苏联外交部已给尤金同志发了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23日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将通过外交部的渠道了解情况。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同意。

1955年3月24日

归档。

B.戈尔布诺夫

1955年3月26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H/Вам第476—477号

请向我们通报此次中共所召开会议的日期以及与举办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71-72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H.布尔加宁(签名)

1955年3月19日

副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A.布尔加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刘晓会谈记录

1955年3月19日

刘晓说，当他动身赴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转达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向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很高兴能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场合完成这一指示，并转达对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问候和感谢。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和布尔加宁同志个人在他的工作中给予大使馆的一切帮助，特别是给大使馆提供莫斯科附近的别墅，并准备今天去看这

栋别墅。然后刘晓说，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指的既有欧洲也有东方发生的事件，对所有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走在一起的。

布尔加宁同意刘晓的意见。布尔加宁也问大使是否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实际问题。

刘晓说，大使馆现在没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有曾一时拖延未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大使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相互供货的问题。但随着贸易协议的签订，所有这些问题都已顺利解决了。因此，刘晓说，他想向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刘晓说，实践表明，为了准备苏中双方有关主管部门间的经济协议，在预先的准备工作中花去非常多的时间。谈判本身有时也拖得比需要的时间长。他本人以及北京的领导同志完全归咎于中方部门不会准备问题。负责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中方领导人往往不知道中方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不知所措。北京自己作出结论，中国的工作人员要学习，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准备签订任何一个经济协议前，应当研究自己的可能性。负责经济组织的苏联同志从自己方面管理经济业务中更有经验，应当不客气地提醒中国同志，指出他们的缺点，提出忠告和实际的建议，如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刘晓说，总的结论是，中国和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实施两国全面合作的工作人员，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他们必须解决问题的意见。苏联同志应当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并教导他们。

布尔加宁：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志有时认为可能过于积极，因此只好制约他们。

米高扬：直到现在，我们只好制约我们的同志。

布尔加宁：想知道大使是否有关于台湾地区的任何新情报。他说，最近外国报刊报道，蒋介石将从金门和马祖岛撤退。

刘晓说，他也看到报刊上的消息，最近蒋介石开始撤退这些岛屿上的居民。他说，据现有资料，金门居住约5万人，马祖的居民约1.5万人。

米高扬：我们的情报也是来自报上的消息。

刘晓说，他认真地学习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的资料，他明白了苏联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方针，他想知道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后发生的新情况。

布尔加宁：现在摆在苏联各组织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春播。赫鲁晓夫同志在萨拉托夫召开中伏尔加地区农民大会，大约有2000名党政积极分子参加。关于农业形势，布尔加宁说，去年乌克兰严重歉收。因此，在国家总平衡表中粮食、油类作物、甜菜等缺额。因此，今年我国经受一定的困难。布尔加宁继而着重地说，我国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方面也面临重大的任务。

刘晓：中国也经常遭遇歉收。

布尔加宁：众所周知，现在对外政策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是：在西方的德国问题，在东方的台湾问题。其次的大问题是裁军问题。关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强调指出，这一政策永远是积极和主动的，而美英集团只好自卫。例如，在批准巴黎协议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就是这一证明，在今天各报公布苏联政府致法国的照会中，阐明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现在，大家知道，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分会在伦敦开会。去年在联大第九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采纳英法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裁军建议。但是，美国拖延了对苏联建议的审核，决定把这一问题转给正在伦敦开会的裁军委员会分会审核。

苏联政府建议销毁核武器，停止生产核武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我们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世界会议。我们同意进行监督。大使可能会产生问题——怎能让侵略集团的监督人员进入苏联？

刘晓：确实有这样的問題，因为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些代表抱有怎样的目的。

布尔加宁：美英集团不会销毁核武器和禁止生产核武器。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他指出，策划奴役别国人民的美国侵略者不会放弃自己的阴谋，不会同意销毁核武器储备的建议。

布尔加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远东的政策也是主动的，我们对台湾问题共同立场就是这个范例。这样，布尔加宁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执行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刘晓说，由于苏联采取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对外政策，美国不得已而自卫并企图摆脱困境。因而苏联的建议得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英集团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刘晓再次感谢布尔加宁的谈话。

布尔加宁：关心刘晓在外交使团的状况。

刘晓说，他已逐步熟悉了自己的新任务，现在他要熟悉其他国家的大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想成为他的真诚朋友。例如，英国人在谈话中向他表明，英国同情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站在他的方面。

会谈持续1小时15分。

记录：И.库尔久科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27-32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机密

致B.M.莫洛托夫同志：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在今年3月17日的法国国民会议外事委员会会议上宣称，关于召开印度支那问题的三大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会议的问题已经决定。

从比内的声明中得知，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与会国在贯彻日内瓦协议过程中将产生的问题”，包括撤离海防的问题和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即将举行的大选问题。

根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这次会议将于今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例会期间在巴黎举行。

美、法、英之间达成协议单独开会讨论海防问题和越南的选举问题，无疑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指示，让他们分别拜会艾登和比内，请艾登和比内对举行这次单独会议作出解释是适宜的。

这种做法可向法国和英国政府显示，苏联政府对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表示警觉。

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的指示草案附后。 [80]

请予审议。

B.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 ф.079, оп.10, п.9, д.8, л.4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4月7日

与毛泽东同志1955年3月30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1955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国人民

共和国成立5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人在這些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

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5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3月12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T.Φ.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Φ.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8, п.393, д.9, л.71-75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 [81] (1955年3月30日)

摘自П.Φ.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

张闻天同志重新谈到我们在3月22日商谈的关于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大会的话题。他说，中国朋友暂时不发表官方的意见，如果科伦坡会议参加者决定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这很好，如果同意邀请，那要看当时的局势。但是中国朋友的立场是最好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会议。接着张闻天同志说，尼赫鲁和吴努已问过周恩来，问他是否亲自参加亚非国家的代表会议，如果他要参加的话，请他开会提前两天来万隆，以便与他一起预先商讨会议的工作。.....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年3月31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便宴上

1955年3月31日

今天13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为了对H.C.吉洪诺夫同志表示尊敬而举办了便宴。

除了H.C.吉洪诺夫同志外，我方受邀赴宴的是我和我妻子、扎布罗金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人员乌拉内切夫、尼基京、库罗奇金和绍尔莫夫同志与他们的妻子。

吉洪诺夫同志和黄镇互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黄镇对我说，报纸上的许许多多报道，也包括情报部长托宾的正式声明在内，都说胡志明将会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这消息是不对的。他得到了一个通知，范文同将担任代表团的团长，他们已经在替他寻找必要的住所了。

武官毛升(Мао Шень)上校在同我谈话时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警察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去组织对将要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那些场所以及紧邻它们的地区的保卫工作。不过，保卫工作的情况是不可靠的，受托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军区指挥部拒绝作出任何保证。这情况同样也与雅加达万隆公路有关，这条公路在许多地方都要穿越“伊斯兰教的达鲁尔”匪帮的活动地区，这些匪帮近来加剧了自己的活动。

毛升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去保护中国代表团。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 (1955年4月6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4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4月6日

今天16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会见了我。

他在会谈时向我通报了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他说，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列入代表团的有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的两位参赞以及伊斯兰大会的副主席(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等，一共是24个人。

我说，据我看来，把著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家列为代表团成员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我问，中国代表团何时到达印度尼西亚。对此黄镇回答，周恩来将于4月15日乘飞机从云南省(中国)飞往仰光，在那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缅甸总理吴努会面，并且将与他们进行会谈。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将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加达。

我问大使，他是否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确保与会者的安全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大使回答，他收到了亚非国家代表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的保证，说是印尼政府认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接着他说，为了保卫开会的会所和紧邻这些会所的地区，现在全部警察和在卡维拉兰上校指挥下的第三军区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此外，有一个营正在从第七军区转移到万隆来，而且还在用前抵抗运动的战士组成两个营。他补充说，中国大使馆已经在万隆租下了两幢位于保护区的大楼以供开会期间使用。一幢供周恩来使用，另一幢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范文同用的。

黄镇说，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不久前向他查询，中国政府是否打算提交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初步提案。大使回答阿卜杜尔加尼，中国政府没有这类提案，因为按照茂物会议的决议，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日程将在会议上得到讨论。

我说，就我所知，不久前印度向联合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情况的报告，遗憾的是我并不了解它的详情。因此我问大使，他有没有从联合秘书处收到过类似的文件，大使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补充说，或许秘书处的文件是直接发到北京去的。

最后黄镇通知说，中国大使馆仿效其他大使馆的实际做法，在辛丹拉亚区的多山地区(茂物市东南方20公里)租下了两幢好的别墅，共有8个房间，还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和冷热水淋浴设施。他说，由于雅加达的恶劣气候条件，他打算在一周的中期派自己的几个同事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自己则在周末出行。他开玩笑地补充说，附近有一家很好的中国餐馆。黄镇邀请我到他的别墅里去做客，并请我偶尔派苏联大使馆的职员到那里去。我感谢了他的这一盛情邀请。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21-123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机密

1955年4月7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经同谢尔巴科夫商议后，我们把苏共中央关于即将同朝鲜同志举行协商问题的报告草案呈交给您。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5年4月7日

机密

文本第5份

苏共中央：

鉴于即将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举行协商会议，我们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发给您——这份报告依据近来收到的密码电报材料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发给您的还有《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的报告草案。

1955年4月_日

第_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

由于战争的结果，朝鲜的经济处于极度混乱和破坏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4200亿元(140亿卢布)。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的总产量同1949年相比缩减了40%多，黑色冶金业和有色冶金业，燃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设备几乎完全没有开工，交通瘫痪，农业经济也遭到重大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降到了极点。

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劳动党在国家经济恢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借助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任务。采煤、钢、水泥、化肥、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工业品生产企业均已恢复生产。

但是，在工作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仍有许多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需要引起关注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 [82]

二、农业

.....

三、居民生活水平

.....

四、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经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在朝鲜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31.6%。

截至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提供的设备、原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捕鱼船，汽车，拖拉机，机器，火车车厢，矿山，纺织和能源工业设备，机床，建筑制备，铺路车，电缆制品，测量设备，实验设备，大学参考书，矿物肥料，石油产品。

苏联援建22个工业项目，勘查工作已进行，其中大部分已完成建设所必需的设计工作。

截至1954年10月1日，朝鲜重建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到100个(其中30个是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新的设备来自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依靠从苏联运来的纺织工业设备为朝鲜提高布匹产量提供了可能，从1954年的2210万米到1955年的4420万米。

1953—1954年，建立了20个汽车出租站和113个马车出租站，拖拉机和马匹主要由苏联补给。

应该指出，朝鲜政府利用来自苏联给予的援助，拥有了工业制备和原料，避免了用于人民消费品的100万卢布的支出。后者的支出约330万卢布。这一形势必须考虑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

按照现有协定，1955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商品(包括商品供应)总额达到3.5亿卢布，其中包括安州水利系统的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联公司、皮革厂、鱼品罐头厂、印染厂、矿物肥料厂的设备、材料，火车车厢和起重机，矿业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器材，石油设备，电缆制品，黑金属和有色金属，以及1600万卢布的大众消费品(布

匹、线、药材、棉制品等)。

此外，根据朝鲜对外贸易省的请求，苏联准备满足在1955年向其额外供应商品的揭底，援助数额为2600万卢布。这些商品的清单目前正在同朝鲜方面进行协商。

考虑到朝鲜政府将掌握剩余的货币(来自向其提供的10亿卢布贷款)，允许其向苏联新订购300万卢布的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提供了8万亿元援助。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向朝鲜供应的商品价格远远高出购买苏联商品的价格，按照苏联对外贸易省的资料中国提供的8万亿元援助约折合8.5亿卢布。

在提供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织布机、内燃机、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提供了大众消费品。例如，1954年中国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大豆)，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件服装和其他一些商品。粮食和日用工业品中国将在1955年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向朝鲜提供了铁路修筑、建设铁路桥梁和机车库方面的援助。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总额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6500万卢布；民主德国4500万卢布；捷克斯洛伐克3500万卢布；匈牙利2500万卢布；保加利亚2000万卢布，波兰1900万卢布。

1953—1954年，这些国家向朝鲜供应了机床、建筑和公路设备、电力设备、测量仪器、钢材、医疗器械、棉絮和其他各种原材料，总额约1亿卢布。

注意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成套设备援助，在一系列工业和其他项目的建设给予了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在砖、瓦和水泥厂的建设中提供了援助；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印染厂、度量衡制造厂；波兰援建3个煤矿和2个工厂：砖瓦厂、森林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气制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人民共和国依靠蒙古人民的牺牲与奉献，1954年向朝鲜提供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兽皮。

应该指出，朝鲜没有很好地利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设备和原料。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54年10月1日，国家拥有的11500台机床中有3500台没有装配；1699台锻压设备中有490台没有装配。以及还有大量其他工业设备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设备存放在仓库里，或者露天摆放而自然损坏了。

同时，一些朝鲜领导同志没有对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给朝鲜提供援助产生依赖倾向，他们把足够的精力用于充分利用国内现有资源上。

五、朝中关系

战争期间，朝鲜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战后这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朝中两国同志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在朝中两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反映。

据来自我们驻朝鲜参赞的消息，朝鲜同志不善于同被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建立持久稳固的联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成员也很少同朝鲜同志打交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些朝鲜同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不满，说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还有这样一些传闻，说苏联在利用朝鲜人来对抗中国。例如，今年2月在莫斯科就军事分界线进行谈判期间，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他不想同中国同志就与军事装备修理相关的工作打交道。

朝鲜的实践工作表明，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的对抗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军事司令部也举行了展览，在展览中，中国的解说员按照自己的方案作了解说，击溃武装干涉分子和解放北朝鲜的功勋都属于中国志愿军。

在朝鲜，有一些领导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在朝鲜人民军服役。这一领导集团同担任领导职位的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和睦。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为了把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排挤出领导岗位，对金日成施加了影响。朝鲜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朝鲜军事科学院院长方虎山也被解除了职务，他也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的证据，指责这些人似乎表达过对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担任朝鲜军队和国家机关职务和金日成完全指望苏联军人和其他顾问的不满。

根据大使馆的情报，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这可能会对朝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有根据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有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关注，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自己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今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六、朝鲜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朝鲜劳动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开展的政治和组织工作都处于较低层次。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官僚和命令主义作风。集体领导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都非常薄弱。

在朝鲜劳动党内和在整個国内，和先前一样极力进行个人崇拜宣传，在党的领导层中有一种观点，不这样做目前就很难过。到目前为止，金日成同时兼任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是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机关。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按照惯例，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命令。金日成经常做出一些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反的命令，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例如，他曾指示要减轻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赋税，使其同私营企业处于同一水平。他在未经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要在江界建地下兵工厂，没有考虑高达4600万卢布(230亿元)收支预算，就支配从中国得到的给中国志愿军的补充开支款项，等等。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在国家政权机关选举工作中实施民主监督原则。他们把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最高人民委员会到1952年任期已满。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没有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截至目前，大部分地方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同志都是指派的。

国家机关进行了部分改组，摆脱了现行政治、经济问题的决定常常导致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复杂化的局面。1954年3月，取消了公用事业部，它的功能转交给国家建设委员会。1955年1月上述命令停止执行，此外，重新组建1953年取消的建设部。与此同时，负责建设事务的国务委员会继续保存下来，显然，这一功能已转交给建设部了。在对工业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后，现在建筑材料工业企业被划归四个部门，认为建筑材料工业企业不能归属地方人民委员会管辖。

同时，各部门的领导人员也实行了大规模更换，这破坏了对有经验干部的培养。例如，1954年有近一半的副相被撤。在1954年9个月的时间里，国家计委负责财政和成本问题的副主任被更换了三次。大部分新任领导都来自某个其他领域。

改善国家各机关领导工作风格和方法的问题总体上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为深化集体领导和为巩固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而斗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中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很普遍，行政命令代替了培训工作。近来，在各部、部门和一些企业的领导同志中盛行设立小金库，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举办各种宴会。巩固内务省机关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内务省机关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能力还很弱。

由于财政登记不好、财政纪律松散和没有国家监督造成局势复杂化，方便以各种名义盗用、挪用国家财产。例如，贸易系统就出现了明显亏空，仅在1954年第二季度就支出1929万元，相当于商品流通总额的4.7%。1954年上半年，被盗用消费掉的公款就达到2.809亿元，当时，同一时期消费合作社的总利润总共是4.348亿元。在平壤开设的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因为店员把商品偷光了，把它拿黑市出售。

上述违法行为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非常普遍，在劳动党成员中也是如此。据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材料，从1953年6月到1954年6月，有

22000名党员因盗窃国家财产而被除名。

一些各部、各部门领导同志对上述行为无动于衷，认为侵吞国家财产、职务犯罪的现象在朝鲜的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通讯相朴一禹就作出过书面指示，侵吞国家财产数额不大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和要求他们补偿损失(内阁取消了上述不正确的指示)。

在这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1952年，财政相崔昌益，他纵容这种行为，极力反对财政监督和曲解朝鲜的赋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褒扬资本主义中的某些要素，却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朝鲜副首相。

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对财经纪律进行监督的责任委托给内阁附属人民监察委员会(崔昌益被任命为执委会主席，1954年11月再次被解除财政相职务，据大使馆的消息，原因是越权和挪用公款)。上述委员会没有开展活动。劳动党中央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促进其开展工作，结果，在朝鲜事实上不存在有效的国家监督。

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软弱。军事纪律和警惕性下降了。在将领和军官中酗酒成风，对下属高傲和粗野。有一些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中，都存在叛国、逃兵、自杀等各种犯罪行为。

七、南朝鲜

..... [\[83\]](#)

八、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以下一些事情。

1.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

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我们认为，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是合适的。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5.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人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和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

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6.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问题是合适的，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现在，朝鲜同志制定了劳动党纲领草案，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纲领中提出了在北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和解放南朝鲜的任务。按照我们的意见，在朝鲜目前的形势下，不适宜发表这种性质的纲领和暴露劳动党的最终目的。取而代之，应该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根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H.费德林、B.波诺马廖夫

1955年4月_日

第_号

机_密

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1.要让朝鲜同志注意，朝鲜制定了太多的重建和发展工业的措施，鉴于此，大部分财政拨款都用于建设投资。要表达一种观点，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此时要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地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对南朝鲜居民将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并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5.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

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可能性，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建议朝鲜同志目前不要提通过劳动党新党章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对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6.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的问题。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关于朝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 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4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上

1955年4月9日

今天晚上偕同妻子参加了中国大使黄镇举办的午宴。

出席宴会的有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锡兰公使萨拉瓦纳穆图及其妻子以及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

中国人是在4月6日在我们大使馆里与我们最近的一次会面时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的。当时他说，他要在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举办一连串这样的宴会，以便更亲切地结识与会国的大使和公使。这次宴会他是专门为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举办的。他收到了大家同意参加的回音，并请求我接受邀请，好让我同他的这些客人一起谈话。

第一位到达的阿富汗大使在宴会开始前说，他很高兴能与中国大使建立个人联络，尽管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并没有任何条约，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最好的。他补充说，可以期待，这些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正式的协定加以巩固的。

宴会席间和宴会结束后的全部谈话都是十分自然的，话题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全体赴宴者，其中也包括我，向筹备会议的联合秘书处成员、锡兰大使萨拉瓦纳穆图提了大量的问题。

他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1.联合秘书处根据许多代表团送来的提议制定会议议程的草案。这份草案将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交给各个代表团去研究和讨论。这份议程含有10个问题。

2.议程的主要问题想必将是：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存、原子弹和氢弹、和平利用原子能、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和其他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而且锡兰人并没有这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3.最难以讨论的将是共存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将会按讨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五项原则的方式来讨论。锡兰人说，共存问题是以与联合秘书处最终方案中所采用的措词略有不同的措词提出来的。以“发展共产主义和共存”为标题的问题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萨拉瓦纳穆图没有说，但这个问题在联合秘书处所提交的议程方案中被命名为“国际紧张局势和共存”。同时锡兰人解释说，在以联合秘书处的措词提出来的问题的标题中避免了它的明确的指向性。

此时许多交谈者都说，在讨论共存问题时可以预料到，像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许还有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仆从国的代表团将会增添许多困难，并且将会试图推翻它。

4.几乎对在联合秘书处会议上得到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团都会争论很久，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5.所有关于将会有观察员(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观察员)出席大会的报道都是不对的。根本就不会让任何观察员出席大会的。达成的协议只有一个：将会接受个别代表团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联合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将只准这些非洲人发表自己的声明，然后就要离开会场。

6.大会工作的开始程序如下所述。4月18日上午9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主人的身份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大会揭开序幕。苏加诺总统致词，并正式宣布大会开始。这次会议将会邀请许多客人，其中也包括外交使团的头头们。然后将宣布休息。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但不再有被邀请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将会选出大会的主席和讨论议事日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大概将会当选大会的主席。

4月18日晚上以苏加诺总统的名义举行招待会。

在上午(9—12点)和晚间(16—19点)的会议上拟定各代表团团长的纲领性发言的内容。这些会议也将是公开的。

最后一次会议大概也将是公开的。

大会闭幕后，4月24日将以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为大会的与会者、外交使团的团长们、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广大社会人士举办一个大型招待会。

7.组织问题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代表团成员住的饭店客房也通过抽签的办法分配好了。

大会的开销初步定为500万印度尼西亚卢比，即大会的每一个发起国各承担100万卢比。此时锡兰人开玩笑地说，印度尼西亚在支出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大会的其余发起国都只好按印度尼西亚人的被人为地抬高的官方汇率把自由的外汇转到雅加达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32-135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 (1955年4月11日)

(请尤金同志代发)

苏共中央：

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

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

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

中共中央

1955年4月11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4月12日

今天白天，从报纸上得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失事和搭乘此机前往万隆开会的中国同志罹难的消息后，我拜访了黄镇，并向黄镇表示我对此事的深切同情。

大使表示感谢。

我问大使，他们是否知道失事的原因，因为报纸上列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推测。

谈话时在场的大使馆参赞钟庆发(ЧжунЦинфа)说，他们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保持着联系，根据后者的通报，失事的情景被简单地作了如下的描绘。

飞机在飞到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岛的海岸附近时在空中烧了起来，并坠入海中。报告这一情况的是出事那一瞬间正好位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渔民。根据遇难飞机发出的信号，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救护飞机飞往了出事地点。飞机驾驶员们看到了水面上的巨大斑点，并数到斑点地区有100多条鲨鱼。暂时还没有收到别的详细消息。

大使补充说，中国驻雅加达的总领事赵仲时即将飞往失事现场去。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 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摘自1955年4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1.满足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京局关于给予财政援助的请求，在1955年度从“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援助给日本共产党。

2.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之后，通过它向日本共产党转交这笔资金。

3.批准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文本(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关于同意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款，给予日本共产党以财政援助的电报。

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用于援助日本共产党是适宜的。

请你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交纳给国际工会基金的数额中，划拨出这笔款项，并利用你们现有的渠道，把这25万美元的款项转交给日本朋友，并告之这是“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给予它的财政援助。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H.赫鲁晓夫

1955年4月_日

No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0日

今天13时，当我在万隆机场等待飞往雅加达的飞机起飞时，中国大使出乎我意料地赶到了那里。他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要与我商谈一个紧急问题。

黄镇告诉我，今天14时30分将要开始讨论关于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的问题。黄镇补充说，周恩来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对下面三个问题的看法：

- 1.为什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上表决人权宣言时弃权了。
- 2.苏联政府今后会不会在自己的声明中引用上述宣言。
- 3.如果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这一宣言的基本原则，苏联政府的意见如何呢。

同时大使说，他们希望尽快地得到回答——最好不要迟于明天白天。

我说，抵达雅加达后，我会立即向自己的政府请示，并请求尽快地给予回答。在这之后，大使请我说说我个人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的看法。

对此我声明，我难以作出任何回答，因为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个问题。接着我指出，据我所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表决人权宣言时确实是弃权了，因为宣言的有些条例订得不十分清楚。但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我就不记得了。

大使感谢了我，并说，他将等候回音。

我问，他对大会的印象如何以及有什么新的情况，对此黄镇回答说，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谈话时在场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40-141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2日

今天14时抵达万隆后，我立即从机场出发赶往中国大使黄镇那里，并在他的寓所里遇见了他。

我收到了莫斯科对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今年4月20日我与他的谈话中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复。

我按照我所收到的指示向大使通报了下面的情况：

1.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里曾指出，人权宣言在有着公认的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下述几点：

(1)宣言的有些条文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规定。例如，第13条和第19条。

(2)宣言里没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苏联坚持要把这种条文列入宣言之中。

(3)宣布可以自由传播“信息和思想”(第19条)的宣言并没有包含旨在反对传播法西斯思想和反对鼓吹战争的规定。

我说，考虑到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宣言的缺点，苏联代表团才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坚持要继续对宣言的草案进行加工，以便把它制订得更好。然而，苏联代表团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所以它在表决通过宣言草案时全面弃权了。

2.后来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过援引宣言中的那些在联合国的许多文件里都含有的条文。例如，在苏联于1953年所批准的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中以及在苏联投票赞成的其他一些联合国文件中。

3.根据苏联政府的看法，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应该反对赞成宣言的原则，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可接受的。由于宣言毕竟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所以在基本上赞成宣言原则的同时，再对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作一些相应的说服工作是合理的。

黄镇感谢了我的通报，并说，他将立即向此刻正在开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周恩来转告我们的答复。

大使补充说，尽管大会已经通过了赞成人权宣言的原则的决议，但我们的答复的许多条规定还是可以被周恩来同志在正在进行之中的、将要讨论共存问题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加以利用的。

然后我通知大使，据我所拥有的情报，已有一个名叫萨耶德·沙米尔和一个名叫尤素夫·阿利捷金的人从土耳其经过卡拉奇被派到万隆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大会上传播一种说苏联和中国似乎有着压迫突厥和鞑靼民族之情况的污蔑性声明。

大使同样也感谢了这一情报，并当场就派自己的翻译到正在开会的那幢楼里去，并吩咐他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我们的答复。

我趁会面的机会问大使，他如何评价大会工作的，同时我还指出，周恩来的发言在场外得到了很大的好评。人们纷纷指出，他用自己的声明彻底动摇了诸如伊拉克、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团的立场，这些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打算破坏这次大会。

黄镇在回答时说，他是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今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重大的分歧。工作的结果是准备好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报告，它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基本上是由共同的宣言规定所组成的。

对我的关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大使回答说，他不熟悉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也不了解它的任何一项决议，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上了。

对我认为日本代表团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大使说，日本人对关于和平和经济合作的事宜谈得太多了。

我继续问大使，可以如何评价报纸上关于会上正在进行八国(五个大会发起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以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首脑之间的谈判的报道。黄镇断然声明，根本就没有讨论台湾问题。

接着我问大使，他如何评价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关于解决共存问题的、由七条规定所组成的提案的。同时我还说，第5条规定中所包含的关于“个体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的提案显然是打算为一系列像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侵略性条约的存在作辩护的。

大使说，巴基斯坦人的提案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拖延了政治委员会里的关于共存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个别代表团团长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他指出，锡兰总理卡塔拉瓦拉在这个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涉及殖民主义问题时，锡兰人对苏联进行了正面攻击，宣称殖民主义有两种：旧的一种已一去不返，而苏联所代表的新的一种是现在的主要危险。黄镇接着又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尼赫鲁总理驳斥了卡塔拉瓦拉。大使同样也指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大会上采取袖手旁观的中立立场。

因此我提醒黄镇说，在去年12月召开的那次解决参加万隆会议的受邀国家这个问题的茂物会议上，缅甸代表团，特别是它的团长吴努的立场是有点与此不同的。据现有的情报，当时在把中国纳入大会并决定寄给它们邀请信的那些国家这件事情上，缅甸总理吴努起了主要的作用。

大使补充说，在讨论几乎是所有的问题时采取最反动的立场的是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

在谈话结束时我问大使，报刊上关于大会看来将会延长2—3天的报道是否准确。他说，对此他一无所知。

出席会谈并在最后把谈话内容从汉语译成俄语的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42-145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亚非国家万隆会议闭幕宴会

1955年4月24日

今天晚上，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的闭幕会结束后，在万隆的“霍曼”大饭店以大会发起国的5位总理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招待会。

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说，阿富汗代表团非常满意已结束的大会所取得的结果，特别是涉及保卫和平和安全的那个部分的结果。他宣布，今天白天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已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份条约中就有一条规定要缔结关于领事工作、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有关协定。

中国大使黄镇说，周恩来请我采取措施，让我们的记者十万火急地转发大会的最后公报，而且要求从公报的最后部分——即“促进全面和平合作的宣言”的部分开始转发它的文本。

黄镇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证实了一种传闻，它说的是，大会的闭幕会之所以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才开始，是因为在讨论大会的最后公报的上述最后一部分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突尼斯驻印度尼西亚的常驻代表阿米尔在与我交谈时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代表团对公报中支持给它们以独立的请求的那部分里的决定感到满意。不过，阿米尔补充说，这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并且也无法保证法国会同意这些要求。尽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代表都表示同意的大会的最后公报里对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国际冲突的必要性谈得很多，但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了取得完全胜利而重新开始同法国人进行武装斗争。

应该指出下面的事实：无论是在闭幕会上，还是在这个招待会上，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大使的出席。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48-149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

1955年4月26日

今天19时30分，出席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而举办的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副总统哈塔、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全体部长、军队的高官们、外交部的领导人员、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除了中国大使黄镇和我之外，外交使团的团长中受邀赴宴的有印度大使蒂亚布日、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缅甸代办米亚·谢恩和南斯拉夫代办拉特科·布尔齐奇。

当礼宾司司长库苏莫·乌托约发给我一张上面指明我的席位的卡片时，他告诉我，今天的宴会他们只邀请了今天人还在雅加达的、已结束

的万隆会议的参与国的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

捷克人指着南斯拉夫代办对我说，包括政府机关的正式官员在内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包括外交部的一些官员，都不了解南斯拉夫与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现有的真正关系，因而经常犯类似于今天的把南斯拉夫列入与中国特别友好的国家行列之中的错误。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说，据报道，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报刊对万隆会议的结果的反应基本上是很好的，同时问我，苏联报刊上是如何阐述大会的进程的。

我提醒总理说，在会议开幕前，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B.B.库兹涅佐夫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大篇声明说，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对巩固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合作的事业来说以及对与殖民主义的斗争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祝愿大会取得成功。我同时还指出，总理想必是知道这一声明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证实说，他知道这一声明。

我继续说，苏联的报刊和电台过去和现在都很关注这次会议。同时我指出，我们的记者的许多报道都是通过电报才耽搁很久地从万隆转发过来的，因此都来不及准时送到报纸的编辑部里。

总理在回答时，对此深表遗憾。并说，他们听到了各国记者对电报误时的许多抱怨，他们曾试图根据大会的进程去扩大万隆的电报通讯能力，但是直到大会结束时他们也无法纠正这种情况。

外交部长苏纳约对我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万隆会议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29个与会国一致要求荷兰恢复西伊里安岛的谈判的那个事实。同时苏纳约说，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上对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一切事情这一点抱有坚定的立场。从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一开始出现时，部长继续说，我们就做过很多尝试去说服荷兰。最初我们在圆桌会议上直接向荷兰提出我们要解放西伊里安岛。然后，在第一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时，我们试图通过联合国来说服荷兰，委托我们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九次会议上把西伊里安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在联合国里，在许多殖民主义强国的压力下，这个问题被否决了。现在，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上，西伊里安问题被提出来供其

他许多国家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必要的决议。

部长继续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功地与大会参与国之一的一个代表团商定好了一件事——即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交西伊里安决议的草案。部长总结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顽强而又和平地在为西伊里安与印度尼西亚的恢复统一而斗争的。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时，苏纳约证实了会场外所流行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今年4月24日的大会闭幕会议之所以推迟了将近4个小时后才开始，是因为不得不对最后公报草案中的涉及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那个部分作许多修改。据说，中国提出的方案遭到了相当多的修改。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简短谈话中，他告诉我，万隆会议上没有举行过关于台湾问题的正式谈判，但是在许多小范围的招待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用餐时，周恩来在同苏加诺总统和坐在对面的哈塔副总统谈话时对他们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尽管年事已高却仍在为建设新中国做很多工作。他指出，她所有的亲戚基本上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内在联系的，但她却独自一人始终不渝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坚定地遵守着丈夫的遗训。

在席间的公共交谈时，苏加诺总统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喜欢我们的电影《在印度尼西亚》时给了这部电影以好评，并宣布要把它放给印度尼西亚的观众们看。接着他感谢了我，因为我使他有幸观看了关于列宁的优秀电影。总统指的是，在去年12月在国民党大会上，我按照我们的协议呈送给他的影片《列宁在1918年》。

我说，我们还有另一些介绍列宁的电影，例如《列宁在十月》等。对此，总统说，他会很高兴地看它们的。

我答应去搞到这些影片并寄给他。

用过餐后，全体赴宴者都到宫殿的另一个大厅里去了，在此之前那里已经为印度尼西亚舞蹈家的音乐舞蹈会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受邀出席这场音乐舞蹈会的有各种国家机关的许多政府官员，还有许多大使馆及使团(特别是我国大使馆)的代表。

在音乐舞蹈会后同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简短谈话中，我说，要是用彩色电影胶片把许多印度尼西亚舞蹈拍下来，以便国家的广大社会人士了解它们，那想必会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因为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剧院很少。同时我对他讲，我们国家里广泛采用放映歌舞音乐会电影的方法。

亚明认同这样做会是很有益的看法，但又指出，他们的电影工业(部长更明确地指出，顺便说一说，它是归新闻部管辖的)还很薄弱。印度尼西亚根本就不会生产彩色电影。接着他请求道，如果我有的话，那就把他作为帕拉尔小组的成员于1950年待在莫斯科时所看过的我国电影《西伯利亚大地的传说》寄到他家里来，好让他放给朋友们和家里人看看。

我答应满足他的请求(影片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真的，我们只有一套俄语录制的拷贝)。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52-155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年4月27日

今天20时，中国大使黄镇为欢迎周恩来举办了一个招待会。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时间里，苏加诺总统第一次出席了驻雅加达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招待会。

谈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4月27日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59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 (1955年4月2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开雅加达

1955年4月28日

今天9时，作为印度尼西亚客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逗留两天后离开了雅加达。从周恩来所居住的总统府到机场的整条路线上，都站着夹道欢送周恩来的人，多半是中国人。

机场上有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许多位部长，还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许多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除英国与荷兰大使之外。

周恩来在登机之前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订了一份共同声明。周恩来没有读自己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贺词，而是以书面形式把它转交给了报界。

周恩来通过翻译为他因太忙而无法接见我一事向我致歉。他补充说，他已委托大使向我通报一切情况。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附注：

5月6日在中国大使馆里，有人转交给我们一份万隆会议的材料选集，里面含有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的简短记录、许多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等。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5月10日

АВ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60-161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钟庆发会谈纪要

1955年5月3日

今天18时30分我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的请求接见了。

钟庆发首先提起了今年4月25日我们与他在沙特阿拉伯使者的招待会上的那次谈话，然后说，他来见我是为了继续进行上一次的谈话内容——是否有可能把中文学校的礼堂让出来供观看电影《在印度尼西亚》用。他说，印度尼西亚当局对这所学校的存在持不大赞同的态度，因此，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是特别小心谨慎的。有鉴于此，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为别人的任何措施去使用过学校的建筑物，包括用来放映中国电影。因此很遗憾，他们不能同意校长对格洛莫夫同志的许诺。同时，钟庆发说出了雅加达另外两幢大楼的名称，它们是特价租给任何组织去供放电影、举行大小会议、开展览会等等用的。他还说明，中国大使馆不止一次地为类似的目的租借过这些大楼。

我为自己给他增添了麻烦而向他道了歉，并感谢了他出的主意。接着我要了解一下，为了使大厅里的人既不显得太多，又不显得太少，可以邀请多少人到这些大厅里来。

钟庆发回答，据他的实际经验看来，大约要邀请比大厅的座位数多一倍的人。作为例子，他指出了中国大使馆为欢迎周恩来而举办的那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大约邀请了600个人，而来了280个人，即来了将近50%的受邀请者。

对于我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受邀请者中有许多人没有出席像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这样重要的招待会，参赞回答道，对于当地的情况来说，受邀请者的数目与接受邀请者的人数之间的这种比例(将近一半)并不是低的。实践证明，来参加招待会的通常是三分之一的受邀请者。

接着钟庆发说，受邀请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党员一个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此外，英国大使、荷兰大使，甚至连印度大使和缅甸代办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

在谈话结束时，参赞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于今年5月23日出访中国，并将在那里逗留两周左右。

出席会谈和进行中译俄翻译工作的是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Р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2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机密

第一份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B.瓦里科夫同志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附件共计3页。(1955年5月9日第198号)

B.库兹涅佐夫(签名)

第2689/480号

附件：

摘自B.A.瓦里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3月9日

第198号

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5月6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临时代办。

会谈伊始，周秋野便感谢我建议其参加铁托总统于今年5月5日举行的招待会。周秋野对参加此次招待会很满意，因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如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如缅甸大使、埃塞俄比亚公使、日本公使、以色列公使、缅甸使馆武官，等等。

随后，周秋野向我通报了关于他与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在这次招待会上的会谈情况。

周秋野把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所谈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 1.作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的任务是：稳固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 2.在美国敌视中国的人的数量正在下降，这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有着重要关系。
- 3.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曾三次访美，其间签署了大量南斯拉夫与美国协议，但在主权问题上南斯拉夫没有向美国作出过任何让步。波波维奇还说，他们——南斯拉夫人可以给中国代表看这些协议的内容。
- 4.美国统治集团不喜欢南斯拉夫的制度，并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另一个政府。但是，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宣称，美国人又不得不与现状妥协，甚至给予南斯拉夫帮助。
- 5.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如今随着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南斯拉夫的情况已有所好转。

随后，周秋野询问了我一些问题：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梅捷列斯来访南斯拉夫的目的等。

关于“援助”问题，我向周秋野通报了一些情况。

至于梅捷列斯来南斯拉夫的访问目的，我说，目前仍很难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但依据土耳其和在背后支持土耳其的美国的政策来看，可能预测，梅捷列斯此行是想使美国人的观点在巴尔干联盟获得通过，尤其是在该联盟的军事发展方面。

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周秋野说，他们的(中国的)大使将于5月16日从中国起程来南斯拉夫，并将居住在目前由波波维奇居住的别墅内。

据周秋野说，南斯拉夫人已答应向其提供办公设施和为期两个月的居住设施，南斯拉夫人已展示了即将竣工的住宅楼，那里拥有10—12个单元，每个单元拥有1—2个房间。至于办公设施，周秋野说，中国使馆请求南方提供一座不少于30个房间的建筑。

在会谈结束时，周秋野请求我就一些礼节性的问题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他请我建议，他是否应当去拜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因为后者曾在5月5日会谈期间邀请他(周秋野)去自己的别墅。

我对周秋野说，我认为这样的拜会是有益的。

周秋野说，他会这样办。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B.瓦里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佐林B.A.同志、欧洲司、情报委员会和档案室

1955年5月9日，第a6/290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172-175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绝密

北京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将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 [84] 同志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已另电发给您)。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要使他知道，从比布罗夫斯基消息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霸占越南南方形成的局面，以加强那里拥护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坚持反帝国主义立场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同时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同志认为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补充措施，需不需要我们方面的某种援助。

请转告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具有在越南南方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完整的有关越南南方的情

报。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正采取措施，准备在一些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揭露美国人在越南活动的文章，揭露他们的活动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匪帮，反对越南南方的爱国反帝力量。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已得到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

电告谈话结果。

АВІРФ, ф.079, оп.10, п.9, д.8, л.12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近来，美国人加紧了在南越把法国人排挤出越南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积极开展把法国人排挤出军队的工作，同时把自己的顾问安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广泛使用收买政策，不仅收买个别的政界人士，而且收买整批的组织，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国内各政治集团间内讧的加剧，突出表现在南越政府的军队和各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之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事实上。

南越形成的局面可以被利用来加强南越那些拥护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帝立场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南越的局势出发，劳动党中央今年4月1日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议中对越南南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下达了指示。

然而，在南越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指示的事情上存在着严重缺点，从拉夫里谢夫 [85] 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中即可可见一斑。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揭露很差，而且前后不一致。但同时，美国进行的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却声势浩大。

我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还远没充分利用越南南方形成的局势在

国家的这部分开展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正面临1956年7月的大选。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越南朋友对在越南南方开展活跃的工作以团结爱国反帝力量予以更大注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还认为，授权尤金同志与中国朋友、授权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朋友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是适宜的。授权波诺马连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以便通过他们驻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获取经常的并尽可能充分的关于越南南方局势的情报。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17日

第747/M号

附件：

机密

第_份 草案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通报他以下内容。

..... [\[86\]](#)

ABПРФ , ф.06 , оп.14 , п.12 , д.170 , л.1-2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5月19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基里琴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

第49项 关于萨布罗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的结论) [87]

委托萨布罗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进行审批。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8, л.35-39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1955年5月19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鉴定结论”

第120号记录第49项

委托米高扬(召集人)、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而制定的苏联政府计划的鉴定结论，并将自己的建议提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

附件：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不晚于1955年5月19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 [88]

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交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我们认为，在计划草案中所采取的方向和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生产产品的速度与水平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个别领域的计划草案需要作下列说明：

有关工业方面

一、根据工业燃料部计划草案规定的，转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生产能力为4280万吨的新矿井的储备量不能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所需要的煤的开采量。到矿井建设的中期，即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半至四年里，在储备量方面，矿井必须达到一个大的生产能力，来

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增长的煤的开采量的需要。

二、应该采用新的探测方法来加强在石油方面的地理勘探工作。在1956年至1957年扩大勘探的深度来超过预定的水平，从而到1957年使勘探的深度达到350千米。研究高速度勘测和使用钻探可能存在的潜力是合理的。

三、在所有的发电站方面，为了在进入下一个五年起作用的生产能力的储备量要达到1.1兆千瓦。

为了在下一个五年的前几年保障正常的国民经济电力供应，在电力生产储备方面合理地规定在1956—1957年的主要工作量，从而使基本的电力生产储备在1958—1959年保证发挥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合理地规定初步计划，使其在下一个五年的前3年的生产能力发挥作用，检查总的储备的生产能力的充足是必要的。

四、由于在中国生铁、钢材和轧材方面生产的不协调将会在近来的3年里使生铁过剩达到大约46万吨，钢材大约78万吨。

同时为了满足特殊需求，计划通过进口获得大量的轧材。

以缩减进口黑色金属的轧材为目的，最好是检查扩大生产轧材的可能性以及放宽轧材的规格来依靠在鞍山钢铁公司和太原工厂的新的初轧车间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利用现有的初轧机和小钢锭来补充增加轧材比较好。

五、考虑到铝的意义的提升，因而应合理地加紧氧化铝和铝的生产企业的建设。

六、计划草案在一些机械制造业方面预定了很少的生产产品和利用生产能力低。

这里所说的是应当尽可能地更充分地利用机械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合理预定未来增加生产仪器的品种和开发新的产品种类(专业的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等)，甚至可以扩展到生产农业机械和农具。为进口的拖拉机组织生产农具，这为后来自身生产拖拉机(作准备)。

七、由于根据制定的计划草案到第五年末在硫酸方面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不协调的，因此应合理地规定硫酸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同时希望研究在生产石碳酸时所消耗硫酸的正常值时硫酸的现有储备。

八、由于必须发展棉纺织企业来保障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布料的需求(1952年人均生产6.8米，而到1957年则为9.0米)，而且也考虑到棉花资源的局限性，因此应合理建议中国朋友采取措施在棉纺织企业节约棉花(提高中等规格的纱线、扩大棉布的花色品种等)。

以增加纺织原料资源为目的，希望能制定出组织和发展在纤维素基地通过如芦苇、水稻和禾本科植物秸秆、竹子等资源来生产粘胶纤维的措施。

有关农业方面

九、在当前农业产品的生产开始限定在保障口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方面。这其中制定了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在五年内粮食作物的生产总量增长17.6%，或者平均每年增长3.3%，而这并不能保障实现人均增长的需求。

研究增补农业耕地的流通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灌溉田地的双季种植，通过垦荒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在这地方成立国营农场的有关问题以及研究在垦荒地区更加广泛地采用现代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的农业机械)的有关问题是合理的。

因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条件下，在计划草案中所列的一系列农作物玉米、高粱、谷子是比较耐旱和比较高产的农作物，而这些被计划缩减播种面积，将会导致谷物收成总量的减少，所以这样做未必合适。

十、研究专门的措施来保障制定的计划草案中增加农作物的收成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加快矿物肥料加工工厂的建设，扩大农药的生产规模。

十一、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制定在1957年黄麻种植要比1952年减少12%。而由于民主国家阵营对黄麻有需求，因此希望与麻的种植面积一起扩大，建议恢复黄麻种植面积，这里指的就是增加黄麻出口。

十二、茶叶预计增加生产35%，产量达到11.2万吨，这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地提高恢复茶叶生产的速度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扩大出口量。除此之外，适当地研究改善一些茶叶的等级的措施。

十三、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预定了合作化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易于合作化的农户的数量和每个省每五年的合作化的百分比。制定这样的计划可能导致加速生产合作化的进程和破坏自愿的原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适当地限制有关进行农户合作化的指令。合作化的水平的制定应根据上一年实行合作化的经验来编制年度计划，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有关铁路运输方面

十四、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和近年来运输大量增长的事实，因此合理地研究有关加大运输任务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

预定到五年结束时缩减资金投入总量将为第二个五年新的铁路建设打基础的建立必要的半成品储备形成困难。有必要检验一下在五年里一些增加铁路运输的资金投入的可能性，这既有加强现有铁路运输网络的作用，又有能投入到新铁路线的建设。

有关基建和地质勘探工作方面

十五、在整个1957年全国的投资总量相对于1956年缩减了3%。投资总量的减少将可能导致在第二个五年建设中半成品储备在无形中下降，而建设安装工程总量的下降又将会导致建设工作的缩减。

有关1956年和1957年的投资总量的问题使得多年的计划更加明晰，因此有必要检验一下在煤炭、钢铁、化学领域的工业、勘探工作和铁路运输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可能性。

十六、在计划中所制定的勘探工作的总量不足以保障必要的工业矿物原料储备(A2 + B等级)的增长并有可能阻碍企业设计所要达到的规模水平。

以协调勘探工作总量为目的，适当地补充审查勘探工作的计划，这其中包括计划增加矿产资源储量的机械钻探。

十七、希望使以依赖增加钻探来确定的煤炭勘探工作以及首先在煤炭匮乏地区的采矿工作的总量更加准确，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及时维护矿井区域。

十八、有关铜和铅的计划预先制定的勘探水平是低的，这不能保障企业的规划和它们的资源基地的可靠性。希望能规定提高勘探水平和增加铜与铅的储备量的A + B等级的任务。

十九、也还希望提高钨、钼、硫黄铁矿储备量的增长，制定勘探工作以增加铌、锆、铍、天然硫黄等矿藏的储备量。

有关国内贸易方面

二十、适当地补充检查规定的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它的商品保障供应，也就是说，在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居民的购买需求之间的充分平衡。商品保障供应的估算应该进行到比较广泛的商品种类方面来。

有关军事工业方面

二十一、由于在所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的

材料，也没有关于在战时利用民用机械制造工厂为军事技术生产的材料，因此，不能确定有多少在军事技术方面新建和改建工厂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要求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适当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同审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生产发展前景的问题，从而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在武器和军事技师方面的需求，同时要注意到在战争时期能将民用机械制造厂转为军事技术生产。

附上有关转交给中国朋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

M.萨布罗夫

K.科瓦利

决议案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B.马林

1955年5月19日

РГАНИ, ф.3, оп.10, д.142, л.14

АПРФ, ф.3, оп.65, д.385, л.27-44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6月2日

第598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5月21日15时30分，我拜会了周恩来，向他转交了B.M.莫洛托夫与杜勒斯在维也纳关于远东局势问题的谈话材料。周恩来请求就通报情况一事向莫洛托夫同志转达谢意，他还表示，希望苏中两国政府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接着周恩来说，他在万隆时与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会谈。周恩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5年5月9日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已向尤金大使通报过这些会谈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还通报说，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在北京时，主要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梅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周恩来说，我们方面也制订了关于该问题的反计划。周恩来将这两个计划的文本交给了我，并请求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第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计划

第一阶段：缓和紧张局势

一、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空军人员，包括4人(费希尔等人)和11人(阿诺德等人)，还有多尼和费克图。

(二)宣传方面的措施。对此梅农没有详谈。我们估计梅农可能指的是减少对美国的抨击。

(三)发表关于中美可以友好合作的声明。

二、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梅农同时建议，中美两国委托第三方具体研究双方侨民的回国问题。梅农还称，印度和英国可以承担这一委托。

(二)不侵犯中国大陆的领水和领空。

(三)关于禁运问题的一些措施。

第二阶段：维持缓和的局势

整个这个阶段应持续5—10年。它分两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为“停火时期”，这一时期需要3—6个月。

(一)中国不进攻金门和马祖岛，不将自己的前线向前推进，即不加强金门和马祖岛附近岛屿上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和蒋介石也不加强自己在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武装力量，以保证实际的停火。

(二)通过像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这样的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影

响，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和马祖岛撤出。

(三)可能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

(四)中美两国驻新德里和伦敦的使馆建立直接接触，以解决侨民问题、侵犯领水和领空问题、海上交通问题以及“停火时期”有可能产生的其他所有问题。

二、第二个时期——谈判时期

(一)中美两国谈判。谈判时间：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6—12个月。谈判地点：最可能的地点是伦敦。苏联和印度等特别有关的国家在谈判期间可以派出自己的顾问。谈判的议题仅限于台湾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同意台湾非军事化；中美两国可以签署互不进攻条约。不过，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撤出还要取决于中国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果。

(二)中国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可与中美两国的谈判平行进行，但不在一个地方。可有两种谈判方式：正式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际上将受美国控制；或者非正式的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干扰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中国同意对台湾当局实行人道主义，不迫害他们，同意台湾在5—10年内自治，同意通过选举在台湾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任命蒋介石为省长。

第三阶段：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5—10年自治期满后，中国对台湾实行控制。

第二部分，我们的反计划

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

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至于说中美谈判，它不仅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且即使开始了谈判，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没有任何结果，甚至中美谈判根本不能实现。这意味着，在形势进一步发展的5—10年中，一是由于中国实力增强，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和中国保证对台湾非军事化，美国有可能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这样就能使台湾和平解放；二是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以保住它在远东的所谓威信，并继续扩大它的武装力量，准备新的战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缓和紧张局势阶段，它包括中国收回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我们估计为此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为谈判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撤出美国军队，解放台湾；二是谈判出现僵局。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停战阶段或者战争阶段。如果谈判成功，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和平状态。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没有进行谈判，那么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谈判过程中出现僵局，那么既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也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制订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我们积极进行备战和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条件下，我们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我们可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出的话，我们将不对他们进行军事进攻，但是必须保证不强迫岛上的居民撤离，不破坏民用市政设施和人民财产。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撤出军队，那么我们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此外，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如果美国撤离沿海岛屿，那么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承认美国占领台湾和存在“两个中国”的局面。

我们也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对等的原则下各自采取某些措施，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必须声明，这些条件不能视为交换条件。我们主张中国和美国各自采取下述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释放美国飞行员，以迫使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些措施是：

一、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我们起码应当力争使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今后不阻挠海上交通，并压缩对华禁运货物清单。

(二)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建议中国委托印度处理与旅美华侨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有关问题。如果美国也建议由第三国处理在华美国侨民回国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一建议。

二、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飞行员。在与梅农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拟表示同意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同时暗示，是否释放其余13名飞行员，取决于美国在其他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取消禁运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准备接待美国公众友好代表团。

为了准备拟于第二阶段举行的谈判，中国和美国在第一阶段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保持接触：一、中美通过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保持接触；二、梅农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行使调停人职能。

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可以有两种谈判。一种是中美两国间的国际谈判，谈判内容将涉及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而不涉及停火问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另一种是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解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的谈判形式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这样可使美国摆脱蒋介石集团不参加谈判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我们不打算向梅农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肯定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准备研究一切可能的谈判方式，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至于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能不能实现，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美国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在双方于第一阶段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后，尤其是在和平解放金门、马祖后，紧张局势会大大缓和，因而谈判的迫切性有可能减弱。但是另一方面，金门、马祖和平解放后蒋介石集团内部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可能增强。因此，过一定的时间，实现中美两国

谈判和我们与蒋介石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我们同意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谈判在不同的地点平行进行。

(一)中美谈判。在这一谈判中我们将提出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力量的要求。至于梅农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后的非军事化方案，我们可提出美国武装力量从日本撤走和美国宣布冲绳群岛为缓冲地带的反方案。但是我们在和梅农的谈话中不应涉及这一反方案，只是谨慎地试探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谈判地点可以是新德里、仰光、万隆或者日内瓦，但不能是伦敦。

(二)中国和蒋介石的谈判。在与梅农的谈判中必须再次重申这一谈判的内政性质，但是应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时，我们希望研究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待遇措施，不过，我们只能同意台湾为一个省，而不是一个自治区。

梅农在与我们会谈时的策略是：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让我们同意第一阶段的计划措施，尤其是同意规定我们首先释放美国飞行员的那些措施，但是回避具体讨论其他阶段的计划措施。我们的策略是：先与他讨论前景计划，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摸清他对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全部武装力量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再提出我们的缓和紧张局势方案，只是在会谈的最后才通知他，我们同意在一定的时间内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这将是梅农在以后调停活动中的资本。

然后，周恩来对以上文件作了口头说明，并请求将这一说明通报莫洛托夫同志，他的口头说明如下：

(一)与梅农的谈判是根据3月给H.C.赫鲁晓夫的有关电报中阐述的方针进行的。

(二)中国政府在与梅农会谈时没有披露它解决台湾问题计划的详细内容。计划中的几点是含糊其词地对梅农讲的。

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台湾问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但是我们对梅农说，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他关于台湾问题将在10年内解决的建议。中国政府提出不同意的理由是：在这10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在大选中被更换，此外，美国会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我们对梅农声明，中国主张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际

上，周恩来说，我们明白，解放金门、马祖后将有一个很长的解决整个台湾问题的时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

(三)在与梅农谈判中，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了采取旨在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状况的措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向梅农声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以下步骤可以作为这样的措施：中国方面释放美国飞行员，美国方面取消或者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禁运。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拟于5月底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对他们的指控仅是侵犯边界，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周恩来开玩笑说，美国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手段解救这些飞行员，替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政府说情的有：哈马尔舍尔德、艾登、尼赫鲁、泰国外长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代表，甚至艾森豪威尔就一名苏联中学生“越境”进入西柏林一案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美国飞行员。

(四)我们向梅农指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从金门、马祖撤出它的军队，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临时停火，给国民党军队提供能够撤退的机会。但是，这不能认为是实际停火。梅农称这是中断军事行动阶段。

(五)为了准备与美国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通过苏联、英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一般外交渠道的接触。中国政府还同意之后建立中美驻莫斯科、伦敦和德里大使间的直接接触，或者中美驻这些城市大使馆参赞间的直接接触。中国政府认为，B.M.莫洛托夫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可就台湾问题与美国官方人士联系。

(六)我们在与梅农会谈时强调指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应是中美谈判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曾经声明过。关于这一谈判可能采取的形式问题，我们向梅农指出，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拒绝其他形式的谈判。

(七)我们对梅农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这一谈判直接取决于美国军队是否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有可能背

着美国达成协议。周恩来说，为了不使美国打消这种怀疑，原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知名人士都应邀参加了为梅农举行的招待会。梅农对这一情况十分关切。

(八)在与梅农谈判时周恩来表示，希望他(梅农)回到印度后向艾登和加拿大外长皮尔逊通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内容。梅农向中国政府保证说，这些人士会支持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还说，现在希望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人越来越多，相反，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人越来越少。梅农称，美国官方人士中有人说，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时代，台湾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梅农还谈了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并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自己收复台湾的要求。据他的看法，美国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同意停战，条件是蒋介石留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宣布台湾为非军事化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台湾问题就会解决，美蒋条约就会失效。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不相信梅农的这些话，实际上他反映的不是美国的观点，而是英国和印度的立场。

周恩来说，日本代表在万隆也说过与梅农这番话意思相同的话，他们称，摆脱目前状况的最佳出路是台湾和中国联合，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关于日蒋条约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了。

周恩来最后说，在与梅农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已经深信，印度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当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正如与梅农的谈判所证实的那样，印度人主张台湾问题有待长期解决。至于说美国，它坚持保留“两个中国”，不同意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比较偏向于美国一边。

周恩来将哈里·波立特 [89] 的讲话记录交给了我，要我转发给苏共中央。

周恩来还将一些中国朋友的一封信交给我，也要我转给苏共中央。

我将关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和大连联合公报草案转交给周恩来，并告诉他，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希望于5月26日在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一联合公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助理何伟、使馆二等秘书H.K.切卡诺夫和翻译马列。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6日

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3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

相互问好后，黄镇通知我说，5月25日他将偕同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前去访问中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所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一起飞往中国。

大使接下来通报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除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及其夫人外，列入代表团成员的有：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及其夫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利德·莫诺努托、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欧和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国家计划局主席拉登·朱安达和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哈尔索诺·列克索阿特莫佐。列入代表团成员的还有2个摄影记者和5个记者——“安塔拉”通讯社、执政党的报纸《宾坦·铁木尔报》(人民民族党)、《杜塔·马沙拉卡特报》(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苏禄报》(国民党)和进步报纸《印度尼西亚别里塔报》各派一个记者。包括总理的医生、私人秘书和副官在内，代表团的总人数一共是19个人。

在谈话过程中，援引一些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后，我问大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出面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大使回答，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补充说，这是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意向中的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打算是想要中国给予印度尼西亚以财政和经济上的援助。

黄镇继续说，现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而且并不排除这次危机甚至可能会导致内阁辞职的后果。指出支持政府的那些党中间的缺少协调，特别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政府对政策的严厉批评后，大使援引了三个依他之见是有损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稳定性的因素。

第一，国家的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黄镇说，当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已经是摇摇欲坠的了，政府无法使财政情况得以巩固，相反，它继续在恶化。国家预算的特点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按大使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请求印度尼西亚银行向政府提供25亿卢比的贷款，以便平衡国家预算。

第二，居民不满意，因为政府无法因伊斯兰教“勒巴兰”节 [90] 的来临而保证向居民供应纺织品(按照宗教传统，伊斯兰教徒在这个节日之前会购置新衣服)。这一情况被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用来攻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

第三，不久前的燃料涨价导致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按黄镇的话来说，燃料涨价的措施是财政部长朱安达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要一年多收到5亿卢比。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为了确保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汽车运输业的用油，政府自己就应该缴纳这笔款项的50%。

我说，从提高燃料价格中获得好处的是那些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石油工业的外国公司。然后我补充说，财政部长朱安达虽说是国民党党员，但根据他的观点来看却是与“马斯友美”党非常相似的，所以提高燃料价格的措施或许是他为了破坏政府的威信而故意采取的。大使同意我说的意见。

给财政部长做鉴定时，黄镇说，朱安达收受西德公司的贿赂，因此后者享有他的特别关照。大使为此还把下面那件事拿来作为例子：财政部长制止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实施的日惹糖厂的建设工程。

黄镇指出，反对派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困难重重之机正在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即将举行普选了。

接着我问大使，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否全都

回国了。

大使回答，大家全都顺利地抵达了。他补充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原本希望一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会乘5月5日起航的轮船离开印度尼西亚。它怀着这一目的把轮船的一部分指挥人员招徕到了自己一方，并与一艘正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的美国航空母舰建立了联系。特务机关希望在公海上截住轮船，劫走船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台湾去。然而，它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因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乘飞机回到了中国。

黄镇接着告诉我，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使者赛义德·哈桑·法基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大使也对他进行了回访。按大使的话来说，在与使者谈话时，后者说，沙特阿拉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伊萨尔王子想要访问中国，如果他得到中国政府发的邀请，他一定会访问中国的。大使补充说，他已经发电报向北京汇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黄镇说，泰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琅·拉塔纳迪布不久前在一个招待会上第一次走到他面前，并同他握手问好。

我说，在万隆大会以后，中国在亚非国家中间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有鉴于此，我向黄镇通报了我与荷兰的商务参赞卡托尔的会谈情况。

黄镇问我，买用作大使馆的房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我已经买了一幢房子，而其余的两幢房子将在6月初买下来。

大使对我说，他已经买了一幢供军事参赞用的房子，现在正在物色一些供自己用作私人府邸的、供商务参赞和大使馆情报部门用的房子。他补充说，大使馆职员共同驻扎在一个地方会给开展工作造成许多不便。

谈话结束时我对黄镇说，我一定会到机场来送他的。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利阳(Линь Ли-ян)、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7日

绝密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5月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1925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 [91] 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年)，胡风在日本。 [92] 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 [93] 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

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

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 [94] 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

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T.Φ.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Φ.尤金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393, д.9, л.107-112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将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5月23日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内容另电发给您)。

请通知周恩来同志，就说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达成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的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以有利于进行1956年7月的普选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准备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南越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保证法国企业能在越南领土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之间的协议范围内无障碍地活动。

至于涉及诸如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的联邦，其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南越保留一段时间部分法国远征军的问题，那就要劝告越南朋友，当谈判过程进展到彻底弄清法国人关于协议条件阶段时再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因为，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显示的，法国人自己是不会提出关于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的。

请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考虑的意见。当我们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后，将指示苏联驻河内大使把我们的考虑通知越南朋友。

谈话结果电告。

АВППФ, ф.079, оп.10, п.9, д.8, л.28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越南朋友请求就他们关于越法关系的初步考虑发表我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已拟订了为回答越南朋友给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指示草案。

苏联外交部认为就此问题预先与中国朋友协商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95]

请予审议。〈RAS〉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28日〈/RAS〉

第820/M号

АВППФ, ф.06, оп.14, п.12, д.170, л.12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内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为了在1956年7月举行普选，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将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越南南方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并保证他们的企业可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他们与越南签订的协议的范围内，在越南领土上无阻碍地经营。

至于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联邦，在这一联邦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越南南方保留一段时间法国部分远征军的问题，请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过程充分弄清法国人关于达成协议条件的立场之后，再回头来研究。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所显示的，法国人自己不会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就此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还能坚持多久。

电告谈话结果。

АВІРФ, ф.79, оп.10, п.9, д.8, л.29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附件一

机密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96\]](#)

与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向越南朋友在其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际地位，在民主和完全履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基础上统一越南，迅速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事业中提供援助。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实现日内瓦协议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执行协议的军事条款，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满意。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强调，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一贯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并宣布，苏联政府将与中国朋友一起，今后将一如既往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给予必要的援助。

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某些问题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执行日内瓦协议

指出协议关于实现越南停火的军事条件已经胜利完成。同时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准备全力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准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政治部分——1956年7月准备举行全面选举，1955年7月26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当局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准备选举的有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在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打算提出几个大国必须支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依据日内瓦协议，政治解决的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了解越南朋友准备的“关于在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党的总路线、策略和政治纲领的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中所指出的在南越斗争的目标和策略总体上都是正确的。

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打算为在南越成立政府而斗争持肯定态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日内瓦协议，举行全越南选举。

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关系有关的问题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南越尽可能与法国人和亲法国分子建立更加广泛的反美联合阵线给予积极评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保障法国企业和种植业在南越的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进行文化合作。

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越南朋友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社会和实业界人士的联系。

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拟发表声明，为了便于统一国家，在南越统一之后，有可能保留某个时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经济、慢一点实行民主改革的共和制度）。这样做是否合适？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与北越的速度相比，就策略上考虑在一定时期有所减慢，原则上是允许的。

三、关于反对美国的印度支那计划

由于美国针对印度支那国家的行动是破坏日内瓦协议，要发表意见，必须建立印度支那进步力量的广泛阵线，进行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国家事务的斗争。应当强调，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朋友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南越所有阶层居民的工作，抵制美国的影响。建议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宗教流派。考虑到宗教界领袖人士对美国傀儡吴庭艳政策的不满，要加强他们的反帝，首先是反美情绪。

四、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柬埔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强调老挝政治解决最正确的途径是王国政府与寮国直接谈判、互相让步。

考虑到1955年5月16日美国和柬埔寨缔结的军援协议明显对抗日内瓦协议，受到柬埔寨某些政治集团的反对。建议越南朋友采取措施，组织柬埔寨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军援协议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违背印度的利益，建议采取措施，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反对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扩大影响。

希望越南朋友们考虑以上所指出的形势，并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加强对这些国家民主力量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动，即为别人提供口实，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日内瓦协议。

五、关于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广泛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与亚洲、非洲

的国家建立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闭幕公报第一章第11节——建议各国政府向该会议的参加国派出代表，交换信息，千方百计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六、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联系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在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越南同志更应当经常地求得中国朋友的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中国朋友更了解越南的形势，越南政府现在致力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不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中经济和军事使团，那就可以向胡志明解释这一做法欠妥。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越南和中国朋友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且行之有效。

当然也不排除，苏联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七、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将拥护越南和平、统一和独立纲领的各阶层居民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给予积极评价。不仅在解放区，还应在南越，依靠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新组织的方法使其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地使用统一祖国的思想是适当的。建议胡志明同志考虑成立群众性的为越南统一而斗争的组织是否适当，有无可能这一问题。该组织能够吸引南方和北方广泛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同时在形式上与民族统一战线又无联系。从策略上看，成立这一组织的倡议应由南方提出，首批这样的组织先在南方成立较为有利。

八、关于土地改革

发表这样的意见：进行土地改革，是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胜利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劳动党关于在1956年7月的选举

前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表示欣赏。告诉越南朋友，劳动党中央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有可能将越南大多居民团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周围、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意见吻合。

九、关于天主教徒撤至南越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将天主教徒从越南北方撤到南方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许越南朋友最好不要阻挠个别的后撤事件，即使是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对宣传，称在难民问题上搞投机。我们认为，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当致力于与南越当局，在居民从南方撤到北方问题上求得类似的解决方法。

建议越南朋友在天主教徒中间多做解释工作，对天主教会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对抗敌对势力在天主教徒移居南方问题上的宣传。

苏联关系问题

1.关于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苏联政府在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之后，决定提供无偿援助，在1955—1956年使用3亿卢布，恢复共和国的经济，根据越方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将3亿卢布用于：

1.25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设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年产10万吨的超大型磷酸盐厂，年开采能力6万吨的黄铁矿，年产3000部各种机械产品的机械厂，总发电量18—22.5千瓦的发电厂6座，2个鱼类罐头厂和2个茶叶厂。

列入以上项目开支的还有通过派遣苏联专定给予技术援助的费用。专家们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沙眼、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援助。

1.25亿卢布用于提供国民经济和居民急需的商品。

5000万卢布留作备用，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

同时应当通知胡志明同志，下列协议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1)关于苏联提供无偿援助，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协议；

(2)关于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支付条件的协议；

(3)苏联和越南政府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的协议。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草案，那就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A.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第三个协议，由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3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商务处。关于这一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于今年5月18交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那就请他发指示将其签署。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议。

3.关于向越南人民军提供物资和提供贷款

通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决定为此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在1955—1956年使用的长期优惠贷款3000万卢布。其优惠条件是：只偿还提供产品的一半价格，年息2%，从1960年开始分8年还清。通知胡志明同志，如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苏方将授权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有关备忘录。

4.关于提供在苏联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5年苏联的教育机构可以收300名越南公民。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由无偿援助费支付越南大学生1955—1956年的学费，可以同意这一要求。

5.关于俄语顾问的教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从苏联派遣6名顾问，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学校组织教学，还同意派遣给越南民主共和国5名大学俄语教员。

6.军事问题

由于胡志明同志要求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给予援助并为此而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会议，可以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这种援助，并按以下程序实施该援助：

(1)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会同中国军事顾问，制定出初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必要时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给予帮助。

(2)苏方向北京派遣2—3名担负领导职务的苏联军事专家，与中国和越南军事干部一起讨论在越南准备的初步国防计划。

7.关于联合公报

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需阐述苏越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保持和巩固和平的愿望，执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政治解决印度支那和平的部分，还要提到苏方为恢复越南经济提供的经济援助，苏越贸易协议等。

АВПРФ.ф.022, оп.8, п.117, д.30, л.12-21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
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

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中共组织书记任友(ЖеньИё)同志和中国新民主青年联盟组织书记王..... [97]，以中共党组织全体大会的名义正式地发出如下请求，责成高校苏共党委会对各高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实施领导，并将中共党员分配到各系相应的苏共党组织中，从而使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高校党组织的工作，并在其监督之下学习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中国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已就此问题达成既定协议。

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有1183人，其中中共党员482人，中共预备党员96人，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577人，无党派28人。

目前，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已组成了统一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并归中国驻苏联使馆大学生司属下成立的中共党委领导。中国使馆下属的该党委与中国大学生各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并及时了解其活动情况。

1954年初，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曾请求苏共中央研究关于将由在苏联各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组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移交苏联各高校和技术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苏共中央研究了该问题，并于1954年4月17日通过如下决议：“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建立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党组织，并委托各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党组织机关)履行联系和帮助这些中共党组织的职能。

各高校和技校党委应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解决与学习有关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吸引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去完成个别公共义务，向其解释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邀请其参加公开的党的会议，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苏共中央在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中确认了上述内容，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提请苏共中央研究关于把由在苏联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转交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请通知刘少奇，苏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已责成苏联高校和技校党组织肩负如下职能：联系和帮助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基层党组织，给予实际帮助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学习方面的相关问题，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但是，从苏共中央的上述决议中还无法得出如下结论，即关于同意将中共党组织转交苏联高校党委直接领导。

我们请你们向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内的中共党组织书记任友通报这一情况。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И.赫利亚彼奇(签名)

1955年6月1日

第25-c-1167号

手写批注：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同建筑学院的党委书记及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商谈过。

И.赫利亚彼奇，1955年6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23-24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В.А.佐林同志：

回复第551//ЮБА号电。

在河内建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问题，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知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等问题上具有援助越南同志的长期经验。

至于说到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援助，那么越南同志永远都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获得我们必要的建议，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大将安东诺夫

1955年6月7日

АВПРФ, ф.079, оп.10, п.9, д.8, л.32

No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拜访中国大使馆别墅

1955年6月12日

今天早上，在中国人的多次邀请下，我与大使馆的秘书M.A.克罗帕切夫同志和商务参赞部门的工程师H.E.博加蒂同志一起，带着我们的妻子到了中国同志们的别墅。别墅位于离雅加达100公里远的山区里。我们在别墅里受到了我们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在那里待了将近5小时。

原以为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杨琳这一天会在别墅里的。因此我请了博加蒂同志与我一起去了。然而，商务参赞这一天并没有在别墅里。

中国代办钟庆发告诉我，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访中国期间，陪同他的5名印度尼西亚报纸的记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将像他所推测的那样做大量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传播、介绍中国发展情况的真实报道，对大使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写了一些介绍此行情况的优秀的报告文章，并且根据他(钟庆发)的情报来看，他们打算发表一系列较为像样的作品来介绍自己中国之行的感想。

我说，想必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和此行所带来的那个成果，将会在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的选举运动中大大地有助于他(总理)的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钟庆发同意我的见解，并指出，按照他们的观察，一些主要的反对党——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顺利地举行过万隆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后，正在大大地丧失自己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看得出的。钟庆发继续说，即使是根据下面这种事实来看也行：许多长期置身于马斯友美行列之中的政治活动家现在都竭力想要退出这个党并加入到别的亲政府联盟的随便什么党里去。

钟庆发把外交部参赞苏巴尔佐的行为作为例子举了出来，后者前不久还是马斯友美党的党员，而现在已转入了“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按

黄镇的看法，苏巴尔佐只是出于要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行列中，并事先得到被委任担任国家的某一职位的机会的愿望才这样做的。

我向黄镇转达了我昨天与苏巴尔佐的谈话(参阅1955年6月15日的第217/c文)的一部分内容，那一部分讲的就是：他(苏巴尔佐)说，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并且打算凭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立宪大会的会员。对于这一点，黄镇说，苏巴尔佐是个反复无常的大政客，他很了解苏巴尔佐的政治面目，所以可以向我保证说，在昨天与我的谈话中，关于自己的政治归属问题，苏巴尔佐肯定是说谎了。

代办并没有多谈细节，只是告诉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观察得到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有一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1-2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 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为学习苏联本土防空经验，中国政府请求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防空学院学习，学习期限2年。

第一批学生(22名学生、3名翻译、2名机械师)拟于1955年7—8月派，第二批30人拟于1956年8月派。

学生学习费用，中国政府将根据1952年8月9日签署的苏中关于中国公民到高等地方院校学习的协定支付。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政府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受中国52名学生到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请求。

附决定草案。

请审阅。

C.克鲁格洛夫

A.葛罗米柯

附件：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机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决议草案(附后)。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5年_第_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52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本土防空学校学习事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关于中国公民到苏联高等地方学校学习的协定，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其中1955年派22人，1956年派30人。

二、满足中国政府关于随同本决议第一条所指留学生，一起派3名翻译和2名机械师来苏的请求，但指出，此5人到苏联的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65, л.102-104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 参观布特爾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现正在莫斯科的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率领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于今年6月3日按照苏共中央所预定的计划，参观了莫斯科州内务局布特爾斯基监狱。

布特爾斯基監獄滿額為3000人，是審訊監獄。現在監獄關押受審訊犯人1660人，已判刑犯人140人(在獄中進行生產勞動)。

監獄為3層石結構樓房，建於公元1800年，衛國戰爭後重修，設施齊全，狀態良好。

代表團成員有：中國司法部長史良同志，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鐵路水上運輸檢察院檢察長蔡學舟同志，中國司法部辦公廳主任王懷安(ВанХуайАнь)同志，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何蘭階同志，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林亨元同志，最高人民檢察院鐵路水上運輸檢察院副檢察長劉惠之同志，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廳廳長王立中同志，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副主任王戰平(ВанЧжанПин)同志，中國司法部宣傳司司長王汝琪同志，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毛鐸同志，華東政法學院教研室主任曾漢周同志，中國政法學會《政治研究》雜誌主編郭綸同志。

他們在8名翻譯陪同下於上午10點來到布特爾斯基監獄。

代表團成員被邀請到監獄長辦公室，應代表團團長的請求，給他們介紹了布特爾斯基監獄的一般情況，介紹了布特爾斯基監獄作為審訊監獄的任務以及所押犯人的生活條件。

然後代表團成員表示願到監獄裡面看看，觀看一下主管人員認為可以給看的一些監獄勤務。

給中國法律工作者看了監獄接收處，那里正在對被捕的犯人進行接收和遣押工作，辦理犯人文件手續；他們還參觀了衛生站和監獄醫院，而且順便還到幾個病房看了看。衛生站長和布特爾斯基監獄的一名外科醫生還介紹了監獄的醫療組織和總的衛生工作狀況。

然後代表團參觀了食堂，那里正在給犯人做飯。代表團成員對犯人伙食很感興趣，尤其是看到了犯人的菜肴各式各樣，飯食質量很佳。司法部長史良同志還親口嘗了嘗，對飯食表示滿意。

參觀了食堂，中國法律工作者又觀看了3個關押受審犯人的房間和5個關押判刑犯人(在監獄內服刑做工)的房間。

代表團成員提了以下問題：

“他们能否同亲属见面？”

“能否收到亲属转来的东西？”

“被判多长时间徒刑？”

.....

对提出的问题犯人们都有礼貌地作了正确的回答。

随后代表团成员们观看了审讯办公室和监狱犯人图书馆，内有藏书12000册，主要是文学作品。应代表团成员的请求，图书馆主任介绍了犯人们借阅图书的程序。

观看了犯人散步、关押和做工的院子之后，代表团来到警卫人员俱乐部休息喝茶。

在喝茶时，代表团成员又提了许多问题，如苏联的监狱是否一直在内务部管辖之下；监狱管理机关同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机关相互是什么关系；按照什么程序解决这些机关同监狱管理机关间的相互要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会谈之后，代表团成员在俱乐部观看了电影。

最后，史良同志给陪伴代表团的监狱工作人员每人赠送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布特爾斯基监狱的有苏联内务部、检察院、司法部和对外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65, л.86-89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
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机密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我们协助收集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期间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同时大使馆请求通报一下邓中夏儿子的所在地，邓中夏的儿子出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和刘瑾(Лю Дин)、黄斌(Хуан пин)、曹元(Цао Цюань)和夏景光(Ся Цзинь-Гуань)的儿子一起被送入红色工人国际儿童院。邓中夏儿子的名字叫董斯蒂尔(Stell Don，董吉，Дондик)，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Ли Гуй-синь)，原名夏明(Ся Мин)。

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备忘录。

A.葛罗米科(签名)

1955年6月17日

第256号

附件：

中国大使馆请求：

协助提供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如果能找到上述材料的手稿，中国方面将表示感谢。

邓中夏的儿子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有一个英文名字董斯蒂尔。1929年3月或4月被送入红色工会国际儿童院。他的教导员管他叫董吉。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刘瑾、黄斌、曹元和夏景光的儿子。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原名夏明。

1955年6月9日

于莫斯科

文件目录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

- 1.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17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2.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5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东方殖民地分部会议上的发言)
- 3.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报告提纲，1929年1月)
- 4.上海黄色工会的末日。(论文)
- 5.广州起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术。(论文)
- 6.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的关于红色工人联合会代表的工作的报告。1928年5月28日。
- 7.中国农业工人联盟的组织问题。(论文)
- 8.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提纲，为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准备，1929年。
- 9.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工会运动。
- 10.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小册子。
- 11.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上报告速记记录：关于中国工会和游击运动以及托派分子等一系列问题。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307 , л.83-85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7月6日

第236/c号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

1955年6月22日

今天12时15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临时代办钟庆发参赞按预先约定访问了我。

代办说，他是来为自己无法接受我的赴宴邀请而当面道歉的，因为他今晚没空。

我在谈话时说，据报刊的报道，各党最近都在加紧展开旨在建立党

的联盟的活动。尤其是，我指出，一些伊斯兰教的党不久前作出了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要相互攻击的决定。我补充说，由于今年9月底即将举行普选，所以这项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马斯友美党来说。我问钟庆发，他对马斯友美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立场和机会有何看法。

钟庆发说，雅加达市里一度流行过一些传言，说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访中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全体人员将会进行改组。根据这一改组可以想到，共和国的总统将会解散内阁，此后国会也将会宣布自己的解散。钟庆发接着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过一次会晤，会晤时讨论了因即将来临的选举而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说，不久前报纸上报道过这次会晤的消息。接着我补充说，报刊上刊登过关于新内阁人员组成的几种方案的报道。我又问钟庆发，各政党对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机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回答说，现在共产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是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主要的党。马斯友美党在西爪哇和北苏门答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则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以及巴厘岛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钟庆发说，在他从日惹(中爪哇)出行到泗水的时候，他几乎只看到共产党的选举标志，并且很少看到国民党的选举标志。

我补充说，据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声称，该党期望得到新国会的全部席位的40%—50%。

钟庆发告诉我，在与一位具有进步思想情绪的国会议员——国会副主席(他就是基督教的帕尔金多党 [98] 的主席)坦布南的谈话中，后者对他说，如果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那么重新组成的政府的地位将是不牢靠的，因为反对派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国内现存的困难，特别是该如何解决杜绝武装匪徒的活动和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接着我援引了以前与钟庆发有过的一次关于马斯友美党在国内的影响正在日见衰落的谈话，这是与他今天关于这个党有机会获得40%—50%的票数的声明有点相矛盾的。代办回答道，他是在向我转达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现在还很难说。

然后我请钟庆较为具体地向我说明，伊斯兰党派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以前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指的是这些党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进行相互攻击的约定又是什么意思。

钟庆发说，现在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答应在收到关于该问题的消息后就向我通报。

接着钟庆发告诉我，他已向教育文化部长亚明转交了请他于今年8月中旬访问中国的邀请信，后者同意了这一邀请，并收下了邀请信。亚明在举行会谈时说，他想随身携带自己的夫人和20岁的儿子，因为“他们留家里是无人陪伴的”。因此钟庆发只好也邀请了他的一家人。

我问钟庆发，亚明想访问中国的愿望是通过谁说出来的。他回答说，这个愿望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托转达的。

我说，亚明形式上是个无党派，但他似乎是接近“穆尔巴”^[99]的。钟庆发对此予以肯定，并补充说，亚明写了一本书，但它并没有被准许放到市场上出售。我问，为什么书不准放到市场上出售。他回答说，上述书籍是献给在1948年的战斗行动时被打死的托洛茨基分子坦·马拉卡的。他补充说，亚明在自己的书中高度颂扬坦·马拉卡，把后者称作印度尼西亚之“父”。

然后钟庆发通知说，由78个人组成的中国演员团将于6月24日抵达印度尼西亚，该团将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个月左右，并将在该国的各个城市里演出。这个团是应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邀请到印度尼西亚来进行对印度尼西亚演员团去年访问中国之行的回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承担中国演员团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НПФ, ф.091, оп.11, п.8, д.4, л.46-48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保密—密码处处长

Ф.П.马利舍夫：

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家到了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些专家应该通过在各个车间进行的实践，熟悉工厂的技术资料，掌握工厂的整个工作流程，这将使上述专家可以了解工厂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生产。但这些信息都是绝密，根据保密清单属于国家级机密。

根据您在1955年4月9日发送给我的第507c号指示，“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的第五项条款，根据给工厂下达的指示，“只有经过部的特别许可”，我们才能够向国外专家介绍情况。

根据上述所述，请求做出相应的许可。

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厂长

拉兹尼钦

1955年6月23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07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955年6月23日

第1—610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苏联科学院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的筹备情况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您报告，今年7月1—5日，苏联科学院将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

会议定于7月1日上午10时开幕。

会议日程

上午会议

1.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发言

2.苏联科学院在铀—石墨反应堆方面的工作情况

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富尔索夫作报告

3.高能条件下加速器里的核过程研究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谢里亚科夫作报告

晚间会议(17时开始)

4.高能粒子轰炸下核裂变产物的放射化学研究

维诺格拉托夫院士作报告

5.放射性同位素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与前景

恩格尔哈德院士作报告

会议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举行(列宁山)

7月2日、4日和5日，举行科学院分组会议：物理材料科学组、化学组、生物科学组和工程学组。

苏联科学院代理院长

И.Г.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学术秘书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Н.М.西萨基扬(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6, л.77-78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

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254/c号

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

1955年7月4日

今天16时出席了美国大使卡明为庆祝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

根据我的计算，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对于这种招待会来说，这在雅加达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招待会。

在出席者的行列中有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外交部长苏纳约和其他许多内阁成员，还有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和实业界的代表们。

在与大使的简短谈话中我问他，他是否知道一队人数众多的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现在正在莫斯科，他们正在同苏联的国际象棋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

大使回答说，他不仅知道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而且还知道，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已经战胜了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

接着谈话转入了不久前也有一队举重运动员到过莫斯科的话题，而且卡明有点苦涩地告诉我，他们的这队举重运动员也被苏联运动员战胜了。

我则说，尽管他们的举重运动员遭到了败绩，但我还是为他们的这位能在这些比赛中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安德森所取得的那些好成绩而向大使表示祝贺。

应该说，出席招待会的许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想要在我们谈话时给我们拍照。

我还与赫尔曼·弗雷德里克·艾尔本大夫谈了话，他是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的主治医师，我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时刻起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是这位医生检查我到雅加达来所乘的“大洋号”轮船的。

他在我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看得到外国医生纷纷离开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大趋势。这情况说明，无论是在医院里工作的，还是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例如，付给医院里的医生的工资是4000卢比左右，他当然无法靠它谋生。艾尔本继续说，私人开业也不会带来高收入，因为就连报酬很高的印度尼西亚人也不大愿意到欧洲医生那儿去看病，而且一般都是去找别的医生看病的。

接着他说，他听说，现在有机会可以签订到中国去当医生的合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他倒是很乐意到那儿去的，因为他很了解中国。他在1930年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上海港做港区医生。他问我，这一消息是否正确。

对此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5, л.67-68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副本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今年7月4日，以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为首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州希姆金斯基区的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

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现关押945名犯人，他们因贪污、侵吞社会

财产、偷盗、流氓、交通事故和其他不太严重的罪行被判1—10年有期徒刑不等。所有犯人都被安置在2层宿舍楼里；大部分房间都带生活设施，有双层床。在劳改营里，有食品和日用品商店、食堂、卫生站和病人床位、俱乐部、图书馆。全部犯人都在生产车间劳动，生产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产品。

参观劳改营之前，同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国家的劳改政策原则进行了座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内务部在犯人再教育事业中的总的任务，还介绍了犯人的生活制度、劳动使用和政治教育等许多实际工作问题，详细讲述了劳改营教育工作和生产劳动的特点。

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是从生产铝制品、浇铸器皿和拖拉机滤油的车间开始的。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犯人生活区：宿舍、公共食堂、付费食堂、犯人食品和日用商店、犯人个人东西储藏室、卫生站以及个人会见室。

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劳动营政治教育部门和犯人自己独立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社会活动理事会)的政治教育工作。代表团参观了图书馆，那里除其他文艺和政治书籍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和人民中国诗人和作家作品的俄译本。

代表团对组织犯人读者代表会和文学晚会讨论古典文学和现代作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法律工作者对吸收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讲演人在犯人中组织宣传讲座也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

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运动场、墙报、光荣榜以及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图片展览和标语，了解了犯人文艺活动小组、提高文化小组和为教授犯人各种专业知识而成立的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代表团成员还观摩了学习司炉知识的犯人小组的课程。

根据代表团的愿望，在俱乐部，犯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参观完克留科夫劳改营，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劳改营首长办公室吃了早餐。

在参观劳改营和座谈的过程中，代表团成员感兴趣的问题是：提前释放犯人的程序，工作日计算，犯人同其亲属见面的条件，犯人是否经

常要求看医生，犯人同某亲属和熟人通信是否有什么限制，是否给犯人提供住院治疗，为什么参观时劳改营医院里没有病人，检察员是否经常到劳改营来，在视察囚禁地时他们的职能是什么，犯人劳动津贴制度，有多少钱落到他们手中，发给犯人的获得专业知识的证书在其刑满释放就业时有多大效力，商店里所卖的食品和日用品哪些是犯人最需要的。

对代表团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相应的回答。

在座谈结束时，史良同志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并以全体代表团的名义说，在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时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了苏联国家对劳改政策的实际运用以及对犯人们所做的大量的教育工作，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才能做到。史良同志还表示，他们在苏联学到的经验将被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工作中去。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C.佩列韦尔特金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65, л.239-242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И.谢尔巴科夫同志：

向您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附件。

附秘密文件86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

A.列多夫斯基(签名)

1955年7月16日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说明。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1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1955年7月9日

第61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B.B.库兹涅佐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H.T.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

向您们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即195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的报告，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的报告，《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提出的八要求》。

附秘密文件83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罗迈进

附件：

机密

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战斗组织，实现了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1954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活动，以便顺利实现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党的统一的措施，发扬党内民主，提高组织和思想工作水平，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的领导工作，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退化变质分子开除出党。通过这些措施使党能够完成去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任务。

依据远不够充分的资料——中共中央党内报告和文件、报刊和其他来源资料，下面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组成、党的机关结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及1954年至1955年初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以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组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发展得非常快。现在中共计有700多万名党员，比1949年时多250万人(1949年——450万，1950年——580万，1954年初——650万)。

农民党员有400万人，其余的300万人分布在军队、工业企业、交通、机关、学校等部门。

根据1954年初的资料，在党员总数中妇女——70万人，25岁以下的——17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的——250万人，农民党员中富农占7.6%，贫农占61.6%。

根据这些材料，共有33.5万个基层党组织。

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近50万人(根据官方材料，一年内接收140万人入党，同时被除名的党员有90万人，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按照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计划到一五计划末(1957年)，仅农村党员人数就达到600万—700万人。打算此时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扩大到30%，以及极大地提高职员、林业工人、学生的比例，等等。这样，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一五计划期间党员人数将快速提高，达到1000万—1100万人。

未来几年党员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某些改变。如果以1953年5月为基准(中共党员人数为610万人)，党内工人党员比例为7.3%，而现在打算提高到10%。

关于逐渐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提高到30%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决定。从而，党在工厂和矿山的党组织建设速度极大提高。到1953年6月(同1950年相比较)，这些企业的党员增长了100.8%，而在各级学校增长了30.8%，在农村增长了8.7%。大规模招收工人入党的转折点是1952年下半年，当时各企业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造，开展了旨在抵制资产阶级向工人阶段进攻的“五反”运动。

现在党的组成中无产阶级工人占10%。在东北大型国营企业比重更高(12%—15%)，而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南方、西北)比重较低(5%—8%)。这是由于工人集中程度不平衡，以及党组织在各地区建立的时间不同造成的。

党员工人在各城市和企业中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不是在所有的企业，甚至是国营企业中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或者存在党员。例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到1954年6月，那里的工人共产党员仅占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总人数的5%，36%的相对的大型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这一地区两年

时间里(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接收入党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和职员占入党总人数的13%，农民党员——58%。提出来的任务是到1957年末，这一地区工人党员的比例要达到20%—25%。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党员中工人和职员的比例占6.5%，但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铁路运输业党员比较集中，达到了60%。

在北京，1954年接收的15224名党员中(除了服务部门)，工人占到2/3(5795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350人在资本主义建设企业，438人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在大型工业中心上海，80万名生产工人中共产党员约有75000人(10.6%)。在1954年接收的46996名党员中，工人占80.2%。在大的党组织中计有党员40000名，工人党员占70%。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大型国营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那么，在许多相对较小的从属于地方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设企业和林业企业，不仅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党员。例如，根据截止到1953年11月的资料，在北京有76%的相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没有党员，而在其他企业中党员人数仅占这类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1.73%(1954年，在私营企业有438人被接收入党)。在上海，截止到1953年6月，14.3%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而党员人数占这些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2.4%。在新疆，根据截止到1954年2月的材料，123家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不少于50人)，有党员的为37家(总共有287名党员和17个党支部)。在东北的资本主义建筑业中固定工人中的党员人数不超过3%—4%，在其他地区不超过1%—2%，而在季节性工人中几乎没有党员。这些情况部分说明了，现在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摧毁后查明，饶漱石在上海时就极力压制工人政治觉悟的高涨，阻碍大规模接收工人入党。高岗甚至指示延缓新成员入党的合理要求。

在农村，在22万乡中有17万个村建立了党组织。但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如果说在解放较早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人数众多，那么，在解放较晚地区只有70%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农民党员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8%，但在个别省这个比例极低(广东0.17%，广西0.18%，湖南和湖北0.27%，河南0.56%)。在这五个省中，人数不足10人的村级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85%。在中国东北地区党员成分占农民总数的0.4%，62%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平均有4—5名党员。在解放较早省份(河北、山西等省)党员成分接近农民总数的1%。

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和其他农村国营企业中，党员人数更少。因此，为了巩固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提出了1955年在工人和职员中党员成分比例达到15%的任务。

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成分比例最低。截止到1954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学校等单位中存在着轻视党组织作用的现象。此外，接收生产战线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也极为薄弱。

北京是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计有23所大学。1953年各大学中接收了977人入党(其中教师112人)。教授党员占教授总数的14%，而在两个国防学院比例为5%。在北京大学的67个教研室中有26个没有党员。1954年北京各大学中党员人数增加了1143人(其中不足接收计划的37%)，但是，那里的党支部规模也不大。工作重心放在了接收大学生和青年老师入党工作上。国内各大学面临的任务是到1956年争取毕业班的党员人数比例不低于毕业生总数的15%—20%，而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达到10%。

党中央还指出要谨慎而积极地接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入党。例如在北京，中学教师中的党员比例为3%，而初级学校教师中党员比例更少(80%的初级学校中甚至没有一个党员)。在四川省(居民总数为6200万人)各大学和中学中共有1933名党员，其中668人是1954年接收的(教师485人，大学生183人)。尽管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存在使党员数量增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人数超过62000人)，但1954年接收党员计划只完成了任务的

10%。各省市大学和中学也都是这种情形。

在科学和医学、文艺和艺术工作中的党员极少。

在主要国家机关中党员比例相对较高，但在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财经和贸易机关，党的力量还很薄弱。

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各条战线进一步壮大党员队伍的纲领，必须强化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为了“研究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接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积极性的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加入党组织，来巩固党的力量”。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地方党组织打算在一五计划后三年期间大规模招收党员。

党的组成在总体上是好的。在各企业主要是接收技术熟练工人、先进生产工作者、积极分子入党，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准备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在农村，近一年来接收入党的主要是贫农和所谓的新中农(土地改革后由贫农发展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愿意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党在农村推行的所有措施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职员和知识分子中也吸收那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士入党。

与此同时，由于党内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经常会在党内表现出来。尽管提高了入党条件(特别是从195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工作问题提出了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谓的“八点要求”)，还是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觉悟较低的人入党。据评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约有5%—10%的党员不符合上述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觉悟较低的人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剥削他人劳动，不想完成党的工作，等等)。这些人将逐渐被开除出党。

例如，中共抚顺(东北)市委对青年党员进行的检查表明，其中只有92.4%的人符合党员要求。其余的8.6%要么是阶段异己分子，要么是觉悟较低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对广东的一个县城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20%以上的青年党员不符合要求。在绵阳(四川省)地区4700名党员中出身雇农的有22人，从事放高利贷的有104人，从事收购土地的有111人，从事投机倒把的有205人，打算做生意的有327人，对党持消极态度的有685人，其他的有1454人(占党员总数的30.9%)。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中有许多党员，包括部分干部，在剥削他人劳动。此时还应补充一下，到1954年末，在较早解放地区有20000个农村党支部，还没有对这些党支部进行检查，没有从中肃清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

在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中，旧的剥削阶级的习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损公肥私的恶习仍没有清除。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现在，当党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给党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和消极分子。1951—1953年在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自愿退党或劝告退党的有41万人。1952年在城市党组织中开展的“三反”运动期间，许多变节分子和敌特分子被清理出党。1954年在农村抗拒统购粮食和合作化的人，或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分子被开除出党(在河南省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2%)。在进行检查工作的薄弱的一些农村党支部中，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7%。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一系列党员有：地方党支部中搞颠覆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分子，破坏党的纪律的人员。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后，党把反党集团的主要组织者清理出自己的队伍，以及把集团的同伴——前中央山东局书记向明和前中央东北局领导层工作人员张秀山、张明远、郭峰、赵德尊、陈伯村和其他一些人——撤职。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过去一年来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对党的组成成分调整得更严格，但党在各领域的建设并不平衡。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章程中确定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章程内容作了某些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组织按照地区或生产部门为标准进行建设。

党的组织体制如下：(1)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2)在各省、市、地区、县、区(城市和农村)——代表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代替党员代表大会)；(3)在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党的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但这个程序只是在部分党组织内有效，因为截至目前，党的代表会议还不能在所有的党支部召开。

党的最高机构。党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3年召开一次，随后应该是中央全体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高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死亡或牺牲的有：任弼时、王若飞、关向应、秦邦宪，由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有：陈伯达、廖承志、黄克诚、王稼祥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云，书记处书记是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董必武、陈云、康生(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周恩来、张闻天、林彪和邓小平(后2人是1955年4月4日中央全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的)。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所有工作，而书记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系列分支机构：组织部、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负责统一战线的部门、领导各经济领域的部门等。195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组后予以扩大，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第一次组建了干部局。去年在取缔中央地方局的过程中，中央机关补充了大量新的地方机关撤换下来的领导干部。中央书记处也得到巩固。

1955年3月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董必武)，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起就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建立了局和分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执行工作，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目前存在一个上海局(辖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4个分局(华南分局、山东分局、新疆分局和内蒙古分局)。1954年，中央委员会裁撤了国家解放过程中建立的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执行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化和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根除某些地方领导干部中的自立倾向。

现存中央局和分局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和市委，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及其机关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由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委会领导。

省和市党组织。省和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省、市委，再后是省、市党的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章程，代表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年至少召开2次，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党的省级委员会(在全部25个省内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领导本省各项工作。在此需要指出，目前大型市级党组织(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不从属于所在地省级党委，而这些城市的市委与省委同级，并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省级委员会组成中有数十名委员和相应的候补委员(例如，在山东省——37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在上海——19名委员)，有1个第一书记和2—4个副书记。省级委员会几乎都有类似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人员编制(例如，辽宁省委员会计有800人)。它

领导地区、市(地区级的)、县和区委员会。

党的市级委员会有类似的结构，区委及生产单位的党组织从属于它。

党的地区级党组织。那里建立有省属地区党委(地区——临时行政单位，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一个行政区平均有8—15个县，还有一些不大的城市。总共计有150余个地区。党的地区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作机关，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大，因为地区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党机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省级委员会对县级委员会的领导，是省和县委员会之间的环节。目前地区委员会得到巩固，干部得到补充，在实现对党的基层机关的领导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县级和区级党组织。县是主要的行政单位之一，一个县平均有5—10个区。总共有2000多个县。乡镇——临时性行政单位，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党的县级委员会是党在农村最重要的机关，直接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党的县级委员会有1名书记和2—3名副书记。县委常委[100]由10—15人组成。从江苏省一个最好的县委员会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其结构。这个县委有4个县组织、32个乡组织、1个国营农场组织、3个负责日常供应的集体农庄组织和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总共计有513名党员(其中县机关和组织中有190人)。县人口——80000人。县委有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委常委——14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4名县委工作人员、4名国家机关代表、1名群众组织代表和1名财政经济机关的代表)。县委下设组织、宣传、财政和贸易、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研究室等部门。每个部门有6名工作人员，在农业合作社部门有10名。县委的主要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合作社，文教工作和卫生，财政和贸易，法律。每个部门都独立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而不是区域划分职责。县委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指示和任务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并组织他们完成，因此，县委的工作人员平时要经常到基层蹲点，较少在县委。县委组成中没有基层积极分子，县委和县委常委的所有人员都是领导干部。

所有的县委员会都有这样的结构和组成，根据某县的特点和党的县级组织的人数可以有所区别。

按照惯例，党中央允许自己的指示和决定、各种党内的解释性文件与资料下达给党的县级委员会。

在各城市建立有党的区级委员会(市属)，各区委从属于该市委员会。它是比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更具强力的机关。

在各县建立有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在许多省，农村区级委员会只是在1953年才建立，因此，他们还未稳固。许多区委没有工作分部，而只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他们主要是乡(镇)级委员会同村级支部联系的纽带。每个乡(镇)党委大约有8—15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是半脱产性质的，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营生。此外，区委书记经常同时兼任区长的职务。

生产单位的党组织。

各大型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来组建，其党的委员会从属于上述按照生产部类划分的党的委员会。例如，北京中央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北京市委不能领导它的工作。这些党的组织有统一的党委，有相应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力。各省直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本省的省委员会，而各市直机关绕过党的地区委员会从属于本市的市委员会。

这样，这个市的许多企业、机关或学校的党支部经常不是同地区委员会，而是同市委员会联系，并直接从属于这个部门的党的委员会。

现在还没有关于改变这个结构的正式章程，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突破，生产单位的党委从属于基层地区党委。

现存城市党委的这种结构妨碍了对党的各支部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

最后应该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的机关是在国家解放的过程中或解放后建立的。这期间党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而且党的成分也变化很大。鉴于此，必须逐渐扩大和巩固党的各级机关。在改变工作方法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党的机关要逐渐由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党的机关应该专业化，面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变得更为专业。另一方面，党的各级机关之间的联系应该加强。尽管党的机关仍然是按照各种体制(中央、地方局、省(市)、地区、县、区委员会)组建的，但党中央、省(市)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在各工厂、矿山、农村、机关、学校、武装部队等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3人。

现存人数多的基层党组织都将建立党小组。在农村党员人数不少于5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在各工厂、机关和学校党员人数不少于1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都将建立基层党支部。在市镇居民居住点、在各大工厂、在大的机关都将建立党的委员会。在重要的大型企业，如果党章没有要求，甚至可以建立有5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的委员会。

截至目前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是按照区域特征，也就是按照乡的规模来建立的。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在农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生产特征来建立党支部。他们都纳入共同的乡级基层党组织。在各企业党支部数量在快速增长，已经逐渐按照车间、部门来建立党支部。

组织工作

1954年中共中央主要关注了以下组织工作：举行省、市和县级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以及基层党组织会议，接收新党员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改善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

代表大会、党委全体会议、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根据1954年2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决定，要求认真关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会议。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从这时起召开了5次中央全体会议和1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1949年、1950年、1954年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鉴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活动而巩固党的统一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党的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个决议成为各级党组织今年活动的基础。会议宣布在党内坚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本位主义的表现，反对变节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斗争。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同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强化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水平。

第四次全体会议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反响，对加强他们的思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3月21—30日，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1.关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陈云作报告)，2.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邓小平作报告)，3.关于召开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就讨论的3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召开经过精心准备。在召开会议前，各省和市党委都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党的工作问题。因此，有100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他们就党和国家的工作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

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展现了党的思想统一。党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看作是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在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时，会议关注了党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四个方面：1. 坚定履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威胁党的统一的言行的决定，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党内讨论应该在党的组织内公开进行，应该坚定地开展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密谋活动。2. 党应该坚定地推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体党员都应该克服骄傲和自满情绪，坚定地开展反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斗争。3. 党应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地对每个地区、每个机关和每名党员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监督。4. 党应该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

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会议决议，并选举林彪和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现行的党章是1945年在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局势中通过的，其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要求对党章进行修改。因此，下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和通过新党章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召开。

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县和区(市属)党组织都就召开代表大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对于大部分党组织来说，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首次召开。在此之前仅仅召开过代表会议，而且还是由党组织安排的。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在全体会议或者由领导干部会议解决。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了惯例。

1954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在某些党组织召开，其中包括3个省、10个市、197个县、32个地区(市)和23个其他(生产单位)组织。比如，在河北省各党组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1956年春举行，地区级党组织——在1956—1957年举行，县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市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这样，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某些地方召开两次)只是打算在接下来2—3年内举行。

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它在重整党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一些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举行，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还没有必备的经验。同时，许多党务工作人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没有理解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或轻视它。他们拖延会议的召开，借口是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代表大会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准备会议需要花大量时间，因此，最好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党的报刊多次强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要求把遵守民主原则，在代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首位。但是，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些指示未得到遵守。最为常见的两个缺点是：会上批评的火力由上至下，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开展自我批评，不想接受下面的批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容忍各种违反纪律现象；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遵守自由讨论的原则，存在领导工作人员向代表团施加压力的问题，等等。在一些代表会议上这种情况引起代表团不满，最后给中央写抗议信。

在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迄今为止，章程中关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规定完全都没有被履行。用领导干部会议或没完没了的常委会议来替代党的会议也是普遍的做法。近来，党让自己的基层组织注意逐渐克服这种错误做法。195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在各重工业企业党组织内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问题的文章，其中

指出：广大党员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对党的领导层的工作几乎没有监督。党员全体会议尽管偶而也召开一次，但流于形式，没能动员起党员，没有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在广大农村，党支部会议没有每年举行，甚至有的党支部2—3年也没有举行过会议。结果，在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根本就没有参加党的生活，逐渐落后下去，丧失了党员的品质。一些重要的问题通常由一个人或不大的一伙人就解决了，党组织总体上没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接收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1954年，无论是城市的党组织，还是农村的党组织，都在积极接收新成员入党。根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时间内全中国共接收了140万人入党(其中农村接收了70万人，军队接收了15万人)。同过去一年相比，农村接收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大部分基层组织，把接收新党员看作是他们一贯的职责，而基层党组织直接从事这项工作。以前接收新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有党的工作方法可遵循。县委或区委的工作队有计划地前往农村，以突击的方式接收新党员。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用了。基层党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并做他们的培养工作，此后再接收他们入党。县或区工作队现在只是被派到没有基层组织的乡或企业。

其他时候，在许多地方接收党员同经济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相挂钩，而不是孤立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

与此同时，在接收党员工作中也有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在一些地方，完全轻视党员数量增长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成党员接收计划。几乎所有区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对接收党员工作持肤浅的态度，主要是重视数量，不注重质量。结果，许多党组织：1.没有认真地选拔可以入党的人，没有对他们的履历和政治面貌进行审查，允许一些可疑的人，甚至是敌特分子混入党内；2.对打算入党的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很薄弱；3.违反接收程序、党的章程和中央的指示，很多人没有经过推荐，没有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讨论过就接收入党，等等，而党委会批准就是采取口头确认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这一系列缺点严重违反了入党要求。例如，根据安徽、山西、四川、贵州省和上海市的资料，1954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5%达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根据四川省委的材料，在农村党支部领导层中有10%的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

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如果不采取严格遵守确保质量和入党程序的措施，那么，一些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敌特分子的窝窝。

党格外关注农村党支部数量增长和巩固的问题。在1954年11月，中央就农村党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当时党中央指出：“如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建立牢固的党组织，若无必要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就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一往无前地实现社会改造的伟大任务。”党中央要求各省、地区和县党委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检查，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工作，制定今后3年党员接收计划，以及把计划通报给基层党组织。

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和状况不符合现在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领域的任务。与此同时，农村存在党员数量增长的有利条件，以便在1955—1957年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农村普遍建立党组织(除了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游牧地区)，使每个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平均达到10人，而在目前已经建立的拥有党员人数不多的党支部，党员人数要达到该村居民人口的1%。计划在这一时期在农村总共接收党员200万—300万人。

在农村党员发展计划中指出，到一五计划末应该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要在国营农场、拖拉机工作站、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村教师中组织党员接收工作，等等。应该首先接收贫农(包括从贫农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以及一些老中农入党。

近一年来，随着农村党组织数量的增长，党内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待加强，提高他们的领导作用。但是，在总体上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仍处于低水平。鉴于此，要认真对待党内民

主生活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及县委和区委要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去年一年内对老解放区比较薄弱的农村党支部不断进行了检查和整顿。这项工作从1951年开始，总共对13万个党支部进行了检查，还剩下3万个党支部没有检查。检查工作应该在1955年结束。中国同志称之为薄弱的或落后的党支部——这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建立的相对较老的党支部。后来，这些党支部没有成立起来，其中大部分脱离了党的机关的控制，结果这里聚集了许多阶级敌人、变节分子，等等。这些党支部逐渐变成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工具或支柱，党的威信受到破坏，阻碍了党的政策的实施。鉴于此，完成对这些党支部的整顿工作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为了改善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上述中央11月会议强调要制定“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规范”，经中央批准后传达给这些支部。

城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问题，党的公开出版和不公开出版的报刊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因此，现在只有关于城市党组织的不完整的资料。各重工业和矿山企业在党员接收工作方面组织非常好，态度积极。接收工人入党计划在很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和和其他类似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党员接收工作。1954年计划没有完成。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多次下达过关于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但各级党组织仍很少关心这项工作，和以前一样轻视党在科学机构、大学、学校等单位的作用。

干部工作。鉴于从1953年开始的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期限内从农村调动和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转入城市，以便加强基本建设和工业，以及使用干部来加强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195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党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中央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对旧的技术工作人员的团结和再培训的政策；大规模培训和干部学习(1953年11月)；关于公布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1955年1月)，等等。

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党委成功地把上述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付诸实际。

多年来，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军队中任职外，就是处于在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党的委员会中。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现在劳动分工更细、干部数量快速增长、专业部门干部逐渐加强，这个体制阻碍了干部的学习、培训和提拔。据此出发，党中央决定：1.在保持组织部对干部集中管理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干部的单独管理体制变为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分别管理的体制。为此把领导干部划分为9类。2.在中央和基层党委下建立干部部门，对相应类别干部进行管理。3.组织部和先前一样负责制定对干部的集中检查和配置的计划，负责干部在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由各机关对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实行监督，并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统一考核的责任。4.在市政、交通、建筑、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单位，那里党的力量薄弱，要建立政治部或批准设立分管政治工作的单位领导人的助理一职。党的这些工作机关在自己的单位内从事党务、政治和组织工作及干部工作。5.划分中央和地方党委之间管理干部的职责。制定干部名册。6.建立对干部进行管理的科学体制，在干部的培训和选拔工作中要坚定地遵守按照道德、政治和业务素质挑选干部的原则。

上述9类领导干部如下：1.军队干部——归军事委员会干部管理总局或总政治部管理；2.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党的宣传部门管理；3.在计划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计划和工业部管理；4.在财政和贸易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财政和贸易问题的部门管理；5.在公共事务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公共事务和交通部管理；6.在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管理；7.在政治法律机关工作的干部——归政治法律部管理；8.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归组织部管理。归属第9类的有：少数民族上层的非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华侨人士、贸易—工业团体，以及在统一阵线机关工作的党务人员——归负责统一阵线问题的部门管理。

贯彻中央制定的新的干部管理体系已经考虑了几年，因为党在挑选大量工业所需的干部时不可能同时为管理干部的机关也配备足够数量的干部。现在这个新体制首先在中央机关实行。其中，1954年5月，中央调整了组织部，强化了组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职能。起初建立的部门考虑了上述对干部的7类划分。在中央组织部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还反映出对干部审查、学习和提拔工作的加强。1955年1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和中共中央关于刊登这份官名录的决定。进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有：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工厂和企业的领导人，科研机构、大学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等。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指出，列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有关任免和调动的问题都应经中央批准。

在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团结和对旧的工程技术干部再培训的问题上，关于组织大规模培训和学习问题的决定中(1953年11月)，中央决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选取和培训为新建、重建和扩建企业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加强对旧工程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以及用5年时间培训30万名新的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部的安排和提拔上还远没有根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保守主义思想、任人唯亲和其他一些错误倾向。鉴于此，党多次注意到了根除这类错误倾向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的各类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把大量军队干部安排到国家和经济工作岗位。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党内存在一个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体制和机构。现在存如下党的教育机关：1.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人员、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等进行培训；2.隶属于省(市)党委的中级党校——总共有7所，对县、区级别的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3.隶属于地区、县的初级党校(学习班)——对区和乡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这类学校(学习班)很少，也不经常开办。不久前决定，高级党校和中级学校划归中央组织部，而中央宣传部将承担领导教学的责任。至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以及各政治类学校和普通学习班的培训期限和学习纪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培训的问题，中央将在今年2月专门研究。

现在打算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的网络。其中包括，打算在3—4年的时间内建立各省(市)党委中级党校。地方党委打算开办一系列学习班，争取在1957年末对工厂和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而党员将在这些学习班进修1—2次。例如，1955年2月，河北省委指示在各县委建立党课学习班，主要接收各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党务工作人员——党员来学习。培训期限——半个月，每期200—300人。计划举办4期。在其他一些市和地区(城市)也开办类似功能的学习班。

进一步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网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培训的机会。

意识形态工作

在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加强了用社会主义理想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决斗争。在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纲要》(1953年12月)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

在国民经济重建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进各种民主改造方面，因而，民主任务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在内党内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角度来讲，都具有局限性。由于上述原因，意识形态工作落后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还存在对意识形态斗争采取姑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现象，轻视理论工作，对党的理论专业干部培训不够，在宣传领域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点，对党员教育工作关注不够。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

要求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高度。

据此出发，党中央在1954年5月召开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就加强宣传和进行党员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1954年10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斗争(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在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宣传的决定(中共中央1955年3月1日指示)。

中国共产党3月会议的决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赋予了重要意义。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习可划分为党员干部学习和普通党员学习两类。

关于党员干部的系统学习问题是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组织开展的。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旨在让领导干部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为学习第9—12章内容，建立了党员学习体系，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班，以及政治学校夜校。理论学习的这些形式囊括了200多万名党员干部。高级班还把原著增补到简明教程教科书中，在高级班学习的干部人数极少，在中级班学习的较多些。初级班学习的是最基础的政治理论课和一点经济建设的课程(党的总路线、现行政策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初级班学习。这一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理论素养和足够的基础知识。在党的各种学习班中总共只有1000名脱产的理论教师，其中多数理论素养很低。在学习理论体系中没有由初级到高级过渡的明确机制，结果许多领导干部几次学习都是那些资料。通常党员学习都是在工作期间组织的。

预定为期一年半的在1953—1954年学习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被拖到了1955年，这是因为在1954年期间全体领导干部都要额外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一些材料。此外，也没有建立对学习的有效监督机制。

今年4—5月在简明教程第12章内容学完和休息两个月后，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从第三章学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独立学习、经过较高培训的人从第一章开始学习。对于没有接受政治经济学培训和学习的人，要安排他们从第一章开始学习苏联党史简明教程。第一次学习理论的领导干部，和以前一样，将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础知识。

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同时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或生产技能，就颁布了一个章程，每个干部都可以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学习。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政治学校夜校和学习办公室来代替学习班。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大学里开设了马列主义夜大。本学年有2300人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习。

普通党员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们的学习同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同。多数基层组织暂时还没有系统的党员学习。目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同党员会谈，或就党的纲领、章程或现行政策给予指导(通常以党支部为单位)。与此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内逐渐形成了党员学习机制，即党支部在讲课人(从党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的人或具有相应水平的党员)的主持下全体党员每月学习1—2次，每次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宣传部撰写的提纲和材料，这个体制目前在大多数党组织得到推行，因为党委建议把它作为基本的党员学习模式。应该指出，超过一半的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学习。近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学习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把这个任务看作是本职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现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中央在1954年就宣传工作问题召开的第二次全

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在对过去3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在1951年5月召开的),会议强调了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和错误,主要是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效率不高,思想水平低。在各级党委及其支部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在某种程序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向党内渗透的警惕性不高,无视错误宣传和错误观点的泛滥。报刊对党的生活问题、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的问题关注不够。1951年建立的基层宣传网络中的大多数环节都断裂了,而在群众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也陷于瘫痪。

从党提出来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坚定地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任务出发,会议指出,现阶段党的宣传应该是关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和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会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执行情况。

上述党中央会议后,1954年7月通过了两项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和关于改善新闻工作,这两份决议中规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在如下领域对农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1.党在劳动互助和合作社领域的政策;2.合作社农业生产高涨;3.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4.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5.普及科学知识,同迷信及其余毒进行斗争。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追求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觉悟的水平,为在农村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稳固的思想基础。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要求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包括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农村党支部的党员教育和活跃党内生活,通过活跃基层宣传网、小组读报活动、农业俱乐部、文艺活动和借助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普及工作。党中央还要求运用组织措施加强各省、地区和县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力量。

尽管1950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报刊工作的决定,但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在1954年7月17日的中央新决定中指出,许多报纸党性和思想性不强,同群众生活关联不够。存在这些缺点是由于各级党委对自己的报纸关心不够。在这份决定中中央要求报刊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介绍党的生活,宣传经济、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

现在党的报刊工作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日报》和党的地方机关报开始每日刊登关于党内生活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尖锐、全面地批评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开始刊登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为了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不久前开始出版专门杂志《政治学习》。

1953年末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的访问对于改善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付诸实施相对较慢。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轻视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宣传工作领域干部配置不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农村的宣传局面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在1955年3月作出了关于宣传材料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别指示。党现在赋予这项工作以重要意义。同年2月份,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各省和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形势外,还讨论并制定了为执行这一指示在改善理论工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最主要的形式是由专门的讲座机构组织授课。在中国所有的省和大城市都建立了这种讲座机构,并开始活动。每个讲座机构每月组织1—2次授课。为组织讲课活动,安排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工作者。例如,在北京,从4月到6月组织了4次讲课,题目为:“为什么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

想”、“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关于唯物主义的讲稿和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和通过收音机广播。听讲座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从今年5月起,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后,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多少排挤了思想战线上正在开始的斗争。)

1954年10月,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报刊上刊登对资产阶级的堕落道德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青年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斗争也得到了加强。

党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私人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改造或取缔。国内共有97家私人出版社,700多家印刷厂,3500多家书店,近1000个书亭,平均每天出版100万—150万册图书,上演2000多场戏,105场电影,657场话剧,还有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舞会、滑冰场和游泳池等。在这类场所和组织内娱乐的人达到20万人以上,在这里工作的服务人员有数百万人。其中的大部分是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中心和传播点。

与此同时,对如下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利用工作也在显著加强:报刊、电影、文学、戏剧等对大多数居民有影响力的传媒。

党在若干方面的工作

1954年党组织的所有活动旨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着力于巩固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改善党的机关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对思想政治的领导,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总体上增强党在各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党坚定地适应新任务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工作,与过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现有的缺点作斗争。

去年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如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上:1.在自己的队伍中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解释工作;2.实施工业建设计划;3.农业合作化和完成主要农业作物的征收计划;4.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5.对私营工业、贸易和林业等进行改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露出党的机关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够动员起一切力量来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种现象流行甚广,具有危害性,最主要的是高岗多年活动给东北工业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1954年6—7月中央对东北进行检查时查明,在许多重工厂和矿业企业中党组织没有进行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轻视党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甚至其中一些人持有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企业可以执行计划和工作,而无需党组织”。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具体表现在对企业党员干部的错误配置上。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担任企业经理及其助理职务的人就比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养。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完全没有书记。东北190个特大型企业的党组织中有75名书记及副书记(23.2%)不能胜任本职,书记还缺53名。领导干部认为从事管理工作要比从事党务工作更好。在许多企业中都有这种情况:党委或党委书记从属于企业经理,经理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凌驾于党委,把党委变成自己的管理机关的附属品。相反,某些党委取代了企业管理,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完全放弃了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变成了管理机关。

在许多企业的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中书记和经理之间不团结,相互拆台和钩心斗角,导致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日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社论中(1955年3月27日)指出:这个现象极具危害性,妨碍了在每个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和矿业企业清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倾向的措施的决议。党中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东北一些企业中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是工厂和矿业企业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共中央建议各省、市党委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状况进行认真检查,批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一危

险倾向。作为一项实践措施，中央建议，从加强企业党委的角度出发，如果有必要就在个别企业内部或在与其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中调换干部。

轻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倾向在一些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和机关中也存在。迄今为止，许多地方认为，大学的党组织不应该，甚至似乎没有权力深入教学过程和关心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没有权力在整个集体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党组织被集体孤立，陷于自己的小圈子。截至目前高校党组织发展很慢，没有起到应有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工作实践造成的结果。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党领导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团结。

近来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大学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

在许多农村党组织中也存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情况。

关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同城市相比较，农村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缓慢地改进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农村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领导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建立在依靠大多数的基础上。数量极少的乡有基层党组织，而且地方政权机关还很软弱。现在形势已出现了根本变化，基层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被党的机关代替的情况随处可见。例如，县委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多数时候不是经过和依靠乡委，而只是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吸收乡委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和乡长)参加工作。每个县委向各乡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几乎常驻，并努力独立做各种事情。在他们那里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独立执行任务比召集党支部会议，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要轻松得多。

同时，乡级组织也替代了乡人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解决各种任务，常常认为不需要他们协助来完成任务。

农村的党组织机构以业务繁忙为由，很少关心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轻视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县级党委在向各区和各乡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地向基层干部解释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不解释党的政策，由此导致基层干部出现严重的命令主义行为，破坏了党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党内存在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应引起重视，要宣传优秀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经验。

许多地方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些经验已成功地向其他党组织推广。各党委对各党组织进行了专门分类，进行直接监督和领导，以便得到和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到落后的党组织中去。

党的报刊系统地刊登了关于一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的先进经验的材料。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党内渗透作斗争。1954年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同个人主义、自高自大和道德堕落进行斗争，同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运动。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的建议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揭露出一系列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私利、歧视妇女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事实。这次检查把大量蜕化变质分子和见风使舵分子开除了党。不久前，《人民日报》(1955年5月2日)公开号召在党内开展反个别共产党人蜕化变质的斗争，增强共产主义觉悟。

党内有部分党员以雇佣贫农、放高利贷、承租土地、商业投机的形式剥削他人劳动。例如，在一些老解放区剥削问题较为严重的一些农村党支部，15%—30%的党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在一些工人共产党员中也存在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在中国底层的剥削现象一向很严重，因此，一些党员很难立即克服它。此外，直至目前党没有认真关注共产党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事实。农村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合作化表明，若不严厉谴责和清除农村党员中的剥削倾向就很难实现党在农村的政策。现在一些最为险恶的不知悔改的剥削分子被开除了党，对一些落后

分子进行了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等。

实行集体领导。中央四中全会后，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报刊和党支部的议程中话不离口。根据一些材料判断，在建立集体领导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去年，许多党委根据具体事实和依据一些党组织推行集体领导的例子展开了宣传和解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例如，河北省委的报纸《河北日报》在1954年10—12月刊登了29篇关于集体领导问题的文章和材料。许多省市县党委从集体领导的角度出发最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在宣传和解释这项原则时其立足点是在集体领导中除了集体讨论和解决各种重要问题之外，个人首先要对所负责的那份工作承担责任和提出倡议。许多工作人员是这样理解集体领导问题的，试图摆脱个人责任，甚至一些最为微小的问题也要通过集体讨论。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结论

1.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其队伍人数一年增长了50多万人，总人数达到了700万。接收入党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贫农(其中包括新的中农)，以及注意更积极地接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在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中的主要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2.党铲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加强了自己队伍的政治思想统一。反党集团的清除是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一，表明党坚定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斗争。

3.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措施。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宣扬唯物主义的运动。在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4.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基层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集体领导赋予重要意义。在许多县和上一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开始定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5.党批评了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采取了一系列清除这一有害倾向的措施。

6.党中央强化了自己的机关，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组织和思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党的干部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监督。

7.地方党的机关改进了领导方式，从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使自己的机关专业化。

8.总体上，党组织成功地承担起了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生产计划和各项政治任务的使命。

9.党持之以恒地关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消除。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A.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5月24日

附件一：

机密

《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马明方同志1954年11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

有计划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3年内，继续在农村中发展200万至300万党员，使全国经过土地改革的乡都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在群众中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各省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工作的具体办法和今后3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各省委讨论农村支部工作的情形和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应在5月以前报告中央。

(1955年2月)

马明方的报告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去进行。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要通过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团结与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的。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展的速度和成效。党必须从以下各方面积极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我们党的组织，在农村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0.8%。党员的成分一般是好的，1953年底统计：雇农成分占7.6%，贫农成分占61.6%，雇农和贫农成分合计占69.2%。

我们的党依靠着农村中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迅速恢复和发

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建设；目前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多年来的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党在农村的组织，培养了大量的干部。现在，在党的、国家机关的、军队的、经济的和群众的组织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是农民出身的。

我们的党，在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下，在农村党的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的。

但是，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程度还不高，资本主义思想在不少党员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的党员只埋头个人生产，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或者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处处为个人打算；有的不积极执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甚至发生对抗行为；有的还有放债、雇工、出租土地等剥削行为；不少党员阶级观点很模糊，对地主、富农缺乏应有的警惕。农村支部的生活一般还不健全。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支部组织成分极为不纯。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全国还有5万个乡没有党的组织，在晚解放区，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的乡仍有30%左右；老解放区也有若干乡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无党员。在一些建立起党组织的乡，因为党员很少，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这些情况，是和目前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

党必须经常注意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纪律和党内团结，从各方面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战斗力量。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老区农村的整党工作已收到显著的成效，约有13万多个支部经过整顿，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支部工作和党员作风。现在还有近3万个老区农村支部，尚未完成整顿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完成。

各地农村经过各项社会改造和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并已涌现出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我们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给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3年内(即1955年到1957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10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全乡人口的1%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农村党员到1957年应发展到600万至700万人。

党首先必须注意结合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积极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发展党员，吸收社员、组员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党员，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建立起党的组织。

党还应注意在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中进行建党工作，有计划地在职工和技术人员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争取这个时期内在这些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20%左右。

党还应注意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中，在农村学校教职员中，在军事、经济重要地区中，在沿海、沿江、沿湖和偏僻山区党的工作薄弱的地区中发展党员。

发展党员时，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包括原为贫农的新中农)中去发展；旧中农中个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也应注意吸收他们入党。选择党员对象，应从阶级成分、阶级立场、斗争历史、政治觉悟程度、和群众的联系、工作表现等方面加以慎重的考察，经过教

育之后，将那些确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分子，接收入党。

发展党员必须和各项工作、各个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离开群众的各种斗争孤立地进行发展党员，是不妥当的。

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均应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发展党员的具体计划。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县委、区委应派遣具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党应加强对新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教育。对于候补党员，在候补期间应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帮助他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做好，不许做坏。

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些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党员都是个体劳动者，农村支部只能按照地区为标准来建立。现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体农民正在逐渐地联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生产。这个情况就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有必要按照地区和生产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加以改变。这里就各地存在的问题，拟作以下一些规定：

1.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乡为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在一个乡的范围內，除了国营农场和供销合作社中的“乡联社”等组织可以单独成立党的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党委领导外，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

2.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乡村，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可建立党的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的支部，以加强党在这些生产组织中的工作。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

3.党章规定：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50人的乡村，得成立党的总支部。但是有些乡已有必要在合作社中设立党的支部时，则全乡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亦可成立党的总支部。

有些乡村过于分散，或党员大多数集中在一二个自然村內，只建立党的小组，不利于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也可以在某些村庄建立支部，以乡为单位建立总支部。

4.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利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地应受乡支部的领导。

5.国营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3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如果党员不足3人时，应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

6.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个别党员时，可暂时与社內的青年团员编成党团小组，以便进行工作和学习。

上述这些规定，各地应按照当地党和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

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支部民主生活

农村支部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和改进支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和党的小组的生活和工作。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

支部委员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支部委员会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应正确地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专人掌管，又都能及时地得到支部委员会认真的检查和讨论。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受到党员的监督。支部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倾听每个党员的意见和批评，经常注意集中全体党员的意见和智慧，以丰富和健全自己的领导。全体党员大会可以随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选举最优秀的党员到支部委员会中来。

支部的最高权力属于党员大会。一切工作中和支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应在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每次党员大会议题不宜多，时间不宜长，但都应有政治的、实际的内容，要确实收到提高党员觉悟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支部委员会对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解决，应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在会议上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党员进行讨论，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发扬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党员大会的决议，支部委员会要组织和领导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现在，有不少支部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用一揽子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代替党员大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支部在召开党员大会时，还可视工作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积极分子参加，这对于联系群众、教育积极分子和取得群众的监督，都有很大的好处。

支部委员会必须密切指导党小组的生活和工作。党小组是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直接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的组织，也是每个党员生动、活泼的学校。支部的许多工作要通过党小组来进行。许多重大问题，先经过党小组的酝酿讨论，就可能使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开得更有准备、更成功些。党小组的这种作用，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在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支部委员会如果忽视了对党小组的领导，就会使支部生活变得软弱无力和没有生气。

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必须加强对党员经常的管理工作，克服对于党员不进行管理和教育的现象。党的组织应按实际情况和可能分配每一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并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逐渐地锻炼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战士。

党的组织还应经常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不断地向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党员，要给以应有的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党籍。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农村支部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些支部一般地说来，党的生活是活跃的，党内是团结的，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各种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在更多的支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和克服缺点的最好武器，即使是最好的党员，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党的组织要支持正确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人，应给以严厉制裁。

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农村支部必须坚决贯彻这些原则而奋斗。

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和

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些倾向作斗争。

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

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农村党员更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懂得党的政策，提高工作能力。

近几年来，各地党委一般地都已重视了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课教员，建立了一定的教育制度，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于农村党员的教育还不经常，缺乏必要与实际可行的制度，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党员的要求，有的甚至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的基本内容，应着重关于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里需要指出，对农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应当注意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关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的教育；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关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及关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政策和各项政策的教育，借以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对于候补党员还应注意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党的省委和地委应根据上述内容编写一些简短通俗的课本或教学提纲，以供教育农村党员之用。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配备党课教员，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各地经验，建立党课制度，每月固定向党员上党课一次或两次，是可行的。目前解决党课教员来源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指定县委、区委委员或县、区机关中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兼任，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教课和工作的地区统一起来，使教学和工作能够互相补益；一种是从支部中选择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或党员担任。有些地方并由县委、区委指派负责干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党课教员传授教育内容，再由他们回去进行讲解。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地方，一般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各地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仿行。

地委和县委应经常了解党课教员的教學情况，帮助他们解答疑难，并定期召开教员会议和举办轮训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交流经验，使他们把教学和自己的学习统一起来。

对于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必须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深入研究党员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经验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学习文化的要求普遍在增长着，各地应注意有计划地满足党员的这种要求。

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0余万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将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迫切地要求建立和加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贯彻党关于互助合作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保证执行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团结和引导周围的互助组和个体农

民逐步走向合作化。

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大体上应注意如下几点：

1.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密切结合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国家伟大光荣的前途等。

2.经常反复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克服现在有些合作社中存在的那种不愿意服从国家的计划生产，隐瞒产量，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等倾向；进行老社员和新社员、社员和社外群众团结的教育，克服有些社员排斥、歧视单干农民的现象；进行爱护社内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勤劳生产的教育，克服现在有些社员中存在的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害别人利益、损害合作社利益的现象。

3.向社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根本路线的教育，进行贫农和中农亲密团结的教育。因贫农土地少、生产工具少而排斥贫农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因中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多而在生产分红中降低中农应得的收益也是错误的。必须教育社员懂得：没有贫农和中农的亲密团结，我们在农村中各项建设与改造事业都不可能胜利前进。

教育社员懂得：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不满和仇视的。为了防止富农对互助合作组织的影响和破坏，为了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目前不能允许富农入组入社，将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发展和巩固时，再根据条件，分别吸收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入社，加以改造。有些人误认为“现在富农老实听话了”，说富农“有文化”，“有管理生产的经验”，因而过早地吸收富农入社，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有些合作社因为富农分子混入，从中操纵以致变质的事例，应引为教训。

4.指导和监督合作社正确地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合理分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的积累等项原则。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实行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反对雇工等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公平合理地将商品粮食卖给国家，反对隐瞒抗拒。

5.支部要经常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帮助合作社做好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培养合作社的骨干，正确地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社员的劳动竞赛，保证和监督这些计划的实行；组织社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培养劳动能手和技术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并注意发挥青年和妇女的力量。共产党员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要起模范作用。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墙报、广播组织等，各地都可以仿行。

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

目前农村支部约有15%左右处于落后状态。落后支部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组织严重不纯，支部领导被地主、富农、坏分子篡夺或暗中掌握，他们站在群众头上，统治压迫群众。第二种是支部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闹宗派纠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由此造成群众间的不团结，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第三种是党员作风恶劣，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第四种是支部缺乏领导骨干，党员觉悟程度很低，党的组织涣散无力，不能起领导作用。第五种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有偏差(例如有些地区在整党中的偏差)，损伤了党员的积极性；或者长期放弃对它的领导，致使逐渐落后下去。

对于这些落后支部，各地党委应定出计划，结合中心工作，加以整顿。在整顿工作中，大

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将落后支部的情况，切实加以研究与分析，然后针对支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支部内在力量进行整顿，并注意征求非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

2.对于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要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恶，把他们驱逐出党，犯法者要依法制裁。对于党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清除出党，民愤甚大者，应给以法律制裁。对于犯有一般性质的错误的党员，则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诚恳检讨，愿意改正，均应留在党内，继续予以教育。

3.处理党内的不团结问题和宗派纠纷，要特别慎重，必须深入了解情况，从原则上辨明是非，切忌偏听偏信；并应从团结出发，经过酝酿讨论，由双方自觉地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不团结的主要负责人，既要严肃批判，又要热情帮助。对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公正和有原则，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不团结问题，还可能使纠纷扩大与加深。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内不团结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的严重性。

4.对过去领导上处理不当的问题，应作适当检讨，启发党员进行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改正。如因时间已久，不便处理者，也要讲明道理和原因。

5.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整顿结束时应经过民主选举，使优秀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县委、区委并应经常在工作上给以具体指导，巩固已得成果。

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非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农村支部应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各种组织，使其步调一致地去进行工作。

农村支部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上，有些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有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偏向，一种是党的支部对各种组织的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甚至放弃了领导，致使步调不能一致，力量分散，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再一种是党的支部包办代替了各种组织的工作，不能发挥各种组织应有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

为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的支部应定期讨论各种组织的工作，提高和统一它们的思想认识，帮助它们建立业务，开展工作，发挥它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于各种组织的决议，党员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群众一起予以贯彻。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党的支部应当善于通过这一组织，吸引和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各种活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支部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对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加强领导，保证它们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巩固和提高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支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使作风正派、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中去。有关全乡人民的重要问题和各项工作，党的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必须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并在执行中随时给人民委员会以具体支持。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现在有些党的支部不重视乡政权组织，不认真执行乡政权的决议和它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包办乡政权工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力量，是党在各种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党的支部要定期讨论和检查青年团的工作，指导青年团动员团员和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使青年团在各种工作中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党的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和

共产党的教育，不断提高青年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并接收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党的支部对于乡村中其他组织，如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妇女团体等，也必须加强领导。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都是党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党的支部要有计划地使这些组织健全起来，使它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

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

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是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

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过整风整党，农村党员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某些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还很严重，近来甚至有所发展。继续向强迫命令作风进行斗争，仍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强迫命令作风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对群众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或以“不接受任务不散会”、“开熬夜会”等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各种任务。更恶劣的是讽刺、训斥甚至打骂群众。结果造成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使工作受到损失。

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原因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高；上级布置工作时交代工作方法少等等。

克服强迫命令作风的办法是教育党员相信群众，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要领导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以实例打破某些党员干部认为群众落后，不强迫命令不能完成任务的错误思想。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使他们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经常团结在支部的周围，支部就不能很好地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率领他们前进。教育党员善于等待群众，对某些一时还不觉悟的群众，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教育和帮助。在推行各种工作中要运用培养典型、实例示范的方法，因为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和新的事物，只有经过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才会自觉地接受。向农村干部和党员布置工作时，必须交代工作方法；检查和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检查和总结工作任务完成的程度，还要检查和总结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对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各种任务的支部和党员，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对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并屡教不改的党员，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严重者应给以处分。

反对强迫命令，采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对农村支部和党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农村中党的组织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必须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取得今天的胜利，乃是党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说服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人们的结果。

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

县委、区委加强和改进对农村支部的领导，对于提高农村支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

近几年来，各地县委、区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有一些县委、区委对农村支部的工作包办代替，缺乏正确地适当的领导方法；有的甚至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放弃领导；也有一些县委、区委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或因干部调动频繁，对于情况和业务生疏，影响了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经常领导。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根据目前各地已有的经验，县委、区委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县委、区委必须把管理支部工作列入经常的工作日程，在布置各项任务时，对支部如何进行工作应作具体交代，使支部能够根据这些布置和指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主动地去进行工

作；并须有系统地定期讨论所属支部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帮助。

2.每个县委、区委都应选择一定的支部，作为重点，亲自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帮助重点支部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包办代替的做法是绝不能提高支部工作、取得任何有用的经验的。

3.县委、区委应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采用召开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联席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等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地委和县委还应利用农闲季节，定期轮训支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争取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普遍地将他们轮训一次到两次。

4.区委应按期制订支部教育计划，帮助支部建立学习制度，培养党课教员，供给教育材料。

5.有些县委、区委机构尚不健全，应适当地予以调整和充实。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或生产合作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指导农村支部工作。

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是全党的责任。这里所以强调县委、区委应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是因为县委、区委更接近农村支部，是直接领导农村支部的。地委、省委对于农村支部的工作，也必须列入工作日程，予以极大的注意。

翻译：A.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11月

附件二：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

1955年3月1日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6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顽固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该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

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因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省市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作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 and 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 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

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作出结论的作结论，对尚不能作肯定结论的就作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党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自行规定。)

校对：B.克里夫佐夫

附件三：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

译自中文

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省市委、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党组、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批准陆定一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发送给你们。同时建议你们对中共中央就宣传唯物主义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进行讨论，根据这两份报告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本决定及其两份附件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日

关于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针问题

(陆定一在1955年2月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

..... [101]

附件四：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1955年1月4日)

兹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发下，并对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表的若干事项，作如下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第八条中所规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制定的。这一职务名称表颁发后，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上海局、分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对属于这一职务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

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今后，由于机构变动，而应增减这一职务名称表中的干部职务名称时，由省、市以上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决定。

二、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各级党委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对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上海局、分局、省(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上海局、分局、省(市)委根据管理干部的需要和建立这一工作的条件，参照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自行制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自行制定，报经中央分局、省委批准后颁发施行。地委、省属市委、大市区委及县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则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统一制定。

三、加强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是当前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职务名称表

的“附件二”，对国营工业中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已经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中央分局、省(市)委应协助中央做好对这一批干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国营工业是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所以在国营工业的干部管理工作上也应该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因此，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应该逐步地把管理干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可以减弱。相反地，在建立和加强工业行政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的同时，地方党委必须也把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按照这些干部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工业部的总局(管理局)和各工厂(矿)分别加以管理。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总局(管理局)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拟定，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后颁发施行。各工厂(矿)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统一制定。

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监督管理，这些干部中之担负较重要职务者，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范围，由各地自行规定，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凡列入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两方面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干部，国务院所属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均有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培养、教育的责任。但在进行工作时应有适当分工：干部的调配、提拔和专业训练等，应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负主要责任，地方党委则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这些工作加以监督；审查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应由地方党委负主要责任，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则应加以协助。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双方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及时交换这些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在任免、调运这些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地方党委亦应主动提出建议。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商量解决，但在必要时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国营工业中的党、群工作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重要的省市市委、大市区委等分别加以管理。

地方党委对于地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办法，可以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

四、在颁发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同时，应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管理干部的原则，重新加以确定。

根据目前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在干部管理工作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地方工业部除外)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干部的管理，也属于这一类型。

除各工业部门外，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海关总署、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及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亦应仿照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建立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制度。这就是说：这些部门除协助中央管理干部外，还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主管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这些下级机构中的其他干部，则由这些下级机构自行管理，但其中比较重要者应列入当地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机构中的党、群工作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

这些部门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由这些部门自行管理。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该部门拟定，报经中央审查后批准颁发施行。这些部门的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这些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如在目前全部自行管理有困难时，可将其中一部分暂时委托地方党委代管。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第二机械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因已基本上具备自行管理其本系统干部的条件，因此也可按这一办法管理其本系统的干部。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拟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查后报中央批准。其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干部的管理工作和上述部门多少有些类似。但外交人员分布在国外，不可能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外交部亦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一职务名称表由外交部拟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第二种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公安部、邮电部，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部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民主妇联，对其下级机构中的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二种类型。

邮电系统，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系统，新华书店系统和合作社系统，在上下级机构之间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但因这些系统的机构很大，分布很广，人员比较复杂，而管理干部的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在目前阶段还不宜采取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干部，而应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系统的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他们应协助中央对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并可对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中央。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的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和妇联系统的情况与上述几个部门虽然不同，这几个系统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但在目前阶段，亦均以采取这一管理干部的办法为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

第三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部门，除公安部门外，对不是由其直接管理而是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部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不担负管理的责任。这就是说：内务部不负责管理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的干部，司法部不负责管理省司法厅的干部，监察部不负责管理省监察厅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计划委员会的干部，财政部不负责管理省财政厅的干部，粮食部不负责管理省粮食厅的干部，商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商业厅的干部，对外贸易部不负责管理省对外贸易局的干部，建筑工程部不负责管理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地方工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工业厅的干部，交通部不负责管理省交通厅的干部，农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农业厅的干部，林业部不负责管理省林业厅的干部，水利部不负责管理省水利厅的干部，劳动部不负责管理省劳动局的干部，文化部不负责管理省文化局的干部，教育部不负责管理省教育厅的干部，卫生部不负责管理省卫生厅的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干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担负管理下级人民法院干部的责任。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这是第三种类型。

上述中央一级各机关，在干部管理工作上，有些兼有第一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兼有第二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则只有第三种类型的特点。凡属最后一种情形的部门，只协助中央管理本部的司、局长一级干部和管理本部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不再管理其他干部。

五、这一职务名称表中未把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包括在内。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俟中央制定后另行颁发。

翻译：拉扎列夫、孔德拉季耶夫

附件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局、中共中央所属各分局、各省党委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现把该报告发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地区开展好这一运动。

1955年5月16日

..... [\[102\]](#)

附件六：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就整顿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队伍。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将来会逐步消失。因此，只有工人人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这一阶级的真正代表，也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也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地开展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在困难面前退却，不应背叛党，投降敌人。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

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六、每一个党员都应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改正。一切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不愿改正，骄傲自满、固执己见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所有党员都应诚实而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以便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地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备注：这八项条件既适用于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进行考核，也适用于接收新的党员。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对打算吸收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开展教育工作。

在中共中央1954年11月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问题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一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认为，八项条件的标准太高了，应当降低。中央委员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八项条件仍然有效，应在考核党员和接收新党员时被严格遵守。

第二项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对这一点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87-218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团员M.C.费多托娃，1928年出生，居住在莫斯科列维塔第2大街2栋220房间，办公电话：Д0 00 24，转分机47。

申请书

当我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我和大学同学允斌·克里姆结婚，他生于1925年，1939年来到苏联，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我丈夫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今年我和丈夫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答辩获得了化学副博士学位。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将回到中国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常相互帮助和支持。这种相互帮助将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我希望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工作，并考虑到中国非常需要专家，请您协助把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去。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关于请求组织委派我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事，我还有这样的考虑。我们有一个女儿索菲亚，1952年出生，我们将要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我父母照看。我的父亲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生于1896年。母亲Е.И.帕夫洛娃生于1903年，作为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应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如果我以允斌妻子的身份去了中国，我将没有能力保障我留在莫斯科的家人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有关办理去中国的手续的文件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今年5月底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和红新月会。

费多托娃

1955年7月9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40-242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同志：

今转交给你们毛泽东同志7月3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邓小平和王稼祥同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贝戈维奇等的会谈纪要信件。信的内容通过电报转给您。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1955年7月9日

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感谢您6月25日关于5月27日至6月2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苏南会谈结果的通报。我们认为这次苏南会谈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对南斯拉夫所采取方针和步骤的完全正确性。我们还认为，今后继续采取对南斯拉夫进行耐心的和有分寸的争取工作的方针，是非常恰当的。

此外，中共中央愿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把我们与两位南共中央委员的谈话情况向您通报。1955年5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会根据当时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要求，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两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两人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现将谈话纪要一份送给你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5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印鉴

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谈话纪要

谈话时间在1955年5月26—27日，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贝戈维奇。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对方事先用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六个问题以及他们临时提出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交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及其政策问题。

第一部分谈话不甚重要，故从略。

在第二部分谈话中，主要环绕着下列三个问题：(1)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关于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3)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他们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主要是由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在国家关系上搞坏了，而不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者思想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他们认为情报局决议所根据的绝非事实。他们说，当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南斯拉夫的党进行了讨论，但讨论时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仅是少数。他们还说，自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政权始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中，并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上述说法，我们给予了适当的批评。我们首先指出，把1948年事件归结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想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在思想的一致性上。正由于南斯拉夫在思想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才引起情报局的批判。共产党人在接受批评时应该采取郑重的、欢迎的态度。在国际援助和苏联援助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援助，所以情报局的批评按理说应该产生好的结果，但结果却不好。从结果不好这一点看来，情报局的批评，可能在方式上有缺点，但这个决议的原则本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7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因为在这7年中，南斯拉夫背离马列主义观点的地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例如南党机关报《战斗报》认为现在世界一体，任何国家都无基本区别，即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是人为的、多余的划分。我们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英美也有社会主义，苏联也有资本主义；同时把两大阵营的划分说成是“人为的”，“多余的”，而不是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用这种观点去影响人民，那么，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兴趣，什么信心呢？

又例如在今年1月的《战斗报》上连载的一篇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关系本身”，这种说法是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专政性质和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职能。

这篇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不是一个政党”。当然，这是与列宁的建党原理相违背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南斯拉夫“企业在它的活动中是独立的，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竞争”。当然这种观点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相违背的，如按自由市场的法则去管理经济，结果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我们指出，上述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在党员和人民中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和风气，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风气。

我们还指出，在对待国际援助问题上，应该珍视苏联援助的意义。我们列举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各种援助来证实毛泽东同志的下列一段话：“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的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因彼此具体情况不同，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国际主义观点来处理我们大家庭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就弄不好。我们觉得南党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与党的关系上，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

最后，我们又指出：在南斯拉夫目前仍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基础，南斯拉夫公共财产是保存下来了，南斯拉夫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原

则的错误思想。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上述意见后，就对我们所指出的事实作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并声称南斯拉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可能是把卡德尔的文章翻译错了，他根据马克思的话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产生官僚主义。他们说关于企业的自由竞争，乃是指执行一定的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竞争。他们说南斯拉夫也重视国际援助，但当时只笼统地说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不谈南斯拉夫自身的内部因素，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关于《战斗报》评论两个阵营问题的社论，他们说，这一社论发表后也有争论，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南党中央是同意的，这个思想就是积极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他们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成分，如英国工党中有许多人是想着怎样才能从资本家中夺得更多的东西。把两大阵营截然划分开不好。最后，他们又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原则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马列主义只规定一般原则，未给各个国家规定具体道路，南斯拉夫解放后的第一阶段，在国家形式上走的是苏联道路，但以后他们说发现别的道路更好些，于是就选择了别的道路；生活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他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是对的，但斯大林就不对，而且各国工人阶级各国党都可以发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解释，不能由一个党来垄断。

对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把世界分成军事集团，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必须问一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怎能抱有坚强的信心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来不讳言我们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至于说到垄断马列主义的解释问题，这样说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解释，有列宁、斯大林的解释。我们还知道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也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模范，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修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党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向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不可分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他们说到苏联过去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同是一个苏联，中国和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都不感觉到苏联对待他们有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唯独南斯拉夫有这种感觉，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觉得南党内部思想上有混乱，应从思想上找原因。认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

关于今后的南苏关系，我们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能重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至于过去的问题，苏联会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南党说过合乎实际情况的话，中共觉得南斯拉夫总是把责任推在苏联身上，好像自己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被迫承认美国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说欧洲大多数人并不愿跟美国走，欧洲广大人民特别不喜欢美国在欧洲搞军事基地。关于美南关系，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南斯拉夫是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但南斯拉夫遵循了三个原则：(1)保持南斯拉夫独立；(2)建设社会主义；(3)美国不能干涉南内政。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野心阴谋并未得逞。

对此我们会提出下列两个事实问他们。第一，1951年11月4日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美国对南军事援助协定，协定中规定“南斯拉夫须为自由世界的防卫提供南斯拉夫人力、资源能力”；第二，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申斥过美帝国主义，但南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却说“苏联是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应作如何解释？他们说记不得有军事援助协定，但南斯拉夫接受过5亿

以上的美元军事援助可能是事实，因为南斯拉夫需要美国武器，也曾说过在联合国范围内，某国家受到侵略时将给予帮助。至于说苏联是侵略国，那是1952年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指出，所谓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承担了义务，还与上述军事援助协定的条文所说，实际上是相同的，现在美国垄断着联合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还指出，南斯拉夫与希腊、土耳其缔结三国军事联盟一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注意，因为这个条约实际上把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公约联接起来了。我们提醒他们说，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是十分了解的，因而我们对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极力表示他们也了解美国，不会上美国的当。关于侵略的问题，我们指出，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才是世界的侵略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侵略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们表示现在希望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表示，希望中南两国关系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中国多多派人到南斯拉夫各地去什么看看，可派政治、经济、管理、计划各部门人去，南斯拉夫对中国门户开放。也可以交换资料。他们还说，南斯拉夫对中国历来是很友好的，只是过去没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条件。

我们说，彼此增进了解很有益处，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多派些人来，南斯拉夫的党也可以派人来。交换资料可考虑。对于过去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关于台湾的权利问题的立场，我们表示感谢。最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过去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交，我们未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很坏的缘故。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将来以至永久，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对于一切国际重大问题，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同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年艾德里来中国访问时，曾批评我们和苏联“一个腔调”，我们回答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莫斯科和北京相隔甚远，但因思想共同，目标共同，故能一个腔调。艾德里又曾称赞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我们回答他说，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需要采取适合具体情况的步骤和方法，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都是同苏联一样的。总之，艾德里批评我们的正是我们好的地方；艾德里赞扬我们的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大家庭里，希望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应保持一个腔调，但今天我们谈话还不是一个腔调，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腔调。

最后，他们表示这次谈话很有益处，因为从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并且很了解这些意见就是中国党的意见。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42, л.207-236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 保密问题(1955年7月9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

1955年4月20日，20名中国专家到了阿克恰套矿务局喀山机车头修理总厂进行实习，这些专家是矿山工人、选矿工人、机械工人、地质学家和矿山测量专家。

从实习工作的开始到结束，上述前来实习的专家对阿克恰套矿务局的工作有了总的了解。但由于不太可能允许中国专家接触关于我们生产的秘密的和绝密的情报，今后实习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困难。

这些秘密情报是：对矿工和选矿工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评价，矿山技术的加工条件，对投产的矿体地段的评价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信息。在此方面没有必要让这些前来实习的人了解类似的绝密情报，比如，了解产地的储量，了解产地和产区的开发前景，了解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

根据“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苏联有色金属部在1955年4月9日的第507c号信件)，请求您把可以允许中国专家使用的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的清单通报给我们。

阿克恰套矿务局总工程师

H.伊利亚什

1955年7月9日

РГАЭ, ф.9022, оп.1, д.3241, л.118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 (1955年7月1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份

第273/cc号

1955年7月

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7月14日

今天16时，我与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一起按预先约定拜访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相互问好后，我对大使说，根据报刊上的报道来看，中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受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官方人士的欢迎。

大使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他们的演员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既在雅加达的总统府又在他那座位于茂物的夏季公馆里进行了演出。

在继续谈话时我对大使说，我来见他，是为了谈谈内政性质的问题，是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事件有关的，今天我们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证人。同时我说，我们与他很久没有谈话了。

大使感谢了我的来访，并说，他很高兴与我谈谈。

我说，最近的一些事件是与高级军官们不同意让班朋·乌托约当陆军参谋长的任命联系在一起的，并导致了极大的麻烦。众所周知，反对派会利用任何一个借口去使国内状况恶化和使内阁倒台，它们就利用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做一切可由它们做主的事情去造成政府的危机。根据报刊上的报道和我与许多人的一些谈话内容来看，政府方面也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一种情况，只得同意国防部长伊瓦·库苏马苏曼特里的辞职。接着我指出，政府同盟的内部缺少支持政府的党的必要的团结，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下面那个事实：“帕林德拉”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要求该党主席、社会保障部长苏罗索退出内阁。“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的领导似乎已宣布要让自己的代表——卫生部长李嘉坚和社会工作部长莫赫·哈桑退出政府。

接着在国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也将按反对派的要求讨论关于不信任财政部长朱安达——国民党党员的问题。

上述种种情况正在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造成一种紧急的形势，并且可能会引起政府将被迫辞职的结果。这在国会选举即将来临时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特别是国民党的势头衰退。

大使回答我说，现在他暂时还不拥有关于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有关的问题在于任何具体的资料。他还不能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有可能辞职一事发表任何看法。然而，他认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未必会在举行选举之前辞职。

然后，黄镇讲了下述有关国内的外交政策情况的一番话，同时还指

出，他从各种知情人那儿，主要是从常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那儿收到了许多材料。大使同时着重指出，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收到好让他对今天的形势得出最终意见的全部情报。

反对派前不久还对他们可以借助于军事政变，主要是借助于陆军(众所周知，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是很强大的)取得政权一事抱有希望。然而，现在看来军事政变未必会发生，因为军队里的势力分布情况，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政府的势力以及追随反对派的势力大致上是一样的，甚至还是总统方面大占优势。这一情况使苏加诺总统有可能显得有点乐观，因为作为对忠于他的陆军力量的一种补充，他还控制着雅加达的警察力量，警察是完全忠于总统的。

陆军与政府之间因班朋·乌托约的任命而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存在于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与副总统哈塔之间的分歧的反映。众所周知，苏加诺总统和哈塔副总统按规定是本该彻底解决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的问题的，但他们却无法达成协议，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完全转交给内阁去处理了。因此，从6月下旬至7月初的婆罗洲之行(或许是故意安排的，以便在预先策划好的冲突发生时不在现场，冲突是与6月27日的事件有关联的，那一天代理参谋长卢比斯采取了各种措施去破坏班朋·乌托约就任参谋长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典礼)回来后，哈塔在与为了报告而来拜访他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阿里芬副部长的谈话中被迫向他们声明，他看不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中有什么错，因为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是苏加诺和哈塔委托政府按它自己的裁夺亲自去解决新的陆军参谋长的问题的。这一情况使哈塔此时此刻不可能在冲突中公然站在反对派和武装力量那一方(虽说反对派的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催促哈塔迈出这一步)。

大使补充说，苏加诺总统同意政府方与军方之间举行谈判去解决已形成的局势，生怕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会导致军队的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内战。

为了证实上面所说的现在不可能发生军事叛乱的意见，大使详细地介绍了存在于全国七大军区的军官们中间的情绪。

第一军区(北苏门答腊)受辛博隆上校的指挥，他是坚定的马斯友美党的反对者，在其编制中有5个团。

第二军区位于南苏门答腊，是完全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军区在班朋·乌托约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之前是处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如果发生军事叛乱的话，这个军区的部队将会挺立在第一军区的部队向首都挺进的道路上。此外，第二军区的部队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和设备就能越过巽他海峡出现在首都附近，那时候第一军区的部队就必须或是完成一次穿越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的艰难行军和战胜第二军区部队的抵抗，或是完成一次长长的海上航程，但他们并不具有足够数量的浮动装备。

报刊上和私人谈话中经常谈论和警告政府的话题是，雅加达列入其中的第三军区(西爪哇)处于卡维拉兰上校的指挥之下，他毫无疑问是对政府抱有敌意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组成第三军区的5个团中有2个团是完全效忠于总统的。关于另外3个团的情绪方面的情报还没有收集到。此外，应该注意到，军警和民警是完全由总统所掌控的，并且是忠于他的。再说，许多人还没有考虑到，驻扎在万隆的军队是完全效忠于政府和苏加诺总统的。许多人同样也不知道下面那个事实：雅加达卫戍部队的长官阿基尔中校曾经是像“10月17日事件”这样尽人皆知的军人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又是一个得到过总统“青睐”的人，所以他现在未必会站出来反对总统。反对党在自己打算进行武装起义的如意算盘中寄希望于他们可以利用(这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活动于爪哇的中部和西南部并受马斯友美党所控制的、人数多达一万的土匪部队。

第四军区。虽然现在还没有关于这一军区的情绪方面的资料，但是众所周知，列入这一军区编制的4个团中有一个部署在苏拉卡尔塔(梭罗)的团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第五军区据初步资料来看是完全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

这样一来，编制人员最多的第三、四和五军区在发生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能在力量分配上起决定作用，它们有许多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部队。

余下的第六和第七军区并不效忠于政府，而且部署在婆罗洲的第六军区完全处于哈塔的控制之下，并且是忠于他的，关于部署在西里伯斯岛和马鲁古群岛上的第七军区的情报的数量还不足以能让人完全判断出它对苏加诺总统的态度，但已经知道的是指挥这个军区的瓦罗乌夫持骑墙的态度。

然后，在我的请求下，黄镇给代理陆军参谋长卢比斯上校作了一个小鉴定。他说，卢比斯在1952年10月17日事件发生时持绝对亲政府的立场，并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政府很大的帮助，因此听到政府决定任命班朋·乌托约当参谋长，而不是任命他担当此职的消息后，真的是感到大为震惊。众所周知，卢比斯上校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严重了。据有些资料看来，卢比斯上校亲近于“穆尔巴”党——“无产者的党”，该党被国内的许多政治活动家评定为托洛茨基派的党。

在对班朋·乌托约少将作鉴定时，大使对我说，他非常亲近于国民党，如果他不是按一个印度尼西亚法律不能属于任何党派的军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当上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接着在提到那些进入政府机关的小政党的立场以及在答复我认为它们的行动会给政府以沉重打击并会引起政府的危机的见解时，大使说，未必能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些党叫自己的代表撤出政府机关的要求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绝对明白无误的是，国民党的威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在国内拥有大量的拥护者，所以不管内阁是否会辞职，国民党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那些小政党在国民党的艰难时刻企图削弱国民党的领导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政府的力量，那么它们只会因此而遭殃的。现在呢，在跟随着国民党走的同时，小政党还在执政和享受执政党的特权。更何况，就算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倒台后会形成反对派——马斯友美党和社会主义者来管理政府的那种情况，小政党也不能指望会在政府中得到席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好处。此外，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为了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政府危机，苏加诺总统的“贴身口袋”里有着一份他已经制订好的新政府人员的名单，其中列出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名字。然而，大使总结说，他所对我说的这些资料全都是当前用的资料。

国内的政治事件目前正在起着很大的变化，因此可能会造成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的那种情况，而这将会使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下面那个情况：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两天前还对国内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最近几天他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据大使所拥有的资料来看，佐约苏哈托现在已经开始做安排国民党领导人员的避难所去应对最坏情况的工作了。

然后大使指出，国民党自身中现在也没有足够牢固的团结。其原因就是这个党对许多选区里已举行过的地方性的地方自治选举的结果和国

内进步势力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例如，不久前在国内的某些地区里所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在苏加武眉地区——它在此之前被认为是马斯友美党的前哨阵地之一，那里还有大股的伊斯兰教的达鲁利盗匪集团在活动，在那里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另一个早就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的地区，共产主义分子也在地方自治选举时取得了胜利。在其他许多地区里也有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这种失败。这一切导致了国民党内的不安情绪的增强，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人士中。

考虑到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的增强，国民党正在试图与反对党，特别是与马斯友美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和马斯友美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尤素福·维比索诺举行了一次会晤，会上讨论了两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合作问题。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次会谈还是没有带来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最后大使说，他预料今天或明天当地的中国人会送来许多消息，此后他将把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消息告诉我。他答应于16日或17日来拜访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说，依我之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从自己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太少向国内的舆论界通报自己的旅行感想，不过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去观察国内已发生的变化。我说，想必他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态度是与民族的政治危机及不愿意恶化与反对党的关系的想法有关联的。

大使同意了这一看法，却又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总统和政府成员们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大使接着讲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访问中国时所发表的一些感想。特别是总理赞赏鞍山冶金联合工厂，并把它和美国的匹兹堡冶金中心相提并论。在参观鞍山联合工厂和其他的工业项目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这些企业里的设备很感兴趣，并说使他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安装在这些企业里的大部分设备上都有着苏联工厂的商标，而且几乎是同一年生产出来的以及苏联竟然能在一小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向中国提供数量如此之多的设备。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为工业企业培养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的培训制度显得特别感兴趣。他感到惊奇的是，人家告诉他，一部分中国专家和熟练工人是在苏联得到培训的，而一部分则是在当地，在中国，在到中国来出差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苏联专家培养出中国专家后立即就离开中国

了。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5, л.77-84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7月15日

今日13时45分，我应周恩来的邀请拜访了他。周恩来转交了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两个通报的答复：关于与尼赫鲁谈话问题的答复以及周恩来给梅农的信。

周恩来说，给梅农的信还没有发，将在周恩来与我谈话结束后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发出。

除转交的文件中所述的内容外，周恩来请求立即将下述内容报告苏联政府：

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当权集团不得不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做出姿态，表示他们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竭力回避这种谈判。为了迫使美国政府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中美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直接谈判。这一谈判应在大使级进行，其任务是为中美最高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美国总统间的谈判做准备。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中美最高级谈判。但是他没有提出另外的地点，只说这个问题容日后再谈。

周恩来指出，美国政府对中方的建议可能持以下态度：

美国政府将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并认为遣返公民的问题是这次谈判的主要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但是只限于谈双方的遣返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建议推迟中美谈判，或者根本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晤。(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像上述情况一样，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四国会议上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不适宜的。他说，最好是在与美国直接谈判时，中方再同意释放这些飞行员。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中国留学生的的问题，等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它于今年5月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即已知的中方对梅农有关计划的反计划)。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将该计划交给了苏联政府，他还说，中方在与梅农谈话时没有全面阐述这一计划，但是它是严格遵照这一计划行事的。

我允诺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

参加谈话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何伟、周恩来的翻译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Б.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В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1, л.274-276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

况(1955年7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第686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7月18日，周恩来约见了，要我向苏联政府报告以下情况：

美国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人还建议于7月19日发表这一联合公报。周恩来说，美国想给人们造成一种中美已就谈判达成协议的印象，以避免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说，由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暂时没有答复美国政府，想听一听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美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中有“北平和华盛顿”接触的措辞，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措辞是侮辱性的，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说，当苏联代表团提出台湾问题时，美国大概会说，他们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最好指出：据它从中国政府获悉，在即将举行的与北京的谈判中，美国打算只讨论与遣返公民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台湾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和周恩来的翻译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Г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1, л.291-292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 (1955年7月1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7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

1955年7月18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设午宴为我妻子即将启程回苏联而送行。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大使馆参赞E.扎布罗金同志和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及其妻子。

在举行会谈时大使问，我对在克马约兰机场上欢送去麦加朝圣的苏加诺总统的场面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苏加诺在机场上的举止中表现出一定的自信和安详。我指出，送行的人士中也有陆军参谋长班朋·乌托约少将及其副职卢比斯上校，而且卢比斯站在前排中的一行中，而班朋·乌托约站在略远处。我补充说，在为总统送行时大量的警力都聚集到机场前来了。

黄镇说，有些人愿意认为副总统哈塔没有到机场来的情况是有特殊意义的。但是依他——大使之见，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副总统以往也没有出席过这类送行仪式。

接着大使说，分析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他的脑海中对最近那些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分歧有关联的事件大致形成了下面的情景。

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近有所缓和，这使总统有机会可以去朝圣。此外，总统相信，他有能力去控制军队，足以在紧急状况下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

最近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己阵地的措施。

7月14—15日，苏加诺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政府成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目的是要更多地加强执政党的合作和团结。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进行这些会晤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断然声明，在与军队里的危机相关联的那些事件中确实可以看到外国人的干预，特别是美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干预。最近一段时间里在这件事中表现得特别活跃的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它利用外国石油公司来掩盖自己同马斯友美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系。

在进行上述会晤期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政府成员宣布，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一直执政到举行普选为止，在必要的情况下它甚至将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

为了巩固自己在军队下层的阵地，苏加诺不止一次地召见过中级和低级指挥官员。

黄镇指出，第四军区的指挥官巴赫伦上校是总统的追随者，他与总统一起到麦加去了。

根据已收到的情报来看，政府故意答应让那些对政府持忠诚态度的军区指挥官参加5月底和6月初举行的、由卢比斯上校主持的军区指挥官会议。政府以此来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容许军队里发生分裂，或许还容许发生国内战争，而且还对卢比斯施加压力。

在军人会议期间政府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其中指出，如果军人不与政府谈判的话，政府就将采取极端措施。此外，政府还要求与会者提出3个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以便有机会从这3个人中选出一个最能为人所接受的候选人。

在总结上面所说的那番话时，黄镇指出，部署在爪哇岛上的三个军区中有两个军区(第四和第五军区)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至于第三军区，那么它的指挥官卡维拉兰则是坚决反对政府的。然而，这里必须考虑到下层指挥员(连长、营长)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大使接着说，反对派同样也没有在浪费时间。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变得特别激烈了。考虑到进步势力的影响的扩大，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已被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在许多地区里获得了胜利所证实以及考虑到国民党的威信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而有了提高，反对派明白，他们不大有机会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和立宪会议的大选中获胜。

此外，反对派难以寄希望于执政党中间的分裂。反对派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积极地加强自己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在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召开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前夕就已形成的局势。

大使说，第三军区指挥官卡维拉兰上校不久前任命萨米·阿特马迪纳特中校顶替阿基尔中校，并因此而使自己的追随者当上了雅加达卫戍部队的指挥官。

根据已收到的、却尚未得到证实的情报来说，卡维拉兰上校撤掉了两个效忠于政府的团长。此外，他派了两个营到雅加达去，但是它们就在城门口被忠于政府的部队拦截住了。

大使说，中国大使馆的职员在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泗水(东爪哇)通电话，但全都白费劲。问电话站的服务员无法与泗水联络的原因时，后者却给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大使补充说，中国大使馆的生活中首次发生这一事例。

接着大使说，根据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第一军区的指挥官辛博隆早在7月12日就与卡维拉兰上校有过一次会晤了。在这次会晤以后辛博隆写了一封信给卢比斯上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在7月12日率领自己的部队站出来反对政府，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卢比斯要把5名军官逐出陆军参谋部。然而，卢比斯没有履行这个条件，于是第一军区的反政府行动也没有付诸实践。

在回答我的关于空军和海军对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时，黄镇说，空军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他补充说，如果说空军的主要力量以前是集中在万隆地区的，那么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渐渐地转移到泗水地区去了，该地区是印度尼西亚海军舰队的主要基地。海军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尤其是马斯友美党在他们中享有特别大的影响力。黄镇指出，海军指挥官苏比亚克托和哈塔副总统是自家人。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НПФ, ф.091, оп.11, п.8, д.5, л.94-97

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一、总论

喀什噶尔矿管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南部喀什噶尔区喀什噶尔县。矿管处的中心在距喀什市以西97公里的康苏(Кансу)村,有可以通过载重汽车的道路通过康苏村到乌鲁克恰提(Угучаты)村,然后到伊尔克什坦与苏联接壤的边界。

来自新疆省中心——乌鲁木齐(迪化)的报告证实,沿公路可以从喀什到阿克苏,然后到乌恰,还可以乘坐民航飞机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南部叶尔羌、和田、克里雅(Кери)到喀什有优质的公路。康苏村的海拔是2274米,喀什市的海拔是1330米。康苏地区是强烈的大陆性沙漠气候,昼夜温度变化不定,温差为20摄氏度,每年的温差为30多摄氏度。春天(3—4月份)的风极其强烈,雨雪很少,大部分是在夏季的月份(7—8月份)降阵雨。冬季经常是完全都不下雪。地势高低不平得非常严重,海拔达到3800—4000米,相对高度达到100米以上。缺乏植被,除了沿河床上有个别的树木和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带刺的灌木。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极其稀少。主要的人群是回族人,该区的西部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在大的行政中心以及康苏村和沙里塔什(Сарыташ)村有大量的汉人。

喀什矿管处于1952年开始建设,用的是前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的资金。根据苏中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关于把“苏中联合金属公司”转交给中方的联合公报,喀什矿管处于1955年1月1日被完全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喀什矿管处是一个采矿选矿企业,主要的产品是对精铅矿和精锌矿进行加工。

矿管处有如下的车间和生产场所。

1.沙里塔什1号矿井,生产能力为每昼夜300吨矿石。矿石的开采有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 [103] 在必要的情况下,矿井还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每昼夜开采500吨矿石。

2.选矿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生产型号为KC2和

KC3的精铅矿和型号为K12的精锌矿。该厂配备有埃尔斯拉·台尔曼厂、布卡乌·波尔夫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科特里亚科夫厂(列宁格勒)的选矿设备。该厂于1954年投产。.....在半年后就开始进行提高该厂生产能力的工作。

3.柴油发动机锅驼机发电厂，登记的发电能力为1958千瓦，但实际上根据设备的状况和当地的条件发电能力为900千瓦。.....

4.每昼夜生产能力为60—80吨的煤矿。勘察工作，采矿准备工作以及开采工作。清理工作不用进行，这是由于为煤矿机械设备提供的电力不够。

5.机械维修中心，下设位于两栋大楼内的铸造部、机械部、车床部、磨制部、钳工部、锻造部、热处理和电修部。维修中心配备有苏联生产的现代设备。

6.辅助车间和生产场所：氧气站、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保障的泵水站、车库等。

7.投资建设部，每年投资额为570万元，包括一些附属的生产——石膏混凝土工厂、石膏露天采矿场、木器加工车间等。

8.地质勘探小组——霍什布拉克勘探小组、乌鲁克恰提勘探小组、沙里塔什勘探小组、乌帕尔勘探小组、和田勘探小组、叶尔羌勘探小组和阿克苏勘探小组，勘探工作的总花费为126万元。

9.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总居住面积大约为1.2万平方米，并且有日常文化设施——食堂、俱乐部、幼儿园、医院、银行、邮局、学校和贸易机构。

喀什矿管处共计有2000名员工，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的居民人数有5000多人。

喀什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的执行。

二、主要的生产

1955年第二季度，喀什矿管处的处境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计划中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没有完成。

首先，电力不足(这一点已经谈过)导致了对所有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对主要的矿场、工厂和煤矿都实施限电。在3月底“民族”号柴油机发生故障以及5月8日第一号锅驼机发生事故之后，电力的状况就特别恶化了，即使其余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发电，无论怎样也不能保障工厂的需要。

第二，1955年4月，在企业所在地区发生了强度为7.5级的地震，这对电站、选矿厂的部分设备以及沙里塔什矿井的部分输矿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工厂停产了158个小时，而有12天矿石的正常开采受到了影响。4月份的计划仅仅完成了42.3%，而企业在5月份和6月份不能完全完成计划中没有开采的矿石量，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

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中的主要指数的完成情况如下表：

指 数 名 称	计划	完成	完成占计划的(%)
采矿(吨数)	17 050	16 524.4	96.9
剥离工作(立方米)	7 500	806 432	107.5
采矿准备工作	57	67.7	118.5
矿石加工	18 805	15 042	80.0
所开采矿石中的金属含量百分比			
(1) 铝	7.98	9.12	114.3

续表

指 数 名 称	计 划	完 成	完 成 占 计 划 的 (%)
(2) 锌	4.89	3.39	69.3
同名矿石中提取金属所占百分比			
(1) 铅	75.0	78.68	104.9
(2) 锌	31.5	15.73	49.9
精铅矿中金属的含量(百分比)			
(1) 铅	50.0	52.01	104.0
(2) 锌	11.18	8.84	79.1
精锌矿中金属的含量(百分比)			
(1) 铅	11.16	12.79	114.6
(2) 锌	45.0	42.71	94.9
精矿石的开采			
(1) 精铅矿按 50%计算	2 250	2 159.2	95.6
(2) 精锌矿按 45%计算	644	74.8	11.6
加工时间(小时)	1 806	1 582	87.6
电站生产,千瓦/小时	1 967 984	1 135 900	57.7
采煤吨数	5 250	207.5	80.0
总产品			72.9

在企业得到57.7%的电力保障的情况下，工厂在87.6%的工作时间内生产了计划中95.6%的精铅矿。各车间在电力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煤矿自4月份事实上就已经停工了。

矿石开采计划没有完成是由于1954年对成堆矿石的开采极其滞后，而这些成堆矿石是应当首先被加工的。矿山掘进工作和剥离工程对于企业今后工作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工作被超额完成了。

选矿厂的铅浮游选矿的质量指数超出了计划的指数，并高于以往时期相应的指数。

锌浮游选矿工作继续稳定发展，但提取锌的计划指数还没有达到。必须就这个问题咨询高水平的选矿专家。

企业工作中的重大不足及其工作不相协调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工程工人和车间主任这一中间环节的工作不够清楚以及实行轮流监督，他们不能独立地做出需要在业务上做出的决定。在此方面苏联专家向中国同志提供了全面的帮助，但是尚未取得足够的成果。……

三、地质勘探工作

到第二季度之前，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实践上的

帮助，提供的帮助的项目如下：С.П.布雷切夫对乌拉根(Ураген)和别尔布拉克勃勒(Бельбулак)矿石产地的沙里塔什一号矿和煤矿提供了帮助；Г.С.鲁缅采夫向乌帕尔(Упал)村所在地区进行的勘察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Д.И.特鲁京斯向叶尔羌和田地区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地的检查工作提供了帮助；В.Б.捷戈耶夫向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帮助；Г.С.别夏斯特诺夫向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搜寻和地质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Н.Г.瓦沙泽向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和搜寻工作提供了帮助。

上述项目的短期成果如下：1.沙里塔什矿场。继续使用山地重型设备在第二号水平巷道对矿体进行勘探。确定往年的结果——该巷道内的矿化情况支撑不住，并且发现了一簇没有工业作用的矿石。用钻孔向下进行勘探也确定了工业矿化情况的不足。根据1955年7月1日的状况，就各矿石产地制定了进行作业的矿藏储量的清单。2.煤矿。地下钻井已经钻到了预设的主煤层的侧翼，现在暂时停留在直到泵站装置那里的地方。石门(不直接通地面的水平矿山巷道)通往东北方向以便贯穿各煤层。地表上进行了准备工作，设置第三个深层钻头以便在主巷道下100米的深度贯穿3—4个煤层。3.乌拉根矿石产地。由于布卡乌·波尔夫电站缺乏备用零件，对该矿石产地第二季度的供电不足。因此钻探工作没有进行。重型山地设备的掘进工作继续进行，但是掘进器过早地遇到了在矿井井筒中的岩石，在第三季度这些岩石将被运往地面。4.别尔布拉克勃勒矿石产地。大量的重型矿山工程没有考虑到1954年的工作决定的工业设备的极限。5月矿石产地的重型矿山工程被中止了。第二季度在矿石产地进行的钻探工作也没有开展。1954年安置的钻头钻到了110米的深度，由于塌方以及钻到了设备而发生了严重的故障。现在故障被消除了。7月初钻头开始钻探。5.乌帕尔。在乌帕尔地区的搜寻和测绘工作计划是在第十三地质勘探队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该勘察队通过对该地区前第三纪的精矿岩层进行取样分析后确定：矿石中铅的含量提高了。5月份和6月份在这一岩层比较有希望的地方采取了599份矿石样本，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含铅。矿石采样分析的工作继续进行。6.和田地区。搜寻矿石的路线长达400公里，视察了当地居民众所周知的卡兰谷(Кан-Чакыл)和塔木的铅矿产地，杜阿(Дуа)、卡雷卡尔达(Каллы-Калда)和卡泽卡尔(Кызыл-Кар)煤矿产地以及杰米尔巴克洛克(Темир-Поклок)的铁矿产地。早先当地居民曾对卡兰谷铅矿产地进行了开发。现在这一铅矿产地则没有被开发。根据地质学家特鲁宾诺的看法，该矿石产地在工业上的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粗晶体方铅矿同含量较低的

方解石芯连在一起。……根据居民们的申请，检查工作现在在克里雅市区继续进行。7.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自1955年第一季度开始进行的钼矿产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在地表寻找矿石产地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从挖掘中得到的试样分析，工业矿石在150米深的地方。当地地质学家怀疑是否有含量丰富的钼矿。……根据1955年的计划，在矿石产区开展了测绘工作。测绘面积达45平方公里。确定了两个钼矿点，预先对其进行的勘探工作从第三季度开始。

上半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执行总情况同计划对比的情况如下表：

各种类型	计划		完成		
	全年	半年	年初以来	完成百分比	
				每年	半年
重型矿山工程	925	450	814.2	88.3	180.9
钻探工作	2 040	1 000	701.43	34.3	70.1
轻型矿山工程	8 000	3 500	2 853.1	35.6	81.4
地质测绘(1:25 000 米)	150	65	131	87.5	201.5
搜寻线路	2 500	1 000	907	36.2	90.7
矿石取样分析	4 000	1 500	1 400	35.1	93.5
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花费(千元)	1 293.4	625.4	572.4	44	91.5

从上述所列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地质勘探工作计划中，矿管处超额完成的只是重型的矿山工程以及比例为1：25000的地质测绘。其余的工作尚未完成。轻型矿山工程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两个计划开展的轻型工程的项目卡拉贝克特(Кара-бекты)和乌帕尔的工作量为3500立方米，这些工作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在第一季度的工作中没有在这些需要进行轻型矿山工程的地段发现可能蕴藏矿石的地区。

这种状况导致了在野外作业初期，矿管处不得不对卡拉贝克特和乌帕尔搜寻队进行改组，在这两个队的基础上组建两个新队，以便在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开展勘探工作和检查工作。5月的部分时间和整个6月份都在进行改组工作。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钻探工人，钻探工作一直是矿管处工作的薄弱环节。在钻探工人和苏联专家转入阿尔泰工作之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此外，由于在萨雷巴伊(Сары-бай)对钻台发动机不断进行的修理停工了一个月，而由于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井架被损坏，这次停工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乌拉根的电力供应不足，钻井在整个季度都没有开工。

为了应对面临的局势，完成指定的各类工作计划，采取了如下措施：1.在霍什布拉克矿石产地，钻探工作改为用钻粒钻头钻进，使第三台钻井投入工作。2.就第二台钻井投入工作在煤矿开展准备工作。3.从6月份开始，在塔木矿石产地(铅锌矿)开始挖掘工作。4.增加从事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和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轻型矿山工程的工人的数量。

采取的这些措施将有可能明显地弥补滞后的钻探工作计划和轻型矿山工程计划。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小组成员被分配到各生产地段。

到1955年1月1日，共有84名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他们担任行政职务、技术职务，也有负责工程的人员。随着向中国转交相关的工作，随着前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完成，部分苏联专家开始撤出。到1955年3月1日留下的28名苏联专家中，有16人在第二季度被召回了苏联。

到1955年7月1日，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有11名苏联专家：列夫·叶夫根耶维奇·埃格尔，前矿管处局长，矿山工程师，带领整个苏联专家小组，直接领导沙里塔什矿工的采矿工作，地质勘探队的采矿工作以及就企业工作的总的问题提供咨询；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库什内利，工厂以前的厂长、选矿工程师，直接领导工厂的选矿工作、技术检查工作，领导研究工作和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以前的总机械师、技术员、矿山机电机械师，领导各车间的机械部；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曾任电站站长，电气工程师，直接领导电站工作以及总动力工程部；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达维多夫，曾任基建处主任、建筑工程师，领导建设和设计工作，领导基建部和维修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布雷切夫，曾主管地质工作，地质工程师，领导苏联地质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煤矿和乌拉根地段进行的勘探工作；维克托·巴特利别克维奇·措戈耶夫，曾任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长，地质工程师，在有三段工程的乌鲁克恰提地质勘探队任苏联专家；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夏斯特诺夫，地质工程师，在霍什布拉克地区的搜寻测绘队任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特鲁宾诺，地质工程师，在和田地区搜寻和检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鲁缅采夫，地质工程师，在叶尔羌地区的搜寻和监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

该报告附上的南疆地区的地图上指明了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各个地段。

苏联专家参与改善生产的工作。全体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了如下问题的解决：

1.采矿工作：在矿石配料指标的制定上提供实际的帮助，保障所开采矿石达到计划中的矿含量，在地震之后，帮助重新制定计划，保障工厂得到金属含量得到提高的矿石；帮助设计、准备和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大规模的爆破，保障了剥离工程的超额完成，并在露天采矿场建立了采矿场所；改善了地下采掘工作的状况，并着手准备使下半年矿石的开采量增加20%—25%。

2.对选矿厂的帮助：改善了技术工艺，结果使铅的提取与1954年相比增加了6%—7%，锌的提取增加了3%—5%；引入了无氰矿石浮选法，这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极大地加强了工作的安全性，并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帮助工厂改进设备，把其生产率提高20%—25%，这项工作将从下半年开始进行，开展一些科研工作来推广选矿方法，并对预计开发的其他矿石产地的矿石进行研究。

3.对电站提供的帮助：制订锅驼机和柴油机工作的主要工作计划，并贯彻这一计划，改善其运行的方法，这些措施提高了电站的工作效率，尽管一号锅驼机和二号柴油机发生过故障；对方案进行局部的改进，改善锅炉和机器的使用，这项工作在第三季度已经实施完成。

4.对机械维修部提供的帮助：处理好浇铸车间的工作，研制配料和得到高质量的铸液，帮助准备可以拆换的钻头，改善对技术设备维修的组织。

5.对基建部提供的帮助：亲自参与到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中，处理好扩大石膏矿渣混凝土厂的工作。

6.对地质勘探工作提供的帮助：对一个铅矿工地和一个钼矿工地(霍什布拉克)进行开发和新的勘探。对当地地质干部开展的各类地质测绘和搜寻勘探工作提供日常上的帮助，制定对矿石产地和较有可能勘探出矿藏的矿石产地进行局部勘探的方案。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所有的苏联专家开展了大量工作来培养中

国干部，其途径是授课、作报告、进行谈话、传授实践知识、参与日常工作问题的解决、就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分别制定出措施。在1955年上半年培训了1000多名工人。

一些苏联专家——达维多夫、埃格尔、加夫里洛夫以及其他同志应中国当局的请求向南疆政府、经济部门和军事单位就一些专业问题提供了咨询。

群众政治和文化工作。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现在有11人。一些专家同其家属一起在这些地方生活。在这11名工作人员当中有5人是工会成员。此外，还要算上没有工作的党员(现在在莫斯科)。地方委员有14人(3人有家庭)。在康苏有苏联专家的两名孩子(上中学的年龄)。在体育组织有3人。工会成员也是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基层工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康苏加入了党组织。地方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在康苏任职于地方委员会小组。体育小组也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在康苏的各组织中有5人是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的，其中：工会组织1人；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委员会委员3人；地方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人；体育组织1人。地方委员会的职务授权地方委员会委员梅利尼科夫同志履行。因此，在14名地方委员中有5人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

在康苏的全体成员在第二季度顺利开展了社会工作；在列宁纪念日和五一节日期间举行了会谈。顺利开展了支持公债的签名，收集了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呼吁书上的签名。个别同志还就内外政策问题作了报告。所有的苏联专家都完成了社会组织的委托。

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对苏联专家进行了描写和报道，这些报纸包括：《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劳动》、《教育报》；这些杂志包括：《星火》、《苏联》、《苏联妇女》、《女工人》、《女农民》、《人民中国》，一些时尚杂志等。

此外，苏联专家还订购了一些技术杂志，并对其进行了阅读和研究，这些杂志包括：《苏联冶金问题》、《莫斯科自然实验员公报》(地质部分)、《科学院通讯》(地质系列和地质物理系列)、《机车和工具》、《铸造》、《苏联建筑》、《莫斯科的建筑和建设》、《关于新技术以及把其转化为建设经验的材料集》、《建设机械》、《重力工作的机械化》。

在第二季度观看了9部苏联影片，这些影片是通过地委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苏联专家集体参加了两场舞会。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演员举办的三场音乐会。通过地方委员会渠道送来的各部电影，在放映的时候中国领导同志也来观看了。在第二季度就苏联的内外政策问题进行了11次会谈、讲座和报告。

苏联专家的日常生活条件。在康苏村，苏联专家生活在两栋大楼内，所有有家庭的苏联专家都居住在单独的住所内，这些住所是两室一厅，38平方米，有厨房、浴室、卫生间和客厅。为单身的苏联专家提供的是诸如两室的住所。所有的住所都配有电器、水管、排水设施。住所和房间内配置的家具是令人满意的，在三套住所内有收音机、有无线电转播音台，但它们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在野外工作的队员们的日常条件明显就要差多了，苏联专家生活在没有日常设施的土坯房内，或者生活在帐篷内。无论是在康苏村的专家，还是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专家们的饮食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霍什布拉克的专家除外。曾多次向矿管处和联合企业的领导提出过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饮食仍然是非常的单调，味道极差且贵。没有可能为大多数人修建房子，因为在11个人中有9人是单身。此外，大部分必需的食品商店中都没有，而商店中有的食品通常质量都很低劣。

通过马伊贡茨(Ма-и-гунцы)系统供应的工业品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缺少鞋、内衣、针织品、外被、家庭日常生活器具、艺术品。儿童用的被子和鞋完全没有。

苏联专家的工资状况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1955年6月，苏联专家的工资额被降低了两次。根据7月1日的情况，同1月份相比，工资平均下降了40%。通过乌鲁木齐市商务代表处得到的部分工资的支付极不及时，要延迟25天到2个月。苏联部长会议允诺的3、4、5月份多达600卢布的汇款到7月底还没有收到，而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还不知道。工资这样不能及时支付，特别是工资被减少40%，使苏联专家们都处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下。

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相互关系。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以及绝大部分当地专家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友好关系。苏联专家的建议被非常高兴地接受、讨论，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完全履行。也曾有过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没有被履行的情况，但这几乎总是同生产方面总的困难、工人中低下的劳动纪律有关，或者是由于高水

平的中国专家不够，有时候不能解决一些小的生产组织问题。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例子：(1)康苏电站的工作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站厂长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同志不能实施苏联专家加夫里洛夫同志和埃格尔同志多次详细提出的建议：遵守维修工作的计划、加强机器维修队、对制订的指示进行研究等等；(2)选矿厂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多次违背工艺规则，这是由于一些轮流值班的工人想尝试一下，如果改变了规则，或者增加了某种试剂会出现什么结果。

绝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厂长还是车间主任，包括担任技术工程师的人员都不是专家，而是从以前的军人、行政干部、贸易或者其他单位的干部中，从政治方面挑选出来并被任命为这一职务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只有在矿场和选矿工厂才有，在生产部门和主要的机械部门才有。

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车间主任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并对企业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直接的讽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基建处老工程师章丁(Джан Дин)同志总是试图败坏苏联专家提出的关于使用当地的建设物资进行建设的建议，技术保障部主任尚庆(Шан Чин)同志经常破坏预定的技术保障措施，杜撰一些重要的关于企业保障的报告，不仅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履行企业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通过对其他一些较小的关于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情况进行的实例分析，我们相信，所涉及的这些人也不履行中国企业领导人直接下达的指示，根据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的评价，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对待中国的工业化。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在矿管处工作，但有的仍然留下来工作。

类似的个别事实是特别明显的，这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冀福海(Ти Фухай)、郭云思(Го Июнсь)、萨德科夫(Садыхов)、刘浩昌(Лю Хаочан)、阿卜杜拉赫曼(Абдурахман)以及大部分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他们对苏联在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很感兴趣，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并阅读技术文献，对于遇到的所有疑问都向苏联专家请教。

苏联专家讲的课程和作的报告都有大量的听众。在就目前的计划的履行情况定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正如在就个别问题召开的生产工作会

议上一样，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被接受，并且通常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命令。

1955年下半年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任务：(1)关于采矿工作：对沙里塔什一号露天矿井进行设计，做好使用掘土机、钢丝绳冲击钻进、平土机、推土机和自卸卡车的组织工作；改善地下采矿工作的状况，减少损失和矿石的贫化，使矿井的生产能力达到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在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湿式钻岩以及用可拆卸的钻头进行钻探；对煤矿中的一号采煤场进行开采。(2)关于选矿厂：把选矿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昼夜生产320—350吨矿石，在同名矿石中提高铅和锌的提取率，提高精矿的质量；搞清楚能否顺便得到含有金、银和钴的精黄铁矿的可能性；对尾矿场的设计和建设提供帮助；开展研究工作，并进行在卡拉杜别(Кара-Дюбе)矿石产地建设实验性钼工厂的设计工作。(3)在电站和电力部方面：从实践上参加电站柴油机部的设计工作，参与新进的功率为450千瓦的柴油机的安装；通过设置静电电容器，在加强对电站电能的利用方面提供帮助；根据技术管理规程，对锅驼机、柴油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修理拟定详细而严格的程序；通过装配闭塞的蒸汽管道、采用精选的煤、机械化除灰来加强对锅驼机的使用。(4)在机械维修部方面：引入对各类主要的设备进行维修的规程，加强对掘土机、推土机以及其他主要设备的使用，准备一系列可拆卸的钻头，为选矿厂浇铸一些球体和合金铸铁品；对于一些复杂的设备的维修提供帮助，组织有色金属铸品的生产，改善热处理车间的工作；为康苏选矿厂准备浮选机提供帮助，为卡拉杜别钼实验性工厂挑选和准备尚未运送到的设备。(5)在地质勘探方面：亲自参与和田、叶尔羌、乌帕尔、阿克苏、伊尔克什坦地区的检查工作和萨雷巴伊、萨沃雅尔达(Савоярда)、霍什布拉克、卡拉杜别、沙里塔什一号、乌拉根煤矿产地的地质勘探工作；进行的检查工作和地质勘探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些主要的任务——扩大喀什矿管处的原料基地；亲自参与对已知的矿产地的矿产储量进行核算和评估，制定1955年关于地质勘探、地质搜寻以及地质测绘工作的报告；帮助制定1956年的勘探工作计划。(6)在基建部方面：在1955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降低石膏混凝土块石的成本，提高其质量，并把其推广到矿管处在各地的建设中，这将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除了上述所述的任务，苏联专家的任务还有通过就各技术问题作报告、进行授课、进行会谈、传授实践知识以及亲自展示等途径来培养地方干部。下半年打算从领导干部中成立学习小组，就地质工作、采矿工

作、化工、选矿、机械、动力学等科目定期讲授课程。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必须提供的帮助。在喀什矿管处的工作中还有三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依靠现有的苏联专家的全体力量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1.在电厂安装的CK250锅驼机在当地煤矿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地煤的发热量很低，块头小，能产焦炭，火焰长，在燃烧时炉渣会烧结，这为建立必须的燃料规程增添了很多困难，锅驼机只能发挥出其60%的效能。

电站供热的机械化以及除灰的机械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根据赛兹兰工厂的设计制造出的燃炉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由于炉条对燃煤的适应能力差。必须采用高水平的热处理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运送以煤气发生炉的燃料工作的柴油机和锅驼机。

2.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产地的铅锌矿石中提取的锌不稳定，锌的提取率不超过15%—20%，在这种生产工艺条件下精锌矿的质量急剧发生了变化。1953—1954年喀什矿管处向苏联的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运送了大量的铅锌矿石。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的选矿厂不能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中提取锌，而只能提取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计划让喀什矿管处从沙里塔什一号矿产地的矿石中生产精铅和精锌。必须从在华东工作的专家中输送一些有经验的选矿者，以便帮助处理好锌的浮选工作。

3.喀什矿管处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效能不高，对铅和锌进行的大量分析都是错误的，这就导致工厂在金属的平衡方面出现不协调，导致在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和采矿工作时出错误。由于缺乏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没有对钴、钼、金、银和其他的成分进行分析。必须在2—3个月内派出有经验的化学家来教会当地干部，帮助他们处理好实验室的工作。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一位化学家。

4.选矿厂和实验室过磅处的工作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工厂自动传送的材料的计量有很大的错误，对接受成品矿石的斗车的重量的计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计量专家，特别是没有对一些专业的构建自动传送的重量进行计量和分析的专家。必须派遣一名计量专家出差1个月到1个半月来做维修工作，处理好计量工作并培训相关的干部。

5.矿管处图书馆现有的供苏联专家个人使用的技术资料陈旧，并且极其不足。关于采矿工作的期刊、地质应用的期刊、选矿问题和化工问题的期刊完全没有，关于机械和动力的期刊不够。相关机构通过苏联驻喀什的总领事馆向每位苏联专家发送了必要的文献清单的申请，必须尽快满足这些申请。

Л.埃格尔

И.库什内利

Т.达维多夫

И.梅利尼科夫

С.加夫里洛夫

С.布雷切夫

В.措戈耶夫

Н.瓦沙泽

Г.别夏斯特诺夫

Г.鲁缅采夫

Д.特鲁宾诺

1955年7月23日

РГАЭ, ф.9022, оп.1, д.3241, л.248-255, 259-282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 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9月14日

第717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25日

我应约到中国外交部后，何伟同志对我说，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至今没有收到关于日本政府拒绝向参加日本全世界反原子弹和氢弹大会的中国代表发放签证的消息(见1955年7月24日的谈话)。昨天(7月24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已致电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就中国代表的签证问题尽快给予答复。但至今未收到答复。

何伟请求询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是否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上述大会。我允诺照他的请求去办。

接着，何伟同志又讲，今天(7月25日)北京时间22时将播放一个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在英国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后商定，去年一年在日内瓦进行的双方领事级代表间的谈判今后将在大使级进行，以便办理遣返自愿回国平民事务、为今后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以及解决目前双方未解决的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进行。”

上述公报将同时在华盛顿播发。

何伟同志请大使馆立即将公报文本转发莫斯科。我说将按他的请求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

T.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АВІРФ, ф.0100, оп.48, п.394, д.11, л.297-298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出境管理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的决议，允许在苏联出生和受教育的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和妻子M.C.费多托娃到中国长住。

目前M.C.费多托娃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

到中国去工作。费多托娃的理由是，她把自己的女儿和父母留在了苏联，他们都需要必要的物质帮助。

M.C.费多托娃，生于1928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教学或者其他实际的工作经验。

考虑到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们认为应当询问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就这一问题的意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5年7月29日

第25-c-1582号

手写批注：

关于这一问题已经于1955年8月15日准备好新的报告。 [104]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17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苏联公民)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和他的夫人M.C.费多托娃(苏联公民)到中国去长期居住。费多托娃(化学副博士学位，可用于教学或者科研)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不必正式询问，但要弄清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是以苏联专家的名义还是以刘允斌夫人的名义为好。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我们将派遣费多托娃同志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去工作。

请告诉我们应该给费多托娃同志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更合适。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307 , л.238-239

No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机密

1955年8月31日

第69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31日11时于外交部

何伟通报说，周恩来让他通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释放11名现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这一步骤同今年8月1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

何伟接着通报说，今日晚7时，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将宣布释放他们，10时30分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广州。关于这一点，首先是向苏联通报。然后，在今天下午和明天早晨，还将通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英国和瑞典。

明天北京时间17时，电台将广播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内瓦是早上10时。

然后何伟通报了飞行员名单：

- 1.约翰·诺凯·阿诺尔德，尉官；
- 2.比利阿姆·赫尔·巴谢梅尔；
- 3.尤真·约翰·巴季；
- 4.沃拉斯·拉马尔·勃拉文；
- 5.埃尔默·弗雷德·列维德林；
- 6.约翰·谢德林·巴克；

7..... [\[105\]](#)

[1] 原文如此，应为江西。——译注

[2] 原文如此，应为遵义。——译注

[3] 捷沃相，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编注

[4] 此处原文有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为1954年2月6—10日。——编注

[5]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2页。——译注

[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指示。——编注

[7]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8]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9]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10] 这里的第一份稿子是指附件二，而第二份稿子是指附件一。——编注

[11] 所收集的档案原文至此中断。——编注

[12]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13]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既无作者，也没有时间，估计是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可参见以上№14580文件。——编注

[14]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5]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6] 这是经苏方修改过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略去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文中标出了一些修改的地方。——编注

[17] P.A.鲁金科，时任苏联总检察长。——编注

[18] 原文如此。以上№21406文件显示，经过修改的俄文本宪法草案是13日提交

的。——编注

[19] 原文如此。疑为俄文打印错误，按照内容这里应该是CCCP(苏联)。——编注

[20] 德钦党，亦称“我缅人党”，正式名为“我缅人协会”，1930年5月由缅甸抗英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组织。德钦，意为“主人”。——编注

[21] 该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一段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编注

[22] 该附件未翻译。——编注

[23] 手写人名，无法辨认。——编注

[24] 俄文原文Шара□Сымэ，系维吾尔语发音。该地1910年设承化县，1954年改为阿勒泰县。——编注

[25] 尤申，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官员。——编注

[26] 原文如此。笔误，应为427，参见以上№09929文件。——编注

[27] 以下数页列举了大量有关中国农业的统计数字，略去未译。——编注

[28]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了苏联农业部提出的建议，但是就这些问题在1954年7月17日给米高扬的信件中指出：“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必须提请农业部注意，在3年的时间内，在土地返青时播种南方大麻仍要依赖进口的种子。必须责成农业部加强南方大麻的良种培养基地，保障1956年在土地返青时种植的南方大麻的种子都是国产的。”苏联部长会议管理处在给苏联农业部、对外贸易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信函中通报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就……问题提出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大麻种子的建议”(РГАЭ, ф.4372, оп.54, д.925, л.95 96)。——原注

[2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30] 又称“罗加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编注

[31] W.B.史密斯，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2] W.S.饶伯森，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3] J.拉涅尔，曾任法国总理，1954年6月下台。——英译者注

[34] S.克奇鲁，时任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英译者注

[35]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应该是某文件的附件，上面既没有文件起草人，也没有起草时间。这里所标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测的。——编注

[36]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37] 原文件中此句被划掉，用手笔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译注

[38] 原文件中“从那里”一词被划掉。——译注

[39]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40] 该档案未标示文件起草的时间，根据文件内容判断为9月。——编注

[4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件。——编注

[4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43] 列为附件一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二项内容，即苏联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4] 列为附件二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三项内容，即苏联与越南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5] 列为附件三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一项内容。——编注

[46] 该档案原件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47]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8]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9] 此处原文字迹不清。——译注

[50] 此处复印件缺字。——译注

[51] 此处复印件漏印一行。——译注

[52]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3]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4]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5] 所公布的附件只有这一件。——编注

[56] 吴努，时任缅甸总理。——编注

[57]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58]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59] 1955年1月5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就其代表艾登通报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是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一事，驳斥了英国的立场，指出：

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集团的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说这一切是不对的；而美国侵占台湾，帮助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英国这种“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日内瓦时候的精神，得到改善”。——编注

[60] 1955年1月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台湾海峡正在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其中谈到，中共军队攻占一江山岛和炮击大陈岛是“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动用美国军队干涉台湾海峡事务。1月28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编注

[61] 爱德华·贝奈斯(1881—1939)，1935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38年10月，在英法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将苏台德等地割让给法西斯德国的《慕尼黑协定》，随后辞职。——编注

[62] 1954年11月23日，中国司法机关对朝鲜战争期间捕获的美国13名间谍进行审判，并判处其中11人徒刑。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尔舍尔德为此要求访华，以从中调解。12月17日中国政府回复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对处理间谍案的严正立场，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第二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并商谈有关问题。1955年1月5—10日，周恩来与哈马尔舍尔德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接触。——编注

[63] 指1955年1月28日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参见以上№10249文件。——编注

[64] 斯杰潘·奥西波维奇·马卡罗夫(1848/1849—1904)，俄国海军统帅，海洋学家。日俄战争初期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因所乘装甲触水雷爆炸而阵亡。——编注

[65] 2月17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大使尤金，中国同意在旅大为1945年战胜日军修建纪念碑，但不同意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修建纪念碑。——编注

[66] 原文如此，疑为1954年。——编注

[67] 1955年3月17日，发行杂志的全权代表刘平的信件被递送给了吉洪诺夫：“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对您在1955年1月31日的来信表示感谢。您提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意见，提出一些批评性的看法”(ГАРФ, ф.Р9539, оп.1, д.408, л.18-19)。——原注

[68] 满洲，清代满族自称，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这里指清朝和清政权。——编注

[69] 该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70] 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在外交政策中一再采

取对法西斯姑息、忍让的主张，以致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不断蚕食，步步紧逼。故张伯伦的政治生涯以推行绥靖政策而闻名。——编注

[71]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72] 葛量洪(George Herder Grantham)，1947—1958年出任香港总督。——编注

[7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附件。——编注

[74]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1942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剧本。主要剧情：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思想守旧，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后由熟悉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取而代之。该剧在当时苏联军队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注

[75] 马斯友美党(Masyumi)，1945年建立，20世纪50年代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编注

[76] 所附文件顺序与此不同。——编注

[7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编注

[78] 原文如此。——编注

[79] 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8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1]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2] 该文件有大量涉及朝鲜经济情况的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83] 此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84] 比布罗夫斯基，时任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波兰代表。——编注

[85] 拉夫利谢夫，时任苏联驻越南大使。——编注

[86]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87] 1955年4月18日，毛泽东致函苏共中央委员会，请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给予结论性的意见。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了这样的结论。1955年5月27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这个结论，此后连同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并发出。——原注

[88] 这里很大篇幅用于介绍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略去未译。——编注

[8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1929—1956年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文件中所指其讲话记录，内容不详。——编注

[90] 即开斋节。——编注

[91] 1928年2月胡风经人介绍在滇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处任科长，任职不到一个月，因不愿宣讲“三民主义”而被撤职。——编注

[92] 胡风于1929年9月到日本，因宣传抗日于1933年6月被驱逐回国。——编注

[93] 原文如此。——编注

[94] 这里说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编注

[9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作为附件的决议草案，可参见以下№10147，但不能确定这就是该附件。——编注

[96] 所收集的档案是某文件的附件，未标明文件时间、作者和呈送对象，其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97] 档案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不清。——译注

[98] 帕尔金多(Parkindo)，印度尼西亚基督教政党，1950年建立。——编注

[99] 穆尔巴(Murba)，印度尼西亚民族共产主义政党，1948年建立。——编注

[100] 原文为бюро，直译为局，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如苏共中央主席团局，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编注

[101]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2]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3]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有多处删节，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104] 参见以下№21440文件。——编注

[105] 档案复印件以下字迹不清。——译注

第六卷(1955.8—1956.9)

1955年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1份

第309/c号

1955年8月1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1955年8月1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武官毛升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的招待会，我带着一大群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令人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情况：与通常有许多印度尼西亚的社交界代表出席中国大使馆的这类招待会的情况不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很少，而且连一位部长也没有到场。这一切都是与政府的危机相关联的。

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危机这个话题进行的。然而，正如已判明的情况那样，很少有人知道任何有关政府的危机将会如何得到解决的消息。这证明，三位铸像造型工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秘密。例如，我同下列人士都谈过话：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他的副职奎杰胡，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中国大使黄镇，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南斯拉夫代办布尔齐奇，印度大使蒂亚布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国会礼宾司司长和总统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官员。上述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比从报刊上得知的那点消息更多的了，即谈论的都是：马斯友美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总理的职位；国民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拖长政府的危机期，并且不让哈塔副总统和马斯友美党有机会在苏加诺赴麦加朝圣回来之前组成内阁。许多人都说，上述党派之间的大分歧

同样也是因争夺经济部门的部长职位(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而产生的。还发表了一些相当认真的推测，说是已辞职的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会得到外交部长的职位。

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对我说，众所周知，现在正在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寿命不长的，因为新的国会班子的选举一定会在9月29日举行的。因此，在这次选举以后将会发生内阁的更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国会里的政治势力将会发生改组。他说，国民党一定会从这场选举中大胜而出，到那时任何反对力量对该党来说都是不可怕的。苏卡佐继续说，国民党或许将会把这个寿命不长的政府中的总理职位让给马斯友美党。然而，这种情况不会不经过一些斗争就发生的。苏卡佐还发表了一个看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中间的最大的外交专家之一将成为“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我同意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这一评价，并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威望在万隆会议后大大地提高了，并且在全世界他也并非不无理地被认为是一位大的政治家和对外交往方面的专家。

亚太国家司副司长奎杰胡对我说，将要到现在的内阁里来执政的是一些目标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部长们有点不一样的代表。奎杰胡还指出，根据他现有的情报来看，苏加诺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总统将不会像计划中所拟定的那样在8月5日回到雅加达，而是会略微迟一点。

印度大使蒂亚布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告诉我，他刚才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观看了他所收到的一部不长的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逗留情况的新闻纪录片。他说，这部影片很短，一共只放了10—15分钟。

我告诉蒂亚布日，我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说是我们生产了一部大型的新闻纪录片，它已经在我国上映了，是专门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苏联之行的。蒂亚布日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在我顺便提及，如果我在雅加达收到这部影片，他(大使)是否会同我一起参加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人士放映这部电影的组织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很高兴与我结伴一起参与这件好事情。

英国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对四个大国的首脑为了讨论许多迫切的国际问题而在日内瓦成功地举行了自己的会议这件事表示很满意。同时

参赞说，他和大使都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他问，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有何看法。

我说，众所周知，苏联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去解决一切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尽管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并没有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什么具体的决议，但是他们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制定了一份使外交部长们有机会在10月份讨论这些问题的珍贵文件。此外，四大国首脑亲自接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并且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和促使世界上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

参赞同意了我的看法，并说，他对报纸上所报道的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艾登的访问英国的那种情况感到很高兴。他推测说，这次访问将会在1956年年初进行，因为今年年底H.A.布尔加宁同志将忙于访问印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1, п.8, д.5, л.115-118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机密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同志的指示，兹呈交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会谈的记录。

Г.К.朱可夫同志请求(您)考虑如下问题，即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宜在报纸上公开。

基塔耶夫少将

1955年8月4日

附件：

Г.К.朱可夫同志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9时30分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和苏联翻译C.A.特洛亚科夫斯基。

在一番寒暄之后，朱可夫同志指出，(苏美双方)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即将结束。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成为双方沟通的良好开端。

朱可夫表示遗憾，双方在过去浪费了许多机会和时间。

朱可夫希望，最好通过两国领导人和朋友会见与访问的方式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答，困难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些大忙人，因此关于此类访问和会谈的时间往往比较难达成约定。不过，他(艾森豪威尔)仍暗示，此类会谈未来仍会举行。

朱可夫说，看来，艾森豪威尔还是相信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感的。

艾森豪威尔答，他非常愿意与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希望在将来举行此类会谈，而两国民众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他(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益。

针对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当前国际形势最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认为，该建议过于复杂，在日内瓦无法解决，因此建议苏联代表团不要在此讨论该问题。

总之，他(艾森豪威尔)为了忠诚地与其他代表团协同工作，并取得良好的结果已竭尽全力。可是，当各国外交部长讨论给10月份的部长会议的指示时，莫洛托夫竟宣称，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他(艾森豪威尔)而言，真是失望了，因为他已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且本以为苏联代表团一定会接受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统一的建议的。苏联代表团不接受美国的提案，使会议工作陷入困难。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朱可夫对此没有责任。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明白，德国问题对美国的重大意义。美国有许多德国移民，因此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德国尽快实现统一的问题，如果美国代表团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放在签署欧洲安全公约之后的话，它也很难向美国人民解释。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该问题不宜在日内瓦讨论，而最好是给外交部长们起草一个指示——提出德国统一的问题，而由后者根据相关程序去讨论。

朱可夫认为，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日内瓦会谈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各方不能就与会者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达到一致，但他(朱可夫)仍相信，如果与会者们仍愿意耐心地、抱着良好意愿来讨论那些涉及安全的问题，那么问题仍是会得到解决的。德国统一的问题关系到所有欧洲国家，甚至欧洲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会谈当然是有些益处。这次会谈无疑会促进苏美关系的发展。不过，他强调，美国人民期待的是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唯一关心的是德国问题，并希望从日内瓦会谈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中独立起来。

朱可夫答，苏联关心的是所有问题的进展情况。苏联人民期望日内瓦会议能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如果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等能带着积极的成果回国，那么一定会得到各国民众的积极响应。朱可夫希望，在剩余的时间内各代表团仍有机会讨论并解决各国人民所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达不成任何结果，那么四个国家的民众都不会对代表团——尤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满意。

至于德国问题，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朱可夫重复道，及时地解决涉及欧洲安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虽然德国问题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个局部问题。

如果西德没有加入北约，那么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些。遗憾的是，如今西德已是北约成员，而东德也加入了华约，这就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了。朱可夫希望艾森豪威尔能从大局出发，作出妥协。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但对苏联和美国有益，而

且也有益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友好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宣称，他会不遗余力地谋求各种观点的妥协的。如果他认为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他无疑会提出建议。他表示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在未达成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离开日内瓦是令人悲哀的事。艾森豪威尔希望，日内瓦会议能为各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指示。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对赫鲁晓夫留有很好的印象。而其他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对他说过，他们很喜欢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即使日内瓦会议不能完全地取得积极的成果，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使双方在未来取得积极的成果。

朱可夫说，直到最后他都不会对会议丧失信心。如果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们能够表现出智慧，并且同意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妥协，那么就有可能使人民得以轻松地生活。问题是朱可夫说，他不是外交家，他一直在寻求使会议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出路。而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一贯精通这方面事务。他当然清楚，被列入指令草案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安全和重建仍是欧洲人民最重要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正如朱可夫所知道的，美国代表团已表现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希望苏联代表团也能从自己的方面对问题去作妥协决定。

朱可夫宣称，他还想提出关于裁军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采取如下平行解决的方式：一方面在联合国，一方面由外交部长会议进行讨论..... [1]

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如果能成立一个小组或委员会以讨论某个问题以及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所提出的报告，会更有利于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意义。

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注意，裁军问题包含有一些原则性政治内容，因而理应在最高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朱可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取得妥协性的结果，各方就应共同努力，以便把问题交由联合国和四国外长会议，共同进行讨论。

艾森豪威尔答，他会考虑这一想法。他表示很满意，因为朱可夫在离开之前可能还能和他们见上一面，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代表团都在超负荷工作。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现在也相信，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想要和平，不希望战争。可是，要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德国和中国。.....艾森豪威尔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说服好战的、总是喜欢以武力去解决那些需要时间去解决问题的中国，并建议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多做些善意的工作。

朱可夫答，他赞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观点。据他所知，中国也不愿一直陷于在该地区的冲突之中。中国人至今仍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够使他们对最终友好地解决问题抱有希望，那么就可能说服他们。朱可夫补充道，他认为，解决远东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举行.....谈判，先解决小问题，然后再着手那些大问题。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举行这样的谈判.....

朱可夫说，最后他还想就裁军问题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苏联先前提出的关于确定各国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水平，关于建立高效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关于销毁原子武器，等等。

艾森豪威尔答，在了解了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感到该建议将涉及一系列国家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四国外长会议或专门性的下属委员会中进行讨论。针对这些问题，他仍坚持自己在相关声明中以及苏联在5月10日建议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在提出观点之前，仍需要作详细地分析。不过，他无疑会严肃地对待任何关于裁军的建议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朱可夫能够访问美国，并认为此类访问对稳固

Г.К.朱可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11时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

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H.C.赫鲁晓夫和И.А.布尔加宁的问候，并说，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均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深的尊敬之情。这种友好情谊形成的时间既包括现在，而且包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

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感谢并答道，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他本人的这种友好情谊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实施过谩骂或个人攻击，总是极力说真话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

朱可夫指出，关于此苏联国内民众是了解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承认，在美国的确有一些人总是发表攻击性的言论，从而对苏美关系造成了损害。

朱可夫回忆起关于苏联和美国人民共同从事的反对德国纳粹的斗争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柏林监管委员会中所做的协调工作。他说，当时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合作及其所结成的友谊为随后年代两国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不断加深，即使至今仍对世界的和平和友好事业有益。

朱可夫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尤其是战争后期，为了赢得胜利，苏美两国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军事、政治资源。……朱可夫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说，他也承认很遗憾。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他派遣波伦大使出席谈话并让他作谈话记录，他不想让第三个人记录或者让记录变成一个官方纪要。而众所周知，他艾森豪威尔记得最好的是，他的老朋友将会对他说的一切。

朱可夫宣称，纯朴的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都愿意与美国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都应当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消除苏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那些阻碍，防止其他国家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一些黑暗势力总是在苏美之间制造障碍，挑动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把苏联描绘成似乎会进攻美国的侵略国家。

他(朱可夫)想诚实而坦诚地——就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对艾森豪威尔说话。他很了解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想法，知道在莫斯科并没有任何人想与美国发生战争。苏联并不想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因为苏联并不需要战争，讨厌战争。

艾森豪威尔答，他相信朱可夫。由于曾与朱可夫在柏林共过事，因而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朱可夫说，西方经常有人说，拥有强大军队的苏联会对西欧和美国发动攻击。他(朱可夫)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虽然苏联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战略空军以及许多进攻性的武器。但苏联制造这些武器并无恶意。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我们不想1941年的事件重演。苏联不可能在威胁面前削弱自己。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军事将领曾公开威胁要从部署在苏联边境周围的基地发射核弹摧毁苏联。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军事元帅应清楚，苏联不可能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甚至美国自己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应当寻求苏联和美国之间都能够接受的共识，以消除两国彼此之间业已形成的疑

虑.....

艾森豪威尔指出，这是符合实际的。

朱可夫接着说，他不隐瞒，此次他来日内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见面，谈谈心，谈谈关于他——朱可夫这些年的所想所思。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在从事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应当能够为恢复苏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得更多。

艾森豪威尔答，他同意朱可夫所说的——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稳固，他也对战后时期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有一点朱可夫没有提到，而关于此他(艾森豪威尔)想要强调一下。问题在于，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莫斯科开始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解释，而作为回应——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向美国人说明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其结果便导致数百万美国人被恐惧心理所笼罩，从而形成美国人对苏联最恐惧的事实之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那他就可能轻易地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善目前的情况。不过，还是应当重视社会(舆论).....力量.....

朱可夫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谈谈关于他与他的政府的思想转变历程。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便开始复员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驻扎在德国占领区、日本、南朝鲜等地的军队在内。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利益。

可是，当美国刚刚复员了军队之后便发现麻烦从四面八方而来：美国在希腊的朋友遭到了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支持的力量的攻击；随后又是柏林之围，还有在远东的蒋介石——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制；最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决心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建设武装力量。虽然，美国要实施的计划无疑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相当沉重而高昂的负担。美国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更坚定地采取行动以便在各种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保卫南朝鲜，组织前往德国的空中桥梁，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莫斯科已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队都合并到自己的武装力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为了与之对抗才建立起来的，另外也为了避免使法国遭受德国的威胁。这样一来，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开始建立核弹和氢弹储备。关于此类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各国之间如果能达成互信的话就理应销毁它们。

朱可夫认为，只谈论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说过去那一方犯了错，那争论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现在，我们应当展望未来，而不是只揪住过去不放。

艾森豪威尔同意上述观点并说，他提起过去只是为了解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如今在出现了核武器和氢弹的情况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正确的做法都已发生了变化。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较，在现代有原子武器和氢弹参与的条件战争已变得没有意义。

朱可夫同意这一说法，并列出了许多与原子武器和氢弹有关的事实，及其亲眼目睹——这种武器具有多么巨大的毁灭性。

艾森豪威尔说，甚至连学者们都不知道，例如在一个月內爆炸200颗氢弹，如果原子弹技术发生了扩散的情况，世界将来出现怎样的情景。

朱可夫指出，如果在战争初期美国向苏联投掷了300—400颗此类炸弹，而苏联方面也向美国投掷同等数量的此类炸弹，可以想象世界将呈现怎样的灾难。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销毁此类武器。

艾森豪威尔不反对上述观点，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裁军的机制(体系).....

朱可夫指出，主要的是要削减军队和消灭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补充道，最初最好能把这样的裁军机制(体系)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进行尝试。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在任何一个拥有监察和监督的机制中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一方可能向对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和氢弹数量。因此最初最好能建立一个更有限制力的机制。例如，苏联可以派一个监察小组去美国，以核查那些未被发现的核武器。在苏联小组的监督之下，如果美国真想隐瞒这些核武器的话，便无法动用巨大的军事海港、机场、其他军事设施、巨大的工业企业以及运输手段。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对核武器实施必要的监督，并防止突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

朱可夫指出，监督只是削减武力和销毁核武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

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

朱可夫说，要建立的这一机制应能够防止破坏和平的企图.....

艾森豪威尔说，这一机制可以包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四个国家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最初加入该机制的可以是两个德国，随后则是统一的德国。他又补充道，主要是要明确一点，即该机制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维护和平，终结军事集团。

艾森豪威尔说，他赞成各方应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不过，他想指出的是，朱可夫所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前景，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还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朱可夫同意这一观点，并说当前最主要的是奠定友谊的基础。我们与你们，众所周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仍结成了真诚的朋友，我依然深深地尊敬总统先生，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的人民也会支持我们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著作中的许多说法都是相信的。这些学说是永远也不会被苏联领导人否定的，而这可能就是导致美国人民忧虑的原因。

朱可夫答，他认为，关于苏联的有些说法——比如领导着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等，并不符合事实。他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自1949年起以讨论某些问题为中心的国际性共产主义会议并未举行过。苏联的确领导过各外国共产党，其中可能也尤其关注美国共产党，极力提高其政治和素质水平，以便其能够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共产党是各共产党中力量最弱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样——我们认为这都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至于马克思的学说，该学说已存在了100多年了，这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都晓得的，可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追随者仍有许多。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艾森豪威尔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总说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艾森豪威尔)却发现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正如朱可夫所说的，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对各种共产党进行集中领导的中心性组织；其二.....

.....

朱可夫说，应当把事情引向这样一个方向：(苏美两大国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相互帮助。.....社会制度方式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至于苏联，就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务事务。

艾森豪威尔说，他提出此事是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多——以便向西方国家民众证明苏联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想法，那么就会更好地促进那里的人们对苏联的信任并更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朱可夫说，苏联在这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声明.....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他还想请苏联帮助解决如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战俘问题。当他(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便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因为他认为这会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可是，时至今日中国仍违反协议规定——拘押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战俘。虽然他(艾森豪威尔)明白，苏联并不是中国的领导，但他仍想请朱可夫帮忙，以便他与苏联政府能够友好地协调此事，以释放目前仍在中国的30—40名美国战俘和公民。中国政府坚信，美国拘留了希望返回祖国的中国留学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此，美国已准备与任何一个监察组织进行协商，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朱可夫答，他并不了解这方面情况，即究竟有多少美国人被中国俘虏，只听说可能有13人。……他已把自己所收到的艾森豪威尔给一个小男孩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不过，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他(朱可夫)是无法对中国释放美国人的事施加任何直接影响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据我所知，中国已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甚至其余人员，朱可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与中国政府协商这一问题，后者也一定会满足美方的相应要求。

朱可夫接着说，鉴于艾森豪威尔提到了中国，他(朱可夫)也正想从整体上就中国问题与其探讨一下。因为中国问题的无条件解决对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为何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为何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为何至今中国无法解放……和……等岛屿以及台湾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在危害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加剧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应当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民主。而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朱可夫认为，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威信。

艾森豪威尔说，即使他和朱可夫把这次会谈的整个时间都用到中国问题的讨论上，估计也不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理解朱可夫在上面所陈述的观点。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史则是一段相当让人伤感的故事。他无法描述美国国内对当前现状的愤怒情绪，只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下一任总统)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艾森豪威尔)想说的是，尽管美国遭遇了许多压力，但并不愿在这一地区投入大规模的军队，因为美国政府想避免流血和战争。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想对朱可夫元帅说，就是关于目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战俘的问题。美国政府收到了各个国家的大量请求——要求帮助协调这一问题。例如，据说目前在苏联仍关押着14万名西德战俘，等等。可以设想，其中一些人曾被判为战犯。但艾森豪威尔认为，已经到了做出大度姿态并释放这些人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请求朱可夫帮助协调这方面事务，如果有可能的话。

朱可夫答，虽然对目前在苏联的战俘具体数量并不太清楚，但他可以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所提供的数字是被严重夸大了。如果如今在苏联仍有战俘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些由于所实施的罪恶而被判决的战犯了。众所周知，苏联已将所有奥地利战俘释放，而关于德国战俘也正与西德政府进行谈判。不过，鉴于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请求，朱可夫将采取措施以了解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希望，苏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双方都可通过各自以及对方的使领馆来相互沟通。

艾森豪威尔还请朱可夫对德国的统一施加积极影响。虽然他并不认为此事现在就能成，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以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有助于实现德国的统一。

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不仅应像个元帅，而且还应像个和平卫士那样去作为，这样，苏联领导人也将会以一个促进和稳固和平的政府那样而被载入史册。

朱可夫说，事实上，不论是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苏联政府，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

国和平和友好的事业。众所周知，苏联现存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集体领导绝不应从该词语的狭义去理解，而应作广义的理解。这种集体领导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苏联政府，以及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和政府，州党委等等。在美国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恶意的报道，说什么苏联的集体领导体制似乎已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苏联的集体领导是集中了整个集体领导者的智慧。

苏联目前正花大力气发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福利。我们国内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至于德国，该国要实现统一仍需付出努力。正如布尔加宁在政府首脑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希望西德总理和美国政府考虑民主德国存在的现实，以便在现有基础上妥善地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目前，理应使德国的两个部分都融入到欧洲集体安全的体系内。我不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就能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只能逐渐地促进并解决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能够局部性地解决德国问题，他(艾森豪威尔)也会付诸努力，以便德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发生由于人们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便遭到逮捕的情形。

在会谈结束时朱可夫感谢艾森豪威尔，并表示对此次有益而愉快的会谈很满意。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这种感受，认为与朱可夫的会谈是有益且愉快的，并对朱可夫表示感谢。

记录：O.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106-131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协助收集关于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1928—1930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同时中国大使馆请求通报1928年在苏联出生的邓中夏的儿子的所在地。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仔细查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关于红色工人国际的档案材料，找到了一些邓中夏有关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的文本。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大使馆的请求，并把这些文件和材料的复印件转交给他们。(清单见附件)

至于邓中夏的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关于他所在地的材料，可以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说，我们在继续寻找邓中夏的儿子。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说明：关于邓中夏的资料已经交给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并通报了寻找邓中夏儿子的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9月20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86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 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今年7月29日所通过的决议，我接待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后者是于今年8月4日来到莫斯科的。

在会谈期间，张治中说，30—40年以来他一直幻想着能到莫斯科来，现在非常高兴，自己的这一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打算在苏联停留3—4个星期。张治中表示，除了莫斯科之外还想去一下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在莫斯科期间，他想看看城市和市郊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展览会，并参观2—3座工厂。在访问其他城市时，他也表达了类似上述的愿望。

我们对张治中说，在这方面他将获得我们充分的协助。

8月5日，张治中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例会的晚间会议。

在访问苏联期间，陪同张治中的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萨济科夫同志。

.....(签名 [2])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报告赫鲁晓夫同志。归档。

B.切尔努哈

1955年8月6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71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的秘书处

Г.С.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由(苏联)外贸部东方管理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画册。 [3]

苏联外贸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M.斯拉德科夫斯基(签名)

归档。该资料Г.С.斯捷潘诺夫要用于记录。

M.索科洛夫

1955年8月22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83-84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允斌·克里姆在苏联接受教育和学

习，并且是苏联公民和苏共党员。现在允斌·克里姆和他的妻子——苏联公民M.C.费多托娃表示，希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住。

苏共中央出国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通过决议，允许允斌·克里姆和夫人M.C.费多托娃到中国去。但是费多托娃另外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以便使留在苏联的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M.C.费多托娃应邀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进行了谈话。她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正如费多托娃所通报的，她是在同自己的丈夫允斌·克里姆协商之后提出上述请求的，但是刘少奇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不得而知。

由于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并考虑到她是在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请求允许她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谨慎地就这一问题同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15日

第25-c-1582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电报已发。

В.费多谢耶夫

И.谢尔巴科夫

И.维诺格拉多夫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允斌·克里姆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很快就返回中国。他的妻子费多托娃是苏联公民，也打算与他一起去中国，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关于费多托娃的请求，需要谨慎地与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请向他通报说，他的儿子及其妻子近期打算回到中国，但费多托娃说，经与自己的丈夫协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工作。苏联相关部门愿意根据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申请向费多托娃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的话，关于可以派遣费多托娃同志做什么样的工作，请把你们的意见通报给我们。她是医学副博士，可以担任教师或者到科研机构工作，她没有作为苏联专家所必需的经验。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43-244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第81/380-ГС号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四、提交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适宜的。

ЦХСД, ф.4, оп.9, д.1347, л.121-123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苏联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之子允斌·克里姆目前已经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硕士毕业，并打算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

允斌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予以协助，以便他和妻子在回国之前能够到一个有专职医生的疗养院去疗养。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给允斌同志和他的妻子М.С.费多托娃派发两张疗养证。所有招待费用从外国党和社会活动家的接待费用中报销。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20日

第25-с-1761号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40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8月22日会议第142号记录

致苏斯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外交部)、B.库兹涅佐夫同志、叶留金同志、鲁缅采夫同志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苏联高教部关于在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援助的建议。

(1955年8月19日第81次会议记录第380-rc条)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适宜的。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552—2553页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
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兹呈上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这封电报是1955年8月31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名义发给苏联外交部远东

司的。

附电报文本，共1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5年8月31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中国公民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贝庆志(Бечин-чжи)和朱武三(ЧжуУ-сан, 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今年经苏联政府的允许由苏联返回中国。倪特金和贝庆志声称，他们是苏共党员，而朱武三则声称是苏共预备党员。

倪特金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言系任中文教员。他向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斯克岛区党委会交还了自己的党证(党证是1954年派发的，号码00454627)。贝庆志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坎顿公社的集体农庄中工作。他把党证交给了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委第二书记乌拉霍夫斯基同志(党证号码不记得了)。朱武三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城沃伊沃日石油托拉斯任职(他的党证是1952年下发的，号码为0566892)。

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下上述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并告知我们结果。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8月22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45-246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致苏共中央：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请求，我们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等代表已经讨论过的“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的两项条款的复审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从纲领草案中删除如下两项条款：1.“在统一后，越南将以民族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原则为指导，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联盟的问题”；2.这里涉及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军的问题：“法国军队撤退的程序和法国军事人员的撤退问题将由越南联合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中共中央于今年8月25日向越南劳动党中央做了答复。其中说，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从纲领中删节关于越南加入法国联盟的条款。

至于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出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应当对纲领草案中与该问题相关的文字作如下修改：“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

中共中央认为，如此措辞的原因如下：

其一，应当维持越南对待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态度；

其二，如果简单地把纲领草案中关于法国军队撤出的表述删节，将会给吴庭艳集团的诬蔑性宣传提供口实，后者可能宣称，南方人愿意法国撤军，而北方人却不愿意这样做。

其三，在纲领中加入如下表述：“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可以使人民群众了解越南劳动党是拥护法国撤军的，与此同时该表述也表明党完全赞成循序渐进地执行日内瓦协定；

其四，如果法国军队可以抵御美国人和吴庭艳的压力，那么其部分军队可以留在越南，并将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再撤出，而这样做也不会与我们关于法国军队逐步撤出的提案相矛盾。

刘晓同志说，自己根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内容和中共中央(给越共中央)的答复内容，并询问苏共中央的意见。

今年8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曾就此问题致函苏共中央。

今年8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了如下给苏联驻河内大使的电报内容：“请向越南同志转达，我们不反对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

草案中删除那些涉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同盟以及关于法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后撤出的问题等条款。不过，我们认为，替代那些在纲领草案中被删除的条款，应当以胡志明主席于今年8月11日答《法新社》记者问的精神为指导，添加一些表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对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的态度的文字。”

该电报已转交越南劳动党中央。

鉴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在越南参加法国同盟的问题上基本一致，在关于法国撤军的问题上双方也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均强调有必要为逐渐地、完全地履行日内瓦协定而斗争，我们认为应当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会见刘晓同志并向其通报如下内容，即苏共中央不反对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5年9月8日

归档。第25-c-1906号

手写批注：

与刘晓同志的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举行。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5年9月1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97-99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送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简要报告。

附：

- 1.报告55页。
- 2.西藏当局的机关(参考)8页。
- 3.西藏居民各阶层的组成(参考)2页。
- 4.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9月14日

第1597/c号

归档。信息资料。有关苏联佛教徒代表团参加1956年印度庆典一事与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波利扬斯基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

莫斯科，1955年

绝密

内容目录及页数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2页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2页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3页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基本矛盾，7页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11页

2.西藏的民主改革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4页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24页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32页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33页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民主改革，42页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45页

3.结论与建议，49页

附录

(1)西藏地方当局机构，8页

(2)西藏阶层的组成，1页

(3)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西藏：它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经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中共中央1954年10月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原则为基础的：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多民族的中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在中国除了汉族，还居住着28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500万人，同时还有人数众多的各种部落。大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封建制度，而有些则是奴

隶制和原始社会制度。1955年初在云南省西部高山地区甚至还发现一个部落仍处在史前发展阶段。该部落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群居，不穿衣服，他们还没有语言），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每个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实施自己的民族政策。其中在对待西藏和藏族方面，中国朋友考虑到的问题如下。

1. 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19世纪始至1950年西藏是英国扩张政策的对象，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同样也成了美国资本家扩张的对象。英美依靠西藏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始终贯彻使西藏脱离中国并将它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方针。

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有共同边界的西藏，与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还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以中国朋友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中国与美国、英国以及一系列南亚国家。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西藏是广袤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的是西藏各个部落。在中国境内这个区域占据了整个中国疆土的20%以上。在中国境外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广阔区域直到印度（不丹、锡金等），尼泊尔的北部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东北部。藏族的人口总计超过300万人，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280万人。在西藏现在的边界居住着约100万藏人。藏族分裂为许多部落和部族。但是，尽管个别一些西藏部落和部族之间有许多深刻的矛盾和微弱的经济联系，可他们所有人是历史地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所以中国朋友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在整个藏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反响。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佛教本身在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之间传播非常广泛。所有佛教教派和流派信徒的圣地：玛旁雍错圣湖、冈仁波齐神山和拉萨都在西藏。每年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兰、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来这些圣地朝拜。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逐渐地产生了许多变化，14世纪佛教被改为喇嘛教。喇嘛教成了居住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所有西藏部落以及中国蒙古部落中的主要宗教。过去喇嘛教在蒙古和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尔梅克人和沃伊洛特人）的蒙古人中间同样广泛传播。喇嘛教的首脑是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按喇嘛们的信仰他们是转世的佛。

由于文化的极度落后和差不多藏民个个是文盲，喇嘛教在他们中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西藏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它压迫劳动人民。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宗教对于藏人来说联合民族的工具。西藏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常是带有宗教的色彩。因此西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西藏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旧封建神权政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手里，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喇嘛上层。

在西藏喇嘛的阶层非常多。按照形成的宗教习俗，每个信奉喇嘛教的家庭必须将子女中一个儿子送去当喇嘛（僧侣）。所以有近20%的藏民是喇嘛。仅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喇嘛就有30万人，而喇嘛寺庙超过3000座。

如在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着将所有居民分为三等九级（随附有关西藏居民的划分的参考）（方新民（Фан Синь-минь）：《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按照这样的划分所有的喇嘛都归入上等一级。但是绝大部分的喇嘛属于低等喇嘛（喇嘛——除“活佛”外——分为三等：上等为噶伦（Гэлуны）；中等为噶准（Гацулы）；下等为巴基（Баньди）。“活佛”同样也分为几个级别）。这些喇嘛接近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统治剥削阶级。大部分低等喇嘛在寺庙结束学习并被授予喇嘛后回到自己主要从事放牧或种地的家中，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遭受剥削。这个级别的有部分喇嘛仍留在寺庙里，被当作劳动力从事

寺庙里的农事、手工业和商业，一样遭到剥削。

范围很小的喇嘛剥削阶层首先是所有高等喇嘛：噶伦和噶准。这些级别的喇嘛通常出自封建领主或这些家庭的亲信。噶伦和噶准占据了寺庙中所有主要的领导位置以及在西藏地方政府机构中一半以上的重要岗位。他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劳动人民掠夺来的剩余产品。

西藏的封建领主(西藏以前的国王和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家族和其他“活佛”的后代)是为人数不多的阶级。西藏现在有将近150个贵族封建家庭，按照西藏现存的划分属于上等二级和三级。他们中有将近20个家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阶级影响力。比如像他们中的巴哈、扎洛克、拉祖家族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小劳尔·托马斯：《我们的世界之外》，纽约，1950年，第242页)。

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联盟在西藏建立了独特的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由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的政府领导(随附有关西藏地方当局机构的参考)。

西藏的工人阶级仅处在萌芽阶段。其人数在几千人，主要从事挖掘黄金、盐和硼砂。一小部分工人从事手工业。西藏的工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按照现存的阶层划分，工人属于最下等九级，而属于八级的是流浪者和乞丐。

主要的被剥削阶级是农民(放牧和种地)，在西藏的居民中占绝大部分。剥削阶级掌握了所有的牧场和适合种植的土地。根据中国朋友公布的最新资料，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土地，30%属于喇嘛寺庙，30%属于封建领主，40%属于国家。(就如近代中国出版物中读到对西藏的描述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原来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官员得到的薪水不是货币，而是以每个职位指定有部分国家土地并随附农民的形式。部分国家土地是指定给每个国家单位的，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用以弥补单位的开支。)

没有土地的农民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寺庙、领主和国家租用土地。比如，在许多地区种地农民的租金经常占到其收成的80%。大部分农民都依附于某个主人。擅自从主人处离开，农民将遭到残酷的惩罚，直至砍去手脚，割去耳朵和鼻子。除了租金，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杂税，并服许多差役。庄园的农奴还要增加劳役。

除了上述指出的阶级，西藏还存在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商人阶层(在西藏大部分贸易由外国商人、寺庙和封建领主控制)以及为数不多的封建知识分子。这些阶层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没有很大作用。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主要矛盾。西藏封建神权政治主要的矛盾是剥削集团与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其中包括被剥削的喇嘛)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遭受沉重的压迫，可在宗教、部族和其他偏见的束缚支配下的西藏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意识暂时还很弱，极少起来与剥削者斗争。为数很少的西藏工人被分散在小企业里，完全没有组织；他们的政治觉悟也不高。

重大的矛盾在剥削集团内。他们中主要矛盾之一是历史形成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由于近几百年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该矛盾现在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只是表现在个别封建领主和寺庙为土地和农奴而进行的争夺。

喇嘛上层的许多矛盾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围绕达赖喇嘛的喇嘛集团与联合在班禅身边的喇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还在喇嘛教最初的历史阶段时就出现了，当时个别喇嘛寺庙相互独立，为了在西藏和喇嘛教中的影响和统治而进行斗争。逐渐地在旧西藏的卫地区围绕拉萨的哲蚌寺形成了一个喇嘛集团，而另一个喇嘛集团则是在旧西藏的藏地区围绕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中国17世纪掌权的清王朝竭力想通过这些喇嘛集团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在1652年授予哲蚌寺的转世者达赖喇嘛的称号，而扎什伦布寺的转世者称号为班禅喇嘛，以此批准了他们在喇嘛教中的统治权(沈宗濂、柳陞祺：《西藏和西藏人》，纽约，1952年)^[4]。以后达赖喇嘛将自己的

宗教和管理权扩大到了西藏的东部，包括这里居住着藏人的西康省和四川省以及不丹、锡金和印度其他地区。班禅喇嘛和他的政府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影响扩张到了西藏的中央和西部以及青海的西藏部落和蒙古喇嘛。

分布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寺庙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矛盾。喇嘛寺庙的这个集团在喇嘛教内占据着领导地位，并为了在教派中和西藏地区的领导经常进行斗争。它们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不仅是对控制喇嘛教，而且对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三座寺庙领导者的首肯，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实施任何一项国家措施。

更为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拉萨寺庙与坐落在拉萨以外的喇嘛寺庙之间。

每座喇嘛寺庙，遵照共同的喇嘛教教规的同时，竭力保留在授予喇嘛称号问题上，在财政和经营事务上的独立性。拉萨的寺庙与西藏境外的喇嘛寺庙之间的这些矛盾特别激烈，在喇嘛教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境外许多地区(蒙古、内蒙古、青海、西康、四川、不丹、锡金等)个别寺庙建立了实际上已经脱离西藏而自成体系的教区。西藏地区以外的中国境内寺庙的喇嘛上层，通常比大部分西藏的喇嘛上层较少地倾向于反动。1949年到1951年期间，这些寺庙部分领导者积极支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同样应当指出，喇嘛寺庙与在西藏仍旧存在的其他佛教流派为数不多的寺庙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些寺庙经常受到来自喇嘛教上层的压迫。

考虑到西藏统治阶级中自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集团，中国朋友确定的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十分重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上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既直接又通过印度和尼泊尔的官员、地主和商人与英美紧密联系的集团。有些西藏封建贵族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英国和印度受的教育。

与此同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中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倾向于中国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从19世纪起一直为了在西藏的领导地位进行着时有胜负的残酷斗争。

20世纪初到1933年，西藏的权力掌握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亲英集团手中，他依靠的是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寺庙领导集团的支持。以九世班禅喇嘛为首的亲中国集团曾试图削减亲英集团的权力，结果在1924年受英国人挑唆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将九世班禅喇嘛赶出了西藏。班禅喇嘛与自己的政府以及扎什伦布寺的许多高级喇嘛去了青海省，在那一直待到1951年(九世班禅喇嘛在1937年圆寂。在他圆寂后又过了数年，一名来自安多地区藏族家庭的男孩被隆重宣布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解放青海省以后，联合在班禅喇嘛周围的喇嘛集团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它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按西藏当时的状况五世热振活佛成了摄政王，他是依靠拉萨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亲中国集团领导之一。在他统治时期，亲中国集团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摄政王热振活佛的领导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中国被选出并受到了教育培养(随附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参考资料)。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教唆，1947年组织了一个反对热振活佛的阴谋，摄政王的权力转而落到了亲英美集团的领导者之一的噶伦达扎手中。热振活佛跑到了色拉寺，号召该寺庙的喇嘛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热振寺喇嘛的支持。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几千名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喇嘛因担心遭到迫害，纷纷从西藏逃往西康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这些省份以后，这些寺庙的许多喇嘛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积极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运动。

解放前，很大程度上是现在与英美有联系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还掌握着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中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位置。

中国朋友在自己针对西藏问题的政策上同样考虑到一方面是所谓的“活佛”和另一方面的高级

喇嘛(噶伦和噶准)和封建领主之间非常重要的矛盾。每座寺庙都有“活佛”或转世者，形式上被认为是寺庙的首脑，虽然实际权力在高级喇嘛手里。根据喇嘛教的教规，大部分转世者，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常都是从劳动人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活佛”在喇嘛中的地位是受人尊敬的傀儡。如果他们不听话或脱离喇嘛的政策自行其是，通常他们会被弄死，而他们的位置会由新选的“活佛”替代。比如，九世、十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都是被毒死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些“活佛”支持人民的利益和实行民主改革。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中国朋友同样不得不考虑到藏族对汉族的不友好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是残酷压迫藏族政策的结果，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期间执掌中国政权的清朝和中国地主，而自19世纪起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对藏族都实行过的政策。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人为地拆散西藏人民。1918年从西藏划出总共居住着50多万藏民的西藏东部的许多县。这些县与四川省西部的一些县一起成立了西康特区。后来从西藏划分出剩下的东部地区(康区或昌都地区)，那里居住着大约60万藏民。这个地区与西康特区一起在1928年改成了西康省，省的首脑是委派的中国管理人员。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部成立了中国青海省，包括了与青海省西康特区15个中国县一起大片地域，那里居住着40个西藏部族。

西藏人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西藏人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遭到来自一心想汉化藏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千方百计的侮辱。

从西康划分出的地域，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强行从西藏人那里夺走大片宜于种植的土地并迁入中国移民。中国商人不受监管的行为，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掠夺式的不等值贸易和以重利盘剥的圈套哄骗藏人，同样也引起了藏人的极为不满。

2. 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与宗教和封建领主依旧保留着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朋友无法得到西藏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朋友只得暂时主要通过西藏的统治阶级实施自己民主改革的政策。

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

该协议一方面预先声明保留西藏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规定将实施许多办法以逐渐进行西藏的民主改革。

根据1951年夏的协议由西康省、青海省和新疆省向西藏地区派遣总数达3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拉萨、日喀则、江孜。部分部队布置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

虽然在人数上人民解放军部队略少于西藏地方部队和寺庙及封建领主的武装队伍，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作战训练、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方面要大大地占据上风。这些部队足以保障西藏内部的秩序和保卫该地区的国界。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来到西藏的，还有以张经武将军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处。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逐步地开始了。从该地区民主改革的最初阶段起，中国朋友就遇上了来自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运用灵活和谨慎的策略，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起的4年期间，在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协议的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施协议中的这一条不仅触动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样还有印度国大党政府的利益。

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从西藏夺取了拉达克(1846年)、不丹(1864年)和锡金(1890年)。后来英国强加于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从西藏获取了许多特权，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西藏地区。根据奴役性条约，英国从1936年开始在拉萨就有了常驻的政治使团，履行外交代表处的职能。

在西藏城市亚东、江孜和噶大克，都利用领事权成立了英国商务代办处。借口保护商道和代办处，在亚东和江孜等城市布置了英印的军队。1922年英国人从藏印边界到拉萨架设了一条与印度电报电话线路网相接的电报电话线路，而后来又控制了西藏的邮政。英国人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的地段，为印度的朝圣者盖起了12家宾馆，同时还夺取了大量的仓库和商务楼。

英国资本家以及帮助他们在西藏实施攫取政策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逐渐地控制了与西藏的对外贸易。在西藏解放前的最后时期，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1943年美国情报机关(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派遣了非官方的使团，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1948年8月美国与赴美的西藏贸易代表团签订了非正式的贸易和财务协议，这些协议使美国能够加强自己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英美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西藏，将它作为向西藏相邻的省份西康、青海、云南、新疆渗透的立足点。西藏的上层受他们的指使开始加紧宣传建立包括这些中国省份大片疆域的“大西藏”的计划。战后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竭力利用西藏作为反苏联、反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战争据点，为此还研究通过西藏和新疆向苏联边境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还研究在西藏建造空军基地、机场和发射导弹的发射装置。根据他们的提议，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1948年8月开始建造从印度到西藏的公路。

印度获得独立后，1947年英国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及所谓的在西藏和与其为界地区的“权力和义务”转交给印度。印度国大党政府不仅没有拒绝这份帝国主义的遗产，反而竭力与英国资本家紧密勾结，更为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这份遗产。锡金和不丹公国以及其他过去从西藏被夺走的地区，都被归入了印度的版图。为了防止这些地区的统治上层有脱离的意图，印度政府大大增加了给他们的资助，同时强加给他们更为奴役性的条约。

1947年到1949年间，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将这块地区从中国夺走并将它变为“独立”国家的政策。其中，受以前是英国而从1947年起是印度在西藏的使团的指使，该使团现由曾是英国间谍的理查森领导，1949年夏西藏当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队时，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并宣布进行“反共产主义的宗教战争”。所有中国的机构关闭，而中国人则被赶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重视一个相邻而强大的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来自印度人民对它极大的好感，在对待中国方面只得采取对外友好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尽管不是直接的。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1950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实行两面的，实质上对中国是敌意的政策。印度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而在1949年底对英美帝国主义者代办处和西藏反动势力未加阻止，任其进行组建藏军的动员并将其主力调往昌都地区，以组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印度人作为顾问和教官继续在藏军里服役。

当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初接近昌都地区边界时，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将此告知印度政府后，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团过境印度前往北京。但是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帮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在抵达印度后以各种借口拒绝回中国。印度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局面，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以使中国的主权成为纯粹的形式，同时承认印度所有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比如，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的照会中指出：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阐明它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中国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但它同时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在拉萨市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江孜商道上有政府建造的邮局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道，40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希望这些机构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政府当时看到西藏当局无意进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就在1950年9月下达了命令，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解放昌都地区和西藏，而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要保留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遗产，即对西藏的权利和特权。在印度政府明显的纵容下，逃出西藏的英美间谍以及一些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侨民代表重新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和其他印度地区安家落户，并在那里进行反西藏的破坏活动。

1952年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商人停止在西藏收购羊毛和其他出口商品，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工业品。经济封锁的组织者们认为，这在西藏与中国之间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会导致西藏的经济危机，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使他们起来与中国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按他们的推测，中国政府将被迫给予西藏“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印度在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不作任何有辱中国主权的让步。考虑到要与印度建立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国朋友在向西藏驻军后对印度的机构和印度的财产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和单方面的行动，以得体的方式拒绝承认它们的合法性。

对印度政府的立场有显著影响的是中国朋友为了对印度政府施压，在出版中国地图时继续印刷出版以前旧中国通过的版本，也就是标明的边界线大大越过了麦克马洪线的以南和以西地区。（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条边界线，该线一端在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之间，另一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虽然实际上中国曾经承认该线，但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包括了所有以前中国统治的疆域，也就是18000平方英里缅甸现在的领土，17000平方英里印度的领土和22000平方英里克什米尔的领土。）

印度政府碰上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同时相信自己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会变弱的推测不现实，于是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1952年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使团问题得到了协调。按照协议，印度在西藏的使团改变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但是根据相互对等的原则，印度政府同意在孟买开设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

1954年年底，中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开始就协调其他涉及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相互交换了补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照会。这个协定和附属的照会实质上废除了所有以前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方面的就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建立印度与中国的新型关系。印度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完全废除。印度政府承担从西藏城市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的军队，以合理的价格将所有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及其设备，同时还有所有宾馆，转给中国政府，将所有使用的或印度政府占用的土地，除亚东印度商务代表处的地段外，全部归还给中国政府。

为支持和发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友好邻邦的贸易关系，在西藏境内保留了三个印度商务代办处（在亚东、江孜市和噶大克市），但根据相互对等原则，印度政府也同意在印度境内成立三个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德里市、加尔各答市和噶伦堡市）。

考虑到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和拉萨是印度佛教徒的圣地，中国政府承担义务对印度佛教

徒去这些圣地朝圣不加以阻挠，同时同意为朝圣者保留现有的宾馆，还答应尽一切可能协助建造新的宾馆。印度政府照样也承担责任保证不阻挠中国朝圣的佛教徒去印度的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菩提伽耶、桑奇大塔)。

协议中没有反映出有关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正如1955年1月1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的那样，印度政府“完全满意”在答复有关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边界大大超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指出这些地图是旧版的错误翻印。

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协议在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确定印度可以输入西藏和从西藏输出的商品清单的同时，按照贸易协议，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根据现行法则促进那些无法在印度得到的商品输入加尔各答口岸，随后再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这样的促进只是推广于中国出产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共和国贸易协定》，《苏联对外贸易部科研情报所通报》1955年第1期(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第19—23页]。

履行上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协议的结果令人满意。譬如，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向中国移交印度财产的仪式，其中包括邮局和电报局。驻扎在西藏亚东市和江孜市的印度部队也从西藏撤出。

与印度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是中国朋友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这些协议：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完成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恢复，并废除了有关西藏问题旧的不平等条约；

动摇了那些依靠印度的广泛支持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的反动分子在西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对改善中国与尼泊尔和缅甸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尼泊尔政府在1949年至1954年期间对中国还持敌对立场，1954年宣告自己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到1955年就建立了这些关系。

但应当指出，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西藏问题做出不友好的行为。比如，印度政府至今没有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国民党和反动的西藏移民利用印度境内从事针对中国的敌对活动。英国、美国和国民党间谍在印度境内靠近西藏的地方有许多侦察情报中心，在那里进行反对中国的破坏活动：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调拨武器和装备，经常对边境地区的地形进行拍照和航拍。印度境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是锡金的大吉岭市；从西藏出逃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曾与该中心活动有联系(根据1955年8月15日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的哥哥经日本逃往美国)。许多间谍中心分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境内。在拉达克(克什米尔)，英国人理查森也在那里安了家，他曾是印度驻西藏使团的团长。

还应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签订了协议，可印度政府直到最近还以各种借口阻挠向西藏运送粮食和货物。为了同西藏做生意，每个商人都必须向锡金的印度政府的政治干事申请特批。直到建造了青藏公路和西康到西藏的公路以后，1954年12月印度政府才与中国签订了向西藏运送2200吨印度米的协议，而从1955年5月27日起取消了对印度商人将米卖到西藏的所有限制。

(2)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的特点，认为现在还不适合授予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分离的自决权。按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政策，授予的是区域自治权，也就是有限的自治权。在西藏就是实行地区自治也困难重重。

如上所述，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走上将西藏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为此，西藏当局1943年擅自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赋予它履

行独立国家外交部的职能。比如，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扩大贸易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去了美国 and 英国。1949年仍以同样的借口派常驻使团去印度。同样，实际上与尼泊尔也建立了不依赖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后者在西藏派有非正式的外交代表。西藏当局完全由自己来保卫穿越西藏地区的国界，并且调整了人员与货物过境的规则。中国政府以前集中掌握着西藏对外事务的代表处被停止参与决定所有对外事务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该代表处之间的往来甚至不是直接进行，而是要通过外交局，也就是如其他外国使团那样。

西藏地方政府养了完全不受中国管辖的武装力量。在英国顾问和教官领导下成立了一支人数总计在10000人的军队，而参加训练的后备人数同样大约有10000人。军队按照英国操典训练，用英美武器装备。除了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在每座寺庙以及每个封建领主都有私人武装队伍和自己的弹药库。有些队伍人数已达到1000—2000人。这样的武装队伍总数已经超过了藏军人数。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8和14条）。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顽固地抵制履行协议的这些条款，多次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国朋友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容忍。1952年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代表柳霞·土登巴塔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将藏军改编延期一年或甚至二年。但与此同时，中国朋友逐渐地步步紧逼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协议规定的办法。

1952年拉萨成立了中国外交部帮办办公室。这个帮办办公室由外交部委派的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领导。帮办办公室的工作同样也吸收了西藏外交局的地方工作人员。此后，以前成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也废除了。鉴于帮办办公室的管理，在印度的西藏使团也接受建议回到了西藏。

现在西藏所有的涉外事务都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握。制定的中国通则，调整了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规则，以取代被废除的西藏特别规则。守卫国界的西藏地段和出入境检查由先前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

在改编藏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委任中国将军张国华为军区司令，而他的副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官和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藏军总司令）。藏军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但是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顽固抵制，藏军至今实际上还没有被改编；它基本上是按照旧原则建立的，只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的队伍是例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指令在青海省组建，该队伍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在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

由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坚决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只得下达指示，解散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队伍。为了将该措施实施到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据外国报刊报道，许多封建领主和寺庙形式上解散了队伍，但自己仍旧保留着枪支弹药，以防一旦需要仍可在短时期内重新恢复自己的武装队伍。

不管反动势力的阴谋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许多藏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促成这点的情况是1950年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部队俘虏了超过藏军1/4的士兵和藏军的司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藏军的俘虏非常友好，在俘虏中间进行了说明解释工作后就将所有人释放回家。

1955年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护送达赖喇嘛赴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再次研究了藏军进一步改编的问题。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是，在西藏解放后建立的3800名藏军中成立一支为数1000名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军人的装备交由中国国防部负责办理。中国国务院于1955年3月9日同意了该项协议。

有关西藏自治区的边界问题也很复杂。在中国共产党旧的有关授予西藏人民区域自治权的纲领文件中规定，将居住在中国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所有西藏部落统一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自然，只能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这个西藏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朋友认为应该暂时放弃这样解决问题，显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当时情况是，按照协议几乎是完全不受侵犯地保留旧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周围，势必导致反动的西藏喇嘛和领主聚集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将阻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的民主改革。与此同时，无疑也可考虑到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西藏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治区，可能引起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不安，这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善邻关系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中国朋友决定将区域自治权利授予现存边界内的西藏和从西藏划出的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西藏人。到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9个西藏自治区，其中甘肃省1个，青海省6个，四川省1个和西康省1个。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西藏自治区极大地减轻了总体解决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难度。

中国朋友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同样主要居住着西藏人的昌都地区问题。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昌都地区或康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仅在1928年被从西藏划出。以后，西藏用武力将该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195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昌都地区以后，在喇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中国朋友在该地区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履行地方当局的职能。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有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昌都地区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国朋友没有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民族自治区，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总体民主化问题作出让步后，再将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在西藏地方政府民主化问题上，中国朋友同样也遇上了很大的困难。按照《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将不予变更，而“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所以协议签订后保留下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几乎是旧的班底，而它的职能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西藏地方政府中大部分领导和官员都是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倾向英美，敌视中国，是西藏民主改革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多里始终一贯地执行限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方针。上述提到的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以外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实施这种措施中的一项。其他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1951年让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并恢复了他在1924年以前已存在的地位和职权。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后就恢复了班禅的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该政府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中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区域，包括日喀则市和江孜市的某些部分。这极大地限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

班禅喇嘛的宗教和管理权力的恢复，是在遭到西藏反动势力顽强抵抗情况下进行的。西藏反动势力利用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之间存在的历史性争议问题，试图挑拨性地夸大这些分歧。幸好中国朋友充当中间人进行干涉，这些挑拨才没有得逞。1954年到1955年在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协助下，1955年1月19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限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民主化，中国朋友坚决争取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五条，该条款指出必须在西藏设立不仅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军政委员会。设立这样一个在地位和职能上高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使中国朋友能够加快地区当局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西藏统治上层表现出特别顽固的抵制，直到1954年年底前仍坚决地拒绝成立军政委员会。

只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次会议工作期间，这次会议除达赖喇嘛代表团

外，班禅喇嘛代表团、西藏昌都地区代表团和西藏各寺庙的代表同样也参加了，中国朋友才得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195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自己的决定，从而完成了经与西藏社会所有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有关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按自己的职能，筹备委员会是比西藏地方政府更高的政权机构。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同样还有因这项决定将并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政府(人民解放委员会)都服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具有广泛地代表制的特点。由51个人组成，其中只有15个人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剩下的里面有10名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5名中央政府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和11名其他各种组织的代表，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组织代表等。批准达赖喇嘛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为班禅喇嘛，而第二副主席是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

筹备委员会下设庞大的机关：秘书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10个部门(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该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像筹备委员会那样按照比例代表制全套配备。厅、委的主任、副主任和各处处长、副处长人选由国务院批准任命。

成立筹备委员会是中国朋友的西藏政策的巨大胜利。这项措施更加削弱了西藏反动势力的地位，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为西藏地区当局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

1951年之前，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是分开。它与中国没有直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唯一的一条不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线路，将拉萨通过江孜和亚东仅与印度相通)，没有航空交通。一些陆地道路，更确切的是山间小径，穿越在荒野空旷的高山地形中，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修建过的路。在夏天的时候，只能骑着牦牛或马在这样的路上行进。

中国朋友公正地将这当作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加以研究，决定结束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1952年人民解放军工兵部队架设了通往西藏的电报线路，同年沿该线开通了拉萨与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电报通讯。以后这条线路继续通到了日喀则市。1953年12月沿该线开通了电话通讯。同时恢复并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城市之间以及整个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1954年年底建造完工的两条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稳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对消除西藏与祖国隔绝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一条公路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度穿越，将四川省的雅安市与西藏的主要城市拉萨市相连，全长2225公里；另一条公路长2100公里，穿越在更高的高山和空旷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连接了拉萨与青海省的行政中心西宁市。过去开车从拉萨到北京的道路需要4—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20天。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今年西藏境内将开始建造两条公路：羊八井到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这些公路是青藏公路和西康西藏公路的延续，它们将在经济、行政和宗教意义上处于西藏第二中心的日喀则市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

(4)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

虽然西藏落后，可它的经济对于国家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现在已经是最大的牧区之一。因为西藏没有准确的牲畜数量资料，所以中国官方的牲畜统计资料至今未包括该地区的牲畜头数。根据1952年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科研勘察队的大概计算，在西藏繁殖生长的主要品种(牦牛、绵羊和山羊)的牲畜头数有几千万头。仅位于扬子江上游西部的黑河(那曲)和羌塘地区总计有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以及将近200万头牦牛。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运往印度1500—2500吨羊毛，30000—40000头牲畜，大量的皮革和用以制作著名的开司米围巾的羊绒。

但是西藏的畜牧业极为落后。比如，西藏绵羊活体平均为51.6公斤，新疆品种绵羊活体重量是83.5公斤。西藏绵羊每年剪下羊毛平均为1.3公斤，而新疆的则是10.3公斤。西藏的牲畜中瘟疫猖獗，导致牲畜大量死亡。

西藏和中国农民多年的经验表明，能够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山谷广泛发展农业。但是，虽然条件优越，可农业推广十分落后。仅种植几个品种(青稞、燕麦、小麦、稷、荞麦、豆类和其他蔬菜)。由于耕种土地的方法和工具落后，西藏地区的农业出产率很低。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西藏不得不每年主要从印度输入500—1000吨粮食和许多其他的农产品。

在西藏很大范围内都能采集药草和从麝身上提取麝香。仅是每年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就达200吨药草和1.5吨麝香。

对于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西藏极为丰富的矿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西藏进行的地质勘探表明，西藏许多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仅在那尔察(Наэрцан)地区的金矿绵延近450公里。在拉萨北部发掘了最为丰富的硼矿。与此同时在西藏发现了煤矿、油页岩矿、铁矿、铅矿、钨矿、镭矿、锌矿、铋矿、硝石、硫黄、石棉矿和银矿。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地区还有石油。西藏同时还分布着巨大的盐矿和硼矿。向尼泊尔和不丹输出盐和硼，以前是现在也是西藏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比如，西藏解放前每年运往不丹和尼泊尔的盐达到2.2万—3万吨)。

西藏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拉萨的军械厂、铸币厂和发电厂是唯一最新的现代型工业企业。这些厂的规模非常小。比如，西藏军械厂总共只有30名工人在工作，每月制造4支枪。拉萨发电厂的功率只有60千瓦。

手工业略有发展：呢绒、羊毛料、地毯、毡呢、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具的制作以及佛教用品。部分手工业集中掌握在寺庙，而其他的则由私人企业家掌握。小规模的手工业无力满足居民的需求，过去西藏主要是从印度输入大量的工业品。

由于西藏劳动者还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缺乏组织性以及还保留着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西藏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所以中国朋友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是旨在让西藏摆脱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使其牢牢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落后制度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经济，逐渐由国家在经济中把握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农业企业，随着西藏劳动大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增强，逐渐地有时是迂回地废除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中国朋友十分关注畜牧业。旧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商人阻挠，他们有限地仅仅购买高等级的羊毛和皮革。1952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有关国家无限制收购所有等级，包括低级的羊毛和皮革的决定和通过人民银行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养殖户在4年期间得到超过10万元的贷款。在整个工作中资料都是以新的元进行换算)。首批在西藏组建的兽医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及时采取预防兽疫的措施仅在1953年就能够预防疾病并治愈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地区超过9万头牲畜。

中国朋友提出了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西藏的农业，使它摆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高价输入农业品，并在西藏地区建立牢固的粮食基地。

驻扎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命令，要在当地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粮食自给。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经地方当局同意划出的荒野之地上建起了许多军垦农业。从1951年到1954年开荒整地超过3000公顷荒地，到1953年已经收获了1000吨粮食。

与此同时采用奖励和让西藏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农业的办法。为此在过去的4年，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方面总数为16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种子和农具的无息贷款的帮助，结果使西藏农民在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扩大了面积达3300公顷的可耕地。(贷款数额每

年增长。比如，1952年以贷款方式发放了28.5吨粮食，1953年已经是375吨。1954年贷款额又大为增长，增加了贷款发放点。因为西藏农民没有土地，是农奴，所以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地主和寺庙。中国朋友利用这项措施将统治上层中的个别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让其保持中立。）

军垦农业和特别是在拉萨司令部建立的农业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过去4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在西藏的高山环境下可以种植300种以上的农业植物，其中包括亚麻、棉花、茶叶、许多品种的小麦、土豆和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其中从苏联获得的北方品种小麦(包括亚麻、多穗小麦、土豆和其他植物)显示出非常好的结果。

为了加快西藏的农业发展，1955年3月9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班禅喇嘛政府和昌都地区拨款100万人民币用以购买农具无偿分发给农民的决定。这项措施使西藏农民配备了更为现代的农具，并因此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收获量。同时通过了有关在拉萨河和年楚河上建造两座河坝的决定，为的是一方面消除洪水对拉萨和日喀则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利用建造的水库人工灌溉农田。另外还通过了有关扩展和加强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市创建的农业试验场的机械化。为了这个试验场以及军垦农业，今年向西藏运送了从苏联得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国朋友为建立西藏的工业同样也采取了措施。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后的4年期间，西藏工业恢复了力量，拉萨的热电厂开始输电，建造了4家示范性缝纫厂、皮革厂、金属制品厂和血浆厂。开始建造木材加工厂、一些洗毛厂、砖瓦厂和石灰厂。这些企业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作了奠基。给予贷款的方法为地方手工业、金矿以及盐和硼的加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

1955年3月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代表协商并征得同意后，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西藏工业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未来几年将在拉萨市建造水电站、皮革联合加工厂和预先指定主要生产最简单的农具和金属的家庭用具的小型金属制品厂。同时还将在日喀则市建造小规模的热电厂。

中国朋友在实施发展经济的措施时的每一步都与西藏反动势力非常顽固的抵抗发生冲突。比如，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阶段，受到反动势力挑唆的藏民游行示威，拒绝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的贷款，同时还拒绝兽医站和其他的帮助。怀有敌对情绪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阻挠将空闲的土地划分给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农业，而有时则划出完全无法种植的地块。

反动势力的抵抗特别厉害的是表现在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最近时期，西藏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或者是通过它们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商品。也正是这些国家在西藏购买西藏大部分的出口商品。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后，印度、尼泊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英美资本家的压力下，自1952年开始几乎完全停止从西藏购买羊毛和皮革，而且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西藏的商品没了销路，价格一落千丈。在这同时西藏市场上出现了工业品和部分食品的紧缺。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沿着西藏未经整修过的山路从中国其他地区运来粮食(米、青稞和小麦)非常困难。由于西藏大部分农田遭受洪水，这样的状况在1954年夏季更为严峻。

幸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在西藏收购所有的羊毛和皮革并加强往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这才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与经济困难的斗争使中国朋友能够对西藏的对外贸易建立起国家监督，并将以前由国外资本家集中控制的大部分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现在批发贸易基本上由专门成立的“西藏国家贸易公司”控制，到1954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在西藏各城市和大居民中心有了9个分公司[“西藏国家贸易公司”在3年期间(1951年到1954年)向西藏人民提供了茶叶、布匹和日用品总计在200万元人民币，从西藏收购了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的养殖产品，包括超过2000吨的羊毛]。大部分西藏居民对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表示赞许，因为这是英国

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外商人掠夺性的非等值贸易的终结。1954年西藏的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的产品得到的收入比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平均收入多了两倍。

至于零售贸易，它依旧像以前那样由寺庙、封建领主和城里的个体商人掌握。中国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过于尖锐化，暂时不在西藏搞国家和合作社零售贸易。

两条公路的建造完工使得进出西藏的货物运输从1954年起有了极大地增加。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最初4个月运入西藏的货物量是1954年同期的9倍。过去的经济困难现在被彻底克服了，西藏市场上价格稳定，主要商品货源充足。

反动势力在财政领域表现出非常顽固的抵抗。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推行西藏“独立”方针，发行自己所谓西藏卢比的货币。西藏解放后它顽固地拒绝废除该货币。由于提供贷款和内外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控制，中国朋友抑制了反动势力的抵抗并使有关西藏主要城市开设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和在西藏地区流通中国货币(元)的问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同意。国家银行通过自己的分行逐渐地争取到了在西藏财政上的领导地位。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当局同意1955年中国国务院有关停止发行藏币和逐渐退出流通的决定。决定同时规定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货币援助以消除金额为70万元的年度逆差。同时投入400万拨款进行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

虽然西藏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可中国朋友还是在现存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范围内多少改善了西藏劳动人民的状况。譬如，在邮政转为国家控制后，中国朋友经过努力废除了西藏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乌拉差役”。(按这项差役每个西藏家庭有义务提供一或二名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人，自带驮畜以驮载货物及邮政官的吃喝用品。该项差役经常不断地每月使一个西藏家庭中一至二名成年人离家为期20天。)

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以及中国进行农业改革的经验迫使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大大减轻了对农奴的剥削。

据报刊报道，现在中国朋友正准备措施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改为用货币支付工资。这项措施将使绝大部分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摆脱农奴地位。

(5)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民主改革

在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朋友在西藏的政策是旨在逐渐地取消喇嘛教的反动统治。

1951年前的西藏只存在寺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是喇嘛。寺庙学校里的学习主要为学习藏语、喇嘛僧侣的清规戒律、经书和粗浅的算术。只有在大的寺庙下属的经学院里，与宗教科目一起的同时学习西藏医学、数学、西藏文学和其他一些科目。

不止一次地尝试为不是喇嘛的居民成立非宗教学校网，遭到了来自喇嘛教会上层领导顽固的阻挠。和平解放前西藏总共只有两所不大的非宗教学校。其中的一所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办的学校，教孩子学习汉语，另一所是英印在西藏的使团办的学校，教学生学习英语。

喇嘛对教育的垄断引起了所有非喇嘛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仅有一小撮封建领主可以请私塾到家里教孩子读书或者将孩子送到印度或中国内地接受教育。

中国朋友依靠非喇嘛阶层的民众和喇嘛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开始着手在西藏创建非宗教学校网。1955年年初在拉萨、日喀则和西藏主要居民中心已经开办了7所共有1000多名西藏孩子就读的非宗教小学。学校依靠西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力量用藏语上课。

中国朋友特别注意为当局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培养民族干部。为此几百名西藏青年被派往中国高等学院学习。比如，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由拉萨和日喀则的中央政府代表处组织举办的定期1个月的培养民族领导干部的进修班在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同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藏反动势力对教育发展进行了非常顽固的抵制。当拉萨开办了第一所非宗教小学时，迫

于反动喇嘛势力的压力，西藏人拒绝将孩子送去该学校上课。他们坚决拒绝将自己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学习。只是在达赖喇嘛号召居民将孩子送去读书并表示“学习科学对西藏人有益”后，西藏孩子和青年的学习状况才得到改善。

和平解放后首次在西藏出现了电影院。仅在1954年一年中，西藏和昌都地区就放映了70多部影片，有超过85万人观看了电影。西藏第一次出现了广播；在拉萨的机构促进了广播的迅速推广，而同时中国大的广播站用藏语进行广播。

在拉萨成立的西藏出版和翻译委员会在发展西藏的教育和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朋友成功地在该委员会中联合了西藏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着手翻译成藏语并出版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第一张藏语版的报纸，编纂藏汉词典。

人民卫生保健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喇嘛掌握的所谓藏医，既落后又无法抵抗许多疾病。解放前的西藏到处流行性病、沙眼、天花和其他许多疾病。根据在拉萨进行的调查，将近90%的居民患有某些疾病。新生儿便有75%的死亡率，而剩下存活的有将近46%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便死去。

1952年，人民解放军在克服了喇嘛中反动势力的抵制后，在西藏建立了第一所诊疗所，后又转为拉萨人民医院，有标准床位90个，一天可看病400—500人次的门诊所。与喇嘛反动势力的破坏性宣传相反的是，现代医学逐渐地取得了民众的信任。现在除了拉萨，已经在日喀则市和江孜市开设了门诊所。除此以外，专业的医疗队在西藏许多地区与流行病和其他疾病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

根据中国朋友的倡导，在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成立的西藏爱国青年协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欢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现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它们是西藏第一批民主政治团体的萌芽，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组织的助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成立于1951年，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干部和专家小组中入驻西藏的中共党员组成。后来采取的步骤是吸收倾向于革命的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6)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

派往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基本上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所研究的政策原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尊重民族的宗教情感，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务。同时中国工作人员履行中央的指示，为了使针对宗教的措施“不至于加强宗教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反而为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来欺骗群众”。

中共中央针对宗教的指示对成功地实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巩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暂时的放弃在西藏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包括农业改革，使中国朋友能够大力加强自己对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中更为进步的人士，使动摇的人中立，使反动分子孤立。中共中央在总结民族地区工作经验时，在1954年10月的决定中指出：

“在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领导和控制下，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上层人物，坚持长期地与他们合作的方针，为此并准备花一批钱将他们养活起来，用来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跟我们前进。应肯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应该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以前被驱逐的班禅喇嘛和他的拥护者返回西藏，同时还有1947年起义后从色拉寺、热振寺和其他寺庙出逃的喇嘛也返回了西藏，这极大地加强了喇嘛中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期间发现和团结了西藏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主要集团中许多进步代表，这些人现在与中国朋友合作，为西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中国朋友实施的以下措施对扩大和巩固西藏上层的进步中坚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派遣多批(总数超过1000人)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代表的代表团去国家其他民族和汉族地区(四川省、内蒙古等地)以了解民主改革的进程和宗教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不止一次地与西藏代表团座谈；

——勇于争取喇嘛上层的代表不仅参加在地方上的，而且是在当局中央机构合作共事，其中包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广泛地向喇嘛寺庙和封建领主提供用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贷款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帮助。

中国朋友使许多“活佛”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之间享有很伟大威望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应该认为是中国朋友特别重大的成就。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达赖喇嘛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而班禅喇嘛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国务院决策有关西藏问题的工作，1955年组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观祖国各地了解民主建设的进程，这些都使中国朋友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对这些“活佛”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最近在多次的讲演和布道时号召佛教徒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坚决地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领导收集签名的运动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反对准备原子武器战争，这说明了中国朋友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日益稳固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发言不仅在国内佛教徒的中间，而且在国外的佛教徒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朋友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进一步加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有民主倾向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现在对中国境内和国外佛教徒的进步影响。为此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

1955年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以履行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职责的西藏喇嘛喜饶嘉措为首的代表团有蒙古喇嘛，同时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法师和僧侣。从4月1日至5月4日在缅甸的逗留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与缅甸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关系，揭穿了缅甸和国外反动分子在缅甸散布对中国的诬蔑，造谣说中国佛教几乎已被消除，而僧侣或被驱逐或被枪杀。

中国佛教徒的进步发言和他们对国外的影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者们的惶恐。资本主义的报刊在最近一段时间急剧地加强了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佛教在中国情况的诬蔑材料。两名被安置担任摄影者工作的国民党间谍试图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5年在北京期间枪杀他们，目的是利用这起枪杀事件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中国和境外佛教徒之间的威信。

应当指出，佛教进步人士对国外影响的加强同样也引起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统治阶级的很大不安，特别是印度。为了巩固自己在印度和国外佛教徒中的影响，尼赫鲁国大党政府打算利用1956年5月在印度庆祝佛陀涅槃的2500周年日。

众所周知，佛教至今没有自己一个统一的中心。在过去可以看到来自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在自己的影响下成立这样的中心，可他们没能得逞。现在尼赫鲁政府又决定作这样的尝试。在他的支持下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庆祝期间将在菩提迦叶和贝哈尔召开世界佛教会议。邀请了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和会议，其中达赖喇嘛受到个人邀请。

(7)结论与建议

四年半期间，中国朋友在巩固自己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今后逐步的民主改革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与基本上正确实施政策的同时，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犯过、现在还在犯着许多错误。比如，人民解放军部队抵达拉萨后，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后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设在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中国朋友不懂得习俗，不经意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喇嘛和藏民的不满。其中藏民认为对自己和喇嘛教有侮辱性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布达拉宫上挂起了红旗。这些错误马上就被喇嘛反动势力所利用，1952年4月在拉萨挑起暴乱。中国朋友费尽周折才未动用武力消除了这次暴乱。

在某些来西藏的中国干部中间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有辱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场合，缺乏友好的联系和对藏族工作人员帮助不够。

个别干部对西藏的情况和特点认识不够正确，经常机械地将与汉族地区使用的工作方法搬到与藏民的工作中，因此有时遭受挫折。在实施一些措施时常常考虑欠周到和草率仓促。比如，1952年中国政府下达有关国家贸易公司收购西藏所有的羊毛和皮革的指示。但在执行这项指示时中国朋友犯了错误，将收购价制定在由于英国商人拒绝收购这些货物而急剧跌落的价格水平上。它仅仅是在制定新价格后消除了大为提升的高价和藏民支付的新旧价格之间的差价，这引起了藏民的不满。有些干部还有犯命令主义的情况。

可总体上应该指出在西藏的中国朋友十分精干地剖析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有效地加以消除。在实施民主措施方面他们特别注意防止草率仓促。

据以上叙述的情况有理由认为，中国朋友旨在扩大和巩固西藏和西藏以外的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进步中坚力量的政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其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共同事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好能与中国同志商讨有关在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家徒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其中包括研究有关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同时还有苏联参加的1956年5月在印度为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组织的庆祝活动和为此召开的世界佛教会议的问题，这将有正面意义。派遣社会主义阵营的佛教代表团将对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造成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会议不仅能够阻挠佛教僧侣中反动势力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会议，而且能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中的进步人士结成同盟，对会议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施加影响。如果会议通过有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就能够对确定该世界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苏联佛教代表团出席世界佛教会议的特别重要性。佛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宗教。所以苏联代表团的参加能成为苏联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习俗极为尊重的新的表达，毫无争议地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各民族的友谊。同时苏联代表团参加佛教会议将能够揭穿反动势力散布的谣言，似乎在苏联唯独欧洲民族的宗教有自由，而亚洲各族人民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遭到迫害。在这项计划中最好应该同时研究有关实施的方式和在列宁格勒开设一座如同在佛教徒中颇负盛名的纪念性建筑物——佛教庙的问题。

苏联的专家学者最好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帮助中国朋友从理论上概括实施民族政策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缅采夫

1955年9月17日

附件一：

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

(参考)

西藏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为首的，驻扎地在拉萨市，另一个是班禅喇嘛为首的，驻扎在日喀则市。达赖喇嘛的政府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人口更多和经济上更发达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昌都地区或康区)。

班禅政府管辖着西藏的中部、北部，同时还有整个西部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点和地方以前曾是现在还是归达赖喇嘛政府管辖。比如，日喀则市的三分之一，西藏和其他等地区的许多宗(县)。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各自控制区之间至今没有建立经双方完全同意的地界划分；这些为许多居民点和地方的争吵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1942年班禅喇嘛和他周围的人被逐出西藏后，达赖喇嘛政府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整个西藏地区。由于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喇嘛和自己的政府回到了西藏，而他以前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了恢复。1955年年初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他们政府的领导负责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调解下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其他问题都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在为和平解放西藏斗争期间，1951年1月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或康区)成立了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地方民主政府，被称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这样一来，从1951年起西藏领土上实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在运作。

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形式上属于无限权力。从达赖喇嘛去世后到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完成(16—18岁)，权力转在摄政王的手中。

按照西藏现存情况，摄政王可以由达赖喇嘛在自己去世前由他本人任命。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摄政王就该由政府为此特地召开的民族大会选举产生。通常只有是拉萨三座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等喇嘛转世者(活佛)才能被选举为摄政王；这样的转世者在西藏只有几个。同时甘丹寺现在的和以前的主持和达赖喇嘛大师也有权成为摄政王。万一摄政王去世，就另外再选一个替代。

伴随喇嘛身边的是他的内侍系统，即所谓的“泽”(顶)，大部分是从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活佛”和其他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形式上该系统被任命帮助达赖喇嘛；可实际上它的使命是让达赖喇嘛的每个举动都在上等喇嘛的严格控制下，使达赖喇嘛的活动完全符合上述寺庙集团上等喇嘛的利益。

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有三个机构组成。达赖喇嘛的个人事务和财产由达赖喇嘛所谓的“基巧堪布”(内侍总管)负责管理，他有三个助手，分别掌管达赖喇嘛的饮食、日常需求和宗教仪式。不管达赖喇嘛去哪，内侍总管和他的助手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他。内侍总管手下还有达赖喇嘛个人的秘书处。

两名经师负责达赖喇嘛的教育，他们一直是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高级“活佛”。经师有几个来自上等喇嘛的人作为助手。经师和助手让达赖喇嘛认识了解经文、西藏的历史，并

与达赖喇嘛进行辩论。

因为按照喇嘛教的教规，达赖喇嘛不应直接与外界交流，为此他下面有一个联系的机构——泽嘎(Iqera)(顶的代表)，作为达赖喇嘛与外界，其中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这个机构由从上等喇嘛中任命的大主持领导，他帮助制定同样也仅从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官员编制。

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行政机关是绍尔(Шол, 平原)，在达赖喇嘛和他的内侍系统领导下执行自己的职能。 [5]

称为“噶厦”的内阁领导着中央行政。噶厦由4名部长(噶伦)组成；其中一名是高等喇嘛，而另三名是封建领主。噶厦成员中的一名是藏军总司令。噶厦是集体性机构，但噶厦成员中喇嘛地位最高，履行总理的职能。噶厦准备各种法律和主要的命令，并将它们交付达赖喇嘛研究和批准。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噶厦颁布各项法律和采取措施付诸实行。

噶厦还建立以僧俗官员为代表的扩大或精简的理事会以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理事会实际上是西藏政府的幌子，因为理事会成员的名单是噶厦按照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行挑选和批准的。理事会由噶厦任命的“八人委员会”领导，由4个秘书和4个管财务的担任。理事会上不举行投票表决；经过“八人委员会”讨论后独立形成决议并以理事会的名义提交噶厦和达赖喇嘛研究。

在西藏地方政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个秘书处：僧侣官员事务的秘书处和世俗官员事务的秘书处。

掌管僧侣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从高等喇嘛中选出的秘书领导。秘书处的整个编制完全都是经过由国家管理的学校专门学习的喇嘛官员。秘书处登记所有的寺庙和它们的财产、所有高等喇嘛，批准授予他们高级称号，审理查清寺庙之间的各种诉讼等等。该秘书处受双重领导：除了噶厦，它还直接服从于达赖喇嘛。服从噶厦的同时，掌管神职官员的秘书处还是它的监察机关，因为秘书处存有达赖喇嘛的印鉴，而没有达赖喇嘛的印鉴，任何一项政府的法律和命令都是无效的。

掌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审计官组成。无论是审计官还是该秘书处整个落后的编制，都是从世俗官员中挑选的。这个机构主要是对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地产进行清点核算，解决涉及封建领主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世俗的官员并授予他们职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完全服从于噶厦。

除了秘书处，噶厦下属还有许多辅助机构。它们中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由两种(僧俗)官员领导的外事局。除了外事局，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超过20个的局和部门(贷款局、国资局、财政局、喇嘛事务局、粮食局、城管局、地方政府直辖区管理局、司法局、军队事务局、移民局、建设局、农业处、邮政处、电力处、盐和茶叶管理处等等)。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配套构成。有些特别重要的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共同领导。

按照西藏现有的状况，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由僧侣官员各175名组成。但事实上官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编制表”。同时应指出，喇嘛官员的人数约占西藏政府机构总人数的2/3。

西藏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除此以外，设置了3个“噶准”的职位，其任务是帮助噶厦的成员进行国家事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西藏分成各个“宗”，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县。拉萨市及市郊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解放前西藏总共有123个“宗”。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管辖着100个“宗”。按照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各个“宗”可分为4类：大、中、小和边。“宗”的地方当局是“宗本”或“宗”长，由西藏地方政府从封建贵族或高等喇嘛中任命。在许多“宗”领导职务由两名官员担任：一名是喇嘛官员，另一名是世俗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

是僧官为主，俗官为副。大部分“宗”的领导都住在拉萨或日喀则，而地方上的事务由他们信任的官员管理。

西藏的“宗”也分成乡“措”，以乡长(“措本”或“噶布”)为首，由“宗”长从自己的亲信中任命。村的首脑是村长(“米米”、“谿本”或“埃巴”)，由乡长任命。有些大的分散的村有时也分成团体(强)，这些团体也有团长(强本)。

西藏地方政府有自己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达赖喇嘛是军队的首脑。军队总司令是最高西藏行政机关噶厦的成员：朵噶彭措饶杰噶伦。军队主要依靠农民，喇嘛不从军。藏军的部队主要编制单位是500人的骑兵团。每个团以藏文字母为标志。团的领导人是团长，有两名助手，每个助手领导250名骑兵。军官完全都从封建贵族中挑选；来自平民的士兵只允许担当低级的军士军衔。西藏和平解放前，藏军学习的是英国军规操典，并装备以英美的武器。

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

日喀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班禅喇嘛。按照现存的情况他拥有属于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内形式上的宗教上层的和行政上的权力。从班禅喇嘛圆寂到新的转世灵童成年之前，班禅喇嘛的权力由活佛中挑选出的摄政王掌握，这些都是属于班禅喇嘛寺庙中的活佛。

班禅喇嘛通过在他之下成立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囊玛岗)实现自己的权力。和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噶厦一样，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是由高等喇嘛和封建领主组成。应当指出的是班禅喇嘛政府里的喇嘛比达赖喇嘛政府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辅助机构有：

“囊萨康”：掌管所有内部事务，主要是喇嘛内务的机构；

“夏曾康”：掌管解决一般性问题，包括世俗事务的机构；

“泽康”：秘书处；

“冲依康”：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 [6]

除了每座大的寺庙和领主有武装队伍外，班禅喇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人队伍，主要是保卫政府。这支队伍在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帮助下在青海省成立，人员都来自青海的藏民。它的组织和配备与其他人民解放军部队一样。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不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当局选出的机构。委员会是在1950年12月27日到1951年1月2日期间召开的昌都地区第一届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委员会由地区最大寺庙的“活佛”、喇嘛、领主的代表、西藏部落的首领、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24名是西藏人，而9名副主席中7名是西藏人。与藏民一起被选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生活在昌都地区的汉族干部和汉族代表。

委员会下设许多部门(农牧处、工商处、财政处、卫生教育处等)。在各个部门工作的既有当地藏民，也有中央政府派去的汉族干部。

过去存在的服从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周围和县级的政府都被取消。周围许多地区和“宗”(县)同样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地方(周围的和县的)政府。在仍旧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认可的部落管理机构。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缙采夫(签名)

附件二：

西藏阶层的组成

(参考)

西藏仍旧保留着封建的阶级划分，按此划分所有西藏人被分为三个等级九个级别(方新民主著，《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 上上(上等级)：达赖喇嘛、摄政王、达赖喇嘛家庭成员；
- 上中(上等级)：高官、“司伦”、“噶伦”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大寺庙的“活佛”；
- 上下(上等级)：“代本”、“宗本”官员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所有其他的喇嘛；
- 中上(中等级)：地主、英雄、大封建领主的世袭后代和所有的有产阶级；
- 中中(中等级)：在行政机构和大官手下工作的中等和低级的官员；
- 中下(中等级)：士兵、农民；
- 下上(下等级)：官员的仆人；
- 下中(下等级)：流浪汉、单身男女、乞丐；
- 下下(下等级)：卖肉的、街道清洁工、金属工、铁匠等。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三：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生平简要，供参考)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来自一个曾在青海省靠近西宁市农村居住过的安多部落的藏人家庭。达赖喇嘛的世俗姓名叫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的父亲直到其儿子被选为达赖喇嘛之前是个农民，经济收入较富裕。丹增嘉措的家庭与汉人关系很紧密；他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讲汉语。

1937年10月，喇嘛教领导派出专门的西藏喇嘛使团，根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魂飘逝”的许多迹象，从西藏来到青海，找到了丹增嘉措，并称其为达赖喇嘛的新转世灵童。在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喇嘛教上层通常仅仅是形式上的遵照喇嘛教规，而实际上是出于政治

上的考虑。这点在选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也是如此。喇嘛上层亲中国的集团首领摄政王热振一边组织在青海省寻找新的转世灵童，另一边显然是在追求下列的政治目的：第一，在青海省的藏民中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可加强西藏在该省数百万藏民中间的联系和影响。第二，因为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能进一步巩固西藏与中国的联系并相应地加强亲中国集团摄政王热振的地位。第三，选择青海省来寻找达赖喇嘛新的转世灵童能够争取西藏第九世班禅喇嘛的选举并迁移到青海省，后者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迫于1924年离开自己在日喀则的常驻府邸。被认为与达赖喇嘛一样是喇嘛教主要领导人的班禅喇嘛，他的同意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转世灵童的挑选更为合法。

1939年9月西藏使团与丹增嘉措以及他的家庭一起到了西藏，在那里丹增嘉措被认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在1940年隆重登极成为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选为转世灵童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与丹增嘉措一起来的家庭(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被提升到最高的贵族级别，获得了许多领地并搬到了在拉萨专门划拨他们的一幢4层楼的府邸。(达赖喇嘛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几个家人继续在拉萨生活。达赖的哥哥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与一伙反动分子一起跑到印度去了。如国外报纸披露，在侨居国外时，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加入了美英侦察兵在大吉岭创建的颠覆特务中心的活动。1955年，显然正是由于加入了美国侦察兵，唐格采尔从印度经日本被辗转派往美国。)

1950年以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参与西藏和喇嘛教的管理，从事学习喇嘛教的清规戒律和文学。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学过其他学科，所以他的教育水平非常一般。

1947年以前主要依靠喇嘛最主要的寺庙之一色拉寺的摄政王热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管理西藏。1947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挑唆，喇嘛上层的亲英分子发动了宫廷政变。该集团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喇嘛达扎，将热振停职后自己掌握了摄政王的位置。色拉寺喇嘛为支持前摄政王热振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一些起义的参加者被残忍地杀死，而该寺庙大部分喇嘛害怕达扎的迫害，被迫逃往中国境内。以前的摄政王热振被捕入狱，很快在监禁中神秘死亡。

达扎政变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丹增嘉措是摄政王热振喇嘛挑选的，在他领导下受的教育，完全有理由担心新的摄政王达扎会尽力杀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像过去在孩童或少年时期被杀死的大部分达赖喇嘛那样。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以及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大部分人的反对立场，迫使摄政王达扎退出对西藏的领导，并将权力转交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但是在管理喇嘛教和西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的权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喇嘛上层和一小撮封建领主手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敌视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些人凭着喇嘛教的教规，千方百计地阻挠达赖喇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往来。

中国朋友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的独特威信，也竭尽极大的努力让这个年轻人接受自己的影响。要是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那就能极大地减轻西藏、内蒙古和其他有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依靠达赖喇嘛的威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佛教和喇嘛教广泛流传的亚洲国家的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缅采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53-322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

专家(1955年9月23日)

致苏共中央：

据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报告(第648号发自河内的专电)，胡志明和范文同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今年召回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顾问。胡志明还告知，他在访问北京期间曾请求中国同志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哪怕留下一部分也好，但中国同志没有同意，并主张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过高层交换意见的方式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讨论。胡志明和范文同认为，召回所有中国顾问将会给越南人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拉夫里谢夫同志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代表法捷耶夫同志认为，在调整国家机关的工作、恢复经济，特别是安排计划和培训方面，越南同志还非常需要援助。

苏联外交部认为，委托我们驻中国大使馆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我们关心中国顾问继续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7]

请予审议。

佐林

第424/B3号

АВППФ , ф.079 , оп.10 , п.9 , д.8 , л.57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摘自Ю.绍尔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10月

机密

今天11时30分我受大使委托赴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同文化参赞司马文森进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告诉参赞，新闻部在选举的前几天把许可证发给了大使馆二等秘书和我，准许我们了解和观察大雅加达区的普选进程。

我说，昨天，也就是今年9月29日，我们参观了市内各区的几个选区。我们还顺利地在这5个选区得到了选举结果的数据。

说明我是受自己的大使委托而来的以后，我表示想要与中国同志们交流关于昨天的国会选举的新闻材料。

对此司马文森先声明，昨天代表中国大使馆出席选举活动的是他本人。参赞说，他去的是乡村地区，并且没能搞到任何关于投票结果的信息。在雅加达，参赞说，他只到新闻部里的选区去过一趟，按他的话来说，在那里投票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司马文森把自己对选举过程的一些感想告诉了我。他说，在农村里可以看到军方和警方吓唬投票者的情况。他指出，乡村和城市居民都是相当积极地参加选举的。

援引印度尼西亚朋友们的一个声明后，参赞说，国民党将会尽全力去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并且它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许多选举委员会当领导的都是国民党的代表。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看法，司马文森更明确地说，在雅加达获得多数票的可能是国民党人，而在全中国——则可能是马斯友美党人；按他们的推测，获得第二名的：在雅加达是马斯友美党，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则是共产党人，因为后者在许多乡村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接着参赞问，我们对投票结果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如果按已见报的初步资料来判断的话，将会在选举中取得第一名的不是国民党，便是马斯友美党；取得第三名的显然将是“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第四名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和伊万诺夫同志在昨天所收到的那些关于投票结果的资料大致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我向参赞宣布，为了互通信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简明的资料转交给中国同志。

司马文森也答应今天就把新华社记者所收集到的有关选举的材料寄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译员

Ю.绍尔莫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1, п.8, д.6, л.75-76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414/c号

1955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招待会

1955年10月1日

今天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这是黄镇大使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而举办的。

由于外交部长阿纳克·阿贡不在雅加达，为两国首脑的健康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兴旺发达而互致祝酒词的传统仪式是在中国大使黄镇和哈拉哈普总理之间进行的，因为后者现在代理着外交部长的职务。

出席招待会的有与中国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外交代表机关的领导人。同时必须指出，英国大使莫兰德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此之前他一次也没有到大使馆里来参加过诸如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或庆祝中国建军节的招待会这样的大型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实业界的代表、文化和社会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人员。还有许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中的前部长，也包括他本人。内阁成员中，除了哈拉哈普外，我只知道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和经济部长卡西莫是出席的。一共有600多个人出席。

走到我跟前的展出委员会主席拉伊哈德通知我说，大概过一个月以后，他打算给苏联政府发一封请苏联参加拟定在万隆举行的1956年的第四届国际工业交易会的邀请信。

我问他，常设工业展览会的筹备情况如何。

主席声称，他打算预先，即与上面提到的第一封邀请信同时，也给我们寄一封参加1958年的常设国际工业展览会的邀请信。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对普选结果的看法的问题。拉伊哈德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将会获胜。当我问他，他本人属于哪个党的时候，拉伊哈德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员，但是也信奉天主教。

在与前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谈话中，我说，由于选举，他现在大概特别忙。

亚明同意我说的话，并讲，9月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他将会在10月份休息，以便把11月份献给为将于12月里举行的立宪大会选举做准备的新一轮预选运动。

我先指出，无论是我们大使馆的职员，还是苏联的居民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还说他的优点就在于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作家，然后我问亚明，他能否把最好的作家以及印度尼西亚作家的最出色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介绍给我们阅读。

亚明对此回答说，在战后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1945年开始的上升期和始于1950年的衰退期。

我说，要是能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的上升和繁荣期的作品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亚明答应在今年10月把一份印度尼西亚最好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单寄到大使馆来，并会附上自己对他们的优缺点的评注。

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请我把我对国会选举的感想告诉他。

我回答说，我在各个不同国家里工作的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普选的情景。我可以说，单凭雅加达里的情况来判断，印度尼西亚的选

举真的进行得很有组织性和很平静，选民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纪律性、很大的积极性和自制力。根据我的观察，选区里秩序井然。

我则问哈尔索诺，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选举结果的公布。

副总理说，雅加达的票数的最终统计数字大概将会在10月7—8日公布，全爪哇的，或许还有苏门答腊岛的最终统计数字将在10月15—16日公布，而全国的总结果只能等到11月底才看得到，因为许多地区并没有准备好在9月29日举行选举，根据政府的决议，它们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今年11月29日之前办完这件事。

招待会的正式部分结束后，大使给出席招待会的人观看了一部介绍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中国彩色纪录片和几期新闻杂志。

在放映的过程中，英国大使莫兰德对黄镇大使说，他在日本时学习过汉字，因此能够流利地读电影上的字幕。然而，说汉语他就不会了。

针对此话，黄镇回答说，看来，到北京去当大使对莫兰德而言将是有好处的，因为识汉字将会使他——莫兰德有可能迅速地学会中国的口语。

对中国人的意见莫兰德却毫无反应。

招待会结束后，在离开大使馆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国家司司长走到我身边说，他从刚刚看过的纪录片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确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而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НРФ, ф.091, оп.11, п.8, д.6, л.64-66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 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10月20日

第820号

苏联驻华大使П.Ф.尤金与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7日

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期间，我国广东省和广州市几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助理何伟，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贺希明，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省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林李明，广州市市长、省委委员朱光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冀朝鼎 [8]。

会议开始时，我简要地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情况。何伟代表出席会谈的人员对情况通报表示感谢并告知，中国共产党按苏共中央全会的材料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工作。对布尔加宁同志的报告和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表示要认真关注。

何伟说，全苏工业工作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带回了会议纪要及其他材料，中国的干部把这些材料复印多份，并仔细地进行学习。

何伟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也对南斯拉夫问题做解释工作，中共中央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两个公报发到基层党委(到县级)。苏联同南斯拉夫谈判的结果则传达到省级党委。

何伟指出，大部分共产党员正确地接受苏南谈判的结果，但有些中共党员产生了疑惑不解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的提到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社以及其他单位。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并在机场讲话后，收到许多人民来信。

赵紫阳指出，7月中央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也对中国的干部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他们及时发现缺点，不居功自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他完全支持全会的决议，并认为，需要帮助南共党员从错误和曲解中解救出来，他的意见是，对待这个问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分寸。

林李明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并表示自己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指

出，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以及他本人都明白，为什么铁托对赫鲁晓夫自我批评的发言，当众不作任何回答。

何伟证实，许多中共党员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请中国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广东省的情况。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代表出席人员作了情况介绍。

关于反革命活动问题，他说，这在广东的状况最紧张。这是由于下列原因而产生：(1)广东省比其他省份解放较晚；(2)广东省毗连香港、澳门，离台湾又不远。这些地方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华的、特务破坏活动的策源地；(3)蒋介石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分布很强大的特务网。

从解放一开始直到现在，在广东的中国当局同反革命进行紧张的斗争。在1951—1952年期间，逮捕了12万多反革命分子，其中4万被枪决。目前，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已基本上被镇压。但是，在山上，在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仍有武装的国民党匪徒。蒋介石、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和空中继续派遣破坏小组到广东境内。尤其是，不久前有几股这样不大的小组从飞机空投到海南岛。这样，赵紫阳说，广东的特务和搞破坏的地下组织，主要是由国民党撤退时在广东留下的特务骨干以及经常从境外派遣到这里来的人员凑合起来的。所有的反革命工作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其他地方，并受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葡萄牙等五个主要国家的指使。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工作的规模，最近香港的人口增加了10万。除了官方的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有所谓的“广东省各县侨民政府”，这些不外是旨在广东进行反革命工作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

然后，赵紫阳讲到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由于最近政府采取统购统销的措施，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明显地尖锐了。过去的地主、富农真够会利用地方党政机关在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中的缺点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目的。一些地方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因力所不及的采购量和对农村的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来开展破坏活动。其中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就是梅县港口乡农民的暴力骚动，持续了7天，有3000人参加。闹事者要求废除“不合理的采购定额”，取消所有出售余粮的组织和“市场自由”等一切限制。同广西省毗连的一个乡村，反革命分

子煽动部分不满农民公开闹事。暴动分子杀害了所有的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然后逃到山里。

除了破坏、纵火、杀害积极分子等等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外，过去的地主和富民最近加强从内部瓦解已重建合作社的破坏工作。他们加入合作社，表面上表现积极，夺取合作社的领导岗位，然后瓦解合作社的全部工作。

赵紫阳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党委采取了一切措施，消除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克服在粮食战线和合作化运动工作中的缺点和冒进。但是，农村的敌对分子仍然继续反抗党和政府的措施，反革命地下组织继续进行破坏工作。尽管搞过一系列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在广东的农村仍残留不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在调查珠江口一个有3000人口的农村时，清查处3个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还有5人应判各种刑期。

谈到农村合作社建设时，赵紫阳指出，从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的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来看，他们进行了初步检查，结果表明，党组织对农民的积极性以及他们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关心严重估计不足。

赵紫阳说，省委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计今明两年合作社的数字可达到8万，即全省35%农户联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现在，只联合7%农户。

赵紫阳强调，大部分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因为具体的事例证明，合作社比个体农户优越。他们看到了自己同村人有较高的收入，在合作社利用农业技术、肥料、水利设施，合作社社员战胜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台风)的斗争等等。

我表示，根据苏联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随着合作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引进新的农具和机器，可能出现剩余劳动力，它在工业发展较差的条件下可能引起农民自发流入城市，并因而增加失业大军。

赵紫阳回答，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他的意见是，在合作化中摆脱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促进了省人口的高密度(许多农业地区每公顷达20人)。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自发从农村走向城市。

赵紫阳说，这一问题他们尚未充分研究，当前还需制定一系列措

施，避免在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困难。现在，农民从一些城市强制返回农村。此外，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非常重视发展副业(渔业、果树种植、手工业等等)。个别合作社开垦规模不大的生荒地和熟荒地。与此同时，赵紫阳指出，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中国的干部尚未充分深刻和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后来，我请赵紫阳介绍广东合作社分配收入的制度。

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工作中最复杂和困难的部分。有不少情况，个别合作社由于分配收入的错误而解散。合作社分配收入最普遍的原则是60%按劳动报酬，40%作土地报酬。

为了实施劳动报酬用下列各种方法进行核算：

(1)最落后的方法——核算劳动时间，不依据加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相当大部分合作社都采用这种办法。

(2)第二种方法区别于第一种的是，在工作中考虑到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部分合作社用这种方法进行核算。

(3)也考虑加工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合作社占的百分比不大。

赵紫阳再次强调，关于收入分配和核算的问题他们还存在混乱和缺点。

中共广东省委分管组织问题的副书记林李明回答我关于反对胡风分子运动的问题。他说，这场运动在这里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有4万名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投入运动。现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已揭发出8名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积极的胡风分子；此外，有30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100多人同这个集团有联系。在揭发出来的胡风分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形成肃清国家和党的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和镇压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广泛运动。林李明说，参加运动的4万人中，1500人在反革命活动中有严重的牵连，其中许多人经长期调查后将被逮捕。还有1300人有嫌疑。

林李明补充说，平均7%以上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同

反革命工作有牵连。

在这场运动期间，查明了反革命分子盗窃了大量秘密的和党内的文件。例如，省计划委员会被偷走了40份机密文件。

公安机关在居民的协助下，最近揭露出大量的武器库、发报机等。例如，在广州发电厂揭露出4台无线电发报机。

林李明在会谈结束时说了初步打算，今后5年内广东大概将逮捕15万名反革命分子。

我对中国朋友的通报表示感谢。

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广州领事И.П.克留奇科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副处长Е.Д.德尼先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О.Б.罗满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

会谈由罗满宁和方祖安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共印发8份：Н.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Н.Т.费德林同志、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存档

1955年10月17日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28, д.116, л.171-178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08, л.167-173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致苏共中央：

《真理报》国际问题副主编茹科夫同志通报，《人民日报》记者李

何在与他交谈时说了一个想法——最好在莫斯科设立一个2—3人的该报记者站。

正如《真理报》副主编萨秋科夫同志通报的那样，《真理报》编辑部通过自己北京的记者转告《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李何同志的建议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朋友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话，可以实施。

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再需要其他的建议了。

A.斯米尔诺夫(签名)

П.科瓦诺夫(签名)

1955年10月8日

第25-c-2107号

手写批注：

同意在中国同志提出候选人提名的建议后再交中央决定。

..... [9]

10月10日

情况说明：与萨秋科夫同志和茹科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5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7, л.252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0月12日

致苏共中央

A.A.斯米尔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孙逸仙在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孙逸仙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一封信(随附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我认为有可能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这些文件。П.Ф.尤金已就有关刊登这些文件的问题征得了周恩来同志的同意。

请告知您对此问题的看法。

Н.费德林(签名)

2ИК\те

存档

归卷

第2708/ДВ号

1955年10月11日

附件：

副本

孙逸仙致苏联俄罗斯驻北京代表电报

(1924年1月24日于上海)

感谢您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来衷心的贺电。

大会的宗旨：继续并完成始自1911年的革命，争取以这样的方式恢复中国，将它从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懂得一个软弱和分裂的，而又具有无尽资源的中国是亚洲在近十年内能引起世界大火的巴尔干半岛，一个团结的解放了的中国又何以不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的唯一保障。

大会坚定地期待所有自由人民的支持，并感谢第一个表达这些情感的俄罗斯人民。中苏两国人民应该努力，共同走在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

我仅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邻居——苏联俄罗斯表示兄弟般的问候。

中华民国总统府

广东

1924年2月16日

尊敬的契切林同志：

我应为您于1923年12月4日非常有意思的来信而表示感谢。您说得完全正确，我党的主要目的旨在发动一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运动，同时是革命和建设的运动，为此必须要组织和宣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工作；我们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做到贵党能够在俄罗斯做到的那些，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具有新构想和新管理体系的国家。

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10]

由于唐宁街从法律上承认了贵国政府，贵国外交取得了胜利，我热烈地向您祝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为了收获该胜利的成果，还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你们对寇松主义的胜利无疑将引导你们取得外交上的其他胜利。 [11]

列宁同志的逝世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是贵党的工作，所幸无忧于深厚的基础，所以列宁同志的逝世将不会对由你们强有力的双手所建起的强大建筑产生影响。

我赞成您有关今后保持相互联系的想法。这不仅对我们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对能在世界斗争中共同努力也同样是必要的。

对贵国政府今后的成就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翻译：C.A.托卡列夫

确认：И.卡拉布霍夫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8, л.104-107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外交部保

存的著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逸仙的两份文件：一份是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一封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信(随附文件复印件)。以前没有刊登过这两份文件，是因为有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准备付印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才打算刊登这些文件。该杂志主编(萨纳科耶夫同志)也支持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孙逸仙的两份文件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已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П.Ф.尤金同志通报说，周恩来同志已经同意在苏联刊物上刊登上述文件。

我认为有可能支持苏联外交部的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上述孙逸仙的文件，同时要删去写给契切林信中说的“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A.斯米尔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10月14日

第25-c-2141号

存档

手写批注：

同意。

M.索科洛夫

1955年10月15日

送A.A.斯米尔诺夫同志阅。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通报费德林同志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仅供参考。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308 , л.108

No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对意大利广播编辑部正在播音：1955年10月14日

采访节目作者彼得·涅宁

“彼得·涅宁的三个问题”

播音员：在从中国返回祖国的途中，彼得·涅宁以客人的身份在莫斯科待了几天。昨天，他热情地同意回答我们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我们记者的采访录音。

记者：您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主要结果？

彼得·涅宁：我访问中国有三项任务。首先，我想看看中国人民的劳动情况，看看革命为劳动者创造了哪些新的劳动条件。其次，我想亲自结识一下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了解他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评价。第三，我极力推动中国和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我的上述三项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我看到，中国人正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既要改造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要在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尤其让人感叹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的信念和信心。革命唤醒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着的中国。中国不论是在体格上还是在道德思想方面都是一个巨人。我相信，中国必将以自己的成功震惊整个世界。

我与一些革命领导人见了面，如国家领袖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们。我还非常荣幸地在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委员会上发了言，后者团结了九个党派和新中国的精英们(骨干)。革命时期，这些人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相互合作。在所有会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中国新领导人完全控制着国家的局势，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且干得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在工作的同时还展望着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任。规模宏大的共和国成立6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便是这一信任和威望的证明。规模宏大、无边无际的人民游行队伍显示的是智慧和力量，传统和未来的有机融合。

至于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我从北京政府方面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后者非常愿意迅速达成有益于意大利和中国人民及其经济的协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意大利很有可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彼得·涅宁：通过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谈，我坚信，如果意大利政府拥有起码的勇气，能够放弃针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断自己与福摩萨政府的不切实际的、荒谬的、柏拉图式的关系的话，那么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成为促进意大利工业和劳动的进步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对此，当我再过3—4天返回罗马之后，我就将向意大利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的建议。我希望，自己的这一建议将获得所有意大利民主派的支持和同情。

记者：您是否能简要谈一下自己在莫斯科逗留的情况。

彼得·涅宁：很遗憾，我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莫斯科之行就更短暂了。(在莫斯科，)我与保卫和平运动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见了面，去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原子能站。我还有幸对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们发表了讲话。

..... [12]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80-82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同志：

在您1955年8月25日的第64c号命令中指出，在对国外实习工人进行培训的组织工作上，我缺乏进行监督，并且没有对一般的日常服务保障给予应有的注意。

兹报告如下：

1.前来的实习工人都有在市中心提供舒适的住房的保障。

2.在实习工人的居住地都特别为其安排了食堂，这些食堂准备的菜都考虑到了实习人员的民族风味和状况。

3.实习工人一到俄罗斯，马上就组织其进行俄语学习，并对其制定了培训工作计划。

4.培训计划都完全完成，而对于一些实习工人来说还超额完成了。一些实习工人着手对另外的领域又进行了研究。

5.来自大使馆的宋鸿儒(Сунн Хунжу)和王承志(Ван Ченчжи)同志以及来自有色金属部的副部长И.И.普斯季利尼科同志、稀有金属工业总局总工程师С.М.梅利尼科夫同志以及稀有金属工业总局局长助理Б.И.布拉金同志到过工厂，在同中国公民进行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对实习工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很感兴趣，对培训计划的履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

高水平的专家Е.А.约诺夫同志经常同中国同志待在一起，通过他来解决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以及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

我本人同中国同志也有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住所和工作的车间进行了访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以及工厂的领导成员一起出席了晚会。

考虑到，我作为工厂的厂长首次在工厂接见中国公民，而除了对我进行正面的评价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指出我现在有一些缺点。您在命令中阐述的那些发生在其他工厂的类似事实，在我领导的这个工厂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需要请求您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其中包括对别列兹尼基工厂下达的命令，并撤销对我的处分。

别列兹尼基镁加工厂厂长

К.齐列辛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2月26日

第1899/ДВ号

致苏共中央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П.Ф.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1955年10月22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附纪要共13页，仅送收件人。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968号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尤金同志、В.И.利哈乔夫同志、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马尔采夫同志、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叶廖明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马卡里耶夫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陆定一说，1955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

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院校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会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5300宗重大案件，因此逮捕的有1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三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杨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

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员进行分类。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四种：1.“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

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三次相似的运动：1.1931年到1933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该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400万到600万人。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成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具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等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来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B.利哈乔夫(签名)

打印5份，送：

..... [13]、H.T.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 [14]，归档

1955年12月3日

第1592号

手写批注：

归档。作为通报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参考资料使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3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74-187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 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596/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奉告同时呈送潘克拉托娃同志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附上述内容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第2781/ДВ号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767号文的附件

1955年9月29日

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编译局的任务是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著作、苏共决议文集译成中文。在从事此主要任务的同时，编译局还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项现行决议(有选择的)译成中文，同样也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由中文译成俄文。

翻译工作有几个相应的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党史编译室、哲学编译室。每个室由翻译组、主任和副主任组成。

室的所有工作由一名编辑室主任及其三名助手协调。所有翻译都具有大学俄语教育程度。

编译局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选集》第1、2、3、8、9、10和11卷；《苏联共产党50年史》(1903—1953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文选；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党的建设和有关社会主义竞赛等的单行本选集。

编译局进行了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 and 文件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工作。如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等。

编译局每月出版《学习》杂志，该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来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经济问题》杂志、《历史问题》杂志、《党的生活》杂志等等。专家们在整个这项复杂而多样的工作中帮助编译局。编译局中直到最近，直到1955年4月仍有4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安东诺夫同志(4月份离开了)、格拉扎切夫同志和列佩申斯基同志自编译局成立之日起工作到现在。他们都掌握了汉语，负责对翻译稿件进行编辑工作。

格拉扎切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12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一书中的许多文章。将中文译成俄文的有：《美国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的细菌战》展览的资料，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材料，等等。

列佩申斯基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8、9、11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1卷，以及许多有关苏联经济建设的文件。

安东诺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所有正在出版和翻译的各卷斯大林选集(没留下详细的工作报告)。

顾问潘克拉托娃的任务是就工作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组织问题向编译局领导提出建议，对翻译过程出现的理论问题给予咨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苏共决议的原文作详细解

释。

在这段时间，所有专家都积极参加了编译局对1954年工作进行的总结和1955年工作计划的编制。在工作会议和大会上提出各种建议。比如，在3月份召开的会议上解释了民族、民族性和人民，法律、法规，奴隶和奴隶制等术语，解释这些术语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潘克拉托娃为稽核编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和斯大林著作编译室谈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经验，以及翻译工作的原则的问题。我还为一些党员干部小组讲述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党组工作的经验。

在列宁诞辰85周年之际，苏联专家帮助了《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纪念文集的出版准备工作。文集中登载了安东诺夫同志(与副主任姜椿芳合写)有关列宁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文章，潘克拉托娃《列宁论述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文章。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组织举办了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展览。

专家组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进行答疑的时候。中国同志方面的问题最为复杂和多样，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中某个句子的理解一直到复杂的理论性问题。

举例如下：

《列宁选集》第33卷，第429页。“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就这个问题的提问是：“这里讲的是怎么样的重工业，私人的还是国家的？”

第29卷，第309页，见第3—4行，列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革命取得了成绩，可马路上还走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

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2卷，第39页：发行税是什么意思？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瓦格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孜孜不倦地专心研究！”(《列宁选集》第30卷，第511页)

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些表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等。

一天要向每个专家提出达10个问题之多。

最为复杂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请教专家。经常(每周一次)由基谢廖夫同志、菲拉托夫同志、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给予某些质疑的解答)负责哲学方面的咨询。向尤金同志询问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莫斯科的一些问题。

1955年期间下列著作只得向专家咨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英国》，苏共决议文件集第1卷，《列宁选集》第1、28、29、30卷，《斯大林选集》第4、12、13卷，等等。

所面临的是重要而大量的工作，所以专家们提请总顾问马尔采夫同志今后注意并帮助挑选主要是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专家。

现在根据我们的建议，编译局制定了五年工作计划，旨在动员所有力量在五年期间内完成所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

潘克拉托娃(签名)

1955年7月_日

1955年7月22日

第1055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转谢尔巴耶夫同志。

М.索科洛夫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8л.109-114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绝密

致H.C.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国对缅甸政策报告如下：

中国对缅甸联邦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缅甸内部拥护独立、和平发展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于中国对亚、非国家，尤其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刘少奇在1955年3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如下表述：

“.....我们应当谨慎地将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来。为了能够与他们一道从事巩固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我们应当谨慎地开展吸引他们到我们一边来的工作，与其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放弃自己的和平中立政策，而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动摇立场。设想他们立刻就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以便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和平中立立场，而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帮助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对待缅甸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利用了很久便已在中缅两国间存在

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众所周知，直到188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缅甸一直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即使在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其与中国的联系仍未中断，甚至还在1937—1945年间中缅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今，在缅甸仍居住着近30万中国人，他们在该国经济，尤其是贸易和手工艺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稳固与缅甸的友好邻邦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考虑到如下情况，即该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界线，历史上其经常被帝国主义分子用作向中国的与其他地区联系薄弱的西南部渗透的基地。

当1949年12月中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便开始走上了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道路——极力帮助缅甸巩固自身独立，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使它在经济上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起来，引导它积极参加维护和平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缅甸统治集团和缅甸政府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和相应的两个集团，其中之一极力执行亲美政策；另一集团的领导人为吴努。直到最近以前，后者拒绝了美、英等国拉缅甸加入其建立的东南亚侵略集团和联盟。反对中国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吴努政府与印度一道始终坚持中立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实施了在缅甸统治集团中支持和加强吴努集团，而削弱亲美集团的影响力的政策。为达此目的，在发展广泛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必要给予缅甸重大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克服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中国与缅甸相互间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同意在1955—1957年间每年购买缅甸15万—20万吨大米和其他一系列缅甸商品，以交换中国工业设备和工业品。中国政府有责任在1955年以英镑方式支付缅甸大米价值的20%。

大米是缅甸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国在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向缅甸购买数量如此巨大的大米，并以其工业设备、工业品和外汇作为购买这些大米的支付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缅甸的重大援助举动。正如吴努所言，中国同意购买缅甸总价值达600万英镑的大米是一项慷慨的举措，再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贸易协议的积极政治成果大大地高于其在物质上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国给缅甸的巨大经济帮助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缅甸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并巩固了吴努集团在缅甸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购买缅甸大米和其他农业商品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缅甸人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声望。中国从缅甸购买商品是有针对性的，一般而言，中国购买的这些商品均与缅甸人民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又尽可能地避免从缅甸购买由英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以防止促进和加强其经济地位。

鉴于在缅甸国内业已起步的民族国营工业对该国争取国家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朋友极力帮助其加速工业发展。为达此目的，中国开始向缅甸输入机床和机器，并承担了向缅甸提供成套设备和帮助其建设纺织厂的义务。

众所周知，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和吴努访问中国以及1954年4月的万隆会议为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吴努的谈判结果作了如下评价：

“……我们化解了他(指吴努)对中国和苏联关系的许多疑虑和成见。确认了中国和缅甸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更加坚定了缅甸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立场。”

关于万隆会议的结果，毛泽东的评价是：

“……总体而言，万隆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今美国在亚洲国家中更加孤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已开始更加憎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們。

……另外，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在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愿意美国对其国家实施控制，显而易见的是，在东方不仅美国，而且英国的地位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给予缅甸广泛的经济帮助和协助吴努政府加强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正在缅甸领土上发生的吴努政府和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内战。在访问中国期间，吴努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其指示缅甸共产党停止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斗

争。吴努提出上述请求的理由如下：缅甸政府反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坚持民族独立，极力提高人民福利，而(缅甸)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在干扰缅甸政府实施上述举措。吴努认为，这最终可能导致美国以与共产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为借口干涉缅甸事务。另外，如果能解决好(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的问题，势必会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很好的影响。

毛泽东答复吴努道，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都存在有共产主义党派。这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中共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况且那里的人也不见得要听中共的话。

在给予缅甸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其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苏联也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于是，当1955年5月苏联大使向毛泽东通报关于苏联打算购买缅甸大米的消息时，后者指出，“缅甸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

来自中国以及随后的苏联的经济帮助(主要是购买缅甸大米)对缅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反帝力量在吴努政府和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这一帮助。1955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专门谈了关于缅甸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有必要进一步给予其帮助的问题，并请求(苏联大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因为吴努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关于此周恩来还说，除了根据现有贸易协议给予缅甸帮助外，中国政府还打算向缅甸提供商品信贷和以外汇方式提供的现金信贷。

总之，中国在对缅关系上正在实施一系列经济和对外政治举措，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对缅甸的影响，加强民主阵营对该国的影响力。在对缅关系上苏联和中国采取经过双方共同协商的一致性政策将是顺利解决这些任务的重要因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11月9日

第1962/c号

文件分送给：H.A.布尔加宁、B.M.莫洛托夫和H.C.赫鲁晓夫等同志

No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绝密

H.C.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向您报送关于中印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

在发展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从对印度政府立场的如下评价出发。1955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对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集团作了如下发言：

“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但是，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有着很深的历史联系，他们还没有割断自己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及买办势力的关系，走上与其对抗的道路……他们愿意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和中国态度谨慎，他们仍然在两大阵营中持中立立场，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持中立立场。他们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害怕卷入战争，丧失他们目前的阵地和得到的好处。同时，他们还指望通过保持中立立场换取前宗主国的让步，从社会主义阵营那得到好处……但他们的中立立场是不稳固的，而他们的和平中立政策是不坚定的。”

关于同印度的关系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考虑了如下一些情况，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执政集团竭力宣传不发达国家“新的”发展道路以及印度国家工业化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民主”方法，努力用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对抗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削弱这些国家对亚非各民族的影响，争取担当不发达国家和附属国的领导人角色。

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绩，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此非常惊恐。例如，在香港出版的英国经济周刊《远东经济学家》，在文章《印度与中国：两条工业化道路》中写道，如果共产党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那么，“多数亚洲人民可能会认

为那种经济方式更有效”，也就是中国道路。在此，杂志号召西方国家扩大对印度的援助，以便加强其“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作用”和对亚非民族的影响。

印度统治集团表示，他们拥护自己独特的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也会认真关注和研究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经验，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以及这种援助的条件等问题，以便在印度使用他们认为适合本国的东西。

中国朋友努力利用印度当前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符合民主阵营的利益。他们推行中国与印度接近的路线，与印度在反殖民主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建立合作，支持印度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利用印度的影响促使其他亚非国家也转到中立立场上来。

中国朋友认为，中国能够对像印度这类的国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巩固中立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如果中国对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推行灵活的策略，并且态度友好。

(二)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从1949年12月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之际，就采取措施解决使两国关系复杂化的那些问题，首先是西藏问题。

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采取措施保存和巩固1947年印度从英国那里取得的特权。印度政府不阻碍英美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和西藏反动势力动员西藏军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通过印度领土为西藏军队运去英美的武器。许多印度公民作为顾问和教官在西藏军队中继续工作。当中国政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不想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时，1950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解放昌都和西藏的命令，印度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在致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和各州第一部长的密信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努力施加某些影响，多少会阻止中国人进驻西藏。显然，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帮助西藏对抗中国驻西藏当局。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政策界限，不见得有法律依据。”

西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印度和尼泊尔集团停止在西藏购买兽毛和其他商品，拒绝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工业品。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当局没有对印度机构和印度资产采取惩罚措施，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印度政府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大幅度让步。印度驻西藏公使馆被改为驻拉萨总领事馆，依据平等原则，印度同意建立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

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协定》。印度政府还同意从西藏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军队，以适当的价格把所有的邮局、电报、电话部门及附属设施、旅馆出售给中国政府，把所有印度政府使用或占领的土地，除了印度驻亚东通商代理处外，全部返还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保留三个印度通商代理处(亚东、江孜、噶大克)，而印度政府允许中国在印度领土建立三个通商代理处(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中国政府同意不阻碍印度佛教徒前往西藏圣地朝拜，而印度政府也不阻碍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圣地朝拜。

上述协定实质上是撤销了以前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给旧中国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印度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关系。如下事实对印度采取的这一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中国当局几乎完成了连接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公路建设。现在，这条路已经竣工，并向南延伸至中印两国边境处。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完全停止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某些不友好活动。例如，印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分子、国民党分子和西藏流亡反动分子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对中国的敌特活动。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政府尽管签署了协定，但此后仍以各种借口阻碍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各种商品，只是从1955年5月27日起才取消了印度商贩在西藏出售粮食的禁令。

中印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没有彻底解决。现存边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在1914年单方面确定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按照麦克马洪线确定边界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领土从中国分离出去。

尼赫鲁同周恩来就印度和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相互关系进行谈判期间，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中国政府承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和中国边境线的问题。尼赫鲁同在1954年7月1日给各州第一部长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的密信中写道：

“我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情报委员会注)，因为要是这样做将会表现出我方存在着某种疑虑。”

在尼赫鲁的这封信中证实了印中关于西藏的协定是重要成果，“间接地解决了关于我国漫长边界的问题”。尼赫鲁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这条边界，包括麦克马洪线，是持久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中国政府暂时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不希望中印关系复杂化，而把这个问题搁置到合适时期再提。

应该指出，中国在1950—1954年出版的地图，其中包括用于在国外发行的地图中，中国的国界线都被标注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以西的地区，但也有补充说明，指出一些地段尚未准确划定。

随着与印度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印度密切接触和合作的路线。此时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对亚非的影响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的联系。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会就一些国际问题向印度政府通报情况。按照尼赫鲁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印度政府的信任，也是提高印度国际威望和承认印度作为亚洲领导人之一的举措。同时，印度也就一些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美英对美国间谍活动的立场，等等)向中国通报。这种情报交流促进了中印两国就双边都感兴趣的问题取得共识。

在很多时候，在重要的国际行动中，中国政府都维护印度的威信。例如，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支持印度在这次会议居于主导地位。

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时，中国利用了印度的中间人角色。

(三)

在努力与印度就对外政治问题建立密切合作的同时，中国朋友也极力发展两国经济往来。在解决这个任务时，中国朋友遇到了极大困难。

中国和印度有着相似的对外贸易结构，这两个国家自己传统的某些贸易种类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茶、麻、棉布等)。

两个国家都需要为本国工业化所需的工业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工业设备，同时，都想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自己的一些剩余工业品。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意识到，向欠发达国家出售自己的工业品，从争夺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力的斗争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951—195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达到最大规模，当时印度遭受自然灾害迫切需要粮食援助。中国那时向印度供应了大量粮食商品(大米、高粱)，同时在印度采购麻袋、黄麻和棉花。1951年中印的贸易总额达到2.9亿卢布，1952年为1.4亿卢布。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印贸易额开始缩减，主要是由于印度降低了对粮食的进口需求，中国也缩减了在印度采购黄麻和棉花。对中印贸易额缩减产生影响的因素还由于印度贸易机构以无法让人接受的低价购买中国大米，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粮食交换的黄麻袋和黄麻袋数量，中国已经没兴趣了。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署的贸易协定为发展双边互惠贸易奠定的基础，这份协定考虑到了各方的进出口的可能性。在筹备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向印度作出一系列让步。其中规定，两国之间的所有结算和支付都使用印度卢比或者英镑。

贸易协定规定，双方既可以相互出售粮食、原料商品，还可以相互出售工业设备，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品。例如，在中国打算向印度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刨床、钻床、插床和其他一些机床，蒸汽机、铁道机、电动机、纺织设备等，而在印度打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金属切削机床、滚珠轴承、电动机、纺织设备等。

在1954年10月14日的通商协定中可以找到对1954年4月29日印中关于西藏问题协定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其中包括，印度政府同意经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西藏的中国商品。

但是，尽管签署了协定，中印之间的贸易到目前为止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远没有用尽协定规定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双方极少相互供应工业品。1955年上半年，中国向印度购买了烟草、麻袋、花生、胡椒，而印度向中国购买了粮食、生丝、纸和其他一些商品。

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印贸易得到增长，1954年时已提高到2000万卢布，而1953年只有6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已达到2490万卢布，但其规模远落后于1950—1952年中印贸易水平。

鉴于印度公司不想扩大在中国采购商品，近年来中国同印度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也阻碍扩大购买印度商品。例如，1953年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为440万卢布，而出口额仅为160万卢布，1954年分别为1200万卢布和8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为1790万卢布和700万卢布。

中国朋友努力提高与印度的贸易量。其中包括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朋友制定了一份议案，打算1955—1956年中印贸易额达到1000万英镑，其中在这两年内中国从印度进口额达到500英镑，出口也达到这一数额。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政治经济联系还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施加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

1955年12月12日

文件送：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36-145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机密

第01/1880号

致苏共中央：

苏联共青团中央在此呈送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邀请，由全苏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团长)B.И.扎卢日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K.Г.艾哈迈托夫、伯绍勒铁路沃尔库塔站机务段司机B.C.别斯科洛夫内、高尔基市“红色萨尔莫沃”厂苏联共青团团员B.Φ.博加季科夫、苏联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A.X.韦基洛夫、乌克兰赫尔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B.A.古谢夫、《共青团真理报》报社记者C.B.古西科夫、明斯克市第29共青团综合建筑队队长M.A.日布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共青团州委书记Y.肯扎耶夫、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Г.В.克列斯尼科夫、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A.Д.库德里雅舍娃、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H.H.梅夏采夫、莫斯科市卡冈诺维奇国营轴承厂磨床女工A.E.奥夫恰洛娃、苏联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市共青团市委书记B.Φ.特卡琴科、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车工B.И.费奥多罗夫、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伊玛扎石油钻探”托拉斯钻探班长A.Φ.齐尔科夫、卡拉干达州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В.沙因、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共青团区委书记Г.В.谢季宁(10名共青团干部和8名来自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于当年9月18日至10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见了青年代表、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交换了生产方面的经验，同时也交换了共青团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逗留期间代表团去了北京、天津、杭州、唐山、沈阳、鞍山、大连、旅顺口、上海、武汉、广东、昆明、重庆、西安、玉门、丹东、太原等城市(总共到过17个城市)。代表团参观了59个工业、交通、建筑企业，其中包括：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上海和天津的冶金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的机械制造厂；唐山、大连和西安的机车和车辆制造及修理厂；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纺织联合工厂，开滦、抚顺和丹东的露天煤矿；玉门油田，北京站、沈阳站、上海站、大连站和昆明站机务段；辽宁省、广东省和云南省的农业合作社；还去了北京石油研究所、沈阳和上海的综合技术学院、武汉医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中学；文化教育、校外活动和医疗方

面的单位。代表团还参观了一些与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相关的历史遗址，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纪念碑。

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目的在于推广和宣传让青年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动员他们的力量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而奋斗；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有1527名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着工人和农民青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青年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由地区、市和省级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选举产生。与会者中也有32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女青年占24.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青年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还聆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3年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最近2年的任务的报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关于为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而斗争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报告，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同志题为“保卫祖国是青年的神圣职责”的报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有关学习任务的报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关于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的报告。

在为期9天的会议上，有超过120名青年积极分子作了发言。许多发言的积极分子都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成绩，提出了有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中的勤俭节约、为夺取高产丰收等等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与会者在自己的发言和致辞中都始终不变地着重表达了热烈急切地希望巩固与苏联青年的友谊，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表示了真挚的感激之情。

苏联代表团向大会宣读了苏共共青团中央的致词。代表团成员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H.库德里雅舍娃、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讲述了苏联青年的工作与学习情况和各自在生产工作中的经验。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与参加大会的各行业青年工人们(机床工、矿工、建筑工、铁路工人、冶金工作者、纺织女工)进行了七次见面与会谈。共有470人参加了这些会见。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出席了大会的闭幕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向祖国的青年提出的任务：你们要无限忠诚地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向一切国内外敌人作无情的斗争。你们要敢于同旧的东西决裂，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要向懒惰、腐化、官僚主义挑战，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展开斗争。你们要不懈怠地帮助落后的人前进。你们要坚决地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开辟道路。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你们应当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任何工作中，严格地要求自己，发挥大胆创造和不怕困难的精神。青年应当努力学习。你们要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使你们这一代的青年都成为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够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你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你们一定不要骄傲，一定要虚心地向有经验有学问的老一辈人学习，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我们十分关切。我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和久经锻炼的，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固的团结，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真诚援助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个胜利。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这个胜利。”

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达了决心并向全国的男女青年发出了号召。在这些文件中大会的参加者以全中国青年的名义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体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奋斗。

按照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看法，大会准备充分，组织得很好。同时我们感觉不足之处在于大会的发言完全没有批评意见。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中主要谈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很少说到集体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作用与组织力量。

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后去了辽宁省、江西省、河南省、广东省、云南省、四川省、山西省和陕

西省的城市。在城市、企业、建筑工地、合作社、学院，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而喜悦的欢迎。代表团与中国青年进行了超过50次的会见。会见时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苏联青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的情况，有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中国青年极其友好的感情。这些会见都是热情和友好，充分显示了那种将苏中两国的人民和青年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友谊。代表团成员的发言都上了广播，刊登在报纸上，都是讲述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工作。

参观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时，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这些年轻的生产先进分子了解了中国男女青年在劳动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传授了工作经验。代表团成员在45个中国的企业讲述了自己的先进经验。参加会见的超过17000人。通常代表们边讲述边直接在工作地点具体展示先进工作方法的实质。会谈和演示引起了无论是青年们，还是中国干部们的极大兴趣。

马格尼托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在4家冶金厂演示了自己的快速炼钢方法。在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他用7小时30分钟的时间炼出了按标准需要10个小时的钢。第二天，炼钢工王利浩(Ван Ли-хао)依靠他的经验用7小时20分钟炼出了钢。来自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的高速车工B.费奥多罗夫在12家企业展示了运用陶瓷刀头的车刀以高速动力的方法切削金属加工件。他在加工某个零件或生产操作上提高了生产率通常是3—5倍，甚至更多。许多青年工人都竭力要学会费奥多罗夫同志的工作方法。比如，在沈阳机床制造厂，费奥多罗夫同志采用高速的方法切削了硬质合金材料的防松螺母上的内螺纹，用时2分40秒，而按标准则为25分钟。车工李志林(Ли Чжи-линь)运用费奥多罗夫的方法，用4分50秒完成了这项工作，而车工李儒林(Ли Жу-линь)则是6分钟。卡拉干达煤矿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沙因在开滦、抚顺和丹东煤矿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他推荐他们使用经他改装的简化采煤机操作的装置，从而提高采煤机的生产效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说，现在这些装置使用得很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青年的生产工作者的发言吸引了中央和地方各机关部门的关注。在青年工人讲演的企业，通常还邀请其他省市企业的青年工人。中国黑色冶金部在太原冶金厂组织举办了国家各冶金厂平炉车间和工作班的炼钢工们和领导们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年轻的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同志的见面会。有关苏联青年代表团中年轻工人的

经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报纸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许多地方报纸)。

代表团与高等院校的青年们也进行了多次会面。在这些见面会上学生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关心。他们告诉我们，优秀学生中大部分都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我们还得知，学生中工人和农民青年的成分一直在上升，现在已将近50%。

在企业、在生产合作社、在学院，代表团成员到处能看到年轻人渴望学习、坚决地想要提高自己普通教育和技术知识。几乎在所有的企业，我们遇见的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在夜校学习，独立扫除自己的文盲，直接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生产经验。

中国的男女青年在所有的会见中、自己的发言中和个别交谈中都真诚而热情地谈到了自己对苏联人民和青年的友好情感，始终充满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指出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计划时苏联对中国提供的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

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点，代表团努力去了解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的战斗先锋队，动员青年去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

如今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共有140万名团员。在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青年团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原则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与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是同一类型。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实施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上有9名书记，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只有6名书记直接参加工作：第一书记胡耀邦(同时掌管宣传方面问题)；书记罗毅，负责农村青年工作；书记章泽，负责工人青年的工作；书记胡克实，负责学生青年和少先队员的工作；书记荣高棠，负责军事体育工作；书记区棠亮(女)负责国际联络部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还有两名书记：廖承志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王照华负责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工作，他们俩实际上不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因为负责其他工作(廖承志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负责中国保卫和平运动方面的问

题，王昭华同志负责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中的青年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上，在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担任青年部副部长的将军刘西元同志被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以替代被免除职务的原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刘导生(免职的原因不得而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由以下各部门构成：办公厅(负责组织工作问题)、组织部(负责干部、纪律和奖惩方面的问题)、工人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大学生工作部、学校青少年和少先队员工作部、军事体育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国际联络部以及特别处和总务处。

地方组织结构由下列各级组成：省委员会(25个)、中央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3个：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市委员会(在划分有区的大城市里成立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

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团了解了北京市、大连市和上海市团委，云南省团委员会，北京汽车修理厂和车辆修理厂，重庆压缩机厂和冶金厂，上海第一冶金厂和丝织厂，沈阳机床制造厂，武汉、大连等机务段，大兴姑(辽宁省)和新陆乡(广东省)农业合作社团组织等部分青年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

青年团在青年中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在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中是党组织积极的助手，动员青年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开展为节约而奋斗的竞赛、组织青年学习、参加合作化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将开展这项工作和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对青年团提出的新任务。

今年2月16日至26日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国内形势，会议讨论了有关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会议指出，青年团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应该紧密地与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任务相结合。会议在这方面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宣传兵役法和开展军体工作，更积极地动员青年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教育青年对侵占、多占的行为和破坏纪律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提高警惕，与反动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指出了发展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时刻关心满足青年健康需求

必要性。在会议上着重指出了文化普及工作的内容应旨在消除青年的文盲现象(会议召开的当时有将近80%的青年和50%的团员是文盲或略识字),提高青年的技术水准,向青年普及文学作品和定期刊物,发展艺术的独立性和体育运动。

认为有必要更深入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与资产阶级道德现象作斗争。还指出必须真正地关注对落后青年的工作,加强对女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工作的关心。应注意到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广泛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同时要关心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觉悟,学好唯物主义世界观。

会议指出,将来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巩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扩大青年团的队伍。

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幕前一天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研究了有关进一步加强青年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事业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更改青年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全体会议的决议将提交给打算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有关青年们参加履行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合作化决议的问题。

会议号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克服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关注得不够,提高自己对这项有历史性意义工作的积极性。会议要求青年团组织和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向广大青年阐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教育青年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会议强调在成立、巩固和发展青年生产队和组,青年突击队、监督小组、技术学习小组方面和在为提高收成、增加耕畜数量、扩大植树造林面积奋斗方面必须深入和扩大农村的组织工作。会议号召所有农村青年为“成为合作社的好社员”而奋斗。

会议号召青年团组织继续做好动员青年去垦荒的工作。现在已经成立了七支青年垦荒队。到1956年春这些队伍中的青年将达到20万人。1956年5月打算就垦荒问题在黑龙江召开青年会议。

在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了要对党组织在教育和培养农村合作社领导和干部方面提供帮助的任务。到1958年春计划从青年中培养200万名会计

员，300万名掌握使用农具的人，150万名技术人员和50万名畜牧工作者。

会议明确了青年团在扫盲事业中的作用。决议中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争取到1962年80%的农村青年学会1500以上个字。会议责成青年团组织与教育机关一起制定扫除文盲的长期和年度计划。

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后能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正确地明确了当前主要的任务，但我们觉得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组织接下来要完成拟定任务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原因在于青年团的许多省、市、地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能力较弱，他们进行的组织工作由于经常脱离广大青年中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狭隘。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说，在青年团的组织中，对组织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首先是指属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团委和地团委所领导的基层组织。经常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发布各种指示，召开各种会议等等。

中国同志说，他们有许多各种会议。不得不写许多东西和写报告。正如辽宁省团委书记、重庆市团委书记、西安车辆修理厂团委书记等说的那样，这一切严重地妨碍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去进行青年的实际工作，去研究当地各种事情的情况。武汉市团委、辽宁省团委等一些同志说，他们一开始脱离青年，就无法研究他们的生活，造成他们很难做到娴熟地领导教育青年的事业。

会谈中许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经常问道，应该如何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便能分出时间学习，同时又能好好工作。他们中许多人都说，青年团中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基层积极分子的学习，没经过周密考虑，以致该组工作人员的学习经常总是有人缺席。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与地区团委和市团委同时存在的有领导工业企业等单位中团组织的部门团委，青年团中其他市的市团委要真正地领导区和部门的团委，同时还有许多这些基层组织，我们觉得，要是经过地区团委的话，是很困难的。比如，有40个工业企业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归北京市团委管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上海市团委同时领导着31个区和25个部门的团委，还有许多基层组织也归它直接领导。这些

同志对我们说，这样的结构实在太笨重了。

注意到了自身的组织和委员会中庞大的编制。比如，共计有3500名团员的太原冶金厂的基层组织中有57名脱产的工作人员。

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感到青年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深度和广度。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稳定，其中有不少缺乏计划而赶任务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青年团组织与其他单位和部门在进行青年的思想工作方面的联系很薄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如果说解放后初期青年团的青年工人还经常走近青年并作些政治报告，而近来这样的事情已经非常少了。

国家正开展文化革命。青年团组织的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但是争取大学生来参加这项事业的工作力度很弱。这多少有点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比如云南省团委书记等)不信任学生们，同时也忘记了学生中有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结果。

自然，我们对青年团的观察和意见不是希望有个更深更全面的分析。对此，青年团中央在计划和组织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时，直接或间接地竭力不让代表团成员能了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在青年团中央，胡耀邦同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表示：“我们并没有尽量让你们去充分地了解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所以你们代表团成员向干部提的问题越多，他们能回答的就越少。”

与此同时，代表团在团中央的会谈中，在青年团许多省、市、地的团委，以及在工业企业、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学院和农村的生产合作社中，在与积极分子的会面时，在青年会议上竭力传授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有些会谈中问题的数量达到了上百个。实际上提出的问题全都围绕着差不多是青年团机关和组织所有的工作内容。对我们请求最多的经常是要求讲述有关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结构、工作风格，有关检查执行的组织情况，有关思想工作、青年劳动教育的安排，有关干部的工作和培养青年团积极分子的工作，有关地区、市团委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有关青年团组织在提高青年生产积极性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和余暇时的活动，有关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有关提高革命集体性的教育等等。会谈期间对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接见了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成员谈了自己的印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工作。陈云同志感谢代表团成员给予企业的青年工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他表示，党委和政府机关对苏联青年代表团的工作很满意。结束时陈云同志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随附会谈记录)。

在与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会谈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表示希望在1956年能派遣两个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同志们请求在第一个代表团里包括农村青年代表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而第二个代表团可由教育工作者、劳动后备军(中等技校学生)、高等院校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组成。这些提议值得关注。

我们的看法是，最好同时研究和实施措施，组织中苏边境州与省的青年见面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自己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情况的一些印象。

在中国的工业企业时，代表团成员遇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里进行着重要的工作。但按照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工作中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我们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将自己的职责仅归结为解决非常大的技术问题，很少同时关心有关中国专家的教育和学习，首先是在企业、车间、劳动组织的管理问题上。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和西安车辆修理的中国同志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的看法是，苏联专家完全能够做得更多更积极地将我们企业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运用到生产中去(黑色冶金方面的快速炼钢、机器制造厂的运用陶瓷刀片的快速强力切削等等)。

然而有些苏联专家甚至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样的经验。比如，在会见我们代表团成员炼钢工克列斯尼科夫同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顾问马雷舍夫同志对有关如何运用先进的劳动方式的情况实际上什么也讲不出，甚至显得对中国冶金厂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上海造船厂工作的苏联专家索辛同志、阿梅尼茨基同志、热姆丘日尼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我们工厂发运到中国企业的一些零件，同时还有部分设备在检查时发现是废品。他们还告诉我们说，比如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制造的轴，其尺寸超过了规定容差。为此中国专家提出要求检查所有运到他们企业的零件。对技术文件的修改通常都一再的延误。这些同志还对我们讲述说，运送零件和设备的木箱在从企业发运前没好好检查。在上海工厂打开这些木箱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多余的东西。比如，在那找到一份列宁格勒工厂的共同协议、没用的螺栓、垃圾等物。苏联专家与自己企业的联系非常差。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和意见。在每个月发回的汇报中苏联专家常常会提请注意某些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答复。按我们的看法，最好责成造船工业部和运输交通部搞清楚这些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代表团团长

B.扎卢日内(签名)

1955年11月14日

第C6-7号

附件：

与陈云同志的会谈记录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以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团看得多的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而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至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代表团就研究得更少了。我就详细地谈一下两个问题：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对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有5100万人。在农村总计有1100万户农民，这样一来每户约4—5个人。农村的第一次改造是农业改革。现在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到处都在进行农业改革。西藏仍由达赖喇嘛统治。

进行农业改革后开始向集体劳动方式：即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转化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互助组最早出现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以后的江西省，而当时正值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现在这些农业劳动互助组已经占农村人口的大约70%左右。

在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农村农业改革的第二阶段：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有超过150万户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1953年6月的资料，现在这个数字正迅速增长)。首先进入合作社的是占农村人口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在中国富裕中农占20%—30%，他们中只有部分觉悟高的加入了合作社。其他人暂且还在说：“我们这没有比我更好的了。”富裕中农的部分人还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7月31日在党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刊登在报纸上，你们知道报告的内容。

今年冬至春播开始将在农村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五年计划到1957年年底将争取所有农户的1/3加入合作社。现在可以说我们已将这项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了。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能有70%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在中国领先的地区合作化已经结束将近一年了，而在四年期间将全部实现合作化。

现在合作社中的土地和公共的耕牛是股份。收入主要根据劳动多少和仅仅是部分地根据入股土地多少进行分配。这项原则，看起来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这个运动是第二次革命。5000万农民正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还不能对许多地方进行垦荒，因为更多的资金用在国家的工业化上。将进行约4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式是成立生产合作社。它们将能增加农业生产的20%—30%。这样一来，如果去年粮食收成达1700万吨，那么就能增加340万吨。

中国的可耕田不多，大约在1100万公顷。每个农民为3亩地(约1/5公顷)。这里说的是中国北方。西北部多一点，而南方(广东省)总共约1亩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当农民在田里就好像是在绣花一样对土地是那么精耕细作。

东北和西北有空置土地，总共约880万公顷。如果开垦这些土地，将增加许多粮食。可那里人手不够。垦荒需要用机械进行。我们暂时还没有一辆自己的拖拉机，没有农业机械，没有足够的石油。所以我们只能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这样一来现在的合作社组织就是提高收成和所有农业产量的后备军。近几年将大力开展如1928年至1930年苏联的集体化运动。

耕牛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们有近3000万头耕牛。在进行集体化时避免损失耕牛是非常重要的，决不允许中农在加入合作社时杀死耕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

现在每个省都有建立在高级合作社原则基础上的实验性集体农庄。但这样的形式转向普及要到1960年以后。

我们的国营农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它们中不少是亏本的。中国中部的国营农场不多，大部分是在东北和西北部，那里有许多未加利用的土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看来将成立国营农场以及合作农场。

关于富农。存在于国民党时期原先的富农数量占人口的10%，按照户计算占8%。农业改造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在解放区给富农留下的田地和给农民的一样多。何况给富农的田地更差一些。还将与富农的斗争，但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有所谓的新富农，是解放后和进行农村改造后产生的。为数不多，不到1%。

今年我们获得大丰收，约1800万吨粮食。棉花丰收完成了计划任务：130万吨。

1957年年底资本主义工业比重将占大约12%(按产值)。现在资本主义的部分占40%。但解放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家只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国家。他们也只能从国家那里买入原料。这样一来资本家的生产就处在国家的监督下。企业(资本家的)的收入分配大致是这样的：收入税30%、部分收入(强制的)作为基建投资，部分收入为社会保险。资本家的收入不多于25%。这样，大资本家的纯收入不会超过3%，而小资本家则为总投资的2%或1%。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的这种方式意味着，国家的劳动人民实际上按一定的比例向资本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所有企业都将成为国家企业。

也可以一下将所有资本家企业国有化。但我们将无法管理它们。将会失去很多。现在采用的方式减少了损失。

中国的资本家和其家庭成员人数共有700万—800万人。你们可以在街上看到的小厂小铺，常常是没有雇佣工人的，而在工作的是一个家庭。像这样的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人。像这样的私人企业家共有3000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不事先安排好他们，而去没收企业，那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的商业企业52%是国营和合作企业，48%的私人部分中23%从事零售。25%是理发店、小摊贩和售货亭。将这些关闭很容易。可有200万在从事商业。能让他们不吃饭吗？

国家批发组织。国家规定价格。私商没有自己的产品。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城市里更少，大约在18%。

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时间。这将一起进行。

现在国内有700万个商业点：330万家商店，350万个售货亭。这些企业业主，1/3有土地。商人中有部分人是不劳动的。对他们我们应该忍耐，因为他们要养活自己。

我们知道在苏联100个居民中有1.5个商业工作者。在中国按照这样的对比需要900万名商业工作者。现在没有这么多！

关于物品配给制。棉布、油和粮食暂时配给供应。问题在于布匹和粮食我们还不够。解放后的第一年收获1.05亿吨粮食。现在我们收获的比这多得多。为什么还不够？第一，因为农民开始更多地买粮食了。以前大部分农民半年在吃糠、树叶和树皮。现在农民买得更多，而且买的人很多。如果每个农民一天吃一两多(1/15公斤)，那就要多增产几百万吨粮食。此外，生产粮食的人数少了，因为许多农民进城了。在农村牲畜的头数在增长。国民党时期有6300万头猪，而现在有1.1亿头。要喂它们也需要许多粮食。

粮食配给制是在1953年10月实行的。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粮食不够了。国家开始收购粮食并实行粮食配给供应。它还将实行一段时间。

1949年棉花收获了44万吨，而现在是130万吨棉花。为什么布匹还不够？以前许多地区的农民是三个人合一条裤子。孩子在12岁以前一般来说是没有裤子的。许多家庭都没有衣服。现在的农民都穿“三样新”：新布、新棉花和新衬里。就这点布匹就不够所有人的了。

现在北京和上海每个人是大约17米布，而在农村是7米多点。这点农民能穿了，但不够。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够。将来的主要后备就是荒地。

对食品分配的限制带来诸多不便，但现在给每个人的食品比以前多得多。在制定定额时我们考虑到了气候条件。

如果我们不实行棉布配给制的话以及一些食品的配给制，那所有这一切就正合投机倒把分子胃口了。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共青团中央已对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摘录，并呈送给相应的部委，以便采取措施。苏联共青团中央将另外提交有关扩大苏中青年联系的建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2日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摘自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5年11月16日

第144/НФ号

机密

文本第10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见

1955年11月15日

应刘晓请求，我会见了他。

刘晓说，他想向我通报他回国参加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情况，同时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的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某些计划。

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由于政治素质差和不了解当地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是完全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地争取中农、孤立富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看到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景气解散了，主张放慢合作化的速度。到今年年中，共成立了65万个农业合作社。本来还可以成立更多的合作社。但由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路线不正确，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了。

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的错误不仅受到中央委员会，而且受到了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尖锐批评。邓子恢在全会上表现还好，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央和地方许多党的工作人员也作了自

我批评。

中共中央采取了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60年全国基本上将实现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业逐步集体化奠定基础。

二、在完成1955年计划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的确，重工业顺利地完成了计划；煤、钢和生铁与去年相比将增加20%，而化工产品、水泥和铜的生产将增产10%。但轻工产品生产计划完不成。这主要是纺织工业企业开工不足造成的，原因是棉花和亚麻原料不足(去年许多棉田、亚麻受淹，收获不足60万包)以及由于贯彻节约制度对轻工业的拨款有些减少。

今年全国粮食状况好于1954年。尽管一些地方受旱，但总的收成较好。1955年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收成较去年多收4.9%，棉花多收22.6%。增产增收不仅是由于气候条件好，还由于吸取了去年的教训，采取了防涝措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效能很高以及由于实行新的收购政策，农民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但中国的粮食问题依然很严峻。中国人口很多，而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个体农民经济缺乏充足的肥料和必需的农具，耕作的方法也很落后，无法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无法保证城市所必需的商品粮。摆脱这种状况，建立大型的合作制集体经济，这是党一贯坚持的农业合作化路线。

三、中国现在正执行严格的经济政策，压缩机关编制。某些中央机关压缩工作人员达60%。中国外交部缩编在40%以上。被裁减下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被派到一些省份——西康、新疆、西藏和农业地区工作，一部分人被派去学习。许多现在不需要或可缓建的项目被停了下来，这样节省资金在7亿元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工业，部分用于农业。

四、现在中国同志们正忙于制定1956年的基本措施计划。这一计划将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一)与1955年相比，扩大工业生产。1956年应当超额完成计划，以便以此补偿1955年未完成的计划部分。

(二)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到年底计划制定工作将结束。到明年，计划将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并征得苏联代

表的同意。同时要考虑到把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联系起来。刘晓补充说，由于打算今后使中国的计划与苏联的计划相协调，所以现在尚未决定，中国的计划是做3年还是5年。中国政府打算同苏联政府协商这一问题。

(三)1956年把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135万个。

1956年要开垦74.2万公顷处女地和熟荒地。

(四)继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比重将达到70%以上。批发贸易中私有成分将完全被排除。对零售贸易中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监督。现在工业中的私人资本有2.5亿元，而商业中的私人资本有8亿元。

1956年继续进行逐步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分散企业将联合为国家领导下的大型公司。加入这些公司的资本家的企业将被看成是资本家的股份。私人资本企业是现存的收入分配体系(分四部分：国家税，社会保险提成，资本投入，企业业主利润)将由新的体系取代：确定某一企业里私人资本的数额，给企业主支付这一资本的利息。这将加强国家对私人资本部分的监督，同时减少私人企业里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由于降低了对利润的追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便利用资本家自身在企业主和商人中开展相应的工作，把私有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久以前，毛泽东召开了民族资本家代表会议。他从总体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他解释说，资本家也可以被当作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中被加以利用。

出席会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欢迎毛泽东的声明。但是，刘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将对抗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许多资本家理解新的形势，开始同人民政权合作。他们认为，他们适应得越快，越能占据较有利的位置。

(五)加强国家防御能力。计划靠减少部队数量来提高部队质量。计划请求苏联政府再援助额外建议的34个国防企业，这些企业将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投产。再过一年，江西福建铁路将竣工，这条铁路在中国沿海

地区有战略意义。这些措施将大大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待这些措施实现之时，刘晓指出，同美国人讲话就会容易得多了。

(六)继续同反革命作斗争，今年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将近5%的人为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明年还将审查1000多万职员、大学生和部队职工。干部审查将用3年时间。

刘晓接着通报说，前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被揭发是外国间谍，他在1940年就开始成为汪精卫的特务和日本的间谍了。估计，早在1946年他就与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

(七)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斗争(胡适、胡风、俞平伯、梁漱溟)，以便提高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领导水平。对提高部长、副部长和各司局长等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学习班参加学习，其他人每年抽两个月进行政治学习。

五、刘晓指出，中共中央同意赫鲁晓夫同志在刘晓回国之前同刘晓会谈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同志所发表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紧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力量。中共中央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制定中国的相应步骤。中共中央赞成苏共中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采取措施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贸易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团已赴南斯拉夫访问，还将派其他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关于铁托即将访问苏联，中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六、涉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计划，刘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困难，想对他们提供援助，以便加强中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影响。中国购买缅甸的大米。中国可以帮助缅甸建设某些企业。中国政府还考虑扩大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贸联系。中国自身还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为了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准备做出一些重大的牺牲。中国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将考虑，中国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哪些帮助。

为了加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联系，宋庆龄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在这些国家影响很大，她的出访将带来好处。她还可

以访问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还未表态。

刘晓补充说，宋庆龄大概1956年要访问苏联，但这个问题尚未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已着手准备亚非国家会议，看来会议将在明年(1956年)6月召开。

刘晓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寻找同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建立联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很关注同日本的关系。日本需要同中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中国政府将利用这一形势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让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组织宣传的目的是想让它脱离美国。中国报刊把批评集中在外相重光葵身上，对鸠山一郎 [\[15\]](#) 少一些。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不准备对他们复仇，过去一度遭受美国压迫的中国人民现在同情遭受美国人压迫的日本人民。

中国还希望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哪怕是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对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中国将向这些国家派出贸易代表团。中国政府也欢迎纳赛尔访华。

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条件下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进行试探。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么中国能与它们建立半官方的关系，就像中国与英国那样。

关于同英国的关系，刘晓说，英国政府努力想同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它又支持美国的立场。在讨论美国在华公民的问题上，英国人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想对英国人宣布，如果他们想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那他们应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有诚意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看来能够举行，但在同美国谈判中，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采取强硬立场。

谈到朝鲜问题，刘晓说，现在未发现任何新的变化，当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结果清楚之后，将讨论相应的措施。

谈到台湾问题，刘晓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台湾国民党集团现在正经受严重的危机。陈诚集团、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集团和孙立人集团之间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孙立人及其近400名追随者已被逮捕。国民党政权还对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及其他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分子进行了迫害。但是现在还很难说，这种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产生什么影响。

刘晓继续说，为了对台湾进行宣传，同时也是为了在国民党中开展工作，中国政府正利用一些前不久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来的原国民党活动家：卫立煌、翁文灏等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前不久到过苏联，他曾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客。他回国之后，刘晓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兴奋地讲述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的很好的文章，并在中国民主人士中间开展了有益的工作。

对于张治中访苏期间苏方对他的关照和对他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应中共中央请求做的)，刘晓表示了感谢。

我对刘晓同我会谈和提供消息表示感谢，我指出，这一会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形势。

出席会谈的有：远东司顾问M.C.贾丕才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用于关于中国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8, л.131-139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

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1月30日

第522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5年第122号至第128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B.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8/347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8(347)号，1955年11月29日

内容及页码：

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195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 [16]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7/346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7(346)号，1955年11月26日

内容及页码：

- 1.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组织大为增长。第2页
- 2.贵州省33429名新人入党。第3页
- 3.司法机关的作用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驾护航。第4页
- 4.农村信贷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农业合作化。第11页
- 5.广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干部应遵循的原则。第15页
- 6.至1956年春之前广东省将重新组建超过7万家合作社。第16页
- 7.广东的国民收入在增加。第19页
- 8.黎族自治区和苗族海南行政区改为自治州。第20页
- 9.简要新闻报道。第21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И.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6/345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6(345)号，1955年11月22日

内容及页码：

- 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第2页
- 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第6页
- 公私合营工业的增长。第10页
- 上海汽轮机厂、电气仪表厂和锅炉厂的新车间。第11页
-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有关加强司法机关保障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指示。第12页
- 更广泛地展开扫盲工作，以应有的形象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14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И.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5/344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5(344)号，1955年11月19日

内容及页码：

1.在建立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基层组织(195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2.认真做好粮食定产、订购、定销与市镇定量供应，进一步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辽宁省副省长黄达在1955年10月20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的《辽宁日报》)。第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4/343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定。第3页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第4页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的决定。第6页

5.有关中国增加油料作物产量的建议。第7页

6.机械部企业决定至年底前另外增加生产5万架双轮双铧式犁。第16页

7.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第1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3/342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恢复。第2页

2.今年11月起全国实行统一粮票和地方粮票。第4页

3.1955年铁路网扩大。第6页

4.兰州工业区建造环形铁路。第6页

5.拉萨至日喀则公路通车。第7页

6.改善银行放贷工作，协助国家企业节约使用资金。第8页

7.今年中国植树造林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第14页

8.超额完成9月份棉花收购任务。第15页

9.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烤烟和晒烟收购计划。第17页

10.云南超额完成茶叶收购计划。第18页

11.广东增大出口商品。第19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2/341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2(341)号，1955年11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与日本工商界代表团签署290项供货协议(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与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进行贸易谈判的公报(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3页

3.许多城市和市镇实行粮食定额供应系统(195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4页

4.秋季油料作物获得大丰收(1955年10月25日《大公报》)。第6页

5.福建省统计局通报完成1954年国家计划。第7页

6.对实行集中领导和帮助私营工业企业政策的总结。第15页

7.1955年已经获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上海270家私营工业企业中，有123家已经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第19页

8.辽宁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迈出了新步伐(1955年10月6日《辽宁日报》)。第21页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26-283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绝密

第2513/K号

苏联内务部

1955年11月26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7月27日决议，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一行19人自今年7月29日至11月16日来苏联访问。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代表团团长)；陕西、云南和广东等省的公安厅厅长：李启铭、刘明辉和寇庆延等同志；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梓群(Се Цзы-Цюнь)同志；北京和上海等市的公安局副局长贾正操(Цзя Чжен-цао)和雷邵田等同志；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石广平同志；公安学院教育长王仲方同志；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姚立(ЯоЛи)同志；公安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治平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处长徐波(СюйБо)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副处长陆兵(ЛуБин)同志以及随行翻译5人。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于今年8月1日开始工作。9月20日以前一段时间，他们了解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组织情况。

自今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代表团成员们学习了苏联外交机关的结构和工作经验。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些负责人向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如下情况：部门内部的结构和任务，制度安排，干部的培养和登记；警察局内部与刑事犯罪、盗窃社会财产和投机活动作斗争各机关的工作组织；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护照管理系统；交通和行人安全保障制度和警察机关内部的其他工作。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成员还了解了如下情况：苏联劳改政策的基础，囚禁地(监狱、劳改营)的组织制度，犯人的关押和警备制度，已判决犯人的再教育和改造工作，少年劳教营的工作；本土防空司令部和国家火灾监控机关的工作；特别重大设施的保卫、押送勤务和内部组织；苏联边防军的结构及其保卫国家边境的任务；苏联内务部的档案组织及其机关的其他工作。

中国代表团成员拜访了苏联内务部党委，了解了内务部的党政工

作、党的教育和普通教育培养的组织情况。

除了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外交机关的工作情况举办了讲座和座谈外，我们还向其介绍了分布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以及列宁格勒、里加、基辅、索契、巴统和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苏联内务部各分支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

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一期间还参观了如下内容：莫斯科市警察局，莫斯科河区警察分局和克拉斯诺戈瓦杰伊斯基区警察分局，莫斯科市第9、第45和第83警察分局，莫斯科市警察局居住址查询处，并实地了解了足球赛进行期间“迪纳摩”体育场的公共秩序保障情况。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克柳科沃劳改营和伊克山斯基少年犯劳教所，布德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监狱。他们还了解了苏联内务部高级中学和军事学院，高级消防技术训练班，中央消防科研所，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和军事历史档案馆，电影图像文献档案馆，犯罪侦察学学院和博物馆等的工作情况；观看了本土防空设施，参观了莫斯科市的当地防空司令部，部署在莫斯科和列乌托夫等城市的外交部内、外押送勤务部队，了解了外交部所属的“公社社员”国营农场的工作情况。

根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要求，今年10月20日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基辅。

10月22日，代表团受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特罗卡齐同志的接待。后者向代表团成员们简要介绍了共和国内务部各机关的工作概况。在斯特罗卡齐同志的陪同下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斯万托山斯基区警察分局，了解了农村地区(派出所)地段民警以及基辅少年犯劳教所的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基辅市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碑。

今年10月24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了索契市。他们在这里了解了苏联内务部第一疗养院的医疗预防工作情况和索契马采斯京斯基疗养区的名胜古迹。

今年10月27日，代表团抵达巴统市。巴统边防部队负责人特卡切夫向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辖区内国家边防部队的组织情况，随后代表团参观了第9、第11边防哨卡和一个海防汽艇大队。

10月28日，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举办了一个气氛热烈而友好的招待会。

11月1日，代表团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市，先是参观了城市的历史古迹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然后又去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和以H.C.赫鲁晓夫名字命名的位于斯大林格勒州红军区的一个集体农庄。

11月5日，代表团返回了莫斯科市。

在代表团参观各城市、企业和机关以及参加各种座谈会期间，内务部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公民均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现出了极其由衷而热情的态度。而从中国同志们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们确在苏联人民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朋友。

11月7日，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红场的军队阅兵式和劳动者的游行活动。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还应邀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十月革命节之后，代表团继续了解苏联内务部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

11月14日，代表团全体受到了苏联内务部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感谢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和在代表团了解苏联内务部工作过程中苏方所做的良好的组织工作，并表示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次到苏联访问感到非常的满意。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1月16日决议，苏联内务部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中国公安部需要的如下设备：防空、消防和刑侦器材和仪器以及如下一些办公文件——具体内容涉及警察机关、劳改营和劳教所、边防军、消防、档案机关和苏联内务部其他分支机构等的工作情况。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20, л.146-150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
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部长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B.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H.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6年12月7日

苏联塔斯社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322c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M.A.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B.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H.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5年12月7日

附件：

机密

关于塔斯社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

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工作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苏共中央1955年9月21日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团人员由以下同志组成：B.Г.谢里维尔斯托夫、新闻处处长И.И.别格洛夫、远东各国处处长B.П.尼科利斯基、国外信息管理局排版负责人К.И.罗曼诺夫斯基、国外无线电台播接收站站长Г.М.博布罗娃、国外信息管理局咨询部专员Ю.Ф.卡斯托尔斯卡雅。代表团于9月28日抵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部门负责人和年初在塔斯社实习过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报纸和杂志编辑或副主编，北京广播电台、苏中友好协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代表，塔斯社分社工作人员。

当天，吴冷西同志举行了招待会，有将近80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出席了招待会。第二天代表团参加了由周恩来同志为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的外国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10月1日代表团观看了阅兵式和北京劳动人民的游行。

次日，代表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刚投入建设的第二纺织联合工厂，去了官厅水库和市郊的合作社，多次与国家的和党的负责干部交谈，还参观了《人民日报》报社，在那与北京的记者们举行了会谈，了解了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参观新华社时，以塔斯社的名义向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赠送了礼品。

而后，按照新华社领导提出的计划，代表团进行了中国之行，参观了10个城市：沈阳(穆克顿/盛京——沈阳的旧名)、抚顺、鞍山、大连、旅顺口、天津、上海、杭州和南京。

代表团在沈阳参观了机床制造厂、综合技术学院、中国东北工业品展览会，还去新建的工人新村和农业合作社。在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的矿井和油页岩的开采以及(石油)炼油厂。在鞍山代表团参观了冶金联合企业：高炉和马丁炉车间、无缝钢管厂、钢轨厂和轧板厂。塔斯社的工作人员在大连了解了造船厂和码头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参观了旅顺口的历史遗迹。代表团在天津参观了第二文化宫和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在上海，代表团去了工人文化宫，在那参观了反映上海无产阶级斗争和上海工业品展览会，还去了上海国营卷烟厂和公私合营申新第九纺织厂，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同志就上海民营工业的状况和改造道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杭州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丝织厂，历史名胜和劳动人民休闲的地方。在南京，代表团瞻仰了孙逸仙陵墓、革命烈士陵园、南京国家天文台。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报刊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同志对代表团都表现出友好的关注和热情款待。在所有城市，代表团都是由地方报纸编辑，党的机关、电台、中苏友好协会代表负责迎接护送。随同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第一副社长朱穆之和三四名新华社其他同志。

从中国之行回到北京后新华社领导邀请代表团参加隆重的午宴。10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为代表团的到来举办了招待会，来参加招待会的有新华社负责同志、报社编辑、记者、外交部代表、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等。

10月2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以吴冷西为首的许多新华社同志、北京报刊代表、苏联使馆人员、塔斯社北京分社工作人员。

中国之行和参观各种企业、机关和休闲地方期间，塔斯社的工作人员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进行了多次友好的见面与交谈，有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学生、小孩。所有这些见面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不管代表团在哪里遇见当地的居民，都能受到最热情最真挚的招待。在公园和其他休闲的地方，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孩子，经常围住代表团成员，十分乐意地与他们交谈，自发地演唱有关中苏友谊的歌曲。以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人的会谈记录。

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同志的会谈

薛暮桥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引用了已知的实际数据，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会谈过程中薛暮桥同志表示，包括1954年粮食歉收导致食品困难的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减速。如棉花生产最近两年下降了20%。但今年将获大丰收，预计谷物丰收将超过1952年这方面记录的9%。棉花生产同样将超过1952年。

同时，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增长23.4%，可在前三年中仅增长了10%。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小商品生产性质。出路在于合作化。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之一是垦荒，包括熟荒地。现在垦荒和垦熟计划完成得很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打算开荒250万公顷土地，但根据国家计委核算到五年计划末将垦荒400万公顷土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计划30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和垦熟。

中国大约有5亿公顷土地，同时，可耕地仅为1.1亿公顷，也就是说每家农户大约1公顷。与此同时，也考虑到农业人口的增长，计划增加300万公顷可耕地依然无法消除可耕地的不足。

谈到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问题时，他说，这样的资金是靠内部积累。比如，1955年国有企业收入为1100万元。部分资金来自对私营企业家和商人税收，部分是国营农业税以及苏联的借款(资金数额不大)。

薛暮桥表示，最近进行的削减非生产建设费用的运动应该可以节约300万元，这笔资金也将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

为此还大大地削减住宅建设和日常生活服务机构以及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拨款。

在参观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时，我们了解到，比如由于对建造联合企业工人大食堂的拨款延期，该项建设将根据联合企业内部积累情况推迟进行。

薛暮桥同志提出将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增长与1949年时期的比较一下，当时的工业比重是17%，而战前时期，根据不确切资料好像是在10%左右。下列数字就是工业比重的增长所具有的特征：1949年：17%；1952年：26.7%；1954年：33%；1957年：36%。至于部分规模大的工业比重，1952年相当于39%(工业总产值的)，1955年则为18%，而在1957年只有12%。这样的减缩是因为快速的公私合营改造造成的。暂时无法对工人和职员征收任何税款。积累的来源只剩下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农户向国家缴纳的税款。

薛暮桥在结束时指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问题远没有解决。为此还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为了保障人们的工作，有时被迫放弃使用机器。

这点在代表团成员参观上海卷烟厂时得到了证实，那里部分包装好的机器都暂停使用；参观鞍山联合企业时，看到运送氧气瓶和其他货物都采用人力车装载。

在上海和南京都向我们谈到过有关劳动安排的困难。为了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开展了将城市居民转入农村户口的工作。最近几年从上海派到农村的有80万人，以致城市居民减少到620万人。但在上海，还包括至今仍存在的12000条帆船，其船主的生存状况十分悲惨。在南京造成安排就业困难的还在于许多居民没有任何技能，因为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官员的仆人(20万人)。

在一些企业有许多工人也对我们这样解释，新的工厂需要培养干部。如鞍山联合企业轨钢轧制车间党组织书记说的那样，车间有为两个同样的新车间培养干部的任务。他还说，考虑到H.C.赫鲁晓夫同志在去年参观联合企业时的批评，车间的工人数量已经从1300名缩减到1000名，而到年底还将裁员50名。

与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的会谈

汪锋同志说，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350万人。分布居住在整个中国境内约50%的国土

上。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从事农业的主要是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苗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藏族、蒙古族则从事畜牧业。

许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进行了农业改革，涉及250万人。至于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那里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更为复杂，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

汪锋表示，共产党被迫与民族地区的封建上层进行斗争，后者利用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号召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的地方经济，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该上层以“民族天性”为由反对社会改革，坚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曾发生强行接受这些要求的事件，包括在讨论结构方案时。此外，共产党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信任作斗争，这也正是那些封建上层点燃的不信任。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共产党提出了任务：用十年时间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赶上总体水平，在那里培养干部，巩固和增加暂时还十分薄弱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主要依靠是当地的工人阶级。

在这次会谈中弄清楚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各自拥护者之间继续进行着潜在的斗争。共产党的方针是：使两个集团保持中立，将所有权力掌握在一个将来以选举方式建立的人民政府手中。

现在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少数民族建立文字。现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傣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锡伯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大约有1000万人。600万人(东干族(回族)、满族和其他民族)使用汉语；纳西族、彝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有简单的文字和语言(330万人)。

宗教是重要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是佛教、喇嘛教，还有一些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与国民党分子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他们经常往少数民族地区派遣自己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应当指出，我们从中国资料中搞明白了，东干族指的就是穆斯林，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得来的信息中有一些混淆)。

汪锋同志而后说，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在个别民族族群内部，还是民族部落之间还存在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比如，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许多部落内还保留着奴隶制。在某些地区一些部落还保留着原始制。这是还没有形成的族群，可他们有发展得很强烈的民族同一性，存在宗教的同一性和许多其他能够被认为是某个族群的各种特征。所以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取消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阶段被取消了。共产党特别强调成立自治区的作用。现在自治权是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所以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按照这些少数民族的意愿成立自治区。最近几年期间成立了73个民族区域自治(28个自治区和自治州以及45个自治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维吾尔族新自治区。

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工人阶级，还在于封建上层还想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保留自己对其他剩下居民的统治地位。这样的上层人物阻挠着人民中新的民主力量和新干部的发展。

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会议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显示出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主要是封建上层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某些人是为了希望在会议上得到他们族群的完全独立直至脱离中国。

党采取的方针是从人民中培养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勇于将少数民族中的党员推上领导岗位。

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私人工商事务)副主任许涤新同志的谈话

许涤新同志描述了中国私人部分的状况、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变的改造工作进程。

他说，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买办资产阶级：体现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四川省、上海市和宁波市。蒋介石集团采取讨好外国资本，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背叛政策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断裂。为了让资产阶级更完全地脱离蒋介石集团，利用它为人民国家的利益服务，就需要推行非常巧妙的政策。要将剩下的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要让革命胜利后逃到国外去的那部分人回到祖国来。政府为这部分资产阶级保留了所有权和承诺给予帮助。

许涤新说，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分为四类：

“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那些已意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并且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资本家。包括民族资本家的上层也属于这一类；

“中立的”，人数最多的一类资本家(占总数约60%)。如许涤新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一类资本家很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仅将它作为一种事实来接受，但不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有时候还进行干扰；

“落后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不接受国家的订单；解散自己的工人。但是不进行公开的抵抗；

反动资本家。进行暗中破坏，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办法。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

许涤新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分裂资本家，将第二类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孤立第三和第四类资本家。

在工业方面对待资本家采用的是以下方式：

1.国家收购私营企业的商品。

2.在私营企业加工由国家提供的原料，同时这些企业完成国家订单时，由企业负担原料费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限制利润和自发性以及私营工业与私营商业的脱离，这就迫使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许涤新在回答问题时说，资本家因为要依靠国家才能获得原料，所以他们想竭力利用私营市场很困难。原料是资本家身上的压力杠杆。

3.下一种方式就是国家资本。现在大部分私营工业和商业改造成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公私合营企业提供了整个私营企业总产值的36%。差不多所有工人总数在百人以上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实行了私营工业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如在上海，所有棉纺企业、橡胶制品企业、器皿制品企业同时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

1952年中国共有19万个批发商。这里同样也采用将生产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挤走的方针。到现在只剩下了9万名商人，这部分仅占批发贸易的8%。私营贸易的范围只剩下日常生活消费品：火腿、水果、家禽、鸡蛋等等。许涤新同志在回答有关批发商资本数额时说，“很少有资本在10万元的批发商”。至于工业资本，他们一般都有2000万—3000万元资本，有些甚至达到1亿元。

1953年国家共有453.3万户商人家庭(包括小铺子)。有680万人从事私营商业。在对待私营商人时采用两种方式：

1.国家按照合同以现金结算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同时私人应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商人也可以从私营企业者进货，但销售价要与国家协调后制定。

2.国家以代理销售的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商店的所有者有责任向银行缴纳抵押金，以此从国家得到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给商人的商品零售价由国家规定。

对私人贸易制定了严格监督。在这方面我们深信不疑。每家商店，甚至每家小铺子都有专门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购买人获得的商品。一张小票给购买者，而另一张留在商店里以供检查。违反商业规则的将受到严惩。

对于公私合营改造的问题，塔斯社代表团可以在上海和天津从实际中了解。

我们在这些城市里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去了属于资本家的大商店。

在上海与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进行了会谈。他讲述道，全国所有私营企业的一半产值由上海产出。

上海有75000家企业，其中包括46000家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的企业2800家，其中包括270家国营企业(规模大是指有超过15万名工人和靠电力工作；也有超过7000名工人的企业)。规模大的企业中聚集了65%的上海工人，他们创造70%的总产值。仅有7%的企业不在国家监察之内。剩下的从国家获得原料，完成国家的订单，有为他们制定的生产计划和制成品的单价。

说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化，这项工作早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保障工人的就业和居民商品的定额供应，国家对那些主人已经逃往国外的企业进行了托管。国家当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注资，派出了自己的常驻代表，可其后也还没有收归国有。这一点争取到了外逃的人，他们开始逐渐地和抽出的资本一起回来了。比如，大企业家刘鸿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拥有火柴厂、仓库和码头。就这样，国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

第二阶段始于1952年，当时的“五反”运动结果揭露出了非法利润，国家将此和在个别企业中发现的四大家族和日本公司的股票予以没收。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在上海规模大的公私合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为：1950年：24家；1951年：83家；1953年：133家；1954年：244家；1955年：520家。

为了稳定，国家将小企业围绕规模大的企业进行联合，将它们合并。比如，上海自来水笔厂现在将联合9家企业。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生产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和集中。这里只能是蜜糖饼干和鞭子一块用，因为规模大的企业业主不愿意与小企业合并。非常重要的说服方法之一是拒绝提供原料和不保障销售。合并的结果许多以前的管理人员被解职。通过与企业家的协商，明确这些人的新职位并保留以前的薪额等级。规模大的工厂经理收入为每月400—700元，而小企业的经理为每月200—300元，大大超过国营企业经理的收入。

有趣的是，国家在成为股东之前成立了委员会，与资本家确定企业的价值。资本家自然要尽量提高自己的资本。比如，以前上海“申新”纺织厂是属于百万富翁荣毅仁，顺便说一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其他许多荣誉职位。但是在确定他工厂的资本时，他千方百计地降低设备的损耗，说他的机器还能用上20—30年。国家代表回答，这些机器最多还能再用10—20年……

不管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与我们会谈的领导都负责任地表示，为了让企业成为是公私合营的，有5%的股份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企业的决定性杠杆握在自己的手中。刘述周强调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最好，上缴的利润更多，原因是工人对生产的态度改变了。

应当指出，国家旨在排挤私人资本的政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私营企业的工人经常和工厂主闹矛盾，劳动生产率要比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低得多。私营企业的工人们要求加快对他们企业的改造。

城市居民实际上是抵制私营商店。在上海我们在同一时间走进两家商店：国营的和私营的商店。国营的商店中所有楼层满满都是购物者，而私营的，只有一楼有一小部分购物者在食品杂货和美食柜台边，二楼卖鞋、丝绸、皮毛、儿童玩具处一共只有几个人，灯光也暗了些。很显然，这家商店的店主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生存不了多久了。有一个对我们讲述的故事，很准确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两难状况：资本家感觉自己就像在燃烧的湖中与强盗同坐在一条船上。

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杜润生同志的会谈

杜润生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他讲述道，有许多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在1955年7月31日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找到(报告在我们会谈后就刊登了)。

会谈前杜润生同志表示在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方面有许多困难。食品不够，和棉布制品一样定额供应。在1952年的丰收年按人口平均仅为500斤粮食(大约250公斤)。1953年发生了农民拒绝将粮食卖给国家。为了保障定额供应给工人的粮食，开始计划收购粮食和卖出粮食。

杜润生同志说，中国现在共有1.168亿农民户。65万个农业合作社联合了1700万户农民：占所有农户的14.5%。平均每个合作社有25.5家农户(每户平均为4.5人)。

1956年春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了150万个，联合了4500万户农民，也就是说五年计划将提前完成。

然后杜润生同志讲述了农村的阶级成分。25%为贫农户；45%为下中农户；中农户(他们中有部分人还雇劳动力)不到30%；富农大约为2%。前二类人积极奔向社会主义，形成了党基础组织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依靠。第三类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由于地方上表现出害怕“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许多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今年春天这种愿望特别高涨)开始表示不满。听到了责备声：想生活得更好，却阻挠我们！于是开始成立“秘密”合作社。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今年春天党向农村派遣了15万自己的特派员，其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合作社和成立新的合作社(根据计算一名特派员负责10个合作社)。重新组织的合作社将给予200元用于购买耕牛和农具的津贴。加入合作社的贫农发40元。这些贷款将连续发放3—5年。

现在有101个拖拉机站，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200个；运作方式和苏联的一样，也就是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

谈到党的农村工作方法时，杜润生说，要对农民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每个农民明白，他应该耕耘多少土地，将有什么样的收获，他该卖给国家多少。在农民会议上规定所有的定额，所以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已的责任，也知道村里其他人的。而既然已在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就不得违反。农民还知道，即使他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上缴粮食的定额还是不变的。禁止私商在农村里收购粮食。只有在固定的地方有着有限的市场，农民在那里可以在没有商人的参与下相互交换各种农产品。国家同时还掌握着农村工业品的供应，通过消费合作社供应工业品。

杜润生在谈到农业机械化时说，国家向合作社提供犁和其他农具，同时还提供化肥。今年生产了30万架犁。至于拖拉机，要到1959年才开始生产。到1967年前打算生产600—700辆拖拉机。

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会谈

吴冷西同志简要地讲述了新华社的发展史。1932年(实际上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出版了报纸《红色战士》。1934年到1935年伟大的长征后通讯社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出版《新中华》报，报社有了通讯部。

1937年10月1日新华通讯社正式组建成立。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通讯社设在延安。从1942年起与中文广播一起，通讯社开始了英语广播。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后方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有新华社的分部。同时在新华社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为通讯社写了专稿反对刊物中的形式主义。

1946年在延安的新华社机关大大地扩大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成立了新华社分部。那时新华社传播中共中央内写的各种进步文章，也就是说，实际上起到了

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作用。

1949年10月起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在庞大的管理方面建立了各个部门，而在各省建立了分社。新华社在军队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早先属于新华社的无线电广播服务转给了无线电委员会。1952年以前在情报总局下的照片新闻转给了新华社。

现在新华社每天以6万字的量发布公开新闻：以无线电报方式发送4万字，邮寄发送给需求者2万字。这样的信息量中内部新闻为60%，国外新闻为40%。

新华社每天给各地方报纸发送的材料约为750万字。其中350万字为口述笔录传送，剩下的以无线电报方式。

新华社每天出版6万—8万字的新闻通报(不用于刊登)。该通报包含了国内的和国外的新闻，每天分发给固定的客户。

此外，新华社还给当地机关领导发送(以内部电报方式)简要新闻通报：信息量大约为3000字。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每天用英语为国外通讯社发送8000—10000字的新闻。

新华社的照片新闻在1954年提高了10000张底片，发布了50万张照片。

通过在国外合作的通讯社，每月3—4次向相应的国家分送文章，用以刊登在这些国家的报刊上。

新华社自己的记者使中国国内的生活更加多彩。主要来自塔斯社和民主国家通讯社的材料基础上国际时事也更加生动。新华社自己驻外记者的材料占该社国外新闻的20%—25%。

新华社在中国有29个分社(每个省和每个大城市都有)。此外，在福建省还有前线分社。总体来说新华社在全国有389名记者。国外有22名，包括在莫斯科、柏林、华沙、布拉格、汉诺威、雅加达。在朝鲜有两个新华社的分部：一个在平壤，另一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新华社在香港有“半官方的分社”，通过无线电报获取新闻。香港分社从事对来自亚洲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的杂志和报纸进行加工。

新华社计划在贝尔格莱德、仰光、卡拉奇和伦敦设立记者站。

新华社有编辑团队，由新华社的社长、3名副社长、国外新闻部、对外新闻部和照片新闻部的部长组成。

计划成立新的解决出版和新闻传播方面问题的部门。

现在新华社有2400名员工。他们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1100名，在国外有140名(包括在当地招收的人员)。

吴冷西同志说，为了生动地报道大型的国际会议，新华社就在当地租用转播设备。如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万隆会议)和在日内瓦(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有周恩来参加)。

塔斯社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人民日报》报社编辑部与首都记者进行了会面，参加的有近70人。会谈前几小时给了我们一份中央刊物人员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大公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除了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经济工作的决议以外，如何在经济新闻中体现党的领导？”；“苏联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后，如何在刊物中组织经济报道？”；“在向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发起总攻期间该如何组织有关市场问题的报道？”。《北京日报》提出的问题是：“特写和通讯报道中叙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时，记者可否允许进行逻辑性推论？”；“记者能否对大量地引文作某些修辞上的改动或增补，而不与真正的引文内容对立？”。《工人报》请求讲述，塔斯社是如何推广先进经验，如何对掌握生产技术进行报道，如何借助

于新闻使党和工会的组织工作更为生动？塔斯社是否根据题材在国家不同地区有自己的记者，如何培养这样的记者，塔斯社如何与自己的记者配合工作等等。

预先说明代表团成员对某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有关因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报纸组织材料的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时期大约是30年以前的，我们随身没有任何就这个问题的材料，我们讲述了塔斯社是如何为报道先进方法的经验、生产革新者的成绩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如何报道完成生产计划，如何实现对记者网的领导，如何为塔斯社选择干部。

我们同时还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浓厚的兴趣。塔斯社和苏联报刊广泛地利用新华社和中央报刊有关中国劳动人民取得成就的材料。

在参观企业与合作社时，我们很想知道物质情况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如在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为70—75元，而普通工人则为47元。工厂食堂伙食为15元。工人没有带薪休假。只有生产先进分子才能去修养所或疗养院。工人不缴税。

在沈阳机床制造厂，副厂长对我们说，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月30元，最高为110元。平均工资为50—60元。厂长每月为160元，总工程师为240元，一般工程师大约120元。

沈阳机床制造厂的许多工人都居住在工人新村。人口多的家庭能得到住房。每套住房有两个房间(都为8—10平方米)，带有厨房。工人每月支付10元。孩子送托儿所每月需支付12元。上小学每年支付5元。

一个三口之家最低生活费大约在每月60元。

在中国许多城市，我们注意到城市交通是薄弱环节。尽管大城市里有电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可大部分人和货物，都采用自行车和人力车。北京现在有42000辆人力车。其他城市也有许多人力车，特别是在上海。甚至在工业中心：鞍山和抚顺大部分货物都采用人力车或马拉车运输。汽车很少。在南京和杭州几乎看不到汽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城市和农村都十分干净。看不到垃圾、垃圾堆放处，看不到苍蝇，楼房都保持错落有致。在这方面居民本身显示出十分整洁。几年前在中国就开始的爱卫生保健康运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结果。

塔斯社负责人

B.谢里维尔斯托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大部分资料都已刊登在报刊上。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308, л.140-166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
(1955年12月10日)**

驻华大使访问团在访问汉口期间，中国地方机构向他们介绍了长江铁路大桥的建设。大桥建设负责人彭敏向大使们介绍了该桥建设中的困难及其技术特点。长江大桥的宏大给各国大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20名苏联专家参加了该桥的建设。我会见了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人西林工程师。

西林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科技意义。长江在汉口地区平均水深达30米，在每年中的个别时期还会达到40米。此外，这里的水流速度很快。这些状况以及其他的状况(水底气体的溢出)都排除了用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可能(一般认为，在这么深的水中使用沉箱的方法，工人每天在水底工作不会多于45分钟)。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同中国专家一起制定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使用沉箱固定桥墩。

桥墩的基座是通过把管道从水的表面放到水底，再通过管道(直径为半米，长40多米)钻河底的方法建造的。这种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使得大桥的建设比预先指定的期限快得多。最初计划在1959年结束该桥的建设。然后这一期限被改为1958年。现在大桥预计在1957年建成。西林工程师说，如果苏联能够按照原计划在195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供应1.5万吨用于钢筋结构建设的轧钢，那么，大桥在这一期限内完全可以建成。

当所有的设计和试验工作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某一组织进行了建设大桥的准备工作，1954年8月19日，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致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在长江上不可能通过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工作，中国铁道部决定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对中国铁道部部长的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

1954年11月10日，中国铁道部部长又给科热夫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关于按照新的方法建设大桥的问题。

1955年1月10日，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部长写了回信。在回信中科热夫尼科夫不建议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他写道：你们关于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在岩石的基础上建设桥墩基座和钢筋混凝土桥墩的方案，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没有进行过检验，现在不建议在复杂的条件下使

用这种方法建设长江大桥的桥墩。

在科热夫尼科夫拒绝建议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之后，中国方面自己通过了关于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决定，这种方法是以西林工程师为首的苏联专家制定并向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这种方法在苏联经受过实践的检验。

负责大桥建设的彭敏于12月3日在《友好报》指出，“这种建设大桥的新方法在建设汉水大桥的时候就已经检验过”。彭敏指出，“关于建设大桥基础工作的新方法的建议特别重要。按照这个方法在钻了大孔之后使用大型特制钢管作为基础；多年以来关于做这些工作必须用沉箱方法的说法被打破了”。

在长江上应建造8个桥墩，现在已经建造了4个。

新的建设方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得是如此顺利，以致中国工程师将要按照这种新方法在南京建造新的长江大桥。用沉箱的方法在南京建造大桥是不可想象的。南京地区长江水深达50多米，而水流的速度比在汉口地区也要快得多。中国工程师已经准备了直径达3米的钢管，并在汉口地区进行了试钻，为的就是在南京地区建造这么大的桥墩。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在长江大桥建设一事上的立场令人感到奇怪。

建造大桥的新方法是由苏联专家提出来的(西林等人)。苏联进行了一些实验性工作。钻探的特别设备和其他装置都是苏联提供的。交通建设部的科学会议上多次讨论了该桥的建设问题。

很明显，这一建桥的新方法取得了成功。苏联交通部现在开始担心并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我国专家论证苏联方面关于用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方法的优越性。

从上可以看出，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的立场是畏缩的、双保险的：一方面，它阻碍了苏联建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苏联在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认为，必须委托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写一封信，信中应高度评价中苏桥梁专家共同工作取得的成果，他们推行新的建设方法在长江大桥的宏大工程中取得了成果。并提出，希望总结这

一经验并共同作出科学的和实践的结论。

或许，应该请科热夫尼科夫部长到中国实地看看这一建设。此时，中国朋友们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由科热夫尼科夫轻率而同时又是正式的答复引起的。

АПРФ, ф.3, оп.65, д.503, л.152-157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绝密

第174号会议记录

关于在中国建造非沉箱式桥梁的问题

1955年1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有关在汉口市附近建造长江大桥的密码电报，特报告如下：

为执行1953年7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交通部对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跨越扬子江大桥(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由22名著名的桥梁专家和交通建设科研人员对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提交的初步设计中规定桥墩建造在沉箱基础上并带有双层跨越结构用以通行火车和汽车。

鉴定委员会证实了初步设计中规定的河中桥墩建造并使用浮式沉箱的方式，并建议在详细制定技术设计时进行另外的地质勘探、水文地质和地形测量工作。

在1953—1954年用在河床上大量钻眼的方式进行勘探的结果表明，河里桥墩必须加深到4—6米，而一个桥墩甚至超过初步设计规定的水平，深达11米。这个情况使运用沉箱方式建造桥墩变得更为复杂，因

为需要将个别沉箱下沉至40米的深度。

因此，在1954年为了提供技术帮助建设长江大桥而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按照中国铁道部的指示仔细研究了桥墩的无沉箱方式构造方案。

该方案规定桥墩建造在直径为1.5米，深度达3—5米的岩石基础上的钢筋水泥柱上。

建造这样的柱子要求采用的方法是将大口径中空的钢筋水泥管沉降至河床的岩石层，通过钢筋水泥管在岩石基础上扩孔至3—5米深度，并用钢筋混凝土充填岩石井和钢筋水泥管。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1954年年底请求交通建设部就该方式进行工程作出结论，表示由于中国建设者缺乏建造沉箱基础的经验，缺乏高水平的沉箱工人和技术干部以及相应的设备，所以采用沉箱基础涉及许多困难。

交通建设部详细研究了有关无沉箱建造长江大桥桥墩的提议后，将该问题报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同志，并根据以下理由认为当时不可能建议采用该方式建造大桥：

扬子江的特点在于非常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水流湍急，洪水时水深达40—50米。

在苏联和国外造桥实践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采用过所提议的桥墩结构和工程进行的方式，建造如此独一无二的长江大桥要是没有精心设计上的详细研究和试验性的检验，从交通建设部方面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交通建设部在今年1月10日以书面方式向中国铁道部建议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实验性检验，直至彻底解决有关结构类型和建造桥墩工程的方式问题，这些都已经完成。

1955年一季度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在建造长江大桥临时安装的桥墩时运用了无沉箱建造桥墩的方式，这样就有可能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完成结构和工程进行的工艺规程并解决许多首次在造桥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铁道部考虑到建造临时桥墩的检验，决定建造无沉箱基础的长江大桥。

1955年按照此方式建造了4个河里的桥墩。

交通建设部曾经要求、现在仍要求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咨询。1955年有经验的桥梁建造师和设计师大大增强了工地上苏联专家组的力量。交通建设部经常研究长江大桥的建造经验并采取措施予以总结。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

E.科热夫尼科夫

文件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什维尔尼克同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5年12月14日，B.马林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49-151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27项 尤金1955年12月10日来自北京的电报。

绝密

接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关于派遣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到中国的建议，以便研究用非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桥墩的经验。

对科热夫尼科夫在长江大桥用非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一事上的观点进行评价问题，待他返回苏联后再行审议。

РГАНИ，ф.3，оп.10，д.207，л.9-10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第17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K.E.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

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B.M.莫洛托夫、M.З.萨布罗夫、M.A.苏斯洛夫、H.M.什维尔尼克、A.B.阿里斯托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A.И.米高扬主持。

第27项 尤金同志1955年12月10日发自北京的第 号电报。

苏联交通建设部关于利用无沉箱方法在中国建造桥梁问题的立场。

[17]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基里琴科、科热夫尼科夫。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对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说要做一个进行试验的基地，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非沉箱的方法。他的信不好，是走形式。尤金同志的电报是不正确的。

采纳尤金同志的建议。（承认答复是走形式的，是拖延，损害了名誉。）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14-17об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今年11月30日，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在印度首都德里圆满结束。

众所周知，国际议会联盟成立于1889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各国议会成员之间的私人交往，以便后者齐心协力维护和平和推动国家间的合作。目前，该联盟包括有46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近几个月以来，国际议会联盟规模有所扩大，又有一些新的国家议会代表团加入进来，其中便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尽管这样，现在仍有许多国家的议会游离于国际议会联盟之外。例如，直到最近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近两天，赴印度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例会的帕列茨基斯回到了国内。鉴于这次国际议会联盟例会所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

的记者便拜访了Ю.И.帕列茨基斯，并请他通报一下此次会议的成果。

帕列茨基斯通报说：

——(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已经闭幕。我无法详细说明会议议事日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讨论经过及其所通过的决议。鉴于境外报刊已公布了此次例会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之一的情况，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权力，我认为有义务向苏联公众通报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

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为联盟成员)的问题。例会参与者以4：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符合国际议会联盟章程中关于(加入联盟)的相应规定。

在投票表决中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坦尼盖特勋爵(英国)以及苏联、锡兰和瑞士的代表；投反对票的有伊拉克、意大利和泰国的代表。

在这次例会上蒋介石集团的鼓动性提议——企图让会议承认其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力——遭到了否决。

根据联盟章程，执委会将向国际议会联盟委员会报告自己的这一决议情况，并将于1956年4月份在南斯拉夫召集国防议会联盟例会。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资格)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自身的威望。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下一次国际议会联盟大会将于1956年11月在曼谷(泰国)举行，届时会议将讨论亚洲问题。而允许亚洲国家的真正代表来参与并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闭幕的这次执委会例会——是国际议会联盟历史上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例会。它显示了联盟与世界上这一地区国家的议会的关系的加强。在印度举办例会的事实本身的意义重大，表明亚洲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增长。

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及其议会在这次例会上对参与者所表现出的特别关注。

手写批注：

应通过塔斯社在所有主要中央报刊上发表。

Д.谢皮洛夫

1955年12月17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99, л.83-86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 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2月26日

第569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刊物1955年第129号至135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2月19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9/348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29(348)号，1955年12月1日

内容及页码：

- 1.关于发放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债券(《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第2页
- 2.关于执行辽宁省1954年的预算和1955年的预算。第4页
- 3.3万多吨工业品下乡(《福建日报》，1955年11月20日)。第19页
- 4.新闻简要报道。第19页

..... [\[18\]](#)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0/349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0(349)号，1955年12月6日

内容及页码：

- 1.中国对外贸易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第2页
- 2.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有关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委“降低新农具价格”报告决议的通告。第8页
- 3.中国的采煤量超过去年水平。第14页
- 4.不许阻止贫农和下中农加入合作社。第16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1/350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1(350)号，1955年12月8日

内容及页码：

- 1.中国与东德签署1956年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第2页
- 2.关于私营商业企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3页
- 3.制油工业工人为超额完成今年油的增产计划而奋斗。第4页
- 4.1955年11月大事记。第5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2/351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2(351)号，1955年12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鸠山一郎政府往哪里去？”(庄涛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2页

2.全力以赴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在1955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电力工业全国电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第20期《人民电业》)。第7页

3.克服外贸仓储运输中的浪费(中国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庞之江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第12页

4.全国第三次关于农村私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光明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6页

5.辽宁农村的党组织迅速增加(《辽宁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7页

6.上海市大规模工业建设减速的必要性。第18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3/352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3(352)号，1955年12月13日

内容及页码：

1.东京中国商品展。第2页

2.中国与越南签署有关确定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的协议。第6页

3.有关制定1956年中国电力工业计划的指示。第7页

4.研究农村中各阶级阶层的倾向。第12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4/353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4(353)号，1955年12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关于我国的利率问题(杨培新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2页

2.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做好兵役工作(邱先通在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辽宁日报》)。第11页

3.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1955年10月10日《新闻日报》)。第21页

4.上海商业国家机关三年扩大农村工业品销售的工作总结(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三商业局局长陆穆云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第23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И.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5/354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5(354)号，1955年12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多民族地区同样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第2页

2.中国粮食作物和棉花大获丰收。第7页

3.农业化学制品和化学制品喷雾装置新的降价。第9页

4.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响应进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第10页

5.加强党建工作，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第12页

6.亚非学生疗养院建院1周年。第16页

7.中国发展信用合作社。第17页

.....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145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C.赫鲁晓夫同志：

呈送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河北省(北京位于该省)中共县委书记的会谈记录。

该会谈的意义在于直接地转达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具体进程。

附以上内容共6页，仅送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号

1956年1月21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与河北省中共定县县委书记王洪儒会谈纪要

1955年12月23日

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小组去定县参观时，我请王洪儒简要地讲述了定县合作化运动的进程情况。

王洪儒说，定县有147个乡，共有496个村。整个定县有12.571万家农户，县的总人口为65.6569万人，其中60.3454万人从事农业。3234人从事手工业和做生意。县里居住着13850名东干人(回族)(2986户)。

谈到解放后的文化成就，王洪儒说，现在县里有545所学校，其中6所中学和539所小学。中学里有4665名学生就读，小学有75577名小学生上课。

而后王洪儒着重讲述了农业合作化在定县的问题。

他说，县里最初的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1年春成立的。入社农户383家，到1952年县里合作社的总数达到了84个(574家农户)，1953年为654个，其中有3个大规模的(100多家农户)。这些合作社的入社农户总共已有6700家农户或者是县里所有农户的5.7%。1954年县里已有2185个合作社。

1955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增长到了104866户，占整个农户数量的86.6%。

同时将规模小的合作社合并成规模大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数量从2185个减至395个。395个合作社中288个是规模大的合作社，也就是农户总数在100户以上，个别情况下有1000家农户，50个中等规模的(50户和多于50户)，57个小规模的(少于50户)。王洪儒补充说，288个大规模合作社中现在有108个合作社在进行低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工作，其中4个合作社已经完全转为了高级社并已完成各项手续。然后他谈到了加入合作社农民的阶级成分。70%的合作社社员是贫农和下中农(73406户)。中农的富裕阶层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29.5%(30935户)，富农和以前的地主为0.5%(524户)。

至于已成立的合作社质量方面，王洪儒表示，395个合作社中有287个合作社是坚实的产业，它们中122个合作社已经选举了理事会，对生产资料进行了评估，基本上结束了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而165个合作社还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王洪儒然后又说，1955年秋开展了强有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首先，这项运动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的。合作化过程中县里农民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比如在1955年，小麦播种超出了计划15000亩。王洪儒以农民积肥工作为例作为生产积极性的标志。12月21日农民共积肥366万车(独轮车)(每车在800—1000斤)，比1954年同时期多出81.5万车。

当前的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现在已经要求成立有几个村加入的大规模合作社。通常，农民在规模大的合作社中的收入要高出在规模小的合作社(比如在汉扎瓦合作社高出5%)，比单个的合作社要高出大约10.8%。

第三个特点，王洪儒表示，是与1954年相比贫农与中农的联盟更进一步地巩固。在这场运动中富农和地主比任何时期都更感到孤立。

王洪儒接着又谈到了县委有关开展和进行运动的方法问题。

第一，着重关注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党的农村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合作化的报告刊登后，县党委就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农民有481218人。

第二，1955年9月开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从贫农中培养干部。为成立合作社的工作培养了35000名积极分子和13500名宣传员。此外，培养了2166名合作社干部(主席、队长、会计师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县委采用了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在乡里成立互助委员会，每个合作社有2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问题，委员会成员减缓建立合作社的经验。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合作社，就成立混合型委员会，每三天聚集一次。除此以外，还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任务是交换经验并在整个县里推广好的经验。比如，还有委员会，每月一到二次召集规模大的合作社主席等等。同时还广泛开展总结和推广合作社内部的好经验。

王洪儒随后还谈到了运动过程中经常要遇到的困难。

1.合作社合并时在解决财产问题上会产生许多困难，因为要合并的合作社在合并前对解决个别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评估等等)。288个合作社中有269个合作社有关耕牛

和农具的评估问题至今还没协调好。

所以在农具和耕牛的使用上不同的合作社都规定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合作社合并后要把他们一律看待，就需要相当复杂的协调。在新的合作社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简单得多，因为是按照市场价格评估。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王洪儒说，大约有70%的耕牛采用将它从合作社社员赎回的方式公有化，30%向合作社社员租用。去年严寒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现在合作社情愿选择租用。根据耕牛的质量，租用分为30元、20元和15元一年。

2.基层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在管理有几个村联合起来的众多农户时会遇上极大的困难。王洪儒举了杨志东(Янчжидун)乡的例子。

3.在成立合作社高级社时农民和干部都产生了许多混乱和弄不明白。同时在家中劳动力不够的农户中以及年迈的、寡妇等农户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安。王洪儒举了“前进”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10个家庭缺乏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将这个合作社转变为农业组合时干部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10个家庭的问题。

4.最近一段时期县里有关牛方面的情况不是太好。市场上小牛的价格急剧下降(比夏天下降20%，甚至更多)，同时成年牛的价格上升。按照他的想法，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合作社觉得卖光小牛更划算，为的是用卖得的钱买成年牛，这些牛不用再增加费用就可生产中使用。

王洪儒说，县委极为重视，已着手消除在牛方面的这种不良现象。几天前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问题：县委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王洪儒指出的那些困难，王洪儒回答说，县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毫不松懈地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除了与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在互助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县干部还经常去当地实际帮助那些合作社。

王洪儒然后说，现在县里合作化运动的速度继续在增长。毛泽东的报告刊登后，他们计划生产合作化的普及要达到68%，可在这次谈话之际已经有86.6%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而年底将增长到90%；剩下的10%主要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以及部分中农户。

他表示，定县以前是老解放区，所以在这里广泛开展合作化的条件良好。县委考虑到这点，计划在1957年实现农户的完全集体化。谈到不同的阶层加入合作社，他说，贫农和中农基本上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接纳富农和以前的地主参加合作社还有个唯一的特点。他说，渗透到合作社的有时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的富农地主分子，利用这点对合作社进行破坏活动，表现在不给贫农贷款和对贫农施加经济压力的其他现象。这些人中的部分反革命分子采取公开的阶级斗争方式(纵火、投毒等等)。他说，土地改革结束后，县里的富农人数略有增长。如果说1952年至1953年富农人数占2%—3%的话，那么现在已达到5%。

王洪儒说，县里现在有151个党委和633个基层党支部，整个县共有28077名党员，其中24566名在农村工作。

结束时王洪儒说，合作化运动才刚开始，他们还有许多的困难和不清楚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参观近郊的“马宝山”(МаБао-шань)合作社，现在这个合作社正在实行向成立高级合作社的转化。对此我向王洪儒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方(ГоФан)、县长刘成(ЛюЧжэн)、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金镇(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以及大使馆一等秘书B.C.梅德韦杰夫、二等秘书A.Д.杜布罗夫斯基和O.B.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打印1份

1956年1月21日

第102号

手写批注：归档。信息资料，供工作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10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7-13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1年12月31日会议记录

第П177/І号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将于1月6日召开。委托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开始。

提交会议讨论的提议有：

- 1.有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
- 2.军事问题；
- 3.外交问题。

委托米高扬同志准备经济问题方面的材料，朱可夫同志准备军事问题方面的，莫洛托夫同志准备外交问题方面的。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玛廖夫同志和葛罗米柯同志为会议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必需材料。

邀请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同志参加会议。

批准发给中共中央的有关召开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电报全文附后。 [19]

РГАНТ, ф.3, оп.10, д.210, л.1-2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下列电文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预先协商好在莫斯科于1月6日召开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兰联合工人党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奥地利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会上的主要内容是交流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还打算讨论由华沙条约通过的军事问题以及一些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问题。

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完全和及时了解有关大会活动的信息。

请通告我们有关你们的决定。

致以党的问候!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Н.赫鲁晓夫

РГАНИ, ф.3, оп.10, д.210, л.6

1956年

№21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1956年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月10日会议第180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波诺马连科、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谢皮洛夫、波斯佩洛夫。

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问题。 [20]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科涅夫、葛罗米柯、朱可夫、苏斯洛夫、萨布罗夫)

赫鲁晓夫同志：对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表示赞同意见。 [21]

莫洛托夫同志：取消关于协商的问题。

米高扬同志：建议召开委员会会议，以便讨论某些问题：

关于欧洲安全问题，关于德国问题。

在此进行了协商。

批准了条例。 [22]

解决关于德国的问题。 [23]

协商委员会可能通过共同宣言。 [24]

(委员会的会议可以在布拉格召开) [25]

关于代表人员的问题。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米高扬、马林科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 [26]

全体支持。

委托莫洛托夫同志、朱可夫同志、科涅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谢苗诺夫同志为1月11日会议准备全部文件。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41-41об

№25946 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1956年1月10日)

摘自П.Ф.尤金的日记

机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1月10日

我拜访了刘少奇，以便把苏共中央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和H.A.布尔加宁同志前往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访问的通报转告给他。

刘少奇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他说，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之行所作的评价。

刘少奇强调，这次访问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还有一些中立力量，他们也是一个阵营。这些力量由尼赫鲁来领导，对我们更有利，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自己这边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中立力量现在很明显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们有可能会取得双方的援助。这对侵略阵营有联系的其他国家也在产生影响。

刘少奇继续说道，泰国的立场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泰国处于美国的压力之下。同时泰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困难的状况。首先，泰国遭受了同缅甸一样的大米销售的困难。橡胶、咖啡和锡的销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泰国每年有多余的大米50万吨以上，橡胶50万吨。

刘少奇说，泰国政府向中国秘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请求购买泰国所有剩余的出口产品。刘少奇说，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一点，泰国承诺将脱离东南亚条约组织。

我问道，这个代表团有多少有影响的人物。

刘少奇回答说，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人员。1955年12月，銮披汶总理在仰光期间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委托他与我们建立联系。当时就达成了关于代表团出访北京的协定。泰国请求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前正在谈判。关于泰国代表提出的贷款问题现在还没有给予答复。出席会谈的周恩来助理马列同志说，昨天晚上，周恩来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告诉泰国代表团，中国将购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根据刘少奇的意思，如果中国购买了泰国所有的多余产品，那么，就有可能使泰国从侵略阵营中脱离出来，并使其加入中立国家之列。刘少奇顺便指出，泰国有300多万中国人，他们在泰国的工业和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即便是菲律宾最近也在同美国人就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对话。至于日本，鸠山一郎日前也发表声明说，他不排除自己前往中国的可能性。这个声明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民众作出的。鸠山一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提到了近日美国各类高级军事人员和其他活动家多次到台湾的问题。

刘少奇就此事说道，美国人非常想争取台湾。他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会谈。刘少奇继续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们想用自己的傀儡孙立人取代蒋介石。蒋介石先发制人，消除了孙立人。”

美国早就向蒋介石提出，把他们的陆军派到台湾，但是被蒋介石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有损他的地位。

刘少奇说，英国正在散布虚假谣言，说英国人科恩来中国是为了充当中国政府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这些谣言是一名英国工党党员散布的。科恩确实到了中国，他之前也去过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他请求允许他在中国参观。现在科恩正在东北。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希望就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师们组织一次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使馆参赞K.A.克鲁季科夫同志和总理助理马列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46, п.362, д.13, л.22-24

№21457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 访苏情况(1956年1月10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呈送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来访的报告。

附件共5页。

П.季明(签名)

1956年1月18日

附件：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报告

根据苏共中央1955年6月22日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一行27人应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邀请，于1955年10月17日至12月16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

代表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同志为团长。

代表团成员有：中学管理局副局长，教育部小学管理局教学部主任，《人民观察》杂志编辑，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在该代表团中几乎有中国所有主要地区和城市的代表。所有的代表，除翻译外，都是首次到苏联。绝大部分代表都是中共党员。

代表团前往苏联的目的是对如下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政治教育，小学、初中和师范院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全面的必需的教育，中学工作的领导。代表团团长一到莫斯科就得到通知说，他们面临的任务是研究、总结和在中国推广苏联经验。

代表团有组织地分成4个固定小组，每个小组按已明确的代表团逗留期间计划工作。

在苏联逗留期间代表团完全履行了拟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深入地了解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方面研究的主要问题，教育部各管理处和部门、人民教育地方机构、学校、对外机构、教师进修学院的工作情况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情况。

代表团在组织上被分为4个固定的小组，其中每一个小组都按照一定的、为代表团在进行访问的整个时期制定的计划进行工作。在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完全完成了预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方面的问题，关于管理工作问题和教育局的工作问题，关于地方国民教育机构工作问题，中学问题，高级中学问题，教师进修学校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问题。

同代表团进行了一些谈话，谈话的题目如下：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初中、七年制中学和中学教学教育机构和方法，对学校的视察工作，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关于全科必修教育，关于苏联消除文盲的经验，中学和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小学和初中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格里夫科夫同志同代表团进行了“关于教师工会的结构与工作”的谈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图马诺夫同志使客人们了解了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组织的工作。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除了到莫斯科，还到过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索契和新西伯利亚。

代表们熟悉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教学法联合会主席、任课教师的总的状况。翻译们把教学过程速记了下来，对代表们参加的每一堂课都仔细进行了分析。晚上，代表团的每个小组都对白天的工作进行总结，按顺序提出一些问题，并熟悉得到的材料。代表们在列宁格勒熟悉了列宁格勒州教育局和列宁格勒市教育局的工作。他们指出，第308中学、第321中学、以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命名的师范学校和列宁格勒州北方农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方面的组织性很强。

在乌克兰共和国，让学生掌握几个职业和建立专业班的经验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代表团参观了有第70名中学学生在工作的工厂和契尔尼科夫州科泽列兹村中等畜牧学校，那里是科泽列兹村学校的科学实践基地。

代表团在列宁格勒和第比利斯的少年宫、基辅儿童农艺生物站、莫斯科儿童读物出版社儿童书店、莫斯科、第比利斯和新西伯利亚儿童剧院等地方了解了校外工作的组织情况。

11月7日参加观看了红场上的阅兵式和游行，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并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敬献了花圈。

应代表团的请求，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他们被安排参观了两个集体农庄，在这里他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参观了农业生产单位、集体农庄俱乐部以及农民的住房之后，代表团团长说，从这一集体农庄中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前景，回国之后，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将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集体化提供帮助。

代表团访问了国营莫斯科滚珠轴承厂的自动化车间。

在索契转机的时候，代表们参观了城市，参观了两个疗养院，参观之后，他们赞叹道：“在中国还没有这么美妙的院子，没有这么好的疗养条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且更加希望把自己的所有力量 and 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除了参观国民教育机构之外，代表团还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新西伯利亚最好的剧院、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使得代表团对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

代表团了解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教师之家工作的组织，并在这些地方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举行了会谈。所到之处代表团都受到非常好的欢迎和接待。在大街上、地铁上和火车上，即

使不认识的人也走向代表团，以便转达他们衷心的问候，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尊重和热爱。

很长时间代表们都一直在回忆一个第比利斯的5岁小女孩，当她在大街上看到代表团之后，跑向一名女代表，并递给了她一颗糖果。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名年迈的基洛夫市退休的女教师”，代表们说：“她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师，她们两人在深夜来到我们乘坐的火车上，以便向中国教师送去温暖而衷心的问候。在这里，我们一直感到自己是在自己的家里。苏联是我们的第二个祖国。”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代表都非常谦虚，非常热爱劳动。代表团团长在代表们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回国前夕，应代表团的请求，向他们赠送了教师用书和儿童文学作品。苏联各城市的学校、少先队之家都准备了送给代表团的礼物，以便转交给中国的中学教育机构、学校和孩子。

在代表团回国前夕，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陈曾固同志代表代表团对苏联国民教育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帮助代表团了解了苏联经验。

从奥特波尔到莫斯科的整个路途中，在各州中心，代表团受到了各州和市人民教育局领导的接待。他们在到达下一个城市的途中向代表团介绍了代表团所经过的地区、州和市人民教育组织的状况和成就。

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详细而又全面的答复。就这样，还没在莫斯科开始工作，代表团就已经了解了综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学校领导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组织情况。

新西伯利亚市的领导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这是代表团临走回国之前最后一次与苏联教师见面。代表团受到了极其的关注和照顾。各学校为代表团的到来准备了礼品。

在与新西伯利亚教师的见面会上，代表团团长说：“我们明白，所有珍贵的经验都离不开人民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劳动。请允许我以代表团的名义感谢这些经验的创造者们：苏联教师和人民教育工作者。我们到处都能感到苏联人民所表现出的热情，就好像我们遇见了老朋友。代表团所受到的真情款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非常明白，我们代表的是谁。你们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

他说：“我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我们有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的人民是兄弟，我们有着将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我们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将决定世界命运。”

但是，也应当指出一些严重的错误。宾馆里给的房间通常都没有浴室。为了旅途之后在公共浴室里洗澡，代表团只得排队等候。

极其令人不满的是为代表团服务的“国际旅游”车队。车队调度常常声称，原来预定的三到四辆车现在就只能提供一辆车。

M.季赫米洛夫(签名)

1956年1月10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就改善为外国旅游者提供服务方面的不足之处已与“国际旅行社”理事会(安库季诺夫同志)商谈。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5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6

№20371 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 《人民日报》写文章(1956年1月12日)

第03260号

Д.Т.谢皮洛夫同志：

在1956年2月14日——苏中友好条约签署7周年即将来临之际，
《人民日报》编辑部请求《真理报》编辑部帮助，求得一篇由苏联著名
领导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作为该报通栏的专论。

我们建议请А.И.米高扬(捷沃相 [\[27\]](#))同志来为《人民日报》写这篇
纪念苏中条约签署7周年的文章。

П.萨秋科夫

Ю.茹科夫

1956年1月12日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53

№20370 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 计划草案(1956年1月15日)

致科瓦利、萨布罗夫和巴伊巴科夫等同志：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兹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分送给你们审阅
并提出有关建议。

В.切尔努哈

1956年1月18日

第01903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兹向您报告如下问题：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期完成情况；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指标的预计

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预先提出的草案。

今年4月份当最终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之后，我们还要将自己的计划提交苏共中央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再次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对如下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给予中国应有的帮助。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李富春

1956年1月15日

附件：

李富春提交的报告 [\[28\]](#)

ЦХСД , ф.5 , оп.30 , д.164 , л.2-3

№21456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1956年1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94/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Т.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苏联专家1955年的工作报告。

附以上内容共13页，第175с/ДВ号，仅送收件本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1956年1月19日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ДВ号

1956年1月18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6年1月4日

第16号

关于苏联专家1955年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报告

一、《人民中国》杂志的方向与特点

《人民中国》杂志的基本宗旨：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合作对外政策，巩固中国人民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友谊。杂志上刊登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反映国内生活，之所以也刊登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中国。该杂志有俄文和英文版，每月出版2期，日文版每月出版1期。1955年的俄文版出版了24期。用三种语言出版杂志有相当的困难：各国读者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不尽相同，所以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宣传更具积极作用，事情确实非常棘手。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这种困难的局面，使宣传更积极有效，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在每期杂志上登载2—3篇专门针对该国的文章，而其他的文章则一律都是面对所有国家。

在报告年期间，杂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宣传五年计划，并且首先是在国内建立重工业的整个计划。与此同时，刊登了许多有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革新者的文章。

通过宪法后，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反映最重要的革命大事记的文章。比如，在第2期上登载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百年史》，此后还刊登了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文章。编辑部将在1956年继续刊登有关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

杂志经常宣传中苏友谊。比如，1955年2月16日第4期上刊登了师哲同志标题为《伟大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长篇文章，张风(Чжан Фын)同志《新的经济合作方式》等文章。杂志还以两篇文章和许多照片反映了苏军撤出旅顺口。

同样也非常关注巩固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曾刊登了一些文章，如《中缅友谊发展的新阶段》(第1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谊正在巩固发展》(第6期)、《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第7期)、《历史性的万隆会议》(第10期)以及许多有关中国和印度之间友谊的文章等等。

在有关中国医药、中国的学者、有关剧院、电影院、学校、高校、绘画、实用艺术等系列文章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杂志在“答读者问”的栏目中经常刊登一些参考性质的文章，如《中国人民政协》(第4期)、《新中国的穆斯林》(第6期)、《中国万里长城》(第8期)等等。

考虑到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兴趣和要求的广大读者，编辑部在每期杂志上刊登重要的政治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

报告年期间有关党的建设、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理论问题和关于有问题的文章。

二、编辑部的组织和计划工作

杂志总编辑部由4个部门组成：经济部、政治部、国际部和文化部。各部门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材料的组织和编辑。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外边组稿，个别文章由编辑部人员撰写。为文章争取到了广泛的作者：中共中央领导干部、部长们、社会活动家、作家、演员等。编辑部依照规定的计划约稿(计划分月度、季度和长远的年度计划)。作者的稿件到达其中的一个编辑部后，在那里进行编辑，稿件中所有修改都要征得作者同意，然后由主编批准该文并成为所有外语编辑的原文，该文被译成相应的语言。《人民中国》杂志有三种语言：俄文、英文和日文。

主编在准备中文稿件时，经常与外语编辑们商榷，考虑他们对组稿的意见。有外国专家参加的编辑会议上对当前计划要出的一期杂志进行讨论。季度计划和年度计划同样也在编辑会议上讨论，这是各部门主编工作的基础，但是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对它们进行更改。

稿件首先要经过主编的批准，由副主编仔细地检查，再送各部门讨论，为的是尽可能完善文章的质量。每月召开一次编辑扩大会议，对出版的两期杂志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审理。在这样的会议上对已经刊登的材料进行评价，分析研究文章的优缺点、杂志的装帧、杂志的排样等等。

对某些文章的组稿，编辑部派出自己的记者去国内的某些地区。比如，编辑部派自己的记者去浙江省研究当地的合作化运动，去旅顺口(为苏军的撤离)，去西藏等等。

三、苏联专家的工作

杂志社编辑部有4名苏联专家，他们的职能分配方式如下：

1.B.Я.西季赫缅诺夫，担任主编，在所有对外宣传的主要问题向中国同志提供建议，仔细审查已完成的中文稿件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参加编辑会议，对翻译成俄文的文章质量负责。总体负责杂志俄文版的出版。

2.H.Я.帕霍莫夫，杂志俄文版出版的编辑顾问，负责俄文稿件的编辑，审查所有的修改部分，在整个稿件的编辑过程中向中国编辑提供建议。

3.M.Г.科洛杰兹诺夫，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的编辑顾问。因为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计划的量不大，所以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还参与《人民中国》杂志的稿件编辑工作。

4.H.M.济科夫斯莫洛夫，翻译顾问，负责翻译的质量，对中国翻译的译稿进行编辑，也参与对修改部分的审查。

苏联专家除了自己的职能外，在业务会议上还要做一些报道。比如，报告年期间苏联专家就这样一些问题作了发言，西季赫缅诺夫：对材料收集的工作经验，苏联读者谈《人民中国》杂志，帕霍莫夫：苏联杂志《新闻》的编辑工作经验，科洛杰兹诺夫：苏联宣传者在演讲工作中使用《人民中国》杂志材料的经验。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规则是信任方式。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方面认为，文章是中国作者写的，中国编辑审核的，所以我们无权擅自对文章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表现出无原则性，如果文章有实质性的缺点就需要合理的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常是邀请中国的编

辑，向他阐明我们对该文章的观点。经常的情况是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撤下了个别文章或大幅修改原文。但这并不排斥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之间的意见相争。我们时常强调，编辑部是一个创造性的集体，所以这样的集体要有成效的工作就不可能避免意见相争。这意味着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是作创造性的处理，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接受。

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工作人员之间建立在正确的党性上的关系很融洽。苏联专家中经常进行业务会议，对一些责任重大的建议，在所有专家之间组织意见交流，只有经过这样才将建议转交给主编。

在报告年期间我们对杂志的内容和装帧提出了以下最为重要的建议：

1.由于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读者，所以有必要在每一期杂志上专门为该国的读者安排2—3篇文章，而剩下的材料可以统一针对所有国家的读者。这个建议被采纳，从1956年开始，俄文版、英文版和日语版的杂志上与统一的文章一起还刊登2—3篇专门针对该国读者的文章。

2.由于开始出版《友好报》，为《人民中国》杂志中“中国报刊导读”和“今日中国”栏目的组稿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这些，苏联读者可以在《友好报》上读到。这项建议也被采纳，从1956年起杂志中上述栏目就被取消了。

3.为了使杂志更为生动活泼，建议增加新栏目“杂锦”，登载一些小东西：谚语、纠错、笑话趣谈、格言等等。编辑部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956年起杂志上就开辟了这个栏目。

4.作为替代“今日中国”栏目，建议最好在杂志封面的背页上登载不同题材的插图，以替换“今日中国”栏目。这项建议同样也被采纳。

5.苏联专家根据苏联读者提出的问题汇编了主题目录，并建议在杂志上按照该目录刊登文章。该目录已转交编辑部供研究和制定计划时使用。

苏联专家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完全能保障《人民中国》杂志的出版。但是考虑到这份杂志是中国进行对外宣传机关主要的刊物之一，应当只有派苏共产党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比如，在翻译局工作的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是非党员。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主要的缺点在于缺乏政治上的成熟、工作上有些轻率和浮躁。希望只派苏共产党员，政治上成熟、政治和文化方面素质较好的有杂志工作经验的人员来担任这份工作。

四、杂志编辑工作中的各种特别的困难

杂志工作中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编辑和杂志人员。整个编辑部就两名有经验的编辑和一二名有经验的杂志人员，其他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足够的期刊工作经验。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所编辑的文章上。苏联专家尽自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同志完善所编辑的文章质量。可以举出我们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如何有助于完善文章质量的例子太多了。但是提及根据中国的国际威望来要求文章，大部分文章的质量还不够高。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专家经常提醒中国同志，应该不断地提高登载文章的质量。的确，在过去的五年期间，不管是杂志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可质量问题至今还是没能完全解决。

五、《人民中国》杂志的发行分布

俄文版的发行量超过45000份。发行地区为：

苏联 40436份

罗马尼亚 517份

保加利亚 480份

朝鲜 398份

捷克斯洛伐克 384份

蒙古 362份

匈牙利 221份

东德 184份

波兰 133份

阿尔巴尼亚 80份

伊朗 166份

英文版的发行量超过22000份。主要发行地区为：

印度 6152份

印度尼西亚 2144份

缅甸 2118份

巴基斯坦 2029份

英国 1171份

澳大利亚 787份

丹麦 512份

日文版的发行量超过16000份。

除800份在中国发行外，剩下的都在日本发行。

遵照1955年12月东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政府代表团首脑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建议，研究了有关出版《人民中国》杂志德文版的问题。

《人民中国》杂志每月一次在印度以乌尔都文和在智利用西班牙文再版(从英文本翻译)。

在国外杂志通过以下渠道发行：

- 1.通过书店；
- 2.通过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
- 3.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工会、妇女联盟、友好协会等)。

在那些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杂志很难打开自己的销路。

编辑部收到来自许多国家读者的来信。这些以友好的口吻写的信能够让我们了解读者的要求和兴趣。比如，印度新德里的读者阿萨德写道：

“请告诉我们，你们的国家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和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主要是农业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它面临着主要的问题：如何提高大部分居民，也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你们的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步骤，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个我们想了解更多。你们是以什么方式彻底废除了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政府决定给农民留下最大数量的土地是多少？你们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干了点什么？这些问题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亚洲国家都想改善农民的困难处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社会主义，所以，很自然，不仅仅是印度人民，而且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埃及的人民都想更多地了解现在中国正进行的这方面经验。”

然后这位读者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倾听中国人民的声音。他写道：“全世界人民想知道你们国家是如何对待各种国际问题……你们应该永远支持中东国家为自由的斗争：你们国家6亿人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巨大的分量，所以你们应该利用任何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那些

与帝国主义剥削和英美的奴役斗争的人们.....

现在是自由的世纪。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摩洛哥也起来斗争了。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再来一记沉重的打击，让这个罪恶之魔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再也无法抬起它那丑陋的脑袋。”

日本读者写道：“这份杂志提供有关人民中国的真实信息，增加了日本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有了信心。”

英国读者写道：“《人民中国》杂志为他和他的朋友揭露帝国主义的谎言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与这些对杂志的正面评价的同时，读者也表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主要归纳如下：

- 1.杂志直面现实不够，没有深入地展现中国社会的斗争和冲突：新与旧的斗争；
- 2.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说得太少太平淡；
- 3.许多文章带有宣言式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论据；
- 4.特写和小故事写得艺术水准太低；
- 5.杂志中很少有概括经济建设经验的创见性文章。

六、结论

在报告年期间《人民中国》杂志的内容和外观有了不少的改善，但是刊登的稿件质量还是希望进一步改善。

苏联专家面临的任务是改善编辑材料的质量，更深入地研究编辑工作的创造性问题，要经常帮助中国编辑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培养年轻的编辑工作人员。

建议中国同志在近年内为亚洲国家出版这些国家民族语言(印度文、缅甸文和印度尼西亚文)的《人民中国》杂志。

研究有关针对个别国家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问题。我们觉得，比如，不能对缅甸的读者以写给苏联读者的形式写有关中国运用列宁主义的内容。采用统一的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会降低宣传的真实性。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文化水平、人民所处的社会体制、国家的历史特点等等。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

1955年在《中国》画报编辑部工作的有两名苏联专家：索巴诺夫同志和基斯洛夫同志，他们现已回国。现在还有一名专家在工作：普罗琴科同志。在该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任务是：

- 1.传授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苏联画报杂志工作的经验；
- 2.对编辑工作问题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 3.就画报的内容和外观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 4.经常帮助编辑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 5.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帮助编辑工作者；
- 6.为俄文版的出版帮助和参加文章的编辑翻译。

1954年该画报以11种语言出版，发行了总共34万份，其中中文版15万份，俄文版85000份，英文版20000份，法文版13000份，西班牙文版19000份，印度尼西亚文版11000份，日文版18000份，朝鲜文版24000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10000份。

画报的任务和方向早在1953年中国主管部门通过的关于杂志的专门决定中已经明确了：“使读者，主要是外国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变化。”

这项决定中指出了画报的不足之处如下：

- 1.画报普通照片表现的无政治性内容；
- 2.偶尔收集的照片和文章缺乏明确制定好的计划；
- 3.编辑部缺乏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联系。

在画报编辑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注意到要帮助编辑部消除这些缺点。

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12月期间苏联专家实施了以下措施：

对1954年上半年出版的6期杂志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在所有编辑人员出席的会议上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

在进行了示范性的评论后，下一期就已经由受主编委托的编辑人员自己对画报作评论了。这项措施激起了编辑集体的积极性和编辑人员对画报内容和外观的兴趣。

基斯洛夫曾作了题为“关于画报中材料的计划拟定”的报告。

1954年11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年度长期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1955年初制定了编辑组的月度计划。研究了编辑部内使用所有材料的大致进度计划，目前正在实行该计划。考虑1955年工作的同时完成1956年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

报告年期间曾举办了以下列主题为名的报告会：

- 1.关于每个主题目标的意义；
- 2.有关个别主题计划的研究；
- 3.有关画报编辑人员对主题材料的研究方式；
- 4.关于对文章原文的编辑；
- 5.关于如何寻找题材和为画报收集材料；
- 6.有关画报摄影记者的工作；
- 7.关于照片的构图；
- 8.关于画报装帧的原则；
- 9.有关画报装帧时对题材重点的确定；
- 10.关于在画报中添入民族元素；
- 11.有关社会政治小组的工作和对许多其他组织和编辑题材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报告会和会议上都借用了苏联刊物，首先是《苏联》杂志的经验。

在这段时期还为俄文编辑人员上俄语课，为俄文版的翻译人员上有关翻译原则的课，为俄文版《中国》画报和《人民中国》杂志的校对人员上有关校对的课，为技术编辑上有关书籍和杂志的印刷和技术编辑方面的课。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帮助中国同志更为仔细地画报选择和收集材料的工作方面，在稿件原文的编辑方面，建立必要的后备方面，照片的选择和许多组织问题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

不久前派到《中国》画报编辑部来的普罗琴科同志正在研究如何消除这些缺点。

B.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5份：4份送H.T.费德林同志，第5份存档

第739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提出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已被列入今年6月返回苏联的名单中。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2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84-297

№23065 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1956年1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会谈纪要

1月19日，我拜访了王稼祥并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其转达了印度朋友提出的关于让印度共产党员穆基尔日返回印度的请求以及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和马来亚朋友对马来亚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所提出建议的意见。

王稼祥承诺将把上述情况向相关部门转达。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谈到了关于吴努(缅甸总理)近期就自己对缅甸共产党的态度所发表的声明的问题。王稼祥说，吴努的声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使得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有了某种成功的希望。王稼祥指出，由于吴努发此声明，在北京的缅甸朋友已向缅甸发出了相应的建议函，其中附录一封给吴努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缅甸共产党欢迎吴努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合法化以及关于吴努并非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的内容。该公开信宣称，缅甸共产党人与吴努一样也赞成

停止武装斗争，并说，为了明确所有这些问题，有必要举行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

王稼祥认为，以吴努的声明为由发表缅甸共产党的公开信，可以更大程度地引起广大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更有利于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谈判的举行。

王稼祥接着说，美国极力试图阻挠谈判，因为他们希望继续维持缅甸的内战状态。美国人影响吴努的思想是：如果共产党人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力，那么政府就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关于马来亚的局势，王稼祥说，看来，英国人正极力挑拨马来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从英国报刊上的报道内容来判断，英国政府在与马来亚联盟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中采取的是明确允许马来人实行自治的方针。英国人极力使马来亚战争被看作是马来亚政府反对共产党人的战争，而不是英国政府反对马来人的战争。如果考虑到共产党武装力量主要是由中国人组成的，而马来亚政府的军队——由马来人组成，那么我们会明白英国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挑动马来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另外，英国人还想以共产党人来恐吓马来亚政府，以便达到如下目的，即马来亚政府不要求英国军队撤出马来亚。

王稼祥指出，英国人的这一策略使共产党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真的爆发马来亚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与当地土著人发生战斗，而这要比与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困难得多。

王稼祥说，目前中国朋友暂时还没有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任何建议，因为伦敦谈判尚未结束。

王稼祥接着对我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打算参加苏共二十大，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已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艾地对中国朋友说，他想访问中国，并就印尼共产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据王稼祥说，中国朋友认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最好能在莫斯科，并在苏共、中共和印尼共产党代表三方之间进行。

关于艾地的莫斯科之行，王稼祥指出，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给艾地发放出国签证。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把自己就国家经济建设问题所作的草案转交给中国朋友并咨询其意见。根据该草案，越南政府打算在最近期内开始兴建一些大型的工业和矿产采掘企业，并把主要资金都投入到这些工程的建设方面。正如王稼祥所言，中国朋友不赞成越南朋友的这一路线，并建议其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越南朋友被告知，其当前理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和资金都投入到发展农业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方面，以便使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南方居民。至于重工业，因为其发展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因此越南暂时不要发展重工业。在矿山采掘工业发展方面，越南朋友得到的建议是：只发展那些苏联和中国需要的金属采掘业。

王稼祥说，中国朋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地说服越南人。他们——越南人仍倾向于加速发展本国的工业化。

我对王稼祥所通报的情况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H.K.切卡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Ф.尤金(签名)

文件共5份，分送给：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和档案室

1956年1月21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43, л.1-3

№20370-1 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1956年1月20日)

Н.А.帕乌金同志：

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一起审核，并准备建议。

Н.巴依巴科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23953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 中国刊物通报(1956年1月2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14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6年第1—2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61号，1956年1月

通报第1—2(361—362)号

(1956年1月3—5日)

国家统计局管理局关于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第2页

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

国家人口数量(根据截至1953年6月30日调查统计资料)

(单位：千人)

编号	市、省	人口	编号	市、省	人口
	全国共计	601 938	8	吉林	11 290
1	北京	2 768	9	黑龙江	11 897
2	天津	2 694	10	热河	5 161
3	上海	6 204	11	陕西	15 881
4	河北	35 985	12	甘肃	12 928
5	山西	14 314	13	青海	1 677
6	内蒙古	6 100	14	新疆	4 874
7	辽宁	18 545	15	山东	48 876

续表

编号	市、省	人口	编号	市、省	人口
16	江苏	41 252	25	广西	19 561
17	安徽	80 844	26	四川	62 304
18	浙江	22 866	27	贵州	15 037
19	福建	13 143	28	云南	17 473
20	河南	44 215	29	西藏	3 381
21	湖北	27 790	30	西藏和昌都	1 274
22	湖南	33 227	31	台湾	7 591
23	江西	16 773	32	其他	11 743
24	广东	34 770			

注：

1.这里的“其他”包括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

2.台湾人口数量援引的是国民党在香港出版的《周卫报》(Чжоу Вэйбао)杂志1951年4月10日第99期上所列统计资料。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РГАНИ , ф.5 , оп.30 , д.165 , л.1-5

№25169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1956年1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48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B.H.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呈送给您两封缅甸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和13日的来信原件和一封马来亚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的来信原件，该信随附有关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公报文本和马来亚共产党宣言文本。

附件共10页，仅送本人。 [29]

П.尤金(签名)

文件2份，送：B.H.波诺马廖夫同志，归档

第103号

打字：诺索娃

1956年1月19日

随附中文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转

敬爱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同志：

去年12月中旬，马共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马共当前斗争方针和策略各项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党的宣言。

现在，寄上马来亚共产党宣言和马来亚共产党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公报英文译稿各一份。希望你们能就这两份文件给予我们指示。

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拟请你们将这两份文件转给《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以便向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和工人阶级介绍马共的主张和情况。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委员 小章

中央委员 阿海

1956年1月12日

手写批注：

存档。

保存。1.关于缅甸共产党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信函已经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2.请求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党的纲领以及呼吁在谈判的基础上停止军事行动的信函此前也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3.马来亚共产党的宣言(声明)已发表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上。

1956年1月13日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 [30]

1956年2月1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43, л.5-8

№20372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1956年1月24日)

摘自A.Φ.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2月_日

第106号

机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的会谈纪要

1956年1月24日

根据苏联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的请求，有关方面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组织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拜访了苏联使馆，陪同他一同来访的还有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刘群(Люд{зюнь)、两个翻译方和柯。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阿尔希波夫、利哈乔夫、克鲁季科夫、斯克沃尔佐夫、叶廖明、彼得鲁舍夫斯基、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马卡里耶夫、福缅科和热尔科夫。

应我方的请求，许涤新谈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情况。

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进展得很快，我们只是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总体进程并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中国对国内私营工商业加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即当毛泽东与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座谈之后。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我们认为，从1949年至1953年底属于第一阶段，主要方式为将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其职能是加工国家定购的半成品和生产国家指定的产品。

1950年，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零售业贸易中占主要地位。例如，当时私营成分在国家重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60%的轻工业产品都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在零售业中资本主义成分甚至达到70%。

首先，我们极力清除批发贸易中的私营者，后者1950年在国家商品流通中比重占到50%。为了使商品批发业服务于国家利益，我们一方面确立了对私营批发业的监督，另一方面——强迫资本主义企业接受国家的订货来组织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家所生产的成品由国家包购，从而以此来防止其产品流入私营商业网络——斩断私营商品批发业的源头。

将资本家的经营活动纳入国家定购范畴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因为后者总是想避免受到国家的监督，而他们手中又往往控制着原料并拥有广大、自由的市场。根据这一情况，国家循序渐进地在两个方向上采取了措施。其一，对原料的源头实施监督；其二，对私营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如下：1951年，上海有一位生产口琴的工厂主千方百计拒绝接受国家定购，不愿意与国营公司代表甚至市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代表见面和谈话。我们找到了对之实行经济压制的办法。据调查获悉，该企业是从其他私营企业获取金属元件以组装口琴的。于是我们便与后者达成协议，要求其停止向口琴厂供货。这样，那个生产口琴的工厂主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抵抗，并开始完成国营公司的订货任务。

在落实国家订货的同时，我们还对私营企业的原料来源实施了监督以迫使工厂主首先遵照人民政府的要求去生产(国家急需的)棉布和纱线。实践经验表明，对私营企业采取订购的办法为赢得当前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订购的方式，我们了解了资本家(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取了哪些利润，从而能够对其利润的规模加以限制。而监督资本家的利润又为我们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向建立(公私)合营企业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对资本家企业经营利润的监督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这使资本家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必须同意将自己原先的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式的企业。

对私营企业实行订购方式存在着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私营者从国家手中所得到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固定和相当便宜的，而他们所生产出的商品的价格却是由其试图参与平分的利润的规模所决定的。资本家们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对降低所生产商品的成本漠不关心。另外，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便利，盗窃原材料，在财务方面虚报、瞒报和做假账，不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为了私利而采用各种方式来欺骗国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甚至敢于冒着被国家罚款的风险将企业产品拿到黑市上去销售。在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的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尖锐。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只有实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的转变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根据中国32座城市的统计数据，截至1955年6月底平均80%以上的私营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加工半成品和生产个别种类产品的订购任

务。总之，截至去年夏季我们已完成了既定目标，即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改造私营企业的基本任务。

不过，当时实现国家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数量只有近2000家。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模式还在1949年便在中国出现了。它们是由买办资本向一些私营企业注资而形成的。从1949年至1953年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属于自发性的。我们并没有计划性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只是当这些有买办资产阶级注资的企业发生倒闭情形时，国家才会将其收归国有。

1953年末，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将合作经营型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的决议。于是，从1954年起我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这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经营型企业不仅指那些有买办资本注资的(私营)企业，还包括其他一些由国家注资的(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可以形象地表述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各个私营工业领域中只是先扶植2—3个最大的(私营)企业。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自己经验不足；担心破坏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促使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这便导致当时国家内部合作经营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例如，在上海一年内接受改造的私营企业只有500家。而今后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来实施对私营企业的改造，那么仅完成对上海范围内私营企业的改造便至少还需要55年。

从1954年第一季度至1955年末我们共改造了约1000家私营企业，而从1949年至1955年中我们总共建成此类合作经营型企业2068家。

要进一步对私营企业加以改造尚需解决如下问题：

1.关于干部的问题。1955年国内拥有4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共计13万家。如果每个企业都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的独立经营的企业，那么国家就需要向其派遣大量的干部。这个问题要解决目前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已将自己的所有干部都派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去了。

2.关于投资的问题。目前在现有的私营生产企业中已没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了。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基本上都不欠国家的债。因此，要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国家就必须向其企业注资。而国

家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国务院已讨论了关于国家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注资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如果国家注资少了，那就不足以应付企业的运转；如果大量注资，那又会对国家的基本建设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压力(重大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按如下方法来做将对国家更有利，即不要单独地一个一个地改造私营企业，而是按部门来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比如，在某个部门中私人资本的总量为100万元，而国家在该部门现有合作经营型企业中只需拥有20万元的投资即可。在将该部门全部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已在该合作经营型部门中拥有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

3.关于企业管理及其活动的问题。例如，在纺织业中我们共有50家企业，其中有2家已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对后者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因而这两家企业的生产状况都很好，而其余48家的生产情况却参差不齐。于是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便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这一情形便对我们对该整个部门实施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还在1954年末，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便已出现，到了1955年则更趋尖锐。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末中共中央便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部门合作经营型企业活动的调整工作应当与建立新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速度相结合。这就是说，在安排好现有合作经营企业的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对各部门内部私营企业的改造速度。

在上海，各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是从1955年8月份开始的。同年9月，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如下八个部门的私营企业联合为合作经营型公司：棉纺、毛纺、(黄)麻纺、烟草、造纸、陶瓷、面粉和大米加工，等等。

1955年第4季度的10月初，在北京市开始对各部门的私营零售业进行改造。这一举措对国家以后针对私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国内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合作经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都低于私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我们对将私营商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是心存疑虑的，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困难，另外在对私营商业企业实施公私合营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担心私营

商人们会撤资。

经过实践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对上海八个部门私营企业和对北京两个私营零售商业部门的改造是成功的；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对国内所有部门的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

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10月末就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举行了与资本家的座谈会(首先是与少数资本家座谈，然后是与更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举行座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这两次座谈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国内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刻地触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恐慌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向资产阶级解释一下中共中央的政策。其解释涉及的问题如下：

1.近6年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的。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2.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3.资产阶级应当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充分的认识，从而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相结合。在旧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因而其必须与人民一道前进。

4.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分子能够积极地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府打算对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给予支持。

5.国家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主要)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式进行。

6.对于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资产阶级没有必要过分地担心害怕。因为这样的指控只是针对那些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而言的。

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座谈会期间所阐述的思想使很多资产阶级代表受到了启发。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在中国当代条件下还是有他们能够接受的前途的。总之，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中国资产阶级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担心。

1955年11月21日，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例会。随后，中共中央便立即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其间讨论了关于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并制定了对各部门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具体措施，具体决议如下：

1.在各部门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

2.通过对企业实施改造、安排生产和对资本家进行再教育的方式，组建部门(专业)性公司。

3.对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从前，合作经营企业的利润共分成4个部分。其中约25%的利润被用于支付股息，即这一部分收入根据私营者和国家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来进行分配。其结果常常是：私人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多，而国家所获得的利润少。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对国家不利；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更多地投资，那么)企业所取得的大部分红利又都被私人资本拿走了，这对国家也不利。这种状况导致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经常这样说，在合作经营企业中资本家们占尽了好处，而国家得到的好处却很少。

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其中矛盾也必须予以解决。于是，中共中央规定，今后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根据其股本所取得的收益应当是固定的，而与该合作经营企业的年终利润无关；向合作经营企业投资的资本家平均每1000元投资的月收益应在1—6元之间。不过，即使这样，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收益仍是相当可观的。例如，上海一些最大的资本家因此而每月所获得的收益也在1万元以上。

政府对资本收益比例问题所作出的相关规定，不仅解决了(合作经营企业中)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有利于后者，而且促使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将企业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使资产阶级与企业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国家掌握了合作经营企业的管理权，并推行了一系列与合并私营企

业有关的组织技术性举措。一个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被安置到另一个企业中，从而割断了资本家与生产资料之间赖以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已经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这些措施为今后实施合作经营企业的国有化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总之，中共中央出台的上述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方针及其落实方法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新条件。

其效果不久便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速度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仅在1955年末的50天内通过使用上述新方法国家便将3700家私营生产企业和12800家商业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截至1955年底以前，国家又对国内企业实行了新的检查办法。从1956年初开始，国内开展了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规模运动。

针对私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 1.私营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不断提出关于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如果资本家不同意这样做，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便日复一日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并提出对企业进行改造的要求。

- 2.那些曾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的资产阶级代表在私营企业改造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他们主动要求对所属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并号召其他资本家以他们为榜样。

- 3.资产阶级家庭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很多人已是国家的领导干部、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对那些思想仍处于动摇状态和对改造怀有抵制情绪的资本家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4.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5.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揭露了党内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对这场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与国内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所存在的保守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6.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的急速发展促使政府对以前所制定的工商业

改造计划作了修正。起初，政府曾预计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得用1—2年时间。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例如，在北京，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每天都在锣鼓的伴随下到市党委请愿，要求政府加快(本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由此导致北京市委在一个月内五次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而当其对自己的第五个改造计划进行讨论之时，北京市范围内几乎所有私营企业主和商店主都已递交了关于将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

根据截至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国内65个城市(其中包括23个大城市)中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主均已递交了关于将其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预计，截至(1956年)2月中以前在全国所有城市，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资本家都会递交这样的申请书。

而当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阶段结束，即企业主们递交了改造申请，地方各级政府向上级机关提交了相关决议并宣布了关于该企业已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告之后，国家将对所有合作经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资产盘点，人员分配和领导干部配置。而针对这些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改革预计将于今年(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并于同年夏季结束。可能，还有少量合作经营型企业将被迁往国家西北部地区。不过，国家在推进这项工作时不会做得太急迫，以便在通过和实施这些决策时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作认真考量。

以上所述便是对私营工商业实施改造的第二阶段，它为中国实现对国内工商业的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其所花费的时间将比第一阶段更长一些。

实现第二阶段的任务预计将需要2—3年的时间。其间，我们还要利用合作经营企业工作环境中涌现出的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以便通过直观的事实向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另外还可借助组织专门性的政治学习班和学习小组的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都是小资本家。在其企业被公私合营后，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要依靠工资，因为其资本规模都不太大。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今后有一些小资本家会主动宣布放弃因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而本应取得的那一部分股息，而一些大资本家也会

效仿前者的做法。现在国内已出现了上述迹象的苗头。例如，西安的45个小资本家便向政府递交了关于自己将主动放弃在企业中所投资本利息的申请。然而，我们目前并不鼓励资本家如此作为——放弃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股息。国家打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在企业中拥有股份的资本家支付股息，虽然有一些小资本家希望把工资作为一种固定、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收入，并想加入企业的工会组织。

预计，再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可能宣布关于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的实现。我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国有化：其一，在宣布国有化之后便立即停止向资本家支付股息；其二，在宣布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其支付股息。不过，目前我们还未最终确定将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在许涤新作上述通报之后，(我们)便向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均作了相应的答复。这些问题和答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中国国内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和拥有100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私营企业总量中所占比重如何？

回答：中国国内现有私营企业130000家，其中45000家拥有工人在10人以上，2300家——工人数量超过100人，170家——拥有工人数量超过500人。商业企业共计450万家以上(不包括小摊贩)。

问题：所有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如何？

回答：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估计为33亿元，其中工业企业——25亿元，商业企业——8亿元。

问题：资本家是否有权从合作经营企业中撤出自己的资本？

回答：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利。

问题：在中国国内接受了改造的资本家中是否有人在境外还拥有企业和资本？

回答：的确有这样的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在解放前便已在境外拥有资本，也有一些人在解放之后才将自己的资金转移到了香港。我们并没有掌握关于这些资本的规模等情况。我们鼓励资本家将这些资金从境外撤回中国。

问题：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如何？

回答：在我们对私营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仍相当尖锐。起先，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国家的订货；而在接受了国家下达的订购计划之后，他们又开始盗窃国家财物和不按时完成国家订购任务。

1954年，当我们开始对私营企业实施改造和组建合作经营型企业时，很多企业主不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到了1955年末，仍有一些资本家拒绝接受改造。只是在企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斗争压力下他们才表示同意对企业进行改造。我们发现在一些小型企业常常会发生资本家撤资，隐瞒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等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型企业中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性较差，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均弱于中型和大型企业。

在一些企业中工人对资本家实施了强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其向合作经营企业追加资本投入。此类做法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事件的发生，如有些资本家因此而自杀。虽然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太多。

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家将大量金钱用于满足个人消费方面。他们认为，在当前国家政策仍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现金用于个人消费方面对自己更划算，因为将来即使企业的资产被国有化了，至少他们现在所购买的消费品不会被国有化。资产阶级自身内部也日渐分化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两部分。这也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

问题：截至1955年末，国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额有多少？

回答：截至1955年中以前，合作经营企业的资本比例如下：私人资本——8亿元，国家资本——3亿元。后者包括被国有化了的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在内。在最近时期国家尚未向合作经营企业注入新资本。

问题：含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的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如何？

回答：完成国家订购的私营企业在私企总量中所占比重为80%以上。截至1955年末以前合作经营企业共计5700家。属于商品流通的零售业中有25%的私营商店是根据国家的委托从事寄售业务，国营和合作社零售网点比重达到51%，另外还有20%以上属于私营商店和个体摊贩。

问题：如何对合作经营企业开展领导工作？

回答：在合作经营企业中都要成立由13—16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中包括党支部书记，委员会组成的一半——工人阶级代表。以前，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向人民委员会中的各专业部委汇报工作，如今其主管部门变为专业性的公司，而后者则从属于地方工业管理局。再往后，这些专业性公司将从属于中央。

政府将自己的干部派到这些公司去担任经理或副经理职务。

除了专业性的公司外，还要组建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合作经营企业代表协会。这个协会带有协商性质。资本家们可以在协会里开会和讨论问题。我们认为协会就像是某种类似于老人院的机构，成为协会代表的资本家约有2万人。

在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许涤新请与会者们谈一下自己的意见。尤金同志首先对许涤新组织这次会谈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此次会谈中所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意义。以前，我们只是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对其个别和具体的内容不甚了了。但经过此次会谈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变得清楚了。

尤金同志接着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正确的，并引起了多方的满意和良好反响。其在如何对待资本家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做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消灭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运动准备了条件，而且没有在社会上引发动荡、怠工和其他特别的复杂情况。

我们苏联当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就相对复杂些。1918年，列宁曾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资产阶级的阶级问题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我们并没有像以上所述的那样——如此广泛地成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干扰。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发展到像中国这样的规模。你们(中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开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对其所实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加以总结，那就更好了。你们(中国)的实践经验将会对其他亚洲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内的民

族资产阶级也对本国的民主化变革抱有浓厚的兴趣。

此次会谈历时3小时，担任会谈翻译工作的是方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5份，送：谢皮洛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等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馆

第192号，1956年2月1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54-69

№223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1956年1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月30日会议第184a号记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Д.Т.谢皮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就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结报告草案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作为基础——很好，可以接受。

基本赞同。把意见转达给报告人，报告人将重新分发。

卡冈诺维奇同志：

触及到目前局势的某些问题以及纲领性的某些问题。

是否还应该谈谈一系列纲领性的问题：

1.关于议会道路；

2.关于和平发展道路；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莫洛托夫同志：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基础。

还存在着某些意见。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理解争取动摇者，建立统一战线和削弱一系列论点的意图。

我还理解——可能采取的折中办法。

报告中存在着一系列冒险主义的论点，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论点。

在原则性问题上(第33页)：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的主观意愿不可能废除客观规律。 [31]

列宁并没有使政治与经济脱节。第34页。不正确。

(第35页)——对列宁著作只引用了一次——这是报告的缺点。 [32]

已经写上的内容，我不反对，但是，还不完全。

主要道路——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专政，而后再进行赎买，当粉碎了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时候。 [33]

(第36页)“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对列宁的这句话引用得不对。

关于和平发展道路：列宁在苏维埃框架内进行的说明。

第37—38页——关于议会形式的斗争(然而由谁领导呢？)。 [34] 工党党员也是工人。工人阶级可以拥有大多数，但是，政权将不是工人的。

第38页——反对考茨基、伯恩斯坦——而他们都是干瘪的家伙。

第20页——问题不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应该谈谈对接点，谈谈统一战线。

关于所说的基础——我们赞成革命的斗争道路，不客气地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援引赫鲁晓夫、米高扬、谢皮洛夫同志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应该保持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阐述的那些框架，依据这一精神进行修改。

莫洛托夫同志：

作为基础第一部分可以接受。应该明确：关于战争——表述得不清楚。

“和平将会得到捍卫和加强，如果人民把捍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为什么没有把这句话全部引证？为什么没有说明引证的是斯大林的话？^[35]

把注意力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上。

在谈论议会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对工党成员进行批评。在英国、挪威和瑞士，社会党人执掌着政权，但是，这并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应当谈谈，我们什么时候依靠群众。

不应该仅局限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名字，而是应该触及到活着的人。

结论：简单化——不进行专政的“牢固和平”。

米高扬同志：

关于和平革命道路可能性的争论(与卡德尔的争论)。

在报告中没有谈到关于革命发展演变过程的道路。

话题指的是——革命是否只应该是流血的。

主要问题——阶级力量的对比。

列宁在1917年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只有在我们坚信“我们会来到，我们将把你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才不再依靠群众。

关于统一战线的口号(在犹太人民的眼中，这是一个被败坏了声誉的口号)。

如果我们现在将腐化社会民主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将与谁保持统一战线呢？

关于战争问题，说得正确——斯大林的表述不全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正确。

在保加利亚，在2—3年期间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人民民主制度”正在履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也给出了温和的表述。

实际上不应该对措词进行纠缠。

胡志明不愿意给党改名字，而人们迫使他这样做。 [36]

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已经把卡冈诺维奇说的话标出来了。

只是不应该坚持旧的东西。

报告的所有论点都是与列宁主义原理并存的。

要求进行更明确的表述，不能脱离列宁主义原理。

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战争——给出了答复。争取动摇分子。

在报告中——帝国主义被吊起来了

和平力量阵营——得到巩固。

我们能够预防战争。关于和平共存——我们将不赋予它宣传的性质。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论点是正确的。

应该对措词进行改进。

依靠群众运动的议会形式。

布尔加宁同志：

是否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应该及时地提出来，提出得正确。

关于战争的可能性——斯大林的表达有缺陷。

关于统一问题——说得正确。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同意报告人的说法。

关于议会道路——应该提出来。

已经谈的内容是正确的，原则上就像在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萨布罗夫同志：

关于现阶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我是这样理解的，报告人的意图，立场，我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们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

苏斯洛夫同志：

话题指的不是某些表述。在报告中给出的实质是正确的。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报告中已经谈到。

反正不一定时时都触及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称。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总是通过苏维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是通过国内战争——这是教条主义。

我们没有义务必须强调——我们赞成国内战争。

我们与这种倡议联系在一起没有好处。

关于防止战争——在报告草案中发挥了斯大林的论点。

关于对社会党人的态度——新的形势创造了与之接触的机会。

工人阶级将会“左倾”——需要提出新的内容。

关于议会道路。斯大林给英国人推荐了提纲。 [37]

别尔乌辛同志：

不应该拖延问题，在报告中应该谈到它们，应该做出答复。

我们不能再援引过时的表述方式了。

报告中所谈到的内容，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任何修正。

对两种制度共存解释得非常好，其他问题阐述得也很正确——应该扩大章节。

谢皮洛夫同志：

同意报告的主要论点。理论部分的意义很大。

对手的观点：共产党人认为战争和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卡冈诺维奇同志是错误的，似乎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我们驳斥战争宿命论，不应该坚持僵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赞成战争，我们赞成和平共处。

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是资产阶级本身纵使我们采取的暴力。

我认为报告的所有论点是正确的。

基里琴科同志：

话题指的不是某种让步。最容易的是重复旧的东西。

这是死读书本和精神的贫乏。

关于与社会党人的接触：难道这也是让步吗？

赫鲁晓夫同志：

法国的社会党人害怕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们说：共产党人会吃了他们。

卡冈诺维奇同志应该说得更坦率一些。

各种道路都可能存在。

在报告中，从列宁主义立场对问题作了发挥。

某些地方需要重新编辑。

波斯佩洛夫同志：

在报告草案中，问题的提出是勇敢的和革命性的。

考虑阶级力量的划分。

分析令人吃惊：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战争途径引入共产主义。

列宁谈到关于革命发展的和平途径并不是偶然的。

别利亚耶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对是否应该提出纲领性的问题表示怀疑，

而谈到关于策略问题，在我看来，他是不正确的。

我们能否预防战争，是否可能？我们实行的是和平政策。

我认为，在报告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新贡献。

关于共处——不是策略的方法。

提出原则性问题是正确的。

阿里斯托夫同志：

不能无视现实。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不应该像卡冈诺维奇那样援引列宁的话。

问题不仅在于争取动摇者，而应该把基本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

报告论点的方向应该向这方面。

什维尔尼克同志：

同志们表达的意见都很正确。

报告的论点是正确的，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

请坚持报告草案中提出的立场——它们具有动员性，

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卡冈诺维奇同志忽略了似乎已经出现的偏离。这是不正确的。

不能同意他的说法。

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与报告草案内容不矛盾。

卡冈诺维奇同志说的——重复了过时的东西，未必应该作这种重复。

结论：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将翻越一座大山，有中国、人民民主国家、埃及的支持。

资本浓缩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

美国巨头们准备吞掉我们。

我们应该指出正确的方向。

应该清理一些东西。

关于共处问题还应该进行研究。

引起战争的气氛对我们是否有着切身利益？

长期共处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没有战争宿命论。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已经使群众确信：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

我们希望采用其他方法进行斗争。在思想问题上不应该让步。

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经济、文化领域开展竞赛活动。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

报告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

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是教条主义的。

寻找途径，突破工人阶级(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

赫鲁晓夫同志：

应该寻找与工党分子接触的途径。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会努力缓和自己的修改意见。我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

我赞成，基本上可以通过报告。

我完全理解报告人的意愿。

我认为，存在着政治论点，而且触及到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纲领性论点。

是否应该说，我们取消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点呢？

能够和应该找到定义：“革命”、“进化”——应该对该章节进行加工。

同志们所谈的内容，对我来说都合适。

可以作为基础。

有意见的同志们，可以以书面形式告诉报告人。

考虑到作更好的改进，要报告，将通过什么，没有通过什么。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36-39об

№25176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1956年1月3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通报，中国外交部请求(我们)向如下代表发放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邀请签证：马来亚共产党——林文(Линь Вэнь)、林忠(Линь Чжун)和姜茹(Дян Жуй)；缅甸共产党——凯曼(КэМэн)和王江(Ван Цзян)；日本共产党——郭敏(Го Мин, 日文名袴田里见)。

另外，中国外交部还请求向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何云川(日文名听涛克巳)及其翻译鲍良(БоЛян, 日本名绪方太郎)等发放邀请签证，因为他们将与袴田里见一

起赴苏参会。

日本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是在苏共中央1954年7月15日决议的基础上并在该报编辑部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发出邀请的情况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可以指示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上述同志发放进入苏联的签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详见附件。 [38]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莫舍托夫(签名)

1956年1月31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71, л.1

№20758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1956年2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从上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召开(1949年11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了。苏共和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上保持经常的联系；国外共产党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并且就自己的工作相互通报得不够。

来到莫斯科的许多共产党代表在提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除了出版报纸，共产党情报局将没有任何工作，同时，当共产党之间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的时候，需要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5年10月7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原因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

这样，就出现了情报局的组成问题。有八个共产党加入情报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波兰工人统一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

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情报局。其中的一些党，比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多次提出了关于他们加入情报局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一、预先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王稼祥同志(中央委员，主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进行会谈，并搞清中国同志对可能参加情报局这一问题的态度。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加入情报局的共产党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预先确定会议召开的日期和议事日程。

从苏联方面来说，苏共中央代表就情报局会议的召开可以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建议，并对议事日程作如下建议：

1.同社会党扩大联系和合作(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最好有相应的通报发布)。

2.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及共产党在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方面的工作经验(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不发表)。

3.情报局的工作问题：(1)关于扩大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可能性；(2)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3)关于出版情报局机关的理论刊物。

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讨论关于扩大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是合适的，与此相关的是一些社会党同共产党的联系有增加的趋势。1956年3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第二个问题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一些共产党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于同维护和平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削弱了对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关注。

二、需要同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团进行会谈，以便弄清他们已经成熟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的想法，弄清他们对于在现代条件下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方法和可能的联系形式的愿望。

在这些会谈中可以提出关于按照共产党所在的国家群体建立相互联系的建议，比如，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冰岛共产党)，西欧的一些国家(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等。

同国外同志进行会谈的大致计划见附件。

苏共二十大期间关于共产党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和会见都不应发表任何通报。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Н.波诺马廖夫

1956年2月7日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关于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一、采纳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建议，即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让属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员的各党代表团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二、责成苏共中央以下同志——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参加与各兄弟党代表的讨论会，其间将讨论关于在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依照如下议事日程召集情报局例会的提案。

1.关于扩展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和合作的问题(将在报刊上公开)。

2.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各共产党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活动经验(不在报刊上公开)。

3.情报局的工作问题：

(1)关于扩大情报局的成员构成；(2)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工作；(3)关于情报局理论机关报的出版。

三、责成波诺马廖夫同志按照预定程序与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会谈，并了解中国同志对中共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态度。

四、根据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安排会面以讨论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附

录会谈的大致次序清单)。 [39] 会谈期间，提出关于与一些共产党组织接触和建立关系的建议，这些共产党组织包括：拉丁美洲(巴西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等)，一些西欧国家(法国共产党等)。

责成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就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起草相关提案。

АПРФ , ф.3 , оп.23 , д.54 , л.69-73

№214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 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1956年2月8日)

致苏共中央：

中国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地方政府得到北京的许可，邀请居住在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现为后贝加尔)地区的苏联公民及其孩子去中国欢度2月12日至15日的春节。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被邀请的人数共40—50人。这次邀请是对中国公民被邀请去赤塔州欢庆新年(1956年)的回应。

为此，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和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请求允许派遣40—50名格罗迭科沃车站和奥特波尔车站的铁路员工和学生去满洲里市和绥芬河市。

我认为应当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委托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和苏联交通部总政治部(楚马钦科同志)从优秀的生产工作者和学生中选派40—50名前往满洲里和格罗迭科沃参加为期5天的春节活动。

有关简化苏联公民过境手续的问题已得到苏联内务部(济里亚诺夫同志)的同意。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同意这些提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第25-c-237号

手写批注：

通报奥西波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和楚马钦科同志。出访中国已组织完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3日

归档。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6日

送H.T.维诺格拉多夫同志阅。

O.伊万诺夫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14

№25045 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 (1956年2月9日)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2月7日决议，为参加苏—蒙—中之间直通铁路盛大开幕式，苏联将派遣以交通部部长Б.П.贝舍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

届时，中国派来参加开幕式的政府代表团的团长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乌兰巴托—集宁的这条新铁路的通航开幕式时间为1955年12月31日，而届时在开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后沿该铁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发出了第一列货车。

在赛因山达车站和边境口岸站点扎门乌德也举行了一些由铁路职工

和劳动者代表参加的大型集会。

苏联代表团在乌兰巴托逗留期间与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同志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泽登巴尔同志感谢苏联对该铁路建设所给予的援助，并请求苏联政府继续帮助蒙古组织铁路的运营工作。他还声称，蒙古方面也将采取措施以便尽快为乌兰巴托铁路培养本国民族骨干。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代表团与由副总理鲁布桑同志率领的蒙古代表团一起前往了中国，并在中国逗留的八天里沿中国铁路作了旅行。我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国城市，而在各地均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1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和蒙古代表团，并与之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同志向苏联代表提出如下建议：由苏联承担兰州—阿拉木图共计600公里的铁路建设工作，而中国仅确保此项建设的劳动力。对此，苏联代表团团长表示，这是一个新问题，他仍需要再考虑考虑。

在1月11日举行的会谈期间，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请求贝舍夫同志对中国铁路提供帮助。该请求的实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中方希望苏方向中国铁路部门提供苏联在铁路交通领域所进行的科研成果相关信息；希望在中国和苏联铁路交通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希望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帮助中国从事铁路交通领域的科研工作，并让中国专家前往苏联学习；希望能派苏联专家去中国就个别课程开设短期讲座。

中方还请求苏联对中国境内4万公里的(铁路线)进行航拍勘测工作，向中国提供(铁路)密码闭塞装置、火车头信号和机车自动停车设备，并为北京—天津和沙城—丰台区间的铁路设计此类装置。

滕代远同志还表示，应当在举行各人民民主国家交通部长会议期间讨论如下问题，即如何在各国的铁路建设、军事动员措施、铁路的衔接和边界车站的改造等工作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合作和协调机制。

..... [40] (签名)

1956年2月9日

No21835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 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1956年2月9日)

关于在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协商问题

1.芬兰共产党。在苏共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芬兰共产党请求(我们)就在1956年2月15日即将举行的(芬兰)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应采取的应对策略问题提出建议。

2.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表示希望就于1956年3月将举行的该党会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3.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中央请求：

(1)就已在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讨论过的该党党纲草案的变动问题进行协商。印度共产党中央认为，该纲领的主要条款不需要重新制定，变动主要涉及那些已经明显过时并在相当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章节；

(2)讨论关于(向印共提供)帮助的问题。

4.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议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该党今后的行动策略问题。印度尼西亚朋友对如下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关于议会斗争在(印尼)共产党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党派代表参加联合政府，等等。

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斯兰斯基集团案件提出相关建议。

6.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请求与其讨论如下问题：关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关于与“红色旗帜”共产党和“人民同志”组织的联合问题。

应当把我们与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和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放在一起举行。

7.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中央请求对即将举行的党代会所起草的政治决议草案以及会议就青年问题所起草的决议草案等提出意见。

8.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中央请求：

(1)讨论关于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一境内建立以美国共产党民族委员会委员维利亚姆索和巴塔什为首的美国共产党境外中央的问题；

(2)协助安排(美国共产党)与以下国家——芬兰、意大利、印度、日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

9.墨西哥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代表团随身带来的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0.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1.阿根廷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2.哥伦比亚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3.委内瑞拉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请求研究关于向该党提供帮助的问题。

14.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央表示愿意就党的地位、党对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以及共产党的纲领性声明等问题进行商谈。

15.奥地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中央请求：

(1)就奥地利共产党最近时期的纲领性声明的草案问题交换意见；

(2)就共产党的出版事务问题交换意见。

16.瑞典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向苏共中央通报瑞典共产党二十七大所通过的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在即将于195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期间的行动策略和要求等问题相互交流意见；

(2)(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绝对和相对贫困问题。

17.丹麦共产党。丹麦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向苏共中央通报丹麦党代会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的新要求——拥护丹麦全面裁军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18.法国共产党：

(1)对法国国内当前形势的评价。就大选后法国的政治形势、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苏法关系诸问题进行磋商；

(2)就法共中央信函中所涉及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工作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讨论；

(3)讨论关于对待社会党人的策略问题。

19.朝鲜劳动党。朝鲜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章草案提出建议。

20.荷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讨论关于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2)(讨论)关于保尔·格鲁特的副手的问题。

21.罗马尼亚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者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22.意大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1938年波兰共产党无理由解散的问题。

23.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以及上述两党领导人均打算就党纲相关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

24.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打算就该党党纲中所作的一些变动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些变动主要将涉及其党纲中如下章节：共产党对以色列境内阿拉伯难民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以及如何对待以色列现政府等。

25.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相关问题与我们举行会谈。

1956年2月9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

第П394号

АПРФ, ф.3, оп.23, д.54, л.63-66

№25969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1956年3月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6年3月2日

第27号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参考资料)

香港的政治形势：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殖民主义者占据的领土如新加坡相比，它都是不同的，香港有其特殊性。

尽管香港毫无疑问地属于中国，但英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统治作论证，认为当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似乎香港就存在了。中国历史文献驳斥了这种说法。

目前香港人口近250万。香港和九龙的居民密度极大，几乎每平方英里有6400人，或每英亩近10人。这一数目中的200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和九龙，这里的人口密度为：平均每英亩2000人，99%为华人(其中90%说广东话)，英国人9500人，不包括军人(在英国军队中华人约有

2000人，其中约400人在炮兵部队，1500人在防卫部队)；美国人有300人(主要是美国领事馆的人)；葡萄牙人850人，其他民族的外国人有4350人。香港华人明显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尽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一位祖籍上海的香港华侨说，在香港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英国出生的不列颠人和政府高级官僚；第二等人是在香港出生的不列颠人和那些精通英语有机会参加市府选举的人；第三等人是富裕华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联系和金钱做到一切对自己有益的事；第四等人，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的人，即是那些处于依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南华早报》1955年7月14日)

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镜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种看法，1955年3月11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位记者说，在香港，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穷人富人之间壁垒鲜明，其他民族的人，以及没有足够资产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欧美富人同华人之间隔阂很深。在19世纪对华人的歧视尤为严重，甚至不允许华人站在欧洲人的窗前，只有华人当仆从时例外。记者说，有一次他邀请一位华人朋友，也是记者，去欧洲人的俱乐部走走，以便观察一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他的朋友不敢去，并说这是件危险的事。

香港工人人数众多。现在香港(包括九龙)共有45万名工人，其中13万人在工业企业工作，其余的主要是建筑工人和手艺人。香港有25万小商贩和店员。

香港工人团结在230个工会中，这些工会可以划分为三类：“红色”工会，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联合会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工会联合会(工团)；机械制造工人的独立工会。香港的“红色”工会有98个，其中52个加入了广东省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团结了主要工业领域中的92000名工人，包括：产业工人，公共服务业工人——电力工作者、自来水管工、话务员、城市交通服务人员、造船工人(3个大型造船厂有1万名工人)，医院、政府和外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外资宾馆的服务人员和英国乳制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工人。3个海员工会共有1万多名成员，也都属于“红色”工会。“红色”工会还团结了部分饭店服务人员和部分商贩。

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红色”工会团结了香港工人总数的80%。因为“红色”工会团结的工人主要在重工业领域工作，如果举行罢工，那么，香港就会停顿，如果长期罢工，香港就会衰败。(参见同中共广东省

委副书记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

第二类工会是国民党的工会，在香港有自己的联合会，共有105家行业工会，会员总计3万人(所谓的香港九龙工会联合会)。其中22家工会加入了国际“工贼”联合会，即所谓的“自由”工联。早先有40家工会，但其中的18家后来解散了。这个香港九龙反动的工会联合会是地方当局因害怕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在国民党分子的帮助下建立的。成立反动的工会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和分裂香港的工人阶级。

国民党的工会联合的主要是手工业者、装卸工人、搬运工人(其中不少人是靠干零活生存的流浪者)、小船厂的海员、华资宾馆的服务员；大部分餐馆、茶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部分商贩和铁路工人。

所有这些工会都公开反对共产党和“红色”工会。他们分裂工人运动。但是，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出现了变化。在前往广东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后，部分工会会员表示拒绝国民党的领导，但暂时还没有加入“红色”工会。(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

这样，在他们的队伍中显露出了一些中立态度的苗头。

第三类工会是机械制造工人工会，由英国人领导(香港政府劳动局)，提出自己的性质是第三条道路。这个工会在重工业工人、汽车修理工人、铁路工人和机场服务人员中有较大的影响。它团结了2000多人，主要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在香港这个工会得到200人的资助。在组织方面，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很薄弱，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

近来这个工会的成员对英国的领导表达了不满，开始倾向于国民党人。“红色”工会的任务是利用机器制造工人工会中的矛盾。

在香港任何一个企业或工人领域都可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在争夺工人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任务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最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工会，还是在机器制造业的工会，都明显出现了中立倾向。

在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中有一个劳动局，它的任务是对工会进行注册和公正地解决劳工冲突。但是，这个部门支持“工贼”工会，反对“红色”工会。

香港工人阶级的处境极为困难。每月平均工资为150—200港元。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资最高，为200—300港元。没有卫生医疗体制。住宅极为短缺。工资远远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工人每月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出50美元用来支付一间小房子的租金，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30美元。考虑到一个工人要养活三个家人，考虑到基本生活必需品：衣服、家什、厕所用品等的高昂价格，一个工人的工资甚至入不敷出。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香港的生活用品不断上涨，香港的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情况。例如，1955年9月初香港的粮食价格比去年8月1日上涨了25%—30%。（《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9月1日）

香港还有数量众多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员，据官方明显压低的资料，其数量达70000人。以前，九龙有7000人在库房工作，现在仅有2000人，5000人失业了。1954年在造船厂有9000名工人，现在只有7000人，因此还有2000人没有工作。企业主通常招募工人工作极短的时间，因此，工人对明天没有信心——他是否和以前一样有工作或失业。

大量失业引起香港高犯罪率，盗窃猖獗。香港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新的抢劫或被害事件的消息，有时还会报道失业人员因无法维系生存而自杀的消息。1955年7月14日，《星岛日报》刊登了香港公民协会（或香港公民党）代表关于香港失业问题的言论，其中谈道：“政府考虑到了鱼和猪进入殖民地的问题，却没有关于失业人数的材料”，甚至关于“在英国政府保护下的领土上生活的人们因饥饿致死的材料。这对号称是英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的香港来说非常不好”。

香港资产阶级收入在持续减少，他们试图依靠强化劳动、提高工时和降低工人工资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香港劳动人民在积极开展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根据客观条件，近10年来工人罢工主要是经济性质。例如，1946年罢工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并取得了部分成绩——对电车工人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1947年20000多名机器制造业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当时，为了提高劳动强度（以保持自己的利润），企业主开始大规模地解雇工人，罢工的目的是反对解雇和保障工作。1954年末香港城市交通工人的罢工是这种斗争的榜样，这是由数十名工人被解雇引起的。工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罢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这次罢工后，大规模解雇工人的做法停止了。最近没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1955年4月末，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香港组织了几次工人集会和游行。在民主工会联合会组织的集会上，工人们欣喜地强调了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在集会发言中工人们说，必须忠心热爱祖国，加强团结，关心劳动者的利益，为法制和工会的利益而斗争。（《大公报》（香港出版物）1955年5月3日）

五一节早上，国民党的工团联合会在九龙一家剧院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工贼”工联领导在这次集会的发言旨在反对共产党和民主的工会联合会。

民主工会联合会的活动是由在香港秘密存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共产党对香港工人的影响有这样一个事实：1952年香港没有发生过罢工，因为共产党人认为不需要这样做，而在1953年出现了一系列罢工，因为党号召工人罢工。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最能说明1954年香港交通工人的罢工处于共产党影响下，当共产党人得到北京的指示后，罢工停止了。（参见同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的会谈记录，1956年1月18日）

在香港从事党务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中国。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就在香港工作。但是，在中国解放后他们坚定地提出了立即把英国人驱逐出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問題。向他们作了解释，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做工作，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应该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他们的工作具有长期性。有鉴于此，目前香港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提过政治要求。

在香港，工联联合会和共产党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工人分散在各小型企业，各工会的倾向不同。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任务是揭露反动工会领导层，激化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香港都处于秘密状态。此前没有公开出现过本地政党。不久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党，这是由英国人组建的。它的纲领是改革香港政治制度，为降低和稳定物价而斗争，扩大住宅建设等，事实上英国人建立这个党只是想为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提供另外一种形式。

香港还有一些保守分子和工党分子集团，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积极

性。香港工党分子的官方政策是批评地方当局。他们支持改善英中关系，事实上他们也是英国当局任职的工作人员。

香港的主导政治集团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守分子集团，以总督葛量洪为首。该统治集团力量最强。加入该集团的有在香港工作的外交家、英国大型企业主，以及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

第二类是所谓的改革党（“改革俱乐部”）。这个团体与群众联系密切，相比其他团体而言在群众中支持率最高。其人员构成主要是知识阶层代表：医生、律师、教师和宗教人士。该团体的代表经常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改善英中关系。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同志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激化改革派同本地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团体的领导人是基督教中国南方教区首领布鲁克·贝尔纳奇。他也是改革党的市议会议员。

第三类是亲美团体。从事件表面上看不出它的力量。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驻香港舰队司令斯特拉顿。以前他是英军总参谋部军事学校校长。后来一段时间在美国，显然，从美国军方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他支持扩建军事基地。该团体接受部分支持同美国结盟的香港大资产阶级加入。

在帝国主义分子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高了香港的政治意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从大陆转移到这里。

香港有23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总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共有36位副领事，他们经常前往澳门。（美国在香港新建了一栋4层的领事馆）

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公开干涉当地英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特别是在执行贸易禁运政策方面。这引起当地社会各界和当局的不满，造成英美矛盾加剧。前不久，美国人试图对在香港高等学校学习的一些大学生的活动进行调查，引起当地居民和当地管理部门的愤怒。

美国总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要前往中国的华侨进行教育的工作。凡是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华侨，在回来2—3天内必须到相应的领事馆登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吊销他们的护照。

一些特工学校和外国情报员培训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组

织，如：“自由中国运动”、美国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机构)、“干部培训学校”——正式名称是“美国远东工业公司”，等等，都合法存在。现有资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加强了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近来香港人口增加了10万人。(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广东省领导的会谈记录，1955年10月7日)

美国把从中国叛逃的堕落分子组织起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援助协会”，该协会被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人也被国民党分子利用，他们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电影公司、出版社(如亚洲出版社)。美国在香港出版了英文反动报纸《虎报》，花了5000万美元买下这家报社。他们在香港还有自己的电讯社，在广播公司也有份额。

在军事方面，美国人在香港也非常积极。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有230多艘美国军舰在香港停靠。从1953年4月到1954年3月，有13万美国士兵在香港登岸。美国军官和各类军事顾问也常来香港。美国人试图把当地英国管理机关置于自己的监督下，以便使香港成为自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平台。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出现了冲突。有鉴于此，美国改变了自己在香港的工作方法，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活动上。

美国人要求为国民党分子在香港更广泛的活动创造条件，而英国人对国民党的活动加以限制，有时会中止其活动。这也加大了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就中国扩大对香港的出口，以及美元经香港流入中国的问题表达了不满(每年华侨经香港寄往中国的钱达1亿多美元)，同时，港英当局对美国实施的对华禁运政策感到不满。所有这些不能不导致英国当局同美国之间的矛盾激化。

国民党在香港的间谍数量非常大，特工的活动主要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来领导。他们的数量总计3万多人。早先他们之间有许多派别，而今联合成一体。他们之中主要是地主和无业游民——因害怕人民惩罚而从中国逃亡的分子。恰恰是他们成为国民党在香港从事反动活动的社会基础。香港还有由所谓的“保卫台湾安全”组织领导的蒋介石的特工组织、国民党的地下党，以及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部”和“特务机关”的各分支机构、“游击干部培训班”。所有这些培训班和组织的教官都是美国人。

除了官方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能找到所谓的广东省各县“流亡政府”，这些都是外国情报机关的支部，致力于在广东省从事反革命工作。在香港还有国民党的情报部门。

国民党在香港控制着一些社会组织，一系列报纸和近50所中学。国民党在香港从事破坏活动表现在对有进步倾向的工人实施毒打、杀害和纵火，以及让捕鱼船只强制偏离台湾。“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就是他们炸毁的，更早时还炸毁了两架飞机，香港当局本来应该把这两架飞机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在香港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华人的联合情报机关，该机关是1949年12月建立的，其任务主要是研究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领导第五纵队，从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中招募间谍，并通过他们获取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情报。

可以看出，香港英国和美国之间、英国和台湾之间，以及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矛盾的聚集区(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也存在着共同观点。就在美国想公开反华时，英国不想同中国对立。英国帝国主义认为使用隐蔽的手段更好。美国要求严厉执行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英国表示反对这一政策。

至于英国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英国当局对蒋介石分子的活动都视而不见，但同时他们不希望国民党分子公开活动，不希望出现同进步工人的对抗，或出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当时英国当局被迫逮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三个国民党特工大头目。

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但是，英国不想公开反华。他们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他们也明白，中断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英国将失去香港。

美国想把香港作为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在使香港军事化方面他们得到了英国当局的支持。根据资料，1955年4月在香港驻扎的英军有2万人(不包括空军和海军)。(《星岛日报》1955年4月12日)

从九龙以北沿所谓的“新界”正在形成一个部署有永久火力点工事的地带。半岛有4个机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2个——一个位于半岛北

部，距中国边界不远，是1950年建设的石岗军用机场，这个机场可以停靠喷气式飞机，使用最新技术装备，拥有地下飞机场。另一个大型机场坐落在半岛南部，距九龙东北部把香港和大陆分隔开的海峡不远。尽管这个机场是民用机场，但同时也可以接受轰炸机起降。现在，英国人在香港和九龙都在扩建自己的机场，其中包括扩建香港的启德机场。美国向他们提供了顾问帮助。

在军事领域，美国和英国在香港联系广泛而密切。美国想把香港变成自己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但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英国当局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相信，英国在香港的防务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来进攻。英军总参谋长哈丁表示，在对香港的英军改组和举行军事演习后，三个军种建立了密切协同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华侨日报》1955年3月13日）

因此，英国不认为香港有军事危险。但是，在香港本地还是对香港当局和英国军官关于在该地区出现军事行动时有能力保卫香港的言论持怀疑态度。1955年3月13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写道：“我们不认为英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助军事力量来保卫香港。这是个危险政策。香港只在同中国‘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存在。”关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类似呼吁表明，反动口号在香港资产阶级中没有市场，甚至反动报刊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

香港有14家通讯社，出版中文和英文报纸及杂志128份。其中数十种有进步倾向，发行量达10万册。现在提出未来两年的任务是发行量达到20万册。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处在美国人、国民党分子和港英当局的控制下。其中有50种刊物是国民党的，其中包括10种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发行量达30万册。

反动的香港报纸充斥着对中国和苏联的污蔑，其中有一系列文章试图离间苏中关系。例如，1955年11月25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在头版论证道，苏联似乎拒绝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苏联“把赌注押在印度身上”。在语气方面，其他一些文章就比较谨慎，其中包括1956年1月12日《星岛日报》刊载的来自伦敦的消息。国民党最大的报纸《华侨日报》也蓄意攻击苏联和中国，称赞美帝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但是，由于这份报纸同香港资产阶级联系密切，而资产阶级的收入取决于同中国的贸易，报纸被迫在很多时候批评不得人心的贸易禁运政策。

香港反动组织极力开展对香港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因为亲美报纸订阅量不大，很多时候美国人不得不无偿赠送给各机关和组织。

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不刊登恶意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但现在以客观为借口，刊登一些关于苏联的虚构的消息。

香港的进步报刊主要是《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和《周末报》，这些报纸直接处在新华社的领导下。这些报纸在南海国家也很流行。

香港反动力量试图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香港居民，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电影界和体育界占优势。香港有10家外资影院，仅有2家华人影院。从1954年到1955年初，在香港共上映了380部美国影片，10部香港生产的华人影片，苏联电影仅有3部(从12部影片中挑选的)——《马戏团》、《俄罗斯芭蕾大师》、《萨特阔》。

因此，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宣传领域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早在1954年香港当局就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力度。当局努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用自己的人代替。1954年中为学校开具了统一教科书清单。华人学校的学生被禁止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1955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局发表了一项声明，根据这项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政府还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持当地资产阶级的利润，提高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但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方面什么也没做。最具说服力的是1955—1956年用于警察开支的拨款是教育需求的两倍多。1955年5月2日，《华侨日报》写道，现在香港警察局是政府最为强力的部门之一。

上述已提到过的英国杂志记者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香港文化机关时写道：“香港数十个黄金地段用来建设银行，却无一处用来建设公共图书馆。”(《星岛日报》1955年3月11日)

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同志说，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外交谈判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收回香港，另一条途径是采取军事手段。但是第一条途径在目前是不现实的，而第二条途径是不能接受的..... [41]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21, д.119, л.1-17

№138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М.卡冈诺维奇、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А.布尔加宁主持。

第26项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市至中苏边界地段的建设问题。 [42]

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科瓦利、朱可夫、科热夫尼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

米高扬同志：提议采纳中国人的建议，由我们出资建设起自乌鲁木齐市全长为449公里的铁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劳动力和现场材料。

认为可以接受米高扬同志的建议。

委托科瓦利同志提交新的建议方案。

提供贷款和办理手续。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4, л.12

№21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第26项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Л.М.卡冈诺维奇、Н.А.布尔加宁、Г.К.朱可夫、К.И.科瓦利、Е.Ф.科热夫尼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和М.Г.别尔乌辛。

绝密

兹责成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出的各方面意见，就苏联参与兰州至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至苏中边境区段建设的问题提出一个新提案。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8, л.7

№1260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 ^[43] (1956年3月20日)

苏共中央：

1956年3月16日李海秋 ^[44] 同志转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了。

正如以前所约定的，我们决定派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鉴于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我们的意见是，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

我们欢迎米高扬同志返回苏联时在北京停留几天。

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1956年3月20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9, п.415, д.59, л.16

№12600 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 [45] (1956年3月21日)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需要短时期在很大的地区内进行航空摄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我国现有航空摄影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4月份内派一个由11架飞机组成的航空测量队(包括全部飞行人员和航测技术人员以及每架飞机上的装备和器材)，来中国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工作。航空测量队的工作期限定为一年，所需费用将通过贸易程序付还。

以上请求，请苏联政府考虑，并盼赐复。

谨致敬礼！

周恩来

1956年3月21日

手写批注：

请尤金大使代发。

周恩来

3月21日

АВІРФ, ф.0100, оп.49, п.415, д.59, л.17

№23992 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1956年3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在就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问题而举行的会议期间，针对苏联代表团提交的关于组建东方研究所的协议草案，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提出了如下意见：

1.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杰同志称，草案规定中国只承担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费用的10%——这对中国而言有些少了。他请求增加中国的实际参与度，并将其应承担的费用比重提高到20%。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日丹同志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夫列莫夫同志在与托普奇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则说，对于它们两国而言，承担研究所组建实际费用的6%——负担有些过重。

我们认为，应同意上述建议。

2.罗马尼亚的卡斯顿同志、波兰的列什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叶尔同志、蒙古的阿瓦尔吉德同志和民主德国的戈尔茨同志等代表团均主张，在东方研究所的一系列新科研项目中应设立一个宇宙射线实验室。

鉴于建立一个新的宇宙射线实验室需要大量的费用，我们认为，理应将会议的这一建议转交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并责成后者参考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以及相应的东方研究所组建参与国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负责研究这一问题。

3.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认为理应以各会议参与国政府的名义邀请其成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成员。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第МП.2/0694号(1页)。

Б.瓦宁科夫(签名)

А.托普奇耶夫(签名)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兹责成苏联代表团在关于组建东方原子能研究所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完成如下任务：

1.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即增加中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经营方面所承担费用的比重，从10%增至20%。如果这一建议获得会议通过，那么苏联和与会其他各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的)费用分摊的比重上将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承担上述费用比重的20%)苏联承担47.25%，其他国家承担32.75%。

2.应提出如下建议：委托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讨论波兰、民主德国、蒙古和罗马尼亚等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东方研究所成立宇宙射线实验室的意见，要求其对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问题加以研究。另外，我们还建议应把这一问题提交东方研究所组建各参与国政府讨论。

3.建议会议邀请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东方研究所成员。

..... [46] (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74, л.31-33

№25197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1956年3月2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6日

第29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47]

1956年3月24日

.....

之后我奉中央之命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允许苏联空军的4架飞机在今年3—5月飞抵中国东南部地区，向中国派遣由奥布霍夫博士率领的160—165名专家，以便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研究工作。我提醒张闻天，中国去年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专家组。

张闻天说他将会尽快给出答复。

.....

我们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于解散在中国居住的苏联侨民的社会组织的看法，张闻天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苏联政府的措施没有反对意见。我说，随着大多数苏联人从中国一系列地区的撤离，那些曾经用以对苏联侨民聚居区的生活秩序进行维持管理的社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在一些城市(如哈尔滨、伊宁)还仍然居住着大量苏联侨民，很显然，相应的社会组织在那些地方还应当存在一段时期。张闻天表示苏联大使馆可以对这个问题享有决策权，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妥。

.....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3, л.83-86

№23936 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 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1956年3月2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Д.Т.谢皮洛夫同志：

在此向您提交今年3月29日大使馆转交给外交部的彭真电报，这一电报是谢皮洛夫同志需要的。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6年3月29日

第209ДВ-НО号

附件：

彭真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M.A.亚斯诺夫的电报

尊敬的亚斯诺夫同志：

我收到了您1956年2月9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驻国际议会联盟代表Ю.帕列茨基斯关于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101次会议结果的通报和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1955年12月25日会议的通报。

在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第101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加入国际议会联盟并拒绝台北的声明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予了莫大支持，我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委员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和转达我们的问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

1956年3月26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48, л.48-49

№20760 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鉴于已经开始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和鼓动部 [48] 的委托，请求明确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领导人肖像悬挂方法的几个问题。
(附上大使馆就此问题的备忘报告)

附件共1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1956年3月28日)

鉴于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明确以下问题：

1.在节日期间和平时如何悬挂无产阶级领袖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肖像？

2.与悬挂肖像有关的其他问题。

手写批注：

请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谈谈意见。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6年3月30日

归档。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向库尔久科夫同志通报答复情况。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6年4月4日

就此问题已于1956年4月16日向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大使发出了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4月18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07，л.6-7

№21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28日会议第8号记录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49\]](#)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波诺马廖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

什么时候公布？

通过高层会谈来决定。(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在文件中应更详尽地说明，否则就显得简单而枯燥。

关于(公布的)形式还要考虑一下，但不要拖延。

书记处应该再研究一下，

苏斯洛夫、谢皮洛夫、波诺马廖夫参加。

应该解释一下这种联系方式，否则会发生猜疑。 [50]

同志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文件，再研究一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接触问题。

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再进行修改。

期限是5天。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4, л.15-17об

№23060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1956年3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20日，在与M.A.苏斯洛夫同志的会谈中，朱德和大使刘晓等同志表示，希望让目前正在苏联学习或实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被吸收到相应的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党和共青团教育网络中。

根据苏联高教部1956年2月29日指令，各高校教学大纲中均包括有24小时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教学内容。中国(留苏)大学生与苏联大学生一样也要学习二十大资料。

我们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责成苏共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各联盟共产党中央(名单见附录 [51])具体组织中国(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党的教育网络的活动。

附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联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电报草案。 [52]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1956年3月28日

第25-c-538号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81, л.84

№23935 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1956年3月30日)

机密

帕列茨基斯同志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谈记录

地点：在帕列茨基斯同志的办公室。

时间：自1956年3月30日下午2时15分至3时。

当时在场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帕尔哈明特斯基、格鲁热、希缅诺夫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大使通报说，当3月22日与帕列茨基斯同志会谈后，他便立即咨询了北京并得到答复。中国政府感谢苏联同志对接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进入国际议会联盟的问题的关心。北京还通报了如下内容：

1.完全同意苏联代表团在国际议会委员会会议上所采取的措施。

2.认为中国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存在有许多负面因素。至于委员会是否存在接受两个中国都加入联盟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在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国际议会)执委会已拒绝了台湾的请求。

3.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将不正式参与委员会的活动。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前我们将会亚洲代表中开展工作。我们已通过本国驻印度、缅甸和锡兰使馆做了工作，以便这些国家派遣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届时能支持中国。我们驻瑞士和印度的使馆已通报说，这些国家的议会代表均持这样的观点，即关于中国在国际议会联盟的代表席位问题应在委员会会议上解决。此外，我们驻英国的临时代办也曾与国际议会联盟主席斯坦斯盖特谈过话。后者由于生病可能不会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但他认为，

中国已获得了参与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利。在德里，台湾已遭到了拒绝，而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变更国际议会的章程。当然，美国仍会继续持反对意见，以便重新审议(德里会议的)决议；或者在曼谷会议上再次提出关于重新审议(德里)决议的问题。斯坦斯盖特认为很多联盟的成员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53]

4. 中国政府不打算派遣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关于中国的决议仍被拖延或拒绝的话，在委员会会议之后再发表言论是合适的。

这里，大使指出，问题可能会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帕列茨基斯询问，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塔斯社于3月24日的报道——关于美国人不允许在委员会上正确地解决中国议会小组的问题以及他们发出的要退出委员会的威胁。中国大使答道，中国政府了解这一报道，并认为美国人只会这样说，而不会这样去做。帕列茨基斯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中国大使指出，如今委员会可能将不会否决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但目前仍很难说最终情况会怎样。不知道在伯克利召开执委会会议有什么法律依据，因为相关章程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中国大使说，来自北京的第五点内容是：北京对会议议事日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均表示支持，这些问题将有利于各亚洲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国际联系的拓展。

帕列茨基斯通报了自己的推测，即中国的敌人们可能会利用会议程序规则来破坏与中国相关的决议。目前执行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来参加会议的执委会成员代表人数只有一半多。而根据会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执委员便无权召集会议，也无法向委员会报告关于自己在德里所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自己将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必要时让米哈伊洛夫去参加会议。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也对此事非常关心。例如，匈牙利人便建议在会议召集以前我们内部先相互达成一致。我们将尽量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中国大使也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之前准备得不够充分，那就最好把决议的通过拖延至秋季。中国大使问，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利。帕列茨基斯答，我们希望现在便能够保证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帕列茨基斯说，这当然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通过正确的决议，但最终结果怎样仍将取决于参加会议的人们。

中国大使说，昨天我与缅甸驻莫斯科大使谈了话。缅甸代表也将参

加这次会议。但目前还不知道..... [54]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是否会是斯坦斯盖特。如果他的病能好的话，那就应当是他了。不过，对此我们很难指望。帕列茨基斯说，斯坦斯盖特曾出席了德里的会谈。也正是在那里被选为联盟副主席的。另外，被选为副主席的还有意大利人..... [55] 后者在德里时对中国态度很友好。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活动家，因而其态度随时都可以发生转变。明天，我们将去贝尔格莱德，在那里我们将尽量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保持联系。据报刊上说，后者在贝尔格莱德正在为中国得到支持而创造条件。中国大使指出，目前那里已在这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帕列茨基斯说，关键在于要防止敌人利用会议程序问题来阻挠会议。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议会联盟中的许多代表都对美国参加会议抱有很高的预期。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48, л.45-47

№1046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5日

第289号

绝密

文本第1号

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今天我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信函：一是援建51项工程和3个军事工业科学研究所；二是援建乌鲁木齐至苏中边界铁路段。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说，回到北京后的头几天，我就想拜见他(毛泽东)，陈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有病，他不得不推迟

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在共产国际中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作为共产国际不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实例。毛泽东援引了以下情况：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

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王明的“左”倾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大一点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保存下来，因为王明的影响还没有扩展到那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掩护，实际上力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基地，反对把所有各阶层的居民联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固联盟”之类的口号。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也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立场上。毛泽东说，过去王明所有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

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 [56]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而且与我们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

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 this 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我要求派一名苏共中央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国来

熟悉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审阅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事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将它们出版。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而没有依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道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七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生与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们两个国家里，许多东西来自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关于对被告施行体罚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讯时广泛采用殴打。毛泽东说，当时我本人就是毒打被告的见证人。早在那时就已通过了禁止体罚的相应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在延安也屡遭破坏。的确，我们竭力不许非法枪毙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继续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继续说，显而易见，按照事物的逻辑，殴打时被打的人开始提供虚假的供词，而审问者却把这种供词当作真话。过去资产阶级传给我们这种和其他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会长期保留。追求排场、门面和大规模隆重庆典，这也是资产者的心理残余，因为在贫农和工人阶级身上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习惯和心理。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或那种错误产生的条件，这种错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除了这些以外，斯大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知道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说道，在浏览列宁的手稿时，他确信即或是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删去并重新写上这些或那些句子。毛泽东在结束自己对斯大

林的评价时，再一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

总的来说，他着重表明，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代表大会后形成的气氛，也有助于他更加自由地对一系列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好在苏联共产党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否则我们将难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主动。毛泽东说，预计米高扬同志来时，将进一步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在合适的场合也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及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然后毛泽东从这个话题引开，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简短触及某些哲学问题(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着重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连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包括中国报刊，仍然不符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报纸上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严肃的理论论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表示愿意再次和我见面，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关于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唯独中国暂时沉默不语。

随后我向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16名苏联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以及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二十大的理论会议的情况。会上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将作报告。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这一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极佳，经常开开玩笑。

出席谈话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23064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5日)

绝密

文件第1份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年4月5日

第271号

致苏共中央

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兹呈递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所写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共计19页，其中13页(机密)，其余6页(非机密)。

中国科学、文化问题苏联专家组组长

A.马尔采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4月29日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苏联专家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本学年初，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只有一位苏联专家——马列主义基础大学教师П.Я.阿列什金副教授。1955年9月末大学俄语教师B.C.索科洛娃同志来北京工作，而俄语教师H.И.梅利尼科娃同志是在同年10月中旬来第二分校工作的。10月底，我们小组又补充了一批新专家翻译——Д.В.彼得罗夫和A.B.卡罗米耶茨等同志。12月初，女翻译З.В.季米娜也来这里工作。12月末，第二分校来了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大学教师M.И.库兹涅佐夫同志。总之，如今我们小组共有七位专家。

我们专家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苏共党员，拥有高等学历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并具备必要的实际工作经验。

从前，高级党校第二分校的苏联专家们均是第一和第二分校联合顾问小组的成员。1955年12月，该联合顾问小组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小组，从那时起П.Я.阿列什金同志便被任命为在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高级顾问。

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实际活动均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决议以及党委、党支部和科学文化问题高级顾问的指示为指导。与此同时，该专家小组还充分利用了苏联专家们在国外复杂工作条件下所积累的积极经验。

在实际工作中，小组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帮助听众——日本共产党未来的党和理论部门的干部们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该小组还把帮助社会学教研室教师集体更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理论和培养助教们的独立教学工作能力当作自己的任务。

去年，第二分校在教学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社会学教研室，从而形成了3个教研室——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在将教学办公室改组为教研室的过程中，通过局部考查的方式将部分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员补充为助教。因此，如今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的有30名助教。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数量同上。上述两个教研室的绝大多数助教过去都没有科研教学工作经验，几乎所有助教以前都没有学过马列主义基础教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工作面临巨大困难，并成为我们完成自己肩负任务道路上的严重阻碍。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开展必要工作以改进全部教学模式，提高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各教研室的工作进行策划和组织。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为了改进全部教学法工作模式，提高助教的工作技能，我们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1.利用苏联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教学法委员会工作的积极经验，我们建议在第二分校各系组建教学法委员会。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为组建教学法委员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无疑改善了各种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促进了大学教师们教学技能的提高。

2.根据我们的建议，首先制定和批准了提高助教技能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按照一系列最重大马列主义科学课题给每位助教安排一位苏联专家为导师。该计划所列课题具体包括如下：“坚不可摧的工农联盟——共产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苏联共产党为赢得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兄弟

合作的基础”。

3.为了培养助教独立教学工作的能力，我们建议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让助教们独立承担个别课程的备课和讲课实践。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于是，在上一学期的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助教们讲了几个课时。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方法是有效成的，因此在本学期我们将继续坚持此类教学实践。

4.俄语教师B.C.索科洛娃和H.H.梅利尼科娃等同志编制了新的俄语教研室工作计划。该计划被校方采纳。她们还建议开展各种课外俄语教学活动。

5.我们建议第二分校的校长有必要把“日本问题”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将工人革命史和日本共产党史作为这门课的基础课。只是由于目前学校里没有必要的专家，才未把该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如今，校方已完全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把“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入第二分校教学计划的建议。该课程将从新学年开始讲授。而且，学校还决定将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哲学教研室。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根据我们的建议，为纪念全体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生活中的一个著名日期——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整个分校集体举行了专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几场报告，其中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揭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影响。为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而举办的这次会议无疑是第二分校整个集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本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分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俄语专业班——目的在于培养熟练的翻译人才骨干。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旨在更深入地阐述历次苏共中央代表大会、讨论会和全会等历史性决议。在社会学教学中我们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讲课内容和课堂讨论活动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以及日本共产党当前所要解决的实际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当然，在解决这一极其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承受，并将继续承受巨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尽量与助教们一起开展课堂讨论活动，在讨论各种理论原理的同时，又尽量将其与这方面的一定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而助教们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得到了相应的训练，并将之运用于自己在科研小组的实际工作之中。为此，我们还与助教们举行了关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座谈会。其间我们指出，苏联共产党为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成功建设而进行的斗争，是落实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典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完美经典范例。虽然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方面，仍没有完全剔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死记书本)的因素。例如，我们一年级和二级的助教们所开设的讨论课以及学员们在考试和考查过程中所作的答案等，均说明了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分校有一个规定。据此规定，所有教案都要在授课前呈交教研室并翻译。在第一学期，马列主义基础课已讲授了19课。如今，为了整个完成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仍需要就第13题目和第14题目讲授15个课时。

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共有8课。由于长期缺乏苏联专家，政治经济学课都是由助教备课和讲授的。在编制教案的过程中，助教们除使用我们建议的学习政治经济学必备的参考书籍外，还借鉴了在高级党校第一分校代课的B.H.多库金教授的讲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们基本上胜任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在这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定期举办与助教们的讨论会。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第二分校副校长迟克昌同志。

如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章节的授课已基本结束。此类重要章节的课程——如“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讲授，实际上只剩一年时间。原因在于，以前派来的政治经济学专家M.Л.萨济科夫同志没有完成教学计划，他两年时间里只讲了一个章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就这

还没有教完。因此，我们现在只得重新安排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计划，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

简单说一下授课情况。我们在讲课时并不完全读教案，这项工作由翻译来完成。一般情况下，校长承担最重要章节的课程。总之，在讲课期间，我们会加入一些以前撰写的补充材料。当然，此类授课需要事先与翻译做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还想说的是，翻译对我们的授课速度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授课速度不能太慢，因为这必然让听众感到乏味，但又不能太快，讲得过快，学生们就不总能有条理地把课程中一些最重要的原理记下来。

9月份，我们重新恢复了俄语翻译班的学习活动。最初，只有B.C.索卡洛娃同志给学员上导论课，随后又来了H.И.梅利尼科娃同志。这个班共有29人，他们被分成了两个小组。在这个两班组工作的还有一些懂日语的日本教师，他们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主要是比较深入地学习了俄语的语法。与此同时，还继续学习了俄语的语音和语汇。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我们还就如下题目撰写了辅助参考资料：“词的构成”，“名词”，挑选了87篇文章来做语法练习。上述工作由B.C.索科洛娃同志负责。H.И.梅利尼科娃继续与学员一起从事俄语词汇和语音的学习工作。其间，她还备了俄语阅读课，其中包括：从A.C.普希金和T.Г.舍甫琴科传记中节选的文章，A.C.普希金的诗作——《恰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节选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文章，关于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关于苏联宪法等方面的诗歌、散文和文章等，并在报刊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俄语教师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学员们所掌握的词汇量不够，语法术语掌握得比较差，因此无法在被要求的一个小时之内完全看懂如此大量的教学资料。鉴此，苏联专家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对学员的词汇、语音和语法术语学习给予特殊的关注。

在向学员教授语法的过程中我们更重视语汇学习，并根据学员所学词汇选择练习资料。

在这一学期里社会学教研室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下方面：提高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教学的思想理论水平，尤其是注重把课堂所学和讨论课活动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相结合。与此同时，各教研室还重视助教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技能的提高。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系统地听取和讨论了助教们就如下一些重要问题所作的理论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苏联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工业化的大会。共产党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合作化”，等等。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多次讨论了关于讨论课、辅导和其他教学工作模式的方法问题，并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各教研室系统地研究和批准了针对学员的讨论课计划，听取了助教关于个人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其他问题的报告。

第一学期，在教研室的领导下社会学各教学办公室也在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帮助学员独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系统地开办了辅导课和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并组织了各类教案直观教具的展览。

上学期，所举办的此类展览有：纪念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

如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各教学办公室正合力举办一个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展览。

自高级党校第二分校成立之日起便设立了一个翻译部，并拥有一些自己的翻译人员。还在我们工作开始初期，我们便意识到，鉴于翻译任务比较多，现有翻译人员不足以保证学员们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共中央历次代表大会、全会和学术会议所作决议、决定”以及其他最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于是，在当时召开的顾问小组会议上，我们便决定向校长提出关于有必要邀请新的苏联专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当赴莫斯科访问时，校长闻山(Вень Шань)同志便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这一问题。后者满足了这一请求并向第二分校派遣了三位翻译。

最初，在第二分校翻译部工作的有三位苏联专家——Д.В.彼得罗夫、А.В.卡罗米耶茨和З.В.季米娜。彼得罗夫于12月份被调走从事其他工作，因而如今直接在翻译部工作的只有季米娜和卡罗米耶茨。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联专家兼翻译所做的工作如下：季米娜同志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世界垄断国际联盟的经济分裂”(共计30页)译成了俄文；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夫等同志一起编辑校对了译自俄文的斯大林的讲话“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夫等同志编写了1954—1955年间在苏联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和专著等图书的目录；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卡罗米耶茨同志翻译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六个讲座和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斯大林著作“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俄共(布)十七大和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决议的编辑校对工作；参加了关于1954—1955年间苏联出版的期刊和志著的卡片索引的编制工作，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方面的活动。

彼得罗夫同志把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共计29页译成俄语，与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了如下著作俄语译文的编辑校对工作，具体包括：俄共(布)十七大和俄共(布)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通过的决议，И.В.斯大林的上述发言；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在第一学期期间，本小组成员还开展了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的工作。阿列什金同志继续研究如下课题：“工农联盟——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石”。去年，该课题部分成果在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85周年集刊上公开发表。

彼得罗夫同志研究的课题是“日本人民要求伟大邻邦：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季米娜同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在翻译政治经济学讲座的过程中，她再次通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卡罗米耶茨和索科洛娃等同志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小组成员对所在国作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参加中国同志为苏联专家所办的讲座，参加旅游活动，学习《友好报》上所刊登的材料。不过，目前我们小组成员对(中国)内部刊物上所刊登的资料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几项实际性建议：

1.为了我们事业的顺利进行，应当实践如下举措：关于一些极其重大而尖锐理论问题的课程的备课工作，开展创造性集体讨论；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方面应重视把讲课和讨论课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

2.在将培养助教的独立教学能力作为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之一的同时，必须制定助教培养的两年制计划，其中包括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提高这些未来讲师的学术理论水平和教学法素养。

3.为了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有必要就苏共二十大资料问题举办顾问小组成员的理论座谈会。

4.为了进一步提高第二分校学员和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应当迅速将苏共二十大资料译成日

文。

5.应当安排针对所在国的学习活动以及关于日本当前形势的学习活动。为此，有必要为专家小组举办专门的报告会和通报会，以通报中国和日本等国内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

(苏联专家)小组组长

П.阿列什金

1956年2月20日

附录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第一学期测验结果

	优秀(%)	良好(%)	及格(%)
一年级	27.9	57	15.1
二年级	20.4	52	27.6
三年级	21.4	65.7	12.9 (俄语班和评议预科班)
四年级	22.5	55	22.5(机关领导)
	24.5	55.9	19.6

注：没有“不及格”。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1956年1月25日

发送资料3份：苏共中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档案室

经办：阿列什金

1956年2月28日

第331号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4, л.40-54

№31225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 (1956年4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4月5日

今天，周恩来前来谈柬埔寨的形势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我说，根据报纸消息判断，泰国政府和南越当局宣布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封锁。正如西哈努克所说，泰国和南越此举是为了向柬埔寨施加压力，迫使柬埔寨放弃完全中立。西哈努克表示，尽管存在外部压力，柬埔寨将继续奉行中立政策。

有鉴于此，我接着说道，对于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柬埔寨不加入军事集团、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愿望，我想知道他(周恩来)有什么看法。我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印度大使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还打算同印度政府就柬埔寨局势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答复说，最近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消息。周恩来表示，由于印度大使即将回国，他们没有同印度人就柬埔寨局势问题进行过接触。

根据中国驻河内大使的消息，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提交的报告中说，吴庭艳和泰国在向柬埔寨施加压力，争取迫使柬埔寨放弃中立政策。这位波兰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我们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柬埔寨局势极为复杂。美国人对柬埔寨施加了极大压力。实质上柬埔寨处于孤立状态。柬埔寨的外部环境不太好。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统治集团中部分成员对西哈努克的政策表示不满。但是，西哈努克在继续斗争，辞去首相职务只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西哈努克的继任者钦迪，在今年访问中国的柬埔寨代表团成员中按照资历排在第三位。钦迪亲近西哈努克。总体上，柬埔寨政府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外交部长由亲近美国的前驻华盛顿大使担任。这种任命，显然是为了维持来自美国的援助，美援掩盖了柬埔寨的大量财政赤字。

周恩来接着说，西哈努克在从中国返回后在公开演讲中对改善同中国和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寄予厚望。出于策略考虑，显然，他没有发生激烈言论。在此周恩来顺便提到，西哈努克的母亲是亲美分子，而他的父亲卡姆国王(Кам) [\[57\]](#) 处处顺从西哈努克，实质上并没有自己的路线。

西哈努克在访问北京期间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达成协议。现在，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期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的到来。暂时还未听到柬埔寨新政府就此问题通过了什么决定。接着，西哈努克从中国返回后宣布，周恩来将于6月访问柬埔寨。周恩来指出，实际上并未确定他访问柬埔寨的时间。有这样一种意见，应该等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看一下此行的结果。至于周恩来访问柬埔寨的问题，未必急切。

至于苏联政府对柬埔寨采取的措施，周恩来说，这些措施将是有益的。对此他指出，还应该听取印度就此问题的意见，看看事件的进展情况。周恩来补充说，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考虑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告知，老挝新总理宣布他的政府打算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通过印度向老挝总理转达了访问中国的邀请。这里指的是，由老挝政府自己选择访问中国的合适时机。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期待老挝新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如果老挝新总理梭发那·富马访问中国，我们将对老挝施加影响，周恩来说，将减轻柬埔寨的孤立状态。

周恩来表示，泰国的变化应引起注意，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摇摆不定，情绪在变化。该国有很多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又害怕美国人。众所周知，不久前，两个公开的和一個秘密的泰国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泰国政府逮捕了公开的代表团的成员，但随后予以释放。秘密代表团的成员都是与泰国政府有直接联系的人员。代表团就两国建交问题和开展贸易往来问题进行了谈判。代表团成员与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元帅有联系。秘密代表团成员在仰光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告知，不久前秘密代表团的团长、一位领导中泰建交的活动的家(泰籍中国侨民)和其他一些泰国政府的代理人死于空难。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搞的破坏活动。周恩来说，美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泰国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美国人不会袖手旁观，上述破坏活动只是例证之一。

周恩来指出，近来菲律宾的波动和巴勒斯坦的动摇已显露出来。这引起美国人的担心，他们极其粗暴地、以极端的斗争方式反击这些国家政策中出现的新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内部斗争将是长期的，因为那里开展反对美国统治的坚决斗争的内部条件尚未成熟。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应匆忙。如果我们急于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措施，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认为，应该逐渐地吸引这些国家

中一定的阶层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从事反对美国的独立斗争。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匆忙的话，可能会给上述活动家造成严重伤害。

在谈到今年3月26日和29日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人造液体燃料生产、地质勘探工作和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设工作进行援助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时，周恩来委托我转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同志的复函。周恩来表示，对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满足这些新的请求他们深表谢意。

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和铁路建设协定草案，周恩来再次对苏共中央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周恩来说，在对计算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后，他们得出结论：铁路的建设可以在苏联的少量援助下完成。为此，不需要向苏联请求贷款，因为可以使用商品结算。

周恩来告知，4月6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阿尔希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同他就该问题的协定草案进行了讨论。

我说，我会立即向莫斯科转交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和中国外交部随员方祖安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4, д.13, л.105-109

№02852 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1956年4月7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21日

第89/c号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1956年4月7日

14时，按照预先的约定，我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在谈话过程中，我向甘野陶通报说，我获悉不久前苏加诺总统与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情况。

然后，我说，根据得到的资料，在这次会晤时，讨论了苏加诺行将访问美国以及访美后他还可能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得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上述各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在总统行将访问美国之际提出苏加诺出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是不适时宜的。而且，这样做大概不仅想使苏加诺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推迟2—3个月，而且还怀有让这次访问在年内根本不可能进行的目的。

我问甘野陶，能否与我谈谈，是否知道这个问题。

甘野陶回答说，他也知道这些情况，他正准备向我通报这个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次会晤在10天前就进行了，上述各党的领导，尤其是社会党和国民党右翼代表反对苏加诺访问美国后立即去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总统本人现在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稍早一些时候，他曾声称，如果上述两个国家政府发出正式邀请，他愿意出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甘野陶强调指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总统的一位秘书普林戈迪格多(社会党成员)对苏加诺有一定的影响。

接着甘野陶告诉我，中国人从自己方面想利用苏加诺早先曾邀请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机会，设法推迟苏加诺访问美国。他们试图将宋庆龄访问印尼的日期与苏加诺打算访美的日期重合在一起，从而推迟他按原订计划出访。甘野陶说，他们现在正通过某些人士试探利用此计划的可能性，一旦他们得到某种肯定的消息，他们马上就会将此事转告我们。

对于这个计划，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提出要实现这个计划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苏加诺会推托行将访美，而建议宋庆龄在总统此行之前或之后访问印尼。

对此，甘野陶回答说，这是可能的，因此，他们现在正通过友方人

士查明实现此计划的可能性。

我询问甘野陶，是否知道印尼政府各界人士在议论要更改印尼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现行原则的意向。其中，我曾指出，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印尼政府有意要拒绝印尼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所依据的划拨清算。

甘野陶指出，的确有这些传闻，但据他所知，现在这个问题在政府内还没有正式讨论。

我说，如果这个变更将来被采纳，则对中国与印尼的未来贸易也是不利的。

甘野陶同意这个看法。

在谈话过程中，甘野陶向我通报说，中国使馆现在准备出版苏加诺总统绘画陈列馆彩色画册，并准备将画册作为礼品赠送给总统。

对于中国朋友的这个意图我很赞赏，并宣称，作为艺术，尤其是彩色写生艺术忠实爱好者的苏加诺将会接纳这份厚意。

在结尾阶段，我告诉甘野陶说，昨天接到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雅加达市长和印尼议会发的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信。

谈话持续了两小时。在谈话中中国朋友设便宴款待。

出席此次谈话的有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Ю.Ф.帕尔菲奥诺夫和中国大使馆李翻译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

АВРРФ, ф.091, оп.12, п.10, пор.4, л.13-15

№02853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1956年4月9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21日

第88/c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拜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

1956年4月9日

按照预约，今天19时通过外交部礼宾司在总统府拜会了苏加诺总统。

我表示，请总统接见我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我国政府的委托，向总统递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邀请总统于1956年夏天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信函。

总统看了邀请信函内容之后表示，邀请使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期待着访问苏联。总统强调说，他认为对他来说收到这样的邀请是很大的荣幸，并请我尽快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主席团转达他对邀请的深情谢意。

苏加诺表示，他接受邀请，并在他方便时根据邀请前往苏联并在那里会见苏维埃俄国的人民和领导人。

我在回答总统的话时说，我将立即将对邀请的感谢和同意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谈话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我国政府。我自己表示希望就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信函中所说的那样，总统的访问能够促进两国相互关系的发展，他将利用这次机会了解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苏加诺在回答我的话时表示了他感激之情。

我使总统想起了我早就向他说过的话，即他的名字——印尼人民忠实的儿子和印尼独立斗士的名字——在苏联众人皆知。我指出，总统在访问期间会亲自结识和接触苏联人民，这将大大促进两国间友好往来的扩大和巩固。我同时还补充说，我作为苏联公民，非常高兴总统同意访问苏联并结识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总统指出，就像他在这次谈话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在他心中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苏加诺说，如果他不当总统的话，他早就访问了苏联，当然要苏联政府同意，但由于他占着总统的岗位，所以他无法实现这一点并要等待正式邀请。苏加诺说，现在得到了官方的正式邀请，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

苏加诺继续说，当苏联驻印尼临时代办E.T.扎布罗金同志以正式方式告知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打算邀请他访问苏联时，他对扎布罗金的回答是最好等新政府执政，因为当时的伯汉努丁·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会很快就同意他访问苏联。总统再一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因此，总统说，他将正式邀请推迟到新政府成立。

总统说，就在同扎布罗金的这次谈话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然来到印尼，并出其不意地邀请他访问美国。苏加诺说，由于美国表示要他在5月中旬访美的愿望，所以他担心他今年夏天的苏联之行不能如期进行。谈话结束时他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苏联的夏天持续到哪个月。我回答说，根据总统与扎布罗金临时代办谈话时表示的愿意在暖和季节访问的意见，我想对总统的苏联之行来说，最好的时间是6月底和7月，因为这是苏联所有地区如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乌拉尔等地区最暖和的季节。我补充说，这个季节通常很少下雨。我提醒总统，就像他在他所熟悉的那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是在6月底访问苏联的，在尼赫鲁访苏的整个过程中，天气一直很好，而7月份天气会更好。

听完我的话后，总统沉思片刻问道，9月份我们不会感到冷吧。

我竭力消除总统的顾虑，说8—9月一般来说都是好天气，是舒适的暖和季节，因为从天文学讲，我国的夏天于9月22日结束。

听完我的想法之后，总统告知说，或许我已听说了，宋庆龄7月份要来印尼，他答应要像当年迎接印度女人拉克希米·潘迪特 [58] 一样迎接她。总统强调说，这意味着，他应亲自接待宋庆龄女士。宋庆龄离开印尼之后，总统继续说，他要用数周或至少数天时间加紧起草他在8月17日共和国成立11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稿，按传统他应亲自主持这次庆典。苏加诺还告知说，正是这个时候，即共和国成立庆典日子里，沙特阿拉伯国王将来印尼访问，根据礼节他应亲自接见他。苏加诺这样推算说，如果此后他立即去苏联，那也要到8月25号，他可根据与苏联政府的协

商在苏联逗留两周左右，因而总统问我，这期间苏联的天气对他来说是否合适。我表示相信，这个时间的天气将会很好，够暖和的。我随即补充说，既然总统了解一下苏联的农业，那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时正是我国的收获季节。

总统说，这样他将立即同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今天夜间就通知政府有关收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邀请和他想于8月底前去苏联访问的事。总统还说，他想非正式地告知我，中国政府也预先非正式地与他进行过协商，愿意邀请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加诺说，他正期待着近期内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邀请。苏加诺继续说，这样他将于8月底前往苏联并在那里度过约两周时间，9月中旬便可去中国。他听说这时间中国的天气很好。

我同意这一点并告知总统，中国9月的天气好极了，我自己有一次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过中国。

随后总统问我，他在访问苏联期间能否乘敞篷小轿车行动。

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完全可以。

接着我告知总统，如果他同意，我想预先就总统拟于8月底前往苏联、此事他还要与自己的政府协商的问题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

总统同意我的建议。

此后我说，总统眼下当然难以研究这次苏联之行的细节。但我想，总统在去美国之前能否告诉某些愿望，想访问苏联的哪些地区和设施，以便从各个方面了解我国的生活，如经济、文化、艺术、城市、加盟共和国等。这时我表示在提供咨询方面我完全听总统的，必要时可为总统出主意。同时我向总统赠送了莫斯科游览手册，请他在工作之余读一读并标出要参观的设施。

苏加诺对我表示了感谢。

接着我想起苏加诺在与我谈话时谈了要在苏联访问两周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他预先的想法还是最终的愿望，因为总统在苏联做客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能单方面决定多久或多少天。

苏加诺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两周时间是他预先计划的，没有考虑旅途时间。总统援引我的话，按照天文学，我们的夏天9月22日结束，原来他是根据这个日期决定的。此外，他还说，他从电影上看到，尼赫鲁访问苏联18天，吴努访问两周，并解释说，他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确定访问时间的。但苏加诺又说，如果他可能在苏联逗留比两周多的时间的话，那他对此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想参观，而且想学习一点东西。苏加诺说，但愿那里不冷，自己别感冒。

我请总统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到使总统不感到冷和不影响总统的健康。

苏加诺对我的话表示真诚感谢。

我对自己还要耽误一点总统的工作时间表示歉意，并请总统确定我同他详细商谈他这次苏联之行的计划的具体时间。

苏加诺重复说，他将于今天夜间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邀请和拟于8月底去苏联的事通知他的政府。总统说，明天，即4月10日，他将去苏门答腊，在那里住到4月11日至12日，4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将回到雅加达，4月12日他才能与政府商谈去苏联的问题，并表示希望4月13日我们就拟订他苏联之行的计划开始共同工作。他答应通知我4月13日会见的时间。

此后我问总统，他就上述问题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因为我想转入下一个问题。总统回答说，他对我有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要提，他认为这个问题我能够很快解决，我表示随时准备听总统的。

总统问，能否允许他在报刊上公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邀请。我在回总统时表示完全同意并欢迎他的建议。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表示，根据苏联政府的委托我想赠送给总统两部电影作为礼物。我说，我国政府知道总统是电影爱好者，因而委托我向总统赠送两部彩色电影：第一部是《乌克兰在歌唱》，第二部是被检察机关禁止的《勇敢的学校》，但我表示相信，检察机关的禁令不涉及国家元首。

总统对上述礼品表示深切谢意，并请我尽快给他提供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并说他已经看过一次，还想看一遍。我想这太巧了，我本想过

一会儿就告诉他这件事的。我表示我完全可以将我这里现有的关于列宁的影片作为礼物赠给总统。苏加诺表示感谢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意。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向总统作了如下表示：苏联政府计划将总统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在控诉》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如茂物会议结束时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万隆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印度尼西亚独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等，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出版社想就出版这本书和其他著作同总统商议得到总统的许可。

如果总统同意的话，出版社想在苏联出版这些著作之际请总统写一篇较短的致苏联读者的前言性说明。

苏加诺在回答上述请求时表示他无反对意见。这就是说，他同意将我上面提到的他的著作和讲话翻译成俄文并在苏联出版。他还表示，他不反对并非常乐意有机会写一篇短而简练的前言，他问需要何时完成这一工作。

我向总统表示感谢他同意翻译和出版上述著作并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在回答何时将前言交给我们的问题时我说，我很难回答总统何时将前言完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总统很忙，但表示希望总统尽快写出前言。

谈话结束时，我向总统转赠有关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影集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缅甸、印度、阿富汗的讲话汇集。

总统在接受影集和汇集时感谢大使馆向他赠送出版物并说，他将高度评价和爱护这些书，将珍藏这些书。苏加诺说，他在睡觉之前要读一些大使馆寄给他的书，他将这些书放在自己的床头。

我对此说，我个人完全相信总统对苏联书籍的兴趣，在总统接见“火车头体育协会”的足球代表队并领他们参观总统府和自己的办公室时我就注意到了，我看到那里有不少苏联使馆赠送的苏联文艺作品。

谈话持续约一个半小时，是用印尼语进行的。出席谈话的有使馆译员沙尔莫夫。

№09840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6年4月9日)

机密

文件第3份

1956年4月9日

苏联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领土问题、禁运问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及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一、台湾问题

由于台湾地区形势趋于紧张，苏联政府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援助，并同中国政府协商采取一系列旨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措施。

1954年12月16日，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鉴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海特在1955年1月28日同莫洛托夫同志会见时声明，新西兰政府准备在安理会上提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英国政府“对这一区的危险形势深感不安”，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政府努力巩固远东和一切需要和平地区的和平，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并准备支持那些真正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假如美国在台湾地区停止它的侵略行动，那么这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形势的紧张。同时莫洛托夫同志提醒英国大使注意，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侵略行动，那么，美国便不敢采取这些行动。

1955年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安理会主席，要求迅速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动问题。

随信所附决议草案里提议：

- 1.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2.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3.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走美国的陆、海、空部队；

4.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不属于中国的武装力量容易地从这一地区撤走。

1955年2月4日，苏联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对调节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域周围形势感兴趣的国家在相应的会议上(在上海和新德里)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可与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建议由英国、苏联和印度倡议召开这次会议。

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让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的问题。英国追随美国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阐明于莫洛托夫在1955年6月联合国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言中和布尔加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发言中。

为企图证明自己台湾问题行动的正确，美国政府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之规定——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不止一次声明，它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根据是：按照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这些岛屿没有正式移交给任何国家。其中杜勒斯在1954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就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声明。

美国人还积极采取行动，替国民党保卫紧靠中国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群岛。根据杜鲁门的倡议，美国国会于1955年1月29日通过专门决议，扩大美国国民党“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

美国政府努力把金门、马祖岛问题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这表明美国政府企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放弃解放台湾才能把这些岛屿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步骤。这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1955年4月23日周恩

来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在万隆于1955年4月23日讲话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其中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预先条件提出了如下要求：允许国民党分子参加这次谈判，中国同意在台湾地区“停火”并同意把这一问题交安理会讨论，立即释放美国飞行员和其他被中国关押的美国人。

1955年5月26日，英外交大臣远东事务助理奥尔登指出，在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政权和同意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尔登还补充说，台湾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必能解决，要让美国改变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同意把该岛交给中国可能需要好多年。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中国代表建议讨论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取消禁运，为召开缓和和消除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的会议作准备；美国方面提出了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后，由于美国的过错，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国提出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是企图让中国放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而美国自己，为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从未打算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方面还不愿意就中美大使级谈判问题说出自己的确切立场。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是由它不想让远东现在扩大军事冲突的愿望决定的。英国人担心，这种冲突会导致亚洲英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削弱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严重破坏它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英国政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为哪怕是部分地调节台湾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与美国不同，英国主张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沿岸岛屿撤兵，毫无条件地把这些岛屿交给中国。根据所掌握的非官方材料，1955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伦敦召开了大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其中指出，如果美国军队因为金门、马祖岛屿卷入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不列颠帝国各国不支持这种干涉行动。此外，艾登在1955年3月下议院会议呼吁蒋介石政权自愿放弃金门、马祖。至于台湾，则英国和美国人一样，认为它的地位暂时还没确定。1955年2月11日，艾登在下院讲话时声明：“根据和平条约……日本放弃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交给了中国主权管辖。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台湾和澎湖

列岛从法律地位上来讲，属主权尚不清楚和没有确定的领土。”

英国人认为，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相左，非正式谈判需进行很长时间，台湾问题只能逐步调节。

在台湾问题上，英国人明显尊重印度的立场。而且英国人认为，由于印度奉行中立政策，它做中美之间的调停人要比英国好得多。

二、对中国的禁运

1951年2月1日在非法宣布中国是侵略者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委托当时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讨论对抗侵略所需的进一步措施，并给大会提出有关报告”。

美国代表团给委员会提出了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于1951年5月14日由委员会通过，并连同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交大会讨论。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制裁决议——《为对抗朝鲜侵略所必须实行的补充措施》。

苏联没有参加讨论制裁决议，也没有参与决议草案的表决。

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定之后，苏联在几届大会上没提出什么取消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该问题在国际会议上也没讨论过，只是被一般地提到过。如，莫洛托夫同志在1954年1月25日柏林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美国 and 同它有联系的国家在同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外贸关系问题上采取歧视性措施，还指出，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将起积极的作用，将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1954年4月29日，莫洛托夫同志在日内瓦会议上讲过禁运是非法的。

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16次和第17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为取消妨碍正常贸易发展的障碍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假若通过这一提案，那将意味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但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投票反对这一提案。美国和古巴代表在第16次会议上声明，说苏联的建议具有宣传的性质。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代表对苏联的提案没说任何反对的话，但认为这不合时宜。在日内瓦外长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同志在同麦克米伦会谈时(1955年11月4日)提出了必须取消对华禁运的问题。麦克米伦回

答说，英国政府一直关心着这个问题，在美中日内瓦大使级谈判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很快就能从减少禁运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禁运问题。

1955年11月13日，莫洛托夫同志在与杜勒斯会谈中提到了中国禁运问题。杜勒斯宣称，根据中国日内瓦谈判代表的提议，这一问题已列入谈判日程。但问题被推迟讨论，原因是美国首先期待迅速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其次，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讨论的问题——在台湾地区相互放弃使用武力，关系到禁运问题的解决。杜勒斯还补充说，如果中国代表重申自己有讨论禁运问题的愿望，那就毫无疑问，在谈判过程中将讨论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说，拖延解决禁运问题没有根据，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有重要意义。

在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关于今年1—2月英美华盛顿谈判总结声明中写道：“我们同意对贸易应当继续进行监督，从条件变化的观点看，为了使监督更好地服务于自由世界，现在对监督应该给予重新考虑，而且今后定期给予考虑。”

三、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国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于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这样，中国是这一组织的最初成员，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规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国际法通用准则，除国民党残余势力非法占领的台湾岛之外，对中国全部领土实行管辖。

被人民推翻并被赶到台湾岛去的国民党集团，失去了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人民的全部法律上的和实际的权利。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人民承认和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国际法的观点看，获得了在联合国和一切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人民的全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地彻底地主张让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

1949年11月15日，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剥夺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权利。

1950年期间，中国政府多次要求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联合

国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

苏联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要求，1949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声明支持中国政府11月15日的声明，拒绝讨论代表中国的国民党代表团的问题；11月25日，在大会政治委员会和1949年12月25日在安全理事会上，苏联代表团声明，它不承认国民党代表团的代表性，不承认根据国民党集团的要求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苏联联合国代表团在以后历次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上，都坚定不移地提出把关于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方案。

在第九和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捍卫旨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人权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委员会、贸易监护委员会、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国家经济委员会、维护和平监督委员会)工作的苏联代表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代表关于从联合国一切组织中驱逐出国民党分子和中国合法代表进驻联合国的建议。

1955年7月，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布尔加宁同志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列入不能再拖的问题之中。

在同美、英、法代表团就远东和亚洲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时，苏联代表团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

在同印度、缅甸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过程中，苏联政府也提出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个问题还反映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印度总理于1955年6月22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以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时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

资本主义国家在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

美国政府力图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但由于国际形势

的变化，美国人力图拒绝把蒋介石分子驱除出联合国和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论据”也有所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务院于1950年2月10日专门发表声明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其中写道：美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已指示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投票反对所有旨在剥夺蒋介石代表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里所占席位的提案。同时美国代表宣称，在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不行使否决权，说这一问题是程序问题。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积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借口说中国是侵略者。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美国代表为给美国不想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找理由，曾拿中国领空事件作新的借口，拒绝中国在联合国的范围里就台湾海峡“停火”问题进行谈判。

1954年7月15日，美众议院赞成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表示支持总统“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心”。

近来，美国民主党的代表表示赞成“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某些美国活动家认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应该让给印度、巴基斯坦或某一亚洲民主国家。

1955年9月，在第十届联大上，美国代表团提出并通过了决议，其中宣布，联合国大会决定“在今年第十届大会上不讨论任何关于驱除国民党代表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

英国

英国表示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决，因为它怕加剧自己同美国的分歧。

英国政府的代表通常说，他们不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但他们的所有声明都伴随有各种保留条件。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理由是，中国新政府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承认。后来英国政府声明说，被宣布为“侵略者”的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有在朝鲜战争停止以后才能讨论。

根据非正式情报，1955年1月底至2月初，在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艾登宣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解决远东的问题，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国应能尽快在联合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用艾登的话说，实现这一点现在还有许多阻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朝鲜、印度支那的行动以及解放台湾的行动。艾登认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的活动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这个国家居民的少数共产主义者没有共产主义渗透的基础，那么在马来西亚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所有这一切，用艾登的话说，造成了对中国政府真正意图的不信任。

在第十届联大上，英国支持美国的提案——联合国大会推迟讨论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

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报告，英国人现在仍奉行拖延立场，借口在美国竞选揭晓之前讨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是时候。

法国

印度支那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法国开始倾向于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根据非正式消息：1955年4月，法国外交部给法国国外大使一封信，其中说，法外交部致力维护和平和使远东形势正常化。其中包括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信中还指出，应提醒中国政府，爱好和平的国家期待它让人放心，它不采取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的行动。

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提案的前景

在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赞成中国在联合国有代表席位的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反对美国不在第十届联大上讨论中国代表席位问题方案的有13个代表团(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挪威、丹麦、南斯拉夫等)，6个代表团弃权(阿富汗、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色列)。

由于1955年联合国接受新成员国，开除国民党分子和邀请中国代表的提案还将受到以下国家的支持：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还可能指望菲律宾和柬埔寨也支持这一提案。

近来在联合国代表团中间，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样，有理由认为，今年的形势更有利于在例行的第十一届联大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顾问

М.贾丕才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二等秘书

И.卡拉布霍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4, д.51, л.9-20

№23027 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56年4月9日)

译自中文

致部长会议第一书记米高扬同志 [59]

——来自中国吉林省白城新区铁路小区江培武(Цзян Пэй-у)的信

尊敬的米高扬同志！

我们对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学习活动。但是，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因而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我们不明白，既然苏联政府和您早在10多年以前便已了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的危害性)，那么为何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才被提出？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涉及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被提出的有点太晚了。(当然，你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请原谅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相应的资料。

我们知道，您很忙，但我们很了解这个问题，您即使给我们一个简短的答复我们也会感到满足的。

江培武

1956年4月9日

№09836 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1956年4月1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大使馆同意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意见，《共产主义中国和老大哥》一文的作者歪曲运用中国报刊引文，企图表明，似乎在中国某些居民中存在对中苏合作的不满。其实对这一合作表示不满的仅是个别落后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他们所反映的根本不是中国居民任何一个阶层的意见。

文章中经常引用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对苏联的态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众所周知，在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些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

文章作者诬蔑中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企图在两国关系中制造障碍。

同时，文章的内容充分表明，美国有些机关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国内形势以及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他们详细地研究中国的报刊。

通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有人在仔细地注视着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活动，注视着他们同中国同志们的相互关系。而且，我国专家稍有失误便会立即被他们用来进行反苏宣传。

大使馆认为，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无需对文章中的荒谬意见进行批驳。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4, д.49, л.50 51、75-76

№21460 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1956年4月1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年4月11日

第308号

苏共中央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翻译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就其政治和业务素质本不应该准许他与中国同志一起工作。工作浮夸，由他编辑的翻译稿质量低下，经常违反劳动纪律，缺点在于爱说废话、阿谀奉承和讨好上司。在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之际，他晚上与中国同志一起喝酒，结果酒喝得太多，以致第二天没来上班。与中国同志之间，比如对杂志社领导师哲和张扬(Чжан Янь)，毫不拘礼，极为放肆，明显地是想在他们面前赚取廉价的名声。

1956年4月4日《人民中国》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欧阳飞(Оу Ян-фэй)在与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同志谈及济科夫斯莫洛夫的工作问题时说了以下内容：“最近发现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有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他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对待译稿的编辑工作疏忽和不认真，在帮助中国翻译提高业务水平方面能力较弱，不注意发现中国翻译同志的错误，不为他们总结工作经验。有关他对译稿编辑的草率的态度已向外国文学出版社社长吴文涛同志作了汇报。”欧阳飞同志同时还说，在济科夫斯莫洛夫以前曾来工作的苏联专家波斯佩洛夫给他们的帮助要多得多。

我们认为中国负责人欧阳飞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止一次地与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就他的工作和行为进行谈话，但我们的教育方法对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将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从中国撤回，派遣政治上成熟、业务水平高的中文翻译来取代他的位置。

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A. 马尔采夫(签名)

《人民中国》杂志社苏联顾问组长

1956年4月11日

发送2份，送：收件人，归档

经办：西季赫缅诺夫

送文：菲拉托夫

第569号

手写批注：

急件。送谢尔巴科夫阅。请准备提出建议..... [60]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15-16

№20378 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 建企业清单(1956年4月12日)

机密

第021/2576号

1956年4月12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中)两国政府所签署的相关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一系列企业。兹发给您具体关于这些企业的清单。

该清单的编制参考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给苏共中央的建议：关于缩短工程设计的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对156个援建企业中的一些企业进行扩建；应周恩来同志于1955年12月9日所提出的请求(再)建设几个新企业，等等。

附件共计11页，另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K.科瓦利(签名)

附件：

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及设备的企业清单

(截至1956年4月10日的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1	鞍山,鞍山钢铁厂,年产生铁 250 万吨、钢 320 万吨、轧钢 250 万吨	1950—1958 年
2	本溪,钢铁厂(重建及改建)	1950—1956 年
3	武汉,钢铁厂,年产钢 120 万—150 万吨	1954 年一季度—1958 年
4	包头,钢铁厂,一期工程年产钢 120 万—150 万吨	1954 年一季度—1959 年
5	吉林,铁合金厂,年生产能力 4.35 万吨	1952 年—1955 年上半年
6	齐齐哈尔,特殊钢厂,一、二期工程年产钢 30 万—35 万吨	1952—1959 年
7	大石桥,菱镁矿厂,保证年产 600 万吨钢的供应	1952—1957 年上半年
8	承德,热河钒钛矿,改建后年产钒钛精矿 13 万吨、钒铁 1 000 吨	1954 年二季度—1957 年
9	超厚特殊合金钢厂,年生产能力 40 万—50 万吨及 7.5 万千瓦热电站	1956 年二季度—1962 年
10	太原,特殊钢厂生产热轧、冷轧钢板及钢管车间,年生产能力 35 万—40 万吨	1956 年二季度—1961 年
11	抚顺,铝厂,(一、二期工程)年产铝 3 万吨	1950—1956 年
12	哈尔滨,铝合金厂,年生产能力 2.5 万—3 万吨	1951—1958 年
13	白银,有色金属厂,年产铜 3 万吨	1954 年四季度—1958 年上半年
14	东川,开采及加工铜矿的有色金属厂 ^[1]	[2]
15	会泽,开采及加工铅锌矿的有色金属厂 ^[3]	[4]
16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年生产能力 6 万吨	1954 年四季度—1958 年
17	株洲,硬质合金厂,年生产能力 50 万吨	1953 年三季度—1956 年
18	个旧,锡厂,年产锡 3 万吨	1956 年三季度—1959 年
19	杨家杖子,钼矿,一期工程年产精钼 7 000 吨	1953 年三季度—1957 年
20	江西安源,钨矿,年产精钨 3 万吨	1954 年二季度—1958 年上半年
21	佳木斯,金属网厂,年产金属网 6 万平方米	1951—1955 年
22	吉林,电板厂,年产电板 8 000 吨	1951—1957 年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23	铝镁粉厂,年总产量3 500—4 000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一季度
24	佳木斯,敦山一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5年
25	佳木斯,兴安台10号煤矿,年采煤150万吨及洗煤厂	1951—1958年
26	西安,中央三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5年
27	阜新,平安五号竖井,年采煤150万吨	1951—1956年
28	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年采煤300万吨	1951—1955年二季度
29	山西,潞安煤矿,年采煤12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0	山西,潞安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1	阜新,新邱六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7年
32	潞安四号煤矿,年采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33	潞安四号煤矿洗煤厂,年洗煤200万吨	1956年三季度—1960年
34	大同,北土窑(Boitryao)煤矿,年采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5	焦作,中马村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36	佳木斯,兴安台二号竖井,年采煤9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37	峰峰,潘家口(Homonoo)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38	陕西,王石凹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8年
39	通化,王帽(Bauro)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4年三季度—1958年
40	平顶山一号煤矿,年采煤120万吨	1956年四季度—1959年
41	峰峰,通顺竖井,年采煤9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9年
42	佳木斯,双鸭山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50万吨	1953年四季度—1957年
43	淮南,八公山,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0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44	峰峰,峰峰中央洗煤厂,年洗煤200万吨	1954年一季度—1958年
45	抚顺,采煤厂,年采煤1360万吨 ^[3]	1955年一季度—1958年 ^[4]
46	广东茂名,露天开采油页岩矿场两处,年总生产能力2 200万—2 40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47	阜新,阜新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0—1958年三季度
48	抚顺,抚顺热电厂,容量17.5万千瓦	1950—1958年二季度
49	吉林,丰满水电站,容量51万千瓦	1950—1958年
50	太原,太原第一热电厂,容量7.4万千瓦	1950—1956年一季度
51	太原,太原第二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4年四季度—1957年二季度
52	西安,西安第一热电厂,容量4.8万千瓦	1950—1957年一季度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53	西安,西安第二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4年三季度—1958年三季度
54	郑州,郑州热电厂,容量1.2万千瓦	1950—1952年
55	重庆热电厂,容量2.4万千瓦	1950—1952年
56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1—1958年三季度
57	吉林,吉林热电厂,容量15万千瓦,及北方变电站	1952—1958年二季度
58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热电厂,容量7000千瓦	1950—1952年
59	大连,大连热电厂,容量2.5万千瓦	1953年二季度—1954年上半年
60	兰州,兰州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3年下半年—1958年三季度
61	石家庄,渭水热电厂,容量2.4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62	武汉,武汉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63	包头,包头第一热电厂,容量22.4万千瓦	1954年一季度—1959年二季度
64	包头,包头第二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4年四季度—1958年一季度
65	株洲,株洲热电厂,容量1.2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7年二季度
66	成都,成都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7年四季度
67	洛阳,洛阳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8年二季度
68	佳木斯,佳木斯热电厂,容量2.55万千瓦	1953年—1957年一季度
69	个旧,个旧热电厂,容量1.6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70	北京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8年二季度
71	洛阳市西,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电站容量90万千瓦	1955年上半年—1962年
72	广东,茂名热电厂,容量25万—30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60年
73	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8年二季度
74	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9年一季度
75	青海,西宁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6年四季度—1960年
76	本溪热电厂,扩建容量7.5万千瓦	1956年二季度—1959年一季度
77	抚顺,页岩制油二厂热电站,容量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9年一季度
78	太原,化工厂,年产硫酸4万吨	1951年下半年—1956年
79	吉林,有机合成染料厂,年产硫酸4万吨	1951—1956年
80	吉林,合成氨厂,年产5万吨	1951—1956年
81	太原,氮肥厂,年产氨5万吨	1953—1959年
82	兰州,氮肥厂,年产氨5万吨	1953—1958年
83	吉林,碳化钙及氮氯化钙厂,一期生产能力6万吨	1952—1956年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84	兰州,合成橡胶厂,年生产能力 1.5 万吨	1953—1958 年
85	有机合成厂,年总产化工品 30 万吨	1956 年二季度—1962 年
86	塑料厂,年总产能力 3.7 万吨	1956 年三季度—1962 年
87	四川,氟化合物厂	1956 年二季度—1962 年
88	兰州,炼油厂,年生产能力 100 万吨	1953—1957 年
89	抚顺,页岩制油厂(部分生产设备)	1956 年上半年—1960 年
90	茂名,人工液体燃料(页岩焦油)厂,年产焦油 100 万吨	1956—1960 年
91	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年产机械产品 6 万吨	1953 年三季度—1959 年
92	洛阳,矿山机械厂,年产设备 2 万吨	1953 年三季度—1958 年
93	兰州,生产 1.5 万吨的石油机械厂	1953 年三季度—1957 年
94	兰州,生产 2.5 万吨的炼油及化工设备制造厂	1955 年二季度—1958 年
95	哈尔滨,锅炉厂,锅炉压力 15—39 大气压,年产锅炉总生产率 3 600—4 000 吨蒸汽/小时	1951—1959 年
96	哈尔滨,汽轮机厂 一期工程——生产 6 000 及 12 000 千瓦的汽轮机总容量为 36 万千瓦,可扩建到 60 万千瓦,以生产容量为 2.5 万千瓦及 5 万千瓦的汽轮机 二期工程——补充生产电站用的 1.2 万—2.5 万千瓦汽轮机,年总容量为 24 万千瓦并生产 1 万—3.6 万匹马力的船用汽轮机,年总功率 56 万千瓦	1951—1956 年 1955 年一季度—1959 年
97	哈尔滨,电机厂,建设生产 6 000—12 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年产容量 60 万千瓦的车间,并能制造容量 5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1953 年三季度—1958 年
98	武汉,重型机床厂,年产 2 万吨	1953 年三季度—1958 年
99	沈阳,第一机床厂,年产 3 500—3 700 台金属切削机床	1950—1955 年
100	沈阳,第二机床厂,年产 1.6 万台金属切削机床	1953 年三季度—1960 年
101	长春汽车厂,年产吉斯(ЗИС)-15 汽车 3 万辆	1951—1956 年
102	成都,汽车厂,年产嘎斯(ГАЗ)-51 货车 10 万辆、ГАЗ-63 汽车 1.5 万辆及嘎斯(ГАЗ)-63A 汽车 5 000 辆	1954 年一季度—1960 年
103	洛阳,拖拉机厂,年产拖拉机 1.5 万辆	1953 年三季度—1958 年
104	大同,小型拖拉机厂,年产拖拉机 2 万辆	1955 年二季度—1960 年
105	洛阳,滚珠轴承厂,年产轴承 1 000 万套及备件 60 万套	1953 年三季度—1957 年
106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年产轴承 1 000 万—1 200 万套	1955 年上半年—1958 年
107	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年大修 2 000 辆汽车及 1 000 台发动机	1950—1952 年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108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年产保证3万台机床用的刃具及2万台机床用的量具	1951—1953年
109	沈阳,风动工具厂,年产1.5万台钻孔机及6000套风动工具	1950—1954年
110	沈阳,电缆厂,年产各种电缆12540千米及裸电缆1920吨	1950—1956年
111	哈尔滨,电镜表及计量仪表厂,年产60万只电度表	1952—1955年
112	北京,微型电子管厂,年产1200万个	1952—1955年
113	西安,电器及水银整流器厂,年产高压开关1.3万套、水银整流器25万千瓦	1953年第三季度—1958年
114	西安,油浸电容器厂,年生产能力达100万千瓦安	1953年第三季度—1957年
115	西安,绝缘材料厂,年生产能力6000吨	1953年第三季度—1957年
116	西安,高压电瓷厂,年产电瓷7000吨	1953年第三季度—1957年
117	自动电话交换机厂,年产10万台	1953年第三季度—1956年
118	哈尔滨,炭刷厂,年产100吨	1953年第三季度—1957年
119	北京,无线电厂	1955年8月至1957年一季度
120	船用铅蓄电池厂,年产蓄电池(合汽车蓄电池)9000吨(铅的重量)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1	小型专用电机一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2	小型专用电机二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3	小型专用电机三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4	优质(快硬)水泥厂,年产水泥5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125	佳木斯,纸浆及造纸厂,年产硫酸盐纸浆5.4万—6万吨	1951—1956年
126	哈尔滨,1.5万锭亚麻纺织厂	1950—1952年
127	石家庄,淀粉厂,年加工玉米3万吨	1953年第三季度—1956年
128	重庆,肉品联合加工厂,日屠宰猪3000头、牛50头	1954年第三季度—1957年
129	汉口,肉品联合加工厂,日屠宰猪5000头、牛100头	1953年第四季度—1956年
130	太原,橡胶制鞋厂,年总产量100吨	1953年第三季度—1959年
131	石家庄,抗生素厂,年产品链霉素50万亿单位、链霉素36吨	1954年第三季度—1957年上半年
132	兰州—阿克托盖段铁路工程	1957—1959年

注：

[1][2][3][4]生产能力及完工期限经调研后再定。

[5]包括企业现有生产能力。

[6]这是该厂东露天煤矿确定的期限，全厂完工期限待全套设计批准后商定。

部分项目、车间及装置

1	某一铁路站的机械集中连锁装置及路线控制装置	1953 年三季度—1954 年
2—3	液化氨装置 2 套	1951—1952 年
4	浓硝酸装置	1952 年一季度—1953 年一季度
5	东北电网(含调度站)	1950—1958 年
6—11	机车发电站 4 座及柴油发电站 2 座	1950 年
12	铁路支线工程	1951 年
13—14	2 所兽医医院	1950 年
15	医学院	1950—1956 年
16	教学医院	1950—1956 年
17—20	4 台无线电短波发射机	1950 年
21	船用电机生产车间	1955 年二季度—1958 年
22	煤气添加站	1956 年二季度—1957 年
23—25	3 座列车电站,每座容量 4 000 千瓦	1957 年二季度—三季度
26	京津段铁路工程	1958—1962 年
27	沙城—丰台段铁路工程	1958—1962 年

АВІРФ, ф.5, оп.30, п.38, д.164, л.96-108

№21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1956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4月13日会议第1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阿里斯托夫、波斯佩洛夫 [\[61\]](#))

米高扬同志关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缅甸、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情况通报。 [\[62\]](#)

(米高扬)

1.在大使馆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没有一名来自中亚的工作人员。

2.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语言掌握得不好(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3.大使馆里的设施条件很差。

4.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各部里的顾问人员(许多是多余的)。例如，没有必要向内务部派遣顾问。

这次旅行是非常有益的，是必要的。

米高扬同志的活动受到了赞扬。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22-25об

№21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4月13日会议第10号记录

绝密

关于1956年五一游行中国际革命工人运动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兹认为五一游行中应当仅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肖像。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该问题准备通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РГАНИ，ф.3，оп.14，д.14，л.26

№09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1956年4月16日)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四、此决议(草案)送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6年_月_日)

关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问题。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规定苏联科学院自1956年起，每年留出118个名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研究班学习，其专业同中国科学院协商确定。

二、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期限为8个月至2年。

三、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费用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的协定进行偿付。

四、责成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在1956年7月1日前为苏联科学院提供150人的宿舍，临时安置中国公民——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并于1957年8月1日之前按照同苏联科学院的合同为此目的建成400人的标准宿舍。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956年4月20日)

关于在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之事。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 ф.4, оп.16, д.42, р.3273, л.28-31

№31226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1956年4月17日)

摘自B.M.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

1956年4月17日

应刘晓同志的要求，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他们。

刘晓告知，今天他同缅甸大使进行了会晤。缅甸人说，中缅之间应该建立这样的关系，使之成为亚洲大国同小国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将对泰国和菲律宾产生影响，也将有利于改善苏联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在此，缅甸人明显暗示，中缅之间还没有解决边界问题，他说，过去苏联和土耳其之间在亚美尼亚地区也存在领土纠纷，导致苏联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紧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明显地促进了苏土关系的正常化。

莫洛托夫指出，缅甸的建议值得重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巩固同中立国家的合作，在这些地区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他又补充说，苏土边界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

刘晓说，4月18日他将前往中国参加中国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代表会议，两个月后返回莫斯科。他请我谈一谈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使关心的问题是：三个西方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什么变化？中近东的局势如何？为了吸引更多的亚非中立国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应该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表示，苏共二十大工作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大会召开后还没过多久，会后国际形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新变化。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延缓战争。正如苏共二十大会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在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增强。目前不存在不可避免战争。但是，由于战争危险始终存在，我们要竭尽全力去延缓战争。为此要强化我们的阵地，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阵地，需要吸引那些所有脱离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士站到我们一方来。我们所有的外交举措都是为了缓和国际形势，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和削弱帝国主义阵营。

首先，我们认为裁军很重要。在西方国家仍在武装时，我们不准备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这样做：持续开展争取裁军的斗争，同时不削弱我们的实力。我们打算裁减常规武器，同时着重发展连敌人都认为重要的武器：原子弹、导弹和空军。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英国期间向英国政府阐述了我们的裁军计划。如果西方国家不裁军，我们将独自削减常规武器。

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难以用似乎是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来欺骗本国人民。在西方经常流行这样的声音：说苏联侵略是没有根据的。其中，在前不久居易·摩勒和皮诺批评美国政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反映。

这样，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近年来，在印度、缅甸、埃及和其他一些对帝国主义大国有依赖的亚非国家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谴责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万隆会议就是上述国家形势的体现。苏联和中国同印度、缅甸、埃及及其他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

莫洛托夫告知，明天将刊登苏联政府对近东政策的声明。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努力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和表达对阿拉伯国家的同情。

刘晓说，他认为，美国人怂恿以色列侵略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是想加剧近东的紧张局势。苏联政策应该是致力于巩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寻找改善同以色列关系的途径。他问，他对苏联对近东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

莫洛托夫表示，根据苏联努力维护和平的总任务，我们不允许近东出现战争。我们想维护近东和平，保障该地区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此举也是为了保障阿拉伯国家的防务和独立。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在该地区的政策是另一种情况。对英国来讲，近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近东是英国同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时首先是由于近东是英国的石油基地，没有石油英国就无法生存。因此，英国人在近东是不会妥协的。至于美国，他们不同意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同时努力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他们怂恿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侵略行动，是为了显示存在战争危险，应该武装。同时，由于美国在亚洲人民眼中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担心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他们巧妙应付，试图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是同情阿拉伯人的。有鉴于此，正如报纸报道，美国人甚至似乎表示，近东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苏联的参与。

经济联系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现在正经历经济高涨时期。但是，这一有利局面不会长久。经济危机临近，这将为我们的经济措施和巩固我们的势力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亚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极为重要。

在我们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措施中，发展私人接触、社会组织合作和开展文化往来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措施中，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广播同英国广播站“BBC”已开始进行关于签订广播领域合作协定的谈判。根据互惠原则，资产阶级报纸可以在苏联出售。

刘晓说，看得出，报纸互售是不符合资产阶级集团心意的。

刘晓请求详细介绍一下法国和英国政策的新动向。

莫洛托夫指出，法国是大西洋集团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近年来，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法国(印度支那和北非)的势力明显削弱。有时美国企图取代法国的地位，这明显加剧了法国在这些地区地位的削弱。法国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在激化。我们并不指望法国会离开帝国主义阵营和同我们联合。但同时应该承认，法国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4月末，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居易·摩勒和皮诺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我们期待同法国改善关系。同时还应指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法国的立场与英国和美国差别不大。

至于英国，其政府声明说，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美国。同时，英国政府邀请苏联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英国同美国站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又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英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总那么顺利的，资产阶级报纸就谈到了这个情况。英国在殖民地统治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塞浦路斯、埃及、锡兰、马来亚)。因此，同美国相比，英国不得不推行更为谨慎的政策。英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政府代表团向英国提出了关于发展苏英贸易的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英国一些团体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采纳这些建议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商品存在出口管制，不克服这个障碍就无法开展贸易。

刘晓指出，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行动上保持更

大的步调一致，他问，为了进一步协调中苏在对外政策领域的行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应该就对外政策问题做更多的协调。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在协调两国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必须积极推动巩固文化联系、社会组织往来和私人接触的工作。

同时莫洛托夫问道：按照刘晓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中苏之间的行动协调呢？

刘晓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孤立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中立国家站到自己一边来。形势复杂，斗争也很艰巨。社会主义阵营在这场斗争中拥有优势，但尚未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需要更密切地协同我们两国的外交行动，事先计划，提前就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同意刘晓的意见，他说，应该考虑一些，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我们的步伐需要具体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问刘晓，对于改善他同苏联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联系、改善中国大使馆以及刘晓大使本人的工作条件他有什么愿望。

刘晓回答说，大使馆有了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他同许多苏联机构——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高等教育部、文化部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同苏联外交部，其中包括远东局联系最为密切。他(刘晓)会晤过许多部门的领导，同一些从事对中国经济援助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本人处处受到关照。

刘晓补充说，目前中国正在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他的要求很多，但苏联各机关，尽管存在困难，仍亲自与他会谈，充分考虑对待中国方面的问题，努力向中国提供援助。

莫洛托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就应该这样。

刘晓说，他将带回许多新闻，待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拜见莫洛托夫同志。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和中国大使馆二秘杨民志。

№11449 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 扩大会议情况(1956年4月27日)

摘自M.B.齐米亚宁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第014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桢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4月27日

我与大使馆参赞索科洛夫一起拜会了阮维桢同志。他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今年4月19—24日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工作情况。

阮维桢同志指出，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和越南劳动党的任务。全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中央总书记长征同志的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全会决议发表在4月27日的《人民报》上，长征同志的报告发表在4月28日的报纸上)。

他(阮维桢)奉命就全会的工作情况向我们通报。

全会开幕前十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将党员和非党人士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搜集并上报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想加深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认识、向广大党员作解释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二种是那些水平不太高，随着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打算分析自己的错误并在这方面求得帮助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三种是那些政治修养不高，对批判个人迷信不理解，思想认识混乱的广大同志提出的问题。至于非党群众，

许多党外人士说得很坦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尊敬斯大林，但现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他。他们认为，党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点的。

此外，还应当指出敌对分子的宣传。他们企图用攻击性的论断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员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不能相信他们。

越南劳动党中央必须考虑这一切。

全会在准备时决定只从整体上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不把个人迷信问题突出出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长征同志介绍了大会的总结，从总的方面报告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读了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全会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1.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及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同时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2.全会在苏共二十大决议，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越南劳动党集体领导实践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由长征同志宣读。报告分析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提出了劳动党内有无个人迷信实践活动这个问题。

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它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强大，巩固了国际安全。全会在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的总结报告时，还同时讨论了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革命的文件(文件已发往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全会一致指出，越南人民为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也反映在祖国阵线的纲领中。全会特别关注实现巩固越南北方、巩固越南和平任务的意义。全会指出，美国在南越的影响增大，必须提高警惕，反对美国的阴谋。

全会分析了越南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会考虑了这一形势后得出结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同时，应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柬埔寨、老挝和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扩大东南亚的和平这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越南民

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关于全会学习对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指示这一部分。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光辉未来将推动我们阵营的所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全会分析了越南在这方面的形势，指出必须重点发展农业和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开展完成1956年计划的竞赛。全会决定，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完成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密切联系。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完成经济任务。至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7—1959年)的指示草案，拟在最近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十次全会上讨论。全会还通报了长征同志在莫斯科和北京访问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通报了米高扬同志、陈云同志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全会一致拥护所有这些建议和意见。

全会的第二部分，即党的生活部分，讨论了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现状，发展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民主的问题，文化、艺术工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全会指出，劳动党理论工作水平很低，因为党很少关心。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缺点也反映在全会的决议中。必须指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首先是在越南条件下劳动党运用马列主义的经验和党的成就，劳动党对马列主义宝库所作出的贡献，尚未研究，还没有党史教科书，党领导以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反抗(殖民主义)战争的经验也没有加以总结。全会指出，必须加大纠正这些缺点的力度。

全会在讨论思想工作问题时指出，必须强调越南的特点，如过去是殖民地、国家落后，越南北方已经获得自由，面临南方的任务。如果说在越南北方，在培养干部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那么也不必为此而满足。作为执政党的劳动党，不能容许其成员屈服于主观主义情绪，过高估计成绩和脱离群众。胡志明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指示了这一点。

全会在讨论党的工作问题时强调了巩固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意义，决定检查在巩固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现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不许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迫害的指示后，认为有必要对在越南土地改革期间，进行的镇压有多大的正确性加以分析。以前决定镇压敌对分子，其中也包括用欺骗手法混进党内的党员。但是，开除出党的比例太高，已经承认

这一做法不正确。越南劳动党中央早在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已经决定审议省、县级的整党工作。中央代表分赴各地，还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有错误现象。例如前不久出版了一部名为《解放》的文学作品集。文集的作者们犯了一些思想错误。但我们不是批判其错误和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将作者非法逮捕。在对党组织进行组织整顿工作中，许多党员对这些活动产生恐惧心理，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则更惧怕。即使将他们留在党内，也不给予信任，他们工作时也提心吊胆。甚至对某些受到迫害的党员也应当恢复名誉，因为向他们提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土地改革的第4—5阶段，也迫害了一些党组织的书记，其中有些是依据攻击性的指控而被处决的。尽管这样的现象为数不多，但他们涉及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中央认为必须迅速纠正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

必须巩固国家机关的民主秩序。国会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选举。国会选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国家分裂成两部分，而国会当时是全国选举的。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商议，但现在必须提高国会的作用。例如涉及法律问题，国家并没有全面的立法。通过了许多命令，但他们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批准。

非党人士与党员一起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组成。他们是忠于人民利益的人士，但在政府的实际活动中，没有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拥护政府领导的行动，不提任何建议。

省县两级也不重视国会的作用。在抗战战争期间这些国会倒是经常开会，按期改选。但自从土地改革以来，当发现地主混进国会以后，大部分国会事实上也就没有开过会。全会决定责成政治局，准备关于各级国会活动正常化问题。经过检查土地改革的结果，也有可能同时进行各级国会的新选举，先在公社，后在省一级举行。全会高度重视巩固国家的法制，改善安全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我们认为安全机关的工作比较积极，但法院和检察院机构的工作却开展得不够。例如成立了特别人民法院，但他们不是隶属司法部，而属于土改委员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时滥用权力。尽管在短期难以做到全部工作中保障民主和法制，但全会还是强调应当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借口国家形势特殊，蔑视发展和巩固国内的民主秩序。

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意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文化和艺术问题。根据

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越南劳动党中央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和科学的作用，加强他们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应当更加注意千方百计扩大学校教育网，建立科研机关，例如在农业方面、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等。为此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全会特别重视讨论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迷信等问题。

全会理解，苏共二十大讨论党的工作时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大会指出，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们党应当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学习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原则。因此也有必要检查越南劳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党内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是否正确。

全会指出，从越南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1951年以来，党的领导一直实行着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根据党章的规定，召开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比规定的期限确实延长了一年。其原因是劳动党内正在开展从组织上巩固党的重大工作，因此中央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可能在1957年召开。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倒是定期举行。例如，根据党章，中央全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有时全会间隔达到8个月。中央全会即使在抗战时期也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定期举行。

涉及党的政策的所有原则性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党的领导遵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

全会经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全会决议已经指出了上述缺点。至于党、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待领袖，具体地说对待胡志明同志的态度，这样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是尊重领袖还是个人迷信？

全会一致指出，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表现是正确的。胡志明同志是党的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在过去(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都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我们党。在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刻，胡志明同志表现正确。在中央，胡志明同志尊重集体的意见。胡志明同志关心人民生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教育党员倾听群众呼声。胡志明同志非常谦虚，对此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胡志明同志非

常朴素，堪为人师表。最终可以说，党对胡志明同志没有个人迷信，胡志明同志也没有自我吹嘘和抬高自己。

但是，全会还是认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个人迷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亦有表现，尽管不具有任何严重的、系统的性质。例如，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夸大胡志明同志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做法正确。但在同时，我们对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不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经常说，有了胡伯伯，才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意识到还有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斗争。某些工作人员有时使用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场合不当，有滥用的现象。文学作品经常把胡志明同志当成神去描写。一首诗中写道：胡志明同志命令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胡志明同志说我们必胜，那必然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光荣归于领袖”之歌是这样唱的：“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农村举行的一些活动挂胡志明同志的像就跟神像一样。官方的招待会，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胡志明同志身上。

全会认为，如此个人迷信现象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特别是在南越，当然，全会认为存在个人迷信现象并决定纠正这些做法。否则，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强调。危急关头（领袖逝世）人民将不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而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表现时应当强调，胡志明同志是领袖，不能否认他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应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我们的胜利中的作用，培养正确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应当提高集体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尊重领袖与个人迷信区别开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全会决议已经谈到了。

阮维桢同志接着谈到，全会十分关注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全会前刊登了一些文章，如《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全会指出如下观点。斯大林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巨大的功劳。但在实际活动中，斯大林犯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自我吹嘘，由此导致了党内个人迷信现象的发展。斯大林背弃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将自己置于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这就为贝利亚及其走卒混进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推行其破坏活动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在晚期，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实际，在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犯了许多大错误。全会认为，斯大林同志最严

重的错误是错误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干部，首先是在1934—1937年间，毫无根据地迫害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关于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消息激起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的极大愤慨。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和进攻期间，在保卫苏联问题上麻痹大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也犯有错误。苏联共产党与南共联盟，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而变得不正确。尽管铁托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也是可以改正的。由于斯大林不正确的决定和贝利亚的中间作用，两国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遭受破坏。斯大林在指导国民经济中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农业上。斯大林无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人民生活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关心。除了上述错误之外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全会在讨论斯大林错误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和米高扬同志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的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也列举了一些事实。

至于斯大林同志的理论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尚无关于这些错误的足够材料。全会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当越南劳动党中央有了所需的材料之后再向全党传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决议对越南劳动党非常有借鉴。我们党应当检查自己，我们是否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有重大意义。例如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发展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不是减少了，而是尖锐了。

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斯大林，他的功劳大还是错误大？全会认为，不能机械地评价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客观地对待他的功过是非。在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全会在讨论时还提示了另一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领袖，怎么会在20年期间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呢？这一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全会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斯大林的巨大功劳，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热爱。但他将这种感情用于建立个人迷信和自我吹嘘的氛围，因此而犯了大错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苏共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氛围，致使任何人也无法指出他的错误。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和消灭贝利亚敌对帮派之后才有可能这么做。苏共中央从1953年就应当检查这一点，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才能保障集体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和

胜利。苏共中央在准备了问题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了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及时的、正确的。当然，做得早些更好，但这只是主观愿望，从前实现它没有客观条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认为，在苏联内政和外交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才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典范，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所有兄弟共产党带来好处。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不应当看作只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还注意到敌人的宣传。他们企图歪曲全部事业，并在今后歪曲现实。全会一致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敌人不可能这么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犯的错误更多，但他们永远不会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将苏共二十大解决这一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胜利，我们敌人的失败。敌人特别希望兄弟党和人民不相信苏联共产党。他们想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巩固剥削者的统治。但众所周知，每当共产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敌人总想利用这一点，但敌人总是失败。这次他们也必定失败。

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应当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

我们全会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全会一致并热烈拥护苏共二十大决议。全会的所有决议被一致通过。决定全会之后先在河内随后在各地和各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向非党群众传达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制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的计划。

我们对阮维桢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

由于他在谈话中提到越南劳动党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我方提出要求，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内容讲得具体一些。阮维桢同志通报了以下情况。

整顿党组织工作开始于195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定对领导干部和党员进行理论准备。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朋友在哪里，让他们树立正确的领导群众的作风。这些

措施从1951年年底到1954年年底已经搞过。我们将它看成是整顿党组织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视为从思想上整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领导机关的党委进行审查并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但主要还是从思想上进行整顿。

第二阶段是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其方法是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改进他们的工作。这一阶段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将党员和混入党内的敌对分子区别开来。我们认为，敌对分子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主和其他亲帝国主义分子。

第二步是将共产党员和剥削阶级分子区别开来。这一步最主要的内容将在实际活动中不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而是捍卫剥削阶级的剥削阶级分子清除出党。

第三步尚未开始，其任务是将党员和其余(尽管不是敌对分子)分子，即不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分子区别开来。

实际上，整顿工作是这样开展的：我们在进行土地改革时首先整顿了基层组织，清除了党内的敌对分子。土地改革使我们发现，敌人不仅混进了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混进了领导机关——地区和省级党委。因此组织整顿也发展到有关党委。土地改革以后这工作可望结束。当然，现在正在对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的基层党组织、县委和省委进行整顿。越南同志对这项工作是这样评价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和经验，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在地方党委会议上已经予以揭露。

阮维桢同志在中国期间，中国同志告诉他，受到处理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审判)的比例不能超过5%，而我们越南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米高扬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开除出党应当特别谨慎。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准备措施，检查这项工作和纠正错误，同时检查土地改革是否搞得正确。这两个问题——关于整顿党组织和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已经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提到。

由于阮维桢同志只是大概地向我们介绍了从组织上整顿党组织，而且有些问题我们还不大清楚，我们请他今后抽空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项重要工作。阮维桢同志答应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还请求他同意向莫斯科通报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的情

况，阮维桢同志表示同意。会谈持续3小时。

АВПРФ, ф.079, оп.11, п.13, д.5, л.84-95

№21462 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 专家帕霍莫夫(1956年4月2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4月27日

第349号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B.Я.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苏联专家H.Л.帕霍莫夫同志不恰当行为的信件。

H.Л.帕霍莫夫同志的不恰当行为已经核实确认。

我们认为应当将H.Л.帕霍莫夫同志召回苏联，同时委派更适合国外工作条件的同志替代他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工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党委书记

H.安德罗索夫(签名)

驻中国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A.马尔采夫(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1956年4月21日

1956年4月27日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顾问H.Л.帕霍莫夫同志是由苏联文化部系统于1955年10月派往中国的。帕霍莫夫同志对报纸杂志业非常有经验，积极工作，喜爱编辑事业。但是他个人的缺点，不认真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无法继续在国外工作，更何况他是在如此重要的思想工作岗位上。

首先谈一下他的个人缺点。

在北京市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在集体中他表现得像个好意气用事和孤僻不合群的人。来到中国才几天，他就以微不足道的借口与党员普罗琴科吵架（《中国画报》杂志的顾问），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比如，他说：“才不值得看普罗琴科那张嘴脸，免得我整整一天的情绪被他破坏。”），还企图唆使其他苏联专家（科洛杰兹诺夫、济科夫斯莫洛夫和科诺诺娃）也去对付普罗琴科，不再与他交谈和打招呼。

直到严肃地对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不允许他这样对待同事后，他才开始与普罗琴科同志说话。

下一个侮辱的对象，他选择了党员科洛杰兹诺夫（书籍和小册子出版方面的顾问）。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试图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错误，并将此事告诉了唯一的党组织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这引起了帕霍莫夫同志近似病态的反应。在党委与安德罗索夫同志谈话后，他回到工作地方首先就百般追问，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哪个笨蛋在诽谤我？”他怀疑这事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有关，于是就开始在个人谈话时和业务会议时千方百计地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宣称：“科洛杰兹诺夫啥事都不会做，不会编辑文章，他只配去编辑墙报，而不是杂志，他在我眼里是最差劲的人。”等等。他公开对我和普罗琴科声称：“我这就等着，啥时出版科洛杰兹诺夫编辑的小册子，那时我就让他看看，他算个什么编辑。”也就是企图迁怒于科洛杰兹诺夫的错误。大家向他指出，如果册子上可能有错误，那就应该在册子出版前，现在就帮助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改正错误。可帕霍莫夫并不考虑这个：问题不在于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某些错误，而在于又是一个新的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借口。事情发展到帕霍莫夫同志不再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打招呼 and 说话，而这也引起了中国同志的注意。为了使帕霍莫夫在对待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态度上遵守最基本的礼貌规矩，要求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过问此事。

帕霍莫夫同志对于工作中的集体性不屑一顾，极端病态地无法忍受任何，甚至微不足道的针对他的批评，不愿意听取其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该小组的组长试图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帕霍莫夫同志编辑的文章加以修改，却遭到最激烈的抵制。比如，他用这样的话来对待我对我提出的编辑意见：“这是猴子的杰作，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等等。帕霍莫夫同志的无礼和粗鲁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当着党员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和普罗琴科同志的面对我声称：“我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指出帕霍莫夫同志编辑上的错误时，后者就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帕霍莫夫同志对待同事的意见和建议采取这样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性劳动中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可言。

帕霍莫夫同志给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中国同志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杂志社的

中方工作人员石一申(Шийи-шэн)同志、沈江(Шэн Цзян)同志和欧阳飞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反映帕霍莫夫同志的粗鲁和不知分寸，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同志的意见。我不在的时候(我曾回苏联出差)帕霍莫夫同志经常上班迟到早退，给中方同志造成了负面影响。我出差回来后编辑工作人员欧阳飞是这样说帕霍莫夫和苏联翻译济科夫斯莫洛夫的：“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漫无边际地闲聊，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帕霍莫夫同志对待中方同志表现出不该有的神经过敏和容易激动，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领导同志的意见。比如，在编辑某篇重要的文章时他对主编吴文涛的意见不理不睬。”

曾不止一次地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缺点：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与他谈过话，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领导马尔采夫同志，党的基层组织书记潘克拉托夫和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都找他谈过话，在党员小组业务会议上也说了他的行为。但是帕霍莫夫同志对所有这些表现出病态的反应，并没有为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在许多党员对他说了不应违反劳动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后，他对我、科洛杰兹诺夫和普罗琴科说：“遵守工作制度，这是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把裤子坐破的方式。如果我在编辑部里无事可干，我认为就可以提早一两个小时下班。”

应当指出，帕霍莫夫同志在行为上和工作中的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事情，显然，是因这些错误长期没有得到健全的批评。所以我们感到震惊，帕霍莫夫同志原来工作单位的党组织怎么能派他出国工作。

我认为，在国外条件下帕霍莫夫同志再继续待下去的话，可能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危害，所以恳请苏共中央将他从中国召回并派政治上成熟、谦和有编辑工作经验的同志来替代他。

《人民中国》和《中国》杂志社苏联专家组组长

B.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A.Φ.马尔采夫同志

第616号

1956年4月19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18-22

№02856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 访华问题(1956年4月28日)

摘自E.Г.扎布罗金的工作日记

第105/c号

1956年5月14日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同志

1956年4月28日

应钟同志之约，我会见了他。

钟同志说，他了解一下，我们邀请访苏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中是否包括了议长沙托诺本人，他是否将于近日抵达莫斯科。钟同志解释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关系到沙托诺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已向沙托诺转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希望其年内派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邀请。沙托诺已告知中国同志，他应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将于5月前往苏联。

我向钟同志证实，我国大使Д.茹科夫同志刚刚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转交了对沙托诺的邀请。我向钟同志解释说，据了解，由于沙托诺不能与他的3名副手及国会代表团同时于今年9月访苏，鉴于此，苏班德里约外长与我大使Д.茹科夫同志商量，希望最好能在国会代表团访苏之前单独邀请沙托诺访苏，而且沙托诺本人也期望出访时间不迟于今年5月，以便6月30日国会开会之前返回雅加达。

我还说，我们还没有发出邀请，印尼的报纸已经发了沙托诺即将访苏的消息。我说，据我所知，与沙拉诺一起访苏的还有他的第三副议长艾哈迈德(马斯友美党)，至于还有其他什么人，我暂时还不知道。

钟同志对我通报的消息表示感谢。

而后，钟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大使馆已经以中国穆斯林文化同盟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各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发出邀请，请他们派团访华参加穆斯林斋月节。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代表团可能于下周启程。

钟同志还说，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及两名随员将于5月下半月访华。对苏迪罗的邀请早在1955年就发出了。苏迪罗访华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承担。

我说，我们也邀请了苏迪罗和夫人及市政府3—4名工作人员访苏，

但苏迪罗尚未就访问日期给予答复。

钟同志说，苏迪罗告诉过他，已收到了这个邀请，但是，据钟同志理解，苏迪罗在获得旅行用外汇方面有困难。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日本东京市政府早就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至今仍未能成行。

谈话结束时，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方面对美国政府只承担陪同苏加诺访美的14个人的费用表示不满。陪同苏加诺的另外20人的费用要由印尼政府负担。

我对钟同志通报这些表示感谢。

另外，我们谈了一些一般的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

E.扎布罗金

АВІРФ, ф.091, оп.12, п.10, пор.6, л.110-112

№2146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 (1956年4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机密

第446号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4月30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
1.关于(苏联)就亚洲各国学者在原子能领域展开合作问题与印度学者巴伯举行会谈的情况；2.关于苏联政府对老挝与巴特寮相互关系问题的立场；3.关于葛罗米柯与里丁 [63] 就老挝问题举行谈判的情况；4.关于延长苏联学者小组在中国逗留时间的问题；5.关于邀请40—50名中国领导人前往苏联休息的问题。同日，就上述所有问题已向莫斯科发送了传真

报告。

周恩来对苏联和中国在印度支那一系列问题上持相同立场表示赞赏。会议期间，他指出，中国与巴特寮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在必要情况下最好能通过越南朋友来保持这方面联系。

周恩来继续通报说，中国通过印度大使已向老挝总理富马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周说，我们现在已经获悉，富马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周恩来接着道，中共中央现在正召集各省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经济和国家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党内问题，等等。

目前，周恩来继续说，我们正认真研究涉及中央和地方机关权力以及在它们之间如何进行权力分配等问题。

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特别注意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也要将之与完全的民主相结合。他指出，我们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缺陷之一，便是过于偏好集中的问题，而对民主问题“关注不够”。例如，在计划问题方面，就既要无条件地讲究集中，同时也要让地方机关发挥相应的主动性。因此，周恩来补充道，我们现在正打算采取措施以扩大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民主化”，以便更大程度上加强人民与政府机关的联系和有助于落实党的“依靠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中所确立的新制度势必提高劳动群众和地方机关开展社会主义变革工作和与反革命作斗争的积极性。这些举措也将有助于我们更顺利地反对官僚主义。遗憾的是，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它有时也将滋生官僚主义”。

在会谈期间，我向周恩来讲了关于为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我们党在提高、发展地方机关自主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联盟共和国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问题，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个别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多次试图脱离苏联并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我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阶段就必须在苏联全境内实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

周恩来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企图在某个时期可能会对这些共和国民众中的个别阶层产生影响，因为“俄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周恩来说，在中国，我们在落实对西藏的民族

政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都是由于清朝和蒋介石统治者们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所致。

周恩来接着指出，中国的特点在于，“汉族”是主导民族并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94%)。而所有其他50多个民族仅占全国人口总量的6%。与此同时，这些占中国人口总量6%的少数民族占据了国家60%的面积，而汉族人只居住在40%的国土上。

周恩来说，各省党委书记会议涉及了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周说，在会议期间，我们强调了“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危害，并提出了坚决与干部中的沙文主义思想作斗争的任务。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说，他刚从欢迎前来参加五一节庆典的外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回来。周说，今年已有5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位代表访问了中国，这些代表的构成包括：和平运动的拥护者、工会、妇女组织、文化和科学活动家、演员、贸易—工业界代表，其中既有来自兄弟国家，也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右翼和左翼派别人士。

关于H.A.布尔加宁和H.C.赫鲁晓夫对英国的访问，我对周恩来了关于库尔恰托夫院士在英国的讲座情况及其对英国学者所留下的印象。周恩来对此通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指出苏联学者——政府代表团成员在英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整个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马列同志以及我使馆二等秘书O.B.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6份，送：H.C.赫鲁晓夫、B.M.莫洛托夫、H.T.费德林和И.Ф.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1份，中央委员会1份，档案室1份

执行人——罗满宁

1956年5月24日

第71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文件被用作中共八大的证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7月23日

ЦХСД , ф.5 , оп.28 , д.408 , л.25-28

№081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1956年5月2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第447号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纪要

1956年5月2日

今天晚上，毛泽东主动乘车来到我处。这时科学院院士齐津也在我这里，于是他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通报说，最近他打算休假，想利用这次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他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地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

毛泽东向齐津详细询问了苏联专家组在中国的工作状况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成就。他满怀兴趣认真听取了齐津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培育小麦新品种和植物杂交方面的经验，向他讲述了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希望齐津院士和其他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能更广泛地向中国科学家介绍苏联的科学思想成就。他衷心感谢苏联科学家在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然后毛泽东提到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英国之行。他强调说，这次重要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进一步改善了苏英关系。这次访问，现在和未来将对国际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他说，这次访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苏英贸易。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英国立场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欢迎并完全同意这一立场。他说，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他说，实际上，我们过去和目前的

主要敌人是美国。毛泽东说，早在1948年同米高扬会谈时，我就强调了必须改变对英政策的思想，指出把英国同美国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64] 在米高扬最近一次来中国时，我曾向他提起了这次谈话。

在确定我们的对英政策时，他继续说，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即战后美国把英国降到了小伙伴的地位，从欧洲和亚洲所有重要的阵地上把它挤了出去。毛泽东继续说，中国人是这一事实的见证人：比如，他们看到了当年英国人如何在中国经营，后来又怎样先后被日本和美国从这一阵地挤走。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这种政策不能不激起英国人的愤恨，使他们努力摆脱对美国人的依附。

毛泽东说，英国人不想要战争也不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出现对他们有利的结局，他们的国家也将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使英国脱离美国，支持英国努力独立于美国人，然后“借助英国接近美国，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继续说，在当年，斯大林同罗斯福紧密合作，同他亲近，但后来让丘吉尔钻了空子，挑拨他们互相敌视，达到英国靠近美国的目的。斯大林对英国形势估计不足，他说，导致了英苏关系的紧张，使英国继续靠近美国。

然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现在清楚地看到，他们没能力占领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经验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日本的被消灭)。比方说，即使是敌人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有辽阔而富足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他说，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他强调说，中国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被消灭。毛泽东举了三国时期战乱的例子。当时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1000万。这种状况在安禄山(唐朝)造反时也出现过。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清醒地分析所有这些事实，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现在越来越激烈地争取两个主要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他列举了拉丁美洲、非洲的这些国家，亚洲他列举了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像法国和西德这样一些国家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这些“中间”国

家的领土上，毛泽东说，美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他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日本等国)，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战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这些“中间”国家，他指出，对于使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了印度的立场后，毛泽东说，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

在会谈时，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他指出，今年的春播工作较往年进行得都顺利。在春播准备期间，生产合作社做了大量工作，兴修水利，大搞积肥。这些工作是今年农业丰收的保证，今年农业可望比去年增产2—3成。增加2成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毛泽东通报说，中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的绝对数字将接近日本，再过10年，将超过英国和法国。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可以预料，年产量可达450万吨。这样，他(毛泽东)说，再过10年，帝国主义者就根本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了。

然后毛泽东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他重复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直到革命胜利前，斯大林还不相信中共的力量，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这是斯大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毛泽东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听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便会夭折。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问题所犯错误，其原因之一是他(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后，我给毛泽东谈了我对尼赫鲁两本著作《开发印度》和《自传》的印象，我说，当时在苏联，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大概这也是对印度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

毛泽东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继苏联之后，在中国对印度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混乱。可以直言不讳地讲，他说，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由于他的过错，共产党同社

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而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于是在资本主义范围里出现了不少议论，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也有不少议论。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干部当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问，斯大林的错误到底有多大，在他的活动中，是过大还是功大。毛泽东说，如是这样回答他们，在他的活动中过占20%，那他们认为这太少了；如果给他们说40%，那他们又觉得太多了。所以，毛泽东微笑说，比较能够接受的比例数字应该是30%。毛泽东说，这个比例哪里也没写着，但很可能，斯大林的错误程度接近这个判断。

他接着说，在中国人们对待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态度不一。某些老干部对待这个问题所依据的是他在不同的革命时期犯了哪些错误。

接着毛泽东说，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实施了正确的路线。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但认为这没必要，对共同事业不利”。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不信任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他微笑着说，至少是“半个铁托”。

在解决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似乎被恢复了名誉”。毛泽东说，“从同米高扬最近一次谈话中得知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我。他甚至差点儿把他最亲密的战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看成是外国的走卒”。

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这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在巴基斯坦总理这次来华时，他(毛泽东)准备向他暗示，希望巴基斯坦对帝国主义国家执行更独立的政策，并向他强调巴印友谊的重要性。

在会谈过程中，我对毛泽东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政治问

题上所采取的一些最新措施。

会谈过后，毛泽东留在我这里吃晚饭。他心情很好，常开玩笑。在离开时他说，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休息得很好，进行了有趣的谈话，在会谈中，他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我这里停留了3小时。

师哲同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罗满宁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9, л.124-130

№20373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1956年5月5日)

机密

1956年5月5日

第821号

致苏共中央：

自今年4月28日起，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13人在苏联受到热情款待。该代表团的领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愈之。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曾受到了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见。有鉴于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认为，针对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最好能由苏联党或政府领导人之一来承担接见工作。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被采纳，那么接见该代表团的时间最好能安排在5月20—25日之间，因为此时正是中国代表团完成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访问之后返回到莫斯科的时间。

该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名单，及其在苏逗留期间的活动安排是(我们)与代表团负责人共同商定的，具体参见附录。

附件共计5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

A.杰尼索夫(签名)

第1709号

手写批注：

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M.A.苏斯洛夫同志收。1956年5月9日。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人员构成清单

胡愈之(代表团团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人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千家驹(代表团副团长)——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负责人之一，《经济研究》和《新建设》等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戈宝权(代表团副团长和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管理局负责人和中国作协对外委员会委员，《外国文学》杂志编委。

代表团成员：

王思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张维桢(Чжан Вэй-чэн)——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二分部副部长。

杰伊波扎·阿利耶夫(Тейпджан Алие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委员会文化宣传部文教处副处长，中苏友好新疆协会管理局负责人之一。

夏莉雅(СяЛи-я)——江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朱云海(ЦзунЮн-хэн)——甘肃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王烈珠(ВанЛе-цзю)——云南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厅副厅长。

何毕然(ХэБи-жань)——福建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聂希文(НеСи-вэнь)——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欧阳惠——《中苏友好报》编辑部主编。

宋琦(Сун Ци(ж))——《中苏友好报》编辑部文化部副部长。

代表团随团翻译：

邱琴(Цю Ци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秘书。

高曼(Гао Ма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翻译。

王琦(Ван Ци)——《中苏友好报》编辑部翻译。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行程安排

代表团人员组成：共计16人。

逗留期限：1—1.5个月。

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10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商谈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行程安排相关事宜。

2.出席由莫斯科市23个工厂联合举办的庆祝五一节职工晚会。

3.出席并观看在红场举行的莫斯科卫戍部队五一阅兵式和莫斯科劳动者游行。

4.(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莫斯科器械厂。

5.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胡愈之作《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报告。

6.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由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7.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千家驹作《关于中国在工、商、手工业领域的社会主义变革》。

8.在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由戈宝权作《中苏文化关系》的报告。

9.(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第一钟表厂，在该厂工人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0.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电视上发表演讲。

11.代表团成员在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上发表演讲。

12.参观工作状态下的核电站。

13.了解苏联科学院电子计算机站的工作情况。

14.(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卡洛姆尼斯基蒸汽机车制造厂，并由王思华在工厂俱乐部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5.(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所属生产联合企业。

16.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列宁格勒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了解城市住宅建设情况。

2.参观斯莫尔尼宫。

3.乘车前往拉兹利夫站。

4.参观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

5.参观列宁格勒地铁。

6.胡愈之在列宁格勒电视上作演讲。

7.(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制造厂以及工人日常生活设施和住宅；在工厂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8.了解卡普拉诺夫文化宫的群众文化工作；由胡愈之为文化宫积极分子作《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报告。

9.代表团成员作关于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的指导方针的报告，具体题目如下：

(1)《关于中国文字改革》

(2)《关于中国农业合作社》

(3)《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

10.(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乳制品厂的自动化生产线。

11.(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瓦洛达斯基制衣厂。

12.(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基洛夫面粉联合企业。

13.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东方文字系负责人座谈。

14.戈宝权在《涅瓦》杂志编辑部座谈《关于中国的苏联文学和艺术》。

15.(代表团成员)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见面。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

1.(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厂。

2.参观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3.千家驹在棉纺织厂作《关于中国工、商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4.参观哈萨克斯坦女子师范学院；戈宝权作《关于苏联文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作用》的报告。

5.(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维利亚姆斯农业学院；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6.参观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和为该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

站；(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集体农庄社员大会堂；张维桢座谈《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

7.与阿拉木图社会各界座谈；胡愈之作《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报告。

8.(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在垦荒地区组建的国家农场之一。

9.参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

10.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伏龙芝市的相关事宜已与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里加市的相关事宜已与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伊尔库茨克的逗留时间——4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伊尔库茨克市的相关事宜已与该州苏共州委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备注：中国代表团可在各地参观博物馆、剧院、俱乐部、文化宫和音乐会。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71-76

№24916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 (1956年5月7日)

致《国外文学》副总编辑C.A.丹古洛夫

亲爱的丹古洛夫同志！

早在3月份就收到了您的来信。拖延这么久才对您的请求进行答复，感觉非常抱歉。

你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国外文学》杂志挑选一些当代中国小说，它们应该是近20—30年最为优秀的小说，总数为5万字。我们觉得，这使我们非常为难。首先，挑选5万字，很难概括30年内最为优秀的作品；第二，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像鲁迅、茅盾、老舍、赵树理这些专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翻译成了俄文，因此认为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并不合适。同时，没有这些作品，挑选出来的作品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考虑了您的请求之后，我们挑选了最近2—3年发表的7部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人民中先进人物的典型。大部分作品都是出自青年作家之笔。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新面貌，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新面貌。该信附有推荐性的附信。我不知道，这样能否满足您的请求。

一切有待您的审议。

此致

敬礼！

周扬

1956年5月7日

推荐的中国专家作品名单：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谷岩的《枫》，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吉学霁的《小白旗的风波》，华适(ХуаШи)的《山村接生婆》，南丁的《检验工叶英》。

这7部作品是从最近两年我国的各报刊发表的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是许多相对较好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近来，我国文学的对象是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最近两年出现的绝大部分作品也都是描述农村生活的。但是，作家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描述农民们怎样从残酷的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在展示，他们怎样在党的领导之下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很多作家的作品展示了农民怎样从时代所形成的私有制下挣脱出来，他们怎样转而由个人生产走向集

体生产。随着社会改造的深化和迅猛开展，农民的心理和意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李準《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揭露了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新的阶层，展示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吉学霈的《小白旗的风波》这部作品展示了中国农村男女之间新的相互关系。贫穷作为他们之间相互谩骂和斗殴的原因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他们由于什么发生的争吵，这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共同事业的问题。华适的作品《山村接生婆》描述了接生婆从事的令人鼓舞的、勇敢的工作，展示了新的生活之风是怎样吹过山林中的村庄，新事物是怎样战胜农民的旧偏见和旧习俗。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和和谷岩的《枫》这两部作品描述了中国人民入朝志愿军的英勇贡献。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斗争的激情，它们展示了高尚的情感和为祖国、为和平而战的战士们的性格。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就像一幅鲜明的油画一样，反映了作者家乡——山东老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匪徒的斗争，勾画了鲜明的农民代表的形象，他们宁死也不愿被奴役。

相对来说，关于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我们较少，但是近来我们已经有许多作家正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是相对较好的关于工业方面的选题的作品。该作品塑造了一个年轻工作人员的鲜明形象，他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勇于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作斗争。

当然，单单这些作品远远不能代表最近两年我们的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这一体裁的文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许多作家转向了生活本身向他们提出的题目，转向描写和对人的性格进行深入的塑造。公式化和抽象化阻碍着艺术创作的发展，这两种现象已经遭到了打击。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出现了许多新作家。这里挑选的7部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青年作家，他们在最近几年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

在最近两年，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同敌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循序渐进的斗争。在此方面取得的特别重大的成就是揭露了反革命集团胡风鼓吹的文学观点。该反革命集团企图以所谓的“真诚”和“艺术的良心”来偷换文学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们反对作家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反对对马列主义进行研究。他们的作品对人民进行恶意歪曲，并歪

曲事实，他们把革命解释为野蛮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起点。因此，非常明显的是，由于文学战线上的斗争，我们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被消除了。继续同表现出来的各种敌对的、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今后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应当指出，我们的文学战线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首先，文学对生活的涵盖还不够广泛，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仍然没有被我们的作家纳入视野。我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克服现实主义的趋势，我们将同其展开长期的斗争。许多作品把复杂多彩的生活以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把英雄人物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的使命就好像是来解释作家想要说的东西。尽管“不引起冲突”的理论已经在理论战线遭到了我们的批判，但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能够发现美化生活的现象。这些作品的作者以鲜艳的色彩来塑造生活，把尖锐而复杂的生死斗争贬低为小小的争吵。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的性格不是在斗争过程中揭示的；相反，作者只是人为地塑造一些小小的冲突，使英雄人物按照他预先设定的计划表演。广大读者越来越对这种枯燥无味的作品感到不满。

但是，一些作者在尽力克服形式主义的同时却陷入了自然主义。他们描述生活就像摄像一样，满足于单纯的列举事实，不对他们作品中描述的事实进行应有的挑选和艺术加工，使读者对其塑造的英雄持冷漠态度，把他们的思想塑造得非常低级和庸俗。他们的作品严重歪曲了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已经遭受了批评。

尽管初看起来，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在文学中对真实的生活进行正确的描述，贬低了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把思想性化为乌有。同形式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其他各类脱离社会现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是我国文学家面临的重大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作家以高度的热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和斗争中，全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认识世界的武器，不断地提高自己认知生活的能力。中国的作家们现在正是在这一方向进行工作。

РГАЛИ, ф.1573, оп.1, д.54, л.40 44、47

№21463 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 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1956年5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1955年9月16日苏共中央相关决议，H.Л.帕霍莫夫同志被派往中国，并在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从事顾问工作。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季赫缅诺夫同志对帕霍莫夫同志的评价是：该同志工作积极，是个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但缺乏纪律性，并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不讲究策略。

据西季赫缅诺夫同志通报，由于他们在当地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对帕霍莫夫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提出关于把帕霍莫夫召回莫斯科的问题并由另一同志来替代帕霍莫夫。上述建议得到了(苏联驻中国)使馆党委书记和苏联科学文化问题专家组负责人的支持。

鉴此，我们认为，应借休假的机会于6月份召帕霍莫夫同志返回莫斯科，以便届时与因出差期满也返回苏联的西季赫缅诺夫同志一起共同查清对帕霍莫夫同志的指控。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再决定帕霍莫夫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附录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0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提出了关于急召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顾问帕霍莫夫返回苏联的问题，理由是该同志行为有失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让帕霍莫夫在6月份与西季赫缅诺夫一起返回莫斯科休假，以便在这里查清和解决该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手写批注：

归档。

B.戈尔布诺夫

1956年5月19日

电报已发往北京。

..... [65]

1956年5月12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3-24

№21461 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情况说明：召回在华专家济科夫斯莫洛夫(1956年5月12日)

情况说明

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被苏联高教部派往中国(依据苏共中央所属出境管理委员会1955年5月9日决议)。高教部已了解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就济科夫斯莫洛夫事件所写信件的内容，并决定于今年6月召济科夫斯莫洛夫返回莫斯科，以调查对他所提出的指控，并解决其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2日

手写批注：

归档。

И.谢尔巴科夫

5月15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17

№20374 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1956年5月17日)

致Д.Т.谢皮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我国记者А.科任同志于1956年5月17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1956年5月17日

1956年5月17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中国《友好报》即将在5月18日刊登一篇新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标有如下注释：“编者按。1956年4月7日我报曾刊登过一篇被译成俄语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该问题所作讨论的基础上编写的。后经(我们)认真审查发现译文中存在一系列不足：除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之外，译者在对原文的个别词、句的翻译上也存在曲解和不完整之处。鉴于该文对读者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本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将重新翻译和校对的文章译文再次在本报发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了该文之后再未对文章作任何改动。

新译文已交给《真理报》(驻中国)记者站和塔斯社(驻中国)分社。

据我所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并参与了新译文的编译工作。

A.科任

手写批注：

已通报。归档。

..... [66]

1956年5月19日

B.戈尔布诺夫

1956年5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77-78

№02860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1956年5月24日)

1956年6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6年5月24日

在12时，按照预先的约定会见了休假后返回对我作礼节性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寒暄之后，我想知道大使对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工作开始时间延搁原因的意见，我还问他，中国大学生代表团怎么还没有来到雅加达。

黄镇回答说，中国代表团将于5月25日到达。至于会议工作开始问题，大使说，准确的日期暂时还不清楚，会议延期开幕的原因在菲律宾代表团。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菲律宾代表宣称，该会议的议事日程和最后公报是在共产党人和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世界青年联盟的作用下拟订的，所以筹委会应该修改议事日程、公报文本，直至被邀代表团的成员，首先应给民族主义制度国家优先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一定程度上受菲律宾人支配。

黄镇接着声明说，中国人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和埃及代表团身上，因为这两个代表团是由绝对多数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人依靠这些代表团的支持有可能对会议的工作进程产生一定的进步影响。

黄镇对我说，有两组美国人来到了雅加达，他们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工作。

我要求黄镇将会议开幕的日期预先通知我。我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我们苏联的一些大学生组织想发贺电，我应该将会议开幕的事提前告诉他们。

黄镇允诺，一旦中国大使馆获悉会议的开幕日期，会将此事通知

我。

然后我向黄镇谈了我们昨天会晤雅加达市长苏迪罗一事。在会见中，我们讨论了他将要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我说，我告诉苏迪罗，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承担从北京而不是按市长要求的从雅加达起算的旅行费。听后，苏迪罗宣称，在7月份他不可能去苏联。市长接着说，看来，此行势必要推迟到10月初，在这里他又说出了他一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可能去北京。但是，苏迪罗说必须预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磋商这个问题。在同黄镇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曾推测说，苏迪罗在与黄镇会谈时，可能会提出为他支付从雅加达到北京的旅费。在从莫斯科返回雅加达时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支付经过欧洲的全部路费，因为苏迪罗想在罗马和布拉格作几天中途逗留。

黄镇对提供的这些信息表示感谢，也谈了预先要求他承担苏迪罗及其一行从雅加达至北京旅途开支问题。他在这里开玩笑地说道，印度尼西亚人始终想寻找依靠别人负担却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某些通道。他提醒我说，今天苏迪罗启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3周的正式访问。因此，到10月份，开支早已超过了为这些目的拟订的计划范围。

在谈话过程中还涉及了苏加诺总统访问美国的问题。

我询问黄镇有没有在苏加诺访问美国之际反映印度尼西亚社会舆论情绪的一些资料。他回答说，除了印尼报刊报道的外，他没有其他资料，他补充说，在地方报章上公布的材料不具体，主要是描述性的，反映了总统与美国官方代表的会见，但没有涉及总统同这些人士会谈和会见的内容。

黄镇想知道，苏加诺访问苏联怎么拖延了这么久。我回答说总统在苏联将逗留两个星期，外加在这段时间的中国的两整天充分休息。在苏联访问之后，苏加诺应南斯拉夫政府邀请还要访问贝尔格莱德，从那儿返回后，显而易见，他将在苏联的克里米亚或高加索沿岸休息两天，然后前往中国。

接着黄镇告诉我，前几天，他会见了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他具体谈了会见的内容，黄镇对我说，阿里·阿姆罗乌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由于有这方面的功绩，现在他很可能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因此，黄镇问我，有没有介绍阿里·阿姆罗乌西

的资料，以便在决定是否同意他任大使这个问题时，他能使用这些资料。

我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可以设法通过苏联外交部拿到这些材料。我补充说，在我看来，阿里·阿姆罗乌西当埃及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职位候选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据我观察他是一位诚实的人，具有很进步的见解，这一点对将这样一个国家介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接着我说，我认为阿里·阿姆罗乌西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他自己妻子的影响。他妻子是一位很有头脑且意志坚强的女性。根据我手头的材料看，大使夫人出身于属于沙特阿拉伯家庭影响圈的贵族家庭，她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不是由于她的地位而是由于真实的宗教信念使她成为这样的人。我补充说，我认为她对丈夫在解决重大问题上会有重要的影响。她具有很宽广的政治视野。

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看阿里·阿姆罗乌西这位候选人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出席这次谈话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和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Ю.Ф.帕尔菲奥诺夫。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ІРФ, ф.091, оп.12, п.10, пор.4, л.122-125

№25200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 中苏补充协定(1956年5月2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6日

第50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5月29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张闻天。

他转交给我一封信，内容是周恩来对于1956年5月10日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请求废除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补充协议的相关回复。信的原件是被封在信封内的(只寄给了H.费德林同志一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信息已通过电报发送。

.....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Г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9, л.160-163

№09834 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1956年6月6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加快苏联援华项目的设计和提供，扩大援助范围以及建设几个新的项目，苏联部长会议于1956年5月25日通过决议，规定：

一、缩短为以下苏联援华建筑项目——工厂和电站——完成设计和提供设备的期限：

重型机床厂；

“峰峰”中央选煤厂；

“双鸭山”中央选煤厂；

“滦县”中央选煤厂；

“武汉”热电站；

“西安1号”热电站；

“包头2号”热电站；

“太原2号”热电站；

“株洲”热电站；

轴承厂；

拖拉机厂(洛阳市)；

重型机械制造厂；

锅炉生产厂(二期)；

汽轮机厂(二期)；

矿山机械设备厂；

炮镜厂；

高射炮和坦克炮制造厂；

雷管、点火装置生产装配厂；

硝化甘油火药、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厂；

信管和引火装备厂；

炮管生产厂；

梯恩梯炸药和黑索金炸药厂；

单基无烟火药和发射药生产厂；

雷达生产厂；

复杂接收装置(收音机)生产厂；

无线电器件厂；

航空仪器厂；

飞机起落架生产厂；

探照灯和汽车灯制造厂；

水雷制造厂。

二、对以下企业扩大技术援助：

“抚顺”热电站——发电能力扩大2.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 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千瓦；

“本溪”热电站——扩大7.5万千瓦(3×25000 千瓦)；

“成都”热电站——由3.6万千瓦扩大到5万千瓦(2×25000)千瓦；

“包头”1号热电站——由10万千瓦扩大到22.4万千瓦；

抚顺市2号蒸馏岩厂热电站功率为5万千瓦；

“滦县”煤矿(4号井)开采能力年产达到150万吨；

“平顶山”一号矿井年采煤能力达到120万吨(矿井带变电站和筛分室)；

“滦县”4号选煤厂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00万吨。

三、帮助建设以下企业：

船用铅板蓄电池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一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二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三生产厂。

委托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同中国方面联系，以备备忘录的形式为本决议规定的义务办理手续，其中应规定，同援助这些企业建设有关的设计工作、所提供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费用支付应按照现行的苏中贸易协定办理。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M.贾丕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5, д.59, л.16-17, 30-32

№09842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1956年6月7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华使馆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提出建议，建议我派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共在过去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党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向苏联派过几次代表团了解苏共组织工作的经验。苏共向中国派代表团多数只是在正式场合下才派，如出席中共八大。我们认为，苏共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共工作经验定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欢迎。

所以我认为，可以支持苏联使馆的建议，今年可向中国派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可包括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员。根据相互原则，也可邀中共这样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这个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是适宜的。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的信给苏联对华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成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 ф.5, оп.49, д.41, р.8862, л.16-17

№21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1956年6月21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建议：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之间联系的形式

1956年6月21日

关于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事先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需要就他们之间可能进行联系的形式交换意见。

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

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 and 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68]

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

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

苏共中央认为，可以每两周或者最初每一个月出版一期杂志，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各民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但是每位编辑都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得到指示在杂志上签名，这指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可以在编辑部中有自己的代表。

如果大会在原则上能够赞同这一决议，那么可以委托各党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小组制定具体的建议(出版的地点、杂志的名称、预算等)，并同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68, л.52-53

№21466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1956年6月27日)

1956年6月27日

第01/970号

致苏共中央：

呈送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手写批注：

归档。具体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与中国青年组织联系的各项建议，团

中央将另外提出。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7月24日

关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邀请，由М.А.艾哈迈多娃、С.Б.巴格达萨良、М.Е.鲍罗金、Д.А.叶西片科、В.А.扎伊采夫、Л.П.兹洛曼诺夫、Б.Х.卡比耶娃、И.Т.库伊津、Н.П.洛莫夫、М.И.马尔芬、А.А.拉波辛(代表团领队)、М.В.鲁道夫、Н.И.斯米尔诺娃、Г.М.索先科娃、Б.М.斯皮里多诺夫组成的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于1956年5月18日至6月2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与来自农村和学生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交换了各自的工作经验。

代表团的两个小组去了10个省(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河北、江西、浙江、山东、广东、黑龙江)和15个城市(北京、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上海、杭州、济南、南京、无锡、苏州、广州、天津、哈尔滨)。代表团参观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高等学院、学校、一些工业企业，与中国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和工作人员会面。

最近中国的农业正发生巨大的变革。到1956年5月，超过90%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同时其中的61%进入了高级合作社。合作社的低级社向高级合作社转入预计到1957年结束。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的12年的发展农业大纲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助手。按照这个大纲到1967年粮食生产应当增产达5亿吨，也就是一年300亿普特，生猪的头数增长到6亿头，绵羊2.06亿头，牛1.475亿头，山羊1.23亿头，马1650万匹。

最近几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组织增长和稳固起来了。根据资料，4月份农村地方上共计有12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联合了45.6万个基层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与干旱作斗争、建造灌溉设施、打井、积肥、开垦荒地、植树造林、防虫害和抗洪等。在合作社中大约有16万青年生产队，聚集了约500万人。为了进行刻不容缓的临时工程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在全国有1亿以上这样的队伍，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有不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被推上了合作社领导岗位：担任主席、副主席、队长、理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向青年提出了7年消除文盲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基层组织各团委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成立成百上千支扫盲队，除了专业教师外，这项工作吸引了广大的识字青年参加。

青年要求识字的愿望是强烈的：仅今年就有将近4000万男女青年在扫盲学校里学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对代表团表示，农村青年中的共青团工作有相当的困难。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工作人员多次会谈中和与积极分子的不同会见时，许多向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证实了这一点。合作社中的政治和劳动的热情是高涨的。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明显无法令人满意。团委经常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青年竞赛，提出了许多标语口号和号召，可没有相应的组织工作配套。共青团的基层组织成立了青年队，却常常因而忘记了没有参加青年队的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先进经验推广工作同样无法令人满意。共青团的干部经常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先进方法和接受农业技术的具体内容和优越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团委、省团委乃至团中央在总结和推广好的共青团组织经验方面很薄弱。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向代表团提出了各种涉及共青团如何组织青年竞赛的问题。中国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有关共青团组织如何推广生产革新者的经验，如何帮助青年掌握农业技术知识的讲述。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有许多表现出特别愿意干好工作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积极分子非常缺乏经验，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县团委和省团委很少在学习和工作上帮助这些积极分子。对于许多团员来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特点就是开会多的工作方式，这样的方式威胁着脱

离积极分子和青年。因此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积极分子对批评某些共青团组织官僚主义和迷恋开会反映很活跃，这些就是在代表团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会谈时讲述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基础至今还是乡一级的组织。但是生活迫切地提出了在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这个问题应予以足够的关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能够建立这样的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高等教育做了许多工作。国内有198所高等院校，有29.2万学生在读。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高等院校培养的专家要超过最近36年的总数。

人民政权给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在高等院校学习提供了十分广泛的机会。如果说1952年工农子弟的学生占20%的话，到现在他们的总数已占29%。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增加了6倍。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了高等院校的发展。在高等学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为自己的队伍吸收了65%的学生。青年学生身上令人看到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强烈渴望对知识的掌握。超过50%的学生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和“良好”。许多学生参加了科学小组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帮助教育学生青年投入到社会公益劳动中去。学生们参加农业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参加丰收的收割和工程建设，学院和城市的绿化和居民的扫盲。共青团组织学生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象作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道德而斗争。

不得不注意到在学生中大范围地组织体育活动。高等院校有装备得很好的运动场地、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高校80%的学生通过了“准备参加劳动和国防”综合标准。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个组织在高校的工作有许多困难和不足之处，而各省市的这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的领导能力，正如共青团自己的团委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很弱。

参观学院时向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说到，在学生的学习中如何避免拘泥迂腐和读死书，特别是在研究社会经济学时；共青团该如何教

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已经弄清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很少深刻地研究教学过程，没有利用多种工作方式让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在学生们的组、班级、系和学院中很少组织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和会议。学生时间计划的过于集中和过分限制妨碍了学生学习的顺利和独立性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部门制定了这样的制度，规定学生何时该起床、梳洗、早餐、上课、运动和睡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非但不反对那些多余的清规戒律，反而以各种要学生参加的大小会议来加强它们。在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指责这样的制度，说应该给学生更多的独立性。

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工作人员说，虽然自己团委(100—110人)人员机构很庞大，高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10—12人)的脱产人员也很多，可是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还是很弱。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说，省市团委和他们负责高校学生的部门很少给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具体的任务，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也不在学生中举行有意义的城市活动，不研究也不推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校、系和小组中的组织工作经验。

代表团在自己的讲述和回答问题中谈到了高等学院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情况，谈到了在改善教学教育过程中和培养懂得自己的事业和思想觉悟高的专业人才方面以及在协调高校与生活、与实践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共青团对党组织和学院管理部门的帮助。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期间，分组去了24所高等学院、18家合作社、3个国营农场和2家拖拉机站。代表团成员在参观合作社、高校、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时，与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团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谈话并交换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100多次会谈，有超过5000人参加。与积极分子会谈时还有党委书记、高等院校校长和合作社主席参加。代表团为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作了14次报告，听众不少于15000人。代表团与学生、工人和农村青年进行了40多次见面会，参加人数超过25000人。见面会以会议、集会和晚间休息的方式进行。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见面会鲜明地展现出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和人民的热爱。

结束工作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请求在书记处谈了自己与共青团积极分子和青年见面后的印象以

及向委员会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个别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同志为代表团的工作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条件。地方党组织对代表团也表现出极其的重视。

代表团在中国逗留的最后期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与代表团又继续进行谈话(会谈纪要随附)。

从我们自身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建立为交流工作经验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方的代表团互访的实践被证明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同样认为应当同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即共青团代表团每年不少于去中国两次，在某一个青年小组中交流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自的工作经验。关于这点，胡耀邦同志在向中共中央作相应的咨询后打算提出具体建议。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领队

A.拉波辛

附件：

刘少奇同志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会谈纪要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建造了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正在建造。我们每一个项目中都有苏联人民的劳动。由于苏联的帮助和苏联的存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没有苏联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派出了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建设项目中给予我们帮助进行谈判。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造了205个项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助。我们打算到1957年钢产量增加达700万吨，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达到15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达到3000万吨。像这些我们能够应付得了的建设工程，就不再请求帮助了。

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正迅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都已合作社化了。我们已经没有地主阶级了，而资本家们留下的只剩尾巴。

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光靠农业合作社化和商业改造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所以国家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国家工业化。人民需要这样，所以人民的热情是强大的。所有农民都支持工业化。

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援助。有了中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我们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最好现在还能将印度、缅甸和仍遭受美国压迫的国家也团结到共同的斗争事业中来。

毛泽东同志对米高扬同志说，也有可能几年后所有国家都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其中包括英国并孤立美国，建立一种对我们有益的局面。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实行正确的深思熟虑的政策

对待世界各国人民。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支持它。

世界上的社会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种世界青年组织等的活动，其使命有助于让所有其他国家转向我们这一边，从而孤立美国。

昨天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谈到国际青年运动时说，要利用多种工作方式，所有组织要平等。这是正确的，必须要采用多种方式，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让一个国家的意见强加于其他国家。我的看法是在社会运动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争取将工人阶级、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平运动和工会运动联合起来。

不久前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亚非国家学生会议。尽管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还包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会议进行得非常好。一名受命于美国的菲律宾代表企图妨碍会议的工作，可他自己把自己揭穿了，受到了孤立。毫无疑问，菲律宾学生自己就将反对这名代表。会议特点在于，它不是由国际学生联合会或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提议召开的，而是根据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日本和印度，主要是印度的提议举行的。从这次会议中能够吸取经验：要争取既团结右派，也联合左派，要联合大众，要让中间派提出倡议，那时左派和右派就都走向它了。

事业上应当实现领导，而不是形式上的。如果我们左派到处提出倡议，那我们就无法使右派加入到运动中来。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进一步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要让中间派组织提出自己的倡议。

政府的运动也是如此。尼赫鲁、吴努、纳赛尔和苏加诺发出号召并能够召开亚非会议。所以我们应该争取让中间派提出倡议，比方说，召开国际会议。让他们走在队伍的第一排，出面号召，提出倡议，而我和苏联将走在第二排。

我们的领导不在于表面的号召，而在于实质。最好将领导权给中间派分子。让他们来号召，而我们就能够展开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大多数工人、青年和妇女。如果中国和苏联走在前面的话，其他人就离开了。这将导致分裂。

要争取中间派组织提出倡议是困难的。要想办法，如何找到这些中间派组织并支持他们。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最好站在后面。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妇女和工会组织的情况比我们更好，他们既和右派，又和我们联系。应当考虑这样的问题，让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帮助南斯拉夫提倡议，尽管就一个南斯拉夫还太少。应该要它和其他的一起提倡议。重要的是争取左、中、右三方相互见面并交换意见。如果能成功，就是我们的胜利之一。

所有的国际社会运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地球上群众运动分裂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右派。他们要为此负责任，可他们的目的就是分裂。所以仅说他们要为分裂负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实行这样的政策，让右派组织无法反对。不久前我们研究了国际社会运动的某些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请你们通过自己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研究一下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了，请苏共中央也研究一下。

总之一句话，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应该后退一步，少一点积极，多一点消极，这样事情就会逐步改善。这后退的一步并不意味着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因为共产党人永远是积极的。不，这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在事业上我们将更积极。这意味着放弃领导，将领导权交给别人吗？不是。领导权不存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人民，不分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都能跟我们走。

请你们商量一下并就此说出自己的看法。

会谈中拉波辛同志告诉刘少奇同志，中间力量的倡议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工作中十分重要。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们提出倡议，要召开全国学生组织领导会议来讨

论国际学生运动的联合问题。

刘少奇同志对此回答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为了学生运动的联合提出的倡议非常好，应该支持它。国际学生联合会最好不要参与，右派也一样。就让国家组织参加。就像在亚非国家学生会议上一样。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而中国作为国家组织参加。中国的参加可以表达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出主动的精神，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可中国和苏联的学生组织将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也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反对右派分裂主义者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

应当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退后一步，列宁在当时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二步》。现在可以写本书《退一步，进二步》。中国有句俗话：“为了往前走，就要先后退一步。”列宁同样也说过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先后退一步。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举了日本同旧沙俄军队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没能正面拿下旅顺口，他们后退了一步，采取迂回方式赢得了胜利。现在群众运动也应该以迂回方式前进。这是个非常复杂和重要的问题。要好好想一想，让所有人都一致同意，首先是我们左派要争取看法一致。

而后应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讲述了自己在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印象，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青团交流活动经验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同工作的印象。会谈过程中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的其中之一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现在农村有120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他们以乡为组织单位，合作社中没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他说，每个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员不多，但有许多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具有在合作社里成立基层组织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在许多委员会兼任党委的副书记。刘少奇同志表示，显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生怕得不到党组织应有的帮助。想必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更多的独立性是正确的，让党的工作人员干自己的工作。他说，应该推荐更多的青年担任领导工作，但一开始想必是要稍微变动一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现在团中央那里并不全是年轻的同志。

因谈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等院校的工作，刘少奇同志承认，高等院校里的学生负担太重，那里会议太多，在这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稍微消极一点。这想必也是党组织的不幸，而青年团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应该少给学生的生活制订清规戒律。

结束时刘少奇同志指出了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正面意义并感谢代表团的工作。

1956年7月19日于北京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34-42

№223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1956年6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6月29日会议第2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

夫；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第53项 关于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 [69]

(赫鲁晓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并寄发给中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其他党组织。

布尔加宁同志的声明为时尚早。

还称铁托同志为列宁主义者，这是不谨慎的——应该说到这一点。
[70]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伊利切夫 [71] 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

关于波兰发生的事件。 [72]

波斯佩洛夫：在报刊上发表通报。 [73]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61-63

№1037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1956年7月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7月6日会议第16/6号记录

第6项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件和资料问题。

(波诺马廖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一、将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

二、将第一条中所说的文件和资料的移交工作，委托给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来完成，他们应该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复印下来，并保留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将这些中国档案运往北京。

三、批准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的电报文本(详见附件)。

附件：

书记处会议第16号记录第6项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663项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并向他转达如下电报内容：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保存着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档案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其领导机关和一些党务活动家的文件资料。近几年来，对这些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挑选。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話，我们准备随时将这些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如果你们能够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熟悉这些材料的话，那么，我们准备接待他们，并给他们以必要的协助。

苏共中央”

请电告此函的执行情况及中国朋友的答复。

ЦХСД，ф.4，оп.15，д.522，л.3、23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

苏共中央参加谈话的有赫鲁晓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参加谈话的有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詹卡洛·帕耶塔、意共中央委员切列斯捷·涅加尔维列、意共中央候补委员贾科莫·佩列格里尼。

谈话于10时30分开始，于17时结束。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意共代表团团员们收到南尼 [74] 寄给苏斯洛夫同志的信，信中对《世界工人》杂志刊登《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一文作了解释，并保证对苏共持友好态度和忠实于与意大利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政策(向代表团成员宣读这封信)。

帕耶塔同志：您的看法怎样？

赫鲁晓夫同志：信写得不错。我们决定以苏斯洛夫同志的名义正面答复他。但那篇文章不好。不过，考虑到意大利国内业已形成的条件，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在复信中我们将谈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起初我

他们认为，南尼打算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用作疏远共产党人的借口，并认为在我们的报刊上就他的文章表态是适当的。然而在收到信后我们决定克制。

帕耶塔同志：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南尼吗？

赫鲁晓夫同志：可以对他说，我们对南尼的信，对他努力保持与我们友好关系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就自己的行为与我们保持接触感到满意。

然后帕耶塔同志通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意共的情况。意大利共产党广泛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强调他们在意大利条件下的意义。他们在意大利舆论中得到广泛响应并使共党的敌人们陷入混乱。代表大会有关在苏联加强民主的决议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决议与意共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是吻合的。共产党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过程中正在广泛利用二十大的材料。

个人迷信问题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苏联对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准备，而在意大利则没有。共产党(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社会党)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因为斯大林的名字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意共中央认为，苏共进行揭露个人迷信的工作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做这件有益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应当看到苏共和意共所处条件的差别。苏联居民看到，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带来良好的结果。例如，为被非法审判的人平反，取消对上班迟到和旷工的惩罚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意大利人们不知道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缺点，因此这些缺点的宣布最初产生了消极的效果，后来人们对苏共采取的有效措施有了正确的理解，才在意大利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意共领导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到突然揭露个人迷信引起的“休克”。何况，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动报刊对苏联发表意见时受到他们国家与苏联良好的外交关系的约束，而在意大利由于没有这个顾忌，反动报刊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选举运动更使这种攻击尖锐化。资产阶级报刊的主要力量用于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分离。

南尼在这一时期惊慌失措了，发表了一些主张自治的声明，企图把反动宣传的主要压力转嫁到共产党身上，怕他的党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从局势和意大利社会内形成的情绪来看，我们赞同苏共对它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共产党人完全赞同苏共的政策，因为它给所有的共产党带来益处，促使他们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

意共领导开始进行个人迷信问题的辩论时，力图使其超出本党的范围并以进攻的态度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这个辩论。在党内，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不通过纪律措施进行，而是通过说服的方式。意共领导还本着在这个问题上的灵活性不应当损害原则的出发点。

因此，在反对成为个人迷信后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时，意共领导使党避免了宗派主义的反面表现，其形式是把辩论限制在党内。

在美国国会公布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我们对二十大决议的解释就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在这之前只公布了部分消息。陶里亚蒂 [75] 曾认为报告将是保密的。从这点出发，我们采取了逐步地解释由于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而发生的变化的方针。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知道。对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只通报了报告的政治方面。意共中央懂得，主要任务是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不过应该向工人和劳动群众正确地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并回答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苏共中央也以自己的决议对此作出了回答。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表明，他们对苏共中央所作解释的同意具有批判性。否则共产党人会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你们赞成来自苏联的一切，现在，当事情正相反时，你们还是赞成一切？”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从正面对待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但出现一些不坚定分子、一些不正确的和敌视苏共的看法。

赫鲁晓夫同志：可能你们现在将失去统一，然而以后你们将得到多十倍的东西。

帕耶塔同志：没有任何人离开我们的队伍，我们相信我们党将赢得新的拥护者。

有关成为破坏苏联法制的后果的严峻事实的具体资料公布后引起了严重的混乱。无论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党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立场，它应当承认事实确实是严峻的并使人们坚信，一切都将纠正过来并且不再重犯。使党的中间环节相信这一点尤为重要。按照这个方针拟定了陶里亚蒂对《新议论》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和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

苏联同志赋予“蜕化”这个词以我们未曾赋予的绝对意义，尤其是陶里亚蒂的第二个意见是从苏共中央决议中引用的，它证明了我们对此词的理解。这个意见反驳的不是陶里亚蒂说的意思，而是你们对“蜕化”一词的理解。

意共领导完全理解斯大林所负责的程度，同时要避免“反向的迷信”，即把所有的缺点说成一个人的错误，并更快地使共产党人乃至全体劳动者信服。苏共中央决议对此有很大帮助。

陶里亚蒂关于该决议的声明，其目的是表示意大利共产党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同时表明意共领导人(在次要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以此打击那些叫嚷“赫鲁晓夫揪住了陶里亚蒂的耳朵”的资产阶级报刊。

作为一个有200万党员，有600万选民投它的票的大党，意大利共产党有能力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理解，拿这个党的威望冒险是不适宜的。

接着帕耶塔同志转向意共代表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他说，意共领导希望能预先得知苏共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措施，并对苏共详细通报其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谈表示感谢，因为这对意大利共产党与南共联盟关系正常化很有帮助。

赫鲁晓夫在告诫大家注意情报的特别机密性后向代表团通报了铁托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谈话。

帕耶塔同志：现在从美国方面传出一些谣言，说苏联政府打算承认朝鲜战争似乎由斯大林倡议发动的。如果这些传言被证实，无论共产党，还是和平拥护者的运动都会受到打击。

赫鲁晓夫同志：这不是真情。我们随时准备声明，美国人撒谎。

帕耶塔同志：你们非常坦率地宣布了许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这一切都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你们彻底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的决心，然而我们觉得，再公布这方面事实好像是多余的。

赫鲁晓夫同志：请你们不要生气，因为我要说的事与你们无关。然而有趣的是，丘吉尔在我们访问英国期间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他说：“应当给人民时间去领会你们公布的东西，否则这件事将向与你们对立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真诚的建议。丘吉尔这个老狐狸担心，如果我们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被解除对国家的领导权，那么将取得政权的政府会恢复斯大林那种毫不妥协的方法。我对丘吉尔说：“我们将考虑这一点。”

帕耶塔同志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大大加深了对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的分析并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现象不会重演。”同时，他也关心苏共将来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协同一致地行动。他还通报说，意共代表团在《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和在苏联最高法院关于苏维埃国家民主性的交谈对代表团特别有益。他对苏联同志明智而真诚的答复表示感谢并认为这些交谈是苏联与意大利两国共产党关系改善的证明。帕耶塔同志说，甚至在苏联生活自由的“细小”证据也对增加对苏联的好感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资产阶级报刊公布的关于两个资本家乘自己的飞机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与铁托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消息都抵得上共产党整整一年的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对印度的访问，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社会领导人的访苏邀请，对伊朗国王的邀请——都大大有助于共产党说服意大利人民相信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并粉碎敌人关于只有共产党人希望扩大与苏联关系的谰言。甚至阿登纳来莫斯科也被我们用来广泛地宣传，以改善意大利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谈到苏共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时，帕耶塔同志表示希望在两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苏联的存在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不过没有必要恢复共产国际时期的纪律，这大概会成为两党之间的障碍。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即使个别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出现大的分裂，也无损于共产主义运动。苏共最近对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实行的政策看来能证明意共领导这意见是正确的。即使不能建立起共产党的区域性联合体(法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在各共产党之间，首先是他们与苏共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仍然是有益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联系不应带有“旅游”性质，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之间坦率的创造性的谈话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帕耶塔同志请求通报苏共中央对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事态发展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报刊，如匈牙利和波兰报刊对他们的党和政府的各

种措施常常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认为，坚持并用浅显易懂的话阐述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方面，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缺点的原因而不是粉饰现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着帕耶塔同志通报了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的成果。意共与南共联盟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不过南斯拉夫人对领袖地位的追求很明显；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事先也要争论一番。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不过如果他们想抓住整个胳膊，这是办不到的。铁托十分欣赏对苏联的访问。使他尤为惊讶的是斯大林格勒的示威游行。他形成了一个印象，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是统一的和团结的，如果他们中间有意见分歧，也可以自由地表示意见。南斯拉夫人认为，无论与苏联领导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还是进一步改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都没有障碍。

铁托对法国共产党人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有所保留，在一次会见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南斯拉夫人使用“同志”一词时有些犹豫，等等。总而言之，铁托表示打算改善与法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但并不急于求成。

意共代表团成员们形成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现有的关系对其他共产党可能是有益的。现有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南斯拉夫人大概不想加入，不过他们不反对加入新的国际民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大体上相当于对南尼的党态度。

赫鲁晓夫同志回答了意共代表团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首先谈及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的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曾考虑不公布这个报告，否则写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两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原计划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由波斯佩洛夫同志作为通报来作，不过这可能使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或者怀疑苏共领导人中间存在分歧。因此这个报告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作了。

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具体事实。然而结果发现这对我们是有益的，而对你们是有害的。在苏联斯大林像是半人半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

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大家知道，他死后情况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人们排队去圆柱大厅那几天，街上压死了许多人。甚至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劝说人们散开都没有人听——所有的人都想看看斯大林的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在他的意志和在他的压力下所做的不体面的事。到斯大林死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告诫大家对下面所谈事实要保密)在监狱里关了大约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胜希特勒后增多的：所有我们过去的战俘及一些少数民族都被驱逐，现在由于平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人获得了迁回的权利想回归故里，而那里已经住上了别的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那里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例如1916年入党的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过去在莫斯科州委组织处工作，我个人认识她，马林科夫同志更了解她，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把她抓起来流放了，我们当时认为她与敌人有联系。在贝利亚被揭发后我们把她释放了，恢复了党籍，现在她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显然，应当对这些人进行解释，使他们对党和对党的领导人别留下怀疑情绪。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积极地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这也是需要解释的。

在二十大进行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过几次激烈的会议，主席团一些成员认为，不应当提出个人迷信问题，因为这会在国内和工人运动中造成困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死负有罪责？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现在的苏共中央包庇有罪责的人，同意他们的做法，不敢说出真相。像斯大林在世那样继续“拧紧螺母”。采取严惩措施等，倒是可以逃避批评，但这意味着危害党。

我们决定沿着民主化的路线，沿着加强与群众联系的路线前进。仍然坚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续实行正确的政策，同时我们应该对党及其主人——代表大会讲真话，我们公开就我们所谴责的所有缺点讲了真话。

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可以从小事开始，把时间拖长并使批判的分量不要太重。但这可能给党带来危害，直至造成它的分裂，因为一部分共产党员承认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会仍旧支持我们；而另一部分不掌握

足够的事实，会仍旧坚信斯大林的一贯正确。我们一下子说出了全部真相，虽使人们有些震惊，但我们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大的积极的纲领，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一个人，而且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完全支持。全党在中央周围团结起来，尽管有人表现出对斯大林的愤慨(要求把他从陵墓中迁出，摘掉他的肖像等)，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在揭露个人迷信时我们曾以为，外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会像后来出现的这样严重，因为报告不得在报刊上发表。我们曾打算逐渐地，随着这些党宣传工作的进展来报道报告中叙述的那些事实。然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贝鲁特 [76] 逝世和波兰共产党恢复名誉正值二十大召开。在波兰，当人们得知党恢复了名誉而它的领导人被枪决了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对此应当补充一点，在波兰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后，还是斯大林在世时就从我们的监狱里释放了许多波兰共产党员——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回波兰，这些人很不正常地领会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极其恶劣并极力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过去贝鲁特同志以自己的权威制止了他们。他逝世后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厚颜无耻，然而对他们的抵制也加强了。

我出席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当时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我在会上坦率地说，在一个工农国家，大多数领导干部应从主体民族中提拔。在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问题时，一些人(少数人)曾认为推荐现任国家监察部长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适当的。其他多数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领导职务将任命犹太人担任。我个人认为尽管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不过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最好还是选拔波兰族出身的党的领导人，因为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的犹太人越多，反犹太主义情绪就会越严重。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苏联的犹太族公民中，也有人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忠诚。

在接着谈波兰问题时赫鲁晓夫同志讲，当候选人扎姆布罗夫斯基被请到全会上来时，他声明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但他的讲话像一个待嫁的姑娘，嘴上请求父亲不要把她嫁出去，内心却巴不得这样。最后不得不对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说，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干嘛还要当书记，这将加强反犹太主义。

我没有出席选举书记的中央全会，然而马上就有人开始暗示似乎我

持反犹太主义立场。不过我仍然认为，领导波兰的应该是波兰人。要知道在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件后到波兹南去的不是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他在那里大概会碰到困难，而西伦凯维兹 [77] 同志去了以后，就找到了与波兰人的共同语言。

在你们意大利，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不会没有一批从苏联回去的心怀不满的人参与，尤其是波兰，波兰社会党人、米科瓦伊奇克 [78] 的追随者和天主教徒还很有势力。这些力量开始行动。领导者们惊慌失措了。报刊开始发表反对政府材料。我们事先告诫过波兰领导人这些现象的危险性，而他们认为民主化过程正在进行。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波兰的法国朋友通报说，看到陪同他们的波兰同志口袋里有赫鲁晓夫的报告，而美国人声称，在波兰赫鲁晓夫的报告值230兹罗提(赫鲁晓夫风趣地说：我对奥哈布 [79] 同志说，你们对我的报告作价太便宜了)。仅在克拉科省就发现我的报告短缺17本。这一切都是波兰领导人某种“休克状态”的结果，他们丢掉了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波兹南事件的益处在于，经过这些事件后波兰领导人看到了他们那里的敌人。

我们当然会懂得，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内容迟早会捅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但我们原以为这将逐步地发生。在苏联，首先了解报告的是中央委员会，然后是苏共中的领导干部，再以后是全党同志，对它的内容也不得不向共青团介绍，因为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教育出来的青年，在米高扬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出现了混乱。为了不使工人和知识分子受到委屈，决定也向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在苏联，报告的内容立刻得到所有人的正确理解，这是事实。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因这个理由从党内只开除了5—7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谈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迷信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你们惊讶，原来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因为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它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靠我国其他州而享受许多经济优惠。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得到孟什维克分子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至于格鲁吉亚事件，是从一些无关重要的讲话开始的。在斯大林诞辰日，最初是一些孩子到他的纪念碑那里来来去去，接着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后来聚起数以千计的人群。发现了发表反对党和政府言论

的演说者，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从莫斯科发出了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邮局、电报局的指示。警备司令得到命令，要他在城里建立秩序并要求人群在指定时刻前散开。在这个时刻前示威者组成了两个小组，其中一个组夺取武器，而另一个组向驻有部队的邮电总局大楼进发。人群冲进一层楼，在向士兵们开了几枪之后，开始冲向二楼。一个士兵擅自用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弹，人群四散奔逃。剩下一些人在斯大林纪念碑附近被装甲车包围，他们试图冲出去，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些小组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工人们不支持他们。例如，一个大学生小组到一个工厂进行宣传鼓动，被工人们赶出去了。

在格鲁吉亚还必须进行大量教育工作，因为如果说那里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有相当的觉悟，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尽管许多人也投票赞成党的政策，但对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理解。正是知识分子在人群中高喊：“格鲁吉亚孕育着新的斯大林！”“我们将给你们一个斯大林！”等等。格鲁吉亚的情况正在复杂化，原因是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是俄罗斯人，而行政管理人员是格鲁吉亚人。在格鲁吉亚40%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等，但在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然而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能说。

在格鲁吉亚过去实行的是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葡萄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集体化被搞成这样，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收入是从宅旁园地得到的。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原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不过我们并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懂得，人们得逐渐地习惯于新事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平衡价格差别不是靠降低价格，而是靠提高我国其他州的采购价格。

在本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实行监督，不让个别人或个别政府鼓励不同的共和国居民人均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一措施很有意义。

赫鲁晓夫同志表示相信，意大利共产党将正确地理解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战胜在意大利产生的困难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一切缺点正在成为过去。

至于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么在资产阶级那里可能找到比个人迷信的

后果多得多的坏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说，如果知道资产阶级报刊什么时候发表他的报告，那苏共中央《关于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克服个人迷信的决议》会通过得更早些。

在谈到陶里亚蒂同志对《新议论》杂志发表的谈话时，赫鲁晓夫同志说，总的来说我们对谈话的评价是很积极的，无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还是对苏联共产党人来说，都没有理由对来自对方的个别评论感到不满。当时不难对“蜕化变质”一词避而不谈，因为它已在国际上得到响应。为了预先向陶里亚蒂同志通报，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给他发出一封信并将决议的发表推迟了一天。我们非常满意的是，你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相信，对斯大林活动的批判和重新审查将改善我们的关系并给你们带来很大益处。我们认为，我们两党的关系不会因所发生的事件而蒙上阴影。我们理解你们的困难和作出有些紧张的反应的原因，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对陶里亚蒂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所说的不能作出回答。

意大利代表团提出我国的民主制，特别是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提出若干个候选人的问题。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今后也应当提出一个候选人，因为一个政党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严肃的，而其他政党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资产阶级的选举法的全部意义在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党，因而也就有自己的代表。斗争就由此而来。然而要斗争就需要有对抗性矛盾，而我们这里没有。如果我们在实际处理这个问题时，开始提出几个候选人，例如由党代会、苏维埃分别提出，那么我们这里倒不是在斗争，而是在游戏。而在苏联成立另一个对抗性的政党，在还不具备任何条件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没有任何意义。

帕耶塔同志：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合适的。但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难道不可以提出几个候选人吗？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提候选人时有过尖锐斗争的情况。有时，在筹备选举的大会上一个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落选了。有时，在受托人会议上改变了有关党组织预定的候选人的最初人选。不过我们把这看作该党组织工作的缺点，它对人不了解，给地方苏维埃提出了没有威望的候选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当之无愧很有名望的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极力诬蔑我们的选举制度，但是它办不到，因为选举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人

有使候选人落选的可能，不过他们宁愿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良好愿望。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改变选举制度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寻求社会生活各环节进一步民主化及提高全体党员和劳动者主动精神的方法。例如，我们正打算改进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本次会议就将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过去报告人总是极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讲到。布尔加宁同志将就退休金法作的报告大体上与报刊上发表的内容相同，他将不对预先讨论该法过程中提出的建议表态。这件事将由代表们及代表立法建议委员会作报告的人去做，后者将对讨论的结果做出评价并提出建议。把争议提交到苏维埃会议是适宜的，这会使它的工作活跃起来。赫鲁晓夫风趣地说，让共和国的代表们互相揪脑门上的那绺尖发吧，不然这次会议确实就开得枯燥无味了。

现在的情况与斯大林在世时不同。过去总是这样：不用作报告，不用宣读五年计划草案，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一次会上只用10分钟就亲自把计划批准了。如果任何人反对这样的程序，斯大林就会认定他是反对派。现在我们用一切方法鼓励对主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斯大林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时我们把我们的成就归功于苏维埃制度，也只能归功于它。当然，领导层出现过停滞不前，然而斯大林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世时也曾经正确地开展过意识形态工作。在基层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斯大林死后领导得到改进，成绩比以前更大了。

今年我们在3300万公顷生荒地上播了种，期望得到好收成。然而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做。斯大林死前不久委托我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的决议草案，这就把我置于危险的地位，因为我根据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建议，对斯大林也许是不能接受的。我马上遭到了贝利亚的抵制，他声称赫鲁晓夫的工作与以前马林科夫所做的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拟定了有益的建议并向政治局提出。然而斯大林既没看文件，又没看报纸，就问那上面说的什么。在听了说明以后，他推翻了建议草案并提出对它加以修改，根据是农民生活很好，只要卖掉一只老母鸡就能交上所有的税。他提出把对农民的税收增加420亿卢布，增加额相当于农业的全部收入。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被增补到中央全会的农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中时，才暴露出他们对工作完全不负责任，于是斯大林叫起来说他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等等。

帕耶塔同志还对《语言学》著作是否斯大林自己所写感兴趣。

赫鲁晓夫同志：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看来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指出，斯大林也有清醒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也创造出一些很像样的东西。例如，苏共党章的许多规定就是斯大林口述后记录下来的，你们自己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些多么好、多么清楚的表述。

帕耶塔同志：有意思的是，从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就发现了一种对民主化的渴望。

赫鲁晓夫同志：这也是斯大林要求的。遗憾的是，他要求别人发扬民主作风和敢于批评，只不过不对他自己。顺便说一下，斯大林在世时，州和共和国全会开得比二十大决议规定的要勤一些。这不完全合理，但却是民主的，并且证明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化的关心。

赫鲁晓夫对代表团说，斯大林以不能容忍的粗暴对待政治局委员和整个政治局。他讲了一件事：当斯大林得知政治局关于乌克兰西部一些州土地分配标准和决议后，用不堪入耳的字眼大骂政治局，尽管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

涅加尔维列同志：斯大林在对自己同事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粗暴吗？

赫鲁晓夫同志：是的，完全不容异见并且病态地疑心。

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准备随后就逮捕他们。斯大林死后才发现，以前被流放的莫洛托夫的妻子在莫斯科，看来是为了得到指控莫洛托夫的供词。加里宁的妻子坐了15年牢。对伏罗希洛夫的窃听从1942年就开始了。不让他看秘密文件，也不请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原因是认为他是英国间谍。甚至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可笑的指控，说他是美国间谍，好像他在美国还有财产，有自己的铁路车辆。

还可从斯大林与其最亲密的战友个人关系中举出许多说明他多疑和专制的事实，而多疑和专制导致他总是感到自己受到威胁。

帕耶塔同志，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可能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和暴君。

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同时他容不得竞争者存在。难怪有这么多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

罗马尼亚的情况无论是党内还是经济都很好。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错。领导机构免去了协尔文科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他干了不少蠢事，但他是个诚实的好同志，应当支持他。在他们国内有少量失业者。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请求我们给了他们一些农业机械。然而遗憾的是，机械化会使失业者人数略有增加，因此需要新的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地位是牢固的，但是国内生活水平很低。阿尔巴尼亚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但是从来不偿还。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潜力，而我们在这方面具体地帮助他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很好，尽管有怠工的事，尤其是在运输业，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能处理好这些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不错；经济形势差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活水平低于西德。我们完全满足了民主德国同志的所有要求，这将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西德进行斗争。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意有必要共同援助民主德国。赢得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现已展开的斗争，就意味着赢得争取整个德国的斗争。应当向德国工人和居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看得见的优越性，而这些根本的优越性就是油脂、肉、皮鞋。在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方面，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份额。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6年内工资提高了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予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3辆坦克，还想枪杀1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匈牙利的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 [80] 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 [81] 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 [82] 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

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得到巨大发展，那里没有使人严重关注的缺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形势严峻，生活水平低下，而领导人着手实行不切实际的方案，由于没足够的资金，他们对工业的投资搞得过大。我们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将以应有的方式纠正。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国际形势问题。他说，苏共领导对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以及在当前局势中美国人可能搞一些破坏行动的见解给予严重关切。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并不说明我们在走向战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以下看法。法国没有想战争也没有准备好战争，它已陷入阿尔及利亚，看来要把它丢掉。它的经济已被破坏，国内有强大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而法国人民不想要战争。英国同样不向往战争也没有准备战争，担心轰炸，从与艾登及其他英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德国目前被解除武装，人民中间也缺乏好战情绪，反对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就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不能进行武装也不向往战争，国内没有一个侵略性政党。在美国有人想靠战争发财，但他们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不会同意在朝鲜停战了。在远东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就是说只能通过欧洲作战，但美国不想用自己的力量作战，而是想利用别人的力量。目前在欧洲还没有要向我们开战的国家。

这样一来，现在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形成一种印象，在美国，人们谈论战争更多是出于恐惧。他们自己害怕，但极力吓唬别人。美国的复杂局势迫使一些反动集团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分歧投机，尽管他们仍旧挥舞着反共这个稻草人儿，但他们的行为已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把杜勒斯的发言与他以前的发言相比，现在已不带有那样多的侵略性了；麦卡锡、诺伦德及其他一些人全都下了台。

我们认为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错，只是应当保持警惕，聪明地实行政策，不削弱民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尤其要为这些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应当更有民主作风并更积极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挪威、比利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非正式地正在谋求与我们联系，这说明我们的威望得到高度评价。我们打算默不作声地忍受法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友善的讲话，现准备一篇文章反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科门的讲话。不过我们将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辩论。

梵蒂冈也试图通过意大利总统格隆基的私人医生与我们联系。目前正在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重要的是，如果梵蒂冈试图与我们联系，

这就是说它预感到什么。战争前夕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帕耶塔同志：甚至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关系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赫鲁晓夫同志接着说，我们正在与南斯拉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铁托同志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耍一些手腕。他本人希望与我们建立良好关系，但某种力量，大概是卡德尔及其同伙妨碍他。例如，乔治乌德治同志通报说，罗马尼亚方面提出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公报铁托同志起初赞同，但在卡德尔和波波维奇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过此后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铁托同志向乔治乌德治同志说，他仍然赞同公报的内容并将按它的精神行动。

至于在列宁格勒对铁托同志的迎接和我们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他在这件事上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的欢迎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苏联领导人而不完全是对铁托同志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发现了并对我们说苏联领导人在人民中很受欢迎。

谈话到此结束。意共代表团团员们为这次坦率的对意大利共产党非常有益的谈话向赫鲁晓夫同志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帕耶塔同志代表本党领导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人除了与苏联并肩前进无其他道路可走，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苏共看作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兄长和领导者。

赫鲁晓夫同志亲切地拥抱了意共代表团团员们。

АПРФ, ф.3, оп.23, д.207, л.14-41

№08812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致苏共中央

1956年7月19日

第900/Д号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20号决议(1955年5月19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黑龙江和吉林省机关的文件材料(即所谓满洲档案)做了准备。

所有满洲档案材料已全部由东方学专家做了研究,对研究苏联历史有用的文件(10000页以上)拍了微型胶卷。在材料移交准备过程中,对其编制了卷宗目录,包含17081份档案。文件材料已由硬纸板装订、封箱。

苏联外交部已把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意图通知该国政府,并等待中国代表今年7月前来苏联接收档案。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内务部认为最好现在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消息,报道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

此外,为了保障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以微型胶卷形式留在苏联的满洲档案文件的权利,考虑必须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我们留下上述拷贝和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它们。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报刊报道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签名)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号

苏共中央决议

一、批准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报刊报道草案。(附后)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留下对研究苏联历史有意义的微型胶卷拷贝,同意苏联学者可以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使用某些满洲档案文件。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把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所谓满洲档案(1675—1900年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文件资料)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批档案是原沙俄军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这批档案中保留着珍贵的和历史科学罕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政治发展史以及俄中关系史等方面的资料。

在移交的材料中有大量的关于两省行政和军事管理问题，关于居民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和农商发展，关于道路和水利建设、旗军状况等文件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文件基础，满洲档案对于研究17—19世纪中国东北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81, л.46-48

№02862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 和西欧的情况(1956年7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7月24日

第320/c号

机密

文本第2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谈话记录

1956年7月20日

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了话。

中国大使宣称，他想谈一谈苏加诺总统在美国和西欧国家访问的一些细节。然后，黄镇提议由自己的翻译陈利水(Чен Ли-шуй)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关于总统之行的通报。

陈利水宣读的内容如下：

在这次出行中，总统苏加诺的某些随行人员宣布，总统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目的如下：

- 一、就西伊里安问题寻求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 二、保证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但此次出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美国重建银行允诺给予援助，但在规模上远比早先进出口银行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的借款少。

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总统的正式接待是热烈的，但没有举行与广大群众的会晤。只是在意大利，总统有过一次与普通人民会见与交流的机会。在意大利，他访问了汽车制造厂并与工人谈了话。工厂所在地正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地区。

据另外一些人士说，访问美国的计划很紧张，不必要的礼仪层出不穷。军队致敬仪式和要参观的军事目标也过多。给苏加诺仿佛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整个美国就是一座兵工厂，到处都能看到大量的士兵，渴求武装化预示着怯懦。

美国报刊很少关注到他，将他访问美国的报道竟刊登在最后的版面上。苏加诺对此表示不满意。他对美国官方人士怠慢代表团成员、印度尼西亚空军少将苏里亚达马而感到受辱。

上面提到的人士认为，苏加诺在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之后加强了自己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在美国有人试图挑唆他去发表反共产主义的演说，但未能得逞。

在加拿大和在美国一样，接待也是正式的。

在意大利，他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

在西德他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但西德政府开始时并没有想让他公开发表演说。只是反对派的发言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才给苏加诺提供了发表演说的机会。西德也允诺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可以看出来，美国和西德加强了败坏总统声誉的尝试。在这些国家总是秘密派遣了一些女人到总统身边。他们也没有忘记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向他们“安排了娼妇妓女”。现任外交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充当了撮合总统与女人私通介绍人的作用。苏加诺没有能坚持住。他将3个这样的女人带回了雅加达。他同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在茂物宫里，而将另外两个美国人安顿在“杰斯因杰斯”宅邸里。

苏加诺得到20多种型号的火炮礼品。美国人馈赠他一辆汽车，但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劝阻苏加诺不要接受它。在西德他也收到了礼品。美国给苏加诺的儿子贡图尔赠送了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放映机。

苏加诺代表团的成员，在从雅加达出发时各携带了两个手提箱，而

在返回时，手提箱的总数已增至400个。苏加诺的许多随行人员向华裔移民勒索了钱财。

然后，黄镇通报说，他们正在采取措施，准备苏加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他说，为迎接总统的来访，他们专门出版一本印度尼西亚画册。

对于这一点，我对他说，我们准备出版苏加诺著作选集。

中国大使接着说，总统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演说中表达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要求和宿愿，并号召所有进步势力要加强团结。黄镇说，在中国苏加诺希望像面对自己祖国人民一样面对中国人民发表演说。他说，总统要用印尼语讲，之后不要一句一句地译成汉语。大使通报说，他们打算给苏加诺赠送他访问中国的相册。

从我们这方面，我说，我们准备拍摄苏加诺访问苏联的长彩色影片。

最后，黄镇说，苏加诺要求对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给予关注，并说，总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多会见人民的要求，不赞成搞过多的形式和礼仪。

陈利水补充说，苏加诺喜爱舞蹈和歌曲。在苏加诺喜爱的印尼歌曲中他点了《边加万独奏曲》、《哎哟，妈妈》、《梅拉姆别拉姆别》、《赫拉·罗塔涅》。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1, оп.12, п.10, пор.5, л.66-68

№21474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1956年7月26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5日

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会谈记录

1956年7月26日

平杰三来访，同他就中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了会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平杰三说道：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除了农工党，其他民主党派都是不久前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民主党成立于1927年。最初被称为“第三党”，然后是“革命同盟”。

现今有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1956年5月底它们共计有45987人，各党派党员人数分别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数据是1956年4月底的，其余党派的数据是1956年5月底的)：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803人

中国民主同盟——18036人

民主建国会——12921人

民主促进会——2330人

农工党——3016人

致公党——120人

九三学社——1607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54人。

尽管人数少，但是这些党派在特定居民阶层中有很影响，它们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主要是，为了这些党派进行合法斗争，就各种问题和我们讨论，并发表他们这一阶层的观点，在那里我们很难

施加自己的影响。

平杰三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的特征。民主建国会——这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超过70%的党员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余下的是与资本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在部分工业商贸企业工作的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前国民党活动家、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民党军队代表组成，还有其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

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主要是高素质的老知识分子，这些党派“按照这些人的职业特征进行划分”。比如，民主同盟成员是大学里的教授教师；民主促进会成员是大学老教师、中小学校长、印刷业工作人员；农工党成员里没有一个农民和工人，他们吸纳的是中医医生，而且吸收这类专门的人才是中共中央最近向农工党建议的。致公党——这个党主要包括回到祖国的中国侨民。有别于以前的是，该党在国外的中国侨民中进行工作。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于台湾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是台湾岛居民的政治组织。

在解放前，民主党派人数相对很少，当时他们中最大的一个党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清洗，他们的党员人数还要更少。只是从1952年起出现转折，当时这些党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恢复接收新党员工作后，至今都在继续这一工作。

民主党派人数急剧增长的新阶段始于1955年末，特别是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涨时期。这一时期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农工党的人数急剧增长。九三学社在最近3个月内增长了700人，目前共计约2000人。民主建国会从今年4月到现在增长了4000人，到7月底共计有17000人。其他党派也适当地增加了。除了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委员会就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在下半年民主党派将有持续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人数增长进程如下：

1950年末——9790人

1952年6月末——24880人

1954年4月末——38000人

1956年4月末——大约45000人

1956年末——估计8000人

平杰三表示，中共不担心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相反，希望它增长。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的党——中国共产党——共计有900万人，共青团有1200万人；第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现今已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帮助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即中共和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这一框架内早已有之的合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党派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总体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遵循和中共一致的立场，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同时他们 also 存在着和中共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党派中部分党员在寻找着第三条、中间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和另一方面，即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消除了走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幻想。解散积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民盟是重大教训。经受了反动派对自己的压迫，民主党派明白了，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开始转向中共一方。1948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民主党派公开号召，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主党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可能性观点的破产。他们的代表来到中国解放区，并完全转向中共。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助手，至今都在与蒋介石合作。

1949年后，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民主党派，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

问题是，为什么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共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群众没有考虑走向资本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包括它没有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在革命胜利后，之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生存的可能性。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

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民主党派的行为。

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服从它，并和中共走一条道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他们组织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关系中保持自由，而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这反映在自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有权从中退出，有权自主，没有外来干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形式，选择自己的机关等等。参加实践、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们有自由表达任何观点并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在政治方面，民主党派党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民主活动家中被分为以下三类：(1)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2)那些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共措施的人，而在他们心里则是反对的，他们不赞同中共的措施，有时会施加阻力；(3)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是中立派，顺势而为，落后分子。但是在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在增长，落后分子在减少。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面貌继续在改变，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劳动者。经过2—3年，资产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些将给民主党派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共考虑到最近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分在发生变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与它们的相互关系。

1956年5月，中共在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即“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这一新路线的出发点是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多久，共产党就存在多久。这一路线使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平杰三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关于共存。中共关于几个党共存的新方针的提出，考虑到了一系列因素、主要形式和国内政治。

第一，存在使这些党生存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不可以消灭这些党，只要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关于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直接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相联系。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同时剥夺它的资产，而是要逐渐赎回它；对待资产阶级本身，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对资本家的改造并使他们成为劳动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民主党派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中共提出的新方针消除了这种危险，表示同他们合作，同非中共党员合作，这是共产党不变的方针，只要中共自己存在，就会保持这一方针。

第二，民主党派的存在也是由于他们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相对广泛，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和倾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情况，提供准确制订必要措施的可能性，更快地注意到成功的迹象，因为民主党派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缺点。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中国与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点都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形式是很多的，由此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条件，提供了以不同方式解决多党存在问题的基础。苏联在只有一个党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因此中共和民主党派走向共存，也就是保持多党制。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中共的领导下，多党制是必须的。

从其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平杰三说，民主党派现在也正经历特殊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面貌和特点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由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劳动人民的党。但是，甚至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也会保留。我们认为，从觉悟方面来说，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人总是停留在不同的层次，何况，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有基础，作为政党，它们反映了政治觉悟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人的情绪和要求。

关于相互监督。说到相互监督，我们的意见是，首先，不同的党有提出不同观点，或者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自由。批评中共和政府的行为，指出他们的实践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这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和政府的重要形式，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提出相互监督的方针，首先是监督中共，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支持中共的政策，尽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阶层

人的地位的独特性。中共干部经常掩盖不足，或者不能适时纠正它，而民主党派则能更早地指出这些不足，更快地提出这些不足进行讨论。平杰三说，通常，对于这个或那问题，在中共成员内部没有进行特别尖锐的讨论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当问题被拿到政协组织中和民主党派讨论时，就会有很多修正意见、补充、具体的建议等等。比如，根据傅作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补充了关于接受已转向人民一方的前国民党军人加入合作社，并给他们分配土地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

在赞成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指出，比如，农民留给自己很少的粮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挨饿。在支持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破坏法制的事实，如不遵守司法程序就逮捕、跟踪等等。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代表就司法机关、贸易部和农业部等诸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考虑到这些，中共在施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变得更加聪明和谨慎。

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是一个政策方针的两个方面。共存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中共领导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监督中共的活动，只有在共存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保那样的监督。民主党派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同时它消除了之前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担心。应该指出，如果说中共领导干部对中共新方针的正确性已有统一的看法，那么下面的干部暂时对其实质的理解还不够。因此，在对新方针的解释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平杰三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还有自己不利的一面。中共和一些民主党的共存可以促进消除一党制度固有的很多不足。一党制显然不一定必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可以在几个党共存的情况下顺利实施，但要在中共对他们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持的看法，这一看法源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条件。

平杰三指出，中共和民主党的联盟就其实质来说，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平杰三回答了在谈话过程中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 1.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1226人，其中668人是中共党员，274人是民主党派人士，284人是无党派人士。

2.关于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和机关中民主党派人士的数量。

平杰三说，民主党派人士占中央机关领导和部长总人数的1/3。民主党派人士有“16人”，领导以下各部和机关：

史良，民盟，司法部部长

章伯钧，民盟，交通部部长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粮食部部长

李德全，无党派人士，卫生部部长

傅作义，无党派人士，水利部部长

张奚若，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

许德珩，九三学社，水产部部长

罗隆基，民盟，森林工业部部长

李烛尘，民主建国会，食品工业部部长

朱学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邮电部部长

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蒋光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部部长

梁希，九三学社，林业部部长

李四光，无党派人士，地质部部长

沙千里，民主建国会，轻工业部部长

沈雁冰，无党派人士，文化部部长

在副部长和机关领导副职中，民主党派人士占18.7%。

在省级人民委员会的22名省长中有2名(湖南省和广西省)是民主党派(均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将近3000名民主党派代表担任副省长、各省局机关的负责人和副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大约有12000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地方政权机构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概25%—30%应当是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3.关于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的工作。在民主党派中每一个党里，都有共产党员，它们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总共不超过600—700人。出于策略上的目的，中共中央对那些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党，而不是在那里“监督”，否则他们将失掉威信并处于隔离状态。

4.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共。最近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中共。从今年2月到5月，大约有50名来自九三学社的成员被接受加入中共，来自民盟的有150人。他们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谈话结束时平杰三说，在统一战线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中共将逐渐揭露并消除它。

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平杰三同志，约定最近进行下次会面，以便再次谈谈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大使馆人员杜布罗夫斯基和达维多夫同志。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

И.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对中国的工作。已经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191-201

№23029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

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1956年8月2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根据约定，兹发送给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的译文，这是由我们的记者科任同志转交来的。

Ю.茹科夫(签名)

1956年8月2日

附件 [83]：

附件一，195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钺的文章《谈“百家争鸣”》；

附件二，195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光潜的文章《百家争鸣，定于一是》；

附件三，1956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罗隆基的文章《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附件四，1956年6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附件五，《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1日发表的马寅初的文章《我也来谈谈百家争鸣》。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219-233

№20554 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3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А.М.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7月20日至8月3日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

平壤市

第216号

1956年8月4日

8月3日，应邀会见了中国驻朝鲜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

曹克强同志请我向他通报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结果。我谈了关于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补充经济援助的情况，并顺便问曹克强同志，是否朝鲜朋友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提供补充经济援助的问题。曹克强同志作了否定的答复，并说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机关个别领导人的会谈中，后者正为朝鲜政府起草相关建议。显而易见，该建议在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审议后将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据他(曹克强)同志所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已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关于中国和朝鲜间1957年商品供应的协议草案。根据该草案，中国在1957年度应向朝鲜提供总价值为2亿元的各类商品，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预计也将根据该草案向中国输入价值为4000万元的商品。曹克强同志认为，朝鲜希望通过中国的援助来填补这一缺口，显然，他们是打算请求这种援助的。

接着，曹克强同志指出，个别朝鲜同志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对中国是如何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颇感兴趣。关于中国同志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曹克强同志说，他们在答复此类问题时一般都会引用中共中央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著名决议。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A.彼得罗夫(签名)

1956年8月3日

共发送4份，送：谢皮洛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库尔久科夫同志，
存档

1956年8月4日

第850号

№23028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 谈双百方针(1956年8月8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我们的记者A.科任和B.阿福奇尼科夫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Лин Цзянь-цин)同志的会谈纪要：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的译文。

Ю.茹科夫(签名)

1956年8月8日

附件一：[\[84\]](#)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简评“百家争鸣”方针》

附件二：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谈纪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同志在与记者会谈期间讲了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些相关问题。

林同志说，要理解这一口号，就必须搞清楚以下意思。我们应当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证明，只有我们的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十月革命前当列宁创建共产党之时，马克思学说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旗帜。而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版图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理论得以实现的活生生的范例。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二面旗帜。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面旗帜——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旗帜。近年来，全世界共产党针对新的战争准备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和平成为了他们的第四面旗帜。共产党人手中还高举着第五面旗帜——自由的旗帜。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家争鸣”这一口号的意思是让不同观点的代表自由地辩论，自由地表明各种看法，其中包括批评和反批评的思想自由，以及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谓的宣扬唯心主义自由的局面。

那么，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允许宣传唯心主义的观点呢？这里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世界上仍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它就将一直存在。如果不承认在社会上，甚至党内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观点，那就跟现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唯心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对它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宣布唯心主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唯心主义并未因此而停止存在，只是长期地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另一种方法——宣布允许唯心主义观点有宣讲的自由，从而在公开的争论中确保唯物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学说的胜利。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只有采用第二种方法才能够赢得彻底胜利，并最终把唯心主义斩草除根。

第二，在唯心主义内部也存在有积极的因素。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庸俗化地谴责与唯心主义有关的一切。德国古典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如今，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在走下坡路，并变得越来越反动。但即使现在在其中仍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要知道，沙漠里也会有绿草的，唯心主义也存在有价值的萌芽。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唯心主义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只是在100年以前才有的。而在这么一点时间里唯物主义学说当然尚无法包含如此众多的，跟地球上的海洋一样的人类知识。在许多科学领域，即使是那些拥有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仍在做出有价值的发现，并得出有益的结论。无论是在自然学科，还是在人文学科均存在这样的情形。例如，在美学问题上便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就这一问题写过许多东西。应当承认，坚持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中国如今也有许多学者有时没有决心表明自己的见解，就是担心被指责犯了唯心主义错误。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地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样我们也就能够从他们的“密室”中获得大量的知识，并在公开的、同志式的批评中分离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我们认为，给予人们宣扬唯心主义的自由将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为了进行辩论，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需要准备好自己的武器。以前，我们的宣传家们有时很少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自己的文章变得更加让人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现在，他们就不得不警觉起来，以防止在自己的文章中出现弱点、不足和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从而轻易被人驳倒。展开这样的辩论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将使其有机会在战斗中检验自己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们当年都是这样做的。要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的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反对杜林和马赫的斗争中写出来的。

总之，让唯心主义观点自由地讲出来是必要的。可是，为什么过去党没有提出这一方针？而且，1954—1955年间在国内反而还搞了大规模地坚决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运动，其间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呢？难道我们当年是搞错了吗？不是的。问题在于，我们当时是以公开辩论方法进行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必须首先以唯物主义思想来很好地武装我们的干部。要知道，当时我们许多人尚不明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许多科学领域均受到唯心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的人还不能完全明白唯心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和危害。

这就好像当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我们要与其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先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才有停战谈判的可能。与此同理，只有先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才能让唯物主义在成千上万人民的头脑中扎下根。这些年间，我们已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战线上赢得了巨大胜利。如今，唯物主义已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并已在公开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当然，让唯心主义拥有宣传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思想可以和平共处了。我们是根据当前的新条件而提出这一政策的，以适应向反对唯心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过渡的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赢得社会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彻底胜利。

“百花齐放”口号的意思是(作家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体裁和表达方法。作家和艺术家既可以采用新的描写方式，也可以采用旧的表达方法，既可以描写新社会，也可以刻画旧社会，既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正面人物，也可以把反面形象作为刻画的重点。在落实这一口号的过程中围绕这样一个情况产生了许多争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好的，但远远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方法。而“百花齐放”的口号并不是侧重于争论，而是竞争。观众和读者自己将会对什么样的作品更为成功作出评价。而生活本身也证明，我们不能仅仅把一种体裁或一种创作方式宣布为唯一有价值的。这就好像北京的传统戏剧——京剧一样。这一体裁的作品不仅在民间非常流行，而且其中无疑也蕴涵了许多能够体现我们民族性的积极特点。难道他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类似例子还有苏联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另外，我们的作家们有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刻。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叙述平淡、乏味，充满公式化的样板式人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前不久举办的全国话剧汇演中，多数剧目均

以“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泽东”等台词作为结尾。当然，此类言语现在倒是经常会从工农群众的口中听到，但也不能如此千篇一律，把老百姓所言、所感如此概念化。在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时，作家们所描写的新人形象失去了特色，乏味而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其全体高尚品质均套用如下公式：一位工人由于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而放弃了婚礼，新婚夫妻平时所谈的只有关于在工厂里高速切削的事，等等。作家们都避免描写爱情方面的内容，以防被指责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外，我们许多对旧社会及其矛盾有深刻了解的老作家也被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宝库封闭起来，而只写一些并不总能让人好理解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要求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在艺术创作的体裁和方法方面，文学工作者们理应得到充分的自由。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新时代的旗手，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近来，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批评的自由问题。一些人赞成“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认为没有必要开展针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他们希望，至少在1—2年内不要对唯心主义者的言论进行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放弃批评，虽然我们也保护反批判的自由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批评是需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因为在政治领域所发表的错误意见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我们也认为批评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敌人的批评和同志式的批评。将所有发表了唯心主义言论或错误政治观点的人都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不对的。例如，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成政治禁运的言论，我们就要把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拥护者来批评，虽然我们不会像对待帝国主义者那样来对待他，而是极力以辩论的方式驳斥其观点，证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党在进行此类同志式的批评方面拥有良好的传统。众所周知，王明和博古等同志都曾犯过政治错误，并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反对党八股》、《党的正确工作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在针对上述同志的同志式批评方面树立了榜样。王明同志至今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同志式批评的方式。

现在便开始谈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问题还有些为时尚早。但其主要结果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它活跃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自由创作创造了条件。例如，从前人们曾认为所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是正确的，反映了对某一问题的最终观点。可实际上即使这些文章也会犯错。报纸，包括中央机关报在内都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什么事情都看得清的。因此把《人民日报》当成是可以免除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报刊是不对的。要知道，连斯大林自己也曾说过，世界上并不存在不经过辩论和争议便能够发展的科学。

当然，高校里的大学生们有时很难自己分辨出唯心主义观点的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辩论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一位身为摩尔根观点研究者的教授在课堂上理应依据国家为所有大学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来给学生授课。与此同时，我们也打算分出专门的时间开设有大学生参加的学术辩论会，而其间这位教授就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并向听众介绍自己认为摩尔根的哪些观点最具价值。当然，此类辩论会也应当从大学教师中邀请一些持强烈反对观点的学者来参加。

我们向林同志提出的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与中共前不久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所有党派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方针，是否有关？林同志答道，这些都是不同的东西。中共执行与民主党派和平共处的政策有如下几个理由：首先，该政策适合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阶级终将消亡，那么保存他们的党派有何必要，例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我们认为，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其观点、意识形态仍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最好能够为表达这些观点提供一定的合法场所，而各民主党派便是这样的合法场所。

其次，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和执政党都有好处。前不久，有人曾向中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在自己的政策中犯错误。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我们不会犯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但至少不敢保证不失败。各民主党派发挥着补充性的监督作用，可以

向共产党暗地里指出其所犯错误和所存在的不足。如果有人竟然认为，当我们在为国家从事繁杂的工作时完全不会犯错误，那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错误是有的，而且将来仍会经常存在。应当及时地指出这些错误，从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展到严重错误的地步。

其三，保留民主党派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一道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也积极地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当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便拒绝与这些人合作是不公正的。另外，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这些党派也可以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有可能促使非无产阶级党派为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服务的。

科任

阿福奇尼科夫

1956年7月26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40, л.200-218

№20555-7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17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6—24日

第2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8月17日

我拜访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之会谈。

在谈话当中我叙述了关于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与朝鲜政府代表团之间的会谈结果和经过。

乔晓光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朝鲜新的援助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了在这方面苏联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乔晓光说，截至目前朝鲜政

府仍未就中国方面进一步给予朝鲜援助的问题向位于平壤市的中国驻朝鲜使馆作出任何相关通报。乔晓光问，关于这方面问题苏联使馆是否了解一些情况。对此，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乔晓光继续说，率领朝鲜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的是金日成，看来，届时他们将与中方讨论关于(中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问题。

乔晓光又说，朝鲜政府已建议(中国)签署关于在1957年度中国向朝鲜提供2亿元商品的协议，其中4000万元为以商品的方式提供。至于其余16000万元如何使用，乔晓光说，朝鲜同志仍未做出明确的说明。

我们相互约定并认为，今后多举行此类会见对双方都是有益和必要的。

参加此次会谈并承担翻译工作的有我使馆随员М.П.库尔别茨基和中方译员王保民。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46-347

№1038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1956年8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所决定的问题(1956年8月20日)

第141项 关于苏联内务部的问题。

一、批准并同意在报刊上公布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通报草案(附件)。

二、责成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保留一部分对于研究苏联历史具有一定意义的满洲档案的缩微复制文件，并允许苏联学者在进行学术研

究时使用这些档案材料。

三、提交主席团审批。

附件：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保存在苏联国家档案馆里的所谓满洲档案(即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1675—1900年期间的文件资料)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档案材料是原沙皇俄国军队在1901年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这些档案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目前历史学界还极少有人研究过，其内容涉及中国对外联系的历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以及中俄关系的历史。

在即将移交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有一大部分材料其内容是关于两省的军事和民事管理问题的，还有关于居民的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农业和贸易的发展情况、道路建设和水利工程、旗人军队的状况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研究中国东北地区17—19世纪历史的文件史料基础，满洲档案具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ЦХСД, ф.4, оп.15, д.527, л.46、93

№24925 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 实习工人(1956年8月22日)

格洛莫夫同志：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80名工人前来实习。24名实习工人的名单(22名工人来自蒸汽机修理工厂，2名工人是研究内燃机工作的)已经提交。

兹向您发送另外56名实习工人的名单，这些实习工人应当在今年10—11月份分别到达苏联。

考虑到我们没有充分的经验来制定名单，这些名单的制定不完全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就实习工人的专业教育问题和实习期限问题进行的谈话。

注：所提名单有112页，共2份。 [\[85\]](#)

此致

敬礼！

1956年8月22日

莫斯科

РГАЭ, ф.1884, оп.60, д.1758, л.41

№09835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8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号

致苏共中央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随信寄去使馆整理的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的材料。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或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底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以后在不同时间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在内部报告中重复过这些原则。

在中国的公开报刊上，还未引用上述毛泽东的十项指示。本材料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

附上述材料，共18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В.利哈乔夫

附件：

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

所谓十项方针或十项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又拿到地方上讨论、修改和补充，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在提出这些方针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到3月底，全国90%的农户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55%的农户是高级社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的成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企业(其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92%，其资本占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75%)已变成合营企业。全国手工业的88%已联合成生产合作社。

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一、第一项方针毛泽东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强调指出，不能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在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关注。否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就将处在困难的境地，而重工业本身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重点项目已由计划规定的65个增至99个。从预算拨款看，与1955年实际水平相比，1956年对轻工业拨款增加86.14%，对重工业拨款增加42.08%。在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和报刊上(见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详细论证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的变化依据，而且作为基本理由还提出了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再者，轻工业投资回收快、利润高，这样将保障国家积累迅速增长。

在分析引起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变化的原因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的确，中国同志们指出了按人平均中国轻工业生产的落后：中国的棉布生产仅为苏联的1/4，不足印度的1/2，羊毛、亚麻和丝绸布匹生产接近苏联的1/40，而不足印度4年前生产水平的1/3。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按人平均更少、更落后。1955年按人平均，电力生产不足苏联的1/40，煤不足苏联的1/12，石油不足苏联的1/220，生铁不足苏联的1/27，钢不足苏联的1/47，水泥不足苏联的1/15。而且现在轻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现在还难确定，与原来设想相比，比例调整要使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多少。但是应该指出，按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五年计划时，中国同志们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据是，重工业现有基础非常落后，在生产日用品上轻工业和手工业可利用的潜在资源雄厚。随着比例调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计划达到87.5%。

二、第二项方针涉及必须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

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强调不应在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和高等教育，应把一部分工厂和高校从这一地区迁往内地，那么现在经验表明，不应这样做。毛泽东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旧中国70%的工业。接着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工业区的发展上，但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五年计划前3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呈现滞后，尽管以前的多数企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较发达的生产手段，有较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65.6%，沿海各省市增长54.4%，而内地增长96%。如果说1953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31.7%，上海增长34.5%，天津增长36.7%，那么到1954年，全国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6.7%，而上海仅为7.4%，天津为11.6%；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是8%，天津仅为2.1%，而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反而下降4.5%。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上海，对40种产品的生产调查数据表明，仅有10种产品，其中生产设备使用效率超过80%，20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40%—80%，8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20%—40%，2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低于20%。而按照五年计划，近70%的工业生产增长应依靠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好位于沿海地区。

毛泽东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形势成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56年6月)、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的对象。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公开讲，对上海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挖掘上海的工业潜力注意不够。《人民日报》在7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规定出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积极措施，或考虑得不充分。这样，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而国家没能从沿海的工业中得到更多的产品、积累和干部。李富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还指出，由于对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地的意义估计不足，存在怀疑，没有同内地建设很好地结合，所以在制定计划和实际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认为纠正这种状况的具体出路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地区所有的现有潜力，把企业改造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重组结合起来。

据报刊上报道的材料，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海，5、6月份已有160多家合营企业(重工业)开始被改造，规定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扩大产品生产。据使馆掌握的材料，现在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将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全国的主要轻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三、中共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计划反映在第三项方针里。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上的资金还不够充分，给国防拨款还依然很高，毛泽东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给经济建设拨更多的资金。这一方针还有其具体的表现。例如，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对苏联军事顾问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根据毛泽东减少军事开支的指示，打算裁减兵员，减少即将陈旧的武器储备，减少武器进口。

四、接着，毛泽东在第四项里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他说，在公布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里，只讲发展农业生产，几乎没提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们对工人讲了许多，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

这一加强关心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的方针有其客观必要性。与国民党时期相比，尽管居民的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关于中国基层居民的详细生活状况请见使馆整理并已寄往中央的专门材料)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薪金实行了改革。从1955年底开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改革准备工作也积极开展起来。现在改革正处于实施阶段。1956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将增加13%。

改善劳动者物质状况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里都认真讨论过，至今报纸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企业和机关里正在专门调查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调查结果拿到党的组织里讨论。党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详细掌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采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在毛泽东讲话之后，这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农民，党组织提出了在1955年让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任务。7月9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下达了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其中规定，今年限制社会基金留成和管理费留成，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合作社社员。

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中央还不能对全国执行这项指示的前景作出确定的结论。据某些省的夏收分配结果，这项指示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四川

省21个县，91.93%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安徽省种植茶树的许多县，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幅达到20%—30%，甚至50%。同时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在湖南省，经检查确定，在夏收分配中，40%的合作社不能保障自己的社员(90%以上)增加收入；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发展多种经营。类似情况在甘肃省某些合作社也存在。现在党组织正在做工作克服出现的缺点，以求秋季丰收弥补过去的损失，完成中央下达的指示。

如此看来，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方针首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重新考虑它以前提出的原则，揭露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

中共加快速度提高劳动基本群众物质福利的方针巩固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实际优越性，巩固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为在全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着有利的氛围。

五、在十项方针中，包含许多纯政治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民主，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进一步巩固国内政治形势。

在第五项里，毛泽东提出了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他说，中央机关包揽了过多的事情，直到解决狭小的具体的问题。管理国家，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毛泽东要求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直至制定某些法令文件的权力，让他们有可能根据本省的情况，在贯彻中央机关的指示时作出适当修正。

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国家管理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由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引起了生产力的高涨。为了适应这新的形势，周恩来说，必须进一步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的原则应是“进一步调动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至于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如李先念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将在国务院召开的…… [86] 会议上详细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六、在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长期以来经受压迫，其中包括来自汉族方面的压迫，居住在边陲以及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切实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地方，中共的民族政策贯彻得不力，还有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一些地区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依然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少地区还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匆忙，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和本身发展的特点，轻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如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权益，轻视他们。汉族干部包揽一切事务，实际上把少数民族干部排挤在一边。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让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钻了空子，甚至组织武装暴动。1956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这方面的情报已寄出)

…… [87] 对这一领域工作中的缺点展开了广泛而尖锐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7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不久前，民族委员会对各民族地区状况进行了检查。为此成立了7个工作组，分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工作组成员有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

族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民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等等。其中一些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专门培训。给这些小组提出的任务是，用4—7年的时间深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发展水平、所有权系统和阶级斗争状况，尽可能搜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习俗和风尚方面的资料。所有小组，包括西藏小组在内，均已着手工作。

毛泽东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正在努力贯彻执行。按照1956年预算，全国经济建设拨款比1955年增加17.04%，而内蒙古这一拨款增加了54.31%，青海增加113.14%，西藏增加27.27%。全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经费拨款1956年比1955年增加预算18.36%，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25.06%，内蒙古增加50.36%，青海增加71.38%，西藏增加28.72%。

七、毛泽东在十项方针的第七项里，论述了中共中央对待民主党派的完全新的和重要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将在长时间里允许在中国存在民主党派。在论证这一原则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反对派”有重要意义，通过民主党派中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提出的其他论据还有：继续把资产阶级吸引到人民政权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分子赞成我们是重要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赞成我们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中共所实行的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政治方针的实质。

正如中国朋友们所认为的，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是非常薄弱的，无论从他们的政治分量看，还是从他们对群众的影响看。他们总共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5万人。这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拥有9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而且表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还很普及。现在的民主党派按其本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中共新方针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老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同时，这也表明中共打算继续保持统一战线，意味着资产阶级代表和老知识分子有可能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保持自己已有的权利，意味着“安抚”这一阶层，防止他们的不满，加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最终，新的方针将进一步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毛泽东讲话和新方针颁布之后，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地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始吸收新的成员。例如在3个月的时间里，到7月底，九三学社增多了700个成员，人数将近2000人；民盟成员从4月的12000人增加到7月底的17000人。中共认为，到1956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将达到8万人。（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关于中共中央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的通报）

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镇压反革命和贯彻镇压措施方面的总的政策方针。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大大减轻对犯罪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
[88] 一般来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国民党俘虏不使用死刑.....保留反革命分子的生命不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险；如果在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时发生错误，那就不可挽回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行动完全是正当的。其正当性首先是由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根本社会变革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及其强大允许在全国范围内于1955年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镇压颠覆活动的行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前3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大一批破坏分子受到保卫机关、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监管。1955年处决12500个反革命分子。如果说第一次镇反(1951年)监禁130万人，处决71万人，监管120万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好多年没有停止，那么这次很清楚，到1956年4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

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对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的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

查。到1956年初，共审查400万人。

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肃反斗争，这表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颠覆中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削弱了内部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自己也开始明白，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前途。从1955年底开始，到安全机关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增多了。到目前为止，自首人数已达几十万。毫无疑问，对反革命分子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九、第九项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讲某些批评的原则。毛泽东反对这种现象：当摸清了中央领导的意图之后，下面便“异口同声地赞同上面同志的意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有不同意见也不说，只是观望其他人的反应并同意他们。毛泽东还反对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人，瞧不起他们，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工作。

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会议是在发扬党内民主和代表积极参加的条件下召开的。比如，在省的代表会议上，通常有60—80人发言，有事不能出席还可书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书面发言也算发言。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口头或书面发言的通常达到120—140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一般情况下，不称职和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被从代表会议主席团拟定的新的党委候选人名单或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开除。

与以往相比，这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是在严厉的批评精神之下召开的。在发言中，一反传统做法，每一个发言者都对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给予批评。

不久前中共提出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递交单独报告）

关于同情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因而受到严厉批评的薄一波同志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如今仍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占有显著位置。

在开展批评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从下面来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

所以，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藉。

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

毛泽东告诫不要骄傲，强调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继续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也反对解放前就存在的一种意见：似乎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妄自菲薄，相反，为建设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动员自己潜在的力量和能力。

№09839 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6年8月23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现报告对在第十一届联大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以往几届联大会议上，苏联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权利的意图经常遭到美国的破坏，它每次都以多数票蒙混通过自己的提案：把这一问题推到“下次大会讨论”。

但是最近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联合国资本主义成员国开始倾向于正确地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促使这一倾向发展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总的来看，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因此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寻求可接受的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努力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国际威望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

——许多不发达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希望在巩固自己独立的斗争中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

——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人士同中国扩大贸易的兴趣不断加强。

对联合国许多资本主义成员国立场的变化——向有利于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方向转向——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一件事，即由于国民党分子在十届联大上的错误，18个国家没能同时加入联合国。

主张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国家的数目增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十届联大会议结束时吸收了16个新国家为联合国成员国，其中一半以上同中国有友好关系。

据非正式材料透露，蒋介石驻美大使馆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于1956年1月26日给国民党立法院外事委员会提交报告，其中指出，联合

国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十一届联大会议很难阻止讨论中国问题。

对在下届(第十一次)联大会议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现在各国所持立场如下：

在联合国76个成员国中，对下届讨论这个问题持坚定立场的可能有24个国家(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有12个国家发言赞成讨论中国问题；有42个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主张再次拖延讨论这个问题；有6个国家弃权)。它们是：1.10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2.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挪威、瑞典、丹麦，它们在十届联大会议上已发言反对美国拖延讨论中国问题的决议；3.埃及、叙利亚、也门，它们不久前已与中国建交；4.阿富汗，它在阿苏1955年12月18日共同声明中已明确表示对这一问题持积极立场；5.锡兰、尼泊尔、柬埔寨、菲律宾，它们已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被吸收为联合国成员国，从它们对中国总的态度看，可以预料，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它们对中国将采取积极立场。

但是应该指出，在上述国家中，其中一些国家虽说赞成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可能采取不十分彻底的立场。众所周知，其中一些国家还没有彻底抛弃在联合国可有“两个中国”代表席位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坚决反对讨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可能有27个国家。它们是：美国、国民党分子、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伊朗、伊拉克、泰国、菲律宾，还有17个拉美国家(即除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之外所有的拉美国家)。

至于其余25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立场(英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巴基斯坦、新西兰、南非联盟、老挝、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等)，现在尚不清楚。它们大部分承认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同时也不想激化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其中有的找借口说，类似步骤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可能很不利。所以应该指出，从提出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的前景看，把第十一届联大开幕时间改在11月中旬，即美国选举时，可能会起积极的作用。

这样看来，同去年相比，明确支持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的国家明显地减少了，它们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将不会占必定的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把该问题列入第十一届联大会议议事日程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将首先要看现在动摇的那些国家届时在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

所以，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尽量让大多数动摇的国家在未来联大会议上支持提出让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至少让其保持中立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附关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的材料(7页)。 [89]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АВРФ, ф.0100, оп.49, п.414, д.51, л.60-63

№21475 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1956年8月23日)

摘自马尔采夫А.Ф.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11日

第722号

机密

与中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8月23日

8月23日，我拜访了中国高教部杨秀峰同志并根据苏联高教部的委托向其转交了叶留金同志的私人信件。杨秀峰同志请我转达对苏联高教部部长叶留金同志的谢意。随后，杨秀峰同志向我通报了中国高校会议的工作结果。

今天，我们请您来，是想向您通报我们在全中国高校校长会议上所讨论的那些举措。关于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我们以前已向您通报过了。根据我们的原定计划，此次会议应有59所高校参加，但最终只有21所高校的代表与会。与会代表中半数所高校的校长，另一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会议于8月16日闭幕，但与会者仍在部里继续工作，直到8月20日才开始各自返回原单位。正如我们以前所确定的那样，此次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清除大学生们的学习负担，而发展其独立思考能力等。与会并参与上述问题讨论的高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类型：技术院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在会上我们提醒校长们注意，当返回原单位后他们只可能把会议所提及的少量措施落实到实际，因为其他问题仍需要继续讨论。我们在此次会议上所制定措施的特点在于，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哪些措施以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目前，我们并不打算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只想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便统一意见，而在来年再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关于那些我们目前正在实施，或以后将要实施的措施，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1. 我们应当参考苏联的经验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并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条件来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换言之，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将之与中国的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的主要目标——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苏联经验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苏联的实际情况相比，说明我们的条件在许多方面还相当薄弱和落后：如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大学教师的工作条件，教育设施和基本建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大学学生的学习为何如此的繁重。问题还在于，我们所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计划是在苏联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所确定的教学课目和课程过多。从而导致学生们可以独立支配的时间太少，无法复习和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因此只有少部分学生有可能牢固掌握所学到的知识。而一部分学生则很难掌握所有知识。由于时间不够，在准备讨论课时学生们只能死扣自己的课堂笔记，从而导致讨论课几乎都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相同的内容。学生们自习的时间很少，课外阅读的时间也就更少了。因而也就无法为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做准备。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高校毕业生往往不能立刻独立承担起本专业的工作，从而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鉴此，我们必须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教学计划，减少一些不重要课目的学习材料，当然在采取此类减轻学习负担举措的同时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增加一些课目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材料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在总

体上减少所有学生学习内容的同时，也会向那些学有余力的，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以供其自由选择。我们现在暂时能供自由选择的选修课只有一门，今后会考虑增加其数量的问题。

如果一些人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待我们打算采取的这些举措，那么就可能得出这些措施将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的结论。但我们认为，我们将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是会降低，而是会增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2.在各地地方院校灵活机动的基础上实施统一领导——这是我们的既定原则。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改正过去那种只强调统一领导的一刀切做法，在教学计划、大纲和管理规章制度方面我们应当使各高校拥有一定的灵活性。

3.“让所有学者们展开竞赛”——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该方针将与各地方高校灵活机动基础上的统一领导原则紧密结合起来。在会议上一些人赞成让校长和教师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总体上我们的教学计划仍需要以统一下发的文件为指导。鉴于多数与会者均要求提供这种灵活性，我们便在会议文件中指出，各高校在制定教学大纲和计划上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上三条原则充分反映在我们会议所制定的措施中。我们今后将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压缩教学计划，减轻学生负担。

与会的所有同志都赞成我们计划实施的举措，而实际上除了赞成外，有些高校已开始在这方面开始了具体的行动。

应当说，我们过去对大学生所制定的管理措施过于严厉，并要求其严格遵守。今后，我们对此将作相应的改变。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个人爱好和能力。

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而非会议结论。我的发言记录已准备就绪，3天左右我就可以审阅完毕。所有举措都是由3个局(技术高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制定的，并载入相应的文件。这些文件都应当经过认真的讨论，并报告给各高校上级机关和高校直属部委。我们希望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共同制定这些措施。

所有与会者均指出，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这些均与借鉴苏联的经验密切相关。我们的高校已培养了

大量业务熟练的专家型骨干，理顺了教学进程。正是由于这些成绩，我们已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坚持的主要方针是：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更广泛和紧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并在中国的实际中运用之。

在深化改革和改进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经验仍很欠缺，因此我们请求苏联专家在这方面更多地给予我们帮助。

一些同志询问，我们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是否是教育改革的继续。我个人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业已成功结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进一步改进和巩固高等教育体系。我们目前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都拥有统一的模式和基础。另外，大家都承认马列主义在所有高校所发挥的领导、主导作用。我们高校的教学科目是最完备的，虽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一些科目仍很欠缺，但这只是个继续完善和加强我们工作的问题。我们工作水平的改进和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目前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提高和改进。

会议期间，我们还讨论了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学教师、社会活动家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同志均承认，虽然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其中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苏联经验的实质，因此也就无法完整地将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从而有时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中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例如，课堂讨论在苏联本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但在我们的高校中，这一教学模式则往往变成了课堂笔记转述课。学习苏联经验的不足还明显表现在如下方面：在运用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和研究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另外，关于中国高校的情况资料我们向苏联专家提供的也很少。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向苏联专家通报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以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条件。因此，今后我们应当清除一些阻碍，以便苏联专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另外，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我们很少迫使自己去思考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所有上述三方面不足，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专家也向我们指出了这些不足。而如今，我们请求你们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不足，以便改善我们的工作。

所有苏联专家，包括在高等教育部门工作的专家在内，均认为有必

要高度评价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我听到许多，但我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却不多。在创造性采用和正确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困难以及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缺陷。如果我们能够把学到的苏联经验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并更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既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清除已渗透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死啃书本和教条主义等不良现象，同时也要与经验主义作斗争。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不能走老路，走旧中国的路，或美国道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业已建立，如今只是涉及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整个工作水平的问题。

在会议上我们还争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并不存在教条主义错误，只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苏联经验的实质；另一些同志则说，我们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不过，多数同志均赞成如下观点：由于我们存在有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导致没有很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更正确一些。关于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已向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作了汇报。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我们中间存在着教条主义，而应当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是不如苏联的条件的，因此我们最好提出这样的行动方针：“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要贯彻这一方针，就必须减轻学生负担。陆定一希望，我们能采取与苏联专家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问题。他指出，苏联在高等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提醒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苏共二十大决议。

技术高校管理局局长谭淑云(Тан Шей-юй)同志指出，由于大学教师不足，便出现了以生产实践考查替代毕业设计的问题。在压缩教学时间方面我们尚没有实施具体措施，因为这方面问题仍需要研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虽然思考了许多，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答案。许多人认为，此类课目，如安全技术和消防安全等，虽然也很重要，但按照苏联专家的话说，只需听几次讲座即可，而无须将之列为一门必修课。在高校中学生们往往很少在此类课目上下功夫。我们打算把这些课程换成一些独立的讲座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在一起。

关于考试的问题——其中包括口试和笔试在内，必须强调的相关内

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考试期确定为3—4个星期，这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都是一项过于繁重的工作。一些同志建议将考试期限缩短至2—3个星期，但这里我们又会遇到另一个矛盾，即学生的复习时间就相应减少了。

其二，鉴于学生数量多而教师数量不足，一些同志建议以书面考试替代口试。

其三，许多人认为，只根据考试结果而不参考平时成绩来作为对学生所掌握知识的评价依据，才是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但近年来在苏联，人们更经常强调在中学应当参考学生的平时成绩。针对这方面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压缩学生的考试和掌握知识的评估次数，并在必要时参考其平时成绩。

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于北辰指出，我们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教学实践活动问题上仍有一些不甚明确的地方。例如，历史课的教学实践活动如何开展等。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但在文科类科目中这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东北人民大学组织学生参观了北京的博物馆，这当然很好，但在博物馆中大学生们只能跟游客一样看到一些展品，而不能系统地接触到这些东西。另外，这样的实践活动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对那些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高校就无法组织类似的活动。

我们没有人会否认毕业论文、生产实践和年级论文等的重要意义，但在教师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例如，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定计划，如果400个学生毕业，就需要40位教师来做这些毕业论文的导师。可除了毕业论文，教师们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年级论文和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根据这样的教学工作量来计算，那么我们的教师数量就远远不够了。那么，北京大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对于我们而言，这将是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关于考试的形式问题。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说是口试，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笔试。例如，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们先是为答题做了详细的准备，记录了所有需要回答的问题，然后在口试时读所记录的内容，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学生太多，教师根本没有时间提问其他问题。而这样一来，口试便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以依据平时成绩来代替考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缩减考试数量。这样，学生们就不必在考试期间超负荷地工作了，就可能在一个学年中更平稳地、更集中地从事学习活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如果北京大学每个俄语教师只有15位学生的话，那么考试就当然没有必要了，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那里每个教师都要负责许多学生。

在会谈结束时，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补充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1.我们达成共识的观点如下：每个专业的课程必须明确固定的最低标准，其中专业课应当深入学习，次要课程应当压缩，作相应的改动，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合或作为选修课。教学计划也应按最低标准来作，并统一适用于所有高校。

2.在各高校的计划中学习科目过多，从而导致学生负担过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加以改变。但变化不能超过适用于所有高校的、统一的最低标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学生们能够很好地达到最低标准，那么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比较好的结果。

3.在统一领导下的灵活性。这里的灵活性不能理解为放任自流，在这种灵活性条件下，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灵活性——就是要考虑各个高校不同的具体条件：所培养学生的水平差异，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差异，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灵活性，就会造成学生负担。当然，有时此类学习负担也可能是错误的教学方式引起的。过去，我们制定的制度过于严厉，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如形式主义、无效率地浪费时间等。而为了今后不再出现这种无效率的浪费时间现象，我们就必须迅速改变现状，对课程类型作相应的变动。所有这些举措都应当在统一领导和严格遵守原则的条件下实施。

4.我们应当全力搞好大学生的实践培训工作，这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马虎。在三个管理局共同编制的文件中均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在变动之前，我们必须对一些具体模式做出全面的分析，以便确定哪些教学模式需要变动，否则各高校就可能在这方面出现错误的认识。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对所编制的文件作一些修改。

5.会议反复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一些高校仍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6.农业高校管理局在自己制定的文件中关于口试和笔试的自由选择条款所作表述不甚明确。对此，我们必须按照如下意思来表述：笔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考试学生数量众多或根据课程性质需要采取笔试考查方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应当由教师，而是由高校来确定考试方式。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里写上一切由教师本人说了算的内容，那么就会出现脱离统一领导和无限制灵活性的情形。这显然是对我们当前所面临任务的错误理解，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180度的根本性转折。所有这些并不是个别性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原则的问题。那么，如何帮助各高校减轻学生负担呢？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制定了一些措施，专门为了一个年级确定了教学时间(当然，这一数据今后也可能仍需缩减)。我们仍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留的最低教学时间究竟应当是多少。我们还要改变课程类型，这当然也是为了缩短教学时间。

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仍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大学生的入学数量在年复一年地增长，但教师数量不足，而且补充的可能性很小。今年，清华大学学生入学分数为不低于70分，而其他技术院校为85.7分。今年，在技术、法律和经济类高校中平均入学分数均为50分以上，但实际上注册到这些院校的学生入学分数均达到70分。我们年轻教师的数量庞大，这是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我们的高校都保持同样的教学水平和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健康状况。在这方面我们收到了许多申诉。在体育方面我们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但也存在学生负担重的问题。

关于培养质量的问题也与我们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任务密切相关。许多老学者都认为，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质量是提高了，但他们不善于独立思考。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的工程师们也提出了关于大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在所设置的许多课程中，教师提出的要求不少，但实践条件很差，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而考试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实验课总共只有2小时，都是由教师先展示和讲解，而最后留给学生亲自操作的时间却所剩无几。所谓学生的学习质量问题，就是要提高其独立工作和思考能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通过压缩次要课程的方式来给学生留出更多的独立实践的时间。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许多研究，并专门对各高校作了跟踪调研。

今年，我们随机性地开始实施国家考试制度。参加这方面工作的工

程师们都要脱产近一个月。于是，一些工厂便提出了申诉，一些申诉甚至发到了周恩来那里。这些问题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态。

杨秀峰同志请我就他通报中所涉及的问题谈点意见。对此，我当着当时在场的中国高教部顾问们的面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观点：

1.由于中国国民经济在最近12年内对高水平的骨干有着巨大需求，为了顺利完成达到或接近世界科技水平的任务，中国高校需要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并使其所掌握知识达到当代科技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首先从培养大学生的质量问题入手，重新审视高校的教学大纲和计划。

2.最好能为所有高校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并列入最低课程标准。在当前中国发展高级中学阶段，一些科目可以转为选修课，一些可以合并，还有一些小型科目可以清除。

3.最好也能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其中必须列入必要的、最低标准的学习材料，以便培养出掌握最低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

4.希望高校总局帮助各高校更详细地了解“实践课”的概念，因为此类课程包括有实验课、解决实际问题、画图和练习等内容，如果学生不参加此类科目，就可能导致所培养大学生的质量下降。

5.以生产实践考查来替代毕业设计或国家考试会导致毕业生的质量下滑。

6.生产实践活动可以不必非安排在夏季进行，可以在一个学年的任何时间进行。但这门课一定得列入教学计划。

7.有鉴于此，在下一个新学年中各高校应从毕业的1万名学生中补充一些新教师，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注一般技术和各科学领域教研室的教学工作法问题，以便在教学方法上给予那些尚没有任何从教经验的大学教师以帮助。

我感谢杨秀峰同志和各管理局领导就各高校校长会议情况所作的上述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谭淑云——技术学校管理局局长，于北辰——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刘子载——中国高教部副部长，周其文

(Чжоу Ци-вень)——农业高校管理局教学部主任，B.И.多库金教授，博士B.C.叶尔绍夫教授，科学副博士H.И.格里斯坚科副教授——中国高教部苏联顾问。

翻译周岩苏(Чжоу Янь-су)和Г.И.拉古林——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A.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И.Ф.库尔久科夫、B.П.叶留金和B.A.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拉古林

发送：菲拉托维奇

1956年9月5日

第1187号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02-214

№09838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 (1956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一、考虑到印度将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届时苏联代表团应支持这一提案。应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它最初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它已经被33个国家(其居民超过10.66亿人)承认——的权利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应该强调指出，事情关系到一个有着6亿居民的大国积极赞成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它的参加国际生活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起来都会十分困难。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缅甸、埃及、叙利亚、瑞典商量(视情况而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

二、在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可能出现允许“两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提案。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应驳斥任何可导致允许“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在发言中指出，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地控制着中国的领土(仅台湾加几个岛屿除外)，该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接下来应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提醒人们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声明一定要解放台湾。同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提醒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现在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谈判，目的是缓和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地区所出现的紧张形势。还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它已建议台湾地方当局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举行谈判。

三、在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有关的问题上，应视情况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埃及、缅甸、尼泊尔、锡兰、菲律宾、瑞典、叙利亚、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老挝、柬埔寨、冰岛等国代表团保持接触并千方百计取得它们的支持。

四、反对可能提出的新的关于拖延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的提案。

五、如果接着出现把中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席位让给他国的提案，在这种情况下应指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尤其是第23条。

六、如果西方国家把1951年通过的宣布是“侵略者”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当作论据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取消这些决议的提案，同时指出，这些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取消它们有助于发展信任，继续扩大国际合作。

接下来强调，禁运通常同现存军事行动有关，或是对某一国的限制措施进行报复而实施的。这些，同远东形势和中国的情况都沾不上边儿。中国同63个国家有着贸易联系，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对外经济

联系。

还应指出，被作为实施禁运的理由的朝鲜战争已经结束3年了。指出，对中国禁运已影响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妨碍许多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往来，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和通航自由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9, д.51, л.71-73

№20761 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 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1956年8月25日)

绝密

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反应

1956年7月12—25日

《人民日报》记者今年7月12日的通报

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之后，这个问题变成了山东省广大干部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近日召开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该省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在学习了苏共中央的决议之后，主要表达了以下意见：

1.许多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尤其是把所有的错误推到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在了解了决议内容之后，许多人认为：陶里亚蒂关于“产物”的声明未必是正确的。但是，其报告的主要论点毕竟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把全部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合逻辑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决议，仍像从前一样无法说服任何人。

2.一些人声明说：“无论如何，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积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苏共中央会没有任何责任？现在对这一点还值得讨论吗？”一位领导干部说：“赫鲁晓夫同志过于自信了吧？”

3.另外一些人说：“与《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这个决议无疑是向前迈了一步。这种辩论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逐渐地对问题作出详

细的说明：不能要求苏联共产党迅速行动。”某些人声明说：“苏联共产党没能足够冷静地看待世界兄弟共产党的意见。决议还令人感觉到缺乏公正性。”

4.一些人表现出绝望情绪，对所有这些辩论隐约感到委屈。例如，他们声明说：“所有这一切给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思想造成了某种混乱。意大利共产党有自己的意见(陶里亚蒂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共产党也心存疑虑，论战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这将会给敌人制造许多可乘之机。难道不能采取其他方法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这样做是何等的被动啊！”

“还是有共产国际好。现在统一意见就相对困难些。在发表决议之前，苏联共产党应该与兄弟共产党协商一下：事先做些准备没什么不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会落到美国国务院的手里？是不走运？”“为什么不让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没有允许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参加会议？”一些人还表示了自己的揣测：法捷耶夫的自杀是不是与反斯大林主义有关？

5.人们说：“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关于说陶里亚蒂意见是正确的(也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意见)那部分内容，是采用了‘非常重要和正确的结论’这样普通的词组表示的，对此也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说明，而与此同时，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却提出了具体的反驳。如果陶里亚蒂的结论是正确的和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此前就清楚，对某些方面的分析不够正确或者是不够深刻？关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一些人声明说：“在决议中没有必要提陶里亚蒂的名字。”另外一些人说：“提不提名字无关紧要。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嘛。”

《人民日报》记者肖扬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12日第1931号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决议

新华社，重庆，今年7月13日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

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时表达了如下意见：

1.不少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像从前一样过于低了，不应该把这个决议视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后结论。一些人声明说：“我对在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给予的评价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良心不允许我赞同在苏共中央决议中作出的那个评价。”某些机关的干部人员说：“不管那里怎么说，而斯大林的功总是大于过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像从前一样，把斯大林并列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人们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在阅读了《参考消息》上的关于在苏联对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工厂进行更名的通报以及听说关于打算把斯大林的遗体迁移的说法之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这是极其幼稚和阴暗的做法。

2.在苏共中央决议中，首次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醒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警惕被敌人欺骗的危险，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体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支持苏联。因此，陶里亚蒂对苏联共产党进行公开的批评，有其不利的方面，如果他能够通过内部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就好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值得认真地研究那样一个事实，即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单方面地谴责了某些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对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不正确的解释。如果从最初开始就作出决议的话，那么，兄弟共产党就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兄弟共产党保密，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却公布了报告的文本。敌人的嚎叫声渐渐平息，而事情变得越来越具有轰动性质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泄露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总之，大家对苏联共产党的这一步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某些人甚至怀疑赫鲁晓夫等人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兄弟共产党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而正好相反，这些党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现象。

3.不少人认为：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对斯大林的肯定性方面和缺点的分析，仍然如从前一样是不够全面的。目前，要是苏联共产党有“重新评价遗产”这种倾向的话，那么，也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既然是属于斯大林的，就都应该抛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领导集体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自我吹嘘。尽管决议确认了斯大林的功绩，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许多人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与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进行比较，并从中找出许多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把苏联共产党的

决议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个文件采纳了我们的许多观点。陶里亚蒂和其他人的观点也确实起到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因此，许多人感觉到，兄弟共产党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至今仍未有过的、值得全面鼓励的现象。但是，同时人们还认为，苏联共产党盛气凌人的沾沾自喜和自私自利的工作作风，仍然没有彻底地改变。例如，苏联《真理报》没有发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而是公布了丹尼斯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摘录了它不喜欢的内容；即使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以简略的形式发表的。所有这些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只喜欢听好话，不欢迎反面的意见。这个决议是对在它之中有许多批评而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解释。因此，一些人也表示了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这种自高自大的批评意见，认为陶里亚蒂所作的这种直接批评是有益的。

4.在读者之中，许多人对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是否存在统一领导这个问题表示出许多猜测；与此同时，各地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长期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提出的批评，与米高扬和赫鲁晓夫提出的批评不同？为什么在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莫洛托夫也辞职了？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认为，在赫鲁晓夫的某些讲话和行动中，似乎流露出把人们吸引到自己一边的意图。例如，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对朱可夫有成见；赫鲁晓夫也有降低朱可夫和铁托，尤其是我们的地位的打算。在国际事务中，赫鲁晓夫经常把自己摆在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的前面，同时说的也比他们多。某些人表示困惑：为什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的立场是如此的草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把斯大林从坟墓里拉出来，为的是痛斥斯大林和向他发泄愤怒，同时令人不理解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表现出了个人性格或者某种指责人的徒劳的企图。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13日第1932号

安徽省机关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反应

新华社7月25日来自合肥的报道

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公布之后，该省机关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个决

议有力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散布的谣言，决议表明了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巨大意义，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同时确认了斯大林的一定功绩。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进行比较显示：这个决议更具客观性，更有说服力，因此使某些思想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领导干部人员同时对这个决议还表示了许多反对和怀疑意见：

1.认为：在这个决议中过分强调了客观因素是没有说服力的。以前，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而现在又在决议中说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导致了个人崇拜的发展。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在许多人看来，决议中的关于在斯大林生前没有进行批评完全不是由于缺乏个人勇气的声明，是非常勉强的说法。如果说过去对已经发现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提出批评的话，那么，这表明(苏共领导人)原则性太低，追求个人平安，害怕坚持真理。某些人认为，既然斯大林当初接受了列宁的批评，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完全不是不能接受批评的人。但是，莫非苏共中央在后来阶段没有向斯大林指出错误，当这些错误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为什么对斯大林的批评会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和可能不被人民理解？害怕在斯大林生前对其提出批评和只是在其逝世之后才提出批评以及推测斯大林不会接受这种批评，这是缺乏客观性的表现。苏共中央没有勇敢地承认自己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错误，这表明苏联共产党没有站在中国共产党所处于的那个高度上。

2.关于在批评陶里亚蒂方面的意见。

某些人认为，从决议中看得出来陶里亚蒂错在何处。陶里亚蒂根本没有表示怀疑苏联执行的方针的正确性。他也完全不否认社会主义根本的民主性质。如果说关于“产物”的方式那几句话，那么，这不应该作为对错误缺点进行批评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在决议中对陶里亚蒂提出批评的那种方式，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应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兄弟共产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有利于敌人。某些人认为，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中，表现出了苏联共产党的轻率和愚蠢、傲慢无礼，对兄弟共产党表现出盛气凌人和大国的派头。许多人表示担心：在对斯大林的态度方面缺乏统一性以及苏共中央的这些做法，将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产生不良的影响。

3.一些人认为，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和有说服力的。

(1)至于谈到个人崇拜出现的原因，那么，许多人认为，这里过于单方面地强调了斯大林个人品质的否定性方面。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决议中甚至可以让人看出人为地寻找斯大林错误行动连续性的痕迹。谈到关于列宁指出斯大林性格的事情，那么，也没有必须如此具体地阐述列宁的遗嘱，因为这表明：在这里潜藏着个人的感情；

(2)鉴于在决议中包含着这样的声明：在战争期间，中央委员和苏联军事首长们，可以就某些问题独立地做出决定，以便确保战争的胜利，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集体领导，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3)某些人认为：在决议中对斯大林的功绩谈得不足，而对于他的错误却谈了很多。如果这是决议的话，那么，在其中就应该有全面的总结。

4.某些人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建筑在实现了以前的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只强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好像追求全力以赴地表明现任领导人的正确和贬降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来了，绝不是由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来的。某些人还认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不少附带的后果，即在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影响下，在某些国家开始了反对现任的或者是已经过世的共产党领袖的行动。

5.某些人认为：决议是被迫发表的。许多人认为，苏共中央这个决议的发表是被迫进行的，是在该问题上缺乏统一观点的结果。如果最初就发表这样的决议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这样大的思想混乱了。但是，一些人还认为，这个决议的许多问题值得认真地研究；要是想以公布这个决议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就作得太早了些。如果今后将会作出补充决议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它是在受到很大的压力下做出的。一些人认为：这是苏共中央自高自大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久苏共中央就会做出进一步的结论。

6.某些怀疑和其他观点。

一些人有这样的怀疑：苏共中央是不是处在内部斗争的状态？他们询问：为什么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离开了所担任的职务？是不是报复或者内部斗争的结果？谢皮洛夫怀有极

强的反斯大林情绪，现在他担任了外交部长。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非常了解斯大林，他们为什么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不是因为赫鲁晓夫的高升，使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些人还给自己提出了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从一方面徘徊到另一方面，能不能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苏南关系问题上，责任应该在于双方，为什么只说自己错误的方面，难道这样不会混淆真理与谬误？

7.一些人提出怀疑：是不是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与斯大林的错误有联系？

8.一些人说：过去大家都说，苏联共产党如何伟大，它如何公正，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怎样伟大的成绩，现在，当这些错误被发现时，这是不是与上面所说的内容相矛盾？

9.一些人声明，过去人们常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而现在为什么取消了斯大林的名字呢？

10.一些人说，不应该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断言，也就是：“以此建立一个牢固的保证，保证今后任何时候在党内和国内不出现类似个人崇拜的现象。”

11.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决议中提到关于斯大林的悲剧是不妥当的。

秦聿震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25日第1942号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07, л.175-180、187-190

№138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8月27日会议第3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是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的。

第5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90]

巴伊巴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布尔加宁同志：关于供应设备问题：我们可以供应很多(尤其是机床供应方面)。

卡冈诺维奇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对内是不现实的，他们的速度过快了。

米高扬同志：两个问题——他们请求出主意和我们可以给予建议。这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工程人员。重型机床我们没有义务提供。就说我们做不了。

别尔乌辛同志：中国人的步子太快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现实。物资平衡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出现巨大的赤字。应该考虑制定建议。工作设计方案中国人自己能够完成。

马林科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的总结(在1957年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义务——足够多了。触及到我们最尖锐的立场。应该进行修改和向中国人解释清楚。

苏斯洛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定得过高，国家计划委员会给出的结论也过高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的要求被满足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应该进行仔细的计算，弄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

委托巴伊巴科夫同志起草建议，委托米高扬同志、别尔乌辛同志、萨布罗夫同志审理并提交苏共中央审批。

№21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8月27日会议第37/5号记录

绝密

兹责成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 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观点, 重新制定对中国1958—1962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意见以及关于1957—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问题诸提案, 并责成米高扬、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等同志审查苏联国计委所起草的相关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54, л.3

№2185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1956年8月31日)

第38号会议记录

1956年8月31日

绝密

兹责成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萨布罗夫同志和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 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制定1957年度投资控制数字, 并在今年10月1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自己的相关提案。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56, л.3

№20555-2 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1956年9月1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

第251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1日

今天，金日成邀见了我们并谈了关于8月30—31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全会的结果。

金日成说，在全会筹备过程中在与崔昌益和徐辉等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已对他们所提出的如下问题：关于干部的错误任命、关于个人崇拜等作了相应的解释。通过在私下会谈中交换意见和在常务委员会讨论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定对朝鲜劳动党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访问作一总结。在全会报告中我们列入了如下问题：关于政府代表团的访问结果；参考兄弟共和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关于改善朝鲜劳动党的工作。报告阐明了个人崇拜、改善党内民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改善党的工作等问题。8月28日该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一致称赞。崔昌益也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提得很尖锐。金科奉也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

此次全会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表明，那些对个人崇拜问题表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对朴正爱 and 朴金喆等领导人所提出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金科奉表示同意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不提交全会讨论。中央常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些人对个别领导人提出指责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接着说，利用这次与您会谈的机会，我想对您说，在与我的会谈中金科奉说，他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是得到了兄弟党的支持的。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究竟是哪个兄弟共产党

的问题，金日成答，金科奉对此并没有明说，但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对苏联使馆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金日成似乎向金科奉解释道，兄弟党如果有什么意见都是会通过官方正式渠道来向我们转达的。

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结束以后，便产生了关于尹公钦的问题，后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责朝鲜劳动党否定了苏共二十大决议，不遵守马列主义原则。他指出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个人崇拜，并否定党的总路线。

按金日成的话说，全会的与会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挑衅性质激怒了。他们纷纷要求剥夺其发言权。尹公钦表示自己支持崔昌益。而其他发言者则对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反党性质进行了揭露并列出了他在全会举行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党活动的事实。

根据金日成的声明，与尹公钦一起曾从事幕后反党活动的徐辉、李弼奎和文化部副相金刚4人均离开了全会会场并越过了边境，目前被中国边防军扣押在安东。

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4人均被开除党籍，崔昌益被开除出中央常务委员会，朴昌玉被撤销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职务。上述人的问题均移交中央党的委员会审议。关于此金日成宣称，党的领导层本没有打算对崔昌益和朴昌玉两人采取这些举措，只是由于其反党活动被彻底揭露，全会与会者才要求对这些领导干部作出组织结论。

关于金科奉，金日成说，他们认为，他只是受到了该反党集团的影响，因而被搞晕了头脑。金科奉目前已站到党的正确的立场上来了。这方面的证据似乎是，还在全会举行以前他便提出了关于将崔昌益从中央委员会开除的要求，而对此，金日成当时并没有表示同意。

金日成接着说，在研究了反党集团的活动之后，我们已别无选择，并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团结了自己的力量并达到了全党的统一。总之，虽然我们党的问题很复杂，可现在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全会上我们研究了国内的卫生状况，其中讨论了卫生教育、医疗设施网络的建设和医疗工作的改善等问题。

在结论中金日成指出，在8月2日与苏联代办彼得罗夫会见时，后者说苏共中央正对朝鲜劳动党的状况表示担心。金日成请我向苏共中央通报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并表示此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在翻译后将转交苏联驻朝鲜使馆。

鉴于金日成说金科奉曾提到关于兄弟共产党的意见，朴义琬解释道，金科奉在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已被金日成曲解了。金科奉当时只是说，在常务委员会内部不应当研究证人的口供，而应当委托金日成与这些证人交谈，这样的方式才是可行的。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兄弟党内部所经常采用的。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321

№20555-3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 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1956年9月4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

第251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8月4日 [91]

我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苏方打算在9月下半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送那些根据劳务合同在苏联林业部所属企业工作并声明希望返回祖国的朝鲜工人。

南日表示同意依照既定程序向朝鲜政府移交上述工人。

接着，我又向他通报了今年9—10月间苏联相关机构就边境防护问题所举行的苏联内务部边防军代表与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边防代表会

议决议。

对此，我请南日向朝鲜相应机构作出通报并就这方面问题提出意见。

在9月2日为庆祝共和国宣布成立11周年而在越南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所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邀我见面。9月4日，在我方使馆举行了此次会面。

乔晓光说，他此行是想请教两个问题。其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向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说，今年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他的会谈中说，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物质需要，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关于在近五年内朝鲜朋友希望从中国得到的援助的具体数额，会谈中并未说明。不过，在确定1957年度两国贸易计划之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1957年度中国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总金额为1.85亿元，其中8500万元用以购买商品，5000万元为无偿援助，5000万元由中国政府直接拨款。

乔晓光说，朝鲜方面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补充援助的问题我们已向本国政府通报，但目前仍未得到答复。

关于第二个问题，乔晓光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召集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9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相李东根向他通报，今年8月30—31日夜，4名朝鲜公民：贸易相尹公钦、职业联合会中央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和建材局局长李弼奎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李东根表示，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

乔晓光说，上述事件立即报告了中国政府。朝鲜边防军也建议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可这些人均坚决表示拒绝返回朝鲜。

于是，中国方面针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所给予的答复是：上述人等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地将其遣返回国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乔晓光又说，9月1日他曾应邀与崔庸健和金昌满见面。后者向他讲了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进展情况。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讨论会上，贸易相尹公钦发了言。此人在发言中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进行了恶意的和诬蔑式的攻击。他指责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没有认真落实

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结果似乎导致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党内缺乏民主，错误地提拔干部，以及在解决朝鲜人民物质困难状况方面表现无能。尹公钦的发言被终止了，而他本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午饭后则与上述三人一起没有再参加后续的会议，而是逃到了中国。根据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要求，尹公钦被开除了党籍。

乔晓光还通报说，有人告诉他，上述人等的反党活动早在政府代表团出访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前便已显出端倪，尔后尤其是当金日成不在朝鲜期间其活动更为猖狂。还在中央全会开幕以前，金刚便去了几次海州（Хечжа），以便为逃往南朝鲜做好准备。可当其确定此事很难实现之际，便逃往了中国。

乔晓光问，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过程以及关于上述四人有何看法。

在回答乔晓光所说的，即朝鲜领导人在关于全会工作的会谈过程中便在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的问题时，我说：据朝鲜领导人说，还在全会开幕前徐辉等人便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朝鲜劳动党中央的言论，其中包括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指责。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解决，金日成的报告也是得到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肯定的。可是，到了全会开始后所有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以上这些话都是尹公钦所言，也就是乔晓光所提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乔晓光又说，据崔庸健和金昌满对他所言，一些对中央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曾去过苏联使馆并声称苏共中央已向苏联驻朝鲜使馆专门派遣了一名工作人员以调查朝鲜劳动党内克服个人崇拜的相关情况。在会见过程中我向乔晓光解释道，类似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并说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彼得罗夫已向朝鲜领导人澄清了此事，而后者也已表示认可。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经过和上述所有事件，我对乔晓光的答复是，朝鲜劳动党内所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苏联或中国方面，也与其党内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

乔晓光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又再次询问我对那些逃到中国的朝鲜领导干部有何看法。我说，由于上述人等目前都在中国，中国方面显然更了解其从朝鲜出走的原因。我又补充道，关于这些人我个人并不了解，因而目前仍无法准确地说明其出逃的原因。我只知

道，朝鲜领导人指责这些人不仅从事反党和破坏活动，而且还存在品行不端和盗窃国家财物方面的罪行。

乔晓光指出，自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只与徐辉和尹公钦有过交谈。对此，乔晓光补充道，他也知道尹公钦等人被人指责所谓盗窃了近100万元国家资产的事。

参加此次我与中国大使会谈并担任翻译的有(我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和(中方翻译)王保民。

РГАНИ , ф.5 , оп.28 , д.410 , л.322-325

№0991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1956年9月4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撰写的资料《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英国的对华政策》(1956年9月4日)。

该资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撰写的。

附件共计19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图加里诺夫

1956年9月4日

第1294/Г号

文件送：А.И.米高扬同志、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И.В.卡皮托诺夫同志、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П.Ф.尤金同志

附件一：

《美国的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美国政府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一直奉行公开敌视中国的政策，首先表现

在：不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台湾岛实行事实上的武力占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

一、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拒绝承认进行辩解的理由是，中国的现政府以暴力推翻了“合法的”政府，“非法地”夺取了政权。

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的比利时外交部1956年初写的关于美中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说：“目前，不承认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官方政策，为其辩解的理由多种多样：一曰会造成后果：如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使大陆上那些还指望获得解放的人失望，在马来西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和印度支那的少数中国人就不能在两种制度间选择，在台湾，老一代国民党军队就会完全丧失斗志，注定被永远赶出大陆，蒋介石可能的继承人为返回大陆就要付出比现在还要大的努力。二曰有法律依据：毛泽东集团没有被授权代表国家主权。三曰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不抛弃老盟友的义务。最后(这种言论越来越少)是美国国内的影响，在美国，最高统帅还有一些忠诚的往往很有影响力的朋友。”

美国政府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长期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接触。但是，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和国内政治局势不断稳固，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对美国对华挑衅政策不满的增长，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些联系。

1954年美国被迫同意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同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领事级关于一国公民在另一国居住若干问题的双边代表会谈。

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了持续到现在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级代表的会谈，会谈商定讨论以下问题：双方遣返公民和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其他实际问题。

同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不变的立场。1955年9月14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麦菲在费城讲话时声明，美中的日内瓦会谈并不意味着“我方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承认这个制度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杜勒斯去年3月在台北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和艾森豪威尔在去年7月给蒋介石的信件中，都再一次声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应该指出，最近，美国国内有许多人讲话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195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朗格在今年6月29日的国会发言中，呼吁修改美国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某些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陆”。朗格还声明，“为什么在这个会上谁都不敢承认，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之后，我们在对华政策方面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去离间斯大林和毛泽东，把中国的领袖拉到我们一边，或者，起码促使中国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不是用我们的毫无前途的外交政策把中国推向苏联，使之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1956年7月12日的国会发言中声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味着比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更加轻率地冒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曼斯菲尔德接着指出，敌对国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迟早会发展到要么冲突激化，要么关系更加密切，曼斯菲尔德说，“为了美国的利益要面对远东的现实”。

英国简讯《外事报道》在这方面的报道值得注意，1956年6月21日出版的加有密级标志“秘密”的一份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会保持它眼下的对华政策直到11月份总统大选结束之前不变，其理由是，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大选中的前途”，但是，在华盛顿的外交界里，人们“预言美中关系在1957年，最迟在1958年将会有相当程度的缓和”。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从1950年开始，当苏联代表团第一次提议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驱逐国民党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时，美国始终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组织的合法权利。

当时正在进行朝鲜战争，美国人为它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辩解的第一个借口，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与联合国的战争状态”。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都极力通过一项关于在本届例会上对“上一年度”的这个问题不予审理的决议。如根据美国人的提议，最近联合国大会第10次例会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本届第10次例会上，对上一年度任何关于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或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供席位的提案都不予审理。”

目前，美国政府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立场从各个方面判断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1956年6月7日在华盛顿与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持“强硬”态度，反对对现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7月9日在卡拉奇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如果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那将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错误，是灾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未必会很快改变。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1956年7月18日和23日一致通过决议，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因为“类似的加入将会给联合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会妨碍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原则和章程有效地工作”。

应该提出，这一点在苏联驻中国大使与周恩来在1956年4月底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美国企图再一次阻挠联合国大会第11次例会讨论中国问题，并不排除一种可能，如果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得到讨论，美国会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会接受他的方案的。

这些方案是：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蒋介石集团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 2.蒋介石集团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杜鲁门在他1950年1月5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主席1943年12月1日在开罗通过的联合宣言中声明，他们的目标是把日本从中国夺走的领土如福摩萨归还给中华民国。在美国签署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中说，开罗宣言的条款应该得以实现。该宣言的条款在日本投降时已被日本所接受……最近4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都同意中国对这些岛屿行使自己的权利。

美国没有掠夺福摩萨或其他某些中国领土的任何意图……也没有使用它的武力干预现状的任何打算。美国政府将不会奉行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路线。”

1950年2月发表的国务院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说：“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从美国方面确认了关于解决福摩萨问题的开罗宣言。从1945年起福摩萨由中国管辖……该岛作为一个省已划进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各个盟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美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因为这些步骤完全符合在开罗通过和在波茨坦确认的协议。

换言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最近4年间把福摩萨一直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此后美国政府不仅拒绝遵循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的有关规定，而且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旨在阻挠台湾与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国把朝鲜战争当作借口，按照杜鲁门1950年6月27

日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指示，把它的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护”该岛免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进攻”。杜鲁门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关于福摩萨未来地位问题，应该推迟到太平洋恢复安全、与日本缔结和约或联合国审理这个问题时解决。”

1951年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美国人达到了不把有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的条款写进条约中去的目的，而只指出日本放弃它对这个岛屿原来的权利。

其后，美国政府据此宣称，台湾和澎湖列岛好像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这些岛屿被日本放弃后并没有正式向其他任何国家移交。

最近几年，美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措施，让国民党盘踞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一些岛屿。

于是，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发布了所谓台湾“废除中立化”的命令，意思是美国第七舰队不要阻挠国民党袭击大陆中国沿海。这样一来，杜鲁门1950年的指示中关于美国舰队“保护”台湾的那部分内容就完全生效了。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美国保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试图通过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杜勒斯在1954年12月2日就签订上述条约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声明：“签订这一防御条约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关于美国同意将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 [92] 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切传说和报道。”

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扩大“共同防御”条约范围的专门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总统获得了使用美国武力“保护”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实际权力。

美国始终不想让台湾和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方在目前举行的日内瓦会谈中的立场可以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这些会谈过程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把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作为讨论中美关系具体问题必须先决条件。

四、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美国采取了很多经济措施，给中国恢复经济工作制造了困难。1950年3月美国公布了所谓“战略商品监督规定”，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达600多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1950年11月美国商业部将清单上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扩大到2100种。

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在美国的国有和私人的中国财产实行监督，其中包括扣押中国的存款及扣留在美国或发往中国途中的商品。（据1950年12月17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总数约为2亿美元，但中国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实际金额。）

1951年5月18日，根据美国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决议。

由于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急剧缩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的材料，1950年美国和中国商品交易额为2.831亿美元，而1953年就缩减到10万美元，从1954年起美中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目前，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完全的贸易禁运政策。1956年4月26日，美国商业部长温克斯直接声明，“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北朝鲜实行的完全贸易禁运继续不变”。

关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鉴于这些国家的压力，被迫在这一方面做了某些让步。

众所周知，华盛顿会谈之后，1956年2月1日发表的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联合声明提出，虽然美国 and 英国打算将来还要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实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现在应该修改，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在范围方面进行定期修改，以便使这种监督以最好的方式为自由世界的利益服务”。

正如2月24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所说的那样，美国已原则同意修改现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限制政策，让西方大国像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那样按照商品种类清单进行贸易。

1956年5月，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而美国对英国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反应相对平静，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根据外国报刊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好像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施加了压力，迫使该委员会取消它1956年5月17日通过的决议，即关于禁止向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贸易的美国盟国提供援助的决议。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年9月4日

第1294/T号文件的附件

附件二：

英国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这反映在英国人多多少少用另一种方法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

一、关于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并准备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它还宣布，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尽管到现在它在台湾岛还继续保留着总领事。同年2月，英国政府临时代办级代表到达北京(从1950年到现在，英国换了4任代表，即哈奇森·拉姆——自1951年2月13日，杜维廉——自1953年8月29日，奥尼尔——自1955年6月26日)。英国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的官方目的是，为英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做准备。但这个问题解决由于朝鲜事件耽搁下来了，尽管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在北京还继续保留着它的外交代表。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政府在进一步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这个情况反映在英国极力加强英中之间的经济联系上(其中包括1953年下半年英国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艾登有过私人接触，并且达成了互派代办以及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1954年6月23日，艾登在下院介绍他与周恩来的谈判时声明，“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改善了英中关系”。

根据所达成的协议，1954年年底以代办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抵达伦敦。

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英国政府在采取有可能导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措施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态度。例如关于周恩来能否访问英国的问题。英国人十分冷淡地对待中国方面的试探。1956年6月1日法新社记者报道，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他说，周恩来访英之前，也许伦敦和北京先互派大使。英国政府“出于实际考虑”，拒绝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正式的议会代表团，而这件事曾于1956年5月7日在下院宣布过。

英国还阻挠英中关系中其他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尤其拒绝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开设常驻代表机构，而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2月15日就提出来了。工党党员布罗克韦曾问这个问题怎么办。1956年7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了模棱两可的答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容许一些公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不友好性质的行动。譬如去年春天，英国政府把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后在香港着陆的飞机驾驶员和军用飞机返还给了国民党。这个事实证明，英国容许蒋介石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反华破坏活动的基地。

此外，英国政府至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揭开“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情况，事情发生在1955年，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一些成员遇难(据调查，此次飞机失事与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关，破坏行动发生在飞机在香港停机时)。

至于英中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英国政府在广大英国工商界人士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整对华贸易。

英国政府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必须减少对华贸易限制的问题。1956年1—2月英美最后一轮华盛顿谈判过程中，艾登坚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削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禁运。虽然美国也同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做一定的修改，“以避免全部监督体系的总体瓦解”，但是他们也让人们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会做出很大的让步。

英国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受制于北约的一个主管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委员会——谈判，现在已经把对华贸易的限制减少到对苏联和欧洲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限制相等的水平。

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巩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例如，英国利用所谓的“例外程序”(据英国贸易部代表称，“例外程序”为：向北约国家协商委员会主管对华贸易问题的小组发出通知书，声明该国希望准予对华出口某些禁运商品，例如在接到关于出口此类商品的国际裁决之前，准予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来达到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系列禁运商品的目的，这些商品无论是从英国本土还是从它的一些殖民地都是被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准许英国公司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了大约60台拖拉机。1956年4月，按照“例外程序”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同意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橡胶。据路透社记者1956年6月4日报道：

“英国做出决定，允许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向共产主义的中国出口橡胶，这个决定是英国扩大对共产主义各国贸易的新政策的最新体现之一。”

当天，伦敦官方人士声明，这个决定除橡胶以外还涉及其他商品。

据英国报刊估计，英国对华贸易最近几年有可能增长到每年1.2亿—1.5亿英镑(1955年英国的贸易额共2100万英镑)。

当时英国官方政府是支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政策的。至于发展英中贸易问题，英国外交副大臣里丁勋爵于1955年12月6日在下院声明，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对华贸易禁运的决议是应该遵守的，英国政府“并不认为现在是就这个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的适当时机”。

这样看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同，它不仅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迈出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一步，尽管它推行这条路线还相当谨慎。英国政府推行这样的政策，首先应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

——英国统治集团担心，美国推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公开军事、经济压力的政策，事关远东的战争冒险。在英国人看来，远东的战争目前不管怎样都有可能使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它在马来亚、香港和新加坡已受到实际的损失。

——考虑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给西方大国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组织起反民主力量，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进而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企图利用美国目前还不会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竞争对手这一时机巩固它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完好无损。据某些资料反映，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1950—1951年已达到8亿美元。

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己直到1955—1956年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趣。1954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称，“中国政府并不急于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后来，尤其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准备访问英国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进行诚挚的谈话时，多多少少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强调了一个愿望，就是愿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谈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一事，他指出，苏联对英国政策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欢迎并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一立场。毛泽东在阐明自己对英国的态度时说，美国最近把英国贬到一个小伙伴的地位，把它从欧洲、亚洲一切重要地方撵出去，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想打仗，也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在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下，英国也将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必须争取使英国脱离美国。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英国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很多年的时间内却仍然奉行一个政策，那就是拖延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为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找的理由是，正如1950年1月12日英国代表卡多根在安全理事会上宣称的那样，中国新政府当时只得到不多的几个政府的承认。后来，英国人宣布，关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停止后才能予以讨论。

但是在朝鲜停战后，英国仍继续坚持那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不予理睬的政策。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发言，表示支持美国的提案，即不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时提出的理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1955年，英国和其他外国报刊广泛传播一条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进入联合国，其条件是，在联合国中保留国民党分子（“两个中国”的代表机构），据非官方消息反映，这个计划是艾登在1955年3月去德里时炮制的。该计划的实质在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在安理会中没有它的代表机构，国民党分子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除名，但保留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上面谈到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计划，是得到英国统治集团中最有影响的那一部分人支持的。

应该指出，最近，英国报刊又提起关于在联合国设立“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可能性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设立这种代表机构的另外一种条件。譬如，最近一期（1956年8月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北京，鉴于它的领土和在它统治下的居民，应该在安理会中占据中国的席位，而台湾应该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被接纳。

很明显，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在“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基础上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一问题的计划。因为直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将意味着英美关系的严重尖锐化，英国政府未必会下决心走这一步。有个事实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一些国务活动家在与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馆的同事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机构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是把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联系起来考

虑的，所以说，在美国总统选举这一年，美国 and 英国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英时，艾登在一次与他们会谈时也声明过：

“虽然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

据非官方消息证实的外国报刊报道说，艾登1956年1月底2月初在英美华盛顿谈判时曾答应艾森豪威尔，坚持拖延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

根据外国报刊的报道判断，1956年7月初结束的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也得出结论：延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所有与会国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是“可取的、不可避免的”。

三、关于台湾问题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实质上是力图不使至少是近期不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尖锐化。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局势尖锐化的进程会导致远东发生广泛的军事冲突，导致英国亚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而且会削弱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从种种情况判断，英国人企图限制美国在远东，尤其在英国最重要的基地和交通线分布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企图保持进犯中国领土的威胁。按照英国人的行动计划，应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属于它的其他领土的积极行动。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开罗宣言(1943年)和波茨坦宣言(1945年)所确定了的。英国政府还提出了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佩斯卡多尔列岛)法律地位“不明确”的论点。譬如，艾登1955年2月4日在给国会的工党议员辛威尔的回信中声明，“按照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是主权尚不明确或主权尚不确定的一些领土”。

在上述问题上，英国所持立场的另一个特点是，英国顽固地坚持这样一条路线，那就是拒绝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主张有关的国家进行非官方谈判。由这点出发，英国政府一方面不采纳苏联在1955年2月提出的关于就台湾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另一方面劝说美国放弃在联合国讨论台湾地区“停火”问题的意图(在安理会讨论“关于中国沿海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提案，是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政府正式提出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在安理会讨论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此后，美国认为，不加紧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在2月14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对台湾问题的讨论被不定期推迟)。据现有的情报反映，1955年2月7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麦金斯在和杜勒斯会谈时说，没有必要在安理会上挑起“多余的风波”，而应当转为有关国家就台湾问题进行秘密外交谈判。

据非官方消息透露，1955年6月29日，艾登在英国各大记者会上也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是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合适的途径。

英国人特别注意在台湾问题上与印度协调立场。他们同时考虑到：鉴于印度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它可能比英国更能成功地扮演中美解决这个问题的中间人角色。1955年5月，印度的一个分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现有情报反映，这个计划是得到英国人赞同的。这个计划的核心可总结如下：

第一阶段——解决诸如释放在华美国军人、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减少对华贸易禁运这些美中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第二阶段——解决直接关系到调解台湾问题的那些问题，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期(3—6个月)，达成在台湾地区停火的协议。那时，英国、加拿大和印度则争取让美国从金门、马祖撤出蒋介石的军队。这个阶段的第二期规定：进行美中谈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分子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应讨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条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台湾在5—10年内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并选举出以

蒋介石为首的政府。第三阶段——在上述5—10年期满后，自治的台湾将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由此看来，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把解决台湾问题推迟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实际上保持美国人对台湾的占领。

然而，根据现有材料判断，上述计划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因此，英国人并不坚持实现它，尽管英国也没有最终放弃它。

以后，在安排日内瓦美中大使级谈判时，英国政府充当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介人。美中谈判从1955年8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美中谈判的开始，1955年8月1日的《泰晤士报》写道：

“按照英国的意见，现在事实上的停火现状，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部分撤出双方的军队，只能在建立了信任感之后才能开始进行，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在此之前，有可能讨论福摩萨未来的地位问题。”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虽然基本上与美国的政策不相悖，但是，多多少少有所不同，这也使得西方大国难以制定统一的对华立场，也难以制定远东的共同政策。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年9月4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л.87, 88-96, 97-106

№09837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5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所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同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参考材料》。

两份文件是因目前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拟定的。

附上述报告(10页)和参考材料(32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图加里诺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以下情况——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某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支持反帝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这些国家取得经济独立，帮助不发达国家巩固他们的中立立场或向中立立场过渡，以此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

到目前为止，中国同9个不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5个是东南亚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4个是中近东国家：埃及、叙利亚、阿富汗、也门。锡兰[93]和苏丹也宣布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柬埔寨和老挝的谈判为同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时还呈现出了同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等国家建交的可能性。

中共和中国政府特别关注东南亚国家。同时考虑到了很久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就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东南亚生活着许多华侨，这一因素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从英国和法国渠道得到的材料，在这些国家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生活的华人数量有：

国家(地区)	华人数量(万)	华人占总人口(%)
香港、澳门	182	98
新加坡	910,7	76,4
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	225,2	37,5
英属婆罗洲	22	25
泰国	300	17,3
印度尼西亚	300	4,3
柬埔寨	14	3,7
老挝	17,1	3,7
缅甸	30	1,8
菲律宾	23	1,2

在确定对东南亚不发达国家的政策时，中国的朋友们考虑到了想在亚洲起领导作用的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所以，正如刘少奇给苏联大使讲的，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的角色露面，这样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吓跑摇摆不定的人。

在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对这个国家没有采取可以引起印度不满的一些措施。例如，在尼泊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互派大使时，后者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尼泊尔的要求。现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 [94] 中国报刊没有就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声明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政府打算利用巴基斯坦总理即将访华之机充当克什米尔问题的调停人，认为巴印关系的改善将减少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用什么办法克服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和实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很感兴趣，中国的同志们广泛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府、议会和社会代表团访华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为此目的，中国的同志们组织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到中国各地旅行，参观大企业，建设项目和农业合作社，还组织他们同中国的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的代表见面。其中，不久前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萨尔托诺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同中国的资本家座谈之后，萨尔托诺说，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可行的政策，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等国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被邀请并同意将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4—1955年期间访

问了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1956年年底，他还计划访问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锡兰、老挝、柬埔寨和缅甸。1955年9月至1956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接见过印度、智利、泰国、埃及、柬埔寨、约旦、苏丹、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议会代表。

万隆会议对改变中国同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利用会议通过的决定和会议上建立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来大大加强了它在东方的政治影响。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东南亚还未能同泰国、菲律宾、锡兰、柬埔寨、老挝，在中近东和非洲国家中还未能同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利比里亚、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拉美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造成的，他们努力对东南亚、中近东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联系看得非常重要，将其视为解决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指出中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中所奉行路线的以下特点：

一、在计划向亚非国家出口商品时，中国不追求让自己的商品同这些国家的商品竞争市场。

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都遵循政治考虑，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亚洲国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同时，中国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通常都高于对他们的出口。

三、中国贸易组织只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贸易联系，同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公司不发生任何联系。

四、中国政府努力同不发达国家签订协定：中国以优惠条件向他们提供成套设备(目前主要是轻工设备)，以便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

五、在许多情况下，考虑到亚非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商界代表害怕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公开的联系，中国贸易组织便通过中间人同他们建立秘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利用香港和澳门以及亚洲国家的华侨。

在同不发达国家发展经贸联系中，中国朋友们取得了某些成绩。例如，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从1954年的3.942亿美元增加到了1955年的4.81亿美元(增长22%)；1956年预计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将达到6.30亿美元(计划增长31%)。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从1954年占16.2%提高到1955年占17.2%。

尽管同中国的贸易对某些国家(缅甸、锡兰、马来亚等)来说有很大意义，但总的来说，人民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外贸联系中，其作用还不是很大。据中国外贸部的数据，1955年中国同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这些国家外贸总额的1.9%。…… [95]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不发达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中国的同志们努力以工业品出口商的身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中国同志们把发展这种出口看成是自己亚非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5年，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主要有：轨钢、钢管、水泥、石棉制品、机床、纺织和电力设备、大米加工设备、火柴和石油储存厂成套设备、电话设备、工具等。中国对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品出口价值1955年达到6000万美元，即占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21.5%。

1956年，中国计划继续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其中包括重工业产品。如，按照中国外贸部的计划，1956年计划对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以下产品出口：生铁，由1955年1256吨增加到1万吨；黑色冶金轧材，相应由3.959万吨增加到14.3226万吨；钉子，由1.6246万吨增加到3.2万吨。还计划对亚非国家出口新的工业品：柴油机、织布机、纺织机、电动机、变压器等，以及其他机械、车床、成套设备。

但是，中国技术和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它不能大力展开工业品出口，同时也不能保证制品

的高质量。

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中国的同志们广泛采用交换各种非政府代表团的做法。1955年，有32个不发达国家的864名社会、文化和宗教界代表到中国访问，其中东南亚国家——599人，中近东和非洲国家——151人，拉美国家——114人。同一时期，中国有550名社会各界代表到9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访问。

在与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印、中国印尼、中缅和中巴(巴基斯坦)友好协会，这些协会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相应的友好协会保持着联系。对发展同亚洲国家联系有着重要意义的还有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正在根据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倡议筹备1956年的亚非经济问题会议。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同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问题上缺乏应有协调。因此，希望讨论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化部长系统会议的问题。

为同不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中国政府广泛利用中国的宗教组织，首先是佛教和穆斯林组织，因为佛教和穆斯林在东方不发达国家传播极广。在中国政府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穆斯林协会正同东方各国的佛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进行接触，利用这种接触促进国家关系的接近。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出席了纪念佛教诞生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国佛教代表团还将出席1956年10月18日在尼泊尔开幕的第四次国际佛教徒会议。亚洲不少国家的佛教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中国穆斯林协会不断邀请外国穆斯林代表团来中国。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以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总书记卡迈尔·雅各布·萨布里为首的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来京访问。1956年5月，埃及、叙利亚、苏丹、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代表团出席了在中国穆斯林节庆活动。

1955年，中国穆斯林小组在朝圣期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同那里的穆斯林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在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于1956年4月3日参加了开罗清真寺的奠基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对伊斯兰的尊重在中近东穆斯林居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应该指出，中国朋友们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没有充分吸收中国民主党派参加，况且这些党派的许多进步活动家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界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旧交，这些人可以帮助理顺贸易和文化联系，帮助从政治上接近这些国家。例如，中国民主界人士的著名代表宋庆龄，她的1955—1956年期间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行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反响。

中国的朋友们完全没有利用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进步活动家。然而，为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有不少天主教徒的亚洲国家(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建立联系，吸收这些活动家参加，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在同工人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建立和发展联系方面，在同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建立接触方面，中国的同志们所做工作不多。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成熟。出席中国1956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巴基斯坦工会代表团团长、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巴基斯坦全国劳动联盟执委会委员阿巴萨伊德·恩维尔的声明最富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可以倡议成立亚洲国家地区工会统一组织。他说：“如果在这方面提出什么建议，那么巴基斯坦代表团将研究或支持这一建议。”

万隆会议之后，亚非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召开亚非国家政府新的会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新的会议可能成为对不发达国家施加影响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召开新的会议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1956年4月就提出来了。当时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以后并没有为此采取实际的步骤。不过中国朋友

们是可以利用自己在东方国家的影响采取措施，以加速召开新的亚非国家政府代表会议。由于最近将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外贸部长会议，讨论亚非市场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贸措施协调问题，希望在会议上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它作为工业出口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和设备)地位的问题。还应该重视中国和苏联或中国和某一民主国家同不发达国家建设工业企业的联合协定问题(以苏联和民主德国同南斯拉夫在南建立铝联合企业的协定为蓝本)。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р.5175, л.107-117

№21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8号记录

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决议

绝密

一、对发生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事件予以认真重视，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就这些事项交换意见。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苏共代表团联系朝鲜劳动党和中共领导人，以交换对朝鲜劳动党的形势的看法。

三、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3天内，准备和交付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份宣言草案，用于苏共代表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56, л.3

№138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

马林科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和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8项 伊万诺夫同志发自平壤的关于(.....) [96] 的1956年8月31日电报和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体会议情况的1956年9月1日电报。

1.米高扬；2.卡冈诺维奇；3.伏罗希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费德连科；4.马林科夫；5.别尔乌辛；6.苏斯洛夫；7.波诺马廖夫；8.阿里斯托夫；9.萨布罗夫。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接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我们在中国的代表团应该与朝鲜人认真地谈谈。 [97]

周全地考虑一下给朝鲜大使的答复(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

给中国大使的答复：就这些问题，我们的代表团将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考虑和起草指示草案：代表团在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会谈时应该如何表现自己。

前言部分。

承认以下是必需的：

委托代表团..... [98]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10月1日前准备好指示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答复中国大使，并接见朝鲜大使。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起草和准备汇总报告。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0

№20550 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1956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应苏共中央的委托，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李相朝举行了会谈。兹提供此次会谈的书面记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6年9月12日

第25-c-1972号

1956年9月10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李相朝请求转达他对苏共中央给予朝鲜劳动党的帮助的感谢，并说他想通报的内容与他在与费德林同志的会谈中和给赫鲁晓夫同志所写的信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李相朝又说，我已发出了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接着，李相朝同志表达了如下意见：目前朝鲜劳动党自身的内部力量已无法解决党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诚实的好同志因提出批评性意见便被开除出党的条件下，此类批评活动也很难在朝鲜劳动党内展开。例如所有与个人崇拜有关的批评性意见均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李相朝说，我希望苏共和中共能够共同分析朝鲜劳动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帮助纠正当前该党内部所存在的非正常局面。

李相朝说，在劳动党内部存在很多需要批评的不足。金日成同志远远没有完整地将苏共中央的建议通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关于这方面情况我是从一些中央委员那里获悉的。在今年7月份在苏共中央所举行的会谈中，与会者除金日成外还包括朴正爱 and 南日，而中央其他成员根本不了解此次会谈的内容。李相朝说，虽然在苏共中央金日成已承认了苏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返回朝鲜后他的做法却是截然相反。

李相朝说，他曾打算就党内情况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发一封信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可南日却对他说，金日成为中央全会所准备的报告也

说得很全面了。于是，在几位朝鲜同志的建议下我便没有发这封信。

李相朝称，南日向他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在全会上转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其中对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苏共党员的言论(指苏共中央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的結果)进行了谴责。鉴于这只是南日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单方面解释，李相朝请求让他了解该信的原文内容。

李相朝得到了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结果的那部分内容的解释，其中谈到关于二十大会议以后在苏共内部出现了个别错误的言论。

李相朝同志被告知，他的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报告，我们从中共中央所得到的关于4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干部转到中国以及我国驻平壤大使所作的报告都得到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到忧虑。根据委托，参加中共第八次党代会的苏共代表团正与朝鲜代表团商议这一问题，并与中国同志商谈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情况。

李相朝得到通报，正如他所清楚知道的，在金日成同志逗留莫斯科期间苏方与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会谈。金日成同志声称，他赞成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克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的个人崇拜和发扬党内民主、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的建议。

关于李相朝同志提出的关于苏共和中共方面有必要就党内问题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问题，他得到如下答复：诸兄弟共产党原则上是可以提出此类建议和意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诸兄弟共产党不可能干预其内部事务。因此李相朝应当理解苏共和中共方面在采取一定步骤和举措向朝鲜劳动党提出建议问题上所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

接着，李相朝说，最好能以某种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方便叙述劳动党活动中的不足和一些即使以普通方式表述的批评性意见。

有关方面对李相朝同志的建议的答复如下：目前不应讨论关于李相朝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或其他类型的言论的问题。

结束时，李相朝同志对苏共中央的接待和会谈表示感谢。

№0984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 备忘录(1956年9月11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附备忘录(7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1956年9月11日

台湾岛隔台湾海峡与中国东海岸相望，海峡最窄处宽约130公里。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据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资料，人口到1955年年底超过950万人。探明矿藏有金矿、铜矿、石油、煤和硫磺。水利资源估计在275万千瓦左右。岛上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树种，如樟树。台湾和澎湖列岛(沙砾岩)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行政中心——台北市。

众所周知，台湾岛现在成了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和准备实施侵略的基地，是蒋残余部队(主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歼灭)的避难所。美国在台湾的一切措施和蒋介石的政策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为反对中国做战争准备。

岛上养着大批部队(60万人以上)和庞大的行政机关，他们需要大笔非生产性开支。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台湾的资源上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某些措施恢复和发展这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但它仍无能为力负担这么大的开销。所以，军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援助，从蒋介石溃逃到台湾之时起，美国给他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

台湾的经济形势。二战期间和战后初年，台湾经济急剧衰退。最近

几年，台湾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呈现某种程度的增长。1955年主要农产品大米的产量与1945年相比增长1倍，达到173万吨(1938年是140万吨)。1955年全岛生产200多万吨甘薯，约14000吨茶叶；生猪2100万头，大角牲畜40万头。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农业生产仅仅达到或在一些情况下略微超过战前的水平。与1948年相比，加工业的生产规模增长2.5倍。

对恢复台湾经济起了一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援助。从1950年至1954年期间，根据美国援助计划，国民党政府得到8.69亿美元的援助。1955—1956财政年度，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数额为7300万美元。尽管美国的援助大部分是以提供美国多余的农业品的方式实现的，但其相当一部分用在了台湾工业(水泥工业、化工、电站建设)的发展上。1953—1956年，用于台湾工业生产的资本82%来自美国的援助和用出售美国货物资金所建等值基金补贴。

在经济关系方面台湾不够发达。

台湾的工业主要同农产品加工联系在一起。岛上实际上没有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只有几座不大的冶炼厂(以进口废铁为原料)以及一些为军队服务的装配厂和维修作坊。甚至连发展最快的部门——化工(主要生产化肥)和纺织业也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台湾依然依赖工业品进口。

台湾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一天劳动(工作日)长达12小时，而工资微乎其微。1955年主要工业部门工人的平均工资为365台湾元(1台湾元=0.04美元)，即略高于官定的中等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一半。低工资、高税收和其他收费导致岛上群众贫困和居民破产。

利用贷款和税收手段，政府无偿夺去农民近2/3的收成，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持军队和国家行政费用的开支。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 and 地主手里。地主占农业人口的9%，而他们占有60%的土地。只有1/3的农民拥有一点儿土地，其余农民只好租地耕种，所收谷物的近70%用于交租。

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美国资本的淫威。由于缺少地方资本，蒋介石分子努力刺激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投入。现在已给美国公司提供毫无阻挡地把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汇出国外的权利。美国垄断资本

已控制台湾的主要经济部门——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掌握着各地一半以上的发电站。铝业生产为美国雷诺公司所控制，糖业生产30%以上的固定资本为美国公司所有，水泥和化肥的生产也控制在美国资本手中。

外国资本的渗透对台湾地方公司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许多当地公司竞争不过外国公司，被迫停止经营。例如，由于美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台湾船队货运吨位比1949年减少1/4。

台湾经济对美国资本和美国公司的依赖，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巨额非生产性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以上)导致台湾财政形势异常紧张。政府预算长期出现赤字。由于政府巨大的开支和它有限的财政能力，台湾通货膨胀加剧。与1954年相比，1955年货币发行量增加37%，而工农业产品仅增长2.5%。通货膨胀的增长引发了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台湾元汇率的下跌。

内部政治形势。台湾建立了公开的国民党军警专政，准确地说，是蒋介石和他周围一小撮心腹的专政。(在台湾，除国民党外，还有以徐福林(Сюй Фу-линь)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成员2000人左右。该党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此外还有青年党，有200名干部。两党均由蒋介石运行和提供经费。)蒋介石的心腹有：蒋介石的妻子——他最亲近的顾问，积极干政，尽管据掌握的消息，她对他的影响近年来有所下降；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领导安全局和军事保密局(政治军官学院)；副总统陈诚，蒋介石学生时代的朋友，负责内部问题，被蒋介石任命为自己的继承人。蒋介石主要同上述几人保持直接接触，他们是他的决定的主要执行者。

蒋介石分子依靠军队和3万警察对台湾实施戒严。岛上居民经常遭受镇压。据台湾报刊报道，1955年初几个月，岛上逮捕了1万多人。至1955年年底，仅军事监狱就关押3.5万多人。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分子与当地居民相比，可谓高官厚禄，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单独住宅里。军队主要成分是大陆来的士兵和军官。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当地居民对蒋介石分子的不满。

台湾的资产阶级被课以重税，而且必须认购“爱国”债券，实际是在军事专制的条件下。当地资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利，它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已化为乌有，因为国民党分子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决定都有否决权。

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居民所奉行的掠夺和恐怖政策，引起广大台湾群众的不满。但是，在军事警察专制和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台湾劳动群众公开反对国民党制度的行动还未出现。

由于对当地资产阶级扩大了某些权利，一部分当地资产阶级开始同国民党合作，维护现有的制度。主要反映这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是“班山”反动集团，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个当地资产阶级集团“阿海”以前同日本人合作过。它在省议会成员之间和市政机构有很大影响。它支持把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的口号，尽管它的成员还没公开反对蒋介石制度。

1955年9月，在日本由所谓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成立的“福摩萨临时国会”给国民党政府在海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麻烦。这一国会任命一台湾岛的“临时政府”。同日本人有联系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主张台湾独立，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解除蒋介石分子的武装，解散国民党政府。该党在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有分部。中国政府对该党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持否定态度。

完全依赖美国和重返大陆已毫无希望导致了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国民党一些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领导岗位和斗争。现在在国民党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集团。这个集团顺利地大大地削弱了“第三力量”——国民党的部分领导，他们企图把中国内战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在蒋介石身上，夺取蒋的位置以实施更有效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现在“第三力量”以“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的名义行动，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建立广泛的反共战线。但是这一集团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威胁。美国人力图利用“第三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利用它取代崩溃的蒋介石政权。

国民党上层瓦解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国民党内部集团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55年8月，蒋介石的“军师”孙立人“退休”，长期以来他在许多问题上与蒋介石不和。据非正式消息，孙立人受到美国人的支持(顺便指出，受到美国驻台湾军事代表团团长杰斯将军的支持)，目的是想让他取代蒋介石。蒋介石以追查孙立人案件为由，在军官和官吏中逮捕一大批与他不和的人。

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分歧也不断增长。1955年10月，国民党领导批评俞鸿钧政府企图把财政困难和国民党政府威信下降的责任推到他身上。

他被指控的一条罪责是他在所有事情上过分追随美国人。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因为两者都追逐国民党军队中的关键位置。现在美国人正利用蒋介石的制度来掩盖他们武装占领台湾岛的事实，在亚洲这一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T.库普里科夫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р.5175, л.183-190

№1038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9月1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14日会议第22/1号记录

第1项 关于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内建立中国研究所的问题。

(加富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为了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批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二、中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研究并撰写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语言、文学和国际关系学问题的著作；

(二)翻译并准备出版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以及中国现代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

三、允许中国研究所自1957年起出版学术杂志《苏联中国学》，每年6期，篇幅15个印张。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苏联科学院现有的编制和工资基金范围内，审理和批准中国研究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给研究所必要的外汇拨款，用于购买学术资料和研究所研究人员前往中国出差。

五、批准佩列韦尔泰洛同志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

六、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 ф.4, оп.15, д.530, л.2

№23063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1956年9月18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楚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9月18日于苏共中央联络部

陈楚同志说，中国使馆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其中周(让我们)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的请求——帮助安排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休养事宜。江青同志预计将乘图104飞机于1956年9月19或20日来莫斯科。关于其抵达的具体日期将另行通知。在江来苏休养期间，将安排医生、护士和翻译陪同，周恩来同志请我们提前向苏方表达谢意。

我们对陈楚同志说，我们将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好江青同志的休养事宜。根据两国间的医疗协议，江将被安排在一所疗养院或另一个医疗机构。

陈楚同志接着说，中共中央请求对苏方为以何长工和于毅夫为首的18名党的领导干部的团体休养活动所作的安排表示感谢，这些人已于9月1日返回北京。陈楚同志还向我们转达了这些已结束休养同志的谢意，后者非常满意苏联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关心，其身体已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作为回应，我们对陈楚同志说，苏共中央总是很乐意接待各兄弟党的同志们来苏休养。

陈楚同志继续道，他以前曾与康斯坦丁诺夫同志谈过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康斯坦丁诺夫同志当时表示，希望在全会举行前再次与我见面，并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对陈楚同志答复道，苏共中央全会将延期举行，而康斯坦丁诺夫同志也已去休假了。等他休假回来后，我们会向其通报此事。陈楚同志感谢苏共中央提供给中方的其在苏共中央所在地与社会主义者们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会谈结束时，陈楚同志对举行这次会谈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B.B.莫舍托夫同志。

会谈记录者：Д.尼古拉耶夫(签名)

1956年9月18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82, л.196-197

№20375 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 报告事宜(1956年9月19日)

机密

1956年9月1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关于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将这些报告的原文以附录的方式交给《新时代》外文周刊(共有五种语言)？

总编辑

列昂季耶夫

手写批注：

不要给，因为将以单独的小册子出版。

П.波斯佩洛夫

1956年9月20日

归档。答复已向B.M.勃列日涅夫同志作了通报。

A.索洛维约夫

1956年9月20日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79

№103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1956年9月21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21日会议第23/75r号记录

第75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为新疆出版《新生活》杂志的问题。

一、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1957年1月1日起，停止在阿拉木图市用维吾尔族语和哈萨克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二、责成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兹梅乌尔同志)，就在阿拉木图市停止出版《新生活》杂志事宜通知中国有关组织。

三、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析和研究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文学出版社继续为新疆居民工作是否适宜的问题。

ЦХСД, ф.4, оп.15, д.531, л.23

№25377 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1956年9月25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根据委托，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我将于今年9月28日在联盟宫圆柱大厅的盛大集会上作报告。兹发给你们我的报告草案。

请你们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A.阿里斯托夫

1956年9月25日

报告：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

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离现在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6万万中国人民在自己英勇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动统治才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自己亲爱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就像庆祝一个人类获得解放的快乐节日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和地球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与中国人民一道都在为这个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日而欢欣鼓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之际，苏联人民谨向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斗盟友——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忘我斗争的结果，是伟大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晶。这个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日离我们越远，它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对各种历史事件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也就展现得更为完整和全面。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杰出的事件。它对东方各国解放斗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最为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由此，全世界进步的人们有充分理由确认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他们实现伟大的人民事业，走上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阶段之一。

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创了6万万中国人民生活的新纪元，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并将中国人民带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如今，那个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道成为了进步的力量和人类的先锋队。在成为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期内便在经济、文化和国家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成果作了总结。与世界人民一样，苏联人民对此次大会的工

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也具有重大意义。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并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令人振奋的计划。大会通过的决议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响应，并更紧密地将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大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并对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并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伟大列宁的天才预见。在马克思主义提出后，历史便不断地提供新证据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还在1913年，列宁便曾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标志了人类历史的未来时代，但仍需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它。”而随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一论断：四年之后，俄国便爆发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正是在这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武装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我们的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如何创造性地掌握马列主义，如何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子。他说：“箭”就是马列主义，而“靶子”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了自己和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理论，才能够用这支“箭”来射中中国革命这个“靶子”。

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将本民族中所有积极力量都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从而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之一。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始终得到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赢得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深切同情。后者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减轻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征途上的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标志。

在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借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深刻了解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自己确定了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总路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循序渐进地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中国人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年时间内，中国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新胜利，苏联人民由衷地表示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和著名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以创造性的态度解决中国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联盟是中国人民在将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而当革命胜利后，统一人民战线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它在发挥着工农联盟基础作用的同时，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既兼顾了本国的国情——已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继续赢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人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只是国家的经济，另外还包括人的思想和意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劳动，顺利地完成了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该精心制定的建设计划包括有694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完成上述计划的过程中，中国扩建了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在中部和内蒙古又建设了一批新兴冶金工业基地和城市。如今中国工业已经能够生产重型汽车、喷气式飞

机、大功率发动机、大型钢制设备、高质量的模压钢材、冶金和矿山设备、最新型的冶金机床和其他现代工业品。这些企业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依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品总产量增长了90%。所有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提前顺利完成了。例如，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将于今年完成五年计划的预定产量，而在下一年度——1957年它将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近15%。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截至1956年(7月)末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比重的99%，产值的98%以及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公务人员均已被改造为公私合营制。

工业在国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增长了28%，1952年增至39%。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从39.7%增至46%。国有企业已在国家工业品总产量中居于主导地位。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5年中国粮食收获量达到1.84亿吨，棉花达到151.9吨。

中国正在进行把个体小农经济纳入到集体经济轨道的伟大进程。在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上，中国人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集体经济已在中国农业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

截至1956年末以前，国家已建成99.2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在农户总量中所占比重已达91.7%，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达62.6%。预计截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末——1957年，除个别边远地区外，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中国的铁路和公路也正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着。它们将荒芜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与国家工业中心地区连接起来。在党的鼓励下，中国的建设者们将铁路铺到了以前人们根本无法涉足的地区。众所周知，唐朝诗人李白曾就中国四川省的道路状况写过一首诗，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如今，经过那里山区的湍急河流和牧场已铺设了现代化的铁路。还有西康西藏和青海西藏公路，它们将西藏与中国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

通过兴建铁路，中国广大地区被连接成一个整体。通往蒙古和苏联的铁路也将中国与苏联边境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政府所建设的交通网络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出发点有根本性的区别。殖民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目的是为了攫取中国的资源，而中国人民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修路来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通过发展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好，商品流通总量不断增加。

在发展国内社会主义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内市场。与1952年相比，1956年中国的商品流通总量增长了66.3%，出口和进口总量也增长了65%。在公共饮食方面，中国个体贸易企业和私营企业总量中68%—74%的从业人员，已接受改造并加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或合作组。

目前，中国正打算着力进行文化革命，以繁荣国家的科学、教育和艺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便充分调动学者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创作的热情、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政府还不断扩大高等院校、中学、专业学校和初级学校等教育网络，增加受教育学生的数量。通过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国家培养了一支有能力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新型的人民知识分子大军。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工农联盟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得以巩固，全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人民中国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中国人民忘我劳动、中国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7—1962年)，中国提出的国民经济计划更加宏伟。其主要目标包括：进一步发展国家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便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加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1962年国家工业和农业生产总量将比

1957年增长两倍，并且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将比过去更为迅猛。

农产品总量将增长35%。在1962年国家粮食收获总量预计将达到2.5亿吨。与1957年相比，1962年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总量将增加75%。在工业投资比重方面，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58.2%相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至6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打算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将国内商品零售总量增加50%；将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提高25%—30%，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与此类似。

中国朋友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那时，它不但拥有现代化的工业，而且还拥有装备着先进技术的社会主义农业。

同志们！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其持续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保持与世界各国间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深深的敬意。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一贡献在数个世纪以来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评价。而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国已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作为一个伟大强国本应拥有的地位。

关于上述历史进程，其实早已被列宁预见到了。后者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人类的命运及其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俄罗斯民族的卓越思想家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伟大的未来属于拥有天赋的中华民族。俄国的天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曾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将发生一次伟大的转折，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的首领，必将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发挥伟大的作用。”如今，在东方已然觉醒的时刻，我们已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自由的中国对东方那些从殖民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吸引力有多么的巨大。自由的中国将促使后者在东方国家的复杂和独特条件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消除朝鲜军事威胁和重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中国和印度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者不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并且已日益成为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法准则。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承认中国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上所起到的重大主导性作用。正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和斡旋下扩大了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间的互信和合作。与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一道，中国人民对埃及政府发起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合法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某些国家)对埃及所采取的挑衅性压制举动。

可以这样说，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不论它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发生，如果没有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强大中国的参与，那都是无法解决的。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2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60个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其国际关系不断扩展，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对国际事件进程的影响日益增加。像所有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行的与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已成为当代公认的国际关系法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在联合国的恢复必然会对该重大国际组织的活动成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兄弟国家，也是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利益血浓于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够繁荣昌盛和将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体现。

1950年签署的关于(两国)友好、同盟和互助的历史性条约使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依据苏中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两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互助体系。这些互助活动促进了两国生产力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和经验上的互通有无。苏联把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全面的援助视作自己的国际义务。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劲崛起并促使帝国主

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世界各民族一致要求和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们都为我们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近一时期，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印西亚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不懈努力下，欧洲很多国家之间、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情况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乐意看到的。但是，我们绝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因为西方国家中的侵略集团一直在致力于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加剧国家间的矛盾。

苏联、中国、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民族都关心和平问题。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加强主张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发展和巩固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关系。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即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只有在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策和当共产党成为社会的领导和引导力量之后才可能发生。正是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与本国人民紧密联系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该党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党员要关心群众的利益，认真研究和总结工农群众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不遗余力地关心国家的繁荣和为人民谋福祉等内容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人民极其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人民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并以高度的热情去完成党的指令。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中国成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它必将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祝苏中人民的永恒友谊不断加强和发展！

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永远保持朋友加兄弟的关系！

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万岁！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万岁！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81-95

№21476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 专家工作报告(1956年9月27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年9月27日

第786号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苏联高教部副部长Б.С.格拉先科同志

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Б.А.基里林同志：

兹发给你们中国高教部顾问Б.И.多库金同志所作的关于自己在1956年1—6月间的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19页。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А.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上述三位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马尔采夫。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1241号，1956年9月18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3份

1956年9月27日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社会学教授Б.И.多库金

关于1956年1—6月间工作的报告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1955年中国思想斗争运动发展的总体特点，并对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状况作了评价。

兹报告阐述了我1956年上半年在中国高教部作社会科学顾问期间所做的具体工作。报告以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资料为依据集中说明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育的进一步改善等问题，并简要介绍了苏联驻中国的社会科学教师组的工作情况。

一、参与解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领域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1956年上半年，中国高教部和整个中国高等院校系统都在积极地起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计划。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经济、科学、文化和干部培养等领域实施全面规划的指示正逐步地落实到实际，并在中国高教部制定的一系列前景规划中得到充分反映。

为了反对保守主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总要求，中国各高校都在打算并逐渐实施广泛地规划以消除自身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局在1956年第一季度就社会科学未来12年发展问题起草了如下一系列前景规划文件：

1. 社会科学干部培养前景计划。
2. 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前景计划。
3. 科学思想评论发展前景计划。
4. 社会科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前景计划。
5. 在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发展的前景计划。

根据计划预测，1967年中国高校将有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为了开展社会科学教学，届时在目前3000名社会学大学教师的基础上仍需要再培养近8000名大学教师。

正如我在1955年报告中所指出，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各大型高校正大量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扩大研究生和培训班招生规模。根据中共中央决议，中国人民大学将改组为一所专门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培养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专业的教师骨干。

1962年以前，还将组建两年制学习班，以便从优秀高校毕业生中培养理论专业的社会学教师。

关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学教学、政治教育工作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的举措也制定了相应的前景计划。关于社会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在近三年内完成主要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和资料的编制和翻译，研究生必修科目书籍清单的编制等工作。在未来12年内，必须完整地向高等院校提供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作为干部的理论培训资料。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必须反映当代各相应知识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概括性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计划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2年计划打算完成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出版苏共最重要的决议，苏共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最重要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领域，也打算开展对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活动。在哲学领域计划研究中国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普遍和特殊规律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将着重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需要特殊关注和研究的是工

业、农业、交通、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经济合作诸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国同志还向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在以下方面提供帮助的问题：

- 1.对上述前景计划提出批评性意见和具体补充意见；
- 2.向中国同志介绍苏联科学在相应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 3.就中国同志所编制的上述科学工作前景计划介绍苏联的经验。

二、(我们)对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局所给予的帮助

在上述期限内，我们以顾问的身份向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局提供了如下一些帮助：既参与并完成了整个计划期的一个基本工作，也参与并解决了一系列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整个计划期的基本问题：

- 1.了解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在社会学教学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培养教师骨干领域所做的工作情况。
- 2.与政治培养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参观北京市各高校的社会学教研室并了解其工作情况。
- 3.根据既定计划，就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相关问题与中国高教部领导者会谈，参与社会学教学、中国各高校政治—培养工作和教师培养等方面资料和指令的编制、起草工作。
- 4.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相关问题组织和举行辅导和报告会。

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1956年计划的制定工作，该计划包括的主要问题如下：

- 1.制定社会学教学和干部培养领域未来12年的前景计划。
- 2.就在中国各高校开展科学—思想评论活动的问题而编制相应计划。
- 3.研究中国高校政治培养工作的发展经验。
- 4.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定期组织和举办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室主任培训班。
- 5.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组织培训工作和举办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6.编辑出版教学大纲和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籍目录。
- 7.对各高校社会学大学教师的教案进行评审。
- 8.对中国东部、湖南省和广州市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检查。
- 9.组织苏联社会学专家在长春、成都、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和西安等城市举办讲座。

在帮助政治培养管理局落实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我在1956年完成了以下工作：

——对武汉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

——为了在社会学教学中将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举办了上海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我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根据会议成果制定了相关举措。这些举措主要包括：根据为中国各高校社会政治课而准备的材料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

——参与制定相关前景计划并帮助落实改进社会学教研室科研工作的相关举措。

——参与编制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议题计划，在这些进修班上要作的理论性发言和报告(4次)以及中国同志起草的将在讨论会上要作的报告。

——参与筹备和举办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有关的中苏社会学

大学教师国际会议(参见本报告第4章)。

——参与中国高教部组织的委员会赴广州、长沙、南昌、汉中和南京等城市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调研，并参加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在中国高教部年中总结时，我就各高校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个别问题作了一系列报告。

三、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

1956年第二季度，由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所刊登的一系列文章，中国社会学教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便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针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年中总结，我们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就一些与苏共二十大决议及其资料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就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工作安排问题，苏联专家对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咨询问题，组织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角度阐明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出了大量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二十大的会议资料，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一些教研室希望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基础教程的教学作了一些变动。下面，我们将从这些问题中列举一些比较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1.目前如何揭示关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终将胜利的问题？

2.个别同志说，现在不能把《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用作马列主义基础教程的教学参考书。这对吗？

3.与利用议会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关于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问题？

4.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同志指出，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那么，这里指的是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哪些国家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下降？

5.И.В.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一书中就战争不可避免问题所作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

6.关于苏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关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参考书的编撰前景如何？

7.苏联如何评价《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8.针对中国同志提出的关于И.В.斯大林是否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问題，如何作答？

9.从下一学年开始，马列主义基础教程一课的教学如何组织？А.И.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上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只适用于苏联历史的说法是错误的。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必须编写一系列马列主义教科书。那么，即将编写的此类教科书将是怎样的呢？是否应当加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的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0.除了南斯拉夫问题外，И.В.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了哪些错误？《人民日报》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错误，具体都是哪些错误呢？

苏联社会学专家们就苏共二十大资料相关问题举办了一些会谈和辅导。在这方面苏联高教部发出的关于在1955—1956学年完成高校大学生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的学习的指示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苏联高教部的这些指示，及其在附录中所建议的参考书目也被中国政治培养管理局和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根据这些课程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教学特点，运用于大学生的社会学学习之中。

在开展针对大学教师的再培训和提高其理论水平的工作上，我们所进行的活动包括：长期组织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培训班，加强苏联专家对各技术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帮助，举办巡回讲座，并由苏联专家为中国社会学教师作报告，等等。

在培训班上除了听取苏联大学教师所作的报告外，还讨论了中国大学教师就一些现实理论问题所作的报告。期间，各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所作的报告具体如下：

1. 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报告人：林启茹(Лин Чи-жуй)同志；

2. 中共在农业合作化领域的方针——报告人：郭高启(Го Гоу-чи)同志；

3. 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报告人：程州(ЧенЧжоу)同志；

4. 关于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工作——报告人：艾知生同志。

在培训班上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讨论了如下报告：

1.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基础——报告人：陶大盛(Тао Да-шэн)同志；

2. 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类型的合作社的过渡——报告人：宋涛(СунТао)同志；

3. 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原则——报告人：朱升富(Чжу Шенфу)同志。

开设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长期培训班的工作引起了大学教师干部的浓厚兴趣，许多大学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苏联专家在教学法的组织、科学研究和政治培养工作等方面向各技术院校的社会学教研室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大学教师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最重大课题所作的讲座和报告也使中国大学教师受益匪浅。参加此类报告会的人数一般都在1000—1500人左右。

我们通过上述举措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中国高教部和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充分肯定。

苏联专家所采取的旨在帮助中国高校培养高度专业化教师骨干和发展科研工作的一系列强化性举措也得到了上述部门的高度评价。而中国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实践成果则进一步证明了苏联专家工作的成效。

四、关于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举办的首次理论联合会议的工作情况

今年3月31日至4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理论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与会者除了苏联社会学专家、大学教师外，还有中国科技工作者和各高校的社会学大学教师。

本次大会是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高教部的大力协助下，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下属的科学—文化工作组和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领导人为В.И.多库金教授)组织的。

举办联合学术会议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热情支持，其工作人员也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该理论会议的主席团主席为科学院院士П.Ф.尤金，成员包括苏联科学工作者代表，中国科学院，各高校和其他文化、社会组织的代表。

在社会学代表教学法会议和统一的党组织党委会议上讨论并肯定了这次联合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会议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帮助同志们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和资料，阐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并用这些资料来武装苏联专家。此次学术会议应有助于解决被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实际任务，确保进一步巩固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创造性的学术合作。

此次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 1.会议开幕。科学院院士П.Ф.尤金致开幕词。
- 2.И.М.巴尔哈托夫同志作报告：“苏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
- 3.В.И.多库金同志报告：“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并存”。
- 4.В.С.斯巴诺夫斯基同志报告：“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
- 5.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同志报告：“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
- 6.就上述报告如下同志将作发言：Л.С.拉布霍夫、М.И.库兹涅佐夫、С.В.亚历山德罗夫和М.Я.潘克拉托娃等。
- 7.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报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及其进程”。
- 8.郭沫若同志报告：“关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在社会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计划”。
- 9.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和统计计划管理局局长杨英杰同志报告：“中国国民经济未来15年发展前景”。
- 10.Н.И.克利姆科同志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
- 11.中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同志报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 12.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报告：“中国的阶级斗争”。
- 13.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报告：“中国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 14.会议领导人为会议致闭幕词。

此次会议的工作引起了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浓厚兴趣。这从与会者数量上便可充分反映出来，此次与会者人数为450—800人左右。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会议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从而为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会议期间的报告和发言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中文和俄文，报告和发言稿均同时提供给苏联和中国同志。会议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

苏联科学工作者们(如В.И.多库金教授、Н.И.克利姆科教授、科学副博士兼副教授И.М.巴尔哈托夫和В.С.斯巴诺夫斯基等)的报告均涉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问题，展示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

针对Л.С.拉布霍夫、С.В.亚历山德罗夫、М.Я.潘克拉托娃和Н.И.库兹涅佐夫等同志的报告，在会议发言中，同志们对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有益的补充，并提出一些评论性意见。

中国同志所作的关于以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大学教师骨干和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报告不仅展示了中国未来12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前景，而且深刻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和思想斗争状况，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自己的报告中展示了中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并对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在社会学领域培养科研和教师骨干的任务给予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联合理论会议工作的意义，郭沫若强调了此次会议工作对中国科学和教师骨干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他尤其满意地指出，此次会议的举办在巩固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科学合作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然，作为苏中两国学者首次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其进行过程中难免也存在有一些不足

和缺陷：例如针对所作报告的讨论原本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个别报告仍需要作更详细的修改和编辑，报告和发言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了所规定的时限。

但这些不足并不能抹杀此次联合理论会议对苏联和中国思想战线工作者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政治和实际意义。为了密切苏联和中国科学—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学术事业的交流，有必要全面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经验。

在总结此次理论会议的同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16日)指出，这次会议积极地推动了中苏两国社会学界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合作和经验交流。

所有报告全文，其中包括中国同志报告的俄语版均于1956年5月21日发往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

五、关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的工作情况

截至1956年6月1日，在中国高校中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共计34人，其中3人在上海市，2人在成都市。

该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给予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以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在教学法联合会会议上，及其分部(党史、经济和哲学)会议上，均就一些新课题的教学法资料和讲座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为了进行年中总结，举行了5次教学法联合会全体会议并每月举行一次分部会议。在教学法联合会中详细讨论了理论会议的筹备问题及其相关资料，研究了关于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基础上重新编制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训练班学员提供的讲座和其他教学材料的问题。

所有社会学大学教师都有责任在自己的讲座中充分体现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联合会各分部在自己的会议上也讨论了苏联大学教师们以及中国同志所提出的问题。

教学法联合会在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目和教学大纲草案的讨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联驻中国使馆的负责人会定期到教学法联合会作相关信息报告和咨询活动，以便向社会学大学教师们补充一些关于国内的新情况。社会学教师们已经听了一星期中国领导同志就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作的讲座。

社会学教师们经常为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工作的苏联专家集体作报告和讲座。这一工作为这些同志独立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学教师集体根据会议资料准备并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座。

他们为苏联专家准备并作的讲座的题目具体如下：

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苏联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巴尔哈托夫同志)；

战后国际发展中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库塔科夫同志)；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克利姆科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库兹涅佐夫同志)；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博塔波夫和杜宾斯基等同志)；

列宁的两个体制和平共处的政策——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伊诺泽姆采夫同志)；

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和平共处(多库金同志)；

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帕夫洛夫和缅任斯基等同志)；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模式(亚历山德罗夫和西托洛夫等同志)；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六五计划——共产主义建设的新的重大步骤(卡拉塔耶夫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社会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马卡罗夫同志)；

关心人民的福利——党的法律，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任务(斯洛博佳纽克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安东诺娃同志)；

列宁的民族政策以及在农业和文化领导中进一步扩大各联盟共和国的权力(列文科同志)；

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阿列什金同志)；

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巴尼拉托娃和萨波日尼科夫等同志)；

共产党——苏联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力量(贝斯特雷赫同志)；

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调和性(基谢廖夫同志)。

教学法联合会所做的工作使在中国高校工作的苏联社会学教师之间可以广泛地交流经验和相互帮助，以有利于搞清楚一些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问题。

关于被派往中国的苏联社会学教师集体工作的不足，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个别同志(如基谢廖夫和列为尼克等同志)参与教学法联合会及其分部的工作较少；

2.个别教师在与中国同志联合举办的会议上犯了错误。例如高级工会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师马卡罗夫和克利姆科等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关于教学负担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北京国立大学工作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师——巴特里克耶夫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抱怨负担过重。

3.在个别情况下不愿意向那些没有苏联专家的中国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如姆哈诺夫同志。

上述错误正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纠正。总体而言，我们的集体是以守纪律、负责任和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的。

而一般而言，中国同志和相关组织对苏联社会学教师们的工作也都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的。

六、参与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出差事务

我们根据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要求，出差去外地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中国同志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并举办与这些课程相关的教学经验交流会。

该委员会的出差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城市：武汉、上海、长沙、南京、广州、杭州、南昌等。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这些城市高校举办了大量社会学教师会议，与会者既有中国同志，也有苏联专家。

在了解各教研室工作的同时，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思想理论水平方面，检查教研室的前景计划，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的措施以及科研和政治培养工作的开展情况。

苏联专家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一些重要题目为各高校教师集体作了一系列讲座。

1956年4—5月间，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南部和东南部一些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此次检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

量，及其政治教育工作状况；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以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学生的指示的情况。

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已对中国高校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积极经验作了总结；正在对采取如下一些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的成果进行研究，如在高校中设立先进集体制度，突出和奖励优秀工作者，尝试从所有教研室选拔优秀教师组成教育小组等；正在对把教师教学和大学生培养全面负责制原则落实到实际的结果进行预先评估。

各高校所出版的刊物在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社会学教学质量和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几乎所有高校在各系、年级和班级都办有报纸和墙报。高校刊物揭露和批评教学、科研和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在政治教育工作路线方面计划实施的各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系列高校均在学术委员会上编制和批准了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社会学教师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仍存在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严重缺陷。因此高教部实施的提高社会学教师骨干专业技能的举措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

苏联专家对中国高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苏联专家在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的过程中；苏联专家进入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苏联专家参加定期训练班的工作；苏联专家就一些理论和教学法题目作报告和讲座；最后，与中国同志共同举办学术会议。

1956年5月末，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举办的科学和文化组老顾问会议上，听取和讨论了多库金B.И.同志报告：“关于中国高校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和任务”。

结论

1.1955—1956年度，中国高校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表明，各级党组织领导层在这方面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社会学教研室组织的建立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补充，为中国各高校完成针对大学生的马列主义教学培养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的任务在于，改装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领导工作，提高骨干教师的专业技能，确保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给予年轻教师更大的帮助。

2.今年7—8月份，中国高教部仍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社会学教师和教研室负责人再培训夏季讲习班。参加者将包括中国所有高校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教研室的负责人。这些讲习班的工作计划将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教学法问题。

近期，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所属特别委员会正在对各高校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大纲、参考书目和研究生必修课进行复审。

中国高教部请求社会学方面的苏联专家对上述举措的落实给予必要的帮助。另外，在举办夏季讲习班和新学年的准备工作方面，我们也必须确保向中国高教部给予相应的帮助。

3.针对苏联社会学专家在中国各高校所作的讲座内容也需要重新审定和编制，以便其能够充分反映和说明苏共二十大会议决议和相关资料以及苏共二十大业已提出并解决了的那些新的理论问题。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

B.多库金(签名)

材料共4份，分送给：И.Ф.库尔久科夫、B.И.叶留金和B.A.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多库金，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1240号，1956年9月18日

手写批注：

归档。此为信息资料，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了多库金同志的报告。

..... [99]

1956年11月23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05-234

№20590-1 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7日

拜访了朴金喆，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开始我向朴金喆介绍了大使馆参赞B.И.佩利申科。佩利申科在战前和战争年代都在朝鲜工作，他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朴金喆说，佩利申科具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关于这一点，朴金喆说，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必须同苏联同志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他接着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前不久谈到，今后一定要加强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并交换意见。我说，最近大使馆的个别工作人员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消除。

朴金喆对我们的这次来访感到满意，因为他正想同苏联大使馆商量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谈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发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

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并建议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文件材料制成特别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将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

我提醒朴金喆说，他们已经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达成了在报纸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协议，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同意这个协议。

佩利申科说，在报纸公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朝鲜劳动党有利，因为这样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可以了解朝鲜劳动党的工作情况。

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个原则性问题，其意义还在于履行金日成和米高扬、彭德怀同志达成的协议。

朴金喆说，他知道米高扬、彭德怀同金日成达成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通过特别的决议来公布这些决议，只是有意见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他说，将把我们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我问朴金喆，8月中央全会是否已经做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正在制定这个决议，现在金日成正在审查这个决议。决议的最后文本还要2—3天时间进行准备。

佩利申科同志问，各级党组织是否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分送给各级党组织，但是，已经向地方上通知了这个决议并且已经讨论了这个决议的内容。他说，几天之后，各级党组织将开始讨论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相关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往各地。

我问朴金喆，9月中央全会关于个别同志的决议是怎样执行的。朴金喆回答说，已经通知了崔昌益和朴昌玉关于全体会议恢复他们中央委员的决议。朴金喆说，崔昌益现在身体状况不好，朴昌玉则被派往两江道工作。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通知那些出逃到中国的同志。

朴金喆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再次向我们承诺，他将把苏联大使馆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参加了这次会谈。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0-23

№20590-2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9月2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8日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的提议会见了，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和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以及翻译员王保民参加了这次会谈。

曹克强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三四天每天都提醒他们必须关注朝鲜报纸并立刻通知朝鲜同志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他说，根据报刊上的材料来判断，这个决议还没有公布。他还通报说，他在同金昌满会谈时，谈到了金日成对彭德怀的许诺，向金昌满要金日成的报告以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对此他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一准备好就送给大使馆。”收到的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只有金日成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族国家进行访问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曹克强问道，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知道什么情况，并提醒说，彭德怀在他离开前说，关于公布这个决议问题已经同金日成达成了协议。

我回答说，从报刊发布的情况来判断，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没有公布。我提及了今天同朴金喆的会谈，并通知曹克强说，按照朴金喆的话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人认为在报刊上发表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不合适，一方面是因为，报刊上没有公布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另一方面，同苏联和中国的兄弟党代表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报刊上公布这些材料。我引用同朴金喆的谈话内容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分送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我也引用朴金喆的话说，对他所说的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的问题也不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

至于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问题，我说，我们苏联大使馆收到的材料同中国大使馆一样。

在会谈的最后，曹克强通报说，他从北京收到特别指示，要在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这个问题上同苏联大使馆进行联系，如果需要的話，就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朝鲜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

曹克强又补充说，通过同金昌满的谈话他已经知道，出逃到中国的那些朝鲜同志的家属已经被恢复了粮食供应。至于这些同志返回朝鲜的问题，曹克强说，金昌满通知他说，朝鲜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关于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同志的家属受到的其他迫害这个问题，曹克强回答说，这些家属都被赶出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是否又搬了回去，他就知道了。这次会谈由M.П.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翻译。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3-26

[1]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2]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呈送的资料。——编注

[4] 该书已有中文本。——编注

[5]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这个机构通常被译做“雪列空”（“列空”是机关、单位的意思），是管理布达拉财务和拉萨郊区政法的部门，在旧西藏算不上高层机构。——编注

[6]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囊萨康负责(班禅)服饰，夏曾康负责(班禅)膳食，泽康为财政处，冲依康为秘书处。此外，班禅政府的机构还有柴曾康(负责佛像上绸缎制品的制作等)、拉日康(负责佛画绘制等)。——编注

[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决议草案。——编注

[8] 原文如此。冀朝鼎并非中共中央委员。——编注

[9]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0] 在此段旁白处有手写批注：删除。——编注

[11] 乔治·寇松，1919年至1924年英国外交大臣，是鼓吹和实践维持英国在海外扩张及其大国地位的代表人物。——编注

[12]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5] 鸠山一郎，时任日本首相。——编注

[16]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17] 1955年12月10日，苏联驻中国大使П.Ф.尤金向苏联领导人建议：让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Е.Ф.科热夫尼科夫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利用无沉箱的方法在长江上建筑桥墩的问题。建议被采纳了。——原注

[18]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19] 参见以下文件№20757。——编注

[20] 这里指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对外政策和军事问题。会议是在1月6—11日期间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这是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原注

[21] 参加会议工作的还有以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АПРФ, ф.3, оп.1, д.5, л.1)。——原注

[22] 这里指的是1956年1月28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就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建议通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统

一指挥的条例。——原注

[23] 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之后，其武装人员将被列入华沙条约参加国联合武装力量的组成中，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将由联合武装力量的一名副总司令担任。——原注

[24] 这里指的是“华沙条约参加国关于友好、合作和互助宣言”，其草案文本已经在1956年1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批准。（参阅第183/1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3，оп.10，д.217，л.1-9）——原注

[25] 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是于1956年1月27—28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关于会议的情况以及有关材料和最终通报可参阅第182/33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3，оп.10，д.216，л.72、93、94），1956年1月20—28日《真理报》。——原注

[26] 这里指苏联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原注

[27] 括号内的文字是用手写加上的。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第3版。——编注

[28] 略去未译。——编注

[29] 所收集的档案只有马来亚共产党1月12日的信件。——编注

[30] 此处人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31] 卡冈诺维奇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H.C.赫鲁晓夫报告的如下内容引起的（在“关于在现阶段可能避免战争”的章节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通常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只研究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经济基础。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战争可能或者不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拥有巨大意义的还有人们的意愿，阶级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原注

[32]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初的一份草案里，在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一章中，确实只援引了列宁著作的以下内容：“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在报告中说：“列宁在其对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着对人的暴力’。在自己的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天才论断中，列宁预见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写道，‘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个弱小的国家里，在相邻的大国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有可能和平地让出政权，如果它坚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话’。”引言在此处就中断了。在列宁的著作中接下来的内容应该是：“（资产阶级）认为保留自己的脑袋要更好一些。而更有可能的自然是在弱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承认这样的战争应该是国际社会民主制度的唯一纲领，尽管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2页）——原注

[33]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这段内容是这样表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特殊性，它的经济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是极其落后的，并带有半封建的性质。在控制了国民经济关键性命脉部门的基础之上，人民民

主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执行的是和平改造私有工业和贸易，逐渐地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方针。”——原注

[34] 卡冈诺维奇的意见，是报告最初草案的以下一段内容引起的：“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形式。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将会采用议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对于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传统性的机关，将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这个国家人民的绝大多数——意愿的工具，也就是变成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的民主制的机关。这种领导力量将是工人阶级的人民的议会，将能够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关于可能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找到了肯定性的回答。按照赫鲁晓夫的意见，在现代的条件下，“把劳动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全体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和坚决打击了机会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反动派和反人民的力量，在议会中夺取牢固的大多数，把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关，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工具”。——原注

[35] 斯大林1951年2月17日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内容：“和平将被保持和得到巩固，如果各国人民将把和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将把它坚持到底的话。”——原注

[36]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1年时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为越南共产党)。——原注

[37] 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在对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发表讲话时，指出了英国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同时尤其强调了它的和平性质。他说，“俄国的道路是短暂的，然而，也是困难的，同时伴随着流血”，“同时，英国的道路也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原注

[3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39] 尚未解密。——原注

[40]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1]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42] 1956年3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乌鲁木齐至中苏边界地段建设工作”的决议草案和给毛泽东的信函草案。苏联负责完成设计、勘察工作，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运输工具和机械以及在建设过程中给予其他的技术帮助。除此之外，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用于建设这个铁路地段所需数额的年息为2%的长期贷款，自1960年开始，清偿期限为10年，中方以货物偿还(РГАНИ, ф.3, оп.14, д.8, л.7; д.11, л.11、48-50; д.13, л.81、105-113)。——原注

[43]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44] 李海秋，即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И.Лихачев)。——编注

[45]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46]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8] 原文如此。关于这一机构，中国称中共中央宣传部，苏联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编注

[49] 这里指的是关于公布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问题。此前几个月，在1955年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在1955年12月14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曾说，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二十大前夕，苏联领导人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组共产党情报局。在此之前，情报局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大的威望。米高扬提出的关于设立几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来替代情报局的想法没有实现，或许这是由于没有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4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中止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通报。这份通报指出，共产党将会找到建立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更好的形式。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成了各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最重要的形式。——原注

[50] 在4月13日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中谈到了以下内容：参加情报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每个政党或党派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自己国家的条件，来开展自己的活动，一定能够找到各国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益的方式。在给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中谈到，涉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在近期即将举行的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4, л.3、76-79)。——原注

[51]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名单。——编注

[5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53]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4]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5]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6] 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联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是在1949年1月。——编注

[57] 即诺罗敦·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父亲，1955—1960年为柬埔寨国王。——编注

[58] 潘迪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妹妹，曾任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编注

[59] 原文如此。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编注

[60]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1]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А.И.基里琴科、Н.М.什维尔尼克和Н.И.别利亚耶夫的名字。——原注

[62] А.И.米高扬之行是在1956年3月20日至4月9日期间完成的。——原注

[63] 里丁，时任英国外交副大臣。——编注

[64] 原文如此。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西柏坡会谈发生在1949年2月。——编注

[65]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6]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8] 关于解散情报局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苏共最初的想法是分别建立欧洲、亚洲和北美几个联络局。1956年3月米高扬访华时提出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建立机构，并提出有事可以开会解决。——编注

[69] 1956年6月1—23日铁托访苏，苏南高级谈判最终结果是在6月20日签署了苏联政府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声明以及关于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的宣言。6月24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协商会议上，Н.С.赫鲁晓夫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领导人通报了关于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情况。6月29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1956年7月13日，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寄出了苏共中央的秘密信函，其中强调了应该注意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南斯拉夫方面拒绝声明与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以及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原注

[70] 6月5日，在大克里姆林宫招待铁托的宴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提议“为朋友，为列宁主义者，为我们战斗的同志”干杯。在苏共中央致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信函中，称这个声明为时尚早。——原注

[71] Л.Ф.伊利切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刊物部主任，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65—1989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72] 指的是1956年6月28日发生在波兹南的事件。——原注

[73] 6月29日，塔斯社驻华沙记者向莫斯科传送了波兰官方关于波兹南事件通报的文本。这个通报于6月30日被以标题为《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发表在《真理报》上。当天，苏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克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著名决议；决议中还包括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特务机关的阴谋活动。——原注

[74] P.S.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1947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与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建立了“人民阵线”，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两党分裂。
——编注

[75] P.陶里亚蒂(1893—1964)，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76] B.贝鲁特(1892—1956)，生前任波兰统一社会党主席和第一书记。——编注

[77] 西伦凯维兹(1911—1989)，时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编注

[78] 米科瓦伊奇克，二战时期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79] 爱德华·奥哈布(1906—1989)，时任波兰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编注

[80] 拉伊克，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匈牙利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编注

[81] 拉科西，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编注

[82] 法尔卡什，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编注

[83] 以下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84] 该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85]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文件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8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7]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8]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90] 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委托H.K.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于紧张了，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自1961年开始，在提供设备方面是可能的，而在一系列项目上——可以从1960年开始(РГАНИ，ф.3，оп.14，д.54，л.23，19，55-57)。——原注

[91] 原文如此，显然属于笔误。应为9月4日。——编注

[92] 即澎湖列岛。——编注

[93] 锡兰，现斯里兰卡。——编注

[9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9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96] 原文如此。——编注

[97] 1956年9月中旬，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A.И.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局势问题，并与他们制定了共同的行动计划。米高扬和彭德怀按照计划访问朝鲜，于9月23日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苏联和中国的干预下，金日成许诺恢复8月事件参加者的党籍，不对自己的党内论敌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原注

[98] 原文如此。——编注

[99]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第七卷(1956.10—1958.3)

1956年

№20590-3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1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1日

..... [\[1\]](#)

10月1日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对我说，根据北京9月29日的指示，他拜访了朴金喆并说，对于长时间拖延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北京表示关切。

朴金喆回答说，《劳动新闻》报于9月29日已经刊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而且是头版。

预计不会公布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以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因为他们将发行单独的小册子并分送给各级党组织。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26

№138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 (1956年10月4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这次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38项 《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针对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楚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说明。 [2]

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3] 、萨布罗夫、维什涅夫斯基、苏斯洛夫。

知悉，犯了错误。

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处罚犯错误的人。

关于塔斯社方面——书记处应该审理所犯的错误。

塔斯社的说明——不真诚。

宣布对维什涅夫斯基同志的警告处分。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5, л.33-40

№2055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

致苏共中央：

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同志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同志将自己给朝鲜劳动党中央所写的信件译成俄文，并将译文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李相朝还通报，关于这封信的原文，他打算于十月十几号左右发往平壤。

这里是发往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李相朝同志所写信件的俄语译文。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年10月5日

第25-c-2136号

手写批注：

阅。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31日

附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的简要内容

在自己的信中李相朝同志叙述了苏共中央已经基本了解了的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有关情况，并补充了一些新事实。

李相朝同志表示，自己不同意1956年8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他认为，此次中央全会本应解决以下问题：

- 1.关于重新研究以往的(朝鲜)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以此为基础制定用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切实措施。
- 2.关于清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确保党内真正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 3.关于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影响下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
- 4.关于消除党在宣传领域的错误，因为后者如今已背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
- 5.关于免除那些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人的领导职务。

但是，上述问题在8月中央全会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那些试图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志却遭到了镇压。

李相朝同志说，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中，多数所谓金日成撰写的“著作”都不是他本人，而是由其他同志撰写的。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和传播，金日成同志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并将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李相朝同志的结论是：如果党内民主体得不到保障和不能彻底地恢复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李相朝同志认为，在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朴正爱 and 南日等人没有向全体与会者传达苏共中央向他们提出的那些有价值的建议，那些在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则被污蔑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密谋者”。与此同时，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却谣传，仿佛苏共中央已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信并表示不希望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

还在此次全会开幕以前，一些同志在与金日成的私人会谈中便谈了自己对他的批评性意

见，而他也向前者表示已诚恳地接受了他们的同志式的意见。可与此同时却制造了关于这些同志从事派别活动的所谓案件。很多领导干部遭到了暗中的跟踪，因而他们害怕彼此往来，并担心有朝一日被指责为“密谋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曾打算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于是便被紧急派往莫斯科学习。

500多名在机关和部委等部门担任骨干领导工作的同志被指责为“延安派”。所有当年在朝鲜战斗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都被以各种名目定性为派别集团，扣上反党的帽子。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被称为“裙带派”，而那些从中国返回的则是“延安派”。而似乎只有那些由金日成领导过的游击队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形成了党的主要力量。

总之，李相朝写道，所有与金日成没有关系的革命者都应当给自己带上派别活动者的标签。

李相朝接着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宣称，劳动党内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然而，在8月中央全会上很多共产党员表示不满。于是，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决议中便写道：“.....在党的队伍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个人崇拜。其表现首先在于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在这一工作中过度拔高了个人的作用。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一贯坚持的最高领导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制和劳动党的路线、政策产生影响。”

李相朝同志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违反党章和社会主义规律的事实。例如违反党章的要求、不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便增选一些人进入党中央，而其中一些人随后便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其中就包括成为民党中央主席的崔庸健。

劳动党被金日成所制造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甚至连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任何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的发言稿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便确保发言者所说的都是“需要”的话，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党代会代表们。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所有发言稿都事先经过了详细的审查，并在不经代表同意的情况下胡乱修改。

李相朝写道，国家内部经常出现违反宪法的事。多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各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而根据宪法相关条款，前者都应当是经过选举方可产生的。

由于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3万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了一个师的编制。8000人被定罪为反革命，约1万人因其他犯罪遭到审判。总之，在北朝鲜平均300人中便有一个犯人。

关于所谓“反革命分子”，涉及这样一个事实。8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共有2000人被解除监禁，其中被判刑5年的“罪犯”，只是由于他们用了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封面来作包书皮。

根据金日成所发布的指令，如果有两个证人便足以给一个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意年限的徒刑。

李相朝同志继续写道，朴一禹同志(前政治局委员)被逮捕，其家属也被从平壤强制迁移，理由是朴一禹竟敢在实物税和党对待反对派的政策等问题上与金日成唱反调，并声称，(党)不应该不加选择地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

李相朝的信还谈到关于朝鲜当代文学中对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的歪曲问题。其中包括：过分夸大实际上早在1940年便已停止存在的由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历史作用；吹嘘金日成的贡献，当年他在普天堡一带所发动的一场很平常的游击奇袭活动，竟被吹捧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夸大“祖国光复会”的作用，实际上该组织的人数还不到100人。

但与此同时，却对与中国人并肩战斗反抗日本人、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朝鲜共产党的活动避而不谈。

(朝鲜现领导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问题上犯了巨大错误。例

如国内居民在饮食、住房和生活必需品等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便计划兴建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却没有考虑到国内并没有可以为上述工厂从事生产所需要的原料。

李相朝同志在信中还写了关于当朝鲜战争进行到第一阶段时，他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会谈的情况。他说，当时(朝鲜)人民军已顺利地推进到了朝鲜南部，可毛泽东同志仍然预计到存在美国大部队入侵朝鲜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李相朝同志向金日成作了汇报。而后者却答，我们不打算后撤，因此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

在信的末尾李相朝说，他并不反对金日成同志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但是请求朝鲜劳动党中央把他的这份书面声明告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为他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在8月中央全会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

译自朝鲜文

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引起了朝鲜共产党员、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普遍关注。在这次全会上人们期待讨论的问题有：关于我们政府代表团对兄弟国家的访问；关于其他一些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未获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我们清除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不足。人们尤其期待讨论并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问题是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依靠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性决议和其他一些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决议。在依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的基础上，所有兄弟党都广泛地展开了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思想斗争。

为了对那些将要在全会上解决的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可对之作出如下归纳：

- 1.重新审查以往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可以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实际措施。
- 2.消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便确保真正的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 3.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被篡改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因为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金日成的贡献被过分地夸大了。
- 4.清除党的宣传领域中的不足，因为截至目前此类宣传已背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
- 5.撤销阿谀奉承者的领导职务，因为这些人损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上述问题无疑会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很多共产党员的意见可能会与党内个别阿谀奉承者和一心想往上爬的人的意见发生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当采取行政命令和限制性的措施，而且还必须允许所有人都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我们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只要通过全面的集体讨论的方式便可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统一。

我提出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想抹杀我们党、个别领导者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在战争年代领导全国人民反抗外部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朝鲜人民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我也不否认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

问题的实质在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是为了揭露我们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及扩大我国劳动者所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绩。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消除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为已有的成绩所陶醉并把这些成绩仅仅归功于某个人。

可是，这次全会的结果不仅辜负了朝鲜共产党员和其他兄弟党的期望，而且完全与这一期望发生了背离。

所有那些以列宁的组织原则为指导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对我党所造成的损害提出了原则性批评意见的同志均被定性为企图推翻政府和党的领导的“反党集团”。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同志提出批评性意见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党内民主、确保党的集体领导、恢复被个人崇拜的影响所篡改了的我们党史的本来面目，将阿谀奉承者和一心只想升官发财者从党的领导岗位清除掉，制定具体措施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粗暴的压制下那些曾在讨论会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被剥夺了发言权，导致他们不能在中央全会上完整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一些诚实的敢于公开批评金日成个人崇拜的中央委员也受到欺骗并威胁可能被开除党籍。

难道这一切不令人感到可怕吗？

所有遭到镇压的同志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担负着重大职责的领导干部。其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其案件移交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贸易相尹公钦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弼奎等被开除了党籍。这样，上述同志便无法在全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一些也打算在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言的同志均被剥夺了话语权。

总之，这种粗暴和专横的做法是对我党党章的严重背离。

据说，曾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和私下批评过金日成的同志有朝鲜劳动党最高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朴义琬、前建设相金承化和通讯相金昌海(Ким Чан Хэп)等。金日成及其亲信践踏了党章所维护的党内民主，并通过肆无忌惮的压制方式将所有这些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定性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分子和“罪犯”。

在了解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昧着良心认可金日成及其同伙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稍后所作出的结论，即我党内部不存在个人崇拜和党内具体的个人崇拜对象只是朴宪永呢？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只有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国际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呢？很明显，就像其他兄弟党一样，朝鲜劳动党也是无法避免这些错误的。然而，尽管这样，我们的代表团在参加了苏共二十大返回祖国之后竟在自己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声称，个人崇拜在苏共的活动中非常普遍，但在朝鲜劳动党——这样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中是不可能存在个人崇拜的；由于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不存在个人崇拜，因此她也就避免了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可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声明并不符合事实，应当认为是对共产党人的欺骗。上述言论无疑是对绝大多数(朝鲜)共产党员意见的蔑视。

一、在朝鲜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及其表现已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种情形下，难道我们还能苟同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所作出的结论：在朝鲜已形成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允许劳动党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避免了在自身队伍中出现个人崇拜现象？如果我们苟同了类似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是承认其他兄弟党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这难道不是滑稽可笑的理论吗？

实际上，就朝鲜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有利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的。更别说，我们没有适合的条件，从而可以避免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朝鲜曾长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整个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民主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日本殖民者极力用无条件服从手中掌握着权力的日本官吏的思想来“教育”朝鲜民

众。久而久之，无限地服从上级对朝鲜人而言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苏联军队帮助朝鲜解放以后，政府回到了人民手中。

当时在国家缺乏经受过解放斗争的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一些没有经过足够的革命培养的新干部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促成官僚主义、阿谀奉承和个人崇拜在朝鲜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而根植在朝鲜民众思想意识深处的封建教育残余又为个人崇拜的繁荣准备了肥沃的土壤。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封建教育是无条件服从国王及其偶像的基础。在封建教育中国王是国家的化身，谁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的罪犯。而所有这些旧思想残余至今仍在朝鲜人的行为中有切实的反映。例如，根据阿谀奉承者所总结出的“理论”，谁批评金日成，谁就是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由此来看，上述“国王便是国家的化身”与金日成的拥护者们所坚信的“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阿谀奉承者所提出的“理论”目前在我们党内得到普及。难道这一“理论”不就是在我们封建和殖民统治时期所形成和建立的那些旧思想的残余吗？换言之，该“理论”就是应当受到诅咒的封建和日本殖民统治思想的延续。其思想基础就是“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官僚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个人崇拜在朝鲜的形成和发展。在这方面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苏联军队解放朝鲜之际，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被公认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共产党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警察式镇压的情况下，国内所有共产党组织都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固定的联系。每个共产党组织都拥有自己的领导人，金日成只是其中之一。而当金日成同志与我们的解放者——苏联军队返回祖国之时，他便受到了全国民众的支持。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朝鲜的共产党员们都毫无例外地相信苏联同志，因而也就热烈地欢迎和拥护得到苏联同志支持的金日成。

如果我们对当时从属于不同革命组织的领导干部们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人基本可分为如下四个类别：第一类——在朝鲜本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第二类——分布在苏联并接受苏共领导的朝鲜人；第三类——在东北从事游击运动的共产党员，其活动截止于1940年；第四类——在中国坚持斗争并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在朝鲜解放之际朝鲜共产党的内部基本情况。虽然那些坚持在朝鲜从事斗争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人曾反对由金日成担任党的领袖，但当时朝鲜大多数社会力量还是支持金日成的，他们还通过制定一系列举措以加强和提高他在党内的威信。人们在各地都将他的肖像与斯大林的肖像并列挂在一起，当时很多文件，其中包括国家复兴纲领20条等，都是以金日成的名义对外公布的。

而如今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使全世界都感到振奋之时，竟然有人极力将朝鲜人民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一个领袖的身上。以上所述都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列宁的组织原则遭到违背的同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个人手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当干涉朝鲜战争的外国侵略者扩大了战争行动的规模之时，更是所有权力都由金日成一人把持。

如果说，在战争环境下党和国家内部的民主原则受到限制还有几分理由的话，那么当国家步入和平发展阶段，类似的限制必然对党和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可是，和平发展时期在我们国家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人试图进一步强化之。其结果便导致金日成同志将自己置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而他本人则成为了神圣不可冒犯的人。

通过阐明上述事实，我们是否可以断定朝鲜拥有绝无仅有的良好历史条件，从而使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因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呢？我们应当承认，朝鲜不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正相反，我们国家中的所有客观条件都比其他兄弟国家更有利于个人崇拜的形成和普及。在这种情况下，自高自大的金日成同志不是去尊重那些当年曾工作在各个共产党组织中的同志们的意见以确保和加强党的统一，而是完全不再考虑同志们的意见。

随着个人崇拜的出现，就像月影随形一样，在金日成的周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谋取权力的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运用各种手段抬举金日成。一方面，如果说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有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存在，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也是领导人对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行为不断鼓励的结果。而当从上述两方面

来对个人崇拜现象加以分析之时，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党内是存在着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而作为领导人的金日成同志则鼓励了这些人的活动，从而促成了个人崇拜的产生。我们不难推测，如果金日成不知道和不经他的允许，类似“伟大的领袖”、“天才的统帅”和“卓越的领导者”等讴歌之词是否会在报刊上出现？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有人在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所说的那些话呢？

这些话是：在劳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存在个人崇拜。

否认劳动党内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有意欺骗党和人民，意味着对广大党员意见的歪曲。

如果全面分析报纸、杂志、中学教科书、文学著作和艺术创作，我们便显而易见随处可见、无时不在的个人崇拜现象，即金日成的名字被抬举得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王。在很多歌曲中都在歌颂着金日成的名字。朝鲜的民主教育也在告诉人们，似乎只是由于金日成的意志，人民才获得了自由，农民才得到了土地。尚处年轻力壮时期的金日成，其名字已被用来为平壤大学、各个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等命名。还有不少这样的称谓：年轻的金日成被称作朝鲜青年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谦虚地极力试图将金日成比作“朝鲜的”列宁或“朝鲜的”毛泽东的说法。

难道将金日成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只有那些完全陷入了自高自大的泥淖或丧失了所有廉耻之心的人，才可能将自己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相比。

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在金日成文选中所发表的那些作品。任何人都晓得这样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即金日成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其他同志——个人崇拜的积极信徒——代写的。试问，究竟有多少文章完全是出自金日成本人的手笔呢？

我甚至不打算对这些著作的质量加以评价。任何仔细和系统地研究过党和政府的文件的人都知道，很多文件都是在金日成的报告或发言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根本不考虑事物近期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编制补充性报告，以便修正基础性报告中的错误。而自认为高人一筹并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的金日成便是这样做的。我们会发现此类国家文件在有关形势方面的叙述往往大都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仍被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以金日成著作及其卓越的创造的名义发表。我建议党的高级专家和科研工作者对金日成的著作加以重新研究，以便对其中正面的、积极的内容与负面的、消极的内容加以正确的区分。然后再将它们作为党的报告集，而不是金日成的著作予以发表。其他材料则可作为党的政策研究的参考资料。

关于个人崇拜，我们在此不能不列举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实，以便说明个人崇拜在朝鲜的普及程度。还在不久前曾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将金日成的所有讲话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而这些讲话都只是涉及一些琐碎的小事。凡是金日成在发言中就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所说的话都立即成为了党的政治口号并被悬挂在每个大街上。例如金日成曾说过“大米就是社会主义”或“纺织是艺术”，便成为了党的口号。为了将这些口号以更形象的图画形式反映出来，有关部门还动员了大量的艺术家。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思维健康的人们感到好笑。不但城市大街上挂满了这样的口号，而且有人还让剧作家以“纺织就是艺术”的口号为基础写了一部戏并在平壤上演。类似这样的事实不仅让人感到可笑，而且也使人感到痛心。

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金日成同志将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威望凌驾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他在任何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与是否反映了多数共产党员的意见无关，而且均被认为是“最高指示”。即使他的最终决定违反了党章和既定法律，也无人敢表示反对。正如刚刚结束的8月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党章和其他党内民主规范遭到了金日成及其拥护者的粗暴践踏。而当时所出现的这样一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即中央副主席公开声称：“谁反对金日成，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等着他们的只有那些关押着人民敌人的监狱。”难道所有这一切不会引起党的严重恐慌？！难道这一切不会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吗？！

我们都依然非常清楚地记得，金日成是如何在每次会议上都提到的一个同志的名字，该同志以当年曾积极从事派别活动而闻名。但正是此人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称，金日成同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而被立刻任命为内阁相。这里哪还有党的原则可言？对于金日成同志来说，违反党章、国家法律和共产党的原则都不是难事。他从来都不曾把共产党员们的意见放在眼里，更别说到去认真考虑绝大多数党员的意见。如果我们说，金日成同志所信奉的信条是“力量便是真理”的话，那么他的观点的权威性则胜过所有国家法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前人们已被类似的思想观念所控制了的话，那么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明白，金日成的做法并不是党的工作作风。盲目相信金日成同志并将之比作上帝的民众已逐渐开始从个人崇拜的意识中清醒过来。而一些捍卫党的原则性立场的领导同志则向金日成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可金日成，不是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那样，虚心接受这些同志式的批评，而是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那些敢于公开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对于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们而言，苏共二十大出台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的文件是比老虎还可怕的威胁，因此他们对后者充满了仇恨。

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能够这样对待意义如此巨大的苏共二十大文件呢？如果我们不清除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错误现象，不能完整地捍卫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最终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二、8月中央全会并没有解决克服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消极影响等原则性问题

众所周知，8月中央全会本应成为坚决反对金日成个人崇拜和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全会，但此次会议最终并未达到目的。

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兄弟国家期间，我们完全有可能了解这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情况。我们的代表团多次与受访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通报了使所有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为之激动的问题，即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

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苏联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向我们党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同志式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如下问题：关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等。苏联领导人指出，需要对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提出警告，不应将党的历史与金日成个人的历史画等号。最后，他们还谈了关于脱离实际的党的宣传的危害性的问题。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上述意见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每当发现兄弟党内存在不足和缺陷时，其他兄弟党都会从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批评以便对其纠正错误有所帮助。苏联领导人所提出的这些有价值的同志式的意见是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说的，并非针对金日成本人。很显然，对于了解苏联方面这些希望的金日成、朴正爱 and 南日而言，本来应当顺理成章地将所有情况向中央全会作出汇报，以便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清除我们党和国家内部所存在的那些严重不足。然而，金日成等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向党中央隐瞒苏共的上述期望。这里我们将以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同志的实际活动为例。作为例子，我们将举出这样一个事实。

在苏联当H.C.赫鲁晓夫和H.A.布尔加宁同志结束了对外访问回国之后，其与英国领导人所签署的协议性报告都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作了传达。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苏共同志的愿望向我们的党组织作出通报呢？

这表明，苏联领导人都是极力向广大党员通报与党和国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最重大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了解谈判过程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和英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领导人的活动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意见为基础，而前者的意愿也能得到党员群众所给予的应有评价。与此类似的工作作风只是列宁原则在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党的工作中向与此类似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看齐？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归结为一点，即或者我们的领导人公开忽视党的利益，或者他们害怕把苏联同志所提出的具有价值的意见让广大党员群众都知道。

另外，我们还应当明确一个问题，即苏共的愿望是针对我们党中央提出的。然而我们有些人却认为，劳动党中央就是指金日成、朴正爱 and 南日等，或者后者已将自己看作了整个党的化身。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每个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不能不同意这样一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苏联领导人所表达的愿望都是针对我们中央的。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犯有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是在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对我们提出了意见之后，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兄弟国家之后召开的。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们的同志曾向苏共中央承诺将把苏共的同志式意见向党中央汇报并认真考虑其中所提问题。可是，正如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人欺骗了苏共中央：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切实措施来纠正所犯错误，而且对那些敢于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实施了镇压。

难道我们可以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吗？针对那些以苏共所提出的意见为指导敢于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各类型拥护者提出批评的同志，对于这种健康的党内批评方式，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实施了镇压，所有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人都被指责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的延安派”和“密谋者”。

以这种方式伪造的所谓“延安派”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员。但此举的结果却是更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和团结。

众所周知，一些同志在私下里已对金日成同志提出了批评，而后者也允诺接受其同志式的批评意见。但时隔不久，金日成便在上述同志的背后下了手——制造了所谓关于他们派别活动的臆造的“案件”，这些提意见的同志被称作“延安派”。而在中央全会上也以公开的党内政治斗争替代了对党内各种错误问题的讨论。

可是，即使在这种党内民主基本规范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一些同志仍采取了真正的勇敢举动——公开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阿谀奉承者提出了批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自身命运所受到的威胁，这些同志勇敢地公开批评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这些同志的举动绝不应当认为是试图取得内阁首相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虽然也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人说这些同志的举动存在这样的企图。

这些公开对金日成提出批评的同志很清楚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由于这一举动自己将被吓怕了的只知道机械地服从的全会多数开除出党。因为还在全会开幕前夕，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便已公开扬言：批评党的“领导人”的人将被开除党籍。由此一来，难道还可以继续说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是在关心自身的利益吗？事实上，他们批评个人崇拜只是考虑到党的利益，只是想恢复历史的真实。

金日成及其少数拥护者们所采取的这些镇压措施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记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闻的可耻的一笔。类似这样的镇压是否可以看作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关系而采取的预防性举措呢？

应当直接承认的是，类似这样的举措既不会促进党的团结，也不会有利于加强朝鲜劳动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国际关系。它们只会削弱与其他兄弟党派之间的联系并背离马列主义的真理。

金日成及其拥护者以自己史无前例的镇压活动忽视了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意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谣言，仿佛是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一封信，其中希望不要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我们应当认真地读一下这封信。究竟苏共中央在哪说过，不应当反对个人崇拜的话？事实正相反，在这封信中苏共明确地肯定了与个人崇拜作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所有兄弟党派都已取得巨大的成绩。放出此类谣言的是南日，而对他的这一可耻活动提出支持的有金昌满等人。

难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应被认为是胆小鬼和骗子手的把戏吗？金日成及其拥护者断言，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组建了自己的“派别”，即所谓“延安派”。很显然，类似这样的判断都是荒诞不经的，根本不值得去驳斥。

人们只是对他们的政治近视感到惊奇，即他们竟然将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与深受6万万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员们热爱着的革命圣地延安联系起来了。这里，让我们对其在指责诚实的共产党员从事派别活动时所使用的那些理由作一下分析。金日成同志的拥护者们断定，那些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还在全会开幕之前便早已背着中央讨论过关于党的政策的问题。他们所作的这样一些类似的判断根本经不起推敲。大家都晓得，如今遭到镇压的同志还在全会召开前便已在私下与金日成的会谈中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性意见，然后才在中央全会上发了言。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那些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都被剥夺了话语权。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由于这方面原因无法参加讨论会。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哪里可以看到“密谋”反对党和政府的痕迹？而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怎么还可以断言在我们党内还遵守着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呢？

至于其他一些他们惯用的理论是：对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批评必然导致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密谋”。难道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以消除领导同志活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就是“犯罪”吗？

我们的党章为党内民主提供了保障，即允许任何一位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只要他的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没有一个共产党或工人党会承认自己党内有这样一条规定，即个别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可以置身于党的批评之外。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个别共产党员对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便是“犯了罪”。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在哪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即要求构成一个党派的共产党员可以拜倒在个别领导者的权力面前？如今甚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内部都不允许开展同志式的批评，而在中央常务委员会里——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即使在封建时代，个别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讨好社会舆论和防止个别官僚做出极端的反人民举动，也会在自己的宫廷中成立一个国务院，其成员则有权指出国王的错误行为。

由此试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开展针对个别领导人的批评活动？

那些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实施调查跟踪的领导人，极力希望借助于权力压服所有共产党员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但显而易见的是，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还没有能够使全党和整个政府都屈从于他们。

我们可以假设，某人公开地反对金日成和个别国家领导人，我们是否可以判定，此人的这一举动就是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呢？真正意义上的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意味着将改变现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可如果按照我们劳动党内一些人的逻辑和他们的观点来看，那么是否应将一系列兄弟党派中领导人的变化也视作推翻党和政府的举动呢？如果认为，金日成在有生之年都应当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那么他与国王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可究竟是谁任命他终身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的呢？如果有人建议解除金日成同志的职务以纠正他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及其负面影响，纠正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确保党和国家的真正的集体领导，按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反党和犯罪的企图。而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上述类似要求，他们只是建议解除几个阿谀奉承者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因为后者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犯罪和反党活动可言呢？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说，不应当在私下里从事有关政治话题的交谈。难道这不是一个荒谬的要求吗？难道有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不在私人圈子内就政治话题进行交流？这样的活动家是没有的。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竟然会在自己的队伍中禁止人们私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事实上这样的政治也是不存在的。难道金日成本人不在私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饭桌旁私下与他就政治问题进行过交谈。难道类似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被认定是从事派别活动？每个感到自己对党肩负着责任的共产党员都不可能同意类似这样的对派别活动的定义。要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除了金日成同志及其几个拥护者，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在吃饭或者举行某些庆祝活动，因为任何此类“聚会”都可能被找到“密谋”的蛛丝马

迹。难道暗地里对领导干部实施跟踪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吗？还在8月中央全会开幕前夕，李弼奎便在私下里向金日成同志谈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当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副部长金英柱（金日成的兄弟）得知此事后，便要求李弼奎同志所在部门的基层党组织主席对该同志实施毫不放松的监视，并在稍后建议将其开除党籍，虽然李弼奎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而只有中央全会根据相关章程才有权开除其党籍。那么，类似这样的随意开除党员党籍的要求是否可以认为是公正的呢？人们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便已知道，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将在全会上就个人崇拜问题发言。可是还未等到时候，该同志便被迅速地派往莫斯科学习。

让我们列举另一个事实。

还在全会开幕前，金日成同志召见了曾向自己提出过批评性意见的副首相、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朴义琬同志。金日成对后者恐吓性地地说，自己手中似乎掌握了会损害其名誉的经济方面的材料。难道金日成同志这样做是在依照党的原则办事吗？如果他手中真的掌握着有损于朴义琬同志声誉的材料，未必需要如此处心积虑，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作为实施恐吓的手段。这可真真是朝鲜劳动党的悲剧。

而当全世界都在普遍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之时，为何在朝鲜却出现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虽然，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金昌满曾在公开场合说，很希望随处见到共产党员毫不担心地讲任何事情。可是在由于最微不足道的批评就可能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又有谁敢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形下又如何能够巩固党的团结呢？

有谣传说，已经有500多名厅、局和部级领导干部因被指责属于“延安派”而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在全国上下都在高喊要根除“延安派”的情况下，还有谁敢当面说实话。可是，我敢说在我们党内远远不止500人是真心反对个人崇拜的。终归有一天，所有共产党员将摆脱个人崇拜的束缚，到那时我们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都会起来坚定地反对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我们整个党（超过100万党员）都被指责为“派别集团”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前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进步思想与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反映。而其斗争的结果又被人地利用，从而形成了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所谓“延安派”。而这必然会削弱我们党的队伍的组织团结和思想统一。

我们为何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封住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共产党员的嘴巴、耳朵和眼睛呢？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是不怜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个性自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奋斗的。这也是人民参与革命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党内有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国王，歪曲真理并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而让其他人都跪倒在他的权力面前，那么我敢说，一定有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会不顾及自己生命地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那时，这样的斗争将不会仅仅局限在劳动党内部，它将作为思想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扩展到国际范围。

金日成的拥护者反对共产党员私下里与苏联和中国同志会面。他们还放出谣言，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同志给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难道朝鲜共产党员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在私下里会面可以被判定为从事反党活动吗？难道个别共产党员向兄弟党的领导人写封信可以被认定是犯罪吗？

我们还不知道有类似这样的事实，即国外共产党员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便被指责犯了反党和反国家罪。

金日成同志必须想到，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是非常了解我们中央的不足和错误的，他们忧心如焚，却害怕把这些都说出来，因为这样做必然受到镇压。

为了压制敢于提意见的同志而人为地蓄意制造出来的虚假案件，如所谓“延安派”案件等，其

结果导致所有当年曾在朝鲜舍生忘死斗争过的共产党组织被定性为各种名称的派别集团，其中包括：“火曜派”(对日战争初期在上海活动的朝鲜共产党组织)、马列派(在南朝鲜活动的共产主义组织)、北方派、共产主义派、咸南派，等等。

从苏联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宗派集团，从中国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延安派”。

总之，只有曾由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构成了我们党的基础。

我们是否能够同意类似上述的判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的结论是：所有与金日成有关的革命者都应给自己打上派别主义者的标签。我认为，这一问题应当按照原则性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有必要将诚实的共产党员与真正的宗派主义者区分开来，以便根据党的原则对他们的革命功绩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朝鲜这种无法保证党内民主、共产党员的权利遭到践踏和个别党员可以为所欲为等条件下，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意见和愿望虽然也在那些阿谀奉承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后者表面性地接受了这些愿望，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些愿望付诸实现。

众所周知，在有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及其拥护者声称，在劳动党内部并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

可是，在8月中央全会上他们又承认说，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禁要发问：难道这不是在欺骗党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而在全会上又那样说。如此这般，还让人如何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

在8月中央全会上为了压制多数共产党员的不满情绪，他们被迫在中央决议中写下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公开在全党面前所说的一些话。下面在自己所写的信中，我不妨重复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所写的一段文字，以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党的欺骗。

“正如我们党中央3月中央全会(指全党听取了关于苏共二十大报告的那一次中央全会)所承认的，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队伍中有了一定的小范围的普及。这主要反映在我们党的思想工作方面，即过分地吹捧一个人。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始终坚守的党的最高领导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被写入我们党中央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的那一段文字。

根据上述决议得出的结论，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据普遍意义，因而个人崇拜的后果也就不存在。这样，在表面上承认存在个人崇拜之后，实际上却拒绝清除其后果。

我们上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事实，已完全可以证明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兄弟党，而其对党活动的影响也是尤其深刻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不顾威胁和恐吓而敢于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是反党的，旨在“推翻”党和政府以及组建反党集团呢？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在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性决议和兄弟党所采取的清除个人崇拜这一举措的推动下进行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个人崇拜对我们党队伍的恶劣影响。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用自己的粗暴的专横践踏了列宁的党内生活基本原则——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我们是否能容忍类似专横做法在我们党内存在呢？

下面我们将尝试展示个人崇拜对我党活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三、关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

阿谀奉承者断言，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我们党并未受到其影响。

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我下面将举几个实例，以证明个人崇拜对党章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背。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违反党章规定、不经党代会的批准便让某人进入中央，而随后该同志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的情形，虽然他并不曾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里我仅举一个实例。其实这个例子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

所有朝鲜人都知道崔庸健是民主党中央主席。但他继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不久又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朝鲜目前仍处于分裂状态和我们党正在推行所有爱国力量统一战线政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将该同志选为中央委员。而所有这些非法的决定都是根据手中掌握了一切权力的金日成同志的建议和在他的坚持下被通过的。所有共产党员在递交的报告中均指出，类似这样的决定违反了党章的相关规定。上述决定的通过并非由于我们的中央委员们无知，而是因为我们党已完全被金日成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政治局委员、副首相内阁相和各道内阁相都是根据金日成的意愿任命的和免职的。因而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终日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断定说我们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的影响吗？

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完整地列举违反国家宪法相关规定的事实的。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列举一个事实。

目前绝大多数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可是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只能由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担任。对于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而言，经中央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大会只是某种“民主的装饰品”。据他们声称，中央委员依照党章积极参与党的工作并监督党的组织机关的活动或人民代表——最高人民大会代表根据宪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等等。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派胡言。

在第三次党代会期间，代表们的发言稿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后者可以不经作者允许擅自对文章进行删改。当年曾为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朴昌玉曾打算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但当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之后，便取消了他会议上的发言权。这样干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公正的做法呢？

如果准备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其发言稿都是别人代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央委员和代表只能说“需要”的话，那这样的发言还有什么创造积极性可言。甚至有人的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可该稿件都要事先经过中央工作人员的仔细审查和修改。经常会听到有同志这样的半开玩笑式地抱怨自己总是在扮演代表的角色。

在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任何违背领导同志观点的发言都被认为是派别活动和“反国家”罪。这里哪还有普通共产党员的创造积极性可言？难道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还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过去在党的机关领导会议上只有领导者一人说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只是听，然后表示支持。

苏共二十大以后当开始强调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原则时，金日成同志曾说：“集体领导没办法搞，因为总是没有人发言。”而实际情况是又有谁敢对金日成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反对性的建议呢？每个人都清楚，在经过这样的批评性发言之后，自己将很难保住目前所担任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同志自然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高那么一筹，只有自己有主见并日益自高自大起来。

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同志开始断言，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便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是，在无法确保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即使形式性地开上几千次会也是无法表明党是真正处于集体领导之下的。

朝鲜的个人崇拜还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破坏，其结果是数千人遭到了非法逮捕和囚禁。目前在朝鲜监狱中关押的各类犯人超过3万人。其中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一个师的编

制。还有8000人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被控犯有各种罪行，而依照该法相关规定很多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除了上述被逮捕的人外，还有约1万人被控犯有其他罪行。如果将北朝鲜的人口总量(900万人)与被指控的人数相比，我们便可得出：朝鲜每300人中便有一个人犯了罪。难道这个事实还不具有代表性吗？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以便我们来进一步看清所谓的这些“反革命”都是些什么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全会开幕前夕，一些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人共计2000人被解除了监禁。这些人中包括有这样的犯人，即由于用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做了包书皮而被判5年监禁。还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一个诚实的同志出于良好的动机用铅笔对没有画好的金日成肖像作了修改便被判剥夺人身自由5年。难道这一案件不让人感到气愤吗？

上述案件无论如何都不应属于常规刑事案件的追究范围之列。我列举的上述所有事实都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并在与一位负责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向司法省副相作了汇报(关于这个问题，金科奉同志向司法省副相金京根(Ким Тды Ген)作了报告)。金日成曾发布了一个指令，根据该指令，如果有两位证人便足以给某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不关注案件的性质和证人供词的可信度。可是，如果从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立场来看，难道可以说金日成所发布的上述指令是正确的吗？

在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难道还可以再相信金日成、金昌满、朴金喆、韩相斗和李一卿等人所说的关于朝鲜劳动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影响的话吗？

这里，我不能再举一个令人感到愤慨的违法乱纪的事实。

1954—1955年粮食采购期间，当局使用威胁强制手段剥夺农民的粮食。一个被剥夺了最后一粒粮食的农民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便来到乡人民委员会。那里挂着一幅金日成的肖像。这位农民用手指着肖像大声喊道：“您不了解人民的状况，只知道折磨人。”但正是因此，该农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被判处剥夺人身自由7年。在经过此事之后，我们如何可以说自己遵守了社会主义法制呢？现在所有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了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相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朴一禹同志为何遭到了镇压。他的所有“犯罪”活动都归结为一点，即他敢于在关于实物税和党对反革命的政策等问题上反对金日成。他说，在对待反革命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经过调查分析便不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可是正是因此，他便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参加了反党集团。但有关部门通过对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仔细的核查，却无法证明其犯有反党罪行。于是便有人伪造了关于他侵占国家财物的案件，如今该同志便因此受到追究。相关部门还根据所谓该同志企图攫取内阁首相职务的传闻，针对他准备提出新的司法案件审理程序。他的家属也遭到镇压，被迫从平壤迁往一个煤矿区。战前和战争期间，朴一禹同志曾担任金日成的得力助手。1950年当我军撤退期间，我被迫与金日成和朴一禹等同志一起后撤。在途中休息时，我们曾一起午餐和交谈。当时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可如今当朴一禹同志向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时，却被立刻逮捕，并投入原归他领导的机关所设的监狱。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朝鲜当局是如何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又作如何解释呢？

依照我们当代历史书籍中所写，只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的活动构成了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朝鲜还未出现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以前便已产生了抗日武装。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农民发动的三一运动浪潮——在潭州(Танчон)、汶州(Менчон)、安澜(Елын)、万源(Хвонвон)、涂州(Тукчон)等爆发的起义——尚未结束之时，工人的罢工运动(分布在元山、兴南、汉城、平壤等地)又蓬勃兴起，并成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成长壮大的标志。

众所周知，上述这些运动均与金日成的名字无关。至于武装斗争，则是在“正义军”和“独立军”运动之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这些武装斗争都是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开始的，而武装反日斗争的主体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朝鲜游击运动领导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金日成的名字以后之所以比较有名气，原因在于他所领导的部队与朝鲜联系密切。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把这一斗争运动仅仅与金日成一人的名字相提并论，就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从而也就歪曲了事物的历史本来面目。

大家都很清楚，截至1940年，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当从革命者的原则性立场出发对整个运动以及整个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在指出这场运动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还应强调其不足和缺陷。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其中之一便是截至1940年朝鲜游击队的作战行动上便停止了。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导致无法继续从事这场斗争的客观因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占领了中国东北，从广大战线上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准备发动针对苏联的更大战争。为了“巩固”后方，日本帝国主义者便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从而对朝鲜游击队的存在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否认。

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当时的游击队领导人是否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利用了一切可能以加强和开展游击运动呢。我个人认为，其并未充分利用这方面的可能性。

要探究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就需要了解为何截至1940年游击队的作战行动都停止了，以及游击队的组织本身和该运动的领导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东北地区不同，那里没有高山和森林地带，因而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条件理应更为困难，可即使这样，中国同志仍是坚持了下来，并与日本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当时为何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这样的，即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运动没有建立与群众运动的紧密联系，其游击队运动没有在人民中扎下深刻的根基。而与此相反，中国的游击队运动由于与人民联系密切，因而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于是，当中国东北地区的爱国力量仍继续展开地下斗争之时，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

不过，当时仍有很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地下斗争直到解放。

从1942年起，我便根据党的指示在中国东北工作。其他在朝鲜参加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朝鲜存在有地下党组织。

我们绝不应歪曲历史。为此，我们便有必要简要地研究一下在保青浦(Почонбо)地区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以及祖国光复会的活动。因为这些事件和事实的经过都在朴金喆、韩相斗、李一卿、何安权(Ха Ан Чен)和李天源(Ли Чен Вон)等的描述中被蓄意篡改了。

在保青浦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实际是游击队发动的攻击警察分局的战斗，结果是3名警察被打死。从事实来看，这不过是游击队与警察部队所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接触战。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撤退时又打死了10名日本士兵。可是，正是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却被上述历史伪造者们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在朝鲜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虽然我们不应否认朝鲜游击队发动的这场奇袭战的所有政治意义，但却不敢苟同上述伪造者们对这场战斗所作出的评价，因为我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的。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一点，即有人是想刻意吹嘘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功绩并企图人为地创造金日成的个人历史。

这里，我们还可以用平壤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中的资料来作为例证。

根据这里的资料，似乎所有朝鲜东北和中国东北地区都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作战区域。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关于“祖国光复会”再说几句。以往说法的问题在于，该协会似乎在朝鲜革命中发挥了全面的领导作用，而这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该协会的纲领通常被称作金日成的纲领性原则。可历史事实表明，协会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关于人民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以及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为基础编制的。这样，又怎么可以说这些文件的缔造者是金日成同志呢？

由此可以断定，有关这方面的历史都是被篡改了的。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企图把历史描绘成这样，即似乎“祖国光复会”在朝鲜各地都拥有自己的地方组织。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谁不知道，参加该协会的革命者人数很少呢？而按照那些金日成的拥护者所说，那么该协会所团结的革命者咋会有上万人之多。可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数字明显是被夸大了。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真正按照该协会的指示在农村和郡城开展活动的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人。

在朝鲜真实的革命运动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能够将上万名革命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组织。另外我们还应考虑到，在当时地下斗争条件下，革命组织的任务并非仅仅是扩大自己的成员人数，而且还包括提高组织的战斗力。

每一个希望阐述关于“祖国光复会”问题的历史学家，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从这样一些问题入手，例如该协会存在的时间、人数，开展了哪些活动及其持续的时间，等等。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历史学家才可能对该协会的活动给予应有的评价。在提起这些与朝鲜人民民主解放斗争史有关的问题时，我们认为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游击运动理应成为朝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然而，如果我们把金日成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的全部，那就有失水准了。在谈到关于朝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所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这些朝鲜军队不仅与日本人英勇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反对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在这些朝鲜人中最后共有5个师参加了朝鲜战争，更别说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在朝鲜和中国各重要岗位上坚持斗争的同志。

关于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军人的英雄事迹，这是所有朝鲜人民都很清楚的。有这样一些证明材料：上述5个师中的几乎所有指挥员都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国家最高勋章，更不用说那些集团军指挥员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国家奖励。然而，在战后这些当年功绩显赫的军人中只有少量人留在了人民军中。即使有人留下来，也只是担任一些并非重要的职务。

对于篡改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歪曲众多在朝鲜本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的历史的做法，我们怎么能承认其正确性呢？要知道，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巩固党的组织的统一，而且只能起到涣散和削弱党组织的作用。为了蓄意突出金日成个人，他的阿谀奉承者们建立了所谓长白山开山战役展示图，根据该图所示：金日成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在北朝鲜地区积极开展活动。而在参加“祖国光复会”的人中，竟包括了那些根本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的同志。

一场发生在开山附近的只具有地方意义的小规模战斗，却被说成是具有全朝鲜意义的重大事件。由此导致一些同志瞬间便被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原因只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关于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板上。

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关于国家领导人有意篡改历史的事。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表示无比的憎恶。

在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我曾专门去看了一下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在参观期间我问博物馆馆长：“是谁编制了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图，而金日成同志本人是否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东西？”馆长答，该图是由中央编制的，至于金日成同志，前不久还亲自参观了博物馆，并对馆中的展品和资料表示满意。当我听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气愤。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该显示图被从博物馆的墙上拆除了。

如此不知羞耻地伪造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其中原因自然要问这样一些人：如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朴金喆、中央组织部部长韩相斗、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卿、中央社科部部长何安权和李天源等同志，因为正是他们有计划地歪曲了我们的历史。

我建议，由一些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组建一个权威性的委员会，以便从科学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恢复我党真实的解放斗争的历史。

由于受到个人崇拜的控制，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均被取消，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进而导致我们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问题上都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下面我将举几个实例。

近两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而关于以前所犯错误，这里暂且不提。让我们以粮食采购问题为例。由于缺乏应有的科学统计和对各地情况的调查研究，导致我们编制了官僚主义式的粮食采购计划，并犯了严重错误。强制性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结果是300名农民自杀。而这一结果在我国农民中又引起了何等巨大的反响啊！

这难道不是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吗？而在这场错误的运动中，当局曾预计要采购300万吨粮食。

在这场历时两个月的事件之后，金日成同志曾自夸式地向一位外国同志宣布，我们已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了。

可任何一个对政治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化肥、劳动力严重匮乏和播种面积缩减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收获相当于战前最高收获量的300万吨粮食的。再加上这一年朝鲜北部省份和咸镜南部均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农民几乎颗粒无收。

在忽视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同时，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当局发动了强制性的粮食采购运动。情况不久便清楚了，农民坚决抵制这一采购运动。他们使用了各种抗拒方式：自杀，散发号召抵制采购运动的传单，等等。尽管这样，强制粮食采购运动仍在继续，结果共收购粮食2万吨。这场粮食采购运动的结局是：导致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粮种都被剥夺了；农民所饲养的家畜也由于缺乏饲料而大量死亡。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这场令人发指的运动中有“功”，那些金日成的阿谀奉承者们仍继续进行这场反人民的强制采购运动。

而当政府已了解到此事的性质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又开始被迫从国家储备中向农民发放救济粮。那么，究竟应如何对类似这样的事件进行评价呢？应当承认，这些举措直接破坏了我们制度的根本基础——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

其结果是：许多农民家庭已濒临饥饿的边缘。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农民提供了帮助。每个志愿军战士将自己每天节约下来的口粮集中起来去帮助朝鲜农民。关于中国志愿军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举动，朝鲜人民永远也不会遗忘。

我们知道，正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志愿军总部向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每个部队的指挥员在朝鲜农民饥寒交迫之际要承担所驻防地区的救济工作。可是，即使在如此悲惨的时刻，我们党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歪曲了我们的正确路线。”

因此那些在地方执行了这一错误指示的工作人员就必须承担本应由党来承担的责任。在停战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曾对开城地区农民的生活困难情况有所了解。我对这一地区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调查。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和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结算了饮食和实物税之后，农民手中所剩余的商品粮仅占所收获粮食的0.5%。

根据这些数据性资料，我作了一个大致的推算，结果表明：在粮食采购过程中，朝鲜农民只能交纳15万吨粮食(而不是国家计划预计的300万吨粮食)。

关于农民的困难情况，我亲自向金日成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即如果要在开城地区

推行粮食采购运动，那么只能采取强制方式才可能保证这一运动的实施。另外我补充道，在新解放地区强制实施粮食采购运动将极大削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我的意见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因而在开城地区未推行粮食采购运动。粮食采购是否可以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即使如此，金日成同志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这一政策本身是正确的”。尽管在这方面已存在有十分明显的事实，可金日成同志从未就这一问题作过自我批评。他依然忽视党和国家的利益，以便证明身为共产党员的自己总是比所有人都站得高、看得远，因而不应受到党内的批评。

前不久，我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省副相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年中农民究竟有多少天需要无偿地服役？”他答，农民每年平均需服役50—60天。而今年他们将需服役40多天。如果根据这一数据来推算，那么就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每星期需要服役一次。这都是战争刚刚结束后朝鲜农民的服役情况。至于现在一些朝鲜领导干部所说，如今的农民都是自愿去服这些徭役的。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这里，我还想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国家的税务政策。在没有经过周密准备和对国内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条件下，国家便实施了旨在消灭私有贸易和工业企业的税务政策。难道在国内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下，人民和国家的日子会比从前好起来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国家仍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全面深入地对所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实施。由于这样的决策并不符合国内的实际状况，因此在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内阁被迫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在公开与上述类似的事实时，我绝对不是想将我们所推行的政策定性为左倾主义。这里我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即我们政府所通过的一切决策都应当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在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再将政府的决定付诸实践。上述事实表明，这些决策都是经金日成个人提出并由少数几个领导人同意便通过和实施的。而这些决策本来是应当经中央政治局和内阁会议讨论后才可获得通过的。

不过，由于整天处于为自己的命运而提心吊胆的环境中，谁又敢在此类会议上以自己的意见来对抗金日成呢？

所有这一切悲剧性的结果都与党内的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和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密切相关。在这种恐惧和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呢？

个人崇拜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之后，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无偿给予朝鲜人民1亿卢布援助的决议。于是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朝鲜领导人在没有与专家进行应有的商议的情形下便以在内阁所作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建设和重建一系列工厂和工场的决定。根据金日成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者的倡议，国家计划建设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多个大型企业。当然，上述工厂对朝鲜而言也是需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大家都知道，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计划。

所有人都清楚，目前在朝鲜工业部门欠发达。如果要建设汽车工业，就必须为该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否则超前性地建设此类工厂就只能是白白耗费劳动力。而在这种条件下建成的工厂则可能长期无法生产产品。因而在建设此类工厂时就首先要考虑此类产品的成本，如果其产品成本根本不适合我们的经济需要，那么这种建设是否还应当进行呢？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关部门计划在朝鲜兴建肉联厂和罐头厂，等等。然而，几乎每个人都知，在朝鲜畜牧业不发达的条件下便投建上述工厂也只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结果，在平壤修建的肉联厂根本无法保证生产所需的原料，一个月的生产都无法维持，因为整个朝鲜也没有如此数量的肉。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市场上每公斤肉价格为400—500元，而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00—1000元。由此可以推算出该肉联厂所生产的香肠肉制品的价格应达到多少钱1公斤。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国家领导者欠思考的、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居民的生活状况

和国家的客观实际而做出的决策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

上述事实也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崇拜的恶果，在个人崇拜的控制下党内民主缺失，进而促使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怎么还能否认个人崇拜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存在呢？

所有人都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连续三年的由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残酷战争摧毁了国家的大部分工业，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创。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关心得不够。这里，已不必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公务人员在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所经受的巨大困难。但我们知道，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返回祖国之后，正如苏共中央向我们党所提出的愿望那样，我们国家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努力。

在住宅问题上我们也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这方面我们已说得够多了。如相当多的居民仍住板棚、仓库和地窖等根本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企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如下：平均每个3人家庭只拥有住房面积7.5平方米，换言之每人平均2.5平方米。至于居民的物质供应状况，我不得不指出，目前朝鲜每人平均只拥有5.4米布，每年2.1双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急需我们去解决的。因为在目前国家处于分裂的状况下，这些问题均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此，苏共中央就这方面问题而提出的意见和愿望都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尽快地落实和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绝不是想贬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重工业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重视重工业，但在解决这一问题之时，我们还必须理性地看待其实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重工业建设领域，从而破坏了各工业部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金日成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将有计划地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可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家在轻、重工业部门的资金和工人等的数量投入情况，便会清楚地发现其比例分配上的严重失调。

按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应参考以下情况：朝鲜经济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须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建立了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联系。这使得我们自己的经济计划有可能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看来，我们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所坚持的所谓“独立的”立场是否正确就很值得商榷。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从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出发来加以解决。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重视兄弟共产党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苏共中央曾通过金日成、朴正爱 and 南日等同志及时向我们党提出了同志式的批评性意见。这些意见和愿望均涉及关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关于克服我们党内对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崇拜，关于清除阿谀奉承和一心追求名利者以及关于我们党的历史和党的宣传等一系列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论证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了。只有迅速地清除在我们党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上述不足，才有利于巩固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加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只是形式性地接受了苏共的这些意见，而实际上却对之抱忽视态度。

据我所知，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对我们党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可这些有价值的愿望却被人以党的机密为借口完全隐藏了起来，并未落实到实际。或者关于此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整个党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当战争刚刚爆发之时，我根据金日成同志的指示去了北京，并与毛泽东同志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其间，毛泽东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愿望。

我认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有责任把这一事实向中央作汇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我们人民军已将敌人驱逐到了洛东江一线。一切似乎都表明，我们胜利的日子

只有几天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同志就朝鲜人民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我向他通报了我军前线的整个作战形势之后，他说了如下一些话：首先，他强调，朝鲜人民所要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对此我们时刻都要牢记。关于朝鲜军事行动的前景他谈了三种可能性。在谈话期间，他问我，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是否会同意让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撤退？

其一，朝鲜人民军有可能将侵略者从釜山港赶下海，并彻底解放整个朝鲜，但这种可能性非常有限。

其二，毛泽东同志说的意思是：敌人可能集中强大力量在釜山地区实施大反攻。

其三，他说，在人民军后方存在敌人实施直接登陆作战的威胁。这样，与继续在釜山港实施进攻的同时，敌人会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以便包围人民军部队。对此，他指出，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应建立在最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全党进行相应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谈了希望我们在以下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所有党的领导人、军官和士兵在思想上都要牢记可能实施战略性撤退的情况。

为此，毛泽东说，就需要朝鲜劳动党正确地、全面地向人民群众解释可能存在的危险。

在现有条件下，当人民军部队已实在无法在洛东江地区向前推进之时，就必须实施战略后撤，以便造成敌人在前进时力量的分散。要知道，打击握紧的拳头，总比打击张开的拳头要难，因为当出现后一种情况时，我们便可以对其每个指头实施打击。面对敌人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就像一个拳头时，那我们的打击就很难奏效。如果敌人张开了自己的拳头，即分散了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对每一部分敌人实施攻击也就要容易得多。毛泽东继续道，我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应当采取这种经过考验的战术。

事隔不久，毛泽东同志的话便应验了。的确，朝鲜的军事行动进程完全符合了他的预测，尤其是关于敌人在仁川采取的作战行动。对此，我国驻中国前大使李周渊也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内容，我均详细地向金日成同志作了汇报。可后者答道，我们不准实施战略后撤，因为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随后，金日成同志又警告我，不要将这一情况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现在我们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的价值所在。

我怀疑，关于这方面事实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是否都是知道的，更别说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们了。

在战争进行当中，尤其是在我军后撤期间，我们均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忽视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结果导致我们对战略性撤退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侵略者直接插入我军后方，并立即切断了人民军的交通线。我们的部队陷入敌军重围，丧失了战斗力，并开始溃散。敌人对我军实施了沉重的打击。除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外，当时朝鲜人民军部队中均没有建立党组织。

而这一点对陷入重围的人民军部队的溃散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了阻滞敌人的进攻，我们向前线派出了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甚至连军服都没有的师，有些部队甚至没有装备武器。所有这些师都在敌人发动的首轮进攻中便溃散了，大部分伤病员成了敌人的俘虏。这期间被敌人俘虏的人民军战士共计1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被我军俘虏的敌军数量。

导致我军蒙受如此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便是金日成同志不顾前线实际情况独断专行，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愿望。从金日成同志能够如此轻易地、不负责任地否决有威望的兄弟党及其著名活动家的意见和愿望来判断，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为何敢于公开地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性意见了。

如果能将所有上述问题与那些列宁组织原则的捍卫者和扩大党内民主的拥护者们的原则性立场一起来加以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也正是因此，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对朝鲜劳动党，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都具有一定的

政治意义。我们是否能够允许这种状况——共产党的自身活动与实际背离和拒绝清除党的活动中的严重错误等等继续在我们党内存在呢？当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那些违反列宁的党的生活原则的人，无论是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必定受到谴责。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始终坚持列宁的党的生活规范、扩大党内民主、坚定不移地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清除国家内部的官僚主义的同时，纠正和清除自身的所有错误和不足。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予以支持。

为了确保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我坚决反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我坚信，对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共产党员们将赢得我们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同情。鉴此，我提请中央研究我的如下建议：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上述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我请求中央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我的书面声明。

我提出这一建议的依据是我党党章第2节(第2、第3、第5诸条)第3款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我本人，我已准备以一个党员的全部责任感，随时接受同志们对我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当然，如果我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33 295

№2059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8日

按照金日成事先的邀请拜访了他，并在他的别墅住了几天，这座别墅在平壤市外250公里。

10月8日拜访了金日成，当时南日也在场，我口头向他阐述了葛罗米柯10月5日指示来电的全部内容。

金日成作了如下答复：报纸上刊登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通报的时候，他(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这份通报的材料是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准备的。他同米高扬和彭德怀之间没有关于公布这些决议完整文本的特别协议，对于他们关于在报刊上公布这些决议的意见，他(金日成)当时对他们的答复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将考虑这些建议。

常务委员会认为不应公布这份决议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承认，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做得过于匆忙，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不公布这个章节将会避免广大群众和北朝鲜的其他政党，特别是避免南朝鲜过度渲染这个决议。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将发送各级党组织进行广泛的讨论，这已经足够了。此外，中央委员会在工作实践中还没有在报刊公布组织问题决议完整文本的情况，而通常只是简短地通报信息。今后我们将公布党的所有重要决议，然而应当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

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劳动党开展正确的组织工作的转折点，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他当时不在平壤，报纸上没有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那个章节，而这个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党员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

我提出看法说，这个失误可以弥补，可以在报纸上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金日成回答说，现在就不必要了，何况所有党员将了解这个决议的完整文本。他说，各级党组织马上将对9月中央全会决议展开广泛的讨论，除了这个决议以外，还将向各级党组织分发金日成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然而，常务委员会认为，应该删除他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建议。在金日成看来，删除这些内容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将给党员们留下一一种印象，即兄弟共产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重新审查就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压力。第二，是因为不愿过分渲染中苏共产党代表对朝鲜的这次非正式访问。因此，决议的完整文本可能会被敌人利用而给我们的利益造成损失。

现在，各道党委正在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总结报告。参加道委全体会议的同志严厉谴责了党派集团的活动并要求给予他们严厉的处分。我们也知道一些党员的看法，这些党员不同意9月中央

全会关于减轻对这些党派集体分子处分的决定。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可以正确组织工作，来执行9月中央全会决议。金日成答复说，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将贯彻9月中央全会决议并组织相应的解释工作。

我问道，那些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是否知道9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个决议直接涉及了这些人。金日成回答说，中央委员会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居住地。关于这一点金日成提出建议说，中国同志可以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告诉他们。

我也提出建议说，现在必须巩固劳动党，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党员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将极大地促进对党员的教育工作。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朝鲜劳动党才存在10年时间，其成员组成有当地的朝鲜人，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同志，也有南方人。因此我们对党员干部的了解不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问题。在提拔干部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推荐，根据侧面材料。最近发生的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在我的坚持下，崔昌益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尽管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都反对这一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在过去从事的党派活动。然而，我认为，崔昌益将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近发生的这次事件之前我对徐辉的看法不错，但他受到了崔昌益的强烈影响。我们党内还有许多人不同意中央在个别问题上的决定，比如，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朴勋一，他利用兄弟党代表出席9月中央全会的机会发言攻击个别领导同志。事情发展的地步是，朴勋一和其他一些人要求免除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郑一龙等同志的领导职务。

参加这次会谈的南日说，在他看来，朴勋一是在没收富农的财产和土地时逃出苏联的。金日成对此回答说，目前知道的只是他在东北参加游击斗争时期之后的情况。

金日成接着说，劳动党以前对出逃到中国的尹公钦的了解不够。现在才知道，他过去曾向日本人签名保证不再从事革命活动。

在党内有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光彩的过去，还企图败坏领导人的名声。党同他们作了斗争并且仍在同他们斗争，但是，他们对党的影响众

所周知。现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都采取措施来巩固劳动党。前不久关于9月中央全会决议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必须在思想上巩固我们党并加强教育工作的问題。

金日成表示，他对朝鲜劳动党地方权力机构即将进行的选举能够圆满完成充满信心，但是让人担心的只是平壤市的一些居民。金日成说，最近党和政府建议减低商品价格，并且在今后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而且，今年的粮食收成不错。

金日成请求我转告米高扬同志，由于上述情况，没有必要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8-33

№20552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 与金日成谈话内容(1956年10月1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伊万诺夫同志报告，他于今年10月8日就公开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

从伊万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金日成实际上拒绝了关于全文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建议。金日成请伊万诺夫转告米高扬同志关于没有必要全文公开9月中央全会决议，因为该决议将散发各党组织进行讨论。另外朝鲜劳动党领导还认为将全会决议广泛地公之于众也有些不妥当。金日成援引说，似乎自己与米高扬和彭德怀等同志事先并未专门约定要全文公开全会决议。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同志建议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了解他于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

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同志的意见很对，并表示同意。

兹附上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稿。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年10月15日

第25-C-2236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给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已发出。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17日

附件：

平壤

苏联大使

678-685您可以简要地向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介绍一下您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情况，期间不要提此举是受莫斯科的委托。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96-297

№23030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1956年10月16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我们)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的两次会谈记录。

1.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情况。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一：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会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落实情况

(1956年10月5日)

1956年10月5日，苏联记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的与会者除苏联记者外，还有现驻北京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负责人和苏联无线电广播工作组成员。会谈伊始，陆定一同志首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宣称在本次会谈期间他主要想讲一个问题，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陆定一同志还事先声明道，他认为此次会谈内容属于内部通报，不宜在报刊上公开。

以下便是陆定一同志的谈话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工作领域的新方针的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所提出的十点意见紧密相关的。

当前，思想工作问题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在这方面并不具备充足的经验，经常会遇到与思想和执行新方针有关的许多问题。如果同志们感兴趣的话，我将谈几个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请大家就今天会谈的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谈最初，陆定一同志简要谈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问题，并强调后者的力量如今已不是很强大。虽然关于此陆定一同志也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比重仍占到约20%，在贸易方面——控制着大部分的商品流转零售网络。

陆定一同志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我们并不可怕。原因在于，如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已是相当的强大，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1000万，而在1949年时——只有约700万人。在当今的中国已没有一个党派能跟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相提并论。以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组织，但如今它已被摧毁。中国现存的一些民主党派规模都不大。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军队归中国共产党领导，而非资产阶级各党派。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和我们所执行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中国拥有一个好邻居——苏联，后者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原因，虽然不应在报纸上公开，但我们应当指出来，以便大家能够正确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形势。

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对我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也并不可怕。因此，我们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们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我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思想工作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我们不害怕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我们极力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以便将之转变为人民中国中的劳动者。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再教育)是否具有可能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有可能。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

1. 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财产，使之成为贫穷阶级；
2. 逐步地改造资产阶级，循序渐进地对之进行改造。

我们认为，可以实行逐步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式。

实行这些教育方式对于正确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其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来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如今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其中多数——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们均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拥有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国家的无产者虽然也拥有一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仍无法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中国农民有知识的很少。地主们虽然也拥有一些知识，但他们的知识往往都不契合实际的需要。

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拥有广泛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

当然，拥有大量知识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能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目前拥有约600万知识分子，其中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约有100万人。正如你们所看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党派人士，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中国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和封建国家，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怀有爱国情结，并参与过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当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发表的反对殖民压迫的言论会得到先进的革命工人的支持——这都不是偶然的。

针对知识分子，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侧重以下两个方面：

- 1.思想改造；
- 2.建立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统战部。起初，一些同志曾对该部抱有轻视态度，认为该部的领导干部与资本家交往过密。而如今，他们已深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建立统战部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党很早便开始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认为，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了资产阶级，理解了知识分子；我们详细地了解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阶层主要活动家的人生经历，细致地研究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因此，我们知道，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所有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之发生关系便无法生存。因而他们与国民党联系紧密，甚至许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知道，几乎所有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年都坚持过反动观点，许多人还反对过共产党，与劳动者的革命斗争作对过。

在了解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他们当年反对共产党的言行的同时，我们党采取了吸引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著名代表参与国家领导机关的工作的方针。众所周知，李济深便在我们的政府里工作。他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党的八大上作了祝辞。他的这一发言受到了大会热烈的欢迎。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晓得，李济深曾在1927年4月参加了广州镇压共产党和革命工人的活动，是当时白色恐怖的积极参与者。1927年，他组织杀害了多名共产党人，而如今他也参加了政府的管理。这并不是偶然的。1927年以后，他脱离了蒋介石，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前，他曾是一名著名的反革命者，而后来他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立场，并开始支持共产党。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他彻底转到了我们一边。有这样的民主人士在人民政府里工作，当知道李济深也是政府组成中的一员之时，其他民主人士便不会害怕我们——共产党，这将有助于我们开展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中很少有资本家逃到国外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国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开展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非常重视针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北京刚一解放，我们便开始大规模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引以为依据来解释所有社会财富都由劳动人民创造而来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从1953年起，我们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而此前，我们已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和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公安部长罗瑞卿已在党的八大上作过详细的介绍。应当说，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有70万人，230万人被监押或处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和强大威力。

我们在反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动中所赢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胜利打消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特别强大的迷

信。以前，他们都相信美帝国主义拥有特别强大的实力，可如今这一信念被打破了。这(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的美国已不复存在。此前，所有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对我们是否能够在与美国的冲突中获胜持怀疑态度，可如今残酷的事实表明，他们失算了。我们在朝鲜赢得反对美国侵略斗争的胜利。

甚至在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开展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将自己的主要打击目标瞄准那些以前曾与反革命分子保持了极其密切关系的人，而不是那些拥有不良思想者。我们首先对那些赞成与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保持联系的人施压。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使这部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在西安一所大学工作的教授——张东荪。他年龄有60多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该教授经常发表虚伪的民主言论。可实际上他是个美国间谍。他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广泛尊重，自以为自己是位专业的哲学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观点，宣扬直觉主义哲学。他一度参加了最高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可是，随后他被群众揭发：向美国情报机关传递国家重大机密。因此，他被清除出国家领导机关，但与此同时，该教授并没有被逮捕。他依然是大学里的教授，但由于他的犯罪活动被揭露，大学生们都不愿意上他的课。起先，他还有四个学生，随后剩了两个，直到最后他连一个学生都没有了。但国家仍继续给他发薪水。我们不会枪毙他的，也不会让他蹲监狱。因为他现在已没有危险了，他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类似例子我们还可以举许多。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我们还在学者和各高校中以向苏联学习为口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于是，人们开始了大量研究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各高校工作的活动；开始输入大量(苏联)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为了扩大高等教育和培养国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骨干，我们在高校改组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一些高校得到加强，新建了一批高校，还有一些被停办。

只有在前几次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等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才可能得以成功开展。否则，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便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因为知识分子可能会起来反抗。

随后，我们又开展了反对胡风和胡适的运动，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虽然是一场在思想领域开展的运动。但我们的主攻目标是一些政治反动分子。胡适——反动学者、思想家，现居住在美国。他宣扬实用主义。其学说曾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被揭露的还有另一位反动思想鼓吹家——胡风。此人为资产阶级学者，自1932年起以左派言论为掩护开始活动。这一时期，他精心掩盖自己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近期，我们找到了他在国民党开始向共产党疯狂进攻时期所写的近10篇反动文章。如今可以确定的是，胡风的这些文章帮助了这些反动活动，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辩护。

胡风在留居日本时曾钻入日本共产党队伍。随后经确认，由于他的挑拨离间活动，因而遭到了日本共产党一位积极活动家的枪击。

稍后，从日本返回中国之后，胡风整天围着鲁迅转，极力试图利用鲁迅的名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风一直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最近，他仍在从事破坏活动，并在中国许多地区拥有自己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反对党的政策，而胡风本人也一贯以文学辩论为掩护进行着(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斗争)。他撰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近30万字)，以反对党的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认为，不应当公开胡风的这篇文章，但我们决定采用另一种做法。对此，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要改造资产阶级，后者就会反抗我们。而上述胡风的文章便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表现之一。我们决定把他的这篇文章发行7万册。我们认为，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已是我们赢得这场运动胜利的一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就无法批判他的观点，我们也就可能取信于人，有人就会说我们是宗派主义者，说我们害怕向其他人提供

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只会有助于在大量的知识分子中间加强胡风的立场。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决定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揭露其反动观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胡风组织的参与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对该组织中胡风的最亲密助手之一施加了影响。经过我们做工作，此人开始揭露胡风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们公开了所有这些揭露胡风犯罪活动的资料。此后，我们逮捕了胡风及其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活动的走卒。我们还在报刊上公开了三个资料选集，彻底揭露了胡风的嘴脸。

揭露公开的反革命的运动取得了重大的结果。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大量的社会组织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范围包括500万在中央和省的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经过运动之后，在这500万人中共发现了约1%的公开反革命分子或异己分子。

我前面已经指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详细谈了关于肃清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运动)的问题。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广大群众参与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我们的居民中拥有不同的阶层，其中也包括一些落后的群众。有时，这些落后群众却知道许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了解一些先进阶层不了解的、关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在对待这些落后群众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曾犯过一些错误——采取过压制的手段。初看起来，这些落后阶层与反革命分子很相似：他们对社会不满，有时说起话来跟反革命分子一个样。但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是落后，而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虽然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个人经历)，但在统一战线的帮助下，我们还是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并参加了反对反革命和争取再教育的斗争运动。这场斗争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虽然其间可能难免犯有个别错误和不足。可以说，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并与此相应大致明确了今后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工作的途径。以上简要叙述便是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方针呢？这一方针又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在开展了各种前期的运动之后，(国内)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的苗头。许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自认为自己已是非常强大了，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他们而言，这种自高自大的情绪才是极其有害和极其危险的。

列宁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及其在共青团三大的讲话等中都谈到关于不容许自高自大，关于必须正确地利用知识分子，关于唯物主义者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论断。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领导。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就会手中拿一根大棒来敲打非马克思主义者们。这种领导方法无疑是错误的。还有另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者 and 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把所有唯物主义者 and 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团结起来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针对其他唯心主义爱国者则通过以改造为目的的批评方式，而不是镇压。上述方式也适用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工作。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反对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时，动辄便手里拿一根大棒，那就不太好。更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应使所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以及那些是爱国者但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得到好处。我们在这些人中开展批评工作，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种批评方式在我们党内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众所周知，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许多著作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其中很多作品均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性质。我们当然不应当镇压郭沫若，而应当尽量亲近他，并与之一道以团结所有知识分子先进力量的精神去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适用于其他大艺术家们。我们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叫齐白石，还有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叫梅兰芳。他们现在都拥护社会主义，但仍不是社会主义者。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郭沫若在科学院和文学创作领域承担着大量的工作。梅兰芳——中国的无价之宝，著名的艺术家。我们绝不对这些人实施镇压的手段。

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在为团结社会所有力量而斗争的同时，我们党和人民还应当从事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的斗争。而宗派主义的表现则是对这些人实施镇压和打击。

我们的许多同志由于胜利而变得骄傲起来，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并开始攻击其他人。在我们许多部门都出现了此类宗派主义的苗头。例如，一些人曾说，中医是封建主义的医学。但他们遗忘了一点，即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正是借助于这种医术治好了许多疾病。我们中国的多数医生都是在利用中医在看病，而对西医知之甚少，或很少使用西医。的确，我们的许多(懂中医的)医生还不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自己的医疗做出正确的解释，但了解现代西医的医生们的责任便是帮助搞清楚这一点。在中国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中国医生不学自己的中医，而苏联一些学者和医生却开始努力研究中医并广泛运用于实践。这时，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才开始广泛地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再比如，针灸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已停止使用针灸治病并称之为一种落后的、卑俗的、低级的治疗方法。可实际上，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最好的治病方式之一，虽然它并不能医治所有疾病。

我再举一个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例子。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人有时会用大棒来对付其他不同意其观点的人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电影艺术仍相当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该艺术的领导者都是些持宗派主义观点的人。比如，他们认为银幕上只能出现工、农、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由于我们赢得了许多胜利和成就，宗派主义者便常常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而也就变得更加自高自大了。但宗派主义者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

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承诺给予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自由，但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如果要更精确地翻译这一方针，大概应当是这样：“让百花一齐开放。”但在这一百朵花中也会有一些不好的花。比如胡风便是朵坏花，因此我们不允许他完全开放。该方针的另一句更精确的翻译是：“让所有学者争论。”意思就是说：“让百位学者争论。”胡适是一个坏的反动学者，我们当然也不允许他参与这场争论。

胡风和胡适不是普通的坏人，而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那么我们将给予他们言论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何要给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呢？因为那些发表不正确观点的人们并不是反革命，因而他们的言论对我们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 1.可以教育群众；
- 2.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往往带有表面性。因为我们的人对这样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杜威、罗素等——的学问了解得不够。而为了顺利地展开这场斗争，就必须研究唯心主义。否则，便无法真正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我们已摧毁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学习唯心主义并不会对我们的制度和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当然，在学习黑格尔和康德的过程中，我们中间也可能会出现此类观点的拥护者。但也要看到，每出现一个此类唯心主义观点的拥护者，我们中间就会同时涌现出十个已成功武装起来并能够与唯心主义者战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些非常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能够更成功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只局限于高喊一些一般性的口号。

我们并不害怕唯心主义哲学，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拥有强大的共产党，我们拥有稳固的、得到了群众拥护的人民政权，我们拥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还拥有苏联的强有力支持。

学习唯心主义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而且会带来好处。我们将能够更加成功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运用它去从事反对异己思想的斗争。这对我们从事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也具有重大意义。在自己数十年的历史上，我们党被迫与陈独秀、王明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执行着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主观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即使至今，此类人仍有不少。所有这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不怕公开的唯心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与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的唯心主义者展开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有益于我们的建设事业。当年在为摧毁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革命时期，我们曾采用过一些方法。如今当我们已步入另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应采用其他一些工作方式。如今的中国已赢得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封建主义已被消灭，并正实施一系列改造资本主义的重大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工作也应相应采用其他一些方式。

为了文学和艺术的顺利发展，我们应当实现多样化的目标。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舞台上可以而且应当排演出最丰富的、各种不同题目的戏剧。（而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已大大落后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应在思想和科学方面具备更多的知识，而不能忽视马列主义——这一最先进理论的学习；与此同时还应当更多、更深入地研究思想问题。当前，相对一些旧知识分子而言，我们的许多共产党员书读得比较少，还无法在所有思想斗争和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复杂问题中达到能够很清晰地辨明方向的程度。这正是为何我们认为应当让那些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们有机会继续在高校中执教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人所教的学生——大学生中有人能站出来驳斥他们。如今，我们在一系列自己的高校中都安排了唯心主义哲学课，因为这对我们并没有威胁。例如，还在童年时我便学过儒学。可是，我最后并没有信仰这一思想，而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而与此同时，我也能够以所学到的大量知识来驳斥儒家学说。在旧社会，我们没有机会去大学深入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如今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了我们的最高理论。在涉及关于唯心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问题时，应当说，我们并不想让唯心主义者立刻便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言论或拥有许多的大学生。

在我们的北京大学有一位罗素的学生。我们决定允许他上课，并在课堂上讲述罗素的观点。在其课堂听课的人员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兼教师，以便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判断：即如何能够更好地组织以罗素观点为内容的课的讲授工作以及其中哪些内容是大学生们需要了解的，而哪些是需要我们予以驳斥和批判的。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即应当把罗素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中文，以便能够编制关于如何授课的教学大纲。只有在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开始讲课，而且听课的学生只能是那些已在社会学领域具备了相当修养的高年级大学生。我们还建议在高校中更深入地研究法国18世纪的资料，并开设德国古典哲学课程。

把一些大学者、学派和流派的最新著作译成中文，编写基本的教学大纲，然后在大学的一些高年级讲授。

如果允许唯心主义的所有拥护者都立刻开始在许多大学的大量学生中讲授自己的课程，就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与之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现在对其理论还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让学生们逐渐地、小范围地学习这些课程，那就没有危害。那时，我们可以派遣骨干人员，在批驳唯心主义的同时还可从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派中挑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

由于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们的科学将发展得更快，并可以避免产生教条主义。当然，在此类工作中仍存在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逐渐地、谨慎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我还想就党的教育和党内培养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们认为在组织党的教育工作之时应当更全面地展示两条路线：一方面是积极而正确的路线，而另一方面是消极而错误的路线，就是说展示正、反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只宣传一条正确的路线，那么同志们就可能只简单地接受一些现象，而不能理解整个斗争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以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导致我们滑向教条主义立场——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和轻而易举。这就是为何我们认为在

党的教育中应加入学习正确和错误路线的内容的原因。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出版一些能够准确描述关于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书籍。当然，关于错误路线的书籍不应在公开的书店里销售，而应放到图书馆、办公室和教研室等地方。例如，我们决定出版蒋介石文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们会逐渐地遗忘与国民党的活动相关的一些事。但所出版的蒋介石的书我们不会拿去销售，而只会放到图书馆和教研室里。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方便人们记住国民党所做的那些事，从而与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及其表现作斗争。

我们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持观望的立场。我们会逐渐地为其敞开大门，而不是一下子。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我们不会枪毙，也很少将其关进监狱。因为把他们都枪毙或关进监狱，对我们并没有好处。让他们都活着，但要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要让群众了解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们仍会给资产阶级学者们发工资，以便他们能够活下去。我们不担心他们的思想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因为我们不害怕他们，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应当将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区分开来，应当在政治斗争中把反革命分子与那些带有错误政治观点的人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在思想工作中更广泛地采用辩论的方法。我们前不久曾就遗传学问题开展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众所周知，遗传学有两个流派——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我们的这两个不同流派的学者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米丘林派的学者将摩尔根派的学者称作是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而摩尔根派的学者也相应地宣称，米丘林派的学者们如此说法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些人认为，应当(在高校中)开设米丘林遗传学或摩尔根遗传学课程。于是，今年夏天，40位中国遗传学家在青岛开了一个辩论会，与会者中既有米丘林派，也有摩尔根派。人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拥护一方并反对另一方。不过，最终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流派都具有自己积极的一面，因为遗传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总共才只有50年的历史，其中许多内容仍需要依据各种不同的结论加以澄清、分析和解释。辩论结束时，所有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既有米丘林派学者，也有摩尔根派学者；他们将携手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再过10—12年，中国遗传学将达到这一学科的先进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我们为各个流派的学者们都提供了自由发表见解和自由交流意见的机会，而辩论的最终，他们决定将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中国科学的顺利发展。

如今，一些中国学者希望发表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一些文学界想发行自己的杂志。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赞成还是否定。

近期，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发现了某些倾向，出现一些观点，对之我们并不能总是同意。我们认为让其他人来批评我们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胜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担心的是，这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人都高喊：“万岁！乌拉！”，而不再批评我们了。如果我们对报刊上所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倾向实施打击，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人批评我们了。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仔细地、逐个地研究；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会作出答复，而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即使不作答复，但也不会对之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予以回应，而不会随便给人扣帽子，不会给人贴标签。针对一些言论，我们可能答复得快一点，而另一些——晚一点。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千万不能压制批评。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二：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组织情况——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谈话

(1956年10月10日)

10月10日，(我)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其间，他谈了关于宣传部的组织工作、该部的结构及其主要工作方式等情况。

据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具体如下：

- 1.宣传处；
- 2.鼓动处；
- 3.干部处(负责管理各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各高校教师干部，等等)；
- 4.科学处；
- 5.高教处；
- 6.人民(民族)教育处；
- 7.文学和艺术处；
- 8.出版和杂志处；
- 9.报刊处；
- 10.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政策宣传和中国内部的族际生活问题)；
- 11.体育和卫生处。

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各省党委和其他基层党的机关所属宣传部是如何建构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宣称，各地方党委所属宣传机构的构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说，例如在上海的党委会中便有四个处——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职能范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据陆定一同志说，在上海市党委中，共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高校部、中学部、文学和艺术部。上述4个部的全部活动均由一个隶属于市党委领导层的委员会统筹负责。

在北京市委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中学部和高等院校委员会。问题在于，在各省和其他地方委员会中难道不能建立一个结构统一的宣传部体系和组织吗？据陆定一说，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机构的建立将取决于各省的具体条件，并由各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自己决断。在各区党委中也设有宣传鼓动部，据陆定一说，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有3—4人。陆定一同志说，各地方宣传鼓动部工作的特点是：我们的县级党委暂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执行上级党委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在区、县党委机关中工作人员不多，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群众工作。陆定一说，各基层党委主要是执行上级党委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其在工作组织方面都基本类似，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必需的。但现在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在此类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无法使各基层党的机关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实践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使各基层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能力(自主权)。

针对我提出的如下问题——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是以何种方式与基层机关的宣传部保持联系的；他们是否经常去基层组织，陆定一同志作了如下答复：党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下到地方上去，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要求，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每年要在地方党组织体验生活至少1—2个月，以研究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务。在不了解地方情况和不作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向其他人提出建议和发出指示的权力。

陆定一同志详细谈了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对此，他强调道，他们对思想工作的正确组织以及如何正确地协调宣传部和国家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拥有高教部、科学院，以及一些以联合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创造性组织。中央宣传部

不干涉国家机关和管理文化问题的各部委的日常事务，但掌握着拟定一些最重大思想问题的动议权，并时常开展对这样或那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推动各国家机关在思想领域的实践活动。

陆定一同志说，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实践，即我们经常会干预各部委的内部事务，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因而我们决定加以改变。

中央宣传部极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中央在思想战线上的助手。党中央领导着所有战线的工作。我们宣传部理应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总司令部；应当及时领会中央在思想工作战线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并将之落实到实际。思想问题的范围是很难确定的，在这条战线上的活动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要讲究工作的效率。其他机关的任务可以用数据指标来体现，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性质则往往无法用数字指标来衡量。

中央宣传部极力去发现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问题，然后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思想战线的工作与我们党在其他战线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而，我们总是极力以自己的全部活动来促进党的路线在其他战线的顺利实施。

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在思想战线发动了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但这项工作实施过程中必须兼顾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我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使自己的工作与党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过早地提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口号——不好，而过晚在思想战线上提出这一问题——也不好。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发动思想领域的进攻，以便与党在全线发起进攻期间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保持同步。

在去和前年，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反对胡风集团和胡适——此人也曾鼓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反对过共产党——的斗争之中。

在医学领域，我们广泛开展了反对一些共产党员和专家对中医及其治疗方法的错误观点的运动。这次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能否正确看待民族遗产的大问题。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在哲学领域我们组织了反对胡适反动学派的斗争。

在建筑领域我们开展了针对机械式地恢复古代风格建筑的批判。

在上述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我们均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其间，我们对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根据思想问题在不同领域活动的具体条件来制定相应的策略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详细研究了各领域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思想战线各领域应当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从事反对与反革命有关的胡风的斗争是一回事；而在建筑领域反对梁思成所坚持的错误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位资产阶级专家，但并非反革命。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批判其错误的思想观点。这里就需要采用谨慎的、灵活的策略。例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整理了一批建筑学专家们所撰写的文章——内容以尖锐批判梁思成的错误观点为主。当然，其间我们并没有直接点梁思成的名字。这些文章均被刊登在报纸上。我们就是让梁思成看看，并直接对他说，虽然报纸上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这些都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的。梁思成一度很长时间不同意在报纸上反对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在这些文章发表前，我们曾在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其间梁思成也参加了。在对他做了一番工作之后，他本人决定对文章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回应。梁思成所写的文章包含了一定的自我批评的内容，并被我们提前发表。随后，我们才刊登了那些事先已经过讨论的批判性文章。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打击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其所持观点和观念。我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持有错误观点的学者在遭到批判后首先是感到害怕，只有在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后，他才能在报刊上表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解释工作对梁思成帮助很大。在开展反对该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斗争的同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涉及他的公职，没有撤消他所担任的职务。不论是在遭到批判之前还是之后，梁思成一直都担当着大学

建筑系领导的职务。他所写的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其他一些专家所写的批判他以前所持错误观点的文章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为了顺利开展这场反对建筑领域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召集了几十位著名专家——这些人以前都曾是梁思成的学生。有了这些专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搞清楚该学者错误观点的原因，从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要求和参考建筑学的一些特点对这些错误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最终正确地解决在这一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每篇批判性文章都是由一些大学者撰写并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要知道，梁思成——作为一名建筑师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知名的地位，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经过在报纸上广泛讨论建筑学的一系列问题，梁思成在(今年7月)全国人大一次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是一次真诚的自我批评。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反对梁漱溟所持错误观点的斗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哲学家，思想反动，但他并不是反革命。针对此人，我们采取了另一个斗争方式。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尖锐批判梁漱溟在哲学上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一批判文章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无党派学者撰写的。当这批文章发表后，梁漱溟也在政协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他对文章中批判自己错误的那些指责在态度上表现得并不够真诚。

针对我提出的究竟是谁具体负责这些文章的编写和组织，而这一切是否事先与学者们讨论过等问题，陆定一答道：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作出决断。至于就一些哲学问题发表言论以及这一言论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科学院事先作准备，并由郭沫若直接负责。针对建筑学领域所出现的那些错误观点，所有工作都是由北京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经大学领导层亲自领导的。

在谈及关于制定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策略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强调，我们都是极力避免由自己来写这些文章，而是尽量把发言的机会留给那些学者们。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门学科，文笔方面也比我们好，并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应当广泛地利用他们的经验来为思想斗争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在起草关于思想问题的文章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当然，在工作过程中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干部们也要与各科学和社会组织以及组织负责人一起做一定的工作。只是在事先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全面地把自己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议，以最终确定斗争的方式、策略，并形成必须在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坚持的那些主要原则性条款和结论之后，中央宣传部才开始实施这一工作。这种斗争方法是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制定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极其关注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团体对我们所采取举措的反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对检验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及时纠正我们自身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政治任务的提出，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在思想领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当国内开始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之时，我们在思想战线的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整天手里拿一根大棒，只是采取打击的方式当然是不行的。而必须以团结的精神为指导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可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党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起先，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建议得到了加强、完善并形成了一个体系，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思想领域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我们极力以这样的方式来协助宣传部的工作，即不纠缠于日常繁琐的小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各思想工作领域的情况，为各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制定出不同的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大量的资料，以便很好地了解知识分子各个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我们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工作与落实国家的主要政治举措紧密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党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当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一些工作人员便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即如今在思想工作方面似乎已不用再做什么了。他们说，以前仍需要解释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并揭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而如今在合作化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似乎思想工作的任务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这种情

绪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思想工作要做，以便有助于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正确地教育已被联合到合作社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中间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即似乎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出来，那么宣传思想工作的事务便自然而然地告一段落了。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党组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这一方针得以正确地落实。他们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大力帮助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思想工作部门的党组织。

在开展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只能够解决1—2个大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集中自己的主要精力。当然，其间也会碰到其他一些宣传方面的日常小问题，但这些都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解决。

针对我提出的——谁在宣传部中负责挑选这些工作人员和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等问题，陆定一同志答道：这些宣传部的干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经验方面也有些欠缺。对此，陆定一同志强调，针对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仍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以便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主要的、头等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引导的同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应当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对之进行细致的研究。陆定一同志通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有300多人，其中没有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者其工作效率仍不太高。

为机关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其中，一些人断言，不应当给工作人员下达某种固定的任务，而只向其指明工作的目标，并建议其搜集和研究各种资料，研究思想战线各领域的情况；而另一些人认为，应当给工作人员提出非常具体的任务，如指出应当设立多少所学校，出版多少家报刊，等等。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没有对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及其内容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起初，我们曾采用过提出具体任务，明确固定任务的工作方式。可后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这样：使我们自己从一些繁琐的小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研究一个实际的问题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达到一定的思想水平。例如，在关于党的教育和关于党校的组建等问题上，我们认为，不应当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建设这些学校的数量上，而应当集中在如下方面：如何使这些学校研究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应当制定出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使其能够主动地去研究一些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关键在于——确保对这些学校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沉迷于此类学校的建设数量方面。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实际组织党的干部的理论培训和党校的理论学习等问题，陆定一同志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在中共中央所属的高级党校里学习。在该校内设有两类学制的课程：

1.一年学制：学员200—300人。在此类学制学习的都是各省、市和区党委书记，部长和其他国家机关领导干部。

2.二年学制：学员500人左右。这里主要为各党校、高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培养社会学教师以及宣传部骨干。

在为党的领导干部设定理论学习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精确地计算这些同志学习各门课程的时间，不能让干部们的学习负担过重。我们领导干部离任学习的实际期限一般为一年。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在我们党内从区党委书记及以上约有1万名现任领导干部。通过对这一范围内的干部们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约50%的此类干部可不必系统而深入地学习，因为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其他一些原因均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至于另一部分干部，则必须通过相应的学习课程。我们可以为他们制定一个多年的、轮流式的、在高级党校各年级的学习计划。在实际中我们也常采用这样的办法：向其提供几个月的假期，以便其就一些确定的问题从事学习。

在各省党委也有一些中等类型的党校，学制为6个月(半年)。此类党校在国内有10所，在这

里学习的都是各县党委和区党委的书记们。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如何组织干部和党员们学习中共八大决议——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前不久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两个重要规定。而根据该规定，我们需要组织学习会议决议的工作，具体做法如下：1.必须深入学习主要文件——党的八大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出的决议。其他文件将由干部和党员们自己阅读和学习。2.学习会议资料的期限和组织方式由各省委和市委自己决定。他们有权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各省党组织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把学习文件的期限定为3个月，有的6个月，还有的2个月。一些地方的党委认为有必要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以便能够更经常和精确地核查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这项工作的组织方面，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各地方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更大的独立性，以便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陆定一同志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思想工作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大家都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和民主，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内团结一切能够被用来反对反动派阴谋的有利因素。

陆定一同志说，苏联在思想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以成功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工作。他还说，苏联及其科学干部在各类国际科学组织和各种文化协会中设有大量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训练有素的干部比较少，也较少有机会在各国际科学和社会组织中发言。如果苏联学者们能够更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自己的大量代表机构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发起进攻，这将对我们非常有益，也是对我们开展国际范围内开展思想工作的巨大帮助。当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积极发动针对各反动流派的进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要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就首先必须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深入而精确地了解自然科学知识。为了成功在思想领域发起进攻，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和不断地研究敌人，必须回击敌人的阴谋诡计，捍卫正确的马列主义原则。其中，我们认为，自己首先必须去学习资产阶级哲学，以便能够成功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但为了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就应当用正确的知识来很好地武装自己。

会谈最后，陆定一同志说，中国同志对学习苏联的思想工作经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明年能去苏联一趟。陆定一同志还通报，毛泽东同志已告诉他们，他打算去苏联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40, л.259-275

№0409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 (1956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18日会议第47/59号记录

绝密

第59项 关于去波兰的苏共代表团。

1.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出现的严重局势，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组成。

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见附件)。 [4]

附件：

绝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法国大使口头通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罗马大使口头通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口头通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认为有责任将以下情况通报给你们：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就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

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苏共中央

ЦХСД, ф.3, оп.14, д.67, л.25, 104

№040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 (1956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0日会议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1项 关于苏共代表团华沙之行的情况(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朱可夫)。

1.一个结论——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留下来，那得忍耐些时日。

大演习。 [5]

准备文件。 [6]

成立一个委员会。

2.波诺马连科大使同志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

3.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也会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去中国通报情况。

4.发出信息。

接收信息并通知。

思考所提出的问题。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49

№097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0日会议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2项 匈牙利问题 [7]。

考虑是否派米高扬去。

由米高扬和朱可夫研究将士兵召回部队的问题。 [8]

由米高扬起草对兄弟党的通报。 [9]

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 [10]

ЦХСД , ф.3 , оп.12 , д.1005 , л.49-50

№0409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1日会议第47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

一、关于全会报道的第1页送去发表。

二、采取什么方针：

1.影响并注视事件的发展；

2.要么我们加以干涉。

召集兄弟党领导人。

时间——10月22日决定。

认为召开一次由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

鉴于波兰事件和波兰的局势，我们希望进行协商。

我们希望开会。

其他党的代表也有同感。

10月23日即星期二开会。

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受到打击。

星期二、星期三，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将参加。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谢罗夫、朱可夫、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心(大家赞同)。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哥穆尔卡同志关于克格勃顾问问题的信。

采纳修正意见：如果他们愿意接触，想要顾问，让他们先说，我们再讨论。

关于将领和军官，我们请你方准备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同意召回。

不要波兰的煤越早越好。

对形势的评价和我们的方针。

为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会见兄弟党代表材料(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说还是不写这种材料好)。

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说要对形势作出评价。

莫洛托夫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不写材料。

准备一封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为自己暂拟一份提纲——对形势的评价(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准备)。

布尔加宁同志：期待中央全会作出决议。

暂时不公布任何消息(摘自讲话)。

关于顾问的信件。

经米高扬、朱可夫、谢罗夫、科涅夫、谢皮洛夫同志审阅。

对波兰的高频通信问题要自己提出来。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1-3

№040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致中、捷、保、德各党中央电文(1956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1日会议第47/1号记录

绝密

第1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谢罗夫、伏罗希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1.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的意见，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电报全文(电文附后)。

2.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意见的情况，委托米高扬同志、朱可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谢罗夫同志和科涅夫同志审阅苏共中央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在波兰的顾问问题的信函草稿，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

附件一：

绝密

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诺沃提尼同志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尤哥夫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乌布利希同志：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

我们建议在星期二，至少在星期三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晤。其他兄弟党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请告你们的意见。

苏共中央

附件二：

绝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想交换意见。

我们想请你们，如果这样可以，请贵方代表于星期二、星期三来此，为此我们将派图104专机一架。

苏共中央

ЦХСД, ф.3, оп.14, д.67, л.1, 4-5

№252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 (1956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第868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2日

今天我根据中央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

对波兰事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我通过密电将谈话全文发给了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H.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49, д.9, л.410, л.200

№040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第1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布尔加宁)

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会晤。

10月24日11时同中国人会晤。

还同其他人单独会晤。

然后大家聚会。

全体委员会见中国人。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萨布罗夫一起会见匈牙利人。

大使通报了上层的真实情况。物色大使人选。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了同哥穆尔卡谈话的情况。

不发表哥穆尔卡的讲话。

准备进行接触。

致各级党组织的信没有写。

哥穆尔卡的报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和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分别送出。

由米高扬、波斯佩洛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同志负责起草信。期限3天。信传达到区委员会(文件不留在区委员会，而由州委员会的代表传达后带回)。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5-5об

№25203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1956年10月23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3日

第869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3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我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波兰局势进行了讨论。对于该问题的详细谈话记录那天已通过密电发给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胡乔木、师哲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H.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097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出席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波洛夫。

关于布达佩斯和全匈牙利的形势。

(朱可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三同志)

朱可夫同志通报情况：

布达佩斯10万人游行。

广播电台被烧。

在德布勒森市，州委大楼和内务机关大楼被占领。 [11]

赫鲁晓夫同志主张出兵布达佩斯。

布尔加宁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出兵的建议是正确的。

米高扬同志：没有纳吉就控制不了运动，控制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对出兵表示担心。用匈牙利人自己的手整顿好秩序。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出兵会自找麻烦。先尝试政治措施，然后再出兵。

莫洛托夫同志：匈牙利已经让纳吉搞得动荡不安。同意出兵。

卡冈诺维奇同志：正在推翻政府。不能和波兰相比。同意出兵。

别尔乌辛同志：必须出兵。

朱可夫同志：与波兰有差别。必须出兵。派一名中央主席团委员去。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实行宵禁。

苏斯洛夫同志：形势与波兰不同。必须出兵。

萨布罗夫：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出兵。

谢皮洛夫：同意出兵。

基里琴科：同意出兵。

派马利宁同志和谢罗夫同志去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吸收纳吉参加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总理。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乘飞机去布达佩斯。

ЦХСД , ф.3 , оп.12 , д.1006 , л.4-4об

№0409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 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4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琴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刘少奇同志[12]。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问题交换意见(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和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

通报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

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

有时是强加于人。

有时候(对待决议)的方法和方式过于仓促。

批评的形式(第4点)。

立即发表。

应当预先修改。

关于日本的文章(在《争取持久和平》^[13]上)已经发表(没有给毛泽东同志看)，斯大林没有寄出。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日本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到现在情况仍未得到改善。在国际组织内工作方式的方向不正确。

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

关于援助.....^[14]

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的观点。

谈话将继续进行。

B.H.马林的亲笔记录，铅笔所写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52

№21477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1956年10月24日)

今年10月22日白天，莫斯科到北京的2次特别快车在开赴途中，在还没到达第一站亚历山德罗夫站的时候，在1号车厢5号包厢内发现了一具乘客尸体悬吊在绳带上，该乘客在莫斯科乘坐本次列车去北京。

按规定进行了初步调查，死者是中国公民陈国富(ЧэньГо-фу)，生于1927年，在莫斯科柳别尔齐炼油厂实习。

5号包厢的一位乘客朱应举(Чжу-Инь-Чжу)在被问询时说，在莫斯科一名中国驻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把陈国富送上了火车，并请求他和同包厢的其他乘客帮助同胞陈国富到达北京，并说陈国富是一名精神病人，因此在实习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他回国。

朱应举解释说，他和他的旅伴在火车离开莫斯科后去了餐车，并邀

请过陈国富同去，陈国富拒绝了，并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提到，他不想回中国。

陈国富一个人留在了包厢里，自杀了，用裤带上吊了，裤带固定在墙上的把手上。

在陈国富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中文写的便条，是寄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便条说，他由于在苏联犯了某种过失，才迫使他走向悲剧的结局。

在包厢的小餐桌上发现了一本用中文写的笔记，其中一部分提到，陈国富入党时隐瞒了一个事实，他妻子的父亲是一名土匪，因此被枪毙了。笔记的第二部分写得很潦草，还没翻译完。

中国大使馆已经通过苏联外交部知悉了陈国富的死讯。

总检察院交通分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苏联总检察长

P.鲁坚科(签名)

1956年10月24日

手写批注：

归档。根据这些资料，苏联外交部和总检察院已经采取了措施。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31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35-236

№20585-1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1956年10月26日)

1956年10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11—29日

第317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26日

拜访了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曹克强同志，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向他通报同金日成同志谈论的关于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非正式访问的问题。我对曹克强说，尽管朝鲜领导人向米高扬和彭德怀许诺公布朝鲜劳动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朝鲜同志只是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5天之后，即9月28日才简短地公布了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在这份通报中有两个重要章节。第一个重要章节涉及朝鲜劳动党的自我批评问题，其中指出，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过于仓促，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过于简单。第二个重要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全党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原则。

金日成解释说，对第一个章节要有意识地进行删改，因为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还没有发表，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让报纸知道这些仓促的决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自己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因此应该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而不是从公布不好的决议开始。关于第二个涉及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问题，金日成说，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公布的，当时他已经外出休假，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章节被删掉了。

对于我的看法，即关于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的疏忽是可以改正的，金日成回答说，这两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以及他在9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将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并要分发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而且报告中将删除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内容，按照他们的建议重新审议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用金日成的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把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这件事泄露出去，同时也不使广大党员认为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在兄弟党的压力下通过的，也不使他们认为兄弟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

我还把金日成说的以下的话通报给了曹克强，金日成说，好像我们

并没有向米高扬和彭德怀承诺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只是向他们承诺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金日成还说，在各道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论材料的会议上，许多党员干部怀疑减轻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处分是否合适。

曹克强很想知道，朴昌玉和崔昌益目前在什么地方。我回答他说，朴昌玉现在是一个锯木加工厂的副厂长，而崔昌益现在好像生病了。

曹克强说，他没有同朝鲜领导人特别地谈论这个问题，然而中国大使馆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情况，但是他不能确认这些事实情况的可信性。比如，在平壤市委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果的会议上，平壤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发言批评了破坏党内民主的现象，并支持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恢复党内民主。在这次发言之后，这名副部长就被开除出了劳动党。平壤市党委委员长李松云在这次会议上也做了错误的发言，他说，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到平壤是为了找出劳动党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们使他们相信，情况完全相反。曹克强又说，有消息传到中国大使馆说，金昌满针对反对派强硬地声明说，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我们都有内务省和军队。

我问曹克强，彭德怀曾请求把囚禁在狱中的朴一禹放出监狱并送往中国学习，对这个请求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措施？曹克强回答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中国大使馆什么也不知道。彭德怀同志将拜见金日成，并转告他说，如果朝鲜同志不需要他们，而相反，限制朴一禹和方虎山回朝鲜，那么中国同志同意他们到中国。对于方虎山目前在哪里的问题，曹克强回答说，方虎山和朴一禹一样，都是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同志，他对中国东北的革命活动有很大贡献，后来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并领导了一支部队。现在他只是一个矿厂的普通工人。

曹克强也通报说，跑往中国的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的家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口粮供应。金刚的夫人到文化宣传部部长那儿请求帮助，但是这名部长没有接见她，并把她送往总务处处长那儿，这名处长骂了她一顿，并拒绝给她口粮。

我对曹克强的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朝鲜大使

B.伊万诺夫

№0409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1956年10月2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6日会议

到会的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朱可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共中央的刘少奇..... [\[15\]](#)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交换意见：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刘少奇同志语)。

哥穆尔卡太过分了。

10月26日20时继续开会。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53

№097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28日 [\[16\]](#))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8日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佐林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正在复杂化。初步拟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卡达尔的意向：与抵抗中心进行谈判。

纠正索博列夫在联合国所说的话。 [\[17\]](#)

工人支持起义(因此希望重新考虑“反革命暴动”的叫法)。

朱可夫同志——通报信息。暂时放弃对一个抵抗据点的镇压。 [18]

已经下达命令：不准许进行游行示威。

朱可夫同志——一些地区的铁路被毁坏了。

在德布勒森，政权已经移交给我们的军队了。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信息。局势已经复杂化。苏斯洛夫同志应该飞回莫斯科。

执政内阁还没有公布。建议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4人赞成，6人反对)。 [19] 目前正在召开全体会议。 [20]

伏罗希洛夫同志——缺乏信息通报。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表现得很冷静，缺乏信息通报。

我们的处境很糟。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匈牙利同志也同意的方针。

米高扬同志不适合继续这项工作。已经拟定的那件事，应该进行(派出一组同志)。我们将不撤出军队——应该以坚决的方式进行镇压。纳吉是取消派分子。

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不好。局势正在恶化。

事情在许多方面正在向投降的方向发展。

纳吉马上就要反对我们了。我们的同志表现得缺乏信心。

对于我们让步到什么界限应该达成一致。

话题谈到了政府的组成，还谈到执政内阁。排除赫格居斯，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考虑我们了。关于与苏联的友谊问题，我们军队的援助问题——这是最起码的，米高扬同志安慰道。如果不同意，那么，就要讨论，将如何对待军队。

卡冈诺维奇同志——反革命活动活跃起来了。匈牙利共产党员们优柔寡断。对工人和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应该向卡达尔指明方向，也就是

制止(运动)。对于反革命中心行动要果断，我们不应该后退。

布尔加宁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行动不明确。卡达尔摇摆不定。重要的是：要求卡达尔更坚定一些。

应该这样做：与米高扬通电话并告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行动应该更坚决；否则，我们将不经过他们而采取行动。莫斯科的政治局将不得不亲自任命政府。

马林科夫同志——我们的同志们对目前的局势不能忍受。坚决实施镇压的方针。要求纳吉代表政府发表纲领。

朱可夫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的作用，现在对他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按另一种说法，当我们决定撤军时，局势就复杂化了。应表现政治灵活性，使中央采取更加灵活的行动。组织武装工人义勇队。准备支持我们的军队。对主要的抵抗中心进行镇压。

萨布罗夫同志——同意朱可夫同志的意见，在重大工厂占领自己的阵地。需要纲领。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要对许多事情负责。应该尊重事实。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个与我们一致的政府，或者是一个与我们不一致的政府，他们将请求撤出军队。到那时将怎么办？纳吉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他将放弃一切权力。那时，联盟将会垮台。 [21] 那里没有坚定的领导，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起义已经波及省里。军队可能会转向起义者一边。赫格居斯不再坚持。两种方案：政府行动起来，我们援助。这能够很快结束，或者是纳吉转而反对我们。

赫鲁晓夫同志——要求停火并撤出军队，然后是投降。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方案？

1.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好的方案)，到时我们..... [22]

2.控制这个政府，派政府代表前往各省。需要行动纲领。莫斯科政治局(起草)我们致居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书，否则，我们只有开枪。

3.是否应该要求中国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

人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4.坚决镇压暴动分子的武装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应该起草文件。

达成一致：各兄弟党应该向匈牙利人发出呼吁。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23]

(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同志——局势复杂化。10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介入。10月25日，还剩一个抵抗点，10月26日才知道这一点。在科尔文剧院区，以霍尔蒂军队的一名上校为首的匪帮。零星的射击(经常性的)。枪击军官。3000名伤员。350人被击毙(匈牙利人)。我方损失600人被击毙。 [24] 目前对于我们军队的态度不好(已经恶化)。原因是：1956年10月24日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 [25] 开枪射击。居民中有70人被击毙。挂出许多黑色旗子。

工人们离开了企业。

在各个企业(自发性地)出现了委员会(每个城市都在谈论着)。游行示威具有反苏联的倾向。

如何控制局势？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的路线：不反对吸收一些民主主义者。昨天形成了政府。

10月28日晨5时，卡达尔同志前来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组织要求重新考虑对起义者的评价问题——应评定为民族民主起义。他们希望以波兹南事件为例进行评价。

卡达尔通报说，已经与工会工作人员就取消民族民主运动的提法以及有关国家安全机构事宜达成一致。 [26]

在呼吁书中，纳吉塞入了撤出苏联军队这一论题。 [27] 关于停火问题(一直在坚持这一观点)。

目前我们的方针是：既然政府建议停火，指挥部制定将部队从布达佩斯撤出的命令。

纳吉和桑托提出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的问题。

选举不应该进行。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是否发表公开宣言支持该政府？ [28] 支持。没有其他出路。

布尔加宁同志——(..... [29])

伏罗希洛夫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紧要的不是撤军。美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比苏斯洛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还要积极。需要的是一组同志尽快前往。在达成协议、组织政府之后，就撤出军队。再派你们(指 A.И.米高扬和 M.A.苏斯洛夫)前往那里就徒劳无益了。(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表示反对)

布尔加宁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同意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看法。赞成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做法。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应该作出结论：在布达佩斯存在着这样的力量，他们希望摆脱纳吉和卡达尔政府。持有支持现政府的立场。否则，应该实行占领。这对我们来说很冒险。

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派军队问题：派出军队的做法是正确的。责难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不应该)——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把一切都推到他们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支持，就得占领这个国家。这将会使我们走得更远。还是支持政府。关于撤军问题宣言不进行改动。让他们提到友谊。关于加强党的问题。不再增派人员。

马林科夫同志——行动是正确的。指责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对于该政府应该支持。经政府同意保留军队。

马林科夫同志——那里卷入了这样一些同志，必须保证赦免他们。

莫洛托夫同志——派出军队，这是正确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和苏斯

洛夫同志最初的就对待政府态度的通报是镇静的。党对群众的影响很弱。关于该政府，应该支持。但是，他们的关于与苏联的友谊——谈论时提到撤军——应该谨慎行事。

朱可夫同志——支持该政府。关于从匈牙利撤军问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威信。对各兄弟党提出要求，让他们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朱可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将军队从街道撤到一定的地区。也可能代表指挥部发表声明。关于对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评价问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萨布罗夫同志——支持这个政府。应该在人民中提高政府的威信。不反对他们对于事件所作的评价。不反对撤军，但无须立即。

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支持这个政府。研究制定策略。同卡达尔和纳吉谈话：我们支持，宣言——显然，更多的你们(指卡达尔和纳吉)没有能力承受。我们停火。我们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约定条件，使抵抗中心停火。

莫洛托夫同志——第二，我们应该关心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

布尔加宁同志——国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垮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存在了。(..... [30])掌握了政权。

卡冈诺维奇同志——话题谈的不是让步，而是为人民进行的战争。接受宣言。从首都撤出军队。

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哪怕是建立一个小组，也可以保留军队。不能指望任何人。否则就会有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我表示支持宣言。政治上对我们是有益的。 [31]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埃及制造了麻烦。 [32] 不要陷入同一境地。不要抱幻想。人员我们保留。基本接受宣言。接受带有修改的(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安排好城市里的生活。来自各兄弟党的呼吁书。给南斯拉夫发出密码电报。 [33] 波斯佩洛夫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前着手准备报告。如果指挥部的传单..... [34]

赫格居斯、格罗、皮罗什，派他们前往保加利亚。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5, л.54-61об

№1605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1956年10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10月30日

今天，(我)与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有关会谈内容的完整纪要我已发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

对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的宣言，刘少奇说他本人表示欢迎，并特别提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许多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这些专家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他们对所在国的特殊国情不甚了解，一些专家就政治问题开出的药方往往引发了消极后果”。依据当时苏联专家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指出，经验表明，当地那些在各自工作中曾犯了某种错误或过失的干部，总会一股脑地把所有罪责推到苏联专家的身上。有鉴于此，中国已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所有专家。

在谈及苏联专家时，刘少奇指出，他们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表示，这些专家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协助各国培养起了自己的干部队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苏联专家(不包括技术专家)回国的問題。刘少奇特别指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小心谨慎，并与当事国共同协商解决，要避免像以前在南斯拉夫那样不加区分地召回所有专家。

刘少奇说，的确，一些国家会坚持提议撤走苏联专家，因为“他们在受援国待的日子已超出时限”。不过，有鉴于此，苏联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一贯立场。

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请刘少奇谈谈他对于从中国召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并提及此前曾与周恩来谈过这一问题。刘少奇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说中共中央需要对

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并进行充分研究。

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刘少奇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应被视为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人，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出经验教训，“就像马克思当时总结和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列宁概括和阐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样”。会谈时，使馆二等秘书O.B.罗满宁也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Г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9, л.202 203

№097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

第49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同志和谢罗夫同志的情报被列入其中。

朱可夫同志：

关于在维也纳地区 [\[35\]](#) 集中军用运输飞机事宜的情况通报。

纳吉在耍两面派(按照马利宁的意见)。

派科涅夫同志前往布达佩斯。

关于与中国同志的会谈情况。 [\[36\]](#)

赫鲁晓夫：

考虑到我们部队驻在国的意见，通过宣言，今天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这些问题是在华沙条约会议上讨论的)。

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是这个立场。

一份文件给匈牙利人，另一份给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对哥穆尔卡说，这是你们的问题(波兰人的)。

布尔加宁同志：

对于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国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准备我们给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准备宣言。

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就给匈牙利人民的呼吁书，以便立即开始关于撤军的谈判。

还存在着华沙条约。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我们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基础上；党之间的关系，则在另一种基础上。

伏罗希洛夫同志：

应该向前看。宣言的制定，不应该将我们置于困境。可以批评自己，但要做到公平合理。

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五项原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建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

两份文件：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和宣言。

在这份文件中不需要进行自我批评。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别。

谢皮洛夫同志：

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

谢皮洛夫同志：

基础是牢固的。消灭操纵者，不让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作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方面仔细考虑一系列措施。

宣言，这是第一步。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就不应该再发了。

关于武装力量，我们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我们准备撤军。

应该同民族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

朱可夫同志：

同意谢皮洛夫同志所表述的意见。重要的是，在匈牙利解决问题。

反苏的情绪在扩大。

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要求，就从匈牙利撤军。

在军事政策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朱可夫同志：

关于驻在德国和波兰的军队，问题更加严重。

在协商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简短的决定，今天公布重要的内容。

福尔采娃同志：

通过共同的宣言，而不是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

(宣言的呼声)并不高。

第二点，对于内部局势非常重要。

应该从其他方面看待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关于与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有关相互关系问题)。

召开中央全会(通报信息)。

萨布罗夫同志：

赞同宣言和撤军事宜。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事后对群众的创造精神缺乏领导。

领导是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没有奋起保卫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我们将落后于形势。

同意福尔采娃同志的意见。向各位部长、中央委员询问。

关于罗马尼亚，他们欠我们50亿卢布，依靠这笔钱那里的人民建立了公有制。 [37]

应该重新考虑相互关系。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同志：

表达的意见一致。第一阶段应该发表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

通报与米高扬同志交谈的情况。

卡达尔表现得很好。6个人中有5个人态度坚定。 [38]

关于撤军问题，主席团内部正在进行斗争。

国防部长将下达命令，用武装力量镇压戏院区的暴动分子。(看来，马利宁很紧张，离开了会议。)

(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我们军队里。 [39]

(谢皮洛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宣言的有关问题来谈。第2页的第2段，不应该减轻自我批评、所犯的错误。更多地运用“列宁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同志：

表示赞同，并说，我们遵循的是列宁主义原则。

第2页的第5段，所作的是声明，不是解释。

第3页，谈到经济权利平等，应该使其成为重要的一条。

说明，在大部分国家里没有军队。

说明，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领土上。

赫鲁晓夫同志：

这样做是经过他们政府的同意，并为了这些政府和人民的利益。

表明对匈牙利政府的态度。支持他们采取的措施。

关于党、匈牙利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召见纳吉和卡达尔。

卡冈诺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朱可夫同志：

应该谈一谈与每个国家签署的波茨坦协定和条约。

朱可夫同志：

对于人民应该表示同情。我们呼吁停止流血事件。

第2页的第2段：应该说，二十大批评了缺乏权利平等。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报告 [41]

局势如何：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

是否可以信任他？关于专家问题。

朱可夫同志： [42]

谈关于经济问题。二十大之后的改革被拖延了。

(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向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讨论关于专家的问题——准备召回专家。

应该让一些同志进行校订。 [43]

通过高频电话转告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

中国同志。

关于匈牙利局势。

(赫鲁晓夫同志，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政府，过渡性的政府。 [44]

发表宣言。说明我们的立场。明确对新政府的态度。

我们开始撤军的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纳吉——总理。

卡达尔——为国务部长。

蒂尔迪·佐尔坦——

科瓦奇·贝拉

洛松奇——共产党员，纳吉的支持者。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6-14

№25204 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1956年10月30日)

第1457/ДВ号

1956年11月23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远东司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 [\[45\]](#)

1956年10月30日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国不是经互会的成员国，因而有必要就设立机构、经济合作框架和周期性的年度计划达成协议。

二、有来自苏联的30个组织和10多万名苏联人在中国。应考虑取消部分机构，将其职能移交其他机构行使。

1.取消经济合作总局的驻华代表处。技术援助与成套设备供应的执

行工作交给商务代表处，在华专家的管理工作交给大使馆。

2.取消“苏联电影出口公司”与“苏联新闻社”的驻华代表处。

.....

7.召回负责亚洲各国工会工作的机构驻北京的代表处。

8.与中国政府就保留和方便苏联红十字医院活动达成协议。若达成协议，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部分医生转为苏联在华专家顾问。

9.讨论关于进一步保留苏联在华巡视员机构的问题。中国在苏联尚无自己的巡视员。

三、每年有关商业和经济问题的谈判均在莫斯科进行。考虑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此类谈判可在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进行。

四、苏联专家对华援助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和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来管理的。应考虑仔细研究这些协议，统一专家的工作条件，并争取出台一个单独的协议，要涉及6年前就已确立的以外汇结算苏联专家公差的补偿金问题。

五、在中国，苏联大使可以定期拜见中国领导人并举行会谈，他们有广阔的途径可以获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我们应该考虑，应极大地扩展中国大使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及外交政策措施的了解层面。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委员曾会见驻华的苏联大使，双方就各种问题举行会谈。我们也应组织驻苏的中国大使与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开展此类会谈。

六、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改进苏联与中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协作。

七、应采取措施扩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及科学家与中国重要人物的接触(非正式访问，共同组织休假、短途旅行、会议等)。

八、一般而言，中国赴苏联的代表团要由一名部长或副部长带队。我们应考虑派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或代表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

九、苏联的报刊只是以简短的形式刊登领导人的文件和报告，而一些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报告和决定(例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6年9月1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甚至都没有被提及。我们的报纸和杂志在编辑时应注意，不容许忽视中国领导人声明的重要文件。

十、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侨民聚居，也有一些是没有苏联国籍的人(来自帝俄时期)。我们应考虑将苏联侨民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可以委托大使和中国朋友研究这个问题，请他们就遣返和接纳这些人中的中国公民提出具体的建议。

十一、苏联在中国有7个领事馆，而同时中国在苏联只有两个总领事馆。我们应考虑关闭苏联驻沈阳市和伊宁市的领事馆。

十二、苏联在中国有7所学校，超过1300名学生和100名教师。我们应考虑削减在华学校的班次，取消8—10个左右，并严令禁止超过学龄的儿童到这里就读。

.....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д.37, п.414, л.8-10

№097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第49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成员：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З.萨布罗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46]

绝密

第1项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苏斯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萨布罗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朱可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

通过经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文本。

宣言文本于10月30日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转播，1956年10月31日在报刊上发表。

附件：

关于第49号记录第1项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

苏联对外关系的牢固基础，过去是和今后仍然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这个政策获得了最深刻和最连贯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使社会主义各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的友好大家庭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并不排除，而且正好相反，要求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之后，人民民主制度在欧亚一系列国家里，在这一基础上表现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制度生成和社会关系深刻的革命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困难，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任务和直接的错误，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以及一系列降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原则的意义的一系列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坚决地谴责了这些错误，并提出了任务，即苏联在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

苏联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在尊重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主权的这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创造条件。

正如最近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苏联有必要就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首先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方面自己的立场作出相应的声明。

苏联政府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起，共同讨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的措施，以便消除破坏经济关系中的国家主权、互利和平等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顾问人员。大家知道，在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初期，苏联根据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请求，向这些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专家人员——工程师、农艺师、科学工作者、军事顾问。在最近时期里，苏联政府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关于召回自己的顾问人员的

问题。

鉴于目前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已经在国民经济和军事建设的一切领域里，形成了本国专业干部队伍。苏联政府认为审理关于苏联顾问人员继续逗留在这些国家的适宜性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在军事领域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其参加国应该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包括接受“为加强其防御能力、使其国家人民的和平劳动免受破坏、确保其边界和领土不受侵犯和对抗一切可能的侵略行动所必须的协商一致的措施”的义务。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约和政府协议，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和国里。在波兰共和国里驻扎的苏联军队，是以四大国波茨坦条约和华沙条约为依据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没有苏联军队。

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共同讨论关于驻扎在上述国家的苏联军队的问题。同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那个共同原则，即某个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在另一个国家境内——华沙条约的参加国——部署军队，是根据其全体参加国相互间的协议和只有在那个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并按照它提出的请求布置军队或者指已经部署的这些军队。

苏联政府认为正值匈牙利事件发生之际必须作出声明。事件进程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匈牙利劳动者，提出关于必须消除经济建设领域的严重缺点、继续提高居民的物质福利水平、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不久，反动的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就加入了劳动者这个合理和进步的运动，他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者的不满情绪，颠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在那里恢复旧的地主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于匈牙利事件发展导致的流血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

根据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权机关整顿城内秩序。

考虑到苏联军队继续停留在匈牙利，可能会成为局势更加尖锐化的借口，苏联政府已经向自己的军事指挥部下达命令：当匈牙利政府确认这是必须的，苏联军队立即从布达佩斯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准备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联军队在匈牙利境内逗留问题举行相关的谈判。

捍卫人民民主主义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重要和神圣的义务。

苏联政府表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的，这是每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建立和巩固的制度。他们将付诸一切努力，消除在继续加强民主主义基础、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继续发展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和文化，以便不断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他们将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与互助。

1956年10月30日

ЦХСД, ф.3, оп.14, д.69, л.1, 4-8

АПРФ, ф.3, оп.64, д.485, л.25, 26-30

№097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1月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日会议

第50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和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等同志)

撤出军队的要求已经变成全国性的。

反苏情绪高涨。

(米高扬同志)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

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济于事。

参加谈判。(再等)10—15天。

如果当局将逐渐堕落，到时再决定怎样行动。

绝不能让匈牙利脱离自己(我们)的阵营。

目前不要与军队闹翻。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再作决定，我们是否撤出军队。

再等10—15天，支持这个政府。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到时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苏斯洛夫同志：

政治局势不稳定。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已经紧紧逼近。

近日局势将会明朗化。事件在很平静地发展着，但是没有党的监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出现了分裂——党内斗争转入公开化。

我不认为纳吉组织了暴动，但他的名字却被利用了。

这个政府能否保存下来，没有保证。

只有借助于占领行动才能拥有支持我们的政府。

谢罗夫同志：

发言稿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纳吉与暴动者有关系。

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应该占领这个国家。

布尔加宁同志：

通报1956年10月31日通过的决议以及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

布尔加宁同志：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将失去匈牙利。

科涅夫同志：

布达佩斯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无政府主义蔓延，反动派获得了胜利。

决定：实施占领。

卡冈诺维奇同志：

讨论是复杂的。中国人表明了意见：我们不能撤军。

从客观上讲，极端反动的运动。

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应该等待太久。

反动势力在进攻，而我们却(不)进攻。

福尔采娃同志：

对宣言的反应。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将匈牙利拱手相让。

(朱可夫同志)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1956年10月31日决议。

不同意米高扬同志关于(应该)支持现政府的意见。

行动应该坚决果断。取消一切废话。解除反革命的武装。

阻止前往法国的议会代表团。

使驻布达佩斯大使的家人前往布达佩斯。

议会代表团前往泰国的事应重新审议。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10月31日决议精神采取一切行动。

朱可夫同志：

一切都会就绪。我们在宣言的基础上行动——

调动军队——使一切就绪。

苏斯洛夫同志：

现在局势已经变得更加清楚了。

摆脱诚实的人。

(措施计划)分送：朱可夫、苏斯洛夫、科涅夫、谢罗夫、勃列日涅夫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47]

(米高扬)

关于我们驻在匈牙利大使馆的情况。

(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朱可夫、谢皮洛夫)

大使馆暂时保留。关于主要问题。

谢皮洛夫同志：

两条路：考虑运动的群众性不去干涉；另一条路：动用武力。

还有第三个结果：加以干涉，但反动派胜利了。

谢皮洛夫同志：

目前的局势：反革命叛乱结束了，国体改变了。

主要的方向是反苏的，主要方向的力量来自外部。

如果再不采取坚决的行动，那么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也会崩溃的。

利用武力恢复秩序。

米高扬同志：

如果匈牙利变成帝国主义的基地，那么就无话可说了。

话题指的是对今天局势的评价。

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应该太死板。

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主意。

策略是：与他们保持接触。

苏斯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匈牙利同志——

研究制定措施(依靠什么样的干部，今后我们将如何行动)。 [48]

№20586-1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5日)

1956年11月1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30日至11月14日

第33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5日

..... [49]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的请求接见了。

在简短的礼节性谈话之后乔晓光问我，是否知道在执行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新的措施。乔晓光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我说，在我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谈论过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朝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说，朝鲜领导人预计将批准崔昌益为保护国家物质文化遗迹的国家委员会主席，而朴昌玉预计被批准为建设马顿(Мадон)水泥厂的领导人。通过从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我们还得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前不久召开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

乔晓光请我谈谈朝鲜同志是怎样看待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的那次访问的。我回答他说，如果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进程来判断，那么朝鲜同志的回应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是，绝对地肯定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我也请乔晓光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乔晓光回答说，关于朝鲜同志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访问的反映他目前还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

我问乔晓光，现在在中国的尹公钦、李弼奎、徐辉和金刚是否知道他们已经被恢复了朝鲜劳动党党籍，他们是否考虑返回朝鲜。

乔晓光说，这些同志都知道这些决定。他们还是不愿返回朝鲜，他们想请求朝鲜政府允许他们的家人到中国去，因为他们也知道朝鲜政府不会坚持让他们返回朝鲜。乔晓光接着说，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在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朝鲜领导人说，朝鲜领导人在朝鲜获得解放之后这段时间以及在战争年代清除了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使用反民主的方法领导国家和劳动党；不能正确地使用和教育领导干部。他们认为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和韩相斗这些人不能胜任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朝鲜领导人还被指责没有为反对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

乔晓光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其他的材料来证明上述这些人在信中所说的内容，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理解并谨慎地看待这封信的内容。

我通报乔晓光说，朝鲜领导人免除了李相朝朝鲜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并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李新八为朝鲜驻苏联大使，李新八现在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从朝鲜同志那儿得到消息说，李相朝拒绝返回朝鲜，并且，他大概是想留在中国。

我问道，中国大使馆是否有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乔晓光回答说，他们没有这个决议，但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把这个决议转给了毛泽东。

大使馆一等秘书Г.Е.萨姆索诺夫参加了这次会谈。

这次谈话由中国大使馆翻译员王保民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伊万诺夫(签名)

№20376 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1956年11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市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苏联人民的盛大节日之际，请接受我的诚挚祝愿。

我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在未来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取得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

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刘晓(签名)

1956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收)

莫斯科。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4, л.80

№11453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1956年11月1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年8月27日在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实现1956年国家计划过程中，遇到了居民日用品不足的困难，请求在今年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4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越南政府原来打算将这笔贷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筹措资金项目在1957年向苏联政府提出。越南政府建议在政府间今后的长期贷款谈判中讨论结算的期限和方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拟将上述4000万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棉布、面粉、食糖、医药、化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同

时还使用其中的500万—600万卢布，为军队购买物资(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等)。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商务处的代表支持越南政府的请求。

我们在讨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上述请求之后特报告如下：

1955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4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卢布的贷款。贷款用于支付向越南军队购买设备和材料，只偿还一半的价格。

此外，根据苏联政府1956年6月6日的决定，苏联已经无偿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军队提供了总价值2400万卢布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在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4亿卢布无偿援助中，已经有1.93亿卢布用于供应设备，在28个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建设给予技术援助。截至1956年年底，已经提供了约6500万卢布的设备和技術援助，这笔资金的剩余部分除了从前已经拨出用于建设鱼类罐头厂，而越南政府又认为不宜建设的500万卢布外，将留作1957—1958年使用。

2.02亿卢布用于提供商品，其中食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料占了65%。在无偿援助账号内提供的商品，除了原定于1957年提供的价格1100万卢布的挖泥船之外，其余的已经在今年结束提供贷款。

今年内，依据贷款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无偿向军队提供的物资也将全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提供了1.5亿卢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朋友提供的资金中，截至今年9月1日仅使用了1.4亿卢布。

据范文同同志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力向居民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手工业原料。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又无外汇从国外进口商品。由于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从今年年初以来工业消费品上涨了20%—25%。由于完不成商品的销售计划，对国家预算和货币流

通也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三年计划尚未结束，目前考虑向其财政提供信贷问题为时尚早。如果在制定三年计划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那么这个问题宜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为妥。

苏联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3000万卢布的商品贷款，供其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用于购买日用品。此外，还可以提供500万卢布的日用品，从在宜安没有建设的鱼类罐头工厂经费中支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大部分尚未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的人民生活必需品。

АВПРФ, ф.022, оп.9, п.134, д.56, л.19-21

№223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 (1956年11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3日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7项 发自布达佩斯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朱可夫、萨布罗夫。

同意会晤。 [50]

派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哪些国家(参加)？不包括南斯拉夫。

中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华沙条约国家。

委托马林科夫准备给匈牙利人的信：“同意你们的建议，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会有益处的。

“我方的代表团成员为：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同意召开兄弟共产党会议。代表团将阐述我们的立场。”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6，л.49

№20560-1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1956年11月19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19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说，根据金日成请求苏联相关机构采取措施尽快为兴南化工联合加工厂运送建设设备的请求，11月7日运出了2台混凝土搅拌机，每台容量为425升，最近还将运出泡沫混凝土搅拌机以及深度混凝土探捣器。

会谈中南日说，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马顿水泥厂的总指挥。朴昌玉请求把他派往最艰苦的工地，以便证明他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根据南日的意见，他可以这样做。在11月8日的会谈中，金日成也这样说了。

他说，就让朴昌玉担任建设总指挥一年时间，以表现自己。

关于崔昌益，南日说，他被委任为历史物质文化纪念碑管理局的局长，这一部门将从文化部中分离出来并隶属于内阁办公室。然而崔昌益拒绝了这一职务，并请求让他作为院士从事科学工作。南日的意见是不适合让这样重要的领导人担任自己的下属。

在谈到党内的局势时，南日说，不能认为8月中央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因为朝鲜朋友知道，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来自科学工作者圈子的一些人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工作者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

南日说，9月中央全会之后跑到中国的那些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不打算回到朝鲜了，朝鲜朋友们认为，他们将不会放弃攻击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打算。如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家人也带入中国，他们将不会反对。

接下来南日说，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写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解除了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诬蔑我们，同时他也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或者把他转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学习。

在谈到同波兰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谈判过程时，南日说，在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时候，哥穆尔卡担心苏联领导人不会同意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但是在谈判中这些疑虑都被打消了。

然后他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把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请去并向他们通报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说，我们的苏联同志把哥穆尔卡错误地看作右派民族主义者，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他的错误看法。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287-295

№21478 安德罗索夫致苏共中央联络部函：提交中国留学生对苏联印象的信(1956年11月20日)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现把在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彭瑞桑(Пэнжуй-сан)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信件发送给您，以便了解情况。

H.安德罗索夫

1956年11月20日

附件：

莫斯科地质学院大学生彭瑞桑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

(1956年10月4日)

亲爱的《人民日报》主编同志：

首先，请原谅我在您非常繁忙的时候打扰您。我是在苏联学习的一名中国大学生，是一名党员，在莫斯科地质学院学习。今年夏天暑假期间我同一些苏联大学生一起到了北高加索，帮助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割庄稼，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对苏联有了更多的了解。现在我想把我的见闻告诉给您，同时也想谈论一些关于我国宣传工作的意见。

我们的国内总是在宣称说，苏联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在谈论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高尚的品质。我们刚到达苏联的时候，充满了在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是后来，特别是在集体农庄工作之后，我开始觉得，事实上情况恰巧相反，因此现在我想依次谈论所有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所有苏联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观念，他们都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一些工人的家庭过得不错，他们的钱够花，因此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漫不经心：如果有人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工作一会，而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开始休息。一些人甚至进行欺骗，抬高自己的成绩。比如，一名司机跑了12趟车，他却说跑了20趟。前来帮助收割庄稼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工作都不卖力，他们需要有人来驱使他们。如果在他们后面没有人监督，他们就在原地躺下来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仍然要因为微薄的报酬而谩骂领导，而有时候甚至要组织罢工。这种现象绝不是个案。他们也不用心学习，为了不得到“两分”，他们只在考试期间突击背死书，考试期间抄袭现象非常盛行，对于那些不抄袭的人，他们感到不能理解，也感到奇怪。他们经常说：“我们要多休息，我们有吃有穿，还担心什么？”

他们中很少有人珍惜同学间的友谊。没有两个能够相互关心的好朋友，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分享给其他人。在半个月的集体生活和工作期间不得不多次请求，让他们帮助洗衣服、值班、挑水或者洗盘子。总的来说，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像我们的同学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理解，相反，他们经常会暗地里相互怀疑，在他们之间很少能够看到像在我们的同学们之间能够看到的集体主义的温暖。

苏联人的纪律观念非常差，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纪律。需要保密的东西通常都不能保密，他们总是说：“我们能够对自己在学习上的同学和在工作上的同事保守秘密，但是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难道能够对家人也保守秘密吗？”

至于共青团的工作，他们做得也不够好。没有发现他们开展任何思想工作。没有哪位基层组织和支部的领导人非常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很少有人组织生活中对思想上的不足展开批评。

苏联集体农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应受到强烈的怀疑，他们在工作中很少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他们就没有这样做)，有一些管理干部跑来跑去，当他们跑到一个地方，发现不好的情况之后，就开始大骂起来。他们不去弄明白事情的真实情况，通常他们谩骂的都不是那些需要被谩骂的人，而是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人们不听领导同志的话。没有看到哪

位领导人能够耐心地开展工作，去说服和动员群众，所有工作都是自上而下地开展。而另一些领导人只是在使用干部，而没有表现出对群众的关切。比如，有一次他们派出了一批年龄为10多岁的一群孩子到10公里之外的地方挖土豆。结果孩子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坏了，一直到了晚上10点才回来。

苏联的工资制度也不合理：经常存在的情况是，干了重活得到的很少，而干了轻活却得到了很多。因此，同我们一起前来的大学生经常组织罢工。

苏联的社会秩序也很差，酒鬼和骗子非常多，即使在节日的晚上，姑娘们也不能一个人上街，但是人民和社会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苏联，不良的情绪要比健康的情绪严重(当然，也有一些健康的情绪，但是在此我就不谈论了)。

相比而言，上面所述都是在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不得不进行观察，并就我们的宣传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

首先，现在我们的民族是非常好的、令人满意的、不断发展的和健康的，我非常担心的是，在今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我们的民族也开始逐步变质。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汲取苏联的教训，加强思想工作，并且一直贯彻下去。

第二，在报纸上发表和广泛宣传的只是一些非深层次的问题或者宣传的只是一些好的东西，对此我不同意。这会引起人们对我国宣传工作的不信任，并且他们会证明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有宣传说，苏联的这好，那好，一切都好，但是当我们在苏联生活的时候却看到的是这样不良的现象(当然，事实上也有好的现象)。因此，我们怀疑，我们的宣传是否脱离了实际，对于报纸上的宣传：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积极地参加生产工作，我们怀疑这是否符合事实？

第三，我不能同意某些领导干部的做法，他们不能区分黑白是非，大肆吹嘘说，苏联的某些东西是好的，把一些缺点看作是好的东西，把个别人的优点看作是整个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和看法。或许，其中有许多错误，因此我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如果我的上面所述有一些正确的东西，那么请提请相关部门予以注意。

此致

敬礼！

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大学生

彭瑞桑

1956年10月4日

(来自《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2028期)

什利亚普尼科夫翻译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37-241

№21487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1956年11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年11月23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B.H.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H.T.费德林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呈交中共中央就苏共党史教学问题召开的会议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主要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秘密资料拟定。

附件共3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

И.尤金

附件：

呈交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资料

今年6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鼓动与宣传部理论宣传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党校召开了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以及那些开设了中级党校课程的初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负责人。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高等教育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师范学院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关于苏共党史研究的问题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创建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会议发表了对未来这一课程研究前景的基本看法，批评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善这一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会议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尽管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着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指出的不足，其中包括与个人崇拜相联系的不足，还是应该继续在中国党校研究苏共党史。这是必要的，因为苏共党的历史经验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地位问题、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会议指出，研究苏共党的目标是研究苏共党的主要经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原则。至于一些历史琐事，个人功过的大小，即便是不了解这些内容也不会对苏共历史主要内容的讲授产生障碍。此外，在会议上提到，我们不需要将苏共党史授课方面的工作深化到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对别人物的评价。

会议指出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主要不足，比如：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死板。这表现在，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科书的每一个句子都被看作是经典结论，认为这本书是完全正确的，是对苏共党史的完美概括。这导致了掩盖历史，文过饰非，并偏离了一些根本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方针。在党校中和其他学校中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过分关注教学方法，这有损于对课程主要内容的创造性研究。学生把主要时间花在了写提纲、死记提纲上面，没有深入关注问题的实质。在教学中缺少创造和创新，或者教学大纲和讲义被视作是公式化的、不变的东西，教师和学生的观点实际上被“一条绳子连接起来”。

会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如下观点：为了改善今后苏共党史教学工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将有极大的意义。必须研究苏共党史，从这一文件的精神出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关注无产阶级专政。每一个教研室都应该像研究历史科学一样研究苏共党史，积极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正确地向学生们叙述苏共党史。为了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需要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进行论战的机会。考虑到时间不足和中级党校的大量课程，必须缩短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等主要科目。今后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占到中级党校所有授课时间的8%—10%。会议委托高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在1956年10月前制定与新的教学方法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并与中级党校苏共党史教研室的负责人讨论该教学大纲。中级党校苏共历史教研室自己应该积极地制定新的教学大纲。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议决定，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所有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都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准备的方法是：要逐渐把苏共党史课程扩充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今后打算首先把第一和第二国际的篇章补充进苏共党史课程，然后把第三国际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篇章补充进来。

最后，会议指出了成功教授苏共党史对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基础的重要性。

Г.什利亚普尼科夫

文件5份，送：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ЦХСД, ф.5, оп.28, д.485, л.52 55

№20560-3 伊万诺夫与朴义琬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22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2日

参加了在朴义琬那儿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审理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会后应朴义琬的请求同他进行了会谈。

朴义琬说，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还没有完全缓和，党内气氛仍然紧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像8月中央全会前一样变得复杂化。

朴义琬对此解释说，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朝鲜朋友们还没有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在工作中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生活准则应用得还不够。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次会议上金日成说，他同意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只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访问变得复杂些，而实际上他是不会同意关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操之过急和决议不正确这种意见的。朴义琬强调说，他和南日坚持必须贯彻实施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在此之后，金日成同意了这些意见。

然而，在此之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继续犯错误，这让人想起了波兰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9月中央全会之后平壤市委许多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以及个别同情崔昌益的内阁相、或是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更换了职务，他们或者被派往僻远的省份工作或者被开除出党。金日成说，因为参与崔昌益集团并应该负责任的个别人，也应该为朴义琬、金承化以及其他领导人有这样的看法负责。

朴义琬从他在朝鲜11年的工作经验中得出结论，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早晚会被迫跑往苏联。去年为反对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而发动的运动带有反对苏联的性质，这类似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朴义琬说，他打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到1957年5月，然后应该会到苏联去，因为他不能在得不到信任的环境中工作。

我认为关于朴义琬到国外去的问题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管理的事情，对此朴义琬引用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例子，他说，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在朝鲜的情况同他完全相似。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请求被接受为苏联公民并回归到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中。

在谈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讨论问题时，朴义琬说，这些材料在各道、各郡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被讨论。各级内阁相级别的党组织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决议的最后文本。参与这次会议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佩利申科。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295-296

№23062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1月24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4日

机密

第165/HΦ号

接待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6年11月24日)

今天12点正，我接待了刘晓。

1.刘晓谈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苏的情况。据刘晓说，在指出代表团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和服务之后，鉴于在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彭真在自己的发言中又强调了如下内容：1.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的道路；2.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唯一中心；3.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

在此，彭真还特别指出了进一步巩固苏联与中国的团结和友谊的必要性问题。

我本人也表示，请中方及时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下一步安排情况以及代表团成员关于代表团的工作问题可能存在的各种意见和针对苏方可能存在的各种要求。

2.刘晓请求我们协助中国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八大获得签证。

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真(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刘长胜，随行人员——代表团秘书张蓓飞(ЧжанПынь-фэй)、翻译齐宗华和李茹华(ЛиЖуй-хуа)。刘晓说，他们已向意大利使馆提出了签证申请。但考虑到意大利使馆可能会对此进行阻挠和拖延，刘晓请求(我们)与意大利的意共中央取得联系以加速签证的办理。

我承诺将给予协助，并说我们会把中方的这一请求向苏共中央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和三等秘书К.Л.克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签名)

РГНИ, ф.5, оп.28, д.382, л.181

№16686-3 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 访华观感(1956年11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我有幸同苏联作家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了25天。我们走遍了中国的主要省份。我们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普通老百姓，谈了很多、很久，而且正如我们感到的，谈得很亲切。在我们的交谈者中，有著名的作家、院士、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地方中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投产及在建工厂的厂长和工人以及农民和农业合作社社员。

有鉴于此，我认为把在我看来同中国进行社会性联系的我们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很严重的缺点告知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作为党员的义务。

正如我感到的，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老化了，妨碍了这种交流的进一步巩固。

1.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由极有威望的新中国活动家之一宋庆龄同志领导。我们在中国旅行时到处(在大城市和小乡村)接触了该协会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到处看到的普及推广苏联成就的展览会，在

工厂甚至在遥远的乡村经常举行的关于苏联的报告，普及苏联文学、苏联电影等等。这个协会有数以百计的会员，是个很活跃的、有战斗力的组织。在同该协会领导人的座谈或我们在作报告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好像是授意的：“苏联有类似的协会吗？有多少会员？”如此等等。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同所有国家进行交流，中国的朋友在我们那里有两亿。——回答不太令人信服。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协会。这就在相互推广成就方面，造成了某种不平等，并且正如感受的，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舆论。我想，已经到了赶快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时候，并至少在共和国首府建立分支机构，使这种组织变成社会知名的，安排著名社会活动家当领导，并开展相应的工作。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按章程应该同时造福于所有的人，但看来，这个协会的角色是不能完成的。我想，应当出版苏联报纸《友好》的中文版本，以便让中国人获得第一手的最有意义的苏联新闻。正像我感到的，作家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即在北京和莫斯科出版相应的书目参考手册，它关注那里和这里最有意义的苏联文献和中国文献，并且推荐所有文化和科学问题的最重要文章，并加内容简介以用于阅读和翻译。这样做有助于把翻译事业引向精确和正确的方向，以便两国根据相互推荐而翻译最优秀的文献。

2.对所有来中国的苏联活动家，中国同志都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他们的部长和国家头面人物，甚至把接待次要代表团，并同他们座谈当作自己的职责。可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给予同样的回报。在我们这里，所有代表团被一刀切。再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苏联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礼貌，正像我感觉到的，中国人有权指望我方的充分回报。这也涉及代表团的接见和对代表团的招待，尤其是中国同志与领导人员的会见。特别是与此相关的社会措施，我们这方面事情差得不可容忍。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举办了苏联电影联欢节。联欢节办得像重大的文化节日，工厂和乡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提出了报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联欢节是在人群何等拥挤的情况下度过的。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相应举办了中国电影联欢节。传到中国的报刊报道说，这次联欢节，像对待例行“措施”一样，只求做上记号来报告一下联欢节举办过了。郭沫若若在告别座谈中有礼貌地提请我注意这一点，并且说：“大概我们的电影已差到如此地步，不值得苏联观众注意。”要知道，中国人不是随便说说的。显然，这样做留下了相应的遗憾。

3.在中国，我们早就牢牢记住由于各种原因而忘却的和往往因没有功劳而忘却的人们。他们是列宁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使者以及巩固中苏友谊的带路人和奠基人。中国今天领导人的青少年时代，与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这样的人，其他与孙逸仙并肩战斗而闻名中国的人，广东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的教员及北伐战争参加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我们这里已经被忘却。他们的画像和图书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向导会把他们作为中苏友谊的奠基人进行介绍。人们有机会时常记起他们的功劳，并为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等等。我们也怀念他们。正如我感到的，如今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某种不妙的状况。我想，为了我们能知道以前奠定友谊基础的人们的名字，如果不是全部，那么部分也好，为了中国人能知道这一点，同中国的友谊是值得的。这样马上就能使他们和我们摆脱我们之间现存的某种不妙的不协调之处。

4.我认为已经到了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在中国工业中苏联顾问工作组织的时候了。他们大多数是优秀的人士，拥有丰富的有意义的经验，很有知识，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他们，中国同志创造了少有的条件，不规定他们的工作日，用最好的火车把他们分送到全国，将他们安置在宾馆最昂贵的房间内，吃饭时以宴会的方式供养着他们，如此等等。中国人是很节约和讲究合情合理节约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勉强过得去，这不是秘密。这种突出的谦虚是他们的工作作风。我感到，苏联同志在接受被给予的受尊敬的地位和福利方面，表现得太顺从了。我想，该是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导我们同志的时候了，以使他们不把所给予的特别福利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以使他们生活得节俭些，不使中国人过度破费，而应满足于自己的工资，顺便说一句，工资通常是很高的。为了说明现状，我敢于把一位苏联著名学者的私人信件当作本报告附录寄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学者同志。在这封不是为了报告的信件里，我感到，这位聪明和有远见的苏联人、共产党员，揭露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人相互关系中的所有不足。对这些不足，我们有机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从我们的工程师那里听到。我经收信人同意附上这封信。

5.最后，关于实现莫斯科与北京联系的苏联段航线问题。我们的国际航线，在西方国家的工作有了某些改进，但是在这一段，仍处于极差的状态。由于该航线总是有大量不同国家的人流，从欧洲来到中国，这一段航线出现的马虎行为已经变成了政治事件。10月16日，以中央委员为首的中国国家安全代表团从波兰回国时所乘的我国飞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转机时滞留了整整一昼夜，原因是没有找到必需

的燃料。在归途中，我们不得不离开在新西伯利亚的国际班机，因为继续乘飞机去莫斯科的旅客比较少了，并在那里换乘了汽车。要知道，乘这架飞机的有以外贸部长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两个航班上发生两个错误。航空港的建筑物是宏伟的，而其中的服务仍像处于小木屋里那个时候。在同中国保持联系的该航线的三个地方，都高挂着众所周知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印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纳尔班江画的复制品，在画中，毛泽东的样子就像一名通过了教授考试的激动大学生。即使这幅画是真品，都会令人感到恶心，可是至今那里还挂着它的商业性复制品。一般来说，最好是根据外国模式，用飞机着陆城市和地区的大幅美丽的照片来装饰机场围墙，而不要用著名巡回医疗展览派艺术家优秀画作的拙劣复制品。这些拙劣复制品只会引起稍有一点鉴赏力的人不寒而栗。在新西伯利亚飞机场入口的对面，两根柱子上挂着一大块胶合板，文字标题为“苏联——世界社会主义主要强国”。标题上画有一幅大大的红色苏联地图，旁边有两栏，由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图组成，但大小只有苏联地图的10%，地图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这样，中国在此顺序中排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挂起这幅地图的新西伯利亚的同志，完全失去了幽默的感觉，因为大地图上标出人口为2亿，而小小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人口却有6亿。我们自己看到，外国人是如何站在这幅地图旁拿它寻开心的。我感到，务必对这条航线进行最严厉的检查，并且责成一些州的党委经常关心自己区段的工作、航空港的文化状况以及服务等等。

由于该航线苏联段和中国段间的不同已经太明显了，所以我感到这也是政治问题了。

Б.波列伏依(签名)

1956年11月26日

维诺格拉多夫(召集人)、基里林、留里科夫、佐洛图欣同志：

请审核一下Б.波列伏依同志的报告，并准备建议。

..... [51]

1957年3月16日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6, д.506, л.87-93

№2056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金日成并向他转告了匈牙利的局势。

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后金日成说，匈牙利的致命弱点是缺乏党组织，为了改正匈牙利劳动党领导人和政府所犯的错误，就不应该忽视党，要依靠党组织在实践中消除错误。

然后金日成说，卡达尔在自己的讲话中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说，铁托也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对于铁托这一发言的后果，个别朝鲜工作人员认为铁托向社会主义阵营接近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作出了错误的评价。

有人对我说，南斯拉夫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团结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把那些维护和平的国家吸引到自己一边，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事业。铁托的错误言论不应该在国内向全体人民传达。

金日成然后说，从波兰匈牙利事件中他们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企图分裂苏联和其他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美帝国主义者唆使李承晚进行各种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最近李承晚政权号召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起来反对民主制度。

金日成说，波兰匈牙利事件警示我们要坚持专政，不能满足，不能丧失警惕性。尽管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状况是牢固的，朝鲜的国内状况是稳定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还是把中央委员会委员派往各道，去推进地方上的工作。11月27日地方人民权力机构的选举显示，几乎100%的居民参与投票，超过99.8%的居民投票支持人民阵线代表候选人进入各郡和各道的人民会议。

各工厂第一和第二级的党委委员长、各道委主席都被召集开会，会上向他们解释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并且因此提出了现实任务。金日成亲自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宣传工作中阐释了工人阶级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这与南朝鲜的情况不同，南朝鲜的政权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在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方面我们党也做了工作，同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进行了斗争，在党的工作方面着重于对党员进行解释和教育工作，在于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进行斗争，在于遵守党的生活准则。

对于在我国北部的南方人，党组织也开展了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生产生活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为他们开办技术学校以及一所党校。南方人，特别是南方青年目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还不信任，我们的任务在于消除这种不信任并赢得他们的支持。

国际关系方面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巩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在于加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

经济领域提出的任务是保证日用商品生产的增加，为此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国内的资源。为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在12月10日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在咸镜北道增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而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月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增加捕鱼量和扩大渔业生产的问题。

因此，今年的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将会比去年好一些，除了两个道，农民们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他们对日用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到今年年底将提供1000万米布匹，然而，看起来这还不够。

然后金日成通报说，在1957年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了大额逆差，本想通过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额外援助或贷款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周恩来在赴越南访问前夕召集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大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国内状况，然后说，中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不能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义务。

在审视了朝鲜驻北京大使的这一通报后，朝鲜的同志们反对派遣贸易代表团同中国谈判，并指示国家计划总局考虑这一声明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他们将被迫不得不减少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煤和煤气。然而，他们却不得不请求苏联于1957年额外援助1500吨棉花。要考虑到一些情况再制定计划。

然后金日成说，1957年最高人民会议将进行选举。他指出，最高人民会议中有180名南方人。一些朝鲜同志就有了疑问，是否按部就班地保留所有的南方人代表或者也对他们进行重新选举，只保留足够的代表数额。

金日成然后谈到了他们所提出的货币兑换问题。到现在他还不明白，流通中需要多少货币，150亿或200亿朝鲜元。货币是否足够。同时也有一些假币在流通。1946年北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已经不符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现状了。

朝鲜同志提议按照1：1的比率兑换现有货币。这将不是货币改革，但是，在兑换货币的过程中可以废除现在整个荒唐的货币体系，并改变货币体系的形式，使其更完善等。

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看起来，解决这项任务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不得不请求苏联印制货币，并将向苏联派遣必要的专家小组。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297-300

№20560-5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

和平会议问题(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B.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朝鲜政府备忘录的答复，这个备忘录表述了朝鲜政府对联合国第十一次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这个备忘录是今年11月5日由大使馆转交苏联政府的。

在知道了苏联政府的答复意见之后，南日满意地说，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政府的立场和朝鲜政府完全一致，并说，今天他就将把这一答复报告朝鲜政府。

然后南日通知我说，这个备忘录他们也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答复中也同意朝鲜政府在备忘录中关于朝鲜问题的立场，并在备忘录中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然而，对于由联合国大会审议召开相关国家以及中国参加和平会议的提议，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联合国是同朝鲜交战的一方，因此不会通过这样的建议并作出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决议。

对于这个问题，南日说，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14个国家参与了反对朝鲜的战争，因此，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可能会支持关于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此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本身也会对朝鲜有利，不论对这一问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因为这是展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意愿的机会。

然后南日说，在朝鲜新大使李新八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新大使应当努力把这一路线贯彻到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金日成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像铁托这样的领导人的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南日谈到了前大使李相朝的行为，原来他不是一个好同志。同志们都知道李相朝的亲中国情绪及其对苏联的轻视。然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以及不熟悉苏联真正生活的结果。同志们原都认为，李相朝在莫斯科的工作会对他的观点产生积极影响。

而现在，李相朝却打算留在苏联，南日认为，他不应该为了依靠苏联生活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在苏联将什么也做不成。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301-302

№21479 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 华(1956年12月4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12月4日

第1708c号

致苏共中央：

现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报告发送给你。

附件共7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

雅科夫列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代表团的建议已经落实。

1957年1月16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708c号

1956年12月4日

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的信息报告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的邀请，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时间为1956年9月30日到11月1日。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了解了中央和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组织和活动以及地方上对司法的管理工作，也了解了法律干部培养工作的组织以及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

代表团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高等教育部领导人以及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法院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并参观了上海的监狱。

代表团分成几个小组，详细了解了法院、检察院、司法部的工作，了解了高等法律学校、大学的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的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政法干部学校教学过程的组织。

代表团成员米舒京同志、帕夫洛夫同志、莫罗佐夫同志、布拉图斯同志和诺先科同志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苏联法律一些迫切的问题和苏联法律的科学问题作了报告，有将近7000名法律界的实习人员和法学界科学工作者听取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巨大兴趣，并提出了许多问题。此外，应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请求，代表团成员同他们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了20多场会谈。

前不久，在回国前夕，代表团受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代表团到中国各地进行了访问，访问了南京、上海、汉口和广州，在这些地方了解了一些工业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工作，了解了北京西郊一个名为中苏友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代表团还访问了博物馆和剧院、幼儿园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机构。在中共上海市委、代表团听取了关于把私营工商业企业改造成合营企业的谈话。在北京，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向代表团通报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代表团同中苏友协的领导人 and 积极分子举行了会谈，访问了《友好报》编辑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机关的研究证明，这些机构能够顺利解决一些问题，保障和加强中国的人民民主法制。在组织上加强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正在接近尾声。他们的实习活动和任务要服从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提出的任务。但在制定和通过新的法典(刑事法、民法、诉讼法)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工作，这些法典都是现有法律的牢固的基础，是国内司法秩序的可靠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关于法律干部的培养工作，在大学、政法学院、政法干部学校开

设法律系以及开办各种学习班对法律工作者进行培训。但是国内缺乏法律干部，因此，法律高校接受的听众的名额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每年这些高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接下来简要地阐述一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体系、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形式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特点以及司法干部培养体系的特点和司法领域科研工作的方法。

一、司法机关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是司法管理机关。其职能包括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通过核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检查其作出的判决和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实施这些功能的不仅仅是司法部和各省司法厅及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司法局，还有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的一些专门的司法机构，它们对基层法院及其专门的司法工作者实施管理。因此，司法机构的功能和行使司法权的功能在组织上的区别仅仅在最高的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司法局，而在基层的司法机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则由法院自身来行使司法职能。

还必须指出，司法机关对法院司法权的监督是平行的，而且常常还是一起进行监督的，其途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检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

二、司法系统的特点。与我国的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处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有几个审判庭(5—7个或者更多)，它们是法院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法院没有常设办公地，通常是几个乡共用一个办公地，通过定期去固定的案件审查点开展工作。大多数法官都没有固定负责的下辖地区，这些地区通常都包含数个乡，他们通过定期到一些地点出巡来审理案件。

还应当指出，不太重要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单独的法官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司法系统的特点是，军事法院不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领导的司法体系之内。人民解放军最高法院隶属于国防部，在组织上同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关系。

铁路系统的法院和水路运输系统的法院的特点是，这些法院审理的只是在运输期间在运输时犯下的罪行，只审理在其运输路线及其办公场所犯下的罪行。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关于助理法官的条例是苏联的司法制度所没有的。助理法官的任务是协助法官工作。在地方法院，根据法官的提议，相关的审判委员会(见下)可以批准助理法官行使司法权。助理法官条例的制定，是由于很多法官都没有受过法律教育。

关于案件的管辖范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最终确定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任何一个法院，从最基层的法院开始，都可以根据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把下级法院认为应该转交给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转交给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审理的时候应考虑下级法院的意见。

审判委员会。所有的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组建了审判委员会，由相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组成，其数量为5—7人，或者更多。审判委员会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对一些重要的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也讨论一些审判政策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法院的审判工作。

三、诉讼程序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案件的调查和审议的程序进行调节的诉讼法，但是195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对诉讼程序进行调节的原则。现在法院在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依据的都是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决议所确定下来。

现行的诉讼程序的特点如下：

1.没有秘密商议室；法院在结束案件审理后有权宣布休息几天，并与法院领导人、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商议案件的判决。

2.对于法庭很难宣判或者作出决定的任何一个案件，都可以预先提交给审判委员会；法院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3.如果法院院长认为，对案件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案件就要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审议，审判委员会不能撤销已经作出的判决或者决议，而要委托组成新的法庭再次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新的判决和决议。

4.缺乏明确的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的程序：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是以提出诉状和上诉状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对某些案件的审理程序的确定要依赖审理诉状的法院的考量。

值得指出的是，法院应该组织好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任何公民如果认为任一官员的行为不对，他就有权携带对其行为的申诉书去法院。如果法院认为该申诉不由其管辖，就会把申诉转寄给国家政权的权威机关。作为对申诉的回复，提交的申诉会转寄当地法院，并被交给申诉人。

四、调解委员会。这是一种独特的对社会进行调节的法院，审理的是一些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包括侮辱，小规模打架斗殴等)，该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地方权力机构)。调解委员会是一个社会组织，不属于司法体系，但受到法院的帮助。向调解委员会递交的案件只有在各方都愿意协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决议的履行也只能是自愿的。一旦不同意解决方案，相关的一方可以请求法院解决。全国共组建了15万个协调委员会。他们使法院得以少审理数万、数十万的案件。

五、人民检察院。与苏联的人民检察机关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检察院是合议机构。在各级人民检察院都组建了监察委员会，对检察院工作中的所有主要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只有中共党员才能担任检察官。在检察院组建了党小组。党小组成员及其领导人由党委会批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然在实施事先审查的制度，这一工作由公安机关进行。但是由检察院授权逮捕，并将被告移交法院。必须指出，对法院进行监督的一个特点是：在审查程序结束，进入对案件进行事先调查的阶段之后，在指控的结论得到批准之前，检察官自己会亲自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如果需要证人，他们的讯问记录可以归入审讯案件的卷宗中，而不会向公诉人提供有关案件的调查情况。检察院认为，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助于通过材料确定案件的真相，是对调查材料进行检查的一种方式。

检察院现在尚未组建侦查机构。预计，社会安全机构今后将仅会对反革命案件进行侦查，其余案件(社会刑事案件)将由检察机关侦查。

检察院不对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社会的侦查工作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

六、对司法干部培训的组织及关于司法领域的科研工作。法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及教学过程制定的基础利用了苏联法学院的工作经验。

在1954—1955年之前，在法律大学中主要采用的是苏联的法律课程，并使用苏联的教材。现在主要讲授的是中国法，而苏联的法律课程则被作为选修课。

目前还没有固定的中国法教材。因此，教师们在向学生授课之前通常必须撰写教案。

一些法律高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尽可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们亲自参与到案件的实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从事实践工作。

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出版了法律方面的杂志，正在进行组建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准备工作。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在科学工作中，在法学领域的教学中实施“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实践中正在加强对原有的法律干部的利用。

七、同周恩来同志进行的谈话。在同代表团成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谈论了如下各点：

1.检察机关应当实行集体领导。对于一些属于司法机构管辖权的重要的案件的审判，应当事先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法院和社会安全部门同党组织共同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考

虑到了对行使司法权的必要限制，以便消除错误。一些案件关系到公民生命和自由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刑事案件必须避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任何阶段由个人作出决定。

2.所有公民，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非党员，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决定对某人进行逮捕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在对刑事罪犯进行起诉的时候，不应考虑其党性如何，但应当征得党的机构的同意。

3.在所有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中，在社会安全机构的工作中必须推行“群众路线”。人民应当了解党和国家机构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了解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一工作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不应是秘密的。周恩来说，在依赖群众的同时，我们要相信群众。上述状况也完全适于各司法机关的工作。司法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建立在两个原则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反对检察院和其他的司法机构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工作中，其中包括同国家罪犯作斗争，实行集中的、独立的领导。他说，只有通过集体领导，进行仔细调查，实行让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政策，并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才能真正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请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称赞少一些，而要更多地就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

八、一些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希望在自己践行法律的工作中以及在巩固国内法律的工作中逐步推行“群众路线”。司法机构认为，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保证是实行集体领导制，依靠群众来揭露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的政策，消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保守工作秘密，反复对案件进行仔细的调查，提高思想理论和科学工作。

现存的不足阻碍了中国司法机构加强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些不足是：缺少法典，缺少成熟的法律。因此，对于那些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处罚规定，都要由审理案件的法院和检察院根据个别情况来确定，这不能不对国内司法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此外，可以提出如下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愿望，来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司法高校的工作和法律管理工作。

1.看起来，现在改造法庭的时机已经成熟，基层人民法院的“常设委员会”要有独立的司法区。

2.为了确保诉讼业务的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创建军事委员会是相宜的，军事法院通过军事委员会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3.应当承认，最好能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权限，其途径可以是授权其就下级法院实践工作中的问题下达指示。这一任务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会议更大的权力。

4.应该取消助理法官制度，如果需要，可以增加法院人数来代替。

5.最好在所有级别的法院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举，创建统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6.最好制定检察院参加二审案件的审查监督制度。

7.提出质疑：缺少秘密商议室，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之前审判委员会介入案件的审理，法院调查期间和作出宣判期间进行休庭，上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程序上的规则以及通过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理由，通过对他们审理的结果进行上诉)。诉讼程序普遍民主的原则要求建立诉讼形式的更高准确性和确定性。

8.一方面通过司法部和司法局，另一方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来进行检查和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这种双重监督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9.必须准确地确定各级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

10.在很多情况下，法官自身就是法庭决议的执行人，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了法院执行者的独立职能。

11.有关公证和律师的法律规定是必需的。同样还必须通过关于司法部的结构和职能的法律规定。

12.应当加强对检察机关进行的普遍监督，并建立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司法监督。

九、代表团提出的建议。

1.必须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列宁格勒和伏龙芝召开法律工作者代表大会，由代表团成员向这些城市的法律界代表报告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结果。在召开会议和作完报告之后，向各法律单位和高校通报关于同上述活动有关的材料，并向中苏友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进行通报。

2.必须出版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总结的小册子，同时在《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上发表如下题目的文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些特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工作的一些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人员培训组织及司法研究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律状况的若干方面》。

3.建议《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编辑部定期同时刊登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科学工作者约稿的文章，试着在自己的杂志上转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杂志上刊登的较具有现实性的文章。

4.为了今后加强苏中两国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应当同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保持全面联系，其途径可以是私人的和公务上的信函，互换文献，就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互通信息。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领导人的坚决请求，代表团应该提出自己在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之后产生的意见和希望，并在1956年12月10日之前将其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

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苏联副总检察长

A.米舒京(签名)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42-249

№10495 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1956年12月12日)

1956年4月30日，我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在1957年中国将订购总计价值8.9亿卢布的军备物资。然而由于中国今年大面积遭受严重水灾而引起的物资供应短缺，我们不得不重新分配原计划出口的物资以满足国内供给的需求因而就会减少明年的出口。为了保持1957年进出口的平衡，我们除了减少购买外国产品外别无选择。可是，就像我们已计算过的，为了避免给现行的基本建设带来反作用，我们无法缩减成套设备及一般的

贸易项目。因此，我们决定我们原定1957年从苏联订购价值8.9亿卢布的物资降为4.26亿卢布。

我们知道我们减少订购苏联军备物资将给苏联政府带来一些问题，而这样做也是有悖于我们的意愿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接受我们的请求。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将派唐天基 [52] 作为军备物资的全权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外贸部进行谈判。我们也将尽快向苏联驻华使馆经济处提交一份详细的经过缩减并已经确定的订购清单。盼望回信。

АВІРФ , ф.100(1957) , оп.50 , п.423 , д.5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

根据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命令发出

机密

文本第10份

1956年12月28日

第1578/ДВ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劳动党的局势

1956年是朝鲜劳动党党内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年。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在中断了8年之后，于1956年4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也确定了朝鲜劳动党今后对外政策的任务。因此，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朝鲜国内及朝鲜劳动党内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实践意义。

同时，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都没有反映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朝鲜的具体状况出发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原则：克服朝鲜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后果，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加强民主纪律。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出的还是以前那种着重发展重工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倾向，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这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一中心问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无论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一些著名领导干部都特别担心这些问题。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琬、徐辉、尹公钦、金承化和其他重要领导干部都认为，今后决不能容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大错误。甚至军队和工会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劳动党党内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更加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以上指出的那些人打算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的重大错误，他们指出，盛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按照个人忠诚的原则对干部进行任命的做法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并降低了党和国家各个机构的责任感，党内仍然像以前一样笼罩着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的气氛，事实上人们在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朝鲜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极其困难。

这些著名的劳动党领导人对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证明朝鲜劳动党内产生了民族主义干部，他们对劳动党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指出的领导干部希望通过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现有的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金日成没有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建议，也没有像劳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他的期待那样在劳动党8月全体会议上批评党内工作的缺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开展自我批评，反而采取了一切措施孤立那些打算发言批评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一些对劳动党领导人的缺点不满的领导干部勇敢而又开诚布公地谴责了劳动党内的状况，因此他们也被看作“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敌对集团”，并遭受党内处分。以上指出的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害怕今后再受到迫害就跑到了中国(9人)，而朝鲜驻莫斯科前大使李相朝则拒不返回朝鲜。

这样朝鲜劳动党内就形成了复杂的局势，党的领导人的重大缺点和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派遣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到平壤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讨论朝鲜劳动党内形成的局面。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举

行了9月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重新审查了8月中央全会关于崔昌益、朴昌玉等同志的决议，并且承认，“8月中央全会没有认真审查这些同志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9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也被恢复了党籍。

同时，9月中央全会决议也承认必须在党内创造良好的氛围，以便更加积极地组织活动讨论党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并通过开展深入的批评找出真理，而不要采取组织和行政的方法。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当为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而努力，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下级的批评。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通过的决议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金日成和绝大多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都是不愿意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的。在准备召开9月中央全会过程中他们企图证明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的罪行，证明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些人采取的措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作出的组织决定也是有依据的。

现在朝鲜劳动党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种看法认为，8月中央全会揭露了崔昌益和朴昌玉敌对集团，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尽管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职务，恢复了其他人的党籍。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愿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组织决定也表现在如下事实，即尽管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人都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会谈，商定在报纸公布9月中央全会关于上述问题决议的全部文本，这个决议的文本终究没有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报纸公布了简短的信息通报，公布的这份决议删除了其中两个重要章节，而这两个章节涉及了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和朴昌玉所采取措施的评价，同时也涉及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他们也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商定重新审查党委关于与崔昌益和朴昌玉有牵连的其他同志的决议。然而，这项工作朝鲜领导人进行得非常缓慢。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的领导干部、国立大学的委员长以及建设厅、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和贸易部的许多领导干部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后都被解除了职务，其中

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关于被逮捕的前政治局委员朴一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也同金日成达成了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0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建议把他软禁在家或者遣送他到中国学习，如果他愿意到中国的话。然而，这项决议现在还没有执行，这就说明了朝鲜总体的政治局势。

朝鲜内务相方学世认为，考虑到当今的国际局势，不排除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一些不受欢迎的言论的可能性，他们支持在党和国家内实行比较民主的领导方法，尽管8月中央全会，把这种言论谴责为党派活动和反党行为，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处分。首先，这些言论可能来自中央委员崔昌益，他希望得到金雄(民族保卫省副相)、方虎山(是名中将，曾领导过一个方面军，现在是一个矿厂的副厂长)和高峰起(朝鲜劳动党黄海南道党委委员长)的支持。在方学世看来，在进行发言批评的时候，还可以期待得到金科奉类似的发言支持。

以上所述证明，过去金日成曾多次清除自己的对手并且有时对他们滥加镇压，企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现在他的领导方法改变得仍然非常缓慢，他极不情愿改正过去的错误，并且非常勉强地对对手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方法。

同时应当指出，不论今年的国际事件，还是朝鲜国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以上指出的朝鲜部分著名领导干部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严重不满现象，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金日成今年夏天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他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谈，他在莫斯科得到加强对国家经济领导的建议，他也得到建议加强对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关注，米高扬和彭德怀在平壤也开展了工作，这些也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在这方面朝鲜劳动党开展了政治、经济和组织工作。

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工业领域提前四个半月完成了计划，而农业计划基本上也将完成。尽管北方一

些省份的庄稼收成不好，朝鲜粮食生产总产量基本达到了270万吨，达到了战前1949年的水平。

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作了明显的修改。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和合作的原则。

因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可以暂时放弃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的计划，这些大型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建设时间，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拥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资源的地方建造工业企业。

通过了决议决定放弃平壤大型机电设备厂的建设，放弃以金策的名字命名的清津金属加工厂的恢复工作，放弃平壤化妆品厂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领导人最近比较关注矿物化肥的生产。他们提出了缩短兴南化肥厂硝酸钾生产车间建设时间的任务。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推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到今年10月底，所有农业作业的79%都实现了合作化生产。可以想象，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化将基本完成。

朝鲜领导人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推行的这些经济措施证明，在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能够更加现实地对待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和工业能力问题，并且表现出对提高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关心。

最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从1956年11月1日起，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并且制定和推行了新的工资表，按照这个工资表，每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是1000元，而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00元。

在今年8—9月份，国家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价格平均降低了10%。由于工资得到了提高以及一些商品零售价格

降低，人民一年大约得到了120亿元的好处。这个数目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可以使人民得到12万吨的大米。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朝鲜领导人除了利用自己国家的资源外，还希望得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日用品的援助，这些援助应该从1957年开始得到。如果不能增加出售的商品数量，即使提高工资和降低商品的价格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

为了减轻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对国家的税务负担，朝鲜政府通过了减轻农业税和免除农民1956年借贷的粮食的决议，也不再追索在过去年份借贷的粮食。按照这个决议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被免除今年的农业实物税，并且他们有实物税的优惠，这些税收不超过他们农业收入的10%—12%。由于干旱粮食收成低的农民、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贫苦农民、生活在非武装地带的农民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对于他们应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不再向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追索过去的借贷。

不应该在1956年给予农民上述优惠，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预计需要2.6万吨以上储备的粮食。

通过了关于降低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这些税平均降低了4%。

朝鲜政府在10月份也通过决议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不能超过1万元。

朝鲜政府的其他决议也规定地方上的人民权力机构和部门领导人应当保证私营企业主生产日用品所必需的原料供应。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可以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工业品，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资金。为了增加居民收入和外汇的积累，可以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工金砂矿床。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的上述措施都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然而，朝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目前仍然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

朝鲜大约40%的国民需要国家给予生活保障。每个工人和职员每天

可以分到700—900克的粮食，而每个学生和受赡养的人每天可以分到400—500克粮食。每个人得到的粮食其中50%是大米，50%是其他种类的粮食。其中只有4%的工人能够每天得到900克粮食，22%的工人能够每天到800克粮食，大部分工人每天得到700克粮食。

工人和职员按照级别每年可以分到15—23米棉布，3—12双袜子，2—12块肥皂，2—6双胶鞋(朝鲜人穿的橡胶鞋)，3公斤植物油，7公升酱油，7公斤黄豆和12公斤盐。最高级别的人占1%，第二级别的人占6%，第三级别的人占17%，73%的工人属于第四、第五和第六级别，他们这类较低级别的人获得的供应比较少。

按照票证供应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工人和职员家属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的需求。

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几乎不能按照票证得到肉食、油脂和糖。渔产品的供应也不经常。

市场上食品的价格非常高。比如，1公斤肉需要250—300元，1公斤鱼需要100—200元，1公斤大米需要100元，1公斤土豆需要30—40元，1升豆油需要600元，10个鸡蛋需要130—150元，等等。工业品的价格情况也是这样。纺织品、衣服和鞋的市场价格和商业价格都很高，几乎大部分国民都买不起。

国家在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建造了35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然而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仍然居住在地下室或者简易住所内，这些简易住所是用高粱秆和黏土建造的。城市居民冬天极缺燃料，学校校舍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室几乎不能取暖。

今年农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朝鲜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在把地租、灌溉设施使用费以及机器租赁站的一些费用上缴给国家之后，在新一季庄稼收获2—3个月之前他们的粮食就已经不够了。

这样，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朝鲜国内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为低下。许多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家属长期吃不饱，得不到暖和的衣服，生活在条件极差的住所里。

在国家分配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苦。关于这方面应该指出，南朝鲜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居民的粮食状况要比北朝鲜居民

好一些。南方居民必需品的保障程度也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破坏要轻一些，也是由于南朝鲜市场上充满了美国的工业品。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朝鲜人民目前经受的苦难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是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还没有被恢复，也是由于以前朝鲜朋友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和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朝鲜的国内状况严重苦难，朝鲜劳动党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过去遭受外来压迫，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困苦。

然而，由于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侵略事件以及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防备南朝鲜当局和敌对势力在南朝鲜的代理人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为了做好群众的政治工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也非常注意深入研究朝鲜人民军官兵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居民的情绪。

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美国人和南朝鲜当局加强了针对朝鲜的破坏活动。在这段时期敌对势力更加频繁地把他们的代理人送往北朝鲜，更加频繁地散发传单，他们的广播节目也加强了侵略论调。11月份汉城和南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号召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为了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几百名汉城大学生在11月底乘坐汽车到了三八线，他们号召北朝鲜人民“以匈牙利为榜样”。

应当指出，北朝鲜人民对南朝鲜日益加剧的挑衅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回应，也没有发现什么反对人民政权和朝鲜劳动党的言论。

这段时间朝鲜许多工厂、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举行会议，平壤市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反对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挑衅活动，这些都证明，朝鲜人民支持朝鲜的人民民主制度。

最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非常注意在党内和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何况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松散：党的队伍中有

116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这意味着朝鲜每八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也考虑到，60%的党员是农民，23%是工人，86%的党员和预备党员是文盲，他们只读过小学，只有0.8%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受过较高的教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54年事实上停止了接收党员，在这一年开展了检验党性的运动，今年要更换党组织发的证明文件。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意识形态工作。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科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删除其中那些用个人崇拜的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

谴责了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现象，也谴责了把苏联的一切经验都机械地运用到朝鲜实际工作中的现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改革了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过去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

同时为了改正意识形态改革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开始在报纸发表更多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剧院的剧目中重新加入了苏联和俄国的话剧，不仅在党的建设中全面推广苏联经验，而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中也全面推广苏联经验。

今年10月份召开了朝鲜作家代表大会，而在11月召开了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大会，这些都显示了朝鲜知识分子和青年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周围。这些会议反映了他们对朝鲜劳动党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支持，反映了他们对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支持。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核心发生了明显变化。同以前的政治委员会相比较，改选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增加了两倍，其人员组成都是那些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拥有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干部。有5名前领导人被留任，其中包括金日成、金科奉、朴正爱、金一和朴金喆。其中，金科奉和朴正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最近有所削弱。同时，当选的常务委员会新成员的作用和影响加强了，他们是崔庸健、金昌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一龙(副首相)和金光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崔庸健、朴金喆和金昌满在任用干部方面做得并非都对。比如，他们经常夸大从中国和苏联返回朝鲜的许多领导干部的错误，企图把这些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委员会委员许哥而、朴一禹的，然后也这样对待朴昌玉、朴永彬和崔昌益。对他们都采取了严厉措施(逮捕了朴一禹，罢免了崔昌益)。最近针对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被看作是党派集团和反党活动。

应当指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崔昌益返回了平壤，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问题；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一个水泥厂的领导人；一些朝鲜劳动党党员被恢复了党籍，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以前苏联籍朝鲜同志的态度向好的方向转化，其中一些苏联籍朝鲜同志官复原职甚至得到了提拔，被安排到驻外机构从事外交工作。

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进行了解释工作。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有：大会报告、金日成的总结发言以及关于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完整文本，这些材料都被分送到各道、市、郡和基层各级党组织以便对党员进行相应的解释工作。

一些地方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材料的同时，也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各级党组织会议，特别是各部和其他大型企业机关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议都召开两天、三天甚至四天时间。按照朝鲜同志们的通报，他们不得不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大量的组织和解释工作，以便向党员们证明必须通过决议恢复崔昌益和尹公钦等同志的名誉，向他们说明，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党内应当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并且同志般地对待他们，而不要采取惩罚措施和行政方法；他们不得不证明一些同志的错误发言，这些发言要求严厉谴责崔昌益等人。

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且还出席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各级党组织会议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对地方上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意见，批评他们不够关心劳动人民，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些批评意见包括，要求他们加强住宅建设，加强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的供应等等。他们也提议说，各企业在提拔工长和队长职务时要考虑到工人的意见，对生产先进分子的奖励，也要根据工人集体推荐。

对于党员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时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和要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都进行了总结并且在实践工作中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和要求。

党内来自下层的批评也更加勇敢了，然而，对最高党组织的批评还不够。各级党委在实践中越来越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越来越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这些材料把说服教育的方法看作是教育党员的基本方法。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一些党组织重新审查了由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而被开除出党的那些同志的案件，其中两名副主席和平壤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被恢复了职务。然而，前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前不久由于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被重新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开始遵守列宁主义关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准则。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走出的只是第一步。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和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956年11月20日和27日地方权力机构实现了选举。绝大部分居民参加了选举，对朝鲜劳动党、其他党派和社会组织推出的候选人进行了投票。有99.73%的选民参加农村人民会议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89%的选民参加郡、市级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93%的选民参加省级候选人选举投票。现在正在准备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预定在1957年4—5月份举行。

朝鲜朋友们认为，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恢复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以便不在党内和国内引起不良后果。

消除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朋友们采取渐进的政策。最近朝鲜劳动党的决议和文件指出，朝鲜劳动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在朝鲜朋友们承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朝鲜的个人崇拜没有消极后果。朝鲜朋友们

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在宣传中不再颂扬金日成，文学和艺术工作也实行这一方针。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都经由集体解决；对那些对领导进行批评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

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朝鲜朋友们的称赞和支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声明，对于苏联政府发布的这份声明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同苏联政府讨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即完全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友好合作，循序渐进，努力推动苏朝关系的不断发展。

尽管朝鲜朋友们宣布对于这份说明他们对苏联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朝鲜的一些内阁相非正式地提出了现在个别苏朝条约和协议中的不平等的地方，这些不平等损害了朝鲜的权利。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这段时期，极不正常地对待苏联籍朝鲜同志，并且在朝鲜人民的民族历史进行宣传的时候也犯了错误，在反对一切外来东西的幌子下经常禁止宣传苏联的活动，而现在他们改正了这些错误。

在谈到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对朝鲜进行访问的必要性时，金日成说，各党相互关系之间的这些访问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同时应该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最近在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特别消极的因素。

应当指出，朝鲜和中国关系中的不正常因素产生于反对美国和李承晚军队的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朋友和朝鲜领导人在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发动和进程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对待中国朋友们的态度不对，这种错误态度不符合中国人民给予朝鲜的巨大援助，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时期。

朝鲜朋友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宣传明显不够，而推广这些经验或许会给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的国家建设带来实际的利益。

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非常少。

金日成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中国民族节日到来时金日成没有参加那次隆重的民族节日盛会，也没有出席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然而他却出席苏联民族节日时举办的这类活动。朝鲜朋友们很少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见，也很少同他们商量朝鲜劳动党和国家建设的相关问题。

对中朝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出逃到了中国。朝鲜朋友们认为，中国方面将会遣返这些出逃的朝鲜领导干部，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这样做。在中国朋友们看来，这些出逃者将继续“抹黑”朝鲜领导人在这些朋友们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中国朋友拒绝向朝鲜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使中朝关系更加不正常。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额外的无偿援助或者提供5000万元贷款，他的这个请求三个月没有得到回应，而后的答复是拒绝。因此朝鲜朋友们取消了朝鲜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事先商议好的，打算派遣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与中国签订1957年的贸易协定。

朝鲜朋友们对中苏代表在1956年对朝鲜的访问作了积极的肯定，然而，他们不满的是，彭德怀作为中国代表被派到了平壤。彭德怀好像不受朝鲜的欢迎。

上述论述证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尽管做了一些工作来改善劳动党内的状况，来实现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朝鲜劳动党内及朝鲜国内的情况仍然是复杂的，这需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逐渐采取措施来贯彻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而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也非常关注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

考虑到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仍然极其困难，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今后巩固朝鲜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朝鲜的必需条件。

关于以上指出的朝鲜领导人和中国朋友们关系的不正常性，金日成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分送以下同志：

布尔加宁、朱可夫

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

卡冈诺维奇、毛希丁诺夫

基里琴科、福尔采娃

马林科夫、什维尔尼克

米高扬、阿里斯托夫

莫洛托夫、别利亚耶夫

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

萨布罗夫

苏斯洛夫

赫鲁晓夫

第2/III号

1957年1月2日

РГАНИ , ф.5 , оп.28 , д.486 , л.1-17

**№16686-4 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
(1957年 [\[53\]](#))**

副本

地理科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副主席阿列克赛·华西里叶维奇·斯托日科致朋友、冻土学研究所学者A.M.切卡希洛的信

再一次祝贺您节日快乐。您白白地抱怨我了。事与愿违，我对您最近的来信一封也不能回，因为我去国外出差了一个半月。至于这次出差，我在莫斯科跟您说起过，并且我记得在信中写到过。确实，我想不能，当然也没有告诉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不起您，请原谅。我没有从中国给谁写过信，甚至给家里也仅写过一封信，为此我当然要受到训斥。但是那里的状况是这样，甚至没有足够时间做梦。要知道，我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工作。而工作到处多得吓人。我们的路线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格罗迭科沃—哈尔滨。哈尔滨工作10日后的路线是：哈尔滨—牡丹江—密山—虎林—锦西—穆棱—牡丹江—哈尔滨(这样的环形路线)。在哈尔滨休息3小时后(未来得及洗澡)的新路线为：哈尔滨—沈阳—天津—北京。在北京工作10日后的新路线是：北京—长春—吉林—丰满—长古里(Чаньгуль)—哈尔滨。最终，在哈尔滨逗留2天后。经过牡丹江和绥芬河回家。出差的任务是：让中国同志熟悉自己的工作、资料、示意图和未来计划；熟悉他们的资料，考察他们的资源，同水工技术、地质学、冻土学、土壤学、林业、农业和其他机构(包括科学、教学机构，也包括设计机构)建立联系；而最主要的是同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建立私人接触。间隔一个月之后，我们带着同样那些任务被B.T.佩科夫派往朝鲜。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我们提出任务：同邻居建立最紧密的科学联系，按许多科学领域归纳选题，而如果需要，那也可全部修改我们的选题、计划和纲要。我们是打着阿穆尔考察的旗帜来中国的。但我们在当地得到证实，这种旗帜在那里显得太破烂和褪色了。要以自己的旗帜即以远东分院的名字来开展工作。对中国同志而言，远东存在苏联科学院分部，是完全意外的。他们差不多是在同一计划内开展工作的。对我们的手稿(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印刷品，因为手稿上还标有“机密”字样)，他们简直是一抢而光，分成若干部分，马上开始翻译。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著作作用中文出版，随后翻译成俄文再版。

一般来说，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惊人的强烈印象。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任务——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因而包括我们的科学)。但一切表明，他们完成计划要花长得多的时间。他们首先从此开始，从建设和装备研究所开始，这方面显示出的规模，让我们看得头昏脑涨。他们4年来建成的研究所要比科学院存在20年来建成的多好几倍。仅仅在中国科

学院东北分院，就建成了10个左右研究所，其中包括带冻土实验室的建设研究所(我们还没有这种研究所，而中国已经有了，怎么样!)冶金研究所、土壤学研究所、林业研究所等。每个研究所，占地好几公顷，建设的建筑物规模有好几万立方米。建筑物内部有最完美的设备，这只是我们研究所所梦想的，其中也包括莫斯科的研究所。设备主要是从两个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订购来的。虽然也有我们的设备，但最新最完美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见到过。这方面最诱人的是，这些研究所已经建成，而他们的设备是在我们的顾问指导下订购和配备的。那么说，我们的学者在别人的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部属研究所、高等学校和设计院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普遍存在甚至莫斯科理解的那种糟糕的拥挤，但公共建筑物、文化生活建筑物，研究所和高等学校是宽敞的，虽然工作人员和学生人数到处是巨大的。在高等学校，有7000—8000名大学生和500名教师；在设计院分院，有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规模真正是惊人的。他们甚至在拍集体照时，也一定是500人或1000人一张。

在东北，没有一个大城市不建立数十个研究所的。而且，他们建设得很快(规模2万—3万立方米的楼房，在半年内建成，包括所有各类作业直至建筑物周围的设施)、很漂亮、很有质量(墙体和设计是我们的，而屋顶是中国式的)，也很便宜。在一个项目上集中了500—600名工人，每人每月挣工资30—40元(按官方汇率60—80卢布，或按黑市汇率300—400卢布)。机械化是最少的：矿井升降机+混凝土搅拌机，这就是全部。

纪律和组织是极好的。一名技术人员领导这500—600名工人。设计图纸是最少的，而施工图纸全部都装在这位技术员的脑海里。

但中国最珍贵的是中国人自己。他们热爱劳动，遵守纪律(40天中没有见到一个懒汉，一个醉汉，一个逃兵，虽然处于最密集的人群中)，极有能力掌握所有科学，行动果断，敢于首创，不仅对我们俄罗斯人，而且他们相互间也很礼貌、很客气，但最主要的是人人都正直。如果把照相机遗忘在商店或存衣箱(我们以前有这种情况)，过了一小时、一昼夜或一星期，它就回到你身边了，也就是说你会找到它们。所有国内开销都是凭承诺进行的。把钱交给出差者没有收据，他凭自己的良知来花钱。返回后要交回剩余钱款，并按照规定将发票附上。无论他使用多少，谁也不会指责他。不过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出差者想多花费一个

卢布。罗戚柱(ЛыЦы-цжы)教授得到考察费6万卢布(7个人考察了两个月)，他花费了4600卢布，剩下55400卢布。要知道“花费”是按我们的标准精确计算的。

他们花费唯一不节约的是招待和照应苏联同志。遗憾的是，许多莫斯科人没有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个年轻而贫穷的共和国，他们的节约规定不是空话。因而不应该以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随便吃，可以睡高级旅馆，乘国际列车。诚然，离开之前，阅历丰富的莫斯科人对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无法顾及我们的感受，实在是用强力将奢侈的接待强加于我们的，而拒绝这种接待，中国人会用引起国际纠纷来威胁。但这一切都是谎言。当我们告诉主人，我们非常喜欢中餐，但按照习惯，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俄罗斯饭菜。这种俄罗斯饭菜不是由20—40道美味菜肴，而是由2—4道普通简单菜肴组成。他们马上相信我们，保持平静状态。我们单独用了餐，并全数付了我们的饭钱……我们说，在苏联乘国际列车的只有部长，而乘软卧车厢的只有厂长经理。于是，我们决定坐硬卧车厢。我们乘坐普通列车，认识中国同志，要比乘坐软卧“监狱”有意义得多。他们相信了我们，心情轻松，因为他们跟自己人在一起乘车，跟他们打牌，要比寂寞地与我们在一起感到有意思得多。很快我们也迅速掌握了他们玩都拉克(即“傻瓜”)扑克的游戏规则，之后也把自己的游戏教给了他们。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6, д.506, л.94-97

1957年

№10181 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1957年1月4日)

苏共中央：

鉴于1月7日周恩来行将访问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建议将与中国朋友讨论涉及苏中关系、国际局势以及朝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一、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2739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名，经济领域的顾问123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2213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374名军事顾问和专家。

考虑到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中和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阐述的关于此问题的我方立场，可以讨论苏联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宜或者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数量的问题。

二、最近，不论从我们方面还是从中国朋友方面，都没提出任何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可能中国朋友会在会谈过程中提出某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补充研究此类问题。

三、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希望就涉及朝鲜局势的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

在此种情况下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这种强调应是适宜的。

四、由于英法武装干涉埃及、匈牙利事件以及美国近东和中东政策危险地活跃起来，造成近来国际局势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考虑到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可以就国际局势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会谈结束时签署一个联合声明是适宜的，在联合声明中要强调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和双方在评价当前国际局势时意见一致。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谢皮洛夫

1957年1月4日

附件：

我们认为以下做法是适宜的：

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介绍波诺马连科同志今年12月7日、11日和12日关于波兰局势的密电内容，但12月12日密电中涉及在波兰军队的建设中采用中国军队经验的地方(第15页第3段)除外。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谢皮洛夫同志)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准备并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局势的材料，以便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期间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材料中应列举具体事实说明苏联军队从希特勒占领军铁蹄下解放波兰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人民的贫困处境和波兰经济的崩溃；说明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波苏关系的特点和1944—1956年期间苏联对波兰经济援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苏联为捍卫波兰利益提供的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问题等)；对近期波兰报刊和电台的观点进行综合：对今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波苏会谈进行的总结等。

三、委托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准备一份转交给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其内容是关于波兰报刊是如何不正确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关于波兰，特别是匈牙利局势问题的立场的。

四、委托苏联外交部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通报关于波兰的局势。

五、委托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大使保持紧密联系，并直接地以及通过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中的真诚朋友帮助中国大使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客观的、正确的情报。

六、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在方便的场合(比如，在某一次招待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会晤，向他阐述自己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并在周恩来同志抵达莫斯科后，就上述问题向他通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16683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1957年1月5日)

绝密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上由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准备的情况报告《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此调研报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即将来莫斯科而准备的。

附件共15页。

А.葛罗米柯

1957年1月5日

第12/2号

文件送：Н.А.布尔加宁同志、К.Е.伏罗希洛夫同志、Л.М.卡冈诺维奇同志、А.И.基里琴科同志、Г.М.马林科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В.М.莫洛托夫同志、М.Г.别尔乌辛同志、М.З.萨布罗夫同志、М.А.苏斯洛夫同志、Н.С.赫鲁晓夫同志、Г.К.朱可夫同志、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Д.Т.谢皮洛夫同志、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Е.А.福尔采娃同志、Н.М.什维尔尼克同志、А.Б.阿里斯托夫同志、Н.И.别利亚耶夫同志、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已用于关于越南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2月15日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0份

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情况报告)

195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明显尖锐化了。在客观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影响越

南民主共和国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是越南劳动党在领导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重大错误。

在1956年夏季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以及随后的中央委员会第十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讨论了党在进行农业改革和整顿农村党组织时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会通过了关于纠正错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法制和改善职工生活条件的决定。不过，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地方上会犯新的错误。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局势，至今仍是紧张和不安的。

(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越南农村的局势，那里生活着约占共和国90%的居民。

还在解放战争进程(1946—1954年)中，越南同志就实现了一系列农业改造——开始是减租和减息，而从1953年12月起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党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与富农达成协议，消灭封建剥削阶级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到1956年前夕，已在拥有417万农村居民的的土地上进行了农业改革，而从1956年1—8月，在约有600万居民的地区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农业改革。总共剥夺了地主69.8万公顷耕地，其中1956年剥夺了37.68万公顷。^[54]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被摧毁掉，而他们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部分分配给了占农民中绝大多数的中下农。

不过在进行改革时，主要是在1956年，犯下了严重错误和过火的做法。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领导人，事实上放弃了对农业改革的领导，把它交给中央委员会所属组织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虽然这一小组形式上是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总理和总书记长征领导的，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小组的工作，而过分信任中央委员胡维泰(Ховьетан, 农业部副部长)和黎万龙(ЛеВанЛонг, 内务部副部长)来领导这一小组。

从城市向农村派了超过3万人的干部工作队和工作组，他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工作队和工作组很少考虑当地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意见，主要用行政方法来行事，没有依靠贫下中农。

其结果是，越南劳动党的农业改革路线在许多地方被歪曲了。往往没有考虑到中农的经济利益。存在剥夺中农土地而给他们分坏地的事实。部分中农被不正确地划为富农。中农的政治权利受到了限制。

在执行党在农业改革期间与富农达成和解的方针时，遭到了特别大的歪曲。把许多富农看作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禁止雇佣雇工，剥夺富农的政治权利。把农户划入地主行列，应在农民代表会议上进行，随后由省级行政委员会批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此程序被破坏了。在地主中间，并没有划出解放战争的参加者，他们的财产不应该被没收，而应被赎买。

党对保护教堂、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方针遭到破坏，征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没有留下法律规定用于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夺走了宗教人士的土地。

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还被赋予摧毁反革命组织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某些结果。不过，工作队和工作组的脱离群众，轻视当地党组织的意见，导致许多正直忠诚的人们受到镇压。存在迫害贫农和中农的大量事实，原因是他们和地主、富农有“联系”以及在国外占领期间参加傀儡组织或在傀儡军中服务。

往往根据挑拨性的言论或者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进行逮捕。同时，有部分敌对分子仍然未被揭露。

在农业改革进程中，工作队和工作组同时进行确定农民土地面积的工作。通常是份地的数量被提高了，从而造成农户交纳农业税的增加。

由于农业改革中所犯的错误，相当部分劳动农民降低了劳动积极性，恶化了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又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出现政治道德状态的恶化。

为了纠正农村中出现的状况，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消除确定阶级归属时所犯的违法行为，为所有不正确判罪的农民恢复名誉权利，弥补给他们带来的物质损失，纠正虚增的土地面积和税收。

全会的这些决议，农民表示满意，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局势。1956年稻米获得好收成，也对农民情绪产生正面影响。

不过，在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纠错工作中，现在已发现有严重的不足。在一系列地方，干部考虑欠周密并表现出急躁情绪。在释放因错判而坐牢农民的同时，往往也释放了被正确判罪的人，其中也包括参与破坏活动的地主。坐牢释放的人返回农村，也同时产生了复杂情势，在一系列情况下还出现了严重的混乱。1956年底，许多农村发生了坐牢释放者和干部间的斗殴。在一系列地方，参与这种冲突的有几百人，有被杀害的也有受伤的。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地国家机关和党组织不情愿纠正所犯错误，竭力将其掩盖起来。

(二)

在工业和财政部门，存在严重困难。在解放战争进程中以及法国人撤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期间，所有重要工业企业都遭到破坏或拆除。超过8.5万人失去了工作。所有铁路、公路和主要通信线路都报废或拆除了。八大水利设施的破坏以及大部分耕地的毁坏，给农业带来重大损失。国家国民经济的出口部门陷于衰弱。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同志没有根据地给自己提出了短期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重工业的任务。对于一个没有多少发达工业、训练有素干部和本身积累的国家说来，即便在外力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在安排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情况，忽略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的问题，没有对生产出口产品的经济部门以应有的注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层，存在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来发展经济的意图。

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友好建议，越南同志于1956年开始采取某些措施重新考虑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决定修改1957—1959年三年计划的草案，准备缩减计划建设的重工业企业数量，代之以建设11家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厂。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近年来恢复了一系列重工业，并建成了一系列新企业。不过，工业总产值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55年等于战前水平的18%，而且1956年准备达到40%。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建设计划完成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首先是由于专业建筑工人不够，建筑材料不足，设备供应期限违约以及一系列组织缺陷，经常改变基本建设计划。所有这一切导致新工业建设和投产的拖延。例如1956年上半年，在兄弟国家帮助下规定开始建设36个项目，投产7个项目，而实际上开始建设的只有16个项目，投产2个项目。

现有的国家工业企业，胜任不了计划任务。其中许多企业的机床和设备的利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机器的故障和损坏不少。一系列加工企业的原料(棉花、甜菜、烟叶等)得不到保证。由于1956年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大幅度没有完成，原料困难也将延续到1957年。

职工的劳动纪律水平低下。缺工、迟到、借口疲劳而擅自离岗的问题大量存在。例如1956年夏季，鸿基(Хонгай)煤矿开采地有几天约有半数工人不去上班。不过，不管是上班的还是旷工的，工资都一样支付。所有这一切会对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不良影响。

工人阶级和大多数职员的生活水平极低。工人的月工资波动于3万越盾(1卢布约等于1000越

盾)范围内。这种工资水平远远不够养家糊口。例如在荣市的磷肥厂,工人本人每个月仅仅在工厂食堂就餐花费大约1.8万越盾。第十次全会后,员工的工资和军人的固定津贴作了某些提高(增加5%—15%)。国内仍有部分失业。至1956年7月,失业人数计3.06万,其中河内和海防有1.86万。

私营经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商业中起到相当大作用。1955年的这种比重,在工业中占85.8%,在零售商业中占66%。这种占优势的是手工业和小型工商企业,其就业人口超过200万。

直至最近,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发展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以及私营商业的领导仍是薄弱的。对这些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政治和教育工作估计不足。对手工业主和私营业主的原料、设备供应以及国家贷款组织得不好。因而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企业开工不足,而其中有许多被迫停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失业者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是对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建筑材料、陶器、鞋子、食品、金属制品、木材、甘蔗、皮革、毛料)的生产和内贸的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手工业的私营工商业经历的困难,造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绪大大变坏。

最重要出口商品(煤、水泥、木材、花生、酱油等)的生产,仍然是少量的。1956年同10个国家和个别公司签订了总额2.521亿卢布的相互供货合同(出口1.269亿卢布,进口1.252亿卢布)。但是,由于国内出口商品的不足,1956年上半年签订的供货合同总额只有9330万卢布,同期运出的商品实际上只有2370万卢布,为年度计划的18.8%。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贸平衡形成了很大的缺口。

恢复和发展消费品生产工业的速度缓慢以及现有商品储存量的枯竭,导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56年下半年出现商品短缺局面。棉布、服装、过冬棉衣和毛衣、糖、药品、纸张、自行车等的供应严重不足。1956年工业新产品价格连续上涨。仅仅从1956年12月20日起,一系列商品(雪茄烟、夹心糖果、大麦米、丝绸、毛料等)的国家定价就提高了30%—100%。与此同时,稻米价格由于大丰收而下跌,从而造成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

提高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以及给受到不正确镇压的人发放补偿,要求补充发行纸币。仅仅是在最近2—3月间,印发了总额超过200亿越盾的货币,此举导致越盾的进一步贬值。越南同志认为,1956年越盾的贬值不少于15%。

业已形成的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更加强化城乡居民的不满。

(三)

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机关和团结所有人民进步力量的祖国阵线的作用遭到贬低,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造成负面影响。战时证明是正确的限制的民主,在目前条件下成了提高劳动人民政治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的阻力。

如公民选出的人民议会这样的人民代表机构,作用大为降低。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会议不经常进行选举。全国会议在十多年间没有进行过选举。宪法遭到破坏,执行委员会绝大多数不是由人民议会建立的,而是由上面决定的。执行委员会不向人民议会和选民作报告。官僚主义、行政化、忽视居民的需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中极为普遍的最大缺陷。

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选举审判机关,还没有研究立法。这在一系列情况下会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权力。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强调重视巩固民主权力机关和强化国内法制的问题,特别是通过了下列决定:1957年选举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议会以及选举这些机关的执行委员会;所有各级执行委员会务必定期向人民议会作汇报;研究修改宪法(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宪

法是1946年通过的)和人民议会进行补充选举以接替已离开代表的问题;准备补充现有法律,特别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利问题法律的建议。

越南劳动党对领导所有主要社会组织和政党参与其中的祖国阵线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一系列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建立祖国阵线组织。在建立这种组织的地区,它的工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越南青年联合会、越南妇女联合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组织中,政治教育工作也做得薄弱。吸引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民主建设不够。越南劳动党忽视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参加祖国阵线的政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合作。

参加政府和政府机构的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但是,他们参与这些机构的工作,带有纯形式性质。越南劳动党成员,不考虑非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批评性言论,没有努力发挥他们的工作首创精神,这就加剧了存在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不满情绪。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进对祖国阵线以及参与其中的政治组织工作的领导,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积累的丰富经验。

(四)

越南劳动党长期以来成功领导了越南人民的武装斗争。不过在战后时期,它没有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队伍,拖延了和平时期条件下对党工作的改造。

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对思想和理论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就导致了越南劳动党的部分干部和许多普通成员没有好好弄懂党的政策的实质,所以也不能在生活中积极地、创造性地加以贯彻。

民主集中制和党与人民群众牢不可破联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成为党的生活的法则。像战时一样,现在的县、省和地区党委也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从1951年起没有召开过党代会。越南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和党务机关的工作中,通常没有得到遵守。许多事实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所有活动中的薄弱性。迄今为止,党内缺乏关于党组织工作基本问题,特别是干部选拔和任职检查问题的明确方针。

工业中心的解放,为更广泛地在居民的无产阶级部分中开展工作以及接纳工人入党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这种机会利用得极其不够。到1956年1月1日,企业职工中共有共产党员2700名,即不到党员总数的1%(到1956年,越南劳动党的党员为33.2万名——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但是,1956年几乎没有接纳工人入党。越南劳动党的干部依靠工人不够,不好好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在与农业改革同时进行的农村党组织整顿中,对农民党员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到1956年1月1日,农村有党员18.76万名)。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委托给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部,而实际进行此项工作的是当地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许多党员被没有根据地指责为参与反革命活动。镇压也包括体罚,带有大规模性质。在日本占领越南时期和解放战争进程中就得到锻炼的许多好党员被判了罪。党组织松散,毫无秩序。县党委和省党委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受到怀疑。结果到1956年8月,经审查的15万名党员中,有8.4万名受到了处罚(开除党籍、逮捕等)。

整顿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导致这次最重要的运动没有达到目的,给党带来损失,被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评价为沉重的失败。在越南劳动党内造成了一种紧张的、不安的局面。老党员数量的减少,对党员队伍的团结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在一系列情况下,造成党战斗传统的丧失。在党员中,也包括在干部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对所执行政策的正确性产生疑问或缺乏信心。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1956年11月底向苏联驻中国大使表述的中国朋友的意见,越南劳动党某些领导人,特别是总理范文同,怀疑迄今为止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展方针的正确性。这些领导人把农业改革看作是错误的措

施。

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的权威被贬低了。这从负面影响了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以及党和群众的联系。正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阮维桢1956年11月告知苏联大使的那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还没有占据以前的领导位置。团结遭到削弱，对党的信心不足，是现今局势的严重现象”。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坚决揭露了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纠正错误上。全会委托政治局拟订关于巩固党首先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以及扩大同群众联系的具体措施和计划。全会还责成政治局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原则，并准备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的计划。

不过，不论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还是在随后的措施中，仍然不够重视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居民中开展工作的问題。在思想理论工作和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党方面，继续存在重大不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在部分越南党员，其中包括领导人中间，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尤其是表现在，不友好地对待中国顾问以及很少宣传越中友谊。

全会决议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正确对待。在党组织会议上，党员们赞成全会拟订的纠错措施。不过，执行全会决议暂时是缓慢的。在一系列地方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即恢复了所有被开除者的党籍，虽然其中有部分人被开除是正确的。

(五)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外的敌对分子，试图利用已形成的局势来强化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破坏工作。他们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后，积极鼓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提供“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以及“严惩”犯错误者，力图以此消灭或者败坏越南劳动党内，最训练有素、最忠实的干部的名声。在右派分子的感化下，社会党和民主党越来越摆脱越南劳动党的影响。在这些党派周围，开始聚集一些人，其目的在于限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按资产阶级路线发展国家。

出现了坚持反动方向的报刊。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派别，开始出版报纸《人文》(根据1956年12月18日河内行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纸《人文》被封闭，并禁止发行)和《光华日报》，并在其上发表攻击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政策的文章。私人出版的某些报纸，如《新时代报》以前对人民政府取奉公守法的立场，现在开始攻击人民民主制度。

敌人最注意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他们在一系列地区组织了天主教徒的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判刑的天主教神甫。破坏分子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准备11月在义安省(Hue)发动农民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只是在军队帮助下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敌视性鼓动的影响下，要求允许自愿者进入南越的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提供类似要求的大量信件，寄至国际越南委员会。

吴庭艳政府和美国间谍旨在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推动此情况的是南方当局。尽管人民不满现行制度，但南方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下，南越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吴庭艳的制度(美国每年向南越政府提供大约3亿美元)。1956年初，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净化和巩固”，从中清除了民主主义分子。1956年4月，基本上粉碎了反吴庭艳的教派武装力量。3月，举行了立法会议选举，立法会议通过了具有煽动性的越南共和国宪法。

从南方广泛派遣有经验的破坏者和间谍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下列状况，即民主共和国的安全机构还很薄弱，混杂有形形色色的人和异己分子。具有代表性的是，战争结束后，在加强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条件下，安全机构没有破获过一起大大小小的重要反革命组织。

南越政府竭力利用北方的尖锐化局势，来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存在大规模花岗岩的问题。11月29日，吴庭艳政府在第十一届联大全体会议上通过菲律宾代表团致信联合国，要求进行干涉，以保证在北越的民主权利。根据比诺不久前在法国国民会议的讲演来判断，法国、美国 and 英国都企图支持菲律宾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的吴庭艳挑拨是非的诉状，以强化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污蔑运动。12月4日，南越的立法会议通过了“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罪行”的决议，并且号召“自由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吴庭艳政府打算提出开放北纬17°边界的问题，这样就有可能毫无障碍地从南方派遣间谍，并且组织部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转移至南越。

南越政权加强了军事准备，特别是北纬17°地区投放了4个师。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标定线和水域事件的次数更加频繁了。

越南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不满分子和敌对分子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举动以及美国 and 南越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挑衅。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图加里诺夫

1957年1月5日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2, д.485, л.1-16

№21485 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1957年1月5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年1月5日

第1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

情报委员会：

现将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呈送给你们。

附件共30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2月15日

附件：

第10号文件

1957年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

(情报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吸引了中国社会广泛阶层的集中注意力。党员、工人、国家干部、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界，都在座谈会上、政治教育班课堂上和讨论会上积极讨论代表大会的材料。代表大会结束后，其材料就成为党组织政治学习网的学习科目。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和阐明代表大会提出的新问题。

共产党员、广大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护，并且力求将其实施，广泛反映于会议和集会上的发言中，反映于中国报刊上，反映于工人农民申请入党的人数增加上。

说明不同阶层人民对中共八大深切注意和具有兴趣的事实是：代表大会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的中央报纸杂志销量明显增加。例如在北京，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报纸的零售量翻了一番；在太原市报纸销量从2.9万份增至5万份；其他城市的报纸销量也增加1—2倍。《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

我们不详细描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反应和资料，而只是努力说明某些不是从公开报刊上获得的反映，并就中国社会舆论最感兴趣的中共八大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根据普通党员、中下层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言论以及中共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措施作出回答。

据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中共八大在务实的气氛中进行，没有喧哗，没有在企业开展庆祝代表大会的竞赛，这种情况给许多党员、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指出，中共八大的报告是简洁的、务实的和谦虚的，没有自吹自擂，没有预先过高评估代表大会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的普通党员和干部，对代表大会工作的组织往往提出相同的批评意见。例如，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这里和其他地方引用的新华社记者的资料都属于刊登在该通讯社秘密简报上的专门情报，这些简报仅供领导干部阅读)，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某些干部表示，中共八大对党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注意不够。他们认为，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共的成就说了很多，但关于缺点和错误说得很少，说得不具体。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够。在中共北京市委，有些工作人员将中共八大和苏共二十大相比，很多地方是在总结经验，但不像苏共二十大上那样，谈及工作中的缺点很少、很表面。根据重庆市某些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主要注意到目前的内政问题，阐述理论问题的地方不够，而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和殖民地反帝运动的一整套理论问题，并且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政治结论。

不过，部分党员和干部发表了相反意见。例如，根据今年9月19日来自重庆市的消息，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中共八大最强的方面之一是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的证明。有鉴于此，有些人宣称：“以前一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那么我们就研究苏联的理论，虽然我们有了某种比它更好的东西。”

共产党员十分注意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理论新问题。在有些党组织，党员们阅读刘少奇的报告后，就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争论，特别是下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吗？为什么只有到1956年中共中央才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开始就已确立？现在如何对待现有的学习资料，其大部分是专门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的？多党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矛盾吗？如此等等。在北京的科学界，在高校社会科学教师中间，至今在讨论过渡时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问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矛盾的性质，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共存和合作的基础，等等。

考虑到部分党员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某些理论新问题不够熟悉，中国的报纸杂志系统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例如，理论杂志《学习》和《新建设》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阶级性质，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特点，关于允许自由宣传唯心主义的原因，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等的内容丰富的大块文章。

必须指出，在这些文章中，从新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问题。例如在龙浦(Лун Пу)发表于1956年11期《学习》杂志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中，作者发展了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到的原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将会保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新的角度提出关于唯心主义社会根源和问题。作者批评了以前中国(以及还有苏联)哲学文献中盛行的概念，即把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归纳于阶级矛盾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作者把这个观点叫做庸俗唯物主义偏见。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一般说来不仅是唯心主义错误的社会根源，而且是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他说，此外，旧思想的残余还将很长时间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一整套复杂状况，创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唯心主义的存在基础和存在形式。自然，这种唯心主义将存在于同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这种矛盾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思想生活矛盾的反映与集中表现。此一

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将是社会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类似新提法同时，根据我们的意见，个别文章中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原则问题有着不完全正确的或至少有争论的阐述。例如在高放的文章(《关于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新建设》1956年12期)中提出下列原理作为发展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第一步，即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作者为证明这一原理力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这正是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同时，他忽略研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种转变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开始，并且已在自己内容的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

为了保证党的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得到较高水平培训，目前在研究关于一系列政治学校和党校举办专门学习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学习班的问题。

对中共新党章和党加强国家机关与群众联系的组织措施的反响

邓小平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肯定的反响。

大多数中共党员表示同意代表大会关于提高党员和预备党员要求的决议。不过，关于确定统一预备期为一年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希望入党的有些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认为，为他们规定的预备期和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一个样，不完全正确，并表示新规定有利于出身不好的人。有些党员甚至说出了这样的担忧，即中共新党章对入党者规定，一年统一的预备期来替代以前根据入党者的不同阶级属性而规定不同的预备期，会恶化党员的质量构成。

根据某些城市的消息，大部分民主人士、无党派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认为，对入党规定统一的预备期，符合国内新的形势，是个完全正确的措施，是消灭宗派分子道路上的新步伐。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提高了对党员和入党者的要求，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会说，党对知识分子关上了大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南开大学俄语系教师卢绍英(ЛуШiao-ин)的声明。他说：“我感到，开始有利于知识分子的风，近来改变了方向。接纳知识分子入党的浪潮过去了。邓小平的报告说到提高对入党者的要求，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入党的大门牢牢关上了。希望等待到再次刮起一股有利的风，到那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下列情况引起党员大为惊奇：以前是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和张闻天，只是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事实引起了对这些党务活动家未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原因的不同猜测。同时，许多党员注意到，李立三和陈绍禹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党员将此看作党宽大对待犯了错误但有所悔过的同志的证明。不过，有些党员因此而表现出不满，说道：“陈绍禹犯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公开检讨。为什么他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许多党员认为，李立三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十分深刻和有力。

在讨论代表大会材料的过程中，有些党员表示奇怪，为什么中共八大的召开要比党章规定的晚那么久。他们说：“如果这种情况将来再次发生，那么中共九大召开时，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个别党员和干部问道：“为什么中共八大上没有批判个人迷信，难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是个人迷信的表现吗？”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某些城市的消息可见，党员、干部和工人都热烈赞同发展党内民主、巩固党和群众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的措施。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热烈争论。大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着重注意这些问题是件正确和及时的事情。正如北京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思想领域存在主观主义、实际活动中存在官僚主义和组织方面存在宗派主义的指示，完全符合国家的现状。中共北京市

委工业部的有些工作人员说，在一系列机关，官僚主义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们表示，必须组织一次新的运动来纠正工作作风，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广泛斗争，其时应特别注意反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根据其他省市的消息，许多干部也发表意见认为，中共八大后必须进行清党和新“三反”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工作作风的斗争，以前基本上是在中低级别党务机关中进行的，不大触及中央机关。

现在，党组织在逐渐开展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的中央级和省级报纸上，在机关等的会议上进行系统讨论。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措施，在于最大限度地缩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精简管理机关，使管理机关接近群众，减少不同层级数，动员全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同因循守旧、没有效能和无节制、漠视劳动人民事件斗争。

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禁止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增加机关数目、扩大编制。组建新机关和极端情况下扩大编制，只有根据专门决议才允许。中下级国家机关和党务机关的注意中心，是反对粗暴行政方法，反对压制群众批评的任务，其目的是使干部更深入地研究现场的状况，考虑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12月份赴全国不同地区视察赋予很大意义，其目的是调查各地的状况和不同阶层居民的情绪，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为了发展创造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组织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管理及其民主化，摸索职工参与管理的最合理最有效形式。在国营和合营企业，召开职工代表会议，讨论企业管理的工作和组织。此外，在公私合营企业，建立了所谓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固定机构。选入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有职工代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以及资方代表。民主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涉及生产组织和经济管理的问题，反映员工的意见，反对行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虽然这种委员会主要是咨询性组织，不过有权广泛监督企业和行政管理的活动。现在，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合营企业中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社在10—12月间总结党组织讨论代表大会决议的材料时，在自己的报纸上系列刊登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党和政府机关个别领导工作人员骄傲自大以及脱离群众的必要性的文章。10月8日《人民日报》[\[55\]](#)在题为《不要害怕反对意见》的社论中说：“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的不一致。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愈是成熟，就应该愈懂得集思广益的必要，就应该愈懂得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利益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危害。”

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董必武、罗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上关于巩固革命法制必要性的发言。同时，许多民主人士注意到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过程中有错捕错判以及不正确使用称呼和破坏法制原则的情况的发言。经常说到这样的意见：目前极为敏锐地感觉到最快地制订和编纂中国新法律的需求。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士为此表示：“这是个最迫切的问题。当建立组建律师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时，就看到希望获得宪法的公民在排队。人们想知道政府的法律，特别是民法和刑法。现在，国家机关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希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律后要尽可能地制订社会主义法律。”

根据中共八大的决议，考虑到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关于必须加快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和刑法空白的言论，司法机关制订了某些新的法律法令。例如，11月准备和分发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11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关于宽大处理不进行敌对活动的有罪的甚至犯有严重罪行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决定中也拟议了对因反革命活动判刑期满的人给予劳动安排的措施。在全国人大这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限制获释反革命分子权利和对其监督只有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才可实施的决定。

12月18日，在同出席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工商业者代表团代表座谈时，毛

泽东同志说，有些资本家害怕镇反运动，但是这种害怕是没有根据的。毛泽东同志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已过去，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毛泽东同志说，匈牙利事件证明，匈牙利国内有许多反革命分子。中国不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工商业者中间有个别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的数量不多。毛泽东同志说，原先和国民党有联系，但没有严重犯罪的人，不应该算作反革命分子。在反对胡风和揭露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过程中，审查了400多万人，其中属反革命的约占1%（3.3万人），而不是以前设想的5%。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有10%被捕送入劳动集中营。毛泽东同志说，对其他人，仍留在工作岗位上，不再采取惩罚措施。任务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改造。（注：毛泽东同志的话，根据苏联专家E.M.谢苗诺夫同志所作的座谈记录叙述。）

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出席八大以及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的方针，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与兴趣。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对许多共产党员说来，民主人士出席中共八大是出乎意料的。有些共产党员表示，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他们问，当民主党派成为劳动者的政党时，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区别在何处呢？在某些其他城市，共产党员也有相似的反映。例如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上海市和济南市的部分共产党员不能理解刘少奇的下列表示：“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以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党。”因此，个别共产党员不清楚将来这些政党的性质问题。有些干部发表意见认为，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党代会，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相矛盾；对于他们的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可能不会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因为害怕泄露党的机密。

在资产阶级代表和大多数民主人士中间，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引起了最欢欣鼓舞的反响。例如海南省的民主人士，称中共中央的这一步骤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新闻”。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感到欣喜的是，关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的原则写入了共产党的章程。根据民主建国会重庆市组织领导人林广恒（Линь Гуан-хэ）和其他会员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并且给他们以热烈接待，证明真正解决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和相互批评的问题。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民主人士甚至开始热烈争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也是执政党？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许多成员表示，希望中共八大以后允许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而民主党派和团体将享有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独立性。

有鉴于此，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说，虽然中共关于对待民主党派问题的总政策不会引起怀疑，但是在地方上，这个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例如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闻柏山（Вэнь Бо-шань）表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以前有时候不和他商量，甚至对民主人士关于认购公债的意见也不感兴趣。闻柏山说：“关于真正的共同讨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连形式上的讨论也没有。这里能说到什么相互监督吗？”广东省有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成员，也表示怀疑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合作的方针。他们说：“这些党派和团体的基层组织，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经过几年，这些党派的大多数老成员将去世。那时，中共将和谁合作呢？”在青岛，有些民主人士甚至表示，八大提出中共与其他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只是为了叫民主党派更积极地工作”。

考虑到在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中间存在类似的情绪以及实现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的组织问题跟不上，近来中国报刊尤其是《光明日报》发表了不同民主人士关于其对这个新方针理解、关于民主党派和团体新任务的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的政治积极性不高，以及担心和怀疑。

不过整体说来，中共八大之后，各个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基层组织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根据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一系列消息可以看出，中共的地方组织也开始更加注意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了，比较经常地同民主人士商量，更为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工作。据某些事实判断，党组织在努力提高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其方法是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组织独立性。例如从天津的民主建国会组织中，召回了参与其中的共产党员。

1956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团体)中央二次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民主建国会的任务和下一步工作方针，并通过决议强调，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挥工商业者在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性以及提高其自觉性，促进资本家的改造，将其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巩固原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用热爱劳动、无私的精神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经验和知识技术教给工人。

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最重要的若干原则问题”的决定，其中斥责了民主建国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章乃器(决定中未提他的名字)对现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关系问题的错误观点。章乃器的观点归结为：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劳动者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相似了。章乃器据此表示，私营企业变为合营企业后，已经不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了。章乃器的观点表现了部分会员和民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情绪与观点，导致高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低估了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工作和改造的必要性。

自然，研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那些代表会材料，吸引了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力。必须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中共八大材料的反响是极为矛盾的，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政策的不同态度。

相当部分资产阶级，饶有兴趣地、表面上极为肯定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之后，资本家发表关于想放弃转入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利息所得的声明数量明显增多了，他们声明想完全结束剥削，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根据一系列城市的报道，其企业已变为合营的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道：“什么时候最终把我们从‘资本家’这个称呼中解放出来？”

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兴地接受了下列原则：今后对资本家做工作的基本方法将是说服教育。例如，管理天津大型纱厂“恒源”的王秋民(Ван Чжоу-мин)表示：“从形势判断，可以希望将来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要好很多。”

正如新华社记者1956年9月29日发自重庆市的报道，根据重庆市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总结的经验，特别是执行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策方面的经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有些资本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执行了好政策，而且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指明了前途，这将有助于削弱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不过，部分资产阶级对代表大会持极为谨慎、疑虑或敌对的态度，等待人民民主国家出台新的限制，担心迅速取消转入合营企业的股金的定息。例如，天津市“乾忠善”银行的经营者张钟伟(Чжан Чжун-вэй)在表达原资本家一族意见的同时表示：“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易变的：今年对你宽宏大量，明年就再次开展什么‘五反’运动。”有些反动资本家竭力以最曲解的形式来想象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国家机关目前进行巩固合营企业、原资本家的劳动安排、使他们接近员工并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完成私营企业全行行业改造为合营企业后工商业者的活动问题，资本家改造、他们与工会的关系、巩固他们与员工团结的问题等。

考虑到一定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怀疑自己被安排的位置以及担心所投入资本的定息将被很快取消，便采取措施，以便让这部分资产阶级安下心来，并且指出，资本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12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同各省市工商业者(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参加

者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中表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原资本家因将企业交给国家而得定息的期限可定为7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而必要时，如果资本家还将感到有困难，这个期限可能被延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合营企业的资本总额为17亿元，而7年来将以定息付给资本家的达8亿元。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国家不是没收而是收购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家可以安心劳动，因为将来不会有工商业改造的新高潮，一切将逐步适应起来。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目前，80%原资本家按阶级属性来说可不划入中产阶级，而是划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他们的资本很小，他们自己参加劳动。

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云和薄一波同志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陈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欢迎有些小资本家放弃定息，但近期不准备在资本家中间组织某个放弃规定利息的运动，认为把这种期限持续至原私营企业主最终获得劳动安排是合适的。薄一波同志在发言中特别指出：“过早取消支付给资本家的一定定息，会给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条件暂时没有成熟，定息将继续支付。”

由于许多小资本家在企业改造后感到有巨大的物质困难，国家机关给了他们某些补助。如果这些人获得股息——不足2000元，那么他们就不是工会会员，但有自己的新工作岗位，生病时可得到相应的休假以及医疗补贴，与其他员工一样。代表大会也强调，当资本家不领取定息，如果工人们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他就可以参加工会。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报道，中共八大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教师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天津市南开大学的教授和教师，十分注意谈及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任务的代表大会材料。许多教师开始制订自己个人的科研工作计划。与此同时，有些教师说出了对所提出的中国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现实性的意见。例如，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邢索(Син Со)表示：“我认为，刘少奇报告中提及的高校大学生数量增加速度太快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高校大学生数量应该比目前翻番……不过，骨干教师的问题仍未获解决。”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反响及最近中共在经济部门的措施

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间，对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国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积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材料，在党的教育系统和报刊等进行了广泛宣传。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赞成下一步发展国家经济的新方针。

不过，在座谈和学习代表大会材料过程中，个别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非党工人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如果总结部分共产党员、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某些说法，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归纳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物质供应和工人、职员、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够快以及轻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例如，许多城市里的相当数量干部和工人说出了下列意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中共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规定投入工业建设的基本投资太多，而工资增长速度较慢。许多工人认为这种速度太慢，因为他们生活的改善似乎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例如，武汉市的部分工人很不满，今年工资改革后物价上涨了，副食品供应不适应需求，而有些商品仅仅上了黑市。上海市的工人中间，也极为广泛地流行类似的情绪。

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农民的收入增加25%—30%，那么参加合作社后收入很低的，或者生活深受自然灾害痛苦的那部分农民，多少会持谨慎接受的态度。部分农民不满于投入农业的基本投资和投入工业的比起来规模小，收入的提高速度慢。在某些共产党和干部的发言中，也表现出这种情绪。例如，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天津市的报道，在中共县委区委的党务工作者学习的党训班上，许多发言者表示不满，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规定用于发展农业的基本投资只占用于发展经济的总投资的10%。他们表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务必增加对农业的基本投资，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农机、拖拉机等以及更好地向农民供应日常消费品。

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特别是高校教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完成的可能性表示

怀疑，认为任务提得太高。上海和天津市的有些教授也有这样的说法。有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代表发表意见认为，快速发展重工业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国家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这一观点的拥护者表示，目前务必主要注意提高人民物质供应水平的任务，而后全力发展重工业。

必须指出，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推动了类似情绪的流行和强化，特别是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

正如看到的，这种情绪在工人和部分干部中间十分流行，因为这年11月《人民日报》就此问题发表一系列专门文章，解释了在员工物质供应方面碰到临时困难的原因。在《人民日报》11月27日社论《人民生活只能逐渐改善》中说到，党和国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现象和不注意人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现象，不过，中国经济总体落后性，不可能迅速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使这两个方面适当地结合，这不仅是党和政府应当注意的重大政策问题，也是每个工人、职员和一切劳动人民都应当明了的问题。”

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修改了1957年度某些预算指标和生产计划，是共产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措施之一。中央全会指出，1956年的经济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困难。造成这些缺点和困难的原因是：个别计划项目的指标过高，特别是用于大企业建设的基本投资过大，雇佣劳动力过多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必须重新修改1957年度计划和预算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放慢一些，而某些部门的增长指标有所降低。工农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也将有所改变，更多地注意住宅建设。

由于某些商品的短缺，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以及为了保证农产品的销路，近来在城市建立了自由市场，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民、手工业和手艺人可在那里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由于这些市场，城市居民的供应有了改善。进入市场的这类商品，有许多在国营商店里是没有的。不过同时，这些市场的存在，也导致小型私人商业和小型私人企业的很大活跃。在有的城市(例如上海)，产生了许多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自己产品的地下小企业。自由市场的价格根据供需情况来确定，不是由国家直接调节的。这在有些地区导致一系列短缺商品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市场上甚至开始出现按规定应该只能集中分配的那些产品。

为了改善城市的供应情况，国家机关采用了这种活跃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方法，虽然这样做将给发展手工业合作化带来某种损害，强化了手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趋向。由于手工业合作社工作组织方面的缺点以及部分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的收入降低，有些手工业人力图退出合作社，在自由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目前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没有加速手工业的进一步合作化，而是在做从组织上巩固已建合作社划小的工作，不阻碍手艺人退出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改善城市商业管理体制的工作。不久前撤销了采购部，它的机构并入城市供应部，目前从事城市粮食供应问题。该机构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由于改进城市供应问题还十分尖锐，1957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在农业领域的基本工作方向是，巩固不久前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将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打算到1956—1957年冬，将完成由占80%农户参加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合作社。

由于某些地区的自然灾害，合作社经营组织中的缺点以及副业的冻结，所以部分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有部分农民竭力想退出合作社，党和国家机关花大力气注意从组织上巩固新合作社，改善他们的经营活动。11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的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出，必须总结合作社活动的经验，研究所犯的错误，作出必需的结论。指示强调，冬季必须特别注意发展副业，为的是用由此得到的收入弥补主业生产减少的收入。

由于某些合作社中成员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其中汉族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其他少数民族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从而引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摩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介绍了调整这些问题的一系列途径。

指示强调，合作社领导必须严格遵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性章程，坚决改正对某些农具、森林、果园等作价和入股时犯的错误。为了巩固每个合作社中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必须精确确定低交费额，把超过这个股份的入社资金退还农民。如果不够，就要求补交费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所有干部在办理合作社事务中一贯遵守民主，定期召开合作社社员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示强调，农村的干部应该全力巩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和团结，勇敢地揭露合作社活动中的错误和缺点，批评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指示说，必须在今冬明春打好基础，以便在来年使90%甚至更多社员增加收入。

关于中共八大国际意义的意见

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在讨论中共八大材料时经常就代表大会国际意义问题进行争论。

根据9月28日新华社记者发自重庆的报道，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表示，代表大会在发展国际革命运动、帮助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他们认为，中共不但在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政策这些问题方面的经验，而且镇压反革命、解决犯错误同志等问题方面的经验，都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具有很大意义。

不过，个别人其中也包括党员，高度评价八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将八大与苏共二十大相比，竭力提高该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有个别人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应该首先向中共学习。同时，从有些中共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对共产党八大的反应中，有时透露出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潮流。例如，据10月11日新华社记者发自武汉的报道，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八大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结束的，然而苏共二十大是在“乱七八糟和神经质”条件下结束的。他们表示：“苏联批判个人迷信，引起一系列兄弟共产党的思想分歧。相反，中共八大正面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此举将有助于消除分歧，提高兄弟共产党的思想水平。”有些人说：“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

据发自地方的报道可以看出，某些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热衷于这个方面。例如民主建国会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州市副市长严书夏表示：“中共八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比苏共二十大的意义更大。”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组织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李述中说：“中共许多新的工作方法例如组织多党专政，务必让其他国家知道和理解。现在已经可以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所以，和苏共二十大相比，派往中共八大的代表团要庞大很多。”

很难说，类似的观点流行到什么程度，但中共八大之后，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类似的说法看来不是个别的，这就是党的内部报刊关注这一点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社会舆论热烈欢迎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不过个别普通中共党员对代表团的组成产生了疑问，因为他们认为来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一定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所以，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和刊登在内部简报上的报道，有些党员和干部对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组成表示极大惊奇，并且说出了一切可能的猜测，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没有来。有些党员问道：“1954年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典礼。难道这次代表大会不重要吗？或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某些分歧吗？”

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注意中共八大上米高扬同志的讲话，将他的发言看作是苏共对中共工作的评价。绝大多数人对米高扬同志讲话中如此高度评价中共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

除此之外，有些党员和干部认为，虽然米高扬同志讲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讲话中同时坚决强调，列宁已经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所以得出结论，似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任何新东西。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南昌的报道，江西省有些中层干部认为，米高扬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不够谦虚，充满了引文和外来的教条主义。有些党员表示：“米高扬的引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考茨基的著作，不过没有一段引文来自斯大林的著作。难道斯大林就没有一条正确的原理了吗？考茨基成了叛徒，难道斯大林甚至比考茨基还坏吗？”

米高扬同志在中共代表大会结束前离开中国这件事，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引起了多种多样的推测，并猜想他过早离开的原因。在华东地区，代表会后广为流行关于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以及中共和苏共关系即将破裂的谣传。

由于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及看来考虑到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和干部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存在混乱的不健康的看法，是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专门决定，组织在中国广泛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并且因此而举行庆祝大会、群众集会、苏联电影联欢节、同苏联专家会见。中国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时，在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和会议上的报告中，坚决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作用，全力巩固苏中友谊、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并在苏联的领导下。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写了这些文字。

不过必须指出，近来，中国同志开始比较批判地对待苏联的经验和苏联学者的理论。在党的内部报刊上，特别是在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中间十分广泛分发的信息简报上，开始出现反映苏联党务和国家机关工作缺点的资料、工资制度的负面现象等以及西方报刊关于苏联状况的报道。

若干结论和建议

从普通党员、国家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响中可见，党员群众、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的工作总结是满意的，并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八大有助于这些阶层政治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共在整个中国人民中的威信，提高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政策正确性的信心。

代表大会提出某些新问题和新政策，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科学和艺术中开展自由争论方针等的具体实现途径，对中国社会舆论来说还不大清楚。现在解释这些问题和宣传代表大会提出的原理，在中国报刊上占到很大篇幅。

正如从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反响中明显看出的，某些阶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实际工资提高缓慢，一系列商品短缺以及城市住房面积不足表示不满。鉴于此，中共旨在更快发展轻工业、提高员工工资、组织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等的措施，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目前，中共和中国政府在政策中一贯执行中共八大的决议，特别注意全力巩固党和国家与群众的联系、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巩固法制、反对国家机关不同环节上的官僚主义、努力团结各阶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节约资金、发展生产特别是轻工业、改善居民供应。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巩固工业、商业、农业、手工业部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成就，安排好合营企业的工作，从组织上巩固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安排好资产阶级分子的劳动岗位，暂时不加快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

考虑到中共八大的意义以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某些新的理论问题(关于不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与不同党派共存和相互监督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矛盾的问题，关于反对科学艺术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等)，组织下列活动是合适的：

(1)在苏联社会政治和哲学杂志上发表苏联作者——这些问题的研究专家的文章以及中国作者的理论问题文章的译文。

(2)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国立莫斯科大学举办这些问题的理论学术会议，尽可能有中国同志参加。

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与文化建设的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当然，这种形式的大多数，是由中国环境、中国阶级关系以及中国所经历阶段的特点决定的。不过，根据我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形式中有些值得相关的苏联组织在可能用于苏联方面比较深入地加以研究(例如党务工作的某些组织形式，组织定期召集中央政权机构的代表到自己的选区熟悉当地情况和会见选民，组织分析劳动人民写给上级机关的信件和申请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利用苏联各种代表团的访华(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们基本上都带有礼仪性)，对每个代表团提出相关的具体任务是合适的。特别是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访华，不能仅仅是回访或礼仪性的，而是希望代表团成员在中国逗留时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特别注意中国国家机关工作经验的积极方面和适合以某种形式用于苏联的工作方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A.谢尔吉耶夫(签名)

1957年1月5日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2, д.485, л.19-49

№25205 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1957年1月19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1月21日

第4/nf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

1957年1月19日

在一次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的航班上，周恩来在与我交谈时要求告知H.C.赫鲁晓夫以下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将继续与布罗兹·铁托就今年2月底可能召开的会议进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

对于这个问题，与彭真的协商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铁托可能会同意参加这个会议。那样的话，周恩来在结束对东部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及其他)的访问后，准备在今年2月初对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包括南斯拉夫，进行访问。与铁托的初步会谈中，准备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铁托可能会以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等理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这样的话，关于该会议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彭真与铁托协商的结果，周恩来将会告知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3, п.423, л.4

№138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1957年2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2日会议第7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 [56]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在向铁托通报时，不要表现出强行会晤的意思。 [57]

最理想的是：在最初进行一对一的会晤(双方之间的)。

不能表现出特别关心的样子。

对中国人说——我们赞成应该找个时间会晤，可以在3月或4月初进行这样的会晤。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信函草案。 [58]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7, л.1-8

№207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1957年2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2日会议第71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 [59]。

第71号记录第2项，1957年2月2日。

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同志就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件草稿。 [60]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5, л.2

№21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1957年2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6日会议第7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А.毛希丁诺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1项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草案 [61]。

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草案被分发了——毫无目的。

关于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是不适宜的。

关于“取缔任何一个集团”——不应该这样说。 [62]

1.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

马林科夫同志：局势对缓和紧张状态非常有利。

在第38页——“建议没有根据”——显得很天真。

2.关于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

米高扬同志：关于对芬兰方面在表达方式上应该更柔和、更灵活些，在外交部的口头表述中——要更委婉些。

伏罗希洛夫同志：有些无的放矢，在形式上有鼓动作用，但有些粗鲁，令人生气。

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近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出现了尖锐化的局面，对反动力量应该进行打击。

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已经向谢皮洛夫同志转达了具体的意见。

理论上的证据很多。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宣言不妥当。

福尔采娃同志：关于成绩已经谈过，“微笑政策”不成功。 [63]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削弱报告内容。目标——给予打击，达到缓和。援引的内容不合适。

词藻华丽：“占优势”；关于人民民主国家——范围应该更广一些。报告很好。

№21481 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 代表处工作报告(1957年2月14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B.H.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发给您关于1956年苏联新闻局代表处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报告。

具体详见附件，共计16页。

苏联新闻局负责人

П.波兹杰耶夫

1957年2月14日

第32号

附件：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1956年工作报告

(一)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我代表处的工作都是在苏中友谊不断巩固的氛围中进行的。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这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随着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模式。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用4年时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八大通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者成为了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纲领。

中共八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会议也强调，必须积极发展轻工业，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合作社。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进行从低级合作社向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高级社的转变。中国北方和中部份的多数农户已加入高级合作社，人数已占其农户总量的近96%；而在南方和西南诸省——比重为60%，也有一些地方——40%，甚至更低下。在内蒙古畜牧区也开始组建高级合作社。去年，虽然国家许多地区规章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作物总产量仍略高于1955年(增产1000万吨)。牲畜数量的增长情况比较差。虽然牲畜数量(其中包括力畜在内)有所减少，但80%以上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的收入仍有所增加。

合作社经济在组织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训练有素的干部，尤其是会计人员。许多问题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如劳动组织、核算，大队和小队的规模，劳动收入的分配，劳动日的评估，向计件劳动的转换，等等。目前合作社的状况是，60%—70%的收入

按劳动日分配。粮食按维持生活的定额发放。如果劳动日超过了这一发放定额，那么超出部分用现金支付；如果工资不足以赎买粮食(原因是只有一个劳动力，赡养者众多)，那么劳动组合成员就必须在冬季找一些附加工作，以便合作社社员能够增加劳动日数量和补偿那些多发放的粮食定额。赎买粮食的部分费用由互助委员会负担。

去年，各阶层居民都增加了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需求，尤其是对党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了党内监督。各级党的监督委员会的作用也在提高。在这方面，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居于重要地位，尤其重视培养党员和非党员的纪律性、高度觉悟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在企业 and 机关领导中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和人们的教育工作承担着全部责任。重视加强党组织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各级党委的工作计划中便包括指导和定期检查工会的工作情况，帮助工会完善民主制度，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群众参与生产管理。

强化党委领导企业和工会组织的责任感，使北京市的一些企业有可能转而采取另一种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参加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管理的模式。例如，在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第二棉纺厂，企业经理不再实行任命制，而由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也选举产生，该委员会是这些企业的最高领导机关，拥有对经理的监督权，在必要时可以提出改选经理的提案。很难说，这些管理模式是否会得到广泛的普及，目前看来，它们只具有试验性质。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各地正在开展为扩大劳动者的民主权力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

当陆定一同志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各地目前正在广泛开展关于哲学科学、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等问题的辩论。其中，近期争论的问题便包括：“关于(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否可以将资本家的非劳动收入纳入剩余价值的范畴”，“在中国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关于精减管理机构”，“与教学计划相关的八个问题的讨论”，等等。

这场正在开展的辩论是在马列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参考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成就以及中国自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些辩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有助于人们找到更好地解决当前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办法，而这些问题均对国家的科学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人们坚定地维护马列主义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观。另外，此类辩论还在以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辩论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从而更自觉和积极地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就正如中国同志们常说的：“这场辩论是在朋友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我们与我们的敌人之间的争论。”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在中国国内大量开展了如下工作：进一步加强苏中友谊，更深入地学习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最广泛的层面上了解俄国人民以及苏联所有其他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上述工作开展的方式包括：将大量艺术、科学、科普、科技等俄文书籍译成中文，出版中国作家完全或部分为苏联而写的著作，组织宏大的苏联电影展，等等。

为加强苏中友谊，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发送自己的宣传资料，从而为中国的期刊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全面地介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满足了中国读者的迫切需求——向最先进、最进步的俄国人学习。

(二)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与中国绝大多数中央和地方、省市以及许多杂志编辑部保持着联系。这一期间，中国国内共有71家报纸(其中13家为中央报纸)和23份杂志均定期刊登我们提供的资料。与1955年相比，报纸增加了8家，杂志增加了7份。1956年请求我们发送资料的中央报纸还有：《教师报》、《人民汉语报》和《体育报》等；杂志——《农村

青年》、《科学新闻》、《冶金报》、《食品工业》、《人民音乐》、《物理通报》、《今日扬州》，以及地方报刊——《广州日报》、《南京日报》、《语言报》、《闽西工人报》和《新疆日报》。

1956年，代表处共从苏联新闻局收到原创文章1478篇(比1955年少了2篇)，其中通过邮递的793篇(1955年902篇)，通过电传的685篇(1955年578篇)。这些文章多数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直接把原稿交给中国编辑部的，少部分(30.7%)由代表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后(再转交中国编辑部)。

所有转交中国报纸和杂志发表的714篇文章中的48.3%，均来自苏联新闻局。

1956年，根据中国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书面和口头要求，为中国定期刊物而从苏联新闻局索取的资料，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题目的多样性上均超过了1955年。我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提供的资料获得了好评。该报的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ЧэньЦзю-ань)代表编辑部对我们所提供的高质量资料表示满意。他还指出，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文章对《人民日报》进一步深入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人民、苏联的经验和成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请我们转达报纸编辑部对苏联新闻局的请求，即今年不但不能减少，而是要更增加向该编辑部提供相关资料。

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刊物提供自己的资料——这一帮助得到了所有中国编辑部的高度评价。绝大多数省级报纸编辑均在来信中写道，苏联新闻局出版司是他们唯一的获取苏联文章的主要来源。他们还说，各中国编辑部没有力量撰写整体评价苏联的文章，也没有翻译能够始终关注苏联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并将所需资料译成中文。所有中国报刊均指出，我们根据各报刊的要求发送相关资料，并对满足各报刊的要求抱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发送的多数文章都是根据各中国报刊的相应要求而撰写的，并兼顾了其所要求的文章篇幅，而且这些资料的模式和文章的语言也是浅显易懂，因此那些由于内容枯燥、空洞而被编辑部退稿的文章数量减少了。

不过，虽然我们所发送的资料受到了各编辑部的高度评价，但1956年我们资料的刊载率仍比1955年低了18%——减少了161篇文章。这两年间各月份之间上述比例关系，可参见下表：

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5	68	76	78	66	72	53	40	65	53	90	104	115
1956	76	56	80	80	60	64	43	61	27	48	62	53

文章刊载率的下降不仅只涉及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还有各中国报刊通过中国作家和苏联作家所组织的关于苏联的所有其他资料。

下面，我将就三种主要的中央报纸列举一些数据：

1. 《人民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 年	1956 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73	98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文章数量	55	24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40	18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78	56

2. 《工人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 年	1956 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68	59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 文章数量	49	27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68	16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51	16

3. 《光明日报》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 年	1956 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160	57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 文章数量	31	16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66	16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63	25

上述三份报纸合计

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1955 年	1956 年
全年刊载的所有文章数量	501	113
其中：1. 来自苏联新闻局的 文章数量	135	67
2. 其他苏联作家的文章数量	174	50
3. 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数量	192	97

从以上所列数据可看出，关于苏联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减少了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而增加了各编辑部吸收到本单位并独立工作的中国和苏联作家所撰写的文章。

从上表数据还可看出，《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资料均多于另两份报纸。原因在于，该报规模比较大，其在莫斯科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站，相对其他报纸该报与我们中央出版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并经常相互交流资料，且拥有自己的俄文翻译。

刊载率的减少始于1956年2月末，并在6月、9月和10月达到最低点。随后，其虽重新有所增加，但数量并不大。不过，据各编辑部工作人员所言，几乎所有中央报刊均打算在1957年增加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

前不久，在与我的一次会谈中《人民日报》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说，今年编辑部计划刊登比1956年更多的关于苏联的资料。与此同时，关于去年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他解释道，编辑部提高了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要求，在文章的筛选方面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标准。一系列报刊中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批评。而关于这方面情况，陈秋安和《中苏友好报》报副总编辑苏艳辉(Суян-хуй)均向我作了通报。

关于刊载率的下降，陈秋安还指出了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主要包括：筹备党的八大，匈牙利事件，(英、法)入侵埃及(他这里所指出的后两个原因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是在英、法侵略埃及期间，还是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报刊登载我们资料的比率均是反而有所提高的)。至于其他一些报刊刊载率的下降主要与报刊规模的缩小有关，如纸张不足，报纸采用更大的字体和新版样(横行印刷)，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听到的是中央和省级报刊工作人员自我批评式的言论。这些同志把我们所提供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归咎于自身原因，即没有对我们所提供的文章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长江日报》报编辑便发现了7篇我们以前向他们提供的具有一定价值而未刊载的文章，只是由于一位编辑的疏忽大意，才导致这些文章没有被刊载。几乎所有我去过的编辑部均能找到一些此类文章。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央报刊也经常出现。例如，有一篇关于与柯西金同志会谈的文章《人民日常工业品的发展》。《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不刊载这篇文章的原因

被解释为“没有任何新意”。而稍后我才得知，该文章的编审不是这些报刊的主要负责人。最后，当该文章转到《大公报》那里并了解了文章的内容之后，该报决定发表，但文章却意外地不见了。过了两天才搞清楚，原来是文章被一位领导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而他本人出差去了。关于与涅斯梅亚诺夫同志的会谈资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文章被送到了《人民日报》，那里的人在审阅了稿件之后便不由分说地退了回来。直到几天前才搞清楚，该报从自己的莫斯科记者那里也得到了一份同样内容的资料，因而发生了我们的资料被退稿的事。如今，该文章已在《大公报》编辑部，近两天就将发表。

所有编辑部均承认，他们很少会拒绝发表关于苏联的文章，因为报刊在这方面总是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大众日报》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些调查表，这些都是该编辑部于去年8月份向自己的读者们发出的。表中有一个问题，即读者们对本报所刊登的苏联人民生活情况的相关资料是否满意。所有填表的人均作了否定的回答。读者们的答复充分说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苏联的情况，而报纸在这方面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不久前来北京的《青岛日报》编辑顾寅(Григорьев)也对我说，读者们在来信中激烈地批评了该报，原因是报纸没有很好地介绍苏联人民的相关情况。

顾寅说：“我们没有人能写关于苏联的文章。另外，你们的材料和通报只给‘新华’，我们没有东西在报纸上发啊。”该编辑请求我们今年多给他的报纸发送一些资料。

通过向中国发送资料的方式，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出版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其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苏联新闻局通过自己的大量工作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各方面需求，因而发挥了重大的教育意义。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发送的资料给予高度的评价。当然，代表处也收到了不少针对个别文章和个别宣传问题的批评意见，而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这些批评意见涉及的内容如下：

1. 几乎在每封来信和每次面谈时，人们都会请求我们写一些简洁的、短的文章，多给一些具体的实例资料，而提出类似请求和愿望的并非只是个别人。所有中国报刊都希望刊登一些短小的、有趣的事实在根据编写的内容生动的小故事。而这些篇幅简洁而内容生动的文章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和向其他人转述。因为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是文盲或文化水平低，只有这样的文章才会发挥实际的重要意义。

我们是否会考虑这样的请求呢？我们当然会考虑，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是在自己的所有文章中都能充分考虑到。例如，前不久中国《农村青年》杂志向莫斯科发了一份预约函，其中请求我们为其中一篇能够让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人不费力气便能读和理解的小文章。我们向该杂志发出了B.库兹涅佐夫所写的《成长》一文。该文章由三部分组成，共12页。但当我们把文章发到该杂志编辑部时，仅文章的篇幅便让他们犯了难。于是，在给他们的电话中他们说道，他们并没有要如此大篇幅的文章。说实话，我们的这篇文章只有报纸可能会采纳，而针对杂志预约的一些文章，我们只能表面性以完成任务为标准。

有时，我们也会收到编辑部的退稿，原因主要在于文章的质量比较低。一般而言，我们会注意文章的语言是否浅显易懂，是否缺乏新意，对各种技术过程是否描写得引人入胜等。《湖北日报》的编辑云宇(Юн)关于此对我们说道：“我们从你们那里收到的文章，关于生产情况的描写方面都很不错，但关键是读者并不能从文章中充分了解生产的具体过程。关于苏联的情况，我们从文学书籍和电影里已了解了不少，因此我们现在已不满足那种肤浅的描写。我们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好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请求你们转达我们对作家的如下愿望——希望他们更好地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以更简洁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们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上述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写的一些文章为何被退稿的原因。

我们受到批评还由于，我们并非总能完成约稿。例如，我们为《北京日报》写了7篇文章，但其约稿原本有14篇。因而该报编辑部对此很不满意。对我们更不满的是《工人日报》，因为我们欠了他们9份约稿。鉴此，该报副总编辑向我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的约稿你们不做，却

把我们不需要的稿件发来不少，这如何解释呢？”他告诉我，今年该编辑部已与苏联《劳动》报建立了联系，以便双方相互交流信息。虽然他们仍会通过我们组织相关资料，但在约稿的数量上将会少于去年(另外，该报纸刊登我们资料的版面也会比去年少一些)。

几乎所有向我们约稿的报刊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没有按要求完成他们所约定的稿件。《长江日报》编辑就此问题对我道，今年他仍会向我们重复去年的约稿，因为那些稿件至今仍未完成。《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也请求我们向作者转达如下信息，即今年他们将放弃去年向我们约定而至今仍未收到的5篇文章的约稿。

严格地履行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与我们希望宣传的那些问题发生冲突，从而限制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范围。其中原因有二：首先，中国报社的约稿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所涉及的问题也是不尽相同的。其次，认真地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限制，也与我们主动发送一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无关。那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我们仍可以跟以前一样发送，虽然这些资料的刊载率当然会低于那些事先约定的稿件。

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会直接对苏联资料在中国报刊的刊载率产生影响。严格履行约稿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资料的刊载率。而每份中国报纸和杂志也一定会保证尽快地百分之百地发表自己所约定的稿件。

我之所以关注这一情况，是因为今年我们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约稿。仅在第一季度我们已收到了363份约稿，估计全年我们将收到1000份以上的约稿。而按期完成这些约稿，不仅会提高我们资料的刊载率，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增加向我们约稿的数量。如今，一些中国编辑部仍对我们怀有不信任感：或担心我们会延误约稿的期限，或怀疑我们会发去他们未约定的资料。去年，为了消除他们的这种疑虑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今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报刊对那些他们未约稿但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文章也是需要的。当然，临时刊登这些资料会对编辑部的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被列入刊登计划，从而会打乱其工作节奏。为了临时安排刊登这样的文章，他们有时就需要把一些已准备刊载的文章拿掉。对于我们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质量。

综上所述，我写了关于中国同志如何评价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附录的意见和愿望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资料所作的高度评价。下面，我想列举其他一类评价，即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些同志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对我们资料的评价很低。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使馆工作人员中都没有人看我们所提供的资料。至于中国同志，至少我从他们那里并没有听到对我们资料不好的评价。他们对我们所提供文章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不好的文章他们便会说不好，而好的——就会说好，而不会说别的。向我们提供文章的有我们的作家、诗人、学者、工程师、闻名全国的当之无愧的生产能手和记者。他们不可能只为报刊写好的文章，而只给苏联新闻局写不好的文章。我们也不能作出如下错误的结论，即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需求已不大，因为中国同志自己现在也开始写关于苏联生活方面的文章，等等。我这里保存了来自中国中央和省的报纸以及杂志社的数百封信件。其中内容使我们确信，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中国的报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给我们发出的数百封均要求加强对报刊的援助力度。当然，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性意见，但如果从其中拿出任何一项意见，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表达一个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中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不宜在中国保留苏联新闻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因为中国在苏联并没有设置同样规模的机构。不过，中国同志自己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反，他们让我们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落后以后才刚刚起步，在一些地区只是在近期才取消了奴隶制，在这种条件下来自苏联新闻局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中国同志本身毫不怀疑这种帮助的必要性。那么，既然需要这样的帮助，那就

得有人来组织。我们使馆的人之所以那样说，理由是：如果苏联可以在中国保留这些人，那么也应当让中国在苏联也保留相应的人数，否则就是“不平等”。如果说到“不平等”的问题，那么撤消我们的代表处正好强化了我们与中国在宣传意义的的不平等现状。我虽然并没有对这方面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以确定中国在我们报刊上的宣传和苏联在中国报刊上的宣传之间的对比关系。倒是前不久有人将我们的《共青团真理报》与中国的《中国青年报》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如果说1956年《中国青年报》刊载了38篇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话，那么，《共青团真理报》便在同期刊登了200篇大篇幅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该信息来自《共青团真理报》记者B.卡西斯)。可能，其他许多报纸和杂志也存在着上述不利于中国报刊的比例差异。

我也没有对《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作过类似的比较。但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我们甚至无法按照它们两者的规模来作类比(须知，《人民日报》的规模是《真理报》的两倍)。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人民日报》在莫斯科拥有自己的三位记者，与《真理报》、苏联驻中国的专家和许多苏联作家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广泛利用着苏联新闻局的资料。据该报工作人员说，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记者组织搞到像通过苏联新闻局这样如此广泛的资料。该报今年打算向我们约定的稿件不少于50篇。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即拒绝中国数百家报纸和杂志提出的关于帮助宣传资料的坚决要求，原因仅仅在于中国没有同样在苏联派驻两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

至于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的下降，我认为主要与代表处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我们的代表处要把所得到的所有俄语文章的30%—40%译成中文，需要对这些文章进行编辑和校对，并对所有索取我们未翻译资料的报刊提供咨询服务。如果这方面工作被取消，那么中国几乎所有省级报刊都将放弃刊载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能够完成此类翻译工作的翻译人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翻译人员。至于其他报刊，如果没有我们提供咨询，也会减少对我们文章的需求。另外，我们代表处还与各报纸和杂志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事组织、翻译和编辑中方的约稿，关注约稿的完成情况，并与莫斯科总部机关的同志相互交流意见。在莫斯科负责资料组织工作的同志如果不参考代表处同志的意见，工作就处于盲目状态，只有从代表处的同志那里他们才能够获得确切的信息，以便为明确的读者和确定的报刊组织材料。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工作，才有可能根据中方的所有要求和愿望完成各报刊的约稿，在作家和报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确保我们宣传工作的巨大力量和说服力。如果我们不愿意削弱自身在中国的宣传工作，那就总得有人来做所有这一切。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而不履行约稿——这将对我们的长远工作造成损害。

据说，在中国设有许多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只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我们与“经贸公司”代表处相提并论，这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对的。我们在中国的正确注册并非代表处，而是使馆出版部。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应将我们简化为代表处，即使对中国同志而言，也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如果所有中国报刊都知道，我们不存在了，那么他们就将断定，苏联使馆出版部被精简了。这样的话，他们以后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信件投到该部门。到那时，就仍需向中国报刊的同志解释，使馆出版部在缩减的同时依然存在，因为当苏联新闻局的资料到中国后，它们的收取和发送仍是由该出版部负责的。总之，从官方层面上，我们这样做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因为事情的性质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经使馆工作人员之手，仍会有一些其他资料发送到中国来，而这些资料依然是由苏联新闻局提供的。只是如今是一位不隶属于苏联新闻局的人来负责这些资料的传播工作，而且并承担咨询方面的责任。这只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而就其实质而言，我们并不是办事处，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存在并不多余，而是中国新闻媒介与苏联新闻局联系的极其必要的环节。正是通过这一环节，我们不断积累和总结宣传工作的经验。

如果我们不在中国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否仍能像现在一样给予中国报刊如此规模的帮助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必须由固定的、专职人员来

做，而不能委托使馆的某位工作人员来兼职。如果不这样，就必然导致以形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新闻局的文章，导致我们的宣传资料失去自己的威信(例如，在领事馆我们所摄制的照片资料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所培养的翻译骨干也会因此而流失，中国的省级报刊也不会再使用我们的文章。例如，当以中文发行的《苏中友好报》停止出版之时，关于苏联情况的资料出版工作便发生了急剧的缩减。中国(报刊)在干部方面正面临一系列困难，而我们并不存在这方面问题。我们清楚，中国新闻媒介很需要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强加于人，甚至也不是建议，而只是在完成中国报纸和杂志所提出的大量要求。

下面说几句关于相片的事。在本报告所指的时间内，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近1800张相片。其中，我们为定期举办的中苏友好协会展览提供了1292张照片，其余均发往各报纸和杂志社并多数均得以发表。我们从国内收到的相片是很多的，但中国方面对它们的需求也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尤其是用于文章插图的照片。中国报刊要求尽可能地为每篇发表的文章都配一张照片。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

П.扎哈罗夫

1957年2月14日

属实：苏联新闻局办公厅主任B.杜比宁(签名)

手写批注：

请注意保密并加以保管，这份资料已在有关中国的工作中使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3月29日

ЦХСД, ф.5, оп.28, д.408, л.259-275

№24932 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7年2月22日)

兹报告如下：使中国代表团成员焦继辉(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同志和邢国文(Сень Говень)同志实地了解苏联铁路机务工作的组织的这项工作严格按照机务管理总局制定的，并得到交通部批准的计划严格进行的。

计划中指出了如下机务段：内燃机务段——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勒季谢沃II机务段、B巴斯昆恰克和古杰尔梅斯机务段；电气机务段——焦马机务段、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和莫斯科夫卡机务段；蒸汽机务段——红利曼机务段、基辅旅客机车和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对这些地方和场所进行实地参观。

为了更加详细地介绍新型火车头的开发以及机务段工作的组织，根

据交通部机务局的指示，计划中规定的各铁路火车头勤务站要安排一些勤务站的负责代表陪同代表团成员，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

奥姆斯科铁路。在巴拉宾斯克和莫斯科夫卡电气机务段由火车头勤务站总工程师库兹涅佐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而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内燃机务段由勤务站副站长沙布朗斯基同志陪同代表团。

乌法铁路。在焦马电气机务段安排勤务站副站长戈卢比亚特尼科夫同志陪同代表团。由总工程师伊万诺夫同志介绍机务段必要的改造工作。

东南铁路。在勒季谢沃II内燃机务段，由机务段段长和铁路分局长以及当时在勒季谢沃II内燃机务段出差的内燃机车管理局局长雷列耶夫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以及内燃机标准替换件(ТЭЗ)的开发。由铁路段副段长拜科夫同志介绍路段内的工作，其中包括运行规模扩大的保障、内燃机工作的技术指数及其效能。

伏尔加河沿岸铁路。在巴斯昆恰克机务段由勤务站的内燃机车局局长罗日涅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由铁路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把同志们送往火车。

奥尔忠尼启则铁路。在古杰尔梅斯内燃机务段没有勤务站。机务段有工作十多年的内燃机车。由机务段高水平的领导人相互协调，向同志们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和内燃机的工作。

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工厂厂长费奥多罗夫同志、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介绍工厂的工作以及工厂的各个车间。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向代表团成员赠送试验架上的照片。

顿涅茨铁路。在红利曼蒸汽机务段的勤务站中安排勤务站总工程师柳博夫同志介绍工作情况。勤务站站长多隆丘克同志也参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在前往基辅市的时候，根据勤务站站长的提议，使中国同志了解亚西诺瓦塔亚机务段的工作。

西南铁路。基辅蒸汽机机务段由火车头后勤站总工程师季亚科诺夫同志陪同。勤务站站长克雷洛夫同志参加接待工作。

在上述列举出的每一个机务段都要详细地参观机车库的车间、设备、试验架以及生产和修理电气机车、内燃机车和蒸汽机车所必要的附属设备和装备。

正在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蒸汽机车要单独进行考虑，确定生产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以及利用现有的蒸汽机车设施生产出新型牵引机车的可能性。也要考虑对蒸汽机车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程序。

第一：必要的最少的车间和装备设备，利用这些车间和设备才有可能使新型的电气牵引机车和内燃蒸汽机车投入生产；第二：对机车库和准备设备作进一步的改造，保障能够修理各类必需的机车以及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

在参观改造成新型的牵引机车的机车库的时候，基本包含了现有的各种类型的机车库，即：扇形机车库、梯形机车库以及直角道岔区机车库。

引起极大注意的是对古杰尔梅斯扇形机车库的改造，引入内燃机车。在此需要对起重运输设备的类型给予特别详细的检查：降落槽、千斤顶、梁式起重机、天车、高架单轨铁路等修理内燃机车必要的设备和装备。

在对现有的内燃机车业务设备进行改造时，在对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进行确定的同时，还要详细地了解生产的原则以及对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定期进行维修的技术原则。

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用于组织火车头队、维修队和机车库指挥干部的培训工作上。除了对学习的组织进行解释之外，同志们实际了解了奥姆斯科市机车司机学校的工作以及在机车库技术室学习的组织。在转换成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每一个机车库都要对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工作指数进行研究。

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奥姆斯科铁路段的戈利科夫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指出的机车库之外，中国的同志们从1957年2月15日到2月19日在莫斯科枢纽站了解了霍夫里诺十月铁路机务段、莫斯科库尔茨

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I机务段、雅罗斯拉夫铁路莫斯科III摩托车厢机务段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技术。

略谈一下中国同志同各地机务段同志进行的会谈。

火车一到达车站，中国同志们就受到机务段领导、个别铁路段的领导、党委书记、枢纽站和机车库领导以及地方机务段委员会主席的热烈欢迎(在基辅机务段个别铁路段没有一位领导)。

在介绍机车库工作和车间工作的时候，机车库的调度员、机车司机和钳工都非常热心地接见了中国的机务人员。机车库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工作地段上向中国同志详细介绍了车间的工艺、使用的辅助工具和试验架、在生产中使用的工人发明的和提出的合理化的建议。讲述了维修的火车头的质量、枢纽和零件的相互替代性、在维修时减少火车的停工时间、劳动生产率，以及所承担的今后完善生产的任务。

必须指出，在中国同志们所到达的每一个机务段，机务段的全体人员都给予他们很多的关照，热心地向他们传达工作经验。比如，在巴拉宾斯克机务段，机务段先进的机车司机讲述了自己平均每昼夜驾驶电气机车行使883公里的工作经验。最优秀的机车司机戈连科夫带领同志们参观了他自己驾驶的电气机车，并且说，他现在同助手一起，每昼夜可以运输每公里总重200万吨的货物。为了表示对中国机务人员的友谊，机务段集体向每位中国同志赠送了一把钳工用的锤子，机务段段长亲自赠送了关于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工作经验的书籍。

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机务段领导人同中国的同志们互换了地址，并且承诺在内燃机车的开发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了表示苏中两国铁路工人之间的友谊，该机务段集体向中国的每位同志赠送了一盒制图仪器以及一套工具(扳手、截铁器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同志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期间，有一天州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利亚科夫同志、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市委交通局副局长接见了他们，并一起到俱乐部观看了电影。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机务段机车司机、钳工及其家人对中国的机务人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把其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表示了苏中两国人们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焦马机务段期间，苏共乌法市委书记带领中国同志参观了该市以及新乌法石油加工厂。

在中国同志到过的其他的机务段中，必须指出的是莫斯科夫卡和红利曼机务段。在莫斯科夫卡机务段，机务段的党组书记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邀请函，使其作为尊贵的客人出席区选民代表大会。红利曼机务段根据该段最优秀的机车司机舒米洛夫的建议，集体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并且机务段集体在一天晚上独自为中国同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在红利曼机务段，应该段最优秀的一位机车司机别列维什克同志(舒米洛夫同志生病了)的邀请，中国的机务人员到了别列维什克同志的家里做客。市委书记、机务段领导以及先进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的愿望，在莫斯科库尔茨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I机务段展示了工作以及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为了对推动机进行试验，使用了总重230吨的ИС系列蒸汽机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承认，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工作性能非常好，承认其结果独特，并对红利曼机务段集体以及所有的苏联铁路工作者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余光生同志说：“我们认为这一推动机是机务段最好的推动机，并将把这一点通告给红利曼机务段集体。”

邹继辉和邢国文同志在他们的发言中对机务段集体的悉心关照表示了感谢，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

他们说，你们对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回国后，我们将把这一点告诉我们所有的铁路工作者，并把你们的地址告诉给我们的机务段，以便能够更加深入地交换工作经验。

苏联交通部机务总局副局长

拉奇科夫

РГАЭ, ф.1884, оп.60, д.1769, л.30-34

№16686 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 访华情况(1957年3月8日)

机密

M.A.苏斯洛夫同志：

给您送去关于今年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副本。

H.米哈伊洛夫(签名)

1957年3月8日

(一)

我报告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研究和签订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结果。

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月12日动身去北京，成员有：苏联文化部部长H.A.米哈伊洛夫(代表团领导人)，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B.C.格拉先科，苏联文化部副部长Г.А.奥尔维德，苏联卫生部对外司司长H.И.马特维耶夫，影片生产总局副局长A.Φ.卡拉什尼科夫，出版社总局副局长A.П.雷宾，苏联文化部对外司司长B.A.博尼。

中国方面代表团成员有：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皓风，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文化部部长助理王阑西和黄洛峰，艺术管理局副局长周巍峙。中国方面参加工作的还有：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阳翰笙同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同志。

研究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委员会，在今年1月12日至18日于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工作。

特别应该强调，中国同志对待所有的这项工作极为仔细，组织得很好，很深入、很具体。

在第一次联合会议上，钱俊瑞同志发表讲话，简短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文化交流情况，并且指出，苏中之间的合作在所有文化领域都获得了富有成果的发展，中国高度评价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文化活动家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苏联的先进经验。钱俊瑞同志表示相信，我们在文化合作事业方面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苏联方面致了答词。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通过了苏联方面的建议——除了研究1957年度的具体措施计划外，还就更长期的远景规划交换了意见。

今年1月18日，在中国文化部签订了双方研究制订的1957年度计划。

根据双方对联合委员会工作总结的协商结果，发表了由中国同志编写的公报(见附录)。

计划签订后，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同志当时刚从缅甸回到北京，直接致信苏联代表团。信中说，向苏联博物馆转赠送550件艺术瓷器、玉石、搪瓷、漆器和清朝时代(17—19世纪)刺绣。

1月18日，苏联代表团组织了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和外国记者。

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代表团发表了关于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及其对巩固我们人民之间友好事业的意义的声明(声明全文见附录 [64])。

需要报告苏共中央的是：中国同志关于善于把所进行的工作赋予巨大的政治意义。例如刘少奇同志同代表团座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座谈了四个小时。我在上海同市委领导人谈了很长时间。在文化部，就思想工作和文化合作的具体问题，总共座谈了10个小时以上。

代表团抵达前夕，报刊和无线电出现了关于苏中文化合作的大量报道。《人民日报》，而紧接其后是《友好报》，发表了《真理报》的文章和其他资料，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的大块文章。

全部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可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提纲中看出。他在中共中央同代表团座谈时提出：苏联为全人类指明了道路。苏联人民的经验和文化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更努力地研究你们的经验。你们给了我们巨大的无私援助。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规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文化交流。

计划规定交换大量艺术团体。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的芭蕾舞团和哈

萨克斯坦国家人民乐队将访问中国。

在苏联，其中包括远东，将组织中国歌舞团和杂技团巡回演出。他们将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

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相互组织艺术展览。

在电影业方面，计划规定联合拍摄献给苏中电视创作友谊的艺术影片，宽银幕彩色电影，关于阿拉木图—兰州铁路干线的科普电影。扩大电影院领域技术经验的交流。将建立电影记者站，在北京建立苏联电影记者站，在莫斯科建立中国电影记者站。

在出版活动方面，计划规定经常交换出版社计划、推荐出版的书目，建立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出版社的联系。

同1956年相比，计划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卫生领域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除了互换大学生、研究生和互邀教师外，规定建立苏中学校、医疗机构间的经常联系，科学著作、科学规划、定期资料、教学资料、设计文件、科研工作计划等的定期交换。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以蓬勃的速度在发展。

报纸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7.98亿份增至1956年的24.01亿份。图书和小册子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5.95亿印张增至1956年的43亿印张。

影剧院数量，从1950年的641家增至1956年的955家。

1949—1950学年，中国有2577.6万人在学习。1956年，学生数量增至6627.5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2年发展规划，规定拍摄电影从1955年的112部增至1967年的367部(其中艺术片136部)在8个城市建立电影制片厂，电影放映机从1955年的5876台至1967年达到7.6万台，艺术团体数量从1955年的2414家至1967年达到2811家，报纸从1955年的289种至1967年达到4500种，在北京建设15家印刷厂。

在苏中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的条件下，由于到处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巨大兴趣和衷心的尊重，我们在文化交流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点，甚而有时是错误，就显得特别不能容忍。

苏联的中国学者断言，新的苏联中国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有段时间存在一种意见，即我们这里懂中文以及某种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过剩了。这种意见是不是对的。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即懂中文的某些工作人员没有在专业方面被使用，那么发生此事不是因为我们过量培养了这种干部，而是因为某位工作人员只是形式上了解中国，而实质上受到的训练很差，不能作为中国学者来使用。

根据语文学博士奥沙宁同志的看法，错误的是苏联高校都按一个模式培养中国的学科带头专家。根据奥沙宁同志的意见，培养各种未来中国专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和文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培养内容和质量间差不多没有区别。

根据奥沙宁同志以及谢尔秋琴科教授的意见，对按中国学问题培养的所有专家而言，极具代表性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了解很差。

按奥沙宁、谢尔秋琴科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看法，另一个不小的缺点是，苏联的中国学专家仅仅在苏联的高校中培养。顺便说一句，实践告诉我们，当青年专家在苏联高校毕业后有机会在中国大学学习2—3年时，我们就获得了成功。在某些个别情况下，即苏联青年在中国读完高校课程时，也会达到正面的结果。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培养干部，显然可以得出良好结果。

十分明显，为了培养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必须利用这样一些极为丰富的机会，例如在中国高校，训练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在中国组织对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实习。顺便说一句，目前在中国的只有一名苏联研究生——戈尔冈涅夫同志。中国同志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戈尔冈涅夫同志无暇学习，因为他的时间还不够用于完成苏联大学生代表的职责。

他们说：“要知道，他一个人要面向全中国。”

中国同志在培养干部和中国青年研究俄语方面，大规模地依靠苏联的帮助。

在同我们的会谈中发现，中国同志明年至少派700名研究生到苏联高校学习。仅仅在1956—1957学年，开始在苏联高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有1349名，研究生520名。目前，约有300名教师在进修。

我们许多机构，首先是科学院及其研究所，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存在重大不足。

不久前建立了中国学研究所。但遗憾的是，该项研究所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迄今为止，研究所没有办公场所，只有三间房子。研究所的人员没有配齐。自然，中国学研究所本质上应该是研究中国问题最主要的科学机构，而目前这样的条件下未必能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足够的威望。

根据大量事实可以判断，我国许多学术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有时候差到何等程度。

我们出版的某些学术著作，在深度和准确度方面不大出色。

中文教授援引了这样的事实，即苏联翻译了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参与翻译工作的是我国优秀语言学家，不过，在语法课本中有许多粗心的错误。

根据苏联学者的判断，契科巴娃的著作《语言学引论》，在中国引起极大不满。中国急不可待地盼望看这本教科书，但它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的同志确信，教科书中表述不好的不仅仅是有关中国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有印度语言学问题。对契科巴娃所著教科书《语言学引论》的意见，已经编写好，且已寄往莫斯科。不过教科书出版第二版时未作任何校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惊讶。

中国是物质文明史、人类社会史的极为丰富的宝库。顺便说一句，苏联学者在该领域的工作是极为薄弱的。我们不能列出近几年中出版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多多少少重要的著作。我们的学者在该领域同中国学者合作得极差。

苏联学者的某些著作出版得太迟。例如《中国语言学文集》排印已

将近5年了。谢尔秋琴科同志的书稿《论民族文字的创立》从1952年至今没有出版。顺便说一句，中国同期已出版了两版。

谢尔秋琴科同志作为科学院研究人员，从1950年起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总共只能发表一篇。

我在中国碰到了苏联科学院的一组科研人员，其中有科研人员松赞娃同志。她还在1953年，就和佳普金娜同志一起完成了有关中文语法问题的著作。科研人员为该著作发表毫无结果地等了好多月。他们没有得到结果，便将手稿缩写后，送交学术委员会以求认可，经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办理手续寄至中国。在来到北京后，松赞娃看到自己的手稿用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书店出售。

显然苏联科学院对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采取形式主义的和不认真的态度。如果考虑到工作中与苏联机构有联系的中国相关科学机构和研究所都是由最著名的中国学者和专家来领导这一点，这样尤为不正确。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确认，他们有许多问题既没有得到外交部也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所的回答。科学院两年中仅仅发来一封信，也没有涉及工作的任何实质指示。

应该指出，根据苏联文化部的方针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没有从我们这里获得足够的帮助，没有同他们保持固定的联系。

苏联的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献方面还严重滞后。虽然1957年我们打算出版中国作者的图书达100部，大大多于我们以前出版的，但这个数字还是太小(1956年中国出版苏联书籍6210种)。苏联出版者还很不了解中国文献。文化部派遣出版总局副局长雷平同志到中国去，其目的是和中国同志一起研究进一步增加中国文献在苏联出版的问题。

近期来，中国积极发展音乐活动，有两所音乐学院在工作，交响乐队经常举办演奏会，合唱艺术在发展，中国独唱演员在增加，音乐创作在开展。

作曲家马思聪、李焕之、贺绿汀等，近年来已创作了值得注意的作品。不过，中国作品在苏联的演奏带有偶然的性质。中国的戏剧艺术，在苏联剧院的剧目中暂时也还没有占有应有的位置。苏联文化部在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缺点。

应该说，苏联的报纸杂志还很少发表关于中国人民生活和文化的资料。

(三)

我认为也有必要报告涉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工作的若干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在很多方面是按标准进行的，但在今天条件下，极其落后于新的要求和需求。文化领域的交流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方面产生了新的大问题，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活动中，最关注的是代表团出访。但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让两国知识分子代表参加集会、高喊众所周知的口号等，显然没有多大的需要。现在应该使工作具有更深入的、更有目的的性质。

同时应考虑到，有时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出访准备得很差很仓促，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不久前，卡伊洛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出访了中国。其成员是苏联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文学家卡塔耶夫同志、坚德里亚科夫同志和艾德林同志，艺术家韦列伊斯基，作家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P.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作为代表团负责人的卡伊洛夫同志，最后一天才真正被批准为代表团领导。对出访中国他没能做多少严肃的准备，代表团其他成员对出访也准备不足。

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的若干个城市，每个城市停留2—3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参观各种项目，出席隆重的宴会和招待会等。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开展任何业务工作。

这样的代表团返回苏联后，通常马上被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根据我们的意见，根本改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必要性问题早就成熟了。在目前形成的情势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失去了自己的权威，变成一个纯礼节性的体面组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没有深

入的交流。

也要注意自身这样的事实：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代表，首先是文学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访问中国后不总是在报刊上发表随笔和故事，特别是研究文章。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我们注意下列情况：

苏联新闻工作者访美后，不仅发表有独立的相关随笔，而且有大部分的相关书籍。例如，波列伏依同志写了一本几乎500页的书。像茹科夫、克拉米诺夫、伊扎科夫同志这样的新闻工作者，都讲述了有关美国的许多东西。

至于对中国，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著作是比较稀少的。

(四)

在中国逗留期间，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根据中国同志的倡议与其座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首先，中国同志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他们在怎样的客观形势下，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怎样的政治总背景下，必须提出上述口号。他们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即中国的人民政权已获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了忠诚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出现了提出这个新口号的可能性。之所以需要这个口号，是因为还要更加团结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开辟新的广泛可能性。主要条件之一，也在于这个口号，从策略上帮助中国共产党保证进一步团结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

陆定一同志在座谈会中也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原则。

他说：“我们需要，正如中国俗话说的，引蛇出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间谁传染上了唯心主义观点、不正确的观念，谁就会耐心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进行思想工作。”

陆定一继续说：“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植物放在温室条件下成长。我们想使植物获得锻炼，变得强壮。植物可在斗争中获得这种锻炼。”

“我们不想同假想的敌人战斗，我们应该同现实的敌人战斗。”

“我们应该向青年展示唯心主义观点，例如哲学中唯心主义观点的内容。青年应该自觉地掌握，为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应该在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败退。”

同刘少奇同志一样，陆定一同志也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因此，陆定一同志列举了这样的事实。他恰巧同梅兰芳座谈过。梅兰芳说，在“艺术推陈出新”的旗帜下，似乎是同封建主义斗，没有让他(梅兰芳)表演，虽然众所周知，他是最年长的，是中国民族戏剧的最杰出活动家之一。现在出现了新的口号，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关系也有了变化。

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说，《人民日报》不时地刊登文章，证明有必要了解唯心主义哲学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目的是以此来显示这些理论的错误性，证明马列主义科学的先进。

尤其是在张岱年的讨论文章中，报纸写道：“在新中国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为什么当时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哲学的发展是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唯心主义不仅有阶级的根源，而且有认识论的根源。唯心主义甚至在消灭阶级之后仍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领域像以前一样将继续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公开暴露唯心主义，其目的是促进展开哲学的思想斗争，活跃哲学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不仅不会给唯物主义带来损失，而且相反，会促进唯物主义思想的繁荣。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以及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哲学领域学者的争鸣，将不仅表现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于同一个唯物主义阵营中不同学派的争鸣。近几年中，广泛发展的趋势，表现于要求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要符合某些准则，对一个问题只允许有一个可能答案，对一种理论只允许有一种可能的解释。真理只有一个，但达到这个真理的过程往往是曲折和复杂的。所以，出现因不同方法和不同观点而固有的不同学派，是种合乎规律性的现象。形成不同学派，是繁荣科研工作和提高理论水平的强有力保证。

在中共中央的座谈中，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只有在符合该口号性质的具体条件下才能提出来。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知道，越南想要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越南同志，提这样的口号，他们还没有必要的环境。在越南条件下提这种口号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刘少奇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口号，当时在匈牙利、在裴多菲俱乐部也进行过座谈。但是我们认为，在匈牙利的条件下，也不能提这个口号。事件表明，匈牙利实质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同志总结了思想：“我们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只是因为必要的环境成熟了。”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同志在所有座谈中，都认为有必要说一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务必要求有党的日常领导。

陆定一说：“在这个口号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作用有所增强，对党组织而言工作复杂化了。”

根据同中国同志的座谈，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的会见以及中国报刊的言论来判断，中国认为有必要细化和发展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的某些原则，特别是涉及下列问题：

1.关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

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外，艺术中也可采用其他文艺创作方法。

目前，中国报刊上强调的思想是：在其他创作方法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最革命的、最完善的。所以，尽管可以采用各种艺术创作方法，但对共产党员作家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应该是决定性的和唯一的。共产党员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应该从这种方法出发。

2.关于文学艺术中反对公式化的斗争

文学和艺术应该涉及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旨在揭示政治上重要的，对人民迫切的这些方面的某些作品，有时候受公式化困扰，艺术性不够。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反对类似作品的尖锐批评言论。在中国报刊上，明显因此而发表了许多资料，从中得

得出结论认为：不可以借口反对公式化的斗争，毁灭性地批评涉及当今生活重要问题，但写作时有时候带某种公式化成分的作品。这些言论说，应该把公式化作为缺点来批评，但同时不该抹掉许多作品的政治意义。

3.关于对古典遗产的态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旧时古典遗产的态度。如果说的是，中国文化拥有还经许多年也不会失去自己价值的宝库，这就更为正确了。同时，有时候试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掩盖下，不加批判地从旧遗产取出并非最优秀的，或者不加批判地改编旧文学旧文化的某些样本，粗鲁地破坏艺术原则，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永久保存自己作为作者的名字。中国同志认为，这种缺点也应该加以纠正。

在同中国同志的座谈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苏联没有文章和其他资料来阐述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中国同志也力图讲述为什么在中国条件下有必要提出这个口号。

陆定一同志在有次座谈中说：“我们不怕这个口号，我们认为对它不害怕，因为它只会有助于我们，促进工作。”

(五)

苏联文化部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继续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合作。

在出版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出版一系列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著作，增加出版中国作者的艺术作品。计划出版中国诗选，建立“新中国”丛书，收入一系列有关中国地理、经济、文化的驰名出版物。今年音乐出版社将出版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集，而国家造型艺术出版社将出版“中国民间艺术”画册。

在电影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大大巩固苏中电影活动家的创作合作。除了联合拍摄艺术片、纪实片、风光片外，苏联电影制片厂、导演和电影剧本作者同中国的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者建立固定联系。将出版献给中苏友谊的电影杂志月刊。

计划为苏联学生创作科学认识中国的电影。

文化部采取措施在苏联剧院演出中国戏剧家的剧本。今年，音乐团体的独唱者将把中国作者的作品列入自己的音乐会节目。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赠给苏联博物馆两千多件中国艺术作品。目前，中国同志又给我们的博物馆转交了550种展品。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的某些作品转交给中国。

关于扩大苏中之间文化合作措施以及执行1957年度合作计划的问题，将在文化部部务委员会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下列建议(见附件 [65])。

苏联文化部部长

H.米哈伊洛夫

附件：

苏联科学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建立了广泛联系。

几乎所有全苏代表大会和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会议，都邀请中国学者来参加。1956年进行了三次联合综合考察，而1957年将进行5次这样的考察。1956年，由18人组成的科学院著名学者小组出访中国，以帮助中国学者编制中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

1957年，苏联科学院接受38名中国学者来熟悉科技领域的研究组织和研究方法。从1956年秋季开始，科学院进行培养128名中国研究生和培训10名中国科学工作者。

近几年来，苏中科学院间建立了系统的图书交换。

为了加强和扩大学术交流，1956年1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邀请由10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讨论和签订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合作的协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准备了考虑到中国科学院所有原则的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协议草案。中国学者告知，他们准备1957年秋末签订协议。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6, д.506, л.67-85

№20593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1957年3月9日)

机密

苏共中央B.H.波诺马廖夫同志：

向您呈送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B.佩利申科与朝鲜外务相南日于今年3

月9日的会谈纪要。

附件2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7年3月25日

第292/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请将该文件在本处登记并保存。信息资料，已用于对朝鲜的工作。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密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B.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7年3月14日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的会谈纪要

(1957年3月9日)

今年3月9日应邀拜访了南日，并与他进行了会谈。

1.南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要求苏联于1957年向朝鲜提供3万吨炼钢用焦炭。

关于这方面南日告知：朝鲜唯一一座运转的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60%的生产能力。一年的缺口是13万吨焦炭。

为补足缺口，1957年中国将提供10万吨，原先拟提供13万吨。所缺的3万吨焦炭，朋友们希望从苏联获得。

朝鲜劳动党中不久前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委托南日向我们提出了上述请求。

我答复南日：上述请求将转告莫斯科。

2.接着南日说，他们已经知道关于李相朝进入莫斯科高级党校学习一事。关于这件事，南日说，平壤一些单位包括朝鲜外务省的不少朝鲜劳动党党员表示不理解 and 不满，为什么被朝鲜领导撤消大使职务的李相朝会被高级党校录取。有些党员提出问题：如何理解该事实；是否间接证明朝鲜领导的路线不正确和对李相朝的支持。

南日强调指出，“我们在解释上述问题时有些尴尬”。

我问了南日，这是指哪些党员，是否包括领导干部，对李相朝提出疑问的人得到了怎样的

答复和解释。

南日回答说，朝鲜领导层对李相朝的有关情况是清楚的。在回答有关李相朝的问题时是这样解释的：到高级党校学习有助于他改正错误。

我对南日说，这样的解释，依我看，是站得住脚的，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南日还谈到，一些投奔到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也在党校学习，但是这些人现在都不与待在中国或短期前往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交往，过去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这些人明显减少了。

至于两个曾是朝鲜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离开莫斯科后留在了中国的问题，南日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两个人行动有所限制，要他们保证不从事任何涉及朝鲜的活动。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B.佩利申科

ЦХСД, ф.5, оп.28, д.486, л.71-73

№1049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 经济评估的错误(1957年3月13日)

中国政府声明，虽然整体上可以接受由苏联远东经济委员会编写的远东经济发展评估草案，但此草案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上有几处错误：

一、以“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为题的一节(第1页)中提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反対”。这句话与事实不符。我们国家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刘少奇在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充分阐述，完全驳斥了这样的论断。在谈论中国的物价问题时，草案故意歪曲或抹去了李先念给人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主要成就，而夸大了我们个别的缺点与错误。因此，鉴于这一事实，草案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第20页)

二、由于只是对我们用于不同目的而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草案还有如下错误，主要表现为：

1.“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一节提到：“中国计划在1956年把手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到15.3%，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本只计划在1957年达到9.4%。”(第4页)事实上，前一个数字指的是手工工厂和个体手工业共同的产量，而后一个数字只反映了个体手工业产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2.“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称：“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夸大了其人均收入增长，假定中国关于国民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从1953到1956年有所增长，那就是1953年人均127元，1954年137元，1955年141元，1956年154元。根据刘少奇的报告，这是因为1953到1956年间工业生产有一个不高于90.3%的增长，而上面所列数字似乎表明增长应该是104%。”(第5页)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到的90.3%的增长包括了重工业、制造业和个体生产在内的所有工业生产，而薄一波报告中的104%的增长仅指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增长。

3.“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也指出：“中国1953到1956年间基本建设总额超过了五年计划预算427.4亿元的1%，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致人大的报告中只说中国到1956年将完成计划基本建设的87.6%。”(第7页)事实上，五年计划所设计的基本建设总额只包括经济和文化(文艺和教育)建设的主要部分，而1953到1956年间的基本建设总额包括更广的范围。

4.“发展计划”一节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本以98.3%作为整体增长目标，但周恩来总理在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中将目标降至90.3%。”(第23页)事实上，原定增长目标并没有降低。因为前一个数字不包括个体生产总量，而后一个数字包括了个体生产总量，这样就变成了90.3%。既然在公布这些报告时，对上面提及的数字所包含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毫无理由的。除了上面所列举的错误外，草案还有一些与我们关系不太大的小错误。

АВПРФ, ф.100(1957), оп.50, п.423, д.4

№25208 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1957年3月14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3月15日

第43/TC号

机密

文本第31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

1957年3月14日

奉周恩来之命，刘晓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如下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从1958年开始，增加米格17F战斗机和VK 1F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了在1959年开始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认为其符合当前的需要，中国的现有条件也能支持。

关于这一问题的陈述，中国政府提议派遣一组中国技术专家到苏联，并讨论了以下问题：

对于在中国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苏方需阐明其观点。

如果苏方对在中国生产喷气式飞机持肯定的态度，那么可以从中国当前的需求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角度对新机型交换意见。

对基本原料的运输以及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进行咨询。

刘晓要求苏方确认什么时候能够接待这个中国专家组，以及届时应该与哪些部门进行协商对接。

我回复刘晓，中国政府的请求将会报告给苏联政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3, п.423, л.5

№16686-2 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1957年3月14日)

情况通报

对H.A.米哈伊洛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的简要报告，苏共中央已经审核。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苏共中央通过了决议(苏共中央1957年2月14日通过的决议，第Ср32/222号)。批准了

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议定书和计划，责成苏联有关组织和部保证实施预先制订的措施，批准苏联文化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活动家代表团1957年访苏。

简要报告中包含的关于调整苏中科学交流的建议，将在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交流协议时加以考虑。为了签订这项协议，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应在今年3月访苏，但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代表团访问延至较晚时间。

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有必要改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建议，反映在苏共中央1957年3月4日的决定(第180/15号)“关于完善苏联对外宣传的措施”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A.列加索夫(签名)

1957年3月14日

ABПPФ, ф.5, оп.28, п.126, д.506, л.86

№24024 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1957年3月20日)

关于中国报刊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报道情况的报告

致Д.Т.谢皮洛夫同志：

195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对此次大会作了第一次报道。该报道很短——只有570个字，报道了会议的开幕，认为大会对苏联艺术家40年的工作作了总结；通报了艺术家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及会议的主要任务。在3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简要描述了约甘松同志的报告内容(共计730个字符)。

3月4日的《人民日报》简要介绍了您在艺术家大会上的报告内容(共计1500个字符，共用了3个半机器打印版面)，其中特别关注的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艺术家们对苏联新人形象的创作态度等问题。

另外，还介绍了中国艺术家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中国其他报刊均未对会议情况进行报道。而中国3月份出版的杂志，目前我们尚未收到。

П.阿布拉希莫夫

1957年3月20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48

№24023 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1957年3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机密

昨天，即1957年3月22日，我与出版和印刷事业部副部长A.M.马扎洛夫、出版总局副局长A.M.谢尔巴科夫等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与后者一起在场的还有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和中国使馆参赞张映吾。

中国同志与我们商议了关于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会议的问题。会谈涉及的问题具体有如下一些：

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议，中国代表团应当在莱比锡作一个题目为《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和组织编辑工作的经验》的报告。

中国同志建议该报告的名称为《编辑工作的组织》。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原因在于这样的名称不会引起各方的争议并成为发生争议的借口。比如，南斯拉夫代表便提出了关于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的问题。

中国同志还建议由苏联代表团首先在会议上作报告。

关于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德国同志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他们主张开办一个国际性的关于出版事业的杂志；继续保留此次会议的主席团，以作为一个现成的机构——检查会议建议的具体落实情况。

中国同志询问，我们对上述建议持何看法。

..... [66]

我们还建议，本次会议决议只具有强烈建议性质。必须使这次会议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会议上通过的任何决议均不具有强加于人的性质。会议只负责编制适用于全体与会者的决议。

会议上的所有工作均须依据如下方式进行：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点；重视出版活动的经验交流。

中国同志说，他们完全同意上述这些建议，并认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会议进程应遵循的原则。

苏联文化部与苏联代表团一起正在进行必要的会议准备工作。

近日，苏联代表——谢尔巴科夫同志将赴柏林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其职责便是落实我们与中国同志所商定的那些原则。

苏联文化部长

Н.米哈伊洛夫

1957年3月23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28, л.46-47

№138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1957年4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4月4日会议第8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А.布尔加宁主持。

第43项 关于不可能给台湾、南朝鲜和南越代表签发进入苏联参加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疫学代表大会签证事宜给国际兽疫委员会的通

报。 [67]

米高扬、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拒绝给南朝鲜人和南越人发放签证。

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台湾人——可以说：我们不可能给他们发放签证。

关于台湾人——应该询问中国人的意见。

南朝鲜人、南越人——可以发放签证。

РГАНИ , ф.3 , оп.12 , д.1007 , л.36-39

№25209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1957年4月8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2日

第309/nf号

机密

文本第3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68]

1957年4月8日

在会谈期间，刘晓谈到一个非官方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就像在莫斯科发行的英语和法语的报纸那样，也类似于在中国境内用俄语发行的报纸《友好》。

刘晓有理有据地强调说，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有着很多必要的因素。首先，在苏联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没达到能够熟练阅读俄文的程度。经常阅读苏联的中文报纸能够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也有大量的读者需要

阅读一份用汉语发行的苏联报纸，因为这样一份报纸在其版面上能够比中国报纸更加全面而广泛地让人了解到苏联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以及苏共中央书记处。

A.葛罗米柯

1957年4月11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3, п.423, л.26-27

№2059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57年4月9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9日

与金日成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他论述了国内经济状况的若干问题、新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以及朝鲜劳动党的党内情况。

关于五年计划。朝鲜1954—1956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经验，我们决定制订朝鲜1957—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基

本控制数字已审定，并提交给各部和地方。五年计划制订工作预计将于5—6月完成，随后计划草案将交给中国朋友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协调相互间的责任。然后，国家计委委员长非正式程序出访莫斯科就计划进行咨询和听取建议并解决重要问题。

朝鲜劳动党中央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朝鲜人民在吃、住、穿方面的需求。

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主要关注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去年我们获得了朝鲜(包括战前时期)历史上创纪录的粮食收成，总产量超过280万吨。

对此金日成说，过去，朝鲜一百万农户中，36%农户缺粮5—6个月；30%农户没有余粮，只能自给自足；只有剩下的34%农户提供商品粮。现在，只有10%农户缺粮2—3个月。其余农户粮食完全自给自足并提供商品粮。去年，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每个农户平均获得1.6吨粮食和9600朝元。

在最终统计1956年粮食总产量之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批准的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为280万吨。最终统计公布之后又提出5万吨补充任务。各地合作社、郡和道里讨论了计划任务。合作社社员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并决心把粮食总产量提高到340万吨。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有信心今年能获得粮食总产量300万吨以上。他说，支持这一信心的理由如下：

目前，农业合作社团结着81%以上的农户。由于有了合作社，我们更容易在农业中应用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在此，金日成谈了自己视察咸镜南道时看到，有些合作社善于运用科学手段，借助插播的方法取得了丰收。他列举数据：1町步插播土地上收获玉米60公担、大豆15公担、土豆150公担以及朝鲜白菜200公担。现在根据劳动党中央的指示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一经验。

今年大量开展用冷方法栽稻秧的工作。1948年开始进行的试验表明，用这种方法栽秧可以提前20—30天收稻米，即不迟于6月1—10日结束收割，而且每町步收到的稻米增加10—20公担。规定用这种方法栽秧的面积不少于稻米耕地的10%。

今年农业合作社有自己选留的种子；牵引设备条件较好；农用化肥

供应达到25万吨，去年是18万吨。

为了获得稻米的稳定收成，十分关心灌溉系统建设。目前，朝鲜农业拥有的灌溉系统可以在40万—42万町步耕地上不论天然降雨与否保证收成，而很大程度上依赖降雨的水浇地面积为6万—8万町步。近几年将在这些耕地上改建灌溉系统，还将建设新的灌溉系统。提出的任务是，在灌溉的耕地上要收到40公担稻米。这样，一年我们将从水浇地上收到200万—250万吨稻米。

大量开展了种植玉米的工作。去年玉米耕地面积为60万町步。这大大有助于去年获得粮食高产。1957年规定玉米种植面积为70万町步。预计每町步获得20公担玉米。去年农业合作社成功采用青贮(饲料)法，一共青贮了180万吨。肉类生产量很小，只能首先保证军队和很小一部分城市居民的需要。增加肉类生产的任务将晚一步解决，到粮食足以满足人均10公斤肉的需求。目前很大程度上以鱼代肉。今年计划捕鱼量为380万公担，如果包括响应的承诺是400万公担，这样，平均每个居民近40公斤。1956年捕鱼量为382万公担……

在保障居民穿衣方面我们将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和发展人造纤维生产。今年规定棉花播种面积达到2万町步，到五年计划末提高到5万町步，以便可能收获原棉2万吨(棉花在旱地上种植)。

在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增加由苏联援建的联合工厂生产的棉布产量的同时，在人造纤维生产方面采取措施，为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于1958年上半年提供必要设备的协定。

预计到五年计划末将生产各种布匹达到2亿米，人均达到20米，而1956年人均只有8.4米。

在工业方面主要关注迅速恢复和建设兴南化肥联合工厂。提出的任务是，今年完成恢复年生产能力折算成硫酸铵为40万吨的氮肥生产的各项工程。

我告知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已通过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兴南化工联合工厂扩大氮肥生产的决议。

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的关心并补充说，他们迫切期待这一决定。金日成日前视察了这家联合工厂。厂领导向他请求增派参加建设的劳动力

1000人并采取措施加快从苏联引进设备。

拟安排生产磷肥14万—16万吨以及为酸性土壤施用的石灰，1959年共计生产矿物肥料50万吨。

金日成说，解决居民住房保障的任务是困难和长期的任务。朝鲜拥有的建筑材料数量很少。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使苏联援建的年产40万吨的马顿水泥厂尽快投产，并把全国水泥年生产量提高到250万吨。这样才可能安排必要数量的水泥投入企业、住宅和水泥路的建设中。此外，将可能出口水泥到苏联和其他有关国家。

金日成告知，只是今年工业部门首次超额完成第一季度计划，工人们为超额完成计划在挖掘内部潜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列举了以下事实：

在讨论1957年计划时，冶金工业省建议制订炼铁计划为19万吨。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增加到23万吨。然而，冶金省不同意，认为这一计划过高了。这样，我们决定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认为，可以把炼铁计划提高到25万吨，而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工人们保证再增加2万吨，合计27万吨。

鉴于要完成上述炼铁任务，朝鲜政府曾向苏联求援，额外安排3万吨焦炭。金日成说，朝鲜政府对苏联政府满足这一请求表示衷心感谢。

朝鲜劳动党党内状况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掌握充分材料证明：以崔昌益为首的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中的一批人去年准备改变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领导，而自己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当我们从访问人民民主国家归来时，发现了这一反党分裂集团的活动，我们马上着手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耐心听取所有的意见并以适当方式搞搞清楚。然而，尽管我们把这一切安排妥帖，但效果并不理想。当一个分裂分子在全会上发言时(看来，金日成是指尹公钦的发言)，他恶毒攻击领导，其口气犹如李承晚在文章中写的。出席全会的人员对这一发言十分愤慨。我们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了影响，放弃了原来要耐心听取意见的想法，做出了把分裂分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当然，我们表现得过于草率。因此，受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委托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来帮助我们改正。在9月中央全会上修正了8月中央全会的

决议。一些同志恢复了党籍，一些同志恢复中央委员职务，但撤消了领导职务。我们在基层党组织向全体党员广泛解释了8月中央全会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全体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收到许多党员来信要求把这一反党集团的全体成员开除出党。我们同反党集团展开了斗争，但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反党集团的某个成员与祖国的敌人有联系。

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金日成继续说，必须指出，在匈牙利事件之前我们国内出现了相当困难和独特的状况：

朝鲜南方的李承晚集团分子加紧派遣特务和间谍并散发传单；

国内的前地主和富农蠢蠢欲动，在此金日成告知，朝鲜对4万地主没收了土地；

党内存在反党集团。

金日成得出结论，如果匈牙利事件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不揭露这一反党集团，那么，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许多同志都读到了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铁托在普拉的讲话并发表了看法，说实话，按铁托建议行动的人不多。中央常务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有这些事件和国内形势，并认为有必要向全体党员发公开信。在信中党中央号召全党团结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周围，团结在苏联周围并支持苏联政府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党员积极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一切措施。

金日成说，我们人民中没有反苏情绪，除非某些个别人，他们不仅反苏，而且也反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十分尊敬苏联并对苏联所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感激。

匈牙利事件时期我们成功应对并避免出现某些复杂情况的标志是，去年12月顺利进行了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

谈到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情况时，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金斗奉（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在8月事件时动摇了，在一系列问题上支

持反党集团。我们耐心向他指出这一立场的错误。现在他明白过来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分裂分子反党的错误行为。现在我们常务委员会会内工作协调。金日成说，我在思考如何提高常务委员会成员的威信并得出结论：常务委员会成员必须经常下到基层，给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事与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党是团结的，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

我们还采取措施加强思想战线的工作，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中。我们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党和青友党的工作。金日成指出，民主党原来有几十万党员，现在只剩下几万党员，而青友党只有几百党员。

今年秋收前的8月份，我们决定进行最高人民会议选举。

关于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决定我们已向全党通报。但我们没有向全体朝鲜人民通报。我们没这样做是因为在我国人民心中斯大林的名字是与热爱苏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谈到朝鲜劳动党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问题，金日成说：我们是年轻领导人，经验不足。我们曾努力而且继续努力向苏共学习，吸取苏共的经验。在崇拜方面——报刊和文学作品中常有赞美和颂扬，常常高呼“乌拉”（金日成没有明确指赞美谁，但我清楚他是在讲自己）。我们决心这一切要改正，过去做了，还要继续做。但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要考虑国情，不过分宣扬，不急于求成。现在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已结束。

金日成还告知，他最近一次到地方视察时揭露了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的错误行为。金日成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我们也决定加强法制，对一些错判或因一些小事而定罪的人，弄清情况后予以释放。然而，最高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犯了严重错误：把顽固敌人、暴动头目等都释放了。当然，这种人不多，而且其中一些人又重新被关了起来。在检查中发现，在最高法院领导岗位上混进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曾在日本警察机关服务过，而在自己履历上隐瞒了这些。是他们提出了释放上述人员的建议。高等法院中来自工人的成员提出反对，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纠正了这一错误，

将于近期在会上讨论该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

会谈结束时我转告金日成，苏共中央邀请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于1957年赴苏联休养。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将提交赴苏休养人员名单。

南日会见时在座。

苏联驻朝鲜大使

A.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 3-11

№20596-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4月10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10日

在拜访乔晓光时我向他通报金日成同志的告知，他们将于5—6月完成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7—1961年)的制订，并将把计划草案交给中国朋友，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

对这一告知乔晓光提出以下意见：

考虑到众所周知的困难，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

援助。

我解释说，金日成同志在告知中没有提出追加援助的具体问题，而只是说，他们考虑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中应该给谁送去朝鲜五年计划草案以听取意见和协调行动。

苏联驻朝鲜大使

A.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 12-13

№24933 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1957年4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协议的有效期到1957年12月31日。

第二条 1957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货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将按照上述协议，根据该纪要附件的第一份和第二份清单进行。

在第二份清单中还包括应当在1957年向苏联提供的一些货物，这些货物的总额应当补偿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和利息，同时还应当提供一些商品，用来支付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协议把其参与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份额。

第三条 为了支付根据该备忘录提供的商品，同时为了支付同商品流通相关的开支，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上述贸易协议的第5条款相互开办特别的以卢布支付的无息账户。

第四条 如果1955年12月27日和1956年7月25日苏中会谈纪要中规定的一些商品要在1957年1月1日之后进行供应，那么这些商品应该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进行计算。

第五条 关于如下列举的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的支付以及根据上述提到的1954年10月12日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的价值，将在1957年支付，支付的途径是通过苏联国家银行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款列出的款项，它们是：

1.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0年2月签署的协议提供的12329.6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2.1957年1—6月每月偿还根据1952年9月15日签署的协议提供的613.9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六分之一；

3.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5567.4万卢布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第1项和第2项条款中提出的利息的支付以及1954年1月28日提供的贷款利息的支付，根据该项条款规定的关于这些贷款的条件支付，以便在1957年偿还上述贷款。

上述提到的需要偿还的贷款的总数可以由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检查和计算的结果来确认。

第六条 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在1957年5月份前按照1957年4月份的情况对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给予的贷款的数目进行核算。

核算结果后的余额被划归根据本备忘录第三条需要支付的款项，在此之后，用于支付根据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需要支付的款项。

该备忘录于1957年4月11日拟定，一式两份，分别为俄语文本和中语文本，每份文本的法律效力相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授权代表

И.卡巴诺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

李哲人

РГАЭ, ф.413, оп.37, д.156, л.2-3

№20597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1957年4月13日)

1957年4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3—27日

平壤市

1957年4月13日

.....

接待了前来进行礼节性回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

在会谈中大使说，在伏罗希洛夫同志访华期间中国人民非常热烈地欢迎了他。

这种热烈欢迎反映了中国人民真诚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给予中国政治上的支持以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无私援助。大使还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作为回应我与乔晓光同志谈到了苏联人民对兄弟中国人民满怀兄弟情谊。我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对中国的访问是上述感情的反映，并将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强调了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对加强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重要性。

乔晓光指出，他认为今天的会见不仅是礼节性的，而且是两个曾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的见面。他表示希望今后能经常见面。他希望互相交换双方感兴趣的情报。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愿望且自己也为此努力。

大使馆武官库尔巴茨基和译员王宝琴会见时在座并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A.普扎诺夫(签名)

АВГ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6-18

№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年4月22日

第146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一、国民经济

1.工业和基本建设

2.私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改造

3.农业

二、国家建设问题

三、中共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措施

四、民族建设问题

五、与国内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六、中共党内和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二、中国与亚洲、东欧和南斯拉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四、中国与近中东各国

五、中日关系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七、中英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关系

第三部分 使馆内部工作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第四部分 结论

第五部分 建议

附件

1.表格一，1页

2.表格二，2页

3.表格三，1页

4.中国经济简要概述，88页

前言

在过去的1956年中，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遵循苏共二十大决议，从事本馆活动，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中关系。

二十大决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各项活动打上了重要的烙印，各项基本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成。在二十大决议影响下，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结果，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寻找到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民主制的途径，对以前所通过的有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部分决议进行了重新审理和明确解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为巩固中国人民的统一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苏联政府的各项外交基本行动，以实际行动始终不渝地重申中苏友谊和合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整个阵营力量所具

有的特殊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由于国际形势出现部分的复杂变化，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展示中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从而打消了我们敌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某种分歧而抱的希望。

1956年，国际上充满了各种重大事件，它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考验的一年。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中苏友谊的意义得到更大提升。中国朋友对国际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以批评的态度对自己的成绩和困难作出评价，并且及时采取了有助于降低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推动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措施。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坚定地同党内和政府机构中骄傲自满和故步自封分子作斗争，密切观察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如何解决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不忽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国家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中国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是在争取党内进一步统一、巩固党与群众联系、忠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下进行的。大会决议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党和国家建设实践的认识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从而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

八大的召开首次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当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主要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党应该运用自己的才能不仅要领导群众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统治，而且要经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过程。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样能够顺利解决比打碎旧社会关系的革命任务更加复杂的开创性的建设任务。

在认为党的八大具有特殊意义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党员总是强调，大会的成功离不开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决议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仅对工人阶级、农民，而且对知识分子，甚至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出席大会并发

言的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代表，无论在其公开声明中，还是私下评论中，他们都公认大会具有杰出的意义，承认会上通过各项决议是正确的，有助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并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许多代表通过大会工作以及对中国各区的个人了解后坚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批思想久经考验、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实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人。

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在大会的组织和进行、广大党员对会议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以及贯彻落实这些决议方面，都有许多独特而新颖的做法。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在适当情况下供兄弟共产党所利用。

中共八大工作结束刚不久，便发生了许多令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事件：匈牙利反革命政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公开侵略，在其他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帝国主义暗中偷袭。这些事件极大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不仅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都提出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在这一尖锐时期，由于一些身上披着拥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崇高称号外衣的头脑不清者就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言论，使得局势愈发严重。在这些头脑不清者人中，首先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其自认为有资格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拥有新的发言权。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

可以坚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动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的经济、内政、外交状况的特点如下：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在本报告年度，苏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得到了继续发展。苏共二十大对扩大苏中关系、巩固苏中友谊具有巨大影响，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响。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外交领域，苏中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国家一起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同心协力，为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国家间信任、联合和平和民主力量而奋斗。

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的中央决议对中国诸如中共八大、政协第三次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产生了影响。

1956年，中共与苏共中央以及中国与苏联政府继续支持和发展密切联系，在实施各自内政外交措施上彼此给予各方面支持。作为苏联与中国共同协调行动的一个鲜明例子便是对肃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苏联政府所制定的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相关措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就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予以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这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没能实施的话，而我们(中共中央)又对此不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向苏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进程的详细通报和在匈牙利问题上协调行动转达了热忱的感谢。同时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还就波兰事件问题表示了保持友好接触和经常的互相磋商。在发生对埃及的侵略期间，苏联与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战术措施上，表现出了紧密的互相协作。

苏联1956年所实施的外交基本措施在中国得到了很高评价，比如：苏南会谈、苏英会谈、苏法会谈、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争取裁军的努力等等。苏联对支持中国在其国际事务中，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采取的外交步骤博得了中国朋友的巨大满意和感激。(参见大使馆有关中国对苏联重大外交步骤反应的现时通报。)

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政府为改善工业、农业，为提高苏联居民生活水平和完善党和国家机构工作所采取的内政基本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新闻报刊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所从事的活动予以了相当广泛的阐述。

1956年，苏联与中国领导机构就各自国内状况以及与其他各国和兄弟党之间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情报交流。苏共中央在一年内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系列不公开的材料(有关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有关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结果和执行情况所作出的决议、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有关与朝鲜劳动党会谈情况)，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欢迎。同时中国的党和国家机构也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报了自己的措施，并向大使馆提供了相关情报。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苏联对发展中苏合作、巩固苏中人民友谊分别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是苏联各种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尤其是A.И.米高扬同志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代表团会谈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1956年苏中之间共签署了旨在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的11项重要协议。

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使得中共与苏共代表能够就两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换，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

1956年12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巩固和扩大苏中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阶层。苏联舰队对上海的访问，大批的社会、科学、文化及其他代表团之间的互访，同样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扩大。1956年，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一共95个，代表团人数总计1242人。到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一共77个，人数总计762人。

1956年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与苏联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苏中友谊具有特别意义。在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的忠诚以及与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正式声明和新闻报刊上，用比以往更加大的力度宣传苏中目标统一的思想、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紧密合作。这尤其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时候。中共中央就大规模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党内大会等下达了专门指示。按照中央指示，在各个大会上发言的分别是各党委第一书记或者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声明说，虽然1956年不是十月革命的整数周年，但是“如今必须强调指出，中国与苏联一如既往地彼此统一，任何东西哪怕在最小程度上都不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丝一毫的紧张。对我们忠

于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提出任何质疑。”《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文中尤其说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仅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必须所走的共同大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统一问题予以了认真关注，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种政治问题表示了极大关切。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和直接地参与了对这些事件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还与兄弟国家代表们一起认真开展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接见社会主义各国驻京大使和访华的各国代表团成员时分别强调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统一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代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在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的部分讲话中，在中国报刊大量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材料中，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本报告年度，对华关系上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对一切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换，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互相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领导和党的干部开始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说得更直率了，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了部分批评意见，而在过去这些是难得一见，并且始终是十分含蓄的。如今，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相互关系历史上和苏联对个别问题政策上的一些地方给予了批评性的评价。比如，在1956年3月31日至5月2日与大使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看法给予了严肃批评。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中国朋友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基本上赞同苏共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而所作的斗争。同时，中共中央在评价斯大林作用问题上，起先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中共的专门看法在《人民日报》4月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得到了反映。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通过的。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言论开始更加明确了。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与大使的一次会谈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运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两把刀子，其中之一，他指出，我们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拿来进攻我们自己。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中，中共就斯大林评价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声明说：“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根据党内消息来源，中国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持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过分地监管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对他们的关系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有关中国朋友中所存在类似的看法，在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提到了。在中国政府就苏联1956年10月30日宣言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统一及其奋斗的共同目标，一些工作者常常容易忽视国家在其互相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这种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尤其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和团结造成严重的损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提到的大国沙文主义是直接指向苏联的。其中说道：“……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斯大林)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

应该注意到，个别苏联公民在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同志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一部分苏联人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些苏联机关工作人员、苏联代表团成员在与中国团体组织和个别人士交往中，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谦虚，过于强调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对我们的不足却完全避而不提。他们通常把自己当成教训他人的人。

中国朋友以各种方式对苏方在重要政治问题表态时并非始终与他们商量表示了不满。根据以上所示，中国领导人认为，比如，我们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事先与各兄弟党以内部方式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波兰事件，中共领导人在10月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对没能向他们充分通报波兰事件起始阶段的发展情况表示了部分不满。（参见1956年10月21日大使与刘少奇的会谈。）

同时还引起中国批评意见的情况是，苏联新闻报刊就兄弟党互相关系原则问题所发表的部分言论，没有事先与其他兄弟党磋商。为此提到《真理报》记者撰写的《论波兰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文，对铁托在普拉讲话的评论等。

在中国引起负面反应的还有，在许多场合，苏方往往事后才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各种外交问题，事后去征求对苏联所采取步骤的看法。曾有

这种情况，一些苏联文件(有关裁军、埃及问题等)只剩最后1—2天时才转交中国朋友，有时离文件发表只剩几个小时。引起朋友意见的还有迟发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信，如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柏林经互会会议、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庆祝节(参加经互会会议的邀请信在开幕前夕才通知，中方已来不及向柏林派遣自己的代表团)。

在中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苏中之间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常常由于苏方的缘故而被拖得时间很长。可列举的有，由于苏联组织方面对进行经济问题谈判准备不足，使得由中国副总理李富春带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滞留了好几个月。

鉴于中国反对在运用苏联经验时采用教条主义以及在科学与艺术发展中推行新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闻报刊开始愈加经常地对苏联作者的个别论点提出批判，对苏联艺术作品提出批评。比如，《光明日报》1月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对日丹诺夫同志在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中国新闻报刊第一次对举办的苏联电影节上放映的苏联影片予以了批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我们影片中的消极面。应该注意的是，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节时，苏联新闻报刊同样对中国影片给予了批评的评价。

在中国分发给党员负责干部的内部材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在苏中国记者和留学生撰写的报道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渠道的有关苏联现实中的阴暗面。尤其最近刊登比较多的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对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辩论，有关我们在工资问题上存在的不足，有关苏联个别地区出现的骚乱，有关个别苏联人在境外的不雅行为等。中国朋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苏联公民在华的错误行为以及苏联有关组织领导人在财产上犯的个别过错沉默不语了。

必须指出的是，就各种问题对我们提出批评时，中国朋友的做法是讲究策略的和同志式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消除有碍我们之间友谊的个别不正常现象的良好提醒。周恩来12月19日在仰光就苏中关系问题发言时声明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就像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样，原则上允许相互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只会促进我们的共同进步。”

鉴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大使馆发专电向中央通报了中国朋友对苏联的主要意见，并加入了改正缺点和进一步改善苏

中关系的相应建议。

至于说到这种情况，即最近中国开始对积极发展中的苏中友好关系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进行更为仔细而深入研究和分析，更为经常地对个别苏联代表团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首先，如以上所述，这是由于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政府为执行会议决议而随后所采取的内政措施。这些措施，尤其是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有利于在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包括与中国之间，营造一种更加频繁而开诚布公交流意见的友好氛围。

与此同时，决定的因素显然是由于中国政府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解放后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经验。近七年半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党和国家机构，他们在领导国民经济中取得巨大经验，目前已有能力熟练而独立地去解决管理一个经济复杂的大国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这些都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而强大的国家机构中，成长起一批干事认真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国家干部，他们在与苏联各种组织、部门、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广泛和密切交往过程中，取得了在解决个别问题以及领导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如今中国建立了必要的各种国家机关、设计和科研机构，能够独立解决和批评对待整个国家在企业设计、建设和经营中，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复杂问题。近年来，中国干部所取得的经验逐渐丰富了与人民民主各国的专家与国家机关之间，首先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合作。所有这些合起来为中方去研究苏中合作中个别实际问题创造了新的局面，对此苏联相关组织和机构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应该指出，在中国现实中也存在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互相关系造成一定损害的个别不健康的现象。为此必须指出的是，基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中国一部分群众中，其中包括党员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无论是对待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朝鲜、越南、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有关类似情绪在中共内部资料和中国西文新闻报刊上都提到过。

在苏中经济合作领域，过去的1956年中的特点如下：

苏中贸易。1956年是苏中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年。据资料初步统

计，1956年苏联与中国的外贸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为59.97亿卢布(包括通过对外经济总局渠道的供货)，1956年苏联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51.5%，1955年为52%。根据1955年12月27日签订的商品流通备忘录及补充协议，1956年商品流通总额苏中互相承担的义务为62.216亿卢布(不包括根据双方互相协商过账1957年的供货量)，1955年为49.158亿卢布，其中苏联向中国的供货数量预计为27.472亿卢布，中国向苏联的供货数量为34.744亿卢布。苏联完成了1956年合同额中对华所承担义务的供货数量的97.2%(26.706亿卢布)，而中国则完成了95.8%(33.264亿卢布)。苏联完成的出口计划达到了将近98.9%，中国为99.6%。与过去几年不同，1956年中，由于苏联供货进展比较顺利，极大地缩小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供货数量上的差距。截至本报告年底，双方供货和结算收支平衡中，苏方顺差为27.86亿卢布。

本报告年度，苏联继续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购买方：在中国出口总额中苏联进口比重占6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农业产品总额为17.873亿卢布，占中国商品总额的5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商品种类超过233种。这些商品诸如乙醇、干果、葡萄糖、蔬菜和蔬菜罐头、甘油、琼脂、101产品、镉等，中国还是第一次提供。苏联1956年在中国采购的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前几年价格的水平，除了1956年在中国第一次采购的那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我们各家联合企业和中国各家公司根据国际平均价格水平而确立的。

1956年，保证中国商品资源出口出现了紧张局面。与过去几年情况不同，中国向苏联供货进行得十分困难，对此，中方的解释如下：1956年下半年，在中国一系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劳动人民购买力提高以及工人与职员工资的增加，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国内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投资生产步伐加快对生铁、黑色金属轧材、铝、水泥、烧碱、钙碱等的需求；1956年中国出口规模比1955年(22%)有了很大增长，尤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

鉴于目前形成的局面，贸易办事处无法保证合同中所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供货数量，如猪肉、大米、生铁、钢材等。为此必须指出的是，中方到1956年11月底还声称，向苏联供货的义务将会完全履行，直到12月3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正式提出请求把1956年的供货数量5139.9万卢布过账到1957年，其中包括生铁、水泥、生丝、橡胶、轧钢、猪皮等商品。此外，中方请求用其他商品取代数额约3863.7万卢布

的部分商品以及取消1956年中国对苏联供货数量计约3933.5万卢布的供货合同。苏方考虑到中国朋友的请求，对用其他商品取代部分商品表示了同意，并同意将1956年供货数量5139.9卢布过账到1957年。中方有关取消1956年供货数量计4318.5卢布的供货合同的请求则被列入了备案。

1956年中方按季度出货进行得并不平衡，其原因解释为，1956年第一、二季度季节性农业产品出货大幅增加。中国供应的商品质量基本上符合合同的技术要求。全苏联合企业提出的个别补偿要求主要涉及商品短缺、尤其是日常用品(包袋、鞋子、针织品、手工艺品)以及商品运输途中的破损。补偿要求通常都及时得到了中国公司的满足。

由于外贸工作开展条件发生变化(很大一部分外贸业务集中在公司、部委的中央机构中，拥有一批更有经验和专业的外贸干部等)以及出于减少在华苏联专家人数的必要，对贸易办事处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革，减少了全苏联合企业在华雇员人数。关闭了设在沈阳、天津、哈尔滨和广东的贸易办事处的分部，并将雇员人数从85名减少到42名(截至1957年1月1日)。

1956年苏联供货数量比1955年增长了12.1%。这一增幅是在大宗商品供应量的增长下降到10.5%的同时，靠总体供货增加而取得的。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大宗商品供应计划只完成94.8%，数额达到10.638亿卢布。未完成设备交货的全苏联合企业，主要有机械出口公司(18.4%)、机床进口公司(13.8%)、船舶进口公司(6.1%)、汽车出口公司(3.6%)以及全苏联合企业工业原料进口公司(金属轧材)等。换言之，除了全苏联合企业机械进口公司和全苏联合企业木材出口公司之外，其他的所有联合企业都未完成1956年的各自义务。

尽管苏联出口中国的货物供应商对供货文件的手续作了一些改进，但发货仍然出现违反规定程序的情况。违反供货文件程序大部分是因发货厂家的过错造成的。一部分供货文件甚至在铁路运输中遗失了。自开通经蒙古的铁路直达列车后发现，出口商品供应商并不是都能正确标明货物应该经过的边境车站的名称。因此，中国收货人常常为货物在中国境内多余运输而承担额外的铁路运输费用。此外，根据中国主管领导人的声明，这种局面导致收货人无法及时收到货物，从而又影响了生产计划。还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给苏联境内收货人的货物却发到了中国的集宁车站。全苏联合企业和发货厂家应该认真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并采

取措施，杜绝类似情况在以后重复发生。

1956年，贸易办事处基本上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在贸易办事处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不足。贸易办事处未能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供货数量，也未能保证发往苏联的同等数量的中国商品，这类商品是：生铁、水泥、黑色金属轧材、猪肉、淀粉、大米、猪皮、生丝、花生，从而影响了一系列苏联企业的工作。未能保证1956年修理中的“食品工业”船和“二号冷冻船”完工下水。同时贸易办事处也未能完成对合同规定的苏联商品交货数量和期限所承担的义务。

对华技术援助。1956年苏中经济合作明显扩大，尤其是苏联对华技术援助的规模扩大了。中国同志对1956年4月签订的苏中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根据该协议，苏联必须对中国55个工业企业建设提供额外援助。苏中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就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华技术援助问题所举行的谈判。众所周知，中国同志起先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成套企业提出了过高的请求，苏联对此并未给予完全满足。拟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109个新建企业建设的援助(中方请求的是200个项目以上)至1960—1961年方可开始提供设备。对中国同志的解释是，无法做到更早开始提供设备，因为在我们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按签订的协议对向中国提供大量设备已定了下来。在对完成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不构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增加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设备供应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至于1957—1958年对中国提供设备问题，由于苏联实行工业技术改造任务以及这些年内对中国供应设备的大量增加，有必要把1957和1958年的部分设备交货期推后至1959和1960年，因为所制定的这些年内供应大批设备数量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过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结构复杂、独特的专业设备的请求(锻造和冲压设备、金属切割机床等)。

中国朋友正确理解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况且中共八大期间，在与А.И.米高扬同志和苏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会谈中，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承认，中国对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量新建工业项目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现实的，中方本身对其也是无法实施的。这一情况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随后所采取的措施中，尤其是中共八大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中得到了反映。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中国同志采取了放

慢1957年基础建设步伐的方针。同时，这一路线实施也是针对苏联援助建设的成套企业。众所周知，1957年“156”项目中一系列企业的基本建设资金被取消了。为此，中国同志打算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的设备数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该年1月17日与经济合作顾问的一次会谈中提出，1957年中国出口的能力无法保证支付从苏联进口的供货和计划所规定的其他货款，缺口将近3亿卢布。为此，中方确定1957年苏联总体供货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为9.8亿—9.9亿卢布，以取代之前商定的12亿卢布，其中设备项目为6.623亿卢布，取代苏联所提出的10亿卢布。缩减供货主要涉及机械制造厂家、国防工业企业、部分冶金工业项目。从苏联提议供应设备的117家企业中，中方完全接受的为其中66家企业的供货，部分接受的为其中33个项目，拒绝接受的为其中18个项目。这一问题现正处在苏中双方协商阶段。

缩减苏联对华供货是在1957年设备供应计划已经被通过、对联盟各部总供应商已下达了订单——供货通知单，并且设备已经开始装运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将对我们工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对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将造成无效的浪费和亏损。同时，这种情况还会影响到中国设备供货订单项目的完成。在北京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苏联部门专家组领导必须仔细研究中方的建议，提醒中国朋友采取顾全中苏双方利益的更为合理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对华技术援助所做的主要方面有，完成项目，提供设备以及向由苏联援建成套设备的企业派遣专家。1956年苏联对“211”项目中各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援助，除了1956年1月1日之间已经投入运行的项目之外，14家企业和2个单独车间完全投入了使用(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制造厂、北京无线电子管厂等)，22家企业中单独车间和项目开工。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苏联在研究核物理和民用核能方面所给予的援助。1956年提供的技术援助规模比1955年大大提高了。共向99家企业提供了数额8.396亿卢布的设备(完成计划101%)，即比1955年增加了1.5倍。然而，按供货计划单却并未完成任务。对项目、派遣苏联专家、接受中国专家赴苏联生产实践以及其他技术援助的支出达1.927亿卢布，或占计划的约96%。计划未完成，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足够的设计资料。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得到了其所提供的项目文件和必要设备。设备质量和项目技术文件总体上都很不错，并且满足了中方的要求。截至1957年1月1日，在华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共有1904名，其中822名是成套企业方面的。向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专

家们总体上都能胜任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促进了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巩固。

但是，在对华技术援助的巨大而重要的工作中，至今仍存在着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严重不足。尽管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为保证苏方实质性履行义务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许多联盟部委开展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依然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大使馆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该工作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但是1956年苏方履行对华技术援助义务的情况依然是紧张。至今对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各家企业在设备交货期、项目技术文件转交和派遣专家上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约。对中国履行各自义务无法完全令人满意的部委有：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苏联化学工业部及一系列其他部门。一年内，化学工业部违反项目技术文件转交所涉及的企业有：吉林炭化氰生产厂(炭化物分类和包装车间、压缩车间、毒气吸收装备车间)、太原化工厂(供水和下水表面布局工作图纸、工厂总图纸等)、兰州化工厂。该部对一些工厂没有很好地供应设备。对吉林氮矿肥生产厂的个别设备交货拖期达到2年以上，对吉林氨基染料生产厂的设备拖延交货达到半年以上。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曾多次提请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注意苏联对该厂、太原工厂和其他设施的设备交货中不满意的情况。中国同志向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就其违反各项目的项目文件转交期提出了许多意见。该部拖延转交245工厂工作图纸，结果造成将近4000名建筑工人严重停工。由于未及时转交804工厂工作图纸，使得该厂建设全年计划搁浅。在该总供应商和其他部分供应商工作中还出现了对建筑文件转交的不道德做法，具体是：地下排灌图纸(供水和下水等)在大楼工作图纸之后才转交。这种技术文件提供程序严重地违反了建筑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无效浪费。

作为六大项目的总供应商，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在履行其对中方义务上态度极其玩忽职守。在对待所有这些企业上，该部系统地违反了项目文件转交期。尤其是严重耽误了工厂内地面上的排灌和道路的技术文件，没有这些就无法开始生产大楼的建设。违反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的还有一系列其他联盟各部(苏联电站部、苏联黑色金属部、苏联国防工业部等)。

各部总供应商尚未达到高质量地完成对华项目工作。苏联项目组织对适合中国地方条件的项目结合上注意不够，通常所设计的构造和设备都是过时的种类。例如，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完成的工作图纸常常质量

不行，其中存在许多错误，设计方法陈旧，在推荐使用金属构架的那些地方，中国设计者早已使用上了混凝土。

各总供应商并非总是保证其所供应的设备令人满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工业在中国工作人员心中的威信。质量低下的设备分别供给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锻造冲床)、吉林的氯化氟生产厂(冷却桶)和氮矿肥生产厂(空气分离机组)、哈尔滨锅炉厂(弯曲设备)及其他设施。有些情况，由于包装不好，设备在途中损坏了。

在向中国派遣专家方面，联盟各部依然违反自己的义务(苏联化学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苏联药品工业部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中国同志对违反向中国派遣专家期限的苏联各部曾多次提出了意见。

过去一年的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工作实践再次表明，在派遣专家去中国工作上，务必要仔细注意人员的业务和道德素质。鉴于中国国家干部人数的极大增加以及所取得的一定工作经验，要求联盟各部派遣去华专家务必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面、充分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向中国工程技术工作者提供专业技术帮助。然而，至今苏联各部显然没有认真注意这一问题。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专业水平还有待做得更好。中国同志愈加频繁地对苏联专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做法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比如，通过内部文件上发表的批评资料)。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六局副局长史可壮(Шикэчжуан)在出访苏联前夕与苏联专家Я.И.帕胡奇的一次会谈中，请求其向苏联交通机械制造部领导转达说，该部近期来的技术援助专家的技术专业比1—2年前来的专家水平要低许多。并非所有的专家对其承担的事业都充满义务和责任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竭力让自己“辛勤承担”与中国干部一起频繁而辛劳的工作。武汉在建冶金联合企业厂长直接向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苏联专家组组长萨维茨基对中国建筑联合企业工作人员援助不够。在使馆人员到中国一些城市出差时，中国地方负责人员也向他们提到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不足。

使馆认为有必要指出，苏联各部来华解决技术援助问题的一些专家和负责同志实际上根本就无所事事。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外事处主任А.Е.霍赫洛夫同志领导的该部工作组对中方采取了显然错误的立场。他们对西安市和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向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予任何答复，借口说，他们不想去“检查”苏联部长会议有关向中方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限的决议。换言之，А.Е.霍赫洛夫同志不敢向中国同志通

报，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无法保证按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期完成一系列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在霍赫洛夫同志向北京大使馆和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作了解释后，情况才得到了扭转。

我们苏联各部和机关显然没有完全考虑到无可争议的这一事实，即中国已经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专业工程技术干部，他们在苏联企业经过了认真学习，从参加建设中国企业的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此外，不能不注意到，现在中国工作的有一大批来自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都有中国专家在学习和工作。这一切致使具有很多知识的中国专家可用更加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专家的工作，去评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去评价技术文件以及与技术援助相关的其他问题。

鉴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同志对待苏方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不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开始更加直率地指出这些不足，随即向联盟各部、外经总局和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提出意见，尤其是在苏联使馆人员出差去中国一系列城市的时候(西安、太原、哈尔滨、汉口等)。中国同志对设备供应工作，对提供给中国设施的设计，对苏联专家在华项目组织和企业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都给予了直接的指摘。毫无疑问，这一切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即坚决消除所有不正常的现象，其中包括那些在联盟各部、对外经济联系总局以及与中国有关各部、各机关的专家和个别企业领导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刚刚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为巩固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采取了最新措施。

说到中方与苏联共同对“211”项企业中的一系列设施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应该指出，中国同志在选择建筑场地、准备原始数据和设计任务、进行勘测工作中犯了严重差错。比如，中方至今迟迟未能按“55”项企业协议提供发电站设计的原始数据(延迟了近半年)。中国有时拖延提供苏方设计所必需的补充原始数据，从而造成苏联设计机构设计工作完成期爽约。在一系列情况下，出现拖延提供苏中项目部分互相结合所需要的数据。在设计过程中，中方有时改变工厂规划，从而对设计结果(化工厂、国防设施等)也就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同志并非总是及时为本厂在建企业订购设备，这有时导致企业投产期限无法履约，因为临时去订购很难得到满足(如平安煤矿5号矿区、新丘煤矿)。

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呼吁保证履行苏方对中国技术援助的义务。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对违反设备供应协议和合同、提供设计技术书、派遣专家等的联盟总部供应商、个别部委和机构及时地发出了信息。但是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未能达到及时而优质履行苏方对华技术援助的所有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本机构在工作上所出现的不足。机构中对苏联设备交货以及对技术援助设施的项目书从不进行系统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有关履行设备供应义务的情况，并非来自外经总局和苏联外贸机构，而是来自苏联设备专家组领导人从中国朋友和中国机械进口总公司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反馈，也就是来自中方的两条渠道，而这些情况未必都是准确的。

机构转交苏方技术书情报的程序十分复杂而紊乱，其结果是实际上无法建立起及时对履行这部分义务的有效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对使馆消除技术援助工作中的缺点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不够。尽管实践已经证明，使馆的干预有助于解决涉及对华技术援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京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显然对1956年8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系事务总局办事处”决议的实际意义评价不够。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不足还有技术专家与苏联顾问组之间缺少密切联系，从而阻碍消除中国同志在苏联技术援助企业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企业建设规划问题、投入使用期、原材料供应等)。

科学技术合作。过去的一年中，苏中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极大发展。1956年6月和12月在北京与莫斯科分别举行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和第五次会议对此予以了极大的促进。使馆在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对第四次工作会议的工作结果进行了通报。

第五次会议上倾听了有关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过程的通报，审议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开展先进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的迫切问题。会议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不仅中方，而且委员会中的苏方代表对如何使用所取得的经验都分别进行了介绍，从而纠正了过去只有中方介绍如何使用所掌握科技资料的那种显然不正常的情况。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方所提出的有关获得苏联各种科学文件和派遣专家的近500项申请以及苏方所提出的近100项申请。应该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说，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苏方对第五次会议的筹备比以前的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要成功得多。就筹备中方提交会议审理的申请进行了巨大的工

作(半年之内准备了1000多个项目)。苏联有关部委对中方的申请开展了比较有组织的工作。向第五次会议提交了2000多个项目的中国同志当然期望其一大部分申请能得到苏方的满足。但审议通过的只有近500个项目，并且其中一半还是在会议间隙协商通过的。由于一些不明原因，将近900个已经准备好的中方申请在会上以其“未准备好”为由而没有进行审议。这样一来，科技合作处和委员会苏联方面领导人使自己处在了明显被动的地步，因为中国同志通过联盟各部早就得到确定，事实上是对上述项目，各部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在科技合作管理处放置了3个月之久。使馆认为，必须对这种不正常情况予以重视，并建议科技合作管理处领导采取措施，在科技合作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将这些项目转交给中方。会上就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情况进行了审理。尽管对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联盟各部履行苏方对华科技合作义务的监督予以了改善，但占已协商通过的所有中方申请数量10%的一系列项目却未能如期提交，并转放到1957年。中方基本上是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去年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巩固了委员会苏中双方之间的交往。双方关系开始具有更加开诚布公的特征。中国同志积极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转用于国民经济中，就可能会引起苏联兴趣的那些科技资料提出了自己的推荐意见。他们创造一切机会，以便使在华苏联专家能够了解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中国朋友开始对委员会中的苏方工作表现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和批评态度，经常对苏方因未能完成某种义务而提出公正的意见(苏联专家来华拖期、团队零散、延误文件转交等诸如此类)。他们对进一步扩大中苏科技关系表现得比苏方更为积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对建立苏中相关部委之间直接联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几乎一年时间内，中国同志已经努力设法取得苏方同意给予各部在交换各种科技资料上的自主权利。中国政府自己已经通过了相关决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有关扩大苏中相关各部和部门直接交往的决议未能完全满足中方在该领域的期望。

1956年，中苏之间的科技合作采取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其标志在于这一年开展了一系列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有关掌握黑龙江河的能源资源、勘查中国地下矿产的一系列地质考察、防止中国土壤侵蚀的研究等)。联合研究给苏中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益处，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工作友好联系。但在很多情况下，个别苏联中央机构组织对筹备和进行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所抱的形式主义态度使苏联威信以及加强苏中友谊造成了一定损失。苏方在筹备黑龙江野外工作综合考察中暴露的不足说明了这一

点。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的州、边疆区和地区组织都未事先得到中央有关今年中国大批科学家、专家和年轻学者将抵达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工作的预告。结果是，中方境内地方当局预先做好了接受考察团的准备，而我方的地方当局则在交通运输安排、解决与中国朋友抵达后相关的琐碎日常问题上进行得十分吃力。考察团中的苏方在设备、水上交通运输和食品供应上比中方要差许多。设法克服苏中联合科学考察组织中的其他不足，尤其是苏联科学院与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活动中的闭关自守，毫无疑问，这势必能使开展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同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开展中苏科技合作方面专家和学者之间的联合工作同样是十分适宜的。首先，这符合互助原则，其次，能给苏联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益处。1956年，中苏之间以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多边科技关系(举行学术会、工作会议、联合研究个别科学问题等)。1956年1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船舶制造会议上，苏联、中国、波兰、东德都出席参加。中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国同志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各种国际科技合作会议，派遣专业、权威代表团参加。去年的另一特点是，苏中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科学研究所、项目研究所、实验室等)，尽管这一合作形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互相邀请专家了解科研成果和交换工业和农业各领域中的经验是过去一年中科研合作的重要形式。通过科技合作路线，苏联有100多名专家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代表团成员)，也就是说，比1955年多出了将近一倍；中国有200多名专家莅临苏联。中国同志十分乐意邀请苏联在各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来华，帮助解决中国的个别科学问题。

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苏中文化合作协议的签订促进了过去一年里苏中文化联系一定程度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协议制定的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要求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和体育代表团互相交流以及出版物、电影影片等的交换。

根据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国向苏联派遣了3家艺术团体和11个各类代表团以及1343名本科留学生、520名留学研究生以及97名进修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2家艺术团体和9个代表团。

文化合作计划是主要的，但并非是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唯一渠道。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发展，这些都是直接通过苏联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全苏对外文协和中苏友协之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国

总工会之间以及通过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协会、影片出口公司等途径实现的。

1956年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中，中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称赞了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访问。毛泽东在与大使的交谈中对伟大的苏联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表示了满意，并对他们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规划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苏联在原子能运用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苏联生产先进工作者代表团的访问也得到了中国高度评价。

本报告年度，总共有26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其中成员人数达到254名。回国后，代表团成员为巩固苏中友谊以及广泛宣传他们在苏联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开展了卓越的工作。比如，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两个月内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先后作了200多场介绍有关苏联情况的报告和演讲，出席人次达到约30万人。

1956年苏方在实施文化合作计划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足：苏联代表团经常晚到或者分成好几批往返中国；苏联文化部在向中方通报有关苏联代表团的出发日期上做得很差。未能及时通报代表团和艺术团体成员的基本资料。

苏中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派艺术团体。

苏联艺术团体在中国的演出取得很大成功。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国表演很成功，演出观看人次达到22.5万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与前几年赴中国的其他苏联艺术团体不同，乌克兰艺术团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巨大中心城市表演，而且还到无锡、郑州、西安、杭州等地。苏联马戏团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同样也很成功，并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兴趣。基辅歌剧与芭蕾舞团女独唱演员Г.奥列依尼琴科在中国做了很好的自我展示。遗憾的是，苏联人民演员Б.戈梅拉的表现却无法让人恭维。戈梅拉所表现出的有些高傲的举止以及对巡回演出提出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要求，给中国朋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对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在文化、科学和技术以及对华转授苏联技术经验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6年5月5日至8月5日在杭州举办了展览。共有34.66万人次观看了展览会。两个月内共有20.2万人次参观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根据中方的愿望，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上，安排9000名中国专家对展览会资料进行了深度介绍。

过去一年中，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得到了扩大。1956年在中国银幕上共上映了103部长片，其中45部苏联片、37部中国片、21部其他国家产影片。此外，还上映了约100部苏联纪录和科普短片。反映苏共二十大工作的新闻影片特刊发行量十分巨大。1956年观看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总人数达到3.5亿人，1955年为3.35亿人。

11月7—13日，为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在中国20个最大城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列入电影节片单的有影片《母亲》、《未结束的故事》、《士兵伊万·勃罗夫金》、《外来亲家》。电影节期间，共有427.5万人观看了苏联影片。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在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应该指出，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但对苏联所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则无法恭维(中国内部新闻报刊上刊登了中国作者撰写的资料，证实莫斯科举办的电影节组织工作很糟糕)。

1956年，与往年一样，苏联书籍依然是中国人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科技先进成果的重要来源。

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图书从5184种增加到6210种，增长了19.7%，而发行数量则从4500万册增加到6400万册，增长了42.7%。几乎中国出版的每三本图书中就有一本苏联图书。几乎中国出版的高中等技术院校的所有教科书都是翻译苏联作者的书藉。

中国同志对中国出版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根据中国出版总局资料显示，从1956年1月至10月，中国出版了列宁著作28种，发行量为72.25万册，斯大林著作19种，发行量为132.8万册。1956年对华几乎没有供应任何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因为中国组织方安排在中国翻译出版苏联书藉。

1956年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俄文及其他文种图书(没有维吾尔语)共计327.2165万册，1955年为321.0257万册。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图书在中国传播和出版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虽然1956年出版的苏联中文图书的总发行量以及科技和政治类书籍的发

销量增加了，但由于中国作者的政治类书籍出版大大增加，苏联政治类书籍的数量则因此减少了17%。在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数量增长绝对可观的情况下，1956年，按种类数量，其在外文书籍再版中的比重从94%下降到89.3%，按发行数量，从92%下降到88.9%。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的增幅(主要是科技类书籍)比苏联书籍出版增幅要高许多。比如，按发行数量，苏联书籍出版增幅为42.7%，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则增长了一倍，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出版几乎也达到一倍。按书籍种类，增幅数字则更有特点：苏联方面为19.8%，人民民主国家方面为60.8%，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则接近了1.5倍。1957年中国在订购苏联文艺和社会政治杂志上(《苏联》、《苏联妇女》)预计要减少苏联这类书籍的进口。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和机构减少了对不具备学术性质的外文出版物的订购经费。同时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的进口(主要是科技书籍)则比1956年增长了85%，而按整套数量计算则增长3倍。从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书籍预计也增加了。但是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外文书籍的比重不大，苏联书籍依然在这方面占据主要位置。

使馆注意到苏联进口的中国出版的俄文和中文书籍及期刊出现明显增长(达到1倍多)。中国朋友十分满意地接受了有关从1957年1月1日起在莫斯科开版印刷《友好报》6.1万份的决议。同时必须注意到，根据订户数量，《友好报》的发行量明显很少(为总印数的20%)。

总体上应该承认，1956年苏中图书交换扩大并非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工作成功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出版社的高度积极性和中国国际书店公司的工作。在国际图书公司和图书贸易总局积极活动下，按满足中方订购的情况看，1956年苏联图书在中国所占比重还可高出许多。使馆认为情况尤其不正常的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未能完成国际书店的订购，特别是科技书籍，1956年，不算完全拒绝发货的话，共有43.9万册苏联图书未能完成发货。

使馆注意到在苏联出版的俄文中国图书发行量相当少。甚至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共八大文件资料》汇编，苏联只出版发行了7.5万册，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苏联读者对其的实际需求。中国则大量出版了苏共二十大文件资料。这些文件，如《苏共中央二十大总结报告》和《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决议》，其单行本发行量达到318万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报告》和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1956—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发行总量为80万册。

使馆注意到苏联文化部和出版总局对苏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籍和中国出版社出版苏联书籍工作的合作和协商显得十分薄弱。这种协商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使馆看来，在京国际图书公司分部只从事机械的图书邮寄和统计，没有起到它所应该起到的作为苏中出版社和图书贸易组织联系环节的那种作用。

1956年1月17日，苏中国国际旅行社之间签订了游客互换协定，根据该协定，从5月18日至12月31日，在苏中关系历史上，苏联有44个旅游团，共计1344人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使馆认为不妥的是，1956年去中国的所有旅游团都没有进行身体检查。其结果是，团组中出现了病人，造成团组行动不便，并且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带来许多麻烦。严重不足的还有，旅游团组中没有自始至终的陪同人员。

1956年12月31日，第一个，也是1956年唯一的一个中国旅游团，一行23人到达了莫斯科。苏中旅游人数出现的这种比例，在使馆看来，其原因是，去苏联的旅游按其成本，中国职工还负担不起。在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70元的情况下，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期一个月旅游的二等火车票价格为1000元，飞机票价格为1500元。造成中国游客去苏联旅游更多实质性障碍的还有中国缺少休假制度。因此，1956年唯一的中国旅游团的旅游还是工会支付的或者是分配给大资产阶级中的代表。

由于旅游的昂贵成本以及中国朋友去莫斯科的愿望，中国国际旅行社只能设法给那些过境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发放旅游通行证。因而，使馆认为不妥的做法是，尽管中国国际旅行社再三请求，苏联国际旅行社理事会7月份仍然拒绝向中国演出团一行78人发放旅游通行证，8月份则拒绝接受过境莫斯科赴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的300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旅游申请。

从1956年12月14日至1957年1月24日，莫斯科举行了苏中国国际旅行社代表会谈，结果签订了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及为过境旅客提供互相服务的议定书。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中规定，1957年苏联将派遣1000名游客，赴苏联的中国游客人数将晚些时候确定。鉴于中国国际旅

行社宾馆总量有限以及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签订游客交换协定的愿望，根据中方请求，将苏联赴中国游客人数缩减到了1000名。

在对1956年苏中文化合作进行总结时，应该指出，7月5日协定为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文化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1956年文化合作方面特点在于，由影片、文学作品的一般交换开始过渡到科技领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国各区之间、苏中边境地区、大城市、院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联系；开始过渡到联合创造影片、学术和文学作品等。

苏联文化部与中国文化部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苏中文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谈判中对1956年的文化合作实施进行了总结，制定和签署了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预先讨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有必要增补为期3—5年文化合作前景全年计划的问题。

二、中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年，与过去好多年来一样，朝鲜问题在中朝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鉴于1956年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紧取消中立国委员会和朝鲜停战协议，对中朝政府而言，特别是该年上半年保持朝鲜停战和维持和平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美国与李承晚集团之间频繁破坏停战协议而造成的朝鲜实际局势以及对方企图直接摆脱中立国委员会监督，中国政府奋勇承担起制定一系列整套措施的倡议，在中国同志看来，这些措施的实施便能粉碎美国的阴谋。在1955年12月28日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说明，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精简中立国委员会机构和人数问题上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但决不允许完全推翻该机构的活动，以保持委员会继续执行对双方履行停战协议监督的权利。

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探索调解朝鲜问题的途径，1956年4月对美国、英国以及同联合国军队具有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了正式呼吁，建议召开相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和平统一、从朝鲜撤出各外国军队及其他问题。但是，考虑到目前朝鲜和平统一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过去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必然会遭到美国强烈的否定，所以中国朋友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真正的实际意义。这一建议的目的，正如先前所

考虑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减轻来自坚决要求精简会员机构的瑞典和瑞士方面的压力以及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在调解朝鲜问题上的真正反对者。

中朝之间经过磋商之后，中国朋友同意了这种意见，鉴于召开朝鲜问题会议缺乏良好的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和逐渐接近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在中国朋友看来，中朝政府之间在一系列外交关系问题以及对朝鲜国内状况的评价上缺乏完全足够一致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备忘录，文中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提出研究有关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的适宜性。因为朝鲜政府这一建议完全背离了以往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朝鲜问题应该取得公正解决。还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中国和朝鲜就已共同表示要坚持这些原则，中国政府在其回电中对这一步骤的正确和现有条件下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

在之后对该问题予以解释时，朝鲜同志声明道，显而易见，朝鲜与中国政府在对联合国本身概念的解释上存在分歧；在他们看来，不能把作为朝鲜战争中的作战方的“联合国军”与整个联合国对等起来，除了朝鲜战争参与国之外，许多反对联合国军事干预朝鲜冲突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因此，朝鲜认为，把整个联合国看成为参战方是不利于共同利益的。

在仔细研究了朝鲜政府的建议和论据以及就这一问题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之后，1956年12月8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了第二份备忘录，文中指出：

- 1.美国经常利用联合国来干涉朝鲜事务。朝鲜、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决地反对联合国干涉。

- 2.联合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朝鲜战争的作战方。

- 3.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奉行其几次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联合国始终只承认南朝鲜并允许其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的各种会议。

- 4.目前，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利益而言，解

决整个朝鲜统一问题条件尚不成熟。为了取得朝鲜统一目的，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未接受朝鲜政府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参与朝鲜问题调解的建议，接受该建议，正如中国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等于承认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据今年中国对使馆内部通报，得知在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存在行为不端，个别中国军人，主要是指部成员出现严重违反朝鲜现有法律和风俗的情况，出现干涉朝鲜当局内政的个别事实，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从新华社内部简讯某期刊登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个别中国军人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朝鲜老百姓极端的不满。刊登在这份简讯上的一些朝鲜公民的言论证明，目前朝鲜中许多人把一部分中国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其在朝鲜进一步存在是不受欢迎的，侵犯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从中国朋友的通报中可以得知，这类看法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

1956年中朝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按全年贸易协议互相供货以及1953年11月23日有关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协议基础上的，而且与过去几年一样，中国供货数量按价值要超出朝鲜供货数量的几乎11倍。

根据9个月的中朝贸易的资料初步显示，证明中方对1956年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是满意的。9个月来中国向朝鲜提供了价值人民币2.197亿元的商品，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同时，朝方在同期内却只完成了全年供货计划的58.4%。

1957年1月，中朝之间签订了1957年商品贸易额议定书和根据1953年11月23日协议对朝援助议定书，该协议有效期至1957年。从1958年起，两国贸易关系将建立在普通商品交换基础上。

在进行有关1957年中朝之间商品交换问题的会谈进程中，中方无法满足朝方所提出的提供某些粮食品种的申请要求。比如，朝鲜人坚持要中国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诿本国物质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并且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1956年中朝之间代表团进行了大量交流，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相互间

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各自所取得的经验。比如，朝鲜教育工作代表团10—11月期间到中国访问，熟悉考察了中国初高级教学安排情况。差不多同时期，另一朝鲜代表团对中国金融和贸易进行了访问考察。为了熟悉考察非灌溉水稻培植和朝鲜“人参”种植经验，中国农业代表团6—7月期间去了朝鲜。1956年9月，中国林业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熟悉考察朝鲜植树经验。

根据1956年中朝文化合作计划，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交流，举办展览会、电影节，并举行了印刷出版物的交换。1956年2月，中国人民代表团一行125人访问了朝鲜。随同代表团出访的有13个演出团组，成员总数达到755人。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年中国在发展和巩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方面取得了进一步成就。

1956年中蒙政府在两国关系和国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经常和密切的工作联系。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代表团三次访问了蒙古，其中3月份，中国出访代表团是由朱德同志率领的；7月份，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中国出访代表团则是由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本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是由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率领的。

1956年，蒙古方面，以达姆巴同志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党中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出席了中共八大。

1956年8月，中蒙之间签订了向中国向蒙古提供总值1.6亿卢布无偿援助协议。这项协议签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声称的，只是“偿清了陈年老账”（延安时期，为援助解放区），对发展蒙古经济以及巩固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在4年期间援助蒙古建设一系列大型企业（如精纺毛厂、玻璃器皿生产厂、造纸厂、标准房工厂和其他部分厂）以及援助对蒙古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产业的组织和配备（蔬菜种植产业、伐木业、渔业等）。

协议中规定，这些企业的建设和设计将根据蒙古工人和技术专家力量条件予以实施。但是为建设这些企业，除了按照1955年4月所签协议规定目前已在蒙古的1.2万人之外，中国同志拟定另外再派遣1.5万—2万工人和技术人员。

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中国政府一方，还是蒙古政府一方，对派往

蒙古的中国劳动力予以了很大关注。1956年中国向蒙古继续派遣了1955年未能成行的中国工人和专家队，计1.2万人，同时还有他们的家属。由于蒙古当局对前来的中国工人的物质供应以及日常设施问题安排解决不够及时，使得中国工人中间出现了不满，甚至与蒙古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此外，还引起中国同志许多意见的是，常常出现蒙古当局不加区别随意使用中国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情况，并且在非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去挖井和植树。

使馆了解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人采取的含糊立场，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但又不准备与中国同志就该问题讨论具体建议，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取得很大增长的唯一国家。1956年2月7日在乌兰巴托签署的中蒙1956年双方货物供应议定书中规定，今年商品贸易总额将比1955年增长1倍、比1951年增长8倍。根据议定书要求，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米、生丝、烟草、干果以及其他商品。蒙古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依然还是蒙古马、毛皮和其他一部分畜产品。

1956年蒙古向中国出口了总值约1400万卢布的4万匹马。

1956年对中蒙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是，按照两国贸易组织之间达成的相互协议，取消了过去所存在的价格不正常情况，比如，蒙古在苏联和中国采购的一系列同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根据该协议，1956年所有相互供应的货物及其结算均按照中国和蒙古与苏联之间贸易结算时现有的等价格。

1956年中蒙贸易的增长还促使开通了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运输直达列车。

1956年12月22日，中蒙之间签订了1957年双方商品供应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蒙古1957年将向中国另外再供应4万匹马、22.7万张皮革以及毛皮、马鬃、鹿茸及其他商品。中国将向蒙古供应：机器、工具、建筑材料、丝绸、布匹及各种日常用品。

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发展顺利。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同志对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接文化联系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比如，1956年访问蒙古的大多数中国文化代表

团均来自内蒙古。在赴中国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团同样也只限于参观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5月，内蒙古作家和演员代表团访问了蒙古，6月，内蒙古文化活动家代表团和民族剧团则对蒙古进行了访问。鉴于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旅顺和大连港演出团赴蒙古举行了音乐会。蒙古方面，1956年蒙古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团将近一个月对内蒙古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考察。10月，访问内蒙古的还有蒙古铁路工作者青年代表团。

目前中蒙相关机构之间正在解决在呼和浩特——内蒙古行政中心开设蒙古总领事馆问题。蒙古同志认为开设该领事馆对关注中蒙有关相互提供牧场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该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蒙古公民情况是必要的。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在于，努力巩固作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越南的地位，况且它在中国南部边界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日内瓦协议来加强保障越南和平发展。依靠我方在越南问题上所拥有的那些优势，中国同志在正式声明和宣传中揭露美国 and 吴庭艳集团旨在撕毁日内瓦协定和加剧越南分裂的政策。然而，在他们看来，越南同志不该非常热衷宣传越南统一，从而避免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众产生多余的幻想。为此，中国同志考虑到以共同选举方式实现其余所有分裂国家(越南、朝鲜、德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在河内与越南活动家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有必要对人民进行解释工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意思是说，越南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中国朋友对越南就改善其与老挝关系及改变对老挝立场发表了看法。他们指出，为了促进老挝的和平调解，从丰沙里和桑怒省撤走少量越南人是适合的。

中国同志不止一次并且尤其在年底对越南处理个别内政问题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在抵达河内期间对越南同志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近年内他们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带有一些极“左”性质。

说到越南国内状况，中国同志在承认有必要克服大量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认为越南改变对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农业改革方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中国同志认为，对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让步使得这些分子甚至对人民民主主义制度采取了攻击，毫无疑问，这一点马上被吴庭艳所

利用了。1956年底，当帝国主义者加紧反苏和反共宣传后，吴庭艳还十分积极地开展了颠覆活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进攻。据中国同志提供的资料，吴庭艳集团对挑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关注。

有关周恩来与越南同志的会谈情况中国同志向使馆只是概括地进行了通报。但是，使馆不清楚，河内方面究竟是怎样接受中国同志的批评以及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1956年中国继续给予越南经济援助。虽然其规模比1955年要缩小了一些，但对加强越南经济依然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1955年7月7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双方1956年7月26日签订了两项议定书，对援助的具体性质做出了详细说明。其中一项规定中国向越南提供对其国民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成套设备、轧件、机床、汽车、列车厢、船舶及其他商品。第二份议定书规定中国向越南派遣工业、农业和林业、水利和交通领域的专家。此外还规定向中国有关企业派遣越南实习生。与此同时，中越还签订了1956年双方供货和结算协议。1956年4月开通了越空中航线，12月则签订了海运协议。

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消除与越南关系中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此中国同志，按他们的话说，对中越互相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周恩来在与越南的讲话中指出，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必须谦虚谨慎，向越南人民学习并对其予以忘我的帮助。在1956年11月22日签订的中越联合公报中强调指出，两国政府在各自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将坚决克服沙文主义性质的错误。在对上述公报进行评论时，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国人民就更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在于围绕苏联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与团结，保障其相互安全，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独立和互相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各项措施正是基于这些任务出发的。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1956年1—2月，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中国代表团支持华沙条

约组织国家有关建立这些国家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的措施，并于1956年1月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56年9月，鉴于中共八大举行，欧洲人民民主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其政党领导活动家的带领下全都访问了中国。邀请这些政党领导人赴中国出席中共八大，极大地促进扩大了中共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之间的交往。中国朋友组织安排这些国家代表团成员在华行程，让他们一一了解中国国内状况、个别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956年12月，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并于次年1月访问了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旨在消除相互关系中个别误会的措施表示了欢迎。鉴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宣言的发表，1956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政府声明中强调指出，这一宣言对纠正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关系中的错误、巩固其之间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朋友在公开讲话中总体上强调指出有必要彻底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一贯遵守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内的局势，并对这些国家中及其与苏联和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朋友认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应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必须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并从中作出正确结论。在11月1日的声明中，中国政府指出，不久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整个事件过程对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提出了要求，并强调，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在第一份声明中还未强调匈牙利事件反革命性质的话，那么在第二份声明中，尤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匈牙利事件所作出的这种评价则是十分明确的。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对匈牙利工农政府镇压法西斯分子嚣张气势所给予援助的行动，支持Я.卡达尔政府，谴责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1956年11月5日的电报中，中国政府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战胜法西斯分子表示了欢迎。鉴于匈牙利出现的经济困

难，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转给匈牙利工农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质和资金供其支配，以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友好援助和支持。11月，中国政府向匈牙利发送了1.2万吨大豆和花生，年底又发送了4.4万吨各种食品。

匈牙利法西斯叛乱期间，由于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匈牙利专家和在中国的匈牙利人民军队演出团成员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反苏情绪，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阐明匈牙利事件的真实含义。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中国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匈牙利与波兰事件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匈牙利И.纳吉政府实质上是向反动势力投降，其结果造成反革命分子在10月底和11月初期取得了力量上的优势，而波兰政府和劳动人民则是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拒绝华沙条约组织。在中国期刊上没有刊登有关波兰局势或者针对波兰政府的任何批评文章。《人民日报》将1957年1月苏波谈判及其成果评价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活生生的例子”。波兰领导人更换之后不久，1956年10月，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并要求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转达了一系列友好建议。毛泽东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必须特别重视巩固波苏友谊，目前不提苏军从波兰撤离的问题，巩固党的统一，宽大对待犯了错误的党的老干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鉴于波兰事件和苏波谈判，中国朋友仔细检查了中国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否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地方，特别重视与波兰贸易的条件和中波轮船公司的工作。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了针对这些国家产生骚乱的原因、苏匈和苏波关系中的问题、匈牙利过去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广泛热烈讨论。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文章和文献上刊登对这些事件的观点之前，党员、干部、大学生、知识分子等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性质发表了各式各样以及时而混乱不清的观点。个别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主主义活动家提出的看法是，匈牙利出现骚乱责任在苏联、苏军帮助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毫无依据的，是干涉匈牙利内政。在中国政府就这些事件所阐述的立场的文献上发表之后，其立场马上得到了工人和职员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支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成为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部分人之间对工资增长水平缓慢、粮食商品供应和居住面积保障不足情况的不满情绪的逐渐而公开的流

露。

1956年，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继续保持积极的贸易交往。年初，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贸易代表团交流。1956年1月，中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签订了1956年商品贸易及支付协议和议定书，1956年3月则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协议。6月，在波兹南举行的国际交易会期间，中国与波兰组织之间签订了总价4100万卢布的商品交换协议。此外，1956年7月4日，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了1958年至1962年间长期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1956年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部分缓慢增长，甚至有部分缩小的明显趋势。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扩大与中国贸易很有兴趣。但1956年期间，由于中国出现经济困难，中国经济机构不愿去满足扩大商品贸易规模的建议。比如，1956年初，拉科西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建议将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1956年商品贸易总额提高到3000万卢布，未来再提高到2亿卢布。中国政府回复道，鉴于国内经济困难，中国无法同意扩大这种贸易。由于这一原因，中方取消了与匈牙利签订长期贸易协议的决议。

1956年上半年，鉴于国内困难局势，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向阿尔巴尼亚出售20000吨小麦和玉米的请求，其中6000吨，阿尔巴尼亚请求于1956年9月发货。中国对外经济组织拒绝了阿尔巴尼亚这一请求，声明道，中国无法出售所请求的粮食数量，因为中国1956年同样遭遇了粮食供应困难。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会谈中对中方组织的这些行动予以了解释与说明。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经济困难，将影响到与兄弟国家经济合作的长期计划的制定。在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强调说，举行的将只是初步的谈判、协商和交换意见。同时周恩来指出，处于经济严重状况的个别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将通过特别方式予以研究，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领域。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年初，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对建设45个大型企业给予援助的请求。其初步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华将建造一系列热力和水力发电站、合成汽油厂、化工厂、冶金厂、食糖厂等，并对这些企业提供成套设备。然后后

来，这些企业则被缩减到14家。相关的总协议没有签订，只是对个别企业签订了合同。1957年上半年，将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关系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1956年中方组织通知东德方面，他们提出要向东德订购价值几百亿卢布的设备。其初步要求是，这些供货将包括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但是在以后谈判过程中，中方并未确认自己之前的订购要求，只确定1957年东德对华提供价值1亿卢布的供货量。在此期间，根据之前所签订的贸易协议，反而去重新审议削减供货数量。

与此同时，中方明显减少了对民主德国所供应的一系列粮食商品，尤其是肉类、脂肪、含油作物。中方组织拒绝起先所订购的工业设备以及力求减少向民主德国出售粮食的做法引起了东德方面的不安。根据1957年1月访问中国的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科贝尔的话说，这可能会导致民主德国生产能力供应不足并对给国内取消粮食供应卡带来困难。为此，目前东德对外贸易组织正在设法了解有无可能向中国采购哪怕有时对东德并不需要的新商品品种，只是为了避免减少东德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

科贝尔同时还因中国与民主德国商品贸易规模继续缩小对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发展表示出担心。

中国与1956年底来华的波兰贸易代表团之间举行的谈判未能扩大双方贸易供货。1957年中国与波兰的商品贸易规模增幅极其有限。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1956年经互会会议的结果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该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为其经济新的广泛而有力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向经互会会议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大。一年内先后举行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科技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并签订了相关议定书和协议。同时还签订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合作协议。在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就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合作协议将得到执行。但指出在早先科技合作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比如，中方

有时提出十分大量的订购申请，使得兄弟国家难以履行承诺。周恩来说，必须给科技合作奠定更现实的基础，明确确定中国的需求和能力。

与1955年相比，1956年在华工作的来自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并且保持了继续增长。这从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管理局所提供的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

国 别	专 家 人 数		
	1955 年	1955 年 10 月	1956 年 12 月 15 日
匈 牙 利	3	61	60
罗 马 尼 亚	4	6	15
波 兰	39	45	59
捷克斯洛伐克	53	57	63
民主德国	33	191	221
保加利亚	—	—	7
共 计	132	360	425

来自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增加使苏联专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产生了与其建立至今尚未有任何联系的必要性。我国的专家直到目前依然还是单独工作和生活，与其他国家专家不相往来。

1956年1月，匈牙利政府像苏联一样向中国赠送了一套长途电信设备，并为组建该站工作派遣了自己的专家。建于山东省的新长途电信站被授予了“中匈友谊长途电信”称号。1956年6月，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整套机器和设备基础上建立了“中捷友谊国家农场”，还有中阿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交往得到了进一步扩大。1956年1—2月期间，中方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分别签订了1956—1957年文化合作协议执行计划。

一年内，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分别开展了社会、专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以及艺术团体的广泛交流。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代表团有：赴民主德国的中国律师代表团、赴罗马尼亚的卫生工作者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的煤炭专家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和民主德国的新闻记者代表团(3月份)、赴罗马尼亚的工会代表团(11月份)、赴民主德国(3月份)和阿尔巴尼亚(11月份)的青年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代表团(8月份)和妇女代表团(3月份)等。此外，中国演员团组、文艺演出团和杂技团先后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

亚。

1956年，访问中国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工作者代表团(6月份)、德国研究农业和饲养家畜问题科学家代表团，他们分别访问了华北和华东(5月份)，以及民主德国培植野生植物代表团、罗马尼亚科学家代表团(11月份)、民主德国教育和记者工作者代表团(12月份)、工会、青年代表团、文艺演出团等。1956年，在中国先后举办了几个电影节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5月份)、保加利亚电影节(9月份)。一年中，中方组织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相互系统地举办了展览会。

1957年，为了节省经费，中方组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之间文化合作方面所需资金和活动次数。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奉行其过去所制定的与南斯拉夫保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更加密切关系的方针。

中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是以争取进一步接近南斯拉夫、吸引其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为基础的。

直到1956年底，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人，甚至在那些与南斯拉夫之间存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都未公开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通常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同志只是采取限制阐述对各种问题的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发表与其不相符的自己的言论以及不去过于突出这些分歧。

中国同志的这种克制被南斯拉夫人错误地解释和理解，如果不是间接支持的话，那么就是对南斯拉夫“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思想的默认。可见，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自己的官方发言中始终赞扬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尤其强调中国与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式和途径上的“共性”。在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南共联盟代表团团长И.维塞林诺夫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如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无数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维塞林诺夫把自己讲话中的相当部分用来赞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通过工人苏维埃取得社会自治”和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可见，是为了设法向中共证明“南斯拉夫道路”的优越性。

但是，自中国新闻报刊上刊登了兄弟党对1956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讲话的反应之后，南斯拉夫人开始彻底明白了，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领导人近几次讲话所持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是远非有利的。因此，南斯拉夫驻华外交官采取一系列步骤，打算对中国同志施加明显压力，促使中国人至少对南斯拉夫人自己提出辩论的问题不公开发表看法(参见大使与王稼祥就其1956年12月11日与波波维奇 [70] 之间谈话的记录)。在有些情况下，南斯拉夫试图甚至采取类似威胁的手段，声明指出，如果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持批评立场的话，那么这将是“退回到1948年了”，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发生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人将会坚持到底”。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质上是对南共联盟领导试图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意义以及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给予了回击，如果不是下结论的话，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南斯拉夫人设法从中国朋友那里寻找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支持的企图是徒劳的。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发展朝着好转的方向向前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问题、在涉及巩固和平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中国与南斯拉夫同志在处理解决这些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存有一些分歧，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南斯拉夫新闻报刊一年内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正义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斯拉夫人曾提出要求举行中美更高级别谈判，从本质上说也是支持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立场。

由于1956年2月中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完成，中国与南斯拉夫贸易规模与过去一系列年相比有了很大扩展。

195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与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判，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关于延长1956年2月17日中南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贸易协定有效期的公报。协议规定，协议双方在进出口中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在1957年间，双方向各自对方提供价值700万英镑的商品，这几乎是超出了1956年水平的3倍。

在谈判期间，南斯拉夫人坚持要进一步地扩大中南贸易，并设法取得中国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但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不够以及必须对其更为迫切需要的领域提供帮助，中方没有接受这些提议。

南斯拉夫人同时还提议建立类似中波公司那样的中南轮船合资公司。但南斯拉夫人的该项建议也未被接受，因而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南斯拉夫人试图把中方拒绝这些建议与铁托近期的讲话联系起来。在扩大与南斯拉夫贸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部分矜持态度，其中另一原因在于，1956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贸易谈判时，南斯拉夫人拒绝了向中国提供一系列战略性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南斯拉夫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贸易谈判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南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结果是签署了该委员会章程。

在过去一年内，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互相交流的代表团有：青年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此外，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有：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南共中央委员维塞林诺夫(他还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过中共中央八大)率领的南斯拉夫农业代表团、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和艺术活动家代表团。中方访问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有：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杂技演员代表团及其他一些代表团。

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中国工艺品展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继在贝尔格莱德展览后，在南斯拉夫其他城市又先后进行了展览，就像中国人民赠送礼物展览一样。

此外，1956年4月，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中国集邮展览，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和版画展览。

1957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南斯拉夫图片 and 艺术展览会开幕了。

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节——共和国日，在中国20个城市先后举办了南斯拉夫电影周。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两项协议：2月份签的邮政通讯协议和4月份签的关于影片租赁和纪录片相互交换的协议。

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

在对待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南斯拉夫的所有问题上，中共中央全都赞同苏共的路线，这一切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与大使多次会谈以及一系列官方声明中都有所反映，证实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赞同苏共中央的立场。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依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解放进程给予积极支持，降低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力争消灭侵略集团和扩大整个亚洲“和平区”。如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最大地利用亚洲国家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始终一贯地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其视作为这些国家接近中国共同接受的基础，视作为争取巩固其独立的战斗武器。作为一个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中国坚定地提出团结亚洲各国的口号，号召他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其所存在的争议问题，旨在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利用这些矛盾的机会。

在对待侵略集团成员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以及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其他亚洲国家问题上，中国朋友自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手段。根据目前亚洲的具体情况，中立是亚洲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解放意志的表现形式，是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斗争方式，是反抗美国和其他殖民主义列强的方式，中国朋友针对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目的是从自己一方来促进巩固和发展亚洲国家这种中立地位。

对那些参加美国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国朋友并不公开向他们施加压力，相反，对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因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遭受的困难还尽量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表明支持他们的愿望。中国以此极力鼓励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倾向，并不断强调他们参与这些集团是不得人心的。中国朋友的出发点是，对瓦解集团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作为眼前任务，应该设法哪怕甚至去降低亚洲国家在侵略集团中的作用和积极性。

1956年，中国政府极其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政府领导人、著名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个人交往。在这些会面时，尤其是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时，中国同志灵活而多方面地为执行上述任务而努力。周恩来的出访毫无疑问是中国近期最大的外交活动。这次出访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得到

了进一步接近，促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中国代表团所到达的国家，而且在邻近国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向亚洲国家领导人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竭力强调指出，亚洲国家和我们阵营应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冒险和颠覆活动。由于周恩来对亚洲国家的出访，大大抵消了因匈牙利事件而掀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的效果。

中国同志对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表示了满意。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分别为周恩来举行了十分友好的招待会，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出访期间，亚洲国家人民群众对中国明确地表现了巨大同情，视其为坚决地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和封建主义压迫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亚洲强国。按照陪同周恩来出访同志的话说，与中国代表团的会晤常常超出了本地当局所拟订举行的框架。

1956年中国政府为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作出了许多努力。中国政府鼓励进行各种代表团之间的交流。积极采取措施以打破对中国贸易禁运和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5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共展出了1300多种商品。邀请了亚洲和非洲贸易界3000多名代表参加。1956年中国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39.4%，或增加了7.356亿卢布。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贸易规模中亚洲和非洲国家所占比重达到64%。中国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是为了赢得政治成果，在经济问题上经常予以让步。（详情参见使馆195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甚至现在，在中国被迫稍微缩小自己对外贸易总量的情况下，依然规定要扩大与亚洲许多国家的商品贸易规模。

印度。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奉行的对外中立政策。

中国同志认真关切的是，印度人对中国外交和内政能形成更加正确的理解。中国政府多次秘密地向印度通报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与尼赫鲁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满信任的意见交换，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阐明了匈牙利事件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印度驻华使馆十分愿意促进对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人民生活的其他

方面的研究。1956年，印度政府向中国派遣了为期不等的4个阵容十分庞大的代表团，他们专门对这些问题从事研究，如农业合作化与规划、铁路交通工作、中国的五年计划及规划机构。在对印度表示真诚愿望的同时，中国同志向印度人讲述了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一些不足，这无疑使印度人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1956年，中印之间各种官方、社会、体育、文化和宗教代表团交流开展得十分活跃。印度议会和军事代表团对华进行了访问。

为了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解决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问题。美国人试图利用这一活动，通过其在印度的代理人在印度境内掀起宣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不回西藏的运动。一些印度反动组织和亲美的社会各界在纵容印度政府时参加了这一挑衅运动。周恩来在新德里时提请尼赫鲁关注这些事实，并坚定地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滞留不归的话，一切责任将由印度政府承担。为此，尼赫鲁再次让周恩来确信，印度始终一贯地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当局不允许在自己境内进行敌视中国的活动。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政治势力，他们采取公然敌视中国，图谋公开对抗中国的西藏政策并一直在从事有关西藏应该成为独立国家的宣传。

中国竭力扩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1956年中印贸易规模比1955年增长了35.6%，并且增长部分靠的是中方的出口。中国从印度的进口规模缩减了33%。在中国从印度进口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生棉、黄麻和烟叶(按对印度烟草采购量比较，中国与印度烟草主要进口方——英国相差无几)。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为丝绸、纸张、化学品以及大米和工业产品。

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其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中国积极的支持。有关在第11届联大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是由印度提出的，从而给美国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

印度继续努力扮演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中间人角色。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和美国大使尽快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协定。为此，印度谴责了“不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访问美国期间，尼赫鲁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提出了改善美中关系问题。而在自己的讲话中则表示反对“两

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亚洲的国际问题。

中国朋友欢迎和鼓励印度政府所做的类似行动，同时，在严肃的原则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上或者涉及事关其自身特殊利益的问题上的分歧则持足够的坚定立场，比如，他们不赞同印度提出的有关释放在华服刑的美国间谍的建议。

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利用印度的中立政策和国际威望，以扩大“和平区”。在一系列情况下，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建立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与印度的互相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印度在中国政策中比其他亚洲国家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完全考虑到印度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所能起到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竭力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去巩固其与印度的关系，只要存在可能的话，在国际事务中去联合印度一起或者得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通常总能够与印度政府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达成协定和协议。

鉴于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发展，中印关系具有某些特殊性。1956年9月20日签订了“关于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议”。这一协议声明，中国与尼泊尔“将拥护和平和友谊”。协议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出发点。9—10月，尼泊尔首相阿恰里亚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根据尼泊尔人的请求，签订了有关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价值6000万卢比无偿经济援助的协议。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把尼泊尔视为几乎是印度一部分的印度政界的担心。所以，为缓解印度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反应，中方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中国取消了尼泊尔起先提出与其签订条约的建议，拒绝了向尼泊尔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在加德满都和北京互设中国和尼泊尔永久大使馆的建议。在中国朋友看来，他们最终使得尼赫鲁能比较平静地去看待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缅甸。考虑到缅甸复杂的内政局势和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其的压力，中国政府1956年十分关注支持和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

系。中国朋友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以支持缅甸统治阶层中以拥护缅甸独立自主和外交中立的部分人。为此，中方耐心地处理研究中国与缅甸之间所积累的一系列无法调解的问题(中缅边境、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华侨等，这些问题被反对中缅接近的敌人广泛利用，以便在两国关系中煽起纠纷和散播猜疑)。

1956年中国政府对中缅边境问题表示出不少善意并作出了妥协的准备。(详情参见“关于中缅边境问题谈判”说明资料，发文号934，1956年12月4日。)应该指出，在对边境问题的长期谈判中，吴巴瑞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加剧与缅甸关系的紧张，毫无疑问，这样做只有对那些反对缅甸中立、独立政策以及缅中友谊的敌人是不利的。中国政府甚至在边境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根据1956年11月初周恩来与吴努之间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双方至年底从互相有争议的领土撤走了军队，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旨在向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解释边境协议的重要性。然而，边境问题的调解尚未结束。

吴努率领的缅甸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56年10—11月)以及周恩来出访缅甸(1956年12月)被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利用，为了打消缅甸统治阶层对中国好像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对缅甸内政干涉问题所存在的担心，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讨论了缅甸国内战争问题。众所周知，反动分子竭力设法阻挠中国和缅甸之间逐年不断发展的合作，广泛利用反缅共宣传来攻击中国政府。如同去年一样，在与吴努和缅甸其他活动家以友好委员会形式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对扩大缅甸民主主义战线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内部分歧的益处发表了意见。这样看来，中国朋友再一次清楚地让人明白，他们并非是在如何极力利用内部纠纷，相反，而是欢迎缅甸国内局势能保持稳定。

在会谈中，中国同志坚决打消掉了缅甸人的疑心，怀疑中国政府似乎在引导在缅华侨从事反政府活动。在仰光华侨集会上，周恩来彻底打消了这种怀疑，中国政府与华侨反缅活动毫无关系，相反，周恩来呼吁中国公民尽量遵守缅甸的风俗和法律，支持缅甸政府的措施，为避免误会，他拒绝参加缅甸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这一讲话不仅在缅甸，而且在亚洲拥有几百万华侨的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反响。

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缅甸境内存在着约3000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缅甸政府声明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国民党分子，事实上是想逃避责任。同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缅甸当局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民党并与这些国民党分子保持联系。缅甸人倾向于利用自己境内存在的这些国民党部队来对中国实施一定的压力。中方认为，最好暂时不要去提出这一尖锐问题，不要去揭露缅甸政府的不友好立场。近一年中，两国积极开展各种代表团交往。中国朋友对自己在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久前叶剑英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缅甸的回访。

1956年，双方(首先是中国朋友)为发展中缅经济关系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努力。1956年中国采购的缅甸商品比1955年多了一倍，实际上是对缅甸的积极援助。1956年夏天，签订了有关中国向位于塔曼卡由中国专家援助在建的纺织厂提供设备和原料的合同。12月31日，在仰光还签订了有关扩大中国援助该厂的两个合同。按照这些合同，中国将向缅甸提供相应的设计资料并另外向缅甸派遣技术专家。

柬埔寨和老挝。去年中国为接近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积极步骤。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果是，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发展中柬经济和文化关系协定。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以及周恩来回访柬埔寨的时候，中国朋友对柬埔寨政府所声明的奉行中立政策的意向表示了理解和赞成。中国强调了在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柬埔寨建立关系的愿望。正如中国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柬埔寨当局为周恩来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为了更大程度上接近柬埔寨，促进削弱其对美国的依赖并鼓励其政策中的中立倾向，中国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1956年6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无偿提供柬埔寨的援助规模为800万英镑。中国在柬埔寨将建立几个不大的工业企业、医院和水利灌溉设施，还向柬埔寨派遣了中国专家组。

中国政府对在京柬埔寨经济使团给予了事实上的外交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柬埔寨也派遣了经济使团。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领事馆在柬埔寨依然还在工作。虽然柬埔寨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说，他们不承认该领事馆，但同时他们又不赶走国民党代表并允许他们进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根据日内瓦协定条例促进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中国朋友认为，看不到巴特寮具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任何前景，王国政府与巴特寮势力之间斗争加剧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在他们看来，在苏发努冯亲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取得协议之后，老挝的进步力量应该自主、积极地争取国家民主。至于我国对老挝问题的立场，他们应该设法让王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协议，而不是竭力通过各种限制和消灭巴特寮势力方式来寻找巩固自己的阵地。

中国为富马亲王首相率领的老挝代表团来访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鉴于老挝政府正遭受着内外困难，如同与柬埔寨代表团的谈判一样，在与老挝代表团的谈判中未提出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方表示准备给予老挝经济援助，并且向老挝人表明，向他们提供援助如同对柬埔寨提供援助一样，将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再者，由于富马担心中老关系与解决老挝统一问题之间有某种联系，所以中国政府建议老挝自己来决定何地、何时和何种代表团进行有关对柬埔寨 [71] 提供经济援助的谈判。富马对中国给予经济援助的建议当众表示了感谢。

谈判中，老挝人提出希望周恩来对老挝的访问安排在较晚时间。中国朋友认为，在调解老挝内政之前，老挝政府不想接待中国代表团。于是初步商定，今后两国政府将通过印度保持联系。

老挝代表团对中国的来访有助于老挝政府加深对中国立场正确的理解，也为进一步发展中老关系创造了前提。两国之间所取得的某种接近给那些内外势力制造了障碍。他们试图把王国政府推向拒绝履行富马与苏发努冯之间协议的道路上。

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以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取代哈拉哈普内阁之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重新又顺利发展起来。各种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建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著名国务活动家之间的个人交往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中国十分重视议会代表团以及一系列其他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来访。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热情洋溢的招待会。苏加诺对其中国之行感到十分满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规模、中国人民的政治统一和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内的民主党派合作。

中国同志极为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他们将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解释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帝国主义者及其

代理人利用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以分裂其队伍，动摇政府稳定，破坏国家经济独立，阻挠中立和独立外交政策的推行。中国朋友认为，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必要支持由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领导的为维护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力量。中国朋友正是遵循这点，以往在一系列问题上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各种建议。

与1955年相比，中印贸易规模有了极大增长。1956年11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印贸易协议并将1954年支付协议期间延长了一年。根据贸易协定，每方的供货量应该是1200万英镑，超出了1953年第一份贸易议定书所确定的贸易总额的4倍。双方谈判中还讨论了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这些问题讨论最终达成了协议，中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部分种类的轻工设备，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接受印度尼西亚实习生，以提高他们的技术专长。

从政治设想出发，中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那些甚至连其本身都十分需要的商品(钢铁制品、棉纱线、铁矿石等)，而向印度尼西亚所采购的商品则多半是印尼感到销售困难的商品(砂糖、可可油、椰子干籽、调味作料等)。其结果是，1956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增长了3倍多，而从印度尼西亚的进口数量则几乎增长了一倍。中国政府在结算问题上也迎合了印度尼西亚。比如，如果说1965年之前根据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议，印度尼西亚在一旦出现商品贸易债务情况下必须用外汇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根据1956年的贸易协议，这一债务则可以用货物来予以偿还。1956年，遵照自己国家利益，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道，印尼对橡胶贸易限制将不予遵守。这对于对华禁运政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中国政府始终极为担心200万印尼华侨对印尼国内事务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在新闻报刊和中国国务活动家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中国政府呼吁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众所周知，1955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有关双重国籍的条约”。但反动党派(马姆米等人)因试图利用华侨问题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并破坏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而坚持反对这样做，因此，印度尼西亚议会至今未能批准这一条约。

锡兰。自从亲帝国主义的科特拉瓦拉政府选举失败以及班达拉奈克执掌政权后不久，锡兰政府就采取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骤，向中国派遣了以锡兰驻英国最高特使克利斯为首的锡兰代表团。1956年9月14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立外交关系和扩大贸易及文化联

系的中锡联合公报。至周恩来访问锡兰之后，双方已达成了互派大使的协定。

周恩来在锡兰访问期间，中国同志坚信，锡兰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友好关系的。锡兰民众，包括农村，处处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的到访。

1956年与锡兰的贸易得到了继续顺利发展。1956年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955年水平的236.7%。1956年12月29日，在科隆坡达成了有关延长中锡贸易协定至1957年底的协议，并且签订了向中国向锡兰提供27万吨大米以及锡兰向中国提供5万吨橡胶的合同。中国对发展与锡兰的贸易赋予了重要意义。按照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比如，从1952年起，中国按照比新加坡橡胶价格高出许多的固定价格支付锡兰所供橡胶。这使得锡兰获得了2亿锡兰卢比的利润。如今按对华进出口业务规模，锡兰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中国在锡兰对外贸易中同样也占据了首要地位。

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同志为扩大文化，尤其是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方面各种华侨组织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使得英国，尤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当地反动活动家的担心。按照他们的指令，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华运动，煽动华侨与马来西亚人进行冲突，追踪和逮捕进步活动家。年底，香港骚乱之后，反动势力发动了特别强大的反华运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民众中间上升的威信，使他们无法与中国接近。

中国同志积极利用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出现的经济困难。美国和英国减少了对自然橡胶的采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出购买其橡胶的建议。并声明说，今后还将采购橡胶。这一提议显然对在该地区工商界留下良好印象是有利的。在他们的压力下，1956年6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声明说，他们对橡胶贸易禁运的限制将不予遵守，并将鼓励旨在扩大“法律框架内”的对华贸易的各种努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作为该代表团顾问，前新加坡首席部长J.马歇尔随团抵达。该代表团82名成员中有些是著名的商业界代表。在抵达中国之前，马歇尔在东京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道，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孤立”中国

对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朋友极为重视马歇尔和全体代表团。与代表团的谈判是以签订一大笔交易而顺利告终，可更重要的是，此举是理顺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谈判中也显露出许多阻碍与该地区商业往来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制定的限制以及英国人的反对所造成的。

中国同志极其重视与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正如以上所述，中国对巴基斯坦(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和脱离侵略集团。

去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来华访问，而周恩来又访问了巴基斯坦。众所周知，为苏拉瓦底的来访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期间双方仔细研究了中巴关系各个方面。鉴于巴基斯坦内政外交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国内对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存在着不满，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对改善与中国关系抱着一定的期望。

两国总理的互访以及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其他合作形式对巴基斯坦领导人来说十分有必要，这样能展示巴基斯坦外交联系的广泛，证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不是只限于参加集团和完全服从美国统治。并且，正如朋友们所指出的那样，苏拉瓦底想亲自去中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

中国同志对苏拉瓦底予以了某种礼仪接待，也就是说，表示了自己愿千方百计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与苏拉瓦底会谈时，中国领导人竭力阐明，面向美国将导致巴基斯坦孤立，并且将使其与亚洲其他国家所隔绝，如遵循这一方针的话，巴基斯坦将无法解决自己的内外政治问题，无法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并由此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中国领导人还强调指出，巴基斯坦奉行的中立政策更为完全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中国朋友认为，苏拉瓦底来华访问和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回访毫无疑问对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和民众产生了有益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总是嫉妒地注视着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巴基斯坦领导人始终特别密切关注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虽然中国同志认为，最好的方案是保留克什米尔的地位，但认为还是最好不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巴基斯坦出访期间，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国人

民相信，巴基斯坦和印度兄弟民族能够通过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这一立场总体上无论对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都能愉快地接受。由于知道中国与印度关系十分友好，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在他们之间有争议问题上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由于中国的努力，1956年与巴基斯坦的文化联系得到了顺利发展。建立了中巴友好协会。加强了各类代表团、展览会等的交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巴基斯坦的进口却大大减少了。中国外贸组织1956年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购买棉花和黄麻的几个合同。众所周知，棉花和黄麻约占巴基斯坦整个出口的80%。中国同志考虑到，由于美国人对其出口实行反倾销，巴基斯坦棉花和黄麻销量减少对这个国家经济产生了痛苦的影响。中国外贸组织与巴基斯坦还签订了提供42.5万吨煤炭、出售6万吨大米、赠送4000吨大米的合同。大米和煤炭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93.2%。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拥有多余的大米和煤炭。显然，中国同志借这些协议所特别追求的是政治目的。应该指出，为了不想引起印度和缅甸的不满，中国拒绝低于国际价格向巴基斯坦销售大米，并建议赠送一定数量的大米，以避免其价格下降到巴基斯坦所期望的水平。

总体上说，在积极评价过去一年里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时，中国同志认为，巴基斯坦还将长期追随侵略集团，但是他们打算今后耐心地、向巴基斯坦就其在国际事务中适宜奉行中立政策进行解释工作。

在泰国，1956年与中国接近的社会情绪在不断上升。它与泰国国内经济困难状况以及民间对亲美外交愈加不满有着关联。正如中国朋友所指出的，近几个月，泰国报刊上，在发表对中国攻击言论的同时，开始第一次出现了赞同的言论。

中国同志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泰国人对中国的担心，并促使泰国统治阶层寻求与中国建立联系。1956年泰国代表团对中国的一次秘密访问和一系列公开访问，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代表团的成员请求中国购买泰国多余的大米和橡胶。中国同志不仅同意购买泰国人的大米和橡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贷款。泰国与中国不断接近的倾向使美国人感到担心。他们对泰国政府实施了强大压力，一时影响了中国与泰国联系的发展。

不断加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反而迫使泰国人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联系。无论是銮披汶总理，还是泰国许多著名活动家，数次发表公开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与中国朋友建立联系的只是那些指望在对华贸易中发财的个别集团的代表。中方设法让泰国政府本身参与贸易关系的建立，以便能使中泰贸易公开进行。

早在1956年6月底，泰国政府就予以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泰国新闻报刊对此表示疑惑不解，为什么泰国要反对对华通商，而一系列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全都在对华进行贸易，并且作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大发横财。鉴于1957年2月的选举，对华通商问题在各党派宣传竞选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切迫使泰国政府为了建立对华直接贸易关系而采取新的步骤。1957年初，在泰国政府亲允下，泰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与中国外贸机构进行了扩大两国贸易的谈判。

中国同志对菲律宾国内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多次指出，去年菲律宾反美情绪有了一定增强，尤其是针对美国基地的无数次集会具有重大意义。

菲律宾国内听到要求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愈加频繁了。菲律宾商会董事会成员曼多查于1956年7月声明道，菲律宾商会正在研究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他还声称说，菲律宾议会一系列议员和工商界赞成对华发展贸易，在这方面“菲律宾拥有极其重要的利益”。但菲律宾政府却依旧反对与中国建立联系。所以，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联系尚不很多。更何况，中国同志把建立对华联系的集会认定是一种积极的征兆，是菲律宾改变其对华立场可能性的一种迹象。

四、中国与近中东国家

去年，中国在对近中东国家关系上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这种突破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政府主动而十分灵活地利用所开创的条件与阿拉伯国家接近，促进加强各民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的团结，建立广泛的反殖民主义战线。

中国领导机构始终明白这一地区的特点。考虑到这一地区一系列国

家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还十分强烈，他们竭力设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作为建立外交关系基础的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此来削弱这种依赖。

1956年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一系列非洲国家中也都出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能够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倾向。

尤其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以及对埃及侵略战争期间，中国在这一地区国家中的威望得到了上升。中国发表的有关坚决要求停止侵略以及准备向埃及派遣志愿者的讲话对阿拉伯国家社会舆论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一年中，中国同志积极地从事发展与埃及的全面关系。各种代表团交流活跃，建立了中埃友好协会，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以及支付协定和中埃贸易协议次年供货执行议定书。为了加强与埃及的关系，使其进一步脱离西方列强，中国人竭力为解决埃及经济困难给予了有力帮助。中国向埃及提供了价值2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中国外贸机构与埃及300多家公司和企业建立了贸易联系。1956年中国继续向埃及大量购买棉花。从埃及的进口数量总体上保持了1955年的大致水平。中国对埃及的出口增长了好几倍。中国向埃及提供了钢铁轧材、织布机和精纺机等。

中国竭力利用自己与埃及不断增强的关系来建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许多前往埃及的中国代表团也都到过其邻近国家。中国政府为加深和扩大中国与近中东其他国家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同样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与叙利亚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与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议(为此黎巴嫩专门成立了中国贸易办事处)，与苏丹达成了互换贸易代表的协定。中国还致力于与其他非洲国家——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联系，尽管这些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很大兴趣，但由于其与美国的从属关系，他们迟迟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良好。对两国合作关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活动是，为纪念阿富汗独立日，中国出席了工业展览会，双方艺术家代表团进行了交流，以及喀布尔市长访华。1956年底至1957年初，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北京，考察两国贸易发展条件以及准备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议。但是，为促进两国经济联系发展必须进一步谈判。1957年1月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阿富汗之间

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五、中日关系

1956年中国政府对开展对日关系一直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竭力促使其脱离美国并增强其中立国倾向。这一政策既符合维护远东和平，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又符合国际社会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因为对蒋介石而言与日本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朋友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努力最终会取得一定的显著结果。

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在日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其原因在于，首先，日本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兴趣上升首先与战后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相关。与过去年代情况不同，那时几乎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代表主张扩大与中国经济联系，如今对日中贸易开始产生部分兴趣的则是大财团。其次，缺少对像中国那样亚洲大国的正常关系，对活跃日本亚洲外交来说是某种障碍。其三，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日中关系能够大大加强其为减少对美国的依附所开展的斗争。

在中国同志看来，恢复苏日关系以及随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将是日本向推行更加自主外交道路过渡的重要阶段，并且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况且，根据中国人掌握的情报，日本统治阶层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日本如今是联合国成员了，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在意蒋介石集团了。

在实施对日外交任务中，中国政府一如既往以这种方式去构筑自己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美矛盾和该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如同以往年代中那样，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吸引日本社会各阶层投向自己，并通过他们对日本政府予以施压。两国社会政治、工会、体育和其他组织和活动家之间联系依然得到了各种发展。按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数量看，日本依然占据着首位。据报刊报道，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日本各种团组有60个。整个一年来，有2000多日本人到过中国。其中不乏大量的日本大财团代表以及有时是极其反动的右翼集团活动家。

利用日本人对发展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兴趣，中国朋友十分巧妙地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拥护改善对华关系，反对美国对日中贸易的限制政策。

1956年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52.5%，达到5.08亿卢布。美国实行的

对华贸易禁运促使中国朋友为更加扩大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而没有考虑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能力。

1956年5月，正如使馆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相关组织延长了1955年“第三次”中日协定和捕鱼问题协议。1956年底，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中国设法使一系列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得以展出。中国同志尽量设法在展览会准备期间与日本尽可能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展览会使更多的日本资本家认识到发展日中贸易是适宜的，并使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中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机构对日本进行了系统性的宣传。在新闻报刊、广播中，如同在中国领导活动家声明中的那样，坚定地贯彻有必要改善中日关系的思想，并以各种方式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是中日实行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强调两国之间已经确立实际关系的意义以及对日本政府所遭受的困难表示理解的同时，中国人说，为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本阶段双方，正如周恩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声明的那样，“应该采取过渡性质的措施”。

1956年对在华日本战俘问题进行了审理。1062人中只有45人被送交了法庭。他们中没有一人被判处最高惩罚。其余1017名罪犯全都被释放并遣返回日本。这一措施在日本引起了对中国良好的反响，打破了不久前日本所发表的一个主要提纲中的敌视宣传。由于对日本人进行了教育工作，使得他们从中国返回日本后就再也没有从事任何反华运动。况且，中国朋友还寄希望于其中一部分人在日本会从事有利于中国的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各界代表更加坚定地拥护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56年春，周恩来通过印度政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事隔不久，中国同志又再次表达了类似姿态。中国同志十分清楚，日本政府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开始直接谈判，因而经常设法利用这种手段向日本统治阶层施压。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自民党领导的更替评价良好。从这些变化来看，他们在期待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首先发展两国经济关系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比如，我们的朋友认为，1957年日本政府可能会同

意“民间的”(非政府的)贸易办事处进行互换交流,并且签订中国与日本银行间的结算协定。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是公开敌视的。美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利,继续对台湾实施自己一整套侵略活动,对赞成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政策的国家予以强大施压。这种政策迫使美国统治阶层竭力对华继续实施“强权立场”政策,希冀阻挠中国国际威信的提高及其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竞选运动前以及1956年期间因匈牙利事件而大肆喧嚣时,美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共宣传,但在美国反对不承认和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绪逐渐也有了增强。这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信提高,中国多方面的努力以及经济地位的加强是密切相关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系在美国工商界引起了一定担心,为了不放弃有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利用中国市场的机会,他们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由于来自日本、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对缓解对华贸易限制的要求不断增强,这种倾向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了。在美国开始更加频繁地发出“承认”中国的阵阵声音,批评美国对华非现实主义政策,虽然这种批评声还是很克制的。

1956年底,美国一部分新闻报刊对中国的言论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对中国敌视的强烈言论开始少了。美国政治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兴趣开始上升。然而,中国同志并不期待近2—3年内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实质性改变。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国同志看来,只有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才有可能。

中国政府与以往一样对美国“不承认”政策不抱任何担心。他们经常说,可以等待10年。他们认为,甚至可从美国这一政策中为自己获取一定利益。美国人目前的立场使得中国能更自由、更广泛地揭露美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本质,更积极地主张团结这些国家民族去争取其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在中国同志看来,目前在中国没有美国代表(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没有派代表),将使中国有可能比较安静地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美国一旦承认中国,其余国家的代表就会接踵而至。

为了对美国施压，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地、主动地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提出倡议，以此揭露美国统治阶层不想接受中国建议的愿望。在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中美大使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不止一次地提议举行双方外长会议，希望能促进解决所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包括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等问题。中国政府允许大批美国记者代表团进入中国。美国国会禁止美国记者以及美国文化活动家（“艾弗里曼歌剧”演出团等）受邀访华的做法甚至遭到了美国反动报界很大一部分人的谴责。中国同志的这些成功手段给美国会造成了不小麻烦，使得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政策愈加被动而不受欢迎。

根据战术设想，1956年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要求，认为在目前问题暂时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行动甚至可能会给作为大国的中国威信带来损害。中国朋友更倾向让其他国家出来支持尽快准许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对印度所提出的有关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问题列入联大第十一次会议日程议案进行讨论，并在联大全会对该议案予以表决，这一切证明，1956年大多数国家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无论美国如何粗暴施压，有24个代表团对美国取消印度提议在联大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的决议投了反对票。

无论美国怎样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恢复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合法权利，1956年中国的对外联系得到了继续发展。中国代表参与了50多个有关社会和科学问题的各种非政府国际大会、研讨会、会议的工作。中国坚定地反对美国建立“两个中国”的企图，拒绝参加有邀请蒋介石代表出席的各种组织和研讨会（哪怕就是把他们称为台湾岛地方代表的情况下）。

1956年期间，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在设法拖延谈判，竭力设法利用其达到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保留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目的，从而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其合法占领台湾事实并以此继续加剧在亚洲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了这些目的，美国继续坚持首先解决“集体或者独立自卫权法”和在台湾地区“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但是，在几乎10个月（从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尽量掌握主动和取得突破，在1956年下半年中方提议讨论取消禁运和发展中美人民交往和文化交流问题。应该指出的

是，当提出在谈判中讨论禁运问题时，中国竭力设法利用美国毫不妥协的立场，旨在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即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建议的做法以及四面八方发出的对华通商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明白，如果取消禁运问题得到积极解决的话，中国将会处于困境，因为中国不具备进行广泛贸易所需的足够外汇储备，缺乏出口能力。

1956年期间，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有关开展谈判的声明，从中揭露了美国企图无期限地拖延谈判、继续保持台湾地区 and 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在有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多次警告美国，造成目前谈判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持鲜明的敌视态度，甚至整个地把美国作为侵略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并未取消以往所奉行的反美方针。

使馆认为，中共和中国政府让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政治动员状态中，为此不仅利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行动，而且利用了凡是表现美国人奉行侵略政策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如同往年那样，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主要而关键的问题。在继续实际占领台湾时，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了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1956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价值3370万美元的工业设备。为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提供了价值6000万—7000万美元的设备。除了这些所谓的“经济援助”之外，美国每年还向蒋介石分子提供总额约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956年期间，在美国军事顾问领导和监督下，继续进行以喷气式飞机更新老式飞机，加强防空导弹体系，增加海军数量。1956年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台湾完成了各种军事设施的装备，其中包括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沿岸工事和“防御”设施建设。1957年初，美国宣布在台湾建设新的“超现代”机场，其建设成本估计在2500万美元，并且还向蒋介石分子转让了遥控炸弹发射装置。驻岛美国军事顾问团从1955年的约1700名增加到1965年底的2600—2800名。他们的活动分散到了包括营连级单位。1956年期间，来台湾访问的大量美国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包括尼克松、杜勒斯、雷德福、饶伯森等。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以及在美国人压力下国民党分子所进行

的大量“改革”，岛上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80%以上的预算经费花费在供养53万军队和准备“反攻大陆”上面。台北报纸《征信新闻》1956年10月31日谈到台湾经济，尤其是财政所面临的困难时，这样写道：在长达7年期间，无法做到平衡预算，每年约有8000万美元的对外贸易赤字。台湾商品昂贵的成本使其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无论蒋介石分子如何努力防止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底，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比1949年还是增加了58倍。通货膨胀的威胁引起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他复杂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宣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和平解放方针。很显然，从一方面来看，这一方针有利于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更长的和平喘息机会，从而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期间，国家能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可使中国朋友拥有广泛的政治手腕以及影响国民党分子、台湾所有民众和世界社会舆论的良好机会。

1956年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向国民党分子发出赞同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吁。在中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讲话中，周恩来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讨论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的愿望，并表示期望，“只要台湾当局一旦寻找到对自己合适和方便的时候，可派自己的代表前往北京或者其他合适地点”，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向台湾的国民党活动家发出呼吁，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加深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分裂，激励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的爱国力量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的猜疑和摩擦。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还考虑到，美国人竭力想摆脱一部分有损于自己利益并令其不快的国民党活动家以及国民党集团不同派系之间在台湾无休无止的纷争。

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周恩来1957年底至1957年初出访亚洲国家的时候。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周恩来特别指出，北京考虑到蒋介石返回大陆以及向他提供在中国政府中显赫地位的机会。中国同志当然明白，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至今尚未成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无论是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情绪，还是对美国，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为了对国民党分子各阶层施加影响，中国同志在对台宣传推广中利用前国民党活动家(张治中、翁文灏等)发出和平统一呼吁。尤其在庆祝

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比如，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邵力子就发表了广播讲话。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报刊界往年经常刊登激烈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和漫画，那么1956年期间，这种文章和言论就已经相当少了。宣传中主要关注美国人在台湾作威作福(其中包括其试图清除令美国不快的人)、经济困难和台湾民众沉重的生活条件。在向国民党分子和台湾民众发表讲话时，中国朋友很少把台湾与全国人民分割开来，而更多的是强调所有华人都是爱国者的必要性。中国同志指出，他们对台湾人士的宽容政策开始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们已经拥有了与这些人建立联系的某些经验。

在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基本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尤其在1956年2月，完成了连接厦门与浙江、江苏的战略铁路建设，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沿海战线与内地的联系。

七、中国与英国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互相关系

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发展，主要是在贸易和文化联系方面。但是西欧和美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1956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寻求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上态度并未表现得十分坚决。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出这种意思，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歧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多半只会给这些国家本身造成损失。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并非坚持等待和消极的立场。中国意识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力违背美国统治阶层的意志，立刻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方针，所以中国政府摆出不少条件，旨在利用英国、法国、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工商界对华通商的利益关系来影响这些国家政府去重新审视贸易限制政策和扩大对华经济与文化联系。

1956年5月，根据东南亚各国总理倡议所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取消对华贸易限制等问题。在反映英国工商界因对华通商限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绪以及对如日本和西德其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的担忧时，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重新审视被禁止对华贸易的商品名单以及更大限度地利用对华通商中的“例外程序”问题。在英国和英联邦个别国家提出之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局部改变了其对“禁运政策”的处理态度。

西德工商界对发展对华经济联系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本国代表，比如，国会议员施万(与克虏伯有联系)前来中国与 中国外贸组织进行关于对华提供巨大数量设备的谈判。可以期待，随着1957年西德代表团的到来，这些谈判将会继续下去。至今与西德之间开展贸易还是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的。1957年2月26日，在西德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的声明中提到，西德不打算与中国签订政治或者贸易协议，或者与其进行谈判，直到“中国共产党不再固守不符合国际准则的行动”为止。对此有充分理由可以初步认定，近期西德政府不可能去迎合西德商业界和政治活动家不断提出的有关与中国建立永久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要求。

法国商业界也出现了 对华通商兴趣的增长。尤其证明其事实的有，1956年初，由罗塞罗议员率领的法国贸易代表团一行28人抵达中国。中国参加了1956年巴黎博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展馆的参观人数超过了80万人。中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在博览会期间签订了300万英镑的合同。总体上，中法贸易规模与1955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在双方贸易合作顺利发展以及法国社会各界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法国政府领导人，其中包括比诺，应该会发表与中国建立永久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声明，并向北京派遣代表团，举行有关贸易和进一步改善中法关系的谈判。

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分别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代表对荷兰、丹麦、芬兰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出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互惠合同。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贸总额增长了29%。对法贸易额取得了很大增长，达到56.7%，对西德贸易达到49.5%，对意大利贸易达到93.9%，对比利时贸易达到70.9%，对瑞士贸易达到44.1%。与英国的贸易额只增长了6%。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占据首位的依然还是香港(与澳门相加为7.7亿卢布，其中6.73亿卢布基本上是中国商品出口)，1956年位居第二的是日本达到5.08亿卢布，英国退居至第三，为4.436亿卢布。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非一直局限于商品贸易额指标上。比方说，中国政府善于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极其广泛的商业界感到对华通商前景的兴趣。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他们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胜利。至于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具

体前景，中国现在拥有的进出口条件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今后将不得不稍微减少，或者无论如何暂时不会扩大与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之间的贸易规模。

1956年期间，中国组织对发展中国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贸易关系的条件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但是目前中国同志却说，近期内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前景不会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主要都是农产品，向中国所能购买的东西也不多。并且从大洋彼岸运输商品的附加开支将导致其成本巨大地上涨。事实上，1956年期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唯一能指出的是，与1955年相比，中国与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规模却是缩小了。

在建立和扩大文化和科技合作联系上以及与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政府和社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上，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访问中国的分别有：巴西、比利时和英国议会团，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活动家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同样也长时间地去了西欧、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智利、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受到了这些国家的热情接待。但是，中国同志却没能让这个代表团实现访问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一些美洲国家的计划。中国代表团领导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说，对中国代表团予以善意接待的不仅有上述南美洲四国民众，而且有其官方组织，但后者则常常避免出现官方仪式，担心由此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中国代表团在南美国家成功地建立起许多有益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报界广泛报道了代表团的出访及其成员对这些国家的印象。

有关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发展联系的报道，有以下方面：一年来，来自43个国家的590名工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到过中国。过去的一年中，中国76名学者分别出席了在13个国家，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等国所举办的15个国际会议。同时来自19个国家(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约200名学者分别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许多资产阶级活动家回国之后都表示支持与中国接近。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澳大利亚宗教代表团领导人莫埃尔在悉尼教堂讲台上的讲话，他对中国人民六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激动人心的评价，并揭露了有关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谎言；巴西议员维拉斯科发表的声明把议员代表团中国之行评价成中国与巴西之间“为实现关

系所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却还是唯命是从地跟随美国，继续无视强烈改变对华关系的要求。以休斯曼率领的比利时议会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同志说，比利时过于依赖美国，所以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比利时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景时，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在与我们的会谈中指出，近期很难期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希腊和奥地利方面来说，中国朋友认为，情况会有一些例外。希腊和英国之间矛盾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中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会促进中国与希腊建立关系。奥地利所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奥地利在相对不久的将来寄希望承认中国提供了依据。所以，中国朋友十分细心地对待与希腊和奥地利建立联系的机会。

中国继续与西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文化联系。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6—7月份，以芬兰议会主席苏克舍拉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在中国报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赞成芬兰所奉行的和平与中立政策，逐年不断牢固的中芬友好关系可以成为中国与各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

1956年，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依旧还是具有“半外交”关系的性质。造成与这些国家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的主要路障依然是英国和荷兰政府不愿放弃支持美国在制造“两个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英国与中国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朋友经常大量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这些国家脱离美国。对此，毛泽东在与大使会谈中曾多次讲到。如往年那样，在对英关系上，中国政府力求取得能够接近和关系逐渐正常化，但基于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英国需重新审视自己对上述根本问题的观点，拒绝对华歧视和通商禁运的政策。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主动提议采取了如以上所述的一部分步骤，旨在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扩大对华销售商品名单以及还采取了一些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其他措施。有关开通广州与九龙之间直达铁路的谈判已开始启动。双方同时还就设立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使办公室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是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谈判暂时尚未取得任何结果，总体上

说，在中英互相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英国并未表现出改变自己本质上反华立场的愿望。

从埃及政府宣布苏伊斯运河国有化，而中国坚决地表示支持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英国重新压缩了向中国出口商品名单。促使关系恶化的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挑唆的1956年10月在香港发生的寻衅闹事。香港事件开始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与英国临时代办会谈中向英国当局断然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当局对拖延制止闹事和惩罚肇事者采取一切所需要的措施。在中国的压力下，香港当局不得不逮捕几百个10月在香港闹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声明准备审理闹事期间受害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1957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由香港英国当局当年1月1日所公布的有关香港闹事报告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中国再次谴责了英国政府纵容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及英国当局试图逃避对出现闹事所应承担的责任。声明中还要求保障在港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朋友认为，中英目前无法调解的关系将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显然，英国在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问题上依旧继续支持美国，竭力在某些对其重要的问题上从美国那里得到所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样也不接受与英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因为目前的正式关系形式在政治关系上赋予其一定优势，为对英国人施压、揭露英国政府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

第三部分 使馆内务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1956年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对各类在华苏联机构以及全体出差来华的工作人员经常提出任务，要求尽力扩大和加强苏中多方面合作友好关系。特别在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之后，使馆多次研究了苏方对苏中协议及合同的义务履行情况，并就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以及个别协议修改意见向中央提交了设想和建议。

同往年一样，使馆关注苏联各部门和机构对协议和合同义务的执行情况，并采取措施以消除这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使馆始终关注苏联专家的活动，注意提高其工作质量，削减那些今后不再需要来华的专家人数。为消除各种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友好事业不利的障碍，使馆十分关注研究中国各界对苏态度，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措施建议。1956年，领导和监督在华苏联机构工作的问题占据了使馆工作很大位

置。在华苏联机构包括外经总局办事处及其各分部、贸易办事处及其各分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组、各领事馆、学校等，总共有88家。这一数字本身就已经让使馆警觉地感到，有必要对这些机构今后保存下去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自苏联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之后，这一问题便显得更加尖锐了，根据宣言要求，使馆与党委一起对每个机构的工作进行了评析。

针对在华苏联机构数量过多以及人员编制太大的情况，使馆认为这既不符合政治观点，也没有实际必要。使馆对缩减在华苏联机构数量提出了建议。目前一部分领事馆已经关闭，取消了驻天津和广州的贸易办事处分部，精简了苏联新闻局分部、亚洲各国工会局办事处，将苏联红十字医院转给中国政府管理。从1957年7月1日起，将精简电影出口公司分部。有关取消驻大连海事处问题将稍晚些时候予以解决。

1956年全年，在华工作的有2300—2400名苏联专家，他们分别合并成由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的团体和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直接领导的科学文化团体。使馆对这个与成千上万中国人有着直接联系的庞大的苏联人团体的工作情况予以了时时关注。

与往年那样，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继续提供了重要的各方面援助，他们的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和普通员工的高度评价。但是最近中国朋友在对待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他们对个别专家的知识 and 经验水平开始提出批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抱怨专家表现不够积极，并对建议或讲座的质量提出意见。公道地讲，中国朋友的不满在于，来华的专家常常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职业和专业。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情况，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曾不止一次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过去的一年里，使馆对经济小组专家工作做得更多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56年8月3日通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决议明确了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序。

1956年，经济部门顾问的工作是在与中国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展开的。正如以上所述，积极援助建设的项目数量从145个增加到了211个，配套供货规模与去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5倍，部分申请及合同的技术援助规模也得到了显著扩大。一年来，在华苏联专家的人员结构因顾问人数急剧裁减而发生了变化，以下数据对此予以了证明：

	截至 1956 年 1 月 1 日	截至 1957 年 1 月 1 日
专家总人数	1 745	2 025
根据 211 建设项目	853	822
根据个别项目和特种援助	546	1 082
咨询专家(顾问)	316	121

在每周的部门小组领导会议上以及针对各类问题举行的专门会议上，经常对专家活动和技术援助实施进程问题予以讨论，这类会议既由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召集，也由专家小组本身内部举行。1956年组建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及其部门下属的技术委员会成为了对专家活动进行领导的新的方式。顾问机构在基本任务上为专家组指明了必须为之努力完成的正确方向。但是机构工作人员尚未十分深入地投身于许多专家组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边区工作上，对其活动监管薄弱，在研究、总结和推广苏联专家对中国干部技术援助工作经验上做得不够。

去年，在研究各种跨部门问题上，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改善了对协调个别部门专家活动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转交中国上级领导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提议方案。然而，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情况，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对中国具体情况研究依然不够，或者说与其他领域专家之间缺少应有的合作。另外出现了一种情况，在专家建议及其言论中，对朋友不该用不妥当的批评口气。顾问机构向外经总局和部门系统地汇报了已被查明的有关设备制造质量不好的事实，包括设计文件中存在缺陷以及货物包装和运输中的缺点问题。多次向中央汇报了有关苏方对华技术援助义务履行的情况，并对消除被查明缺点提出了建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苏联组织履行合同和其他义务中的不足并未及时作出反应，缺乏应有的果断和敏锐。在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甚至也不向使馆领导通报这些情况。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部分专家处理问题中的狭隘集体立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与各部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有着密切联系。

在使馆讨论顾问专家报告以及与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个别部门专家之间日常联系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必须建立我国专家与其工作所在的中国相关机构人员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在执行所提出的建议方案时，决不允许干涉中国机构内政以及对华工作人员施加压力。自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后，使馆与党委对此作了大量解释工作。在使馆业务会议上和各专家组的党员大会上，对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使馆由一名参赞、三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二等秘书负责中国科学、文化和卫生专家组的工作。截至1957年1月1日，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人数总共是414名，他们分别在中国19个城市的100多家教学机关和组织中工作。

科学和文化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日常组织工作，维持与中国相关组织的联系，看望苏联专家所工作的教学机关单位，外出走访几个集中了我国更多教师人员的城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武汉、西安、南京等)。

专家组每月举行两次高级顾问专家会议，会上主要讨论各个顾问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专家们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建议方案。

在了解掌握专家组工作的基本情况时，使馆领导人注意到，在高级顾问会议上，过分关注了来自中国科学、文化和学术机构的批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讨论苏联专家本身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及其工作的实际成果上。在负责科学和文化组的外交人员身上，也曾有类似不正常的情况，如今这一缺点正在改正。在高级顾问的工作会议中，使馆同样指出了经济合作顾问身上所存在的类似错误。

近2—3年内，科学和文化组专家及苏联教师在工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高等与中等学校的组织问题，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改革，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制定等。在中国朋友对这些问题坚持不懈的关注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教学系统如今基本上已形成，高校内部组织工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为此，目前，我们让全体苏联教师组主要去关注对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开展高校科研工作，加强对高级顾问专家讲座质量的监督。

根据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使馆在其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有必要大大削减苏联专家人数，尤其是在中国中央机构的顾问人数。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支持，并提交给中国领导组织研究。据使馆所知，中国朋友原则上同意削减在各部的苏联顾问人数，但不希望因此而搞成一种运动，近期内，将逐渐把顾问人数降到最低限度。有关削减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人数问题，中国朋友认为，近期内，大量削减这部分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还十分需要我们的专家。同样技术学科的教师人数也不会大量削减。至于社会经济学科、其他人文学科的教师和俄语教师，中国朋友则同意我们的立场。在1957年度的申请计划中，几乎

不再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和教师提出任何需求了。

考虑到1957年度科学与文化组成员中技术学科教师的比例将占多数，使馆建议将科学与文化组与经济领域工作的专家组合并起来。1957年3月报送中央的这些建议正在研究之中。

有关科学与文化组专家工作情况将在单独呈报中央的报告中予以更详细的阐述。

1956年，在北京的苏联红十字医院进行了大量工作。医院实际上就是一家主要的医疗机构，除了治疗工作之外，还安排来自国内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的专业进修。在医院工作的苏联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每年平均达到45—50名。我国医生在中国医生专业进修班上主要进行教学工作。1956年医院门诊部共接待了约12万病人就医，在住院部进行治疗的共有2880名病人。在我国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医生，还有中国医生，一共进行了4596例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手术做得是成功的。医院还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组织了两次学术会议，举办了约90场报告会。两次会议的报告全都印刷出版了，并被列为中国和我国医生的教学资料。

由于医院在北京已经开业约5年时间，其今后的存在似乎已经不再必要，于是使馆便提议将其转交中国组织进行管理。2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医院转交仪式。出席仪式的周恩来和彭真对五年来医院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大使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对赴华出差苏联人员进行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6年底，使馆党组织合并了35个基层党组织，其中党员人数共计2206名(包括57名预备党员)。在各基层党组织中，共有42个车间党组织和100个党小组。

在过去的一年中，作为统一党组织的常委会和基层各党总支，其各自活动主要是执行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1955年)的决议，年底时，则关注实现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的要求。

为了改善在华苏联机构的工作，使馆和领事馆基层党组织、贸易办事处及其分部、外经总局办事处以及在华各地生产部门的苏联专家组，

其他苏联团体(科学与文化工作组、医院、学校等)展开了各自的活动，力求增强每个党员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对所肩负事业和巩固苏中友谊及合作的责任心。

加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苏联团体和部分专家组生产和工作活动的重视，有助于督促苏联团体遵守劳动纪律和国家法律，改善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所在国的行为举止。

在过去的一年中，基层党组织在各自会议上讨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关于学年总结报告及新学期开展党员教育的任务”、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所提出的党组织的任务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改善和活跃党的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和政治各领域的群众工作的影响。在党的组织中，开始更加认真地遵守党组织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员们开始更加勇于揭露苏联机构、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工作中的不足，提高了党员的原则性。

可以列举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党总支对其领事克留奇科夫同志不良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作为例子，该同志滥用职位，违反境外行为准则，粗暴对待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出差公民。根据普通党员们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些事实在大会上给予了揭露，党员大会还作出了将克留奇科夫同志开除出党总支委员会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基层党组织(党总支书记М.П.瓦西连科同志)在加强党组织以及解决苏联团体和苏联专家组日常活动出现的问题方面，开展了认真工作。党总支在其会议上系统地讨论了党员在企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了对苏联团体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先进经验的研究活动，在加强动员苏联团体帮助中国朋友培养自己国家干部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党委听取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总支有关党组织情况的工作报告，力求运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组织的经验来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党委会听取党总支工作的汇报，有助于发现和改进一些缺点，总结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党委会讨论长沙和武汉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指出，武汉苏联团体基层党总支人事工作做得不够，很少讨论该团体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对车间党支部工作领导不力。同时还指出，长沙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尚未形成集体领导机构，忽视党员

工作中的实质性缺点，对党员自我政治教育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

党委通过的关于这些党组织汇报的决议，帮助了党总支改进了工作，目前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改正。

自1956年10月30日发表苏联政府宣言之后，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组织和政治活动，旨在贯彻宣言所提出的要求。1956年11月中旬，党委举行了苏联机构及团体领导人和在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会上讨论了宣言中所提出的党组织任务。之后，党委成员和党委机关工作者分头奔赴一些有苏联出差人员的中国城市，就地帮助安排实施宣言所要求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做解释工作等)。在党组织和党委活动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对在华出差的苏联所有公民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在各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举办各类政治报告会、讲座、座谈会。在北京，由党委领导的编外宣讲团与基层党组织一起来实施这项工作，宣讲团中拥有50多名演讲人员。

去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演讲团成员共举办了约250场讲座，共有2万多苏联听众出席了讲座。

今年，所有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及其家属成员深入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八大会议资料，从而对提高在华出差苏联工作人员生产和政治积极性，对他们更充分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国际主义义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目前，在统一党委党员教育系统中学习的人数共有3634名，其中党员1689名，共青团员341名，无党派人员1604名。这些数据中不包括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的数据，因尚未得到那边所提供的必要数据。

党组织通过党员教育系统开设了23个苏共党史学习小组和讲习班，人员总数245名；政治经济学讲习班74个，人员总数733名；中国历史和经济讲习班26个，人员总数424名；苏联工农业具体经济讲习班12个，人员总数164名。除了参加讲习班的学习，大部分党员和无党派人员都单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793人)。

党组织举行的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成为党员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巩固和宣传学习资料的名副其实的形式之一。比如，去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理论研讨会。党员对去年在大连、乌鲁木齐等城市所举办的理论研讨会给予了良好评价。

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足：在一些情况下，对党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关心不够，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组长的工作存在缺陷，对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性缺乏监督，在一些团体中，对部分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履行国家义务和工作职责方面要求不严格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党委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各级党的工作。

在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开展党的组织、政治和教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对所肩负职责的责任心，加强了劳动和国家纪律，对在华出差的所有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成员遵循境外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此，应该指出的是，在华的大多数苏联人员的行为是端正的，是着力于尽力巩固苏中之间友谊的。

但是，去年，在中国一些地区的苏联团体中分别出现了部分苏联人员违反行为准则的事情，现对他们已进行了适当的教育。比如，在大连有几个苏联海员(帕夫洛夫、伊万尼、维列缅耶夫、克拉夫佐夫)，上岸后喝醉了酒，在中国酒吧表现得有失行为准则，而水手帕夫洛夫和维列缅耶夫则在不省人事状态下被送到船上，其中一人还丢失了自己的证件。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宾馆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

在哈尔滨，苏联专家扎伊采夫道德生活腐化，与当地一名苏联女公民同居，经常与其约会和吃喝，向其赠送相片，其中包括苏联专家集体合影照。在上海，苏联专家罗斯拉维兹(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教师)非法从学院领导那里获取莫斯科至上海的旅费2093元，欺骗苏联同事，并对他们声称说，他与中方完全结清账了，这一骗局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被揭穿。因这一严重违背行为准则的事情，罗斯拉维兹被责令提前回国。他所欠的全部金额被如数没收并归还给了中国朋友。

在出现所有类似情况下，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都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当从吉林方面得知，苏联专家波波夫、沙马耶夫、科尼亚泽夫及其他一些人违反医院内部秩序准则，滥用公车，并对中国朋友说话语气不恭，党员大会立即对以上党员行为中的错误分别予

以了谴责，并给予他们党内处分。

在武汉，在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场地工作的苏联专家马多尔斯基将自己与整个苏联专家组对立起来，在中国朋友面前歧视他们，试图对中国同志提出违背之前集体所作出的建议方案。为此，他还放肆地声称道，这样做是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中国朋友自己会分辨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建议。同样还是这位专家违反了劳动纪律(擅自行程1000多公里去北京，由中方提供费用)。在审理这一问题时，党组织对马多尔斯基给予了警告。

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努力利用上述情况提高党员对不能容忍各种违反行为准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每个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对无条件履行自己工作和社会职责的责任心，使每个在华苏联人都成为守纪律、勤劳、谦虚以及具有崇高道德素质的楷模。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减薪原因，1956年底和1957年初，我们工作人员(大多数情况下是专家)中出现了个别不良情绪和言论。专家指出，两个月之内薪水减少一半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专家在苏联(以前工资的60%)和中国所得到的工资总额还是比其去苏联出差之前所得到的要少。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家庭成员较多者(4—5人)，则抱怨物质困难。使馆机关和党组织针对这些事实做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使馆内部本身与党组织经常开展思想教育和提高业务专业工作。从使馆外交成员党组上所讨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当中，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如“关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宣言的党员任务”，“关于改进中国外交关系研究的措施”，“关于使馆全体人员思想工作的现状”及其他等。在这些会议上，党员表现出了必要的政治上的成熟，对使馆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发表了许多涉及改善全体人员工作的宝贵建议。

去年，外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很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文件准备更加深思熟虑，对当代国际局势复杂问题的判断更加慎重，对改善中苏关系提出了更有价值的新建议等。属于该队列的工作人员是，切卡诺夫、罗满宁、扎尔科夫、莫丘尔斯基、杜布罗夫斯基、什利亚普尼科夫、诺维科夫、勃列日涅夫、拉扎列夫、库达舍夫等。

集体团队中政治道德状况基本上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过去一年以

来，对党方面没有出现任何经不起考验的言论，这可足以证明对党和政府决议与措施的理解上都是正确的。在进行外交礼仪活动时，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自我表现得很有自尊，表现出克制，善于使会谈进行得饶有兴趣、内容丰富。

使馆信息工作。有必要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采取批评的态度，还应该指出的是，1956年使馆信息工作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些改进。

使馆尽可能广泛利用中央有关中国内政现状、中国政府外交措施、发展苏中关系的所有各类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更为重要和迫切问题的详细电文、情报简讯、概述、对重大问题的客观资料。使馆人员与中国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外交使团成员的许多会谈记录等，同样对中央信息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年来，使馆向中央发送了几百封电文，500多份会谈记录，30份资料及其他情报，其中基本反映了中国的生活方面。在使馆情报资料内容本身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中央对收到的资料所给予的评语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逐渐克服了以往情报资料中所存在的缺点，其中纯描述方面、个别事实和数字占据大量篇幅，对之评价则往往出自中国资料。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待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现象批评不够尖锐，只是在文献中消极地转述中国党与国家机构发表的官方论断和概括结论。在使馆1956年所准备的情报材料中，我们力求更多地展现独立性以及对国内政外交生活的批评看法。当然，这不意味着，在自己的结论和总结中，我们没有去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决议。

除了与中国同志和外国人会谈之外，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于中国各部门提供给苏联专家的各种材料。其中有些带有公务性质，有些则有时带有机密性质。中国相关组织向我们顾问团提供了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汇总统计资料、党的内部文献以及报刊上未公开发表的法规。专家们有机会阅读到党的内部杂志《组织工作》、《监督与检查》、《统一战线》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材料内容十分精彩，在给中央写各种文件时，使馆通过专家途径采用了这些资料。

与以往相比，使馆如今对准备发送中央的资料和情报经常进行集体讨论，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工作人员的视野，促进了其业务专业的提高，改进了情报材料本身的质量。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1956年中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质量并非都很高，其原因还在于，使馆外交人员很少到现场，深入中国内地，因此，对各阶层民众生活了解还甚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实际贯彻情况，对中国普通民众对苏联、对各种国际事件的态度缺乏足够的了解。使馆情报资料缺少鲜明的生活事例，基本上都是充塞了统计数据或者是选自中国内部及公开报刊上所报道的事例和事实。

使馆情报工作中尚未克服的缺点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给予评价时，往往只是单方面的，对事实缺少足够分析和批评态度。作为案例，可以举以下例子。在我们的情报资料中，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来源，我们对中国近几年基本建设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由于受宣传文章基调的影响，我们只看到这一大问题的表面，而事实上情况则并非如此，取得的这种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在一系列情况下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误和失衡。我们认为，与苏联和中国报刊上刊登的情报资料不同，使馆在自己的文件中应该更仔细地去分析困难、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无可争议的成就的反面。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使馆情报工作中，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中，在1957年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中国经验好的方面，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建设特色。

本报告年度，使馆举办了20多次外交和办事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和苏联机关领导会议。在生产会议上，使馆总结了所做的工作，研究了下半季度的工作计划，倾听了大使所作的各种传达，包括有关苏联外交部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对本部和境外外交代表处任务讨论的情况，有关中共八大决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关中共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政策，有关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通常经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馆制定出相应的建议。在工作会议上，则主要是听取使馆部门的汇报(领事处、礼宾处、科学文化处)，讨论使馆工作人员编制的一些资料。在大使召开的会议上，听取苏联专家通报有关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12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问题，中国农业现状，工资改革和城乡之间商品贸易流通现状。很多苏联代表团的领导人和成员先后在使馆作了报告或进行了座谈。

使馆部分人员还倾听了中国领导人员和苏联专家对中国部分政治与

经济问题所作的报告。

为了提高业务专业水平，使馆全体办事人员有系统地进行外语学习。目前，学习中文的有27人，其中包括进修中文知识的有24人。学习英文的有20人。为帮助人员学习外语，使馆经常放映中文和英文电影。许多同志经常去中国剧场、影院、展览会。学习外语人员开始更多地重视提高口语水平。同时，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对所在国情况研究尚且不够，特别是其文化和日常生活情况，对中国文学作品了解甚少，不听公开讲座等。使馆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不足。

使馆经常举行各级招待会、电影观摩会、联合郊游、国际俱乐部见面会、友谊体育比赛和其他礼仪活动，所有这些为使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加扩大与中国朋友和外交使团人员交际面的机会。我们外交人员与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高等教育部、中苏对外友协、《人民日报》社、各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高校校长、部分学者、文学和电影活动家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使馆一年当中举办了4次大型招待会，26场电影观摩会，11次大使午餐会，28次参赞和使馆其他人员小型招待会，26次与中国同志和外宾之间体育比赛、郊游活动及其他类似见面会。鉴于使馆人员无法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使馆专门开设了一间用来举行小范围招待会的办事处住房，尤其是为中国外交部、中苏友协、宣传机构、各类北京组织等少量中国相关人员所举行的招待会。

1956年下半年，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联系极为活跃。基本上根据这些国家使馆的主动提议，我们积极为其国内所举行的苏联友好周和友好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举行了体育比赛、休闲晚会、电影观摩会。类似友好见面会一般都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使馆工作人员一起举行。6月份曾为南斯拉夫使馆人员举办了招待会。匈牙利十月事件之后，使馆组织了与在京匈牙利人友好见面会。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次招待会对曾经历了严重动摇的许多匈牙利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使馆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使馆外交官的工作予以了认真关注。大使和外交工作人员与埃及、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使馆一次生产会议和党组织会议上，对办事处活动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从而促进提高了外交人员在招待会上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去利用招待会收集情报，开展有关苏联外交政策、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交谈。

领事问题。截至1956年1月1日，在中国共设立了9家苏联领事馆。本年内关闭了满洲里领事馆和喀什市总领事馆。目前在中国只有5家苏联总领事馆(分别位于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乌鲁木齐)和2家领事馆(位于广州和伊宁)。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决定是根据使馆的建议作出的。因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可派1—2个工作人员常驻伊宁办理当地苏联公民证件，使馆认为有必要研究关闭伊宁领事馆的问题。使馆还认为可以精简领事馆人员编制，特别是广州和大连的领事馆。

使馆人员，包括使馆下属党委工作人员，一年内平均要到苏联驻华东地区的领事馆4—5次，党委工作人员去了新疆两次。使馆参赞对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广州各领事馆的情况也作了调查。进行一系列寻访的原因是由于个别领事馆工作中出现了问题。1956年使馆听取了上海和哈尔滨两地总领事和广州领事的汇报，并且还举行了苏联驻中国领事机构领导人的会议。

在本报告年度，使馆向各领事馆下达了关于在情报领域和其他问题方面改善对苏联专家、当地苏联公民的领导工作指示。使馆多次提请领事馆重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年底，领事馆对苏联专家的领导工作有了一些起色。沈阳和大连总领事馆概括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运用中国先进经验的建议。沈阳总领事馆同时还取得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工作的显著改善。根据哈尔滨、乌鲁木齐、沈阳、大连和上海各总领事馆的建议，有系统地从中国调回了一些专家，因为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已没有更多必要。

去年领事馆在向苏联外交部和使馆通报有关各领事管辖区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使馆明确要求各领事馆进行研究，在其领事管辖区的具体条件下是如何实施中共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措施的，并且现场研究有关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使馆经常提请各领事馆工作人员重视扩大其与党政和社会组织，与文化和民主党派活动家联系的必要性。使馆建议各领事馆对及时提供最紧迫问题的简要情报予以更多重视。实践证明，这种情报往往比大篇资

料更有用，而为了编写大篇资料，各领事馆则常常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给其他工作造成损失。在本报告年度，最感兴趣的情报资料来自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在编写情报、资料、管辖区出访报告上，哈尔滨、大连和乌鲁木齐各总领事馆工作做得还不够。

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对组织和调整各领事馆情报工作做得还不理想。由于与使馆工作计划协调不够，领事馆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送交使馆的时间太晚，往往在使馆已经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准备向中央送交相关文件之后。对存在的这些不足在1957年3月份北京的领事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

1956年，使馆对减少常住中国的苏联公民人数问题继续予以了很大关注。为此，使馆考虑到了中国朋友对清理在华整个当地苏联侨民区——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关心。

正如1956年的工作经验所证明，对大量减少长期居住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问题不能只通过组织这些公民回国的个人方式来予以解决。根据资料初步显示，1956年从这些地区返回苏联的人数达到2200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约900人。在这些地区所剩下的1.32万人同胞中，根据现有资料初步显示，看来，将近有三分之一人表示愿去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中许多人在那里都有亲戚。

为了减少长期在华居住的苏联公民人数，1956年使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当地苏联同胞出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关于运送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苏联同胞回国进养老院。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了，并且部分已被贯彻执行。使馆和领事馆获准在1956—1957年向苏联残疾人疗养院运送500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同胞。简化了以往返回中国拥有苏联国籍的前政治移民出境手续。各领事被授权可以核销当地同胞，只要他们一旦提出要求离开中国，包括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朋友十分赞同取消对当地苏联同胞离开中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

考虑到当地苏联同胞突然大量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会急剧加重当地侨民区中的不良情绪，给中国朋友造成困难和引起外国新闻舆论，使馆提请领事馆注意有必要改进在苏联同胞中的教育工作，同时还提醒领事馆核销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公民，防止他们转变成为一种运动。吩咐各领事馆，应该与本地当局紧密联系推行这项工作。可以期待

的是，随着继续组织当地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使居住于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在近期内有实质性的减少。

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减少问题遇到了极大困难。根据截至1956年1月1日情况统计，长期居住新疆的苏联同胞有4.34万人。此外，根据中国外交部通报，新疆拥有从俄国和苏联出来的无国籍人士20万—30万人。

1956年期间，从新疆返回苏联的当地苏联同胞人数为8000多人，无国籍人士7000人(苏联同胞家属成员)。根据伊宁领事馆估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拥有近6000家苏联侨民家庭和大量的无国籍人士，他们同样也想返回苏联。

根据与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会谈以及我们新疆领事馆的通报，可以作出以下结论，中国当局对从事农业的当地苏联侨民大批离开新疆回苏联持否定态度，因为其很大一部分人已加入了合作社，这些公民的大批出走将对其所居住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生产合作社的巩固造成损害。中国当局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同胞要求离开新疆返回苏联，但希望他们的离开不要像往年那样形成一种广泛运动，从而对当地整个苏联侨民区以及从我国出来的更多数量的各种无国籍人士的情绪造成较大影响。

所以，我们新疆领事馆应该在1957年更加谨慎地处理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问题，对中国当局有关公民任何群体离开新疆的观点予以考虑。领事馆不应该进行间接的或者通过当地苏联同胞动员大量公民回苏联。为此，还需考虑到新疆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顺利进行，首先是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合作社，应该改变在当地侨民区中的政治群众工作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取消苏联侨民协会分部，并将文化教育机构转交合作社与当局管理，以便为整个当地居民，包括苏联同胞服务。在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伊宁苏联领事馆便可关闭了。

中国当地侨民区大量减少使得1956年先后关闭了喀什、乌鲁木齐、满洲里、大连、沈阳和北京的苏联侨民协会。至于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苏联侨民协会，则根据中国同志的愿望，根据保留对以上地点大量当地侨民区的当前教育工作形式情况出发，使馆认为有必要暂时保留这些协会。对取消上海和天津苏联同胞协会问题待1957年底再处理，等这些城市的当地侨民区减少之后。

1956年使馆和领事馆就吸引当地苏联同胞积极参加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工作。长期居住在新疆的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数量不多的苏联同胞。

使馆和领事馆对中国当局代表所表示的意思是，如果作为工业和商业企业拥有者的当地苏联同胞，随同中国公民一道，在与中国公民相同的基础上投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话，苏方不会反对。但是1956年期间，中国当局没有对当地苏联同胞的工业和商业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像对其他外国公民那样。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立真的通报，1957年初，中国国务院规定，在中国拥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外国人可以继续在国家监督下从事自己的活动，对他们将基本上使用社会主义改造低级形式(由国家提供加工原料任务和按照当局所定价格的订单，向国家销售成品等)。一旦苏联同胞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改造成混合制，那么其要求可以予以满足。作为手工业、畜牧业和农业所有人的苏联同胞则根据其本人愿望，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加入合作社。对房屋所有者目前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有关领事处工作的报告将单独呈上。

第四部分 结论

在过去的1956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经济；完成工业化、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得到了顺利进行；加强了围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国家；扩大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同时还巩固了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劳动人民的高度生产积极性，1956年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

中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完成了生产总值计划107%，基本建设计划完成99%。工业和基本建设呈现发展速度十分高的特点：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提高了27.7%(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7%)，而基本建设则提高了约60%(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约10%)。1956年工业产品增幅几乎等于1950年全年工业产值的规模。1956年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几乎等于1953年和1954年基本建设规模两者相加的总和。五年规划所制定的

工业生产总值、大多数产品种类、工人和职员工作水平的指标都提前一年完成，而基本建设则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一切为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完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证明，1956年计划定得非常之高并且平衡不够，尤其对基本建设，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在完成1956年计划过程中，查明了三大基本矛盾：资本投入需要与资本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增长速度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后则是进口增长与出口能力之间的矛盾。

由于整个计划中出现过错和失误，尤其是在制定物质和财政平衡上，由于基本建设资金大量分散，工人和职员人数超计划增长，在国内经济中造成了严重紧张。这促使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过去所制定的1957年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规划草案，以消除已形成的比例失衡。

二、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改造工作。改造规模和步伐极大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规划所制定的指标。工业生产中私有部分比重从1955年的16.2%减少到1956年的0.0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内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56年整个工业总产值约1/3是由合营企业所生产的。

由于中国经济中上述改造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进一步增长和合营企业逐渐转变为全社会性质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工人和职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掀起了竞赛活动，从而保证完成了1956年生产计划和提高了商品贸易额。在社会主义竞赛影响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得到了改善。在把私有工业和商业企业改造为合营制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对合并小企业主、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许多情况考虑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日常用品生产的下降和居民商品供应情况不良。

尽管中国领导机构对新成立的合营企业经营重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组织经营活动以及对资本家不断进行教育，依然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主要问题。

三、在农业方面，中共和中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采取了巨大努力。其结果是，无论遭遇自然灾害的损失有多么严重，1956年还是取得了农业产量进一步增长。粮食总收成达到1.846亿吨，比丰收的1955年

多收940万吨(5.7%)。棉花总收成比1955年增长2.1%，为155万吨。虽然国内农业产量得到了提高，但大多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由于削弱了中央对采购谷物和居民粮食供应的领导，造成该工作中出现了很大错误。中国粮食收支平衡依然还是紧张。截至1956年，国家仓库粮食储备为3520万吨，比1955年底减少了10%。棉花采购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这一原料的需求。

畜牧业，尤其是耕牛和养猪业情况依然严峻。产生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合作化进程中出现了错误，1954—1955年饲料基地被减少，收购价格太低，合作社缺少饲养和使用牲口的经验等。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改正上述缺点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注意提高农民和合作社社员对畜牧业的兴趣。这样做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但尚未取得重要进展，无论是牲畜总量还是各种主要牲畜量的增长计划均未完成。

1956年是中国农村完成基本合作化的一年。随着进一步吸引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社过渡，同时巩固大多数合作社的进程开始了。截至1957年1月1日，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由于合并而减少到75.8万家。其中合并了1.174亿农户，或全国农民的96.6%。1.066亿农户，或全体农民的87.7%，合并为56万家高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全年对巩固合作社生产活动组织和安排问题予以了很大关注，以取得在合作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生产高潮，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提高合作社90%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从而显著展现合作社经营的优越性。中国党和政府在合作化和合作社组织经营活动进程中查清和改正了大量缺点、错误。比如，他们让合作社对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估计不足予以关注。为同破坏合作社的民主领导、浪费和其他错误现象作斗争采取了有效措施。所有这些取得的结果是，大多数合作社基本上于1956年顺利建成了，尽管发生了自然灾害，80%的合作社农民与去年相比还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帮助弱小合作社和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依然是中央和地方党及农业机构关注的中心。

四、城市和农村生产关系性质的深刻变化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其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逐渐消除了民族资本家

阶级，全面加强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一切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理论，探索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正确而灵活的形式，以保证完成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过去一年，共产党队伍得到了很大成长和壮大，实施了旨在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党政工作的措施。

中共中央极大地关注加强党内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国内其他阶层民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工作的基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和政府决议，为此，特别强调在人民中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因取得巨大成就而骄傲自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工作和生活中谦虚朴素作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文化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一定意义，这关系到把中国科学与文化提高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总任务。

五、根据团结中国人民所有力量的必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人民民主战线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并实际上贯彻了共产党与中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相互监督的方针。作为中共统一战线领域新的政策方针，它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任，加强了其对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外交措施的支持。过去的一年中，统一战线组织改造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显得十分活跃，民主党派成员的队伍得到了扩大，召开了各党派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其基层机构组织得到了加强。

六、1956年举行了一系列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活动。在选民十分积极地参与下，进行了国家政权基层机构——乡镇、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与前几次选举相比，参与投票选举的选民百分比有了极大上升；比往年更广泛地实行了无记名投票；会上发言的代表及其提出的有关改进权力机构活动的建议数量都有所增加。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方面，选民和代表更加直率而大胆地对错误和不正常的现

象提出了批评。

为了使国内行政区域划分接近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开展了乡镇合并，县和省部分重组。许多上级组织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工作。鉴于国家管理存在过于集中，在国家和党的机构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反法制的现象，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缺点，并开展与这些机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

七、与前几年相比，1956年更多地去关注民族建设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大量大汉族沙文主义、限制中国落后少数民族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因。在个别居住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出现了由民族主义和敌对分子组织的骚乱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谨慎和正确的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增加对这些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拨款，继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现象。

八、在中国人民内部逐渐统一和国家内政情况稳定情况下，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没有停止自己的破坏敌对活动。在下半年，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农民中出现了个别骚乱，工人中出现了个别罢工，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恶意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认定这些动乱具有严重意义时，认为没有必要广泛地采取镇压措施，而是着重全力开展了说服工作，克服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都是群众中不良情绪和举动的原因。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活动家最近发表的原则性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在先进和落后部分之间有必要利用民主方式去克服这些矛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声明的，对敌对分子不应该采取镇压方式。

1956年，作为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在这些分子中开展“自我揭发，自我坦白的运动”。对自愿坦白者，其人数超过了10万之多，则采取了“宽大政策”。

九、1956年中国外交状况的主要特点是：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领域以及科学和文化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关系得到了继续发展。

苏共二十大是极大推动这些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大会决议对中国政府外交和内政措施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在苏共二十大影

响下，彼此工作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苏政府之间、中共和苏共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中国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整一年中一如既往地互相通报各自国家内部情况，并且在外交政策领域互相协商和密切合作。在匈牙利事件和对埃及侵略时期的复杂形势下，这点表现得尤其鲜明。这一时期在敌人攻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忠诚。中国朋友对苏联政府向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提供援助的行动，对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所采取的其他措施给予了坚决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活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是，1957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中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具有国际意义的苏中联合声明。

近一年来，对苏联、苏联组织和在华专家工作提出更加公开批评意见成为了苏中关系中的某一特点。为此，应该考虑到，通常对我们的类似批评是出自友好的立场，并且反映了中国同志为争取更加多的互相理解和巩固苏中人民友谊的渴望。

1956年标志着苏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相当扩大。苏中之间对外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达到59.97亿卢布。但是1956年中国在履行义务向苏联提供部分商品时出现了严重困难，从而导致了年底中国商品供货部分减少，中方未能完全履约的部分达4.2%。根据1956年合同，苏联履约供货97.2%，而外贸部供货仅履约94.8%。对我们企业和设计机构来说，通过技术援助对华提供设备和完成设计工作进行得十分紧张。虽然对华提供配套设备计划超额完成了，但并未按要货清单履约完成。一年中，许多部级总供应商严重违反了设备交货、设计技术文件转让和专家派遣所规定的期限。

到年底，中国降低基本建设速度和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设备和设计资料的趋势更加明确了，从而有可能对已经开始着手完成中国定单的我国工业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1956年苏中科技合作极其活跃，它表现为在双方科研机构、科学院、设计院等机构之间采取了直接联系的新的各种形式。组织苏中联合科学考察队共同研究个别问题是有益的。中方依然要比苏方更加积极地

主张进一步扩大苏中科技关系。苏方对中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利用还是不够。

1956年与去年相比，双方在文化合作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这得益于1956年中期苏中双方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文化关系得到了一定扩大，但依旧落后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水平。今后文化合作的工作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科学基础上，朝着更加深入、更加专业的互相研究两国文化和科学的方向发展。1957年即将制定的3—5年文化合作远景规划将对这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十、过去一年中，中国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中国与苏联一起坚决贯彻平等、互助和友好合作原则。

1956年，中国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正常。中国向朝鲜和越南继续提供极大的经济援助，同时还与蒙古签署了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协议。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56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朝鲜内政状况问题上暴露出严重分歧，其结果导致1956年中朝关系有些恶化。

1956年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和政党接触扩大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镇压匈牙利法西斯暴乱所提供的援助，并且表示对卡达尔政府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朋友十分谨慎而审视地去评价波兰事件，多次反复研究自己对波兰事件始初阶段的立场。

随着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巩固，1956年双方贸易和经济关系出现了缓慢增长，甚至在贸易额上有些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财政方面遭遇了困难。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得到了一些扩大，对此可证明的是，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开展了各种代表团的大量交换。由于1956年南斯拉夫人掀起的宣传“民族共产主义”以及对苏共的攻击运动，中国朋友坚决地站在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以此支持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斗争。

十一、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坚持奉行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发展各方面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反殖民化斗争和中立化，促进这

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反抗帝国主义者将其结成该地区自己侵略集团的方针。与往年那样，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利用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1956年，在解决上述任务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中国成功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些主要反映在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扩大了与亚非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个人的交往。中国对一系列国家(缅甸、柬埔寨等)给予了经济援助。

中国政府赢得了亚洲国家对自己政策的巨大理解，积极促进了他们对苏联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情况更正确的理解。在这方面，周恩来对亚洲八国的出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次出访时间正好在1956年底，因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苏联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这次出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威信的提高，巩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改善了中国与部分国家的互相关系。

中国对印度继续予以特别多的关注，1956年与印度友好关系取得了发展与巩固，在国际问题上，中印进一步互相理解和合作。

十二、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日本工业生产增长及其对外贸易发展困难、日美矛盾上升、苏日外交关系恢复以及日本随后加入联合国——所有这一切为促进改善中日关系建立了更加良好的氛围。中国政府利用这种局势，继续积极地推行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中国同志对日本所做的工作使得与日本的联系得到了极大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社会民意产生了影响。但是，考虑到日本与美国之间更大的依赖关系以及日本统治阶层反动亲美分子十分强大的立场，可以预见的是，近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只可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虽然中国毫无疑问会设法利用这种进展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效果。

十三、美国对中国依旧奉行自己公开的敌视政策，继续事实上占领台湾，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和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对那些反对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旨在揭露美国统治阶层的政策。比如，在日内瓦大使谈判过程中，中方不止一次提议召开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和发展两国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之后，中国又表现出主动姿态，邀请美国

文化人士和记者访问中国。美国政府禁止这些出访甚至引起了美国部分反动报界的不满，对中国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依然还是美国对台湾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中国同志对拖延解决这些问题持平静态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利用各种途径对国民党人和台湾居民施加影响，促进台湾岛上爱国主义力量的活动，加重国民党人之间的分化以及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尖锐矛盾。

1956年中英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双方关系出现了某种恶化趋势，尤其在英国策动对埃及侵略，并在香港和九龙进行反华挑衅之后。

十四、1956年，对中国国内生活及巩固其国际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显著事件是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展示了党的统一，与群众广泛而牢固的联系，中国主要阶层民众对共产党及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支持。大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本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在总结了七大之后所走过的道路，分析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了实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规划途径和方法。

第五部分 建议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的宪法中，在附加在这些国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条约序言中，强调指出，巩固与苏联的友谊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不变的原则。为此，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至今只在苏联政府声明和宣言中予以了阐述。但是这些原则尚未在我国的基本法——宪法中得到反映。

考虑到苏联外交的列宁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平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争取保障全世界和平等)不仅是苏联政府实际活动中的外交政策，而且是苏联国家整个长期政策中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提交下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把这些原则写入苏联宪法序言中是适宜的，特别要突出和强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永久而牢不可破的友谊原则。这一举动所要强调的是，苏联政府在以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外交基本原则不仅是苏联政府当前的外交原则，而且是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原则。

提请对苏联宪法加上序言，强调苏联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不可摧而永久的友谊、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无疑将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引起良好反响。

二、1956年苏联比往年更加重视普及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但是在使馆看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访问苏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认为，苏联公民对中国人民生活，对中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了解不多。在苏联学校里对中国现实生活、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介绍不够。

为了在苏联推广对中国知识的了解，我们认为，必须开始苏中友协的工作。两年前在莫斯科就已宣布建立这个协会，在中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三、目前，在苏联的中文定期出版物上，对苏联成就的宣传以及在中国民众中对苏联人民生活的介绍还做得明显不够。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中文期刊只有两本——《苏联》和《苏联妇女》，年发行量为240万册。这些杂志上所刊登的材料无法满足中国同志对苏联的兴趣。

为了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宣传，使馆认为在莫斯科组织出版中文大众版报纸是适宜的。报纸可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因为苏联目前尚未成立苏中友好协会)。报纸的主要任务在于，依据具体材料，以普及形式宣传苏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在民主发展方面的成绩。向读者介绍苏联人的生活和日常习俗等。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居民是文盲和半文盲，最好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照片、图片和其他插图。

有关技术方面，则可以利用中方《友好报》的出版经验，即在莫斯科进行报纸排版，将版子发往北京并在中国印刷发行。对报纸出版社工作而言，应该邀请几个中国专家担任顾问。

目前中方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定期出版物有三种——《友好报》、《人民中国》和《中国》期刊，年总发行量为2100万册。据使馆掌握的情况，中方对我们出版介绍苏联的中文报纸持积极态度。因为这符合中

国朋友在中国更广泛地介绍苏联生活的愿望，并且这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

四、1957年中国报刊出版社发来了大量征订有关介绍苏联文章的申请。但是接到这些申请的苏联新闻局只能满足中国出版社30%—40%的需求。目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有关出版供中国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阅读的《苏中友谊》月刊的决定，上面将完全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并且中国朋友计划出版物大半部分保证登载向苏联作者约稿的文章。

鉴于以上所述，使馆请求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就及时而完全满足中国申请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五、使馆认为必须做到的是，苏联新闻报刊不要只限于登载按照通讯社有关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材料，还应根据中国外交和内政的措施刊登社论、编辑部和评论员文章。这不仅符合双方的相互关系，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政府措施的一定支持。

六、使馆从与中国主管人员会谈中得知，中国广播听众对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对华广播质量反映不好，认为苏联广播的许多材料中文翻译很差，枯燥单调。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广播委员会重视从根本上改进苏联对华广播质量的重要性。

七、鉴于最近美国加强在东南亚、近中东国家的宣传，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宣传与反宣传，使馆认为合理的是：

- 1.委托苏联驻东南亚、近中东国家各使馆研究所在国苏联宣传的效果问题，并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 2.召开苏联和中国宣传工作人员有关交流经验和改进亚洲国家宣传组织会议。在该会议上可以协商我国与中国对亚洲国家宣传的协调问题。

八、近来，美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数量出现了增加，并且其活动显得很活跃。美国的广播电台分布在直接靠近东南亚和远东国家(日本、菲律宾等)，并且与苏联广播截然相反，他们的广播听得很清晰。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加大我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功率，同时还要与中国政府商定有关安排从中国南方地区转播苏联对东南亚的广播。

九、正如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与群众组织工作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根据本国情况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做法。对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实际活动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值得进行仔细研究。使馆认为，可从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地方党的机构(州委)向中国派遣工作组，以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情况。

十、个别苏联部门在向中国派遣各自代表团时没有要求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代表团提出具体的任务，没有提请他们注意有必要去研究中国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的做法。通常去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国内形势了解很差，并且对代表团感兴趣的领域的情况也很少介绍。

与此同时，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回国后通常不总结出访期间所收集的材料，在部委会议上很少听取他们的汇报，代表团成员对报界和社会各界发表出访成果总结表现得不够积极。

使馆认为，有必要最好提请我们各部门注意仔细做好代表团赴中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有必要建立对所做工作的汇报程序，包括在同事会上听取代表团汇报。

十一、中国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征求过并且一直征求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严重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与苏联经济建设协调规划的建议。考虑到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目前缺少一个建立在对等基础上讨论中苏经济的某种机构，最好是对合理建立常设苏中联合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予以研究。该委员会将被赋予规划和协调苏联与中国国民经济部分部门发展的功能，研究中苏部分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问题，协调对资本主义市场和亚洲与非洲的外贸政策，交换经济信息等，其中包括外贸业务信息。

十二、使馆支持在华苏联贸易办事处提出的有关中苏贸易关系领域的建议：

1.为了更加合理地解决中苏双方之间往来货物的价格问题，应参照相应商品的世界价格行情，研究相互供应商品价格转为每年制定的问题。一旦世界市场部分商品因特殊情况出现价格上涨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则由双方进行特殊协商。

同时，有必要研究有关取消对苏联商品发往新疆至边境公路的苏联

境内段或者水陆运输的额外补贴问题，因为中国机构在向苏联发运其商品至边境的该地区段是通过其境内公路和水陆运输的。

2.有必要与中方讨论有关签署增加向苏联提供钨精矿石和锡矿石数量的补充协议问题，如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有关向苏联提供有色金属议定书所规定的条件那样，因为考虑到上述金属的实际供应已大大超出了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数量。

3.为了提高双方对如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的责任，应该提出，如果双方有任何一方违反交货期，实行制裁是适宜的，正如供货总条件中对此所规定的那样。

4.到目前为止，苏中贸易问题谈判通常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为了尊重相互关系，这些谈判在莫斯科和北京轮流举行比较合理。

十三、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中央考虑研究在北京建立常设苏联展览厅的问题，以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该展览厅可以用实物或者图片展示苏联的新技术产品、苏联出口品种，并组织有关经济与国家建设、外贸、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等各种问题的图片展览会。

十四、使馆未收到我国驻中国邻国各大使馆(蒙古、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有关介绍各所在国情况及其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材料，使馆极其需要这些材料以便经常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请安排向使馆定期寄送上述材料(汇报章节、个别材料、情报)，同时，请允许使馆外交人员出访中国的邻国和地区(越南、朝鲜、蒙古、缅甸、香港)。

十五、1957年8月1日，中国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应该在苏联报界广泛介绍这一纪念日，并从巩固中苏军队关系出发，委托苏联国防部按其组织系统制定活动计划。

十六、鉴于1959年中国即将成立10周年，有必要提请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和相关的出版社着手准备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可以在纪念庆祝日时出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的专题文献集列入出版社计划，同时还应该责成外国文献出版社在1959年扩大中国文学翻译出版。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1957年4月18日于北京

文件送：А.А.葛罗米柯、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苏共中央
联络部、档案室

1957年4月15日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报告简介和说明已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9月17日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23032 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 技术专家(1957年4月23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遵照本国政府的委托致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请求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苏中协议条件向中国补充派遣96名苏联专家，为期6个月至2年。

中国政府请求苏方给予技术援助，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具体解决如下问题：新建马丁(炼钢)炉的运行，冶金设备的设计，硅化砖的研究，水泥厂和电缆通讯的设计，有色和稀少金属的地质勘探，机器制造厂和轻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工作方面的问题，等等。

中方还打算让上述专家来从事培训和提高本国干部技能方面的工作。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事先与中国有关方面作了协商，明确了中方工作中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和专业。最终，中方决定将自己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减少45人，即其请求派51名苏联专家赴中国。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并于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45名苏联专家，而其余6名专家则从先前已承担了这方面义务的专家人选派出。

在签署合同时，这些专家每个人在中国逗留的期限均按中方要求的上述最低期限确定。

这些苏联专家均将按照技术援助条件派往中国，与其出差相关的一切费用支付均按照现行苏中贸易协议相关规定执行。

与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协商后所颁布的指令性草案，具体参见附录。

И.尼基京

附件：

机密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给予其技术援助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所发指令的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指令

1957年4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请求：

1.兹责成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于1957年第二季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以给予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技术援助，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专家人数参见附录。

所派专家的专业及其在中国逗留的具体期限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协商。

2.责成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依据本指令就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与中方达成约定。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将由中国和苏联相关部门之间视具体情况所签署的协议而定。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将根据1950年10月25日苏中协议条件进行，其差旅费用的支付则遵照苏中贸易协议办理。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附录：

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专家赴中国实施技术援助的苏联部委和部门的名单

部 委 或 部 门	派 遣 专 家 数 量
苏联黑色金属部	3
有色金属部	5
电站部	4
电力技术工业部	7
重型机器制造部	5
机器制造部	2
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	1
苏联工业和建筑材料部	4
苏联粮食产品部	1
苏联轻工业部	1
交通部	1
苏联通讯部	4
苏联内务部	3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	2
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桥梁建筑总局	2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管理局局长

H.科雷巴洛夫(签名)

1957年4月23日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讨论的情况说明

派出专家的部委(部门)	参与讨论的人
苏联黑色金属部	副部长 B. B. 赫列布尼科夫
有色金属部	副部长 H. A. 斯特利津

续表

派出专家的部委(部门)	参与讨论的人
电站部	副部长 А.С. 恰甫连科
电力技术工业部	副部长 Л.С. 切尔尼岑
重型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К.К. 维诺格拉多夫和 А.Г. 波洛任科夫
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В.Л. 列别杰夫
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	副部长 Н.В. 马丁诺夫
苏联工业和建筑材料部	部务委员会委员 Ф.Т. 萨多夫斯基
苏联粮食产品部	副部长 В.Н. 布拉吉列夫
苏联轻工业部	副部长 Н.Н. 阿基莫夫
交通部	副部长 Н.А. 贡多瓦
苏联通讯部	副部长 З.В. 托普里亚
苏联内务部	大地测量和制图总局局长 А.Н. 巴拉诺夫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	民航总局副局长 Н.Н. 阿索夫斯基
莫斯科市执委会所属桥梁建筑总局	桥梁建筑总局副局长 К.Л. 维诺库罗夫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总局局长

Н.科雷巴洛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28, л.78-84

№103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1957年4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4月24日会议第90号记录

第35项 关于遣返从中国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库尔久科夫同志、奥尔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认为目前不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发此电报。 [73]

中央委员会书记

М.苏斯洛夫

ЦХСД, ф.4, оп.15, д.549, л.16

№24934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1957年4月29日)

会议主席：博戈罗茨基同志。

与会者以掌声迎接走入大厅的焦朝河(Цзяо Чжаохэ)和王满寿(Ван Маньшоу)。

主席：同志们!在苏联国内欢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艺术学院
的艺术家——北京中央艺术学院的王满寿教授和焦朝河教授，莫斯科的
艺术家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国画艺术学校在莫斯科举办的艺术展引起了苏联观众和苏联艺术家的
巨大兴趣。中国保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艺术非常美妙，国画艺术鲜明
而生动地反映了当代自由的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作品的创
新性很强，这样的创新性我们只有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中才能看
到。

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同志般地交换意见，谈论关于中国
和苏联艺术的发展道路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问题，可以听取中国同志对我
们苏联艺术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的
艺术家是怎样理解社会现实主义的主要轮廓的，中国怎样实现中共八大
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现代中国的
艺术领域主要的艺术方向，关于中国艺术家工作的组织问题。

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指出苏中艺术家之间今后友好关系发展的道
路。..... [74]

焦朝河同志：我想谈的是，国画艺术学校是怎样进行教学的，艺术
家从事创作的工作过程。

首先，我应该说，在技术方面，中国的艺术家把大自然看作是自己的
导师。对于艺术家能够接触到的他希望塑造的世界上的客体和现象，
他首先应该很好地予以了解，应该深入其实质，而在此之后，当世界上的
这些客体和现象——无论对艺术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艺术家都应该
在自己的工作中和作品中把这种印象塑造出来。他应该对这些客体进
行仔细的研究，深入其主要的实质，无论艺术家塑造什么，是否有花、
鸟、人、美景，他都应该仔细地对其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塑造。

问题在于，在此还需要谈论一下表达的方法和手段。中国的国画主要是线条画。勾画的线条应当具有概括性，言简意赅地勾画出世界上的客体。当然，实物画是基础，但它完全不需要使艺术家深入其中。有时候艺术家要对这些实物进行观察，然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意识，并在画布上简洁概括地勾画出这一实物的形象。艺术家不应该完全依赖客体的明暗面和亮度。主要是需要勾画出这一客体的内涵，而这种内涵是可以通过线条来表现的。而艺术家本人应当尽力抓住某一形象确定的特点，而这些单独的明显的特点有时候在艺术家的意识里被夸大了，而有时候被艺术家故意强调。

在这一展览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例子，艺术家用线条展示了形象的结构。或者你们已经看到了，在许多的中国作品中都缺乏背景，缺乏环境。中国绘画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一点——关于特点就简单地谈一下。

至于教学的方法，也就是怎样对青年艺术家进行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方法完全来自形式，从中国的国画绘画中就能看到例子。首先，青年艺术家应当仔细而深入地对某一形象和物质世界的客体进行分析。在青年艺术家深入某一客体的内涵，搞清了形象，之后就可以教他来利用什么方法，什么色彩，怎样构建作品。

主席：这就是说，他要从绘制实物画开始吗？

焦朝河同志：你们是否看到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实物画与西方的实物画不同，当面对某一实物的时候，就尽力把其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艺术家首先应该进行想象，该形象的内涵是什么，内部结构是什么，而后，当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意识中的时候，在他对这些进行消化之后，他就能塑造这些。（掌声）

但问题是，为了塑造当今复杂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塑造所有复杂的内涵，塑造人们的心理活动，为此我们就必须学习和接受西方、苏联和其他国家绘画中一切好的方面。因此，一方面，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我们的大学生在学习我们的民族遗产和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造型艺术展中一切好的东西，以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但在此方面主要的是：我们的民族艺术是基础，而我们从西方学到的一切，都应当有助于我们丰富我们最主要的东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有人说：对)

至于我，我在尽力对我们的民族遗产进行研究，研究欧洲和苏联一些好的东西，而在我对这些东西进行消化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许多国画艺术家，他们几乎不能不对欧洲的艺术进行研究，因为欧洲的艺术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揭示今天人们生活的精神内涵。

在我从事中国画的整个生涯中，毫无疑问，我们在努力接受其他国家的绘画中和造型艺术中一切好的东西，而今天，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意义。

事情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领会西方这些所有好的东西。对于那些参观了我们的展览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谈谈自己对欧洲流派中的这些问题的意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和不足，毫无疑问，我们的作品还不能完全反映当代的生活。因此我真心地请求你们直率地把这些错误和不足告诉我们。

克贝尔同志：我大约在中国待了七个月，因此我想在此就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些答复。因为我看到过。

1955年，我参观了第一次在苏联展厅展出的中国展。在那里我首次了解了焦朝河的作品。那里展出的作品是《小男孩和鸽子》。当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大作是在我国的展览会上。我看到的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贝尔·维基就雕塑艺术提出的问题，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印象。

中国人能够在很小的东西上塑造出极大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曾到过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其中包括齐白石的工作室，我得以看到他本人是怎样绘画的。我在杭州、北京、广东，特别是在软玉庙看到过许多画作。软玉庙的长老在上海收藏了许多画作。那里有一件特别的作品使我感到非常吃惊。事实是，在这些奇妙的狭小的画布上通常画的或者是小虾，或者是小鸟，或者是小鸡，从这些小小的绘画世界中艺术家们能够看到许多东西，并且对画作进行这样的结构组合(我对画作产生的最多的联想就是这些)，精美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齐白石那里有许多以小虾、小鸟、鱼、小鸡为题材的画作。为了证明我们的客人所谈论的关于他们是怎样领悟自然的话，我想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印象。我曾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艺术问题的大型讨论会。他们确实会观察实物，并带上画板进行绘画，但当他们在进行绘画的时候，他们眼前没有任何实物，整个绘画过程都是凭印象进行的，但绘得是如此的形象，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不存在任何自然主义。这就是中国画——广义上的中国画，不仅仅在绘画方面和雕塑方面，而且还在戏剧方面，它的准确性和形象性使我非常吃惊。这些同活生生的实物没有区别。

如果你们发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缺乏背景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戏剧中也是一样——没有布景，纯粹是演员在进行表演。例如开门或者关门，只做一个小小的姿势。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画都是千篇一律，与实物的相似度很小。但是，当我看到了中国的大自然之后，我开始明白，中国画是非常接近自然的，同时不是对实物的描绘。中国画是经过艺术家用心加工的。在中国，我经常同中国艺术家们进行会谈，我听他们谈论说，“我们非常热爱大自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但是当绘画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实物”。

一名艺术家，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得非常好，“我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一幅画画了2—3年”。我问他：“你是怎么了？要用2—3年，是在写作吗？”这位艺术家回答说：“不，我要思考，研究材料，而作画用了2—3个月。”他把绘画看作是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这种方法非常聪明。

我想，本次展览会上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留下的美妙的印象都会证明我的看法。

我到过杭州，看到过中国应用画家的精美作品。这里的作品是同样的风格。他们这些应用派画家一代一代地把现实主义方法传承下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约定俗成。

我想谈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1954年在中国提出来的，在两个地方——在杭州的华东科学院，在上海与程教授——谈到，中国的艺术家应当怎样向苏联的艺术家学习，他们应当怎样地领会我们的艺术。最初我以如下问题对他们的这个问题进行答复：我们应当怎样向你们学习？因为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艺术，喜欢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他说，我们

这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艺术，而你们的是全欧洲的艺术。这使我感到吃惊，我们也有民族艺术。

我的印象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中国同志们把这种最伟大的传统艺术混为某种偶然的、过去的、没有支撑的艺术，那我觉得就犯了大错。因此，对于我们的客人今天作的发言我很喜欢，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吸取的只是能够发展他们的民族艺术所需要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如下看法是所有在座各位的共识：中苏人民、中国艺术家和苏联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是兄弟般的深深的联系，它首先在于我们应当对艺术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中国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而深入的了解，而他们对苏联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的深入的了解。我还认为，我们相互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会更加喜欢对方，并从对方吸取好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苏中友好!(掌声)

焦朝河说：“苏中友好!”作为回应。(掌声)

.....

РГАЛИ, ф.2890, оп.1, д.396, л.3-4, 21-29

№25210 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7年5月17日)

摘自A.A.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20日

第714/TC号

机密

文本第29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陈楚 [75]

1957年5月17日

根据陈楚提出的要求接见了。

根据政府交给他的任务，陈楚转交了周恩来给H.A.布尔加宁同志的信，这封信要求商谈有关中国十二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本建议，这份规划已经由特别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出来了。同时，陈楚转交了有关该计划草案的说明，并补充说余下的有关该计划的建议将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为转达。他还表示在苏联专家对计划进行研究后，中国政府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向苏联派驻一个代表团，就以上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或让苏方派遣专家到中国。

我回复说会尽快转达信件和所附文件，同时也向他保证苏方会认真研究。

.....

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秘书处

A.葛罗米柯

1957年5月20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3, п.423, л.28-30

№20599-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0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0日

.....

南日说，他刚刚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各分组审议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进展情况。决定各分组工作5月21日结束，5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将听取各分组负责人关于所做工作的汇报。看来，这一天五年计划草案的审议将结束。常务委员会将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应如何修改完善五年计划，然后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协调，在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朝鲜将派代表到中国去。南日指出，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没得到中国政府的回音，尽管金日成在出访咸镜北道之前就接见了中国大使并请他转告中国政府希望接受他们的代表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接着，南日告知，打算在与中国政府协商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派一组负责干部到苏联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和协商。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46-47

№20599-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2日)

1957年5月31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2日

我径自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

我向他叙述了自己与金日成同志一起完成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之行的印象。我谈到了三年来在这两个道工业企业恢复中取得的成就，谈到了工人们由朝鲜劳动党12月中央全会和4月中央全会决议激发起的劳动热情。我提到朝鲜领导同志强调指出，恢复工业生产中成就的取得多亏了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的援助。我特别谈到了朝鲜领导人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的援助所说的感谢的话。

乔大使指出，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朝鲜人民的英勇劳动。工业生产的恢复主要靠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提供原料、某些设备、粮食、日用消费品。

我对大使关于朝鲜人民作为的话表示同意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现金援助不比苏联初期提供的援助少多少。

我继续谈了工业生产安排方面的某些缺点，特别是生产场地和工业设备没有充分利用，经济核算执行得很差。我还举了一些实例。

大使指出，我所说的意见与不久前到过朝鲜工厂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乔大使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150人。团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代表团于今年5月1日至20日在朝鲜各地访问。

谈话涉及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我对大使谈了这一问题讨论是如何组织的。乔大使问我，是否清楚投资于重工业和轻工

业、工业和农业的规模，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我回答说，目前具体数字还不清楚，希望在我们两家使馆获得这方面材料之后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

大使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后说，1957年5月6日金日成在与他谈话时请求中国政府于今年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我已转达，但回复尚未收到。

我还表示希望与大使见面并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我还非常希望听大使谈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重大举措的实际情况。

乔同志很爽快地同意对我谈谈整风运动的有关情况，但他实际上回避了回答我关于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的问题，他借口自己了解情况不多，他基本上只掌握报刊上公布的材料，他很少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见面，即使见，也只是与金昌满见面。

我邀请乔大使星期天去钓鱼。他表示感谢并同意。

乔大使邀请我一起前往开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表示感谢。去的时间以后另行商定。

会谈时武官M.П.库尔巴茨基和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会谈持续了两小时。

АВІРФ , ф.0102 , оп.13 , д.5 , л.48-51

№25211 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14日

第225号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 [76]

1957年5月22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通报了中国政府对大使馆提出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的答复(已电告中央)。

接着周恩来说，他受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些与整风运动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关的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最初，周恩来说，鉴于在一些兄弟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报道，他要澄清一些事实。他说，在某些报纸上甚至出现了“毛泽东报告实录”的报道。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2月28日 [77] 中国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面文件。然而，为了就所提及的问题开展相应的工作，这一报告的内容在党员和无党派群众中广泛作了口头的传达。在对这一报告进行描述的时候，出现过对其描述不准确和不正确的地方。周恩来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国外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的报道不准确、不正确。此外，资产阶级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有明显的歪曲。

周恩来向我通报说，现在毛泽东正在对他那次报告的记录进行修改，对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中共中央打算在其完成之后正式予以发表。周恩来表示，在报告发表前，其文本会及时传送给苏联大使馆。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现在在国内开展的关于民主党和无党派代表对共产党和政府机构的批评这一问题。他说，在这些言论中有许多是有益的和正确的，但也有不少反动的反党言论。他说，其中个别言论还是对苏联的攻击。周恩来对我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不会限制和禁止这些言论，相反，还要在报纸和广播中进行完整的报道。周恩来说，在这一问题上，党所追求的目的是：对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考验。

之后，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话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简短的评价。他说，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他们分为三类。超过100万的知识分子属于左翼，信仰马列主义并支持它。这一群体坚定地站在社会主

义的立场上。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或者说“右翼”有几十万人，他们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人在开展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的反动宣传。最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超过300万人)处于中间立场，也就是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他们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赞同社会主义，但是对马列主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他们认识不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分。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类知识分子是不牢靠的。

周恩来说，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和分类是基于知识分子各群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立场。他说，在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划分的依据是他们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态度。

然后周恩来谈到了关于解放后、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知识分子看法的发展问题。他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在这些具有尖锐的阶级性的运动中，他们都没有冒险地提出自己的特别的立场、进行批评和表达不满。而是相反。比如，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涨的时候，“他们同所有人一样，到街上敲锣打鼓，欢迎改造”，尽管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右派。

现在，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宣布，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随着在实践上采取措施解决内部矛盾，这些人“有了彻底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

接下来周恩来阐述了党在现在开展的这场意识形态运动中的策略计划。他说，可以预料，右派分子会在初期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尖锐的批评。周恩来说，在此之后，预计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和左派会广泛地发出自己的言论，他们除了对党和政府机构进行强烈批评以外，也会遭到“右派”的批评。

在最后阶段，共产党代表会大规模地发表看法。周恩来表示，到这个时候，将会发表中共领导干部对以往的争论进行总结、对批评意见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和发言。此外，他还说，所有正确和有益的言论都将会被接受，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和意见将会受到批评，并被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对那些敌对和反动的言论会被揭露出来。

对于这场运动的结果，周恩来说，我们将会成功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朋友和敌人的真正面目，表明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他说，另一方面，我们期待知识分子继续分化，继续孤立较右的、较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继续说，在这一运动中，持中间立场的广大知识分子将会受到极大的锻炼，会在思想斗争方面得到经验，他们会与左翼知识分子代表进行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右翼知识分子在被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孤立之后，也会逐渐得到改造。

周恩来指出，当然，对知识分子各类群体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会用很多时间。“不能指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在一两次运动后都完全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不仅仅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中共开展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使广大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的职员和学生等在思想上得到锻炼，教育他们。

周恩来接着说，解放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量得到了大量的增长。比如，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党员的数量增加了将近8倍，从150万人增加到了1200万人。在这一时期，共青团员的数量从19万人增加到了2200万人。周恩来指出，工人、国家机关职员、商业机关职员、大学生、教师和军人数量的增长大致也是这样。在1949年之前，这类人有1200万，而现在则有2600万，其中1600万人是青年。所有这些在人数上的重大变化都对相关组织的人员质量产生了影响，因为在人民政权成立之后的许多年，党、共青团和国家机关的人员补充主要依靠的是没有经历过革命锻炼、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生活经验不足的青年。因此，党的整风运动和在思想上采取的其他措施就像一所好学校。

接着周恩来说，在开展这样一个对党和政府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广泛运动的时候，中共中央自然会对所有导致采取这一措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仔细的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匈牙利事件绝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党和政府紧紧地控制并掌握着国家的形势。

周恩来接着说，同时，我们不能保证，在个别工厂、合作社、学校会发生个别的某种规模的骚乱，或者敌对的游行。一种情况是，对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行径进行的歪曲宣传会引发这样的骚乱和游行。

周恩来说，到时候我们“同群众一致，撤换官僚主义领导人并处理好事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游行只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另一种情况是，骚乱被反革命分子组织和挑拨起来。周恩来说，中国不会出现反革命分子发动起大量人民群众的情况。因此，这类骚乱只会具有局部的性质，只会有为数不多的人参与其中。通常可以利用分化骚乱参与者、孤立反革命分子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骚乱。

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响。较为反动的一些报纸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危机”的叫嚣，声称“中共不能处理好国内局势”。周恩来说，一些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代表则从这些措施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看到了它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会谈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谈到了关于把中国经验运用到兄弟国家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一个新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矛盾总是存在和发展的。这两种矛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中的一种矛盾会转化为另一种矛盾。周恩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要善于及时发现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他提出了如下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思想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周恩来指出，我们觉得，“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指出，《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一些表述。

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周恩来说，这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他说：“无论如何，方法都是不能照搬的。比如，我们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方针、借助其他的群众思想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方针的。”

周恩来说，在同兄弟党代表举行的会谈中，中共中央告诫了他们关于机械照搬中国经验的危险，告诫他们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研究这一经验。比如，就没有建议越南同志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匈牙利驻华大使谈论过，他说，匈牙利对反革命不断进行镇压的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没有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方面开展工作。在希罗基总理到华访问期间，他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应当以自己的、

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谈到了K.E.伏罗希洛夫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的访问。他说，这一访问对加强苏联和印尼的友谊、对亚洲的和平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说，苏加诺利用K.E.伏罗希洛夫对印尼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内局势，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就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简短地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指出，作为对日本社会党人关于签署“四国条约”的答复，他赞同签署有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多边集体安全条约。

在会谈中，我也向周恩来讲述了关于就改革工业管理和在苏联进行建设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讲述了关于我最近同一些大使进行的会谈。

在告别的时候，我对周恩来提供的有趣而详尽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东司的刘清宇，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以及二等秘书O.B.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п.423, д.5, л.27-33

№20599-3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3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3日

.....

南日告知，常务委员会审议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已结束。建议国家计委在5月底前进行必要修改并交给各省，以便他们能根据企业和工程项目情况做好修正。6月份党中央和政府的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到企业与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讨论五年计划草案。打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讨论计划草案。到底将在哪里讨论计划草案，尚未最后决定。

南日又一次提到至今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同意接待前往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朝鲜代表的回复。此时他说，他与中国大使乔晓光之间目前还没形成亲密的同志式关系。我与他很少见面。这是什么原因，甚至很难说。不好的方面，当然，是我不懂中文，因此直接交换意见有困难。然而，我的副手朴成哲懂中文。我已建议他常常邀请中国大使交谈，并与大使一起上我这儿。

我指出，我曾几次与中国大使见面，他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诚然，他不懂俄文，我不懂中文，我们交谈借助翻译，但我并没有得出他为人虚伪和封闭的印象。据我知道，乔晓光过去是党务工作者。

南日说，他与中国前大使关系很好，他与在停战谈判时经常见到的其他中国工作人员的关系也很好。他希望与乔晓光也会有好的关系。

АВІ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52-55

№20599-4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 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6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6日

根据原先的约定我与中国大使乔晓光同志一起去钓鱼。

在交谈中乔告诉我，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关于建议朝鲜政府针对美国违反停战协定并准备把新式武器包括热核武器运到南朝鲜一事提出抗议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授权他与南日会见并转交这些建议。乔补充说，现在重要的是，哪些内容纳入这份抗议以及公布的时间。他说，定于明天他与南日会见。

我对大使的告知表示感谢，并对公布抗议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大使关于朝鲜外务省声明内容方面必须谨慎对待的意见。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55-56

№20599-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 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9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9日

应约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同志。

会谈一开始乔大使告知，他在拜访南日时向他转交中国政府关于针对美国官方人士有关新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讲话及朝鲜外务省在报刊上发表声明的建议。乔援引南日的话说，声明将于今年5月30日发表。

我说，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我于5月28日向南日转交了类似建议。昨天与我谈话时南日告知，声明将过2—3天发表，因此，他们未必能在5月30日做成这件事。

谈起今年5月22日我们的会谈，乔说，他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政府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的请求发来的答复。答复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准备接待朝鲜政府代表团。但由于今年6月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团最好在明年7月来访，而不是请求中所说的6月初。

我告诉乔大使，在昨天与南日的谈话中他对我说，朝鲜政府决定于7月中旬派非正式代表团到苏联咨询五年计划编制工作。我提到，看来，鉴于朝鲜政府的上述答复南日说，先派代表团去苏联，然后派去中国。针对乔关于代表团的组成以及计划在苏联待多久的问题我回答说：据我们所知，率领代表团的将是金一和国家计委委员长李钟玉。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国家计委和其他部门的8人。代表团在苏联待多久没有谈起。

然后，乔根据我先提出过的要求谈了目前在中国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

我对乔内容充实和有意思的通报表示感谢。

谈到昨天我与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的谈话我说，波兰大使告知，美国企图6月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我问乔大使这方面知道些什么。

乔回答说，以前就知道美国企图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以便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合法化，重新审议这一问题的数量方面。过去不知道美国要提出这一问题。

乔还谈到了南日在与他谈话中讲了对待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大使转述的南日所讲内容与南日亲自对我讲的内容完全一致。参见5月28日谈话记录)。

我讲了自己对该问题的想法，正如我对南日所讲的。

乔完全同意拒绝讨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问题的意见。

会谈持续了2小时30分。会谈时M.П.库爾巴茨基、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62-69

№20764 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1957年5月31日)

关于组织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备忘录

1957年5月31日

今年1月份，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我们通报说，为了就各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需要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关于这一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对此你们持积极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的条件是，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应当随后再谈。 [78]

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同意兄弟党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并且希望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意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是否认为，举行这样会谈的必要条件现在已经成熟。 [79]

苏共中央认为，如果与会兄弟党代表都同意的话，可以在黑海沿岸地区——苏联、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举行这样的会谈。

如果愿意在苏联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可以把会谈的地点选择在克里米亚。会谈应该秘密地进行。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原则上同意参加这一会谈，那么，很想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关于会谈时间问题上的意见。

至于会议的日程问题，我们认为，就会谈时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事先确定一个范围，以便与会代表就地解决交换意见的性质、内容和方式问题。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26, л.27

№16686-1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1957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作家B.波列伏依1956年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致信苏共中央。信中对在苏中文化、科学以及苏中其他联系的实践中所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并据此提出了某些建议。1957年初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也向苏共中央寄送了类似信件。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的科学部、学校部、文化部、行政机关于都研究了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信件，并根据信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采取了措施。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批评和建议，大部分是正确的。

为了改进苏中文化联系，1957年初在北京签订了包括广泛领域问题的协议，规定继续巩固同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合作。比如苏联文化部准备实施一系列措施，扩大中国科学、艺术和其他文献的出版。准备出版通俗文库“新中国”、中国诗选、画册《中国民间艺术》等。今年将出版中国作曲家作品集，并把中国音乐和歌曲列入音乐会节目。在电影艺术领域，除了业已建立的苏中电影活动家创作合作外，将出版献给苏中友谊

的电影杂志月刊，计划创作关于中国的科学认识电影，采取措施改进在苏联中国电影联欢节的组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给苏联博物馆2500多种艺术制品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回报，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有些艺术作品转交给中国。

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莫斯科和北京协调出版苏联和中国所出版文献的图书目录手册，这些文献可相互被推荐来翻译出版。这种类型的手册，在苏联由科学院基础图书馆、苏联作家联合会外国部、外国文学出版社等出版。

关于互换艺术文献图书目录手册，委托苏联联合会同中国作家协会谈判，并实施该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指出了在接待和照应访苏中国代表团方面的一系列缺点。特别是，这涉及代表团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见。

目前，这种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按部、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组织渠道来访的代表团，通常可以同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会见。

波列伏依同志的见闻录指出，当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时，苏联并没有类似的同中国的友好协会，这不符合苏中之间确立的兄弟关系，引起中国朋友的不满。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关于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类似建议，交给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苏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于今年3月4日通过决议，责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研究和向中央提出关于在苏联建立同一系列外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友好协会或部门的建议。目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准备了自己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在见闻录中提出了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是否合适的问题，它类似于在北京由中苏友好协会做的那样。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外国文化交流委员会准备了这个问题，并于最近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关于改善在华苏联专家教育工作的問題，提到苏联专家享有太多的特权，而其中有的滥用中国的好客。在中国实行勤俭节约的条件下，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甚至和中国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相比具有太大的反差。

波列伏依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考虑到了苏联大使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建议。1957年1月11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报酬的决议。关于改善在国外苏联专家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工作，苏共中央外交和外贸机构干部于今年4月召开了国外苏共党组织、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克服该项工作中缺点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注意到了莫斯科北京航线上旅客服务方面的缺点以及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其他城市里飞机场很差的文化装饰。

因此，民航管理总局副局长热伏龙科夫同志亲自来到了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检查和克服缺点。根据今年2月6日管理总局的命令，准备就改善苏联国际航线工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此外，同苏共州委书记商谈消除波列伏依同志信件中指出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存在缺点的必要性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苏共友谊，应在苏联以某种形式普及在华首批苏联顾问的名字，如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以及20年代同孙中山合作的其他人。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特别措施。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1956年，苏联报刊首次刊登了孙中山和越飞的通信。在中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苏联和中国报刊都发表了孙中山政府及原军事顾问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位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去了中国。这样的实践，今后也可能被认为是合适的。

关于根据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所采取的措施，已告知他们本人。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В.基里林(签名)

В.留里科夫(签名)

В.佐洛图欣(签名)

1957年6月1日

第15Д144号

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6, д.506, л.101-104

№20600-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 朝鲜的问题(1957年6月4日)

1957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3—18日

第144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6月4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告知，朝鲜政府同意关于今年12月召开人民民主国家对外联络部长会议的建议。

南日接着说，今天中国大使乔晓光来访并转告说，周恩来同意南日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中立国委员会提出修改协定第十三条，即南朝鲜运进新武器问题，应当坚决反对修改。金日成也是持有这一意见。他接着说，有一项建议：今年6月下半月在朝鲜外务省召开有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委员会的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朝鲜的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在该会议上将通报朝鲜政府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会议目的——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我问南日，对即将召开的第12届联合国大会外务省是否已有拟定好的建议。

南日回答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难道只能，他带有很大保留地说，提出单方面撤军问题(我的理解是，他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

我谈了以下意见：这样的建议，依我看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现在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军队人数几乎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出将使局势朝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补充征召人员入伍并增加军费开支。然而，朝鲜的经济状况，我认为不允许这样做。

南日对我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并补充说，谈到撤军他指的是，撤出的部分军队将部署在中朝边境，一旦有情况能迅速出手援助。他继续补充说，他提出这一问题不敢说一定有把握，这一问题没有在任何场合讨论过。

通过交谈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推测)：

朝鲜朋友希望的是，部分中国军队撤出并部署在中国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

谈到最高人民会议选举的准备工作时，触及到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

南日说，金日成希望自己仍保留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职务，目前令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不安的是首相问题，尽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这一问题尚未讨论过。问题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为什么？

曾打算让崔庸健担任这一职务。为了这一目的把他实际安排为第一副首相和朝鲜劳动党第一副主席。为了这一目的金日成放弃了内阁的职务。然而，实际情况表明，崔庸健担任首相职务不合适：工作较差，没有干劲，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不努力争取更好地了解。虽然担任民族保卫相的职务，但军事工作也没有好好搞，全部工作由总参谋长金光侠(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担任。首相人选可以提出其他更合适的人。但问题在于崔庸健已知道准备给他什么职务。他是一个贪

权和爱记仇的人。他会用庸俗的、蛊惑性的手段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方。因此担心，南日继续说，任命其他人为首相会引起崔庸健的激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党内非常复杂的局面。

谈到首相的可能人选，南日提到了金一。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16-117

№24936 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1957年6月5日)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被派往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以便了解中国的生活，为作讲座和报告做准备。

由于我受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邀请，因此我成了该局的客人。马列主义研究所同该编译局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研究所曾向其提供了自己的出版物、参考文献，并同他们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进行过磋商。1955年，编译局副局长曾到马列主义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以便熟悉组织工作。最近两年有三名研究院的专家到编译局工作，现在编译局仍有一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且我们现在收到了再派遣两名工作人员的请求，要求一名在编译局工作两年，另一名工作一年。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编译局的工作人员巨大的帮助。

附属于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其中有300多名工作人员。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已经出版的有：3卷《列宁选集》(第四版)，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11卷《斯大林选集》。编译局还把马列主义研究所出版的其他一些文献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列宁的《论重工业发展和国家电气化》、《论苏联国家机关工作》、《回忆列宁》、《苏联共产党决议》(第三卷)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译局计划改组为研究院，其任务类似于附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

我曾向编译局的工作人员作了两场报告：关于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列宁全集的报告，也向北京高级党校的教师们就苏共党史问题作过报告，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会议上作过报告，为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作过报告。

在中国期间，除了到过北京，我到过的城市还有：广东、武汉、上海和杭州。众所周知，广东和上海曾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发源地。我们访问了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现在该校成了博物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曾为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纪念馆以及其他的历史名胜。

在北京，我了解了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党史文献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社，排字的困难令我们吃惊，排字工人不得不处理大量的文字符号，并且需要非常了解它们的位置，以便迅速找到需要的字符。尽管如此复杂，排字工人排字的速度很快，而且也很准确。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一个生产电子仪器的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工厂。该厂以前的主人现在是该厂的工程师。在同他和现在的共产党员厂长进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该厂前主人现在工作得很好，忠实于人民政权，在工作中同共产党人友好相处，参加了对资本家进行改造的学校的学习。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块钱，是共产党员厂长工资的两倍多。此外，他还可以从自己被估算的数百万元的资本投资中每年获取5%的红利。上海的这个电子仪表厂看起来是其他工厂及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授进行了会谈(1949年他到过研究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进行了会谈。会谈中谈到了关于党的教育的组织问题，关于学院的培养问题，关于编译局的工作，关于文字的改革，关于党的工作作风的整顿，等等。

会谈中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针的实施并没有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唯心主义的信奉者在高校中讲授唯心主义哲学，结果是，没有发现唯心主义的信奉者、没有发现希望上唯心主义课程的人。北京大学讲授了关于凯恩斯经济观点的课程，但是上课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因此，宣布这一方针不会导致高校中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的“毒花”的增长。中国同志说，北京大学将会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但上这些课的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他们说，希望要求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来授课，但能否邀请到，现在或许还很难说。

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这一方针将导致文艺、戏剧和出版领域的极大活跃。

关于党内生活，苏联现在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中国正在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大规模工作，并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各级党组织都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短暂的在中国访问期间，通过同中国同志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进行的谈话得到的印象以及一些观察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活，这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根据报纸公布的材料，最近4年，在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33.5%。从1950年到1956年，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157%，诸如棉布、胶鞋、盐这样的农用商品的销售增加了2—3倍甚至更多倍，而煤油的销售增加了12倍。

无论到了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热爱劳动的人民，他们是纯朴的、诚实的。无论到哪个地方，苏联人都会受到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Г.奥比奇金

1957年6月5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28, л.95-98

№1180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 党务代表团(1957年6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1956年的年度报告中，建议派出由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作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和党务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建设领域以及组织开展群众性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提出了许多有特色和独到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工作中一系列好的方面，尤其是第八次党的代

表大会之后，在党务建设工作方面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向苏联派出自己的党务代表团，学习苏联共产党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而苏共党的代表团前往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等等。在我们看来，苏共代表团前往中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肯定会受到中国朋友的热烈欢迎。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大使馆的建议，在今年派出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按照互相轮流的方式，可以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务代表团前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此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适宜的。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7年6月7日

第15-Д-207号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制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般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 ф.5, оп.49, д.41, р.8862, л.16-17

№20600-2 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6月11日)

1957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3—18日

第144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6月11日

南日邀请我以及中国、捷克和波兰大使到外务省，并说了以下内容：

众所周知，去年美国人单方面中断中立国停战委员会的工作，把该委员会的代表撵出南朝鲜。目前，美国人在散布北朝鲜破坏停战协定的挑拨性谣言的掩护下把武器运进南朝鲜。

有种推测，美国人7月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或中立国委员会里提出修改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目的是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合法化”，而且可能单方面宣布这件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对中立国委员会的瑞典和瑞士代表施加压力。

鉴于此，建议于6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非正式召开中立国停战委员

会的波兰和捷克代表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和朝鲜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大使的会议。

会议宗旨：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中国大使乔晓光、捷克大使苏利纳·米库拉什和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完全支持南日关于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

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美国人煽动的挑衅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千方百计把非法运新武器进入南朝鲜伪装起来，不是保持持久和平，而是破坏朝鲜停战，这一切是为了使美国人继续实际占领南朝鲜。必须大力揭露美方宣传的这类阴谋，揭露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和实际行动，不允许修改协定第十三条。我认为6月17日在外务省召开会议是适宜的。至于苏联大使参加会议问题，我另行告知。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24-125

№25212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1957年6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7年6月11日

第645/ДВ号

苏中关系 [\[80\]](#)

.....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之间建立在交换意见基础上的信任和相互理解仍然得到了极大加强。中共中央和党内领导干部谈及苏联、苏联机构以及苏联驻华专家时，能坦率地提出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在早些时候是很少或者通过很隐晦的方式提出的。

此外，中方就(赫鲁晓夫)评估斯大林角色的演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中国朋友的批评指出，在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以及双

边的党际关系等问题上，苏联方面往往没有与中国进行事先协商。

苏联和中国之间就经济或其他问题展开的磋商，常常因苏方的失误而延期。这一事实在中国并非没有被注意到。李富春副总理就因苏方负责经济谈判工作的部门在准备工作方面做得很糟糕而在莫斯科滞留了几个月。

在反对在中国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科学和艺术发展新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报纸越来越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作家的个人立场，批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举例来说，1957年1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直接批评了日丹诺夫同志有关哲学史的言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国报纸对苏联电影展开了批判性分析，这在当时的苏联电影节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些中国文章中指出了苏联电影的消极面。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举办电影节的时候，苏联报纸也批判性地评价了中国的电影。

在那些只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传阅的内部资料中，越来越多地刊登了生活在苏联的中国记者和学生提供的消息，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报刊的关于苏联国内某些负面情况的报道。尤其是，最近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就不同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关于劳动收入问题的争论，关于苏联不同地区广泛存在的混乱的思想情绪以及一些在海外的苏联公民的不当行为等方面的材料非常多，而在过去中国朋友并不关注一些在华苏联公民的错误行为，以及相关苏联机构领导人所犯的个人错误。

正如他们向大使反映的那样，中国朋友毫无疑问是从良好的动机出发，以同志的身份去批评我们的各种问题，除了个别非正常的会干扰巩固我们之间友谊的因素。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远东司三等秘书

Ф.莫丘利斯基

No09981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1957年7月3日)

摘自阿布拉希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9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会谈纪要

1957年7月3日

1957年7月3日，我拜访了邓小平。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向他递交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有关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问题的决议以及苏共中央致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信的全文。

在随后的交谈中，邓小平谈到了中国国内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据估计，这场斗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有力量在两三天内就把右派分子压垮，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做。将给右派分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说完想要说的话，因为这样能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上一堂很好的课。

通过暴露真面目，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教育广大群众和中间分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鼓励，他们是不敢开火和这么大规模地干的。邓小平特别指出，右派分子像一条从地里钻出来的蛇，察觉到危险以后想钻回去，但是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尾巴。

反右斗争已经展开。这场斗争积极的一面是使干部们有机会积累经验，得到锻炼。有些党员干部不敢让右派分子有充分自由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可是经验表明，哪里的右派分子有充分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哪里的反右派斗争就进行得比较成功。在那些地方，斗争的对象暴露了，反击的目标显露出来了。在那些地方，群众看清楚了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露骨敌视，在开展斗争的时候就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在有些单位和组织，右派分子没有机会讲话，他们的真面目也就没有得到暴露。有些地方甚至邀请别的地方的“右派分子”来讲话。在这样的单位，斗争成了无的放矢，达不到目的。

这场运动的缺点是，不是所有的党组织都能在必要时充分地讲清楚中共中央为这场斗争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中央避免管得很细或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而是想让党组织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来体会中央的策略，深入地理解执行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好处。

邓小平还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冷静来忍受右派分子在口头上和通过报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一连串攻击。

另外，邓小平说，这场运动开展得不平衡。有些地方反击得太早，敌人隐蔽起来了。但是迟迟不动是不能原谅的。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给予打击。当然，让右派分子再多讲十天也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说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已经暴露自己，群众对他们的观点已经了解。邓小平说：“大鱼已经在网里了。”

我说，周恩来同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而且也是党给予右派分子第一次有力的打击。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补充说，人民群众正是这么理解周的报告的。右派分子也清楚地看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报告的这一内容。

我问，右派分子在全部进攻都崩溃以后，现在表现如何。

邓小平回答说，他们现在想隐蔽起来，但是他们办不到。右派分子之间已经开始争吵和分裂。在上海，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谴责右派头目，说他们反动透顶。有些右派分子已经投降，其余的人还在继续顽抗。

中国共产党不但不镇压这种顽抗，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支持它。右派分子正在彻底地撕掉自己脸上的假面具，在此基础上将能够给群众上一堂很好的课。章乃器等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在继续顽抗。中国共产党认为，即使他们负隅顽抗一年，党也要在整个一年中向他们做艰苦的解释工作。

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也将执行同样的政策。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将留在高校内，其中的有些人在毕业后还可以留在各自的高校内当教员。例如，甚至给他们机会每3个月讲一次他们的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学生中间通过直观教学来开展教育工作。对高等院校的教师也照此办理。

我问右派分子大约在大学生中占多大百分比，邓小平回答说，右派

分子在大学生中平均只占1%，还有更多的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受了蛊惑人心的右派分子的欺骗，但是目前他们正再次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某些高等院校，右派分子的百分比要高些。例如，北京大学是3%，有些高校则高达10%。

在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提到，今年的农业收成前景良好，但是7月底和8月初常发生水灾。

在中国，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了三次严重水灾，每次大约有4000万人受灾，去年有7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

在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向他谈了将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的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谈话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阿布拉希莫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п.424, д.8

№20601-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1957年7月5日)

1957年7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19日至7月8日

第157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5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

在交谈中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反党小集团在8月(1956年)中央全会被揭露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党内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南日没有举出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我从内务省的苏联顾问专家处得知，对集团头目进行了侦察跟踪，但没有查到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

在8月中央全会上，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对反党集团的行为很愤怒，并一致谴责他们反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的活动。我们在A.И.米高扬同志(代表苏共)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共)的参与下又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

谈到这里我对南日说：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党集团参与者及其追随者发了好几次言，给了他们知无不言的机会。苏共中央全会参加者在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之后，一致谴责集团的反党活动。(60人发了言，其他人递交了书面声明。)决定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莫洛托夫)。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南日所说的集团中的任何人发言，开除几个人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前也没有听取他们中任何人的意见。因此，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就来了。众所周知，他们并没有判定一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想提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着重指出代表们粗暴地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

南日表示同意，但他力图辩解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参加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发言一开始就进行的诽谤性攻击所激怒(发言半途被中止)。

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并提醒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场时)以及金日成与我于今年4月9日谈话时都承认他们做得不对，违反了党内生活的列宁准则。

南日问我是否已把朝鲜内阁首相人选问题的现状向苏共中央领导通报。

我回答说，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做，因为全会之后我马上回到这儿，为的是尽快把全会决定向金日成同志通报。南日再一次重复说，如果任命崔庸健为首相是很危险的，他会在朝鲜的内外政策上犯许多错误。

我问南日，金日成是什么意思。

南日回答如下：

在最近一次谈话中金日成说，他将找崔庸健谈一谈，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担任党的工作。然而，他(南日)持反对意见并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金日成仍担任首相，同时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以便主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为了领导全部工作设立朝鲜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金一为第一书记，2—3年以后选金一为首相。根据南日的话金日成说，他将考虑这一建议。

南日说，大量军事干部积极支持崔庸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战争期间反对采用苏联军事战术，他(南日)当时担任总参谋长曾经与这些人展开斗争。他特别提到原朝鲜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朴一禹。谈到此我问，朴一禹目前处境如何。

南日回答说，朴一禹释放以后现住在家里。(的确如此，朴一禹与家里人一起住在郊外，受到保护。对他的审讯已停止。)放他到中国的问题已解决。领导层委托金一在他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中国时，试探一下中国朋友现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国一事。如果意见没有变化，那就允许朴一禹前往中国。

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签名)

АВН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38-141

№138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 (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米高扬、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柯西金、波斯佩洛夫。

1.米高扬同志中国之行的情况通报。 [81]

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体会议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最初他们说：开除出中央是徒劳的(反对采取尖锐的措施)。

赞成米高扬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认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提交了情况报告——中国还欠我们多少债，都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收到了什么。 [82]

(委托柯西金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研究这个问题。)

2.关于国防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83]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把别尔乌辛同志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 [84]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没有这个必要。)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7, л.59-59об

№218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 报告(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的决议 [85]

绝密

1.我们认为，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国并向中国朋友通报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相关决议是有益而必要的。

同意米高扬同志在访问期间所做的工作。

2.责成米高扬和柯西金等同志研究中国对苏联所欠债务问题，并就该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34, л.1

№20602-1 普扎诺夫与朴义琬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1957年7月12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12日

我与朴义琬同志一起视察了位于索普河(Сопхо)的苏联大使馆官邸地块(为了进行水上勘察设计工作)之后，在我的官邸午餐时与他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朴义琬讲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近期工作情况，并涉及一些其他问题。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朴义琬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更多遵循集体原则。定期召开会议，更积极开展问题讨论和交换意见。在会议过程中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观点的，除了金日

成，还有总参谋长金光侠、他(朴义琬)以及其他人员。但是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朴金喆、金昌满、朴正爱、郑一龙)按惯例，没有充分讨论，各方面都支持金日成的建议。而金科奉和崔庸健多数情况下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保持沉默。

然而，不久前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研究犯有巨额盗用公款的朝鲜文化省事态问题时，崔庸健发言激烈，提出逮捕文化相的建议。常务委员会没有同意这么极端的建议。

几天前常务委员会在谈论朴一禹问题时崔庸健也发了言。他继续坚持不放朴一禹到中国，而这一点先前已作出决定，因为按他的意见，这样会壮大跑到那儿去的朝鲜干部的反党集团。金日成对改变先前已作出的决定表示反对。他说，关于朴一禹问题的决定不能再拖延了。必须或者给他在朝鲜安排适当的工作，或者同意他到中国去。金日成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将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士，因此，不用担心朴一禹到中国去。已经委托3位常务委员会委员再与朴一禹谈话，弄清他的最终愿望并据此决定问题的处理办法。

朴义琬接着又告诉我，1个半月至2个月之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将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任命为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取代逃往中国的徐辉)。同时，讨论了中央组织部起草的文件，文件中对徐辉的反党活动给予了评价并特别提到他对苏联籍朝鲜人的挑拨离间活动。

就此问题(朴义琬)发了言，在肯定对徐辉活动评价正确性之后指出，徐辉反对苏联籍朝鲜人运动中的助手是韩相斗，正是他在那个时期提出了全部苏联籍朝鲜人的“黑”名单。因此他(朴义琬)建议把韩相斗的这一错误立场写入上述文件。常务委员会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我问，我认为金日成目前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态度是真诚和友好的看法是否正确？朴义琬作了如下回答：

金日成真诚和深信不疑地支持苏共中央的政策和苏联政府采取的措施。他现在给予苏联大使馆很好的评价。至于反对苏联籍朝鲜人的运动(1955—1956年)，依我看，朴义琬说，金日成完全清楚中央在那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但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点，也不认为可能通过为我们恢复

名誉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朴义琬强调说。

在交谈过程中我问朴义琬，在他看来，朝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朴义琬回答说，朝中关系的许多困难与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的错误行为有关。他不与朝鲜干部进行任何交谈和联系。甚至精通中文的金昌满，朴义琬补充说，要与乔晓光搞好关系的努力毫无效果，并认为他在调整好朝中关系方面是不称职的大使。

我对朴义琬说，对乔晓光下这样的结论是不能同意的。我们对他形成了良好的印象。可能他在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还缺乏经验，但这件事需要双方坚持不懈和友好的工作。

朴义琬对朝鲜内阁首相人选这一目前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候选人崔庸健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他能力差，不懂得也不想学习经济和国内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大多数领导干部中没有威信。朴义琬补充说，崔庸健过去曾带头反对苏联籍朝鲜人。

随后，朴义琬谈到了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对待经济问题顾问马卡罗夫同志的要求的错误态度。李钟玉拒绝给马卡罗夫同志提供关于基本建设物资平衡和分单位制成的总预算表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根据朝鲜朋友的要求，给他们在朝鲜五年计划草案方面提供咨询所必需的。在朴义琬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向金日成作了汇报，金日成吩咐立即提供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所需要的五年计划草案方面的资料。同时，金日成对李钟玉指出其错误行为，并说任何必要的材料都应当提供给苏联。

接着，朴义琬讲了他两个月前主动找朝鲜劳动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金昌满谈话的情况。朴义琬问，为什么金昌满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他(朴义琬)不怀好意，甚至敌对。金昌满回答说，他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朴义琬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朝鲜期间的表现不满，当时朴义琬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但是现在金昌满认为他与朴义琬的关系是正常的。

我问朴义琬，他如何评价相互关系，他回答说，确实他与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关系已有改善。近几个月金日成多次找他谈话，给他讲一些问题，对朴义琬有关的工作指出建议。

随后，谈到朴正爱，朴义琬指出，她在中央和常务委员会的地位和威信近来也都有提高。

朴义琬最后讲了他与南日的谈话，谈话是关于金承化(原建设相，目前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学习)。朴义琬建议南日把金承化从莫斯科召回，并当面弄清对他的指责。南日不同意。朴义琬说，对他有点新意的是南日认为金承化不愿意回到朝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会产生他过去与苏联大使馆不正常关系的问题，而这是不允许的。至于什么关系，朴义琬不能说。

大使馆参赞佩里申科谈话时在座。

АВІ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47-151

№20602-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1957年7月16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16日

根据原先的商定我接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他进行了交谈。

应大使的要求我对他谈了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

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衷心感谢和个人赞同全会决定，还讲了我们已知的中共中央的态度以及《人民日报》已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

大使同意我所说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历史形成的苏联与中国、苏共与中共的友谊与团结的重要性。

随后，乔问起金一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何时从莫斯科回来。大使补充说，代表团回来后将前往中国，他将陪同前往。

我回答说，计划今年7月20日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咨询工作。我估计代表团可能将于本月底回来。

谈话时担任翻译的是大使馆随员M.П.库尔巴茨基。

АВ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51-152

№20602-4 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1957年7月29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29日

我和朴正爱一起回到了平壤。在交谈中她谈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关于内阁领导。让崔庸健担任内阁首相，这是1956年金日成曾经提出的，已完全不可能。据她说，金日成自己也深信这一点。待在别墅期间金日成曾与朴正爱商量，是否从本地朝鲜人干部中推荐首相人选，当时提到了财政相李周渊。

朴正爱说，我当时就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并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一段时间内金日成继续兼任内阁首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

第二，崔庸健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金一担任内阁首相，而金日成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

据她说，金日成表示要好好考虑这一建议。

朴正爱说，崔庸健对这一职务会满意的，对于他将不担任首相，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至于金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修养和做事认真的干部，长期和金日成一起工作，金日成很了解他。金一在工作中与各阶层干部和劳动群众保持广泛联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人商量，能认真听取意见并执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指示。因此，金一是首相最合适、最好的人选。朴正爱指出，同意这个建议的有金昌满、南日、金光侠，她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其他委员也会同意的。

至于金科奉，朴正爱说，不要再让他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了：他工作没有任何积极性，年龄也大了(68岁)，做出了违反党性的事，具体如下：

战争期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他提出尖锐批评(鉴于丢失苏联制造的勋章以及常委会工作的缺点)之后，他在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会议上当着党外人士的面宣称，政治委员会不把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放在眼里，不让它有独立性，他还说，如果不是战争时期，他会辞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之后，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本应讨论撤消一些反党集团成员担任的领导干部职务问题，金科奉借口已订好火车票要去休假，就在常委会开会时离开了。其实他早有预谋，并根本不想讨论解除这些反党集团成员所担任的职务，因为他同情他们并支持他们。

随后，朴正爱说，金光侠(总参谋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民族保卫相，南日担任副首相和外务相是相宜的。

她对内务相方学世工作的评价很高并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上应当把他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关于一些省(部)的合并。朴正爱告知，已通过决定要合并文化和教育省(部)，建材省与建设省，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最后一个省的名称尚未确定。

我指出，合并文化与教育省、建材省与建设省显然是合理的，至于把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合并为一个省，我不完全理解，怎么可以把很少有共性的两个省合并在一起。

朴正爱也没有讲出什么想法和根据。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朝鲜军民的态度。我问朴正爱，应如何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什么误会或相互有自以为是的行为。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待朝鲜居民的态度，朴正爱对此的反应良好。诚然，初期有过傲慢的情况：“我们来自大国，你们是小国，因此，我们可以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些坚决被制止。有几个人由于错误对待朝鲜居民甚至被枪决，尽管我们请求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现在一切正常，个别小事忽略不计，这类事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朝鲜人民军战士也犯。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59-162

№08851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1957年7月31日)

1954年苏联内务部消防队工作人员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朋友们现在表示，愿访问苏联以便学习我国的消防经验。

苏联内务部请求允许邀请中国消防队工作人员代表团来苏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1957年9—10月期间)，这是考虑到中国代表团出席华沙国际消防委员会代表大会后，将于今年9月20日返回。

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的费用可由苏联内务部预算报销。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0885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1957年8月7日)

作为1956年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领导人曾请求如有可能邀请他们来苏联参加一次本土防空演习。

由于1957年8月下半月将同苏联国防部一起举行苏联本土防空演习，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允许6—8名中国同志参加这次演习，在演习过程中给他们介绍参加演习的各加盟共和国、州和区指挥所的战斗编组工作。

请求苏共中央对上述内容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91, л.349

№25213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1957年8月8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0日

第1596/TC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86\]](#)

1957年8月8日

我在刘晓的要求下会见了她。

.....

2.刘晓奉其政府之命，询问苏方是否有可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使得两个即将建造的回旋加速器的其中之一具有2500万伏特的能量，苏方是

否可能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文件，并在1958年上半年接待一个由5—6人组成的小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刘晓强调该请求是非正式的，还要取决于苏方的具体情况，并在双方协调沟通的基础上予以确定。

我回答说我会将他的请求转达给相关部门。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 д.3, п.423, л.37-38

№24937 《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1957年8月9日)

《真理报》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来自中国材料的内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指示——引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反响。就其性质来说，这些信件可以被分为如下三类：来信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些指示在我国也可以实行；来信者建议我国报纸对中国开展的这些活动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评论；来信者在信中反映了中国开展的这一运动的一些问题。

按这些类型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汇编。

Е.И.热尔瓦科夫(莫斯科州昆采沃区、马兹罗沃村、什科内利街、12号，信件编号116758)，写信者是第п/я222号工厂的一名铣工，他请求把他的信转交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我在《真理报》上看到了您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以前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实在是太好了。显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应该尽快贯彻一切宝贵的、有益的东西，同时尽快消除我们阵营中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真诚地祝愿您——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领袖健康长寿，为亿万中国人民谋福利，并且保持世界和平！再次请求您向中国人民转达我亲切的问候，祝愿他们万事顺利。”

Н.И.莫金，苏共党员(阿尔汉格尔斯科市，卡尔·马克思大街28栋6号，信件编号100557/2)，他在信中写道：“《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指示令人非常激动。这一指示非常英明，又很实在。读起来令人兴奋，这一指示非常有力，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人民的智慧。把所有这些指示都贯彻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十月革命之后，我没有看到苏共州执行委员会、州委、市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阿尔汉格尔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Н.А.拉奇科夫同志、州执委会副主席Н.П.叶多文同志、И.П.阿拉贝谢夫同志、Н.Н.谢德利切夫同志一刻也没有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这些人认为，同自己的同事一起工作是可耻的。好似那样做会损害他们的尊严。”

И.库季诺夫是一名苏共党员(塔什干州，俄罗斯奇尼阿兹村，信件编号97921/101)，他在信中写道：“当在《真理报》上读到关于中国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时候，非常高兴。中国同志们开始在思想上完善自己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下达该指示的重要性是显然的。这一指示将使党和人民群众相接近，这将使共产党更有力量、能力和威信。体力劳动将使人们更加健康和理智，并能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类似的消极现象。列宁尽管非常繁忙，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中国的同志们走的是列宁的道路。我们中间就有个别同志整天躲在办公室中，埋头于大量的文件材料，而不了解集体劳动的重要性，害怕走入集体，害怕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所产生的问题达到的程度是，生活在距企业100—200米的厂长，还乘坐汽车上班。到田野的生产队的时候，这样的领导人不能走向田野的深处，以便检查土壤的质量。只是向远处张望一下就走开了。这些同志没有感觉到，工人们和农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并且认为这样很正常。更糟的情况是，有一些同志非常狂妄，认为自己比自己所有的下属都高一头。”

А.И.柯林(古比雪夫市，信件编号99825/51)在信中写道：“应该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产生的最初年代，列宁就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从中不难发现现在中国推行的整顿领导作风的活动的相似性。列宁在其最后的信件中指出，必须显著提高苏共中央委员的素质，依靠的方法是使那些值得信任、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层工人干部进入中央。由于一些原因，首先是由于个人崇拜阻碍了列宁指示的实行和进一步推广。从苏共中央相关的决议中的共同的说法来说，这些原因及其后果没

有被好好地反思。在这些原因中比较明确的有两点：第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状况恶化了；第二，人为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农民分割开来。事实上，在苏联政权存在的40多年内，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挑选出来各种各样的人，尽管他们较有才华、能力，有一些特别的和独特的能力等。数百万或多或少对非工人的专业领域和非农民的领域的工作表现出能力的工人和农民被发掘了出来，他们在经过训练后被派往了国家机关、党的机构、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军队、文化组织、创作机构以及其他的许多组织，这样，他们就不再是工人和农民了。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同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失去了日常上密切的联系，这首先阻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和文化发展。

那些曾是工人和农民而现在成为苏联知识分子的数百万领导干部的工作也不会更加顺利。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忘记了体力劳动，这不仅对知识分子的外部面貌，而且对他们的内部面貌都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结果，知识分子的一些消极的社会陋习就不断蔓延，比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自高自大的老爷派头、功利主义、受贿、教条主义、无原则性、政治消极、创作无力以及其他一些微小但具有社会危害的缺点。正如所看到的，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相脱离对一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脱离在工作的时候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我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是：即使是在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领导同志把双手插在口袋中，下达所谓的领导的指示，并且认为同普通的同志一起工作一会，哪怕是工作2个小时也是很可耻的。这种对体力劳动的忽视将会导致个人的身体素质和道德的改变。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数百万优秀儿女们应该改变他们所犯的、对他们的阶级产生危害的错误，也就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关于这种回归的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来了，这就是：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

德列穆奇，苏共党员(莫斯科，斯塔罗皮缅诺夫斯基街区13栋21号，信件编号103248/0)，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看到描述列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图画的时候，普通人的心情都会特别高兴，正是这些普通人改造着整个世界。我国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教育新一代，消除老爷习气、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件编号第106367/87号，(斯塔夫罗波尔区)，该信的作者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共中央开展整

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如果检验一下我们对区级和州级干部工作的态度，那么就会经常发现，其中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事实上对人民的生活了解得很差。其中的许多干部曾是党内优秀的同志，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早就不工作了，而是处处由专家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准备报告。比如，如果到斯塔夫罗波尔区执委会副主席洛尼斯同志那里检查收割庄稼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一定会随身带上一名农业专家和工程师。是时候把那些长期以来占据要职但什么也不做，并丧失了列宁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从他们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使他们同普通人和工人接近。”

A.戈林(斯捷尔利塔马克市，共青团街98栋，信件编号102077/7)在信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该文引起了人们非常大的兴趣。该文谈论了关于怎样深入而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活动是非常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在我国开展这一运动也非常有益。”

П.П.加夫留克(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信件编号195867/10)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首倡是明智的、富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应该学习和贯彻。尽管我国的国家管理机构经常缩减，但现在仍然非常庞大，它脱离了许多人物物质财富的生产。巴拉诺维切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以及苏联其他许多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急需工人，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播种、栽种蔬菜、施有机化肥、除草、购买种子、收割等等)。特别是在城市周围的那些农庄，由于许多村民都到了城里从事生产工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州机构和加盟共和国机构的工作，那么就会得出结论，机关干部可以利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建筑业和工业企业的工作。”

P.达夫利亚托夫(塔什干州，上沃梭区，区执行委员会，信件编号107794/101)在信件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我认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应该通过这样的决议，因为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机构的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一些‘脏工作’、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老爷式的。此外，他们自己不工作，而且漫不经心地对待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产生非常大的危害，这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为费力的工作就是采摘棉花。不仅工人和职

员，而且中学生和大学生也帮助采摘这‘白色的金子’，在采摘棉花这一重要的工作中，领导干部的直接参与起着重大的作用。此外，这将会额外收获数十和上百吨的棉花，领导干部本人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动员劳动者采摘棉花，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情况经常不是这样。

去年秋天的一个休息日，上沃梭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了红色十月集体农庄的第14大队采摘棉花。这一天是区委组织部主任A.H.沙赫马托夫和区调查员A.尤努索夫第一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出来工作，他们每人采摘了1.5公斤棉花，然后在中午12点离开了田野。在看到这些共产党员对体力劳动的这种态度之后，其余的工作人员在午餐后也回家去了。他们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拍那些不会采摘棉花、不会弯腰的人的马屁。共产党员阿布巴基罗夫·阿布扎尔、巴甫别科夫·扎基良、贾纳别科夫·拜穆尔扎以及其他人对体力劳动都持这种态度。除了谩骂其余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做。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也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组织上的作用外，这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领导干部亲自参与劳动的那些工作队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余工作队的1.2—1.5倍，比起领导不愿干活的工作队，有领导参加的工作队的学生也更加愿意在下课后参加普通的工作。

如果直接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就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建议。这将非常有助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有助于同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其他的缺陷作斗争。”

Ю.Н.萨尔诺(哈尔科夫市，比罗比詹大街4栋13号，信件编号107312)在信件中写道：“中国就逐步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采取了初步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有力的、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在我看来，设计师、工艺师以及其他的在工厂技术部门工作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在工作日的最后几天的工作成效是非常少的。此外，技术部并不总是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利用，经常有许多空闲时间。我觉得，一些部门的技术工作者以及工厂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自己工作日的最后一段时间应该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基连加乌捷(列宁格勒州，别索契内，列宁格勒大街第81栋，信件

编号107166/55)，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而且对我国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实践证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劳动者需要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主要在于，机关和组织的领导干部对生产需求和劳动者的需求的了解不够。

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还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业务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领导干部参与体力劳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机构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每年都应该在一定的时期从事…… [87] ”

斯佩西夫采夫(格罗兹尼市，克拉斯内弗伦托维科夫大街15栋，信件编号10122/23)，苏共党员。他在信件中写道：“如果说在劳动人民夺取政权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同志采取了一些坚定而完全现实的措施，警告国内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其中的一些措施。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自然能顺利地摆脱如下不良状况：尽管国内的总政策是正确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紧密的日常联系，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因此，我认为，《真理报》必须就如下问题交换意见：关于中国同志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其中的哪些建议。正如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所提出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措施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

И.М.库祖博夫(沃罗涅日州，里斯基市，信件编号82306/19)，他在信中写道：“《人民日报》针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把官僚主义从我们的社会清除出去，苏联人民将会得到许多好处。因此，我们也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生产中最为经常发生的冲突正是由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引起的，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没有真正同官僚主义开展斗争。”

Е.И.戈洛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信件编号84162/81)在信件中写道：“让我们看看中国吧，它成立才只有7年，就勇敢地提出了关于矛盾的问题。为什么成立了40年的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

伏尔加顿斯克市的一个人造脂肪合成联合加工厂的建筑工地工作，该厂的名称为尼日涅敦盖斯特罗伊。我们的每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得到劳动者的尊重，毕竟领导干部有国家授予的权力，他还是党员。在我们的建筑工地上领导是不受尊重的，他们搞了建设，然后又把它摧毁了。比如，水泥地板在刚入冬的时候就有水珠渗出，今天由于废旧金属的打击倒塌了。其损失是数十万元人民的资产。但是有关部门还因这一耻辱的行为得到了奖励，而工地主任——酒鬼库克索夫还被授予了红旗称号。对此您会怎么想呢？这是矛盾还是比这更糟的什么东西？毕竟我们有工会、党组织。他们应当对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者不愿接受建议，不愿听取工人的意见，他也不把建设的任务和前景向工人们讲解。而工人们也不会尊重这样的领导人。”

H.Д.德罗诺夫、A.谢苗诺夫都是苏共党员(巴库市，卡冈诺维奇大街22栋65号，信件编号106040/4)，他们在信件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同志的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非对抗性矛盾、克服官僚主义、不仅加强国家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控制，而且加强对党的机构控制，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两份文件中的内容没有争议和需要驳斥的内容。我们认为，中国同志谈论的许多问题都符合我们的实际。遗憾的是，在苏联政权建立40周年的时候，我国事实上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大量的官僚主义经常藏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经常阻碍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或者犯下罪恶。

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适合我国，采用它们对我们将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项党的或苏维埃机构的工作，许多同志都坚决拒绝从事生产工作，从事群众工作，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旧中国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还没有被摆脱掉。当我们的领导干部留起长长的指甲，把手指保养得光光亮亮的时候，还不能说明这一点吗？遗憾的是，在许多大学毕业或中等学校毕业的相当多的青年中也可以发现对体力劳动的忽视。那些被父母娇惯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这该怎么办呢？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或许，我们写的信件不很重要，但是我们写信的时候是真诚的，是凭党员良心写的。《真理报》没有对发表的中国同志的文章作任何评论。因此，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内容是公正的和应该被关注的。既然如此，就希望通过《真理报》或者其他的报纸了解一下，中国同志的文

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的现实。”

维里加耶夫、罗曼诺夫(克拉斯诺雅尔斯市，建筑中等技术学校夜校，信件编号104275/49)：“我们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市建筑技术中等学校夜校的领导干部，读了中国同志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文章，我们希望了解我们的党和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必要利用这一经验？”

Б.И.雷瓦(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大街38栋1号，信件编号10082/0)在信件中写道：“我要表达许多读者的愿望。我详细读了《真理报》上的文章以及对毛泽东报告主要内容的解释，我认为，这些内容和解释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实践意义。我给《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写了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些报纸和杂志上还没有发现有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同志上述报告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和重要的。”

Б.М.维连斯基，苏共党员(博布鲁伊斯克市，昌噶尔大街46栋85号，信件编号102749/60)，他在信中写道：“前不久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改变领导作风以及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文章。在共产党人中开始讨论这些文章。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些内容应该在我国立即实施，而另一些人，比如我们的宣传员佩夫涅夫则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工作已经做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定只是关于中国人的。我想了解《真理报》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Е.Е.温尼茨基，B.西拉耶夫(伊万诺沃市，信件编号92929/32)在信件中写道：“在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之后，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请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1.苏联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矛盾？2.我国的报纸是否会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这个问题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3.针对我们的情况，苏共党员应该怎样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些文章？

我们觉得，必须在我国报纸上在更广的范围内阐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请共产党员对这一问题予以正确的理解。”

М.К.阿拉克洛夫(第比利斯，格里鲍耶多夫大街19栋，信件编号101594/25)在信件中写道：“我不能想象，怎样能够具体地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

的特色，自己的发展条件，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共同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中国同志提出的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一些建议将会以其他的方式得到采用。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搞清楚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在现在，在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进行改革的时刻。因此，我请求在《真理报》上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酌量解释中国同志提出的一些意见。”

A.马库什金(莫斯科，别斯查第3大街5栋1号大楼32号住宅，信件编号97945/0)，在信件中写道：“我不完全明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报纸上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评论。非常希望《真理报》解释一下，这一新方针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

П.3.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彻尔卡斯卡伊州，齐继林区，梅德韦多夫卡，信件编号99123/118)，在信件中写道：“我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我发现，其他许多同志也对这些文章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中国同志在其中阐述的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中的问题，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报刊对中共的决议阐释得不够。”

Г.П.博鲁阿尔什诺夫(莫斯科州，莫斯科河区，48栋37号，信件编号103467/65)在信件中写道：“最近，《真理报》转载了《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文章。中国同志的这些文章写得非常简单明了，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另外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接受的。我指的是，其中包括，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把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等等，关于改变工作作风的文章也引起了我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讨论，我们在我们的集体中也对其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指示对我们的党是有益的，其中包括，诸如怎样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的指示，怎样把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等等。

我是一名新的苏共党员(1956年入党)，或许，在许多方面都会犯错误。我们的宣传员不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真理报》还是其他的报纸都没有刊登关于上述文章的评论文章。希望《真理报》能够发表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评论。这将是有益的。”

Г.А.东琴科(克拉斯诺达尔市，绍缅大街50栋5号，信件编号102243)在信件中写道：“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将使得许多由于官僚主义引起的错误很容易得到避免和克服，使得人们改变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我想知道，中共中央在实践中将怎样贯彻这些指示？在我们许多机构的工作中都存在官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每天都在谈论。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借鉴中国同志采取的方法，采取措施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拉霍夫，苏共党员(斯摩棱斯克市，国际大街5栋23号，信件编号101684/86)，他在信件中写道：“我请求回答如下问题。能否认为，《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结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其中包括我国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揭露的关于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在我国存在的这一现象，是否有共同的原因？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我国能否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同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能否认为，苏共中央2月全体会议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七次会议的报告中揭露的工业领导中的所有不足都只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引起的？

如果说，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而且是由于以前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风格，由于总局、各部、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引起的，是不是更为正确一些呢？”

别里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列宁大街50栋，信件编号97249/78)在信件中写道：“在同周恩来会谈期间，我国大使尤金说，在我国也存在矛盾。请对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一分析。”

C.H.巴尔卡尔(列宁格勒，莫霍沃伊32栋36号，信件编号92767/55)在信件中写道：“我经常读《友好报》，在4月27日的一期上我读了周恩来同志同苏联客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谈话。我国的大使尤金同志指出，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你们能否回答一下，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哪里？以及消除这些矛盾的途径。”

C.A.罗曼诺夫(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扎姆布里州，楚站，莫勇古姆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6942/36)，在信件中写道：“尤金同志在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说：‘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见《友好报》)，

应该怎样同这些矛盾作斗争？除了进行批评外。”

B.Б.格林丘科夫(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苏呼米市，少先队大街1栋，信件编号89257/25)在信件中写道：“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国是否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矛盾？”

П.利特维年科(库尔斯克市，集体农庄大街，3栋，信件编号98827/53)在信件中指出：“《真理报》上刊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请解释一下，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怎样开展斗争，消除这一矛盾。”

X.Г.海尔利耶夫，苏共党员(古里耶夫州，杰恩吉斯区，扎姆布尔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0421/36)，信件中写道：“在我们苏联是否存在矛盾？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怎样克服这些矛盾？”

Г.И.库尼斯，苏共党员(基辅市，列宁大街9栋3号，信件编号6978/42)写道：“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是否都完全符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些信件由《真理报》读者来信部文学编辑C.尼古拉耶夫编订。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155-167

№2060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1957年8月9日)

1957年8月16/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15日

第18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9日

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谈了他与选民见面的印象：见面和座谈在热烈、亲切气氛中进行；选民们大量谈了在企业 and 农业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从与其丈夫在战争中牺牲的妇女谈话中很高兴地听到了，道领导非常关心烈士家属的生活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工作有保障，给这些家庭发放配给粮食。全道农作物长势良好。农民们告知，他们今年交公粮任务全部完成并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口粮，而近三年该道的收成低，大量农民交不出公粮，他们甚至要靠政府救助。

在交谈中涉及崔昌益、朴昌玉等反党集团案件最新的审讯材料(这些材料我从其他渠道充分了解)。我很谨慎地对南日谈了最好和有必要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金日成在今年8月1日与我交谈时讲的那些问题。南日说，看来，要委托近期即将前往中国咨询五年计划草案的金一去做这件事。

我提醒说，延迟这类通报是不合适的，这件事应尽快通报大使。但南日回应我的提醒说，中国大使乔晓光很少与朝鲜领导人见面，给人的印象是，他常回避这类会见，他很少与别人交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至今没有明显效果。

我指出，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大使的经验不足和他的谦虚。然而，保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朝鲜与中国、朝鲜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不取决于某个工作人员或大使。

南日对这点意见表示同意后说，金日成大概今日也会向中国大使介绍预审材料。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65、180-182

№2060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年8月16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16日

参观体育场。庆祝解放一周年时举办了各种体育活动。领导人坐在包厢里，其中有金日成、崔庸健、金一、郑一龙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金日成说，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即8月15日，很顺利，国内和边境上都未发生任何事件。朴正爱、李钟玉今天外出与选民见面，金一和郑一龙于8月17—18日离开。

金日成在和同志们谈论发展体育运动时，他说，要从苏联聘请必要数量的教练来帮助运动员，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教练交流经验。

金日成还说，今年10月将有明斯克的斯巴达克足球队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谊赛。

金日成说，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商讨工作非常顺利，讨论也很热烈。金日成接着说，根据苏联朋友的建议，拟对计划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此期间金一同选民见面，几天后，金一将带着经过修改的计划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这是用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意见，所以我说，金日成讲得对，在前往中国之前，要把计划加以修改。

.....

我们了解到中国大使乔晓光对莫斯科方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反映很感兴趣，便邀请乔晓光8月20日(星期

二)来使馆共进午餐。就餐时马卡罗夫参赞向(中国)大使通报了计划草案的商讨结果。

乔晓光表示非常希望了解苏联同志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的实质，并对安排这次会见表示感谢。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193-195

№20604-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1957年8月20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0日

在别墅为中国大使乔晓光举行午餐会。同大使一起出席的有一等秘书程文津和随员王保民(翻译)，我方出席的有参赞В.И.佩利申科，В.И.马卡罗夫，稍后商务代表И.А.格拉德科夫也出席了。

应中国朋友的要求，马卡罗夫详细通报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乔晓光对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同志告诉他，现在他们正根据苏联的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他们将于8月底前往中国。

乔晓光接着通报了朝鲜朋友要求中国提供粮食、煤炭、硫黄、棉花等商品的数量，已获同意。

经外交部授权，我向大使通报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崔昌益、朴昌玉反

党集团的情况(这时只有大使和他的翻译在场)。我没有表示个人的评论和意见。

乔晓光十分留意地听取了我的通报，并深表感谢。他说，有关这一问题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朝鲜同志不向他通报，他是无法了解的。他还补充说，如果他了解到新的情况，他将立即向我通报。

乔晓光邀请我和使馆人员及家属近期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接受了邀请。参观日期到8月23日最后确定。

АВПРФ , ф.0102 , оп.13 , д.5 , л.203-207

№20604-3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关系(1957年8月23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3日

.....

南日告知：金日成赞成就双重国籍和双边民事、刑事的法律援助、领事公约等进行谈判。

南日请求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意愿转告苏联外交部，南日同时表示，谈判可在平壤进行，换文可去莫斯科。

南日接着说，中央领导现忙于处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集团活动的

事。但他没有通报新的事实。

我问南日，就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已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过？

南日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但准备通报。

我谨慎地表示，我认为，应尽快通报，可取得中共中央更好的理解，我补充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好保密的，我认为，你们在努力同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建立良好的友谊。

南日完全同意我所表示的意见，他说，我最近全面考虑了我们之间就这一问题的谈话，近期我将亲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大使乔晓光建立亲密的、坦诚的、同志式的关系。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215-222

№08877 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 测绘代表团访华(1957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照会，请求苏联政府派苏联大地测量专家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将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届时出席会议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测绘工作代表团。

这次会议是根据1956年布拉格测绘工作会议的决议召开的，该决议曾得到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4月10日决议(第411—204с号)的同意。

测绘科学技术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技术可能性，以便尽快实施绘制详细地图的工作，在没有或没有完备的大地测量网的地区建立测绘网。实现上述措施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

中国政府已责成中国测绘总局筹办这次会议。

苏联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在解决会议所提出的任务当中苏联比其他会议参加国都有经验。

所以，苏联内务部请求批准派代表团参加北京测绘科学技术会议，为期一个月，代表团成员有：С.Г.苏达科夫(团长)，А.С.尼古拉耶夫、Г.В.罗曼诺夫斯基，П.С.扎卡托夫，Б.А.拉林，А.Д.科洛米耶茨，А.И.库列绍夫，А.И.布拉诺夫，А.И.索洛维约夫，Б.В.特罗伊茨基。

关于苏联大地测量局参加召开的会议和苏联军事测绘局在代表团的成员问题将同总参谋部(А.И.安东诺夫同志)协商。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中国外交部今年6月24日的照会副本附后。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机密

一、接受苏联内务部关于派苏联测绘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为期1个月，代表团由以下人员组成：С.А.苏达科夫(团长)、А.С.尼古拉耶夫、Г.В.罗曼诺夫斯基、П.С.扎卡托夫、Б.А.拉林、А.Д.科洛米耶茨、А.И.库列绍夫、А.И.布拉诺夫、А.И.索洛维约夫、Б.В.特罗伊茨基。

二、委托苏联财政部与苏联内务部一起研究上述代表团参加测绘科学技术会议出差费用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

(1957年6月24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兹谨通知贵馆以下事宜：

中国测绘总局根据布拉格国际测绘会议决议，建议今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亚洲五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

届时参加会议的将有以下五国的代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布拉格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考虑亚洲人民民主国家自然地理条件和其他特点，通报并讨论每一个国家的测量网的位置，比例为1：100000地图和各种比例的地形图的测绘方法和技术以及其他问题。

中国政府特邀苏联政府派团(10—15人)参加这次会议。

此外，中国测绘总局还提请会议参加国和代表团成员注意以下会议内容。

一、天文测地网的分布和共同测绘问题。

二、亚洲人烟稀少的山区和高山地区的测绘方法和技术问题。

三、基本重力点的确定和普遍重力测量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四、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报告。

我们请苏联政府在尽短期限内通知我们你们对会议期限和内容以及各代表团将所作报告题目的意见。

为顺利进行会议准备工作，我们请求尽量在1957年8月底之前把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人数通知中国测绘机关，提交贵国代表团在会上将要作的报告材料。

代表团到达中国后的花费和返回祖国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请将以上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ГАРФ , ф.9401 , оп.2 , д.492 , л.40-44

№20604-4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7年8月28—30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8—30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和司令员杨勇的邀请，我们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方出席的有：经济参赞马卡罗夫、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武官助理斯捷潘诺夫、大使馆随员奥格涅夫。中国使馆方面出席的有：大使、一等秘书程文津、三等秘书张瑞杰和中国使馆女译员王宝琴。

会见是在十分热烈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全程陪同我们的有司令员杨勇、政委李志民(第一天陪同，后来病了)，还有几位副参谋长。到达后我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向毛泽东儿子的墓献了花束。晚上在俱乐部里欣赏了很有意义的音乐会，由人民志愿军歌舞团演出。音乐会开始前，副参谋长肖应棠致欢迎词，我致答词。

№11455 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 中越关系(1957年9月18日)

今天我拜会了李志敏。

我简单向他通报了胡志明同志的苏联之行。

李志敏问：苏共中央代表与越南同志在统一越南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

我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分歧。越南同志建立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当然，未来这一斗争的策略应当仔细考虑，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必要时可以改变形式，例如，目前不能不考虑到两个越南国家的存在，越南分裂成两部分将会保持一段时间。有些越南同志有时疏忽了这一现实。例如，有些在南越工作的越南同志表现出简单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有些越南同志尚未注意到政治斗争的主要火力应当对准美国。他们在大骂吴庭艳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北方和南方建立实际联络的方法。

李志敏还对苏共中央与越南同志在接纳北、南越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感兴趣，我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

李志敏同志说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根据的。部分越南同志过去不同意苏联的立场，主张接受两个越南国家参加联合国。总之他认为，越南同志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间接承认南越的做法非常敏感。特别是他们未必能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的决定，向南越出席国际气象组织地区会议的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对李志敏回答说，越南同志应当正确理解已经作出的决定，向南越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认为，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

李志敏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指示必须提高越南同志反对吴庭艳政权的宣传水平。

武元甲在答新华社记者就吴庭艳7月公报的提问时，仍然是充满了谩骂之词，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中国同志迄今拒绝发表答记者问。

后来谈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在胡志明不在国内期内的活动时李志敏说，越南同志在国内的政治和生活中没有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他认为，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推迟了，也没有对纠正土地改革所犯错误的工作总结，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越南同志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水灾作斗争上。他认为，越南劳动党最近搞的最重大活动之一，是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以巩固军队人员必须进行长期的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就地了解纠错情况。纠错推迟了，看来某些地区将拖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结束。最大的困难是退还被恢复名誉的农民的财产。此外李志敏指出，在越南劳动党领导干部中，迄今对纠错活动是否正确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谈及胡志明同志访华，李志敏说他尚不了解胡志明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只向他通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际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还向他通报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进程的谈话内容，他已经就此事通报了苏联大使馆。李志敏认为，胡志明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老挝问题的反应非常积极。回到河内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苏发努冯，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天与李志敏谈过话的清顺认为，由老挝同志准备的关于老挝形势报告草稿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很好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明白了作为保持亚洲和平共同问题的一部分，老挝问题应当解决。

胡志明同志在北京讨论的问题之一，系非越南族系，特别是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为了研究对侨民工作的经验，越南同志打算向中国的东北地区 and 新疆派遣代表团，当地生活着大量的侨民。

李志敏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说，根据最近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精神，在越南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国人员，今后的工资将不以越南盾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放，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这里包括住房和伙食。这一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中国专家，其生活水平不应当高于越南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1956年秋季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谈过这个问题。

АВПРФ, ф.079, оп.12, п.17, д.6, л.69-72

№20608-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 (1957年10月7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7日

应南日邀请拜会了他。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今天同他通了电话，建议加快因朝鲜公民被美军杀害而致信联合国的事。

南日要求我同苏联外交部联系，质询目前这样的信件是否适宜。

我回答南日说，10月2日的谈话后，我已转达。

南日表示感谢。接着他通报说，根据政府的指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内外商业相陈班秀致信南朝鲜贸易部长，建议为开展贸易而相互开放城市，为南朝鲜人开放开城市，为北朝鲜开放南朝鲜的一个边境城市。

这封信件将于明天，即10月8日见报。我授命将这一信件의复印件提交给你们大使馆。

对南日通报这件事，我表示感谢。

南日还说，他同邮电相详细研究了同莫斯科建立高频通信的事。邮电相说，现在正在架设平壤伏罗希洛夫的线路(恢复原有的高频通讯)。全部工程于今年完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征询苏联政府关于是否能从1958年初起架设高频通讯线路的意见。

我答应把这一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

谈到去莫斯科的事，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于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时，我用委婉的方式提请南日注意，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很少去兄弟的邻国——伟大的中国访问。据我所知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邀请中国党政界的朋友和其他中国代表团。而邻国之间领导人的相互接触，更不要说是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十分必要的，可带来很大的益处，而且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南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他说，的确如此，金日成每年去苏联，而自1954年以来，他没有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情况来解释这一点。我们的确应经常去中国朋友那儿，同他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面。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应经常接触。在这方面我们应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补充说，除了领导人之间的正式会见外，还可以有非正式的见面。例如，您知道，苏共中央每年都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去苏联休息和疗养。今年也曾邀请过。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去苏联的并不多：只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副首相郑一龙和财政相李周渊几人。但即便是他们，也没有同我们的领导人会见。为什么不更多地利用这类邀请呢？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可以在休息和疗养之余，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

府的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

为什么不能组织这样的活动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南日同意说，这是建立个人接触的重要形式，他们今后要考虑的。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263-265

№2521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1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82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88\]](#)

1957年10月11日

今天毛泽东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在北京举行的印度展览，刘少奇也与毛泽东一起参观。印度大使陪同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和我在展览期间的交谈，主要涉及的是苏联的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对于卫星的发射过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还热情地谈论了该事件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了极大的倾斜，”毛泽东说，很明显，帝国主义现在不会冒险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了，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个卫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还对苏联科学家在未来能够成功发送更大更完美的人造卫星表示了信心。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和莱斯顿的会谈记录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听到我的回答后，毛泽东说，现在他们要将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我向毛泽东说明了他们谈话的基本概要。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后对赫鲁晓夫的发言作了赞许的回应。对于他们的谈话，毛泽东非常高兴地

表示：“这些事务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苏联都进展得很好。”“火箭、人造卫星和相关的胜利对美国人而言是个打击，这不仅让你们，也让我们感到轻松和高兴。”

.....

会谈由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Ф, ф.0100, оп.50, д.5, п.423, л.44-45

№20608-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1957年10月16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16日

拜会金日成，向他转交了苏联国家计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控制数字的书面意见。

金日成对转交的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还对苏联政府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缔结1958—1961年向苏联提供既定数量的浓缩单核细胞和锌精矿的建议表示感谢。

我向金日成通报说，由民航总局委派的图104机长贝科夫已于日前

来到平壤，他来考察顺安(Супунск)机场是否能起降图104飞机。贝科夫对我说，机场可以起降这种型号的飞机。他将向民航总局的领导报告。因此，可能在10月20—25日就可作出决定，派什么飞机来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金日成为此表示感谢，并对苏联同志的关心表示谢意。他说，如果乘图104飞机去莫斯科当然很好，但如果有什么原因不能派图104飞机，那么像去年那样，乘伊尔14飞机也不错。

我告诉金日成，已收到增加2—3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加入劳动人民联合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邀请。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我对金日成说，在十月革命40周年时，我们想邀请所有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由苏联援建的企业领导人(15人左右)到苏联大使馆来参加招待会。

金日成对这一动议表示赞成，并说，这样做很好。如果大使馆认为可以，也可邀请一些其他党派的道委员会的领导人来参加。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会考虑这一建议的。

在这次会见时，金日成还通报了金一和李钟玉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

金日成说，我们把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向中国朋友作了详细的通报。他们也很支持这些意见，他们特别建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苏联同志也曾有些建议，我们准备这么做。中国朋友对我们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来完成五年计划这点评价很高。我们曾要求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供应12000吨棉花，中国同志无法满足，他们将供应8000吨。因此，我们作出专门的决议，扩大国内的棉花生产，采取具体措施以建设牢固的产棉基地。打算在1958年种植棉花6万公顷(1956年种了25000公顷)，全部棉苗在培养器皿中进行培植。这样的种植方法今年获得了良好的收成。有一个合作社，有些棉田的产量每公顷达到23公担，平均每公顷可收获12—17公担的籽棉。

我们计划在1958年平均每公顷收获8公担，力争收获1吨。

№24939 《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1957年10月18日)

在《苏中友谊》样刊出版之后，编辑部收到了读者发来的400多封提出意见的信件。党委、友好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人、教师、各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等都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都对该杂志的出版表示欢迎。(没有一封提出反对意见的信件。)

为了使这本杂志能够办得更好，读者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读者的意见可以简述如下：

1.样刊的优点。

《苏中友谊》杂志要好于以前出版的《苏中友谊》报纸。该杂志内容简洁、范围很广，对问题的阐述很详细。对材料有很好的说明。杂志基本上克服了报纸上出现的缺点。

2.读者非常喜欢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同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读者写信说，伏罗希洛夫撰写的这篇关于列宁的文章，对当时现实事件的描写通俗易懂，内容简洁而令人激动。他们希望再刊登这样的文章。

读者主要回应的是关于列宁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反响较好。读者认为，授予列宁奖金是一件大事，它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及其作品是非常有益的。

一些读者认为，发表苏联作家的回忆《伏罗希洛夫在中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该文不同于中国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同时它还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这是令读者非常高兴的，对他们来说也是珍贵的。

读者对《在平凡岗位上的苏联青年》这篇文章的反响很好。读者都写信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该文以具体的实例简要阐述了苏联青年是怎样以自己平凡的劳动来建设共产主义的。这篇文章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使每一位读者更加尊重劳动。

读者们对杂志中《关于苏联》的文章表示了巨大的兴趣，因为该文简要而及时地阐述了苏联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读者非常喜欢《读者来信答复》这篇文章，因为诸如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问题，在哪些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哪些方面还没有超过，苏联打算以什么方法在多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等问题使所有人都感兴趣。

读者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一些文章，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答复。

读者非常喜欢杂志的封面以及乌兰诺娃的彩色照片。

读者还指出了杂志的一些不足之处。

1.杂志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不是很全面。在样刊中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材料太多了，而关于工业和农业问题的材料不够。杂志的内容还不够丰富。

2.文章太长了(在三篇文章中每篇都超过15000字)。

3.文章的语言还不够通俗(一些中学生在来信中写道，许多内容还看不明白，特别是涅斯梅亚诺夫的文章)。

4.反映苏中友谊的文章太少。比如，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工人对新中国建设的帮助，或者，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和八路军领导人的照片。

我们的读者非常喜欢对历史进行回忆的材料，关于我们友谊的材料。第一期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文章。

5.关于苏联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样刊向读者介绍得不够。比如，读者非常想知道飞往月球的问题等。

6.读者非常喜欢《谁是第一个到北京的俄国人》这篇文章。他们表示，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希望，要使这些文章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感情。在样刊中，这篇文章包含了过多的历史材料，因而有点干巴巴的。

读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意见。

1.如果杂志不是月刊，而是更加经常地出版，并且杂志的容量也改变一下(大家都建议使杂志的容量为30页)就更好了。

杂志的价格太高了。(邮局认为，最好的是，每份杂志的价格不超过2角。)

2.一些读者建议，每期都刊登一篇小说。(短篇小说，不超过1万字。)

3.中国读者非常想了解苏联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比如，婚礼，为新生儿选择名字的风俗，各节日的风俗等。

4.在杂志的封底不一定都只刊登照片。如果每一期都刊登一些著名歌曲的歌词、乐谱，或者图画，那么将会使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

5.希望杂志的插图更加丰富。

ГАРФ, ф.Р9324, оп.1, д.2, л.8-12

№20607 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57年10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78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李永镐的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19日

接待了前来礼节性拜访的李永镐。

相互致意后，李永镐说，他担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一职时间不

长，还缺乏经验。他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我表示任何时候都可提供这种帮助。我建议他同中国同志建立最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李永镐称，他同不少中国机构的领导人有不错的交往，今后他还将扩大这种交往。他向中国朋友通报朝鲜内部生活的各种问题，也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重要信息。李永镐简要地介绍说，不久前为了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和贸易问题，一个专门的朝鲜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交换意见十分有益，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全部主要问题。

谈到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的相互关系时，李永镐指出，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关系特别密切。李永镐解释说，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目前的情况同朝鲜有许多相似之处。李永镐说，我曾同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有过严肃的争论，因为他有意歪曲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1956年)的内容，并对匈牙利和波兰发表了错误的评论。他说，在匈牙利发生的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群众反对党和政府的错误政策。听到反驳后，基里洛克说，他(李永镐)是斯大林分子，什么都不懂。李永镐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使用“斯大林分子”一词不恰当。从此以后，李永镐与基里洛克再没有就这个话题交谈过。

李永镐说，南斯拉夫方面目前对朝鲜大使馆的人员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中，印度人、缅甸人、印度尼西亚人对朝鲜人的态度不错。李永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同这些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最后，李永镐表示希望能组织一次苏联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人员的联欢晚会。

大使馆随员A.A.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送：Н.Т.费德林同志、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7年10月23日

№20608-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 华及中国的援助(1957年10月23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23日

根据预先的约定，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并作了交谈。

谈话时中国大使馆一方有参赞曹克强、商务参赞薛春圃和随员王保民，我方有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参赞佩利申科和三等秘书Ю.И.奥格涅夫。

乔大使称，准备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主席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而对中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结果向我们通报。接着由商务参赞薛春圃发言，他陪同朝鲜代表团一起去中国，并直接参加了这些谈判。

薛春圃说，以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于9月12日抵达北京，9月13日至10月6日进行会谈，讨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和两国的外贸问题。

中方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率领参加

会谈。中方代表团的成员有：国家计委的专家、财政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

两个代表团一开始就分成两组。第一组研究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问题；第二组讨论贸易问题。

中方代表团首先表示赞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总方针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控制数字；同时还向朝鲜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中方代表团对计划草案总体上表示满意。计划草案规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方向朝鲜同志就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情况：

1.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表明，农业发展的快慢对工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确定了农业发展的新指标，但要考虑到不利气候的年份对农业歉收的可能性。工业发展的计划指标是在考虑农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执行计划期间，1955年是高产年，1957年的产量也不错，1953年的收成是中等，而1954年和1956年由于气候不佳收成不好。1954年和1956年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料和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这使完成计划遭到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对工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17.3%，农业生产达到4.5%。但这个增长是不平衡的，碰到了巨大的困难。

考虑到农业基础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十分重视那些能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对农业的投资是5.7%，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提高到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对发展农业的投资预计增加到1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五年计划中，将考虑大力进行水利建设，提高山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产量。

中方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中方认为，对农业的投资最好还要增加，可以考虑降低某些重工业企业

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那些朝鲜本身缺乏原料的企业和产品销售有困难的企业。这样，可腾出一些资金来投向农业。

中方认为，计划应该有可靠的基础，要全面考虑，因为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这些困难必须加以克服。

2. 中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存在不少实质性的缺点。

第一，没有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它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

第二，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的本质差别，其结果是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国民经济的非生产领域。

第三，为了发展文化和教育，计划大量建造学校和培训干部，但没有考虑到必须首先发展国民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文化和教育水平。

第四，提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但没有考虑到首先必须保证提高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水平。提出了在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但广大劳动群众对这个口号理解不一致，各个企业有不同的解释。某些企业的工人提出要求说，他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提高了，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依旧。现在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和任务：在工农业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方认为，朝鲜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要研究工业发展、原料供应基础和销售是否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但必须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等，要使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有可靠的保证，因为顺利地完成任务会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可以对劳动群众起到鼓舞作用。

3. 必须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但提出提高生活水平任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发展商品供应的基础；在提高工资时，必须考虑农民的购买能力，用商品来保证工资的提提高。

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方总的意见就是这些。按照薛春圃的说法，中方无法提出具体意见，因为，如要提

出具体意见，就必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进行更加详尽地了解。

第二组的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交换。朝鲜同志提出了一张拟于1958年进口商品的清单。这张单子中的许多商品中国是短缺的，其中有些商品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

会上决定，1958年互供商品的具体问题，提交双方的商务代表团去讨论，这次只是决定一些主要的商品。

朝方要求中国在1958年提供70万吨炼焦煤，17万吨动力煤和3万吨焦炭。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也缺煤。中国在1958年缺煤达600万吨以上。但是如果中方不向朝鲜提供煤，朝鲜经济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中方决定满足朝方的要求，保留上述数字。

还决定满足朝鲜同志的如下要求：提供3万吨大豆和5500吨硫黄，尽管中国自己也缺硫黄。

朝鲜同志1958年的清单中还有橡胶，中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橡胶的。中方同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3100吨橡胶(朝方原要求提供3300吨)。

解决棉花、棉纱和棉布问题最为困难。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棉花生产没有完成任务。1956年的棉花播种计划有500万亩(1亩=0.067公顷)没有完成，今年有700万亩没有完成。居民的棉布供应逐年减少。1951年的棉布生产量人均均为7.3米，到1957年则为6米，1958年减至5.3米。棉布人均数量的降低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棉田播种面积的减少以及由于缺乏原料，不少纺织厂停工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进口几万吨棉花。

考虑到这些情况，中方同意向朝鲜提供8000吨棉花，而不是朝鲜同志要求的12000吨；提供500吨棉纱(朝方要求1500吨)和500万米棉布(朝方要求1000万米)。

1958年的贸易就讨论这些。中朝之间商品交换的其他问题由两国的商务代表团去解决。

此外，朝鲜同志提议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制订，所以缔结上述协定的事被推迟了。但中方向朝鲜同志表明了进一步提供煤炭、硫黄、棉花和橡胶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希望，1959年还能获得像1958年这个数量的煤炭，到1960年和1961年能每年进口100万吨。中国同志说，他们认为1959年有可能提供1958年的数量，而1960—1961年的供煤量只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之后才能决定。

至于硫黄，中国同志同意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保持原来的供货数量，尽管朝鲜同志的要求要多得多。

薛春圃说，朝鲜的硫铁矿蕴藏量同中国一样多，所以他们向朝鲜同志建议搞好自己的硫酸生产。

中方向朝鲜同志预告，棉布和棉纱的供货量今后将减少；到1960年，中国将完全无法提供棉花。橡胶的供货，中方将努力使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维持在现有水平，而到1961年有可能向朝鲜提供人造橡胶。

从明年起，中朝的贸易交换将按世界的价格，用卢布结算，对此，双方已达成协议。向世界市场价格过渡的具体问题将提交双方的贸易代表团去解决。

朝鲜同志还提议缔结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表示同意，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专门机构去审议。

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对今年的换货情况感兴趣。

薛春圃回答说，总的来说换货正常，中方在这方面未提任何要求。今年中国向朝鲜提供310万吨小米和5万吨大豆。

他说，明年看来朝鲜靠本国的收成就够了，因为只计划进口3万吨大豆。

薛春圃表示同意。他说，根据1958年度的初步货单，朝鲜同志计划进口5万吨小米，但后来不要了，大概认为收获会很好。今年中国向朝鲜供应11000吨棉花、100万吨煤，其中包括50万吨以上的焦煤。

1957年中国向朝鲜的供货总量为7500万元，援助为5000万元，今年的全部援助就这些。

1958年向朝鲜的供货量将近1亿元。

参加会见的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问薛春圃，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是否讨论过朝鲜的货单？

薛春圃回答说，没有讨论。但他发觉，某些商品，例如水泥、电解铅、硝酸铵、石墨、玉米淀粉，中方很难接受，因为这些商品中国自己也有多余。

朝鲜同志建议向中国提供3万吨碳化钙(中国自己拥有量很大)，中方同志接受8000吨。因为中国以前接受过碳化钙，1958年如不接受会对朝鲜工业带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接受朝鲜同志提供的30万吨铁矿石。

我对乔大使和薛春圃商务参赞的通报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说，苏联也接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多自己绰绰有余的商品，例如，苏联向朝鲜购买了单核细胞，而且其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

接着，我向乔大使讲述了不久前同金日成谈话的情况。我说，金日成高度评价中国同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他说，他们在最终审定这个计划时加以考虑。金日成说，朝鲜同志理解中国同志在棉花供货上的困难，因此他们打算在明年扩大朝鲜的棉花播种面积，从25000町步增至60000町步(1町步=0.9公顷)。

向乔大使简要通报了朝鲜劳动党10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情况。

乔大使对通报情况表示感谢，他也讲述了同朝鲜国家计委主席李钟玉的谈话情况。

李钟玉在谈话中对中国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对朝鲜代表团在中国的热忱接待表示感谢。李钟玉说，朝鲜政府拟用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生产人造纤维和与埃及签订贸易协定的办法来解决棉花问题。

谈话后乔大使招待便餐，参加晚餐的除了以上同志外，还有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旷伏兆中将，他来平壤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七周年的活动。

利用这个机会，我邀请旷伏兆参加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招待会。

会见和晚餐都是在友好的、兄弟党的气氛中进行的。

АВ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274-280

№0888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1957年10月28日)

苏联内务部请求任命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局长亚历山大·尼基里弗里奇·巴拉诺夫同志为苏联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北京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会议的工作，以取代患重病的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第50/161rc号)今年9月21日被任命为该团团长的С.Г.苏达科夫同志。

苏联代表团将于今年10月30日赴北京。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92, л.204

№03372 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

绝密

副本，第1份

致赫鲁晓夫同志：

今天(10月29日)晚上，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同行。在去克里姆林宫[90]的途中，他开始谈起刘晓关于米高扬向他通报的有关苏共中央决定撤消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职务的报告。

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毛泽东说，他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他声称，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苏共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接着毛泽东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

我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军队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情况。对此他指出，近来我们(中国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有所削弱，军队党组织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也削弱了。

谈到撤换朱可夫时，毛泽东说，这次手术会比撤换莫洛托夫更少痛苦。莫洛托夫几十年来已经作为党的领袖之一深入群众的头脑，而朱可夫则和马林科夫一样，还没有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在群众的头脑中扎根，尽管这是不同的两个人。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来。毛泽东简要地向来的同志们叙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然后，他开始谈到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并说，他再一次重复通过周恩来转达过的请求，无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鄂木斯克都不要举行欢迎仪式，而他为了避免感冒也不准备走出飞机，而在莫斯科，除了在机场发表谈话外，从机场出发沿途也恳切请求不要组织欢迎仪式，因为他也好，宋庆龄也好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从苏共中央收到的关于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首先，毛泽东说，我先说我们对于声明草案的一些意见。草案要大大删减。这事不难。只保留未来声明的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声明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个别有一些意见，准备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谈。

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来判断，那么我们对这种解释有某些不同意之处。

不能仅仅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和平过渡，而且

应当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有些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处在由和平转变被武装斗争所取代的阶段。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而且取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能会迫使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把它强加给工人阶级。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考虑到这第二种可能性。

宣言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应当既写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可能随时将武装斗争强加过来，对此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何表达这个思想，是个文字问题，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第二，毛泽东说，在草案中说到，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他说，应当为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怀疑。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在声明中最好采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一般性的提法，说明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党人，而且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为和平、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流派等等日益接近。他说，不应当仅仅突出提到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

第三，是关于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那一节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对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关系作了长时间的回顾。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49—1950年在莫斯科关于条约、关于势力范围、关于股份公司的谈判，并且说，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

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时，曾经与苏联商定，在人民民主国家将不搞间谍活动，当然也包括中国，但是实际上是搞了间谍活动。罗申大使就招募了一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他提供情报，且不要告诉周恩来。但是，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还有别的问题让我们对莫洛托夫不满(这时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上述罗申的事件并不重视，并请求不要告知苏共中央)。因此，毛泽东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不过我们认为，在声明中以不提到莫洛托夫

为好。因为，在我们中国某些地区，莫洛托夫的威望并不比斯大林的威望低。这样的人不仅在中国有，关于苏共中央谴责反党集团的决议应当提到，但是不要指名道姓(这时他指出，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作为个人则不值得注意)。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6月中央全会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他说，我(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就在他们(他指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得到通报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开会，详细地说明并维护了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谈到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在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曾存在过分歧。曾经有过两派。我们曾几次讨论过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局势，结果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和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这里也有过对个别问题的不一致和分歧，但是时间越长，这些不一致和分歧就越小。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大大地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好比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是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他接着说，我们从来不允许从我们方面站出来反对苏共，即使我们不同意某些做法。他还举出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例，说他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同苏共不一致，他们甚至在私下谈话中也不曾提起这个问题。

谈话进行到此，我作了以下的说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以及在苏共中央以后言论中，丝毫也没有讲到要无产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武装斗争。二十大决议只是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若干国家，工人阶级用和平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说，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当前形势下，可能为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足以迫使资产阶级后退，并从而避免武装斗争。

接着我指出，当您(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交谈时，您毫无疑问会轻易地取得一致意见。我想，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对苏共论述个别国家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误会。毛泽东对我的这一看法极表赞许。

接着，毛泽东转而谈到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是否有必要通过宣言。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党都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如果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反对通过宣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口实，让他们说我们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出现了矛盾，莫斯科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的党，而其他党不同意，等等。但是，如果预先通过决定说，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通过宣言，宣言也要通过，那也可以这样做。毛泽东形象地表达说：“天下不会大乱”，但这一切都要预先讨论好。

第二个方案可以是这样的，毛泽东继续说，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

二、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等。

三、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争取历史进步而斗争，等等。

四、关于开辟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十月革命，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民族条件和民族特点。

宣言式公报这种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最后，是第三个方案：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宣言。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为什么只有两个党发表宣言，那就说明其他党不同意。对此可以回答说，这两个党是最大的党。此外，大多数别的党已经通过了联合宣言，而我们两个党没有参加。这是方案之一，但这个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毛泽东转向我说，请您尽快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知道我们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

此后，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他同斯彼哈尔斯基 [91] 的谈话。毛说，我

努力向斯彼哈尔斯基证明，对他们(波兰人)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消除波兰的反苏情绪，并始终强调说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我是否和他一起去莫斯科。我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说，他乐意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谈话持续了约4小时。

П.尤金

1957年10月30日

АПРФ, ф.3, оп.65, д.589, л.173-179

№1382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А.Н.柯西金、М.Г.别尔乌辛；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对尤金同志发自北京的1957年10月30日电报，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对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声明草案的问题，以及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意大利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的答复。

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库西宁、波诺马廖夫、帕托利切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

简短的公报(这一方案)不要接受。

应该倾向于签署宣言，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同意的话。

如果将通过共同宣言的话，那么，也可以同意搞一个(苏联共产党与

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宣言。

完成草案。 [92]

同志们应该在今年11月3日之前提交新的宣言草案，在今年11月日 [93] 之前提交声明的草案。

2.葛罗米柯同志就裁军问题发自纽约的1957年10月28日电报。 [94]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佐林、布尔加宁、帕托利切夫、米高扬、福尔采娃、库西宁。

我们应该声明：不再参加分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说完了一切，阐述了所有内容。准备返回，如果将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建议的话，或者应该扩大委员会。

佐林同志：现在采取这样的步骤为时尚早。

帕托利切夫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

米高扬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使他们无法指责我们。

委托外交部，根据交换意见的精神，准备给葛罗米柯同志的指令性指示。

批准葛罗米柯同志返回莫斯科。

РГАНИ , ф.3 , оп.12 , д.1008 , л.26-27

№2076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 (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的问题。

第122号记录第1项

1957年11月2日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见，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会议宣言草案及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草案。 [95]

上述文件在今年11月4日之前提交。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61, л.1

№200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1957年11月9日)

今天晚间毛泽东邀我去会谈。

他请我向H.C.赫鲁晓夫转达自己与会议筹备有关的几点愿望。

一、他认为，应当在11月10日前彻底结束中苏两国代表间关于会议声明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在这一天将协商过的草案散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包括那些未参加此次会议的兄弟党在内。

二、毛认为，声明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

三、(毛)希望会议能于11月13日开幕。因为11月10日所有兄弟党代表团便可收到会议声明草案，并在11月11日前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等同志)。而在11月12日，即会议开幕前一天，(我们)还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声明草案再作修改。毛泽东希望，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11月13—15日。

四、毛泽东表示同意H.C.赫鲁晓夫向他通报的关于波兰人所提的建议，即通过第二个“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 [96] 毛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文件的签署既可以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党代表，也可只包括目前在莫斯科的所有兄弟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毛指出，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毛泽东请求苏共中央亲自负责该简明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11月10日让所有党派代表了

解其内容。

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作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作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一个问题作了几处改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

毛指出，有必要保留宣言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要补充文字(该补充性文字是毛亲自写的)。对此，毛强调，斯大林在世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而上学泛滥成灾，辩证法立场被严重削弱。在人们评价和分析各种现象的过程中，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居统治地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的根源。哲学本身有时也会有局限，从而不能完全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同志很少讲到和使用辩证法。我建议，我们应经常地大规模宣传辩证法。毛说，他很高兴地看到，H.C.赫鲁晓夫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回到声明草案的话题，毛希望苏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能再次读读它。毛声称，他自己也将再次阅读该草案。在此期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没能在宣言中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例如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在宣言中补充关于农民地位的内容，等等。

之后，毛泽东又谈到关于让所有兄弟党代表事先了解草案内容的必要性的问题。他说，这一方面是坚持民主，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思想。只是务必让各代表团最晚于11月11日夜前把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报上来。确实，我们给他们研讨草案的时间并不多，但“应当考虑到，会议要持续2—3天，其间每个代表团仍可以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1.只有中共中央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不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财政部长李先念)；2.代表团所有成员——共产党员(11人)都参加会议；3.包括非党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在内的来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所有成员都参加。毛指出，应当考虑到，我们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便可以邀请其他国家(如波兰等)代表

团中的非党人士也参加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毛说，可以再商议。

接下来的会谈中，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关于自己在莫斯科与一些兄弟党代表会面的情况。

毛说，他与哥穆尔卡会谈的时间最长。关于对这次会谈的评价，毛指出，宣言中有两点让波兰人有些为难：1.抨击美帝国主义；2.指出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哥穆尔卡“在与我交谈期间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强调，并非他个人，而是波兰人民不能接受(宣言中)这些条款”。毛说，我建议其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哥穆尔卡答：“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不了。”他在与毛的会谈中强调，波兰不会接受宣言中有关激烈指责美国的表述。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些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他预测，会议宣言“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毛解释道，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被迫反戈一击，“遏制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哥穆尔卡表示，在这一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与哥穆尔卡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问题上。其间，毛强调，“每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班长，每个排也得有排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团队里也理应有自己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毛继续对哥穆尔卡说，“这个领导的角色并不好当，很麻烦哩”。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仅仅通过一次会谈是很难取得什么根本性的成效的，但我还是极力证明哥穆尔卡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能够如愿，让波兰人在宣言上签字，那是再好不过了。可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毛声明，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仍要通过宣言。“（我们）不希望他们说，自己是被迫在宣言上签字的”。他们拒绝签字，我们可以等，过上3年左右，他们反正还是要签的。与毛会谈期间，哥穆尔卡并未否定宣言本身，但提了许多附带条件。毛泽东说，在将声明草案分发给波兰人之后，他打算到哥穆尔卡那里，与他再好好谈谈。

关于与南斯拉夫人的会谈，毛指出，情况比波兰更复杂些，因为“他们不是脚踩一只船，而是两只船”。

毛说，在与多列士、陶里亚蒂和波立特 ^[97] 会谈期间，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形势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欧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毛

与这些国家的代表还就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还郑重通过了一个决议。去年，在访问中国期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仍坚持“不开一枪”的立场，可“现在如果敌人开火的话，那么，他们也打算还击了”。毛说，会谈期间，我建议英国同志要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注意到，波立特对签署宣言表现得相当积极。很明显，英国人是想借此来达到“提高英国共产党声望”的目的。毛说，“我对英国同志的这些想法表示反对”。

毛继续说，在与法国同志会谈期间，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表示了不满。“不过，现在我们感到法共和意共与英共的立场已相当接近了”。

毛泽东还讲了关于自己与金日成的会面情况。毛说，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 [98] 毛让金日成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2个军。在谈了这样做的理由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人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是志愿军，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的”。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答，“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

接下来，毛泽东又与金日成谈了关于周恩来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问题。对此，毛说，我对金日成讲，“看来，要是我(毛泽东)去朝鲜，你们是不会欢迎的，因为我带去的都是些坏消息”。金日成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表示，如果毛泽东来朝鲜，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

П.尤金

№138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 声明草案(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1.关于在兄弟党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

(赫鲁晓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库西宁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应该把由苏斯洛夫同志准备的报告，作为经过中央赞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分发给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分发报告的日期——1957年11月11日。

2.关于兄弟党代表团会议的声明草案 [99]

(波诺马廖夫、尤金、赫鲁晓夫、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柯西金。)

声明草案是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的。

关于协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100]

坚持自己的立场。

进行会晤——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尤金。

关于致拉科西同志的贺词。 [101]

(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2076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 (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

第122号记录第2项

1957年11月10日

绝密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继续开展工作，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会议的声明草案进行协商。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63, л.1-2

№1382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 的修改(1957年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2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О.Б.库西宁、А.И.米高扬、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Н.柯西金、М.Г.别尔乌辛、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关于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和会议的组织问题。

安德罗波夫、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伏罗希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

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关于对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报告修改意见。

委托同一委员会形成可以接受的修改意见。

与中国人进行商议。

会议定于1957年11月14日上午11时开幕。

委托就会议开幕事宜征求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明确会议的工作程序。

代表苏联共产党的是——中央主席团委员。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8, л.29

№2076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 草案(1957年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2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苏共代表以及会议的组织问题。

第125号第1项

1957年11月12日

1.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和候补成员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

2.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按照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提出的并可能会被接受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的文本，并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文本的内容进行协调，以便形成决议草案。

3.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4日上午11点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4.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5.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并把其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代表。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64, л.1-2

№20606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1957年11月12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3日

第122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同金日成同志谈话纪要

1957年9月 [\[102\]](#) 12日，同金日成同志会面。他讲述了会见毛泽东同志的情况；并通报了代表团在即将会见赫鲁晓夫时准备提出的问题。

金日成同志说，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非常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毛泽东同志说，战后金日成同志已两次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们暂时还没有去过你们那儿。我们决定在近期向你们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然后，我打算亲自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怎么样？你们接待吗？邀请吗？”

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同他们的意愿完全一致，他们自己也打算在1958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日成同志在同我会见时还说，他们感谢中国朋友决定访问朝鲜民

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人民将会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友善的态度，真诚地接待中国朋友，接待中国的党政领导人。

金日成向毛泽东同志通报了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和有关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以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

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小集团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朝鲜人来到中国，给中共中央写信，片面地反映朝鲜劳动党内的情况，只讲朝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去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事，可以说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每一个党在工作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应该由他们自行改正。你们曾经犯过命令主义的错误，你们自己克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错误，我们做了自我批评，也请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克服了缺点。最主要的是，我们党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金日成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确认为“来朝”一事是干涉内部事务，但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好研讨，保持我们兄弟共产党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完全支持中共和苏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时，我们立即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政策。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在这件事上也支持我们。

接着，毛泽东同志建议，让8月中央全会后逃来中国的那些朝鲜人回去。金日成同志回答说：“我们不强迫他们。”

毛泽东同志向朝鲜朋友建议，考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论据是，这样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可以促使美国人把两个师从南朝鲜撤走。

金日成同志回答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这一建议。

在谈及即将同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时，金日成同志说，他们会向苏共领导通报有关朝鲜劳动党内部的问题，并交换意见。至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他们对朝鲜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援助表示完全满意。所以有关经济问题仅提出两点：

第一，我们要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每年向我们供应5000—6000吨棉花，而1958年的计划只供应2000吨。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我们本来想向中国朋友要求提供12000吨，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提供这个数量，现在他们只能提供8000吨。如果没有这样的援助，我们就无法完全满足平壤纺织联合企业的要求，如果棉花供应保证的话，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1亿米的棉布。我们现在正研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产棉基地以及增加人造纤维的产量。但暂时还未能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苏联的援助。

第二，关于建立军队的后备资源，以防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入侵。根据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难再建立军用后备资源。所以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苏联的国防计划中考虑建立后备资源：燃料、汽车、武器装备、弹药等，以防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到军事入侵时能向朝鲜人民军提供这些物资。

金日成同志还告诉我说，他同法共代表团的领导谈过，他们预定于1958年派出法国共产党访朝代表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还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同意斯托伊科·基弗同志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接着金日成同志特别强调向赫鲁晓夫同志致敬和衷心地感谢，感谢他同意并愿意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向苏联党政代表团展示，朝鲜人民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他们如何使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还将认真地听取赫鲁晓夫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各种意见和意愿。

会见结束时，金日成同志通报说，在各种会议和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他们想马上回到朝鲜去，以便尽快地召开有广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全会上，金日成同志将作报告，介绍党政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情况，传达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以及这些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他们认为这非常重要，可以动员党和人民去胜利完成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项任务。

文件6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巴托利舍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
费德林同志、书记处、档案室

第2172-ДВ号

1957年11月13日

АВП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251-254

№08881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 通事故(1957年11月19日)

机密

副本，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

1957年11月19日0时15分，苏共中央办公厅汽车队的司机B.M.伊柳欣，驾驶着一辆吉斯110型汽车，车内坐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彭德怀元帅和其他人，沿着伏龙芝大街向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大门方向行驶，行至十字路口时遇黄色交通信号灯，它没有让行正在通过十字路口的由司机П.И.塔塔拉什维利驾驶的“胜利”牌汽车。

两辆汽车相撞，结果是造成了汽车的某些技术故障。

事故发生时车内人员没有受伤。

事故正在调查中。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92, л.256

№26346 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 (1957年11月19日)

1957年11月20日

第02429/TC号

绝密

文本第36份

毛泽东与A.A.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今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毛泽东同葛罗米柯的会谈。

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首先回顾了1949—1950年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的几次会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他说，苏联的外交官“不仅为自己战斗，有时还不得不为我们大家而战斗”。毛泽东指出：至于我本人，我一向支持你们，不错，“是在你们背后”。

葛罗米柯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事务中，苏联代表都感受到人民中国的支持。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人民中国总是无形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接着，毛泽东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在同美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中国力图“离美国更远些”。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以下基本方针：在今后10—15年内中国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方针对中国有利。“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实现这个方针。他指出，美国想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对我们有利。他开玩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杜勒斯成了兄弟。他接着说，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即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或在国内势力的影响下，美国将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并试图渗透到我国大陆来”。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定的困难。

毛泽东继续发挥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虽然我们公开声明愿意同

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甘心情愿，因为在个别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甚至弊大于利。中国在政治和人口方面是个大国，但在经济方面是个弱国。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同我们建立官方关系并渗透到中国大陆来。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和70万资本家及其家属。在这些人中，大部分赞成社会主义。但其中一部分是右派分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中国在经济方面还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因为中国没有必需数量的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缺少外汇。根据这些原因，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中国有利。杜勒斯的对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效劳。他不想承认我们，这使我们很高兴。如果这样长期拖下去，比如说，拖半个世纪不承认，到那时就有可能赶上美国。在经济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看来需要十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钢的年产量为520万吨；美国为1亿吨；英国为2000万吨；德国为2000万吨；法国1600万吨；日本1000万吨。意大利的钢产量大体上和中国目前的水平差不多。因此，意大利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毛泽东强调说，从上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定地奉行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他问葛罗米柯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葛罗米柯答：中共的这个方针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他补充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方针同苏联以及中国其他朋友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矛盾的。他们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关于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从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也强调这一点，并批评那些不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的顽固立场。

然后葛罗米柯同毛泽东就美国对中国最近的对外政策有何反应问题交换了看法。葛罗米柯强调指出了这一情况，即中国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的坚定的原则立场，迫使他们像尊重实力和毅力一样尊重人民中国，尽管他们非常敌视人民中国。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再次指出，中国丝毫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在日内瓦的大使级谈判可以进行20年。我们完全可以等

待。他接着说，大家知道，在朝鲜同美国人也谈了两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直到朝鲜和中国军队在前线打了胜仗，美国人才不得不同我们达成协议。

葛罗米柯接着指出，根据他在美国期间形成的印象，美国统治集团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现在未必会采取实际步骤，因为他们害怕，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表现，从而对美国的整个政策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这种心态就更加突出了。在裁军谈判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在整个对外政策方针有可能破产的威胁下，害怕作任何让步，认为这种让步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会使许多国家离开他们，从而动摇他们操纵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指出，这样认识和评价美国人的情绪是正确的。他接着谈及中国对英国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反对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措施，避免同英国接近。英国对中国大体上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毛泽东在回顾中英建交的历史时指出，在初期，英国极力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建立半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代办级代表的协议。英国人对此也很满意，他们立即往北京派来了代表。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长期没有派代表去伦敦。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专门找周恩来商谈这个问题。因为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了比美国进步的立场(他们甚至同意在越南停火)，中国才决定派代表去伦敦，为的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同英国之间的矛盾。

然后毛泽东指出了英国对中国的前后矛盾的立场：英国一方面主张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的确，他们在表决时有时弃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不赞成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毛泽东说，我们一贯坚持，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在联合国应像苏联和印度那样去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才同意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毛泽东说，至于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我们不主动提出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同他们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时都提出一个主要条件：要求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她承认问题上追求两个目的：使这些国家摆脱美国并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

葛罗米柯请求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时，是否提出必须承认准许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个条件。

毛泽东答，主要的条件是断绝同蒋介石政府的联系和把它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他说，英国同意第一条，但不赞成第二条。因此，中国同英国只建立了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中国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他同时举出最近在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坚决声明，在蒋介石集团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将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说，苏联在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代表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可以再等15年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到那时中国钢年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据波立特同志讲，再过15年英国的钢年产量只能达到3000万吨。由此可见，再过15年中国将超过英国，苏联将超过美国。他对葛罗米柯同志说，站在我们共同的这样的“钢的讲台”上，你的工作将会轻松些。这里还必须加上中苏两国众多的人口。

毛泽东通报了中国钢产量增长的极高速度，来证明中国达到钢产量的上述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他说，在过去，中国于1943年达到的最高钢产量是90万吨，其中大约80多万吨是在日本企业家手里，大约4万—5万吨是蒋介石那里生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同1943年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产量大大减少了。目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年产量将达到520万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2000万—2200万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3000万—3500万吨，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4000万—4500万吨。毛泽东在强调了中国的钢产量增长的良好前景后指出，苏联的钢产量是高速增长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是如此。他说，在这样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毛泽东在谈论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不需要寻求外部销售市场。

葛罗米柯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裁军问题。他强调说，在裁军问题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美国的处境是复杂的和微妙的。葛罗米柯说，

一方面美国拒绝同中国直接进行谈判，不同意让中国参加谈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回避涉及中国的裁军问题。因此，在谈判中讨论裁减大国武装力量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应当讨论四大国裁军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不能解决涉及中国的任何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在今后也是可以采取的。葛罗米柯想知道中国朋友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有何看法。

毛泽东指出，苏联拒绝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是讲原则的。他接着说，中国没有参加裁军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国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比较自由，不受任何条约和协定的约束。现在，如果邀请我们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或某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我们还要等一等，等他们邀请三四次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值得参加。”不错，我们的这种立场很像“贫穷人的立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志气，有原则。

毛泽东接着说，在同任何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一贯遵守完全对等的原则。在这里，他提起邀请美国记者访问中国那件事。毛泽东说，去年曾允许一批进步的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搞臭坚决反对访问的杜勒斯的政策。后来，美国国务院禁止这批记者访问中国。今年杜勒斯试图组织另一批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坚决要求遵守对等原则，随后在日内瓦大使级谈判时提出讨论这些问题。美国拒绝这样做，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

然后毛泽东谈及在中国关押的美国人问题。他说，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刑满释放。某些友好国家的代表曾建议我们释放所有这些美国人。其中一个为尼赫鲁，另一个为莫洛托夫。毛泽东说，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因此他劝我们释放在中国关押的所有美国人。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刑满以后再释放这些人。毛泽东说，很遗憾，这种人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大约只有10个人)。如果有400—500人就好了。

葛罗米柯说，中国朋友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原则立场日益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代表人物对中国的尊敬。

毛泽东问葛罗米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如何，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接触时是充满信心呢，还是没有

信心。

葛罗米柯答，他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最近时期不如以前有信心。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增长。由于苏联最近在科学技术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这种心态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表面上还很自信，装腔作势，神气十足。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于12月前来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满意，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毛泽东接着简要地表述了他最近在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问题的某些想法。他强调说，从1946年起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多。毛泽东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还未取得胜利，希特勒灭亡了，欧洲建立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他说：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比西方强大。希特勒被打垮后，美国人来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比苏联强大，特别是他们投过原子弹。当时我写了篇文章，强调说，如果美国进攻苏联，他们不会赢得任何胜利，只会付出巨大牺牲。

毛泽东说，必须强调指出，美国最怕死人。如果打死几百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们伤亡200万—300万人，那就等于美国的灭亡。因此，他们不敢进攻我们。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他们能够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付出任何牺牲和代价。毛泽东说，他认为，美国力图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依附于他们，占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的领土。他们想不通过战争去奴役这些国家，在那里建立基地，同这些国家签订政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他们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反苏反共的旗号下进行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矛盾：

1. 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恢复了英国和法国的国力，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现在他们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反对苏联，而是反对他们。毛泽东说，这些国家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他们同美国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据此，在兄弟党会议宣言中，有意识地没有把美国同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如波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同苏联同志协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的打击目标应集中在美国身上，从而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

深。

2.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前殖民国家和美国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有13亿，其中7亿人生活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等)。

毛泽东还指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取得独立。前殖民国家在那里还保留了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举埃及为例。他称赞了纳赛尔把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银行资本实行国有化的勇敢行为，他同时强调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铁路和其他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实行国有化。仍然保留了英国和法国垄断资本在苏伊士运河的某些利益。毛泽东接着谈到埃及的财政困难，他说，纳赛尔本来指望，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完全弥补经营和完善运河的开支，并提供建设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但现在可以看出，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毛泽东随后指出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说，纳赛尔在对所有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还不够彻底和坚决。他预料，美国会利用埃及的经济困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葛罗米柯通报说，埃及人现在还向苏联请求提供贷款。

毛泽东指出，“请你们提供贷款，这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很难指望，埃及在经济方面会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尼赫鲁对外国在印度的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同样也不彻底。虽然他已大张旗鼓开始干起来，但后劲不足。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印度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比其他中立国家强大。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说，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只增长30万吨，而中国增长了330万吨。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即印度在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英国资本，有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在继续发挥他的想法，他说，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主要靠自力更生。不错，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2亿卢布贷款。毛泽东指出，这批贷款一部分已经偿还，大部分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偿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还清苏联的债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分之一用于经济建设，购买各种设备；三分之二用于朝鲜战争，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中国将用自己的国内积累逐步偿还债务。今后我们打算“避免从苏联取得贷款，因为除我们以外有许多国家向苏联请求援助”。他说，中国不

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借一分钱。

毛泽东接着再次叙述了他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已经谈过的关于如何满足中国政府的各种请求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态度：

1.满足中国方面的一切要求。他说，苏联同志的想法是这样做可以不得罪中国人，不会搞坏同他们的关系。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恶化同苏联的关系”。还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部门领导人并不经常了解本国的全部情况，总想依赖别人过日子。需要教育他们，使他们一方面依靠苏联，但同时又不力图依赖苏联。这里他又指出，不仅我(毛泽东)依靠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同志，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我。“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2.对我们的请求持较严格的态度。“对我们的请求也许只需要满足一小半，或者至少需要减掉30%”。应当做到，使中国有关部门“不因吃得过饱而感到腻烦”。对中国方面的请求持这样严格的态度，可以迫使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更认真地考虑如何解决内部困难。这里我们不应忘记苏联人民当年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困难中才能锻炼人”。

毛泽东在此讲述了中国经济部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项建议。他说，前年中国的棉花大丰收，使得去年的棉布产量大大增加，因而提高了居民的棉布供应量。每人棉布供应量定为12米。他强调说，对于中国人，这样高的定量是空前的。但在确定这个定量时，没有考虑到以后棉花歉收时如何办。到1956年，棉花收成不好，我们的经济部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棉布的缺额。因此，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提出了今后5年平均每年从苏联购买5万吨棉花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北京讨论过，当时我在杭州休假。我们的同志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提出，因为那时你们正开展反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斗争。

在回到北京后，我反对我们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这个建议，向他们指出：“不应再麻烦苏联同志，因为苏联不仅要满足国内的棉花需求，而且还要满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棉花需求，此外还要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必要的外汇。”最后我们决定不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请求，为了解决困难，把每人的棉布供应量由12米减到9米。的确，这个决定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毛泽东在谈及棉花困难时还说，去年播种面积减少了20万公顷。他

指出，这项临时措施是因粮食作物面积太少而采取的。从明年开始，中国打算重新恢复原来的棉花播种面积，并采取措施提高每亩棉花的单产，并增加合成纤维的产量。

在会谈中毛泽东广泛地谈论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意义。他说，应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大规模的慷慨援助，把它用在主要的工业项目上。他强调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提供过这么大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德国、捷克、波兰)也向中国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远不能同苏联的援助相比。苏联同志公正地指出，在中苏两国经济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当前这样大的贸易规模。

然后，毛泽东在谈及中苏两国外交部的工作时强调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中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通过两党中央解决的。苏联外交官的主要精力看来需要集中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他接着说，我们给我国外交部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对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尚未认真对待，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葛罗米柯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确实具有党的性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下，苏联外交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中关系，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同时通过某些对外政策措施动摇帝国主义阵营。

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任务同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吻合的。

葛罗米柯赞扬了中国朋友对印度、印尼等国进行的大量的有益工作。苏联代表在国外的活动中经常体会到这些工作的效果。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原则上不同于兄弟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前一种关系主要是在党与党之间发展的。兄弟国家的外交部在发展和巩固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预祝苏联外交部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他说，很明显，“没有莫洛托夫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去”。

葛罗米柯说，没有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更好些，因为他妨碍了苏联外交部及其在国外机构的工作。他是党肩膀上的沉重包袱。尽管他本人认为，没有他天会塌下来，会落在地上。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毛泽东赞扬了上述说法。他说，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大家都会因此而遭殃”。

葛罗米柯列举了一些事实，如：莫洛托夫实际上曾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和东德让给帝国主义，他曾建议把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华沙条约之外。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莫洛托夫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接着，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那时他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半月。他说，在此期间，“我同斯大林吵过几次”。斯大林憎恨我。在一次会见中，他(斯大林)组织了对我的“攻击”。第一个开炮的是莫洛托夫，第二个是贝利亚，斯大林最后作总结。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大体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说，他们还表示担心，在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铁托”。毛泽东指出，当时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是这次谈话的见证人。参加这次会见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极力使斯大林等人相信，在中国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毛泽东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基本上保持沉默，只是“内心里讥笑他们”。我不想反驳他们的说法，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毛泽东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不敢扣押我，最后为了挽回局面，才签订了1950年2月14日的条约和其他协定，把中长铁路还给了我们。

毛泽东强调说，对于争论的问题，斯大林不愿倾听我的意见。有一次他甚至扔掉了电话筒，中断了同我的谈话。另一次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已委托米高扬同我谈话。毛泽东说，当时曾想“让我们吞下两个我们不愿意吃的苦果”。第一个是所谓合营股份公司问题；第二个是最难忍受的问题，即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叙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说，当时蒋介石组织了对上海的疯狂轰炸，企图摧毁那里的工业企业。我们请求斯大林派一两个空军师去保卫上海，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问：“我们能否把新疆和满洲看作是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原来是这样，只有在我们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苏联才会派两个空军师去上海。

关于这两个“势力范围”问题，是指在上述地区只能允许中国和苏联

公民居住，禁止第三国公民在那里居住。毛泽东接着说，在谈判时我问莫洛托夫：对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如何处理呢？在东北有150万朝鲜人，而且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莫洛托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此外，在哈尔滨还有相当多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新疆南部有巴基斯坦人(大概200—300人)，他们在那里经商。我们根据同斯大林达成的这个协议，不得不把巴基斯坦人赶出新疆。

从前只有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过这种做法。我认为，斯大林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东北和新疆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事件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搞坏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骂铁托是法西斯分子，是刽子手。

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功劳占70%，错误占30%。或许，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将作出另一种评价。也许认为他的错误占10%，但即使在这10%的错误中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苏共中央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做法好像揭开了我们身上的盖子，消除了宗教式的迷信”。毛泽东说，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我们不完全同意你们，主要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初期，没有适当地确定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的范围。不错，在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明确些。“由于这个补充，我们双方的观点接近了”。

葛罗米柯问毛泽东：是“接近”，还是“一致”？

毛泽东答：是“一致”。然后他说，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比较大，还是错误比较大，讲得不够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同斯大林本人有关，而且同苏共全党、同2亿苏联人民有关，因为在斯大林生前的30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功劳是同苏联人民、苏共、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相联的。这种联系正确地反映在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议上也公正地谈到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在此强调说，苏共中央、苏联领导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不仅一次地谈到斯大林的活动，实际上既谈到他的功劳，也谈到他的错误。他说，他本人认为，确定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的准确比例和用比例来表述是困难的。采用这种方法有陷入机械主义的危险。既肯定他

生活和工作中的正确方面，也认清他的错误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即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为确实“不能用斤两来衡量功劳和错误”。他表示相信，历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接着又说，在中国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或许历史学家将来纠正我们。总的来看，在评价斯大林方面，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接着说，苏共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同时他强调说，这个问题是在同中共中央密切协商中解决的。他援引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商谈的经过。

毛泽东说，中国代表随时准备前来莫斯科，以便商谈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如这一次，当需要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召开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立即来到莫斯科。

毛泽东强调说，今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许多问题，我们的同志，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陈云，任何时候都可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毛泽东在这里对陈云的评价很高，说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是杰出的“经济管理领导人”。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说，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很好的措施。例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清除一切不愉快事件和积垢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我们吐出了当年强迫我们吞下的那些苦果”。他接着说，中国赞赏苏联同志的工作作风有很大改善。这种改善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国家。

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中央之间以及其他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称赞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兄弟党会议上。开会时考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团结一切力量。毛泽东问：难道斯大林在世时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说，当时“兄弟党”仅仅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实际上斯大林是父亲，我们都是儿子。

中国对苏联国内的变化也很高兴，从前，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对他提出一句批评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都向我讲过。

毛泽东满意地谈到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时所受待遇的重大差别。他说，这次我于11月2日来到莫斯科，11月3日就同苏联领导同志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在那次会谈中特别提到，斯大林同兄弟党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比作“父子关系，或猫鼠关系”。“你们苏联同志正确地指出，更像猫鼠关系，如果说像父子关系，那么就不是欧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而是封建专制和父权至上的亚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

毛泽东在回到斯大林评价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个优点，就是不固执己见。过一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同意他曾经反对过的东西。例如，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他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革命。朝鲜战争开始后，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156个企业的协定等。对此，中国人民感谢斯大林，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

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些友好行动符合苏联人民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毛泽东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相互热爱和尊重的。“我们和你们是全天候朋友，即使当年你们扣押了我，刘少奇仍然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

毛泽东接着说，我应当向斯大林在天之灵表示歉意，尽管在他生前我们俩吵过架。当然我们没有采取南斯拉夫人的做法。南斯拉夫人在回敬斯大林的谩骂时，指责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无疑，应当承认，当时犯的错误是局部性质，从全局来看，苏共和苏联还是正确的。在评价一个党的全部活动时，应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说，对中共的活动也需要进行分析。总的来看，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这里列举了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高岗的反党活动。他强调说，“在苏联有个莫洛托夫，在中国有个高岗，高岗是个可怕的人物”。他指出，高岗在自己周围联合了100多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东北。在中国6个大行政区中，在4个大行政区都有他的代表人物。高岗的这些追随者后来承认，他们曾试图把陆军、空军、海军的领导干部拉到自己方面来。毛泽东说，高岗分子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分子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分子清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该“打倒我了”。值得注意的是，高岗在最后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我

的健康状况。“有一天，当他得知我的身体不好时，他立即从南方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高岗受到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看来还有马林科夫的信任。高岗曾背着中共中央向贝利亚集团提供秘密情报。毛泽东还说，贝利亚的代表戈格里泽 [103] 为此目的曾秘密到东北同高岗会见。

毛泽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早在1949年，刘少奇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曾经商谈：在兄弟国家不搞情报活动。斯大林同意这个建议，并于1951—1952年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发了文件，说在兄弟国家不再搞情报工作。毛泽东说，但这是一句空话。“其实，在贝利亚被枪毙以前，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

毛泽东说，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都属于斯大林那30%的错误。中国有一切理由对斯大林不满。我们的不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国革命在1930年代遭受到巨大损失，丧失了90%的革命力量。在那些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伤亡惨重的长征。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苏联治病的王明本人会讲得更清楚。不过，他本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在1945年，“不允许我们革命”。当时斯大林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们一个指示：不要开始打内战。原来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过分工。罗斯福负责劝说蒋介石，斯大林负责劝说共产党。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在指示中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内战，“他将袖手旁观，其后果不堪设想”。还推测说，“整个中华民族将要灭亡”。毛泽东指出，我们“没有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蒋介石分子首先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妨碍了中共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开始夺取政权。

3.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本身受到怀疑。猜测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铁托分子，是亲美分子”。毛泽东说，对我们的这种怀疑直到朝鲜战争后才得以消除。

毛泽东说，确实，关于对斯大林的不满，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为的是不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使他们用来在中苏间制造分裂。在刚刚结束的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不能讲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帝国主义可能从这里了解到许多情况，并用来损害我们的事业。因此，在会

议上我们只讲对斯大林的不满，但不讲为什么不满意的细节。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即他回忆的这些具体细节如果公开讲出去，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关于中共中央的这种不满，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除中共中央委员外，中共一般党员也不知道。毛泽东指出，不错，由于国外发表了雅尔塔会议的文件，中国有人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也有人从杰吉耶尔写的铁托传略中看到这个协定。在这个传略中还有关于雅尔塔会议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材料。

葛罗米柯就此问题对毛泽东说，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引证的那个文件，说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似乎达成了协议。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查证，这个文件没有发给苏联，当然苏联也没有答复。葛罗米柯指出，在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通信集中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而且英国人对此解释也没有提出异议。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南斯拉夫同志应该注意到这个情况。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祝贺苏联外交部在加强苏中友谊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再次强调说，中国和苏联是“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表示希望葛罗米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O.B.罗满宁

发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里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科罗特琴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毛希丁诺夫、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马林、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佐林、谢苗诺夫、费留宾、费德林、波采罗布、察拉普金。

文件3份，送：情报委员会、远东司、档案室

共印39份，1957年11月20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葛罗米柯

1957年11月20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0а, п.1, д.423, л.1-22

№24940 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1957年11月23日)

会议主席：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B.A.热利科夫斯基。

杨显东(Ян Сяньдун)同志：我想谈一些总的看法。昨天我们对文本进行了研究。我们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机械化应该迅速发展，另一些人不认同这一点。中国农业机械研究所在8月份刚刚成立。该所的干部还很少，只有30名前不久才毕业的科研工作者，其中3人从事农业的电气化研究。由于中国缺乏干部，苏联专家很难开展工作。我们的农业工作者认为可以扩大合作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应该被逐步实现。另有如下5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在被列入合作计划中：1.化肥问题；2.土壤改良问题；3.棉花栽培问题；4.养羊业问题；5.家畜疾病防治问题。

如果4个课题被纳入农业合作的总计划中，那么机械化问题就占了很大的比重。

现在两国之间和两国的科学院之间已经有了合作计划。两国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首要的问题，而两国科学院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次要的问题。

汪道涵同志：机械制造研究所在3年前成立，干部的培养还不够。我了解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全面的。机械制造部要在农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因此，必须考虑到农业部的要求。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需要，还要考虑能力。我认为，为制造和研究一些新的机器并建立农业机械体系的类型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一项研究

工作。很明显，主要的是前两个题目。在此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农业电气化的问题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到对中国的电力资源进行研究，需要考虑到对农业中电力的应用开展科研工作。

现在面临如下两个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把国家计划和研究所和科学院的计划相分离。现在必须对中国完成工作计划(首先是1958年的任务)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不能把国家的计划同研究所的科研计划混合在一起；也不能把五年计划同1958年的计划混在一起。

能否把4个问题合并为一个总的题目？在总的题目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合作形式。在此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可以完成这些计划。因此，需要把提出的要求和完成计划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讨论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明白如下看法：机械制造部比农业部有更多的机会。从形式上来制定计划非常复杂。这份文件在保留其内容的同时，需要被制定得更加简单。我建议大家对其进行审议，并再次对其进行总的评价。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们制定12年计划的原则的出发点是，要使科学能够解决的不是生产在今天提出的问题，而是其在明天和长远的将来提出的问题。

两国之间的合作计划可以像汪道涵和杨显东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制定，也就是说，部分题目应被纳入同列宁科学院签署的协议的草案中，而第二部分的题目应当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最终决定，哪些题目应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而哪些题目应当被列入科学院的计划中。

考夫曼同志：我觉得，把五年计划同科技合作计划割裂开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科研计划要服从于一些主要的生产任务的解决。看起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的各领域大规模地推广机械化，其中包括推广最简单的机械。或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最初阶段将会依靠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得到的技术。我认为，机械制造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中推广技术以及对今后机械化发展的机器的类型作出正确的选择是重要的。在此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各方面的帮助，提供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通过有计

划有步骤地作出指示，专家参与新机器的试验，中国专家参加苏联机器试验站的工作等等。

杨显东同志：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克拉斯尼琴科同志：中国的同志们同意，中国今后应当建立起对机械的系统使用。如果不能安排好机器的试验，如果不在中国的农田里对国外的农业技术进行研究，那么就无法实现机械化。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农业机械领域工作的专家的数量需要扩大。

布兹科同志：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农业发展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从1956年开始，机械制造部门、农业部门应当在开展广泛的试验和研究工作之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定出农业机械化方案。并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逐步而坚决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科技干部和试验干部，迅速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我们认为，举出的合作题目应当会促进所提出的任务的实现。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在苏联，新的机器的研制都以一些专门的学科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向我们一样发展那些基础学科。苏联关于机械化问题研究的所有资料都可以转交给你们。

洛佐夫斯基同志：或许，三个问题都可以合并为一个题目，名称为《新型拖拉机、农业发动机、农业机器和工具，其中包括适应中国各地区需要的供牲畜耕地使用的工具的试验、研究和设计》。第二条可以分为三节：1.新机器的试验；2.耕作机械的研究、设计以及理论问题的研究；3.为机械体系的制定挑选材料。或许，要一一列举，需要就哪些机器开展工作。

杨显东同志：我们同意。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根据布兹科同志的提议，我们增加了关于农业电气化的条款。

国家拖拉机和农机维护工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利瓦诺夫同志提议把对机器的磨损和修理问题的研究列入合作计划。

汪道涵同志：机器的修理问题非常复杂，不应列入该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委托洛佐夫斯基同志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制定新的文本，我们在制定完之后将在今年11月25日交给中方代表团。

杨显东同志：而对于专家的人数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在协议中指出？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认为，关于专家的水平 and 数量这些问题需要另外解决，需要弄清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来解决问题，这样将更妥当一些。

汪道涵同志：我们认为，第一批高水平的苏联专家应当在1958年第二到第三季度派到我们这里。

洛佐夫斯基同志：这一点可以写下来。

决定：

1.承认应当把最初的三个题目以及机器的磨损、修理和开工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2.电气化问题应当同动力工程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3.根据本次会议第一项和第二项决议，制定新的合作计划的草案的文本。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07, л.33-37

№20609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1957年11月26日)

1957年11月2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26日

第286号

平壤市

1957年11月26日

应邀拜会了南日。南日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听取了金日成关于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之行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团所做的工作。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对代表团领导的各种会见结果，特别是会见了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表示十分满意。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今年12月5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听取金日成关于莫斯科之行，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结果和会议通过的公报和和平宣言等情况的报告。全会将邀请各相等中央机关的领导，各道的主席、各郡党委的主席和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出席，还邀请驻外大使参加。全会以后将召开祖国战线扩大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

初步研究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时间问题。常务委员会研究的结果认为，来访最合适的时间为4—5月间。

党代会看来将在明年2月份召开。

我问，金日成拟什么时候访问中国和越南北方？南日说，看来要到1958年10—11月间。

南日代表金日成邀请我，参赞克留科夫和舍斯捷里科夫、武官季亚科诺夫以及外交部工作人员托尔宾科夫出席于今年11月29日为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而举行的午宴。他还问，还应该邀请谁？

我建议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博钦，南日表示同意。

在同我的谈话时，南日严肃而又表示信任地对我说，在莫斯科，金日成同毛泽东两次谈话时(有金昌满和他(南日)在座)，对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事十分注意(见1957年11月27日我的第655号电报)。

在同毛泽东的第二次谈话时，金日成说，彭德怀到别墅去找他，同他谈了很长时间。毛泽东说：彭德怀去您那儿了，很好，他还没有来得

及向我汇报同您谈话的事，但我要告诉您，彭德怀讲的不都是事实，所以彭德怀讲的不一定都是中央的意见。只有我(毛泽东)讲的才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南日还说，目前外务省正在草拟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8年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信件，还在草拟为建立高频通信一事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信件。至于苏联每年向我们提供500吨棉花的事，已授权目前在莫斯科的我们的代表团在缔结贸易协定的谈判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至于赫鲁晓夫在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请南日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也起草一封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式信件。

南日表示同意。

АВІРФ, ф.0102, оп.13, д.5, л.322-324

№20422 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1957年11月29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月20日

第34/ГК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会谈记录

1957年11月29日

应杨秀峰之邀，我们在中国高教部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杨秀峰部长谈了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高教部所面临的一些新任务的决议。

会谈伊始，杨秀峰便谈了关于与中国高校里的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中国共有230所高校，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其他部门的高校在内。高教部目前掌握了112所拥有27万大学生的大型高校右派分子的基本资料。在这些高校中右派分子近9400人，约占学生和教师总数量的3.5%。在北京的81所高校中右派分子比重为4%，即略高于上述全国

高校中右派分子的总体比重。在全国所有大学教师中右派分子比重为6%，在教授和副教授中——10%—15%。在全国所有高校中共有教授和副教授8000人，其中右派分子约1000人。

与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证明，近2—3年来我们在中国高校中针对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

关于在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社会出身情况，杨秀峰同志列举了70所高校的相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在这些右派分子大学生中37.5%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此类右派分子许多都是被镇压者和反革命的亲属。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表明，在国内高校中我们在坚定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着不足，从而使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青年中个人主义和虚荣心不断蔓延。青年人不懂得如何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导致纪律松懈现象大量出现。部分青年公开对从事社会工作和学习中共政策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做这些事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以前我们在高校的教学和培育工作中只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必要性，而没有为这一思考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右派分子反对马列主义，并使大学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首先应当是一名专家，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与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针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的不足会导致其立场上的不坚定，从而使一些地方的右派分子能够乘机对部分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思想施加影响，并将其拉到自己一边。

直到最近以来，高教部的领导干部们依然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持续性问题没有充分的意识，虽然早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已强调过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右派分子的问题。尽管上级已发出了上述指示，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只是从业务(能力)方面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而对其政治观点关注不足。如果说在解放初的几年间许多大学教师们仍坚持政治学习、参加报告会和从事夜大学习等活动，那么在随后时期他们便开始逐渐放松了这方面的学习活动——对政治学习态度不端正，把政治学习放到次要位置等，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各地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大学教师们并非都能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缺乏战斗的主动进攻精

神。他们的理论素养不错，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和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无法很好地完成高校政治教育的任务。社会科学教研室往往是独立于党委、自行其是，党委对其领导薄弱。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只归罪于始终勤奋、诚实工作的高校教师和领导，也跟我们没有为其工作指明必要的发展方向有关。

大学教师们在课堂上只管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根本不谈其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

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大学教师只说中国也应当建设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高校，但与此同时却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实际。苏联专家向我们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例如在实验室的装备方面，他们便建议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一些实验所需要的物品，但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建议走捷径——从外国购买所需设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想走捷径，但最终结果却是花了许多冤枉钱，买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良好普通教育素养和强健体质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是新型的、具有全面素养——尤其是政治素养的劳动者。

我们的政治学习应当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学习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不能以牺牲政治学习为代价而只专注于普通教育科目。

应当培养我们的大学生热爱马列主义。如今，中共中央给我们提出的总任务——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培养红色专家的无产阶级高等学府。鉴此，我们党正打算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加强针对高校的政治领导工作，其中包括：计划从党和国家机关中抽调2000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各高校、科研和文化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决定由一些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党委书记亲自承担一门社会经济学课程。他们还要平均每月1—2次到普通高校发表演讲和在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生会议上作报告。

我们打算，在本学年原来4门独立的社会学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将由一门新课程来替代——“社会主义教育”。该课程学习将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为基础。

我们将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重新对所有社会学课程教科书进行审查。为了培养各方面人才，我们将在高校设立拥有不同期限的教学模

式。

1955年，我们撤消了工农速成中学，但现在又产生了重新恢复这种教育模式的必要。从前，这些中学的教学目的——只为培养和帮助工农青年考入高校，而如今我们打算部分青年结束了在这些中学的学习之后便可进入技术学校继续深造。从前，这些中学的学生在3年期限内必须学完6年的课程，但实践证明这一期限对于多数学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打算将此类中学的学习期限设定为4—5年。这些中学的教学模式将跟独立的高校一样，称作工农中学，类似于苏联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

与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知识分子的任务相联系，我们将对专业性的中等学校的工作进行重大的调整。进入这些中等学校学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优秀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如今，我们的高校和技术学校在接收新生时更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社会出身，并将与右派分子作斗争和工龄作为接收新生的参考。劳动阶级青年可以免试进入高校和技校。至于大学生的物质保障方面，我们打算给干部发放的助学金为原工资数量的100%，其他类型来自工业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原工资的70%。

中央全会已确定了大力加强大学生劳动技能培养以及将许多教授和大学教师发往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的方针。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将到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参加为期1年的见习劳动。

与国家的财政经济总任务密切相关，各高校将压缩管理机构并对干部进行合理的调整配置。各级党委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鉴于中央全会所作出的相关决议，我们确定了扩大基层机关权限的方针，这尤其体现在财政、干部和一些教学组织领域。

例如，中央所确定的教学计划只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给出一个基本的指导方向，至于细节问题则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必与高教部协商。中央所制定的教学大纲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各地方可以随机应变，只是必须遵照大纲中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在会谈最后杨秀峰同志通报说，国务院已决定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食用油供应定额标准。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一等秘书H.П.萨拉博金同志，中国高教部顾问A.Я.希涅茨基，以中国高教部翻译周同志。

杨秀峰同志允许(我)把会谈内容告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大学教师们。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分送：费德林、库尔久科夫、安德罗波夫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H.Г.苏达利科夫

1958年1月18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1-16

№08873 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1957年12月8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外交部现有材料获悉，在中国大连、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和其他城市保存有沙皇俄国各种机关的档案材料。例如，在大连市保存有阿穆尔沿岸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军区的秘密材料和文件；在沈阳辽宁图书馆里保存有大量的俄国文件材料(近14000份)。

上述文件反映着俄国同中国、日本和蒙古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中东铁路的历史、在华俄侨的生活、白卫军将军首领的活动等)。

所以，比较稳妥的做法是，通过苏联驻华使馆从中国朋友那里弄清这些俄国档案材料和文件转交苏联的可能性。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指望中国朋友们会很好地对待这一请求，因为不久前苏联把满洲档案和涉及中国的共产国际档案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A.葛罗米柯

H.杜多罗夫

1957年12月8日

第2597/TC号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3份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批准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归还俄国档案事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的电报

正如你们所知，在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其他一些中国城市保存有俄国的文献材料和苏联机构可能对其有一定兴趣的出版物。

请从中国朋友们那里摸清将这些材料和出版物归还苏联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科学机关的愿望，我们准备为他们留下所归还文件的感光复制品。

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一请求抱积极态度，请与他们商量我们派2—3名苏联专家去事先了解所说材料。

请禀告事情结果。

ГАРФ , ф.9401 , оп.2 , д.493 , л.29-31

№10497 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1957年12月14日)

为了加强中苏间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和紧密联系，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

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

二、讨论诸如务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武器生产方式之类的问题；

三、讨论技术规格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

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和援助的步骤、期限及数量；

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和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达到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的目的；

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与加强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

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九、研究一方向另一方的生产提供的技术资料的担保问题；

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

在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中国政府将授权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驻莫斯科商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及国防工业的交流和联系。在此期间，苏方由何机构负责此项事务将由苏联政府决定。

联合委员会在召开每一次会议前，每一方应向对方提供包括议程、事件表及补充材料在内的备忘录。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备忘录和记录都应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准备，并经双方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签字。

联合委员会讨论的所有结果供双方政府参考，若认为必要，政府将授权特定机构实施。

组织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费用均由会议的承办国负担，但是会议期间各个代表团的费用将由各自政府负担。

请考虑上述提议。中国方面希望了解苏联政府的反应。

АВПРФ, ф.100, оп.50, п.423, д.3

№08876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1957年12月1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已经查明，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保存的那些被缴获来的德国保安总局和德国秘密警察局(盖世太保)的全宗文件资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的内容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关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他们如何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等等文件资料。还有一些从德国杂志上剪裁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以及从一些反共产主义宣传手册和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苏联内务部认为，把附后的清单中所列出的文件移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适宜的。

附文件清单共4页。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1957年12月16日

附件：

机密

保存在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资料清单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其内容是：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关于加强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恐怖政策的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

装斗争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建立中国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关于向人民揭露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真实面目等。该文件是由中文译成德文的，由盖世太保机关翻译的。

年代：1931年12月2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16-19。

2.美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国新闻局机关报——《群星报》(中文版)。

年代：1935年8月1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212。

3.1930年在纽约开办的《中国先锋队》周报(中文版)。

年代：1936年10月31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242。

4.中国出版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册，被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反共产国际”运到盖世太保(中文版)。

年代：1937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236-312。

5.关于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内容的《中国新闻》传单(在巴黎用中文出版的)。

年代：1939年1月10日，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20。

6.由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编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名单。

年代：1939年1月，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48-74。

7.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盖世太保和汉堡不来梅经济情报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年代：1937年至1940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29-134；д.135，л.7682；д.445，л.102-127；ф.501，оп.3，д.227，л.124 136；д.393，л.104-106，110-133；ф.1257，оп.1，д.5-6。

8.驻中国的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件，其内容是：关于1938年9—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关于在中国散发号召参加革命斗争的传单；关于中国妇女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加强中国的罢工运动；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杀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

年代：1936年至1938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200，201；д.135，л.13-52；д.444，л.75-77；д.445，л.70-81，88-90，133-135，143-150，157-160；ф.501，оп.3，д.232，л.232-234，259，260，263-267。

9.从德国的一些杂志和报纸剪裁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例如，《世界报》、《共产国际》、《评论》、《红旗报》、《世界晚报》，其内容为：关于在中国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阵线，组建中国的志愿部队，开展释放政治犯的运动，关于中国人民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团结；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8年10—11月期间召开的扩大

会议的决议，集结力量准备总的反攻行动，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关于中国大学生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加强中国红军队伍的力量，加强国际无产阶级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大团结，声援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关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建立“中国友人”联合会以及在中国建立“苏联朋友协会”，等等。

年代：1928年至1942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3，4，6，9，118，135，137，211-220；д.135，л.9，10，56，57，117，122；д.136，л.10，11；д.444，л.46，208，209；д.445，л.8-10；ф.501，оп.3，д.227，л.28，42-54；д.394，л.49；д.232，393。

10.国民党支部在德国出版的简报：《新中国》和宣传册：《共产主义在中国》、《关于远东战争新闻之声》、《中日冲突》，等等。

年代：1937年至1939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444，л.21-45；ф.501，оп.3，д.227，л.210-221，277-280；д.395，л.3597。

11.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手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由“反第三国际联盟常设局”出版)、《共产国际在满洲国的阴谋》(由“反共产国际”组织出版)和从反共产主义杂志《大陆共产国际》上剪裁下来的关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容的文章。

年代：1932年，1937年，1939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00-115；д.444，л.2-14；ф.501，оп.3，д.394，л.54，55，59，71。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

Г.别洛夫

1957年12月10日

ГАРФ，ф.9401，оп.2，д.493，л.43-47

№2061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17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2月14—20日

第308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2月17日

应邀拜会金日成。在谈话时，金日成向我通报了以下问题：

第一，今天我们通过中国大使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中国朋友提议将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提出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的程序。主要是：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要求于1958年内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致函联合国，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离。在1948年就是这么办的，当时我们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撤出苏军，同时致函美国政府撤出美军。苏联政府立即同意，并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南朝鲜，美国的撤军拖延到1949年中期。朝鲜和世界舆论在苏联一边。我们认为现在也是这样，中国朋友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南朝鲜人民和全世界舆论都将给美国以强大的压力，坚决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第二，我们向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在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时间是5月份。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4-19

№2061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20日)

1957年12月2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1957年12月14—20日

第308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2月20日

在我们使馆举办的苏中友好晚会上，我同中国大使乔晓光谈了话，是乔大使主动找我谈的。

乔大使说，在莫斯科期间，金日成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于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发出了正式邀请。现在收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允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回音。代表团将于明年5月来到朝鲜，到达的确切日期以后再进行协调。周恩来将参加这个代表团。

鉴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这次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我也向大使通报了金日成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赫鲁晓夫在同金日成交谈时已表示同意派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随后，乔大使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大使说，金日成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意毛泽东关于在1958年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的建议的决定通知了他。撤出志愿军的工作将于年底完成。乔大使继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离，从军事角度说，有可能很快地在南朝鲜和美国的侵略行为上得到反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无妨，因为军队只撤离到鸭绿江的对岸。这时大使又说，对朝鲜同志来说，在国防方面的确有些问题，因为东部的分界线从开城到黄海，西部从开城起，还有沿海地区，现在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守卫。

大使认为，志愿军撤出朝鲜在政治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以使朝鲜居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产生的不正常情况得以结束，这是由于后者违反了军纪引起的；同时还可以让世界舆论更坚决地要求美军撤

出南朝鲜。

对大使所说的这一举措的重要性我表示同意，并说，金日成回到平壤后曾说过，打算在1958年1月同防务相一起亲自去停战地区了解军队部署情况。我顺便问乔大使中国志愿军在朝的大致人数。

乔大使说，志愿军大概有30万人。

乔大使最后说，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谈话时，毛泽东曾建议，要朝方派人到中国去，说服去年逃往中国的朝鲜人回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需要这些人。大使补充说，从某些朝鲜领导人处得悉，这些人已被开除出朝鲜劳动党，并已吊销了国籍。

谈话由大使馆随员M.库尔巴茨基翻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20-22

№23033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 谈话纪要(1957年12月27日)

机密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向您呈送与中国文化和宣传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沈雁冰、钱俊瑞和阳翰笙等同志的会谈纪要。这些会谈都是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的内容是关于改善我们对中国的宣传工作，协调苏中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委员会考虑了中国朋友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并在无线电广播管理总局、苏联新闻局和《苏中友谊》杂志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等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朋友们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

Г.茹科夫(签名)

1957年12月24日

第899号

附件：

与中国文化和宣传领导干部钱俊瑞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1957年11月25日

Г.С.茹科夫同志与钱俊瑞举行了会谈。根据事先约定，他向钱俊瑞提出了关于中国反右斗争的结果的问题。

钱俊瑞同志的通报如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是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活动日益活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右派分子的积极活动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不满。钱俊瑞说，这只是内部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这还与国际形势有关。

由于苏共二十大开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活动，国际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批评”的恶浪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也卷了进来。众所周知，在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认为社会主义还不够稳固，因而可以在中国与之开始斗争。以上所述便是中国右派分子活动猖獗起来的国内外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国内的形势，就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所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问题，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利用这一口号，他们攻击中共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在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的同时，右派分子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让所有花开放，让所有学派都争鸣”…… [104]

众所周知，今年4月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口号。右派分子谴责了这一口号，并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诬蔑性运动。

中国右派分子包括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部分代表。在中国，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估计有500万。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拥护与中共的合作，我们称这一部分人为知识分子的左翼；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间派；第三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并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部分人数较少，并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右翼。在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的拥护者约占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人数的5%。

也正是这5%的知识分子右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原因在于，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右派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虽然少部分资本家也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但他们没有胆量加入到这一斗争之中。

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自己暂时具备了精神方面……政治资本，因而便采取了反动的立场。他们认为，党在科学、教育、艺术、技术……等方面的领导作用是薄弱的。因而，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们对党的领导地位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右派分子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罗隆基、章乃器，右派分子指责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情况甚至连国民党时期都不如。

右派分子组成了联盟。民主同盟、工农民主党、“九三学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党派的许多活动家均加入了该联盟。他们还与共产党内部的反党分子相勾结。

这导致右派分子在国家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异常活跃起来。反党分子丁玲等人与右派分子一起，在文学战线上组织了对党的攻击。右派和反党分子还在文学和中国作协领导部门发表

反党言论。他们断言，文学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公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艺术应当为人民（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们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关心的事，文学艺术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不应当为中共的政策服务。他们广泛地在中国青年作家中散布这一“理论”。

右派分子的思想在造型艺术（绘画、雕刻和木刻等）中也有所反映。这些思想的追随者们包括中国中央艺术学院院长、中共党员江丰。在与右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之后，江在该学院开展了反党活动。右派们极力败坏党在造型艺术中的威望，……并以此企图危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

.....他们声称，党的领导方针似乎对中国的传统戏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右派分子还在.....领域开展了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清华大学著名中国物理学家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学院院长费孝通编写了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反对中共的10年经济发展计划。

.....及其来自高级中学的拥护者们——多数都是以前曾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者，试图排除党的领导并在该校中占据党的地位。

学者常振海(Чань Чжэн-хай)、梅海忠(Мэй Хай-чжун)和陈达(Чэнь Да)等人在社会学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

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和集团也积极拉中国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民主联盟和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罗隆基和章伯钧等，虽然自称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他们实际上却是在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作对。从去年下半年起，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这些活动家均加紧了自己的右派活动。

在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开始后，右派分子的活动也高涨起来。起初，他们极力.....到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以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威望。他们认为.....他们极力渗透到.....领域，以便危害人民解放军。

.....右派分子希望中国与美国亲近，并极力破坏中苏友好。

.....中共在广大劳动者层面揭露右派和反党分子们的思想本质，并允许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者在报刊上发表反对右派立场的言论。

结果显示，90%的发言者拥护中共，反对者只有10%。钱俊瑞说，我们决定支持大多数群众。6月8日，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全面反对右派立场的进攻。这场斗争在全国人代会上也有所反映。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辩论。钱俊瑞说，我们在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该斗争的规模巨大，其间人们不仅可以进行口头辩论，而且还可采用任一形式的书面辩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大字报”，即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一张纸上，或机关的墙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所反映的观点具体包括：

1.中国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2.由谁来领导比较好，是中共还是国民党？3.国家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4.国家是需要民主集中制还是无政府主义？5.国家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保持生产和民族经济的无政府状态？6.中国应当成为苏联的盟友，还是苏联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会议和报刊上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例以表明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复辟思想，并罗列了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典型案例。

.....

.....右派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复辟思想受到了批判。

.....右派分子在中央所承担的职务被撤消。与此同时，在.....会议上一系列右派领导人的

右倾机会主义活动受到了批判。而以后，他们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自己的行动。钱俊瑞说，不过，我们在决定右派命运的问题上将采取宽大政策。我们公开宣称，右派与人民群众之间已出现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如果右派分子不再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那么他们将不会受到追究并保留其公民权，仍可以继续保留中共党员身份，调到其他工作岗位继续工作。钱俊瑞说，这样做将有利于分化中国的右派力量，但如果他们重新开始斗争，那么我们也会更激烈地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类教师：第一类教我们懂得马列主义原理；第二类——以自己的言论反对我们的右派，从而可以向我们展示其反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右派们的批评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地渗透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我们批判右派错误的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已进入了第三阶段。

.....8年来，中国广泛地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钱俊瑞指出，中国在宣传苏联成就的问题上仍做得不够，例如苏共是如何领导苏联人民取得这些成就的？这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似乎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些中国青年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成就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钱俊瑞说，我们希望在报道苏联成就的过程中，也要强调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也正是借此苏联人民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例如，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让全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必须说明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

钱俊瑞说，在访问苏联期间中国同志看到了苏联工厂和企业正在使用的那些老设备，看到了苏联人民朴素的工作条件。而我们，钱俊瑞指出，却存在这样的议论：什么时候能建起这样一个新企业或设施，并在其中安装上全新的设备，从而有一个富丽的工作条件。钱俊瑞说，我们必须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的新生活建设；必须让我们的人民明白，苏联人民在过去的40年间都是过着朴素的生活的。在上述这些事例中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展示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斗争历程.....另外，钱俊瑞说，我自己也亲眼看到苏联工人在为中国生产设备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些事实都必须用到针对中国作家的宣传方面。

在苏联24所高校中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共计6000人。苏联大学生像兄弟一样帮助中国朋友掌握知识和克服学习上所遇到的困难。在苏联各工厂，目前有中国实习生7000人。关于这些内容都应当更多地在中国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目前拥有一所中国学院，但关于这所学校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必须让中国读者了解这所学院的教学目标、任务及其活动情况。我们也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在中国不能有一所研究苏联及其文化的学院呢？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上报道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将有助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参加此次会谈的有35人。

会议记录者Д.卡杜莫夫。

与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会议纪要1957年12月1日

机密

(我们)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了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后者即将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因而前来辞行。

阳翰笙同志说，自己逗留苏联的40天期间，在为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而举办的联欢节上他详细地了解了苏联戏剧团体所作的各种表演。这些演出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将作为他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活动而在戏剧艺术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基础。

据阳翰笙同志说，1958年中国同志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苏联戏剧和导演大师们的经验，打算向苏联派遣8—10名中国戏剧和电影导演，让其在1—2个月的时间内每天都观看目前苏联舞台上所上演的戏剧，从而随后对所观看的戏剧及其作者、编剧和导演进行详细的筛选。

与此同时，中国同志也正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邀请苏联一流的导演们——奥赫洛普科夫、扎瓦茨基和普鲁切克等人在夏季时去中国度假，以便了解中国戏剧家和话剧家们——其中包括梅兰芳——的戏剧和表演艺术。

阳翰笙对自己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之际，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苏联期间所看到的一切表示衷心的赞叹。他还对苏联朋友们——其中包括苏联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在内——为中国同志所提供的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

关于自己造访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要目的，阳翰笙说，除了在中国人民文化协会的工作……

……

……据阳翰笙说，中共中央目前正在研究关于把国内类似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对外文化关系的组织联合起来的问题。

根据阳翰笙同志的请求，我们向其介绍了我们设立这个国家委员会的目的及其结构，并提醒说，我们所通报的情况都是需要严格保密的，不当泄露到中共中央机关以外。我指出，我们的这一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便是协调我们的对外政治宣传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对外政治宣传活动。鉴于阳翰笙同志感兴趣，我们现在可以向中国朋友介绍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方面的活动情况。

在认真听取了我的解释并对所作通报表示感谢之后，阳翰笙也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即至今中国没有建立任何统一的对外政治宣传机关，这方面工作由几个机构和组织同时负责，由于工作中经常出现失误，因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人经常会对其发出指令。1956—1957年间，应中国各社会和贸易组织的邀请，日本各阶层代表……大量来中国访问。总体而言，这些日本人到中国来是有好处的。他们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不断增加，有利于揭露美国和蒋介石在日本所进行的反对中国的诬蔑性宣传。尽管这样，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组织……例如，一个由前日本战犯——由以前曾积极参与了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日本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来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对该代表团成员表现得极其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都接见了他们。因此当这些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们回到日本后，便开始积极要求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揭露美国在宣传中所作出的判断，即中国似乎正准备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揭露以日本各种事务性和文化界代表团成员身份被派往中国的许多日本和美国间谍。

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急于问鼎政权的心理来从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作和扩展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风见章便与中国同志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1958年，社会党各分部将派遣由日本各府县代表组成的30个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日本社会党提出的自己的主要竞选口号之一便是——要求恢复日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一口号将有助于破坏美国在日本的整个政策。中国同志方面也对日本社会党组织此类访问中国的代表团的访问给予了必要的帮助。

在答复关于苏中两国间在对外宣传政策方面的重要工作的具体建议的问题时，阳翰笙同志指出.....将有助于确立两国在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

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

C.齐赫文斯基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28, л.197-211

№23034 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1957年12月29日以后)

致苏共中央H.C.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真理报》于1957年12月29日公布的在中国生产第一架安-2飞机的问题，兹报告如下：

安-2飞机的设计者为安东诺夫同志，所安装的发动机型号为安62ИР(我们的里2飞机安装的也是此类发动机)。该架在中国生产的飞机的许可证是由苏联航空工业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6年6月29日第907—493号决议(向中方)颁发的。

此类飞机是在位于基辅市的第473号航空制造厂批量生产的。

1957年，在第473航空制造厂共生产安-2飞机360架，而1958年此类飞机的生产计划为400架。

安-2飞机的战术技术参数：

起飞重量——5吨

营运负荷——1—1.2吨

巡航速度——200公里/小时

最大速度——259公里/小时

安-2飞机的生产计划在中国南昌市的一座工厂里进行。

报纸上公布的飞机是安-2飞机的第一架样机，其零部件由中国生

产，而飞机上所安装的发动机是苏联生产的成品。

П.杰缅季耶夫(签名)

手写批注：

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了解了，归档。

..... [\[105\]](#)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28, л.213

1958年

№09843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1958年1月10日)

摘自П.Φ.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月23日

第22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1月10日

在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我提出请求，想同中国国务院某位负责同志就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赞同我的想法，建议同薄一波副总理谈一谈。

在1月10日举行的会谈过程中，薄一波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1957年经济建设总结，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会谈一开始，薄一波指出，1957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工业、农业、基本建设、外贸和内贸等领域所规定的许多任务都超额完成了。薄一波说，1957年初，规定工业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4.8%；实际上到年底增长9%。钢、生铁、轧材的生产指标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比如，1957年的轨钢生产比原先计划的多生产58万吨。1957年初，计划生产棉纱440万件(根据1957年计划，棉纱生产数额为463.5万件。看来，薄一波所说的计划是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实际达到465万件，即比规定的指标多生产25万件。计划采煤增加到1.1亿吨(根据计划，1957年预定采煤1.17亿吨——不包括手工开采，实际上开采了将近1.23亿吨)，实际达到1.2亿吨，即比计划规定的多采1000万吨。木材生

产比原先规定的指标多出90万立方米。

由于许多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年度计划，薄一波说，不少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957年的工业计划指标是不是定低了，这是否是保守的表现。所以，薄一波指出，《人民日报》于今年1月6日发表社论，号召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薄一波说，这一号召，意在反对领导经济工作中的保守主义。

针对我关于超额完成计划总比完不成好的插话，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对此开玩笑说，如果说定1957年计划时犯了右倾错误，那么这一右倾让我们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让我们感到高兴，所以可以称其为“愉快的”右倾。

谈到新的企业投产和现有生产能力的使用情况时，薄一波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报刊已经报道，到1957年底，将有450个项目交付使用，其中57个在苏联帮助援建的156个项目里。薄一波说，实际上，交付使用的项目数字要比报道的数字大。

薄一波说，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已建成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能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长春汽车制造厂现在每年可生产3万台汽车，而如果再增添一些设备，便可生产4万—5万辆。但去年工厂仅生产汽车8000台，1958年计划生产1.3万台。谈到工厂生产能力吃不饱的问题时，薄一波说，原因之一是原料不足，其中包括优质钢；另一个原因是工厂生产的汽车没有充足的销售市场。长春汽车制造厂只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解放”(吉斯151)。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汽车使用范围相当窄。长春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只能在城市里使用。在农村很难使用，因为那里没有好的道路。为了货物的长途运输，需要载重量为4—5吨和10吨的汽车。薄一波补充说，此外，如果我们把生产汽车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我们为此会缺乏燃料。薄一波说，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因此，当前很难为机器制造的同一类型的大量产品找到销路。

薄一波说，在不久前开工的许多其他现代化大企业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按照最初的方案，鞍山无缝钢管厂应年产6万吨同一尺寸的钢管。尽管中国的工业需要无缝钢管，但是国家现在并不要求如此大量的同一尺寸的钢管，这些钢管找不到销路。因此，工厂对生产过程作

了一些改变，用生产若干种尺寸的钢管来取代单一的品种。这使得工厂可以将产量扩大到生产10万吨无缝钢管，而且这些产品的销路完全可以保证，工厂的产品甚至供不应求。

薄一波说，专家们对类似企业转向扩大产品品种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坚决地主张，既然生产一种产品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而且还导致生产设备不能完全利用，那么就必须让这些企业转为生产几种产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改造这些企业让他们能生产几种产品。其他人认为，在进行这种改造的条件下，新企业的现代化设备将得不到充足的运用。此外，企业的类似改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规模的某种下降。例如，如果长春汽车厂现在每年能生产5万台汽车，那么经过改造生产4—5种类型的汽车之后，汽车生产数量自然要减少。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问题，薄一波说，现在正在认真研究，但如何解决，现在还未彻底定下来。

谈到农业形势，薄一波指出，今年收成可望达到中等水平。1957年粮食收成为1.85亿吨(不包含大豆)，即比1956年略有增加。棉花丰收，达到3280万担(164万吨)。薄一波说，1957年初预计中国棉花不够，必须请求苏联援助；但现在由于棉花丰收，靠自己的力量也可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大豆收成也很好。

薄一波指出，1957年全国农业严重遭灾。中国北方各省旱灾损失严重。由于去年农民增产不大，某些同志问，在领导农业生产问题上，1957年初是否有保守主义倾向？薄一波说，不过到年底，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生产高潮，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薄一波说，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也超额完成了。原计划是111个亿，结果完成120个亿。这也给某些同志以理由，说1957年初在确定基本投资计划指标时过于谨慎，容忍了保守主义倾向。

1957年计划预算收入达到294亿元，实际收入超过307亿元。与此同时，预算支出缩小了。年初预计，企业原料供应和日用品市场将很紧张。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到年底，原材料和商品还有某些剩余。在确定零售贸易额计划指标时，其出发点是保障473亿元的商品，实际上所需商品价值比这要低一些(在1957年计划中，确定零售贸易额——包括服务——为473亿元。据掌握的材料，实际完成477亿元。而且，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减少和其他一些措施，对保障商品的需求有所减少)。结果到

1957年底，仓库所存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将近2.8亿元。

所有这一切，薄一波强调，说明国家生活是稳定的，运行正常。1956年，生产发展很快，但到1956年底发现，由于某些部门发展过猛，导致某些货物和物资供应紧张。1957年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作了某些相应的调整。这些部门的生产发展指标定得有些低。但在执行1957年计划过程中发现，年初所定某些指标过低，于是在1957年4月对计划作了某些调整。但总的来看，薄一波指出，可以说1957年是明显的经济建设喘息的一年。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指出了1958年经济发展速度有提高的可能性。

在回答我1957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问题时，薄一波说，1957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在1956年的水平上，只比1957年的计划提高了2.2%。1957年的成本降低4%。195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原因是，1956年工业企业招收了大批新工人。他们的劳动效率很低。他们许多人工作量不足。

现在全国工人和职工有2400万人；其中生产工人1300万，机关职工(包括国家机关)1100万人。1300万工人中有400万人，1100万职工中有300万人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企业和机关中有富余人员700多万。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也不合理。例如，在工业企业中，车间管理干部占35%—40%，而真正的工人才占60%—65%。很明显，薄一波说，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过大。对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薄一波说，这方面问题进展还很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没解决。这方面口头上讲得很多，薄一波说，但实际上做得很少。企业里许多领导干部还有干部国家保障制度的余毒，还有所谓“供给制”观点。众所周知，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在于，干部不必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保障，但对他们也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更好地工作。所以，薄一波说，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工作不工作，反正是二斤半小米。正是不少干部对事情的这种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实行核算制的困难。一直到目前，薄一波说，企业还是将全部利润交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银行那里领取必要的资金，其数量同企业利润无关。这样，对他们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多交利润。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没有经济核算制度，薄一波说，中共中央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口号和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这一方针目前包括以下基本措施：

一、从1957年起，派干部和国家机关职员参加生产，主要是去农

村。计划最近派200万名行政干部和职员去农村工作。这方面，薄一波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派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生产问题。计划学生毕业之后将被派往企业和农村进行3年劳动锻炼。机关干部也将分批到农村工作2年。例如外交部，薄一波说，已派往农村一批干部。干部和学生下乡运动已收到好的效果。这一措施改变着干部和学生对体力劳动和农村工作的态度。此外，城市干部下乡阻止了农民涌入城市，农民看到，城里人已到他们农村来，这就打消了他们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念头。对招收劳动力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工厂未经中央批准无权招工。

二、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二项成果措施是整顿企业的工作作风。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在工人和职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基础上，对企业行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监督。这种群众监督，薄一波说，还将促进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企业整风运动是从1957年8月份开始的，比机关学校开始得晚。薄一波指出，某些工作人员害怕企业开展鸣放运动，认为这将引起工人间的混乱。但实践证明，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风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整个气氛的健康，对经营工作的干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过去，许多工厂经理独断专横，浪费严重，违反纪律，无所顾忌。现在他们最怕通过“大字报”以及通过《人民日报》批评自己。来自下面的批评帮助揭露和纠正了企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总的来说，整风运动和整风过程中广泛发表意见，薄一波说，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和超额完成计划，促进了节约制度的贯彻执行。

大鸣大放运动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形势，而且改善了国家机关和党内的形势。在这一批评过程中查清了一些在日常系统学习中很难搞清的问题。例如，在浙江省党组织中揭露出了一些敌对分子，其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汉。广东省揭露出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在被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是省委书记，他们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甘肃省在整风运动中揭露出了一些钻进党内的奸细，其中一个中共省委的一位书记。利用一般的方法，薄一波说，不能在短期内办成如此重要的事情。正是群众运动，让所有人开始讲话，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这种状况，才使有可能完成类似的任务。所以，薄一波补充道，毛泽东主席说：“必须每年一次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立的统一。”政法机关也揭露出了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

1958年3月，薄一波说，将召开中共八届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

要议事日程是讨论整风运动的总结，还可能讨论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

三、实现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三项重要措施是目前开展的反对浪费运动。由于企业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中共中央打算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上海“梅林”罐头厂浪费的事实，实际上这是全国广泛开展反浪费运动的开始。

最后，改善企业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完善工业管理结构。扩大地方政权机关对工业、商业和财政企业的管理权限，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薄一波指出：“我们现在正在认真研究苏联工业管理改革的经验。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薄一波强调，因为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最后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管理系统上。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中国企业工资等级和劳动工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方面也有不少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是采用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但劳动定额和劳动工资上还有不少缺陷。生产定额很低，工人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在鞍山，现有标准规定，6级工资每月90元。但实际上，由于劳动定额低，许多工人工资达到180元。

许多工人仅用两个半小时便完成所规定的定额，剩下的时间为获得奖金而劳动。平均奖金占工人工资的25%，在个别企业，如电力和冶金，则占到35%。现有定额是2—3年前规定，已经过时，必须重新考虑。但这是一种非常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涉及广大工人的物质利益。增加工资很容易，薄一波指出，但要降低则很困难。行政机关企图提高劳动定额，但遇到了工会组织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指出，国家和工会之间存在矛盾。

这样，薄一波继续说，我们在组织劳动方面，碰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生产定额定得低，必须重新审定；（二）企业里有一大批多余的工人和职工，但国家不能解雇他们，必须给他们发工资；最后，（三）在工人劳保和其他生活补充保障方面有许多过分的东西，与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符。

然后薄一波回答了有关公私合营的形势方面的问题。1956年上半年，薄一波说，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已全部完

成。虽然形式上合营企业是独立的一块，但实际上他们已同国营企业没有区别。他们同一般国营企业的区别仅在于：(一)在某些公私合营企业里，还有资本家担任副经理或工程师，如果他们有技术素养；(二)作为他们交给国家生产资料的“赎金”，领取国家5%的保证金。在合营之前，私人企业设备的总价值，薄一波说，约为22亿元。从1949年到1955年底，按利润的形式获得13亿元。预计，到1962年底，作为利息，每年将给他们支付1.2亿元，7年共计8.4亿元。这样，从1949年到1962年，资本家将获得“赎金”近21.4亿元，即向他们几乎支付了他们企业的全部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薄一波说，国家彻底实行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赎买”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较好的结果，因为国家支付给资本家的资金得到了补偿——生产没有受到损失。此外，资本家毕竟主要靠工资生活，即主要靠定息生活(他们购买了国债券)。保证定息，薄一波说，这仅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尾巴”，它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

但是，尽管私人企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薄一波继续说，国内还存在黑市和投机倒把。一些城市，尤其是上海，许多日用品短缺，奸商们组织了非法的私人企业(大部分都很小)，生产短缺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同时，奸商们钻国家经济计划缺点的空子。国家计划自然不能考虑到所有细节，薄一波说，国家计划有时太死，不灵活。国家计划中的空白给了奸商们以可乘之机。例如，国营裁缝铺只能制作3—4个型号的服装，而私人可做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服装，自然价格高。居民餐具的供应也存在这种状况。黑市上短缺商品价格高，但居民还是买。

国家机关不急于取缔非法企业和二类商品奸商。同时，薄一波指出，奸商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帮助国家机关揭露和纠正计划中的缺点。奸商们使国家机关明白，哪些商品不足，这样在以后作计划时好作出纠正。在这方面，薄一波风趣地指出，可把奸商看成是国家贸易机关的一种特别老师。

1956年底和1957年初，薄一波继续说，国家允许有自由市场，这时自由市场开始发展。一些城市专门划出地方允许自由买卖花生、猪肉、蔬菜这类商品。但实践表明，自由市场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国家定购任务难以完成。由于自由市场的发展，国家贸易机关开始难以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因为农民都想以高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自由市场导致总的物价上升了2.8%。这一切表明，必须加强对自由市场

的监督，限制它的发展。

在转到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话题上来时，薄一波说，国务院已批准1958年的经济计划，1月25日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今年还将大体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但批准这一草案只能等来年开人大会议时。考虑到1957年某些经济计划指标定得有些低，薄一波说，今年我们打算提高相应部门的计划指标。至于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计划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5%。钢产量增加到600万吨。煤产量增加到1.5亿吨。1958年的经济计划草案，薄一波指出，已在各部代表会议上详细讨论过，他们都同意所提出的指标。

谈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薄一波说，1958年计划征购粮食3900亿斤，即1.96亿吨；棉花3500万担；生猪1.5亿头。农村现在出现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农民积极兴修水利，大搞积肥。例如，仅安徽一个省，由于广泛动员农民群众，1957年底已完成土方1.6亿方。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薄一波继续说，例如，雇佣农民干这些工作，挖一方土仅支付0.5元。这样，完成1.6亿方仅需8亿元。这不算贵，薄一波指出。此外，农村兴修水利的基础工程，薄一波强调指出，主要是靠合作社的力量，国家只需给合作社不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为1958年获得好收成奠定了基础。

不久前，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全国时参观了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高农业生产的途径问题同农民和地方党的干部举行了座谈。

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7年增加近10%，达到335亿元。所以，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到140亿元(1957年为120亿元)。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820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485亿元)，即每年投资增长13%—1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财政收入为136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加560亿元，达到192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1958年和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重工业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企业的建设中，中国还将依靠苏联的帮助。至于普通机器、车床、石油设备、化学品生产的调整，相应企业的建设，薄一波说，我们试图自己建设。

谈到中国的外贸，薄一波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得不够积极，他本人对此也不满意。1958年出口总额与1957年持平，达到54亿元。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薄一波说，发展顺利，我们甚至出现了外汇剩余。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外汇则不足。苏联给中国以巨大的援助，为我们提供成套的设备。当然，薄一波强调，我们努力做到在同苏联的贸易中进出口平衡，但现在中国是苏联的债务人。据不久前所作的初步统计，到1958年1月1日，中国欠苏联3亿—4亿元。1958年中国未必能偿清这一债款。薄一波同时指出，不久前他已同中国外贸部的工作人员们商量过，苏联需要什么货物，中国能供应什么。

苏联贸易代表И.А.叶廖明问中国外贸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展，薄一波同志回答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加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将放缓。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将增加矿产和有色金属的出口。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东南亚国家，将扩大机器出口。薄一波预先声明，他记不清所拟定发展出口的准确数字，到1962年，出口大致增加到85亿—90亿元，1957年出口额为55亿元，即增加60%—70%。

至于国内贸易，薄一波说，有充分的根据指望，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将是稳定的，供应基本上能满足需求。国家贸易组织手里有大批商品储备。收购的粮食，国家现在手里还有870亿斤(4350万吨)。1958年将大大改善棉纱供应。如，1957年生产棉纱460万件，计划1958年将增加到526万件。

1958年企业和国家机关将招收70万新的工人和职工，但工人和职工总数没有大的增加，因为有许多机关职工将下放农村劳动。1958年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增加5.4亿元，达到158亿元。在工人职员数量没有大的增加而工资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工资总额却有了增加，其原因是，下放农村劳动的国家干部在一定的时间里还将从国家基金中领取工资。计划规定，与1957年相比，1958年劳动生产力提高2.5%—3%，而产品成本下降4%。

这就是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安排，薄一波说。

在计划国家经济发展时，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特别注意工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比例，注意工业材料部门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精力放到了工业的发展上，而对农业

关心不够。现在，在考虑新的需求和必须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规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以对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将有所变化。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占总投资的9%，那么1958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2.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的投资比例是7比1，而1958年将调整为5比1。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几年显现出来：煤炭、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工业原材料的投入将有所增长。

在结束谈话时，薄一波再次强调了苏联援助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薄一波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中国也可援助其他国家，因为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非常巨大。但是现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得依靠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须学习苏联的口号，薄一波强调说，这意味着不是从形式上，而是真诚地深刻地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对于中共来说，不仅要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研究苏联出现的错误、偏差和教训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苏联的经验可帮助中国人民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少出偏差和不走弯路。现在，薄一波继续说，苏共给苏联人民提出了在生产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号召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生产水平上超过英国而奋斗。这一号召，薄一波说，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动员意义。

我们两国的合作一年比一年紧密。薄一波强调说。他指出，他不是外交人员，但他经常同苏联同志们见面，他可以说，中苏工作人员的关系一年比一年好。任何力量也不能离间我们，薄一波强调说。这不仅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同所有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关。继续改善我们的关系不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前几年不好。我们的关系以前也很好，薄一波强调；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更懂得苏联，更理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应该说，薄一波指出，以前中国某些同志不太理解苏共的措施。例如，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立刻理解1956—1957年苏共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内部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谴责。一部分中共党员怀疑这些措施是否适宜。一些共产党员尽管知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错误行动，但还是说，对待这一集团成员过分粗暴，不该在报上公开此事和公开点名。薄一波同时

强调，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考虑到部分党员中存在着类似的不健康情绪，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使全体中共党员对苏共中央的措施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共经常在群众中做这种教育工作，薄一波说，解释加强中苏友谊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我们两国的团结和联盟——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对薄一波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给我们做了内容充实的谈话。我说，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感到高兴。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和某些比例失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发展中的困难。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在扩大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我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干部顺利地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同时我祝中国朋友们在进一步掌握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劳动经济等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营范围方面取得成绩。

会谈进行近4个小时。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И.А.叶廖明；使馆参赞К.А.克鲁季科夫，Н.Г.苏达利科夫，Б.Н.魏列夏金；副经济参赞Н.П.布瑟金等同志。会谈翻译是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和使馆随员Р.И.库达舍夫。会谈记录是使馆二等秘书А.В.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文件6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А.В.谢尔盖耶夫

1958年1月16日，第26号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20-38

№09890 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1958年1月20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6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大使馆代表谈话记录

1958年1月20日

今天，在中国外交部，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临时代办，举行了会谈。刘宁一向各位与会者通报了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的情况。他在开始时指出，一些国家的大使馆请求中国外交部举行这次会谈。出席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章汉夫，各司司长和中国外交部其他领导人员。

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刘宁一说，参加会议工作的有49个国家的代表团。他指出，代表团成员中有许多国家的官方代表，也有不同国家的各社会阶层和反对派力量的代表。按照我们的术语概念，刘宁一微笑着说，我们称这次大会为“成员国联合企业”。代表团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王子和王妃、王室成员、部长、国会活动家。这些代表代表不同宗教和政党以及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独立的和半独立的以及殖民地国家。应该指出，刘宁一说，一般说来，各代表团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在会议上相应地反映本国政府的立场。

开罗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代表团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种共同性表现在忠实于“万隆精神”，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议发言和会议决议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大家都明白，不含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原则的报告和决议是得不到与会者的满意的。当然，其中伴随着斗争。例如，在起草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的委员会里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该结束帝国主义，但也出现了争论：反对什么样的帝国主义，怎样反对。同美国有联系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反对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但回避提美国。刘宁一详细分析了关于在决议中应如何表述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的各种意见。刘宁一说，一些代表坚持在决议中提葡萄牙、荷兰这样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关于决议中的提法还有其他一些分歧，但总的气氛明显是反帝的。

在开罗，刘宁一说，聚集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记者。他们相信，会议上将有许多争论，出现轰动一时的报道材料。一位外国记者问中国代表，刘宁一说，为什么在这次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占多数的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对待美国、英国、法国而不咒骂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在这次会议上，对待西方国家够客气的了，因为在不久之前，这些强国只用大炮和刺刀同亚非国家的人民对话。

在会议期间，刘宁一说，我们弄清了我们和埃及、叙利亚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的理解上有差异。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认为，殖民地国家应该“反对殖民主义”，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没有反对这样运用这些提法，所以他们在决议里经常出现。

非洲代表，刘宁一继续说，努力强调种族歧视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刘宁一指出，在开罗会议上，争取和平的问题占有应有的位置。

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亚非国家团结大会同爱好和平大会的区别在于，这里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如此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发言在爱好和平的大会上是没有的。

刘宁一指出，在开罗，没出现敌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没出现反共产主义的发言。相反，针对我们国家的发言带有友好的性质，许多人发言感谢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援助，感谢帮助他们进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代表们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谴责侵略集团，要求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不付诸武力。所有这一切，刘宁一强调说，表明了我们和平声明和和平宣言原则的正确性，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结论的正确性，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

我个人觉得，刘宁一说，以前我们对非洲国家潜在的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估计不足。我们看到，在亚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其他一些国家退却了，对非洲类似现象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那里的反帝力量增长。在开罗会议上，我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是王室成员也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在塞得港庆祝战胜英、法、以色列侵略的集会上，纳赛尔只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参加军事检阅的部队的装备，正如对我们讲的那样，全是最新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纳赛尔在讲话中强调，埃及忠于万隆十项原则，声明再过10年，所有非洲国家都将成为独立国家。刘宁一指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纳赛尔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予以注意，只是到后来才接见了他们。

刘宁一说，埃及人讲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美国人想收买纳赛尔的一名追随者，给了他16.5万美元。这个人把这事全告诉了纳赛尔，并把钱也交给了他。这是美国人颠覆活动失败的例证。纳赛尔在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会谈时声明，埃及信守万隆十项原则，将来也信守之。

刘宁一再次强调，总的说来，大会是在激烈的反帝气氛中召开的，但会议上也有“右派分子”，他们有时发言也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但努力不涉及美帝国主义。苏丹外交部长就属这样的右派，他以同美国的联系而著称。他被选为种族歧视决议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很满意干这件事，研究非洲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自然，他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但他的参加对我们也有利。

然后刘宁一分析了大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当然，暴露出了观点上的分歧，但我们采取了措施，不把这些分歧带到会议上，只在会下调节。我们对待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的方针是，刘宁一说，把不利于我们团结的东西放到一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同他们的团结。我们同他们的分歧表现在，我们比民族解放运动者反帝更坚决更彻底。我们认为，在反帝斗争中必须依靠人民。至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人民，但也有担心。他们害怕发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害怕人民过分坚决地起来斗争。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表现出动摇。

开罗之行，刘宁一说，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比如，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主人埃及当局在组织会议过程中，事事主要依靠警察。多次听为我们代表团服务的埃及人讲，他们是警察机关工作人员。在群众集会时，真是隔十步就有一个警察，集会前几排站的还是武装警察，其后才是集会群众。更有意思的是，整个集会过程也由警察指挥：集会群众鼓掌按照最高警衔警察的信号进行，根据他的信号开始或停止鼓掌。而且，在会议开始时，在讨论工作程序问题和出现各种生活

性质的问题时，埃及人也严肃地建议采取部队程序。一般说来，刘宁一指出，我们确信，埃及首领们相信群众，但也害怕群众。

至于与会者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刘宁一说，亚非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分辨能力较差。例如，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埃及)提议按照类似“欧洲共同市场”的形式建立“亚非共同市场”。而这些代表不明白，“欧洲共同市场”得利的主要是西德，而“亚非共同市场”得利的可能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通过日本)。当我们向埃及人作解释时，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收回了提议。

据我们所知，刘宁一补充说，日本代表(尤其是自由民主党成员)给自己提出了在大会上进行宣传的任务，其计划可归结为，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美国的资金使日本向非洲渗透。自然，他们非常欢迎关于建立“亚非共同市场”的提议。是一名埃及代表机智地挽回了这种说法，他说，据说在印刷时出现了错误，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弄拧了。

刘宁一接着说，美国人也采取了措施，企图在会上挑起摩擦和争论。例如，日本代表团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带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台湾自治运动”(廖文毅集团)的代表。但埃及人在机场就抓获了这名“代表”，而另外两名这样的“代表”在此之后完全放弃了进入开罗参加会议的企图。

总的来说，刘宁一指出，我们形成了这一印象，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欢迎我们参加大会，欢迎同我们接触，尽管担心“过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我们努力表示理解和尊重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代表的立场，耐心给他们解释一些问题，但都是在会下(为了不因批评使他们感到委屈)，努力做到让他们自己提出对自己的提议作相应的修改，顺利地说服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放弃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抹掉”这样的词句写进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的思想，代之以这样的词句：以色列——这是帝国主义的基地，表达了对以色列侵略政策的谴责。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刘宁一指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阿拉伯东方知道得很少。会议向我们表明，这一地区的反帝情绪是很高涨的，应该得到应有的运用。我们还相信，对阿拉伯东方各国需要严格区别对待，需要考虑每一个国家的特点。

刘宁一说，埃及人对会议的召开很满意。纳赛尔对中国代表团说，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始至终矛头都是对着帝国主义，在埃及人看来，它是亚非历史上，尤其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亚洲，这样的大会简直是首次。这次大会，按照纳赛尔的话讲，对埃及和其他亚非国家是一次很大的支持。亚洲，纳赛尔说，基本上获得了独立。现在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支持非洲。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在10年的时间里也能获得独立。刘宁一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对待会议结果也是这种态度。对开罗会议不满的只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总的来看，刘宁一总结说，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开得是完全成功的。这次会议同时表明，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促进潜在的反帝力量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广泛地利用这些力量。

刘宁一问，与会同志还有没有问题。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请求谈一谈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同其本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开罗大会的认识，它是否是万隆原则的发展，它在国际范围内将产生什么后果。

刘宁一说，参加大会工作的有政府成员，但代表团被认为是非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日本代表团构成时，刘宁一指出，这个代表团50名成员中，2/3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只有1/3是社会的代表。日本代表团开始时打算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行动。但在大会总的气氛的影响下，日本代表团最终采取了与我们一样的对待帝国主义和其他问题的立场，自然，这不符合日本政府给它下达的指示。

当然，刘宁一说，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符合亚非国家万隆会议精神；它进一步发展了“万隆精神”，讨论了更广泛的问题。毫无疑问，开罗会议进一步发展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精神，它必将导致上述国家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估计在这次会议之后，根据亚非国家主动提议，将采取一系列国际措施。例如，还在开罗大会期间，埃及代表就提出了召开非亚国家青年大会和工会会议的愿望；印度代表提议召开亚非经济会议。科伦坡国家提议召开亚非妇女会议。刘宁一指出，这些会议的召开是完全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召开亚非会议的思想现在已很普及。

可能，这种会议将由全体亚非国家共同召开，刘宁一指出。召开会议的第三种形式是由某些国家集团倡议，其他国家支持。第三种可能是

通过国际进步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召开，在最后一情况下，参加会议的将主要是亚非国家的进步力量，有许多亚非国家将不愿参加。此外，美国为了它的利益现在正在策划通过国际反动组织在其庇护下召开“非亚会议”。自然我们将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刘宁一在同我个别交谈时指出，在开罗会议上，苏中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很好的事务性合作。

为会谈记录的是使馆随员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

K.克鲁季科夫

文件5份，送：H.T.费德林、Ю.В.安德罗波夫、远东司、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8年1月31日，第81号

ЦХСД，ф.5，оп.49，д.136，л.1-9

№25081 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1月20日)

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的会谈纪要

1958年1月20日

(莫洛托夫)指出，蒙古苏联边界谈判数度延期，原因在于谈判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态度上存在着分歧。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基本原则，蒙苏边界的划定首先必须考虑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居民的根本利益，并兼顾当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和进一步巩固蒙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另外，苏联代表团认为，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依据历史资料来确定两国的边界线。

蒙古代表团则以“恢复历史公正”作为自己的谈判主要原则，即依据所谓“历史边界”来划分边界。可我们认为，蒙古代表团提供的历史资料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何英同志同意苏联的观点，并说，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缅甸的边界问

题时也遵循了类似观点——在划界过程中兼顾了缅甸居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后者如今所居住的地区，如果依据历史地图资料以前均属于中国领土。

在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何英几次均对(蒙方代表)阿维尔齐德 [106] 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因为后者似乎总是有意回避就苏蒙谈判进程问题作任何交流，并始终坚持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АВІРФ, ф.0111, оп.40, п.252, д.5, л.232

№24030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1958年1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中文周刊杂志《苏中友谊》第二期以及该期刊读者来信汇总(二)。具体参见附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月28日

《苏中友谊》杂志的读者来信汇总(二)(从杂志第33期至第45期的来信)

1958年1月16—25日

共收到来信13封。

来自中国的8封。

其中，来自河北、北京的，2封，来自江苏、上海的，2封，来自湖北、杭州的，2封，来自辽宁的，1封，来自四川的，1封。

来自苏联的5封。

所收到来信的内容：

- 1.读者对杂志的反响和建议，3封；
- 2.请求在杂志上签名，1封；

- 3.请求在杂志上刊载自己的作品，1封；
- 4.请求为杂志社工作，1封；
- 5.请求结识并建立通信关系，3封；
- 6.请求发送礼物，1封；
- 7.请求翻译中文私人信件，1封；
- 8.其他方面的请求，2封。

读者所提愿望和建议的简要内容：

上海金属制品厂工人丛秀吉(Цзон Сюй-ди)指出，《苏中友谊》激励读者们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为祖国服务的劳动之中，并写道：“我们希望《苏中友谊》杂志能全面而多角度地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在发展初期的著名劳动成就。我们国家目前已步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许多情况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极其相似。因此我们希望能在该杂志中更多地看到这方面的相关内容。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如何克服困难，以节约和……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这将非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苏联学习。”

一位来自杭州的名叫岳元(Юе-иань)的中学生请我们讲一讲关于苏联中学生、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一个位于北京的科学知识出版社请求我们立刻发送Г.亚斯特罗波夫的文章《人造地球卫星》的原文，以便他们搜集并在专集上转载。

武汉市教师技校的一名大学生——关良超(Гуань Лян-чжао)请求我们：1.定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新发行的邮票和美丽的信封；2.在《苏中友谊》杂志上开辟“通信”专栏，以便在其中列出苏联和中国读者的通讯地址，从而方便后者通过信件的方式相互交流。

我们对来信所作答复情况：

在杂志上——无；

在杂志简评中——1封。

以书信方式所作答复：

1.用俄语——4封；

2.用汉语——4封。

给其他机构所发出的答复——1封。

目前准备答复的来信——3封。

未作答复的来信——无。

杂志编辑部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18-20

№09889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1958年2月1日)

摘自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6日

第3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8年2月1日

应周恩来请求，我去拜会了他(尤金大使病了)。

周恩来说，今天他想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提议的答复，该提议是大使于1958年1月27日转达给他的。

周恩来说，“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这一提议。

然后他说，苏联的这一提议可以和尼赫鲁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周恩来指出，尼赫鲁的建议当时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支持。按照我们的意见，他说，可以提在太平洋西部建立这样的区域，其中包括日本、中国(这时周恩来两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朝鲜、印度支那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锡兰、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总之，他重复说，这里应该包括南亚、巴基斯坦以东的所有国家。

在上述区域里，周恩来继续说，应禁止和储存核武器，禁止建立导弹武器和导弹基地。然后可以建议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签署相应的条约，其中载明，外国不能在这里建立上述基地以及实验和储存核武器。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众所周知，这一地区各国现在还未生产核武器。

然后周恩来通报说，中国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应由印度倡议提出。

他指出：“印度已提出和平区建议。此外，尼赫鲁的最近发言也表明有同印度进行这种接触的可能，他发言反对巴基斯坦请求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为其提供原子武器和其他现代化武器。”

按照我们的意见，周恩来说，关于建立无核区的提议，应先同印度协商，暂不急于告诉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看来，需要尼赫鲁自己决定，是他先提出还是与这些国家一起提出这一倡议。”

周恩来说，印度未必会完全否定我们的建议，应考虑两种可能性：“一是印度同意提出这一倡议，一是它表示应由其他国家提出。第一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印度同意提出建立无核区倡议之后，才可以同它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因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很可能在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在尼赫鲁不同意提出这一倡议的情况下，可以就此事与苏加诺或吴努协商。

周恩来说，中国同意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关于建立无核区的问题，由中国政府去同尼赫鲁说。

对于我要弄清楚的问题，周恩来对地区国家之间签订条约作了一些解释。他指出，条约应规定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的义务。所以，在签订条约之前，各国政府应原则上同意建立无核区。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支持它，而日本，比如说，不承担这些义

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承担这些义务。”所以，他说，在签署相应的条约之前，需要所有国家有一定的表示。

很可能，周恩来说，美国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支持建立无核区的思想。这一建议还将遭到澳大利亚，可能还有巴基斯坦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指出，正如苏联政府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的倡议将给我们带来一定政治好处。至少我们在宣传方面能达到有益的结果。周恩来然后专门叮嘱说，在同印度和其他国家开始接触时不涉及条约问题。开始时，他重复说，重要的是弄清原则态度和吸收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政府一致行动。

我对周恩来说，大使馆将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和他在会谈过程中所说的意见报告中央。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理司长李汇川，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一等秘书O.B.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

文件5份，送H.T.费德林、Ю.Б.安德罗波夫、M.B.齐米亚宁、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拉赫马宁

1958年2月6日，第107号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9, р.8893, л.10-13

№20423 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1958年2月5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第29号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H.T.费德林同志

苏共中央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联远东司司长M.B.齐米亚宁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发送给你们(我驻中国)使馆从中国外交部得到的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9页。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签名)

机密

1958年2月5日

第29号

译自中文

台湾(基本情况)

一、居民

根据蒋介石台湾省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7年4月台湾居民为940万人以上。其中，近20万人为少数民族，其余为来自福建、广东和大陆其他省份的移民。

包括蒋介石的军队(计52万人)以及分布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居民(5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统治的总人口数量约为1000万人。

二、基本政治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和缓和国际关系紧张的大趋势的影响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更加处于风雨飘摇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在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幕后斗争发展得尤其迅速而尖锐。

美国担心，蒋介石或其周围亲信中的某一个人会与大陆举行和平谈判。美国的这种疑虑在处理与蒋经国的关系方面表现得尤其强烈。鉴此，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如在台湾部署装备有导弹的美军等)，另一方面极力加强胡适、廖文毅和台湾各地方亲美反蒋派分子的活动，增强其影响力，以迫使蒋介石听美国的话。

蒋介石对美国所采取的加强对台军事控制和推动台湾内部政治分裂的举动特别不满。他正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旨在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1957年3月，蒋介石发布命令，据此今后严禁任何人涉及上述现存根本性、重大关系问题，必须奉命保持沉默，但遇到攻击时也要以牙还牙。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也在迅速增强，反对美国在台湾肆无忌惮、干涉台湾“内政”和要求捍卫台湾的民族尊严的言论广泛传播。1957年5月24日，台北市突然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游行的突然发生充分反映了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和台湾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

前不久苏联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和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自己的卫星发射领域遭受了失败。这一切都对蒋介石集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此，香港亲蒋报刊写道：“我们并不急于知道，未来将属于艾森豪威尔时代还是赫鲁晓夫时代。”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实施自己的建立“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加强对蒋介石的压力。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一些方面：

- 1.美国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在1958年度减少了对台经济援助规模(缩减数量超过2000万美元)，以极力迫使蒋介石压缩自己的军队规模(主要是陆军)并放弃不现实的“反攻大陆”的企图。

- 2.美国鼓动亲美反蒋派分子在台湾发表关于建立“反对党”的言论，以便该党在建立后能够与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和其他“第三势力”代表们遥相呼应——共同从事反蒋活动；美国人要求蒋介石“公开权力”，鼓励亲

美国分子参与台湾的“建设”。

在与美国人的这种极其不友好的活动展开斗争的同时，蒋介石倾向于全面抵制美国人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其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坚持“反攻大陆”口号，提出所谓“将反攻与革命相结合”的“政治路线”。

2.积极在国际上展开活动。在这一领域该路线的内容如下：

坚决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维护和扩展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全力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和一切国际活动；极力巩固和加强与那些已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关系；为了摆脱孤立的困境，建立和扩展与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等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文化、经济和贸易关系。

3.积极巩固自身在台湾的地位，促进内部团结，安抚台湾岛内、外所有丧失信心者。上述举措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明显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反复强调了“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一些象征性的决议，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国民党内部和外部那些丧失信心者、心怀不满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4.强调在继续依靠美国的同时，自身也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确定台湾今后的“外交政策根本原则”是：“坚决拒绝在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美援”。

总之一句话，蒋介石今后将执行这样一条总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自己的福祉、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坚持观望态度。很难预期美蒋之间的矛盾会得以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

台湾内部的分裂和动摇仍在不断加深。

在过去的一年间，台湾岛内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纠缠不断，斗争日益激烈。这场为了扩大自身权力的斗争主要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两个派系——蒋经国派系和陈诚派系之间进行。这两个派别都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支持，并都拥有一定的势力和掌握相当一部分实权。得到美国支持的“自由中国”活动家们在愈演愈烈地从事着反蒋活动。而那些丧失了自身权力的国民党军政官僚们则对蒋介石及其儿子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

1. 长期以来，蒋经国和陈诚都在积极地扩展自己的势力。

他们两人都极力想使自己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并一直都在为今后能够成为台湾的主人而准备条件。

蒋经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党(国民党)的基层机关和保密单位。蒋经国已基本确立了自己对整个国民党的控制权。通过其所建立的“反共救国青年联盟”，他确立了对大学生群众组织、中学生和青年组织的控制。蒋经国攫取了保密机关的领导权，并在这些机关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通过在军队中独立运作的党政系统，蒋经国对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尤其是陆军)实施着相当严密的监督。军队中一部分高级军官也是蒋经国的人。例如，蒋介石的现任陆军司令便是蒋经国的心腹。蒋经国在政府部门——如居留海外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事务委员会等——中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陈诚的支持主要来自行政、财政经济界和陆军。与从前一样，陈诚现在依然在执行机关和陆军中拥有重要影响力。近年来，他在财政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得到了很大扩展。陈诚在国民党上层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人物和失宠的政治家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

蒋经国和陈诚之间的矛盾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决定任命陈诚为党的副主席，从而象征性地确认陈诚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其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打消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为将来在他去世以后，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作准备，以便表面上看是陈诚执政，但实权仍集中掌握在蒋经国手中。

2. 宋子文所实施的政变失败后，美国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把陈诚拉到自己一边，另一方面又全力支持“自由中国”活动家——胡适、雷震等。美国人打算以这些人为中介把那些失宠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拉到自己一边，并以建立“在野党”为口号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力量。

另外，美国还煽动在香港的谢澄平(注：谢澄平，在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参加了旧金山会议；自1947年5月至1949年1月任农林部次长；1948年10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年会。1949年，他逃往香港，并通过这里的美国领事馆与美国国务院建立了联

系。此后，他开始以“第三种力量”代表的身份积极展开活动。其在1957年的活动最为积极，当时中国内部正在从事反右斗争运动。谢澄平在香港依靠美国人资助的金钱办了两份杂志——《中声晚报》和《自由阵线》，但这些杂志的影响力都不太大。由于当年曾与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私交甚密，谢澄平现为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人团结“第三势力”，以便促使“第三势力”再次积极活动起来。美国人依然对如今在东京的廖文毅傀儡集团给予支持。

3.伴随着困难的不断增长，台湾岛内国民党人的没落情绪也在日益增强。多数国民党元老们均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并处于被压制状态。国家机关中的普通公职人员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由于看不到任何前途而精神萎靡，心情倍感压抑。各阶层公职人员的生活条件极其窘迫。例如，一位国民党官员便曾讥讽地说，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还不如根据人们对被服、食品和住宅的需要将台湾省政府各司部改组为“食品司”、“被服部”……，以解决大家在服装和食品方面的迫切需求。

蒋介石曾多次发出“心理建设”和“道德动员”等口号。其目的就是想缓解党内严重的、无法根除的精神抑郁病，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使情况有所好转，反而使病症继续蔓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蒋介石起初为防止其影响的扩散，曾试图禁止这一消息在台湾岛内传播。但该政策相关内容很快便在岛内广泛传播开来。部分国民党员也发表言论，支持中国提出的关于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致对外的口号。其他国民党人也宣称，“可以与共产党人一起通过不同道路走向同一目标”。甚至在(台湾)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人“赞成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现存问题”。其依据是：既然目前谁胜谁败的问题业已解决，那么再继续拖延(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只会有益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去年，台湾岛外已有关于和平谈判的传闻。这些传闻在台湾和香港曾三次引起了比较大的骚乱，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至今蒋介石仍禁止其周围的亲信们提及这一问题，但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下国民党内部的反美情绪已逐渐发展起来。国民党的官员们可不愿意在台湾养老送终，他们的唯一意愿是：“只要能顺利返回故乡，即使死也不可怕。”这正应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黄金鲁(Хуан Цзи-лу)曾说过的话，台湾国民党人的“身体在台湾，但灵魂却在大陆”。

三、经济状况

台湾的财政和经济目前仍面临着严重困难。

过去，美国每年向蒋介石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正如美国驻台湾前大使兰金所言)为3.25亿美元。但即使这样，台湾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并没有得到缓解，依然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蒋介石的军费开支极其巨大。1956年，这方面开支占到中央(财政)预算的85%(其中并不包括从美国军援中直接向台湾军队提供的军事装备在内)，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其逐年增长导致台湾的财政赤字从1953年的6.5%，增至1956年的10.6%。财政开支的增长导致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台湾的税收比1949年增长了33.9倍。税务占到了居民收入的36%，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台湾目前流通的货币数量已比1949年增加了50多倍。而随着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2000多万美元，台湾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更趋恶化。

台湾的主要农产品为大米、白糖和香蕉等。台湾的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加工工业产品占到台湾工业品总值的60%以上。

通过从事外贸业务，台湾平均每年出口的商品价值为1.2亿美元(该数据为近三年来的平均值)。由于生产缩减和商品匮乏，近三年来台湾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为3600万美元，而其他隐性贸易赤字每年还有1000多万美元。自1951年至1955年上半年，台湾的国际贸易收支负债为4.9亿美元，而该负债的85%得由美援来填补。

翻译：P.库达舍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H.T.费德林、Ю.В.安德罗波夫、И.Ф.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1份，中央委员会1份，档案室1份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年1月22日，第3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情报已经报告给苏共中央(1958年3月2日)。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24943 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1958年2月5日)

与中国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 [107] 会谈

1958年2月5日

根据范长江的提议，同他举行了会谈。

范长江谈论了中国为了保证苏中新的科技合作协议的顺利完成而打算采取的一些措施。

范长江说，到现在为止，中国方面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进行是按照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制定的政策进行的。至于科学规划委员会，那么，在这一工作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122项共同的科研项目，特别是那些预计在1958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开始进行的项目。此外，上述122个项目中的2/3以上都已经制定了1958年的具体工作计划，并同相关的组织进行了协商。其余项目(不到1/3)的计划或者尚未制定，或者还没有协商。现在正在对各委员会进行的准备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这一检查将促进那些尚未制定的计划的制定工作的进行，计划应该在今年第一季度制定出来。122项中的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负责部门——科学院、部，在一些情况下负责的部门则是科学研究所，有时确定了2—3个，有时甚至是7—8个组织作为具体的执行者。负责每一项计划的组织根据它所开展的科研工作的状态，向苏联方面的相关组织通报关于自己的准备情况，或者不准备接受苏联科学家。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根据同苏联方面相关的组织达成的协议，苏联科学家到中国的时间可以延期。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以便开展同实现协议相关的所有的组织工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该组织的一项任务将是准备各种决议的草案，收集并综合意见，为政府准备材料等。

以什么样的形式对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进行具体的领导更好一些？委员会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聂荣臻在访问莫

斯科期间曾经指出，中国方面，这一任务应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完成。同时，现在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设立一个主管科技工作的职务；第二个方案是，设立一个主管贸易和文化工作的参赞职务，或者把相关的机构扩大。委员会认为，根据第一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和可行。

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顾问Б.Р.拉扎连科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谈。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随员B.И.沃先金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

1958年2月5日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22, л.31-33

№2186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1958年2月13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Н.Я.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И.基里琴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Н.柯西金；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13项 关于就国防问题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

米高扬、科涅夫、布尔加宁、乌斯季诺夫、赫鲁晓夫、柯西金、赫鲁尼切夫。

上次决定——是何时作出的？

在3月份准备问题。

与人民民主国家约定：我们将转交带有火箭技术装备的部队。

提供空对空。

我们将不再购买飞机。

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并提交建议。在10天之内。

在下一次会议上听取切洛梅同志的汇报。

在我们完成“要害”问题的时候，乌斯季诺夫同志就应该汇报了。

委托国防部：关于人民民主国家军队的问题，汇报自己的构想。

期限——10天之内。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49

№24050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1958年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兹发送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已修改的指令草案，以便其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上述修改是依据苏共中央主席团2月13日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

A.葛罗米柯(签名)

1958年2月14日

第490/ГС号

附件：

机密

优先(急电)

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令性草案

请通知张闻天同志，我们已指示苏联驻埃及大使向纳赛尔转达如下内容，即苏联政府认为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问题纯属友好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的内部事务，苏联不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都没有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打算。

在就该问题与我国大使所进行的会谈中纳赛尔断言，似乎他也没料到现在会发生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的事情，而他原先预计这一联合至少在5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纳赛尔预测，敌人会利用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的事件，以离间埃及和苏联，或至少破坏两国的外交环境。纳赛尔强调，西方报刊所谓的——纳赛尔攫取叙利亚，目的在于不使后者继续加强与苏联的友谊——是杜撰出来的。纳赛尔声称，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是在不可动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埃及既没有签署任何协定，也没有服从任何“学说”。与此同时，纳赛尔还对如下情形表示了担忧，即叙利亚的那些不满意解散所有党派的共产党员们可能会对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发生曲解，从而导致埃及和苏联之间发生一些误会。

由于在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叙利亚和埃及目前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建议我驻开罗和大马士革大使——苏联官方代表，保持谨慎态度，不要让埃及和叙利亚人有任何理由说——苏联大使干涉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内政。我们的观点是：绝不能忽视苏联与该联合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景。

在2月21日——届时将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之后，根据埃及方面的意愿和所发表的言论，我们打算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问题采取一些礼节性的举措。届时，我方打算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出贺电。..... [109] 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通报关于苏联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席会议，并责成苏联驻开罗大使在收到委任书之前行使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的权力。

我们已通过了如下决议，即任命目前苏联驻开罗大使Е.Д.基谢洛夫为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给该大使的委任状已发往开罗，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后便可立刻走马上任。

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全民表决相关，苏联报刊也将发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相应文章，纳赛尔总统的照片和关于该联合国家建立的官方资料。

我们已通知苏联驻开罗大使，如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关于不允许在大马士革保留外国使馆和领事馆的决议，那么苏联政府就打算对苏联驻大马士革使馆和总领事馆进行重组。关于苏联政府的上述打算，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相关决议后便立刻对外公布。

关于我们针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打算采取的那些礼节性举措，苏联驻开罗大使现在就可以向阿里·萨博利作出通报。

请电告执行情况。

手写批注：

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没有意见。

Е.А.福尔采娃同志没有意见。

..... [110]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72, л.3-5

№20614-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2月15日)

1958年3月24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15日

同使馆的人员一起出席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向苏军抗击日本解放朝鲜纪念碑的敬献花圈仪式。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献花圈时穿着元帅制服(抵达平壤时和在群众大会上陈毅穿的是普通服装)。

应金日成的邀请，陪同代表团在牡丹峰山上俯视城市全景。这时南日向我通报说，为了会谈，已组成以金日成为团长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南日、金一、金光侠和朝鲜驻中国大使。今天就进行会谈。今天在招待会以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就去兴南化肥联合企业。陪同代表团前往的有：金日成、南日和李光武(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2月16日代表团将参观兴南化肥厂，然后去元山考察国防工程。代表团从元山乘火车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从元山到银平(Инпхе)站以及以后的行程都乘汽车。2月17日、18日代表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活动。金日成和我方的其他同志都不陪代表团去司令部。

我问南日，出于怎样的考虑作出这样的安排？

南日回答说，周恩来邀请他们一起去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但是看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团员是想处理一些私事。南日补充道，的确，代表团去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地要做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南日说，签署会谈结果的公报安排在2月19日上午。签署公报后，周恩来将在最高人民会议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南日向我提出要求，是否可以通过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各国对公布的公报的反映和评论。公报将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期间撤出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

我对南日说，您的要求，我将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向朴正爱提交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件。转交的信件是封好的。(金日成要求将信交给朴正爱，因为他整天都忙于有关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事。)

在见面时，朴正爱扼要地介绍说，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见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昨天的群众大会安排在市剧院，而不是像通常接待来访的各国政府代表团那样放在广场上，这是中国朋友坚持要求这么办的。朴正爱还简要地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晚上，政府内阁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招待会上，金日成和周恩来先后致辞。周恩来热情地赞扬了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带头作用。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35-37

№2521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 苏联专家事宜(1958年2月16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致以敬意，并由衷希望得到如下援助：

从工作需求出发，中国相关部门决定在1958年聘请281名苏联专家来华。专家们在中国展开为期多久的工作，他们何时到来，以及协议中涉及的其他材料都包含在照会文件中。

我们要求使馆将上述要求转交苏联政府，并予以答复。

中国外交部对大使馆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1958年)2月16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д.1, п.431, л.1

№20614-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1958年2月20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20日

拜会南日。

向他介绍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月5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2月7日的声明的声明，并将文本交给他。

南日看了声明的文本后说，声明写得很好，很有力。南日还指出，在苏联政府的文本中首次将南北朝鲜称为“两个朝鲜国家”。

我问南日，是否他实质上不赞成用国家的称呼，还是他有别的想法？我说，在朝鲜的土地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我还提醒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所及的领土上进行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了这一点。

南日回答说，实际上，这样的称呼不会引起什么反对和怀疑，事实上，在朝鲜的领土上存在着两个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正确理解这一点的。只是有一点使我们感到不安，朝鲜人民会正确理解吗？

接着，南日对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如果两个朝鲜国家缔结了和平协议.....”这段话说，这一点不为理解：如果联合国认为是在同北朝鲜打仗，而南朝鲜自己又不愿签订和平协定，那么怎能同南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呢？

我对南日说，如果是说南朝鲜政府的立场，那么它直到现在都不愿进行任何谈判，更不用说签订和平协议或条约了，当然它是不会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协定的。但在朝鲜土地上形成和存在的两个国家间签订和约，承诺不用武力来解决一切争端，从实质上讲是完全正常和正确的。

南日对通报苏联政府的声明一事表示感谢，他说，现在金日成大概有空了(他原来忙于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事)，他会马上看声明文本的。

由于苏联外交部的要求，朝鲜外务省对在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ЭКАДВ)的大会上要审议的提案提出一些建议，其中有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这个委员会的会员国的建议。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令，我向南日通报说，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大会没有决定吸收会员国的事。这类问题要由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来决定。我对他说，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的大会上发言时将会提出，不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是错误的。我们的代表团会介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代表团在发言中还会表示赞成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这将会促进朝鲜两个部分的相互接近。

南日对通报这些情况表示感谢。

我对南日说，我使馆的武官将于2月23日举行招待会，庆祝苏军建军40周年。我请他将我们的邀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请他们出席招待会。

南日表示感谢，他说，我和金日成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已转达了举办招待会的事。金日成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会出席招待会的。

我问南日，在内阁举办的最近一次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为什么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金科奉没有出席？这如何解释？

南日回答说，近期不邀请金科奉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不邀请他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通常出席的招待会和见面会。

因此，我征求南日的意见，是否该邀请金科奉出席2月23日的招待会？

南日说，鉴于上述情况，不宜邀请金科奉出席招待会。

我问南日，对2月16日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客机和飞机上的乘客的处置，是否有了决定？

南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还未最后决定。美方于今年2月18日向军事委员会秘书处提出讨论归还南朝鲜当局飞机和乘客的建议。朝方代表回应说，这一问题不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南朝鲜政府必须直接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交涉。南日说，我们已经有了说法，有关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南朝鲜当局应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向我们提出。如果进行这样的交涉，我们会送回非军事人员的。至于如何处理飞机，这个问题让南朝鲜政府直接同我们政府交涉。

最后，南日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访的印象。他说，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对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水平方面的巨大成绩。兴南化肥厂给代表团的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当时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化学工业方面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面，他表示要派中国化学工业人员代表团来我们的化工厂学习经验。元山地区的国防工程给中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中国朋友参观了建造在山里和隧道内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周恩来在参观这些工程时说，这些设施既结实，又方便。这时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说，在国防设施方面应该学习朝鲜同志的经验。代表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产品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访问肃南(Сунан)郡的三亚(Санян)农业合作社时，周恩来对用营养罐培育棉苗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了解。南日说，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棉花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大概有可能每年提供1万吨(在商讨五年计划草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向朝鲜朋友每年提供棉花8000吨)。谈到提供焦煤问题时，周恩来询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多少才能满足要求，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提供焦煤方面将给予援

助，待回国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讨论后再通知提供的数量。关于宗派主义和逃往中国的政治叛逃者的问题没有提出，也没有讨论，因为这一问题，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已取得完全的谅解。

我对通报以上情况向南日表示感谢。

过了一会儿，南日用政府专用电话告诉我说，金日成已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文本。用南日的话来说，金日成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声明是有力的，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措施。金日成要求转达一点，如有可能，则在声明的文本中，将“.....两个朝鲜国家.....”中的“国家”一词改为“政府”，或者说：朝鲜的两个部分——南方和北方。南日说，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在我看到声明的文本时已谈到。这时南日再一次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理解已形成和存在两个国家。

我告诉他说，要求将会转达。这时我再次表示，在朝鲜的土地上事实上已存在两个国家，未必有太大的必要作这样的修改。

（金日成的这一要求已用电话向远东司的负责人齐米亚宁同志转达。他说，他将立即向葛罗米柯部长报告。另外，齐米亚宁还说，对转交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还将有补充——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2月19日的联合声明。）

注：在公布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中，把“两个朝鲜国家”改成了“两个政府”。

晚上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招待会上我向周恩来通报说，今天晚上电台将广播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2月5日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2月7日的声明。这一声明将于2月21日见报。

周恩来对通报这一消息表示感谢。

АВР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41-46

№20614-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22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22日

朝苏友好协会在牡丹峰剧院举办纪念苏联武装力量建立40周年的庆祝会，以金日成为首的党政领导出席了庆祝会。我和武官季亚科诺夫在主席台就座。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泰根(Ким Тхэ Ген)中将作报告。报告后武官作了简短的讲话。

在交谈时，金日成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的印象；自己对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生的态度；还就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飞机事件交换意见。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的印象时，金日成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成员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和同工厂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的会见十分满意。他们高度赞扬工业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同意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他们注意到人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的支持和居民良好的政治情绪。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我们要求他们研究可能提供棉花和焦炭的数量。周恩来回答说，最近几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每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1万吨棉花(以前是每年8000吨)。至于焦炭的数量，代表团回国后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后再告。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周恩来向我们建议在鸭绿江的水丰水电站上游修建功率为50万千瓦的云峰水电站。我们回答说，目前我们缺乏资金建造这个水电站。针对我们的回答，周恩来说，他们可以出资建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后再支付自己的投资部分。我们没有表示异议。

事实上情况是这样，花一年时间用来勘查，一年用来设计。几年后电站才能动工修建。

接着金日成说，他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安德罗波夫部长就在莫斯科就读的8名朝鲜大学生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问题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的意见。我向南日建议，要大使馆转告安德罗波夫，不要采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学生返回朝鲜。这样做对苏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来说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会带来损失。金日成说，我不知道今年2月初内务省已派了两个人去莫斯科，想要强行把这些学生送回平壤。（我倾向于认为这件事金日成是知道的，但他现在却佯装说内务省派人去莫斯科未经他的同意。）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46-49

№138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 (1958年2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2月27日会议第1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毛希丁诺夫、柯西金、卡伦别尔津、科罗特钦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

第18项 关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米高扬、布尔加宁、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委托库西宁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邀请刘晓同志，并向他说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说：他并没有放弃斗争，不珍惜友谊；库西宁同志还应该讲述一下共产国际时期的事实。 [111]

交换了意见。

什么也没有寄出。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9, л.1-2

No09888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1958年2月2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

第74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2月28日

受中央委托，今天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并向他阐述了苏联政府在高峰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向他通报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消息。

毛泽东满怀兴趣地听取了高峰会议的消息，并且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新闻中阐述的苏联的立场，他补充说，“是积极的和完全正确的”。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说，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措施。毛泽东说，中国也支援苏加诺 [112] 棉布和大米。此外，众所周知，中国已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

在会谈中，毛泽东几次强调，必须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援助是它所必需的”。他指出，近几天，印度尼西亚内阁作出了重要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反对暴乱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支援苏加诺。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他继续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尤其是苏加诺和哈塔，正遭受外来的巨大压力，军事方面有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行动，经济方面有经济封锁的威胁。毛泽东援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决定邀请苏联军舰进行友好访问。“我认为”，他指出：“如果苏联军舰这一访问不伴随什么危险，那么绝对应当实施这一访问，这将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菲律宾地区行动的一种对抗。”毛泽东还谈了艾地 [113]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然后，毛泽东赞许地谈了他对苏联政府想就印度尼西亚问题同尼赫鲁接触的看法。尼赫鲁，他指出，也许能想出什么有益的东西。从经济援助的观点看，印度可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船只。的确，印度不能提供粮食，因为他现在还从美国购买大批粮食。

于是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印度的经济形势。指出，印度农业苦于经常遭受自然灾害，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印度没能力自己解决这些困难。被迫求助于外国援助。

然后就我通报的两则新闻概括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效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他说，“我们在中国高兴地关注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

这些措施，毛泽东继续说，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相反，由于苏联的努力，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里，他指出，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说，处于被迫让步的形势之下，其中包括在裁军问题上。在某些地方，他指出，人们开始明白，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战争会导致什么。大概，要消灭比如说西德或英国，使用4个氢弹就足够了。

不能排除，毛泽东说，人类不能逃避这种状况，“资本主义阵营的疯子们会开始热核战争”。无论有多大牺牲，毛泽东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不会灭绝，可能得用100年时间才能恢复在这一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但资本主义体系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但也存在另一种结局，即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同社会主义阵营妥协。帝国主义者，他强调，可以同意禁止使用原子和氢武器，就像当年他们同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样。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指出，双方都明白，在发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一阵营和另一阵营国家的人民将遭受什么样的牺牲。而且，资本家还将考虑到，在战争情况下，覆灭的不仅有他们的资本，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他们害怕原子弹和氢弹。“但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拥有普通装备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现在特别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公开讲，在禁止氢弹的情况下，他们“面对苏联陆军和空军优势的兵力将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同社

社会主义国家谈判之前，急忙建立自己的火箭装置和氢弹储备，而为了掩盖自己的计划和支持军事狂热，他们同美国人一起组织了所谓的“带原子弹和氢弹飞机的安全飞行”。帝国主义国家所煽动的军事狂热以及军备竞赛，毛泽东说，进一步促使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

谈到美国领导人的最近讲话，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的立场看来大大好于杜勒斯的立场，“杜勒斯的发言我没看，因为我清楚，他(杜勒斯)要说什么”。

谈到离中国不远的美军事基地，毛泽东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冲绳岛、菲律宾和中途岛上的基地。“台湾和南韩是次要的危险，因为这些地区集中的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较少”。

在座谈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朝鲜问题。他说周恩来朝鲜之行取得了积极成果。“朝鲜事态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是确定的历史条件和所有工作促成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莫斯科同金日成的会谈。当时我指出，毛泽东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活动中有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反帝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捍卫国际主义原则。除此之外“我还指出，在党的活动中也有缺点，不能认为整个工作从头到尾是绝对正确的”。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时承认他们党的作风和地方工作有不少缺点。

在莫斯科，毛泽东继续说，我还向金日成证明，中国志愿军必须从朝鲜撤出，因为“国内几乎驻有百万外国军队，这种状况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然后毛泽东还谈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电告中央。

我们对朝鲜同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说，开始产生积极的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之后，讲了许多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作风的新气象”。总的来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讲得是对的，朝鲜问题，尽管复杂，但毕竟比波兰问题轻。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提到以

往几年的形势时，他指出，1955年冬季以前，“无论是我，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现在这么高兴。只有在中国农业、私有工商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我们才切实感觉到有可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但之后不久，从1956年6月至1957年6月，“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又进入了严峻的时刻”。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这是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反共，尤其是反苏的行动。我们国内1957年春天出现了右派的疯狂进攻。

涉及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他们应成为一次很好的教训。说到这里，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他同布克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内形势会谈的情况。^[114]在其来华期间，毛泽东说，布克谈了匈牙利事件过后不久党内出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共产党的形势。莫斯科会议之后，美国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丹尼斯这时期发生了动摇。^[115]

现在，他继续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事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比如在中国，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继续说，在中国以前历次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也进行过，尤其是在揭露胡适、梁漱溟、胡风，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和对经典著作《红楼梦》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但所有这些运动只涉及个别的或部分问题，涉及的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个别方面。

毛泽东指出，对总的资产阶级思想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是从去年开始的，当时解决在中国是要无产阶级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众所周知，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自由观。在资产阶级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自由便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比如在波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那里有过多的资产阶级自由。

毛泽东接下来谈到了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拖延，没给小私有者留下“生根巩固”的机会。所以在土改之后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合作化进程。

在完成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开始了思想领域的革

命。众所周知，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概念包括：1.所有制关系，2.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物质福利的分配。”现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2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解决群众和干部之间，工人和农民、工厂和农村领导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中国采用了大鸣大放辩论的方法。乍看起来，可能认为，他指出，这种方法“会损害党和国家干部的威信，但实践表明，并不是这样”。批评和批判少数工作不好的干部的同时，群众又保护多数好的干部。

解决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还帮助我们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例如，在整风运动中，工人们自觉宣布，“在未来15年内，他们不要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增加工资，发工作服和给予其他优惠，因为现在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光辉前景和目标——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以便赶超英国”。以前，他指出，工人们常常看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即“在某种情况下，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定数量的工资或得到某种供给”。工人有时说，以前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所谓的“五大件”，即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在大辩论之前，毛泽东继续说，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共青团)同工人之间经常形成不平等关系，即“老爷和劳动者的关系”。人民群众有时把干部称作“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官僚”。

由于在运动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势开始得到好转：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工作中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干部勇敢地彻底地开展自我批评，为群众作表率。

由于最近的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机勃勃。看来，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指标要比规定的期限大大提前完成。全国兴起水利建设，水浇地面积大大扩大了，只要3年时间(1958—1960年)就可抵御一般的水旱灾害了(特大灾害除外)。原来计划完成这一任务需要10年。农业生产增长指标实现也无需10年，5—7年就可实现了。现在我们碰到自然灾害，毛泽东补充说，我们得需要外援。但再过3年，“我们就会打个小的翻身仗”。毛泽东指出，不久前，他到各地走了走，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措施。毛泽东说，有时候，外国朋友不理解这些措施和工作方法。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些措施和方法，需要注意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然后毛泽东说，最近几个月，他到过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两周前，他刚从东北回来，他到了抚顺煤矿和铝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长春汽车制造厂。在高度赞扬长春汽车厂时，毛泽东指出了它的不少消极方面：“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个工厂似乎太大了；由于缺乏原料，它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工厂许多零件自己不能制造，还需要进口。”看来，类似的大工厂，毛泽东说，中国不需要很多。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多建设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需要投资不大，而在短期内便可建成。

会谈中毛泽东热烈称赞了苏共中央最近(2月)全会的决议。他指出：“苏共中央在全会上制定的措施是前进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进一步加速发展农业，给生产力发展以一个广阔的空间。”苏联的这一经验，他说，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们和毛泽东详细地就机械拖拉机站改组的有关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赞成这种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没能正确地看到机械拖拉机站的前景，所以作出了匆忙的、不正确的理论结论。

涉及斯大林时期苏联事业的整个形势，毛泽东说，工业当时进步很快，而农业却非常落后，“就像一匹瘸腿马一样，不能正常前进”。他接着说，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民不正常的高税收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斯大林在工业上也犯了错误，例如，对工业管理过分集中。但毕竟，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其他错误现在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教训，“我们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困难。“事情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毛泽东说，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他同意我以下补充意见：对于苏联来说，严重的困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缺少有技能的干部。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同在莫斯科时一样，重新谈到“苏联哲学界有一个好的风气，苏联哲学很活跃”。他说，近来他想了解苏联哲学家的一些近作。他请我给他说出几个作者的名字并给他推荐他们的几本著作。

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从东北巡视回来之后他患了感冒，病了两个星期。一般说来，他指出，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现在中共中央，他继续说，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规定中央委员，各省委区委书记一年得下地方4个月，了解情况。这一规定只对那些身体不好不能下去的同志例外。这一决定，毛泽东说，能帮助我们克服领导地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

会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2, д.6, л.86-96

№20379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1958年3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有关台湾情况的简要介绍。相关资料均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3月1日

第15Д242号

关于台湾的局势

(情况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北京使馆转交了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其中涉及该岛的人口、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中方情报中说，据蒋介石分子所统计的数据显示，台湾人口共计94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军队(52万人)以及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的人口(5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共计约1000万人。

关于台湾的政治状况，该情报指出，过去一年中国际紧张局势的日益趋缓更加动摇了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内部斗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由于担心蒋介石或其亲信中的某一人，如蒋经国(蒋介石与前妻所生的长子，精通俄语，妻子为俄国人，1925—1937年间在俄国居住，化名叶利扎洛夫。他曾在孙中山大学就读，后转学军事政治学院，并曾在苏联军队中当过兵。他于1937年回到中国，现任“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负责人和主管侦察和反侦察事务的国防部政策司司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人极端仇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暗中与大陆举行谈判，于是便加紧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展阴谋诡计——积极支持亲美分子胡适(国民党反动亲美活动家，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科学博士学位。1938—1942年间，他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职务。目前，他居住在美国，是亲美、反蒋分子的领袖人物)、廖文毅(现居住在日本，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此人既反蒋又反共，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傀儡)等组建“在野党”。而后者则与身在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当年曾为中国军阀集团领袖人物之一，并从事过反蒋活动。1949年4月，他曾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1949年4月，他前往美国至今)和“第三势力”的其他代表在反蒋行动中遥相呼应，内外勾结。为此，美国人蓄意策动桑晨斌(Сэн Чэнпин，国民党活动家之一，1949年逃亡香港。美国人利用其以达到自己的反蒋目的)发表了反蒋演说。另外，美国还积极采取措施拉拢陈诚(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1950—1954年间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54年，他被“选举”为所谓中华民国副总统。而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他被“选举”为国民党副主席。目前，实际上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

物)。在上述人等的帮助下，美国人极力将拥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例如，其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以迫使蒋介石放弃自己“反攻大陆”的幻想；1958年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援助，数额比以前减少了2000万美元。

蒋介石不满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自己所采取的不友好举动。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反对美国干涉台湾内政的民族情绪也不断高涨。

为了破坏美国所谓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蒋介石依然坚持自己“反攻大陆”与“革命”相结合的口号，并在国际上积极展开活动：为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而斗争，在国际关系领域扩展自己的联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与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英国、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等建立或加强文化、经济和贸易诸方面的交往。

蒋介石还采取各种措施以稳固台湾的形势。例如，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反复强调“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这里，他无疑指的是所有台湾内外那些对国民党的胜利丧失了信心或表现欠佳的党员们。

因此，很难想象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会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2.在过去的一年中台湾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分歧也在加剧。其中争斗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集团与陈诚集团之间为争夺蒋介石(蒋现在已经70周岁了)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这两个集团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并得到了蒋介石的直接支持。

蒋经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包括：国民党基层组织和保密机关。他通过自己一手组建的“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控制了台湾所有青年组织。通过在军队中独立发挥作用的党务政务系统他还对陆军、空军和海军等各军种实施着监督。部分高级军官(如陆军司令彭孟緝)也是蒋经国的亲信。另外，蒋经国还在政府部门(如境外中国人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支持陈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政府行政部门、财经界和陆军范围内。另外，他还在行政院和国民党上层中享有重大影响和威望。

为了消除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在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建议选举陈诚担任党的副主席职务。此举象征性地表明：陈诚将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蒋介石采取上述举措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便在他死后政权表面上由陈诚掌握，而实权仍集中在蒋经国手中。

广大国民党员中低落情绪的不断加剧也对台湾政治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多数国民党老党员都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他们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前途，精神状态倍感压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推行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也对国民党内部反美情绪的高涨和矛盾的激化产生了直接作用。在大陆方面宣布了上述政策之后，部分国民党员便公开表示响应并宣称：“(国民党人)可以与共产主义一起殊途同归”。甚至在掌握着政权的集团内部也有人赞成“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理由是：如今谁胜谁负的问题业已解决，而如果继续拖延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其他好处，只能有利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试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影响力的扩大，但至今也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于台湾的经济状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提供的情报显示，以往美国每年都向蒋介石提供价值32500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此举并没有减轻台湾岛内的财政经济压力，后者状况反而是每况愈下。蒋介石的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例如1956年此项开支便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85%(其中不包括台湾所消耗的从美国直接军事援助基金中获得的那部分军用物资)。军费规模过大及其逐年不断增长导致台湾财政赤字从1953年的6.5%增至1956年的10.6%。财政开支的增长致使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截至1956年以前，台湾税收幅度比1949年增加了38.9倍。如今，台湾的货币流通量比1949年增加了50多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7-21

№23035 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1958年3月8日)

机密

第136号

参与会谈者包括：

苏方——H.П.布瑟金、A.Γ.阿金佛夫和O.C.基谢廖娃等同志。

中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同志。

翻译——Γ.Γ.马纳耶夫和宣森等同志。

会议伊始，薄一波同志便说，И.В.阿尔希波夫 [116] 同志曾请求李富春同志通报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8年经济建设领域所计划的最重要举措，但由于李富春同志目前正在出差，因此只能由他来负责通报这方面情况。

薄一波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给予了高度关注。

最近，中共中央详细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其中尤其是如下几个时期：1.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下半年；2.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下半年；3.从1957年下半年至今。

通过分析上述各时期的经济建设，表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按照如下曲线运行的：一个时期——快速高涨，而另一时期——发展速度又相对缓慢。

例如，1955年工业品(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在内)总量增长了8%，1956年其增长已达到31%，1957年增长速度又下降至8.6%，而按照1958年的计划(目前该计划正在制定，并将作为动员性计划)增长速度将重新升至32%—33%。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从1955年10月1日至1956年10月1日，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1亿亩(740万公顷)，而从1956年10月1日至1957年10月1日——只增加了4500万亩(300万公顷)。

根据计划，从1957年10月1日至1958年10月1日，原计划土地灌溉面积增长9000万亩(600万公顷)。而实际上，截至今年3月1日已完成了1.6亿多亩(近1100万公顷)。如今，该计划已增至2.6亿亩(1730万公

顷)。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摇摆不定的原因，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众所周知，1955年末和1956年初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群众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表现出了巨大的劳动积极性，因而国家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半年以后，即自195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的一些同志在是否有必要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上产生了疑虑，一些人甚至说国民经济发展得过快了。其结果便是导致我们减弱了对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口号的关注。

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下降了。而《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所刊登的题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不正确社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上述情况起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该社论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旨在缩减计划的保守观点；而另一方面，也应当坚决反对冒进。该文章的重点在于批评“冒进”，即加速发展，也正是这一点起到了负面作用，从而压抑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些倾向和观点一直存在并持续到1957年中共9月中央全会以前。在全会上这些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情况才有所好转。

对此，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1955年下半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些人怀疑是否有必要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另一些人则坚持高速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坚决地批判了那些对高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并制定了由40条纲要组成的著名的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此后，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入了决定性的转折阶段，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也急剧加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章集所写的序言在批判和揭露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与对待“多、快、好、省”方针的态度相类似，一些同志又对是否能够顺利落实40条纲要抱有怀疑态度。这些同志又开始认为40条纲要步子迈得太快。因此，在1956年末，尤其是到了1957年上半年，他们又放松了对40条纲要的重视。只是当召开了坚决批

当然，与对待“多、快、好、省”的方针一样，并没有人公开反对40条纲要，但个别同志对落实这些举措所持的怀疑态度滋生了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国务院部委、部门、办公厅和机关单位工作缺乏以前的干劲，没有了应有的执着和高涨的热情。

通过分析过去三年间的经济建设结果，中共9月中央全会详细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并要求党和人民注意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1)坚定不移地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落实“多、快、好、省”的方针；

(2)坚定不移地落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40条纲要，就是说，要提前完成这一任务。

(3)改善工业、贸易和财政工作，完成这些部门的管理，就是说，要使各部委和部门成为能够促进和发展群众积极性的机构，与此同时还要扩大地方机关管理工业、贸易和财政的权限。如今，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全会作出的这些决议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的报刊均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都存在的新高潮以及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跃进情况。

当前，国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运动，目的就是要反对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搞清国内资源储备，坚定不移地落实“多、快、好、省”方针和提前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

与此相应，中共中央通过决议：1958年的计划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第一个计划，已被全国人大例会批准，此为最低计划。

第二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作为动员性计划。其中，各经济部门的发展指标均大幅提高。根据该计划，在1958年，工业（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将达到32.33%。该计划将成为所有部委和部门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依此作为评估其工作的根据。只是该计划将不会对外公布。

第三个计划，由各部委、部门、省、企业和建设单位等根据利用当地现有全部资源储备的最大可能性自行制定，其计划指标将比上两个计划更高。

薄一波说，以上是他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阿尔希波夫同志问，在经济建设出现新高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中国领导人目前如何评价1956年所出现的情况——当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迅速增长，从而导致国家在商品保障方面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回答说，1956年在一些领域，其中包括在劳动和工资等方面，(我们)的确存在步子迈得过快的问题。

例如，根据计划，1956年我们原打算增加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为80万人，可实际上其增加了250万人。同时，工人和职员工资也提高了14.3%。人数和平均工资这样增长当然是有点过快了，这自然会加剧居民商品供给方面的困难。现在，乃至今后，我们将极力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原因，当各部委和部门由于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而要求增长人数时，我们则表现得较为谨慎。不过，就1956年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而言，该年度我们的发展步子迈得还不算过快。

接下来，薄一波同志又谈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在中国条件下利用这些经验。

他说，1958年和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将继续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后每年都要跟1958年一样——达到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是，我们也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应当像过去的近三年那样——出现急剧下滑的情况。当然，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并花大力气改进各经济机关，尤其是计划机关的工作。目前，后者的工作仍存在严重的不足。

当前，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在中国条件下更合理地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以便更顺利地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从而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能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原则，又能反映只有在中国条件下才具备的那些特点，即创造性地借鉴苏联的经验。

我们认为，中国的当前情况在很多方面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技术发展水平低。农业人口占到了国家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我们国家的这些特殊条件均要求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要持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省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在当前中国正实施的经济建设领域中所存在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该讲话以前未公开，而近期将对外公布)。

薄一波同志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摘取了如下四个问题：

(1)关于国家工业化时期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关于轻重工业发展的关系；

(2)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3)关于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

(4)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以及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等在预算资金的支出上的关系以及关于利用国防工业企业生产民用产品的问题。

薄一波说，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详细研究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授给我们的。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绝不能忘了农业。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即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以前，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同——只重视发展工业。因而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农业是重工业发展的主要积累源泉。我们应当使农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成为国家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资金积累源泉。

如果只重视工业发展，而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那么国民经济就像一个瘸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薄一波同志指出，在高度集中管理的

情况下将导致中央的高度集权，这会减弱地方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并最终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将物资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中央的情况下，其目标只针对直属中央的大型企业建设，而中、小型企业就得不到充分的建设和发展，最终导致国家经济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与苏联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工业过分集中于某些区域，而对其他以前落后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够，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对的。

例如，山东省拥有5000万人口，几乎与英国的人口相当。四川6700万人口，约与德国的人口持平，而湖南和湖北的4000多万人口也几乎是一个意大利。但在工业方面，这些省份则根本无法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

如今，我们提出了全力在所有省份发展工业尤其是地方工业的任务。毫无疑问，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将在国家内陆地区进行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建设和扩展在老工业区的那些现有企业。必须认识到，在原有工业结构上停滞不前和只在位于沿海地区的现有企业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是很不合理的做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反复研究而确定的经济建设、国防和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的预算资金支出的比例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当前国际形势，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把军事和行政管理的预算支出压缩至20%，而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30%以上。

在国防和民用工业的和谐发展关系方面，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今后将不再加速生产常规武器，而将精力只集中到特殊种类的现代武器生产方面；把剩余出的国防企业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民用产品。

薄一波同志接着强调，过去我们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在工业上所花的力气比农业多。大量资金和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及其机关，而各省份只得到少量资金并在权力上受到限制，国防企业的发展有时会以压缩民用产品的生产为代价。

这些偏差给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且无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如果我们只重视工业发展，就只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而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利用不够，因为我们对农业发展的关注较少。在发展中央直属工业时，我们只依靠了大城市工人的积极性，而各省份居民的

积极性和各地方的可能性就利用得不够。

近期，国家正在对工业、贸易和财政管理机构进行改组。许多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将转交各地方管理。目前，各省和各县都在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此举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地方将积极地挖掘内部潜力，从而为1958年实现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将使我们在大型、以及中型和小型企业的建设方面都能集中精力。

如今，中央，即各部委和部门将关注所有大型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建设和管理问题。大部分中型和所有小型企业将完全由地方管理。与此同时，各地方还要负责这些企业的建设事务。

这样，各地方的巨大能力和他们的积极性将被吸引集中到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方面，以确保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加快一系列新企业的建设，从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目前各部委和部门的任务有两个：

(1)管理所属大型和一些中型企业，为此他们将集中自己精力的30%以上。

(2)帮助各地方发展……

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在今后的15年内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赶超英国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已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领导同志说过。我们知道，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在积极动员民众所有力量的条件下该任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落实这一计划，中共中央给每个省都下达了如下两项任务：

(1)各省必须在尽量短的期限内确保工业品总量取得对农产品总量上的优势；

(2)在最短期限内，根据各省的特点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的计划。

目前，除辽宁外所有省份的农产品总量均超过了工业品总量。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任务，所有省份如今都在积极开展工作，寻找各种可能性

来扩大工业生产，发展新的工业领域，利用全部现有资源，以便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况下尽快改变农产品和工业品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进而使各省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

至于设定期限为10年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所提出的那些任务，许多省份都认为自己可以提前完成，而个别指标甚至可以在不到5年时间内便彻底实现。

各省在落实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将受到严格的社会监督。每个季度有关部门都将对各省的工作进行总结，而到了年终将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作出整体总结。至此，薄一波同志结束了自己关于第二个问题的通报。

针对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第二个和第三个最高生产计划与……由最低计划所决定的物质技术供应相互结合；现有资源以及所开采的各种原料和物资是否能够保证按照第二和第三种计划方案完成1958年的既定生产计划。薄一波同志答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一下过去数年间我们实施物资技术供给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

1958年，(我国)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一些计划机构，尤其是那些从事物资技术供应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开始传出这样的议论，即原料和物资不足，有必要降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等等。而当我们刚刚降低了发展速度，他们又开始抱怨说原料和物资过剩，商品积压，而解决的办法只有增加这些物资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就是1955年时的情况。

1956年，我们极大地加快了工业和建设的发展速度。于是，又有一些人抱怨原料和物资不足。1957年，发展速度放缓，物资剩余又开始增长，而关于商品积压的埋怨又起。

我们前不久认真检查了国内的物资技术供给情况，了解了这方面的积极经验和诸多不足。过去年间的经验表明，关于个别种类物资不足或者过剩的那些抱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此类抱怨即使现在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这方面的些许征兆。

我们认为，在物资和原料供给方面所产生的困难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原因首先在于：

(1)生产的增加，并为此而广泛利用一些小型手工业企业。

例如，1958年我们计划把生铁生产数量增加到800万吨，钢700万吨。

又如，今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出现……与此同时，优质的名牌水泥将用于建设工、农业大型设施。

(2)动员现有的大量剩余物资和储备。例如，截至1957年底以前，剩余的黑色金属为250万吨，而依照常规能用90万吨。

(3)增加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

另外，通过开展反对挥霍浪费的斗争和节约原料、物资的运动，也将有助于我们成功克服所产生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把话题转到第三个问题，即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他说，我们目前正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整顿工作作风运动在现阶段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展反对降低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的斗争，揭露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尤其是大规模地开展反对挥霍浪费和提倡节约的斗争。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便是贴大字报。

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计划于今年5—6月份结束，并打算于4月初或中旬召开全国党代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讨论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结果。

自1958年下半年(7月1日)起，将在国内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技术革命运动。该问题目前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筹备。该问题本身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细致的准备，因为当前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技术方面赶超一系列先进国家。

与此相关，中共中央在干部问题方面所提出的口号——“又红又专”……极其重要的意义。“红”的意思是注意培养干部的革命性，“专”指的是要获得专业知识。

做到“红”，仅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优秀专家。只是“专家”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知识，则意味着其工作没有光明的前途。我们正在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而斗争。当前，中共中央已向广大干部提出了如下任务，即从副部长起直到更高级别的领

导干部都要在5年期限内学习一门专业，或某一部分科学技术，以便成为一名熟练的专家；与此同时，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掌握一门外语。

技术革命任务的完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各地方上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是成功解决这一任务的保证。

薄一波同志接着通报了关于根除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打倒官僚习气”的口号的问题。他说，这一斗争也是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干部中仍存在这样一些人：满身的官僚习气……行贿受贿……喜欢自吹自擂；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的批评；不去工厂和建筑工地，农村和高校，而是待在办公室里；认为革命工作只是写文章，作决定和编指令。

中共中央提出了根除官僚习气的任务，要求坚决清除官僚主义，从而巩固与群众的联系。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已局部地实施了如下举措：

(1)派遣所有人——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参加劳动锻炼，即到企业参加实际劳动锻炼和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目前是要求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去企业或农村工作不少于2年，截至今派去参加劳动锻炼的人数已达到160万。

(2)中共中央全会成员和干部——从副部级开始，每年在地方上，而非中央，工作的时间至少4个月。

在结束自己的通报之时，薄一波同志说，中国对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抱有浓厚的兴趣。

中共中央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和高度赞扬苏联在清除个人崇拜，迅速振兴农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扩大联盟共和国权限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团结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这一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对我们所说——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话。这里，薄一波同志强调，坦诚地说，他本人和其他自己的同志们一样，即在刚听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之后，都在对批判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因为斯大林在中国人中是非常有声望的。只是在稍后，我们才清除了这些疑惑。

阿尔希波夫同志感谢薄一波同志所作的上述通报，并询问：薄一波同志是否知道，中方打算何时和如何完成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哈萨克斯坦城镇)铁路线的建设工程。

薄一波同志答，与以前计划的工期相符，(中国政府)目前正计划加快这一铁路线建设并尽快使之投入使用。不过，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更完整情况他将委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我们作出答复。

此后，阿尔希波夫同志简要地向薄一波同志介绍了(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划管理局的工作进程情况，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明确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为中国一系列成套企业——其中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批新企业在内——供应的设备规模。

阿尔希波夫同志说，这一工作的结果显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各部委打算由苏联援建的新企业、车间和设施有100个以上，其中多数均包括在苏方早在1956年9月已原则上表示同意援建的109个项目之内。鉴于上述中国部委一些企业打算于1959年便获得苏联设备，因此双方最好能在近期就这些企业签订相应协议问题举行一系列谈判。

与此同时，阿尔希波夫同志请求薄一波同志敦促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尽快起草关于根据1959年有效协议苏联向正在为中国援建的企业提供设备的数量的提案。该协议是今年4月份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期间就这方面问题所签署的。

薄一波同志承诺将研究阿尔希波夫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于加速筹备关于(苏方向中方)分批供应1959年的设备的谈判的问题，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已经下达了必要的指令。薄一波同志接着提到，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库兹明同志就1959—1965年间中国远景计划双方开展联合工作的问题给李富春同志所写的信。中国国家计委不掌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终控制数据，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初的计划草案中任务制定得过低。目前，我们正在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与此相关，薄一波同志本人支持李富春同志所提的看法，即把中国国家计委的初步草案和从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工作的结果中所获得的资料，交给苏联国家计委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薄一波同志还通报，中国国家计委将继续就这方面问题开展工作，要把必要的问题明确下来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阿尔希波夫同志指出，苏方目前正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一起工作，以确定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向中国供应的、用于苏联援建的企业成套设备的数量，而库兹明同志在来信中所提到的只涉及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阿尔希波夫同志向薄一波同志转交了经互会在莫斯科出版的《1959年经互会成员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指南。

会议记录：A.阿金佛夫

1958年3月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72，л.58-75

№09887 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 (1958年3月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

第78号

绝密

文本第4份

与朱德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3月9日

星期天，朱德主动来到我家里。

在会谈中，朱德除了共同涉及的问题，还与我谈了几个其他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弄清了我的看法。

同毛泽东上次座谈一样，他也说，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与刘骁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朱德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英镑区’相对抗的一种形式”。他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

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有的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基础进行贸易的做法未必是正常的，于社会主义阵营未必有利。”

“建立卢布区，”朱德接着说：“我们认为很有前途。这一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

在这方面，他分析了中国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他简要指出了双方在互相贸易时运费过高的问题。“运费高达30%或更高，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出口货物的成本”。帝国主义国家，他指出，非常重视类似的问题，在降低外贸费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什么我们，他指出，不研究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为了缩短货物运输里程，不仅可以考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出口，还可以考虑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地区广泛组织协作以生产出口商品。”

朱德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或向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时，价格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划一。在价格较有利的情况下，他指出：“像波兰和南斯拉夫这类国家，大概就不会面向资本家了。”

朱德还涉及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问题，尤其是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贸易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指出，有时争相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以不同的价格买卖一类商品。“地理上中国离这些国家近，所以，比方说从捷克斯洛伐克往这些地区运商品就不利，不合算。”

总的来看，朱德强调说，上述因素和其他因素说明，解决“卢布区”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是有利的。

我向他指出，为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经济问题，经互会正在做一定的工作。朱德同意我的意见，但指出：“经互会只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对我的建立“卢布区”的态度感兴趣。由于我没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我只是泛泛地对他作了回答，说在共同努力制定这一措施时，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创造了这一经济合作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变得更强大。这特别加强了我们的立场，我补充说，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朱德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他接着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应由苏联负责。“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带头人——苏联来做。”

然后朱德问，1930年代经济危机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回答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同苏联发展贸易，在经济上同苏联靠近。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还谈了中国国内形势方面的几个问题。他谈了国民经济的伟大成就，说这是党的政策——“为全面提高中国人民生活”创造条件——所带来的结果。

谈到农业，他说，今年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经济作物可望继续增长。为了增产，今年注重了发展化肥生产。如，第二个五年计划，将生产化肥1000万吨，而现在才生产100万吨。

现在，朱德继续说，正在重新审议八大制定的重工业目标。其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定每年生产钢1000万—1100万吨，现在改为1500万吨以上，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将生产30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的任务是达到目前苏联钢的生产水平。朱德指出，“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修改我们以前订的保守计划”。

朱德在会谈中又一次回到中国铁路建设问题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说，计划共修建铁路15000公里—20000公里。其中，兰州—阿拉木图干线占有特殊地位。“今年这条线可能修到乌鲁木齐”。另一条，朱德说，宝鸡成都宜宾云南越南铁路也将有重要的经济和国防意义。

在会谈中，朱德简要谈了中国建设干部的培养问题。他通报说，现在全国有一百多万建设工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的50个师，这些师的全体人员现在已转业从事建设工作，而且获得了相应的技能。这些干部，他指出，在国民经济中表现很好。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苏经贸合作和贸易方面的几个问题。

同上次和我会谈一样，他又提到了苏联利用中国劳动力问题。朱德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苏中协定有一定缺点。“现在，当然是如果苏联同志们同意，可以改变以前的做法，即主要把中国工人派往苏联远

东，而且不是长期，仅在该工地开工期间待在苏联。”我们准备研究这个问题，朱德继续说，让这些工人自己负担一部分往返路费。“由于中国扩大经济建设，我们利用机会在苏联培训自己的干部很重要，同时他们也可给苏联建设提供实际援助。”他还说，中国东北生产发达，有一定的建设储备(砖、水泥等)，这些“中国可以提供给苏联用于远东建设”。

在会谈中，朱德不止一次指出苏联援助的重要意义，说中国长期需要这些援助。我们，他说，在确定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和方向方面急需苏联提供咨询援助。“同时，由于在苏联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骨干力量成长起来了，现在在设计和建设领域，我们可以独立做许多事了。”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国大批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他指出，中国赋予包头、武汉两大型冶金企业以重要意义，这两个企业第一期工程竣工后，每个企业生产能力将达到150万吨，以后将达到300万吨。朱德向我请求，请求采取措施，加紧给这两个企业提供设备，完成其他各项工作。

我答应朱德通过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核实一下对这些企业的援助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再告诉他。

接下来，他简要谈了中苏之间的贸易问题，说中苏贸易很有前途。其中，朱德通报说，中苏贸易额，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看来要比现在增长50%。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谈到了中国由于石油短缺所经受的严重困难。他对与中国接壤的苏联东部石油勘探表示出兴趣。“我们对你们将来能在远东找到石油感兴趣，同地也对萨哈林石油感兴趣。因为通过黑龙江、松花江往中国运送石油费用不会太高。”

同上次会谈一样，朱德又一次强调，在发展我们两国经济时，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和相互联系，他同时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点。

我告诉了朱德苏共中央最近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朱德说，在中国，人们完全赞成这些措施。

在会谈结束时，朱德通报说，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邓小平现在已离开北京到各地去了。

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赵仲元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O.B.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2, д.6, л.97-103

№24035 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1958年3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在委员会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后者受北京的委托了解将于今年3月25—28日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是应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倡议举办的，开会地点在布拉格，将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宣传问题。

我们向张映吾同志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以及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名单。张映吾同志也随即通报说，中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此次布拉格会议，其代表团人员组成如下：

- 1.赵毅敏(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目前已在布拉格)。
- 2.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
- 3.王力——中共中央联络部处长。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13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69, л.48

№24037 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与中国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3月21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教育部杨秀峰同志。

杨秀峰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与1958年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落实苏中合作计划有关的问题。随后，他又提出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主要涉及在最新国防技术手段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专业骨干。

据杨秀峰同志说，他应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将在莫斯科商谈如下事宜：关于增加(中国)专业骨干的培养，其中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火箭技术、特殊钢材和合金的生产、电子和其他科学。在指出已就这方面问题向..... [118] 同志转达了具体的建议之后，杨秀峰说，他很理解该问题“事关国家的既定法令法规”，因此不可能迅速解决。中国方面也愿意按要求等到问题依程序解决的那一天，不过，中方仍希望苏方能够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杨秀峰同志补充道，目前在中国国内已挑选了70名年轻的研究生和大学教师。这些人现在都在等着，并将从1957年9月起被派往苏联，专门从事上述诸科学领域的学习。

杨秀峰同志说，在这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想向苏联高教部了解如下情况：该部的哪些“保密专业”可以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需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才能够解决这方面问题——通过中国和苏联中央之间谈判的方式，在哪些专业领域苏联无法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

杨秀峰同志接着说，目前已有一部分中国年轻专家在苏联从事“保密专业”的学习，但此类学习并非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119]

.....在先前与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采夫同志的会谈中，杨秀峰同志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使目前在苏联的部分中国年轻专家的所学专业——在其结束了在苏联的生产实践课之后——均转到“保密专业”方面。

与此相关，杨秀峰同志还提出了关于根据1958年苏中合作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高教部代表团的问题。其希望该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能够与以前计划的略有不同。与以往普通的代表团不同，中方希望这次在该代表

团中能有如下一些苏联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德罗夫教授，莫斯科能源学院院长奇利金，莫斯科钢铁学院院长基金同志，以及工程物理学院院长，物理技术学院院长，等等。

杨秀峰同志表示，希望该代表团能够在中国逗留两个月时间，并在专门科学领域帮助组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政府希望将该代表团的成员人数从5人增至15人，以便其能够全面(配套，综合性)地开展工作——根据相应专业形成多个由2—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关于该代表团的团长，中国同志希望由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С.В.鲁缅采夫同志担任。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21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69, л.50-51

[1] 此段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2] 1956年9月29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根据塔斯社提供的材料发表了陈楚同志的讲话，而在这些材料中存在着“粗暴的歪曲和擅自的删减”现象。为此，塔斯社领导人А.А.维什涅夫斯基受到了处分(РГАНИ, ф.3, оп.14, д.63, л.1819; оп.12, д.119, л.126-128)。——原注

[3] 原文如此。——编注

[4] 本决定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口头表决方式通过。
——原注

[5] 指在波兰的苏联坦克师团向华沙开动。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上，罗科索夫斯基声明，这是苏军在波兰领土上进行的“计划中的演习”。波兰领导人要求苏军停止行进，并返回自己的营地。——原注

[6] 可能是指就召回在波兰的苏联顾问一事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回信。
——原注

[7] 1956年10月12日和14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先后发出关于匈牙利国内政治危机加剧的通报和紧急报告。——编注

[8] 此时苏军的大部分官兵正在支援秋收。——原注

[9] 关于匈牙利形势的通报未成稿。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执政党的代表召集到莫斯科，主要与他们讨论波兰局势问题。由于布达佩斯爆发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成了10月24日两次磋商(主席团成员与中国代表团单独进行了会晤)的议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没有参加磋商。——原注

[10] 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像波兰领导人那样要求苏共领导人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之所以提出这一动议，可能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军队人数众多的顾问机构使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原注

[11] 根据该情况判断，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22—23时之间召开的。此时在布达佩斯发生了冲击广播电台大楼事件。至23时整，根据苏联国防部长的命令，苏军驻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军区的5个师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原注

[12] 受苏联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协助处理波匈事件。——编注

[13] 原文如此，指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注

[14] 原文如此。——原注

[15] 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未记姓名。——原注

[16] 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大约13点钟开始的。没有形成记录文本。第54—60页是以错误的顺序订在档案卷宗里的。在公布时，将文件按顺序进行了调整。——原注

[17] 根据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的倡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拟定于10月28日23时(莫斯科时间)，就匈牙利局势问题举行会议。该草案是考虑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A.A.索博列夫的建议，由Д.Т.谢皮洛夫为主席团会议起草的，根据该指示草案，向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提出建议，着重强调匈牙利的起义具有法西斯的、反民主的性质(АВНРФ, ф.0536, оп.1, п.5, д.65, л.24-28)。显然，赫鲁晓夫所说的意思是：必须将布达佩斯的新局势通告索博列夫。——原注

[18] 此处指的是在消灭科尔文影剧院区的一批起义者时的不成功的行动。——原注

[19] 这里指的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组成时，对确定赫格居斯候选人资格的投票情况。——原注

[20]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布达佩斯时间的11点钟。——原注

[21] 指的是10月27日被改组的部长内阁，1945—1948年期间的执政联盟的原党的某些代表，这次被以个人身份列入这个改组过的部长内阁里。——原注

[22] 原文句子未完。——原注

[23] 显然，在10月28日晚，M.A.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原注

[24] 可能是记录中的错误。10月28日大约损失600人，死亡的是匈牙利居民，大

约350人是苏联军人。——原注

[25] 正确的是10月25日。此处指的是在科苏特广场上的议会大厦附近向游行示威队伍开枪射击事件。——原注

[26] 实际上，与工会代表就取消这一提法以及要求解散国家安全机构事宜，并没有达成一致。——原注

[27] 显然指的是纳吉在10月25日进行的广播讲话。——原注

[28] 布达佩斯时间10月28日17点25分，纳吉进行了广播讲话，发表新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成为十月事件发展的转折点。政府指责，以前曾将事件评定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认为事件是“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宣布停战以及拟定与苏联就从匈牙利撤军事宜进行谈判。此外多半指的是这个宣言或是它的草案，10月28日上午苏斯洛夫参加了这个草案的讨论。显然，他将这份文稿带回了莫斯科。——原注

[29] 对布尔加宁的发言没作记录。——原注

[30] 原文如此。——原注

[31] 大概，赫鲁晓夫所指的政治益处是：在布达佩斯宣布停战以及苏联军队撤到城市里有助于提高苏联的威望。——原注

[32] 近东的军事行动始于10月29日夜到30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英国和法国于10月31日参与进来，当时他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从海上封锁了埃及，而空军对埃及的城市进行了轰炸。——原注

[33] 显然，10月29日，正是由于这个决定，铁托以及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给匈牙利发来了函电，支持党和国家的新领导以及纳吉10月28日的宣言。——原注

[34] 原文如此。——原注

[35] 在匈牙利事件时间，维也纳的机场已经成为西方向匈牙利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转运基地，由此地沿着建立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空中桥梁将援助物资送达目的地。根据报纸的资料，仅10月29日这一天，抵达维也纳的就有24架英国空军的运输飞机。——原注

[36] 会议继续进行时，赫鲁晓夫参加了。——原注

[37] 大概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苏联运到罗马尼亚的物资的欠款。对于有罗马尼亚参加的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依据苏联政府的倡议，对其减少了三分之一，而1948年又减少了剩余数目的50%。——原注

[38] 此处指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成员。即除了“摇摆不定的人”纳吉之外，其余的所有人。——原注

[39] 在国家机关宣布解散之后，匈牙利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到苏联军队

管辖的区域内避难，11月4日，他们积极参加了在匈牙利进行的“整顿秩序”的活动。

——原注

[40]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1]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2] 苏联政府宣言草案讨论的继续。——原注

[43] 这里指的是会议决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草案。——原注

[44] 10月30日布达佩斯时间的14点30分，纳吉在自己的广播讲话中宣布取消匈牙利的一党制，恢复战后初期的联合管理体制。接着，在政府范围内建立了由共产党代表、小农党的代表和国家农民党的代表组成的所谓的小范围内阁。——原注

[4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在所形成的会议记录中，错误地把M.A.苏斯洛夫列入出席和就此问题进行发言的人员之列，而苏斯洛夫只参加了10月28日关于匈牙利局势问题的讨论，此后一直到10月31日，他一直逗留在布达佩斯。——原注

[47] 1956年11月1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8] 在这个阶段会议所通过的决定，没有形成记录。——原注

[49]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50] 在1956年11月12日通过Ю.В.安德罗波夫转交给苏共中央的卡达尔的信中通报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它提议在近期在合适的地点，召开苏联共产党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建议在会议上，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相互关系，包括民族的问题。”(РГНИ, ф.3, оп.14, д.76, л.3, 6.)——原注

[51]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52] 唐天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编注

[53]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大概推断的。——编注

[54] 195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播种面积约200万公顷。——报告作者注

[55] 原文如此。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9日《人民日报》。——编注

[56]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由苏共中央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同准备的，是在1957年11月14—16日期间在莫斯科市举行的。参加其中的有12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外)。他们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宣言，在宣言中对当代国际局势及倾向进行了分析，并承认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在1957年11月16—19日期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了

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根据这些会议的决定，开始出版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第1期杂志于1958年9月出版)。——原注

[57] H.C.赫鲁晓夫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于在匈牙利事件暴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引起的。关于这一点两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之间的信件往来可以证明。与此同时，出访南斯拉夫的彭真在莫斯科通报了他与铁托的谈判情况以及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9, л.26.)。——原注

[58] 1957年2月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H.C.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建议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以及关于自己同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面主持这样的会晤的信函草案。在信中还通报说，对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适宜的是会晤在稍晚些时候，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期间进行(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5, л.2; д.99, л.16, 26)。——原注

[59] 赫鲁晓夫的意见显然造成了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苏共中央与南共中央关系的恶化。两党领导人在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之间互换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彭真在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之后向莫斯科通报说，他原则上同意南共参加计划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9, л.26)。——原注

[60] 1957年2月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赫鲁晓夫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晤的信件的文本，信中还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这次会议。信中还通报说，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稍晚的时候——195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召开这次会议较好(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9, л.2; ф.3, оп.14, д.99, л.16, 26)。——原注

[61] 在1957年2月5—12日期间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的会议日程中，包括了以下问题：关于苏联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报告人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М.Г.别尔乌辛)；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报告人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А.Ф.戈尔金)；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对外政策问题(报告人为苏联外交部长Д.Т.谢皮洛夫)。——原注

[62] 在报告草案中确定了“向美国政府建议共同发表《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原则的声明》是适宜的和及时的”。草案还谈到了“这个宣言可以使各个国家保持在相互关系中遵循以下原则的庄重承诺：1.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和互利；5.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还拟定对这些原则增补一项义务，即“不对其他国家施加任何压力”(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75, л.44)。——原注

[63] 在Д.Т.谢皮洛夫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资产阶级世界不成功的战略……决定我们‘探索清楚’和开始考虑苏维埃制度的某些‘演变’……在期待着这种‘演变’时，西方的某人甚至愿意对苏联实行所谓的‘微笑政策’”(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75, л.11)。——原注

[64] 见以下附件。——编注

[65]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建议。——编注

[66]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两行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67] 1956年1月6日，根据苏联农业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邀请国际兽医委员会成员参加1957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举行的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医学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时，在这个国际组织的组成中，还包括国民党中国(台湾)、南朝鲜和南越。考虑到这种情况，A.葛罗米柯于1957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预先通知国际兽医委员会，苏联不可能接待上述这些国家的代表的建议。在报告中还表示赞成这样的意图，即国际兽医委员会可以把大会的地点改在其他的国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中，批准给南朝鲜和南越的代表签发入境苏联的签证，对于台湾方面的代表，建议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同时通报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不给台湾代表发放签证”(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13, л.17; оп.12, д.197, л.141-144)。——原注

[6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9] 该问题略去未译。——编注

[70] 波波维奇，时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编注

[71] 原文如此，疑为“老挝”之笔误。——编注

[7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73]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电报。——编注

[74] 原文如此。——编注

[7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7] 原文如此，应为2月27日。——编注

[78] 1957年1月7—11日和17—19日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1月18日布尔加宁和周恩来签署了苏中联合声明，声明的文本见1957年1月19日《真理报》。——原注

[79] 1957年1月，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到访的周恩来进行会谈时说，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同时强调说，不应该强制性地通过所有的决议并把这些决议强加给他们。6月3日，南斯拉夫总统对苏联大使费留宾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将巩固和发展苏南关系，同时，他也说，在兄弟党会谈之前苏共和南共代表团之间应该举行双边会谈(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31, л.2-3, 37-41)。——原注(此处俄文编辑注释有误，访问南斯拉夫的中国领导人不是周恩来，而是彭真——编注)

[8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1] A.И.米高扬于1957年7月上旬访问了中国，其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介绍苏共

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出访结果获得了赞扬(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34, л.1)。——原注

[82] 临近1957年年底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收支出现了赤字,仅在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就超过了25000万卢布。在1957年,中国向苏联转交了根据此前协商一致的12500万卢布的黄金,而不是外汇,就像前几年一样。——原注

[83] 根据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1957年7月8日批准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В.М.莫洛托夫和Л.М.卡冈诺维奇开除出苏联国防委员会以及把А.И.米高扬和И.И.库兹明列入到该委员会的组成中的决议(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34, л.2, 4)。——原注

[84] 在Г.К.朱可夫1957年7月3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议把А.И.米高扬、И.И.库兹明和М.Г.别尔乌辛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РГАНИ, ф.3, оп.12, д.240, л.5)。——原注

[85] 决议提交者: А.И.米高扬。——原注

[8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7]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8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9] 该文件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90] 原文如此,这里是指中南海。下同。——编注

[91] 斯彼哈尔斯基,时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编注

[92] 在1957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准备的新的宣言草案。——原注

[93] 原文如此——原注

[94] 1957年10月26日,Н.С.帕托利切夫向葛罗米柯通报说,大概,他应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苏联拒绝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工作的声明。在10月28日的答复电报中,А.葛罗米柯表示不赞成这样的声明,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将会在“宣传机器”中利用这个声明和指责苏联中断裁军问题的谈判。除此之外,这样的举措将会给苏联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造成损害(АПРФ, ф.3, оп.63, д.579, л.61-62)。——原注

[95] 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57年2月初就提出了这一想法,2月2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2月7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同意这个建议。信中说,苏共支持中共的提议,并且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苏共领导人认为,可以在3月底4月初举行会谈(РГАНИ, ф.3, оп.14, д.99, л.16; д.161, л.26)。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

两党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的意见致使两党关系更加复杂，这次会议被推迟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苏南领导人可以在会议召开之前进行非正式会晤，交换看法。1957年8月1—2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进行高层会晤，这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希望，他们希望在南斯拉夫的立场同其他与会国家的立场存在分歧、会议的宣言不写入南斯拉夫立场的情况下，南斯拉夫领导人也能够参加会议。但是，10月18日苏共中央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同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弗拉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时，南斯拉夫领导人通报说，南斯拉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的讨论并且不接受这一宣言，并且说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担心会使南斯拉夫的国际局势复杂化(АПРФ, ф.3, оп.23, д.63, л.64-71)。——原注

[96] 指《和平宣言》，于1957年11月23日公布。——原注

[97] 多列士，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98] 所谓政治侨民，是指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时，逃亡到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当时毛泽东为此事严厉批评了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详见沈志华：《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号，第32—43页。——编注

[99] 新的宣言草案是由两个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提议的。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М.А.苏斯洛夫、О.В.库西宁、П.Н.波斯佩洛夫、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和П.Ф.尤金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声明文本的制定工作(РГАНИ, ф.3, оп.14, д.163, л.1-2; оп.12, д.296, л.4-22)。——原注

[100] 在被讨论的宣言草案里，记录了以下内容：“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РГАНИ, ф.3, оп.12, д.296, л.18-19)——原注

[101] 话题指的是祝贺拉科西65周岁的生日。——原注

[102] 原文如此，应为11月。——编注

[103] С.А.戈格里泽，1951年11月10日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2年2月13日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兼第三局局长，11月20日升任第一副主席。1953年7月3日被捕，12月2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编注

[104]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105] 手写签名和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06] 阿维尔齐德，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编注

[107] 原文如此。范长江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编注

[108] 这里指的是地对空火箭装置。——原注

[10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译注

[110]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11] 指的是在1930年代的一个阶段里，王明被从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并在共产国际里工作。后来，在返回中国之后，王明和中国共产党里“莫斯科派”的其他代表，与毛泽东和一直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原注

[112] 苏加诺，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编注

[113] 艾地，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114] 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编注

[115] 尤金·丹尼斯，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116] И.В.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编注

[117]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4行字迹不清。本文件以下多处字迹不清，均以“……”标示。——译注

[118]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19]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3行字迹不清。——译注

第八卷(1958.4—1959.10)

1958年

№20380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1958年4月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1日

机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4月4日

今天，当就我赴武汉与毛泽东见面的相关事宜谈妥之后，刘少奇表示希望与我事先进行一次谈话。我立即热情地接受了刘的这一邀请。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会谈期间，我向刘少奇通报，南斯拉夫人已向我和其他兄弟党转交了自己的纲领草案，该草案将会在南共联盟七大上进行讨论。我指出，这份草案用三种语言共印刷了20万份，并广泛地在南斯拉夫及其境外散发。在对南斯拉夫人的上述文件作了相关评价之后，我又说，苏共中央希望就这一问题与中共中央协商一下。

刘少奇说，他尚未看到南共联盟的这份纲领草案的内容。刘又说，自己今天收到了刘晓发来的一份电报，后者听说，苏共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七大。我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向刘通报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送的一系列信件的情况(这些信件的内容已于4月5日转告毛泽东)。

王稼祥告诉刘少奇说，南共联盟的党纲草案只是在两天前才到北京。据王说，截至目前该草案中只有两个章节被译成了中文。王稼祥已通读了该草案的俄文版，并说这份文件是一篇“下流之作”。王稼祥简要地向刘少奇谈了自己对南共党纲草案的看法，并说南斯拉夫人在其中指责所有兄弟党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称斯大林为修正主义者，攻击苏共，曲解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而在分析国际形势之时没有将矛头指

向美帝国主义。王稼祥还简略讲了南共党纲草案中其他一些无法让人接受的观点。他对刘少奇说，中共中央有关部委还没有对南共的党纲进行仔细研究，因此暂且没有向领导层报告此事。

应刘少奇的请求，我详细叙述了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主要条款。在会谈期间，刘少奇经常插话，表示同意我们对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及其党纲草案中的一些具体条款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例如，南斯拉夫人胡说什么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斗争都是“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对此，刘少奇便指出，再怎么样也不该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扩展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的活动提出指责。刘又说，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斗争，以便使我们的影响和社会主义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并尽可能地向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

在涉及中共是否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代表团的问题之前，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中央是否已对南斯拉夫发来的邀请其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的问题作了回复。王稼祥答，中方只是口头上回复南斯拉夫人中共准备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府)举行的此次会议，但书面答复尚未发出。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可能以什么借口来拒绝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自己的代表团。王稼祥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开始谈关于西方国家各社会主义党派是否拒绝派遣自己的观察员参加南共联盟七大。

针对王稼祥所提出的上述问题我指出，在就南共党纲的问题与中国朋友协商之后苏共将向南共联盟中央发出一封信，其中将向其直接提出苏共拒绝派遣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原因。

刘少奇道，显而易见的是各兄弟党实际上都将不派代表参加南共联盟七大。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卢布尔雅那的话，那么我们的代表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与南共联盟的党代会进行辩论。王稼祥补充道，代表团是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大会的，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此类辩论的。

刘少奇说，1957年11月南斯拉夫人自己已经向我们和全世界展示了在遇到类似情形时该如何处理：当时，他们虽然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但就是不愿意参加随后举行的12个兄弟党会议。刘笑着说，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学习“南斯拉夫经验”——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既然不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么现在各兄弟党也就理应可以不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波兰同志对南共联盟党纲草案持何立场。我答，自己对波兰人如何评价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情况还不知晓。

在回答刘少奇的问题的同时，王稼祥也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当苏共和中共拒绝向南斯拉夫派遣代表团之后，其他兄弟党的绝大多数无疑也不会向那里派遣自己的代表了。不过，他又认为自己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是否派代表团去南斯拉夫没有把握。刘少奇随后也声称，如果苏共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那么其他兄弟党也未必会派代表去那里(当然，如果我们能及时向他们发出相关通报的话)。我指出，在与中共中央协商之后，苏共中央将立刻向其他兄弟党(尤其是那些曾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发出过咨询和那些最初已向苏共通报说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会议的兄弟党)发出相关信函。

我接着对刘少奇说，《共产党人》杂志将发表一篇关于南斯拉夫党纲的评论性文章。刘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对南斯拉夫人的如此言论有所反应。

刘少奇宣称，中共方面感谢苏共中央及时就这一问题向其做出通报，并说中共中央的最终意见将由毛泽东在武汉会谈期间向我说明。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杨尚昆说，周恩来将与我一道乘飞机飞往武汉。周将在武汉出席毛泽东与由斯托伊科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见面会。杨尚昆还说，周也将参加毛泽东与我的会谈。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关于前不久在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我答，自己暂且对这方面情况还不掌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助理阎明复和我使馆参赞K.A. 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手写批示：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大使馆通过电报讲了这一问题。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6月18日

文件共4份，送：A.A.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5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01-105

№0988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1958年4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8号

机密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5日

我在武汉毛泽东的临时住所拜会了他，目的是向他递交苏共中央今年4月3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周恩来参加了会谈。

我问他感觉身体如何，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他无大病，但是感觉不太好，老毛病常犯。毛泽东承认，他非常忙，感到很疲乏，而这引起了各种疾病。

我说，我受委托想再谈谈南斯拉夫问题，并亲自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回答说，他还未看到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译文，并问我是否读过了这一文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毛泽东请我首先详细叙述一下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我对这些原则的意见。我大约用了40分钟向毛泽东

讲述了南斯拉夫新纲领最主要的原则。

在听取对苏共中央信的翻译和我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通报时，毛泽东时常插话和发表简短看法，表示对纲领中某些论断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鉴于南共联盟纲领中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很明显，铁托认为，他可以肆意对待苏共和苏联。毛泽东说，铁托甚至喜欢使绊子：“杜勒斯开始这么做，而铁托紧随其后。”

涉及纲领中攻击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毛泽东微笑地指出，南斯拉夫人“看来发现了苏联有某种剥削者：似乎出现了剥削阶级，新资产阶级”。这涉及的正是南斯拉夫自身，毛泽东这时指出，据我们（中国）同志的观察，他们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独裁，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

谈到南斯拉夫歪曲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嘲讽地说，按照铁托的意见，战胜希特勒原来是用不正确的方法夺取胜利的：本不应该使用武力，而应代之以哲学讨论或向希特勒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指出，应为苏联政府和苏共在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范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至于我们中国人，毛泽东说，我们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当时未把中国放入“社会主义范围”。“当时还指望蒋介石，所以达成了协议：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而斯大林说服我们。”

在自己的纲领中，毛泽东继续说，铁托攻击苏联在东欧国家的作用。坚持这种思想，看来对于铁托来说，倘若东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件快事。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强调，东欧国家现在就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了。我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忍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因为它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存在。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没有苏联的帮助，南斯拉夫则不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军队解放的。

我说，按照南斯拉夫人的意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应包括两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时毛泽东立即指出，还必须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共产党的统一和相互援助。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人企图阉割和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感到气愤。

我说南斯拉夫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属于这些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微笑着指出，共产党会议宣言可以高出我们这些国家的立法文件。“因为法律，”毛泽东解释说，“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效，而我们这些党发表的宣言通常是宣布长期有效的原则。”

谈到南斯拉夫指责苏共是“霸权主义”，毛泽东强调说，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自己所追求的正是对于其他党的“霸权”。比如，假如说在某种程度上铁托有可能领导匈牙利人的话，那么决定匈牙利事情的将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南斯拉夫人了。因为众所周知，铁托曾干预匈牙利事件：他想支持纳吉。为了讨论纳吉的问题，毛泽东说，不久前铁托曾会见卡达尔。

我向毛泽东引述了南共纲领中间接驳斥莫斯科声明的一段话。于是毛泽东轻蔑地指出：“铁托根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国际大会：他也积极主张召开高层次的会议，他也不反对参加这种会议。”毛泽东继续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实现这些决定，这是各兄弟党自身的事。

我提请注意南斯拉夫人断然批评各兄弟党的活动。同时我引述了纲领草案里的一段相应文字。毛泽东指出，虽然南斯拉夫人没说是哪些具体的党，但十分清楚，他们所指的是谁。毛泽东认为，南斯拉夫人指的是法国、英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很可能，”毛泽东指出，“南斯拉夫人不想把这些批评加在意大利党的身上。”

我说，纲领草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党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南斯拉夫人认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借助工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毛泽东指出，铁托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积极活动的、时刻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明显，铁托主张资产阶级政党可以继续存在，而共产党不行。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同资产阶级活动家接近。例如在美国，只存在一个不大的共产党，而美国资本家已很讨厌它。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迫害它。现在铁托说，没有共产党也行。

当我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真空”的论断时，毛泽东笑了，他说：“可怜的铁托必须好好学习。”“原

来，”毛泽东补充说，“不仅阿拉伯人那里出现了真空，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也有。”

毛泽东非常赞成苏共中央的信中的结论部分，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然后说，关于南共纲领草案和如何对南斯拉夫这一步作出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4月5日和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接着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

毛泽东说：“在中国支持铁托的只有右派。”毛泽东说：“当时我们公布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结果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快查明了我们这里的许多右派分子，他们赞成铁托的口号。”毛泽东通报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正在这里积极地做工作。例如，它给中国各地右派分子写给大使馆的信——作答复。我们在四川、黑龙江和其他省份发现了大使馆给右派分子的回信。”“您知道，右派分子现在在中国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看来，在我们中国，铁托只在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有影响。”

在翻译完苏共中央的信之后，毛泽东立即问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暂时我还不掌握这方面的消息。这时毛泽东说，根据他的看法，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11个党一定不会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看来，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会派自己的代表去。也不排除，波兰人也不往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自己的代表团。毛泽东附带地说，据我看，在许多问题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我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提起，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的是否定的立场。只是在辩论和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们才投票赞成会议宣言。毛泽东强调说，在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如果波兰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引起不满和许多批评意见，而且波兰领导人这一步将给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多困难。

毛泽东继续说，对于重大的问题，任何时候也轻视不得和掩盖不得。这时毛泽东引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波兰人

想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那就让他们去好了。我指出，谁也没禁止波兰人往南斯拉夫派代表团。毛泽东补充说，波兰同志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切。

毛泽东说，我们总是把类似不愉快的事件看成是对我们共同前进有益的事。他说，我们不仅需要用阐述正确的或对我们友好的思想的文件教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够的。为了教育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利用我们敌人的行动，还需要揭露他们敌对的思想。

所以，南斯拉夫人现在的行动对我们来说还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接着说。在他们的纲领中，集中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各个时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表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这一行动迫使各兄弟党认真考虑和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面前和其余所有共产党的面前，就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困难的位置上。

出去同北京通完电话的周恩来到回到屋里报告毛泽东，说刘少奇今天白天报告：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会议赞成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同意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还通报说，北京认为4月5日不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委员还未来得及读南共纲领的译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过一天，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拟好草稿之后，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对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请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毛泽东说，请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在类似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表明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他补充说，虽然我还未读完南斯拉夫纲领，但我完全相信对我所说的关于纲领的看法。“对于我们，”毛泽东微笑着说，“谈到关于铁托的意见，一切都是明白的。中国有句俚语，叫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在谈话过程中，我谈到《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判南斯拉夫纲领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声明说，对南斯拉夫人的类似行动，可以而且必须给予回应。

周恩来指出，苏联大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指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当年也是苏共二十大的观察员。

南斯拉夫人，当然会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友好，毛泽东说。他们会说，南共曾派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中共的八大。当然，他们还会说，中国人这样做是受了苏联同志们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毛泽东说，都吓不倒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在纲领草案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南共的代表大会。我们自己常说，由于我代表团应在大会上发言，多多少少得对南斯拉夫拉夫人说些褒奖的话。然而我们类似的发言会使南共队伍中许多人、南斯拉夫的居民以及其他国家误入迷津。这些人会认为，实际上我们几乎赞成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南共七大上的发言可能对南共领导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毛泽东总结说：“铁托以他的纲领，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迷惑。”

周恩来问我，苏共中央是否给南共七大发贺词。我回答我不知道此事。毛泽东说，即使苏共中央发，我们也不想发贺词。毛泽东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可能被任命为大会观察员。

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我们共同决定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强调说，各兄弟党有完全充足的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毛泽东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已完全弄清这件事了。

毛泽东说，从整个情况看来，从1948年起，尤其是苏南关系正常化之后，南斯拉夫人早就不想使两党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强调说：“很明显，他们想把关系发展限定在国家范围里，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行动自由，争取时间。”

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主张采取措施，使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南斯拉夫现在走上我们所期盼的道路，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那当然很好。但现在的事实说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走这条路。第一个最能表明他们真正立场的事实，就是他们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南共纲领草案。我说南斯拉夫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没有全文发表莫斯科宣言。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害怕那些原则使他们原形毕露。

毛泽东说，现在南斯拉夫人非常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铁托的新纲领大概很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高兴。”我指出，美国人对这一文件已作出积极的评价。

毛泽东说，铁托的新纲领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很害怕。南斯拉夫人明显害怕原子战争，想站在这一战争之外。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策划建立一个接受南斯拉夫思想领导的亚非国家大集团。他们把自己宣布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反对者，想以此逃避原子战争。必须指出，毛泽东说，铁托的计划在亚非国家中没有引起任何兴趣。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领袖，如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等。

毛泽东说，南斯拉夫人当然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能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但是，毛泽东指出：“铁托知道，他的市场不大：他的‘思想’只能在兄弟党中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找到需求。”

铁托的新纲领，毛泽东重复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对我们大家也是有益的，即它迫使兄弟党更多地考虑反击修正主义。我说，铁托的这一纲领，在集中表现当代修正主义思想方面起着当年伯恩斯坦言论的作用。然后，会谈中，毛泽东又几次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南斯拉夫人类类似伯恩斯坦，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

我指出，南斯拉夫人制定自己的纲领，看来是想以此博得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赞许。南共邀请这些党派观察员出席七大。我还讲了英国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社会党人拒绝了南斯拉夫的邀请。于是，毛泽东说，对于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南共的纲领草案显得太左了：其中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毛泽东强调说：“铁托大概不会放弃这些词句。只有靠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词句，铁托才可以站住脚。而且十分清楚，铁托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从整个事情来看，毛泽东指出，杜勒斯将有利可图。毛泽东说：“顺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杜勒斯是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比工党强；铁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看来对杜勒斯没有什么影响。”

我指出，南共七大可能不会有外宾参加，到时铁托将彻底孤立了。对此毛泽东说，某些集团还是要支持南斯拉夫人。这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说，许多修正主义分子不会放弃支持任何反对我们和你们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起，我们当时把赫鲁晓夫和铁托率领的苏共和南共代表团所进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情况通报给了中共中央。我同时指出了双方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秘密公报中所规定的义务。我强调指出，现在南斯拉夫人完全违反了这些义务。对此毛泽东指出，铁托不止一次表现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周恩来插话说：“铁托简直是一个流氓。”

然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南关系。他说，我们一直支持1948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决定，但我们不同意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它把我们大家都置于被动的地位，铁托至今还经常提起这一决定。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南斯拉夫。斯大林死后，众所周知，我们都积极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同南斯拉夫有一个好的关系，但铁托仍和以前一样。他曾两次耍手腕反对我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再就是现在这次。他要这些手腕目的是一个：出口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们。

毛泽东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斯拉夫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当时通知苏联驻华使馆。说我们不接受南斯拉夫人的承认，但也不公开拒绝。如果中国同意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就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是有分寸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布，现在继续宣布，它准备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时自己也说，南斯拉夫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毛泽东)当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可以把南斯拉夫归入热爱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说，在1955年之前，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打破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的梦想。

谈到目前的中南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开始反右斗争很使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感到沮丧。毛泽东强调说：“因为南斯拉夫对我们的右派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至于我们现在全国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奋发建国以及诸如‘大字报’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这一切都没使南斯拉夫人高兴，而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毛泽东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盼望中国政府邀请铁托来做客。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次南斯拉夫人向中国同志暗示铁托有访问中国

的打算。但是我们，毛泽东说，拒绝邀请，现在对他来访也不感兴趣。铁托访问中国，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我们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托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出了邀请。不久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也邀请了铁托。当然，铁托很难实现承诺，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没邀请他到这里来。毛泽东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南斯拉夫人讲，我们不喜欢铁托来访，但也不表示我们想在身边看见他。

在和我道别时，毛泽东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问候，他再次祝贺赫鲁晓夫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毛泽东说，任命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

我简要地介绍了苏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说，他毫不动摇地赞成这一决定。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共4份，送：A.A.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奇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2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88-100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5，л.97-103

№09886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1958年4月9日)

1958年4月19日

第129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9日

应周恩来邀请，今天我去拜会了他。

周恩来说，4月8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即将召开七大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事宜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已把我们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他在武汉通过电话指示，在上述信件上签上了他的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继续说，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七大即将召开写给南共的信。在将这些信件的文本(其内容当天已通过高频通信发往莫斯科；附上原件和译文)转交给我后，周恩来强调说，中共中央致南斯拉夫人的信件尚未发出。他继续说，我们希望能够首先了解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致南共联盟的信件文本，然后再将自己的信件发给南斯拉夫人(当天通过高频通信从莫斯科收到上述苏共中央信件的文本，并转交给了中国同志)。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无视兄弟党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所作的努力，其行为越来越近似流氓和富有挑衅性。他接着问，苏共中央鉴于这种情况到底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自己的意图。我回答说，苏共中央向那些请求通报的兄弟党作了通报。

周恩来继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他和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谈)向我通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共未来代表大会问题的基本情况。我们作出的结论是：必须从实质上对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作出评述。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评价是：这个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和挑衅性的文件。纲领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的论点和原则相矛盾，是南斯拉夫人发起的新的修正主义的进

攻。南斯拉夫人现在扮演着当年伯恩斯坦所扮演的同样的角色。纲领草案的特点是充满空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完全可以设想，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假象来欺骗兄弟党和南斯拉夫人本身。

王稼祥指出，对于以上所叙述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相接近”的措辞是否过分委婉。他强调，我们考虑，这样的说法是很委婉，这不是修辞问题，而是严肃的评价问题，这种评价在组织宣传时应该起到很大作用并且得到相应的反响。周恩来接下来说，此外，从整个情况来看，铁托在积极准备开展辩论，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获得美国人的好感。

二、对亚非国家施加有利于南斯拉夫人的影响。

三、欺骗世界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兄弟党内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分子。

周恩来继续说，由于南斯拉夫领导的真正目的显而易见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很好地作准备，分析上面提到的整个情况，对其要点进行打击，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兄弟党面前揭露南共及其纲领的实质。我们认为，周恩来说，在批判南斯拉夫人的过程中，苏共起主要作用是适宜的。当然我们中国人也采取相应的步骤，但为此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在谈到以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亚罗舍维奇为首的波兰代表团和以罗马尼亚议会主席基弗·斯托伊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问题时，周恩来说，4月7日，他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单独秘密会谈时，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依卡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南共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的评价、立场和打算。周恩来说，我还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伊科通报了苏共在这方面的打算。据周恩来说，亚罗舍维奇告诉他，关于南共纲领草案他(亚罗舍维奇)在波兰就听说了。亚罗舍维奇继续说，据他所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里，有一定数量的同志在南共纲领草案问题上保留个人意见。周恩来继续说，亚罗舍维奇指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他再次向我保证，一定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哥穆尔卡本人通报这次会谈的实质内容。而且，亚罗舍维奇强调，这个问题很微妙和困难，因为众所周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南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恩来指出，我没提具体的国家和党，我对亚罗舍维奇讲，据我看，代表团参

加未来南共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大。亚罗舍维奇说，他知道这一点。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宜于通过亚罗舍维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通报上述情况，不能通过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基里洛克的个人品质几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一样，是个很不受欢迎的人物。

谈到同基弗·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的会谈，周恩来说，对此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对我们宣布，他们认为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我，周恩来说，给罗马尼亚人通报了我同亚罗舍维奇会谈的情况。同时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南共纲领草案的出现，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可能比其他兄弟党要发生更大的问题。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指出，罗马尼亚党“很难同波兰人说”，请求中共考虑一下。周恩来说，我们自然请罗马尼亚同志们放心，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步骤，努力不给波兰人我们干涉他们内政的口实。

王稼祥问我，按照我的看法，当知道苏共、中共和一系列其他共产党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后，南斯拉夫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南斯拉夫人将讨论和批准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的时间推迟到更遥远的未来，或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加工，使纲领从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变成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带有个别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我说，我个人不排除南斯拉夫人有可能会把纲领的讨论推迟到晚一些时候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然而，鉴于他们完全没有原则，怎么也不能对此打保票。我强调说，据我看，不能期望南斯拉夫人改变自己的纲领，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变成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周恩来再次指出，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是流氓性质的，不负责任的，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努力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缩小它的阵地。实际上，南斯拉夫正以其修正主义的“中立的”行动，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帮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忙。周恩来说，我想指出，南共领导正采取一切措施，禁止在其报刊上出现我们的思想。

谈到出席布拉格国际共产主义报刊机关成员国代表会议，王稼祥特别谈了他同库西宁同志的会谈。在会谈中，他说，我们达成了共识，即一个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同于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开门见山和直截了当地交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往往完全不能接受。政党之间的思想斗争要求高度的艺术和巧妙的辩论方法。王稼祥继续说，根据我们的意见，像南斯拉夫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行动正确，可

以让他们反过来反对他们自身，达到在所有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孤立南共的目的。在同库西宁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会谈中，王稼祥继续说，我们还达成了这种共识，即不该立即批判南斯拉夫，大概应该等待一段时间。此外，我们一致认为，对待自己党内和兄弟党内错误的态度，从批判这些错误的观点看，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批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王稼祥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在批评兄弟党的错误时，发言应有说服力，平心静气，有分寸，讲究策略方法。

至于南共的错误，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以便给其以应有的反击。铁托现在非常自信，有很大的野心。看来，我们应如以往一样，从原则立场上继续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错误，否则，如果我们停止批判，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正逐渐适应他们，从而分歧越来越大。提到的南共纲领草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与以往的南共错误文件不同，它是完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做了一切努力后，南斯拉夫人仍抱着这一纲领不放。这一纲领草案的出现，在我看来，周恩来继续说，从辩证的观点看，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文件里，表述了他们对当代所有现实问题的观点。周恩来轻蔑地指出，可以说，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这样，南斯拉夫人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是什么货色，可以期待他们什么。

至于我们，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同南联邦人民共和国和南共恢复关系后，我们一直说，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我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周恩来指出，我们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党外，过去经常说，在相应的情况下将来也会这样说，南斯拉夫领导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犯了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微笑着说，在一次他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的会谈中，当他直截了当地向大使谈了上述观点时，大使不再问他(周恩来)何时访问南斯拉夫。

出席会谈的有周恩来助理马列和苏联使馆随员P.III.库达舍夫。

附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封信的原件，共两页(只送A.A.葛罗米柯同志)；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译文，1页；中共中央致南共中央信的译文，1页。

文件4份，送：库西宁同志、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年4月12日，第274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59-65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22-134

№20381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1958年4月1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8年4月10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他和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王稼祥通报了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会谈情况。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向铁托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党纲草案问题而给南共联盟中央所写的信。信中主要内容如下：苏联共产党已改变原先决议，并决定不向南共联盟大会派遣代表团，而只派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对我的上述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说，他们很乐意就南斯拉夫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今后如果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之间可以随时面谈。在我向他们两人通报情况的过程中，后者也对南共联盟和铁托提出了一些意见。例如，他们以讽刺性的口吻回击了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

暗示，即当时铁托说：他(铁托)现在就在位于离匈牙利仅6公里之遥的地方，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也正在对匈牙利进行访问(这里暗指：苏联代表团宁肯到离南斯拉夫仅6公里的匈牙利，却不愿来参加南共联盟大会)。

在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铁托会谈期间，作为对苏方通报的答复，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说，他们南斯拉夫人编制党纲草案的初衷是想避免与其他党之间发生分歧。铁托还说，在审阅党纲草案的过程中自己已“发现”其中有一些应当修改的不足。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铁托在谈到南共联盟党纲的话题时，其口气就像是一个与之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似乎他并非该草案的作者之一。周恩来继续道，铁托所谓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个别条款还可以再商榷，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足以表明南斯拉夫会真正地从根本上重新研究自己的纲领。而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专门用来应付苏联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到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这样的话：党纲草案的内容最终将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们的意见。对此，周强调，铁托的上述言论只能说明一点，即南共联盟内部独裁成分严重和列宁式党内民主的匮乏。周恩来继续道，南斯拉夫人虽然大谈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个人崇拜在南斯拉夫国内随处可见。我完全同意周的上述观点，并谈了自己今年1月份在南斯拉夫期间所观察到的其他一些消极现象。

我指出，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已通知南共联盟：他们将不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南共联盟大会。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强调道，据新闻报纸报道，一些已被邀请参加此次大会的党派的立场也可能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周恩来特别强调，鉴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拒绝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南斯拉夫人如今一定正在筹划如何采取措施予以回应。

周恩来问我是否了解各国党派参加南共联盟七大的最新消息。我答，我暂时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最新通报。

在我所通报的铁托与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会谈情况中，最让周恩来和王稼祥不理解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南共联盟七大上将组建一个委员会。后者将在会议结束后的五个星期内对南共党纲草案的内容加以改进和完善。王稼祥声称，从一般的党内生活原则来看，他完全难以理解南斯拉夫上述做法的意图何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周恩来的助手马列、苏联使馆参赞K.A. 克鲁季科夫同志和使馆随员P.III.库达舍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A.A.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年4月18日，第293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06-108

№2061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1958年4月10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4月10日

.....

在与金日成举行的会谈中涉及了有关图104飞机飞行莫斯科—平壤航线的问题。

援引了在一次会谈中金日成曾表示希望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建立图104飞机的固定飞行，我告诉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曾在

1957年12月26日的信(第24/2 3561号)中表示,要求着手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采用图104飞机的愿望。所以要指出的是,如果朝鲜民航局将完成平壤—赤塔的航线,那么按照以前的方式实行对接将使用苏联民航总局的伊尔14飞机。

信中还表示请求,为了实行图104飞机的飞行要将混凝土的起降跑道延长至2500—2700米,还要有可贮藏容积达200吨喷气发动机燃料的油库。朝鲜民航局局长和朝鲜交通部部长金炅炼曾告知(1958年2月8日的信),经过仔细全面研究有关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使用图104飞机飞行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暂时不可能使用所指机型飞行。

同时我说,朝鲜平壤赤塔航线上的乘客将比图104飞机上的乘客少许多,航空公司的收入自然也会因此减少,很显然,朝鲜航空局是根据这个给予的答复。然后又对金日成说,为了更快运送乘客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民航总局建议研究另外一个方案:在莫斯科—北京航线上使用多座快速的图104A飞机作定期航行,在抵达北京之前就可以运送所有从莫斯科到平壤的乘客,为了更快地将乘客从北京运送至平壤,最好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达成协议。

金日成说,他们在去年曾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试图与中国朋友达成协议,可没有结果。金日成说,他担心今年也得不到正面的结果。所以他们将专门研究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飞行图104飞机的问题。这是更为切实可行的决定。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п.75, д.6, л.101-105

№20617-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1958年4月12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平壤市

1958年4月12日

按预先约定会见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中向大使通报了苏共中央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而写的信件内容和苏共中央通过的有关不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大会而仅派观察员的决定。

还告诉大使，受中央的委托将苏共中央的信转交给金日成，后者表示完全赞同苏共的立场。

乔晓光对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他只知道寄到大使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第二部分的内容。他说，中共中央发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信件复印件和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复印件，昨天都由他亲自转交给了金昌满。

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可能的立场交换意见时，就这个问题乔晓光说，中国驻波兰的大使已经得到指示将中共中央的答复亲自转交给哥穆尔卡。

会谈由随员王保民翻译。参加会谈的有使馆随员M.П.库尔巴茨基。

ABПРФ, ф.0102, оп.14, п.75, д.6, л.106-109

№0988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1958年4月1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40号

与刘少奇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12日

受苏共中央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并向他通报了各兄弟党对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立场。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联驻波兰和意大利大使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立场的报告全文，以及苏联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大使同卡德尔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报告的全文。

刘少奇对所有这些消息都很感兴趣。

听了关于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会谈的报告，刘少奇略有轻蔑地表示，哥穆尔卡认为苏共中央对南共纲领草案的批评可能“过于扩大化了”。鉴于哥穆尔卡的其他讲话(说南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些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把自己打扮成重要理论家)，刘少奇表示，在南斯拉夫人当中，确实有不少“歪曲马列主义的糊涂虫理论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刘少奇说，看波兰人批评南斯拉夫纲领的尝试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一般谈到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的会谈情形和意共指示信的时候，刘少奇说，看来，在很多问题上，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不赞成南斯拉夫的纲领。刘少奇指出，但不能排除，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会同意南共纲领草案中的某些错误原则。刘少奇说，所以完全可能，波兰和意大利代表团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将只批判南斯拉夫的部分错误。

在我向刘少奇介绍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其他人的会谈情形时，刘少奇注意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已表现出明显的不知所措。在谈自己对南斯拉夫人在同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会谈中所发表的言论的意见时，刘少奇说，南斯拉夫人现正在进行调整，采取个别步骤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纲领草案，不过这一切自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刘少奇声明说，他完全同意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在报告末尾所得出的那个关于南共联盟领导即使对其纲领草案进行修正，其草案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结论。

刘少奇坚定地说，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开的修正主义集团。目前南斯拉夫人这一纲领草案不是偶然的。

这一文件是全体南斯拉夫领导人思想的结晶。刘少奇指出，其中汇集了南斯拉夫活动家各个时期在不同问题上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中共中央的信已寄给南斯拉夫。他说，现在还未收到中国驻南大使关于南斯拉夫对中共中央这封信的反应的报告。

涉及我通报的关于各兄弟党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未来大会的态度消息，刘少奇指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同苏共和中共的立场是一致的。刘少奇指出，关于这一问题，他们从自己驻外大使那里收到的报告很少。按照他的说法，北京现在只收到中国驻越南、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大使的电报。刘少奇说，这些国家党的代表向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通报说，他们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代表团。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报告，胡志明在同他会谈时指出，他完全赞成苏共中央信中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胡志明说越南同志们打算向南共联盟七大发去贺电。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衷心感谢苏共中央为其提供南斯拉夫问题的消息。

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4份，送：A.A.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21日，第309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75-77

№0988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1958年4月1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3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15日

我拜见了周恩来并按照中央的指示向他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会谈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恩来转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南斯拉夫人关于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信的全文。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他说，我们非常感谢苏共中央经常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讨论情况。

涉及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会谈的消息和哥穆尔卡同志关于波兰代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会晤总结的通报细节，周恩来完全否定南斯拉夫有彻底改变自己立场的可能性。周恩来同时指出，“很想看看波兰人对南斯拉夫人施加影响的具体结果”。

顺着这一思想，周恩来指出，当然，南斯拉夫人对自己的草案作某些修改。但是，周恩来强调说，他们未必能改变这一文件的根本性质。在南斯拉夫纲领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周恩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彻底暴露了自己，以致他们现在很难再隐瞒自己的罪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广泛地扩散和大力宣传了自己的纲领草案。

周恩来说，从整个情况看，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外，其他兄弟党不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问我，关于各社会党的立场，有什么新消息没有。我回答说，我不掌握新的消息。这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现在在自己的大会上很孤立。这种情况，他强调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表明，所有兄弟党都准备坚决反击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纲领。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当然现在处于艰难的境地，不过他们是咎由自取。谁也不想反对他们，如果他们不把自己置于同其他所有兄弟党

对立的位置上。

我指出，波兰人现在企图把南斯拉夫人从泥潭里拉上来。对此周恩来再次指出，大家应该拭目以待，看南斯拉夫人了解了各兄弟党对南共联盟纲领的态度之后如何行动，将做些什么。

然后，在座谈中我指出，近几天中国报刊载文坚决批评日本政府对待中日非官方组织间第四贸易协定的态度。

周恩来强调说，《人民日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猛烈抨击岸信介和整个日本统治集团，报纸社论、南汉宸的声明和其他材料中尖锐批评日本政府在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间贸易等问题上的方针。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决定对日本统治集团施加可能的压力，同时还准备视可能利用目前日本同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的矛盾。

在评述日本政府现在的目的时，周恩来指出，日本统治集团现在指望利用美国的资本以实现日本在东南亚国家新的经济扩张。按其实质，周恩来说，这是日本企图实现它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同时，周恩来说，日本统治集团还打算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周恩来说，我们自然必须努力粉碎日本统治集团的类似计划。能促成这一点的将是日本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使日本摆脱美国压迫的人民力量的增长。这些力量主张日本同中国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自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国内出现的局势。在对日政策中，我们必须恪守灵活的策略：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日本人施加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应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当然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是不容易的。在两国贸易关系领域贯彻这一策略也是复杂的事情。

我指出，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杠杆，借助它我们两国可一起对日本施加影响。周恩来赞成这一思想。他继续发挥这一思想，说，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我们不解决主要问题，过分让步和妥协，那我们将达不到任何目的。为了我们事业的胜利，周恩来说，最主要的是把日本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同时周恩来指出，我们对日本社会党做工作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周恩来指出，在很多问题上，日本社会党人现在奉行的立场较好。

应清醒地看到，周恩来继续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比如最近10

年)，日本统治集团很难摆脱对美国的政治依附。不过，他说，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逐渐使日本脱离美国。在这一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争取把日本人民群众，人民力量，其中包括日本社会党及日本资产阶级的左翼和中间阶层，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周恩来注意到了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再次强调，我们做日本的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参加会谈的有总理助手马列和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4份，送：A.A.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19日，第304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84-87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53-156

№10202 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1958年4月16日)

机密

致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Л.И.索科洛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根据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向帝国主义国家议会的呼吁，苏联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活动，肩负着促进顺利实现苏联和平倡议使命的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同样适用于苏联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斗争，将它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

阵营经济实力等问题上，必须求得完全的相互理解和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从一些主要原则出发。

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保持和巩固越南和平，继续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经济地位，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是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向南越居民显示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和平统一国家任务的完成。

摆在使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苏越友谊的继续巩固和发展，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精神，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时，还必须经常促进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扩大和加深。必须毫不动摇地实现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必须做到完全平等和相互理解，潜心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措施并提出有关建议。

使馆应当严格监督实现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指示上所做的工作，促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活跃，正确协调国家对外经委代表机关、商务处和武官处的行动，经常关心它们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与中国驻河内代表机构保持友好接触。

特别需要巩固大使馆和其他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党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联系。为了继续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地就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要关心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代表团，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苏越友谊。

对于收到关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大使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注意与朋友们交流信息，注意在所驻国家宣传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宣传苏联人民的生活和取得的成就。为此必须给越苏友谊协会以必要的帮助。

大使馆在进行要求越南方面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工作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全力促进越南对外政策阵地和国际威信巩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国际联系的增长，使其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关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和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执行和平和中立政策的国家，实现关系政党化问题。

由于老挝人民党和其他进步势力与越南朋友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协助下实现对老挝形势的监督并在必要时与越南和中国朋友联合提出建议，就此采取措施十分重要。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方面，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越南北方和南越阶级力量的阵容和对比，同时考虑到由于越南暂时分裂状况而造成的国内形势这一特点。

研究越南劳动党的形势及其政策，越南祖国阵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的活动，以至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转入选举制度有关的问题。

使馆面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深入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建设。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建设与外国经济援助的联系，特别是财政状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由于以暂时分裂为特点的越南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南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印度对南越的政策。大使馆应当系统地研究南越和老挝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大使馆应当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关于南越的信息。

必须仔细关注南越为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认真分析南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纲领和行动，查清其领导者的政治面貌以及将其使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可能性。大使馆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报送中央参考：如何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揭露并且孤立越南南方执政集团中反对统一越南的人物所采取的措施；对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主张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力量加强其影响等等。

您应当仔细关注国际观察和监督越南委员会的活动，与委员会内的各代表团保持工作联系，通过波兰代表影响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朝着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采取措施，化解委员会内敌对越南民

主共和国的行动。

利用国际越南委员会总部迁至西贡这一时机，对南越社会各界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南越执政集团的某些人物；寻求在共处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越南北方、南方逐步接近的步骤。上述做法都非常适宜。在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的前提下，研究与南越执政集团建立接触的可能性和逐步与“越南共和国”建立实际联系的好处。

大使馆应当根据得到的材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老挝的形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定期向苏联外交部呈送全面的报告，及时为苏联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是否合适提出建议。

大使馆领导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的同时，每日还应关心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苏联派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构的人员无限忠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理解自己所担负工作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党的原则性，严格要求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当地居民相处时谦虚谨慎、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法令和地方习俗等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的行为和举止有助于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必须保证政治学习的高质量和系统提高使馆人员的业务水平。

收到此信后请予电告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58年4月16日

АВПРФ, ф.079, оп.13, п.20, д.3, л.15-19

№03964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1958年4月1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4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8年4月17日

我受中央委托拜访了邓小平，并向他通报了南共联盟中央今年4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在听取翻译南斯拉夫的信时，邓小平对信的第一句话非常气愤。信中南斯拉夫人声明说，苏共中央的信使他们“吃惊”。就南斯拉夫人在这封信中关于他们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态度的某些议论，邓小平也作出同样的反应。

至于南斯拉夫人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邓小平提示说，南斯拉夫人也相信，通过加强在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美国的社会主义也会胜利。邓小平说，南斯拉夫的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谈得最多。

在翻译完了之后，邓小平说，南斯拉夫人的答复没有出乎中国同志的意料。他说：“这符合南斯拉夫人逻辑的行为。”邓小平宣称，很难设想，南斯拉夫人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纠正纲领中的严重错误。至于说某些个别句子的改变，邓小平指出，这自然不能改变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错误观点。

我向邓小平陈述了苏共中央关于对南共联盟中央回信的决定。听了我的通报之后，邓小平说，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决定。他说，我们现在重新考虑我们从前通过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及其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毫无根据的。

邓小平说：“总的说来，这是件好事。”“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激烈，且很有趣的，所有共产党员，所有兄弟党都应当参与这场斗争。”

指出南斯拉夫人在信中大谈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邓小平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支持南斯拉夫人。”他说：“现在我们要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回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更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我提到，我们在出版列宁论修正主义的言论集。邓小平回答说，他听说了此事，并已指示将该言论集翻译成中文。邓小平接着说：“应当研

究和比较老伯恩施坦和新伯恩施坦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说，老伯恩施坦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这大概是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同意这个观点。

接着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人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举行会谈的情况。邓小平对这个通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听到哥穆尔卡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感到特别高兴。邓小平接着说，波兰人试图说服南斯拉夫人，但他们确信这是徒劳的。邓小平又说，在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过程中，波兰人的观点中也暴露出一些有趣的地方，因此他说，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理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立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它也向我们说明了某些问题”。

邓小平热情地感谢我们的通报。他说，苏共中央及时地通报使他们能够了解南斯拉夫发生的这些事情。

接着邓小平声明说，鉴于南斯拉夫人最近的敌对行动，苏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好的。

我顺便提示说，在4月18日《共产党人》杂志上将发表一篇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文章。邓小平对此指出，对南斯拉夫人自然应当教训，既然“他们自己非这样不可”。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其他兄弟党对南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谈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邓小平说，意大利人给苏共中央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中国同志还不理解。虽然如此，邓小平说，“还是让意大利人自己去作决定”。邓小平说，根据他们最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得到的情报，瑞士同志打算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向瑞士党通报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决定。我说，我不知道是否向该党通报了苏共的观点。邓小平还说了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些小党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地向南斯拉夫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我向邓小平简略地介绍了苏共中央将要举行的全会，会上将要讨论发展化学工业的任务。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邓小平主动谈到5月1日以后将召开中共八大的例行会议。邓小平指出，根据党章，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他说，由于工作特别紧张，中

共中央已将二中全会推后半年。邓小平说，全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据邓小平说，毛泽东现正忙于准备大会的文件。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和机关也在研究这些文件。

我问，全会是否要开很久。邓小平回答说会期事先并未确定，但按邓小平的意见，会期不少于一个星期。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本次全会将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去年党做了非常重要和规模宏大的工作，因此现在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些工作加以总结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从冬天开始加强了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的发展速度。

邓小平说：“你们要赶上美国。这对我们现在还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我们要努力赶上英国。我们还在考虑，以什么形式给我国人民提出下一个任务：用25年或更多的时间赶上美利坚合众国。”他再次声明，目前他们仅仅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又补充说，这种口号可能有助于他们向前发展。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说，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今天拜访中共中央联络部并通报说，星期一，即1958年4月21日，在布拉格召开我们合办的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我在回答邓小平这一问题时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大使馆参赞K.A.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РРФ, ф.0100, оп.51, п.432, д.6, л.157-160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1, л.71-74

№25220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1958年5月2日)

机密

文本第34份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完成了一些企业的新建或重建工作，部分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余下的建设和改造任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部完成。最近，旨在发展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拟定了，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已定计划的基础上编制了初期的项目清单，项目急需来自苏联政府的援助。阿尔希波夫同志会把具体情况传达给苏联政府。但是，提交的清单目前尚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最后确认，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最终的清单应该在不久之后就能确定。

在我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呈现了急速上升之际，我们开始起草1959年的农业计划。考虑到当前中国具备了制定工业计划的能力以及有了生产设备的保证，我们认为有必要请求苏联政府就48个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这些项目将被列入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希望苏联方面可以帮我们设计具体的经济计划。在这48个项目中，我们已经建成4个。

在苏联计划组织的帮助下，有10个其他的项目在建设中将会采用与苏联一致的技术标准，计划中的34个项目由中国独立开展。48个工业项目所涉及的核心设备由苏方提供，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1959年设备的供给费用将超过4亿卢布。

上述提及的48个项目的相关材料会经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审查后转交至苏联政府。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与中方就上述提出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打算5月初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带队，代表团将与负责援助的苏联主管机关进行磋商。

期盼您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8年5月2日

No20382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1958年5月7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23日

第20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记录

1958年5月7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委托向其转交了H.C.赫鲁晓夫就今年5月20日在莫斯科召集经互会参与国兄弟党代表的高级别会议的问题而给中共中央所写的一封信。

周恩来说：鉴于经互会例会的即将召开，我们已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看来，我们能够在近期内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来信作出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他将把上述信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报告。

我告诉周恩来，《人民日报》5月5日所发表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已于今年5月6日在苏联核心报纸上刊载了。我又说，这是一篇原则性地、坚定地抨击修正主义的文章，因而一定会受到苏联民众的欢迎。

周恩来带着明显的满意表情接受了这一通报，并说，南斯拉夫人可能不太喜欢它。

我简要地向周恩来通报了南斯拉夫和波兰使节对发表上述文章的反应以及南斯拉夫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参赞米利切维奇、秘书达科维奇和谢斯坦等在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对这篇文章的发表所流露出的无法掩饰的沮丧和愤怒。例如，在一次与米利切维奇的会谈中，由于其无法抑制的情绪我不得不让他明白，对待批评的言论应当持

更加冷静的态度。周恩来对上述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会谈过程中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一系列讽刺性的意见。在通报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已返回中国之后，周恩来说，他(指伍修权)对南共联盟七大的印象极糟。周恩来继续道，伍认为南共联盟七大就像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所谓民族共产党人的大杂烩”。在联系了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实际之后，周恩来说，南斯拉夫目前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1934—1936年间中国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情景。当时，张国焘掌握着7万—8万人的军队，但他直接指挥的军队总计2万—3万人。他歪曲中共中央的决议，并成功地使他周围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盲目地服从于他。那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周恩来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粉碎了张国焘反党集团(周详细地讲述了关于中共与该集团斗争的经过)，那么现在何谈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如今，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与1956年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更加稳固，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一点，即现代修正主义必将被粉碎。周恩来继续道，当阴谋败露后，张国焘从中国逃跑，目前身在香港。于是，周恩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人又能跑到哪里去，又能跑多远呢？”我答，现在仍很难说南斯拉夫将会采取何种举措，但我个人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现在是无处可逃的，因为甚至美国也是不会欢迎他们的。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关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问题，周恩来说，他完全不能理解南斯拉夫人为何要那样干：每年把自己生产的大量的小麦和玉米拿去喂牲口，之后又要年复一年地向美国购买约100万吨粮食。周继续道，南斯拉夫人现在欠了美国大量债务，他们从美国拿了近20多亿美元借款，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言：“欠谁的债，就会替谁卖命。”

我向周恩来简要叙述了关于自己参观了天津地区几个农业合作社之后所留下的良好印象，并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即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基础建设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今年中国农业一定会有一个好收成。周恩来答，今年除了河北省出现了旱灾之外，中国所有粮食主产省份的粮食收成形势都很好。

在谈了中共关于迅速振兴中国农业的主要举措之后，周特别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政策。

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我们国家仍面临着一个首要的任务——“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以增加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与1957年相比，今年中国大米种植面积增加了400万公顷)。周又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必须更大地扩展土地的灌溉区域。在过去的7个月内中国土地灌溉面积增加了2400万公顷。当前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近三年内使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占到全部耕地的80%—90%。周接着说，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相对次要，但也相当重要的任务是：将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

我为举行此次会谈向周恩来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周恩来助理马列、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我使馆随员P.III.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Ю.Б.安德罗波夫、多罗申科(苏共中央)、梅拉尔希科夫(苏共中央)、档案室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年5月19日，第400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39-142

№26361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1958年5月9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由安东诺夫转交的您的关于召开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的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您的邀请，并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5月20日在莫斯科开幕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决定通过后，立即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补充告知。

致共产主义问候

毛泽东

1958年5月9日

科托夫由中文译成俄文

АВІРФ, ф.0100, оп.51, п.431, д.3, л.44

№0988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1958年5月9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5日

第16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会谈记录

1958年5月9日

应张闻天邀请，我拜会了他。张闻天向我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决定对对日政策作策略调整一事。

张闻天指出，最近以来，岸信介政府对中国奉行很不友好的立场。日本政府迎合蒋介石集团和美国人，阻碍执行“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不久前，在日本中国展厅广场扯下了中国国旗。最近，日本方面又粗暴地破坏中日渔业协定(非官方协定)；日本渔船闯入禁区。日本领导人经常发表敌视中国的讲话。而且他们不断强调，日本可以和中国做买卖，但“不准备承认共产主义中国”。

鉴于这种情况，张闻天说，我们决定“对日本进行反击”。考虑到日本国会即将选举，中国的同志们打算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支持日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努力促使不让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到2/3的席位，以此使岸信介政府不能修改宪法。

为了这些目的，张闻天继续说，将采取各种措施。计划在报刊上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包括一些中国著名活动家的文章)，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反动实质，严厉批判它的对外政策方针，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方针。我们将表明，张闻天说，中国人民同敌视中国的行动是不能调和的，也是不能忍受的。他通报说，由于破坏中日渔业协定，中国海军已扣留15艘闯入禁区的日本渔船。中国朋友们决定不再延期渔业协定，该协定到6月12日到期。还决定停止从日本购买钢材(轧材、钢轨、钢管等)和化肥，所以从日本召回相应的中国外贸公司的代表。据张闻天说，今年计划从日本购买16万吨钢材、58万吨化肥；至目前实际已购入3万吨钢材和38万吨化肥，其余部分不再从日本进口。

日本人认为，张闻天说，没有他们，我们过不去。当然，他继续说，我们需要钢材，但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帮助我们的兄弟国家。暂停从日本进口上述物资，对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召回现在正在日本进行演出的和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据张闻天讲，中国外贸部已同苏联相应机关交涉，请求用苏联的舰船运载歌舞团和代表团回国)。准备最近访问日本的代表团也不再派出(其中包括民主妇女代表团)。至于准备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这个问题要特别研究。中国同志们决定不再给在华日本商人延长签证。

我说，中国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尖锐批评日本政府的文章，对此张闻天回答说，“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张闻天说，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岸信介政府。对日本社会党人和各种小的政治派别，将采取另外的态度，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反对派。中国朋友们打算以此孤立岸信介。中国同志们认为，上述措施对日本共产党有好处。

谈到日本未来选举，张闻天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社会党不可能上台，很可能现政府继续执政。他说，现在重要的是防止岸信介在国会中得到2/3的席位。但是，张闻天强调，即使岸信介得到2/3的席位，我们也将继续反对他。

中国同志们希望，他们的预定措施能给主张同中国友好的那些日本力量以支持。张闻天是本着这种精神讲话的，即当代日本垄断资本是“隐蔽的帝国主义资本”。如果不压制它，那它，用中国话说，“就会翘尾巴”。“以前，”张闻天说，“我们对日本采取了许多友好的步骤，但日本人把这看成是，没有他们似乎我们过不去。所以必须表明，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张闻天强调说，争取日本的基本路线没变，现在强调的是变换策略方针。

张闻天请把以上所说的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向张闻天介绍了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统一和团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

提到在京的外交使节对南共最近这届代表大会和对各兄弟党关于这届大会讲话的反应，张闻天指出，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同情南斯拉夫。基里洛克同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很接近。张闻天说，用“穿一条连裆裤”这句中国俗话形容他俩很恰当。据张闻天讲，前不久基里洛克同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基里洛克说，他不是理论家，关于对南斯拉夫回答他不想发表意见。实际上是不同意这种回答方式。谈到以上波兰大使的讲话，张闻天指出，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基里洛克已公开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讲话，他的观点同中国右派分子是一致的。但张闻天说话留有余地，他说，最近基里洛克比较谨慎，表现比以前好了。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外交部翻译局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随员勃列日涅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共4份，送：A.A.葛罗米柯、Ю.Б.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勃列日涅夫

1958年5月12日

№218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1958年5月12日前 [\[1\]](#))

绝密

1.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日程的建议(附录),委托苏共中央代表团把本决议作为基础提交兄弟党代表研究。

2.批准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兹明、卡巴诺夫、赫鲁尼科夫。 [\[2\]](#)

3.各代表团要以根据苏共中央决议以苏方的名义转交给社会主义各国代表的文件内容为会议依据。

4.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组织措施(附录)。 [\[3\]](#)

附件:

绝密

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定于5月20日早11点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召开,由苏联代表团团长作为应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宣布会议开幕。

二、苏联代表团领导人将提交如下关于会议日程、工作程序和会议章程的建议供会议讨论。

1.制定如下会议日程:

(1)各国——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问题(包括各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协作和专业化的问题);

(2)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相互联系和彼此供应军事技术的问题;

(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

(4)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国家计委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相互关联的基础领域的前景计划的情况通报。

2.批准全体会议如下议程:

5月20日

上午:11—13时

下午：15—19时

5月21日

上午：10—13时

下午：15—18时

5月22日

上午：10—12时

下午：15—17时

5月23日

16—19时会议闭幕

每工作2小时安排20分钟休息。

其余时间为各分组委员会的工作时间。

在会议上所有发言人讲话不得超过20分钟。

3.与会各党代表按照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

4.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会议秘书处。苏共代表团选派安德罗波夫进入秘书处。

会议秘书处保障使用俄语为会议作记录和速记记录。由会议发言人署名的使用其本国语言演说的文本列入会议速记报告。所有会议的基本材料(决议和情况报告方案)都翻译成与会党所在国家的语言。

5.在全体会议上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讨论问题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准备协商一致的意见，并把它提交给会议研究，待决议被通过后，委托该委员会把这些建议作为原则转交给经互会。接下来，经互会的这些建议将移交给经互会成员国政府批准。

6.讨论发表会议公报的可能性问题。

三、参加会议议题讨论的苏方代表为：第一项议题——库兹明；第二项议题——赫鲁尼科夫；第三项议题——卡巴诺夫；第四项议题——库兹明。

在会议召开前，利用同各代表会晤的时候事先通知他们，苏方的哪位代表将在会议讨论中发言是合适的。

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一个问题)。

在讨论会议议程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术问题——时，如果出现其他代表团成员不想就此问题率先发言时，委托赫鲁尼科夫首先发言。

在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三个问题)。

在讨论第四个问题——由于其具有情报性质——时，可以依据各国的字母顺序进行发言，也就是由阿尔巴尼亚代表第一个发言。

除了上述发言的指示外，还有其他代表团成员在会议上发言的问题。

四、在会议上要安排汉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法语和俄语的同声翻译，还要保证为大厅内的所有代表团提供口头翻译人员。

五、在讨论所有问题，除了第二项议程(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

术问题)时，邀请苏方外交部长和副部长、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委员会负责人、苏联国家计委负责人和经互会苏方委员会负责人参加，名单人数共计22人(预计)。

在讨论议程的第二项内容(国防工业问题)时，邀请如下人员参加：

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斯卡奇科夫、沙胡林、西多罗维奇；

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科涅夫、安东诺夫和古谢夫。

六、在会议开幕前，要同主要代表团就邀请苏联驻各人民民主国家大使、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大使以及经互会的两位副书记加莫乌斯和鲁然斯基参加会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七、5月21日，在会议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设宴，邀请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参加。 [4]

八、无论是在会议召开期间，还是在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代表团都要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进行会晤。

РГАНИ，ф.3，оп.12，д.373，л.37

РГАНИ，ф.3，оп.14，д.207，л.25-28

№26363 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 出席经互会的信件(1958年5月14日)

摘自扎哈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5日

第1356号

机密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谈话记录

1958年5月14日

应陈楚同志的请求，10时30分接见了。他。

1.陈楚递交了毛泽东同志就中国共产党出席今年5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组成致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文本(信件的译文将按单独的名单分发)。

我说，将立即把信件转交指定的收件人。

2.根据陈楚的请求，我把我们已经掌握的出席上述会议的兄弟党代

表团的组成告诉了他。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

3.陈楚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访问苏联的结果表示关注。

我回答说，我没有过问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准备好向陈楚通报。

4.对于陈楚提出的关于芬兰总统即将访苏的问题，我说，访问在今年5月22日至5月31日举行。

陈楚问及，这次访问期间能否期待进行某些专门的苏芬会谈，我回答说，没有已拟就的日程。但是，就像通常进行类似访问那样，将会就发展苏芬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陈楚提到，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政治关系是良好的。

我指出，最近几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处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谈话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扎哈罗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1, д.3, л.45

№26364 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 会议将讨论的内容(1958年5月16日)

摘自帕托利切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6日

第1365号

机密

文本第6份

1958年5月16日

应我们的约见，12时接待了陈楚同志。

我向陈楚通报了苏共中央向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议：在经济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我向陈楚通报说，建议在会上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问题、苏联军队撤离罗马尼亚的问题，以及就现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和通过相应的宣言。

将苏共中央分送给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的信件文本交给了陈楚。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立即将信件文本转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司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接待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帕托利切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察拉普金同志、齐米亚宁同志、波采罗布同志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1, д.3, л.46

№24044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5月29日在《真理报》第6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在《真理报》刊登这些文章后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8年5月28日

手写批注:

已经与毛希丁诺夫和福尔采娃同志商量的有关出版副刊的问题。

П.Н.波斯佩洛夫

1958年5月28日

问题解决后请通知萨秋科夫同志。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8年5月28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69, л.192

№24044-1 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5月29日在《真理报》第6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真理报》结束刊登之际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1958年5月28日

手写批注：

毛希丁诺夫同志了解并同意萨秋科夫同志的意见。

..... [5]

1958年5月28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69, л.193

№25221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 新技术专家 [6] (1958年6月3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1958年6月___日

第___号

译自中文

第0/152/58号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表达敬意，
并有幸提出以下援助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赞同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发展需从下面四个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员准备工作开始。这四个领域是：科学研究、发射场地测
试，以及军队新技术的军事应用和相关研发，这些都在工厂生产中经过
重要测试之后予以采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
12名专家的请求，其中7名如下：

..... [7] 专家——1人；

7780Ю和7814E制造和设计专家——1人；

空气动力学和导弹飞行测试专家——至少1人；

导弹发射专家——至少1人；

771910所载仪器专家——1人；

原子爆炸真空系数专家——1人；

放射量测定仪器的专家——1人。

上述提到的专家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工作期限2年。希望上述提到的专家能够在1958年9月到达中国。

其他5名专家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局工作。邀请的专家如下：

专家组领导人——1人

关于地对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地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空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岸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上述专家工作时间是两年，在1958年10月到达，但是专家组领导人要在1958年9月到达，以便协商工作组织架构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1958年6月3日，北京

翻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И.卡拉布霍夫

翻译校对：С.安德烈耶夫上校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1，п.431，л.12-13

№20383 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1958年6月4日)

1958年6月26日

第234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今天，鉴于国防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我驻中国使馆为中国军队领导同志举办了电影观摩会。

出席此次电影观摩会的有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军队的所有司令员(共15人)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杜鲁方诺夫、格列波夫和阿诺申等将军和海军上将普拉东诺夫。

我们给客人们放映了苏联新影片《伟大的战役》。在电影放映之前，我们与彭德怀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谈。

在谈话期间，彭德怀问我们是否了解法国在戴高乐上台之后的国内形势。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法国的情况。彭说，戴高乐政府并不稳固，因为法国人民不愿意在国家内部出现个人独裁，而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戴高乐的唯一支柱就是法国军阀，后者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对戴高乐给予支持。彭德怀元帅预计，在外交政策上戴高乐可能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口号，以反对目前隐藏在法国的希特勒的将军们；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彭德怀元帅还简要介绍了如下内容：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继续裁减中国军队数量和加强军队战备的措施，其中包括即将进行的夏季战备训练等。至于会议的详细情况，彭德怀在会谈中并未涉及。

在晚宴期间，彭德怀谈了关于当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和必须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等内容。在祝酒词中彭强调，在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而斗争的事业中，苏共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楷模。

至于在观摩会所观看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彭指出，新摄制的关于这一战役的苏联电影已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在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诸事件的过程中情景表现得更为逼真，更好地反映了在人民群众的

支持下战士、军官和将军在整个战役和在列宁格勒城下粉碎希特勒军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认为，此次电影观摩活动为建立和促进我们与中国军事家的私人交往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此次活动最大的积极意义。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苏达利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57-158

№20384 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58年6月4日)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9日

第22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克鲁季科夫与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4日

以H.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为此，我们在使馆举办了欢迎午宴。期间，我与王雨田进行了交谈。

午宴期间，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建议为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而干杯。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立刻对这一建议作了纠正，并指出，正确的说法应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作了上述修正之后，彭真才表示赞同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的干杯建议。

对此，王雨田对我道出了其中缘由。他说，毛泽东主席反对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主义阵营由两个国家领导——苏联和中国。毛泽东认为，这样说是不应当的。原因在于，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怎么会有两个脑袋呢！长着两个脑袋的人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个头，那就可能破坏其行动上的一致性，并成为其最终崩溃和混乱的根源。

我还就《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刊登的陈伯达的一篇文章与王雨田交换了意见。王雨田又通报说，6月5—6日《人民日报》将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一篇新社论。关于这方面问题，王雨田说，中国还将继续发表其他一系列文章。

在强调了连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王雨田说，“我们不要害怕这样做会大大地得罪南斯拉夫人”。我们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人会因此而走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彻底地声名狼藉了，并将在本党、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王雨田补充道，我们也不要担心“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可能会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勾结”。

王雨田对我们最近与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感兴趣。对此，我说，近期我们与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会谈内容基本与以前一样。我还说，就在前两天我曾出席了南斯拉夫使馆一等秘书达科维奇举办的午宴。期间，达科维奇主动谈了许多目前正引起多方争论的问题。不过，这次他表现得比较克制，没有发出任何攻击性的言论。不过，他还是放肆地吹嘘道：针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他们立刻便在本国的报纸上发表了相关评论性文章。

王雨田通报说，他本人与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的会谈却充满了火药味。三天前，米利切维奇又请求王雨田与他会面。但鉴于前次会谈的不愉快，王雨田这些天一直都没有再接见过他，借口是工作繁忙。王雨田补充道，最近他将接见米利切维奇，到那时我们就又会有一些可以交流的资料了。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No20385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1958年6月7日)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和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7日

6月7日白天，我应邀拜访了李晨(Ли Чэнь)。

根据我们的建议，李晨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关于应当接受印度政府就老挝国际委员会问题所提出的第二套提案(解散该国际委员会，并由越南委员会现有成员重新组建老挝委员会)。李晨指出，就老挝问题中方将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保持联系。李晨还提醒我道，中方现在就将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波兰同志。

在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了关于亚洲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如何反应的问题。李晨强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袒护铁托的同时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他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是以此为基础来相互合作的。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看亚洲国家新闻报刊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反应的问题，李晨说道，反对报刊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但目前暂时还无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此事已被人积极利用以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

当天晚间，我被章文晋(亚洲司司长)邀请到了中国外交部。章文晋说，白天李晨曾向我通报说，中国已同意接受关于解决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的第二套方案，但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刚才又从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收到了一封电报。该电报通报了一些由波兰高级代表从上述委员会获得的最新消息。其中称，老挝国际委员会的紧张局势已有

所缓和。加拿大代表已不再威胁说要退出委员会了，并暂时停留在越南。印度代表安萨里的最后态度暂且还不清楚。不过，章文晋指出，安萨里原打算于6月5—6日前往西贡，但目前这一行期已延至6月中旬。

章文晋接着说，从安萨里与波兰高级代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前者依然支持自己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即保留原先的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与波兰人的谈话中安萨里说，“西贡那里也赞成在越南保留临时性机构”。章文晋说道，可据我们所收到的电报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在西贡究竟是谁说了要保留这样的机构的话。我们认为，此话一定是出自驻越南的国际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之口。从各种迹象可明显做出如下判断：加拿大和印度代表对启用第二套方案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

章文晋继续道，苏联同志可能也已收到了与我们类似的情报，但我们仍然决定向苏联使馆通报这一情况，以便苏方密切关注此事，并给予印方适当的答复。至于我们，章文晋强调，我们也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研究。

章文晋顺便指出，据波兰人所获情报，前不久富马给国际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断定老挝政府将会执行日内瓦协定。章文晋指出，富马发出如此声明就使加拿大人和印度人所持立场变得更没有说服力了。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P.III.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4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6月24日

第508号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61-163

No20386 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1958年6月15日)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8日

第274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和亚洲司副司长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15日

俞沛文说，他非常希望与谈一下关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打算以外交使团长的名义为即将离开中国的举行欢送会的事情。俞沛文声称，中国同志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为波波维奇离任而举办的活动。我对俞沛文说，基里洛克在组织这个欢送会过程中并没有与苏联使馆商议，另外他还打算(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我指出，我们将尽力促使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的事情流产。在对我的这一观点表示赞赏之后，俞沛文说，他们认为，最好是这个欢送会根本就不要举办。

俞沛文问，苏联使馆的代表是否参加这个欢送会。我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使馆内部已经作了讨论。因为这个欢送会是由外交使团上层组织的(为欢送离任大使而举办此类欢送会一般均需由各国驻北京使团上层会议做出特别决议)，况且这个欢送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因而我们不得不参加。俞沛文指出，“外交使团成员的义务理应更加明确地加以确定”。至于中国同志，他们“在礼仪问题上可以更随意些”。

俞沛文说，从南斯拉夫一回到北京，波波维奇就请求周恩来和陈毅接见他。但后两者至今也没有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使馆便对中方没有对这一接见请求做出回应表示了不满。其使馆代表声称：“难道南斯拉夫大使在临别之前为向中方领导人辞行而举行会见也会如此艰难吗？”对此，中方的答复是：南斯拉夫人事先并没有说，这次会面是为了临别辞行，只是在关于波波维奇返回的使馆照会中说，波波维奇此次返回中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并没有说他来就是为了与中国领导

人辞行的话。不过即使在此次会谈之后，俞沛文说，中方仍没有决定政府领导人是否要接见波波维奇。俞沛文指出，显然，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拒绝接见波波维奇。（注：中方最终也没有举行与波波维奇的礼节性接见。）

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北京之后，波波维奇在北京只是与副部长曾涌泉见过一面。当时，波波维奇并未想与后者进行政治性的争论，显而易见，他是想等与中国高级领导同志见面时再提出那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不料，曾涌泉在会谈中却主动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会谈进行得异常激烈。期间，波波维奇声称，他回南斯拉夫是要担任新的职务。与此同时，他还说，如果能够有利于中、南两国关系的改善，自己愿意延期回国，再在中国待上半年。但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

在这次招待会上我还与李晨和其他一些中国外交部领导同志举行了会谈。他们均指出，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使团几乎不与中国同志交谈。在见面时，他们也总是装作没看到中国同志。

李晨通报说，南斯拉夫人现在正积极开展针对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他们的活动对这种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极力将亚洲国家的政府人士和社会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以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又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我注意到，不论是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还是其他近期召集的礼宾性活动中，南斯拉夫人都在积极地与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代表进行交谈。李晨继续说，根据中方的观察，南斯拉夫人经常与上述国家的使馆代表会晤并在其中间积极地传播自己掌握的消息。

在会谈期间，我提起这样一件事：据资产阶级通讯社报道，日本外交部已向本国驻亚非国家的使馆发出指示，要求其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日本人预计，如果中国不与日本搞好贸易，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面临窘境。其依据是：中国比日本更需要和重视日中贸易。可是，日本人没有料到，中国在对日关系方面会如此的果断和坚定。

李晨接着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与多个亚非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忧虑。他们一直怀着极其嫉妒的心情关注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贸发展情况。中国与日本在很多商品方面均存在着竞争。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一样，日本也想损害中国的声望，他们开

展大量宣传以反对中国商品，极力贬低中国商品的质量等。李晨指出，中国和日本都向东南亚市场输送了很多相同种类的商品。过去，日本商品在南海国家华侨中一直拥有广泛的需求。中国华侨经常充当日本商品输入这些国家市场的中间人或在某种程度上协助日本商品在这些国家的推广。不过，总体而言，华侨还是更喜欢使用中国商品。他们通过大量广告来宣传国货，怀着自豪的心情对近年来中国输入亚洲国家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加称赞。这里，李晨强调，即使现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仍然对日本当年的侵略记忆犹新，仍然对日本人怀有戒心。日本人很难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克服当地居民对日本人怀有的那种深刻的仇视和敌视心理。

在答复我的问题的同时，李晨也承认，近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品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不过，他又强调说，日本商品的更大竞争者是英、美等西方强国，后者在东南亚国家市场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李晨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商品竞争只占有次要地位。他顺便还指出，日本人是非常老到的商人，他们非常执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见缝插针式地搞商品渗透。不过，在目前条件下他们在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经济扩张方面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会谈期间，李晨通报道，泰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巴貌目前在本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问题上暂且持中立立场。从其公开言论中看明显看出，他希望置身于各斗争集团之外，这就是说，他既不愿意加入正在当政的吴努集团，也希望与其反对派保持距离。李晨指出，巴貌的上述做法说明，泰国目前当权的吴努政府的地位并不稳固。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66-169

№20387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18日)

摘自Б.Н.魏列夏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18日)

我通知王雨田，鉴于为苏联侨民服务的工作量显著减少，苏方打算关闭位于大连市的总领事馆和位于广州市的领事馆，并询问中国朋友对此有何意见。王雨田答，他将研究这一问题，并随后作出相关答复。

王雨田通报说，在我们到来之前他直接与波兰大使C.基里洛克举行了会谈。双方交谈的问题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的基里洛克，近期一直在打算为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筹备欢送会。

王雨田说，在双方2个多小时的会谈期间，他一直试图说服基里洛克放弃举办此次欢送会。然而，看来基里洛克似乎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了。他对王雨田道，自己已散发了请柬。但他答应，自己将尽量压缩欢送会的规模。

王雨田说，中国工作人员将既不参加(波兰大使)为波波维奇举办的欢送会，也不出席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鸡尾酒会。

王雨田接着道，近日中国正接待乌干达民族大会党外国事务书记和该党秘书处负责人助理。后者是在访问了苏联之后又来到中国的。

在一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些乌干达人说，在前往苏联的途中他们曾经在开罗稍作停留，并与苏联驻埃及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后者对他们说，苏联会积极支持乌干达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在访问苏联期间乌干达代表团只受到了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和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普通领导人的接见，而且在会谈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苏联给予乌干达实际帮助的事。据王雨田说，这使乌干达人感到有些不满。

我感谢了王雨田，并承诺将向有关部门通报此事。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B.Г.日塔诺维奇。

Б.魏列夏金(签名)

文件共4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日塔诺维奇

1958年6月24日

第508号

手写批注：

存档。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29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64-165

№1038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1958年6月19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8年6月9日会议

第106项 批准所附苏联外交部给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的指示草案。

附件

草案

哈尔滨

苏联外交部给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指示(草案)

致哈尔滨总领事：

请通告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你们不反对将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牺牲并被安葬在哈尔滨市的俄国士兵的遗骸迁入新的公墓。请说明，你们准备拨给人民委员会6000卢布，用于将俄国士兵遗骸迁入新公墓的费用。你们还要说明，总领事馆已经知悉中国关于不迁动哈尔滨市

苏联无名烈士墓的声明。

ЦХСД , ф.11 , оп.1 , д.165 , л.36、 83

№20388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Чэнь Чу)于1958年6月20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8年6月21日

第15-Д-790号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20日)

今年6月20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涉及在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做的准备工作等相关问题。

在双方就上述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陈楚说，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波波维奇将动身回国在外交部就职。对此，陈楚声称，如果南斯拉夫向中国所派的新任大使的官衔将低于波波维奇，那么中国也将采取类似举措，即中国也将以较低官衔的新大使以取代伍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现任大使为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目前身在北京)。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任命新大使，而只在中国保留临时代办，那么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召回本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只在那里保留临时代办。陈楚继续道，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的表现很不好，此人一直与南斯拉夫关系甚密。而在波波维奇即将离任之际，基里洛克更是表现得过于积极——整天忙着为波波维奇送行的事，尽管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对他的这些做法均持反对意见。

陈楚又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于6月20日来莫斯科，并前往一些欧洲国家检查中国使馆的工作情况。7月中旬，张闻天将在布拉格召集中国驻欧洲国家使馆的大使开

会，届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与此相关，刘晓大使将于近期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会议记录者И.谢尔巴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55-156

№24944 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1958年6月24日)

苏联科学院院长А.Н.马克萨廖夫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的一封信。

中国同志感兴趣的绝大部分问题是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管化工问题的国家委员会科学机关的工作问题。其中的许多机构已经经过了科研阶段，并且成了上述委员会的生产工厂进行大量生产的单位。这首先涉及四氟乙烯、三氟氯乙烯、二氯乙烯、全氟丙烯以及其他的氟化物的生产，对其进行的分析方法和聚合方法。原列宁格勒的化工部国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用电化学的方法生产三氟醋酸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考虑到上述所述，我们请求你们不要推辞，立即把你们就中国同志感兴趣的意见发送给他们，同时把关于在国家化学委员会接待江世奎(ДянШикуй)同志问题的意见发送给他们。

苏联科学院方面打算把И.Л.克努尼扬茨院士派往中国授课并就氟的有机化合物化学方面的问题提供咨询。

我们请求把中国同志给您的信件的副本发送给苏联科学院。

附随信件文本 [\[8\]](#)

苏联科学院院长总科学秘书

А.В.托普奇耶夫院士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28, л.30

№20389 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7月1日)

1958年7月16日

第28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1日

今天，根据邀请我拜访了龚普生。

龚普生提醒道，在一系列会谈中，我谈到关于“两个中国”的几个问题，而她也承诺过要详细地向我们谈一谈中国对各种可能导致“两个中国”情况发生的现象的现有规定。她请我们原谅其在近两个月内都没有能够举行这一会谈。（注：从我们与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得知，近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部召集在北京的中国驻外使节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和讨论。）

龚普生说，近期美国加紧实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众所周知，中国一直都对“两个中国”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原则性立场苏联同志是相当清楚的，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再次重复。美国人运用一切非正式的渠道，“暗中”极力企图将“两个中国”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避免以正式声明的方式来涉及这一问题，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其他非正式国际组织开展活动。

龚普生继续道，首先，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其业已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上驱逐出去。

前不久，在法国举办的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例会上各西方国家便曾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已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工作，而中国政府也已决定要加入这一组织。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起初该组织似乎并没有蒋介石分子。然而，当中国代表抵达法国之时却发现，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还有三名蒋介石分子。我们的代表自然要对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会议。可是，我们的建议不但没有被会议采纳，西方国家甚至提出关于将中国代表赶出会议的建议，虽

然后者的建议并没有获得大会多数的通过。随后，中国代表继续抗议蒋介石分子参加此次会议，并宣布中国退出该组织。

龚普生接着说，国际自行车者协会也已接纳中国为会员，并在起初便宣布蒋介石分子不得加入该协会。可是，随后蒋介石分子还是渗入了该协会。

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存在有“两个中国”，因此蒋介石分子也已被其接纳为该委员会的会员。

国际排球联盟反对接受蒋介石分子为自己的会员，只是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以抗衡西方的压力及其所推行的用来孤立中国的“铁丝网”策略。1959年本应举行该联盟大会。但由于如果召集大会，就很难回避讨论关于蒋介石分子的会员资格问题，于是该联盟领导层决定取消来年即将召开的联盟大会。

由英国共产党员蒙塔古领导下的国际乒乓球协会也反对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后者曾多次要求该协会接收台湾为会员。该协会领导层目前正在对自己应采取的对策进行研究，以阻止蒋介石分子加入该组织。

龚普生说，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一直都只承认中国，而不接受蒋介石分子。例如该组织多位领导人均宣称，以朱家骅为首的台湾组织并不能代表中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本身实际上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宣传机构。该组织领导人去年曾来过中国，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很多中国活动家周凯申(Чжоу Гэньшэн)、闻江平(Вэнь Цзян-пин)和吴茂荪(У Мао-сунь)等都曾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该组织的大会。不过，该组织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也并非总能保持一贯立场。在承认中国而不承认台湾的问题上其还有很多不足。因此，该组织也存在产生“两个中国”问题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该组织虽然不承认台湾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但认为台湾协会至少可以代表自己，因此台湾仍有可能被吸收为其成员。为了使该组织的领导层具体以如此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可费了不少劲，目前看来，他们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据蒋介石分子声称，该组织已对关于接收台湾为其成员的问题作了两个研究，只是暂时没有得出结果。但问题依然存在，估计在该组织下次例会上仍将要讨论台湾加入的问题。

总之，龚普生总结道，自1952年在多伦多举行了国际红十字会第十八届大会之后，在英、美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分子不断试图钻进中国现已加入的5个国际组织，具体包括：三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应当说，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两个中国”的说法。而且在这些组织中还存在这样一些情绪：如果由于中国的抗议而导致蒋介石分子不能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那么他们将把中国从其组织中除名。而助长这种情绪的蔓延和在背后捣鬼的人无疑正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分子。在上述这些不太体面的手段背后还有一种稍微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有人会貌似公正地宣称：体育和科技都是属于政治之外的人类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限制。

龚普生说，前不久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国际足球大会的工作之后回国。众所周知，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提出了抗议，发布了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该会议的声明并退出了大会。龚普生强调，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斗争中苏联代表团给予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帮助。

接下来，龚普生开始系统性地谈关于具体有哪些情况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瓦解中国在反对“两个中国”斗争中所实施的政策和具体对策。

龚普生接着说，我们认为可能和常常会有以下五种情形会被敌人利用以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针对每种具体情形和敌人所使用的手段，我们也将采取一定的应对方法。

一、一些由集体性成员组成，既承认中国，也承认台湾(其经常打着“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旗号)的国际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参加过所有这些机构并将一直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去。

如果这些机构不接收中国的要求，中国将退出其所召集的代表大会，不作为其成员国，不参加其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例如，我们退出了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退出了大规模电子系统国际大会例会，关于退出其常设机构的问题目前仍在研究；我们还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等等。

目前，还有9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其成员国既有中国，也有蒋介石分子。而中国还未从其中退出，具体如下：

1.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我们还没有从该机构中退出，但也没有参加在墨尔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国际游泳爱好者联盟；

3.国际篮球联盟；

4.国际竞技性摔跤联盟；

5.国际田径爱好者联盟；

6.国际射箭体育协会；

7.国际举重体育联盟；

8.国际自行车爱好者联盟；

9.亚洲乒乓球联盟。

龚普生继续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将蒋介石分子从上述9个组织中赶出去的可能性很小，而长期维持现有局面在政治上对我们非常不利。

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将采取那些果断措施的问题(注：稍后，中国外交部向苏联使馆通报说，中国已决定退出上述9个组织，并为研究该问题而希望于7月19日在北京召集兄弟国家代表开会)。

在此之前，当我们要参加某个国际性组织或参加某个会议之时，总是要先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有蒋介石分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要求苏联同志帮我们搜集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资料。

龚普生接着说，为回应中国代表对蒋介石分子提出的抗议，后者只有一次退出了国际机构，例如蒋介石分子退出了1952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八届红十字会国际会议。

二、支持集体个人和个人成为其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这样的组织，如民族权利组织和汉学家组织等。从这些组织的形式来看，如果有一些中国人参加了类似组织，似乎并不会发生“两个中国”的情形。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避免出现“两个中

国”的情况。因为如果在某个组织中有一个蒋介石分子，那么他必然要谈及台湾在该领域所做的事。前不久，在印度举办了一个农业经济专家协会会议。印度人“不妥当地”向蒋介石分子发放了签证。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干脆不派自己的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总之，龚普生强调，对于多数类似上述的组织，我们现在已做出了不加入的决定，虽然碰到具体问题我们还需特别具体地加以分析。以前，我们也曾参加了类似上述组织的会议，但参加了两次之后我们便再没有参加过。

每当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有中国海外代表参加之时，我们每次都会对相关情况作专门的研究。问题在于，这些人或其组织可能跟蒋介石分子并没有关系，都是真正出于自愿而来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处理此类事务时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仔细研究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及其社会关系，因为蒋介石分子完全可能利用中国海外侨民以达到其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目的。

三、联合国中的一些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会议，在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是有蒋介石分子的，但在其基层机构中却没有蒋介石分子。

龚普生说，针对这样的组织(不论是其核心组织，还是基层组织)我们都选择不参加。这里，我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在该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有蒋介石分子，而在其个别基层组织中却没有。但我们依然不参加其中的任何组织。

总之，龚普生强调道，在这方面我们的原则是：“通过正规渠道，而不是后门”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通过自己的个别人，以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份，而是某个明确的国际组织代表的身份与一些组织保持着关系。例如刘宁一和刘长胜曾经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但今后，我们将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国际生活，因为最终大家毕竟还是会晓得，中国代表是以什么名义参加的。

不久前，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邀请我们的代表以他们代表团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例会，我们拒绝了。

四、各种要求中国向其提供资料的国际组织。

有一些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会请求我们向其提供相应的物资，各类型图书和出版物的副本等。类似这样的组织，我们以前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过物资，今后也不会给。如果这些组织自己在哪里得到了某些物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们，龚普生强调，将不会向其提供任何物资。

至于通过联合国机构从事有利中国的宣传活动，龚普生继续道，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Г.А.茹科夫同志之间倒是曾就这一问题的性质交换过意见。据龚普生所知，赵毅敏同志当时谈话的意思是：不论是做宣传，还是传播关于中国的资料，都不愿意利用这样的渠道。例如中国不愿意为此目的而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所出版的杂志，因为该组织的其他出版物经常会提及台湾。龚普生几次重复中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即“一些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在发表了我们的材料或关于我们的材料的同时，又载有关于台湾或台湾组织的内容”。

龚普生顺便指出：“如果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使类似出版物不再从事有利于蒋介石分子的宣传活动，那就再好不过了。”

五、各种与联合国保持着一定关系的国际机构。

这里可能存在好几种关系模式，我们应当明确与其关系。

1.如果在决议中提到联合国宪章，那还不足以作为拒绝这一决议的理由。如果在决议中只是泛泛地提到联合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喜欢对该问题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例如，如果决议指出联合国应当支持黎巴嫩的反殖、反帝斗争，那么我们就支持该决议。如果决议指出所有同意该决议的国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都应根据决议内容承担某种责任，那么与此相关，我们每次都会特别声明中国的立场，即中国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因此中国不必承担联合国机构所作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

龚普生继续道，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亚非国家团结大会通过了关于编制亚、非国家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以及关于召集相关历史学者组建编辑小组等决议。上述决议还指出，该书将反映亚、非人民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该百科全书的编辑活动应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

的要求来做。

针对类似这样的出版物，龚普生强调，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看法。至于其中提到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要求来从事编辑活动，“针对这样的表述，我们无法接受”，因为中国既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中国代表在此次大会上特别指出，截至目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还未恢复，因为中国无法同意决议的第三款内容，即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来编制百科全书。

2.与联合国建立了咨询性关系的国际机构。

我们认为，针对每个具体情形都必须对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至于我们，我们反对与联合国建立此类关系，而在投票表决时，我们都会投弃权票。类似的情况过去已发生过。例如在国际记者协会。当时，参加该组织例会的中国记者协会代表邓拓便在会议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并就中国的立场发表了相关声明。

3.有联合国代表参与工作的各种国际性机构。

在类似情况下我们的活动都将遵循以下原则：如果联合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这些机构，但不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投弃权票。在中国的权益尚未恢复的场合，如果联合国代表在这些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或经常会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那么我们将不参加这些机构的工作。以亚、非国家妇女大会为例。联合国以观察员身份——类似于上级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该大会的工作，经常对大会发布指示和教导。于是，当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时，中国代表团便退出了会场。

总而言之，龚普生在结束时说，我们赞成国际合作，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类似以上所述的做法来行事。另外，龚普生强调，我们也会经常性地要求兄弟国家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不论其打着什么旗号：如“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等。

在进一步明确中国持赞成国际合作的立场的同时，龚普生说，中国同志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参加由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居统治地位的那些组织，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毕竟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虽然这样的好处并不太大)。例如，通过参加国际技术等会议可以

终究能为我们的科技和科学部门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而利用这些组织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等等。但是，龚普生强调：“在参加类似组织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因为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就盲目从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类似这样的组织和会议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有价值 and 真正带有某种机密的東西的。从另一方面而言，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可以依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当然，参加了这些国际性组织总是会有一些好处的，而不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也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我们时常以如下格言告诫自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我们不能因为要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为敌对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是会参加个别的国际性组织，而这都是在我们判断其会对自己有一定好处并不会对中国的威望造成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参加国际性组织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龚普生指出，的确，中国有一些知名人物只会盲目地相信所有外国人，而不相信自己 and 中国人民，他们要求不加区别地参加所有国际性组织。此类人可能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活动家以及一定数量的各领域科技老专家。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龚普生声称，我们认为：“不参加一些确定的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不参加在相当程度上将加剧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并促使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因为大家都清楚，美国正是‘两个中国’谬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

这里，我们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为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该组织，就将导致广大的中国领土处于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范围之外。而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其中被指责的对象就包括美国在内。有时，我们也会不急于参加各类型的国际组织，即使该组织的成员国已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思想。

龚普生强调，中国“并不害怕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中国的不参加将逐渐地使那些现在正极力将中国清除出这些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害怕才对”。“另外，我们相信一点，即终究会有一天这些曾经反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反过来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生活。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中国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相信中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在许多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我们的足球运动为例，龚普生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但如果将来我们的足球运动发展得好，国际足联终究会迫使我们加入的。

最后，龚普生请求我们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给予帮助：她说，据我们所掌握资料显示，1958年6月4日台湾“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秘书长范之(ФанЧжи)声称，目前其正打算增加“联合国救济香港难民文案执行委员会”成员数量，即从原来的24个成员增加至25个。而且，据他讲，国民党代表也加入了该委员会。而中国同志对该委员会的情况一概不知。龚普生请求苏联同志向其通报关于该组织的基本资料，具体包括：详细名称、组建时间、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等。我答应将就这一问题查询相关资料。

我感谢龚普生为我们举行这次会谈，并强调，此类会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同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思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工作人员闫虎山(ЯнХушань)、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K.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6份，送：B.B.库兹涅佐夫、Ю.В.安德罗波夫、M.B.齐米亚宁、Г.А.茹科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7月11日

第569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26368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1958年7月3日以后 [9])

(58)部苏字第0/7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请将下列请求转达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因工作需要，拟聘请一个苏联专家组，共计40人，来华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靶场机构进行筹建和使用即将建成的导弹试验靶场的工作。专家组在华工作的期限暂定1年。专家组包括：

组织、领导靶场进行试验和训练的专家2人(即靶场专家组的正副组长各1人)。

甲组6人，计：

- 1.在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试验导弹的专家(电气工程师)1人
- 2.发动机试验专家1人
- 3.导弹单元试验专家1人
- 4.无线电控制系统专家1人
- 5.空气动力学、弹道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 6.地面设备专家1人

乙组8人，计：

- 1.综合试验专家1人
- 2.运载飞机控制站、发射电路和挂载装置专家1人
- 3.靶机发动机和机身及运载飞机的专家1人
- 4.导弹的单元准备和综合准备专家1人
- 5.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调整和导弹效力专家1人
- 6.试验导弹的试验飞行员兼引导运载飞机的领航员1人
- 7.运载飞机上和导弹上测量专家1人
- 8.外部测量和测量结果初步整理工程师1人

靶机组3人，计：

- 1.靶机的自动装置和稳定系统专家1人
- 2.无线电控制仪器和MPB 2M型地面引导站专家1人
- 3.挂载装置和降落伞靶专家1人

丙组8人，计：

- 1.综合试验专家1人
- 2.弹载无线电控制仪器、无线电控制系统和无线电引信的检验仪器专家1人
- 3.自动驾驶仪、弹载电路及其检验仪器专家1人
- 4.发动机和弹体专家1人
- 5.地面设备专家1人
- 6.分析全套武器工作情况的专家1人
- 7.引导站检查记录仪器和模拟仪器专家1人
- 8.综合测量专家1人

海军分场6人，计：

- 1.组织、领导试验和训练的专家1人
- 2.全套装备(导弹、地面设备、发动机、燃料、战斗部和引信装置)的专家1人
- 3.全套控制系统、雷达站和靶标设备专家1人
- 4.全套测量设备(光测设备和遥测设备)和整理、译解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 5.空气动力学、飞行动力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 6.弹在控制仪器(独立控制仪器、控制站、电气设备和试验设备)专

家1人

各种导弹的共同勤务7人，计：

- 1.时间统一勤务专家1人
- 2.遥测专家1人
- 3.光测专家1人
- 4.雷达专家1人
- 5.战斗部、引信装置和火药专家1人
- 6.无线电通信专家1人
- 7.燃料和氧化剂专家1人

上述专家组的人数和专业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有关部门同目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共同商量后提出的。如在专家人数、专业和在华工作期限等方面仍有考虑不当之处，尚望苏联政府斟酌予以重新安排，并希早日得到苏联政府对此请求的答复和派遣上述专家尽速来华。

此外，外交部曾于1958年6月10日发(58)部社字第0/162号照会，请苏联政府派1名专家协助建立导弹试验靶场。大使馆曾于1958年7月3日复照同意。在此需要说明，这位专家应包括在上述40名专家组中，并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希望这位专家组组长亦能尽早地来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大使馆的协助预致谢意。

此致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8年____月____日于北京

附专家名单俄文本一份 [\[10\]](#)

No20390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1958年7月9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6日

第289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7月9日

今天，我拜访了陈毅，并根据中央的委托请他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与会国兄弟党代表在1958年莫斯科经互会会议上的谈话速记记录。陈毅说，这份速记记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并对苏方向中方转交这份记录的举动表示了感谢。

根据A.A.葛罗米柯同志的委托，我请陈毅随意为苏联《国际生活》杂志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国际问题方面。陈毅表示同意写这篇文章。

会谈期间，我们的谈话还涉及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陈毅强调，“针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围而歼之”。陈毅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重点集中在揭露南斯拉夫人的活动方面，因为正是后者在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另外我们还应当把南斯拉夫人当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来予以揭露。陈毅继续道，近期南斯拉夫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幌子不断加紧针对亚、非国家的活动。陈毅特别指出，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提前采取反措施，以抑制南斯拉夫人的企图。陈毅说，现在的关键在于，亚、非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斯拉夫人持信任态度，并顺从于他。

陈毅强调，南斯拉夫人的这些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更有力地在亚非国家面前揭露南斯拉夫人所谓的空洞的热爱和平的活动，因为后者实际上对维护世界和平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作用。陈毅继续道，也许，“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外交部和兄弟国家驻

北京的大使馆应加强针对驻中国的亚非国家使馆的工作”。

我表示同意陈毅的这一观点。

我提出一种观点，即南斯拉夫人利用纳赛尔访问南斯拉夫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目的。陈毅说，他同意这一看法，并说中国方面目前对纳赛尔和铁托的会谈情况一无所知。我说，苏联使馆也对此不太了解。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P.III.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送：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7月14日

第589号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70-171

№13731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 导弹生产厂(1958年7月11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1日

第01887号

绝密

文本第13份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7月11日

应张伟烈的请求我接见了 他。

张伟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我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照会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生产导弹企业问题(译本附上)。张伟烈同志请求我把这个请求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把审核结果尽快通知大使馆。

我答应立即把朋友的请求通知政府，并肯定地表示，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程鲁生和三等秘书A.И.费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库兹涅佐夫

文件分送：科兹洛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米高扬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马林同志、佐林同志、库兹明同志、齐米亚宁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波采罗布同志、卡巴诺夫同志、斯卡奇科夫同志

归档3份

附件：

在1958年7月11日会谈时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张伟烈亲手交给B.B.库兹涅佐夫的。尊敬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荣幸地恳请您协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中国建设一系列导弹工厂方面给予援助的照会转交给苏联政府，工厂的具体方案和他们的生产规模包含在下面几条中：

一、远程弹道导弹厂(142厂)

生产规模与轰炸机工厂相等，年产800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年

二、中程弹道导弹和近程弹道导弹厂(162厂)

生产规模应该与生产驱逐机的工厂相等，年产2000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年

三、导弹推进器厂(440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应该生产出满足于142厂和16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四、导弹仪表厂(252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满足于142厂和162厂开展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五、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1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14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六、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2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16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七、一级原子能物理仪器厂

生产一级真空泵以及满足第二机器制造工业部所需要的仪器。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如果您尽快通知我苏联政府对我们上述请求的意见的话，我将非常感谢。

谨向第一副部长同志致以真诚的敬意。

(标记和条目按原件)

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

张伟烈

ABIPPO, ф.0100, оп.51, д.3, л.431, л.44-46, 50-52

№1382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1958年7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15日会议第16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

夫、H.M.什维尔尼克；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第5项 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 [11]

(赫鲁晓夫，米高扬)：撰写给毛泽东的密函，大体上是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 [12] 将触及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上交换意见。

委托米高扬同志起草信函草案。 [13]

第10项 H.A.布尔加宁同志的信(米高扬、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伏罗希洛夫)。

我认为，布尔加宁同志的举止不正确。

提供休假，期限为1个月。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38-39

№204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1958年7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19日会议第166号记录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库兹涅佐夫)

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的呼吁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致其他国家工会的呼吁信。

“总统先生，我们正处于严重关头，我们正在走向灾难。

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东方燃起。我们将会看到无数的尸骨。你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尽管是局部的侵略战争。希特勒也是这样发动战争的。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你们采取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把人类带向灾难。

我们的呼吁不是从实力原则出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你们的一些部长的声明是不负责任的。 [14]

你们有炸弹，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炸弹。

我们应当保障和平共处。

你们想怎样呢？

你们派出了军队，但是没有获得黎巴嫩议会的同意。 [15] 黎巴嫩的人民已经愤怒了。

英国人也向约旦派出了军队。

黎巴嫩和约旦的统治者丧失了自己人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

大家都了解历史，但是不要往火坑里跳。你们不会长久待下去。这将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

麦克米伦先生知道，他的军队两年前被赶出了约旦。

这是毫无理由的粗暴的侵略。

关于撤军。需要立即撤军。让人民自己来决定。

在这个严峻关头我们建议主要国家召开会议。把时间尽快告诉我们，以便理智地解决问题，制止冲突。

我们已经说过，在商业的原则上不会给石油利益造成损失。

建议召开会议或者通过安理会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日内瓦不合适，我们同意在华盛顿会谈。关键在于你们。”

工会的呼吁信也要起草；要对青年、科学家、妇女组织进行呼吁。

联合国或许会像国际联盟一样被扼杀。

No204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1958年7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近东和中东事件采取新步骤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年7月19日

赫鲁晓夫：关于应当还要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应该交换意见。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或许还要向尼赫鲁发出呼吁。这些呼吁要阐述我们对于所形成的局势的看法。

应该把格里申同志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来，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策向所有国家的工会发出呼吁。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应该利用一切手段。

米高扬：应该想出办法。

赫鲁晓夫：是的。如果大家同意，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些想法是应该包含在呼吁信中的。

伏罗希洛夫：事实上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想谈得随意一些，以便其他人也可以谈。而且今天就应该结束这件事情。

呼吁信不应该太长，但要有表现力。因此我邀请了格里巴耶夫同志，他做这样的事情言简意赅，语言尖刻。

有人说：还有尤里·茹科夫。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格里巴耶夫的语言更为尖刻。

我认为对总统的称呼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语调，比如：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

米高扬：一封信有三个称呼。

赫鲁晓夫：信将是同一封信件，但我想要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伏罗希洛夫：是的。

赫鲁晓夫：应该有各种立场，就拿戴高乐来说，法国现在还没有参与干涉。

米高扬：他们是被赶走了。

苏斯洛夫：他们被痛打了一顿。

米高扬：他们想留下来，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允许，就把他们赶走了。

苏斯洛夫：这是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赫鲁晓夫：我没有读过这个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写一封信，而是三封信。

米高扬：戴高乐应该会抱怨美国人。

赫鲁晓夫：一句话，应该这样呼吁：“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我们正在走向灾难，哪怕稍不留神中东就会爆发战争，而战争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就像风助火势一样成为世界战争。我们和你们(可以这样表达)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们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了解战争的，因为我们遭受过敌人的侵略，看到过敌人成堆的尸体，而这些敌人入侵我国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我们的战士和人民也经受了巨大的损失。

你们开始了侵略，现在你们想进行侵略，你们宣称这种侵略是地区性的，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他也认为他进行的是地区战争。他认为可以征服波兰，然后同样可以征服法国，接下来征服苏联。他就是这样做的，而这导致了世界战争，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我们都经历过这段历史，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我们没有权力忘记这段历史，因为我们采取的措施都会带来自身的后果。你们现在正在迈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这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写信给你们不是为了恐吓，因为你们做得已经足够了，首先美国不负责任的将军们关于这一点做的也已经足够了，比如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就毫无顾忌地说了许多。如果他是苏联公民，如果失去理智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按照我们的法律，他或

者已经被告上法庭，或者已经被送进疯人院了。

或者正如你们的一名部长麦克伦的发言。我们知道，你们拥有氢弹；我们知道，你们有空军和海军，但是我們也有这些。因此，现在我們不会加剧紧张的气氛，在许多军事文件中都充满了这种紧张气氛。我们应该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不能依靠挑起军事冲突的手段，这会給世界带来灾难，我们应该依靠理智，沉着，以便消弭战争，保障世界和平，保障不同国家和平共处。

当你们派出自己军队的时候，你们想怎样呢？你们宣称说，是黎巴嫩总统向你们请求援助。但是黎巴嫩议会什么也没有说，而议会主席表示了反对，黎巴嫩武装力量总司令也表达了反对。”

苏斯洛夫：人民被激怒了。

赫鲁晓夫：人民被激怒了。并且，对于黎巴嫩发生的事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就是外部入侵的事实。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黎巴嫩国内正在开展国内斗争，黎巴嫩人民被激怒了，并且不再支持他们的总统，秘书长先生也想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推行能够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

在约旦。麦克米伦说，是由于侯赛因国王的请求他们才空降了部队。

看起来，无论是黎巴嫩统治者，还是约旦统治者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他们害怕自己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不会支持不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体制，因此他们决定依靠外国干涉力量——美国和英国。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从历史可以知道，如果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行的政策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自己的武力牢固地掌握政权并结束灾难。何况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依靠外来武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如果约旦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统治者不能确信他们的人民将容忍他们，那么谁将管理这些国家呢？是这些外国干涉者吗？他们前来挽救这些统治者，并以此为幌子通过这些统治者管理这些国家。

这是殖民主义者过去推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全世界都知道，无论是

殖民主义者还是殖民地人民。因为这是长期的斗争，这不是和平，是正在结束的长期斗争，当然，对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对麦克米伦的呼吁应该这样说；何况，麦克米伦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仅仅在两年之前，正是在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他们的军队从那里被可耻地赶了出去，而现在侯赛因国王又请求这些军队回来。可以想象一下，当英国士兵出现在约旦的时候，会引起怎样的一种“热情”，因为他们是旧相识。这种愚蠢的解释掩盖了美国 and 英国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他们只是以被他们收买的卖国政府的请求为掩盖。

应该怎样解决呢？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撤出占领军和外国干涉武装，并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战争与否的危险时刻，应该召开主要大国会议，以便消弭战争，保障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保障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这样的会谈，并且越快越好，因为历史赋予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也可以通过理智的措施预防灾难的到来，而不是爆发战争，不是消灭无数的人们，不是毁灭创造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古迹。

在给你们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文件和呼吁信中我们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应该达成协议。当然，这种协议不会损害联合国，不会违背联合国宪章，协议也不应给近东和中东国家带来损失，相反，其目的应该是保障他们的独立并完全尊重他们的主权。

接下来谈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利用问题。

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进步力量说，他们不否认西方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希望西方国家对这些财富的利用要以商业利用为基础。这样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双方经济和相互联系的顺利发展，有助于消除紧张局势和建立全人类都需要的正常条件。

因此，如果你们同意，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这次或下一次会议是有益的，或许，当我们达成协议的时候，需要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决议提交到安理会，以便邀请这些国家来解决问题并消弭军事冲突。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同意各国之间达成协议，以便使中东和近东不再成为战争策源地，以便制止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

(或许他们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特别不需要重新输送武器。)

我们认为，总统先生，如您同意我们的意见，如果您觉得日内瓦或者中立国家的其他城市不合适，为了就举行会谈的日期和地点问题达成一致，为了进行会谈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愿意在华盛顿或者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进行会谈。

这将会是我们两国最高尚的行为。这将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事业最为伟大的贡献(以及其他富丽堂皇的辞藻)。

这将会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等等(用漂亮的语句)。

因此，总统先生，这场冲突怎么解决，事件怎么发展，问题能否解决，是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你的政府，取决于你个人，总统先生。

致以诚挚的敬意，等等(一些表达)。

致麦克米伦的信件也是这种风格。

致戴高乐信件的风格要有一些不同。

致尼赫鲁的信件要采取第四种风格。

对全世界工会的呼吁。也要简明地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的严峻时刻，是否允许世界动荡或者我们要保障和平等。然后说，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首先是谁。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先进力量创造着财富，保障着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将会付出最为重大的牺牲，因此，对于一些统治者滥用权力并准备世界战争，我们现在不能袖手旁观，这场战争会剥夺数千万人的生命。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个人、工会表现出一种责任感，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求自己的政府停止战争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召回占领军，不让他们今后准备和发动战争，而现在离他们发动战争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苏斯洛夫：这个不需要。

米高扬：是的，不需要。

柯西金：可以以青年的名义发出呼吁。

赫鲁晓夫：可以包括大学生组织和青年。

苏斯洛夫：可以以科学家和作家的名义发出呼吁。

伏罗希洛夫：妇女组织较有吸引力。

赫鲁晓夫：对。我认为我们的国际议会联盟应该包含进去。

我个人目前就谈这些。如果在2点钟之前做完这件事就好了，在1点50分之前做完更好。

柯西金：是否应该说出我们在中东的立场：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物质追求。

赫鲁晓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任何物质利益都不感兴趣。我们的利益只有一个，就是保障中东和平，保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不干涉，等等，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愿望。这是正确的。

这封信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不要乞求，而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信中应该说，我们发出呼吁是由于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们不希望通过战争解决这个问题。

米高扬：我觉得不要提及希特勒。应该说，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证明，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提到希特勒，那么会把艾森豪威尔气得发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波兰，我们也会受到责难。如果甚至连希特勒都不提，而只是说这种战争会带来什么，大家都会明白的。

赫鲁晓夫：为了折中一下，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米高扬：应该说，不要依靠粗暴的武力来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瑞典人已经证明，出动军队缺乏客观的理由。

苏斯洛夫：可以举出日本的声明。

米高扬：关于约旦应该强硬地说，所谓的请求只是不负责任、脱离了人民的国王一个人的请求。

赫鲁晓夫：这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派遣军队的一次行为就足够了，

而且这次行动没有联合国的领导。

米高扬：接下来应该说，你们经常宣称支持联合国，而你们的行为证明，这使联合国受到损害，因为在人民生活的关键时刻，英国和美国的军事行动打击了联合国。

赫鲁晓夫：国联就是这样消亡的。

米高扬：我不能确信，但是或许可以这样说。当英国军队撤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撤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出动军队的那些国家短期内就会撤军。

赫鲁晓夫：应该说，有一些联合国的检查员在他们的报告中说，关于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已经说过了，正如他们所说，这没有经过仔细审查，是从外面传来的。

米高扬：应该支持检查员，他们应该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的高层会议应该辅助安理会，并且有所有相关国家参加。

赫鲁晓夫：有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参加的高层会议。

米高扬：这一点我早上已经考虑过了。如果说，要这些国家参加会议，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我觉得，现在不要提出停止武器出售问题，因为阿拉伯人可能会抱怨。

赫鲁晓夫：我们谈的是撤军问题，为什么要谈论武器问题呢？谁也不会允许。

米高扬：关于对工会的呼吁信。我建议这样起草。因为美国工会最坏，因此对他们应该用像美国人自己说的另外一种语言来写，而对英国工会应当用工党成员的语言来写。用他们的表述向他们呼吁，以便使他们很难辩解。使用他们的语言，免得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对其他国家的工会按照常规的语言来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召开工会联合会中心委员会特别会议，这可以真正地揭露他们。

赫鲁晓夫：还要说，现在可以看出，这是武装干涉，这是为了集中

力量今后进行侵略。土耳其外交部长声明说，他不了解这个政府，这是一项恶劣的声明，应该引起警觉。然后，准备武装干涉伊拉克人民。

米高扬：对工会的呼吁信中应该说：请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东方民族想推翻腐朽的国王，而同时文明国家的军队采取的行动则相反。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为反对这种体制进行过斗争，而现在你们却成了宪兵。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在原则上这些都正确，但是我觉得，应当避免说我们不能保持中立，这带有恐吓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呼吁书中已经写过了。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他们将会认为，我们退却了。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再重复，那么就需要有所准备。我们声明说，不会中立，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干涉。

赫鲁晓夫：这不对。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他们希望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将会说：就让我们行动吧，俄国人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那么好吧，他们不会理会我们的声明，他们将会继续自己的政策，这意味着我们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参与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谈论宣战问题，而是谈论信件。我们应当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向你们请求什么，如果要吞并阿拉伯人，那么请看吧，他们会吞下什么苦果，而且会取得这种结果。但是信件最好不写这些。

米高扬：他们应当害怕。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多次重复这一点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重复，如果我们沉默的话，他们将会骑到我们的脖子上。

伏罗希洛夫：现在，因为我们采取的是警告措施，不需要把事情做

到底。我们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有机会说其他的话。

赫鲁晓夫：到那时候再说就晚了。

伏罗希洛夫：这不是外交语言。

赫鲁晓夫：你没有读那些材料。第六方面军总司令说了什么？

伏罗希洛夫：他威胁说，他有一切手段。

赫鲁晓夫：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恐吓我们。

伏罗希洛夫：但是我们不怕。

赫鲁晓夫：应该说出这一点。

米高扬：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我们走得很远，俄国人将会干涉，将会爆发世界战争；其他人和俄罗斯人都说，他们不希望战争，因此可以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难道我认为他们是品行高尚的人吗？我说我们现在不能把我们置于现在还不需要处于的那种位置。

苏斯洛夫：如果这封信中说得比那两个声明还要软弱，那么这会使我们自己蒙受耻辱。

赫鲁晓夫：他们现在还没有说，俄国人退却了。

苏斯洛夫：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再次驳斥他们的依据，即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公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致工会的呼吁信中要说这一点。这一点特别重要。看起来，所有的材料都要同时起草，正式的呼吁信今天发出，而其他的晚一天发出。

赫鲁晓夫：对工会、对青年人的呼吁信也可以明天发出，这些应该是简短的呼吁信。

库兹涅佐夫：关于致尼赫鲁的呼吁信，看起来，需要致力于使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反对这件事。

苏斯洛夫：不需要说出这一点。

赫鲁晓夫：我们把尼赫鲁变成了神的侍者尼古拉，不值得这样做。

应当说，这是一个大国。

柯西金：应当说，美国公民的安全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赫鲁晓夫：应当说，为保护公民进行武装干涉，而这个理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殖民主义者都以此来解释自己的武装干涉。

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我们是提议四个大国参加吗？

赫鲁晓夫：五个。

库兹涅佐夫：这么说也包括印度。

米高扬：关于向哈马尔舍尔德发送一封信件的决定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应该把所有这些信件都发给哈马尔舍尔德，请求他复印这些信件并分发给各国代表。

米高扬：此外要邀请他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是的。现在最为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信件送给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其余的信件稍晚一些，而这件事情现在就要做。需要把速记记录辨识出来，并立刻送给尤里·茹科夫和格里巴耶夫。我喜欢你们关于马尔金的文章，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逻辑性强，语言犀利，就像箭头一样。如果我们以查波罗什哥萨克的名义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信件由你们来起草就好了。

由谁替外交部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呢？我认为由尤里·茹科夫、格里巴耶夫和索尔塔托夫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好。就让这三个人来写吧。这是重要的文件。或许茹科夫同志确实到过法国，他了解法国。一句话，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写信，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

格里申同志写致工会的呼吁信，而苏斯洛夫和库西宁同志写致妇女、青年、作家、科学家的呼吁信。

同志们，就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受到委托的同志可以自由行动了。

有没有听说瑞典代表对索博列夫说了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瑞典人，他是一名国际官员。同志们，你们也可以这样，尽管没有翻译也可以读懂。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995, л.1-19

№1382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1958年7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24日会议第16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K.E.伏罗希洛夫、A.H.柯西金、O.B.库西宁、A.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M.A.苏斯洛夫；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朋友的会谈情况发自北京的1958年7月23日电报。 [16]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库西宁、柯西金)

给尤金同志起草的备忘录报告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

你们怎样才会同意呢？

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代就反对租赁。

关于米高扬同志就有过这样的失败。

我们赞成会面，但是，情况不允许。 [17]

如果不满意建议的话，我们希望听取你们的。

如果关于海军方面的请求仍然有效的話，那么，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个补偿性的建议。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我们愿意撤回，已经给你们写过信了。

让我们来减少他们的数量。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外交部方面——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9, л.43-43об

№218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1958年7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24日会议第168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尤金同志于1958年7月23日发自北京的第____号电报”。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С.赫鲁晓夫、К.Е.伏罗希洛夫、А.И.米高扬、В.В.库兹涅佐夫、О.В.库西宁、А.И.柯西金、М.А.苏斯洛夫和Д.С.巴塔尼斯基)

第168号第2项

1958年7月24日

绝密

兹责成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的备忘录草案，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228, л.1

№25080 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7月25日)

摘自В.М.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29日

第187号

机密

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孟英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25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

在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关于自己此次来访的目的，孟英说，他此次来是想就中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的。

孟英同志通报说，近日中国政府已正式同意向蒙古提供额外的援助，以作为对蒙古在去年8月份所提出请求的回应。当时，蒙古请求中国援建如下项目：几个灌溉设施，几座桥梁，1条从乌兰巴托至科布多市的总长为500公里的公路，2座电站和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住宅。蒙古政府已得到如下通知，应蒙古朋友的请求中国同意在近期帮助其建设：2座电站(1座位于乔巴山市，功率7000千瓦/时；1座位于纳来哈矿，功率12000千瓦/时)，以及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关于蒙古政府请求中国援建大规模的灌溉设施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完成了中蒙1956年协议所计划的灌溉工程后再行商议。孟英继续道，关于蒙古提出的援建公路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暂未做出同意的答复，只表示愿意为这条从乌兰巴托至科波多市的公路上的7座桥梁的建设提供贷款。对此，孟英指出，中国此次对蒙援助的金额已达到1亿卢布，并将采取有偿信贷的方式，而非蒙古政府所请求的那样——无偿贷款，贷款偿还期限为1961年之后的10—15年之内，年息1厘。

关于中国计划在多长期限内向蒙古提供上述援助的问题，孟英答：这将由一个即将来蒙古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将于今年8月来蒙古。从孟英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可以看出，中国对蒙古的上述1亿卢布援助的具体落实期限是在1958—1960年间。

我也向孟英通报了蒙古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年)期间帮助其建设各种工程的情况，其中涉及的苏联对蒙古援助总金额达到7亿卢布以上。与此同时，我问孟英，蒙古政府是否在自己1961—196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援助请求。对此，孟英作了否定的答复。

我问孟英，业已开始的中蒙边界勘定谈判的情况如何。

孟英说，前不久蒙古外交部向中国驻蒙古使馆发出了一份照会，其中建议在两国正式谈判开始前便基本解决边界问题，以便双方在谈判期间只需进一步明确个别细节问题。在该照会中蒙古外交部还表明了如下一个观点，即应已苏联1945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标注作为解决中蒙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而根据该地图，一些原本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如今却被中国占据。

我问孟英，中国地图是否与苏联1945年版地图上所标注的中蒙边界线有出入？

孟英同志答，这方面的差别是巨大的。因而在此次谈判期间必须把一些地方精确化。孟英还补充道，他个人认为，在解决蒙古和中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无法预见的严重困难。

我们这次会谈还简略地涉及中国内政和国际局势等问题。

孟英同志说，在经过反右和顺利进行了整风运动之后，中国的国内形势明显得以巩固。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有了巨大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顺利。预计今年中国的粮食和豆类作物的收成均将达到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5200亿斤。孟英接着强调，国家劳动者们正在积极奋斗，争取在最近15年内在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上不仅要赶超英国(这是最近数年内中国将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而且要在煤炭的采掘和钢的冶炼方面赶上美国。

..... [18]

АВПРФ, ф.0111, оп.40, д.5, пап.252, л.229-231

№09901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B.库兹涅佐夫

1958年7月25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经济形势

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

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

工业总产量与1957年相应的月份相比，增长情况如下：4月份是42%，5月份是46%，6月份(根据尚未公布的初步资料统计)是55%。

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谈时，中国领导人满有把握地声明说，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年度的最佳方案，而且将会大大地超额完成。

例如，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周恩来在评述中国急剧发展的经济形势时说，“我们甚至没有料到，我国人民能够这么快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取得了工业和农业飞速发展的如此巨大的成绩。目前，我们总是要不断地修改我们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跟不上人民本身所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在今年6月初与苏联驻上海总领事会谈时通报说，根据中国计划机关的统计数字，本年全国工业产品与1957年相比，其增长将不会少于40%(最佳方案拟定的是34%)；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6月27日对苏联大使馆参赞魏列夏金说，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增长量将达到45%。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领域也表现出了实际效果。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的报道，夏季收获的粮食作物总产量，正如收获进程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初步资料统计，今年将会达到4750万吨，比1957年多收获1750万吨，或者是58%。尤其是冬小麦的收获量将达到3200万吨，超过1957年的小麦收获量52.4%，或者是1100万吨。

粮食产量如此快速地提高，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并得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结果。自去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村大力开展了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在组织上对合作社的管理。

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中国灌溉面积的增加量是2830万公顷，比1949年前中国拥有的灌溉面积(1500万公顷)几乎增长了1倍。除此而外，还对1250万公顷的土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对1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土壤侵蚀进行了整治，收集了各种肥料3100亿担，或者是每亩地平均施肥9吨(主要是其他一些活性低的肥料)，植树造林1813.5万公顷。由于一些地区对90%或者是2/3的播种面积进行了品种更换，使用了改进的优良粮种，农民的劳动热情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大田播种工作在效率和期限上都好于今年。很多地方还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深耕、密植等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的通报，今年的复种率与1957年的139.5%相比是144.8%，等于播种面积扩大了5.3%，稻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650万公顷，玉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00万公顷，甘薯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扩大了450万公顷，棉花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5万多公顷。

中国领导人对于1958年农业领域的生产前景持乐观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会谈中，周恩来说，今年谷物总收成量将比去年多4000万—5000万吨，大约是22000万—23000万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基本上满足居民的需要，并能补充国库的粮食储备，近两年来国库储备粮极大地缩减了。

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在今年7月12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通报说，如果下半年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话，那么，这一年的粮食作物总收成量大约能够达到27000万—28000万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收成量(1962年)。

上述所列举的评定是初步推断的。国家北部地区粮食作物的收割工作还没有结束，以上所说的关于作物收成量的数据绝大部分是指尚未收割的庄稼。但是，毫无疑问，1958年粮食作物收成量的增长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一些生产合作社里，一些面积不大的试验田也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例如，在湖北省古仓县的一个生产合作社里，1.8亩(0.1

公顷)地就收获了41公担小麦，换算成公顷就是410公担。河南省西坪县“和平”合作社在2亩地里每亩收了36.6公担小麦。

使馆已经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了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的初步统计资料。

1958年上半年工业产品的总产值是433亿元，或者是半年度最佳计划的108%。半年之内完成了年度最佳计划的47%，而完成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会议批准的年度计划的58%。

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情况可用下表来说明：

产品种类	计量单位	半年内的生产	完成半年计划的%	是1957年上半年的%
电 能	十亿瓦/小时	12.2	104.2	128.8
煤	百万吨	84.1	108.9	145.8
铸 铁	百万吨	3.7	99.3	132.5
钢	百万吨	3.13	100.6	125.6
石 油	千 吨	868	105.4	132.4
水 泥	百万吨	4.2	104.3	125.4
金属切削机床	千 台	22.1	104	193.9
氮 肥	千 吨	527	105	164.9
木材(运出)	百万立方米	8.4	102.4	132.1
棉 布	十亿米	2.74	103.6	114.3
机制纸	千 吨	429	99.3	130.3

在上半年年度计划规定的35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完成了24种。计划中没有完成的产品有：铁、机车、拖拉机、气体发生器(煤气发生炉)、农业用水泵、机纺棉纱以及其他产品。

在这半年期间里，广泛地开展了开发新产品的工作。掌握了排水量为5000吨的海运货船、80吨的电力机车、无线电工业用的半导体晶体管的生产技术。生产出了700型初轧机、3种轻型轿车的试验产品，等等。

工业部门的技术经济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好转。工业产品的成本在最初5个月里，与1957年同期相比，平均降低了7.9%。

与此同时，上半年工业部门在一些原料和材料供应方面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铸铁、某些等级的有色金属轧材(尤其是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材料等供应不足。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基建投资计划的完成情况：

	上半年基建投资的 数额(10 亿元)	完成最佳年度 计划的百分比(%)	是 1957 年相应 时期的百分比(%)
全国	6.9	39.5	188
各部和各主管部门	4.3	35.2	148.1
各省和各城市	2.5	51.7	343.3

上半年全国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额相当于42亿元。上半年内62家超定额的企业全部或者是部分地投入了生产。此外，在过去半年内，有20多万个新的小型和中型的(绝大多数是小型的)地方管辖的(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企业)工业企业交付使用。在这些企业里，有2000多个小型炼炉，8000多个小煤矿和煤坑，5000多个生产水泥的小厂等等。

在过去的半年里，生产能力的增长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出来：

产品种类	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的增长
生 铁	千吨/年	428
钢	千吨/年	830
煤 炭	百万吨/年	4.4
石 油	千吨/年	255
电 力	万千瓦/小时	188
硫 酸	千吨/年	166
过磷酸钙肥料	千吨/年	200

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正在建设的各项目上的建筑安装工程的年度计划已经完成48.3%。上半年这些工程交付使用的有：洛阳滚珠轴承制造厂、西安润滑油冷凝器厂、株洲硬合金厂、哈尔滨电度表制造厂、石家庄抗生素制造厂、汉口肉类联合加工厂，等等。

上半年铺设铁路640公里，修复铁路线2749公里。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运输和河上运输工作情况有很大的改善。在半年时间里，铁路部门运输的货物量是16570万吨，是年度计划的47%，或者是1957年同时期的125.6%。河运货物量是1370万吨，是年度计划的46.3%，或者是1957年上半年的111.5%。铁路的运输成本降低了4.5%，河运成本降低了11.4%。

上半年，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在居民就业方面出现了令

人满意的趋势。临近1958年7月，在中国，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已经达到2620万人，也就是在半年时间里就业人数扩大了69万人。其中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数增加了99万人，建筑业29万人，林业和水利部门有24万人。与此同时，贸易部门的工作人员减少了50万人，国家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33万人。

中国同志讲述说，最近时期，在国内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无论是工业部门，还是农业部门都感觉到了劳动力不足。例如，最近在北京市就出现了招聘工作的广告，这种现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考虑到北京地区已经开始了40个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针对这种情况正在讨论关于吸收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59年国内工业工人的数量将会增长到300万人。各地将从农村中吸收劳动力，与此同时，在企业处于季节性休工阶段，或者是缺乏原料的时候，许多工人可以转而从事农业生产。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与1957年同期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内市场的状况，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也变得十分正常和稳定了。在6个月时间里，一批重要商品的零售额相当于237亿元(是1957年上半年的104.3%)，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是210亿元，生产工具的销售额是27亿元，或者相应的是1957年上半年的98%和207.7%。1958年上半年，国内8个大城市的零售价格指数与1957年上半年相比，下降了0.3%。

1958年上半年购买谷物77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04.7%。根据初步资料统计，在自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的采购年里，购买谷物是4570万吨，是年计划的107.9%。其中截至6月底，从1958年夏季谷物收获量中采购了470万吨，比1957年同时期谷物采购量扩大了73.9%。在自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里，棉花采购量是138.8万吨(是年度采购计划的108.8%)。

重要商品在半年内的销售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半年内销售量	与 1957 年上半年相比扩大(+)或减少(-)
粮食产品	百万吨	23.9	+2.2%
糖	千 吨	470	+9.6%
猪	百万头	14.3	+1.2%
食用植物油	千 吨	475	-18.8%
煤	百万吨	22.7	-8.3%
棉织物	百万米	2 020	-18.3%

国营和生产合作社贸易组织的剩余商品库存总值是228亿元，比1957年上半年多出45亿元。

在1958年上半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不仅超过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年平均速度，而且超过了1956年达到的最高指标(超出31%)。与此同时，如果说1956年只是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最高发展速度的话，那么，1958年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是与工业发展速度齐头并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与农业的方针)、提高各地方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在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所属工业企业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

中国同志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总路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的，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是前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在研究制定总路线过程中，吸取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所犯的、

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暂时下降方面的那些错误的教训。

还应该指出，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方针时承认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И.В.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曾经批评过对农业发展的问题重视不够，并采取了相应的旨在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对关于提高地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表举行会谈时，周恩来指出：“在解决国家新的经济区域划分以及在经济区域建立管理机构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苏联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

在过去半年里，尤其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拟定了对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进行改组的计划，规定在保持统一领导和计划发挥职能的条件下，发挥各地方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之后，这项计划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在八大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即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华东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华中经济区。这些经济区的分界线，基本上与原行政区域的分界线一致。

在每个经济区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分委员会)，其成员有各省党的委员会书记以及这些经济区所包括的各省的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每2—3个月将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该经济区内及所包括的各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委员会尤其要关注与协调经济计划和合作生产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使经济发展较强的地区帮助发展缓慢的地区的地区的问题。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目前，在各个经济区的委员会临时设立了常设办公厅，但是，今后将可能在这些地区设立固定的国家管理机关。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把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地方(首先是各省、市)的政府。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6月15日，大约80%(880多家)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一些机关)，首先是中央工业部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了各地方政府。转交给各地方政府的还有：所有的纺织工厂、大多数轻工企业

和造纸工业企业，大约70%的重型工业企业。与此同时，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参见我们的1958年6月26日的第233号信函)，所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大型企业以及国防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业，仍然由中央管辖。这样做是为了更顺利地推广民用企业(这里指的是非军工企业)的先进技术经验，确保更加严格地监督对国防工业国家机密的保密工作。

目前，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着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中，曾经计划在1962年生产出1050万—1200万吨钢、19000万—21000万吨煤、500万—600万吨石油、25000万吨粮食等。

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修改这些经济指标，使其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拟定了1962年新的计划指标如下：生产出2200万—2500万吨钢、38000万—42000万吨煤、800万—1000万吨石油、30000万吨粮食等。这些新的经济指标只是按工作程序提出了，还未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暂不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继续制定这些指标和研究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问题，并广泛吸收各地方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觉地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即不束缚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精神，并以不降低劳动人民群众的热情为出发点。

鉴于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里，各个经济区分别召开了经济协商会议，研究了在最近5年里扩大生产工业产品的前景问题，同时主要关注的是冶金工业、采矿工业(煤矿、铁矿和石油的开采)、机器制造工业、水利发电站的建设和铁路线的建设。

会议的总结文件表明，各地方制定的经济指标，不仅超越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指标，而且还超越了成都会议之后初步制定的那些指标。根据中国同志们的讲述，如果从数量上把在这些经济协商会议上提出的7个地区某些产品的生产指标加起来的话，那么，可以得出的结果是，1962年中国可以达到：熔炼钢12000万—14000万吨、开采煤矿10亿—12亿吨，开采石油是3800万吨。

应该指出，不能将上述这些数字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自然，在地区范围内这些指标是不可能协调一致的，更别说在全国范围内

了。

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

涉及到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具体工作，在中央各机关里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讨论和审批这些指标。

显然，在拟定于1958年下半年对这些任务进行讨论和审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制定出国内经济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但同时它将会考虑到经济依据和中国的物质技术潜力。显然，这些指标将高于成都会议之后制定的那些指标，但是，会低于通过总结7个经济区协商会议资料得出的那些数字。

中国同志认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是在各地广泛地建设小型和中型企业，尤其是冶金工业的大规模建设。例如，在国内建设了许多中、小型的炼钢炉。今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说，在最近的12个月里，国内将建成10000座小型和中型炼钢炉，容量3—255立方米，钢铁生产总量将达到2000万吨。

根据新华社6月20日的报道，在最近一年里，国内将建设200座产量0.5—12吨的酸性转炉炼钢炉，这些炼钢炉每年将生产出1000万吨钢。

在此应该指出，在大规模地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同时，中国朋友还继续加大力量致力于大型冶金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

今年已经开始了年总产量为120万吨的生产人造液体燃料的500座中小型工厂的建设工作。中国朋友们还对在上海和四川省发现的油田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上半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不能不提到，伴随这些成绩，国内还存在着某些相当严重的困难和缺点。首先是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一系列重要产品的原料和材料的不足。上述已经提到关于铁、某些轧材、钢板、滚珠轴承等的困难状况。目前在一些地区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十分缺乏。正如中国同志所说的那

样，金属供应的困难状况，对机械制造部门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现在这个部门仍然是中国工业部门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电力生产和铁路建设也落后于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中国同志感到，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170种商品中，有68种商品在供货方面有些困难，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国内对许多品种的原料需求量增长，还由于计划规定某些产品品种的生产没有得到实现。

为了克服现存的困难，中国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现缺货物的生产量，并在生产部门和居民个人需求方面制定了严厉的经济制度。上述所列举的关于今年缩减棉织物、食用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零售量的资料，也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在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近段时间内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其经济今后发展的前景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制定和彻底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促进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的急剧增长。工业部门顺利地完成了半年的最佳计划，有理由说，年度计划在大多数指标上将被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谷物夏季的丰收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计，如果不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话，谷物收获的年度计划将被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将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生产领域里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关于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这促使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

二、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开始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极大地缩短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状况所必需的期限，尤其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在15年内，在生产钢铁和其他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追赶上英国的口号，创造了条件。有理由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会实现这一口号，而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

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一系列与重要原料和材料缺乏、生产效率低下等方面有关的困难。其结果是，25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有11种上半年计划没有完成，或者是未全部完成。这证明了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困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鉴于这一点，中国同志加强了对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实行厉行节约以及在一

定程度上，在居民的个人需求方面采取限制措施等问题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第二季度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自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个新的形势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形成的，其特征是：在国内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团结党的队伍，加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中国共产党在其工作中新的创造能力的不断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自1957年9—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时起就开始了。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各部的其他领导成员都到各地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工作。尤其是毛泽东，他视察了10个省市，并在各地逗留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这段时期召开的两次党务会议：一次是今年1月份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十条”；另一次就是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大约300人参加，包括各省和市的党委书记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会上还就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之前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都反映在刘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该次会议召开之前还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审批了提交中央进行讨论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在会议听取的主要报告——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毛泽东以及其他人的发言中，也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祝贺会议闭幕的5月29日社论文章中，《人民日报》写道：本次会议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研究制定了党的总路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会议的另一个内容是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决议，会议完全拥护莫斯科的声明和宣言。会议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正

值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批评的时候。在就这两个问题交换意见并通过相应决议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报告和其他人的发言中，还特别关注到如下内容：对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局势的评价，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总结，在结束整风运动之际党的任务，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状况，党在思想和理论工作领域的任务以及各个部门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本次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继续执行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基本原则问题，并对其中内容作了一些修改。

除代表成员之外，本次会议还吸收了党的中央、各省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大约7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在与会代表极其高涨的热情下召开的。117人在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145人以书面形式递交了自己的发言稿。除此而外，代表和大会来宾还进行了分组会议。原来拟定的10天会议延长到19天。

在会议结束之际，报刊上发表了刘少奇和谭震林的报告以及就这两份报告所做的相应的决议，还发表了根据邓小平报告所做的决议。

《人民日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与会代表报告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各省、市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的发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受到一致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报告还对总路线进行了论证。在研究制定这条总路线和为贯彻执行它而进行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和核心的问题是：在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过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定义的党的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工作以及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的斗争，包括了自1955年底直到目前的整个一段时期，其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1955年底至1956年的5月份。由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正确认识到国内变化的形势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重新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制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的序言)。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开展了反对党内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这是存在于修改建设速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1月份提出了1956—1957年期间的农业发展前景计划，并在发展科学和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在1956年1月30日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在谈到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原因时，周恩来声明：“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它(指高涨)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在一切工作领域进行的与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右倾保守主义分子并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他们总是在压制这种积极性。”(参见《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

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着又在同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概括地勾画出目前总路线的这些重要方面，比如：工业和农业并举的方针，中央和地方直属工业企业并举的方针。

自1956年5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季。关于放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方针在这一阶段显露出来。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阶段被评定为“保守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某些同志”开始了所谓的“反冒进”的斗争。按照薄一波1958年6月6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那时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风”。接着薄一波补充说：“这不是12级台风，而是8—9级大风。”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迫于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富裕阶层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是部分和暂时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在谈到这一阶段时，毛泽东坦率地指出：“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这个阶段，我们降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当时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们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发生在农民群众中的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19]

在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错误观点，十分清楚地反映

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指出的那样：“这篇社论在当时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尽管在这篇社论文章中也谈到了与右倾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它的主要方向是反对‘冒进的’。”(参见阿尔希波夫同志与薄一波1958年3月3日的会谈)文章中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涉及农业的状况和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文章写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福利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社论还非常激烈地攻击了当时在农村中实施的扫除文盲的措施，仿佛这些措施加剧了原本并不“严重的状况”。

社论继续写道，在工业生产部门“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目前，这是在与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中的主要口号之一)，“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

社论文章断言，“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文章继续写道：“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文章在指出“不应该绝对化地、单方面地考虑‘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同时，号召与“冒进”这种主要的危险进行斗争。

1956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时正值匈牙利事件之后。这次会议丝毫未提关于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经济领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问题上。自然应该指出，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保守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当时国内也存在着一些经济方面的客观困难。关于这些困难情况大使馆在自己的信函中已经做过通报。

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在与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占了上风。自1957年夏季至1958年5月这个阶段，是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和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被粉碎，消除了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和制定总路线的工作得以继续，总路线在党内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这引起了国内经济新的增长，并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南宁、成都会议上制定的那些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严厉批判了旨在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倾观点。全会指出，1956年国内出现的是经济急剧增长，而并不是“冒进”。全会彻底恢复了在“多、快、好、省”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各省市党的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以及党的成都和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具体实现经济建设方针的新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对右倾和保守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和激烈的批判。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总路线做了论证，他指出：“每一个党员必须与老百姓同心同德，中国老百姓现在最想往前进，尽快摆脱贫困，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尽快将中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总路线就是来自这条群众路线，来自群众的愿望。其目的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这种形式来给总路线下定义，使人民可以理解，总路线应该鼓舞我们的群众并推举出更多的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先锋战士。”

在强调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进行的所谓的“反冒进”斗争的不正确

性时，刘少奇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了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并说，“反冒进”的斗争导致了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的放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与我们会谈时也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如果用数字来表示中国近3年来工业产品的增长情况，得出的结果就是：1956年工业产品的增长额是31%，1957年是11%，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4%，而实际上将会达到50%。

在基本建设领域，1956年资金投入的增长额是62%，1957年是10%，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9%，而实际上将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如果说到农业，那么，1956年农业产品的增长额是4.9%，1957年是3.5%，而1958年预计是21%。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灌溉土地11000万亩，1956年冬季和1957年春季仅灌溉土地4000万亩，而今年灌溉土地是40000万亩。在这段时期内，收集的肥料依次是：500亿担、400亿担和3100亿担。重种的指数：1956年是142%、1957年是139%，今年是144.8%。1957年谷物的播种面积与1956年相比缩减了5500万亩，而今年仅大米、番薯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就扩大了2亿亩。

1956年谷类作物的总产量与1955年相比增长了150亿斤，而1957年与1956年相比仅增长了50亿斤。今年，仅夏季作物(也就是在夏季收获的作物)的总产量就增长了350亿斤，也就是比1955年总产量和1956年的加在一起还几乎要多1倍。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不仅是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而且还有各省与会众多代表的发言，都对去年所犯的右倾错误和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党委书记张仲良指出，1955—1956年期间与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甘肃省进行得并不彻底，已经到了1956年5月份，右倾观点“再次露头”。他承认说，“许多同志对右倾思想做过让步，这些让步立即被党内的右派分子所利用”。在生产中出现了衰退：例如，省内的水利工程计划，在没有任何重大理由的情况下，从300万亩降低到135万亩，不但如此，就是这个已经被降低了的计划，最后也只完成了75%。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内，正活动着一

个反党右派集团，只是到了1957年底这个集团才被揭露并被粉碎。张仲良所说的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组织里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仿佛只有‘冒进’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落后于实际的，就不会被认为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说，对一切事物只是看到‘左’倾而没有发现右倾。”（《人民日报》1958年6月13日）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叶飞认为，“1956年下半年，与‘冒进’进行斗争的‘理论’对我们影响很大，其结果是干部的积极性受到压制，给工作造成了损失”。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进行的复杂斗争”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课”。这种与“冒进”的斗争，对干部的危害性极大，它使某些干部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以最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这些干部问道：“1956年下半年由于这种热情受到了批评，1958年下半年不会再由于这一点而受到批评吧？”

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再次重申，在目前经济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限制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主动精神，或者如毛泽东所表达的那样，“当头浇一盆冷水”，以便不降低人民的政治和劳动热情，这只能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产生不良的影响。

与最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并列的，还有以下两点，这也是党的总路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在集中领导、全面计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直属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无论如何要建成重工业的口号，在另一方面已经做过修改，即建设重工业应该与农业的快速增长一起实现。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近年来苏联在加速农业发展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农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就不会确保重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论证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必要性的原则时，中国朋友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根本原则密切相连的。按照薄一波的话说，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所有讲话内容。

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重申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执行一条群众路线，我们党一直赋予农民阶级以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问题——这是我们党整个国内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在中国数百万的农民阶级和数量很少的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和友谊十分薄弱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前进，革命事业就会失败。我们有一些同志已经参加党十几年了，至今仍不明白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他们至今仍然认为只有在城市与工人的工作是重要的。应该与有这种情绪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情绪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

中国农业部长廖鲁言就会议总结情况与我们进行会谈时指出，巩固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强调说，在农村生活着5.4亿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5%。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农业。中国工业从农业从获取80%以上它所需要的原料，70%以上的轻工产品是在农村销售的，2/3以上的出口货物出自于农业部门。农村应该成为正在发展的重工业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必要性问题没有反对意见。会上还讨论了关于这种同时发展能否实现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论。例如，一些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首先应该发展工业，以便使它得到机器、化肥等。而另外一种意见确定说，为了发展工业首先需要发展农业，以便使工业获得积累和原料。这两种观点支持者的意见可归结为：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是不可能的。在会上，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受到了批判和谴责。

能够证明中国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针的正确性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本报告在上面关于经济一节中所阐述的中国今年在农业发展中取得的那些巨大成绩。

中国同志确定说，中国要实现农业发展规划中的那些基本规定，不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如同以前所计划的那样，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或者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出更长时间的计划，并提出在15年内在单位面积收获量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在代表大会上，对于同时发展中央所属和地方所属工业企业的方针

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业已形成的中央优先管理工业的方法，目前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些方法限制了地方的主动精神。有鉴于此，会议认为，将中央直属企业的70%以上交由省市管理是合适的，这些企业的生产量占全国总生产量的80%以上，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会议的这个决定目前已经被执行。会议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建设关注不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适宜的是：在继续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在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条件下，利用地方的力量，加大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力度。

从上面关于经济形势一节中列举的资料可以清楚，拟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工业产品重要品种的增长量占很大份额，将通过在具备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所有地方，建设中型特别是小型企业这个途径来实现。正如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所说的那样（《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刊登的文章），毛泽东曾经指出，应该把现有一切力量（指的是人力、财产和物力资源）的30%—40%用于发展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上，而60%—70%用于地方工业的发展上。^[20]按照张霖之的话说，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全国的建设中，必须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中、小型企业为重点；而各地方应该以中型企业为骨干，以小型企业为重点”。

毫无疑问，能够大规模地建设中型，主要是小型工业企业网的决定性经济因素，是各地方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应的自然资源。因此，本阶段在经济上对国家有利的做法是：吸收各地方的一切资金，发展地方工业包括重工业的建设，没有必要强行建设大批的城市新型工业，这样会大大增加工资以及其他支出（在小型工业企业里，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农民的收入，也就是比中央直属大型企业里的工人工资少一半或者是少一半以上）。

正如薄一波在与我们会谈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抱定的宗旨是：“抛掉那个神秘的概念，即只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大城市的技术专家们，才能发展工业，推动技术向前发展。要广泛地吸引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构，吸收全国人民参加工业建设的事业。”

快速发展中国地方工业的方针，有助于明确和利用一切新的资源及潜力，加快经济建设，毫无疑问，这一方针在顺利实现党的总路线事业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党的总路线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自目前开始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的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是与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经济建设庞大计划这一具体任务密切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历史任务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即在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将一切力量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应该是中国不断进行革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对技术革命的基本任务作了表述，即考虑到中国本身具备的特殊条件，整个国民经济向新的技术基础过渡，包括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实现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便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里，赶上和超过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实现技术革命所必需的文化革命领域里，提出了以下任务：扫除文盲，普及初级教育，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众多新型知识分子干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创造或者是完善少数民族文字，弘扬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

报告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成为群众性的、全民运动的时候，这种革命才能够顺利地实现。各处的农民自己改进农具，利用国家大量资金开办学校，等等，这种现象被看作是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运动的开始。

涉及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那么，它的第一个口号，正如毛泽东所明确的那样(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扔掉扁担和草筐，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工具”。同时，他还详细解释说，农村技术革命应该从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最简单的机械开始，以便使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根据报刊援引的资料，目前在农村，40%以下的劳动是靠农民的肩膀完成的，30%是靠双手，而只有30%是利用了最原始的农机具和牲畜。自春季在农村开始的“大规模机械化”运动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经改进后的简单工具，其中许多样品还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展览会上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展览会上展出，以便推广。

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国已经改进和发明了各种农用工具至少有

5万多种，用于耕地、灌溉和土壤改良，加工农产品，等等，几千万件这样的工具已经在全国各地区使用。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专门的命令，号召在农村立即大规模地开展推广今年改进的农具的运动，把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原来的2—3倍。

在农业领域实现简单机械化的同时，半年时间里已经制造出许多较复杂的农用机器。在辽阳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完工之前，将在今年生产出几万台各种型号的、功率从4—40马力的拖拉机。仅上海农机厂一家就计划从今年的3月到年底，生产出一万台功率为4—27马力的通用拖拉机。

中国同志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小型机械化”还不能解决技术革命的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在发展现代技术的同时，使用尽管是经过改进的，但实质上仍是很原始的农具，这是矛盾的现象，应该通过用现代技术取代原始机械的途径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还强调指出，目前不应该将赌注只押在现代最新的技术上，虽然技术革命规定国家的整个经济向现代大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基础过渡。《人民日报》今年6月3日写道：我们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是“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

还采取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措施，如：扫除文盲，通过利用国家资金开办学校的途径普及初级教育，等等。这些措施被看作为实现文化革命的开始。

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消灭文盲。解放后，大约有3000万人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但是，扫盲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和不平衡。目前，在农村仍然有大约1.5亿年龄在14—40岁的不识字的农民。从目前的扫盲速度来看(每年大约300万人)，需要大约50年时间才能结束这项工作。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到去年年底大约有40%的学龄儿童，也就是有500多万人没有可能到学校读书。目前已经作出决定：在5年时间里消灭中国的文盲现象。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按最慎重的考虑，也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才能够消灭文盲现象，在青年中——需要3年时间完成。提出的任务是：从今年开始，要达到每年有3000万—4000万人消除自己的文盲现象，也就是将扫盲工作的速度提

高到原来的10—11倍。

目前，在中国的32个省和大城市里，有大约8100万人在学习文化。根据不完全统计统计，在黑龙江省和国内其他省的222个县里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现象。这样一来，扫盲运动就变成了普及到数百万人的群众性运动。在上海有80%以上的不识字工人参加了扫盲短训班。与1949年相比，上海不识字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已经从53%下降到13%。扫盲工作的速度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可以认为，成年人的扫盲计划在5年之内能够完成。在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和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是，依靠民用资金在最短的时间里——从今年1月份开始，在农业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其他学校。

在这个运动中特别强调的是普及初级教育。根据报刊的报道，临近今年的6月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个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省、江西省和黑龙江省)内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普及初级教育。

自今年的2—5月份，国内已经建立了60000所学校，300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除此而外，在最近2个月成立了130所地方高等学校。在一些县甚至是乡里，办起了多种多样的民办“学院”和“综合大学”。毫无疑问，各地方以民用资金建立的各种院校，从水平上来说是无法与正规院校相比的，他们的很多条件是非常原始的，但是，这种以群众为基础，利用现有的条件，快速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创举，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虽然有一些夸张的和不现实的设想(例如，在上述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的计划中，在15年之内普及高等教育)，但这并不能掩盖在现阶段国民教育的发展中已经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就在一两年内，还有数百万名儿童无法上学，而大多数小学毕业的学生不能继续受教育。

在宣传技术和文化革命任务时，还特别强调必须发挥群众——劳动者在工业、农业和知识领域里的创造精神，全面奖励发明创造和革新成就。有鉴于此，在报刊上，对于部分知识分子在外国科学技术面前奴颜婢膝的崇拜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一切科学技术的迷信态度，展开了批判。

《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科学并不神秘》(1956年5月22日 [21])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农民在改进农具运动中大量的发明创造，并列举了许多例子表明：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不应该像对待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那样对待科学技术。《中

国青年报》在尖锐地批判目前存在的对外国科学技术奴颜婢膝的崇拜现象时，写道：“我们有些人总是顽固地坚持那种迷信的观点，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无法与美国人、英国人，总之是所有外国人并驾齐驱。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是不应该思考外国书本上没有说过的那些内容，不应该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仅能够做外国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还能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报纸援引了苏联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这一领域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报纸还列举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例子。

为实施已经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新的“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对自1952年以来实行的税收制度做了重要的变更。根据新条例的规定，11种税收中的7种——印花税、利息税、牲畜屠宰税、城市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文化娱乐设施税和交通工具占有税——转归地方行政当局管辖，上述税收的一切所得均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允许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自己的税收规章，并确定本地区的特种税以及免税或者是降低税收的一切规定。4种主要的税收——商品流通税、商品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仍由中央直接管辖，但是，这些税收的部分所得将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同时，地方行政机关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对这些主要税的征收规则进行某些修改（例如，在农业税率方面）。

新的税收制度，规定了更加灵活的使用税收的办法，在经济活动中可利用它作为限制（例如，扩大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和奖励（例如，免除或降低生产试验产品企业的税收，等等）的手段。

根据新的税收规定，自治区有权自己制定税收规则，并报请国务院审批。

把通过这个新的税收规定称为“中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写道，对于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以便使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次改革是必需的。

正是以此为基础，今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新的农业税收法令，这个法令是国务院自1956年起研究制定的。这个法令完完全全是以发展农业和继续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物质基础为目的的。此外，该

法令还反映了继续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更灵活地把国家、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三方利益结合起来。

新法令规定自1958年起，在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的额度不变。规定1958年的税额较1957年提高4.6%，大体上说，也就是全国农民将向国家交付的税金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略高一些。规定全国农业税的平均数额为年收成的15.5%，而具体的税率每年将由各省确定（在某些条件下，由各县参考省的规定来制定），各地区根据当地条件制定的税率不等，但是不应该超过该地区当年收成的25%。每年从合作社到省来完成对收获量的确定工作。地方行政机关制定的农业税以及所获的税款均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制定预算时国家农业税收额平均应为15%，但是不能超过30%（在富裕地区）。

与前几年不同的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合作化，农业税的征收将不再取自农户，而是合作社的集体收入中以及合作社成员宅院旁自留地的私人收入中。法令还规定，对于个体农民，根据他们的经营状况，将他们的税额在本地区合作社成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10%—50%。

法令规定，由于平均税额在5年期间保持不变，农产品在这一时期增长量的主要份额就应该集中在合作社集体基金上，而仅有一小部分分配在劳动日上。根据计算，按每年农产品增长量为10%，5年就会增长到60%，而农业税在农产品总值中占的比重就将由1957年的11.3%，缩减到1962年的7%。这样一来，农产品5年期间的增长量就将基本上留在农业部门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占农产品总值的比重1952年是13.2%，1957年降低到11.3%。与此同时，在1958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给农业和水利部门的拨款增加了41%，大约相当于国家预算中农业税收的总数（大约30亿元）。

农业税法规定各省，在某些地区是各县，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出不同的税率，这可以比以前更正确地分配税收负担，可以更加灵活地实施扩大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收入的措施。谈到这个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毫无理由的担心，这些同志认为扩大地方行政当局在确定农业税额和使用农业收入方面的权利，可能会分散资金，导致财政收支平衡遭到破坏。根据报纸的观点，以前的实践对发挥地方的主动精神和生产的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作为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个事实：今年，中央拨给了湖北省12000万元用于基本建设，而地方政府却为此目的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到了

28000万元。

至于担心合作社会将产品增长收入的大部分份额分配到劳动日上，那么，各省党委员会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已经严格规定：今年基本上不扩大合作社成员的个人收入，从扩大生产中所获得的一切资金，全部集中到合作社集体基金中。

在这个计划中，为实现地方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另一个措施，是不久前国务院做出的决定：停止发行全国公债，自1959年起将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利交给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这一决议的详细解释(《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目前，各省严重缺乏用于加快实现农业和地方工业发展计划的资金，但是，他们能够比中央更灵活地动员居民手中现有的资金。在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规则中特别指出：这种新的发行公债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是，如果这些公债的发行将与本省居民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将从居民手中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本地区的建设中，那么，这些公债的作用将会被大大地提高。将会发行较短期限(几年取代以前的10年)和较少利息(年利息2%取代以前的4%)的地方公债。显然，在国家预算中，下一年度给各省的拨款也将会相应地缩减。今年，与发行国家公债的同时，各地方已经发行了自己本地区的公债，清偿方法是几年之后用从地方工业企业中获取的利润。

对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总结进行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指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有兄弟党应该“与一切可能给团结和统一造成损失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有鉴于此，在第二次会议上制定了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会议重申，“应该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此不可能有任何让步”，“决不允许这场斗争中途停止”。中国同志还强调说，他们打算利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面例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全国的共产党员。在此，我们认为必须关注以下几点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目前对南斯拉夫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立场，无疑是中国朋友更好地理解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重大

意义的结果，这不仅有利于共同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阴谋，而且有助于本国实现宏大的经济计划。主要由于两个因素使中国朋友更加加深了这种理解——外部因素是：苏联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内部因素是：克服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危险性估计不足的错误，这种危险曾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到1957年春夏反革命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言论时。

在本报告对外政策一节中，对中国朋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正如大使馆已经通报过的那样，进行反对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斗争结果是，在全国揭露出30多万名右派分子，其中党内有1.8万多人。在13个省和自治区(浙江省、甘肃省、安徽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山东省和吉林省等)党的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层中，揭露出一批右倾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分子。

同右派分子斗争的经验，反映在刘少奇报告中，就是明确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强调了资产阶级目前仍然是剥削阶级以及报告中还明确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对反右的总结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同时他还号召全党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他指出：“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分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

揭露出右派分子之后，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分地对所有人都进行严厉的惩处，像一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他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分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

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在党内和人民之中加强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
问题，特别是关于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理论杂志《红旗》的
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前出版的几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
中刊登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著名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陆定一、陈伯
达、王稼祥等人)。根据代表大会的规定，理论杂志在中国其他的一些省
市里已经开始出版。

目前，党组织内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各级党组织对本次运动进行了总结，解决了一些人事上的
问题。

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加强中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力量。显
然，这个措施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继续提高党中央和各地方党的委员会领
导作用的指示实施的(《六十条》中的一条)。毛泽东指出：“在中央和各
地方，主要权力属于党中央和各地党的委员会。一切国家部门和社会组
织都应该在他们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会议补充选举了25名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主要是各省党委书记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在第二
次会议之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副主
席，选举以下人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中央委员、中央华东局书
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井泉(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
谭震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补充选
举在国务院里主管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李富春和李先念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处成员。任命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然是与加强中共领导对军事工
作问题的关注这一任务相关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参见毛泽东的
《六十条》)，中央很少帮助国防部。一部分由于地方主义和右倾错误受
到公开批评的人，仍像从前一样留在中央里。古大存和冯白驹，来自中
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他们被免除了省党委书记的职务，但保留着省人民
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潘复生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
职务。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没有出现右派分子(由于2名中央委员
——黄敬和赖若愚逝世，2名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1957年6月，中
国共产党广西区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由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被免
除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除上述所列出的人员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人事变动。

第二次会议一结束，党内和居民各阶层中，立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

宣传和对其决议的解释工作。在最初一些日子里，各企业、机关、高等院校和农业合作社，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大会，地方领导干部和二次会议的参加者作了报告，并通报了二次会议的总结情况。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对会议材料组织了系统的学习。

引人注意的是，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广泛，总路线的主要规章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在对会议材料进行宣传的同时，党的各级组织还为执行会议决议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争取粮食丰收和建设地方工业企业上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措施

在说明最近时期自己的对外政策措施时，中国同志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完成以下五个主要任务：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强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岸信介的政策，并制定更加强硬的对日方针；积极帮助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参见我们1958年6月7日的电报消息：关于陈毅同志对苏联专家的讲话)。对最近事件的分析表明：中方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正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样，中国同志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在最近几年里，为使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努力，他们也竭尽全力地发展与南斯拉夫人多方面的友好关系，但是，在必要的场合下，他们仍然对南斯拉夫人的错误观点提出原则性的批评。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南斯拉夫人没有能力尽快克服自己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甚至在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发表讲话之后，中国朋友仍然是比较有分寸地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时，中国朋友们还亲口说，在那个时期他们没有展开更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行动，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内正忙于进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

和反苏联的文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南斯拉夫人发表类似文件的事实，评定为铁托厚颜无耻的、挑拨性的举动，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兄弟党的敌意性攻击。

对于苏共中央给予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刻表示完全地、无条件地拥护，并坚决支持苏共中央关于拒绝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赞同必须从根本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开展坚决的、彻底的批判。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集中地表现出了这种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同志在此的根据是：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这个纲领，并不仅仅局限于将自己与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和一致拥护莫斯科宣言的兄弟党对立起来，而且还走得更远：他们广泛地宣传修正主义，不知羞耻地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这种评价，最初是发表在5月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而在5月4日庆祝卡尔·马克思诞辰140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自己的报告中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只是以口头的形式)，这次纪念大会还邀请了外交使团参加。《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和杨献珍的报告正好被安排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开幕之时，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做出的那些结论和评价，这是在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分析之后所得出的。以这两份演说稿开始，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党内以及在自己的整个政治和宣传工作系统内，中国朋友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在邓小平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在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案中，在对该决议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布的中国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中，到处都是以最坚决的方式，将南共联盟的纲领评定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以及上面还有南斯拉夫人亲笔签字的和平宣言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朋友的所有发言中，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被认为是自己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案，表示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声明和和平宣言，使现代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严厉的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彻底地揭露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

修正主义实质。会议一致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与全体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

根据党领导人确定的并经第二次会议一致赞同的路线，中国报界对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批判。除了评论和指责南斯拉夫人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当代国际形势的评价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以外，在自己的发言中，中国朋友还强调指出，南共联盟领导人站到了与全世界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的立场上，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观点与伯恩斯坦、考茨基及其同类以及当代右翼社会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南斯拉夫人“在理论上的”论断，被评定为鼓吹向资产阶级投降。中国同志的许多发言稿依据真实的材料，极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南斯拉夫人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完整体系，其目的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还坚定地重申，南斯拉夫领导集团进行类似徒劳的尝试，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时候，正是右翼社会党人丧失活动能力的时候，正是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中间被日益削弱的时候。中国同志指出，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给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报刊上，中国同志经常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特殊的分裂作用，因为它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对于南斯拉夫人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权主义”这种诽谤性的蛊惑宣传，中国同志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时他们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家团结一致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中国同志非常明白，他们最合适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他们的见解是最具权威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们比其他许多兄弟党更尖锐、更严厉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合适的。其中有一系列的原因。还是在1957年时，刘少奇同志就对我们的大使说过，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们中国同志的手脚更自由一些，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共产党情报局，因此，南斯拉夫人无法将过去情报局在对待南斯拉夫方面所犯的一些错误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当时刘少奇同志还声明说，鉴于这个原因，

中国朋友能够比苏联同志更坦率、更严厉地反对南斯拉夫人。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中国同志都对我们表达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同志认为，必须明确地、坦率地表达出对于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评的态度：承认1949年决议的错误性质以及“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论文章强调指出，1948年决议中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同志向自己的人民详细地、系统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其出发点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右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分子和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得以出现和活动的极其广阔的社会基础。1957年开展的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还在继续。数百万不久以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可能会以某种新的方式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思想自然会在这些人之中找到良好的生存土壤。思想水平低下和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决定了一部分干部立场的不坚定。因此，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中央应该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应该用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以准备对付任何意外情况，包括当党的队伍里出现异己分子和分裂分子时的这种精神，来教育党和人民。考虑到这些意见，必须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断的和系统的斗争。

《人民日报》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了几篇带有指导性的文章。其他一些大型刊物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如陈伯达、王稼祥、康生等人，都发表了言辞尖锐、富于原则性和论据充分的文章。应该指出，自杨献珍的发言和《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论文章起，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中国朋友已经早于其他兄弟党，开始使用严厉的词句和坦率的评价。同在其他文章中一样，在王稼祥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策证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腐化堕落和背叛”。中国报刊利用大量的版面报道了美国援助南斯拉夫及向南斯拉夫灌输“美国生活方式”的事实。同时在这些文章中还做出结论：美国人以这两种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施加的影响，引起了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意识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

在《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陈伯达题为《美帝国主义寄希望于南斯拉夫》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用语。在文章里，铁托被称作是

美国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被比作犹大，而与那个犹大的区别仅仅在于：“犹大只是背叛了耶稣一个人，而铁托现在已经背叛了全体南斯拉夫人民。”根据文章中援引的数据，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铁托已经获得了大约30亿美元。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人利用铁托的双手，已经成功地使南斯拉夫丧失了自己的独立。”

在公布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之后，中国同志在与我们会谈时多次指出，必须仔细研究现在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是不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型国家。关于现在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问题，在公开的报刊中还没有出现详细的说明，但是，有一些理由可以断定，党内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论题已经在报刊上出现，其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的文章中(今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南斯拉夫被归入那一类国家，即它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指出，在中国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刊登一些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中国报刊还以比苏联报刊更大的篇幅，刊登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就此问题发表的言论。在自己的文章中，中国同志坚持不懈地批判南斯拉夫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首先是在涉及社会主义阵营问题上的种种表现。鉴于对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审判，《人民日报》除了社论文章外，还发表了本报通讯员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为《从纳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十分详细、尖锐地评定了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事件、在准备这些事件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南斯拉夫人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联系。

中国朋友坦率的、富于原则性的、尖锐的批判，对南斯拉夫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始料不及的，这引起了他们不小的惊慌和气愤。正如中国同志几乎在自己的每一次发言中都指出的那样，现在，南斯拉夫人还不能回答在目前的论战过程中向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中国人还强调说，南斯拉夫人不敢在自己国家发表那些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的文章，如铁托在拉比纳发表的讲话，并公开出售带有南共联盟纲领的小册子。由于中国人的发言在南斯拉夫国内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共联盟领导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并在这方面竭力煽动反华宣传，以便降低和削弱中国立场的影响力。由于无法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历史在人民中间煽起民族主义的仇恨，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决定捏造关于中国及其政策的荒谬的谎言。

在南斯拉夫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驻华南斯拉夫记者和其他作者写的关于中国局势黑暗面的报道，这些文章具有极大的敌意和偏见。作为对此补充的是，他们还编造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困难以及中国依赖于苏联贷款的居心险恶的谣言，据他们说，这是中国人在开展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政策的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原因。铁托在拉比纳发表讲话时，还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他模仿美国一家最反动的报刊，提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指控，说中国是站在“西方那些最反动的挑拨分子的立场上”。

铁托及其报刊的类似反华言论，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他们满怀愤怒仍像从前一样注视着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正如上述已经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在国内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力求揭露它的真正实质和它在理论上的站不住脚，谴责修正主义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同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更好地锻炼党和非党干部。无论是在制定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材料的计划时，还是在进行群众性政治教育工作中，他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从与中国党务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目前到处都在积极热烈地讨论着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例如，在天津医学院里，人们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和漫画，尖锐地嘲讽和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一些会议上，人们还建议组织反南斯拉夫的示威游行活动。

《人民日报》关于铁托在拉比纳讲话的社论和这次讲话的全文发表之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主要报刊开始刊登读者来信，对铁托恶意诽谤苏联、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和憎恨。例如，《人民日报》刊登了由北京的12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14名江苏的农民、28名沈阳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飞行员、北京外贸学院的大学生、龙岩矿场的6名工人、清华大学271名学生集体写来的信件。读者表示令他们最气愤的是，铁托将中国人比作西方最反动的挑拨分子以及指责中国人企图用批判南斯拉夫来解决国内的困难。这些信件写道，铁托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与杜勒斯将中国称为“侵略者”的诽谤是一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信的标题，如“我们看清了叛徒的嘴脸”、“我们绝不允许毒蛇的伤害”、“大毒草”、“考茨基的叛徒嘴脸”、“奴才与伟人”等等。铁托千方百计地利用关于干涉南斯拉夫事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攻击等类似断言，在南斯拉夫人民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制造纠纷，读者在揭露铁托的这些险恶用心的同时，表示赞成与南斯拉夫人民的友谊。

例如，《人民日报》今年7月2日发表了一封由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写来的信，其中表示：“我们可以对南斯拉夫人民说：在你们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在涉及到南斯拉夫领导人今后的方针政策时，中国同志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一些报刊上，都反复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人还不敢彻底地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因为他们很难欺骗本国人民，误导世界舆论，获得美国的“援助”。因此，中国同志认为，在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表现出过多的谨慎。今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于担心铁托分子投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们的揭露，这是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益处的。《人民日报》指出，铁托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中立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挡箭牌；同时该报还强调说，铁托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立场，完全不是由于谁怂恿他这样做。

中国朋友多次表示这样一种想法，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势必会进行很长一个时期。在他们看来，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将这场批判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在与C.Φ.安东诺夫同志就这个问题会谈时指出：“即使南斯拉夫人仍然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也是没有白白进行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有利于兄弟共产党，最终，也将会有利于南共联盟内部的健康力量。”

中国同志在坚决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同时，强调指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如果回到1954年以前存在的那种论点，是不正确的。今年6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断绝邦交。”在评价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前景时，《人民日报》继续写道：“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己以及别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一样，中国同志也经常指明，在南斯拉夫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实际上，目前中南在国家关系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

对中国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立场感到极度不安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决定委托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前任驻华大使B.波波维奇，试图向中国同志施加一些影响。在贝尔格莱德被任命了新职务的波波维奇，6月份来到北京，其借口是：他应该与中国当局和外交使团进行告别。完全

清楚，波波维奇受命试图与中国朋友弄清楚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的性质，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这种途径达到缓和这些言论的语气。也可能，南斯拉夫人还想观察一下，是否能够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找到一些分歧。但是，波波维奇没能够会见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接受波波维奇的辞别性拜会。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席外交使团及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告别宴会。在自己最后一次的北京之行中，波波维奇只与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期间波波维奇建议自己在中国多逗留半年，“如果这对改善中南关系事业有好处的话”。对于波波维奇的这个试探，中国同志没有做出反应。南斯拉夫人利用这些事情，指责中国破坏了最起码的礼仪规范，故意恶化中南之间的关系。

根据中国朋友的信息通报，在最近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出现之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企图在中国进行修正主义宣传活动。中国领导人在与大使同志会谈时，还指出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与许多居住在中国各地区的右倾分子通信的事实。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还特别积极地向中国各机关、企业、高等院校和某些个人，直接发送翻译成中文的南斯拉夫宣传材料。南斯拉夫人在发送这些材料时，甚至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征求农村的区党委会和某些省的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在中国朋友全力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之前，南斯拉夫外交官员曾千方百计地进行口头宣传，竭尽全力给苏联的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抹黑。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外交官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了，以至最近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人只同外交使团接触。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他们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放在与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上。已经处于孤立状态的南斯拉夫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并竭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亲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日战术方针上的改变

最近三四个月的特点是中日关系急剧尖锐化。

第四次贸易协定(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是由以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协会的代表为一方，由日本国会代表促进国际贸易联盟、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本协会、日中进出口协会的代表为另一方，于1958年3月5日签署的。之后，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以及向蒋介石分子表示让步，日本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意性质的步骤，其目的是削弱并使协定的政治后果化为乌有。这些有损声誉并带有

诽谤性质的措施，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抗议，致使中国方面立即中断了这个协定的执行。中国方面被迫发表声明说：“在没有消除日本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之前，这个协定不可能被执行。”在此期间和接下来的时间里，日本方面做出了各种对中国不友好的姿态和表现，并且这些敌意的攻击都是日本政府领导人所允许的。日本的渔船开始闯入禁区。海上频繁出现中日两国渔船相撞事件。鉴于破坏中日两国渔业协定的这些事实，中国行政当局在5月上旬扣押了15只日本渔船。5月2日，位于长崎市中国邮票与剪纸展览会大厦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被拽了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全方位地给日本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中国报刊开始比以前更加尖锐地抨击日本政府和岸信介本人。在一些文章里甚至将岸信介称为“一级军事罪犯”。目前，报刊上经常出现关于“岸信介政府潜在的帝国主义贪欲”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内容。例如，最有代表性的是，目前在中国围绕着一个名叫刘连仁的中国人回国事件，展开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这名中国人是战争期间被强行拉到日本并在那里漂泊了14年之久。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列举了许多日本前军国主义战犯和他们侮辱中国人民的事实。

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严厉地谴责了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随后宣布中断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八幡钢铁公司”的谈判，该公司计划供给中国15.8万吨钢材，同时还宣布说：“根据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签发与日本进行进出口业务的许可证。”按中国朋友的话说，几乎是立刻，中国与日本的全部贸易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应该说，虽然中国在日本贸易周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但是，这种贸易的中断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对于日本的中、小型公司来说还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此前中国是他们比较稳定的、且前景十分看好的贸易伙伴。毫无疑问，放弃与日本的贸易也给中国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其他国家(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另行分配订货，有时还要承受由于零售价格、货物中转等一些因素造成的损失。但是，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中日贸易对日本更有利害关系。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向日本人表明，没有他们中国完全可以应付。

中国方面还拒绝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的期限，今年6月12日该协定的有效期已满。在中国的日本商人的签证也被拒绝延期。

文化联系也被急剧地缩减了。中国朋友示威性地从日本召回了中国律师代表团和在那里巡回演出的歌舞团。他们还决定不再派出和接待许多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的行程最初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委的计划规定的。按照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目前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岸信介就此问题发表了关于必须“通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来促进消除中日关系之中存在的“误会”的这一观点，在对此进行回答时，《人民日报》6月25日的社论指出，这些声明的目的是欺骗日本的社会舆论，因为在日本政府对日本抱有敌意态度的情况下，中国与日本不可能继续保持那种在过去相对友好的气氛中所具有的那种交流方式。该报还写道：为了促进两国之间文化联系的发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坚决地进行反对岸信介政府阴谋的斗争”，该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路线，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阻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断然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正好赶上日本国会的选举活动。中国同志竭力对参加选举的左翼力量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尽可能地阻碍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获得2/3的席位，这对重新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但是，上述所列出的朋友们的措施，绝不带有短期的、应景的性质。这些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在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声明说，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给予这种潜在的危险以最有力的打击。

按照中国朋友的评价，现阶段日本的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潜在的帝国主义资本”。苏联临时代办在通报关于中国对日采取的措施时，使用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表达方法，即如果不压制住这个“潜在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按中国的俗话说，它就会“翘尾巴”(参见C.Φ.安东诺夫同志与张闻天的1958年5月9日的会谈记录，摘自我们的1958年5月15日第165号文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演示，他们不会忍受来自日本的任何敌意性的举动和攻击，并表明一切各种各样的幻想和谬见(尤其是仿佛中国害怕日本的那种论断)，即由于中国在最近几年里对日本采取了一些友好的步骤，从而在日本的某些阶层出现了这些幻想和谬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国朋友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策略是协助他们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帝国主义阴谋，加深日本与美国和蒋介石分子的最佳方法。

在与我们会谈时，中国同志强调指出，话题所说的战术方针的改变，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而这种改变并不代表着脱离为争取日本而进行斗争的这个主要方针。

中国同志对日本政府进行尖锐攻击的出发点是，这将有助于激活左翼和进步力量，对日本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也将是有益的。

可以认为，在最近2—3个月时间里，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效果。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压力在日本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已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并提高了中日关系问题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最初提出新策略的时候，日本许多活动家将这些措施看成是中国政府为竞选活动耍的手腕和并不相信中国能够真正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安。看来，资产阶级报刊目前关于在政府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各派别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分歧的报道，是不无根据的。自6月底开始，岸信介以及日本内阁其他成员的讲话已经明显改变了语气，他们很少强调关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论题，而更多地谈论必须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有时甚至还对在长崎市扯下中国国旗一事和其他一些“误解”表示“遗憾”。自然，尽管这些表白和言论带有明显笼络人心的性质，并且其目的经常是为了试探中国方面的打算，但是，日本执政者们被迫发表这些言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日本政府已经承受着来自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现在比以前更大，特别是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明显地触动了日本大量工业家、商人和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的直接利益。

当然，最近很难预料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上有何改变。因此，中国同志大概在今后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仍将坚持更强硬的立场，力求更加重对日本的压力。例如，7月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岸信介政府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攻击，并将它称之为“自1945年投降以来最反动的日本内阁”。

在我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在对日方面采取的措施，总的来说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同志认真地评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寻找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抗这种危险。

从中日关系今后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日战术方针的改变是完全成熟的。如果说在以前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执行的是“使关系逐渐正

常化”的政策，确定全面地发展和扩大与日本的非官方联系的话，那么，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因为中国以此获得了机会，将日本社会各界人士争取到自己一边，没有他们，中国对日本施加任何压力都将是无效的。目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明显敌意态度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以前的策略，只能将中国置于不利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日本关于“两个中国”理论支持者的利益。正相反，由于前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中国同志有能力给日本以积极的影响，并采用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接受的那些新的方法对其施加有效的压力。中国同志指出，直到最近，岸信介政府还是将中日贸易发展和两国之间任何接触的成绩和进展归功于自己。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他们的话说，已经揭露了岸信介并“把他逼得无法否认”。从另一方面来讲，岸信介现在不可能发动公开的反华运动，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和专门人士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想象到，在执行对日新的战术方针过程中，中国同志可能会出现一些偏激和缺点。例如，在我们看来，中国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还可能引起日本社会广大阶层的不理解，而日本政府立即获得机会，披着发展日中文化联系衷心拥护者的外衣来对抗中国政府。如此急剧地和全面地收缩这种文化联系，可能会对今后调整这方面的联系和开展向日本宣传中国的工作造成困难。如果实施这种策略的时期过于长久的话，这些措施类似的负面作用也将会越明显。

应该指出，在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的时候，中国同志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事先与苏联政府商议一下，而只是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措施通报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那些坚持自己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帮助。中国继续在朝鲜问题上投入较大的力量，以便在关于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中朝双方的主动精神。中国政府仍然一如既往地争取通过完成日内瓦协定来解决中印问题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并采取了多方面的有力措施，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涉及到亚洲局势的主要方面和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对外政策措施。例如，在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公约的斗争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尤其是在宣传领域也没有发表任何反对侵略集团的有意义的演说。

考虑到目前亚洲几乎所有的中立国家，都在经受着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难，中国政府在向它们提出关于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联合行动的建议方面，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在如下问题上：关于签署确保集体安全的地区公约，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关于就经济问题在万隆召开各国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的根据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可能不会得到一系列中立国家必不可少的支持，因而向它们提出这些建议也不会获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与我们会谈时，涉及到锡兰就经济问题建议召开亚洲国家代表大会时指出，在他们看来，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锡兰，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可能表现出必要的积极性，因为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正忙于自己的国内事务，锡兰政府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而印度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时机并不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观望立场，认真研究局势，并准备一旦出现有利条件，就积极开始行动。

正如大使馆在自己1957年度的总结报告中指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对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的问题没有适时地提出倡议。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磋商之后，中国向印度提出建议，让印度人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倡议。印度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中国朋友认为印度人拒绝的原因是：首先，印度正致力于通过获得美国的援助，来克服自己的经济困难，并竭力不引起美国人的愤怒，以此来保留自己参加高级会议的机会，对此印度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就中国而言，在弄清楚印度人的立场之后，中国朋友也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是合适的。

当然，不应该不注意到那些重要意图，正是这些意图使中国表现得十分谨慎，冷静地为自己的行动选择最佳时机。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些事情上中国总是应该更积极些，他们应该更加顽强地、更加坚定地争取使尼赫鲁和亚洲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有利于缓和远东、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紧张局势。中国同志最近在一系列场合下，甚至在解决自己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时——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一直在极度

紧张地工作着——没有充分地利用亚洲国家。例如，在我们看来，如果广泛地利用这些国家来影响日本，这将是非常理想和适宜的。但是，对自己的对日策略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之后，中国朋友，据我们所知，直到最近甚至也没有从需要的角度出发，努力向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其他国家的官方代表以及直接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真说明一下在中日关系中自己的立场，尽管这将会有助于这些国家更好地理解或者是持更友善的态度，而在某些场合下，大概，还可能获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如从前一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捍卫日内瓦协定上，并利用这些协定来支持越南朋友和柬埔寨、老挝进步的中立力量，同时给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措施设置障碍。与此同时，中国朋友还在印度身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力求从印度所处的地位上使自己获得一定的利益，印度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也在努力加强自己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影响力。

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在今年5月14日的备忘录中，就继续保留老挝事务国际委员会的问题所阐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两国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坚决反对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竭力取消国际委员会的企图，中国朋友坚持在对其进行裁员之后保留它，也就是印度建议的第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他们还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第二个方案(将老挝委员会的职能移交给越南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他们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争取在老挝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以下这个建议在中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建议，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这个建议是加拿大人打算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老挝委员会仅在其3名委员、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和老挝政府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就可以召开会议。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与印度在5月14日提出的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比较，这样的建议(甚至带有印度的修改内容，即召开委员会会议的问题将由委员会的3名成员决定)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如果接受加拿大的方案，召集委员会开会就将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朋友指明，无论是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还是在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出现了某些恶化。迫于美国 and 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建立“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变得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蒙混通过了一个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

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国际委员会通过上述决定之后，中国报刊表示支持范文同在今年的6月14日向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提出的呼吁。中国朋友打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正式支持范文同的这个呼吁。

对于柬埔寨与南越接壤的边界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支持柬埔寨，力求最大限度地将这个国家吸引到自己这边，并给南越政权制造困难。在报刊上以及陈毅在为欢迎柬埔寨代表团(议会代表团、佛教代表团、记者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明了这种支持。

在众所周知的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政府2月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利用所获得的优势，努力发挥主动精神，坚定地提出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以便给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那些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朋友积极地进行斗争，反对美国及其同伙企图在朝鲜问题上将事情引入无休止的争论状态，反对他们企图降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政治效果。这些国家针对政治上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主张必须事先达成协议，中国同志对他们的主张进行了揭露，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其目的是用谈论关于全朝鲜选举等类似的内容，来暗中偷换撤军这个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年5月6日致英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中，再一次重申：“只有从朝鲜撤出全部军队，才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包括进行自由选举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自己 and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如果美国以及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在一定期限内将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的话，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准备建议召开相关国家的协商会议，以便磋商在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之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考虑到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国家给出的否定答复，中国同志打算在近期内，以比从前更强烈的方式，再一次坚决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同时还将表明英国政府7月2日照会中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整个这一阶段，中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巩固中朝之间友谊的材料，并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报纸坚定不移地重申，中朝双方所表现出的主动精神，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新的现实的前景，而且还是对缓和远东和

全世界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将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看作是美国企图像从前一样执行其已经破产的“实力政策”，保住自己对朝鲜的殖民主义统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第一批6个师(8万人)的撤离行动之后，正式宣布：自7月11日到8月20日将进行第二批撤军，人数是10万人(其中包括将撤离的6个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忙于关于援助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也就是帮助印度尼西亚人进行反对暴动分子和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它内部事务的公开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观察了印度尼西亚事态的发展和其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破坏活动和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政策上的改变。中国政府如从前一样，坚定地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信自己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来自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支持，是确保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如中国同志经常正确指出的那样，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不愿意过于亲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害怕这会恶化自己与美国人的关系，通常他们不喜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尼西亚支持的这个事实。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援助问题上的动摇立场和分歧意见，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表现得很有分寸和谨慎。但是，当苏加诺、朱安达政府成员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指挥机关的代表，表示希望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援助的时候，中国代表通常对这些请求都是给予肯定性的回答，并努力地使这种援助的方式和额度，不惊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不推动它与美国人接近。

印度尼西亚人首先提出的是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额为1100万美元的贷款，年息为2.5%，清偿期限为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印度尼西亚人可以以任何一种对他们来说有利的方法偿还这笔贷款(用第三国的外汇，或者是供应货物，等等)。算在这笔贷款项下还签订了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180万匹棉布和2万吨大米的合同。同时，为了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朋友对这批货物的大部分实行了紧急的运达。临近印度尼西亚人希望的期限(今年的4月21日之前)，中国人已经向他们提供90万匹棉布和1.5万吨大米。按中国同志的话说，印度尼西亚人高度地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的及时援助。

在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支持暴动分子和扩大了自己干涉印

度尼西亚内部事务的范围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不公开向亚洲和社会主义国家请求援助。中国同志早就打算正式发表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声明，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打算。当雅加达官方阶层明确表示对这种支持感兴趣的时候，中国朋友立即在自己的报刊上和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坚定地表达了这种支持。

紧随苏联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在1958年5月15日发表声明，坚决谴责了“美国公开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和粗暴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部事务”，表明自己不可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和外国干涉其内政的事实坐视不理。中国政府声明说：自己“曾经以贷款的方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了棉布和大米”，“中国政府准备继续给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自己力所能及的援助”。在中国同志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同苏联政府的声明一样，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阶层尤其是广大居民阶层的热烈欢迎。

必须指出，如同在中国朋友发表的其他讲话中一样，在上述这个声明中特别重申了，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动中，美国利用了被他们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岛和自己的工具——蒋介石匪帮。在所有场合中都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并提出坚决的抗议。

为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同志同意在北京举行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所需武器的秘密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定数量的陆、海、空三军所需的武器。根据中国同志的评价，印度尼西亚请求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武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已经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中国同志的根据是，他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应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将有助于加强进步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立场，巩固该政府保持独立的、中立的立场，更加削弱美国的威信。应该指出，当东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前景还没有明朗化和美国人扩大了公开干涉的范围时，中国同志甚至考虑可以向印度尼西亚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和志愿军战士，当然，如果印尼政府同意这样做的话。

涉及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宗教、体育和其他方面的联系，那么，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这些联系明显被削弱了。尽管如此，今年上半年仍有几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各界的代表出访了中国。中国朋友计划今后将使这些接触重新活跃起来。

必须指出，陈毅和其他中国同志多次表示，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关于在对待印度尼西亚事情上苏联和中国行动上保持协商一致的提议。就印度尼西亚事件交换意见和情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和明确我们两国的立场。根据大使馆的意见，今后，在讨论更广泛的国际问题和准备对于某些国家首先是亚洲国家采取外交行动时，应该更加经常地应用这种良好的经验。

最近，中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政治态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双方的经济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表现是签署了中巴关于出售15万包棉花以交换中国煤炭的协定。巴基斯坦人还对从中国获得玻璃制造厂、造纸厂和纺织厂所需要的配套设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国朋友将巴基斯坦人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方面表现出的主动精神，评定为其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尖锐的竞争使巴基斯坦在销售棉花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缅甸的态度上，根据该国家国内的政治局势，表现得十分谨慎。无论是在报刊上，尤其是在官方的发言中，对于吴努与吴觉迎和吴巴瑞的冲突以及在国内确立和平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都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中缅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包括中缅边界问题，最近几个月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缅甸的执政当局由于国内的局势，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这些事情了。

在1958年里，在巩固和发展自己与近东、中东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了不小的努力，并仍像从前一样十分重视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中国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支持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行动。1958年3月30日，以陆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将军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大型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明。中国同志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多月，参观了一系列大城市，军事高等院校和军事设施。代表团成员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接见。关于中国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几种武器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得也十分顺利。中国同志继续以援助的方式在这个国家购买大批量的棉花和棉纱。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6月23日(紧随1958年初在中国建立了“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之后),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了以原埃—中友好协会主席巴库里部长为首的“阿联中国友好协会”。在阿联、叙利亚、也门地区和阿联其他一系列重要城市里,都设立了该协会的分会。

在尽全力援助和支持中东、近东、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对黎巴嫩人民反对英美走卒夏蒙的斗争持坚决支持的立场。中国的报刊、著名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坚决支持黎巴嫩起义者反对这个国家的亲美政府、反对外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斗争。

中国社会舆论积极开展了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国家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行动。1958年3月,中国发动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斗争的运动。在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大城市里,进行了群众集会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报纸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斗争,谴责法国政府,并表示坚信: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一定会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

中国政府对于1958年4月在阿克拉市召开的8个非洲国家代表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正值会议开幕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发去了贺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确信:代表大会将为加强和扩大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事业而工作。中国报刊广泛地评述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对会议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对外贸易组织成功地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保持了事物性的接触。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摩洛哥和突尼斯政府仿佛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

1958年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已经7个多月没有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毫无疑问,这段时间里,在美国,那种倾向于即使不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至少也要建立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的情绪加强了。但是,目前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

响。中国朋友的根据是，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会有任何重大的进展，按毛泽东的话说，因为美国“不愿意承认新中国，就像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苏联一样”（参见C.Φ.安东诺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1958年5月28日的会谈记录，我们的1958年6月9日第218号文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坚持强硬的反美方针是必要的。

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

这种方针具体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和报刊使用更加尖锐的语气谈论美国，加大力度强调美国的危机现象，更积极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事实，等等。自然，所有这一切都如从前一样，与系统地揭露和谴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美国对台湾的占领、美国人利用蒋介石匪帮进行破坏活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朋友正是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停滞不前的状态，揭露和贬低美国政策的。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在1958年4月12日自己的声明发表之前，中国政府就由于美国人的错误导致中美会谈中止很长时间的问题，几次致函美国政府，坚持恢复上述所说的按以前协商级别的会谈以及解决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系列刻不容缓的问题。1958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日内瓦谈判发表了正式声明，并就问题的实质公布了往来信件。在自己的声明中，中国方面强烈地谴责了美国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拖延会谈，实际上已经中断了会谈。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声明甚至没有给出明白的答复。因此，中国同志继续坚持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于1958年6月30日就中美会谈问题发表了新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从实质和形式上看，与1958年4月12日就该问题的声明很相似，同时，提出问题的语气比前一个声明要更强烈。在这个声明中直接谈到，如果自发表声明之日起15天之内，美国不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和不恢复会谈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不可能不认为，美国决定中断大使级别的会谈”。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目前基本上倾向于中断这些会谈。他们的出发

点是，在这么长的间歇时间里没有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而在一些小的、无关轻重的问题上继续会谈，将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因为美国人会作为一个证据将这描绘成：中国竭力追求无论如何都要与美国进行谈判，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中断会谈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因为这会使美国丧失投机的机会——仿佛中国不进行这些会谈就无法应付。与此同时，停止会谈还将使美国政府丧失利用日内瓦会来欺骗本国的社会舆论和实业界人士的机会，因为实业界的一些人士越来越勇敢和坚定地表示赞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30日的声明看作，不仅是对美国人施加的新的压力，而且还是一份在谈判中止的条件下为社会舆论准备的文件。

中国人预先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将美国政府置于非常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以下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杜勒斯和美国其他国务活动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发表之后，也急忙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他们确定地说，美国人不想中断日内瓦谈判，并准备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但是，不接受中国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中这些新的方面是：打算退出9个国际体育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有蒋介石分子；拒绝以某些间接的方式参加国际性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对自己策略的这些变化做了解释，其原因是：必须反击美国及其同盟者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维护自己国家的声誉，力争做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只能通过正门，而不能通过后门”。

中国朋友经常说，众多事实的实际功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提高，迟早会逼迫美国 and 追随它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容忍正在迅速发展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迫使他们最终承认新中国。

朋友们预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拒绝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来抗击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企图，对美国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有助于激

化他们与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因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同盟者的益处，在一段时间里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鉴于以上所述内容大使馆认为，苏联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里的代表们，应该特别注意对那些能够导致出现“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事实的态度，并仔细认真地研究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1958年7月25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5, л.1-75

№26367 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 秘密访华(1958年7月2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30日

第303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和彭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7月28日

在通过高频电话与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应我的请求，23时周恩来和彭真接见了我们。

周恩来告知，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正在郊区休息。他还说，领导干部明天准备去北戴河开会。

我告诉周恩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近期将不举行5国政府首脑会晤)，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告诉毛泽东，今年7月30日他可能访问北京。我补充说，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弄清楚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几点钟抵达北京比较

方便，以及这次访问应该具有何种性质，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访问。

周恩来说，鉴于问题的重要性，他现在就去别墅会见毛泽东与他商谈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和彭真一起留了下来，决定等待周恩来返回。

大约过了1小时，周恩来返回后说，毛泽东欢迎赫鲁晓夫同志于1958年7月30日抵达北京，并认为飞机在北京时间16时抵达比较合适。周恩来补充说，届时城市里比较凉爽。

至于访问的性质，中国同志们提出了3个可能的方案：

- 1.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的正式访问，并且在报刊上宣布抵达北京；
- 2.在赫鲁晓夫同志返回莫斯科前，不在报刊上公布这次访问；
- 3.对外不作任何宣布的秘密访问。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同志们准备接受赫鲁晓夫同志选择的任何一个方案。他们自己表示赞成第二个方案，也就是说，主张在赫鲁晓夫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前，不对外公布。此后，周恩来继续说，可以发表相应的联合公报。

周恩来补充说，这样的公报对在近东和中东进行直接侵略的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打击，对世界人民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周恩来说，他们准备在郊区的官邸接待赫鲁晓夫同志，以保障他与莫斯科的高频通信等等。

在与彭真简短对话后，周恩来说，不得不取消原定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领导同志会议将改在北京举行。

我答应立即把这次谈话通过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同志，并将结果告诉朋友们。

公使衔参赞安东诺夫同志谈话时在座。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3份，送：赫鲁晓夫、葛罗米柯、档案室

执行人：安东诺夫

1958年7月2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2, д.6, л.170-172

№2039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1958年7月2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陆明(ЛуМин)同志向苏联驻北京使馆通报说，中国科研机构今后将不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МГГ)活动和向今年7月底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中国朋友做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受台湾(为自己的成员)，从而导致“两个中国”的出现。

与此同时，陆明提请苏联使馆关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苏方主席普什科夫同志在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在书信交流过程中所采取的错误立场。陆明表示，希望相关苏联机构能向普什科夫解释中国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所坚持的一贯立场。

苏共中央联络部查看了陆明所引证的普什科夫同志分别于今年6月17日和7月8日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发出的两封信以及后者对普什科夫同志去信的答复。从普什科夫同志的上述两封信中可看出，他是本着交流意见的原则来探询中国朋友的观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内部他应当对中国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与此同时，普什科夫同志还这样地表达了自己的预计，即中国和台湾的学者将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如下共识：双方一起或各方单独参加国际地球年组织，并向后者提供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材料。对此，普什科夫同志还援引了德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例证。尽管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6月17日的去信作了否定性的答复，但后者在7月8日的去信中又以另一种略作变通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原有建议。看来，这可能便是促使中国朋友致函苏联驻中国使馆的主要原因。而针对普什科夫同志7月8日的去信，中国朋友则根本就没有进行答复。

之所以产生这一事件，原因还在于：普什科夫同志在向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国委员会发出自己的上述信函时根本就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其中包括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的其他苏联代表。另外，中国朋友称普什科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苏方副主席，而实际上普什科夫同志只不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他根本无权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

友进行通信，因为这本应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的分内之事。

今年7月14日科学司基里林同志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应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其中明确了苏联代表团在此次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并向普什科夫同志指出了关于其擅自与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通信的错误。

不过，鉴于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学者和其他一些代表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仍经常犯类似错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考虑苏联驻中国使馆提出的建议，即要求苏联外交部和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组织中的苏联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代表发出指示。另外，为达此目的还应责成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与苏联外交部一道在近期内就苏联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问题而召集在国际科技、文化、体育和其他类似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代表开会。

苏联外交部将就如何答复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所提意见的问题向苏联驻中国使馆发出相应指示。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科技和高、中等院校部副部长

Д.库金(签名)

1958年7月29日

第15Д923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指示已经落实。关于普拉科夫同志问题的资料附上。

[22]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

..... [23]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87-188

№11667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

1958年7月31日，怀仁堂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 [24]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他说，两党领导层的有效合作，有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赞同。

毛泽东：不必预测太长的时间，可以讲，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1万年。

赫鲁晓夫：就这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合作9999年，以便同意在下一个1万年再进行合作。

毛泽东：然而，我们还有某些意见分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种分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假如我们用十个指头来比较，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九个指头，分歧只是一个指头。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因此可以签订一个1万年的协议。毛泽东建议会谈转到共同关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接到尤金同您会谈的报告。根据报告判断，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您谈一谈，这样一切都会得到澄清。

毛泽东：好的。

赫鲁晓夫：根据同您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我将不详细讲述我们看法相同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局势的问题、对中东事件的评价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我们也同意您的说法，即我们之间不存在产

生不同观点的问题。对贵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对我们取得成就，你们也同样感到高兴。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我将谈到我们双方突然出现的问题，那就是有关建立海军的问题。您说您一夜没有睡觉，当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毛泽东：我感到惊讶，因此没睡着觉。

赫鲁晓夫：这件事在任何时候与其他人都无关系，首先这件事与我有关，因为主要是我和尤金谈的这件事，然后苏共中央主席团给他下了指示。我们没有人有您和您的同志们所产生的那种理解。对共同舰队的想法，我们简直是一无所知。您了解我的观点，当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反对合营。在菠萝罐头工厂的所有权问题上，我就反对他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我现在强调这一点，即斯大林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是因为斯大林并非愚蠢到不能理解这一点。然而，那是他头脑硬化的开始。

毛泽东：我也经常引用这些例子，我一直说，是赫鲁晓夫取消了这个权力。

赫鲁晓夫：我是政治局中直言不讳地向斯大林讲不要就特许权问题向毛泽东发电报的成员之一，因为作为原则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当时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我现在已经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在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立即提出取消合作社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所有地方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这种东西了。

毛泽东：过去还有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东北。

赫鲁晓夫：那里不正常的状况也消除了。

毛泽东：按照中苏协议，那里还禁止第三国的公民居住。您也清除了这些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是的。因为它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毛泽东：我完全同意。

赫鲁晓夫：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芬兰，我们也取消了军事基地。

毛泽东：旅顺口的基地也是您取消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有其他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样做尤为正确。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特权也只能带来损害。我们取消了在奥地利的合营公司，我们把它们卖给了奥地利政府。这一做法取得了成效。否则，那里将一直会有同奥地利政府产生不断冲突的根源。当我们接待奥地利代表团时，我们举行了友好的会谈。在早些时候，我们还不可能举行这样的会谈。我们同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极为明确。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在我们的条约中不存在损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或包含侵犯我们援助的独立国家的单独条款。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就在于此。由于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而不强加政治条件，我们就赢得了这些国家的人心。已经向叙利亚、埃及、印度、阿富汗和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援助。最近我们同意与阿根廷签订协议。这将影响拉美人民的思想，特别是阿根廷人民的思想。我们同意向他们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工业设备。我们这一行动是针对美国的，这样南美洲就不会感到必须完全依赖美国，他们能够找到出路。

毛泽东：做得对。

赫鲁晓夫：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可能会用您同尤金会谈时所讲的那种方式对待你们？(开玩笑地)现在我要发起一场进攻了。

毛泽东：联合舰队是怎么回事？那么请解释一下。

赫鲁晓夫：谈这个问题使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大使不在场。我给他指示，同他单独谈话，然后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谈这个问题。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担心他误解我的意思，我就问他：“你清楚这个问题了？”他说：“清楚了。”但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告诉您我对他讲的核心东西。

毛泽东：原来如此！

赫鲁晓夫：我是这样看的，他对问题的理解太远了，如同月亮离地球一样遥远。这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同尤金没有关系。

有关建立舰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我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让库兹涅佐夫 [25] 海军元帅退休，让他退出现役，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他的海军建设10年计划，那么我们将既没有军舰，也没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要求商谈援建海军的信件时，我们感到难以回答的原因。

毛泽东询问有关这一计划的费用问题。

赫鲁晓夫做了回答。

有人建议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非常昂贵，而建造港口以及舰队停泊的地点也同样花费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否决了。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按照军事技术已经变化的形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军学说的批评。

1956年，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一次海军会议，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朱可夫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海军呈送了一份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的报告。听了这个报告后，真想用扫帚把他们都扫地出门，不仅是赶出海军，而且是赶出军队。

您可能还记得，当1954年10月我们从你们这里返回的时候，我们通过旅顺口绕道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到共青城。我们乘一艘巡洋舰进行航行，途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演习。库兹涅佐夫元帅陪同我们。在演习中，我们的潜艇和鱼雷艇攻击巡洋舰。鱼雷艇上没有一颗鱼雷击中巡洋舰。潜艇只有一个击中目标。我们想，假如海军处于这样的备战状态，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海军力量。这是我们采取审慎态度的起因。演习之后，我们命令库兹涅佐夫起草一份报告，并准备一个计划。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的计划没有被接受。他变得愤慨和无理起来，责问：“什么时候中央才能对海军采取正确的立场？”将库兹涅佐夫赶出海军的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已经确立了正确的关系。

在斯大林时期，我们建造了许多巡洋舰。我在伦敦访问时甚至建议艾登买一艘巡洋舰。现在人们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感到迷惑不解。您回想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什么大规模的海战吗？没有。海军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被毁灭。美国和日本都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日本是靠飞机给美国带来沉重打击的，美国同样是在飞机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海军的。

问题是应该把钱投向什么地方。

当我们接到你们的信件时，我们开始考虑派军事人员到中国去；然而他们在海军建设方面还没有一致的观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三次了，最近一次决定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让其呈交建议。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停止建造巡洋舰。炮塔已经建造完毕，但还是把他们扔进熔化炉。他们所含的金子还有价值。我们还有几艘在船坞建造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分成两派：一些人说，将它们扔掉；其他一些人说，我们应当建成它们，然后停止建造。在我回去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海军人士也分为两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停止建造，钱就白白花掉；完成它们，将需要更多的开支。在战争中将不需要这些军舰。在去度假之前，马利诺夫斯基请求审议这个问题。在国防军事委员会上，我表示反对完成建造这些巡洋舰，但态度并不坚决。马利诺夫斯基劝我，我决定支持他。我们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许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明确表示反对停止建造。当时我们决定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表决，直到马利诺夫斯基休假回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到时我们将决定把它们扔进熔化炉。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军界将如何对你们解释呢？因而，我们对自己讲，我们必须同中国的负责同志一起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依靠军方，因为他们自己都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想同你们一起讨论，在海军建设方面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例如，今天我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什么观点，或海军司令部司令有什么观点。如果我们派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就不能说他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们的，还是他自己的。因此，我们想同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同军人和文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不想强加我们的观点，将来也不会；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海军这个问题上，你们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是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火箭的存在，现在谁还需要火力有限的巡洋舰啊。我在伦敦时告诉艾登，他们的巡洋舰只不过是漂浮的钢铁棺材。

海军建设的问题非常复杂。军方会问：那么美国为什么继续建造海军？我相信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地处美洲，它准备在欧洲或亚洲发动战争。他们需要海军进行运输和支援。否则他们就应该抛弃自己的政策，宣布门罗主义。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向他索要同尤金会谈的记录。邓小平将会谈记录递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这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因此，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同尤金谈的，指示他告诉您这个情况。我问他一切问题是否清楚了，他的反应是肯定的。但他从来没有同海军打过交道，因此他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的关键。苏共中央过去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建立联合海军。

毛泽东(气愤地)：我没有听到你说啥。你当时在莫斯科。只有一个俄国人同我谈，那就是尤金。因此我问你：你说向我“发动一场进攻”的根据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并没有那样做。

毛泽东(发怒)：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毛泽东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是不是我长时间的解释使您感到厌烦？

毛泽东：一点也不。你还没谈最主要的事呢。

赫鲁晓夫：至于我提到的那些原因，我们需要与你们的同志共同讨论需要什么样的海军这一问题，讨论海军的技术以及实战应用。我的确同尤金说过，毛泽东同志赞同我们协调行动，以防止战争。在1954年我们访问期间和您1957年在莫斯科期间，您都谈过这件事。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任何行动。因此，我指示尤金说明情况。对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应当建造潜艇和鱼雷艇，不是携带海基导弹，而是携带海空导弹，因为潜艇舰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同敌人的海上舰队进行战斗，而是要摧毁它的港口和工业中心。我同尤金谈话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撤销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是不错的，我们不需要他们在那里；如果要在这些地区建造一些东西，那就应该建造规模中等的潜艇。既然是这样，我们应当在哪里建呢？在摩尔曼斯克地区，从那里不易突破美国的防线。在英格兰和冰岛，他们可以采取措施中途拦截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比较好，那里有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在那里监视我们潜艇的活动，打击我们。我对尤金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广阔的海疆，从那里易于同美国进行潜艇战。因此，同中国讨论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是有益的。更为特殊的是，在许多大河中的一条(黄河或其他河流)，我们需要一个工厂生产大批量的潜艇。我们

相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去建立联合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不需要类似于这样的任何东西。

毛泽东：尤金不止一次地讲到要建立共同舰队，他说黑海和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从摩尔曼斯克指挥海军不方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出路被日本封锁等等。他还指出，中国海岸线非常漫长。按照尤金的说法，由苏联来生产核潜艇。他的谈话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也可以使用它。这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使用它是困难的，但对敌人来说也不轻松。总的来说，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毛泽东：我问尤金，谁将拥有这支舰队，中国人，苏联或者是共同拥有？我还强调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需要把这支舰队作为自己的财富，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将向苏联提供一切。但是，尤金坚持舰队应该是共同的舰队。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其他同志会见尤金。尤金在这一次会谈中重复了他先前讲过的话。我们的同志都反对共同舰队。他改变了方案，不谈“共同舰队”，开始谈“联合建造”。我们的同志同样批评这种说法，并说我们把联合建造视为共同拥有舰队。然后尤金开始谈论“共同努力”建造舰队。

赫鲁晓夫：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指示尤金来管这件事，来向您通报。但是我们没有想就这个问题给您写封信，我们想口头上告诉您。

毛泽东：我们是这样理解他的意思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援助，那么就必须建立一支首先对付美国的共同舰队。我们感到，赫鲁晓夫想，加上我们的同志也想，解决有关联合建设海军的问题，还想把越南也拉进来。

赫鲁晓夫：我说过，将来战争爆发时，我们需要广泛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岸。

毛泽东：我也已经说过，假如战争爆发，苏联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俄国水兵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港口行动。

赫鲁晓夫：我不会说“俄国水兵”。如果战争爆发，共同努力是必需的。也许中国水兵要行动起来，也许需要联合努力。但是，关于什么领

土问题或我们的基地问题，我没说过。

毛泽东：比如，如果在一支舰队中有100艘舰只，你我各自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赫鲁晓夫：舰队不能两个国家所有。舰队要有人指挥。当两个国家指挥时，就不可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那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您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加以考虑，您可能说，我们反对这一点。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同样会反对的。

毛泽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赫鲁晓夫：本来就没有乌云。

毛泽东：但是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想睡觉也是徒劳的。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可能会强加这件事，完全背离党的原则？

毛泽东：我甚至告诉我的同志们，从原则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理解这一建议，也许其中有误会。您取消了斯大林强加的错误的东西。我个人和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也许这个建议是苏联海军司令部的某个人提出的。您的顾问4次建议我们发电报请求援建舰队。他保证这种请求将会得到积极的答复。

赫鲁晓夫：应该扔掉这样的顾问。

毛泽东：顾问们没有提共同舰队的事。

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对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才提出。

毛泽东：顾问们建议向苏联提出帮助。在此之后，周恩来提出请求，我们想，是带有火箭发射器的舰队。

赫鲁晓夫：没有指示尤金提出这种建议，只是指示他传达一个提

议，共同讨论建造潜艇舰队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指示尤金进行建造潜艇舰队的谈判？在党务上我们了解和信任尤金，但在核潜艇谈判的问题上，他是难以胜任的。

毛泽东：他说，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共同建立海军的谈判。我请他通报，我们不能进行这种谈判。

赫鲁晓夫：他基本上想做正确的阐述，但是他肯定误解了我们的指示，做了不正确的说明，结果使我们发现，彼此处在错误的相互关系上。

毛泽东：但是尤金说得很明确。当时安东诺夫也在场。现在是刺痛了谁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在我看来，是刺痛了您的自尊心。

毛泽东：那就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

赫鲁晓夫：同样也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你们怎么会误解我们的政策呢？

毛泽东：您的代表做出这样的阐述。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种提议，不会接受。我说：“你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将在陆地进行游击战。”

邓小平：问题起因于对中国和苏联海岸线的分析。尤金说中国有很好的海岸线，而苏联的海岸不好，因此需要共同舰队。然后毛主席就说，这是不是合作社？

毛泽东：合作社就包括两部分。

赫鲁晓夫：一切都非常清楚了。我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相信，中国同志将会更加尊敬我们。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相信你们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担心了。

另外一个方案是——共同舰队。如果没有共同舰队，那就没有援

助。

赫鲁晓夫：尤金这样说的么？

毛泽东：没有，他没有这样说。我是在转述他话的意思。

赫鲁晓夫：那是您的推断了！

毛泽东：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我们撤回请求，因为第二个方案不适合我们。即使一万年没有核潜艇舰队，我们也不会同意建立共同舰队的。没有它，我们也能活。

赫鲁晓夫：您在信中并未提到核潜艇舰队的事。

毛泽东：是的，我们是没有提。我们提出建立载有核武器的舰队的问题了。尤金谈到了核潜艇。

赫鲁晓夫：因此，我说，应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谁给您提出的建议，是戈尔什科夫 [26] 吗？我不能肯定他给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当他给您提出建议时，您将认为那是我们的建议。然后您将会弄清楚，并且说，他们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建造大规模的舰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谈到鱼雷快艇和携带导弹装置的潜艇。这是我们在信中说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想谈完海军的事情，再谈电台的事。我认为，尤金对其下达的这部分指示进行了不正确的说明。显然，他没有准确地表达这一问题并且说出了自己错误的理解。

毛泽东：但是当时有七八个人在场。我当时说那不是一种合作。当听说这一建议时，每个人都震惊得直喘气。因此，我一夜都没有睡觉。

赫鲁晓夫：我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睡着觉。我同意我也应该受到指责。是我提出倡议，我对尤金说明，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并作了错误的说明。尤金是个诚实的人，他非常崇敬中国和您本人。我们信任他，认为他不是有意曲解我们的意思的。他是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他为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指

示而产生误会的结果。我要说的是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我重复了两三遍，问他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因为我给他的指令，是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我也给您带来了难以处理的问题。如果您发现问题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那么您就应该睡个好觉，告诉自己这是个误会，并试图重新澄清一下。(开玩笑地)您看，我在催促您了。

毛泽东：我说过，这也许是一场误会，我希望是误会。

赫鲁晓夫：您可以去睡觉了。

毛泽东：有好几次谈话都是讲共同舰队的，因此当时我发动了反击。现在您在反击我了。但是等一等，我还要再进攻您。

赫鲁晓夫：物理学中有一个定律，作用力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

毛泽东(执拗地)：我有我的道理。我当时就说过，我们可以给你们整个中国的海岸，但就是不同意搞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上帝帮助我们来处理它。

毛泽东：这是第四个方案——给你们全部的海岸。第五个方案是——我习惯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现在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了整个海岸线，我们只有到内地去了。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那好，让我们就海岸线做个交易，但最好还由各自保留自己的海岸，我们对自己的比较熟悉。

毛泽东：我同意将一直到越南的海岸都给您。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胡志明。否则的话，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会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合起来对付他。

毛泽东：按照第五个方案，旅大给你们，但是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现在，您是否真的认为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什么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了解我的观点。但是在旅大港的问题上，我认为斯大林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蒋介石当时还统治中国，苏联军队占据旅大港和东北是有利于你们的。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应当在人民中国取得胜利后，立即结束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好像是在1954年，当时我们提出从旅大撤军的问题，您表示出疑虑，认为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您认为苏军的存在是制约美国侵略行径的一个因素。我们请求您研究这个问题，您答应考虑。您经过考虑后同意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政府中的一些民主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利于中国。您讲过这件事吧？

毛泽东：是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不只如此，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还批评我批判斯大林，而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我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我过去经常说，有时也在莫斯科说，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要公正合理。我们只是反对毫无界限地进行批评。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是要三七开。

赫鲁晓夫：我认为要多一些。

毛泽东：不对。关键是他的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

赫鲁晓夫：是的。要说斯大林的成就，我们也是他的一部分。

毛泽东：这就公正了。

赫鲁晓夫：斯大林过去是，将来还是斯大林。我们批评他，特别是

由于他年老所产生的错误和争斗。但是，当铁托批评他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现在开始20年以后，学校的孩子们只能在字典里查找谁是铁托，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斯大林的名字。字典里将会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他寻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字典里也会说，斯大林是个战士，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但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主要错误，不是两个半殖民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给蒋介石写了不少谦恭的信件，支持王明。

毛泽东：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他的第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第二个错误是，当中国革命成熟的时候，他建议我们不要革命，并说，假如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就会有毁灭整个民族的危险。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一个民族并不能被毁灭。

毛泽东：但是斯大林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相信，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可能会这样认为。

毛泽东：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不想取消过去在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好处。我记得费德林和科瓦廖夫向我传达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到苏联各地走走。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有三件事情去做：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仅仅给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也只好这样。我就完成我的三项任务。去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谈话中，布尔加宁在场，我听说当时斯大林对我们进行窃听。

赫鲁晓夫：是的，是我对他们这样说的。他对我们也进行窃听，他还偷听他自己。一次我同他一起度假的时候，他承认他不相信自己。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建造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

们不会按照库兹涅佐夫元帅的计划来建造一支舰队。

赫鲁晓夫：在舰队问题上，我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毛泽东：我们只是想在建造潜艇、鱼雷艇和小型水面舰艇时得到帮助。

赫鲁晓夫：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有一支携带导弹的强大的潜艇舰队，鱼雷艇不是携带鱼雷，而是携带导弹。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在信中所请求的。

赫鲁晓夫：我们认为，需要的是装备导弹的驱逐舰；认为，应该按照以军事用途使用商船的观点来建造商船。我们正在建造几艘装备导弹的潜艇。我们认为，还应当建造可以携带导弹的护卫舰、扫雷艇。最为重要的是，要建造携带导弹的飞机。我认为，你们首先需要这个东西，这样您可以从空中有更远的射程。我们首先需要海上防卫。旅大港的岸炮群用处不大，它的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需要的是海岸导弹发射架以及可携带导弹的飞机，或者是机动的海岸防卫。这是我们采取的建造舰队的方针。

毛泽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赫鲁晓夫：我认为，首先需要发展携带导弹的飞机，潜艇舰队比较昂贵。借助于可携带导弹的飞机，可以将敌人拒之于远离我们海岸线的地方。

毛泽东：完全正确。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谈过。

赫鲁晓夫：飞机具有更大的潜能。我们准备给中国我们已经拥有的飞机。图16作为轰炸机已经失去其意义，但它们携带导弹进行海上战斗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处在危机之中。军方一片混乱，因为对战斗机来说，已经出现了替代品——导弹。

毛泽东询问苏联、美国、英国导弹部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特性和类型。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使敌人害怕我们导弹的原因。我们给土耳其人写信说，只要用3—4枚导弹，土耳其就不复存在。10枚导弹足以扫平英格兰。在英国，他们进行辩论：一些人说，9枚导弹就可以摧毁英国；另外一些人说，不对，7—8枚就可以了。但没有人会怀疑，一旦爆发核战争，英国将会遭到毁灭。他们所争论的是需要多少枚导弹。当我们在苏伊士事件期间写信艾登和摩勒 [27] 时，他们立即停止了侵略。现在，由于我们拥有洲际导弹，我们同样可以卡住美国的咽喉。他们认为美国不在射程之内，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工具避免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挽救伊拉克了。

毛泽东：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进攻伊拉克了。

赫鲁晓夫：我认为75%是正确的。

毛泽东：大约是90%。

赫鲁晓夫：这是中国的方式。这里也是我们的“意见不一”。

毛泽东：他们害怕战争。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非常害怕。特别是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革命激发了那里的人民，他们可能会重演伊拉克事件。

毛泽东：我们明天再讨论国际形势。我想海军的问题就解决了。

赫鲁晓夫：是的。双方不分胜负。

毛泽东：那就不存在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但是有3个苏联同志谈过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这里有4位苏联同志，我们都说没有共同舰队。

毛泽东：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误会。

毛泽东：同意，把这一点记下来，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同意。把这一点写下来。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问题。这是误解的结果，是尤金错误地说明问题的结果。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现在我不激动了。

赫鲁晓夫：我也是，让我们睡个好觉。

现在我想讲一下长波电台的问题。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决定。我国军方的同志说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这样，当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指挥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我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同中国同志接触，以便建立这样的电台。如果中国同志同意我们通过贷款或其他一些方式参加电台的建造，那就更好了。这个电台是必需的。当你们拥有自己潜艇舰队时，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它。问题是如何利用。我认为这个电台不能有两个主人。因此，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样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同你们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不谈所有权的问题。它应该属于中国。我只是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其使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你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想我们军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反对，我们也不再坚持。

毛泽东：可以建造这个电台。它应当归中国所有，由中国政府投资，我们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不是共同使用，仅仅是部分利用。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战时情况下和平时训练时才用到它。

毛泽东：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马利诺夫斯基在信中提出的方案。

赫鲁晓夫：我没有看到这封信，我们没有在中央讨论这件事。

毛泽东：这是另外一个合营。中国占有30%，苏联占有70%。我们给马利诺夫斯基答复的主要内容，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些。

赫鲁晓夫：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我不知道。显然，这是我们军方之间进行联系的结果，但这个联系结果并不成功。

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7月份的第二封来信，包含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条约草案。如果按第一封信中国还占30%，而在第二封信，整个所有

权就都归苏联了。

赫鲁晓夫：我猜想，就我国军方而言，这是他们的好意。我们需要这个电台，但这是一个耗资不菲的计划。所以他们仅仅是想要进行帮助。但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法律的一面。

毛泽东：我们以彭德怀的名义给予答复，在信中我们说，我们建造它，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军方告诉我，他们已经同中国同志达成了最后协议。

毛泽东：这里是全部的往来信件，您可以看。

赫鲁晓夫：我不必看了。如果这件事通过苏共中央，也许就不会允许出现这样愚蠢的行为，也许会由我们负担来建造，但是在苏共中央，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出钱建造，那就算了吧。

毛泽东：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己建造这个电台，可以共同使用。您同意吧？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它会耗费许多钱。不要拒绝援助，不要让友谊干扰了工作。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共同分担负担。我们可以为电台建造提供贷款。你们可以偿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必偿还，因为你们也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建造这个电台不需要任何贷款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我们将来会需要的。

赫鲁晓夫：但是，首先是我们需要它。

邓小平：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建造，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也许是因为我们军方告诉我，中国人已经同意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中文的细微差异。他们一直感到奇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整个协议似乎已经达成了。

毛泽东：我们同意自己建造，但是可以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认为贷款还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援助。

毛泽东：如果你们坚持援助，那我们就不建这个电台了。

赫鲁晓夫：现在谈谈米高扬。我们对您的说法感到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同米高扬同志有着可能是最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他对中国有不忠实的行为，尽管有一些态度妨碍我们的友谊。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我们也从未看到这类事情。他在你们党代会上的讲话，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过的，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建议他把讲话给您看，采纳您的评论和意见是应做的事情。1954年我在这里谈话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讲话拿给您看，征求您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欢迎您的讲话，是因为它反映了平等的精神。米高扬同志的讲话也不是很坏，好的与不恰当的比例是9：1。讲话的腔调有一些像是说教。会议的一些代表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委婉地告诉米高扬同志这一点。当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的时候，这是一条毫无疑义的真理。但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米高扬讲话中的有些东西，就类似于老子同儿子的关系。

赫鲁晓夫：我最近没有重新读这些讲话，但是我记得我告诉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讲国际问题。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但是米高扬作了一些解释，我也表示同意。如果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情况，不能只归咎于他。我们都忽视了这些问题。

现在谈谈在西柏坡期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他的举止有些傲慢，好像他是一位监察官。

赫鲁晓夫：我感到惊讶。

毛泽东：我也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像老子对儿子讲话。

赫鲁晓夫：对此，我很难解释。您如果告诉米高扬，他知道如何倾听，如何注意以及如何得出结论。

毛泽东：他是一位好同志，我们将邀请他到我们这来看看。

赫鲁晓夫：他现在正在度假。

毛泽东：我们欢迎他在任何时候到中国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在他的讲话中找到了不恰当的东西。

赫鲁晓夫：他当时到中国来，是斯大林的指令。斯大林要求他每天都向他汇报，指示他观察您身边的每一件事，看看您身边有没有间谍。按照他的方式，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斯大林的动机是好的。当时斯大林坚持逮捕两名美国人，你们就逮捕了他们。斯大林去世后，米高扬说他们是无辜的，我们就此写信给你们，你们就释放了他们。您应该想到，米高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他不愿意做的，是斯大林想做的事。比如，斯特朗被驱逐出莫斯科，后来又恢复了她的名誉。我相信斯大林这样做是阻止她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斯特朗是个间谍。现在斯特朗要访问中国和苏联，我们不会反对，尽管她写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愚蠢的文章，你们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些文章。

毛泽东：我没有读这些报纸，但人们谈论过这些事。

赫鲁晓夫：我读过，并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毛泽东：是的，这个报纸当时控制在右派手中。

赫鲁晓夫：文章是直接反对苏联的，我们甚至当时想就此事写信给你们，假如它是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决定不值得写信了。

毛泽东：报纸属于右派分子，现在由我们控制。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没有问题了，但斯特朗是错的。

毛泽东：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局势已经得到纠正。

赫鲁晓夫：这是你们的事。我们也认为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我认为米高扬的事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他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在我们对他的态度上，对他的批评仅占十分之一。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你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100%正确？

毛泽东：超过90%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非常精通，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你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人，所以不会做蠢事，这方面您可以保证。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要求您做出保证。

赫鲁晓夫：但是你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他们来，他们做了蠢事，我还是得道歉。

毛泽东：你不必道歉。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

毛泽东：我的话只涉及个别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出蠢事。

毛泽东：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我们可不拿这个只是针对俄国人的愚蠢的专利证书。这种国家关系的状况会伤害到双方。但是对我们而言情况是不平等的。你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可是要我们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因为你们是最先完成革命的。

赫鲁晓夫：这就是我们的过错吗？

毛泽东：因此，你们不得不派专家。将来还得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时我们将一起承担责任并做蠢事，这样就一家一半了。

毛泽东：我们只是批评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顾问，并没有说经济领域。

赫鲁晓夫：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可能会犯错误，你们也不会没有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即使他们有时提出的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的不合适的看法，也不要紧。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难道你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说的主要是个别一些人，特别是经常调换顾问也不与我们商量。这方面的错误也不是很多。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你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想必是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的过失。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那样一场战争，具有那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只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担忧。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作人员与你们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作人员，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你们，不要支持他。卡冈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个别问题上对他有些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彼得鲁舍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要知道，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彼得鲁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人，杜鲁方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错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非常珍视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就不需要了。

赫鲁晓夫：你们应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军队政治机关，可我们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你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个别人。

赫鲁晓夫：那谁对这条线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你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的确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工作中的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恰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问题，你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英明。我让你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你们不想让俄国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不会永远是这样。你们却忍受了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这个人简直是个香肠，灌的什么，就倒什么。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待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待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4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你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毛泽东：对。这是一个坚强而理智的国家。应该给它援助。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还反对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我相信，我们应当讨论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一支舰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援助它——合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将同恩维尔·霍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某种形式的合作是必要的。请不要为此责备我们。

毛泽东：是的。同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赫鲁晓夫：没有。仅在波兰和匈牙利有驻军。当我访问匈牙利时，我向卡达尔提出撤出军队。他不赞成，仅同意削减一个师。他们在沿着奥地利边界部署我们的军队，但是奥地利人并没有威胁我们。我相信，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好，卡达尔是个好人。

毛泽东：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合作。您看，有多少军事基地，像钉子一样布满我们周围，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

赫鲁晓夫：是的。在欧洲又有多少？到处都是基地。

好在我们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

毛泽东：由于你们的火箭，我们还都活着。

赫鲁晓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人们这样说并不夸张。它威慑着敌人。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是好的。

毛泽东：我也这么看。董必武同志也是这样总结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会见了。他。

会谈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费德林和A.费列文

АПРФ, ф.52, оп.1, д.498, л.44-47

№2041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

8月1日于中南海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28]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29]

会谈开始前，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简短地回顾了一下上次的会谈。

毛泽东：在1954年，你们向我们要中国人，后来又不要了。

赫鲁晓夫：是的，是要过，但之后不要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并不是不足，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劳动。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甚至还有富余。

毛泽东：也许，我那时有些让你们失望了，中国人很难被同化。在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他们死了，还要把尸体运回中国，埋在家乡。不过，如果你们要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你1亿人。但如果他们留在苏联，那么将会很好地组成一个团体。

赫鲁晓夫：在我们西伯利亚地区有中国工人在工作。他们工作了3年并回到了中国，现在这些人又全部返回了苏联。

毛泽东：我讲的是历史。现在社会主义变革后，人们就改变了。

赫鲁晓夫：很多中国人甚至在我们那里结了婚。斯大林从前不允许结婚。

话题转到了国际形势问题上。

毛泽东：今天我们组织召开一个扩大会议，我想提出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我们两党关系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我们两党的基础。但无论是在我们两个党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是不同的。虽然很小，但还是有差异。当然，在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两党有着共同观点。甚至在民族、政党和国家消亡了，小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在座的所有中国人之间都有差异。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正因为他们争论、打架，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不要担心我们和你们打架。

赫鲁晓夫：看样子我得准备打仗啰，但今天这个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笑声)

毛泽东：但你们的国防部长在这儿呢。

赫鲁晓夫：可你们的林彪也在这儿呀。

毛泽东：想跟你交换一下对国际局势方面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很多困难。看上去他们很强，但好像古代中国的一个“三板斧”英雄。他只能打击三下，之后就失去了所有力量。我们说这完全合理，希特勒只砍了三板斧，蒋介石也砍了几板斧，美国和日本也就在最初厉害点。

赫鲁晓夫：别攻击日本。在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费德林，他将是苏联和中国在日本的代表。

毛泽东：好，我们将给他颁发国书，任命他为驻外使节。

美国人试图在朝鲜尝试自己的力量。他们到处调兵，总没调到，始终是7个师，从欧洲和本国都没调到，他们的人口少。而且士兵很多都娇生惯养。他们在战壕里吃巧克力糖，喝牛奶。但是，还是不能小视美国的战斗力的。

至于英国就更不行了，他的力量很弱，共有5万—6万军队。^[30]但它的主力有四部分：在中东有6万人，西德5万人，在本国和新加坡大约各有1.2万人。其余军队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像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德国。在新加坡和英国本土(包括爱尔兰在内)很少，主力在中间，两头很少。

美国的军队主要由三四部分组成，即美国、欧洲和太平洋。还有一小部分在黎巴嫩。据我们所知，在美国一共有19个陆军师。战争刚一打起来美国就会十分惊慌。从英国传来消息，因为英国军队很少，新加坡和远东又都完全暴露在外。只在西德剩下5万后备军队。现在美国人打算从黎巴嫩撤军，把约旦的英国人丢下，吊在梁上。

在黎巴嫩的空军是针对苏联的。西方对土耳其寄予厚望。在那里有12个步兵师和几个骑兵师。土耳其的陆军比英国强大。但是土耳其很慌张。将一部分土耳其部队用来防范保加利亚，一部分防范阿尔巴尼亚。还有一部分用来防范叙利亚和伊拉克。

英国、美国和法国还没有承认伊拉克，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联邦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已经承认了。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彼此祝贺。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聚会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和中东事件。这次的中东事件很好。从前我们什么时候能像这样揭穿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没有参加军事行动，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2年它才来。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自己越来越积极行动了。他们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在朝鲜和黎巴嫩的行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朝鲜他们好像是反对侵略者，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安全的保卫者，因为是金日成先发动的进攻。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中国人应该知道，周恩来知道。

周恩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同志也知道。

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很难抓，现在已容易抓了。在中东谁也不招惹他们。但他们却宣称，在黎巴嫩和约旦有间接的侵略者。没有进行动员，他们便将自己欧洲、地中海、非洲和太平洋的部队投入了战备状态。而且这一切作战准备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报纸和广播中大肆宣传，调动了哪些军队，将其调到了何处。但是之后，又下达秘密指示，从6月15日起不准许部队之间使用无线电波进行公开联络。从6月29日起，北约地区、地中海和太平洋西部地区除外，其他地区命令取消，无线电联系重新开始。在这些国家和东太平洋地区军事准备情况非常好。

他们到处吹嘘的这次行动调集了多少部队呢？一共1.2万人。他们的部队现在部署在三个地方——黎巴嫩、第六舰队的军舰上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共有1个营由太平洋地区被派出，途经新加坡现在已经到了印度。看来，他们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运送部队。虽然宣布在美国的4个师将被调走，但目前他们显然还在美国呢。

在西方，人们经常称美国为山姆大叔，苏联是熊，法国是姑娘。我看有点像。美国极力表现出强大，实际上它已经未老先衰，一共才170多年。资产阶级已经衰落了。除蒋介石和李承晚外，还有谁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还害怕，那样惊慌？尽管他们表面好像很强大，尽管在那里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麦卡锡主义、非美调查委员会等就是证

明。美国比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害怕。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很大。但那里的资产阶级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恐惧。

这次美国在中东完全惊慌失措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他们的第六舰队还能在黎巴嫩海岸停留一个月。你们的报纸上说，美国的军舰停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插手中东事务。我看，这完全正确。否则伊拉克事件刚爆发，他们一天都不想等，就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伊拉克革命发生在早晨三四点钟，而艾森豪威尔在当天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并且得出结论：如果不向那里派遣军队，那么就会失去整个中东。

赫鲁晓夫：他们想的是对的。

毛泽东：他们急躁不安。他们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决定做个样子，表现出强硬，并好像要进行战争。实际上他们只集结了1.2万人的部队，企图吞下伊拉克，然后拿下整个中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场暴风，掀起了反美浪潮。

我们在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表示出不满。这些国家在最近的事件中表现得比苏伊士运河危机更谨慎、更沉稳。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实际上北欧4国家、荷兰、加拿大和卢森堡都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支持美国的有：英国、黎巴嫩——更确切地说是黎巴嫩的一个总统、约旦的国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共7个国家，包括美国。而承认伊拉克的，首先是巴格达条约的参加国。世界上有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在伦敦召开了巴格达条约国会议，本来是讨论侵略伊拉克的问题，但结果是承认了伊拉克。杜勒斯去了德国，企图向西德政府施压，但他刚离开，德国便承认了伊拉克。

赫鲁晓夫：西德在伊拉克有重大利益。

毛泽东：美国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最独裁的国家。在自己的行动中，除与英国商量外，没有同任何国家商量。但英国并未紧跟美国，他们的军队进入约旦迟到了。我想，英国会很高兴，在这件事上让美国领先了。如果美国人从那里撤军，英国在约旦就会很难受。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你对戴高乐的信，并注意到，法国宣布将派军舰到黎巴嫩。他们否认这是显示力量，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军舰派到那里是为了检查法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如何。好像为此就应该派2艘军舰。我认为，法国人是想介入此事，而美国不让它参与。在宣扬艾森豪威尔

主义的时候，杜勒斯说，他认为在中东行动最好不让英、法参加，他们的名声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已经搞臭了。在这次美国人只打算让英国参加。而法国人则被拒绝了，走开了。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改变口气。

美国军队暂时还没有从黎巴嫩撤离。那里进行总统选举并已经出现传言，说美国人要从黎巴嫩撤军，可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不安了，因此美国人说，他们将后勤部队留在黎巴嫩，为英国人提供后勤保障。

赫鲁晓夫：那是谁说的？

毛泽东：新闻就这么报道的。

我想，美国打算从那里撤离，这种传闻是可信的。显然，即使不召开政府首脑会议，也要召集安理会，再不行还有联合国特别会议。从前并没有期待这个会议，尽管是苏联首先提出召开会议的这种倡议。我不知道我的情报准不准，但美国对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立场，好像并不积极。是什么让他们推延会议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因为他们想先撤兵，哪怕是只从黎巴嫩撤一半，那么他们的威望也会有所提升。那时他们将会说：“我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缓和局势，而不是打算进攻伊拉克。”如今黎巴嫩已经选出了总统，而且哈马尔舍尔德在那里的观察团也在扩大。

赫鲁晓夫：这就是说，美国赞成伊拉克的方式。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进来。

毛泽东：我想，黎巴嫩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进，而不是按照美国的道路。谢哈布 [31] 在那里当选了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在那里应该是一个穆斯林教徒。我记得，在黎巴嫩的反美力量中，有许多是中间派的力量。这样，如果夏蒙 [32] 是个明显亲美分子，那么谢哈布则持中间立场。为什么黎巴嫩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美国人在黎巴嫩已经暴露了。黎巴嫩的民族革命并未受到损失，现在国家已经分裂为亲美和反美两派。这就是美国人做的好事。我们很感兴趣的是，英国的6万军队在约旦将怎么办？英国人比谁都疯狂。

现在他们又像从前的那种倾向，只要英国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就会拿起武器。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没有同自己的同盟军——美国商量。

赫鲁晓夫：不，他们商量了。

毛泽东：商量了，但没商量好。

赫鲁晓夫：这里问题很复杂，可能他们就分配角色的问题商量好了，为了不让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占优势，而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反对派力量吸引到美国一边。

毛泽东：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美国不希望与英、法一起来搞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出现了碰撞。

赫鲁晓夫：对，有这方面原因。英、法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当美国与英、法搞在一起的时候，阿拉伯人民就会了解事情真相。这就损害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毛泽东：对，那次英、法两国很尴尬，因此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事件的发展就像个台阶一样，美国站在第一级上，英国站在第二级上，随后法国也被牵扯进来，但最后还是没有让它参加。疯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是最愚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后果，尽管他们担心人们将其当作侵略者，而全世界都说他们是侵略者。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进行表决，就可以给一些国家施加压力，多搞些赞成自己的票，像加拿大、日本。这显然是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阶级属性而造成的。赞成他们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蒋介石和前伊拉克代表将会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些赞成票将是其他一些被说服的代表。

从前任何时候，朝鲜战争除外，美国人都没有遭受过大的损失，并且始终扮演卫士的角色。美国没有考虑到这次他们被揭穿。刚抓住一个稻草，美国人抓住了日本的提案。^[33]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表示感谢，这并非什么新闻。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人向日本作揖。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赫鲁晓夫：显然，日本是根据美国的意图提出的。因此美国人由于日本的关键性行动而感谢他。日本的提案为美国人挽回了面子，并且使美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讨论就撤出。也就是说，美国的意见是被日本人提出来的。

毛泽东：这说明，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他们的困难多，占的地

方大，人口少，一共1.7亿，他们的兵力共260万。其中步兵80万，也就是说步兵、海军、空军各占1/3左右。我同意你的意见：美国的海军是为了吓唬人的，空军有些用。在美国大部分是后勤部队。在第一线可以活动的有19个师，不到30万人。

马利诺夫斯基：从前1个师有1.7万人，现在实行五单位原子师制，减少至每个师有1.2万人。

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刚从德国休假回来，他得到的情报是最新的。

毛泽东：美国把驻西德的第24师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调到黎巴嫩去了。

赫鲁晓夫：所以才破坏了奥地利的领空。

毛泽东：美国这次彻底露馅了。依我看，美国不想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同美国是协调一致的。这是我们的路线。

赫鲁晓夫：杜勒斯是我们的代表，同傻瓜打交道要好于同聪明人打交道。

毛泽东：我不开玩笑，这人的确不错，对我们有利。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我们在一起喝过酒。

毛泽东：但那时很猜忌艾登。

赫鲁晓夫：艾登这个人是西方政治家中最聪明的。

毛泽东：现在艾登做了蠢事。

赫鲁晓夫：是的，走进了死胡同。

毛泽东：麦克米伦的处境还好些，他还没有走进死胡同，但是也接近了。

赫鲁晓夫：是的，损失还在最小的程度。在召开大国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会采取拖的态度，现在不想召开，因为现在召开的话，其结果只能对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有利。要开成的话，也是在英国大选的前

夕，这对麦克米伦有利，迎合英国舆论界的要求，可以争取大部分选票。在大选中，保守派可能得胜。

毛泽东：是否有召开会议的可能？

赫鲁晓夫：是的，但会稍晚些。英国议会大选前。麦克米伦感兴趣的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像一个同俄罗斯调和者。并且那时候保守分子得到多数票。

毛泽东：你对戴高乐这个人怎么看？

赫鲁晓夫：是个坏人，半个法西斯。

毛泽东：难道比摩勒还坏？

赫鲁晓夫：一样坏。

毛泽东：依我看，他好一些，因为他与美国和英国存在分歧。

赫鲁晓夫：对，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而言，戴高乐比摩勒对我们有利。在国内，他代表最反动的势力。

毛泽东：应该说，最反动的势力。难道从前在国内反动势力还少吗？

赫鲁晓夫：摩勒是社会党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群众和工人的意见。而戴高乐是自由党人。他依靠军队和大资产阶级。戴高乐实行更厚颜无耻的政策。

毛泽东：这是正确的。你看戴高乐能否继续当选？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力量对比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法共正在动员工人阶级说：我们不接受。能否推翻，决定于这一点。人民不接受，有可能被推翻。但也有可能搞军事冒险。目前法国的阶级斗争最尖锐。

毛泽东：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第一，法共要坚决反对戴高乐，但是从长远来看，戴高乐执政有好处。人民对他有幻想嘛。他下台，谁来代替他？还不是那些寿命只有几个月的政府。这样，人民还会想他，他还会上台的。他上台最多也只能搞三五年嘛。法共自由惯了，让它锻

炼一下。让毒素放出来。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考虑到戴高乐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并在自己政策中加以利用。

毛泽东：我们既反对戴高乐，又赞成戴高乐。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戴高乐的文章，《真理报》也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

赫鲁晓夫：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真理报》是党的一个工具。

我们甚至有误会。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对我们没有严厉批判戴高乐表示不满。

毛泽东：可以对他们说：戴高乐越反动越好。

赫鲁晓夫：我们向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出头评论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我们公开反对戴高乐，而法共也在反他，敌人就可能污蔑法共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戴高乐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不是对英、美有利。法共政治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报纸登了杜克洛 [34]、多列士的文章，使苏共党员和舆论界正确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问了法共政治局：你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

毛泽东：我想补充一点。从国内局势来看，戴高乐执政也有利。要准备人民否决不了，怎样向工人解释。这次否决了，他还会上台的。

赫鲁晓夫：法共讲，在国内它可以控制，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无法控制。戴高乐上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

毛泽东：希特勒上台也是必然的现象。它是一股毒气嘛。乍一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欧洲8个国家的解放，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希特勒上台，怎能搞出易北河以东这样一大片地区？当然，你们的牺牲很大。我在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他们常向我讲，“日本侵略了你们，我们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我说，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侵略，我们就不能进北京，你们走了，我们才来了。这一点没有公开登报，但在我的文章里写过，日本人做了好事。

赫鲁晓夫：历史是正确的。

毛泽东：可能，全体法国人民都很难理解，但需要让法国工人和共产党不要害怕戴高乐上台。对人民来说，困难只是暂时的会。

赫鲁晓夫：是的，一方面精神上做准备，但同时大力动员群众反抗戴高乐。

毛泽东：当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灰心。

赫鲁晓夫：同意你的这些分析。我记得，在莫斯科周恩来与胡志明同我讨论越南问题的时候，胡志明认为，法国人要将他打败了，请求向朝鲜战争那样派遣自愿军。那时，周恩来同志说还是不派志愿军好，我们当时商妥不把这个决定告诉给胡志明。我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反对胡老的阴谋。(笑声)和这一样，我看还是不告诉法共好，免得影响他们的斗志。

毛泽东：有些同志有时在假象的后面分不清事物的实质。例如，胡志明同志，在奠边府拿下来以前，没有看透法国的软弱。

周恩来：是的，我想起来，我们在莫斯科是如何商谈妥的。法国人后来在日内瓦做出了很大让步，向胡志明让出的领土比我们设定的大。这也体现出他们实力较弱。我们为此要感谢孟戴斯弗朗斯。

毛泽东：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时候谁预见到，从易北河到千岛群岛，到朝鲜的三八线，再到越南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这样一说，你是想给希特勒立一个纪念碑吧？(笑声)

毛泽东：是啊！应该给希特勒、蒋介石、日本天皇立纪念碑。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两个老师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变聪明了。需要两个老师教育。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人，我们就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谁想到会出现吴努、苏加诺、纳赛尔领导的新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这个人就有些冒进，他老说革命就要实现了，即将实现了，但一直没有实现。

列宁的话实现了，但在中国革命这样快就胜利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局势与马克思和列宁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美国外强中干。中

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赫鲁晓夫：这次胜利的后果会是很大的。请允许我谈谈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我同意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过你只是算了美、英的陆军。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并不在人力上与我们较量。它们是在原子弹、导弹、氢弹、飞机和其地方面与我们较量的。有生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来讲是不算数的。在目前条件下，双方对垒打阵地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毁灭后方的工业中心，力量表现在导弹上。在估计力量时，不仅要算在黎巴嫩港口登陆的力量，还要考虑第六舰队的原子弹和导弹的力量。这样一来，力量是很可观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在黎巴嫩登陆以前向我们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他说几天以内可以把苏联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通过塔斯社宣布，我们在三个地方搞军事演习。在伊朗国境上，派格列奇科元帅去。在土耳其国境上，派梅列茨科夫元帅去。

毛泽东：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人。

赫鲁晓夫：一个是年轻的元帅，另一个是老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已经老了，走路都很困难，但人们都知道，他战前是苏军的总参谋长，打日本的时候他是率军从东路进攻的，他的名字完全与那个公告联系在一起。另外，同保加利亚同志一起搞联合演习。我们派了几个空军师去，由斯克里普科元帅率领。过去搞演习没有宣布过，这次宣布是为了钳制西方。我们说，只投几个导弹，土耳其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人才去土耳其，给它打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总司令在此之后安慰土耳其说，别怕，俄国人打你，我们在第50天就去帮助你。土耳其人说，那时你们来参加葬礼好了。后来，土耳其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总统、总理、外长都向我们有所表示。我们得到材料说：伊拉克胜利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准备立即进攻伊拉克，要求美国在道义上给以支持。美国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它说伊拉克已经胜利了，伊拉克国内很团结，土、伊的边境是山区，你们一下子打不垮伊拉克，战争会拖下去。主要意思是怕打仗。这个情报是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我知道第六舰队司令发表的演说，是诺尔斯杰特发表的吧？

马利诺夫斯基：那是在叙利亚危机的时候。

赫鲁晓夫：力量的对比在近东有利于西方。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

主义，人家不听，于是就要打伊拉克，但结果承认了伊拉克。这是道义上的失败。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完蛋了。阿拉伯人明白，不值得采取黎巴嫩和约旦的方式，要采取伊拉克的方式，因为美国承认伊拉克的方式嘛。

毛泽东：是的，瞬间就实现了革命。

赫鲁晓夫：有趣的是，现在伊朗人和土耳其感觉怎样？当费萨尔 [35] 被砍头的时候，美国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动。这样，反动力量就失去了信心，危机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帮助？

我们一枪不放，就赢了美国三次：第一次是苏伊士运河；第二次是叙利亚；第三次是伊拉克。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克。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集会庆祝啊！

赫鲁晓夫：伊拉克政府里有3个共产党员。暂时还不清楚事件的进展。纳赛尔想使伊拉克走埃及的道路。这对我们并无害处，但让步也是不可以的。不能让埃及像对待叙利亚一样来对待伊拉克，使其加入阿联。要使伊拉克保存多个政治党派并建立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这是最好的方案。

赫鲁晓夫：是的，马克西姆方案。如果他们将伊拉克并入阿联，这即使不是失败，但也意味着将要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不应该屈服，应纳赛尔的倡议我与他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待了多久？从哪来的？

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来的，在我们这儿待了一天。事情是这样。他在南斯拉夫结束访问后，坐快艇去埃及。这时伊拉克爆发了革命。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直到事件结束了，他才知道这一切。南斯拉夫大使拜见我，并转达了纳赛尔和铁托的请求，希望苏联提供飞机送纳赛尔回埃及。铁托说，纳赛尔坐快艇回国，有可能被美国俘虏去。在这里他是对的。当铁托向纳赛尔转达俄罗斯人提供飞机后，过了2个小时，南斯拉夫大使再次到我这里来请求会见，并且说纳赛尔想来会谈。纳赛尔与我会谈，这一点铁托是不高兴的。纳赛尔是深夜来到的，夜里，我们俄罗斯人并未像中国人那样睡觉了。与纳赛尔商量好，在第二天早上10

点举行会谈。会谈过程中只休息了2个小时。他想同自己的外长法齐商量，这是一个聪明人。晚上会谈重新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纳赛尔离开。因为担心飞机被打下来，我建议他经南斯拉夫飞回，而经过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纳赛尔说：“对，但如何才能得到允许？”

毛泽东：从前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吗？

赫鲁晓夫：我担心伊朗一天之内不能发下许可。我们与纳赛尔商量好，我们来同伊朗说，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由他来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允许过境飞行，那么将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纳赛尔担心伊朗人将飞机打下来。我们安慰他，这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战争。当把伊朗大使召到外交部佐林那里时，他一进门就发抖，以为我们要向伊朗宣战。

毛泽东：如果是我，我也要发抖。

赫鲁晓夫：佐林告诉伊朗大使，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团坐飞机去埃及签订文化协定。大使回答说：我立即报告给我国政府，我相信政府会同意的。飞机起飞了，沙特阿拉伯不同意过境。纳赛尔说，不同意，也过。我回答他说，我不同意，这样他们会说我们不尊重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会把我们自己束缚起来，无法抗议美国破坏奥地利的领空。我们命令机长只能去大马士革。纳赛尔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同阿列夫 [36] 进行了会谈。阿列夫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很反动。显然他们谈的是如何反对我们。

与纳赛尔进行会谈时，我对他说，让他以个人名义劝告伊拉克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伊拉克将严格遵守以前同各国签订的协定，照常供应石油。这样在西方可以造成一种错觉，对我们有利。这样做，仗就打不起来了，否则现在要打仗。西方有关国家的舆论会说，你看人家照样供应我们石油嘛。至于政变，那是人家的内政。纳赛尔听了很满意。

毛泽东：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赫鲁晓夫：但伊拉克派去联合国的代表说，伊拉克并不退出巴格达条约，这并不是我们建议他们这样表示的，但这也对我们有利。伊拉克希望我们派遣大使，但是因为我们的大使与他们国内有广泛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马上到任。看来，这是纳赛尔的影响。他们想在我们的大使到任之前削弱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府内的力量。纳赛尔怕我们直接同

伊拉克接触。伊拉克的武器很不好，我们说我们可以帮助。纳赛尔说，你们可以把武器交给我，由我转交。我们想直接交给伊拉克，不经过纳赛尔。

毛泽东：实际上运了吗？

赫鲁晓夫：是的，经过叙利亚。是经纳赛尔同意的。我们并不反对纳赛尔。但我们希望武器直接运到伊拉克。现在我们正暗中与纳赛尔进行斗争，但这不是主要的。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可以同意通过纳赛尔转交武器。主要的问题是保护伊拉克。在任何情况下，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毛泽东：伊拉克加入大阿联是完全可能的。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将共产党员交给纳赛尔来随意支配。现在共产党在伊拉克有很大影响。根据伊拉克共产党中央的计划，革命发生了，卡塞姆 [37] 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并未使纳赛尔满意，因此很可能他的命运会像纳吉布 [38] 一样。

毛泽东：请讲一下纳吉布。

赫鲁晓夫：纳吉布曾领导起义反对埃及国王，是埃及的总统。纳赛尔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将其囚禁在家里。

毛泽东：纳吉布不是亲美分子吗？

赫鲁晓夫：不是，他与纳赛尔观点完全相同。因此，很可能纳赛尔会不信任卡塞姆，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

毛泽东：关于这点在西方报纸上已经刊登了。

赫鲁晓夫：因此可能让阿列夫取代他。卡塞姆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在1956年，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卡塞姆领导的那一个师打算利用国王和总理在一个节日去他的师里检阅的机会，把国王和总理打死，取得政权。后来，国王去了，总理没有去，卡塞姆怕把国王杀了，总理不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我们想这个情报可能是英国人的挑衅。他们的政变当时未能实现，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建议。这次卡塞姆奉命带兵去约旦，途经巴格达时搞了政变。纳赛尔可能达到目的。伊拉克共产党可能支持不住，因为伊拉克工人的

觉悟很低，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使他们失去领导。

毛泽东：伊拉克的共产党难道不强大吗？

赫鲁晓夫：不出现意外的话，伊拉克共产党将失去领导地位。该国的阶级觉悟还很低。

毛泽东：伊拉克600万人口，有6万共产党员，这还少吗？ [39]

波诺马廖夫：没有，伊拉克共产党一共才有一二千人。这是在地下活动的时候，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情况。

赫鲁晓夫：现在我们力争尽快向那里派出自己的大使。

毛泽东：如果他们不接受你们的大使，怎么办？

赫鲁晓夫：他们会接受的，但是他们想拖延我们大使派驻的时间。

波诺马廖夫：已经得到伊拉克同意苏联大使赴任的消息了。

赫鲁晓夫：很好。这可能是我们给在埃及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下指令的结果。他已经被委任为驻巴格达的参赞。他从叙利亚去了巴格达，并且我们在伊拉克设使馆可以同伊共保持联系，至少能把我们的观点告诉有关方面。

毛泽东：你讲得很好。我们已经转到了问题的实质——有关工作的方法。你们的方法好，因为很灵活。你们将诺尔斯杰特的反苏言论变得对自己有利。现在你们的策略很成功。当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被消灭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说过，双方都怕。不可能不害怕，否则就我一个人害怕。问题是谁更害怕些。我几年前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是西方更害怕。我能在诸多的事件中验证自己的说法。有时候一些事件对我的看法不利，但多数时候还是符合我的观点的。

在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我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西方外交的动向。葛罗米柯回答说，他的印象是那些王八蛋表面很神气，实际上他们心虚得很。我想，这就是我逻辑论证的理由。

赫鲁晓夫：埃及战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西方曾经两次把我们引到

战争的边缘，即埃及一次和叙利亚一次，但都未打起来。

毛泽东：对，那时候在会谈中，我曾经说过，苏联派志愿军的问题最好不要宣布，以免自己被动，吓唬一下，他们就不敢了。葛罗米柯不知道怎么向纳赛尔解释，如果不得不派志愿军。我问他，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能否派遣志愿军？他那时回答，如果派了志愿军，将会引发战争。是否相信这点？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在朝鲜这么做过。

赫鲁晓夫：在同我会谈时，纳赛尔向我表示过，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埃及主动参战。我说不赞成，我举中国的经验。中国没有正式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却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我们在那里有150万人。

赫鲁晓夫：我对纳赛尔说，在志愿军的名义下，埃及可以派全国所有部队参战。纳赛尔不同意。

毛泽东：依我看，美国人我们的敌人赞同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按他们的观点，最好同志愿军打，而不是与国家打。依我看，总的来说，最好不派志愿军。但如果发生战争，那就可以这么做。有人说，志愿军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创造的。你们和美国都派兵帮助过蒋介石。如果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请您建议杜勒斯采纳志愿军制度。

赫鲁晓夫：我可以告诉杜勒斯，毛泽东同我谈过，他建议采纳志愿军制度。

毛泽东：但他不会同意的，我和他的交情不深啊。

赫鲁晓夫：但有时观点一致啊。

马利诺夫斯基：派志愿军有好处，关键在于，如果投原子弹的话，可以说我们是志愿军，并不代表我们的国家。这将对进行核战争具有实质性意义。

赫鲁晓夫：根据国际法不可以使用核武器。因为派出志愿军的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在与我会谈时，纳赛尔坚决不同意。纳赛尔问我：一旦打起仗来，是否宣战？我回答说，您是国家元首，可以独自决定，而我不是国家元

首，因此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我劝说他，他明白，我不想向他保证。我说现在解决那样的问题还早。也许没有实施打击就赢得了战争。一切均取决于条件。纳赛尔向我们要轰炸机和导弹。我们没给。我们说，这些武器在我们手里比在你们手里更有效。他向我们要60—70公里的中程导弹。我们说中程导弹是2000—2500公里。

纳赛尔提出对本次会谈发表个声明。他说，在西方会晤后就发表声明，而我们能不能那样做？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是的，这很有利。

赫鲁晓夫：然后，纳赛尔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制造舆论，赫鲁晓夫说了这，说了那。这都不是真的。

毛泽东：记者的证据并不是准确。

赫鲁晓夫：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接见了印度记者。他们向我提问，我向纳赛尔做出了那样的声明，是真的吗？我回避了该问题，没有说是或不是，让他们自己猜。

毛泽东：我想，在斗争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我想，当我说我们与资产阶级阵营对比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时，我故意绕开了导弹武器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补充。昨天我问你，在你们和你们之间导弹数量的差额时，你说，差额不大。

赫鲁晓夫：是的，差别主要在于质量。

毛泽东：你说生产导弹很贵。

赫鲁晓夫：是的，是很贵，但是应该生产，并且我们将继续生产。

毛泽东：打仗的时候，我们将从你们那拿导弹。

赫鲁晓夫：到时候你们自己就有导弹了。

毛泽东：我们国家很穷，很难说，将来能不能有。

赫鲁晓夫：谁说的，你们的国家穷吗？你们的国家的财富是人。你们的国家能够生产出作为财富的孩子。

毛泽东：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我们两国背靠背。我们都向前看，不担心自己的后方。你们可以向前看，不要担心自己的后方，因为我们可以保护你们，这很好。

毛泽东：所以才在齐齐哈尔建设工厂。

赫鲁晓夫：要搞个潜艇工厂。

毛泽东：一定搞，借助于你们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你们的帮助。

赫鲁晓夫：是朋友往我的菜园子里投了一束荆棘。

毛泽东：你想让我们清除它？

赫鲁晓夫：没关系，我们会轻装前进。

毛泽东：也许，你还没看清，这不是荆棘，而是抛了一把金子。

赫鲁晓夫：别人的金子我们不要。列宁说过，革命胜利以后，金子就没有用了，只能用它盖厕所。

毛泽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厕所时，我们将助你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那是啊！让我们一同来建设吧！那时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是中国的，不可能是俄国的，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的，而是世界的。

毛泽东：那时候联合国怎么办？

赫鲁晓夫：将飞到天上去喽。

毛泽东：我建议在船上建一个水上城市，从各个国家派代表到那里。

赫鲁晓夫：对那时要有一个中心，组织、协调经济条件。你们会让谁去划船。

毛泽东：我们自己划船。昨天你在顾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吧。

赫鲁晓夫：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上，要我们的顾问，还让我们因为他们而受批评。

毛泽东：到那时候，我们不带任何人上船。

刘少奇：我们只是当面提，背后我们不向任何人讲。

赫鲁晓夫：最好让我责备中国顾问，让毛泽东听。

毛泽东：昨天你说，你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谁让你们是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赫鲁晓夫：这就是出错的原因，为此我们总要受中国人的责罚吗？

毛泽东：这是列宁弄的。

赫鲁晓夫：但他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他留下你们来处理。但是列宁无处不在。他现在在哪？也许在美国的第六舰队上空？

赫鲁晓夫：在中东，第六舰队是个幻影，如果没有苏联在那里，它就蛮不讲理，现在它担心受到呵斥。

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敌手任何时候都不会大声喊叫的。

毛泽东：对，正是这样美国才在全世界大声喊叫。

赫鲁晓夫：一个人在森林里走，感到害怕的时候，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吹口哨。

我想，我们需要在地中海采取积极的政策。就如我昨天所说，需要积极地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要搞导弹、飞机、潜艇、装有导弹的快艇以及装有导弹设备的海岸工事等等。到那时，我们再看看美国的第六舰队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中东事件中，南斯拉夫持什么立场？

赫鲁晓夫：这次态度还好，但是不够。它一方面讨好纳赛尔，一方面也要保持西方的面子。这个立场，铁托是不会改变的。我请纳赛尔说

服铁托，让他同意和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黑海沿岸的国家一起搞军事演习，一旦和平遭到破坏，采取共同行动。纳赛尔说，铁托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什么朋友？

毛泽东：纳赛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铁托商量好吗？

赫鲁晓夫：当然没有。这件事不可能与铁托商量好的。但我也向他友好地扔了一个荆棘。

会谈记录：H.费德林、A.费列夫

АПРФ, ф.52, оп.1, д.498, л.78-107

№2042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 (1958年8月2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三次会谈

8月2日于丰泽园 [\[40\]](#)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41\]](#)；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42\]](#)

毛泽东简要地谈了一下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通报了钢铁和黑色金属生产的情况。

赫鲁晓夫谈了苏联本年度生铁产量增长了470万吨，并指出，在苏联按总产量来说，钢还比铁多些，因为我们还用废钢炼钢。

毛泽东：中国现在没有用废钢炼钢，因为我们还没有废钢。

赫鲁晓夫：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在工业化初期会生产更多的生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钢。

会谈转向国际问题。

毛泽东：今天可以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3个集团包围着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西方人宣传是防御性的，我们宣传是进攻

的。我看，两种宣传都是对的，是符合双方的需要的。他们不好宣传是进攻的，我们也不好说是防御的，实际上该如何评价？我记得，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就像生过肺病的人一样，在生病的地方长了疤，在周围形成了钙化组织，防止细菌渗入别处。我看，这些组织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灭亡，从而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有时，他们是进攻的，譬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要不是我们反击的话，他们都可能把军队开进匈牙利了，然后再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展开斗争，都可能会引发大的震动。谈到进攻，我指的是在他们对他们有利时机，给了他们思考的机会，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不消灭我们。这样有利的时机，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后来他们做事更现实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和中国搞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匈牙利事件是个教训，我们能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政权更巩固，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你曾经说过，“钙化”是不稳固的，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细菌”是会渗入的。你记得这些话吧？

赫鲁晓夫：我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你说得对。他们的组织是不牢固的，这次中东事件证明了在他们的阵营中缺乏团结。

赫鲁晓夫：这次在巴格达的街上砍下了国王费萨尔的头，美国人向土耳其和伊朗说：“如果你们这里也发生伊拉克事件的话，我们来帮忙。”这就是说，在国王的头被砍下来以后才去帮忙。我认为，这种帮助是软弱无力的。马尼拉条约是个软弱的组织。它的情况就像巴格达条约一样，这个条约的背后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北非国家。

毛泽东：换句话说，巴格达条约夹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更何况墙角本身也不巩固。其主干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东面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那里的情况也很不牢固。

赫鲁晓夫：譬如在泰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他们的国会反对外国在泰国建设军事基地，这很明显，甚至菲律宾也不巩固。

毛泽东：是的。马尼拉副市长现在就在中国。感觉他怕打仗，他

说，国内有很多军事基地，打起仗来就是个死。他试探我们的想法。这个人是菲律宾总统派来的，美国人想从中破坏，没有成功。他问我们能否卖机器给菲律宾，看来，美国人不会卖机器给菲律宾。都知道，甚至菲律宾国会中反对党领袖也要访问中国。

陈毅：美国未必能完全控制住菲律宾。

毛泽东：泰国这边也希望不大，这面墙也不牢靠。这种不牢靠在于两面受敌：一面是中国，一面是印度、缅甸、锡兰。他们的3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至于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情况，也是两面受敌，而且都是强大的敌人。这首先是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还有一个第四泛美同盟，但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

过去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不是太明确。有时我们在强调民族独立运动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我们把三者一起提。我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

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彼此闹矛盾。美、加的情况，你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美国企图在经济关系上打压加拿大，称之为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因此在加拿大发生了执政党的更替，反对美国统治的保守党取得了执政权。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北约和巴格达条约国家离我们更近，似乎北约国家的侵略力量更强大，他们有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削弱了。例如，在准备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戴高乐所持的立场就有些特别，这不是分裂，但也并非一致。这个集团的基础已经动摇了。美、英在拼凑这个组织的时候，散布了一些地方的现象恐吓他们：一是战后，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二是朝鲜战争；三是封锁柏林；四是越南战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扩大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开始谈论要建立防御性的

组织，于是就签订了3个条约。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朝鲜战争结束了，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为和平共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在芬兰的军事基地，签订对奥地利和约和撤出驻奥军队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等。基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连英国工党都说，苏联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这很重要，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工党搞起来的。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是侵略国家，这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苏联的武力行为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使得我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动摇了他们的基础。甚至在美国现在也有人说，我们将不通过武力解决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执，不是用导弹和氢弹来解决，而是用意识形态。诚然，尽管用了这个词，但他们所说的并非真的是“意识形态”，而是指通过经济手段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来打败我们。这样，通过恫吓小国，使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失去力量。这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挪威和丹麦拒绝在本国建立导弹基地。

毛泽东：这很重要。是否可以说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将成为一个和平地区。

赫鲁晓夫：现在还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在法律方面挪威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参加国，芬兰和瑞典不是。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政策分化这些国家的人民，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好感，缓和我们之间的国家关系。我们还要继续分化他们，组织运动削弱北大西洋公约。荷兰和比利时也是一个不稳固的、薄弱的环节。

毛泽东：还有卢森堡。

赫鲁晓夫：是啊！卢森堡是最可怕的对头。

毛泽东：这也是个薄弱环节。

赫鲁晓夫：希腊只是在形式上加入了北约，它与土耳其、英国都有矛盾。

毛泽东：正如所报道的，最近几天在塞浦路斯有几千人被捕。

赫鲁晓夫：为争这个岛，正在进行一场争执，希腊要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则主张在土、英之间瓜分，所以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很高。在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民主政党在这

件事上表现得很积极。

美国是这些侵略性条约的组织者，它强使条约的参加国维持巨额的军事开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美国的援助都是军事援助。它每援助1个美元，受援国就要付出5个美元。美国根本不给这些国家什么经济援助的。如果援助的话，也只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怕这些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与它竞争。

甚至在北约各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受到了强大的抵抗。这些国家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联系，反对禁运。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同西德的克虏伯公司签订了协定，向他们购买两个化学工厂的设备。这个公司在某些塑料的生产方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连美国也向他们购买了设备。在我们购买的设备中，有些是属于禁运项目的。为了逃避禁运，该公司代表建议在协定中写上这部分设备是根据苏联的图纸制造的。我们同意了。其实，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图纸。如果我们今后的政策是明智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是可以被我们瓦解的。当然单靠明智的政策不够，还要有实力才行。今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震动了西方。我认为，在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整个东方起作用。

毛泽东：是的，这是共产主义细菌的渗入。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装甲可以防止这种渗入。

我们现在要做工作，争取西德。方法是通过东德和西德的竞赛。东德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但是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我们放弃了东德负担的那部分苏军驻军费用。我们准备多给东德订单，使他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就业。

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使它成为吸引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力量，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当然，阿尔巴尼亚很小，不是一个典型。

毛泽东：它是阿拉伯民族吗？

赫鲁晓夫：不是阿拉伯民族，但是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在接待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方面有优势。因为我们南面的几个共和国，像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共和国的生活水平很高，工业很发达，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也很高。接受代表团对我们有好处。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是想影响我们，腐蚀我们，现在他们派代表团来苏联则怕被我们影响。而我们在完成重工业规划的同时，如果我们在生活建设、食品生产、化学品生产方面完成了自己的规划，那么10—15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

毛泽东：是按人口计算么？

赫鲁晓夫：是的。这对西方的知识界影响很大，不用说工人阶级了。卫星上天给他们很大的震动。落后的俄国在40年后的今天搞出了卫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战争的力量来消灭这些侵略集团，要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消灭它们。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芬兰过去是反苏的前哨，今天芬共是国会内的最大政党。

为了巩固自己在人民中的权威，芬共向我们请求援助。芬兰国内有失业，所以芬兰政府要求我们雇用他们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同意在苏、芬边境上由他们派工人给我们建设价值2.5亿卢布的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这样就解决了他们成千名工人的失业问题。芬兰的资产阶级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经济危机。我们说，能够向他们订货，但是拿我们的机械和原料作为支付的报酬。

挪威政府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打算在挪苏边境上建设个电站。挪威政府要求我们用他们的工人来建设。我们准备让他们来搞。

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这次也要求我们在经济上同他们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我们现在也在土耳其进行试探，虽然不是很积极。土耳其和伊朗怕我们就像怕鬼一样。我们也想在这些国家进行些工作。土耳其、希腊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伊朗和意大利比他们好不了多少。

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好，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局势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被抛在后面了。

毛泽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12年完成，现在看起来，5年就可以完成。已经过去2年半了。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我们的钢铁方面如果今年不能，明年就一定能够超过英国。尽管我们公开说在，在15年内赶超英国。煤今年已经超过英国了。钢去年是500多万吨，今年要搞1100万吨，明年2500万—3000万吨。英国明年的钢产量可能下降，最多也就是2200多万吨。如果不发生下降的因素，明年我们搞2500万吨，可以超过英国。

赫鲁晓夫：这是令人振奋的成果。应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高速度，而你们做的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规划，这对于你们的邻居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经常做比较。社会主义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建设，或者是慢速或者是快速。我们认为，我们所拟定的速度是比较好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

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是钢，一个是粮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是社会主义。一种方法是：少、慢、差。另一种方法是：多、快、好。采用哪种方法来发展？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并作为一场战斗，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来完成这个计划。人民满怀热情，并为提前完成这个计划而顽强斗争。

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1000—1500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

赫鲁晓夫：是人均1—1.5吨吗？这可是很多呀！

毛泽东：在报纸上我们说，在3—5年我们将达到1吨或大约1吨粮食。实际上我们将用3年时间超过1吨。可以做得时间又长又慢，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

赫鲁晓夫：这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连文盲也能找到这样的理论，因为他看到这是从前，那是现在。这对西方人的头脑和知

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把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印度取得独立比中国晚两年。而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当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并且确信他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速度可言。我对尼赫鲁说，看一看中国人的气魄。尼赫鲁请求我帮助其建设飞机制造厂。我对他讲，不应该只建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要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就需要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个工厂。他想要一个工厂，而中国建设了上千个工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团结，那么任何侵略集团都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很对。

赫鲁晓夫：我们请美国帮助搞化学工业，是一个宣传步骤。艾森豪威尔关于这个问题的回信很好，因为伊拉克事件的发生，我们没有发表，在这个时候需要发表一些坏的东西。有些美国公司愿意卖给我们设备，买我们的原料。如果我们的原料不够的话，这些公司还表示愿意给我们以公司的贷款。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指望他们的贷款来实现的。当然，如果给的话，我们也不拒绝。

毛泽东：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已经公布在美国的报纸上。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他们并未公布我们的那封信。如果他们公布了这封信，就会使美国人感觉可以挣钱，那就对我们很有利。

毛泽东：有个时期，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现在才明白，是要买他们的设备。

赫鲁晓夫：这是个策略步骤。美国人说我们只重视发展重工业，不重视生产日用品。我们发展化学工业有两个目的：(1)发展国防工业；(2)生产日用品。我们给他们回信说，你们既然关心人民的生活，那你们就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日用品的化学工业吧！他们考虑的是利润和怎样削弱我们的国防潜力。他们不会帮助我们。那封信是一个宣传步骤。我在德国已经说过了，美国是不会给我们援助的，铁托却大有希望得到援助。

毛泽东：讲得很好，很满意。总的来说，是发展自己，破坏敌人。

在东方还有一个地区，它在形式上没有加入集团。这与费德林有关系。涉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

周恩来：还有南越。

毛泽东：有这种可能，这些国家也许会组成一个东北亚军事集团。他们被绑在美国的车上了。这是美国人的首创。这个组织能否搞成，决定于日本。日本的困难是，搞，就要得罪我们。至于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早已得罪了我们。日本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我们同它的贸易关系，已经断了3个月，准备再断上3个月。他们通过四五条线来活动，想恢复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最近，日本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他们甚至通过苏联商会的人来劝我们。怎么你们还有一个商会呀！目前不准准备恢复。如果恢复的话，好事要让给日本社会党来做。这次不准准备恢复，再等一个时期。恢复要有3个条件：

(一)长崎事件 [43] 要处理，要向我国道歉。

(二)政治上不从事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最近3个月岸信介对我们采取了十分粗鲁的行动。抨击和咒骂我们中止了贸易关系。我们劝他与美国和蒋介石进行贸易，因为我们不同日本进行贸易。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这个政治条件。

(三)不能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并不要求日本立刻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它应该促进而不应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暂时不承认中国，并不妨碍两国间的贸易。我们没有日本还活得下去；日本没有我们，并不一定活不下去，但很困难。

赫鲁晓夫：日本没有中国不行，中国没有日本可以。

毛泽东：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而且东南亚的1000多万华侨也抵制日货。

赫鲁晓夫：这种影响非常严重。

刘少奇：中国的资产阶级掌控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周恩来：这是指那些在印尼、南越、泰国、菲律宾部分地区、柬埔寨、马来亚、缅甸部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

毛泽东：形式上这是一国的代表，但实际上是两国的代表。

赫鲁晓夫：总之，如果把我们的政策用于东方和西方，那么可以归

结为一点，就是为了与所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文化联系，更广泛地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向我们派遣间谍，别当蠢货。总之，在保证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展开和平攻势，但是也要稍微吓一吓他们。

毛泽东：对，吓一吓很有必要。

赫鲁晓夫：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它离我们很远，与欧洲国家相比它的立场有些变化，但是它在我们附近搞了基地。我们向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说，你们的基地离我们很近，我们的也离你们很近。我们说，上帝离你们远，而我们就在你们的旁边。打土耳其，例如，我们声明：你们的朋友——美国很远，而我们却很近。如果需要，我们不用飞机和军舰，只发射一批导弹就可以消灭你。我们也是那么警告德国和英国的。他们明白我们的警告。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攻击，那么将不会有任何生物存活。但是我们不想攻击。

毛泽东：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那样想，如果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赫鲁晓夫：这是对的。

毛泽东：应该说清楚，谁会在战争中灭亡——我们，还是他们。

赫鲁晓夫：是的，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将是同资本家相联系的最后战争。

毛泽东：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首先，需要在道义方面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忙于和平建设。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怕战争的。战争并不可怕。如果谁将其强加于我们头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行战争，那么就过来吧。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苏联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我们刚刚进行建设，如果你们把它破坏了，那么我们战后再重新建设。反正我们还没有建设好。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想战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军事学说，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赫鲁晓夫：我认为，总体上这是对的。但是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要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和平的。

毛泽东：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证实，我们这里有一种事实。每个合作社，每个单位都发枪。并且说，看，如果胆敢侵犯我们，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赫鲁晓夫：我们今年的航空节，就没有军事性质，而是一般性质的。军用飞机没有摆出来，结果影响很好。

毛泽东：我们每年搞两次游行，一次是五一，不带阅兵；一次是十一，带阅兵。

赫鲁晓夫：看来，我们也可以采用你们的办法，11月7日搞阅兵，五一劳动节不搞。

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可以保证7年的和平共处，而有可能是15年。

赫鲁晓夫：过10年以后，也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毛泽东：我是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周期来算的。一个周期是20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经13年了，还有7年。再过7年，我们两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更可观了。

赫鲁晓夫：那时敌人的表现就不同了。那时，他们一听说中苏会谈，就会发抖的。

毛泽东：7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10年、15年、20年就不成问题了。

赫鲁晓夫：从杜勒斯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的政策首先是“推回去的政策”，就是把共产主义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界限上去。结果把谁抛回去了呢？后来，他不得不改变了政策，采取所谓“遏制政策”。结果把谁遏制住了？把伊拉克遏制住了吗？

周恩来：把自己给遏制住了。

赫鲁晓夫：对，失去了纳赛尔。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高涨。情况很好。

毛泽东：法国失去了摩洛哥和突尼斯。

赫鲁晓夫：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正在进行着。目前，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正如火如荼，而没有减弱。我们的成功将促进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去奋战。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帮助伊拉克的国王，是在死了以后才来帮助。一项很不错的“援助”。

毛泽东：现在无论怎样都帮不了伊拉克了，费萨尔已经死了。

赫鲁晓夫：这种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最近拉丁美洲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机降到海地。

赫鲁晓夫：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做结论还早。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初期，是反封建的，提出过民主的口号，并且依靠民主的口号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大多数，他们依靠这个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可否讲：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议会当作据点，抛弃了民主的口号，而走上了公开法西斯和军事独裁的道路。

毛泽东：可以这样讲。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已经破了。资产阶级无法用民主和议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了。

毛泽东：美国就是。

赫鲁晓夫：法国戴高乐也是。

毛泽东：的确，在那里几乎已经没有国会了。

赫鲁晓夫：在危地马拉，美国用军队把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赶跑了。黎巴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所谓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得不要求美国派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国会有用，他们就用；没有用，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形式。戴高乐的宪法还要国会，但把它变成了咨询机关，和美国一样。美国的

国会只是通过一下预算，争吵一下增加或者减少美元的问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权利也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毛泽东：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缓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搞紧张。中东的紧张局势是最近的最高峰。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知道，美国怕打，英国更怕打。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了，做出要打的样子，这使尼赫鲁和世界都很着急。尼赫鲁是真着急了，因为这样的紧张对他不利。英、美从黎巴嫩和约旦早撤兵好？还是晚撤兵好？我看，不要太快，还是晚些好。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请你把这个意见亲自告诉给杜勒斯吧。

毛泽东：最好半年不撤，大家好有事可做嘛！撤退了，他们就又变成了好人，又变成爱好和平了。我想留他们一下。

赫鲁晓夫：我想从根本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留杜勒斯多做几年国务卿。他会给我们制造出另一个黎巴嫩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我同意你的看法。委内瑞拉的事件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是走上坡路。

赫鲁晓夫：今天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给我的回信。我想起了当年扎波罗热营地 [44] 的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苏丹讽刺得很厉害。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在外交信函中有这么一个老的样本。您看过吗？想看的话，我寄给您。在那封信中，对苏丹就有这样的答复。（接着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请艾森豪威尔做一做同样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艾森豪威尔在回信里说，他们是保护小国的，我们是侵略小国的。我准备在回信里答复他，既然你们是保护小国的，那么五大国会议除了五大国之外，还可以请伊拉克、瑞典、挪威、东方的柬埔寨参加。提出这些国家请他保护

吧，看他怎么办。

毛泽东：柬埔寨和瑞典这些国家表现都不坏嘛。

赫鲁晓夫：对了，还有挪威，尽管它已进入了联合国，但它的总理还是是个不错的人。

会议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召开会议的过程。会是开不成的，即便开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紧张局势，紧张局势是我们双方之间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我们要利用才对。

毛泽东：列宁曾经讲过这个意思。在平时教育人民需要几十年，打一次仗就教育过来了。战争可以教育人民。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每出一次“伊拉克”，人民立刻就紧张起来。我和尤金同志谈了5条：

(一)他们的兵少。

(二)他们内部不团结，例如，工党党员和保守党员之间存在矛盾，美国政府成员中间存在分歧等等。

(三)他们的同盟国不满意(如加拿大、法国、日本)。

(四)这次使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更加活跃了，推动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和平运动不是斯德哥尔摩的会议，而是这次伊拉克事件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甚至日本首相都被迫承认，伊拉克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潜力未受到制约。因此，由于中东事件，出现了许多不拥护和平运动的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看，这对帝国主义不利，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在保存面子的情况下撤军。在艾森豪威尔给你的回信中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现在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他还不肯对此情况说得太多，但看得出来，他自己比谁都害怕战争。

(五)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掩盖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可以说，和平运动已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有适当机会，这些斗争就会爆发。谁知道这次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赫鲁晓夫：这次伊拉克革命杀了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此外还杀了

1000多名反动分子。

毛泽东：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对西方国家的党也有利，不像匈牙利事件时，有些人退党，这次要增加一些人吧！

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些人。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在这广大的社会人士眼中是不公正的，真理没有站在美国那边。比如说，东德给西德写了一封信，抗议阿登纳准许美国利用西德的基地。西德向来是看不起东德的，但是这次也不得不给以答复。西德解释说，不是我们允许的，是美国人自己的搞的。这很说明问题。

赫鲁晓夫：今年9月联大主席就要改选，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南斯拉夫和捷克过去曾经谈妥，在联大主席改选时，南斯拉夫支持捷克的代表诺西克，但是南斯拉夫现在不准备支持捷克的代表了，因为南斯拉夫与美国谈妥，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波波维奇做候选人。哪个波波维奇更坏：是驻贵国的大使或者是那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候选人的波波维奇，很难说谁好谁坏。看来，姓波波维奇的都是坏蛋。

毛泽东：总之，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以比较的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当时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英国的同盟罢工、摩洛哥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但是，罢工停止了，非洲的革命被镇压了。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事件未能引起世界的大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是最初2年相对稳定。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1949年我们胜利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整打了3年，然后是越南战争爆发。胡志明同志他们开始是和法国人谈判，后来也打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之间的区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保持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荷兰则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度的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除了印度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印尼、锡兰、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英、美两大帝国在苏

伊士运河事件时所受的挫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从中东撤兵，那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在日益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下一次大战——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事件。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在穿越易北河、朝鲜三八线、越南十七度线的这些国家，我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寸土地，并为和平而战。

赫鲁晓夫：当前就是这样。

毛泽东：我们要争取7年，最好是15年的和平期。

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中也会发生事件的，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伊拉克性质的革命还会发生的。

毛泽东：这类事件是在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地区发生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地区。

赫鲁晓夫：譬如伊朗，也是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地方。

毛泽东：还有泰国。

赫鲁晓夫：还有巴基斯坦。

毛泽东：还有沙特阿拉伯。

赫鲁晓夫：那里的环境也不稳定。

毛泽东：应该向拉丁美洲做工作。

赫鲁晓夫：应该派我们的人到那里，以使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欧洲和亚洲移开。那里干柴很多，一点就着。

马利诺夫斯基：尼克松的南美之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看来，艾森豪威尔也不完全是神经过敏。他在委内瑞拉挨打时，美国向那里派去了伞兵。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尼克松一行相关事件的重复和延续。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不好办。

中间休息后

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党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他说：中国的代表大会是常设机构，其代表任期5年，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赫鲁晓夫：这类似于党的国会。

毛泽东：对呀。我们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制定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基本路线。

赫鲁晓夫：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在1960年举行。看来，我们也要5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更正确些，因为制定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效果很好，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反党集团作了斗争。目前，我们准备对中学和大学进行重大改革。秋季，将对此问题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毛泽东：学习与劳动锻炼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我们现在的中学都是培养学生考大学的，但是，大学招生有限，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然而所有的学生都要为此进行准备。需要中学培养有文化的人到生产中工作。因此可以的话，中学的十年制应改为七年制或八年制。毕业后，所有毕业生都应从事生产工作：去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集体农庄。生产企业将创建手工业学校，为考取大学的人进行额外教育，并且这样可以掌握一门职业。但不是所有人都去学习，而是那些想学的人去。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从该所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派好的上大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学生都要经过劳动。我们那时，有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要考不上大学，就要把你送进工厂去当傻瓜，结果导致不尊重体力劳动，好像只有傻瓜才去当工人。而在新体制下，所有人都将进行劳动。这样更民主。目前，我们大学中很少有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这是很自然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子女来考取大学，因此，他们孩子的潜力更大些。我们将这种方式从根部切除，首先，所有的毕业生都将去工厂工作，通过社会的挑选，这时，问题将不再由父母决定，而是由工作集体来决定。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去哪，学习哪种专业。最终，大学毕业时他们不能通过合格考验，而且不想从事教给他们的知识所能做的事业。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将在工厂检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兴趣。要比在大学里通过学习来淘汰更好一些。如今，党组织正在积极地讨论学校改革事

宜。然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更多的人来讨论。我们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措施。这项措施使我们能够挑选精英中的精英到大学去学习。我们将遵循一个原则——只有工作了2年及2年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大学学习。

毛泽东：这个办法很好。还可以由大学来创办工作间，大学生可以在那里进行实践。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说完。工人和农民将在大学学习，大学准备实行半工半读，20%—50%的时间学习，其他时间劳动，最后一年可以全年学习。此外，提倡工厂办大学。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这将锻炼出一批技能水平非常高的专业人员。

毛泽东：劳动是很好的学习。

赫鲁晓夫：劳动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专门读书是不好的。在新的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向家里要钱，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中学也要搞些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打算把农业专科学校附设在国营农场里，这样大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我们准备把所有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

赫鲁晓夫：譬如，我们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有的家在莫斯科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去农村，宁肯在城里当一个擦地板工人。如果我们把农学院设在农村，吸收农民和农庄干部入学，培养他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农村工作。

毛泽东：非常正确。

赫鲁晓夫：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派人来我国考察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回国以后，对我们的反映很好。但是，时间不过一年，我们的教育制度又要改变了。

周恩来：好，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做的。

赫鲁晓夫：关于改革教育制度，我们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寄一份来。

毛泽东：愿意看。

赫鲁晓夫：那么我给你们寄一份。

毛泽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学校改组问题。我们正在试验。

赫鲁晓夫：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你们也可以看看信中有关我们的改组方向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这里的问题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赫鲁晓夫：在去年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进攻。他说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改组了工业，对农业不满意，改组了农业，可能将来你还要改到学校？他这个人完全脱离了生活。

毛泽东：对，他是脱离了生活。

赫鲁晓夫：他是个老实人，是自己人。

毛泽东：不那么老实吧！

赫鲁晓夫：他是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但是，他是个蠢人，怕新鲜事物就像怕鬼和阳光一样。他不是敌人，但有时比敌人还危险，因为敌人看得见，而自己人当中的蠢人是容易看出的。

现在我们正在改组学校，还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和廉价的干部。

毛泽东：我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做了个决定，还没有定稿。方向和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学生不死啃书本，而是半工半读。

赫鲁晓夫：很好。匈牙利事件说明在大学生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大学生里面闹事也闹得最多。

毛泽东：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中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去参加劳动。在工厂里，厂长这样一些领导

干部都要下车间劳动，参加生产。

朱德：军队里的师长要当兵，受排长和连长管一管。

毛泽东：我们的军官过去都当过兵，我自己也当过半年兵。但他们长期脱离了士兵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地管别人，抽出一定的时间叫别人管管我们，也是应该的。叫下级批评上级，给他们机会批评上级，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还做了一项决定，所有的军官从今年8月开始从事生产工作，一年不少于两个月。

彭德怀：在军队里我们开四级干部会，军、师、团、营四级，还有连、排、班、士兵四级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约有2000人参加，会议开了2个多月，通过了许多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互相展开了批评。军委的同志都受到了批评，我和彭德怀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召开这种会议就是由外交部部长陈毅提倡的。我们一直对参加会议的人发号施令，就让他们也稍微管一下我们，说出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8周内，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当然，不只批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批评，特别是那些缺点严重的人。

彭德怀：通过会议上的批评，一些军官现在讲到，对他们的批评真好。另一些军官因此明白，他们对下属的批评有时候是错误的。

毛泽东：我们对所有路线的干部实施类似的制度。其实质归结为：第一，所有人都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给下级批评上级的机会。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此种情况称之为整风运动。英国人将之称为“肃清”运动。

我们在6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他们不满意，领导有缺点，他们批评了，心中就很舒服，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我们中央做了决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2个月在下面。这不会损害政府的工作，反而有益。

消灭盗窃、赌博等现象，也都是采取整风的办法，很有效。

彭德怀：这是一个处理违反纪律情况的好方法。在军队中，我们取

消了禁闭室，因为那里无人可关。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节日和阅兵式以外，军官和士兵完全穿一样的服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质状况的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军官一时脱离了士兵。

赫鲁晓夫：你们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我们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譬如列宁参加义务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等等。

毛泽东：我们有一项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一年内至少有4个月在农村从事生产。只有在处理文件时，才能脱离工作。开现场会议，哪里高产就在哪里开，哪里的麦子好就在哪里开。会议不一定都在北京开，越在北京开会，脑子就越空。今年上半年，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下半年我们还想下去。

彭德怀：我们的军队每年帮助农民2个月，而且并不影响军事训练计划的完成。

赫鲁晓夫：我们的元帅对此不敢苟同。

马利诺夫斯基：当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我们总是给予协助。

赫鲁晓夫：我们常常使用军队来帮助收割庄稼，特别是最近几年使用军队去开荒地。去年和今年决定不再使用军队。

毛泽东：可以规定这样一种制度，军队按照该制度在一年中从事农业劳动2个月。这样不会妨碍作战训练。

赫鲁晓夫：情况可能有些不同，我们那里的机械化水平高，集体农庄庄员不希望士兵帮助他们做农活，怕他们做不好，反而受到损失。

毛泽东：可以考虑军队办工厂，士兵在那里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马利诺夫斯基：士兵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已经够繁重的了。

毛泽东：不然的话，他们退伍以后，就不会从事体力劳动了。的确，我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全部拥有企业，但已经有了一部分附属于部

队的农业企业，战士可以在那里参加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具有部队创办农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在远东。但没有成为习惯。

彭德怀：在我们的军队中，普遍实行蔬菜、水果等自给体系。

毛泽东：我们的部队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至少半年可以自给。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也有过建筑工程部队，进行军事需要的建筑工程施工。我们大大缩减了其数量，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专业工人完成的费用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质量不好，因为士兵没有经验。行政管理人员也很多，不合算。既然这是部队，他们就应当学习军事，需要指挥员；但由于他们要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又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结果是指挥员多、工人少。用这种方式来建设国家是不合算的，所以决定放弃了。

朱德：我们转业了40个师，他们都掌握了技术，成了很好的工人。

毛泽东：可以考虑实行半农半兵，或半工半兵。

赫鲁晓夫：一般服兵役期限为2—3年。这正好是获得技能所需的时间。3年后，我们使战士们复员，招收新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只能成为学校了，而不是兵役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变成工人，也不能将他们变成战士，而且这样做会浪费国家一些钱。

毛泽东：我们国家不会对此进行拨款。战士会自己挣钱。

赫鲁晓夫：那么吃饭、穿衣、指挥人员的工资呢？况且，红军做的是工人的1/3，并且只能完成非技术的粗活。

毛泽东：我们的战士也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种种蔬菜，修修道路，建设灌溉系统。

赫鲁晓夫：我看，毛泽东同志，这恐怕是由机械化水平所决定的，就像我们二十几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现在是用机械，譬如掘土，就用自动掘土机，驾驶掘土机的都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果让士兵去搞，人家并不欢迎。1933—1936年我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时候，修运河就是用工人和铁镐。现在这一切都使用机械来完成，很少用人工。如果使

用部队来进行建设的话，结果要比使用机械和有技术的工人贵得多。

毛泽东：军队就是军队，训练为主，只是拿出一部分时间劳动。

赫鲁晓夫：在修第一个地下铁道时，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我、雅罗斯拉夫斯基都参加了劳动。现在我们去参加劳动，工人就不会欢迎我们了，怕我们损坏了机器。

毛泽东：1万年以后，干部也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赫鲁晓夫：1万年以后，就没有军队了。

毛泽东：干部还要有的。

赫鲁晓夫：有些兵种，如导弹、雷达等部队，看来要转上雇佣兵制，因为这些兵种的专业性很强。我们不能叫入伍一两年的新兵来发射导弹，叫他们搞的话，导弹未等发射出去就会爆炸的。这种武器要由工程师们来操纵才行。再一个就是在潜艇上服兵役，难道在2年内能教会士兵操纵潜艇吗？这里需要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他们将更廉价。我认为，在某些作战范围内，将转上永久性兵役制。

毛泽东：这是对的，他们要搞一辈子，但他们是少数。

赫鲁晓夫：部队种出的东西会很贵的。

毛泽东：这些干部需要他们始终搞自己的事情。这种情况与人少有关。但让他们搞搞蔬菜还是可以的嘛！

赫鲁晓夫：这样的蔬菜将会很贵。在市场上没人会买这些蔬菜。

毛泽东：为了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聘请农艺师专家。譬如说，叫费德林学种菜，他的作品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他到日本去，就不好种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会让他干这件事的，太浪费了。

毛泽东：如果请来专家，叫上100名像费德林那样的人跟他学习，会学会的。他已经是文学家了，除此之外，再学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对于他的主要工作(文学创作)是有益处的。我们外交部一共900人，分三批下去劳动，每批300人，每次去3年，9年中每人轮一次。

赫鲁晓夫：过去，我们实行过机关的苏维埃化。那时大部分职员都是旧人员，所以我们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工人到机关里，解雇了一部分旧人员，下放了一部分。这是被迫采取的步骤，对工作质量是有影响的。

我认为，我们要这样来实施操作：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在国家机关中，干部问题解决得越民主，那么干部更换就越频繁。于是，干部就变得多起来。一些去从事生产，另一些则在他们的岗位上任职。国家管理机关的民主化多半会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毛泽东：一件事情占据一生这样不太好。

赫鲁晓夫：怎么办呢？例如，在研究所是培养不出来马克思的。人类培育出马克思只有一次。任何人都取代不了列宁。那么，显然，有一些人将来也需要工作，并且一些事情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比如您，毛泽东同志，最好，即使你去了集体农庄去种黄瓜，那么国家就不管了吗？

毛泽东：种黄瓜用不了多长时间。

赫鲁晓夫：但总不能一边种地一边处理国家事务吧。

毛泽东：我能在这个时候不处理国家事务。

赫鲁晓夫：话是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我们苏中之间将有一个最大的争论。

毛泽东：当没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事的时候，是可以去种地的。比如，在中东发生事件的时候，我就不去种地。

赫鲁晓夫：可这时候该收地了。

毛泽东：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种地的。

赫鲁晓夫：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主席团决定让我做好事。主席团的决定，主席团超过60岁的成员一天只工作5小时，一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吃午饭休息1个小时。因此按决定，米高扬和柯西金的工作日应该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我说，真聪明，按条例，就是把我们都当成了残疾人，实际上，所有人工作都超过10个小时。看今天，我也在工作，给艾森豪威尔口授回信。今年给我3个月的假期：夏天2个月，冬天1个月。但我实际上这3个月我像所有人一样，真

正只休息了1个月。咋休息呀？所有的邮件都是给我的。在大海里游泳时，电话来了，只能上岸接呀。你刚一离开，就有人说：莫斯科来电话。但是，按照条例，我一年应有一个季度什么都不做。但是一部分人离开去休息是很正常，而我的假期则是另一个样子。

毛泽东：我则是另一种情况。什么邮件都不看，什么报告都不听。我去休假的时候，甚至报纸都不看。这次周恩来同志下去1个月，我们有事也不找他。除非像这次中近东发生的大事，不然我们是不管的。这次，我们许多同志都在下面，因为发生了中东事件，才又回来。

赫鲁晓夫：是啊！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你中断一切，无论是在休息还是在种蘑菇。

毛泽东：明年1月我准备辞去一个主席。现在我还有两个职务，国家首脑和党的主席。只留下后面的一个。这样我的事就剩一半了。我将全国走走，少在北京待了。

赫鲁晓夫：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我要说，在国家面前我们是有高度责任感、觉悟的。即使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您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责任也是无法辞去的。

毛泽东：那倒是啊！

赫鲁晓夫：黄瓜还是不能种了。

毛泽东：不，还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么那时候你来我别墅种。我那儿有各种作物，也可以种黄瓜。

毛泽东：我要到那样一个地方，那里能游泳，没有电话。在你那我也不和北京通电话。

赫鲁晓夫：可以，如果一切正常，在一周之内是可以的。但看看报，您可以了解发生的事件，不能脱离开这些事呀。

毛泽东：我在广东的时候，连中央报纸都不读。

赫鲁晓夫：依我看，从事政治的人就像酒鬼一样是不可救药的。他

们总是迷恋政治。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到地方走走。

赫鲁晓夫：很好。

毛泽东：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我也是。

毛泽东：到时候，我们两个都走，两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是的，就像退休一样。

毛泽东：我们有个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我们一年不少于4个月当漫游者。

周恩来：我也执行了，因此我不当外交部长了，由陈毅来接任。但应该承认，你们比我们更关心国际事务。

赫鲁晓夫：不一定。

周恩来：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只与十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在你们那儿，莫斯科一批外交官就有60多个。

赫鲁晓夫：是的，在我们那全部外交都要通过中央主席团。有时候不召开主席团会议，但外交部会议是要召开的。

周恩来：这是因为苏联的威望高，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感觉自己更安静。我们只与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往来，并且不急于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最好，这晚点发生。甚至，如果日本答应我们三个条件，为了不引起“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在日本设立机构的打算。进一步说，在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将不与它打交道，就像从前那样，只是半官方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逐步在政府层面上解决问题。这将保障我们处于更主动的地位。从前我们认为，同日本发展半官方的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但可以说，日本方面很稳定。现在破裂了，日本方面更难过了。我们并未感到特别的困难。同日本破裂，给日本人民和贸易公司提供了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机会。现在可

以向日本施加两方面的压力：正式的可以从你们那方面，非正式的是从我们这方面。对待日本的这个方针是我们政府赞同的。

费德林：也许，中国同志在苏联驻日本大使的活动的方面有什么想法吧？

赫鲁晓夫：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把中国的一个同志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派到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

毛泽东：但是他也不像俄罗斯人啊。

赫鲁晓夫：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要有苏联国籍。我们那里有苏联华侨。

陈毅：是的，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他在日本显然会引起顾忌。

赫鲁晓夫：希望这个人懂俄语。

毛泽东：很难挑选这样的人，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那样显然是无法骗日本人的。不排除，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暴露了。

赫鲁晓夫：这是例外。

周恩来：这就给你们添麻烦了。现在给日本送去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大使馆可以根据这些来确定我们方针。

赫鲁晓夫：让那个人做我们大使馆的参赞。

毛泽东：这太好了，费德林将当我们的大使。

赫鲁晓夫：我希望你们的参赞到我的大使身边当助手，而你却想让我们的大使做自己的参赞。

毛泽东：到那时我们就能够裁减缩编为一个大使。

赫鲁晓夫：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周恩来：很难找到这样既懂俄语，又懂日语的人。那些熟知日本的人通常在日本很有名。

毛泽东：这样只会给苏联大使添麻烦。

赫鲁晓夫：现在日本人也不欢迎他。在我们这儿，如莫斯科的瑞典大使就是俄罗斯人，是一个逃亡的瑞典的俄罗斯工厂主的儿子。

毛泽东：列宁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可能是苏联的代表。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各国政府首脑会晤时，俄罗斯人是翻译。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在苏联的日本大使馆工作呢？

毛泽东：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真的要派，派谁去呢？

赫鲁晓夫：这个你们自己想吧。

周恩来：我们同意应该派一个了解当前局势的人去日本。但我们很难派一个人去大使馆。我们在对日关系方面是经常变化的。他将很难确定方针。如果我们向苏联驻日大使馆传递我们的方针通过莫斯科来进行，那就最好了。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解决问题的公报我们留下，在我们明天回莫斯科之前做完。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文件可以在离开前一小时签署。

赫鲁晓夫：我们将怎样签署文件：2份、3份还是4份？

毛泽东：2份。

赫鲁晓夫：好！我们会告知谁来参加会谈。

毛泽东：好的，你们将来几个人？

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涉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是的，涉及国防部。我们涉及到的人与你们涉及到的人一样多。

赫鲁晓夫：我们将叫4名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安东诺夫代办。

我们将签署什么公报：是党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公报？

周恩来：我们不指定公报的性质，我们签署《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

谈公报》。

赫鲁晓夫：我们能不能最后指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等”？

毛泽东：可以。

赫鲁晓夫：好，让帝国主义分子头疼去吧，我们将去种黄瓜了。

毛泽东：那么，会谈就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H.费德林、A.费列夫

АПРФ, ф.52, оп.1, д.498, л.108-150

№20392 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1958年8月2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指示，我向中央转交了自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竺可桢教授所通信函。

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如下简要的解释：

1.我是在1957年夏开始与竺可桢教授通信的，原因是他给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我寄来了一些信函和电报的复印件。这些信函和电报都是他发给特别委员会机关的，目的是抗议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纳台湾(为自己的成员)。

根据该信，我请求委员会主席查普曼将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提交到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咨询委员会(处理)。

我将上述请求的复印件转寄给了竺可桢，并随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信中他对我所给予的坚定支持表示了感谢。

2.关于我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理解，我已在给竺可桢的信中已经谈到了。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原因在于：查普曼请求我提出建议——以何种方式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咨询委员会上讨论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

我在这封信中已告诫竺可桢道：我在信中只是谈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而在没有与他协商的情况下我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而从竺可桢的答复性电报中也可明显看出，中国同志当时已决定不向咨询委员会发出任何关于重新研究台湾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机关决议之问题的声明。

3.我给竺可桢的第一和第二封电报是在收到他对我的信函的回复之后发出的。这两封电报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服中国同志放弃自己的原则，并与特别委员会机关达成妥协。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并没有对参加该组织的国家数量做出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才导致相关部门先是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尔后又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议也给予了台湾以同等的待遇。因为先前也发生的类似的情形：例如南朝鲜便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我认为，理应将关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吸收正式会员的规定明确地固定下来。

当然，这方面规定最好也能采用一般国际组织通用的形式。只是在其中可以提出如下要求：台湾除外；请求中国在台湾不加入的情况下恢复自己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成员国的身份。

鉴于我已坚定地向着竺可桢作出了承诺——在不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我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于是我使用电报向他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根据竺可桢复信中的说法，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述方式作了修改，并再次向其通报我的观点。对于我的第二次建议，竺可桢最初答复是他们正在对之进行研究，然后又说，其答复已通过苏联驻北京使馆发出。但是至今，我也未收到竺可桢的这份复信。而通过外交部来了一封电报，其中内容我是在中央相关部门中才得知的。

4.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曾多次请求中央和外交部，要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制定相关规定。而我个人也曾请求中央部门的安德罗波夫同志接见我，以便就我应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听取他的建议。

根据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一起与谢尔巴科夫同志见了面。我向后者介绍了自己发给竺可桢的信件的内容。谢尔巴科夫同志认为，我所做出的在不与中国同志协商的情况下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还建议我与外交部联系一下。

此后，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又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了一次话。后者也同意这样做：在没有与竺可桢协商的情况下(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他还通报说：通过我国驻北京使馆，可能得到竺可桢用密码电报所作的回复性解释。

5.我的本意是好的，就是想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好心没得到好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通过中央来办理此事，而是擅自行动，就像一名个体单干户。从这些错误中我已吸引了教训，并极力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类似失误。

苏共党员

普什科夫(签名)

1958年8月2日

附件一：

科学院北京竺可桢教授亲启

以撤销机关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为最终目标，我想建议查普曼按照如下方式对正式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委员会进行清理。咨询委员会建议机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只有在如下情形之下：

- 1.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分成两个部分；
- 2.当其中每一部分都已建立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 3.当这两部分同时或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表示反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同时拥有(该国)两个委员会；
- 4.当因此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咨询委员会将建议国际地球物理年机关按照如下方式处置：在机关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请这两个委员会自行讨论，是否能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任何方式来共同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就由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根据自己的利益将其中对本组织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一个委员会列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

请电告你们对上述建议的意见。

此致

1958年6月17日

附件二：

发自北京

致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

针对您发来的电报和您对我国科技事业所给予的莫大关心，我表示真诚的感谢。兹就您在来电中所提出的问题通报我们的意见如下：台湾是中国领域的一部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其目前所形成的局面都是由于被美帝国主义占领所致，而这也只是暂时性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分裂的问题；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既定方针；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蓄意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以便藉此妄图使美国长期占领台湾合法化，并幻想着中国能落入他们所编制好的陷阱之中。另外，他们还妄图以此来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削弱新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鉴于以上所述原因，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已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斗争计划中的主要内容。这便是我们对于两个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关于这一立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容许有半点含糊。

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已于1956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正式成员，而在1957年它又接纳所谓台北中央科学院为其正式会员，这充分表明该机构是打着国际科技合作的幌子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对后者臆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提供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反对这样的错误决定。另外我还想对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原则，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来谈一下我们的看法。如果从这一前提出发，那么该原则性标准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的，因为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只有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民族委员会是唯一的可能代表中国的组织。对于我们而言，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那四个条件都是无法落实的。既然你们在来电中表示，“完全是从友好和兄弟般的关心为出发点……”，那么现在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两个委员会通过共同协商以最终达成如下——撤销主席团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

我们认为，目前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撤销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于1957年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并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否则，我们将坚决拒绝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任何活动。我们珍视和坚信，你们一定会理解和完全支持我们的坚定立场的。

竺可桢

附件三：

竺可桢教授亲启

收到您的回复之后，我想以如下方式来改变我对查普曼的建议：

1. 咨询委员会建议主席团按照全世界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原则将该组织所属委员会列入其正式成员名单。

只是在如下情形下：

2. 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陷于孤立或分裂成几部分；

3.当该国所分裂的几部分都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4.当这些委员会都表示反对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5.当此举可能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之时；

6.咨询委员会将建议主席团，根据有利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自身的原则，将那个能够对本组织作出重大贡献的委员会看作是自己的正式会员。

请尽快电告你们对该建议的意见。该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南朝鲜。因为后者也正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普什科夫

1958年7月8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189-195

№1166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 (1958年8月3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四次会谈

1958年8月3日于勤政殿

参加会谈的人员有：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45]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毛泽东：我想弄清楚两个小的、但重要的问题。

第一，在禁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上，你们单方面命令停止试验，但西方却在继续试验。您认为有必要恢复试验吗？

赫鲁晓夫：他们通过不停止试验，解除了我们做出的保证。现在，我们继续生产原子弹和氢弹。当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恢复试验。当然，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就禁止试验达成普遍协议的话。

毛泽东：我明白了。您说洲际火箭飞行时穿过太空，当它们进入大气层时，它们不会烧毁吗？

赫鲁晓夫：不会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毛泽东：你们如何看，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军事基地非常靠近我们的边界。但是他们主要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离我们很远。使用轰炸机到达他们本土很困难。但是现在，由于火箭武器的运用，力量对比已经平衡了。

我们目前正在克服困难，试验射程远的火箭，这样，我们的国土是不够用的。

毛泽东：你们不能在北极区域发射他们吗？

赫鲁晓夫：但是这个距离确实很短，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越过北极发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极地地区进行监察，这样他们才能够探测出我们的火箭基地，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

毛泽东：我读了艾森豪威尔就您对防止突然攻击提出的建议所作的答复。看起来这是一个恰当的回答，他似乎准备就此问题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他们显然害怕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看到这封信。

毛泽东：我同意您提出的有关代表团离开问题的建议。但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欢送仪式，在机场公开举行，排好仪仗队，邀请外交使团。

赫鲁晓夫：昨天，我们似乎已经一致同意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让我们的协议更加明确。这样，那些无端的谣言就更难找到借口。否则的话，西方就会写道，他们秘密来访，因为他们就不期望会谈会成功，也许中苏之间有矛盾。然后他们会谈，达成协议，并决定举行华而不实的欢送仪式。让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更好，让会谈的事实产生效果。

毛泽东：我认为有必要对你们的来访保密，这样帝国主义者不会在您不在的时候，发起一场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认为他们还不敢这样做，力量的对比对他们不利。现在，他们不得不吞下另外一颗苦果——承认伊拉克。假如他们发动战争的准备只做了一半，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毛泽东：是的，英国当然不会发动战争。

赫鲁晓夫：法国和德国都不敢发动战争。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他们化为灰烬。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吃过德国V 1和V 2飞弹的苦头。但现在，这些武器同火箭比起来，就是一堆玩具。

毛泽东：但是，到处都是他们的基地，在土耳其就有100多个。

赫鲁晓夫：不，在土耳其没有这么多基地，而且它们都处在我们的瞄准仪之中。他们打算在希腊建立基地，那就更容易了：人们可以从保加利亚的山上推一块巨石下去，关于基地仅仅这么多。甚至美国也处在攻击的威胁之中。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科学家制造了洲际导弹。

毛泽东：还有德国科学家吧？

赫鲁晓夫：不。他们仅仅是在开始阶段参加了。我们不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德国人。现在他们全部回到德国去了，去讲关于他们做过工作的故事。美国人相信这些故事，认为我们没有洲际火箭。当我们宣布我们试验了洲际火箭时，他们还不相信。然后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

毛泽东：当各国首脑最高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依然想，您在国外的行程，同可能的危险联系在一起。我建议您在出访的时候，宣布任命一位副手。因为当您离开苏联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

赫鲁晓夫：是的。有某种风险，特别是首脑会议在纽约举行时：那里有许多感到怨恨的匈牙利人和其他敌人。日内瓦的情况好一些。我想起了1955年7月日内瓦会议时一件有趣的事。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的保镖当总统在街上行进时，必须跑在总统的前面。但是制定宪法的时候，人们还是坐着马拉的马车。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来到日内瓦，坐在汽车上的时候，他的保镖跑在前面，这使得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发笑。然后，人们都在猜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如何行事。我们来到日内瓦，坐着敞篷汽车在街上行进。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害怕，会坐在防弹车里。后来真的是坐进了防弹

车，是因为瑞士警察告诉我们，有一个恐怖组织企图攻击我们。

美国人还写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不敢面对群众。但是，当我们访问匈牙利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了。我们要去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纪念碑献花圈，我向卡达尔建议，穿过人群走向纪念碑，这样美国人可以看到匈牙利人是“如何把赫鲁晓夫撕成碎片”的。这件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写匈牙利人反对苏联了。

毛泽东：斯大林拒绝去日内瓦。但是，我还是想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危险。

赫鲁晓夫：这是头脑衰老的缺陷。

我们现在不考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经常命令军方，按照他们的资料准备局势的草案。最近他们汇报说，没有理由相信，有突然爆发战争的危急情况。

毛泽东：您认为杜勒斯还会留在他的位子上吗？

赫鲁晓夫：不会，他可能会离职，尽管对我们来说他继续留任会更好。同一个傻瓜打交道，比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会更容易。

毛泽东：按照您的观点，史蒂文森会不会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他有过于自信的个性。

毛泽东：最为可能的是，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权，那么，尼克松将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是的，最有可能如此。他比艾森豪威尔更糟糕。艾森豪威尔作为国家英雄进入政治舞台，是战争的结果。作为政治家，他不是最好的，他缺乏政治经验。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官，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在战争结束时的阿登战役，德国人几乎打败了他。当时。丘吉尔请求斯大林援助西方盟国。

毛泽东：你们当时就不应该去援助他们。也许那样就不会有西柏林，甚至可能不会有西德。

赫鲁晓夫：是的。也许今天我们都是多列士的客人。然而当时局势

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停止战斗，向美国人投降，对我们进行顽强抵抗。局势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占领柏林。斯大林同艾森豪威尔达成谅解，他给我们占领柏林的机会。在维恩战役中，德国人甚至从我们这边跑开，向艾森豪威尔投诚，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战俘接受。由此，就您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还懂得一些情理。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向他建议的。

毛泽东：签订公报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好的，那就让我们签吧。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 ф.52, оп.1, д.498, л.11, 151-156

№138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1958年8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8月4日会议第17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通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库兹涅佐夫、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

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之中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是，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

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

关于米高扬同志的发言——使用了傲慢的口气。对他说了，他的发言让人感到屈辱。 [46]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顾问，而这些人是在强加给他们的。

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审理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

赞成这次访问，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9, л.44-45

№218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1958年8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8月4日会议第172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访问中国的通报”^[47]

第172号第1项

1958年8月4日

绝密

赞成赫鲁晓夫同志的中国之行，并认为这一访问是富有成果和有益的。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232, л.1

№20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1958年8月4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今年8月1日、麦克米伦和戴高乐7月31日来信的复函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年8月4日

赫鲁晓夫：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近东和中东正处于斗争的第二阶

段。我们现在应该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并找到新的道路。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提议举行高层会晤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呢？就是不允许中东爆发战争，不允许毁灭伊拉克。从我们国家的威望来说，毁灭伊拉克会给我们的政策带来损害。毁灭了伊拉克，到时候也会导致埃及和叙利亚的毁灭，这就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最主要的。因此，当他们投入了军队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政府写了具有恐吓意味的信件，以便动员社会舆论；中东是如此的危险，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如此巨大，以致会导致世界大战。

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的问题了。我们已经阻止了侵略，伊拉克获得了美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的承认，也就是侵略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承认了伊拉克。现在他们开始打伊拉克的主意。

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或许是由于内心的信念（不能排除这一点），伊拉克政府惧怕共产主义，不能忽视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政治信念。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事情没有偏离我们的建议，没有违背我们的愿望，我向纳赛尔提出过这些意见和建议，以便他们不违背约定，而是相反，发表自己的声明：将做伊朗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是不符合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想法的。

现在谈谈会谈。他们想在安理会进行会谈，我们在安理会将解决什么问题呢？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只会进行谩骂。我们能向安理会提出什么问题呢？只提撤军问题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是为了要求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吗？为此部长会议主席是不需要到那里去的。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是艾森豪威尔，在那里都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现在应该思考这一点。我认为索博列夫同志是个善于分析的人；索博列夫同志在今天的密码信件中说：或许现在需要继续提出召开联合国大会的问题。这是正确的。现在联合国大会能够比高层会晤施加更大的压力。毕竟在高层会晤的情况下，可以设想，我不能提议谴责侵略。邀请侵略者进行会谈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可耻的，你是否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呢？这样做将是愚蠢的。他们是多数，而我只有一个人，另一个人中

立，而他们是三个人。

而现在做主要的是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提议就是，一定指出英国和美国是侵略者，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其他国家进行侵略，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制度，也就是举出论据，这些论据已经被应用过。在同他们进行会晤的时候我不能提出论据，而索博列夫同志是可以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派库兹涅佐夫，或许派葛罗米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用不着派部长会议主席到那里去。需要看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将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会出席会议，我也会按照字母顺序就座。我们的座位离蒋介石很远吗？

库兹涅佐夫：距蒋介石隔两个位置。

赫鲁晓夫：这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戏剧？这是一出很差的戏剧，剧中的角色也很差。在中国的时候，我按照我的想法大致口授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我认为，我们不会使他改变什么。说句实话，联合国安理会变成了协调军事侵略集团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取决于该军事集团中的总指挥，大家看一下，那里现在有多少成员：古巴、巴拿马、哥伦比亚、加拿大、蒋介石集团、日本，都是他们的军事盟友，还有瑞典。

当然，我们在那里总是处于少数派，并且不可能进行任何谴责。在联合国大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在联合国大会也很难召集到多数，但是那里是个大讲台。

库兹涅佐夫：那里有中立派。

赫鲁晓夫：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原来认为可以通过五国政府首脑会谈来解决的任务，现在没有经过会谈就已经解决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赫鲁晓夫：是一个争取会谈和反对侵略的过程。各国人民都谴责他们。这件事我们做得很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广泛的世界讲台上。

因此我认为，应该修改我们的文件并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功地减弱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还没有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侵略者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应该这样说，并进行相应的发展。

即使进行侵略的侵略者也承认了伊拉克共和国，他们声明说，他们没有打算侵略伊拉克共和国或者其他的东方阿拉伯国家，而实话说，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即举行那些国家政府首脑会谈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没有解决？就是撤军问题。因此我们要立刻声明，我们要求立即撤军。保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谴责侵略者的罪行，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功能。安理会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因为看起来，要审议这个问题就必须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更不要说，谁会参加这次会议。

而现在谈一下世界各国和世界舆论界仍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消除冷战并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也就是回归到我们以前提出的为进行大国首脑会谈而斗争的立场上。但到时候是另外一些成员，应该回归到我们提议的那些成员，并将解决一些根本问题(我们知道议程)，解决关于中东和近东的问题，以便创造良好条件，以便那里不至于积聚起引发战火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引发世界战火。我认为就是这样。

也可能结果是，我们都来了，我或者索博列夫将进行发言，其区别不大，只是一个意义，就是代表部长会议主席，但是我将会说同样的话。要求什么呢？撤出军队。一句话，这将是白费口舌，这不合适。美国人非常害怕这次会谈，他们甚至也不愿进行秘密会谈，据说，可能进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艾森豪威尔参加，我将不会到他去的地方。我们两个谁先伸出手还不知道，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是否要握手。我们不想恶化局势，我们想使局势缓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信件中已经谈过了，我们为什么会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希望共处。因此，最好以我们的提议为基础。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这些提议，我们提出这一点是由于面临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和威胁，这种危险和威胁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侵略行为造成的。我们提议在这些成员参加的会议中仅仅讨论这些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这样说：并且考虑到其他国家政府首脑明显不愿意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不。他们说，艾森豪威尔将参加会议，麦克米伦将参加会议，戴高乐也没有拒绝，但是他说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纽约进行会谈，麦克米伦也不坚持在纽约会谈。这需要考虑。

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的这种立场将会更加有力，那么，同志们就要按照这一政策来工作并制定相关的文件。

帕托利切夫：致艾森豪威尔信件中的所有内容都保留了吗？

赫鲁晓夫：都保留了，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强。我认为，关于会谈地点莫斯科最好应该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们认为，在安全和安定的意义上莫斯科是召开会议的良好地点。您反对我们的理由，认为莫斯科有游行活动，并且在游行中砸碎美国大使馆一些窗户的时候，确实发生过不愉快事件。这些事，艾森豪威尔先生，如果您自己平静地想一想，您会发现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国家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儿的莫斯科人对你们国家和英国进行的侵略感到愤怒，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并且人们进行游行要求制止这种侵略行为，并要求撤出军队。在这段时间，纽约组织了一些反对我们大使馆的游行活动，砸毁大使馆门窗，并发生了殴打事件。

有人说：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赫鲁晓夫：我国参加游行的莫斯科人民受到了美国游行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不能谴责他们，因为这是对纽约游行的回应。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是：我们感到遗憾，同时也不能谴责，我们理解人民的愤怒情绪。应该这样做。相应地对戴高乐、麦克米伦和尼赫鲁来说也是这样。

一旦我们商定以后，信件就应被写出来。让我们商量一下，如果我受到委托，我们将准备这些信件，并把信件发送出去。如果需要讨论，就让我们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我们将去会谈，这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去呢？是为了说他们是狗杂种吗？我们知道这一点，此外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我们邀请参加会议的范围很窄，只是为了斥责他们。

苏斯洛夫：但是阿拉伯人不完全明白。

赫鲁晓夫：当转入更广阔的舞台上时，我们就得到了支持力量，我们就会回来开始动员人民。他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

马利诺夫斯基：那么，关于军事演习或许还要进行通报吗？

赫鲁晓夫：我们进行的军事演习已经顺利结束了，并且领导这一演习的格列奇科元帅已经返回了莫斯科，着手履行自己的直接责任。 [48]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伊拉克得到了拯救，帝国主义者受到了打击，就让他们这样吧。这件事明天可以做，现在也可以，然后发出我们的信件。这将预先解释，我们是怎样认为的，将不会爆发战争。有什么改变呢？什么也不会改变。

就让我们准备吧，明天或者后天可以公布，但是不晚于后天。

苏斯洛夫：也公布关于在保加利亚的演习吗？ [49]

赫鲁晓夫：这件事情军人来做。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你来做这件事情。应当同保加利亚人达成协议，以便进行解释。看起来，需要后天公布。保加利亚人在自己国家进行演习，而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家进行演习。

库西宁：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限制……

赫鲁晓夫：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就让外交部想一想。我们已经决定要求索博列夫来做。就让我们确切简练地表达出来，我们将把问题转入联合国和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

安理会已经讨论了几次，看起来，安理会成员不会保障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做出的决议是要求停止侵略，谴责侵略者。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且应该保持尖锐性。我们不应该让这个问题平息下来。侵略者不仅没有撤出军队，而且还在集中军队。这只是为了麻痹社会舆论，使人们失去警觉性，以便他们进行侵略。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联合国大会要通过相关的决议。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说，他们要保护小国。

赫鲁晓夫：或许，可以使用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论据？以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有小国都能真正平等，因此应该召开联合国大会。

佐林：这是个现实问题。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召开联合国大会。

赫鲁晓夫：让我们委托我们的代表提出要求，要求召开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佐林：他们将不会投票支持召开联合国大会。到时候提出的问题就不是特别会议.....

赫鲁晓夫：我们将提出要求。沙皇也没有写下这样的诏书。我读过《俄罗斯财富》中的一件趣事。涅恰耶夫写了一份假诏书，即沙皇成了地主和贵族的俘虏，沙皇想给农民自由和土地，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此应当把沙皇从地主那里解救出来。在这一基础上爆发了起义。我不记得作者是谁，是卡罗连科出版的。这在波尔塔瓦州引起了很大的浪潮。当时沙皇带领牧师们进行动员，说服，说沙皇没有发布这份诏书。因此就有了这件事情。一位牧师证明说，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而一位农民说，我们自己也知道，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非常想有这样的诏书。

我们和卡罗连科类似。他们不支持召开会议，我们就要批评，就要要求。这就是斗争。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很早就读过这个故事。就谈到这里。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9965, л.1-11

№09879 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 大使会议情况(1958年8月5日)

摘自М.Г.别尔乌辛的工作日记

1958年8月14日

第0709/ГДР号

秘密

文本第2份

1958年8月5日

我会见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

在会谈过程中，王国权同志说，7月3—16日，在布拉格召开了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会上研究了一系列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会上对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当今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两个阵营之间的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王国权同志说，我们觉得，在亚洲，并非所有国家在宣传时充分强调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争取和平，但不害怕战争。这当然不包括我们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我们两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是有充分觉悟的。

二、会上研究了中近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问题。

三、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在思想和政治问题上加强意见交流的必要性。会议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指出了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

四、会议指出中国驻外大使缺乏紧密联系。决定成立一定地理区域的大使活动协调中心，活动形式暂未定。可能决定定期举行大使会议。中国驻外使馆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会晤。以前，王国权指出，没有北京的同意，大使不能外出，比如到布拉格来。现在，将无须北京同意，根据大使的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将可以到邻近国家去。

会上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外交部对大使的工作。为此目的，中国外交部各副部长巡视了许多驻外使馆。不久前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巡视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和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使馆。

王国权说，像布拉格这样的中国大使会议，决定以后一年举行一次。

王国权说，在会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达成的协议不多。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人指出，必须继续通过批判南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和缺

点，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继续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就此我指出，在批判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同南斯拉夫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以便不使它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给南联盟领导人留下利用我们的批判为其错误的政治路线辩护的机会。

王国权指出，会上没有涉及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问题。我认为，王国权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国家关系，如他(王国权)同南斯拉夫驻民主德国大使沃什尼亚克的关系就“很冷淡”。

王国权问有没有中近东形势的最新消息，我说，除报上公布的，没有任何新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我指出，继续增兵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他们未放弃他们占领这两个国家和这一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在黎巴嫩和约旦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地，达到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政策以及使他们回到以前完全依附于美国和英国道路上来的目的。

毫无疑问，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兴趣是很大的，因为美、英垄断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石油可以发大财。美、英国内有一些资本家集团在策略上意见不一，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的国家。

如果不是苏联、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社会舆论的坚决抗议和行动，美国和英国早就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但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社会舆论制止住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侵略。

美国和英国想一下子把中近东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压下去，但在世界社会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现在他们企图对伊拉克新政府施加影响，利用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新政府内部找到自己的支柱，收买民族资产阶级，从而使伊拉克政府离开正确的道路。美国和英国表面上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自己的军队，实际上这仅是一个阴谋。不能忘记，美国和英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增兵，所以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策略的变化，我继续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两国(苏联和

中国)领导人会晤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次会晤大大加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夺取自己正义事业胜利的信心。

事态进一步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王国权说，为了进一步向中近东渗透，西方国家不仅企图在黎巴嫩和约旦制造紧张局势，而且企图在东方制造紧张局势。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国权说，美国第七舰队现正在日本海岸游弋。近来蒋介石飞机经常对中国大陆实施野蛮突袭。

谈到中日相互关系，王国权指出，现在日本国内反华宣传有些收敛。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本打算恢复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这样的消息，法国政府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法国继续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所以我们要求断绝这些联系。我们决定，王国权说，对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表示出特别兴趣。

王国权继续说，现在在中国，所有经济领域都呈现出大的劳动高潮。1959年，他说，除电力生产外，我们打算在煤、钢、水泥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今年加强了铁路网的建设。现在在中国正在兴建中的有50条铁路线。其中一些，如通往阿拉木图的铁路将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已作出决定，修建另一座黄河大桥。

会议指出，王国权说，我们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因此对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不表示特别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国内开展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将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提到格罗提渥同志请求为他探明东南亚国家和中近东国家邀请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问题，王国权说，中国同志们将尽力完成德国朋友们这一请求，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国家或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拒绝邀请格罗提渥同志的可能性。

然后王国权问我如何看待中近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据我看，现在不该发生战争。

王国权说，中国外交部认为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一、妥协，中近东形势得到缓和；

二、局部战争；

三、局部战争发展为世界战争。

我们认为，现在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不过应该考虑到，美国在黎巴嫩增兵制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说，美国人现在不准备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东，他们也不想陷入大的战争。确实，他们在向那里增兵，不过这样做他们是想以威胁来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各国的目的。

我们两国，我指出，对战争无论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果不干扰我们，再过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冒险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有意拖延战争。的确，我指出，正如不久前我们两国公报中指出的，这不只取决于我们。

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三等秘书齐怀远。苏联使馆二等秘书A.博戈莫洛夫担任记录。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

别尔乌辛

ЦХСД, ф.5, оп.49, д.129, л.182-188

№20414 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1958年8月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同志与南斯拉夫驻中国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于1958年8月5日就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问题而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Ф.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8月13日

与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H.米利切维奇的会谈记录

1958年8月5日

我应邀会见了H.米利切维奇。

H.米利切维奇说，今天他想与我开诚布公地交流一下，而不用平常惯用的那种外交辞令。我答，他自然会对意外公布的关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面的联合公报很感兴趣。H.米利切维奇请我尽可能地“详细谈关于这次会见”。

我对他说，已公开的联合公报完全反映了此次(赫、毛)会谈的主要内容——主要讨论了关于确保世界和平的问题。我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国际形势的估计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包括双方为防止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所有其他双方讨论的问题等。我指出，在会谈期间双方还就两国内部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巩固其强盛的方式等广泛交换了意见。

H.米利切维奇说，自己在阅读联合公报的同时，无疑会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南共联盟党纲等内容。但是，他却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份公报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并不完整，所用资料只是人为地、有意识地添加上去的，因为它们与由于美、英对近、中东的侵略而引发的确保世界和平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H.米利切维奇说，自己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H.米利切维奇也论证道，该联合公报似乎歪曲了南斯拉夫对当前近、中东危机所持的立场。他说，我们国家是首批坚决谴责英、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国家之一。然而，H.米利切维奇认为，联合公报却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质疑，并在文件关于英、美侵略的那一部分内容中对南斯拉夫提出了指责。

我对H.米利切维奇的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并指出，联合公报根本没有涉及南斯拉夫在近东问题上的立场，而只是强调必须与南共联盟党纲中所表现出的修正主义现象作斗争。我又指出，在H.C.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所举行的一次会谈期间，他们均对南斯拉夫对美、英在阿拉伯东部的侵略活动所提出的谴责给予了积极评价。

作为对H.米利切维奇所提问题的答复，我说，据我所知，除了上述之外联合公报中再未提到任何与南斯拉夫有关的事情。

H.米利切维奇指出，近几个月以来，尤其是当送走了波波维奇大使之后，他对中国是否仍愿意继续与南斯拉夫保持国家间关系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对他说，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毫无疑问的是，今后中国同志与所有兄弟党和国家都将会坚定地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但这并不说明其已打算与南斯拉夫断绝国家间的交往。我认为，要解释中国同志在送别B.波波维奇问题上的所持立场，看来，首先得从波波维奇自身的一系列行动、做法上找原因。

我们的话题再次转到H.C.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的会谈上面。米利切维奇问，这次会晤是哪一方主动提出的。我答，我对此一无所知。

米利切维奇指出，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对两国国防部长均参加了此次谈判倍加关注。据米利切维奇说，很多人都猜测，两国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采取某些行动。

我说，P.Я.马利诺夫斯基和彭德怀并没有参加这些会见。显而易见的是，关于此次谈判的大方向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在巩固两国国防方面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对侵略者予以应有的反击。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手写批注：

知道了。

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8月22日

安德罗波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知道了。

..... [50]

No09891 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1958年8月8日)

摘自C.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8月28日

第321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北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58年8月8日

今天，曾涌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约见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在与他们谈话中通报了以下情况：

他说，鉴于美、英两国政府实际上阻挠召开五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同志在今年8月5日致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的信中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立即撤军的问题。同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索博列夫同志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撤军问题的建议。

曾涌泉强调指出，首先，“我受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的建议，认为这一倡议是正确的、及时的。中国政府深信，兄弟国家会竭尽全力，一起支持苏联的上述建议，制止侵略”。

曾涌泉指出，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支持苏联的建议。他继续说道，在最近两天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正式声明支持苏联的建议，中央报刊也将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央报刊有关社论的基本内容如下：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又及时的建议，苏联政

府的建议对保证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

将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因为他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造成了爆发战争的危险。

将严厉谴责美、英两国对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公开武装干涉；重申各国人民自己选择本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揭露美国和英国的阴谋。

将谴责和揭露美、英两国所谓“间接侵略”的谰言，将声明不存在任何“间接侵略”，只有美国和英国直接的赤裸裸的侵略。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争取和巩固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等等。

曾涌泉接着说，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非常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起不了大的作用。不过，看来能够而且必须积极利用这次会议，把美国和英国的侵略政策搞臭，制止侵略。

曾涌泉说，至于说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努力做亚非国家的工作，力争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支持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接着说，众所周知，有些亚非国家害怕美国，还有些亚非国家对美国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

曾涌泉通报说，已经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非各国的大使，遵照上述精神做工作。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罗贵波也本着这一精神做亚非国家驻北京大使们的工作。我们还打算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作。

最后，曾涌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国家通报了自己有关上述问题的意图，希望得到各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和意向的通报。

曾涌泉强调指出：我们认为，坦诚地交换有关信息有助于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阵各国在有关问题上的行动。

我以苏联使的名义对通报情况和支持苏联政府的建议表示了感谢。

谈话由使馆随员库达舍夫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5, оп.49, д.136, л.169-171

№2522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 专家组 [51] (1958年8月16日)

绝密

文本第30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

.....

为了全面完成下级指挥和技术人员的编制、发射控制的设备及其他与发射控制技术有关分队的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准备在今年9月1日开课。考虑到我国发射控制技术仍很落后，教学力量不足，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一个13人规模的专家团，为上述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帮助。我们认为，下面的人员应当进入专家组：

专家组组长，1名；

飞行理论和射击理论专家，1名；

无线电管理专家，3名；

修复和维护专家，3名；

引擎专家，2名；

发射控制和引信特种部队建设专家，2名；

自动化控制系统专家，1名。

.....专家组应在1958年10月初到达。

张闻天

1958年8月16日，北京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д.1, п.431, л.20-21

№09878 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 错误行为道歉(1958年8月26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会谈记录

1958年8月26日

今天我到中国外交部同王雨田进行了会谈。

受中央委托，我对苏联学者的下述错误行为向中方表示了抱歉。

今年7月，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中国科学家出席该委员会会议。

竺可桢复电拒绝了邀请，因为该委员会有国民党代表参加，但普什科夫教授又第二次致电邀请，重复原来的意见。这时中国对外文委工作人员李明将此事通知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普什科夫的不正确行为。

我对王雨田说，大使馆把普什科夫的无礼行为报告了中央，所以他受到了严厉处分。我强调指出，遗憾的是，在我国科学、体育和卫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有时也能遇到不理解中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个别事实，这证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这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支持和完全理解中国朋友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路线。

王雨田说，他们清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感谢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一贯支持。他们还理解，个别同志的错误同我

国的这一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看来，这些错误是因为苏联组织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一些同志未被通知到而犯的。

我让王雨田放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向王雨田提供了关于老挝的一些情报材料，我还要求他组织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司的工作人员就西哈努克在中国逗留结果问题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国朋友们也可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发表看法。我还请求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有关苏发努冯新政府纲领和实际步骤的情况为我们通报一下老挝的形势。

在会谈结束时，王雨田主动给我简要地介绍了金门、马祖地公布的新闻中有8条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首先，最猛烈的炮击，8月21日 [52] 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方打了28000发炮弹。国民党在这些岛上的炮兵阵地被压制住，没能进行回击。我方没有伤亡。根据他们的声明，国民党伤亡几百人。根据我方情报，他们伤亡很大。

现在国民党在金门、马祖岛屿集结有7万人的精锐部队并继续调增援部队来。

王雨田说，我们还将继续打击沿海岛屿。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我们将解放他们，这是我国的内政。对我们的炮击，美国的立场暂时还不清楚，但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卷入这一地区的事件。

我感谢王雨田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给我的印象是，王雨田是主动简要通报沿海岛屿的战事情况的，事先没有准备，他很拘谨。

参加座谈的有使馆翻译罗高寿。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苏达利科夫(签名)

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苏达利科夫

1958年9月26日，第718号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1, р.8892, л.196-198

№20679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 朝鲜问题所做准备(1958年8月29日)

摘自B.И.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日

第18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8月29日

应南日的邀请拜见了。

1.南日通报了朝鲜政府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而将打算采取的措施。朝鲜政府认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重要的应该是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现在环境下正形成对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产生积极作用的顺利形势，鉴于此，近期将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朋友们打算有效地利用这个重要的事实，同时着重指出现阶段中美国军队侵占南朝鲜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主要的障碍。

另外一个朝鲜政府将力争正面解决的问题是邀请朝鲜政府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既然它被列入了会议议事日程。为此，朝鲜外务省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主席发了信函。南日说，朝鲜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在研究朝鲜问题时给予最大的支持。

南日说，今年8月28日朝鲜外务省指示自己驻莫斯科的大使拜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大使受委托转达朝鲜政府的请求，为的是

让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在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中让会议的关注点集中在所有外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的必要性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朝鲜的统一和缓解远东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意义。

有关邀请朝鲜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以后将请求苏联外交部在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中，同时也通过苏联驻外大使馆，首先，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朝鲜代表问题投票表决时弃权的国家(20个国家)代表中，进行相应的有益于朝鲜的准备工作。

南日同时表示了请求，希望苏联外交部系统帮助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因联合国上的朝鲜问题在一系列中立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南日接着说道，朝鲜驻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大使都得到了指示，在那20个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同样的工作。

朝鲜外务省打算同时请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代表，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研究朝鲜问题时积极支持朝鲜。

2.涉及苏联党政代表团打算访问朝鲜的问题时，南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在今年10月成行。

答道，很显然，最近几个月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允许代表团在打算的期限前抵达朝鲜。

南日接着说，今年10月底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出访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将在中国逗留7天，越南是3—4天。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金日成将邀请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访问朝鲜。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4份，送：М.В.齐米亚宁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年9月2日

经办：佩利申科

打印：阿库里切娃

手写批注：

给萨姆索诺夫，请他了解并给出建议。

..... [53]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3

№24945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 中国的巡回演出(1958年9月 [54])

致苏联文化部H.A.米哈伊洛夫同志：

根据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你们派遣的苏联国家乐队在今年5月15日乘坐火车到达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机场，乐队受到了中国政府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和苏联大使馆代表的热烈欢迎。

乐队的每个人都被安排在“新侨”饭店，提供的住宿条件极好，最多不超过两个人就被安排进一个带有浴室的房间。乐队的三餐也由中国同志在该饭店安排，这占据了特别分离出来的半个餐厅。每餐都很丰盛、美味而各式各样。为了饮食的需要设置了特别的桌子。不仅仅当乐队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他们到达中国其他的城市——上海、杭州、天津和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这样。乐队被提供的生活条件没有比想象的更好了。所到之处，乐队的演员们都得到他们随行的医生和护士的医疗帮助，而当需要的时候，会被安排到最好的医院，并能得到国内权威的医疗专家的医疗帮助。应当指出，尽管天气炎热，不适应气候条件，特别是在华南、上海和杭州，生病的情况经常发生，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要看门诊(主要是因为水土不服得的胃病)。只有两名同志，大提琴家施蒂尔曼在北京和男中音独唱家古尔维奇在杭州得了肺炎。他们两人都被安排到了条件很好的医院并迅速康复了。施蒂尔曼同志在从上海到杭州的时候回归了乐队，他已经康复并且能够工作，而古尔维奇同志被从杭州送往北京，并且于6月23日，当乐队在哈尔滨，在全乐队回国的前一天乘坐飞机到了莫斯科。还有一些队员得了一些小感冒，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炎热的天气没有盖好被子，这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演员前往中国的时节，他们也不适应过堂风，而过堂风是减缓炎热的一种方法，中国人

对过堂风没有任何消极的反应，他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

在乐队的日常生活、转车等方面的整个日常安排中都有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同志陪同随行，他们在艾伟的带领下，艾伟是一名很好的同志。

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同寻常的仔细以及高度的组织性，所有人都在不断工作，做得迅速而不忙乱。

当然，在日常生活和交通方面的这种安排对乐队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乐队演出的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乐队演出的整个过程。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代表对乐队的友善和关切以及他们提供的帮助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此方面，特别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哈尔滨的特列菲利耶夫同志，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在他们领导的机构中同我们的工作有接触的工作人员，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必要的建议，从他们的这些经验中可以发现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以及习俗等方面的深刻了解，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他们经常访问我们的演奏会，是我们狂热的观众和友好的批评者。我们的外交家们对我们的演出的这种态度自然以最崇高的方式对乐队演员及其领导者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这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促进了演出的成功。

除了对访问中国的乐队在日常生活方面给予极好的安排之外，中国的同志们工作得非常认真，践行了内容丰富的极好的计划，使乐队参观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参观了当前进行的建设，了解了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活。乐队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宏大的古建筑，一些宏大的寺庙，这些都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参观了放满艺术作品的绘画和雕塑博物馆。乐队在北京参观了皇帝的冬宫和夏宫、北海公园、明十三陵、防护北京的长城。乐队几次到剧院看戏，既到过那些体现了剧院艺术的新形式的现实主义的剧院，它们以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苏联的经验为基础，也到过古典的剧院，在北京、杭州看了几场京剧，在上海观看了绍兴剧。乐队还观看了几次中国的杂技表演。所有的喜剧对乐队演员，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将会成为他们长久的记忆，对他们的创造活动产生影响，对现代中国生活的认识，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所产生的印象也更加深刻。乐队在中国期间正好赶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比如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业、农业和文化领域推行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乐队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和文化单位。这些事情地开展是由于乐队主动表示在中国的一些企业举办演奏会，对迎接乐队的中国同志表示感谢，这些中国同志们帮助乐队在北京的一个纺织联合加工厂和北京近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办了演出，也在北京近郊著名的大型水库十三陵工地举办了演出。在这些企业和建设工地乐队不仅仅举办了音乐会。这些表演展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同时确立了我们个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英勇劳动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水库的建设工地给乐队的演员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无论就其巨大的规模来说，还是就其全民参与性质的劳动来说。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各阶层居民的伟大团结，他们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乐队的一些成员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因为大家都穿着白色的演出服，这无疑将很难进行挖土工作。应当指出，在那天之后几天，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到这一工地进行了劳动。现在我们有幸得知，目前水库的建设比预定的计划日期大大超前完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乐队还参观了其他城市的一些企业，比如杭州的手工艺品工厂，哈尔滨的金属加工厂。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文化，并同中国的音乐家们建立职业上的联系在乐队的访问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自然，我们的交响乐队是第一支来自国外的交响乐队，我们的到来引起了中国职业音乐家们的巨大兴趣，从北京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开始就同他们进行了会见，并且在乐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整段时间内他们都一直陪同着。音乐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教师和大学生不仅经常参加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而且他们还同我们一起进行排练。非常想指出的是，有许多来自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大学生前来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音乐会，天津距首都只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尽管稍后乐队将会在天津举办音乐会。顺便说一下，不仅来自天津的听众，而且有来自其他城市，如南京的听众前来北京参加音乐会，而且前来的不仅仅是音乐家。总的来说，必须指出，对我们的音乐会产生巨大兴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音乐家，而且还有广大的听众。在乐队到达将要演出的城市之前，音乐会的票早就销售一空，并且总会留下许多希望参加音乐会，但是没有机会的人，他们请求我们提供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满足他们的请求，因为，首先是没有座位了，其

次，在中国绝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走后门”搞到座位。唯一的一次是，安排了我们的同胞，5名北京大学的苏联大学生参加了音乐会，为此他们再三向我们表示感谢，这表现在他们写给我们的信件中，至今他们仍在给我们写信。

最后描述一下我们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的总的条件，应当说，这些演出总是取得巨大的甚至经常是特别巨大的成功。观众长久时间地鼓掌，并要求再来一次，每个节目经常都要表演3—4次。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场演出，在长时间的呼喊之后，乐队最终离开了舞台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许多人已经换下了衣服，全体公众仍然在继续鼓掌，呼喊着自己的兴奋，这迫使整个乐队空手出现在舞台上，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只是在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之后最终平静了下来，并开始散场。

无疑，这种反应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不仅仅是他们引起了这么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无疑，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这么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以致他们能够明白用外语表达的音乐艺术。无疑，促进音乐会的直接成功，就是还有美学上的原因。演出中有古典节目以及苏联作曲家和中国的作品。演奏的效果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交响乐队到了中国，这被称为一种好的形式。上述列举的心理上的因素始终导致了取得好的结果——极为美妙的、富有表现力的演出，自然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听众的反应不仅仅表现在音乐会上的欢呼声中，表现在乐队的排练中，而且也表现在报刊大量的反响中，一些高水平的音乐家在报刊上对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进行了评价。

如下一种情况还对乐队饱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积极的印象：乐队始终得到了苏联文化部的帮助和关切。我们在北京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通过电报同文化部保持直接的联系。文化部的帮助还表现在苏联的报刊对乐队的表演进行广泛的报道。在此方面，《苏联文化》报随行乐队的记者多尔戈夫同志的工作以及一些苏联报刊常驻北京的通讯记者的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顺便说一下，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根据我们大使馆的建议，我向驻在北京的苏联报纸和国外报纸的记者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向他们介绍了乐队的经历，乐队在苏联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及其前往中国的目的，乐队在中国的活动内容和工作计划。此外，我向中国发行范围很大的报纸《文汇报》以及《友好》杂志发表了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而K.K.伊万诺夫向《傍晚的莫斯

科》发送了一篇文章，他也向上海的《文汇报》发送了一篇关于莫斯科音乐大厅及其举办的活动的文章。

在此需要再次谈论一下关于我们同中国音乐家进行接触的问题以及在这些接触中我们相互之间进行的广泛的经验交流。正如我上述所说，从我们到达的一刻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了这种联系，并且在我们在中国的整个时间内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发展。这种联系表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最为广泛的形式是自发地相互交流经验，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经常对苏联音乐家提供一些协助。在我们进行第一次排练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管乐队参加了这次排练，他们忙于完成音乐会的前奏曲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该曲是我们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些排练在为演员准备的幕间休息室内进行，顺便说一下，中国同志对我们提供的协助的范围很广，在我们需要进行演出的各个大厅里都进行得很好。参与这些协助工作的还有从事音乐教育单位的大学生和教师，他们经常参加我们的排练。此外，中国的同志们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上海和天津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参与了我们乐队演员举办的音乐会，这些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参加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还了解了这些音乐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一些示范课，并且我们的全体乐队的成员还向教师们提供了一些咨询。就一些专业问题作了一些报告，不仅在上海和天津，而且在没有音乐学院的北京、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也作了报告，顺便说一下，天津音乐学院的许多教师也前来参加这次报告。

所作的这些报告如下：在北京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茹科的报告《关于小提琴演奏》；多克希采尔的报告《关于管弦乐器的演奏艺术》；阿诺索夫的报告《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乐、赫连尼科夫第一交响乐以及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分析》，三天后他作了第二场报告《人民民主国家的交响乐(根据个人印象)》；安德列耶夫斯基的报告《关于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

在上海音乐学院作的报告有：古列维奇同志在会议上就弓弦乐器班的教学实践问题作了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所有小提琴手的中音必修课程》和《关于中国室内音乐的演奏状况》；阿诺索夫就乐队的指挥问题为教师和大学生作了如下题目报告：《关于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哈尔滨艺术管理局阿诺索夫为中国东北各城市的乐队指挥家作了

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指挥艺术》。

在所有的这些报告中听众都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证明，首先，中国的音乐家们对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兴趣是巨大的，他们对知识是非常渴求的。我在报告后附上乐队一些演员的报告，他们都提供了咨询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有所了解。简短地说，他们的印象如下：现在，由于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教师，音乐乐器演奏的教育工作明显跟不上。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是我的学生，他现在是北京中国中央交响乐队的领导人，是一名很有文化和知识的音乐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教育的状况作的评价如下：“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比他们的教师学到的更多，而音乐学校的大学生比高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学到的更多。”这种评价是乐观的。它证明，在教育的初级阶段工作进行得不好，而随着时间的进展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但是，如果不能保证音乐学院有良好的、掌握正确的方法的教育骨干，就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至于中国的指挥干部，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良好的。到达中国之后，我们马上就向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如下两条建议：(1)把我们的乐队和北京乐队联合起来表演我们的一个节目；(2)由K.K.伊万诺夫和我指挥北京乐队进行一场演奏会。这两个建议都被中国的同志们愉快地接受了，并举办了音乐会。关于这些音乐会我稍后再详细讨论。此外，在我们乐队的一场演奏会中，李德伦同K.K.伊万诺夫一起指挥了乐队的下半场演奏。这大大拉近了我们同中国音乐家之间的距离，也有助于经验的交流和磋商。我们在上海同中国的乐队一起举办了音乐会。从这一共同进行的工作中，我们对交响乐事业的状况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明确的认识。简单地说，这些认识为：(1)至于指挥干部，在我们有机会认识的6名指挥家中，有3名无疑是高水平的，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是在北京工作的李德伦(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张宁和(在巴黎受过教育)；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他曾是一名号手，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其他的2名在上海工作的指挥家陆洪恩和陈传熙无疑很有才能，但他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他们两人都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上海音乐学院在培养中国的指挥家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了解了该校指挥班的工作，该班的人数非常多，苏联专家B.Г.杰利钦耶夫指挥进行了演出。(2)关于同我们一起演出的这两个乐队的状况，它们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乐队音乐家以及乐队成员的人数上的不够。乐队成员人数上的不够无疑是由于为乐队培养的音乐家

的不足。至于中国乐队队员的音乐天赋，则是令人吃惊的，只是由于这种天赋才使得他们能够在如此低下的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演奏效果。如果这些乐队没有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的话，他们取得的演奏效果会更好。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随着某些宣传活动的开展，中国人民对交响乐音乐会的需求很大。所有这些状况最终成了中国乐队事业正常发展的沉重负担。还有一种状况阻碍了乐队艺术的发展：在音乐学院，古典乐队的演出很糟，室内音乐也是这样。这可以使大学生们养成良好的演出技巧来改正，但中国的室内音乐还是尚未触及的区域。在此方面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巨大的帮助，可以组织由巴尔沙伊领导的室内交响乐队进行巡回演出，比如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我们的表演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同志的标准，室内交响乐队的演出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我们同中国音乐家的接触还表现在我们对中国的音乐工业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中国的音乐工业状况不仅要比我国的好，而且总的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了解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乐器制造厂。原来中国几乎生产欧洲的所有乐器：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各类的木制管乐器。而且根据我们的音乐家的看法，其中的许多乐器都不逊于法国制造的乐器，铜制乐器的管子非常的好，还有弦乐器。众所周知，工厂制造的弦乐器的质量都不好，但是根据我们的同志们的回应，中国的弦乐器值得关注。在此方面应该了解附在本报告后的古列维奇同志的报告，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中国的乐器制造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想，应当利用我们的音乐家的印象以及其他的材料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研究，因为从中国市场获得乐器要比从西方市场获得乐器较为合适一些。当然，中国并非所有的乐器都是好的。比如，在生产圆号、长号和竖琴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家们发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但是应当承认，有一些乐器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顺便说一下，中国有大量的用于生产双簧管、单簧管、萨克管和巴松管簧片的竹子。欧洲市场上的簧片都是有缺陷的，并且大多数乐队队员都会由于簧片的质量差而感到苦恼。我们的乐队得到了中国工厂的礼物，它们是大量的生产簧片的原料。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对其质量进行确定，并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顺便说一下，在我国的基洛瓦巴德地区也生长有高质量的芦苇，由于不适宜推广种植，这种芦苇的种植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当地部门的需要。同音乐家们进行的各次会见、向他们提供的咨询以及共同进行的演出的结果是，在职业兴趣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些友好关系，并建立了通讯联系，这种联系对职业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本报告附上了一些同志们

的报告，这些同志都就各种职业提供了咨询，这些报告材料对于得出结论和进行概括将是足够的，这对中国开展音乐教育的单位来说将是有利的。

乐队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本不在计划之内，它是在正式的巡回演出之前、在5月17日为中共八大的代表们举办的。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中有：(1)中、苏国歌；(2)序曲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3)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55]，由H.阿诺索夫指挥；(4)作曲家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支中国小型曲；(5)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乐队参加演出，指挥K.伊万诺夫。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国家政协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为首的许多领导干部，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和大使馆参赞H.Г.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大使馆其他的工作人员。

5月18日的音乐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音乐会中的第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是：(1)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1950年》；(2)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3)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5月20日举办的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赫连尼科夫的第一交响乐；(2)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3)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

这两场音乐会都是在“天桥”剧场举行的。

5月22日举办的音乐会是苏联大使馆为外交使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准备的。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3)在下半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结尾是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独奏)；(4)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5)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波兰大使基里洛克为首的各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大使及其夫人、各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领导人陈毅、郭沫若及各政党和其他的社会组织领导人，还有以H.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以波兰大使为首的一些外交人员、外交使团

团长也登台进行了表演，并向乐队赠送了一个大花篮。音乐会是在国家政协委员会美妙的建筑内举行的，而且大厅的声音效果也很好。

5月23日，乐队前往北京纺织厂进行慰问演出。音乐会是在白天举行的，在该厂第二俱乐部的一个很好的大厅内举行的。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了隆重的会见和欢迎仪式。音乐会由K.伊万诺夫指挥。晚上，乐队应中国同志的请求，用录音机录制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和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

5月24日的音乐会是在人民剧院内举行的，音乐会由H.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卡巴列夫斯基的戏剧《哥拉·布勒尼翁》的序幕；(2)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中的舞蹈组曲；(3)恰恰图良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的独奏；(4)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咏叹调；(5)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

5月25日的音乐会是在一个水库的建设工程地举行的，由K.伊万诺夫指挥。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水库的建设工作，也参观了十三陵和长城。

5月26日的音乐会在人民剧院举行，由H.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格林卡的华尔兹幻想曲；(3)格拉祖诺夫的《乐队号手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4)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T.多克希采尔的独奏；(5)И.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6)И.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7)德沃扎克的第八斯拉夫舞蹈；(8)恰恰图良的取自《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9)马思聪的2个中国小型曲。当天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在苏联大使馆举办了音乐会，招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

5月27日，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行了慰问演出会，演出会由H.阿诺索夫组织，小提琴家B.皮凯津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一个合作社。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为苏联国家乐队安排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家领导人、苏联驻北京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招待会的最后表演了中国杂技，这些节目内容丰富，都很有趣。

5月28日，国家乐队在“天桥”剧场 [56] 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K.伊万诺夫指挥；(2)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3)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B.皮凯津独

奏；(4)柴可夫斯基的《弗朗西斯达里米尼》，李德伦指挥。

5月29日，乐队休息一天，当天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晚上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的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苏联指挥家组织，音乐会中的节目有：(1)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由H.阿诺索夫指挥；(2)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由K.伊万诺夫指挥。

这场音乐会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巨大兴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两名副部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马思聪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参加了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座无虚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月30日晚上，苏联国家乐队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同5月28日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相同。

5月31日，苏中两国的乐队联合在体育馆举办了音乐会，出席这次音乐会的有6000名听众。在政府的包厢内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以及由他带领的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这次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音乐会中演奏了如下节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苏联国歌；(2)马思聪的蒙古舞；(3)贺绿汀的《夜校学生》；(4)格拉祖诺夫的《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5)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T.多克希采尔的独奏；(6)哈哈图良的《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由H.阿诺索夫指挥；(7)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8)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的第三部分，由李德伦指挥；(9)马思聪和贺绿汀的2个小型曲；10.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乐队参加演出，由K.伊万诺夫指挥。

这是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它表现出了友谊，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从政府包厢走到了乐队演出的舞台，对演奏者表示热烈的感谢，乐队还收到了许多鲜花。

前来访问的时候，苏联国家乐队随身携带了一些赠送给中国朋友们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些是苏联作曲家的一些总谱，其中有几份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的副本，上面写有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纪念，还有苏联作曲家和俄国经典作家的其他许多乐曲，其中包括关于各

种乐器进行教学的文献资料。为了把这些礼物以及其他的一些礼物赠送给苏联国家乐队在北京结识的中国同志们，乐队领导人和苏联大使馆一起在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进行了表演，并进行了晚餐，赠送了礼物，既赠送给了一些单位，也赠送给了一些个人。由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签名的第十一交响曲的一份总谱的副本赠送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这次招待会是在6月29日的晚上举行的。

此外，出席在6月22日举办的音乐会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还邀请乐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到他家进行午餐。在这次午餐上，叶韦利诺夫同志向郭沫若同志赠送了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是对他两年前对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厅进行访问的纪念，照片被叶列梅耶夫同志领导的莫斯科音乐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镶嵌在木制的框子内。

6月1日乐队乘坐专列(乐队乘坐这辆专列在中国的各地旅行)前往上海，为乐队送行的有许多音乐家和听众以及苏联大使馆的代表。

从5月15—31日在北京的整段时间内，乐队举办了12场交响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演出了2场独奏音乐会。乐队的指挥还同中国交响乐队一起举办了1场音乐会。..... [57]

苏联交响乐队总指挥

Н.П.阿诺索夫

1958年9月

РГАЛИ, ф.2795, оп.1, д.299, л.1-19

№20680 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1958年9月3日)

摘自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2日

第185号

机密

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会谈纪要

1958年9月3日

1.参观了中国大使馆和应曹克强的请求告诉了他涉及今年9月8日在平壤开幕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的信息。

告诉曹克强，因为展览会，将有12名苏联专家去朝鲜。9月2日以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为首的5名人员已经抵达。展会面积需要600—700平方米，高6—7米。不需要特别加强的地板。展会大厅需要220伏和127伏的电力布线。展会分6个部分。预计展会会期为一个月。另补充，如果中国朋友需要的话，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可以更为详细地让他们了解组织展会的问题、展会的技术文件等等一切中国大使馆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也很乐意组织与索博列夫同志会面这样的安排。

曹克强同志对于展会的信息和为这个问题我们安排与索博列夫同志另外会面的建议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关于展会的信息是他们迫切需要用以好好筹办10月份在上海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

2.对曹克强讲述了一些现在正在实施的具体措施。这是因为今年5月在莫斯科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之间签署了有关1959—1965年间相互供货和有关个别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协议。在回答乔晓光的问题时告诉他，为建造企业提供设备和材料，企业的清单已被制定成上述的议定书。货款主要由朝鲜方面以商品贸易负担，仅仅是剩下的部分款项为无偿援助。

曹克强也照样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现在在北京正在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就所有应该列入长期协议的重要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今年9月20日将会签订相应的议定书。中国帮助朝鲜朋友在新义州市建造一家纺织厂(工厂产能6000个纱锭)和第二家生产牛皮纸的工厂。除此以外，中国帮助朝鲜建造5—6个其他工业项目，其中有纺织厂和制糖厂。曹克强指出，根据已有的协议中国方面应该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对上述企业进行安装和投入生产。可是现在朝鲜方面决定设备安装由他们自行完成。

3.曹克强说，10月份将有2个朝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第一个代表

团是带着感谢信来的，朝鲜人民感谢中国在抗击美国军事入侵朝鲜时，同时在战后时期给予朝鲜伟大的兄弟般的帮助；第二个代表团将护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回到中国。

他同时还通报，朝鲜同志请求北京宣布第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9月9日前撤出，可是因为台湾海峡事件，公布相应的声明将延缓到更晚的期限。他还补充道，朝鲜在10月1日开始朝中友好月，期间将成立朝中友好协会。

问了曹克强有关朝鲜党政代表团打算去中国访问一事。

曹克强答，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将在1958年访问中国。在这段时间里代表团还将访问越南。所以，乔晓光补充道，给朝鲜政府的官方邀请还没有发。

会谈结束时曹克强讲述了最近台湾海峡趋于复杂的局势，同时有关在北戴河今年8月17日至8月3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随员M.П.库尔巴茨基。翻译是随员王保民和库尔巴茨基同志。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B.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M.B.齐米亚宁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年9月12日

第421号

经办：B.И.佩利申科

ABПРФ，ф.0102，оп.14，д.3

№20393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1958年9月4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7月底，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收到了一份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同志的会谈记录的复印件。在这次会谈期间，龚普生同志就美国及其代理人为反对中国而试图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情况作了解释。

鉴于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年8月8日有关部门又专门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苏联相关组织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有关部门向与会者解释了中国政府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会议讨论期间，与会者表示希望得到一份书面性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性质的指导性文件以利其实际操作。

今年8月10日，我们向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发送了一份上述会议记录的备忘录，其中我们(向他)通报了我们就“两个中国”问题召集会议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向苏联各组织发放一些关于“两个中国”问题的书面性材料。

今年9月3日，刘晓大使向我们转交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及俄文译本附件，并告诉我们的具体情况来使用。

对此，我认为，(我们)理应尽快将附录的俄文本备忘录发放给所有参加了国际组织或向这些国际组织的大会和例会派遣了代表的苏联组织，以便其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将之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性文件。

请批准。

附件共计6页。

Г.茹科夫

附件：

备忘录

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帝国主义已越来越难以实施自己的敌视中国人民、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生活之外的政策，而且他们的这一政策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并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计划，美帝国主义更加紧了自己的阴谋活动，这就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为推行自己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而采用了各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与自己的追随者一起妄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际会议上形成中国代表和蒋介石分子集团分子同时出席的局面。针对美国的这一阴谋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支

持。美国国会前不久公布的一份名为《关于不承认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政策》的备忘录中，不得不承认其关于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并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不过，美帝国主义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一阴谋的。1957年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国际大会上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活动，并唆使蒋介石集团发表声明以示加入如下一些中国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国际乒乓球联盟、国际排球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天文学国际联盟、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等等。另外，当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能源大会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盟之后，美国便开始唆使蒋介石集团也声明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分子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所有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发出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与此同时，他们在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时还可能使用如下一些称谓，如“台湾政府”，甚至“民国政府”。总之，他们极力想使自己在国际上与中国享有平等待遇。在这一过程中其称谓上的差异只是一种手段，美帝国主义正是想借此来蒙蔽一些中间地带(中立)国家，而其真正目的依然是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彻底粉碎美国的这些阴谋企图，中国反对一切为了自身目的而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批准和接受“两个中国”的情况，并为此拒绝与任何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或被邀请加入的国际组织或会议合作(不论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何种称谓加入)。中国更愿意不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以便不为美国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这便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只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将建构自己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关系。

二、针对各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所采取的政策。

1.关于中国组织参加和蒋介石集团“组织”参加同一国际组织和不同国际大会的问题。在此类情况下中国将坚决要求该组织驱逐蒋介石分子。如果中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中国将拒绝与该组织或大会合作，并坚决退出该组织或离开其召集的大会。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举办一年之后，中国退出的国际性组织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国际执委会、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和国际足联等。前不久，我们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断绝了与它的所有联系，并退出了8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具体如下：国际游泳联盟、田径体育联盟、国际篮球联盟、国际举重联盟、国际摔跤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乒乓球联盟等。今后，中国将不参加任何蒋介石分子已成为其会员或受到邀请的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性大会。任何国际性组织和大会如果接纳蒋介石分子，中国将视其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将坚决退出此类国际性组织和大会。

2.关于中国组织或个别代表和蒋介石集团的个别人参加同一国际性组织或同一大会的问题。此类情况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是制造“两个中国”。但究其实质，它仍是敌人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际社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印象。因此，中国今后将不参加类似的国际组织和会议。至于像民族权利研究协会一样的国际组织，虽然中国已经是该组织的会员，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中国也会从其中退出。

如果一些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和大会邀请个别居住在境外的中国人参与其工作，我们将会对其进行考查，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被邀请人的政治立场方面。如果其不是以蒋介石集团的名义，而只是以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进行参与，我们就不会将之与“两个中国”问题同样对待。不过，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性，以防有人以此为伪装来实施其阴谋活动。

3.关于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或其例会，而蒋介石分子原先已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只是在其分支机构或例会上没有蒋介石分子等问题。这种情形不仅仅只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而且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国就急于加入此类国际组织。因此，针对此类国际组织和大会，中国坚决拒绝参加。

三、受美国影响的，截至目前只允许蒋介石分子参加而拒绝给予中国合法地位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

针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可归结如下：

1. 中国不派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不派自己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系统及其专门性机构所举办的任何会议。中国公民也不得以任何国际组织代表或合作者的身份参加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谈判和存在业务上的联系。

2. 中国不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提供任何材料，并希望兄弟国家也不参与联合国或其专门性机构出版印制有关中国的相关资料的活动。

3. 在处理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各国国际组织及其大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联合国是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具体操作如下：

(1) 中国将支持这些国际组织所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一般涉及到的那些决议。但如果这些国际组织的决议涉及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将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如果这些决议有益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友好合作，那么中国将不会表示反对。

(2) 中国组织的代表将不出席专门讨论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问题的例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出席那些由联合国代表起主导作用，以主报告人身份演讲的或以其他方式特别代表身份参与的大会，并拒绝听取联合国代表所作的报告。如果联合国代表以普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或发表普通的讲话，那么中国机构的代表将出席会议。如果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以会员身份参加的会议发言中对中国进行抨击和诬蔑，那么中国代表立即予以反击并随后退出会议大厅。如果蒋介石分子将以联合国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此举将被视作对中国的蓄意污辱。中国机构代表将对此提出抗议，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出席此类大会。

(4) 关于在各相关国际组织间建立咨询性关系的问题。如果一方是这些国际性组织，而另一方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认为自己不对此发表意见为好。如果这些问题诉诸表决，中国将投弃权票。

四、中国认为，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只是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关系与接触的方式之一。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及其大会能够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的影响和了解某些领域的发展情况。不过，即使中国不参加此类活动，任何人也是绝对无法限制中国的迅猛发展和阻止其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和交往的。中国部分地参加或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及其大会并不表明中国在对待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持消极立场。中国完全能够进行此类活动，但希望采取其他方式。相反，如果中国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或一些国际性会议，就可能会对后者的一些活动造成困难，将促使国际社会增加对美国的不满，并最终导致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遭受更多的谴责和打击。中国准备与那些不损害中国主权并会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国际组织和会议合作。

我们确信，在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反对美国蓄意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1958年9月4日

手写标注：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Г.茹科夫同志已经发出了刘晓的备忘录。

..... [58]

1958年9月16日

№20394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1958年9月5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6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苏达利科夫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陈肇源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5日

应陈肇源之邀，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

会谈首先提起关于苏联外交部于今年6月份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转交了一份会议记录备忘录，其中苏方建议中方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第十三次例会交换一下意见。在对苏方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之后，陈肇源说，他想就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可能涉及到中国的有关问题跟我谈一下中国外交部的想法。

陈肇源说，我们认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将会在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进行。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目前的情况是“东风压倒西风”，各个国家的和平力量有了极大的加强，民族主义运动广泛兴起。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依然控制着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因此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其可能会继续出台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诬蔑性决议。不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出台某个联合国决议，而是其总体政治成效和结果。

陈肇源继续道，关于大会的会议议程，其中直接涉及到中国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1.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2.朝鲜问题；3.关于香港的中国难民问题。

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陈肇源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14日印度代表团给联合国秘书长发送了一份关于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备忘录。在上次联合国例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的投票情况如下：赞成的29票，反对的43票，弃权的9票。陈肇源指出，在这次联合国例会上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票数可能会由于一些亚、非国家而有所增加，从而使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不过，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此届联合国例会可能还是无法解决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

陈肇源强调，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前不久才公布了一份关于“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美国政府这样做，就是想向依附于它的国家施压和用共产主义恐惧症来恐吓其他国家。不过，这份备忘录的公布表明，美国害怕其他国家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对中国提供积极的支持，并说明美国人本身也是害怕中国的。

陈肇源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与以往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主张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坚决要求把蒋介石分子驱逐出联合国所有组织和机构；反对所有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不论其采用何种方式)。

陈肇源继续道，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不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对中国有利。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彻底地揭露美国的政策。有鉴于此，如果形势没有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仍将不在联合国就恢复自身合法权利的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不过，在联合国例会举行期间中国将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相关的文章和资料。以上便是中国外交部关于在第十三届联合国例会上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所做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陈肇源向我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就这一问题所准备的相关资料。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是否认为由苏联代表团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以某种方式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比较合理的问题，陈肇源答，关于这一问题他目前还没有得到(上级)的任何意见或建议。他强调，我们知道，在恢复中国合法权益的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始终如一，而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苏联代表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见机行事。

二、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今年6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中国驻京平壤使馆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朝鲜政府对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讨论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并要求(中国)对朝鲜政府的政策给予支持。朝鲜政府还将类似上述备忘录发给了所有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目前，在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主要可归结为一点，即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

陈肇源说，中国政府基本上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致使美国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志愿军从朝鲜的撤军以及近期近、中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孤立。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利用这一形势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陈肇源指出，当然，这一问题可能在近期内仍无法解决，但这一要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

陈肇源继续道，中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例会上对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斗争给予支持，以促使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中国政府已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几份声明。其中主要包括：今年2月7日中国政府声明，今年2月19日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今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声明，最后还有今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答复性照会，等等。上述这些文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例如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便强调，“朝鲜和中国政府过去和今后都坚持认为，只有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才是包括举行自由选举在内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和其他向联合国提供了军队的国家的政府，能像朝鲜和中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在一定期限内将联合国军全部撤出南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这一决定，那么当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之后，朝鲜和中国政府准备建议召集相关国家会议以协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除了公布了上述这些主要文件外，当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期间中国报刊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今后，中方仍将会继续公布关于朝鲜问题的资料，以达到揭露美国的目的。

三、关于香港中国难民问题

陈肇源指出，根据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预定议事日程显示，此次例会 will 听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委员所作的报告。在其报告中可能会重提正吵得沸沸扬扬的香港难民问题，并将讨论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例会就这一问题所作决议的执行情况。讨论期间，蒋介石分子可能会用诬蔑性的发言来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所谓香港中国难民问题，陈肇源说，我们的立场依旧。我们坚决反对在联合国讨论该问题，也反对给予这些人以物质帮助。因此，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情况没有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也没有出现针对中国的恶语中伤，那么中国政府也不打算就这一问题发表正式声明。

我对陈肇源的上述情况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关于中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立场，我将向苏联外交部做出报告。我还说，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讨论到这些问题，并发生了某些新情况，我们将立即向中国同志做出相关通报。

在接下来的会谈过程中陈肇源说，自己到国际组织司工作时间不长。以前的工作地点是中国驻瑞典使馆。在谈到中国与瑞典的关系时，陈肇源指出，该国对中关系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立场经常摇摆不定。两国间的贸易来往也比较少。其中原因主要在于，瑞典人向中国提供的都是中国用不上的商品，而瑞典要求中国提供的是有色金属、油料作物和其他紧缺物资。如果中国在瑞典购买电子技术工业品，其价格都过于昂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驻中国使馆二等秘书A.B.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A.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档案室

经办：A.B.谢尔吉耶夫

1958年9月26日

第72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0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25-231

№25971 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9月5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洛桑

第125号文

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员国

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林匹克联合会

供媒体使用

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报纸上发表的简讯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得知，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了奥林匹克运动(首先，根据惯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8月25日直接得到了通报)。同时，中国田径运动、篮球、足球、摔跤、举重、射击和网球联合会也宣布退出相应的国际联合会。 [59]

考虑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信件内容已被各报纸广泛报道，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奥委会主席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奥林匹克的规则，对于出于政治动机对其

进行的中伤和诬蔑，需要做出一些解释。

1946年中国第一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947年迁到南京(董守义教授任总干事)。1951年该委员会随同档案资料一起搬迁到了台湾(福摩萨)(但董守义没有去)，并确立起了对台湾的管辖权。董守义留在了北京，任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亲近，直至1958年8月19日退休。

同时，在北京建立了另一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也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为附属委员会，其目的是争取得到全世界青年的承认。因此，不能不关注第一个福摩萨奥林匹克委员会(很重要)，也不能不关注中国大陆的委员会(更为重要)。

第二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只是在1954年5月15日的非洲会议上才得到承认，而且只是微弱的多数(23票对21票)。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北京委员会一直顽固地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输送政治“间谍”(具有外交身份的随员等)而不是运动员，其目的是提出关于承认的声明。这些政治“间谍”(很容易认出他们)既无些微的体育概念，也无奥林匹克知识。我们打算回忆某些政治性讨论的细节，这些人试图绑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从1954年开始，关于“两个中国”的争论就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负担，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继续承认以前的委员会，即福摩萨委员会，因为它把自己的政权延伸到确定的领土，又是委员会的“老成员”。

另一方面，加入组织后，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民主中国的体育项目纳入奥林匹克运动无须任何条件。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试图代表中国全体运动员，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福摩萨委员会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现在，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委员会不可能把自己权力扩展至福摩萨。

最近4年来，他们在出席每次会议(或者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或者是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时，北京的中国代表在每次发言中都固执地提出自己的政策。艾弗里·布伦戴奇先生 [60] 多次提醒和警告他们。他们似乎不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不是政府，而是体育组织(它既不会指责，也不会赞扬得到承认的某个国家的政府，因为这些体育组织所遵循的是奥林匹克规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防止政

治言论。很遗憾，这些规则还不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理解。

我们只是希望民主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能改变自己的活动，能允许其再次加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来，不再成为旁观者。

同时，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的辞职申请，并从我们的文件和名册中删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按照其领导人的意愿，中国(北京)运动员不能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竞技运动。

我们想强调的是，艾弗里·布伦戴奇先生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一切政治性质的言论一向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委员会成员和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致以真诚的敬意！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

奥托·迈耶尔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435, д.28, л.87-89

№09876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1958年9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泛展开了成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在中国报刊上，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

在《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的文章中，在阐述人民公社的作用时曾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贸易)、学(文化教育)、兵(民兵，既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虽说人民公社化运动规模已经很大，中共中央打算在1959年春天基本上结束运动，而中国报刊上还在强调，在这一事情上不应表现出不必要的匆忙，尤其是在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问题上。现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日报》指出，无论如何不要求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而且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已经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中国报刊指出，需要3—6年的时间。

中国同志们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合作社进一步巩固的结果，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在新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千方百计发展地方工业方针的情况下，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写道，规模比较小，全国平均每个合作社才有100多农户，劳力少，公积金不多，发展慢，发展多种经营受到土地数量、劳力不足和资金不足的限制。所以，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大型合作社成了农民群众自身的真正要求。建立大型合作社是人民公社出现的必要前提。按照中国报刊的估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要求有能够保障生产力进一步更大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基层行政单位乡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乡或几个乡的工、农、商、学合而为一，处在统一的机关领导之下。

乡和公社合为一个指挥机关。乡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公社代表会议，乡人民委员会同时也是公社的管理机关，公社党组织书记同时也是乡党组织书记，乡长同时也是公社主任。

在人民公社里，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自留地、部分农具、家畜和生产设施都实行集体化。公社里成立新的劳动组织和实行新的产品分配形式。

公社实施综合经营，包括农业、工业生产(有小型和中型企业)，从事商业、文化和教育以及军事训练(民兵)。

人民公社，按其规模是一个大的经营单位，对于发展各种生产部门有着广泛的可能。例如，在河南省，利用公社资金，建起35万个作坊和工厂。许多公社建立了发电站、冶金厂和机械修造厂。中国报刊报道，公社生产的发展，为逐步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脑体之间的差别创造着条件。

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组织。这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为了给这一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

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不过在最近以前，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的怀疑。

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在中国报刊上有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

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实际措施：

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

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

三、从安东诺夫同志今年8月22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电报可以看出，苏联驻中国使馆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安东诺夫在该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即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们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认为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

附“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简本。 [61]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9月6日

第15Д1094号

ЦХСД, ф.5, оп.49, д.129, p.8891, л.189-192

№25227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1958年9月8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8日

第2379/TC号

机密

文本第6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

1958年9月8日

我告诉刘晓，中国朋友对于H.C.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函文本的相关意见，已通过A.A.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了转达，并且已经被苏共中央予以考虑且接受了。

确定了最终措辞的该信件的复印稿已经于9月7日晚上被亲手递交给了美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戴维斯。我将信件的文本交给了刘晓，并告诉他今晚该信的内容会通过广播公布，明天会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库兹涅佐夫

АВРФ, ф.0100, оп.51, д.3, л.431, л.70

№2062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1958年9月9日)

1958年9月1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7—11日

平壤市

1958年9月9日

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庆祝保加利亚人民解放日14周年的招待会上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杨勇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委王平进行了会谈。告诉他们有关苏共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联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杨勇和王平为此表示感谢。

援引杨勇答应去我那儿，就邀请他和王平9月10日去大使馆观看故事片并吃晚饭。他们表示了感谢，但说很遗憾无法去，因为10日一早就要去司令部驻地。约定，他们尽力挑选时间在9月里去我们大使馆。

杨勇和王平说，他们邀请所有派驻平壤的大使们近日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并问我是否能去。答，就像其他大使一样，非常愿意去。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南日简短地通报说崔昌益案件调查还没有最终结束。崔昌益供认了一切，除了自己与军事人员中的反对派有犯罪关系；反对派领导人中再没有其他受到法律追究；朴昌玉继续被软禁在家中；金科奉已经退休；朴义琬仍在工作。同时南日表示，为什么朴义琬想来参加你们的招待会？

对南日答道，的确如此，在开除出党后的最初几天，朴义琬在与佩利申科电话谈话里表示了要我接待他的请求。我不认为有必要接待朴义琬，所以没邀请他。最近的两个月，都知道，我不在这儿，所以我并不知道有关为了和我见面朴义琬有什么意愿或企图。

晚上举办了大型的政府招待会。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伟大的苏联，将我们的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承认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并继续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无私的帮助。在此请允许我再次以全体朝鲜人民向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真诚的感谢”。

招待会期间的会谈时(桌旁我的位子边上是金日成)金日成说，苏共

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委员会书记和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表示愿意在上述地区和朝鲜相邻的省建立紧密的接触，特别是与咸镜北道。金日成表示他们欢迎这样的意愿，将为此提供一切帮助并给予省领导必要的指示。这样合乎心意的紧密接触与经验交换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建设。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395 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9月10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莫斯科克罗波特妮娜大街10号

第286号

1958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索乌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另通报如下信息：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和玛莉亚·塔·格拉萨·杜特拉目前正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客人的身份逗留在莫斯科。她们将一直在这里待到今年9月16日。

上述姆利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见附录。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秘书长

M.科托夫(签名)

会见毛泽东——巴西记者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毛泽东俯身在拉丁美洲地图上，指着巴西说：

“你们的国家很大，居住着数百万人；它几乎与我们国家一样大；我知道，它也像中国一样富饶。”

毛用手沿着拉丁美洲的轮廓，穿过太平洋，最终停在了中国，笑着说：“请看，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后方。”

能够与主席见面并非易事；要知道，他已经有4年没有接待任何外国记者了。《克鲁塞罗》报记者是南美洲首位向毛提出问题的记者，而毛在回答问题时，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要翻译毛的话可不容易——翻译往往需要费很大的劲；会谈是用英语进行的，而据我所知，这位中国和亚洲人民的领袖目前正在学习英语。毛主席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分析国内、外事件时语言常常带着几分诙谐。（官方翻译对我说：“要翻译毛主席的话并非易事；他经常会在答话中使用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句子，而这些话语又非常委婉和形象。”）

在继续研究着拉丁美洲地图的同时，毛主席忽然转向我并说道：“拉丁美洲就像日出，而美帝国主义就像日落。他们像什么呢？就像‘纸老虎’；有时，他们也会咬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提防(他们)；但绝对不应怕他们。中国在这方面已作了榜样。”此时，毛的目光里透出钢一般的坚定。

（作为）共产主义诗人和作家，（毛泽东）无疑是现代马列主义作家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毛泽东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毛泽东的相片和半身塑像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人们在想到他时，已不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看待。他的脸晒得黝黑，因为前一阵在中国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里他去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毛高高的个子，与一般体形消瘦的中国人相比，他显得有些微胖，但步履轻盈。他看我们时，眼光专注而柔和。他的个性很强，但性格温和而开朗。正是这种从自己农民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品质才使他备受全中国人民的爱戴。一名政府成员对我说：“他(指毛泽东)没有架子，善于与人民交流；在跟农民和工人在一起时，他询问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说的也都是人们听得懂的话；他不爱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而只愿意与人民在茶桌旁或秧田里交谈。”

“在夏季自己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的休假期间，主席经常会到中国北方的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里去参观。他向国家所发出的指示，很多都是这样——在自己的实地考察之后付诸实施的，其中包括领导干部、所有官员、作家、记者、音乐家和诗人，都必须定期与民众交流；他们理应参加农业劳动：播种，收割，到炼钢厂、大坝建设和机井挖掘等工地参加实际劳动。”

此时，毛主席修长而有力的手依然指向拉丁美洲。我从旁望去：毛泽东实际年龄已经有64周岁。他总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被其

敌人——国民党于1933年杀害的。但他看上去顶多50周岁。表面看，他身体健康。可能正是由于他有一副好身体，才使他能够率领30万将士进行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长征”——在一年时间内红军不畏酷暑寒冬、平原大山，一刻不停地横穿了整个中国。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时，主席面带微笑，盛情地递给我一支过滤嘴香烟。他先给自己点上一支，然后又为我划着了一根火柴。此时，我离主席很近，观察到他的手指一点也不发抖。他手拿着燃着的火柴，直到它几乎燃尽，同时思考着如何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不久前发生的“福萨摩(台湾)事件”的问题。我对他说道，关于福萨摩(台湾)的问题是当前全世界都非常瞩目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才关心它。这里的报纸很少涉及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它，那么就没有人会主动谈到它。此时，火柴已几乎燃尽。主席又点燃一支，并开始用比平常更为平静的语调答复道：“台湾属于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将通过谈判或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在作了如此坚定的声明之后他略微深思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美国依然在恐吓中国。即使这样，我们仍将要收复台湾。那么，这种恐吓是否就此停止呢？不，美国的恐吓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几个与我们情况类似的国家，这是一场总危机——它源自美国的威胁。”

毛泽东主席的上述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即使得到解决，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仍是不会宣告结束的。他的上述声明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就像一个魔法师——能够预见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进程。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巴西。指着地图，主席请我给他看印第安人分布的区域，并问道：“巴西现在还保留有印第安人吗？”当听说巴西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关于我们首都迁移的事，对此他已知道了一些情况；他还问了我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巴西的耕地面积、人口分布、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关于我们工、农业的发展情况。毛主席问我上述问题共用了15分钟。当我告诉他目前我们钢的产量不多——只有100万多吨时，他指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要知道，在革命前中国钢的总产量才有40万吨。即使现在我们在钢的生产方面仍是很落后的。今年，我们将号召工人们把钢的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这样，我们钢的总产量将超过1000万吨。”

我对毛主席说，在钢的生产方面中国正在创造奇迹：在一年内将钢产量翻一番——这是多么大胆的计划啊！这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毛泽东微笑着说：“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面积，人口数量及其需求情况，你就

会明白：我们的钢产量还太少，我们还必须更多地生产钢。”不过，针对主席的上述观点，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他的悲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国市场上工业品的品种不但繁多，而且数量很大，甚至完全可以用工业品从事出口贸易。主席说：“是的，中国的轻工业生产状况是好的；但在重工业方面我们的需求仍有很多。巴西在增加钢产量方面是否提出了所要达到的目标呢？”我简要地谈了库比谢克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制订的计划。但我强调，中国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锅炉来炼钢的方法——不适合巴西；目前中国工业的巨大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方面利用已有的数千台旧锅炉炼钢，另一方面每年将建造的数百台新锅炉投入使用。

当主席邀请我再来一杯花茶时，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问题？主席坚定地答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重视这一问题。如果巴西政府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对此倡议表示欢迎；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拥有贸易关系，而不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对之依然抱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建立文化方面的关系，我们的兴趣依然不会改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虽然我们各自的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组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要知道，中国的台湾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即使假设我们收复了台湾，但来自美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拉丁美洲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斗争。”

在强调自己的批评并非针对美国人民，而只针对“在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毛主席继续道：“在工、农业方面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巴西人和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得走工、农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而在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你们国家——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一过程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是当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历史赋予这些国家如下任务：赢得国家本身的民族独立，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

这里，毛主席稍作停顿并以调皮的语气补充道：“另外，我们的国家相距遥远；你们没有理由担心会受到我们的侵略……至于我们，我们也

不会担心你们国家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针锋相对的战争。”

我问主席，美国所采取的物资禁运政府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他答道：“不会的，他们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这甚至有利于我们将全部力量集中到国内。美国的这一政策并不会对我们产生特别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不，我们对美国的物资禁运政策并不感到难过。”与此同时，毛泽东微笑着转而询问在场的翻译道：“你们都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自然了解这个国家；你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我提醒主席道：几天前我听到中国外交部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美国不承认我们，而在于我们不承认美国。”毛泽东点头表示肯定了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说法。

接下来，主席问了我如下一些问题：我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有何感想；我都去了哪些城市、炼钢厂、煤田、农业合作社。我回答，自己感到遗憾的是此次行程安排太紧，时间有限。毛泽东邀请我下次来中国多待一些时间。他说，尤其是现在各个国家理应多多交流和相互了解，并强调了记者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问我是否喜欢自己的职业，并补充道：“应当到各地去走走，以便观察和学习一些新东西。”我问道，难道您当年也做过记者吗？主席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只是因为政治过早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了去过俄罗斯，毛泽东一生从未离开过中国。感到会谈已占用了主席过多的时间，我抓紧机会问主席道：您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何看法，是悲观还是乐观？毛答：“我持乐观态度。目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身陷困境，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世界的一定区域实施统治。他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企图在各处都遭受到挫折，因为美国以殖民者自居。那么，他们为何要美誉自己为所谓‘西方国家’呢？难道巴西就不是西方国家？巴西之所以不是西方国家，是因为巴西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只有西方才具有的那些特殊目标？事实上，美国与法、英、西德、比利时、日本、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一样，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总想着去统治其他国家。我刚才已对你说过，这些‘西方国家’就像落日。即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赞成他们所推行的政策。”

毛泽东以慈父般的语气对我说道：“总之，我们不应当怕他们；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从一开始便总想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从自己的

平生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就是在不断对我们实施恐吓，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对我们)发动真正的攻击。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关键是不能让自己被他们所吓倒，而是要把一切与此相关的成见、迷信和神秘主义教条彻底抛弃。因为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中国，我们正逐渐地清除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以迷信为例：以前人们常说，‘帝国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可现在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要比我们落后。虽然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钢，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我们的差距可谓非常巨大。我们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视他们。列宁就曾说过：‘亚洲比欧洲更先进。’当列宁说这些话时，中国只有孙中山博士所领导的运动。可是，就是在那时列宁便看到，亚洲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亚洲必然会超过欧洲。现在，列宁当年针对亚洲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即‘他们(指拉丁美洲和非洲)正行进在世界的前列’。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是落后的。可能，杜勒斯不会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并会说：‘你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你们的世界是空的，虚假的，而我们手中有钢还有原子弹。’他说自己有钢和原子弹，这都是事实。但他为何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美洲人民根本不买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们的账？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他们还能够炫耀自己的武力，但这种情况并不会维持太久。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在亚洲、拉丁美洲、美洲和非洲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影响。因为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比我们更先进，比我们更高贵，而我们则比他们落后和低他们一等。”

这时，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并问：“您是在美国学习过的，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呢？”不等后者回答，毛继续道：“我再次强调，即使从战略的角度我们也应当自上而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纸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应当认真地对待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一句话，我们应当明白，他们这些纸老虎也是会咬人，我们应当主动地向老虎发起攻击，直到打死它，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必须与这些老虎一起生活。”

主席还特别讲了关于彻底扫除一切禁忌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教育的角度着手。对此，他问我：在巴西现代生产活动是否与教育紧密结合呢？我承认并非如此。

于是，毛解释道：“我们就关于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积极的。我们实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体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过去我们的教育总是与生产相分离的。而在其他所有国家也几乎都是如此。这种样子又怎么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呢？”毛泽东问我，是否曾接触过这种新型的教育体制。的确，他确实对这种新型教育体制有一定了解，也的确看到过这种新体制在大学和技术学校中的使用情况。在经过理论学习之后，大学生们通常会到工厂参加实际工作。我看到冶金专业的毕业生们在建筑工地和小炼钢炉旁与普通工人一起工作。我看到未来的农艺师们在合作社、秧田里和庄稼地里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项规定也适用于所有拥有各方面专业技术的人们。

毛主席补充道：“如此一来，当大学生们大学毕业时，他们也就将拥有相当的科学实践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这种(教育)体制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这种体制也有益于国家机关。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应当了解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再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让外交官们也去从事一下一般性的土方工程和建筑工作等？是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在我们国家里这都是稀松平常的现象。”此时，当时在场的从事外交工作的翻译说，他就曾以小工的身份在离北京不远的“十三陵”大坝建筑工地工作过。主席听后微笑着说：“这还不够。目前，在中国正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国家公务员的2/3负责分内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其余1/3则参加社会工作，如此定期轮换。”

毛泽东继续道：“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相关部门仍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前不久，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党中央连续开了几天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主席说：“我们决定号召人民在今年把钢的产量翻一番，以便使我们的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还决定号召人民组织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由合作社员们自己主动提出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要求将合作社(这在全国共有70万多个)联合成数个更巨大的中心，每个中心将拥有数千个家庭。而由此所组成的公社将包括上万个或更多家庭。公社将能够在农业、工业、教育和贸易等方面为自己提供保障，并通过民兵组织保障军事防御。公社所设立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将使妇女们能够更积极地投入生产当中，从而为农业提供巨大的劳动力。”

毛泽东还谈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问题。可明显看出，这个问题使他心情异常激动。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农业合作社阶段已经过去。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建立“新民主”已经近10年了。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是中国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积极步骤。

毛主席又要了一杯茶。我问他，对当今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中立国或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第三种立场如何看。我想知道，与世界两大对立集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此类中立和第三种立场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毛泽东慢慢地点燃一支烟，最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难预测”；“这种立场要长期保持取决于多种情况。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在它之后还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过，我认为，这种中立或所谓第三种立场，将一直维持到当它依然能够满足民族独立的需要的时候(换言之，如果它已经不能满足这方面需要，那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因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立场符合其民族独立的需要。反正帝国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立场，难道不是吗？因为这种中立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解除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托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也意味着对托管制度的限制。我们欢迎这种中立政策。因为相对帝国主义而言，这种立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我们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给予他们以支持”。

我们举行此次会谈的地方是一个前百万富翁的府邸。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在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回来之后的几天里又参加了本党的一个会议。毛主席起身为我送行。他一直将我送到汽车跟前，祝我顺利返回巴西并邀请我再次来中国访问。他面带微笑，一直等到送我的汽车离去。当时已是北戴河(北戴河有一个名叫中国海的地方，以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经常来这里游泳)的晚上，天气有些凉，但我看到，他依然在原地站了良久。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03-212

№08827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1958年9月11日)

副本

致苏共中央：

出席1958年9月10—11日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专家全国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专家代表团(一行4人)团长曾山同志，在同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Г.А.别洛夫同志会谈时表示，该团在归国途中愿在莫斯科逗留两周以了解苏联档案的组织情况。

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他们在苏联逗留期间的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

中国档案专家代表团建议今年9月16日抵达莫斯科。

苏联内务部代理部长

佩列专尔特金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499, л.212

№13734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1958年9月11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1日

拜访了张闻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张闻天转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在1958年8月16日中国外交部第80号信函中表达的请求的答复，以便使张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个答复。

请张闻天向周恩来通报，他在9月10日转交给我的“中美关于缓和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的声明”草案，也就是在华沙为指导中美谈

判而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那份草案，我已经于当日向苏联政府做了通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共5份，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Ю.Б.安德洛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沃先金

1958年9月25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1, л.244

№20624-1 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3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3日

参加外交使团团团长里哈德·费舍尔召集的大使及代办会议。

会议讨论了以下各项：

1.关于大使、代办以及各使馆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看望的一些具体问题。此次出行是受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之邀请。

2.各大使与各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奥吉(Аоди)游览一事。

在志愿军司令部停留期间，费舍尔将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发表讲话。讨论其讲稿时，我建议添加上这句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全力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有关声明，如果他们非要采取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将在中国人民制止侵略者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保加利亚大使佐罗·克雷斯捷夫·加米涅夫建议，讲稿的结尾部分要体现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这两条补充意见被悉数采纳。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的行程拟定于今年的9月17—19日。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415 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1958年9月15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5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我向他转达了苏联驻日本使馆向日本外交部所发照会的内容，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即美国人利用日本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挑衅(参见1958年9月15日中央所发电报)。

针对在涉及台湾问题时苏联政府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对苏联政府完全

理解中国政府近期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章汉夫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谢意。

我对章汉夫说，苏联政府的坚决声明以支持中国政府的外交政治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目的就是使美国人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其侵略企图。

章汉夫问，该照会是否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我指出，照会内容将在苏联驻日本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公开发表将在苏联报纸上进行。

当时在会谈现场的还有：苏联驻中国使馆译员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Г.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安德罗波夫、齐米亚宁、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9月16日

第712号

手写批注：

归档。知道了。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48-249

№20624-2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 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7—19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7—19日

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的邀请，与各大使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们拜访志愿军总部。苏联一方的参访人员有：大使馆参赞М.Е.克留科夫偕夫人、一等秘书Б.К.皮缅诺夫、随员М.И.库尔巴茨基、商务代表И.А.格拉德科夫、《真理报》记者Г.Г.奥库洛夫和内务部顾问В.И.连科夫。

抵达的第一天，志愿军官兵在俱乐部举办了演出会。演出之前，政委王平上将志愿军的名义向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外交使团团团长里哈德·舍费尔作了答辞。各使馆的工作人员均获得了纪念章。

第二天，9月18日，向志愿军官兵陵墓敬献花圈，在毛泽东儿子的墓前放了花束。毛泽东的儿子精通俄语，作为翻译跟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工作，于1950年年末在美机的空袭中牺牲。

献毕花圈，参观志愿军总部警卫营的营房以及其他处所，并进行了打靶。晚上，司令员杨勇设宴招待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杨勇在讲话中说，大使、代办和各使馆工作人员访问志愿军司令部，是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兄弟情谊的表现，是对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斗争的支持。舍费尔和我都以外交使团的名义作了简要发言。

我邀请杨勇、王平和参谋长王蕴瑞到我苏联使馆来。他们接受邀请后说，今年10月初可以前往。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39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

会谈情况(1958年9月18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0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8日

我拜访了周恩来，向其转交了一份H.C.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问题给艾森豪威尔发送的一份草案文本，并请中国朋友就该草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信件本身尽可能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简要听取该信件的内容之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支持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如果中方对该信有什么意见，将会于9月19日向苏方做出相关通报。周恩来还说，关于该信的主要内容中方已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得到了相应的通报，目前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也已知道此事。

随后，周恩来向我通报了关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的情况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下一步打算。根据9月18日杜勒斯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和中国大使王炳南通报的关于9月18日自己与美国大使比姆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情况，周恩来宣称，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归结起来就是：美国要求中国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周边“停止炮击”，并以此作为双方进一步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从而达到“以和平方式调解台湾地区问题的目的”。

周恩来继续说，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大使要求：“(中方)停止炮击，然后我们协商关于以和平方式消除你们海岸线附近的障碍。”其这里所谓的“消除障碍”仅指采取这些措施：实现中国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美国和蒋介石)停止利用其向大陆投放蒋介石特务，等等(参见9月19日与张闻天会谈记录：关于中美华沙谈判期间美国提出的协议草案)。

关于杜勒斯先前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周恩来对其评价如下：“是艾森豪威尔的老调重弹(今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周强调，杜勒斯也提出了关于中方“停止炮击”的要求，并以国际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似乎台湾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都是中国造成的，似乎是中国“攻击”蒋介石，而不是蒋介石分子在挑衅中国。

周恩来说，根据当前形势来判断，美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不对盘踞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蒋介石分子动武。

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态度，周恩来宣称，美国的这一要求是中国“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骗局，是对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误导。我们应当对之进行最有力的揭露。例如，杜勒斯只是不断要求中方“停止炮击”，而故意不公开提及关于美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杜勒斯并不愿意蒋介石分子现在就从台湾周边岛屿撤走。

鉴于美国在华沙谈判期间和杜勒斯在近期言论中所坚持的立场，周恩来就中国政府的今后将采取的举措声明如下：中国政府将集中力量对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炮击”的要求进行揭露，并提出反要求，即美国应将自己的所有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方的主要论据如下：中国不是针对美国人作战，而针对的是蒋介石军队；美国军队出现在台湾地区才是导致这里局势紧张的根源。与此相应，周恩来通报道，在华沙参加谈判的中国大使王炳南已得到指示：向美方提出中国的反建议——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说之后，中国政府将提出关于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正式声明。总之，周恩来得出结论，中方停止炮击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

关于中国朋友计划的广泛揭露美国提出的所谓“停止炮击”的要求，周恩来指出，有必要在“中立国”，尤其是那些持中立立场的亚洲国家中开展相应的宣传，以便其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周强调，在“停止炮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这些中立国的立场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其关键主要在于：中立国家一定程度上都相信了美国所谓的“停止炮击”的说法，似乎只有中国这样做了，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对此，周恩来指出，虽然上述看法在中立国中还没有形成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在解释了中立国行动的

未来发展趋势的同时，周继续道，如果美国能够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比如，在1个月期限内)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那么我们将同意停止炮击和以和平方式放蒋介石的部队从这些岛屿撤离。但鉴于我们注意到目前杜勒斯并不同意做出这样的保证，因而我们也暂且不做出上述声明。中立国正好可以在敦促这一条件的实现上做出努力，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提出的“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支持。

周恩来又通报道，为了强化中国提出的关于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朋友打算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力度，并准备全力给予蒋介石军队以反击，如果后者胆敢用飞机轰炸中国内地目标的话。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将要求美国军队直接参与自己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因为美国人清楚：目前中国并没有解放台湾的打算。

关于美国人对中方起草的《中美关于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草案的反应，周恩来说，最初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迅速地向其提出自己的条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条件是“最后通牒”；但随后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声明，即中国并不打算现在就以武力解放台湾。不过，周恩来指出，美国人只是现在还不想公开这一点。

周恩来解释道，中国并不想加速谈判的进程，不想单方面地急于公开自己起草的中美声明，而是想通过外交谈判来进一步试探美国的立场以了解其对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补充道：“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

周恩来请我把以上所述通报给目前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

我感谢周恩来通报以上情况并承诺将满足其请求。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玩笑式地说道，中国必须与美国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华沙谈判，在纽约揭露杜勒斯，在金门和马祖诸岛屿打击蒋介石军队。

当得知我曾作为外交使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周恩来感兴趣地问，中国朋友的成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周恩来的助手

马列、外交部翻译方祖安和我使馆一等秘书A.Д.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7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

№25228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 致美国总统函(1958年9月18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0日

第2481/TC号

机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伟烈

1958年9月18日

我接见了张伟烈同志。

1.我亲手向张伟烈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件文本。

我说这份文件会送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然后转交给毛泽东同志。该信将在接到中国同志的评论意见后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在报纸上发布。

张伟烈表示感谢，并答应立即通知北京准备接收这份文件。

2.张伟烈在昨天(9月17日)告诉我，他与目前在雅尔塔的刘晓大使进行过电话交流。刘晓对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面感到非常满意，并打算在雅尔塔待到9月25日左右。之后他将返回莫斯科，为将在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的庆典做准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库兹涅佐夫

АВРФ, ф.0100, оп.51, д.3, л.431, л.71

№13735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9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9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9日

应张闻天的请求拜访了他。他通报说，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全体委员，阅读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台湾问题上给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函，完全赞同这个文稿，并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张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谢意，感谢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文本他提出了两个意见，也就是：(1)建议用“紧张局面唯一的和真正的来源”替换“紧张局面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来源”；(2)把数字“35”(也就是承认中国的国家的数量)改为“30多个”，因为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31个国家。

张闻天还向我介绍了关于中美华沙谈判协定美国草案的文本，这是

美国大使比姆今年9月18日在华沙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以下是这份协定草案所阐述的内容：

为了停止在金门和马祖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远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比姆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一、王炳南大使向比姆大使通报说，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之外，中国放弃针对金门和马祖岛屿使用武力行动，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确信，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将不采取进攻或者其他旨在反对金门和马祖岛屿的挑衅行动。

二、比姆大使向王炳南大使通报了以下情况：

1.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外，美国政府放弃在金门和马祖岛屿采取军事行动；

2.美国政府将实行监督，以便使金门和马祖岛屿不采取进攻或者旨在针对大陆和其他岛屿地区的挑衅行动。

3.两国大使应该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寻找不断地缩减近海岛屿和与大陆毗邻地区的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具体措施。

张闻天强调指出，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草案”。

出席会谈的有外交部的译员方祖安和大使馆一等秘书А.Д.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文件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1, л.242-243.

No20397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1958年9月21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1日

一、张闻天邀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和临时代办到外交部并交给每人一份中国外交部于今年9月21日起草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他通报道，该“备忘录”也将递交给所有其他外国政府派驻北京的代表。

张闻天宣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9月11日和杜勒斯于9月18日分别在各自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在台湾海峡区域“禁止开火”的要求。美方这样做没有别的，就是在玩弄政治阴谋以欺骗社会舆论。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美国的这一阴谋。

接下来，张闻天提请大家关注如下诸点关于台湾地区形势的评估以及中国对之所持立场。

1.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其中包括：7艘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40艘扫雷艇，600架战斗机，1个营的特种兵，在台湾部署了响尾蛇导弹。这一切均表明，美国正集中大量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2.不过，美国并不敢因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扩大(与中国)的冲突。近期，其军舰均保持在与上述岛屿沿岸12海里的地方。美国暂时没有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用美国舰直接向上述岛屿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美国只想威胁中国，但害怕直接卷入战事。

3.关于蒋介石分子与美国的分歧。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共有蒋介石军队12万人(其中,金门8万人,马祖4万人)。蒋介石担心丢失这些岛屿,因此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突破解放军岸炮对这些岛屿的封锁并加强其驻军的防御。鉴于这些岛屿的失陷必然恶化台湾局势,蒋介石一再声称,不能丢失金门和马祖诸岛。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仅凭自己目前的力量是很难控制这些岛屿的周边的,因此便要求美国给予积极支援,并对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表示不满。然而,美国目前只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台海问题(当然,杜勒斯也并没有打算让蒋介石的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因此其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美国积极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样就复杂了美、蒋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4.美国在加强对蒋介石的控制的同时,又在台湾集结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5.中国将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并采取一切措施以建立一道打不破的包围圈。如果美军“不向我们发动攻击,那么我们就绝不向其主动进攻。而如果他们向我们攻击,那么我们也将以牙还牙”。中国政府正准备与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也要揭露其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

6.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经验来判断,当前在台湾周边岛屿沿岸地区所进行的斗争必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几年。中国准备将这场斗争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美国作出让步。众所周知,美国总是不碰南墙不回头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就不会去想别的办法。

7.美国目前的处境非常孤立。而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得到了亚、非多数国家的支持。甚至像芬兰、日本等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摇摆立场,英、法等国也不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8.美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兵力集中在远东地区,这对其很不利。鉴于台海地区斗争的长期性,美国将较少可能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

在最后结束时,张闻天说,在对美国提出的所谓在台湾地区“禁止动武”的要求实施揭露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兄弟国家的帮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希望兄弟国家能够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属于联合国

成员的国家解释中国的立场。张闻天强调，一些“盲目追求和平”的中立国家可能会把杜勒斯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信以为真，从而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错误立场。

我对张闻天所作的上述通报表示感谢，并承诺将按照中国的要求将该“备忘录”转交苏联相关部门。

二、在等待其他国家代表到来会谈之前，张闻天交给我一个装有周恩来给目前正在联合国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的信的文件袋。他要求我迅速将此信发送给正在纽约的葛罗米柯同志，并由后者按要求转交(给西哈努克)。关于这封信张闻天说，西哈努克在香港逗留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了正确的言论，但其在纽约的讲话实际上是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动武”。因此，周恩来给他写了此信，以便向其解释这一问题的实质。张闻天将该信的复印件单独给了我一份，以作为资料保存。

我答应张闻天将满足他的请求。

附注：该“备忘录”由特别中心翻译。随会谈记录附有中文原件(仅发送给齐米亚宁同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电报发出。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20398 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 讨论台湾海峡局势(1958年9月23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荷兰驻中国临时代办斯林甘贝尔格和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萨姆德的会谈
记录

1958年9月23日

我是在阿富汗使馆举办的午宴上会见了斯林甘贝尔格和阿不都拉·萨姆德。

在会谈期间，萨姆德，特别是斯林甘贝尔格，对目前台湾海峡出现的严重形势感到尤为不安。

斯林甘贝尔格固执地认为，美国是不得以才在远东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和插手台湾事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中国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而不在亚洲地区实施扩张政策。其最终观点为：金门和马祖诸岛屿应当归属中国，但此后台湾岛应置于某个中立国的国际托管之下。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不应由联合国来承担，因为它对解决这一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的期限应为约4—5年，以作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过渡期。斯林甘贝尔格继续道，在这一过渡期内应找到能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具体解决办法。斯林甘贝尔格认为，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声明，也未必会在中国周边岛屿的问题上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斯林甘贝尔格一再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敦促中国在取得周边岛屿之后，便采取等待的明智立场，保证暂且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同意在台湾海峡地区确立这种临时状态，以便等待时机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萨姆德指出，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周边岛屿归属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撤回台湾，然后开始谈判。斯林甘贝尔格声称，蒋介石是不会接受这一解决方案的，因为这会对其声望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炮击的情况下。萨姆德立刻毫不客观地反驳道，要知道，蒋介石集团是完全受美国操纵的，因此绝对是会接受美国人的命令的。

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福摩萨自动解放的理论”。其认为，台湾反正将来要落到中国手中，可能有如下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蒋介石去世，台湾爆发反蒋起义，等等。因此令斯林甘贝尔格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何现在要在台湾海峡地区大动干戈。斯林甘贝尔格指出，如果中国从1949年起便耐心等待的话，那么再有个4—5年时间台湾问题最终就会解决了。

关于美国在中国周边(包括台湾)的远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的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总体看法如下：如果美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证——中国不会破坏亚洲的和平，那么美国就可能(主动)放弃这些基地。关于这一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中国得保证自己不会在亚洲实施扩张政策。关于美国主动放弃自己在亚洲的所有军事基地的可能性问题，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只有当美国人拥有了像苏联那样的高效的武器，如远程导弹，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我是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给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信的精神回答的。

斯林甘贝尔格接着宣称，葛罗米柯在最近一次联合国例会上提出的裁军计划好是好，但就是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对此我答道：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解决。因此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之前，西方国家首先得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B.П.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

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1958年9月25日

第705号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45-247

№1382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1958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5日会议第18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Е.А.福尔采娃、А.Н.柯西金；会议由М.А.苏斯洛夫主持。

关于莫洛托夫对中国同志发表的言论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召见莫洛托夫，并对他说：他的行为是错误的。

(没有记录)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9, л.48

№20624-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1958年9月26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26日

应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请求会见其本人。

交谈之后，与乔大使就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各種国际和国内局势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到台湾海峡局势时乔说，根据中国同志的看法，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就金门和马祖岛屿问题卷入一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的战争。但是，蒋介石与他的将军们希望美国出兵帮助他们守卫这些岛屿。乔大使指出，一些美国将军也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乔接着说，针对目前台湾海峡的事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做好全面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来自蒋帮分子及其靠山方面的可能冒险。乔大使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华沙会谈上提出的“停火”建议。接受这样的提议就意味着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金门、马祖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非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

乔大使表示，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支持，感谢赫鲁晓夫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两封信中以及葛罗米柯在联大十三次会议上所表达的苏联政府立场。

同样，我向乔大使讲述了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就藤山爱一郎与杜勒斯晤面一事所作谈话的内容。

乔接着告知，中国东北军区参谋长前两天到过朝鲜。他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的地下防御工事。乔大使说，未察觉有部队自分界线向南调动的某种明显迹象。

我告诉乔大使，我们不久前获悉，似乎有过一些美军从南朝鲜调往台湾的情况。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保卫相金光侠前往驻扎在分界线的部队两周后，于近日返回平壤。我使馆武官A.A.季亚科诺夫应其邀请随同前往。据后者的消息，未察觉到南朝鲜和美国军队在分界线处有任何异动。

我向乔大使询问了金日成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间。

乔大使回答，他今天拜访了南日，并通过他转呈中国政府发出的正

式邀请函。乔大使说，预计金日成于今年11月12日抵达北京。

我询问了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乔回答，毛泽东自我感觉极佳。乔就此讲了明年1月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将讨论毛泽东请求解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之事。乔大使说，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当时政治局不支持他的请求。如今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解除其履行的行政职务。

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一事，乔告知，通过了一项决议，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总部驻扎在中国东北军区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李承晚有可能借助台湾海峡事态，妄图实现其对北朝鲜武装征讨的意图。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告知，鉴于朝鲜举办朝中友好月以及10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撤离，以全国抗美援朝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将于今年9月29日应朝鲜相关单位的邀请赶赴平壤。

大使馆随员М.И.库尔巴茨基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参与谈话，并作翻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138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7日会议第18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基里琴科、Н.А.毛希丁诺夫、Е.А.福尔采娃；会议由М.А.苏斯洛夫主持。

第1项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苏斯洛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库兹涅佐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柯西金、费留宾)

勃列日涅夫同志：赞成邀请法国人参加。

苏斯洛夫同志：邀请法国人未必合适——它是殖民主义强国。

关于函件。

批准修改意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毛泽东的信(未加修改)；给尼赫鲁的信(未加修改)；给其他人分别发出了信函(被邀请者)。

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

给作为总统的诺沃提尼的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人的信——单独寄发。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09, л.49

№10300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 [62] (1958年9月27日)

.....葛罗米柯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他和周恩来同志9月7日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形势，从事实出发，认为美国将发动一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并且在这一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苏联将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但是不参加战争；仅仅在美国使用战略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我们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决定把我们意见告诉你.....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产生幻觉，即如果美国或者日本这些最有可能的敌人，或者另外的国家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苏联将袖手旁观。

一旦对手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为了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运动，如果原子弹开始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并且中国开始付出其儿女们的生命，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却不允许他来援助你，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将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的、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神圣信念的倒退。

对你们宁愿承受打击，不使苏联卷入的高尚气节表示感谢。不过，我们相信，并且确信，你们也同意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让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朋友，尤其是让我们的敌人看到，在对我们事业的理解中，我们是坚定的、团结的。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出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的共产党的团结是毫不动摇的，我们将互相联合，断然回击所有侵略者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分开，为了不发生分裂，使敌人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必要的。

.....这是必然的，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敌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我们也确信在对苏联的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履行其兄弟般的革命义务。如果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决定我们的政策，依靠我们目标的一致，依靠我们国家的力量，依靠我们共同的努力，依靠将我们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那么这将是抵抗我们共同敌人的无敌的盾牌.....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134页

№20399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1958年9月27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9日

第381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7日

今天，根据苏联外交部的委托(今年9月26日电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倡议召集一系列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远东地区军事冲突危险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说，他一定将我们的建议转达给毛泽东同志并在中共中央对之进行研究。周承诺中方将会尽快对这一问题做出答复。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认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目前并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美国人对该地区的局势极其担忧，但他们对采取某种重大行动来支持蒋介石也是心存顾虑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总是想拖延中美华沙谈判。周恩来同志说，在华沙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岛屿，而美国人则一再要求中国停火(停止炮击)。美国代表多次试图探明这样一些问题，即上述要求是否是中国的最后立场，或者中国政府只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同意停止炮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坚决地对美国人声明，只要蒋介石的军队仍占据着中国沿海那些岛屿，那么要让中方停止炮击便无从谈起。近两天，原先大家都在等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演说，可是这个演说因故推迟了。9月25日，只是由杜勒斯讲了话。他的讲话更大程度上带有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的。其中，他通过使用各种诡辩术以论证美国挑拨政策的正确性，但正如某些美国新闻报刊所指出的那样——杜勒斯的讲话没有一点新意。例如，周恩来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艾森豪威尔便曾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让步比作“远东的慕尼黑”，而杜勒斯也将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所形成的局势比作当年的西柏林。而杜勒斯之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可能是想说：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像当年共同保卫西柏林那样来一起斗争，以便使蒋介石军队始终占据这些沿海岛屿。可是，周恩来强调，当年西柏林的情况与现在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波茨坦宣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都承担着一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目前，美国的盟国内部的社会舆论均反对本国政府参加争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战争；美国人无法动员其盟国的军队来共同保卫这些岛屿。不仅美国人盟友——英国、法国等不愿意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战，甚至连美国人自己(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至今也没有彻底表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曾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可信的情报：美国政府打算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即如果人民解放军向沿海诸岛屿发起进攻，那么美国将会帮助蒋介石军队。周恩来说，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人只是有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的打算，而他们本身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将为争夺这些沿海岛屿而将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即使美国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自己把脑袋钻到了这个绞索里来了。而

当其被纠缠在这件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再玩弄什么花招了。而我们那时候，周恩来玩笑式地指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收紧或放松这个“绞索”。那时候，即使给美国人机会，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脖子从这个“绞索”里挣脱出来，因为这是个事关威信的事——美国人害怕“丢面子”。到那时，如果再想做出让步，那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会遭到国内各界的批评。

周恩来强调，我们准备给予美国人以应有的反击。看来，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形势不太乐观。在美国本土反对美国参加争夺中国沿海岛屿战争的呼声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有鉴于此，周恩来指出，目前美国人主动中断中美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最实际和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拖延这些谈判并最终使之陷入僵局。

周恩来继续道，美国人现在正采取措施以便蒋介石分子能够向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多增派一些兵力。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好像是亡羊补牢”。^[63] 美国人极力安抚蒋介石，可后者并不买账，始终鼓动和催促美国人亲自参与争夺沿海岛屿的争斗。可结果是，蒋介石催得越紧，美国人就越是疑虑和犹豫不定。有鉴于此，周恩来说，我们当前的斗争策略也应作如下调整：将军事行动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等三个层次；对这些岛屿实施围困，但并不对之实施登陆作战；实施围困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炮击。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大炮不间断地对蒋介石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舰只和飞机实施攻击。但仍留有一定余地，即使蒋介石军队乘夜间或恶劣天气之时仍能够借助一些小型船舶和飞机向这些被围岛屿输送少量物资。总之，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围困会使蒋介石军队感到非常难过，但又不让其彻底绝望。这种情形也将有助于加速美国人的动摇和抑制其采取极端措施以倾全力来帮助身处这些岛屿上的蒋介石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不断向美国人发出呐喊，但美国人仍会谨慎从事。

周恩来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沿海岛屿的围困逐渐不再成为世界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这件事也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了。关于杜勒斯把中国沿海诸岛屿与西柏林相提并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西柏林的物资供应只能借助“空中通道”，无法长期维持，而蒋介石与沿海诸岛屿的联系相对广泛；西柏林局势的尖锐和围困是在四大强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金门和马

祖地区发生的战争只是在中国与蒋介石军队之间进行，并非与美国，且美国的其他盟国均距离较远，而未干预这场冲突。因此，目前中国沿海诸岛屿所形成的局面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虽然这种局势长期持续对美国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已把自己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力量都集中在了台湾地区，这对其后勤补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总之，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来看，关于这一事件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如下三种可能：其一，当相关条件成熟之时，美国会做出一定让步以求得妥协。其具体表现为：美国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诸岛屿，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讨论其他问题。但是，周恩来说，对此所需的条件目前仍不成熟。其二，目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中美华沙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指出，目前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美国人“把脑袋伸入绞索中”，即美国人亲自参与中国沿海诸岛屿的武装冲突。不过，周恩来强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很小。

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继续坚持提出如下要求：蒋介石军队立即撤离这些沿海岛屿，即使当美国人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一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由于担心中美谈判陷入死胡同，其他国家一些代表针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

1.有些人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周恩来说，我们坚决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虽然我们知道，正义属于我方，也并不担心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讨论。但我们依然认为，由联合国来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合适，因为蒋介石分子目前仍在联合国内；如果我们的代表去联合国，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拥有完整权利的参与者身份。而届时，美国代表完全可能又援引联合国过去所做出的旧决议来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又会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卫士”，并借此要求中国“停火”。这种情况对中国有不利。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因为至今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仍没有被恢复。

其实，蒋介石也是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的，周恩来以玩笑的口吻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他的观点存在着“共识”。蒋介石分

子们也不愿意交由联合国讨论，因为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向中国做出让步——把这些沿海岛屿交给中国。另外，蒋介石分子还担心联合国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又提出所谓台湾中立化的问题，从而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来负责托管，对此蒋介石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2.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幕后外交活动极其活跃。对此表现最为积极的有梅农、哈马尔舍尔德和日本人。哈马尔舍尔德通过挪威代表(而不是通过瑞典，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周恩来同志指出)试图了解中国是否有意与美国人达成妥协。周恩来同志说，针对这一外交试探我们并不急于做出回应。如果美国人同意做出些许让步，而为了不丢面子又不方便在华沙谈判期间这样做，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中间人好了。最近，梅农已放出了杜勒斯愿意与中国总理会见的口风，但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积极。在此，周恩来指出，杜勒斯不过是个外交部长。

总之，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并不急于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如今，对此更感到不安的应当是蒋介石分子们，因此他们才不断要催促美国人来钻“这个绞索”。周恩来同志强调，美国人可能会向这一地区派来很多大炮和飞机，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因美国人侵犯其舰艇和水域已向后者多次发出警告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他，中国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严重警告”，但为何又不采取任何反应性举措，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当中即包括印度驻中国大使，也包括很多中国领导干部，甚至小孩子。周说，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这样回答道：因为中国是否做出反应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美国人。我们(对美国人)所发出的每一次警告都是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这种账越多，将来美国人必须向中国人还的债也就越多。周恩来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是否中国又向美国发出了新的警告的问题。照毛的话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美国人新账、老账一起算，直到他们还清欠我们的每一分钱为止，甚至包括很高的利息在内。但现在我们得沉得住气，以便最后能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因为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耐力和承受力的时候。周恩来说，你们可能会说，如此忍耐力和如此行为方式是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才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气质。

周恩来同志请我将他以上所述向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做出报

告。

我对周恩来同志提供上述情况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将立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莫斯科。在此，我也指出，美国人的确在台湾和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陷入窘境。目前，可明显看出他们正在极力寻求出路以摆脱困境。其中包括：传闻哈马尔舍尔德正就台湾问题制订相应的计划，还听说有在台湾居民中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周恩来同志再次强调，如今美国人的情况的确是悲观的，可谓是情绪低落。

我对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蒋介石军队撤离沿海诸岛屿，中方似乎就不解放台湾了。

周恩来同志答，西方外交使团可能是从驻北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与周恩来同志会谈以前，张闻天同志曾说，前不久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了中国，并已与周恩来同志见过面。张闻天同志还说，中国政府已批准著名美国银行家和活动家C.伊顿以私人身份来中国。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使馆二等秘书A.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И.Б.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谢尔吉耶夫

1958年10月4日

第727号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11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55-263

№218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7日会议第184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第184号第1项

(М.А.苏斯洛夫、А.И.基里琴科、Е.А.福尔采娃、В.В.库兹涅佐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Н.柯西金和Н.П.费留宾)

绝密

1.责成苏联外交部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对关于该问题的文件草案继续进行修改，并随后将自己的提案上报苏共中央。

2.批准所提交的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令草案。

附件：

苏共中央鉴于远东地区局势复杂化给尤金的指示 [64]

绝密

优先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请拜访毛泽东或周恩来并向其通知如下内容：

为了最大限度地阻碍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冒险计划和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美国，莫斯科认为理应预先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提出

如下建议：尽快(如可能，就在10月初)召集各国领导人最高级别会议，以研究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并可能就与会国家提出的涉及远东地区的相关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按照我们的意见，这次会议可以召集如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巴基斯坦总理努恩和泰国总理乃他依吉滴卡宗。会议的地点可设在德里，如果印度政府同意的话。

确保远东地区和平的问题，无疑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宜邀请其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在日本领土上现在就部署有美国军队，而后者存在实际上正在对远东的和平构成威胁。总之，当前的形势是这样，一旦美国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那么日本必将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军武器和物资的供应基地。而在被美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目前的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还没有，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另外，鉴于日本政府目前在对中国关系方面所采取的立场，也不应允许其参加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相关各国政府对召集此次会议的态度和以事实证明谁是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真正制造者，我们打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向上述国家政府首脑分别发送一封信函，其中我们将对远东地区的当前形势做出分析，指出美国的行动正在对和平构成威胁并对该地区局势的激化负有责任；建议会议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建议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给美国总统的信函的复印件也发送给所有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以号召其对我们的建议给予支持。而相应的附录有我们给美国总统信函复印件的书信，我们也会发给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例会主席，以提请其关注远东局势，并希望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尽快消除远东地区冲突的提案能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预料，美国政府势必不会同意召集此次会议。然而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围绕这一问题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大程度地揭露美帝国主义集团并再次向全世界证明谁在阻挠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陷于孤立并迫使美国政府采取防守姿态。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目前中美双方正在华沙举行谈判，中国朋友将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莫斯科想了解中国朋友对所谈问题的意见，请告知。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245, л.1, 5-7

№20624-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1958年9月28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平壤市

1958年9月28日

.....

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金日成说，5天中我仔细研究了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全部资料，以便做出决策，在我国是否应该建立此类公社。经过对我们这里的工农业发展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全面分析后我得出结论，朝鲜不应该建立人民公社。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的4/5，农民远远低于工人的生活水平。可我们这里农业人口没超过56%，农民的生活不差，有些方面甚至优于工人。我们认为，已证明自己正确的合作生产经营模式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更可靠和适合的道路。单就农户数量和耕作面积来看，我们目前的生产合作社规模相对小些。我们近期将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今后，正如前面已说过的，我们认为全面机械化是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我就这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

关于鸭绿江上建设云峰水电站。金日成告知，近日要与中国朋友签署建设60万千瓦水电站的协议。我们将用自己的力量设计建设水电站（中国朋友指派部分专家进行设计）。主要设备——水轮机、发电机组、变压器、电力器械以及建筑设备由中国提供。建设经费预定均摊，发出的电同样由中朝双方平分使用。中国向朝鲜发放10年期贷款，用于支付劳力、材料和设备费用。项目开工日期——1959年，竣工日期——1962年。周恩来同志表示，希望电站早些完工。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以便水电站在1961年交付使用。

与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的谈话情况。金日成说，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我方邀请前来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活动。冯仲云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一起打过游击。他在与我的谈话中问到，1956年8月苏共和中共代表到了朝鲜，对劳动党的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高兴。我回答，这件事过去了，我们这里也未发生任何问题，因为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

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尽管众所周知，进到别人家里时应当先敲一下门。朝鲜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依旧如此。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和中国曾给予并仍在给予朝鲜人民巨大的援助。苏联军队将朝鲜人民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我们在抗击美国人和李承晚分子的斗争中维护了我们共和国的独立。在我国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苏联和中国给予我们巨大的援助。我对冯仲云说，6亿人口的中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非常珍惜来自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帮助。我们确实真诚地认为，苏联人民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而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

谈话中，当我说到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改革工业和建设管理、改组农业机器站取得怎样的重大成果时，金日成真诚地评价了赫鲁晓夫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特别刚毅、坚定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在诸如苏联国内生活以及国际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

他接着说，如果苏共中央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那么他会亲自前往参加会议，并期待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

金日成并且说：“我不时地望着一旁的高频电话机在想，它就是为了用于通话摆放在这里的。但我经常刚一想给赫鲁晓夫同志打电话，就感到恐惧和害怕，因为我对俄语掌握得不好，不能与其进行交谈。”

我对金日成说，你的俄语说得相当好，很容易听明白。

谈话中，金日成不止一次地提到，使馆的大使与工作人员在近一年半中，为巩固朝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发生问题后给予帮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们的看法。

我回答，我作为大使与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指示。

№20400 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1958年10月24日

第409号

毛泽东在接见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在10月2日举行的一次热烈会谈中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者，当然，不是在明天早上，也可能不是明天晚上或后天，但终究有这么一天，我们将赢得彻底的胜利。

迟早，我们都将战胜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能采用两种方式：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主要的方式——和平方式、文化方式。我们随时准备采用和平的方式。在(你们)代表团中有很多军队上的同志，你们是如何准备采用这种方式的？(笑声)我们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我们一定要为采取军事方式做好准备。但是，要知道，战争的方式——这是最后一种斗争方式。如果敌人首先挑起战争，那么我们就得采用这后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你们可能会批评我以及我的上述观点，你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要等到敌人首先挑起战争之时才可以回击呢？你们的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共同来加以思考…… [65] 并且目前我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和平方式。现在，我们不与任何人打仗。我们在华沙与美国人谈判，在此期间，美国人一直要求我们停止炮击。可是，我们并没有与美国开战。问题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名叫蒋介石，我们现在是与后者在打仗。如果从1927年算起，我们与蒋介石打仗的时间可谓久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还要与他打多久。如果再打上70年，那就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了。不过，我们认为，蒋介石也有好的地方。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使民众团结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再教育。蒋介石做了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根本无法办到的事。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给我们当“教员”。可以说，蒋介石不仅在过去为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现在他仍继续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仍必须存在“一段时间——以我们的教员的身份”。而为此，我们甚至不必交学费。我们的学费是由美国人支付的，而我们自己只是无偿地利用这个教员(大学教师)。希特勒当年也曾完成过“教员”的职责，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教育了欧洲人民。在东方，这样的教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既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但却有杜勒斯来顶替他们的角色。如果没有杜勒斯，我们就很难办，但有了他，我们就轻松多了(笑声)。我们一直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志”(笑声)，为此，我们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在资产阶级中也有马列主义的优秀“行家”，那就是他！此人坚定地推行阶级斗争路线，从不与我们妥协。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难说话的人。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便是杜勒斯，再加上第三个中国老师——蒋介石。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开始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未来，世界人民将更倾向于我们。而杜勒斯则身处困境和防御状态。人们会问他：为什么你们要插手中国的马祖和金门等岛屿呢？作为搪塞，他一直以朝鲜战争为挡箭牌。可朝鲜是朝鲜，岛屿归岛屿，全世界都承认这些岛屿都属于中国的领土，而美国的行动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杜勒斯处境尴尬。

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杜勒斯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绝不能就这样放过他。我认为，美国是不会简简单单地就从台湾地区撤走的。另外，我还坚持一点，即美国不会很快就从台湾地区走掉。这次，我们可在台湾抓住了一个小偷。你们还记得否，1956年我们便在埃及抓住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人装得文质彬彬，但在黎巴嫩他们的行动却像是一群小偷。我的观点是，应当把他们继续粘在那里。关于这一问题，我曾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流过，他也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他们粘在那里多久呢？3年吗？或许阿拉伯朋友不会同意这样做。但他们——美国人终究要从那里卷铺盖走人的，可能他们甚至很快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观点就不对了。不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如台湾，我们可以成功地继续粘住他们，以便以此为契机来教育全世界人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可能，你们会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接着，毛泽东谈了关于苏联的援助问题。他说，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

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8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这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3.55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亿吨)超过1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60%—90%，但并没有超过100%。因为我还有1%的疑虑没有消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

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8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

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1000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12年制定的，但很多按12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3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12—15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在船舶制造业方面是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力量？(除了中

国的自身努力)我认为，这些力量的源泉包括：首先，苏联的支持；其次，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最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极其重要的(有利中国发展的)外界因素。虽然，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发生。但为了和平，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依然需要坚定地团结起来。在未来的七八年间，帝国主义者将很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正走向没落，而我们则不断前进。

索菲亚市党委书记请毛泽东同志讲一下人民公社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说：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党对群众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应与党的组织相混淆。因为党是一个由进步人士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以前，我们共有70万个农业合作社，现在由这些合作社组建了2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7000个农户。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万农户，或几万农户。

除了将农户大规模地联合起来之外，人民公社还相当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的公有化。这为我们更容易地与农村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创造了条件。

人民公社基本上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虽然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

1871年，法国人曾建立了巴黎公社。最初，马克思并不承认它，只是后来才对之作肯定，并积极协助，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有名的著作。那么，组建巴黎公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手工业工人，只有一部分是工业工人，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如果在那时法国人都能组建公社的话，那么如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人民公社呢？至于“公社”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尤其是河南人民首先提出来的。正是他们第一个创造了这一名称，并将之写在了自己的有关章程里。

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陕西和山东等省去了一趟。我与农民们讨论关于用什么称谓比较好的问题。之后，我们决定：如果人民想叫作人

民公社，那就应当这样做。在8月的会议上，我们采纳了人民自己提出的这一称谓。

那么，人民公社的前景如何呢？它们将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呢？我们得等几年再说。现在能说的是，人民公社将会得到顺利地发展。因为人民自己希望如此。而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无法为人民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人在为人们做饭。我们应当将妇女们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应当建立公共食堂。而当妇女们被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之后，她们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力量。为此，我们就需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缝纫厂。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会遭受失败。

当然，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话，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如工资体系中的7—8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到中国访问。这是你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我们之间的团结将会更加稳固。”

会谈记录者——B.拉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

契列德尼琴科(签名)

文件共6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齐米亚宁同志、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A.A.安德烈耶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科夫

第76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信息大使馆已经在电报中通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84-293

№20401 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1958年10月3日)

摘自安东诺夫С.Ф.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25日

第42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安东诺夫与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威尔逊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3日

我与威尔逊在缅甸使馆见了面。

会谈期间，我对威尔逊说，鉴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强国的立场，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试验。对此，威尔逊答复道：英国仍坚持自己在今年10月31日当西方强国完成了一系列新的核武器实验以后所说过的话，即英国人希望恢复“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威尔逊还表示希望，在10月31日之后双方的谈判将进行得更有效。

威尔逊还表达了如下一点意见，即希望将找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地区冲突的方法。我在会谈中强调，美国将携带有核武器的海军舰队派往中国沿海，这种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污辱性政策是无法让人继续容忍的，势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试想，如果中国海军舰队也如此忽然出现在夏威夷岛屿周边，哪怕只有1分钟，美国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针对我的上述观点，威尔逊的答复显得非常地没有礼貌，他说：可如

今中国海军并没有出现在夏威夷诸岛屿附近，况且也不知哪年哪月(中国海军)才会在那里出现。威尔逊还说，至于要说起中国人的那种受到污辱的感受，那么请不要忘记(中国人)对美国人所带来的污辱。要知道，美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任何污辱的敏感程度也是一点不比其他入逊色的。威尔逊带着明显的暗示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不体谅美国人的感受，所以后者只能不断增强针对中方的行动力度”。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B.П.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第795号

1958年10月24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29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82-283

№20625-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1958年10月4日)

1958年10月2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

平壤市

1958年10月4日

会见中国大使乔晓光。

交谈时，就南斯拉夫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交换了看法。我向乔大使通报了南斯拉夫请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向其提供贷款的情况以及其中一些国家对此的回应。我说，南斯拉夫政府极力想把亚非的一些中立国家拉向自己的怀抱，并在苏中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我补充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前大使波波维奇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飞黄腾达。

乔晓光指出，南斯拉夫乞求西方大国提供贷款的做法暴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真正嘴脸。为证实南斯拉夫对中立国家秉持的上述立场，乔晓光大使说，正因为如此，波波维奇离开北京后并未直接返回贝尔格莱德，而是经由雅加达、德里。谈到波波维奇本人，乔大使将其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混蛋。刚一抵达香港他就急不可耐地着手诽谤人民中国。大使接着说，南斯拉夫政府最近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敌对行动：禁止在南斯拉夫发行中国出版的《友谊》杂志，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工作人员进行跟踪，时常侵犯他们的外交豁免权。

我指出，禁止《友谊》杂志发行意味着南斯拉夫领导当局害怕有关中国真相的传播，也就是害怕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

我向乔大使透露了苏联政府恢复核武器和氢弹试验的决定，并通报了苏联政府就此问题做出的表达口径。

乔大使说，在美英为自己谋求某种优势依然继续进行这样的试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的决定完全正确。

向乔通报苏共中央应芬兰共产党请求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传达的信息：鉴于该国成立了右派的新政府，芬兰共产党请求别急于出手解决经济问题。还通报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所持的

立场。

乔大使相信，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立场将会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表示，准备在商务参赞从中国返回后通报中国政府与朝鲜代表团就经济问题谈判的结果。

随员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参加了谈话。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62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1958年10月5日)

1958年10月2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

第21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10月5日

在狩猎时的早餐上，与金日成就工业发展问题继续交谈。

金日成告知，副首相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不日将从中国返回。代表团与中国朋友进行谈判，并签署了1959—1965年发展远景计划的相互配合协议。金日成说，根据该计划，中国向朝鲜一些工厂提供设备，其中包括：3个丝织厂、1个微型轴承厂、2个牛皮纸袋厂等等。中国发放2.1亿卢布从1963年起开始偿还的10年期贷款，用于支付所购设备。代表团临别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朝鲜代表团…… [66] 关心的是加快云峰水电站的建设，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势头蓬勃，而电力

问题是个瓶颈。

金日成接着讲，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了电站建设问题。在建设水电站的同时，拟建设一些燃煤热电站，其中，金日成指出，我们非常关心的是尽快得到平壤20万千瓦中央热电站所需的设备。

我答复金日成，由于他们的请求，苏联政府责成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和外贸部会同苏联国家计委共同研究加快所列设备供货的可能，并利用签订贸易合同彻底解决该问题。

我还让金日成注意到，正如我感觉的那样，铁路运输在近一两年内将是国民经济工作中的瓶颈，特别要考虑到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近5—7年的工农业发展远景的因素。

金日成完全赞同这一点，他说，他们应当认真解决铁路运输长远的发展问题，要考虑铁路电气化和建设复线。金日成接着说，与赫鲁晓夫见面时，他要请求赫鲁晓夫让苏联政府在解决此问题上给予帮助，然后转而问我：“你怎样认为，这事能做得到吗？”

我回答，当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请求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始终积极地给予解决。我觉得，关于朝鲜发展铁路运输的问题也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我接下来关注的是，必须要认真做好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工作，尤其是解决新企业建设的问题刻不容缓。

金日成赞同地说，他们将认真地研究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我对金日成说，报纸上刊载了一则有关生产载重汽车的消息，并接着问，报上所载的这件事上尚在讨论中还是已经有了相应的决定。

金日成回答，他们决定从明年开始着手生产(组装)载重汽车，年产量大约1000辆，定在托克契洪汽车配件厂做这件事，而在岐阳机器制造厂生产拖拉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想生产什么牌子的汽车，是否计算过成本。

金日成回答，将生产嘎斯51型汽车。金日成同时指出，正如以前有人对他们讲的，生产载重汽车需要5000吨的冲压机，但朝鲜没有这样的

冲压机。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时看到那里如何生产载重汽车，原来他们用1000吨的冲压机凑合了。金日成说，我们的代表团与中国朋友商定了援助生产汽车的事项。

金日成接着说，他们认为组织生产碳化钙人造纤维具有重大意义。但建设工程需求1300—1400吨朝鲜不能生产的不锈钢。金日成说，中央常务委员会责成南日与你们初步搞清楚能否得到指定数量的钢材。金日成转而问我能不能通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回答，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负责这方面的事。据外贸部工作人员预先通知，1959年能够提供的不锈钢将不超过150—160吨，因为苏联不锈钢的生产状况很紧张。

金日成说，我们理解，苏联大规模地建设化工企业，自然需要大量的不锈钢，但是，缺少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应付。我想直接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这个问题。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20402 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1958年10月7日)

摘自А.Я.波波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9日

第603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波波夫与龚金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7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使馆的新闻专员龚金(ГунТин)。龚金请我向他介绍一下出版司就国际生活和苏联对外政策等问题而给苏联报刊和广播而提出的建议。

在对个别问题(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全民公决)作了详细说明的同时，龚金又说，苏联同志经常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何要成为首先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国家之一呢。对此，龚金答道：首先，中国与法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不存在外交方面的任何障碍；其次，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理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便请求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我答，在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

继续就这一问题，龚金问：“为何苏联至今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呢？”

我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苏联与法国存在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得权衡利弊，通盘考虑。苏联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自身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程。我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到时候苏联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

对此龚金指出，苏联政府迅速地承认了几内亚共和国，但却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何？

我向龚金解释道，几内亚共和国是在经过全民公决之后才成立的。其结果即使法国自己也是承认的，法国没有任何司法根据对苏联承认几内亚表示不满。至于阿尔及利亚，那里进行的可是手拿武器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接着，龚金问苏联报刊将如何报道南斯拉夫的情况，如何开展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我答，我们的报刊依然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揭露和驳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发言论的漏洞，揭示其对工人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危害。不过，我们的报刊并不会给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过分的关注，以至于超过其应有的限度。

对于这次会谈，龚金向我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让他了解了苏方对苏联报刊所提出的相关要求。龚金希望苏联出版司能够定期地让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新闻专员来了解此类内容。

在会谈期间，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龚金此次来访是专门为搞清楚在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究竟持何种立场。

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出版司顾问B.Φ.库兹涅佐夫。

出版司司长

A.波波夫(签名)

文件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H.П.费留宾同志、(苏共中央)Л.Ф.伊利切夫同志、(苏共中央)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П.С.杰杜什津同志、A.A.什韦多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10月9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53-254

№11428 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 (1958年10月9日)

负责同志!

首先请您原谅我，因为我可能会打断您的工作，给您找麻烦!

一个月前我搞到一本书，叫《第四高地》。毫无疑问，您很熟悉这本书!本书鲜明而翔实地描述了苏联女英雄古丽娅的战斗生活。这本书我已读过两遍了，但是我感到这太少，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的每行字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苏联青年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应当学习的。

11月24日是古丽娅英勇牺牲的日子，多么快啊!还有一个月多一点。我想在这个英雄的日子里给古丽娅的母亲写封信，向她表述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以便安慰这位老人。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和她的姓名。

同志!我十分诚心地向您请求，您是否能抽点业余时间去打听一下这些并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您!如果您能在信中告诉我用俄语写信的方式和格式，那太好了!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致敬!

(沈阳)冶炼厂五三三设计组

郝贵陆(Хэ Дуй-лу)

№11780 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好布里亚特分会(1958年10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1958年7月31日的决议，在8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列宁格勒州和伊尔库茨克州成立了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

在中央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中规定，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蒙友好协会分会。然而《真理报》9月26日却刊登了一个错误的报道，说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将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因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按当地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的时间往乌兰乌德发了贺电。鉴于中国朋友以为在布里亚特已有苏中友好协会分会，苏共布里亚特州委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请求允许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我们认为允许苏共布里亚特州委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是适宜的。至于《真理报》出的错误，该报编辑部根据谢柳克同志的通知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错误报道的责任人新闻部主任瓦维洛夫同志给予了处分。

苏共俄罗斯联邦中央行政机关于部长

B.丘拉耶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B.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8年10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5页

№20403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摘自C.Φ.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13日

第393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10日

由于毛泽东不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会谈伊始，我便向其转交了H.C.赫鲁晓夫同志于今年10月4日给毛泽东所写的一封亲笔信。

刘少奇承诺，将按照苏方的要求转交此信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之进行讨论，并随后做出相应的答复。

我们此次会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间，我问刘少奇，关于台湾问题有什么新情况，中国民众对彭德怀最近发布的关于停火和举行直接谈判的呼吁书有何反应。

刘少奇谈了关于10月10日清晨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和人民解放军飞机之间发生的空战情况。在这次空战中国国民党共损失飞机3架，人民解放军损失1架。刘少奇认为这一结果很不错。他强调，源自福建前线的关于双方战斗损失的情况通报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任何夸大或低估，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我们仍打算坚持这样做。至于国民党，他们往往夸大我们的损失，而有意隐瞒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情报没人相信。

刘少奇说，鉴于在(我方)停止炮击之后美国人不再为国民党向金门岛运送粮食的船只护航，我们打算延长“休整”期限，即在彭德怀公告中所规定的停火期限期过了之后也不开炮。我们想继续看看，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如何动作。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

对此我指出，据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人认为，人民解放军停止开炮与他们在华沙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有关。

刘少奇说，这是一派胡言。我们停止开炮绝不是因为美国人所提出

的要求。刘继续道，今天在中国大使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华沙谈判中，我方大使向美国人重复了自己先前所提出的条件。至于美国人是如何答复的，我们暂且不知。

刘少奇几次重复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中方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很多时间。

刘少奇说，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作。我们正集中一切力量大炼钢铁。最近，中国所有的领导干部又都奔赴了各地方，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和组织大炼钢铁的运动。甚至在中南海我们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集中力量建了一个小锅炉来冶炼金属。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请我转达(中方)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成员的谢意——感谢他们始终不渝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0月10日

第745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6-268

№20404 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13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大将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10日

今天，在我使馆举办的电影放映会上共放映了3部苏联电影，都是关于原子科技发展的内容。其间，我与刘亚楼作了交谈。

会谈伊始，刘将军便请我简要介绍一下影片的内容，并强调说自己对原子能方面很不了解。就自己对这些影片所知道的情况，我向他描述了电影的内容。刘强调，苏联在这一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先进了，并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尤其是中国。他说，前不久他们才在北京附近建设了一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他们感谢苏联在上述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我问刘亚楼，台湾海峡是否有什么新情况，国民党是如何庆祝自己的10月10日“国庆节”的。

刘说，今天，10月10日清晨9时30分6架美国生产的国民党飞机(F 86)侵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并在福建省与随即升空迎击的人民解放军8架飞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刘强调，解放军的飞机都是苏联制造。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结果也对我有利：2架国民党飞机被击落并在地面坠毁，还有1架被击落的敌机坠入大海，并成功俘虏1名国民党飞行员。2架被击落的敌机残骸最近将运往北京并公开展示。这一方面对群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就是要让人民看到，正是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了军用飞机，而后者也正是用这些飞机向中国投掷炸弹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民众认识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可能成功地击落美国飞机的。

刘亚楼继续道，当空战结束后的15—20分钟内，我军150架战机升空并沿我领土巡逻，此举引起台湾极大的恐慌。那里拉响了空袭警报。而当时台北正好要开始举行庆祝国民党“国庆节”的军队阅兵式。刘亚楼玩笑式地说道，由于不愿意打扰这场阅兵式，于是我们的战机陆续返回了本部机场。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刘将军近期一直在福建前线并直接指挥着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行动。于是，我问道，福建前线将士的士气如何。

刘答，战士们士气高昂，充满自信，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一点恐慌的迹象，农民们都在田野里平静地收割粮食。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存档。情报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4-265

№20405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1958年10月2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25日

第42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0日

15时30分，我应邀拜访了陈毅。

一、陈毅通报道，15时中国广播开始播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命令。该命令宣布，中国发布的关于从今年10月13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的命令失效。原因在于，在10月19—20日间台湾当局又让美军护航船进入了这些

岛屿所属区域。陈说，中国将于今天16时或稍晚时间向金门诸岛屿的蒋介石军队阵地实施炮击。

在将上述命令文本和中国政府第36号严重警告的文本交给我之后，陈毅又向我解释了中国在今年10月13日国防部关于停止炮击的命令所规定的期限(该命令原先规定：停止炮击的期限为今年10月13—26日)失效之前便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区域的原因。

陈毅说，关于恢复炮击的问题曾在中共中央作了讨论。期间，共提出了三个方案：(1)在10月26日之后恢复炮击；(2)在10月26日之后再停止炮击时间延长几天；(3)不等到10月26日便恢复炮击。最终，中央采取了后一种方案。

陈毅接着指出，实际上提前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的主要原因在于，杜勒斯于今年10月21日到了台湾。当前，蒋介石正叫嚣着要开始反攻大陆，并要求美国人向其提供“毁灭性”武器。陈毅说，美国人把我方停止炮击是当作其在华沙谈判期间所提出的“关于停火”的要求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待的。因此，当我方于10月13日宣布停止炮击命令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美国也停止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但近期美国人又恢复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并侵犯了我国领海水域。

我们之所以作出关于恢复炮击的决定，目的就是把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杜勒斯在台期间能够与蒋介石谈妥关于蒋的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诸岛屿，而在我们今天开始炮击后，他们将不实施这一决定，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撤离”上述岛屿。

陈毅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恢复了对上述岛屿的炮击，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要这样的话，蒋介石就必须派自己的代表来见我们，而不是只在台湾与杜勒斯见面。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美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承认美国人与台湾当局达成的任何交易。

陈毅请我立即将其以上所述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答，此次会谈内容我会立刻报告给莫斯科。

二、我对在今年10月17日图104飞机空难中死亡的中国同志表示了

深切的慰问。

陈毅答，中国方面也对与中国同志一同死难的苏联专家和外国友人感到异常悲痛。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Ю.И.拉兹杜霍夫和中国外交部翻译孙林。

附注：上述内容(俄文文本)共计3页(不机密)。中文文本共计2页，仅发送给：齐米亚宁。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兹杜霍夫

第793号

1958年10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76-278

№20406 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依照情报通报程序发送(我方)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李涛(Ли Тао)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10月25日

库德里亚绍夫与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李涛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0日

今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负责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工作的使馆党委副书记李涛同志拜访了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

李涛通报说，鉴于中国打算取消学位、职称(副博士、博士、教授等)和仅保留高级学者职称等，中国朋友希望从根本上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的培养体制。

他们(中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留苏中国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答辩和获得学位，而是以较短的时间在其所选择专业领域内掌握苏联最新科技成就。因此，中方希望，应当允许中国研究生免修目前为其所制订的研究生必修课程，而只进行专业课考查。中国留学研究生的学制为两年。期间，中国研究生应当根据国家为其所制订的学习计划，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试验，并最终将其研究成果以40—50页的篇幅写成研究报告。中国留苏研究生将不撰写论文和进行学位答辩。对此，李涛引用了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即“人民需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学位”。

中国同志认为，在这种学制下中国留苏研究将免修一系列必修课，也不需要再撰写毕业论文，从而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更广泛地了解苏联的实际、苏联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以及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

根据李涛的通报，中国计划从下一学年开始就按照这一方式派遣研究生来苏联学习。至于已在苏联就读的中国研究生，那些即将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工作的，有权中断撰写和答辩，那些正在从事实验工作的，可根据新情况继续这方面工作，那些正准备通过必修课考试的，将只通过专业课考试。

在此，李涛强调，中国留苏研究学制改革是一件大事，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与苏联学者和教育家进行协商和咨询。最近，他便打算造访苏联高教部和苏联科学院，并向其通报关于中国打算改革中国留苏研究

生学习体制的问题。在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以新方式来培养中国留苏研究的问题将经苏联国家渠道在苏联各相应机构予以贯彻。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科员

A.库德里亚绍夫(签名)

1958年10月21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69-271

№24093 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请审阅我们与出席1958年10月20日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的会谈记录。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5日

第3833号

附件：

摘自Г.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与出席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会谈记录

时间：1958年10月20日

地点：委员会(办公室)

当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途经莫斯科之时，我在委员会办公室接待了他。

我向其简要通报了苏联在1959年与外国文化合作的总体计划草案以及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计划采取的措施。

我请求中方推荐一些中国作家撰写的书籍，以便在苏联翻译并出版。沈雁冰同志答应给予

我们帮助。

沈雁冰同志谈了自己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感受。

他还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关于(中国国内)人民公社的运动，作家参加体力劳动以及中国作家的稿酬支付问题。

据沈雁冰同志说，目前在中国的城市、工厂企业和中央机关均建立了人民公社，但人员的工资支付体系依然存在，虽然已酝酿并出现了一些将其转为集体分配体系的迹象。

在中国的文化部系统中已建立了人民公社，但目前其活动仅限于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普遍前往北京附近的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参与改善公共食堂和幼儿园机构的工作；另外，所有公社成员均参加军事训练。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指示，中国政府机关的全体干部在一年内均须到生产第一线参加一个月的劳动。这一指示同样适用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基层公务人员。而一个月基层劳动时间可以或者一次性完成，或者在一年内分几次累计完成。

目前，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独立的公社——把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自由职业统一联合起来。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居住地参加当地人民公社的活动。

沈雁冰同志强调，缩减作家稿酬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作家的稿费正在不断减少。其给报刊和杂志所写文章的稿酬也在急剧减少。沈雁冰说，以前作家为报刊写一篇文章可以得到20元，有时是40元的稿酬，如今这样数目的稿酬正在急剧减少。文学作品再版的稿酬也大幅下降。中国朋友认为，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另一方面——会促使作家撰写新的作品。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当时在场在还有：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齐赫文斯基、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副司长Д.А.戈杜诺夫、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顾问О.В.瓦西科夫、《星火》杂志主编索夫罗诺夫。

Г.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74, л.207-209

№20407 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 (1958年10月21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我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于今年10月21日在委员会举行的会谈记录。

附该本文件，共3页。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7日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2日

附件：

机密

茹科夫与刘晓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1日

我应邀会见了刘晓大使。刘晓向我递交了一份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张奚若同志就“两个中国”状况的问题而起草的备忘录，并强调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中国使馆以前已转交给我们的就“两个中国”现状问题而写的备忘录中已经提到，而这里只是更加具体地说明：中国同志在参加个别国际组织时应如何应对。

此后，关于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大使又作了如下通报：

目前，美国欲极力摆脱困境——使自己从台湾海峡问题上解脱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实际上是承认存在“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帮助国民党保住金门和马祖等周边岛屿的同时，美国还想实现如下一个主要目标：维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在中国做出某种保证的条件下，美国将国民党军队撤离上述周边岛屿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台湾维持国民党体制。

对此，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使台湾海峡地区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并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不断加深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分歧。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同志将展开一系列积极活动以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关于解放台湾的方式问题——不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这都是中国政府分内的事情。以此为例，中国政府将积极开展活动以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内务事务。刘晓大使继续道，我们目前并不急于解决关于解放沿海诸岛屿和蒋介石军队撤离这些岛屿等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将轮流推行紧张和缓和政策，具体采用哪种政策将视美国人如何动作而定。如果美国人想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紧张形势。如果美国人想诉诸武力，那么我们就采取积极缓和局势的行动，等等。总之，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始终掌握主动，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也要格外谨慎以避免台湾局势失控，从而冒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将等待最佳时机，那时我们不但要彻底解放周边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而且要彻底解放台湾。

我们的这一政策无疑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将使许多目前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士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目前，美国人赞成中国代表与台湾代表同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工作。刘晓强调，从我们的备忘录中可明显看出，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花招，并积极对其进行揭露。而一些亚、非国家却已陷入了美国人的圈套——他们甚至在联合国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关于在台湾海峡停止武力的建议。而这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局面。只是由于中国朋友

采取了相应措施——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解释了中国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和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两个中国”问题直接与万隆会议决议发生了抵触，这些亚、非国家的政府才放弃了准备支持美国建议的已有打算。如今在杜勒斯的台湾之行之后，美国人可能会加紧利用联合国以促进“两个中国”问题的“合法化”。另外，为此目的美国人还会利用那些依附于自己并与中国保持着官方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等)。不过，中国也可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公正的立场。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出台的对台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我感谢刘晓的上述通报及其转交的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起草的备忘录。我也向刘晓通报了我们在揭露美国对台政策的对外宣传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还告诉大使道，我们已准备在即将于今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会上积极揭露美国人。在对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之后，刘晓请我简要谈一谈美国著名活动家(如史蒂文森、约翰·斯通和李普曼等)在访苏期间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我满足了刘晓同志的请求。

会谈结束时，我向刘晓同志通报了与委员会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使馆翻译侯志通、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С.И.齐赫文斯基、该司副司长Д.А.戈杜诺夫。

Г.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72-275

№20408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1958年10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递各机构清单。根据该清单，中国朋友将向各机构发送自己关于“两个中国”问题的备忘录。

附各机构清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2日

第1390号

机密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И.И.库兹明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支付委员会主席，А.П.沃尔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子委员会主席，В.Д.卡尔梅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船舶制造委员会主席，Б.Е.布托玛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化学委员会主席，С.М.季霍米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筑事务委员会主席，В.А.库切连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

外贸部长，И.С.帕托利切夫同志

海军部长，В.Г.巴卡耶夫同志

交通部长，Б.П.贝舍夫同志

交通建设部长，В.科热夫尼科夫同志

电站部长，А.С.帕甫连科同志

苏联高教部长，В.П.叶留金同志

苏联地质和矿产保护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长，М.Д.科夫里基诺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副部长，В.М.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文化部长，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

苏联通讯部长，И.Д.普苏尔采夫同志

苏联农业部长，В.В.马茨凯维奇同志

苏联贸易部长，Д.В.帕夫洛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主席，В.С.格拉先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Д.И.切斯诺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发明创造事务委员会主席，А.Ф.加尔马舍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仪器测量、质检委员会主席，А.Е.维亚特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水利设施管理总局局长，А.А.佐洛图欣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主席，Н.Н.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司长，П.С.切尔内绍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С.К.察拉普金同志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А.А.索博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管理总局局长，П.Ф.日加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原子能利用管理总局局长，В.С.叶梅利亚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印刷品中军事和国家机密保护管理总局局长，П.К.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主编，Н.Г.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司法委员会主席，А.И.杰尼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Г.Г.卡尔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宗教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А.А.普津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外国司司长，П.Т.皮缅诺夫同志

全苏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А.П.克利莫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院长，А.Н.涅斯梅亚诺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外国司司长，В.А.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医学科学院，А.Н.巴库列夫同志

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全苏列宁勋章农业科学院，П.П.洛巴诺夫同志

以К.Д.帕姆菲洛夫名字命名的公用事业科学院，И.Т.伊万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师范学科学院，И.А.卡伊洛夫同志

苏联建筑和设计科学，Н.В.别赫金同志

苏联艺术科学院，Б.В.约甘松同志

各联盟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Д.С.波利扬斯基同志

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Т.卡里琴科同志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Е.阿夫西莫维奇同志

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З.米尔扎艾哈迈多夫同志

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А.库纳耶夫同志

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Г.Д.贾瓦西什维利同志

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Ю.阿洪多夫同志

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Ю.舒马乌斯卡斯同志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Ф.季奥尔季察同志

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Т.拉齐斯同志

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К.Д.季卡姆巴耶夫同志

塔吉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多德胡多耶夫同志

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Е.科奇尼扬同志

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Д.卡拉耶夫同志

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А.米里谢普同志

共青团中央，B.E.谢米恰斯内同志

全苏外国“旅游者”股份公司，B.M.安库季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E.H.阿法纳新科同志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Г.А.别洛夫同志

苏联议员团，O.B.库西宁同志

苏联联合国协会，A.B.托普奇耶夫同志

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系协会委员会，И.В.波波娃同志

苏维埃妇女委员会，H.B.波波娃同志

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C.K.罗曼诺夫斯基同志

苏联历史学家民族委员会，A.A.古别尔同志

苏联红色半月和红十字协会联盟，Г.А.米捷列夫同志

全俄戏剧协会，A.A.亚布罗吉娜同志

苏联斯拉夫委员会，A.C.贡多罗夫同志

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M.B.米京同志

苏联国际法协会，Г.Н.通金同志

苏联作家联盟，A.A.苏尔科夫同志

苏联音乐家联盟，T.H.赫连尼科夫同志

苏联艺术家联盟，Д.С.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记者联盟组织部，H.Г.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老战士委员会，A.П.马列西耶夫同志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H.C.吉洪诺夫同志

苏联亚洲国家团结委员会，A.B.索夫罗诺夫同志

苏联斯拉夫学家委员会，B.B.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建筑师联盟，П.В.阿普罗西莫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A.A.兹瓦雷金同志

苏联经济学组织协会，B.П.季亚琴科同志

苏联博物馆委员会，A.И.扎莫什金同志

苏联电影摄影工作者联盟，И.А.贝利耶夫同志

苏联驻法国大使，С.А.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A.B.茹科夫同志属实。

О.瓦里科夫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20、221-224

№20410 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8年10月27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2日

第44号

机密

与中国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7日

今天，在钱三强教授为来中国参加原子反应堆典礼的苏联科学院士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举行的晚宴上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谈话。

晚宴中间，我们的学者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对这样一个问题

感到兴趣，即为何中国学者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答，对于苏联同行以这种方式所提出的上述问题他很难回答。中国学者只参加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其一是接到了邀请；其二，要看该会议是否符合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需要。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开始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为了科学和尽快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中国学者)应当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况且许多学术会议也根本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

钱三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以及随后还有其他一些二机部的领导干部都开始向我们的同志解释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既没有学术目的，也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有美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同志指出，美国人极力企图拉目前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而此类会议均与美国反动派的“两个中国”思想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立场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学者不参加任何国际(学术)会议，那就会错过许多学习有益知识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国家科学的发展。他们继续指出，通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们可以听到和了解外国学者们尚未公开发表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

钱三强教授以极其严厉的方式答道，他不同意苏联同行的观点。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会议上通报过任何不利于其主子——帝国主义者们的上述所谓的有益信息。

钱三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道，美国人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故意忽视我们伟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真正的学者——祖国的爱国者，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我们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一个蒋介石分子也接到与会邀请的国际会议。例如，钱三强指出，虽然自己曾在法国居住了13年，并长期与约里奥·居里一起工作过，热爱法国人民，但如果他被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台湾代表也将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那么他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并完全拥护

本国政府的政策，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止美国人实现“两个中国”的图谋。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事例，如当时尽管苏维埃国家深陷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但苏俄学者们依然应邀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在以后时期苏联学者也多次参加了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以激愤的方式说，据他所知，在当时不论是阿里汉诺夫还是维诺格拉多夫都不是知名的学者；至于苏联学者参加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国际会议，那是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钱三强继续道，他并不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们是否曾经提出过关于建立两个俄国的思想，但如今他们却正极力使自己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成为现实。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极力暗示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即他们的迷惑之处在于，没有真正明白中国朋友谈话的本意——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理论，并提示其最好不要再继续谈这一尖锐的话题。

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起初并没有重视我的意见。他们甚至还以苏联国内当年所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当明显感到会谈可能出现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之时，我被迫用了半个小时时间阐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并以尽可能彬彬有礼的方式指出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的错误，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无知。

在会谈结束时，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及其不讲究策略的举止，并作了一些补充性的解释，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宴上的紧张气氛才略微缓和下来。中国同志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在我发言结束后，我们的谈话开始转向另外一些话题。

晚饭后，我留下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并再次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个错误，不应当在当前条件下涉及如此尖锐的问题。他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H.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4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茹科夫同志、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1月11日

第821号

手写批注：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托普奇耶夫同志看了上述材料。据他通报，派遣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前往中国的原子能总局局长斯拉夫斯基也看了该材料，并与这两位同志谈了话，还责成副局长叶夫列莫夫同志继续调查此事。

考虑到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的工作事实上隶属于中型机械部，是由原子能总局派遣他们到中国，托普奇耶夫认为，为搞清苏达利科夫在报告里提到的问题，斯拉夫斯基的做法是正确的。

(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

A.莫宁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294 297、298

№138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8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10月30日会议第18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3项 毛泽东同志1958年10月15日的来信和周恩来同志的1958年10月12日的来信。 [67]

米高扬、阿尔希波夫、赫鲁晓夫。

给图-16发放许可证(图75——发放两个许可证。)"索普卡" [68] ——在1959年上半年发放。在解决了具体问题之后,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毛希丁诺夫、阿里斯托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

对毛泽东1958年10月15日电报的复函没有发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应该仔细研究;应该压缩一些,但不是急剧地。

委托书记处审理杂志和报刊的问题(处罚了许多)。 [69]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10, л.3-4

№20411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 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1958年11月1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0日

第44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11月10日

今天,为庆祝德国十一月革命40周年,民主德国驻中国使馆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也出席了此次酒会。其间,我们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如前不久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内容涉及毛的文章及其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标题所发表的谈话)。另外,陈毅还对参加此次鸡尾酒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陈毅说,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便不会与美

国建交。

如果联合国不撤销所谓宣布中国侵略朝鲜的相关决议，不驱逐蒋介石分子，那么中国就不加入联合国。

只要英国人将采取某种旨在支持美国推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具体行动，那么中国便会立刻与之断绝外交关系。

陈毅继续道，他请求大使们正确理解他所表述的思想，并关注以下事实，即中国与美国人的斗争可能会持续7年或更长时间。陈毅强调，换言之，这场中国与美国的斗争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苏联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直到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因为到那时，完成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才会变得更容易些。

陈毅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思想(他的这一思想首次提出是在今年11月8日，当时苏联大使尤金同志在自己住所为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举办了招待会)：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信，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绝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犯冒险主义。

苏联驻中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C.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A.A.葛罗米柯同志、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M.B.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安东诺夫

第816号

1958年11月1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99-300

№20412 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1958年11月12日)

摘自H.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29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张致祥会谈纪要

1958年11月12日

今天，张致祥邀请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代表前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便就南斯拉夫参加预定在今年12月份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罗马尼亚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席，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副主席)。罗马尼亚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鲁坚科大使，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雷曼参赞。

张致祥谈论了如下内容：今年9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筹备会议，这次电影工作者会议预计于今年12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7年在布拉格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纯粹的创作会议)。南斯拉夫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布拉格会议。

在布拉格会议闭幕的时候，对于南斯拉夫没有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会议，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波兰)的代表团表示了遗憾，并且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今年召开的会议。今年9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筹备会议上，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之间在看法上也出现了分歧。结果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把筹备会议的会谈纪要以及关于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过程通报给南斯拉夫电影创作者协会。

张致祥说，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机构对南斯拉夫发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邀请(正如去年一样)，向南斯拉夫发送筹备会议的纪要以及其他相关的通报，会被认为是邀请南斯拉夫人参加会议。

在会谈的过程中，张致祥多次强调说，南斯拉夫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不应该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会议。

张致祥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晚才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进行讨

论，这是个疏忽。张致祥继续说，这是由于参加布拉格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昉(ЦайФан)的过错，他在回国后才把会议上就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讨论结果通报给中共领导人。张致祥强调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南斯拉夫参加会议，因为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张致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对自己参加预定的会议是有利的，并且为此已经组织了以黄瑞(Хуан Жэнь)为首的代表团。

张致祥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如下三个方案：(1)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组织发出特别的邀请，而完全不邀请南斯拉夫；(2)邀请南斯拉夫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起作为客人参加会议；(3)邀请南斯拉夫作为客人参加会议。张致祥说，在这些方案中，最好的是第一个方案。张致祥援引雷曼的意见说，可以在会议之后，把关于会议的一些材料通报给南斯拉夫。

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较为妥当的是采取我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推后决定。

张致祥请求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本国政府进行磋商，把他们就这一问题的最终意见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同意我提出的看法，即应该就这个问题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磋商。

然后我同张致祥举行了简短的会谈。张致祥说，由于早先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亚洲国家的宣传问题上相互协调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及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团就这些问题举行会谈。应该派出由3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不包括翻译)：广播机关的代表，各方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代表以及代表党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会谈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大致时间可以定在明年的1月份。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不应参加这次会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这类会谈的经验。张致祥强调说，这些会谈的目的应该纯粹是为了交换意见、经验和计划，并且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关于协

调对日广播的时间问题)进行研究。张致祥说，不应该通过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必须履行的决议。

张致祥又回到了关于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会议的问题，他说，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难以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如果南斯拉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参加。张致祥强调说，无论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原则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明确的态度，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张致祥继续说，这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要让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他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只在于，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

大使馆随员B.И.沃先金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存档。电影工作者会议已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这个问题已向苏共中央报告。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20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302-306

№24962 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1958年11月15日)

摘自B.И.伊万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27日

第25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8年11月15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同志。

会谈伊始，根据本国大使的委托，孟英同志希望通过苏联大使向苏联相应组织表示感谢——感谢其协助解决了关于在中国驻蒙古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的问题。孟英同志承诺，在“高频”设备的安装、电缆的运输和电缆沟的挖掘等准备工作过程中中国使馆方面将向苏联通讯人员提供协助。孟英同志还通报，经与苏联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协商，中国相关部门已同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

随后当我们的会谈涉及中国和蒙古代表团之间的贸易谈判问题时，孟英同志指出，在这些谈判期间，由于蒙方建议提高本国原料(毛、毛皮等)的价格并降低依照1958年价格水平运入蒙古的中国商品价格，导致中国代表团面临一些困难。孟英同志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毫不客气地向中国代表团提出如下理由，即中国不会因为降低本国商品的价格而损失太多，因为中国在蒙古购买的原料数量并不太多——总金额只有1000万卢布。如今蒙古贸易代表团已有可能与其他国家举行此类谈判，鉴于后者会援引中国从蒙古购买原料的价格来压价，因此建议中国提高从蒙古所购买原料的价格。

孟英同志继续通报，1957年蒙古人曾试图与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建立贸易关系，但由于日本公司对蒙古驼毛的报价低，生意没谈成。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展贸易联系，中国(主动)将蒙古驼毛的价格提高至10000卢布/吨，并建议日本人依照中国的上述报价来购买蒙古此类原料。但最终日本人拒绝与蒙古代表签署这方面合同。

此外，孟英同志继续道，在中蒙贸易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还要求将中国购买蒙古马匹的价格提高至每匹270—300图格里克，虽然这种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内市场的价格只有100图格里克/匹。鉴于中国(的确)需要马匹以及中国是蒙古马的主要购买者，中国代表团最终同意提高价格，但条件是中方有权对所购买的马匹进行挑选。

1958年，蒙古代表团再次要求中国提高购买蒙古马的价格，在该年度其报价为300图格里克/匹，且中方无权对所购买马匹进行挑选。

在此类谈判期间，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由于中国商品在运入苏联过程中需过境蒙古，因而欠蒙古过境转运费1亿卢布。为了部分地补偿这一欠债，中国代表团建议蒙古人把两国间1959年的贸易流转量提高至1亿卢布，方式是由中国向蒙古供应日用品。但是，蒙古代表团借口本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日用品的条件更有利，而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建议，只同意把1959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增至7500万卢布，并单方提议由中国出力在乌兰巴托建筑相应数量的住宅以补偿中国对蒙古的那些商品过境运费欠债。

中方以本国缺乏建筑材料和自由劳力为由拒绝了蒙方的上述提议。

孟英同志询问，苏联在乌兰巴托铁路过境运输的运费方面是如何与蒙古人结算的。我向他讲了苏联与蒙古间在这方面的结算情况。

随后，孟英同志又询问了苏蒙贸易谈判的问题。我对他说，苏蒙代表团双方在1959年度的贸易方面已基本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相互供应商品和苏联以信贷方式向蒙古所供应商品的清单问题，商品价格以及苏联交通部门用汽车把商品运抵蒙古西北方向的税率等问题。我强调，苏联和蒙古在1959年度的贸易额大致维持了1958年的水平。双方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基本与1958年相当——依照1958年度世界市场均价而确定的现行价格。

在谈了蒙古与中国，及其与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情况后，孟英同志说，中国使馆明白，蒙古代表团在与上述国家谈判期间均在极力提高本国各种毛和毛皮原料的价格。在此，他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学会了如何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代表进行贸易，因此在与后者签署贸易合同时总是极力想更多地获取利润。

我对孟英同志说，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举行贸易谈判期间总是想提高本国原料产品的价格，并极力压低上述国家商品在1958年度的现价。结果导致，蒙古既没能与波兰签署热洗毛的合同，也未与捷克达成熟羊皮和山羊皮的合同。

在会谈结束时，孟英同志通报说，在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团，组建股份公司以加工蒙古南部的丰富矿产。但中方暂且回避讨

论这方面问题。孟英同志认为，该问题目前仍很微妙。在孟英同志看来，在未与苏联协商的情况下中国是不会解决这一问题的。

孟英同志为这次会谈向我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B.伊万年科(签名)

АВГРФ, ф.0111, оп.40, пор.7, пап.253, л.1-4

№20413 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 (1958年11月19日)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

1958年11月27日

第59号

机密

摘自与新疆军区副司令郭鹏(Го Пен)的谈话

1958年10月17日，郭鹏通报说，一伙数量200多人的在阿勒泰地区活动的匪帮受到了重创。目前，发现的人数为130人，其余均躲藏了起来。共缴获马匹400匹，击毙约30人。被派去镇压这批匪帮的正规军共1个连，1人牺牲，2人受伤。当地居民也参加了搜捕匪帮的行动。部分被俘虏的匪帮获释。郭鹏同志称：“匪帮的头目将受到审判。”

多巴申同志问：“看来，这些人都是前乌斯满 [70] 匪帮的残余分子，都是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心怀不满之徒？”郭鹏同志答：“说得一点没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Г.多巴申(签名)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译员

Н.纳塔申(签名)

文件共5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驻中国使馆、苏共中央

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档案室

经办：H.纳塔申

打印：H.库尔梅舍娃

1958年11月19日

手写批注：

存档。该资料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30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131, л.301

№26373 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 军区的谈判(1958年11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2日

第480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1月30日

今天，陈毅同志应邀来馆举行会谈。在交谈过程中，陈毅同志通报说，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的代表同沈阳军区的代表就上述军区之间就互相保证空防情况和防空部队联合作战问题签订新协议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陈毅同志接着说，虽然这些谈判是由边境军区的代表们在进行，但是我们把这些谈判看成是我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全局性政治的一部分。在苏中关系史上还从未有过我们不能达成经协商一致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情况。因此，谈判出现困难，特别是苏联代表团决定中

止谈判，使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深感不安。

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介绍在沈阳进行的谈判情况。黄克诚同志说，1955年外贝加尔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而1956年远东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防空部队协同作战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签订后，就发现它们有不少问题，而在实际履行时给中方造成了一些困难。

今年夏天赫鲁晓夫同志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曾指出这两个协议的缺点，他建议苏联派代表来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同沈阳军区之间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发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通知说，他同意必须修改上述协议，为此将派苏联代表去中国同沈阳军区的代表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1月24日抵达沈阳，开始同沈阳军区代表进行谈判。

黄克诚同志接着通报说，根据中方的意见，原先签订的协议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对等原则。此外，为了避免产生某些技术上的困难，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时建议就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问题，同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签订一个协议。如果以前中方必须分别给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两处通报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只需向一处通报情况就可以了。

远东军区的代表还建议签订防空部队互相协调作战行动的协议。对此中方声明，目前在上述几个军区辖区内的军事形势不是危急形势，在和平时期就这个问题签订协议，在他们看来是不适宜的。

今年11月29日，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时发表声明，说苏方同意中方关于在这几个边境军区的辖区内不存在危急形势的意见，因此建议废除原先在1955年和1956年签订的协议，不再签订任何协议，并中止谈判。苏联代表团还声明，它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准备回国。

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无论如何不能中止谈判，一定要说服苏联代表团留在沈阳继续谈判。中国代表团建议今年12月1日继续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但是，苏联代表团没有接受中方的协议草案，又重申中止谈判和回苏联的愿望。黄克诚同志在同沈阳通过电话回来说，苏联代表不想继续谈判，推说已收到马利诺夫斯基让代表团回国的指示。

黄克诚同志声称，中止谈判会给苏中友谊带来损害。他在详细介绍情况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双方必须谈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消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误解和词不达意的情况。

陈毅同志这时候指出，必须深入研究一下原先协议的优缺点。只有继续谈判才能做到这一点。陈毅同志说，我们中国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还刚刚在建设。我们军队也应学习和借鉴苏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如果战争在千岛群岛打起来，苏联的远东地区就是前方，我们就是后方；如果战争在山东省打起来，那我们就是前方，你们就是后方。

随后，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谈谈自己对谈判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激动。他说，为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有人向他报告了沈阳谈判的情况和谈判产生的困难。彭德怀同志说，这使他非常不安。在谈到问题的实质时，彭德怀同志说，他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曾谈过，必须签订符合对等原则的新协议。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1956年协议的缺点比1955年协议多。两个协议只是根据俄文文本签订的，苏联代表借口不懂中文拒绝在中文文本上签字。此外，1955年和1956年两个协议的草案都是由苏方起草的。彭德怀同志指出，苏中两国边境军区指挥部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亲密的和良好的。这种关系是符合苏中关系总的精神的。接着，彭德怀同志对苏方在实际履行以前的1955年和1956年协议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例如，彭德怀同志说，中方是定期向苏方通报情况，而苏方则没有。苏军当局在通知预定有中国空军参加的联合演习时，通知的时间都非常晚。彭德怀同志说，常常是苏方今天通知，而演习在明天或后天就要进行。众所周知，中国空军的飞机还很少，而且目前基本上都部署在中国南方各省参加反对蒋介石分子的作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部队调到北方来是不可能的。这就给苏军当局造成似乎中方不愿意参加联合演习的印象，其实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彭德怀同志接着通报说，尽管原先达成协议在苏联飞机飞越中国边境领空或中国飞机飞越苏联边境领空时应互相通报对方，可是苏方没有履行这个协议，而中方则定期向苏方有关机构通报中国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的情况。

彭德怀同志认为，原先的协议包括了一些如结算伙食费等等的不该列入的细小问题。协议应解决共同的主要问题，而细小问题可在具体工

作中去解决。

至于谈判中产生困难，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友好关系指的是，通过交换意见总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彭德怀同志说，我相信苏联代表团中止谈判的声明是不符合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政府的意见的。现在，我们已经指示中国代表团在互相通报空防情况协议、防空部队联合作战协议和为双方空军提供方便的协议(即协议一方的飞机在另一方境内时向其提供油料、飞机修理等方便)上签字。

至于是向一处还是向几处通报情况的问题，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如果认为合适，我们准备向外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都通报情况。彭德怀同志说，我们的事情比较简单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空军和海军都属于沈阳军区指挥。同时，彭德怀同志主张谈判继续进行，并希望谈判取得成功。

这时候陈毅同志指出，谈判可以停一下，让代表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进行。如果苏联代表团仍坚持要回国，那我们建议谈判继续在苏联进行，我们准备派代表去苏联。重要的是让谈判取得成功，消除一切误解，以及让我们苏中关系中的这个已带上政治色彩的局部事件，根据中苏两国兄弟般关系的总的精神和今年夏天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签署的苏中共同宣言的精神来处理 and 解决。综上所述，陈毅同志请我提供帮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让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我则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我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关于这些谈判的任何指示。赫列布尼科夫 [71] 上将是在今年11月29日星期六向我通报这些谈判情况的。不过，鉴于今天的谈话，我答应将所有问题报告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并转达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关于必须继续谈判的请求。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向陈毅同志通报了几位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同现在的外交使团团长沙波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情况。谈话涉及两个问题：(1)是否出席南斯拉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2)是否去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参加谈话的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等国大使尖锐批评了基里洛克，如罗马尼亚大使鲁坚科对基里洛克说，他忘记了他

不只是外交使团团长，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以外交使团团
长身份发表谈话时，他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

接着，我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所有参加谈话的人都赞成去欢迎阿尔
及利亚代表团。

陈毅同志对我作的通报和对支持中国朋友关于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
代表团的建议，表示感谢。陈毅同志接着通报说，鉴于最近戴高乐同蒋
介石分子的关系暧昧，中国政府决定用最高规格接待阿尔及利亚代表
团。因此当听到大使们将参加欢迎仪式时，他感到特别高兴。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庭荃和该司工作人员方祖安。
担任谈话记录的是使馆三秘A.博鲁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文件共3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博伦科夫

1958年12月12日，第896号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88-195

№24963 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 治变动(1958年12月5日)

摘自B.И.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9日

第27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孟英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5日)

我偕夫人应邀拜访了孟英同志——与他共进晚餐。其间，我们作了些交流。

我们的谈话涉及到一些内政性的问题。我向孟英同志通报了苏联的经济成就以及在提前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临近之际苏联人民爆发出的空前政治和劳动热情。而这次大会一定会通过一些涉及苏联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的历史性决议。

孟英同志说，在中国国内大家都对学习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报刊全文刊载了H.C.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关于1959—1965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的监控数据”。国内的许多工厂、建筑工地、农村公社和高校都积极地召集了群众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以讨论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

孟英同志接着说，今年12月10日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莫劳扎蔑茨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将飞抵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讨论关于在1959—1960年间如何使用中国政府在今年夏季以年息1%为条件为蒙古提供的1亿卢布信贷的问题。

孟英同志接着指出，关于这笔信贷的使用蒙古方面的意见是：在乌兰巴托建筑住宅5万平方米，在国内不同地区建筑7座跨河桥，2座电站：其一位于乌兰巴托附近的涅莫奇内车站，功率为12000千瓦/时；另一座位于乔巴山山，装机容量为3000千瓦/时。北京已研究了蒙古方面提出的关于这些信贷的使用计划。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已委托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向蒙方表达了中方的意愿，以便蒙古朋友能够合理地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工业企业建设，因为蒙古毕竟仍然是一个工业发展薄弱的国家。

接下来，孟英同志谈到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11月中央全会所通过决议的问题。他说，在蒙古工作的中国工人和专家们以积极态度对待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前完成三年计划的提案。中国使馆与蒙古朋友一起重新研究了关于在中国帮助下完成蒙古工业企业的建设和投产期限的问题。

孟英同志继续道，中国使馆一直无法比较肯定地搞清楚，达姆巴同志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据孟英同志说，一些同志曾对他说，达姆巴同志

被免职与其个人修养差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在他任职初期怎么没人考虑这一重要因素。另外，还有另两名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也被免了职。这里面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其中包括蒙古政治局委员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孟英同志请求，如果可能的话，苏中双方应就该问题彼此交流意见。

我对孟英同志说，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上所公开的内容。在会谈期间蒙古同志对我也是说，达姆巴同志是主动提出免去其所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理由是：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素养，因而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被免职，则与如下情况相关：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在免去达姆巴同志原先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并选举其为中央第二书记之后，便确定他在今后主管农业问题。由此，便出现了关于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的问题。

随后，孟英同志说接着说，任命泽登巴尔同志为蒙古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将会促进蒙古国家和党的建设事业的进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这3年多以来，他与前大使何英同志均认为，乔巴山同志(的确)是一位学识渊博和有业务能力的领导者。

我表示同意孟英同志的看法，并说道，在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泽登巴尔同志是被一致选举为中央第一书记的。 [72]

我对孟英同志的晚宴邀请和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B.列夫金(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列夫金

第483号

1958年12月6日

АВПРФ, ф.0111, оп.40, пор.7, пап.253, л.5-7

No09875 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1958年12月16日)

摘自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8日

第278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2月16日)

应谢甫生同志的要求，我接见了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在礼节性的谈话之后，谢甫生同志谈到 he 来访的目的，说，他想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解除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该决定近几天将在报上公布。

在解释解除毛泽东同志这些职务的原因时，谢甫生同志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只留任中共中央主席对党和人民更有利，这样 he 可集中精力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的总路线问题。而且，由于繁忙，谢甫生同志继续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时，经常拒绝外国邀请 he 访问这个或那个国家，以后 he 不必再作拒绝了。

我问谢甫生，对国家主席新的人选有什么考虑。

谢甫生同志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 he 一点儿也不清楚。解除毛泽东国家主席职务和选举新的国家主席的问题将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

在座谈中，还就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国内和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

谢甫生同志说，中国国内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中国人民为提前

完成预定的计划在顺利地奋斗。正因如此，今年取得了好收成，为明年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钢产量将达到1100万吨，即比原定的计划1070万吨还要高一些。工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一切将对明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谢甫生同志说，1959年的铁路建设将有大的发展。这年要建设5万公里以上的铁路线。之所以快速发展铁路运输，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谈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其中包括台湾解放问题，谢甫生同志指出，最近台湾地区出现了平静。美国人采取了某些从各港口撤军的步骤，这些部队是他们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时调来的。

我向谢甫生同志谈了苏联国内由于准备提前召开苏共二十一大所出现的形势，指出了国内劳动和政治高涨的意义，尤其指出了共产主义劳动队，作为劳动竞赛的最高形式，在我国顺利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同时我还谈了苏联政府关于柏林问题的声明。

谢甫生同志肯定了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对苏联的外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苏联外交在争取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事业中起着积极作用。

我对谢甫生同志的来访和会谈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A.K.涅霍罗舍夫。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译员邵美惠同志。

苏联驻蒙古大使

莫洛托夫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3, р.8927, л.13-15

№20693 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1958年12月24日)

摘自B.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6日

与金日成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4日

我与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和贸易办事处代表格拉德科夫同志一起拜会了金日成同志。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对金日成同志来信以及对朝鲜政府有关扩大1959年苏朝贸易额和增加苏联部分商品供货照会的回信。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通报了有关拟定提供的商品以及朝鲜方面请求苏联增加提供的商品。

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向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转达衷心谢意，感谢苏方对朝方要求给予的细心研究。同时他强调说，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金日成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苏联与朝鲜贸易代表团的当前工作，他说，据其所知，对协商的互相供货已经做了大量先期工作，为在短期内顺利举行谈判具备了条件。

当谈到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提出的有关苏联同意帮助朝鲜一些商品销往日本并用其销售所得从日本采购朝鲜所需商品问题时，金日成同志表示非常满意，说，这对朝鲜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谈中，金日成同志还谈到，考虑到对外贸易对朝鲜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进贸易工作的措施。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B.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19号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3, л.8-9

№20694 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 对日贸易多有不便(1958年12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摘自H.E.托尔宾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30日

第252号

与朝鲜副外相朴吉渊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5日

我拜会了朴同志，按苏联外交部指示向其通报，苏联加入了1948年3月6日签订的日内瓦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公约，苏联代表团将参加1959年1月6日于伦敦召开的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首届大会。为此，我向朴同志递交了简要备忘录，并遵其要求讲述了该组织的功能。

朴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答应向朝鲜相关权威机构通报此事。接着他说，朝鲜政府已通过12海里法，在朝鲜感到适当的时候将予以公布，如同当时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他当面对我附带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会谈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认为有必要通报此事。

在接下的会谈中谈到了苏联贸易代表团来访及工作事宜。

朴告，贸易谈判工作计划在当年12月30日结束。

我向朴打听，鉴于贸易谈判开始，朝鲜方面有无产生什么新的问题。

朴回答，谈判初始朝鲜方面尚未产生问题。然后他说，会上，他从金日成处了解了苏联代表团转交赫鲁晓夫的回信内容，同时，他重申了金日成十分满意苏联政府如此细心对待朝鲜方面的贸易供货要求。朴强调，尤其让金日成感到满意的是，苏联方面积极解决不锈钢问题以及帮助朝鲜与日本开展贸易。

朴说，自中国与日本关系紧张后，中国实际上已断绝了与对方的贸易。而朝鲜方面一般只借助或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所以，朴说，继续通过或借助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我们感到不方便。但是，朝鲜需要与日本建立贸易联系，朴指出，所以说，苏联方面积极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H.托尔宾科夫(签名)

文件2份，送：齐米亚宁同志、档案室

第248号

1958年12月30日

执行人：托尔宾科夫

АВІРФ, ф.0102, оп.14, д.3, л.1-2

№20695 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1958年12月29日)

摘自B.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5日

第6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成哲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9日

应朴成哲同志约请，我拜会了他。

1.朴成哲告，他受托向苏联大使馆转交金日成同志给赫鲁晓夫的信。此信是对赫鲁晓夫同志有关1959年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回复。

朴成哲说，收到赫鲁晓夫来信后，金日成同志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为赫鲁晓夫打算1959年访问朝鲜感到高兴。

我向朴成哲表示谢意，并说，大使馆会将其转交信件送交指定部门。

2.当谈到毛泽东同志访问朝鲜时，朴成哲说，这一问题尚未最终决定。但是，据朴成哲所知，毛泽东同志在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许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将于1959年访问朝鲜。

3.当谈到1959年1月5日即将开幕的朝鲜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时，朴成哲告，已收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答应，准备向平壤派遣政府农业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农业部长率队，其他兄弟国家代表团则分别由这些国家的农业副部长率队。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将不能出席。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B.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4份，送：齐米亚宁、安德罗波夫、图加里诺夫、档案室

1959年1月5日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3, л.5-6

№25232 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1958年12月31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3日

第17/TC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73]

1958年12月31日

我接待了刘晓同志。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我告诉大使，苏联政府已决定，让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问美国。

米高扬预计在1959年初出访美国，预计将会在美国停留两个星期。

.....

在与美国代表会谈期间，米高扬将谈到关于美苏关系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苏美的经济联系，同时还将就目前国际局势的实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1

1959年

№26585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1959年1月1日以后 [\[74\]](#))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成员

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苏方机构承担责任完成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作为经济交流的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苏方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期间，主要全力以赴进行了如下工作：(1)履行上几次工作会议确定承担的责任；(2)进一步发展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3)履行与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内容实施相关的责任。

一、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在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了向中国转交技术文件的紧张工作。

第七次工作会议后，苏方有1435个项目没有完成。根据1959年1月掌握的情况，共向中国转交了1052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还有383个项目待完成。

苏联完成的项目清单中，共向中国转交了：基本建设项目131个、机械设备图纸722套、139项工艺流程文件、351类部门技术文件及其他文件。

从第七次工作会议至1959年1月1日这段时间，苏联共接待了198名中国专家。这些专家考察了冶金、燃料、化学、机械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以及交通通讯、建筑工程和建材工业。根

据上几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还要在苏联接待16名中国专家。

二、依据1954年10月12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

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双方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在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基础上实行直接合作的意愿。

遵照上述意愿，苏方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因此，根据1959年1月掌握的情况，56家苏联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45家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开始进行合作。这些单位制订了共同的合作计划，为确保其实施还向苏中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相互转交科技文件和互派专家方面的建议进行审议。

科研院所的建议被苏方纳入苏中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审议的范畴。

在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五次工作会议的决议中，苏方为第二届中国水利研讨会准备了10份科技报告，有若干家各个部委和机关的院所参与了这些报告的准备工作，共有8名苏联学者参加了1958年12月召开的这次会议。

有8名苏联学者和专家出席了1958年11月由中方主办在中国召开的两次化工会议。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进一步加强苏中两国科研院所的直接合作方面将继续工作。

三、依据1954年10月12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科学技术合作

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第四项)，与转交重要科技文件和样品有关的问题，以及为执行协定附录规定工作而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接待赴苏联的中国专家的问题，都应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来解决。

这是苏中合作新的重要的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该协定确定了1958—1962年期间，双方将在16个不同科技方向共同进行122项重大科研项目的合作。

委员会苏方组提请委员会中方组注意，1958年签署的这个协定的合作计划还未获最终批准，所以苏方在年内将不得不对中方提出的单独需求申请进行审议，并对其通过有效的决议。这些决议由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苏方组共同做出，并且众所周知将对执行方进行统计和监督后，在工作会议纪要中形成相关决议。

委员会苏方组表示，在下一步批准实施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方面相关的1959年合作计划时，通过签署工作会议纪要的必要性可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

根据1959年1月1日掌握的情况，苏方机构决定承担如下责任：

1.向中国转交68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2.根据中方的申请，在苏联接收194名实习生和研究生长期(1—3年)学习；

3.根据中方的申请，向中国派遣74名苏联专家进行长期(1—3年)科技援助；

4.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172名苏联学者进行短期(至3个月)讲学和在科技项目研究中提供咨询。

派遣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和接收中国实习生、研究生，都将依据合同通过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全苏联合企业——即苏联电力工程公司与苏联进出口联合企业——来实现。至于涉及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向中国派遣苏联学者的工作，则由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秘书处负责实施。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苏联机构要向中国转交近4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此外，根据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科技部门的数据，苏联机构向中国转交了136个未包括在苏中委员会纪要内的项目技术文件。

在此期间，共向中国派遣了136名学者前往讲学，并对在研的科学研究项目提供了咨询。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今后将尽力做到快速、及时履行苏方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提请苏中委员会注意的是，目前对于苏方机构而言，上

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承担的有81个项目的责任难以履行，且有必要延长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的339个项目要在1959年上半年完成的期限。

因此，苏方就以下内容向苏中委员会提请审议并做出决定：

- 1.根据双方协商解除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二)；
- 2.根据双方协商延期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三)。

附录十二和附录十三由委员会双方的秘书处最后商定。 [75]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44, л.23-27

№1038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吾尔广播(1959年1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1月8日会议第91/42г号记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通过的问题，1959年1月8日。

第42г.项 关于停止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取消联共(布)中央1947年7月14日(第314/365г号记录)的关于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ЦХСД, ф.4, оп.15, д.616, л.17

№24829-1 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1959年1月14日)

1958年就如下题目共同开展了咨询工作：微星星表、报时业务和纬度站。在这些领域共同开展的工作比较顺利，并且逐年都不断发展。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紫金山(Зю-се)天文台，根据国家的天文观测计划对银河系进行了观测，在报时业务方面普尔柯伐(Зи Кавей)天文台借助国家天文台，特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光电设备进行了检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在天津的纬度站开始工作，中国的天文

学家在该站对国家天文台的工作进行了实践，用苏联制造的天顶仪进行了观测。

苏联科学院总天文台正在审议关于接受3名中国同志前来上研究生班或者进行实习的问题。

张钰哲(Чжан Юйчже)教授应天文学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1958年5月在苏联的基辅召开的天体测量学第十四次国际会议。

苏联天文台通过国际图书交流部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定期把他们出版的科学文献送给中国天文台。此外，还向中国相关的科研单位以及个别的科学家发送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出版物。

苏联方面履行了所有的义务，除了派2名天文学领域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这是由于这些出差没有被纳入苏联科学院的计划中。

1959年，打算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报时勤务、纬度勤务和对月球的天文观测方面提供帮助。

苏联科学院天文学委员会副主席

Б.Б.库卡尔金

1959年1月14日

РГАЭ, ф.9493, оп.1, д.970, л.31-33

№20630-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 访华情况(1959年1月15日)

1959年1月2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20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月15日

南日秘密地谈了以下问题：

关于金日成率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即将访问莫斯科。

据1月14日南日所说，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我对即将访问莫斯科赋予十分重大的意义。除了有机会参加大会之外，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就国际最大和原则问题进行会谈，尤其是朝鲜状况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具体就是向赫鲁晓夫同志通报有关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而要协商的主要问题是，今后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卫我们国家。具体是指，南朝鲜方面有可能发起军事挑衅和冲突；该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平统一朝鲜。我知道，赫鲁晓夫将埋头忙于大会举行和接待前来出席大会的各共产党与兄弟国家代表团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关注对我国是那么重要而尖锐的问题。

我问南日，在莫斯科代表团是否打算提出什么经济秩序问题？

南日答道，在常务委员会那次会议上金日成说，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将不会提出任何经济性质问题，因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已对朝鲜提出的所有问题做出研究和决定。

关于政府代表团赴中国访问。

南日说，与政府代表团会谈时毛泽东声称，中国不答应加入联合国，以免自己被束缚手脚，只要那里还是美国人把持的话。

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无法解决的。但为了向国际舆论解释为何中国不加入联合国，我们要求(依次进行)：

把蒋介石一伙赶出联合国；

取消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是朝鲜战争侵略者的决议；

从南朝鲜和日本撤出所有美国军队；

承认美国人是朝鲜战争的侵略者。

即使美国人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说，那么最后一条要承认自己是朝鲜战争侵略者，大概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始终有机会解释为何不想加入联合国。

我对南日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我问南日，他们近日是否打算发表一系列声明？比如，假如李承晚一伙，就像他们经常所做那样，破坏停战条件(飞机入侵朝鲜领空等)，对其行径予以强烈揭露，重申朝鲜不变的和平政策，使停战变成永久和平政策以及是否想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发表声明。

南日说，朝鲜政府正在就李承晚一伙打算派遣很大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准备声明。我们觉得，南日声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摆脱战争期间进入或者流落南朝鲜的几千名不受其欢迎的北朝鲜人。在该声明中，我们打算对李承晚一伙实际是遣送自己同胞去当奴隶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并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再次提醒，朝鲜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将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同胞按照各自意愿返回朝鲜人民共和国。

我也向南日通报，我国报刊几乎全文刊登了关于旅居日本朝鲜人返回问题的最后声明，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篇文章。

南日请我弄清苏联提供的用作盘尼西林生产厂的设备问题。我说，设备供应(结束)计划为1963年，而我們希望能在1961年。这很重要，南日接着说道，因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产盘尼西林保证军队与居民的需求。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8-20

№20630-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1959年1月16日)

1959年1月2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20日

平壤市

1959年1月16日

应金日成邀请，我拜会了他。

金日成说，他想通报一下有关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打算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讨论的问题。

金日成首先提到了李承晚政府打算派遣很大一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问题。朝鲜政府对此，金日成说，正采取一切措施使旅居其他国家的朝鲜人按照各自意愿返回祖国，李承晚一伙拒绝我们所提出的援助贫困受难的南朝鲜居民，实际上是把自己人民出卖当奴隶。为此，我国政府正在准备声明，从中将对李承晚上述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在各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举行集会支持朝鲜政府声明。

接着金日成说道，鉴于李承晚一伙可能发动武装挑衅的情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采取了加强军队警惕与战备以及培训居民的措施。我们决心，金日成说，把人民武装起来，为此组建工农赤卫队。挑选年龄17—45岁的人员参加，首先是朝鲜劳动党和民主青年团成员。武装赤卫队总人数将达到30万人。接着，金日成讲述了有关赤卫队按里与郡单位的组建程序(见1月14日与南日的会谈)。同时，金日成表示，根据他们的意见，建立赤卫队并非破坏朝鲜停战协议。

在中国访问期间，向毛泽东也谈过这一问题。对朝方制定的措施他表示了赞同。

在莫斯科，金日成接着说道，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打算向他讲述我们保卫国家的措施，并请向我们通报有关重要的国际问题；必须就南朝鲜方可能对朝鲜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问题交换意见，并预先商定，一旦发生袭击该采取什么措施。

至于经济问题，实际上都已解决了。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加快一部分设备发货，具体是：

1.在1961年完成平壤20万千瓦热电厂设备的发货。苏联政府就该问题已表示愿意接受，根据1958年5月15日协议所规定的期限，把发货期截止1965年改为1963年。但是，鉴于降水量不足，尤其是近2—3年内，冬季我们电力生产急剧下降，我们才不得不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再次提出请求，目前，因水位不足，水丰水电站7台机组只有4台在工作。此外，平壤建立的热电站只能帮助解决首都劳动人民住宅取暖问题。

2.根据协议规定，亚麻纺织厂建设设备发货期限截至1963年。我们请求发货期限截至1961年。亚麻纺织厂拟建在北方，那里亚麻生长很好。该厂早一步投入运营有助于我们完成保证居民布匹需求任务。一旦发生军事袭击，坐落在北方的亚麻纺织厂就能缓解军队穿戴需求紧张问题。

3.根据1959年贸易协议规定，向朝鲜纺织工业提供2万纱锭。我们希望，该设备发货能在第一季度末或者第二季度初。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轻工业上织布机与纱锭之间存在很大脱节，后者数量不够。第二季度收到纱锭有助于我们完成今年所提出的任务——保证人均20米布匹产量。

最后金日成说，有关加快电热厂设备发货问题，看来，我们要请求赫鲁晓夫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寻求支持我们的可能。有关加快其他设备的发货问题，打算会见苏联相关领导人以及商讨这些问题。

金日成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出很大请求，希望在会议召开前或会议结束后接队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进行会谈。为此，金日成表示，鉴于国内面临的形势(南朝鲜方发动军事挑衅危险)，会议一结束代表团必须马上返回平壤。

金日成请将上述请求转达赫鲁晓夫同志。

我对金日成说，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请求将立刻转告莫斯科。

出席会议的有代表团成员朴正爱和李钟玉。

朴吉渊担任会谈翻译。

№2658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年1月17日 [7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会议于1959年1月9—17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К.А.弗拉索夫、М.И.伊万诺夫、В.К.罗斯托茨基、П.Г.特列季亚科夫、С.Я.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И.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刘冰、杨显东(Ян Сянь дун)、钱信忠、江泽民、李苏(Ли Су)、严济慈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Чэн Бин)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了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1958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交换信函；

二、审议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面的问题；

三、审议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

面的问题；

四、审议了关于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合作的数量问题；

五、审议了与实现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相关的问题；

六、通报了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七、听取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成员的报告；

八、确定第九次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基础上，讨论了第八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双方确认了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签字的交换信函，以及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文件和相互派遣专家的决议。这些带有附录的交换信函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纪要附录中的编号延续交换信函相应附录的编号。双方认为，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在必要时应经常会晤并及时交换由双方提出的达成一致意见的项目信函，以便在下次工作会议上确定这些项目。

二、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35位苏联专家介绍了22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6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此外，中国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苏方组同意，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9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三、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01位中国专家介绍了36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四；并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435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此外，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中方组同意，向中国机构转交了4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四、双方就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执行情况做如下通报：

1.根据1957年12月2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关于苏联和中国专家及工人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规章》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接待53个项目的98—101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期限和人数见附录七。

2.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按中方邀请将派遣9个项目的32位苏联专家赴华提供技术援助，期限和人数见附录八。

3.根据1954年12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向中国机构转交59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九。

4.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中规定的136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十。

五、双方同意新增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在科技合作项目方面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十一。

双方指出，当前已经在大多数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些联系。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建议总结有关合作方面的经验。

六、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情况汇报。双方指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履行双方责任的必要工作，认为1959年上半年合理履行了上次工作会议决议中规定的还未完成的责任。

七、双方同意解除附录十二规定执行的项目，同意延迟附录十三中规定项目的完成期限。

八、在工作会议期间，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向中方专家作了两个报告，题为“在苏联采用大块材料组成的住宅项目建筑经验和用于生产和安装大型预制板的建筑设备”(罗斯托茨基同志)和“苏联地下煤炭气化”(克

列伊梅诺夫同志)。

九、双方决定在1959年6月上半月举行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本纪要于1959年1月17日在北京签字，附有13个附录和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1958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字的交换信函，它们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7] 中俄文正本2份，双方各持1份，两种语言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

韩光

ГАЗРФ, ф.09493, оп.1, д.1006, л.1-5

№24101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1959年1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应苏联外交部的委托，兹呈递可靠情报草案，以便转交如下国家的政府首脑——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锡兰、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阿富汗、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南斯拉夫。其主要内容：А.И.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谈话。

建议：该情报的转交可通过我国驻相关国家使节进行。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9年1月21日

第164/гс号

致苏联驻德里、雅加达、科伦坡、金边、仰光、开罗、巴格达、喀布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奥斯陆、赫尔辛基、贝尔格莱德大使：

请拜访尼赫鲁(对应的是苏加诺、班达拉奈克、西哈努克、奈温、纳赛尔、卡塞姆、达乌德、拉布、埃兰德、汉森、基哈德森、苏克舍拉宁、卡德尔)，并转告如下内容，你们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向该国领导人通报关于在今年1月非正式访问美国期间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内容。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米高扬此次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度假，而与其与这些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都是应美方的要求举行的。会谈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谈判，只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会谈期间，米高扬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和其他著名人士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

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

在双方的会谈中，鉴于美国方面的主动提出，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

米高扬对美国国务活动家们说，在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以当前的事实为基础的。这些事实包括：西德国家的存在，东德国家的存在以及被前盟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占领的柏林等。苏联现在承认所有这些事实，而美国只承认其中部分事实——美国拒绝承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德意志民主德国的存在；拒绝该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巩固，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社会力量的稳固的团结。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德国不仅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各爱好民主和自由人士的拥护。

得到美国支持的联邦德国要求德国的全面统一，但其提出的充满挑衅的、吞并式的条件却是民主德国无法接受的。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只会对这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相互接近不断地制造新的障碍。当然，民主德国永远也不会同意——被西德吞并。武力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东德有苏联军队，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会随时准备援助自己的盟友。

联邦德国政府不仅对民主德国的态度充满挑衅，而且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态度也是这样。难道能够容忍其如下做法吗？拒绝承认战胜国的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战胜国，拒绝与战胜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最终德国和约得以签署——其中包括现有的边界得以稳固，那么德国和欧洲的形势就可能得到改善并趋于正常化，到那时任何人已无法再要求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如同现在联邦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苏联政府坚持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目前要稳定德国的局势只有在承认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存的情况下通过签署和平条约的方式才可能实现。

大家都希望，如果统一的德国没有能够签署和约的话，那么至少现在还可能由业已存在的两个日耳曼国家来签署这样一个和约。

苏联政府并不认为，这两个现有日耳曼国家签署和约非要等到德国问题解决前夕才能够进行，但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这两个国家相互接近，并有益于他们以后通过协商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

苏联认为和约的签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将为此而不懈努力，因为苏联坚信这不但关系到全世界的福祉，而且也涉及到德国的利益。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均在对德和约的签署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完全可能在此达成共识。因为它实际上涉及欧洲是否仍会以战争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涉及确保整个世界和平的问题。德国统一的最现实方式——便是组建德意志族际联邦。

两个德意志国家一下子便完全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相同的，所以机械性的联合必然存在许多对德国不利的障碍，而且..... [78]

苏联并非执意要向德国人民复仇或有意使其处于附属的地位。情况正相反，苏联与东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很想改善与西德境内的德国人民的关系。西德面临着维护和平的重任，并非常清楚，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对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德国将意味着什么。

可目前在西德仍有一些鼓吹复仇主义的集团正极力想以暴力方式来改变现状。

如今，尽管遭到了本国民众的抗议，但西德仍在不断发展武器装备。.....联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西德。

总之，尽管有美国政治家为西德总理担保，但苏联人民仍对西德的武力怀有巨大的疑虑，因为后者所拥有的武器已远远超过了其纯粹的国防需要，而且在这方面仍不断得到美国的支持。

米高扬说，在柏林问题上苏联并非极力想为自己获取什么，也并非想破坏西方强国的威望或使其“丢面子”。苏联希望西柏林成为.....如果成为自由市，可能会符合四大占领国的利益.....

.....

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市.....使其成为苏联和美国为了未来的世界和平而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地区。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对的，即认为，似乎苏联关于柏林问题的照会是采取某种最后通牒的方式，是在威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在动用武力威胁手段。在柏林问题上苏联政府建议在.....期限内采用谈判的方式，这个期限可不短。米高扬说，我们并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而且希望你们也不要这样想。如果有人竟然想凭借柏林问题而实施威胁，那只有西方的将军们会这样去做.....但他们应当知道，任何侵犯德意志民主德国边境的企图最后只能招致应有的回击，并以失败而告终。

.....

美国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主要都是杜勒斯所表述的那样。

米高扬接着说，美国政府准备就德国问题举行谈判，但同时在柏林问题上美国政府又实际上在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签署与德国的和约和关于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议。在表示希望更广泛基础上举行谈判，而不仅只就柏林和约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的同时，杜勒斯指望用一个一揽子的关于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的谈判来取代上述两个具体的、最重要问题的解决。

杜勒斯声称，他理解苏联对德国的未来走向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等问题的担忧。他还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希望确保如下条件，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和德国的威胁。按杜勒斯话说，美国并不想从德国的统一中为自己取得任何军事战略中政治上的优势。美国认为，德国统一后所实行的任何一种制度均应由一系列安全措施、协议和条约等来加以保障，以确保苏联和美国能够在防止德国侵略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艾森豪威尔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也谈了类似上述的观点，并对杜勒斯的看法持赞成态度。

双方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意见交流表明，美国政府依然坚持自己的旧有立场，不愿意采取任何举措，从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确保整个世界安全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当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裁军和停止核试验问题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会谈的过程中米高扬同志简要地涉及了关于终止军备竞赛的问题。

米高扬对艾森豪威尔说，在削减军费方面苏联政府准备采取最激进的措施。但此举只有在(苏、美)两国彼此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实施。几位美国部长对米高扬说，苏联要是削减自己的国防开支，就可以加快苏联的经济发展。但是谈的是单方面削减，而同时美国则继续扩充自己的军力。当然，也不可能奢望苏联这样单方面裁军。应该承认，尽管……军费支出有大的扩张，最近3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变化……米高扬说，当然，裁军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双方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将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回应美国方面的观点时，米高扬说，如果美国用缺少信用来说明军费开支的话，那么苏联也无所谓。米高扬说，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费劲去证明苏联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军事袭击的能力。

作为对米高扬的答复，艾森豪威尔总体上表示，愿意双方在裁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没有证明这一点。

米高扬对杜勒斯表述了苏联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政府认为，苏、美两国应当立即就永久性禁止此类试验的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仅对自己国家本身具有巨大意义，而且还可促进和建立苏、美两国之间的互信，有利于其他一些协议的达成。苏联政府认为，如果美国 and 英国方面有这方面意愿的话，达成永久性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是可能的。

接着，米高扬问杜勒斯，美国政府是愿意签署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还是打算继续为此而制造新的障碍。米高扬指出，尽管在日内瓦谈判中各方已达成了包括有4项提纲的协议，但由于美方的一项提案，导致该协议的实施显得并不那么容易，从而使我们对美国人的企图产生了严重的疑虑。美国政府的意思是必须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并根据该机构成员多数票来做出决议，而不是通过各国之间的协商。苏联政府明白，美国在该机构一定会占据多数，正如其在联合国那样。因而对此，苏联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该机构只会导致美国人说了算。在日内瓦谈判中，由于美国的阻挠，各谈判国之间还产生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分歧。其中便包括美国提出的关于不可能终止地下核试验的声明。众所周知，去年夏天专家会议已达成了关于对核爆破进行登记的可能性的协议。但仅在几个月之后，美国便发表了关于可以不开公地下核爆炸的官方声明。总之，美方在这方面是不断地制造障碍。

作为对米高扬所提出问题的答复，杜勒斯断言，美国政府希望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杜勒斯又说，美国并不想破坏日内瓦谈判，但要解决关于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仍需要长期而耐心的谈判。

杜勒斯也向米高扬保证，美国不打算拖延关于恢复预防突然打击议题会谈的工作，但是他们想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杜勒斯的言语中可明显看出，美方的目的依然是不愿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执行拖延谈判的路线。

近东和中东问题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宣称，美国对近东和中东的局势感到忧虑。他认为，那里的情况是复杂而混乱的，并对各方是否能够对那里的形势达成一致观点表示怀疑。

杜勒斯说，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并处于世界上最重要交通线的关键位置，因而对西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表明自己对近东和中东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同时，杜勒斯指出，美国担心当前伊拉克事件的发展趋势，该国似乎已处于“民族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他试图向米高扬保证，美国军队进入

黎巴嫩似乎不是企图以武力来维护西方对近、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指出，该地区的形势极其危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就很难预测当地的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苏联清楚阿拉伯的石油和经过中东的交通线对西欧国家的重要性，而关于此苏联政府早在相关声明中提到。当年，苏联政府就曾建议各大国讨论中东问题和商定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但该建议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在1950年，美、英、法三国便宣称，它们三国将共同决定该地区事务，甚至不同诸阿拉伯国家商议。

至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米高扬指出，1958年夏当伊拉克爆发那一系列著名的事件之时，当地并没有一位苏联人。那里的……政府只是因为民族政府才受到(民众的)拥护。

苏联之所以在其他国家享有崇高的道德政治威望，是因为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米高扬认为，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国家——其中包括近东和中东国家在内——之间的关系，而这样不会对西方强国产生任何不利。如果阿拉伯国家都实行独立政治，独立控制自己的资源，它们就会依照正常的商业价格向西欧国家出售石油。

由于支持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西方国家自己损害了形象，破坏了自己在近东和中东的地位。

杜勒斯极力弱化正在进行的美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签署双边协议的谈判的意义。据他说，协议的内容似乎主要是协商关于美国将给予上述诸国军事援助的条件问题。

米高扬指出，该条约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极力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而这就不能不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美国强加给伊拉克的军事条约，导致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恶化。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土耳其来反对苏联，而这必然会引起苏联的严重关切。

米高扬强调，美国在近东和中东诸国所实施的军事举措必将导致苏联周边地区出现紧张的局势。当然，也必然考虑如下因素，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原本与自己邻国的关系便不融洽。米高扬援引了印度驻美国大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中所说的话，即印度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已多次对阿富汗发出了威胁性的声明。米高扬强调，在这种情形下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所签署的军事协定便可能导致，一旦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那么就可能成为军事摩擦，并进而演变为更广泛的军事冲突。

远东问题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还提到了关于远东的问题。他声称，在美国看来，中国以及类似的朝鲜、越南和德国，都是好战的国家……

米高扬答复杜勒斯道，这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和德国，不论是在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依据上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由于在二战中被打败，德国的领土范围根据盟国的协议得以确定。朝鲜也是在盟国战胜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李承晚是一个危险的人，大冒险家，他应当懂得节制。众所周知，北朝鲜现在发展得很好。那里的工业不断恢复，仅在2年时间里便超过了战前水平的2倍。其农业也发展得很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李承晚眼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会对南朝鲜有任何侵略的企图。因此，米高扬说，美国军队最好能撤出朝鲜，这样做会促使李承晚走上与北朝鲜接触的发展道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多次表示，希望南、北朝鲜之间进行接触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关系。

至于越南，则是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被分裂的。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关于中国的问题与上述问题完全不同。当中国开始内战之际，美国并未以武力实施干涉。这是明智之举。但当国民党被击溃的残部逃往大陆周边岛屿和台湾之时，美国却与其签署了相关条约，即为了给自己获得好处而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而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作过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对美国的类似做法罢善甘休。

米高扬继续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不曾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诸岛屿。而要求美国离开台湾——离开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并不是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地区。如果美国能够终止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美国只会在这方面获利——其中包括赢得自己的威望。美国在台湾只会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使这一地区始终成为战争的一个策源地。至于苏联，则准备帮助并消灭位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战争根源。

对此，杜勒斯依然坚持过去的说法，即美军之所以在台湾、南朝鲜和南越，都似乎是依据相关的军事协议。

其他一些问题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企业和其他各界代表的会谈中米高扬强调，苏联政府只是想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结束“冷战”并逐步地建立各国之间的互信。米高扬向自己的交访者们解释道，苏联始终贯彻绝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双方均应拒绝战争方式，而都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渴望和平和平共处。苏联人之所以希望和平，并非他们胆小或软弱，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更进一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苏联人民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是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尽管一些美国政治家总是试图得出相反的结论。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代表之间在各个水平上的私人接触应当有助于消除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成见，从而最终更有利于通过谈判的方式克服现有的分歧。

在美国逗留期间，米高扬与美国企业各界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涉及到了关于苏、美两国之间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问题。米高扬强调，两国理应发展贸易，而在这方面双方都拥有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机遇，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必须消除美国在对苏联和其他国家贸易中所采用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针对米高扬关于发展苏、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言论，尽管美国企业各界总体反应积极，但美国官方人士却未给予支持。

苏联政府认为，米高扬和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流是有益的。

请电告执行情况。

1959年1月21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00, л.1-17

№2063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1959年1月25日)

1959年3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

第68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平壤市

1959年1月25日

大家参观了社会主义国家艺术画展。

参观过程中，金日成发表了自己以下印象：

我感觉，波兰联合工人党领导并未掌握意识形态战线阵地。所以，可以明显发现其艺术工作者创作中存在徘徊、迷茫、缺少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在造型艺术中存在错误方向；

东德方面，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同样没有彻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

说到朝鲜作品展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同志带来的作品太少。

从画展参观回来后，金日成交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来信，尤其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发表想法。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于当日转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并由他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所在官邸。金日成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大会会议上刚才所作的报告给予了十分热诚的评价。

金日成说，我们以毫不松懈的极大注意力聆听了十分出色的报告，报告在内容上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总结上显得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No24946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1959年1月25日)

全苏制盐技术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59年1月25日

根据《关于在科技领域共同开展科研工作以及苏联向中国提供帮助解决一些最为重要的科技问题》的合同的第18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进行研究》，我和高级研究员B.B.米基钦斯基被全苏制盐技术科学研究所派往中国出差。

1958年2月18日，我们到达了北京，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天柳大纲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和综合利用情况。柳大纲教授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柴达木盆地的盐湖，黄海和东海沿岸的滨海盐湖以及山西省的运城盐湖。

同时，柳大纲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科学院和研究所的历程。在科学院，我们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一些实验室的工作。

除了科学院，我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在那里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系一些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半工厂式的装备的工作。

还访问了地质勘探研究所，在那里参观了收藏丰富的地质和矿藏研究所，还访问了地质部的矿物原料研究所。

根据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安排的出差任务，1958年2月26日乘坐火车到达了天津，在那里访问了化学工业部化学工业科研设计研究所在天津的华北分部，访问了隶属于工业部的天津大学，访问了天津制盐厂等。研究所所长曾昭抡 [79] 就研究所的工作向我们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先进的实验室的工作。

根据研究所所长提议，我作了题为苏联的盐产地以及全苏制盐技术研究所对盐的研究和开发中的作用的报告会。研究所、大学和制盐厂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报告会。报告后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在今后同苏联制盐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1958年2月28日，我们同天津研究所的代表们一起到了大沽，在那里了

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制盐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及制盐工业的工作。

根据制盐工业研究所所长提议，我作了题为《亚速海黑海沿岸和里海的盐湖，对其进行的研究以及为制盐工业和化学工业进行的开发》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有研究所和制盐工业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学生。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关于克里米亚的萨基(Саки)湖和喀尔巴阡山的盐资源利用情况的问题。

1958年2月2日一返回北京就召开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的代表以及教育部、化学工业部和地质部所属的一些科学院研究所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我得到了关于苏联专家根据合同中第18项的条款参加工作的情况的通报，柳大纲教授还向我通报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在对计划进行讨论之后，对其作了重大修改(见根据第18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1959年的科研计划)。

柳大纲教授制订了我们在1958年12月和1959年1月工作的详细计划。根据该计划我被建议就盐产地和盐的寻找问题向科学院研究所、制盐行业的教学和科研研究所作系列讲座，向科学院柴达木勘探组的工作人员以及轻工业部盐业局盐业开发组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咨询，并同他们进行一些谈话，12月底到山西省的运城盐湖出差，1月到上海向科学院研究所上海分部提供工作上的咨询。

B.B.米基钦斯基被建议在1958年12月7日至1959年1月1日到柴达木盆地出差，到中国科学院柴达木盆地工作组和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的工作地，向他们提供咨询。

关于今后的工作计划是我同柳大纲教授一起讨论的，我们确定了一些细节，并被接受履行。

我作了如下系列讲座：《关于湖盐产地——盐湖的基本知识》(2小时)，《湖盐产地——盐湖的寻找、勘探和评估》(2小时)，《关于盐产地——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基本知识》(2小时)，《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寻找、勘探和评价》(2小时)，《硼矿、天然矿泉水和盐水的研究和开发问题》(2小时)，《污水和化工厂废弃物的收集问题》(2小时)，所作的报告的文本都以俄语书面文本的形式提供给中方，并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的翻译张喜良(Чжан Силиан)同志翻译成汉语。

在作报告期间，我还同如下同志进行了会谈并向他们提供了咨询：王文晓(ВанВэньсяо)、叶秋(Е Дзю)、尚楚飞(Шан Чуфинь)、罗铁林(Ло Телин)等人；并同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孙玉可(Сунь Юйкэ)和韩友廷(Хан Ютин)就碳酸盐岩溶问题举行了会谈。

根据出差安排，我于1958年12月19日到达了太原，然后到了运城盐湖，陪同我的有盐业开发组组长叶秋、总工程师王文晓、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梁明章(Лян Минчжан)和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

在太原同山西省的化学工业局局长以及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эчи)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他们向我描述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化学工业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计划。从谈话中得知，太原市化学工业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污水和废物的收集问题。就这些问题我提供了一些咨询和建议，并指出了一些在各地具体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方法。

在太原，我们访问了化学工业研究所，了解了杨格远(Ян Гэюань)教授的对盐和盐水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在化学和石油工业研究所了解了卓裴立(Чжо Пэли)实验室的工作。在市郊参观了焦炭化工厂以及收集污水的大湖，他们竟然把含有大量酚和其他毒素的物质直接排到了汾河。我们从太原到了运城盐湖厂，在这里我们了解了盐厂对盐湖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情况，了解了防护盐湖免受增加的淡水的影响的电子设备。

在参观了运城盐湖以及以盐为原料的化工厂作业区之后，召开了科学方法会议，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如下一些主要报告：运城盐业和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许兴民(Сю Синмин)关于防止运城盐湖免受增长的淡水的影响的保护状况；盐业开发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文晓关于对运城湖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山西省化学工业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ачи)关于运城盐湖化学工业的发展前景；泽恩斯拉托夫斯基关于苏联的陆地盐湖、盐的开采过程、对其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在听取了上述报告之后，对提出的如下建议和结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1)运城盐湖是盐业和化学工业非常重要的原料来源。(2)盐湖的主要问题是淡水，这些淡水从东北和西南对盐湖带来了淹没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该水坝的水位要高于运城湖20米。(3)必须刻不容缓地对运城盐湖及其湖堰进行研究，以便对运城盐湖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量进行管理，合理地使用这些水资源用于农业，把多余的水排往低于三门峡大坝的黄河。(4)对

工厂需要的原盐实行机械化开采和输送。(5)在原盐的加工方面使用比较成熟的方法。(6)全苏天然气研究所通过柳大纲教授索要在工厂生产芒硝干燥剂(脱水)的技术图纸，并在自然的条件下从芒硝中获取无水芒硝。(7)根据关于第18项的计划，在原盐的加工方法问题上通过柳大纲教授同苏全苏制盐术科学研究所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1958年12月7日至1959年1月4日，高级研究员B.B.米基钦斯基出差到兰州，主要是去柴达木盆地东段的盐湖，以便实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和研究院勘察组工作的主要项目。

在出差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以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综合开发小组副组长韩清石(Хан Чинши)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的安排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在出差的过程中参观了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以及这些湖所在地区。

同时对现有的、1958年科学院和轻工业部通过野外勘探得到的资料和通过科研工作从实验室中得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

从资料的质量和完整性方面对上述资料做出了批评性的评价(就向苏联提出的要求而言，同全苏制盐术研究所多年的工作经验相比较)，并就改善野外勘探工作和实验室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在达布逊湖和察尔汗湖产地有一段可以开采钾矿和硼矿的地段，并就原料的加工采取一些措施。了解了所采取的工艺流程，了解了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以及经济技术指数。

为了对1958年所开展的工作的结果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听取了19场对柴达木盆地、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马河(Мах)地区、西藏的一些湖、雅萨图(Ясару)等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研究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外，还讨论了关于大柴旦湖和察尔汗湖的开发状况，讨论了对从这些地方获取的钾矿原料和硼矿原料进行加工的一些问题。

对报告进行的讨论，其结果一般都是就各个感兴趣的问题提供一些咨询。

以开发组组长余江(Юй Цзян)同志以及总工程师何思彤(Хэ

Сытун)同志为首的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代表参加了一些特别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开发组总的组织结构，科研机构(科学院)同生产机构(地质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改善现代工作的方法；根据1959年的计划今后寻找和勘探工作的主要方向；进行综合研究；对矿产产地及其地区从地球流体力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状况；从水化学和地球流体力学的角度进行严格观察的组织；液态盐湖(表层的天然盐水和晶粒间的盐水)含盐量的勘察和计算方法；山地机械的使用条件以及对盐湖产地盐的开发；相对柴达木盆地的具体条件而言，苏联在盐湖方面的研究经验的转交和使用；关于翻译工作的状况以及加快把苏联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的领导方法和指示，其中包括把苏联制盐术研究所研究员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方法。

在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会使得在短短的时间内，使用较为正确的方法完成对大柴旦、达布逊、察尔汗盐湖区的研究，以便解决对这些原料产地各种矿物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任务。

为了把科学院的工程技术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和轻工业部的青海西部的勘探队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1958年12月19日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勘探盐湖产地盐的方法和技术。

1958年12月28日，同两个勘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召开了总结会议，对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对盐湖进行研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提供了咨询。

除了同地质工作者以及两个勘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直接进行工作之外，在出差期间还同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党组织领导人以及科学院分院的代表举行过一些内容丰富的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副部长袁天琪(Юань Тяньци)同志参加了这些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讨论了关于今后在柴达木盆地进行进一步的勘探工作的问题以及对盐产地的原料进行综合利用来加快青海省化学工作的发展问题。

一返回到北京，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就根据柳大纲教授的建议，从1959年1月1日至7日为《中国科学院院报》杂志撰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是：《用水化学的方法寻找天然盐的特征以及稀有成分的排除》、《盐产地的盐水以及盐湖水的类型》。

同柳大纲教授、王文晓和叶德友(Е Дюю)一起起草了关于保护运城盐湖盐资源免受水量增加的影响的报告，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这些建议将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主席团提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同时，我同B.B.米基钦斯基同志一起同中国科学院矿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举行了会谈，并提供了咨询。比如，1959年1月7日听取了科学院勘探盐湖的地质学家章树岑(ЧЖЭН ШУЦЗЫНЬ)关于驻在台吉乃尔(Тайтинэл)湖的勘探小组1958年开展的勘探工作的结果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讨论。

讨论了关于今后对这些化学原料产地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做出的报告，并提供了咨询。B.B.米基钦斯基同志也提供了一些咨询。

根据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规定的出差任务，1959年1月8日同B.B.米基钦斯基以及翻译李福德一起到了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工业部上海华东化工研究所，并且在研究所张副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在该研究所下边设有两个附属研究所：(1)海水化学研究所；(2)有机合成研究所。

根据化工研究所所长提议围绕如下题目进行了谈话：“关于化工厂废水的排放和废料的处理”。在同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员进行了会谈之后，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图书馆中关于化学方面的期刊非常丰富。在化工部上海科研所我们听取了化学工程师曹同志关于他从物理化学和工艺学方面对柴达木盆地察尔汗湖的盐和盐水进行的研究的报告。在对曹同志的报告进行讨论的时候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柴达木盆地的水文学和水化学方法，关于盐的结晶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这些问题，我和B.B.米基钦斯基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进行的一次会谈是关于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问题。我们指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主要俄语科技文献，并解释了C.3.马卡罗夫教授和H.И.韦夏金教授正在进行的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试验。在会谈的最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条件下不适宜建立生产芒硝的氢氧化钠工厂。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我就如下题目作了一场讲座：《苏联的盐湖及其对苏联的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作用》。在讲座上我进行了类比，并

指出了苏联的盐湖和中国的盐湖的不同。出席这次讲座的有上海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学院的科学工作者。

出差返回北京之后，1959年1月17—26日我们举行了一些会谈，提供了一些咨询，同如下一些单位召开了会议：同中国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杨局长主持，内容是关于对中国盐产地各种类型的盐进行研究的方法及其加工方法；同地质部的地质学家们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非金属矿物局局长李叶阳(Ли Еян)主持，内容是关于在中国各类矿盐和湖盐的搜寻和勘探工作中的搜寻特征和方法。

在会谈中，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开展的搜寻工作和勘探工作的组织、方法和技术问题，涉及对盐产地的形成过程进行的研究和储量的计算问题，原料的质量标准问题，快速分析方法问题等。就地质学家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了咨询。

B.B.米基钦斯基同志向柳大纲带领的科学院盐湖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们作了一场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根据苏联现有的状况，制盐术的领导和实践经验对盐湖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

同中国科学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镭实验室主任柳大纲主持，内容是关于镭实验室和镭工厂废物的处理问题。

同地质部水文地质专家和地质工厂研究所的水文地质专家小组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王如业(Ван Жые)主持，内容是从水文地质和地质工程方面对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进行研究，并计算裂缝中的盐水的储量。

同化工部北京设计院的研究小组举行了会谈，会议由设计院副院长陈光如主持，内容是关于设计的化工厂的废水的排放问题以及从工厂的硼灰中提取氧化镁。

同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岩盐和湖盐的搜寻、勘探和开发工作的七年发展计划。

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庞忠祥(Пан Чжунсян)教授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И.О.布罗德教授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油气产地进行勘探的搜寻工作中盐产地的水和盐水所起到的作用。

同工艺工程师曹夏湖(Цао Сяхо)就从盐水中和从大柴旦湖的盐水中提取锂的工艺问题举行了会谈。

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好报告，特别要感谢柳大纲教授细心的组织工作以及对我们所有人的工作进行领导，我们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还要感谢我们勤奋的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周才凡(Чхоу Цайфань)和张驰亮(Чжан Чилань)，向他们表示感谢。

苏方第18项工作负责人

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教授

В.В.米基钦斯基高级研究员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61, л.36-43

№09910 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1958年科技合作状况(1959年1月2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月28日

绝密

文本第3份

关于1958年苏联与中国科学技术合作状况(简要报告)

回顾过去的1958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科研机构、学者的业务和友好来往得到进一步加强。

1958年1月18日苏中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

规定，1958—1962年期间，两国共同进行的项目122个，这些项目都是解决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签订这两个协议具有重大意义。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今年1月中苏两国签订的科学技术协定，又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的一件大事。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越来越亲密的友好团结、互助合作，使这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日趋繁荣，使世界和平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苏联科技援助的重大意义时说：“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签订了这两个协议，中国朋友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对苏联的科技成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58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在谈学习苏联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科学工作者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善于应用苏联的科技成果，就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1958年，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和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政府间协议，为解决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科技问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科技资料、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实现的。

截至1958年底，根据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向中国派遣了169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3000名中国专家。

根据上述协议，去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

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去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第一次用磁场

吸持装置(OPPA)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中国朋友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声明说：“在中国公布震撼人类的这一崭新的科学成果是苏中深厚友谊的体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与中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科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样形式的科技合作，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

如1958年苏中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苏中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蚀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

但是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方面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加强苏中科学院两院的学术交往在1958年的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去年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

1958年共同进行科研工作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57年12月11日和1958年1月18日协议确定的科技项目总数中，有89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去年完成拟定工作，其中已完成71项，另外18项没有完成是因为课题内容不准确，中国学者没有去苏联，有一些课题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推迟到1959年完成。由于苏方的原因(没有派学者去中国)没有完成的有4个课题。

根据预定的计划，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名科学院院士，13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名学科博士，65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

在此期间，根据科技合作计划，有61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此外，有14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

1958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帮助中国朋友解决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去年一年，苏联学者和专家讲课和做报告达500多次。

中国学者注意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努力尽快掌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经验。如：在苏联科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研究所加夫里洛夫教授作过答疑和学术报告之后，目前最先进的无接触遥控复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得到普及。雷宾德尔院士关于更经济地利用水泥的建议开始被采纳使用。

苏联科技工作者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苏联学者的这种帮助看成是“共产主义无私援助精神的体现”。

但是，苏联科学院在完成在华科技工作计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

一些科学工作者有时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时到达的现象很突出，这就给中方组织科研工作造成了困难。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直接联系时，经常把专家们派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没有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知大使馆，结果大使馆无法了解专家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无法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学者、专家来到中国没有预先制订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发生过不按期提供科技资料的现象。

去年苏联高教部和中国教育部也进行了科技合作，根据1958年1月18日协议规定完成90项科技研究课题，但是某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工艺及水利技术建设方面的课题上。

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课题完成情况不令人满意。协议规定的69项学术课题中，只有32项在苏、中高校之间做了安排。

根据1958年的计划规定，在144所苏联院校和80所中国院校进行科

技合作，但实际上只安排了56所苏联院校和45所中国院校。不是所有的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按照共同的科研课题与苏联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许多中国高等院校并不了解苏联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对苏联高校的状况和科研课题的发展前景都不了解。远非所有参加联合科研工作的苏联高等院校都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科研工作计划。去年，两国高等院校没有就具体联合科研工作进行科学工作者交流，给完成工作计划造成了困难。

大使馆不止一次讨论过执行苏中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也就这一问题多次与中国朋友座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协议执行情况进展缓慢。

苏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科技合作，因为没有1958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执行得很差。

原拟于1958年11月召开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到1959年1月才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两国间科技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互派专家、提供科技资料 and 进行科研工作方面苏中双方义务的一些有关决议。

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主要的不足之处：

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委员会。

因为设在北京的苏联机构对执行1958年1月18日的协议有许多问题不明确，所以根据该协议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和学者，一些由大使馆的科技文化组负责，一些由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负责。

这方面工作中主要缺点之一，依我们的看法，是1958年1月18日两国间《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研究和苏联科技援华》的协议签订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负责对该协议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负责所有工作的组织以及与苏联和中国各有

关机构联系，安排所有工作项目。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做过这些工作，而且与实际处理苏中科技合作事务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在工作中也很少联系。

我们认为，目前亟需适当地对这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在中央(莫斯科)和北京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所有工作，委托这一机构处理苏中两国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

今年1月份大使馆已向中央提出过有关建议。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

1959年1月27日

文件送：M.B.齐米亚宁同志、A.A.奥尔洛夫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

执行人：阿加宁

第81号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л.27-36

№26587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1959年2月26日)

1959年2月26日召开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工作会议纪要

参会人员：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В.К.罗斯托茨基同志、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М.И.伊万诺夫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

主要议题：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在北京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听取了：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决定：

1.基于所交换的意见，同意H.M.西卢亚诺夫同志和Φ.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起草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报告草案。

2.委托H.M.西卢亚诺夫同志和Φ.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在完成委员会大会通过的修改后将报告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审核。

听取了：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西卢亚诺夫同志的报告)

考虑到委员会苏方组的一些委员最近换到了其他工作岗位，由于新工作自身的特点和条件不允许今后在需要时参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遵照1959年9月10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决定：

1.请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免除委员会苏方组主席H.M.西卢亚诺夫同志和委员会委员A.H.阿斯科琴斯基同志、K.A.弗拉索夫同志、B.И.奥夫相金同志及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

2.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推荐，提请苏共中央批准国家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担任委员会苏方组主席，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经济事务参赞С.Я.符明同志作为委员会苏方组委员。

听取了：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西卢亚诺夫同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委员会苏方组委员H.M.西卢亚诺夫同志、A.H.阿斯科琴斯基同志、K.A.弗拉索夫同志、

М.И.伊万诺夫同志、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В.И.奥夫相金同志、В.К.罗斯托茨基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Б.А.孔德拉季耶夫同志“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向委员会苏方组上届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和А.Л.马利琴科同志授予了勋章。

同时，根据中方的委托，西卢亚诺夫同志还向参与大会的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和М.И.伊万诺夫同志授予了勋章。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03, л.9-10

№26588 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 第九次会议(1959年7月4日以后 [\[80\]](#))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Г.В.阿列克先科同志：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九次提交工作会议的报告

根据1959年6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于1959年7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情况；关于落实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有关补充增加中苏合理建立直接合作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数量的情况。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双方关于完成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根据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签署的纪要，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中国

机构转交了40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52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9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39个项目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53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1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同期接待了39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15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每方补充4家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朋友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直接合作的必要性，其中还建议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听取双方关于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合作的组织工作开展和有效经验方面的情况通报。上述建议反映在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中。

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赞同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此外，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中，及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商定的基础上，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86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140个项目的文件。遵照该协定第四项的内容，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有相应的记录。

由于自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并解决1958年1月18日所签苏中协定中规定的122个项目的措施，因而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不将完成上述协定的措施写进随后的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

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准备和召开中，为了保证让苏联机构在转交文件的数量和其完成期限方面不用过于紧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考虑了1959年6月5日召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关于明确和拓宽苏方课题及明确中方课题的指示。

在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写有这样的决定，即中国机构将在1959年向苏联机构转交125个项目的文件，而不是在1959年6月5日召开的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苏方组汇报的30个项目。

在讨论苏中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召开期的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建

议于1959年10月初在北京召开。

中国代表团团长钱信忠强调了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的必要性，是由于这次工作会议纳入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总计划中，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和中国政府的批准。钱信忠说：“10周年庆典期间，苏中委员会委员们将有机会在专门安排的展览上了解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成绩。”

苏联代表团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关于在1959年10月初召开第十次工作会议的建议。

而且1959年10月12日将迎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署5周年的纪念，双方认为有必要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交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期总结的通报。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将于近期把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筹备的活动方案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核。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03, л.11-13

№2063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大文件(1959年3月3日)

1959年3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

第68号

绝密

1959年3月3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我拜访了中国大使馆。会谈时涉及了以下问题。我谈了有关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问题的情况。为此，谈了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执委会给日本红十字会的呼吁书。发表了自己对朝鲜、南朝鲜、日本等其他国家政府对该问题采取措施的看法。尤其是，我说，朝鲜政府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了关注，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与赞同。

乔表示，我对该问题所发表的与中国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完全相符，中方同样密切关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的事态。

我向乔讲述了有关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期间对其给予的热情接待，并谈了与中国政党代表团成员一起工作的同志所留下的印象。

我告知，从今日起，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开通了飞行图104飞机固定客运航线。乘坐由平壤起飞首航的是前往出席波兰联合工人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朝鲜政党代表团。

大使告诉我，昨天3月4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北京办事处面交了给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方16国家的回复照会。乔简要地讲述了朝鲜政府的回复照会内容。该照会文本，乔说，作为通报已转交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之后，乔通报说，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1958年底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了以下请求：鉴于朝鲜劳动力不够，派遣有意前往朝鲜的朝鲜族中国劳工。不久前，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向朝鲜运送4万朝鲜族中国公民的决议，这些人主要居住在中国东北。

第一批朝鲜族中国公民抵达朝鲜的时间为今年3月底，好让他们能赶上春耕季节。此外，中国大使馆正在对将定居朝鲜的13000多名中国公民开展调查工作，了解他们转朝鲜国籍是否合适，并且是否符合其愿望。但这项工作至今尚未取得积极结果，因为中国公民并不说明其转朝鲜国籍的愿望。这些将定居朝鲜的中国公民，其这种立场并非是由于其对朝鲜公民存有反感，而是其多年来所形成的传统。

中国公民居住在世界许多国家，他们在各地都设法保留本国国籍和民族习惯，也就是说，他们尽量避免与居住国的本地居民同化。

乔告知，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着手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材料，并向我提出请求，在对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能产生的问题提供咨询方面给予帮助和协助。

我对乔说，任何时候我对他们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都可提供帮助。

乔同志将一本《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中文版图书赠送给了我。

出席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H.E.托尔宾科夫、大使馆二等秘书B.M.巴库林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

АВІРФ , ф.0102 , оп.14 , д.6 , л.40-43

№09874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1959年3月31日)

1959年3月3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上“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该报告是根据中国朋友们所提供的关于最近事件的消息和苏共中央联络部所收到的其他材料写成的。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9年3月31日

第15-Д-262号

关于西藏形势

西藏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边陲省份之一，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根1953年统计，中国藏族人数达到277.5万人。但居住在西藏的不足中国藏族人数的一半(127万)。其余藏族人居住在中国西藏的临近地区，建有其自治区(在青海、四川省境内)。

西藏过去长期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目标。印度资产阶级在西藏也有很大的利益。西藏的领导上层一直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处心积虑想建立“独立的西藏”。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时刻，西藏统治集团企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他们向所有国家呼吁，请求援助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把国民党分子赶出西藏，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议并开始准备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1951年，中国部队进入西藏境内，西藏统治者被迫停止了反抗。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签订协定，在此基础上西藏正式和平解放。率领西藏谈判代表团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此之前他把东部西藏献给了中国部队。参加谈判的还有班禅喇嘛，他早就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联系，有意从被驱逐中返回西藏和恢复自己二号人物的地位(在达赖喇嘛之后)。

协定规定实施以下基本措施：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对西藏部队实行改编，编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吸收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其编成。协定还规定，保留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职能和权利；保留西藏人民的宗教、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对外权力集中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手中。还达成了在中国政府的总的领导下实现西藏民族自治的协定。协定指出，在涉及西藏各种改革的问题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有任何强制，实施各种改革需征得西藏当局的同意。规定了帮助西藏发展自己经济和文化的措施。

至今西藏仍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些提高西藏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修成了3条重要的公路：康藏公路(2255公里)、青藏公路(2100公里)、新(新疆)藏公路(即将竣工)。组织了地方工业企业，几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在西藏居民工业品和食品供应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前西藏没有一所世俗学校，现在建起了60多所，其中还包括一所中学(在拉萨)。在卫生保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培养大批藏族干部。

尽管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直是很复杂的。在西藏经常出现骚乱。1954—1956年，出现过几次特别大的骚乱。1955年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毅同志来到西藏。作为安抚措施，当时从西藏撤走部分中国机械化部队。把藏族居住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把军政委员会改为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

达赖喇嘛及其反动亲信一直阻挠实施民主改革。因此西藏没有实行土地和其他民主改革。土地仍在寺院、世俗的和宗教的农奴主手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农奴制度几乎未被触动，宗教、寺院和喇嘛仍占统治地位。在西藏，有10万多喇嘛，他们是基本的反动力量，积极支持达赖。西藏至今没有人民政权选举机关，在这方面中国宪法还暂时未适用于西藏。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指出，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那里暂不进行民主改革。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讲，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实施这些改革的问题将由西藏人自己解决。

中共对西藏实行自治至今所依据的各条件仍是：这一地区总的政治形势、实施民主改革和培养能贯彻党的政策的新干部的程度如何。把藏族居住的中国其他地区并入西藏也取决于这一问题。

在西藏，英、美特务，其中包括达赖周围的人一直在积极活动。

处在国外的达赖喇嘛的同宗(3个兄弟)经常进行反对中国的反动宣传，为西藏“解放”而奔波。在达赖喇嘛一个兄弟——洛桑三旦的领导下(目前他住在同西藏交界的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解放战士委员会”。1958年，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告亚非各国人民书。呼吁书中讲，似乎中国人正在消灭西藏人，消灭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呼吁书号召亚非人民“援助西藏从中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奉行十分谨慎的政策，防止在那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虽然这样努力，西藏的形势近来开始紧张。1958年底，西藏一些地区开始混乱，公开叛乱。1959年1—2月，西康地区(在东西藏)发生大规模叛乱。叛乱分子截断西藏东部的公路，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

根据中国同志的通报，3月份西藏形势变得十分尖锐，带有直接军事行动的性质。3月19日，近3万名叛乱分子封锁了拉萨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卫戍部队并向他们射击。叛乱的境内中心是拉萨，境外中心是印度的噶伦堡。实施叛乱的口号是“争取西藏独立和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

据中国同志掌握的情报，西藏叛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挑唆的。美国人通过巴基斯坦和缅甸向叛乱分子提供援助。根据中国同志的情报，尽

管尼赫鲁保证不干涉西藏事务，但印度也没袖手旁观。印度通过尼泊尔向叛匪提供援助，从那里往西藏送大炮和机枪。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直接参与组织叛乱。在印度噶伦堡建立了西藏境外叛乱中心。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朋友采取了坚决平叛的措施。根据他们的通报，拉萨叛乱于3月22日平息。达赖喇嘛从拉萨逃走，至今下落不明。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仍在继续，但中国朋友相信，近期他们将恢复整个西藏的秩序。对此一个有利因素是，班禅喇嘛和前面提到的阿沛·阿旺晋美站在中国一边。打算在他们和其他西藏进步活动家的周围团结西藏劳动群众和推行改革，首先是土改。出于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们还打算把达赖喇嘛重新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可以看出，西藏叛乱带有民族主义宗教色彩。叛乱席卷西藏中部、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西藏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封建宗教集团，他们把西藏地方部队和一个山区部落岗巴族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叛乱的唆使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叛乱的组织者。而且还可认为，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劳动农民，脱离于积极行动，他们既不支持这方，也不支持那方。很明显，这里应找到中共在西藏政策方面的一些原因。首先应指出，在西藏解放达8年之久的时间里，农民仍处在农奴制度之下，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政策在那里博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西藏，重点放到了通过同封建神权集团和他们“所培养的人”协商和平解放一切问题上。基本劳动群众很少能看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结果。

中国朋友没有排除，西藏事件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宣扬，会给中国带来明显的不利的国际麻烦。按照他们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努力利用西藏事件进行敌视中国和加强“冷战”的宣传，竭力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不排除，逃亡的叛乱分子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可能成立流亡政府。如果达赖隐藏在国外，这将更麻烦。

正如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看到的，由于西藏事件，他们对中印关系表示很大的担心。由于某些印度集团干涉西藏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中印关系。近几天，印度反动的党团要求在国会辩论西藏事件问题。印度人民社会党组织反华聚会和游行。许多印度报纸开始煽动反华运动，印度宗教界人士也企图利用西藏事件加剧印中关系紧张局势。

由于尼赫鲁在3月23日讲话中同西藏事件划清了界限，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在当前形势下，陈毅说，主要任务是中立印度，然后把它拉到我们这边来。

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和电台围绕西藏事件正在掀起轩然大波。在大字标题下报道“西藏流血事件”，全国规模的“起义”，等等。多数报道都给予这样的评论——称西藏事件为“亚洲的匈牙利”。西德报纸《白昼报》3月24日登了一幅画，把西藏画成正在喷发的火山。

西方评论总的调子是要要求西方政府密切关注西藏的形势。在官方声明中，除上面提到的尼赫鲁讲话之外，还有3月27日公布的美代理国务卿赫脱的声明，该声明中说，他(赫脱)对西藏事件“深表震惊”，对西藏人民深表同情，谴责“中国共产党人”镇压自由和宗教。蒋介石也声明说，他将给西藏“起义者”提供武器援助。

中国朋友非常担心国际形势和西藏叛乱的后果。看来，他们将发表相应的声明和采取某些实际的步骤。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8, л.42-48

№08828 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 苏中友好文件资料(1959年4月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苏中友好协会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按照苏共中央所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出版文献资料的计划，做好了《苏中友好文件资料汇编》的出版准备工作。

汇编里搜集了反映1918—1958年期间苏中人民文化和社会友好联系的文件，刊登了关于中苏文化活动家代表团访问、艺术展览和剧团巡回演出的报道以及苏中著名科学和文化活动家揭示两个伟大民族紧密友好往来的信件。

在苏共中央审阅了汇编材料之后，按照提出的意见对汇编手稿又进行了加工。今把要加入汇编的材料寄去，请准许他们发表。

出版工作将由“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承担。

附汇编(724页)，收件人。 [81]

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

茹科夫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505, л.248

№24948 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1959年4月18日)

北京

1959年4月18日

为了继续发展和加强电力技术建设领域的科学合作，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和中国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了解电力建设和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之后，签署如下协议：

1.双方研究所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互换得到批准的年度计划和前景规划。

2.每年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交换一次关于已经完成的科研工作的名单以及研究所出版著作的名单，并以附件的形式简单地概述一下最为重要的工作或出版著作。

3.双方的研究所都可以委托对方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并就研究所的工作问题展开协商。评论工作应该有书面文字。

4.经上级部门同意，就相互的需要交换如下材料：

(1)关于建设、安装、电站设备的材料和关于生产车间的科技领域的

出版物。

(2)关于科研项目的最终报告以及设计项目的材料、新的建筑材料的样品。

(3)技术资料、工艺生产资料、影片、照片册。

5.经另一方研究所的同意和作者本人的同意，使用另一方面在定期出版的刊物中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专家的文章。

6.经上级部门的同意，相互通报预计召开的会议，邀请相关方参加这些会议，交换会议的出版材料，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双方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召开共同会议。

7.按照规定的程序派遣高水平的专家进行磋商、授课、参加共同的科研工作和设计项目，并且经双方的同意，派遣专家进行实践。

8.在一些情况下，每一方经另一方的同意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的期限内出版另一方的一些出版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是双方共同选题或者单独选题。

9.双方研究所的图书馆之间建立联系，以便相互可以临时使用科技文献、报告和其他的文献材料。

10.双方不能把所得到的材料转交给第三方，不经转交这些材料的一方的同意，不得发表或在出版物中引用这些资料。

11.双方有权就技术合作问题进行直接的通讯联系。

12.为了帮助另一方工作的完成而进行的出差相关工作的开支，根据相关的规定支付。

13.根据一方的提议，经双方同意，该备忘录可以补充或变更。

14.该备忘录由双方代表的签字生效。

15.双方的法定地址：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古比雪夫市，萨马尔广场。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北京，府右街，第26号。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

陶立中(Тао Личжун)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总工程师

Е.А.沃龙科于北京

1959年4月18日

РГАЭ, ф.9493, оп.1, д.1042, л.42-44

№25236 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 (1959年4月20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4月22日

第976/ТС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 [\[82\]](#)

1959年4月20日

在章汉夫访问莫斯科期间接待了他.....

.....

会谈期间谈到了西藏问题。章汉夫强调工作已基本结束。从很多方面来说，叛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得我们在西藏迅速地实行了相关改革。在那段时间里，叛乱某种程度上检验了中印关系。国内外的总体反应都认为，这件事破坏了中印关系。但其实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并未采取敌对立场。一方面，他声明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了“对西藏人民的同情”以及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可能。章汉夫说，达赖喇嘛也可能会去美国，因为他在那里的哥哥对他发出了热情

的邀请。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7-8

№25237 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 (1959年4月23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191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83\]](#)

1959年4月23日

我们在刘晓的北京家中会面。

.....

刘晓同意这个观点，并主动谈起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他表示，七中全会那一天的工作日程就是准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刘晓继续说道，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1959年的农业计划，这个计划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计划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计划的讨论，我们强调了“用两条腿才能站稳”的道理。刘晓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允许“单腿支撑，结果必然会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李富春关于1959年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对于1958年预算以及1959年预算草案的修正，这些都被包含在全会对于相关问题所做出的决定里。

.....

我谈到了西藏反动叛乱的问题。

我表示，尼赫鲁显然是围绕这次叛乱组织了一个广泛的反动宣传阵线，以将印度民众的注意力从中国的成就上转移开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秩序井然，也出现了反对当局的种种情绪等等。刘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他认为向中国施压，就能迫使中国让步，他想利用西藏事件中的达赖喇嘛作为交换筹码和一种资本。刘晓强调，在他看来，尼赫鲁最近的声明已经表明了他对中国进行了错误的估计，他目前急需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将自己从这个他亲身参与了的西藏叛乱所导致的泥潭中脱身。刘晓接着说，在达赖喇嘛发表声明之前，我们中方都未对印度人进行公开指责。声明发表后，有利形势转向了我方，因此我们现在利用了这个机会，对印度政府的声明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么做。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РФ, ф.0100, оп.52, д.7, п.442, л.27-31

№25238 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1959年5月4日)

摘自A.A.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5日

第1085/TC号

机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84]

1959年5月4日

我在张闻天访问华沙的途中接待了他.....

.....

4.谈到中印关系，张闻天认为关系还很紧张。这种紧张是由于印度干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问题。印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报刊上指责中国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迫害行动，他们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基于这些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反对印度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尼赫鲁的政策，并反击印度的反动派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用印度的例子向中国人民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坚定立场，比如印度以及其他那些两面派人物，如尼赫鲁和纳赛尔。

我问张闻天，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友人并不想进一步恶化与印度的关系，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会出于他们的利益来抓住这个机会？张闻天回答道，对于尼赫鲁及其政策的批评言论都是临时的。这就使得尼赫鲁被迫要为自己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与他展开斗争，迫使他以后更加坦诚，从而得出“中印两国人民在斗争之后重新团结”的最终结论。张闻天表示，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还有着各种算计。他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蓄谋已久。尼赫鲁早在1956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就已经与其会面，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印度开展的斗争取得成果后，才会重新开启两国间的友好对话。张闻天继续说，印度不应由于缺乏自控和耐心而冒犯中国，但是过去10年中印度方面已经出现过3次不友好的举动：1.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及在1950年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措施的时候；2.朝鲜战争时期；3.最近在西藏发生的相关事件。印度还支持 and 散播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此举尤其不恰当。在这三次事件中，我们都在恰当的时间点对印度进行了反击，并使得我们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很明显，这次也会是这样。

谈到达赖喇嘛，张闻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他回家。如果他没有回来，那就更好。张闻天将达赖喇嘛称为处于藏独反动势力控制下的“小男孩”，那些藏独领导人也与他一起出逃了。所以我们没有把达赖喇嘛驱逐出中国，张闻天说，是他自己跑出去的。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10-14

№25239 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1959年5月4日)

1959年5月6日

第1091/TC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85]

1959年5月4日

下午1点，我接待了张闻天同志，他即将从华沙回国。

会谈开始时张闻天谈到了中印关系的问题。他表示直到西藏叛乱开始，中印关系一直都是正常的。但是印度企图在西藏事件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方对印度极端分子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展开反击，以揭露他们的阴谋和不当行为。张闻天表示中国朋友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助尼赫鲁变得理智一些。

上次尼赫鲁面对中方的指控而进行自我辩护，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反击，张闻天继续说道。在西藏叛乱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方容忍了印度极端分子的指控，表现出理智的克制。然而当印度方面实质上声称支持西藏“独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做出反击。

张闻天表示中印关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边界问题，但目前西藏问题面前，所有那些问题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张闻天强调，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现在他已表现出了清醒的迹象。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7, п.442, л.16-18

№25240 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

的影响(1959年5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2日

回复第20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的会谈记录 [\[86\]](#)

1959年5月5日

.....帕塔萨拉蒂说：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公众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触及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宗教情感，尤其是在北印度，那里的许多人来自西藏，他们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

.....印度人民对西藏事件的反应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它只是在表达对西藏人民陷入困难境地的一种同情。

.....尤金说：印度有印度教，西藏有佛教，两者没有密切联系。

帕塔萨拉蒂回答：印度教、佛教和喇嘛教是同属一种宗教的三个部分。

.....帕塔萨拉蒂说：达赖喇嘛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留在印度的。

.....

.....帕塔萨拉蒂说：印度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譬如印度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成为联合国成员资格。印度从未有过让西藏成为“缓冲”地带的计划。

.....

.....帕塔萨拉蒂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会宣称：在这些国家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但规模不大，另一种

是民主进步势力，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而这种区分其实误解了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即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因为殖民主义而导致的一种民族主义。

.....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РРФ, ф.0100, оп.52, д.7, л.442, л.32-35

№24978 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1959年5月6日)

致苏共中央：

目前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共有900多人，其中近760人在工业、农业和其他组织工作，144人分布在教育、卫生、科学和文化等部门。

根据苏联和蒙古政府间1958年月11日协议——“苏联为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而向蒙古派遣专家的条件”，根据苏联派遣人员的专业熟练程度，蒙古政府将依照每位专家每月2200—800卢布的支付标准与苏联政府进行补偿性结算，如果参照附加汇率以卢布计算该数额为18900—6880卢布。苏方对所派每位专家的每月实际支出为5300—2800卢布。其中具体包括：以外汇和苏联卢布计算的专家工资，当地津贴、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差旅费、行李费、休假费，等等。

以上所列数据表明，蒙方为苏联专家而向苏联政府所作的经济补偿额远远高出苏联派遣这些专家的实际费用达2.5—3.5倍。1959年，为使苏联派遣专家前往蒙古工作，蒙古方面应向苏联提供价值约1700清算卢布的商品——占蒙古向苏联出口额的10%。

鉴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特殊条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苏联外交部认为，派往蒙古的苏联专家补偿费用问题理应按特例处理(以例外方式处置)——使此类补偿费数额不超过苏联实际支出费用的1.5—2倍。

决议草案参见附录。 [87]

提请审阅。

C.达什扬

1959年5月6日

1959年5月

第829号

АВПРФ, 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 оп.41, пор.21, пап.261,
л.53-54

№13580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 (1959年5月6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 1959年5月6日

给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H.H.克留科夫同志的信

德里

苏联驻纽约常设代表处于5月1日向苏联外交部通知如下：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贾在早餐时对联合国副秘书长多勃雷宁说，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非常担心由于西藏事件而使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在他看来，尼赫鲁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反对派在国会中向他责难，指责他对外政策的失败，并号召同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在鲍姆别伊工业贸易区支持进行这种密切联系的力量更加强烈。尼赫鲁有足够高的威信来压制目前的各种倾向。但尼赫鲁的年龄也不小了，他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成立的政府将不能压制这种倾向，特别是如果印度同中国的关系继续紧张。

贾说，现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被印度政治界理解为首先是针对尼赫鲁本人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继续下去，并且还是这样强烈，那么印度政府将会反击。事态的这样发展会对亚洲和平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贾接着说，尼赫鲁对达赖喇嘛留在印度不感兴趣。几个月后世界将会忘记达赖喇嘛，但中国将不会忘记他。他将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一点，可以尝试利用尼赫鲁的影响和功绩来调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排除达赖喇嘛“在一定条件下”返回中国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这样的话(贾顺便说，印度一些人不是特别确信这一点)。为什么两国政府不能平静下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或许甚至可以通过安排尼赫鲁和周恩来个人进行会谈？贾说，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以个人立场说的，并且他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向中国进行了这样的试探或采取了措施。

贾在谈话中也谈到了印度政府对尼赫鲁个人的强烈不满，由于他未能调解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地图。用贾的话来说，根据这些地图，一些属于印度的边界地区被标识成中国领土。贾确信，边界问题现在成了尼赫鲁反对者手中反对他对外政策的工具。

按照苏联代表处的意见和贾的谈话，尽管具有个人的性质，也反映了印度政府在自己对西藏事件上的政策越来越陷入了死胡同。对此要注意一种状况：加强了对尼赫鲁个人困境的强调，并足够明确地暗示了其对于印度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对此不排除会考虑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为此向您进行通报并作出判断。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波采罗布(签名)

АВН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1, л.12-13

№20633-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7日)

1959年5月2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4月25日至5月19日

第12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5月7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举行了宴会。

宴会时，我把自己对赫鲁晓夫同志接见崔庸健一行的印象告诉了乔晓光。

乔晓光讲了平定西藏叛乱的经过，讲了西藏的经济与政治状况。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那里至今仍存在着奴隶制社会。在西藏叛乱之前，那里所有的土地全都属于僧侣和地主们的享有特权的上层统治集团，也就是40%的土地被地方政府成员所掌控，30%的土地在僧侣手里，还有30%的土地则在地主的手里。西藏有300户人家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中有20—30户最具影响力，他们拥有巨大的地盘和大量的农奴。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在这小集团的手里。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搞政教分离，并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机关。

在西藏实施土地改革是按下列方针来进行的：参加过西藏叛乱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全部充公，并分配给以前的农奴们。此外，政府打算向地主和僧侣们购买大部分土地，并把它们免费分给贫穷的农民。在实行土地改革时，西藏的广大农民群众给予政府以全面的支持和帮助。

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首脑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会触犯他们的财产状况和政治地位。

西藏政府的反动集团在一些唆使他们并给他们以物质帮助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命令自己的农奴和地方军队对抗人民解放军的驻防军队。然而，农民没有支持地主和僧侣。参与叛乱的一共只有将近2万人。现在西藏的叛乱已完全被平息了。

乔晓光说，全西藏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居民在会上对反动集团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农民讲述地主和僧侣对他们的残暴态度，并坚决要求惩罚罪犯和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教育和提高西藏人的自觉性的好形式。

溃败的叛乱分子逃到了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的印度。现在印度国内正在进行肆无忌惮的反华宣传。扩张分子在印度组织集会，在会上要求让西藏享有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久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主席英迪拉·甘地公开号召党员们协助正处于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之中的“起义的”西藏人。尼赫鲁的妹妹在英国发表了一份针对中国的诽谤性声明，并表示要支持“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几乎在所有的发言中，其中包括尼赫鲁的声明，西藏的叛乱都被认定是“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的“起义”。

接着乔晓光指出，英国人一撤离西藏，印度的统治集团就竭力想加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早在1950年，印度政府的照会里就有了想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妨碍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自己主权的企图。从1950年至1954年，印度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邮政事业、贸易机关等。在1954之前，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国民)。

接着大使说，印度政治集团的代表们发表反华演说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害怕中国(特别是在西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会对印度人民起很大的影响。印度的政治家们想要有一个作为独立国家的西藏，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个能让以前的有利于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农奴制度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自治区，其目的是希望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可以充当一种使印度免受中国影响的牢固栏栅的地区。印度的公开的反华运动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并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和放弃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改革。印度领导集团深信中国会做出让步，因为中国害怕同印度的关系会恶化，而后者曾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帮助和支持过中国。

从我们这方面而言，我对大使说，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部事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完全支持和赞成中国政府在西藏平定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资本主义集团及其走狗们围绕着西藏叛乱这件事大肆叫嚣，企图破坏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然而，这一番喧嚣却是白费心机，将来也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以赫鲁晓夫致纳赛尔的一封信为精神向乔晓光讲了我们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关系。

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乔晓光，我认为可以像去年在我们的外交使团里所做过的那样，让各国派驻平壤的大使们就各国的迫切的外交和内政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和信息。特别是我表示想要给大使们讲一讲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原则；听听乔晓光介绍西藏的情况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等等。

乔晓光同意我的建议，我们约定一起去同外交使团的使团长商谈。

会谈和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袁齐贞(Юань Чжи-цин)和大使馆随员王保民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Н.Е.托尔宾科夫和大使馆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87-91

№25241 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1959年5月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214号

绝密

文本第4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的会谈记录 [88]

1959年5月8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陈毅，向他转达了印度政府人员就西藏问题与苏联代表会谈时所表述的一些观点，这些政府人员包括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印度外交部秘书拉南，外交部秘书长彼尔莱，以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

.....由于此次西藏事件，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他们对中印关系的恶化感到不安，想要采取措施来修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我说，苏联政府告诉印度方面，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苏联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

.....

我继续说道，我们感觉到印度方面尤其是尼赫鲁本人，在西藏问题的处理上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处境，如今也明显是在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复关系的途径，尽管他们在各种国内外压力下有些摇摆不定。印度政府代表安排了与苏联代表的这次会谈，以表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毫无疑问，中国朋友对此也已经知晓了。

我说，我们理解中国朋友在处理与印度关系上采取的立场，他们不希望关系恶化，并希望恢复先前的友好关系。他们已经在西藏事件上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妥协，他们也想走出当前这个困局。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中印关系持续紧张下去的话，帝国主义敌人(尤其是美国)便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一点，从而损害中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我总结说，考虑到印度政府安排了这次会谈并提供了以上信息，我们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在追求和平与减少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印拥有共同的利益.....

.....

.....陈毅表示感谢，说他会立即转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对苏联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感到非常满意。

.....陈毅同样认为现在尼赫鲁的处境十分艰难。

我们观察到，《人民日报》的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中就提出了这个连尼赫鲁本人都无法反驳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同时也为其指明了一条如何走出困境的道路。陈毅谈及此事时说道，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将为此事画上句号，并呈现出一条修复双方关系的道路。陈毅继续说道，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两天时间里，印度方

面没有对其进行报道，影响也很小。显然，印度方面希望降低大家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热情，从而能够与中国和平相处。

.....我们不会再发起对印度的激烈反击运动了.....

.....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想重修友好的中印关系，不希望关系恶化，并打算采取解决措施。但是，这仍将取决于尼赫鲁未来的表现。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7, п.442, л.48-52

№24949 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 报告(1959年5月9日)

随着中国地质部地质学家代表团对列宁格勒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访问，苏联地质保护部地质研究所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在1956年建立了科学上的联系，参加这次访问的有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者，其中包括现在的研究所所长朱晓晨(Чжу Сяочен)、副所长黄汲清、研究所区域地质与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郭文魁。他们熟悉了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主要部门和实验室、最主要的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2月，以地质保护部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地质学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А.П.马尔科夫斯基同志参加了这次访问。苏联代表团在对我国进行访问期间了解了我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计划、科学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11月，中国地质部北京地质研究所代表、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次中国地质学家小组由地质部副部长许杰领导，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首，他们在研究所研究了地质工作的方针，其中包括对远古厚层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其绝对年龄等。

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C.A.穆济列夫在中国期间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朱晓晨副所长、地质所地方分部主任郭文魁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王晓晨(Ван Сяочен)同志一起，对中国地质部的勘测工作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地质地图的绘制问题，该任务被委托给了北京地质研究所。

1958年8—9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学地层部主任Н.К.奥韦奇金、古生物学实验室部主任И.М.波克罗夫斯基在苏联地质保护部科学分部主任A.A.阿米拉斯拉诺夫的领导下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们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苏中两国政府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协议规定了关于共同解决一些科技问题，苏联援助中国解决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地质和矿藏的远古厚层进行研究，制定欧亚大陆的地质地图、古生物地层工作，苏联方面的负责单位是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而中国方面的负责单位是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

苏联专家进行的这次访问以及他们同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的工作都是根据已经得到批准的1958年的共同工作计划进行的。

双方的研究所一起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协调了立场，并通过了双方在1959年的工作计划。

自从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建立联系以来的上述时间内，通过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全苏地质学图书馆以及直接向北京研究所的代表转交了在苏联印制的一些地图、专著、教学指南、关于各种地理问题的指示和指南。对中国各地区岩石的绝对年龄进行了确定，并把相关的结论送往了北京研究所。

苏方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各种出版的关于地理问题的专著和文章。

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了了解，并根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方针共同制定了直接进行科技合作的选题，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A.П.马尔科夫斯基、地图绘制部主任C.A.穆济列夫、哈萨克斯坦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地层学部主任Н.К.奥韦奇金、古生物实验室主任И.М.波克罗夫斯基共5名专家参与了

这一工作。

在这段时间，中国各方面地质学家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朱晓晨同志、副所长黄汲清同志、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区域地质研究室主任郭文魁4名同志。

规定的一项共同的工作计划是1959年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对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需要共同完成的一些课题。

在完成相关工作的时候，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苏联其他地质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关于各种地质问题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使得苏联专家可以确定一些新的地质数据和中国的矿藏，解决许多共同的地质问题，其中包括对一些古老的厚层进行研究，进行生物地层学研究、大地构造学研究以及对矿藏分部的规律进行研究。

现在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正在共同制定下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对于苏联解决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课题是：绘制欧亚大陆的地缘地图、研究古老的地层、进行古生物学地层研究。

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

Н.И.马罗奇金

1959年5月9日

РГАЭ, ф.9493, оп.1, д.1042, л.4-8

№24950 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1959年5月14日)

副本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有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来发展竹业。栽种的竹子有数千公顷，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不仅可以在黑海沿岸，而且还可以在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栽培。

同木材相比，竹子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品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用于生产的竹竿，竹子的能产性很强、很坚固，因此利用竹子作为竹筋混凝土的结构在国民经济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竹子可以替换一些建筑材料，并且可以节省钢筋，弥补钢筋的不足。在农业建设中使用竹筋混凝土，特别是在葡萄园使用竹筋混凝土架构是很经济的，也是非常前景的。

格鲁吉亚竹筋混凝土的开发同一些研究工作和理论实验性工作的完成紧密相关，这些工作需要花费一些资金和时间，主要是要依靠竹子作为加强料来保障混凝土的黏着力。

根据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竹筋混凝土的生产，关于寻找绝缘材料的组成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没有给出关于绝缘材料的组成的数据以及关于生产竹筋混凝土工作的特点。

考虑到，竹子和竹筋混凝土在民用、工业和农业建设中都有广阔的前景，为了真正在我国使用竹筋混凝土，我们认为需要了解中国生产和使用竹筋混凝土的丰富经验，为此应该派遣三名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哈尔滨工学院）出差一个半月，他们到中国出差的这些地方在就建设中使用竹子而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非常充分了。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请求，在就上述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一事上提供帮助。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

Г.米克拉泽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34, л.126-127

№0987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1959年5月27日)

摘自П.Ю.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237号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记录

1959年5月27日

受中央委托，我拜访了邓小平，向他转达了关于日内瓦会谈进程的消息。

邓小平请我转达他对苏共中央向他通报这一消息的感谢，而且说，他将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邓小平顺便说，毛泽东身体欠佳，患了感冒。刘少奇身体也不大好，右臂疼。周恩来现在不在北京。

谈到政府首脑会议问题，邓小平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即召开这次会议势在必行。然后他问到美国新国务卿赫脱的情况，我根据我们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向他介绍了这个问题。

提到哈里曼即将去苏联访问和他也打算到中国来，邓小平说，他们讨论过哈里曼访华的适宜性问题，结论是现在访华没有好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不排除哈里曼将来到中国访问。

根据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消息，我同邓小平讨论了苏加诺访问土耳其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表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现在在亚洲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为友善，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尼的看法与中国是一致的。

然后又谈到南斯拉夫问题，谈到铁托访问东南亚国家，南斯拉夫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南斯拉夫严重的经济形势等。在会谈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接受南斯拉夫的思想。我们一致同意，为揭露南斯拉夫的挑衅政策，我们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加强我们的共同宣传。

邓小平强调，在某些方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比美国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还危险，所以说，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南斯拉夫提出特别抗议的原因。邓小平说，在中国报刊登载了新华社关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罢

课抗议饮食不好的报道之后，南当局提出抗议并警告中国记者，再出现类似情况，他们将采取报复措施。

谈到铁托和纳赛尔提出的四国领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和苏加诺会晤计划(鉴于日内瓦会议协调中立政策)，邓小平说，尼赫鲁坚决反对这一会晤。苏加诺似乎对这一计划表示出了某种兴趣。据消息灵通人士报道，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声称，他将详细研究铁托和纳赛尔所提建议的全部内容，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定苏加诺对此问题的态度。邓小平指出，但有一点已很清楚，铁托和纳赛尔对这一会议的召开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邓小平说，美国人需要像现在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对这一武器利用得也不错，对此也不惜金钱。邓小平相信，最终这些钱将白花，就像当年在蒋介石身上花钱一样。

我问当前台湾形势怎样。

邓小平表达了他的看法：蒋介石不可能放弃政权，他要设法保住第三任期“总统”的位置。如果蒋介石继续连任“总统”的话，中国方面认为比陈诚甚至胡适当“总统”更好，美国则倾向胡适当选，陈诚当选是最差的，蒋介石至少目前还是适合美国需要的。在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表示，中共与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将西藏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解决。

我问台湾经济形势如何，邓小平指出，蒋介石目前是靠美国的援助而生存的。他认为让美国人出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终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当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也会等待一个时期，等待着情况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中国的长期分裂会使全世界人民意识到，是美国在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更重要的是这将使蒋介石意识到，美国并非真正支持蒋介石，而只是在利用他，那时蒋介石也就不会再相信美国了。

在以后的会谈中涉及了苏联和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我向邓小平介绍了我国正在为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做准备的情形。

我告诉邓小平，我们正在准备举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邓小

平预计中国今年农业将会取得大丰收，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将比1958年提高50%，尽管一些地区的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全国小麦的总产量将比去年高出20%。一些地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遭到洪灾，还有一些地区是因为干旱造成的，如果雨季很快到来，这些地区的旱情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严重失误，邓小平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大丰收的许多粮食，被人民公社的农民吃饭不要钱而消耗掉了。邓小平讲到在此之前，由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农民注意经济核算和节约用粮，浪费粮食的现象很少，现在5亿 [89] 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需要更丰富和更美味的食品。邓小平重复说，目前最大的缺点是，农民自己消耗的粮食太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太少。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整顿公社的决议，指的就是逐步整顿这一重要的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简要谈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他说，以前尼赫鲁曾预言达赖喇嘛将在印度的总体计划中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并认为西藏如果没有达赖喇嘛将会发生混乱。但事实正好相反，西藏没有达赖喇嘛后情况越来越好。对尼赫鲁来说，达赖喇嘛反而成了他的负担，尼赫鲁和美国每个月要花20万卢比来供养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人员，现在尼赫鲁正打算把达赖喇嘛送回西藏。邓小平补充说，如果达赖喇嘛回来，我们给他的薪水会比印度和美国给他的都高。过去达赖喇嘛每次出访北京时，我们都至少给他20万元的开销，当他在拉萨时，我们每月支付给他和随从人员70万元人民币。

就此我指出，由于西藏事件，西藏农奴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渴望摆脱农奴制度。

邓小平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西藏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民主改革。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同志、翻译阎明复、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莫丘尔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No2524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6月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239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 [90]

1959年6月1日

刘少奇今天接见了苏联代表团.....

.....

话题转到了国家现状上来，刘少奇认为，就整体而言是很好的，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去年，中国发动了“大跃进”来解决所有新的、困难和紧迫的问题。现在，党认为并且希望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出现的发展不协调，特别是工业和农业。1958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部分时间内，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农业，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口号是工业和农业并举，这样的情况本不应该出现，但却发生了。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仅一年时间，中国国内的工人和雇员的数量就增加了2200万人。1957年底，中国拥有2400万名工人和雇员，而现在有约4500万。这样一种急剧的增长带来了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工人们拿到工资，因此，提出了额外的商品供给的要求。.....尤为困难的是人口与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我们无法满足人们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一系列商品的全面需求。所幸我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发展。我们讨论了将过去一年间进城的部分工人送返回到乡下的可行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清楚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增产的必要性。刘少奇

说，不久前他读一本有趣的书，书中提到美国约有600万人直接从事农业和畜牧工作，这部分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为美国人生产了所需的食物，甚至还满足了出口其他国家的需要。在中国，我们在农村有大约5亿人，不少于一半的人有能力工作。有人 would 认为这个数量足够了。然而没有机械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视角上考虑问题，同时，我们的生产力必须提高，只有这样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才会被解放出来，以便进入其他的生产和研究领域。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再次强调了劳动力生产经验的低效。刘少奇说，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个问题，科学在日后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谈到国际问题，刘少奇谈到，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中国的彭德怀元帅一起去阿尔巴尼亚表示担忧。

.....刘少奇关于西藏的看法：我们的敌人很高兴。印度反动派很希望达赖喇嘛能在印度。但是这不会让我们有任何不安。相反，这能使我们有机会更快地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反动派在西藏人越少，我们的工作越容易进行.....

现在，印度人想要与我们进行谈判，商讨达赖喇嘛和他那些(在印度的)叛军返回西藏的问题。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当然，这是在印度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印度提出的条件。

.....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РРФ, ф.0100, оп.52, д.7, п.442, л.88-93

№25244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1959年6月2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1385/TC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普希金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 [91]

1959年6月2日

我应刘晓大使的要求接见了。

1.大使先生递送了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关于1960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的。

(我)告诉大使先生这封信一定会递送到它的目的地。

注：这封信是专门送给赫鲁晓夫同志的。

.....

3.谈到西藏的情况，刘晓说：西藏问题在其内部方面应该被视为已经解决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清算封建关系，并且这个工作的开展要建立在民族自治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十分现实。

刘晓表示：从这种意义上说，发生在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也有它的积极意义。由于我们已经把参与组织西藏叛乱的西藏反动派领导人的财产充公并禁止他们出境，因此这件事情的危害应该不大。我们没有打算继续镇压这股反叛势力。政府将会赎买地主的牲畜以及西藏封建地主的房产，此外我们会每年给他们一定的利息。刘晓强调这个过程不应采取过分强硬的手段。

提到西藏问题的外部方面，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晓继续说道。尼赫鲁明白如今中国已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印度反动派关于西藏的阴谋已经失败。尼赫鲁认识到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带给他想要的结果。如果印度想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会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

刘晓说，不久前中国给印度的外交照会中提到了关于中印关系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印度的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刘晓表示，这封照会在印度受到了高度重视。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普希金

АВПРФ , ф.0100 , оп.52 , д.5 , п.442 , л.20-22

№24980 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1959年6月3日)

关于苏联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借款和信贷的报告

下面将要摘录的是苏联向蒙古提供的借款和信贷的资料。这些资料，或者源自两国当年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或者众所周知地保存在外交部的相关资料。鉴于苏联给蒙古的此类借款和贷款并非都具有事先的协议——这种情形在蒙古人民革命后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这里所提供的这方面资料并不完整。例如，依据档案资料我们知道，还在1921年苏俄便曾给了蒙古约10万卢布，以助其组建蒙古合作联盟，可当时关于苏俄对蒙古的这一援助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关于苏联在1924—1925年间给蒙古的一些借款的情况，我们只是在更晚时候双方所签署协议中找到相关内容并引用之。

例如，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现存的文件来判断，苏联根据1924年12月23日协议曾以4厘的年息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借款100万卢布，或者1052901图格里克(按当时汇率1图格里克 = 0.95戈比)。在现有档案中虽然没有找到该1924年12月23日协议，但有其他一些官方文件证明：在1932年11月1日以前蒙古已偿还了该借款的一部分——数额为75万卢布或789743图格里克；截至1933年1月1日以前剩余的借款——数额25万卢布或263158图格里克被列入1932年5月26日苏联给蒙古的另一项借款——据此，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共向蒙古借款400万图格里克。截至1933年1月1日，苏联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提供的、尚未偿还的借、贷款共计8950326卢布或(根据1图格里克 = 0.95戈比的汇率)9426658图格里克。但这些借、贷款均没有保留相关协议，只有依照年代划拨该借、贷款项的文件记录。

一、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总额1400万图格里克，名为“1933年整理借款”的长期借款，期限15年(自1933年1月1日至1948年1月1日)，年息2厘。该整理借款包括了苏联以前给蒙古的、截至1933年1月1日以前尚未完全或部分偿还的借、贷款。

1.125万卢布或263158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 = 0.95戈比计算)为蒙古尚未偿还的、苏联依据1924年12月23日协议向蒙古提供的用

以确保蒙古发行新货币的借款。

2.该借款的年息为4厘，利息计算时间为：自苏联向蒙古政府实际提供这笔借款的1925年4月至1933年1月1日即7年零9个月，期间利息共计77500卢布或81580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3.根据上述1924年12月23日协议，苏联还向蒙古借款75万卢布(789743图格里克)，年息4厘，期限为：自苏联向蒙古贸易工业银行转交第一批铸币(1926年1月)始至蒙古偿还该部分借款(即1932年11月1日)止，共计6年零9个月，利息共计20.5万卢布或215800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4.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根据1932年5月25日协议向蒙古提供了40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用途不明)。

5.这笔借款的年息为2厘，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1)自1932年6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7个月间，16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18666图格里克。

(2)自1932年11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2个月间，其余24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8000图格里克。

6.苏联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尚未偿还的贷款余额共计8950326卢布或9426658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以上所列蒙古欠苏联的借款、贷款和利息共计14013862图格里克，其中1400万图格里克是苏联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以年息2厘、整理借款方式给蒙古的，其余13862图格里克已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汇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活期账户。

二、依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苏联相关组织应向蒙古提供800万卢布的商品和物资等。期限为8年，无息。

三、依据1934年3月9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贷款共计1120万图格里克，其中以现金方式——823.7万图格里克，以商品和物资方式——226.3万图格里克。期限为10年，无息。

四、上述三项总额为332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根据1935年10月5日协议被变更并纳入1934年的一项统一的无息借款——总值为500万金卢布或1740万图格里克，期限为25年。

为了这些借款的变更，苏联和蒙古政府之间在1934年12月1日有一些书信往来(具体为斯托蒙扬科夫和甘东的互通信函)。在这些互通信函中提到：1933年以前苏联给蒙古的用于国防的借款，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被变更为1933年借款名目，总金额为1400万图格里克。在1933—1934年间，苏联又给了蒙古两笔用于国防目的的借款，总金额1900万图格里克。这样，截至1934年11月30日，蒙古欠苏联的、以国防为目的的借款总额为3300万图格里克。

为了满足蒙古政府的请求——关于请苏联为其偿还这些借款而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以及出于协助蒙古组建本国军队的良好意愿，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将蒙古的欠债从3300万图格里克削减至500金卢布，并相应地把该500万金卢布和蒙古为偿还这笔借款而每年上缴的20万金卢布(票面价值)，一起列入1934年的一笔统一的无息借款名目之中，期限为25年，即从1935年12月1日起至1959年12月1日止。

另外，在同年12月1日的一些双方互通信函中还提到：苏联决定由自己承担截至1934年1月1日蒙古所欠的一笔商业债务——共计2940万图格里克。上述信函中指出：这笔商业债务是由于苏联一些组织依据蒙古政府相关决议而紧急运往蒙古而造成的，目的是满足蒙古牧民的需求和促进蒙古经济的稳固。而在蒙古已建立了正常的商品流转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会导致蒙古市场的商品饱和即当地市场价格的下滑。

苏联商品迅速输入抬高了蒙古对苏联商品输入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蒙古对苏联的一大笔商业债务。

截至1934年1月1日，苏联外贸银行的资产平衡表数据显示：蒙古银行对苏外贸银行的欠债金额为3900万卢布，而苏联外贸银行对蒙古银行的债务金额为960万卢布。

鉴于蒙古政府提出缩减蒙古银行的债务的请求，为了切实帮助蒙古稳定经济并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的友好态度，苏联政府决定由自己承担蒙古银行对苏联外贸银行的债务，并无偿地代其向苏联外贸银行偿还2940万图格里克。

1934年12月1日关于重新评估苏联蒙古公司固定资本的协议规定，苏联将承担与这些公司的组建相关的部分开支。

该协议指出：“两国政府同意对如下苏蒙合营公司——蒙古运输公司、蒙古羊毛公司、工业公司和‘蒙苏布内尔’(Монгсубунер) [92] 的固定资产进行再评估，并以金卢布来确定图格里克的结算汇率，以便两国政府在不晚于该协议签署之日起的6个月内共同明确如下问题：那些合营公司将完全归属蒙古所有，而蒙古政府将在何期限内和在何条件下偿还苏联政府在这些公司中所投入的资本。”

应蒙古政府的请求，在按金卢布把“工业公司”的资本额确定为300万图格里克的条件上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资本定额的超支部分，即500万图格里克(根据1934年12月1日协议，1图格里克=30金戈比)无须补偿地全部由自己承担。

五、1933年，苏联轻工业部向蒙古借款55万图格里克，以补充蒙方在合营的“蒙古羊毛公司”中所占股份的比例，偿还期限8年，年息2厘。

六、1937年，苏联向蒙古贸易和工业部贷款46万图格里克，以便(向蒙方)供应汽车，偿还期限10年，年息4厘。

七、根据1937年11月30日苏联驻蒙古贸易代表与蒙古贸易、工业、交通和通讯部之间所签合同，苏联向蒙古贷款220万卢布，以扩建中央热电站工业综合体，贷款期限10年，年息3厘。

八、1940年苏联向蒙古贷款124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赎买苏联在两国合营股份公司中所占的股份，贷款期限20年，年息3厘。具体情况如下：

两国合营公司名称	金额(单位: 图格里克)	贷款期限(年)	年息(厘)
蒙苏布内尔	670 万	20	3
蒙古羊毛公司	100 万	20	3
蒙古运输公司	160 万	20	3
工业公司	300 万	20	3

九、1940年苏联向蒙古借款1740万图格里克，用以从苏方手中赎买窄轨铁路，借款期限20年，年息3厘。

十、1944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80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从苏联手

中赎买乌兰巴托至阿尔坦布拉克的公路，贷款期限25年，年息(未知)。

十一、1947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47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赎买东部公路，贷款期限10年，年息(未知)。

所有这些贷款和借款都是苏联在战前向蒙古提供并被(蒙方)使用的，虽然其中一些借、贷款协议是在战争期间(1944年)和战后(1947年)才签署的——例如，苏联向蒙古提供的用于赎买(于1937—1941年建筑的)公路的贷款。

苏联给蒙古的较大规模的借、贷款都是近期提供的——始于1949年，当时蒙古正开始兴建乌兰巴托铁路和其他一些工程。

十二、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6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上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贷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1957年经换算为外贸价格后，该贷款金额为18690万卢布。

十三、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苏联向蒙古借款95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补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借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依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3月25日指令——要求依外贸价格重新评估乌兰巴托铁路的造价。而因此，苏联依据1949年6月6日和1953年4月8日两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从132600万卢布减少至67360万卢布。这就是说：苏联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18690万卢布；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48670万卢布。

十四、根据1953年11月28日协议苏联给蒙古贷款8000万卢布，以助其建设纳来哈矿山，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注：协议最初规定贷款数额为1亿卢布。

十五、苏联根据1955年6月27日协议向蒙古贷款220万卢布，以助其购买工程设备，贷款期限5年，年息2厘。

十六、根据1955年8月12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5500万卢布，用于

建设工业和市政企业，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七、根据1956年4月23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500万卢布，以便在乌兰巴托建设生活性住宅，贷款期限15年，年息2厘。

十八、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2亿卢布以改造热电厂、建造广播电台和发展农业等，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九、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4000万卢布，以便蒙方赎买苏联当年在蒙古股份公司“苏蒙冶金”中所拥有的股份，贷款期限30年，年息不详。

附录：蒙古向苏联偿还借、贷款的相关资料。 [\[93\]](#)

C.达什扬

1959年6月3日

1958年10月27日

第2101/ДВ号

АВПРФ, ф.Референтура по Монголии, оп.41, пор.21, пап.261,
л.56-63

№103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1959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6月10日会议第107/5号记录

第5项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领导对其产品质量问题的错误态度。

(谢尔宾同志、塞菲同志、杰缅季耶夫同志、伊格纳托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基里琴科同志)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9飞机有生产缺陷。

正如所查明的那样，飞机的生产和装配工艺水平低下以及对完成工

序质量的监督情况不尽如人意，是造成提供给中国的米格19飞机生产缺陷的原因。

厂长亚罗申科同志和总工程师塞菲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提供的飞机必须具有的质量以及提高工厂工作人员对于生产的产品的责任心。

苏共中央决定：

1.由于提供给中国有生产缺陷的飞机，给21厂厂长А.И.亚罗申科同志以及工厂总工程师Т.Ф.塞菲同志警告处分。

2.责成苏共高尔基州州委员会和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研究21厂和119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情况，给予各级党组织和工厂领导必要的帮助，以便消除现有的缺陷，并对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犯罪分子追究责任。

ЦХСД, ф.4, оп.15, д.632, л.3

№20634 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1959年6月17日)

1959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1日至6月19日

第14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6月17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在苏联大使馆里为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和经济顾问部门的外务工作人员们开了一次题目为“谈谈朝鲜的农业发

展”的讲座。

讲座开好后举行了座谈会，座谈时曹又一次强调说，中国的党和政府经常不断地注意纠正中国在组织人民公社的最初几个月里所犯下的人民公社社员的薪金上的缺点。现在人民公社里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的过程中，那些匆忙地和无足够根据地竭力想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干部的错误观点也在得到纠正。

我问，今年有哪些品种可收割，52500万吨稻子的收成计划是否完成得了。对这个问题，曹回答说，全国的农作物收成是好的。如果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话，那么今年全国的农民定会完成这一年的计划，并会收获5亿多吨谷物。现在全国的人民公社社员都在为完成中国的党和政府摆在他们面前的今年的任务而奋斗。

曹讲，在苏联，鉴于今年6月24日即将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到处都展开了一场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七年计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工人和职员都在具体地讨论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的措施，并在发掘提前完成计划的潜力。

曹讲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诸企业的工人和职员的主动精神，他们做出了决议要在1964年提前完成生产水平方面的七年计划。苏共中央在一份特别决议中表扬了他们的责任心，并号召全体苏联人民效法他们的榜样。

随后我通知曹，莫斯科的全苏国民经济成果展览会已开幕了。

我通报了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详细地叙述了苏联代表团在今年6月10日的会议上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西柏林和全德委员会问题的新提案；向曹讲了西方强国在对待苏联提案和解决德国恢复统一问题的态度上的立场。

曹说，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葛罗米柯经常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通报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和外交部是了解日内瓦会议的正在进行中的大事的。

出席座谈会的有参赞托尔宾科夫、二等秘书B.M.巴库林、使馆随员王保民。

拜访了南日，他转交了一份7、8月份要被派到苏联去休养和治疗的8个领导人员的名单。

南日还通报说，中国朋友同意朝鲜的非官方代表团去谈判朝鲜人民军的物质技术装备问题。到北京去谈该问题的是金一、李钟玉和金光侠。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43-144

№09872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

苏共中央：

兹按照情报程序呈上国家对外经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整理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7页。

国家对外经委主任

斯卡奇科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根据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朋友们开始打算在1959年仍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与1958年相比，年度计划预计工业总产值增长41%，钢产量增长62%，煤炭增长4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6%，等等。

但是，正如现在中国朋友们承认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没充分分析1958年的结果。在实施“大跃进”过程中，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它们是：能源、冶金，尤其是交通运输落后，工业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居民食品和某些工业品供应出现紧张。

据周恩来同志今年6月17日同扎夏迪科同志会谈时承认，在计划国民经济和领导经济建设中，中共中央和地方机关在1958年采取了主观主义立场，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充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題，大大提高了计划任务指标，如煤炭、冶金生产任务和铁路运输，过高估计了“小高炉”(习惯叫法)的作用。经验表明，小高炉不行，根本不能作为发展冶金工业的基础。这些小高炉生产的大量生铁(约6000万吨)和钢(250万吨)质量不高，含硫和磷很高，不能用来生产优质钢和轧材。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部分金属根本就没从边远地区运出来。

谈到1958年几乎增加2100万职工，周恩来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不需要招

收这么多职工。一部分新招收的工人没有用场，还得给他们发放工资。工资总额的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供应的紧张。

在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问题上也有失误，按照计划，本应建设692个超限额项目，实际上建了1600个，没有集中资源搞首要的项目。

1959年过去的几个月表明，年度计划指标是不现实的，必须进行调整。过去5个月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状况是这样的：生产钢430万吨(或年度计划的24%)，轧钢290万吨(或21%)，电力151亿千瓦(或38%)，煤炭1.59亿吨(41%)，水泥410万吨(32%)。由于物质、技术器材供应和集中供货的中断，由于继续大量生产伪劣产品，中国朋友还未能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还未能理顺企业的正常工作。

这些困难和经常完不成工业生产计划决定了这种状况，5月份国家计委和其他部一起被迫对年度生产指标进行修改，降低生产指标。例如，钢生产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生铁由2400万吨降到1900万吨，轧钢由1400万吨降到900万吨，煤炭由3.9亿吨降到3.3亿吨(由于外运困难)，铁路建设由10000公里降到5000公里。尤其是大大降低了机械制造计划指标。这一变动的正式通知尚未公布。

今年5月份同4月份相比，工业生产额明显减少。例如，蒸汽机和汽轮机的生产比4月份减少40%，蒸汽锅炉减少66%，动力机械减少52%。由于原料不足，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也减缩了，棉纱减少19%，酒精减少25%，卷烟制品、胶鞋、自行车、麻袋等生产减少10%—15%。5月份相应的工业生产总额(包含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比今年4月减少8.2%，产值136亿元。

在基本建设领域，尽管建设项目的数量减少，开工项目的物资材料供应有所好转，但项目投产运营不够充分。5月份，超过项目限额工地约有1100处，5个月时间里投产项目仅有115个。5个月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86亿元，为去年同一时期的189%。5个月新投产项目生产能力达到：生铁210万吨，焦炭200万吨，开采石油89万吨，石油加工130万吨。

5月份各种运输有所改进。铁路运输5月份比4月份增长5.8%。每昼夜装车达到36800个车皮。滞留货物有所减少。同时应该指出，粮食、棉花和日用品运输5月份比4月份有所减少。总的说来，运输业仍然落后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在农业方面，现在已开始群众性夏收工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预计(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报告的)，夏季粮食可收获4000万—4500万吨，其中包括冬小麦3000万—3400万吨。鉴于去年产量提高而一些省份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毛泽东于今年5月初写信给各省委，批评提高产量指标和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批评一些县和省过高地规定完不成的产量指标。他同时强调，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很尖锐，解决这个问题，大约还得10年时间。这期间要完全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这样评价粮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新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按照中国领导人1958年的声明，他们准备在2—3年内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供应总的形势依然紧张。5月份，粮食和其他商品仓库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到5月底，同4月份比较，粮储减少24%，棉布仓储减少5.2%，植物油减少2%。

在加速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在组织收入分配和农产品需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向供应的平均制度过渡，放弃严格的生产定额，热衷于满足农村的需求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导致了城市农产品供应大大减少。城市食品，尤其是肉、动物油和植物油短缺。由于出现紧张，除粮食、植物油和棉布限额供应外，1959年肉、糖和肥皂也开始凭票供应。市场上和商店里开始排长队，食堂2—3个小时便卖完一天的定额，只好关门。

农村粮食也不够吃，山东、河北、广东省粮食短缺。而甘肃、云南、新疆粮食形势很好，但把粮食调往缺粮的地方有很大困难。农村粮食供应也紧张，据陈毅今年6月8日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外交代表通报情况时所讲，这是人民公社(有5亿多农民)免费饮食过度浪费直接造成

的。如果再考虑到毛泽东对地方党委的专门呼吁，禁止各地向农民多征收粮食，可以看出，说1958年收获3.75亿吨粮食，看来是多说了。

从短缺商品供应定量上看，可以说，规定是很严的。比如，植物油，北京市民每人每月供应10两(330克)，干部定额是16两，合500克，计划今年内的定量是每人每月500克。糖的定量是3口之家每月供应500克，肥皂3口之家每月1块，棉布每人每年8米。

按照中央机关的决定，现在执行的居民粮食定量还要减少，这要在居民点街道委员会开展宣传的条件下，根据自愿原则实行。

在实施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朋友忽视了扩大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因此到1958年底尤其是今年，像毛巾、香烟、碗碟、小件金属制品等这样一些畅销商品都感到很紧张。统计机关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小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例如，今年4月份肥皂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40%，而肥皂销售这一时期几乎增长37%；胶鞋——相应数字为2%和72%，暖壶分别为26%和6%；毛巾和针织品生产增加30%—55%，而他们的销售增长60%—95%。

由于畅销货短缺，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对中国消费者不典型的一些日用品如闹钟、手表、毛料和丝绸布、收音机等的销售在今年第一季度也增长1—2倍甚至3倍。

现在日用品的生产，不仅是数量上，品种上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例如，北京批发基地的商品品种，同去年相比，减少4200种。

造成国内市场紧张形势的首要因素是居民购买力的增长：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和工资总额的增长。1959年1—4月，国家支付的工资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9亿元，是1958年职工工资总额的1/6。

由于商品短缺，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取消了部分储蓄(约7亿元)，用这些钱搞个人商品储备。

人民公社由于出卖农产品，货币收入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亿元，除偿还贷款，剩下的钱也用来购买工业品。

这样，仅上述几个因素就使购买力增加近40亿元。

为了纠正出现的形势，中共中央打算采取以下措施：1.坚决缩小食品和工业品总的开支，压缩居民购买力(其中行政管理机构开支保持去年水平)；2.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其中计划裁减职工1000万，主要是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3.对给人民公社发放农业贷款建立严格监督；4.加强吸引劳动者进行储蓄的工作；5.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司长

Г.舍维亚科夫

ЦХСД, ф.5, оп.49, д.243, л.1-8

№20700 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1959年7月4日)

摘自A.A.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6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第1709/TC号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座谈记录

1959年7月4日

礼节性拜会、接见了赴伊拉克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南日。

在谈话过程中我问南日，现在南朝鲜当局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方面表现如何。南日说，李承晚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又谈到了“向北方进军”好像是统一朝鲜的唯一途径。李承晚分子认为，如果美国容许南朝鲜军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挺进的话，那么国家将会迅速地统一起来了。李承晚断言，由于担心会有国际麻烦，所以这一次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干涉朝鲜的事务的。

我说，李承晚在该情况下简直是像个老土政治家在发表议论。美国人对局势估计得比较清醒，所以才阻止他去冒险。

对南日的关于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工作前景的问题，我回答说，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我们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看得比较乐观。不过，在柏林问题上还将会有一番艰巨而又复杂的辩论。至于召开峰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许是能达成协议的。至少我们正怀着这个目的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

南日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打算不久就要再次访问苏联的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我说，这些谣传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麦克米伦的新访问的谈话。

我问，朝鲜朋友如何评价今年的粮食收成。南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今年的早熟谷物(小麦、大麦)的收成是空前的高。本地户指出，朝鲜在最近的100年里没有遇见过这种丰收。但是南日补充说，小麦和大麦在粮食作物的总数量中的比重并不高。水稻和玉米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春天降下的雨雪数量大得足以令人相信，稻子的收成也将是高的。暂时还没有为玉米担心。朝鲜的条件对它的生长发育而言是很好的。

南日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希望在今年7月份向它供应3万吨小麦的请求。南日同时还说，要不是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因失算而向国外出售了比该出售的数量多的小麦，那么粮食本来是完全够国内使用的。

谈话快要结束时，南日说，他想要与我详细地交换关于主要国际问题方面的意见。他还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要谈一些问题，因为朝鲜国内正在为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访做准备，而且还要通报朝鲜国内的内政情况和朝鲜的一些国防问题。

我与南日约定了要在下周初会面。

出席座谈会的有：朝方——李新八，苏方——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同志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Г.Е.萨姆索诺夫同志。

A.葛罗米柯

文件送：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A.Л.奥尔洛夫(中央委员会)、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佐林、谢苗诺夫、齐米亚宁、波采罗布

第M6-3156/Гс号

1959年7月6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A.葛罗米柯

1959年7月6日

ABПРФ, ф.0102, оп.15, д.5, л.5-6

№25245 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1959年7月7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7日

第0608/ДВ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葛罗米柯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94]

1959年7月7日

(我)应刘晓同志的要求在中午12点的时候接见了。

1. 刘晓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提交给我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关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新的军事援助的问题(这份备忘录已单独呈送苏共中央)。

刘晓大使特别强调了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答复刘晓大使一定会立即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请求传达给苏联政府。同时，我还说，关于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也会认真考虑。

.....

苏联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24

№20635-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1959年7月9—12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平壤市

1959年7月9—12日

应金日成之邀，我到他正在度假的水丰水电站地区(鸭绿江)的别墅里去拜访他，并详细地通报了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的情况。

谈话持续了2个小时，并进行得很活跃。金日成对全会的资料，特别是对H.C.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对一些可以和应该为朝鲜所采用的问题表示赞同，并发表自己的想法。尤其是金日成非常留心地听取了H.C.赫鲁晓夫同志对下列问题的意见：

用有经验的干部去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严格遵守国家和党的纪律；

建立党组织监督行政工作的组织形式；

在工业和建设中组织安排铸造工作、电焊。

金日成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下列意见：

我们自己必须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要用先进的、好的组织者去替代落后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论点。我们也必须靠把积极分子中最好的、有经验的同志调到农业合作社去任职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许许多多违反国家和党的纪律的事例，不过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里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党的监督工作，要求也必须更严格。

我们应该在朝鲜更快地组织中央集权的机械化的铸造业。我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某些经营生产的领导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赫鲁晓夫同志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大概现在不会再让他们中的某个人心存疑虑了。

在发表这些和另一些意见的同时，金日成立即就委托出席座谈会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 and 内阁办公室主任崔哲焕准备一份供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理的提案。

我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下列问题：

供应3万吨小麦。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的请求，并下达了在今年7月份提供3万吨小麦的命令。

延长12300万卢布贷款的偿还期限。我通知说，苏联政府暂时还没有审理这个问题。朝鲜政府的延长贷款偿还期限的请求正在获得来自苏联有关部门方面的支持。

..... [95]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83-185

№13582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1959年7月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13日

第169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 [96] 的会议记录

1959年7月9日，符同志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

会谈期间，他说，近年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明显右倾，试图与美国亲近。他认为，印度国内的亲美集团对尼赫鲁施压，而后者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抗拒这一压力。

关于西藏问题，符同志通报说，中国所掌握的材料充分证明，西藏

事件与印度有着直接干系。在我们所掌握的文件中直接涉及了尼赫鲁本人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中国政府目前并不想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并不想因此而对印中关系造成损害。印度政府实际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现在它正在改变以前的立场，试图寻求与中国和解的渠道。符同志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想走极端——因为西藏问题而破坏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符同志指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符同志说，实际上中国是有意让达赖离开西藏的，虽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放他出去；中国现在认为，如果达赖不在西藏，那么政府将更容易整顿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对西藏实施必要的改革。

符同志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如今就是印度人的走卒。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现在是否可能让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符同志答，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只能在达赖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下才可能接纳之，但后者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符同志说，中国研究印美关系的同志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美国正想办法与印度亲近，并为此试图协调印、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此次会议持续1个小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利哈乔夫和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252号

1959年7月11日

АВП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1, л.36-37

№2524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7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原文为中文

.....

根据朝鲜政府关于加强防务的要求，中国政府打算从1960年开始，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向朝鲜政府提供如下根据苏联型号批量生产的军事技术装备：

- 1.米格19型战斗机；
- 2.1226 MS型反潜舰；
- 3.用于炮兵和步兵的多种R型雷达站；
4. P-10雷达。

依照中苏两国政府已经签订的关于军事技术装备交付的一系列协议，我们迫切要求苏联政府对上述即将给予朝鲜的军事技术援助给予答复。

中国外交部预先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59年7月2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3, п.442, л.15

№20635-2 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1959年7月23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7月23日

我接见了朴基永，他在朝鲜工作14年之后即将于今年7月25日返回苏联。

朴基永再一次感谢苏共中央为他提供了在苏共中央附属高等党校里学习，并同家人一起在这段时期居住在莫斯科的机会。

接着他说，昨天他与金日成通了一次电话，金日成感谢他(朴基永)在朝鲜的出色工作，并请他保持联络：给他(金日成)写信，并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去拜访他。

朴基永说，在拜访朴金喆的时候，后者请求他客观和准确地向苏联同志通报朝鲜的实际情况。同时朴金喆指出，有些朝鲜同志在回到苏联时并非十分准确地讲述朝鲜的情况。

接着朴金喆说，现在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建立了信任的同志关系；金日成不止一次地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们说，他一直都很高兴会见苏联大使；金日成会向大使通报国内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42

№20635-3 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9年7月24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密

1959年7月24日

7月24日与金一会面，并通知他，鉴于朝鲜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决定把朝鲜付款偿清苏联按1955年3月31日协定所提供的那笔贷款的总数为12300万卢布的本金和利息的期限推延到1965年和随后的2年。还通知他，已经委托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去与朝鲜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式谈判和签署议定书。

金一衷心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并说，他会立即向金日成转达这个消息。令他表示特别感激的是因为偿清贷款的期限并非像朝鲜方面所请求的那样推延到1965年，而是推延到1965—1967年这段时间，即推延3年。他说，这是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它是全体朝鲜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并将更加巩固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6, л.137-140

№25247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1959年7月24日)

原文为中文

中国外交部给苏联使馆函 [98]

.....

.....鉴于今年8月，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在1956年8月10日达成的关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岗位问题的协议即将期满，中国军事部门现已提出了苏联军事专家的人员职务列表，其中有137名专家，或者是被中国政府额外加入到聘请之列，或者是延长了其在华任期，其中115人是中国政府聘请的，22人是延长了任期的，另外还有任期未满的58位专家，总共是195人。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列出的需要聘请到中国的军事专家的任期是1959年8月到1961年7月。

.....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将这个请求传递给苏联政府，并希望获得批准。

北京, 1959年7月24日

本函于1959年6月24日由中国外交部副司长陈伯清亲手递交给苏联大使馆顾问И.И.萨夫罗诺夫。

АВІРФ, ф.0100, оп.52, д.3, п.442, л.12

№24952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1959年7月27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Г.В.阿列克谢延科：

在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同中国代表举行会谈的时候，中国方面多次向我们请求，就防治船蛆问题和轮船及港口设施的水下附生物问题的经验进行交流，据此，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在1957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交流经验，相互帮助，研究出防治船蛆(船上的寄生虫)和损害港口设施水下附属机体”的建议。必须为中国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木质渔船(大约45万艘)，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们的专家准备了一些小册子和文章，并将其送往中国。同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令苏联感兴趣的。

考虑到上述所述，为了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专家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在1960年苏中科技合作计划中应该考虑向中国派遣3名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事先可以建议派遣生物学副教授Н.И.塔拉索夫(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教授А.С.乌瓦洛夫(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教授Е.С.古列维奇(物理化学研究所)参加这些工作。

考虑到，今年10月5日将在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召开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例行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将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因此，请求您的建议，以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向委员会建议提出这样的条款。

全苏渔业与海洋学研究所副所长

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副主席

П.莫伊谢耶夫教授

1959年7月27日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34, л.143-144

№24953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1959年7月31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 Г.В.阿列克谢延科：

对您1959年7月18日第10 34/1893号来信的答复。

兹通报如下：极地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测研究所原则上同意接收中国的2名实习专家秦炳刚(Цин Бингуан)和吴业刚(УЕган)。

在这件事情上应当考虑到如下几点：

1.实习捕鱼方法最好的时间是从10月底到(次年)2月，也就是用深度不同的探测器在北冰洋地区捕捞鲱鱼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机会了解用漂网捕捞鲱鱼的方法和技术。

2.了解用水声仪器搜寻、用探测器捕捞深水鱼的技术以及了解探测器的设计和试验方法可以在2月份到8月份进行。

3.为了进入海洋，中国的专家们应当有相关的通行证。

同时请求把工作计划以及专家的赞助单位和费用的支付程序(无论是他们的生活费，还是对其提供服务的费用)告知上述专家。

全苏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探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П.莫伊谢耶夫

РГАЭ, ф.9480, оп.3, д.1734, л.128-129

№26589 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

气的计划(1959年8月4日)

第28-643号

1959年8月4日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
合作计划

(项目III/12)

在中国和苏联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合理性及制定合理的勘探方法
批准。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士，地质地理学分院书记

Д.И.谢尔巴科夫院士(签名)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
合作计划

编号	项目 名称	研究目的 和项目主 要内容	在中国的 工作条件 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 期限	苏 方	完成 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 12	在中国和苏联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合理性及制定合理的勘探方法	对中国各省油气含量的前景进行对比评估,这项任务的科学依据决策将确保选择合理的新油气田勘探方向,并快速提高勘探工作的效率。	拥有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团队,建成了一系列科研实验室和研究所。截至目前积累了大量个别地区勘探工作方面的实际资料。	提供相应的技术文件和样品(见附录九)。参与工作的单位有:地区性石油管理局和地质勘探管理局的所有科研机构、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公司,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石油地质领域的科研机构及高校。责任单位: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	1960年 12月 31日	派遣专家进行联合工作。提供技术文件(见附录六)。参与工作的单位有:苏联地质和地下资源保护部石油地质研究院和石油地质勘探研究院,苏联天然气工业总局全苏天然气科研院。责任单位: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研究所。	1960年 12月 31日	
		一、研究地质层的特点和单个油气省份的油气含量特性,包括: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柴达木、酒泉、鄂尔多斯、四川、贵州、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华东。						
		1. 研究上述省份的构造地质学特点,关于油气含量前景,查明主要构造元素发展史,考察有可能形成油气的地带。	具有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成立了一系列科研机构;实验室和研究所。目	参与工作的单位有:地方性石油地质勘探局的所有科研机构,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公司,以及地质部和中国科	1960年 第三季	责任单位: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	1960 年末	

续表

编号	项目 名称	研究目的 和项目主 要内容	在中国 的工作条 件和状 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 成 期 限	苏 方	完 成 期 限	
1	2	3	4	5	6	7	8	9
			前, 积累了大量单个区域的实际勘探资料。	学院下属石油地质领域的科研机构。责任单位: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				
		2. 研究参与各省建设中含油气的沉积层中有开采前景的断面的地层划分。	已经收集并部分处理了一些实际资料, 要求完成最终的处理。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在2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 进行了下一阶段介形目和孢粉分析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处理。 向苏方提交了5种样本(见附录九)。中国地质部和科学院相应的科研机构参与了此项工作。	1960年12月31日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与全苏地质研究所将在1960年向中国派遣两位有经验的专家(其中一位是介形目方面的专家, 还有一位是孢粉分析方面的专家), 作为学术出差, 为期3个月。全苏地质研究所将向中方转交3种孢粉体样本, 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将转交3种介形目样本(见附录六)。	1960年下半年	
		3. 研究有效厚层和潜在有效厚层的沉积岩石学特点, 包括地质标本采集者的主要类型	已预先培训了少部分岩石学家, 对单独地区的实际资料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对实际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收集和整理, 在苏联专家的帮	1960年第三季度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为对此项工作进行科学指导, 在1960		

续表

编号	项目 名称	研究目的 和项目主 要内容	在中国的 工作条件 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 期限	苏 方	完成 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特点和恢复其沉积物时代的成岩环境。	进行收集和处理。	助下进行了最终的处理和系统化分类,并编写了报告。中国地质部和科学院相应的科研机构 and 高校参与了此项工作。		年第四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了岩石学家和岩石矿物学方面的专家,作为学术出差,为期3个月。按照清单转交一份样本(见附录六)。		
		4. 对流体和岩石进行地球化学研究,结合石油母岩系中地沥青形成主要周期的结论。	中国地方人民政府石油工业研究院从1958年起开始着手研究,在该领域有水化学、地沥青学、荧光光谱分析方面的专业实验室。	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将继续进行石油、地沥青类型的地球化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以及它们沿独立油气田分布的规律性。参与此项工作的有:地质部相应的机构和高校。	1960年第三季度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在1960年第一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一位水化学方面的专家,在1960年第二季度将向中国派遣一位地沥青学方面的专家,作为学术出差,每人为期3个月,目的是与中国专家一同进行室内的资料处理,并编写报告。	196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二、适用于中国各省探寻油气田的合理方法 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油气省份做出地球物理学上	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实际资料,可以计划采用油气田的合理方法	石油工业研究院与地区性石油地质勘探管理局及中国石油部地质勘探管理局的科研机构一起资料收集、系统化	1960年12月31日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直接与中国专家一同参加电探法独立研究类型与合理性建	1960年内	遵照中苏1959年的科学合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

续表

编号	项目 名称	研究目的 和项目主 要内容	在中国的 工作条件 和状态	完成工作的清单和责任单位				备注
				中 方	完成 期限	苏 方	完成 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的评价,并对个别地球物理学上的方法(地震学、电法勘探、重力测量学、磁力测定和放射线测量学)的效果做出结论。 2. 对主要的生产层进行地球物理学上的评定,并就采用的个别研究和诠释的方法(标准的电测井法、微电测井法、横向测井法、辐射方法以及对钻井进行研究的其它方法。)的有效性做出结论。 3. 用现行方法分析结构井勘探钻井,结合不同钻井类型任务精确划分效率,并对在整体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做出结论。		归类和采用现有勘探方法分析,查明其效益,并计划采用电探法。中国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参与此项工作;中国石油部石油工业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最终的资料处理,并编制建议书。		议书的编制。向中国专家通报相同工作在苏联独立研究的情况。在1960年年内向中国派遣一位野外地球物理勘探法方面的专家,一位矿山地球物理勘探法方面的专家和一位地质学专家。作为学术出差,每人为期3个月。		产开发研究所在1969年末向中国派遣两位参与此项工作的辐射勘探法方面的专家(Ф. А.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和А. П. 格鲁波科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M. Ф. 米尔琴科(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60, л.19-23

№13583 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1959年8月10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 1959年8月10日

第01995ГС号

致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志：

德里市

根据你们收到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8月8日下达的指示电报，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今年7月24—26日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的英文本送给你们。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并做出判断，把提及的上述材料的俄文本送给你们。俄语文本按规定应在大使馆销毁。

附上述材料112页。 [\[99\]](#)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波采罗布

АВП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1, л.34

№24955 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1959年8月11日)

机密

1959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如下，今年8月4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请求接见了，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夏衍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电影展代表团的团长，他说，中国同志希望，首先对电影展进行良好的组织，营造友好的氛围，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能够团结。

接下来夏衍同志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苏中两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相互直接地、公开地告知我们工作中的所有缺点，就像分享工作中的经验一样。中国同志希望在今后发展文化联系的问题上得到友好的建议。夏衍同志指出，这些联系在深化和具体化。但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的时候，夏衍同志指出：中国艺术家是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工作的，有时候忘记了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而奋斗的必要性；在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高质量的电影、戏剧、音乐等等。1958年中国发行了103部电影，发行量就像苏联一样多，但是其中较好的或者说算得上好的大约有30部，中等的大约40部，有30多部被认为是较差的。因此，今年打算最多发行70—75部电影，以便保证电影的质量和思想艺术水平。

在中国的电影业中，目前导演的水平还很低，指挥还很缺乏。在艺术领域发展落后的是绘画和雕塑，周恩来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将就文化问题召开会议，各省文化管理局的所有领导人都将会参加这次会议。

夏衍同志谈到了中国同志们关于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国纪录影片

和故事影片展的一些希望，他还请求帮助印制电影的副本。

8月6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我们向他们通报说，中国同志关于中国电影展的所有愿望都会被加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影片和科普影片展将在1959年8月25日到9月2日举行。

在展出计划中有如下影片：《星火燎原》、《卢西的生活道路》、《金鱼》、《庐山》、《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艺术展》、《儿童晚会》、《太阳在长江上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合拍摄)、《地下宫殿》、《早春》、《盆景》、《珊瑚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影片展将在1959年9月29日到10月6日举行。展出计划中的影片包括：《党的女儿》、《红色的种子》、《护士日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飞行员保卫者》、《平凡的事业》、《老兵新传》、《风从东方来》(中苏共同拍摄)。

在举办影展的几天内我国荧屏上将会上演中国往年最好的电影作品(《祝福》、《女篮五号》等)。

电影展将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乌兰乌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市举办。

中国同志们关于印制电影副本的请求也将被满足。

随后友好的会谈继续进行，在会谈中我阐述了苏联文化部工作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并讲述了苏共二十一大向苏联文化工作者提出的任务的完成过程。

中国的同志们也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特别强调说，他们的一项中心任务仍然是同艺术领域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我们的敌人——修正主义者希望挑拨我们同苏联朋友们争吵，他们利用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夏衍同志说，在这一口号上他们有自己的盘算。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但是中国的革命文学和艺术早就应当追随这种方法。

夏衍同志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口号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修正他们对社会主义方法的不正确的理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把

现实主义理解为自然主义——没有梦想和想象。因此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枯燥的、公式化的作品。

夏衍同志在最后说，我们党的领导人特别关注文艺问题，指出必须把思想性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

苏联文化部部长

Н.米哈伊洛夫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07, л.44-46

№25249 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1959年8月27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8月27日

第2129/TC号

绝密

文本第33份

普希金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的谈话记录 [\[100\]](#)

.....我应张伟烈的请求接待了他。

.....

.....过去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飞机侵入了大陆领空进行空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RB57D型军用飞机。今年6月，有两架飞机还侵入了北京的上空。由于这些飞机的飞行高度太高，解放军空军无法进行拦截。

.....为了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之际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刘晓大使于7月7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致信苏联政府，要求其提供防空导弹和使用技术。.....并要求在1959年9月15日前交付。

.....

№25250 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1959年8月28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А.Ф.扎夏迪科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谈话记录 [\[101\]](#)

1959年8月28日

.....

此外，习仲勋同志主动地详细阐述了中国当前形势的一些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成果。他指出，现在，尤其是八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形势正在转好。习仲勋提到，八中全会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1958年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过高指标进行了修正，二是降低了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习仲勋回顾了1958年国家经济发展的过高指标，并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已经感到其目标是过于超前了。根据习仲勋的解释，鉴于当时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所以没人能对那些制定出来的指标进行客观的反思，因为那样做可能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但现在是时候做出相关的纠正措施了。

习仲勋继续讲道，当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时，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不相信本国实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些同志认为要想在几年之内到达那样的钢铁产量增长是不可能的，也不相信整体经济会出现大幅增长。

习仲勋说，随后又出现了一些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件坏事的同志.....

习仲勋继续说，人民公社的巨大活力和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尤为明显的是，“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社遭受了失败”.....

习仲勋不止一次提到，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正是利用了眼下遇到的困难，不仅反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和人民公社，事实上也在反对党的总路线。

习仲勋说，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

习仲勋还提到，我们必须承认，1958年我们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方面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你当然明白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将人民公社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时，就对人民公社提出了一些问题。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就是一个例子。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将小集体整合成大集体”的原则。然而在建立公社的运动中，许多的超前行为得到了允许。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类似超前行为也得到了允许——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得以确立。但是，这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1958年在郑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错误，并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修正这些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都知道，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的7个月里的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一些修正工作。

习仲勋再次强调，采取这些措施的确改善了全国农村各个经济领域的状况。

他进一步表示，我们认为“到了今年秋天，情况会有进一步的明显好转，而到了1960年上半年，全国的情况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善”。习仲勋笑着说，在他看来，“现在苏联同志可以对我们放心了”。

A.Φ.扎夏迪科同志回答习仲勋说，我们苏联人对中国同志始终是非常放心的……

在进一步谈到中国面临的食品供应困难时，习仲勋表示，1958年的农业实际上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庄稼没有被得到很好的收割。除了你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之外，食品供应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农民被灌输了“吃饭吃到饱”的理念，他们认为如今食物要比过去多得多。习仲勋还表示，我们当然一直在研究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了解类似错误的可能后果，但我们没能避免这些错误在中国发生。

在回答扎夏迪科同志的问题时，习仲勋表示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实行计时工资的同时，也引进了计件工资的制度。他强调，我们现在在那些适合的领域实行计件工资制，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的领域仍保

留了计时工资制。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36-41

№1358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 情况通报(1959年8月2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7日

第32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年8月29日

8月29日，我应邀参加了使馆武官Г.帕夫洛夫上校举办的招待会，在那里遇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并询问了他对印中边境事件的看法。

他对我说，8月25日两名印度士兵靠近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一个名为郎久的边防哨所并向其射击。当中国军队开枪还击之后，印度人便扔下武器和一名被打死的士兵逃走了。8月27日，中国向印度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印方也于28日就这一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反抗议。稍后在与我的翻译交谈的过程中符同志又说，(印方)挑起这一事件的目的之一便是迫使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对此，中国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符同志对我说，据他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前不久阿尤布汗给尼赫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两国)签署盟约以保卫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或中国对印、巴两国实施侵略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将向印度提供军事基地并与之相互交流军事情报。符同志还说，他(阿尤布汗)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压力。我对符同志说，我手中也掌握了类似的资料。我还告诉符同志，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阿

尤布汗为了说服尼赫鲁这样做，甚至不惜以搁置克什米尔问题为交换条件。关于阿尤布汗的来信，尼赫鲁已与潘特和捷萨伊进行了讨论，似乎后者并不反对信中所提出的建议。符同志说，9月1日在与尼赫鲁会见时阿尤布汗还可能会提及这一问题。符同志继续道，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尼赫鲁已在内阁会议上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但并未说明自己的意见，该信也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符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即印度报纸上关于印中边境事件所发出的鼓噪，印度国会中所提出的各种挑衅性问题和喀拉拉事件均表明，某些势力正希望促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将其纳入某个侵略性条约之中。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印度右翼势力正在进行积极活动并向更具侵略性的方向演变。

接下来，关于不丹问题，符同志说，在关于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已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还极力试图将作为主权国家的不丹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并以中国的侵略为借口对后者实施恐吓。符同志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不丹总理所发表的声明给予关注，后者在声明中一方面对尼赫鲁所做出的——在中国实施侵略之时印度将会为不丹提供保护——承诺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声称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符同志所掌握的资料，不丹总理则倾向于与印度交好，但国王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符同志认为，不丹总理要想推行亲印度政策也并不太容易。

我对符同志说，不丹希望与一系列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不久，一位亚洲国家的大使曾向我通报，不丹总理在9月初访问印度期间可能会在尼赫鲁面前提及此事，也可能向我们(苏联)驻印度使馆提出这一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经济参赞拓(Ta)同志对我说，中国决定不参加1959年12月份在印度德里举办的世界农业展览会。他说，中方已通知印度，中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中国正忙于节日庆典的准备活动。而实际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参加展览会一定不会取得所希望的结果。

此次会谈的译员为俄国使馆一级见习翻译A.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13590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9月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14日

第34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年9月9日

9月9日，我在保加利亚公使处举办的招待会上遇见了符同志，他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他说，他刚刚从印度外交部回来，周恩来同志托他向(印方)转交一封关于印中关系的信件。据符同志说，该信总结了印中关系的历史，并断言即使在1913—1914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也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符同志声称，在1921年以前中国出版的边疆区地图与印度和英国的地图还几乎没有区别，但稍后印度人和英国人已开始有意地对其出版的地图进行改动。符同志还说，中国准备与印方举行谈判，并就一些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以便恢复边境的安定和在双方详细准备之后再最终解决边界问题。据符同志说，虽然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人从来也没有破坏过这条所谓的印中边界线，反倒是印度人越过了这条界线 and 侵犯了中国领土。符同志继续说，该信件要求印度人必须将自己的军队撤出中国领土，这样才可能大大地缓解印中间的紧张局势。

据符同志说，中印间的冲突事件只有一次，而所有其他关于印度侵略的报道均纯属杜撰。他认为，其他所有报纸上的鼓噪和在印度议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均表明，在印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其试图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被纳入某个西方侵略集团。可能，这只是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

分，即首先破坏印度与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进而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而后者将向印度保证——确保印度与中国和苏联的边界安全。也可能，印度的一些社会集团之所以要破坏印中关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印度。总之，符同志认为，周恩来同志给印度政府的信件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反动派，加强了进步力量。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的这封信很快将对外公布。

据符同志说，昨天印度驻伊朗大使T.K.考尔又到 he 那里来了一趟，而在前段时间造访他的还有其他一些印度著名人物，如克里斯纳·梅农 [102]、拉达克里希南 [103] 主席等。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来是想向中国施加压力，但大多数还是怀着一个良好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印中关系得到改善。符同志继续道，正如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那封信件中所言，印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中印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印度自己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

符同志还向我通报说，他打算明天第六次向印度外交部递交抗议书，原因是印度出现的针对中国驻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代表处的示威游行。

符同志认为，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上，而且在印度的报刊上，要对反动势力——纳里扬、克里帕拉宁等以应有的反击和驳斥。

此次会谈持续1个小时，翻译：使馆一级见习科员A.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5, л.129-131

№23036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 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大约为990万平方公里，根据1953年7

月30日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601938000人。现在中国大概有650000000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就其实质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的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全国自上而下的地方权力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并设有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于1921年7月1日成立的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社会制度的领导力量。到195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拥有1272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中国共产党在各级行政区、工厂、机关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都设有组织。中国共产党利用如下社会组织同群众保持联系：工会、全国.....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付诸了巨大努力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到各个阶层，这些运动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运动(1950—1952年，1955年)，支援朝鲜反对美国的运动(1950—1953年)，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和反对贪污)和“五反”运动 [105]，在1957年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推行了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造，比如，推行了土地改革(于1952年底结束)，在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贸易领域和手工业生产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在国内采取了这些措施，恢复时期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开始了广泛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居民的政治觉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某些阶段的经验估计不足，是由于中国朋友们在思想理论方面不够成熟，这特别反映在经济问题的解决方面。

现在，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朋友们采取了新的方针，以便改变状况，消除不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占农村人口不足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70%—80%的土地，占中国农村90%人口的贫农和中农只拥有20%—30%的土地。在工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外资本。到1937年，中国的国外资本大约占国内总资本的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在1950年通过了关于在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那些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这次土地改革于1952年结束……

……同1946年相比，1949年煤的开采减少了2倍，生铁的产量减少了14%，钢的产量减少了16%……的生产减少了20%。农业生产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战前相比，1949年的粮食生产减少了78%，棉花的生产减少了52%，耕作牲畜减少了16%。

在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年遭受战争摧残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最低水平，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战前水平。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利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不惜任何代价使中国摆脱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在1952年颁布了早先制定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据此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该计划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总路线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多项工业项目的建设。由于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都已投入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性质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建立了诸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这样新的工业行业，建造了生产电子设备的企业等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总量增加了大约25%，1957年为60.3亿元。在这一时期粮食的总量增加了20%。

在恢复时期，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初是通过建立生产互助队(有常设的和临时的)，然后是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低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98%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其中96%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1958年初，中国又开展了

一场运动来巩固已经组建的合作社，后来这些合作社被合并进了人民公社。

.....

由于顺利地完成了经济建设的任务，同时由于在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57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89%，而1952年它们只占据20.5%，而国家和私人混合所有的经济成分占据8%，而在1952年它们占据了0.7%。因此，社会主义工业经济成分以及国有资本经济成分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企业几乎完全被改造成了国家私人所有的和合作化的企业。在农村推行合作化的结果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现在在国家和私人所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前工厂主可以保证每年得到他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入股资本的5%，而不再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获得25%的利润。

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1958年中国存在非常有利的局势，以便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对“大跃进”期间的农业生产评价的不足，由于没有考虑到在粮食收割期间分出大量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以及由于1958年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1958年农业生产的数据被定得过高(粮食1.25亿吨，棉花121万吨)。根据中共中央在1959年上半年的指示进行了检查，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指标。粮食总产量被确定为2.5亿吨(比1957年增长35%)，而棉花的总产量为210万吨(比1957年增长28%)。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投资为223亿元，比1957年增加77%，这些投资几乎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一半。1958年建设了大约1600个大型企业和采矿企业，其中完全建成或部分建成并且投入生产的大约有700个项目，也就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建成和投产的企业多168个。

根据中国报刊公布的数据，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比1957年提高了6.7%，其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9.7%。

同时应当指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1958年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正如周恩来在1959年6月27日对苏联专家所说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建设速度过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一些质量指标评价的不足引起的。

在中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部门之间比例失衡的现象，开始感到工业原料的不足，许多产品的质量都降低了。允许加快小型冶金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物力和人力的分散，导致了日用品生产的急剧减少。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在1958年下半年建设了90多万个小型冶金企业，吸纳了8000万—9000万农民。如此多的农民在农忙期间不参加农活，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庄稼没能完全收获。这种状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人民公社对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对粮食收购工作的关注不够，大量的新的劳动力流入城市等)导致了对市民和工业中心的饮食，特别是肉食和蔬菜的供应出现了重大问题，致使供应经常中断。

1958年中国报刊就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残余”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对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的表现是平均主义盛行，在工业上的表现就是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废除了计件工资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作为在物质上进行刺激的一种形式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消除计件工资制度是1958年全国平均工资比1957年降低7.1%的一个原因。

1958年国内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增加了208万人，到年底又增加到了450万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是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的新的工人的。工业领域多余的工人大约为800万人。从1959年起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把一些工人和职员遣返到人民公社，在上半年遣返的人数大约为450万。

由于出现的局势，中共中央紧急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消除出现的困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部门比例不平衡的现象，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建设工作的质量，对技术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督，改善运输工作，保障居民食品的供应以及一些地区必要的物质技术资源的供应，扩大地方日用品企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等。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反对物质利益原则，并进行宣传说，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主要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一些企业重又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农业领域，1958年中国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把所有的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加快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在1958年开始了深化合作化的运动.....提出了把公社变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单位的口号，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农民的所有私人财产公有化，归各级公社集体所有，把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废除农民劳动中物质利益的原则(在公社中实行免费就餐，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平均主义)和自愿的原则，对于日常生活广泛的集体化没有进行应有的组织和准备(在公社建立宿舍、食堂等)，过早地把地方的权力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相合并。在组织公社期间允许在实践上推行“军事化劳动”，这就加剧了单纯的行政化。

此外，1958年在农业生产中毫无根据地缩减了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增加了作物的播种密度，同时对简陋的灌溉设施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估计过高.....

.....解决了关于人民公社财产的所有制形式(在人民公社中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现在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对公社中的生产和劳动的组织问题进行整顿，其中包括保留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能够保障农民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曾被以前的农业合作社所接受。同时，应当注意，在关于公社成员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上，中国的朋友们尽管考虑到了必须减少收入分配中通过提供免费就餐这种分配的比重，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公社中的免费就餐制度应当保留下来，正如彭真在今年8月份在发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件中所指出的，这一分配的比重不应超过30%，最多占公社社员收入的40%。

可以发现，195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继续得到了发展和增长。工业的总产值为729亿元，也就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5%，生铁的产量增加了2.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66%，煤炭的开采增加了2倍，发电量增加了55%等。这一时期的粮食总产量为.....

.....何况，14种最为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到1959年上半年才完成不到40%(钢、轧钢、化肥、电子设备、糖、植物油等)。次品的比率很高(比如，1959年第一季度生铁的次品率为41%。在6月份为22%)，没有完工的生产增加了，生产出了一些不配套的设备。计划中新投入生产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其原因是物资的分散以及主要的建设物资(水泥、金属、木材)不足。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中国农业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根据官方的数据，3400万公顷的农田，也就是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田都遭受了水灾、干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畜牧业领域的形势也极为严峻。今年7月1日猪的头数从1.6亿头减少到了1.3亿头，家禽的数量从1959年1月1日的4.9亿只减少到了3亿只。

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这些消极现象在1959年未必能够消除。

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对早先批准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重新进行审议，降低一些标准.....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1959年的发展计划作了如下的调整。工业总产值从1650亿元缩减为147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1220亿元缩减到738亿元，(看不清楚)总投资从270亿元缩减为248亿元，钢材的生产从1800万吨减为1200万吨，煤的产量从3.8亿万吨缩减为3.35亿万吨，粮食总收购从5.25亿万吨缩减为2.75亿万吨，而棉花的收购从500万吨缩减为231万吨。其他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指数也被缩减。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中共的总路线问题和消灭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右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上就党的路线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和领导的集团。该反党集团的成员利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并且已经得到克服的不足和困难，来反对在国内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反对建立人民公社，反对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该反党集团还企图剥夺毛泽东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了反党集团的行为，该集团的成员有：彭德怀(前国防部长)、张闻天(前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黄克诚.....

.....结果小学和中学学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800万人，高中的学生数量增加到了.....(1949年有2500万名小学生和中学生，11.8万名高中生)。就消除文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到1957年全国78%的居民仍然是文盲(解放前90%的居民是文盲)。

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中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并且在1956—1957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中犯了如下一些错误，比如不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科目进行系统的学习，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决议进行学习。1957—1958年，在没有从新知识分子中补充足够数量的干部的情况下就开始不加区分地对旧的、有经验的高校教师进行批判，并把他们逐出大学。可以发现大学生的生产活动增加了，但是这对学习带来了影响。所有这些都还导致重点培养的年轻专家的政治和理论水平急剧降低。

现在中共中央正在改正这些缺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校中再次开始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9年中国提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和技术革命的口号。刘少奇在同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谈话中说道：“这项任务是非常重大的，也是困难的，因此在得到苏联应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实现任何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到现在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同33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南斯拉夫、14个亚非国家和7个西欧国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认，但没有同该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得到了……、马来亚联邦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而其对外贸易额达到了128亿元。同19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文化和……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6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的）和46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外长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些会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国际威望都增长了。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然被蒋介石分子所占据。在美国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年复一年地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拒绝把这一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第十四次大会上29个国家的代表团赞成，44个反对，9个弃权。中国朋友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能为了加入联合国而接受任何侮辱性的条件……为此还开展了反对现代

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这一斗争现在被看作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同志们进行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导致了中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恶化。中国朋友们在一些场合指出，他们的考虑是，不能承认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并且表示，不愿参加有南斯拉夫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会议。

1956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今后发展和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发表声明之后，中国同志们对他们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评和研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关系中的摩擦和误会。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改善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消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1958年间中朝关系中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注意加强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在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关注的是亚非国家。中国朋友们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帮助，以便促进这些国家向中立的方向发展，割断他们同美国的联系，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埃及，并且坚决支持中东和近东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同叛乱者的斗争给予了道德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对其他的一些亚非国家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支持印度尼西亚关于归还西伊里安的要求，支持印度对果阿地区的要求等等。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支持哪一方，中国朋友们保留了自己的立场，看起来是为了以此既对印度，也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非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关于亚洲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954年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周恩来对尼赫鲁在前不久提出的“和平地带”的思想表示了支持。1954年年初，中国的朋友们向尼赫鲁提出了关于在亚洲建立安全地带的问题。但是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他们指出了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国际局势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式建立无核区的建议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并建议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同志们然后提出了支持在亚洲建立无核的自由和平地带，缔结集体和平公约的想法，但同时他们认为，缔结的和平公约应当是最一般的形式。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一些亚洲国家共同支持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在远东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和平地带，首先是建立无核的自由地带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在这些地区建立无核地带的思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1959年1月1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谈话中表达了如下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亚洲组建和平地带，并且这一地带已经建立。他说：“我们希望，这一和平地带能够持久存在，并扩大到整个亚洲。”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亚洲国家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而且还由于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在东南亚国家有1200多万中国移民，迄今为止，中国同印度和缅甸的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西藏事件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恶化了，印度官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事实上同西藏反动的叛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近来发生的中印边界事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在1957—1958年印度人经常挑起边界事端，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政府不急于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并且表示，支持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保持现状，不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些问题进行挑衅。但是，亚洲局势现在发展的性质是，边界事件发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效应，并被敌人利用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被美国所利用，美国的目的是迫使印度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方针。西方大国和亚洲反动派尽力利用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来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朋友在同中立国家的关系中制造了更多的困难。

中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同那些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建立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考虑到这些国家由于对美国 and 英国处于依附地位而面临的一些困难。因此中国朋友们致力于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建立半官方的和非正式的关系，把这看作是建立正式关系的第一步。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朋友们特别关注日本，他们把日本看作是“一个隐藏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54年苏、中就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发表联合宣言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加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困难，以便使日本脱离美国，使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本希望在日本国内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们对日本国内局势进行影响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同任何一国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关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两个中国”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美国、英国和日本较为盛行。(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越来越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其原因首先在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增长，越来越明显的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推行不下去了。)中国朋友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这一图谋的实现将会为国外永久占据台湾提供条件。他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同意任何使台湾“中立化”的计划，使其受到托管，或者建立“独立的”台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同任何一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推行的是拒绝参加有蒋介石政府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朋友们的考虑是，事实上台湾问题不会在数年内解决。现在他们为自己制定的任务是，为将来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并利用台湾问题来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加剧美国和蒋介石的矛盾。为此，早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开始参与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一谈判持续至今。中国朋友们在政协谈判中的主要议题是，美国应当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并撤离台湾。1958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采取了“惩罚性的行动”，企图使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政策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最初，中国朋友们打算解放金门岛和马祖岛，但是他们在10月初改变了战略，因为他们认为解放沿海岛屿的问题和解放台湾的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样较为妥当，尽管解放的时期会被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仅仅应当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为动员国内人民创造条件。但是，应当说，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中国朋友们的考虑不周，无谓地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

.....在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与此同时，应当指出，中国朋友们在1957—1958年的对外政策上有些失算，这些失算显然是由于中国当时众所周知的国内生活而对自身的力量评价不足的结果。在理论层面的反应就是，毛泽东提出了“所有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和“不怕牛鬼蛇神”的口号。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以及在台湾海峡

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在事实上也表现了这一点。对于亲美的反动派在老挝掌权，中国朋友们对印度支那地区形成的政治局势的评估明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老挝的消极态度还在于老挝反对派后来对国内进步爱国力量的镇压，这引燃了老挝的国内战争。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欧洲事务很少表现出兴趣，甚至对于一些关于整个亚洲的重大问题也不够积极。看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特别忙于国内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如下看法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时间在我们这边，一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可以推迟到局势较为有利的时候进行。

三、苏联与中国的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坚定采取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相接近的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声明：“在国际关系中他们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营的一边，他们应当希望从这一阵线，而不是从帝国主义阵线得到真正的帮助。”

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的协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贷款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1950年4月19日签署了苏中贸易协议，就过境运输问题签署了秘密备忘录。所有这些文件都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广泛和全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谈判的结果是于9月15日达成了关于苏联无偿把中长路的权利转交给中方的协议以及由于远东局势的加剧延长苏联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期限问题的协议，还签署了关于在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三方协议以及关于在种植橡胶树问题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的秘密协议。.....

当我们讨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初3年间苏中关系发展中的总体成就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双方关系中有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一些消极因素。这反映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一些协议中，例如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东北和新疆地

区的协议，关于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的协议以及1950年6月1日签署的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元和卢布的汇率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

从1953年开始，苏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完全消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妨碍了以完全平等、互助和信任为基础的苏中关系的顺利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废除了上述协议中不符合兄弟般友谊精神的协议，或者对这些协议重新进行了审议。1954年10月，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对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双方就苏中关系和国际局势问题、就他们对日本的关系问题签署了联合宣言。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方将苏中科技合作联合股份公司苏方的份额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铁路的协议、关于建设集宁—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等等。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次会议创造了一种气氛，有益于更经常、更友好地相互坦率地交换观点。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困难，同时还(站在一种友好的立场上)就苏联机构和苏联专家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苏中关系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就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反苏和反共宣传的局势下，中国朋友们坚决回击了那些企图把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的人(《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尽管没有公开说出，但在对斯大林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他们同我们的立场却并不一致。稍后，中国同志们重新检讨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作用进行的评价，这反映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讲话中。当时他说过：“……总的来说，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现在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与此相关，中国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苏联哲学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一些作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学术观点进行批评。对于那些歪曲苏联，发表反苏言论的右派而言，这事实上是火上浇油。右派分子指责苏联没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断言，苏联的援助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是低水平的。他们还宣称，苏联没有偿还从东北掠走的设备的费用；还坚持说，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中援助的武器向中国榨取钱财，而中国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大量鲜血。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是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揭穿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以便对其所有言论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右派分子发出了叫嚣，中国朋友们却从来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中国对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声明非常满意。1957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一项苏中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强调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因素，声明还驳斥了关于“苏共与中共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毫无根据的流言。根据这一声明，苏联研究和采取了一些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今后在平等、互利和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苏中友谊和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在今后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和合作，这就是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苏联在国内成立苏中友协对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1957年，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探讨了有关世界局势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和具体问题。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满意地谈到这些磋商的成功经验，并表示中国同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再次就有关事务共同进行讨论。

苏联就改革国民经济的领导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和其他各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中国报刊并没有对这些会议的决议做出官方评论或反应。在向中共中央详细解释了同反党集团有关的活动之后，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加坚决地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言论。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获得胜利，那么，这不仅会给苏联，而且会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危险。”

考虑到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攻势，鉴于他们

试图利用1957年中国进行的几次思想战线的运动，特别是“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来分裂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团结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时非常明确地谈论了(1957年11月)，关于这一点，在同南斯拉夫的代表进行会谈时以及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波兰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时，都谈论了很多。1959年，中共中央在讨论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澄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建议之后，再次肯定必须长期维护这一提法。

苏中之间的持久关系和牢固友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中东国际危机时期和1958年夏天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中，这一力量都发挥了强大作用。在那一年中，苏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個政治事件是7、8月间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那次会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会谈期间讨论了一些关于苏中关系，其中包括关于军事合作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意味着对苏联的攻击，这一讲话受到了中国的感谢和高度赞扬。对于我们做出的在中国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苏联愿意提供核反击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感到非常满意，并且也表示，在苏联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向苏联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和苏共中央的一些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关于减少在华的苏联专家人数和取消苏联顾问制度的报告，关于苏共中央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纲草案的态度的报告等，都在政治上取得了重要的结果。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在实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当指出，在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提纲发表之后，在二十一大召开期间，中国朋友们虽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的。

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制定的文件以同样的论调谈论了关于反对“迷信外国”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同时宣称“大跃进”的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会议使得中国的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起

来。他们开始过分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对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冷淡了。有些人开始宣称，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中国则正在飞速地奔向共产主义。对于苏联实行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度等，中国报刊都相当积极地开展了批评。一些文章的作者还把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实质对立起来。

后来，随着对代表大会材料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组织人民公社和推进“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共二十一大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比如，关于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意义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作用等问题。

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解释，但是在中国进行“大跃进”和组织人民公社的时候，苏共的这些原则立场都被忽视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以及随后他的发言)。苏共的这些立场帮助了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改正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中友谊持久巩固的声明扫清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宣传，这些宣传企图使我们两国互不信任，对苏中关系进行挑拨。

在10年期间，苏中经济合作发展顺利。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950年的23亿卢布增加到1958年的61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2.6倍。在苏联的对外贸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据第二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占据45%。根据1959年的计划，两国的贸易额为74亿卢布。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正在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根据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完成、在建和将要建设完成的企业有300个，这还不包括苏联提供科技援助，并且这种援助起到了重大作用的数千个企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恢复和大规模扩建了鞍山冶金联合加工厂，武汉和包头冶金联合加工厂正在建设中，沈阳机床制造和光缆工厂即将投入生产，长春汽车厂、哈尔滨蒸汽涡轮厂、锅炉厂和亚麻联合加工厂，屏南5号矿场和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轴承厂和矿山机械厂，佳木斯制浆造纸联合工厂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投入生产。从1950年到1959年6月1日，苏联帮助完成的设计工作、援助的设备和派遣的苏联专家的费用共计52.3亿卢布，其

中供应的设备价值43.4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8.88亿卢布。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科技合作的基础是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以及.....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还开展了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了一些科技干部，苏联接受了7000多名中国专家到苏联进行实习，1950—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了6561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到苏联学习。

对过去10年苏中关系进行的分析证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并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友好关系和合作关系每年都不断扩大和加强，是今后增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以及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M.齐米亚宁(签名)

ЦХСД, ф.5, оп.30, д.307, л.49-79

№206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59年9月18日)

1959年10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18日至10月5日

第25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9月18日

休假回来后，我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并与他有过一次时间超过1个半小时的谈话。出席座谈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崔庸健和南日。

向金日成转交了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是我随身带来的)。信中告知的是苏联党政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该代表团应朝鲜朋友的邀请将于今年10月初被派赴朝鲜。

了解来信的文本内容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番话：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威信很高的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和感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朝鲜人民非常高兴和迫不及待地期盼着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临。苏联代表的来朝访问将会更大地鼓舞我国的人民在朝鲜北方继续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会有益地影响到南朝鲜居民对我们的共和国的好感的增长。

我们不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能在我们这儿待多久，但我们希望他和代表团成员能尽可能多地看看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其他组织；能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谈。我们非常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了解我们的国情后能对我们讲讲他自己的观感，能给出一些好的建议和要求，能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金日成问，代表团什么时候抵达平壤以及能在朝鲜逗留多久。同时，金日成说：“我们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及代表团成员能在我们这儿至少待上10天。”

我回答金日成说，因为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正在美国，回到苏联之后就要到中国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又尚未确定，所以现在难以说出我国代表团抵达朝鲜的日期。这事稍后就会办到的。至于逗留的时间，那么众所周知，H.C.赫鲁晓夫同志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员的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想要更近距离地了解朝鲜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况。但是，由于他非常忙，所以正如我在莫斯科时人家预先告诉的那样，赫鲁晓夫同志未必能在朝鲜逗留超过5—7天的时间。

金日成说，他们很清楚地想象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时间有多么忙以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进行一件对全人类来说有着多么特别重大意

义的巩固全世界和平的事业，尤其是在美国逗留的这些日子里。但他们还是敢于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尽可能地在朝鲜待得久一点。同时金日成说，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威望如此之高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是第一次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访问。接着金日成说，如果仔细查阅一下我国的历史，那么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俄罗斯政府代表团到朝鲜来过。金日成在结束发言时请我参加制订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

我回答说，我愿意参加编制我国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因为南日是负责接待代表团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我已与他约定要就这些问题进行面谈。

按照中央的委托，我通知了金日成，莫斯科那边同意朝鲜朋友的关于签订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提议，并以绝对信任的方式把供商讨的条约草案转交给了金日成。

看得出，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崔庸健及南日对我们的苏共中央的这种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金日成说，他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介绍条约的草案，如果有意见的话，他们会及时地把它们通报给你们们的。

接着金日成说，他完全赞同莫斯科所发表的那种意见：希望朝鲜政府在签订条约时能发表一个宣言，宣言中最好能写明，朝鲜政府在签订这份条约时的出发点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朝鲜时他们将不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在其统一之前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按照苏联外交部的委托(9月16日的来电)，我通报了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善意访问苏联的结果。

金日成感谢了我通报的消息，同时他还说，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仅会大大地促进几内亚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在巩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人民中间的影响方面起作用。

在我通报消息的时候，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人对H.C.赫鲁晓夫同志在与几内亚人的谈话中所发出的不要盲目乐观的警告，以及对除了公开的叛徒外，国家的全部民族力量都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联合和团结起来的那种见解做出了热烈和首肯的反应。当国家已获得民族解

放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开始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显露出来了。

在谈话过程中，我对金日成讲，苏联的工业运转得很顺利。在执行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的同时，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全体人员还承担着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责任。我略微详细一点地谈了列宁格勒的企业的全体人员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是要在计划的7年时间里，而是要在5年的时间里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我还说，粮食的收割和收购工作进展顺利。

崔庸健询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收成。

我回答说，正如他们所记得的那样，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逗留时，曾向他通报过，今年的春天是来迟了的。然而，由于土地耕耘得很好，而且天气也很好，所以在夏天期间棉花的收成是好的，他们希望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向国家上交305万吨棉花。

金日成询问了处女地上的收成情况以及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的进程。

我对金日成说，今年在处女地上——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小麦、玉米、土豆和其他蔬菜的收成是好的。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进展顺利。今年，由于干旱，在伏尔加河流域(斯大林格勒州)和北高加索(罗斯托夫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个别地区，收成比去年低。

金日成也向我通报说，尽管8、9月份的雨水太多，甚至过量了，但今年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的收成是好的。预料粮食的总产量是400万吨(1958年是370万吨，计划规定的是500万吨)。今年首次在14000公顷土地上播种的甜菜(种子是从苏联运来的)的收成预计对第一年来来说是不错的——平均是每公顷收获130公担，个别地块上则是每公顷收获300公担。今年的棉花收成(种了4万公顷)预计比去年少——每公顷少收8—10公担。

接着金日成告诉我，前几天他召集了一组农业专家和学者，与他们商讨了转为用种子种稻和在种稻的田上进行第二次播种的问题。与会者以在国家的各个地区所进行的实验为根据汇报说，用种子种稻的方法会带来好收成——每公顷收获60公担，而且劳动力的耗费要比用移植秧苗的方法种稻的时候少得多。实验也证明，为了在种稻用的土地上获取饲

料，可以在稻子收割后至播种前这段时间里播种用作青饲料的黑麦或大麦。

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明天将集合在一起去看一看用种子播种的稻子的收成，并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同时，金日成开玩笑地说：我邀请您，并不是把您看作大使，而是把您当作我的农业顾问。

我感谢了金日成的通报，并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

至于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的逗留，那么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像热爱和平的全人类一样急切地期待着H.C.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良好成果。金日成说，我们知道，为了消灭“冷战”和取得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赫鲁晓夫同志会把一切事情都办成的。我们以前就刊登了H.C.赫鲁晓夫同志的全部演说，并仔细地学习了它们，但是我们特别仔细和特别用心地在学习H.C.赫鲁晓夫现在的演说。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7, л.186-189

№13586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1959年9月2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2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9月25日)

9月25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拜访了我，他9月23日刚刚从中国返回印度。

我通报他说，昨天晚上巴里佳博士拜访了我。巴里佳通告我说，他刚刚同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会谈，并且使我明白，他当时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也是尼赫鲁的看法。我向中国大使通报说，按照巴里佳的话，尼赫鲁现在不满意的是，中国没有正式邀请印度政府某

一成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因此巴里佳放弃了他关于中国国庆邀请的建议，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与当前印中关系的气氛不协调”。

我也向中国大使通报说，巴里佳对我说，印度准备进行任何层次的会谈来调解印中关系：从总理级别到大使级别。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本人和阿伦·阿萨夫·阿里可以开始这样的会谈。但这只能在节日后进行，那时才会有相应的气氛。

潘自力同志对我说，中国正式邀请参加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至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一些部长到中国来，是他们自己表达了前来参加国庆的愿望，因此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至于巴里佳和帕尼卡尔的建议，尽管他们是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名义转达的，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正式的，因为这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何况中国不久前邀请了文化部长卡比尔，并进行了关于邀请拉达克里希南的谈判，但是他们没有回应对他们的邀请，关于日期什么也没有说。确切地说，卡比尔已经把自己的访问改期，而拉达克里希南，已经报道说他可能会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只同意了这一点，而关于他访问的日期什么也没有说。这样，因为中国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尽管他准备在任何时候进行访问。

接下来，对于我的问题——正如在印度人们所议论的，中国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否同边界事件有关，中国大使回答说，这同印中边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由于他的右倾观点。

潘自力同志通报我说，前不久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并同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并且他补充说，在印度，他本人能够获得印度外交部和尼赫鲁的接见很困难。

中国大使对我说，尽管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西藏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现在中国主张恢复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并赞成尽快开始谈判。

他通报我说，同印度的一个分歧是，印度坚持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中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条线，中国的军队从来都没有越过这条线。何况在一年内印度国内发生了两次反对中国的运动——因为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

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拒绝参加在德里举办的国际农业展览会，因为这首先在现在的气氛下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第二，他们现在忙于准备中国10周年国庆节日和组织自己的展览会。

谈话的最后他通报我说，前不久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没有公布，就是一位元帅，由于其右倾观点，被免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尽管还给这位元帅保留了副总理的职务。在告别的时候他询问我关于进行会谈的意见，以便就印度国内状况详细交换意见。

这次会谈持续了45分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同志
[106] 和见习科员A.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5, л.141-143

№25250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 来中国参加庆典(1959年9月25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27日

第2413/TC号

绝密

文本第6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9年9月25日

应刘晓请求在11点钟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作为苏联党政代表团首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大使继续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获悉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将在结束了紧张的美国之行后立即到中国参加庆典。刘晓继续说道，苏联代表

团将会分批抵达，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主要人员将在9月27日即抵达北京，以便参加9月28日举行的庆典会议，这也非常好。

之后刘晓还告诉我说，苏联政府很快回应了中国政府在建国10周年庆典上加强防空措施请求，北京对此十分感激。

最后，大使亲自递交了两封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内容涉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按照协议予以转达。

(我)让(他)自己转交。(这两封信被送给了赫鲁晓夫同志。)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苏联远东司二等秘书B.E.科瓦利斯基也参加了这次接待。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д.5, п.442, л.44-45

№24956 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1959年10月 [\[107\]](#))

石景山“中苏友谊”人民公社(北京丰台区)，由公社副主席杨希明(Ян Шиминь)同志解说介绍。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于1958年7月26日选举生产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议上选出了由2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席，4名副主席以及18名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和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的部门有：农业部、工业部、附属生产部、行政执法部、计划部、军事部、教育部、贸易部、卫生部、财政部。

公社从事多方面的作业：耕作，畜牧业，园林业，蔬菜种植，渔业，电子工业，生产石墨零件，生产陶器、玻璃、耐火砖，生产小型的农业工具、日用品，开采矿藏——建筑材料(被看作是辅助生产)。

公社由4个生产大队组成(它由5个高级生产合作社组成)，每个生产大队又分为几个生产小队，而生产小队也被分为许多环节。

产品实行按劳分配。此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每月可以得到5元钱，病人和老人每人每月得到3元钱，每个孩子每月得到2元钱。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不工作的人什么也得不到，但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公共饮食的组织，确切地说就是准备食物。公社社员从厨房带走为每家准备好的食物(大约86%的人使用公共食堂)。所有的孩子，如果父母需要的话，他们白天就免费上托儿所和幼儿园。

单身的老人生活在养老院——以前地主的庄园内。在养老院的俱乐部内有收音机(苏联大使送的礼物)和“红宝石”牌子的电视机。

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个缝纫作坊(有“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在缝纫作坊内工作的是公社的妇女社员，她们不参加其他的劳动，而只接收缝纫工作。

每个公社都有几个门诊部(平均每个生产大队2个门诊部)，有小学和中学(教师由国家提供保障)。

公社中的党员比例大概为8%(根据最大的一个生产队进行估算，该生产队有140多名社员)。在最大的一个生产队的牲畜饲养场有8头母牛，一小群小牲畜和2头种牛。这群牲畜喂养在非常宽阔的地带，很干净，但这些场所的保暖不够。冬季看起来非常地冷。母牛是产奶的。牛奶用来喂养公社社员的孩子以及到城里出售。

电子设备厂(准确地说，是一些不大的作坊)内装配了几台车床(其中的1台车床是大连市在1958年生产的)，钻孔车床以及1台刨床(自动的)。在一些作坊内生产电动机的变阻转换装置，其价格看起来是非常昂贵的：事实上，它们是用手工的方法生产的。

在作坊内有铸工间，它们在2个棚子内，在这2个棚子内浇铸非常复杂的零件：变阻转换器的电板、机床床身。

石墨制品车间装配了油压床以及生产电焊条的车床。

公社还生产发电机的电刷和电动机、风车。

公社的农业机器自己修理。

原料是生产各种玻璃制品的沙子以及生产电焊条的石墨，这些原料

由国家供应，根据订购生产产品。

以当地的泥土为原料制作耐火砖以及整个结构的独特的炉子。

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房子内摆放着成就展品。

上海的“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是在9个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中有3076户社员(14729人)。公社总面积为27512亩(其中可耕地26344亩)。由700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组成11个生产大队，这些生产大队也被分为68个小队，而这些小队又被分为338个特别小组。

在该公社的地域内还生活着没有加入公社的574户城市居民(4135人)。

该公社种植棉花、粮食和蔬菜。棉花的种植面积为6503亩(占总面积的23.6%)，蔬菜的种植面积为8719亩(占31.7%)，水稻种植面积为904亩(占17.8%)，饲料作物种植面积294.7亩，宅旁园地占1270亩。有640亩耕地打算每年收两次庄稼。除了水稻，还种植玉米、高粱、小麦、大麦、荞麦。

公社成立的历程。在1952年开展土地改革之后开始着手组建互助组，把80%以上的农户都联合了起来。1958年65%的农民都加入了低级合作社。1954年冬，开始组建实验性的高级合作社，到1955年底1956年初，98%的农民都加入了高级合作社。表现出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1949 年	1957 年
棉花	每亩 71 斤	133 斤
水稻	每亩 360 斤	480 斤
商品蔬菜	每亩 40 担	60 担
每年每人收入(平均)	61 元	97 元

群众感受到了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

1958年整风运动期间开始大跃进，开展水电设施的建设。在高级合作社内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1)水电设施应当共同建设，但是一些合作社可以提供人力资源，而另一些合作社则不能；(2)并非所有的合作社都能够独自购买农业工具；(3)不同的合作社存在大量的耕地交错现象，这就加剧了使用农业工具的困难。

1958年第三季度，根据农民们的要求联合了3个高级合作社，结果以乡为基础组建了“东风”人民公社。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通过了组建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10月1日组建了“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最初的名字为“解放”公社。

在组建人民公社之后，以前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社中包含了：农业、工业、贸易、教育和军事。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生产小队全体会议选举代表的计算方法是：在小队5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中选出1名代表。全公社共计有127名代表。

生活在公社领域内的非社员没有参加1958年10月1日的选举。但是该县的前人民代表被邀请参加公社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

在2次代表大会之间，公社的所有工作都由以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领导(1名主席、4名副主席、4名部长、7名队长和5名生产队党组书记)。管理委员会下设如下部门：农业部、人民教育和卫生部、财政部、工业部、民兵事务部、保障部、办公室、社会保障委员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每季度召开1次(已经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在生产小队通常每周召开1次会议。在生产大队选举出管理委员会(5—9人)，在生产小队选举出1名队长和3—4名副队长。生产大队的最高机构是该队的代表大会(从60名有劳动能力的人中选举出1名代表)。

该公社有192名党员，由12个基层党组织组成，有751名共青团员，有53个基层共青团组织。

公社农业生产的增长

	每 亩 的 收 成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预算)
水 稻	480 斤	614 斤	780 斤
棉 花	133 斤	199 斤	250 斤
蔬菜(商品)	60 担	80 担	85 担

1959年的总收成是516.7万斤粮食，111.6万斤棉花。出售68万斤(11月底)。

猪的头数：1957年平均每户4.5头，1958年平均每户6.8头，1959年平均每户10头。平均每亩地1.27头猪。

1958年公社有20万条鱼，1959年57.7万条。此外，还有11.4万条小鱼。

蘑菇：1958年18000平方尺，1959年44258平方尺。

油料作物：1958年每亩88斤，1959年每亩203斤。

公社的工业。公社中有6个工业企业：1.糖厂；2.纺纱厂；3.砖厂；4.酿酒厂；5.农业工具修理厂；6.饲料加工厂。在所有这些企业有固定的工人214名。

公社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公社有：78个食堂，供应全公社98%的社员们的饮食；74所托儿所(其中有1549名小孩，占有需要上托儿所的小孩的81%)；24所幼儿园(有690名4—6岁的孩子，占有需要上幼儿园的小孩的60%)；3个门诊部；1个农业技校；1个无线电转播站，进行广播。

公社有2985名18到25岁的青年人，其中2211人是有文化的(占77%)。有6所公社办的小学，11所国家办的小学。所有年满7岁的孩子都在接受教育。有1所国家办的中学(11个班级，1047名学生，86.8%的学生都是工人和农民子女)。部分小学毕业生或者到该校上学，或者到农业技校上学。其余的毕业生到离公社不远的其他学校上学。

1957年在中学学习的学生有207名，1958年401名，1959年1047名。1957年有13个班级，而1959年有24个班级。共有11个教室，因此2个班要混在一起上课。

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有78个俱乐部设在食堂)，自己的图书馆。公社有2台移动电影放映机，每3天放映1场电影。经常有来自上海的剧团到公社表演。此外，还有业余的艺术小组，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业余小组。地方的皮影戏很受农民的欢迎。

生产队出版墙报。书写民歌，但是没有优秀的诗人。

公社社员的休息日每月2次(轮流休息)。

公社的文盲占25%(主要是老人,多子女的妇女)。到1959年1月,绝大部分的青年和妇女文盲都被消除了(教会600个字)。

该公社没有养老院,因为大部分老人都不是独身一人。独身的老人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内,得到公社的充分保障。今后他们打算组建养老院。

公社有7名医生,9名护士,11名卫生员。妇女在当地的门诊部产子,但通常都是在家里。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小组裁缝,他们不参加农业劳动。

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要依靠生产队的资金。但工人们要缴纳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学费,要由孩子的母亲们支付。

公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比如公社主席陈定亮(ЧэньДинлянь, 1921年生),他在解放前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49年被党派往农村,他在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各个阶段。他很聪明,是做各种农活的能手。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M.E.施耐德

АРАН, ф.457, оп.3, д.3, л.84-93

№20706 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59年10月2日)

摘自A.A.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4日

第1054/ДВ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的谈话记录

北京，1959年10月2日

我会见了金日成，并受H.C.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了今年9月27日H.C.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朝鲜的问题上的谈话内容。

金日成表示感谢我的通报，并完全同意H.C.赫鲁晓夫同志在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我对金日成说，昨天，即10月1日，通过莫斯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致H.C.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封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向金日成介绍了信件的文本。我说，实质上，艾森豪威尔的信证明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的信反映美国统治集团有点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由于无远见的对华政策而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艾森豪威尔的信就是在H.C.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的那个时候寄给他的——这决不是偶然之举；显然是考虑到了他与中国朋友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美国不愿意因台湾而被拖入一场战争。信中提出一系列不能为人所接受的论点，但同时又竭力强调指出，美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调解那些与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有关的问题。当然，如果H.C.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斩钉截铁地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并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的话，那么就可能也不会有这封信了。

我对金日成说，我是按照H.C.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有关上面指定的问题的消息的。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立场。他接着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美国人开始害怕战争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如可以根据艾森豪威尔的信来判断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引伸到朝鲜问题上去。美国人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有分寸的影响。

从我自己而言，我也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这一看法，我指出，国际形势的全面好转，特别是由于H.C.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在远东的局势中也有所反映。

金日成再次为上述通报表示了感谢。

出席座谈的有：朝鲜方面——保卫相金光侠和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M.B.齐米亚宁同志。

АВПРФ, ф.0102, оп.15, д.5, л.34-35

№1166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 中印关系的争论(1959年10月2日)

绝密

特别重要

文本第1份

H.C.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今天，应毛泽东的请求，同M.A.苏斯洛夫同志和A.A.葛罗米柯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住所拜访了他。

毛泽东：我们了解了艾森豪威尔给您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的内容，该信是根据您的委托在今天上午转交给我们的。

H.C.赫鲁晓夫：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使您了解我在1959年9月27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我访问美国的问题以及就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交换一下看法。最好由翻译将前面提到的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在此口头翻译一下。

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口头翻译了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

使中国人较感兴趣的是有关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的问题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如下言论：苏联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在德国问题上同样的立场。

H.C.赫鲁晓夫(在翻译结束之后)：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信件送往中国这里了。

毛泽东：就我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谈论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应当克制，推行温和的政策。

H.C.赫鲁晓夫：是的。

毛泽东：艾森豪威尔还说，有45个国家承认台湾，而承认我们的国家要少一些，战争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信件中有积极的成分，即谈到了不应让战争爆发的意思。我们也不想要战争。

H.C.赫鲁晓夫：您说得很对。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H.C.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

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H.C.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H.C.赫鲁晓夫：我一点也不知道中国还扣押了5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只能在北京提这个问题。

周恩来：1956年8月1日在日内瓦，我们同美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人可以返回美国，(移民)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但协议也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罪，他们将被逮捕。中国法律也规定，如果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他就可以提前得到释放。协议中有权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在中国安东地区而不是在朝鲜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这架飞机上的13名美国军人被俘。后来我们把他们全部都释放了。您记得，联合国曾经讨论过美国战俘的问题，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曾就此事到过中国。在哈马尔舍尔德之后，孟戴斯弗朗斯也就此事到过中国。美国人通过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想同中国举行谈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会谈就开始了。我们采取主动，释放了13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美国人没有进行争论的借口。在此之后，我们拘押的还有两名美国人——费克图和多尼。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当场抓住。当他们驾驶的飞机试图逃跑时，他们的飞机被击落了，在飞机上找到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殊装备。中国法庭判他们长期监禁，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20年。当哈马尔舍尔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他的使命不是就这2名美国人进行谈判。另外3个人长期居住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像这样的美国人约有90名，绝大多数已经释放，只有5名还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间谍，按

照中国法律被判监禁。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释放的美国人已经够多了。

H.C.赫鲁晓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假如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关押在美国的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交换有关人员，假如你们不打算采取对抗方针的话。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如果说要“招惹”的话，那当然可以继续把美国人关起来。而且，我们当时曾用一名我们关押的匈牙利间谍交换了拉科西。照我们看来，一句话，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

毛泽东(带着明显的不高兴和恼火)：当然，可以放，或者不放，我们就是现在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毕竟，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H.C.赫鲁晓夫：那好吧，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并且，看起来这使你们感到了恼火，这些都使得很难交换意见。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代表，也不是美国人的说客，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问题并阐述我们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会激化国际局势。

毛泽东：也就是使美国人感到为难。

H.C.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为难。我们有相当多的理由向美国提出我们的要求。毕竟，他们也扣押了为数众多的所谓的流亡者。我们立场中的弱点就在于，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愿回到苏联。当然，我们不会同美国人讨论关于释放在中国监禁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许诺，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美国人也是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台湾问题很清楚，在10年、20年也许30年我们不仅不会碰台湾，而且也不会去碰沿海岛屿。

H.C.赫鲁晓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至于5名美国人，我们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解决。您说您可以10年、20年甚至30年不解放台湾。这里最主

要的问题就是策略问题了。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台湾而战；但是对外界我们就不这样讲了，我们会说，一旦因台湾而局势紧张，苏联将保护中国。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应当明确两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而中国和美国有关台湾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

H.C.赫鲁晓夫：这很清楚，我们对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说的，正如你们从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节录中看到的。当然，任何问题肯定有它的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列宁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列宁临时承认了它。后来，正如它应该如此的，远东共和国重新回到了苏联。

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作为你们的盟国，我们对你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丝毫不知，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在这一地区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是盟国，应当就那些不仅会使你们卷入、也会使你们的朋友们卷入的所有问题交换意见。应当寻找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的途径，同时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和主权。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报告一切情况。我现在就要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成功的。

H.C.赫鲁晓夫：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

毛泽东：尽管我们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但不会解放它们。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H.C.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知道当杜勒斯去同蒋介石会谈时，他所得到的指示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进行炮击。我不理解你们的这种政策。坦率地说，我曾认为，你们要拿下这些岛屿，当听说你们没有拿下这些岛屿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H.C.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关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而仅仅是关于一些个别的措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同意不同意，现在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应当协调国际政策问题。看起来，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长就那些我们尚未达成一致的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对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你们有什么看法。

H.C.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H.C.赫鲁晓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自决问题。至于远东共和国，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毛泽东：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H.C.赫鲁晓夫：我们和你们对台湾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现在只是

关于策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怎样，你们都不愿制定出能够使我们理解的政策。你们会想，我们好像是在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们是在谈论自己的想法。因此，应当指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又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H.C.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5年3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休息1个小时，会谈重新开始。

毛泽东：我们做什么？

周恩来：继续吧。

毛泽东：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做，对我们不利。而美国人也不愿按照我们的意见办。

H.C.赫鲁晓夫：你们会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但是，我们是站在苏联的、共产党的立场上的。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无限期地推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离美国很远，是美国，不是我们，把舰队派到我们的海岸。

H.C.赫鲁晓夫：应该指出，我们也并非没有过错。毕竟是我们把美国人拖进了南朝鲜。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使得美国人可以作出回应，采取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您知道，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对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常果断。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时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还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职责，你们会相信这点。我们认为，需要制订整个

的行动计划，要使人民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我可以对您讲出很多方面，我本人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随时可以开火的大炮。我们预想随时都会遭到进攻。我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局面，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请注意，为取得这种成效，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其中包括，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就边界问题争论150年了。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的边界多出5公里，或者少5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亚拉腊给了土耳其。直到今天，在外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我说这些是要向你们表明，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资产阶级活动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而我们也没有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他——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尽管他反对过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会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应该在那里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

毛泽东：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此外，苏联就中印冲突问题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H.C.赫鲁晓夫：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声明是必要的。你们终究会注意到我同尼赫鲁的一些不同。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反对尼赫鲁的统一战线。塔斯社声明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错误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时，我们同西藏的人民群众还没有建立联系。

H.C.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没有同西藏人建立起联系。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不同。

H.C.赫鲁晓夫：当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我们那里和你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跑出来的朝鲜人。但这不会使我们有理由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同他仍然是好朋友。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如果他死了就更好了。可他现在在印度，也许会到美国去。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不能阻止他离开，因为同印度的边界线那么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走。

H.C.赫鲁晓夫：事情不在于逮捕，我只是说，让他白白地给跑掉了。是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去的，那么，尼赫鲁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H.C.赫鲁晓夫：那么，匈牙利事件错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们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有军队，我们支持那个愚蠢的拉科西。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美国的错。

毛泽东：难道可以把拉科西比作达赖吗？

H.C.赫鲁晓夫：假如你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属于他们的。

H.C.赫鲁晓夫：我们了解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知，尼泊尔想在自己那里有个苏联大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那里派遣大使。你们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让那里有苏联大使和中国大使。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对尼赫鲁不能期望什么。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揍揍他。

H.C.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要在同印度的边界上杀人？

毛泽东：他们首先攻击我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12个小时。

周恩来：你们更相信哪些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

H.C.赫鲁晓夫：尽管印度首先进攻，但是，中国没有死人，而印度却死了人。

周恩来：如果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总不能对空鸣枪吧。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最近将要来访。这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在我今年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们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H.C.赫鲁晓夫：周恩来同志，您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当比我更清楚，如何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会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那么，我一个俄国人就不需要插手了。我只是反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

周恩来：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另外，问题是中印之间有三块争议地区。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首先开火。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说，如果苏联边界遭到了芬兰人的进攻，你们会不会反击？

M.A.苏斯洛夫：我们不会对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H.C.赫鲁晓夫：中央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少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曾反对过什么。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禁止开枪还击，开枪还击的命令只是后来才下达的。斯大林的解释是，这也许是挑衅。当然，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实在是胆怯了。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另一回事。

朱德：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了我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毅：西藏叛乱后，在印度出现了多次反华、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在我们驻德里的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周围组织了游行，游行者的辱骂中国领导人，高呼反华口号。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也没有一点借口，说我们有不友好的行动。

H.C.赫鲁晓夫：同你们相比，我们苏联代表在国外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苏联大使在国外遇害。在我们苏联，仅有一位德国大使在1918年被杀。在我们苏联，美国大使馆和联邦德国大使馆的窗户被砸烂过，那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陈毅：如果讲到工作的效果，把尼赫鲁拉到自己一边，那么，我们的方法显得更有效，而你们的方法则是迁就。

H.C.赫鲁晓夫：陈毅是外交部长，善于斟酌词句。他这样说不是偶然的。我们已经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我们谁也没有迁就过，而是推行自己的、有原则的共产主义政策。

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主张要有恻隐之心，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压迫。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能在10月中旬来访。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迁就分子。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

H.C.赫鲁晓夫：瞧瞧都“左”倾到什么程度了。陈毅同志，您在向“左”走，但会走到右边。橡树坚硬，但它也会折断。我想，最好搁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此看法不同。

周恩来：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印度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

林彪：在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苏军在消灭法西斯后进入了柏林。这并不意味着是苏联发动了战争。

H.C.赫鲁晓夫：我这个中将是应该来教导您，元帅同志。

M.A.苏斯洛夫：林彪同志，您是在把完全不能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而这里发生的是一个小事。

周恩来：印度人不想从他们渗透的地方撤军。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因此，我们过去建议，现在还建议，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H.C.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

以前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在发动挑衅前的40天内，印度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华宣传。他们首先越过边界，首先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了事端？

H.C.赫鲁晓夫：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那里则犹如诺亚方舟。周恩来同志，您对这一点的理解不会比我差。

M.A.苏斯洛夫：应当理解诺亚方舟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彭真(怒气冲冲地)：纳赛尔在毫无理由地谩骂向他提供无私援助的苏联。其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谩骂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

H.C.赫鲁晓夫：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谩骂，但是，射击和谩骂是不一样的。

彭真：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卑鄙的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H.C.赫鲁晓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局部的边界问题，又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本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对此了解得都很晚，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所有这些，不仅尼赫鲁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西藏军区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当尼赫鲁得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时，他下令让他们撤回来。我们也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

H.C.赫鲁晓夫：如果在互相射击之后马上这么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在很长的时间内，你们都没有向我们通报这次边界事件。

刘少奇：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您通报了边界的情况。我们不能更早地通知您，是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周恩来：塔斯社声明，是在把我写给尼赫鲁的信件转交给您之前发表的。信件是在9月6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M.A.苏斯洛夫：看起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需要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

A.A.葛罗米柯：印度驻苏大使对我说，中国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平静下来，实际上使一切都后退了。

M.A.苏斯洛夫：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带有怒气地)：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

M.A.苏斯洛夫：不，不仅是这样，还因你们议会 [\[108\]](#) 的决定。

刘少奇：今年9月6日我通过安东诺夫转告您，我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印度人进行反击。

M.A.苏斯洛夫：你们议会的决定要比照会缓和得多。

彭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问我，如何理解塔斯社声明，是不是老大哥还没有弄清楚谁对谁错，就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

王稼祥：但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不是我们。

H.C.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首先开了枪，然后自己被打死了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谈谈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人向你们说这些话。

周恩来：中共和苏共之间会有争论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对外我们一直强调同苏联的团结。

林彪：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打了12个小时，直到打光了子弹。我们认为，对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打了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后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进行反击。

毛泽东：根据当地军事部门的决定进行了反击。

林彪：上面没有下命令。

毛泽东：我们没能留住达赖喇嘛，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大，他从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越过边界。

M.A.苏斯洛夫：需要提前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我们想对西藏的改造暂停4年。

H.C.赫鲁晓夫：这就是你们的错误。

毛泽东：推迟对西藏进行改造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但这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就采取了行动。看起来，这正是你们不明白的。以后您会相信，同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还会存在，边界冲突则会被消除。

H.C.赫鲁晓夫：那就好。但问题不是麦克马洪线。我们不了解这条线，也不想了解。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问题，我们将通过谈判解决。

H.C.赫鲁晓夫：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欢迎。

周恩来：今年1月22日我们曾向尼赫鲁建议，就边界问题的举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了。

毛泽东：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同印度的冲突是我们的过错，达赖喇嘛的逃跑也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迁就分子。请接受吧。

H.C.赫鲁晓夫：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塔斯社的声明，使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兴高采烈。

M.A.苏斯洛夫：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搞僵了，那帝国主义者才高兴。我们有情报表明，美国人已经向尼赫鲁建议，对于中印冲突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的行动扑灭了反动派的火焰。

林彪：整个问题是，谁先开的枪，而不是谁死掉了。

周恩来：结果就是，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我们把他揍了一顿，我们还犯了错。

H.C.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此外，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您，毛泽东同志离开了会场。这是表示抗议的行为，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话说，我也可以收拾箱子离开，但是我不这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因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谴责我们。我们也接受了这一教训。结果是，你们可以向我们提意见，而我们却不能。现在，甚至我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在说：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甚至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同我们说话不傲慢吗？

毛泽东：我们是以特别信任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你们这次也是如此。这很好嘛。这有利于事业。但是你们的公开言论，我指的是塔斯社声明，则是不好的。

A.A.葛罗米柯：塔斯社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摘读一些语句)。

彭真：我们也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毕竟是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然后开火，持续打了12个小时。毛泽东同志刚才说了，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什么事。

H.C.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认为自己是正统，你们的傲慢也表现在这一点上。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声明是支持印度，支持资产阶级的。

H.C.赫鲁晓夫：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也是一个政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毛泽东：那么，我们是在哪一条道路上？

H.C.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我们和你们共同

走一条道路，而且，把你们看作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我不明白，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不也从你们那里跑掉了。

H.C.赫鲁晓夫：达赖喇嘛跑掉，你们就没有错误？我们也犯错误，这是事实。我们让克伦斯基从苏联跑掉，是我们的错，但应该考虑到，这确实是发生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列宁信守诺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丁将军。至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赶走了他。尼赫鲁可能会倒向美国。当同我们在一起有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同路人。当我们给纳赛尔援助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反对我们。当他真的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他贷款建造阿斯旺水坝，这是一个策略。如果我们不给他贷款，纳赛尔可能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毛泽东：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我们在争取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H.C.赫鲁晓夫：我们不相信纳赛尔会坚持长期同我们站在一起。维系我们的只是一条很细的线，随时都会断掉。

陈毅：令我非常气愤的是，你们说“同印度关系恶化是因我们的错”。

H.C.赫鲁晓夫：你说我们是迁就分子，我也很气愤。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执掌政权。

毛泽东：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不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个别的分歧不会妨碍我们的友谊？

H.C.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看法。

毛泽东：我想澄清一下，当米高扬同志讲话时，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八大的那次会议。我需要同米高扬同志本人谈谈。

H.C.赫鲁晓夫：你不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米高扬要讲话。周恩来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是个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刘少奇：我们从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H.C.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应该听我们讲。请放弃政治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愿迁就谁，即便是朋友。

陈毅：但是，你们却对我们进行了两项政治指责，说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们仍然是在迁就。

H.C.赫鲁晓夫：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向你们指出你们的个别错误，没有对你们进行重大的指责，而你提出的则是重大的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迁就分子，陈毅同志，就不要把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应该说，我不怕你发怒。

H.C.赫鲁晓夫：不要自以为是元帅就瞧不起我们。这不值一提。不要斥责我们。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不再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因。我们不想由一个党来当头。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是虚假的。

毛泽东(用调和的方式)：陈毅说的是特殊性，不应普遍化。

王稼祥：问题在于翻译错了，陈毅没有把迁就当作一种主义来谈。

H.C.赫鲁晓夫：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不止一架，并且总是在说，它们是自己坠毁的。对此，无论怎样你们都不应称之为迁就。

M.A.苏斯洛夫：你们现在准备同印度谈判，这很好。

A.A.葛罗米柯：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发表一份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声明？我要预先说明，我这样说事先没有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过意见。

周恩来：不必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已经通知印度方面，在10月15日至12月1日这段时间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时

候来访。

H.C.赫鲁晓夫：我也要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刚才因副总统来访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是副总统，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迷惑，为什么不是总统和总理访问中国。

周恩来：拉达克里希南的人选是印度自己建议的。印度总统和总理已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我们发来了贺信。作为回应，我们再次想到了关于邀请拉哈卡里什南访问中国一事。

毛泽东：《真理报》在刊登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的时候有删减，而塔斯社的报道我们则是全文刊登。我们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到此结束，然后谈谈老挝问题？

H.C.赫鲁晓夫：好吧，让我们谈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重大，但对其却议论纷纷。今天胡志明来见我们，同我们谈了老挝问题。我让他去见你们，因为你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在波匈事件期间，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到过我们这里。我们同刘少奇同志的立场不同，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好多天，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我们的立场被改变了，但后来我们达成了一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我们反对老挝战事升级。

H.C.赫鲁晓夫：我们也反对。

刘少奇：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有一个扩大老挝斗争的计划，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他的立场。

H.C.赫鲁晓夫：不应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如果扩大的话，美国人就会卷入。那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上，肯定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这样，他们会直接部署在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很远。如果局势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会极为迅速地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则来不及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不要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历来都赞同，不仅不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而且应保持台湾地区的现状。我要再

说一次，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打算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Р.И.库达舍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

会谈记录：С.Ф.安东诺夫和Р.И.库达舍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210—3222页

№20636-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1959年10月3日)

1959年10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18日至10月5日

第25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0月3日

我参加了从北京归来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的欢迎仪式。在与我打招呼时，金日成说，他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谈过话了(关于谈话的内容却只字未提)，并转达了葛罗米柯和安东诺夫同志的问候。

晚上，我邀请了南日偕同其夫人以及应朝鲜劳动党中央邀请正在休养的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苏朝友好协会副会长В.П.米罗什尼琴科同志来赴晚宴。

米罗什尼琴科讲自己在朝鲜逗留期间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并请南日向朝鲜劳动党中央代为转达他对良好的休养安排和对朝鲜国情的了解

所表示的感谢之意。

我问南日，关于与H.C.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金日成对常务委员会成员们讲了一些什么话。

南日回答说，关于此事金日成将于10月5日向常务委员会通报。在站台上会面时他只是说，当他去北京的时候，他想的是，H.C.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过美国以后能否到我们朝鲜来，并简短地讲述了一下：中国在最近一年里建成了非常多的东西，并使铁路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接着南日讲述了，昨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与朴正爱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最后确定了诺沃提尼于今年10月7日从北京到平壤来访问朝鲜的计划。

南日在谈话中说，他与之谈过话的那些常务委员会成员(他没有报出姓名)正确地理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延期原因。南日说，其他领导人也会予以正确理解的。

АВРФ, ф.0102, оп.14, д.7, л.196

№26590 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09])

附录一

(拼写和标点符号保留)

中方关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5年工作的通报

亲爱的西卢亚诺夫同志！

亲爱的委员！

亲爱的同志们！

再过几天，即将迎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的日子。这5年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构建的中苏友好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仅代表个人和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对取得的这些成绩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对双方共同走过的这5年的道路由衷地赞赏。1954年10月12日

签署了《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同时成立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从那时起，委员会就积极展开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事务的组织工作。如今，我们召开的是第十次工作会议，这10次会议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签署了基于双方友好协商结果的会议纪要。这一时期，委员会双方的主席共交换了5封关于转交保密技术文件的信函。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共组织了4次双方学术秘书间的会谈。从第四次工作会议开始，双方就不间断地安排了187对业务对口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接洽，其中包括93家中方机构和171家苏方机构。

由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中、苏双方科学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合作项目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其总量不断提高。5年来，苏方向中方转交了近5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以科研为目的的学者和以技术援助为目的的专家，接待了近1000名以考察和提高业务水平与进行实践为目的的中方专家。中方同样也向苏方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约300名以考察或联合进行研究为目的的苏方专家。特别是转交技术文件和其他相互移交项目方面的数量，在1959年得到快速增长。仅1959年9个月的时间，苏方向中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就比1955年增加了5倍，而中方向苏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则增加了3倍。

1959年1月18日，中、苏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1958—1962年期间，中、苏将就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这标志着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将全方位更加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合作。从此，中、苏的科学技术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利用苏联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对我国加快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特别注重苏联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经验。几年间，我们已经在工厂设计和建造领域及主要产品生产设计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冶金行业，目前我们不仅能设计和建造中小型规模的冶金企业，还能设计和建造大型的冶金企业，可以冶炼500种钢，生产6000种不同类型等级的轧钢，自给率可达到国家建设所需轧钢总量的90%左右。机械制造领域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实现了从维修到制造的转变，并进入了从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到制造重要的、大型的、精确的和新型的机械和设备转变的阶段。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容量达1386立方米和1513立方米的高炉、

1150毫米初轧机、10000吨位的货轮、72500千瓦的液压机组、50000千瓦热电站的成套设备，以及超过250种金属切削机床。计划在本年度末设备自给率超过80%。电能产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设计100万千瓦左右的大型水电站，以及650千瓦高压和耐高热的电站。由于苏联转交的技术文件，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重要型号的产品，例如化肥、化纤和塑料、高质量的绝缘材料、航空漆、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比较复杂的采煤设备，自主研制现代矿井；迅速掌握了液压采煤技术，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此外，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我们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与苏联对华提供的兄弟般全面系统的援助是紧密相连的。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向以西卢雅诺夫同志为领导的委员会苏方组所有委员和以您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苏联政府、苏维埃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达深深的谢意。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5年来向苏联转交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经验。但由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落后，能向苏方转交的科研成果和经验总量不大。合作的第一年我们向苏联转交的成果主要涉及农业、保健、轻工业、纺织业和其他领域。而最近几年，我们逐步向苏联转交了冶金、机械制造、煤炭业、化工业和建设领域的成果和经验。我们非常愿意向我们最亲爱的苏联朋友转交这些成果。从锡卢雅诺夫同志刚刚演讲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苏联同志已经有益地应用了这些成果和经验，所以在此我将不再就此详细讲述。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是全面友好互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每个成果和每个发展阶段对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都做出了贡献。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交流不仅直接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对我们而言是最珍贵的。毛泽东同志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初就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之间建立在两个伟大国家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充分理解和深厚友谊。人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两个伟大国家通过协定确立的紧密团结是永久的、牢不可破和难以分割的。这种团结不仅会影响我们两国的繁荣，还一定会影响未来的人类、正义的胜利与世界和平。”我们确信，中苏科学技术合作越来越广泛的加深和发展将对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产生

深远而有利的影晌。

过去的5年中，科学技术合作中苏委员会在两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我们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事业坚定不移地发展，我们在该合作中永远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决遵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遵守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规定的原则。

5年来，我们双方的合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和提高。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正面经验，在我们的合作中已经基本得到应用。在此想归纳主要的几条：

第一，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紧密配合，这些规划应成为合作和双方共同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主要基础。由此可以较易获得结果，这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生产能力都成倍增加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国家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第二，合理发展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的直接联系。由于坚定不移发展合作要求不断充实合作的形式，所以从1956年起，委员会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一系列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联系，使他们能够及时交流经验。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意义上向前推动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

第三，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的工作是合作中积极的措施。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很大，依据工作会议召开的届期，一年只召开两次，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中苏委员会采取了措施，有目的地展开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包括建立直接联系和安排双方学术秘书进行必要的会谈，由此来加快实现决议的进程。

第四，完全必要加强执行决议的监督。5年来我们双方一直都在加强对执行决议的监督。特别是从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起，由于双方加强了对执行的监督力度，执行决议的情况取得了很大的好转，执行决议的及时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此阶段，苏联人民正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6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号召下，为实现工业和建筑业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为提前完成

宏伟的七年计划以及为缩短赶上美国的期限而积极斗争。中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高举党的总路线的光辉旗帜，在去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跃进，并为在今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为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而斗争。我们双方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和紧密合作，在两国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全面地借鉴先进经验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过去的5年是满载巨大成就的5年，但我们的工作中某些地方仍有不足。当然这些不足是在进步的道路上出现的，它们具有日常组织工作的特性。比如，总是存在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部分技术文件未能按期转交。在建立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直接接洽方面的工作开展存在不足，其中一些单位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与对口单位的联系。据此我们应该从合作的原则出发，发挥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未来的作用，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快速及时实现工作会议的决议，力争杜绝和减少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在未来加强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强化对对口单位直接联系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此外，对申请工作我们应该进行继续优化，确保申请编写得准确而具体。还有，必须要严格执行第七次工作会议相应的决议，即双方约定了相互通报的期限，对于紧急件的回复应在收到后不晚于1个月内答复，对于一般件的回复则应在收到后不晚于3个月内答复对方。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已经紧密合作了5年，在中苏团结友好合作的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过去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我们合作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和推进。中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将不断创造奇迹，这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日后加强工作的基础。未来工作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广阔的前景，其中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人民一直重视向苏联人民学习，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未来我们将继续学习并在科学技术领域充分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

至于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经验，如果对苏联的建设事业有益，我们将尽力满足苏方的要求。在跨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新篇章之际，我们深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我们的合作将取得更大的发展并将作出巨大贡献。

№26591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10])

附录二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及该领域交流经验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进行的。按照该协定，双方相互转交了技术文件，交换了相关信息，并派遣了技术援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研究了双方关于互换科学技术文件和派遣学习经验专家的申请，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从第七次委员会工作会议起，为了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技术经验交流的周期，在工作会议休会期内收到双方相互的申请，通过决议后在应届工作会议再形成工作纪要的形式越来越普遍。

苏方的信息内不包括本届第十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的工作总结。

在已召开的9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方转交5763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含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以独立附件形成的，由赴苏联对苏联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中方专家所选出的1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以及991名中国专家对苏联171项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决议；

——关于向苏联转交79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和397名苏联专家考察146项中国科技成果和经验的决议。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按照这些决议，在科技合作方面，苏联至今已向中国转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1018套各种工艺流程组

织的文件和3094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件。除此之外，有879名中国专家访问了苏联的企业和单位，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同样，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的项目，188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299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献和资料。有294名苏联专家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对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内展开。在此情况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占比最大的是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寻求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的领域主要为农业，占18.5%，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从中方向苏联申请获得科技文件的性质分析来看，可以确定，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工作图纸、工艺流程描述申请的优先是机械制造类产品，并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车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等，还有就是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文件，如黑色和有色冶金业、化工业及其他行业。

随着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援助下进行新建企业及改造老旧机械制造企业、冶金企业、化学和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企业，中方所提申请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例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中国在提出其他申请的同时，向苏联提出了申请转交10吨位干货海运船的生产技术文件，20万千瓦功率汽轮机、大型冶金设备、轧机、高炉与平炉设备的生产工作图纸和技术设计文件，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同时，苏方在苏联利用中国经验和成果的项目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初期主要借鉴了农业和卫生保健领域的经验，但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与科学的了解，苏方所提申请的范围也拓宽了，在机械制造、冶金、燃料工业、化工和建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借鉴中国的经验。

中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人和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苏联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快速增长，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的工作，在科学技术合作中寻找新的组织形式，能高效和高质量解决那些与完成两国发展未来规划和超额完成相关的问题。如我们在这方面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与合作的决议，还有更加先进与完善及更符合两国需求和潜力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

在第四次至第九次苏中委员工作会议所述的意见指导下，通过了关于苏联158个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个中国相应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直接合作的决议。按国民经济行业的划分，建立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见附录二。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须指出，在该合作框架内，与重工业、机械制造、农业和其他中、苏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发展相关的任何根本问题都能组织共同研发和经验交流。目前有48对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交换文件和互派专家，以及就独立的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来实现。

就独立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的苏中科研设计院所的大致名录见附录三。

从这个简短的进行共同研究的院所名录中可以看出，就科技含量方面正在进行哪些重要和深入的工作。同时必须指出，我们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这种较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还不够完善，同样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在进一步提高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方面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慎重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工作这一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合作的未来发展和进行科技领域的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1962年期间，双方共同进行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项科学技术课题的研究。

应该说，委员会苏方组在履行由这个协定规定的苏方义务时，不仅限于对我们工作会议中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的相应活动正式表示赞同，还积极参加了其筹备及后续的实施。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第四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

据苏方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共同决议，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3次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办理了向中国转交科技文件和样品的手续，还有派遣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进行技术援助和接收中国实习生和研究生赴苏联学习。依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43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派遣了232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举办了讲座，并在科研工作进行中提供了帮助。苏联接收了57名前来学习和提高技能的中国专家。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我们认为，令人可喜的决议是确认了我们的总路线，即在加快和改进我们相互利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和成果方面，将消除一切阻碍或形成的一些额外的困难。

应当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按照1959年双方同意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44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同时，中方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苏联科研机构与中方机构继续参与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共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技术专家进行讲学和咨询，并在勘探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现代高效能生产机械与设备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方面提供了技术援助，此外还接待了215名派往苏联的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点型号生产领域进行了培训和技能提高。

1959年，苏联机构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带领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间共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带领

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还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并对在中国进行的47项科研工作就设计和结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至1959年8月，负责参与解决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的中国机构向苏方相应的机构完整地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的结果表明，中方拟定的所有形式合作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略有提高。这要求苏方采取补充措施，以满足中国组织和机构增加的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规定的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相关的申请。期望双方能及时研究这些计划，并根据双方的协商在1960年初获得批准，以便在相应的机构和单位为其实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同志们!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在过去的5年内不断发展巩固，并促进了两国的技术进步。这从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内我们大量相互利用两国先进经验和成果中显而易见。

为了例证中国经验和成果在苏联的利用，我想请大家只关注简短的实例清单。

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苏联采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还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令人满意。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

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斯、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用“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000条1岁的鲢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鲢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工业建筑方面所获文件的利用可以列举如下例子：

在库兹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在生产条件下进行了结果检验。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道路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四。 [111]

从中方的信息可见，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与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我国这种有效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利用鼓舞着我们继续更好地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中科学技术合作。

为了更全面地体现科学技术合作的范围和特性，以及发展和巩固苏中经济关系方面共同任务的这种合作联系，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合作紧密相连，与苏联通过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密不可分。

许多苏联设计单位参与完成了中国项目的设计。苏联的许多设计单位，如“国家热力工程科研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超过10个现代化的电站的设计，“国家煤炭矿井工程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设计了许多煤矿和选矿厂，“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完成了大型冶金联合企业的设计，莫斯科“国家有色金属企业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有色金属工厂的许多设计工作等。

苏联为中国所做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是苏联现有的先进的新技术，其中还包括利用了众所周知的国外最新成果。正如中方李富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对这部分工作所做的评价，他说：“苏联为我们所做的设计包含了最近几年的技术，而提供的设备是最好最新的。”

为了在苏联援建的项目建设中和对援建企业掌握生产方面提供技术帮助，以及向中国提供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苏联总共派出了7000余名专家。

过去几年，有超过7000名中国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在苏联企业中实习。

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摘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设计和建设中，苏联专家对中国朋友竭尽全力提供帮助，直接复制了国内工厂的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在建设中应用了苏联的标准方案和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取得的可再次利用的项目方案。

在从苏联转交的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设计文件基础上，中国的朋友编制了配套的设计方案，建设了超过400个现代的工业企业和工程。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140家工厂根据苏联的技术文件掌握了2620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

根据中国朋友的通报，利用苏联技术文件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设计周期、建设周期和投产期，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是保证工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工作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确实如此。但如果苏方没有指出自身一系列批评性的建议，也没有使我们的朋友注意，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工作中存在许多相同的不足之处，那将会出现许多不全面甚至是不正确的决定。

在实现苏中科学技术的合作中，以及在苏中委员会两方的工作中都存在不足之处，大致可归纳如下：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3个月才回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4至5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掌握了因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个别例子。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阐述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同志们，1959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12\]](#) 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15—20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年8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10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15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全会(1959年6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将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工业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即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顺利建设，为了1959—1965年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地，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委员会苏方组认为有职责和义务尽全力高质量和及时地满足中方的需求，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在苏联利用中国悠久的经验和成果，同时积极促进苏共二十一大和中共八大会议确定的伟大任务。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60, л.125-137

№26592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13\]](#))

苏方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的通报 [\[114\]](#)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展开的。按照该协定两方相互转交技术文件，交换有关信息，以及派遣进行技术帮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的历次工作会议上，研究了两国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派遣取经专家的申请，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从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起，为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交换技能经验的时间，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在休会期间相互审核对方的申请，并通过其决议，随后纳入下次例行工作会议的纪要中。

在已召开的第九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国转交6100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992名中国专家介绍苏联16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向苏联转交782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462名苏联专家介绍中国187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根据这些决议，截至目前苏联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共向中国移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1018套组织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的文件以及3094套各部门的技术文件。此外，有929名中国专家以考察苏联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为由访问了苏联企业和单位。

同时，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项目、188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352套部门技术文件和书籍。苏联专家共计337人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展开。在此情形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的最大占比集中在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询问最多的科学技术文件主要集中在农业(占18.5%)，其次是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关于按国民经济行业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二。

分析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申请的特点后，可以确定，

中方在初期向苏联提出的申请主要是获得机械制造产品的工作图纸和工艺流程描述，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机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以及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部门相关的组织工艺流程文件。

随着在苏联帮助下实现机械制造、冶金、化学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中方所提申请的特点也随之改变。比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伴随着其他请求，已经开始向苏联申请转交生产载重量达10000吨船舶的科学技术文件、生产功率达20万千瓦的蒸汽轮机的工作图纸和技术方案、大型冶金设备的生产(轧机、高炉设备和平炉设备)，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以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按照苏中委员会第四次至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要组织158家苏联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家中国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直接合作。具有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按照行业的分布见附录三。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要表示，在此合作框架下可以就任何与发展重工业、机械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中国和苏联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相关的重要问题能组织联合研制和经验交流就可以了。目前有48对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联和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互换文件、互派专家以及对独立的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来实现。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的联合研制是先进的合作形式。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的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的名录见附录四。

从所列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科学院所和设计单位间最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未完全得以实现，而且我们在进一步改进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交流的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拥有的巨大潜能。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我们工作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在科学技术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和进行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年至1962年间，双方就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个项目进行联合研究。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第四项内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据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在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关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与样品和向中国派遣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学者和专家，以及接收中国实习生和副博士研究生赴苏联学习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437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共向中国派遣了147名苏联学者进行授课和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帮助，还派遣了28名苏联专家对华进行技术援助。苏联还接收了49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届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需要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协定中，所有上述的苏联机构都对中方的机构提供了大量帮助。在1958年间，根据这个协定，按照中方的请求共有455名中国专家对研究工作进行了考察并增长了知识。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了243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进行了授课和咨询，对科研工作进行了指导和技术援助。转交和准备好转交的有：546种机器、机组、设备和仪器的整套设计和图纸，研究工作的学术成果和报告840份，以及其他技术文件1326份，并对提交给中国机构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鉴定。

根据双方同意的1959年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44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课题的文件。

苏联的科研机构继续与中国机构一同进行解决重大科技项目的工作，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专家进行授课，在自然资源的勘探与无线电应用及现代高生产效能机器和设备的设计和生

产开发领域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还接收了215名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要生产类型领域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一时期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对在中国进行的47个课题的科研工作的设计和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负责承担122个重大科技项目的机构，在1959年8月完整地向苏方相应的机构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表明，中方草拟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要略微多一些。

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不断发展和巩固，促进了两国的进步。

比如，在苏联采用的中国农业经验对苏联的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形势喜人。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斯、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

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以“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000条1岁的鲢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具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鲢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在庫茲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НПОХИМ)在生产条件下对结果进行了检验。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五。 [115]

根据委员会中方组提供的初步信息，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

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和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在委员会中方组的通报中报道，依据1957年7月1日前获得的苏联文件，中国设计了159个大型和小型项目，掌握了202种生产并开发了104个重要的新产品。

委员会中方组委员江泽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中国60%的机械制造产品根据国外获得的文件生产。其中这部分文件中，苏联文件所占比例达85%。1952年至1957年间生产的515000台机车总数中，按照苏联文件生产的机床达435000台。从苏联获得的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文件在中国的应用达到95%。

评价从苏联获得的科学技术文件和生产经验对于中国机械制造的意义时，江泽民同志说：“1953年我们开始仅掌握了‘K’型泵、373型平磨机床、750公斤空气锤和10立方米/分钟空压机的生产，即呈现出一般技术要求的产品。1958年我们已经开始生产许多具有较高技术指标的新的复杂的大型产品，例如：用于年生产能力达5万吨的氮无机肥料工厂的成套设备(包括320个大气压的高压反应器，10000立方米/小时的空压机)；2430型高度精密的坐标镗床；载重能力达250吨的桥梁起吊机；功率达5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设备；1万吨位的海轮；高度经济的快速蒸汽客运机车；功率达7250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设备；40500千瓦、154千伏的大型变压器；22万千伏的高压断路器；0.5级的精确电表；各种拖拉机；煤气汽车和瓦斯罐汽车；轻型汽车等。总而言之，若干年间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取得了空前的业绩。这些成绩离不开苏联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

在即将到来的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讨论该问题时，所列数据将补充委员会中方组所通报的数据。

在展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以及苏中委员会双方的工作中仍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归结为以下几点：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3个月才回

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4—5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推动了由于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一些个别典型。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新闻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报道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1959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16] 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15—20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年8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10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15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中央全会(1959年6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生产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为了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苏方尽自己的努力，在今后将继续尽力最大限度地及时满足中方提出的申请。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03, л.26-37

[1] 根据米高扬1958年5月12日在致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上标注的日期。——原注

[2] 名字是用铅笔写的。——原注

[3] 未公布。——原注

[4] 原文如此，据1958年5月25日《真理报》，5月24日会议参加者在克里姆林宫聚餐。——原注

[5]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编注

[7] 此处文字摘抄时遗漏。——编注

[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9]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名单。——编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致H.C.赫鲁晓夫的1958年6月28日信函中，正式向苏联提出了关于帮助建立中国海军的请求。尤其是，中国人还请求帮助他们建立潜水艇舰队。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П.Ф.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并提议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潜水艇舰队。这个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驳斥，他声明说，他对建立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合作社”不感兴趣。——原注

[12] 中央主席团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准备苏共中央就建立中国海军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的草案(РГАНИ, ф.3, оп.14, д.223, л.2)。——原注

[13] 信函所标明的日期是1958年7月14日。——原注

[14] 6月19日，美国一名军事部长马克尔公开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反对阿拉伯人民。他说，如果美国武装力量不得不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在中东使用载有核炸弹的轰炸机。——原注

[15] 1958年7月17日，黎巴嫩议会主席致信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信中认为美国向贝鲁特派遣军队侵犯了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要求外国武装力量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原注

[16] 7月21日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会晤，讨论关于中国请求帮助建设海军的问题。尤金提出了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第二天，毛再一次邀请尤金谈话，又提到几个月前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并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认为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编注

[17] 毛泽东在与尤金会谈时提出愿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所谓“情况不允许”，是指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决定要同西方领导人会谈，以解决中东危机问题。后来会谈取消，赫鲁晓夫于7月30日秘密访问北京。——编注

[18]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9] 这段文字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20] 这句话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21] 原文如此，应为1958年5月22日。——编注

[22] 参见以下文件№20392。——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手写日期没有印上。——编注

[24] 在中方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编注

[25] H.K.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曾任海军总司令。——编注

[26] C.Г.戈尔什科夫，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编注

[27] G.摩勒，时任法国总理。——编注

[28]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29] 在关于这次会谈的中文记录中，有关中方出席人员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杨尚昆。——编注

[30] 此处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共有65万军队。”——编注

[31] 谢哈布，时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当选总统。——编注

[32] 夏蒙，时任黎巴嫩总统，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下台。——编注

[33] 7月19日日本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黎巴嫩危机的提案说：鉴于美国政府表示它是“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而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去的，联合国观察团继续目前的活动是适当的；日本的提案主张加强这个观察团，以便造成使美国部队能够“迅速地撤退”的局势。——编注

[34] J.杜克洛，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35] 费萨尔，1953年就任伊拉克国王，1958年7月被推翻，在政变中被打死。——编注

[36] 阿列夫，时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理。——编注

[37] 阿尔·卡里姆·卡塞姆，1958年伊拉克政变后出任的伊拉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38] 穆罕默德·纳吉布，1952年埃及政变推翻帝制后成为第一任埃及总统。同年纳赛尔发动政变，仍保留了纳吉布的领袖地位，但自己掌握着实权。1954年纳赛尔担任总理后，将纳吉布长期软禁起来。——编注

[39] 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伊拉克共产党比较大吧，据说有2万多人？——编注

[40] 此处中方记录为：中南海颐年堂。——编注

[41]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42] 在中方的记录中，中方出席人员除毛泽东外是这样记录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编注

[43] 1958年5月2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主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强行扯下悬挂在展览会上的中国国旗，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反华事件。对此，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于5月9日发表谈话，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各有关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提出抗议。中日贸易于12日全面停止。——编注

[44] 扎波罗热营地，16—18世纪第聂伯河石滩地区的乌克兰哥萨克组织，受哥萨克统领领导，与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以及波兰和乌克兰的封建主打仗。——编注

[45] 在中方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季米宁、李海秋。其中季米宁即齐米亚宁(М.В.Зимянин)，李海秋应该是苏联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И.Лихачев)。——编注

[46] 这里指米高扬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编注

[47]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С.赫鲁晓夫、Б.Н.波诺马廖夫、В.В.库兹涅佐夫、Р.Я.马利诺夫斯基、П.Н.Поспелов、М.А.苏斯洛夫和Л.И.勃列日涅夫。——原注

[48] 苏联国防部向社会舆论通报说，7月18日，按照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事准备计划，在外高加索和土库曼军区进行了陆军和空军军事演习。黑海舰队也参加了外高加索的军事演习(《红星报》1958年7月17日)。8月7日，中央期刊通报了军事演习活动的结束。——原注

[49] 指的是保加利亚海陆空军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始于1958年7月18日。苏联一个空军师和保加利亚人民军一起参加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空军元帅Н.С.斯克里普科领导(《红星报》1958年7月19日)。8月8日《红星报》通报，军事演习结束。——原注

[50]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2] 原文如此，此处日期有误，应为23日。——编注

[53]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55]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为《黄鹤的故事》，下同。——编注

[56] 俄文原文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意为天空之门。但北京没有类似名称的剧场，估计可能是指“天桥”剧场。——编注

[57] 原文如此。——编注

[58] 手写签名在档案复印件中被遮蔽。——编注

[59] 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董守义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20日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同时退出各国际体育组织。——编注

[60] 布伦戴奇(Arery Brundage)，1952—197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编注

[6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62] 该档案系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所藏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文件，译自英文节录本。——编注

[63]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俄文翻译用的是一句俄国谚语“让病人喝牛奶”——意思是于事无补。故此推断，毛泽东的原话可能是一句成语“亡羊补牢”。——编注

[64] 在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还有赫鲁晓夫1958年9月19日所写便条的复印件以及附录的由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19日口授的一些信函的底稿；B.B.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4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B.B.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6日报告和附录在新印本中的未加修改的原始资料，B.B.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7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参见：РГАНИ，ф.3，оп.12，д.433，л.9-139。——原注

[65]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6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67] 指的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航空和炮兵装备的问题。——原注

[68] 苏联生产的一种导弹系统的型号。——编注

[69]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共中央思想、文化和国际党务联络问题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原注

[70] 此处原文为Оспан(奥斯潘)，当是新疆匪徒乌斯满。——编注

[71] 赫列布尼科夫，时任驻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译注

[72] 在原件中，这段话被画出，并有手写批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编注

[7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76]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7]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78]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译注

[79] 此处原文为Чен Тяофу(程眺福)，当是曾昭抡。1957年曾昭抡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后由柳大纲任代所长。——编注

[80]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8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9] 当时实际人口应为6亿多。——编注

[9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蒙古与苏联建立的一个批发贸易股份公司。——编注

[9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9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5]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96] 原文如此，估计是中国驻印度政务参赞符浩，下同。——编注

[9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10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2] 克里斯纳·梅农，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编注

[103] 拉达克里希南，时任印度副总统。——编注

[104]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记。——译注

[105] “五反”运动的目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产。——原注

[106] 原文如此。——译注

[10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08] 原文如此。——编注

[10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0]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1]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112]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8年5月。——编注

[11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4] 该档案内容与以上文件№25691大体相同，经过对比，估计该文件是初稿。——编注

[11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116]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8年5月。——编注

第九卷(1959.10—1962.12)

1959年

№26593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年10月12日 [\[1\]](#))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工作会议于1959年10月5日至12日

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H.M.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B.K.罗斯托茨基、П.Г.特列季亚科夫、С.Я.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И.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钱信忠、刘冰、杨显东、江泽民、李
苏、严济慈、张化东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二、审议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三、审议关于补充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的数量问题；

四、通报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五、通报双方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和该领域经验交流的总结；

六、确定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讨论了第十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通过以下决议：

一、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26位苏联专家介绍了12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7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双方确认，中国机构在第十次与第十一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苏联机构转交了21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二、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8位中国专家介绍了10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四；并向中国机构转交了228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双方确认，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3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三、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的对口设计单位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七。

四、双方通报了上一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同意解除履行和延后项目完成期限，见附录八和附录九。

五、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双方所做的工作。

双方满意地提到了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绩。合作5年来，苏联向中国转交了近500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学术访问学者和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接待了近1000名中国专家前来考察、提高技能培训和实习。同时，中国向苏联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近300位苏联专家考察和进行共同研究。苏中科技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繁荣，还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双方也指出，在我们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

双方提出申请的项目没有充分论证和准确表述，所申请项目的审议时间过长。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联系发展不够，特别是在联合研制专题科研项目的领域。关于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相互通报不够。

由于两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消除不足，利用取得的积极经验，要更广泛和及时地交换科技成果和经验，更好地促进两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因此，双方认为，必须要：

在双方的项目申请中要尽力做到充分论证，有具体准确的内容，并提前告知；

更坚决地实现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双方申请审议进度的决议；

未来要对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进行通报；

尽力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他们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中所获初步结果建立相互通报机制。

六、双方决定，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将于1960年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

本纪要于1959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共有9个附件 [2]，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部分。中俄文正本2份，双方各持1份，且两种语言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26594 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 第十次会议(1959年10月12日以后 [3])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Ю.Е.马克萨廖夫：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汇报

根据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及1959年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1959年10月5—12日在北京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

——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

——关于补充追加苏联和中国对口项目单位的数量，使其相互之间合理地建立直接的合作；

——关于委员会上届工作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双方通报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根据委员会签署的第十次工作会议的纪要，苏联机构将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向中国机构转交261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33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0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21个项目的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将接待18位中国专家，并让他们考察苏联1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期也将接待26位苏联专家，并让他们考察中国12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对委员会之前通过的决议进行补充，让苏联国家矿业企业设计院与中国鞍山矿业设计院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建立直接联系，还有交换执行上次会议通过决议的信息。

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恰逢苏联和中国之间签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5周年之际。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了双方关于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在第十次工作会议上通报的中方信息中强调，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在加快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改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在工厂设计和建设领域，以及重要工业品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中国用几年的时间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韩光说：“比如像冶金业，目前我们已经不仅可以自行设计和建造中小型冶金企业，还可以设计和建造大型冶金企业，能冶炼出超过500个牌号的钢，以及能生产出6000种由不同钢牌号的钢轧制出的钢材。因此，轧钢的自给率可达我们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总轧钢数量的90%。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如果之前我们只能够进行维修工作和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那现在我们已经转向生产重要的大型的新型精密机械设备和仪器。有能力设计和生产容量达1386立方米和1513立方米的高炉、1150毫米的初轧机、载重量达10000吨的货轮、功率达72500千瓦的水力机组、50000千瓦发电机组的成套设备和超过250种金属切削的车床。截至本年度末，中国国民经济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了80%。在电力工业领域，我们已经设计了装机容量约为100万千瓦的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装机容量为65万千瓦的热电站。由于苏联提供的技术图纸，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一些重要的化学产品，像化肥、化纤和塑料、高品质绝缘材料、航空涂料、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较为复杂的采煤设备和设计现代的矿井。在苏联采用的液压采煤技术，被迅速掌握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及其他领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这些举例可以看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由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兄弟般全面而系统的帮助。

“通过科学技术合作这条线展开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交换，不仅直

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两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学者专家和科技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向委员会苏方组的所有成员，并通过您向苏联参与实现科学技术合作的学者、科技工作者和专家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提供的兄弟般无私的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已初步获得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意的苏方的通报中，表明了科学技术合作与发展和深化苏中经济关系的共同任务间有斩不断的联系。在通报中指出，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根据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1018套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的文件，及3094套不同行业的技术文件。向中国转交的科学技术文件的总数中，约70%集中在重工业行业。同期从中国获得3个基本建设项目，188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299套行业技术文献和文件。所获的大部分文件涉及农业、纺织业、轻工业和食品业，还有卫生保健领域。最近从中国的申请及相应获得的文件涉及机械制造、化学、冶金、矿业和建筑。

在苏方的通报中表明，共有158家苏联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与88家中国相应的对口单位展开了直接的联系与合作，指出了加强独立科研项目共同研发的必要性，并列出了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利用所获中国经验和成果方面的数据(列举了实例)。

在通报了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框架下苏方完成的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的同时，通报中还表明了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责任履行情况。

委员会中方组发言的委员们对苏方的通报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其用确认的实例以独立的章节进行了补充。

鉴于双方就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通报交换了意见，双方满意地指出了5年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还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境界。

双方还指出，在实现科学技术合作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

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

双方申请的课题，大多情况依据不足且描述不准确。申请的课题审核时间比较长。在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在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发领域。关于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交换不足。

此外，中方就苏方延期交付执行1958年1月18日协定相关的涉密资料问题提请关注。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合作的组织工作，双方认为必须：

尽力使双方的申请更加富有依据，有准确具体的内容，并且提前告知；

更加坚决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审核双方申请的决议；

今后定期交换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

尽量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组织他们及时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时所获的初步结果进行相互通报。

鉴于提出的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1959年9月10日决议中苏方组根据其报告给出的评价相符，联合会已通过关于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组织中消除现存不足的措施，可保证排除委员会工作中指出的这些不足，因而不建议采取其他任何补充措施。同时委员会苏方组将采取全面措施，以完成1959年9月10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授权，在1959年10月12日签署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时，在预先没有通报苏联驻华使馆和委员会苏方组的情况下，向委员会苏方组的委员H.M.西卢亚诺夫同志、Φ.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B.K.罗斯托茨基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B.A.孔德拉季耶夫同志授予了“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转交了若干枚“中苏友谊”勋章，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

员：A.H.阿斯科琴斯基同志、K.A.弗拉索夫同志、M.И.伊万诺夫同志、B.И.奥夫相金同志和委员会上届委员：H.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A.B.戈卢布科夫同志和A.Л.马利琴科同志。

签署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时，苏方参与的人员除了代表团之外，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事务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С.Я.符明同志和H.K.安德罗索夫同志。

双方决定将于1960年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H.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03, л.2-8

№099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 中印关系(1959年10月14日)

摘自С.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0月21日

第424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14日

按照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

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200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军。

毛泽东继续说，在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H.C.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

对此，毛泽东指出，H.C.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 and 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

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10—20年，甚至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年(1918—1940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1958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来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

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12000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600—7000人。大约有5000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80%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为了表明西藏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尽力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毛泽东说：“达赖喇嘛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毛泽东进而又说，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倒比留在中国好，如果他留在中国，许多西藏的农民们就不会投入到民主改革中去了。毛泽东继续说，如果我们逮捕达赖，就会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抗。

毛泽东补充说，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是很难理解的；只有在西藏，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此，西藏的农奴阶级对地主的仇恨和憎恶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大部分地主已经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农奴，农奴自发地、热烈地赞成现在正在实施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说，西藏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在中国甚至还有外国殖民地，比如说澳门。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400年前就从中国掠走了这样一大块土地。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共中央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制定出现在不触动澳门的方针。

毛泽东特别提到：“当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在一定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稳定。比如说去年，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指责中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但是，美国最终是孤立的。在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之后，美国并没有履行保卫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职责，他们处于了一种被动地位。”毛泽东继续说，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非

常微妙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他补充说，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与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毛泽东继续说，总的说来，我们去年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可以看作是为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麻烦中的另一部分是苏联制造的柏林问题的发展。中东危机、炮击海岛和柏林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事件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毛泽东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你们在欧洲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可能性。他继续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和蒋介石发生战争。”

毛泽东说，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尽了我们所能。美国人不想承认我们，并且每天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在报纸上和官方声明中以各种方式诅咒我们。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美国终止占领台湾的期限问题，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5—10年或者15年内撤离台湾，我们就准许美国在台湾待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我们和他们做一种交易：你们美国人喜欢哪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永远保持紧张的局势，还是在一段时期后履行离开台湾的义务？毛泽东评论说，这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在华沙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果美国同意，那么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太愚蠢，他们寄希望于动用武力和制造高压。毛泽东继续说，中国没有派飞机飞往台湾，就连中国防空部队的侦察机也没有飞到过那里。同时，一直有美国制造的飞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实际上，不久以前，借用从苏联得到的武器，我们在北京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我对毛泽东说，从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来看，目前，这种武器已经从苏联运到中国，而且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使用上了这种武器，并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击落这架飞机的荣誉属于中国防空炮手们。我插话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们的武器的评价，并且将这次胜利与我们的帮助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听了苏共中央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又说：“你们的估计（比如对苏美关系）是正确的。我们表示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而又说，冷战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已经慢慢变为一

个不利因素了。而只有在冷战真正成为对他们不利因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才会结束冷战。毛泽东强调说，在他与H.C.赫鲁晓夫同志在1958年7月至8月的会谈中，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现在想要结束冷战，似乎对他们不利。毛泽东继续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冷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如果美国像以前一样，坚持强硬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得更强硬，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毛泽东随即又说，1957年12月在莫斯科和1958年7月到8月在北京举行的他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曾就关于冷战将要成为美国的不利因素，关于哪一方害怕战争和关于好战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特征这些问题，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换了意见。这些集团的特征不仅仅是具有攻击性，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还具有侵略性。如果我们内部非常稳固，那么这些集团的成员将会采取守势。他们建立基地，就像用水坝阻挡洪水一样。上面提到的各个集团，就像是这种水坝一样。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的细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毛泽东进而又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殖民地，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许多范围内都有势力。毛泽东说，比如说美国，每一件事——从台湾到土耳其，其本质就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掠夺了许多东西，他们企图在每一个地方抓住每一件东西，不想让任何东西逃避他们的掌握，甚至是我们中国的金门岛。毛泽东继续说，比如说，在我们看来西柏林的版图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美国人非常害怕失去它，他们从各方面抓住它，他们显然害怕失去西柏林之后，会降低他们的国际威信，就好像他们失去西柏林就会失去其他一切一样。

毛泽东进而又说，至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列强应该开始明显地减少他们在西柏林的驻军。这需要很长时间，大约1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些西方人将被迫完全放弃西柏林。

毛泽东反复说，美国人害怕放弃任何东西。他接着说，但是，现在，即便是在远东，我们也不会碰他们，甚至是在像澳门或金门这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方。通常，美国不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碰他们，哪怕是最轻微的。他们不希望我们碰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任何地方。毛泽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骚扰他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国

土，我们可以用20或者30年，甚至更长时间生存、发展，最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

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

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目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对此，毛泽东讲述了1957年5月24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遭到破坏的那天(这件事是由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关系紧密的人组织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如何发现美国讨论推翻蒋介石计划的机密文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文件是在美国大使馆遭到破坏的时候，在示威者们用大铁锤砸开的保险柜中发现的。由此可见，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毛泽东同志对给他的那个机密报告表示感谢。他请求我们代他向H.C.赫鲁晓夫同志和那些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所有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问候。

我本人对这次谈话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简要地向他讲述了苏联1959年经济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已经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情

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

大使馆顾问B.H.魏列夏金同志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翻译阎明复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安东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大使馆以前曾以电报方式发送过该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 [4]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л.89-96

№1383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0月15日会议第24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A.B.阿里斯托夫、H.И.别利亚耶夫、Л.И.勃列日涅夫、K.E.伏罗希洛夫、H.Г.伊格纳托夫、Я.Э.卡伦别尔津、A.П.基里连科、A.И.基里琴科、Ф.Р.科兹洛夫、Д.С.科罗特钦科、A.Н.柯西金、O.B.库西宁、K.T.马祖罗夫、B.П.姆扎瓦纳泽、H.B.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M.A.苏斯洛夫、E.A.福尔采娃。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党和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勃列日涅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科兹洛夫、库西宁。)

问题的紧张程度——应该进行改善。

不进行辩论活动。

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

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

斯大林所执行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着反对派，如果它出现了，那么，就要彻底地消灭。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民主化。

我们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

与中国朋友的会谈记录，没有被保留在档案馆里，而是被销毁了。

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口头通报了会谈情况。

把尤金与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告知金日成。 [5]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情况。

代表团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的活动受到了赞扬，并认为访问的成果是富有成效的。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准备材料。

关于安东诺夫同志的电报——委托通过大使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

关于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3封信件——应该转交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答复。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10, л.32-33

№207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年10月15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10月15日会议第244/1号记录

一、称赞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做的工作，这次访问是为了庆祝中国建国10周年进行的，这次访问的成果是积极的。

二、认为应该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报告。

委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准备关于这次报告的必要材料。

三、决议。把同中国朋友们谈话的情况口头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同志。

四、决议。当金日成到莫斯科的时候，让他了解尤金同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五、把代表团从中共中央那里得到的关于格鲁吉亚一个集体农庄工作状况的3封信件转交给格鲁吉亚中央审议。委托格鲁吉亚中央验证信中所提内容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发送一份信息报告。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27, л.1-2, 20

№1358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1959年10月2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11月10日

第42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今年10月20日，我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其间，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1.根据印度报刊所提供的资料，美国打算为印度建造冶金联合企

业，以便以此来削弱比莱联合企业的政治意义，并使美国向印度国营冶金工业部门实施渗透。

2.在印度完全可能爆发新一轮反华运动。该运动的发动可能被安排在预定于今年11月份召开的印度国会例会前夕。

3.中国人民一致拥护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将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为巩固世界和平是不遗余力的，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担任此次会谈翻译工作的是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张之毅。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印度)使馆译员A.И.菲阿尔科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249页

№26595 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1959年10月20日以后 [6])

关于对中国国家建设重大项目的研究

此处指的是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天津大学合作完成的项目“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机器房的试验研究与计算”(第14号)。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被应用在湘江上的水电站建设中。该项目包含若干个课题，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负责“水利设施中真空与气穴现象研究”这部分工作。

一、在工厂生产了专用的真空设备(由工程学副博士、H.И.罗扎诺夫副教授设计)，并在水利设计科研局完成了安装，用于洞穴式水利工程设施模型的气穴试验。这种新设备的开发与相关研究由水利设计科研局与莫斯科工程设计学院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共同进行。

收集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真空溢水坝设计与施工经验方面的资料，并对一些堰进行了实地调查。

二、制造了用于测量水流总脉动对整体缓和堤坝堰板影响的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果，包括液压荷载的脉动，特别是方法论上，天津大学在进行研究(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模型研究)时可以采用，那个模型只在排水部分的轮廓上有所差异。

三、继续进行消能槛和能防止空蚀的溢水坝流量分配器的实验室研究(董柏年的论文研究，导师为工程学副博士、H.П.罗扎诺夫副教授)。目前，以数据立方体的形式完成了消能槛的研究，进行了3个周期的试验。

流量分配器的研究按照计划将在1960年进行，这些流量分配器的研究可直接利用到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项目研究。

四、向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术论文集第24辑，以及工程学副博士、H.П.罗扎诺夫副教授的书，名为《在真空条件和高速水流下涵洞设施的设计问题》和《侧面收缩的真空溢水坝》。这些书中的一些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在进行该课题的研究时可加以应用。

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向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提交了关于“湘江水电站溢水坝上水流脉动压力方面的试验研究”课题的简要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富有成效地共同完成上述课题的工作，应适当派遣课题完成者(既有中方，又有苏方)预先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些派遣没有实现。

水能应用教研室就这个项目完成了两项工作：

- 1.布拉茨克水电站建筑物的应力研究；
- 2.拉脱维亚普拉维纳斯水电站上与溢洪道一起的结构应力状态研究。

此外，上述教研室还与天津大学共同进行了水电站的应力研究与地下机器房的计算。

该课题采用光学法和饱和蒸汽压力测定法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应力的研究。

“钢结构预应力”项目(第12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完成了多次预应力钢桁架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引入跨度12米的多次预应力测试,2个桁架破坏。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编写了报告。

二、继续预应力连续梁的计算和最优结构形式的理论研究。

三、测试4根不同结构形式的单次预应力梁。

1959年间,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教研室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不止一次交换了工作结果的资料及有关组织和研究方法的信函。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金属结构教研室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了3份与该课题相关的科技报告。

教研室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获得了若干份关于钢桁架和梁的最佳解决方案的报告。教研室就这项工作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简短的结论。

今年7月,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新的工作计划,其中对此项工作在合作基础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建议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加入共同合作,以及参与该项目的科研工作。

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信函中对共同工作的成果表示满意。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通过中国教育部邀请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E.И.别列尼娅赴华2个月,对项目的工作进行帮助,并发去了期望获得帮助的大纲(项目清单)。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依据经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商,回复同意该项目1960年共同工作的未来发展和派遣E.И.别列尼娅副教授赴华。

关于“浪潮对大海和大型水库浅水区建筑物与河岸冲击的影响研究”项目(第13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经济和海港教研室与大连工

学院合作。

一、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就此发表的科研学术著作进行了研究。可向大连工学院提供初步的数据。

二、设计和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在实验室条件和自然条件下测量速度的测量系统及相应的校准设备。对通过拍摄显示器和电子传感器获得的速度进行了比较试验。有关数据可提供给大连工学院。

“拱坝应力状态的试验研究”项目(第10号)，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联合北京工业学院共同进行。

一、完成了实验室设备的安装(试验台)，该试验台用于在刚性(脆性)材料和塑料制成的模型上测量拱坝应力状态。

在该设备上，今年将进行如下模型的研究：

1.托洛尔斯克拱坝。

2.有轮廓接缝的拱坝(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的论文题目和经济合同课题)。

二、继续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对有轮廓接缝拱坝的研究工作。在大块料碾压而成的拱坝模型上开始第二系列的研究。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研究出来的近似理论方法进行了弯度计算和拱坝应力计算。

三、继续副博士研究生宣祥沃对拱坝地震影响的研究工作。对在地震平台上的拱坝模型进行界限试验。

四、“用于拱坝设计方面技术指导的材料研究”课题方面，确定了拱坝的计算方法，遵照X.T.加涅夫的方法，采用专用的电子计算器，编写了《拱坝温度应力的计算》一文。

五、向北京工业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论文集第29辑，其中刊登了工程学副博士X. T.加涅夫关于坚固拱坝计算的文章。

此外，苏联高等教学机构向中国的高校就一系列项目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以连索韦特命名的列宁格勒理工学院与大连工学院共同进行了“苯胺在染料工业中二酮的提取及其应用”课题方面的工作。

这个项目在中方的帮助下，教研室设计和制成了大尺寸的乙烯酮灯，通过包裹邮寄到了大连市。大连工学院可按规定程序获得苯胺车间的技术文件。

在研究苯胺与氨基蒽醌反应和所获产品特性的领域，教研室通过不断地咨询(Б.А.波赖科希茨、Л.С.埃夫罗斯)，通过发送稀缺的原产品，新合成产品的可见紫外光谱测绘，向中方提供帮助。概括这项工作的文章刊登在中国(《大连工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和苏联(《普通化学》杂志，印刷版)。

1959年上半年内，染料教研室的Л.С.埃夫罗斯教授在大连工学院出差，帮助完成了这些研究。

莫斯科车床工具学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对“科研过程中加工质量积极监管可行性的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

该项目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侯镇冰同志负责的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编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发表有综合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被应用到莫斯科斯坦基工业大学的科研工作中。

在交换学术资料的过程中，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去了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副博士研究生И.Е.弗拉金副博士论文的摘要，涉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的项目：外圆磨削时磨削径向力随磨削深度参数的调节。已准备好提供副博士研究生Л.В.胡多宾关于零件速度参数调节方面的论文。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请求，对进行这些试验所必需的测量仪器和设备进行了咨询帮助。

课题“齿轮切割加工”是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的。交通大学西安分院的代表向苏联计划委员会下属全苏工具制造科研所作了通报。

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教研室与北京航空学院建立了工作联系。按照帮助的方式，针对课题“发动机性能调控”(第27号)，教研室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去了空气喷气式发动机“直流发动机”理论的讲课提纲。

对课题“燃烧室过程的研究”，莫斯科航空学院向北京航空学院交了

大量教学方法方面的资料，大量教学设备、压缩机设备、驱动装置、发动机BMW压缩机驱动的减速器的图纸(蓝图)，确定本地燃料浓度的仪器，直流喷气式发动机组件的零件图册，以及如下工作技术报告：

- 1.“涡轮喷气发动机燃烧室在固定、移动和中断状态下燃烧过程的研究”；
- 2.“紊流对火焰涡流面蔓延速度和充分燃烧的影响研究”；
- 3.“两种稳定器的火焰锋面对相同汽油空气混合气燃烧过程的影响研究”。

课题“超音速气动学理论和试验研究”(第25号)，莫斯科航空学院制造了用于亚音速风洞的标准机翼。

目前，标准机翼处于检测试验阶段。对课题“燃烧过程和稳定性及燃烧室设计研究”(第26号)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设备调试，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谢祥春(Се Оян Чунь)进行了此项工作。另一副博士研究生江哲星(Цзян Чже Син)在其中一家工厂见习，目前正在试验设备上进行测试。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与北京工业学院和航空学院对口的教研室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在经常性的往来信函中，包括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与半导体教研室与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间详细探讨了教学问题和科研工作。此外，学院转交了“陀螺电子仿真”、“将陀螺作为陀螺定位仪的应用”和“关于将带径向修正的垂直陀螺仪作为陀螺定位仪应用的可能性”方面的资料。

准备好在《北京航空学院学报》上刊登H.П.博戈罗季茨基、O.E.布斯洛夫斯基和B.B.帕森科夫的题为《半导体点火装置》的文章。

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陀螺装置教研室，共有15名中国大学生在读。

副博士研究生乔立(ЧооЛи)在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完成了答辩。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工程学副博士Л.К.切尔金在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进行了为期1年的出差成果：

一、准备了100个学时的“半导体仪器”课程的授课；

二、组建了“半导体仪器”课程的教学实验室；

三、理顺了基于硅碳化物制造平面二极管的科研工作；

四、理顺了非线性半导体电阻的科研工作。

莫斯科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学院按规定向北京石油学院展开合作并转交了大量与原油分离过程研究和合理地震勘探方法研究方面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和五部微缩影片。

列宁格勒工学院为清华大学编制了“振荡理论”课程实验室工作用教学设备的技术文件和图纸。

列宁格勒工学院压缩机教研室为第一机械部锅炉和涡轮机制造研究院(上海)制造了一系列空气动力仪器。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的请求，列宁格勒工学院不断向其寄去了苏联动力机械制造领域的新书。

莫斯科动力学院承担了为清华大学设计和制造3台设备的责任：

1.用于确定在500大气压和600℃高温时水、水蒸气和其他类似物质黏度的设备；

2.用于确定在500大气压和600℃高温时水蒸气焓值的设备；

3.用于确定在2500℃高温时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焓值和热容的设备。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这些设备还没有制造完成。有2位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中国大学生施德强和房德中参与了建造所指这些设备的工作，他们毕业后留校8个月参与设计、安装和调校上述设备。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与北京大学展开合作。在过去的1959年，学院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大量纯金属和半导体领域的科研资料(专著、报告等)。

根据经验交流的规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高级讲师C.C.基帕里索夫在中国长沙市的学院进行了粉末金属学方面的讲课。

目前在长沙的学院进行粉末金属学授课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副教授И.П.基斯利亚科夫，他是1959年10月5日启程前往中国的。

基斯利亚科夫同志在北京航空学院就粉末金属学和高熔点化合物生产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答疑。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有8名来自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学习和完成选矿、有色金属学和稀有金属学领域的论文工作。此外，还有2名从中国派到学院来的意在提高业务水平的专家。

国立莫斯科大学按合作规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办了“中国学者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学术交流”的展览。

展览于1959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举行，约有3000人参加了展览。

展览上共展出了：

1.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并在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各类学科的学术文章、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有超过100份展品。

2.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共5份展品。

3.由中国学者撰写并在苏联出版的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共有5份展品，以及学术文章，25份展品。

4.由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编制的中国地震区域图和土壤自然地理地区划分图。

5.以在阿穆尔河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渔业为目的的阿穆尔水文地质河岸研究的共同考察报告。

6.中国学者和研究生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完成的各个不同学科的工作成果，超过20份展品。

7.展现苏联和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科研的大量图片资料，有超过100张照片和20本相册。

8.莫斯科大学从中国地质学家手中获得的矿物标本，共有超过30份的展品。

9.从中国学者处获得的作为礼物赠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的中国生长的一批植物和在两次联合考察期间获得的一批鱼苗。

10.中国授予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荣誉证书和奖状及各种由中国学者赠给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礼物。

国立莫斯科大学就如下几个方向展开了富有创造性的合作：

38. [7] 代数拓扑学。寄去了科研成果的印样。

与吴文俊教授进行了学术上的书信往来。M.M.波斯特尼科夫教授在中国就代数拓扑学进行了讲课。

39—42、53.李群和李代数。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刘绍学和陈庆益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1959年将Г.Е.施洛夫教授两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分别是《线性空间理论概论》和《矢量分析讲义》。经常会发去学术成果的印样。

44.数字几何理论。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45.微分控制。目前有在读的副博士研究生李德元——导师为E.M.兰季斯，吴厚心——导师为C.A.加利佩林副教授。吴厚心向1959年《数学学科成果》杂志提交了题为《抛物线系统新类型》的文章。

通过已毕业的研究生周毓麟发去了课堂讨论和专业课程的大纲。

46.微分几何。1959年6月，谷超豪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完成了微分几何方面的博士论文答辩。寄去了在微分几何课堂讨论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47.概率论和统计数学理论及其应用。E.B.登金教授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进行了学术通信往来。梁志书编写了《马尔柯夫过程规则》的论文，导师为E.B.登金教授。

48.计算数学。1959年李文绚毕业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徐家福和杨芙清完成了计算专业的进修；副博士研究生唐珍、进修生胡家赣、2名三年级本科生、6名四年级本科生以及2名五年级本科生都在继续学业。在中国出版了A.A.马尔柯夫的名为《算法理论》的书。

49.流体空气力学，超音速空气力学。国立莫斯科大学流体力学教研室高级研究助理C.C.格里戈良1959年10月20日前往北京大学进行超音速空气力学课程讲课，为期3个月。

50.固态物体力学。极限平衡理论。通过苏联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向中国力学研究所发去了高速气动冲击试验机的技术性能、结构描述和工作图纸，以及A.A.伊柳申与П.М.奥吉巴洛夫关于“新型气动冲击试验机”的学术文章。准备向中国发运用于ИМХ5型机器温度控制装置的图纸和材料与用于材料松弛试验的Rabotnov型机器的整套工作图纸。

51.线性与非线性振荡理论。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准备寄出研究线性和非线性系统试验设备的说明书。

53.整系数二次型。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54.天体物理学、星体天文学。副教授Г.Ф.西特尼克结束了2年到访中国的出差回国，所到之处他进行了天体物理学课程的授课，并对天文设备的安装进行了指导。

55.太阳物理学。对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获得的日食观测结果进行了处理。

56.无线电天文学。与南京大学的学者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57.理论物理学。国立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学和力学教研室的学者与北京大学杨立铭和王竹溪教授保持着书信往来。

58.固态物体理论。副博士研究生王华馥顺利完成了题为《锰钢中固溶体的分解研究》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61.无线电波传播。副教授B.Д.古谢夫曾到访武汉大学，在那里进行了“无线电波在电离层的传播”课程的授课，并对组织和进行电离层中吸收无线电波研究以及电离层中风的研究和微小不均匀性的研究方面的科研工作给予了帮助。由于提供的帮助，武汉大学的工作人员薄祖基(По Цу Ди)完成了《电离层反射的无线电波的极化研究》的学术文章。

63.自由基化学。与郑州的大学的化学系建立了联系。

64.用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稀有元素。

目前，教研室有2名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从事稀有元素研究领域的工作。

65.分子构成。在光谱学实验室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了如下工作：

(1)研究和弄清了两个原子分子(原子团)的光谱CCL、CCL +、BeCL。确定了分子常数和电子态类型；

(2)制定了在高能量仪器中获得气体联合散射光谱的方法。获得了粒子细微程度达140000的气态CO₂的光谱，以及气态丁二烯的光谱；获得了早先在实验室发展成熟的计算方法和在加拿大由伯恩斯坦开发的计算方法的概括，并给出了烷烃生成动力方程的量子力学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还未向复旦大学通报。

66.溶液理论。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学术文章和专著。

67.交换反应。根据执行与吉林大学的联合工作计划规定，研究了高强度变形铸铁与丙酮的交换。活性能量约为7000卡/摩尔。找到了丙酮的第一序列和高强度变形铸铁的零点。在固相和液相中研究了丙酮和水之间的交换。研究成果还未发给吉林大学。

70.天然化合物化学。杂环化合物化学实验室与南京大学的李清漪教授建立了联系。莫斯科国立大学关于2噻唑烷、2噻唑烷二酮、2噻唑烷丙酮及这一族的其他衍生化合物方面科研成果的印样，将在近期发出。所获的试验结果促使结束这一领域的工作。

72.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在晶体化学实验室进行了如下中方感兴趣项目的工作：X光结构和电子衍射研究钴、镍和铜的络合物和螯合物。确定了一些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对镍、钴络合物的研究做了总结，并发现了其立体化学的基本规律性。

73.稀有元素化学。按照计划，在稀有元素实验室完成了如下工作：

(1)长春大学的副教授郑汝骊(Чжен Жу Ли)同志曾在В.И.斯皮钦院士的指导下工作。研究了高分子偏钨酸乙醚。郑汝骊同志通过了放射化学、X射线照相术和其他专业实习科目的专业培训。

(2)中国专家刘越山在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

(3)实验室保证了2名中国副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副博士研究生陈伯涛研究的对象是高分子磷钨酸盐。副博士研究生王乾石(Ван Чень-ши)从事的是稀土元素钨酸盐的研究。

74.络合物化学。北京大学派遣的大五学生王毓宾在实验室内进行了“四价铂金酸基络合物同分异构现象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工作成果将以刊登文章的形式发表。

75.抑制问题或抑制的生理结构。与北京大学建立了书信交换。确定了联合工作的计划。该项目的科研工作由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显然，根据这个计划北京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也在进行研究。教研室之间的联系目前还没有建立。

76.对动植物的生理和生化辐射效果。

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物理教研室向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实验室发去了教学计划，以及生物物理专业课程大纲的所有复印件和3本教学方法的教科书。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研室收到了北京大学实验室对其提供材料和书籍所示的感谢。

77.昆虫分类学与动物区系学。安德罗雅诺夫副教授在广州大学工作了一年。关于水上昆虫学研究成果的印样发往了广州大学。此外，O.A.切尔诺娃确定了给广州大学蜉蝣目方面的资料，并给出了研究摇蚊科一簇的具体建议。

78.家禽的遗传与育种。莫斯科大学遗传与育种教研室向武汉大学发去了联合进行母鸡性交配科研工作的协议，并建议交换育种资料 and 进行互访。中国同志对这些建议截至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信函回复和表示同意。

79.大米的遗传和育种。教研室经常发去苏联出版的关于生物学问题的印刷版科研成果的包裹，对武汉大学达尔文学说和遗传学教研室的科研工作计划发去了评论，就大米和小麦分级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经常性的咨询(书信往来)。——参加书信往来的有：王祥鸣(Ван Сян мин)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吴莱培(У Лак пый)和唐锡华教授(上海)。准备出版大米形态生成项目方面苏联和中国专家联合的工作成果。中国专家研究成果将会出版在会议主题论文集中——王祥鸣、唐锡华同志和中国派遣的副博士研究生朱之垠和于彦波。

中国翻译并大发行量出版了3本中文版的关于小麦方面的俄文书籍和1本关于禾本科植物有机生成阶段形成方面的书，这些书都是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的。

80e. [8] 确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山间谷地油气聚集分布的规律性。从1958年12月14日到1959年1月30日，国立莫斯科大学地球化学和可燃性有机岩地质学教研室主任И.О.布罗德教授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

И.О.布罗德教授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在大范围地域油气聚集分布规律性方面综合文件编成的教学方法。

此外，根据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领导的请求，И.О.布罗德教授还对油气含量远景比较评估和在中国一些油气田进行勘探工作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帮助和咨询。И.О.布罗德教授作了关于石油生成问题的现状和世界油气田分类转向大型凹陷区油气含量远景的比较评估的报告。

И.О.布罗德教授拜访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院士，并与他就石油勘探方法的问题和许多理论地质问题进行了会谈。

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给И.О.布罗德教授规定了任务，期望在油气含量远景评估方面，以及在松辽油气田与四川油气田组织科研工作 and 进行油气勘探工作提供帮助和咨询。

И.О.布罗德教授在初步了解松辽油气田的资料后，与自己的助手地质矿物学副博士К.И.克拉夫琴科一同出差到长春市。出差的目的是了解松辽盆地油气含量方面已有的数据。

松辽油气田1959年石油天然气勘探的主要任务是：

(1)获得第一桶工业石油；

(2)准备勘探1958年发现的较有远景的区域，1959年对其进行勘探(已经划出了最有希望的场地)；

(3)对整个松辽油气田根据油气含量的远景进行地区划定，划出最有利的区域，在此区域可打出最大涌出量的油气田，为此区域性的横截面布置十分有必要。

建议为松辽所有的油气田编制整体的全面计划和工作草案。该建议被采纳，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学和地址物理学的专家团队参与了松辽油气田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工作1959年全面计划纲要的编制。

И.О.布罗德教授作了题为“松辽油气田地质层、油气储量远景和石油天然气勘探方向”的报告。

第二次出差去了四川，目的是了解在四川油气田各个不同的油气田范围内独立的大规模岩石地层杂岩的油气储量远景比较评估方面的材料，以及四川油气田中部的高山沉积层内油气聚集分布中表现出的规律性，为了建立与油气勘测钻探相关的后续研究所必需的综合设施。

И.О.布罗德教授组织了以司徒欧旺(Сы Ту Ой Ван)和介光明(Цзе Гуан Мина)为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涉及天然贮槽的划分和弱渗透性的分区，以及四川中部地区工业油岩的详细比照。

И.О.布罗德教授返回北京后，在中国石油工业部部长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四川油气田油气储量远景和勘探方向的全面报告，余秋里部长与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以及区域性的石油管理局的责任人和苏联专家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在石油工业部的专门会议上，И.О.布罗德教授就地质学方面作了综述和一系列的报告。

同时，就讨论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的主要方法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И.О.布罗德教授向中国通报了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石油教育的安排。

依据在中国所做的工作，И.О.布罗德教授编写了信息内容丰富的地质学报告。

86.动物物质代谢及其调控机理。

动物生物化学教研室副教授К.Ф.索尔瓦切夫目前在中国北京大学生物理和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参与生物物理教研室大学生实习课的组织，还帮助中国的同志掌握生物化学研究的方法(电离子透入法、色谱法)。与北京大学有经常性的书信往来。

87.可塑性理论主要规律的理论与实验研究。1959年实现了科学技术信息的交换。1959年10月22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资料，介绍了中国进行该项目的工作现状。该资料目前教研室正在研究。

地理系：(1)完成了对中国学者团队起草的稿件“中国自然行政区划分”的评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请求)。(2)6个月内，A.Г.沃罗诺夫在昆明大学讲课。(3)根据互换规定，给中国的大学寄去了超过50本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册，中国同志同时给莫斯科国立大学发去了书籍。

在地理系有8名中国的地理学家在进修。

核物理学院。1959年9月北京大学的助教秦诚儒(ЦинЧьнжуй)结束了进修。

数学历史工作。1959年5月召开了“自然科学与技术历史”的学术会议。李彦(ЛиЯнь)教授参加了数学历史分会场的工作。

植物园。目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植物园与杭州、庐山、南京、北京和云南5个植物园交换了种子目录、种子和活植物。

最近几年(1955—1959年)，从中国植物园邮购获得了超过500株种株。

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在这些年向中国发去了超过800株种株和活植物，其中包括来自列宁山上玫瑰花圃的玫瑰插条和我们的针叶幼苗(来自列宁山的树木园)。

在植物园的暖房中培育了许多出自中国的植物种类。其中有许多是有用的观赏植物。

在分校的公园和列宁山园内的植物园室外也有来自中国的树木和灌木。许多都是由交换获得的种苗成长而成的。植物适应了当地气候，生长得很好。

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与北京工业大学就增压发动机B2的研发一同工作了2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向中国发去了大量技术文件。

莫斯科矿业学院与北京矿业学院就“针对中国标准煤矿难洗选高硫煤

炭的有效洗选方法研究”课题展开了合作。

И.М. 韦尔霍夫斯基教授在北京矿业学院讲完了重力选矿理论方面的课程。所讲的教程出版了中文。同时还在他的指导下组织进行了难洗选高硫煤炭的可选性研究工作。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工作在И.М. 韦尔霍夫斯基离开北京前已经结束。

该项工作的手稿总结报告用中文出版。

莫斯科矿业学院对北京矿业学院选矿教研室提出的询问进行了解答。

莫斯科铁路交通工程学院与唐山铁道学院建立了联系。1959年学院向中国发去了铁路电气化领域的学术成果。

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与浙江大学共同进行了高压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密封的项目研究。

目前，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正在进行弹性密封或轴用密封圈的研发、制造、装配，并运用到了试验设备上，用于对各种不同剖面直径为75—80毫米密封样件进行试验。在该试验设备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凸面密封和平面密封的数据。同时进行120吨压力机的安装，用于直径达220毫米的密封样件的试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接近工业设备的尺寸。压缩机与泵教研室进行了评论，并对中国浙江大学化学机械制造教研室研制的终端压力达5000个大气压的液压泵给出了设计结论。此外，给出了该泵结构优化方面的建议。

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

С.鲁缅采夫(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1079, л.56-82

№24972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1959年10月22日)

摘自В.И.列夫金和Ф.М.马尔季亚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3日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2日

今天，我们应邀去中国驻蒙古使馆与谢甫生同志会谈。中方参与会谈还有使馆参赞孟英、使馆一等秘书张树元(Чжан Шу-юань)、中国贸易部代表邱山(Цю Шань)、使馆二等秘书杨云贲(Ян Юнь-пэнь)和翻译马春明(МаЦунь-мин)。

关于此次邀请我们会谈的目的，谢甫生说，会谈期间他想涉及如下几个问题：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给予蒙古技术援助，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蒙古援助和今后的援助模式等问题与我们彼此交流意见。

在谢甫生同志的提议下，邱山简短地通报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蒙古承建的1.6亿卢布的工业项目和市政项目的建设过程，这些项目是根据1956年的协议向蒙古提供的。

邱山同志说，中国此次帮助蒙古建设的14项工程(参见1959年10月14日第233号报告)已有11项交付使用，仍在建设的还有3个工程项目：灌溉设施和公路的建设将于明年完成，精梳毛织厂计划于今年年底投产。除了这14项工程外，中国工人还在乌兰巴托单独为蒙古建造一座宾馆，费用以贸易方式支付；中国工会中央还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央赠送了一座带有100张床位的结核病治疗大楼；还有三座桥梁的建设即将完工：经土拉河至乌兰巴托机场方向的大桥、鄂尔浑河大桥和乌尔德塔米尔(Урд-Тамир)河大桥。所有这些工程建设都是在中蒙双方1958年12月29日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交工期限截至今年10月27日。

邱山同志继续道，在由中国援建的各建筑工程和已投产的企业中目前共有101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随着精梳毛织厂的投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总数也将增至170人。此外，前不久根据1958年12月29日中蒙协议，又有20名中国专家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工业企业建筑的勘测工作。

随后，邱山同志又谈了在蒙古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障问

题。据他讲，不论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量，每位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00—600图格里克，外加以元计算的该工人赴蒙古之前在国内每月所拿到的全额工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月工资为600—800图格里克。上述工资收入均不用向国家纳税。中国工人在蒙古工作的期限为6个月至1年，在抵达乌兰巴托之前的旅程费用由中方承担，而返回北京前的旅程费用由蒙古方面承担。在总值为16亿卢布的建筑工程中工作的中国工人总量约7000人。此外，根据中蒙1955年协议还有近11500名应蒙古政府之邀在该国工作。其工作的物质保障条件与上述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条件略有不同——其所获工资与蒙古当地工人一样，即视其技能熟练程度和工作量而定。其工资的30%允许汇回中国，如果他们在国内仍有家属或受赡养者的话。对于派遣中国工人前往蒙古，蒙古方面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付任何费用。在谢甫生同志的支持下，邱山同志强调说，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是完全有保障的，他们也没有向蒙古朋友和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任何与物质保障相关的问题。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蒙古朋友们对中国给予蒙古的此类援助模式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在强调由中国援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均适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之后，谢甫生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在以这种模式所进行的援建过程中，中方对所有企业的建设均做了充分设计工作；提供建材、劳动力、机械和各种建筑工具，并几乎免除了蒙古方面在建设过程中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援助模式无益于利用蒙古的当地资源和使蒙古朋友学会独立地解决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蒙古朋友总是以本国缺乏劳动力为借口而希望中方去完成整套建筑工程，并经常违反中蒙相应协议中已规定好的条件。其具体表现为：蒙古方面中断供应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当地建材和建筑机械，而这些都是中蒙协议里原本规定应由蒙古相关组织负责供应的。由于这方面原因，经常会导致建筑工程的完工和投入运营期限被延长。另外，蒙古方面还常常要求更改协议中的既定条件。就在前不久，蒙古朋友便要求中方不要在蒙古开始建设一个酒精厂，而把中方根据1958年协议原本为此目的而向蒙古提供的无息贷款，用于改造乌兰巴托机械厂，以便后者经改造后能够生产一些机床和机床设备，而不是原先计划生产的五金制品。与此同时，蒙古方面还违反原定协议，要求扩大中国原打算在1960年为其建设的一座养禽场的生产能力。对于蒙古的这一要求，中国政府还没有接受。

应谢甫生的请求，Ф.М.马尔季亚诺夫谈了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和经

济援助的方式，并指出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帮助的方式包括：编制工程建设草案、提供设备和机械以及为其派遣苏联专家。马尔季亚诺夫强调，苏联的这种援助模式促进了蒙古朋友建设领导水平的提高，使其学会了独立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并对其民族干部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方的列夫金同志也补充道，苏联把这种援助模式既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用于在经济关系上仍属于不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埃及，等等)。

谢甫生接着通报说，中国使馆正认真研究中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且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这种援助与蒙古的具体条件相适应。为此目的，中国使馆提出如下建议：取消正在蒙古国内开展业务的建筑托拉斯，并将其领导建筑活动的职能移交给蒙古朋友。

邱山同志对谢甫生同志的上述观点作了解释。他说，在取消了建筑托拉斯之后中方对蒙古的技术援助活动范围就剩下这样一些：根据相应协议向蒙古供应建材、设备，派遣专家和中国工人。而蒙古方面将全权负责如下业务：建筑设计、供应必要的当地建材，确保为建筑工程提供劳动力，等等。

接下来，谢甫生同志请求与我们交流一下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如果我们掌握这方面的资料的话。

我们解释道，不论是苏联驻蒙古使馆还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蒙古代表处，目前都不掌握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控制数字的任何具体材料。据我们所知，目前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仍处于编制和确认的阶段。

谢甫生同志请我们讲一下关于未来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针对其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目前尚难判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将如何帮助蒙古。因为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属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蒙古的方式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与蒙古所达成的协议独自决定的。至于苏联将如何援助蒙古，可以这样认为，苏

联首先会考虑蒙古在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在实现了牧民家庭的合作化之后蒙古朋友打算解决牧民从游牧转向定居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经济改造，统筹兼顾畜牧业发展与农业联合体的土地经营。由于苏联的帮助，1959年蒙古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粮食作物收成达到9万多吨。在援助蒙古从事荒地开发的同时，苏联还帮其建设了一些磨面厂、木材加工厂，等等。而这些无疑会为其解决牧民定居的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还对谢甫生同志说，苏联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其畜牧业的产品率。为此，苏联将向蒙古运送数千头良种畜。苏联还将在水利资源开发方面给予蒙古重大援助，以便使蒙古朋友能够更正确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财富，其中包括水能和森林资源。

谢甫生同志强调蒙古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重要性——因为该国在这方面拥有很好的条件以及利用水利和森林资源的必要性。他还说，目前蒙古已建设了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可由于国内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致使这些企业的运营情况不尽如人意。谢甫生同志认为，蒙古人口数量少是该国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大阻碍。谢甫生同志指出，不增加人口就无法指望蒙古的变革会产生重大结果。而该国摆脱目前这一困境的出路，可能得寻求中国的帮助。至于来自中国的这一帮助如何落实，谢甫生同志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谢甫生同志接着说，前不久蒙古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并提出建议——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蒙古的沙漠，如何在那里从事森林采伐获得经济效益，如何利用蒙古的森林资源，从哪个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展开蒙古的地质勘探工作。中国使馆对蒙古朋友说，希望其派遣专家组来中国，以便就地学习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此目的，一个由15人组成的蒙古代表团已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活动。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之间应当以诚相待。他请我们直言相告：大家——其中包括蒙古朋友在内，对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如何评价。

我指出：我们认为，中国工人勤劳且工作积极，对蒙古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与个别蒙古朋友的交谈中他们也都对中国工人和专家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又涉及了蒙古牲畜头数增速缓慢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迅速增加的问题。

当时在场的中国使馆参赞孟英说，在内蒙古解放后的12年间当地的牲畜数量比原先增长了几近3倍，即从1948年的920万头增至今年的2900万头。孟英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成绩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当地牧民所实行的正确政策——提高牧民的生产自觉性，并要求其意识到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变革事业所肩负的责任感。为此，中共提出了8项条件——如培养牧民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发展农业、提高牧民的文化水平等等，而这些条件的落实都确保了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的增加。孟英同志还指出，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当地畜牧业的问题上没有犯任何错误。可在同样问题上，孟英认为，必须承认蒙古的畜牧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这样，蒙古共产党中央却没有就如下问题向民众做出解释：为何国内牲畜数量增长缓慢，而其增长计划总是无法完成。例如今年虽然仍未完成畜牧业发展计划，蒙古共产党就没有做出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我方的列夫金同志指出，我们应考虑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发展条件与蒙古并不太一样。谢甫生同志表示同意我方的上述观点。

会谈结束后，谢甫生同志设晚宴款待我们。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苏联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A.K.涅霍罗舍夫同志。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B.列夫金(签名)

苏联驻蒙古使馆经济参赞

Φ.马尔季亚诺夫(签名)

АВРФ, ф.0111, оп.41, пор.10, пап.260, л.25-33

№13587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1959年10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11月2日

第41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26日邀请了高士偕夫人前来午餐，这是考虑到他愿意同我进行会谈，他委托别人说了这一点。在午餐时高士谈了如下的话：

印中关系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再次发生的边界事件，引起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舆论界的强烈不安。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冲突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印中关系的恶化被美国人和印度反动力量用来改善同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把印度纳入军事集团。以前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矛盾使印度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并促使印度同苏联和中国接近。反动势力已经得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印度同巴基斯坦在水上运输航道上的冲突得到解决，关于东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举行的会议结束，寻求途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印美关系有了改善。

在这种背景下印中关系急剧恶化，短时间内，在印度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许多朋友。

不排除印中关系的恶化会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印中关系的恶化，以便造成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满。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按照中央政府的一名部长通报给高士的话说，10月24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关于1959年10月21日区的边界冲突问题。尼赫鲁在进行讨论时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他希望印中边界争端能够很快解决，并准备做出领土上的让步。10月21日，中国人向印度边防巡逻部队的开火证明，中国政府不愿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调解边界争端。因此，印度政府在这样的条

件下也不打算让步。尼赫鲁在这次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他说，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能够尽快解决。尼赫鲁称赫鲁晓夫为最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他真正地做到了预防战争。

正如那名部长向高士通报的，在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M.德赛和铁道部长贾格吉凡·拉姆都建议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把印度共产党作为“反民族的党派”，他们在边界争端中支持中国，而这个问题对印度很重要。尼赫鲁说，这样的建议还为时过早。他就此强调说，在印度共产党内存在尖锐的矛盾，印度共产党已经开始瓦解，印共现在几乎脱离了人民。高士难过地说，由于印中冲突，印度共产党内确实存在尖锐的矛盾。丹吉公开宣称，他不同意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印中争端问题的意见。南布迪里巴德、高帕兰、阿赫米德和其他人事实上同意丹吉的观点。其他的一些同志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反对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敌人开始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如果说，在印中边界冲突之前印共领导人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喀拉拉州的选举中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印度共产党将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乌塔尔普拉德斯州的市政选举显示，在一些城市中印度共产党候选人都遭受了失败，其原因是，许多选民不支持共产党，尽管他们以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

今年11月4日，在米拉特召开的党的国民会议全体会议上，由于对印度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其明显的征兆就是丹吉今年10月25日在孟买的公开声明。

对于我的问题——是否会对印度国内局势和印共党内局势的严重性重新做出评价，高士说，由于印中边界事件而引起的印度国内局势，印共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和国民会议中的亲美分子要利用印中边界事件来恶化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攻击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反动势力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何况反动派也没有正当的理由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现在一些州的领导人提出了通过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法律问题。西本加林首席部长B.C.罗伊早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现在的局势是，各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在谈到印中争端的时候就会谈到党的关系，就会指责印度共产党是“反民族的政党”，并要求禁止印共的活动。如果现在这样的局势再持续几个月，那么政府将会禁止共

产党在印度的活动。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国内的所有进步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对和平主义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影响。维护和平的任何一次谈话都会导致印度人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政策的指责，也就是引起了回应。

因为到过北京，从谈话中高士明白，在评价印度局势以及对待印度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人认为，印度已经投向了西方大国阵营，为了不允许印度继续同美国接近，中国方面必须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现在正在推行这样的政策。高士试图说服中国同志改变看法，并且他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却发生了10月21日的事件。各级印共领导人，别说普通的印度人了，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

根据高士的意见，中国驻印度大使没有认真分析印度的国内局势以及印度国内对边界事件的反应，这样，他也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事情的真实情况。中国人认为，在印度只有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和空谈的知识分子反对中国的政策。但事实上印度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高士对此的解释是，看起来，中国驻德里大使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正确的导向。

高士认为，在调解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人应主动提议。为了保持印度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防止印度同美国接近，就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为了缓解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国内所有进步力量面临的困难状况。尼赫鲁个人对调解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是感兴趣的，因为不这样做他的中立政策、同苏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尼赫鲁个人本来也表现出可以首先提议，但他担心中国领导人对他的提议不做回应，而这会被右翼利用，再次向他攻击。

至于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态度，高士强调说，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同印度政府和尼赫鲁个人的良好关系在印度总是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并且有利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力量的工作。因此，当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苏联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对此应当指出，苏联在11月14日——尼赫鲁70大寿的日子，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发了贺电，苏印友好协会召开了会议，苏联报刊发表了关于尼赫鲁在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中的作用的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受欢迎的。这是对尼赫鲁及其拥护者的支持。尼赫鲁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对印

度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尽管他在内阁和国民会议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目前印度还没有一位国务活动家能够比尼赫鲁更好地继续推行中立政策和保持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高士请求苏联政府施加影响，尽可能尽快地调解印中关系。高士所说的话都证明，对于印中边界事件的后果印共领导人非常担心。

反动分子积极活动起来，并且资产阶级报刊也说，政府中的右翼分子和右翼国民大会党企图利用印中边界冲突来恶化印度同中国、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改善印巴关系，使印度同美国接近；也谈到了反动势力事实上企图改变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路线。资产阶级报纸多次批评中立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

1959年10月27日印度总统普拉萨特在州长会议上作了发言，号召“在对中国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Г.Г.叶菲莫夫参赞参加了会谈并做翻译。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090, оп.21, п.64, д.5, л.161-167

№20637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1959年10月27日)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

1959年11月5日

第263号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0月6日至11月4日

绝密

文本第3份

平壤市

1959年10月27日

我在大使馆里为各国大使作了H.C.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的总结报告。在报告后发言的有：中国大使乔晓光，罗马尼亚大使奥尔加努·杜米特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里哈德·费舍尔。

乔晓光对报告给予好评，并说，现在已经看得出H.C.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发言中阐明了“冷战”政策与“实力”政策的毁灭性以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这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奥尔加努·杜米特鲁说，我们当然全都读过美国之行的报道，但在苏联大使的报告中简明扼要和合乎逻辑地叙述了H.C.赫鲁晓夫同志所做的工作和这次出访的成果。大使感谢了我的报告。

里哈德·费舍尔说，我们读过和听到的一切内容都给我们以巨大的影响。我国有一句口号：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生活、工作和休息。H.C.赫鲁晓夫同志证明了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工作。我们大家也像苏联人一样感谢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它可以与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所取得的胜利相提并论。世界各族人民都表示拥护H.C.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我们不仅用言论，而且还用行动、事实来支持H.C.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和建议。

АВПРФ, ф.0102, оп.14, д.7, л.247

№09871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1959年11月4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1月4日

第445号

机密

关于H.C.赫鲁晓夫访美在中国的反映

(情况报告)

今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得到了中国朋友的好评。在中国，把这一事件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胜利，看作是冷战的失败。

中国朋友们在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在正式文件、讲话和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9月26日外国专家招待会和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的发言中，在他《伟大的十年》一文中(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陈毅为《消息报》而作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十年》一文中(见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的跃进》一文中(见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10月4日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都对赫鲁晓夫的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报刊为赫鲁晓夫访美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访问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关赫鲁晓夫到美国，他的讲话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界对访问的反应，中央和地方报纸发表了不少消息。

在反映访问的社论和文章中(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以及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文章中，都把赫鲁晓夫的访问看作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认为它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报刊上反映出这样的信心，认为苏、美领导人的互访会给国际形势以重要影响。中国社会舆论界热烈欢迎赫鲁晓夫访美公报。

在向毛泽东递交关于赫鲁晓夫访美的秘密总结报告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成苏共这一对外政策步骤，对苏共中央对此事的评价没有任何异议。

在有来自80个国家5000名外宾出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宣布：“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今天出席我们招待会的有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的成功，并欢迎他同美国总统会谈的公报。”

在今年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其中指出了苏联在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斗争中的作用，决议强调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支持苏联政府于1959年9月18日发表的宣言和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建议。”但无论是陈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通过的决议中，都只字未提赫鲁晓夫访美一事和他在联大上所提的全面裁军问题。

最近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高度评价赫鲁晓夫访美。例如，今年10月20日第20期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傅鹰的文章《赫鲁晓夫访美13天》，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同志的访美，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新胜利，这一访问是对‘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赫鲁晓夫是杰出的和平斗士，他光荣地捍卫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利益，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争取改变美国世界观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6日第19期《时事手册》上陈军(ЧЭНЬ ЦЗЮНЬ)的文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巨大成就》写道：“赫鲁晓夫同志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世界和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成功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光辉胜利，这一政策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欢迎。”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中共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访问，是对美国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一访问将对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他离去之后，苏联大使馆收到了中国公民从各地写给赫鲁晓夫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件包含着对赫鲁晓夫访美的积极评价。没收到带否定意见的信件。信的作者们(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等，甚至还有右派和在信里对中国现在形势表示批评意见的人们)都一致赞扬赫鲁晓夫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不懈努力，对赫鲁晓夫访美结果和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感谢赫鲁晓夫不顾访美之后的劳顿又来中国。

中国报刊非常正常地报道了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劳动群众对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的反应。

但是在中国，在居民中过去和现在未曾进行广泛宣传，宣传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的意义和结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C.捷捷林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р.8927, л.99-102

№09970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1959年11月6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8日

第496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谈话记录

1959年11月6日

我第一次拜会邓小平，并同他进行了谈话。邓小平说他腿部骨折以后尚未完全康复。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出来工作，但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4小时。接着他问我关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感受。我回答邓小平说，庆祝活动组织得气派宏大，显示出人民热情奋发，团结一致。

邓小平说，他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又说，苏联的一切都组织得很好。这种逢整数的纪念日应当好好庆祝。庆祝这些重大节日可以显示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热情以及世界进步力量和兄弟党的团结。

我回答说，兄弟党的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得到了鲜明的表现。短短的10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足以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成就，中国人民的这一成就是任何人都埋没不了的。兄弟民族的团结不止一次地展示出其伟大意义。比方说，如果在十月革命

胜利以后，乌克兰是个单独的国家，而没有参加由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大家庭，它就可能被帝国主义者消灭和分解。友谊——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它的意义我们有时还不能彻底认清。历史终将证明，它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邓小平回答说，统一和团结，这确实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都不害怕。“我们竭力维护和平，在和平条件下帝国主义必亡。如果一些狂人仍然要发动战争，那么在战争中他们得到的只是灭亡。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蒸蒸日上。而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也有美国的——这就是劳动人民。”

我说，H.C.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说明美国劳动人民对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

邓小平说，因此，美国统治集团也害怕这次访问。他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与人民隔开，但人民冲破了堤坝。我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巩固的条件下，必须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

邓小平问我很久以前是否从事过党的工作，我向他叙述了我以前做过的工作，并补充说，我把驻华大使的使命看作党的工作的继续。邓小平对我的这个意见很快做出反应。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外交，而是党的工作。刘晓在莫斯科也不是搞外交，而是做党的工作。尤金在北京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外交官，他是在从事党的工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来说，主要的不是例行外交公事。

我说，刘晓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很有经验和很内行的干部。邓小平回答说，刘晓长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地下工作。

邓小平很关心尤金同志的健康，他请我有机会时向尤金同志转达他的祝愿，祝他早日完全康复。他说，我们之间有过良好的合作。我说，尤金同志对所有中国同志对他工作中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共中央将要召开的中央全会和进一步发展与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你们解决这些问题较容易，因为你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也打算把建立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的困难在于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们不久前修建了1个拖拉机厂。

我说，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有中共的领导作用，邓小平说两者都很重要，既要有中共的领导，也要有苏联的援助。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所处的形势比你们十月革命后早期的形势有利得多。如果再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它比我们都好。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苏联在各方面情况都很好。至于说我们，我们的情况也不坏。”

我说，在我们事业进展顺利的条件下，我们要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力争根除一切缺点。邓小平回答说，我们也有缺点，并且一直都会有缺点。即使对于来自敌人的批评，有时也应当听取。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说，我们以后还要经常会见。

我为这次会谈对邓小平表示感谢，并希望我在大使馆的工作中能得到他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帮助。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余湛、苏联大使馆参赞Б.Н.魏列夏金和三等秘书Б.Т.库利克。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ЦХСД, ф.5, оп.49, д.235, л.107-110

№13589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 (1959年11月13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1月14日

第2818/TC号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K.П.И.梅农的会谈

(1959年11月13日)

我应邀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K.П.И.梅农。

印度大使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在中印边境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H.C.赫鲁晓夫在亲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

印度大使又说，自己受本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原本希望简要地向H.C.赫鲁晓夫介绍一下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情况。但鉴于H.C.赫鲁晓夫公务非常繁忙，自己无法亲自向他通报这一问题，因此便想通过我来向H.C.赫鲁晓夫转达如下情况：

众所周知，前不久在印度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边境冲突事件。印度政府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要再重复。然而，这样的边境事件最近又在拉达克地区重演。于是，印度政府便在今年11月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印度大使向我方转交了该照会的复印件)。印度大使强调，目前印度政府已收到了中国的答复性照会。在其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没有提及印度政府在所发照会中所涉及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建议两国军队沿存在争议的边境线各后撤20公里(其中包括各自占据的阵地)。对于上述建议，印度政府并不认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便对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便向中方做出建设性的答复。印度政府还要向了解中国所提建议的印度军方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印度大使继续通报说，当总理尼赫鲁结束自己对一些国家的4—5天的出访回国之后，印度政府将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鉴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印度政府对中方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表示担心。在1959年10月21日发生的边界冲突中，印方被打死9—10人，7—8人被俘。10月24日，中方同意向印方移交死亡士兵的尸体和俘虏。为了协调这一问题，印度于10月26日专门派出了一个小组，但由于中方的原因导致其至今无法完成既定任务。

中方在这一问题解决上的拖延做法引起了印方的担心，即中方是想赢得时间以便对在押印度人施压。而中方的这一举动将可能导致整个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

印度大使指出，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是印度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但这里已涉及国家领土的完整问题了。由于印度右翼分子和一些机关报刊的煽动，总理尼赫鲁已很难控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印中关系已有4000年的历史，两国边界长度达到4000公里，两国还从没有发生过边界冲突，更别说战争了。

针对苏联政府真诚希望中印关系保持和平和友好，印度大使表示感谢。

我答复印度大使道：大使先生说得很对，关于中印边境冲突，我们的立场印度政府应当是非常了解的，具体可参见塔斯社所发的声明和H.C.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共同的朋友——印度和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并能够通过谈判和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

我承诺，将会把他所通报的情况向本国政府做出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翻译司随员П.В.卡萨特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签名)

分送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潘友新、葛罗米柯、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齐米亚宁、波采罗布和图加里诺夫等，顾问小组，南亚司，苏联驻德里和北京大使馆，档案室(3份)

第4992/ГС号

1959年11月14日

No24792 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 (1959年12月 [9])

出差目的。出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民为完成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问题。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阶级成分的变化，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出发之前，研究所所长同意了我这次出差所要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进行会谈，对科学机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进行研究，对一些企业进行访问。这次出差的直接目的就是为集体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准备材料。此外，为我今后的研究计划准备一些关于今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变化的材料。我认为，我完成了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

工作安排。在中国出差的日期为1959年10月18日至1959年12月18日。

在10月20日到达北京的那天，我们的小组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的接见。10月21日，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接见了我，根据协议，该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起都应是主要的接待单位。但是，在会谈的时候，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说，他们中，很少有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因为大家主要关注的时期是1919年之前，应该研究所领导的请求，我把我计划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我被告知，第三研究所不能对我计划的完成提供帮助，因为对于我感兴趣的历史时期，在他们单位还没有一位这样的专家，并且在10月23日把我介绍给了经济研究所。在讨论我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们满足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坚持减少在各省停留的时间。最初我请求的工作计划是：10—12天在北京，7—10天在上海，20天到一些中小城市——省级的城市或县级的城市，其余时间在农村工作。最后，在北京及其郊区停留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从10月20日到11月11—15日)，其余的时间安排是：11月14—16日在郑州，11月17—25日在新乡及其近郊地区，11月26日在郑州，11月28日至12月9日在上海及其近郊地区。

我认为，安排更多的时间，以便对一些省的问题进行研究更加合理一些，但是在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安排计划中，同一些专家举行会谈太困难了，有时候，特别是由于领导干部过于忙于反右倾的运动，不

可能组织这样的会谈。

在到一些省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访问了国营第二纺织厂(10月30日)，伊利联合糖果厂(11月3日)，在石景山的名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11月1日)，红旗人民公社(11月4日)，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11月6、9、10日)，妇女纺织合作社(11月11日)，北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展览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民族政策的10年”展览会。

此外，应中国同志的邀请，还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10]

10月2日，我被安排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特别改造的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了会谈。该办公室工作人员非常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改造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后来还把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11月13日，在教育部就国民教育的发展、消除文盲问题以及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举行了会谈。

11月9日，哲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吴传启接见了。11月11日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举行了会谈，这两次会谈主要具有纪要的性质。后来得知，在我返回之后，将组织一些对我所提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会谈。

在北京我还在北京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进行了工作。

在郑州我访问了郑州纺织机械厂(11月14日)、纺织厂(11月15日)、轻工机械制造厂，并参观了河南省国民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

11月17日访问了新乡师范学院。

11月18、19日和20日访问了七里营人民公社。

11月21日和22日访问了新乡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

11月23日访问了新乡纺织厂。

11月24日和25日同新乡市城市规划处、农业局和教育局的领导干部举行了会谈，11月25日访问了新乡金属加工厂。

11月26日在郑州同河南统计局副局长就河南省的发展举行了会谈。

11月29日受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领导接见。

11月30日和12月1日同上海资本家、合营工厂的一名厂长进行了会谈，谈论了关于该厂改造前后资本家的状况。

11月30日同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就解放后上海工人和职员的情况问题举行了会谈。

..... [11]

我共访问了15个企业、5个人民公社、3个县，同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的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根据我的请求在每个地方都安排了几个企业进行参观。总的来说，中国同志对我的请求是认真的，并尽力帮我完成自己的计划。这在我对河南省进行访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妨碍我实现一些预定的会谈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现在举行的反右倾运动，一些领导干部过于繁忙。事先曾设想在上海和北京同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干部组织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举行。对此，中国同志多次致歉。

对中国一些问题的研究状况

由于上述状况，关于这些问题得到的信息是不全面的。看起来，第三历史研究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规模不大。用哲学研究所学术秘书的话来说，该所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很少。被派往农村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开展了一些调查：但是调查材料还没有发表，只是部分材料被《人民日报》的“人民公社调查”系列报道采用。在哲学研究所两名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冯友兰和贺麟在工作，他们不研究现代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评主要限于一些研究者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论文集以及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上海经济研究所对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生活水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的一些省份也开展了调查工作，但是没有发表著作。该研究所非常关注对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改造问题。就这个问题出版了3本书，其中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关于一些企业的发展和变革的历史。现在正在准备出版整套类似的材料集和关于上海10年社会改造的书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建于1957年，但是在1959年得到了急剧的扩大(工作人员的数量由50增加到了200人)，现在共有10个部门：政治经济部、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金融部、统计部、国际经济部、上海市经济部、农业区经济部、经济史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有38名工作人员。该所主要从事教学工作，该所教师也从事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哲学史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表著作。

在中国新出版的经济和哲学文献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集。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在利用去年出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书籍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错误的。

近期，看起来会出版一些关于个别经济部门的材料集、一些省经济的材料集以及关于社会改造的材料集，该书准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但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该书还没有出版。

对这次出差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的评价

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同中国专家进行的会谈以及对一些工业和农业企业进行的访问可以使我們搞清正在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在苏联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得到的信息是部分的，大部分是关于某些单个地区和单个企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以及对于了解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帮助。在努力完成预定计划的同时，我认为，还应该得到更加具体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在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在农村得到的很多材料都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关于全国的和一些大的地区的材料是不允许发表的，也不允许用于科学研究。但中国同志认为，关于一些公社和企业的材料可以在苏联发表，但条件是，不允许把关于部分地区的材料没有根据地当作是全国的材料。由于考虑不周，特别是中国同志在农村向我列举的数据经常是大致的数据材料，不充分的数据材料，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失去价值。

关于人口问题。在上海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向我谈到了他们关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其中包括上海人口增长速度的想法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还得到了关于上海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材料，关于城市成年人组成的变化的材料。一些农村和县也有类似的关于自然出生率和人口迁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金山(Синьсян)县和松江县有关城市和农村人口对比关系变化的材料。

关于社会成分。根据材料，居民被分为各工业生产领域、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的工人和职员。得到了全国范围的一些年份的资料以及上海县、奉贤县、松江县的资料。个别农村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明了在农业改革和合作社运动之后农村阶级成分的变化。

关于工人阶级。前不久发表了关于普通工人增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补充了关于河南省、上海市、新乡市的材料以及个别县和个别企业的材料。得到的关于全国的以及河南省和上海市的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这些材料谈到了关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58年工人阶级增长的根源。并且得到了关于全国、地区和一些企业的具体的关于来自农村的工人的材料以及关于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形式的材料。

在一些谈话中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关于劳动的支付制度、关于转而实行临时工资制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的趋势。从一些企业得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关于工资变化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工人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关于他们的住房保障、幼儿园的材料等。

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的材料和上海器具厂的材料特别充分。

关于工人的学习和文化水平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参加夜校的工人和职员的材料，关于学习的形式的材料，关于企业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及关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的材料。

关于农民。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全国范围的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一些公社和一些县在一些年份经济变化和农民劳动积极性增长的详细材料。得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详细材料可以使我们对公社与国家 and 单个生产队在现在条件下的关系有了具体的认识，对人民公社中的工业以及其中的劳动条件有了具体的认识，对公社的管理、个体经济的作用、分配的形式、市场等有了具体的认识。还有一些关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关系的材料。从在各公社和生产队进行的谈话中得到的材料使我得到了关于一些预算的材料，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关于几年预算的材料。我也得到了关于个别公社和县在近年新的发展计划的材料。

关于以前农村中的剥削阶级的状况问题也得到了一些关于一些公社和县具体的关于以前富农、地主及其家庭成员表现的材料。

关于资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了社会改造之前和之后关于各类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规模的详细材料(全国的、上海的以及一些合营企业的)。关于他们现在的状况,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资产阶级代表参与生产的材料,关于他们放弃利润的材料以及关于利用资产阶级的部分收入为公共服务的材料。

关于文化。得到了关于居民识字率的材料,关于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的材料,关于学员社会成分的材料以及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得到了关于个别地区的、关于公办学校工作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上海居民教育增长的材料。

结论。上述罗列的只是中国同志在谈话中列举的材料和反映的状况。只有在对得到的所有的文献材料进行研究之后才能评价上述材料的意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收集到的材料以及已经发表的一些材料,可以为集体研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中关于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为题的研究工作的完成奠定非常充分的基础,也可以为我今后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的专著的写作奠定基础。

建议。应该向中国发送的不仅仅是根据协商的形式拟定的简短的计划,而是尽量详细的关于具体问题的清单,这些具体的问题事先应该在莫斯科协商和确定。这将会极大地方便我们的工作以及接待方的工作。

我认为,应当事先同那些研究共同的题目或者相近题目的学者协调研究计划,这样就可以相互帮助。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哲学博士

Ю.А.列瓦达

1959年12月

АРАН, ф.457, оп.3, д.3, л.100-115

№20638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 (1959年12月1日)

1959年12月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1月6日至12月7日

第2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2月1日

应乔晓光的请求，我接待了他，并与他谈了话。

乔在谈话时讲，昨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费舍尔拜访了他，并把外交使团的公文案卷转交给他了，费舍尔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任该使团的团长。

我祝贺乔接受了外交使团团长的职务，并祝他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的事业中工作得富有成效。

乔同我商量该用什么方式去组织一次欢送外交使团团长里·费舍尔的仪式，后者为在那些派驻朝鲜的大使以及整个外交使团的工作中建立友好氛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大使们的名义组织一次告别宴会，并赠送一件礼品留念。

然后我对乔讲，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审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1959年10月27日致世界各国议会的信，并发出了复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旨在用和平民主方法恢复朝鲜民族统一的措施。接着我讲述了复函的内容，同时着重指出，解决朝鲜问题应该从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离南朝鲜开始，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去年秋天之前撤离那样。

乔也讲了美国人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的事。

由于这一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拘留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鉴于这种诬蔑性的声明，外交部于今年11月30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是揭露驻孟

买的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丑陋行径的。

我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冷战”的拥护们所感到厌恶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今后也将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的途径去维持国际紧张局势。

我向乔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尼赫鲁对周恩来的最近一封信的回信。

大使回答说，他没有被正式告知，回信是否已发出。然而，印度报刊正在大张旗鼓地评论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的回信。印度报刊在自己文章中声称，尼赫鲁不接受周恩来的从边境线上撤走边防军的提议，并提出了要中国边防军单方面撤离的要求。

接着乔讲，尼赫鲁不愿意会面和进行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总理级别的和平谈判，并宣布，只有在中国政府接受印度的要中国军队撤离尼赫鲁认为是印度领土的拉达克地区的提议的情况下，才会有谈判。此时尼赫鲁的出发点是从前在拉达克的领土上有过一个独立国家的那个事实。接着乔说，拉达克的统治者们同西藏打仗，结果失去了独立，并入了西藏。乔说，尼赫鲁以此为据认为拉达克地区的中国领土是印度的，并要求中国政府把这块面积等于4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转让给印度。乔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印度过激分子的凭空臆造出来的理由。

接着乔告诉我，现在印度国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在给这场运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印度的一些著名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担任的并不是最小的角色。例如，印度国防部长不久前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在解决同中国的边境纠纷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将会用直到动用武力为止的一切方法来捍卫自己的领土权。

接着乔说，美国和英国在煽动反华运动的过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我讲述自己的看法说，印度的反华运动是一连串旨在燃起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敌意和仇恨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行动中的一个环节。帝国主义分子心里非常明白，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领头国家，所以他们竭力用一切方法破坏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保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印度右派分子和他们的美、英主子们的扩张主义目的一定会破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和亚洲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都非常明白真理是在哪一方，并且都支持中国人民的争取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АВІРФ, ф.0102, оп.14, д.7, л.287-289

№10462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1959年12月8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

我愿意明确表达一些想法，我们应在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并就有关缩减军备和裁军问题做出决议。

当前，苏联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优越的位置。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和我们在联合国全面裁军组织上的提议被世界广泛接受，甚至各国的反动派也不能简单地拒绝和忽视它。甚至那些不想缓和紧张局势、不想裁军的人，考虑到这样广大的公众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减少军备的愿望，都不能公然反对它；也许他们将用拖延战术找到一些论据以扭转他们的颓势，或者想推迟或破坏对我们提议的表决。

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而敌方不满意的机会，它是我们依靠公众的认可、国际声望和我们始终如一地保持几年的领导地位和主动权而获得的。我想现在我们应该着手进一步缩减我们国家的军备，大幅减少陆、海、空三军人员，甚至不以其他国家的相应裁军为条件。我想也许能削减100万或者150万人员，这必须与国防部讨论研究。

我相信这样一种相当大的精简将不会破坏我们的防御能力。然而，如果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实现它，将有对国际形势有巨大的积极影响，并且，我们的威望将在全世界的眼光中出现巨大的增长。这将对和平的敌人、战争贩子和冷战鼓吹者的不可抗拒的打击。为什么我相信今天这样做是可行的，而且没有危险？我的决定是基于：第一，事实上现在我们苏联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很好的状态；第二，我们优先关注火箭工厂；当然，我们有适于任何军事目的的各类火箭，从远程到近距离战术范围的“地对地”火箭以及“空对地”和“空对空”火箭，核潜艇等等，而且，从爆炸物的生产来说，我们有很多的种类。另外，我们已经设计出并连续生产这些火箭。在这封短信中我将不列举所有这些火箭——那些主管，他们知道，当我们开始讨论它——我们将反复讨论——因此我不

在信中列举，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能展示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有远距离射程的火箭，并且有实质上能够粉碎世界的数量。人们也许要问——我们有这么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火箭武器，那么我们还要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吗？

这没有道理。我们的设想是我们不寻求战争，并且我们不准备进攻（战争），但是，我们准备防御，如同我们做的那样。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假定，当我们有类似这些火箭的强大的武器的时候，我们军队就有保卫国家的能力，可以击退妄图攻击我们祖国或我们同盟国的敌人。

但是，战争是他们希望的。当我们事实上能运用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把这些国家从地球上抹掉，并且我们的水下火箭能打到地球的任何一点的时候，哪个欧洲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胆敢攻击我们？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成功地裁军，并且不能使十国委员会做出裁军的决策，我们就不会保持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提议将被送到委员会的迷宫，将有许多的谈话、讲演和华而不实的空话和颂扬，并且，这将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中的主动权相应减少。

假如我们现在就通过决议，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大约100万或150万，这将是适当的论据，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裁军的条件是非常成熟了。的确，我们已经对此表示了看法：在我的报告中，并且在其他其他的宣言中，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经济竞赛来解决。因此我们提议并实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承认将给我们的对手——帝国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一些同志们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裁减军备，而敌人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敌人做这件事情，就说明有问题了。我们裁军，是因为我们的核和火箭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必要的水平上保持防御能力，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所以我们想裁军，因为我们不准备进攻。苏联从不寻求征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呢？维持这巨大的军队意味着减少我们的经济潜力。我们有精简军队的机会。即使我们的敌人不随着我们的样子做，也不必顾虑会给我们造成损害。

相反，像在社会主义国家显现的情况那样，国家维持着大量的军队（比如，他们的经济上的潜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热核和火箭武器），打个比方说，这些军队吮吸他们的预算，耗尽国家经济，并

且，如果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件事来说，他们(即帝国主义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同盟国”，因为他们将吞没他们的预算，减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增加我们体系的优势。

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想法，决定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送出这样一封短信，以便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能阅读它，并在我到达的时候讨论它。如果同志们赞成我，那就能通过一个必要的提议。我的看法是，能够做以下事情：召集最高苏维埃开会，例如能在十国委员会开会前的1月末，或者在2月(应该挑选时间，但不应耽搁)召开会议，那样在2月召开的十国会议将讨论我们的提议。在十国委员会开始其工作之前，我们将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一名大会报告人，向最高苏维埃作报告，展开辩论，做出决议，承诺呼吁中的保证。无论其他国家对我们呼吁的反应如何，无论他们是否追随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将遵守最高苏维埃的决定。

我确信这将是非常有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步。而且，这一步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对我们的防御带来损害，但是将带给我们主要的政治、道德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用经济上的术语来说，它将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因为我们的经济是成功的，发展是迅速的。我们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使我们在创造保卫我们国家的手段上占有优势。并且，我们不仅有科学的发明，而且为了实际的需要能使科学的发现巧妙地实现。我想，现在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有火箭，而同时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将没有道理。

另外，应该记住自从我们拥有现代化的、强有力的、迄今为止是无法防御的武器，并且自从我们维持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以来，的确使我们的敌人惊慌，并且它甚至使那些以不同的方式欢迎公正裁军的诚实的人们受到惊吓，但是他们的害怕也许正好促成我们策略上的转变。他们的争辩如下：苏联提出了新的裁军建议，但是不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裁军。这可能使一些诚实的正在寻求裁军的人们害怕。抵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势力，那些侵略成性的和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毫无疑问将利用这一点，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这样的步骤将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里的那些力量，那些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打算改善国际形势、通过和平共处原则来生活的人

们。这将加强他们的力量，使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的集团，无法利用我们的优势作为恐吓其他国家的论据。

应该就此交换意见：我们如何去做以及全部的细节。我们将给国防部、总参谋部指示，以便他们具体准备提议。

这样的裁军，这样大规模的裁军将持续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在此期间逐步地裁减军队，因为这样大量地裁减军队，需要接纳他们：官员们、军官们(士兵更容易接纳)，为了将他们全部安置和接纳。然后我们将看一看它进行的趋势，因为我们不是立刻裁减：它将需要一年、一年半、两年(但不超过两年)。它将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项大约要4年的全面裁军提议，但我们在2年或更少的时间内实行部分的单方面的裁军。这将是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此外，它也是没有危险的。

我经过透彻的思考，向主席团提出审议这些建议，我希望我们的主席团好好地讨论它们，并权衡所有的争论和反对意见。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一件事。但是，看来我的这些提议，如果我们实现它们，将不会引起任何对我们国家的损害，将不会威胁到我们针对敌军的防御能力，而是将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加强我们国家。

我的这些提议中有一些细节，但是，我不在备忘录中描述它们。当我们开始讨论它们的时候，我将阐释我的论据中比在这一备忘录中提到的更多的细节。例如，裁军时，应该确定某个时间，也许确定某个程度上，军队编制转到地方系统。换句话说，将有些团和师的建立实行属地原则(城市新兵在他们服役时不离开他们的企业)。当然，应该有适当的军官做这样的军队单位的骨干，武器必须储存在某处仓库里。我们必须有运输机空运系统，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把这些团从一个地方迅速地部署到其他地方。例如，如果必须把几个师调到德国，我们必须几乎在几天内完成它。给这些地方师的武器必须保管在靠近这些编队展开地点的各种适当、合理的地方。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的这些师，得到警报，将立即到达指定地点集结，乘飞机出发。并且，我们还将考虑到其他因素，因此，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我们将解放因维持巨大的军队和武器而枯竭的资源，维持军队的负担将更小，并且，我们的国内以及国际的政治地位将加强。在国际竞争

中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将以有利的地位在更多的领域获胜，我们国家的威望将更进一步增长。所有这些将发扬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理，促进我们为和平而奋斗，因为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每个新的年度变得更加赞同我们。他们的赞同将增长。他们首先将把恐惧转变到中立状态，然后将逐步发展为对我们国家的同情。我感到这是自然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它。

当我说也许我们应该不仅有骨干军队而且要有部分地方自卫武装的时候，这样做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重复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做法。但是，形势不同，某些方法也不同。当时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没有军队；今天我们有资源和武器，我们有一支军队。我们不能不保留军队，而且我们也不想那么做。

但是，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法建设这支军队，它将是适当规模的，没有过度的累赘，以便它能做好战斗准备，满足国防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必须整顿军事院校系统：他们的分布和数量。也许，如果我们转变为新体系，我们也应该设立这样的军事学校：军官们将不离开他们在企业的工作而受训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部这些措施将无疑地去掉国家预算的负担。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实现我大致描述过的单方面减少我们武装力量的提议。

一个关于我们军队院校的消息。当初我们创办我们综合军事学校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员当教官。如今，所有的年轻人都受教育，因此，征募足够的人到军校工作，培训干部们，使他们不脱离生产，并且为全军的所有分支准备军官是可能的了。这些指挥官将是更接近人民的一类人，而且是不受所谓的社会等级约束的，可为军校提供更好的生源。

在其他方面它将是有意義的，并且，费用将不那么昂贵。

这些问题我认为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仔细讨论。

Н.赫鲁晓夫

1959年12月8日

ЦХСД, ф.2, оп.1, д.416, л.1-9

№24957 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1959年12月11日)

副本

绝密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月9日第61-25cc/об号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应该在1959年向中国的II15导弹(火箭)提供两套检测设备和一套地面装备，而从协作工厂得到的产品向协作工厂订购。

上述成套产品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生产，而部分从协作企业得到的产品，将在1959年12月15日之前运往中国，但是附件中列出的一些特别的汽车以及一些复杂的装备，由于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在1959年没有储备的装备，因此不可能供应。

为了保障对上述汽车和设备的供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划拨必要的储备金，并请求国防部从现有的储存中供应这些物品。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通知说，1959年不可能在工业生产中安排这些设备，而国防部则拒绝了从现有的设备中供应。

因此，请求把附件中列出的产品改在1960年供应，并责成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委员会在1960年生产和向中国供应这些产品。

我将提供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12]

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

П.杰缅季耶夫

1959年12月11日

РГАЭ, ф.4372, оп.79с, д.261, л.5-6

№26596 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959年12月12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1959年12月12日

第A118-4685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

为完成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苏中协定中规定的科研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在根据中国的申请安排订购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器械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中方在编制这些设备的申请时，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没有参与，因此中方所订的设备不全是为进行科研而必需的，并且有些设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国外供货的生产。

一些申请，显然是依据我们专家不谨慎的建议提出的，或者是基于到访过苏联实验室、研究所和企业的中国专家、副博士研究生和大学生提供的信息编写的，未考虑供货中的必要性。

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于必须与中方共同解决所有与仪器、材料和设备保障科研工作相关问题的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苏联科学院、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国家化学委员会、通信部及其他单位)回避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执行1958年1月18日协定的监督机构，为理顺对上述设备和仪器的订单安排，请您采取如下措施：

一、责成苏方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在编制科研工作计划时，经与中方协商确定进行研究所必需的设备供应量。

苏方责任机构必须明确供货的类型、特性、大致价格、必要性及可能性和每一项的生产厂家，指出设备有无批量化生产，并向中方给出相应的结论。

确定供应量的工作应在本年3月1日供货前结束。

二、鉴于1958年1月18日签订协定后有新部委和新的国家委员会成立，以及其他部门进行改组，必须明确哪些苏方机构是负责科研项目的

责任单位，并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名单中进行相应的变更。

还应当研究替换与科研工作无关的机构问题，比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子工业处(第11个研究方向的4个项目)，指的是这些机构无法展开这个问题的任何工作。

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M.苏洛耶夫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988, л.145-146

№0906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1959年12月14日)

摘自1959年12月14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53号决议

第253号记录

绝密

致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为进一步减少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

一、赞成H.C.赫鲁晓夫同志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的关于由苏联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提议。

有关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问题，应该被列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中。

二、委托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议，同时也作为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参考意见。

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8日召开今年指挥官会议，总参谋部首长和军区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讨论有关H.C.赫鲁晓夫同志在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概述了要点的提议在军队里的实际措施。

委托H.C.赫鲁晓夫同志为会议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 ф.2, оп.1, д.416, л.10

№08103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呈上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要作的《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请让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阅，如他们对草稿意见，请通知我们。

M.苏斯洛夫

1959年12月18日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报告，主席团同意代表团的的活动，决定把这一问题通报给中央全会，同时也把我们同中共中央的关系通报给中央全会。

代表团今年9月赴北京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朋友们通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并就一系列现实的当代国际问题与兄弟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和在会见时所进行的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们一直深刻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千方百计支持

他们的斗争。苏联人民为人民中国——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当代主要的根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同时，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

在向中央全会通报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中央主席团的出发点是：全会不仅应当知道这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还应该知道它的困难方面，为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坚定地贯彻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方针，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

在革命胜利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现在，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千方百计加快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任务，以便在今后10—20年的时间里使国家摆脱长期以来的贫穷状况，使之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根据自己的国情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只是同情，而且实际上总是帮助兄弟的中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可以充分地说，在291个工业企业和59个独立的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上，苏联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重大援助。其中135个企业已完全或部分投产。在设计，提供设备、材料和给予其他技术援助方面，从1950—1957年期间，苏联所给予的援助以出口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0亿卢布。在过去10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1.1万人。在苏联企业学习和实践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达7.5万人，大学生和研究生超过7000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中国援助，帮助中国100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或提供其他援助。

同志们，这是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小贡献。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他们因中国已经站了起来并得到显著的巩固而有点头脑发热，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在这次会议上，实质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计划，采取实施所谓“大跃进”的方针。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达到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8%—19%的速度还不够。他们抛弃了1956年所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多次改变计划，过度扩大计划。

为了给自己的新的经济计划找科学根据，中国的同志们开始发展值得怀疑的“以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经济不应有计划地逐步发展，而应采取跃进的冲击方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直接讲，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跃进”，应该按照“马鞍形”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遵循“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原则。马鞍形，刘少奇同志继续解释说，这意味着两头儿高，中间低。

中国的同志们认为这种跃进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是真正的群众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民经济似乎是靠加大劳动力的紧张程度，靠紧张再紧张。不难理解，这种领导国民经济的方法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了实现“大跃进”，中国的同志们大搞所谓的“小高炉”。他们认为借助这种办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大提高生铁和钢的产量。不顾对其他部门，首先是对农业的损害，大约有9000万人被投到了“小高炉”工作中去。1958年为建设自制的小高炉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结果炼出300万吨钢，但它们不得不从国家指标中划掉，因为这些钢，连中国同志自己都承认，回炉都不能用。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时代，当生产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时候，哪里还需要这样的金属呢？

顺便指出，在1959年整个苏联黑色冶金部门，其中包括采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总共才70万人。这年，我们的黑色冶金行业为国家生产矿石9440万吨，生铁4300万吨，钢6000万吨，轧材4690万吨。

尽管中国朋友们利用人民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违反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原理，结果造成了国家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普遍的紧张。1959年初，开始暴露出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部门严重落后。国内出现了紧张形势，居民粮食和工业品短缺。农业感到劳力不足，城市有将近1000万多余的工人，他们不得被工厂解雇，重新返回农村。

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隐患，曾同志式地坦诚地给中国朋友们讲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及时地提醒中国人注意他们计划中的严重缺点，但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中国领导人才承认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失误。在中共中央1959年8月召开的全会上通过了大大缩小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决议，使之适应国家的现实能力。改变了对待小高炉的态度。尽管中国同志至今仍在报刊上继续强调用土办法大炼钢铁运动的意义，但实际上去年建起的成千上万座小高炉现在已停止使用，大多数已被遗弃或拆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同志们放弃跃进式前进。类似的跃进在中国农村还可以看到。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为取代现有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成立农民联合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中国的同志们企图实行明显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以军事化的方法组织劳动。在这种公社里，大体联合有5000个农户。地方工业、贸易和财政问题交给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建立劳动连、营、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有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

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直接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领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方针，强调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我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中国报刊和个别负责同志的讲话，在这些报刊和个别的讲话里，中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少地方简直与共产主义没有差异。

在过分夸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同时，某些中国理论工作者公开攻击和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实施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把这一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某些“理论工作者”公开宣布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过时，应当被新的分配原则所取代。中国人所主张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建立公社吧，尽管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不具备。

自然，中国同志们的所有这些危险的表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简单粗浅的理解，不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到1959年初，中国的农村形势严重地恶化起来。按照统计资料，去年中国获得了大丰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城市，连农村都出现严重的粮食困难。

所谓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导致了商品粮的急剧减少。中国人自己承认，农村已卖给城里的粮食开始就地加工，没几个月就被公社吃光了。采购部门已付款临时存在公社里的粮食也被公社吃光了。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导致公社劳动纪律松弛；部分农民开始不好好出工；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在农村按证定额分配食品。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化迫使中国的同志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改变了对人民公社的许多观点和方针。生活严肃地纠正了他们。他们被迫在公社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纠正把农民财产充公的路线，取消了农村军事化制度。现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大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企业。中国的同志们现在强调这些联合

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公社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现在是生产队，是实际上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房舍和小副业不再公有化。给农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励农民个人饲养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现在采取自愿原则。

当我们谈论中国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时，我们没忘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错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同志们领导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经验不足。当然，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但是，别人的经验，即便是最好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经验，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共产党员和全体人员最理解的经验。须知中国同志们所犯的许多错误，当年我们都犯过。我们也曾试图建立公社，组织劳动大军，在集体农庄收入分配上允许平均主义。自然，中国同志知道这一切。但他们没吸取我们的经验。在进行类似的实验时，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能绕过去的。应当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人将清醒地估计事物的形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同志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怀疑。中国共产党1956年提出的这种思想工作方针，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党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按照这一口号，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获得了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广泛可能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反动派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在学校讲坛上，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百花齐放”的理论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导致了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公开的反革命进攻。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同志们开始改变对“百花齐放”口号的初始解释，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这一口号，宣布将只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观点和学说的发展。结果，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又回到唯一正确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上来——在科学和文化上实施党性原则，但并没有公开放弃“百花齐放”的口号。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同志们试图赋予他们的某些措施以普遍意义，不仅仅对中国适用。在《人民日报》、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等，都被作为创造性

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词汇来加以描述。

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开始效法中国，尽管在那里实施类似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后果。甚至在地方上我们也有一位同志，不分辨怎么回事，就试图宣传和贯彻中国朋友们的类似创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乍看起来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报告中央全会的理由。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正面报道、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而加深了这些错误。我就不用说，这样做我们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苏共和中共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现在让我转向我们同中国同志们存在一定分歧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确定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增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业，为保卫和平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主要的对外政策措施，与我们一起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而斗争。

然而，最近以来，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出现骄傲和急躁的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对外政策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不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1958年，中国出版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小册子，于是上述命题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下面从小册子中摘录出的几句话，代表着对帝国主义的典型看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中国领导人发动这场思想运动，试图以此教育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一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时令人产生吹牛和对战争威胁满不在乎的情绪。甚至试图为这种立场找理论根据。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就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1957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言中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讲：“问题是不能用钢铁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继续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所有这些见解离对国际舞台力量对比作具体分析相去甚远。中国朋友们这样简单地号召不要怕帝国主义，要相信“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等等。看来，他们只是根据自己过去同蒋介石的斗争和朝鲜战争经验出发的，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现代战争估计不足，不知现代战争可造成数亿人的毁灭。

当然，不应该拿原子战争蕴藏的危险吓唬人民，但是也不应该安慰人民，说战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轻视它。

当教育人民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就可能对现代战争产生错误概念，国家和人民就可能对战争处于无准备的状态。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应该教育人民树立相信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信念，让每一个人都坚信，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斗争多么残酷，胜利将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战争。在苏共二十大决议中，兄弟党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包含着当代正确的结论，在当代条件下，不存在所臆想的战争不可避免性。捍卫和平事业的是当代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所有这一切力量可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和保障和平。正是这一点决定着我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长期维护和平的路线。这就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战争和和平的观点；我们不止一次给中共领导人讲过这些观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他们解除了警报。

例如，去年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紧张的时候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收复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着正义的斗争。他们不止一次声明，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支持这一立场。

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盟友的义务把我国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从我们截获的秘密文件中得知，美国统治集团已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准备把上述沿海岛屿交还中国。然而，当把沿海地区的形势弄到白热化程度，而且按照自己的声明走了很远之后，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同志们却踟蹰起来。他们开始强调，说什么中国不急于解放沿海岛屿，它似乎对蒋介石在这些岛上驻军感兴趣。

此后整个事情变成了定期炮击列岛和对美国发表警告；“严重警告”现在已达70多个。

我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怎么能对武装敌人待在它的岸边和家门口感兴趣。当时很清楚，中国的同志们只是动用福建前线的大炮，然后又改变主意，其行动是不谨慎的。这被国外看成是退却。美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大力宣扬这一事实，肯定这是“实力政策”的结果。

对此还应该补充的是，美国当局为了宣传目的，极力把中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行动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他们挑衅性地强调，说中国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我们协商过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它对日本的关系上。在1958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是逐步同这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中国人努力设法同日本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国释放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并遣送他们回国。

中国朋友们对日本的策略路线在1958年上半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导火线是一次在日本长崎市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这次事件之后中国方面停止了同日本的所有进出口业务，拒绝在渔业协定上签字，中断了文化联系。中国报刊展开了反对日本岸信介政府的广泛运动。

1958年6月5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发言时威胁说：“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继续加剧紧张形势和组织类似的挑衅，那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使1945年的事情重演。”

中国的压力，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被看成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结果日本借口保障国家安全开始积极地武装自己，加紧了日、美所谓“安保条约”的审议谈判。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所指望的日本进步界人士的支持。

近来中国朋友们，看来开始明白，他们对日本施加如此猛烈的压力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不久前，应周恩来邀请，前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来到中国。在周恩来和石桥湛山签署的公报中强调，中国人民应根据万隆原则“改善两国关系”。

今年春天，中印关系严重恶化。这与1959年3月西藏叛乱有关。大概印度的反动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但是，假如在西藏及时实行民主改革，根据西藏具体的历史特点实施相应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对反动分子保持应有的警惕，西藏的叛乱就不会出现了。很遗憾，

中国的同志们没从苏共中央的警告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苏共中央早就提醒注意反革命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同志们坚决镇压西藏的反革命叛乱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声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加剧国际紧张形势。在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其中包括利用中印边界争端给人民中国脸上抹黑的企图。

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在于，把西藏问题变成首先是中、印之间的纠纷之源，使亚洲的这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加剧东南亚的紧张形势，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立场。美国报刊上公开写道：对于消除中国的威望，印度说一句话胜过美国说一万句。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没考虑到帝国主义分子策略的这些特点。为了回答帝国主义报刊所掀起的关于西藏的议论，他们发起了自己的宣传运动，集中火力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他们指责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中国。还是基于这种原因，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的长篇社论。

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世人所知。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他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尼赫鲁表现得十分克制。在自己的多次演说中，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建立所谓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强调印中友谊的意义。印度不止一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正因如此，同美、英资本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资产阶级右翼猛烈抨击尼赫鲁，指责他对待人民中国“不彻底”和“退让”。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尼赫鲁，改变印度中立的对外政策，恢复它同西方结盟的权利。假若印度的反动集团实现这些目的，那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尼赫鲁政府的现今对外政策是争取巩固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

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如此不调和地反对尼赫鲁目的何在呢？他们自己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团结—斗争”的原则。用毛泽东同志的

话说，他们给尼赫鲁戴上了“两面派”，“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绅士，一半是流氓”的桂冠，似乎是“迫使”他加强同中国的友谊。

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同这些“鬼”相处？如何同印度建立关系？中国的同志们找到办法：迫使尼赫鲁悔过，通过施压迫使他同中国合作。而且中国人还说，他们考虑到了尼赫鲁政府垮台的可能性，即使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上台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这只能加快印度的革命。

很清楚，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同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果不出所料，西藏叛乱平息之后，中国军队前进到了中印边界。

人民中国和印度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这里不可能再去纠缠历史问题的某些涉及喜马拉雅山地区领土问题的实质。但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同志们以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使双方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搁了起来，待以后解决。他们强调，为了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不立即强行划定边界，将来要考虑实际形成的状况。但是中印争端由于西藏叛乱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边界领土问题又尖锐起来。8月25日，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印度方面死伤了几个人。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利用这一冲突大肆叫嚣，指责“人民中国实施侵略”。在印度国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同时对尼赫鲁和印度共产党也展开了攻击。

应该指出，上述事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出访美国之前几天里发生的。敌人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利用印、中冲突破坏苏联的和平行动，把中国行动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想以此挑起我们同印度的争论。

考虑到这一切，苏共中央决定致信北京，表达我们对由于中、印冲突所出现的形势的关切。同时还决定由塔斯社发表声明，促使和平调解所出现的冲突，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我们的立场。苏联的行动当时暂时制止住了冲突的发展，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危险把戏。中国和印度政府声明，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再继续扩大分歧，他们将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边界问题。

但事态进程表明，印中边界问题蕴藏着新的危险。众所周知，10月21日印中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出现了人员伤亡。此后印度又爆发了更大的反华运动。

应该指出，在印度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妄图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帮了印度反动分子的忙，使他们能够容易地动员本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人民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境。

中国的同志们肯定，他们是从考虑自卫和本国声望出发，真理和正义在中国一边。所以必须向全会报告，我们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塔斯社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声明，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国朋友们在信中指出，该政府的“内外政策早就有了反动趋向”。信中接着说：“我们认为，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仅仅实行迁就退让政策，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在他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只能助长他们的猖獗，如果中国不予以还击和谴责他们。这不仅对中印关系不利，而且也不利于让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再继续向西方靠近。”

信中包括有这样的内容，指责“塔斯社声明把中国和苏联对中印边界事件的不同态度暴露于全世界，这只能使印度资产阶级、美英帝国主义者高兴，让他们利用这一点挑拨中苏关系。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分析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它们是：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冲突，中国领导对印度形势和尼赫鲁行为的评价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主观臆断的。

请允许我援引一下我们的印度朋友在致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在指出由于冲突，印度形势在不断恶化时，印度朋友们说：“如果再继续争论，这将对印度的反动势力有利，给广大印度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印度的同志们正当地认为，印中关系继续恶化，可能削弱印度的民主运动，深刻动摇印共的阵地，使其面临被禁止的威胁。用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话说，印度共产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中国的立场，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提出边界问题，不知其中隐藏着什么目的。所有印共领导人都表示诧异，为什么中国政府给印度反动派提供了介入这一边境冲突的机会。

至于中国同志们肯定，说印度反动派、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苏对

印中边界事件立场不一表示惊喜，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者确实惊喜过。但是在印中冲突发生的时候，假如苏联也介入这一冲突和造成这种印象，似乎为反对尼赫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应该认为，将更加高兴和感到惊喜。事实表明，当苏联主张和平调解印、中冲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喧嚣明显地降低了。

中印关系紧张和中国同志们的其他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什么结果？导致了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导致了它在亚洲阵地的削弱，导致了許多亚洲国家同西方和美国结盟趋势的加强，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非常仇视他们的长期以来的敌人——殖民主义者。

中国和印尼关系目前变坏便是其标志，在此之前两国关系一直很好。

事情在于，在印尼生活着200多万华侨。大部分华人从事贸易，对印尼经济有着很大影响。这早就使印度尼西亚人产生了压力，但在最近以前他们没敢采取任何措施。今年11月苏加诺总统颁发决定，禁止外国（其中有10万以上中国人）在农业地区经商。印尼的反动派利用这件事发起了广泛的反华运动，并企图使其具有反共性质。

中国朋友们试图抗议印尼政府所采取的似乎是歧视中国公民的措施。但是中国人的抗议没有也不会有成效。它只能加剧印尼的反华情绪，因为客观上事情显得是这样的，人民中国政府庇护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印尼人的故乡剥削印尼人。

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努力利用中印(尼)争端挑拨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使印尼更加依附于西方国家。难道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阵营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吗？

如果考虑到中国同缅甸和泰国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朋友们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同亚洲和远东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同志们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孤立。是的，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主要归咎于中国领导人自己。在苏联和其他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努力维护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同志们对待亚洲许多中立国家的行动实际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共

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相违背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缺乏应有的一致性是不正常的。所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利用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上述问题。同时还打算，在苏斯洛夫同刘少奇或周恩来同志会谈时讨论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存有分歧的某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这样做了。

参加对外政策问题讨论的，我方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中方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等同志。

会谈于10月2日在中共政治局驻地举行。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他访美和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消息。同时指出，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对悬而未决的争端问题进行和平调解的情绪，对于继续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坚定前进出现了一种完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我们完全不理解他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印度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我们两党的领导在最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必须更好地互通消息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的盟友，不知道明天中国同志们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什么措施，不能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仅被共同的目的和思想，而且被盟友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国家不正确的行动会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形势造成困难。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宣传直接把中国同志们的行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各个共产党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对外政策方针。

至于苏共中央，我们定期向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的领导通报苏联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行动，必要时还要同他们一起协商。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同志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所做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宣布，他们对待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还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他们对待尼赫鲁政府所采取的路线也是正确的。我们的会谈一时气氛非常紧张。事情僵到这种程度，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对待尼赫鲁所采取的路线似乎有些迁就，看风使舵，而中国的政策比较坚定和正确。很明白，对类似说法，我们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鉴于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怎样理解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他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否认为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

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的同志们表面上承认世界两种制度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倾向于只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临时的策略手段。

中国的同志们对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对话的思想的动机理解得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不久前取得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影响的增长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内爱好和平力量影响的不断增长。

甚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比如著名的美国记者C.苏茨贝格今年在纽约出版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瑕疵》一书，其中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西方在同社会主义竞争中失败了。苏茨贝格这样写道：

“1945年.....美国和它的西方朋友的战略形势很好。今天，其形势可以这样概括，即使作乐观估计，也只能称不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了自己在中东和亚洲的城堡。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站起来了——他们大多数反对我们。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我们失去了我们一时的核优势，而苏维埃俄国在惊人迅速地复苏之后在所有方面变成了超级大国。

“我们亲眼看到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这一惊人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现在不能不看到力量对比中的这种变化，从中得出结论以改变自己破产的对外政策。然而某些中国同志把这些进展看成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新的阴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中国的同志们不是把美、英当局某些人士出现的有益于和平的情绪变化用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用来发动新的反美攻势，实际是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报刊近来加紧了反美和反英宣传。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电影在中国一

些城市仅放映了2—3天就停止了。

从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全部同意我们的和平共处方针。他们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原则，需要有益于防止战争和有益于和平的相互退让，需要想到考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利益。列宁很好地指出了它的理论根据，他教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善于贯彻灵活的对外政策，善于协商，当生活需要、事业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当然，在原则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退让过，将来也不会退让。但是，正是为了这些原则的胜利，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迅速向共产主义推进，必须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原则。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和平共处是必要的，因为它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建立良好的对外政策条件的可能性。它可以为我们为保障社会主义力量超过资本主义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蕴藏的所有可能和优势赢得必要的时间。不难理解，在我们时代，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提醒我们注意的列宁的这一指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现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时代对我们有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此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世界的革命进程。时代对社会主义有利，赢得7—10年的时间意味着保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竞赛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里胜利的不可避免性，今天不只是为共产主义者所承认。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胜利。我们坚信，在未来时代，社会主义体系会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力量优势会不断地增长，追随我们的榜样，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一定能胜利。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不是靠外部武器的力量，而首先是靠榜样的力量，靠自己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力量取胜。

我们全身心倾注于这一胜利，为此我们正在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为了接近这一胜利的时刻，必须冒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今天这一战争可能是导弹核战争。这种无数人牺牲和广袤千里变为废墟的战争不仅不能加速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会大大制约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迟滞它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

在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我们党考虑到，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种危险扎根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的反人民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之中。存在军事进攻的威胁，要求我们对侵略势力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做好保卫苏维埃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取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的准备。只要战争危险未被消除，没有达到彻底全面裁军，我们就应该一直关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自己武装力量的实力。

当我们说和平共处原则和我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业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我们明白，在这些集团中有不少“冷战”和热战的疯狂追随者。有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热衷于军备竞赛。最后，还有不少失去理智的疯子，他们憎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准备盲目地冒任何风险。自然，不能为这些人的行动，为他们努力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形势作担保。

但是，如果单从帝国主义分子可能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出发，那么就可能忽略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巩固和平、制止战争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放过这种可能性，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千方百计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孤立他们和钳制他们，保障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支持和平事业。正是这样才是当代条件下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所有世界人民的期望，而报之以穷兵黩武则形是而实非。

应该指出，在10月2日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们宣布，他们不希望战争，将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通过谈判调解同印度的冲突。他们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同我们有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目的。我们对此表示了满意。

在会谈过程中就老挝形势交换了意见。而且我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我们达成协议：应该继续坚持执行1954年的日内瓦老挝问题协定。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这个国家内战扩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不能不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注意他们接受苏共代表团批评意见时的神经过敏和抱怨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说，这不符合共产党兄弟大家庭里所形成的平等和同志关系原则。应该指出，中国的同志们在过去对苏共中央提过批评意见，而我们对此保持了应有尊重——尽管我们对这些意见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共领导说出我们的批评意见，况且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共的领导作用，虽说我党中央反驳过这种说法。

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同中国的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把你们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以高傲的态度同我们讲话，即使是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中国的朋友们开始平静下来，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立场。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也对同我们存有某些分歧感到不安并想消除分歧。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

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为了广泛讨论苏共与中共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共领导人以前也见过面。这方面重要的一次是赫鲁晓夫同志同毛泽东1958年在北京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国际形势由于美、英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而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我们讨论了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情况下实施共同防御的措施问题，制订了防止近东冲突的共同路线。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永远是一致的。“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比作十个指头，”毛泽东对我们说，“那我们有九个指头完全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指头有分歧。”我们认为有必要消除这些分歧。

我们同人民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而全面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兄弟般关系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由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来丰富的。我们党继续以该有的注意力对待包括中国同志们在内的国外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同时，必须创造性地批判地思索这一经验，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勇敢创新同“左”倾幼稚病和标新立异相区别，以便为我们的干部指明方向，不使他们迷途。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

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所

以，应该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加大力度宣传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措施，坚定地捍卫为我们党的整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对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毫无疑问，关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总路线依然未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警惕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友谊，不给人以破坏中苏关系的机会。应该说，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势力，他们正企图寻找我们同中国相互关系中的缝隙，挑拨我们相互争吵。可以坚定地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应坚决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陈述的、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原则，应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谨慎、尊重和分寸感，对需要我们两党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的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千方百计促进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

ЦХСД, ф.2, оп.1, д.415, л.56-91

№26597 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 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1959年12月18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研究所第1146 08号函附录

1959年12月18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1959年发给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秘书处的技术文件清单

课题号	名 称	发出日期	信函号
	一、计划规定的技术文件(发给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		
1 05187	中间引入载热介质的油页岩燃气发生器(内部燃烧)的综合报告	12月17日	1140-08
1 05188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七期成果论文集《可燃油页岩与其加工产品的化学和工艺》	3月31日	295-01-31
1 05188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八期成果论文集《燃料和其加工产品的化学与工艺》	12月17日	1140-08
1 05189	有关带液体降渣的燃料气化领域试验工作的科学技术报告	3月31日	295-01-31
1 05190	有关分离、加工和利用水溶性页岩酚的综合报告	12月17日	1140-08
从 1959 年 11 月的 计划 中删除	波罗的海沿岸矿区及卡什皮尔矿区浮选法油页岩选矿的综合报告	5月4日	422-01-31
	二、未按规定在计划中的技术文件(发给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1. 刊登在全苏页岩炼制科研所成果论文集第四辑和第五辑的2篇文章的印样,作者是Л.И. 古利亚耶夫和佩什金,第四辑:《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矿区页岩焦油成分与180°—300°发电机关分馏成分》;第五辑:《180°—300°焦油室内分馏化学成分研究》	8月7日	91-08
	2. Л.К. 科列洛夫的书,名为《液态页岩和煤炭产品的物理化学特性》	8月31日	752-08
	3. 刊登在工程物理杂志1959年8月号的Л.К. 科列洛夫的文章《关于块状材料热分解的基础理论》的印样	8月31日	752-08

续表

课题号	名 称	发出日期	信函号
从 1959 年 11 月的 计划 中删除	4. 刊登在《化学工业》杂志1959年第二期的Л.К. 科列洛夫的文章《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的印样	8月31日	752-08
	5. К.Б. 乔尔内舍夫的论文摘要《页岩焦油中间馏分主要成分初级热转换的过程研究》	9月7日	771-08

课题负责人

A.C. 弗捷耶夫(签名)

ГАПФ, ф.09493, оп.1, д.988, л.139-140

№26598 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1959年12月30日以前 [13])

关于完成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工作计划中VI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的报告

此项工作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

今年1月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从苏联科学院矿业研究所获得了本年度应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的V I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1959年的工作计划。

在今年的2月份，通过国民经济列宁格勒委员会对外联络局，获得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指示及有关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建立交流经验直接联系的形式。

基于所获得的指示和形式，起草了与中方合作的如下协议，并于3月份发给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

- 一、工作计划；
- 二、苏联向中国转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 三、苏联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中国专家的课题清单；
- 四、中国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苏联专家的课题清单。

至1959年年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没有获得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协商一致的上述文件，因此所有往来信函及所有技术文件的转交在本年内都没有实现直接对接，而是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实现的。

多次就此询问后，只在今年11月份收到了秘书处的回复，其中告知，在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所提的计划中，删除第四项“浮选法油页岩选矿”，尽管科研所已经在1959年5月份就将该项目转交给中国的资料发给了秘书处。

此外，在该回复信函中该告知，苏联和中国专家相互考察出差的内容也要从1959年的计划中被删除，因为这可以在1959年提交给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家。

从1959年的计划中还删除了编写小颗粒页岩有效的工业加工方法研究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在年内没有收到任何用于这个结论的资料。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年度计划中给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规定的

其余部分都全部完成，并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给中方发去了本信函附件中所示的技术文件。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主管科研副所长

A.希涅里尼科夫(签名)

ГАЭРФ, ф.09493, оп.1, д.988, л.136-138

№16669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 提要(1959年12月31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K.E.伏罗希洛夫同志Φ.P.科兹洛夫同志E.A.福尔采娃同志：

苏联外交部向你们呈上关于同印度和尼泊尔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会谈提要的草案。

请告知你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并将这份文件提交给苏共中央审议。

葛罗米柯(签名)

1959年12月31日

第3213/TC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在印度的会谈提要

K.E.伏罗希洛夫、Φ.P.科兹洛夫和E.A.福尔采娃等同志访印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印的友好关系，加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发展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趋向，争取印度在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举动获得更积极的支持。

此行的情势特点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12月访问了印

度。这次访问对印度各界主张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积极性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的出访为了抗衡上述影响，应当促使那些在印度主张印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的力量结合和积极起来。

代表团在会晤、会谈和公开演讲的场合下，必须遵循下列要点：

现在国际关系明显趋向于紧张局势缓和以及政治气候变暖。这样的形势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和苏联过去和现在共同努力的结果。

促进美苏关系改善以及有力地影响东、西方紧张关系基本上缓和的最重要措施，就是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代表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极大的意义，受到各国人民一致支持和许多政府的赞同。

最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外长会议，各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各领域交流的加强等等，有力地促进各国政府更好地互相了解。

上述因素对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未决问题创造出有利的可能性。按我们的意见，应完全利用这些可能性。要表达这样的信心：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的实际步骤，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政府认为，因此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会上将研究当代这些迫切的问题，如全面彻底裁军，签订对德和约，包括关于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苏联政府将竭力设法使会议在高层领导人中取得成功，使会议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及推动各国走向进步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进行的访问，我们希望，这不仅是改善法苏关系，而且是东、西方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世界持久和平的建立不能没有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特

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参与这一事业。这对解决国际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是公认的。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每一实际步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总的情况，“合作精神”的维护与发展，各国避免新的冲突与分歧的努力。和平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而现在刚刚出现了新的各国互相对待态度的最初萌芽，表现出更多地互相谅解和业务合作的渴望。这些新动向当然需要非常认真和关心的态度。

印苏关系

1.政治关系。在同印度国务活动家会谈时，应对苏印关系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着重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加强苏印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印苏关系经受了一系列考验并证明了其牢固性，这种关系的顺利发展基本上对改善国际局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内促使西方国家发生新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共处和互相谅解的问题。印度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互相支持，使这些问题为了和平与安全得以顺利解决。扩大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既符合印度，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赫鲁晓夫访美后，总的趋向缓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仍认为，加强印苏合作是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将促进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更广泛地交流关于对外政策性质问题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良好实践已经形成。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个人信息赋予重大的意义，并愿进一步继续同印度政府交流信息。

2.关于印度和苏联国务活动家今后的个人接触。会谈时表示，印度和苏联的国务活动家进行个人接触，尤其是两国政府首脑正式互访，大大地促进了印苏关系顺利发展。苏联政府认为，不同国家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的个人接触，是使各国人民亲近的重要方法，并促进相互谅解的发展和巩固。

苏联政府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展印苏合作，应扩大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个人接触。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团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对尼赫鲁访问苏联的邀请仍然有效，如果他能够在1960年方便的时候同其女儿英迪拉

及孙子们一起对苏联进行访问，我们将非常高兴。

在预先同尼赫鲁商谈后，应邀请内阁总理及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到苏联访问，其中包括克里希纳·梅农、潘特、莫拉尔吉·德赛、C.K.帕蒂尔等。

在同普拉萨特总统会谈时，适时地提出，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并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他在1960年来苏联。

3.经济关系。指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感到愉快的是，印方对此合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高兴的是，苏联政府准备今后尽力发展同印度经济技术合作的互利形式。

如印方提出新的贷款问题，则回答印度人，我们认为，应当在印度偿还苏联提供的贷款，包括偿还最近一次提供的15亿卢布贷款之后，再提出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到在执行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过程中可能会另外出现的储备金。

4.贸易关系。表示，印苏贸易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尚有一些条件未被利用起来，以便显著扩大互利的贸易量。苏联准备按通常的商务条件，根据印度需要的数量，扩大机器和设备的销售，供应石油、石油制品以及其他商品。因此，签订苏印长期贸易协定(现在要每年商定货物清单)，以及签订有苏联和印度参加的三方贸易协定，这将是积极的因素。应表示，希望双方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扩大互利的贸易。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应表示，希望印度和苏联能够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发展各国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彻底废除关于贸易问题的歧视政策。

关于中印关系

若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在会谈时提及中印关系问题，则以广泛讨论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为出发点。在谈到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问题时，应限于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报告上阐明的苏联政府立场以及塔斯社1959年9月10日的声明。应当强调：通过谈判尽快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符合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

若印度人提到请苏联在调解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出面斡旋，则指出，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自己能顺利解决这一争端，而不需要任何第三国的帮助。

若印度人提到关于苏联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问题时，则说，这一复杂问题要由苏联的主管机关认真研究。

关于克什米尔

若印度人关心苏联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访印时已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关于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的这一立场至今不变。

关于西藏

若印度人以任何形式提到西藏问题，应回答说，苏联政府的意见是，这一问题完完全全是中国的内政。

关于苏联与尼泊尔关系

由于苏联代表团被邀请到尼泊尔访问，不排除印度人在会谈时将会提到关于苏尼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完全理解尼泊尔同其邻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紧密和友好关系，并衷心地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尼赫鲁进行秘密会谈时，关于苏尼关系问题应补充指出，关于这一问题，正如苏联驻德里大使当时已向印度外交部通知的，苏联政府在同尼泊尔的关系中总会考虑到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今后有意继续遵循这条路线。

关于联合公报的发表

认为，应当发表关于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的联合公报。

1959年12月31日

第3213/гс号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73, д.301, л.241-258

的报告(1959年12月31日以后 [14])

关于1959年在苏、中高等院校合作中开展科研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历史上首次将苏、中两国高等院校的学者联合在一起，解决大型科研和国民经济的问题。

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基础上，苏联高等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之间制订了联合科研合作计划，该计划由两国的高校负责完成。

按照1958年的计划，25所中国高校(其中有11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4所综合大学)就完成85个科研课题展开了合作。

1959年，在富有创造性的合作中，有29所中国高校(其中12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5所综合大学)参与其中。1959年，高等教学机构在完成114项课题方面进行了大量多种多样的工作，其中一些课题是跨期的。

中国和苏联高等院校2年的共同工作总结，表现出了许多正面的结果。

在新技术和新工艺领域：2年内，莫斯科钢铁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及北京钢铁学院共同做了大量工作。

对“用中国自有元素制成新牌号合金钢的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了研究。

研究了在普通加热条件下奥氏体状态对动力学的影响和3种过冷奥氏体钢的等温转变机理。采用感应加热，绘制了钢淬火所允许的最佳状态曲线。

关于“炼钢过程机理与动力学研究”的项目，共完成了7个课题。

课题一，“氧化剂射流对熔融金属作用下氧化过程的规律性研究”

在实验室完成了不同加热方式条件下钢的熔炼试验和以确定碳的临界浓度为目的的金属熔炼，在此状态中氧化过程放缓。检验了炉浴表面对比氧化剂供应的数量和速度。对试验数据进行了理论处理。进行了金属炉浴不同状态和氧化剂供给不同浓度条件下的实验室金属熔炼。采用

真空熔炼法研究金属氧含量，研究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二，“钢熔炼时炉浴成分不均匀性研究”

完成了设备的制造，根据其高度准备了专门用于炉渣采样的盛渣桶，及不同层位炉渣和金属炉浴的金属采样仪器。掌握了采样的方法。就金属炉浴不同高度碳和氧分布的不均匀性研究进行了部分试验。

课题三，“液钢脱氮和脱氢的机理、动力学和冒泡效果研究”

设计并建成了用于测定炉渣气体的真空设备。进行了试验和调试方面的工作，对接触面上氮和氢的表面活性进行研究：惰性气体—金属、氮和氢从金属容器移到表层的动力学。

课题四，“现代贝塞麦炼钢法的研究”

使用低硅含量(0.7%—0.8%)的生铁进行了多次软钢的平衡熔炼，熔炼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五，“滚珠轴承钢的真空处理”

此项工作完成，发给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准备中。

课题六，“500吨平炉优质钢(包括合金钢)熔炼工艺研究”

进行了含有锰、镍、铜、铬元素的合金钢的多次熔炼。确定了一些重要的熔炼工艺参数。得出了在500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相比在185吨和25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并不差的结论。

课题七，“在用天然气燃料的平炉内炼出优质钢的熔炼工艺研究”

在寻求重油与天然气合理比例方面进行了研究。多次熔炼表明了天然气燃料的炉内环境中水蒸气局部压力升高与钢中氢的性状之间的关系。

关于“电热处理时相变与工艺研究”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课题一，“高频电流加热合金结构钢时，淬火的最佳状态研究”

研究了8个牌号的中国含有钨、钼、钒的合金钢。

绘制了两个参数，即淬火后的硬度和晶粒度的最佳状态曲线。得出了快速加热时每个牌号奥氏体化的温度间隔。工作已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二，“高频淬火状态与稀土元素(镧、铈)对50X2C型钢机械性能的影响”

绘制了添加微量镧、铈的中国牌号50X2C钢感应加热最佳状态的曲线。为了达到最佳淬火状态，对低温回火的动力学和回火温度与机械性能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未添加稀土元素的同类型钢的回火及在正常淬火后两种钢的回火进行了研究。对硬度、冲击韧性、抗拉强度方面的机械性能进行了评价，以及固溶状态回火时对应单位电阻率和矫顽力的变化。

课题三，“感应加热时奥氏体化状态对等温转变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对两个中国牌号的钢进行了研究。参照感应加热特征引起的若干变化，在相变测量仪上进行试验。绘制了感应加热两种状态下奥氏体等温转变的曲线。此项工作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四，“高频电流加热的气体氰化处理”

在机械车间流水线上现行的设备中对30X1T钢进行气体氰化试验。

设定的制度，使得35—45分钟内在齿轮上形成深度达0.4—0.55毫米的氰化层，在氰化层表面区域氮含量为0.1%—0.3%。

此外，在实验室设备上进行试验，为了高频电流加热的氰化处理，研究使用三乙醇胺蒸气作为活性介质的可能性。

关于“新型冶金熔炼炉机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课题一，“炉中熔炼室射流运动的研究”

从圆形喷口流出的平射流扩散研究。在单向供应燃料和双向供应燃料两种情况下，循环炼钢炉熔炼室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其结果是应确定熔炼室中速度场与温度场间的关系。

制造了模型，并制定了平炉沉渣室(平炉沉渣室内尘降)的研究方

法。研究工作已结束。

课题二，“由于气体运动与燃烧，在炉内熔炼室中热交换的辐射特点及机理”

建立了用于研究天然气在氧化环境分解的试验设备。重新安装了用于研究火焰混合过程对辐射特性影响的设备。部分进行了3种混合方式的研究试验：完全扩散式、部分预混式、完全预混式。为了研究混合过程的机理，建成了可在冷态气流状态下进行研究的专用设备。

建成了第一台燃气电加热器，利用它可进行气体燃烧温度曲线测量方面的试验，对燃气分解物抽样进行质量和数量的分析。在工厂条件下准备在实际炉内进行试验工作。此外，在工厂建成了着手重油火焰研究专用的试验台。

“金属压力加工理论”项目共进行了4个课题的研究。

课题一，“金属与工具间接接触摩擦力的研究”

继续1958年开始从事的研究，列入轧钢教研室副博士研究生董德元论文的研究范畴，有关压力和摩擦力分布不均时夹角、摩擦角、临界角方程式的结论与分析。

课题二，“在合金钢轧制的不同状态下抗变形和抗展宽的研究”

制定了研究方法，选定了相应牌号的钢，可研究抗变形和抗展宽与碳和铬含量变化的关联性。标定了压轧的状态，确定了轧制的温度和速度。选定了轧制用的相应设备、测量和记录仪器、加热设备和工装。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好，完成试运转和调校。

完成了第一部分在平滑轧辊上轧制时确定抗变形和抗展宽方面的试验，获得了一系列试验数据，一部分数据已经处理。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继续进行。研究了轧制金属线材变细的孔型系统和在轧辊上制造孔型槽。

课题三，“在轧制合金钢时用轧辊改善金属夹紧度”

预备好了样件，用于研究轧制A-12号钢时，单位压力与展宽性及轧制该种钢时的可塑性间的关系。

制造了用于轧制A-12号钢时，确定摩擦系数的工装，进行了试验。

课题四，“顶锻时变形的基本规律性”

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是分析实际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选出新的更加合理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

最终确定了在轮流顶锻和拉拔作用下的总变形系数。

“高温合金研究”项目包括13个课题。

课题一，“在1700℃以下温度工作的钼合金研究”

1.帮助北京钢铁学院制定一系列试验的方法，包括联结性试验、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抗氧化性试验、耐腐蚀性试验，以及试件通过电流时的温度控制试验。

向北京钢铁学院提供整套设备图纸，包括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机 and 一般持久强度试验机，以及设备ВИМ-ІМ、ІМАШ-6、ІМАШ-6的图纸。

2.冷硬化对钼及钼合金的老化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准备的试件上完成了工作。试件于1959年10月收到，研究随之展开。

课题二，“镍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1.镍基高温合金的结构、特性、生产和研究方法的信息。

撰写了有关信息的内容，并转交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2.编制了提炼和杂质分析的指南。

相关信息与合金ЭИ-437杂质光谱分析用标准物质配套，在1959年3月一同转寄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3.冷硬化对Нимоник-100型合金特性的研究。

此项研究应在北京钢铁学院提供的试件上完成，但目前还未收到试样。

4.热处理对合金结构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1)二次淬火的影响研究。合金二次淬火后对其晶界结构的分析研究。

(2)多次组合式回火的影响研究。

研究了多次(分开)回火以及连续先进行低温回火，之后再进行高温回火处理。

课题三，“铁镍铬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为北京钢铁学院准备有关铁对镍基高温合金影响的通报。

课题四，“用于电机制造业的不含镍的奥氏体钢的特性和老化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熔炼了各种成分的钢。制造了试件，进行了腐蚀性的研究。此项工作由北京钢铁学院的肖纪美(Сяо Дзи Мей)教授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A.A.亚斯克维奇副教授共同完成。

课题五，“莫斯科钢铁学院在设备制造中的帮助”

准备好发运7台持久强度试验机和做试验用的80公斤纯镍。设备和材料将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办理完许可后发运。

课题六，“镍铬基高温合金中出现不等粒性的原因研究”

熔炼出了真空炉和非真空炉的镍铬基合金。在用获得的合金制成的试件上，用金相学统计方法确定晶粒的平均大小和不等粒性的程度。确定了真空合金与非真空合金晶粒增长倾向的巨大差异。所有非真空炉合金直到1200°C以下微小晶粒依然存在。进行了超过一半以上的X射线检查。

课题七，“热处理时复杂混合物结构方位散乱变化的X射线检查和镍铬基高温合金的利用”

在不同时间内利用镍铬基高温合金ЭИ437研究复杂混合物结构的方位散乱。采用较为精确和敏感的X射线方法进行试验。

课题八，“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

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在不同温度下温度特征的表现(说明晶格耦合强度),确定-177°C—+550°C温度范围内的衍射线强度,在隔箱内的纯金属上组织和测试。对合金X20H80进行研究,根据X射线照片底色制定固溶体实际结构的研究方法。

课题九,“参与组织北京钢铁学院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印刷实习课的材料,并寄给北京钢铁学院。

2.准备报告和发给中国的文章的印样。

课题十,“液态金属与合金流动性的研究”

与副博士研究生韩其勇一起完成了关于确定液态熔渣成分流动性部分的工作。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十一,“反映扩散的研究”

与高英山(Гао Ин-шань)教授一同完成了反应扩散方面的研究。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并发给中国。

课题十二,“内耗法研究马氏体不锈钢回火脆性的机制”

继续研究合金添加物对马氏体高铬钢回火脆性的影响。内耗温度相关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方法。除内耗外,还研究了冲击韧性。部分研究了冷却速度对回火脆性的影响。

今年打算完成合金元素对回火脆性的研究,之后转而研究回火时持久性对脆化过程的影响。计划研究合金添加物碳的可溶性影响。

课题十三,“研制达到2000°C温度时高熔点金属与合金表面应力的测量方法”

制成了设备,正在进行试验。

1960年

№2072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1960年1月15日)

1960年2月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月8—29日

第12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月15日

设午宴招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时通报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详细讲述了赫鲁晓夫同志有关苏联单方面裁军120万人问题的建议。强调苏联军事力量在实现裁军后还剩下242.3万人，这将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1956年讨论裁军问题时规定的程度还要低。还说，因为苏联武装力量大量配备核导弹武器，所以苏联的战斗力并没有因裁军而减弱。

讲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59年)12月全体会议研究“有关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的的工作。

列举了一些数据，表明农业及其某些部门在七年计划中第一年里的顺利发展。

乔晓光对所说的信息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说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苏联人民在工业和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有

了信心，并鼓舞他们为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政治强盛而更加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将苏联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取得的成就评价为最出色的成功。乔晓光说，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乔晓光接着说道，对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建立和平和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新的裁军建议是出色的贡献。这些建议在全世界善良人们面前鲜明地展示了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并给予人们为和平和裁军而斗争的力量和信心。

中国人民高度评价这些建议，并认为是和平建议。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明显证明了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盛。这是赫鲁晓夫同志的伟大功勋。苏联内外政策的成就使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和不可战胜充满信心。

乔晓光从自己的方面讲述了1959年中国人民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超额完成1959年的计划。去年中国的炼钢工人生产了1300多万吨钢，而不是计划的1200万吨钢。尽管过去的一年中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的粮食和技术作物依然获得很好的收成。与1958年相比，去年农产品生产增加了16%。

回答了乔晓光想知道的有关莫斯科市建设的问题后，讲述了自己去北京的印象。

与大使约定届时在我们大使馆向大使们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12月的全体会议工作情况和今年1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午宴的气氛温馨而友好。

参加的有：中国方面是大使和翻译楚家杰(ЧуЦзя-те)，苏联方面是参赞H.E.托尔宾科夫和二等秘书B.M.巴库林。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6, л.25-26

№24959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1960年2月2日)

在川南地区对天然气的产地进行研究的工作正在根据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制订的计划进行，或许，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工作从1959年1月29日至2月15日，A.Л.科兹洛夫和E.M.明斯基同志参与了这些工作，该阶段的工作是为了熟悉四川南部天然气产地的地质结构和开发条件。

在这一阶段期间，苏联的专家队伍对大部分的天然气产地进行了考察，而中国同志也向我们介绍了这些地区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工作的状况。

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果以及关于在川南天然气的勘探、研究和开采问题上提出的建议，A.Л.科兹洛夫和E.M.明斯基在1959年2月14日在重庆召开的天然气工业和石油工业科学院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报告，并且，这些内容也包含在A.Л.科兹洛夫和E.M.明斯基于1959年2月19日向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转交的“川南地区天然气产地的勘探和开发的基本状况”工作报告中。1959年2月18—19日，A.Л.科兹洛夫和E.M.明斯基把这一报告的主要结论报告给了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科学院。

工作的第二阶段从1959年2月16日至4月5日，制订了对川南地区石油沟(Шиюгоу)、东兴(Дунсы)、羊羔溪(Ян-Гао-си)和纳溪(Наси)天然气产地进行实验性开发的方案。

因为提供的主管开裂，在生产层位不能进行实验性的开采，由于复杂的地质结构，在天然气的储备、气层和钻孔的参数方面，还没有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的确切的资料，据此制订出最终的开采方案。因此还制订了实验性的开采方案，在保留预先提出一些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关于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类似的方案，这是对些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进行开发所必需的。这样就可以确定天然气的储存、工作量和许可的最低的流量、钻孔的低压区、疏松度、穿透性等其他参数，这些都是制订最终的开采计划和对这些天然气产地进行正确的开采所必需的。

在对制订的开发方案进行试验的过程中，对现有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地质构造的材料，关于开发结果的材料和天然气钻孔的材料。为了把石油沟、东兴天然气产地开采层的地质构造搞得更加清楚，A.Л.科兹洛夫、E.M.明斯基、Ю.П.克罗塔耶夫和П.П.伊万丘克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沿着通往重庆市附近的南北温泉地区的这类

岩层的表面走了好多趟。

事实上，天然气产地石油沟、东兴的实验性开采方案中包含了通常的开采方案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

为了使中国同志们能够根据储藏的天然气的大致数据，熟悉制订研究方案的方法，建成了一整套进行气体动力计算的设备。

此外，在天然气产地羊羔溪也设计了从下面的二叠层到上层的三叠层特别的天然气方案，以便通过在两个层面同时降低压力并防止天然气从7号钻孔进出的方法确定天然气的储量。

为了制订石油沟、东兴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实验性开采方案，200多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苏联专家一起参加了工作，他们都进行忘我的工作。经过这一紧张的工作，实验性开采方案在一个半月就制订了出来，而通常完成这样的工作则需要6个多月的时间。

制订的实验性开采方案在1959年4月6日在南充市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业地质勘探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在对羊羔溪天然气产地制订实验性开采方案的过程中，Ю.П.克罗塔耶夫对第一和第三号钻孔进行了展示性的研究，以便中国同志在固定渗透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了解苏联所采用的关于天然气钻孔的研究方法。对第7号钻孔的研究是按照新的方法进行的，没有测量压力数据，因为由于出口设备的质量不好不能确定这一数据。

中国的同志们熟悉了在对天然气产地制订研究方案的时候，对钻孔的研究结果进行处理的方法和气体动力的计算方法。Ю.П.克罗塔耶夫在隆昌(Лунчан)、重庆、泸州和南充市就下列问题作了报告：“在固定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确定天然气钻孔研究结果地层参数的方法”、“对勘探的天然气钻孔进行研究的特点”、“天然气钻孔操作方法的确定和计算”、“在自发的条件下以及在特别组织的天然气方案的条件下天然气储量和钻孔操作方法的计算”。

前三份报告被翻译成了汉语，并出版了120份以供在天然气的工作实践中使用。第四份报告被纳入羊羔溪产地天然气实验性开发方案的个别章节中。

伊万丘克在泸州、成都、重庆和南充市就天然气集流器的类型作了报告，并在北京石油大学作了报告。

为了制订实验性开发方案，挑选了大量的关于地质工业的资料，储备和剖面的确定以及其他的建设使得可以确定石油沟、东兴、羊羔溪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地层，这为今后开采方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的工作从4月9—11日，了解了湖北省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以及汉口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情况。在对相关材料和钻孔工作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就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以及湖北省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提出了建议。

在中国出差期间，我们提出如下几点：

1.中国科研所的同志们在铺设通往汉口管道的工作中用天然气代替乙炔来切割金属，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苏联使用。

2.在四川省，为了增加烟黑的排放使用了萘，看起来，在苏联也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方法。

3.为了在B-2-300发动机上得到电能，广泛使用天然气取代液态燃料。

4.由于了解了重庆市橡胶—竹管道生产厂的工作，可以确定，橡胶—竹管道要比钢管便宜得多，且可以承受高达15帕斯卡的压力。看起来，目前在苏联开展的、用非金属管道代替金属管道的研究工作，应该熟悉中国现有的在生产非金属管道方面的经验。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小组长

地质矿物学副教授A.科兹洛夫

1960年2月2日

РГАЭ, ф.9493, оп.1, д.1064, л.28-33

№20726-1 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1960年2月7日)

1960年2月17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7日

与所有大使们一起参加了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12周年的隆重大会。总参谋部参谋长金昌凤作了报告。在自己的发言中他表示，苏联政府关于完全彻底的裁军建议和赫鲁晓夫的访问美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昌凤说朝鲜人民与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们热烈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宣言，他表示他们完全拥护它，并坚决要求西方列强依照苏联积极有效的榜样去做。

按我的看法，报告中过多地讲述了朝鲜人民军是在“反抗日本人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如何建立武装力量和高度的革命传统经验基础上”建立的。同时报告中没有提及朝鲜人民军研究和借用苏联军队的经验。报告人说在残酷的斗争中朝鲜人民军保持了荣誉，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之流的战争中捍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完全没有提到与朝鲜军队和人民肩并肩地战斗并流过自己鲜血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觉得没有根据的是金昌凤报告中以下的声明：“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像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样撤出南朝鲜并停止侵占南朝鲜，我们祖国就已经通过和平方式统一了，南朝鲜人民与北方共和国人民就能一起过上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日子(下画线是我加的)。”

.....

АВІРФ, ф.0102, оп.16, д.6, л.40-41

№20726-2 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

盟条约问题(1960年2月10日)

1960年2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10日

因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领导金一邀请我参加晚宴，同时还有大使馆的参赞B.И.佩利申科、H.E.托尔宾科夫和B.A.扎尔科夫。

会谈中金一详细地讲述了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印象。金一说，首先是代表团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给他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特别好而且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赫鲁晓夫繁忙于国家和国际上重要的事务，可他还是抽出时间详细地以兄弟般的方式与他们代表团商谈，听取并支持他们的一系列问题，从他的方面是给朝鲜的党和人民巨大的帮助和关心。他们为此再次感谢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以个人名义感谢赫鲁晓夫同志。

金一接着通报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提出的问题。

金一说，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讲述了有关今年保障他们国家居民的粮食情况变得十分紧张的问题，并请求根据贸易协定的9万吨粮食打算再让苏联增补供应给朝鲜5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同志问他们，在什么期限内该提供上述数量的粮食。他们回答，对他们来说迫切需要能不迟于5月提供粮食。赫鲁晓夫同志答应仔细研究他们的请求。

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考虑苏联向朝鲜供应能完全满足朝鲜国民经济需要数量的石油。赫鲁晓夫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金一表示，

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放弃重建阿吾地工厂的可能，该厂在日本人时期从事从煤提取汽油的生产。这个工厂将被利用于其他方面。

由于美国人将原子武器运入了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照民主德国那样发表一个声明是合适的。代表团问了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者原则上表示赞同他们的建议。金一说最近将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适当的朝鲜政府声明。

为此问金一，是否打算在刊登上述朝鲜政府声明前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声明的内容进行商榷？

金一答道，尽管原则上这件事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赞同，但既然问题好像不仅涉及朝鲜，而且也与苏联有关，就是个很重大的国际问题，他认为，声明的内容将必须适当地预先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商量。

金一同时还说，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回到关于签订苏联与朝鲜之间联盟友好互助的协议问题上去，这里要注意的是不久前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新军事条约。赫鲁晓夫同志同样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

金一说，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委托邀请赫鲁晓夫同志今年务必率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出访时间最好是在8月朝鲜解放15周年庆祝日之后。赫鲁晓夫同志感谢邀请，并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考虑研究出访时间，并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金一也详细谈到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党和工人党代表就交换发展农业方面经验会议的意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金一强调，在上述会议上所说的就是苏联在提高农业方面特别丰富的经验，这是他们的榜样，如何能够具体地做到坚决地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同时还有社会主义经营体系的优越性，它能够增加生产粮食作物和用于青贮饲料的玉米，在现有条件下为充分保障国家的粮食展开了现实的前景。

谈到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金一说：会议显示了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一致和不可战胜。会议工作的总结，就像会议上通过的宣言那样，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更坚定的信心。

金一说，朝鲜代表和所有其他国家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与会者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深受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这些成就是全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6, л.54-57

№13401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年2月14日)

亲爱的谢甫生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作为统一友好大家庭的成员，聚集在这里，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苏中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签署10周年。

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代表苏联大使馆和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全体在场的同志，表示祝贺。

还请允许我，亲爱的大使同志，对您向苏联表达的真挚话语，表示感谢。

条约更加巩固了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盟，这成为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过去从未有过一个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盟，像苏、中人民之间的联盟那样，对于两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历史产生如此决定意义的影响。

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积极支持，最终结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为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立场，首先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阻碍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犯罪的侵略行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果断，使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动能够快速得到消灭。

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强大联盟，已经成为东方各国人民开展反殖民主义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在近年来其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

高，国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开始着手实现由第二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订的七年宏伟计划。苏联的工业、集体农庄的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着，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七年计划所拟定的速度。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倡议，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成果。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月球探测器和宇宙飞船，使我们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我们的人民已经进入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为了和平和进步的事业，为最终获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

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铺设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这些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进行着。封建制度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制度，数世纪以来一直阻碍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

在英雄的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而现在它的可观成果已经令全世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台湾统一问题，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而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将会遭到新的可耻的失败。

我们已经尝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带来的喜悦。在兄弟的蒙古劳动人民面前，已经展开了繁荣和富强的美丽前景。

在最近这些年里，社会主义在以下这些国家尤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非常了解自己的通向幸福生活的最可靠的道路的时刻，争取和平和争取巩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H.C.赫鲁晓夫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以及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建议。赫鲁晓夫此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对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访问以及和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

的一系列会晤，应该更加促进了我们国家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继续接近。

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固原则之上的。谈到这种友谊的伟大意义时，我们倍受鼓舞的是：这种友谊是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团结服务的，它开辟了通向人类幸福生活、共产主义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

最后请允许我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统一和团结，干杯！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干杯！

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建设的成果，干杯！

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各国共产党的继续发展和巩固，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4—257页

№16670 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1960年2月24日)

M.A.苏斯洛夫和Φ.P.科兹洛夫同志同中苏友协代表团会谈纪要

1960年2月24日，于克里姆林宫

互相致意后，科兹洛夫请代表团成员谈访苏印象。

刘长胜同志(团长)代表代表团非常感谢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同志对代表团的关心，并接见代表团。然后，他请转达对苏共中央及苏联政府在代表团访苏整个期间对代表团的关照表示感谢。

刘长胜继续说，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帮助，代表团作为他们的客人，中国同志到过莫斯科和阿塞拜疆许多地方，会见了苏联各界许多人士。刘长胜说，我们将满载访苏的美好印象回到祖国。

刘长胜说，在苏联逗留的日子是代表团的盛大节日，因为代表团参加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周年的庆典。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代表团所感受到的爱和关怀。所有这一切，证明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意义。我们相信，今后我们两国的友谊将更快地增长。

刘长胜说，我们参观了一系列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代表团在所见一切的基础上表示深信，苏联七年计划将提前，大概5—6年，某些部门能更快地完成。

科兹洛夫同志说，七年计划的第一年已顺利地完，大大地超过计划指标。七年计划的第二年，苏联人民的开局也很好。

刘长胜同志：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在那里能看到生产自动化的一切重大意义。我们听说，自动化计划完成后，工厂将每2.5分钟生产出1辆成品汽车，而现在要4分钟。这家工厂对我们中国人特别珍贵，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它的儿子——长春汽车厂。

苏斯洛夫同志：(开玩笑)儿子大概已经超过父亲了。

科兹洛夫同志：工厂为了改建和自动化投入了很多资金(700万卢布)。

苏斯洛夫同志：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更好的设备，而现在利哈乔夫工厂还有老的设备。

刘长胜同志：我们会见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因亲眼见到而确信，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我们在阿塞拜疆看到了特别惊人的变化。在苏姆盖特的合成橡胶厂看到了16个不同民族的工人们如何友好地劳动。这些只能在苏联看得到。这些人们毫无疑问地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

刘长胜说，代表团对这样的事实特别感动，在参观莫斯科和阿塞拜疆的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无论如何都与中国有联系。有的向中国提供自己的产品，有的接受中国专家实习，有的则派遣自己的专家到中国。现在在许多的苏联企业可以遇见曾在中国当过专家的人们。这一切明显地看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

科兹洛夫同志指出，在苏联大概没有一个大企业不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产品。

刘长胜同志再次重复说，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自己访苏深感满意，回国后将尽力把自己的印象比较全面地告诉中国人民。他说，关于苏联人民的成就，关于苏中友谊可以讲一百遍、一千遍，但永远也讲不完。

苏斯洛夫同志问：代表团的其他同志是否也要讲一讲自己的感想？

众声：团长都已说了。

刘晓大使说，代表团中有一位科学家裴丽生同志，现在在苏联率领另一个代表团——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成了同苏联科学院关于1960年科学合作计划的谈判。这一计划非常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计划中也表达了苏联对中国的友谊，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

H.B.波波娃同志说，代表团成员李焯尘在苏联期间写了一首关于苏中友谊的千字诗，2月23日在友谊宫的晚会上他朗诵了这首诗的片段。

苏斯洛夫同志热情地感谢刘长胜和刘晓同志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达的亲切讲话。他指出，在这里关于苏中友谊所说的一切，反映了事物的实际情况。在我们两国都广泛地庆祝苏中友好同盟条约10周年纪念日。这再次显示我们两国人民、政府以及两党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巩固和牢不可破。这也表达我们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继续加强我们的友谊的愿望。苏联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兄弟友谊是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

苏斯洛夫继续说，苏联人民永远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他请转达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表示衷心的问候并祝愿取得进一步成就。祝代表团成员一路顺风。

刘长胜同志对座谈和热情的祝愿表示感谢。他请代向赫鲁晓夫同志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出访亚洲国家对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24931-1 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 (节选)(1960年3月 [\[15\]](#))

最近几年(1958—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的发展研究

1960年3月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Г.С.奥斯特洛乌莫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法律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在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内开展的。该所成立于1958年10月，现在已经有大约30名科学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和比较有经验的是张友渔(研究所所长)和周新民(Чжоу Синьминь,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各部门的主任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地下革命斗争的经历，比如，王明同志。研究所主要是青年人，其中几乎一半都毕业于法律系，或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读过研究生。

研究所有4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总的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第二个部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民法、土地法和家庭法进行研究。第三个部门的任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刑事诉讼和司法建设进行研究。第四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国际法。研究所在最近几年的主要目的是对当代中国国家法律建设丰富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概括以及在中国史和法律史方面进行研究。

在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对于提出的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是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实地搜集一些具体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国家机构以及本国的一些农村进行访问。并且，科学工作者还经常到这些单位开展短期的实践工作。但是，用研究所所长的话来说，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收集到的材料还是不够的。研究所成立的时间很短，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太少。

由于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会议)，在1959年的年度计划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研究所一项也没有完成。为集体撰写的专著《社会主义

国家的代表制度》一书撰写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制度”甚至也没有按时写完。今年研究所打算完成如下书目的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知识》、《法学基础》、《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法律领域取得的成就》。……

研究所的图书馆共计有4万册图书。其中将近一半以上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书籍。1949年以后出版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翻译的苏联法律工作者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中，对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建设问题和中国史、中国法制史进行关注的有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湖北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此外，还有法学研究所，今年这些单位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国家和法律问题的著作。

在高校中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有关法律课程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教材和参考书。比如，在人民大学法律系，1959年在国家和法律理论方面教学的基础是逐段逐段地研究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著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等等。湖北大学法律系1959年的教学大纲是在法律系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教师、大学生和国家机关法律工作者提出的意见的基础是制定的。大学生每年要有3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农村和基层国家机关工作……

Архив РАН , ф.457 , оп.3 , д.1 , л.143-150

№03967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1960年5月17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日

第28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5月17日邓小平接见了我。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我简要地通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

邓小平说，会议所审议的几个问题和H.C.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中国报刊对会议情况作了广泛的报道。他指出，苏联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一些重要的新措施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的力量和苏联的大好形势。

根据中央的委托，我把苏共中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信件转交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定去苏联访问，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会严肃对待苏联同志对这次访问所表示的意愿。

接着我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联对召开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H.C.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指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邓小平说，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他说，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H.C.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说，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

谈到美国的侵略行动，邓小平说：“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这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美国统治集团千方百计企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本身不言而喻。全世界人民可以把美国和苏联的行动进行对比。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的巴黎演说和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同志完全揭露了艾森豪威尔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在继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苏联政府关于召开首脑会议的倡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强调说，“这也是我们的观点”。如果在爱好和平力量的压力之下取得无论或大或小的成绩，这当然很好。虽然现在首脑会议还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帝国主义自我暴露这个事实就是个不错的结果。接着邓小平说，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管艾森豪威尔怎样洗刷自己，也无济于事，实际他在帮助我们。甚至巴黎会

晤这个结果也说明，胜利在我们一边。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

在会谈过程中我指出，某些外交家——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特别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试图替美国辩护，一直强调说，美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没有多大意义，据说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这样做，但美国这次碰上了。邓小平说，尼赫鲁、吴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活动家都这样说。邓小平详细谈了周恩来不久前结束的亚洲几国之行的某些观感。周恩来今天已回到北京，谈了他同尼赫鲁的谈判，周恩来对此人形成一定的看法。邓小平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赫鲁晓夫去巴黎参加首脑会议同样的作用。赫鲁晓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同志访问印度也使尼赫鲁暴露出他的真面目。邓小平说：“两人的出行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也都取得了成果。”

邓小平强调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充分证明“我们以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是正确的”。第一，尼赫鲁是印度反华运动的中心人物。尼赫鲁决不是处于右翼或其他反动派的压力之下，他本人千方百计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就没有过尼赫鲁对国内失控，大权旁落的情况。尼赫鲁善于把国家紧紧掌握在他的手中。第二，访问证明尼赫鲁从来就不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哪怕是在某个约定时期。他是从自己国内外利益出发的。尼赫鲁反对印度共产党。因此解决同中国的边境问题对他不利。邓小平说，假若尼赫鲁解除了与中国的冲突，他就得不到为数12亿美元的美援。

邓小平指出，中国报刊现在开始发表揭露尼赫鲁真面目的文章。他接着说，持尼赫鲁这种立场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如纳赛尔、卡赛姆、苏加诺、吴努。尼赫鲁与他们不同，他最狡猾。他在英国没有白学，印度称他为半个英国人，而英国人在玩政治游戏方面比美国人有经验。

邓小平强调说，同这类资产阶级活动家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问题。像纳赛尔、卡赛姆这样的活动家正在自我暴露，在印度这项工作要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印度某些共产党员甚至吹捧尼赫鲁。邓小平说，但是尼赫鲁的行为最终也教育了这些共产党员。他接着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内问题的重要决议，即不同国大党和国大党的政府

作斗争，就无法同反动派作斗争(关于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的资料5月17日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印度共产党机关报开始刊登公开反对尼赫鲁的言论。

话题又回到巴黎会晤，邓小平说，中共中央审议了在国内开展支持H.C.赫鲁晓夫声明的运动。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过了两三天，当形势明朗化的时候，要在这一方面进一步采取步骤。他说，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

邓小平请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H.C.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他说，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目标的基础上的。

说到这里我又强调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将访苏的重大意义。

最后，邓小平同志说，我所通报的一切，他一定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

会谈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И.И.萨夫罗诺夫和一等秘书Б.В.卡普拉洛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7, л.129-133

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п.8, д.454, л.165-169

**№13402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年5月28日)**

亲爱的泽登巴尔同志！

亲爱的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请允许我代表外交使团，热烈欢迎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受尊敬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亲爱的客人们。

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无疑将是对继续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我们赞同泽登巴尔和周恩来同志今天在此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感情。我们坚信：所有这些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中国人民真正无愧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这些重大的成绩。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于巩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不久前，整个世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卑鄙挑唆行动的见证人，即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为达到侵略的目的，派间谍飞机深入到苏联的内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声明，即空中的间谍行动是其官方的政策，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目前已经清楚，这种挑唆行动的目的在于中断高级会议。在巴黎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在其声明中完全揭露了这种伎俩，任何借口都无助于美帝国主义分子摆脱中断四国首脑高级会晤的责任。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帝国主义分子在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追求，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掩饰自己的人面兽心，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动。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固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帝国主义在古巴的政策垮台以及在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政策，都很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非洲各国人民之中，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加强。

所有这一切，要求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

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更加积极地实现他们自己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统一和团结的成就，是和平事业、民主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基础。

请允许我举杯，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牢固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干杯！

为兄弟的蒙古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全世界和平事业的永久性胜利，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8—261页

№13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6月2日会议第28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柯西金、毛希丁诺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钦科、基里连科、马祖罗夫。

在会议记录之外：关于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协商的问题。

关于组织纪律问题。 [16]

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已经做了警告，对所有人的纪律只有一条（中国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请求，或者，前往，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阻止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把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他，让他读一读。

No2188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1960年6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关于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7]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1.批准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发信件内容，即关于召集兄弟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参与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见附件一)。

2.批准分发给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诸使节的指示草案(见附件二)。

3.在各兄弟党同意苏共中央上述建议的情况下于今年6月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布关于即将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通知(相关文本参见附件三^[18])。责成苏联外交部与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朋友们商议该通知的具体内容。

附件一：

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向各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发出此信的目的在于，协商于近期召集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美国人破坏了高级会谈之后国际形势中所出现的诸问题交换意见。另外，苏共中央之所以发出上述倡议还由于，近期一些兄弟党也提出了关于举办这次会议的意见。

在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通过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声明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我们所制定的旨在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在这些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各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近年来，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而作的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了各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业已成熟的各種国际问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冷战”和军备竞赛手段使世界面临可怕的前景，试图破坏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激化国家之间关系，加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近一时期，为达到上述目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惜使用直接干涉，直至美国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卑劣做法，从而导致原准备讨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高级会谈归于流产的结局。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力量转入进攻的企图已经失败。他们的挑衅活动遭到了致命的反击，美国侵略者们和美国政府的背信弃义，他们所推行的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政治方针已完全地暴露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

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和团结，而帝国主义势力则陷入困境之中，而且在西方强国中已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明显加剧的情势。

总之，苏共中央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为我们采取新的联合行动——更深入地突入侵略集团阵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在维护持久和平斗争中加强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理应在近期召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以就当前国际形势和确立我们今后的总路线等问题交换意见。

会议可以于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罗马尼亚同志已表示对此无异议，如果举行此次会议的建议能得到普遍支持的话。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即届时在布加勒斯特将召开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各兄弟党都会派代表团参加。

我们认为，届时还有必要在布加勒斯特召集华沙条约诸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以讨论如下问题：为加强各国防御能力所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提高用于组成联合武装力量的军队的战备能力；该军队的装备和军事技术保障等。为了吸引世界舆论的关注，我们认为最好能提前（约6月8—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开这次会议召开的信息。

我们认为，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理由是华沙条约诸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并希望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的代表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此次会议的工作。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可以通过相应的宣言或声明，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则为简洁的联合公报，并随后将这些文件在媒体上公布。

苏共中央请求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就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附件二：

给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使的指示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苏联驻地拉那、索菲亚、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河内、北京和乌兰巴托等城市的使节：

请拜访恩维尔·霍查(与此相应的还有：日夫科夫，卡达尔，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诺沃提尼，胡志明，毛泽东或刘少奇，金日成，泽登巴尔)，并向其转达苏共中央信函(见附录)文本。

请告知对方，类似信函已分发至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

会谈期间请向对方通报：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将是H.C.赫鲁晓夫同志。

请电告上述指示的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4，д.393，л.52

РГАНИ，ф.3，оп.14，д.394，л.61-65

№2073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1960年6月5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5日

晚上9点20分在金日成府邸与他见面。

援引今年5月2日与他的会谈，转告说莫斯科将很高兴在今年6月上旬接待他的非官方访问并按照他的愿望与他就朝鲜朋友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说，如果他觉得合适的话，去莫斯科的行程最好大体上可以确定在6月8日或这个日子的前后几天内。同时告知，他可以与赫鲁晓夫同志在黑海沿岸进行会面，这个时间他正在那里。

金日成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个通报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去莫斯科的日期，金日成说了以下内容：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打算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他在6月8日去莫斯科将会十分困难，但尽量在6月15日前去。明天6月6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将研究苏共中央委员会6月2日关于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的信件和确定代表团的组成。同时金日成表示，现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成员都在地方，可明天他们应该回来并参加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金日成说，开始，在收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信件之前，他们打算任命金昌满同志为代表团领导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现在，显然，不得不由他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明天，主席团会议上他们将决定此事，同时确定对他们合适的去莫斯科的日期。关于此他们将在6月6日晚或7日早通知我。

金日成接着说，他希望自己去莫斯科的日期在6月8日稍后的几天，也是因为在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后，自己能不回平壤直接去布加勒斯特。

会谈中金日成说，前几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6月15日之前结束朝鲜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制订工作，并在6月18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加以讨论。在这以后到6月25日期间他们打算去莫斯科。现在鉴于打算召开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然，所有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对金日成说，自己受委托要亲自让他了解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的侦查机构反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所采取的手段的通报，并补

充道，显然，这事最好是在今年6月7日或8日见面时再谈。

金日成同意上述的建议。

会见时在场的还有外务相朴成哲和国际局局长朴容国。

会谈翻译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译员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外务相的翻译李思赫(Ли Сы Хэк)担任。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6, л.195-196

№20734-2 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7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7日

应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的邀请拜见了。

金昌满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托请求转达下列内容：

1.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2日的信件，并同意有关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将由金日成同志率领，代表团的成员都已批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局局长朴容国和另一名代表团成员将稍后再确定(他们想任命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委员、副首相李周渊，但他现在生病了)。

2.金日成同志去莫斯科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和谈判的日期，我们希望是今年6月13日。随同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见的将有：金昌满、朴容国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林启喆。金昌满希望金日成和随行人员从平壤飞莫斯科，可能的情况下坐“伊尔18”飞机。他同时还说大体上与代表团一起总共18人。人员组成将稍后确定并将名单转交大使馆。

告诉金昌满，他的通报和所说的愿望将转告莫斯科。

金昌满同时还说，批准金日成成为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的劳动党代表团领导。代表团打算在今年6月18日从莫斯科去布加勒斯特。

参加会见的有朴容国。会谈由Д.А.普利耶姆斯基担任翻译。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6, л.197

№23038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 裁军提案的声明(1960年6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向苏共中央发送安全委员会从中国驻苏联使馆收到的“中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裁军新提案的声明”。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谢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新提案的声明

1960年6月2日，苏联政府就全面和彻底的裁军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提案。这项提案是1959年9月18日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提案的发展，其中考虑到了西方强国在裁军谈判期间所提出的一些意见。该提案是苏联政府在落实裁军问题上提出的一项新的有力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一提案。

历史表明，帝国主义不愿意裁军，尤其是绝对不愿意全面和彻底的裁军。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政府便提出过大量关于裁军的提

案，但所有这些均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又多次提出裁军提案，并为了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多次在自己的提案中考虑各西方列强的裁军意见。可是，每当苏联政府接受了西方列强的一些建议之时，后者总是仍然拒绝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并为裁军谈判制造新的阻碍。由于西方列强采取如此立场，裁军问题的讨论已持续了10多年之久，时至今日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高喊裁军，但实际上依然加紧军备竞赛，并在别国境内扩展军事基地。

他们如此做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威胁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想压制亚非拉，甚至欧洲各民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民族运动，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前在中断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更加紧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为准备战争而大搞军备竞赛，在西德和日本加速复苏军国主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给所有国家政府首脑的信中强调，苏联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裁军意愿持严重怀疑态度。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裁军的新提案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考验，而拒绝这一提案必然更加明显地暴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关于自己爱好和平的谎言。苏联政府的裁军新提案势必成为一个号召——促使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族奋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准备，反对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只有通过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方式，最大限度地孤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坐到严肃谈判裁军问题的桌子面前，才可能延迟，甚至防止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新的世界大战计划，才可能确保整个世界的和平。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32, л.83-86

№16671 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 外长谈话纪要(1960年6月13日)

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В.И.列夫金同志同蒙古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谈话记录一份。

A.葛罗米柯(签名)

1960年6月13日

摘自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今年2月的下半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莫斯科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代表团会议回国后，同我谈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自己的印象。在谈及其他问题同时，他告知，苏联大使莫洛托夫因工作调动而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的问题已预先谈好。

今年4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一次招待会上告诉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于5月来访。然后，他问我：“我是否可以知道关于推迟审核莫洛托夫从蒙古召回的问题原因？”我回答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关于这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

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列夫金(签名)

АВІРФ, ф.5, оп.30, п.80, д.332, л.87-88

№20735-1 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 联会议情况(1960年6月1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5日

举行了与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

A.H.柯西金同志向金日成及其随行人员通报了有关苏联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完成的进展情况。

Φ.P.科兹洛夫同志通报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他们曾试图利用今年5月的世界工联大会就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强加自己的决定，这些观点和决定与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同，与声明和平宣言中叙述的情况也不同。

鉴于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努力使金日成相信，不是他们，而是苏共主动就劳动党党内问题在1956年派中共和苏共代表去平壤，A.H.米高扬同志向金日成介绍了当时A.H.米高扬和彭德怀从平壤回到北京后在北京进行会谈的内容。

Φ.P.科兹洛夫同志通报后，金日成并没有表示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大致表示这样的意思，即中共和苏共代表有必要聚集在一起把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午餐后，在去游览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之前，金日成与苏联外交部远

东司司长И.И.图加里诺夫就朝鲜对联合国大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每年都会有的所谓朝鲜问题的立场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金日成说，他们的立场依然不变。他们反对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但要是讨论的话，他们要求朝鲜代表同时也参加，如果不允许朝鲜代表参加，那么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将不是朝鲜所必须遵守的。

金日成说，他们主张并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此以后他们同意举行朝鲜南、北方全面大选。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干涉。同时金日成指出，如果哪个国家提出建议在中立国家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全面大选，朝鲜将不反对这样的建议。关于接纳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金日成讲述了如下内容：他们不反对接纳南朝鲜进入联合国。他们将不提问题，也不认为朝鲜有必要在现在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但在西方强国提出有关接纳南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情况下，只有当提出建议同时接纳南朝鲜和朝鲜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时，他们才不会反对西方强国的建议。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Ф.П.科兹洛夫同志邀请我去他那儿，并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指示要让金日成知道毛泽东是怎么说他(金日成)的。Ф.П.科兹洛夫同志问我是否记得在哪些文件中有这样的叙述？

我说，前驻北京大使П.Ф.尤金同志大约是1956年年底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中有这样的叙述。

Ф.П.科兹洛夫同志委托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同志将那次会谈的材料给我，并让金日成了解。

АВР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56

№2073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1960年6月16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6日

了解了П.Ф.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后(会谈是在1956年11月30日进行的),Ф.Р.科兹洛夫同志把它交给了我,并嘱咐要亲自交给金日成,而且只让他一个人知道。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拜见了金日成并说受委托让他了解一份文件,并补充道,这也可以放在金日成打算去参观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展览后,金日成表示希望马上就让他了解所说的文件内容。

我向金日成读了П.Ф.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通报中涉及金日成问题的内容(会谈在1956年11月30日进行)。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话极其愤怒。在读通报的过程中,他几次都在说:“这是谎话。没有这个。毛泽东不仅这样谈论我,还这样看待我,他怎能这样呢?”等等。金日成非常难过,起初甚至有些惊慌失措,有时候坐着默不出声,不同寻常地抽了很多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日成的这个样子。通常他很难失去内心的平衡。他外表上总是很平静。然后金日成详细地向我重复地讲1956年夏季劳动党内形成崔昌益和其他反党宗派集团的往事,有关1956年6月代表团在莫斯科时所得到的同志般的建议,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反党集团的电报(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份电报是支持他的),有关1956年9月彭德怀和А.И.米高扬在平壤,有关毛泽东1957年秋季在莫斯科的道歉和多次声明,有关彭德怀在那时拜见他等等类似的事情。金日成声称,他永远并将坚决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金日成指出,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劳动党号召全体朝鲜人民支持苏联的措施,并宣称劳动党现在支持并将永远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切措施。金日成大声说道,毛泽东不仅说,而且还认为他可能是叛徒,怎能这样呢?他怎么能与李承晚串通?这简直是谎言和诬蔑!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口是心非:当面说一套,背后另搞一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是另外的做法。Н.С.赫鲁晓夫同志富有党性地同志般地

当面指出他们的不足和错误。他坚决和始终不渝地支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正确路线。

接着金日成问，昨天Ф.Р.科兹洛夫同志有关中国领导人错误的行为和宗派活动的通报后，他表述的立场是不是足够清楚明确。

对金日成说，因为我在与他的会谈中一直是按党性的直接和当面说，我说，昨天在与Ф.Р.科兹洛夫同志、А.Н.柯西金同志和А.И.米高扬同志的会谈时，他在就上述问题的表述自己的立场不够明确清楚，只是说了中共和苏共的代表应该会面和将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金日成大声说道，但是要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过去一直支持、现在也支持苏共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方针。他们过去这样做，现在也这样做，将来还将这样做！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永远支持苏共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但既然现在这个时刻说的是中国领导人错误的宗派行为和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显然，应适当地明确说出就这些问题自己的和劳动党的立场。

金日成说，明天在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他将当面和坚决地声明这一点。

晚上告诉金日成，Н.С.赫鲁晓夫同志明天中午11点接见他。

АВ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7-8

№20735-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60年6月17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平壤市

1960年6月17日

早上对金日成说，他自己应决定朝鲜方面谁将出席H.C.赫鲁晓夫同志的接见和会谈。

金日成说，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除了他参加会面的还有：金昌满、朴容国和翻译崔元植。

然后金日成说，他考虑今天再次邀请H.C.赫鲁晓夫同志能找到机会在今年访问朝鲜。

问金日成，他认为什么时间访问最为适当：是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还是其他时间？

金日成说，8月中旬的天气很热，未必适合出访，就像他记得的那样，在庆祝10周年时代表团的领导阿里斯托夫同志感到自己不舒服。除此以外，他们不打算在庆祝15周年之际邀请政府代表团，而且如果邀请了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话，那大概就该同时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金日成指出，他们无法应付同时为两个代表团服务，轿车的数量不够。然后想了一会儿，金日成说，可以邀请一个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庆典。

我对金日成仅说了一点：您就说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出访时间。

白天举行了会见，与H.C.赫鲁晓夫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会谈(5个半小时)。我方出席会谈的有：我，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B.K.皮缅诺夫和译员Д.А.普利耶姆斯基，为赫鲁晓夫翻译他是完全胜任的。

晚上吃晚饭时，金日成说对会见非常满意，特别是与H.C.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9-10

№20735-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1960年6月18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8日

去机场之前与И.И.波兹尼亚克同志一起去金日成单独居住的楼房晚餐。金日成的情绪非常好，好几次对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和见面表示满意。晚餐时Ф.Р.科兹洛夫同志也来了，并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很满意与金日成的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平壤的一路上，金日成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十分满意，并感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到中国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非党性的和不真诚的态度，他们搞了一些反对他的幕后活动，还说“他们怎么能甚至想我会走上伊姆雷·纳吉的道路”。金日成成为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委员会不正确的立场和抨击感到愤怒。

休假回来的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也乘坐了这架飞机。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10

№20735-5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1960年6月2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25日

内务相方学世在和我谈话中(通过高频电话)讲述了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召集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局长们，部分相和道党委员会的主席，向他们通报了自己莫斯科之行的总结。在这次会议上金日成向出席者讲述了有关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Ф.П.科兹洛夫同志、А.Н.柯西金同志和А.И.米高扬同志的见面和会谈，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和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金日成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采取宗派主义方式，在原则性的思想问题上公开进行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他同时还讲述了在莫斯科通过文件了解了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一些令人愤怒和诬蔑的言论和评价。

根据方学世所说，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毛泽东是完全错误的，对苏共站在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就国家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他没有任何理由起来反对苏共，毛泽东的言论和所有行为只能说明一点：“毛想成为世界上的第五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谈及中国人对朝鲜方面的政策，金日成宣称，他们想把朝鲜变为中国的殖民地。金日成号召与会者提高警惕，因为中国方面可能会进行新的挑拨离间。

方学世说，金日成这次的莫斯科之行，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太及时了。今年5月中旬，金日成、金昌满和其他人在北京并与毛泽东会见时，中国人努力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劝他们转向中国人需要的方面。从北京回来后，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中国领导人对待他们很好，很真诚。在莫斯科从文件中和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金日成知道了并确信，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欺骗和阴险的行为以及有关对待苏共的错误行为。

方学世接着说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可能也将进行斗争。因为主席团某些成员，特别是林海(外贸相)、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亲中国的。同时还有某些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相也是亲中国的。

方学世同时还说，当他随金日成坐火车去金日成的休假地(昌城郡，离水丰电站不远)时，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了有关中国人在对待朝鲜人方面而现在又对待苏共方面的阴谋和卑鄙勾当，并几次提醒方学世要提高警惕。

方学世指出，各方面看来金日成的心情是真诚的，他现在不再相信中国人了，还说，他不会再到他们那儿去了。

АВІРФ , ф.0102 , оп.16 , д.7 , л.12-14

№03968 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1960年7月1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7月9日

第371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什基洛的会谈记录

1960年7月1日

在民主德国大使馆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根据巴什基洛的提议，我同他进行了会谈。

巴什基洛问我了解不了解中国报刊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报道。

我回答说，我读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切报道。我认为报道得太简短，也不完全。

巴什基洛说，问题不仅仅是简短，而是从H.C.赫鲁晓夫同志、乔治乌德治同志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讲话中略去了涉及苏联对外政策和对

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这在我们这里造成了误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彭真的讲话，而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在中国报刊上只作了简要报道。

接着巴什基洛谈起了在机场迎接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回国的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党的代表团时，中国领导同志(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表现冷淡，完全是例行公事，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巴什基洛说，我在飞机抵达前半小时就来了。上述中国领导同志都在机场的政府官员候机室，但没有一个人同我谈话。而当彭真、康生和伍修权来了以后，他们甚至没有对他们在罗马尼亚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

巴什基洛问我是否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彭真似乎没有出席。他强调说，他本人并不知道此事，但资产阶级的电台已经广播了。

我回答巴什基洛说，我不掌握这个情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9, л.125-126

№08104 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1960年7月13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及候补委员：

兹寄上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的草稿，其题目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如果有意见，请告知。

Ф.科兹洛夫

1960年7月13日

草稿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

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同志们!

1960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在6月28日报刊公布的公报中已经报道过了。另一次会议由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51个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就当代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共运的一些结论交换了意见。

会议参加者认为，世界发展的整个过程，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绩，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事业斗争的开展，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削弱完全证明了苏共第二十和二十一大的决议，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是正确的。

在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宪章和它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斗纲领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布加勒斯特会议参加者一致宣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人民对战争危险必须保持警惕性(因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仍有侵略战争的土壤)，关于不同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结论完全适合于当代的情况。

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同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问题的错误观点。

事情在于，近来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许多原则，公开反对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从而在这些问题上把自己置于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与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兄弟党的所有代表完全一致，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各兄弟党的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指出了我党和苏联政府近年来的活动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意

义。

一、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

同志们!

去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黷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1958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不能允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宣言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和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的列宁指导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

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J.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6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6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

基本原则。

在6月5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作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B.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当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应他们的请求，苏共中央接见了他们。我方出席会谈的有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伊利切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中方有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同志。会谈从早上3点持续到晚上11点。在会谈中讨论了同中共领导人所有的基本分歧。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我们认为：第一，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认为他们的措施是极端危险的，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直接对彭真和其他人讲：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在讲述了我党对中国人观点的实质的批评意见之后，我们对他们说，他们背离了列宁主义，不理解列宁学说的精神，不认为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永垂不朽的列宁的指示。

在这次会谈中，我们还分析了中国领导内部政治的某些阴暗方面，表示相信必须对我们存有分歧的所有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必须消除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当代的原则问题建立统一的观点。我们表示，希望中国的同志们冷静地掂量自己行动的后果，应该懂得他们对最重要的国际发展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能给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带来重大损失。

几天之后，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国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把中国同志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看作是派别活动。他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等待的是尊重的态度。

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但同时又怀疑我党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明显的事实所作的解释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政策的矛盾性。

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中，完全证实了中国的领导同志们不仅与苏共，而且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系列当代国际形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他们认识不到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中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的意义，实际上否认在当代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正确地理解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

利之前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会议宣言，否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存在两条道路的可能性，错误地以宗派主义对待中立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一系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中国人的这种立场证明他们走上了修正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根本原则的道路。

还彻底弄清了，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批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立场的措施和形式是不对的，在兄弟党的关系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座谈中不仅驳斥了中共领导的反列宁观点，还详尽地阐述了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二、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苏共中央今年6月21日关于中共领导行动和立场的新闻简报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看到苏共中央简报的还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的代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不正确的措施和行动，看出在兄弟党关系上他们背离所确定的规章和原则，看出在当代世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同志观点的错误性。

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会议宣言看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的问题。但中共领导人近来断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似乎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借口弄清这些问题，中国同志们的确试图推翻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最重要的原则，以自己特殊的教条主义的立场与之相对抗。

请允许我阐述一下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和他们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实质。

首先谈当今时代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指出，“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界限及其成为世界体系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这样，我党二十大在总结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舞台上力量分野的根本变化。

按照这一结论，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宣言中宣布：“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开端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是由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决定的……”

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帝国主义的瓦解过程；二、这一革命进程已发展到这种程度，所出现的社会主义体系正给予世界发展进程以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同志们在自己的理论发言中努力回避该宣言对我们时代的评述。他们认为，似乎苏共背离了列宁关于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认为列宁几十年前所做出的这一论断应保持不变。

然而只有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才可以这样讲话。从列宁对他生前时代提出自己的论断时起已过去许多年，发生了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等这样一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须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不止一次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和它的变化”，真正的群众政治领导，应该善于抓住需要改变政治口号和策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

看来，中国人不懂或装作不懂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低估我们时代主要特点——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发展的意义，贬低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影响的力量，即实际忽视当今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世界舞台力量对比中所出现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他们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提出的许多原则。

我们的时代不像1917年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这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和巩固的时代。

列宁说过，1917年之后，如果不把苏维埃俄国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已变成当代强大因素、对世界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在首

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伟大列宁的预见实现了：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正在解决“变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存在于一个国家而不能决定世界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对整个世界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

现在不是帝国主义势力，而是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家人民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强大洪流震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使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独裁，剥夺了它肆意妄为的可能。难道在帝国主义绝对统治的时代殖民体系的崩溃是可思议的吗？不，当然不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和加强的条件下，人民斗争浪潮的不断增长才导致殖民主义的垮台。

中国同志毫无根据地断言，似乎我们在评价帝国主义的本质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但这是对我们党的诬蔑，是有意歪曲我们的政策。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讲，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没有变，它的侵略本性我们谁也没有否定。

在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文件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的发言中，都在努力强调，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而在我们时代它反而变得更加凶恶，因为它看到，历史的发展将无挽回地导致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中共领导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是由于他们低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力量，没看到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削弱。

况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该忽视帝国主义正经受它的崩溃和瓦解时期，它的力量远不是50年前甚至5—10年前的时候了。现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考虑到世界形势的这些巨大变化，从中为自己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战略战术找出了必要的结论。这完全来自列宁的著名指示：“……最高的和唯一正确的学说标准……”应该是“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过程”。

现在我们转入我们同中国人分歧的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问题。

政治上稍微有一点儿知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在上并列即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依某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结果。世界上并立存在两个敌对的体系，这一事实似乎造成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否同时存在？问题在于，这一同时存在将采取什么形式——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在现今条件下，唯一理智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共产党人——是有现实思维的人。他们考虑到，热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结果。须知氢爆炸的火焰可以吞噬亿万人的生命，而某些国家和民族可能整个从地球上消失掉。共产党正为建立一种能够避免新的世界战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奋斗。和平共处原则——这不是暂时的策略口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中国同志以前奉行的也是这一立场。但近来他们实质上开始背离在其制定中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潘查希拉”^[19]原则。和平共处逐渐被他们解释成“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时间”。下述事实说明了他们对待和平共处思想的态度：在签署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蒙古公报时，周恩来同志把蒙古同志们写进草案里的和平共处一词删掉了。

中共中央代表在北京同工会活动家们会谈中公开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称作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还讲，“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而帮帝国主义的忙”。

然而，放弃和平共处原则则意味着世界战争方针。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两条路可走的原则：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毁灭性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中国领导人近来强调，似乎他们不大理解这一原则。“和平共处，否则就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不太理解。”——彭真同志今年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这样说。

中国同志看到了什么出路？他们讲，似乎有第三条路——“局部战争”和没有世界战争的“冷战”。刘宁一和其他中国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总

理事会会议上也公开这样讲过。刘少奇同志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中也表露过这种思想。

但是，每一位有健康思维的共产党员都十分清楚，这所谓的“第三条路”通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局部战争”不会保持多久，它很容易变成世界战争。沿着局部战争之路往下走，这意味着滑到深渊的边缘。所谓的“第三条路”意味着继续人民厌恶的军备竞赛。试图实现这条道路将给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提供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描绘成“局部战争”、“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追随者。我们党认为这“第三条路”是冒险之路。

彻底实现和平共处政策将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得到巩固，保障它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给予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可能。另一方面，和平共处可促使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内部离心力的增长，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削弱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阵地。

中共领导人试图强调，似乎苏共实施和平共处原则的方针意味着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阶级斗争，放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但他们明显地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弄混淆了。只有不懂列宁主义实质的人才看不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是别的，正是世界范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正是从中赢得胜利的。

争取和平共处、反对以帝国主义者为其载体的战争的斗争正在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促进人民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辩证主义者，谁就不能对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作创造性的分析。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倡过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坚定地说，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开始越来越尖锐。事情的确是这样。和平共处的形势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劳动者社会解放的斗争，为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创造了广泛的可能。

同志们，这是事实，在国际气氛缓和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碉堡发起了猛攻。大家仍记忆犹新的是，朝鲜人民起来反

对李承晚专制制度，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规模空前，土耳其推翻了曼德列斯的恐怖制度，此外，近来还有许多重要事件。

由于彻底贯彻和平共处路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人民中博得了巨大威信。苏联的国际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世界人民越来越坚信苏联是和平政策、和平共处政策的旗手。

正是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爱好和平的政策，人民现在才把共产主义同和平政策等同起来，把帝国主义同战争和侵略政策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我们党的伟大成果！

列宁遗言嘱咐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坚决地毫不动摇地遵循列宁这一英明的遗训。

中国同志还反对我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中以及莫斯科宣言中所提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则。我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到底坚持什么主张呢？

考虑到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情况，我党二十大做出了在当今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这一命题获得了所有兄弟党的全力支持。莫斯科宣言写道：“在当代和平的力量获得了如此的增长，以致防止战争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共领导现在似乎背离了这一立场，尽管它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比如，在《红旗》杂志上写道：“……只要在存在帝国主义制度，世界上就绝对不会结束最尖锐的暴力形式——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同志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也问道：“怎么能说在人类生活中有排除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这里的事情不在于中国领导人设想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是可能的，有谁没看到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也认为，帝国主义会试图发动战争。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说：“在当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依然存在，决不能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同中国人的分歧不在这里。

事情在于，中共领导认为世界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布尔加勒斯特同彭真会谈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他说：“我们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你们断言——如果我们理解中国方面是没有错误的话——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策略——让人们做战争不可避免的准备？”对此彭真回答说：“是的，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中国同志对待战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给人民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坚持战争方针。按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宣传战争不可避免，而不是动员人民为防止战争而斗争。所以在中国流行“全民皆兵”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有这种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观点？问题依然在于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估计不足和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依然有能力任意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否以战争代替和平问题，是否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还是放弃侵略行动，是进行局部战争还是总体战争，等等。

《红旗》杂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终是由帝国主义总司令部决定的。“当然，帝国主义者最终是否发动战争，”该杂志里写道，“这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一声明不是偶尔的词句，它反映的是中共领导的观点。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参谋长。”他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能替他们决定他们的事情。”这样，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意见，我们只好向帝国主义军队的将军们投降。但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国际舞台上现实力量对比的蔑视。

苏共二十大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做出在我们当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所依据的主要是以下决定性因素：苏联实力的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和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组织性和觉悟的增长；诸如广泛的和平拥护者运动这种因素的增大；拥护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数目的增长；帝国主义现在没有当年殖民主义体系时那样可靠的后备力量了。

当共产党人说现在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说存在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平。他们的出发点是，和平只能靠所有爱好和

平的国家和人民积极而坚决的行动来捍卫。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作为最热忱的不疲倦的和平斗士，把这一斗争看成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关于在我们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论断，不是抽象的智慧，而是动员巨大力量的战斗口号。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争取和平斗争胜利的前景，帮助人们克服内心悲观情绪、信心不足和宿命论，坚定人民可以捍卫和平的信心。相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命题可以瓦解人民积极的斗志，使人民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

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治活动家，如艾森豪威尔现在都被迫承认，帝国主义已无能力打赢新的世界战争，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他们的悲鸣！难道在类似的帝国主义头子的声明中我们就看不到他们对我们力量的估价，对我们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吸引力的承认吗？

在当代，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把侵略者和军事冒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在争取自由和保卫自由免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的斗争中给人民以最有力的援助。正是由于苏联的坚决行动才打破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干涉，防止了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好了的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进攻。否则，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冒险行动有可能发展成为危险的世界冲突。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的成就，它们在世界经济领先中的成果使社会主义正在变化成这样一种力量：即使最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觉得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毫无希望。这样，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的一部分还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人民一定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不久之前，中国同志们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讲：“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争取15年的和平，那时我们在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也不敢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全世界巩固的和平将有保障。”现在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这一正确的观点。

同志们，总而言之应该说，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混乱和不彻底的。一方面，他们宣布，帝国主义衰落了，变成了“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没有制止它的力量。

这种不彻底性的基础，看来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对现代战争没有正确的观念。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计算各国居民的数量、军队的实力，并以此确定各方面的力量。但是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至少是19世纪甚至是18世纪的立场，那时必须要求以刺刀消灭敌人。现在战争的命运操纵在装备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军队手中。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无论给人民造成多大牺牲，这一牺牲都是值得的。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在涉及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后果时，毛泽东同志说：可能全世界27亿人口死掉一半，或者更多，达到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通过热核灾难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经过废墟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同志们想引导人民所走道路的实质。

不难看出，中国同志们的类似立场对于人类孕育着最可怕的后果，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革命理论不需要导弹和氢弹为它开辟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正确地称需要通过原子弹氢弹战争走向共产主义的主张为痴人呓语。绝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世界战争永远孕育着革命，但革命不一定必须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革命的基础，而某一国家革命形势的出现不一定要有军事形势。

所以，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原则，绝不是像中国同志们企图断言的那样，要使被压迫的人民永遭被奴役的命运。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革命解放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们把反对腐朽的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看成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战争，而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向人民提供武器的方式。说苏联的政策似乎在制约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这是昧着良心诬蔑苏联的政策和实践。

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现实地看待当代形势。我们清楚地知道，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在垂死挣扎时可能铤而走险，发动战争。所以苏联政府努力制止这种冒险，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胆敢挑起战争，那就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苏联的军事实力为世界所知。为了制止所有的侵略，我们拥有足够

数量的各种型号的导弹武器。最近几天我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在13000公里的距离上精确地命中太平洋预定目标就证明了这一点。

5月1日和7月1日消灭美国侦察机；声明我们将对美国人及其盟友企图用来对我国领空派遣飞机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我们坚决声明，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开始武装干涉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人民——这不是在“劝说”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在“乞求和平”，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行动，是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和发动战争的积极斗争。

苏联的武装力量捍卫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使之不可侵犯。关于这一点哥穆尔卡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倘若不是苏联在发展防御武器首先是导弹武器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倘若苏联没有这种实力，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拥有这种武器就可能同我们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之所以不敢进攻，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攻，他们的司令部没有拟定出进攻期限，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共产主义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促使战争的发生，而是结束所有的战争。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肯定要灭亡，这是历史注定了的。但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在灭亡过程中尽量给人类少带一些痛苦，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地球上不下废墟和灰烬，人民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人民自己服务。

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里的胜利，不需要发动热核战争。我们共产党人遵循最人道的思想，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分子消灭亿万人的生命，毁坏当代生产中心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类的生命和繁荣高于一切。

同志们！

在我们时代，裁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志们的观点同其他兄弟党的共同立场是相矛盾的。

我们党认为全面彻底裁军是防止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基本途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但中国同志把这种支持连同我们的裁军建议都看成是外交手腕。既然存在帝国主义，如列宁所说，全面裁军——这只不过是幻想。所以，谈论裁军的可

能性，意味着散布幻想，扼杀阶级斗争。

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对待裁军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裁军问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提出来的，正是遵照他的训令，我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裁军建议。

通过把裁军问题提到国际生活日程上来，能使苏联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加强和平共处事业。为了保障和平，不能只口头上承认和平，必须迈出实际的步骤。通过向人民群众宣布全面裁军的思想，这就为争取和平指明了具体的目标。这一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反对它。裁军政策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的代表者。

第二，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现在也可做到某种程度的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限制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使用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民的巨大胜利了，它大大有利于在世界上建立安宁的环境。同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方面也可赢得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样在全世界面前他们成了拯救人民免遭核战争灾难威胁的救星。难道能像中国同志那样，把这看成是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吗？

第三，提出裁军口号，今天就限制着军国主义集团扩大军备竞赛、增加军事税收的可能性。

第四，通过提出裁军问题，我党帮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消灭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我们消灭这种军事基地的要求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是一致的，日本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最后，提出裁军问题，使苏联共产党给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打击，促使拒绝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的数目增多，使由于奉行不明智政策被吸引参加这些集团的国家容易脱离他们。

由此看来，裁军斗争不只是外交手段。它是严肃的政治行动，它是以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的冷静分析为依据的。苏联共产党认为，存在实现裁军措施的可能性，必须充分利用之。

当然，我们对在近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不抱任何幻想。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是及时的，应该为它的实现进行不懈的奋斗。放弃

裁军斗争或放弃停止军备竞赛的斗争，中共领导的立场实际上就是要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将给整个和平事业带来损失，给和平事业的敌人以帮助。

也不能同意中国同志们这样的论点，认为裁军口号将使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中国这一命题最积极的正是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员。“对于我们未独立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达格利奥同志声明所说，“十分清楚，和平和裁军对于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援助。”

真奇怪，怎么能够这样看待问题，把全面裁军看成是涉及受殖民者压迫的没有武装的人民的事？在苏联的建议里，首先讲的是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大国的裁减军备。

中国同志怎么也不能理解，如果宣布裁军是不能实现的理想，是幻想，那就不能动员群众起来为裁军即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当直接对群众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实现的事的时候，群众能站起来为裁军而斗争吗？

中共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问题的不正确的观点，不是毫无关系的理论练习。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同志的实践活动，导致完全消极的后果。近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和平运动，国际工会、妇女、青年运动，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等等)中的代表的行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努力阻止这些组织的活动。

中共领导人试图怀疑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外政策措施的正确性。

正如出席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回来的许多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劝他们“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建议他们“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这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

苏共中央认为类似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教导共产党人要有灵活的策略，善于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遵循列宁的指示，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政府进

行谈判。同志们，请想象一下，假如苏联坚持这种“不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的政策，世界将发生什么。正因为苏联遵循了列宁的指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成立了反希特勒联盟。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积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孤立侵略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苏联政府在不作原则让步的情况下，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策略，达成协议和做出理智的妥协。

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出访资本主义国家，为广大群众了解苏联政策的真相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提供了良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访问对社会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大大巩固了共产党、和平和进步拥护者的阵地。例如，美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E.弗林同志讲：“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对我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激起了他们对苏联的友好感情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

苏联政府首脑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法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取得这些访问的成绩是不易的，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势力拼命破坏访问，制造困难，不让赫鲁晓夫同志宣传苏联爱好和平政策的真相，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近几天，赫鲁晓夫同志对中立的奥地利的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功。同志们，奥地利人民给予赫鲁晓夫同志的热情接待和艾森豪威尔不久前远东之行的可耻失败(日本人民不允许他进入日本)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是人民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是苏联国际威望和它不懈地争取和平的斗争深入人心的有力证明。

赫鲁晓夫同志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行和他在最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演说——这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形式。这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直接在资本主义巢穴里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具体的实际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帝国主义分子让过步。回忆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在美国人以侦察机挑衅飞行破坏高级会议时，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是以何等的尊严和对我们正义事业的

坚定信念捍卫了我们的立场。

同志们!下面我想分析一下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暴露出来的分歧。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宣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苏共的分歧已有4年多了,即从我党二十大开始。

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结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论述为其依据的。

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坚决反对所谓“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理论”。他说:“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全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在二十大决议中阐述的通过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不仅总结了我党的经验,而且总结了许多兄弟党的经验,他们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除了非和平道路外,可以利用和平道路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存在两种可能的道路——非和平的(即使用武装斗争)和和平的(即通过各种形式的、积极的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利用议会)——的结论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支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以通过两种道路的命题写进了兄弟党的纲领文件和会议宣言中。

现在中国同志宣布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上述结论。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假装不理解,说:“让苏联同志们告诉我们吧,哪些国家存在这种可能性,哪儿有先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提法!假如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对待革命理论和实践,那世界工人运动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难道马克思在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难道列宁在创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的时候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当然,当时教条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不少,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了,跟随列宁前进,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尽管中国同志强调，他们赞成莫斯科宣言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们了解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不分具体情况如何，都应坚持一条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共领导人甚至没有停止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苏共只主张和平道路，只引导兄弟党走这条道路。

只要重温一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文件材料，苏共代表团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苏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足以相信类似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许多兄弟党请求苏共给予建议和提出咨询意见。在所有这样的会谈中，苏共中央都提醒外国同志们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强调必须全面考虑利用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

中国同志以宗派主义、书呆子习气对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正如列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他们的立场表面上显得“惊人的革命”。实际上他们的号召——不分每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的民族条件，都把重心放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训练上，只准备一种斗争形式——武装起义，这种号召是纯粹的宗派主义。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积极争取实现广泛的民主要求——土地改革，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限制垄断资本的肆意妄为，等等。中国人称这些为机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争取群众、争取盟友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去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十七国共产党会议呼吁书，便是这种争取群众斗争的范例。中国同志们傲慢地宣布这个呼吁书是机会主义的，称这些资深的有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只有那些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经验的人和和在工人运动中没有社会民主传统的人才能这么说。这些人企图教训拥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和成长起来的经受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中共领导人肆意把多列士、陶里亚蒂、雷曼、伊巴露丽、科普列尼格等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在地下和法西斯监狱中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我们运动中的老战士诬蔑为机会主义，这引起众人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马克思也说过在个别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他曾预见在工人阶级有能力赎买资本家的银行的时候出现这种形势。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条件下，当有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远不是理想而成为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当社会主义思想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时候，为什么这种道路不可能呢？在我们今天，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看到苏联正在顺利地为保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奋斗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抛弃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呢？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给予榜样的力量，我们的经济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的榜样力量将动员资本主义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改变本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己应做好准备，同时教育工人阶级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推翻资本家政权。

同志们，现在请让我分析一下印中冲突和对中立国家的态度。从12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你们可以知道苏联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苏共中央阻止了中国领导想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拉入他们挑起的同印度的民族冲突之中去的企图。我们不能支持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普遍和平的利益的。

如果中国真的面临受进攻的现实威胁，那苏联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它了。比如在台湾危机中中国受到威胁时就是这样。苏联立即直接支持中国。中印冲突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公开对中国同志讲，他们选择的用军事力量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不是好办法。我们对他们说，他们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想挑起争端，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各兄弟党的利益尤其是印度共产党的利益的莫大打击。

印共领导不止一次请求中国同志采取以他们为转移的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当时既没听印共的话，也没听苏共的话。毫无疑问，这给印度共产党带来了损失，尤其是影响到了喀拉拉邦的形势，大家知道，该邦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冲突对尼赫鲁有利，这给了他败坏共产党人声誉的借口，把自己打扮成印度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保护者。

中国领导对苏联的立场表示了不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支持他们，也不应该支持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立场给了帝国主义破

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能，说我们这些国家背离了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同志的行动更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印度，众所周知，没有加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奉行的是中立立场，在许多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的同志至今也不明白，他们的行动帮了那些企图把印度和尼赫鲁政府从现今对外政策立场推向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一方。

至于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干预冲突，那就会给美国找到借口站在印度一边干预冲突。另外我们还得知，艾森豪威尔曾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苏联有远见的立场使美国挑衅者失去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生活完全证明，苏联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印共中央主席古普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满有根据地宣布：“在这一冲突中苏联明智的立场揭露了共产主义的敌人，提高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同志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中国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态度。由于印度尼西亚对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商人采取了限制政策，中国同志企图与印度尼西亚争吵。这只能损害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中国同志这些理论和实践错误的实质在于，他们低估了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断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成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建议对其采取敌视的立场。中国政府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和建立友好关系，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现在他们突然转变了方向，称苏加诺为“血腥刽子手”，称尼赫鲁是“半个帝国主义分子、半个鬼和半个流氓”。现在北京称这些活动家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称他们这些人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领导建议共产党人改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认为这些资产阶级不会再反对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政策中已失去反帝的方向。

他们把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清一色的。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奉行中立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加入了帝国主义集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把尼

赫鲁的政策和伊朗沙赫或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的政策混为一谈。

我党的立场是，在东方推行有远见的政策，扩大同中立国家的联系。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以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激励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一切力量和可能为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熟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这样，同志们，从引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具体的世界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平宣言。现在完全清楚了，早在1957年签署宣言时，他们就不同意其中的许多原则。现在中国同志们越来越倾向于背离这一世界共运的总纲领。表面上他们还重复宣言的原则，提起和平共处和可以防止战争，等等。但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是努力证明和平共处政策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幻想，承认社会主义和平道路是机会主义，等等。

按其实质，中共领导是在号召各共产党放弃宣言中所确定的总路线。为了把它危险的路线强加于我们的运动，中国领导人仍继续以不允许的方法歪曲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搞秘密的宗派活动以反对神圣地捍卫列宁伟大旗帜纯洁性的苏联共产党。

我们列宁的党不能同中共领导的这种方针妥协。苏共中央认为深刻批判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路线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因为他们的路线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和共产主义前景孕育着危险的后果。

同志们!

在195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报告了中国在国内政策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当时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的。他们反映在：建立人民公社和实行不符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组织劳动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取消地方人民政权机关，把它的职能转交人民公社。在全会上还指出，中国同志背离了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一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原则称作是“资产阶级残余”。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同志们“大炼钢铁”的错误。

当时苏共中央告诉中国同志们，我们严重怀疑他们某些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强调指出，这是他们的内政，要他们自己解决。

中共领导没有考虑兄弟党的意见而是继续执行自己的方针。而且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把自己的措施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人民公社“是旨在领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根本方针”。中国的公社被说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而且中国的生活事实越来越雄辩地证明，中共中央的许多国内措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国，实际上修改了其国际意义已为1957年宣言所肯定的列宁某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应该起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国同志违反这一规律提出了“大跃进”的政策。他们违反生产不断高速提高的经济规律，提出“高潮和低潮”规律。

这正是造成国内经济不断出现狂热状况的理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必然伴随生产起落，从而降低速度，减少工资，出现比例失调和其他消极现象。

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的实践再次证明，按人口分配原则导致吃光储备，使生产发展失去动力。这正是迫使中国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物质利益原则的原因。

同志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分内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

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

但是，当事情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

同志们，6月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会议，交换对当代国际共运现时问题的看法。

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建议晚些时候开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只商量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商量新的宣言或新的文件的准备问题。

苏共中央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愿望，又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了这件事，表示了在布加勒斯特预先会晤时，除不对问题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对这一意见所有党都表示了同意。

按照达成的协议，在布加勒斯特于6月24—26日举行了两次会晤，这在报告开始时我已谈过了。尽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但两次会晤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批评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时候各兄弟党表现出意见一致，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已是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坚定地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各兄弟党的代表以大量事实材料证明，中国同志背离了宣言原则，教条主义地以列宁的原则掩饰自己，试图把自己的“左”倾立场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彭真同志在会上强调说，分歧确实存在，而且分歧，用他的话说，是实质性的。但他试图反击并把产生分歧的罪过推到苏共身上，指责苏共背离宣言，破坏列宁的原则。而且彭真再次说我们的分歧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并劝人们相信，中共领导似乎将一如既往站在宣言的立场上。

参加会议的同志不禁问他：假如中国同志们站在宣言原则立场上，那为什么他们又大大加批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的观点呢？彭真同志回避正面回答，没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党的代表逐条逐句地批驳了中国代表的立场，批驳了他们没有根据的和不怀好意的、对苏共的责难，揭露了中国同志

们所持立场的真正用心，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立场将导致什么结果。诺沃提尼、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卡达尔、日夫科夫和其他同志愤怒地给中共代表指出，他们的观点只能被看作是明显地背离了宣言，他们的行动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间的相互关系的普遍准则格格不入的，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矛盾的。

卡达尔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他公正地指出，中国同志的发言是与各兄弟党的方针相对抗的，“给我们的队伍带来了混乱”。卡达尔同志说，根据中国同志们的概念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盼望战争，而且应该宣传战争，甚至应该亲自挑起战争，以便尽快让帝国主义完蛋。”

乌布利希同志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反对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发言不能动员群众为和平斗争，宣告失败论，“只能帮助敌人的忙”。中国同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声明，乌布利希同志说，与西德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发言相吻合，所以说中国同志已“堕落成阿登纳的好邻居”。

诺沃提尼同志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完全赞成我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苏共中央的结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情况通报的内容，中国同志可以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我党的观点。”中国同志不想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诺沃提尼同志说，但十分清楚，这里涉及的“正是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今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观点”。

乔治乌德治同志在发言中宣布，“中国同志们不正确的立场帮了帝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宣传的忙，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把社会舆论引入迷途”。“我们不同意在中国流行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战争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唯一的途径”——乔治乌德治说。

应该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修斯尼·卡博同志的特殊立场。他宣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似乎超前，苏共和中共的分歧是这两个党的事，应该由他们解决。苏联代表团对卡博同志不理解问题的实质表示遗憾，并对他作了解释：中共领导不仅是同苏共一个党有分歧，而是同所有坚持宣言纲领的党有分歧。所有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通过解释，卡博同志谴责了中国同志的非党行动。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席会议上，各兄弟党仍然是意

见统一，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发言的人都一致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正确的政策给困难斗争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莫大的援助。同时，他们指出，中国同志的立场和行动给各共产党争取群众带来了损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们以该党活动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批驳了中国同志没有根据的如下主张：争取和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夺取政权的斗争似乎是扼杀阶级斗争，削弱工人阶级在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途中的立场。

在批驳中共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错误观点时，意共领导成员科隆比同志说：“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基础上的政策.....将使我们变得孤立。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失去力量。”这种政策，用科隆比的话讲，将使拥护和平的运动失去目标，使其必遭失败的下场。

美国共产党代表伊丽莎白·弗林同志坚决捍卫和平共处政策，反对中国同志们的观点。她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从宗派立场出发开展和平运动。我们有一些派别小组，他们是极端‘左’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制造混乱，反对和平共处。”弗林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他们的错误行为正在帮敌人的忙。

各共产党的代表们正确地向中国同志们指出，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他们是和平的捍卫者还是战争的宣传者。

应该谈谈正在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的发言。这些同志们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下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似乎和平共处政策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损害，使之迷失方向和削弱它的力量。“争取和平和平共处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强调说，“不仅不妨碍，相反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会议的参加者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代表不正派的派别做法。乔治乌德治、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同志，法国、美国、摩洛哥、以色列共产党的代表，其他许多共产党的代表，通报了中国人在世界工联理事会6月会议期间采取非常方法的新例证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散布他们的印刷材料和相应地收买各兄弟党干部的活动。而且这些同志们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破坏苏共的威信，使各兄弟党脱离

苏共。

在指出中共领导的非同志式行动和虚心假意时，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措施，让人怀疑他们涉及苏共和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的漂亮声明是不真诚的。”

中共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如何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议刚开始，彭真立即把自己摆在了会议参加者的对立面。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是谴责我们的党还是交换意见？这次会议是审判我们的法庭？”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党的同志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对中国代表们解释说，对现实的国际问题预先交换意见，不能对中共领导对这些问题的特别态度避而不谈，是中国同志自己错了，是他们首先开始公开辩论的。当中国同志看到他们不能逃脱批评时，就试图装出受委屈的样子，宣布会议进行得不民主，其指责矛头主要对准苏共代表团。但这遭到了各兄弟党的一致反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完全有机会在会上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彭真同志，尽管他比其他代表好一些，发了三次言，但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歪曲事实，多次重复，按他的话说，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代的那些话。

对兄弟党代表对中国人的批评，彭真同志报之以粗野和轻蔑的态度。“听了这些批评，”他说，“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认为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和诬蔑。”彭真的另一种意见更具代表性：“苏共中央信函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但他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信函。

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对中共代表们给予了应有的反攻。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露了中国人想把各兄弟党引入迷途的企图，指出了中共领导在最重要的当代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立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

赫鲁晓夫同志列举许多事例说明，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不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企图贯彻自己的特别政策，把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际主义利益之上，想让所有兄弟党都听命于北京的意志。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多次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令所有与会者瞩目的，这一团结被中国人解释成了完全另一种团结。实际上他们不想让兄弟党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是团结在中国党定的条件之内，想让兄弟党支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

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反对中国人的这种企图，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统一只能以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为基础。

中国同志不相信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统一(这代表了他们在会议上的全部立场)。在会议结束阶段，当提出通过公报问题时，这再次表露出来。彭真同志推说事先没有达成发表什么文件的协议，推说他没被授权，等等。

发表公报的建议是一些兄弟党提出来的而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它作了附加说明，说它签署公报只是“为了保持一致”，其实所有人都清楚，它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它就会自我暴露，说明他们是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各兄弟党表现出了统一的意志，他们宣布，中共领导人应该考虑对他们的批评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以便保证在根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保持一致，使其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总结布加勒斯特会议时，满意地指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意见一致和团结精神，各兄弟党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并一致支持和赞许它为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活动。

苏共中央主席团赞许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坚决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和坚决反击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观点和行动所进行的活动。

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一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彻底实行之。我们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的伟大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最亲密、友好和兄弟般的相互关系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把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援助看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按其规律和内容，我们这一兄弟般的援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为中国291个工业企业、49个独立的车间和其他项目和装置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最完备的设备。到1957年期间，苏联给中国的供货总额，包括设计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在内，共有147亿卢布，至1960年1月1日供货已完成60亿卢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起了崭新的工业部门——航空、拖拉机、汽车、铝工业等部门。

在建立各种现代国防工业部门方面，苏联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建设了95座军工厂，其中24座已经投产。

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48年至1960年1月1日，苏联给中国提供了1万套设计技术文件和样品，价值近50亿—55亿卢布。

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方面，我国也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

为了清楚起见，同志们，还应该说，为补偿我们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苏联提供了货物和原料，其中包括有色金属。

苏联给中国的全面援助——这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但是不能说苏共的这一真正的列宁路线得到了中国领导的应有理解，而是适得其反，我们给的援助越多，中国同志胃口越大。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尽量多的东西。而且中共领导有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企图得到苏联军事科学技术最新的和秘密的成果。

我们想说，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伤及苏联人尊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之后，整个中国开始拼命吹牛，公开号召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人”。在口头宣传中和在报刊上，越来越少地提到苏联国家、党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完全不提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考虑到上述事实，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某些措施，表明我们不能同中共领导人的不正确行动妥协。

我们不再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中国同志们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所发表的文章。苏共中央嘱咐相应的苏联机关停止购买中国阐述中共领导立场的书籍和宣传材料。

我们建议中国同志不再出版杂志《友好报》和《中苏友好报》——这两份杂志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出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近8期中国《友好报》杂志上开始刊登中国中央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宣传他们不正确的观点。

现在在中国有1200多名苏联技术专家，他们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中国同志也经常提起。

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所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去了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正如你们看到的，同志们，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

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找：中共著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浅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他们不善于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

造成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这种崇拜在国内首先被用来让劳动群众盲目相信国家领导一贯正确，使领导逃脱批评，转移群众对由于内外政策上的愚蠢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麻烦的注意力。

我们不是刚刚认识毛泽东，同他共事也不是一次了。我们深知他的弱点，他很傲慢，虚荣心很强，喜欢别人巴结和奉承，不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行动。

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对于他的每一句话，现在在中国都成了绝对正确的和绝对的真理这种状况，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每一句话都被赋予法律的力量。在那里，现在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被说成是“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各省党代会的报告里已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敢地按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道路，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方法前进”；或“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等等。

难道像中共这样一个大党，至今尚未考虑必须把马克思全集译成汉语，到1959年只出版了列宁选集这一事实还不说明问题吗？而就在这一时间，所有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材料和书籍以及赞美他的生活和活动的无数小册子都在不断出版。在国内，从行政中心到偏远的农村，到处都竖立着“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这样的标语。这些口号以斗大的汉字刷写在田头、屋顶、路旁山冈、河边和稻田之野。印刷了无数的标语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当然，只把中国这些实际现象看作是对党的主席的阿谀奉承和逢迎是不正确的。这里有更多的内涵。中国同志吹捧毛泽东同志和他在当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功勋”，其用心是以他们对基本的国际发展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错误解释，对抗我党和我党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对这些问题和任务所做出的解释。

绝不能认为，同志们，近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起劲地过分颂扬斯大

林是偶然的。

你们很清楚，苏共二十大坚决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受到了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热烈赞扬。唯独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特别立场。

在苏共二十大上，中共代表团把斯大林捧上了天，之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声称，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有一半是他们不能同意的。现在，当中国领导和我们党加深了分歧的时候，他们这样描述这一“思想”：共产党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磨快斯大林这把刀子并用它武装起来”。这样做并非无目的，一是为了证明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并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针，二是为了用斯大林的政策和方法同苏共中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和方法相对抗。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

必须报告中央全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致认为今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适宜的。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起草会议决议草案。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会议。

同志们！在布加勒斯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我们党的名义对中共代表宣布，为巩固我们的关系和协调一致立场，在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把我们争取工人阶级事业、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斗争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将付出我们的一切努力。

中国同志是否准备从批评中吸取教训和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呢？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根据这样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各兄弟党代表同中国同志的会谈和会见表明，他们关于团结的声明看来是为了伪装，掩人耳目。

在这种掩护下，中国同志根据整个情况，打算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做详细“准备”，准备在会上发言宣传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7月3日在北京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曾对匈牙利同志宣布，尽管他们，中国人，“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布加勒斯特公报上签了字，但

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还准备阐述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个事实。我已经说过了，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通过自己的驻外机构在许多国家散发材料，首先是他们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在布加勒斯特，许多党的代表提请中国同志们注意类似行动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之后仍继续寄发材料。我们得到了通报，其中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说中国大使馆散发了1960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中重新坚持在布加勒斯特遭到各兄弟党一致谴责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对来北京的兄弟党代表团加紧做工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东方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很明显，他们企图争取支持者。不能排除，他们可能把一些国家未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锻炼的干部搞糊涂，加强“左”倾宗派集团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提高警惕，积极地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想破坏同中国同志的友谊。但是，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我们要对中共领导当面讲真话，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发展，保卫和平事业才能发展。

我们被同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希望为了形式而统一。我们希望的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和正确的列宁路线基础之上的符合所有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彻底而不知疲倦地贯彻、实施自己的进一步巩固统一和团结，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协调行动的列宁主义方针。

同志们!

近年来世界事件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已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战斗指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英明和生命力。布加勒斯特会议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忠实于这些纲领性文件的。

某些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该党代表团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国会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某些省委员会的全会上，都细心阐述了会议工作结果。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总结到处都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1960年7月1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详细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法共中央在决议中说：“中央委员会赞成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所载原则，符合不久前布加勒斯特宣言中所肯定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所忠于的原则。”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向全国劳动群众解释苏联共产党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安全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指明我党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阵地的巩固，保障揭露战争贩子的侵略阴谋，鼓舞人民积极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反对当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宣言指出的：“当代修正主义企图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宣布它‘过时了’，对社会发展似乎已失去意义。修正主义者企图毒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动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宣言指出，修正主义，或曰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

但宣言同时指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一些党一定发展阶段的主要危险”。现在中国同志的“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他们的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动措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应该指出，我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同志的行动，如果不给予及时反击，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

所以，为顺利地完 成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展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它们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质相违背的，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整个革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力量去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忠于列宁遗训的苏联共产党将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统一！

我党将一如既往带领苏联人民沿着经过考验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奔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РГАНИ, ф.2, оп.1, д.458, л.2-74

№230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1960年7月15日)

第1692号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0年7月15日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中央全会通过)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

(1960年7月中央全会通过)

(一)

在听取和讨论了Ф.Р.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拥护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以及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公报。

这次会议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机会就当代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以及这一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任务等交换意见。会议再次有力地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会议结论及其在和平和社会主义利益方面对国际形势所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及在1957年秋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所通过的和平宣言和声明诸原则。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代形势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所持的一致性立场再次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所有兄弟党已为今后继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好了准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均坚定地表示将回击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并学会在实践中运用它。

苏共中央坚定表示，自己将忠诚于和平声明和宣言，因为后者已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宪章，及其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纲领。

和平声明和宣言的所有结论已被国际事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发展的进程所证明，至今仍完全没有过时。该宣言的内容涉及：我们时代的性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各国家必须保持对军事危险的警惕性，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为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式等。宣言所包含的马列主义诸原理对各民族在当代条件下顺利从事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苏联在步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增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平、各民族友谊，反对侵略和帝国主义势力，赢得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地位已变得更加稳固，帝国主义的地位变得愈加衰弱，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普遍呈现出发展壮大之势。

苏共中央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尤其是美国不顾及各民族意愿，极力制造国际紧张和强化自己针对和平事业的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分子破坏高层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理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和侵略企图，提高各民族的警惕性，巩固和完善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国防，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苏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参加布加勒斯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发表的宣言，即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而和平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当前可以防止战争，可以维护和平”的条款依然没有过时。

避免人类遭受战争毁灭的主要条件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动员所有国家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不断增长和巩固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不仅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并成为各民族和平、进步和自由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苏联共产党认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为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而不懈斗争是自己的责任。

各共产主义党派为了纯洁马列主义学说，为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其队伍和清除其机会主义分子。要顺利解决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面临的任务，就需要继续从事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与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相矛盾，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革命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全部力量去争取和平、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坚持不懈地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和平在全世界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兄弟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马列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二) [20]

苏共中央全会指出：

1.近期，中共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就在当代国际条件下社会发展、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同志在许多重要方面均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中所包含的马列主义原则。中共领导人对当前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变化估计不足；对当前时代作出了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评价，从而与所有其他共产党所作出的评价发生了分歧；错误地理解列宁提出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否定了在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全面、彻底的裁军思想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关于有可能利用两条基本道路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与宣言发生了背离。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观点表明，他们已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所提出的诸原则。

2.中共和各兄弟党之间除了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之外，还出现了如下问题：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持不真诚的、非同志

式的态度，中国同志违背了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原则。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中共领导人在未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事先交换意见，甚至不作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便在许多国家中散布自己的特殊观点和立场——这里指中共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活动家讲话和报刊中所发表的言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北京例会工作期间，中共领导人组织了与各外国工会活动家的集体和个别会谈，并对苏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公开的指责和攻击。中共领导人试图利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以便以世界工联的名义使自己与其他兄弟党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立场存有分歧的观点和立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由于各兄弟党和中国同志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分歧在世界性报刊上刊登，被人利用，从而给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带来了损失。

近期，中国同志在北京又对来访的外国共产党、各共产党和民主组织代表团开展了专门的工作，其目的就是想传播自己的观点，及其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批评。

当国际工联总理事会例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共领导人的行动，尤其是中共代表团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的言论，及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发言，均充分显示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及其极力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3.在国际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在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联、亚非国家团结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中国代表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近一时期，中国同志开始在这些组织中公开自己特殊的，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统一立场相对立的观点，以试图在群众性民主运动和组织的活动问题上把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付诸实践…… [21]

中国同志的立场对国际民主机构的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破坏了各共产党组织在行动上的一致性。

苏共中央认为，中国同志的这一立场和实际活动会限制共产党在抱有民主和爱好和平情绪的群众中开展工作，以及动员和团结群众从事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可能导致宗派主义以及共产党脱离工人和其他在工会等群众组织中的劳动者。

4.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

面，尤其在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问题严重恶化了中国与这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削弱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在这场冲突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对亚洲和平事业的巩固，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均造成了损失。

在中印冲突问题上，苏联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立场在阻碍帝国主义者把这次边境冲突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5.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行动方式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对苏共和中共以及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苏、中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党派——苏共和中共，通过协调立场在对外政策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形成观点的统一，对确保和平的稳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地位和赢得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背离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为巩固和平而斗争的唯一正确方针的做法将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某些错误步骤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落实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造成严重的困难。

中国同志关于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赢得胜利之前不可能确保和平和避免战争的错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的气焰，导致这些国家更加坚定地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战争威胁的源头，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传播共产主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了巩固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本党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所有国家劳动者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如下：

(1)全会完全拥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所采取的路线，及其所做的全部工作。苏共代表团始终不渝地、坚定地执行了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为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

而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坚定捍卫和平宣言和声明的同时，苏共代表团对中共代表的错误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回击。H.C.赫鲁晓夫同志所持立场及其在会议上的发言，在加强各兄弟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共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来自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均与苏共代表团保持了完全的一致，共同批评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及其不正确的行动方式，一致拥护苏共提出的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路线，从而展示了苏共和苏联政府近年来为国际工人、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

(2)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

就本次中央决议问题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开展必要的解释工作；采取必要措施以筹备1960年11月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

苏共中央全会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人能考虑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式批评意见，并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以便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使自己的言行适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利益的需要，适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统一利益的需要，适合全世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利益的需要。

至于苏共方面，将会从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毫不动摇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竭尽全力消除与中国同志所发生的分歧，继续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兄弟情谊。

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0年7月15日

РГАНИ，ф.2，оп.1，д.458，л.75-85

№23008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

1960年9月2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H.C.赫鲁晓夫同志在1960年7月16日中央全会上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的发言(速记报告内容)。

共发送40份。

绝密

H.C.赫鲁晓夫的发言在1960年7月16日中央全会上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速记报告内容经H.C.赫鲁晓夫校订
[22])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大量关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所存在的分歧的资料和结论。虽然,我这里也可以重复一下科兹洛夫同志报告中业已说过的那些内容,但最好还是补充一些新的、原来根本没有的东西。

首先,应当略微讲一下关于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会议上通过联合公报时的情况。中国人当时很不希望此次兄弟党会议通过任何决议。原因何在呢?因为这样的文件将会束缚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从事宗派活动。但我们认为,通过这一文件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话,各兄弟党就能够在文件中表达自己的一致意愿并向全世界展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的统一。

在坚决反对关于发表联合公报的提案的同时,中国同志还援引在会前事先就召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书信交流期间,苏共中央已同意〔在此次会议上〕各兄弟党将不通过任何类似新宣言的文件。我们对中国同志们说:是的,即使现在我们仍赞成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任何新的宣言,但与此同时,与其他党的代表们一样,我们坚持一点,即我们的会议要通过一个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牢固地坚持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我们只希望做到这一点,其他再没有什么。我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正如自己曾多次声明的那样——真正拥护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那么签署这样一份联合公报对于他们也就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联合公报里所写的内容正是他们想

要的。

这种情况使中国代表团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会议通过任何联合公报，因为这样会束缚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宗派主义活动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在出席会议的各兄弟党全体代表面前中国同志又不能拒绝签署联合公报，因为如果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就表明中共领导人将不与所有兄弟党保持步调一致，因为其不愿意签署证明自己忠实于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文件。总之一句话，最终中国代表团在所有兄弟党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联合公报。

中国同志当然不喜欢宣言中的一些最重要条款。这从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报刊的言论中便可明显看出。但由于担心损害自己的声望，他们又不能公开在会议上向各兄弟党代表说明这一点。因此对于中国代表而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签署联合公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

我并不太相信，中国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真正理解了那些针对自己所提出的批评意见。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并不能作为其所得出的一系列乐观结论的依据。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同志的发言很单调，老是重复同样的内容。他歪曲事实，并多次重复——据他说——毛泽东在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前夕对他所说过的这些话。

在会议临近结束之时，一些同志，如哥穆尔卡同志，甚至已经开始对这一情况流露出讥讽的态度，并能提前预言彭真同志将在发言中说什么话。从当时的情况可看出，中国代表团团长拒绝回应会议上针对本党所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在北京时〔毛泽东〕对他所说的话。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感到中共一部分著名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列主义锻炼，只了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些肤浅知识和对共产主义的粗浅而简单化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同志的能力还不足以正确地定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任务。

中国目前正在盛行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敢说，已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而这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同志们的迷茫。中国国内当前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每一个指示都表

现得跟法律一个样。前不久，卡达尔同志曾对我讲了关于匈牙利代表团与一些中国集体农庄农民所进行的一次谈话的情况。虽然我心里并不情愿把匈牙利同志告诉卡达尔同志的这样一件事，跟笑话一样在我们国内流传开来，但它的确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当前中国的情况。这里说的是，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在一次与中国农民的谈话中问他们：你们如今生活得怎么样？农民们答：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相比，在毛泽东皇帝的治理下，我们还从来没有生活得这样好过（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人民政权，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正在执政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他们如此宣扬对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此规模地组织对这位领导人的顶礼膜拜。农民们的政治水平当然不会太高，因而他们也看不出该共产党的主席与当年的中国皇帝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会议厅里一片笑声）。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大家也都看到，中国同志们说，他们只是在重复毛泽东同志事前对中国代表团所说过的话，毛泽东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笑声，会议厅气氛活跃）。但在我们看来，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几乎与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过去每当我们与毛泽东同志谈话和听取他的不容反驳的言论之时，我的眼前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斯大林的身影。我看到毛泽东，就跟看到斯大林的一个精确复制品一样。当然，只是斯大林〔在各方面都要比毛泽东同志的水平高一些〕。

两年前，毛泽东同志宣称，他将退出中国领导人的岗位，以便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理论研究方面。这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毫不客气地让大家明白，自己打算专门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此，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我总感觉有点怪，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宣布自己为世界的理论家，而甚至都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会被那些他想以自己的理论创新而“谋取福利”的人们所接受。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预言家”，而现在大家都看到，毛泽东同志竟宣布自己不仅是本国的预言家，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的预言家。与此同时，他正在从事圣书的编制工作，而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有据此才能够继续发展。可实际上，同志们，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不愿意考虑其他人的经验，喜欢虚荣和自我吹嘘，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将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危险的后果。

让我们以当年毛泽东所宣布的，而如今又被中国同志广泛宣传的一个口号为例，即“东风压倒西风”。苏联报刊曾提到过这一口号，因此我们国家的公众对此也并不陌生。

乍一看起来，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的提出，似乎是觊觎对马列主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但如果细想一下这句话的本质并经过透彻分析，我们便可明显看出，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就其实质而言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原理。如果用简洁的、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说，那么其意思明显应当是这样的：世界上东风的力量将压倒西风的力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源自对当代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并反映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在于，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公式完全歪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均存在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分析世界上的阶级力量分布，我们看到，这一公式实际上采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泛亚细亚主义的地理原则——东方反对西方。

另外，在分析当代形势以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之时，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均存在有一些带有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社会，就自身的阶级构成而言在类型上都不尽相同并分裂为一些彼此相互对抗的阶级。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从事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制定的策略，各共产党正极力将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不过，在这些国家中也有残酷地剥削着劳动人民的大工业、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其统治，共产党人正在发动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奋起斗争。

如果再看一看东方那些如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一部分与西方垄断集团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在执行着反动的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尖锐的否定立场，并极力在政治上孤立他们。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另一部分极力挣脱对帝国主义强国

的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极力使其脱离反动阵营并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即使是暂时的、并不牢固的盟友。关键在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有广泛的劳动群众阶层，而他们无疑对我们抱有好感。

中国同志提出并宣传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从本质上歪曲了所有上述的一切。他们把所有东方人民与所有西方民众对立起来。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究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当年，日本军阀也曾持有过类似的“思想”，他们高喊自己的国家——太阳升起的国度并借此认为自己理应在亚洲世界获得特殊的地位。

如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同意了中国同志的这一口号，并开始以之武装自己并大力宣传，那么这将使我们的共同敌人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援引中国的公式，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有机会狡猾地欺骗普通群众——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共产党人正号召东方人民征服西方，从而鼓动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绝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一定会动员西方国家的民众去反对所谓的东方的共产党人。

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中国提出的这一口号无助于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团结，而是相反，只会促使他们的分裂，只会挑起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争端，并让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

更不用说，“东风压倒西风”的公式还会把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等一样也位于欧洲西部的国家的人民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究竟会如何来理解中国的这一口号呢？

不，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口号。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各大陆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而是取决于广大劳动阶级战胜剥削阶级，取决于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并不是根据地理原则来团结群众，而是依据共同的阶级利益，依据在争取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的阶级斗争中所拥有的共同的政治目标。

我们捍卫的是跟民族性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我们的

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阶级的口号。这才是呼吁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战胜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口号。它对世界各大陆和地区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一视同仁，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奋斗。因为无论哪里的无产阶级——无论是居住在西方还是东方——构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都是站在同一旗帜下为反对自己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而斗争。

而当我们——共产党人断言，社会主义必然在全球获胜时，我们所指的胜利当然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胜利。这才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学说的阶级本质。

而中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只会搞乱许多优秀的、诚实的人们的头脑，误导其脱离国际主义立场而陷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淖。这一论题客观上是为我们的敌人提供了反对我们自己的武器。这就是为何我们不支持、也不能支持它，并相反要揭露其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原因。

那么，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毛泽东又是如何论断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也在客观上帮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忙。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及其宣传机器极力试图证明一点，即似乎共产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据他们说，共产党人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当然是一些具有挑拨性的论断，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需要用它们来恐吓普通百姓远离共产主义。帝国主义首脑们非常清楚，和平是当代世界最迫切的要求，是最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把保卫和平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同志的希望的那样去做，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那就正中帝国主义集团的下怀〔帮了他们的大忙〕，并导致自己孤立于广大劳动群众。那时，帝国主义宣传机器便会向全世界高喊，我们——共产党不相信马列主义思想能在不通过战争手段的情况下获胜，因而想把武力强加给广大民众。而反之，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所持立场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展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

在动员人民从事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同时，共产党人还要团结他们，以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党人作为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热烈捍卫

者，理应保护和避免人类受到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我们所肩负的这一崇高使命是业已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而如今中国同志却建议我们放弃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把为捍卫和平而斗争的旗帜拱手交给帝国主义者。难道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与中国同志的分歧涉及到一些非常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试图形象地说明我们分歧的关系。他们说什么，他们与其他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争论性问题是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可不这么看。哥穆尔卡同志公正地对中国同志说，如果从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所存在争议问题的本质上去深入思考，那么这些分歧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可能是整个手掌的问题。

中国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便随时可能发生。这当然没错。但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例如，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资本主义只在一个或几个小国家——如洪都拉斯——内存在，而整个世界其他地方都已是社会主义了，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将反复说战争不可避免吗？

当然，在说当代可能避免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并非完全认为，我们当前正在面对的帝国主义的性质会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实际上依然跟自己最初产生的时候一样——具有掠夺性、强暴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个，甚至最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能发动战争，因为不论国家大小，资本主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巨大的帝国主义强盗有能力吞并大的猎物，而小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的本性跟从前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如今，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存空间已在不断地缩小。如今，帝国主义的力量也不比从前了。随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帝国主义者们的活动已不可能跟半个世纪以前一样——那样地肆无忌惮了。帝国主义者所面临的那些历史条件无疑已从根本上变得对社会主义力量有利起来。不仅我们，即使帝国主义首脑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年变得越来越强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如果帝国主义分子们能够的话，他们即使现在就会发动战争。可是，他们目前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发动攻击是可以的，但此后却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前不久，苏联政府发出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我们的导弹在必要时可

以支援古巴人民——革命力量。我们的导弹射程可以直接打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总司令部。所有美国的盟友都极力劝说美国统治集团，以便保持谨慎，不要发动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因为这样做可能招致苏联随后而来的打击。

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事实并善于依据它们做出正确的基于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性的结论。

中国领导人认为，无论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给各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牺牲，这些牺牲都会得到补偿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便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可能，他说，由于未来的世界战争人类的人口将会损失一半，但帝国主义将因此而从地球上消失。

在与各兄弟党的会谈期间，中国同志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例如在与捷克党和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过程中。对此，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说，如果爆发核战争，许多小民族就可能彻底被消灭。而毛泽东同志答，小民族必须敢于为了大民族而牺牲自己。从这一对话中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完全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的6亿人口在未来的战争中即使存在重大牺牲，也还剩有2—3亿，但无论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小民族，在经过未来的世界大战后都将完全不复存在。尤其让捷克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弱小的捷克民族就一定要为了巨大的中华民族而牺牲自己。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可能只有通过核战争的灾难，经过战争的废墟才会实现——这一思想本身，无疑是荒诞而野蛮的。历次世界战争总是与革命相联系，但革命并不一定非与战争相关。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也并非一定要通过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方式。

而中国同志动辄便以战争相威胁。他们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原子弹和氢弹。可是，如果我们实际地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及其全部可怕的后果，只有疯子才不会害怕。

这里，我想起了如下一个例子。麦克米伦在自己的一次发言中曾声称，苏联将不会首先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因为赫鲁晓夫害怕战争。当我到美国的时候在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期间，我便向他提起了麦克米伦的发言并询问，总统先生对战争持何看法？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

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我对您坦白地说，我非常害怕战争。是的，是的，我真的怕，尤其是核战争。因此，让我们与你们一起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吧。”遗憾的是，即使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位现任的总统，正如人们所言，也无法控制住国家。五角大楼的政治家们并不总是与他商量〔所有问题〕。但这当然是美国人的内部事务了。

当我们谈及关于预防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并不仅仅指望美国人的明智或心软，而是依靠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军事训练，当然，并不是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到现场看过。可能再过几天，我们将去看一看这些导弹的训练过程以及其他一些最新型的技术装备。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是拥护裁军的。

当苏联政府决定裁减武装力量的时候，就是想直接告诉全世界，我们现在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们已拥有了通过加强武器威力的方式缩减军队人数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今年〕5月1日我们的军队击落了1架美国的“U 2”侦察机。美国的情报机关是如此的愚蠢和缺乏远见，前不久竟主动向我们提供了击落其另一架飞机的机会。我们这一下可把英国人给窘住了。麦克米伦可能真的会恳求艾森豪威尔发出如下声明，即美国 and 英国将进一步磋商关于部署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从这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等问题。白宫发言人赫盖尔奇前不久已作过这样的声明。同志们，这是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持续不断的掌声)。

我们必须果断、坚决和深思熟虑地落实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另外，我还可以对大家说的是，中国同志的好战声明只带有展示的意味和不认真的性质。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掉链子。我这里可以向同志们列举如下一个事实，而对此，可能A.И.米高扬和K.E.伏罗希洛夫等同志都还记得。

我指的是在我们赴日内瓦之前所举行的解决越南问题的谈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都应当了解。当时，越南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但在战争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越南同志英勇地与殖民者殊死搏斗，但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胡

志明同志通报我们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

A.И.米高扬：当时正处于越南停战谈判的前夕，奠边府战斗进行期间。

H.C.赫鲁晓夫：是的，当时正是奠边府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而越南人民军已是精疲力竭。于是，胡志明同志便向中国领导人求助。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人民军的军队将退往中国边境，而你们来支援我们。胡志明同志的这一请求可把中国同志吓坏了。周恩来同志在与我进行的单独会谈中声明：“赫鲁晓夫同志，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对您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会参加战斗。如果胡志明同志退往中国边境，我们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不会为越南人战斗，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朝鲜损失太大。”我们看到，事情正朝着不利于越南人的方向转变，于是便对中国同志说：在我们看来，援助越南的问题属于你们的分内之事，但关于我们的立场你们暂且什么也不要对胡志明同志说，最好让他们暂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首诗，名叫《白裙子》。其中讲述一位母亲如何欺骗了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儿子。她穿上了一条白色的裙子。这位母亲之所以穿这件白色的衣服，是因为她与儿子事先有一个约定，即一旦她穿上这条裙子，就表明儿子将被〔皇帝〕赦免。当看到母亲穿上了白裙子，儿子便认为他将被赦免一死，于是便精神抖擞地走上了断头台，并在没有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被绞死。这位母亲欺骗了自己的儿子，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在被处死前害怕。这当然是一个高尚〔神圣〕的谎言。我已记不得这首诗的作家是谁。这里坐着西蒙诺夫同志，可能他知道？

K.西蒙诺夫：有这首诗，名叫《神圣的母亲》。

H.C.赫鲁晓夫：不，它的名字叫《神圣的谎言》或《白裙子》，只是这首诗的作者我记不清了。不过，既然连西蒙诺夫也记不清作者，那么我就更有理由记不住了(会议厅所有在座的人都活跃起来)。

那时，当越南同志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之际，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我们当时认为不应告诉其关于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更恰似这个神圣的谎言。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了他们实情，就可能影响他们的战斗精神。随后的情况是这样，越南人民军不久便占领了奠边府——这个殖民者的最重要据点。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虽

然胡志明的军队已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但敌人的状况更糟糕。军人们都了解这种情况，这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

我们派往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根据事先的指示坚决捍卫越南同志的利益。当时胡志明同志也化名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绘制了预定南、北越南之间边境线的地图。我们代表团必须把这份地图提交给法国人。但当越南人攻占了法国的奠边府据点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向我方代表团发出了急电，以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所携带的那份地图。我们期待着在这种新形势下法国人能够向越南同志做出更大的让步——给北越更多的领域。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心绪不安的，只希望法国人不要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因为越南同志当时已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最终，法国人签署了协定，并向越南同志让出了比他们最初所要求的更多的领土。这就是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正如大家所看到，当时中国同志的立场并不是跟现在战争已结束一样——如此的好战。上述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例子。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关于各个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的论断。其中指出，除了采用非和平的、暴力方式之外，无产阶级还有可能通过和平夺权的途径——通过各种方法积极发展群众运动，通过利用议会斗争方式等。我们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中有一个必需的、决定性条件，那就是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必须掌握政治领导权。

中国同志对苏共二十大关于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论断持怀疑态度。他们将关于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包括利用议会斗争方式在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论断称作机会主义。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呢？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正是斯大林本人将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写入了英国共产党的党纲的。

A.И.米高扬：当时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由斯大林写的。

H.C.赫鲁晓夫：是的，这的确是当时由斯大林写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现实生活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党的二十大和莫斯科宣言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接下来不久，资本主义国家的17个共产党举行了罗马会议。我们的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论断正好适用于这些国家并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们完全拥护这一论断，会议决议的内容与苏共二十大决议以及1957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中关于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中国同志对上述17个共产党所通过的罗马会议决议提出指责，而我们认为这些决议都是正确的。不久前，我与陶里亚蒂同志会谈。我们都再次坚定地认为，不对兄弟党的罗马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持任何怀疑态度。

我们为什么不当听取那些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共产党员们的呼声呢？要知道，不论是非和平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他们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同志却不愿意考虑这些。

显然，中国同志是把阶级斗争问题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解放等问题相互混淆起来了。这里，我们可以拿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捍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中对各共产党工作问题所持立场为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如下情况，即捍卫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包括有工人、农民、资本家、不同国家解放运动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各种成分。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与共产党人一起开会的也有资本家；在这里，虽然人们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而且从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但他们相互合作，正是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团结了起来。

我再重复一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这一切。他们要求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共产党员们通过包含有谴责资本主义内容的决议。

例如，中国同志建议通过关于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决议。但是，同志们，在和平理事会上我们不能这样干，这纯粹是共产党的要求。而在这里开会的还包括有像赛鲁斯·伊通一样的人们，这里的氛围明显不适合通过这样的决议。但中国人却想让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资本家们对这一决议投赞成票。

如果我们在维护和平运动组织中只建议和执行自己——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决议，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属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人们会停止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局限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基础，自己削弱了自己的阵地，并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这应当

看作是中国同志以漂亮的革命辞藻对我们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的典型事例。

中国领导人还多次表现了自己的宗派主义观点。当我们于1958年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对我们说：你们如何看待联合国呢？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从那里离开并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会怎么样呢？让在纽约开会的只有资本家们，而我们将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我当时便对毛泽东说，我不能理解这样提出问题，不明白社会主义国家都离开联合国，从而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能够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此举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何好处。仅仅因为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吗？要知道，当年在沙皇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也不占多数！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有必要待在那里，以便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以便在反动的沙皇杜马中时而高声响起工人阶级代表们的声音，以便利用沙皇杜马的讲坛宣传工人阶级思想。这就是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布尔什维尔的观点。

我们共产党人目前在联合国中所肩负的职能与当年布尔什维克派别在沙皇国家杜马中所履行的职能是极其类似的。的确，我们暂时在联合国仍处于少数地位，但我们因此却有机会在世界公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者们的反动政策。

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都成功地把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孤立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例如，当年，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情形下，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在联合国占多数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即使有些国家不拥护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至少会拥护那些坚持和平和平共处政策的国家的。

如果我们如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那样——现在就离开联合国，那只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并让美国人感到满意。

要知道，他们已不止一次试图提出关于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驱逐出联合国的问题。而如果共产党人自己竟忽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自己主动离开联合国，那不正是给美国人的一份大礼吗？而这无疑将是我们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事例。当年，为了展示我们的

否定态度…… [23] 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操纵联合国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联合国军进驻朝鲜的决议。而最终，我们又被迫重返安理会，吸取教训，重新占据了自己在联合国的位置。回想我们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安理会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曾多次感到遗憾——自己为什么会采取了如此草率的举措。那么，如今我们又为什么要重复类似的愚蠢做法呢？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正确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已有力地展示了这一点。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料到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会表现得如此团结一致。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人为了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施加影响而花费了不少工夫，他们与后者开了3个月的讲习班。我也曾想过，因此他们可能会成功地糊弄一些人。可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表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亚非拉各国在内，均一致反对中国的立场，而拥护苏共的路线。这对我们今后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不给中国同志继续从事分裂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可乘之机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苏共，则必须在各级党组织中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以便在会议上向共产党员们解释我们的立场和中国同志错误的实质。不过，我们的讨论应当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即不要发展成某种形式的反中国的游行示威。因为这样做会危害我们的共同事业。应当使我们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可能，以便消除我们与中国同志之间的现有分歧，而不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应当成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总路线。

手写批注：

归档。

B.切尔夫哈

1960年12月2日

РГАНИ, ф.2, оп.1, д.476, л.193-235

**№23009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
(1960年7月16日)**

同志们，有一个提案，也许不必进行讨论？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我们(关于此)连登记都没有做(笑声)。

那么，我们就说好了，不对这一提案举行辩论。

决议已分发给大家了，你们都读了吗？

众人道：都读了。

众人道：可以。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还有其他决议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全会与会同志们还有其他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可能有人不同意科兹洛夫同志在主席团所表述的立场？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所有人都同意吗？(热烈而持续不断的掌声)

关于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们将就对该问题进行全体表决吗？

众人道：全体。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提议对该决议进行表决。赞成上

述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想请求全会成员们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对该决议再编辑加工一下，是否还需要主席团对所有问题再思考得周全一些。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算解决了。

还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中央委员们做出通报：在上次中央全会上我们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个人请求通过了关于解除其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的决议，以及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所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理由是其被选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上述通报内容当时并没有见报，目的就是担心你们会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如今，我们将以本次全会决议的名义宣布此事，——我们也不说，上述决议是在那次全会上做出的，而只是公布这一情况。

请允许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会议闭幕。

РГАНИ, ф.2, оп.1, д.476, л.236-238

№09979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960年7月1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奉命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下：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

接指责。然而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们接受专家和顾问中的任何一个人。早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培养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在1958年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如同在1957年一样，这次中国方面仍然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与条约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是相抵触的。按照当局的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竭力引导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去讨论那些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某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他们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在那些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中，领导干部们固执地试图让他们加入上述问题的讨论。例如在5月19日，在广州的中国电子工业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在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提议，讨论用俄语特别出版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选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让他们表达对文选中选编的文章的看法。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苏联专家组，中国官员还强迫每个苏联专家接受这一文选，众所周知，其中包含着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在一次有苏联军事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宣传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而那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和与1957年11月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机构和企业中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事例，那里的领导干部竭力引导苏联专家参加讨论，向他们施加压力，影响他们，促使他们持有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行动是不尊重他们本人及其工作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考虑到这一系列事实，苏联专家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再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而这是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所必需的，更别提他们为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军事建设所提供援助而应受到的尊重了。还存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忽略，或者对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不予考虑的情况，尽管事实上这些意见是基于专家们基础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提出的。甚至苏联专家们准备的文件，包括个人意见和技术规范，也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没有机会履行他们职责，也不能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他们实际上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无私的工作不被赏识，他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只是忘恩负义。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正如我们的一些专家指出的，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表明，这些怀着深切的感情，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理解。

的确，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中国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指出，中国方面上述的举动对苏联是极不友好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苏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些协议中，中苏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友好合作，完善和巩固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就中方的这些举动而言，让苏联专家们继续留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大使馆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苏联方面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本身以前也曾提出过命令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确理解苏联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418—3421页

№03969 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

友谊》和《友好报》(1960年7月21日)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今年6月29日的决议，指示苏联驻中国大使通报中国同志，我们认为停止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和停止在苏联出版中国杂志《友好报》是适当的。

中国同志至今对这个交涉没有做出答复，虽然参赞苏达利科夫同志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会晤已过去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杂志《友好报》仍按期送交《真理报》出版社付印，现在印刷厂里已有6期——第26、27、28、29、30和31期。

印刷我们《苏中友谊》杂志的北京印刷厂积压着我们杂志的第26、27、28、29期。所有这4期都已出版，而且《人民日报》对此都作过报道，其中有这样的话：“订阅《苏中友谊》请到各地邮局。”从30期开始，我们杂志的材料再没有送去付印，所以杂志事实上已经停止出版。

中国同志继续在毫无限制地推销用中文出版的《苏联》画报(第7期和第8期每期订数达62000份)和《苏联妇女》(第7期和第8期中国朋友各预订了51000份)，这个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外，中国还在毫无限制地销售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刊有地方报刊文章的新闻周报，印数为1000份。

对中方寄来的《友好报》杂志第27、28、29、30和31期上文章的分析表明，他们仍然和第26期的精神毫无二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交涉。至于说到为了在苏联销售而用俄语出版的《中国》画报，它的第10、11和12期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人民公社，关于“大跃进”，关于“小高炉”等方面的文章和插图。同时杂志上还刊登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和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论战文章。虽然“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对寄来的第10、11和12期《中国》画报(每期90000份)没有发行，中国同志也没提出任何批评。

7月12日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拜访了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索要“在苏联发行的那些用俄语出版的外国杂志”的资料，特别重视用俄语出版的《美国》杂志。这件事也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

一、委托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中共中央对苏达利科夫同志的通报尽快做出答复。通报说：“莫斯科认为停止继续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是适当的，并请中方停止在苏联出版《友好报》杂志。”

二、至于说《中国》画报，我们认为允许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把该杂志的第10、11和12期分发给订户，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塔什干每期销售2万到2.5万份。

三、关于两国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我们认为当前互相不宜主动提出取消这种出版物。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简报用打印的方式每周出版，每份2—3印张，印数约1000份。它分送各地方报纸和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不定期出版，由于用油印机印刷，份数不多。总共只出了39期。大使馆出版新闻简报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公认的活动。

请批复。

Л.伊利切夫(签名)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Г.茹科夫(签名)

1960年7月21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9, л.166-167

№207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 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1960年7月24—26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平壤市

1960年7月24—26日

我受托去长松与金日成见面。

我同外务相朴成哲离开平壤去长松，一同前去的有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B.M.莫罗佐夫。

7月24日我们刚到，金日成就请我吃午饭，饭后我们在他别墅里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崔庸健(在休养)、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B.M.莫罗佐夫。会见时我对金日成说H.C.赫鲁晓夫有信给他，并亲手把信交给了他。会谈时也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我把H.C.赫鲁晓夫1960年7月19日的信交给了金日成，信中通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请求的决定。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使金日成和崔庸健感到非常高兴。金日成在读信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好”，“很好”，“苏共中央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 [24]

接着，金日成感谢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正确无误地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国内的实际情况。

我也感谢了金日成，我说，我作为大使，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以及H.C.赫鲁晓夫亲自要我以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身份进一步加强苏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友谊。

金日成和崔庸健很满意，很高兴地收到了H.C.赫鲁晓夫的来信。后来，吃晚饭的时候，金日成告诉朴正爱(她刚从农业合作社回来)说：“经济问题解决得很好。”外务相朴成哲在座谈会上和在以后会见中，对苏共

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第二，金日成问，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9月几日抵达平壤。

我回答金日成，来平壤之前H.C.赫鲁晓夫同志接见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委托我向您转达，他可能于今年9月中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体日期要在得知以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苏的日期定下来以后，才能通知你们。

金日成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的心情等待为世界和平做不懈斗争的战士、卓越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到来。我们想让H.C.赫鲁晓夫同志看看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期间，金日成说，我们准备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会上将讨论、通过给南朝鲜的和平统一国家呼吁信。信中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文件中多次提出的建议。其中一条新的建议是建立联邦。信中的基本原则我将在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详细阐述。报告中会提到，如果两朝鲜政府不准备或担心参加南北朝鲜普选(美军撤离以后)，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议成立联邦。我们不坚持废除南朝鲜的资本主义制度，朝鲜的共同问题可以通过联邦来解决。联邦的成立将促进南北朝鲜的接触，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为和平统一国家打下基础。我们将请H.C.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我们想，金日成接着说，最近期间，8月15日前后，发布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60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消息。具体日期何时合适由苏共中央决定。

金日成还说，因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今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0年8月15日解放15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就不邀请其他政府代表团了。

我问金日成，能否事先告诉我，H.C.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他们准备邀请哪些企业、城市和团体。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于8月初，他休假回来以后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的日程。建议参观访问平壤纺织厂、兴南无机肥料厂及其他邻近的企业、冶金厂，可能还有黄海道某个集体农庄、安州水力灌溉系统、平壤大学等。考虑在平壤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三，据金日成通报，今年8月10日到9月20日全国举办朝苏友好月，期间朝鲜人民能够广泛了解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了解苏联政府的对外和平政策、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解苏联关于普遍全面裁军的建议。

第四，金日成饶有兴趣地问，谁来主持平壤的苏联展览会开幕式。

我回答说，大使馆还不得而知：可能莫斯科有人过来，也许会委托大使。

金日成希望展览会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8月14日，他说开幕式上金一同志或崔庸健将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辞。

我对金日成说，展览会建设已经结束，至今还要做一些清洁工作和修补工作。展品已全部运到，80%已经到达平壤。展品很有价值，而且很多，不知能否全部在展览会展出。现在苏联专家和朝鲜同志一起正忙于安置展品。估计一切工作最晚不会超过8月10—13日结束。他们希望展览会的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14日，关于这一点将会报告给莫斯科。

第五，我将苏共中央于今年7月18日的信交给金日成，信中附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回苏联专家和参赞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复本。

金日成和崔庸健在读信时表示惊奇。听到在中国的许多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不恰当待遇表示愤怒，多次重复“阴谋”这个词。金日成也指出，“中国领导人看来想把苏联专家变为中国自己的专家”。总的来说，对这封信的反应还是相当平静的。

金日成请我代为感谢苏共中央提供了信息。

第六，金日成通报信息，今年8月8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

会例会，会上将研究下列问题：

1.关于农业、地方工业、建设、捕鱼业的机械化，工业的技术改革。报告人金一。

2.培养技术专家。报告人金昌满。

3.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传达人：代表团团长金昌满。

金日成说，他也将就这个问题发言。

第七，金日成同时通报说，按朝鲜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大概将在8月18日举行全国“千里马”队队长会议，将有五六百人参加。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李孝淳将作报告。会议参加者将被邀参加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的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八，今年8—9月间，金日成说，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准备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这个代表团也将去中国。中国领导人邀请代表团8月份去北京。可是，我们想代表团最好先到苏联，这样合适些。

7月25日一整天(从6点到20点)和7月26日上午(从6点到12点)应金日成邀请，我和他一起在水丰水电站旁边的水库钓鱼。整个这段时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在轻松、同志式的、相互信任的气氛中我们谈了许多问题。

金日成跟我交换对有些问题的信息，谈了自己的观点。

..... [25]

金日成多次亲切地回忆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见的情景，后者跟朝鲜领导人谈得很深入，涉及的内容很广。金日成好几次提到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一贯坚持不懈地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关心赫鲁晓夫同志的健康情况，对他的工作能力、勤奋精神以及国内外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演说的鲜明性表示由衷的钦佩。“为什么要战争？”他问了好几次，“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懂得这一点？”他强调指出，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执行的列宁主义政策。因此谁反对苏共中央，金日成说，谁就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谈期间金日成多次提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Ф.П.科兹洛夫同志，对他评价很好，金日成说，他本人在今年6月13—18日访问苏联期间第一次跟他直接接触，这位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精通国内外大事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心平气和的、细心认真的交谈者。

我向金日成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我对金日成内容丰富的会谈和通报的讯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23-29

№20736-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960年7月30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30日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我见到了朴金喆(事先已经约定，见7月22日的会谈纪要)，并与他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开始时，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全体成员得知H.C.赫鲁晓夫同志亲笔给金日成同志来信的内容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从这里，朴金喆说，我们就看出H.C.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巨大作用。

苏联最近的援助有助于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七年计划中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不能说在利

用苏联援助过程中没有缺点，而总的来说，利用得当。我们争取更有效地利用这次给我们的援助。

朴金喆代表党中央领导感谢大使在这方面起的作用。

我说，我们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始终全面深刻地研究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请求和愿望。这一次我们的领导人认真地研究了金日成在去莫斯科时提出的请求。苏联人民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新的七年计划顺利完成。至于对大使的感谢，我应该感谢您的关照，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我只是做党和政府交给我进一步巩固苏朝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事情。

是的，朴金喆说，正确理解我们党，对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接着，朴金喆强调了H.C.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执行和平共处、巩固世界和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政策方面的重大作用。

H.C.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朴金喆说，旨在不间断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例如，现今的南朝鲜还处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可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使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条件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朝鲜劳动党为和平统一国家的斗争，是苏联政府和H.C.赫鲁晓夫同志一贯坚持的世界和平共处政策的一部分。

应朴金喆的请求，我向他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朴对此感到很大兴趣，也很关心。

朴金喆称我们的炼钢法很奇妙，把科兹洛夫工程师的轧钢机发明称作建设中的革命。这一切我们都感兴趣。接着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筹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苏共中央的决议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以后我向朴金喆通报了Ф.П.科兹洛夫关于总结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我详细地叙述了中国领导人反对共同宣言和平宣言基本原则以及开始反对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错误立场。通报以后我告诉他们，苏联的刊物上将登载大量关于和平共处、争取和平、战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各种形式的文章。

朴金喆说，他得到了非常重要、有用的信息。当然，在与金日成同志会见时，他说，您(即大使)给他讲了一些比他以前从金昌满那里了解到的更新的消息。

朴金喆说，苏共中央，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立场，久经锻炼，经验丰富。我们不赞同反对苏联，反对苏共中央的人。众所周知，我们领导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根据朝鲜劳动党的路线，听从金日成同志的指示。现在整个朝鲜劳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朝鲜劳动党跟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党政领导以及金日成同志本人多次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金日成同志始终指示我们，正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强大，科学的发达，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得以很快地发展经济。帝国主义者害怕苏联的强大，他们不敢发动战争，因为害怕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我们像支持和平共处的斗争一样永远支持H.C.赫鲁晓夫的积极活动，朴金喆继续谈及和平宣言和共同宣言。H.C.赫鲁晓夫同志的积极活动为和平共处进行的不倦斗争对保卫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能说的就是，我们两党的关系将一如既往地得到更加巩固。中国同志们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同意。

朴金喆同时也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捍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我党始终正确制定路线、方法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中，在提高自己威信和增强自己力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总结是正确的，他们一致赞同共同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国领导人对当前时代的性质给予不正确的评估。但是，应该知道，错误地估价形势会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会给帝国主义者制造进一步军事竞赛的机会。

我们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思想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后退，将来也决不

能后退，因为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虽然中国人胡说我们反对列宁，他们拥护列宁。

接着，我举了一个中国实行人民公社的例子，说明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错误。我详细地指出中国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为时过早。

朴金喆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而我们，他说，我们将沿着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道路前进。

接着我讲了中国人在国内政策的错误，如忽视甚至反对物质利益的原则、发展“小”冶金业、跃进式的发展国民经济等。我特别强调，中国人尽管在内外政策方面犯了错误，但还是奢望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坚定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及时纠正不可避免即将发生的某些问题。

当然，朴金喆说，我党现在走的正是苏联共产党走的路，虽然我们的速度并不太快。我们的建设速度，他说，也很快，因此有时也会出现工作质量方面的缺点。

朴金喆说，我们永远不会犯中国人所犯的错误，如果发生困难，我们会征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请求他们的帮助。

此后朴金喆提醒大家，8月份将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会考虑，朴金喆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建设中。

我们双方对各自提供的有益信息和意见表示了谢意。

会谈的翻译工作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副部长金永南和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翻译Б.М.莫罗佐夫担任。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31-35

№20736-3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

的亲华派和亲苏派(1960年7月31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31日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与内务相方学世在青山(Чинсан)水库见了面。

我告诉方学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金日成于今年6月13—18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的请求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方学世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这项新的巨大援助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朝鲜人民必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项援助。

方学世告诉我说，国内局势正常，没有出现严重事件。不久前分界线附近的海上发生了一次南朝鲜护卫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巡逻船之间的冲突。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船沉了，有些人牺牲了。渔民安全逃离，没有伤亡。

不久前因受台风的影响，约有十名渔民遭难。

后来方学世再一次讲起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他跟H.C.赫鲁晓夫同志的会晤和会谈对正确认清形势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金日成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多次会见了毛泽东。回来以后他感受中国领导人对他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很真诚，很关心。他后来在牡丹峰自己的别墅里为中国大使和参赞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招待会。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以及跟领导干部会谈中多次讲到，毛泽东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关心我们，愿意在多个方面帮助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目前没有任何不能协商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莫斯科，金日成听说毛泽东在对待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不真诚、虚情假义。当金日成在莫斯科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立刻改变了对中国人态度。回国以后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声明，必须警惕中国人的各种挑衅。

会谈中涉及常务委员会亲中国立场的人。方学世说，最亲近中国的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外贸部部长林海，常务委员会成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副主席金昌满也亲中国，但是此人，方学世说，是个非常聪明、狡猾的人，他不会当面反对金日成的立场。而亲苏联的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朴金喆、金一和李孝淳，后者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朴金喆。至于韩安天、郑一龙和李钟玉，方学世回答说，韩安天不亲中国，郑一龙和李钟玉他们是善于经营的人。讲到金日成对南日的态度问题时，方学世说，金日成仍旧尊重南日，对他很好，但是好像觉得在对待南日的问题上有些压力，都在说希望金日成改变对他的态度。后来到底怎样，现在很难说。

我对方学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36-37

№13732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1960年8月4日)

根据我的请求，我在中国外交部拜访了陈毅，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

“我们得知，凡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在和他们进行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政府曾与中国政府秘密交换的关于召回苏联驻华专家的照会，但是专家们事先都不知道被召集谈话的目的。中国方面的负责官员(直到副部级)告诉一些专家说，是中国政府下令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个照会的。

大使馆认为，中国方面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其目的在于毫无道理地替代苏联机构管理其在国外工作的专家。另外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

为所有在华苏联专家都已经被苏联政府告知了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大使馆不得不指出，中国有关单位在苏联专家问题上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寻常的、蓄意的行为，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进行上述谈话的目的是在召回专家问题上散布怀疑情绪，并借此在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和苏联政府之间制造矛盾。

考虑到这种针对苏联政府及在华苏联工作人员的不明智、明显不友好的行为，大使馆认为，有义务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这种行为在两国关系中是不能允许的，并希望下令中国有关单位停止这种做法，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听完上述声明后，陈毅说他愿意对此给予答复。他说，召回苏联专家这一非常事件是苏联方面制造的，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召回为数大约1400—1500名专家的决定，是苏联政府没有与中国政府商量而单方面做出的。中国方面是在7月16日被告知此事，而且没有等我们(中国人)做出反应，苏联专家就开始回国了。现在有大量的苏联专家已经回国了。苏联专家分布在16个城市，500—600个单位。他们不管“那里机器正在运转”，就全部被召回国了。陈毅说，苏联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兄弟国家了，根本无视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义务。召回苏联专家“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

他进一步说，关于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之事，他们过去从未，现在也不准备责备大使馆，也不想指责这次召回专家的工作，因为大使馆有义务执行政府的命令。我们(中国人)不想猜测大使馆向专家们做过什么工作，你们在这里有你们的权利，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陈毅说，召回苏联专家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到9月1日所有专家都会离开中国。全世界都将知道这件事，这也会是“一件大事，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两国都是大国，过去一直互相合作。他强调，他所要说的不代表中国外交部，也不代表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小人物，不想评价苏联政府的行为。我只是希望你正确地理解我们。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突然的、决定性的步骤，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友谊的破裂——这是严重的问题。”陈毅再次强调，所说的都是他的个人意

见，并声称中国方面的官方立场很快就会宣布。

陈毅说，我们两国竟然成为不友好的国家，失去友谊后我们还如何生存，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由于专家被召回，我们(中国人)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我们会努力重建我们的友谊，“兄弟终究是兄弟”。你们早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 [26]

陈毅笑着说：“你看，你想见陈毅，而他已经接见了你，尽管他知道肯定要谈专家问题，你也会向他提出抗议，但他还是来见你了。”在强调这都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而只是一次朋友之间的交流之后，他说，如果苏共和中共还讨论这种小事的话，那么讨论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必须把这些小事放在一边，而着重谈那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你和我都解决不了，因此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苏联大使以前是尤金，现在是契尔沃年科。所有这些同志，中国的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总理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接待并和他们谈过。但是中国驻苏联的大使，甚至连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都见不到。陈毅又进一步说，“就连一个副职都见不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坏成什么样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两党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但是，彭真与科兹洛夫在莫斯科的会谈以及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都没有达成一致，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大会也是这样。“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希望，我们党也希望，所有这些争论在下次会议中能够解决。”

为了不给敌对势力拿专家离开作恶意宣传的机会，双方同意应着重强调苏联专家对中国国力增长的促进作用。之后，陈毅声明，去年中共和苏共之间一些局部的和细小的分歧“已经让外人知道了，但这不是中国的过错”。无论如何，用他的话说，直到1958年都没有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但从1959年初摩擦就越来越多了。他强调指出，他们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两个照会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

回到向专家宣读照会的问题上，陈毅重复道：“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突然行动，这个单方面的、非法的、违反双方条约和协定的行为，破坏了我的友好关系。”单纯指责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双方理论上的分歧可以通过充分讨论来解决，为了我们同志式的友谊，这种事是应该避免的。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的行为是单方面的、非法的、突然的，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你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非法的和不友好的指责。

陈毅说，他不想说更多了，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兄弟党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有必要指出，1948年苏联曾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行为(撤出专家).....

陈毅继续说，我正在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你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停办杂志和召回专家。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但我们仍然是兄弟，我们早在列宁时期就建立起友谊了。中国方面不会采取任何针对你们的行动。我们只想对此作一个合理的解释。陈毅再次表示惊讶：苏联方面在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政治行动的时候，一方面漠视中国人，一方面又指责他们。他说：“我们不是南斯拉夫，如果你们要把我们当作南斯拉夫对待，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之后，陈毅又开始谈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这种仇恨“在未来二三十年都不会消失”。我们说，苏联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并不亚于中国人民。陈毅对此没有反应，又宣称：“我们将继续与美帝战斗，即使你们对我们采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或其他不友好的行动。”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打游击的时候好多了。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对伟大列宁所创立并留下来的苏联和苏共失去信心。

陈毅再次提到“第三次行动”，并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一直有心理准备。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这些事件能够成为转折点，使双方关系不致进一步恶化，这可能会成为一件好事。在双方关系中，你们(苏联)处于优势，你们(苏联)比我们更强大，困难也比我们少，你们有权决定帮助还是不帮助我们，召回还是不召回专家。而我们(中国人)则无发言权。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口多一点，因此，召回专家对你们损失不大，而对我们则会造成巨大损失。

此后，陈毅又回到了宣读照会的话题，试图把整个问题归结为通过宣读照会这种特殊方式来表示对苏联方面的不满。我说，这个问题不应人为地使之复杂化，并强调，处理问题的惯例是不需要讨论的。

陈毅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但又立即指出，我们的处理方式也不是“很好的”，并且是“由你们开始的”，其理由是苏联报纸在中印边界冲突发生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实质性的批评了。最后，陈毅对我们之间的坦率交流表示满意。

№2073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 访朝(1960年8月11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1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见了金日成，并通知他，因为H.C.赫鲁晓夫同志有重要事情，很遗憾，不能于9月中旬在商定的时间进行访问。H.C.赫鲁晓夫同志只能在10月初前来访问，如果朝鲜朋友接受的话。

听了通知以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些话：“很好，H.C.赫鲁晓夫同志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我们都随时准备接待他。我们同意H.C.赫鲁晓夫同志在1960年10月初确定的时间前来访问。”

我对金日成说，莫斯科同意H.C.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朝的消息可在朝鲜解放15周年前发布，是否可在明天，8月12日在报刊上简短地介绍一下来访的情况。

金日成说，我们同意在今年8月12日发布H.C.赫鲁晓夫即将访朝的消息。对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我通知金日成，苏联政府同意您提出的关于今年8月14日在平壤提前举行苏联展览会开幕的建议，并把此事委托给我。我问金日成，展览会开幕的时间何时合适，跟谁协商开幕式的程序。

金日成回答说，他的意见是11点钟比较合适。有关开幕式程序与郑一龙见面后商定。

金日成告诉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苏共中央在指定的时间内开始委员会为即将于今年9月29—30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做编制文件的工作。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员即将确定。

我感谢金日成通知我这些情况。

参加会见的有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

АВ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43-46

№20737-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1960年8月13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3日

我受托拜见金日成或其代表，并以口头形式通报关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消息。因金日成忙于朝鲜解放日的筹备工作，应他的要求，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出席了通报会(第一个问题)。

朴金喆感谢苏共中央的通报，并说：“这些我都理解。这些材料很重

要，很重要，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很有帮助。”

朴成哲后来离开了，他说要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我对朴金喆说，今年7月24日我与金日成会见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苏联政府同意，在今年8、9月份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议。莫斯科研究了他提出的意愿，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签订1961—1965年苏朝两国互换货物协议的建议，并准备于1960年9月下半个月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谈判并签订这项协议。

朴金喆对此表示感谢，并说，他立即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报告。

朴金喆主动向我通报了关于今年8月11日闭幕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有关这个问题他谈了下面一些话：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了三个问题：关于技术进步，关于培养技术专家，关于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上的总结。有关第一、第二个问题的材料已在报刊上发表，您已知道。我现在向您通报的是全会议程中的第三点。”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表团团长金昌满作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报告的草案经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之后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读。全会的参加者一致同意报告。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一些资料以及中国同志的观点。报告中指出，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观点。

我简单扼要地谈一下我们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国际问题。首先，我们报告中谈到了对我们时代的评价问题，谈到共同宣言和平宣言的问题，也谈到了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的时代特点是帝国主义灭亡，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一致支持。我们的同志一致反对中国同志对当前时代性质，如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方面的评价。我们完全同意苏联同志的评价。

报告中讲到，苏共中央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观点已阐述得非常清

楚，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制止战争的力量。而中国同志关于苏共中央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我党支持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形成的和平共处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支持它，因为我们认识到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当代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制订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路线。我们在报告中就是这么说的。

报告中我们反对中国同志说苏联不支持、不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家人民的观点。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独立斗争中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由于苏联的干涉曾经多次成功地制止了战争。我们知道，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支持苏联的政策。

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和平，裁军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全力支持苏联。

报告中也指出，金日成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时的会谈，与H.C.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以及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们都是完全赞同的，也是全面支持的。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中国同志使印度的边境冲突尖锐化，使尼赫鲁成为英雄，使印度共产党陷于困境。苏联同志说得对，过去甚至国王也不会为边境问题动武，而现在中国同志却为了边境问题打起仗来。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重要国际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与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存在着分歧。

同时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同志把H.C.赫鲁晓夫与苏联共产党分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绝不会得逞。

报告中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为了使无党派同志——工会干部接受他们对许多国际问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我们在报告中指出，这是阴谋。

报告的结束部分我们强调，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一贯忠于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这两个文件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宪章。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结论，苏

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当前必须更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

在通报全会决议第三个问题时，朴金喆说，他只是大体地介绍了报告的精神，报告内容还要详细，并附以实例。

朴金喆最后说，全会一致通过了对这问题的相关决议。

我对朴金喆的通报表示感谢。

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翻译工作。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51-55

№03978 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 纠纷(1960年8月17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7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并向罗贵波面交了关于中国公民在布兹爱吉尔山口地区擅闯苏联国境的照会。

罗贵波以气愤的口吻声明说，关于中国公民是否越过苏联国境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据中国当地政府报告，上述照会中提到的中国公民并没有越境，因此中方不能接受照会中提出的要求。此外，有关国界的问题不属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应由双方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苏联政府和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事先没有进行适当的协商，突然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罗贵波对此感到吃惊。

罗贵波接着说，据他们的情报，中国边防当局还在一个月之前就接到苏联边防军的通知，说应当举行会晤以解决边境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授权边防当局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便不能同苏联边防军会晤。据罗贵波说，中国外交部不久前已批准中国边防军与苏联边防军会晤，但如果这次会晤时提出国界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将不参加讨论。

罗贵波接着说，他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请苏方注意，苏联边防军在这一地区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中国公民不友好的态度。罗贵波强调说，在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因此我们只希望对中国公民要友好相待，希望类似事件不要重演。至于说苏联的照会，那要进行研究，再给予答复。

我同意罗贵波的意见，我们之间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我指出，根据大使馆的情报，苏联边防当局拟同中国代表会晤仅仅是为了清除可能成为错误或者偶然性结果的误会，并说明情况。关于国界的谈判他们不应当进行，因为他们手里无疑没有可以明确确定苏联国界的文件。我国边防军提出要审查的不是国界问题，而是发生的事件本身。很遗憾，中国地方当局不愿意同他们会晤。

我说，如果中国外交部有苏联边防军不正当行为的具体事实，就请告诉我们，以便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审查。

罗贵波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最好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协商来解决。”他表示希望苏方不要坚持让双方边防当局的代表进行会晤来解决国界问题。

接着罗贵波列举了一些据他说是苏联边防军对中国公民不友好态度的事实。7月1日苏联边防军对空鸣枪吓唬中国公民。就在当天他们又绑架了人民公社一位副社长，直到7月7日才将其释放。苏联边防军威胁中国公民说，如果他们不离开这块领土，他们就要被绑架，牲畜要被强行扣留。苏方派了一个班的武装边防军来监视中国人。

罗贵波声明说，他所指出的苏联边防军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这一事实，将会得到核实。至于今后对出现的整个问题进行审核的程序，大使馆最好请求中国方面对苏联的照会做出正式的答复。

我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将本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所特有的友好精神去解决。我说，苏方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因为事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它应当得到解决。

罗贵波说：“苏方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很好，我们也同意解决这个问题

题。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政府的友好协商。”他对一些友好的言词表示感谢，并且声明说他相信“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该司工作人员李广儒(Ли Гуань-жу)和史俊弟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B.拉扎列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32, л.216-218

№0397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1960年8月17日)

兹呈上今年8月中国报刊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言论。不同于不久以前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怀疑和回避，中国报刊现在特别强调说，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一点很引人注目。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0年8月17日

第15-Д-1011号

1960年8月中国报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的言论

大家知道，8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就和平共处问题发表了声明。周恩来是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这个声明的。他来得很晚，当时主要客人，包括陈毅，已经离去，招待会快要结束了。

据新华社报道，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简述如下：

“可以说，中国和瑞士的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例子。现在有些西方舆论集团挑拨说，中国放弃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是诬蔑。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分别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

条约和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同很多亚洲国家，例如阿富汗、锡兰、柬埔寨也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同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力求和平共处。我们不仅愿意同亚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共处，而且也愿意同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我们主张亚洲国家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无核地区。”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也重复了周恩来的声明。中国报刊开始发表重申“五项原则”的文章，竭力证明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积极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亚洲和平共处的范例》的社论。文章描述了中缅边境争端的历史，强调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表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良好榜样。

中国报刊不断刊登经过精选的国外对周恩来声明的积极反应。例如，刊登了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一些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反应。详细地评述了不久前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决议，决议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赞赏。广泛发表了支持周恩来建议的参加这次大会的亚非国家小组的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东京举行的上述会议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早在1954年，中国政府就同印度政府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洲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不久以前我国政府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缅甸联盟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尼泊尔王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根据同样的原则，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还是这个刘宁一，两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同格里申同志会谈时说的话却完全相反，即“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这种两面手法成了现在许多中国同志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所特有的。

周恩来8月1日声明之后，中国中央一级的报刊目前还没有发表在理论观点上对争取和平和平共处进行探讨的专文，大概让地方报去分担这个角色，让他们继续照旧发表一些带有错误观点的文章。而中央一级报刊的基本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政策，竭力用一些实

例证明中国一贯支持和平共处。

中国报刊更加广泛宣传号召“建立各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大使馆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时引用毛泽东同志那句说明这个战线任务的话：一定会以更大的力量掀起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风暴。周恩来说，我们确信，毛泽东这一预言“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无疑也适用于全世界”。就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同志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以“不倦的努力来缓和国际形势，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中国最近发表的关于和平共处的文章的真正意图从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驳斥了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极端好战”的声明，揭露了美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文章的末尾并不是指向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至于说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现在竟然也拾起美帝国主义的牙慧，大肆诬蔑中国‘好战’、‘要战争’、‘不要和平’、‘不要和平共处’，捏造中国‘要用战争’来‘推进世界革命’等，那只不过把他们自己抛到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地位。这对中国毫发无损，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十分不妙的。”

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周恩来8月1日的讲话以及随后就和平共处问题开展的宣传运动是中国同志对兄弟党在布加勒斯特批评的回答。显然，中国同志不仅想“驳斥”批评，而且还想说服兄弟党中某些人，似乎对他们的批评是不公正的。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8, л.77-80

№20737-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1960年8月18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8日

我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拜见了金日成。

受中央委托我向金日成介绍并转交了苏共中央1960年8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金日成认真听取了这封信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他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的观点。

然后金日成问，中国同志有否做过什么工作，是否将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我回答金日成，据他所知，中国领导人意欲影响苏联专家，企图煽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的那则通讯中讲到中国同志准备1960年秋季的莫斯科筹备会议的消息。

我们无法想象，金日成说，中国同志准备怎样反驳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提出的原则。那里一切都讲得清楚明白。这份通报我读过两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在讨论金昌满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的报告时不曾有过什么问题。全体一致支持苏共中央的立场，参加全会的还有县党委会的委员长和党的其他干部。全会之前，金昌满的报告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讨论过，没有任何问题和其他观点。

为了恢复和巩固统一，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同志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中国领导人尊重兄弟党，才能达到统一。统一不只是嘴上讲讲“以苏联为首”，而是要实际行动。

这封信，金日成同志指着转交给他的那封苏共中央的信说，也许会帮助他们弄清事实的本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信。

金日成指出，目前尚不知中国同志是否发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支持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公报的通讯报道。

外交部部长朴成哲也参加了会见。

会谈由大使馆三等秘书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翻译。

АВІ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68-69

№03972 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1960年8月23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11月7日

第41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0年8月23日

8月23日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我认为，中国许多领导人和各社会团体代表出席招待会，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同志对罗马尼亚国庆节的关注。除周恩来和朱德外，出席招待会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和习仲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还有一些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招待会期间我被邀为主席团成员，根据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提议，我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鉴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宇宙飞船，他们通过我向苏联表示祝贺。周恩来当即向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家、苏联共产党而举杯。此后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积极地同我保持接触并进行了会谈。招待会

上没有轮流讲话，但根据一切判断，周恩来以防万一作了讲话的准备，他问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巴什基洛：“为什么今天不祝酒呀？”然后，他似乎又回到起初关于宇宙飞船的话题，指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凭记忆就能说出很多的数字，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绩(主要引用罗马尼亚成绩的数字)同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进行比较，每次都强调说中国仍然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列举了罗马尼亚、苏联、中国各种产品的人均指数，例如钢、石油、粮食等。在对这些数字进行比较以后，周恩来立即得出结论，要让中国在产品的人均指标方面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水平，分别需要10年、15年、25年或更多。朱德也参与了谈话，他说，某些品种的产品中国一般说来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水平。接着周恩来特别突出了一个思想，就是中国同志当然为兄弟国家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成绩最终反映在每个国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相帮助和关心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成绩上，在这方面苏联的帮助最多。

他强调指出，现在苏联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不久以前可能还被许多人看成幻想——人均产品不仅要赶上，而且要超过美国。周恩来说，我们也给自己提出赶上英国的任务，但我认为，从世界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个任务并不重，而且赶上英国仅仅是指产品的数量，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国内鼓足干劲。我说，人均产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然而这仍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可以比较合理地发展经济的某些方面，人均生产水平并不总是确定人民福利状况和繁荣程度的衡量标准。这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不能以汽车的人均产量确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会谈在继续进行，周恩来说，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比较容易；比方说，如果与苏联初期发展作一相对比较，那中国就发展速度而言，比苏联当时要快，这是由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兄弟国家之间紧密联系这个新的条件已经产生效果来保证的。周恩来回答说，这绝对正确，也就是最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人，还要更容易一些。

会谈又回到中国国内的发展问题后，周恩来说，今年国内除旱灾和水灾(有的省6—8个月没有下雨，而其他地区又下了暴雨)外，还遭了大灾，许多地区刮了台风，毁坏了土壤的表层和地里的庄稼，拔起电线杆，毁坏了铁路等，今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比去年大得多。这一切

给我们完成今年的任务造成很大的困难，周恩来说，尽管如此，但我们一定会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一个地区的损失可以用另一些地区的丰收来补偿。

又回到上面谈到的各兄弟国家发展的成就时，周恩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显示出为了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而分配劳动和更加有效地配置生产力的过程。他说，但有一些产品，如粮食，每个国家都应当对自己有充分的储备。周恩来详细谈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粮食生产，准备在农业方面做些什么工作。这时他重复了那个著名的提纲，即坚决贯彻工农业并举，以粮为纲，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而农业发展中首先要促进粮食的增产。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我们中国没有解决好城镇居民的粮食问题和畜牧业问题。我说，当然这是常规，我也谈了苏联的情况，说尽管苏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粮食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很重视进一步大大提高粮食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说，大家知道，在解决粮食问题中采取了对我国命运的确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即开垦荒地，尽管存在不利的自然条件(周恩来提到了那几年的情况)，这仍然可以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建立必要的储备。周恩来对我们所开荒地的数量颇感兴趣，然后他算了它与苏联耕地的百分比，说这是件好事，中国同志也初步打算开垦自己的荒地，但由于缺乏机器，目前开展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凭手工劳动也可以开垦荒地，但效率不高。周恩来说，对我们来说，目前除了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和技术开垦荒地外，重要的是发展水利，没有水利，开荒也不会取得必要的效果。谈到荒地，我说陈毅从阿富汗回国的路上，如果他有兴趣，有时间，可以访问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国营农场。周恩来回答说，他们想借会谈之机，对苏联政府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对陈毅和整个代表团的关心表示感谢，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会见了他们。他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邀请陈毅在回国途中访问这两个共和国。周恩来说，陈毅很可能会这样做的。后来周恩来回忆他20年前到过的地方，但如他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20年前的往事就不值一提了。

他说他多次去苏联，但只到过莫斯科。他对我说，甚至乌克兰也没有去。朱德说他去过乌克兰，并在苏联游历了两个星期，在这一方面他

比周恩来好。我告诉周恩来，如果您能抽时间不仅到莫斯科，而且仔细看看我们国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一定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我对朱德说，朱德同志，您自己也说，苏联是个很大的国家，两个星期的时间对了解它是不够的。朱德同意这一点，而周恩来回答说，他们不会放过仔细了解苏联的机会。

接着在会谈中我注意到周恩来只到过莫斯科，近几年也没有到我国游历过，我说，他不应当“脱离地球”。周恩来对此报之一笑，说这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谈到古希腊英雄安泰时形象地说：“谁脱离大地，谁就失去土壤和支撑点，这个人的价值就等于零。”我把谈话转向活跃的话题，说同地球母亲的联系，正如中国同志简明的说法，是一种“群众路线”——多研究生活，常到各地去走走，多到别国去看看等。周恩来对此完全同意。

谈到中国情况，周恩来说，中国还有许多缺点，并用事实加以说明，他开始发挥他的思想，无论工业还是农业中，都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大概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只是这三类人的基础将有所不同。朱德也参与我们的谈话，对这些话题“高谈阔论”，说，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落后的东西”似乎还要牢固地存在许多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些先进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而不惜牺牲落后国家和民族，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是另一个规律——这就是让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赶上来。此后朱德又用几段著名的毛泽东语录详细叙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在会谈中也涉及批评在解决矛盾中的作用，此时朱德指出，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要通过斗争克服一切生产领域里的矛盾，而周恩来插话说，只要存在发展，存在生活本身，这个过程将一直保留“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东西”。

为了尽量使谈话转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向周恩来和朱德详细谈了苏共中央为使落后的集体农庄达到先进水平所采取的措施，特别在1953年以后，指示要(从区、州和中央)派干部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等，特别强调当前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组织地巩固集体农庄仍然是加强农业生产所有部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周恩来很关心苏联集体农庄的数量以及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专业技术干部的供应比率。我对他详细谈了现有干部的供应水平，党和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同时指出还有一些落后的农庄，地方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消除组织和领导农业

生产方面的一切缺点。周恩来说，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干部问题非常尖锐，他又说了中共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他说，他们不得不把基本注意力放在派干部到基层去，因此开了许多会，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实际解决用干部加强农业生产基层小分队的任务。

在招待会快结束时周恩来的话题又回到苏联科学的成就，他说，不应不再次举杯为苏联科学家新的功勋干杯，他指出，虽然中国同志对苏联在这一方面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对他们来说，用活的生物进行实验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他再次向苏联科学家表示祝贺，并为他们的健康而干杯。

把许多事实加以对比，我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中国领导人在有其他国家代表参加的人数众多的招待会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以表面上同我们交往做出引人注意的样子，尽量在外交使团和舆论界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一些秘密会晤中的表现却完全不同——态度孤僻和公事公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7, л.205-212

№20738 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 一致行动(1960年8月25日)

1960年9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24日至9月10日

第1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25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向我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工作情况。同时他也讲到了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积极活动的情况。特别是驻莱比锡领事馆参赞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将开始成立人民公社。为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报刊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回击了中国领事馆参赞不恰当的干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曾邀请州党委领导去领事馆，与他们进行了有关组织人民公社的座谈，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分歧的一些国际问题。

接着大使告诉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做出下列一些指示：在与中国大使馆接触中，如遇争论性问题，必须先与苏联大使商量后行事。

我们决定，我们大使不应跟中国大使进行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有争议问题的专题辩论。可是，如果中国大使在外交使团工作人员中对当代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散布反列宁主义错误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予以回击。如果中国大使馆散发摘自中国报刊的反列宁主义新闻简报，我们应该把这些新闻简报退回中国大使馆。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介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大会的情况。同时他也说到，金日成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统一国家的纲领，这在以前没有见到过。由此看来，大使指出，金日成的发言考虑到了苏联的意见。大使批评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考虑南朝鲜民主党选举前的纲领，对民主党内新派(Синхва)和旧派(Кумхва)之间的分歧没有进行分析。

我不同意德国大使的看法，我说，金日成最近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统一纲领。我详细介绍了朝鲜朋友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国家一贯采取的措施。我说，建立南北朝鲜联盟的问题实际是H.C.赫鲁晓夫于今年7月在莫斯科会见金日成时讨论的议题。

德国大使感谢对他作了解释。他现在更清楚地了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为和平统一国家采用的步骤。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谈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朝鲜朋友在许多问题上仿效中国同志的经验。特别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例如：大跃进发展

的理论，按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联合乡镇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形式。

我同意德国大使的说法，去年朝鲜朋友曾仿效过中国同志，试用了大跃进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结果他们相信，忽视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带来多大的危害。至于农业，德国大使说，依我看，中国的经验不是表现在几个类似人民公社的国营农场，而是过分，不切实际地叫嚷什么粮食亩产要达到10000—15000千斤，玉米亩产达4000—5000斤，要比1958年收成高2—4倍。他们不考虑播种的面积。结果，去年的总产量，特别是粮食和玉米，大大减少。期望夺取高产的任务没有完成。粮食总产量的计划大打折扣，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还要低。在人民公社方面，从它在中国成立开始到现在，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件下是不适合的，结合朝鲜国情的苏联劳动组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大家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朝鲜领导人通过去年的实践深信，不能违背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因而中央委员会全会采取了措施以纠正错误。

德国大使感谢我对此作的一番解释，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АВГ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79-82

№16674 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兹向您呈上我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志于1960年8月25日进行最后的一次会谈记录。

大将巴托夫 [27]

1960年8月30日

1960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会谈翻译：大校C.И.安德烈耶夫、大校张伯恒。

相互致意后，巴托夫同志说，由于自己最近要回国，他想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战斗、政治及技术准备以及军官干部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说，他非常高兴同巴托夫同志谈这些问题。

巴托夫同志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准备开始谈起，他说，最近4—5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人员组成和技术基础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化。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在能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海交通线，打退敌人，比如，在渤海湾等地。

一些潜水艇能独自在远海交通线进行战斗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了部队战斗准备和参谋部准备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使战区在战略和战役各方面做好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上述变化，对海南岛、广州军区、汕头、厦门、舟山群岛，对北京、沈阳、济南和南京等军区的现行计划有必要作更明确的说明。

根据上述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按每一次战役来确定兵力的组成和装备的配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决定(在每一个作战方面)来确定哪一方面是重要的，来确定应怎样建设军队。

所有这些更明确的说明，对各军区司令部能更正确地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决定的基本意图具有重大的意义。

还应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司令部确定在每一战线共同作战的任务，并提出这一任务，为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参谋部确定任务，对作战保障问题和空军、海军及防空军区每一战线的协同作战问题进行研究。

要为人民解放军军区、工程部队首长、铁道部队司令员另行确定战区今后准备工作的任务(道路、桥梁、仓库、防御工事、指挥所及通信线路等)，确定工作的规模、时间和次序。

要就作战伪装、电子对抗以及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的保密工作对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下达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无须把总的指示都全部下达给他们，而只要把其中与每一方有关的内容下达给他们即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的参谋部以及各军区的参谋部的作战指挥部门要制定在危险时期从可能遭敌人核导弹的打击中(陆军集中和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分散的地区)撤出部队和兵力的计划。

在实施作战准备时，最高参谋部应关注下列问题的训练：

——指挥部队；

——协同作战；

——把后备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纵深撤至进行反击的战线；

——作战的机动保障和进行打击的保障(空军、防空部队、防原子武器部队、防化学部队、反坦克部队)；

——第一、第二梯队以及后备队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要对陆军、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工程及化学部队、汽车部队以及后勤机关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根据经验，哪怕对一个民兵干部师和一些陆军、海军的特种部队的战时编制进行扩充，对他们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监督，这些都是有益的。在这一问题上还可以对那些干部得到扩编的师和部队的保障问题进行检查，保障他们得到汽车、武器、检修工具、通信工具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必须为国防工业进行订货，在这一问题上不能使航空兵、炮兵、坦克兵和海军的技术装备无形老化。例如，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已过时了，而米格19飞机的生产被推迟了两年半。T 34坦克过时了，而T 54坦克的生产也在推迟。

总参应对海军、空军及坦克部队发动机的寿命消耗情况进行监督，不容许以武器保管不好和发动机寿命有限为由而降低部队的备战水平。因此，对军事技术装备要建立严格的定期检修、日常维修、中修及大修制度。

总参应加速解决关于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的燃料由中国的化学工业来供应的问题。

总参要确定一些设施，而保卫这些设施将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部队。为此，要加速在这些设施所在区域对这些火箭部队的作战阵地进行的现场勘查工作，并在人民解放军总参的组织措施计划中需要考虑到建立必要数量的新的火箭部队。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已大大地成长，他们的任务更复杂了。很明显，空军已很难胜任对防空部队的领导。因此，应对如下问题予以研究：是否是时候把防空部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军种。

现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炮兵部队和通讯部队中都有雷达装备，这些装备的使用不集中，而且不经济。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应当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司令部和作战部把空军、海军及陆军的雷达技术部门工作总的领导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巴托夫同志指出，他在一些军区访问的某些海岸防御炮兵连没有步兵的掩护，他们在敌方部队袭击的情况下易受损伤。海岸防御炮兵连要有步兵的掩护，为此，可以把他们部署到海岸防御旅(师)的连或营的阵地中。

巴托夫同志说，军区参谋部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还存在不足，并需要提高。

关于干部问题(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关于干部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谈话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巴托夫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在自己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方面符合要求。他们全都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很长的军龄。

全军的军官干部，从团长及其以下的干部以及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坦克和炮兵部队的军官干部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但是，在业务素质方面尚未完全符合必须的要求。

例如，不久前测验过25位潜艇指挥员和政委的潜艇航海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取得即使是合格的评分。

在任命一些军官干部担任总政干部局职务的时候，常常不考虑他们的业务素质。

巴托夫同志提出建议：在对军官干部进行任命时要更广泛地听取连队指挥员及各部门领导的意见。总的应考虑，是否是时候把领导权转交给党委和各军兵种指挥部，让他们分配自己的干部。

接着巴托夫同志说，总政、党委、部队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部队的政治培训、对他们的政治道德教育及团结全军队伍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下达的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似应把党的政治工作与战备计划的执行问题结合起来，与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问题结合起来，使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形成热爱技术的风气，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传统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指挥员的威信和参谋部的作用。各级党委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工作中应提高自己的效能。

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准备时，巴托夫同志说，根据他访问军区后想到的意见，也根据各军兵种专家组长的意见，军事科学院和军校的训练基地通常都还不错，但部队的训练基地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在部队的修理工厂和工场，以及在国防工业企业利用一些副产品，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安排好军用直观教具的生产。

每一个师应建立一个示范性的训练场，并在其中构筑一个连的阵地。我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的4本图集中有建设教练场的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较多地采用集成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仅仅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在接下来的2—3个月内进行射击训练，等等。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部队的常备战斗准备状态可

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更多地采用综合战斗训练的方法，例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同时有计划地进行队列、政治、射击、战术及技术训练。

然后，巴托夫同志说(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他谈话的这一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界定为一个战斗的队伍，赋予他们可靠地保障中国人民的英勇劳动、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不受侵犯的使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种界定也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

巴托夫同志注意到，在上述表达方式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的队伍这一点被摆放在首要的地位。既然这样，就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用于维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常备状态。

但是，巴托夫同志说，有些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伍这一界定的基本精神。

例如，相当多的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去参与各种集训和其他的生产工作，这对他们的战斗准备状态和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各种集训应在部队驻地、在岛屿和前线的战斗地段进行。

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会导致下列缺点：

——使部队和连队没有专人领导；

——军官无法掌握部队的活动以及部队生活和训练；

——军官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工作中形式主义，想把一切推到党委；

——不作为和不使用自己权力；愿望达不到时弄虚作假；

——工作中要求不高和不受监督；

——破坏和不执行战斗训练计划；

——指挥员不愿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军官以士兵的身份到自己所属军种的连队工作只会得到单方面的好

处，这只是在干，他在那里会得到政治和劳动锻炼，但他自己的业务素质将会落后，将会失去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考虑到这种状况，巴托夫同志说，应让全军的军官到技术部队的连队去工作，他们可以在那里研究坦克、大炮、通信及工程业务，这样做可能是更适当的。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尤其是在空军和海军的工程干部的技术培训方面，巴托夫同志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空军和海军发生了许多事件、事故和灾难，并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事件和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工程技术干部不懂技术和不正确地使用技术。

例如，空军第三和第十八歼击航空兵师，这两个师都发生过事故和灾难。加油车使用了10年没有维修，导致金属屑从加油车的油罐进入飞机的燃料箱，堵塞了加油系统，因而发生了灾难。打开燃烧室时不用钥匙而用锤子，结果异物落入燃烧管，因而发生事故。

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两座口径122毫米的榴弹炮爆裂的原因是，炮弹的引信是用手工的方法在军工厂制作的。

巴托夫同志说，空军和海军部队缺少技术训练班，这也无法促进技术干部提高水平。

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坦克和通信部队要完全从事战斗训练，而不要被用于从事劳动。这些部队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时间，离岗参与其他工作，他们会丧失自己的战斗素质。

巴托夫同志最后说：人们可能这样想，他仿佛在自己就要离开时才如此直率和尖锐地提出上述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他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将、杨成武中将、总政主任谭政上将 [28] 会谈时都讲过，在访问各军区时同会晤过的许多将领和军官也都讲过。

部队工作中许多缺点已经被克服或正在被克服。

巴托夫同志说，他是一名军人，具有军人的性格，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认为有义务在离开前应坦诚和直率地向罗瑞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汇报上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表现出来的坦诚、尖锐和直率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巴托夫同志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自己也发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的变化，必须确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等，关于这些问题巴托夫同志今天已经谈论了。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防部根据巴托夫同志1960年3月25日的建议，高度关注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将采取措施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质量。

罗瑞卿同志承认，在组织生产米格19歼击机的过程中他们犯了错误，走错了路。

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在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方面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援助。苏联在两年半以前把生产米格19飞机所需的一切技术资料已交给了中国。彭德怀和黄克诚应当对两年来没有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负责。机械制造工业部对拖延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过错。

1960年上半年以来，罗瑞卿同志说，他本人、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在研究这一问题，由于采取了措施，已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将很快在中国安排生产米格19飞机。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为完全在中国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他们尚未从苏联收到关于生产飞机上两个雷达间的塑料垫圈以及生产在高速情况下用于飞机头部的隔热材料等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在努力自己生产上述缺少的材料。

罗瑞卿同志说，1960年春天，林彪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关注海军、空军及炮兵所发生的事故和灾难，关注巴托夫同志提出的关于消除这些事故和灾难的建议。罗瑞卿同志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这些事故和灾难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技术干部的科技水平低，说明违背了使用装备的工作细则和规定。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都是教训，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继续说，他们也觉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及团长以下级别的指挥官经常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这对部队的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影响。最近总参谋部将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一缺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以及巴托夫同志关于部队，尤其是特种部队要更多地从事战斗训练，尽可能少地离岗参与副业工作、到农村和工厂劳动的建议，罗瑞卿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完全从事战斗训练。罗瑞卿同志同意这一点，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战斗的队伍，所以战斗训练对解放军来说是首要的。但是，他认为，部队在进行战斗训练的同时，也应支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从事副业生产。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例如，辽宁省发生了洪水，部队就完全停止战斗训练，并把工作转移到救助灾民方面。特种部队虽然较少参加劳动，但暂时还不可能完全让他们不参加劳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意让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副业工作。还要经过一定时间，将可能免去军队的这一义务。这时，罗瑞卿同志引用中国元帅陈毅同志的话说，虽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苏联轻松些，因为那时苏联是孤单的，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速度，需要节约开支，因此，有必要让部队参加劳动。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接着说，他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应当以提高战斗训练素质和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为主。但关于这方面他表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政治工作已有这样明确的方针。如有偏离这一方针的倾向，这也不具普遍性，会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政治性质是一样的。两军都是在自己的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这是主要的。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特性是无关紧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原则，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个人负责的制度。

罗瑞卿同志再次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尖锐而直率地提出的问题表示感谢。他说，他将把巴托夫同志谈话的全部内容向林彪以及中国所有其他的元帅汇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将非常认真地学习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贯彻执行。罗瑞卿同志请巴托夫同志不要把他们所作的解释看

作是不愿接受他提出的某些建议。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有缺点，他不会把它缩小，也不会掩盖，现在和将来都要尽力克服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仍落后于苏联军队，尤其是在自己的技术装备方面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确信，经过一些时间，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比不上苏联军队，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这个差距将是不大的。

罗瑞卿同志最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向苏联军队学习，将来也继续向苏联军队学习。

会谈结束时，双方互祝身体健康，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会谈记录：上校安德烈耶夫

РГАНИ, ф.5, оп.30, п.81, д.335, л.118 131

№25606 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 的经济生活状况(1960年8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蒙古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沙拉夫的谈话记录

1960年8月26日

今天应沙拉夫的请求，我接见了。沙拉夫访问了内蒙古，之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他同时也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与我交换了访问的印象。

他在内蒙古逗留了十多天，访问了内地的许多地区，并与自治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中国人说这里约有500万蒙古族人，但他觉得只有100多万人。(注：据正式资料报道，1959年内蒙古的人口已经达到970万人，其中蒙古人有113万人，汉人有840万人，除此以外，还有回族人7.39万人，满族人2.54万人，朝鲜族人1.4万人，达斡尔族人2.69万人，索伦族人0.68万人，鄂伦春人0.1万人。)据沙拉夫观察，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在民族工作方面非常认真而灵活。沙拉夫得出的结论是：在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重视蒙古人民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还不够。现今，蒙古族人都参加了公社。谈到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时，他说，他们无法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比。在自治区，汉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集中在靠近中国内省的地区以及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附近的地区，而从首都到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区的中国居民还很少。现在迁移到那些地区的人数开始增多，有些地区大概已经有1万人。最早，他们迁移过去时不带家属，而现在一家老少都迁移去那里的家庭逐步增多。看起来，中国人正在实施同化政策。按当地蒙古族居民的看法，可以从下面事例说明这个问题：蒙古姑娘通常以各种借口迁移到大多数汉族居住的地区。控制教育。沙拉夫认为，在中国全国进行同一个水平的教育将促进更快地提高蒙古族居民的文化水平，因为蒙文的字母仅32个，而汉语要复杂得多，这与汉字的体系有关。但是沙拉夫说，自治区没有提出全面扫盲的任务，很多蒙古族小孩都不上学，甚至大部分青年还没有达到初等教育程度。教育工作很薄弱，上学的条件很艰苦。学校只在夏季开办，学校连课桌都没有，没有应有的教学设施。孩子们坐在破旧教室的地上听课，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字。冬季不上课，因为室内很冷。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由教师自己制订，教学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

看来，由于中国的物质情况很差，蒙古族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受到了限制。目前一个家庭平均拥有的牛不到两头，羊不到10头，马不到两匹，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家庭有100—150头牲畜。沙拉夫听农民说，他们在公社里的公共食堂吃饭，那里没有考虑到蒙古族居民过去形成的习俗和传统。他们很少有肉吃，肉类用蔬菜——卷心菜、土豆，少量的谷物——主要是米和馒头来代替，而蒙古族居民不太习惯吃这些食品，尽管年轻人已经逐步习惯了。因此，这种食物大部分会剩下，而锅中的小块的肉都会被抢吃个光。在内蒙古，蒙古族入肉吃得特别少，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每年一个家庭可以宰24头牲畜，主要是羊，但也会包括两头牛。

蒙古族入一般在冬季吃很多肉，夏季吃很多奶制品。自治区发放的是奶粉，而他们习惯喝新鲜奶，奶粉从来不当食品吃。

沙拉夫来到一个蒙古包，农民按蒙古人的习俗传统宰了一头羊欢迎他的到来，沙拉夫问一个女农民，平时你们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吗？女农民摇头说，只是欢迎贵客才这样做的，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拿

到糖和茶叶了，供应的茶叶是劣等的，不是那种蒙古人习惯喝的茶叶，按照布票供应的棉布也很少根据生活条件分发。蒙古人冬天和秋天必须穿暖和的衣服，而夏天则需要穿其他的衣服。因此，一年供应5—8米的棉布是不够的。在谈话中沙拉夫说，在同当局进行的谈话中他提出了如下一种想法：希望能够根据确定的标准定期向蒙古人提供哪怕是像棉布、糖、茶叶这样的货物。对此中国当局解释说，供应的间断是因为交通运输困难，没有公路，桥梁遭到了破坏。

自治区的领导体系主要是这样构成的：在盟和公社必须是这样：第一把手是汉族人，第二位就是蒙古人，或者反过来，但是在大部分地区第一把手是汉族人。当地干部愈来愈轻视蒙文，引起蒙古族居民的埋怨。他们通常都说汉语，当沙拉夫用蒙文与当地农民交谈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把他认作为当地干部，不知道他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沙拉夫认为..... [29]，看起来像是在执行一种政策，因为，在一些地方，初级教育是用蒙古语进行的，但是在中学的高年级则是用汉语进行教学。接着沙拉夫说，现在自治区许多蒙古族人要求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收到过很多这方面的信件，现今这类信件基本没有了。看来，中国人在信件分类时就把它们扣下而不寄出去。他们渴望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受那些已经迁移过去的蒙古人的来信以及他们回来作客时讲述的情况的影响。有些蒙古族人愿意把牲畜和财产留下，只要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就行。沙拉夫认为，现在中国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改善条件的措施，同时特别加快了汉人往蒙古族居民较多地区迁移的速度。有些地方正在开垦荒地，但机器不够，劳动力缺乏。

沙拉夫通报说，有两次越境的现象，并赶着牲畜深入了30公里。当蒙古人提出了特别的抗议照会，并向中国人展示了表明边界的地图时，他们说：你的这张地图是从哪里弄来的，毕竟你们是没有自己的地图的，或许，这些地图是苏联给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16673 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1960年8月28日)

绝密

呈赫鲁晓夫同志阅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马利诺夫斯基(签名)

1960年9月15日

致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陆海军政治总局、大将Ф.И.戈利科夫同志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局局长、大将安东诺夫同志：

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民事及军事专家回国的决定受到苏联军事专家组全体成员的拥护，认为这是我方坚决和必要的行动。

接到你们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退人员及技术的指示后，苏联军事专家工作组领导成员和党委立刻阐明苏联政府上述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采取实际措施做准备工作，遣返我们的人员回国。

7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军事专家各组组长及党组织书记会议，阐明苏联政府决定召回专家的政治意义，并按苏联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关于这问题的指示精神，布置了遣返全体人员工作的具体任务。

7月27—31日，在秦皇岛北戴河疗养院召开了专家及其家属大会，这时大多数专家及其家属都在这里。0029部队、哈尔滨以及其他单位的专家组也举行了会议。苏联专家组全体领导成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对苏联政府决议的解释工作。广泛地同专家及其家属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谈话。

8月7日，根据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在苏联大使馆召开了在北京所有党组织的党员大会，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作了报告。

党员大会非常关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问题，批评中国同志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立场。在党员大会上宣读了致苏共中央的信。

客观的事实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让我们做出结论：中国同志非常不正当地接受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专家的决定。他们大大地延迟答复我国政府1960年7月16日照会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7月31日回复照会的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例：当中国领导人伪善地讨好我们的人员时，他们尽量赞扬专家帮助中国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建设和完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业中立下的个人功勋。这时，他们有意地避而不谈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现代工业、在发展科技最重要的领域中给予的巨大和无私的援助。同时，他们企图破坏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政治路线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的人员，甚至使苏联专家对抗苏联政府。

1960年8月4日9时30分，军事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代理书记O.C.帕拉尼契夫上校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过同这两个机关的领导同志谈话后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打算把苏联和中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提出来让军事专家讨论，质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并越过政府领导诉诸专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以最坚决的形式声明：这样的步骤是不容许的，我们坚决要求中国同志不要采取有损我们友谊的行动。

与此同时，即8月4日那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北京市及其他省市的中国领导人，同时向全体专家介绍苏联政府的照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回复照会。当时企图引导专家们讨论上述文件。

非常明显，他们故意用这样不友好的行动让我国政府和中国的不同观点走向对立，力图让苏方人员怀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寻求苏联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很高兴地向你们报告，苏联专家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成熟，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忠诚，在捍卫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历史性决议不受攻击的聪明才智。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员一致谴责中国同

志的不正确行为，并表达自己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以及苏共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政治路线。

在古博列夫、奇尔科夫、涅韦多姆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组，中国同志企图宣读上述文件并要进行讨论，立即遭到我方人员拒绝。他们发表坚决支持苏联政府这一决定的声明后，拒绝听文件和讨论这些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对中方拟在全体苏联专家中讨论和争辩苏中两国照会的企图，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这以后不友好的行动仍时有发生。

例如，今年8月7日，0029部队司令部宴请苏联军事专家，欢送他们即将回国。这时0029部队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和基地政委栗在山少将力图利用宴会来达到反对苏联政府决定和苏共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总路线的宣传目的。

栗在山少将在自己的讲话中表扬了我们专家的工作，同时抨击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称这一决定同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矛盾的，在国家相互关系中是单方面的、史无前例的，不仅中国人民，而且苏联人民都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的专家对栗在山少将的反苏攻击感到愤怒，并给他应得的驳斥。

0029设施专家组的一位组长科瓦廖夫中校工程师先对宴请表示感谢，同时声明，政委的讲话对苏联专家来说，是不适当的、不知分寸的，而且是侮辱性的。专家组的党员致函军事专家组和党委，要求提前撤离0029部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继续留下来是极不受欢迎的。结果他们比规定的期限提前撤回了祖国。

栗在山少将过去曾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列宁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当时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作了报告，以便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

后来，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专家一致支持自己的政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没有得到苏方人员的支持，而是引起了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其意图在于缓和局面。此后，中国同志对我方人员的态度普遍开始好转。

在欢送专家回国的各种晚会上，在同中国主管部门和机关领导人的正式和私人谈话中，已没有讨论苏联政府上述决定和苏共政治路线的企图，而是更多地强调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说苏联专家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破坏这一传统友谊。

今年8月25日，巴托夫大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4个小时会谈(内容将向你们报送)。

人山人海的中国同志在火车站非常热烈地欢送苏联专家。

也应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再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文章，稍微更多地强调两种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性。但是，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无私和巨大的援助仍显得微不足道。

据我们所知，在口头宣传方面仍像过去一样，散布同各兄弟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决议相对立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观点。

在同苏联专家多次的正式会晤和私人谈论中，中国同志过去表示过，现在仍表示非常忧虑和担心，因为他们失去了所需要的高科技援助。许多人公开说，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行的。这时他们充满信心地希望，苏联军事专家能很快回到中国工作。因此，已经建立的安置专家的基地不仅没有撤销，反而在继续改善：在西直门饭店和苏联军事专家招待所，正在修建餐厅，修缮住房，保留国防部、各军兵种、中央主管局和机关的服务人员及译员，图书馆增添苏联的专业和政治类图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事专家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体人员及其家属，其中包括管理部门和党委，共计520人遣返回国。根据你们的指示，将有实际价值的书籍和秘密文件送到苏联国防部，其余书籍和文件按规定程序就地销毁。党委及所有党组织的财产送到苏联国防部档案总馆；电影放映设备、无线电中心站、政治和文艺图书及唱片等政治教育资产转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拉特(PAT)无线电台、吉姆牌汽车、乐器、无线电收音机及其他一些财产运往远东军区。

人员及物资的撤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积极帮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苏联军事专家组长、大将

巴托夫(盖章)

党委书记、上校

休特金

1960年8月28日

第410号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81, д.335, л.109-117

№0397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1960年9月3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9日

第436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谈话记录

1960年9月3日

今天11点30分我应邀去中共中央，彭真向我递交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两封信，注明日期为9月2日。信中中共中央同意，为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于9月29日至30日在莫斯科集中，也同意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前在莫斯科事先会见，并告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等10人组成，将于9月15—17日抵达莫斯科(信的内容已于9月3日电告莫斯科，原件已随大使馆9月 日的第 号信件发出了)。听完信的译文后，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我将立即把此事报告苏共中央。我还指出(指的是第二封信——关于苏共和中共代

表团的会见)，我个人同意我们两党之间团结一致和解决现存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看法。

彭真说对信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补充了，他强调指出，我们两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我们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争议虽然只是局部的，形象地说，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问题都带有原则性，涉及的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次要的，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不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应当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并解决分歧。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相信，分歧能够得到解决。牢固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不是同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暂时的友谊或者临时的联盟。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两个伟大的党、工人运动的两个先锋队之间的友谊。彭真最后说，因此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解决，中共中央的信函本身就说明这一点。

彭真说，与此同时，我们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为了我们两党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我们两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两党代表团的会见是富有成果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彭真指出，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接着，我同意说我们的友谊不是出于某种战术的考虑，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如中共中央信中所正确指出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这是克服有争议问题的决定性的条件。

彭真对此表示同意。

在会谈结束时，我代表H.A.毛希丁诺夫 [30] 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对中共中央和彭真同志在代表团赴越途中中国给予的关注表示感谢。

彭真说，在代表逗留的城市——北京、武汉、广州，中国同志都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们，他请求转告以毛希丁诺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欢迎他们从越南回国途中再到中国一些城市进行访问。

会谈是在心平气和的良好气氛中进行的。参加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以及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

№03971 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0年9月10日

第44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的联系(1958—1960年)

(情报资料)

从中共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和对当代国际形势一系列问题的特殊观点的角度来看，中共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对中共领导及其代表人物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8年末起，中共急剧地加强了自己同兄弟党的联系。这种加强活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中国人民目前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对中共来说，了解兄弟党对它采取的措施的态度和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扩大国际联系用于推广自己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相矛盾的特殊观点，以很不正当的方式把一部分兄弟党吸引到自己一边，以便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

本情报资料主要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此外，这里没有涉及中共与苏共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在大使馆的其他文件中已有所述。本资料的叙述从1958年开始，因为正是这时中共中央开始加强宣传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强加给其他兄弟党。

1958年以前中共与各兄弟党的关系基本上没有一贯性，仅限于或者派中共代表团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或者给这些代表大会拍发贺电。据已公布的资料，1958年只邀请了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美徐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1958年2月)，受到刘少奇的接见。1958年中共派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党的代表团，在5—6月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给澳大利亚、日本、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拍了贺电。董必武的讲话和这一时期的贺电没有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内对外政策原则背道而驰的论点。

中共与各兄弟党关系人所共知的转折是在1958年年底。苏共对人民公社、对放弃物质利益原则的理论“根据”等保持沉默的态度，此时这个问题逐渐明朗了。这一事实可能提醒了中国，他们的一切有关追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新举措得不到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他们密切注视着苏共的观点，因为苏共有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证这一建设国际政治条件的丰富经验。

因此，1958年以来中国同志首先关注的是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工作。这一时期邀请访华的是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而且代表团的性质也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人民公社，小高炉炼钢等。

到了1959年，党的代表团的数量急剧增加。这时在中共对兄弟党的工作中，如专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来华访问，两党就这些问题或那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第一批这样的代表团有越南劳动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和12个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他们是参加了苏共二十一大后应中共之邀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的。此外，1959年上半年中国还邀请了日本(2—3月)、意大利(4月)、匈牙利(4月底至5月)、阿尔巴尼亚(4—5月)、波兰(4月底至5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同日本和意大利代表团分别于3月6日和4月1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些代表团都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接见。为他们组织了长时间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国内旅游。中国同志为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典的兄弟党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节后这些代表团(大家知道，苏共代表团除外)访问了中国各地，参观期间首先向他们介绍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根据兄弟党一些代表人物回国后发表的谈话以及中共与意共1959年

4月19日的联合声明和中共与日共1959年10月20日签署的第二次联合声明判断，在同这些代表团会谈期间，照例讨论了中国对内政策的原则，而且主要关注的是人民公社。这里应当指出，在共同声明中竭力把两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意见确定下来，中国同志追求的目标是把某些党支持他们在建立人民公社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文件证明拿到手。在上述中共与意共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代表团指出，“中国的人民公社是把农业、工业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实现政社合一，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这也是提供了一个中国人民公社的定义。

应当指出，中国同志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和兄弟党代表团在介绍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表现在某些党的代表人物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赞许的言论。比如，伊斯特万·道比(匈牙利)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庄严的大会上强调说：“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显示了出色的成就，群众对人民公社深信不疑。它一定会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向前进。”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把公社叫做共产主义的萌芽。(195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法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罗歇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在巴黎发表演说时，特别指出中国实行大跃进后的巨大成就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单位的人民公社的巨大成就(引自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胡志明、金日成、萨瓦茨基(波兰)、冈萨雷斯(智利)、马里内略(古巴)、萨特(厄瓜多尔)诸同志也程度不等地对人民公社作了肯定。

与此同时，对许多兄弟党的代表人物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加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同志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使兄弟党的代表人物相信他们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他们说人民公社是社会最基层的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最好的、几乎是万能的组织形式等。比如，诺沃提尼同志(捷克斯洛伐克)、马杰尔同志(民主德国)在北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大会上的演说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代表团长贾尔卡赛汗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公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转入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道路问题的一种形式。

中共代表团与兄弟党代表团会见时也涉及当前国际形势问题，同时在1959年初中国同志就试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文件中把自己关于国际政治方面某些问题的观点确定下来。中共和日共签发的上述两个共同声

明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宫本显治于1959年3月，也就是苏共二十一大之后不久签署和专门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声明中，只顺便提到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建立远东和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对于代表大会重要的理论结论，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只字未提。在第二个声明，即10月声明中承认“社会主义阵营是任何帝国主义联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强大的和平堡垒”。声明支持苏联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建议以及它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

两个公报发表的时间相隔8个月，在其中一些问题的提法上的三种区别可以说明，在第一种情况下，正如我们认为的，中共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说服日本同志站到自己一边。这个结论可以从一个月以后，即1959年4月，中共和意共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与苏共二十一大结论一致的原则得到证实。

1959年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二十一大(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3月)、英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3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2月)派了代表团。向墨西哥、玻利维亚、瑞士、法国、印尼、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发了贺电。

1960年过去的几个月的特点是，中共继续加强与兄弟党的联系，即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在这段时间到中国来访的有古巴共产党代表团(4—5月)和匈牙利工人党代表团(7月)。5月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偕夫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讨论了两党之间的一些问题(6月)。根据大使馆现有资料，除这些代表团外，还有22个秘密访华后途经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其中有13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瑞典、法国、伊朗、英国、澳大利亚诸国的代表团。)

来华各国共产党代表，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的，有议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

中共代表团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2月)、新西兰和芬兰共产党(4月)、古巴人民社会党(8月)、越南劳动党(9月)的代表大会。以薄一波为团长的代表团去了波兰。

今年各党的关系中还有许多新的特殊因素。在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

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赋予国际政治问题和宣传这方面的特殊观点已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如果1960年5月以前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些观点还没有概括的说法，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对这些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避而不谈，那么在列宁诞辰90周年前夕，发表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材料之后，特别是巴黎会议失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在秘密会谈中(例如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而且在中国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如彭真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刘长胜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的讲话)都得到鲜明的表现。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同志遭到失败。他们的特殊观点没有得到所有与会的兄弟党代表团的支持，但在会议以后他们仍然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如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不容争辩的讲话提纲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丝毫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和备战，因此全世界人民仍然处于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给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从中共领导的宣传提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寿命已屈指可数”出发，号召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作为粉碎战争和侵略政策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主要条件。但是这两个讲话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已经做出并在莫斯科宣言中得到确定的结论——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当代消灭战争的可能性等——避而不谈。李富春的讲话引用了列宁的话：“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0页。)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他采取中共领导惯用的影射手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同志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而回避同兄弟党有分歧的某些问题，证明他们不愿意在今年11月份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中共领导极力要求兄弟党承认他们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观点，还表现在他们试图在同别的国家正式缔结的文件中反映自己的观点。例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今年5月访问蒙古期间坚持说服蒙古同志在共同声明的内容中写上中共关于国际政治的方针。这一点遭到了蒙古同志的坚决拒绝(见A.M.马卢欣与托伊夫1960年8月16日的会谈记录，第404号)。

为了让众多兄弟党站到自己一边，中共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歪曲这

样或那样一些原理，玩弄两面手法，公开说一套，暗地里做的又是一套。可以举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1960年6月访华期间发生的事件作为例证。刘少奇在招待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会上的讲话稿事先并未让代表团看过(只是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绍娃一再坚持下才把讲话稿交给她看)。这个讲话稿中有这样的话，“在北京同阿尔巴尼亚代表的会谈中，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虽然中国同志在招待会前，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激烈的会谈中知道，并不存在这种一致(苏达利科夫与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贝利绍娃1960年6月6日的会谈记录，第381号)。在贝利绍娃的要求下，才把刘少奇讲话稿中的这句话删去，但当时他们的明显用意是想在报刊上发表这句话，使其成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与中共领导观点“一致”的一种官方证明。7月2日，也就是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的观点遭到一致批判，而苏共和其他党再次就当前局势的某些原则问题清楚而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后，在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中，刘少奇公然歪曲苏共的观点。他曾向匈牙利代表团声明，苏共持反对一切战争，包括正义战争的观点，苏共只承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等(1960年7月4—5日马卢欣与匈牙利临时代办西格蒂的会谈记录，第337号)。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匈牙利同志的义愤。

为了求得别人承认自己的观点，中共领导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方式，企图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立起来，背着苏共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中共要把这些问题提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例会上去讨论的企图以及中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

有鉴于此，在分析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必然要选择出几个党来做他们的工作，以引起大家对中共的注意。列举中共代表团的访问和邀请兄弟党代表团访华表明，最近两年来中共领导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党。这些党的代表团应邀访华比其他党的代表团要频繁得多。毛泽东、刘少奇照例要接见他们。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志在为自己物色同盟者，希望这些党因为某些原因比其他党更快地站到自己一边。例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贝利绍娃于今年6月作为阿议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她说：“我认为，中国人可能寄希望于我们没有经验，想利用阿劳动党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斗争中坚定的立场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达利科夫与贝利绍娃1960年6月6日的会谈

记录)

中共领导人显然企图让阿尔巴尼亚同志站到自己一边，在同他们会谈时直截了当地说，苏共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前后的表现不一致。可以认为，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被邀于今年5—6月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极其热情的接待不是偶然的。显然，中共领导注意到丹麦共产党在匈牙利事件前后观点不一致。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领导特别重视加强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仅在1959年，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就两度访华(如上所述，邀请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的12个国家的代表团，10月又邀请了14个共产党的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几乎邀请了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对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代表特别关注。除党的代表团于3月和10月两度访华外，党的主席马里内略(1959年5—6月)，总书记布兰斯·罗加(1960年4—5月)也访问了中国。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进行了会见和会谈。1960年秘密访华的前述22个共产党的代表团中，有12个代表团是拉丁美洲的。

中共加强同兄弟党的联系是在扩大同这一地区各国联系这个总背景下进行的，被邀请访华的有议会代表团、工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毫无疑问，中国同志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一定能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舆论界找到对自己观点的理解和对自己对内对外政策措施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至今还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即11月在莫斯科即将举行的会议上，中共领导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那里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各种代表团，包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以及中共代表在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一个思想，即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中国准备支援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例如伍修权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新巩固起来的两国人民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196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一些画家经常描绘毛泽东在亚非拉人民的代表之中(《中国建设》英文版1960年第8期)。用11种外文出版的《中国》画报1960年第11期上在“团结，斗争，战胜帝国主义”的标题下，发表了毛泽东会见亚非拉代表团时的讲话，刊登了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照片。中国同志用这些办法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中国非常关心这些国家，把毛泽东说成各国人民，首先是亚非拉人民的领袖。

可能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共产党代表人物的工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党校，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学习(见И.И.萨福隆诺夫1960年8月31日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吉布桑的会谈纪要以及孔德拉季耶夫1960年7月18日同中国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龚丹的会谈记录，第537号)，基本上是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产党员。这个学校的学习都用学员的母语进行，正如吉布桑所指出的，学习是根据中共与这些国家共产党所定的协议实施的。很难说，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怎样对待这里的教学工作和所学的课目，因为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他们都回避说明这些问题。但是可以推测，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定会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关于苏联和苏共的观点。在学习6—9个月以后，许多代表来找我们，请求让他们在苏联待一两个星期，这不是偶然的。最近一个时期向我们提出此种要求的有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除了要熟悉苏联情况外，代表团还对弄清苏联对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很感兴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有趣的是关于这所学校的消息充斥资产阶级报刊的版面，他们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各种臆测。例如，在今年7月17日的香港《南华早报》写道，日本共产党部分机关中大约有300名领导干部在北京这所专门学校受过培训。这里用不同于俄罗斯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在适当时机进行挑拨和制造混乱”。用这个报纸的话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习过的日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区别，就像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方式的区别。”

其次，1960年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领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向出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企图在由于首脑会议中断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时刻，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兄弟党比任何时候都应当团结一致的时刻，离间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只有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观点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今年6月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例会上，中国代表顽固地拒绝在决议中写上例会赞赏总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中方不同意报告的论点)，虽然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声明，如果决议中没有这样的话，会有损于这些国家共产党加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组织的团结工作。

如果1959年同兄弟党代表会见时指出苏联的成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七年计划对于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获胜的意义，苏联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援助，那么在最近提到苏联和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首脑的作用纯粹是形式主义，有时根本不提这些问题。相反，中国同志在各种讲话中却过分地颂扬自己的成绩。

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发出的贺电和祝词中，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思想，即这个或那个民族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用沉默来应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的意义。例如，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冗长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越南劳动党一切胜利的取得都是靠越南人民自己的努力。他说：“越南在抗战中的胜利表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一个已经觉醒和团结起来的被压迫民族是完全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的。”(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但他只字未提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对越南人民的独立事业的作用，苏联在越南停战中的作用，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援助。

在中共领导人促使其他党的领导人站到自己一边采取的手段中，可以提到的还有尽量对某些访华的党的领导人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中国同志邀请澳大利亚、美国、丹麦、以色列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到中国疗养。他们也想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但后者识破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婉言谢绝了(见马卢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托伊夫1960年8月20日的会谈记录，第405号)。

据今年访问过我大使馆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叙述，在长期疗养期间，对他们做细致的工作，介绍国内情况，也不排除让他们了解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在谈到他们特别关心某些党的代表团时，应当指出，假若某一代表团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那对他们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例如中共领导送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时态度冷淡就十分明显，其规格之低，同会见时的规格很不相符，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是由于他们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见1960年7月4日和5日马卢欣同西盖蒂的会谈记录，第381号)。

说到中国同兄弟党的关系，还应当着重叙述下面这样的事情。中共领导在兄弟党内散布自己的观点，并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观点传达到各兄弟党，诸如会谈，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量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在国外发行的中国杂志上发表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同时又对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苏联和其他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

大使馆已经报告了中国报刊上关于H.C.赫鲁晓夫对美国、亚洲一些国家、法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关于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的观点狭隘而又片面的说明。其次，对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了简短而又歪曲的报道，对H.C.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也很简略。不仅在公开报刊上，而且在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新华社《参考消息》上对各兄弟党专门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问题的中央全会，未作任何报道。

可以说，这种立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兄弟党的观点。如果1956年的中国报刊，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版面，借口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认清真理在谁一边，用来发表右派分子言论，如果在苏联专家回国前夕以同样的借口向他们宣读苏联和中国政府的秘密照会，那么现在完全隐瞒和片面歪曲兄弟党的观点，说明中共领导害怕向全党说出自己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原则立场相矛盾的观点。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扩大与兄弟党的联系，被中共领导人用来向兄弟党推广和宣传自己的对内政策和在当前国际形势问题上的特殊观点。中国同志这时并没有停留在使用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上。中国领导人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说自己始终一贯“遵守莫斯科宣言”(196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而在解决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中则坚持宗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中共领导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为，对这些党不公正的批评，诬蔑苏共和其他党为机会主义(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第九次例会上，不同意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会议的决议，说它是个机会主义性质的决议)，无助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从而是对莫斯科宣言的破坏，宣言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具有特别重大

的意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为生活所考验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领导人的做法和立场的一致批评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持，包括中共领导试图施加一定影响的党的支持。但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继续那种方法(7月2日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中共领导并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继续在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推行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

吉列耶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7, л.218-233

№03973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 将在莫斯科的会谈(1960年9月12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8日

第503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0年9月12日

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提议，今天10点30分我会见了。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在互致问候和短时间的一般性谈话之后，邓小平宣布说，他请我来，是要面交中共中央对今年6月21日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苏共中央转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情况通报的回信。这时邓小平通过翻译宣读了注明日期为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的送件函。然后他把回信的中文原件和这个文件的俄文译稿(共143页)交给我，并强调说，他们认为中文文本是正式的，因为俄文译稿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他说他转交的这份文件也是对苏共中央今年8月13日信函的答复，因而中共中央将不再单独寄信答复苏共中央上述信件。邓小平接着说，这个文件的中文复印件和俄文译件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在莫斯科转交苏共中央。

我问，可否认为文件今天在莫斯科已经递交或将要递交，对于我的这个问题中国同志未作准确的答复，只是说已经做好了递交文件的准备，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一些技术原因(飞机起飞的时间等)。

我说，我立即把送达的文件转交苏共中央。

在这次简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这将是第四次访问莫斯科。他第一次去莫斯科是作为中共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成员，接着去莫斯科是由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还参与了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工作。

我指出在后两种情况下，他参与讨论的是兄弟党生活中发生的尖锐而严重的事件。邓小平说，问题显然是在尖锐化后才提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辩论，否则应当把它“扔进垃圾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战斗中和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得到巩固的。邓小平这番话指的是在目前条件下达到我们两党之间相互理解，特别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代表团9月间将要举行的会晤期间取得良好的结果，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1957年起草莫斯科宣言过程中，在编委会里M.A.苏斯洛夫领导的苏联小组的同志和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同志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完全开诚布公、密切合作的。但现在我们两党之间产生了分歧。为了消除分歧，应当明确而清楚地把所有问题都摆出来。我们两党的行为最终要由三个主裁判来评判——一个是群众，另一个是共产党，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会弄清事情真相。第三个是时间，历史将会做出最后结论。他接着说，历史事件的发展既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党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当然会对任何观点做出结论——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我们两党应在十分坦率的情况下交换意见。他最后说，我不可能介绍我们复信的内容，因为它比要答复的苏共

中央文件长得多，他强调说，但我们已努力尽可能详细而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文件的篇幅长短不能成为我们坦率讨论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较大的努力。希望两党即使通过争论和辩论能够达到相互谅解。接着就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问题交换了一些实际的意见。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

注：收到的文件已于今年9月13日以外交邮件由图104飞机送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手写批注：

该资料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过。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1月29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7, л.255-257

№03975 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1960年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1960年9月15日

第0722/ДВ号

关于对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态度问题

1960年8月5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同契尔沃年科大使的会谈中宣称，中共和苏共之间最近一个时期形成的不很正常的关系，影响到莫斯科对中

国大使馆的态度。陈毅在说明情况时指出，苏联驻中国大使有机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几个副总理和部长会晤，而中国驻苏联大使却没有这种机会。他最多只能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的接见，而通常接见的只是外交部的司长或副司长。

陈毅的上述声明不符合实际。苏联外交部不知道1959年到1960年期间有这样的事：刘晓大使没有受到他要求会见的人的会见。接见刘晓的总是外交部部长或副部长(如果他要求这样做的话)。1960年1月1日刘晓在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会谈中确认，大使馆提出的问题都能很快得到答复。刘晓大使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没有主动提出要求同苏联国家领导人会见。

1959年11月5日递交了国书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过了4个月，即1960年3月7日，毛泽东才接见他，虽然这位大使抵达北京后立即通报了他想拜访的中国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接见契尔沃年科同志时对他说，他一知道苏联大使请求会见这事以后，就立即同意与他会见。

此后苏联大使不止一次地请求会见毛泽东，以便完成中央的委托，但中国同志通常总是回答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或者有病。

1960年1月10日苏联大使要求会见毛泽东，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裁军的信。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开会，接见他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1960年1月24日苏联大使受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转交苏共中央拟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的一封信，也没有得到同毛泽东会见的机会。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由伍修权接见他。

1960年5月16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弄清会见毛泽东的可能性，并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一封信。中国同志回答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请他把这封信交给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

1960年7月2日契尔沃年科同志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陆定一。7月5日答复大使说陆定一不在北京，并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接见他(张子意同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举行了会谈)。

1960年8月8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毛泽东，以便递交苏共中央关于成立文件起草委员会的信的文本，这个文件的草稿拟在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国同志两天没有答复。8月10日契尔沃年科又向中共中央提醒这一要求。8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毛泽东委托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大使。

1960年9月5日苏联大使请周恩来或他的副手参加招待会，以便转交苏共中央关于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不在西柏林散布与联邦德国的经贸协定的影响方面保持一致的一封信。苏联大使得到的答复说，周恩来正忙于其他事，大使将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接见。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图加里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

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的要求下，外交部根据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做出了情况说明。除了情况说明提到的事情，苏共中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请求，在1960年接见过他几次。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 [31]

ЦХСД, ф.5, оп.49, д.332, л.247-249

№10279 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 [32]) (1960年9月17—20日)

苏共代表团：苏斯洛夫(团长)、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康斯坦丁诺夫、格里申、契尔沃年科

中共代表团：邓小平(团长)、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伍修权、刘晓

第一次会谈

(1960年9月17日13—15时)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打算如何对待苏中友好？……只有等这一关键问题包含的各种事实得以澄清之后，才能弄清楚如何来消弭我们之间的分歧……

第二次会谈

(1960年9月19日)

科兹洛夫同志首先解释说，我们一向认为，在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应当发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适应的真正的友好关系……

接下来，科兹洛夫同志谈到，至于两党之间已经长期存在的一些严重分歧，中国同志的信中把其原因归结为苏联与波兰的关系以及1956年秋季的匈牙利事件。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在苏共中央同波兰党中央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获得了解决。对于1956年秋季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之间早已达成一致的评价。

我们不否认中国同志在那个时候的确给过我们一些建议，但是那些建议跟现今中国同志来信中所提到的内容全然不同。科兹洛夫同志反驳了中国同志的说法，随即问道：你们为何想要重新提起1956年的波匈事件？我们以为，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就如何评价这些事件释疑解惑。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这种质疑只会煽动波、匈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损害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同波兰、匈牙利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密切关系。

第三次会谈

(1960年9月20日)

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对如下事实深感不解：在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其他几位领导人会谈之后，胡志明同志于回国途中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提到如下消息：赫鲁晓夫在同他及其他越南同志谈话时声称，中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整修成吉思汗的陵墓，这使人嗅到“黄祸”的味道。成吉思汗缔造他的大帝国时曾波及三个国家：蒙古、我们的自治领土和(现在的)布里亚特苏维埃。但是你们那里却通常以为，在成吉思汗的征服中首当其冲受到伤害是欧洲人民，其实中国人民才是受害最深的。

波诺马廖夫：应当做的是拆毁其墓地，而不是去颂扬他。

波斯佩洛夫：许多民族都曾因成吉思汗的征服而受过伤害，中国为什么还要把他作为正面人物加以颂扬？

彭真：是蒙古人想要恢复他们祖先的墓地，我们怎么能够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比如说你们吧，你们也崇拜彼得大帝。你们也曾打算在旅顺港为三位俄国将领——库罗帕特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马卡罗夫——修建一个纪念碑，他们也都曾侵略过中国。

波斯佩洛夫：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纪念碑绝不可能修建，只会修建马卡罗夫的纪念碑。因为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都曾背叛过俄国的事业。

彭真：现在我们来谈谈朝鲜战争的问题。

接下来的谈话反复提及6月22日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意图在于否认毛泽东有过任何过错。据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曾声明：“由于苏联不适于派出军队保护北朝鲜，一旦敌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准备派遣中国志愿军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战。”

在进一步讨论过这个问题后，邓小平宣称：尽管我们并不怀疑你们总的来说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但是在解释过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想要苏联同志反思的是，他们在对待敌人和对待盟友时所有这些做过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妥当。

波诺马廖夫：可是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好像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邓小平：那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讲话时那么尊崇艾森豪威尔？

苏斯洛夫：不能将涉及原则的问题同斗争的手段混为一谈。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不要轻率地下这种结论。你没有听过(赫鲁晓夫)其他的谈话。这里缺乏相互尊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会谈很难再进行下去。不过，我们想问问你，假如遇到困难时，你究竟指望谁的帮助，是艾森豪威尔呢，抑或是尼赫鲁这类人，还是指望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兄弟？

科兹洛夫：对我们而言，这类问题并不存在。

邓小平：我倒是希望真的不存在这类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令人关注。

科兹洛夫：那是你们自己想要削弱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你们自己硬要往这个问题上拉。我们一再声明这类问题不存在，可是你们却坚持说存在这类问题。我们以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名义宣布说，一旦你们遭受侵略，我们将会动用(我们所具备的)一切力量保卫你们，可是你们却总是怀疑这些话。

邓小平：我要求你把你们的行动同你们最近的言论一致起来。

苏斯洛夫：这种说法是对我们的攻击。

邓小平：我以我们党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并凭着充分的责任感宣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无论中国人民遭受怎样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

苏斯洛夫：当1955年民主德国遭遇困难形势时，我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33] 当我们对匈牙利的反革命活动给以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就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吗？

邓小平：但是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你们却没有那么做。

苏斯洛夫：然而那时你们并未受到过侵略者的威胁。

邓小平：你们单方面从中国撤回了你们的专家，你们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延伸到国与国的关系中，而且我也不同意你所谓的印度对中国不构成威胁的话。你们曾宣称说，你们会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居然能够维持一种中立的立场，这在我们看来倒是很新鲜。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中苏两国之间存在过的那些分歧，其中包括1955年2月4日远东军区就共同防空最高指挥权的谈判以及1955年9月27日中苏两国军区就防空问题的谈判。彭真再一次详尽地解释了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邓小平总结说：众所周知那是一项特别不公平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中国竟然无权准许第三国代表进入它所管辖下的两个省，而这两个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是否允许来

自第三国的人员(进入自己的领土)关你们什么事？米高扬同志访华时，我们曾同他讨论过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你们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予以积极评价。

苏斯洛夫：那为什么现在你们又一次把这些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提出来？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邓小平：遗憾的是，无论是关于建设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还是要在平等基础上协商此事这种种建议，都是出自赫鲁晓夫同志。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曾经反问过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提出这些问题，让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根据你们的提议来做呢，还是根据我们共同的想法来做？假如我们按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就得把我们全部的沿海地区，都像对旅顺口和大连那样拱手相让。赫鲁晓夫同志回答道：你们不能那么做，不然你们又该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接着说：那我们就上山打游击。

苏斯洛夫：我想那只是句玩笑话。

邓小平：这不是玩笑，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谈。必须指出的是，在那次会谈之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通报说，苏联将会终止(向中方)移交为原子弹生产所需的技术资料和必要材料，随后你们就停止向我们移交为建设核潜艇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关于中苏两国边界事件，邓小平声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反应，因而我不会就此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邓小平：……借此机会，我请你们转达我们对你们的党以及赫鲁晓夫同志的问候。同时也请转达我们的以下愿望：自去年9月以来，赫鲁晓夫个人三番五次地攻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作为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世界事务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而，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向赫鲁晓夫)转达这一口信，希望他能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满意地看到，双方都认为此次会谈是有益的，都认为这有助于逐步地克服我们之间的分歧。

SAPMO, JIV 2/202 280, Bd.3

**No00597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
月的中国之行(1960年9月22日)**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访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的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在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7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 [34] 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秘密访问，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聒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就不必秘密访问，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来邻国谈判。这

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把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做好充分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

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赞成停战并在中国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并请电告您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作如此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从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平’运动。这

表明，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交通部长科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科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宗派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有人想杀掉他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在党内要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更便于活动。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

有助于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应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待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须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 [35] 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古和内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古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才100万人。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古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古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党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 [36] 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

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意义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并热情地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 [37] 受斯大林委托来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作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38]

A.米高扬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局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и.п.2375

АПРФ, ф.3, оп. 65, д.606, л.1-17

№24149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贺信(1960年9月23日以前)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0年9月..... [39]

第2513号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将至，我认为理应按照往年的惯例向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情报机构)领导人和中国公安部部长发送贺电。

请求批准。

贺电内容请参见附录。 [40]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谢列平(签名)

手写批注：

应批准。

..... [41]

1960年9月24日

归档。

已完成，见背面。

M.索科洛娃

1960年9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35，л.132

№2303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您的要求，现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提交给您。

B.库兹涅佐夫

1960年9月28日

绝密

第0750/ДВ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

1960年6月的最后几天，一伙中国籍牧民，人数近百人，赶着一群

约15000头绵羊，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过苏联国界，并深入距国界3—4公里的地方，在苏联领土上定居下来。中国牧民拒不服从苏联边防军人令其离开我国边境的要求。他们声称，他们是按自己的人民公社主任的指示来到这一地区，未经他的许可不能离开。

中国边防当局断言，牧民占据的地区似乎是中国的领土。在7月期间内，他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规避同我边防军会谈，讨论我们提议关于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

中国公民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一段边界是根据俄中在19世纪的一系列协议划定的，即1860年11月2日的北京续增条约、1864年9月25日的塔城议定书、1881年2月12日的圣彼得堡条约及1884年5月22日的诺沃马尔格兰议定书等。

在1951年出版的某些中国地图上，一系列地段的边界线(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不正确，极大地偏离条约签订的国界线而有利于中国，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位置标在中国领土上。在1954、1957年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这一地区的边界线进一步以与上述条约文件不存在分歧的划定边界图例来标示。

在苏联政权所有年代，我们的边防军一直保卫这一地段。近年来，在中国牧民让牲畜越过边境的各种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在第一时间发出指示后，这些牧民立即毫不争辩地离开苏联领土，并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今年8月17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指出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并要求国界破坏分子离开苏联领土。

中国外交部在今年8月22日的答复中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因为所指的地区好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这地区放牧。中国外交部怀疑苏联边防机关提出的1945年出版的该地区地图，说这不是条约的地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外交部的答复中企图扩大争论的题目，并公然全盘提升苏中边界问题。在答复中尤其指出：“苏中边界在某些地

段尚未划定，而已划定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方亦未经勘察。”因此，中国外交部继续指出，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上某些地段的国界标识存在分歧。至于中国牧民占据的地段，中方声明，请苏联边防军撤出“争议地区”，关于它的归属，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

上述的中方行动，正如中国外交部对今年8月17日大使馆照会的答复，证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具有蓄意的性质。

下列事件更有力地证实这一结论。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中国牧民采取新的企图，不仅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而且在别尔特、乔科来(Чокоай)、乌谢列克(Уселек)等山口地区，把自己的牲畜赶到苏联的领土上。自9月1—6日期间，我们的边防军及时防止了这样的企图20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具有挑衅性质。一些孩子带着几群牲畜，当我边防军出现并令其离开苏联领土时，他们便开始呼叫和哭泣，向后奔跑，虽然边防军根本没有恫吓他们。

由于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从9月1日起下雪，中国牧民9月2—4日开始在苏联领土上用草土块为牲畜搭建圈栏，并很快就造好在冬天条件下生活的土屋。

今年9月6日，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和特普施(Тепши)地区4次企图赶牲畜深入肯科(Кенкоо)河流域的苏联领土，但是这些企图都被苏联边防勤务班及时制止了。这时他们声称，在整个冬季期间，他们将停留在这地区，并按公社领导的命令，打算逐步深入到离边境线20千米的卡拉乌尔秋别(Караул-Тюбе)哨所的苏联领土。

今年9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要求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立即离开苏联领土。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向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递交回复照会，该文已呈送苏共中央。

据最近材料，中国牧民已离开博孜艾格尔山口以北地区的苏联领土。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图加里诺夫

№20739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年9月29日)

1960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12—30日

第162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9月29日

我和夫人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参加了晚宴。座谈中我谈到了苏联农作物取得了好收成，谈到了收获中的一些情况，想向大使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收获情况。

乔晓光说，今年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今年农田受到水灾、旱灾和虫害。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初步统计，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农作物比预期的总产量要减少25%。

接着大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情况良好。乔晓光说，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总产量已经完成了年计划的60%，过去同期只完成40%左右。

我向乔晓光简要地谈了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工作的情况，介绍了卡斯特罗的尖锐而有趣的发言以及纳赛尔的引人注目的发言。

乔晓光接着说，他读到过有关H.C.赫鲁晓夫同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晤的报道。

很明显，乔晓光回避联合国第十五次会议的工作问题。

大使馆二等秘书B.M.巴库林参加了会谈。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125

№03976 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 挑起辩论(1960年9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兹呈上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政治部主任、上校雷巴尔金同志的报告副本。

我提交的这份报告只是提供信息。

附上述报告共3页。第М65881号。给收件人

高利柯夫(签名)

1960年10月13日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关于加强对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的教育工作，参见1960年10月29日苏共中央的决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1月30日

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

1960年9月30日

第01358号

基辅市

兹报告，在我校学习的人民民主国家学员中，休假回国返校以后，就苏共和中共领导之间的分歧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同他们谈话以后才弄清，这方面的情报他们是在家乡度假期间得到的。

今年7月中国班班长上尉李乃宾(Ли Най-Бин)被召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此后学员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就更大。李乃宾从莫斯科回来后说，大使馆向他们通报了同苏共分歧的实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就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基本原则立场。同时好像对他有指示，让他们在各地不要就这些问题挑起争论，采取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方针。

根据特设系各班党支部书记的要求，9月27日对外国学员讲过一次课，题目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历史意义”。讲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历史科学副博士、上校B.H.罗巴京。讲课的思想水平很高，首先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课时对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原则，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批判了这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没有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名。

但是一些中国军官，其中包括李乃宾、张如申(Чжан Жу-шень)和黄新民(Хуан Синмин)，借口提问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讲课人某些完全正确的观点，如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等。

他们挑起辩论的企图得到了及时制止。下课以后中国军官(7人)未经系领导批准召开了自己党的会议，会上他们一致表示不同意讲课内容，第二天他们将此事报告了系里分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

中国班长李乃宾因此而受到相应的训斥，批评他本人和其他中国军官在课堂上的错误表现和不经系领导批准就争论的问题召开党的会议。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代表所有中国学员请求原谅他们的急躁，保证今后不就这些问题挑起任何争论，虽然，如他所言，他们在提到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其他国家班上的军官对讲课都很满意，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

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讨论的一些问题都能正确理解，并一致拥护会议的公报。

学校领导和政治部，特设系的干部继续奉行巩固与人民民主国家，包括与中国同志的兄弟般友谊的方针。10月1日将召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会议。

关于中国军官的表现，我们还要给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处写信。

政治部主任、上校

雷巴尔金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8, л.160-163

№20740-1 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60年10月7日)

1960年10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14日

第16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0月7日

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卡斯托·巴格达诺夫的请求，我接见了
他。

大使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今年8月建议朝鲜朋友进行谈判，并缔结长期贸易协议。朝鲜政府一直到9月底才做出答复。回答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准备签订这样的协议。

大使感到惊奇，朝鲜朋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拒绝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谈判，这可以从李周渊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一事看出。大使以疑问的口气指出，朝鲜领导是否想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一些分歧，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告诉大家，据我们所知，朝鲜领导人在今年5月初向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提供经济援助。金日成亲自就这些问题于5月去过北京，于6月中旬去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

我向大使通报了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哪些经济援助，通报了金日成在与H.C.赫鲁晓夫会谈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错误观点的反映。

大使感谢我给他的通报。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140-141

№20740-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1960年10月8日)

1960年10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14日

第16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0月8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通报了阿尔巴尼亚大使彼得·盖杰什于今年10月7日在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就苏联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的错误言论(在大使们通报之前)。阿尔巴尼亚大使说，不久前驻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他那里，说到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本国所有专家的事。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记得，阿尔巴尼亚大使讲过这些话：苏联政府做得不对，一方面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召回苏联专家。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说，召回苏联专家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同志做得不对，而盖杰什回答说，这方面有错的是苏联领导人。

对阿尔巴尼亚大使的错误说法极为不满。

我感谢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通报。

我拜见了金日成，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信件交给了他。

我读了信件的原文，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们说：H.C.赫鲁晓夫同志很想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在接见我的时候一直这么说。这一点H.C.赫鲁晓夫在今年6月17日会见您的时候也对您说过。苏共中央主席团也知道，朝鲜劳动党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H.C.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大使馆收到的给H.C.赫鲁晓夫的信件、电报超过3.7万封，信中充满对苏联人民诚挚友好之情。可是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必须与您商量推迟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时间。

金日成非常仔细听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来信。可以看出，来信中表示的热情、真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金日成了解来信内容后有点激动地说道：

“我们很了解，H.C.赫鲁晓夫同志目前在纽约正进行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不能打扰他。回国以后H.C.赫鲁晓夫同志还要忙于准备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些情况使得他不得不推迟出访时间，我们完全理解。

我们期待H.C.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这不会是徒劳的。这是必须的工作。它有益于巩固与苏联的友好和团结。

有关推迟访问最好在报纸上同时发布一个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大家不要认为不方便，把访问时间推迟。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努力。这项工作比访问朝鲜更重要。

以后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可以在今年11月会见时与他本人协商。”

接着金日成用疑问的口吻补充说：

访问未必会在今年举行吧？我们这里冬天很冷。H.C.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朝鲜以后还想去萨哈林，那里大家都知道，冬天雪很大。因此，是否把访问日期定在明年春天？

至于发表此消息的时间，金日成赞成定于10月12日。考虑到10月10日将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建党15周年庆祝大会，10月11日将刊登大会的报告。

关于发布消息原稿的问题，金日成说，稿件译成朝鲜语后我们审阅一下，然后把意见通知大使馆(对稿件内容未作改动。只对标题提了些建议。消息发布时间是1960年10月12日)。

我感谢金日成对我们的正确理解，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主席团信中提出的看法。

外务相朴成哲参加了会见。

翻译由大使馆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劳动党国际部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

Д.А.普利耶姆斯基担任记录。

АВРФФ , ф.0102 , оп.16 , д.7 , л.141-144

№1038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1960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0年10月18日会议第165/5号记录

第5项 关于对待在《苏中友谊》杂志工作的中国专家的不正确行

为。

(罗曼诺夫斯基同志、罗戈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鉴于已停止出版《苏中友谊》杂志，苏共中央在今年9月7日的决议中，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表扬中国专家的良好工作，以编辑部的名义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赠送不太贵重的纪念品。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苏中友谊》杂志编辑部的领导，只是形式主义地对待苏共中央的这个命令，对动身回国的中国专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志式的关心。杂志的原主编B.H.罗戈夫同志不接受中国专家的邀请，参加由中国新闻记者专门为杂志的苏方领导同志举行的告别宴会。中国专家对这种举动非常生气，并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中国专家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特别流露出这一点，没有走出车厢与前来送行的杂志的苏方领导人告别。

这样一来，《苏中友谊》杂志原领导人此种考虑不周的行为，给杂志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过多的猜疑，造成了不必要的神经过敏。

苏共中央决定：

一、由于对期满回国的杂志中方工作人员的不正确行为，给予《苏中友谊》杂志原主编B.H.罗戈夫同志警告。

二、请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过问，在取消《苏中友谊》杂志问题上，形式主义地对待执行苏共中央命令的问题。

ЦХСД, ф.4, оп.15, д.690, л.8-9

№09880 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1960年11月26日)

机密

A.И.米高扬和Ф.Р.科兹洛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的会谈记录

米高扬：今年3月，我们曾邀请你们派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你们当时原则上同意了，但没确定派代表团的时间，也没确定代表团名单。然后，在现在代表团前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和莫斯科会议之际，你们通知，这一代表团作为党政代表团前往。我们理解，这正是我们邀请中所说的那个代表团。正因如此，在到达的第一天我们便接见了你们的代表团。

然后你们作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的活动。会议很快要结束，我们认为，你们的下一步逗留应重新提到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计划。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在会议结束之后到我国各地走走，参观一些工业企业，了解一下农业，到科研所、高校和中小学看看，同广大居民阶层——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艺术代表、大中学生见见面，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讲话。这一旅行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科兹洛夫：我完全同意米高扬同志的话。你们到苏联各地走走，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了解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巨大建设。而主要的，你们可以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怀有什么样的兄弟般情意。到我国各地旅行时，你们可以亲临列宁格勒，那里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是列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彭真同志到过列宁格勒，而你们，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还没到过。列宁格勒完全医治好了战争创伤，正在快速地进行建设。

刘少奇：我们理解你们的邀请，这对我们并不突然。但现在正在进行兄弟党会议，会议气氛使我们很伤心。我们现在不能回答你们的邀请。待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会议之后再回答你们。

米高扬：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不管会议结果如何，中国还是中国，而苏联还是苏联。我们是社会主义邻邦。你们代表团到我国各地走走，有助于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和增长。

刘少奇：我想谈谈我对会议的认识。我认真观察了会议的进程，我应坦白地说，我对会议的实际工作不满意，所以我的心情不好。

列宁当年讲过，看一个党和一个政治家怎样，不是凭其言论，而是观其行动。我想把列宁这些话同我们会议的工作联系起来。会议是由赫鲁晓夫同志宣布开幕的，他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在会议开始前，苏联的同志们同我们谈过苏共在会议上的立场。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而仅是它的形式方面。问题的实质表现在苏共中央今年11月5日的信中。在会议召开前和会议过程中，苏联方面在各兄弟党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使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谴责我们，似乎我们奉行特别的路线，似乎我们赞成“民族共产主义”和支持宗派活动。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谴责中共的会议。

从兄弟党代表的发言看，这次对中共的谴责是苏共中央组织的，而且直到目前仍在继续。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都是本着这种精神组织的。

在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删除了有激烈言辞的一段。而且我加了一句，其中讲，苏共路线尽管有某些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是国际主义的。然而我们对苏共的这一积极评价未得到苏联同志的应有反应。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责我们，说我们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国际主义者，是民族共产主义者，等等。现在我的同志对我讲，说我建议从邓小平发言中删去一些尖锐的词句可能是犯了错误。

当我们来到莫斯科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准备的发言。但是在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以后，我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你们对中共采取了新的攻势。因此，留给我的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况且我们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结局是什么。

由于你们，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同志前来拜会我们，那就允许我衷心地、坦率地同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米高扬：请吧，我们很高兴听您讲。

刘少奇：首先我想告诉你们，我非常激动。1921年，当时列宁还在世，你们国家正经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有40年党龄了。现在已数不清，为保卫苏联和支持苏联我做了多少工作。1956年，尽管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有某些

争论，但我们合作得不坏。所以我以同志的名义，衷心地请求苏联同志不要把事做绝。

纵观会议进程，我难说它会以什么告终。如果在讨论的文件里包含有谴责中共的内容或通过谴责中共的秘密决议，那么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将是错误的，将受到历史的谴责。我衷心地建议苏共中央不要犯这种错误。

请回想一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我当时曾说，如果你们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而撤走军队，那你们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我现在还想重复那些话：不要贯彻错误的路线，否则要犯历史的错误。我具体的建议可归结为以下四点。我请你们从声明草案里删除以下几点：

关于宗派活动；

关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

关于民族共产主义。

在从文件中删掉这些问题之后，不通过谴责中共似乎搞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那时我们将签署这一文件。在正确地解决了这些争论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邀请，到苏联各地走走。表面上看，这4个问题很简单。但它们反映着这次会议的实质。接受它们与否，意味着还进行不进行反中共的活动。

我想向你们提起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他正同孟什维克争论什么人可以成为党员。孟什维克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只要他交纳党费。列宁补充说——交纳党费并在其中一个组织里工作的人。补充了半句话，但它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些建议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他们改变了我们会议的实质。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工作气氛不正常。我参加过共产国际、世界工联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我有体会，应如何进行类似国际会议的工作。我重复一遍，这次会议的气氛不正常。在会上，不是力求弄清真理，而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少数施加压力。在会上，没有一个发言能驳倒我们立场的正确性。发言者执意重复和坚持自己的错误观

点。比如，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人大讲和平共处政策，赋予这一定义以有限的概念。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的相互援助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这才是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作为总路线，你们和平共处的定义把社会主义国家摆在了和平共处的范围之外。谁的原理正确，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在会议上我们的哪一个原则实际上也没有被驳倒。我们公开声明，现在我们仍坚持我们的观点。

我们非常想同你们合作。无论会议有什么结果，我们仍将同你们友好，互相帮助。我们恳切请求从声明草案中删去上述3个问题，不通过关于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如果接受我们的建议，它不应受到全面的谴责。如果你们固执己见，那么根据我个人的意见，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应受到谴责。我公开这样讲。我入党已40年，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米高扬：我们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您本人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感情。至于您所说的意见，我们首先认为刘少奇同志的以下意见是不正确的：认为会议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目的是谴责中共。我们认为苏共中央似乎在各共产党之间做工作，组织攻击中共，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我十分坦诚地宣布，苏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攻击中共的意图。

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了这三点。我想让您相信我们立场的正确，以便您清醒地认识它。无论我能否说服您，刘少奇同志，但我应该坦诚地说，我们党任何时候也没想过要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同意您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年轻党的代表，也有老的经受过斗争考验的兄弟党的代表。

辩论是在极高的理论水平上进行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素养是如此之高，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当然，你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绝大部分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反驳你们的原则，反对你们而捍卫我们党赞成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在很高的党的水平上进行的。难道在这些发言中没有一点儿对你们有益的、值得听取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学校。它的目的不是谴责中共，而是找到争论问题的正确观点。

比如，宗派活动问题。列宁说过，不仅在党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同宗派活动作斗争。在声明草案中，从列宁的原则出发，说要禁止宗派斗争。这里说的是总的原则，而非某一个党。宗派活动是与统一相矛盾的。谁赞成统一，谁就不能允许宗派活动。在声明草案里写上禁止集团、宗派活动的原则，是对所有党而言的，其中也包括苏共。如果你们相信，似乎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反对中共的斗争(我们认为，你们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你们正是这样想)，那你们应该同意同宗派活动作斗争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所有党的，如果他们搞宗派斗争。它不是针对中共的，它对所有党都有约束力。

这里只能有一点，或者统一，或者搞宗派活动。这一原则不能理解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模式。

中国同志们特别强调准备彻底捍卫列宁主义。从这一观点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反对列宁在宗派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不想在声明中反映列宁的这一观点？

你们不想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写进声明草案里。对此我们的敌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说，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未提。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苏共二十大？况且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共，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和专门会议上，都强调过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都对此表示过同意。您，刘少奇同志，在我们参加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也是这样做的。

您多次没有根据地声明，说苏联同志们偏离了1957年宣言的许多原则。现在您在二十大意义问题上，您的立场公然偏离了1957年宣言。

您认为我们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定义不正确。我们不能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正如您所说，不能有三条总路线：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他一切措施。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是另一个题目。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没有争论的。这里说的是互相合作的、对其余世界有统一路

线、统一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所以，就其实质看，在您提出的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分歧。因为我们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天天在支持这种斗争。分歧在什么地方？

和平共处是以社会主义利用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斗争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为其前提的。您对和平共处定义的补充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定义已涵盖了您的补充。

您要求从声明中删除民族共产主义的条款，不然就不在声明中签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此这样热心，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指责民族共产主义是直接针对南斯拉夫的。这里没说中国。

不过，如果您在这一点上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认为，这一点不是我们之间争论的目标)，那我们向我党中央报告，我们认为可以达成协议。

科兹洛夫：邓小平同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说会议工作气氛不正常。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工作的评价，因为在会议上，围绕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道路问题与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着广泛的自由的辩论。您肯定说，我们在兄弟党之间做工作，让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这不符合实际。在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不同意你们的立场，对你们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在会上发言的，除年轻的共产党的活动家外，还有在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如多列士、伊巴露丽 [42]、隆哥 [43] 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难道你们认为，所有这些同志没有自己的观点，是随指挥棒行动？我们认为，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会上通过的文件将进一步使我们团结起来，鼓舞我们同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刘少奇同志，您刚才讲，我们应该在我们一切活动中遵循列宁的永垂不朽的指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的党是列宁缔造和哺育的，它神圣地遵循自己伟大领袖的遗训。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都应该是彻底的。您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禁止宗派活动的原则写进会议声明草案中去。而列宁曾多次讲，必须在国际范围里同我们队伍中的宗派活动作斗争，加强共产党的团结。请回想一下列宁著名的接

受共产国际成员的条件，其中关于禁止共产党内宗派活动的思想，关于共产党队伍团结的思想阐述得是非常清楚的。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把已写进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关于苏共二十大历史意义的评述从声明中删除，各兄弟党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不理解。而敌人，正如米高扬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就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谋的目的。

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的评价，说会议气氛不正常，就从起草委员会所做的大量的有益工作来看，也不能同意。我和您，邓小平同志，共同起草会议声明草案已达三个多星期。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们开始已达成共识，正如您讲的，已有90%，后来是95%已达成一致意见。其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即使按照您的计算，在文本中也只有5%。这表明，已做大量工作，否定这一点是不行的，是不正确的。

我们完全否定对苏共的指责，似乎它在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攻击。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带有建设性的性质。其中没有直接批评中共的地方，尽管对它的个别错误观点进行了解释。为了不使会议工作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决定以书面形式答复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们应该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我们应该看到苏中友谊的前景，应千方百计加强它。而你们怎么做的呢？我举一个例子。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共同建设海军舰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北京期间，就这个问题他专门同毛泽东同志谈过。会谈过后，毛泽东同志讲，乌云消散了。赫鲁晓夫同志回答说，乌云本来就没有。您，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发言中提出这个问题？这把我们往后拉。

邓小平：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有益。我们两党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还理解，我们两党的肩上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讲过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两党之间不能像现在这样交换意见。

正如你们看到的，代表我们代表团在会上发言的，是我。而我根本没有准备发言，准备发言的是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党。我对你们说实话，在11月5日之前，我们打算让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稿是我们党中央批准的。但在今年11月5日你们的来信

之后，刘少奇同志发言已不合适。我们代表团讨论过：刘少奇同志还要不要发言？由于我们有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验，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等待着对我们党的进攻，但不是这样的进攻。所以我们决定，最好刘少奇同志不发言，由我发言。我们不想把事做绝。

我的发言主要涉及11月5日苏共中央的信，因为这封信是会议工作的纲领，就像当年苏共中央情况通报是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的纲领一样。说实话，这次会议，按其特点讲，同布加勒斯特会议几乎是一样的，尽管有一些区别，尽管苏共中央在11月5日发出了信，赫鲁晓夫在这次发言中还没像布加勒斯特那次。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但他这次发言的形式比布加勒斯特那次好。为什么我们把主要领导人推向前沿？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中国？尽管在发言中没有直接讲，但大家都清楚，他谴责的是中国共产党。

科兹洛夫：您说这次会议同布加勒斯特会议一样，苏共中央组织它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共进行进攻。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说法。两次会议的目的是消除你们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参加布加勒斯特和本次会议的是各兄弟党的领导人。所以绝不能认为苏共中央在背后组织对中共的进攻。在世界工联大会期间北京出了什么事？你们背着各共产党领导人，把你们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拿到工会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你们公开攻击苏共的立场。关于这一点，不仅是我们，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说过。难道你们认为，所有他们都不对？

邓小平：中共是坚强的党。如果其他党遭到这样攻击，未必能顶得住。中国有句谚语，叫做虱子多了不痒。我们党就像是这样。

米高扬：怎么说好呢。1919年我被投入监狱，我生了虱子，但我不能习惯虱子咬，总觉身上痒痒。

邓小平：如果让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方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合法化，那我们还怎么能达到团结？我想讲一讲我们的四点建议。这不是我们的最后通牒。我们说的是实情。我们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比较好。在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民族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是中国人。而且开始时，在讲南斯拉夫时才用“民族共产主义”一词，后来在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也用这个词。只是在经过辩论之后，才决定在谈南斯拉夫时用这个词。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同我谈电台一事时，称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在这之后我们会同意这一建议吗？一般来讲，“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提法就不正确。

难道还不清楚吗，谈论集团和宗派活动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某些会议参加者就直接讲过。怎么能够通过谴责中共的文件？

邓小平：我想讲讲1957年莫斯科宣言是如何写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的。我参加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起草工作，苏斯洛夫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们代表团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不妥。我们把此事告诉了苏斯洛夫同志，但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我们还建议他删去“中共”一词。我记不清了，那里是怎么写的，但大体是：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下来是：中共、法国和意大利及其他共产党也表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其他党没有条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苏斯洛夫同志当时处于困难境地。当时苏共中央刚刚完成反对党内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客观地权衡了这一切，决定迎合你们。我们当时确实反对这一点，但考虑到这是需要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是毛泽东同志做出的。你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兄弟党会议上，支持苏共反对反党集团。

米高扬：我同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见过面，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声明支持苏共中央。

邓小平：我出席了这次会谈。我们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已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提过了，就没有必要在其他文件中再提了。最主要三点在于，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不能以某一党的决议为基础。况且，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在声明草案里已具体讲过了。如果我们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二十三、二十四大等历次大会的决议都写入国际文件，那会有什么结果？这只能证明，我们存在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平等。

科兹洛夫：但是所有兄弟党都承认苏共二十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您的结论，邓小平同志，认为评价我党二十大的意义似乎就是强调各党之间的不平等。

邓小平：至于个人迷信，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支持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但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

尽管我们对声明草案有一些修改，其中95%我们还是同意的。我们的修改不多。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这些问题是实质性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文件有重要意义。它对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也有重大意义，其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他们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没有提出来的。这个文件是有力的文件。请想一想，如从中删除这三个问题，难道这能给谁带来什么损害？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我们公开讲这些，这对谁有好处？

彭真：许多代表的发言不是在加强合作，而是在反对中共。我们认为在文件中没必要提宗派活动。

米高扬：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邓小平：今天我们公开地向你们讲了我们的立场。既然这些建议同谴责中共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我请你们相信，如果在文件中留下这些地方，那么在会议之后将出现广泛反对中共的运动。

米高扬：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的特别观点。你们不该这样做。这些问题应在各党中央级的水平上讨论。

刘少奇：我直接告诉您，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宗派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宗派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宗派活动呢？我们请求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各党。

彭真：为了交换意见，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这次会议参加者的名单。

米高扬：你们邀请他们出席招待会而不是会议。请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们向前看，不往后看。

刘少奇：关于到苏联国内旅行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认为，应在友好的气氛下完成旅行。

邓小平：即使我们达不成一致意见，我们也将友好。

科兹洛夫：我们也赞成同中共友好，同中国人民友好。但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同你们努力保持友好团结的意见相背离的。我们多次向你们讲过赫鲁晓夫同志是公认的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发言反映的是我党及其领导人的集体意见。我们呼吁你们放弃类似的行动。

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这一团结是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取得进一步成就，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

邓小平：在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我在机场发表讲话时讲过中苏友谊的重要性。

米高扬：我们看重您的这一讲话。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老问题上来，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被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反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我们团结，我们就可顺利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我们寻找帝国主义分子的弱点一样，他们也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缝。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一裂缝，他们将非常高兴。

你们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使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很屈辱。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给我党制造分裂。这使我们痛心。须知，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这样做。

例如，我们在发言和文件中，没对毛泽东同志和您——刘少奇同志作任何攻击。

邓小平：我们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是因为他在发言中攻击我们。

邓小平：我们感谢你们举行这次会晤。关于你们邀请到全国各地旅行的问题，我们研究之后再告诉你们。

会谈记录：B.西季赫梅诺夫(苏共中央工作人员)

АПРФ, ф.3, оп.65, д.610, л.100-120

No03977 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1960年11月2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60年11月29日

第58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情况通报)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前夕，北京开始上演大型艺术片《永恒的友谊》(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从11月5日到22日，北京几个电影院每天演2—3场。影片根据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国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苏联专家的忘我行为。影片描述说，苏联女专家梅什柯娃来到地质队，在(新疆)阿尔泰山中进行勘探。在梅什柯娃的帮助下，中国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处矿藏。在考察过程中梅什柯娃胃痛开始剧烈发作，需要急救。她被送往乌鲁木齐，但中途突然受阻：在额尔齐斯河上没有渡口，而船工又住在对岸。年轻的地质队员李青冒险渡过去，而梅什柯娃的生命则处在垂危之中。影片最后才告诉观众，1945年梅什柯娃救过李青的命，当时她作为护士与苏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

影片中有许多反映苏联专家和中国地质队员之间极其友好关系的情节——同志关系、互相救助、忠于共同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思想——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思想。因此，不管影片艺术上的优点如何，它的内容无可指责(虽然有时使人感到过分强调中国干部对苏联专家的关心)。

选择放映这部有关苏联专家影片的时机引人注目。虽然影片是1959年出品的，但首次放映却始于今年11月5日，并一直延续到11月23日。

围绕影片进行了相应的广告式宣传。《人民日报》在“新片”栏里不止一次地刊登影片《永恒的友谊》的简介，强调说影片“热情地讴歌了中苏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大众电影》杂志在《永恒的友谊》上演之前就登出了这部影片的剧照。该杂志最近一期(11月份)的封底是影片主人公的照片，同时发表了一篇影评，通篇充满了热情的赞誉。文章保证性地表示，“中国人民世代将为捍卫伟大的中苏友谊而献出全部力量，因为党和毛主席培养下的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文章作者把中苏友谊还叫做“保卫世界和平和战胜一切战争挑衅者事业的伟大力量”。

当苏方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不得不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而且他们已经回国时，中国同志广泛放映关于苏联专家的影片(与北京同时，在郑州、西宁、南京等城市的电影院也放映影片《永恒的友谊》)是想说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处于正常的条件下，受到中国领导的支持和互相理解等(影片描述的一切正是这样)。另一方面，摄制这部影片以后，中国同志得到了一张王牌，用以形象地说明在评价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宣传苏联援助中自己的“客观性”。^[44]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列入情报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2月23日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9, л.234-236

№03979 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 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1960年11月30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Ю.В.安德罗波夫：

兹汇报下列事实作为情报：

今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外宾服务局通知说，在我大使馆任技术工人小组组长的李山东(ЛиШэн-дун)因其在馆外的行为不轨而被解职。就在当天李山东来到大使馆，同随员罗高寿和总务主任斯维里德琴柯谈话时说，他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对待自己在大使馆的职责太认真和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态度太好。在外宾服务局的会上对他做了这样的鉴定，说他已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因而他不能留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李山东还说，在我国大使馆服务的中国工人对每个苏联工作人员进行严密的监视。中国工人必须对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谁经常到谁那里作客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干些什么进行汇报。所有这些情报都应当交给大使馆的4个技术工人(中国公民)李德才(Ли Дэ-цай)、郭、丁和邵，他们再把这些情报转给相关的组织。

我们当然会批判地对待李山东所谈的情况，但某些客观事实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

李山东在大使馆工作了8年，是有13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在大使馆工作中表现很好。这一点早就引起其他中国工人对他不友好的态度。第二天当李山东到大使馆来结账时，不许他踏上我们使馆的用地，有两个中国同志一直在监视他。李山东被告知，如果他把解雇他的原因告诉大使馆，对他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32, л.303-305

№03460 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1960年11月30日)

摘自И.А.罗高寿的工作日记

1960年12月6日

第59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0年11月30日

11月29日外宾服务局有人给大使馆打电话说，从今天起大使馆的中国工人李山东不再来大使馆上班，也不允许他到大使馆去，“因为他有不轨行为”。同时又强调说，李山东的过失与他在大使馆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就在同一天，李山东本人给大使馆打过几次电话，恳求大使馆任何一个苏联同事跟他见见面。他暗示说他被解雇是因为他跟苏联同志关系好，并想告诉我们，“大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中有坏人”。

趁李山东还未交清他在大使馆工作手续的机会，我今天跟他进行了会晤。李山东情绪沮丧，不时地哭泣。他谈了如下一席话：

他在外面没有任何“不轨行为”。11月28日外宾服务局召集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开会，通过解除李山东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决议。会上详细分析研究了李山东的表现。其借口是大使馆一位苏联同事的妻子在离北京回国时把一双鞋和牛肉罐头送给李山东的孩子(李山东有5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在吃奶的年龄。妻子现在怀孕，很久以前患过肺结核)。在离开大使馆时，李山东的这些东西被没收，而根本不理睬他的抗议。因这事还开过会，会上指责李山东“拍外国人的马屁”(李山东强调说，现在开始把苏联同志叫“外国人”)，“学会俄语是为了向外国人谈论中国人”，“不信任中国”，最后，“他完全丢了中国人的脸，他的所作所为像个俄罗斯人”。

在苏联大使所住的独院当清洁工的李德才对李山东很不满，说他“已有一两年没有向他做过任何汇报”。我问是哪一类汇报，李山东举了一个例子，去年11月8日，在大使馆的招待会后，李德才把他叫出来，问他邀请的客人中有没有南斯拉夫人。“李德才监视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他补充说。

李山东非常激动地说，他曾试图在会上提出异议：“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对苏联同志这样不好，难道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难道这是英国的大使馆？要知道苏联是个兄弟国家！但根本不让我发言。”李山东说，有几个人(其中有姓孙的司机)会前会后都对他说，他们很同情他，但他不敢冒险支持他。孙曾建议他求助于临时代办或者大使。

李山东列举大使馆许多中国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事实。特别是

他不止一次看到李德才偷盗食品，他在李德才的房间发现有大使所住独院中的餐具。另一个叫邵福全(Шiao Фy-цюань)的工人也偷东西(李山东列举了具体事例)。关于这一点，用李山东的话说，他不止一次向大使馆汽车房司机丁凯文(Дин Кай-вэнь)作过汇报，他们是他们的工会主席，但一切到此为止，因为丁凯文本人不止一次地教唆李山东从大使馆的仓库里给他拿肥皂(中国目前最稀缺的商品之一)，或者把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他还利用邵干活之便，让后者偷偷把招待会后剩下的食品、啤酒等送给他。

谈到丁凯文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间的作风，李山东说，两个月以前，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大使馆食堂的地下室里开过一次会，丁凯文在会上对他们说，他们大概听说中共和苏共之间现在有了分歧。因此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丁凯文说，苏联的做法是“大国主义”，“所有兄弟党都支持中共的立场”。

根据李山东的说法判断，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李德才是个重要人物。他安排搜集情报和进行监视，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监视。他最亲密的助手是郭泽章(ГоЦзэ-чжан, 女)和丁凯文。邵福全是个较次要的人物，但也干一些很不体面的事情。这些结论跟苏联同志的观察和大使馆掌握的事实相符。

李山东还说，不久前他的一位好友——张科长(在外宾服务局工作)对他说，外宾服务局和苏联大使馆之间的关系有点恶化，大使馆甚至没有邀请外宾服务局局长郭洁参加今年11月7日的招待会。

李山东完全绝望了，他反复说，外宾服务局的干部对他的攻击和迫害使他如今“除了上吊，别无出路”。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建议他找苏联大使馆批准他去苏联。他感慨地说：“我不是罪犯，不是小偷，我勤勤恳恳在你们大使馆工作了8年，在苏联同志面前我问心无愧。入党13年了，在前线受过伤，他们为什么这样迫害我？”

最后，李山东恳求对他说的这些话保密，因为严禁他到大使馆跟苏联同志会面。郭泽章在会上发言时直接威胁他说，如果苏联大使馆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公安部门就要“关照”李山东，把他送去劳教。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25284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1960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0年12月9日

第921/ДВ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重大问题的声明 [\[45\]](#)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就核战争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6月5日苏联专家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一以贯之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美国人不愿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对他们的回应不会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中苏双方在对待美国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分歧，但实际上，当然不存在这种分歧。我们完全理解苏联针对美国的政治路线。美苏之间维持着外交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这种顾虑——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我们对于尽快建立这种关系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历史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三年来美国人同蒋介石一起发动的针对我们的战争，此后又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两年多的战争，并且最后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总有一天，我们‘要和美帝国主义算清以前所有的旧账’。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美国拒绝承认人民中国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对此的回应，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自己拒绝承认美国及联合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忽略它们的存在并建好自己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对美关系时的坚定方向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并将有利于我们对美国民众及广大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人民施加影响。’”

1958年7月12日，陈毅在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裁军谈判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那么最终采取的决议将不适用于

中国。而这同样也适用于核武器的供应和储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声明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即认为一旦东西方达成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协议，苏联可以将这些武器转至中国等地进行实验和记录。毫无疑问，这种局面是不利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的。”

在1958年9月5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我们想在这一地区(台湾)给美国人及蒋介石制造一个紧张的局势。就像在中中东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我们想迫使美国人同这一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捆绑起来’。在遭到我们的打击之后，美国人总有一天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其侵略者及凶恶敌人的面目。”“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展示，人民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并不惧怕美国，相反，当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牢不可撼的地位时，他们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得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激发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无耻侵略政策的仇恨和无畏战争的精神。”

“美国惧怕中国。中国不想发动战争，现在同美国开战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害怕。”

在1958年9月6日同葛罗米柯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考虑到中美在这一地区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沿海岛屿进行打击的同时，目前已做好准备承受原子弹对其本土的所有严重打击和对城市的破坏”。而在此之后，一旦美国意图扩大这场局部战争，苏联应当能够出手相助，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将在国际关系中蒙受耻辱。

在1958年9月30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同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会谈的时候，我们已做好准备承受第一轮打击，接着我们会密切关注形势，美国人何时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何时会爆发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看来，苏联应当保留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以给予帝国主义最后一击。我们将尽可能地承受第一轮打击。这对于国际共运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重要的。”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和平与战争问题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中苏力量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10月14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出现的

问题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坐等美方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我们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我们的目标是不给美国人挣脱绞索的可能。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威慑美国人以及加强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教育。就让该地区继续保持紧张状态吧，我们不能让主动权从自己手中溜走。我们将.....继续制造麻烦，并适时改变策略。我们会适时调控该地区的紧张状态。”

“因为目前美国人已经被套上了绞索，那么收放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将绞索收得太紧，那么就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如果太松，那么美国人就会放松下来。这两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最好保持现状。”

在1958年11月8日苏联大使馆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同时也是从我们自身角度考虑，认为冒险主义是要不得的，并且以全力应对此事会给帝国主义提供甚至是发动一场所谓局部战争的借口。”

.....毛泽东在1959年10月14日的谈话。

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д.24, п.457, л.235-242

№13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1960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12月13日会议第31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Ф.Р.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总结。 [46]

米高扬、毛希丁诺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福尔采娃、波利扬斯基、伊格纳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波斯佩洛夫、科兹洛夫。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对声明(意义)做出评价。

毛希丁诺夫同志：建议接受草案(不对新闻界公开——是不是不应该说得更尖锐？)谈赫鲁晓夫同志演说的意义，谈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意义。谈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应该扩大文件内容，但是，也不能够缩减它。

柯西金同志：可以分送文件，但是，不能公布。

福尔采娃同志：我们可以采纳草案

(部分不是为发表——或者，扩大)。

波利扬斯基同志：或者，可以说说关于阿尔巴尼亚人。

伊格纳托夫同志：文件很好，可以采纳它。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崇拜问题不应该提及，关于苏联方面的内容也不应该再强调了，否则，就将摆脱不掉了。

对于第三条补充意见——可以采纳。

波斯佩洛夫同志——不应该缩减草案。

科兹洛夫同志——草案编制得很好。

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应该谈及。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分发最终的编辑文本。

将不会产生意见，认为可以接受。

批准包括报告内容的演说稿。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11, л.29-29об

№25285 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1960年12月14日)

机密

第944/ДВ号

1960年12月14日

.....1960年12月4日，在从列宁格勒出发去明斯克的路上，勃列日涅夫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吃饭。在两个小时的晚餐过程中，双方进行了一次友好、自由的交流。

.....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中国同志们有关中国国内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说，他了解到中国报刊上称，南方灌溉种植水稻地区的家禽养殖、渔业生产发展都取得了成功。刘少奇回避这个问题并继续谈论公社。他几次都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何时开展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问题上，还以个人身份提过好几次，尽管这些在苏联已经刊登过了。此外，刘少奇说，1920年代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也组织了公社。他说，当然，我们考虑吸取这些经验，但不想重复那时你们犯过的错误。此后，刘少奇转移话题，开始讨论研究马列政党不仅要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时也要认真分析自己的错误，以免重蹈覆辙。他再次谈到了从实践和生活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现实，然后得出正确结论，这样的实践过程具备重要意义。

回到人民公社这个话题，刘少奇说，正如所记得的，应该避免苏联在建立公社时犯的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二个是收回公社成员的自留地(在谈话过程中，刘少奇认为他理解自留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基础)。中国方面清楚苏联方面曾经犯的错误，并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

.....

勃列日涅夫同志多次把关注点转回到刘少奇强调的部分：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中，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到底是按劳取酬还是各取所需。勃列日涅夫同志请刘少奇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界定，公社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处于一种原始的起始阶段还是就是这样发展到了最后一步。

刘少奇没有直接回应，仿佛默认一开始就存在按劳分配原则，他再次强调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现在他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大同小异，他说，公社对于中国而言是新事物，并非一开始就很顺利。他强

调，建立公社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公社在中国以如此快的速度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并运行，中共中央无法随时保持密切的关注，从头到尾地时刻掌握他们的具体发展方向。于是，运动有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出台了一些决定。中央提醒广大干部要提防犯错误，通告全党人民公社应如何正确建立。

.....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实际上在1920年代苏联就开始成立公社。很快就表明，他们无法站住脚，首先就是因为平均分配。这导致工作纪律松散，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公社解体，制度瓦解。随后的列宁时期，我们党放弃了公社，寻找一个更正确的适应社会发展情况的农村生产生活制度。

勃列日涅夫同志继续讲，随后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它的建立除了党做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列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认识的重大转变。多亏了这一切，党可能将农业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很好地为人民提供产品，为工业提供原料。

.....

后来，顺着这个方向，刘少奇进行了讨论。坦白地说，他讲，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看法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安。显然，苏联同志们也许不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大家对我们的人民公社保持警惕让我们很困扰。有时，在我们看来，“人民公社”这个称呼甚至会让苏联的同志们感到惊恐，例如，如果我们不是叫“人民公社”而是“联合公社”的话，那么苏联同志可能就会有新的认识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中国同志错误地理解了苏联同志对人民公社的态度。

这些问题，当然与名称无关。苏联同志了解成立公社的最初几个步骤，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和拖拉机公社的原则，并且中国报刊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我们不能认同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尤其不能接受它背离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这无法解释我们的集体农庄。当然，你现在告诉我的，(如果)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坦白地说，从你们所讲的故事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谈论已经不是关于你们一手建立的人民公社本身的问题

了。

刘少奇没有继续明确以下问题：目前存在公社将要面临更多的变动，他们要被迫引入苏联集体农庄所证明的一些经验，但勃列日涅夫同志没有当场提出任何反对和质疑的意见。

在这里，苏联报纸说明介绍人民公社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苏共中央副部长)说，应认识到以下情况：

首先，苏联报刊不能全面地了解人民公社，因为在关于建设人民公社一系列的主要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达成共识，包括中国同志如何处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问题。出版的同时就会引发争论。这对我党是不利的，而不是你们自己认为的那样，人民公社都只是一个临时的实验。第二，如果苏联报刊广泛支持人民公社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同志对自身缺点的判断，这一点，正如你们所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说，人民公社运动展开期间他在《真理报》工作，他很清楚在苏联报纸上解释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公社运动会带来那些问题。他进一步说，不是不能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出版物，但正如前面提及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没有被展开讨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当然，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是否适用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每一个模式都带有自己党和国家的特殊性。对我们来说，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曾谈到他和毛泽东同志就人民公社展开的会谈。然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没有重建人民公社，你自己设计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反对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事物……

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п.453, д.6, л.41-53

№099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1960年12月26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月6日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12月26日

根据中央指示，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

我向毛泽东转达了苏共中央和H.C.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苏共中央和H.C.赫鲁晓夫的这一衷心关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十分热情地感谢友好的祝贺和祝愿。毛泽东说，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他请求向H.C.赫鲁晓夫同志转达最热情的感谢，并祝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身体健康，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好成绩。

接着应毛泽东提议进行了谈话。他讲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很多。他说，“至于我本人，工作比以往少多了。尽管我每天8小时工作(有时多一些)，但是工作效率却是今非昔比了。读过的东西记不太住，必须看大号字的文件。”谈到这里，他说：“从工作效率看，老一代人不如青年一代人，看来这是普遍规律。”

接着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为减少他的国务活动负担创造了条件。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只有政治局委员支持他，许多中央委员反对。“普通党员中不同意的人更多”。他说，现在大家已经都支持这一决定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的工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他说，好多年以来，实际上从1953年、1954年起，他已经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他说，从1956年起，政治局的全部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领导，他只是偶尔出席个别会议。毛泽东说，他平时自己工作，基本上只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有时候特邀人员也参加常委会议。

毛泽东接着讲道，个别情况下他也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扩

大会议通常邀请地方上党的负责人参加，例如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最近，他几乎不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讲话，仅限于致简短的开幕词。他接着说，从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后，他可以不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他还说：不错，我还经常看党和国家系统最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在通过这些文件和材料之前)。

我说，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作了某些调整，但是领导党和国家的重担仍然由他(毛泽东)挑，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常常要连夜工作。“主要的负担是要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他说，比如“我每天不得不两次阅读给我送的两厚本关于国际问题的资料，当然，为了不落后，不脱离生活，必须得看”。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必须认真关心，及时分析。我还强调了莫斯科会议的重大意义，莫斯科会议对最近的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同意我的这番话，对这一话题作了积极的反应，他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做了认真准备，由26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得很有成效。”他接着说，有些外国代表不理解，问为什么会议开这么长。毛泽东说，看来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81个党的代表每人仅发言一次就要10多天。然后还有第二次发言，就不说研究文件的工作了。他指出：“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很好。这是件好事。”

接着，毛泽东同意我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论点有深度的看法，他还说，文件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中，在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

在谈话中我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开展的宣传莫斯科会议成果的工作，讲述了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会议文件的情况。

毛泽东讲，中国共产党内也组织了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研究。至于说到总结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下达具体的指示。

然后他说，1961年1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全会(上一次全会是在1960年4月召开的)，这次全会将听取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预计全会要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决议，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除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成果外，中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还要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接着，毛泽东说道，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又说，开始，中共中央有人建议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剩下3年的计划。但是1960年已经过去了。因此，决定制订五年计划剩下两年的各年单独的计划。他说，国家已经有了1961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已经在执行。

我向他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取得的搞规划的有利条件，讲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批准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讲了中国在及时批准经济计划方面落后，他说，例如1960年的计划，1960年4月才通过，还有过在6—7月份才在人大会议上批准计划的情况。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缺乏应有的经验。

我向毛泽东讲了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讲了苏联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问题，其中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全会的几个特点，讲到在这次全会上将审议和解决十分重要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现在也在“专门抓”农业。他还说，正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甚至考虑把工业战线缩小一些”。他在解释这一想法时说，这是指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对工业生产投资的规模，其中包括对某些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还要压缩对楼堂馆所的投资。

在谈话中他简要地谈了中国工业的瓶颈之处，尤其是采矿业、煤炭业以及运输业，讲了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讲了他们对发展其他部门(钢铁生产等)的影响。

在回到农业问题时他强调指出，对中国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就不能满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日用品的需求。毛泽东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深信，与生产死的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炭等相比，组织生产活的植物和牲畜是件难得多的事。”他开玩笑说：“死的从我们这儿跑不了，我们可以缓一缓。”

在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解决出现的困难。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困难。就是在有成绩的地方，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讲到这里他指出，再过三四百年，也会产生新的问

题，需要去解决。“不这样就不会有发展。”

我向毛泽东讲述了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一些感想，强调了这次访问对巩固苏中友谊和团结的意义。

毛泽东对谈这一话题很积极。他说，中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高兴，“出访了，这很好”，他强调说，我们两国人民要求采取这一措施。“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满足了两国人民的要求。”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的，苏联的许多共和国，例如乌克兰，对中国代表团没到他们那里去还“耿耿于怀”。他笑着说，这个抗议应当向代表团成员提，譬如向这次谈话在场的杨尚昆提，因为政治局没有反对继续访问。我也用同样的口吻说，中国朋友说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才使“耿耿于怀”的苏联同志消了气。毛泽东说：那就可以说定，他们欠你们一笔债。

当他稍微展开话题讲这种会晤和访问有益时，我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访问时，苏联人不止一次地请求向他(毛泽东)转达最美好的祝愿，希望他在自己合适的时候访问苏联，到各个城市，到工厂，到集体农庄走一走，因为上一次访问苏联时，他没能比较广泛地接触苏联。他对此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

接着，毛泽东讲道，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他有怨言，对他没能到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他说，这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我把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后，他们又称我是“半个国家的党主席”。

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好像不再积极从事党和国家工作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就等着转为一般的政治局委员”。他还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内还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他又指着杨尚昆说：“甚至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我是和您第一个谈自己的‘阴谋’。”

我肯定地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他开玩笑说：“那样的话，只好等大家都认识到这事的必要性。再过几年，他们自己就会可怜我的。”

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出门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再次请我们向H.C.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对他们的祝贺和祝愿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和使馆参赞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ІРФ, ф.0100, оп.55, п.454, д.9, л.98-105

№25288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1960年12月27日)

副本

回复第133s-dv号文

北京，1960年12月27日

敬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您11月10日的来信。从您的信中，我们得知了苏联政府对物价的调整，卢布的含金量也将调整为0.987412克，同时，卢布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也进行了重新确定。

中国政府委派中国驻苏联大使——特命全权大使刘晓同志，授权他代表中方与苏联方面交换关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的官方汇率的意见，以及商讨关于增加非贸易支付额度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责成相关部门与苏方相关部门共同采取行动，根据苏联对物价体系和卢布含金量调整的情况，开展关于中苏双方的对外贸易价格、税率和互惠活动的详细谈判。

部长会议主席同志，请接受我最为崇高的敬意！

№13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0年12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12月30日会议第31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柯西金、米高扬、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

第1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48\]](#)。

赫鲁晓夫、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

不进行鼓励，不无偿给予。

复函(通过外交部)发出。

在高级别(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上提出——只有在最高的党务和国务级别上。

基地——只有我们占据着，12艘舰艇都是我们的——在关系正常化之前，或者我们带着12艘潜水艇离开。

米高扬同志：我也同意——不鼓励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某些步骤可以加紧实施。

2艘潜艇可以完全转交给他们，2艘可以联营——归我们指挥(华沙条约指挥部)。

扩大基地的工作今后不再进行。

停止无线电站的工作。

抗议报告已经撰写好：为什么我们的军舰还要滞留在那里？

1961年

№20813-8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1961年1月18日)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

同志们，去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自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这些文件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来，到现在已经3年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国际影响急剧增长的3年，是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打击下解体的3年，是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3年。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新变化。

有必要全面分析所有这些变化的实质，揭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新条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基本战略策略路线。在这个代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国际会议上，上述任务应当能够更顺利地得到解决。首先由此产生了于1960年召开会议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1960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之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看法上公开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就产生了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危险。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夸大这些分歧，而国际反动势力则开始制定阴险计划，利用这些分歧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害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必要全面审查这些分歧的实质，克服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达到共产党和工人党观点和行动的统一。

可以十分满意地说，11月的会议顺利地解决了所有这些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新胜利。

会议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成熟性和所经受的锻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毫不动摇地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容忍任何偏离我们的伟大学说的倾向。我们党和绝大多数其他

共产党和工人在对待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为克服现有分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全面地、创造性地讨论了会议所面临的问题，在关于国际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观点的统一。会议通过的文件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它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是这个运动进一步团结并取得新胜利的思想基础。

会议的全部工作是本着大胆的革命创造性和集体研究我们时代迫切问题的精神进行的。声明中阐述的新的理论原理和结论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会议文件对当代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人类的命运和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如何估价现时代和它开辟的前景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可能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主要任务问题以及关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

同志们，会议文件你们都很了解。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向你们作了介绍。因此，我只是简要地谈谈声明的基本结论，而把报告的大部分集中在下述问题上：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如何进行的，会议是如何举行的，会议是如何达到一致而通过历史性文件的，会议在争取一致通过的道路上克服了哪些困难，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说，应当从会议总结中得出什么结论。

(一)

共产党和工人在自己的声明中确认忠于1957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对社会发展的新进程和新现象做出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估计，提出并详细制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准则和政治准则，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发展。摆在第一位的是科学确定我们时代的性质，其基础是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结论，这已经得到各马列主义政党的普遍承认。正确估计时代性质不仅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它还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制定有科学根据的符合现实生活客观条件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在我们时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极其复杂的，而进程的速度又急剧加快了，为了在革命斗争中正确把握方向，确定世界发展的主

要趋势和前景是特别重要的。不仅要制定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战略路线，而且要制定出每个党的符合各该国特点的正确战略和策略，这就与时代性质问题分不开了。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49]

会议一致赞同对于现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其意义还在于这种解释结束了中国同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中国同志在自己关于时代的定义中忽略了近年来世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变化。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像中国同志所企图断言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有了变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兄弟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帝国主义已经较少具有侵略性。问题的实质在于，首先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强盛，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出现了瓦解的积极过程，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

会议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在我们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开辟了新的、比以往更加有利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机会。

我们期待着在实践上实现了列宁的伟大构想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民族力量转变为一种国际力量，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声明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成就做出了总结，对于这个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作了详细的解释，确定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进一步巩固自己实力的任务。在会议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结论中，需要注意下述原理，即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结成统一的阵营，这个阵营的团结日益加强，它的实力不断发展，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范围内将获得完全的胜利。

1957年会议之后的三年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了新的成就，它的国

际影响力增强了。从1957年到1959年，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增加了37.1%，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只增加了7.4%。同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3%，而美国的工业生产只增加了4.6%。

会议责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尽全力利用已经在每一个国家及整个体系中出现的巨大可能性，即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定地遵循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一点之所以具有更突出的意义，是因为中国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关系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妨碍了最有效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会议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承担着国际主义责任，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为其提供的可能性，以便在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实力方面，以及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历史任务(即在工农业的绝对产量方面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后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超过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方面，不断扩大每一个国家的贡献。

声明的巨大政治意义在于，它把全世界共产党人、国际工人阶级、全体反对战争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最使人民担心的问题上，集中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更高地举起了为和平而斗争反对战争危险的旗帜。

在我们的时代，新的战争是否仍然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预防的？

会议推翻了中国报刊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会议再一次确认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性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1957年宣言的原则。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当前出现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强大力量。可以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可以防止战争的时期已经到来。但是，为此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战的一切国家和全体爱好和平人士的努力统统联合起来。

会议的这些结论拥有巨大的动员作用，它号召各族人民为反对战争准备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它使人民深信，这种斗争可以防止战争，保障持久和平。

会议的文件指出了防止战争的途径，为共产党、为各种组织和为一切憎恨战争的人们确定了为和平而斗争的行动纲领。

声明尽力强调，不能等到已经开始投掷原子弹和氢弹时再来开展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斗争，现在就需要开展这种斗争，一天一天地增加力量。这样提出问题更能够激发一切国家和平斗士的积极性，帮助把反对新战争的一切力量投入行动。

这个结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的，即中国同志明显地低估了现代战争的空前破坏性。他们实际上的出发点是，即不必特别害怕世界大战，因为据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会在战火中被消灭，而牺牲将得到补偿。因此，声明中包含的下述思想则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即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用最少牺牲和破坏的代价来埋葬资本主义。

有鉴于此，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尽管中国同志努力企图证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反对和平共处原则，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仍然重新确认，他们实质上把和平共处仅仅看作是暂时的喘息时机。在争论过程中，中国同志的论点完全被推翻，会议一致确认，现在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或者是破坏性战争，别无选择。

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它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威望和影响。会议同时指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如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放弃阶级斗争，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因其固有的优越性必然赢得胜利。

会议深入研究了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前景的问题，在声明中公正地认为，这个运动的突出胜利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诞生的第二大事件。这是会议对世界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会议的结论为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指明了通向社会进步的道路。特别需要提到下述原理，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土壤上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新型国家——独立的民族民

主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从前曾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原理，为摆脱了法西斯统治枷锁的欧亚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指出进一步斗争的道路。现在，共产党人提出了民族民主独立国家的原理，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有利的条件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在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全体进步力量的战斗积极性之下，它可能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形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在声明中占有很大地位。

会议向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指出了他们今后斗争的新前景。会议认为，历史将确定不移地向着消灭已经陷入总危机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推进。这个新阶段不是由于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它是在两种制度竞赛和斗争的环境下、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更大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环境下发生的，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的环境下发生的，这种状况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力量开辟了鼓舞人心的新前景。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来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反动和侵略的堡垒——的一切力量，来建立广泛的反垄断战线。在这个团结过程中，在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改革、争取满足群众经济政治要求、争取推翻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进程中，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己与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引导群众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声明中占有显著地位。中国同志在会议之前以及在会议期间都极力攻击苏共二十大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正是宣言有关部分的基础。他们实质上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看到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新的力量对比而在当代产生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据我们所知，他们直接建议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尽快地投入武装斗争，而不管具体环境如何。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中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国家利用和平形式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来说是极其重要和尖锐的问题。因此不能不着重指出下述情况的全部重要性，即会议完全肯定了宣言基于苏共二十大的原理得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

还必须指出声明中宣布的下述论点的巨大政治意义，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学说，坚定地继续反对输出革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并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国内的一切力量，积极行动起来，以便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防止或者坚决反击帝国主义者对任何国家起来革命的人民的事业的干涉。宣布这样的结论能够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决心。

会议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事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会议承认，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像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统一，严格遵守党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倦地关心加强自己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不容许发生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在自己的队伍中尽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认为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尽全力继续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共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政党在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性，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外表上是互相对立的。实质上，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互相补充的，同样的不仅能够对某个党，而且能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匈牙利的朋友们在会议上回忆了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当时不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拉科西等人)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伊姆雷·纳吉等人)，都助长了国内的反革命动乱。因此，两条战线斗争是生活本身的要求。共产党的正确的彻底革命的政策是在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制定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受到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一切阻挠，仍然胜利地向前发展，并且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现在，共产党已经存在于87个国家中，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了3600余万人。

世界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更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和富有成效的。现在没有像共产国际那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统一组织和

领导机关。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条件下，特别需要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尽力联合起来。统一和团结可以使我们的运动的力量增长10倍。因此，会议制定的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原则，尤其是它们之间加强统一和团结的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会议宣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共同制定的涉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总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不允许发生可能破坏这种统一的任何行动，这是为民族独立，为民主与和平，为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而进行斗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破坏这些原则必将导致削弱共产主义力量。为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获得成功，所有马列主义的政党必须达到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每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通过的这些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突出的意义，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中最重要的新结论和新准则就是这些。这些结论和准则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是由会议一致通过的。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卓越的胜利之一。

但是还必须注意到，这个胜利不是立刻得到的，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尖锐争论而得到的。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全会介绍争论是怎样展开的，以及在会议进程中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怎样达到了观点的统一。

(二)

同志们，关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另一方所发生的分歧的性质，已经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两次报告：1959年12月一次，1960年7月又一次。

众所周知，早在去年夏天之前，关于如何估计当代国际形势问题，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务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某些错误观点。

把现时代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所作的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是这种错误观念的理论基础。在这样解释时代的条件下，把帝国主义看成了我们时代实行独占性统治的力量，至少是看成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力量。作为论据，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借口是，似乎现在地球上2/3的人口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和控制之下。例如，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之一田天学在1960年7月1日的《贵州日报》上写道：“事实终究是事实，帝国主义几乎把地球上近2/3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认识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35%(超过10亿人)，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或者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12亿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5%(约7.5亿人)。

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和过低地估计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中国理论工作者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能防止这种战争的结论。从这里，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在“逻辑上”自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战争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帝国主义仍然决定着世界事件的主要方向，那么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只是作为战争之间的短暂喘息时机，而各国的真正裁军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提出普遍裁军的口号，意味着只是在劳动者之间制造幻想。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叫做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声称，“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助长帝国主义的气焰”。

中国同志不正确地看待重要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因而在对待中立国家，包括对待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追求狭隘民族利益，在边界问题上同印度展开了有害的争论，并且企图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拖入这场争论中。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没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事实完全证明了我党中央的政策的正确性。在11月会议上，许多发言人，首先是印度共产党的代表指出了这个政策的英明性，因为它使共产主义的敌人大失所望，使苏联的国际威望进一步

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印中冲突中的不正确立场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产生的。这种观点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立场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在中国报刊于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得到阐述。

中国同志由于不正确地理解时代，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在争取和平、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斗争中，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他们在对待国际民主组织(和平拥护者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的任务方面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把关于武装斗争形式的冒险主义观点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求他们把这种斗争形式作为达到自己基本目的的唯一斗争形式。

中国同志不限于在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时，他们转而公开攻击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立场，同时呼吁非党群众组织反对兄弟党的所谓错误观点。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中，中国人遭到了共产党代表和非党代表的坚决反击。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期间，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积极反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的分裂活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向兄弟党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在1960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没有超出中国同志自己在1960年4—6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向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参加者发表的言论中提出的问题的范围。通知书是完全有根有据的，是以平静的同志式的语气写成的。

兄弟党的代表了解了通知书之后，批评中国同志背离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在布加勒斯特还决定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成立了文件起草委员会，草拟能表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立场的文件草案。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重新审查自己的错误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地坚持这些观点，更积极地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开展幕后分裂活动。他们越过兄弟党中央委员会散发

自己的阐述错误观点的文件，力图借助大使馆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自己的代表去影响兄弟党的干部。很明显，用这种办法来准备会议，不但不会消除分歧，而且会加剧分歧，只会给会议的准备和举行造成困难。

为了顺利召开会议，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切任务，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分歧。为此目的，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决定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会议之前举行我们两党代表双边谈判。同时，也是考虑了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愿望，他们向我们说，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预先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召开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相应信件于1960年8月13日发往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但是过了1个月才把自己的代表团派往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9月10日的来信，中国同志把这封信同时散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自己驻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让其他兄弟党的领导干部了解这封信。他们把这封信(其实是长达109页的特别详细的著作)叫做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而实际上不论就其实质或形式而言，这封信都不单单是对我们的通知书的答复。

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自己的信中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实际上是从以前的错误观点后退了，对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作了新的表述。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附带了许多互相矛盾的首尾不一的保留条件和遁词，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迹象，顽强地企图证明这种立场正是他们以前所持有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9月10日的信(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是以非同志式的、刺激性的、高傲的、对于我党往往是侮辱性的口气写成的。这封信证明，中国同志不是客观地有原则性地对待我们的通知书、对待兄弟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的发言，而是在克服分歧和使观点接近的道路上寻找和设置一个又一个新障碍。信中没有采纳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建议和希望的意向。不仅如此，信中公开地、高傲地声称，如果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与中国同志的观点不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准备考虑这些意见。况且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声明说，如果大多数共产党不同意中国同志的立场，他们将重新研究这种立场。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无视通知书中列举的事实和论据以及文件的引文，基本上继续坚持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这封信不限于我们的通知书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实际上已经解决，或者与成为争论对象的原则问题无任何关系。例如，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关于1956年的苏波关系问题，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等等。

信中包含了诽谤性的指责，要求苏共中央对我党从未采取过的行动和从未提出过的论点负责。例如，该信的作者竟然做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论断，似乎苏共中央“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越来越背离正确的道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这封信充满了对苏共中央以及对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攻击。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之间的双边谈判于1960年9月17—22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中央委员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廖承志同志、伍修权同志和刘晓同志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派出下述同志组成代表团参加谈判：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库西宁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康斯坦丁诺夫同志、格里申同志和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党代表团同中国人初次会见时，便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的来信给以坚决的批判。我们对他们说，他们的信没有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希望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消除已经发生的分歧。恰恰相反，这封信加剧了分歧，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不正确的新论点，不顾及我们两党的利益，不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党代表团断然拒绝并戳穿了针对我党及其中央提出的诽谤性指责，同时代表团声明，在托洛茨基分子之后，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公开敌人之外，无论任何反对派，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允许自己对我国说出这样的话。

我党代表团以最坚决的方式批驳了中方的企图，他们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企图挑拨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我们坚定地明确地对中国同志说，赫鲁晓夫同志的立场反映了中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乃至我们全党的意见和观点，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苏共中央的集体意志，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为

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因而在我们党内、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享有巨大而崇高的威望。

与此同时，我党代表团从最初起一贯坚持如下方针，使讨论即将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使首先研究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使分析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此相反，他们实质上力图回避研究原则性的重大问题，而纠缠于我们两国关系中的第二位的问题，以此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来信中确定的方针。其中，一部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部或者大使馆予以澄清，而另一部分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作为笑料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同志激烈地指责我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所谓的大国主义态度，他们硬说苏联的组织企图在旅顺口为沙皇将军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西耶夫建立纪念碑！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冗长发言一次又一次迫使我们解释早已经澄清的问题，而且在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后，中国同志又提出新的问题。谈判具有尖锐的气氛。

两个代表团之间经过5天的争论，我们同中国同志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消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不想消除分歧，他们只是把代表团的会谈看作是为了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上捍卫自己错误观点而斗争所需要的某种“火力侦察”。

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结束后再过几天，布加勒斯特会议为准备文件而确定的起草委员会就应当开始自己的工作，而11月会议应当通过这些文件。

每一个党都深刻意识到有责任使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获得成功，因而向起草委员会派出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邓小平总书记为首的一大批同志。苏共中央为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派出了由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声明草案，并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总共有26个兄弟党的67位代表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顺便说一

下，这正是它区别于1957年会议的重要的突出特点。那一次文件草案也是由苏共中央准备的，经与中国同志协商后，以苏共和中共联名提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讨论。这一次不单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广泛参加了我党提出的声明草案的讨论。这种情况使兄弟党的同志们特别满意。

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从10月1日工作到10月22日。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查明，到达的任何一个代表团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声明草案。委员会成员了解了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之后，一致同意把它作为基础。同时，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给予草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当代的所有问题在草案中都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做出了正确的阐述，与1957年的宣言完全相符。中共中央的代表看到与会者的情绪，虽然提出了以后对草案进行自己的修改和补充的保留意见，但也同意把苏共中央的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装模作样地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共中央声明草案中在某些问题上接近了中国人的立场。阿尔巴尼亚人(卡博)对草案放肆地进行批评。他声明说，草案中有许多不正确的表述和结论，对修正主义表现出调和主义，对帝国主义揭露得不够，对和平共处谈论得过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似乎不是以革命精神阐述的。

在委员会工作的前几天，关于声明草案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争论。中共的代表发言后，争论的进程有了急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草案中的一系列论点，说这些论点是“不完善的”，而且似乎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发言证实了中国同志确实存在着苏共中央通知书中以及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所批评的错误观点。

中共代表在委员会的两次发言中再三地说，必须考虑到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也同样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他反复地说，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他依旧把帝国主义叫做“纸老虎”。邓小平同志没有再直接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点，但是提出了新的论点——局部战争不可避免。

邓小平同志反对声明中提出的热核战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表述，他要求“不要宣传战争恐怖”，实质上是要求向人民隐瞒这种战争的真

相，似乎这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精神状态。至于说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仍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结论，并声明说，只能从“策略观点出发”谈论和平过渡问题，他表示根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什么地方会有可能出现和平结局。

在谈到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中共的代表断然拒绝声明草案中包含的不允许有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论点。关于这一点，关于声明草案中指出的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以及草案中的其他某些论点，中国代表顽固地称之为“分裂的地雷”，同时向大家暗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会接受这些论点。与此同时，他高傲地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的争论中，“历史最终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利用起草委员会的讲坛直接攻击我们党，胡说什么把一个党的意见“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党”，在共产党之间培植“老子党和儿子党的不平等关系”等。投给我们党的所有这些荒唐的指控又伴随以虚伪的声明，说什么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苏联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而苏联共产党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给所有的人造成令人苦恼的印象：看得很清楚，即使大多数共产党谴责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即使大家一致阻止它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阻止它反对苏共的国际威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利用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来捍卫自己的错误观点，为自己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动自由。

同志们，我引证中国代表团在起草委员会的这些发言，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同他们论战，为什么在你们所熟悉的苏共中央1960年11月5日的信中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的发言中对这些问题给予这么多的注意。

在三个星期的过程中，在委员会内进行了不断争论，主要是围绕中国同志的论述进行的，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他们的论述。关于我们的声明草案，每一个代表团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补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最多，达40页。委员会成员共提出300条建议，文字174页。其中多数建议不具有原则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草案个别条文和词句的补充和修改。诚然，有不少建议会对草案起不好的作用，经过交换意见之后，建议人自己撤销了这些建议。

依照惯例，草案中每一条原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关于时代的定义有120人发言，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有66人发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有29人发言，如此等等。关于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

我党代表团毫不妥协地捍卫声明草案中阐述的立场，并耐心地说明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兄弟党的代表确信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共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表明他们理解面临的任务，既要达到统一，同时又要坚持应有的原则性，在苏共中央草案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但是其中某些人也表现出动摇，特别是同中国同志的争论达到激烈程度的时候。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团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段新内容，即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经验对于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国际意义的内容。中国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说法，只讲“苏联共产党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删掉了下面这句话：苏联共产党的表率作用和兄弟般的团结是“在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表现”，同样地，凡是提到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地方一律删去。

关于这个问题燃起了最激烈的论战。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责备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共产党的不诚实态度并果断地维护波兰同志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的阿吉特罗普同志企图找到出路，讲了下述精神，虽然他的党在自己的文件中原则上指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但是在声明草案中最好不提这些代表大会，据说因为这会引起中国代表团的反对。在其他一些争论的问题上，越南代表、朝鲜代表和日本代表有时也持有这种论调。但是就实质而言，这并不表明这些代表团同中国同志的立场一致，而只是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希望求得妥协。需要指出，其中任何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也没有支持针对苏联共产党的诽谤性声明。就争论的原则问题的本质而言，只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结一致，完全同意中共代表的观点。

委员会经过许多天的工作，终于敲定了声明草案的条文，并基本上达成一致。同时苏共中央草案中多少带有原则性的论点全部保留下来。但是声明中还剩下某些带原则性的重要论点没有达成协议，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有些日子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是委员会仍然不得不

把它们提交正式会议讨论。

第一，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表述没有达到一致。

中共代表顽强地坚持主张，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原则只能适用于各党自己内部，而不应当扩展到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各党之间的关系似乎应当完全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上。他们断言，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暂时处于多数地位的人把意见强加于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人”，然而暂时还不知道谁的观点是更正确的，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最后裁决。我们和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这样歪曲列宁原则，并证明说，共产党人没有权力把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问题留给历史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不应当有两种政治立场和两条路线。委员会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公正地认为，中共代表团对不允许派别活动这个论点的反对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严重威胁，表明他们不愿意听取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意见。

在关于派别问题的顽强争论中，中国同志以非常激烈和激动的形式表示我党草案中最初的表述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古巴同志、巴西同志和波兰同志经过我们的帮助提出了某些修改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集体做出的决定。破坏这些原则会导致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不允许会破坏这种统一的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是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获得胜利和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个公式一出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出路已经找到。但是，中共代表团断然拒绝这个公式，拒绝其他的谈论，不允许有破坏共产党队伍统一的行动的任何词句。委员会内的剧烈争论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而这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留给正式会议解决。

第二，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中国人坚决主张从声明草案中删掉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提法。

第三，关于克服个人迷信有害后果问题没有达成意见一致。中共代

代表团建议删去关于个人迷信的表述。会上发言的同志以自己的党内生活为例有力地证明，由苏共中央首创开始的为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为克服因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而导致有害后果的斗争多么富有成果。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代表团所以反对这一点，是因为它旨在反对任何个人迷信，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个人迷信。

在起草委员会多日工作过程中，兄弟党代表团日益紧密地团结在苏共中央拟定的声明草案的原则基础上。所有的代表团对于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的错误立场看得越来越清楚。然而，中共代表团继续表示毫不让步，看来他们指望在正式会议上再“挑起战斗”，并在那里寻找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会议上，声明草案得到赞同，但是对上述未达成协议的问题作了保留，会议委托苏共代表团就所进行的工作向大会作报告。

(三)

同志们，这样一来，正如你们所能料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准备工作经历了一场大战，是在尖锐论战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派出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代表团团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

苏共中央力求为克服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扫清道路，排除妨碍会议正常工作的一切东西，于11月5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一封信，目的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做出答复。我们指望用这种方式为在会议上冷静地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则问题创造条件。

在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日子里，苏共中央邀请的所有兄弟党代表团都聚集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考虑到了会议工作的成功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苏中两党立场的协调程度。当时，尽管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已经数日，关于中国同志对会议工作有什么想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中国同志没有像以前通常所做的那样，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最好是由苏共代表团尽一切努力做到，使会议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讨论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任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尽量做到不使次要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不使会议偏离主要任务。当时，我们认为最好是两个代表团进行会谈，向中国同志公开陈述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曾委托科兹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会见中共代表团。

会谈于11月9日在刘少奇同志住处举行。我们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共中央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告诉他们，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将采取心平气和的、务实的和同志式的态度，具有实事求是的性质，不准备同他们辩论，发言只限于声明草案中提到的问题。我们曾声明，苏共中央同时从下述情况出发，即在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面前，共产党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统一，在会议进行中和会议以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消除分歧，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中国同志立刻提出我们11月5日那封信的问题，他们声明把这封信看作是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不用说，这显然不是真话，况且，中国同志自己也承认，他们曾经等待我们对他们9月10日的信做出答复，并且确信会做出这种答复的。

我们说明，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只不过是对中共中央的信的答复，因为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比我们的通知书广泛得多的问题。中国同志继续把自己的信的内容介绍给外国同志，如果苏共中央不对这封信做出答复，这会使人相信我们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到这时，许多外国同志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他们座谈时，完全不真实地说明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专家的问题，把事情说成这样，苏联政府强制采取的这个措施似乎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破坏了所有的经济计划，等等。因为中共代表团同我们座谈时重新提出从中国撤出苏联专家的问题，我们向他们声明，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需要我们的专家，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相应的邀请，我们会做出肯定的答复，当然条件是，苏联人在中国应当保证有正常的工作环境，并且不能企图唆使他们反对苏共中央的路线。顺便说一说，从那以后，中国同志再没有提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问题。

我们不得不深感遗憾地说，中共代表团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倡议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以不友好的与不和解的态度同我们谈判，并且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会议的总路线达成协议。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到达莫斯科之后，表现得更加不友好，更加粗暴。他们顽固地拒绝同苏共中央的代表会见。

这样一来，会议前夕，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便面临如下问题：会议的工作如何开始以及沿着什么方向进行？是走上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所追求的道路，因而降低即将展开的论战的思想水平，并且冒进一步加剧分歧的风险，使会议偏离它面临的任务呢，还是坚持对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路线，以便对世界所有共产党人、整个进步人类感到焦虑的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央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时，我们以列宁的指示为指针。列宁说：“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清政治问题，更深刻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则变成对骂、造谣和无理取闹。先进工人知道自己对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进程责无旁贷，因而应当特别当心，千万不应让那些不可避免的争论和不可避免的交锋变成对骂、造谣、无理取闹和诽谤中伤。”^[50]

会议于11月10日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幕，81个兄弟党的262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

苏共代表受起草委员会委托，作了关于起草委员会工作报告。

对声明草案的讨论在当天从尼·谢·赫鲁晓夫的发言开始。

苏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提出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对声明草案作了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科学地确定现时代的本质；揭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的国际作用；确定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主要任务；确定解决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防止世界热核灾难问题的途径；阐明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全面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工作任务，研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当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密切关心的所有这些问

题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这是真正的纲领性的发言，它从革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阐明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活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发言结束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中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大厅中立刻响起欢呼声。兄弟党的代表团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以他为代表的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党。只有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带着紧张的表情不动地坐在那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还有处于慌乱状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会议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对苏共代表团的示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的示威，看作是即将降临非同小可的斗争的征兆。

赫鲁晓夫同志反映我党中央的立场，在自己发言的末尾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苏联共产党声明，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同所有共产党的紧密的兄弟关系，其中包括同那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某些问题与我们有不同认识的共产党的关系……现在我们的任务在于，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使世界共产主义阵线更加巩固，使每一个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党代表团坚决贯彻的苏共中央的这条路线是保证会议获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且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它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实质上为其他人的发言定了调子。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在自己的发言中声明，苏共代表团领导人发言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原则性，深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乌布利希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同声明作了卓越的理论论证。他的发言的特点是，他把各个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并且表明，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已经存在的分歧需要采取什么方法和提出什么样的具体论据。”

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里斯门迪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讲演时，同样着重指出：“这个讲演特别深刻地分析问题，展示了前景，具有高度原则性，坚定地 and 始终不渝地捍卫列宁主义，善于考虑当前形势的一切细微差别，摆脱琐碎事务，既关心我们的运动的命运，也

关心共产党员的团结。这个讲演对我们会议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会议的前四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这几天发言的有蒂姆·布克同志(加拿大共产党)、吉奥迪同志(阿根廷共产党)、日夫科夫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努里同志(伊拉克共产党)、卡达尔同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柯里杨尼斯同志(希腊共产党)及其他同志，他们全面地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的可能性，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分析了维护和巩固和平的途径。所有的发言都着重指出声明草案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指出，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将给工人阶级开辟鼓舞人心的为和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前景。

11月14日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被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所破坏，而在此之前宣布的是刘少奇同志报名发言。在邓小平之后发言的人都指出，这个发言是与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完全唱反调的。

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会上最长的讲话)中，只字不提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很大一部分是重复他在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个发言是专门同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进行辩论的，对苏共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发言中再一次企图歪曲我党和我国政府奉行的列宁主义的爱好和平政策。中国代表继续混淆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本质和阶级倾向性问题，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解放战争和侵略战争问题，歪曲苏共二十大关于有可能以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错误立场，并且斥责塔斯社关于这个冲突的著名声明，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不平等地对待其他兄弟党，说它美化帝国主义，等等。

中国代表的发言得到了会议参加者十分消极的反应。人们完全以沉默来对待他的讲话。在他之后发言的外国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讲话的内容和腔调。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科普列尼格同志说，这个讲话使奥地利代表因深感震惊。多列士同志断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违背了1957年宣言确定的总路线，而宣言是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

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提出尖锐批评。哥穆尔卡声明，这个发言更加尖锐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他说，“中国同志不相信裁军，不相信有可能巩固和平，他们不

赞成的正是构成和平共处政策的实际内容，并且给我们阵营带来了非常有益结果的苏联对外政策措施”。哥穆尔卡同志对中国代表团说，“你们究竟为什么如此顽固地采用不正当手段力图贬低这些措施的意义，而这些措施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威望，争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争取到了和平事业和裁军的支持者，在资本堡垒中的普通劳动者中间扩大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朋友的队伍？”

11月6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领导人霍查同志发表讲话以后，会议的形势更加尖锐化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令人愤怒的发言。霍查发言以后，伊巴露丽同志立刻要求发言。她说：“自从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人使用这种语言。恩维尔·霍查的发言只能看作是挑拨性的和诽谤性的发言，而不能看作是别的，它不会给发言的人和怂恿他这样做的人带来任何好评。”

确实，霍查同志的发言不仅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深深感到羞辱。会议正是这样评价的。这是满怀怨恨的人的发言，他企图诽谤苏联共产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苏联人民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中一切好的和光明的东西。他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歪曲我党的政策，他怪罪苏联共产党，说苏共以大国主义态度对待阿尔巴尼亚，同这个国家实行不平等的政策。而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援助所不能比拟的！

赫鲁晓夫：我们给了他们粮食、衣服，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苏斯洛夫：众所周知，苏联以最优惠的条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总数为12.43亿卢布的贷款，给予了11.21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在已经提供的贷款中归还的只有3.42亿卢布，而用这些贷款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则作为苏联人民的礼物赠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1951—1960年，有3000多名苏联专家派往阿尔巴尼亚，给以技术援助。苏联实质上无偿地保证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一切需要，包括最新技术装备。

中伤苏联政策的企图还突出地表现为阿尔巴尼亚代表歪曲我党于1954—1955年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5年5月赴贝尔格莱德前夕，苏共中央曾经同兄弟党协商过这个步骤，并得到了它们的完全赞同。而霍查在会议上虚伪地声明，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似乎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向会议参加者提供了我们当时收到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来信的副本。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经过某种犹豫之后那时也支持了苏共中央的倡议。当时他们把苏共中央的行动评价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性一步”，而把1955年签订的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协议评定为“对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特别是对我国具有莫大重要性的事件，是对巩固我国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所作的特别宝贵的贡献”。

当然，十分卑鄙地中伤我党的企图不能不受到与会者的愤怒谴责。哥穆尔卡同志激动地说，“我们在这里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嘴里听到的东西，只能简直叫做对苏联、对苏共和对赫鲁晓夫同志的不负责任的、肮脏的、流氓式的攻击。我们大家都感到羞愧，因为这种放肆的挑拨性的攻击竟然出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任何一个郑重的人，更不要说是共产党员，都不会允许自己用这种腔调发言，进行如此的攻击。我深信，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听到了这个发言，他们会和出席这次会议的我们一样，同样感到羞愧”。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恩维尔·霍查的讲话极大地破坏了我们会议的工作进程。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口里吐出这么多不足信的诽谤言论和粗鲁话，这是耻辱。而且它是说谁的呢？是说社会主义的祖国，说兄长的党——领导者，说肩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责任的首领！”

演讲人的愤怒言论如此强烈地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生作用，顺便说一下，凑巧代表团正坐在讲坛的旁边，以至于霍查和谢胡的神经明显地承受不了，他们有好几天没有出席会议。

同志们，必须指出，虽然在邓小平和霍查之后发言的兄弟党代表对他们的不正确论断给予了还击，但是这些发言的人还是在发言中把主要注意力用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他们特别强调指出，运用我们列宁主义党的丰富经验，运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制定的新的理论政治原理，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同志们指出，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新型相互关系的基本支柱，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苏联的榜样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具有莫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说，我党坚持捍卫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

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方针对于他们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来说，是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积极支持。那些天，在会议上展开激烈辩论的情况下，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同志一致赞同苏共中央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尽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之间的接触而进行的积极活动，这个事实具有原则性意义。

美国共产党的杰克逊同志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作为美国共产党员的代表，分析了尼·谢·赫鲁晓夫两次访问美国所进行的活动时说：“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讲坛上为和平而战斗，当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他还在纽约宽阔的人行道上，在流动的人群中，在富有敌意的和友好的纠察队的战斗队列中进行这种战斗。他在黑人加尔列姆大街上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手拉手为和平而战斗。他在千百万美国人家庭电视屏幕上为和平而战斗……赫鲁晓夫同志深入到我的同胞美国人中间，冲破了一切各种偏见的障碍。成百万人听到了他，他也给成百万人留下印象……我们说，谢谢赫鲁晓夫同志！谢谢您访问了美国！希望您再来！但愿身为共产党员的国务活动家向资产阶级的领地经常出击，使资产阶级旨在把共产党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分离开的努力无法实现。”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同志指出：“亚洲和非洲各族人民争得了政治独立并正在保卫和巩固这种独立，他们和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永远把苏联看作是忠实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高士同志评价说，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他说，这种立场“有助于我们同我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反动派想破坏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把印度推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在这个冲突中“不是为巩固和平区域而行动。他们的立场助长了和平区域的削弱”。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通过自己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实例确凿地证明，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自己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的前景。这里仅举隆哥同志的讲话为例。他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最近几年促使每一个国家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战斗精神无限增长，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心增长，促使各阶层人民更加关心共产主义思想，关心共产党员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十分积极的因素，足以证明(特别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验证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

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以及苏共领导人在这几年把决议贯彻到生活中去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11月23日，赫鲁晓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对会议的进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这次发言中，针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特别是霍查同志放肆的发言中不正确的不符合我党政策的论断给予了还击，清除了诽谤和中伤我党的企图。但是如同第一次讲话一样，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用在有决定性的问题上，摒弃了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想把会议引入恶劣狭路的企图，而这条路是通向泥塘的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指出，“……这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不是共产党达到统一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这一次发言也是努力引导与会者深入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来防止战争，推动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发展，以及讨论使所有共产党员激动不安的其他问题。他的整个讲话贯穿着我党的如下愿望，即希望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希望帮助中国同志放弃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产生有害后果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心平气和的、论据充足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代表们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目送赫鲁晓夫同志。只有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例外。

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同样表明中国同志不想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诚然，这个讲话主要的是防御性的。人们感觉到，大多数党在数十个发言中表现的强硬的原则立场，开始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起作用，这些发言热烈号召团结和统一，同时果敢地带有揭发性地批评了他们的立场。诚然，他们仍然企图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他们的代表不仅断言1960年4月发表的著名的三篇文章符合1957年宣言，甚至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即这些文章追求的目的是防止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对宣言的背离。和从前一样，他们断然拒绝大多数与会者提出的关于在声明中包括不允许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要求。

大家发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新的讲话表明，中国代表完全不想寻找消除同与会者的分歧的途径，因此更加愤怒了。会场上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中国代表刚一结束自己的讲话，多列士、隆哥、哥穆尔卡、日夫科夫、巴拉克、伊巴露丽、泽登巴尔、艾斯卡兰特、巴格达什和杰克逊等

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立刻要求第二次发言。

同志们的第二轮发言都很简短，但措词尖锐，要求严格。多列士同志声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完全不考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党的意见，这是不对的。你们顽固坚持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如此有害的立场，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请你们向你们党的中共委员会转达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这个强烈请求。”伊巴露丽同志说：“中国代表团还有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立场，倾听所有党的呼声，这些党号召它不要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当在各国劳动者面前，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历史面前，承担巨大责任。”

我还想引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易斯·普列斯杰斯的发言。他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界限。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中国同志应当谦虚地问问自己的时候：他们所持的立场正确吗？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捍卫者吗？难道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我们这些绝大多数共产党的代表都错了吗？难道苏共所持的立场错了吗？或者是中国同志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苏共的‘傀儡’。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和对我们大家的诬蔑吗？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苏共采取如此敌视的态度，这如何解释？难道这不正是他们错误的出发点吗？”

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总共有24个兄弟党的代表发言。讲演人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代表团制造分裂危险的立场。

会上，许多发言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了中国同志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对待理论问题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态度，用死啃书本代替对活生生的现实的创造性研究，理论脱离实际，是这些观点的思想根源。

实践向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寻找现成的答案是徒劳的。共产党在深刻地严谨地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从精神实质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词句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同志打着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的旗号，继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放，重复着在当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已经过时因而不符合现代形势的原理和口号。与此同时，他们把基于对变化了的条件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所得出的新结论和新原理，看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倒退。

会议的参加者指出，教条主义和死啃书本是中国同志宗派主义立场的基础，这种立场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行动上。大家认为，如果中国同志的路线获得胜利，这无疑会导致急剧缩小民主组织的群众基础，把民主组织变成封闭的教派。

列宁当年曾经揭露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革命性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就是：工人阶级个别队伍的阶级不成熟性和缺乏锻炼，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施加的压力。

特别是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并拥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国家里，这种思想的残余继续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施加压力。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困难时，这种压力变得特别强大，并且往往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无根基的极端革命性，企图跳越阶段并人为地加快发展速度。列宁写道，“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51]

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还同他们奢望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起特殊作用有直接关系。这种奢望特别表现为在中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

邓小平同志力求证明，这个公式是以通俗的形式表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点。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另一种含意。例如，1960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时代精神的汇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阶段”。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同志的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它对东方革命和世界革命具有新的普遍意义”。中国报刊上有不少这种根本不正确的论断。

完全显而易见，中国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不是指的把一切国家普遍适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而是指与毛泽东名字相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发展阶段。这个公式向后后退了，后退到了个人迷信时期，这时一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仅仅是“被挑选出来的”共产主义运

动领袖所专有的事。中国报刊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说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日报》，1960年10月7日），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赋予毛泽东以特殊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未必毫无所知。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行中无疑表现出，想在兄弟共产党中间谋求领袖地位，这就毫不奇怪了。

民族主义对共产党的影响是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偏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肥沃土壤。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行为中得到反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因边界冲突而使中印关系尖锐化的错误政策，中国同志对待会议大多数参加者的经验和观点的高傲态度，这些不能不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许多党的代表在发言时指出，谁都没有否认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方面做出的贡献。但是不应当夸大民族意义的意义，并且不应当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只适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作为共同的原则和规律，错误地强加于其他所有的党就更是不对了。

大多数的党都认为有必要在声明中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不会自动消失，必须同这种恶习进行坚决的斗争。民族主义的残余仍然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团结的严重危险。

在会议长时间争论的过程中，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是中国代表团继续坚持要求对声明的某些重要论点采用自己的表述。这时决定由原来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会上讨论的情况进行起草工作。

委员会逐页地重新审查了声明草案，吸收了各代表团的新建议，经过几天协商草拟好了几乎是声明的整个文本。但是这一次对下述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关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有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活动问题；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

兄弟党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与会者中间加紧进行幕后活动。他们说，中国同志以拒绝签署文件相威胁。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代表团仍坚定地坚持到最后，并始终如一地捍卫共同的路线。不言而

喻，我党代表团也同兄弟党的同志们举行了许多次会谈，说明了苏共的立场，捍卫了声明草案，指出了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立场的不正确性及其危害性。

应当说，也发现有少数人动摇不定。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通常还有缅甸和马来西亚的代表追随中国同志。原因很清楚，他们很早以前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除了这些人之外，越南劳动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表现动摇了。在地理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的这些国家的党同中国共产党有着传统紧密的联系。这些党的代表们受到了特殊的压力。

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请求赫鲁晓夫同志邀请他们举行会谈。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同中国代表团就没有取得一致的表述达成协议。他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不签署声明，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他们的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苏共中央准备达成一致并准备接受协商后的表述，同时他坚决表明，如果声明中不包括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和关于不允许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会导致破坏这个运动统一的行动的内容，苏共代表团就不签署这个文件。

在这种条件下，起草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建议做出决定，责成委员会全体成员向自己代表团的领导人汇报既成的事实，然后再重新聚会说出最后意见。在起草委员会工作暂停结束后，争论更加强烈地展开了。根据波兰同志、匈牙利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倡议，经苏共中央代表团同意，认为可以不坚持在声明中提出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大多数代表团坚持认为，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的论点具有突出的原则意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申明，如果从文件草案中删去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就是从1957年宣言后退。

苏共代表团和绝大多数兄弟党代表表现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对上述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从前在起草委员会中，而后在会议上表现出某种动摇并倾向于妥协方案的少数同志在争论的问题上重新开始站在更明确的路线上，并转到多数人的立场上来。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鲁克曼同志对中共代表团说，希望它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越南劳动党的代表黎笋同志发言的精神也是如此。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建议通过不公开的不予公布的会议决

议，其中规定不准派别活动的论点，同时确定所有兄弟党在彼此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准则。

所有这些对中国代表团发生了作用。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已经得出结论，进一步继续争论下去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对领袖地位的奢望不仅破灭，而且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面临着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危险。这时，中共代表团请求宣布临时休会。

宣布休会以后，中共代表团立刻走向苏共代表团并请求会谈。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主席团所在地举行。当两个代表团从格奥尔基大厅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塑像，半开玩笑地说：“向列宁，我们走向列宁吧！”

在这次会谈中，同以往的所有会谈相比，中国代表团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彭真同志对我们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如果苏共和中共之间达成协议，会议就会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会通过协商好的声明。他向我们暗示，中共代表团准备停止争论，不再坚持自己的建议。看来中国代表团决定寻找某种妥协的协议。该代表团声明，它同意采纳以任何形式表述的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如同苏联同志所表述的那样。为了避免苏联代表和中国代表今后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发生分歧，他们建议恢复从前的就共同立场预先进行协商的方法，他们许诺向自己的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

但是，中共代表团继续顽强地反对即使是以不公开的决定的形式表示的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提法。除此之外，中共代表团坚决建议增加如下一点，即只有所有的共产党，而不是多数共产党，都同意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会议才可以做出决定。我们声明，这种“一致同意的原则”将使每一个党享有否决权，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交换意见的结果，就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维护这种统一的途径问题通过了协商好的表述形式。众所周知，其中极明确地指出不允许有任何会破坏共产主义队伍统一的行动。这种表述完全反映了声明草案中包含的关于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一切基本论点。尽管中国同志反对这些论点，因为他们不无根据地看出，这些论点的矛头正是反对他们最近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紧进行的派别活动，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面临着如下抉

择：要么接受所有共产党的集体意志，要么在世界工人运动面前扮演分裂者的角色。

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最终也达成了协议。

整个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彭真同志受中国代表团委托提出请求，希望刘少奇同志能在第二天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在会见之前，他们想解决好可能不利于会见的一切争论问题。

11月30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接见了刘少奇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感到很痛苦。现在，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重新取得一致。因此我们需要一起签署会议文件，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

刘少奇同志说，中国同志同意下述意见，即在反帝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上，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上，在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他申明，中共代表团同意声明草案中包括关于苏共二十大作用的论点，他重新请求删除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同时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朝鲜同志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中国同志注意，在我们苏联，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重新确认二十大的决议，其中也包括关于个人迷信的决议，但是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删掉这个说法，而他们的愿望不能不予以考虑。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说明，我党消除了个人迷信以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二十大的决议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对于巩固我们党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为例说明，个人迷信如何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会带来多么悲惨的后果。经过这些说明之后，中国同志不再坚持要求从声明中删掉个人迷信说法的建议。

会谈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会议的工作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想立刻到苏联各地去访问。会谈中还商定了关于结束会议工作的程序问题。

同一天，即11月30日，举行了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所有的人立刻感觉到了出现的转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条文。彭真同志提议委托苏共代表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12月1日，会议参加者出席了闭幕会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了工作完成情况。然后，在特别激昂、特别庄严的气氛中对会议文件进行表决和签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向与会者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道，尽管会议的工作走过了“崎岖的道路”，然而由于所有的兄弟党都渴望团结，困难终于被克服，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在结尾说，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制造分裂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同苏联共产党在一起，共同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友谊。

在会议的整个进行期间，中国代表的发言第一次赢得了掌声。赫鲁晓夫同志和我党整个代表团首先开始向刘少奇同志鼓掌。

赫鲁晓夫同志在会上致闭幕词。他概括地阐释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然后他说，会议参加者服从共产主义最高利益，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解决争论的问题，使共产主义阵线达到更大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着重指出，现在决议已经做出并得到一致通过，剩下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集体制定的决议的旗帜下前进。他表示坚信，所有的党将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这些协议；执行共同制定的纲领，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这个纲领而斗争。我党代表团团长以苏联共产党的名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定不移地贯彻会议通过的决议，为了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真正同志式的关系，就像以前长期所保持的那样，我们甘愿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大厅里用多种语言喊出“英特纳雄奈尔”。这激动人心的、令人难忘的场面显示了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显示了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事业引向彻底胜利的决心。

(四)

同志们，概述了会议的准备与进行中所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它最终取得的这个胜利是相当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兄弟党代表团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同志高度原则性的发言以及苏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整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会议在马列主义原则上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的几次发言，渗透着关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必

胜的伟大信念，渗透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对保证共产党和工人党历史性会议获得胜利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中，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建立牢固思想基础的事业中，再一次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的党在会议上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是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的基础。我党提出的并构成了当代国际发展的一切重大问题的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所有新思想和新原理，都写进了声明，并成了声明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发言批评我党的立场，他们未能够以任何有根据的建设性的路线同苏共的思想纲领相对抗，他们终于签署了声明，接受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

由于苏共中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兄弟党得以在声明草案的思想基础上达到团结。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工作期间，中央主席团很关心做其他党代表团的工作。有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的同兄弟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见和友好会谈起了重要作用。经过这些会见和会谈，从前站在正确立场的代表团坚定了自己的正确信念，从前动摇的代表团选择了正确的观点，所有这些总的来说促进了兄弟党的团结。

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向中央全会报告，从会议的结果看，我党获得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会议给予了我们共产党以很高的评价。会议通过的声明中说：“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

会议的代表们怀着深深爱戴的心情谈论我们的党，着重指出了它的经验对于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具有的突出意义，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特殊意义。会议声明中强调，“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

步发展”。

由此可见，会议再一次确认了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各国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享有多么无可争议的威望。

由于兄弟代表团多次向苏联共产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说：“我党中央委员会向这个会议上发言对我党——伟大列宁的党表示信赖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谢意。我们对这种信赖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声明，我们将不辜负这种信赖和期望，苏联共产党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经验、革命热情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共同斗争的事业。”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在全世界、在所有居民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迎接会议的文件。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热烈欢迎会议的结果和它的文件。他们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自己思想和希望的体现者，他们越来越确信，和平、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是不可分的。毋庸置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将把全世界亿万诚实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资产阶级集团及其报刊对莫斯科会议结果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会议的完全胜利使最反动的那部分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明显地惊惶失措并表示愤怒。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企图贬低它的作用，歪曲所通过的文件的意义。比较清醒地观察事物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则承认这些文件对保持和维护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共产党人真心希望和平与和平共处，就像会议文件中所表达的那样。

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恢复密切接触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这是莫斯科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与此相联系，需要提醒大家，仅在1960年苏共中央曾经两次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回避了这件事。只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工作的前夕，当所有的争论问题都已经解决之后，中国党政代表团才主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后完成了对苏联各地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话，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将孜孜不倦地巩固同苏联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兄弟党的友谊。

同志们，从会议工作结束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召开了中央全会。党组织内举行了积极分子会议和其他会议。会议文件在报刊上得到广泛的详细的阐述。兄弟党热烈欢迎会议的胜利，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声明及告世界人民书，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实际结论。这些党在自己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会议通过的声明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自然，我们很关心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会议结果的反应，关心他们对会议上给予他们的那些原则性批评的反应，关心他们在会议之后的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暂时还没有讨论会议结果。驻华大使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会见他时说，会议进行得很好。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会议结束和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工作人员接触到的大多数中国同志怀着真正满意的心情，有一些人甚至带着喜悦的泪花欢迎关于苏中关系开始了新的友好阶段的消息。

下述消息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改组人民公社结构和在企业的劳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人民公社方面，特别规定要同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人民公社中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建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允许公社社员拥有小块土地归个人使用；预定在3年期限内向公社成员归还从前公有化了的家畜家禽、小工具和其他财产的价值。

出席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顾问之一所讲的消息同样令人感兴趣。他在北京叙述自己对莫斯科会议感想时，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他解释自己的看法——我们遭到了猛烈的行动一致的攻击，而且与其说是苏共代表团攻击我们，不如说是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攻击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经历了这样一所大学校，甚至不是大学校，而是真正的研究院，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看来，不能不同意，这位同志真实地说出了对会议感想。

在中国同志的言行中也有提高警惕性的地方，特别是中国报刊上宣传会议结果时，带有某种倾向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遮遮掩掩地流

露出这样的思想，说会议决议中的所有论点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例如，196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年之前就说过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报纸甚至刊登了引文，但是却矢口不说，就是这份《人民日报》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还刊载了完全相反的说法。可是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不管你怎样巧妙地翻转毛皮大衣，每个人都能轻易地确定，哪是大衣的外面，哪是大衣的里面。同志们，当然我们也应当替中国人想想：他们比我们更难于向党员群众汇报会议的结果。

也许中国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为此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而我们有义务表现出应有的耐心，最大限度地保持稳重，竭尽全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我们两党的团结。

简单说几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立场。不久以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会议的问题，批准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活动。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说出关于会议上自己的行为以及兄弟党对他们的批评的全部真相。

我党中央委员会对待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当继续执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全力加强苏中友谊的方针。最好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最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就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互通对外政策情报。必须做到，苏中两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遵照会议决议精神协调行动。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一如既往地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可能的物质技术援助。

在加强两党之间的联系方面，我们也应当表现出主动性，按照相互往来原则邀请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苏，以便在党的建设以及思想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交流经验。我们的报刊必须比以前更广泛地介绍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成就，同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成就持同一态度。还必须经常交换社会和文化组织的代表团，总而言之，要竭尽全力保护和巩固会议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加强苏中友谊。

至于谈到阿尔巴尼亚，在此种情况下，基本上一切取决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今后的表现，取决于他们是否真心希望加强苏阿友谊。

同志们，从会议总结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结论？它向我们党提出了什么任务？

会议的主要结论是，会议制定并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将具有历史意义。声明是所有马列主义党的可靠指南。兄弟党有了它，就能够在为自己的伟大理想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过去严格遵守了今后将继续遵守集体制定的并得到会议通过的关于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估价和结论，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并且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会议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会议更加明确地固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的组织原则。共产党表明非常关心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确定了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准则，这正是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国际主义交往中所一贯遵循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尽力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行动的统一。

81个党的会议承认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这就大大地加重了我们大家的责任。

战后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了约30个新的共产党。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同所有兄弟党的联系，特别是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细心(认真)地对待兄弟党的一切需要，特别是在提高他们干部的理论水平方面给以帮助，同他们交流经验和信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他们磋商。

我们必须对于深入研究并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阐述国际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过程，给予更多的注意。必须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方面提高党的理论工作水平。

我们还应当从会议总结的角度审查苏联社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更多地关心国际民主组织的工作。提高苏联代表在如下的国际社会组织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这些组织是：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亚非国家人民团结委员

会、大学生组织、科学家组织及其他组织等。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保卫和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大学生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以及各种志愿团体的执委会都应当改进自己的对外活动。苏联各组织应当特别细心选拔派往国际组织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细心选拔出席国际会谈和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苏联共产党以声明精神为指针，今后将坚持不懈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力争实现苏联的裁军纲领，始终不渝地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路线。还应当继续全力加强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联系，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为防止世界大战、为完全根除殖民主义、为巩固新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动员世界一切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仍然是我党对外政治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志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的牢固团结和统一，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各族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和友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可战胜的主要条件。我们党今后将不断巩固这种统一、这种团结和友谊。

国际解放运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出如此鼓舞人心的前景。不管我们的敌人多么憎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会议通过的历史性文件鼓舞苏联全体共产党员，鼓舞全体苏联人民为在我国——第一个为全人类的光明未来开辟道路的国家——建成共产主义而积极斗争，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而斗争，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下，以此来迎接新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党的第二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经久不息的鼓掌）

РГАНИ, ф.2, оп.1, д.535, л.132-143

№24165 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

苏联擅自外出(1961年2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1年2月18日

第420号

绝密

苏共中央：

中国公民张舵全(Чан До-чуан)1956年自中国来到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学习。此人不久便停止正常上课，并违反外国公民在苏联境内居住的现有规定，开始在苏联国内到处乱跑，靠打零工糊口。

1960年11月，张舵全从基洛夫去过莫斯科，并两次在可疑情况下造访了英国使馆。此后，便返回了他的法定居住地哈里科夫。但今年1月，他又在未获护照登记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前往了卢甘斯克州的克拉斯诺顿。在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情况下，张舵全才返回了哈里科夫。我们在警告其不得违反苏联给外国人所规定的制度的同时，也帮助其安置了工作。尽管这样，张舵全还是在不久又前往了克拉斯诺顿，并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让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建议。

在坚持让我们提供给他于卢甘斯克州的居住权的同时，张舵全在与哈里科夫和卢甘斯克执照登记部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还威胁说，自己可能返回中国，以便申诉关于自己似乎在苏联受到了恶劣的待遇。他还声称打算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家安全委员会

德拉贡(签字)

1961年2月21日

手写批注：

需要归档。B.戈尔布诺夫。1961年2月28日

No25293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1961年2月23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3月13日

第176号

机密

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 [52]

1961年2月23日

.....2月23日，我根据中央的指令拜访了刘少奇，并转交了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邀请中国同志赴苏休养邀请函。

.....

.....我向他通报了1961年1月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他特别有兴趣地了解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农业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刘少奇对如下一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并想了解：苏共中央对党内出现的一些“无稽之谈”和“欺骗”的斗争，为农业生产克服自然和气候条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如何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农业部门的重组等。

.....

.....刘少奇随后谈到了中国的农业形势。

他说，早些时候我们低估了农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过去的两年，这个缺点暴露愈加明显。在我们看来，刘少奇说，农业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没有察觉国家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出现的基本食品(供应)短缺问题。然而在去年，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同时还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影响了整个国家，农产品供应短缺带来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国民经济的各

个领域。中国的整个领导层、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刘少奇表示。以此出发，我们认真加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毛泽东、我、大多数中央党政机关和国家部门、一系列科研机构的专家，他继续说，都在忙着发展农业。刘少奇说，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处理农业的问题相关方法。我们聚精会神地考察苏联农业经济出现的问题以及苏共采取的应对措施，尤其是近年来苏共采取的措施，同时也研究美国、日本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农业政策，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通过学习所有的材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中关于劳动技能的经验最值得关注。

刘少奇进一步讲到，在中国，过去两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严重下降，深刻影响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刘少奇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基本上，影响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有两个：(1)自然灾害；(2)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认为，他说，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刘少奇没有继续分析缺点、错误和领导人所犯的 error，只评论说“近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无疑被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加剧了”。

说了一会儿后，刘少奇提醒我，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两到三年自然灾害牢牢挟持着国家。作物歉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荒。今年，他说，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曾经出现过的，当然，也可以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若不然死于饥荒的人数会不断上升，最后达到像过去一样可怕的数量。然而，刘少奇继续说，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历饥荒，因为目前现存的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列举一些中国同志们采取的措施，刘少奇说，让1960年农产品正常收获的地区输送一大部分粮食给受灾区。同时，中国将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他继续说，数年来，中国第一次举全国之力进口粮食，而之前中国甚至是粮食出口国。粮食进口量非常大，现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约200万吨谷物(主要是小麦)的合约。现在，刘少奇继续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来研究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因为200万吨的粮食对中国来说是微小的数量。此外，他说，我们不能确信帝国主义不会阻止我们，他们可能会购买粮食，然后禁止粮食出口到中国。就这样，他继续说，进口的粮食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从国外大

量进口粮食后，我们就不能增加其他商品的进口量，由于中国的现汇很短缺。

他进一步讲，粮食的困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可能也将会慢下来。“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人口的非自然死亡，一个人的胖瘦由摄取的营养决定”，他说，这还是可以挽救的局面。刘少奇继续说，中国同志保证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困难都是暂时的。6月份进口的粮食解了国内的燃眉之急。根据他的话，国内小麦在1961年应该会丰收，显然这还是未知数，所以不能排除今年下半年从国外进口粮食可能性。“我们认为”，他说，“1961年上半年的人口增长幅度会有所下降，毫无疑问，这与人的健康状况相关。因此，我们在下半年将采取措施增加每天的粮食供给量。”

.....

他又进一步重复，中国关于食物原料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今年5—6月份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基本上我们将度过困难时期。现在，据他所说，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

.....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д.7, п.466, л.57-64

№1383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年2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会议第31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А.Н.柯西金、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Г.И.沃罗诺夫、В.В.格里申、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波斯佩洛夫同志关于苏联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通报。 [53]

(波斯佩洛夫、安德罗波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

关于无线电台的问题——拆卸，什么都不要送去。

记录在决议中。

赞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活动。代表团的策略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上表达了原则性的立场。

与米高扬同志进行了辩论。

准备了信函，阐述的问题包括告知全体人员所发生的事件；阐述整个事件的情况。 [54]

向兄弟共产党寄发，或者，如果可能，通过电报。在信中说——(关于对贝利亚的揭露)。

目前，不签署贸易条约。

继续谈判，在莫斯科，在高级别上进行。

米高扬同志：我想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担心，中国人和其他人会说，我们这是在压迫弱小的国家(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感到轻松)。

关于贸易条约——不能中断贸易。 [55]

如果阿尔巴尼亚人不做出向好的方向改变的话，就不邀请他们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了。

委托科兹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准备(?)信函；委托书记处准备。

3月25日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地点？ [56]

№25300 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 货币汇率(1961年3月23日)

B.库兹涅佐夫给刘晓的信

莫斯科，1961年3月23日

亲爱的大使同志！

依照1961年1月1日向你方介绍的情况，苏联对价格做出了调整并提高了卢布的含金量，苏中双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1.自1961年1月1日起，卢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222.22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或45卢布兑换100元。

基于此，1953年9月22日制定的卢布对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汇率，以及1955年2月20日和1955年3月7日分别制定的人民币对卢布外汇汇率都将不再有效。

2.自1961年1月1日起，1957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非贸易支付中提高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的条款将会被继续执行。

(1)第一条列在下面：

“自1961年1月1日起，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非贸易支付中，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涨幅33.3%。即60卢布兑换100元人民币或166.67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

(2)将“3.82%”改为“8.6%”。

(3)第四条协议不再有效，其后的条款会做出相应修改。

请大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B.库兹涅佐夫

№25301 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1961年3月24日)

摘自H.П.费留宾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3日

第01104/TC号

绝密

文本第8份

副部长接见中国大使馆代办张德群。 [57]

1961年3月24日

我应张德群的请求于12点会见了他。

.....

2.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指示，张德群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发出请求，恳请苏联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制钞活动提供帮助，共制钞30亿元，其中3亿为十元面额人民币纸币。张德群表示，希望能够在1961年底完成制钞任务。

他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纸币先前是在苏联进行筹备工作的。苏方也保留了纸币的设计方案。当时苏联财政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并与苏联外贸部的进出口部门进行了协调。

张德群强调，他的口头声明应当被视作中国政府官方的正式请求。

张德群表示，中国政府的此项请求将被递交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已送到A.И.柯西金同志和B.Φ.加尔布佐夫同志处)。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费留宾

№25302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 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1961年3月31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28日

第33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纪要 [58]

1961年3月31日

今天下午15时30分，我应邀会见了周恩来。他谈到了以下问题。

一、老挝问题.....

.....

二、周恩来说到苏联提出的援助100万吨粮食以及50万吨糖的建议。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第一，关于糖：周恩来希望派一个以叶季壮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具体问题展开商谈。叶廖明已经在北京通告叶季壮，苏方会在4个月内(8月前)交付糖。我们同意这项提议。费用由我们承担.....

第二，周恩来说，刘少奇此前与契尔沃年科会谈时提到，中国对外贸易部建议我们向苏联交付从加拿大东部进口的谷物，苏联则在靠近中国的地区向我们交付谷物.....

契尔沃年科说他记得这个提议。

周恩来说：关于这个提议，苏联同志已经同意从库存中拿出100万吨谷物和30万吨小麦提供交付，中方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我们注意到，苏联向中国交付30万吨小麦而中国向苏联交付3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的谷物。此外，周恩来问道，苏联是否能在近期交付小

麦，加拿大会在1961年7—8月间交付(这意味着会很晚)。所有运费将由中方支付。

周恩来还问，能否将30万吨谷物增到60万吨。

.....

我表示会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些提议.....

.....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д.7, п.466, л.166-172

№21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61年4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

(Н.С.赫鲁晓夫、Н.М.什维尔尼克、Ф.Р.科兹洛夫)

第323号记录第6项

1961年4月6日

绝密

责成科兹洛夫和什维尔尼克等根据为交换意见而举行的会议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РГАНИ, ф.3, оп.14, д.466, л.8

№21896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1961年5月16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苏联外交部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相关问题提交了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以便其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摘自北京来电：从今年5月11日第621—624号至5月13日第628—632号)。

决议草案见附录。

请审议。

B.库兹涅佐夫

1961年5月16日

手写批注：

H.C.赫鲁晓夫同志就该问题所作批示已转交苏联外交部B.B.库兹涅佐夫同志。

B.B.列别杰夫

1961年5月17日

附件：

草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就苏阿关系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

绝密

批准给苏联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

就苏阿关系诸问题给苏联驻北京使节П.Ф.尤金发出的指示

1961年5月16日

绝密

请您以商谈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为由拜访周恩来或邓小平，并根据委托向后者通报如下内容：

“莫斯科认真研究了你们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在关注你们所提出问题的的重要性时，我受委托谈谈苏方对此的一些看法。我们显然已无必要重复你们已知的那些文件的内容——如今年4月26日A.H.柯西金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的信和苏联政府于今年5月8日

给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备忘录等。在这些文件中关于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双边关系苏联政府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这里我们仍希望再次强调，苏方对近期苏阿关系深感忧虑，并将付出更大努力以促其正常化。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即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时理应表现出大的耐心，不应操之过急。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在面对此类存在争议的问题时应当采取同志式的协商和相互讨论的方式。这也正是苏联始终不渝坚守的路线，为了保持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苏方不惜竭尽全力。

正如你们所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开对苏共和苏联持不友好立场。会议期间，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调解双方隔阂作出了许多努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当时根本听不进我们的同志式的意见，甚至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他们反而在我方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致使苏阿关系不断趋于恶化，并开始向外界公开自己与苏共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结论的分歧。我们自然不能不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政策中出现的如此意外和急剧的转变感到担忧。我们现在搞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对苏共和苏联采取了如此不友好的立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中央曾立即建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我们两党代表之间的会晤，以及时化解苏共和阿共关系中已明显可见的隔阂的根源。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却多次拒绝我们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兄弟党会议期间，我们之间虽举行了此类会谈，但阿方领导人却中断了谈判，这表明他们是有意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晓，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对苏共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们均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苏共的恶意攻击表示了愤慨。与会者均诚恳地呼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法，重新回到与苏共、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友好的道路上来。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没有从这种公正的、同志式的批评和与会者们的期望中得出任何有益的结论，而是继续走在破坏阿苏之间友好的歧途上。从莫斯科会议回国之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虽然在口头上依然声称自己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并号召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力试图玷污我党活动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通过各种不友好的，甚至直接攻讦的方式，往苏联身上抹黑。如今，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形成了这样局面，所有那些赞成保持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人均会遭到排挤和镇压。

你们提到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之后举行的H.C.赫鲁晓夫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其中谈到有必要改善苏阿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至今仍然如H.C.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所言。我们依然真诚地希望和尽可能地去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虽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直接反对苏联的做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仍然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和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在莫斯科会议之后，便多次建议阿方领导人举行双边高层会晤以讨论两国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期间与阿共中央领导人的会谈中，仍坚持召集此类会谈以解决双方的隔阂。可是，即使这样，阿尔巴尼亚领导层仍固执地拒绝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会面。今年3月，华沙条约参加国在莫斯科举行了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各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者均得到了邀请，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不想利用这一机会来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恩维尔·霍查和谢胡等同志拒绝出席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使与会各国代表感到理所当然的惊诧，而且为各种敌视我们的不公正新闻媒介提供了歪曲的口实。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耐心而顽强地通过各方面努力以改善苏阿关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将目前的苏阿关系与1956年的苏波关系画等号。因为众所周知，在1956年，不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波兰领导人，都是从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角度出发，都极力为解决苏波关系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努力。这种共同努力最终便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结果。即使今天，我们仍可以骄傲地说，当前的苏波关系是在兄弟式的、真诚的基础上结成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至于现在的苏阿关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苏联真诚地努力协调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可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方面的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目前条件下只凭苏联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近期召集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当然不能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对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置若罔闻。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当谈及苏阿关系状况时，H.C.赫鲁晓夫同志再次表达了准备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意愿。其他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也强调了这一点，并带着极大的忧虑激动地指出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所执行路线的危险性。从极其友好的动机出发，政治协商委员会呼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严肃的态度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解决，并采取措施以履行自身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所肩负的义务，完全遵守条约之相关规定，从而确保条约所有成员国的团结和加强其防御力量。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促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如果有人把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们所提出的这些同志式的意见看作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制或压力，那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以极其遗憾的心情不得不指出，对于政治协商委员会全体成员为清除近期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的各种努力，阿尔巴尼亚政府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甚至，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继续坚持自己的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华沙条约国家的不友好路线。

你们的谈话很多都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军基地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更详细地讲讲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并不想从阿尔巴尼亚撤出自己的军舰和装备。而如果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绝对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我们把海军从发罗拉海峡撤出是被迫的，因为阿尔巴尼亚方面执行了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我们根本无法忍受基地内的环境。由于阿尔巴尼亚军事政权的直接挑衅性活动，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导致该基地实际上已丧失了战斗力，苏联海员已无法在那里继续待下去。

关于阿尔巴尼亚政府针对苏联海军及其家属所实施的各种不友好举动，我们这里没必要详细列举。因为其中部分事件我们已在发给你们的文件中作了通报。虽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能通过个别的反面事件去加入判定，但不得不遗憾地说，目前苏阿关系中出现的这种不和谐绝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针对苏联工作人员而采取的、系统的、有预谋的不友好行动。这明显是破坏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好基础，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方曾多次提请阿尔巴尼亚政府关注发罗拉基地内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可是，阿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予以阻止。相反，针对我们的请求阿政府总是以不友好的举动来作为回应。随着阿军事政府的挑衅活动的升级，发罗拉基地的形势不断恶化。仅仅是由于苏联领导层政治上的成熟，苏联高、中级军官和水兵的刻意容忍，时至今日才避免了我水兵与阿方的直接冲突。苏联海军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才到了阿尔巴尼亚，是为了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防御能力，但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海军待在这种无法忍受的环境之下。

为了提高部署在发罗拉海峡的海军的战备能力，消除那里业已形成的不正常局面和避免苏阿水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在得到政治协商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苏联政府建议在阿苏友好关系恢复以前向停泊在该基地内的所有舰艇补充兵力，后者均为隶属于华沙条约国家联合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苏联水兵。可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并不认为上述建议是目前条件下唯一明智的举措，并有意识地采取了清除发罗拉海军基地的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苏联海军继续留在阿尔巴尼亚只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218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17日会议第328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诸问题”

(B.B.库兹涅佐夫，H.C.赫鲁晓夫、A.И.米高扬、A.H.柯西金、M.A.苏斯洛夫、P.Я.马利诺夫斯基)

第328号记录第2项

1961年5月17日

绝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意见就该问题制定相关提案。

РГАНИ，ф.3，оп.14，д.475，л.2

№21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 问题(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答复”

(H.C.赫鲁晓夫、A.H.柯西金和A.И.米高扬)

第328号记录第3项

1961年5月17日

绝密

196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信函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苏联驻中国大使的会谈均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诸问题，兹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就上述问题起草给中国朋友的答复性信件。

РГАНИ，ф.3，оп.14，д.475，л.1

№138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17日会议第32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H.Г.伊格纳托夫、A.H.柯西金、A.И.米高扬、H.A.毛希丁诺夫、M.A.苏斯洛夫、E.A.福尔采娃、H.M.什维尔尼克、B.B.格里申、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H.C.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库兹涅佐夫、赫鲁晓夫、米高扬、柯西金、苏斯洛夫、马利诺夫斯基)

允许进行不大的修改。

如果我们的建议将被采纳的话，可交付报刊，但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允许。

不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 [59]

第3项 关于给中国人的答复。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

进行不大的修改。

对所有3份文件做出答复：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和中共中央的信。

删掉：主席可能会愿意留下一些资产。

第4项 关于与肯尼迪的会晤。 [60]

在欧洲——柏林。

关于裁军——让我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到自己的国境内。

外交部提交的材料——官僚主义的文件

(第794号和第819号建议)

不审理，但是，可以编制报告。

РГАНИ, ф.3, оп.12, д.1011, л.42

№0810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1961年6月5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6月24日

第421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61年6月5日

今天15时15分在会见前往日内瓦的老挝合法王国政府首脑梭发那·富马和党主席苏发努冯之前，在机场我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谈论了几句天气状况和今年中国的丰收景象，参与这次谈话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与给中央的新闻通报相比，中国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没通报任何新的东西。

接着我又执行了中央1961年6月3日关于给中国提供粮食的电报中的指示。

周恩来对苏联政府为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表示了感谢，并说，除了中国想用加拿大小麦等值偿还苏联所提供的粮食和面粉问题外，其他一些问题均已弄清。与上次会谈一样(见1961年5月29日的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周恩来再次声明，中国同志想在结算时本着数量等值原则，即对苏联为中国提供的30万吨粮食和面粉，以30万吨加拿大小麦偿还苏联。在回答周恩来这个问题时，我指出，我们已把中国同志的这一愿望转告莫斯科，但显而易见，对这个问题无需回答，而应按照这种情况的惯例处理之。周恩来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日

内瓦谈判和维也纳会晤的新消息。我们回答，除了他已经知道的官方消息，其他消息我也不掌握。

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老挝形势和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之行的什么消息。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得知富马和苏发努冯之行的消息确实来自这里的中国同志之口。亲王到北京是16时，而莫斯科关于他们之行的电报通知22时才到。苏联外交部谁也没用电话告诉我们这一消息)，并补充说，看来中国同志作为邻居掌握着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同时我们指出了在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周恩来说，苏联、中国、波兰、越南、老挝王国政府和巴特寮确实进行了很好的配合。

周恩来通报说，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去日内瓦，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会谈。他说，大概你们也知道，富马致信宾努亲王，建议在老挝组织三方代表会晤。富马开始时建议在金边或在日内瓦举行这一会晤。后来在河内讨论过这一问题，决定最好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说，两亲王应该尽快赶到日内瓦，现在宾努亲王在巴黎，而西哈努克在尼斯。

周恩来通报说，不久前西哈努克致电赫鲁晓夫同志和肯尼迪，但电报内容不太好，这说明这一中立国家在老挝问题上立场是摇摆的。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根据不久前收到的消息，西哈努克在越南同哈马尔舍尔德的代表会晤时讨论了扩大东南亚和平和中立区以及建立所谓的“第三力量区”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泰国、菲律宾和南越在形式上应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然后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柬埔寨和老挝(共9国)共同组建“第三力量”。这些国家的政府按照上述计划应承担义务，不许第三国的军队进入本国领土，并对所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相互监督。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建立所谓“第三力量”的计划，其目的是使参加国政府能够在形式上对中国和苏联坚持友好立场，而在本国国内则执行反共和镇压人民力量的政策。这一计划的追随者想在中国和苏联门前垒一道大墙阻挡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在本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亲西方政策。

周恩来接着说，中立国家甚至制定了建立所谓“中立部队”的详细计划，其编成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度或锡兰(周恩来说的正是锡兰)三国

的军队。这些中立部队的任务是监督老挝的全部边界线，从而终止外国对老挝三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这一国家的力量分布进行监督，在国内实施民事监督和政治监督，而把老挝的武器交给“人民警察”。事实上，周恩来说，这一计划是借助中立国家的帮助在老挝实现美国设想的共同管辖。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已将这些计划情况告诉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但是，他指出，我们是以某些隐晦的方式转告他们的。我们告诉亲王，周恩来说，对待老挝的这些计划，联合国和某些东南亚国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请他们提高警惕。梭发那·富马回答说，他们高度评价对他们的关心，感谢提醒。他们明白，这是反对老挝的阴谋，如果在日内瓦谈判中遇到这些问题，则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

至于扩大国际监督和观察委员会在老挝的权力的要求，按照梭发那·富马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在建立国中之国或是向中立国家提供在老挝的特权，所以梭发那·富马对这个问题看来将采取否定的立场。

周恩来指出，在老挝问题上，现在有3个基本问题：

一、保障在老挝建立联合政府——首先达成成立政府的协议，而后着手组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老挝联合代表团。

二、签订在老挝实现有效停火的协议——首先达成成立老挝三方委员会的协议，在此之后确定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周恩来强调指出，才能够保障在老挝实现真正停火。

三、下一步奉行这样的方针：日内瓦会议只有权解决老挝国际方面的问题，而其国内方面的问题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

关于这些，周恩来说，已写进赫鲁晓夫同志同肯尼迪会晤的公报中。所有这一切，周恩来总结说，我们今天想在同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会谈时进行讨论。

周恩来问，我们是否想会见两位亲王(看来，他指的是邀请亲王去苏联大使馆或我们去拜会他们)。我们回答，这要看两位亲王在北京逗留的时间(6月5日晚我拜会了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于他们下榻的国宾馆，即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节日下榻的房间)。(会见情况已通过电话报告)

这时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的飞机抵达了，周恩来中断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司长于湛、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人员方祖安。苏联方面有：大使馆一等秘书Г.Х.格鲁舍茨基、三等秘书Б.А.索罗金。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532—3537页

№1373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

按照中央指示，我在今天晚上9点钟见到了周恩来。他说，毛泽东不能接见我了，因为一个月以来一直有咽喉炎。刘少奇被派以任务要准备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的报告。刘少奇现在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专门去写这个报告了，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他被判服苦役，是我们的奴隶了”。

我首先向周恩来祝贺中国共产党建立4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说，并说他们已经决定不搞大规模庆祝，只开一个纪念会，发表一个报告。似乎是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他又补充说，国内情况比较严重，有一场旱灾，情况比去年更糟，遭旱灾的省份还在增加。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很显然，今年要比去年减产1000万吨，去年夏收是3000万吨，而今年将只是2000万吨多一点。

我问了一下粮食的计划。

周恩来说，只是就夏收而言，今年的计划是要达到去年的水平。夏收在全年粮食收成中占有很大份额——五分之一。去年收获1.6亿吨谷物，根据夏收的情况，估计今年很难达到去年的程度。

他继续说，一些农村地区春播都还没完成，特别是在中部省份，如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江苏省，由于干旱，那里的水稻种植一直没完成。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那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但

由于干旱没能开始播种。在那些可以依靠机器供水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而在没有机器的地方要困难得多。况且，很多井里根本就没有水。

据气象局天气预报说，7—8月份北方将有大雨。而现在，长江以南地区却是雨量太多了。

我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告诉我，他们正在计划增加抗旱作物(如甘薯)的面积，也在采取其他措施。

他提到，一些兄弟国家在自然灾害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工作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同意了这一观点。

我进一步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递交一份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速记记录。指出这些谈话的要点后，我把材料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表示感谢，并说，“西方对维也纳会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消息我们不必认真对待。”周恩来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其他看法。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我对周恩来说，因为我7月初将回到莫斯科，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我们可以谈一些问题。他同意了。

我说，我对各省和地方单位所做的落实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大量工作有良好的印象，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告诉我一些最近会采取的重大措施，特别是有关明年国民经济方面以及对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评估。我问，除了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外，中国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人民公社。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已经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很明显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中央委员和各省领导人参加)，讨论了国内问题。

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计划，分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四个阶段。现阶段的目的“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一些比例失衡问题”，也就是重新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

周恩来说，有必要说明一下比例失衡的原因。在客观原因中必须指

出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的下降。这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到主观原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并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基础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既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新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周恩来继续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工作中存在很多漏洞、缺陷和错误，并因此受到了惩罚。

周恩来又提到，这种情况(缺陷和错误等)不只发生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也同样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我们借用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但我们还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因为任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新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困难和失误。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原因。我们所做的截然不同于剥削阶级，他们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我们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们也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原因”。

周恩来说，还必须指出，我们的干部过分满足于三年里的成就，因而造成了他们工作中的疏忽和不足。工作中的不足去年已经暴露并开始纠正，此后，干部们很快地了解了这些并去努力改正他们。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方面，即使取得了胜利，如果不加注意，它就包含了错误和不足的萌芽。如果犯了错误，工作因此受损，那就应多加注意，消除这些不足。马克思和列宁都谈到过：“胜不骄，败不馁。”

周恩来说，要完全掌握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的，理论总要是由实践来检验，一个人应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知识。这个原则既适用于作为整体的阶级，也适用于单个的工人。他补充道，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关于中共成立40周年纪念的报告中予以体现……

他说，他想强调一点，他们正计划把对干部和党组织进行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按中国俗语说，这个思想可以用“三字经”来表达，就是：“领导之，培养之，教育之。”

要达到任何政治目标都只有依靠各级干部，干部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目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传达给人民群众。你们已经积累了44年的经验了，我们才刚刚12年。

我开玩笑说，加在一起已经56年了。

周恩来友好地回答说，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苏联的道路，因此，仅仅用算术的方法相加是不行的。

周恩来继续按他的思路说，民主革命他们用了28年。在这期间，对干部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自从革命胜利至今仅有12年，因此在培训干部方面做得还不够。

一般地说，我们可以借鉴兄弟国家的经验，但必须要注意特殊性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学习。并且这种经验有两方面：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我们很有必要迅速地总结这些经验。

我说，作为领导干部没有这种能力是不合格的，我又说，仅仅有方针是不够的，有必要把它制度化。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按他的思路说，仅仅靠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校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干部深入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对干部的培训反馈到具体的实践中。他简短地结尾说，他们正在做先辈们从未做过的事业。

我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说我想谈一点。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地方，有过很多的谈话，也有很多的观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地方干部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实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基本上他们都对所负责的事情了解甚少。我也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或许可以算是整个国家和这个党的建设性意见：为这样的干部开办一些专门的学校，让他们有机会接受专门的知识训练。我还介绍了一些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经验。

周恩来说我说得很对。他还接着刚才的思路说，这12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相互交织。因此在很多单位，同志们对学习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也表明我们对他们教育得不够。在这一点上，周恩来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12年来，他一直是总理，但他所谈论的政治问题远多于实际问题。他说，他刚才说的是很诚恳的。

我说周恩来同志很谦虚。

他重复说，他一直都在诚恳地谈话。然后周恩来说，对他而言，经

济建设的主要趋势和主要方面还不太清晰。要把握这些，理解这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继续说，他们往往不能事先预见，而是在工作过程中才会逐渐地了解总体趋势。他说，显然，中共不得不经历这样的过程。

会谈期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告诉他，我们将和朝鲜签约。周恩来说他们衷心地祝贺苏朝签约。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又就勃列日涅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征求了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邀请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提出的。我谨慎地利用了一个恰当的时刻(当话题转到有大量政府代表团互派和许多外国客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很快就会接到通知的。

谈话期间，周恩来说，为了与中共中央的邀请相协调，有10位中国同志计划到苏联去度假。但他又说，中国主要领导人不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因为他们忙于国内事务，无法抽身。

比如，周恩来就他个人而言，在大跃进三年间从未有过度假，即使在1959年他生病之时。

谈到这里，他告诉我，上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决定就是，为健康考虑，让我每天只工作半天。但我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我说，他在有意违反这个决定，并且以后也不会遵守它。周恩来说，很不幸，这是事实。

这次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第一局负责人叶护生，中共中央译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大使馆顾问O.B.罗满宁和Φ.B.莫丘利斯基列席了会谈。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п.466, д.8, л.119-133

№20280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1年8月1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的会谈记录

皮聪大

1961年8月17日

在互相问候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向胡志明同志阐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 [61] 的情况。

胡志明：西方会同意就德意志问题进行谈判吗？

赫鲁晓夫：西方大国还没有给出官方的答复，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将同意进行谈判。当然，这还只是预测。但谈判无疑会进行。我们为西方大国做了准备，为此准备了所有的手段——说理和大棒。

胡志明：为什么肯尼迪要为军需补充拨款？

赫鲁晓夫：帝国主义者同样试图利用大棒政策对付我们，他们想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给加强军备竞赛的拨款中，他们赚了不少。

胡志明：用这样的办法他们会花很多钱。

赫鲁晓夫：只有美国会花钱。英国和法国不会在这件事上花钱的。

至于我们，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任命了科涅夫同志为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总指挥，我们关闭了西柏林边界，并开始控制边界。这些措施对西柏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统治集团神经过敏，吓坏了。同时他们威胁解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协定。作为回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如果贸易条约被废除，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采取对策。可以认为，西德不会解除贸易协定。可以告诉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如果西德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很合适的方式予以回应。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将封锁西柏林，什么都

别想运进城市，什么也别想运出来。

胡志明：西方国家可能会利用空运。

赫鲁晓夫：从柏林向外空运成品和向柏林空运原料太昂贵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胡志明：如果完全封锁，西柏林的人民会遭受痛苦。

赫鲁晓夫：当然，西柏林的工厂要留下。切断贸易协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同志没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时把自己的经济从西德的控制中拔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德正在详细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封锁的计划。但是我们不会遭受痛苦。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将带来相当的损失。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将做一切来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摆脱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依赖。我们建立了专业后备军，为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拨了外汇。但是，有可能不封锁。假设西德宣布封锁，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未必会支持。生活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真的。为了不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旨意，西德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西德的工厂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以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订货生产产品给我们正在贸易的国家。常言说，资本家为了赚钱，不惜一切。

胡志明：关于最基本的问题——战争与和平，情况怎样？

赫鲁晓夫：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中国的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将来就会存在战争。确实，这最初并不是中国同志提出的，而是列宁提出的。我们赞同列宁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战争的必然性。当前，我们认为，爆发战争的现实危险大约是3%—5%。但战争可能突然爆发，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关于这点我在维也纳与肯尼迪谈过。今年7月27日，肯尼迪在电台和电视台作了演讲之后，我与约翰·麦克洛伊进行了交谈。 [62] 我对他说，实际上在这个演讲中，肯尼迪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他说，如果我们签署对德和平协议，那么就将爆发战争。我对麦克洛伊说，美国总统的这个挑战，我们接受。和平协议将会签署。但如果

美国对我们发起战争，那么，肯尼迪恐怕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麦克洛伊意识到，肯尼迪谈的不仅是战争，还有谈判。

西方大国起初想要威胁我们，但认识到这样的策略不会给他们带来成功。我再次重申，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被百分之百排除。帝国主义者可能把战争强加给我们。不久前，在和阿斯托明·范范尼的谈话中 [63]，我对他说，苏联和美国领土上不接壤，因此美国可以利用洲际导弹和我们打仗。但是美国在这个领域比我们弱。他们应该在冒如此大的危险之前好好想想。在与我们的战争中，美国首先将利用自己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基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打击基地，那样，这些国家将什么都不剩。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的政府不想战争。不希望战争的还有阿登纳。关于战争他比所有人都叫得欢，但是自己却害怕战争。前不久，西德军事部长施特劳斯说，不会有战争，谈判即将开始。我们的反应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恐惧，这就引起了他们要求加强军事的呼声。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胡志明同志，苏联最近决定恢复核武器试验。

胡志明：如果美国不进行试验，苏联会开始原子武器的试验吗？

赫鲁晓夫回答说，这样的试验苏联将在任何时候开展，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胡志明：关于日内瓦禁止原子弹试验的会议怎么办？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恢复原子武器的试验，因为西方大国提出裁军问题的立场。我们建议他们和平，但他们用战争威胁我们。这个威胁并不只是与柏林有关。他们正在威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义务做出相应的结论，并提高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组织由我们的科学家建议的新原子武器的试验，那么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签署裁军的协议，解决关于禁止原子弹试验的问题。很快将公开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在文件中我们将宣布，既然西方大国不想裁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积累新武器，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武器试验。我们试验原子弹，它们的能量相当于1000万、2000万、3000万、5000万吨和1亿吨炸药。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者的组织，看来都将反对。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人民应该给自己的政府压力，强迫其在裁军方面做

出真正的行动。此外，我们指出，法国不考虑联合国的决议，继续试验原子武器。关于这个问题我昨天在基辅与考涅楚克 [64] 同志谈过。他来到莫斯科，与约翰·别尔纳 [65] 会见，并秘密告诉他，我们恢复了原子武器试验的计划。

此外，这几天我接见了南斯拉夫大使，也和他说了我们恢复原子能试验的计划。我请他秘密告知铁托。

胡志明：这样帝国主义者就都知道了。

赫鲁晓夫：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很快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中立国家大会。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计划，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委托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把我们关于核武器试验的文件在其发表前1—2日内交给所有中立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可能会谴责我们。但是，最终他们应该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能在和平主义者那里得出结论。为争取和平应该进行积极的斗争。问问为什么法国可以继续试验，而他不被谴责？

有可能我们会被指责说，我们让环境被放射性物质包围了。但是我们，俄罗斯人，有一句谚语：“割掉脑袋，就不会为头发哭泣。”帝国主义者已经准备好战争。我们应该采取足够的手段适当地回应他们。你们会看到，帝国主义远不是纸老虎，他还可能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社会主义现在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应该而且即将拥有可以给予侵略者反击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胡志明说，他完全支持这个立场。

赫鲁晓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必须签署对德和平条约。只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比谁喊的声音都大，反对帝国主义者，但事情真来了，就后退了。在华沙条约国的大会上，谢胡和霍查派来的人不能全权处理关于签署对德和平协议的问题。这不是要求的级别。自然，阿尔巴尼亚人被告知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对中国同志在会上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立场非常惊讶。他们坚持要我们承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权力，或者至少让他们签署公报。在会议上，我询问了作为观察员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你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刘晓同志回答说，这问题是诬蔑。

难道这是诬蔑吗？我向刘晓同志说明，如果他们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请求的做，那么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如果是自己的想法，阿尔巴尼亚不知道，那么这将带来很大的争执。假设我们在会议上通过，让阿尔巴尼亚签字，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可能会问，他们凭什么签字。

在休会期间，刘晓同志走到我面前，对他粗鲁的表达方式表示歉意。我说，那些粗鲁话是当众讲的，现在是单独道歉，这不行。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立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支持可能不会这样表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他们在保护中国——这很可笑。中国是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大党，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不需要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对于他们也没有任何人会去进攻。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很不聪明的无耻之徒。在自己的行动中，他们利用了直接的强盗方式。自己想想吧。他们实质上就是消灭了政治局所有老的成员，他们的能力没有引起怀疑。谢胡自夸说，他亲手枪毙了科奇·佐泽 [66]，并将他的尸体埋葬，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墓在什么地方。在不久前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谢胡说了大概下面的话：“谁批评我们的路线，我们就打他的嘴巴，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将让子弹穿过他的脑门。”这就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理解的为巩固自己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难道这与列宁为加强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最紧要的时期，我们的党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他们的行为就像叛徒，把起义的日期透露给了敌人。但是列宁没有枪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将他们开除出党。还有托洛茨基的历史。列宁掌握所有的理由和惩罚他们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明白，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则用恐怖的方法对待诚实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不允许用这种强盗方式为获取统一而进行斗争。

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过高评价了斯大林。他们经常过分赞扬他们的工作方法。斯大林唯一的错误，阿尔巴尼亚人认为是，他没有在肉体上消灭哥穆尔卡。不客气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不想与他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发罗拉我们的基地扣留了4艘潜艇、军舰和其他军用器械。难道这样可以吗？谁需要这样的军事基地？是所有社会主

义国家!它是针对谁的?是针对美国第六舰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瞧不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共安全利益。他们失去了基地的活动能力。而且,他们幻想得到所有的12艘潜艇,但没有成功。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我们的潜艇?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要知道,如果这些潜艇在阿尔巴尼亚人的手中,那么将在第一场战斗中被美国人击沉。

我认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从华沙条约中分离出去。实际上他们是效法铁托。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和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需要从这些国家获得贷款。

有人问,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做了什么不好的,为什么它的领导人这样攻击我们?要知道我们为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做了一切。当我们签署华沙条约时,我们这里有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加入。他说明了理由,不应该在美国人想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为它战斗。我反对,并批评了莫洛托夫的这种立场。当时我说,应该声明,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侵犯,我们会保护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忘记了这些,对我们忘恩负义。

我们公布了党纲的草案。里面有我们的立场、行动纲领和所有重要的问题。不同意的人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在一个党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更何况在不同的党派中有所议论。但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问题上,应该是坚如磐石的团结。这样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的基本原理上。

不久前,谢胡和霍查给我们寄来了令人憎恶的信件,我们准备好回复。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厚颜无耻极度惊讶。他们侮辱了我们,还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当然,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政治强盗的手段。而强盗应该总是比被他抢劫的人实力更强,否则他们将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小猫是吃不了老虎的。

鉴于目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将不援助阿尔巴尼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重新考虑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协议。与他们的贸易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样的关系已经在我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我们与南斯拉夫签署了贸易协议,根据这个进行贸易。我们卖给他们武器和其他商品,他们请求给予他们优惠,但我们拒绝了。我们告诉他们:不愿意,就别买。南斯拉夫支付给了我们很好的商品。这对我们很有利。

阿尔巴尼亚给资本主义国家好的商品，而给我们的则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需求的东西。我们给了他们贷款，之后又不得不将它们取消。我们表现得像个大哥，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却很卑鄙。如果他们认为与我们的友谊不重要，那么我们没他们也行。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残忍地镇压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贝利绍娃。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给我们叙述了与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是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进行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贝利绍娃同志和我们说的内容告诉了他们。当时正在莫斯科的M.谢胡听到我们的通告之后立刻回到地拉那，镇压了贝利绍娃同志。这时我们才明白，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这就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行为的评价。我们可能会与阿尔巴尼亚保持国家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下面的事实值得注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有关我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谈话内容。我们委托我们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通知D.霍查。但是D.霍查不想接见苏联的大使，而是委托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个部门的领导人来接见。而且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的想法。苏联政府指示地拉那的大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阿尔巴尼亚的官员接触。

胡志明说，他很荣幸有机会见到赫鲁晓夫同志。他在苏联待了快一年。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苏联发射了载人宇宙飞船“东方1号”和“东方2号”。苏联共产党公布了计划方案。非常好的是今年苏联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同样很高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所有委员都很健康。

主要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让我不得不来到苏联，胡志明同志说。这次出行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并不想保护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最近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还是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如果阿尔巴尼亚宣布

退出这个团体，那么我们将被烙上污点。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是社会主义人民家庭中最小的一个。苏联是社会主义家庭公认的首领。如果遵循家庭的感觉，那么大哥应该帮助小弟，保护他，原谅他的错误。如果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中分离，那么他很容易被帝国主义者吃掉。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将遭到灾难。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犯的错误而让整个民族来承担吗？

我们的国家越南和越南劳动党都很小。从地理状况的角度，我们与阿尔巴尼亚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身边也有敌人，想把我们吃掉。如果我们有一分钟对别人说，苏联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祖国将会发生什么呢。

无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犯了错误，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并没有错。您可以接受这样的意见，就是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同时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状况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达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坚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空前的成功，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国家的成功，国际无产阶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上，唯一的污点就是阿尔巴尼亚问题。

我不想成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辩护人，但是我想站在这幅伟大的画卷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边。

大哥可以原谅小弟的愚蠢行为。我们知道这很难。在巨大的海洋里可能会有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您，建议宽容。我只想一件事，就是让整个成功的画面上没有污点，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会因为糟糕的领导人而遭受灾难。也许，我成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的辩护人。但是我相信大哥的伟大。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攻，用社会主义体系坚如磐石的团结给予抵抗。现在，当阿尔巴尼亚就像一只威胁到老虎的猫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老虎原谅了猫，它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赞扬。正是这一点使我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

赫鲁晓夫对胡志明同志在调节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复杂形势的正确认识表示感谢。但赫鲁晓夫同志说，可以提出我向刘晓同志提出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有请求您采取这样的措施吗？如果它没说，那要怎么办？假设我们改善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但是过

后他们又说，不想与苏联友好。那时我们将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

您的立场与基督教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教义很相似，当有人打您的一边脸时，就给他另外一边。

我们已经显示了很大的耐心，并且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反对我们的立场之后，仍然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鄙视与我们良好的关系，无耻地要求我们继续援助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蛮横无理。这简直不能接受，非常的不正派。要知道，就连普通人都会说，吃东西的地方不会脏。看来，阿尔巴尼亚现在的领导人不明白这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出应有的认识，把侵占的武器——潜艇还给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和他们关系正常化。事情最终不是这些武器和潜艇的价值问题。说到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很气愤他们的无礼行为。他们轻视了我们的友谊。他们的行为无异于海盗。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占了我们的财产而痛苦。在他们没有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最起码要求去做之前，我们是不会援助他们的。我们和阿尔巴尼亚说过，鉴于华沙条约的利益，需要保存发罗拉基地。这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很有用。但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惜一切去除掉基地。这是为什么？

以前我们在旅顺港有基地。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决定离开那里，尽管毛泽东同志说服过我们留下，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可以抵挡美国人。我们成功地让中国同志相信，在中国遭到侵犯的时候苏联总会援助，这个基地我们不需要。现在，众所周知，我们在旅顺港没有基地。

我们在芬兰也有过基地。与芬兰有关基地的问题没有争论。我们自己清除了波卡拉岛上的基地。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要清除有利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和中国同志的行为非常相似。当时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为了监视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尤其是潜艇舰队。毛泽东同志说，这不可以，因为这样的建设损害了他们国家的主权。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立场不是国际主义的。如果中国为了与帝国主义战斗需要在摩尔曼斯克或者苏联领土的其他什么地方建立某种军事设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欢迎。

如果阿尔巴尼亚确实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他们应该满足我们的条件，也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条件。他们要为发罗拉军事基地

的活动创造正常的环境。我们可能再次把自己的潜艇舰队派过去。这将是巩固我们友谊的良好行动，基地将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服务。我们并不反对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请试试说服他们。但我想，他们不会同意。

您说，因为谢胡和霍查的错误，令阿尔巴尼亚人民遭受了痛苦。我们同意这点。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藐视与我们友好的政府首脑来援助人民，因为这可能会被我们的苏联人民误解。我们深切真诚地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民，但是我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不关心自己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长久存在。

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死后重新出现了列宁永垂不朽的名誉。在斯大林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两面。一方面，我们认可并尊重他，另一方面，我们谴责他。但是我们可以将谢胡与斯大林相比吗？这简直就是将矮子和巨人相比。

还需要补充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去影响阿尔巴尼亚。至于您的想法，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大概不会买账。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以前和现在都主张团结，不把个人怨恨放在首位。如果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真的想与我们改善关系，那么就自己来说。他们应该表明自己对改善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渴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接近。

改善关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归还我们的财产和协调发罗拉基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不回到基地。但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财产。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鼓励海盗行为。

还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清晰地反映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特点。在阿尔巴尼亚同意的前提下，为了带走苏联在发罗拉基地工作的人，我们的船进入了他们的水域。对面来了阿尔巴尼亚的军舰，让我们的船停下。为了威胁，阿尔巴尼亚人将大炮瞄准了我们的舰船。现在阿尔巴尼亚不承认这个事实了，但是我们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拍摄了下来。这就是小弟怎么对待大哥的。

胡志明：我还远不能信奉基督教的原则，“当有人打你的一侧脸，给他另一边”，但是在家庭中有最小的弟弟，有时不听话，就是因为他小。

赫鲁晓夫说，农民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教育儿子，当他还不明白自己行为的缺陷时把他“痛打”一顿。当然，这里是另外一码事。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这是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阵营事态负责的不仅是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试图破坏兄弟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胡志明：如果阿尔巴尼亚同志听我们的话，他们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想，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做一个调和者。尽管我几乎确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理解我。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意见。在莫斯科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由我们发起组织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会晤。但是他们不想听我们的，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我当时很想追过去和他们说句矿工的骂人话，但是忍住了。大哥的地位要求这样做。

同样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热情地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提供了住宿，但是他们并不想接受我们的殷勤招待，事实上跑回了自己的使馆，为的是不在我们的房顶下居住，不吃我们的食物。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会下毒。他们这样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侮辱。在此之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谢胡的身份遭到了质疑。他是艾哈迈德·索古 [67] 的军官。巴卢库在意大利侵占时同样是军官。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是相悖的。不排除，他们不是那些可以暴露自己的人。到他们那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会说出他们想要什么。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于一些重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在国内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果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永远将是“旱和涝”。我们在1930年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领导农业。结果是十分凄惨的。

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在建设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没有支持他们。看来，现在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将认识到建设公社这一路线的错误。中国同志想要越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整个阶段，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这样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农民说，超出自己力量

的事是办不到的。我很愉快地阅读了我们驻朝鲜大使的电报，其中包括金日成同志去中国行程的信息。毛泽东同志在与金日成同志的谈话中说，你们朝鲜的情况很好，你们没犯错误，而我们犯了。

去年在我们的国家，在一些集体农庄里消除了物质奖励。我们得知这件事，干预了，改变了状况。我们要求集体农庄严格遵守物质利益的原则。

谈话就在这里中断了，因为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的到来。

中饭之后，赫鲁晓夫同志秘密地给胡志明、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看了苏联驻罗马大使的电报，其中他提到与范范尼的谈话。

关于范范尼出行莫斯科的要求，赫鲁晓夫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意外。我们甚至没有想过邀请他。但是当我们知道，范范尼想在巴黎的西方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到达莫斯科时，我们认定，他不是出于自己意愿到来，而是作为西方大国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个人代表。这个事实范范尼自己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演说中已经承认。

在莫斯科，我们和范范尼举行了非常公开和有意义的会晤。我们对他说，我们将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协调西柏林问题。西方大国因为柏林的事用武力威胁我们。但是战争首要的受害者就是西方大国本身。所以和平解决符合他们的利益。范范尼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刚刚读过的电报证明了西方大国试图用和平途径调解德意志问题的意愿。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已经威胁了3年，要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什么措施也没采取。这样的话可能是一点也不懂政治的人说出的。实际上阿尔巴尼亚的指责是具有挑拨性的。要知道，需要迫使西方大国同意研究德意志和平条约问题，要为它的签署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这就占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现在这样的条件都已具备，什么都不影响我们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

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应该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我们手上拿到的秘密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意识到了协调德意志问题的后果和影响。实际上，问题是要消灭在西欧由帝国主义者建立的整个侵略集团体系。首先要证明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是不需要的。

德意志问题的协调将在西欧建立一个全新的局面。历史有这样的例子。在战前，未必有人希望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样的条约却签署了。这样的转变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现在未必可以推测西德敢于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他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同时，他又足够强大为自己的西方邻居改善地位。现在欧洲主要的复仇主义者就是西德。在这方面值得西方大国思考。

从电报上还可以看出，我们对梵蒂冈的措施收到了正面的效果。我们需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利用各种力量，梵蒂冈也包括在内。

胡志明、M.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会晤。

胡志明请求赫鲁晓夫可以再次接见半个小时，用以结束一些问题的讨论。

赫鲁晓夫同意了他的请求。时间再商量。

АПРФ, ф.3, оп.64, д.560, л.140-165

№20281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1961年8月19日)

皮聪大

1961年8月19日

胡志明向赫鲁晓夫接受1961年8月17日的会见表示诚挚的感谢。胡志明说，这次会晤使我明白了很多有关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在河内我们有过这样的想法，战争存在的可能性现在大约是45%。但是您的关于战争可能性只存在3%—5%的声明，是非常令人安心的。

不久前，美国的副总统约翰逊到了南越。在他的访问之后，在北越的破坏活动加强了，经常被派到那边的是间谍和破坏者。不久前，我们迫降了一架在我们领土上美国制造的敌机，抓获了一些伞兵和间谍。

赫鲁晓夫：肯尼迪把派到社会主义阵营的间谍叫做“游击队员”。美国人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以前和现在，在南越、老挝和朝鲜正是采

取着这样的方式。他们想用同样的办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游击队员之所以可以生存和活动，是因为有了人民的全面支持。也许，被派来的间谍可以在这样的国家找到一点同情和支持，比如匈牙利、波兰、中国。但不包括我们的国家。

胡志明：现在在南越，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涨。农民对我们的党有好感。还是在抗战时期，在这些地区我们党就给了农民土地。吴庭艳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从农民手中抢走了这些土地，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在南越的一些省，吴庭艳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南越的形势与南朝鲜的形势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在南越，我们拥有强大的秘密的党组织，有农民的支持。今年初，南越建立了民族战线，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尽管南越的美国傀儡政权吴庭艳执行白色恐怖，革命运动还是日渐增长。实际上吴庭艳的追随者已经消灭了很多共产党人和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吴庭艳执行的白色恐怖带有禽兽的形式，就像希特勒时代：吴庭艳的人砍人的脑袋，挖出眼睛，切开受害者的肚子。几乎每天吴庭艳政府都要向南越的省派遣讨伐队。所有这些更加激发了农民的革命运动。除了在1954年力量重新配置之后南越剩下的共产党人，我们正在向南越派遣新的同志。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胡志明同志说。我是否可以在回到莫斯科后通过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转达下面的话：

“今年8月17日，在秘密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苏联提出以下三个条件缓解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苏联要求阿尔巴尼亚归还还在海军基地非法占有的4艘潜艇。

二、苏联不想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海军基地，尽管这样的基地可能会促进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提高。

三、苏联已经准备好接见权威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协调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上的其他问题具有全权的代表团。”

赫鲁晓夫说，基本上同意这些条款。但是，他强调，如果阿尔巴尼亚派来三级的人物，那么不仅是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其他成员都不会和他们谈判。在与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谈话时可以

说，会晤只可能以最高级别进行。

胡志明：需要要求代表团的首脑是谢胡和霍查吗？

赫鲁晓夫说：就是这样，或者是谢胡，或者是霍查，或者两人一起。没有谢胡和霍查根本什么都不能解决。如果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确实想改善和我们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应该派这样的人来。如果他们想玩两面派的把戏，那么我们不会和他们谈判。

在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中，霍查是最聪明的，谢胡是个意志更坚定的人。如果谢胡不愿意，那么霍查就不会来苏联。阿尔巴尼亚现在正在执行谢胡的政策。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那么请向安德洛波夫同志要一份现在住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件。在这封信中他解释了逃离阿尔巴尼亚的原因。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毒死了他的哥哥；他得知在谢胡的领导下，在霍查的参与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大的团体决定同时也将他毒死。因此，他跑到了南斯拉夫，并且现在请求到我们这来。看来，要答应他来苏联了。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苏联干涉了阿尔巴尼亚的内政。这方面可以引用我们的信函，里面我们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处决原政治局委员——怀孕的妇女里拉·盖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个决定是残忍的。因为就算是在沙皇时代，国家也没有处决过怀孕的妇女。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收到我们的信函，并没有引起注意，并且枪毙了里拉·盖卡，只因为她不同意他们有关局势的看法。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突然决定反对我们？想对您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中国得到允许的。近来中国领导人为贬低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没少做努力。他们开始在我们的政策中找毛病，开始给我们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他们把自己的打击投向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问题是在影射苏联，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像个笨蛋，上了中国人立场的当。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需要在南斯拉夫身上耗费太大的精力。这对于它来说实在是太大的荣幸。苏联共产党批评南斯拉夫，但是适度，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会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会。不应该抬高南斯拉夫修正

主义者的身价。我们批评南斯拉夫，有自己的途径。这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大怒。当我们减少对南斯拉夫的注意时，美国人开始减少对它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现在是这样描述事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灾难和危险都来自南斯拉夫。这是不对的。由于中国同志的错误，共产主义运动也蒙受了不少损失。毛泽东同志的自大狂妄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消极作用，他认为，他在历史中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当今，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难占据自己的位置，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广大群众的思想结晶。斯大林死后，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形势变差了。事实上，情况是有了好转。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里加入非常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同志。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以及其他，无疑比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加了解。当前，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是不容置疑的、完全的权威，都不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为兄弟党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党。现在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关系，起重要作用的是民主。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赞扬斯大林。但我可以以绝密的程序告诉你，正是斯大林当时建议铁托，让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共和国。关于这一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知道。现在阿尔巴尼亚人夸奖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公布了这个文件，他们会说什么呢？当然，我们不会公开这个文件，因为它见证了斯大林的错误。顺便说一句，同样，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也说了关于朝鲜的问题。现在有人想模仿斯大林。但现在已经是不同的时代。

我想，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您应该和毛泽东同志谈谈，因为，老实说，有关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问题将不会在地拉那解决，而是在北京。

胡志明：我在北京停留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或者刘少奇，我可以对他们说，赫鲁晓夫同志为了协调阿尔巴尼亚问题建议胡志明找中国同志谈谈吗？

赫鲁晓夫：当然，我同意，但我想提醒您，不需要向中国同志以信任的方式转述所有的，因为这不会促进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接近，而是会增加现有的分歧。而我们希望消除与中国领导人的分歧，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良好、坚固的友谊。我们应该看到在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力量的统一是主要的。

胡志明：完全同意这样的安排。

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几乎搞坏了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除了和他们最相信的中国。因此，中国同志的声音就成了决定性的。赫鲁晓夫同志接来说，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不要胡志明同志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采取任何步骤以影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胡志明说，希望通报一下老挝的情况。在老挝现在存在三个党派：梭发那·富马、布恩·乌姆和苏发努冯的追随者。梭发那·富马知道，没有巴特寮的力量，他是不可能得到政权的。但是他害怕巴特寮日趋增长的影响。苏联、中国和我们支持梭发那·富马和巴特寮。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帮助老挝。但是主要的援助来源于苏联和中国。现在梭发那·富马不满意，说大部分给老挝的援助都到了巴特寮那里。巴特寮的领导人也不满意，因为给老挝援助的一部分给了梭发那·富马。

我们想给巴特寮援助，并组建1万人的军队。但是巴特寮的领导人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们想拥有一支2万人的军队。在我们看来，如果组建2万人的军队，老挝朋友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当我们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当回到自己的国家，则又是另外的一套做法。我们认为，老挝需要1万人的军队，建立坚固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统一战线并加强群众工作。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希望全力强化苏发努冯的权威。苏发努冯是巴特寮力量的旗帜。他去了日内瓦，去了莫斯科和北京，赫鲁晓夫接见了，苏发努冯是成熟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我们同样援助我们的老挝朋友。在我们看来，老挝朋友对极端虚弱的群众工作估计不足。巴特寮的领导人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建立武装力量上。

现在我们在老挝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梭发那·富马希望为自己保留在这个政府中主要的部的职位。另外，由于老挝朋友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干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巴特寮的领导人认为，我们影响了他们与苏联和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最后，胡志明请赫鲁晓夫就老挝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赫鲁晓夫：我并不完全了解老挝国内的局势。现在德意志的问题比老挝的问题更重要，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些看法。

我们支持老挝的爱国力量，支援他们武器并给予其他援助。

有一个问题，把希望都建立在巴特寮身上的条件成熟吗？巴特寮可以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并完全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们认为，这样的条件还没有。当前在老挝，最主要的人物是梭发那·富马。很清晰，他比苏发努冯离我们更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但需要明白的是，帝国主义者把巴特寮的军队看作是共产党的力量。如果现在我们武装巴特寮，他的武装力量将比梭发那·富马的力量强，那么我们将要准备老挝的战争。世界上不会有一人同意把巴特寮政府看作中立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老挝需要执行更灵活的政策，首先就是支援梭发那·富马。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英国政府，还有国王，都把他看作中立的角色。我们对梭发那·富马将执行中立的政策有信心吗？不，梭发那·富马——是个动摇的人。现在他已经比怕帝国主义者更害怕我们。尽管如此，暂时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梭发那·富马。他的政府应该是过渡的。这个政府里当然应该包括巴特寮的代表。同时，巴特寮也要加强群众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如果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得到的武器多，那么后者将离开我们，与布恩·乌姆联合对付巴特寮和我们。这样对我们不利。由于我们对梭发那·富马的援助，他巩固了自己在老挝的地位。现在是这样的局势，他们只相信我们一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救药。你们给巴特寮更多的武器，威胁到了柬埔寨。我们认为，巴特寮应该从梭发那·富马政府得到在整个国家的群众中合法工作的条件。应该让苏发努冯明白，他目前应该在自己兄弟的保护之下。

胡志明：迄今为止，苏发努冯对梭发那·富马有很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不需要为梭发那·富马的不信任和离开我们找借口。这是没有远见的政策。如果我们给苏发努冯更多的武器，那么梭发那·富马就会向美国人要武器，而现在他向我们请求武器。我们帮助摩洛哥的国王。把我们和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期望。我们同样支持纳赛尔。纳赛尔——共产主义的敌人，他把共产党人关押在监狱

里，他把英国人从苏伊士驱逐出去。这很重要。如果我们停止援助他，那么它将落入美国人手里。

梭发那·富马应该被我们利用，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他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我们不能让他转向美国一方。美国为了利益去调解梭发那·富马和布恩·乌姆，并利用苏发努冯，使梭发那·富马失去武器，你们就成了美国的帮手。必须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为了老挝，给越南送去了武器，你们进行了分配，但是分配的不对。应该纠正。

胡志明：现在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掌握着更多的军队。他们之间的比例是5：1。

赫鲁晓夫：这是数学的角度，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它完全是无用的。研究政治现象不能用数学的角度，而要从政治的角度。现在越南同志所做的，吓到了梭发那·富马。因为这样的政策，我们几乎失去了他。

胡志明：梭发那·富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贡勒代表的是谁？是梭发那·富马的力量。但越南同志没有给贡勒武器。

胡志明：贡勒实在太年轻。是的，他认为梭发那·富马是动摇的。他向越南领导人请求，帮助他建立自己的政党。

赫鲁晓夫：贡勒给梭发那·富马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不是共产党人，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果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话，就应当支持他。卡斯特罗同样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将会成为共产党人。不过，这样的过程不需要加速。卡斯特罗表达了要来苏联的意愿。我们对他说，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就让他在国际社会的眼里继续不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同样需要利用贡勒。在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以后局面改变了，他们成了执政党。巴特寮也应该走这样的路。

胡志明：我们建议老挝朋友帮助贡勒，但是这样做要非常小心，以免吓到梭发那·富马。接着，胡志明问，贡勒想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事是否属实。

赫鲁晓夫回答，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这并不合适。不需要

给贡勒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

胡志明同意这样的观点。胡志明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授予苏联宇航员Ю.А.加加林和Г.С.季托夫一级劳动勋章。他向赫鲁晓夫询问怎样更好地组织勋章的授予：是在莫斯科还是把他们请到越南去。

赫鲁晓夫感谢胡志明，并表明邀请加加林和季托夫去河内不合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出行将带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胡志明说，越南人民迫切期待着赫鲁晓夫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也许，这样的出行可以同时和对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一起进行？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我去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忙于准备出访和解决德国问题。等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时间多一些，到时候我们将讨论去越南访问的问题。但这不会很快。今年我本应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但没去成。再延迟这个访问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这个访问在未来进行。同时，顺便再去趟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当地看看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发展了农业。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面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向国外出售。

胡志明感谢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民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特别是大米。去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稻米收成很差，因此在居民供给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今年稻米的第一次收成还不错。关于第二次的收成情况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时在收获前十天还可能变糟糕。最后胡志明问赫鲁晓夫：还能给一些建议吗？

赫鲁晓夫回答，他不太了解越南。只想说：不要建立公社，在合作社建设中不要贪大求全。

胡志明说，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85%的农民家庭都参加了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平均有50—200个家庭。

胡志明再次对这次交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赫鲁晓夫同志身体健康。

谈话记录员М.波多利斯基、Ю.潘科夫。

№130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961年9月15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希望就以下这个问题与你们商量，在我们看来，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你们知道，在最近开幕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将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讨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向你们通报了关于苏美双方就这个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及苏联打算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采取的立场。在最近的谈判中没有出现任何特别重要的情况，尽管我们迫使美国人最终开始着手研究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这两天，麦克洛伊还向我们驻纽约的代表佐林同志转交了一份关于原则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立场做了让步，的确，是以最普通的方式，但仍然继续坚持确立对军备的监督。实际上他们目前新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证。但是，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机会，以使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关注的中心，因为，以前美国基本上是拒绝谈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这个话题的，现在它被迫最起码是在口头上承认了这个原则。自然，我们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情况，以利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现把美国的文件——关于原则的声明转交给你们，便于你们了解情况。

但是，我们认为，当前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涉及裁军的个别问题的某些进展情况，而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参加谈判和参加制定关于裁军的有关国际协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的提出完全是以前就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的结果。这个问题以其论据广泛和充分的形式提出，将意味着裁军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将把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你们大概非常清楚，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报刊中，尤其是在中立国家广泛的政治阶层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样的论点是绝对错误和荒谬的，根据这个论点，由于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抵抗，伟大的中国人

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在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目前，情况发展得更为有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来看，在美国执政当局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担心，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将很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前的路线。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和强硬地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平等参加裁军谈判和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美国人自然将会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那么，这将有助于加强中立国家和世界舆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们要求列入裁军委员会的6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6个加入了西方强国政治军事集团的国家，4个中立国家。

我们当然明白，美国及其盟友将会把我们的这个要求视为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会说苏联企图阻碍裁军谈判。也可能，我们的这个要求将会导致裁军委员会的成立被再次拖延，因而也就推迟了裁军谈判的进行。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提出裁军问题的政治结果，不仅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而且有利于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和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分子的斗争。

每一位思维健康的人都会很容易明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关于裁军这种重要的谈判的。在西方，包括美国，越来越经常地出现那种清醒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裁军谈判，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为这个建议进行辩护，我们将指出：如果居民人数少于50万人的联合国成员国，能够参加对裁军问题的讨论，而居民人数有6.5亿的中国，却丧失了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论点的荒谬性和不可容忍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论点是不能容忍的。

在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时，应该从世界现有的实际力量出发。而这意味着，没有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解决这个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如果坚持把中国排斥在谈判大门之外，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其理

由就是，你们看，美国执政当局不喜欢中国政府，那么，根据这个理由，可能，美国人也打算把苏联排斥在裁军谈判的大门之外吧？这简直是荒唐。在没有中国和苏联参加裁军谈判的情况下，能够出现什么样的裁军协议呢？由此而言，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将不会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联合国中拥有自己的合法席位，平等地参加讨论和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

我们坚信，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裁军谈判，同时伴随着要求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这将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并唤起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争取和平，争取裁军，争取和平解决早已成熟的国际问题。这将动摇帝国主义的阵地，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的地位。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我们打算将此问题作为重点向美国提出。

我们请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和设想通报我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4—976页

№13008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1961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认真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9月15日来信。在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美国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情况，继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你们信中阐述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裁军问题上的斗争策略，我们希望表达自己的如下意见。

一、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11年期间，美国一直是采取拖延讨论的方法，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现在，甚至美国自己也承认，这种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有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联合国大会本次会议上改变自己的战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企图提出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坚持把这个问题同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联系在一起。采用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误导人们的方法，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是继续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保留那里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便为制造两个中国和继续占领台湾创造条件。

我们已经注意到，葛罗米柯同志已经代表苏联政府向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联大会议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驱逐非法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在此，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苏联一直坚定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保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因此，必须把这个问题作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列入大会会议的日程中，正如苏联就此问题所建议的那样。新西兰笼统地提出所谓的中国问题，既没有谈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也没有提到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很明显，这完全是为上述已经指出的美国的阴谋服务的，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揭露。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联合国章程第18章第2款中已经谈到。某个国家政权的更替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联合国组织只能对此承认，而无权讨论，更没有权利去核准这个政权是否合法。在相反的情况下，这将对该国内政的干涉。这是联合国章程所不允许的。因此，美国企图把中国代表权利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不是程序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与联合国章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对此必须进行坚决反对。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单独问题进行解决，而不

应该把它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否则，就将无法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界线。企图把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与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捆在一起，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在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混淆真理与谎言，欺骗舆论，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揭露美国的这个卑鄙手段，不给它以实现的机会。

我们推测，在目前联合国仍然处于美国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资格问题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可能会单独提出表决。在这种情况下，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国家，将会占少数票。在我们看来，这种结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害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和谎言是完全清楚的，美国将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还将会明确看出参加表决的人的立场，这将有助于我们区分敌友。第二，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将与其他问题混合，并将其作为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最后使其变成未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就被混淆了，在表决时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欺骗。因此，参加表决的人所持的立场将不是完全明确的。自然，如果仅是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就会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其外部，那么，受到欺骗的国家也会逐渐明白的。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应该担心的不是暂时的少数票，而是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被混淆，这对今后的斗争非常不利。

二、关于裁军的问题。

在对于你们的关于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会议日程中的建议的解释函中，苏联政府指出，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严重地阻碍了在联合国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如关于普遍和全面的裁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对于说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迫切性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但是，我们认为，与中国参加裁军谈判问题一起来解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建议的那样，这是极其不合时宜的。根据上述提到的美国的战术，他们完全有可能建议，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提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拖延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合法权利将不会被恢复，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们仍然会留在联合国里，而我们则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反对美国的建议

的话，那么，后者就会利用这一点指责我们，说中国不愿意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很显然，这种情况将对我们不利。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匆忙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成员参加由联合国领导的裁军委员会，而同时联合国还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话，那么，将是更大的失策。在你们的信中还指出，美国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证。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形下，给美国施加压力的最佳方法，是让美国无法明确地知道，中国是否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这将有助于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斗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7—981页

№09881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 (1961年9月30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0月12日

第725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1年9月30日

受中央委托，9月27日我要求会见毛泽东。9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通知，毛泽东委托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当天，我同邓小平举行了会见。

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未接见我们作了解释，说“中央其他同志都很忙，正在接见国王”(这时在北京的有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比利时女王)。

我口头通报了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情况(据我们观察，他们已掌握情况)。听完我的通报，邓小平说：“坏消息。你们两国两党的关系达到顶点了吗？”

我回答邓小平说，从以前转交的信中他可得知，苏联政府已多次努力使苏阿关系正常化，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相反的步骤。他们最近的步骤给华约成员国的安全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带来了损害。

邓小平说：大家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该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

我再次强调，在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方面已多次采取步骤消除苏阿关系中的误解。例如，曾表示，赫鲁晓夫准备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他们，正如中国同志们所知道的，坚决拒绝这一会见。我补充说，我们不理解阿尔巴尼亚这种立场。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看了这一时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所有互相通信。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我们一直主张这样。以前和现在我们都对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讲，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改善，不要恶化。

然后邓小平对我们通报表示了感谢，表示希望这个坏的消息将成为顶点，之后苏阿关系将逐步改善。

我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他们一样持这种看法，但问题不在苏联一方。至于阿尔巴尼亚的最近步骤，它涉及所有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都应该致力于团结。

邓小平回答说，他没兴趣深入了解苏阿分歧的实质。邓小平强调，我们唯一的愿望是你们两国关系改善。

我回答说，除了改善苏阿之间的关系，苏共没有其他愿望。这时邓小平又重新回到苏中关系的话题上来。在提到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时，邓小平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莫斯科会议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些关系发展得不错。邓小平说，在朝鲜，科兹洛夫请他吃饭，而他也请科兹洛夫吃了饭。接下来邓小平又说：“我们谈了团结的重要性。我对科兹洛夫讲，当然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不错。

科兹洛夫同意这一点。”邓小平继续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支持你们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苏中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在日内瓦会议在老挝的问题上。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在朝鲜时我同科兹洛夫没有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他补充说。

然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但最突出的是苏阿关系问题。难道就不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某种途径吗？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一直希望找到这一途径。邓小平回忆到，周恩来和他(邓小平)以前都发表过对阿尔巴尼亚事情的意见。的确，他指出，你们对我们不满意，尤其是对我(邓小平)的发言。

会谈中，阿尔巴尼亚问题就谈到这里。

利用同邓小平会谈的机会，我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赫鲁晓夫同尼赫鲁、斯巴克 [68] 和雷诺 [69] 会谈的消息。对此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说，这些消息将转告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但他没表示任何个人意见。

我向邓小平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关于裁军问题的信的原件。同时指出，《消息报》(9月27日)和《真理报》(9月26日)都载文支持所谓的“蒙哥马利三项原则”。邓小平对此回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表示希望苏联支持他的“三项原则”。 [70]

在会谈结束时，我问，是否收到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祝贺中国国庆节的贺电。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我给邓小平通报了这个问题的情况。邓小平感谢苏共中央的祝贺。然后他指出，莫斯科已举行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周年，他请我转达对苏共中央关心中国人民节日的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翻译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使馆参赞Ф.В.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РФ, ф.0100, оп.53, п.454, д.8, л.175-178

(1961年10月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0月7日会议第34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沃罗诺夫、格里申。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在报告中说得灵活一些——缓和，表现出希望，希望改善关系。

[71]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B.M.莫洛托夫的报告。

没有援引报告内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或者，把他从维也纳召回，如果他顽固的话，

或者，把他开除出党(不需要决定)。 [72]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48

№11459 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 越南劳动党的动向(1961年10月17日)

苏联驻越南大使馆

1961年10月17日

第0393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活动的一些问题

大使馆此政治信函的宗旨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和观察，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自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尤其是这封政治信函分析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的决议的态度，越南劳动党对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准备苏共二十二大的宣传和评价，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经验的态度，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等。

这封信特别指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越南劳动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遗憾的是由于大使馆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越南劳动党的活动进行比较详细和全面的分析。这封政治信函只依据大使馆最近几个月所积累的一些材料、观察和印象草拟。今后我们将对使馆这方面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

越南劳动党在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越南国内的其他政党——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也承认越南劳动党的威望和领导。

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改造，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实现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的决议，越南人民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在建立和继续发展工业，社会组织和发展农业，发展文化和巩固越南北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尽管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各阶层的广大居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国内经济和文化落后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深信在今后几年，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会改善。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积极拥护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越南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其国家和社会制度呈现继续稳定和巩固趋势。

越南朋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大劳动群众，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旨在巩固和平和各民族安全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消灭可耻的殖民制度，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关于在和平的基础上统一越南的立场，苏联巩固

国防的果断措施和其他活动，在越南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得到完全的理解和热烈的积极反应。

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鼓舞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完成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和统一自己祖国的任务。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协作，共产党和工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越南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一致。

越南劳动党中央及其领导干部，高度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兄弟般援助。多年以来，越南劳动党在用热爱和忠于苏联的精神教育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南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热爱和尊敬的感情。

自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和其他渠道的往来继续扩大。越南的报刊和电台对苏联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报道不断加强。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在讲话和谈话中比从前更加强调苏共的活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榜样对越南人民胜利实现自己面前的任务有一定的意义。胡志明同志1961年2月在越南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为第三次青年劳动者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许多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在场)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必须学习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克服困难的经验。他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青年应当向苏联青年学习。他在9月初结束的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参加的国际大学生研讨班的讲话中也包含同样的内容。

最近以来，朋友们主动提出就各种问题向苏联派遣的代表团、专家、青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小组较前相比呈增长趋势。据大使馆所知，大多数越南朋友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传播苏联经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今后继续巩固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意义重大。以阮维桢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团从苏联回国以后，越南朋友决定向苏联派遣一个领导干部小组，研究计划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问题。

前不久，胡志明同志在谈话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

的军事院校中，训练以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为首的越南军官表示热烈的感谢，并再次请求苏共中央同意再派遣一个军人小组赴苏联留学。

以范文同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61年夏季的苏联之行意义重大。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事，由越南报刊和电台做了广泛的报道，在人民中间得到积极反应。赫鲁晓夫同志关于统一越南问题的讲话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界的好评。声明中所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前哨阵地，对东南亚国家和前不久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所有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产生了特殊影响。

苏联共产党，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巩固苏联威望，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始终不渝的原则性路线，过去和现在都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总结，越南劳动党中央在1961年1月举行了中央全会。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黎笋同志的报告以及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根据黎笋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都阐明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列举的主要理论原理和结论。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同意苏联共产党对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国际形势评价的观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拥护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并要求越南劳动党各级组织学习。

越南劳动党党的报刊发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一系列文章，解释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要点。1961年1月1日《人民报》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开端》的社论，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它已经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宣言是全人类为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旗帜。”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同志在回答莫斯科电台记者问题时说，去年在越南最重要的事件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上是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越南朋友在文章和谈话中，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材料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发现越南

朋友有意强调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的理论原则和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中央全会之后，国内大部分企业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让劳动者了解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1961年3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在全国开展春季政治运动，所有干部和党员、军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越南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的决议中指出，开展政治运动必须与实现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实际活动相结合。还提出了培养劳动者国家主人翁感情、集体主义精神，为生产服务，勤劳节约品德，加快越南民主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在春季政治运动期间，特别注意与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挥霍社会主义财产和保守主义作斗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建议学习胡志明同志的讲话，党中央关于在越南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具体问题的决议，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党的报刊系统报道了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局委员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在企业、机关、农业合作社作报告。报刊和领导干部的讲话，系统地强调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苏联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公开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1周年材料断言，越南人民正在沿着列宁指示的苏联的道路前进。

在了解越南劳动党中央就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进行解释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同意苏联共产党路线、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同时，顽固地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意义表示沉默。还在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苏共党的代表团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进行了座谈。代表团团长、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毛希丁诺夫同志在谈话中坦率地告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不理解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已经公开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竟只字未提。胡志明同志不等毛希丁诺夫把话讲完就回答说，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并将纠正这个错误。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从未反驳胡志明同志，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1年1月举行的

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了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这就是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改正其错误的好机会，但在这次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在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似乎是故意删去了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作用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端这样的内容。众所周知，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对自己不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理论结论也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如此举动是不真诚的表现。我们有这样的看法，也许在向苏联派遣政府代表团之前，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决定稍许修正自己对莫斯科会议声明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先锋作用的提法。1961年6月9日，在苏联大使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大使馆以及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范文同同志首次称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他在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过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次讲话都重复了这一提法。他之所以用了这一提法，大概是不想说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据我们所知，在企业、机关和军队党组织的党课上，在谈到莫斯科会议的总结时，也只是笼统地提一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任务的章节上，对其他理论问题一般很少涉及。例如，正像河内市委书记阮林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该市的党组织会议上，党员只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向党员介绍了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一般内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许多非常重要原则问题上的如此表现，显示出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处理它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上所持有的不一致的立场。

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活动过去与现在都给予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他们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每当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会晤苏共中央领导人或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事先都要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他们磋商。我们的某些观察还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经常专程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会见从不公布。

我们认为，中国和越南朋友有些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缘关系及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的意义，夸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的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越南人民抗击战争的命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似乎使越南朋友感到欠了中国共产党的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打得火热。中国同志在声明中强调，中国和越南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血缘相近，无节制地吹嘘越南劳动党领导人等。但我们认为，主要在于越南劳动党部分党员与中国同志在当代和对待苏共二十大决议等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一致。

所有这一切，使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贯彻其路线上产生一定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思想和越南劳动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立场施加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的观察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层的许多同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倾向于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由于苏联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对越南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历史环境多少与越南近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合适。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层事实上倾向于吸取中国的经验，在越南许多问题上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的许多方面，实际上采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只是根据当地的环境，在形式上做了某些改变。特别是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们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朋友们的这种立场导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犯了重大错误。在农民经济的合作化上也犯了重大错误。由于追求数量（“大跃进”），忽视在增加农业产品的生产中对社员物质刺激原则的重要性，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供给方面都遇到严重困难。

越南劳动党中央借用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对党和国家建设的组织形式不做大的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党和国家机关职能不分。许多地方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再具体地说也是厂长。除了县委和省委之外，所有较大的党委都直属于越南劳

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基层组织事实上孤立于地方党的组织，不受河内市委和区委的领导，这就为国家和经济机关及其党的基层组织脱离党员和劳动群众创造了客观条件。自然也使他们脱离了下级的监督，同时剥夺了这些机关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的经验补充自己经验的机会。

除了具体措施以外，朋友们还模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诸如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各种会议，研讨会、全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等。因此，连续几星期将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局限在会议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ТоХыу)同志指出，越南人有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会议。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事实上同意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待个人迷信问题的观点。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却对此保持沉默。

越南朋友对苏联电影《晴朗的天空》的反应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经过长期争论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专门审查之后，承认它不适合越南观众，不能租片。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说，这部影片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分渲染，可能在越南劳动者中间对当时的苏联产生错误的感觉，对共同事业造成损害。他说，我们担心，这部电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对越南劳动党在土地改革时期所犯错误的争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看过此片的许多同志也都有同感。

已经很清楚，越南劳动党中央不同意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路线。胡志明同志说：“今后不能再这么干”，“应该做些什么”。尽管他在过去扮演了不成功的“调停者”的角色，但仍然决定出面干预。越南朋友不大愿意向我们谈他们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回答说，他们应当再次研究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文件。胡志明同志只说，恩维尔·霍查“表现软弱，这种软弱从1959年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并不明确表明自己的想法，只让人觉得他们“可怜”阿尔巴尼亚人。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仿效中国共产党的榜样，夸大一些笼统的口号的意义，对于采取实践措施来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工作，他们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也是他们在领导国家国民经济中所犯的大错误之

一。但生活迫使朋友们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某些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农村工作之后，开始看到由于不正确的口号(大跃进)和工作方法(行政命令)所出现的后果，今后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关于会议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全会的决议尚未发表，报刊和领导人的讲话也从未提起。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进(Тюен)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第四次中央全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谈到对农业的不正确指挥，表现在对农民赤裸裸地行政命令和无视物质刺激的原则，他认为，结果导致农业社社员对增加农产品生产失去兴趣。我们还了解到，全会广泛批评了片面追求农民经济合作化的百分比。据进同志介绍，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是越南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他还说，第四次中央全会之后，这些中国方法支持者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工作放任自流。他强调指出，目前这些同志尚不构成多数。在中层机关，只有为数不多的干部坚持这些方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1961年7月25日谈话记录)也有这种看法，他未提越南劳动党第四次中央全会，但表示不同意某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采用像苏联这样先进的国家的经验为时尚早，应该建议吸收中等发展国家的经验(可以理解为这里指的是中国)。朋友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缺点。他们稍许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调整农业社的领导，培训农业干部，采取某些措施提高农业社社员的福利。拟召开越南劳动党改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业工作的中央全会。

1961年7月底，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会，讨论五年计划(1961—1965年)提高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任务。中央全会确定了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前景、任务和方向。全会特别注意巩固农业合作社，提高所有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牲畜和禽类存栏数，开垦55万公顷荒地(先前的五年计划规定20万公顷)，兴修水利，改进对农业的领导等。

遗憾的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对如此重要问题的决议，竟然没有对领导农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进行足够的揭露，采取的措施尚不具体。其中有许多一般性的提法，别说农民，甚至党员也不明白。全会决议在谈到领导农业严重缺点的原因时称：“我们了解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太简单，因此经常表现出主观主义。由于没有充分发现我们的能力，时而出于对我们国家现实形势不完全清楚而犯保守主义，时而又犯教条主义。”

越南民主共和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某些品种的农产品。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农业落后的原因是价格政策不正确。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些同志到底是谁，也许其中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不排除“悲观主义分子”中间还有领导干部。他们认为，越南劳动党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解放越南南方，同时将南方视为整个越南的粮仓。有些越南领导干部在与我们谈话时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就是指越南南方的财富，这绝非偶然。

从黎笋同志的答复可以看出，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认为现阶段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仅仅满足国内的需要。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北方的农业可以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品，甚至更多一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旨在保障热带和亚热带作物(茶叶、咖啡、可可、香蕉、菠萝、胡椒、柑橘等)的继续发展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意义保持沉默。

谈到价格政策时黎笋同志认为，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冒进只是对“某些方面”有影响。全部问题在于“应当改变省、县级的领导”。看来朋友们打算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搞的那样，打算大量调动地方领导干部。

应当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国际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某些内政问题上，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相同。某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企图依照中国的模式在越南成立公社但没有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支持。最近以来，越南朋友对“大跃进”的口号也非常动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最终结论为时尚早。

一般而言，朋友们不大愿意向我们通报他们对越南南方采取的步骤。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有一次在同我们谈话时答应每月系统地向大使馆报一次南越的形势和他们采取的措施。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看来朋友们认为，他们如果坦率地阐述解决南越问题的观点，将得不到苏联方面应有的支持。10月1日，在黎笋、范文同同志在场的与我们的谈话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范雄说，摆在他们面前最主要和最中心的问题是南越问题，包括老挝问题在内所有主要问题都得围着它转。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政策，在解决老挝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观点一致的同时，在这一问题的某些观点事实上还有所不同，达到目的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解决老挝问题上首先是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的利益出发。看来，这才是朋友们所犯错误和苏共中央多次指出的错误的根源。

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组织力量平息老挝的叛乱中，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起到了决定作用，促进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在整个战斗期间，由贡勒领导的老挝政府军一共只有20人被打死，约80人受伤。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却伤亡800人，其中300人被打死，500人负伤，尽管国家面临许多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是向老挝送去了大量给养，武器、车辆和其他物资，承担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老挝物资大部分运输任务，而且是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

同时，朋友们无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议，开始通过自己的代表，超越自己在老挝的权限。当军事行动尚在进行时，老挝人似乎“没有发现”这一不正常的形势，但在停火之后梭发那·富马、贡勒及其支持者开始对越南军事当局在老挝表示不满。

甚至在苏共中央8月31日信件和我们多次会见越南领导人，强烈要求消灭转交苏联援助老挝物资中存在的突出的缺点，改善越南人对待梭发那·富马政府的态度之后，越南朋友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克服自己的缺点。只是在9月25日与我们谈话之后胡志明同志才说，他们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和缺点的危害，并会将此坦率地告诉梭发那·富马，决心扭转形势。当天在午宴上范文同同志说，在老挝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犯了严重错误。看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最后才认识错误的。他还说在老挝问题上，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朋友们撤换了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老挝犯了严重错误。所有这一切有理由认为，朋友们对老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的发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党的刊物上刊登了党纲摘要和解释党纲某些章节的一系列文章。8月1日的《人民报》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为苏联开辟了共产主义社会光辉未来》的社论，其中说，越南人民和工人阶级企盼苏共第二十二大和了解党纲草案。胡志明同志还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

题为《共产主义的天堂》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苏联20年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还就这个问题在电台发表了一篇不长的讲话。

越南劳动党的鼓动员在许多企业和机关就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在工人和职员中做了讲解工作，党员、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完全拥护苏共党纲草案。他们特别满意地讨论了经济建设计划和“当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这一部分。同时许多人强调，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为向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创造更多的条件，加速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还在8月，某些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苏联援建的企业，如磷酸盐厂、河内制药厂等，学习了党纲草案后为迎接苏共二十二大而承担了社会主义义务。今年9月1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做出决议，为迎接苏共第二十二大而开展竞赛，以新的劳动成绩迎接它。决议说，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都是一个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建议所有党组织开始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向领导干部和各阶层居民讲解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介绍，9月初政治局决定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所有党员将开始学习苏共纲领草案，然后再学习党代会的其他文件。高级领导干部将根据特别计划学习苏共二十二大材料。

使馆方面，我们已将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党纲和党章草案等问题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委员(胡志明、黎笋、黎德寿、阮志清、范雄、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等同志)以及工会联合会、青年劳动者联盟，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及其一些区委、越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谈了话。根据与朋友们达成的协议，使馆工作人员和许多苏联专家关于苏共新党纲作了报告。有的会议有上千人出席。会议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全部参加竞赛，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苏共二十二大。今年9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所有党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大会，有1000多人出席。我们就苏共纲领作了报告之后，与会者要求回答许多理论问题：苏联前十年和后十年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怎样克服越南农业的落后状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公民的觉悟水平都很低，在越南北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或多或少同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奔向共产主义；关于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所有制向全

民所有制过渡的道路以及关于国家的消亡等。10月9日，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新的决议，建议党的所有组织继续宣传苏共二十二大的材料，大会期间将全体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大会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指出在宣传苏共二十二大问题上的某些缺点。苏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关于召开苏共二十二大和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之后，几乎所有兄弟党都刊登了这一决议的全文，同时强调了即将在大会上审议苏共纲领的历史意义。越南朋友们8天之后才刊登了召开会议的消息，同时对会议的日程只字未提。只是我们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谈话之后，1月24日的《人民报》才发表了H.C.赫鲁晓夫讲话摘录，其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将审议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迄今为止，朋友们并没有像其他兄弟党那样，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出面，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苏共领导表明原则性的立场。可以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今年9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发表声明，评价苏共纲领草案并表明自己对待这个文件的态度，但这样的声明将在代表大会之前发表。这次谈话过了一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在谈话中说，越南劳动党中央将不就这个问题发表正式声明，认为今年8月1日《人民报》的社论和胡志明同志的文章《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够了。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朋友们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其他材料的了解，表明他们只刊登了苏共纲领草案和《真理报》发表的材料，声明欢迎党的代表大会等，但越南劳动党对纲领草案，特别是对新的理论原理的评价就没有了。8月上旬，《人民报》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摘录。胡志明同志当时就告诉我们，全文将于最近几天刊登。但是，仅仅在过了两个月之后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发表在理论杂志《学习》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新党纲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作过报告。

从越南同志就苏共党纲草案向我们的报告人所提出的问题和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许多越南同志首先关心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否克服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的落后状态，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何时达到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目前他们尚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当然，越南朋友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一样，为苏共纲领草案所欢欣鼓舞，感到激动。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正在进入共产主义之际，他们也想

知道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位置。

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更加巩固了朋友们情绪的转变。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苏联之行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苏联国家和经济建设经验。今年夏季在莫斯科和乌兹别克斯坦休假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了解了当地党的工作经验之后更加巩固了朋友们这个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书记阮林认为，此行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苏联的国家和经济建设经验。许多朋友也表示，要按照苏联的榜样改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与中央代表团今年夏秋在苏联一起休假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坦率地表示，苏共的经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头等意义，应当以苏共为榜样，在许多方面进行改变、改革和工作。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特别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关齐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此次苏联之行的主要结论是借鉴苏共经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H.C.赫鲁晓夫同志体现了新的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学习。越南工会联合会总书记遵(Tyeh)同志在与我们谈话时发表的见解更值得注意。他说，越南工会在其活动中将遵循苏联工会的丰富经验。可以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地运用中国经验而带来的挫折感到失望。中国同志在越南内政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和大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越南劳动党党员的情绪，从而导致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和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系统地完根据相互协议的经济义务，这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可能对部分同志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大使馆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 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其活动中旨在更加紧密地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兄弟党合作的路线已经明显加强并得到巩固。越南朋友开始更加注重宣传苏联的成就和研究苏联的经验，以便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他们正在逐步克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的缺点。

2. 现在在许多党员，其中也包括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始意识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工作、国家和经济管理、工农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工作，必须更广泛地采用苏共和苏联的经验。考虑到当前面临的扩大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扩大苏共和越南劳动党联系的大好形势，大使馆认为必须支持朋友们更加广

泛地研究和采用苏共和苏联经验的愿望，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党、政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团的交流。由于越方在资金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因此朋友们也经常难以向苏联派遣各种代表团，我们认为对越南人前往苏联必须寻求提供优惠的可能。

3.不能过高地估计以上所说的部分越南同志情绪变化的意义，因为中国朋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千万不能将我们影响的加强和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对立起来。

4.应当注意，尽管胡志明同志在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减弱，但他仍然是苏共和苏联一位伟大的朋友，为了继续巩固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正在做大量工作。他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对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今后，我们更应当巩固我们与胡志明同志的私人联系。

5.正如今年的实践所示，越南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赴苏治病与休假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事先考虑明年夏季邀请50名越南同志赴苏休假是适宜的。这些邀请最好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其他一些部和单位(中央消费合作社、创作联盟、科学院等)发出。还应当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党的代表团，就地了解党组织的活动和交流经验。

6.我们认为必须邀请越南劳动党理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座谈以及就苏共二十二大材料，苏联共产党新党纲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联合出版刊物等交换意见。

7.正如所见，由越南朋友出版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文件将会大大推迟。大使馆认为必须解决在苏联用越南文出版苏共纲领，H.C.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报告、苏共章程和Φ.P.科兹洛夫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等问题。

8.由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及时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条约中承担的义务(专家、设备和资料不能及时到达)，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大使馆认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有关机构的监督。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务必采取应有措施，及

时而高质量地结束由我们援助越南的企业、电站和国营农庄的建设工作，同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

9.大使馆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今后继续扩大与越南领导人的个人联系，特别是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联系，深入研究越南劳动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经常、全面地掌握越南劳动党及其中央和政治局活动的信息。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C.托夫马相(签名)

АВРРФ, ф.079, оп.16, п.31, д.3, л.35-57

№13009 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 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1961年10月31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越南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成熟的国际问题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加团结以及全体兄弟党应对在国际舞台上的策略和实际措施协商一致，我们希望就华沙条约组织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合作事宜与你们进行商量。

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华沙条约组织允许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步骤，以保卫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及其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集团的阴谋。大家都非常清楚，例如，华沙条约参加国政府于1961年8月13日发表的关于整顿西柏林边境地区秩序的声明，起到了怎样巨大的作用。这一集体行动促进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措施，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免遭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

华沙条约成员国应该讨论和商议和平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而且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常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与此同时，华沙条约成员国方面参加讨论问题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而没有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席的则是另一个级别的工作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所有的观察员总是能全面地、准确无误地把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问题的实质，通报给本党的中央委员会。

当然，如果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以同等级别出席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很难在所有场合下做到这一点，也未必总是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当你们党和政府没有以最高级别参加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时，那么，最好是，我们直接向贵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通报所讨论的全部问题。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82—984页

№11460 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1961年11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C.A.托夫马相同志：

复您1961年10月18日第292号电。

大使馆准备的反映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政治信函无疑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值得给予良好评价。

大使馆在分析越南劳动党的活动及其与兄弟党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能在今后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大使馆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怎样对待苏共二十二大的工作和决议；越南社会各界对这些决议反应如何。还应注意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在传播和宣传大会材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兹通知，政治信函中第2、5、6、7点所列举的建议，现正在考虑之中。

至于建议中所提的以国家渠道交换的代表团，那么最好是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提出1962年交换代表团的计划。

关于在1962年，由全苏总工会、中央消费合作社、国家计委、苏联科学院及其他团体(第22页第五点)系统出面邀请越南同志代表团夏季赴苏休假的建议，已经送到有关单位考虑。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H.莫利亚科夫(签名)

ABПРФ, ф.079, оп.16, п.31, д.3, л.58

№25314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飞机技术援助(1961年11月30日)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73\]](#)

.....

遵照中苏双方政府在1961年3月30日达成的协议，苏联政府转让给中国政府米格21战斗机和K 13导弹的生产许可与技术文件，苏联政府在1961年交付中国一部分米格21战斗机用以做地面准备工作。为了掌握这种型号飞机的使用技术和维修技术，我国国防部准备在武装部队中开展训练。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政府决定请求苏方派给我们7名飞机技术专

家(具体需要的专家类型和来华工作期详见附录)，同时，还请在相关课程中给予此类型飞机飞行技术的指导、讲授相关方法的教科书，以及飞机维修和测试的技术文件。外交部将此文件提交给苏联政府，望苏方给予肯定答复。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61年11月30日

附件：

清单

- 1.飞行教官1人，4个月
- 2.空气动力学指导1人，4个月
- 3.飞机和发动机指导1人，4个月
- 4.特殊设备指导1人，4个月
- 5.无线电和雷达指导1人，4个月
- 6.无线电技术指导1人，4个月
- 7.军事装备指导(K 13导弹)1人，4个月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д.2, п.466, л.10-12

№10203 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1961年12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越南南方的局势

(资料)

1961年，越南南方国内政治局势明显尖锐化了，形成了对吴庭艳政权的直接威胁。美国政府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认为越南南方之所以形成当前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长的支持下，游击运动增强以及吴庭艳政府在人民中没有强大基础因而地位不稳的缘故。

确实，1961年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明显加强，在许多地区都爆发了爱国力量与吴庭艳正规军之间的武装斗争。据现有资料，仅1961年10月间，爱国力量就进行了近500次战役，使敌人损失了2000多人，消灭了地方军和正规军的143个哨位。根据越南朋友提供的资料，在越南最南部地区的368个村社中有36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在所有南方地区的1290个村社中有92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

南越居民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越南朋友多年开展的巨大而全面工作的结果。

在缔结日内瓦协议和各方力量重新部署后，越南朋友采取措施保留了越南劳动党在国家南部的基地，并向这些基地下达了继续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任务。据朋友们说，越南劳动党1954—1958年在南方的路线是开展破坏现有制度的政治斗争，广泛利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扩大城市与乡村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为保存南方地方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战斗力的同时，他们被允许在必要情况下采用武装斗争作为自卫手段。

众所周知，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在执行中遇到了南越政权的坚决反抗，他们在美国支持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立场，全面回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所有建议，不论是关于就组织全越南普选以统一国家进行协商的建议，还是关于实现两个地区间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正常化的建议。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越南劳动党十五中全会(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全会讨论了当前局势并通过决议，决议指示越南南方地下组织采取任何形式加强革命斗争。武装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形式之一，只要相应的条件具备就能够并且应当采用。越南朋友之所以这么做，其出发点是因为到1959年开始，在越南南方实际已形成了两大有组织的势力——一是吴庭艳的军事警察机构，一是越南劳动党在南越的地下组织，它已拥有3万名积极分子和15万同情者。

根据这种情况，在越南南方领土上开始建立起游击队，它们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开展与政府军的武装斗争。越南劳动党干部领导的爱国力量开展了“肃清”偏远省份的工作，他们消灭忠于吴庭艳政府的反动分子，并用自己的干部代替他们。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军事行动的规模；1960年1月，在太宁(Тай-нинь)地区(南越中部)的南越军队一个团被游击队解除了武装。

受所取得的成就鼓舞，越南朋友开始表现出发展武装斗争的趋势——这部分表现在对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1960年5月，越南朋友就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提纲，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咨询。在为统一越南而斗争一章中，提纲实质上是直接指示在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推翻吴庭艳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立解放区并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这一斗争被宣布为抗法战争(1946—1954年)的继续，而建立解放区则被宣布为“逐步实现祖国统一的形式”。

在莫斯科，越南同志被提醒说，在现有条件下抛弃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和平统一越南的口号未必是适宜的。越南朋友对此表示同意，所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阐述的立场仍然规定和平统一国家。

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计划中，越南同志进行了在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团结所有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爱国力量的工作。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对在南越各阶层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建立一个以联合民族民主政府为首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南越国家。

爱国力量的行动对吴庭艳构成了直接威胁，引起了企图保留南越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桥头堡的美国的极度不安。

根据美国的倡议，东南亚国家联盟3月份的曼谷例会上讨论了南越的严重局势。根据掌握的情报，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在“北越武装力量进攻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指老挝和南越，它们不是该联盟的成员，但它们的领土包括在联盟的‘防御区’内)”的情况下，作为“回应措施”的“6/61计划”。

为了实地查清南越局势，最近有许多美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访问了

越南南方；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中央情报局专家伦茨代尔准将、美国副总统约翰逊、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穆尔曼少将等。

约翰逊在访问南越期间，与吴庭艳政权就加强与爱国运动斗争的实际措施举行了会谈。在他访问(1961年5月11—13日)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吴庭艳提供了总数为4100万美元的补充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声称打算使本财政年度的援助数额达4亿美元(1960年美国援助南越为1.5亿美元)。

美国人为南越政权制订了一整套一般的和特殊的建议，其中包括“斯坦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18个月内使南越“安定下来”。1961年6月美国承担了南越警察(达5万人)和民兵部队(达6万人)的供应和训练，并担当了与国内游击运动作斗争的领导任务。

到目前为止，美国改组、重新武装并实际上建立了南越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南越的正规军有17万人，武装有150辆坦克、170辆装甲汽车和装甲运兵车、1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近150架飞机和近300艘作战舰艇。

为了制订出关于在南越采取的措施的总的建议并将其呈交美国总统批准，1961年10月往越南南方派了一个以泰勒将军为首的小组。泰勒小组在自己给总统的报告中形容吴庭艳政权的态势从军事观点看是“令人绝望的”。小组建议以下措施：把南越正规军扩充到20万人；向南越提供可观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加快提供飞机和大炮；往该国派遣大批各种专家以及工程兵部队的分队，并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再派遣1万人的正规军部队；为巩固吴庭艳政府的地位在南越实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等等。

但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范围内协商期间，英国和法国代表坚决反对往南越派遣美军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个步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演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导致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应行动并最终破坏吴庭艳政权的立场。考虑到这一点，肯尼迪政府暂时还仅限于增加军事供应，往南越派遣大批军事专家并开展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

当前，在越南南方有近2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美国的军事顾问在南越军队的各级司令部都有，在部队和直到营、连的分队也有。

美国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小组从菲律宾调到了土伦市 [74]。在1961年10—11月期间，共有8架B-26飞机、2个中队的直升机和400多人的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调来，以南越为固定基地。

1961年11月，在波来古地区(越南中部)开始组建新的步兵师，这个师是专门训练在山地森林地形条件下对爱国力量作战用的。在1962年初计划还要组建两个同样的步兵师。为组建新部队和兵团，在1961年10—12月期间共征召了2万多人，主要是青年和大学生。还进行了保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的边界得到可靠守卫的大量工作。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群岛地区保持着经常战备状态的有一艘主力航空母舰(载有39架携带核武器的强击机、28架歼击机、3架侦察机和6架远距离预警雷达飞机)、一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装备有防空导弹的护卫舰、一艘直升机母舰和第7舰队的几艘运输登陆舰，这些舰只上载有一个人数达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营和20架直升机。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朋友的某些行动也引人注目，这些行动与他们早先确定的在越南南方的路线是背道而驰的。这表现在他们不到南越居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以便为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群众运动准备条件，这些越南同志，看来也不无受中国同志的影响，却在1961年采取了使武装斗争活跃起来的方针。这也是形成的有利条件促成的结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成就以及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老挝南部巴特寮控制的省份通往越南南方的通行无阻道路的建立。越南同志通过老挝领土(车邦阿速坡地区)组织部队、武器、弹药、装备和粮食的调运。为此目的广泛使用了本是为老挝提供援助的苏联伊尔14飞机以及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伊尔2飞机，开展了巩固南方现有游击基地和建立直至营和团的军事分队的工作。在1961年的夏季月份，朋友们往南方调去了3个完全满员的步兵营和大批军官，他们可以配备计划在越南南方用本地力量组建的20个营。

越南朋友采取的广泛支援越南南方游击运动的措施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影响。根据某些资料可以推测，越南同志想让老挝当前这种不确定状态保持更长时间，因为他们害怕经这个国家向越南南方供应的道路会被切断。

从上述情况出发可以做出结论，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吴庭艳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如果越南朋友不对群众进行相应的政治训练

而只是继续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就可能不仅在国内方面，而且在国际方面产生消极后果。目前，反对吴庭艳的武装暴动在得不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情况下，只会把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置于被打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大大复杂化，并把南越变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尖锐焦点。

(本参考资料依据苏联外交部、苏军总司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材料编写)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Н.莫利亚科夫(签名)

第2767/ЮБА号

1961年12月22日

АВПРФ, ф.079, оп.16, п.32, д.20, л.102-108

№20789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 扩建工业企业谈判(1961年12月2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在电报中阐述了中国方面于1961年12月3日的说明，这份声明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帮助的一些企业的设备的供应暂缓两年，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必须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关于这一问题现报告如下。

今年2—3月份在北京，然后5—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在谈判中苏中双方审查了以前双方签署的关于苏联给予建设和扩建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协议。

经过谈判，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在1961年6月19日签署了关于苏联给中国建设和扩建的66个工业项目与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和中国方面的愿望，1961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总额确定为7700万卢布。截至1961年9月1日，已经提供了5150万卢布的设备。

今年8月15日，周恩来在同库梅金进行谈话时做出了声明。此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都做出了声明，其中包括波兰 [75] 驻莫斯科大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在8月28日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进行谈话时做出的声明，这些声明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正式声明说，中国方面：

1962—1963年不打算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请求今后停止向中国供应合同中规定的在1961—1962年应该向中国供应的设备以及往年没有抵达的设备；

对于1961年已经商定要供应的，但还没有就其签署合同的设备，请求不要供应；

对于合同中规定的要在1961年供应的设备，如果在1962年1月1日之前运抵中国，中国将会接收。对于那些还没有签订合同的半成品设备，中国方面请求提交一份关于这些设备的清单，并注明其完整的程度。在研究这份清单之后，中国方面将会通报，将会接收其中的哪些设备；

请求尽可能地减少1961年设备的供应，中国方面提醒说，将不会再签署1961年供应设备的合同。

由于这些说明，9月1日之后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减少了，预计1961年的供应总量大约为6500万卢布，而根据以前的协议应该供应的总量是7700万卢布。

无论是周恩来的声明，还是中国方面其他代表的声明，在解释减少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时都说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中国近年来遭受的自然灾害。

现在从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12月3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中，中国方面企图人为地制造一种印象：由于苏联方面的过错，停止了向中国已经开工的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李强同志在声明中举出的事例，大部分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方面采取这一立场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最近两年来中国方面总是突然改变自己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的计划，这样就使事情复杂了，使苏联方面不能按照计划履行协议，并给苏联方面造成了损失。

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应该：

向中国方面重申，我们同意在北京进行谈判，来审议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今后的落实问题；

委托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向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声明，对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给予答复。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76]

请审议。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

斯卡奇科夫

1961年12月26日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4, л.102-104

№20790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 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1961年12月26日)

机密

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落实问题及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报告

1961年12月26日

1961年6月19日，经过先是在北京，然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谈判，最终签署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苏中协议以及关于调整先前双方所签协议的议项书。

根据这次所签协议和议项书，苏方将分期、以不同规模向中方提供相关设备，而1961年苏方供应中方的设备总量价值约为7700万新卢布。为向工业部门订购上述数量的设备，以全苏联合企业作为担保。

根据苏联使节的通报(特字第920—924号)，今年8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与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会谈期间，以国内经济困难为借口声称：

“(向苏联)支付13500—16000万卢布的贷款(用新卢布)，为目前运转的工业企业设施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数量的设备、特殊物资和配件以及军事技术等开支，已几乎花光了中国通过出口资源所换得的全部外汇，他们(指中国)已很难再向苏联购买其他商品了。”

周恩来同志要求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他的请求，即(苏方)暂不要根据双方已签署协议安排新的成套设备订购任务，并将已安排订购任务的相关信息向中方通报，以便后者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应当向中国供应。

今年8月18日，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Гао Цзинь-шэнь)同志在北京与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期间前者作了如下声明：

“.....中国打算暂停许多企业的建设，其中包括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在内。

有鉴于此，中方计划在1962—1963年间不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并延期两年履行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这就是说，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设计工作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活动将顺延，并从1964年开始正常进行，只是年份有所不同..... [77]。中方对苏方提出如下请求：

1.不要预定那些以前没来得及供应且如今尚未投入生产的设备，并将其供应期限推移至以后几年。如果该设备已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2.不要安排预定那些在1961年已经双方协议供应的但尚未签署合同的设备生产。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并正在生产，请尽快向中方通报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在经过研究后，再通知苏方哪些是中方可以接收的。

3.那些根据已签署合同计划于1961年分期供应的设备，如果对此类设备的生产尚未安排预定，那就不要再安排了。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且

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4.不要安排根据1962年已签署合同计划生产的那些设备，因为关于此需要双方重新审议。如果上述设备已安排了预定且正在生产，中方请求苏方转交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

在上述会谈过程中，高同志多次请求向苏联相关机构转达中方的愿望，即希望苏方最大限度地减少1961—1962年间对中国的设备供应。

今年8月28日，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拜访了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并在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会谈期间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就今后设备供应问题作了声明并在其中警告说，中方将不再就1961年的设备供应签署(任何)合同。

至于以后年间的设备供应，谭伟同志说，关于这个问题应依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所发表的讲话为准，即中国将推迟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并在1962—1963年间不再安排此类设备的生产。

在会谈期间，谭伟同志表示，相信苏方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出现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与中方一道研究由于中国政府做出关于暂停苏联援建企业而引发的所有具体问题。

今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在会谈期间向中国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作了如下通报，根据中方的声明苏方已向苏联相关机构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前者还向后者转交了部分已处于半成品状态且无法在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清单(其余部分的设备清单是在今年9月23日的会谈期间转交的)。

谭伟同志对上述通报和所转交的材料表示感谢，并再次请求苏方考虑中方的意愿，即希望苏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本国内部利用那些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中国经苏联)向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据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的报告(其于今年8月18日和9月1日在北京与高同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中方打算在10月中旬就今后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以及如何利用(苏方)为中国订购的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等相关问题与苏方举行谈判。

1961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期间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与中方进行上述谈判。今年10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雷索夫同志与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会谈，期间后者口头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在北京于10月末至11月初举行中苏双方谈判的建议。李强同志许诺在10—12天之后(再向雷索夫同志)转达中方关于此次谈判的具体建议。可是，后者至今一直未得到这些具体建议。

1961年12月2日，正如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在1961年12月3日所发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在会谈中向雷索夫同志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决定，即在1962—1963年间中国将不再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其中包括现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在内。至于恢复1961年6月19日协议所规定的向中国88家企业供应设备的问题讨论时间被推移至1964年进行。

在会谈期间，李强同志对苏联相关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指责，理由是后者取消了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项目急需的个别种类配套设备。

正如我们检查后所显示的那样，李强同志的上述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如何对李强同志所列事例进行解释，请参见附件。 [78]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24, л.105-108

№207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22项 关于与中方就今后落实苏中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的决议。

(А.И.米高扬、Н.С.赫鲁晓夫、М.А.苏斯洛夫、М.А.列谢奇科、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

第9号记录第22项

1961年12月28日

绝密

1.根据1961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方将就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定的今后落实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我们认为，在谈判举行之前，应让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拜访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并对后者今年12月2日发出的声明做出答复。

批准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口头声明的文本，该文本已经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见附录)。

2.同意苏联驻中国大使C.B.契尔沃年科同志的建议，即与中方举行上述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将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C.A.斯卡奇科夫同志率领。

3.我们认为，应当根据谈判结果对外界发布苏中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指明，此次谈判是在中方的倡议下举行的。

如果中方不同意公布上述联合公报，那么关于此次谈判的情况将在苏联报刊上单方面公布。

4.批准附录的苏联部长会议指令草案。

附件一：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П.Н.雷索夫提交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口头声明的文本

绝密

今年12月2日与李强举行会谈的内容已上报莫斯科。根据委托，我向中方通报：苏方准备在中方适当的时间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以便就1961年6月19日协定今后的落实问题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我还根据委托就李强同志在这次会谈中所提意见做出解释。李强的意见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全苏联合企业似乎在近期开始撤销向一些即将完成的建设项目提供配套的必要关键设备，理由似乎是中方已不需要供应这些设备了。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61年6月19日协定签署之后，根据与中国外贸组织所达成的约定，1961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和物资总量约为7700万卢布。

苏联相关机构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充分满足中方各方面的需要，如成套设备和物资供应，由苏联技术协助而在中国建设的企业文件的设计制作以及在苏联工业部门安排相应的订购业务

等。通过采取相应举措，截至1961年9月1日苏联已向中国提供了价值5150万卢布的设备 and 物资。

而今年8月15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П.Н.库梅金同志的会谈中以中国经济困难为由请后者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如下内容，即关于暂停根据上述协定计划安排的成套设备的新订货，并请苏方向中方通报业已安排的订购设备内容，以便中方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是中国目前最急需和需要苏方供应的。

关于中方的上述愿望，中国外贸组织在北京和莫斯科的代表们曾作了具体的表述。例如(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同志于今年8月18日在与我的会谈中，便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请求(苏方)在1961—1962年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其中包括不再安排在1961年业已经过双方协议但还没有形成合同文件的设备订购。

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也于今年8月28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成员彼得鲁舍夫同志的谈话中重复了这一请求。另外，他还声称，1961年中方将不再(与苏方)签订设备供应合同。

根据中方的请求，苏联相关机构便暂停了为中国生产的设备的订购计划，并于1961年9月18—23日间向中方转交了根据已有协议和所签署合同处于分阶段生产状态的设备清单。今年9月18日，谭伟同志在从苏方手中得到上述清单时提出了如下请求，即最大限度地(在苏联国内使用)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从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全苏联合企业对中国出现的暂时性经济困难以及中方提出的推迟两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的意愿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鉴于中国外贸机构代表的上述请求，全苏联合企业采取了措施以将原先为中国订购的部分设备在苏联国内使用，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转交中方的半成品清单上所列的设备。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转为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主要涉及的只是那些中国外贸组织拒绝签署转交合同的部分，而不涉及极其重要的用于黑色和有色金属制造的轧制设备以及能源设备。

当然，上述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绝不表明，苏联相关组织拒绝向中国提供这些设备。一旦中国认为自己有必要获得某种设备并签署了订购该设备的相关合同，那么苏方就会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期限内保证向中方供应这些机器。

这里，我们还应当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一段时期中国组织经常会改变双方已商定好的、为由苏联技术援建的企业提供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因此便打乱了为中国订购而负责生产的苏联企业的工作计划并给后者造成了相当大的物质损失。

在今年12月2日的声明中李强同志列举了几个事例，由此中方认定，全苏联合企业取消了向中国供应关键设备的计划。经过我方调查之后，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关于向(中方)化工项目供应设备的问题：

所有这些设备(的相关文件)，除了其中两项(合成胺蒸馏塔填料和T 25/340泵)外，均已于今年7月12日和17日转交中国组织以签署相应的供货合同。可是截止今年8月28日以前相关记录显示这些设备的供应合同仍未签署。鉴于今年8月28日谭伟同志发出的关于中方将不再签署(从苏联进口设备)合同的声明，苏联组织便暂停了针对国内企业的订货，以等待中方签署新的供应合同。

至于第438号项目，由于苏联国内已停止了型号5324铣床的生产，苏方便建议供应中方优化改进型的5E32铣床，可是至今中方也没有对苏方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在关于第856号项目的噪音测量设备以及第451项目中用于检验金属使用寿命的设备的供应问题上，也未必能说是苏方单方面取消供货，因为已于今年7月17日和21日转交中方的合同一直

都没有签署，因而导致苏方暂停了提前向企业发出订货单。

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还包括：为第451号和第8231号项目供应的齿轮磨床、横移—镗床和液压机，为位于宝鸡的电影胶片厂生产的铸模机、八级蒸馏混合器、8立方米的搅拌器和16分段加热器，等等。其中，苏联“技术工业出口”联合体取消为宝鸡电影胶片厂生产的设备订购，只是在中方订货代表徐晓(Сюй Сяо)同志于1961年9月9日发出了如下声明之后才做出的，后者在声明中指出：有必要停止向该厂发送设备并撤销已订货。

中方于今年11月又提出关于在1961年重新恢复上述订货的要求，这是我们无法满足的，因为生产计划是事先已经确定好的，要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可能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1959—1961年间我们已向中国的这座工厂供应了如下设备：8台铸模机、10台混合器和8台16分段加热器。

苏联完全可以按照中方的意愿为中国如期生产和供应上述所需数量的设备，只是必须依照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办。

关于向(中国)鞍山金属联合企业供应轧辊的问题。众所周知，1960年9—10月份苏方共向中国发运了41套轧辊，其中中方仅接收了18套，而其余货物中方均拒绝接收，从而导致其中16套设备被运回边境，其余7套被途中召回。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被迫指示工厂在与中方订货者解决存在的问题之前暂停发货。而只是在首批轧辊发运的7个月之后，即今年6月6日中方才在后续谈判中签署了供应117套轧辊的合同，因而导致在1961年内完成这一订购已无可能。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方仍需要这批轧辊的话，苏方只能在1962年上半年提供。

至于在会谈中提到的其他个别种类货物的供应(如为第857号项目提供的测量装置、为第451号项目提供的金属实验仪器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方知道，苏联工业尚不具备此类设备的生产能力，随着苏联对此类设备生产技术的掌握，苏方才能够按照双方的事先约定如期向中方供应此类货物。

这里，我们还应当对(中方)声明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个别解释，即似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终止了(中方)冶金项目的图纸设计工作。我们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关于(苏联相关部门为)位于包头的特殊五金厂、轮箍—轮轧厂和冶金联合体，鞍山冶金联合体，太原冶金联合体(冷轧钢板车间)和密封式钢缆厂等设计施工图的问题。还在1960年，我们便将完成上述项目(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除外)工作图纸的合同交给了中方订购者，而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在1961年7月。

只是到了今年9月18日，中方才通知苏方表示同意签署这些合同，也就是说，只是在这之后中方才正式向苏方表明了关于自己想把设备供应期推移至1963年以后。

合同签署时间的延迟和设备供应期的推移，自然就要求双方协商新的工作图设计期限。事实上，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并没有停止上述项目工作图的设计工作和拒绝完成这些工作，而其撤销合同也只是想重新签署新的合同文本。

苏联相关机构将依照中方的意愿，采取措施以便基本如期完成在双方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包括的多数上述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只是其中一些项目，如特殊五金厂和密封式钢缆厂等施工图纸的设计工作的完成可能会推迟，因为这部分设计工作与所生产设备的实际技术规格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设计期限与所需设备的供货期紧密相关。

苏联和中国相关机构可以就上述冶金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以寻求双方都能够满意的解决办法。

李强同志在声明中还要求，苏方向中方提供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清单，以便中方根据需要决定这些设备的利用方式，但现在看来这一做法实际上已没有实际意义。这里我们需要作如下强调：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方根据周恩来同志于今年9月18日和23日所表达的意愿，已向中方转交了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所有设备清单。虽然中方表示将很快向苏方通报关于自己如何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其中可能包括中方所谓的急需关键设备)的意见，可关于该问题苏方至今也没有从中方得到任何信息，因而苏方也无从了解中方将以何种方式来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

在最后结束时，我衷心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双方能够以友好和互谅的精神讨论与成功解决与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协议相关的所有问题。

附件二：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苏联部长会议指令：关于同中国就经济关系问题举行谈判

草案

绝密

1.就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问题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在中方感觉合适的时间在北京举行谈判。

2.批准与中方在北京举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

C.A.斯卡奇科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

Я.В.尤申同志——苏联国家计委委员

М.М.古谢夫同志——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司长

П.И.雷索夫同志——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

Д.И.巴格洛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高级专家

В.Ф.捷普利亚科夫同志——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合同法司司长

责成斯卡奇科夫同志确定随代表团前往中国的专家名单。

3.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

可以同意中方依照1961年6月19日协议把为相关企业供应的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期限推迟至稍后时期；

鉴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可以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1962—1963年间停止从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设备的建议，同时明确在1964年根据上述协议双方应履行义务的新期限；

讨论苏方理应在1961—1963年间向中方供应的设备半成品和成品的使用问题，这里应指出，所有苏方为中国订购的、苏联国内又无法使用的设备，中方理应承担苏方可能出现的损失；

应提请中方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近年来中方经常出人意料地提出关于重新审议早先已协商好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以及已经苏中协议确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从而导致苏方很难有计划地履行既定协议内容。

4.在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与中方共同签署双方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或议项，委托代表团团长斯卡奇科夫C.A.同志代表苏联政府在上述文件上签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19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38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准备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文件的起草工作”。

(Н.С.赫鲁晓夫、А.И.米高扬、Ф.Р.科兹洛夫、М.А.苏斯洛夫、А.А.葛罗米柯、А.Н.柯西金)

1961年12月28日

绝密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部(伊利切夫同志)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那些设有中国代表机构的国家的苏联使节的指令草案，并准备如下文件草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苏共中央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信(艾地同志收)和苏共中央给苏共党组织的信。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14, л.17

№13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И.沃罗诺夫、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 [79]

在总结中没有指明，在会议上没有公布波诺马廖夫同志的报告。

第28项 关于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准备文件的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科兹洛夫、波诺马廖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柯西金)

1.第2192号文件过于简单，给艾地的答复也很简单。我们在什么问题存在着分歧？重复我们的立场，揭发性的方式。应该论证：为什么召回大使。

2.表现出积极的立场。是不是值得由于与阿尔巴尼亚人形成的关系而准备给中共中央的文件。“公布文件并声明说，这是为了团结统一。为什么我们要用分歧来让敌人高兴呢？难道不能找到力量来战胜这些小问题和遵循共同的利益？我们准备会晤。中国人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你们的支持只会使他们情绪加剧。”

包含有分歧内容的公开信(对内的)，也要阐述一下。3个部：国际部、宣传部和联络部——准备文件。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7, л.3

1962年

№10285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1962年1月17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年1月17日

今天我接到了古普塔的请求。古普塔转告我说，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全体会议将于1月16日至17日在德里举行。会议将讨论高士去世后，印度共产党将来的工作。古普塔说，他希望苏印两党的关系不会因为高士的去世而受丝毫影响，同时要求苏联给予援助。古普塔强调，苏共中央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和同志式的忠告，对印度共产党都是巨大的帮助。古普塔接着说，任何一个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不可能取代苏共在印度共产党心目中的地位。

古普塔汇报说，在高士去世后，他担心苏共给予印共的资金援助会中断，而目前印共正在准备参加竞选，现在竞选资金非常缺乏。古普塔强调，这些问题以前都是由高士亲自处理，高士从没有与他商量过，甚至也很少与南布迪里巴德和奈尔两位助手商量，所有这类问题的处理都是由高士自己秘密进行的。印度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任何报刊也都没有刊载过与这方面有关的内容。古普塔说，他不能单独处理有关援助的问题，他必须和南布迪里巴德一起商量。南布迪里巴德本人诚实可靠，高士最信任他。古普塔非常肯定地说，高士对于接受援助的问题从来没有与阿赫米德和丹吉商量过，高士曾经说过，他只相信自己，所以所有的外援全部由他个人签收和处理。

古普塔明确否认了中国给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他说印度共产党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收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将来更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古普塔阐明，印度共产党也绝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要求。会谈中有人插话说：中国方面不太清楚苏联向印度共产党提供援助的事。古普塔接着说，有关苏联提供援助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人接着插话说：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只有旁遮普的党组织从居住在英国的锡克教徒那里得到过；至于通过贸易接

受的援助，一般都是由丹吉负责的。

古普塔几次重复说到，印度共产党目前非常需要得到援助，因为竞选斗争将于2月份的第一周展开。竞选之后，印度共产党在培养和提高党的骨干分子的理论水平方面，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古普塔坚信，印度共产党在竞选中不但能够保持在议会中的原有席位，而且还会有所增加。

古普塔说，在竞选斗争中，国内反动势力的矛头将会直接指向苏联，特别是在有关果阿、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印度共产党在选举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完全是无私的。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80, д.5, л.14-19

№10286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1962年1月27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年1月31日

今年1月27日，我和朱可夫同志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古普塔进行了会谈。

我代表苏共中央答复了古普塔上次与我谈话中提出的要求。古普塔表示衷心感谢苏共中央在印度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苏共提供的资金援助。他向苏共保证，会随时将党内的情况及变化向苏共中央汇报。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80, д.5, л.31-36

№20005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1962年3月1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3月28日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2年3月1日

因受中央委托，就与毛泽东会晤一事，我们联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2月28日我们被告知，毛泽东现不在北京，因此无法接见苏联大使；如果苏联大使根据委托需要将苏共中央的文件亲自转交毛泽东，那么，他可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办理；如果(苏联)大使不反对，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可以接见他。于是，根据约定，3月1日苏联大使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见了面。

会谈开始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杨尚昆在态度上表现出谨慎和不安的神情，可明显看出，他们原以为，要接收的是属于另一性质的文件。

在大致了解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邓小平说，他们会立刻将此信转交给中共中央其他同志。他继续道：“我们中央无疑会非常认真地讨论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当然，只凭如此粗略地读了该信内容，我现在很难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良好的愿望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很多兄弟党都关心我们之间的团结，这种关心是一种正常感情的流露。就我们党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并不比其他兄弟党少。可是，应当承认，近年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很不正常。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你们的来信中也反映出你们也是承认这一事实的。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倾注全部力量，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解决我们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有。”

这里，从这封信所表达的内容中，我注意到，苏共中央对此也是充满信心的。

顺着这一思路，邓小平继续说：“在解决这些困难方面我们有着很好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原则、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如果(我们双方)能够真正地以这些原则为指导，遵守上述宣言和声明，那么，兄弟党之间就不可能有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通过莫斯科声明以前，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便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便已存在很大的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不过，最后毕竟还是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文件——莫斯科声明。声明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得到了双方的同意。其中也有一些双方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但我们作了让步。莫斯科会议之后的半年间(即1961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您，大使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未发表一篇涉及双方有争议问题的文章。然而，在莫斯科声明过去半年之后，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然，我这里并不想谈关于这些问题重新被提起的原因。因为，不论是我们，还是你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整个事件发展的经过，就会了解其中原由。”

邓小平说：“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问题。^[80]对此，苏共中央的信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莫斯科声明中所制定的规定和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那么，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就不会弄得如此不可开交。在你们的来信中说，苏共中央在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遵守了莫斯科声明诸原则。我们对此有异议。当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详细探讨。我们注意到，你们来信中提到关于有必要改善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最终大党总是应当采取主动。因为对一个大党和大国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威望的问题。我们也曾与其他政党有过分歧，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对此，我们已向赫鲁晓夫同志谈过。正像以前给您所说过的一样，我们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方面便有一些好的经验。而苏共在处理与波兰关系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只要存在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愿望，就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接着指出：“你们在信中谈到南斯拉夫。不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莫斯科声明已作了明确的定性。当然，就这一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

邓小平说：“总之一句话，坚决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中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于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和结论，就有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对此次苏共来信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当然，也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充分协商和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但

这样的问题并不太多。我们完全可以暂且先将其搁置到一边。这一思想在你们的来信中也有所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不变的立场。在多数问题上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我们便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团结。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之所以会对多数问题举手表示同意，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因此，我认为，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之规定，是解决当前(我们之间)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会认真讨论你方的来信，并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你们。”

我代表苏联方面表示相信，尽管苏中两党间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多么难以克服，都将无法妨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双方都表现出紧密团结的意愿，我们的关系终将回到两国人民始终期待的那样一种状态——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友好。

随后，邓小平询问，我是否要回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我答复道：可能我将不参加此次全会，因为病愈后身体上一直感觉不太好。我告诉邓小平，为何苏共中央目前对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特别关注，并强调，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全苏范围内都召开了地区会议，几乎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参加了此类会议。我继续说，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机构正在寻找补救措施来加强农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正在全力实现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任务——在各重要农产品生产指标上超过美国。不过，我们仍需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这方面主观因素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邓小平关注地倾听着我的话，并说，他认为，苏共确定的赶超美国的目标是可行的。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他回答道，会议开幕日期不会早于3月15日。他解释说，因为包括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很多代表都到中国各地“调研”去了。邓认为，“调研”是一项有益的活动。藉此，代表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情况。据邓小平说，即将举行的人代会并打算预先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邓的话说，只有对一些国内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才能通过此类计划。在答复我的提问的过程中，邓小平还说，毛泽东目前正在南方，去南方旅行——是毛泽东很早就养成的一个习惯。邓称，毛泽东可能会回北京，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答复关于中国国民经济远景规划问题时，邓小平说，关于这一问

题——究竟是编制五年计划，还是十年计划——他们内部仍存在不同观点。与此相关，我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关于最近10年和20年内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重点和任务。我同时指出，我们依然非常重视七年计划，因为它是整个远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邓小平说，中国的很多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您知道，我们国家内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在国家计划方面，我们提出了3种方案，但所有方案都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另外，这3种方案相互之间在时间、范围和相关指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他指出，你们的农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太快。而农业，根据目前的发展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和确保增长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的物质供应需求。仅仅在1961年一年内，中国城市人口便缩减了1300万人。这些人都返回了农村，基本上都是返回了他们以前的居住地。因为发展国营农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城市返乡人口中多数均被发往各地的人民公社。今年预计从城市迁往农村的人口还有1000万。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缓解了城市的物质供应矛盾。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几乎每个企业的工人数量都存在超员现象。我们必须想办法，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些企业的工人数量过多，以至于需要10年之后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因此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对劳动力利用不合理的不良情况。邓小平举例说，就拿鞍山联合企业来说，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情况下，须裁减职工5万人。这种状况还表明，我们必须为新企业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请求，即他本人或他所委托的某个人能否在适当的时间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国内情况。我强调道，这样的会谈将有助于我们(苏联方面)更完整、更清晰地了解目前中国内部的发展状况。对于我的这一请求，邓小平并未给予肯定的答复，虽然他允诺，会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

虽历经了各种波折，此次会面最终在平和、安静的气氛中共持续了近1个半小时。当中国同志了解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其举止不再拘束，且显得随意而友好。在道别之时，邓小平说：“你们在信中呼吁团结，这很好。”

会谈进行期间，在座的除上述人员，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我方参加人员有使馆公使衔参赞H.H.梅夏采夫和使馆一等秘书Г.А.甘申。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ПРФ, ф.3, оп.65, д.620, л.1-7

№207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3月5日会议第22号记录

第22号记录第43项 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情况报告

1962年3月5日

绝密

1.批准《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附件)。 [\[81\]](#)

2.使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了解《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了解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39, л.46

№09984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1962年4月9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5月8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1962年4月9日

4月5日，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会见毛泽东，或者他指定的中国同志，向中国方面通告外交部长A.A.葛罗米柯与Д.腊斯克 [82] 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情况。

等了4天之后，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邓小平会见大使，与此同时，大使同他的会谈能够满足苏共中央的委托(如果我们没有异议的话)。

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拜访了邓小平。

邓小平问到我的莫斯科之行，我详细告诉了他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关于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措施。

邓小平感谢我带来的这些消息。“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尽快地解决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然后邓小平提到他的任务，他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7日答复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来信的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5日致越南劳动党的信的复印件交给了我。(这里所说的文件已经分别寄给中央了。)

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信件很长，邓小平说，他不会去读他们。他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的基本内容继续说，就事实而言，不论怎样，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必须互相平等对待，在解决这些即将出现的问题上统一思想。为了这些目标，他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建议召开新的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从一系列兄弟党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表达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愿望。邓小平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英国共产党、瑞典和新西兰共产党(按收到的顺序排列)发出了这样的信件。邓小平进一步说，以往积累的经验表明，首先应该召开各兄弟党之间的预备会议。展开这一想法，他强调“在当前条件下仓促召开会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且由于这一理由，必须实施大量的准备的工作并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工作必须具体化。邓小平说，如果这样的会议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那就不如不开。他进而谈到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兄弟党指定苏共中央召集会议。

由于不熟知信件内容，我没有对此作任何评论。我仅强调在苏共中央2月22日的信中表达了为统一和团结所进行的真诚努力。

邓小平说，这一会议意味着保证兄弟党的统一和团结。他说：“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各兄弟党的代表们必须开会并达成共同的结论，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团结。一句话，会议必须保证成功，为此，大量筹备工作是必须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前，邓小平继续说，准备工作做得好。因此，会议的结果是好的，会上没有发生大的问题。类似的筹备工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前做得是不充分的。这一准备大约要4或5个月，包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的双边会谈，文件的撰写工作等。其他工作，他说，筹备工作要考虑确定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这里，他有意避开明确说明中共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是否举行双边会谈。

邓小平说，会议的召开影响到所有的党，因此应当同所有的党进行协商。他强调，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必须同苏共中央讨论，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作为会议召集人，苏共中央承担着相当沉重的义务，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必须与其他兄弟党协商。他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与个别的兄弟党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谈将有助于保证会议成功。

就我所知的中方信件的内容，我请邓小平解答一些问题。

我问他，中国同志是否考虑过近期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召开一个大会。邓小平回答，在信中没有谈到召开大会的具体期限。为了开会，要确保有详细的准备，他说，我们准备在任何时间开这样一个大会。然而，他坚持重复说，最重要的是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假定召开了这样的大会，要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说，会议要取得团结一致的成果。

另外，我问邓小平，中国同志是否将就会议主题预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初步协商，或者中共中央是否现在将这一计划通知所有的党。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只是含糊地回答说，关于召集到一起开会的计划已经在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中作了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一些兄弟党写信给中共中央，他们责备我们与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大会期间的事件有关联。英国和瑞典共产党提议兄弟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另外一些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及法国、西德、芬兰等国的兄

弟党也给中共中央写了信。我们给他们写了回信，信中我们向他们通告了向苏共中央写信提议召开会议的打算。”他说，我们还想向其他的“可以被通报的”党通报这个建议。

他说，中共中央给兄弟党回信的内容，与4月5日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信件的内容大致相近。

我说，一旦收到上述文件，我将毫不耽搁地把它转送给苏共中央。

按苏共中央的指示，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葛罗米柯与腊斯克的会谈情况。他感谢我带来的消息并说将尽快转达给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们。

会谈期间，我告诉邓小平，一个以帕托利切夫 [83] 为首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将在4月13日到达北京。邓小平表示中国方面欢迎代表团的到来。

他说，全国人大正在继续开会，显然在几天内它将结束。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赵仲元以及大使馆赞O.Б.罗满宁和二等秘书A.A.勃列日涅夫参加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苏联驻中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17页

№20793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1962年4月9日)

1962年4月9日

根据苏共中央1962年3月1日的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瑞典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了解了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的内容。

此外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和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古尼亚尔以及丹麦共产党主席艾斯比尔森也在莫斯科了解到了上述信件的内容。

兄弟党领导人对这封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这封信是及时的，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他们也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今后的实践工作将是很有益的。其中一些同志指出，如果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能够被其他兄弟党领导人所了解，将会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带来很大的利益。

我建议，另外要通过苏联大使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84]

波诺马廖夫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80, л.45

№207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4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4月14日会议

第26/12号记录

1962年4月14日

绝密

认为另外还需要通过苏联大使进行口头传达，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批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 [85]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51, л.6

№13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2年4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4月17日会议第2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 [86]

..... [87]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 [88]

赫鲁晓夫。

准备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

不要拖延。

我们应该表现出主动。

我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分歧已经被宣扬出去。

关于协商问题，如果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话，原则上是不反对的。

[89]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9-10

№13737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1962年4月1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4月18日

第253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与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年4月17日

今年4月17日，我应邀在使馆接见了K.梅农。

梅农心绪很是糟糕，因此与其一起来使馆的只有他最信任的前助手П.班达利。

梅农说，印方曾与苏方商定，印方可以向苏联购买6台用于本国歼击机的发动机并获得该类型发动机的许可证。“可是，你们这种类型的发动机根本不能与印度XΦ24型飞机的机身相匹配，因而需要重新制作，即对发动机作一些改变。”据梅农说，目前在班加罗尔的印度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的结构作一些改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可能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对此印度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

梅农继续说，印方希望从苏方得到对发动机进行改造的权利并向印度援助2—3个苏联专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进行相关谈判，印度政府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由达特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可是，据梅农从达特将军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后者提出的改造发动机的请求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如今，印方面临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才能摆脱这一困境：或者将该发动机送到法国，或者其他国家。

梅农说，“苏方做出拒绝的决定，将把印度人推向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怀抱”。

梅农强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并将使我名誉扫地。须知，我们为了这种发动机已准备好了工厂和相应的机构。如果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问题必然要拿到国会中讨论。我的名誉将严重受损，国内反动派会利用这一机会攻击政府。国内新闻媒介也会借此大做文章”。

我对梅农说，据我所知，我们的专家认为，印方的所谓改造发动机实际上就是生产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我警告他道，要是在3年以前这样做是可能的，而现在，这种类型的苏联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完善

了。印度的歼击机目前仍处于试制阶段，因此如果能够对印度歼击机的结构作一些调整和改进，可能更合理，所花费的时间也可能更少些。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梅农说，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要是対现有印度歼击机的机身加以改变，实际上就等于要重新造一架飞机，所花费的时间至少需要3—4年”。

梅农指出，当达特与米高扬和西多罗维奇等同志会谈之后，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他们似乎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进行改造是可行的。

梅农强调，至于改造发动机的期限印方并不强求，“印方愿意为苏联发动机结构上的改造承担一切责任，只是该发动机在安装到印度歼击机上之前必须进行所有必要的检测和实验”。

梅农继续道，自己对杰缅季耶夫 [90] 同志的拒绝感到很不理解。他之所以拒绝印方的要求，只能解释为他对此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不太了解。苏联对印度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关键是你还要对此事的深远意义有更透彻的把握。

梅农请求将他的改造苏联发动机的要求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请后者批准并最终向他本人通报苏方的结论。

我答应会把这一情况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在会谈结束时我问，尼赫鲁总理身体如何。梅农答，“虽然尼赫鲁仍在坚持工作，但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B.A.济明。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B.A.济明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年4月23日

No25954 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 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1962年4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_份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Y.乌苏巴里耶夫同志：

报告书

关于采取措施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兹通报如下：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预计将有大量中国公民穿越国境进入吉尔吉斯境内。

鉴于上级做出决议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置这些移民，为了更有组织的完成这个决议，请求您对下列问题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

1.委托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局劳务和移民局与各区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公民就地安置。

2.考虑到绝大部分越境的中国公民一般都没有带必需的生活资料，我认为，1960年12月2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605/38C号《关于从新疆回国的苏联公民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决议可以适用于他们。

3.为了限制敌对的破坏分子渗透到部署有特别重要的设施的地区，为了不使他们在距离国境线较近的地方居住下来，应当使他们迁移到加盟共和国的腹地。

有鉴于此，不应把越过国境的人安置到加盟共和国的如下一些城市和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茨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

由于越境的破坏者中可能有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在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亲戚，应把这些人安置在距其亲属较近的

地方，或者在经他们的亲属同意后，把其转交给其亲属照管，但上述区域除外。

可以把中国公民安置到那些比较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工作。

4.考虑到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警备司令部和哨所所处地区偏远，要保证他们能对越境者进行拘役和押送，保证他们用必需的交通工具押送这些人，并在如下接受地点对他们进行安置：阿特巴什村、天山州、奥什州阿赖斯克区的萨雷塔什村、普热瓦利斯克和奥什市。

鉴于不可能得到其他的交通工具，责成劳务和移民局负责把中国公民从苏联边界地区用飞机运送到奥什市，可以预料，近期在苏联的这些边界地区将会有越境者。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П.奇韦尔特科(签名)

1962年4月26日

第6885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2—1014页

№25958 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1962年5月4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

1962年5月4日第25号

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克格勃的报告(П.Б.奇韦尔特科同志)

鉴于大量中国公民可能通过苏联国界进入吉尔吉斯，为了有组织地安置他们(定居和安排工作)，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1.为穿越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专门设立安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主席B.Φ.斯捷平；委员会委员П.М.霍多斯、O.图拉利耶夫、Дж.托伊贡巴耶夫、A.A.库特马纳利耶夫..... [91]

2.责成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和天山诸州党委和州执委，建立委员会，负责上述(中国)公民的接待、迁移和劳动安置等事宜。

越境(中国)公民的迁移应在共和国后方地区进行，可在除共和国城市之外的、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其安排工作，具体涉及如下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斯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列宁斯克和丘普斯克。

3.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1950年12月2日通过的“关于从新疆遣返苏联公民及其家属”决议(相关规定)，适用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公民，一次性发放过补助金的除外。

4.责成公路交通部(K.K.科尔巴耶夫同志)为从努拉阿赖、卡拉塔什苏维埃茨克、图鲁加特阿特巴申斯克和卡拉萨伊、杰特奥古兹斯克等地区诸居民点撤出的公民提供交通工具。从克孜勒扎尔居民点至卡拉塔什居民点人员采用牲畜驮运方式撤离。

5.责成卫生部(A.艾达拉利耶夫同志)组织好医疗服务，给予来自中国公民必要的医疗救助。

6.责成教育部(T.图尔古诺夫同志)统计这些来自中国公民的学龄儿童数量，以便其能够全部上学；孤儿和多子女家庭应指定保育院和寄宿学校负责接收。

7.责成生产采购部(П.Г.亚基姆科同志)组建牲畜—植物卫生监督机构。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T.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62年5月4日

印发12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5—1016页

№13745 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 等问题(1962年5月1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5月31日

第49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武官陈皓的会谈记录

1962年5月19日

在民主德国贸易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使馆武官陈皓进行了交谈。

陈皓说，印度政府看来不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因为该政府更喜欢派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而不是使节。陈皓这里指的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已经有10个月没有在北京露面了。陈皓强调，印度政府坚持要派军队进入两国有争议地区，并在那里加修防御工事、更换军队和运送武器弹药。中国武官还对印度国防部长上星期的克什米尔之行感到不安。不过，陈皓也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两国存在争议地区所部署的军队并不太多。这一方面说明，那里属于高山荒原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粮食供应不足，难以驻防大部队。另外，关于印度在那里派驻军队陈皓还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这是印度军方所运用的整体战术的有机组成部分。陈皓认为，印度人这一战术的目的就是想使印中边境地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不动用大规模部队和进攻的情况下不断使用小股部队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领土。而且，在印度军队每

次得手之后，印度报刊都要大肆鼓噪一番。印度人的进攻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一次接着一次。但是，陈皓指出，印度人的这一政策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使自己失去一切支持，到那时候，印度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必然无法避免。

陈皓说，中国当然希望与印度和解。但印度军队无休止地侵犯中国边境，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和报刊对这些小规模冲突的大肆吹嘘均无助于两国间问题的和平解决。陈皓再次强调道，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要达到这一点很难。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5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53—3654页

№207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5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5月31日会议

第33/1号记录

1962年5月31日

绝密

1.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附后)。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

2.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

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今年6月召开经互会会员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会议时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们。

3.委托苏共中央国际部提出建议，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能够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60, л.1-2

№13746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1962年6月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6月__日

第38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6月6日，应我的邀请，贾·尼赫鲁接见了我们。

我告诉了贾·尼赫鲁，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实施侵略政策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危险局势的看法。贾·尼赫鲁仔细地听取了苏联政府的想法之后，说道：印度也对东南亚的形势感到忧虑。贾·尼赫鲁承认，南越的确存在着美国的武装干涉力量。贾·尼赫鲁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与究竟那一方会对我们好无关。国际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就应当以事实为基础。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北越也与发生在越南国家南方的事件有关。贾·尼赫鲁请求我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外交部民族合作国家事务司秘书古尼杰维亚进行交谈。说了此话后，他便立刻将后者叫了来。很明显，贾·尼赫鲁已就此次会谈向后者作了相应的指示。

我告诉贾·尼赫鲁，自己即将返回莫斯科休假。贾·尼赫鲁请我向苏联政府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转达自己最良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时对印度的支持。他说，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形势相当复杂。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议案，却让一个小国在安理会上提出了所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而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由这些小国家来提出明显是有些欠妥的。

贾·尼赫鲁看起来神色疲惫，我感到，他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尼基福罗夫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年6月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1—3662页

№13750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1962年7月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7日

第460号

摘自М.Ф.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会谈记录

1962年7月7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国大使说，他得到指令需要回北京一趟，因而前来告别。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驻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卡里姆宾格的两名政治参赞和所有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已经关闭)的工作人员也要回国。照中国大使的话说，近期中国不会派新大使来印度。至于中印关系，潘自力说，当自己从北京返回印度之后(今年6月26日)便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委托在两天内两次拜访了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并声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边境冲突问题，只是希望印方不要为谈判预设任何条件。中国大使在第三次造访中向印方再次重申了上两次所说的话。潘自力继续道，作为答复，P.K.尼赫鲁立即回应道，印度政府只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与中国进行谈判，即中国边防哨卡均撤离拉达克地区。在这个问题上，P.K.尼赫鲁根本不提及在两国东部边境的一些地区印度边防哨卡已远远地深入到了中国境内。

总之，潘自力继续说道，从P.K.尼赫鲁的回应中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印度政府不希望协调解决两国的边境冲突问题。中国大使认为，印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待在德里已没有太大意义。

潘自力补充道，在中国外交部最近发出的一份照会中，中国已向印度政府发出了警告，即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这种冲突依然存在，那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应当由印度政府承担。中国大使指出，印度政府不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边境冲突的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希望维持中印两国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极力想向美国展示自己对中国和共产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以便藉此从美国那里获得印度所需要的经济和其他援助”。

中国大使又指出，自己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认可。

关于台湾侵犯大陆的危险，潘自力说，当他离京来印时获悉，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中国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战备)动员，要求相关部队随时保持战备状态并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以便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并彻底地消除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

潘自力指出，国民党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攻大陆，中国民众便会起来响应。潘自力继续道，“据我们估计，把国民党的反攻部队与美军加在

一起也不过只有45—50万人。中国领导人坚信，侵略者必将被粉碎，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会谈结束。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7月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6—3668页

№13751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7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17日

第474号

摘自M.Ф.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纪要

1962年7月14日

今天，我设午宴为中国驻印度大使饯行。同时参加此次午宴的还有中国驻印度使馆所有参赞。在宴会期间我与中国大使作了如下交流：

关于中印边境事件，潘自力说，在中印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局势已紧张到了临界程度，双方随时都可能爆发武装冲突。

潘自力说，在拉达克的喀尔湾谷地印度士兵已深入到了中国边防哨

的后方并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哨所。中国连队指挥官要求印方停止这一举动，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潘自力还通报，印度军队指挥官迅速地在拉达克地区普遍构筑防御工事。中国大使断定，国民党和印度人在行动上已达成了一致，以便从不同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

潘自力说，7月13日他参加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举办的午宴。“午宴举办得相当正式。”按中国大使的话说，尼赫鲁的讲话内容非常全面，但对中印关系却只字未提。（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午宴期间尼赫鲁曾告诉中国大使，印度政府坚决抗议中国人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后者将所有中国军事哨所撤出拉达克地区。）

此次宴会的其他话题均只带有一般性质。

宴会组织得相当好，始终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Φ.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626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9页

№13752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1962年7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27日

第492号

摘自M.Φ.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年7月26日

今天，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来向我辞行。他说，自己已得到指示，很快将启程返回北京。因此来向我告个别，并对在印度整个逗留期间苏联使馆所给予他的各方面协助表示感谢。

叶成章指出，中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原以为，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迅速平息的。

叶成章认为，中印两国间现有的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原因在于：其一，印度政府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从西方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援助；其二，印度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将中国边防巡逻兵从本属中国的领土上排挤出去。

叶成章通报，目前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实际上业已中断，因此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将压缩到最低编制。他还补充道，前不久全印和平大会主席松杰尔拉特曾得到了去中国的邀请，他本人也已同意前往。但印度外交部就是不让他去。

印度外交部在向印度公民发放边境签证之时均依照相关程序在上面做出说明，即严禁前往中国。

在稍作犹豫之后，叶成章询问道，报纸上说A.И.米高扬同志在德里会见了梅农，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对这一传闻，我坚决予以否认，并指出米高扬同志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的确曾在德里停留，但当时梅农已去了孟买。而当A.И.米高扬在德里停留和从雅加达返回莫斯科期间，梅农则已到了日内瓦。

叶成章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

会谈其他内容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Φ.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652号

1962年7月2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0—3671页

№20027 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92\]](#) (1962年8月14日)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大厦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寒暄过后，我们进行了长达1小时15分的会谈，在场的还有朝鲜外务省外相朴成哲。

会谈过程中，金日成同志讲道：

我们高兴地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特别和全权大使，并向您表达我们对继续加强和发展朝苏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党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说道，这是值得期许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友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苏联是我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给了我们援助和支持。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先锋；是我们党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直给我们党以帮助，支持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我们将朝鲜人民党视为苏联共产党的小兄弟。因此，金日成同志强调，我们一贯全力地并将在一切问题上支持苏联党和政府。我们会继续教育朝鲜人民以国际主义精神发展同苏联人民之间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兄弟情谊。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

金日成同志继续说道，我们将会对您这位代表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大使的工作给以全力支持，将我国发生的一切情况予以通报。作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彼此间没有秘密…… [\[93\]](#)

(我)向金日成同志一一表达了谢意，并向他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对他的友好问候以及身体健康的祝愿，还就赴朝前与赫鲁晓夫会面情况向他作了通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我转告(您)，中央委员会和他本人

认为两党关系发展良好，我们对此感到很满意。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完全赞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这一看法，并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模糊不清和疑难的问题。

当我向金日成同志转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请他访问或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邀请时。他对此表达了诚挚谢意，并答应一旦身体需要做治疗，他定会应邀前往，他还强调除了苏联共产党，没有其他人能为他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

金日成同志还表示，他计划在假期过后，注意军事方面的事务，熟悉国防情况。这时，他提起1961年夏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重要军事援助一事，还讲到苏联同志当前在空防领域向朝提供的援助。他还说，在8月15日假期过后，他会与苏联大使会面，商讨军事方面的事务.....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ПРФ, ф.0102, оп.18, п.93, д.5, л.3-9

№13754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8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8月..... [94] 日

第57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年8月26日

我与梅农见了面并问道，报纸上公开的关于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中印

边境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之事是否属实。梅农坚决予以否认，并说道：“印度人没有开枪。我们已向本国军队发布了严格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特殊情况除外。”

梅农说，中国人将自己的哨所设置在印方的交通线上，导致印方无法向自己的前沿哨位运送装备和粮食。这些前沿哨卡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印方不得不派遣小分队去营救。目前，两国的前沿部队均深入到了对方的后方，从而为冲突的随时爆发埋下了隐患。梅农说，类似的冲突无疑会恶化印中两国的关系，并导致印度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这明显只会对反动势力有利。

梅农提起关于自己与周恩来的会谈情况。期间，梅农对周谈了自己的观点：印中关系的恶化对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国家都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梅农又指出，外界所有关于贾·尼赫鲁的继任者究竟会是谁的传言都毫无任何意义。因为尼赫鲁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好，他将会在今后6—7年间继续管理国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745号

1962年8月2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2页

№13756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1962年9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9月..... [95] 日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会谈记录

1962年9月4日

我拜访了萨·拉达克里希南总统，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名义诚挚祝贺总统生日，并祝愿他及其家属在崇高岗位的活动中取得成就以及身体健康长寿。他对祝贺表示热情的感谢。

与总统的会谈在非常热情、友好和信任的氛围中进行。拉达克里希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的活动给予极高评价，强调他在国际事务中、在执行英明的对外政策中、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说明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并说，他多次向印度政府指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合乎情理的典范。总统特别强调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签订采购米格21飞机协议的谈判中显得非常英明、理解和极有分寸。他指出，苏联并不强加这份协议，而只迁就印方的愿望；对协议保持英明的平静和沉默，当大家冲动和叫喊时，美国人的举动“简直愚蠢”，经常提出这一个问题，并以此表示对自己不公平的利害关系。总统声明：“我们深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政府仍将平静、满怀信心、英明而不声张地执行自己智慧的对外政策，并将取得成就。”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声明，他在声明中，甚至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对比苏联同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以军事基地包围谁——是苏联包围美国还是美国包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这样一个对比，足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做出评价。他提起他在科伦坡的一次讲话，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指出，美国制造了原子弹，称此创举为恩赐，并在日本使用了，而苏联制造了原子弹后声称，这对人类是一个该死的东西。

总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但他不否定，由于偶然性、挑衅性或不幸的情况而有可能发生战争。他引证说，因苏伊士、

老挝和柏林等问题引起国际形势紧张，最近双方都放弃了用战争途径进行威胁和解决冲突，并走上谈判和协商的道路。他指出，“苏联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是发动战争的制止因素，不让战争发生”。

总统声明，根据他的见解，印中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他遗憾地说：“这样的小事引起如此的噪音。”他说，他明白中国对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道路的利益关切。总统声明，“根据他的意见，印度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国使用，如果中国承认印度享有这一领土的主权”。总统声明，“印度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自己的领土”，并举例说，1870年英国大地测量学家征得克什米尔大君的特许在这一地区进行勘测。

拉达克里希南继续说：“当这争端得到调解，不仅中国和印度感到庆幸，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庆幸，因为苏联更想与这两个大国是朋友，并走同一条道路。要知道列宁早就希望加尔各答、北京和莫斯科走向同一目的。”

拉达克里希南在会谈中提到，总理的健康虽比春季时好得多，但还不是非常好。他说，尼赫鲁的工作非常多，又不保重自己。现在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竭力帮助尼赫鲁，把他作为“国家第一号人物”。

总统关心地问及苏联近况。我向总统讲了关于我国取得的成就，关于工业、科学、农业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拉达克里希南认真地听完后说：“我感到你们的情况很好。甚至肯尼迪不得不承认，美国落后于你们，因为他对情况很了解。我常对我们的人民说，我们看苏联，要看它在20—40年内取得哪些成就，苏联人民如何从1917年破坏了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强国；他们如何不断加强自己国家的威力。与此同时，我们是如何争论多、讲得多，而做得少。为什么印度不能取得这些成就？！我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我们需要纪律、人民的创造性热情以及为达到目的而集中力量。可是我们却时常夸夸其谈，把一切归咎于总理；反对党极其不妥、无礼、粗暴地对待尼赫鲁，攻击他，而不去做一点正面的事。他们最怕尼赫鲁的方针会把国家引导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把他们吓坏了。”

总统请我向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以及苏联政府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最后，总统希望苏联大使近期不要离开印度(显然由于报刊发表了即将召回大使的消息)。拉达克里希南说，苏联大使应留下较长时间，以帮助将来发展印苏关系，尤其是提出解决印度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问题的建议。他希望很快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当提到印度的农业问题，他不愉快地批评了印度农业部长帕蒂尔先生。

大使馆翻译专员А.Л.尼基福罗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3—3676页

№13760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1962年10月1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10日

第88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而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进行了交谈。

针对印度总理贾尼赫鲁近期发表的关于印中关系的声明，我询问他的看法。

叶成章同志说，他从尼赫鲁的声明中感到，印度政府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本质上与印度军方和国内在野党所发布的声明没有任何区

别。叶成章指出，我们不要指望在近期内中印边境问题的解决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印方根本就没有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叶成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印方的不断挑衅，两国之间的边境争议将会不断加剧。印度把很多军队运往东部边境并始终在那里驻有重兵。

叶成章通报说，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今天举办招待会期间，印度人民同盟和人民社会党等印度在野党在中国使馆周围专门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在通往中国使馆的所有街道上部署了岗哨以拦截和驱逐所有前来参加中国招待会的印度公民。叶成章说，关于印度国内在野党的上述举动中国使馆已通知了印度外交部。

叶成章同志说，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去年，其中主要农业作物的收成都比较好。

我也向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如下情况：今天，Н.С.赫鲁晓夫和Л.И.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发去了贺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7—3678页

№13759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1962年10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3日

第656号

与印度国防部代表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日

我接见了以达特少将为首的由5人组成的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该代表团是根据印度国防部的委托来访的。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苏联尽快向印度派遣专家，以便为印度设计能够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印度代表团强调，这些苏联专家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不仅能承担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作，而且能够组织飞机及其附属工厂的生产活动。印度国防部代表答应将向苏方提供相应的问题清单，第一批苏联专家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只有在苏方作了相应的解释之后，印度代表团才会表示同意，让苏方的飞机设计小组先来，以便对印方感兴趣的问题做出相应的答复。但印度代表团仍坚持要求，这些苏联专家必须拥有广泛的专业并能够迅速地将其派往印度。

我指出，印方常常要求苏方迅速地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答复，但当得到了莫斯科的答复之后，他们往往又不急于解决问题，在情况通报上和给苏联专家的签证办理方面无故拖延。印度代表承认我的意见很对，并承诺他们会竭力不使类似的拖延再度发生。

我建议他们迅速成立大型的设计机构以便完成相应的(飞机)设计工作。他们说，印度已组建了两个专家小组，正在对飞机厂的厂址、占地面积进行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经济参赞Б.С.罗曼诺夫同志，苏联驻印度贸易代表Г.П.维里津和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24203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1962年10月5日)

绝密

今年10月3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前新华社驻瑞士记者张扬(ЧжанЯн)，他娶了一位外国记者新娘，背叛了祖国。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决定遣送他回来，并对他进行专门监视。大使馆请求苏联方面在张扬途经苏联企图逃跑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跟踪。

但是，中国人在阐述了要求后不久，中国大使馆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根据大使馆得到的情报，张扬10月3日不会前往莫斯科。

根据来自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情报判断，张扬被扣押了，在布拉格要登机的时候，他受到中国大使馆8名工作人员的阻挡，并被带回大使馆大楼。

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

(1)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张扬途经苏联时给予中国方面以必要的帮助；

(2)通过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向捷克斯洛伐克朋友通告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关于张扬的要求，苏联方面打算满足该要求。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2年10月5日

第02980/ТС号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98, л.107

№103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2年10月9日)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自1962年10月15日起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4小时30分钟。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斯纳斯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哈尔拉莫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ЦХСД, ф.4, оп.17, д.494, л.6

№10287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 中印危机的立场(1962年10月1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19日

第910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叶成章同志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0日

由于叶同志将要回国，我同他进行了一次会谈。

叶同志主动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他说，印度最后还是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建议。印度方面仍然坚持说，最近在印度领土东部边界麦克马洪线以南发生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军队向南侵犯并攻击印度边境哨所而引起的。叶同志说，事实上这完全相反。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并攻击了距麦克马洪线以北较远的中国哨所。叶同志讨论了他最近与印度外交部中国部门的负责人梅农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叶同志要求梅农拿出1960年印度出版的东部边界的地图，根据印度照会中指出的那些地点的经纬度，找到现在在发生冲突的那一地区。结果表明，由印度人自己标明了经纬度的这一地区在距麦克马洪线以北很远的中国境内。用叶同志的话说，梅农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即使这样，梅农也还是坚持说，印度军队绝对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

叶同志说，促使印度与中国保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希望在国际上得到美国的金钱，并企图镇压那些不合统治阶层意图的国内政治势力。此外，叶同志认为，印度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无法再回到正常的关系上。

叶同志提到了中国大使最近同贾·尼赫鲁在今年7月13日举行的会谈，他说，在这次会谈中尼赫鲁支持两国在双方研究边界问题的委员会于1960年制定的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叶同志指出，现在印度不再建议这一点。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如何评价印度的经济局势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叶同志承认，中国大使馆因完全忙于边界之争，没有对印度的国内发展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

出席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的译员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10日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44, д.5, л.147-148

№1383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 (1962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1日会议第5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柯西金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 [97]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参加其中，制定详细的文件。

委托外交部进行准备工作。

寻求停战。 [98]

麦克马洪线。

中国方面是很难同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撤军的建议——是明智的。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7, л.33-34

№1384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1962年10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4日会议第59号记录 [99]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33项 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

由Н.С.赫鲁晓夫同志继续阐述：

1.暂停向印度派遣米格21飞机。 [100]

2.关于给驻印度的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志的指示。应对尼赫鲁说：“我们感到失望”。

是否想象到，冲突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麦克马洪线是谁确立的？

谁承认的？什么时候划定的？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把军队撤离到20公里以外的建议是合理的。

印度方面关于把军队再撤出20公里的建议，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损尊

严的。

我们赞成消除冲突，因为它是不会带来益处的。

印度未必能够从冲突之中赢得什么。

什么时候提出了关于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的倡议——在1962年11月6日之前。 [101]

电报：

(1)给波诺马廖夫同志——关于1962年11月20日会议。

(2)给乌布利希同志——关于农业问题。 [102]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35

№24196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 访苏情况(1962年10月15日)

机密

向您汇报，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在苏联逗留期间表现得非常拘谨，避免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对我们的成绩进行评价。讨论问题也只是在陪同他们的苏联机关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在宾馆里，而是在走廊或者户外谈论问题。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董辅弼 [103] 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会主席..... [104] 努力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对苏联所取得的成绩持怀疑态度，让他们的头脑中留下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的不好印象。例如，在苏维埃摩尔达维亚列宁宾馆里，董辅弼对代表团的成员说：“不要相信他们，这只是个中等的集体农庄，还有更好的。这只是皮毛。这只是最好的集体农庄之一”。

董辅弼采取措施研究苏联的经济形势和苏联居民的情绪。一开始他隐瞒自己俄语非常好，随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在各种场合与人交谈，认为同衣着简陋的人交谈最好，在乘车时同旅客交谈，等等。在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时他离开团体成员单独活动，在同庄员和工人交谈时间问他们——这个集体农庄是否盈利？商店里用工资是否能买到肉、油等。董辅

初向苏方陪同人员打听，为什么宾馆管理人员必须准确地知道代表团成员的房间号码。

董辅初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张莫潭(Чжан Мо-тан)在列宁格勒、基辅和梁赞多次离开代表团，单独逛粮店，尽管什么也不买。

代表团领导人彭真很不友好地打听苏联的生活情况。例如，他问苏联是否有免费医疗，对苏联公民在医疗的花费进行报销，等等。

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对苏联的最高和最低工资情况感兴趣。

在离开莫斯科的那天，代表团成员拒绝了苏方陪同人员的效劳，借口说必须去一下中国大使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

РГАНИ，ф.5，оп.30，д.398，л.87-88

№1376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1962年10月1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3日

第70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布佩希·古普塔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5日

我接见了布佩希·古普塔，并与他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布·古普塔首先声明，最近一次召开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后，党的

情况大大改善了。他巡视各邦后，感到组织加强了，对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的讨论绝大部分组织进行得很好，对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完全拥护，甚至对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大部分支持苏联的观点。仍有某些争议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包括道路、城市的改名，等等。古普塔说，他号召各组织不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古普塔提到现在书记处开会，讨论喀拉拉邦的情况，印中边界目前局势以及日常事务。他声明，边界纠纷，特别是公开的武装冲突，使印共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印度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困难，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古普塔请我把印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印共与中共关系的意见转达苏联的领导人。

会谈转入这些问题时，古普塔声明，印共没有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关于边界问题的任何信息。“所有关于边界事件的信息都是从一般的资产阶级庸人的报纸那里得到的。由于我们一点准确的信息都不知道，因此产生了许多困难和互相矛盾的意见。”古普塔告知，不久前印共通过接近国防部的一位人士获得秘密消息，印度军队现在离中国领土边界以北3英里。他指出，不能保证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古普塔肯定地说，最近两年半以来，中国同志拒绝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也不听取印度同志的意见。他们不想弄清楚印共对边界争端的立场及其困难。“要知道，他们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和我。我亲自会见过所有这些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一方无法伸手接近他们。”古普塔提到，他在莫斯科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未能实现苏斯洛夫提出关于古普塔与陈毅会晤的建议，当时陈毅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也没兴趣与印度同志会谈。根据古普塔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个月前收到了中共中央从北京寄给印共书记处的信。但是，收件人至今仍未收到这封信，因为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丹吉、南布迪里巴德或古普塔三人领导小组中某一位到大使馆去看这封信。古普塔对此批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是充满同志般的态度，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小官僚，“永远不理解我们”。

古普塔确信，因印中两党关系形成的不正常状况，到了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他赞成各兄弟党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各党的立场，因持续的边界纠纷产生的观点和困难，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不能去北京”。他说，大部分同志赞同他的意见。

他同时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应当像男子汉与男子汉一样会晤和对话的时间来到了，因为中国同志在世界上除赫鲁晓夫外，谁的话都不听”。

同时，他关注到：越来越剧烈的反华、孤立中国的运动，破坏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企图，资产阶级利用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使苏联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意图。他建议加强反对这类宣传的斗争。

古普塔说，印共领导收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邀请，派三名党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南，但至今仍未答复这次邀请，显然是不接受了。他还提到，党报《新纪元》在9月初错误地刊登了订阅南斯拉夫出版物的广告。因此，印共书记处指出，不准刊登南斯拉夫党的报刊的广告，同时也禁止刊登中国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的广告。

古普塔谈到书记处内部职责分工问题。他说，他主要负责印共在议会的活动和党的学习；丹吉负责工会活动、《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纪》杂志的工作；南布迪里巴德从事《新纪元》周刊工作，我们三人都负责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戈文丹·奈尔和约金德拉·夏尔马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书记处的各地成员则负责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谈到创办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古普塔讲了书记处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书记处得出结论，在德里发行英语或印地语版日报将是无效的，因为，在德里的党组织很弱小(只能推销2000份)，当天报纸到晚上只能送到4—5个地点，其余地点要1—2日后才能送到。这使报纸的作用低下；党每月将亏损1万—1.5万卢比。因此决定，在中央领导下在比哈拉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发行3家报纸。比哈拉邦的报纸将于1月出版。

我强调了中央日报的重要性，并提示《星火报》和《真理报》对组织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意义。古普塔对此表示同意，并声明，他明白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特别重要，但对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这类报纸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古普塔说，书记处授权他收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以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关于二十二大提出问题而发表的最重要演讲和文章，并在各地用印地语发表。他请求对此事予以促进以及物质上的帮助。我避开了关于物质方面问题的讨论。

谈到苏联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的组织方案时，他强调说，对此事必须

极其小心。只有书记处三人领导小组将去讨论这问题，并与苏联同志联系实现方案。关于这个问题，古普塔声明：“我不支持中国同志的观点，我也明白，近年来印苏关系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和改善，需要保护它以免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古普塔建议，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在各大城市建立良好的苏联图书刊物阅览厅，以抗衡美国 and 英国在那里建立的阅览室。

我请古普塔采取措施，加快办理同志们到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手续。古普塔答应去办，并补充说，印共代表团在去参加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莫斯科时，途中听到关于党校工作的介绍。古普塔解释说，印共在这里举办了一系列党校，因为这对培训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但不能全部都派到莫斯科来。所有这些党校都将在中央的严格管理下进行工作。

我通知他，《真理报》编辑部邀请各地方党报10—12名编辑人员访问苏联，并参加11月7日的庆祝活动。

古普塔说，可以通过列札·阿里与书记处联系。

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苏共中央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普希金同志、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07号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2—3696页

№25605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1962年10月17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0月27日

第76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7日

应策伯格米德的请求我接见了。

会谈中大使谈了下面几点：

他提起了以前向我们通报过的事，他说最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乌兰巴托，目的是进行中蒙边界的谈判。代表团成员中有区公安厅负责人(策伯格米德认为，他是从内蒙古被叫过来的)以及现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据说以前在边防部队服役)。

大使说，中蒙边界长4000公里，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哨没有驻扎在地图上标注的地方，而是在离它20公里的蒙古境内；他们只有在有水源的地方驻扎。

中国人声称，策伯格米德接着说，他们认为目前在研究边界问题时必须按实际上已经形成的边界线划分，即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划分。大使说，过去中国坚持另外观点，即边界应按历史上已形成的边界线确定。为何中国放弃了这种观点，这个问题很难说。或许他们担心，如果边界问题的解决按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会产生诸多争论性的难题。问题在于：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会想这可能会使人想起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国界是在长城沿线，这样很明显地对中国政府是不利的。虽然我国不希望这样做，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中国现在想进行谈判以确定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如他们把军队进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线后的区域，这些地区在现在的地图上都已标出，紧靠蒙古的边防哨所。中国代表暗示说，地图上所标注的国界线不应算数，至少因为这条边界线不是蒙古人标出的，而是苏联方面。

接着大使说，中国当局恳请我们将关于已在乌兰巴托开始的蒙中边

界谈判的事情及其内容保密。Д.策伯格米德说，他也得到乌兰巴托对此的指示。大使答应等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立刻向苏联大使馆报告。

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最近一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他强调说，对图穆尔奥奇尔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及时的。目前图穆尔奥奇尔在这个边远地区是建设工地的负责人。目前也进行其他机关的干部调遣，特别是历史研究所。全国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提到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总结。大使指出，由于图穆尔奥奇尔的积极活动，最近在蒙古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阴谋日益明显，甚至可以听到要重新审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内、对外总路线的言论。许多人议论起蒙古人民共和国应确立独立经济、保留过去好像(据称)被俄国人破坏的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因此，Д.策伯格米德指出，尽管图穆尔奥奇尔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自己关于这一切的意见，但是在他的默许下，类似的言论在党内和国家内部流传。图穆尔奥奇尔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他对泽登巴尔说，泽狄布似乎要把泽登巴尔从他现在的位子上赶下来，而对泽狄布说泽登巴尔会在背后搞他。他在乌兰巴托的其他机构中就是搞这种阴谋诡计。有人说，乔巴山犯了严重错误，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跟他一起工作的人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听这些议论，图穆尔奥奇尔没有反对它们，一直说“是的、是的”，并且在他看来，好像确实如此。泽狄布和桑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图穆尔奥奇尔就是这样散布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现任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现象在党内、国内持续了将近3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图穆尔奥奇尔是罪魁祸首。

Д.策伯格米德后来谈到了几天前因蒙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事，他在蒙古大使馆举行蒙中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招待会，他邀请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邀请了70位中国领导人，实际到现场的只有44位，职位最高的是陈毅(大使指出，在乌兰巴托的招待会上泽登巴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中国与会代表表现得过于官方化。陈毅在招待会上强调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式严峻，但不会减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接着，陈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更加致力于发展两国间的传统友谊。他举杯，为我们的伟大家庭干杯，说的是中蒙两国，而不是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大使气愤地说，他在那天招待会的发言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被严重地歪曲了。刊登了关于他说的中国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

内容，可对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却只字不提。另外，Д.策伯格米德解释，他不能保证下面提到的数据的正确性，因为没能检查，策伯格米德说他认为有必要向苏联大使馆报告他从住在内蒙古的人听到的有关消息。他们说今年7—8月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反中国当局的大规模运动。参加者宣称愿意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说，他们是蒙古人，终生都从事畜牧业生产，想吃到新鲜的肉。现在我们的荒地上来了500万中国公民，他们耕作了牧场，我们却忍饥挨饿。我们这里的老人却被饿死。

为了平息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抑制它的蔓延，北京派来了以乌兰夫为首的代表团，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每户杀羊，禁止乱开荒地，留部分土地做牧场。但是仍有几个人穿越蒙古的边防线。他们被蒙古的边防战士送回中国，中国人将这些穿越国境者及其妻子儿女当作叛徒和叛国者一起枪杀。

后来大使谈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工作的情况，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从中国公民处得到的消息(有关的消息已向中央专门报告)。

会谈结束时，Д.策伯格米德邀请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他们在伟大的十月革命45周年前夕组织的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我感谢大使的邀请，并表示，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很高兴地参加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5, п.480, д.7, л.96-100

№13762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18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4日

第425号

与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德赛的谈话记录

1962年10月18日

我应邀与M.德赛见面，并与之进行了交谈。期间，他主动谈起了关于印中边境争端和所谓麦克马洪线等问题。

我声称，由于自己没有得到授权，因此无法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德赛答，他了解苏联的立场，也理解我为何要这样说，但仍希望向我通报一下引起中印两国间争议的几个问题。

他说，近几个月以来，印度一直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与中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但中国人却无意维持近两年来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区的平静现状，从9月初开始，中国不断派自己的军队深入到印度境内，并觊觎印度东部边境特区的大部分领土，结果导致近期中印间武装冲突不断升温。中国的上述举动是对印度合法权利的侵犯，引起了印度国内民众的激愤。德赛认为，中国此举无疑使印方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尝试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即使这样，印度总理仍声明，如果中国尊重印度的领土主权、尊严，放弃对印度的威胁，并将本国军队所占地区撤往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不过，从中方所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尝试让本国军队向南方推进。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印度外交部发出了抗议印度军队的行动的照会，以配合他们的侵略行径。在自己的照会中，中国人断言，中印两国军队间的冲突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

德赛提出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理由。

他向我转交了“麦克马洪备忘录”的文本和1962年9—10月间中印两国互换的照会文本，其中包括两个最新的印度照会文本在内。

德赛指出，印度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虽然中国已经侵占了印度很多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印度绝不会让中国军队继续这样做。他警告道，

在1960年的谈判中，中方便曾表示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以印度承认中国占领拉达克为交换条件。如今，中国又向麦克马洪线发起挑战，试图利用拉达克问题对印度施压。德赛认为，近期内解决两国争端的前景渺茫。“如果因此而导致两国间的战争，那就可能持续10年、15年或20年。”

我对德赛谈了苏联政府对印中边境争端的观点，并强调双方理应以和平谈判手段解决争议。我指出，在边境上相互以武力攻击，远非解决争端的明智之举。

我向德赛通报，苏联政府已同意印度政府的最新任命，即由T.H.考尔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对此，他代表印度政府表示感谢。

我告诉德赛，根据两国间现有贸易协定，很难取得向印度供应苏联商品的许可证。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印度外交部副外交秘书K.B.H.梅农和我使馆顾问、翻译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87—3689页

№207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1962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8日会议

第59/33号记录

1962年10月18日

绝密

1.批准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草案(附后)。

2.委托苏联外交部把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通报给苏联驻中国大使。

附件：

关于第59号记录第33项

就中印冲突问题给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指示

不晚于1962年10月17日 [105]

机密

优先

德里

致苏联大使：

您应当立即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单独会谈，并约定，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担任会谈译员。

请告诉尼赫鲁，您受委托向其通报如下可靠内容：

“苏联政府极其关注印中边境地区，尤其是近期危险事件的发展状况，并认为就这一问题向您——总理先生公开表述一些看法是自己的首要责任。我们在这次事件中不论是对印度还是中国人民都抱有友好的情感，始终致力于印中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不致激化，在双方均能接受的基础上从印中两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巩固全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如果印中之间所发生的争端能够在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精神指导下得以解决，那只能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那些总是试图激化国际局势和插手印中间军事冲突的人们的失败。

您——总理先生自然非常清楚，(在当今世界上)反动的和战争的力量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活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极力在亚洲两大强国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削弱印中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并刻意挑拨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集团在印中边境纠纷之际绝不会放过任何在苏印和苏中关系中进行投机的机会。他们，正如俗语中所说那样——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破坏苏联与印度和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

您是知道印中边境冲突刚开始时苏联政府所持的立场的。那是在1959年印中武装冲突爆发之际，苏联政府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以便在不导致事态复杂化的前提下找到能够令双方均满意的解决途径。苏联政府相信，均以传统的佛教原则为基础构建双边关系的印中两国政府绝不会允许事态走向激化，而会以双方完全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为指导来解决所发生的误解。也正是因此，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虽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而要做到彻底的以诚相见，应当说，也就得这样做才行，而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说苏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衷心希望，总理先生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并认为，如果(各方)都表现出耐心，那就终将找到明智的方式并采取措施来解决冲突。

然而，后续事件，尤其是近期所发生事件的发展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担忧。当前，情况非常清楚，情况的发展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事态的走向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反倒是冲突的加

剧。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印中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出现了大量人员损失。

与此相关，一些印度国务活动家的言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9月15日和10月8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便指出，印中边境东段的局势极其尖锐。他强调，这可能导致(印中两国)严重的冲突，而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必然展开一场厮杀”。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印度军队已得到了开始对中国直接展开军事行动的命令。上述这些声明的性质及其后续行动，都可能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印方在和解问题上、在以和平方式解决边境冲突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努力。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各方严重的不安。

我们并不愿意从本质上探讨印中双方的彼此要求和涉及两国边境冲突的细节问题，虽然我们 cannot 不关注印度国务活动家们的言论。后者言论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印中两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是荒漠地带，对生命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当然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印中两国在内的边境问题是国家间关系中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继承并留给我们的沉重遗产。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便是这样。那么，这条边境线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设立并由谁承认的呢？关于这条边境线在印度境内确定的时间，众所周知是在强大的殖民强国——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在不考虑各民族民族利益，没有兼顾历史和种族特点的情况下便绘制并改画了这一地区的地图。另外，据说，英国当年在改画地图时是随心所欲的，只为满足自身的私利。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因而无法对英国这样的做法给予应有的抵制。不过，即使在国力不抵英国的条件下，中国也从来没有单方面承认过英国人制定的麦克马洪线。

我们认为，您——总理先生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当年殖民时代的遗产未必可以被认定为法律，而让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都必须遵守它。实际上，如果一定要无条件地承认殖民时期强制性制定的边境线，这种观点就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民族间的相互利益发生抵触，而最终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理所当然的是，在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利益和实际，要解决任何涉及主权国家的问题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完全没有干涉印中边境纠纷的想法，只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了解苏联政府为何认为有必要向印方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衷心期望能够更迅速地消除过去殖民时代的人在当前印中关系中所遗留的难题。如今，印度和中国都已是独立的国家，在双方都具有良好意愿的前提下两国之间现存的边界纠纷一定能够而且应当得到圆满的解决。与此相关，我们认为，中国提出的关于双方在不带任何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举行谈判的建议倒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建议是建设性的，不会对双方的声望造成任何损害，既照顾了印中两国相互利益，又可能成为和平解决双方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我们还希望指出的是，早在1959年中国政府便已提出了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建议，即印中双方军队均撤离边境线20公里，换言之，中方将从当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撤退20公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方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接受，用以解决印中之间的争端。而如今，新的撤军要求则可能被中方认定为污辱性的，会损害自己的声望。

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希望印度和中国代表能够在没有任何预设条件的前提下坐到谈判桌前，以便共同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

您——总理先生所发表的多次声明在苏联国内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如关于国家间的争议问题应当通过非武力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国家的智慧并希望印中双边争端将以谈判方式得以解决。您与我们一样都很清楚，如果印中两国无法达成共识，冲突势必日趋激烈。但是，难道以军事行动方式来解决争端就一定会给印度带来好处和利益？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答案是否定的。而(印度国内)那些坚持扩大两国冲突路线的集团是否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认为通过武力就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呢？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路线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深信，印中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对后者而言，两个伟大邻

国关系的恶化将为亚洲和整个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为破坏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制造了适宜的土壤。

苏联政府在高度评价与您——总理先生所形成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在这一关键时刻坦诚地、直言不讳地(对您)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和您——总理先生本人能够正确理解那些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表达的观点。我们衷心期望印度政府能够动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以消除印中边境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并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该口头通报的书面文本可留给尼赫鲁。 [106]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97, л.37、93-97

№13763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1962年10月22日)

第3136/TC文附件

苏联外交部翻译局

1962年10月22日，译自英语

印度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意，并敬请关注中国蓄意和无端侵略印度的事实。

在中印边界西段，即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深入侵犯印度领土。在东段，中国部队于1962年9月10日越过国界线，对印度境内的哨所发动了袭击。1962年9月20日上午5时，大量中国军队在重型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在宽阔的地带进攻印度西段和东段的几个据点。

数周前，中国政府建议开始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个建议由印度政府提出，并讨论过谈判的日程、代表级别和日期。现在明白了，中国关于谈判的建议，只不过掩盖其侵略印度的计划和准备。

印度从来不想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但现在中国人以军事行动强加于它，印度军队正在击退中国的袭击。只要中国积极地继续和扩大侵略印度，不可能公然在任何的法律基础上进行谈判。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印度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印度不止一次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地位的要求。众所周知，印度对制止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所作的努力。印度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和互不干

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原则，侵犯了印度。

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抗击中国的侵略。

大使馆借此机会，再次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2年10月22日

于莫斯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0—3691页

№13765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1962年10月24日)

摘自И.Ф.什佩季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0月24日

第501/юам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苏联临时代办扎伊帕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4日

我应邀会见了P.扎伊帕尔。

他向我通报，今年10月23日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К.Д.马拉维亚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之邀来到莫斯科访问。后者目前为印度内阁成员，与贾·尼赫鲁交往甚密。部长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能够接见他。

扎伊帕尔说，目前印中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已发生了真正的战斗，期间在一些地段中国军队已推进到了印度国土腹地。这引起了印度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安。马拉维亚明白，赫鲁晓夫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希望能与他见一面，即使20—30分钟也行，以便向他解释一下印度政府的

关心的事情。而关于印中边境地区的详细情况，马拉维亚打算在与B.B.库兹涅佐夫见面时再说。

扎伊帕尔补充道，马拉维亚的上述请求(关于与赫鲁晓夫会见之事)带有保密性质。扎伊帕尔希望苏联方面明白，马拉维亚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完成贾·尼赫鲁的委托。扎伊帕尔说，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马拉维亚在苏联的逗留期限为10月28日以前。

我答复扎伊帕尔道，他上面提到了关于马拉维亚的请求之事，我将向苏联外交部领导人汇报。

在随后的会谈中扎伊帕尔指出，目前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均公开声明，他们都站在印度一边。印度明白苏联的立场——苏联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理应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印度人民渴望得到苏联的道义上的支持。扎伊帕尔强调，对于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而言，中国军队竟会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是印度全国上下始料不及的。

我对扎伊帕尔说道，目前印中边境地区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而要是再听信挑唆者的话那就更加危险。正如扎伊帕尔所言，苏联与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印中两国边境冲突伊始，苏联便呼吁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如今，木已成舟，在这种形势之下印中双方代表就更有必要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共同努力和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以解决边境争端。

扎伊帕尔说，他理解苏联的立场，并认为这一立场是客观的。印度也非常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印中争端。扎伊帕尔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苏联理应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南亚司随员А.И.菲阿尔科夫斯基。

外交部南亚司副司长

И.什佩季科(签名)

文件共6份，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Г.М.普希金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第1213/юам号

1962年10月2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7—3698页

№13766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2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4日

第100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4日

今天，我与新任印度驻苏联大使T.H.考尔举行了初次会面。他10月20日刚从英国回来，11月2日便来莫斯科赴任。他强调，他 very 希望到苏联来，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政府派他来苏联工作的。此次会谈是应T.H.考尔之邀举行的。此前，他曾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多位领导人进行过长谈。

会谈伊始，考尔便提出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问题。他说，自己曾两次去中国，认识一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并自认为是中国的朋友。他断定，自己以前非常敬重的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模式，明显已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考尔继续道，“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不遵循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且似乎已完全放弃了这一发展原则。他们否定和平相处，并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考尔指出，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看法存在着误解。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印度政府并没有得到人民真正的支持，印度人民很乐意接受另一个政府。考尔认为，中国的宣传

机器将贾·尼赫鲁比作一个拿着宝剑与北京作对的将军，而一个脖子上戴着山姆大叔用美元做成的花环的尼赫鲁是不会得到印度民众的拥护的。考尔断言，中国近期在印中边境上所采取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印度的和平外交，迫使其放弃中立、不结盟的既定路线，加入西方强国的军事集团，并公开放弃和平共处政策。考尔继续说，“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无论如何印度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虽然我们并不拒绝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援助，虽然为了我们暂时仍相当弱小的军队，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个向我们提供更优惠条件的国家做生意和购买武器，但我们并没有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并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考尔强调，印度政府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自己不加入到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列强所组织的集团之中，不参与任何冲突，以防止自己成为新的冷战热点。

我对印度外交官就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的等问题所发表的上述观点和结论表示了异议。我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均具有爱好和平和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而不懈斗争的性质。我强调，印度当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全面的准备战争，而是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和尽快平息边境军事冲突的办法。我认为，中印双方越早开始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尔答，印度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尼赫鲁在自己给H.C.赫鲁晓夫的信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可是，中国也应当明白印度从来都不会向专制力量屈服，不会在威胁和中国军队的不断进攻下举行谈判，从来都不会在投降的条件下走上谈判桌。任何军事上的挫折和困难，都不会击垮我们和让我们屈服。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直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印度人——具有热爱和珍视和平的天性。他们的反应可能比较迟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反击必然更加有力而持久。印度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受过外族洗劫，但我们对祖国的命运怀着坚定的信念。尼赫鲁曾在自己的广播演说中表述过印度民族的这种信念、决心和镇定。”印度大使再次强调中印之间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军队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后才可能进行，并断言印度已经容忍中国军队的入侵长达3个年头了，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印度人民对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充满了信心。考尔还试图证明，印度有能力承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有与中国进行长期冲突的实力。不过，他又说，中国应当明白，不应当扩大与印度的冲突，因为此举会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构成威胁。考尔指出，就印方而

言，我们已命令军队只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考尔表示坚信，苏联一定会在这次印中冲突事件上对中国施加影响。他告诉我说，尼赫鲁也对此寄予厚望。

这里，印度大使还顺便提到，1953年他作为印度外交部的官员也曾参加了当时和以后年间印中两国间所举行的历次边界谈判。他回忆道，当时中国谈判代表一直借口说时间仓促，来不及仔细研究老地图。中方向印度保证说，印度方面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两个友好国家会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苏联等都有很长一段边界没有界标。但是，随后中国便开始抢占两国在边界上有争议的领土，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于界标的问题。

此次会谈持续1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A.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2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9—3702页

№1028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 不理解苏联的立场(1962年10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 [107] 日

第834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2年10月26日

今天我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主动要求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举行会谈，并通知他有关苏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看法。他认真、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保证马上将苏共中央的意见传达给印度共产党书记处的全体成员。

南布迪里巴德说，目前书记处的4个成员正在德里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苏联《真理报》10月25日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他要求我转告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以及苏共中央在信中对印度共产党提出的忠告，都将帮助印度共产党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南布迪里巴德说：“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感到孤立无援，现在我们有信心摆脱困难的境地。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请转达我个人和古普塔同志对苏共中央的谢意。”他同时指出，印度共产党正在积极纠正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发生的偏差。用他的原话说，许多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不能清楚地区分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不同造成的，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他接着说，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在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印度共产党认为麦克马洪线才是两国边界真正的分界线，印度共产党内许多普通党员和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认为，边界冲突的引发和加剧的责任，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古普塔指出，苏联《真理报》的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地会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使他们重新考虑有关的问题。书记处的成员奈尔和夏尔马也指出，《真理报》的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志，反而批评了印度共产党的立场，并说由此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南布迪里巴德在印度共产党书记处讨论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后发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将会在印度国内掀起一股新的反苏浪潮，使反华的情绪转变为反苏，并进而扩大到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指出，由于苏联《真理报》这篇文章的影响，许多中立国家也会强烈呼吁

印度尽快地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印度政府会因此得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的结论。南布迪里巴德表示，非常希望帮助印度共产党弄清楚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同志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在不损害尼赫鲁本人威望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促使中国与尼赫鲁举行和平谈判而不是采取武力对抗。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一致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也抱着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愿望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这对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整个进步力量的反帝斗争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49号

1962年10月29日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80, д.6, л.134-139

№1371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1962年10月3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_日

第1005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30日

我在招待会上会见了P.K.尼赫鲁，并表示想了解一下关于他对中国最近提出关于调解印中边界争端建议的意见。

秘书长首先声明，他是和平调解这一问题的坚决拥护者。“谁也不比我更想和平调解。”但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国的建议没有建立谈判可以接受的基础。他说，1959年11月7日的界线与1962年9月8日的界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1960年前印度人在拉达克的那部分没有自己的哨所，但在1960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谈判失败后，在远离这条界线后面建立了自己的哨所。因此，在拉达克的1959年11月7日界线，据他说，对印度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必须放弃自己的大片领土。他强调说：“假如中国人确实认为，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声明，他们的建议与1962年9月8日界线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他们必须同意我们明确的建议，把部队从今年的9月8日界线后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强调，只要中国人不执行从1962年9月8日界线后撤部队这一项，他不会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

P.K.尼赫鲁暗示，印度政府希望，苏联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快速解决。

他顺便说，他否认国防部长K.梅农辞职。

在这次招待会以及后来宴请新任命的印度驻苏联大使T.H.考尔的过程中，P.K.尼赫鲁对苏联大使特别殷勤，在两次招待会上创造了毫无拘束的气氛，对所有苏联外交官表达了十分热情的态度。

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分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09—3710页

№1028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1962年11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4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日

在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尼赫鲁，他靠近我并开始与我交谈。他首先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并说这些看法他已向总统作了汇报。尼赫鲁说总统委托他将一封信呈交赫鲁晓夫，主要是有关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尼赫鲁说，总统非常关注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原则立场。尼赫鲁说：总统曾经详细谈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现在他非常繁忙，也很劳累，需要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只好由我同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以下是尼赫鲁的谈话)

一、两年前，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回来，我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力求和平解决中印之间在边界划分上的分歧，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在某种程度上，我采取了比政府更缓和的姿态。政府当局要求采用最强硬的路线来解决边界争端，而我则主张采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印度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也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解决边界争端，并尽可能地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并没有准备采用任何军事手段。至于两国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现在我们采取了撤退的方针。

二、几年前，我就对中国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认识中共的所有领导人，我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对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所持的观点也都很清楚。我敢肯定周恩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对印度的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而刘少奇则会支持这一政策。

三、我也完全能肯定中印边界争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中共一定是另有图谋，这一定是中共极左派全部策略的一部分。这些极左派明显地掌握着大权并凌驾于中共全党之上。中共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印度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行列，所以印度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他们扬言尼赫鲁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民主主义领导者，而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利用他们的军事进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把印度划入西方集团之中，借以打击整个中立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以及和平共处的方针。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所以说这一事件的根本不是边界和领土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者企图用实践来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起进攻的。

四、我坚信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苏联共产党争论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苏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尽可能避免发生核战争，争取将共产主义的胜利尽可能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经济竞争，而不是通过战争来取得。我们高度评价苏联的这些原则与政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一点也不反对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当然，前提必须是共产主义能够提供更优越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而不是原子弹。

五、可是中国的狂热分子的势力明显在加强，他们正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愚蠢的手段，包括军事行动。他们既不像苏联，又不像美国，对核战争的危险丝毫不懂，所以他们的举动将会危害所有的人民。现在世界已经划分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而中国的宗派主义分子硬要以自己的观点划线，以“一方”来反对“另一方”。

六、我们印度正好处于这种疯狂的理论纲领付诸实践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这种理论纲领还要用以对付全世界和全人类。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援助我们的斗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他们面前退却，不能被他们的威胁所屈服，也绝不能同意他们采用武力占领我国的领土后提出的任何条件。相反地，我们一定要战胜他们，并粉碎他们的企图。只有战胜他们才能保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给中国共产党上一堂生动的课，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和修改他们的思想理论。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1月14日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44, д.5, л.120-124

№1371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 谴责(1962年11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 [108] 日

第881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4日

应丹吉要求我接见了。他转交了印共全国委员会决议中不公开发表的一段原文，只供党内部传达以及通报各兄弟党。他请我把他的信转交苏共中央，他在信中阐述了这段决议的意见(信件另发)。这段原文如下：“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爱好和平、民主的印度的行为是对1960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共产主义世界达成的共同协议的最粗暴的破坏，这次会议是为讨论和平共处、对待刚解放国家态度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举行的。而社会主义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则不惜以损害世界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代价，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会谈时，丹吉同志发挥了他在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阐述的论点，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他首先尖锐地谴责中国同志对待印度的行为，他们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及对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评价等问题方面，以他们理论观点的实用公式来对待印度。他坚信，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就是说，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是有罪的。他想起，还在六年前尼赫鲁曾请中国领导人承认印度对拉达克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以租借的条件移交中国在拉达克所需的

领土。他深信，在两国没有建立良好关系并宣布“潘查希拉”原则 [109] 的时候，发端于中国的边界纠纷是不会得到调解的。这时，丹吉表示完全不相信中国同志关于普遍和平以及关于愿意通过谈判调解这一冲突的声明。他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和平共处及裁军。他们认为，印度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阵营；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工具，因此他们的行为是无罪的。”

我回应说，假如中国不愿意和平调解，那它就不会提出1962年10月24日的建议了。丹吉声明，中国提出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明显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中国是不可相信的。他举了中国内战历史的例子，当中国同志在1949年集中了300万大军进攻国民党的阵地时，也同时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战线上的平静是暂时性质的，要预料情况会复杂化。

丹吉指明，冲突的延续会造成对国内局势失控的威胁，使反革命势力增强，并给进步力量和印度共产党带来极大危害。他深信，在冲突持久的情况下，印度确实会转向西方大国集团。和平调解冲突的拖延会更加剧这一切趋势。因此，印共的最终目的，据他说，就是和平调解冲突，虽然现在共产党强调要更注意防卫和努力，这是为了：(1)共产党不被指责叛国，假如所有带头的共产党员都被捕后，共产党不被赶入地下；(2)夺取目前公然掌握在反动派手中的活动主权，竭力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使反动派退却；(3)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同人民站在一起。根据丹吉的意见，当前局势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共产党不被完全消灭；以此为出发点，印共领导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并要以此阐明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的护国主义精神。

他指出，共产党等待和动摇将近3年了，但幸运的是，现在占领了组织得很好和坚固的阵地。他提示，由于反动派和有势力的沙文主义狂徒的强大进攻，现在一切进步力量，不排除尼赫鲁本人，不得不比真正的护国分子表现得更加积极。

印共主席指出，尽管党采取支持政府及其努力防御的路线，党仍将时常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并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说明，反动分子无疑会宣布，印共支持政府和拥护国防的声明是虚伪的，并将要求禁止共产党；另一方面——印共左派活动分子不同意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企图破坏党关于加强防卫的措施：为军队募集经费，停止罢工，等等。这样，他们也将促使反动派努力把共产党赶入地下。

丹吉对《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表示极大的遗憾，他同时表示完全不同意文章中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评论，据他说，这篇文章“得罪了印度人民”。他实际上是在指责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支持中国的观点，甚至暗示，印共“左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他们以前有的赞同苏联共产党，有的以中国同志的理论原理和实际行动为基础，并不完全同意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现在左派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了”。他说，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要求公布苏共中央来信，因为该信支持他们的建议。但是，丹吉不许公布此信，他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此信将立即成为资产阶级报刊的资料，导致外交及其他方面复杂化，并玷污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良好声誉。据他说，“左派”认为他不同意公布此信会造成失去大多数的危险，因为按他们的见解，假如介绍苏共中央的劝告，一定会影响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大多数就会站在“左派”——《真理报》文章的拥护者方面。

丹吉证实了有关书记处三位成员的事实。他说：“他们自己请求辞职，我们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据他说，南布迪里巴德同志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明，他现在“处于这样的混乱情况下，既不能讲，又不能写，也不能工作”。但是丹吉承认，他曾请求他留任，并说，他自己承担全部工作和全部指责。

他说出了反对印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的意见。“只要对中国同志说，他们是对的，而印度和尼赫鲁是不对的以后，才能到北京去。要知道他们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两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到北京去把他们的谬误告诉他们是无意义的。既然苏联同志都不能说服他们，那么我们这个不大的党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指出，中国同志早就拒绝与印共进行任何联系了。

丹吉宣称：“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只有争论麦克马洪线。”他通知说，原定各地方党报12名编辑人员的出访取消了。起初他解释这是由于印度外交部因非常情况而不发给他们签证。后来，当告诉他外交部给大使馆的照会中已表示准备发签证后，他说，现在出访不合时宜。他本人也不愿意前往莫斯科，并说出了反对出访的意见，因为南布迪里巴德在苏联。他还告知，印度外交部拒绝给印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出国签证。

丹吉说，印共没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特别的呼吁。他声明，印共组织一系列的游行反对反动党团，为了抗议他们的反共示威和暴行。他顺

便提醒我们，反革命党团在11月7日准备在大使馆前示威游行。

在回应两名印共活动家在旁遮普被捕的问题时，丹吉有点冷漠地答道，这是不支持全国委员会决议的“左派”。他说，可能还会发生更进一步的逮捕。

丹吉说，他打算近期会见贾·尼赫鲁。

我对在苏共中央来信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中所执行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深信不疑，并提出了丹吉未能回答的一系列反论据。其中我阐明了，继续冲突对双方不利，这(对印度来说)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使薄弱的经济过度紧张，削弱尼赫鲁政府本身，降低印度在世界的威望，并对中国和印度制定的“潘查希拉”原则带来危害。

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和参赞韦休诺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16—3720页

№1371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 和平谈判的立场(1962年11月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5日

今天，我邀请P.K.尼赫鲁共进午餐。会谈期间，我给他看了一篇

《真理报》今年11月5日发表的社论，并给了他一份由我使馆编辑印刷的信息简报。

P.K.尼赫鲁主动谈起了关于目前印中关系的话题。在讨论过程中P.K.尼赫鲁说，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理论方针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认为赫鲁晓夫的路线以及苏共为和平共处与和平而斗争的做法是明智的，而中国所坚持的是一条军事冲突和暴力的路线，他们甚至现在仍在加紧研制原子弹。P.K.尼赫鲁强调，印中冲突只是反映了中国对待和平问题的大方针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它拥有更为深刻的根源。

P.K.尼赫鲁的看法与苏联不同，他认为中国目前已陷入孤立的境地（其中原因并非只在于他本身）。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不了解现实的国际形势的复杂性。P.K.尼赫鲁说，他的这一看法是当他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时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过程中形成的。

以中国的错误立场为例，P.K.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反动政府。P.K.尼赫鲁指出，中国政府的做法明显与苏联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例如苏联认为印度不加入任何集团的做法便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而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的不结盟是“伪装的”。中国似乎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虚伪的印度“缓慢地倒向”西方阵营。P.K.尼赫鲁继续道，中国人试图以武力来迫使印度就范，但他们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中国领导人便失算了。他们似乎期待着印度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印度空前地、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P.K.尼赫鲁说，自己很难解释中国人采取行动的原因。极有可能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内部的困难和危机。

P.K.尼赫鲁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深深地刺伤了印度人的民族感情。须知，当美国企图以军事集团来封锁中国之时，正是印度曾帮助中国建立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却被中国的军事行动毁于一旦。尽管如今中国的广播仍在高唱着中国人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后者实际上都在一致地谴责中国。甚至印度共产党中的多数人也在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指责。P.K.尼赫鲁说，我个人并不赞成目前印度国内掀起的激烈的反华游行示威活动，但这的确是人民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强调了印度政府希望两国尽快开始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之后，P.K.尼赫鲁再次重申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即印度与中国的谈判只能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9月8日两国边界线之后才可能开始进行；当中方完成撤军之后，在双方专家所作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和中国便可以进行谈判。P.K.尼赫鲁认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是明智的。他说，我们甚至没有要求中国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印度领土，没有要求立刻解放被他们所占领的位于拉达克的印度部分领土。印度政府同意在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这样的谈判只有当中国军队从印度东北部边境诸省撤出，当那里仍像今年9月8日以前一样——没有一个中国人之时，才可能开始。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不会开始谈判，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印度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P.K.尼赫鲁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就是有预谋的侵略。他之所以肯定这一点，是因为印度边防军都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而中国军队则根本不同。他补充道，即使领土是存在争议的(虽然他个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但事实是中国的确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动用了武力。

P.K.尼赫鲁承认，如果印度政府在1954年时便对印中边界的划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那么双方可能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冲突。另外，冲突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两国在对方的首都均没有大使，从而妨碍了两国政府的联系和沟通。

P.K.尼赫鲁认为，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印度无疑将承受经济上的困难，但印度政府仍将坚决支持如下计划：

- 1.继续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
- 2.抵抗侵略。
- 3.在印度民族尊严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随时准备举行谈判。

P.K.尼赫鲁强调，近期中印之间原本已缓慢地出现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迹象，但由于10月20日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前一阶段的所有努力都毁于一旦了。

P.K.尼赫鲁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为消除战争威胁在古巴危机事件中所做出的最终决定。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不顾及自身威望的做

法是明智的。不过，在印中冲突这件事上，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做法并不能作为印度仿效的楷模。因为前者是中国以武力占领印度领土，在这件事上印方要是妥协的话，就有些不明智了。P.K.尼赫鲁还试图以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纵容为例，来为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妥协的做法进行辩护。

针对苏联政府希望印中两国应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P.K.尼赫鲁给予了高度赞赏。后者同意苏联的观点，即继续冲突对印中双方都没有好处。与此同时，P.K.尼赫鲁表示希望苏联能够向中国“施加善意的影响”，以便后者将心思重新回到与印度和平解决冲突的思路上来。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根据我方的一贯立场，一直向对方表达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印中两国立刻结束冲突，开始谈判。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A.M.瓦维洛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1—3724页

№13716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1月13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15日

第3354/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莫斯科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3日

考尔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陪他一同来访的还有印度驻莫斯科使馆参赞P.扎伊帕尔。

考尔跟我谈了自己13年前来苏联时对莫斯科的印象。如今，莫斯科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建筑，甚至新的大街。13年来，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印度虽然也很重视本国经济发展，但很遗憾，目前国防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为国防花不少钱。印度始终致力于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她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不过，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的这一政策。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针对印度的侵略，就是因为他晓得，印度在国防方面准备不足。

我答，考尔理应非常了解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印中两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放下各自的所有架子，并开始举行谈判。

考尔说，这里谈不上架子的问题，要知道，印度从1959年便一直忍受着中国对印度领土的侵犯。时至今日，今年9月8日之后，中国军队竟然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对印度的直接侵略，这实际上无异于对印度宣战。对此，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的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所有印度人民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印度党派和各阶层民众都对尼赫鲁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至今，中国人仍不同意撤退到今年9月8日以前他们所在的阵地，也没有对举行与印度的谈判作过任何表示。

我答，印方不能根据印度国内民众的情绪意气用事。因为这种情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并使两国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考尔说，印度总理已竭尽全力来安抚民众情绪以将其纳入到建设性的轨道。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已无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的侵略问题。究其本质，实际上便是关于(中国)统治整个亚洲的问题。印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已得到了另一个不结盟国家元首——纳赛尔的支持，但中国却拒绝了这些建议。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对某些领土提出要求或其他占有的想法，而在于，中国是想迫使印度屈服于

自己的武力。

我对考尔说，在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多封信件中，在赫鲁晓夫与印度部长马拉维亚和考尔的会谈中以及在《真理报》上，关于印中两国间冲突的解决，我们的观点已表达得相当明确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不应当向后退，而是应向前看；各自都应当放下一切架子和脸面，在不提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判。否则，这种冲突就会发展到双方永无宁日的地步。

考尔再次强调，只有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9月8日其所在阵地之时，印度才可能与中国开始谈判。印度不可能再作其他妥协。因为这里并非只是个别冲突，而是大规模的侵略。尼赫鲁在国会演说中将之与希特勒的侵略相提并论。

我对考尔道，战争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迟早都是要坐下来谈判的，而且谈判的越早，问题就越容易得以解决。

考尔再次声称，他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考尔继续道，印度过去和今后都将始终信守不结盟政策，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也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为何苏联不向那些沦为侵略的牺牲品的国家提供保护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让苏联公开地去保护冲突中某一方。而是说，苏联可以帮助(被侵略的一方)来寻求谈判的基础。须知，中国可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

我答，苏联与印度和兄弟般的中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如果苏联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它所采取的立场就可能让双方都不喜欢。因此，印度和中国应当自己去寻求谈判的基础。

考尔说，在印度国会中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目前形势下苏联是否还会履行自己与印度于今年8月份所签署的关于向印度提供飞机和在飞机厂的设计、建造方面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关于这一问题，T.考尔说，他将与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商谈，并在稍后希望与我再次会面。

本次会谈的记录：翻译司随员O.M.阿列尼科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签名)

文件共17份，送：葛罗米柯、拉宾、马立克、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波采罗布、斯米尔诺夫斯基和图加里诺夫等同志，第一顾问组、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驻印度德里大使馆、档案室(3份)

1962年11月15日

第мб-5998/гс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5—3727页

№1371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1962年11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8日

第83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4日

我拜访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并转达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在其生日之际对他的衷心祝贺。

贾·尼赫鲁请我首先向H.C.赫鲁晓夫转达自己对其祝贺的诚挚感谢。他又道：“请再对他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珍视赫鲁晓夫本人、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我们国家的友好感情。”

接下来，印度总理又主动说道：“关于我国北部边境的状况，我认为，您和您的政府是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了解这场灾难对我们所造成的诸多困难和不便的。我已在(给苏联政府的)多封信函中陈述过我

们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仍然希望大使先生把这一问题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做出报告，因为您一定对此事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更透彻。我希望，您能提请苏联政府关注印度广大民众对此事(印中冲突)的强烈反应，请苏联政府关注我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尼赫鲁对在自己生日之际能接到H.C.赫鲁晓夫的温馨祝贺感到高兴。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1009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28页

№13718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1962年11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 [110] 日

第884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代表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4日

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主动来访的C.A.丹吉。

丹吉通报，今天印度共产党秘书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他有必要在近期前往莫斯科的决议。关于他此行的目的，他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与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成员会面，并向其汇报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1962年11月1日决议；说明印度共产党的困难和问题，与苏联领导人商讨这些问题。丹吉认为，自己到苏联之后再从莫斯科前往北京将会更合理和更有好处，以便让中国同志根据第一手资料了解印度国内目前的实际状况，并与中国同志讨论相关问题。丹吉说，他前往苏联的正式理由是苏联邀请其来苏休养。丹吉又道，他在与贾·尼赫鲁的交谈中已说了自己打算出国的事，并告诉他说，印度共产党应当向兄弟党解释印度的国内形势和印度共产党所做出的决议，只是并没有提关于自己可能去北京。丹吉请求苏共中央通知他，自己究竟何时动身去苏联讨论上述问题比较合适。丹吉表示，希望届时可以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以便在苏联作一次旅行，因为他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那还是1947年的事。丹吉还请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转告他的口头请求，即他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丹吉通报说，印度秘书处不同意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与丹吉一起前往莫斯科，因为目前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还很不成熟，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由于思想上动摇不定，他甚至都无法为报纸写文章。这样，他自然不能在出访苏联期间执行党内多数人所确定的路线。丹吉说，如果我与他一起去苏联，那么“他到时候就可能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有鉴于此，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兄弟党面前，只能有一个人来作为印共的正式代表，他将有权以党的名义讲话。最终，丹吉被任命为党的代表，而南布迪里巴德则由于自己的动摇不定被取消了前往苏联的资格。丹吉明确声称，他个人也反对让南布迪里巴德去莫斯科和北京。

丹吉说，自己与贾·尼赫鲁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据丹吉说，贾·尼赫鲁了解国内右翼势力的危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贾·尼赫鲁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丹吉建议贾·尼赫鲁加强国大党的活动以对政府的政策和贾·尼赫鲁本身提供支持，并提请贾·尼赫鲁重视国大党当在野党活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悲观情绪。于是，贾·尼赫鲁问：“我该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在国内5—6个大型中心城市举行国大党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政府的政策和拒绝右翼和反对派所提出的纲领和论断。据丹吉说，贾·尼赫鲁已经同意将在明天举行的印德国有企业职工大

会上发表演说，然后他还要组织一个国大党大型集会并在期间发表长篇演说。丹吉说，贾·尼赫鲁很快还要前往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并在那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丹吉继续说，“在与尼赫鲁会谈期间，我没有直接表示希望K.梅农辞职的意思，但已向他作了相应的暗示。我说，如今印度国内所有针对政府的指责都集中在梅农身上，但我们有可能揭露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对的实际上就是尼赫鲁本人”。丹吉认为，当前线第一次失利之后，梅农就应当立刻递交辞呈，那样就可能对挽救政府有所帮助。其实那时就应当让他走人，至于现在更不必帮他。由于承担着联合国的工作，梅农实际上对印度军队的状况并不很了解，只是由于他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才在国家各部门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丹吉补充道，梅农在国内树敌颇多，不说各种政治上的原因，仅就他沉闷的性格和尖刻的言语等主观原因而言，便已使许多国大党人和与政府亲密人士非常反感。据丹吉回忆，自己曾与梅农在伦敦共事两年，从到达那里的第二周起他们便绝了交。丹吉声称，“拉达克里希南对梅农也怀有很深的恶感，因为后者曾经挖苦他，说他作为一个教授和律师，根本就不了解印度的实际，对印度的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丹吉认为，正是由于梅农的原因，作为政府的组织者之一的拉达克里希南才被撵出了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拉达克里希南与尼赫鲁本人的关系。现在，总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地支持总理了。外界传闻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即自尊心很强的总统希望由自己来掌握行政权力，而让尼赫鲁退居二线，这充分说明总统的政治积极性正在明显加强。

丹吉认为，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查万是右翼势力的核心。他会在主要问题上支持尼赫鲁，但这并非出于其坚定的信仰，而是他本人对总理的尊敬。表面看来，查万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在政治上他也不像梅农那样强硬。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显然是得到了尼赫鲁和莫拉尔吉·德赛的支持。他曾经与我们一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随后于1921年与我们分道扬镳，并加入了M.罗伊的派别。他参加了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坐过牢。当孟买邦根据语言特征发生分裂之时，他原则上赞成印度共产党的观点，但实际上却支持了尼赫鲁的主张。就在这时，他与德赛发生了不和，此前他们是密友。当德赛在孟买邦任第一部长之时，查万曾在德赛的内阁里担任过部长职务。由于美国人的帮助，查万被任命为印度国防部长，因此便有人认为他是德赛的追随者。丹吉说，“查万实际上仍与德赛维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当他来德

里时，经常会在后者家里逗留，我就在那里碰到过他。如果德赛看到，多数内阁成员都支持德赛的话，那么他也会支持他。但总体而言，他基本上仍属于尼赫鲁派”。查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与他很难开诚布公。有传闻说，查万不同意尼赫鲁提出的关于1962年9月8日边界线的建议，并表示要追随印度共产党。丹吉指出，“不管怎样，德赛毕竟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逮捕共产党事件负有责任”。正是因此，印度共产党兰纳迪夫 [111] 小组决定在国大党全会开幕前夕召集秘密会议。在会上“左派”组织决定公开放弃本党的纲领，公开反对党的多数的意见，为了对外公布自己的纲领，他们甚至准备随时转入地下斗争或坐牢。丹吉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该左派组织准备将兰纳迪夫的纲领印在传单上，但传单尚未印出，北京的广播已在今天公布了其中内容”。丹吉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然是‘左派’自己将这些资料送给中国人的。”

对此丹吉指出，中国对印度广播中所说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向北京通报的情况，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如据中国使馆通报：印度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假装拒绝保卫祖国，尼赫鲁的反动政策已经背离了不结盟政策，等等。丹吉对中国使馆的整体工作情况极其不满。他认为，该使馆中“那些不负责的官僚们”只从各种信息中挑选那些与其想法相吻合的，并能证明其想法正确的东西。丹吉表示希望能够向中共领导人写一篇文章，以回应他们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再论在印中边境冲突问题上的尼赫鲁哲学》。

会谈临近结束之时，丹吉强调：“如今当‘左派’退出印度共产党之后，印共书记处的情况已得以迅速改观。过去，书记处要通过一些决议需要10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10分钟。这就是说，在印共书记处内已经没有能够妨碍我们的人了。”

此次会谈持续1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参赞C.C.韦休诺夫和顾问、翻译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1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29—3733页

№13729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 米格飞机(1962年11月23日)

摘自Я.А.马立克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24日

第03420/Гс号

绝密

文本第14份

与印度共和国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3日

10点，我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Т.Н.考尔，并向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以答复他给苏联外交部的致函。

“鉴于您就今年8月29日(苏印两国间)协议问题致函苏联外交部，兹通知如下：苏联政府准备按照该协议(之相关规定)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具体包括：苏联将按照协议规定的期限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帮助印度设计和建造飞机厂。

至于(向印度)提供现成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我们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实际能力。原因如下：苏联国内对此类飞机的需求增加；整个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对此已不必再作专门的解释。至于(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向印度供应米格21飞机，估计(我们)得在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还想提请印方注意的是，在8月29日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之时双方已有约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得公开本协议的内容和条件。可是，印方在自己所发表的声明中竟暴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从而致苏方于十分微妙(被动)的境地。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理解我们。如果这样，印方也会得到苏方

的相应的理解和评价。

至于(印度所要求的)AH12飞机，苏联相关部门将会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向印方提供。关于印度要求苏联提供的6架Ми4型直升机，苏方将在1962年内满足印方的要求。”

印度大使对苏联政府的上述保证性声明和苏方将履行1962年8月29日苏印协议表示感谢，并指出，此举不仅对印度的当前事务，而且对印度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随后，他又说，自己前不久还向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苏联)为印度补充提供一定数量的用于和平目的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为印度现有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提供所需燃料等请求。

我对印度大使说，由于他提出上述请求的时间比较短，对此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仍在研究。我补充道，我会关心这些问题的审议结果的。

印度大使还询问了关于印度直升机和运输机驾驶员机组赴苏联接受培训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印方打算再向苏联派遣一个由82人组成的学员队来接受培训。

我借口不熟悉这方面情况，对他的问题避而未答。

关于我在上述声明中提及印方透露了苏印协议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印度大使辩解道，不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驻苏联使馆均未向外界透露过该协议的内容，虽然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的事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大使又道，印度政府只是当需要回应报纸上出现的与该协议相关的投机性言论和为了打消印度民众对苏联是否会履行该协议的疑虑时，才以一般性的方式提到它。

鉴于印度大使的上述表态，我再次重申了我刚才在声明对他说过的话，即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8月29日协议的事。

印度大使接着说，苏方认为不可能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这使印方感到失望。他补充道，因为印度并不想只在一方完成自己的军事采购，从而违反自己的不结盟原则。他还提醒道，自己根据委托通知苏方，印度政府对任何向其提供具有国防意义的装备的(国家)都会表示感谢的，然而他并不想使苏联感到为难。

我对印度大使说，我们希望印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方的处境。苏方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内对米格21机型不断增长的需求。不过，正如我在声明中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讨论这方面问题。

大使首先表示他明白苏方的立场，接着他又询问我对近期中国方面所提出的提议有何看法。

而我则反问大使先生对中国的提议有何评价。

大使说，印方希望在中国的单方面提议之后能够实现双方停火，而中国也能够真正兑现自己所承诺的撤军。不过，目前对这一提议的普遍观点认为，这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方面的建议。这里，大使让我看了尼赫鲁于今年11月14日给周恩来所写的一封信。印度大使指出，尼赫鲁在信中对最新提出的建议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以前所提建议的评价几乎没有区别。

我对印度大使说，如果提议本身是好的，这与它是单方面提出的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有利于解决两国间的纠纷。

大使强调，印度希望得到的谈判条件是，双方军队所占阵地都恢复到1962年9月8日的现状，而并非(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而我们都不清楚，中方是否指的就是这一概念。

我对大使再次提起了我在上次谈判中所表达的希望，健全的头脑终将赢得胜利，对两国都有利的解决办法也一定会找到。我们希望，双方都是在谋求问题的真正解决。

大使说，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可不能做一个乐天派，而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中国的提议含有胜利者对被战胜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接下来，大使对H.C.赫鲁晓夫与他会谈时反复提到的关于苏联对和平共处原则的信仰表示了满意，并希望中国也会赞同这一信仰。不过，他同时又说，我们倒是被自己的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信仰所欺骗。进而，印度大使强调加强国防力量对印度的必要性。他说，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防安全问题是当前事关印度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印中武装冲突问题，大使说，中方指责印度是侵略者，这完全是令人气愤的一派胡言。印度根本不可能在那块前一段时间爆发了冲突的边境地区对力量超过自己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再说印度在那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正是中国人发动了进攻，虽然他们立刻便通过广播提出指责——似乎这场战争首先是由印度发动的。大使最终的结论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及其新建议。

我指出，看来，最好是通过双方正面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方式以确认中方单方面建议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仅从书面上来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

印度大使询问我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应当请联合国出面以解决印中争端。大使声称，在这件事上印度并不打算请联合国帮忙。

我代表苏方指出，这是印中两国之间的事，如果印中双方有能力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解决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最好不要让第三方插手。

此次会谈持续1小时50分钟。当时在场的还有：印度(驻苏联)使馆参赞扎伊帕尔和苏联翻译司顾问O.克罗哈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马立克(签名)

АВІРФ, ф.090, оп.24, п.86, пор.3, л.9-12

№24201 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1962年12月7日)

机密

近10天来，北京对外广播俄语频道播出了大量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材料。其中不少是关于国家解放18周年和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50周年的材料。报道了关于阿中友协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关于为迎接该代表团党和国家领导人安排的招待会的消息，关于他们给阿尔巴尼亚领导层的贺电。详细讲述了北京社会各界怎样纪念这个日子以及在发罗拉举行的庆祝活动，关于霍查、谢胡和列希的学说。谈了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威胁——现代沙文主义——作毫不妥协的、原则性斗争的情况。例如，在11月26日广播中播放了阿尔巴尼亚

驻中国大使的演说，大使说：“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沙文主义企图摧毁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对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

在11月30日，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详细讲述了在发罗拉举行的盛大集会，播放了列希和谢胡的演说。播音中多次重复谢胡的话“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创造性地运用马恩列斯学说的结果”。

在北京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还多次转述了霍查在发罗拉的演说。

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M.哈尔拉莫夫

1962年12月7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98, л.102

№13731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1962年12月1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 [112] 日

第876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12日

遵照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今天我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我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其他成员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尼赫鲁首先询问赫鲁晓夫的健康，对他的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

请代祝愿他身体好，并取得好的成就。尼赫鲁总理请求说：“也请代向所有我的苏联朋友们致以我的问候。”

我向尼赫鲁通报了关于我国工农业工作的成就，关于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关于改组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等情况。总理指出，他高兴地知道苏联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他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苏联不断超额完成计划以及农产品的增长。”

然后，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告诉尼赫鲁的问题内容。我对尼赫鲁说，苏联政府珍惜印度政府及尼赫鲁本人对维护不结盟政策，对维护及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关于以下问题的意见：必须竭尽一切可能积极开展争取和平与普遍裁军，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及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斗争。我表达了赫鲁晓夫关于印中边境冲突也应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愿望。

尼赫鲁认真地、非常关心地聆听这一切，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记录。他对苏联和印度之间、两国政府之间以及赫鲁晓夫同志与他个人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表示极大的满意。他也表示坚信，这些关系不仅现在保持着，而且将来会进一步发展。

总理接着说明，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先生关于我们共同争取和平与裁军的必要性”。他提出，苏联可以指望对这些问题得到印度的支持。

谈及和平解决尖锐的国际问题时，尼赫鲁声明，“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先生本人在古巴事件中给我们所有的人做出了伟大的榜样”。

然后，尼赫鲁详细地叙述了印度对印中边界争议的立场。他说：“这一切并非始于我们方面——这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希望得到调解。”他提到自己在1962年12月10日在议会上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建议，“在我们双方试图和平解决失败的情况下，或在直接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同意任何形式的调停，其中包括把问题移交国际法庭审理”。

尼赫鲁指出，赫鲁晓夫正确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存在，他们力图怂恿政府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争端。他同时声明，政府知道这些势力的行动，但他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根据他的谈话，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体印度人民，普通的农民、工人和职员，“所有人都对中国，对中国反对印度抱有最强烈的反感。当然，他们不要战争(谁也不要战争)，但是，要求

中国人从印度领土撤退，要求保卫我们这片领土。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向中国的领土推进，但要考虑到，人民坚决要求解放属于印度的领土”。

尼赫鲁回应我声明和平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向人们解释和平方式的正确性时说：“我们试一试解释这个必要性，并将这样做。”他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尝试目前尚未取得成果。“我们愿意与中国人坐到谈判席上。我们准备好了。但政府向他们说明，为此必须恢复3个月前存在的边界位置——9月8日的位置。”

接着，尼赫鲁从正在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的谈判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两国关系的问题。尼赫鲁首先声明，巴基斯坦的领袖“和那些建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些现在管理国家的人士，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原则，过去没有制定过，现在也没有任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纲领。他们唯一的‘原则’和‘纲领’就是永远仇视印度”。根据尼赫鲁的谈话，巴基斯坦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和世袭国家官员的人，他们对印度抱有本性的仇恨，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一贯进行消灭世俗主义的斗争，主张国家以宗教为基础，这使印度有可能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在分裂以后，他们仍继续攻击印度，每一次当他们的国家处于严重的局势时，就开展大规模的诽谤运动。尼赫鲁继续说，在每次需要转移巴基斯坦人民对内部危机注意力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提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例如，当东巴基斯坦出现脱离西巴基斯坦运动的征兆时，领袖们立即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并开始同平时一样地宣称，印度准备侵犯巴基斯坦。尼赫鲁说明：“其实我们是最早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完全友好的关系，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同一个民族。这样，我们建议他们签订互不作战公约，但是他们拒绝了。”

“当一位英国部长和一位像是名叫哈里曼的美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调解好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你们与巴基斯坦总的关系？’我回答，我们早就想这样做了，假如能实现，我们就高兴了。同时，我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并说，我准备随便会见任何人并讨论任何问题，但我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向他们说明，不可能谈克什米尔区域地位的改变，因为，除此一切之外，如果我们失去这片区域，那么我们就失去通向拉达克的出口，现在那里我们与中国有麻烦。这样，我们就必然会失去整个拉达克。然而，他们从拉瓦尔品第回来后，仍继续强调谈判的必要性，并带来总理与总统讨论克什米尔

问题的会谈联合公报。”尼赫鲁指出，总的来说，他准备会见阿尤布汗，目前他不打算进行会见，总之对这种会见并不期待太多。他回想起，他曾建议与总统会晤并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阿尤布汗不接受这次建议只不过在几个月之前。但是，归根到底，他同意公布联合公报，虽然其中作了某些修改。森迪斯立即打电话给阿尤布汗并征得他同意尼赫鲁对公报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印度总理在议会上宣读了公报，同时声明，印度的立场依旧，只能在细节上作一些小的修改，不可能对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作实质的和有害的更改。当天夜里12点钟，在巴基斯坦的森迪斯“出乎意料地飞到德里并来到我家”。据尼赫鲁说，他证实，总理在会议的声明在巴基斯坦议会引起了喧哗，使阿尤布汗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英国部长要我拯救阿尤布汗，据他推断，阿尤布汗可能被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他说，可能更野蛮的领袖、更敌视印度的人取代阿尤布汗掌握政权。我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帮助。我想起，我曾提醒过他要当心自己的地位。那时候，森迪斯说，他大概要同我们的外交秘书德赛谈谈。我打电话给德赛，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于是森迪斯夜里1点钟赶到他家，他们商谈到3点钟。到清晨，他们向我提交了关于会谈可以讨论任何问题的简短声明草案。我没有反对。”

谈到与巴基斯坦正在举行谈判的前景时，总理着重说，谈判会遇到严重的误解，因为“巴基斯坦的胃口非常大”。据他说，对印度代表团的指示是允许讨论任何问题，但责成代表团坚决执行政府宣布的政策。尼赫鲁说明：“可以准许讨论对停火线的不大修改，但不能讨论整个克什米尔地位的改变。”他补充说，看来谈判要拖延，因为开始在拉瓦品第举行的会谈将是部长级的，然后是在德里，以后可能是部长与总统的会谈。

总理再重复说，巴基斯坦的领袖没有政治原则，执行机会主义政策，企图利用印度的每一次困难。从印中关系尖锐的时候起，他们为了恐吓印度，开始倾向于同中国友好。为了同样的讹诈印度以及获得大量美援的目的——他们不久前开展了强大的反美运动。

涉及巴基斯坦最近对苏联的外交手腕，他们关于改善巴苏关系的声明，尼赫鲁宣称，据他的见解，“巴基斯坦要这个把吓唬美国，并从美国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也承认，这些行动有使苏印关系冷淡的目的。然而，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据尼赫鲁说，是对印度仇恨和讹诈的政策。他坚信，巴基斯坦的领袖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他们为

了获得军事援助参加了军事条约，这些军援会使他们比爱好和平的印度更强大。总理说，他不排除敌视印度的势力提出关于“自由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他说明，所有关于分裂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什么自治国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提到关于克什米尔成立两个自治区的建议，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会在这一地区造成内部和外部经常紧张局势的源泉。尼赫鲁指出，关于“独立的克什米尔”的国际保证的建议也没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联合国的保证，还是各大国方面的保证。

总理谈到巴基斯坦经常在克什米尔居民中进行破坏工作，并反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他甚至声称，印度政府每2—3天就要镇压巴基斯坦派遣来的暗中破坏分子。

尼赫鲁说，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反对克什米尔邦总督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出访苏联。他指出，然而将来出访的时间，显然要直接依据国内形势以及印中边境局势而定。

总理在自己的家中接待我，在整个会谈期间他很殷勤，对苏联大使表示特别关切。意见的交流是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并具有十分坦率的特点。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2月17日

第1108号

АВПРФ, ф.090, оп.24, п.80, д.6, л.197-203

**№137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
与中共的关系(1962年12月27日)**

1963年1月31日

第5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27日

我在大使馆接待了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他自己主动要来，并说为了党的命运他感到严重不安，因此决定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他交给我一份报告，其中有他关于当前国家和当前政治形势的意见。他请我把这份报告转交苏共中央，请苏联同志“能向我提出忠告”。南布迪里巴德要求不要透露他的意见内容。他说，现在只有古普塔和高帕兰知道这些内容，但最终他可能把这些内容提交印共中央执委；他想在这些意见定稿前能知道苏联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建议。

南布迪里巴德表示，他想对自己的报告口头补充几点意见，他认为这些意见直接写入报告是不适宜的。首先他强调，虽然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比停火前稍有好转，但党内形势“非常不好”。他声明：“许多同志(尤其那些现在被监禁或过去被监禁的同志)认为，现在党的大多数利用非常局势，因此共产党员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被捕的情况，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运动；因此，在恢复正常状态和所有同志出狱的情况下，大概不可能同现在大多数中的人一起工作。我不自我推荐，我能同他们并肩工作。”他同时说明，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经所有被捕党员讨论及中央各机关原有全体成员开会后，将很难维护党的团结，或使党保持原有状态。“在这样的关头将遇到非常严重的局面。”问题在于这些同志因当今领导的政策而感到非常痛心，领导有时毫无根据地指责知名的印共成员。他举了穆萨菲尔·艾哈迈德(西孟加拉邦)的例子，他是印共创始人之一，被指责忘记了印共的利益。又如拉马穆尔蒂同志(马德拉斯邦)，他知道自己要被捕后，他告诉同志们，包括书记处某些成员，他将躲藏一周以逃避警察逮捕，因此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并安排有病的妻子往某处；他这样做了以后，因此受到了自己邦的党组织领导人的指责。

南布迪里巴德说，他看过各党机关致当局的请愿书，要求从狱中释放共产党员，他本人确信，请愿书编写得很不好，而且结果是，他们要求释放的只是那些以反华情绪著称的印共成员，而不是那些似乎亲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久前内政部长要求各邦政府再申被拘押共产党员的案件，这只能是再审和释放那些在押的党外人士，而不是所谓“亲华派”。他提醒，直到现在，印度仍继续逮捕共产党。

谈到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关于贾·尼赫鲁与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相互关系的议论；甚至说，拉达克里希南联合莫拉尔吉·德赛反对尼赫鲁。南布迪里巴德表明，现在总统不可能反对尼赫鲁，虽然，这些言论可能是在危机时期发表的，特别是由于克·梅农的辞职，总统对他不能容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下台。他指出，国内确实广泛传播这样意见，克·梅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领导一切的尼赫鲁对前线的不利形势负有责任，于是尼赫鲁没有办法，只好把梅农从政府撤职。但是，据他的见解，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尼赫鲁本人的指责。

我向南布迪里巴德介绍了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的基本情况。他说，他看过赫鲁晓夫在全会以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有一系列问题：

解决“古巴危机”，防止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此问题的批评；

古巴同志对苏联行动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未经古巴同志协商被迫做出的决定——“这是我唯一的疑问”；

现在中苏分歧是否比以前更大？

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关系如何？

我以赫鲁晓夫的讲话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中央在古巴危机时政策的正确和英明。有一种印象，好像南布迪里巴德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并解决了自己的“疑问”。还在这次讨论之前，他声明，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印中冲突的谈话“非常好”，在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问他，印共书记处1962年11月20日就印中冲突致函哪些党。他回答，准确的不记得了，稍候再告知，这信会发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国除外，还发给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他提到北京电台的广播，据他说，电台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提出希望举行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他推测，中国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大概认为现在比上次会议有相当强大的支持。他还指出，中国电台在古巴事件期间力图玩弄苏联的政策。

会谈结束时，南布迪里巴德转交了共产党领导和以阿图里亚为首的多数派小组的文件。

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1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56—3759页

[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2]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4]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5] 指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1960年6月赫鲁晓夫请金日成到莫斯科，并给他看了这份谈话记录。——编注

[6]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 本档案中多处出现数字序号不连贯等现象，系原文如此。——编注

[8] 表示第80项第6小项，俄语字母e在这里相当于英语中的第f项。——编注

[9]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10] 此处部分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 此处一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2]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的内容为：(1)在对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月9日做出的第61-25cc/об号决议关于货物的供应问题作了部分修改；(2)允许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贸易联系委员会根据1959年的附件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部分特别设备的期限推迟到1960年。——原注

[1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5]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16] 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袖进行的协商会议，他们打算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1960年6月18—25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莫斯科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这些领导人分送了苏共中央的信函(标明的日期为1960年6月2日)，其中建议进行协商，“以便就目前的国际局势问题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3, л.52; ф.3, оп.14, д.394, л.61-63)。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真理报》1960年6月21日)。在标注日期为6月24日的公报中，通报了12个党的代表“就当代国际局势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真理报》1960年6月28日)。在协商会议上继续进行了辩论，这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一方，以苏联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的反应。——原注

[17] 本决议以表决方式通过，投赞成票的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Н.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О.Б.库西宁、Н.А.姆欣特吉诺夫、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Е.А.福尔采娃、Н.С.赫鲁晓夫、И.М.什维尔尼克等。——原注

[18] 该附件未公布。——原注

[19] 潘查希拉(Pancasila)，印地语，词源直接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是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带有喜庆的意义。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编注

[20] 文件此处有手写批注：不得公开。——编注

[21] 档案复印件此处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22] 该文件中六角括弧内的文字是手写加入或改正的。——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24] 档案复印件此处缺少一页。——编注

[25] 这里一段是有关南朝鲜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6]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27] П.巴托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军事专家组组长。——编注

[28] 原文如此。张爱萍、杨成武均为上将军衔，谭政则为大将军衔。——编注

[2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此处一词无法辨认。——编注

[30] Н.А.毛希丁诺夫，时任苏共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编注

[31]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32] 该档案出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发表了英译文(CWI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p.172-173)。尽管未找到俄国档案馆的原始文件，但因其重要性，这里还是将这份档案编入了档案集。删节号为英文原文所有。——编注

[33]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1953年6月东柏林发生的工人骚动事件。当时，苏联采用了镇压的手段。——编注

[34] 原文如此，当时称北平。——编注

[35] 白崇禧，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编注

[36]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37] 波斯克列贝舍夫，时任斯大林的秘书。——编注

[38] 1995年俄国《远东问题》杂志发表此报告时未附这些文献。2005年出版的档案集发表了米高扬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文，见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 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 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编注

[39] 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40] 所收入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录。——编注

[41]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2] D.伊巴露丽，时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43] L.隆哥，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44] 显然，还有一个类似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11月1日《红旗》杂志(太原印刷)发表了一首诗《苏联专家来到车间》。内容讲的是苏联专家在39.3℃的高烧来上班，并排除了设备中谁也发现不了的故障。——原注

[4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指的是在1960年11月11—25日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议。参加其中的有81个共产党的代表。这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各共产党代表了解了对于国际发展的最迫切问题的各种观点和立场，在激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和“致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原注

[4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8] 中央主席团仔细地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关于经济问题谈判”的照会，并采纳了赫鲁晓夫“关于海军基地和潜水舰队问题”的建议。委托苏联国防部和苏联外交部准备必要的文件。苏联海军基地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峡地区。——原注

[49]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译注

[50]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译注

[51]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译注

[5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961年2月13—20日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向苏联及其对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本人进攻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指令性指示，苏共代表团遵循着不参加辩论的方针。——原注

[54]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分歧。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决议，委托书记处制定苏共中央就阿苏国务和党务关系问题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信(РГАНИ，ф.3，оп.14，д.456，л.1-2)。——原注

[55] 在1961年4月，苏联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声明说，鉴于业已形成的局势，它拒绝在无偿的基础上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并警告说，今后将把自己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建立在不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基础之上。——原注

[56] 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是在1961年3月2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原注

[5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9] 指的是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苏联海军的军舰。在1963年5月，苏联方面废除了阿苏关于华沙条约义务的双边协定，停止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随后，又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了8艘潜水艇。这个决议的做出是苏阿关系恶化的结果。阿尔巴尼亚对苏联潜水艇的撤出进行了阻挠。——原注

[60] 2月22日，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在近期举行高层会晤。两个星期之后，赫鲁晓夫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会晤时，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美国支持在1961年4月中旬进行的反卡斯特罗登陆行动和使老挝局势复杂化，拖延了对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5月12日，赫鲁晓夫正式答复了肯尼迪的建议，并准备与美国总统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晤。——原注

[61] 会议于1961年8月3—5日举行讨论准备签署对德和约问题。——原注

[62] 麦克洛伊，美国总统裁军问题特别助理。会晤于7月26日在索契举行，赫鲁晓夫在那里休假。——原注

[63] 阿斯托明·范范尼，意大利共和国总理，于1961年8月2—5日对苏联进行了官方访问。——原注

[64] 考涅楚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副主席。——原注

[65] 约翰·别尔纳，英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原注

[66] 科奇·佐泽，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政府第一副总理，1949年被作为铁托分子判处死刑。——编注

[67] 艾哈迈德·索古，1928—1939年阿尔巴尼亚的国王。——原注

[68] P.A.斯巴克，比利时政治家，时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编注

[69] P.雷诺，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外长和总理。——编注

[70] B.L.蒙哥马利，二战时英国著名将领，1951—1958年曾任北约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司令。1961年9月访华期间，蒙哥马利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和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撤回本国领土，得到中国的赞赏和支持。——编注

[71] 指的是H.C.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1961年10月17—31日)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的国际局势部分，其中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原注

[72] B.M.莫洛托夫在1962年2月被基层党组织开除出了苏联共产党。在3月里，苏

联共产党莫斯科州委员会，而在6月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决定。1984年给莫洛托夫恢复了党籍。——原注

[7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土伦，今岷港。——译注

[75] 原文如此(ИИП)，应为中国(KHP)。——译注

[7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草案。——编注

[77] 原文如此。——译注

[78]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其内容可参见以下文件№20786的附件一。——编注

[79] 话题可能指的是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1961年8月3—5日举行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缔结对德和约，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等问题。——原注

[80] 在1960年底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所有观点均遭到大会代表的批判，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赞成中方的立场。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中央公开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周恩来代表中共站出来反对，并呼吁与会者支持中共的观点。会后，中共再次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责。——原注

[81]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82] D.腊斯克，时任美国国务卿。——编注

[83] H.C.帕托利切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编注

[84] 参见以下文件№20792。——编注

[85] 卷宗中没有这份材料。——原注

[86]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人员名单中，漏掉了H.C.赫鲁晓夫的名字。——原注

[87] 会议此节讨论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8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2月22日向苏共中央发出了信函。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3月1日的决议，准备了给中共中央的答复函，其内容已经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西德、瑞士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除此之外，莫斯科还向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介绍了信的内容。4月7日，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再一次来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信中补充说明了，认为必须执行共同的方针，坚持自己对引起分歧问题的说法。鉴于他们的关于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答复函内容的建议，于4

月14日做出了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介绍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函”的第26/12号决议(РГАНИ, ф.3, оп.18, д.51, л.6)。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此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961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就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有关决议。——原注

[89]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协商会议。——原注

[90] 杰缅季耶夫,时任苏联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编注

[91] 此处还有4个手写加入的人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92]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93] 该档案译自英文,英文刊载时有此删节。下同。——编注

[9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5]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6]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7]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上,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以下人员的名字: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谢尔比茨基、伊利切夫、谢列平。——原注

[98] 无论是在1959年,还是在1962年,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这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不良反应,它要求苏联领导人“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支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勒比海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苏联为了确保得到中国的支持,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在《真理报》(1962年10月25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的合理性。然而,在后来,苏联又回到了以前的立场上。——原注

[99] 在由Н.С.赫鲁晓夫签署的会议记录誊清稿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标注的日期是10月18日(РГАНИ, ф.3, оп.18, д.97, л.1)。——原注

[100] 在1962年秋天中印边界冲突再一次尖锐化之后,苏联不希望恶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停止向印度提供苏联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包括暂时不发出在1962年8月29日两国协定中规定的新型米格21飞机。这使驻中国的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在回答周恩来针对苏联给印度提供军事装备提出的抗议时,有理由声明说:苏联“到目前为止”,仅仅向印度提供了8架安12和20架米4飞机。自然,这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原注

[101] 1961年11月6日,联合国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呼吁有关各个国家在签署必须的国际协定之前停止继续试验核武器。在1961年8月前单方面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的苏联,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1962年10月,在联合国第十七次大会上,由30个中立国组成的委员会,对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例行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苏联在这种场合下决定投赞成票,因为这个决议规定自1963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

验。——原注

[102] 指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关于给德国提供农业产品，首先是肉类产品的援助请求。——原注

[103] 原文这里的拼写为Дун Фу-линь，疑俄文原档案有误。——编注

[10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05] 该指示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随附的B.B.库兹涅佐夫于1962年10月17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在其中一页中留有如下批注：“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并以表决方式通过。1962年10月17日。B.马林。”——原注

[106]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夹有B.B.库兹涅佐夫用蓝色铅笔写的给B.H.马林的便函：“B.H.马林同志收。H.C.赫鲁晓夫和Ф.Р.科兹洛夫等同志已表示同意。10月17日。B.库兹涅佐夫。”(РГАНИ, ф.3, оп.16, д.163, л.118.)——原注

[107]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08]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09] “潘查希拉”，印地语，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注

[110]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11] 兰纳迪夫，1948年曾出任印共总书记。——编注

[112]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第十卷(1963.1—1964.11)

1963年

1963年 №25607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 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 [1] (1963年1月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1月15日

第8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

兹向您呈上发给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副本。

附记录共19页(绝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绝密

契尔沃年科与Д.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

(1963年1月1日)

策伯格米德大使回到北京(他于1962年12月27日蒙中边界条约签订后陪同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祖国)，策伯格米德受泽登巴尔的委托主动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并秘密地通报了Ю.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于1962年12月25日和27日进行的会谈情况。

策伯格米德报告的内容如下：

在12月2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北京当天举行的所有会谈和会晤，其中包括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都只是正式的，没有超出对边界条约草案进行讨论的框架。12月27日签订条约前与刘少奇的会谈也只是礼节性的、正式的；会谈中也没有涉及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条约签订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集会。12月27日泽登巴尔和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看上去中方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在会谈过程中提到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除了中蒙两国关系之外，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党包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策伯格米德继续说，在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指出，今天我们签订的中蒙两国的边界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其他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整个形势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国界线划分以后将正式勘定分界线。接着周恩来提到了中印之间的争论，他强调说，过去没有勘定正式分界线，因此双方坚持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传统分界线。现在应该正式勘定中印的国界线。周恩来也提到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谈判，他指出有进展，强调巴基斯坦对勘定边界线的态度正确。可是美国担心中巴政府的谈判进行顺利，对此美国心里很不舒服。周恩来讲到了中巴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这场冲突会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是他还是希望归根结底这场争论也会得到解决。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试图证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争论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印度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竭力通过外援，包括苏联的援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利用这种援助在做赌注。印度曾作过积极的努力试图寻找美国、英国的援助，但这并不能帮助尼赫鲁挽救局势，因为真理在中国一方。最主要的，周恩来指出，亚洲、非洲人民支持中国。策伯格米德指出，他觉得会谈的这部分内容就好像周恩来在给蒙古代表团作演讲。

周恩来讲完这些说，您(泽登巴尔先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争论曾表示遗憾。

泽登巴尔肯定地回答说，我们的确感到很遗憾，中印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至今发展到军事冲突。周恩来说，中国不喜欢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表示遗憾的这种态度。周恩来提起1959年与泽登巴尔的会见情景，当时泽登巴尔途经印度，谈到中印冲突的问题，他(泽登巴尔)明显地没有站在中国的一方。周恩来重提蒙古政府对中印争论的这种态度，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灵活谨慎态度。生活和事实都已证明，在这些情况下灵活行事是何等重要。泽登巴尔接着强调，今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获得世界性的胜利，边界争论将成为历史遗迹。这就是我认为在边界争端和冲突问题上共产党员应采取的态度。继续谈这个问题，策伯格米德说，此时周恩来竭力证明，在中印争论中中国没有过错，中方一开始就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方面争取不让这场争论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泽登巴尔指出，我们应该看这场军事冲突所引起的后果，应谨慎地、负责地考虑这场争论在印度的反响。目前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不仅仅导致共产党，而且导致所有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面临的形势都异常复杂；目前印度到处都有镇压活动，反革命分子和右翼分子猖狂，公开对尼赫鲁施压。

此时周恩来赶紧打断泽登巴尔，力图证明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过错。接着他说，中国几乎同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商谈了国界问题，他开始夸耀中蒙谈判的结果。谈判之所以成功，周恩来指出，是因为双方相互谅解，相互让步。关于这一点，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强调中国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作了适当的让步。他希望今后兄弟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互相迁就。比如说，我们希望，如果我方提出了关于允许我们在靠近中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有一个牧场的请求，这就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我方当然也会满足你们的请求。

策伯格米德说，在这一部分会谈快结束的时候，接着泽登巴尔提出了一些国家间的问题。

1.他说，最近经蒙古到中国的铁路载货量明显地减少了，过境的货物调运量也大大地缩减了。我们希望中国增加铁路的运输量，如果中国觉得可以做到的话。

2.策伯格米德指出，贸易专家初步谈判已经有了结果，蒙古方面担心中方大量缩减1963年与蒙古的贸易业务，这会使已经形成的相互供应体系受到破坏。这将导致蒙古出现一些以前未曾预料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蒙古企业用一些以前从中国过来的原料有关。

3.泽登巴尔对中国政府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援助以及派遣工人表示了感谢。目前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同蒙古工人一起劳动的有8000名中国工人。遗憾的是有时发现有些工人拒绝做一些工作。他们不会说蒙古语，因此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愉快的事情。泽登巴尔强调说，现在和将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会有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蒙古欢迎中国工人在自己企业里工作。但现在在蒙古的工人不懂蒙古文。是否可以派遣更多会说蒙古语的内蒙古的工人来我们这里，这样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听完了泽登巴尔讲话周恩来说，会谈过程中蒙古代表团提出的三个问题，他会尽量回答。

第一，周恩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商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少得多。我们确实被迫减少一些商品的供应量，特别是棉织品，因为我们国内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最近三年内持续的干旱和歉收。即使我们根本不出口棉纺工业的原料，而全部用这些原料生产布匹，这样的产量也只能满足每个人使用3米布匹。总的来讲，周恩来说，我们目前自己有困难，无法达到前几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供应纺织工业原料的水平。至于大米、茶叶、丝和部分羊毛，我们可以供应，就让贸易和工业部门讨论这些问题吧。

接着，周恩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中国供应1700万卢布的商品(按照新的价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只能供应600万卢布的商品。

周恩来继续说，明年中国尽可能增加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运输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收入。

然后，周恩来说，蒙古答应供应中方10万头马，我们这里临时发生了些困难，请蒙古方面帮助解决。策伯格米德解释说，现在的困难在于中国要求我们只通过两个边防哨所供应马匹。这样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了难度，因为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们建议中国人通过那些对蒙古方面比较有利的边防站运输马匹，而中国人所建议的等于是把从蒙古各地收集到的马只送到两个边防哨。

第二，周恩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问题，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执行计划出现了困难，要考虑重新审查计划。纺织厂和其他企业原料不足，完成计划必须考虑到可能性，因此，周恩来建议有些工厂临时停产。

策伯格米德解释说，中国对蒙古的态度已经完全确定，目前蒙古确实发生了严重困难，难以完成五年计划，按照五年计划的要求，有25项工程由中国工人援助完成。现在与蒙古工人并肩作战的有8000名中国工人，此外还有5000多名在中国建设托拉斯以外的工人。

第三，周恩来提到中国工人的问题。他指出派遣中国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两国关系中的新事物，这是件好事，可是中国政府也有困难，周恩来强调了中蒙之间的历史共同点，提到两国之间友谊于1950年开始得到发展。我们把工人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些工人长期工作在异乡，1960年他们的工作期限已满，但政府不仅延长了许多工人的工作期限，而且还派来了新的工人。周恩来说，我们很担心，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工人不懂蒙古文，不了解蒙古人的习俗，出现了一些误会。应该说，在前五年的工作中发生的误会，很快就解决了。最近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工人们不愿干活。泽登巴尔趁机接话，对周恩来说，你看，你自己也说中国工人不肯干活，他们不懂蒙古文，不了解我国的习俗，因此导致了误会的产生，互不相谅解。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可以不干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罢工。

泽登巴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蒙古也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我们不能同意一部分工人破坏或漠视规定的制度，这种现象会给蒙古工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听完以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首先兄弟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到底存在哪些原则分歧，现在我不想多讲。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我作了发言，发言中我尽量不让我们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效果，相反分歧越来越严重。接着，周恩

来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都登载了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刊登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蒙古人民革命党持相反的立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批评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周恩来表示了中方的担忧，这样下去，分歧会越来越公开化，会影响到一些党，敌人已经了解我们存在的分歧。谁是谁非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认为，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周恩来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一系列重要问题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针。周恩来接着转移话题，他说，总的来说中蒙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关于派遣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问题，他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派遣工人与我们对待一些重要问题的态度有关联，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不少困难，很难在你们那里的工人中做思想工作。如果我们不分是非做工作，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为中国工人要跟蒙古族人进行交流，他们看书读报，了解大事。8000名中国工人生活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强调说，人是活的，是会思维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会放弃工作。你们在报纸上唆使中国工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话，我们还怎样做他们的工作，还能把他们留在你们那里吗？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人，不是商品。泽登巴尔说，还是要做不愿干活的工人的思想工作。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不要因此使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如果情况不改变，那么不愉快的事情和误会还会持续发生。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和周恩来的谈话火药味很重，有时觉得马上就会爆炸，但他们还是克制了。策伯格米德说，在听完周恩来的话以后，泽登巴尔已经表示，影响我们今后建设的是那些中方承建的工程项目，另外是已签订协定中的商品供应问题，特别是原料，我们经济建设中的困难由此产生。接着泽登巴尔也指出，中国工人给我们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帮助，特别是在1961年前，他们与蒙古工人一起劳动，没有发生多大的困难。从1960年起，特别是从1961年起，工人就停工了，按周恩来的说法，是工人罢工。如果你们那里允许这样做，在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工人不肯干活，这是因为我们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不一致。这一点周恩来你说得对，你谈到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谈到了党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态度，是阿尔巴尼亚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统一，背离了国际主义原则，违背了党与党之间团结的原则。我们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坚持这个正确、客观的立场，并将与破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赞同苏共的路线，支持苏共为维护统一而斗争。

您(周恩来先生)说，不要把党与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但是，您是知道的，苏共采取许多非常措施，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也许你们不知道，1960年苏联领导人好几次想找霍查和谢胡谈话，赫鲁晓夫也亲自做过努力，但是他们不仅不接受苏联领导人的善意劝说，相反拒绝接受。我想对您(周恩来先生)说，阿尔巴尼亚的活动不仅针对苏共，还针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不仅污蔑苏共，而且还污蔑其他马列主义的政党。这就是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说，您指责我们没有刊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是的，我们没有刊登他们的文章，我想指出，这样的文章我们今后也不会刊登。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我所讲的一切绝不表示我想把兄弟党的关系尖锐化，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你们中国支持阿尔巴尼亚，鼓励他们粗暴地污蔑苏联。

泽登巴尔谈了关于中国工人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也不准备为了8000名中国工人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改变我党的正确路线，不会做出让步。我想告诉您，周恩来先生，我们没有在中国工人中间做过任何思想工作。周恩来打断泽登巴尔的话，希望允许他提出一个问题，泽登巴尔表示同意。周恩来问，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刊登了直接和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果中国工人读到了这样的文章，他们肯定会有所反应。泽登巴尔说，他决不允许这些工人的存在。周恩来问，怎样解决工人的问题呢？

周恩来说，他并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党的路线，对泽登巴尔老是提改变党的路线表示不满。泽登巴尔说，周恩来所讲的不符合兄弟党会议的精神。

周恩来生气地回答说，莫斯科会议被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给糟蹋了。

泽登巴尔请周恩来别生气，生气是不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苏共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共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以来走过了40年。蒙古党和蒙古人民毫不动摇地与苏共并肩战斗，任何人别想动摇蒙古党和苏共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我们深信苏共路线的正确性，深信苏共是伟大列宁的党，世界和平运动的先锋队，深信苏共忠于自己的事业。周恩来问，你们那里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也是这样吗？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中国工人问题上。

泽登巴尔声明，现在中国工人生活在蒙古工人中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他们可以单独安排。可以像建筑托拉斯管辖下的8000名工人一样有组织地安排在一起。

周恩来开始冷静下来，他说，是否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代表进行洽谈，例如说请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蒙古的有关单位商谈这个问题。目的是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以便取得谅解。泽登巴尔说，关于刚才说到的中国工人，大概可以将他们集中到第一工段。如果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收到相关指示后，我们就可以派人进行商谈，并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他没有不高兴，也没有生气，但再次强调泽登巴尔似乎教训了他40多分钟。

泽登巴尔强调说，我们蒙古人尊重中国共产党，珍惜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它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党，他只是提请注意一下蒙古党和人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

.....

泽登巴尔说，边界条约已经签署，在这方面他明白了很多问题。在来北京的时候，他认为条约的签署会在改善两国友谊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后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了其他蒙古同志，即看来边界条约的签署并不能改善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

最后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代表团全体成员对中国政府的盛情接待和有益的意见交流表示感谢。

我对策伯格米德所作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会谈纪要基本反映了大使所谈的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АВІРФ, ф.0100, оп.56, л.495, д.7, л.1-19

№13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日会议第7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П.基里连科、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杰米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А.П.鲁达科夫、В.Н.季托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Ф.Р.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的信。 [2]

起草信件。

就关于举行兄弟党协商会议的问题 [3] 分别发出了信件。

РГАНИ , ф.3 , оп.16 , д.947 , л.57-57об

№13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 中国领导人(1963年1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9日会议第8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

关于准备给《真理报》的文章——给中国人的复函。 [4]

应该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南斯拉夫(当时是正确的，时间在流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国际方面的问题——根据声明的精神。 [5]

争议问题仍然存在着。

在对南联盟纲领的评价方面。 [6]

——仍然如从前一样这个评价是否意味着永远呢？

目的，驱除？或者是帮助摆脱错误。

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了，党掌握着政权。而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应该是一种更宽容的环境，不是必须拿来十字架——也就是镇压政策。我们应该促进摆脱错误立场的过程，帮助铲除缺点。

中国人——迟钝的人。在南斯拉夫也存在着这样的人。

现在，当我们拥有10亿居民的时候，居民和领土都将会扩大的。

是否能够出现分歧呢？可能。

怎么办？实行驱逐政策？这样我们就会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正在朝着民族同一性前进。驱逐——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我们在为未来铺设道路——不应该排斥，而是应该宽容地对待。例如：在经互会组织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合作。 [7]

我们帮助在南斯拉夫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些力量。而西方只帮助那些想使南斯拉夫倾向于他们的力量。

在文章公布之后发出信函。 [8]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7, л.60-61об

№20798 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1963年2月14日)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现提交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这封信件的文本已经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我们认为，在把这封信发往北京之后应该再把它转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同时也要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Ю.安德罗波夫

Б.波诺马廖夫

附件：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

1.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附后)。

批准发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 [9]

2.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古巴革命组织联盟民族领导。

3.把这封信件的副本送给苏联驻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使兄弟党(名单附后)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草案

苏共中央就中共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你们发出此信，以便再次对近期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表示关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及其代表在国际会晤中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公开且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大多与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共产党主义运动总方针背道而驰。与我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相对，几乎每次国际性会面都成了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代表之间观点激烈斗争的舞台。

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国同志的言论将导致共产党运动中的激烈论战将不断走向深入。所争论问题的范围常常被人为地扩大化，尖锐和公开的争论采取了令共产党员所不能容忍的方式。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结论及其地位经常被随意阐释，由此导致在涉及我们总任务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论战同样也造成了这样一些事实，或不准确地、有时简直是歪曲式地解释兄弟党的立场，或从一系列问题中只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或只图论战的激情发挥而不能客观、清醒地分析所产生问题的实质。

这些分歧已超出了共产党运动范畴的制约，被带入到民主组织之

中，涉及国家间关系，并在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具体政策领域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自然就制造了我们都极其不愿看到的隔阂，并无助于我们党际关系的改善。

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所发生的分歧对兄弟党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国内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的兄弟党，造成了越来越负面的影响，妨碍了他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顺利地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许多兄弟党公正地对这种情况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允许事情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势必面临严重困难，结果导致我们处境的恶化并将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失。如果我们不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行动中团结一致，如果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仍各行其是，那么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而相应加强了敌对势力，并进一步激励西方侵略集团实现其反共产主义的企图。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被公之于众以来，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一切力量希望从业已形成的局势中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就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极尽污蔑和诽谤之能事，有意歪曲兄弟党的立场，试图以此来瓦解和分化我们的队伍。帝国主义者明白，目前并没有能力以武力和在经济竞争中战胜紧密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体系，因此便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破坏我们的团结方面。而我们内部的分歧表现得越明显，帝国主义者也就表现得越肆无忌惮。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者与世界上的反动派极力联合自己的势力以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情况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的团结也就显得尤其必要。这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断高歌猛进的可靠保证。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下，每个兄弟党，尤其是像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在于，尽一切可能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团结。

我们相信，目前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不一定发展到深刻冲突的地步。因为我们坚信，今天导致我们分离的那些分歧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我们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苏共和中共都是以我们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这是确保苏联和中国之间友谊长久的主要基

础。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世界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共同阶级利益，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伟大的马列主义学说。

无论今天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深刻，都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性斗争中我们都将与你们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从此出发并考虑到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尤其有必要指出，我们关注的并非是那些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的问题，而是那个主要的，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关键性问题。

中共中央在其信函和声明中均始终强调自己忠实于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其声明，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自己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斗争中，在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坚持和平共处诸原则斗争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这些都是与苏共和所有马列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克服分歧和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良好基础。

正如实际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涉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等问题。这些当然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当妨碍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亲近这个主要问题。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战略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派及其侵略战争的基础。与此同时，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民族、地域范围和国际条件下存在的，在马列主义武器库中现有的那些斗争方式和方法均能够较好地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从而有利于各共产党派别利用之以实现我们的上述总目标。

如果有人突发奇想要求处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斗争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共产党人都采用千篇一律的(革命)策略和方式，那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因此，要对兄弟党所实施的这样或那样的战术步骤及其整体策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需要对不同党派斗争和生存的具体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马列主义分析。

莫斯科会议决议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总路线。与此同时，它们给予了自己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根据自身的民族条件和具体情况来多样化地选择各自的斗争策略。(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为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我们党认为，如果坚定地遵循这些文件和根

据其结论构建自己的政策，就会确保我们队伍的团结，而所有分歧也都有可能正确地得到解决。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与我们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关系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我们的党以及我们政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站在同一队伍中继续前进，还是只一味沉迷于相互之间不必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只可能导致我们的相互隔离并削弱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为了确保苏联和中国人民能够继续过上像兄弟那样的生活，我们两党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对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两党有责任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勇敢而坚定地清除所有对我们友谊的阻碍。我们认为，这才是马列主义者能够和应当走的唯一道路。

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角度和尽一切努力克服分歧的真诚意愿出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停止共产党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本党内部对其他党的批评的建议。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未来，停止目前在报刊上就一些有争议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是明智的选择。让我们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时间将帮助我们最终明白谁是正确的，而谁误入歧途。”这一建议已得到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再次表明自己已准备尽一切努力以促使我们两党间关系的正常化，并再次向你们提出建议，即停止关于那些我们存有不同理解的问题的争论并不再就此发表公开言论，因为后者将无助我们的团结事业，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为了着眼于马列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在各个共产党的关系中(我们)更要掌握分寸，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灵活性。

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也会为马列主义政党会议的筹备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应进行集体讨论。苏共还在1957年和1959年便主动

召集了兄弟党会议，当时召开这些会议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严重变化和有必要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路线。

我们如今正准备召集的所有兄弟党会议也是具备了充分理由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重心应着眼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总任务，粉碎其侵略计划，进一步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在1962年5月31日的去信中我们已经向你们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而如今希望对之再次予以确认。

非常清楚的是，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还需要时间，以便营造必要的氛围并做好必要的筹备工作。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必定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非激化我们之间的分歧。

为了给会议的筹备营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党认为最好我们双方事先举行一些会谈。任何一个兄弟党，如果有兴趣与苏共代表会谈，我们都准备与其代表一起坐到谈判桌前。

在这里，我们向中共中央发出举行两党代表高级会晤的建议。如果中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此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可再另行约定。关键在于，这样做是我们当前所必需的，它表达的是一种双方在马列主义学说基础上解决现有问题，严格遵守共同制定的路线，不容许任何可能干扰该路线实现的行为的良好意愿。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同志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初衷。我们都是以我们的伟大事业——赢得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利益的出发点，而为了这一事业各共产党正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深信，苏共和中共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赢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国和全世界的胜利，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而斗争的总目标。只要我们表现出自己的良好意愿和对我们斗争利益及目标的高度觉悟，那么这时候任何困难都将不能阻碍我们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1384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2月15日会议第8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А.П.基里连科、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Л.Н.叶夫列莫夫、К.Т.马祖罗夫、Ш.Р.拉希多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В.Н.季托夫、А.Н.谢列平、Б.Н.波诺马廖夫、А.П.鲁达科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4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赫鲁晓夫：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撰写信的草稿。应该避免论战，而是通过信稿表现出对可能分裂的忧虑。不要抓住在某一点上的分歧不放。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同意举行任何级别的会晤，听取和弄清楚各种意见，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委托书记处最终拟定出信的文稿。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7, л.63

№2079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2月15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63年2月15日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根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终拟定出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134, л.10

№215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

信的反应(1963年2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2号

苏联驻华使馆

北京

1963年2月26日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

1963年2月23日

今天19点30分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从中共中央来电话，表示毛泽东希望在20点接见苏联大使，以传达他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同志代表毛泽东表达歉意，毛泽东由于患流感，将在他的卧室接见大使(在谈话中毛泽东半躺在床上)。

在场的中方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苏方有：大使馆参赞O.B.罗满宁和二等秘书P.III.库达舍夫。

整个交谈实际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由毛泽东主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伍修权会偶尔补充和评论。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并为没能在1963年2月22日接见我们表达了歉意。就解释的原因，他说在最近访问中国南方的过程中得了轻微的感冒，而他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还留下“一点尾巴”。

鉴于他对所有在场苏联同志都相当了解，毛泽东评价说和我们今天的见面有家庭聚会的特点。

毛泽东对我说，作为一名大使我不算幸运，因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充满了争论与分歧。

我回答说，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尽快结束。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苏联大使正在变得越来越幸运，因为两党之间结束论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我强调，我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希望实现的了，就像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那样，上帝保佑！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都影响到了上帝。

毛泽东答复说：“现在马克思已经成了世界的上帝，而列宁是他的总理。”

然后谈到苏共中央在1963年2月21日发出，由我在1963年2月22日转交到中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他看过了这封信。

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手中握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中文印刷文本，不断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提法。这封信是在一个文件夹内，它有一个标题，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收到的文件”。在这封信的内容及空隙处覆盖了许多标注以及在许多提法下都画了线。从手写的字迹判断，这些批注是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这封信，因为其中有些很好的提法。我们支持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信中）积极的地方包括两党之间的平等和协商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地方，它说（毛泽东引用信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一项提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结束共产党之间的论战，结束在自己党内对其他政党的批评。这项建议，如你们所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引用信中的这段之后，毛泽东说，这是好话。但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建议结束公开论战时的发言中批评中共感到不高兴。总之，苏共推出了4份文件，其中都包括对中共的批评：2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2份是《真理报》的社论。

他继续说，在4天中——今年2月20—23日，他发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这样做是使我们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观点。中方报刊也将会发表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然后，我们将发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已经回复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我们会再做一个声明。

在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批评苏共的文章。

在目前，毛泽东说，在42个兄弟党——如果算上苏共是43个党——都在谴责中共。在本质上这种批评是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人们当然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是由刘少奇和伍修权向毛泽东提示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附加各种标签。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显然，这是正常的。

这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害怕批评，并询问了我的生活和过去的工作。

我简要地谈了谈自己，并表示我不害怕批评。当然，我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偶尔受到批评。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都受到责骂。他强调，在我看来，害怕批评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回应所有对我们的批评。由于我们受到了批评，我们就会作出回答。我们有句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同样非礼也。

毛泽东强调，正是苏共和其他42个党给了我们“往”的权利。你们可以骂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你们，但是某些地方必须有限制。我个人希望能有个间歇。我们不打算立即回应这些给我们的批评。让它们像过去一样，保留在我们的账单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算回答，但任何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都有权回应。也许，我们一年不会回应，甚至两年。总之，我们视情况来决定我们回应的的时间。正如我说过，我们打算发表3篇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无意批评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回应你们那4份文件。如果我们去回应所有43个党，这将需要半年的时间，甚至整整一年。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英国的同志说他们属于广大的多数党，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派。嗯，毛泽东说，我接受我们确实是在少数的事实。

他继续说，我们在所有党之前，早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就做出了关于结束公开批评和攻击的提议。但是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和人格上的指责。在此之后，许多其他党也做

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各国人民、各国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被提出来了，也在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反动派面前被提出来了。

既然如此，他说，“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全部真理属于43个党。那好！但是，我们要提出这项建议：让苏联的报刊和其他42个党的报纸刊登我们的文章。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毛泽东进一步引用苏共中央的来信说道：“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但问题是，他说，谁发起的这些攻击，谁组织起40多个政党的攻击，将这些攻击不仅引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引向中国共产党，谁在大会上第一个挑起对其他政党的公开批评？最近一段时间，5个兄弟党的公开声明里，都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来信中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有可能产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这在具体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枝节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

毛泽东再次引用来信说：“但是，这些意见的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可以通过联合的、同志间的协商充分得到解决。”他指出，这个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在“人为地夸大这些意见的分歧”？谁在散播谣言说毛泽东已经没用了，还有说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快死了？当然，这些谣言是有客观原因的。举例来说，我真的生病了，感冒是我的常客，而今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见你们，何况，我也似乎快死了。

散播的谣言还说，我(毛泽东)只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中国对老而不死的毛泽东有个人崇拜。还说，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和我差不多老，他们是65岁，他们也会很快死去。你，大使同志，是比我们年轻，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但你也会生病。他说，看来你有时也生病。

他再次回到来信上。毛泽东说，总体上，他对此表示欢迎。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讨论那些“我们的不满”，那些没有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在别人背后议论是不礼貌的表现，特别是在同志关系中。信中有一些很好的提法。尤其是它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加深互相了解，我们向中共中央提议，进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并进一步说：“这次在苏共和中共代表之间的会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工作不能成功。”毛泽东说，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争吵了好几年，而且最近开始走向公开化。他继续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吵，一个人难以应付，就是有50个人也不够。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泽东继续说，在1962年4月7日回答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的来信中，我们建议停止公开攻击，要求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最后召开一次兄弟党会议。在这封信中，你们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中央1962年4月7日的回信，好像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完全被你们忽略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英国和瑞典共产党也提出了这个方案。是的，英国和瑞典提出要开一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群众路线上差异问题的会议。

刘少奇补充说，他们特别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印尼和新西兰提出召集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根本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1960年会议并签署了声明。南共参加了1957年会议，但拒绝签署该宣言。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纲领了。在1960年会议上，苏联同志告诉我们必须批评南共。在1960年会议上的81个政党正确地指出，南共在后退，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到现在一直持续。中共正在执行1960年会议的这项决定，即使是现在。目前，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驱逐出去，虽然这项

制裁不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我强调说，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重复说，他们正试图驱逐阿尔巴尼亚，把这个小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驱逐出去。美国正试图驱逐古巴。阿尔巴尼亚哪里变得如此可怕了？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错，应该予以党内批评，而苏联同志们却发起了公开批评。同时，信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困难，是临时的，是可以完全被克服的”。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的来信还提到一些问题，它们正被提上议事日程：“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会议)工作不能成功”，“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说，都是好的。

然而，伴随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内？在任何情况下，这封信都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对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把它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能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党决定，由会议的参加者决定。

毛泽东问：那南共是否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方式决定。

毛泽东表示，南共已参加了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会议。

我说，关于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由与会的各党自行决定。这是每一个党的权利。至于兄弟党之间的会晤，请谁参加的问题，可能

应该由各党通过正常的方式集体解决。

在此刘少奇指出，《真理报》在今年2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本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补充说：也许大使的看法和《真理报》上文章的作者不大一致？

我解释了苏共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我指出，有关南共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最终，它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问题之一。我又向毛泽东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与刘晓的谈话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在那次谈话中，特别是提到了对铁托的原则性评价(关于铁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摇摆不定)。

毛泽东似乎是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他读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但不能准确地想起这些内容。

我说，此外，与南共的相互关系还具有复杂性，一如既往，各兄弟党的共同努力可能对南斯拉夫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我提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必须要将这个国家拉近我们，而不至于使它更接近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一种生硬的语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明确的——“应该遵循的81个党的决定”。南共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件不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指出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好的一些举动，我引用了铁托从苏联回来后谈到所谓“特殊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我强调，我们中央在与南共的关系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对此，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了解。如果毛泽东同志你向我们党的任何组织发问，他们都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你。我还补充说，与南斯拉夫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党派之间关系的改善，纠正某些错误，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南共的纲领中。

关于我对苏共中央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关系的解释，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解释。同时，毛泽东继续

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南共。他指出，南斯拉夫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出席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做与1960年的声明是一致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总之，这个声明对南共进行了严厉批评。

至于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维持在代办级水平。他说，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互换大使。例如，英国一直试图让中国同意互换大使代表的级别。但我们不会同意互派大使，因为英国是在搞双重游戏：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却还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他们。

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引用了其中一段说：“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继续说，关于这一段，我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这的确是个问题。

仿佛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他转而讨论中方代表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问题。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大会上严重地受到阻碍，他们的发言被有意破坏，而最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也被删节了。

这时，伍修权提到讲话的重点被删节了。

这就是民主？毛泽东问。

他接着说，在兄弟党的5个会议上，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中共受到了攻击；而且从你们那边，他说，就有两个声明和两篇文章。他说：“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有效果，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人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提，那就停止论战。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提出批评，我们都会答复。什么时候回应以及回应什么——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会留着，会回应一部分。现在不会直接回应你们的文章，我们打算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做出回应。

这时刘少奇表示，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国会有第二篇文章，因为意大利已经发出了好几篇。

毛泽东说，法国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都已经刊登在《人道报》上。他们特别健谈，他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篇文章给他们。关键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关于被卷入“艰难和不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表述。没那么“艰难”，他说，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必要”的斗争。对此，毛泽东说，如果“这场斗争，不那么有必要，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发布4份文件，为什么43个党都公开批评我们”？当然，这一切斗争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对立的斗争，正如我们所说，动笔，动嘴，不动手。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一段说：“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与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他对此评论说：“这话说得非常正确，但不应该等到后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都不会原谅我们。”

毛泽东问：事实上，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在我们的人民和政党之间？之后自己回答道：“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些话。

至于信中提到的克服分歧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争论，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克服分歧。例如，在华沙的中方代表与美国人斗争了7年，而苏联已经和他们斗争了40多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最近和你们讨论的更多是斗争，而不是团结。我们一直在吵架，他说，现在应该休息一下了。

最先提出的一项倡议是在越南、印尼和新西兰兄弟党代表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1962年4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这项建议。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的来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到要支持这一建议，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这封信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毛泽东然后读到信的提法，“我们双方有责任在现有的形势下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已经出现，就是勇敢而果断地清除所有妨碍我们友谊的障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他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他完全支持这些提法。“但是，这只是文件中说的，我们要看看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我们深信克服那些已经存在的分歧，不仅服务于苏共和中共的利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为了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深层次目标。必须要表现出对目标的意愿和自觉以及对斗争的动力——那么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碍我们加强和发展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读完，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并觉得这是好话。他强调说信中两次提到了这些话来表示必须“表现出良好意愿”。

总体而言，毛泽东继续说，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我当即决定邀请苏联大使来并且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苏共中央信中的建议“……召开一次有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的双边会晤”，“如果你同意这样的会晤，可以进一步讨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他表示在这次接见大使之前，他咨询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康生，他们有一个提案，他们希望能够呈给苏联同志们。

我们已经听说，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打算去柬埔寨，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去柬埔寨的途中或是回国的途中是否方便来中国访问并且同我们在这里会晤。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请您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此次会晤非常有兴趣，多次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同志来中国，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在这里公开地责骂我们。

当我表示不同意这些说法时（我提醒说，我当时也在中国），毛泽东在谈话参与者的帮助下，回忆起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言的几个片段（“不应以武力考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然后提到他回莫斯科途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次集会中的发言以及一次接受《新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刘少奇提醒有这样一句：“他们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地提到，嗯，那么，我们中国人，像好斗的公鸡，而你们，像好斗的母鸡，是不是？事实上，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是好斗，特别是我。美国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其他人都跟着美国人说话。

再次回到了他对赫鲁晓夫访华的提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并希望他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努力改善关系并实现停战。毛泽东仿佛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就个人而言，无论是他，还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和朱德，都不会允许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我强调，对我来说中国同志不应该把这些词句当成是针对个人的，此外，也不应该怀疑苏联领导人有不友好的言论。我指出，在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帝国主义的情报人员利用一切手段来煽动分歧的火焰，使我们吵架，用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来达到某种目的。我本人表示对赫鲁晓夫发言这种解读的明确异议。

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毅早在1959—1960年就同苏联大使谈及此事。

随后，毛泽东拿起苏共中央的来信说，不超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将会给苏联同志一封信进行答复。不过，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在收到信后立即告知我们对此的看法和意图。你，大使同志，和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

我说，1962年底我接到指示向毛泽东转达(生日)问候。然而，他那时没有在北京，因此我将此问候转达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

我表达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同志回应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的满意之情。我强调，如果我们两党代表举行包括最高级别领导会晤在内的会议更频繁的话，中苏之间就不会有现在出现的这种紧张关系了。我说，我会转达给苏共中央在此谈话中表达的所有想法。总体来说，毛泽东表达了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毛泽东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在你们(国家)我总是挨骂”。他说，我更愿意远离挨骂。将来我希望能够访问贵国，他说。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中国与与会者发出会意的笑声)。谈到他194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即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10]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

再度回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访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此行。对于我补充的中国同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说，这次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举行两党会谈将采取公开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回顾了1958年“与尤金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情况，第一，他说，赫

鲁晓夫同志的那次访问本来决定是一次秘密访问，结果有关发表公报的问题就来了，后来决定对访问“解密”。

在随后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他主动谈起国内的生活问题。他说：你们的情况比我们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他说，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前些年要好些，但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困难问题上，就会影响农业和工业。他说，按照英国的数据，中国宣称1962年收获1.85亿吨粮食，是夸大了。实际上，粮食的平均收成应该在1.5亿—1.6亿吨之间。与1961年相比，1962年的粮食生产增加了1250万吨。

他继续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确实能够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了。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具备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

周恩来补充说，困难在于，他们无法生产整套的合金原料，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是低下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缺少精密机械、轧钢机和原材料。至于农业，我们拖延了5年才开始着手。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发展化工，生产各种化肥，各种农业机器和机械，这些机器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使用——开始是播种，之后是照看庄稼，最后是收割与运输。毛泽东这时重复说，他们把农业拖延了5年，晚了。

我评论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向人民公社的调整。毛泽东回应说，在生产大队的调整过程仍在进行中(他说，准确地讲是“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大约有15%—20%还没有作调整。

毛泽东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发出现的私人贸易的顾虑，投机、受贿和腐败现象一直在增加。他说，中共中央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说，新资产阶级分子将会产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他们就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近来一个时期急剧恶化。目前，不仅美国和法国的矛盾激化，美国联邦德国之间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也有很多矛盾。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通过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我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指美日垄断者之间的斗争。他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关系

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者，他们的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次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凝聚力，在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我们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可以暂时搁置。总体上，他说：“我们之间停滞的关系应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互批评只会让帝国主义国家高兴。”

毛泽东一再重复，中共中央打算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并“对指责中共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部分地给予回应”。他着重强调说，此后，我们会暂时停止我们的声明。

随后，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停战”与“和平”的概念，这是在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中建议的。他说，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和一场血腥的战争相连的“停战”与“和平”，因为“我们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由“舌头和印刷字”进行的。此时，毛泽东对我说，我们的使馆人员不该怕这个，也不该觉得过于紧张。

即使在家庭中也有争论，更何况两党和两国之间了。人们应该讨论这些产生的问题，并逐步找到消除分歧的办法。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人们可以）耐心地寻找途径来逐渐解决它们。

这时，毛泽东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并引用了信中的提法：“在会谈中人们可以逐点讨论所有关系两党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这涉及我们斗争的共同任务。一旦这些问题被考虑，就从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么就应该同意采取措施，这将有利于拉近彼此的立场。”

表示出对这些提法的赞成态度，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意见都很好。不过，他立即表示，苏共中央的信中只是笼统地讲了可能存在的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达成一致，即可以做出决定，有争议的问题将被暂时搁置，而不是写在长篇的文章里相互指责”。

我指出，鉴于我们之间的良好意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完全能够克服的。我提起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同志与刘晓大使的谈话中有关党派团结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渴望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从一张白纸”一样开始。

在概括地谈到即将举行的会议以及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时，毛泽东说，也许，从现在起，要避免1960年9月中共代表(由邓小平任团长)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同志参加)之间的那种双边会晤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两方都是谈自己的意见和为自己辩解”，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同一年，在1960年，毛泽东继续说，有一个由26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努力下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还有一次经历是在1960年的81个党的大会上，大家都在争先讨论自己的事情。

刘少奇在此时加入了谈话，补充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会议工作的最后几天。他继续说，直到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同志，起草委员会才就会议中的所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过了事先同意的。

人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协商和会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可以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推迟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如果部分问题不能当即解决，人们可以推迟到以后的协商会议中。根据1960年81个党协商会议的经验，很有可能最终我们两党将要承担起有争议的问题，在两天之内达成协议。

另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毛泽东说，即按照1957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经验召开协商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与其他同志一起，在一个组里，来完成最后联合宣言的草案的编辑工作，然后它以苏共和中共的名义提到会议上讨论。因此，有两种方法，毛泽东说。在您看来，哪一个更好，大使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支持后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将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争论，消除分歧，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团结。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的说法。

加入谈话后，刘少奇说，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中制定共同文件的草案，只有在那时才能召开协商会议。1957年的协商会议，他说，在会议前很短的时间里解决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别人等待。”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刘少奇继续说，如果我们两党没有马上达成协

议，我们在其他场合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毛泽东说，总之，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之一。重要的是所有的会议和磋商最终都能加强团结。他指出，虽然1960年协商会议有许多争论，但是他们采用了闭门的方式。

刘少奇指出，西方报纸公开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一些细节。对着毛泽东，他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公布了莫斯科会议上他们代表的发言。

毛泽东回答刘少奇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对本次会议和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说，从毛泽东同志今天的谈话来看，苏共中央非常渴望加强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凝聚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愿望在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我强调说，我们的凝聚力会是对那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伎俩的最好回答。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所说的话。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反对向报纸公开他此次接见苏联大使的短讯，还问我是否要向莫斯科询问。

(在与安德罗波夫同志于当地时间24点通过高频电话后，我向中国通报了我们的同意公开此短讯。)

临别，毛泽东做出友好关系的保证。我表达了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的祝愿，也希望他在将来能够访问苏联。

毛泽东在感谢(我)之后，回答说，将来他不排除这样一次访问的可能性。

刘少奇、周恩来、伍修权在谈话结束后把我们送到车上。

总体而言，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交谈。如果和他在过去两次会议上留下的印象相比，这次毛泽东看上去更具活力。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使用笔记，只是不断地参考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以及他在信上的批注。我们没有留下他身患重病的印象，尽管他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半坐或半躺在床上。

在中方，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阎明复参与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д.7, л.98-121

№24299 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1963年3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1963年3月7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报告说，老挝国王向成功完成飞行任务伊尔18飞行机组进行嘉奖(机长沃罗比约夫)。机组人员接受了老挝勋章，并对老挝国王的奖励表示感谢。

契尔沃年科认为，利用老挝国王抵达北京之机，苏联官方对老挝国王授予飞行机组老挝勋章一事表示感谢是合适的。

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同意该建议，并请求通过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给予相应的指示。

H.齐宾(签名)

1963年3月11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25, л.12

№13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1963年3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3月12日会议第8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H.C.赫鲁晓夫、A.H.柯西金、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A.П.基里连科、Ф.Р.科兹洛夫、O.B.库西宁、

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И.П.拉希多夫、К.Т.马祖罗夫、В.П.姆扎瓦纳泽、В.В.谢尔比茨基、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П.鲁达科夫、А.Н.谢列平，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副主席З.Т.谢尔久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函。 [11]

一、非常愉快地接受，但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将前往柬埔寨。 [12]

二、非常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如果不能来的话，那么，欢迎代表团来访。 [13]

信函的文本——不能带有论战的腔调。

与南斯拉夫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14]

不可能不考虑到那些正面的过程。

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拥有一致的观点。

最好发表图尔松扎德的文章 [15]，没有争议。关于亚非国家代表大会。 [16]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65

№219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1963年3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3日会议第87号记录

第50项 关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 [17]

1963年3月13日

绝密

兹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内容(附录)。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杨尚昆并向其转达如下内容：

“中国同志建议在报纸上公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我们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在信中我们坚持必须克服现有分歧，并因此而不再提出任何像当时中共中央信件中所包含的那些争论性的问题。

鉴于中国同志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声称，不论我们同意与否他们都将单方面地公开自己3月9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并不反对双方同时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今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提出关于公开信件的建议之时所采取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是最后通牒，这至少不能证明其这样做是怀着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愿。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我们相信，要达到相互理解的目标就需要我们进行兄弟式的协商以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143, л.44、81

№16675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1963年3月21日)

苏共中央，1963年3月22日

第779-с号

莫斯科市

机密

致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近期经常发生中国边境地方政权就有关苏中两国的国界走向以及一些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界河中的、自身位置朝向中国领土的苏联岛屿的归属等问题发出毫无根据的声明的事件。此类岛屿有152个，其中59个与中国的河岸相连接。

苏中边界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中的走向是由1860年俄国和中国之

间签订的北京补充条约确定的。根据该条约，俄中两国的国界线在离中国河岸的最近地区划定，而河流水域及其大的岛屿均归属俄国。如今，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共有1318个岛屿，其中1037个归属苏联，269个属于中国，还有12个为两国共同使用，国界从这些岛屿上穿过。

可是，如今中国边境地区的地方政府竟然置条约文件所确定的现存两国边界走向的合法地位和阿穆尔、乌苏里等河流中诸岛屿的归属于不顾，声称苏中两国之间的国界线应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中心线为准，而分布在该中心线中国方面的岛屿即归属中国。今年1—3月份，仅中国县、区级公安局的代表便向苏方发出了6份内容类似的声明。

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同时，中国边界地方政府有意准许(中国)当地居民前往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中线附近的岛屿从事伐木和捕鱼，并派遣身着便装的军人在这些岛屿上登陆，由此可见，他们正打算单方面地对部分苏联岛屿实施渐进性开发。他们是在中国政府机关的指令下才这样做的(附录有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委员会给中国边境哨所负责人的指令的复印件)。

在1963年的两个半月间，共有27批中国平民和军人登上了苏联岛屿，共计近400人。在苏联边防军要求其离开这些岛屿时，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不但拒不听从，而且声称这些岛屿均位于河流中线中国一方，因而属于中国。还发生了这样事实，中国军人试图拘留苏联边防军人和阻止其在边境线上执勤。

例如，1963年2月18日，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第14哨所负责人率领一个由8人组成的边防军小组准备修整一条履带式汽车路，该公路是从前由中国公民在我们的第124、124a和巴尔卡斯等岛屿地区的阿穆尔河苏联一侧领土上修建的。就在这时，从第124号岛方向来了一队中国军人，共有10人并由1名军官带队。他们一到便开始阻挠苏联边防军的行动，并对苏方发出的要求其离开岛屿的建议根本不予理会。

1963年3月15日，中国牡丹江地区公安局边防科科长王秀唐(Ван Сю Тан)中校在与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长的会面中竟声称，似乎是苏联边防军1963年2月18日在巴尔卡斯岛屿上对中国军人采取了非法的行动。他还断言，中方并不打算阻止中国公民登上该岛屿，也不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会面期间，我们已向王秀唐作了相应的解释，即苏联边防军是在严格遵守条约文件中的规定，因而苏方对侵犯边境者

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合法的。

就中国公民侵犯国界并登陆苏联岛屿的所有事实，苏联边境代表已向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发出通报，要求其采取措施以维护边境秩序并严禁此类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行为，可苏方的此类做法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中国人以开发为目的登陆苏联岛屿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如今，关于苏中两国边界走向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在陆路地区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活动仍在继续。仅在今年1—3月间，便发生此类事件9起。期间，我方边防人员均采取了相应行动以期阻止中国人进入苏联领土，而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均认为是我方违反了边境管理制度并就此向苏方发出索赔要求。

1963年2月19日，中国查齐(Чазы)边防检查站负责人对苏方第30边防中队代表声称，1962年12月27日2名苏联边防人员似乎侵入了中国国境并对中国运粮队实施了阻挠。但经事后调查确认的实际情况是：1962年12月27日苏联第77边防中队第5哨所的边防值勤人员在离边境1.5公里处遇到一队由11人组成的中国公民正在穿越苏联领土。我边防值勤人员建议中国人立即返回中国领土，但后者拒绝听从并继续前进，只是在我边防人员的坚决要求下他们才最终离开了我们的领土。

据我方的军事观察和中方违反国境者的供述获悉，近3—4个月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采取了切实措施以加强与苏联交界地区的军事力量。他们增设了10个边防哨所，平均人数为10—30人，而对以前就存在的21个哨所也增派了人员，使其平均人数增至30—60人。

1963年2月10—12日，为保卫边境总数近1000人的中国边防部队进驻黑河地区，并分布在该地区诸县。

中国边防哨所经常派遣由5—10人组成的武装分队进入那些中国地方政府对边界走向和岛屿归属提出异议的地区。

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在苏中边界线上所采取的上述行动相当程度上使得苏联边防人员完成保卫国界的任务变得复杂化，而一旦中国公民，尤其是武装部队进入苏联领土，并极力侵占我方分布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心线附近岛屿的事件，就可能在边境线上引发各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

目前，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共和国边境地区分布有中国居民66872人，他们都是在1962年4—5月份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入苏联境内的。在这些人中一部分家仍留在中国的人希望重返中国。苏联边防人员早就打算将这些人移交给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但如今实际办理了移交手续的只有约300人。虽然我们曾多次就此向中方提出建议，但中国代表坚决拒绝接收，并声称理应返回中国的总共只有6万名当时越境进入苏联的居民。鉴于中国代表拒绝接收上述人员，后者已打算以非法途径返回中国。

为了阻止苏中边境形势的复杂化，有关方面已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其在苏中边境地区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中均要表现得谨慎、克制，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过程中均须严格遵守苏联国家边防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谢米恰斯内(签名)

附件：

复印自副本

机密

文本第1份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指令

外事办公室

机密

第45号1962年10月26日发送

接收人：所有边防哨所，县、市人民代表大会

内容：就我国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以及苏联方面提出的要求等问题所发布的指令。

当我方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捕鱼活动期间，苏联边防人员经济会要求我方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我方渔民应继续在这些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并向苏联边防人员声明上述岛屿均属中国，侵犯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如果苏方援引爱辉和北京条约，那我们就要对其声明这些条约的内容正表明上述岛屿属于中国。如果苏方要以地图为证，我们就说该地图是由他们绘制的，我们不予承认。如果他们不

同意，我们就向其声明，即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和我们的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应对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完成生产计划。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撤出。我们预计，鉴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方将不会使用武力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赶走。而如果他们采取武力措施，我们就必须对其声明，为了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些岛屿撤出自己的渔民，但苏方要对破坏中苏友谊和自己的非法行动承担责任。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承认说，那些岛屿不是我们的。

边境地区凡涉及两国争议问题的事件，均须根据本指令作出报告。

1962年10月26日

国徽印鉴

翻译：马成松(Ма Чен Сун)少校

李大尉

1963年3月2日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101, д.424, л.47-52

№13733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1963年3月2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3月29日

第348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63年3月24日

在波兰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P.K.尼赫鲁。后者今天早上会见并送走了乘机途经德里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

会谈期间，P.K.尼赫鲁对我说，当他从机场一回来便立刻会见了印

度总理贾·尼赫鲁，并详细地谈了关于自己与马利诺夫斯基的会晤情况。他对印度总理说，苏联国防部长从印度尼西亚返回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前所预计的要晚一些，因为他已受到了奈温将军的邀请——在返回的途中访问缅甸。据P.K.尼赫鲁说，印度总理当时便说：在这种情况下马利诺夫斯基必然将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里，并可能在德里停留几个小时。

P.K.尼赫鲁对我表示，希望马利诺夫斯基能够与印度总理本人贾·尼赫鲁见个面。P.K.尼赫鲁说，如果能与苏联国防部长会晤，印度总理将感到非常荣幸。P.K.尼赫鲁明确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很希望得到这次与苏联国防部长见面的机会。

关于有情报显示中国军队正在沿印中边境全线集结并可能发动新一轮进攻的问题，P.K.尼赫鲁表示，不论这些消息是否可靠，印度都要小心防范，以避免去年秋天中国人所发动的那样的进攻再次重演。P.K.尼赫鲁说，印度希望和平解决印中冲突。如果中国人将接受科伦坡提出的对双方都非常合适的建议的话，即使“明天”便举行谈判，印方都愿意。印方已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P.K.尼赫鲁强调，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建设国家的新生活和发展本国经济。P.K.尼赫鲁指出，中国也需要和平，其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已证明了这一点。P.K.尼赫鲁列举了自己与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时后者所说过的话，即中国至少需要5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于是，P.K.尼赫鲁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便可能成为中方接受科伦坡的建议和两国开始谈判的基础。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3月2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65—3766页

№23458 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

保护伞 [18] (1963年4月15日)

(我)应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莫拉维克同志的要求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刚从板门店回来，他告诉了我在这期间的会谈情况。张将军 [19] 不在板门店，他(莫拉维克)见到的是一名接替张将军朝鲜上校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希尔将军。……莫拉维克同志告诉这位上校，苏联不会要求小国家提供任何在生产昂贵的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并且苏联人民仍旧……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这位上校答复，他知道苏联拥有强大的导弹，这些导弹可能还部署在远东，但是如果把这些导弹交给朝鲜和中国，那远东可能会变得更好、更平静。

.....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ІРФ, ф.0102, оп.19, п.97, д.4, л.140

№103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1963年4月16日)

关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采取补充措施，排除宣传中共领导人那些众所周知的特殊观点的中国书籍进入苏联境内的可能性；

——查明再版上述书籍并寄给苏联组织和个人的其他国外中心的资料。

二、责成苏共中央联络部提请各部门和各组织的领导人注意，必须更加详细地向前往中国的各代表团、文艺团体和体育团体下达指示，当遇到试图将他们拖入就争端问题进行辩论或者是攻击苏联政策的情况

时，苏联人要能够给予应有的答复。

三、责成苏联外交部，就中国的一些组织以及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现役军人的不友好的、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行为，向中国驻苏联大使提出交涉。

四、责成苏联外交部，就抵达中国的苏联公民的行为举止问题，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馆下达补充命令。

五、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 ф.4, оп.17, д.529, л.6

№1384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1963年5月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5月3日会议第9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阿列克谢耶夫、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在五一节招待会上的反应。

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召见中国大使。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1-2

№16681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1963年5月4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年5月4日

莫斯科市第1247-c号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兹报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宣传资料，其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的看法。

今年4月份，苏联各地区有来自中国的5000册以上的宣传小册子。与此同时，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散发了近千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苏小册子。

上述资料均已没收。

№09903 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1963年5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5月17日

第47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M.A.苏斯洛夫同志：

兹寄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第一季度的政治信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2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举行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附上述信件共50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5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系统向中央通报了中共领导对苏共中央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消除中共同整个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分歧，团结队伍，制止中共领导的宗派破坏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和行动所持的态度。

苏共中央遵循中苏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以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高利益，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共领导共同寻求能够引导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走向团结的途径。早在1960年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于1962年2月22日，然后又于5月31日两次发去了专函。中共中央甚至对后一封信没有做出答复，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非党的民主组织中更加积极地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尽管如此，苏共中央于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又两次致函中共领导，再次呼吁停止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重申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设性建议并提议将会谈的时间定在1963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提出的双边会谈的建议。但是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中，既没有中央主席，也没有其5位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位。率领代表团的是邓小平和彭真。这两个人，从上次会谈的情况和此后的活动来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积极地推行中共的特殊方针。

中共中央口头上答应停止论战，实际上却仍在继续发表论战文章。在这方面，最近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东南亚，特别是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所发表的声明[见刘少奇1963年4月18日在巴厘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原注)]，5月12日和15日在河内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5月13日和16日《人民日报》——原注)不能不予以注意。中国人的一系列其他行动，也使人对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结果不容乐观并有所戒备，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再次交换意见后，双边会谈改在1963年7月5日举行。

总之，可以断定，正如许多事实和事件所遗憾地表明的那样，中共领导将带着错误的纲领，带着在当代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去参加我们两党的双边会谈，仍将像过去那样，大肆宣传和不断加深它的错误纲领和观点，谋求使兄弟党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康庄大道，背离集体制定的、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里所阐明的总路线及其战略和战术。

(一)

现在已用不着怀疑，中共领导所奉行的方针不是别的，而是从“左”倾教条主义立场出发，篡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篡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并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得到确认的对新形势下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评价与结论。一切都已变得十分明显，中国领导奉行的现行方针在实践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制造分裂，客观上削弱整个反帝阵线及其主导的决定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可以完全有理由说，中共领导的这一特殊方针在当前正在变成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如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还可以认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共领导只是误入歧途分子和动摇分子的话，那么，现在就完全清楚了，中共领导人完全是自觉地推行一条既定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基础是中国领导的当头的意向。在个人崇拜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而兴盛起来的大汉族主义是产生这种意向的土壤。

中国领导的特殊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个方针是在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农业国里逐步形成的(6.8亿人口中，农民占5.5亿，工人和职员在革命时期为800万，1957年为2450万，1959年为4500万，现在为3500万)。国内曾有一个强大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其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党的干部，尤其是广大党员，没有及时地用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他们是以摘编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那些通俗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全集》首次在中国全部出版是1959年，总共出版了700万册，而当时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册数已超过3.8亿册，仅他的第四卷《选集》就出版了2.8亿册(在苏联弗·伊·列宁的著作大约出版了3.17亿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出版了前13卷。根据中国报刊的资料，在此期间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总共有

160种，700万册(1963年5月5日《人民日报》)。

还应当指出一种情况，那就是汉族的优越感是一代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所有这些都在中共有损于国际主义的民族情绪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反映出来。

本报告对上述指出的情况将不详加论述，认为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在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特殊立场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中共领导发表那些有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册，冠以自命不凡的名称：《列宁主义万岁》)，是其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持特殊立场的首次集中和公开亮相(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实际上，这是打着“捍卫”列宁主义旗号，头一次以中共的方针公开对抗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方针。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论点，并将其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中共领导则相反，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苏共这些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中国领导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歪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段，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观点和结论进行攻击。中共领导竭力散布对这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的怀疑，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搞乱，使他们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它在兄弟党中间加强了宗派活动和组织瓦解工作，再次挑起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重新提出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它声称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似乎已濒于危境。中共领导人宣称自己是唯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拯救者。他们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掩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特殊的亲华集团而四处奔走。

众所周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采取两面派及其他不体面的手段，明显地奉行破坏苏共威信和贬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方针。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领导对苏共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妄图破坏苏共的总方针，贬低和破坏苏共的威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共领导人从背着苏共隐蔽地进行活动到直接地、实际上是公开地反对苏共。他们甚至面对出现分裂也不肯罢休，“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垮台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邓小平同沙尔基的谈话)。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也以类似口吻表明对论战的看法。“论战既然已经开始，”他说，“那就继续论战下去吧。要是论战真的开始了，难道天就要塌下来啦？或者中国的西山上就寸草不生啦？不是那回事！天塌不下来，花草树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游在水中。”

过去中共领导人曾经形象地把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比喻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即在局部、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而在主要方面，我们是一致的)。现在中共领导人已经不讲这个话了。不但如此，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公开宣称，分歧不在于条件不同，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以及对他们所抱的态度”(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在1962年底和1963年春中国发表的、锋芒主要指向苏共及支持苏共的各国共产党的文章中，已经不是暗示，而是直接公开地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一方，以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另一方”的斗争新阶段。文章特意作了一次历史回顾，指出同机会主义的“第一次大论战”的结果是列宁胜利了，“第二次大论战”的结果是斯大林胜利了。“第三次大论战”就是当前由毛泽东和似乎是“最正确”、“最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同机会主义的这一次斗争。虽然没有直接那样说出来，但话中所包含的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这些文章反复强调说，第一次大论战导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大论战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胜利，“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的胜利”。第三次大论战，按照这些文章作者的逻辑，将导致“现代修正主义”的覆灭，殖民主义的最终灭亡及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见《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实际上中共领导已着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大的破坏活动，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粗暴地诋毁苏共，必欲抹去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的称号。中共领导忘记了仅仅5年前说过的苏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的话，忘记

了当时它坚决主张维护这个地位的态度。中共领导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作掩护，毫无根据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在苏共及其他不接受中国纲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头上，其真正用心在于为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夺领袖地位而扫清道路，达到其在政治纲领基础上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目的。

这一巨大的思想上的破坏活动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篡改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及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和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本结论，首先表现在下述根本性的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对时代的评价，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焦点的认识，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设。

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的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方针，而且，中国理论家们在这个方面的论断，客观上会得出推动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这里隐藏着深远的计谋，其实质可归结为一点，即不惜冒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人为地掀起革命浪潮。中共中央在今年3月19日的信中提出的在双边会谈中需要谈的主要问题中，就有“当今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问题，显然与此有关。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会将自己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和理解强加于人。

中国人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提出来，一方面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并以此贬低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则竭力夸大中国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先锋队的的作用，使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与苏联对立起来。

第三，中国领导避而不谈或贬低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第三部分关于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结论和观点。不仅如此，中国领导还企图阻挠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符合声明精神的实际措施。中共不仅不支持经互会，而且企图从理论上论证被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自力更生”方针，以此与之相抗衡。在这一点上不能不看到其败坏苏共及其国际主义行为的声誉，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和使其脱离苏联的意图。中共暗示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经济附属地位，这种附属地位以后可能扩大到政治领域。

第四，表示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结论。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有很多东西与斯大林当年作为苏共和苏联国家首脑时期特有的现象颇为相似。中共领导人之所以难于接受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恰好敲打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此外，中国人是在利用斯大林来与苏共现领导人相对抗。中共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在同其他党的代表(例如同意大利人)的会谈中公开声称，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是一种“不同意赫鲁晓夫政策的象征”。不排除《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机关报刊下一轮(在刚发表《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之后)发表阐述中国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评价的文章，试图为在“第二次大论战”中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斯大林恢复名誉。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1963年5月15日在河内党校的讲话中三次引用斯大林的话，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

第五，不仅在国内，而且远在国外广泛开展吹捧毛泽东运动和宣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硬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学说。说到这里应当指出，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脱离其他国家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新的纲领和新的思想。因此，中共领导只好采取人为的手段大吹大擂地夸大毛泽东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曾起到过正面的作用。但是，现在要把其中的论点机械地照搬到别的国家和各个大陆(中国人固执地要这么做)只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只会使其偏离共同制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和战术。另一方面，也有人企图把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以及一些由各兄弟党或者某些党(首先是苏共)集体研究

所得出的论点(关于思想、组织、理论基础和党的策略，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殖民地和附属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理论，等等)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同时，如上所述，从整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们主要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领导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近年来中共几乎不了解各兄弟党首先是苏共党的建设、理论和思想活动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基础上而形成

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产物。中共领导在近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已就当代的根本问题勾画出了其基本纲领的轮廓，即中共领导为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政治根据并企图在此基础上改变各兄弟党的方向。中共领导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掩护下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企图篡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真正的列宁继承者及其遗嘱的捍卫者，把自己说成是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领袖。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的想当头的人现在要办的事情是，把北京宣布为新的政治中心，或者作为第一步，与莫斯科并列第二中心也好。

(二)

中共领导人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分歧从何而来——答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以及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策略。因此，在我们看来，着重分析一下近来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方针是很重要的。

当前，中共领导为把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强加给各兄弟党又在积极地进行活动。在前不久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虽然明确了某些观点(表面上承认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矛盾，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对革命运动发展的意义，等等)，但这并不是退却，也不意味着要修正自己的特殊观点。作为争夺世界领袖地位道路上的主要策略之一，中共领导要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非大陆上确立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的意图，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中国领导早就就曾提出一种所谓中共与苏共之间进行“分工”的想法。近来这种想法重又强调地提了出来。1962年1月间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时就讲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瞩目的中心。《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1963年4月6日在同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在东方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

近来中国为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同几乎所有的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并且差不多每一次中方都做出了让步。同时下大力气对一系列亚非国家进行交往[邀请班达拉奈克、苏班德里约、西哈努克、布托、阿里萨布里访问中国；以盛大仪式实现刘少奇(首次)对缅甸、印尼、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邀请奈温再次访问中国；还邀请非洲索马里和苏丹的国家元首访问中国]。

值得留意的一点是，为实现亚非团结所进行的宣传和采取的具体步骤，不讲业已变得模糊不清的阶级原则，不讲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却把地缘的和民族的特点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位。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亚非国家的民主组织(中国代表在雅加达新闻工作者大会上的行为，吸收苏联作为“欧洲代表”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委会，都是企图从亚非区域性组织里把苏联代表排挤出去的先例)。

在实现亚非团结的想法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其在亚洲大陆争夺领袖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但是，最近的一些事态表明，

凭借这一点就想在解决亚非团结问题时撇开印度，那是很不够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看到，没有印度的参与，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以解决。这样，实现亚非团结的任务迫使中国领导必须着手解决同印度的边界冲突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来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一直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努力的效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导致了科伦坡会议的6个参加国与中国之间立场上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政治威信受到一定损害。

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竭力人为地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刘少奇的东南亚5国之行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意识到，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亚非团结问题是不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中国人却不希望他们获得这种支持。苏加诺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加强亚非团结的呼吁时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偶然的。他说，他(苏加诺)献身于“新兴力量”的联合。他解释说，“新兴力量”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依我们看，当时应当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应当给予苏加诺的想法以全面的和广泛的支持。从事情的本质角度来说，这可能是最具有远见和最为有利的做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了中国领导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真实意图。看来，当时要是能同苏加诺举行高层会见就好了。在会见期间也能提供一个让他更加详尽地阐述他的观点的机会，并且，我们甚至有可能拟定一个共同行动的计划)。

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在印尼和缅甸访问期间，三番五次地强调加强亚非团结的思想，没有利用此机会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在讲话中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所有这一切说明，不能低估中国领导为在三大洲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步骤。按照大使馆的意见，对中国想当头的人的这一方面的活动，需要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我们觉得，他们的上述路线在诸如对时代的评价和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等这样一些当代重大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条路线在中共领导所制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上也表现了出来。

在分析中国领导奉行的特殊方针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问题时，按照我们的意见，必须注意到：这里也有使列宁主义去适应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的企图。研究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近些年新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有40个之多)，其中多数出自落后的农业国。这正像当年中国的情况那样，很多类似这样的党不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的，而是围绕着民主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而建立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在继承国际无产阶级的传统，借鉴苏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的同时，都以很大的注意力研究中共的经验(在中国的那些众所周知的试验失败之前的一个时期尤为明显)，由于历史和经济条件相似，这些经验使它们很感兴趣。加上我们过去对毛泽东所作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留余地的评价和我们对中共的积极推荐，对于提高中共和毛泽东的国际声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并非总能看清中共的民族局限性以及毛泽东理论观点的自相矛盾、不完善和错误的性质。

由既不属于帝国主义体系，又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中立国家所结成的广泛阵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寻求发展道路和前途还将经历一个复杂过程。随着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大和这些国家内部发展的任务摆到首位，将出现一个意义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国家年轻的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正确到何种程度，是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因此，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这些党明白，只存在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苏共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刻不容缓地全面加以研究。我们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是指现在就应该出来直接批判这种可能出现的重蹈民粹主义覆辙的农民社会主义倾向。

这样的批判可能引起年轻的共产党和中立国家的警觉和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一些农民阶层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党可能对这种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不理解，甚至会促使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密切起来。因为他们可能把对中共领导的批判看作是冲着他们去的。

对中国人 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立场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将亚非团结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协调一致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中共领导所提出的亚非团结的思想本无可非议。同时，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可清晰地看到的对阶级原则实际上的掩饰，则会导致统一战线基础的动摇，导致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共同努力的削弱，并在配置阶级力量和评价谁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上把兄弟党引入歧途。

众所周知，中共的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加剧了中立国家的“喜马拉雅山性”，促使他们转向西方。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他也是国际法学家联合会副主席之一，多种国际组织的成员，科伦坡6国会议的代表)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在进步运动中，“社会主义曾是不分大陆，不分种族的”。佩雷拉强调说，他在去年10、11月访问叙利亚、埃及、希腊期间，此前他在访问日本时，感到了苏中分歧对民主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接着说，持中立态度的活动家(佩雷拉点了纳赛尔、尼赫鲁还有班达拉奈克的名)有可能向右转，转向西方。佩雷拉将他们比作克伦斯基，“大门既可以向反动派打开，也可以向人民打开”。佩雷拉以塞古杜尔为例。杜尔曾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活动家。但是近一两年来，他“向右转”得很厉害。因此，在几内亚、西方和美国的影响骤增。佩雷拉高度评价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铲除殖民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说，万隆会议的原则，在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是有威力的(见C.B. 爱尔兰沃科同佩雷拉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4日第462号)。

如果对中共领导在国际组织中的分裂活动不加遏制的话，那么，在中立主义阵线中就可能出现严重困难。这将有损于帝国主义和削弱社会主义友好团体对中立国家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中共领导人应对此负责。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应就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问题加强正面宣传，并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加强思想和组织工作。也许，应适当地发表重要的专题政治文件，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由苏联提出的并在宣言中阐明的全部干净铲除殖民主义的思想上来，并对实现这个宣言的情况做出总结。同时，要以事实揭露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所谓援助的实质。

中国领导人明白，在实现其当头的方针的道路上横着一个苏共，而苏共的外交路线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领导虽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结成了反苏言论的广泛阵线，但是，考虑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中共领导认为公开反苏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说穿“某些人”、“某些党”或者“有些人”的字眼指的是谁。

不但如此，中共领导人近来还变换了手腕，其实质在于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和中国领导受到了来自“帝修反”的攻击。因此，中共领导除了进行自卫，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领导及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路线哪怕有一星半点的批评或微词，都被认为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 attack。此外，中共领导还将其现在的纲领与列宁主义等同起来。每一个与中共意见相左的党都被指责为反列宁主义的党，而那些向它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则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的叛徒。为了替最近发表的对兄弟党，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复杂斗争条件下的兄弟党(如美共、法共、意共、印共)进行无端的粗暴批评的文章作辩解，中国领导声称，有100多篇来自兄弟党的讲话向中共发难。尽管如此，中共似乎表现出了“大度”，仅对3个党作了回答。其实，中共领导人只是利用一些兄弟党的个别的、顺便的、相当委婉的、没有超出党内辩论范围的意见，公开地对他们大加指责，其主要用意是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自己的政治纲领。

中共领导对兄弟党进一步施加压力。在这个方面，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基本意图表现得相当明确。

刘少奇今年5月12日在河内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把他前些时候(1961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所下的不同于1960年莫斯科声明提法的定义具体化，提出三个基本观点。按照他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是：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互助合作，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给予有力的支援。刘少奇强调指出：“这就是说，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并把它扩大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和平共处来取代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且不允许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来代替各个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向党校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并公开地对越南同志施加压力。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在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当今条件下，“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斗任务是不回避挑战……而要团结一致，以彻底打退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刘少奇特别提请注意的一点是，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走中间道路”。刘少奇在河内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很多观点”绝对不是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老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翻版和发展……”他号召听众研究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文章。谈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时，刘少奇实际上又重复了中国的“指挥棒”的论点。他指出，必须反对“只啃书本，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人云亦云”。

在中共领导以往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进行两党接触期间，刘少奇讲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诸如，主要的不是中国帮助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相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了中国。还说什么“有些人不顾事实，总是强调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却闭口不谈别人对他们的帮助。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对刘少奇与胡志明联合声明(见196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的初步分析表明，中国代表团对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中方得以使越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在这个声明里写进了一系列反映中国领导人立场的观点。诸如，在分析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统治基础带来沉重打击”，而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同这一运动相结合，才能“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当前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此外，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其经济成就对世界发展进程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的必要性却闭口不谈。声明对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只字未提。中方重申了它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越南人只不过是笼统地表示支持“三面红旗”的政策。

提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防力量的必要性时，联合声明贯彻中国路线，并号召“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优势”。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仍像过去一样，越方在声明里实际上完全支持中国人。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联合声明来看，越南同志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上没有接受中方固执地要强加于他们的立场(包括刘少奇今年5月12日和15日的讲话在内)。联合声明没有反映出刘少奇所讲的“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的论点。虽然在这个声明里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在现代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但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大体上与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内容相接近。对教条主义也不是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讲话中提到的那个角度下的定义。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几个方面：没有称南斯拉夫为非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阿尔巴尼亚未置一词，没有提及亚非团结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和中越联合声明提出的路线都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是在双边会谈前夕对于公开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试探。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的讲话

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一些观点，在双边会谈期间和在兄弟党会议上，中方将试图在这些观点上对我们发动攻击。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活动中的下述重要方面：

一、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许多年来特别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一直是用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的精神对全党和人民广泛进行思想灌输，并批评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在中国缺少对苏联、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活动的客观报道，同时还广泛扩大发行半公开的报纸《参考消息》，其中除了载有专门从资本主义国家资料来源中选择的反苏材料外，还开始出现新华社自己的歪曲报道(见“使馆专报”)。

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正在有目的地分阶段进行着：首先对干部和共产党员进行教育，其次是对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军队、青年、民主党派等，还在报刊登载相应的论文之前，就在会议上，甚至在政治学习中研究了他们。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和苏共进行系统的愈来愈加紧的攻击，迫使许多正直的好的共产党员进行思考。他们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收到有关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言论的消息。特别是中国公民寄给使馆或者通过使馆写给苏共中央和H.C.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见《使馆来信概要》1962年11月12日第787号，1963年1月29日第177号等)。

看来中共领导人了解这些情绪，所以为了“缓和”这些情绪，时而采取一些措施，以调整反苏运动的白热程度。想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共领导人才在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团结各民族”、“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在实行“调整”方针的过程中提高了某些级别的工人和职员工资。对农民做了重大的让步(返还了自留地，鼓励发展自由市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灵活策略，延长了支付定息的期限，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进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等)。

为了把党和人民团结在中共领导人的周围，进一步提高毛泽东的声望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罗瑞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武器和指南针。”在中国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这一思想。中国报刊上最近的一些有名的文章(据某些来源称，他们是由毛泽东撰写的或者由他审定的)被当作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马列主义代表作”(郭沫若)。

在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最为露骨的时期(1962年10月至1963年3月)，即中国报刊登载一系列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众所周知的文章时，在中国，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思想影响的斗争笼罩了整个宣传活动和思想生活。这个任务成为文学和艺术领域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状是他们的作品背离了阶级立场，鼓吹全人类的超阶级的道德，诋毁革命英雄，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自私自利做辩护，宣扬淫乱等。中国的批评断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共产主义之间画等号，没有坚定地抵制西方国家的影响，腐朽的文学艺术渗透到由“现代修正主义者”领导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等。

在批判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国文章中并没有直接点苏联作家作品的名。但是在阅读这些文章时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文章都(间接地)评论到下述一些影片，如《第四十一个》、《人与兽》、《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伊万诺夫的童年》等。中国的个别负责工作人员在同苏联艺术活动家谈话中，公开表示自己斥责上述影片中的某些影片。

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进攻，除了上述诬蔑苏联文化的目的之外，还想以此为他们实行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断绝文化联系的政策找出“根据”，限制苏共 and 兄弟党对中国舆论界的思想影响。而实际上近年来，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显著减少了。1962年文化合作的规模比1961年的水平大约降低了30%，而与1957—1958年相比则减少到原来的六分之一(按参加活动的人数计算)。中国的组织机构向苏联购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比1961年几乎减少一半，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书籍则减少了三分之一。苏联报纸的零售份数也不够多(例如在北京，《真理报》大约为30份)。苏联的纪录文献影片和科学普及影片的购买量(与1961年相比)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最近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关注加强军队中的思想工作。今年2月2—28日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工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报告。他们的讲话均涉及建设符合现代时代精神的革命军队问题。有消息说，周恩来好像在回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处于何种状况的问题时说：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将是热核战争。敌人将热核武器打击的主要力量指向那些工业比较发达且有热核武器潜力的国家。他强调说，至于中国，为了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与如此众多的人民作战，帝国主义者就要投入大量的士兵，这就使自己的殖民地发生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便会发生起义和革命（见苏联驻中国武官瓦西里耶夫同志与保加利亚武官扎伊莫夫同志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1日第239号）。顺便说一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人员在同苏联代表的谈话中在这方面表示，现在似乎可以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因为美国人不能向那里投入2万名以上的士兵，以保住自己在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免受威胁（摘自今年5月初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员的谈话）。今年5月12日中国负责干部在同匈牙利工会代表团谈话中说，一些人错误地指责中国消极地对待解放台湾这件事。中国对此有着明显的目的，通过保持现状来吸引可能投入亚洲其他地区用以镇压革命运动的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

据现有消息，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讨论现代条件下公安机关活动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报告。毛泽东关注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必须更加严格遵守法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加强这些机关的教育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依靠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风都带进国内一些“影响呼吸的灰尘”。刘少奇强调指出，应当特别小心地过滤来自北方的灰尘，应当辨别那里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见斯米尔诺夫同《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张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9日第290号）。

二、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的战术企图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上，以引导兄弟党不去揭露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且认为修正主义似乎不仅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而且程度愈演愈烈，范围愈来愈广。虽然南共联盟依旧遭到经常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对具体问题提出批评，也不考虑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变化，而是利用南共联盟作靶子来攻击苏共。看来，现在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满足。况且近一个时期南共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接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步骤。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共领导人他们发起的围绕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喧闹寻找理由时，决定扩大对修正主义的指控，继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把较大的兄弟党的领导人像陶里亚蒂和多列士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名活动家，都算在“修正主义分子”之列。

因此可以预料，在双边会谈中及在即将举行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会试图把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至于谈到教条主义，中国领导人虽然也会提到机会主义的这一变种作斗争，但是，他们的解释只能是从有利于中国人的立场来批判教条主义，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利用苏共经验的人指控为教条主义者，从而把兄弟党引入迷途。比如，这一点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对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一些文章指出，教条主义“不加选择地仿效其他国家的经验，强加于国内群众”，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人物谈话时也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强调指出：“最好是你们自己能够解决重要问题，而不必求得国外的指示。”

中国领导人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斗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党进行激烈的不应有的指控，企图引起苏共方面神经过敏的反应，从而加剧公开论战，使中国人可以把公开论战的责任转嫁给我们党。假如苏共不捍卫这些党，那么按照中国人的打算，这就可能被用来挑起这些党和苏共之间的纷争，使他们远离苏共，甚至对苏共产生不良印象，似乎苏共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性和战斗性。

中共中央进行批判的腔调是很典型的。它带有公开不尊重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性质。中国文章中关于“指挥棒”、“指手画脚”这类言词的真正用意在于阻止兄弟党支持苏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士气沮丧。中共领导人力图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如果某一兄弟党直接反对中共、支持

苏共，中共领导人可能指控这个党没有独立性，以刺激它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看来，形象地说，中共领导人的企图是把某些党赶入战壕，让他们孤立苏共，而且面对面地同苏共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大肆向国外散布自己的言论。他们将最近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所有的报纸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用14种外文出版了单行本，而且多次向国内外广播，广播均以国际歌结尾。在中国国内，载有上述材料的小册子免费在饭店、餐厅、车站和机场发放。中国的广播电台还通知听众，希望得到这些文章的人可将自己的地址告诉电台。在国外，中国的各种代表机构积极散发和宣传这些文章。与此同时，兄弟党的文章，其中包括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信，仅被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他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大力宣传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中国人在退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后，提高了《北京周报》杂志的国际作用，开始用数种外文出版。中国人还利用长期驻华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充当他们观点的喉舌，以她的名义印刷、出版并以致友人信件的形式向国外散发小册子。

中共领导人还不厌其烦地唆使或者公开号召各兄弟党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中国的文章，他们这样做并非没有用意。众所周知，中国发表这些文章之前，先在骨干中后又在广泛的社会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这些文章的基本论点。与此同时，大家知道，其他兄弟党并未进行反对中共的宣传工作。中共领导人催促兄弟党刊登中国文章，是想从内部瓦解他们，促使其党内产生或复活反对派组织和派别。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各阶层中广泛发行的半公开刊物（《参考消息》），经常刊载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种种谣言，说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好像出现了反对派。

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对兄弟党进行粗暴抨击的文章后，接着在自己1963年3月9日的信件中声明停止公开论战。但是，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双边会晤的阶段并未停止论战，而是在继续进行，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和方法。中国的一些资料照旧积极地散发到国外，而且为此目的还利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其他代表机关、国外的对华友好协会、阿尔巴尼亚的报刊和电台、国际运输航线等（见1963年4月8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关于中共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信件后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参考资料）。

中共领导人继续进行公开论战还表现在将日本和印尼别有用心地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报刊上。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报刊更加起劲地开展了肮脏的反苏诽谤运动，看来这也不是偶然的。

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旨在影响一些兄弟党的措施。最近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出版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到中国访问。有人说中共企图召开亚洲一些共产党代表的共同协商会议，以便协调总的行动路线。同时，某些中国人士声言，他们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苏共领导人“经常同经互会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交换意见和协调自己的行动”（见1963年4月6日斯米尔诺夫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谈话记录）。

一系列事实直接证明，中共领导人企图在个别兄弟党内部制造分裂，想把这些党的某些领导人拉到自己一边。中共一直支持个别党内的亲华派别，积极协助扩大他们的影响，并积极协助他们的派别活动。例如，这反映在中国报刊对芬兰、英国和比利时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及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会议的情况介绍上。中共领导人的所有这些行动，尽管目前带有隐蔽性，但均旨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兄弟党疏远苏共，散布怀疑苏共方针正确性的言论，降低苏共的国际威信。

三、中共领导人口是心非地声明自己信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而实际上继续在社会阵营内部进行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显著减少了与不支持中共立场和观点的、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联系，并且也减少了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如果说

苏共不顾现有的分歧，力争扩大与欧洲以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等)的政党间和国家间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同阿尔巴尼亚、朝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同越南保持事务性联系。

还应当指出，由于中共领导人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间联系也显著减少。我们两国之间在外交步骤和行动上的相互通报几乎终止，实际上只是苏联单方面进行通报。最近向中国同志转交了有关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资料，然而从他们那里则一份通报也没有收到。交换代表团几乎减少到零，中国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外，在某种程度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也除外)军队之间的事务性接触和联系也中断了。

中国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急剧减少。例如，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装备的总规模1962年降到1959年的四十分之一。中国拒绝在1964年以前，从苏联接收过去通过合同订的成套设备。总体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根据中方的倡议急剧缩减，从1959年的18.9亿卢布减少到1962年的6.45亿卢布。在今年的相互供货贸易谈判中，中方采取了进一步减少同苏联换货额的步骤，停止或显著减少了向苏联供应许多传统的中国商品(锡、水银、桐油、生丝及其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除了指责苏共“大国主义”(“指挥棒”的论点)、“施加经济压力”等外，还开始积极散布新的罪状，说什么苏共在各个时期都采取过“冒险”行动。中国官方人士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歪曲事实，伪造事实。他们考虑到对苏共的指责很少有证据，会对理解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造成一定的混乱，所以先委托中国党政机关和组织的中层干部进行散布上述指责的工作。想必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谈话的内容将上报兄弟党的主要人物，会对他们的立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见扎尔科夫与季米特洛夫1962年12月25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5日第74号；莫丘利斯基与斯托耶夫1962年12月30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4日第42号；格鲁舍茨基与库库奇卡1963年3月12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12日第338号)。

在这一方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发表的某些意见很有价值。马丁今年3月中旬从布达佩斯返回中国时，在莫斯科同苏联驻中国大使会谈时说，匈牙利高度评价苏共的政策。同时他指出希望各兄弟党互相间更加紧密地协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个别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他特别谈到，可能不该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出席德团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让朝鲜劳动党代表发言；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发言时似乎不应搞成起哄的局面等。马丁还指出，或许应当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协调行动，使他们不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攻击，若无必要不给中共进行各种攻击的借口。类似的想法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治乌的谈话中也有所表示。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谈到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1963年3月)。用他的话来说，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经互会国家兄弟党会议上协调的立场和文件，不经集体协商不要单方面进行修改(见C.B.契尔沃内科与乔治乌1963年4月24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30日第415号)。

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手法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报道这次谈话以及发表苏共中央2月21日的信和中共中央3月9日的信，也主要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现在采取的策略方针旨在动摇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破坏苏共的国际威信，使兄弟党与苏共分裂，以便为树立中共的世界领袖地位扫清道路。

(三)

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前夕，通报一下中国人民共

和国的总形势。

在中国目前可以看出，经济困难比起1960—1962年有某些缓和。由于实行“调整”方针，中国国民经济的改善有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962年谷物和蔬菜的生产有某些提高。工业生产基本上停止了下降，个别部门(化学、农机制造、个别种类轻工业商品)比起1961年产量有所增加。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有些改善。同时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仍然处在停滞状态，而中共集中主要精力关注的农业在主要指标方面至今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却显著增加了。在经济作物(棉花、茶叶和油料作物)生产方面情况仍旧困难。

进行“调整”的一条经验，便是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大跃进”初期曾经实行的一些健康的经济形式和方法，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首先是苏联的经验，虽然后一点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谈论。现在很重视具体的经济问题、核算问题和个别部门生产和分配的监督问题，很重视物质刺激和按劳分配原则。最近，中央和各地就农业和工业问题多次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忽视国民经济计划乃是尽快调整的国内经济生活道路上的严重干扰。在中国已经好几年没有正式批准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了。1963年中国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这个计划至今未批准；这个五年计划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审议。总的看来，中国领导人在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具体确定最主要的经济方向上正经受着巨大困难。周恩来同苏联大使今年5月9日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同志正在研究经济，但是仍然好像摸索着确定其前景，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尽管由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而有了一定的觉醒，但是，大概出于保护面子考虑，他们仍然声称“三面红旗”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据我们观察，现在他们主要是在节日活动、大的国家活动或外宾来访的场合吹嘘“三面红旗”。

中共领导人在保留这些方针的旧名称(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同时，逐渐给它们补充新的内容，以便以后可以重新围绕“三面红旗”开展吹嘘宣传运动，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按他们最初的想法这些方针本来是这样的。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中共领导人调整好经济生活后就开始新一轮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攻击，指责他们以反华言论参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大合唱，指责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三面红旗”的胜利前进。

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方法问题上的严重失算和错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继续重视“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提前宣布即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注意在国内加强法制，加快制定法律等(众所周知，在中国至今尚无刑法典、民法典及有关劳动、婚姻、家庭和监护等方面的法典。在国内实施的基本上是临时的法律规定，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以及公民的法律地位无法可依)。

尽管中国人民已有多数(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实际上得不到关于我党和苏联人民生活的正确客观的消息(相反，歪曲报道现在有增无减)，但是，关于苏联实际情况的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那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到，由于消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我国党内和国家生活中恢复了列宁准则，这给苏联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承认苏共的这些举动，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在这些举动的影响下，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步骤。他们在国内采取了一些措施，显示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以及他同群众、同人民的亲密联系。特别是近几个月，毛泽东频繁会见各种会议和碰头会的参加者，等等。

但是总的来讲，上述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他们也是为了对外宣传)并不能根本改变国家生活，不能消除毛泽东个人迷信在党内和国内的负面影响。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代表大会的年度例会仍旧不能举行，他们粗暴违反中共例行代表大会的召开期限(根据党章，代表大会5年举行一

次，而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1956年召开的)，而且不公布党和国家各种会议、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资料和文件(简报和一般决议除外)，也不公布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在国内没有造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难怪中共领导人对待兄弟党对他们的任何批评甚至善意的批评意见都极端敏感，对他们的劝告和希望置之不理，对威信问题表现过敏感，坚持强调自己绝对正确。

还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最近采取了一些步骤巩固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改善中国同大多数亚洲国家(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国)的关系，恢复了1958年中断的同日本的联系，中印边境的态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同非洲一系列国家的接触更加活跃，在发展同西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中国的活动更加积极(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问了英国、荷兰和瑞士)。

与此同时，中共实行的与社会主义国家隔离的特殊外交方针阻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巩固。其后果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不仅未得到广泛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中国在和乎共处、裁军、争取和平等问题上的立场，在许多国际民主组织中遭到尖锐的批评和谴责。中国代表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声明，助长了指责中国有侵略意图的资本主义宣传，降低了中国在争取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事业中的威信。尽管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确定维持公认的现状，但是冲突至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不仅妨碍中印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给整个东南亚的形势带来不良影响。

中国人在围绕中共拼凑追随其政治路线的共产党集团方面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支持中国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准备追随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共产党小集团，但(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朝鲜劳动党、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表现出一定的动摇。同时，中共领导人还对印尼、日本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很大的思想影响，在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中，亲中国分子占有强大的地位。

但是整体上讲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马列主义党的支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相反，他们对于像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攻击，并没有损害他们在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信。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刊登众所周知的中国全部8篇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刊登4篇，日本2篇，印尼和古巴各1篇，其他共产党——据中国方面判断——完全未理睬这些文章)。可能是由于这些文章未能得到预期的国际反应，中共领导人的新的长达200页的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只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没有广播，尚未译成外文，而且也没有像刊登上述8篇文章时那样，对这篇文章大吹大擂。

中共领导人又开始了新回合的攻击，春天进行了特别粗暴的攻击，企图借此引起苏共和其他大党的强烈反应，抵制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停止论战的建议，把论战的责任加给苏共。但是，苏共中央所表现出的克制和镇静，破坏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企图。结果正是中共领导人以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可见，在双边会晤前夕，中共领导人处于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中。

不能不注意到，中方着重强调中苏两党必须首先达成协议这一论题，看来有它自己的打算。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共和苏共两党达成协议，以中苏两党的名义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制订并提出协商一致的文件，可能是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定性条件，他们说这番话并非偶然。看来他们认为，他们在单独与苏共会谈过程中比在全体兄弟党会议上易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易于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中国人知道，大多数兄弟党赞同苏共的政治观点。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人企图利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在某种程度上将苏共与其他兄弟党分隔开，并把事情说成不是什么中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而是个别党之间，包括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国方面准备双方会晤的最初步骤证明，中共领导人不是从真诚愿望出发。他们建议在中

国举行高级会晤时不可能不知道，在他们掀起的反苏运动形成的环境下，况且是邀请H.C.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谈判，这一建议对于苏共来说实际上是不能接受的。看来，中国人也预见到这一点，打算把拒绝高级会晤的道义责任推给苏共。假如H.C.赫鲁晓夫同志去中国谈判，那么这会贬低苏共的威信，抬高中共的威信。

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的信件，形式上表示同意与苏共进行双边会晤，实际内容却是粗暴篡改、歪曲苏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带有尖锐的论战性质。这封信就其内容来讲显然是着眼于对其他党的宣传效应，中方代表坚决要求公布这封信的立场就能证明这一点。

苏共中央今年3月30日的信件使中国领导人处于相当复杂的境地。这封信再次强调了我党中央坚持宣言和声明的坚定决心，揭露了中国关于宣传苏共背弃这些文件的指责站不住脚。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苏共不容许把自己拖入继续公开论战之中，而且今后它仍将从原则立场出发捍卫兄弟党的团结。从信件中可以看出，苏共真诚地力图举行两党代表的高级双边会晤，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中方。

然而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苏共中央的这一真诚意愿。周恩来1963年5月9日会见苏联大使时声明，为了举行双边会晤，中共中央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团赴莫斯科，由邓小平和彭真率领代表团。同时，周恩来建议将会晤时间改在6月中旬，并确定谈判约持续10天。周恩来没有解释中方拒绝进行高级会晤的理由。即使撇开毛泽东本人能否赴苏不谈，中共中央如有真诚愿望，那么也可以指派中共中央5名副主席之一参加谈判。

至于将会晤改期和中共中央迟迟不答复苏共中央信件问题，周恩来解释为“工作繁忙”，“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分散在各地”，特别是刘少奇5月20—22日刚刚回到北京。

中方目前这样做有更深的原因。看来，中共领导人现在很难回复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更广泛地展开论战，就会更加暴露他们与莫斯科会议文件背道而驰的立场。

之所以出现这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碰到了苏共中央坚决克制的态度，苏共中央不顾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中表现出建设性和同志式坚决克制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近的几篇文章在国外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明显期望的那种共鸣。给予中国的蛊惑宣传和诽谤中伤以沉重打击的是，苏共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采取了进一步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反对西方文化艺术渗透的新举措；意大利共产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的胜利；法国无产阶级在不久前的阶级搏斗中的胜利；以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伊里安等。

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一些党内的中国追随者，促使他们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指出，甚至在同情中国人的党之中，许多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也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如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斯大林问题、中印争端等)，而总的来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来这些党没有许诺完全支持中共领导人。

许多人认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引起强烈国际反应的菲·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对中共领导人推迟回答苏共中央最近的信以及他们将会谈延期有颇大影响。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指望依靠古巴人，看来现在他们在等待访问的最后结果。

显然，中共领导人打算利用双边会谈前的这段时间，围绕H.C.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问南斯拉夫开展一场蛊惑宣传运动。中国报刊在这一方面现在已经开始了宣传准备工作(发表批判南斯拉夫新宪法的文章，转载国外报刊反南斯拉夫的材料，等等)。

中国人最近一个时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有关。中共领导人迟迟不答复苏共可能是为苏共中央全会万一讨论中国问题留一手，为了检验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公

开论战、停止在党内反对另一个党的声明有无“诚意”，以便收集另外的“证据”，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

中共领导人采取的立场使人们认为，他们将围绕双边会晤采取新的策略。根据种种情况判断，某种不定的局面(毛泽东称之为“暂停论战”)现在正中中国人下怀，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做出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姿态的同时继续攻击苏共，使白热期与休战期交替进行。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红旗》杂志，1963年第9期)作了一个历史的类比并非偶然，文章指出，列宁当年也反对停止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争论，认为停止论战就是停止揭露孟什维克。文章还强调，列宁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捍卫了党的政治独立性和纯洁性，保证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广泛地增长。

据我们观察，很难指望中共方面会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提出任何改善中苏关系、真诚改变整个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建设性措施。可以认为，会晤将被中国人主要用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中苏关系正常化、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中共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想必不会完全暴露自己的意图。除了中国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的那些观点外，他们仍旧会留一手，准备就苏共新纲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详细发言，可能集中批评纲领似乎背离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学说，等等。今年5月刘少奇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曾经部分地涉及这些问题。在双边会晤中和兄弟党会议上，预计苏中国家关系问题将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企图诋毁苏联(大使馆已将中国人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提出的问题清单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发往中央)。

目前北京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是苏共和中共交换信件以及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

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一些代表在与我们会谈时，一致对苏共中央在回答中共领导人的粗暴攻击时所表现出的高度原则性、克制态度、耐心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深表满意，认为这样做就粉碎了中国领导人把兄弟党拖入徒劳而有害的论战之中的计划。这些代表表示确信，苏共继续奉行这一路线符合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利益，会使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企图暴露无遗，将是他们分裂活动道路上的障碍。

通过总结我们的观察，概括中共和中国人民当中的情绪，分析国外不同代表人士的意见，大使馆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当前的国际和内政形势下，中共领导人未必会下决心承担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公然分裂的责任。看来，中国人最希望这样的局面，即他们仍然留在共产党总战线的队伍中，可以借此继续进行自己的宗派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宣称：“为了谈判，如果一次会晤不够的话，那么……可以多进行几次会晤”；如果在例行的会议上不能消除分歧，那么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拿到兄弟党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会议上去解决。由此看来，中国领导人现在就已努力制订某种预案，以便在处于少数派的情况下，保持虚假的统一，但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路线。

中共领导人背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协商一致的路线，现在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斗争将是持久的、复杂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制订我们长期行动的远景计划。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将继续详细研究中国的内政情况和中共的外交活动。

由于正在准备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大使馆现上报以下材料：

中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苏中经济关系，关于中方已提出的和可能提出的要求，关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苏中贸易往来，关于中方对苏中贸易关系可能提出的要求：对苏中贸易的建议。

中国的对外贸易。

关于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共领导人在恶化中苏国际关系方面的路线。

关于中国外交活动的基本方针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当代问题的特殊观点方面的新言论。

中国报刊对苏共和兄弟党关于当代基本问题的立场进行的歪曲。

中国中央报刊刊载的关于苏联国内状况和外交政策的材料简述。

中国报刊对当代某些问题进行宣传的政治方针。

中国对亚非团结的立场。

中共党的教育培训系统和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70—3820页

№138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 答复中国(1963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0日会议第10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对中国人有关不扩散核武器的报告的答复问题。 [20]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9-11об

№103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3年7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7月6日会议第77/72r号记录

第72项 关于延长苏联的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迟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广播6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

ЦХСД, ф.4, оп.17, д.539, л.28

№08107 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 [21] (1963年7月6日)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1963年7月

第一次会议

1963年7月6日

苏斯洛夫同志 [22]：同志们，我们开始吧。

邓小平同志！

彭真同志！

同志们！

我代表苏共中央欢迎你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

我党中央对中共中央同意派代表团来莫斯科举行会议、共同讨论我们两党所关心的问题，表示欢迎。 [23] 苏联共产党、所有的兄弟党和一

切珍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与一致以及一切珍视民族自由、和平和民主的人，都欢迎我们两党代表团的会见和谈判。他们期待着我们的会谈能够有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

中共中央在3月9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些中共中央认为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也提出了我们认为需要在双边会谈中加以讨论的全部最迫切的问题。 [24] 我们认为讨论下列问题是适宜的，这些问题考虑了双方的愿望，也使我们可以逐点地讨论宣言 [25] 和声明 [26] 的全部主要结论。这些问题是：

(一)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与团结和把它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斗争。

(二)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推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形式。

(四)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的一般理论问题。

(五)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一致的问题。

(六)其他问题。 [27]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使我们两党代表团的注意力集中到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上。

我们认为 [28] ，在会谈过程中我们将使用共产党人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应该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研究两党的真正立场。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各国共产党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决议研究我们的立场，取得两党之间的相互谅解，为重新召开各兄弟党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我们想特别强调：在1960年9月举行双边会谈时，我们的代表团曾阐述了我们对我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问题的观点。后来这些问题在81国共产党会议上又被提出，并由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全面进行了

讨论。各代表团基本上都是由各兄弟党有威信的领导人、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组成的，为了使观点一致并制定出一致的立场，起草委员会化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党都同意，要一致通过宣言。
[29] 该宣言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意和赞成，为各党签署 [30]，成了各国党所必须遵守的，成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共同法律。

我们的代表团再一次强调苏共中央的观点：在宣言和声明通过以后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实践，国际事件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总路线是在总结实践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通过纲领性文件来共同制定的。我们党严格地坚持不渝地遵守各国共产党的这一共同路线。

在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制定的关于共同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和结论，严格遵守在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苏共纲领考虑了宣言和声明中的全部重要的论点和结论。应当指出的是，苏共纲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基础上对当代的看法、对世界革命进程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灭亡的分析，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问题、争取独立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民族运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当代的问题进行的阐释，都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结论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单方面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1957、1960年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 [31]

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为我们的共同斗争制定了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苏共中央便严格遵守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在3月30日的复信中阐述了对一些原则问题的理解。 [32]

苏共中央的信是始终一贯的，没有超出宣言和声明的范围，信中包括了我党对会议重要文件中所阐述的那些问题的鲜明立场，并且逐点地支持了苏共中央的政策和总路线，而这种政策和总路线也是在阐述当代一切问题的宣言和声明的纲领性文件中所制定的。

6月15日，在会议的前夕，中共中央交给了我们一封新的信件，并

在全世界散发了这封信件。很遗憾，在这封信件中对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重新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苏共党纲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苏共中央全会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信件后，认为这些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诽谤性的。

中国同志们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信件，并把它广泛地散发，不顾兄弟党关于停止论战的共同愿望，破坏了达成的协议。虽然如此，苏共中央决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履行自己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义务，并且不在目前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也不发表这封信所要求的我们的复信。我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委托，将在会议的过程中对6月14日的信作必要的答复，阐述苏共中央对信中所涉及问题的态度和我们党对世界革命运动主要问题的立场。 [33]

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以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未引起争论。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已有总路线一事表示怀疑，实质上，你们企图用你们信件中由25点所表达的新路线来代替现有的路线。

苏共的出发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已经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努力制定出来，并在它们集体的主要文件——宣言和声明中加以阐述。其基础是现时代的定义：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时代，是两个对立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基于对时代的这种理解，声明所持的出发点是，世界上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它们团结一致的行动使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时期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声明指出，现时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汇合为统一的反帝斗争的洪流所决定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是根据对革命斗争巨大经验的概括和对近十年来世界舞台发生的变化之深刻分析而制定的，它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充分考虑到现时代特点的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出发点是，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这个纲领规定要尽力发展和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现时代的所有革命力量，指出了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完全胜利的道路，指出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条件下，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正确的，不需要再修改和修正，它为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劳动者以及所有人民指出了斗争的主要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对现时代、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目的和斗争，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进行理论分析的完整而又是有机的统一体。随心所欲地强调其中的某些方面，并把这些方面同其他方面对立起来，这就为有成效地贯彻整个总路线造成威胁。

宣言和声明中阐述的路线是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体现和国际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巨大大经验的概括。马列主义理论的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范例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特点及当前的任务，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共产党人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学说等，在总路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了各国共产党的新经验和世界上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确定了实际的结论。

根据6月14日的来信判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喜欢这条总路线。但这不能成为任何人的一种根据去歪曲我们的观点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指责他们似乎把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片面归结为和平共

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这是荒谬的指责。

除此之外，在信中明显地表现出否认两种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否认有利用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否认生活本身提出的并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

你们忽视各国党共同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提出了一些实质上是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的建议。在自己的建议的借口下，你们实质上是在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就以你们对当代世界矛盾问题的解释为例。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列举了四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确存在。但是你们对矛盾所做的解释的缺陷在于修正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所有这些矛盾中的一个矛盾——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不论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或是从其他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成为世界发展的基础的结论，是列宁作出的。他写道：“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的国家体系，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是关于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和巩固，作为世界发展决定因素的这一矛盾的意义更加增长了。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强调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难道在现代世界中能够找到这种现象，它未曾受到现代基本矛盾——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巨大影响？不考虑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就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和尖锐化的特点。你们不仅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并且走得更远了：你们说，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错误的结论，得出了牢固的概念，

认为目前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你们说，第一，亚、非、拉美地区是世界上现有一切矛盾的焦点，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第二，你们说这些地区人民的斗争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们这些纲领性的观点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明显地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应当知道，世界现有矛盾的焦点，也在首先解决现时代矛盾的基地——这就是同帝国主义主要力量相对抗的、最强大和最有力的工人阶级力量在行动的基地。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巨大力量，但它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基地。这个运动现在首先是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民主任务，而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并不是集中在这里。

那么目前世界矛盾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世界政治的中心点，以及世界工人阶级的工人运动的中心，或用你们的话来说，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在哪里？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强调指出了，并结合目前形势发挥了列宁的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斗争，是世界政治、是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中心点。现时代的基本矛盾正是在这里解决。世界现有矛盾、国际阶级斗争、世界政治的中心焦点正是在这里。

你们关于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列主义相抵触的。这种论点忽视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实际作用，贬低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虽然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动摇它的基础，消灭它建立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但是不能够粉碎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按你们的说法包括除了美国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也贬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你们在发挥这一论点时，实质上是认为现阶段世界政治的基础不是两个体系的斗争，而是美国对中间地带的侵略。你们认为，美国反动派在征服这些国家——指中间地带国家——之前，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间地带的概念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政治上是有危害的。在这里，偷偷地用地理概念代替了社会概念。这里毫无根据地把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新独立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及帝国的残余混为一谈。这样就抹杀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和矛盾。中间地带的概念忽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公约结成了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集团。这种概念导致对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另一方面，忽视了包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执行反帝政策的新主权国家的真正新地区，即和平地区。

中间地带的理论造成对现代国际关系曲解的情况。这种理论实际是贬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侵略的威胁，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失去警惕性，使人觉得美国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只是一种烟幕。当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描写成美帝的扩张对象的时候，这种概念就会贬低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意图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意义。忽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复仇政策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对和平的威胁同这种概念联系起来，就特别有害。忽视现实的威胁就会产生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不能同意这种概念，它模糊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危险，并完全在事实上忽视西欧帝国主义者的，首先是西德帝国主义复仇分子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不久前肯尼迪访问西德时声称：“西欧不再会是世界战争的发源地。”

我们认为这是欺骗人民。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反对只能有害于保卫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斗争事业的幻想。

因之，你们对基本矛盾的提法修正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这种提法对国际工人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对普遍和平事业无疑是危险的，是不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1960年声明认

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全体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达成了共同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现时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革命运动的一切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所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担负了不断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义务，它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国际影响正在年年增长。

我们党把实现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自由的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成果而走上了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

我们的出发点是：互相援助和彼此支持，以及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巩固和相互援助的历史。起初，组成军事政治联盟是为捍卫自由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成就所必需的，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不能到此为止。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完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已经沿着加深和完善全面联系和合作的道路更加前进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制定了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苏联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与欧洲、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特别重视同那些继承了过去的落后经济的国家实行经济合作。这里没有必要来列举有关材料，看来这些材料中国同志们是很清楚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竞赛中获得了不少成就。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工业产量方面所占的比重已达37%强。在1950年到1962年的期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大约增加了3倍。但是在最近时间内，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生产增长的总速度降低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要求人们予以严重注意。在1951—1962年这一时期，以工业每年增长速度来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非社会主义国家1.5倍。然而，假如看看最后这4年的情况，那么我们超越得就相当少了，仅超过0.5倍。我们必

须考虑，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如何保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便赢得时间。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无疑会使我们达到这一点。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和潜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事情的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并且在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社会关系的改善以及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认为，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党的注意中心。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之前，利用内部力量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途径。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非常懂得这一点，他们曾经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重新建立经济的各个部门。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责任感，是由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发展中作用不断增长这一点而来的，这种责任感就是要很好地和顺利地建设新社会，发展经济，加强防御能力，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它们实际的实现中成为对一切劳动者具有吸引力的思想。我们在实践中遵守这一义务，我们也呼吁其他一切人都履行这一义务。这也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实际贡献，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社会主义的优点，与其说是应当根据口头的论断、理论著作来判断，不如说是应该根据具体事情，根据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来判断。

假如这项任务我们完成得好，这就是对其他国家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巨大支持；假如完成得不好，这就是对这一斗争的打击，因为如果看到不能解决那些正好是推动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例如，提高物质福利，繁荣文化和民主，保证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等等，那么，谁还愿意去进行合作呢。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同其他兄弟国家合作的途径，才能在自己的发展中取得最大的成就。在尽力巩固每个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同时，还要不倦地促进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的加强，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相抗衡。

在这方面将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向后拖，阻挠各兄弟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过程，那是不正确的，这会给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带来损害。

全面发展所有14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对国际生活的影响，使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信中列举了将近10项要求，按照你们的意见，完成这些要求，社会主义体系就可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给予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信中却无一处提到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以经济建设对世界革命的发展给予主要影响的论点。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向社会主义各国提出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的领域内，即物质生产的领域内，使资本主义遭到失败。离开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忽视决定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主要之点。

同志们，令人惊异的是，你们企图把我们党完全符合声明的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成就的范例的决定性力量的立场，描述成为否定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认为单是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就能够自动导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取得胜利，那是荒唐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取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将大大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吸引力，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反帝革命战线。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不是代替一切进步革命力量为争取社会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但是从根本上使这种斗争容易进行。这些成就使资本主义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声誉扫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不利于反动、战争、侵略的力量，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创造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使那些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这一革命的政治条件更快地成熟，促进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什么幻想资本主义会自动垮台。问题只能是这样，一切想为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应当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致，像爱护眼珠一样来爱护它，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

发展的各个方面来加强这个大家庭。

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威力，壮大它们的军事实力，是争取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防止热核战争和使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斗争成功的保证。

苏共认为，全力促进各自由民族的进一步全面接近，不懈地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尽一切可能支援兄弟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己的神圣的职责。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承认，现在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因此，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只要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是和平共处就只能是破坏性的世界战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声明根据这一结论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义务。根据宣言和声明，苏共认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部活动的头等任务。

我们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中，向党和人民提出了下述争取和平的具体任务：“继续坚持不渝地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力量和加强其威力，坚定地始终不渝地实行作为苏共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对外政策总方针的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始终不渝地执行团结一切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的力量的路线，对力图破坏和平的帝国主义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对揭露战争冒险的祸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不受侵犯。”

邓小平：这种翻译方法使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为什么？或许需要稍微慢一些！那就稍微慢一点！

邓小平：您所阐述的是重要的问题。

苏斯洛夫：那么我尽量慢一些。

彭真：这是交换意见么。可否您读一段，然后翻译坐在这里读一遍，然后再来另一段。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您讲的话。现在这样很难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那样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

邓小平：听来有时声音很大，有时很小。

苏斯洛夫：你那里有调整器，可以调整。

邓小平：为了这样重要的交换意见，可以多占一些时间。

苏斯洛夫：您看一看，那里还有调整器。

彭真：这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调整。还是请您念得慢一些，我们再听听看。您发言可以多占一些时间，我们来听。

苏斯洛夫：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神圣斗争；全力促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国际工人阶级一切队伍和组织的战斗团结。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再一次阐明了我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的非正义的战争和革命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且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是神圣的战争问题的理解。所以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个问题。

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根本变化，要求共产党人现实地、根据科学资料了解和分析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向人民隐瞒这些资料，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们。

我国人民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在迷信斯大林的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向苏联人说明关于战争的真相，没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为击败希特勒侵略进行必要的准备，反而要他们相信，用很小的牺牲就可以粉碎敌人。

现在问题这样摆着：要不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即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仅第一次原子打击就会使7亿至8亿人死亡，现代核弹的杀伤力比毁灭了广岛的原子弹要大1万倍，这样的核弹已经有几千个；或者相反，向人民群众隐瞒这些事实，使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事实，甚至对他们

说，核武器实质上不能改变什么东西。

我们认为，采取后一种做法就意味着犯重大的错误，正中是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各国人民愈清楚地意识到热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他们就会愈自觉、愈积极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

事实上，到底什么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进行争取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斗争呢？是原子弹根本不可怕这一论点呢，还是说出真相：热核弹能够完全消灭整个国家，世界核战争将毫无例外地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残酷无情的但是现实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而对他们隐瞒这一真相，如果我们忽视列宁曾预言地警告过的这一破坏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危险的现实性，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低估核战争的破坏性的后果，只对那些为继续核军备竞赛进行辩解的帝国主义思想家有利。

（中国代表团说听不清楚。）

这种技术我在你们中国也看到过（笑声）。请告诉他们，怎么样调整。

而我们和你们应该十分清楚，如果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不发挥必要的毅力，不对各国人民敲起警钟，不号召他们积极进行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而让帝国主义者发动热核战争，这对人类将意味着巨大的悲剧，对共产主义事业将意味着巨大的教训。列宁在表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热爱的同时，经常考虑如何避免战争行动。

列宁写道：“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什么样的闻所未闻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保持住我们用这样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平。”

现在，当热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长，使战争的后果将成为对人类的真正灾难的情况下，列宁的这些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

实意义。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终于发动战争，各国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该尽一切努力，不允许发生定使亿万人死亡的新的世界大战。

对这个当代的根本问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目前新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的大家庭为主要堡垒的和平力量，可以用联合的努力防止新世界大战。这一极重要的结论是以严格计算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根据的。

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根据就在于他们毫不动摇地深信：可以制止侵略势力，防止热核大战，世界革命进程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正在并将更广泛、更顺利地发展。

争取和平，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斗争的极重要形式之一。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会削弱帝国主义的战线，孤立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增强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我们认为，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有机地联系着的。81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近年来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胜利，世界革命进程正顺利地发展。所以，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割断开来，把前一种形式同后一种形式对立起来，即如你们，中国同志所作的那样，就是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变成空洞的词句，阉割其实际内容，实际上是忽视为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好处的。

你们指责各国共产党，似乎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扩展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杜撰，是对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兄弟党的污蔑。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我们党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路线，为了使——

第一，在和平的经济竞赛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成制止帝国主义和防止国家间战争的更加有力的因素。

第二，更广泛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促进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三，动员群众为争取和平、防止热核灾难而斗争，孤立垄断资产阶级，抑制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

第四，迫使帝国主义裁军，制止其输出反革命的企图，为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使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期早日到来。

第五，对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给予更多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促进它们的民族复兴并过渡到符合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样，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就意味着同帝国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紧张的斗争，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进攻革命的人民的时候，采取积极和坚决的行动保卫他们。

因而，问题不是在于谁一点也不触及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在于用和平共处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作了全面表述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在我们的热核武器时代，一笔带过地承认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是不够的。

为了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必须鼓起劲来，不倦地劳动，为解决这些世界根本问题而斗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领导这个斗争。

1960年的宣言强调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内进行不屈不挠的扩大和加强和平运动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个运动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团体尽很大努力使和平战士的行动更加积极起来，吸引他们参加世界各国人民广泛阶层的队伍。

我们深信，和平战士力量的重要源泉是无所不包的性质的问题。它包括一切愿为人民权利，为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相反，如果按地理特征区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战士，如果一些国家和大洲的工人阶级、劳动者、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并与另外一些国家和大洲对立起来，那么这就会给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

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一样，认为在现代的情况下，各国人民通过自己积极的、坚决的斗争，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军。

苏共积极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并且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在这方面采取更勇敢的行动。

近年来，苏联一贯坚决为实现已经提出的裁军纲领而斗争。在联合国，在日内瓦18国委员会，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谈判中，苏联外交始终不渝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旨在维护和平的建设性措施，争取通过全面、彻底裁军的纲领。我们认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主要核心和促进裁军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停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这丝毫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这将限制原子军备竞赛计划和阻挠冒险主义的、复仇主义的西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的阴谋。

拥护和平共处的中立国家，特别是竭力巩固和平地区的新独立国家是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苏联一贯奉行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亲密和合作的政策。苏联认为，为了各国人民沿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合作、加强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情。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和为了消除已解放的国家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执和冲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永远会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这些争执和冲突只有利于帝国主义。

81国共产党会议要求所有兄弟党承担起尽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国防能力的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和平。

苏共不断地关注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威力和国防威力，改进为回击和报复侵略者的一切手段，力求经常保持并增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武装力量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优势，以此对巩固普遍和平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主要贡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通过动员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斗争，首先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牢固的经济和抑制侵略的强大物质手段，能够制止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防止它们的侵略行动和反革命输出，因为只有实力的理由才会使帝国主义有所考虑。

赫鲁晓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牢固的经济，军队再有良好装备，这就会更好地影响那些想发动新战争的人的脑子清醒起来。”

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手段，并尽一切可能来保卫世界和平。

在热核武器时代，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要保持特别的警惕，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给以毁灭性的回击。这个任务也需要大量的物质耗费。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苏联作出了大量的这类耗费，并为建立和巩固火箭核防御做了巨大的工作。结果，制成了强大的现代化核武器，制成了能够在地球的任何地点击败侵略力量的洲际火箭和全球火箭。

苏联火箭核武器的威力是保卫社会主义果实和制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可靠手段。

苏共关心和努力把这种威力保持在应有水平，把这看成是自己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反帝斗争这一事业的有效贡献。谁现今不负责任地断言苏联不反对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者奉承讨好，谁荒唐而愚蠢地大肆宣

扬苏联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那么他就是在诬蔑苏联共产党，就是对苏联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垄断及对建立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巨大军事力量而做出的伟大功勋进行诽谤。

苏联对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止一次的发动新战争的企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世界舞台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根本变化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千百万苏联人真正巨大的工作和努力应得到任何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与进步的拥护者的另一种评价。

苏联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在对外政策中，把坚定与灵活，果断与谨慎结合起来，既利用使帝国主义阵营冒险分子清醒过来的积极进攻的方法，也利用孤立他们、束缚他们手脚的谈判方法。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做为例子。由于这一危机，苏联在同美国谈判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和动员措施，向美帝国主义者表明苏联准备援助英雄的古巴人民。苏联政府的行动，古巴人民英勇的斗争，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制止了将世界置于热核战争边缘的帝国主义冒险集团的危险挑衅。

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苏联表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甚至在极尖锐的形势下也能够制止侵略集团和防止发动世界战争，证明了能够制止反革命输出。

在给予美国帝国主义以主要的打击的同时，我们党认为忽视其他国家——日本、英国、法国特别是西德——的侵略政策是极其危险的。1960年声明强调指出西德帝国主义对和平事业的特别的威胁，各个共产党面临着加强反对西德侵略野心的斗争的任务。

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危险，苏共中央认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来说，对这个普遍和平事业的敌人估计不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西德帝国主义已远远不单纯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西德军国主义依靠大大超过整个希特勒德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愈来愈起主导作用。

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危险进行斗争，巩固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的阵地，在我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外活动中过去和现在也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巩固和发展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力量相抗衡的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苏联和所有华沙条约国的坚决支持，在实行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极重大的措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1961年8月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伯林的边界进行监督。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企图借助恫吓和加紧战争准备来破坏这些措施。华沙条约国武装力量司令部采取的警告措施使这些阴谋未能得逞。苏联一贯地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坚持争取和平解决，签订对德和约，并在这一基础上解决西伯林问题。

苏共的出发点是，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和西德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保持最大的警惕，把一切为和平、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更广泛地援助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巩固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的人民。

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苏共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运动以及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关于休息问题。如果我再耽误你们10到15分钟，把这一段讲完，然后再休息如何?(同意)]

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完成阶段，目前，只是在总共近5000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保存着殖民主义者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不能否认，可耻的殖民制度的瓦解已经成为事实。

莫斯科声明公正地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顺利进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一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各国人民在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相互联系的保证。列宁特别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写道：“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

一方面团结世界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为被压迫民族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摧毁一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开辟了可能。

1960年声明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给予民族解放运动很大支持。苏共坚决主张完全消除殖民制度，解放一切仍然处于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人民，从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战争，支持反对专制殖民制度的人民起义。

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给予所有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宣言。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揭露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殖民地、附属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权利，始终是苏共、苏联外交和苏联社会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中心。

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争取普遍裁军和和平大会上说：“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明确的：不论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不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该有任何带着殖民主义桎梏的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当是自由的。”

鉴于对奋起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压迫者的人民仅用道义上的支持和表示声援是不够的，苏联还向各民族政府和组织提供物质资料、粮食、技术、武器等重要援助。

我们断然拒绝下面这种诬蔑和影射，说什么苏共忽视和低估民族解放斗争，对它采取消极、否定和鄙视态度，以“敷衍”的态度，将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负担或者恩赐。现在，前殖民地的大多数地方已基本完成了消灭殖民主义者直接统治的任务，民族解放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力量面临的巨大任务是巩固已取得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克服多年的落后状态。

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剥削的经济基础，是使他们的民族经济从属于垄断资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是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它用一切力量企图阻止民族解

放革命进行到底，将年轻国家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变成虚假，使其剥削和掠夺制度永久保存。

抵制外国垄断组织，进行土地革命，发展民族工业，使社会生活民主化，这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年轻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关键性社会任务。为解决这些任务的斗争，正是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条件。

帝国主义其战略的主要方针之一，就在于分裂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将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使已获得独立的国家离开中立政策的道路和争取和平的道路，破坏年轻的主权国家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建立的联系。

我们党认为，坚决反对这一计谋是进一步顺利发展上述国家的反帝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战后年代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为巩固政治独立并获得经济独立以反对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是现阶段民族解放的、反帝的革命开展和深化的主导的主要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援助年轻的主权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和平的发展条件，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党纲领中指出，苏共把同摆脱了殖民与半殖民枷锁的民族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的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给予经济援助，在现代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联给予的这种援助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为此目的仅贷款就拨出了30亿卢布左右，援助23个国家建设480个工业及其他项目。

我们十分重视援助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巩固和发展民族经济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科学和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专家和熟练工人，并继续实现扩大的援助计划。

当然，我们的资源目前还是有限的，但是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增加。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

中所取得的成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意义，如果对此估计不足，那将是最大的错误。这些成就的作用绝不是归结为，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树立范例和鼓舞他们斗争，尽管这些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当强调指出，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直接地同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发展相联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同世界经济舞台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迅速地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威力越增长，那么这些国家对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援助也就越广泛和有效，民族国家在反对国际垄断斗争中的地位也就越巩固，它们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也就越迅速和越顺利。

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中共的领导是否拥护列宁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原理。

争取和平的斗争符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根本物质利益。这是为消灭军事集团和在一些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样一些最重要的殖民主义工具的斗争，这是为争取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的斗争。禁止军备竞赛将使不发达国家免除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侵略的经常危险，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规模创造条件。我再次地重复，同时我们也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正如苏共纲领强调指出，民族国家日益积极地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客观上它基本是一支进步的、革命的和反帝的力量。

殖民体系的解体和老的帝国的崩溃，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其殖民结构和殖民经济开始解体，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世界联系的扩大——所有这些因素在加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削弱世界帝国主义阵地方面，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年轻的主权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取得经济独立，将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新的沉重打击，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即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经济剥削的制度的垮台。

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消灭，应该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当代的中心问题——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过去帝国主义能够无障碍地利用被它们战胜的国家人力物力资源来准备和进行它们所发动的掠夺战争，那么现在这一局面正在告终。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日益积极地参加到争取普遍安全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来。

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有助于和平共处的巩固。同时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在进一步削弱，它的阵地日益缩小。在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根本民族利益，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认为，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同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我们主张在反帝斗争中竭力把以前殖民地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主张发展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但是，如果有人企图把这种团结变成某种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孤立集团，那么这种团结就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方式，变成把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孤立出来的结果。

不管中国同志如何商谈讨论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定作用，说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决定人类命运，但是这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在事实上把这一斗争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斗争中孤立出来，这只能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削弱这一运动，而有利于力图分裂革命力量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使非洲、亚洲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离的路线，旨在削弱非洲、亚洲组织与国际民主组织、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路线，是有害的路线。

马列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的和种族的特殊化，争取消除妨碍所有种族、民族及各大洲的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藩篱。你们恶意抨击这一马列主义的立场，把它说成是一种坚持保存帝国主义统治和所谓优等民族统治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列宁主

义的骇人听闻的诽谤。

当我们说革命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反殖民主义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这一能冲毁、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统一洪流时，我们指的是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反动势力的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谁反对这种不分肤色、民族或地区的人民力量的伟大联合，坚持保存压迫者所建立的种族和地理藩篱，以种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把人民分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那么他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阻碍世界社会进步，阻碍革命事业。

历史将谴责这种极为错误的方针。那些几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而同国际工人阶级隔离，现在帝国主义又妄图令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分割开来的人民本身，也将谴责这一方针。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只一次地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开展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像我们所知道的，国际无产阶级从它存在的最初年代起，就表现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对一切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正在作出并将作出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列宁，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在高度估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个运动只有同国际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在分析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决不把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主要斗争口号。这个口号的内容在新的条件下扩大了。众所周知，列宁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增长的意义。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增长，它需要团结的巨大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认为，为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紧密团结和兄弟

联盟，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各个大陆的人民，同一切冲击着帝国主义堡垒的革命队伍的联盟，是顺利进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志们，我请求休息20分钟。

同志们!现在就革命理论问题谈几点意见。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声明中关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道路的估价和结论仍然有效，不需要加以修改。

这些结论已为最近几年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切矛盾的加深所证实。

革命过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反映这些特点，不应当仅仅限于重复人所共知的公式。

在我们时代，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面前开辟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已不仅仅是在个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对劳动人民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明显的优越性，这个制度，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基础，对任何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都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它对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国际义务的忠诚，群众性的、有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为任何一个国家顺利地进行革命和保卫革命成果开辟了有利的前景。今天，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预见，而且是由实践证明了的事情。

在某些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主观的和客观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复杂结合的结果。能否正确地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因素的作用的对比是否有正确的理解。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该国的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

苏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它的纲领中做了如下的阐述：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由本国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革命是不能定做的。不能从外部把它强加于人民。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而产生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把任何取得幸福的办法强加于别国人民而不因此破坏它自己的胜利。(原文从“不能”以后直到句末是删节号。这一整段话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94页)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反对从外部推动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它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它所拥有的同盟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阶级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具备革命的形势，这些就是革命的内部条件。

同时，正如声明所指出的，革命者必须考虑到国际局势、世界革命过程的总进程这些因素。

我们党、苏联人民正在积极促进我国以外的革命事件的发展。我们以苏联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以自己对世界事件的进程的全部影响，以对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对一切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贯的支持和援助，对革命的世界发展事业作出有效的贡献。这就是执行列宁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国革命斗争的途径的指示。

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近来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最近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置之不顾。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

在你们党的刊物的一些编辑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相矛盾的。你们把这种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但这是对他们观点明显地歪曲。这意味着，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的、工人的运动服从于一般性的民主运动，而领导这种民主运动的常常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就像你们所说的是“爱国的王公贵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指出，这一个国家或者那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应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自己来确定。(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没有找到这句话。只是

在“声明”第五节第二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

那么，怎么来理解你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企图呢？问题不在于需要不需要革命。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在一百年前就已解决了。这里讲的是另一回事，是关于必须估计具体形势的问题。你们对于那些“不敢”夺取政权，不敢领导革命，放弃革命目标，害怕牺牲等等人的诅咒，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里革命形势今天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已准备夺取政权，但共产党抑制他们，那就请你们举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来。

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是由列宁所全面确定了的。不能从远方，比如从莫斯科，从北京，或者从其他中心来确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在何时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列宁主义的党精心地研究大、小国家的革命过程。但是它从原则上从来不向兄弟党提示革命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认为这个问题完全是每个兄弟党自己的事。

的确不论我们如何精心地从旁研究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的进程，我们也不能比在当地活动的、同群众保持经常联系的共产党更好地确定革命过程发展的道路和形式，不能比这个党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对革命行动的准备程度，更好地估价力量的分布、革命后备的状况等等。

我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不是为外国同志审查现成的革命斗争方案，不是把这种现成的方案强加给他们，而是解释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力援助，积极支持实现他们所选择的方针。

苏共是根据共产党的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以及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来确定自己对现代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道路和形式的问题的观点的。

苏共纲领指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掌握斗争的一切形式，准备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来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社会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只有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段话不是直接引述，类似的话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94—196页）

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作用属于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创造性地和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原则，以及维护它们使它们不受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侵袭——这些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

正确理解和平的和非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共产党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极其明确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平和非和平道路的问题。

苏共坚定地保持这个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力求通过和平的方式，不通过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同时，革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对人民采用暴力，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采取夺取政权的非和平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的具体条件。

在我们的时代，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增长了。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增长，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改变了，也不因为目前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自动交出政权，而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更为有利的力量对比。

共产党人不能不关心充分利用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当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实现，它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现在，表面上似乎也承认革命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承认是迫不得已的，是不诚恳的，因为你们在同兄弟党的论战中把全部热情用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和平手段是不可能的。

我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在一切国际性会谈中，在自己的一切有关和

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的文件中都首先强调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应该掌握革命活动的毫无例外的一切形式或一切方面，应该准备好最迅速地、突然地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争取民主、争取广大居民阶层的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革命运动时，不可以对这种斗争置之不顾。在我们的时代，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重要性正在大大地增长着。这一斗争提高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威信，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的团结，是它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声明宣称，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的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23页，这里的“帝国主义”一词在“声明”中是“资本主义”。）我们确信，每一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是恪守对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忠实，一贯地和顽强地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我党中央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给予它们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获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表现在声明中的、由所有的党共同协议、赞同的、各国共产主义者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所结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是相互支持，每一个党对本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责任，是团结一致地遵守共同制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容许任何可能破坏这一团结的行动，或者换言之，禁止派别活动和小组活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的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所有的党，对大党和小党，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同时对谁都不例外。

兄弟党相互关系中的这两个方面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应当把

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任何企图把每一个党的平等和独立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关心整个运动队伍的团结，不采取反对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忘记这种义务，实际上就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列宁认为，一个党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以及把对只同一个党有关的问题的观点强加给另一个党是不能容许的。当这种干涉内部事务的行为是来自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并且是为了反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艰难条件下和在我们阶级敌人的巢穴中进行斗争的兄弟党时，它就特别危险。

苏共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注意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坚决摒弃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方法，如对美共、法共、意共、印共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活动所进行的公开的、主观的、按形式说来是不能容许的粗暴和不友好的批评。这些党遭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和诽谤，在特别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它们有权期待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而不是背后的打击。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要求，必须有一个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纪律。

列宁写道：“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在解决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的伟大问题时，服从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各国工人的经验，他们的知识和意志。”

有人会问，在各国共产党没有统一的章程，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的情况下，什么是遵守国际纪律的标准呢？标准就是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每个党履行它对整个运动所负的国际义务。

根据宣言和声明，在争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在其代表会议上制定了统一的观点和立场。会议文件中反映了兄弟党的集体的意见。每个兄弟党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这些意见。忠实于会议的决议是每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藐视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纪律的基要条件在所通过的宣言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规定。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小集团，声明则责成各国共产党不得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

派别活动有自己的逻辑，它能够把走上这条道路上的人拖得很远。

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党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分裂行动，企图建立少数党的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内的反对派分子——所有这一切就是派别活动，所有这一切就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的粗暴破坏。中共中央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负有严重的责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声明中规定了克服产生的分歧和制定对共产主义运动总问题的共同立场的具体途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双边会谈和协商。我们党始终不渝地遵循克服分歧的这些形式和方法。

苏共认为今后仍有必要始终一贯地履行各国共产党所承担的相互义务，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党第一个起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也在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方面表现了主动精神。由于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被粉碎了。

因此，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最近中国同志把事情说成是，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正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而产生的，你们现在还在自己的尖刻的文章中硬说在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正在复辟，并且引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

你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是要把南斯拉夫驱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堵死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与合作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路线问题，关系到各国党争取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的方法和形式问题。

在要求把南斯拉夫排除于社会主义之外的时候，任何一个中国同志从来也没有试图提出任何稍微有分量的论据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你们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对南斯拉夫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客观分析表明，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连你们自己过去也不否认这一点。仅仅五六年前你们不仅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甚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进展表示自己的钦佩。例如1957年秋天《人民日报》在一篇论述中国和南斯拉夫友谊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两国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的

道路前进。”

这篇文章还写道：“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还可以援引其他一些类似的言论。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同志毫不怀疑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几年后的今天，客观分析表明，南斯拉夫仍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近年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实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提高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作用重大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在许多国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共处问题、裁军问题、消除殖民主义问题、德国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各国的立场是相同的，或者是相近似的。

为什么中国同志五年前并不怀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还夸奖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赞同它的对外政策，而现在却宣称在那里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会说，中国领导方面采取了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提供对事态的正确认识。当问题涉及一国人民的命运时，这种态度更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继续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国家，会严重地损害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因此，苏共中央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利用可能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它的影响。苏共的这一路线当时曾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赞同和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方针在1955—1957年曾经是正确的话，那么在目前，当南斯拉夫发生的积极过程已经完全显而易见的时候，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许多对内与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正确的立场的时候，当他们已经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并且实际上已经不再同巴尔干条约组织合作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这一方针呢？

苏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存在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我们也看到了南斯拉夫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针上有某种不一贯的地方，对此我们曾经多次坦率地告诉过南斯拉夫领导人，并且公开地指出过。

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在它所提供的文件草案中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一切绝不能成为把南斯拉夫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根据。

声明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使这种危险不致变成事实。

我们深信，我们的这种路线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同志根据声明中说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的段落作出结论说，似乎应该尽快地踢开南斯拉夫，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推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但是，这种政策不能联合各国人民，而是分离他们；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把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不到别人改正错误，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错误——这是一种进行政治迫害的方法，它同列宁主义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曾不惜努力，帮助迷失方向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回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批评这个或那个兄弟党，这些或那些党的领导人所犯的 error，目的不仅在于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而且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在各共产党的关系中，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利益，需要表现出更大的容忍，更大的分寸，更大的灵活性。在同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中，我们党正是遵循这一点的。

不能闭眼不见，最近在某些兄弟党内，对共产党人的危险现在并不比修正主义小的教条主义占了优势。苏共也反对这种新威胁。你们想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确定了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和抹杀它的有害实质，苏共驳斥你们的这种完全不合法的企图。

1957年宣言中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妨碍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用引经据典和死啃书本代替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使党脱离群众”。你们用自己的理解代替了这种列宁主义的关于教条主义的定义，仅仅把教条主义看成

是“照抄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这样解释教条主义是反对各共产党利用最成熟、久经考验的和成就最大的党的经验。这种解释是贬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同志们，你们所使用的“指挥棒”的说法，同全世界反动派所历来喜欢用的“莫斯科之手”的诽谤并无多大区别。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行动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那么，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接受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经验，把这说成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不分皂白把这些兄弟党自己的经验骂成是完全的机会主义，并且把外行地制订出来的纲领宣称为普遍真理而强加给它们，也就是表现出家长制、高傲和对兄弟党不尊重。这显然是违背列宁主义的。

如果是站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那么，就不能容许口头上承认兄弟党独立平等，实际上却干涉它们的内政，用对它们的领导进行没有根据的攻击，来代替对它们的工作和斗争条件进行仔细研究，代替无产阶级的支持与合作。

同志们，我们两党代表的会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了信件。你们6月14日的信件使会谈的这一准备阶段发生了新的转折。我们在向你们发出3月30日的信件时遵循着下述考虑：为了使会谈能顺利进行，应当要有可能保持最大的客观态度来对比苏共和中共在它们展开争论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信就是抱的这个目的。这封信阐述了我们对宣言和声明基本论点的理解，丝毫也没有超出它们的范围。

自然，希望你们走同样的途径，从正面阐述你们对争论的问题的观点，以避免扩大公开争论及对其他党的攻击。6月14日的信不是向准备会谈前进一步，而是向扩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争论和分歧前进一大步。

我们已经提到了苏共中央全会对这封信的评价。这里我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没有公布中国报刊的8篇文章和6月14日的信件的问题。这是善意的表现，是不愿意加深和加剧论战。如果公布你们的文章，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公开回答。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我们全体人民热烈赞同的纲领所遭到的没有根据的攻击保持沉默，我们的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是

不会理解的。我们不用说，公布这些没有根据地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在我国会引起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的急剧恶化，这一点我们是力图防止的。如果我们还在谈判以前就走上公布你们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答复的道路，就必然会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论战。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你们的材料和我们对这些材料的答复。

你们的信妄图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已经简要地叙述了中央对这条路线的实质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

一个党有什么权利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呢！你们的整个信证明，你们简直是要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其他党，因为你们处处都强调说，凡是不同意你们这25条的人，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向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讨好。这种建议只能认为是强加于人的东西，不能认为是别的。

在信中有一些关于和平、关于革命道路等等的详细的议论；有时也引用了正确的论点，转述了宣言和声明的提法和我们党的文件。但随后马上又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反对这些正确的论点。而每一个注意我们争论进程的人都知道，是你们在过去和现在都对这些论点提出异议。同时你们把你们反对的人从来没有主张过的观点强加给他们。

使用这样的论证方法能够认真地进行辩论吗？

苏共代表团呼吁你们对我们的谈判作出贡献，放弃上述的做法，弄清彼此真实的而不是臆造的观点。否则，任何谈判都会变成聋哑人的对话，花费许多时间，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你们来信的特点是毫无根据和不能容忍的粗暴语调。通常，敌人之间谈话才使用这样的语调。在你们的信中，给所有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按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你们竟然不体面地影射我们党发生了资产阶级的蜕化，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我们断然拒绝这种在共产党人的关系中完全不能容许的讨论问题的方法。这种手法不会有效，而且你们永远也损害不了苏共和苏联人民在几十年的伟大斗争和成就中所赢得的威信，只能破坏你们自己在各国共产党和进步舆论界心目中的威信。

在来信中提出了引起我党特别愤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国

的内部问题，涉及苏共制定的并在其纲领中规定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理论原理，涉及我们党的内部政治措施。

你们企图把争论扩大到这些问题上。自然，问题不在于一个党无权对其他兄弟党的纲领有意见并发表这些意见。苏共是国际主义的党，决不打算用民族主权的叫喊来阻止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的兄弟党的批评。我们两党承担了不扩大辩论、促进创造有助于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的义务。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正当需要集中力量的时候，你们却把一系列极重大问题的争论强加于人。

如何来理解这个步骤呢？这只能理解为企图在我们分歧的火堆上再加几捆柴。给人的印象是，你们需要的不是协议，而是意气之争，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在信中提出的新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新的。我们对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以及我们对待个人迷信的态度，在7年多以前，就曾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过十分明确的阐述。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各兄弟党的支持，包括你们签了字的宣言和声明的支持。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党的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即2年以前，在苏共纲领草案中就已公布了。纲领草案经过全党、全民的讨论。这个草案也是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所知道的。为什么中国同志在前一种情况下沉默了7年，在后一种情况下沉默了2年，而现在，恰恰在会谈的前夕，对我们党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发动了攻击。

例如，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所说的，你们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如果回忆一下中共领导人几年以前讲的话，那么对中共的这种立场该怎么解释呢？我指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一篇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材料，这些讲话、文章和材料都包含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对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支持的。

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认为，中国同志或者在几年以前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或者在自己的6月14日的信中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

你们为斯大林的错误、邪气甚至罪行辩护，是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高尚的任务，实质上是企图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缺少的特征。

不能不看到，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的声誉，只能破坏社会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

中共中央的来信硬说，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削弱党的战斗力。一切都说明，上述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苏联人民在近几年来之所以取得成就，主要是因为苏共清除了个人迷信的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与做法，解放了蕴藏在群众积极性中的巨大的创造力。

大家都公认，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把共产主义运动提到新的更高阶段，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来信中谈到的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情况，恰恰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个人迷信的思想中。领袖和群众的真正的联系必须建立在严格彻底地贯彻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群众，倾听舆论的意见，关心全力发挥人民的创造主动性的领导人，才有真正的威信。苏共在揭露个人迷信和克服它的消极后果时，一向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最卓越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这些组织者和理论家在自己的活动中体现群众的愿望，得到群众的拥护。

你们的信件中还不正确地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转变为全民国家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转变为全民党的问题。中共中央信件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懂得甚至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之间的差别。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过这种差别，他们严格区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和作为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这第二阶段是随着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成熟而逐步地从社会主义成长起来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存在着多种成分的经济，还保存着社会分成对抗性阶级的情况，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土壤，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以新的方式展开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方式破

坏旧的社会主义关系。

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存在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道路已被堵死，复辟的内部危险已不复存在，社会内部已没有对抗性阶级，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冲突。代替它们的是所有社会集团的友好合作，这些集团给自己提出的共同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

你们看不到这种本质的差别，断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企图实现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经常产生着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呢？是不是为此还需要来一次革命呢？

当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但是对苏联来说这早已成为过去的了。只有完全无视现实条件，才会在中共中央来信中不断影射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30年以前，在消灭了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之后，在苏联就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内部根源。

谁也不否认，苏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证明这一点，轻而易举。但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理解这些差别的性质。在苏联，阶级已不再具有这个词的旧的本来的含义了。大家知道，列宁曾认为可以简要地给阶级下这样一个定义：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些集团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这种阶级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有工人和合作化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别(已经不是根本的差别)正在消失，全民所有制和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共同劳动把这两个阶级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同这两个阶级手携手地一起劳动。

自然，社会在社会政治与思想上的一致已在苏联形成的条件下，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提法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外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所以当然也就还存在着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阶级斗争的战线。这一斗争也包括制止敌人的间谍在我们国内的活动。还必须同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受资产阶级腐蚀的分子进行斗争。还必须同寄生虫、懒汉、投

机倒把分子、流氓等进行斗争。这些分子虽然有害，但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这正是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期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同的地方。

中国同志在引证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名言时，把下面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存在。

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大家知道，列宁也是把社会主义称为不完全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没有任何矛盾，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指的是整个的共产主义形态，其中既包括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包括高级阶段——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

在上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中，紧接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这一段话，马克思对哥达纲领作了以下的指责：“纲领既没论到后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也没论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区别开的。显然，这样的国家制度只能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不是国家制度完全消亡的高级阶段。

按照你们的说法，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都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将是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你们就漠视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国家制度的思想。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这一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该书中，无产阶级专政被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正如列宁所解释的，这已经是“过渡形式的国家（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国家将消亡，因为没有剥削的阶级，因此不能镇压哪一个阶级。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有必要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还有必要对资本主义传统的体现者、染上旧习气

的人们采取强制手段。

这些职能(列宁那么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这些职能的必要性)也就是现在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职能。它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后者又随着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

中共中央的信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同上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消亡的辩证过程相对抗。根据这个公式，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胜利以前都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在这之后它就立刻消失了。但是，专政这一概念要求实行阶级统治。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能去统治谁呢？统治“资产阶级”吗？从这些分子的存在中绝对不能得出必须要有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结论，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能放弃国家的强制，不能放弃国家政权。

你们认为，下述结论——即从国家内部的发展任务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了——似乎造成了严重的危险，“促进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的传播”，认为这意味着用“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明显地暗示由此而来的社会制度变质的危险。

但是，苏共二十二大确认我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难道这削弱了同一切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害的分子的斗争吗？相反，这种确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保证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全体人民参与这一斗争。我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如此广泛的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依靠，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广大的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日常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意味着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民主变成真正的全民民主。这不是削弱国家政权，而是使它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更有效的手段。

苏共二十二大所做的理论性结论，是对苏维埃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30年代下半期，在消灭了所有剥削阶级之后，我们国家镇压敌对阶级的职能就消失了。在1936年的宪法中，取消了对选举权的一切限制，还取消了工人阶级原先在选举中享有的特权。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不是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是依靠全民了。

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提出了不可能有全民国家的公式，来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活生生的经验相对抗。试问根据何在？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表示过反对“全民国家”的口号。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是拉萨尔派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全民国家”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批评了认为全民国家可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于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丝毫没有谈到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民国家。这是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你们的下述论断恰好也是这样，你们断言，承认党是全民的党就给共产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威胁，你们企图把这种承认解释为“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解释为缩小党的作用。

这种论断粗暴地歪曲了苏共的立场。党变成全民的党，这是加强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苏共纲领中谈到，共产党作为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的意义在增长。党现在依靠着最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是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当作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的体现者。怎么能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威胁呢！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这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表示高兴，而不是悲伤。

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它的先进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由于它直接同最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相联系而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拥有革命的经验而决定的。

共产党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这既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也是党本身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随着社会主

义的胜利而在苏维埃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不反映在党的身上。早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根据入党人的社会地位所规定的入党条件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正如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说的，早已不符合“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已经改变了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意味着党的社会基础的扩大。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已经是真正全民的党。但是，就是现在，党也关心使党的队伍主要由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特别是工人来补充。

阶级差别的逐渐消失，是苏维埃社会在向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现实过程。这个过程也不能不在党的发展中得到反映，这使党更加强大。实际生活表明，苏共成了全民的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纪律更加严格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它能够解决建设新世界的最具雄心的任务。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利用这个讲台，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阐述了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解释了我们党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的立场。

不能闭眼不看这种情况，即中共领导人使自己同苏共和整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这些分歧涉及世界发展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争论，不断扩大分歧的范围。

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如何引起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了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由于他们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极严重的忧虑，因为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对我们党来说是最神圣的东西。破坏这种团结只会对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有利。

我们认为，不存在扩大我们之间分歧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任何导致分裂的客观因素。当然，由于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条件不同，由于它们的社会成分不同，它们的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会产生某些不同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讨论和比较不同的观点，制定一致的立场，看作是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的一种必要的方法。

但是，难道观点上的不同一定应该发展成为威胁我们的团结的原则分歧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的阶级利益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致使我们两国联合起来，这种生产关系不是使我们的人民分离，而是使他们团结起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我们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争取和平事业的共同利益使我们联合起来。

只有帝国主义的诽谤者才会认为，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样，社会主义体系内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有共同商定的文件，它们全面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确定了共同行动的方针。这就是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我们承担了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坚定不渝地遵守这些文件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你们党不止一次地说过，它忠实于这些文件。我们呼吁中共领导在实践中遵守这些文件。

苏共中央全会指示我党代表团坚定地执行兄弟共产党团结的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的基础上消除现存分歧的路线。

苏共中央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其他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中的兄弟友谊，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运动的团结，以利于争取我们的共同事业——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

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对全体进步人类负有最重大的责任，他们热烈期待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分歧将在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消除。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人民所负的这个重大的责任，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我党中央表示愿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争取克服分歧。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

们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苏共中央代表团将坚定不移地遵循着这种意愿来同我们的中国同志们谈判。

邓小平：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苏斯洛夫：同意。那么下星期一上午10点钟再继续。这样就算达成了协议。

宣布休会到7月8日上午10时。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23—3826页

№08108 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 [\[34\]](#) (1963年7月8日)

第二次会议

7月8日

邓小平：按照规定，为了我们工作，看来格里申不应该反驳吧？

格里申：今天是工作日。我不知道，同刘宁一一样。

康生：刘宁一不说话，也就是说，他同意。

邓小平：今天怎么办，看来，我发言？

苏斯洛夫：请。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的发言 [\[35\]](#)

邓小平：首先，我要表示，中共代表团受我党中央的委托到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而来的。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同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愿望相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正在那里煽风点火，希望我们的谈判达不到任何结果。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谈，能够像我那天在宴会上讲的那样，达到一

个好的或者比较好的结果，来回答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的挑拨，这将符合 [36] 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真诚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始终如一地为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不用讳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分歧的性质是深刻的、严重的。这些分歧，严重地损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削弱着我们共同对敌的斗争，威胁着我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

正因为这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消除我们的分歧，不加强我们的团结。但是，应该指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也不用讳言，对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认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就必然会歪曲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团结是能够加强的。

我们很注意地听了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在7月6日的发言。遗憾的是，在这个发言中，你们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解释宣言和声明。你们把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所阐述的观点，任意地加以歪曲和攻击。

你们的发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使用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硬把一大堆罪状加在我们身上，如像什么“不老实”、“无原则”、“诅咒”、“诬蔑”、“粗暴的歪曲”、“荒谬的指责”、“骇人听闻的诽谤”、“耸人听闻的杜撰”、“毫无根据的攻击”、使用“敌人间才使用的语调”、“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用“新路线代替现有的路线”、“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违背

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家长制”、“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阻挠各兄弟国家之间经济合作过程”、“阻碍革命事业”、“阻碍社会进步”、“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政治迫害”、“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把自己错误的纲领强加给其他兄弟党”、“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派别活动”、“分裂活动”、“建立少数党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的反对派分子”、“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中共“要的不是协议而是争吵，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等。

对于你们的这些指责和攻击的语言，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愿意指出一点，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双方在会谈中都要坦率。在你们的发言中，坦率地讲了你们的观点。这样并不坏。

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辩明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你们7月6日的发言，我们认为，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们今天不可能作全面的答复，只准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的评论。我们党在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意见以后，将考虑作出答复。

对于我们两党这次双边会谈中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两党中央已经交换过多次信件。我们双方都赞成，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需要逐点地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陈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作为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我党中央在这封复信中提到的问题，连同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件中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是这次两党会谈的讨论基础。

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从什么地

方讲起呢？我们愿意从这个问题，也就是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讲起。我们愿意对历史事实加以分析，来回答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可以说明，苏共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路线的错误，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今天的发言，是我党中央6月14日信件中所提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的一点补充。下面所谈到的问题，有不少内容是交换信件中没有公开讨论的。在这次两党会谈中，我们愿意本着坦率的态度，对苏共同志谈清楚。

现在，我讲讲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

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讲到，我们和你们的分歧，似乎是由于中共领导“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不正确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坦率地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追本溯源，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

过去我们在公开的场合，为了照顾你们的处境，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只是指出：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了1957年宣言的缘故。

现在看来，为了真正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不彻底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是不行的。

为了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必须弄清楚分歧的由来、分歧的性质，必须对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进行逐点的、充分的、详细的讨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

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回顾一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7年多的事实吧。

我们先谈从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一段时间的事实。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二十大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所谓“和平过渡”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两个问题。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同你们谈过，我们的观点你们是很清楚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再详细地、全面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论如下看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必须正确。

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事实说明，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共领导同志为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道路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在实质上针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7]

我们认为，苏共领导同志对斯大林的这样的批判，原则上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由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一个反苏、反共的高潮。帝国主义、铁托集团、各国反动派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给许多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在处理波兰事件中，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企图用压服的方法，甚至企图用动武的方法来压服波兰同志。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法，不仅是对待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态度。

紧接着发生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匈牙利事件同波兰事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苏共同志对解决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的波兰事件问题时采取压服，甚至企图动武。

而苏共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苏共领导曾经企图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你们知道，我们当时是反对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投降主义的态度。对这两个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讲。

苏共二十大的错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加拿大、美国、丹麦、荷兰、法国等等国家的共产党内，都出现了公开的、修正主义的反党派别。

同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也使一些过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党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

苏共二十大以后，从1956年起，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温和地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沉默了7年，这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还是在过渡的形式，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都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阐述过自己的立场。而且我们的这些看法你们也是知道的。 [38]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同米高扬同志的谈话，随后毛泽东同志同尤金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说斯大林“功过各半，是不对的”，“总是功大于过，要三七开，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毛泽东同志的简单的语言就是这样说的。

你们后来反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三七开，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价，要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

1956年10月 [39]，周恩来同志同波诺马廖夫同志(当时是参加我党八大的苏共代表团的成员)谈话的时候，在斯大林问题上也同样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周恩来同志在同波诺马廖夫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苏共同志的错误：一、“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二、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三、苏共领导同志“缺乏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讲了这么三条。

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尤金同志的时候，又谈到对

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他并且指出，对于斯大林这把刀子，你们根本不要它，把它丢掉，结果敌人就拿这把刀子来杀我们。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又接见尤金同志。他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1957年1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五次会谈中，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曾经指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同斯大林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面所犯的某些错误有关的，也是同苏共领导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所犯的错误的有关。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再次谈到我们对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点意见，就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同兄弟党商量。

此后，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以前同尤金同志的谈话，周恩来同志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都同样地提出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

还要谈到的是，在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会谈时，也曾经谈到斯大林的问题，并且批评苏共同志在波兰事件中犯了斯大林时代就有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由此可见，从1956年4月开始，我们就不断地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怎么能说我们沉默了7年呢？

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善意的，是诚恳的。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只在内部少数人谈话的时候进行的。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你们。我们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的用意是很明白的，是为了共同对敌，为了促使苏共领导人反省，不要走得太远。 [40]

在那个时候我们写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你们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我在过去的讲话中都赞成你们的“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斯大林的做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的，当时我们的讲话中，为了照顾到你们当时的处境，为了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措词是很慎重的。但是，我们在适当地表示了赞成你们的某些措施的同时，又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批评了你们的错误，只是没有指名就是了。这是很明显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赫鲁晓夫同志曾经对中国挂斯大林的像的问题多次指责我们。这这就是一个证明。怎么能说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呢？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向你们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你们很清楚，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前夕，在起草文件过程中，我们曾经批评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个人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丝毫没有含糊的地方。只是为了照顾到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为了照顾你们，我们才同意用宣言及其以后的声明所采用的那一段话的词句。

你们在7月6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不真诚”，“无原则”。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赞成两手，只赞成一手，只赞成非和平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提纲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最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讲的，也是同样的观点，没有丝毫的改变。

我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观点是什么，真正的立场是什么。

总之，无论在斯大林问题上，还是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我们都曾多次提出过意见，并没有沉默。但是，我们为了使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发表一个大家能够同意的比较好的宣言，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其中包括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

你们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不真诚”，“没有原则”，我们要问，究竟是谁不真诚，没有原则呢？1957年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订了1957年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我们本来希望，苏共同志同各国兄弟党一起，按照宣言的革命原则，努力发展世界的革命斗争，把我们的目标对准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同志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那个时候，你们对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不随风倒，恨极了；对我们不赞成你们的“和平过渡”，不赞成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恨极了。就在这个时候你们以为内部问题解决了，就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严重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

你们在这个时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还是让我们举一部分事实来说明问题。

1958年4月至 [41] 7月，苏共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问题，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看清楚了你们的意图。你们没有达到你们的目的。

接着，你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中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活动。

你们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

例如，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同志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

例如，1959年7月，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一个农业社的讲话。

1959年6月，你们单方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制造原子弹的协定。

接着，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第一次把中苏分歧公开在全世界面前。

同年11月，赫鲁晓夫同志对印度《新世纪》记者谈话，公开指责中国是“愚蠢的”、“可悲的”。

1959年9月的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同志大肆宣扬“三无世界”，就是“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把和平共处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鼓吹美苏合作决定人类命运，实际上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附带说一句，艾森豪威尔是不承认有什么“戴维营精神”的。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觉得有了一个什么“戴维营精神”，似乎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抓到了一根稻草。这样，你们就放肆地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的言论。

1959年9月30日，在我们建国10周年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959年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42\]](#) 的讲话，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

1959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说什么像托洛茨基那样“既不和，也不战”。

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要“对对表”，并且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又辱骂什么“破套鞋”。同时，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犯了“狭隘民族立场”、“狭隘民族利益”的错误。

所有这些讲话，我们，你们，我们的敌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苏共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和社会科学、苏共党史等方面，继续宣传和发展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讲话就不行了。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批判了某些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就在这3篇文章中，我们的斗争锋芒，仍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的错误。

接着，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本来不存在的所谓“戴维营精神”垮台了，证明苏共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1960年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北京会议上，苏共同志支持的总报告草案，又强调“三无世界”，不同意谴责艾森豪威尔，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散发了一个全面攻击中共的通知书，并且组织一批兄弟党代表团围攻我们。

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准则，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所引起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布加勒斯特会谈后，苏共同志采取了4个步骤把中苏之间的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方面单方面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1300多名，并且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使得这些协定和合同中规定的许多建设项目、技术设计、设备安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制造中苏边境纠纷，禁止我国在苏联发行《友好》周刊，无理要求我国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同意苏共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错误做法，苏共同志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提议，宣布短暂休息。)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不久，我们两党在1960年9月举行了两党会谈。在两党会谈以前，我们发出了给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两党会谈中，我们指出了你们在敌我关系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在敌我关系上摆错了位置。

上述有些事实，我们在那次会谈中已经谈到了。所以，有些细节，我今天就不谈了。

接着，在1960年 [43] 10月的26党起草委员会上，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

本来，我们期望，在起草委员会上，能够在各方面取得一致的协议，制定一个共同的文件，提交81国会议通过，开一个团结大会，最为有利。但是，结果还是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放到81国兄弟党会议上去讨论。

1960年 [44] 11月，举行了兄弟党会议。苏共同志在会前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攻击中共的信件；发动了一批兄弟党在会上对我们进行围攻。

在会上，我们坚决反对苏共同志的这种错误做法，批判了你们的错误，反对了你们在声明草案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为了使会议达成协议，我们又一次照顾了苏共同志的需要，作了一些妥协(还是关于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关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

当然，也应该说到，苏联同志在会上也作了一些妥协。所以，会议通过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莫斯科声明。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声明。同样的，我们本来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可是，事实的发展，又一次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莫斯科声明签字以后，苏共同志根本不把兄弟党的协议放在眼里。从签字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地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以及我们之间达成的各种协议，越来越严重地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展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同宣言和声明相违背的。在81国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一些错误论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

你们在前天的发言中说：“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践踏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这样做的，在我们看来，不是别人，正是苏共同志自己。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主要的事实吧！

1960年12月2日，就是在莫斯科声明签字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同志就在酒会上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同声明签字相隔只有24小时。相隔48小时也好哇。仅仅相隔24小时，就违反了声明中对南斯拉夫的估价和编辑委员会中的协议。

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都记得，当时，我们两党指定了一些同志，讨论南斯拉夫的问题。当时苏共方面参加的，有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中共方面参加的，有彭真同志、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刘宁一同志，还有别的同志。当时，双方肯定了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彭真同志插话：当时，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方面说，苏共在报刊上不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莫斯科声明是12月1日大概像今天这样的时间前后签字的。12月2日，大约过了24—25个小时，你们就否定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达成的协议。

我们不理解，是不是就在这24个小时中，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就改变了自己的错误了呢？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同志不顾我们再三劝告，采取一系列步骤恶化苏阿关系，这很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领导很快地恶化中苏关系一样。

1961年3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决议，提出发罗那军事基地的问题。

4月，苏联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

5月，苏联把由苏联军人掌握的舰艇撤离发罗那基地。

8月，华沙条约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出席。

9月，华沙条约国国防部长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

在这以前，苏联已经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所有这些步骤，来得这么急，这么猛，好像是1960年恶化中苏关系的翻版。

在苏联采取了这些恶化苏阿关系的步骤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劝告苏联同志不要做绝，要主动改善关系。9月30日，我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了我们的这种愿望。1961年10月6日，刘少奇同志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也表达了我们的这种愿望。周恩来同志在那个期间了也曾经几次同苏联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劝告苏联同志，表示了我们的希望。

但是，这些劝告苏联同志都听不进去。如果说，在斯大林问题上，和平过渡问题上，由于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苏共同志对我们恨极了；如果说，由于中国不同意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你们对我们恨极了，那么，同样的，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对他们也恨极了。

那时，我们的劝告，你们听不进去。苏共同志不但没有主动地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途径，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苏共二十二大把苏阿分歧公开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你们在苏共二十二大集中搞了些什么呢？事实表明，你们集中反对阿尔巴尼亚，公开指名攻击和污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

在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你们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你们很不高兴。你们实际上用各种方式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还搞了些什么呢？你们还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到苏共二十二大，已经8年了。死了8年，在苏共二十大又已经反得那么厉害，这回又大反一次，出于什么目的？是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的阴魂缠住你们呢？

我们认为，[\[45\]](#)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一个我们认为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和纲领；还进行了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反对斯大林这么三件大事。

(宣布休息到15点)

第三次会议 [\[46\]](#)

7月8日

邓小平：可以继续吗？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 [\[47\]](#)

邓小平同志：我们谈到了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我们觉得，你们实际上违反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顺便说一下，这在你们今年3月30日的信中，表达得也很清楚。

在你们的纲领中，你们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你们还宣扬离开阶级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

苏共二十二大后，1961年12月，苏联采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同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你们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你们的代表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和平运动对立起来，诬蔑民族解放运动为“死尸运动”。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阐明了我们的正确观点。会后，十几个兄弟党给我们写信围攻。我们知道，是有一个指挥棒在那里起作用的。

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间，印尼、越南和新西兰等兄弟党提出了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遭到了苏共的拒绝。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给我们安上了3个罪名。这3个罪名是：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行为”，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了自己的“特殊立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什么所谓“独特路线”。

1962年4月7日，中共中央写信答复苏共中央2月22日的信，提出了有关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的5点积极建议，主要内容是：和缓关系，停止公开攻击，兄弟党之间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交换意见，改善苏阿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建议，实际上又被你们拒绝。苏共中央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接着，1962年4—5月间，你们在我国新疆制造事件，进行颠覆活动。

1962年8月25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说，将同美国缔结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定。在我们看来，搞这样的协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你们同美国商量好了来束缚中国的。

1962年10月，在印度向中国边境大举进攻以后，苏联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大力进行经济输血，在政治上支持和鼓励尼赫鲁反华。

你们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赞扬。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说：“我认为印度同莫斯科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非常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我们(指美国)的利益的。”这是哈里曼在1962年12月9日说的。接着，12月18日哈里曼又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说：“美国希望看到苏联在支持印度的防御力量方面提供帮助。”

在中印关系的问题上，你们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你们忠心耿耿地同肯尼迪、尼赫鲁共同反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62年10月，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认为，你们犯了两个错误：你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接着，你们在美国核讹诈面前惊惶失措，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导弹运进古巴？我们有经验。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件事的性质，同你们想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性质很有点相像。保卫古巴并不需要导弹。那么，你们把导弹运进去，是对它帮助，还是害它？我们怀疑，你们运进导弹是一种企图控制古巴的行为。

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不同兄弟国家商量。你们天天讲核战争的危险，但是，你们却这样轻率地玩弄核武器。

你们解释说，你们这样搞，是为了换得美国的什么“保证”。而且，你们说，你们真的得到了什么“保证”。

事实怎么样呢？结果，在美国的威胁下，还不是不得不撤出了导弹？你们还千方百计地去说服古巴的同志，要他们接受损害主权的、干涉他们内政的“国际视察”。你们还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替美帝国主义搽粉，要他们相信肯尼迪的什么“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在1962年10月27日和28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说，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我对您所表现的分寸感以及对您目前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的理解，表示满意和感激”。

究竟美国给了什么保证没有呢？看看1963年1月11日腊斯克是怎么说的。腊斯克说：“不论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危机期间在什么程度上承担不侵犯古巴的义务，这种义务并未生效。”他又说：“根本不存在这种义务。”

1963年3月13日 [48]，腊斯克又说，美国“没有作出不进攻的无条件的保证”。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事件中，坚决捍卫古巴的主权，积极支持古巴的5项要求。我们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些人说，这是我们反苏。这真是很奇怪的论调。

紧接着加勒比海危机之后，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掀起了一

个新的反对中国、反对马列主义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5个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2篇讲话，《真理报》发表了2篇文章，我们都全文转载了。在这期间，有40多个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

你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举例说，像东德这样的党代表大会，甚至用跺脚、吹口哨、起哄这些令人……(该怎么样说呢?)难以相信的手段，无聊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参加德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在这里，就是伍修权同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德国人的文明吗？”

当然，问题不在这里。 [49] 问题在于，如果它是一个严肃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是理由在它那一边的党，它就不会采用这种手段，它完全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德国党自己干的事。但是，我们坦率地说，难道苏联同志没有分？在这几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完全排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另一方面，硬要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拉进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来，为铁托集团翻案。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起哄、吹口哨、跺脚，刚刚是在我党代表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正是按照原文一字不改地读莫斯科声明的时候发生的。

上面说的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制造分裂，而且是越来越凶，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有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气势是非把人压倒不可。

我想指出，这种方法，你们是用得很习惯了。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是用这种方法。在上次(1960年)两党会谈时，我就说过，幸好是彭真同志去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他有80多公斤，顶住了；我只有50多公斤，要是我，我就垮了。以后，在德国，幸好是伍修权同志参加，他也有70多公斤，他也顶住了。坦率地说，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用，不能证明自己正确，不能证明有道理。相反的，对一个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说，是一种亵渎。

波诺马廖夫：而格里申同志重70公斤。毕竟这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开始的。这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开端和原因。 [50]

邓小平：我懂得你的意思。 [51]

彭真：请等一下。 [52] 有你们讲话的时间，你们有多少，讲多少，我们都听。

邓小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很严重。全世界几十个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党进行了围攻。帝国主义反动派配合了这种围攻。

所以，在你们对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放肆的攻击之后，我们不得不发表7篇文章进行答辩。顺便说一说，我们发表了8篇文章，7篇是对某些兄弟党对我们攻击的答复，另一篇是《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是对印度丹吉集团说的。

至于印度的丹吉集团，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们看它不像共产党。

在这期间，我们发表了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文章。

以后是中苏两党交换信件：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3月9日中共中央的复信；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我们都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没有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在中苏两党会谈前，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接连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要求召回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等5人；同一天，也就是6月27日，苏联公民砸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新闻图片橱窗；6月29日苏共发表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尽管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中共中央在7月1日的声明中，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决定如期派出自己的代表，举行中苏两

党会谈。

今年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再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我们7月5日发表声明，还是照样派代表团来，照样责成我们代表团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来进行会谈。

苏共领导最近的声明、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重复地讲，中共破坏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共中央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是这样说的：“这件事(指停止公开论战这件事)，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现在，两党会谈刚开始举行，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说得上破坏协议呢！？

或许苏共同志在想，[\[53\]](#) 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比如说，想攻击哪个兄弟党，就放肆地不顾后果地攻击，并且组织兄弟党一块儿围攻；一旦自己需要停止时，就可以不经过平等商量，就下命令停止讨论。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问题上，还是采取平等的态度比较好。

有些人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公开争论的号召。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刚提出停止公开争论，接着就马上发出一连串的攻击。这难道是言行一致吗？

坦率地说，我们的7篇文章只是答复某些攻击我们的兄弟党的。我们对苏共领导同志和苏共报刊发表的攻击我们的文章，还没有作直接的答复。

苏共同志说，我们6月14日的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我们的这封复信，只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且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意见是提出来讨论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苏共同志却说是诽谤和攻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本身并不是作为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倒反而不是什么论战、诽谤、攻击。我们感觉，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总之，近一个月来，苏共领导同志采取这么一系列做法，应当说，

实际上是打着停止公开争论的幌子，来加剧公开争论。

在这段时间，苏共领导 [54] 采取武断的、蛮不讲理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提出的积极建议；并且进一步把两党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以及你们的报纸这些天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和消息，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有意地毒化气氛，你们正在加紧进行公开破裂中苏关系的舆论准备。我是有这么一个怀疑的。

我们不能不郑重地指出，你们正在把中苏关系引导到破裂的边缘。我们还要郑重地指出，在你们大肆组织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你们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同1960年声明相违背的。

我们在1960年9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曾经指出苏共同志实际上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和美化艾森豪威尔的一系列言论。

近2年来，苏共同志对以肯尼迪为首的美国政府，又发表了许多美化帝国主义的言论。例如：你们把肯尼迪比作罗斯福。

1962年7月13日，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想，美国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野心。”1963年6月15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评论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的时候，又为肯尼迪搽粉，说：“他的这篇演说包含着一系列积极成分，证明他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顺便说一说，我们要问，肯尼迪最近在西柏林的演说，是不是也是“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呢？

正是基于这种把敌人当作朋友的错误的立场，苏共同志在许多场合，极力鼓吹苏美合作决定人类命运的错误观点。这明显地表现在：1961年10月25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谈到苏美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两个大国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来保卫和平事业，那么，谁还敢破坏和平，谁还能破坏和平？谁都不敢和不能。世界上没有这种力量。”1962年12月13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苏美两国之间有信任和合作，就会有和平；在苏联政府首脑H.C.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违反1960年声明的。

声明说：“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宣言和声明，都没有说人类的命运要由美苏合作来决定。

关于苏共对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专门来讨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指出，尽管在某些场合，在某些时候，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也说过一些正确的话，但是，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不是那样支持的，甚至是反对的。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我们需要专门讨论。苏斯洛夫同志在前天的讲话中，为南斯拉夫作了一大篇的辩解。但是，我们还是相信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的评价。道理很简单：有那么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花了50几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为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的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里边所说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声明中所说的，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面，我们对7年来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作了一个回顾。我们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承认，事实是最雄辩的。

从7年来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究竟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谁维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谁维护团结？谁在搞分裂？谁遵守宣言和声明中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谁真正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上面所说的7年来的事实中得到答复。

我们讲这么一篇东西，当然有些语言“不好听”，但是我们讲的是事实。

你们讲的语言也不好听。这不要紧，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弄清楚，大家好好地、冷静地考虑一下，分歧究竟从何而来，从而找到消除分歧的途径，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今天讲的大量事实，在我们的公开文章中并没有说过。但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两党会谈的场合，应该坦率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如果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有益的。因此，我们想提出几点意见来，请苏共同志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考虑一下，苏共同志是不是把敌我关系的位置摆错了？

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不明白。 [55]

邓小平：这是个老问题。1960年两党会谈时，我们就提出过。我们是这样看的：你们并不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过去，你们捧艾森豪威尔，现在你们又捧肯尼迪。你们把肯尼迪、尼赫鲁、罗马教皇、铁托当作朋友，把兄弟的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看作是仇敌。

刚才说的1960年中苏两党会谈时，我们就着重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你们说，不用担心。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在对待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有时候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有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实际上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害怕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反对一切战争，这是犯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你们坚持反宣言和声明的独特立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对不接受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以至军事压力，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你们在兄弟党内还进行一些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总起来说，我们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领导所推行的路线，是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路线，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路线。

我们恳切地希望，苏共同志要看到7年以来，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你们把光荣的、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引上多么危险的道路。

我们愿意郑重指出，苏共领导同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少兄弟党在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印度共产党的教训。此外，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这些教训，以后有时间再专门来讨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兄弟党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地侵蚀党和国家的机体，损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由于苏共领导同志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你们的错误的路线，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声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人民中的威信，都遭到损害。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苏共领导同志喝倒彩。你们的错误，使他们越来越觉得通过“和平演变”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有了希望。尽管这是一种幻想，但是你们的错误鼓舞了他们。

我们诚恳地希望，苏共领导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对列宁缔造的党、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的期望。

我们代表团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是以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为指导方针的。

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斯洛夫：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

翻译：让我翻译完！我应该翻译完。

弗兰佐夫：翻译调节整个会议。

邓小平：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藏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 [56]

中共中央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尽管我们之间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总是尊重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

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是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切的忧虑和不安。我们认为，对苏共同志的错误，这样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

团结对敌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为了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中苏两党两国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包括古巴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起来。

我们希望，我们两党都能够以我们两党、两国的团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利益为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遵循宣言和声明，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中苏两党会谈，使得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5个小时了，我这一篇讲话就完了。怎么办？今天继续谈，还是明天再谈？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休息到后天上午10点，我们需要了解你们的发言。

邓小平：我们同意。后天是你们讲，还是我们讲？

苏斯洛夫：按照顺序，该我们发言。

安德罗波夫：还是按照你们一次，我们一次的原则。

邓小平：这是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明。 [57]

№13011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63年7月10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Ю.泽登巴尔同志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请求其就蒙古人民共和国打算加入1955年5月14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的华沙条约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们希望就此重要问题与你们进行商议。从自己这方面来说，苏共中央认为对Ю.泽登巴尔同志的建议可以持肯定的态度。

众所周知，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于1955年。在条约中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和平。希望成为华沙条约的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协助在目前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维护和平的意向，在我们看来，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组织的成员国的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将有助于继续加强这个组织在世界舆论界眼中的威望。

尽管身处亚洲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非欧洲国家加入华沙条约，大概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备忘录，以明确一下目前仅仅涉及欧洲国家的条约第4章，但这与条约总则并不矛盾。例如，在该条约的第9章里指出：条约为联合其他国家开辟了可能，这些国家，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将表示为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准备通过参加本条约的途

径，促进热爱和平国家力量的联合。这条规定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条约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况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定期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重要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里，蒙古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多地发展了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就在不久以前，它已经成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这个组织最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

苏共中央所遵循的理由就是如此，同时认为，对Ю.泽登巴尔同志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建议持肯定态度是适宜的。

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事情，可以通过召开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途径得以实现。这次会议(实际上这可能要求一次会议)可以于今年的7月在莫斯科举行，利用兄弟党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经互会成员国会议的机会。由于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工作，那么，也就不存在关于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寄送这封信的问题。苏共中央请你们就触及到的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赫鲁晓夫

1963年7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5—3866页

№08109 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

第四次会议

7月10日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认真听取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我们暂时保留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发言中所提诸多问题上去的权利，我们认为，鉴于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必须讲讲自己的意见。

我们深为遗憾地指出，中共代表团前来谈判，看来绝不是想表达友好意愿，寻找相互理解和克服分歧道路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看来你们完全是另一种目的——加深分歧，在达成相互谅解的道路上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障碍。这一发言开始所引用的关于中共领导希望同苏共统一意见和团结的溢美之词与其发言的内容和我党莫名其妙的指责大相径庭。这一发言是以对我党的指责而告结束的。

邓小平同志发言的意图何在？难道这是同志式辩论的发言吗？不，其目的是败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名誉。不引用任何较为严肃的论据和证据，您往我们头上堆了一大堆最卑劣的诬蔑之词，诸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反共颠覆活动”之类，直至把苏共的路线说成是“反革命的路线”。

我党代表团坚决否定这些指控和诬蔑。苏共领导博得了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无限支持。我们的党不允许任何人诬蔑自己的领导。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就这个问题明确地发表了意见，表达了全体苏联共产党员和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在历史上有不少当时享有威望的活动家，他们企图败坏列宁党的声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光荣，而列宁的党仍在大踏步地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攻击我们的党不会有别的结果，只能使干这种不地道事的人身败名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们又采取1960年那种已遭到各国共产党谴责的人身攻击方法攻击

赫鲁晓夫同志。这种方法曾引起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的愤怒，今天也不会有其他结果。

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人。他表现的是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党的意志，他无限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保卫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着非凡的斗争，因而他在我党、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赫鲁晓夫同志以其忘我的劳动和斗争，以其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灵活的革命策略给帝国主义分子以准确的打击，他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他给广大群众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再次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近来贯穿于你们的发言和行动中的那种把苏共领导同全党对立起来的思想，对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来说是何等的侮辱。

你们给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公民们建议的是什么纲领，企图让他们同列宁的苏共中央对立吗？放弃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和平共处斗争的纲领吗？但是，请问，你们找到了一个苏联人支持这种纲领吗？

或是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新回到个人迷信和他的措施上去的纲领？莫非你们希望我们的人们集合在反对人道主义，反对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之下？——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所批评的正是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获得了真正意义的口号。

不，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党，不了解苏联的人们和苏联的实际，看来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否则你们就该明白了，我们不公布你们的材料绝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万众一心地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支持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我们之所以克制，唯一的原因是不希望加剧论战，是希望巩固与中共的团结。

从过去交换信件中，我们理解我们两党达成了停止论战的协议。前天我们才惊异地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们恪守自己停止论战的承诺，不回敬对我们的诬蔑，不加强反对你们，我们这样做似乎又“破坏了”对等。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完全避而不谈我党代表团在第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共同深入讨论的问题。你们认为无须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回答我们的论据——实质上是回答对你们在总路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难道你们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你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注意？假如你们坐到谈判桌旁来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找解决分歧的途径，那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在注意的中心。

关于您发言的格调，我不能不谈谈看法。我不能步邓小平的后尘，堆砌诬蔑、谩骂之语。我谈事情的本质。我们从来不怪罪您的直率，即使是采取最尖锐的形式。但是这种直率我们在您的发言中见到了吗？绝对没有。您的格调是有意激怒对方，荒谬地指责对方，从而挑逗对方也采用您这种信口雌黄的人所采用的格调。

您的发言给达成必要的协议和消除现有的分歧增添了困难。

尽管如此，我党代表团认为需要重新强调，我党代表团不走你们的道路——挑起分歧和加深分歧之路。我们一如既往，认为谈判的主要目的不是加剧斗争，而是在争论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使我们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在唯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纲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按照这一目的，我们再次试图把我们的辩论纳入建设性轨道。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今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自然，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我不得不回答他的某些指责。我们不想造成我们离开了您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印象。

但重点不在这里。为了使整个谈判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觉得必须公开地和直接地对你们讲，我们怎样理解你们的立场。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许多我们不理解或不完全清楚的问题，现在开始清楚了。

一、关于分歧的原因和中共领导人对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所应负的责任

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共和苏共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他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困难的责任推到苏共身上。我们应该坚决地宣布，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这一说法同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制造分歧的是我们的党，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这种主动性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

仅把现有的分歧看成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事也是不真实的。实际上，现有分歧是以中国领导人为一方和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之间的分歧。

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越来越远。这是任何一位把3月30日苏共中央的信和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作一比较的人都能看清楚的。中共领导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企图把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把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指责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产生分歧的真正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分歧由来时说，似乎分歧是由苏共二十大关于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结论引起的。您声明，似乎你们当时没有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于一系列原则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所作的结论和评价。但我们无论是从当时出席这次大会并看了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那里，还是大会之后从其他中国领导人那里，都没有听到对于二十大决议的任何反对意见。

中共代表在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上签了字，该文件都谈到了我党二十大的国际意义。

在上述宣言和声明中写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且对于开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和促使它进一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我们提醒你们，对二十大决议的支持，不仅表现在你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上签字，而且表现在中共本身的决议里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里。

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讲过，苏共领导在克服了个人迷信的后果后，“揭开了盖子”，他指出了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决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

苏共二十大半年之后，195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你们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讲道：“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在1956年中共代表大会上，在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苏共二十大决议也得到了详细的肯定的评价：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现在中共领导们，正像邓小平同志发言那样，则是以讽刺的口吻来评述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决议了，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而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则是这样讲的：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做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著名文章中，中国同志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

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中国的同志们当时就是这样评述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不能十分肯定地说，似乎你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妥协的——谁也未胁迫你们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直率真诚。这是很好的号召。但我们现在想问一下，您在评价苏共二十大时的哪些讲话是直率真诚的呢？是7年前您在你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二十大国际意义时所说的话呢，还是您现在在毫无根据地恶毒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列宁方针时所说的话呢？

邓小平同志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当时是为了苏共的利益，考虑它的处境违心地赞成二十大决议才进行妥协的。这种解释不能不遭到稍微知道一些实际情况的人的讥笑。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同志说话的用意是什么，但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在斯大林死后，我们党由于贯彻二十大决议，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了。苏联经济不断地迅猛发展。苏联人民坚定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

所有想使我党脱离二十大道路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党集团受到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谴责便是有力的证明。苏共中央最近的全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在全国进行的宣传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党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表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赞成和支持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路线和实践活动。

如果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最近几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这首先是中共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造成的，看来中共领导人把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每一个公正的人都会对您说，您自己在评价苏共二十大上态度180度的大转弯所作的解释是虚伪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诸如战争与和平、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等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能也不应该犹豫和摇摆不定。看来，关于以下两点必须承认其中之一：或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同苏共中央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没有分歧，或是中国领导人不真诚，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假如你们当

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你们至少可以不发表类似的意见嘛。

至于我们，是在1959年底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露出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同志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众所周知，你们第一次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方针是1960年4月：当时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你们出版了《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直接修正了1957年宣言关于当今时代特点、防止战争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把自己对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正确的方针强加给各兄弟党。

1960年6月，在北京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在非党群众面前陈述自己错误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论战，开始反对集体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一系列原则。

为什么你们单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呢？现在还难于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你们最近的文章，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发言说明了你们这样做的原因。甚至通过你们个人的声明也能看出，你们所遵循的原则绝不是努力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事情在于另外的方面：你们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真正原因，正如你们自己承认的，是由于不满意苏联不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许多错误行动。

在《分歧从何而来》一文中，中国同志直接把自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开始公开论战，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支持中国在印中冲突中的立场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你们甚至说出了日期——1959年9月9日。众所周知，这一天塔斯社公布了阐述苏联政府对印中冲突立场的声明。

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正立场所激怒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漫长争斗。

中国领导人还把自己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同1959年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与苏美之间冷战的缓和(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期间)联系起来。你们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特别的路线，你们把不

惜一切代价破坏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关系紧张作为自己的任务。

最后，不能不看到中共中央开展反对苏共运动，同因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导致当时中国国内遭受经济困难之间存在的联系。中共中央在其党内和国家里如此起劲地批评苏共，是不是想把造成国内困难的责任推到他人头上？

中共领导人由于对根本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追逐自己同共产党统一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目的，因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党内反对个人迷信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千方百计庇护斯大林。

我们想直接问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你们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拉回来重新讨论它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们居心何在呢？难道你们想让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回到这种状况：一个人像神一样居于人民之上，并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解决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毫无希望的企图，它表明你们完全不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

难道为个人迷信牺牲了成千上万无辜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共产党员的生命的苏联人民支持这一要求？难道通过自己的经验知道了个人迷信的所有后果——歪曲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政治和经济上的恣意妄为的人民支持这一要求？我们在1937年、战争之初和战后年代，为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粗暴错误和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你们现在故意说“所谓的”个人迷信，假装不知道斯大林个人迷信给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对你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刻的痛苦和不安。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碰到公开为个人迷信唱赞歌。应该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的鼎盛时期，斯大林本人在谈话中也不得不回避这一小资产阶级的理论。

你们的那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批评的，似乎苏共没有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作用，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它的后果。这些问题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材料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广泛的论述。

你们那种认识也是很险恶的，似乎苏共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理解成否定工人阶级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望。包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我党不止一次强调，它珍重和巩固领导人的威望，在破除个人迷信时，党高度赞扬那些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并把自己的精力献给共产主义斗争事业的活动家。

邓小平同志，除了众多的谬误和歪曲，出人意料地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实践和事实是检查真理的最好标准。

然而，正是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着，贯彻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引起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从我们党坚决转向恢复列宁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之时起，在10年时间里，苏联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振兴文化和科学、提高人民福利和巩固国防能力方面取得了多么光辉的业绩。在兄弟党彻底贯彻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您强调指出，似乎由于贯彻二十大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其中您特别强调，在许多兄弟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但是，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是由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摆脱了个人迷信的后果，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他们才能够反击修正主义并从思想上粉碎它。

你们心怀鬼胎，企图把二十大决议和著名的波兰事件以及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联系在一起。你们清楚地知道，苏共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样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同这些党对1956年秋季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同志在1960年会议上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做了详尽的回答。

我们不想重提这些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你们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似乎是二十大决议导致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正如兄弟党的材料里说的，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系的原匈牙利领导

人的错误，由于斯大林的过错，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关系不平等现象。消灭了这些不平等现象和完全恢复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二十大，怎么能是匈牙利人民不满的原因呢？

你们现在想捞取资本，企图利用这些事件证明，似乎苏联犯了错误，而你们的干涉未必挽救了危局。

这是对苏共奇怪而荒诞的指控，这是来自中国领导人方面奇怪的主张。难道不是我们国家为了保卫兄弟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牺牲了自己几千名儿女的生命，难道不是我国在友好的匈牙利人民危险的时候前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你们现在又重提往事，又翻匈牙利和波兰的旧案？这说明你们不仅在理论问题上，而且在最重要的实际政策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立场。

这就是我们对两党之间分歧产生的原因和中共领导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所应负责任问题的意见。

二、关于我们分歧的中心问题

我在一开始已经讲过，您在发言中回避了我们两党之间论战的核心问题。不过邓小平的发言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一发言帮助我们完全弄清了中共领导人的路线，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根据中共领导人对个别问题的立场来认识这条路线的。

我们建议集中精力讨论的正是这一路线。

如果不反对，可以建议休息20来分钟。

(休息)

我们认为，争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那一长串所谓“事实”意义不大。如果分析一下，那算什么事实呢？它们多数是被肆意解释的诸多事件的日期。我们将向您补充说明这些事件以及它们真实的内容。我们认为现在最好是谈原则问题，谈方针、观点、政治路线。

既然我们对于你们的路线现在有了较为全面的概念，那我们的会议现在就面临着另一个首要任务——进行分析，看这一路线在多大程度上

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想以此把辩论引上讨论原则问题和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的道路，从而使我们的论战转入建设性的轨道。

在分析你们的路线时，我们不想采用主观评价和“扣帽子”的方法，我们将用唯一可靠的观点——以其是否符合生活、实践、事实、马列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观点来审视它。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们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唯一的最高裁判。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才表明，事情不在于在个别问题上哪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事情在于要开展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行动。这从他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便可看出来。——苏共二十大，按照写进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所有兄弟党一致的意见，这是一次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代表大会。这从他对待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态度便可看出来——这种态度，正是企图把共产主义拉向后退，拉回它走过的历史阶段。

最后，这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这里所表示的蔑视态度，我想说是敌视态度——蔑视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而生存和它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新途径的探索，便可看出。

从邓小平同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角度看，又提出了我们以前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

说实在的，在谈判开始前几天，从今年6月14日中共的信里我们就明了事情的趋向。在这封信里，你们提出了对当今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所谓“建议”。前天邓小平同志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建议遭到我党的激烈批评。

是的，我们是可以解释的。第一，我们认为信的内容，信里对我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发难，对他们政策的有意歪曲是诬蔑。第二，难道还不清楚，中国同志提出总路线的问题，是想以此一笔勾掉载明了集体制定的当今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莫斯科宣言和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之后，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更清楚了。确实，不能否定苏共二十大，同时就得承认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固定下来的总路线。

是的，按照普通逻辑，你们，同志们，是不能否定的。谁说了“一”，就应该说“二”。你们向二十大挥拳，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进攻。

你们号召我们要直率坦诚。那就请允许我直接地明确地对你们讲，现在已十分清楚，你们在最近活动中所遵循的思想和理论，是完全同莫斯科会议文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这从你们对一些根本问题——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问题、当代解放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解释中便可清楚地看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没有阐明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所以必须哪怕是简要地指出，从你们打印的和口头讲话里得出了哪些结论。

我从基本矛盾问题讲起。

难道可以同意中共领导的论断吗？似乎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我顺便指出，这个原则，看来是其所建议的“总路线”的主要原则)？

我们说过，现在再次重复，这种对当今时代主要矛盾的评价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这是对唯一正确的观点——阶级观点的背离，是以民族主义的地理的和任何其他，总之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取代阶级观点。正在斗争的和已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为一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矛盾再尖锐、再重要，毕竟不是这一矛盾决定着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不是这一矛盾构成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错误地估计时代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对两支伟大的革命力量——今天不仅由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而且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其代表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当代革命的、解放的反帝运动中所占地位的错误估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两支力量在今天发挥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它们的斗争构成了世界解放过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丝毫不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能力和前景，与此同时，把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角色赋予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完

全符合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把所有的反帝的解放运动引上彻底的反帝斗争的轨道并把它进行到底。只有在这种领导条件下，这一运动最终才能获得社会主义性质，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这里引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当今时代的中心等原则。这些原则是莫斯科声明中固定下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

中国同志有什么地方与此相违背呢？从对时代特点、它的基本矛盾、社会力量分野的错误估计出发，你们把民族解放斗争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如果不信口开河，而是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等于强调，当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国际工人阶级。

你们提出了这种观点，还敢指责我们背离了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

我们很难相信，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这些方针仅仅是由于理论迷惑。

我们想分析一下中共领导关于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

对中共领导最近3年多以来讲话的分析表明，中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疑，在开始的时候，你们很少注意以抽象议论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好处来掩盖自己的观点，表达观点较为赤裸。后来明显地，你们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动摇，开始较多地谈你们也争取和平，承认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但你们的观点这些年实质上很少变化。前天邓小平同志证实了这一点，他宣布，中共否定二十大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和平共处问题的结论，似乎这些结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我们清楚，你们不承认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你们想要证据，我们可以摘录你们的发言和文件以证明我们的结论。

但否定当代条件下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不相信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能力，意味着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能力，相反夸大帝国主义的能力。

但是，非常奇怪，中国同志似乎与其他共产党在评价现在力量对比方面没有分歧。他们著文和讲话，宣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了帝国主义，宣传人民反战运动的巨大规模，等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分歧的本质何在呢？问题在于，当和平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时，在世界舞台上执行什么政策。

这就是中国同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所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力量对比于我有利的时候，列宁的方针在于，首先依靠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其他优势，把这些优势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工具，作为遏制侵略势力的强大因素。

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怎样的呢？你们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认为国际范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同时你们又强调战争一如既往不可避免，那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首创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排除在外。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把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同你们关于“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的原则”这一论断联系起来。

你们在自己6月14日的信里愤怒地指出了那种认为中国力图“发动战争”，想“通过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的“荒谬说法”，宣布这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诬蔑之词”。

当然，你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热核武器时代，这种指责比任何一种指责都更能破坏一个政党的威信，败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应考虑到，同志们，是你们自己不止一次地给人们制造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想让更多的人相信它。

也拿你们对待热核战争前景的态度为例。现在全世界都心怀忧虑地知道了你们《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胜利的人

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止一次地对你们讲，类似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把这种观点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

借助世界战争在其他国家实现革命，从原则上考虑，这条路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建立在“革命输出”这一反列宁的思想基础之上。此外，这条路完全没有考虑可能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现实后果问题。

试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考虑过没有，导弹核战争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废墟？

这绝不是旧的过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废墟。这是我们地球上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城市和农村留下的废墟。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世界主要的文明和文化中心将从地球上消失，甚至许多国家和民族也将整个从地球上消失，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将处于致命的辐射作用之下，核辐射不会怜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国家的领土。

国际主义者能否轻视这一问题？

而你们自己是如何描述热核战争后果的呢？请你们像实事求是的政治家那样，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想听一听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不负责任和轻视的态度使我们很吃惊。

某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声明说明了你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所说的话：

“要设想一下，爆发世界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毛泽东同志还说，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共领导准备牺牲3亿中国人。

也许，你们关于牺牲3亿中国人的论断是危言耸听？你们指望热核战争仅仅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即使不谈这一观点的道德方面，它也是从不现实的前提出发的。导弹核战争不分前线 and 后方，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陆和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威胁，对此不应该轻视和不予理睬。

应该冷静地估计热核战争的后果。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这种战争后果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绝对应该。这能否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麻痹”人民呢？相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将能激励人民的革命意志。人们对头上的危险知道得越清楚，他们就越积极地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计划，而且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正是害怕事情出现这样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才努力把热核战争描述成一种虽说是灾难但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说什么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还可接受的事情一样。至少这种情况是可怕的：中共领导开始客观上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欺骗本国人民，不让他们知道也尽量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知道真实情况。

具体而言，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是努力巩固和平共处，还是走激化国际紧张程度即有意识地走战争冒险的道路？是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还是把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派别的策略——“在战争边缘上保持平衡”作为武器？

在这方面，你们是与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

的确，中共领导在口头上支持两种社会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则，甚至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参加过著名的万隆原则的制定。但是，从你们对和平共处所作的解释，尤其是你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你们实际上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实现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性。你们仅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策略口号，而实际上贯彻的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剧“冷战”的路线。难道你们“针锋相对”的口号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种口号能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最冒险的帝国主义阶层所奉行的政策——“实力政策”、“战争边缘”平衡政策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意味着我们受人挑拨，走向军事冲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军事冲突对军事冲突。

自然，这种政策正中五角大楼将军们的下怀，但它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它分散社会主义国家的精力，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任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我们认为，国际局势经常紧张不利于中国人民，不利于他们集中精力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和提高生活水平。

自然，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会以武力对抗帝国主义的武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把武力政策作为一种原则，以此推行这一政策，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进行冒险主义的和侵略性的比赛。

而你们明确地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接受这种挑战。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试图削弱“冷战”，改善自己同美国的关系，加强自己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引起了中共领导们的愤怒。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你们都不赞成。你们指责我们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批评我们同美国就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和改善贸易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为什么偏偏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总是引起中国同志强烈的否定的反应？难道你们真的对这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感兴趣？

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共处所采取的许多实际步骤，正如你们理解的，追求的是中国的特别利益。你们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问题的立场，你们对中立政策的评价，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政策，尤其是你们在加勒比海地区危险时期的立场证明了这一点。

对后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一下特别的分析。我认为，你们哪一篇文章、哪一篇讲话都不如中共领导在这两次事件中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更能揭示你们的真正立场。

首先看中印边界冲突。

我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无论中国同志怎样理解，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尽快停止这种冲突。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印中之间的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们所谓似乎我们作为盟友没有支持你们的说法是做作的。你们不能不知道，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谴责印

度的反动集团，谴责他们企图煽动中印冲突，想利用这一冲突使印度脱离中立的道路，同时取缔国内的左派力量。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给印度政府以可能的影响，希望不要扩大冲突，提醒它通过和平的道路调解争端。苏联政府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旨在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设性建议。

你们，同志们，没有考虑在印度还有右派势力，它专门等待时机，企图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中立道路，把印度和西方联系起来。你们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靠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还有，你们没有考虑你们将把印度的共产党员们置于什么境地。

你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行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协商制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关于支持争取独立的所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关于中共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立场。

无须指出，这是一场可能导致世界热核战争的最尖锐的国际危机。当时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分子表现出了冒世界战争风险以镇压革命古巴的决心。

1962年后半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只有采取积极的坚决的措施才能使侵略分子头脑清醒，遏制住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机器。这种措施就是在古巴部署苏联的战略导弹，它清楚地表明，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入侵不能逃脱惩罚，入侵意味着热核战争。这一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入侵被制止了。这里有什么“冒险错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指出：“去年中期古巴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采取相应措施警告入侵，我们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之上的。”

尔后的谈判——以撤出导弹武器作为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交换条件——得以粉碎了美国那些准备铤而走险、不顾核战争危险的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谈判以和平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胜利，战争和反动力量的失败而告结束。革命的古巴坚定地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它的社会主义成果得以保全。

在苏古联合声明中写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卫古巴革命中的坚定立场，苏联和古巴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所表现出的沉着和对形势的冷静思考，还有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古巴的支持防止了热核战

争。”

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呢？其立场在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坚定地宣布自己支持统一的方针，表现出我们队伍的统一，抛弃所有分歧，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地采取措施帮助古巴，同时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发生。

而中共领导采取了什么立场呢？实际上你们没有集中全部火力对准帝国主义，而是对准了他人——对准了苏共和苏联。中共领导企图利用尖锐的国际紧张形势得出有利于自己同苏共进行宗派斗争的结论，从而加强自己对苏共和苏联的进攻。为此你们在古巴危机时期拼命指责我们：说我们牺牲古巴人民的利益搞“慕尼黑阴谋”，说我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冒险主义”，说我们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了“投降主义”，等等。你们竭尽全力破坏苏联在国际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在此之前曾证明帝国主义可能随时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了旁敲侧击的立场，没有采取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战斗盟友的立场。我们没有听到你们任何关于中国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已制定出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建议在美国侵略者进攻情况下中国部队起什么作用等方面的声明，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政府关于决心不惜一切力量支持古巴人民，决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保卫古巴成果，履行自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所承担的盟友义务的任何公开声明。

应该说，你们不仅批评苏联的立场，而且明显地企图加剧本来就已很紧张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形势，给冲突火上浇油。

简言之，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藉以判断中共领导在总路线、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等这些原则问题上所持真正立场的确实的事实。

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2小时吗？到3点15分再见。

(休息之后苏斯洛夫同志继续发言)

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国同志已经到了指责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从今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第一次开始在文章和声明里正式指责我们。邓小平

同志在这里重复了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们党坚决驳斥这些诬蔑。每一个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确存在的分裂危险来自另一方——中共领导一方。企图指责我们党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卑鄙的图谋。

中国同志把自己说成是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的“斗士”。在中国的文章和讲话里，再没有比“团结”、“统一”这类词出现频率更多的词了。在7月8日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这些词重复了许多次。

但是，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统一问题的，让我们把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与此作一比较。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论是一个党的统一，还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首先是靠思想纲领一致，靠在对阶级敌人斗争中在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观点相同来保障的。

可以说今天中共领导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吗？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一切，即中共领导对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关于世界舞台上基本力量分布的特别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以及其他观点，都说明：中国同志们在其思想方针上，是与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和载入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的思想政治纲领相背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有什么根据把自己说成是统一的“斗士”？

还有，无论是一个党还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总路线的统一即该党和整个运动在该阶段为自己所提出的战略和战术、政治目标和任务相统一来保障的。

今天中共领导奉行与宣言和声明所载路线不同的“总路线”，这一事实能说明它在为统一而斗争吗？不，正好相反，这说明它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分裂整个运动。

还有，一个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所有党自愿承担和严格遵守一定的义务来保障的。

从你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你们的纲领是反列宁主义的宗派斗争的纲领。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不仅是你们的发言，还有你们的行动。让我

你们看看某些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在其他党里大肆进行宣传你们“特别”思想纲领的活动。这里指的是对其他党发动群众性的宣传攻势；散发数百万份小册子和文章，批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些党的一致的思想政治路线；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一些地区建立进行这种宣传的特别中心；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进行集体或是单个“训练”。而且这一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相应党的领导人进行的，因此你们已多次遭到各兄弟党中央的抗议。

看来，你们甚至不为这一事实感到害羞：你们的宣传正受到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共组织的利用，他们正处心积虑地宣传和散发你们的材料。

你们高傲地、蔑视地看待兄弟党，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们身上。你们肆意把许多兄弟党从共产党国际大家庭中除名。例如，从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惊奇地知道，对于你们来说，印度共产党已不算共产党，而是集团。在同一发言中，你们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古巴共产党抱有同样的看法。

我们十分吃惊，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愤怒反对残忍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光荣的领导人的时候，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抗议运动。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各兄弟党的谈话里，暴露出你们对各兄弟党十分蔑视。原来，这是因为，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一批兄弟党反对中共的行动”，在1960年会议上“组织了全面向中共进攻的集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后”有10个党抗议中国共产党，“而我们知道，这是谁的指使”，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40多个共产党公布了向中共发难的决议和文章，而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等等。

甚至难于启齿，在这些极端侮辱性的谈话里还包含着贵族老爷式的蔑视轻慢态度或十足的无知，不知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看待有的党公开破坏、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危险的分裂破坏活动时是无须什么“指挥棒”的——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北京的。您的谈话使各兄弟党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对此您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承担责任。这里还有什么权利平等和尊重各兄弟党(大党和小党)的独立

可言？

您在7月8日的发言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侮辱，指责他们那里“资产阶级思想吞噬了国家和党的机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您对此得解释清楚，因为假若我们沉默不语，不对您没有代表来到此谈判桌旁的其他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员们的指责进行坚决的谴责，我们代表团将承担沉重的责任。

长期以来，你们积极地在兄弟党里招募支持者，企图在那里建立宗派集团。

你们自己，先是在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尔后在自己6月14日的信里，道出了这一活动背后的目的。你们所谓“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外”都可以找到沿着你们建议的道路前进行的“力量”，可以在党外找到可以领导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是直接号召分裂，号召成立宗派组织，号召推翻不为你喜欢的各兄弟党的领导。

这一切不是别的，正是你们对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这种干涉的鲜明例证，就是你们粗暴而放肆地反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你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对整个党还有什么“帽子”没有扣？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你们有意识地推行这种方针——败坏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名誉并推翻他们。

你们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肆意赋予自己评论他们活动的权利，甚至企图以绝对的形式给他们下达指示。你们发言的口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你们的发言中，对其他共产党充满了这样一些命令字眼儿，如：“各共产党应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等等。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追求特殊地位。你们觊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赋予自己最高裁判的角色——或右或左地给予评价和下达领导指示。显而易见，你们并未发现，在世人眼里，你们6月14日信里关于各

党权利平等，关于“在兄弟党相互关系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的论断是多么可笑。

至于苏联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清楚，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和公认的功劳，可她不仅不觊觎领导地位和批驳关于某种领导地位的思想，而且主动建议改变关于它的领导作用，关于运动以苏共为首等这些在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文件中长期以来已成为传统的提法。顺便指出，中共在其他党中间，十分积极主张保留这些提法，认为这些提法已完全被苏共的功劳和她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现实贡献所证实。

最后，谈到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不能对这一事实沉默不语：你们开始中断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联系。仅举出这些例子就够了：中共代表撤出了各兄弟党唯一的集体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委会。你们拒绝参加国际援助基金。如果轻视援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掌权的共产党第一个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毫无根据地说：“某些以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反对你们对兄弟党的这种诬蔑，反对你们企图在此双边会晤时讨论某一其他党的政策，背着他们给以单方面的评价。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我们坚决批驳你们毫无根据的臆测，似乎是苏共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我们严肃地提醒你们，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行动说明，你们没有严肃地、按照列宁的教导对待你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分裂的可能后果。

我们劝你们认真斟酌你们的行动，斟酌不断加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对社会主义阵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解放运动、整个人类命运所带来的一切可能后果。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重提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代表个人发表看法。

我们现在想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据一个也未驳倒。你甚至没有解释清楚，你们为什么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看法，须知在几年前你们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你又把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抛到九霄云外，只知道

给南斯拉夫领导人头上堆砌谩骂之词。

至于您说，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会议某一委员会里承诺不把南斯拉夫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完全是谎言。

四、苏中关系的几个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苏中关系上的路线，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坚定地发展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发展和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各个历史阶段，苏共始终是中共的真诚朋友和战友。我们同中共关系上的立场是建立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实际情况是，正是我们的党，不顾近年来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破坏苏中友谊，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的企图，为保护这一友谊做着它能做的一切。

邓小平同志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令人十分遗憾和痛苦。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竭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企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脱离实际的结论。你们，中国同志们，甚至把一个喝醉了酒的学生的流氓行为——打碎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大楼周围的展览橱窗提到政治行动的高度，在你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制造舆论，从而煽动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帝国主义宣传没有白白青睐所有的反苏事件，他们最近起劲从北京发出报道，津津乐道他们敌视苏联的方针！

但是，不像你们想象的，是个别的不快事件决定着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性质。你们的行动让我们想起一些真实的事实。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立即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是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武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援助中国建立和巩固国防。在苏联技术帮助下建成的24个国防企业成了建立中国相应工业部门的基础。此外又建立了33个国防企业。由苏联提供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当时装备了中国军队60个步兵师，1955—1956年，中国军队又实行了现代化，装备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在过去的年代里，我国给中国提供了很大数量的技术和工艺文件资料，因此中国才获

得可能，生产米格17飞机、米格19飞机、米格21Φ飞机、图16飞机、米4直升机，“空对空”、“地对空”、“地对地”、“空对地”、“舰对地”导弹，海军技术装备、潜艇和各类快艇。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了原子工业基础。

邓小平同志，这一切您都清楚得很，但您又重新搬出了我们早就共同讨论过和已十分清楚的长波电台问题，杜撰出所谓共同建立水下舰队问题。的确，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说明，苏联想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可笑的。1960年您还没落到如此荒诞想法的地步；如今在此面前看来您还不肯却步。

讲几句你提出的所谓“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似乎我党企图把共同建立海军舰队强加给中国，因此我们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邓小平同志您出席了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参加了会谈。难道您忘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所作的如下声明：“任何时候我们苏共中央也没人产生过共同建立海军的想法。你们知道我的观点。我在斯大林生前就反对‘合作社’。”接着赫鲁晓夫又说：“我们认为需要谈谈舰队建设问题，但关于建设共同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没考虑过，而且也不需要。”毛泽东对此回答说：“如果这样，那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没有问题，而您今天又重提此事。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在冷静地对待事情，对苏联帮助中国巩固国防所作一切记忆犹新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类似的观点？

我们还想给健忘的中国同志们提醒苏联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事实。难道在苏联帮助下建起的198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苏联培训技术干部没有说明苏共忠于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苏联援助下，在中国建起的冶金企业生产的铁，到1959年几乎占到铁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钢超过了钢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轨钢中也超过总轨材的一半。在苏联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建起了汽车、拖拉机、航空等这些新的工业部门。苏联向中国转让了2.1万套科学技术文件，其中有1400多套完整的企业设计方案。

在坚决指出您对苏联臆测的同时，自然，我们保留对您无根据的攻击进行回答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苏中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中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旨在

发展苏中关系和以同志式态度解决分歧的苏共方针，一种希望加大分歧，破坏苏共和中共之间、苏联和中国之间各种联系和合作的中共方针。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问你们：为什么中共领导近几年不理睬苏共中央发展两党两国联系的任何建议，破坏两个兄弟党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是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大大缩小了，1962年我们合作和贸易总额降到1959年水平的36.5%，苏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成套设备下降了97.5%。难道这些事实可以否定吗？！

1962年我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人数比1959年减少80%，这难道是出于苏联的倡议？！

难道实际上是苏联方面中断了我们两国社会团体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减少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

难道不是中国方面蓄意挑起多次中苏边界事件，非法侵入苏联领土？仅1963年登录的此类破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

对1962年夏季新疆居民越过中苏边界的事实，您重提此事，似乎这是苏联制造的颠覆活动。您很清楚，这是诬蔑。我们曾建议你们的代表同难民谈判，说服他们返回。但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你们的响应。

最后，对于谁也不是秘密，近年来中共领导在中国人民中间开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史无前例的破坏苏联内外政策名誉、破坏中苏友谊、煽动反苏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十分清楚，中国领导的这些行动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给中共党员和中国劳动者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带来了重大损失。

同志们！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的观点和行动是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方针的。而且这里说的，还不是同文件字义和个别部分的差异，而是背离整个文件精神，背离文件的主要理论和政治结论。

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这是集体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它

是经验的总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背离这一文件，意味着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无论口头上怎么保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无论怎么攻击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都掩盖不住这一事实。

你们企图拿宣言和声明同苏共二十大结论和苏共纲领相对抗。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哪个共产党员不清楚，正是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它受到各兄弟党会议的赞许。

其实，是你们自己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通过6月14日的信表明了你们背离宣言和声明。

中共领导人断定苏共和绝大部分共产党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与当年那些蹩脚的“左”倾空谈家们放肆指责最伟大的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修正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荷兰极端“左”倾分子Γ·戈尔特在1920年秋给列宁的公开信(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回答)中写道：“您知道第三国际现在的行动同过去的社会民主派一样……按照工人运动的发展，欧洲存在两个派别：急进派和机会主义派。而您，列宁同志，支持机会主义派……您由马克思主义领袖变成了机会主义领袖。”没有必要评述这种荒谬的来信。深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正在步这种蹩脚的极端革命者的后尘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实施攻击。

当你们提出这种荒诞的谎言——似乎苏共不再区分朋友和敌人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与此完全一样。我们愤怒地批驳这些谰言。

我们对你们代表团领导人对我们党——伟大列宁的党、对她的列宁主义方针和二十大以后时期的实践活动所进行的诽谤深为愤慨。

在你们的信里和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普通的词句，如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应该联合起来，等等。是的，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一百年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原则。但是，在当代形势下，我们的运动的战略是什么呢？你们对这些在宣言和声明里论述得很清楚的问题根本不重视，而在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共纲领、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却达到了极精美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当绝大多数共产党不赞成中国同志的立场

的时候，你们的立场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所谓第四国际的欢迎。在第四国际领导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写道：

“同志们！近来贵党许多领导人和官方机关开始对某些基本命题展开辩论：‘和平共处’、幻想全面裁军、把帝国主义理想化——这一辩论的基本点就是这些。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一辩论和你们立场的巨大意义……

第四国际站在你们一边，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同你们今天反对的那种思想进行斗争……第四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这一辩论。它呼吁你们进一步开展这一辩论。”

托洛茨基分子的恭维表明，中国同志走上了多么错误和危险的道路。

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公开地告诉你们这一切。

我们再次呼吁中共代表团客观地、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看待如此严肃的对于我们两党两国、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从我们方面，我代表团在执行苏共中央训令中，将尽一切努力，做到不加深已有的分歧并为克服它们寻找途径。苏共中央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彻底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奋斗。

邓小平：明天可以休息一下吧？（转向安德罗波夫）

苏斯洛夫：好，到10点钟开始。行吗？

邓小平：好，同意。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7—3909页

No08110 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

[58] (1963年7月12日)

第六次会议 [59]

7月12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发言

同志们：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7月10日的发言。你们在这个发言中，故意地曲解我们的原则立场，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事实，歪曲了许多重要事件的真相，使用了大量的恶毒语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加放肆的攻击，给我们加了更多的臆造的罪名。你们的发言，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解苏共领导固执坚持的错误立场和观点，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路线，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背离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路线。

我们分歧的性质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为了消除分歧，取得共同的语言，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我们认为，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对当代革命有关的一系列的原则问题，进行逐点的、详细的、反复的讨论。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指责我7月8日的发言回避了原则问题。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我在那次发言中着重谈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弄清楚产生分歧的原因，才能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你们对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都不想弄清楚，这怎么能够说你们对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是抱有诚意的呢？你们在自己的发言中似乎认为，只有你们谈到的问题才是原则性的、建设性的问题。坦率地说，你们的两次发言，除了重复那些早已被我们多次批驳过的论点，更粗暴地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更谈不上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一方面 [60]，你们的发言，力图否认我们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这一事实。但是，另一方面 [61]，你们又一再强调，拒绝苏共二十大就是不承认宣言和声明。你们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你们坚持要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说明我们的分歧正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说明了我们对于苏共二十大的一贯立场，列举了我们从1956年4月开始就多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你们明明是知道的。令人惊异的是，苏斯洛夫同志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没有听到中共中央领

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任何反对意见。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对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一向有不同意见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一直就挂着斯大林的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在指出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同时，还肯定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吗？为什么你们硬说我们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呢？这难道是讨论问题的严肃态度吗？

你们极力否认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特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但是，历史不是用几句空话能够篡改得了的。我们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立场是一贯的。你们要想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所发表的言论里去找帮助，是完全徒劳的。

你们上次发言似乎从托洛茨基分子的第四国际那里抓到一根稻草。

我们要提醒你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鼓励了托洛茨基分子，并且受到他们的热烈赞扬。你们的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唤起了在绝境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希望。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1957年10月11日，第四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说：

“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1961年11月，第四国际书记处《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

“托洛茨基在1937年说了这些话反对斯大林：‘莫斯科的清洗和可怕的审讯的主使人将饱尝羞辱，苏联人民将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承诺将树立这个纪念碑。”

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斯大林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

托洛茨基分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他们

确实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混水摸鱼。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清楚，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在对待叛徒铁托集团问题上，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谁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赞扬，谁真正走上了危险的道路，这是很容易鉴别的。你们企图借助托洛茨基分子来诽谤我们，这是徒劳的。

你们在发言中，借口我们无权在这次会谈中讨论其他兄弟党的问题，指责我们上一次的发言。你们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上次所谈的是苏共的错误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恶劣影响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同你们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倒是要向苏共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口口声声说中苏两党的分歧是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你们俨然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究竟你们受了谁的委托？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

坦率地说，你们滥用曾经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伟大成就的苏共和苏联的威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兄弟党，以老子党自居，是太习以为常了。你们居然傲慢到这样的程度，谁批评你们，你们就认为是批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不同意你们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谁就是反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这是一种极坏的习惯。真正要像上帝那样，一个人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根据自己的意见解决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的最重大问题的，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裁判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自己。

对于你们两次发言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涉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再作评论。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几个原则性的根本问题。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对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分歧，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认为，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是解决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

我先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的问题。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1957年宣言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60年声明进一步指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最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1960年声明还指出：“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宣言和声明是把争取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争取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而绝不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不革命的路线，反对革命的路线。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是你们在3月30日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你们在这封信里系统地阐述了你们对总路线的观点。

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叙述了我们对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我们的看法，同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完全符合的。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攻击我们对宣言和声明进行了“总修正”，把宣言和声明“一笔勾销”，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

我们要问，你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不应当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应当联合起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应当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呢？

坦率地说，你们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对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路线，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不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关于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等等，都是“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起码常识”。是的，这的确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解决的问题，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但是，革命还是不革命，无产阶级要不要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不要联合起来，恰恰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斗争的中心问题。过去，列宁同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我们同你们的争论的中心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因此，你们轻视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

坦率地说，你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企图否认你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且说“这是荒谬的指责”。但是，抵赖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以你们几年以来大量的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作根据的。

你们对于我们的时代的分析，虽然也常常引用宣言和声明的词句，但是你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两个社会体系和平竞赛的时代，阉割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内容。你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这段时期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社会体系的竞赛。这个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

你们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共产党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从来不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和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你们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内容。你们说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社会主义阵营，不要革命的吗？

你们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斗争，把和平共处解释成为“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的国际合作”，解释成为“同一切国家实行全面的合作”。

你们错误地夸大经济竞赛的作用，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赛中的“彻底胜利”，就“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打击”，说什么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要用经济竞赛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你们违背宣言和声明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观点，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错误地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你们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在现

在条件下，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把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曾经谈到葛罗米柯同志鼓吹苏美合作。其实，葛罗米柯同志的讲话不过是反映了苏共领导的观点。

赫鲁晓夫同志1961年9月8日在苏印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和平和友好的关系，那么未必有谁能够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虑两国的立场而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照你们看来，美国不但不是当代世界的主要侵略者，而且它的“立场”还可以使别人“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

由此可见，你们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就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就是反对革命的总路线。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的这种错误的总路线，是同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对于世界现实的全局，对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革命的领导问题、革命的主力军问题、直接同盟军问题、间接同盟军问题、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问题，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空谈矛盾，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分析矛盾，通过革命来解决矛盾。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正是从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来阐述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的。我们在这封信里强调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观点，是同你们的观点根本相对立的。

你们的两次发言，都攻击我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但是，你们的发言恰恰说明了，你们关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口头上也承认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否认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你们的出发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你们的结论，不是革命，而是取消革命。

你们口头上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个矛盾会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会在苏美合作中得到解决。

你们口头上承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承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得到解决。

正因为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因而你们的总路线，只能是一条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现在，让我们再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一看你们的不要革命的错误路线。

拿苏共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来说吧。

苏共同志有意贬低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的目的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例如，苏共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巨大高涨”。

苏共纲领谈到保卫世界和平力量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纲领在谈到和平共处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成和平共处的巩固”。

你们7月6日的发言，反对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论点，又一次证明你们低估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

列宁在50年前就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过：“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和平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同几十年前相比较，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你们却对它采取鄙视和否定的态度，这真是令人十分惊讶。

我们认为，当代的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基础的重要的力量。我们是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认为，当代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我们的这种立场完全是列宁主义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而你们那种轻视和鄙视民族解放革命的立场，才真正是违背列宁主义，才真正是背离阶级观点，符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利益。

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是区别进步和反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是资产阶级，甚至是王公贵族，也是起进步作用的；支持帝国主义的，即使是共产党人，也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是列宁早就提出来的原则。

苏共同志常说：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快完成了，似乎目前只在总共5000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才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饰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几亿人民的侵略和掠夺。事实是，在许多国家中，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改用新殖民主义政策继续进行统治，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苏共同志的错误论调，实际上是取消这些地区人民把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苏共同志害怕民族解放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核战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苏联代表，在会议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并且用核战争来恐吓被压迫民族。他说：“核战争会引起亿万人的死亡，这样还有谁的民族独立？那时会有亿万的死尸，我们不希望是死尸的民族独立。”

苏共同志把民族解放革命从属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说：民族解放革命“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你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苏共同志散布对于帝国主义能够全面彻底裁军的幻想，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等待裁军的实现，而不要自己起来争取解放。

赫鲁晓夫同志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1200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8%—10%用于这个目的，那么在20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看，多么美妙啊！世界上竟然会真正有愿意裁军，就是说愿意放下武器的帝国主义，竟然会真正有愿意“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的帝国主义。看，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善良和慈祥的呀！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战后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不是都毫无例外地在那里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这种论调完全是骗人的吗？

苏共同志在7月6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自己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辩解，大谈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我们愿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适当的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你们夸大经济援助的作用，企图以此代替新独立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主要地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能依靠卢布，不管是30亿也好，300亿也好。

而且近些年来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经济援助的目的，是值得怀疑的。以印度为例，苏联给印度的经济援助约占苏联对新独立国家贷款总额的

1/4左右，但是，你们这样的援助恰恰是鼓励了尼赫鲁政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印度人民的利益，又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苏共领导在实际行动中，不支持并且多次损害民族解放运动。

例如，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苏共长期不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1955年10月3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还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又如刚果事件：1960年7月13日，苏联竟然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队去干涉刚果的决议，实际上是支持美国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1961年，苏联又极力推动基赞加参加在联合国“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结果使刚果民族力量遭到惨重打击，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对于这些，难道苏联同志一点也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吗？难道这些不是证明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十分错误、十分不光彩的吗？

正是由于苏联同志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态度，苏联同志在许多场合中，在许多国际民主团体中，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自己不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责备别人，责备我们。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团结污蔑为什么“以地理和种族的原则为基础的某种特殊集团”，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我们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十分荒唐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是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北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不是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一边，而是站在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他就把自己置于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就必然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老实告诉你们，不管任何人，譬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立场，也必然会把我们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帮凶的地位，必然会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唾弃。我们自己也就会

变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革命的、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者。

再拿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来说。

苏共领导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不是从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不是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出发。归根到底，你们的观点，就是不要革命。这种不革命的观点，当然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们同你们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这是毫无根据的。

恰恰是你们，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以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条反对革命的路线，千篇一律地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

我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是：

第一，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同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即“议会的道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第二，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在这里，他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好像用不着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

第三，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传统机构，“将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这显然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的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现在，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在大力加强自己的军事的官僚国家机器，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错误观点，我们曾经多次向你们提出过批评。但是，你们不但没有接受我们的批评，没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观点，而且继续坚持和发展你们的错误。

你们说：“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最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向往，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开辟着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的有利的前景，通过由马克思和列宁最先发现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继续宣扬“议会道路”，说什么“在那些议会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是通过利用议会的道路”。

你们继续宣扬不需要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就会同意赎买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

苏共纲领说：“也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增长、工人运动加强和资本主义阵地削弱的条件下，在某些国家中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它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益的。”

你们还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就能实行超出一般改良范围的措施。

苏共纲领说：“在新的历史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

你们还把和平过渡的错误论点，扩展到民族解放革命方面去。你们说：“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面前，正在展开着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平过渡的前景。”

你们7月6日的发言，还曲解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

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确实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顺便说一下，你们这几年来，在引用列宁的著作时候，常常采用歪曲的手法，阉割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来为你们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作辩护，这种手法是十分恶劣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请苏共领导同志严肃地考虑一下，你们一贯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也就是不革命的路线，已经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公然提出要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否定二月革命道路的共同规律，说什么“不是干俄国人干过的事情”，提出了系统的所谓“结构改革”的纲领。试问，这种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古巴人民社会党曾不断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恐怖主义”，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一切都是错误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根源及其首领不依靠群众的结果”，甚至公开要求卡斯特罗同志“放弃进行盲动活动，进行不依靠人民的武装行动的错误道路”。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1957年起，完全脱离了武装斗争，并且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主张通过妥协的折衷的途径，取得独立，因而在国内完全丧失了政治地位。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伊拉克共产党放弃了曾经一度实行的正确路线，幻想在伊拉克实现和平过渡，使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挫败。在1963年2月8日的反革命政变中，伊拉克共产党毫无准备，遭到惨重的流血牺牲。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曾经指出：“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这里所说的三种情况，就是从我们前面谈到的古巴、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典型事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你们竟然把我们的信件中的这段话，曲解为我们公开号召推翻兄弟党的领导，这是十分荒谬的。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凡是接受你们这条错误路线的，就要瓦解革命意志，涣散革命队伍，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使自己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和挫败。只有拒绝你们这种错误路线、实行革命路线的兄弟党，它们才是生气勃勃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不断发展。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直到这一次会谈中还在强调的那条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不正是麻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意志，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吗？

再拿战争与和平问题来说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讲得实在够多了。其实，你们的基本观点也很简单、很清楚，这就是：你们害怕革命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会引起核战争，因此你们就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

赫鲁晓夫同志说过：“我们不要战争。打仗——这就是杀人。谁要这？这会得到什么？战争——就是毁灭，我们要杀人，也会被人杀。”

他还说：“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染污的土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了。”

这些话的意思太清楚了。无非是说，不管怎样活着，活着就是一

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令人可悲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仍然在谈论这种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你们还重复帝国主义的语言，诽谤我们要借助其他国家实现革命，诽谤我们指望美苏之间发生热核战争。这简直是荒诞无稽的。你们津津乐道地重复这种诽谤，无非是企图为你们自己的反对革命的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辩解。

1957年宣言指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种压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上面。坦率地说，你们的灵魂深处是：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从自己不革命到不许别人革命，从自己不支持革命到不许别人支持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所谈到的，是关于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下的、占世界人口2/3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总路线。至于说到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1/3的人民还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你们的总路线同样是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总路线。关于这类问题，我们也需要另外进行详细讨论。

现在，我来讲一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各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殷切地期待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日益加强。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宣言和声明还规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

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必须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我们觉得，有必要请苏共同志考虑一下，你们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上，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你们所实行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你们所实行的政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是团结的政策，还是分裂的政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还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政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

为了说明问题，波兰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是不能回避的。你们在波兰事件中，企图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难道不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吗？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你们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敌人，这难道不是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吗？

我们再看看你们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吧。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大国，只有援助它的义务，而决没有欺侮它的权利。只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你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不跟你们一起反对中国，你们就向它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你们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呢？

你们对待古巴又是如何呢？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你们一定要把导弹运进去，后来又惊慌失措地把它撤出来，还要迫使古巴接受“国际视察”，你们这样做，究竟考虑过古巴人民的利益没有？你们要古巴放弃主权，难道是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吗？

至于我们对于加勒比海危机的正确的立场，是举世共知的，无须在这里多说。

再看看你们这几年怎样对待中国吧。

我在上一次的发言中，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的无可抵赖的事实，说明你们越来越放肆地反对中国，蓄意要在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扩大分歧，制造紧张局势，把中苏关系推到公开破裂的边缘。

令人吃惊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企图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我们要问：

是谁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呢？你们大谈几年以前给中国的援助，为什么不提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的巨大损失呢？为什么不承认这正是中共两国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呢？

你们千百次地夸耀你们对中国的援助，从来不讲相互援助，从来不讲别国对你们的援助，从来不讲中国对你们的援助。难道中国过去对你们的援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吗？难道中国真的是单靠你们的施舍过日子的吗？

是谁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设置障碍呢？你们可以允许美国在苏联出版刊物，为什么要禁止中国在苏联发行《友好》杂志呢？为什么不允许新华社在苏联发行新闻稿呢？为什么要干扰北京电台的俄语广播呢？为什么把中国的出版物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把散发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中国同志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呢？为什么要对中国的留学生实行种种歧视呢？

是谁在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呢？为什么苏共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彭德怀和 [62] 高岗呢？

你们把中苏边境的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你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难道有一丝一毫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吗？你们实际上参加了美帝国主义和尼赫鲁政府建立的反华联盟，难道是符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你们说，苏联不帮助尼赫鲁，美国就要帮助。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在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方

面，要同美国竞赛呢？你们为什么要学美国那样，给印度反动派提供武器屠杀中国的士兵呢？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竞赛的对手是衷心欢迎你们这样做的吗？

你们接连不断地采用通过决议、发表声明、领导人讲话、报纸上发表文章等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狂热地进行反华运动。

你们居然还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无端地攻击我们进行“反苏”。你们不是完全颠倒了黑白吗？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居然有勇气说什么苏共执行的是“旨在发展中苏关系和同志般清除分歧”的方针，难道一点也不感觉到脸红吗？你们不是要破坏中苏团结，不是要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又是什么呢？

你们对其他一些兄弟国家，又干了些什么呢？你们损人利己，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的那一套，难道做得还不够吗？你们这一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难道还不值得好好反省吗？你们难道还不应当稍为检点一下吗？难道我们好心好意地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你们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也是进行什么“投机”吗？

坦率地说，你们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搞得这样乱糟糟。你们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关系，根本不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当你们自以为是顺利的时候，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那里，或者是从什么地方，抓到一根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得意忘形了，大反不听你们指挥的、不愿意受你们控制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根本不把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眼里。

当你们处境困难的时候，当你们由于实行错误的政策而碰壁的时候，你们就恼羞成怒，拿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出气，要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你们的“替罪羊”，甚至牺牲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讨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寻找自己的出路。

我们严重地注意到，你们在许多重要场合，在许多重要文件中，已经不大讲社会主义阵营了。

你们对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态度，也说明你们不要社会主义阵营，要同铁托集团组织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了。你们同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结成阵营的叛徒铁托集团组织的“大家庭”，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家庭”呢？

你们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本来，社会主义阵营是应当而且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像你们这样把社会主义阵营越搞越乱，怎么还谈得上什么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呢？

我们在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要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条件。这些主要条件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阵营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再来谈一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兄弟党关系的问题。

无数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革命的总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你们就实际上把它当作自己的仇人，就采取一切你们所能够采取的手段去反对它，去损害它。

你们就是这样地走上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到，兄弟党不需要任何指挥棒。这句话倒是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独立的、平等的，本来没有什么“领导党”、“被领导党”、“上级党”、“下级党”的区别。问题正是由于你们坚持着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你们任意解释、歪曲和违反宣言和声明，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和错误路线，把你们一个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你们指挥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你们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的代表大会，利用一切你们所能够利用的宣传工具，公开指名地攻击别的兄弟党。

你们横蛮地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

你们想什么时候发动攻击，就什么时候发动攻击。你们想禁止别人对你们的攻击做出回应，你们就下命令“停止公开争论”。

难道在你们的眼里，还有什么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

正是你们这一套挥舞指挥棒的恶劣做法，才确实是对兄弟党的侮辱。我们希望你们停止挥舞指挥棒，希望你们停止用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待兄弟党，希望你们停止对兄弟党继续进行侮辱。

你们两次发言，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叛徒铁托集团百般地进行辩护，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需要？究竟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们在两次发言中，硬说我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改变了立场，说我们在1957年秋天怎样，以后又怎样。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7年冬天的莫斯科会议上，拒绝在宣言上签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8年，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1960年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结论吗？

你们矢口否认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达成的口头协议。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协议只有我们两党几个负责同志知道，就可以赖掉了？现在我提醒你们，这个协议，是在1960年11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里，兄弟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当众宣布了的。

同志们，你们对待兄弟党之间的协议，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叫别的兄弟党怎么能够信得过你们呢？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提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和“国际援助基金”问题。

你们和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关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和抗议，破坏了杂志创刊会议的决议和协议，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变成了苏共领导随心所欲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讲坛，变成了苏共领导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工具。你们的这种分裂主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你们现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反咬一口，难道你们以为这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关于“国际援助基金”问题，很清楚，为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过去一贯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但是，你们已经把“国际援助基金”变成为推行你们错误路线的一个工具。给谁不给谁，给多还是给少，都是以追随不追随你们的错误路线，听不听你们的指挥为标准的。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的基金，而是苏共领导进行宗派活动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来援助兄弟党的革命事业。

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你们沿着分裂主义道路已经走得很远了。你们的行动，已经给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你们的行动，博得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的喝彩。

现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都殷切地希望你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从上面所说的大量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分歧，中苏两党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苏共同志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中苏两党的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越来越远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你们指责我们说，“中共领导越来越走上狭隘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力图把一条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事实恰恰相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背离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的路线。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宗派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

我们愿意坦率地向你们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同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地要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社会

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实现什么“全面合作”。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也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会完全一致、融洽相处呢？这完全是不能想象的，在这方面决不能抱任何幻想。

请苏共领导同志冷静想一想，一旦国际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肯尼迪、尼赫鲁、铁托是靠得住的吗？难道他们能够是你们的可靠的同盟者吗？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同志们！

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国际无产阶级，只能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中国有句俗话，“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对你们提出这样的批评，对你们提出这样多的忠告，完全是出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我们诚恳地呼吁苏共领导同志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采取革命的路线，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采取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路线。

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迫切希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破坏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

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在这方

面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团结对敌，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而奋斗。^[63]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10—3948页

No08111 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1963年7月13日)

第七次会议

7月13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发言。

苏共代表团代表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昨天我们听了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第二次发言。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说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之情离开会场的。当然，不是因为这一发言中似乎包含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式的批评。我们共产党员们，坚强的人们，不仅多次遇到过没有根据的批评，而且还多次遇到过最恶意的诬蔑。

不，不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完全证实了我们在第一次发言末了所产生的最坏的担心。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谈判绝不是为了寻求一致意见，消除分歧。看来你们另有意图——给莫斯科运来一大车垃圾，企图把它扔在我们身上，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败坏苏共的政策和活动，从而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之间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把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的团结看成是我们整个事业取得进一步成绩的重要条件。

苏共代表团坚决反对肆无忌惮的发言格调和你们乱送苏共和苏联侮辱性外号的伎俩。这种格调，这种语言只能被看作蓄意使关系紧张，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程度，使与被你们称之为自己苏联同志的人的谈判破

裂。我们呼吁放弃这种格调，提醒这种格调不仅在同志之间，甚至在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人之间谈判时都是不能允许的，看来我们的呼吁成了徒劳。

更为糟糕的是，在谴责我国政策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中，您狡猾地一字也不提苏共的真正观点和真正行动。您的整个发言全是一派胡言和捏造。

胡言何其多也，大大小小的捏造不计其数。逐一批驳它们，大概得用一整天时间。现在我仅择其一二而已。

捏造之一。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这简直令人惊愕，怎么能摇唇鼓舌，对一个不仅在自己的全部文件中一直强调存在这种斗争，而且在实际上不断坚定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党说出这样的话？您需要事实吗？我们可以略举一二，哪怕是从1956年之后。难道我们反击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干涉埃及，我们采取坚决行动反对武装干涉叙利亚，我们对印度尼西亚、也门及脱离巴格达条约之后的伊拉克等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其中包括武器援助，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年轻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对争取自由的民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难道这些不是“尖锐的斗争”？莫非“尖锐的斗争”——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没完没了“严重警告”的文章？

捏造之二。邓小平同志肯定地说，似乎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民族解放革命”。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原来表现在，苏共的纲领在谈到总的危机，谈到捍卫和平的力量，谈到和平竞赛时，没提民族解放运动。而您真的读过我们的纲领还是相信自己的顾问？须知在我们的纲领中白纸黑字写着：总危机的标志之一，这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反对军事危险的斗争中，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普遍和平最强大的因素。这一反映三分之二人类意志和力量的强大阵线可以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让步”。如果您嫌不够，我再引述几段纲领中讲民族解放斗争的地方：

“民族解放革命的狂澜席卷殖民主义体系，颠覆着帝国主义的巢穴。在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方出现了和正在出现年轻的主权国家。他们的人民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他们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和国际政治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摧毁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站起来了。”

还有：“解决全民族的任务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彻底地同帝国主义斗争。帝国主义力图控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巩固他们在其中的不平等地位。当代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是美国帝国主义。”

“苏联共产党把同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桎梏的人民的兄弟联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难道您没看到，纲领中专门有很长的一节论述民族解放运动？其整个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其中包含有10多亿原殖民地人民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依据。

捏造之三。您昨天宣布，按照苏共二十大路线，革命只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道路，似乎这条道路不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前提条件。这也简直是捏造。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大上讲：

“当然，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在它手中还握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那里的反动势力的拼命反抗是不可避免的，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在尖锐的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是以前先进的部分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舍此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是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和平道路实现革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对革命报之以暴力，不想服从人民的意志，那无产阶级就应该摧毁它的反抗，坚决地实施内战。”在体现和发展了二十大路线的苏共纲领中写道：“工人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成绩，将取决于它和它的政党掌握所有斗争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的程度，他们应准备由一种斗争形式迅速而果断地转变为另一种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立场，它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至于不仅在二十大决议中，而且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都以同一种方式表述的，关于利用议会问题和在许多国家将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变为人民政权机关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至今还未听说，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把议会和国家机构看成是一回事。把议

会变为人民意志机关不仅不排除，而是相反，把打碎整个剥削阶级的军事警察机构并以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取代它作为前提条件。

捏造之四。您明显地编织谎言，似乎苏联没有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战争。请看事实，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1960—1962年，我们无偿地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提供2.5万支步枪，2.1万支机枪和冲锋枪，1.3万门曲射炮、火炮和迫击炮，几万支手枪和其他武器。仅苏联社会团体给阿尔及利亚寄去的衣物、粮食、药品就价值500万卢布。数百名阿尔及利亚解放军伤员在苏联得到救护和被治愈。苏联的小麦、砂糖、食用油、奶酪、浓缩牛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尔及利亚。

最后，捏造之五。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您关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和古巴政策上的谎言。当这三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全面而坚决地公开地向全世界批驳您的造谣中伤，向您宣布，对于共产党的代表来说，通过编造谎言力图挑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允许的时候，您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苏联和他回国之后的讲话中，鲜明地评述了苏共政策的国际主义特点。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些讲话？这些讲话将给中国人民表明，你们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的立场是错误的，是违背古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无数类似的捏造，但仅举出的几例就足以表明您所使用的方法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斗争方法，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种非共产党人的方法和措施。您努力把许多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记在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账上，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党来说绝对是陌生的，我们根本不赞成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赞成这些观点。

驳倒您所有的虚伪的观点并不费力，尤其是您在苏中关系问题上和我党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政策问题上所发表的无数谰言。在这些问题上，我代表团还要给您应有的回答。

但是，如果您今天编造谎言，我们明天揭穿谎言，这样下去我们的会谈会变成什么呢？这样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们认为，必须转向邓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发言。

一、从一开始，我党代表团就建议把存在分歧的原则问题作为谈判

的中心。我们列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把他们列入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干了些什么呢？他这样表达问题，似乎分歧的中心完全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而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世界历史使命的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团结口号的问题。

不，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里，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您都找不到还在争论这些问题的共产党员。如果您想证明似乎苏联共产党人“叛变了革命”，那我们想郑重地警告您：还是放弃您这没有希望的企图吧——企图说服什么人相信似乎我们的党不再是革命的党。

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一个会相信您，因为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都晓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进行着多么伟大的反帝斗争，甚至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相信您。帝国主义分子清楚地懂得，是什么力量推动革命前进，是什么力量破坏着帝国主义的立场。

人们相信的不是词句，而是事实。我们不是以没完没了的革命词句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的。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多余的事情。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伟大的列宁的党，整个苏联——这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人通常是在病的时候谈论健康。同样，正是在与革命不合拍的时候，才开始滥用革命词句。

对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而言，重要的是，苏联人民真正地表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有谁在听我们的宇宙飞船上的广播时敢说：“这是世界革命的叛徒在飞行？”实际上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超过了资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在你们面前说我们忠于革命事业这是白费口舌。难道那些用事实都说服不了的人还可以用口舌说服吗？

我代表团有充足的理由再次对你们讲：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在我们列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政策中心的问题上有分歧。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是通过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固定下来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靠“莫斯科指挥棒”的指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服从的这一威力无比的指挥棒是生活本

身，是现实的实际情况。

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是对工人阶级、苏联人民，也包括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这就是对世界热核战争威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1960年的声明中明确地写道：保卫和平，同热核战争威胁作斗争——这是共产党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认为首先弄清这一根本问题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这一态度符合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不是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是从生活，从整个事态进程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从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出发。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如果它想不仅宣传，而且有行动，不仅解释，而且改变现实，领导亿万群众斗争的话。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这样行动意味着——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

苏斯洛夫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对这一当代根本问题的立场令人疑惑，甚至怀疑你们滑向了“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所谓的“革命战争”的方针。

我们听到的是个回答呢？它完全证实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怀疑。您嘲笑和平共处原则。您昨天的发言令我们完全相信，您是从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甚至盼望这一战争出发的。您故意低估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和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您肯定地说，我们反对热核战争是因为我们“害怕帝国主义分子的核讹诈”，是因为我们“想苟且偷生”。

正是您说的这些话里，而不是夸夸其谈革命的词句里，隐藏着您昨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现在我们明白了，曾在这里被引用过，而在您的发言中未敢批驳的毛泽东关于在热核战争中世界牺牲几十亿人，其中包括中国几亿人的提法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你们真正的立场。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坚持你们对“经常保持国际紧张局势”感兴趣，你们对裁军问题的立场得到了真正的解释。

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经受了和正在经受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考验。当需要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时，我们的手从来没颤抖过。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力量的全部威力将压在它的头上，帝国主义将灭亡。

但苏联政府不止一次解释过，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强大的核导弹盾牌，这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建立起来的。这一盾牌保证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侵犯性，保护着爱好和平的人类免遭核灾难。你们对这一核导弹防护有益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感到不快。越来越清楚你们对苏联和平政策，尤其是对我们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步骤不满的真正原因。在这里，您明确了你们对中印冲突，对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无论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的立场是危险的，它孕育着发动热核战争的危险。

我们应该对你们讲，这不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是不明白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的人的立场。

你们把自己和自己伟大的人民置于很大的危险面前，无论你们怎么讲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你们的路线却把你们带到十分孤立的境地。只有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支持你们这样做，这一事实难道还没提醒你们吗？

你们的立场是积极对抗列宁和平政策的立场。坚持这种立场意味着帮帝国主义的大忙，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制造莫大的困难，给他们带来危害。

还有，昨天您完全暴露了您对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敌视态度，暴露了您对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对苏共纲领的敌视态度。

关于个人迷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整个问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是重要的问题之一。这里指的不是别的，正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形式发展全人类所注目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能否允许实行大规模的镇压，轻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还是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律、人的权利和尊严，经常关心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能否允许随意解决对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经济问题？还是必须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所蕴藏的伟大能力和它的客观规律性？——不注意这些，就不能制定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政策和在极短的期限里达到共产主义。

能否允许通过行政压制推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否允许放弃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破坏党内民主制度和以个人权力取代党的集体意志？

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国家民主制度，及时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全民国家？

我们可以说，苏联在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时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以自己的成绩在这一时期首先达成了以下基本结果：

第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为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几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上，帝国主义头子第一次承认，他们已没能力在公开的军事冲突中战胜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心目中，和平已紧密地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帝国主义阵地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这是人民社会主义成果的可靠保证。

“我们应该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届代表大会上说，“在帝国主义出口反革命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自己的力量，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给自由的敌人、和平的敌人以坚决的反击。”

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期就是这样做的，从而防止了反革命向古巴出口。

第二，现在已十分清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苏联在经济领域赶上了美国，在人类活动的关键领域——物质生产方面超过了美国，从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大大增长了。

第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伟大成就，促进了当代一切革命运动的增长，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极大增长。

而你们中共领导人在这几年为革命过程的发展干了些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彻底让我们信服了，你们特别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概念的基本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这就是作为革命武器的旨在发动世界战争的路线。走上这条路——即意味着走上了冒险主义之路。

2.这就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隔离的路线。这是民族主义的立场。

3.这就是“强行推动”革命的路线，实质是“出口”革命的路线，只采取一种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的绝对路线。

所有这一切，我们苏联共产党人都非常熟悉。我坦白地说，在昨天我们听您发言时，您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您在这里使用的那些“论据”，我们感到很耳熟。所有这些都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的话，当时他们猛烈地攻击我党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妄图把他们有害的方针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口头上赞成“加速世界革命”，但是实际上，他们疯狂反对党的列宁的总路线，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

须知这是事实，你们许多的政治和思想概念在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相吻合。

的确，托洛茨基分子不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哪里呢？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可以解决矛盾和困难，不相信在个别国家或一批国家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国家支持，没有其他国家革命，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即没有在全世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分子虚伪的诽谤性的论断——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熟”，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再生”和“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此首先支持国际无产阶级，促进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顺利发展，而是进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强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你们距离这种观点还远吗？

难道这种相似不给我们权利引证托洛茨基分子对你们的褒奖吗？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热尔曼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正式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几乎站在中国领导人的那种立场上猛烈攻击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

另一个事实。1963年2月17日，第四国际领导出版了题为《关于中苏冲突的发展》的文件。在该文件里写道：“在中国共产党人近几个月做出解释和修正之后，第四国际才可以批准它于1960年9月给中共中央公开信和1961年1月第六次世界会议上通过的文件里所陈述的立场。它认为，中共关于世界范围里阶级斗争方向的论点比赫鲁晓夫的论点更进步，因为他们同我们运动的某些原则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下划线为原作者所加)

然后，托洛茨基分子满意地指出，在和平共处、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道路、对待国际共运中“多数”和“少数”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上，自己的观点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吻合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从这一切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总而言之，从对中共立场的分析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即托洛茨基分子)对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基本政策方向的主要批评意见非常接近。”

再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邓小平同志怎么能在此之后肯定，似乎不是中共，而是苏共的行动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热烈称赞”呢？

现在还为之时不晚，苏共代表团呼吁中国同志们深思：你们对苏共的攻击同托洛茨基分子——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凶恶和最狡猾的敌人所说的话相吻合。

二、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我们已经指出，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无论你们怎么努力饰之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与各共产党的一致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完全相反的。我们已经说过，甚至很难令人相信，你们的观点——似乎仅是理论谬误的结果。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立场，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共领导的什么特殊目的和计划。

至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最好让这几年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同志的所作所为来说话。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代表团在坦噶尼喀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的表现，知道它如何反对邀请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

表，如何拒绝同我国的同志们进行事务联系。我并不隐瞒，刘宁一同志在和苏联代表会谈时说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东欧的国家不应该干涉亚非的事务。我们对你们终于前来这里感到遗憾。为什么你们要上这里来？”

以前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名中国负责同志一时克制不住自己所说的话。以前，在观察你们试图在亚非拉建立单独组织的行动时，我们还可以认为，这种有害的分裂主义的实践活动只是出于宗派斗争的逻辑。

现在我们清楚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你们不择手段地利用亚非人民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有意识地推行让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你们想让亚非拉人民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人民对立起来，甚至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冲突。这一方针的根本目的既不是关心世界革命，也不是关心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你们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地位”的说法骗不了任何人。这简直是企图借助动听的词句轻易骗取亚非拉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跟随你们走。但你们想带他们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引导他们接近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从而使这些伟大的反帝力量一致行动，以共同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呢，还是引导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各兄弟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我们之所以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因为这里说的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你们的真正意图。

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宣称，苏共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事实上，正是中共领导极端地低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作用和结果。显然，矢口否认今天的殖民主义者还仅在一些国家里(人口总共不过5000万)保持有直接的统治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时候，您就是在抹杀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奴隶体系崩溃和民族解放革命在世界上广大地区胜利的结论，在蔑视绝大多数原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伟大历史意义。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反帝斗争，而结果呢，实际上没有。难道这不是实际上贬低民族解放斗争战无不胜的特点和它的革命作用？

您昨天说，似乎由于我们担心民族解放战争的火花可引起世界战火，所以我们促使各族人民放弃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已经说过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但这仅是一个例子。近年来，没有一次民族解放革命，没有一次被压迫人民的起义没有得到过我国的全面援助。这一点你们十分清楚。这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是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的援助。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还是不知羞怯地说谎。

然而各国人民知道苏联的这一援助，你们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

现在大多数被解放的国家面临着其他的任务——发展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争取经济独立，排挤外国垄断资本，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根本的土改，提高人民生活，社会生活民主化。

迷信枪杆子能救一切的“理论家”们想过没有，比如说印度尼西亚，怎样使用武装斗争的方法达到经济高涨和避免经济依附于人？而缅甸、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其他许多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呢？

我们再次声明，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立场，直接促进了帝国主义想把印度拉入自己侵略集团的意图。你们帮了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势力的忙。这一冲突给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

你们试图破坏苏联给年轻的民族独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里面充满了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命运及其发展前景的蔑视。现在，当经济舞台正在成为获得了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最重要的桥头堡的时候，贬低为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他们正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努力而进行复杂困难的斗争——提供经济援助的意义，反对这种经济援助，这意味着忽视人民的需求，帮助新殖民主义者。

昨天，您在这里讲述了列宁关于原殖民地国家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但在论战的硝烟里您未发现，您的解释明显地与列宁意见的内容相矛盾。您说，我们“删改”列宁的引文，阉割相应列宁原则——“关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的问题，关于组织苏维埃作为新国家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但是，每一个读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他的其他发言中，都没有像您所说的类似内容；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像中国同志企图强加给他的东西，因为这等于放弃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听了您的发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个获得了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由于那里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就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必然要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

当然，类似立场自然来自那些把真正的列宁理论称作是“空谈”的人（认为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空谈）。然而这种立场是彻底背离列宁主义的。

列宁提出的，并在苏共纲领中得到阐述的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景，对于摆脱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亚非拉国家就可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这种机制使原殖民地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帝国主义列强农产品原料供应者的地位。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解放的国家就可保障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并在极短的历史期限里克服长久以来的落后。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原殖民地人民就可冲破束缚他们进步的、过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桎梏，坚决清除中世纪的残余。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人民群众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可接受性越来越清楚。同时，当代历史形势为几亿人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保障着越来越优越的条件。

苏联为帮助人民踏上这条道路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它把这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你们的立场妨碍数亿人民看到非资本主义前景，把获得解放国家的劳动群众引入迷途，不是促使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是在这些国家巩固资本主义，这与列宁主张的内容是相违背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极端蔑视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利益，把他们作为你们大国目的的牺牲品。

（宣布休息20分钟）

同志们!对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分裂活动不能无动于衷。你们努力进行这种活动已有很多年了。

为了给自己的这种活动找根据，你们创造了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别理论，发明了彻底反列宁主义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中“临时少数”和“临时多数”的“理论”——似乎真理在“临时少数”一边，“临时多数”已误入歧途。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它实际上为自由宗派活动树立依据，否认国际无产阶级纪律——列宁早就指出过这种纪律的必要性。你们修改阐述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的声明。

在6月14日的信里和你们在这里的发言中，在谈论各党相互关系原则时，你们闭口不谈这一文件中所确定的原则——“每个共产党都必须遵守各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所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你们同时还回避声明中所规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绝不允许某些可以破坏统一的行动”。

你们为什么努力回避这些原则，在你们的文章和发言中一次也未提及这些原则？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你们早就知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严格禁止宗派活动！

为了给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你们甚至不知羞耻地把你们同列宁相比，竟把你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比作是当年列宁同第二国际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但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样提出问题不正好完全暴露了你们？你们所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什么样的统一，如果预先就把它的大多数参加者宣布为应该“抛弃”的“叛徒”？你们到底想与谁统一和加强“团结”——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多数？但你们已公开地把他们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意味着你们想与“少数人”，即与一小撮与你们思想一致的人统一。但这种“统一”，在共产主义和党的语言里早就有了另外的称呼——具有自己特别纲领和特别集团纪律的宗派。谁不清楚，宗派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真正统一是对立物。

中共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实践，完全符合你们的“理论”主张。

你们在自己肆无忌惮地反对许多兄弟党的文章里所采取的格调，是不能允许的极端粗暴和放荡的格调，是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格调。你们进攻各兄弟党时所遵循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利益，而是有完全另外的考虑。中国的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所有与你们意见不合的兄弟党列入敌人的营垒，像你们所表达的，“帝国主义的帮凶”的

行列？中共领导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败坏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为了把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它，如果这一手不能得逞，那就提前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

7月12日，邓小平同志粗暴地诬蔑攻击苏联共产党，大谈什么似乎它“对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他在这里毫无根据地说他掌握这方面“无数的事实”。然而他一个例子也未举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领导不掌握这种事实。您在这方面的谈吐，都是预谋的谎言，您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败坏列宁的党——大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名誉，企图破坏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威望。

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习惯毫不客气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拼命地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他们，你们广泛散发反对他们政策、反对他们领导的宣传材料，不择手段地煽动挑拨，在国外散布流言蜚语，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形形色色的叛徒出版公布的、反对兄弟党领导的诬蔑文章。

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种情况是，中共中央把自己对那些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根本未遇到过的，应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斗争的党研究的问题的路线强加给其他共产党。须知这是事实，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即面临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提出需要修改革命理论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路线已完全得到生活的证实，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已得到近年来阶级斗争历史本身的证实。

近7年的革命实践(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述中歪曲了这段历史)明确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解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在培养本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大军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认为，您不了解法国、日本、比利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智利、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国家，在近7年的历史充满了最严重的阶级搏斗，充满了反对资本剥削、反对反动制度、反对法西斯的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只有那些不珍重共产主义运动兄弟般团结的人才可否认，在这些阶级搏斗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党走在最前列。他们，在为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切实实现宣言和声明的思想而斗争时，遇到困难从不气馁。他们站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处于资本主义的巢穴之中。当必须适应形势要求的时候，他们将勇敢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们不知疲倦地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指教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国家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宣言和声明的思想。但如果他们不同意和驳斥北京的指教，你们就指责他们背离革命的原则，宣布他们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等等。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碰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不是那些站在一线反对敌人阵营现实资本主义的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的问题，而是完全处于另外条件下的中国同志提出这些问题。说得客气点，你们胆大妄为，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知道在任何国家里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该怎么搞。

你们反对兄弟党的颠覆性宣传，引起了反动营垒里的惊喜。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他反共组织，甚至把这种宣传当作自己的武器而加以利用。例如美国当局，不仅不设置障碍，反而赞成《人民日报》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扩散传播。

中共同志们为自己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行为辩解的口实是，这些党，在批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派教条主义的观点时，点了你们的名。但你们的这种辩解再次证明，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自高自大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根子有多深。

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权利平等的斗士，实际上，你们肆无忌惮地践踏各党的权利和利益，把独立制定、贯彻自己政策的兄弟党诬蔑为某种似乎只会围着“莫斯科指挥棒”左右“旋转”的驯服集团。

中国同志近来企图在自己的领导下，把各兄弟党开除的各种没有原则性的人和腐化变质分子——他们希望你们帮助下重振自己的事业——拼凑成一个集团。昨天邓小平同志再次宣布，中共中央将搜集和团结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在共产党内。这意味着，看来你们，中国的同志们，想承担分裂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光彩的使命，搜罗所有叛徒和一小撮宗派分子，使他们同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经过几十年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立。

苏共代表团号召你们，中国的同志们，现在还来得及，要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要以自己的分裂行动帮助帝国主义。

由于你们的分裂行动，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现在开始活

跃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反对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集团，如：美国以米尔坦·罗津和霍梅尔·蔡斯等为首的几个集团；巴西阿马佐纳斯格拉鲍斯集团；被比利时共产党开除的雅克·格里巴集团；澳大利亚希尔集团等。你们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叛徒的思想纲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大喊在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依靠着你们，是你们的思想鼓舞着他们。

这些叛徒的志同道合者寥寥无几，而他们手里的钱，正如外国同志们说的，却多得无数。看来这就是您昨天所说的对兄弟党“援助的特殊形式”。

你们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已不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里。你们已把这一活动推广到群众性的非党组织里，关于这一点我党代表团还要单独对你们讲。

还应该谈谈你们有意歪曲和伪造关于在两条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众所周知，不坚决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同任何修改它的基本原则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是出自右的还是“左”的机会主义立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列宁教育布尔什维克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教育的)，要善于及时改变主要打击方向，把矛头对准对当时工人运动危险最大的背离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倾向。

列宁在当时之所以只把“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幼稚病”，是因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结果。但列宁从未怀疑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可以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莫大危害。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是这样指出“左”倾的特点的：“革命急躁和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分子企图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实质上，是对革命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建议1919年的应征公民反抗动员)。这些企图包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成分，假如真的采取这些措施，便可长期牺牲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作的整个革命准备工作。”

列宁在1921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愤怒反对欧洲共产党内的“左”倾观点时指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妨碍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胜利——这就是‘左’倾的愚蠢行动。如果我们不偏激，继续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

在1956—1957年，当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时，我们党第一个举起了反对这种危险的旗帜。1957年会议就是在这种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召开的。正是苏联共产党，建议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原则写进了宣言草案。

你们妄说，似乎整个二十大，其中主要是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是修正主义扩散的主要原因，这是愚蠢的谎言。

生活证明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按照列宁的要求勇敢地、主动地在二十大上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是何等的正确。帝国主义宣传及其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们鼓噪一时，企图把这一根本转折说成是思想混乱、瓦解、“共产主义危机”。现在中国同志实质上是在重弹敌人的老调。但实际上，这是深刻的净化过程，激发和团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形势很快明朗了，经受了锻炼的和再次检验了自己队伍纯度的共产党员们，放下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所积留下来的令人忧郁的包袱，登上了视野更加开阔的新的巅峰。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需要提醒邓小平同志，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公布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草案。但您是否记得，这次坚决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修正主义错误，是我们党主动提出的？

与此同时，我们党严格遵循列宁关于需要开展双向斗争的教导，时刻对教条主义保持着警惕。在其他党代表团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建议把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评述写入了1957年的宣言之中。由于中共和阿劳动党领导人的活动，教条主义的危险性大大地增长了，有鉴于此，在1960年的会议上，坚决谴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其声明中详细评述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您在我们这次会晤的发言中，您只字未提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问题。这意味着你们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6月14日的信里，你们对此公开发表了意见。你们把教条主义仅仅理解为“机械地重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服从他人加给的意志”等。但这仅仅是教条主义的一个方面。所以，你们对教条主义的理解不是列宁主义的，而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难道这不是对宣言和声明的修正吗？

我们清楚地懂得，你们何以这样做——依然是为了败坏苏共的名

声，为了把其他兄弟党学习苏共的革命经验说成是教条主义(各兄弟党认为需要在声明中专门强调苏共经验——根本的国际主义)。但你们是否知道，假若各兄弟党响应你们的号召，那遭受损失的不是苏共，而恰恰是需要这些经验，并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这一点的各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邓小平同志昨天在发言中，对苏共肆意吹毛求疵，您甚至忘了您在重蹈那些最卑鄙的反共覆辙。比如，您说，似乎所有那些模仿苏联经验和榜样的兄弟党都“革命意志衰退”，“革命队伍涣散”，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来，您想以此证明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无耻谰言。

昨天，您百般诋毁英勇牺牲的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似乎他们“幻想和平过渡”；诋毁为聚集力量而生活、而斗争的光荣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您指责该党把游击队同民族解放军合并、积极参加战争并不断在人民群众中扩大自己的影响是“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

言论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是危险的，它们会削弱并不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灭顶之灾。看来，您的出发点是196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原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夺取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当兄弟党，尤其是执政党跌向小资产阶级革命，跌向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左”倾宗派主义，跌向“左”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这时“左”倾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就开始成为突出的危险，其程度绝不亚于修正主义，而且不仅是对一个党，而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警惕着修正主义的危险。但当反修正主义的任务开始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和损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当正如列宁所说，“借反对右倾的斗争组织狂热的活动……那我们就应该说：‘够了!否则危险将会变得更大!’”对于你们而言，围绕“当代修正主义”掀起风波，这已不是什么狂热活动，而是分裂我们运动的烟幕。

现在，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已十分清楚，中国领导需要反对修正主义的歇斯底里式的佯攻，为的是吸引对近来日益增长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注意力。如果我们不像以前对待修正主义那样，对所有共产党人发

出警报——警惕绝不是出自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那里的特别危险性，那我们就将自动放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

昨天邓小平同志发言的实际用意何在呢？其用意在于，他不仅不澄清、不否认我们列举的中国领导在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搞宗派活动的事实，而是相反，实际上是肯定中国同志将一如既往，继续搞这些活动。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志们！在对头6天的谈判做总结时不能不得出一定的结论：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一整套完整的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总路线的真正内容。

你们关于世界革命的话语在这里骗不了任何人。你们企图利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来达到自己的特别目的。你们把“‘左’倾言论”当作武器，想倚仗它轻易地败坏苏共政策的名誉。你们妄图欺骗那些不熟悉列宁主义真正实质，没经受过无产阶级斗争锻炼或远离现实政策和以现成模式与立场对待生活的人。

但生活正在擦亮人们的眼睛，看清你们政策的真正目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坚定地、顺利地前进，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将通过那些今天不惜一切力量顽强同热核战争危险作斗争，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人，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人，帮助亚非拉人民的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人的双手来完成。

那些口称革命，而对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十分不责任和准备离间亚非拉人民的人为一方，他们的革命性对于另一方——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又值几个钱呢？

试想一下，假若中共领导的路线得逞，那它就会给所有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无穷的损害。它将引导国际工人阶级偏离可靠的马列主义方针，放弃工人阶级斗争最重要的问题，把工人阶级引入死胡同。它必将使各兄弟党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立的境地，最终颠覆工人阶级世界解放运动和革命事业。

我们不相信中国领导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理论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的结果，是这些缺点偶尔导

致你们“左”倾，迷恋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和政治幻想。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你们的文件和你们的许多实际步骤，根据你们的发言，邓小平同志，无论您愿意与否，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你们有某种特别的目的和阴谋。你们的“左”倾“革命”词句仅仅是掩盖和烟幕而已。

我们不禁想问你们，同志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否提出了继续造谣中伤，施展阴谋，不搞垮苏共和苏联，不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不罢休的任务？

苏共代表团再次呼吁中国同志，放弃你们在会晤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停止对我党的阴谋活动和造谣中伤，走真正共产党人需要的、研究现实问题的道路。

你们应该听一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明确的意见，听一听经过对帝斗争考验的各兄弟党著名领导的意见。

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的党，我国人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为和平与安全，为民主、民族独立，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

我们党为这些目标而生活、斗争，我党代表团为了这些目标而行动。如果从这些任务出发，那使我们统一的东西就会超过使我们分歧的东西。

那时我们的双方会晤就会有积极的结果。

邓小平：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是否休息？

苏斯洛夫：休息。

邓小平：应该遵守你们的章程。

苏斯洛夫：休息到星期一上午10点。同志们，说妥了？

邓小平：很好。

№13012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1963年7月15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自讨论武装力量建设问题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在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武装力量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完善了部队的组织机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准备、战斗和战役训练能力，用新式武器、现代化飞机、坦克、雷达和其他的军事技术装备武装了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那样一种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侵略集团指挥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其他措施。

鉴于此，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根据已经工作的经验，讨论旨在继续完善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和战役训练以及提高其战斗准备能力的措施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此外，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已经请求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

考虑以上所述内容，苏共中央认为，于今年的7月26—27日，在莫斯科召开有政府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是适宜的。

在此次会议上，可以讨论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A.A.格列奇科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和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以及研究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关于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中的请求。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致兄弟般的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赫鲁晓夫

1963年7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78—3979页

№13013 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 条约组织(1963年7月15日)

华沙

致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亲爱的主席同志！

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的委托，我荣幸地向您、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年5月14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捍卫者的首脑，提出如下内容的请求：

为继续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与经互会成员国在一切方面的合作，认识到华沙条约组织的重大意义——它真正地捍卫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果，完全拥护华沙条约的目的——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并关注到全球各个地区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新式武器武装日本；因而意识到，必须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根据以上所述内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声明：自己希望根据华沙条约第9章规定，加入1955年5月14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加入华沙条约——具有严格防御性质和使命，是成为确保根据联合国章程规定的集体安全的重要工具的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一起，坚定不移地履行上述条约规定的全部义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征求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条约。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预先表示自己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协助将这个声明通告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政府知悉。

致以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63年7月15日

于乌兰巴托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3980—3981页

No08112 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 **[64] (1963年7月15日)**

第八次会议 [65]

7月15日

邓小平：开始。

苏斯洛夫：请吧。

邓小平：我代表团今天由彭真同志发言。 [66]

中共代表团代表彭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7月13日波诺马廖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令人遗憾的是，你们的这次发言表明，你们没有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而且，你们在会谈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特别是你们昨天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沿着加剧分歧、制造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我们代表团7月12日的发言，就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两个中心问题，即关于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团结的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观点，向你们提出了同志式的忠告和积极的建议。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谈才开始，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双方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有利于弄清是非，弄清双方的论点，寻求共同语言，逐步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而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竟然对我们6天的会谈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的、最迫切的问题的一套完整的错误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条所谓总路线的真正思想。”你们甚至说，我们的全部发言“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一整套最无根据的谎言和捏造”。你们企图利用这样的

遁词来逃避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论点的讨论。你们甚至威胁说，我们的谈判“是走不远的”。更离奇的是，你们说我们“没有举出一个事实”。同志们，如果苏共代表团第三次的发言是出自一个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谈的人之口，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在两次发言中列举的大量事实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讲的，你们总不能说没有听到吧。这显然只能说明你们不敢正视我们提出的大量事实，更谈不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应有的教训和结论。你们企图用“捏造”呀、“臆造”呀、“诽谤”呀这一类词儿，来否认你们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对待事实、对待真理的态度。

也正是由于你们的这种态度，你们认为似乎不需要讲任何事实、任何科学论证，就可以随便给我们加上种种罪名。你们甚至从帝国主义的造谣工厂那里捡起一些陈旧的，诽谤我们要发动热核战争。老实说，对于你们这种极其低劣的手法，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凡是不同意你们的意见的人，凡是敢于批评你们的错误的人，你们总是给他们加上什么“反苏”啦、“反共”啦、“托洛茨基分子”啦、“反革命”啦，等等罪名，把他们当作你们的仇人。这是你们惯用的伎俩。但是，请苏共同志想一想，你们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处呢？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你们的错误开脱吗？就可以把批评你们的人的嘴堵住了吗？过去你们这样做，没有成功，难道现在和将来你们就会成功吗？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都着重阐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和观点。令人吃惊的是，苏共同志在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立场和观点说成是什么“左倾的”、“假革命的”空谈。你们甚至攻击我们说，我们用革命的词句来作为掩盖我们“丑化苏共和苏联、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烟幕。你们认为我们“无休止地重复革命词句”，对你们来说是“多余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你们自己不屑于讲革命，而且厌恶别人讲革命。你们认为，谈论革命是“多余的”。这恰恰说明，你们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这恰恰说明革命还是不革命，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是我们同你们的分歧的一个中心问题。

因此，不管你们是多么厌恶革命，我们今天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同你们再一次讨论这个我们之间分歧的中心问题。

让我们先来讲一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的确，应当说，听了你们的发言，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你们背弃了宣言和声明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你们心目中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确实是一条反对革命的总路线，或者说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你们的发言和你们许多言行，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在对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都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的。

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问题。我们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动员全世界人民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观点，是同宣言和声明的论点完全一致的。

声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接下来指出：[\[67\]](#)“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

但是，你们却违反宣言和声明的观点，实际上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你们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你们竟然跟肯尼迪、尼赫鲁和叛徒铁托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一样，说什么中国主张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行世界革命。你们不是明明知道，

声明曾经正确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用世界战争来推行革命，只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诽谤吗？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一下界限吗？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定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政策，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后来，他在1947年又说过：“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宣言和声明也指出：“各国人民都清楚，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指出可以取得世界持久和平这个光明前景的同时，必须向群众指出客观上还存在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只有让群众看到这两种可能性，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既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又不致于在帝国主义如果把世界大战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措手不及。

可是，苏共同志却认为，如果同时指出两种可能性，就是对和平力量没有信心。苏共同志甚至有过这种说法，如果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就是吓唬人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认为已经不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消除世界战争的绝对保证。这并不表明对于维护和平的信心，而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动员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

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是否现在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把消灭战争当作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国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宣言和声明都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声明还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多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苏共同志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核武器出现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你们却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说：“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消灭自己的同类。人，按其本性和气质来说，并没有想杀人的特性”。

他还说过：“你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仰徒吗？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不用说，这样的看法，同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宣言和声明，是相背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了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

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就讲过这个问题，指出了世界持久和平的光明前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中，就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正如声明所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可是，苏共同志却一直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说，在核战争的面前，“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地球上消失了”。

他还说：“在紧张局势下，‘冷战’会很容易地变成热战，并且是温度很高的热战——核战争，它不仅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烧尽一切。”“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方舟——地球。”

我们坚决反对你们的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人类毁灭”论，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的正确论断，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能表明你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

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有效地防止核战争。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以便推行它们的核讹诈政策。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

我们不能理解，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同志无数次地一味宣传核战争的恐怖，这种做法，究竟对于保卫和平的斗争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在敌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甚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害怕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害怕得发抖，敌人就会对我们慈悲起来吗？相反的，这种大肆宣扬核战争恐怖的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但吓不倒帝国主义，反而会吓坏自己的人民群众，使敌人更加猖狂，使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更加严重。那才真正是中了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你们一再攻击毛泽东同志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关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我们应该怎么办的一段话，好像这是中共的一项最大的罪证。但是，这种攻击难道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吗？我们在1960年81国党的会议上，就驳斥过你们。我们党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任何的核战争，并且要用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世界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究竟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难道那时我们就只有向帝国主义投

降吗？难道我们就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牺牲而放弃抵抗吗？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应该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但是，你们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毁灭。这实际上就是说，只能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屈服，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老实说，毛泽东同志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论点而讲的。他正确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极而言之，即使人类死去一半，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批驳了认为核战争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另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了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歪曲为我们主张用消灭人类一半的办法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不能歪曲为我们不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任何共产党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唯一正确的立场，只能是坚决抵抗到底。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应当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吗？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我们的正确立场，不是恰恰证明，你们坚持着一条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路线吗？

在关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正确方针，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宣言和声明都指出，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世界战争的爆发。声明说得好：“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的确，如果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和斗争上面，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但是，如果像你们那样，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

命运，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只能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你们的许多言行，证明了你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你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你们热衷于鼓吹“美苏合作”，希望肯尼迪同你们一起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创造可靠的条件”。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

我们愿意郑重地忠告苏共领导同志，你们的这条以美苏合作来乞求和平的路线是靠不住的。它不仅不能维护和平，相反的，只能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会使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使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这是一条鼓励侵略、导致战争的错误路线。这是一条有害革命的路线。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路线。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指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我们充分估计到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伟大意义，对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革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我们在前两次的发言中，都批评了苏共领导贬低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对它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力图为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和错误政策辩解，力图否认你们所执行的是一条反动和取消民族解放革命的路线。但是，你们的毫无力量的辩解，更加证明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苏共同志说，在你们的纲领中有许多地方谈到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确实，你们在这里或那里也不能不讲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用一些漂亮的词句，来为你们的错误路线打掩护。但是，你们在最重要的地方，例如，在苏共的纲领中，在谈到保卫和平的力量时，恰恰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为什么你们偏偏这样做呢？很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是同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立场有关的，这是同你们这些年来做了一系列损害民族解放运动利益的事情有关的。

我们曾经指出，苏共同志轻视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表现在你们认为只有在总共5000万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企图拿1960年声明关于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的论点来替自己辩解，这是徒劳的。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指出：“对于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符合1960年声明的。

1960年声明一方面指出旧的殖民制度的崩溃，另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拉进军事集团”，他们“力图阉割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

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

我们批评你们掩饰新殖民主义政策，正是以声明的论点为根据的。你们把我们的批评说成是低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恰恰说明了你们要取消总共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违反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观点，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直接同盟军。苏共同志歪曲我们的这一观点，说什么似乎我们认为“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恰恰表明，苏共领导把当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

不错，目前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现时代，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民族解放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没有形成产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民族解放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是旁观者或追随者，而应当并且能够成为领导力量。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苏共同志低估民族解放革命的伟大意义，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取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苏共同志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革命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开来，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不是别人，而是苏共领导把自己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隔离开来。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背弃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不支持 and 反对民族解放革命，因而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只能怪你们自己，而不能责备任何别的人。

令人惊异的是，苏共同志并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采取可笑的、老爷式的傲慢态度。在第三届亚洲团结会议上，你们的代表，企图以全面彻底裁军、和平主义的路线来代替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一贯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坚决进行民族独立的正确路线。你们横蛮无理地破坏大会书记处的决定，硬要把没有被邀请的人强加于大会，破坏亚非团结。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劝你们的代表要支持大会的正确路线，要遵守大会书记处的决定，要维护亚非的团结，反而遭到你们的污蔑。你们完全颠倒是非。

你们这些错误主张和行动遭到大会的坚决反对之后，你们竟然辱骂不同意你们的错误路线的人是什么“六亲不认的伊万”。你们的这种态度，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吗？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离开阶级观点的种族主义吗？难道你们这种老爷式的态度，不应当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吗？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什么中国同志“用好话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领导他们的可能性”。这种说法，不仅是对我们的诽谤，也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侮辱。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相互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能够说，光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够“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他们是可以用几句漂亮的空话来欺骗的吗？

说实在的，你们倒是经常说了不少听起来很美妙的话。但是，为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不相信你们的“好话”呢？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你们并不是真正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要把他们的反帝革命斗争纳入你们的和平主义的轨道，实际上是要他们忍受新老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奴役。

你们口头上也说要“消灭殖民主义”，但是你们的药方是什么呢？

你们的一个药方是全面彻底裁军。你们说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就意味着“彻底和最终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你们还不厌其烦地宣扬

帝国主义能够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帮助不发达国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等待帝国主义变成和平使者和慈善家。

你们的再一个药方是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你们说：“现在联合国已经宣布了最终消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具体日期。而这期限并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十个月。”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联合国的恩赐，等待新老殖民主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们在刚果事件中的错误立场，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这个药方，会带给民族解放运动多么严重的恶果吗？我们不知道，苏共同志究竟根据什么断定，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会在几十个月内结束他们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掠夺、侵略和奴役呢？

你们的又一个药方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又把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作为民族解放革命的前提条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比垮帝国主义，而不去进行反帝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总之，不管苏共同志怎样辩解，你们在民族解放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唯恐他们的革命斗争会妨碍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唯恐他们妨碍你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这种正确的立场，说成是什么“玩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诬蔑。

你们口头上也反对种族偏见，但是，根据你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你

们实际上鄙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实际上把他们看作低人一等。看来你们真正是染上了种族偏见的病毒。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还强调地指出：“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你们说我们不承认新独立国家有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完全是捏造。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是有根本分歧的。从你们7月13日的发言中，我们进一步地看清楚了，你们所反对的就是列宁所坚持的观点，即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是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在你们看来，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权在什么人手里，就是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手里，也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你们的观点，才真正是要堵塞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 [68]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说过，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分歧，并不是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也就是赞助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只在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形式问题上转来转去，却极力回避这个原则分歧的实质。

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们提出和平过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提供什么新的斗争形式，而是为了反对革命。你们提出的和平过渡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早在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我们就说过：“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和平过渡’，同马克思、列宁所曾经提出的和平过渡，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

马克思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

列宁认为，俄国在一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手中”。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论点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也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在人民手中”，只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和平过渡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已有“现实的可能”。究竟在哪些国家存在着这种现实可能呢？

你们在发言中辩护说，你们也说过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是的，我们也知道你们说过这些话，但是你们说这些话是不真诚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就指出过：“我们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同志们！你们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一点呢？

你们口头上讲非和平过渡道路，其实只是一种烟幕，是怕人看出你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你们反对革命的手法，就是经常不断地宣扬：“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你们提出“和平过渡”的论点已经8年了，请问，8年来这种可能性究竟在怎样“扩大”着，又“扩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在上两次的发言中，一再指出，在你们“和平过渡”路线影响下的古巴人民社会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伊拉克共产党等兄弟党的教训，请你们考虑。那么，已经证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的，是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呢？还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是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党的教训呢？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革命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和“自我牺牲”。你们这些言论，正像列宁所说的，“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叫苦”。

列宁还说：“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列宁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你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同列宁的革命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你们在发言中攻击我们说：“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竟把议会同国家机构混为一谈。”

看来，你们似乎是不同意把议会同国家混为一谈的。

可是，就在你们发言中提到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著作——《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中，却明明白白地说：“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

你们的发言认为，不能把议会和国家混为一谈。

赫鲁晓夫同志却认为，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究竟你们谁的说法代表苏共领导的观点呢？

其实，你们发言中的说法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说法，都是为你们抛弃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你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辩护的。两种说法的矛盾，只不过是表现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混乱罢了。

你们在新独立国家革命发展的问题上，也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批评你们这个错误的时候，引证过列宁

这样的一段话：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织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接着，我们指出：“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的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实在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你们在发言中说，“列宁的讲话和你们断言，毫无相同之处”，还说，“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中国同志们妄图加在他身上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就等于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请你们把列宁的这段话再仔细读一遍，请你们也把我们所说的话再仔细地读一遍，看看列宁的话和我们的“断言”，究竟在什么地方“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列宁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吗？难道这是我们强加在列宁身上的吗？为什么这样就是“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呢？

你们还说：“听了你们发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十个获得解放的，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按着你们的说法，不论什么阶级的政党，不论什么阶级的国家，甚至像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之流执政的一类国家，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听信你们这一套，那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说你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你们死不承认，那么，你们的这段话究竟说明什么呢？

你们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又在什么地方同列宁的革命理论有相同之处呢？

下面我要讲讲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前两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

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忠实执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我们反复地说过，谁是为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能根据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来判断。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经验证明，只要按照这些正确的原则办事，兄弟党的团结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就能够得到巩固，即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反之，如果违反这些原则，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使用压力，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诬蔑和攻击的做法代替协商一致，那必然要损害团结，那就要犯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我们在7月8日和7月12日两次发言中，在批评苏共领导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时候，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不听从你们指挥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居然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举不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感觉很奇怪，我们在两次发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你们是真的没有听见呢，还是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们自己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

对波兰施加军事压力的，不是你们吗？

对待阿尔巴尼亚，你们所能够施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不是都施加过了吗？

而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呢？^[69]正当我们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对我们施加种种压力，你们的企图，很明显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压服。你们对我们施加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还嫌少吗？

你们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国家执行

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压力。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你们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你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甚至把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那一套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合作关系方面来。对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各种压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从1956年以来，我们曾经多次批评过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多次劝告你们要铭记列宁的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训。你们不但不改正，而且在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污蔑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力进行分裂活动和派别活动”，说我们提出了“暂时少数的理论”，并且说这“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关于多数、少数的問題，首先是你们在1960年提出来的。你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何在呢？

事实证明，你们一再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的办法来代替平等协商的原则。你们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体面的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70] 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的。在目前不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提出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在1960年就对你们这种错误提出了批评。中共中央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指出：“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事实很明显，违反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

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又一次批评了你们的错误。我们当时说：“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责中共‘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志’，认为这会‘造成分裂’，‘破坏团结’，这种说法，显然是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否定了你们的多数压制少数的错误观点，又一次肯定了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

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列宁主义的，是你们；破坏宣言和声明的，还是你们。

你们以所谓“多数”作为你们手中的一个法宝，对不同意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兄弟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排斥这个，明天排斥那个，你们就越来越走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在兄弟党的关系中，你们一贯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你们把你们一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你们把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分歧，说成是“中国领导人一方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你们一直这样说，俨然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我们再一次地问，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呢？你们不应该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 [71]

你们对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指挥的兄弟党，就指责他们进行宗派活动。实际上，搞宗派活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你们就在兄弟党中间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举例来说，你们曾派米高扬同志去动员阿尔巴尼亚同志同你们一道反对中国共产党。你们干的这种丑事，已经被阿尔巴尼亚同志当众揭穿了。这一类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勾当，你们干的还少吗？

你们自己不进行反省，还污蔑我们进行宗派活动，这难道不是完全

颠倒黑白吗？

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路线已经给许多兄弟党造成极大的危害。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接受了你们错误路线，学你们的样子，对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的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排斥的政策，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些同志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坚持革命的。对于一切要革命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理由不同他们来往，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坚持真理的立场，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坚持革命的斗争。我们支持这些革命的同志，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对待一般的国际友人，都欢迎同他们友好往来，为什么偏偏地不能同这些革命的同志来往呢？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企图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污蔑我们以自己的理解代替了宣言关于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定义。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1957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们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符合1957年宣言的，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

宣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

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他尖锐地批评过那种简单照抄外国的现成药方，来解决本国革命问题的教条主义，他说这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他还说：“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与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

难道宣言错了吗？难道列宁错了吗？难道列宁和宣言都是“按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反对教条主义的吗？你们一天到晚大喊大叫地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对这种真正的教条主义，对这种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教条主义却采取保护的态度呢？拆穿了说，就是要把你们那条错误路线强加给别人，要别人跟着你们的指挥棒团团打转。

你们这种挥舞指挥棒的做法，强迫兄弟党服从你们的意志，指东只能向东，指西只能向西，这才真正是对兄弟党极大的不尊重和侮辱。

真正的教条主义，你们不反，你们要反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呢？我们早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就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看来还没有懂得什么叫作教条主义。”“你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一句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

从伯恩斯坦起，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情况的变化，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

列宁在《怎么办》这本伟大的著作中指出，当时许多国家的不同名称的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你们正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反对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能不导致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进一步的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危险更大了。这就更加证明了宣言和声明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你们硬说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

主义，这是对宣言和声明的明目张胆的篡改。你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转移斗争的目标。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上的分析充分地说明，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对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的看法，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们在那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正是因为苏共领导犯了这样严重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在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宣言、声明的革命原则，提出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我们在这封信中还说，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首先提出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并且把自己的这种看法说成是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就是可以容许的；而我们把我们的看法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就犯了弥天大罪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苏共领导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自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认为有权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有权垄断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有权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指责我们竟然胆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际的问题，似乎我们无权对这个问题说一句话。你们的这种禁令下得实在太奇特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宣言和声明中的一个最重要革命原则问题呢？如果可以把这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一笔勾销的话，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岂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苏共领导禁止别的兄弟党谈论这个问题，而自己却经常大谈特谈在这个问题上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观点。你们不但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在自己的报刊文章中，宣扬你们的修正主义观点，给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提出一个千篇一律的“和平过渡”的药方，而且你们还经常发号施令，挥舞你们的指

挥棒，命令这个兄弟党或者那个兄弟党，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这不是唯我独尊的老子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们在会谈中并不要同我们讨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是要企图迫使我们接受你们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你们早在会谈之前，就在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责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你们的什么“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就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实际上封了门。在会谈过程中，你们又蛮不讲理地坚持你们的错误路线，越来越放肆地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恶毒攻击。在会外，你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苏联人民中间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感情。你们在中苏两党会谈内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的。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把中苏会谈作为你们加剧两党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的手段，作为你们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备步骤。

昨天你们的报纸发表了苏共中央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这个文件，我们党将在详细研究之后，给予评论。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领导发表这样性质的一个文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请问，你们究竟要把我们的会谈和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苏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实际上是把两党内部会谈中你们代表团发言的内容公开化，并且对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加以歪曲和攻击。你们悍然片面地破坏了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苏共中央应对你们所采这一严步骤的后果承担责任。

现在，你们已经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在这个十分严重的时刻，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为重，不要把事情做绝。

从这次会谈中双方发表的意见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所牵涉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两党没有理由不经过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烦的讨论，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以便寻求共同语言，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事业，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到这里来参加会谈的。尽管事情已经恶化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我们并不想断定，苏共领导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一切道路都堵死了。在我们方面，我们仍然抱着最大的耐心，竭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的会谈能够朝着有利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着苏共同志也做相应的努力。

邓小平：讲完了。

苏斯洛夫：要到星期三上午10点吗？ [72]

邓小平：可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49—3977页

№08113 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年7月17日)

第九次会议

7月17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们代表团发言的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共代表团代表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在7月15日最近一次会议上听了彭真同志的发言。中共代表团这第三次发言再次坚定了我们谈判之初所形成的印象：中国同志前来谈判不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交换观点，不是为了克服分歧和使立场接近。

看来，中共代表团不想真正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轻视我们的结论，一味重复已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遭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驳的对苏共的荒谬指责和诬蔑。

中国同志们不想往前走甚至想往后退的意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彭真同志的发言里。我们反复听到的都是同一种歪曲之词或无关紧要的事实，同一种引文甚至同一话语。可以认为，今天不是1963年7月，而是1960年11月。如果说在彭真同志的发言中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更多了一些谩骂和不负责的诬蔑。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代表团执意重提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并歪曲他们的实质，想借以引起论战。例如，彭真同志为什么需要重提早已彻底解决了的匈牙利和波兰问题，把他们公之于众？现在甚至在联合国里也没人谈论这件事了。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搬弄这些问题，尽管你们清楚地知道，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了的。

在1957年1月18日发表的苏中联合声明中(中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同志)写道：“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反革命叛乱，完成了自己对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完全符合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

你们也十分清楚，匈牙利和波兰兄弟党领导人早已亮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坚决批驳了中共领导从中捞取“资本”的意图。卡达尔同志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一切有觉悟的和诚实的匈牙利人都会满怀感激之情回忆起苏联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在1956年所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援助……由于这一援助，才粉碎了帝国主义重新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强加于匈牙利人民头上和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军事基地和战争活动舞台的企图。”

至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哥穆尔卡同志已给予你们详尽的回答。当时他说：“……对中国共产党在今年9月10日给苏联共产党同时也交给了我们党的信里所涉及的关于1956年波兰事件的问题，我们不能沉默不语。我们要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谁需要这个？这是什么目的？问题早已解决，而且是对波兰和所有人民有利的。我们认为，没有丝毫的理由重提这个早已解决并被遗忘的问题。”

难道中国同志还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考虑的要比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党员们高明？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

三地不仅在这次会晤中，而且在兄弟党之间重提这些问题？他们是否想唤起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结局不满的民族主义反革命分子？

你们对待事实毫不严肃的态度，是你们在这次会谈中所采取的卑劣的手段的明显证明。比如南斯拉夫问题。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还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只想说说你们的观点，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在起草委员会上承诺不称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仅过24小时之后就违背了承诺。中国的同志们甚至讥讽我们，说哪怕过48小时也好。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那我们称赞你们这种幽默。让我们看看没有偏见的见证人——当时的速记吧。其中写道：

“苏斯洛夫同志向起草委员会报告南斯拉夫小组所提出的措辞。

在通过这一措辞之后，彭真说：‘补充一点。在小组会上，由于苏斯洛夫同志同意未来在我们的报刊上不再重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再坚持把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措辞写进去。’

担任主席的苏斯洛夫同志也声明说：‘同志们(中国同志们)这样表述是不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党的什么承诺，我是说，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不想把南斯拉夫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任何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说那里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未封口。’

彭真：‘我们还不封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党未作任何承诺。我们当时认为在报刊上专门讨论南斯拉夫社会制度性质问题是不合适的，苏斯洛夫同志已声明过这一点。在实际中，我们坚持了这一想法。你们引用苏斯洛夫的发言绝对是没道理的，因为这些话是在欢迎兄弟党的招待会上讲的，而不是在公开的报刊上。后来，当你们利用南斯拉夫问题挑起论战和喋喋不休地强调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站出来捍卫真理，在报刊上发表了客观分析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文章。逻辑本身表明，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其他兄弟党，都不能本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签署声明。

在兄弟党声明中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错误而受到威胁。但是，难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受到威胁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表明南斯拉夫存在这些成果？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谓受到威胁的。

对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十分清楚，如果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革命成果被断送的危险，那么，所有兄弟党的责任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巩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地，努力不使危险成为现实。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苏共中央实施了巩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成果的路线。在贯彻这一路线的时候，过去和将来我们都努力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犯的错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错误和迷惘给以严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

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中央表示极端不满，说我们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信并表明了对信的态度。彭真同志说，这是恶化我们两党关系的“极端重要”的一步。

这种说法让我们吃惊。难道不是你们，中国的同志们，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天天骂我们，似乎我们害怕刊载你们的材料和公开进行论战？难道不是您，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发言时宣布欢迎苏斯洛夫同志的表示：在我们党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中共中央的信？你甚至说，我们对这封信的复信将在中国报刊上转载。你们现在为什么又愤怒呢？

我们反对你们的指责，似乎我们破坏了关于谈判结束前暂不公布有关谈判消息的协议。首先在我们的公开信里没有有关谈判的消息。其中只是对谈判形势的一般估计。这种估计我们也是被迫做出的，它是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谓“中苏谈判在开始之前已遇到严重阻碍”的回答。而且，在这篇文章里实际上已将谈判的材料公开——实际上它转载了邓小平同志7月12日发言的许多东西。你们《人民日报》的文章是13日公布的，而我们的回答公布于14日。到底谁第一个在报刊上涉及谈判的过程？

至于你们说似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反华运动，这纯属诬蔑。我们党忠于国际主义原则，任何时候，不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进行反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其他人民的运动。另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的党组织里现在正在讨论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材料，其中包括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问题。

但苏共中央全会不能不讨论在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所寄来的信。如果在全会期间我们不让中央委员知道此事就答复你们，那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个集体领导问题。现在全国正在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讨论六月中央全会的工作。自然，他们不能绕过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央全会工作中占一定位置，是中央全会通过了你们所清楚的决定。

你们指责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和对该信的复信。这明显地暴露了你们的一个企图，企图把你们给谈判制造困难和因你们的过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复杂局面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给中共中央制定自己特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权利找根据，说中共中央认为可以这样做，因为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里似乎第一个阐述了自己的总路线。彭真同志甚至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苏共似乎“禁止”其他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对于总路线的观点，“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居”，起“老子党”的作用，等等。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陷入了窘境。假如，你们认为需要认真地和不带偏见地阅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那你们就会相信，我们的党没有意图在信里提出什么自己的总路线。在这封信里，我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宣言和声明关于根本问题的立场，换言之，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这样做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中国同志在其1962年底和1963年初所发表的文章中，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是何等的糊涂，肆意解释宣言和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给你提示一下所有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声明的根本原则是非常有益的。当中国的同志们提出自己的特别方针，以此在许多根本的问题上同我们3月30日的信相对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宣言和声明的最重要的原则。

为证实上面所说，我举下面几个例子。

在3月30日的信里写道：“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可以看出，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兄弟党声明的有关原则。

对此中国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直接指责，苏共的路线——这是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放弃革命的路线。

而且，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在论述当今时代的特点时也回避这个问

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越来越决定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6月14日的信里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彭真同志在7月15日的发言中又重复了这个错误观点：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而是亚非拉地区“是对帝国主义实施直接打击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我们请中国同志回答我们，在宣言和声明中哪里写到这样的原则：亚非拉地区——这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我们还请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发誓要忠于宣言和声明，那你们为什么，有什么根据在所有发言中都拼命回避声明中所载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不断增长这一最重要的原则？

还有一个例子。无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里，还是在我代表团谈判发言中，我们都逐字逐句地引用声明中的下述重要原则：“可以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企图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出现了从人类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

你们在谈判发言中严厉批判这些最重要的原则，企图证明，坚持类似观点的只有苏共。同时你们还拿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批判了的“关于两种可能性——有还是没有世界战争”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结论相对抗。彭真同志长时间毫无效果地向我们证明，似乎在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一原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在宣言和声明中有一处原则证明了彭真同志的这些论点？宣言中一处也没有。

第三个例子。在我们3月30日的信里和这次谈判我们的发言里，引用了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发言中，彭真同志千方百计辱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歪曲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我们想直接问你们，同志们，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正确性？如果不承认，那就勇敢地说，不同意宣言和声明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还可以举其他许多的例子，说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里和苏联代表团在谈判发言里所阐述的立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措辞上都是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而中共中央是直接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为什么没提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理由。我们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完全赞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而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你们不同意宣言和声明。

你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路线，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它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途径、它巩固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的根本政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有益于世界革命过程的顺利发展，解决当代所有根本问题的保证。

正如你们在这次谈判中在发言时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上，中共领导采取了与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立场。你们的立场是贬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两种体系经济竞赛的意义，轻视经济发展的意义，放弃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的立场。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增强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关心每个国家经济顺利发展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进一步融合的立场。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我们谈判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中国同志发展了自己关于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论，抛弃了1960年声明中所载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增长的原则。实际上，你们不是把世界反帝革命斗争的领导作用归结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归结为，如果用阶级的语言表达，便是亚非拉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正如你们所表述的，“具有爱国情绪的王公贵族”。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捍卫这些错误观点。同时，他们还采取偷换概念的手法。本应讨论什么矛盾是基本矛盾，而中国同志们却提出了其他问题——他们指责苏共，似乎它强调，一切矛盾都在“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与和平过渡的过程中消失了”。的确，手段是“高明的”，但这能瞒过谁呢？

你们在任何一个苏共文件里，无论是它的纲领里，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找不到这样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说，似乎在两种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阶级和民族矛盾”就可自行消失了。正如1960年所说的，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的经济竞赛为开展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看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意识到了自己立场的脆弱性，现在开始说，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很好。但这一原则怎么能同中共领导人关于亚非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观点相提并论呢？不能同意这一论断，因为它，正如上面指出的，是明显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想用这些论断，为你们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对世界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辩护。

看来，为了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需要完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所谓“七项条件”。

他号召苏联领导人“严肃考虑”这些条件。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莫非考虑向后转，回到苏联社会已走过的发展阶段，迎合中国的理论家们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或人为地煽动起阶级斗争？或回到个人迷信时代的可恶实践？

你们的“七点”所暗指的就是这些。

或许你们想用诸如“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的团结”等这些办法为社会主义国家谋福利？

当然，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请问，谁不知道这些众人皆知的真理呢？正如现在弄清的，除了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里有谁反对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反对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呢？整个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些任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上早已前进了很远了。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已几乎20年了。它无论在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全面国际合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

实践经验。自然，我们离解决所有问题还差得很远。但要对共同经验宝库增添自己一点或大或小的贡献，必须实际参加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可，而不能靠口头理论，总结什么“七点”、“十点”甚至“二十点”之类。你们近年来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之外，采取观望并且是常常进行批评和恶毒批判的态度。

共产党员们是务实的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振兴本国经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形式，发展最新生产部门，理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是对从事革命斗争的世界工人阶级和所有人民给予援助的最可靠的途径。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清楚了，你们是两种体系和平经济竞赛思想的顽固敌人。不用吓唬我们，似乎我们的立场是“最新革命成果”！你们的道理只能骗那些分不清事情的本质、受“左”倾词句影响和草率拒绝经济竞赛路线的傻瓜。可以相信，你们在懂得列宁主义本质的人当中找不到这样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牢固地掌握了：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竞赛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它完全符合1960年声明。它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成就，在这一竞赛中取胜——这是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帝斗争事业、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事业、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我们曾多次引用列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嘱咐我们的正是这条路。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为现有的全部经验所证实。

首先建立在经济胜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这是所有人民社会主义成果不可侵犯的主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越强大，他们干预反革命“出口”的能力也就越大。难道古巴的例子还没说明这一点吗？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军事经济潜力，我们能给予古巴所需要的援助吗？古巴能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眼底下站住吗？帝国主义只习惯考虑实力，只开声援大会和发表揭露性文章是不能迫使帝国主义却步的。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潜力越大，他们就越有能力帮助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人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在革命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破坏的

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越强大，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也就越大。

你们不要企图强加给我们，似乎我们指望由于我们在经济竞赛中取胜，资本主义便“自动垮台”。我们清楚地懂得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对革命斗争的整个影响机制。社会主义革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每个国家的劳动者、该国人民和该国共产党自己的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代替他们革命。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过，似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就不再需要了。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当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活中实际实现了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仅靠理论论据和道理——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重要——来说服群众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实际，通过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使劳动者生活得更好，走向革命所要求的斗争和牺牲对群众有利。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今天就能使群众成为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即在现代条件下，在存在两种社会体系的情况下，完成列宁所论证过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工人运动之中。

之所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讲述这些，是因为中国同志回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为了在务实的气氛中对话，我们想听听你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示范作用的伟大革命意义？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成就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军事威力提高了粉碎任何反革命“输出”企图的能力？最后，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的经济成就使新独立的国家容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你们继续回避回答这些问题，你们想以此肯定你们对这些问题的否定态度。

众所周知，面对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只有一种选择——即所谓的“革命”战争：非此即彼。如果认为热核战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又何必竞赛呢，又何必花气力去发展经济，又何必绞尽脑汁考虑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和从事各种生活“琐事”呢？

说实在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事情的。有一个时期，你们提出了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当时你们似乎站在了和平经济竞赛的立场上。后来，当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遭受挫折之后，这个口号在中国就很少提起了，以后就彻底不提了。从那时起，你们就开始了对和平经济竞赛思想的声讨。

为了故作镇静，你们现在给自己的经济挫折找到了所谓的“理论根据”，你们企图安抚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指出在革命胜利的第14年他们所遭受的贫穷和困难，不是中共领导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为了“世界革命”所必须耐心而热忱忍受的牺牲。

我们当然理解你们的困难处境，也准备帮助你们。但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子”而抛弃列宁的经济竞赛原则，接受你们提出的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冒险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同志对待这个问题很片面。乍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是对的，一方面不能干涉其他方面的事情，应该遵守平等，尊重独立。谁也不反对这一点。但不能忘记，平等和不干涉——实质这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都同意的原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要求的要多得多。众所周知，列宁当年甚至提出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服从世界范围里这一斗争的利益。

在当代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本国的利益、本国人民的利益应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相结合。

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沉默不语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近些年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实践越来越背离列宁主义。

比如，中国同志们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合作化这个问题的立场。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只提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攻击苏共和苏联的理由。

所有兄弟党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每个单独的国家 and 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都依赖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的不仅是苏联，它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有着更大的意义。

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今天我们和你们讨论的则是另外的内容了：如何更好地把一国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实际加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这将给我们两个国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带来好处。遗憾的是，中共领导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与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共产党相对立，中共领导提出这样的方针——“每个国家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何不好。苏联的共产党员们也认为，各国人民首先应该利用本国的国内资源建设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苏联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但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今天，绝对采用这一公式意味着拒绝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主义优势，意味着独立发展的方针。

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比你们的理论原则更清楚地暴露了你们的真正立场。现在，尤其是从中国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济联系的角度看，这一立场完全带有另一种色彩。

你们对诸如国民经济计划协调一致、外贸统筹安排这样一些为实践所肯定的实际操作形式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在这些事情上，你们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中共领导的特别立场。你们早就宣扬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政策的方针。宣扬这种观点——意味着提倡民族局限性，拉向后退，而不是前进走向当代社会大生产的顶峰，意味着遏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以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福利的增长。

中共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基本方针的表现就是如此。走上你们所指出的道路——这意味着颠覆甚至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合作。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观点，似乎苏共二十大方针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请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混乱？也许是在连今天帝国主义分子都不敢否认的苏联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成就里？也许是在克服了一切困难、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的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里？

仅最近4年时间里，经互会国家生产的电力就从3290亿度提高到5040亿度，开采煤炭从4.82亿吨增加到5.36亿吨，生产钢从7200万吨提高到1.01亿吨。1962年同1950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匈牙利1倍，保加利亚2倍，民主德国1.6倍，波兰1.3倍，罗马尼亚2倍，苏联2倍，捷克斯洛伐克2倍以上。

这是什么“混乱”？不，你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混乱”的影子。但在你们特别观点风行的地方可以找到它。这是事实，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跌到这种地步，你们一连几年不敢公布事情真相的统计数字，不向人民通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

受你们鼓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使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孤立，脱离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导致阿尔巴尼亚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停滞不前。

中共领导加剧中苏关系紧张的路线。中共领导人削弱社会主义体系的路线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你们力图颠覆苏中关系上。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列举任何事实，不仅把现在的苏中关系说得一团漆黑，而且歪曲过去，一笔勾销苏中友谊光辉的一页。

邓小平同志在7月8日的发言中表示了要揭开苏中关系恶化原因的愿望。他认为这些原因在于，似乎苏共“仇视”中国共产党人，因此攻击中共，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甚至谈到，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决议中关于苏共执行发展苏中关系方针的声明似乎是“为了破坏中苏团结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观点多么荒谬！中国同志为了把苏联兄弟般的援助说得一无是处，竟蜕变到了何等程度！

苏斯洛夫同志已谈到苏联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我想补充一点，所有这些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是在我国尚未治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创伤，而且本身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刻提供的。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攻击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它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的列宁主义方针。各兄弟党都公认，正是苏共二十大决议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关系现在成了真

正平等、真正互利、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这里面有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巨大贡献。

中国同志理应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才上了规模。取消了斯大林生前苏中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取消了我们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取消了苏中合股公司，取消了禁止其他外国人在东北生活的协议，等等。“关于中国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取消所有障碍和隔离应归功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我们才吐出了当年硬塞给我们的苦果。”

中国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正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消除了伤害中国尊严的现象，苏联方面才表现出了完全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1957年11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同葛罗米柯同志会谈时，他特别谈到这一点，为此他还在1958年7月对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过感谢。

我们的这些行动伴随着中苏相互合作的增长。例如，在1959年，我们两国经济往来额几乎比1953年增长1倍，达到83亿卢布，这时为中国建设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材料增长了3倍。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些年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站稳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阵地，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努力。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经常同你们协调行动，在最重要问题上和苏联对外政策行动上向你们通报情况。

我们对待中国人民的整个方针表明了和正在表明，我们一直真诚地希望中国繁荣昌盛。我们认为，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现在你们宣布，苏中关系恶化和我们两国之间经济、贸易、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往来减少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须知这纯属谎言。有哪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会相信这一点？

有鉴于此，必须特别指出，尽管从1958年起，你们开始贯彻自己特别的路线和对我们不友好的方针，我们在1958、1959、1960年这几年里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而且数额不断增长。至于说从1960年之后，这种援助有所减少，那这是中国领导同志自己开始拒绝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造成的。

在同兄弟党代表会谈中，在报刊上，在此次会谈中，你们肯定地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召回自己的专家，似乎这成了中苏合作减少的主要原因。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中国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号召要尊重事实。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近几年中国方面违背苏联方面不断扩大同中国经济往来的愿望，走上了削减这种往来的道路。

1960年10月31日中国副外长罗贵波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照会，要求修订以前所签订的所有关于工业项目建设、关于技术和科学合作的协定。1961年6月19日，根据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顾卓新的要求，减少了苏联对89个工业企业和35个独立车间、设施和其他项目的技术援助任务。1961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会谈时提议推迟2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该协定签字距此时刚刚过去2个月。1961年12月，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宣布中国政府打算全部停止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在1960年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同志正式宣布，缩小基本建设和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是：第一，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已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因此今后许多项目中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建设；第二，中国政府决定集中精力搞短期的和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因为中国在1959—1960年期间大部分资金都搞了基本建设，再者，由于农业歉收和在短期内不能扩大短期矿产的开采和出口，国家收支平衡出现了较大的困难。

此外，你们还说，苏中经济往来的减少似乎是召回苏联专家所致。

由于你们奉行减少同苏联经济联系的路线，包括贸易、科学技术合作和提供的军事物资在内，我们两国之间总的经济合作规模，在1962年已降到1959年的36.5%，其中成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降到1959年的2.3%。

令我们十分不安的是，中国的同志们不断减少同苏联的联系。正因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呼吁中共中央制止这一过程，不把意识形态问题带到国家关系领域。在这方面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最近3年时间里，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中国政府签署长期相互供货协定，协调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销货物以及租赁外国商船的行动。在

1961年贸易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互换贸易情报的意向，并递交了相应的协定草案。1963年4月22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谈判时宣布，苏联准备以贷款形式给中国提供扩大锡矿生产的设备。1962年底，苏联方面建议同中国机构举行谈判，核定按照1962年5月13日意向书所规定的中国在1964年想从苏联购买设备的数额和名目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没收到有关回音。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苏共的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路线；另一条是中共的压缩和颠覆这一关系的路线。

我们认为，苏中经济联系的现状是完全不正常的，我们再次建议研究我们两国之间加强相互贸易、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经济问题。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建议讨论同中国长期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前景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为了我们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交换世界市场贸易政策问题方面的情报。

中国政府找各种借口回避苏中共同努力建设互利的经济项目。例如，按照政府间协定，共同建筑了兰州阿克斗卡铁路。苏方早在1958年就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友谊”车站）。而中方停止了施工，留下一小段没修。甚至没有向我们说明其中的原因。为修这条路我们花费了近5亿卢布。

你们的发言迫使我们再次向你们提起关于苏联专家和使用他们经验的真实情况。我们给中国派去了专家，认为你们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他们。但从1958—1959年起，中国当局突然恶化了对我专家的态度，不再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他们很多人实施跟踪，企图唆使他们反对我党的政策，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与此同时，中国行政当局开始要求苏联专家接受违反技术规则的决定，在会上“教育”他们，指责他们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所作所为，迫使我们召他们回国。

不过，1960年，米高扬同志受苏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会议上在同中国代表正式会谈时宣布，如果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苏联政府准备把他们派回中国。后来还多次提出这一建议。关于这一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共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团成员会谈时也谈过。但是你们回避，没有给予回答，至今还在回避，不实施派遣专家的相应协议（1961年6月12日）。与此同

时，你们继续无根据地指责苏联召回专家的不友好行动。

我们认为，你们千方百计煽动苏联专家问题只有一个目的：把你们近年来经济建设失败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不能不指出，专家问题，是你们有意识地不想解决，以便利用它煽动反苏运动。

我们再次向你们声明，如果你们确实对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感兴趣，如能为他们提供正常的条件，那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

我们党以兄弟友谊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已有好多年了。即使在你们采取骤然恶化苏中关系方针的时期，苏联共产党仍教育苏联人民深深尊敬中国人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世代永存，如果利用出现的分歧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播下纠纷的种子，那将是犯罪。

由于你们的过错，苏中文化交流合作一年比一年减少。1961年的文化合作比1961年减少了一半，按照你们的意见，1962年又减少了一半。

你们是破坏苏中军事领域和对外政策领域相互合作的罪人。按照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苏中条约，双方有义务统一兵力，“以便禁止日本重新发动侵略和破坏和平以及任何第三国直接或间接联合日本发动侵略”。这些义务至今仍然有效，任何人也没给这方或另一方解除这些义务。

中国方面如何履行这些义务的呢？

当年我们提出了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以迎合你们关于帮助中国建立海军的请求。你们这次提到了这件事。可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否定的立场，而现在又企图把此事说成是苏联想控制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在自己的东南前哨既没有现代化的舰队，又没有为潜艇提供联系的电台。

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必须最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每次谈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的实际措施时，你们总是找各种借口，躲避合作。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国防实力。但你们对发展我们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实际的贡献呢？

如果你们真的想反对美帝国主义，那你们就应该经常关心同自己的盟友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自己的国防努力了。

苏中条约规定，中国和苏联“将就涉及苏联和中国共同利益的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彼此相互协商”。根据这一条，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经常主动同中国方面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我们两国的对外政策行动。我们向你们通报了鉴于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苏联拟采取的步骤，通报了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通报了在苏联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情况，等等。我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供了苏联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会谈的记录，苏联和其他国家会谈的材料，经互会会议工作总结等。仅从1960—1963年期间，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国方面提供这种信息材料就将近140份。基本上这些都是最可靠的情报。

您，邓小平同志，在今年7月8日的发言中，歪曲事实，说您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的情况和苏联的立场。我们可以提醒您，去年10月23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国大使刘晓同志会谈时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出现的形势和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后果。所以说，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事件的原委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你们，你们早就停止了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1958年，中国方面当时没通知我们你们要炮击台湾海峡近海诸岛，这一决定是在赫鲁晓夫同志离开北京后不久做出的。据很久以后毛泽东同志承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之时，中国同志们已做出决定实施这一战役并已开始准备，但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向苏联政府通报此事。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还是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进攻中国意味着进攻苏联。

近年来，中国政府根本没向苏联政府通报从1955年起中美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晤的情况，据报刊报道，会晤已达100多次。从1958年5月起，你们两次改变对日政策方针，你们违背1950年条约，这两次均未同我们协商。

中苏边界，以往长时间是蒋介石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犯的目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则成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象征。但由于近年来你们对苏联采取了不友好的方针，中苏边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形势。这是中国政府预谋已久的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此次

会谈中捏造似乎苏联把苏中边界推到了中国领土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把你们的这一声明看成是企图为你们在苏中边界上的挑衅行动辩护。

你们第一次大规模破坏苏中边界是1960年夏天，当时中国牧民在布兹阿依吉尔地区闯入了苏联领土。从那时起，中国方面侵犯边界的事屡有发生，数量不断增长。1962年破坏边界近5000次。现在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从今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某些地段，尤其是在远东，中国边防军和受他们指使的个别中国公民猖狂地进行挑衅，挑衅我边防军。只是由于苏联边防军人的克制，才避免了公开的武装冲突。

侵犯苏联边界是中国当局指使的，一位越境的中国公民身上所携带的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说明了这一点。该命令直接号召在苏中边界上进行挑衅行动。“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有争议的岛上捕鱼时，苏联边防军人常常提出要求，要求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我们建议继续在这些有争议的岛上捕鱼，对苏联军人说，这些岛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在这一命令中还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考虑到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方面不会采取暴力措施，把我国渔民从岛上撵走。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则应声明，为了保持友好关系，可以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上撤走，但应向苏方声明，是他们破坏中苏友谊，其行动是非法的。”

我已经提到布兹阿依吉尔地区牧民大规模越界的事。1960年随同牧民们一起越界的马吉阿克萨拉公社社长对我边防军说，这次越界是根据中国当局的直接命令进行的，现在没有中国当局的许可他们害怕返回中国领土。

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我们自然要问：难道破坏苏中边界现在成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我们建议对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确定进行磋商表示沉默。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中国大使馆图片橱窗问题也完全能说明问题。我们想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在谈判中大肆夸张这个问题，在报刊上也赋予它政治性质？苏联外交部已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做出了解释，同时还表示了我们的遗憾，声明要处分打碎橱窗的学生。为什么你们就此加剧紧张气氛？当你们对我国在华机关工作人员不止一次

做出类似事情时，苏联一次也没有这样对待你们。

我不再举这样的例子，但如果中国同志想了解，我们可以举出这些事实。

我们十分清楚，你们利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理由在中国劳动群众中煽动反苏情绪。现在看来，这成了你们的路线。

我们清楚，在中国，尤其从1961年起，在会议上，在政治课上，随时处处进行反苏宣传。在中国人民之间，进行类似的反对苏共及其领导的活动，是粗暴地违反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原则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

中国同志们喜欢说自己刊登材料时的所谓客观性。但众所周知，在中国，苏联领导人的某些讲话，有关苏联的新闻都要经过别有用心地检查，肆意歪曲，按照资产阶级报刊的精神进行解释。在中国，苏联领导人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讲话无人问津，你们努力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在美化帝国主义。你们的报刊已经开始刊载反苏的宣传画。

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你们对待列宁的态度。你们千方百计劝人相信，只有中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无可驳辩的列宁思想的诠释者。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怎样对待列宁的思想遗产呢？你们说，中国要出版列宁著作、列宁文集。但其中许多著作你们都作了这样的安排，使人们对列宁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你们甚至勘正列宁的作品，删去其中某些字句，以便为你们的反列宁观点辩护。在苏中文化合作谈判时，中方代表拒绝苏方的建议，把在中国办列宁宣传画展改为了玩具展。

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事实雄辩地证明，你们有意识地贯彻恶化苏中关系的方针。

当必须分析你们的举动时，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举动的真正原因何在？难道中国劳动者需要这些？难道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客观理由。问题完全在于你们预谋的政策，这一政策服从于你们的冒险主义意图，完全是由于你们企图制造苏中关系紧张气氛，以此为你们的反苏方针和你们所有的分裂活动辩护。

从你们的行动可以看出，你们想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开手脚，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以使你们较为容易地把你们有害的路线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整个国际联系用来为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思想斗争服务。为了这一斗争，中国领导不顾一切，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利益。

你们并不感到羞愧，这一危险的方针损害着你们党的威信，在人民心目中玷污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领导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正统性，死乞白赖企图说服众人，正是他们现在高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但这一奢望一联系你们的所作所为便化为泡影。怎么可以又谈论世界革命、捍卫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同时又破坏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怎么可以一边说“永远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一边又实际上奉行反苏方针，教育自己的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故乡、仇视列宁的党！

在这次同中共代表会晤中，我们再次有机会深信，中共领导的言论同其实际行动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深信你们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你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你们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路线，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行动，带来了哪些实际后果？你们力图破坏苏中友谊意味着什么？

你们所有行为，包括此次会晤中的行为，促使我们问你们：你们是否同意，需要巩固成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反动派侵害可靠保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应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赢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和平经济竞赛的胜利？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互相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所有优势？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顺利发展的利益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民族利益，要求通过自愿而平等地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通过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来完善国际劳动分工？

我们想听听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而直接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以中共为一方，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

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面的分歧已经很深，正如人们所说的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我们清楚地懂得这条路上的困难。我们深信，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关系只能损害社会主义体系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应当坚决停止这一过程。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在我们会晤中，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苏中关系已到崩溃的边缘。7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这样公开明确地讲。类似声明不能不使人警惕，因为我们坚信，苏联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成为这样提出问题的理由。

我们应该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依然加剧苏中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对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重大责任。

我们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不要继续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回到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我们在这方面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们再次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发生根本好转，我们两国人民，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都期待着这个。

苏斯洛夫：下次会晤怎么安排？

邓小平：后天。

苏斯洛夫：后天10点？

邓小平：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19—4050页

№24296 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1963年8月10日)

苏联共产党基洛夫工业州委员会

绝密

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局：

现呈送中共中央的小册子和信件，这些材料是在基洛夫1号车站找到的，具体情况如下：

8月9日2点26分，当莫斯科—北京第8号列车停留在站台的时候，一队送行旅客的中国人把一本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小册子留在了站台上。

И.多布罗拉德尼克

1963年8月10日

附件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1963年7月10日)

1963年7月9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中谴责中国一些机关在北京集会声援5名中国同志——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中国政府召回这5名同志，在中国居民中点燃对苏联的不友好情绪，使中共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形势复杂化，并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旨在破坏苏中关系的蓄谋已久的运动，而没有顾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

目前正在举行中共代表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有理由期待在谈判过程中能平静地讨论到中共分歧的有关问题。但是，苏共中央与期待相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掀起新的攻击，中共对此被迫予以公开答复。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包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的内容是完全不正确的。共产党人应该尊重事实和公正性。实际上，有人在中苏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破坏中苏关系和使谈判形势复杂化的手段。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就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信的答复。苏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苏共中央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然，中共中央应该系统地阐述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尽管我们不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阐述的意见，我们还是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便让我们党和中国人民都了解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样做很正常，在兄弟党关系中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也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消除分歧和巩固合作。但是，苏共中央不仅没有刊登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在自己的一系列决议和声明中诬蔑说，中共中央的信含

有对苏共的“诬蔑性和无根据的攻击”。始终不让人们了解中共中央复信中的内容，而是对这封信进行攻击，说信的内容是对苏共的“攻击”，放出一个大的空话，难道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么？

早在中国报纸刊登苏共中央3月30日信之前，苏联机关和个人就开始在中国散播这封信。此前他们就开始散播一些苏共领导层和苏共中央机关有关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同志是同意这些文件的内容的，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此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它的党和政府的代表机关及人物公开散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已经公开的文件，在相互的基础上这是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干涉这类活动。不过，中国机关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共中央却说成是对苏联主权的破坏和对苏联内部事务的干涉。这个逻辑完全行不通。如果这个逻辑行得通的话，难道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丧失主权的国家了么？

中国机构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联政府却要求中国召回相应的个人。这个要求没有任何根据可言。但是，中国方面以中苏团结为重，没有对在中国的苏联机构和个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方面的克制态度世所共知。至于中国机关在北京举行声援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召回的5名同志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弄清楚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并表达了巩固中苏友谊的愿望，这中国在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所做的最低限制的事，这样做是有益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共中央要严厉谴责这次集会。难道苏共中央的同志要求我们宣布这5名同志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么？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平等的。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这件事呢？“允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团结。对待中苏之间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如下立场：坚持原则、巩固团结、消除分歧和对敌联合斗争。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言行一致。现在有这样一事实令我们感到不安。苏共中央不仅在散布中共与苏共之间在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还通过组织各级党机关集会通过决议的形式和通过发表冗长的演说和文章的形式，在全国开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同志想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何种程度？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团结，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全世界的同志和朋友都对中苏谈判寄予厚望，期待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使中苏两国的友谊得到维系和巩固。只有美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势力和铁托叛徒集团才期待中苏谈判破裂，和中共与苏共决裂。中国和苏联的团结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让朋友伤心和敌人高兴的事。我们真诚地期待，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宣言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逐步消除分歧，巩固团结，共同对敌斗争。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1963年7月19日)

7月14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同时还刊登了7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这是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对这封信评价道。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的这封信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我们不能同意信中阐述的观点。中共中央对这封信进行了评论，对涉及了的问题进行了澄清。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登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同时也刊登7

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以便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并对之进行比较和研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将在其他中央机关报和各省市机关报上刊登。

中共中央还决定通过对外广播向全世界播送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公开信，同时也播送7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共全体党员的信。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知晓我们的这封信，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过我们的信以及我们立场和观点的反对者在6月中旬广播时可能没有听到。现在我们再次转播我们的信，期待那些人能听到它。我们特别期待，我们的反对者能耐心听一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助手头掌握的资料对我们给予相应的批评。坦白地讲，这些人对我们的批评并不合适，也不能让人信服。至于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转播是因为它是份文学杰作。在中国的诗作中应该说是“一部令人深受鼓舞的作品，很难挑出错来”。很有可能，当苏联广播这份“杰作”时，广大革命群众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不想或者没有耐心去听。我们劝告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要以这种态度对待这件事，应该耐心听听，好好研究一下，把这份杰作刊登出来，把积极的和消极的材料比较一下就可以或多或少得到正确的分析和批评。不批评这个思想就不能发展唯物主义；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为了进行批评就必须掌握另一方的资料。现在这封苏共公开信正好就是用于负面案例学习的典型材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应该祝贺苏共中央最终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7月14日的信件。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和对待中共中央的文件态度一致，能继续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包括从去年12月1日开始的我方刊登的7份文件以及我方7月1日、7月5日、7月10日声明和现在这份声明，以便让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能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一些中央及地方报纸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从7月15日开始，又陆续刊登了一系列翻译过的和自己写的文章以及读者来信，利用这种形式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以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政党的机关报，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文章在我国的报纸上都予以刊登，我们将对这些攻击进行答复，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苏共中央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这很好。说了总比没说好。马列主义者尊重事实和真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如果我们都一直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而不是与之相反，那中苏分歧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势力和南斯拉夫叛徒集团开始众口一词地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诬蔑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颂扬和诬蔑之词。我们将把这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以便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也会“赞叹”这些东西。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24, л.163-173

№08114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

[73] (1963年7月19日)

第十次会议 [74]

7月19日

邓小平：我们可以开始了么？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 [75]

邓小平：今天我们代表团由康生同志发言。

中共代表团代表康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了7月17日安德罗波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

你们的这篇发言再一次表明，你们不是在会谈中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而是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对我们继续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并且为你们破坏中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贯错误行为打掩护。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代表团在前几次的发言中，阐述了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的观点，指出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路线。但是，你们的发言却对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的讨论采取回避态度。

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曾经多次指出，我们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而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关于是否目前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是否要区别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问题的分歧，是应当怎样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的分歧。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曾经问过你们：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界限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难道不是应当按照宣言和声明指出的，也是我们一贯指出的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依靠当代各种保卫和平力量的斗争，而是要依靠什么苏美合作，甚至同美帝国主义搞一些不可

靠的勾当就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吗？难道无数事实不是已经证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一条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而按照你们的办法，只能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加剧战争的危险？

在当代革命的问题上，我们问过你们：你们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的这种立场，难道不是十分错误的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你们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的核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吗？

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错误路线，批评了你们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你们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你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仇人。难道不正是你们的这些错误，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吗？

对于所有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苏共同志怎么可以避而不答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苏共同志7月17日的发言，还颠倒黑白，倒果为因，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协议，撤退全部专家，使对方经济建设受到巨大损失，使中苏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不断缩减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同美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对于这些举世周知、铁案如山的事实，你们的任何强辩，任何抵赖，都是徒劳的。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我们将另作详细的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诚恳地希望苏共同志认真考虑我们党在6月14日的信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的7个条件的问题。但是，苏共同志的发言，却说是什么我们要你们考虑向后走，回到苏联社会发展中已经走过的阶段去，说什么我

们要你们重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煽起阶级斗争。你们的这些话，意思很明白，就是认为苏联现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在几次发言中还谈到批判斯大林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是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现在，我就来集中地谈一谈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首先，我要谈一谈斯大林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到怎样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重大原则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第一次发言中，已经简要地表示过我们的意见。

但是，你们在发言中竟把我们的意见，说成是“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罪行辩护”，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立场的有意的歪曲，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苏共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始终一贯的，对于苏共领导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始终一贯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为了给予斯大林以正确的评价，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从中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否定一切，任意地歪曲和篡改历史。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是以斯大林为首的。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 [76]，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 [77]，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 [78]，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79] 所实行的对外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基本上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斯大林在革命和建设，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在为苏联人民建立了伟大功绩的同时，也的确犯过一些错误，其中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

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肃反工作中，斯大林的领导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冤枉了许多好同志，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党和国家生活中 [80]，他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

如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次，斯大林也犯了一些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你们指责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的。虽然斯大林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应该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发展和捍卫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在你们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我们为斯大林辩护，不是为他的错误部分辩护，而是为他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辩护，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辩护，为列宁所缔造的伟大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辩护，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辩护。不仅我们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要这样做。

斯大林的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的财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长时期内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激烈的斗争。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完全不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是很难设想的。

斯大林的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我们需要把斯大林的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就不但不能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在实际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早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党内多次犯过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也是因为受了斯大林一些错误的影响的。早在30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是批评这些中国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的身上。我们进行这些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揭开盖子，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采取错误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一生不加分析，全盘否定；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你们没有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事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在这次大会之后使兄弟党接受事实。 [81]

你们对斯大林的批判，不是采取探索真理的态度，不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而是采取煽动的语言，进行咒骂。

苏共同志把斯大林说成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猪屎”、“白痴”。

这些咒骂都是出于赫鲁晓夫同志之口。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赫鲁晓夫同志辩解，说他对斯大林有“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是“原则性的态度”。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

老实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苏共领导为什么对于斯大林有这么大的刻骨的仇恨，为什么要用一切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他，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人民曾经在30年中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难道苏联人民多年来公认的领袖，竟然

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吗？难道苏联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验，就是在一个“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经验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混蛋”为首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难道几十年来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尖端技术的发展，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取得的吗？苏联的核武器和火箭技术，难道也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奠定基础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红军，它的最高统帅是一个“白痴”。难道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贡献，是在一个“白痴”的指挥下赢得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共产党，30年来是在一个“强盗”为首的领导之下的。难道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的苏联共产党，几十年内是以一个“强盗”作为自己的领袖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长时间内是在“狗屎”的领导之下的。难道各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内竟然把“猪屎”作为自己的旗手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长时期内最痛恨的无产阶级领袖，只不过是一个“赌棍”。难道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导师的吗？

同志们，你们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红军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侮辱。

你们是不是想过，那些曾经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人，现在这样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已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放在“凶手”、“强盗”、“赌棍”的同谋者的地位呢？还是放在“白痴”一类人的地位呢？

同志们，你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你们怎能这样地对待斯大林。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历史，又使你们自己十分尴尬。

当你们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的时候，你们就给整个苏联国家和党的

领导抹黑，同时，你们就无法分辨，那些当时参与这个国家和党的领导的同志们，对于你们所说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就以赫鲁晓夫同志为例来说，把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完全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把自己说得一身清白，这难道能够令人信服吗？

人们如果不健忘，就会注意到，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赫鲁晓夫同志就曾经多次歌颂斯大林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曾经不断地颂扬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等等。

赫鲁晓夫同志在1937年6月6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我们党一定毫不留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再如，1938年6月8日在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同志又说过：“亚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例子还很多，这里不举了。我们举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你们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说成黑漆一团，又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老实说，在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你们不如斯大林。斯大林做错了事，有时还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还可以向中国同志和别的人承认错误。而你们呢？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你们现在还吹嘘自己100%的正确，以“神人”自居，你们这样的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难道同列宁所说的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错

误、对待真理的起码态度，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正因为你们对斯大林采取了以煽动和咒骂代替探索真理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你们不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你们实际上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生的活动中大量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抛弃了，而把他所犯的某些错误继承下来，大大地加以发展了。

你们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苏联、苏共和苏联人民；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你们实际上就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

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才真正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信誉”，“在世界劳动人民眼里破坏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最近8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帝国主义就利用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都趁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绝境逢生，大肆活跃起来。他们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苏共领导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从1956年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全盘

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为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打开了缺口。

苏共领导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恰恰是关于新的社会制度将朝着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问题。你们的结论是应当“使无产阶级专政及时地发展成为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新的更高阶段的全民国家”。

你们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是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苏共纲领说：“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这是“提出了并且解决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82\]](#)

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但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但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83\]](#)

列宁又说：“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

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 [84]

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斗争。” [85] “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最觉悟的、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 [86]

不难看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一贯认为，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二、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已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复辟；

三、建设社会主义；

四、反对旧社会的传统，教育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

五、完全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撇开对外的任务不讲，单就国内的任务来说，都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并且“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

你们也无法否认，在苏联社会中，还存在着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寄生分子等等。你们也无法否认这些人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同这些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全民的”斗争呢？怎么能够说，要消灭任何阶级，而不

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产生这些分子的根源呢？

列宁指出，消灭剥削阶级的观点和习惯，消灭剥削阶级的一切残余，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当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完成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的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根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呢？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仅还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而且还经常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说过：“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不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时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87]

列宁还指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的影响，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从这方面来看，也不能得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结论。

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消灭“任何阶级”，不仅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而且包括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他们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不只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而且是没有工农的阶级差别的社会。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88]

列宁又说：“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

义，阶级才能消灭。” [89]

要做到消灭任何阶级，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就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列宁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90]

只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还没有消失，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依然是必要的。

苏共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在苏联已经不必要了。

我们要问：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任何阶级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工农的阶级差别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进入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没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了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经消灭了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了吗？没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天，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包括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阶段。

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是“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

但是，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缩短到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按照你们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是限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存在着对抗性阶级的时期。只有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必要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只要把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以后，对剥削阶级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苏联早在30年代、全盘集体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必要了。按照你们的说法，不仅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二十二大以前，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误”。

同志们，不是的，你们过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错误，你们现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全民国家”才是真正的大错误。

当然，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形式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就以为可以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企图引用列宁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解释的一段话，来替你们的错误论点辩护，这是完全徒劳的。请你们看一看，列宁究竟是怎样解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91\]](#)

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要一直存在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请问，究竟是谁把自己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难道不正是你们把自己的错误观点，既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又强加在列宁身上吗？

苏共同志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国家还存在；取消了无产

阶级专政，才能使民主发展为“真正的全民的民主”。这也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有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随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会逐步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你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所谓“真正的全民民主”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反列宁的观点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民主相结合”。^[92]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剥削阶级实行镇压，同时对劳动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人民民主的发展。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为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到世界空前未有的地步。^[93]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苏共领导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荒谬的修正。你们在苏联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没有彻底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条件下，在还存在着工农的阶级差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条件下，就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国家”，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

你们这样做，或者是为了吹嘘你们领导下的社会制度发展如何“迅速”，在理论上如何标新立异，如此而已；或者是真的要放弃对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和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就当然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果是前者，纵然是错误的，但危险还可能比较小；如果是后者，那就不能不使人十分担心了。^[94]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全民党”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用“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这同以“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荒谬的修正。

按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党之所以成为“全民党”，其理由是：一、党现在依靠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三、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是真正的全民的党。

坦率地说，这不是严肃的论证，而是诡辩。

如果因为人民都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党，就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早就应该是“全民党”，而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那么，先锋队和群众的区别也就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的问题了。

如果说党员成分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就是全民党，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阶层的人，它们岂不是都可以叫做“全民党”了吗？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只有在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后，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完全消失而消亡。只要还有政党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你们就在半路上宣布苏联共产党已经不

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已经成为“全民的党”，那岂不是要放弃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历史使命、放弃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吗？那岂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成为另外一种阶级性质的党吗？

苏共领导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同它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有关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历来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但是，我们的这种主张和作法，同你们用“反对个人迷信”来代替列宁的党的学说，代替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代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你们引用毛泽东同志、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某一段话，硬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错误做法，这是徒劳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全党应该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最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如果不是在集中指导下，就不可能有广泛的民主。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党，就不可能实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战胜阶级敌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久经考验的、富有天才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有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的，是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拥有这样威信极高的领袖，是这个党的政治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我们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领导，这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全面论述，说成是你们“第一次遇到公开为个人迷信辩护的事”。这种诡辩，对你们是不会有有什么帮助的。

你们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就是把党的整体同组成整体的“个人”对立起来，把党的领袖同党员群众对立起来。

你们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你们又大力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你们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推行你们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开辟道路。

你们不仅在苏联大力推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活动，并且硬要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也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这实际上是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事实证明，你们正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活动的掩护下，进行着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坦率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来破坏无产阶级事业，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后，他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

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已经逝世的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说他“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他“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降到了中纪的或者东方的迷信的地位”。

可见，你们提出的所谓所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是从巴枯宁、考茨基一脉相传下来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

你们搞的这一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停止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来进行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损害和削弱各国共产党战斗力的一套错误做法。现在，应该是回到列宁关于党的完整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列宁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问题，不仅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讲的这些问题以及前几次发言中讲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相信，他们是能够从实践中辨明是非的。

苏共同志知道，我们本来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但是，现在公开争论既然已经被他们搅动起来，就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就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双方应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把双方的论点明明白白地、清清楚楚地摆在自己党员的面前，本国人民的面前，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面前，让他们来鉴别是非。绝不应该遮遮掩掩，封锁对方的观点，掩盖争论的实质，采取歪曲欺骗的恶劣手法。这种手法，只能被认为是害怕事实、害怕真理、害怕群众的表现。

7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虽然，在你们的公开信中，有很多事情不符合实际，有很

多观点我们不能同意，虽然你们采取了这样严重的步骤，虽然你们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但是，我们仍然准备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的公开信。对于你们这个公开文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党将在研究后予以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7月8日的发言中，曾经说过：“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辨别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7月14日，《真理报》也发表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苏共同志知道，我们过去多次发表了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谁都知道是攻击我们的。可惜的是，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在6月14日信件中提到的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都阐述了我们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问题的重要论点。

我们也发表了苏共中央6月18日的声明、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95] 的决议和7月9日的声明，苏共领导却没有发表中共中央7月1日、7月5日、7月10日的声明。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办法，发表我们的7篇文章和我党中央的3个声明，以便于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充分了解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以利于我们双方寻求办法，实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目的。

现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殷切地期待着我们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能为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才指望中苏会谈失败，中苏两党分裂。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公开插手中苏分歧，印度反动派正在利用中苏分歧从中获利，叛徒铁托集团正在趁机浑水摸鱼，进一步起着作为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作用。这些革命的敌人，正在煽风点火，进行各种卑

鄙的挑拨离间的勾当。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能中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奸计。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义务。

我们在这里,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向苏共同志呼吁,同我们一起努力,通过中苏两党反复的、耐心的会谈,争取积极的成果,力求争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改善,力求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加强,以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康生同志的发言完了 [96]。

苏斯洛夫:请允许我谈一些看法 [97]。

苏共代表团对今天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将在以后发言中给予详细的回答。但是,我们代表团现在就要提出坚决的抗议,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同时,我们代表团抗议你们北京电台最近几天开始的同类性质的宣传。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你们在这里大谈特谈团结,但是,你们的行为和康生同志的这次发言,绝对不会有有助于获得我们对这次会谈所期待的良好结果。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98]

同志们!现在,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我们代表团对于两党会谈本身的建议。

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两个星期了。在会谈中,彼此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尽管我们双方的观点,一时尚难达成一致,但是,双方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坦率地摆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彼此相互了解,寻求逐步地取得共同语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过去十几天的会谈中,双方所说的话,已经不少了。我们需要把会谈的情况报告我党中央,以便我党中央仔细地考虑你们的观点,看

来，可能你们的中央也需要考虑我们的观点。当然，彼此都可能还有很多话要讲。讲话的机会是有的。

现在，重要的是彼此都把对方在信件中、文章中和发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冷静地加以研究，才有利于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使两党会谈获得积极的结果，为准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们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这次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个时间继续举行会谈。下一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另行商定。

我们双方都很清楚，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同意你们这样的看法：如果认为这些分歧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两党会谈暂停一下，并在双方同意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是比较妥当的。

我们代表团再一次表示我党的真诚愿望，这就是：对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进行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详的讨论。

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来。

我们深信，我们两党都理解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不辜负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特别是我们两党党员和两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以上关于暂停这次会谈和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谈的建议，请苏共代表团加以考虑。

这就是我想说的。 [99]

苏斯洛夫：我们明天答复你们。 [100]

No08115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1963年7月20日)

第十一次会议

7月20日

苏斯洛夫：可以开始吧？

邓小平：请吧。

苏斯洛夫：同志们！昨天你们代表团提出建议，暂时结束此次会晤，改在以后继续进行。你们建议通过我们两党党中央协商确定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研究了你们的建议，认为需要声明如下：

苏共中央多次指出，我党的一贯目的是克服出现的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巩固苏共和中共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以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会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们认为这一会晤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现有分歧，达到更好的相互理解。为此，苏共中央一如既往，将不惜时间和气力。

我们认为，中共为一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克服得越快，我们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进展得就越顺利。不能不看到，所有兄弟党赋予我们的会晤以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清楚地懂得，保留分歧和继续论战将给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带来严重的损害。

我们的会晤使双方代表团有机会详细阐述了本党对当代一系列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的立场，更好地弄清了现有分歧的实质。

从这一切出发，我们代表团准备继续谈判，以便取得积极的结果。但由于中国的同志们认为暂时停止谈判是适宜的，苏共代表团准备迎合你们的愿望。

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谈判，只有认真在比较双方的立场、双方努力克服现有困难和放弃攻击与无根据的指责的条件下，才能是有效的并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苏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中共领导想把苏共领导同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分开的企图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这是卑鄙手段，是必遭失败的。

中苏领导应该明白，此种卑鄙手段只能引起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

位苏联人的愤怒。苏联人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亲爱的共产党和以杰出的列宁主义者、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和为劳动人民的幸福、为和平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畏战士——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一团结像磐石一样，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居心险恶的诬蔑和诽谤碰到它，都会被彻底粉碎的！

在7月6日第一次发言中，我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需要在我们会谈中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问题考虑到了双方的愿望，它有可能逐条逐条地把宣言和声明的基本结论再修改一遍。

苏共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原则问题上，尽可能详细地交换意见，以事实为依据并以此促进克服我们两党关系中的困难。

但在你们对我党进行各种造谣中伤之后，我代表团自然应该进行应有的还击。

现在，当中国代表团建议暂时终止会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达成能促使我们两党关系改善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条件。

我们认为这些条件之一，是达成停止相互论战的协议。

在此次会晤之前，苏共中央早就主动建议停止论战，我们坚定地坚持这一建议。但到我们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不理睬苏共中央这一受到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建议，继续公开论战。正因如此，有必要公布苏共中央致苏联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公开信。

我们再次建议，不要给帝国主义宣传提供炮弹，不再公布包含有相互攻击内容的文章、声明和材料，也不进行电台转播，以便改善气氛，有助于双边会晤的准备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准备。

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同你们能达成协议，苏共中央准备承担相应的义务。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对克服现有分歧、使关系正常化和巩固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的团结，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表现出善良的愿望。我们坚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符合我们共同

的反帝斗争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利益。

我们还认为，关于我们两党这次会晤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是适宜的。

我们建议你们，注意讨论以下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莫斯科会晤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7月5—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 （以下是代表团成员名单）。

在会晤过程中，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各自陈述了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和苏中关系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提议，达成了代表团暂时休会、过一段时间继续会晤的协议。继续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将通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另行确定。

双方代表团，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进一步会谈和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条件，同意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们听了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苏斯洛夫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为了共同对敌，我们两党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还表示，此次会晤使我们两党有了进一步相互了解，苏共代表团同我们一样，将不遗余力使我们的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苏斯洛夫同志还说，苏共中央同意我们关于暂时中断会晤的建议。他表示同意，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另行协商确定。这一切我们都很高兴。

至于苏斯洛夫同志发言的第二部分，即谈到此次会晤过程的那一部分，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今天我不想说这些，我想今后还有机会弄清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再次声明，我们始终认为，在我们所进行的会晤这种范围里，公开阐明自己的意见和进一步弄清相互的观点，对我们继续会晤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们坚信，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也能够通过多次讨论逐步找到共同语言，做到消除分歧和巩固团结，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必须改善气氛，为所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他还说，必须改善和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些话。

苏斯洛夫同志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一贯主张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暴露在敌人面前。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祝词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党的这一立场。但事与愿违，公开论战还是发生了，它不是我们挑起的。

由于这一公开论战已经发生，由于我们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那么这一论战就应该按照平等的原则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讲过多次。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直是被迫的。我们从未首先攻击过其他兄弟党。只是由于其他党公开攻击我们党，我们才被迫给予回答。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只是在别人先发制人之后，我们才采取相应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以后我们也不先发制人。但如果别人先发制人，不论他走多远，我们都将奉陪到底。

我们请苏联同志们注意这一事实，不久前苏共公布了“公开信”，而且苏共和许多其他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多次攻击，对此我们还未给予相应的回答。自然，在我们给予了应有的回答之后，如果不出现言行不一这种状况，不对我们实施攻击，我党将不首先“攻击”任何其他党。

我们在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提出了，关于必须按照平等的原则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公平协议。至于苏斯洛夫同志说停止论战，我们方面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言行一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我们这次会晤之后，在两次会晤之间或下次会晤期间，我们和你们能够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最后，关于公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表公报。我们同意发表公报。

现在我们是否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研究一下你们提出的公报草案，然后我们再谈我们的意见。

苏斯洛夫：好。15—20分钟左右。

邓小平：那好。

苏斯洛夫：好。

(休息)

邓小平：关于公报草案，我们作以下修改。

我们建议，把谈交换意见的第4段改为以下文字：“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要的原则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你们看怎样？

苏斯洛夫：这可以接受。

波诺马廖夫：这里没有当代发展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把几种提法拼成这样：“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邓小平：好，通过。一切都清楚。

苏斯洛夫：我们委托两位同志进行核对。

邓小平：下一段。我们建议删去第一句，即“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是联合公报。所以最好以我们建议的提法公布。我们建议这样写：“双方达成了……协议……”，以下不动。

苏斯洛夫：我们的出发点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写。

邓小平：我们不坚持这一修改，但我们希望能够接受它。

苏斯洛夫：那么我们保留，如何？

邓小平：好吧。

苏斯洛夫：好。

邓小平：最后一段。我们认为，现在在我们的公报中先不提这个，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双方以后的实际行动来决定。

苏斯洛夫：我们认为，这对我们两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益的。

波诺马廖夫：这将受到大家的欢迎。

邓小平：如果苏共代表团坚持这个，那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双方同意，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应该共同努力，为达成公正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寻找理智的基础。”

苏斯洛夫：在你们的提法中，应不提“其他党”。我们没有受委托，我想你们也没有受委托替其他党说话，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彭真：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不能不涉及其他兄弟党。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参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铁托叛徒集团的代表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而我们的代表甚至被禁止宣读莫斯科声明的有关引文。所以，您建议的这种停止公开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在我们两党代表会晤中，我们应该真正的行动，不应该采取外交手段。如果达成协议，大家都应该遵守。

邓小平：我们提出我们修改的出发点是，达成大家都能遵守的公正协议。否则公开论战不能停止。

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这个问题所有党都感兴趣。既然这样，我们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不是强加给其他人。如果你们认为这将引起误会，被认为是其他党强加给的，那我们建议作这样的改动：把“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改成“我们两党同意并建议有关的兄弟党同意……”，以下文字不动。

苏斯洛夫：此处措辞，我想直接说，很模糊，意思不明确。可以这样加上：两个代表团双方表示希望，希望各兄弟党也积极评价我们达成

的这一协议，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想再次声明，正如我上面说过的，既然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那它就应该按照平等原则进行。现在又对我们进行了很多攻击，其中包括你们的公开信。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清这些问题，不应该对这些攻击进行评论？

苏斯洛夫：很遗憾，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未能同中共代表团就我们联合公报的这一条达成一致意见。

邓小平：对，我们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苏斯洛夫：怎么，今天就不要这段？

邓小平：好，我们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什么时候发表公报？

邓小平：考虑到我们还要向我们党中央汇报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后天发表。

苏斯洛夫：星期一我们可以公布？

邓小平：可以。

彭真：双方星期一都可公布。

苏斯洛夫：说定了。星期一你们还在这里吗？

邓小平：我们想今天晚上飞走。

苏斯洛夫：如果在北京如何修改呢？

邓小平：到时我们通电话。

苏斯洛夫：在公报发表问题上可以认为达成了一致意见？

邓小平：我们还要报告我们党中央。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今晚6点同我党中央主席团在城外奥加廖沃见面。

邓小平：谢谢。结束时我想说几句话。

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逐步找到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因为我们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

在讨论过程中，尽管我们双方都说了许多对方不能同意的观点，尽管你们说我们的话难听，而我们也说了你们的话难听，尽管如此，我们此次会晤还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和你们达成了关于发表今后继续会谈公报的协议。我们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同意，必须使我们的会晤继续下去，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协商。

在此我想顺便表示我们的希望，如果你们代表团，如果苏共中央同意，我们想邀请苏共代表团去北京继续会谈。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特别协商。

苏斯洛夫：这个问题，也要由我们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讨论。就这些。我们今天见？

邓小平：6点钟？

苏斯洛夫：6点。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86—4096页

No13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196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7月23日会议第10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鲁达科夫、波诺马廖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列谢奇科、葛罗米柯。

1.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的谈判。 [\[101\]](#)

葛罗米柯同志阅读了条约草案。 [\[102\]](#)

2.说：我们没有直接与不进攻条约联系在一起，但是，约定做出努力，以便争取达成缔结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不进攻的公约。 [103]

3.批准对公报草案的修改。 [104]

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协商会议。 [105]

不能刺激罗马尼亚。

关于对保加利亚人的援助——或者，提供一些煤炭。

关于对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的态度问题。 [106]

与中国人公开交手的时刻已经来临。

在废除条约的基础上——提出一切。就一系列问题准备信件，并寄发给兄弟共产党。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12

№138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1963年9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9月10日会议第11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中国的事情。

(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伊利切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

委托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是进行防御，而且还要进攻。

协议和休战——应该以证据作为基础。

关于中国公民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 [1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108]

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步力量的信。

除了信之外还有声明。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16-18

№13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1963年9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9月10日会议

H.C.赫鲁晓夫：现在，我想谈谈会议日程之外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的事情。 [109]

而这方面，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他没在这里，安德罗波夫同志，——这些同志们应该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了，应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集中了成千上万人；而如果我们回应得慢了，自然就会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

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做好长久的准备。应该不仅仅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现在需要反攻了。但是，我们进行反攻，同志们，不是利用责骂和侮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导致现在这种局面的事情。不。我们应该执行的方针，是能够争取休战和达成协议的方针。

因此，我赞成这样做。休战代表着什么呢？这不代表着证明是正确的，而是代表着揭露。然而，这种揭露不仅是体现在语言上，说这是不正确的，这是谣言，还要体现在证据上。

可以举一个例子。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仿佛断绝了与他们的经济关系，并把他们置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境地。这里有一封今天收到的列宁

格勒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得很好，充满了智慧；谁写的这封信——我不清楚，是工人自己还是别人帮他写的，但是，写得很好。 [110]

如果这样说，我们给你们的农业造成了损失的话，那么，自然，这是在你们那里没有我们的农业专家的时候。他们还说：你们召回了专家人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此可以这样说：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说——他们将着手这件事情时(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说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说的。当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这是正确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同意这种方法，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试试。”还应该说：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其他的我们什么也不能说，除了所说过的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弄清楚。

在工业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工业方面，除了提供原子弹之外，我们没有拒绝任何一个要求，所有订货，我们都给你们供应了，停止也是按照你们的建议。被召回的工程师和专家人员，也是因为你们对他们不尊敬的态度导致的。 [111] 可以举出例子。从我们的信里可以举出例子，我们有这些材料。请看，这个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应该以什么形式？我考虑了一种形式——可以致信全党、全体党员和我们的人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信里应该弄清楚所有这些问题。

那么，就让我们来弄清楚这一点吧，为了人民，我们还应该弄清楚中国的事情，当然，这将会被国际舆论所利用，就像那些信件一样。

我认为，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该如何撰写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为什么？我不清楚，这场斗争将会出现什么结局，它会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说，这是不理智的行动，你们发动了这场论战，应该弄清楚：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你们反对我们，并指责我们背叛和变节，指责我们签署了条约 [112]，说我们与帝国主义缔结和约，指责我们赞成没有战争和武器的和平。而你们自己呢，你们致函各国政府首脑，呼吁政府首脑集会和裁减军备。 [113]

你们明白吗？这是矛盾的。就是说，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分子缔结和约。是的，我们曾经建议，现在仍然要建议裁军。但

是，你们自己也向帝国主义分子发出过呼吁，你们也希望与他们缔结这种和约。

如果你们说，暂时还存在着垄断资本，因此，依然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与他们不可能达成裁军的协定，——与某个人交谈时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谁是垄断资本呢？我们不可能与加纳、与几内亚进行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没有武器？！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事实。一句话，应该周全地考虑我们的立场。在中国人那里存在着许多矛盾，应该把这些矛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把这些都要写到信里，把这一切都说出来，这是正确的做法。

现在，中国人正在呼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已经摆脱和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进步力量写信，向他们发出号召，他们正处在美国垄断剥削者的压迫之下。我们说：因为中国同志向你们发出了呼吁和指责我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弄清楚问题。应该找到论点和论据，我们这里有一大堆。也许，这将会是一封非常好的、非常有水平的信，我们可以把它寄给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国家，或许，我们还将以呼吁书的形式公布它。

在给自己党的信中可以说：“实话说，因为什么指责我们——如果你们说是因为裁军，那么，我们赞成裁军；你们说是因为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你们说，工人阶级不应该通过和平途径夺取政权，而我们说，也许通过和平途径，也许通过非和平途径；你们说，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而我们很久以前就说过，殖民主义者是永远也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

接着，谈一下苏联已经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在未来仍然还要起到。

同志们，现在，对于这一点应该进行仔细的加工。我们有许多聪明的人，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如果只有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应该共同努力。同志们，现在，对我们来说头号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对外政治工作。

同志们，你们再考虑考虑。只是，同志们，这不是书记处应该考虑的事情，因为当时你们没有给各位书记安排这项工作。这应该是意识形态委员会来做的工作。

A.H.柯西金：关于技术合作问题——说，我们给过他们多少和还将给多少。 [114]

H.C.赫鲁晓夫：应该说：“你们现在仍然在从我们这里获得(技术设备)。为什么你们还说，我们中断了(贸易关系)？如果我们中断了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你们(提供设备)？”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向印度出售武器。如果你们这样指责我们的话，那么，印度人也能够指责我们，说，你们使用我们的武器与他们打仗，我们在你们那里建造了工厂，并提供了使用权。我们给你们供应(货物)，不是为了让你们发动与印度人的边界战争。我们希望你们武装自己和对抗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把印度归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国家。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事情就会清楚的。因此，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现在，我们为这场冲突感到遗憾，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再考虑一下。

这就是，给我们党的信，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称呼它，我认为，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们可以直接针对政府。那里也有非进步的力量，但是，管它呢。

现在，为了与我们进行斗争，中国人甚至同意随便与谁结盟。

H.C.赫鲁晓夫：这不，戴高乐，他们(中国人)将与他结盟。 [115]

因此，我们应该驳斥他们的指责。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A.H.柯西金：他们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呀。

H.C.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们给中国人写信之后，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我们还应该苦口婆心地去说。我们还要把这封信寄发给兄弟共产党，不单单是要寄发给兄弟共产党，或者，我们还会“有损失”，它可能会被发表。这样，它就会变成世界舆论的财富。他们会这样

做的，他们会编造谣言来反对我们的。

但是，在他们面前不要央求，不要奉承，而是要站在高水平的思想和原则立场上说，这不仅会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而且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损失。

Ю.В.安德罗波夫：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发表声明。 [116]

Н.С.赫鲁晓夫：声明是要发表的。

显然，给苏联共产党员的信也将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可以分章节发表它，因此，一封信会延长一周时间。否则的话，不管我们怎么写，人们在收到报纸之后，会说：这么长的信，就不看了。或者，我们可以一天发表一个章节，还应该不断地加入有用的材料。

在我看来，我们不要做任何记录；这件事应该由苏斯洛夫同志负责，由各部门领导负责。我不知道，在此我们是如何分工的，苏斯洛夫同志不应该袖手旁观，而且也不能束缚我们各个部门的主动精神。

Ю.В.安德罗波夫：这样非常好。我们这里还有代表团，它参加了谈判，正好所有参加谈判的同志都在这里。 [117]

Н.С.赫鲁晓夫：是的，应该阐述以下内容：让人如何理解呢——我们约定停止论战，而你们现在却开始了更大的攻击，加深分裂的局面，你们自己说的，你们希望团结。但是，这样做怎么可能会有团结呢？！

然后，再通过领导人向人民发出呼吁。这不是新的方法。所有反动派都使用过这种方法。例如：希特勒，当他宣布战争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将使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他指望一越过苏联边界，所有的一切都会崩溃和瓦解的。

还有在卡尔·马克思时代，在工人革命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巴枯宁是团结工人力量的主要障碍，他是第一共产国际破产的组织者。还有反对列宁的人，也就是你们称之的托洛茨基分子。众所周知，所有这些都诉诸过人民群众，李可夫，布哈林，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你们也是。

我们党走过了60年的革命道路，它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过各种障碍和敌人，我们党战胜了他们。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利用空洞的革命

词句来进行申诉，这些词句没有别的内容，有的只是这样的内容，即我们希望和平，而且我们想要和平，但是，在被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面前，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正好相反，我们在武装自己，但是，我们不想把争取和平斗争的优越性，献给世界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敌对力量就会捡起这个口号，并团结人民来反对我们，也就是反对我们的革命和爱好和平政策本身。

应该找到这种让人容易了解的句子。

在这方面，库西宁同志应该好好显示一下。但是，你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就让他干他熟悉的那方面工作。

我的想法就是这些。你们是否同意呢？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正确。同意。

H.C.赫鲁晓夫：你们提交的计划，我还没有看。这只是构想。让其他人先看吧，然后我再看。你们看完之后，要研究一下，并提出准备好的材料。

РГАНИ，ф.3，оп.16，д.941，л.1-44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 [\[118\]](#) (1963年9月13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П.Ф.洛马科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Ю.泽登巴尔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3日

苏方参加会谈者：И.И.波兹尼亚克、Н.Н.伊诺泽姆采夫和В.Н.戈留申；蒙方参加者：多洛斯波拉穆。

会谈开始时泽登巴尔谈到了蒙古现在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这是因为

中国缩减了在蒙古的工人数量。近两年来中国工人的数量从12000人减少到7000人。1964年二季度将撤走全体工人。

因此泽登巴尔请帮他解决苏联派遣苏联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且第一批最迟于1964年第一季度到达。

.....

П.Ф.洛马科

АВПРФ , ф.0111 , оп.45 , п.278 , д.2 , л.17

№25623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1963年9月17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年9月17日

今年9月1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策伯格米德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因为9月19日他准备去乌兰巴托，然后，如有可能他准备去莫斯科进行身体检查，因为他在北京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病，医生不敢贸然给他动手术，而且他自己本人也不想在北京治疗(有关此事专门发给苏联外交部一份通知)。

策伯格米德请我谈谈关于中国共产党分裂活动方面的政治形势。

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

策伯格米德向我表示了感谢，并说，这对他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会帮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蒙古人民革命

党领导人。

会谈过程中策伯格米德想知道中国领导人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此时策伯格米德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对手，即中国领导人。他说中国领导人执行的方针是经过周密思考制定的，准备长期与苏共对抗。策伯格米德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向斯大林以后上台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向H.C.赫鲁晓夫同志开火。有些人认为，也这么说，假如中国得逞可能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可是，他强调，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策伯格米德说，假使中国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和苏共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即使后者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中国提出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中共在今年6月14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即使中国得以如愿，他们未必会停止对苏共的斗争，可能他们会改变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方法。但是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中伤苏共，降低苏共在世界舆论、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地位。

策伯格米德说，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想法，他强调指出，上面所说的一切表明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它的长远目的。世界上也就是说天下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国内的一切对内对外活动都必须以它为核心。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策伯格米德说他对召开兄弟党大会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把这次大会延迟到1964年，给中国人说出全部看法的机会。一方面，这很诱惑，但另一方面，很危险。诱惑是因为中国人会进一步地暴露自己，会手忙脚乱。但另一方面，这很危险是因为他们同时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形成以北京为目标的思想一致的队伍。因此有可能，策伯格米德强调，必须召开1963年的兄弟党大会。大会前要集中火力对中国的立场、观点发动政治攻势。

听策伯格米德的发言，我感觉他觉得我们的一些演说似乎论据不足。策伯格米德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要有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因此最好在报刊上刊登一些依靠具体的、实质性的材料的发言。

接着策伯格米德谈了一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他明确注意，尽管过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图穆尔奥奇尔被撤了职，但蒙古的民族主义危险还存在。因此，他提出，在北京以及整个中国大力开展了宣传内蒙古成果的运动。这里不排除，中国领导人在修建

一座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从内蒙古到外蒙古的桥梁。

会谈中我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所可以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问题可以从政治和理论方面展开，如果蒙古同志能写出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章。这种题目可以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例子来展开，这对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策伯格米德积极支持我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Р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1-3

№25624 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1963年9月18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3号

机密

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8日

今年9月18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拜访了苏联大使馆，他谈到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陈子平，在马尔丁离开北京前的会见。

费伦茨·马尔丁注意到了越南大使的一些说法。首先，越南大使指出，他希望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大使与大使之间，而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谈话，不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礼节性的。然后他转入共产主义与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情况，提到了共产主义世界中争论的形式问题。他特别指出，越南大使谈到了列宁当时与他的对手进行斗争的时候利用的手段。陈子平就开始详细地谈论列宁被迫与布哈林、季诺维耶夫进行的斗争。列宁进行残酷的原则性的斗争，无情地批评了自己的敌

人，但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总是寻找一切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应该学习列宁如何进行争论。”越南大使最后这么说。

然后陈子平将话题转入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争论问题上，说进行思想上的争论，甚至是斗争都是可以，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哪怕是最重要的分歧和争论也不能影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波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只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他接着说道，千方百计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形势，从各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进攻。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不是我们发动进攻，就好似帝国主义进攻我们。因此采取正确的策略，把策略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的。陈子平开始说，帝国主义总是想方设法进攻共产党，但共产党并没有时刻准备给予回击，因为他们在选择斗争形式和方法上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命运是我们的教训。

马尔丁说，越南大使表达的自己不完整而且含糊不清的观点之后，直接问马尔丁他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马尔丁好像对越南大使说，他的观点含糊不清，他，马尔丁，难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马尔丁给陈子平指出，后者不想知道50年前的国际形势和当今形势的区别。同时马尔丁也不想与陈子平进行强烈争论。马尔丁对陈子平说，越南共产党应该知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提到过的问题的立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始至终一直支持苏共的总方针和对外政策，马尔丁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

马尔丁在说到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时，挑起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罪魁祸首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全世界都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加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和企图。然后马尔丁问越南大使的想法，为了制止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有害、危险倾向的发展，为了消除社会阵营中的分歧，为了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应该做些什么。此时马尔丁向越南大使提起了胡志明同志在会见中共和苏共代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时所讲的话：停止争论，创造良好的气氛。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胡志明讲的这种气氛以前没有并且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没有形成，这是谁的过错呢？接着，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说，他弄不明白，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宣言和声明的立场上，怎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提出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口号和对外政策呢？谁的过错？陈子平保持沉默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马尔丁就

说，大家都清楚，挑起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是中国领导人。因此看来，马尔丁强调说，召集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要弄清一个问题，谁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谁违背和歪曲宣言和声明这一问题了。

陈子平对此默不作声。突然开始道歉了，因为最初提出进行共产党员式的谈话，不是大使之间会谈。最后作了马尔丁弄不懂的声明。越南大使说他十分高兴，因为越南大使和匈牙利大使之间对当今的根本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马尔丁说，他对陈子平说，这很好，但是他没有完全理解陈子平最后所说的话。越南大使对此什么也没有说。

还要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陈子平说，他今年24日要举行午宴，欢送马尔丁回国。这个声明是他在上面所讲的会谈之前作的。会谈之后，越南大使取消了午宴，向马尔丁道歉，说他没有时间，工作较忙，无法实现这一诺言。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НП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3, л.4-7

№25625 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 苏边界调兵 [\[119\]](#) (1963年9月20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4号

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拉登·绍伊奇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20日

.....

南斯拉夫代办谈到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中国将10个师的兵力调到南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附近。总共有10万人左右。据说，行驶在北京河内干线上的列车走的是边缘线的支线，借口是为了避免水灾，但这不符合实际。火车改变北京河内干线的

原因在于把大量军队调到南面。代办说，这次调防的目的是向越南北方和柬埔寨表示，中国政府对他们与南越局势的尖锐化有关的命运表示真诚关怀。大使指出，这也是对越南北方和柬埔寨的一种压力，特别在当前，许多国家对莫斯科对部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南斯拉夫代办也提到了新疆的问题。请我谈谈成千上万新疆人移居到苏联的真实情况。我把实情告诉了他。然后南斯拉夫代办援引了机密情报说，目前大量的部队被转移到中苏边界的新疆和阿穆利亚地区。该地区正在修建工事甚至在田地布雷。

.....

АВІ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9-10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1963年9月23日)

1963年9月24日

致B.H.波诺马廖夫：

根据约定，兹发送苏联外交部各部门就有关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所编制的资料。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3年9月23日

1953—1963年间苏联政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治活动目录

一、基本问题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非自治领地——巴苏陀兰 [120]、贝专纳 [121]、桑给巴尔、肯尼亚、斯威士兰等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亚洲国家》，莫斯科，1963年，第1卷，文件，第32、39、48—49、53、62、88页)。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索马里、西萨摩亚、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瑙鲁、太平洋

诸岛屿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6、40、50、54、61、66、82、83页；第2卷，文件，第34、73页)。

苏联揭露北约的殖民主义实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64、66、93、94、95、96、99—102、110、115—119、121、128、131、144、145、147、149、169、174、175、177、184、185、197、200、204、219、223、229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114、115、123、125、131、134、138、142、149、152、155页；第2卷，文件，第16、23、25、27、34、56、67、75、80、91、99、101、107、108、117、125、132、162、175、179、180页)。

1955年5月11日

——苏联政府积极评价万隆会议的结果(苏联部长会议声明——《消息报》，1955年5月12日)。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提案：在3—5年间让如下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等独立，确定上述地区获得自治权和其他被托管地区获得独立的具体期限(《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50页)。

1960年2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在莫斯科组建各民族友谊大学(《苏联外交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39—540页)。

1960年9月23日

——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向联合国大会第15次例会提交的提案：关于清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3、9、10、12、27、32页)。

——苏联为落实联合国1960年12月14日颁布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权力的宣言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02、107、108、110、117、179页)。

1962年9月21日

——苏联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次例会提交的宣言草案：关于将裁军后节余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和平目的(《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7—168页)。

1963年5月20日

——苏联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塞浦路斯、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突尼斯和西班牙等国政府建议：关于使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无核区(《真理报》，1963年5月22日)。

1963年7月9日

——苏联外交部长A.A.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信中建议将1965年宣布为国际合作年，并指出1965年“应成为：1.完全彻底地清除可耻的殖民体系，给予目前仍承受着殖民奴役的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一年”(《真理报》，1963年7月17日)。

1963年9月

——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在亚非团结组织执委会例会上发表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这次图尔孙扎代例会的发言——关于苏联果断、坚定和毫不动摇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真理报》，1963年9月12、14日)。

二、近东和中东

苏联揭露了巴格达条约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42、46、75、90、93、95、98、103、105、110—113、115、117、128、131、145、146、149、151、161、170、171、173、174、177、178、179、181、184、200、205页)。

苏联揭露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93、95、102、131、145、149、177、200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第24—27页)。

1955年4月16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和中东安全的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在该地区建立侵略性集团，并准备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而支持和发展与近中东国家的合作(《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页)。

1956年2月13日

——苏联外交部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在于1956年2月1日发表的旨在干涉近—中东国家内政的华盛顿声明中打算采取的举措，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把本国军队派入该地区的计划。苏联政府宣布，其将一如既往地捍卫近—中东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坚持不干涉该地区诸国内政的政策(《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2页)。

1956年4月17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形势的声明。其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旨在制造近东地区紧张，以吸引该地区各国加入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挑起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恢复帝国主义在近东的地位的政策；表明苏联政府准备支持联合国关于加强和巩固近东地区和平的措施和建议(《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6页)。

自1957年以来

——苏联揭露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学说”的殖民主义本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3、96、98、99、102、103、105、108—111、113、115—116、119、121、125、126、131、145—147、151、177、184、200页)。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就近—中东和平和安全以及不干涉该地区各国内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建议；苏联政府还同时向上述各国转交了关于上述问题的联合声明草案(《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5页)。

1957年4月1日

——苏联外交部就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兰的百慕大会议所发表的声

明，其中揭露了美国针对近东和中东的侵略性政策方针，指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身在该地区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地位。苏联政府重申，为了巩固近—中东地区的和平，就必须落实其以前便提出过的建议：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近—中东地区所存在的一切争议性问题，成为四大国的共同义务，不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放弃吸引该地区国家加入大国军事集团的企图，彼此放弃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武器，清除在这些国家领土上所建立的外国基地，撤出外国军队，促进近—中东各国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8页)。

1957年4月19日

——苏联政府建议美、英、法等国政府，发表关于谴责以武力手段来解决近—中东问题和放弃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的声明(《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9—101、109—111、115页)。

1957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建议英国工党政府，声明支持苏联提出的，旨在维护近—中东和平的提案(关于英国、苏联、美国和法国发表声明，谴责以武力手段解决近—中东所存在的问题；关于拒绝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和彼此停止向该地区所有国家供应武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7页)。

1957年10月19日

——塔斯社关于近—中东形势的声明。声明揭露了美国对近—中东国家的侵略政策，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准备在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参加下侵略叙利亚。苏联政府重申了自己关于维护近—中东地区和平的建议，并宣称，将坚定地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和防止战争，准备以联合国的原则和目标为指导，采取措施，以制止侵略和给予被侵略国必要的帮助(《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9页)。

1957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领导人所发送的信函，其中建议，为了争取近—中东形势的正常化(各国之间)相互约定，不采取任何破坏该地区国家独立的举措，拒绝以武力方式解决与近—中东相关问题(《消息报》，1957年12月12—13日)。

1958年5月5日

——苏联外交部转交美、英、法等国驻莫斯科使馆：“苏联政府就各政府首脑会议所提出问题而起草的提案。”该提案第十二条款涉及“缓和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的问题(关于谴责和制止破坏该地区和平的行为，关于谴责以武力方式解决争议性问题和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关于拒绝向该地区国家供应武器和在这些国家部署核子—导弹武器，关于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2页)。

埃及

1956年7—10月

——苏联维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权力(《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51—56、58—66、68—69页)。

1956年9月至1957年2月

——苏联反对英、法和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1—62、64—66、70—84、86—91、96页)。

1956年11月5日

——苏联政府给英、法和以色列等国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严厉警告英国和法国政府立刻停止侵略埃及，并十分坚定地声称，要动用武力摧毁侵略者和恢复世界东部的和平(《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80—83页)。

1957年3月28日

——塔斯社声明：关于以色列在西方强国支持下准备再次对埃及发动新的侵略(《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7页)。

约旦

1957年4—5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帝国主义针对约旦的阴谋(《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3—105页)。

黎巴嫩和约旦

1958年5—10月

——苏联为反对美国和英国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筹备武装干涉伊朗和要求英美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而进行的斗争（《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5—147、149、151—153、156—190、192、194、196页）。

伊拉克

1963年6—7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为争取自身民族权利和反对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干涉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所发生事件而进行的斗争（塔斯社6月16日声明，参见1963年6月16日《真理报》；7月9日苏联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政府的声明，参见1963年7月10日《真理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7月9日给安理会的信函，参见1963年7月11日《真理报》）。

也门

自1957年起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也门（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0、111、113、114、116、117、143、192页）。

阿曼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阿曼（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8、110、111—114、116、117、143、192页）。

叙利亚

1957年9—11月

——苏联为防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叙利亚的预谋而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1—119、121、124—128、131、200页）。

1963年9月3日

——苏联在安理会上否决英美起草的决议草案，后者把叙伊边境所发生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叙利亚(《真理报》，1963年9月5日)。

三、非洲

..... [122]

——苏联为消除外国在非洲国家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1、32、33、36、62、152页；第2卷，文件，第1、2、3、16、25、27、30、33、52、67、73、75、80、85、91、92、96、99、100、101、106、107、108、110、117、124、145、146、162、165、178、179页)。

自1959年起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关于使非洲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地带的提案(《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5、102、106、142页；第2卷，文件，第30、33、44、53、85、93、94、96、146页)。

1960年2月14日至12月30日

——塔斯社就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问题所发表的声明(《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94；第2卷，文件，第33页)。

1963年5月22日

——H.C.赫鲁晓夫给非洲独立国家政府和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的电报。苏联政府在电报中声明，支持“非洲团结的思想”和为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为巩固国家独立和发展国际合作而斗争(《真理报》，1963年5月23日)。

1963年6月25日

——H.C.赫鲁晓夫给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国际会议的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表示(苏联)支持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真理报》，1963年6月25日)。

阿尔及利亚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1、62、76、94、114、116、117、126、129、137、138、139、143、192、193、197、219—222、224、229—232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24、140、141、160页)。

1962年3月28日

——苏联外交部，就法国由于苏联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而对苏联采取不友好立场所发表的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8期，第172页)。

1963年3月23日

——塔斯社声明：谴责法国政府在位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再次爆炸一枚核武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321—322页)。

安哥拉

——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75、80—81、132、180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2期，第26—30、46—55页；第13期，第55—56、329—339、366—372页)。

喀麦隆

1959年3月4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捍卫喀麦隆人民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66页)。

肯尼亚

1962年9月11日

——苏联支持肯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5页)。

刚果

1960—1963年间

——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刚果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115、121、125、131、133—134、138—141、149—156页；第2卷，文件，第13—14、16、23、25、28、31、34、39、41、46、51、56、57、60、67、71、95、121—122、133、164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文件，第103页)。

摩洛哥

1953—1955年间

——苏联支持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1、37、41页)。

1956年10—12月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摩洛哥政府提出的关于将丹吉尔(省)与摩洛哥合并的要求(《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7、92页)。

莫桑比克

1962年7月27日

——苏联支持莫桑比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2页)。

尼亚萨兰 [\[124\]](#)

1962年5月31日

——苏联支持尼亚萨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47页)。

南—北罗得西亚

1962年4月26日和1962年6月18日

——苏联支持南—北罗得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

家》，第2卷，文件，第143、154页)。

卢旺达—乌隆迪

自1959年起

——苏联政府发言捍卫卢旺达—乌隆迪人民的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3页；第2卷，文件，第34、73页)。

突尼斯

1953年10月23日

——苏联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3页)。

1961年7—8月

——苏联就法国对比塞大地地区的侵略而支持突尼斯(《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91、99、100、101、106页)。

西南非洲

1954年10月1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赞成将西南非洲列入国际托管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5页)。

——苏联支持西南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20、178页)。

南非

——苏联反对南非共和国境内种族歧视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9、99、101页；第2卷，第97、114、175页)。

四、亚洲

柬埔寨

1962年8月25日

——苏联政府同意，参加柬埔寨建议的就承认柬埔寨、确保柬埔寨中立和领土完整问题而召集的国际会议(《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第266—267页)。

印度

1961年12月

——苏联支持印度及其为解放果阿、达曼和第乌而进行的斗争(《真理报》，1961年12月19—22日)。

印度尼西亚

自1954年起

——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争取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尼合并的斗争(《消息报》，1957年5月21日；《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77页；第11期，第104—106页；第17期，第118—119页)。

1958年5月14日

——苏联政府就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而发表的声明(《真理报》，1958年5月15日)。

南越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干涉南越内部事务(《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516—518页；第18期，第128—130页；第20期，第14—17页)。

老挝

1954年7月20日

——五大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度支那协议问题签字，该协议内容涉及停止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行动，从而宣告了法国帝国主义针对这些国家的殖民主义战争的结束。协议计划在上述国家中

建立一个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等3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停战条件的落实情况。

1959年5月至1960年3月

——苏联政府就东南亚条约组织教唆老挝政府拒绝执行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决议而发表言论，其中建议恢复关于老挝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并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老挝的局势(《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文件，第198页；第3期，文件，第173、244页；第4期，文件，第9、101、131、158、352页；第6期，文件，第18页)。

1960年9—12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谴责美国政府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干涉老挝内政和反对宣布打算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老挝新政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9期，文件，第90页；第10期，文件，第299页)。

1960年12月至1961年4月

——苏联政府建议，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由于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对老挝内政的干涉而导致的该国当前的形势，恢复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0期，文件，第340页；第11期，文件，第51、52、53、54、55、56、75、88、92、204页；第12期，文件，第114、213页)。

1961年5—6月

——苏联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调解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草案，关于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撤离老挝领土以及关于国际委员会的权力等内容(《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3期，文件，第69、150、272、306页)。

1962年7月23日

——苏联政府与1961—1962年间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的参与国

一起签署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文件，第36页)。

1963年2月

——苏联老挝联合公报以及Л.И.勃列日涅夫在老挝国王访问苏联期间所发表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援助老挝，坚决捍卫其自由和独立，并使其免受任何侵犯(《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199—201、204—205、214—218页)。

1963年5—9月

——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苏方主席给老挝联合政府总理以及1962年日内瓦协议参与国政府和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主席所发送的信函草案，内容涉及必须停止外国干预和老挝局势的正常化(《真理报》，1963年5月11、18、30日；6月21日；9月7日)。

五、拉丁美洲

古巴

1960年7月16日

——塔斯社声明：如果古巴遭到武装干涉，苏联人民不会坐视不管；苏联将凭借自己的实力给予古巴必要的帮助(《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270—275页)。

1961年1月4日和1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表保卫古巴共和国的言论(《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1期，第21—32、152—153页)。

1961年4月

——由于古巴受到武装入侵，苏联给予古巴人民支持(《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2期，第266—268、283—287、289—300、315—326、336—350页)。

1962年9—11月

——鉴于美国针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苏联政府消除因此所导致危机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1期，文件，第76、91、135—140、142、144、147、148、149、150、151页；第22期，文件，第1、11、16、17、21、125、133、139、155、158、159、162页)。

1963年3月29日

——H.C.赫鲁晓夫给拉丁美洲与古巴团结大会的贺词。其中宣称，苏联人民将一如既往地革命的与古巴在一起，始终不渝地帮助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331—332页)。

1963年4月28日至5月23日

——苏古联合公报和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期间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人民将始终如一地与古巴人民在一起(《真理报》，1963年4月29日和5月25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1年12月5日和7日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政问题给安理会的信函和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6期，第296—302页)。

危地马拉

1954年6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政府在美国的挑唆和指使下对危地马拉所实施的侵略(苏联代表察拉普金6月20日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6月22日《消息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6月24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外交部长6月25日给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托里斯里奥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代表6月25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1954年6月27日《消息报》)。

附件：

与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相关的资料

1. 苏联坚决反对把和平共处理解为：维持国家内部的某种“原状”和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在一系列针对苏共的诬蔑性攻讦中，中共领导人的主要谬论之一在于，苏联所执行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似乎意味着其忽视了(忘记了)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并号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共处。

这里不妨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有意曲解，实质上与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后者一直无法成功地把这一错误的概念在各依附性国家人民和被自己奴役者中间传播。

在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过程中，美国上层国务活动家们曾不止一次建议苏联，保证苏美两国在如下基础上和平共处，即苏联同意维持世界现状(不为维持世界现状制造障碍)，放弃对解放运动的支持。

苏联不仅要坚决地驳斥美帝国主义的类似企图，而且还要不遗余力地强调，并不是苏联应放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而是美国应当停止干涉世界各民族奋起反抗自己压迫者的事务。

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1961年6月，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会见。当时，美国总统的观点便遭到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激烈、毫不妥协的反击。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赫鲁晓夫同志1961年6月15日在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演讲中是这样描述的：

“与肯尼迪总统的交流表明，我们对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总统讲话的意思可归纳为：应想办法阻止民族运动在本国建立某种不利于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制度。

如果双方同意这一观点，(苏美两国)就需要签署一个协议并承担对其他国家实施监督的义务；不允许对现有制度作任何变更，即使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话，某些国家的民众想要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那就绝对不能容许。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苏联)是绝不会接受的……”

2. 苏联利用联合国组织为清除殖民主义和保卫已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自联合国建立初期起，苏联便开始在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进行紧张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世界所有民族的独立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为了立即给予各殖民地国家、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的人民完整的独立，并使其能够自由地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了更迅速而彻底地根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总辩论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宣称：

“我们向各殖民地人民为反对殖民者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神圣斗争致敬。如果殖民强国继续无视理性的呐喊，继续顽固执行自己以往的殖民政策，继续压迫殖民地国家服从自己，那么那些反对殖民制度的国家，就应当全力帮助斗士们去争取自身的独立，反抗殖民者和殖民奴役；必须从道义、物资等方面，去帮助各民族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神圣和公正的斗争。”(参见《1946—1962年间苏联与非洲国家》文件集，第2期，第18页)

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上，苏联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发出呼吁，号召永远结束可耻的殖民体系。在苏联的倡议下，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给予各殖民地

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

在为落实该宣言诸原则而进行着坚持不懈地斗争的同时，苏联还建议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例会，讨论关于如何具体落实该宣言诸原则的问题，因而最终成立了监督宣言落实情况的特别委员会。1962年，该委员会根据宣言的要求研究分析了12个殖民领地的局势，1963年——14个殖民领地。

在该宣言通过之前，世界上共有92个殖民地、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总面积140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400万；在宣言通过2年半之后，已有面积4055万平方公里，人口3900多万的殖民地和被托管地区获得解放。这一时期，在非洲出现了如下一些新国家：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在亚洲——科威特；在加勒比海——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大洋洲——西萨摩亚。1963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使西伊里安岛回归祖国。多灾多难的肯尼亚人民也临近获得国家独立。

在特别委员会中，苏联多次发出倡议，并坚持通过相应的决议，其目的就是要尽快使那些目前仍处于殖民压迫之下的国家和民族获得独立。该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不遗余力地揭露西方强国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其不愿意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落实宣言所规定的条款。苏联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的活动，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是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旗手。

苏联还广泛利用自己在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权力，维护各不同民族的利益，以使其避免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干涉、侵略企图和公开侵略活动的伤害。在最近几年间，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已近10次利用常任理事国表决原则，否决其通过旨在以阻碍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加强殖民者立场的决议。苏联利用否决权的具体事例如下：反对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2次)，各殖民强国针对刚果的挑衅行为(4次)，美国和英国针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侵略措施以及在审议一系列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性政策所产生的问题的过程中。

不论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在联合国之外，苏联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直得到坚持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各民族的深切同情。这些国家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均认为，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比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2月，当涉及苏联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原则的问题时便宣布，这些原则“已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转变为一个坚持的、始终不渝的……人权捍卫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76页)。

加纳总统K.恩克鲁玛于1961年7月宣称，“如果没有苏联，非洲摆脱殖民枷锁的解放运动必将经受全面残酷而粗暴的武力镇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360页)。

3.关于苏联支持亚非国家的中立

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不可估量的帮助还体现在，苏联政府支持年轻的亚非独立国家所坚持的中立方针，即所谓不结盟政策。中立主义(即不结盟)有利于这些年轻国家捍卫自己所赢得的民族独立成果，挫败了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将把这些国家拉入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手段——即集体殖民主义的方式，进而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中立主义(不结盟)还有助于这些年轻的、已获解放国家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通过全力支持本民族经济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独立。H.C.赫鲁晓夫1960年3月4日在阿富汗的演讲中指出，中立政策和不加入军事同盟“有助于动员各民族力量以解决最重大的内部问题(任务)”(H.C.赫鲁晓夫，1960年，第202—203页，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

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极力反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中立方针。众所周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中立主义为“不道德的”现象。美国对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想迫使其加入由美国主导的、于1954年在东南亚拼凑起来的侵略性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的支持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印度等国的中立方针的举措，无疑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所坚持的，反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的立场。

H.C.赫鲁晓夫在1955年，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进行“友谊使命”访问期间宣布，苏联对中立政策持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与此同时，他还宣称，苏联政府赞赏印度和缅甸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做法。1955年12月，在仰光政治会议上，当谈到缅甸政府反对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时，H.C.赫鲁晓夫强调：“缅甸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的赞扬。”（《友谊使命》，1956年，第233页）

在1955年12月6日，H.C.赫鲁晓夫和吴努的联合公报中指出：

“.....应当谴责建立(军事)集团的行为，因为它会导致国家(民族)间的恐慌和不信任，只有不加入此类集团的政策，才会有助于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和产生良好的意愿，从此对保障和平和安全的事业做出贡献。”（《友谊使命》，1956年，第250页）

H.C.赫鲁晓夫1955年12月29日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报告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友谊使命”的成果时所发表的声明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其中指出：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后者宣布，印度将在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是真正中立国家，并只会有助于增进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友谊使命》，1956年，第355页）

在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H.C.赫鲁晓夫在会议报告中也表明了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他在报告中强调了中立的积极意义，认为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世界广大的“区域”，正是由于一系列爱好和平的，宣布以不参加军事集团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加强（H.C.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党的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第21页）。

亚非国家的中立政策，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共的支持。H.C.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场合——在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讲话中，在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的友谊使命访问期间的讲话和声明中，在1960年10月13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发言以及其他一些言论中——均强调过我们对中立（不结盟）政策的拥护。例如，1960年2月11日在印度议会会议上的讲话中H.C.赫鲁晓夫便说：“印度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不断增长的威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的个人威望都是以印度政府所执行的中立政策，以与军事集团相对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基础的，这一政策中凝结着智慧和力量。”（H.C.赫鲁晓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1960年，第1卷，第77页）

在给予坚持中立政策国家有力支持的同时，苏联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影响力，如削弱西方强国的军事—政治殖民主义集团，赞成非洲多数民族国家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坚持不加入军事集团的方针。苏联的支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致使美国政府以及紧跟美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被迫在近几年间重新构建自己针对中立国家的策略路线——从公开指责中立不道德，转而保证准备在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政策的基础上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合作关系。

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对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军事冲突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西方强国急于利用中国反对印度的行动，来破坏和败坏中立政策的声誉。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对印度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目的就是想把印度——如果不是形式上的，那就是实际上的——拉入西方强国在亚洲建立的军事体系。从另一方面来看，印度国内的右翼分子们，也在不断要求重新审定印度的对外政策，即要求放弃中立方针。至于中国领导人，则极力把印度的中立丑化为所谓的“欺骗”、“幌子”、“挡箭牌”等，甚至制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相互对立，而后者，众所周知，已是西方强国两个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1963年4月，周恩来在实况采访中对巴基斯坦通讯社记者声称：“.....印度的和平和中立政策只是个幌子.....不结盟的印度实际上已成为南亚地区最受美国赏识的‘结盟’国家了。”（塔斯社，1963年5月7日第107期邮政信息简报附录，第9—10页）

在这种情况下——当反对印度中立的势力结成了一条独特的，由美帝国主义、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和中国领导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之时，苏联对亚非国家所执行的中立政策的支持便有助于他们抗衡帝国主义的压力。

4.关于苏联政府支持已获解放民族争取统一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剩余领土的斗争

苏联政府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解放西伊里安岛屿而进行的斗争。在1960年2—3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期间，H.C.赫鲁晓夫对在巴厘岛召集的群众集会的与会者们说道：“我们——苏联人民认为，你们提出的，关于将西伊里安岛屿与印度尼西亚故土合并的要求，是完全公正和合法的，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并对你们表示深刻的同情(理解)。”

苏联与要求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印尼人民的紧密团结还体现如下方面：一方面在道义政治上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另一方面——广泛帮助其加强武装力量。而对此，许多印度尼西亚国务活动家，均在讲话中充满感激地提到，甚至连荷兰和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也不得不承认。

鉴于苏联政府于1962年2月9日所发表的关于西伊里安岛的声明，苏加诺总统在1962年2月12日给H.C.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我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该声明坚决支持印尼人民从荷兰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西伊里安岛的斗争。我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对这份声明表示崇高的敬意。”苏加诺希望，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将有助于加速清除西伊里安岛上的殖民主义。

苏联政府还坚决支持印度统一本国领土上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斗争。

苏联还阻止西方强国利用安理会反对印度解放果阿和本国领土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企图。

5.(苏联)极力支持非洲国家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基础上确保非洲国家的团结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自身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

苏联向1961年成立的、坚持反殖和反帝立场的卡萨布兰卡国家集团——具体包括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埃及等非洲国家——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苏联反对成立由法国政府帮助并受帝国主义控制的非洲多国联合体——非洲马尔加什联盟。虽然关于该联盟苏联国内并未发表正式声明，但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抨击性的文章。

苏联积极评价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因为正如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所显示的那样，在该组织中进步的非洲政治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给这次通过了非统组织宪章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致电中，H.C.赫鲁晓夫强调：

“我们之所以赞成非洲爱国主义者的追求，不仅在于他们为了争取完整的独立而不懈斗争，还在于他们与世界上的反帝、反殖战线一道，巩固了非洲大陆所有已获解放力量的团结。”

该电报受到了非洲所有进步社会舆论的大力称赞。

在会议结束之后，H.C.赫鲁晓夫又向参与此次会议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发送了信函，信中满意地表示：“当前，在许多令人类担忧的问题上，苏联和非洲国家的立场不是完全一致，就是基本相同。”

在上述信函中还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此次会议的最重大成果，便是与会者就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一致通过了该组织的宪章。该宪章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受到了苏联国内的一致赞许。”

№23051 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1963年9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M.A.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M.A.苏斯洛夫同志在双边会谈上所作发言基础上起草的编辑部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此文打算发表在下一期的《共产党人》杂志上。

普拉特科夫(签名)

1963年9月24日

手写批注：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把经过少量修改的文本交给《共产党人》杂志社。向出版社表明我们的愿望，即处理文本中的重复的问题。

苏斯洛夫

1963年9月27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

是否忠诚于马列主义、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党派领导人的理论纲领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活动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我们的共同事业，都会在其对当代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持立场，在他们的方针、观念和行动上体现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要坚决谴责中共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正在修正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及其所确定的基本前进方向，而这些基本前进方向正是马列主义政党正集中力量为实现工人阶级最终目标而斗争的依据。

中国领导人，正越来越远地偏离了马列主义诸原则以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并相应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他们极力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试图向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而对那些不同意其这样做的人，便扣上“反马列主义者”的帽子。自从走上这样的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违背自己本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始终与兄弟党团结一致，为解决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总任务而进行共同斗争。

1. 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中共领导人的观点的政治危害极其站不住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由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经过共同努力才制定出来的，并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性文件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在通过了该声明的由81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会议上，所有代表团都是由各兄弟党中最具威望的领导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组成，因而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当时，为了协调各方观点和就所有问题达成统一立场，起草委员会和大会本身花费了近2个月时间。最终，所有党派均赞成，要一致通过一份纲领，但要同各党进行协商，得到各党的赞同，使各党无一例外都在上面签字，这样，这份纲领就可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必须遵守的唯一的一部法律。

对当今的时代进行确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其中应当指出：

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两个对抗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是所有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正是基于上述对我们时代的认识，声明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如果能够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就可能以更少的代价和更短暂的教训，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正如声明中所指出的，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运动，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等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个声明，是在总结了世界发展和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分析了近几十年来世界舞台上所出现的一系列最新进步趋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充分考虑当代特点的同时，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斗争纲领，该纲领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及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由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决定的。

该纲领事先便考虑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全面发展和巩固的问题，指出了在各民族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和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在全球赢得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途径，认为上述斗争进程，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即两种敌对社会体系之间经济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为各共产主义党派、工人阶级、劳动者们、所有民族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当代理论分析、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斗争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这就是为何有人——如中国领导——会随意抓住该路线的个别方面并以之来反对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这样做，势必会危害到整个路线的成功实施。

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学说的体现，是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它使得马列主义理论中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榜样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的特点和任务；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关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和总结了各共产党的新经验和当今世界的诸多重大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得出了一系列实际的结论。

在宣言和声明获得通过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国际事件的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

苏联共产党严格而毫不妥协地坚持共产主义党派的总路线。我们党

的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各兄弟党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总任务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党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共党纲包括了上述宣言和声明中所有最重要的原理和结论。例如，当前时代的性质，世界革命进程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问题，国际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问题。正如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一样，苏共自己的党纲始终依据马列主义伟大学说，其论述与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性意见表述是完全相符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驳斥任何片面地重新解读宣言和声明的企图以及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质疑和擅自篡改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原则性结论的图谋。

应当指出的是，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件(发表)之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没有引发争论。该信不仅对现有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提出质疑，而且实质上还试图以自己在“25点”中所提出的新表述来替代现有路线。

事实上，还在1960年就已有迹象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歧。但只是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中国领导人才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对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尤其是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发表之后，情况已变得非常清楚了。此时，中共领导人与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体现在问题的个别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而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总路线发起了进攻。从这里，我们也会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即中国领导人为何要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因为根据所有兄弟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达的一致观点，这次大会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中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态度…… [125]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62, л.108-112

№25626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1963年10月3日)

1963年10月16日

第772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3日

罗马尼亚大使谈到了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在罗马尼亚疗养的事。

从与乔治乌的会谈中得知，曾涌泉在疗养期间曾会见过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对曾说，罗马尼亚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共的攻击。乔治乌说，中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们声称苏联政府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违背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和损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至少是一件不严肃的事。不会有人，也不应有人永远相信他们花费了那么多物质、时间和力量是为了证实他们在正式文件中所写的一切。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采取另一类解决问题的方法。乔治乌说，甚至是罗马尼亚方面好像也发现，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些他所不能同意的問題(他具体地指出了经互会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诸如会见和会谈。

接着乔治乌问，今后应怎样发展各国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如何，苏共和中共的谈判将如何进行，谈判是否会进行。他似乎一边在思索，一边在说话，最后他说，应该及时召开兄弟党代表大会，但又立刻对此表示了怀疑，是否必须急于召开这样的大会，指出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主要是兄弟党代表大会在帝国主义面前、在共产主义敌人面前还未显示出强大的团结力量。如果现在就召开大会，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未必能显现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请乔治乌认真思考自己的疑虑，我说，在当今的条件下中国挑起分裂事件，大搞派别活动，我们需要原则，需要兄弟党的斗争，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性。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16-17

№25628 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 ^[126] (1963年10月16日)

1963年10月16日

第76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16日

印度尼西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法特万先生(二秘)谈到艾地的北京之行很不满意，很不开心。

根据法特万所说的，艾地似乎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如何看待最近的中苏争论，争论的结果只能导致分裂。艾地感到很忧伤，他没有看到中国悬崖勒马的迹象。

艾地担心苏中两国代表第二次会见的结局和前景。艾地认为第二次会见即使举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位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说从艾地含含糊糊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北京向艾地表示，愿意提供大笔经济援助，但他不敢接受，因为如果他同意接受中国的援助，会引起苏加诺的怀疑，甚至是愤怒。

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告诉我们，艾地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好像曾试探过同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的可能性，想借助此次机会帮助化解矛盾，停止他们之间的争辩。艾地好像想从中调解，使他们之间日益尖锐的论战停息下去。但是艾地的好意没有得到中方的谅解，他深表遗憾和忧愁。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44-46

№13734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1963年10月18日)

1963年10月5日

第855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18日

我对美国(驻印度)大使作了礼节性的回访。

谈话是从有关中国的问题开始的。切斯特·鲍尔斯认为，再过5—6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必然会垮台。其理由如下：首先，该国的领导人承担的责任过多，但其能力又很有限；其次，老一辈革命者退出历史舞台，担任国家领导的都是些年轻人；最后，中国无法养活整个国家。这最后一点，鲍尔斯认为最关键。他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能在粮食收获年景好时可能勉强维持国人的粮食需求，而在年景中等和歉收时就会出现饥荒，成百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中国适用耕种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只及印度的1/3，但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为了增加粮食收获量，中国必须使用大量的化肥，但中国工业生产又无法满足其实际需要。

美国大使认为，在中国没落的情况下，苏联和美国都不应趁机染指中国。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必然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那时，美国不应当利用蒋介石，因为“后者明显已经没落了”。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使中国保持中立，即使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保持均势。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并推行温和(外交)政策。其他国家应当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应当“维持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平衡”。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鲍尔斯将之定义为“遏制”政策。

我对鲍尔斯的以上言论及其所设置的前提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相信，中国通过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和加强劳动的组织管理就能够使其粮食收获量翻一番。我指出了鲍尔斯陈述理论中所包含的漏洞和错误，并

根据苏联政府和党的文件的有关精神，阐释了苏联对中国的立场。我表示，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根据国际社会的意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在谈话期间，美国大使公开宣称，美国将会竭力扩大和加深中国与所有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指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世界强国不要再相互采取那种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行动。这里，他列举了古巴和德国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最尖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鲍尔斯做出如下结论：“你们可能，比如利用古巴来反对和激怒我们(美国)，也可能以此来给肯尼迪政府制造麻烦，甚至可以使伯利·戈德华特当不上美国总统。但我认为，(你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干。最好以协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好以克制的态度行事。”我指出，(苏美双方)之所以能在古巴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苏联为了满足美国付出了许多。苏美双方都应当极力采取举措以改善该地区的状况。

在这方面，我对该地区各种反革命集团无休止的军事准备表示了担心。后者公开宣称，打算入侵古巴和推翻那里的合法政府，而所有这些集团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大使同意我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纵容政策是相当危险的。他说，美国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措施以安抚苏联。鲍尔斯呼吁苏美双方，在德国问题上都保持克制态度。

关于自己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发表的声明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鲍尔斯解释道，自己认为，目前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已不能定义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对某个其他国家的态度了，即他暗示，这已经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敌视态度。不过，在此鲍尔斯仍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印度依然维持原来的立场，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鲍尔斯断言，美国并不反对印度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例如，去年印度政府曾就获得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询问美国的意见，A.哈里曼便说过，美国不仅不反对印度这样做，甚至还乐观其成。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美国大使表示希望能够再次与我见面，以便就印度局势和印巴关系的调解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鲍尔斯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调解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不想看到，印度由于担心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而不断武装自己和为此组建30个师。要知道，印度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A.尼基福罗夫。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10月24日

补充发送材料3份，具体包括如下同志：A.A.葛罗米柯、拉宾和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103—4105页

№138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1963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1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马利诺夫斯基、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经互会里关于古巴问题的意见发自北京的电报。 [127]

应该给予驳斥和对卡斯特罗说清楚，或者，让塔斯社进行报道。

关于共产党协商会议事宜的密码电报。

H.C.赫鲁晓夫的意见。

如果以分裂为目的的话，就应该召开协商会议(这是多列士的观点)。

比较正确的是陶里亚蒂的观点——不召开会议。

关于对周恩来演说的反应。

应该做出反应——或者是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对《真理报》记者的问题给予答复，或者是给中国人写信，说：我们准备恢复经济和贸易关系，或者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信。

最好是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积极的立场出发，不能带有论战的性质。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19-19об

№207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1963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3日会议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绝密

1.批准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

2.批准塔斯社的消息报道草稿(附件三) [128]

附件一：

就中国《参考消息》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和德国《明镜》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A.И.阿列克谢耶夫和苏联驻北京大使C.B.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哈瓦那

苏联大使

抄送：北京，苏联大使

请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会谈，根据受到的委托，向他作如下通报：

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然后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

西欧的这些歪曲报道被中国的《参考消息》转载。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破坏经互会的活动，使中国舆论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古巴进行的援助产生错误的认识，激发古巴人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信任和不友好的情感，并给这些国家同古巴的关系带来危害。

当然，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杜撰的以及得到中国报纸迎合的这种言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些报道如此迅速就被中国的报纸转载，这说明，这些文章或许就是由中国授意的，这种方法早就被人们所知道了，为了掩盖真正的作者，是经常会采取这种方法的。

请向卡斯特罗转交塔斯社通讯报道的如下文本：

“完全是为了挑拨的歪曲报道。

莫斯科，10月(塔斯社)。今年10月10日英国的《金融时报》、10月16日西德的《明镜》上发表了关于所谓《经互会秘密会议》的报道。报道说这次会议好像讨论了古巴方面提出的，关于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的请求。上述报道甚至列举了《辩论的材料》，旨在对事实进行歪曲，目的是要在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中、在加入经互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古巴的关系中投下阴影。

根据塔斯社得到的确切消息，《金融时报》和《明镜》的报道，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杜撰，是愚蠢的歪曲报道。

应当注意，一些国家转载这些报道，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挑拨。”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附件二：

关于中国《参考消息》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北京大使C.B.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北京

苏联大使：

根据给您的给驻哈瓦那大使的指示的副本(以单独电报发出)，请与古巴驻北京大使见面，并与他进行谈话。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РГАНИ，ф.3，оп.18，д.197，л.121

РГАНИ，ф.3，оп.18，д.198，л.51-52、53

№2192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1963年10月22日)

苏共中央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苏联外交部“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1963年10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北京大使通报说(今年10月18日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好像讨论了由于古巴遭受自然灾害而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向其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报道说，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接着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会议拒绝向古巴提供援助来克服自然灾害。可以认为，中国人将使古巴领导人知道《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是歪曲的报道。

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使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同卡斯特罗进行会谈，应该使卡斯特罗注意到，资产阶级报纸的这些报道以及中国报纸转载的这些报道都是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也应该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同古巴驻北京大使进行相应的会谈。同时塔斯社应发表简短的报道，对英国和西德报纸上的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给予简短的评论。塔斯社的这一报道的文本应转交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议。

Б.波诺马廖夫

Б.库兹涅佐夫

手写批注：

决议：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以便投票。

Б.马林

1963年10月22日

РГАНИ，ф.3，оп.16，д.357，л.35-36

№103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吾尔无线

广播(1963年10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5日会议第87/92r号记录

第92项 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采纳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在塔什干开辟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时间为每昼夜1小时。

ЦХСД, ф.4, оп.17, д.549, л.27

№13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1963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1月10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H.C.赫鲁晓夫：我认为——这已经属于波诺马廖夫同志的问题了——很明显，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不是在提建议)，但是，应该确定方向，以便使人们了解我们在召开共产党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就会出现分歧和开始“争吵”：一些人赞成召开会议，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 [129] 我们使人们发生争吵，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不，弗拉霍维奇 [130] 说：请提示一下，你们是什么立场？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现在坚持召开会议，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有害之外，这种会议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效果。同志们应该以此为方向，谨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赞成这一点，如果人们一定要坚持的话。但是，出于这种谨慎的考虑，我们认为，最好是不要急于求成。

在此，问题并不在于会议的筹备方面，现在，已经过了这种分界线，也就是就共同的行动纲领达成一致的界线。显然，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不可能再来做这项工作了。因此，现在，如果操之过急的话，这就意味着急于走向分裂，使事情发展到分裂的地步，而我们的目的恰恰是团结我们的力量。

这不，已经找到了某种论据。应该同法国人商量一下，别让他们感到伤心，因为他们是最积极的，是我们最忠诚的同志，也是在这件事上最坚定的人。因此，应该与他们商量：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时也考虑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党也赞成这一点，但是，我们自己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B.H.波诺马廖夫：也许，现在这样做是合适的，也就是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信函。将向他们提出建议：停止论战一个月，也许，要根据这一点通报一下情况。

H.C.赫鲁晓夫：您现在总是想着这封信，关于它我们将专门谈。而关于这方面，我说，您有机会提前考虑的，现在，或许应该这样。区别在于：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因此，让人们有了悬念。

赫鲁晓夫：关于蔗糖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关于价格的问题。波德戈尔内 [131] 同志，我认为您关于蔗糖问题的准备工作过于缓慢。今年就快结束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瞻前顾后了，播种期就要来临了。显然，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物质方面——也就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物质利益的制度。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还没有行动，而只是准备好了。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再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商量一下。我们打算提出关于扩大播种面积的建议，以便获得800—900万吨自己生产的蔗糖。

赫鲁晓夫：就农业问题召开中央全体会议的事情，显然，我们需要周全地考虑。我认为，大约在1964年2月，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稍微提及一下这个问题，而在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应深刻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它只是一个附加的问题，而在后一个报告里，它才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将是“非公开的”和“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的”。在这封信里，我不仅要代表我个人，而且还要代表中央主席团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者

政治局委员们呼吁，不仅是对毛泽东一个人，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说，也不仅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是代表我们的整个领导层，代表我们的党中央。

在这封信里应该按如下方式进行阐述：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如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我们非常担心：在我们之间已经有尖锐的分歧，将会削弱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这只会让我们党的敌人以及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高兴(或许，没有这些华丽的辞藻，可能会顺利一些)。

我们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声明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是正确的，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利的。即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裁军的问题，等等类似的问题。因此，显然可以把他们视为我们立场的基础，但是，对此我们大概有着不同的理解。难道我们现在应该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激动和进行辩论，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同时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

自然，我们能够理解，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所想的，但是，我认为，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想法。最好是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要好过于单枪匹马，我们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争吵，给其他一些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他们显然是向你们说过，他们希望是你们的朋友，但是，这话他们也对我们说过，希望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和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军事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为什么我们要制造这些困难呢？谁需要这样呢？争吵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我们之间的争吵。

关于边界问题，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方面，就此问题两次提出了呼吁。你们同我们一样，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边界线是历史上形成的，边防军并没有改变他们，这些争吵只能使双方关系复杂化。这是政府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让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派出人员前往各地，考察和研究这些争端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的一封信里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或者，在一封信里提出来更好一些，因为，在我们单独写信呼吁他们停止争吵以后，又提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似乎不太正确，因此，也许，最好是在的一封信里把这一切问题都提出来，以便在政府级别上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消除这个问题)。

在你们这方面，在报刊和某些活动家的演说中，都说边界是俄国沙皇改变的。但是，难道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应该进行争吵和相互推卸我们以前政府活动的责任吗？我们不想为俄国沙皇进行辩解，他们曾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而我们相信，你们也不会为自己的帝王辩解的，他们也拥有俄国沙皇的性质，也为自己掠夺了许多领土。因此，难道我们现在，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在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而发展的最终阶段是国家意义的消亡？在这个时刻，我们却相反地表明，我们准备制造让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的冲突(应该从容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这样的文件，以便使动摇不定的人理解这一点。

因此，应该周全地考虑一下——把这一点写进这封信里，还是单独地提出来。

请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不坚持，或许是单独地提出来，或许是写进一封信里。

米高扬：如果不是为了争吵的话，应该写进一封信里。

赫鲁晓夫：还是在两个月之前我就说过，应该写信。就拿哥穆尔卡来说吧，他问我：“您是否考虑一下，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
[132] 我说：“没有考虑，也不想考虑，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哥穆尔卡自己已经考虑了关于与阿尔巴尼亚恢复关系的可能性问题。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个同盟者，像一头山羊一样，还不知道要蹦到哪里呢。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另一封信，也就是关于给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我认为，这封信应该按如下方式去写——

亲爱的同志们，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一年对于苏联的农业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年(理由是：这样的寒冬以及干旱的夏季)，你们的国家也同样蒙受了苦难。

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们写这封信，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的储备粮食已经用尽，因此，当苏联农业出现这样困难的状况

时，你们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你们罗马尼亚的农业，多年以来一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你们以前请求我们提供援助，我们总是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管你们是按照合同范围，还是超出合同范围向我们提出请求。这样一来，就消耗了我们的储备粮，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年，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拿出了最后的储备粮支援你们，我们指望能有好的收成，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恢复，而且还能扩大自己的储备，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不利情况，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需要都不能保证了，因此，我们立即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了1200万吨粮食。这立即引起了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风潮。

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在购买粮食，而且在运输粮食方面，都存在着困难。

大家都清楚，我们无法再继续以这种态度对待这种情况了。因此，我们希望说明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利益，还是你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样做。也可能，在3—4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供应粮食和棉花方面，不能够再承担任何责任了，我们请求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

我们将以满足自身需要和积累一定数量的储备为出发点，这种储备不仅仅是苏联的储备，而且也是你们的，以便使我们在储备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预见到一些事情，以便使那些不能保证自身需要的国家，立即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以防重复我们今年出现的那种状况。

如果现在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可耕地保障程度的话，那么，它的情况是这样的：土地保障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其他一些国家，大致处于同等水平上。例如：罗马尼亚拥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那么，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也基本上是这些，但是，他们的保障程度却是不同的，收成情况也是如此，化肥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依靠其他部门，为提高化肥的生产量投入基本资金，以此来提高粮食收成，确保粮食收获总量和为储备粮的积累创造条件。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并没有忽视这给你们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更周全地考虑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上，粮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要比陷入这种状况好得多。只是由于我们每年都满足你们的要求和减少了自己的储备，才落得今天这种境地，而我们寄希望于恢复储备粮，但是，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你们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储备粮食的问题，因为你们每个国家的土地保障程度不同，收成也不一样。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收获量，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这并不是制度的关系，而是化肥的数量和质量起到了作用。

因此，我们打算给你们写这封信，并向你们说明，我们原来承担的那些责任……(没有听清)，而明年我们将无法履行这些责任，因为在一年时间里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显然，需要的不是一年、两年和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积累储备粮的任务，这要求3—5年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些。因为，为此还要使化肥制造厂投入生产，拟定的灌溉工程已经开始进行。我们不愿意拖延这些任务，我们现在希望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以上就是要说的大概内容)。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2, л.1-34

№138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 (1963年11月2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1月26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葛罗米柯、谢米恰斯内、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给毛的信的方面与哥穆尔卡交谈时的主要问题。

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写给我们党的信，但是，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把材料告知给各级党组织。或者给中国人写信，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不进行公开的论战。

准备好给兄弟共产党的信。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应该就中国问

题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 [133]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21-22

№25630 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134] (1963年11月28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2月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的会谈记录

1963年11月28日

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他途经北京去马尼拉参加地域性的贸易会议。他主动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作礼节性的访问。陪同他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萨姆丹。

索苏尔巴拉姆强调了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意义，蒙古不止一次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索苏尔巴拉姆告诉我们，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工人有3000名，到1964年苏联专家和工人的人数将达到8000人，他对专家和工人的工作评价很好，特别指出，没有苏联的援助，蒙古的发展远景规划无法顺利实现。

接着索苏尔巴拉姆扼要地谈到了一下蒙中关系，他说蒙中关系很紧张，指出1964年的贸易协定尚未签订。蒙方设想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要达到1200万—1300万卢布，而中方认为只能达到600万—700万卢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马匹……索苏尔巴拉姆说，1964年的贸易最后没有谈成，这样会影响两党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在劳动力问题方面给我们施加压力。至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中国工人人数大约有6300人，中国政府要求我们签约，保证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蒙方不能同意，表示国际惯例中没有这种签约的先例，再说，在蒙的中国工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所以实际没有必要签订这样的协议。中

国不同意蒙方的意见，一直拖延我们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人能否于1964年到蒙古参加工作的答复。

索苏尔巴拉姆继续说，我们并不排除中国要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自己的工人这种可能。如果工人被召回，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基本建设计划就会发生一定的困难，因为完成这些计划需要有3000名中国工人。如果这样的话，蒙古人民共和国只得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不使国民经济受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73-75

№10397 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1963年12月 [135])

机密

文本第17份

苏共中央书记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II2001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全会工作的整个过程再次表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带来好的成绩，并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了新的令人鼓舞的前景。

这次全会还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满怀信心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在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情况是，中央全会给出了解决两项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城乡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地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

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深刻和详细的报告中，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各国劳动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找到了新的动因。

中央全会向所有国家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提出了今后许多年的建设计划，始终不渝执行和平政策。我们，像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个政策为巩固苏联的事业服务，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服务，为总的社会进步利益服务。

全会的工作，同我们党的全部活动一样，——这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真正的进攻，这是列宁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即解决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大家都清楚，我们走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成就俱在，社会主义的威力在增长，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中国活动家们，他们顽固地不想看见我们的党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实在成就，不想看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持正确的道路。

迄今，中国领导人暴露出了更多的阴谋，他们反列宁主义、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通报关于目前这方面的形势。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党和人民建设共产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同绝大多数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同心协力地行动，而这时的中国领导人正进行着反对我们的诽谤运动。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及其他同志，在6月中央全会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实质。在这次全会后发生了什么？

最近的事实表明，中国活动家们被民族主义的傲慢所迷惑，不听取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一致意见和号召。据说，他们没有回心转意，而且继续加强分裂活动。

从《苏共中央的非公开信》中你们知道，中国代表团以怎样的谣言归咎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在莫斯科6月双边会谈中采取了哪些卑鄙的

伎俩。

苏共中央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建设性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遭到苏共中央代表团坚决反对后，停止了会晤，表现出了不想寻求化解分歧的途径。

谈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剧地恶化了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由于他们的原因，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进一步减少。由于签订了《禁止在三大领域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领导人通过可耻的诽谤运动达到了反苏、公开分裂方针的巅峰。

中国分裂分子现在主要是打击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进步力量的堡垒——反对列宁的党，反对苏联。最近数月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其他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章内容粗暴地攻击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纲领以及我们所有对外和对内的政策。中国领导人现在千方百计，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而只是反对苏共的领导路线。

没有非常愤怒的感觉，就不能阅读这些充满诽谤，对我们的党以及其他兄弟党的真正立场造假的中国报刊的言论。这些言论中，还显出中共活动家们一个荒谬的阴谋——企图破坏苏联人民、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党、对中央委员会、对苏联政府以及对我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

昨天在北京，在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之后，又发表了诽谤文章，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反对我党的领导。

我们可以告诉中国的活动家们：你们白费心机了。苏联和我们的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从来没有这样崇高，我们的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周围。（长时间鼓掌）我们的党和人民，整个国际工人阶级非常了解和热爱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长时间鼓掌，全体起立）……作为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因为他热诚接近人民群众，因为他不断地关心劳动人民，因为他有真正革命战士的勇气，因为他为保卫和平而忘我奋斗。任何人，任

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破坏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崇高威望!(鼓掌)

(一)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路线上开展破坏活动。现在已完全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分裂列宁缔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破坏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我们的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果；

——使国际工人阶级脱离争取团结它的全部队伍，争取联合民主力量到反对垄断资本统一战线的道路，而走上宗派主义策略和“左”倾冒险的道路；

——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政策的基础，保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制止热核战争的方针；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于国际紧张局势并使其尖锐化，鼓吹军备竞赛。

当然，中国的活动家们不会公开讲自己的真正意图，他们举着“世界革命”的旗帜行动。但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面具。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大国主义、领导权的意图所迷惑。他们真正的计划是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服从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狭隘利己主义利益。

如果以他们活动的基本方向来说，那将是这样的画面：

由于中国分裂分子的罪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这样的局势：自成立以来它的团结便受到威胁。从北京发出激烈的攻击，反对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决定的、协同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各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遭受直接的损失，因为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劳动人民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解决的问题强加于争论，诱使革命政党的力量离开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的活动家们，对其他共产党的利益一点也不关心，以大肆叫嚣的批评猛烈抨击其他共产党，他们力图使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失去信用，破坏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

例如，北京活动家们为什么要指责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

首先，是因为这些党派全力加强自己民族与苏联的团结；其次，他们积极动员本国民众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并赋予工人、全体劳动者反对垄断独裁和政治反动派的日常斗争以重要意义；再次，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和整个工人运动保持了行动上的一致；最后，在为自己国家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同时，他们不听从北京活动家们的“建议”，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准备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不排除和平斗争方式。

那么，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事实上，在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活动家们根本无法提出任何积极的纲领性意见，实际上他们谴责任何一项能保证建立反垄断资本的统统一阵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能保证组建和训练革命政治大军的现实活动。

在自己的诬蔑行动中，中国的宣传机器竟堕落到了如此下流的地步——借鉴了(敌对势力)反共产主义武器库中的一些惯用伎俩。例如，他们所谓的“莫斯科的手杖”的说法，意思就是说，似乎只要这个手杖一挥，其他共产党派别便一会儿向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向另一个方向。北京的这一说法不是别的，而正是老一代资产阶级关于“莫斯科之手”的寓言的再版。这一谎言是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者发明的。当年，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便曾用之来反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如今，它又被北京领导人借用。北京活动家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送给我们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领袖们的一份大礼。

不过，同志们，事情的实际情况已远远超出了对各兄弟党领导人的简单诬蔑。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可谓不择手段和不惜血本，他们公开从各类变节者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以组建宗派集团，而且甚至也以某某“党派”称之。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如今，建立了此类“党派”和集团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

时、巴西、英国、美国、锡兰、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这些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叛徒们均高喊，自己将依靠中共反对苏联和本国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则称之为所谓“真正的革命者”并在北京热情地招待这些人。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享受到了如此的殊荣呢？例如，在瑞士宣称自己为“真正的共产党”的叛徒集团只有5名成员。中国代表立刻接纳了这些人，并向其提供了印刷机。如今，该集团以“党”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诬蔑性传单。在澳大利亚，亲中国集团只有2名成员，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行了机关报。在英国，当一个月以前14名夸夸其谈者所提出的亲中国观点被基层党组织否决后，又在一个啤酒馆完全依照北京口气粗制滥造了一份宣言。

在与到访中国的共产党人会谈时，北京领导人极力促使其反对苏联及其本国的共产党，甚至连前不久才从监狱中获释的溥仪——前满洲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今又“嚣张”起来，他在接见外国代表时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而“苏共领导人则是修正主义者”。由此看来，中国活动家们在干部方面的问题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竟找了这样一个“大人物”来鉴别事关列宁主义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的对外宣传，服从于宗派斗争的目的。现在北京电台昼夜不停地用数十种外语进行广播。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堆满了有关中国的资料。

资产阶级圈子毫不掩饰、兴高采烈地去迎接连续不断运来的北京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甚至在西德、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许多反动制度下的拉美国家，就是说，在那些一般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图书进入的地方广泛散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用意是清楚的。他们企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各个国家所有的“政党”都拥护他们。同时，他们加紧说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以及那些因其他原因能够接受中国主张的政党领导。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外，他们成功地影响了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立场，还有新西兰共产党。顺便说说，它总共只有600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部分领导越来越陷入亲华立场。侨居北京并早已脱离本党和本国人民的缅甸、马来西亚和泰国共产党的活动家们随着中国之声附和。一年来，自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宗派小组和政党而开展公

开的斗争之日起，与这个时期之前相比，他们其实一个人也没有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中国共产党人，实质上力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础上建立宗派集团。但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大多数——约70个共产党——坚决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证实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完完全全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鼓掌）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培植的宗派小组，没有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生根，他们不可避免地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也要强调指出，不能把屈服于中国影响的政党领导人的立场与这些政党的共产党人和党员的立场相混淆。在这些政党内，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开始，直至党支部，有许多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的真正朋友，他们反对中国路线，反对把中国路线引入党内的人。

中国的活动家们，力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归自己领导。他们到处把自己描绘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现在大家多么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还是没有任何实事求是的纲领，打算帮助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的革命斗争中取得进一步切合实际的成果。

确实，现在年轻的民族国家，已经是世界这一地区的基本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取得经济独立，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容易解决这个任务。某些国家已经按这个方向行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批驳列宁创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次是继续强调说，武装斗争对民族解放运动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请问，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谁？！反对奈温、纳赛尔、恩克鲁玛，反对莫迪博·凯塔还是本·贝拉以及其他为巩固民族独立，为捍卫自己国家的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但是要知道，正是当地的反动派要推翻这些政府，帝国主义集团要进行阴谋活动。结果是，中国的宣传实际上鼓励了他们。

中国活动家们现在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政策的矛头，在世界上这些地区活动特别明显。他们不害羞地放出所谓“苏联帝国主义”的谎言。中国的宣传机关和各大使馆，千方百计诋毁苏联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他们暗中对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说，不能相信“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似乎要剥削“贫穷的国家”。他们采取直接的经济

压力。例如，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向印度尼西亚商务代表团暗示说，假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斗争，那么中国可以大大地扩大对印尼的援助。

中国代表已长时间进行组建亚非拉三大洲的分立主义工会及其他联合会，按他们的图谋，这些组织必须与世界一般民主运动相对立。

大家知道，民族解放运动并非同一种类型的运动，因为有社会力量的不同成分。中共的领袖们究竟指望谁呢？虽然他们空谈革命力量，实际上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联合居心不良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种族主义分子，利用卑鄙的感情，利用民族“有色”和“白色”的差别来投机取巧。这样可耻的事，不仅对共产党人不相称，甚至对普通的诚实人——民主人士也不相称。

中国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对个别活动家发生影响，但他们不能停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世界上有苏联，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有良好的作用；在年轻的民族国家有很了解自己人民利益的力量，他们已经成长，他们能看清楚中国霸权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他们已不止一次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公开谈论此事。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同已解放国家的战斗联盟坚强起来，并粉碎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分裂分子的一切计划和打算的可靠保证。

接下来，我们谈关于国际政策的问题。中国的宣传叫嚷说：中国共产党与同它在一起的人，——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不妥协的战士。但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难道中国政府在加勒比危机时刻采取的立场，证明是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国政府拒绝支持苏联使古巴免受美帝侵略的防御措施，与此相反，而是移山倒海般猛烈诽谤苏联。据古巴人自己承认，苏联不止一次被他们证实，苏联拯救了革命之岛。中国的活动家们不是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采取措施制止美国的侵略，拯救古巴的革命，而实质上是在背后打击一切反帝战线。

难道中国政府在印中冲突的行为，能证明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吗？中国政府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只能为印度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效劳。

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谈反帝斗争，越来越接近巴基斯坦，这是一

个反动制度的国家，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

怎样查看出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全部立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对《莫斯科条约》的态度实际上把自己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一伙。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他们准备即便全中国“没有裤子穿”，也要掌握核武器。事实上这一切只能促进军备竞赛，并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原子狂人。

北京对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反应是怎样的？在北京，人们不掩饰自己的欢悦。在北京的报刊上出现了一幅漫画，肯尼迪被描绘在血泊中，下面题词：“肯尼迪，啃泥地去吧！”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谋杀的背后是种族主义者，是美国“疯狂的”反动军界。中国领导人因肯尼迪被谋杀而欣喜若狂，有意或无意地加入这些反动派与战争集团一伙。

最后，要讲一讲关于中国加强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密切接近的情况。帝国主义的领袖们非常明白，什么对什么有关系。我们是原来情况的证人：在北京反帝喊得越响，则越多的帝国主义政府竭力同中国建立关系。当然，“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因中国宣传的叫喊而改变，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领袖们深信中国的活动家们反对苏联，而力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并使中国同自己的关系密切。来自日本、法国、英国、西德的“大生意”代表常常到中国去。居于高位的中国活动家们在祝酒词中和报刊上慷慨地奉承和恭维的，就是那些“血腥的帝国主义”代表，并同他们联合起来经常指责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在这些生意人当中，有过去的大战犯，中国活动家们遇到他们甚至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共产党人不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立场，而是为了使更多国家同苏联对立，并建立自己的不同国家的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方针，实际上阻挠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力量进一步逐渐增长。这样，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帝国主义者的声势。

例如，不久以前大家都知道，从白宫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的指示：“中苏分裂，像他们所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垄断组织的报刊没有掩饰自己主人的阴谋。例如，《华盛顿邮报》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表示，“利用中苏分歧是为了西方的利

益”。这就是阶级敌人评价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谓“革命斗争”的结果！

中国活动家们对外政策实践的总结是怎样的？他们越来越使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民孤立起来，他们已经削弱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艰苦贫困和流血牺牲为代价赢得的国家威望。关于当代基本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公开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同意的路线。因而他们表明，他们实际上反对和平共处的政策，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体系有力量，各国人民有能力不容许新的世界大战发生。

在刚结束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华沙会议上，中国代表不是偶然地千方百计辱骂保卫和平运动，他们路线的一个拥护者竟然达到这样程度，他当众声明：“国际保卫和平运动不应以争取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目的。”中国活动家们同时肯定地说，责备他们否定和平共处是冤枉的。一切问题在于他们的立场没有原则，充满矛盾，并实际上完全归结到否定或破坏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同志们，我们讲的这一切揭露了北京当前政治方针的真实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空话掩盖对世界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而实际上对基本的革命力量，对反帝斗争的整个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领导人现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贯彻自己方针的后果。在国际会议的论坛上，中国代表越来越频繁遭到坚决的反击。这明显地表现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世界妇女大会、尼科西亚亚非团结组织等会议上。华沙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刚结束，他们就对尼科西亚会议抱有特别大的期望。这些国际会议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愤怒地批驳中国代表分裂民主的、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谴责他们诽谤苏联以及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实表明，中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猖獗的反苏宣传引起越来越大的愤懑。

还有更大的政治失败在前面等待着中国分裂分子。但是我们的党，我们国家的威望，尽管北京的宣传家们进行一切诽谤，不但没有发生动摇，反而与日俱增。（鼓掌）

坚定的，同时也是灵活的、列宁主义的苏联对外政策，已不止一次挽救世界避免热核战争，得到人类的绝大多数支持。希望遏制侵略者，

制止热核战争，和平得到维护，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同苏联联系在一起。(鼓掌)

(二)

同志们，有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党同各种倾向斗争的经验，是开启我们答案之门的钥匙。

现代革命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在它将近成立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在最近10年内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及解决这些任务的新方法。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内部通常会暴露一些政治活动家的弱点，他们没有足够的无产阶级锻炼和培训，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因此，当革命道路转折的时候，他们通常很难站稳立场。

中国领导人惯于讲革命空话的毛病，他们的自高自大，教训别人的一切语调——这都是内部思想和政治弱点的表现，他们没有能力提高面临新任务的水平，这是他们在需要解决国内和国际重大任务面前折腾的表现。

十分明显，中共领导在国际舞台推行自己的特殊路线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相联系，即用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庸俗化”成为“三面红旗”方针的后果。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明显失败，国家好像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不是真诚自我批评地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正国家的状况，而是在对外政策上走上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企图诿过于人，竭力把自己内政失败的罪责推到苏联身上，把失败和撤退苏联专家联系起来。

我们的专家，当然不能支持强加于他们发展生产的冒险实践。他们是“大跃进”失败真正原因的无意见证人，这个失败在他们撤退前早已明显暴露出来了。至于“人民公社”的失败，把它联系到撤退苏联专家，那简直荒谬极了。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为中国的农业工作过。

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类似不配称为“解释”的荒诞无稽和骇人听闻，被民族主义迷惑的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全世界扩散这些诽谤，而且把它作为说服本国人民的基础，唆使他们反对苏联。在这种可耻的事情中，

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竟不害羞地把这些诽谤写入今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决议中。

民族主义——当现实打击他们的不切实际、弄虚作假的计划和口号时，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通常的靠山。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态度，他们大喊大叫的、超革命的空洞辞藻——这只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掩饰。

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贯穿于他们的所有路线。民族主义促使中国领导人染指社会主义大家庭最珍贵的财富——苏中友谊。民族主义也是中国领导全部所谓理论的源泉，成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纲领。既是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亚非拉各国的理论；又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提纲；还有从民主组织赶走“白人”代表的图谋；还有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自己的”原子弹的志向；还有对与印度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民族主义真实的表现。

这样，在以中国活动家们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左的”空洞辞藻为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现代机会主义倾向有一系列的特点。现在，它已不像共产国际成立后的最初年代，与共产党的建立有联系。它已掌握了早已存在并取得了政权的政党领导机关。

这一流派的代表们，力图以自己的特殊思想纲领和政治方针为基础，在北京组建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流派。

这一反列宁主义的流派，有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包装——毛泽东主义。当然，这绝对不是严整的、完全的理论。（民族主义就是它的基本来源。除民族主义外，其中还强烈感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这包括“不断革命论”。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不能掩盖有明显的孔子学说烙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136]

毛泽东主义的折中主义特征，给予现代托洛茨基分子越来越多的理由，热烈地支持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

毛泽东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是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化身，并直接修正它的基本原则。

真的，举他的“促进”革命论为例，他限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忽视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原理——这是直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修正。这里还有一系列例子——这是教条主义最坏的一种形式：重复旧的关于世界大战的表达方式，关于时代的旧定义，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旧的表达方式，等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他思想也有有机地包括进去。难怪托洛茨基分子如此高兴地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和活动。）[137]

现在，中国公开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被提升到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最伟大的理论家一级。

在中国报刊上可以看到有关他的论述：“毛泽东继列宁和斯大林之后，总结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没有过的丰富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尤其是“总结了时代的一切重要的科学成果……”

所有这一切极端吹捧和夸大的真实思想何在？在于树立毛泽东的全世界领袖的地位，并提出中国领导的领导权诉求理由。

今天，中国领导人背弃自己原来对我们的党，对二十大路线的评价。对毛泽东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烧尽了原来所崇拜的一切，而原来所焚毁的一切，现在崇拜起来。”（屠格涅夫语）

这是毛泽东观点的一些对比。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他说：“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现在毛泽东的宣传队叫嚣，似乎二十大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中国领导现在对斯大林过度赞扬，而他们对斯大林的真正态度，可以按毛泽东在1956年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的讲话来判断。他对意大利同志说：“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以自己的行动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带进共产主义，呼吸这样的空气令人难受。他成为共产主义的成吉思汗。斯大林的错误更甚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是，他提出以党内特务系统为基础的政治方法，建立怀疑和恐吓的连坐方法，这种方法会使人们做出卑鄙而恐怖的行为，在工作中互不信任，使人民生活在威胁中。”

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怎样说的呢？现在他们虚伪地对斯大林进行颂扬，赞同他施行镇压的方法，并且声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中国活动家们甚至肯定地说，苏联的导弹威力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请听，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1957年说的：“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武装到牙齿。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小卫星’……如果搞一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把苏联的强大同订立和平协定联系起来，把苏联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中国同中国的独立直接联系起来。

而现在中国领导人吹嘘，他们不需要苏联的支持。例如，不久前陈毅声称，不需要苏联的核威力来保卫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要知道，假如苏联不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早已利用任何合适的情况（例如，中国领导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状况），以便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那里生活着6亿多人。

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都明白，正是苏联以自己的全部威力，保证防御能力并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三）

同志们，分析目前由于中国领导人反对我们总路线而形成的状况，我们应当完全认识清楚，强加给我们的斗争可能将是长期的。

这场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掌握一切意识形态手段和国家机器的执政大党的领导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领导人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旗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大喊大叫地把自己描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这有时可能把政治上不够成熟或没有经验的共产党人引入歧途。

当然，不应夸大中国领导人分裂路线的危险性，但也不能把它缩

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害羞地在方法上，蛊惑地利用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加强反帝斗争的自发志向。如果不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目的和行为，那么可能把某些阶层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个别队伍推向冒险的道路，从而对开展世界革命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

我们的党竭尽全力，不容许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保证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尽我们一切所能，改正中国活动家们当前的方针。

苏共中央在这里的依据，是列宁关于政治领袖和政党的动摇性不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真正利益，及各国人民的命运成为被我们排挤对象的指示。人民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巨大的反帝力量。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也需要吵一会儿架。

遵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按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不久前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新的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建议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

各兄弟党在苏共中央这新的步骤中，看到了我党对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高度理解的表现，它的列宁主义英明和丰富经验的表现。（鼓掌）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自己的政策作长期打算。伟大列宁教导我们的党，要对革命运动内部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实行始终不渝的、无产阶级的策略。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指明哪些途径？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的路线。

我们党的立场在纲领中已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共非常关心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不对民族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主要敌人，是国际反动派在其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斗争中基本的政治和思想武器，与民族主义祸害作斗争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我们的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加强同各共产党的联系。今年苏共中央接待了9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这大大地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数字。赫鲁晓夫同志尽管在百忙之

中，也要同其中许多代表会晤并座谈。

国际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对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党肩负着召开这样会议的责任。为了严肃地审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的问题，中央委员会认真地研究各兄弟党的一切意见和所有立场。它主要的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各共产党，确认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总路线。

第三，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过去和将来都沿着列宁的道路——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的道路前进。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民族主义迷惑中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用他们的话说，“天当然不会塌下来”。

在悠久的岁月中，我们的国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一直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的力量已无比增长，我们在世界各国有那么多朋友，任何人不能遏制我们。（鼓掌）

应该说，最近，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他们遭受到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坚决回击以及中国人民对反苏方针的不满，他们力图修改自己的反苏策略。他们开始更多地夸耀自己希望维护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时加强对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的诽谤性攻击。其中，去年底召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证明，他们的主要路线仍然不变。会议确定的目的不是反对反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借口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立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甚至没有提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然，我们应该向苏联共产党员，向全体苏联人民说明中国领导人路线的错误程度。特别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作用，我们进行对外联络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已增长。他们执行责任重大的、党的委托，应当广泛和深思熟虑地宣传苏联的成就，我们的党带给苏联的伟大列宁主义真理。关于苏联政策的真理要传达给中国人民，继续在中国人民中间播下友谊的种子。特别是将来，当国内不再有毛泽东个人崇拜压力的时候，这些种子会结出自己的成果。

第四，中央委员会教导我们，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决定性贡献，在于逐渐扩大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共产主义建设——这是苏联人民对一切现代革命力量最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党的力量——在于它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正义性。实践和生活完全证实，正是我们路线的正义性，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政治方针是站不住脚的。(鼓掌)

每年，可以说是每一天，都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并在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面前反驳中国活动家们的论点。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得非常好：“我们沿着伟大列宁指示我们正确的，唯一牢靠的道路前进……没有力量能干扰苏联人民达到预定的目的。”

苏共中央竭尽全力，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在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下继续前进。(长时间鼓掌)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12-19

№10396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1963年12月 [\[138\]](#))

机密

文本第15份

苏共中央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II2002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全会的会议上，已经第二次听取关于因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情况通报。这一事实证明，苏共中央极其关心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证明伟大列宁的党对为社会主义体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而斗争的事业的高度负责。(鼓掌)

共产党员完全有理由担心最近在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情况。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破坏活动。

中国的领导当然明白，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团结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是团结各国进步力量的骨干和核心。因此，他们首先主要竭力于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的思想基础，拆毁团结和联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各国人民的组织政治链条。中共领导人，力图分离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实现自己长远的阴谋。

事实证明，不顾苏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党致力于消除已发生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近来加强了，具有公开政治斗争的性质，反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制定的方针。在这个毫无原则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不择手段。

数年前，当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特殊立场登上国际舞台时，可以表明，他们发起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争论，纯属理论问题。例如，关于评价我们时代的特点，关于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可以表明，北京的活动家们在随便搞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但是，他们后来的行动证明，这不但是对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问题的各种解释(当然，这本身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明确，在开展的论战中，谈论的是关于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路线不受中国分裂分子的恶意攻击，关于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的政治方针。

中国领导人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击，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越来越把意识形态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政策范畴的斗争重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公开的宗派工作。他们竭尽全力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不和睦。中国领导人明显地执行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其队伍的方针。很明显这一切符合他们的特殊目的。

(一)

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遭到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决反击。有鉴于此，中共领导人现在企图随机应变，改换策略，稍为更深地隐藏自己的真正阴谋。开始时，按北京战略家的阴谋，应当用“左”的辞藻和一点也靠不住的宝剑来表示他们的

非凡勇气和革命性。近来越来越改用劝人信服的话，说中国领导始终为和平共处而斗争，说他们也没打算过通过发动战争等手段“促进”革命。总而言之，看样子已经像高唱其他歌曲了，虽然仍明显是老调，因为中共领导人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到，除了隐瞒自己那些引起各国人民极其厌恶和愤怒的观点和主张。

在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策略特点之一，就是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抹黑苏联共产党，把它的政策与其他兄弟党的政策相对立，力图证明，似乎苏联在国际舞台的路线不符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中共领导人明白，我们的列宁主义党以及苏联的爱好和平与国际主义的政策，是他们走向实现大国民族主义图谋之路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力图以任何手段和方法破坏苏共的威望，削弱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影响。

与不久以前不同，那时中国宣传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现在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二十大后执行的全部对内政策。中共领导无论在自己国内还是与其他党会谈时，千方百计竭力强调，似乎他们并不反对苏联共产党，只是与其中中央委员及苏联政府有分歧。然而，这并不比中共领导的卑鄙伎俩更高明。不可能使始终不渝地贯彻数百万苏联共产党员大军意志的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委员与我们全党、全体人民相对立。况且大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宣传对党的最高机关——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措施及文件进行攻击，反对谴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反对二十二大通过并得到不仅全党而且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拥护的我们党的纲领。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最近的多篇文章中这样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关于苏共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认，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而中共机关的理论杂志《红旗》写道：“这个纲领……是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本杂志还声称，苏联人民“背弃了共产主义的高尚理想，因为他们以物质福利的观点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而在这一切之后，中国领导人想让人相信他们，似乎他们更“热爱和尊敬”苏联共产党以及全体苏联人民。

很典型的是，中共领导企图把我党竭力保障苏联人民更美好的生活

描绘为背弃共产主义的理想。

在这个方面，现在北京各剧场演出的话剧《雷锋》具有代表性。譬如，从毛泽东同志本人去看这话剧，就可以看出这剧本具有何等意义。这话剧的主人公直言不讳地批评人们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他在舞台对着观众说：“从前你光着脚走路，后来穿布鞋了，现在是橡胶鞋，而以后想炫耀穿皮鞋了，而且可能是长筒靴了。这样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全场活跃）

当然，我们明白，在中国现在皮靴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也理解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困难。但是，当把困难视为理想，当以此立场企图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企图证明，只有处于困难之中并认为这是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么，这不可能不引起任何明白人的抗议。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论战的怒火中“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在那里最大限度地完全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在那里每天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发挥体力和脑力的能力，保障越来越充分的自由发展。

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明白这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关于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是，他们为了宗派的、民族主义的目的，准备诬蔑苏联人民的成就——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财富。

许多兄弟党的同志说，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近来不止一次声称，在贯彻中国方针的斗争中现阶段不应分散，而要集中力量主要打击苏联，或像他们直接讲的“擒贼先擒王”。这个策略在中共领导最近的全部的宣传和宗派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证实。在中国报刊的版面，充满反对苏共和反对苏联的诽谤内容。仅在8月份，一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200多篇各种各样的反苏性质的材料。从11月初开始，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从每天6小时增至9小时。

几乎每天都有从中国播放北京报刊的反苏文章，中国发言人的讲话，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以及其他诽谤性的材料。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中，甚至采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

义”三大敌人的表达方式。同时，中国刊物直接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苏联共产党人。今年10月，《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同匈牙利 [\[139\]](#) 报纸记者会谈时说：“苏联比帝国主义更坏。”

中国领导人做出类似声明，恬不知耻地继续确认，似乎正是他们“遵守阶级立场”，“划清敌友界限”。事实上，正如事实所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是集中火力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掉转政治斗争战线去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中共领导人宗派活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力图破坏我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如果以前，他们是反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路线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那么现在，他们玩弄的计谋更狡猾，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引诱，对另一部分施压，对第三部分恫吓。不久前，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彭真做出对策略路线的改变，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要不同对待，但主要打击核心，打击苏共……要把一个一个国家区分开来，从而达到瓦解修正主义阵营的目的。”

如果在1959—1960年，中共领导人在实行自己的特殊路线的斗争中，企图通过所谓骑兵进攻的跃进取得成就，那么现在，他们则转入了长期和顽强的围攻。他们指望长期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共领导打算经过这样的斗争，据他们说，可能持续数十年后，一部分厌倦了并退到局外，另一部分开始动摇，第三部分则完全“举起白旗”。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实行这条路线，极大地减少了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经济联系，公然宣称，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反对中共的立场。不久前，民主德国在北京的大使被中国外交部召见，直接向他声明，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停止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那么“将严重影响民主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但如此，中国外交部1963年9月5日致民主德国政府的官方照会中写道：“如果民主德国确实把德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它理解到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应站在中共一边。” [\[140\]](#)

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和匈牙利实行了粗暴的讹诈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年9月，政治局委员朱德在与匈牙利在中国的代表会谈时声明，假如匈牙利同志与苏共路线划清界限，那么中国欢迎。假如你们，朱德威胁说，站在修正主义一边，那么我们将反对你们。

中共领导对蒙古有特别的打算。不久前泽登巴尔同志对苏联大使说：“现在中国人一方面采取经济压力方法，把乌兰巴托铁路的运输降至微不足道的规模，减少自己的商品供应量；停止贷款援助；以中国工人的行动讹诈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企图进行破坏苏联援助蒙古的威信，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宣传，寄希望于在我国、在蒙古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

中国代表无耻地利用古巴的困难和复杂的局势，问题是，在那里才刚成立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国的宣传机关(利用古巴人民的无知)

[142] 在古巴散布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古关系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似乎打算停止援助古巴。同时，中国的宣传千方百计鼓吹中国对古巴援助的意义。

不言而喻，中国领导这样的分裂活动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应有的反击。这些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十分明白，中国的分裂主义者要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把事态引向何方，他们同时认为，必须动员力量进行反对分裂活动的斗争。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特发展的路线，煽动民族争吵和各国人民间不信任的方针以及派遣破坏组织分子到我们队伍的方针，虽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最终必将遭到完全和可耻的失败。(鼓掌)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要通过互相和全面合作的努力，通过同苏联的友好，必将建成通向他们新的幸福生活道路。(鼓掌)

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说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直接同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实行的错误对内政策相联系，它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大家知道，所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路线导致中国经济何等的巨大失败。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大的和落后的国家——事情是复杂的，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像列宁说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现在要非常重要地说明：为了什么目的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采取错误和冒险的措施？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前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取得了无疑的成就后，马上进行危险的试验，使国家经济倒退了几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十分明显，中国领导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路线，试图飞跃地、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超越所有发展阶段，因此声明自己要求担当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种，是以加速度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属于这类国家的当然是中国；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原地踏步的国家；第三种，是从社会主义向后转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在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决议中肯定地说，在中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可能要3—4年或5—6年。决议中还说，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了。

大家都看得清楚，“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时还有“丑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都失败了，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的口号。这个运动的简单思想，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干部承担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形式上保留原来的口号，竭力掩盖放弃总方针。

早已停止了“小高炉”的土法炼钢运动，修订了随意的技术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是1958年在会议上通过投票决定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改变为通常的农业合作社，恢复了物质利益关心原则，当时中国领导人曾如此草率地嘲笑这个原则。

最近，中国领导人力图千方百计强调，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稳定”，指出工业和农业都向前发展。但不能不看到，现在这个“发展”是在1958年的水平上开始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可悲经验的结果，使国家经济倒退到这样的水平。同志们，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由于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遭受了残酷的教训，现在从一个极端猛撞向另一个极端。

还在几年前，他们向全世界宣布宏伟的炼钢、生铁、采煤的计划数字，声称“提前工业化”——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它将于最短的期间实现。现在，中国领导违反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把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决定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在上述“调整”运动的过程中，基本建设企业缩减，工业发展速度急剧下降，2000多万人从城市强迫下放到农村。

与1957年兄弟党宣言中阐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反，中国领导人现在证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应按下列次序发展：首先是农业，然后是轻

工业，最后才是重工业。现在他们总的说，工业化政策的制定要非常依赖农业的状况。假如这一切他们仅为中国设想，那是好的。这样可能会考虑，中国某些特殊条件为他们解释这样的决定。但是，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改正原来的错误，便匆忙把自己的仓促决定赋予为普遍特点，并把它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

但是要知道，实质上这样对待工业化的态度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竞赛中放弃阵地，在困难面前投降，更不用说这一切不可能不削弱中国的国防力。

顺便说说，中国领导人喜欢提醒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必要性，甚至责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国防。那为什么他们自己对这个公认的最重要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最近几年的时间，苏联不惜资金制造导弹核武器，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可靠的盾牌，而中国却缩减了对国防有直接影响的钢铁、有色金属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工业品的生产。无须惊奇，这样的结果，武器现代化和中国军队的装备严重地放慢了。难道这一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防力吗？

发生产理当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不顾在发展经济中的一切困难，顽固地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兄弟合作？要知道，这很明显，中苏经济和科技交流正常化，苏联政府近来不止一次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这只能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快地扭转在经济中的大失败。

骤然看来，这是一幅不明白的景象。我国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利较少，但它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合作建议，同时中国拒绝我们所有的建议。究竟如何解释中共领导这样的立场？只有一点：中国领导人害怕他们的人民知道关于苏联无私的、兄弟般的建议的真理，那时，他们企图归咎我们的党和苏联人民的一切卑鄙诽谤将完全粉碎。中共领导担心，同我国的合作，可能会把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不可容忍环境的二十大思想清风吹到中国。在今年初的边防部队会议上刘少奇直截了当说：“现在风从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把铺天盖地的沙尘吹到我国，这些沙尘影响我们呼吸。如果我们同西风、东风和南风进行斗争，并学会了战胜它们，那么我们还没有学会同北风，同从那里吹来的沙尘作斗争。”^[143]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风从北方来”的恐惧。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思想的影响下，害怕人民自觉意识的增长，他们政治积极性的提高，迫使中国领导人更紧密地关闭面向苏联的所有门窗，这样对二十大思想影响的害怕，当然不是偶然的。

同志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不能不使一切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人提出抗议。还在人民政权的最初年代，兄弟党已注意到中国领导在实践中的某些负面现象。例如，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同志太过分追求建造庞大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强制扩大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机关。任何到中国来过的人可以观察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仍然明显地告知关于这方面情况的信息。那就可能明白，不要忘掉中国发展历史道路的特点。但是，无法解释的是另一点。无法解释的是，中共领导不仅没有对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进行斗争，反而像是有意识地保存这些现象，使之适合于自己今天的政治目的。

在党内形成绝不容许流露即使最轻微批评的环境。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清洗运动”，实质上变成残酷镇压一切不同意中国领导当前政策的人。对当前中共领导政策的动摇，首先是那些同情苏联的人遭到镇压、撤职、降级或下放农村。在所谓的“改造”运动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们因一丁点儿理由而离开家庭，被强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停发粮票。所有这一切都充当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新方法。

这是中国公民自己如何描述中国的状况。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杨乃文(ЯнНай-вин)在自己的信中说，大规模地建立“思想检查”制度，定期进行检查“政治可靠性”，这是中共实行新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如被怀疑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有一丁点儿不同意，”他写道，“就要遭到无穷的检查、审查和批判，直至他们真的或假的承认错误为止。这一切摧残人的生活，导致某些人自杀，在人们中产生敷衍应付、没有原则性的心理。”

然而中国领导人把这样的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典范，并企图把它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坚定地说，无论我们的党，无论其他兄弟党，无论何时，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接受这个社会主义“典范”。(鼓掌)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言嘱咐我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贯彻他们的思想道路上才能建立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生活。(鼓掌)

同志们!不能不考虑到,反对中国领导分裂路线的斗争,是在历史环境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的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增长以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都在增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在增长。现在人民民主国家早已不是15—18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国家了。它们全部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顺利地发展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同时,当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增长了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这些现象当然有着正面的意义,因为它建立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总的实力加强都得到保证。

但不能不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伴随着由于克服旧的传统和观念以及从资本主义继承的旧心理而产生一定的困难,还要克服由于许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消灭经济落后而产生的困难。这全是历史造成的事情,我们正在顺利地克服成长中的困难,并将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继续克服。 [145]

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发生的客观程序,来达到自己的分裂目标。中国领导人利用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利用各国人民完全自然的对加强主权的志向,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基础,削弱它们同苏联的联系。

现在,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自力更生”的提纲。我党中央已声明,假如中国领导人没有在提纲中放入以干扰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并最终导致各国人民按民族分布地分离为主要思想的特别内容,那么对这提纲不作任何反对。

这样,如果用心观察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力求达到:

——拒绝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联合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每一个国家孤立发展,建立以中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拒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承认小资产阶级思

想和个人崇拜实践的合理性。

同志们，实质上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一切分裂活动以及自己的国内政策，都意味着一条放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经济竞赛的路线，意味着不相信在这场竞赛中战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在两大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性和困难面前投降。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特殊政治方针以及围绕它的叫嚣，不仅号召掩盖这个投降，而且转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注意力，把这些责任推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很明显，中共中央因此不顾我们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攻击我们的党。

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在共产主义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它的大吹大擂的革命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和困难任务面前惊慌失措，否定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纪律性，具有从一个极端猛撞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这一些势力，正如列宁不止一次指出，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128页），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共产主义运动，已不止一次遇到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潮流的代表。只要回想起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反对20年代的“左”倾共产党人，反对托洛茨基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分子的斗争就足够了。了解这次斗争历史的人，不能不觉察到中国领导人不仅假借上述潮流中的观点，而且仿效他们的斗争方法反对我们的党。他们越深入开展自己的破坏活动，越能明显地看到，“左”的空话只是掩盖其实行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同志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问：怎能发生像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年代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可能发生，像这样党的领导滑到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

只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可以获得对此问题的正确答案。20多年来，直至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正

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党，吸收了数十万农民，他们曾很好地对外国奴役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没有像无产阶级所固有的素质：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性和纪律性。

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事业。否则中国革命可能不会取得胜利。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农民方面，太把农民理想化，同时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他们认为，农民是比无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的阶级。这样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组织规定。党的成长优先依靠农民，并长期进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1949年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只占2%—3%。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达到1800万人，但就其构成来说，仍然是一个农民党。

只要领导政策正确，如同列宁领导的那样，在农民中普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可以不引起此类负面作用。但是，当中共领导人本身经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自己的压力时，没有同它斗争，而企图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解释中国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所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领导人现在肯定地说，似乎他们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在二十大以后开始的。实际上，在中共酝酿民族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直接反苏的情绪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还在20世纪30—40年代，所有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在中共都遇到了不友善的对待。对在共产国际学校学习过的人，要求做出书面声明，放弃他们在莫斯科学过的一切东西。在这个时期，已经相当强烈地感到中国领导人的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那时他已经强调指出，只有中国领导人不仅能够正确了解 and 评估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形势。

1949年春，中国领导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特殊立场使自己感觉非常清楚，以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华北西柏坡同毛泽东会谈。顺便说说，在这些会谈中，苏共中央力图说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

响，更多地注意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像上海这样一些城市的工作，更广泛地开展工会工作，等等。

很典型的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支持他们撤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支持中国吞并它。苏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他们，也不会同意自己这样做，虽然中国领导人从那时起不止一次重复这个问题。可以再列举其他事实，完全驳倒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同苏共的分歧只在二十大之后开始的论点。有一切理由证实，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主张很早以前在中共领导内就已成熟了，他们的代表者等待公开发言的合适时机。

中共领导人经常在农民中间工作，本身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一切负面后果的影响。在相当的时候，中国领导还能保持用批评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针对这个问题说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很遗憾，不得不承认，经过许多年以后，中共领导忘记了这个危险性，并容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自己的党内占优势。

(四)

我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常常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同情，敬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同志。我们坚决相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基础，归根到底，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和中国人民将一起在一个队伍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鼓掌)

苏共中央已经声明，中央委员会不会屈服于狂热的斗争，不会走上吵架的道路，不采用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斗争中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卑鄙伎俩。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苏共中央为了消除存在的分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把已开展的论战在共产党人之间可接受的框架内进行。按我党建议，今年7月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这些谈判中，苏共代表团受中央委托，提出了一系列巩固苏共同中共两党团结的

建设性意见。如果谈判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那么对此罪责完全归咎中国代表团，它不仅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设性建议，而且竭尽全力使这次会谈失败。

你们知道，今年10月苏共中央再次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因此，苏联的报刊停止发表论战的材料。但是，中共中央实际上又拒绝了苏共中央这次倡议。

不久以前，今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信中重新建议采取措施，必须促进中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对此信的答复暂时尚未收到，但不能不提高警惕，中国领导人收到此信后，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发表反苏言论。不久以前，早已是北京喉舌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实质上对苏共中央的新建议进行攻击。与此同时，中国发表反苏文章，并在电台广播，恬不知耻地欺骗人民，肯定地认为，苏联的报刊似乎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

苏共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表明世界共产主义的舆论，认为我们是按列宁的方式在对待其他兄弟党，其中包括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沉着和耐心。同时，苏共不止一次声明，它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切身利益的最重要原则。

最近，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同志会谈时，公开而且相当肯定地声明，他们不准备同苏联改善关系，换言之，要以我方“无条件投降”为条件。他们想要什么？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就看得清楚，他们想要我们的党把自己的政策服从于中共领导的大国意向。他们想要苏联人民恢复个人崇拜时代的制度，放弃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放弃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但是他们应当知道，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把我们的党、我国的人民从列宁的方针指引下击退下来。（鼓掌）

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顽强地克服发生的困难，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破坏活动，更积极地执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坚决捍卫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争取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斗争是严重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

一切事实证明，中国领导人将继续顽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将企图并继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自己的宗派和破坏活动。

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以国际主义政策对抗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以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发展合作的路线，对抗他们使社会主义大家庭思想混乱和分裂的政策；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对抗小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苏联共产党人的这一方针得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热烈支持。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沉着，利用一切可能性，制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利用一切手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分歧。正是基于这些意见，苏共中央采取了行动，不顾中国狂妄的反苏运动，一次又一次建议中国领导人认清当前局势的一切责任，并制止事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党维护和巩固团结的努力，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人民自己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强大。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越来越新的胜利。它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在全世界民主力量中赢得了空前崇高的威望。

为了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加强，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榜样的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贡献数十年来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而忘我斗争所积累的一切经验以及强大的力量。

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及其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原则的全体苏联人民的路线，我们坚定地相信，这条路线一定胜利！（长时间鼓掌）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3年12月26日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20-34

导的分裂活动(1963年12月 [146])

机密

文本第16份

苏共中央书记Л.Ф.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II2003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不同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时间。

开始并不完全清楚,后来越来越明确地显出中国领导人的真正政治目的,他们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战略和策略。苏共中央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遵循国际主义的最高利益和对一切革命力量团结的关注,不止一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同志式的讨论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大量的、正确的列宁语录,耐心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根本问题的立场。

但是苏共中央以及各兄弟党的努力未能获得中国领导人的理解。

相反,最近他们强烈地开展自己的分裂活动,顽固地扩大争论的范围。更准确地说,杜撰越来越新的“有争议的问题”,企图使争论尖锐化。结果,他们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文件的纲领越来越远。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偶然的错误认识,可能是个别的错误,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定的政治和理论性质的错误体系?

现在,颁布官方声明、半官方通告之后,特别考虑到中国分裂分子的实际行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应付的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而是举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的战略和策略基础的修正,是以好战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为基础的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行为方式说明什么？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试图从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一点与当今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对比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的论据，但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论据，甚至根本没有。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一篇又一篇讲话，这类东西很多，但你不能摆脱中国理论家们不诚实的感觉，因为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是一回事，而所说的是另一回事。因此要说：“不知啃什么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咽下。”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明，不是对真理的关切使他们恐慌，他们不单是从事寻找以自己的“特殊”立场为论据的全部理由，而主要是发明越来越新的，攻击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借口。

如果当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甚至可能陷入错误认识，有人可能考虑过，同志们是否错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公开出面，修正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理论信仰相对立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包括我们时代一切基础的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当今时代的特点及其主要矛盾，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形式，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政治纲领不是局部地，而是基本上在主要方面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现在，任何人未必能怀疑以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乃至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伊利切夫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人民日报》，1960年1月4日)这种自以为是的意图，想把某种特殊的、“民族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位置上。这深深地败坏了自己的基础。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危害的，既然不可避免地像连锁反应一样产生，很遗憾，已经开始

产生“印度尼西亚化的”、“日本化的”^[147]以及其他“种类”的马克思主义。这归根到底可能将分裂分子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它分割成个别孤立的民族中队和小队。

工人阶级、各国共产主义者只有一面理论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建立，后来经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共同努力发展的学说。（鼓掌）

我们的党过去和现在都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按民族的分布地划分。本质上没有，也不应当有，无论是德国的，或是俄国的、中国的、印尼的，任何的其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民族、国际主义的学说。（鼓掌）

难道中国的理论家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不，假如事情真的这样，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按自己的想法歪曲地解释、掩盖真相，乔装打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注意到，这就是中国同志企图把它作为理论基础强加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现在谈的是，不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而是要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旗帜。

这些企图导致什么结果，其危害性何在？

——它导致革命理论不切实际地失去作用，为迎合恶性的政治方针而修正理论原则，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以民族主义代替国际主义；

——它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后拖，否定我党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它追求的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绝对化，把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对先锋主义、领导权的主张以及大国主义的意图“说明理由”，他们要求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进行修正。但是，列宁主义在本质上，在自己的特征上，是属于国际的，这

不是可以利用来说明民族主义领导理由的学说。对此最可能接近的是孔子学说——中国历史上特别崇敬的学说。

还在一年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警告过：

“……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宗派主义严重危险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凸显。看不见这一点，就是害怕见到事实，拒绝现实的情况，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上负有全部责任。”近来中国领导人竭力加强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他们毫无原则、造谣中伤地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这一切表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已更加增长。

因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应正确地说：

——与教条主义、左倾宗派主义、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斗争主要方向的时期已经来到了。

（一）

最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顽强地企图掌握自己发展革命理论的垄断权，不掩盖自己奢望扮演唯一捍卫和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角色。

当你阅读中国的报刊，有时你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断然声明到这种程度，说什么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就是在中国领导身上肩负着，在理论上领会当今时代与革命斗争经验的任务，说什么这个结论对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有着“普遍真理”的性质。

但是，要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幻想的基础之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老朋友——在各个时期打着各种牌子的修正主义。但每次都是同一目的——使马克思主义失去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以及革命的力量。如果离真理近一点，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做这样的评价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教条主义在实际上、在实践中不是别的，而是修正主义的反面。中国理论家们，需要教条主义的帷幕，是为了掩盖其反列宁主义路线。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绝不决定于口头上的保证和发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创造性，要在具体条件下善于运用。列宁在揭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原因时写道，他们“不是重复背熟的词句，而是认真地审视新的历史条件，他们深思，为什么实际生活是这个样子，他们用头脑工作，而不只是用语言”（《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45页）。

中国理论家们臆造的正统性，并紧连着不合逻辑和没有原则性的行为，这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

在相当的时候，北京的政策攻击列宁的和平共处主义原则。他们宣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时候尚未到来”，以及“说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是欺骗劳动人民”。现在，北京深信，直接攻击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没有给他们带来声望及荣誉，而与此相反，中国的宣传退出原先的立场，现在提出另一种更加巧妙的说法。

刚出版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文中坚信，不是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或他们报上写的“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至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和平共处政策，那么，据报上的论点，“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是“阶级投降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叛变”。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的理论家们也做出这样的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声称，如果打原子战争，地球上死掉一半人后，人类将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时他们公开宣称，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指责苏共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行。

然而，在北京就觉察到，他们骇人听闻的声明受到普遍的愤怒。他们明白，他们作了草率的预算，迅速地改变了方针。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官方声明中表示坚信，他们也进行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虽然他们在公开的讲话中，改变了自己观点的宣传政策，但在国内的内部会议上，仍继续错误的宣传，而且，对出席这样会议的人提出严重警告，泄露信息要受到监禁。

究竟中国人民相信什么？下面就是从中国的一封来信中的真实叙述：

“根据中央领导的设想，假如战争爆发……那么这对中国没有关系。情况是这样的，当世界核战争发生时，首先灭亡的是古巴、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乃至苏联和美国。至于中国，它参与这场战争后，可能死掉一半人，但它的损失将不超过其他国家的损失，因为它还有4亿人……将能顺利地解决领土、边界以及不平等条约等一切问题。不言而喻，谁将占据剩存世界的统治地位，即使帝国主义仍将保留下来……十分明显，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对理论与众不同的态度，经常没有论证地以一种立场代替另一种立场以及虚伪等现象，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政策，而且表现在对内政策问题的处理方法上。

有时觉得，理论对于中国领导人就像辕杆：你往哪儿拉，它向哪儿转。

在最初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在自己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考虑了苏联的经验。但是，当转变到“大跃进”政策时，H.C.赫鲁晓夫早在数年前就指出这个政策没有根据，中国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原则，把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大跃进”方针失败后，宣布了新的、相反的提纲：“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

接下来，我们回想一下中国“人民公社”的历史。

当建立人民公社时，没有任何经济的合理性，当时却宣布，这是“登上天堂的阶梯”，是最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已经被忘记了，现在中国领导人仍讲人民公社，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并已回到当初的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缺乏勇气承认错误，虽然列宁教导过，善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是严肃政党必需的特征。

“大跃进”口号发生过什么情况？

开始想2—3年内一步“跳入”共产主义，而现在深信，即使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好几十年。当然，政策中可以改变口号，比如，因经济的合理性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改变方针——不只是改变，每次改变都宣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

要发展。

不管中国理论家混乱不堪的理论钟摆摆向何方，总是被宣布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贡献，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

还是不久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在官方的讲话中经常强调，运用苏联丰富的经验帮助中国人民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但是，从1958年开始，宣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兜售某种完全相反的论点。高傲地声明，据他们说，苏联“滞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在自己的发展中“停滞不前”，没有什么可向它学习。据说，中国会比苏联更早建成共产主义。藐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归根到底的结果是公开的反苏宣传。

当前，抹黑苏联社会中由于贯彻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新事物已成为中国宣传家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公然愤怒地对待新的苏共纲领。中国领导人对待我们国家以科学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好像把它作为对他们人身的侮辱，破坏他们威望的图谋，对他们自尊心的打击。起初，他们秘密地在自己党的队伍中，后来开始公开辱骂我们的纲领，贬低它的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评价新的苏共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文件，称之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宣言。

这样的评价使中国领导人不满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纲领正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如果听他们的话，那么苏共无权发展列宁关于革命、国家、政党的学说。中国的鼓动家们把苏共纲领的人道主义理想革出教门，声称纲领似乎“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但是，他们指责“修正主义”显得不够，因此声称，我们的纲领导向“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看来，状况已经到了极坏的程度。

根据中国理论家们的论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合乎发展规

律的，不是加强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团结，而是内部矛盾的增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是扩大民主，而是缩小民主；不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扩大困难和贫穷。据他们见解，人们因此得到“革命锻炼”。

总之，他们想以庸俗的立场来研究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共产主义运动。

不但如此，他们毫无道理地传播关于“苏联社会资产阶级蜕化”的谎言，而且他们提出这种谎言的“论据”是野蛮和猖獗的。据他们说，苏联人民“吃惯好的”，习惯于好生活，丧失了革命理想，他们关于世界革命似乎什么也不想知道，不要支援被压迫民族。在中国的报刊上，几乎看不到关于我们生活光辉一面的信息。但在我们的报刊上，只要一提到成为被告的一帮阴谋家，——中国的宣传就声称苏联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的发展在1958年已经结束了。

不久以前，我们的同志访问了北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北京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举办了庆祝十月革命46周年的图片展览。其中广泛地反映我们国家20和30年代的事件，中国的“公社”、“大跃进”；但是讲述关于苏联人民在最近10年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则完全找不到。甚至在那里还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全心全意提供给中国的机器，现在他们把工厂的商标都剥下了！

这样，企图使中国人民忘却苏联人民最近10年的劳动。

苏联人民令人鼓舞地建设共产主义。我党纲领拟定的伟大计划，是每一个苏联人的人生目的。中国领导人，把这些计划以及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事实宣称为昙花一现。现在中国的宣传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苏联人民在建设取得成就”，但是，在建设什么？“意外”用上共产主义一词。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尊重苏联人民。

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指示，建议召开会议，每一个发言人必须在会上随便讲什么关于苏联人，关于我们国家不好的东西。中国领导人企图使苏联人民与党对立，使党与其列宁主义的领导相对立。他们描写的情况是这样的，似乎他们对苏联的党和人民怀着友好和尊敬的感情，仅对

苏共领导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中国分裂分子反对谁：他们反对我国全体人民，反对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反对苏共中央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我国人民、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是团结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他们的团结！谁想打击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谁企图迫使我们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纲领，那么他将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回击。

出于什么目的，中国领导人要攻击苏联纲领，反对我们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反苏运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这里隐瞒自己行为的真正政治动机，给他们披上伪理论的外衣。

但问题是否仅在于理论上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失策了，现在力图把中国人民遭受困难的过失推到苏联身上，使沙文主义欲望在中国人民中炽烈起来，并在民族主义的浪峰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他们能否成功实现自己的策略，看看将来吧！

(三)

中国理论家们的两面派手腕，可能在对待个人迷信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他们喋喋不休地提出众所周知的某领袖，说他是“万能的”，可以随自己的意志决定历史进程。

中国领导人，力图维护很久以来树立起来的、对斯大林原封不动的声望。苏共和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时，中国代表在所有的发言中，尤其在专门准备好的讲稿中，蓄意把个人崇拜说得天花乱坠。1963年9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官方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在全世界大登广告宣扬。中国作者声称：“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斯大林辩护。”

问题在哪里？

要知道，中国的政策曾完全拥护我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措施。为什么现在改变了立场？庇护个人崇拜的真正目的是极其明显的，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的指责，冲击了在中国建立的制度。他们认

为个人崇拜正确，就是认为自己正确。他们维护声望空缺的宝座，就是想毛主席树立在它的上面。

真的，围绕毛泽东个人所做的事情中，有许多东西很让我们想起早已翻过的历史记载。

毛泽东被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五位经典作家。中国的宣传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未能具体预见发展的整个过程。毛泽东肩负着，总结摆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面前的，当今时代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为了确定毛泽东是中国唯一和伟大的理论家，蓄意限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学、党校学习“毛泽东主义”。派往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禁止听讲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苏共历史问题的课程！

人民政权13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列宁著作总印数约700万册。而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近4亿册。仅毛泽东的3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总印数几乎等于所有列宁著作的印数。

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像曾经背诵孔子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思想是当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这4卷，掌握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能担得起来……我们可以说：‘读破毛著，成功一半。’如果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可保证在工作中取得一半成就。毛主席在建设时期，除《选集》外，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都要认真阅读。主席还发表了20多首诗词。这些诗词内容深邃、激动人心，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结合。我建议大家把这些诗词都背出来，因为它们会自然增添力量。”（全场活跃）

下面是另一个方法。这是《劳动报》介绍的。

《劳动报》认为“三放四看”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方法。“三

放”——报上写道——这就是把一本毛泽东著作放在家里，另一本放在工具箱里，第三本放在身边。“四看”——就是开会前看，饭后看，睡前看和路上看(引起一片笑声).....遇到困难并不可怕——报上最后说——可怕的是不学《矛盾论》。(引起一片笑声)

在中国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夸张的程度。现在已不是把毛主席比作太阳，而是把太阳比作毛主席。(全场活跃)不论在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校，在大学还是工厂，在公社还是机关，在俱乐部还是剧场，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在向人民灌输毛主席伟大这一思想。

这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有一位工人被机床切断了右手，患者被送到了医院。外科陈医生决定再植断手，发布了独一无二的手术资料，这的确是世界外科实践中的杰出成果。

但是，中国的宣传怎样报道这一事件？

当工人被送到手术台时，外科医生似乎在想：“如果我只简单地清理残余部分，那么工人就失去一只手，毛主席就失去一位为社会主义积极奋斗的战士。(笑声，全场活跃)我试试再植断手，那时工人可能留在战斗队伍里，将为毛主席的三面红旗而奋斗。”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外科医生放下手术，走去同党委书记商量。(全场活跃)书记称赞外科医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但陈医生不是前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而是去图书馆。为什么？竟然是为了制定毛主席教导的战略计划。(全场活跃)最后外科医生开始做手术。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十分严肃的语气来叙述！

中国的宣传，把一切成就和成果都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使人牢记，如果没有毛主席，无论中国人民，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寸步难行。

“如果历史赋予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伟大使命——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宣传说，“那么现代历史赋予人人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更伟大、艰巨和重要的使命——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彻底完成它，粉碎并埋葬可恨的、奴役人类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并消灭它的最后堡垒——美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深信伟人的力量达到这样程度，以致开始随意对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他们已能完全支配这些规律。

中国人民在1958年提出口号：“苦战三年——幸福万年。”发展国民经济指标经过修订，翻了许多倍。这样的修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发现了某些新的经济可能性？不，这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把客观规律服从于自己的个人意志。果然不出所料，“大跃进”没有搞成，魔幻的变化没有发生。这怎能不想起列宁关于类似情况的讲话：“假如共产党员中有人想三年内能改造经济基础、小农业的根源，那么他当然是个幻想家。”（《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193页）

主观态度也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领导人不是依据对目前时局的客观分析来评价国际形势、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方针及其实施，而是根据自己的任意评价。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大家知道的。他们的分裂主义行为毫无疑问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活动复杂化，对国际革命运动造成不小困难。

假如不是口头上，而是按事实来判断，中国领导人很少珍惜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

他们玩弄的一整套伎俩包括：使一个民族的利益与其他民族的利益互相冲突；利用解放斗争的特点作投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直至勾结反动分子、各兄弟党抛弃的叛徒以及托洛茨基败类。

他们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推向冒险主义和孤立的道路。难道可以否定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每天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当革命形势尚未到来时号召起义，当战胜条件尚未成熟时提出革命战争的口号。假如共产党员不再为劳动人民的迫切利益，为他们的经济要求，为民主，为和平而进行斗争，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同共产党员断绝关系。

中国的政策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特别尽心竭力地企图讨好他们。

列宁曾经希望，哪怕是先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它作为基地，依靠它并在革命斗争中前进。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尽一切可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各国的完整体系。

可以想象得出，假如民族解放运动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资

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会如何。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国内革命时期表现得灵活机动，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斗争方法。当需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员巧妙和坚决地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但当必要的时候，他们向国民党让步，做出妥协性的决定并达成协议。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经验中的仅仅某些方面绝对化，顽固地强加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所谓“三A”国家)，号召他们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采用暴力方法。

中国同志使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并强加于世界革命运动，明确申请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为了对此不产生怀疑，《人民日报》干脆要求：

“以毛泽东为首的思想阵地，在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体进步人类面前应担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这就是全部的意识形态，全部的世界观！

(四)

中国领导人“特殊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实质就是这样的简单。

假如这条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占优势，那么结果如何？

结果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失；世界革命运动可能误入歧途，对共产主义命运、对人类命运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帝国主义可能从中国领导人实行“特殊的”路线中取胜，而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失败。

中国领导人不惜渲染，俨然把自己打扮成唯一真正的反帝战士。实际上，他们致力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的“特殊路线”助长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声势。

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使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中国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破坏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

中国的分裂分子，虽然他们或许不想这样做，但实际上破坏了世界

社会主义体系的威信。

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离不开人民的幸福，需要极大地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而是用狂热的禁欲主义来偷梁换柱，丑化了社会主义，把人贬为自满的政治机器螺丝钉，剥夺他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难道不是常说的反动派求之不得的东西，似乎共产主义不是别的，而是“极权主义的贫穷社会”！

在人们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会结束民族争吵与仇恨，把各国人民和民族团结到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家庭。

中国领导人的概念破坏这些理想，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立，把民族间的仇恨同各国人民的博爱、平等相对立。

共产主义随时随地与在地球上终止战争并奠定持久和平联想在一起。

中国领导人号召在数亿人的白骨上建设“更高的文明”，这只有助于反共宣传，鼓吹共产主义侵略性和惨无人道的叫嚣。

苏联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是争取人类幸福新社会的化身。已经46年了，反共产主义一直力图以任何方法诽谤我们的制度，歪曲我们的目标，扑灭我国普照全世界的光辉。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他们破坏苏联威信的企图，事实上与普遍的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浪潮相联系。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了H.C.赫鲁晓夫的纲领性报告。中央全会的全部工作生动地体现了管理国民经济，关心生产力加速发展及苏联人民福祉不断提高的列宁主义科学。现在每一个苏联人更清楚地感到我们的计划、我们党的纲领的现实性。

我国正在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新阶段上前进。

管理国民经济的列宁主义科学基础，是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明确认清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经济是保卫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战场，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对国际革命起着主要的促进

作用。

什么是对全世界人民崇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是提高经济潜力，提高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防力量，实际地帮助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还是仅仅模棱两可地谈论世界革命？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不同回答，这就是分歧所在的基础。

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已有很长时间。他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不是今天，而是许多年以前。

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些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未能达到的目的？

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队伍。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受到损失。他们使个别兄弟党背离列宁主义的方针，而在某些党内使一些小组脱离党并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以放肆的蛊惑行为，利用“左”的、超革命的辞藻使许多国家中不成熟、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迷惑、糊涂、思想上误入歧途，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理解产生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当然，所有这一切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达到他们所渴望和力求得到的主要目的。

他们未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失去斗志，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也未能把领导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大多数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的信心，维护和加强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团结一致，政治上凝聚高度战斗力以及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战斗。但是，中国分裂分子在追求自己的冒险性目的失败后，并未放下武器。

因此，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分裂破坏活动估计不足。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及其以H.C.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鼓掌）

我们的最高职责是：磨炼并完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因

为：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使共产党人赢得了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将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35-39

№23016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现将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中关于苏中分歧问题一节发给你们。

我的意见是将这一节发言发给各级党组织。

如有意见，请提出报告。

Н.赫鲁晓夫(签名)

1963年12月24日

根据法令规定，在得到该文件6个月后各联盟共和国

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便可以就地销毁

摘自H.C.赫鲁晓夫同志在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

我们在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已经结束。但这里还涉及苏中分歧问题。对此，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在自己的发言中也都谈到。因而，我也想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掌声)

在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发言中均阐述了一些涉及苏中分歧和中共领导人针对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立场等一些问题。

对于上述内容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

首先，针对中共领导人我们打算采用认真分析双方现有分歧的方式，而不是粗鲁的谩骂。因为谩骂的做法并不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人所熟悉的工作风格。

我们党在开展辩论的时候，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观点，从而以此来维护马列主义真理。对于我们而言，马列主义学说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将继续坚定地以这一学说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最近，人们尤其明显地感觉到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开始发生动摇，其结论也越来越站不住脚(自圆其说)。

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分析中国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你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央发出的一些公开信和其他文件，其中详细阐述了我们党在一系列最重大国际共产党运动问题上的立场。我只想简单地就其中一些内容谈一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宣传机器每当我们中央全会举办之际都表现得特别神经质，并集中火力向苏共发难。如今，他们的做法如下：称赞苏联人民，称赞我们党，但对苏共中央，尤其是中央主席团却大肆谩骂，特别强调主席团中的赫鲁晓夫并对之步步逼进。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究竟想干什么呢？可能是妈妈的错(妈妈从小没管教好)。如果妈妈没有赋予其理智，那么谁——甚至学校，也都是不管用的(会议厅传来笑声)。因为学校不可能遗传给人们智慧，而只能起到促进其智力发展的作用。可能，这里，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也并不想为此而争论，而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想的是：他们在即将闭幕的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忽然看到赫鲁晓夫被赶出中央，或者其他类似的玩意儿。

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想法，我们能说什么呢？同志们！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我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党。我是否担任现在的职务

是由党和人民决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捍卫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这就是我一直坚守的行为准则。至于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正如人们常说的，犹有余力。(全体观众起立，持续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想说的是，在他们那儿，在中共顶层中对我们国家的形势形成了一种非常概念化的认识。他们仍延续着个人崇拜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他是第一书记，因此便高高在上并宣布真理。我们过去的确是这样一种情况：斯大林便是真理。他虽然并不总是宣布什么，但有时会说一些被看成是规律的、不明智的话。这是我们在个人崇拜时的情况，不过现在我们已从这种情况中摆脱了出来。可中国领导人依然用个人崇拜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对此，请允许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内战年代，我曾到过格鲁吉亚。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格鲁吉亚教堂，看到了那里所摆放的偶像——耶稣很像格鲁吉亚人。(会议厅传来笑声)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座偶像是由格鲁吉亚人画的。俄罗斯艺术家笔下的上帝也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因为他是按照俄罗斯人的模子刻画的，正如所谓每个鞋匠都是用自己的模子来做靴子的。

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也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苏联人的心理、政策和国内生活以及我们党的生活的。毛泽东怎么说，便怎么做。而实际上，同志们，我们如今已摆脱了那个时代，并不会再回去了。我们本身并不是真理，而是准备把问题提交大家讨论，以便通过集体的力量、智慧和经验来找到真理——这才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持续不断的掌声)

而如果问题只涉及某个人，那倒是不难解决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个只涉及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集体，而我——只是党的奴仆，是其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做出的，对我们的国内外日常工作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掌声)

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对此难以理解。而斯大林当年也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党——就是他，也只有他。

我曾经与斯大林在电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有一次在电话中问我道：

——在乌克兰西部诸州农民的份地规模有多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同志们，当时在乌克兰西部还未实行集体化。

我答道：各式各样。因为土地差异很大，土地的供应率也是不同的。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份地的规模最大，因为那里的土质都是沙土，而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份地规模较小，因为当地的土质较好。

——那具体有多少呢？

我对斯大林说：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有10—15公顷，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有7—10公顷，而在斯坦尼斯拉夫奇克州有7—15公顷。

斯大林又问道：为什么份地规模这么大？

我对他说：因为如果认为这些份地的规模大，那么许多拥有如此多的土地的农民就得被纳入富农范畴，虽然他们并没有剥削别人的劳动。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地扩大此类农民的范围呢？

斯大林问：关于份地大小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

我答：是当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筹备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有米高扬同志，还有我。后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提案，因而这也可看作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斯大林在电话中答道：给我把这个决议改了。

这就是个人崇拜，一个“个人”便可以“随意修改”集体的决定。这都是过去的事。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个人崇拜和当这个“个人”可以恣意妄为时期所存在的那些现象。

但在中国仍有人可以“随意修改”集体通过的决议。而有谁胆敢反对个人崇拜的恣意妄为，就将受到追究和丢官撤职。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共曾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活动家，革命者、中共政治局委员——高岗。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甚至不及刘少奇和周恩来，更别说毛泽东了。

高岗曾是一位苏联热烈的拥护者和朋友。但高岗如今何在？他在自己的家中被逮捕，然后宣布他服毒自杀了。让我们试想一下这个问题：究竟他是自杀还是被杀的呢？我们大家都晓得，在个人崇拜时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坚决反对类似的事件！（掌声）

苏共中央反对对那些在某些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犯有错误的同志采用镇压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遵照列宁的遗训。众所周知，列宁一生曾坚决地为了党的路线而斗争，他斗争的对象包括有托洛茨基、民族主义者、右倾和左倾主义者。当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协定之时，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列宁被迫宣布，如果中央通过错误的决议，他就辞职。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列宁也没有枪毙任何一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为了团结全党和实施党的正确路线，他开展了思想斗争。如果当时斯大林是党的首脑，那他就可能逮捕自己的对手，可列宁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即使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最初也不得不考虑列宁在自己遗嘱中所作的指示。列宁指出，斯大林可能会滥用权力，就是说斯大林可能大开杀戒。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列宁向党发出了警告。遗憾的是，中央当时并没有重视列宁的建议，相信了斯大林，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功绩方面（只注重了他的“誓言”和忠诚于列宁原则的保证）。但斯大林欺骗了共产党员们的信任，他消灭了许多诚实的，坚持原则的人们，而到了晚年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病态、多疑、刚愎自用的人。是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今，中共领导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盘算和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党会通过一项关于斯大林的新决议。可能，难道我们中竟有人会这样做吗？难道没有斯大林，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吗？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指责我，是因为我曾经列举了苏联人众多的言论之一，即如果斯大林早一些离开领导岗位，那么苏联人民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能会过得更好些。我认为，苏共中央收到的带有此类内容的信件，虽然内容比较幼稚，但它们却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真实的一面。

我们究竟在哪些问题上与中共领导人发生了分歧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里我并不想详细谈这方面问题。因为关于事情的本质大家已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央6月中央全会资料和其他文件中了解得很清楚了。

这里，请允许我简单地讲一讲如下几个问题。

例如，关于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在很多年以来，中共领导人极力攻击和平共处原则，并断言该原则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国领导人宣称，这不是列宁主义立场，关于此列宁从没说过。中共领导人宣称，这都是赫鲁晓夫杜撰和强加给其他国家的。

在攻击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能忘了当年甚至还自夸说，似乎是他们在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发明了和平共处原则，即众所周知的所谓“潘查希拉”。可是，当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之时，中国领导人便随即抛弃了这些原则，并开始攻击和平共处政策。尤其是针对我们党的政策，他们攻击得最为起劲。

如今，中共领导人宣称，他们拥护和平共处原则，但同时又提出了保留意见，即他们反对把这一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已是在玩文字游戏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与这一原则不正相符吗？……难道非要直接问：你们是否赞成和平共处才行吗？中共领导人已是在玩杂技技艺，而不是在坚持政策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得很健忘。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各兄弟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也是签了字的，这些文件指出：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苏共二十大决议通过的、在当代条件下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体系并存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各民族间和平和友谊的牢固基石。”(摘自1957年宣言)

在1960年各兄弟党声明中也写道：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条件下，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提出并在1957年莫斯科声明和和平宣言、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将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

我再重复一下，在上述这些文件上中国领导人都是签了字的。

那么，试问：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立场究竟如何呢？结论是：他们一直在左右摇摆——就没有坚定的立场。

事实上，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并不是谁的杜撰，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眼下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客观实际的要求。

总之，和平共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规律性。当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之时，并不存在和平共处的问题。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战争都是为了重新分割所占领的土地，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都是一部分掠夺者反对另一部分掠夺者的战争。

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异类，因而后者一度不承认它。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试图清除这一异己分子，并发动了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干涉，并以战争反对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但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自己亲密的共产党周围并打败了敌人：外国干涉军、内部的敌人——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

由于胜利，这个世界上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这个国家是由从前的沙皇俄国的工人阶级首先建立的。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劳动成为了主宰，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斗争——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随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严峻的考验——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试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奴役我国人民。但苏联人民光荣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最终，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均被摧毁，许多国家的人民得以解放。

当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曾企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

国家，阻碍社会的发展，终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可是，那些企图以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如今早已在坟墓里化为灰烬，而共产主义及其思想却整个地球高歌猛进。

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一些大陆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劳动人民赢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如今，在资本主义的周围已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当今世界上存在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一年年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一事实本身便体现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地主制度和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了新社会的成就，以自己的劳动胜利显示了获得了自由的人们的能力和才干，即使他们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这方面，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得尤其显著。如今，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仍在自信地前进着。用不了多久，苏维埃国家将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头把交椅。这些成就充分显示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优越性。

需要重复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新阵地。殖民体系业已崩溃。许多新成立的国家均宣布，他们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诚然，其中仍有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还不甚明确。但正如人们常说的，成功的开始便是胜利的一半。历史和各民族的斗争都将使得马列主义所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需要重复的是，中国领导人也是在这样的文件中签了字的。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究竟持何立场呢？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而是左右摇摆着。

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被分裂为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的历史真实。 [148])

要知道，和平共处并不是以人们之间的事先约定为基础的，而是由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因此，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掌声)

中国领导人试图粗暴地歪曲我们的政策。他们对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苏共大肆指责，似乎是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臆断是很容易予以驳斥的。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党纲、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6月中央全会决议和许多其他文件便能够非常清晰地做出如下判断：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全世界都晓得，我们国家早已不存在剥削阶级——他们几十年前便已被消灭了。但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为战胜剥削者的斗争——依然继续存在。

如今，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正如在自己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那样，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在帮助国际工人阶级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促进所有国家无产者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找不到一个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臆断——似乎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发动战争，以便在其他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原则上是反对“输出革命”的。革命应当在社会内部成熟，并应当由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来实施。而我们不会参与此类事务，当然这并不包括如下内容：苏联曾多次教训了那些反革命“出口商”，帮助正在斗争的民族战胜干涉他国内政的帝国主义者。这便是我们的立场。(掌声)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了另一臆断，即似乎苏联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展到了殖民者和被压迫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以此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所有人都了解苏联和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英、法和以色列冒险家们入侵埃及之时，我们曾向后者提供了帮助；我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为合并西伊里安岛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帮助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这一帮助并不仅仅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且还包括了武器等物质方面。

大家都晓得，苏联向一系列年轻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以便其赢得经济独立。

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提出指责，并认为我们这样做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代表也是1960年各兄弟党共同声明的签署者之一。

当时，“会议认为，落实苏联提出的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对人类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此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兄弟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均签署了赞成裁军的1960年声明，因而即使这是一个幻想，也是我们共有的一个幻想。

包括中国在内的1960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告全世界人民书特别强调了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意义，其中指出：

“各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世界强国已经有两年没有进行核试验了。那么，谁又会反对(他们)再进一步并通过一个关于彻底禁止此类毁灭性试验的决议呢？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们不断地宣布自己打算再次恢复原子武器试验并经常威胁要中止他们在各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关于禁止核武器的谈判。”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各国人民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已成功地签署了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可中国领导人现在竟与戴高乐将军一起反对该条约，并称这是对各国人民的欺骗。

如今，中国领导人批评我们签署了该条约。他们要反对自己曾赞成过并与各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告全世界人民书。他们说，我们签署该条约便是对苏联人民的背叛。

在签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从事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怎么

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和其他人民？我们如今所要做的是不再污染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呼吸的空气，难道这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吗？

我们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水下从事核爆炸的条约。这自然也就排除了污染海水和鱼类的可能性，而后者是全世界人民都需要捕捞和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可以放心地吃鱼了，而不必担心他们会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这怎么能叫作背叛呢？

我们签署了禁止在太空从事核试验的协议，从而使宇航员们可以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从事宇宙研究。该条约所包含的条款都是以和平为目的。稍后，我们又成功达成了关于不向太空扩散核武器的协议。

至于地下核试验，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努力禁止此类试验，但暂时还未成功达成协议。我们国家与其他强国一样都拥有同样的条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此类试验以完善自己的武器和服务于科学为目的。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领导人所持立场的逻辑性呢？中国领导人反对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目的何在呢？

要知道，是他们自己致函帝国主义者，并邀请其来谈判和讨论关于裁军的问题的。

他们怎么能说裁军——是一个幻想呢？要知道，在这个问题我们可是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兄弟党的同意的。

中国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暴露了他们的真正图谋。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有两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其中一个适用于自己，而另一个——用于其他人。例如，据他们说，似乎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脑子里充满了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希望与其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妥协——其中包括裁军问题在内。原来，中国领导人对裁军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前不久，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全世界提出建议——召集各国首脑会议以讨论裁军问题。

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向全世界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是幻想，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周恩来发出的邀请及其在这方面的活动会有利于世界革命吗？其目的究竟何在呢？是指望共产党的

代表们从美国去他们那儿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只能是帝国主义联邦政府的代表们。那么，请问，这难道不是对帝国主义者抱有幻想吗？只能这样去理解，中共领导人才是真正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没有一点革命性。

中国领导人还批评我们，理由是我们不认为世界战争是必然的。难道这仅仅只是我们的观点吗？难道这不正是所有共产党工人在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文件中所得出的一致性结论吗？需要强调的是，在那些文件上也留有中国领导人的签名。

如下便是1960年声明的内容：

“终有一天，我们会消除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并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战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防止世界战争的爆发。”

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得出这一结论之际，他们所有人均不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会发生变化。的确，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但当代世界的力量对比却变化了。

我今天曾提到腊斯克的声明。这实际上是美国的另一个面孔，是帝国主义的鲜活写照。该声明究竟说什么呢？美国在他的童年时期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时光：大西洋保卫了美国。可如今，有了苏联，后者拥有洲际导弹，拥有原子弹。因而海洋已不能像从前那样保护美国了。而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类似情况，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参见苏共二十大决议，在那里我们党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掌声）

如果现在苏联手里没有现代武器，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那么，哪一个帝国主义傻瓜会考虑与我们“共处”的问题？那也就不存在任何共处的可能性。

当谈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时，我们绝不是在乞求帝国主义的怜悯。在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帝国主义是不择手段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

这里，给你们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曾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对美国的活动非常愤怒，并说：美国人——这些狗崽

子们向我们这里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间谍等。而我答道：他们并不是狗崽子，只是些帝国主义者。他们实施自己的政策只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难道您指望他们给您送礼物来吗？(会议厅活跃起来)古巴同志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很愤怒，并说：他们这些狗崽子们向古巴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特务，以便从事针对我们的破坏行动……我们能够理解古巴同志的愤怒，因为如果美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反而是令人感到奇怪的。^[149]要知道，当我们国家刚诞生时，收到的也不是“礼物”，而是干涉军——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150]苏联人民把他们都从自己的国家中赶了出去。那可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要平静地对待这方面问题，应当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待帝国主义者，而不能简单地带有急躁情绪。

从根本上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工人想要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的报酬；资本家则相反，他们想让工人更多地干活，而自己则少支付工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关系。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当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拥有导弹，他们也有导弹，如果他们按了导弹发射钮，我们的导弹也会瞬间启动。这样，便开始促使帝国主义者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腊斯克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所发表的那些言论。这正应验了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论断，即……^[151]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已不是那么的强大和随心所欲，并不得不顾及在实力上正越来越追赶上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掌声)

中国领导人恼火苏联共产党获得如此之高的声望。他们相信帝国主义者“智慧”。当然，我们的确也相信敌人并非傻瓜。在“帝国主义”一词的背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些务实的人们和政治家，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中间一些人的智慧去反对其他人的狂热，利用敌人阵营中的弱点和矛盾。但首先，我们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要知道，即使是狂妄的希特勒，如果知道自己将在1945年落个饮弹自尽的下场，他可能也就不会发动战争。

因此，即使现在我们说阿登纳^[152]没出息，如此地污辱他，他也只能听着，并说：你们骂我了，但我跟其他人一样晓得，如果发起战争，那么第一个毁于战火的便是西德。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人们都说他傻，是傻瓜，但他却很聪明。(会议厅里传来笑声)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顾及那些“疯子们”和侵略集团。因为这些人即使知道自己将毁于战火，有时也可能去冒这个险。也正是因此，我应当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掌声）

如果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强大，这些力量使帝国主义感到害怕，那么和平共处就是可能的。如果力量平衡被打破，和平共处也就可能不太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如果他们感到有可能祸害我们，就会这样去干。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并随时准备给予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反击。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自己也不会拒绝这样做。

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比我们更革命，理由是他们使用了更多的革命性语言。他们指责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沉迷于经济主义，似乎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国民经济方面，而较少关心其他革命事务。的确，我们确实很重视经济建设，因为我们把这看作是落实列宁教导的途径，即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促进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据说，中国领导人曾对非洲人这样说过，俄国人——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而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干革命，而俄罗斯人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力量主要用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如果我们只埋头干革命，而时至今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维持在50年以前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会有排斥力，并成为一股让人厌恶的力量。

帝国主义者如今为什么会忧虑？原因是苏联正一年年地强大起来，日益积蓄力量，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以及我们人民的生活福利都不断增强。（掌声）我们将以此来战胜帝国主义。这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是在全世界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掌声）

中国领导人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超级革命者，拼命地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们，极力在世界上鼓噪。他们喊的声音倒是不小，但见不到他们做任何务实的事情，也没有干任何革命方面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需要这些由响亮的辞藻所构成的光华灿烂的烟火，以使用自己“左”的东西来批评我们，以使用空洞的蛊惑来掩饰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背离和自己那些并不算小的罪过。

在自己的辩论资料中，中国宣传机器早已超越了我们所能容忍的底线。我这里并不仅仅指他们针对一些人的的人身攻击——他们在这方面可是做得够多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而在于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地极端，采用了那样恶毒地大呼小叫的方式。看到他们所写的东西，即使魔鬼也会自叹不如：难道共产党能这样写东西吗？难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采取这样的争论方式吗？不，同志们，这不是辩论，而是错误的、下流的谩骂。

我坦白地对你们说：有时你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争论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所争论的许多问题显然完全是中国领导人空想出来的，人为夸大出来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这样的争吵。但我得强调一点，那就是在他们有这方面意愿的情况下！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暂且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某个人需要利用这些“理论”分歧，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掩饰自己的不良图谋和为自己的错误寻找辩解的理由。

例如，他们指责我们似乎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而他们——据说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并马上就要跨越到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他们打算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超越我们并向我们展示应当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但最终除了对全世界发出了一阵喧嚣之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大跃进”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今，人民公社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称谓。他们所谓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采用了我们集体农庄的章程。

有一次当我们访问北京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形势很好，中国几年内将完成“向未来的跃进”。他当然并不曾与我们协商过此事，而只是作了一个通报，说我们要这样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硬要往坑里跳，并认为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举动，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非常谨慎而礼貌地告诫毛泽东关于此类实验的危险性。但我看到，自己这样做并不会有所帮助，而人家也不愿听。怎么办呢？于是，我也只能说，那就让他试试吧，但我们将坚持列宁主义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集体农庄生产的一切有利因素。

于是，他们尝试了，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指责我们的顾问、工程师、冶金工作者等都是“生产极限论者”的机会主义者；说我们这些人理解新事物；说自己要在几年内赶超英国……同志们也都看到，当时中

国的情况也的确不错，于是中共领导人又提出了在很短时间内在钢铁和煤炭生产方面超过英国的口号。

于是，便开始了“赶超”运动。但最后又怎么样呢？他们开始用手工方式建造小高炉。可是，即使200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在乌拉尔所修建的炼铁炉也要比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要先进。但是，如今中国人却开始建设此类炼铁炉。可哪里有合适的能在此类炼铁炉里炼制的金属呢？他们可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集中了上千万人来搞此类建设，农业无人问津。据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也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炼铁炉，以证明自己尊重总路线和毛泽东的英明才智。此类“工业”的最终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如今，这些炼铁炉已废弃了，而所谓赶超英国也放弃了。

如果我们也走这样的道路，放弃集体农庄，瓦解我们的工业和工厂，难道不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坚定地坚持列宁的方针，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绝不能仿照中国的样子，走他们的错误道路。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毛泽东当时曾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想搞整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想让所有部长都到生产第一线去工作3个月。据说，这样做效果不错。我答：毛泽东同志，这都是我们曾做过的事，对于我们而言，这都是已经历过的阶段。我们都扛过圆木，也有描写关于这方面生活的电影和绘画作品。当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工作，组织了在生产第一线和矿山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当年，当我在莫斯科当州委书记之时，曾参加过地铁站的建设工作，用桶搬过土。这对我们当时而言，是对的。可如今再要这样干，会怎么样呢？

中国劳动力倒是很丰富，例如，如果派陈毅去生产第一线，可能还行，但如果我们派葛罗米柯同志到工厂去，会怎么样呢？工厂经理会让他去操控机床吗？是的，任何一位工厂经理都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葛罗米柯同志会把机床整坏的。(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

不，同志们，我相信葛罗米柯同志是一位好的外交部长，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去做一名车工。(会议厅气氛活跃)

我们不必去模仿一部分落后人口的活动。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们党曾有一位这样的领导干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每当他去参加工人大会，便要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好像他没钱去买一束腰带似的。

A.И.米高扬：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H.C.赫鲁晓夫：是的，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仍是总要用一根绳子作腰带。(会议厅传来笑声)为什么呢？要知道，即使工人们现在也不是用根绳子当腰带的，而都是买皮带的。这就是说，他是在作秀。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时的方式。(掌声)

当中国领导人向我们建议此类工作方式之时，我只能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只是，我无法对他们说：请你们自己也不要这样去做，即使毛泽东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因此，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这样做，而至于你们如何，只能自己决定。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并做得更过分。

前不久，中国人代会讨论了经济问题；公布了一个报告，但其内容却让人难以理解。据此报告，中国在某些经济领域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而在其他领域情况却比“往”年更糟。至于究竟是哪一年——没说。我们当然明白，因为没有什么可说，也不能列举数据，而只会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一下。这是在生活状况不太好时常有的事。

中国领导人置整个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不去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应当集中力量抓经济，全力振兴国民经济，认真思考和利用一切机会放弃自己的冒险活动——这才是他们在对事情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应当做的。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病得不轻，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与苏共的斗争中，用在与其它马列主义政党的争斗上。

同志们!上述情况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虽然我们热爱中国人民，高度评价其坚强和勇敢，尊重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这场涉及数亿人民命运的“大跃进”和欠考虑的试验能够早一点结束，以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

我们的担忧还在于，中国力量的削弱——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损失。那个大谈战争问题并号召大家不要害怕战争的人并不会妨碍人们记住一点，即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拿着步枪是无法打仗的，即使你的对手是一些纸老虎。我们只对帝国主义发表宣言和讲话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力。如果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实力又从何而来呢？总之，不管怎么说，结论只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考虑欠周的行动会导致中国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活动家们将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重大的损失。问题的症结何在呢？问题在于，我们将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补偿中国经济的衰落。当然，可能有人会这样说：中国的衰弱或强大与否——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我们可不能这样来看问题。要知道，帝国主义者即使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的，他们时刻梦想着削弱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方面，而绝不能允许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帝国主义一方转变。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恢复和弥补由于中国经济的失败而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清楚这一点，同志们，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威望不是建立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中，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是否明白这一点，对此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把握。

中国领导人现在试图把自己国内经济失败的责任怪罪到苏联身上。他们到处撒谎，说什么中国经济的失败似乎都是由于苏联无理地从中国撤走自己的专家造成的。我们之所以被迫从中国召回自己的专家，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受到了粗暴的待遇。你们大家从相关文件上便能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

可能，苏联专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类似待遇也与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

朝鲜人要求我们在他们国家像装配工一样工作的工程师们都立下字据，以防其向外国传递朝鲜的生产机密和资料。他们甚至还要求我们的专家们在这些字据上按下手印。我们必须与朝鲜人理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美国人要求前往美国的苏联人留下指纹时，我们曾向其发出了严正的抗议。我曾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只索取罪犯们的指纹，而对我们诚实的人们是不应当这样做的。我们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我们不去你们那里了，让你们见鬼去吧，于是他们变更了法律。(热烈的掌声)如今，针对其他国家前往美国的人美国人仍要求留下指纹，但针对俄国人，苏联人——不需要。(热烈的掌声)

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有意夸大分歧？因为他们想把本国民众的情绪纳入一个新轨道。中国的情况很糟糕，人们挨饿，没有衣服和鞋穿，这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于是，他们便想开溜。

中国领导人对民众宣传说，苏联撤走了自己的专家，因而导致中国粮食歉收。但大家都晓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向中国派遣农业方面的人——农艺师、专家和顾问。大家看到，这一切都是中国领导人臆造出来的。他们利用民众不了解实际情况，极力转移人们对中国国内实际生活中所发生问题的注意力。

中国领导人强迫我们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道路来赢得政权。对于我们而言，这已是经历过的阶段，对此我们早在46年以前便已说过，并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国也是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因此，这里理应指的是那些依然由资本家掌握着政权的国家及其政党。这就首先需要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共有两条道路——和平的道路和非和平的道路。这是对的，既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也切合实际，而且这一命题在我们的党纲和各兄弟党的声明中也都是有的。

关于这一问题，1960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是这样说的：

“在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各共产党确认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论断……

但各个国家将采取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则需视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发生了分歧。

中国领导人试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其他党派。

我们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原则，据此，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当前形势来决定。而当年，列宁也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在一种形势下拥护和平过渡，但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则号召发动武装起义。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由于我们提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便批评我们。但要知道，和平过渡的方式可绝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恩格斯和列宁都写过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文章。关于战后时期，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英国共产党编制了一份新党纲，稳

重的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并将该党纲草案递交斯大林修改。该党纲把(英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心放在非和平方式和起义方面，而斯大林建议在其中增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以和平议会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内容。 [153]

正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喜欢援引其言论的斯大林曾认为，一些国家存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斯大林死后和苏共二十大之前，我们也曾讨论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道路。

如果我们在各兄弟共产党宣言和声明中只涉及一条道路，即武装起义的问题，那么就将置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正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的各共产党组织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154] 他们将不得不转入地下和放弃合法的斗争方式。在目前条件下这样干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政党的活动经验证明，他们能够顺利地展开合法工作，从事阶级斗争并为最后的决战积蓄力量。用一个标准或一种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将会局限各个党派开展活动的可能性，这至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理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什么时间采取行动和如何行动。而关于这方面内容在我们的二十大决议以及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文件中均有正确的记载。

应当说，在很多时候中国领导人的做法简单让人难以理解。他们的行动很不符合逻辑。例如，他们想与蒋介石争夺自己沿海的岛屿。根据他们的请求，我们向其提供了大炮、歼击机，甚至还有导弹。他们用大炮打啊，打啊，可是随后却停止了一切活动，再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中国战略家答道：你们知道，敌人离得越近，对我们越好，如果我们要夺取了这些岛屿，他们将会离我们越远。(会议厅传来笑声)真没办法说——这种战略多么奇怪!(人们都笑起来)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发出了1901个警告了。(会议厅传来笑声)所有这些举动好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所发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革命词句。

还有一个事实。去年，在一次关于援助老挝的会谈期间，梭发那·富马请我们大使转告莫斯科，希望苏联能向其提供几架旧的活塞式歼击机，而飞行员他们可以向中国人要。因为，如果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敌方区域着陆，飞行员便会立刻被认出不是老挝人。我们表示同意满足老挝的这一要求，并向梭发那·富马发了一封关于我们准备向其发送歼击机的电报。可中国领导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也说“很好”，你们在

援助歼击机的问题上做得不错，但你们还应派一些自己的飞行员去，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比中国人更像老挝人。（会议厅内一片笑声）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坚定性！中国领导人总是爱唱革命的高调，似乎他们就是想找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并以此来“推动”革命。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打仗，而只是挑动其他人。

那么，他们为何要大嚷大叫，他们不负责任地空谈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因为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他们有利，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也只有这样想，我们才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的战略家们可能是这样想的：让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斗，互相扔原子弹，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即使给中国扔了几个原子弹，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中国人多——反正最终会比俄国人和美国人剩得多。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战略与革命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们曾多次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当代的世界大战可不能再游战争的尺度去衡量。因为这样没有一点用处！可中国领导人可能依然对核战争的性质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战争对人类命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不会冒这种险。我们需要秣马厉兵，但不必表现出匹夫之勇。我们准备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今天，鉴于帝国主义者反对古巴的图谋，我再次重复了我们对他们的警告。这种警告会有益于古巴。所有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而美国也会正确理解的。（掌声）

但我们不会去挑拨离间。如果敌人没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就不会付诸武力；如果他硬把我们拖入战争，那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也会动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持续不断的掌声）

现在，请允许我讲一下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提出批评。他们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盾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保护自己的那些下流做法。

在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我们党正尽一切力量确保斯大林时期的滥用职权不再重演，因为它们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

重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否认斯大林所做的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我们党和人民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过程中所取得的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

要知道，实际上有两个斯大林：一个斯大林——我们中的许多人均与他一起工作过并做了一些好的事情；还有一个斯大林——他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危害。

我们高度评价和维护斯大林在自己活动时期所做的那些好事，因为其在反对阶级敌人和自己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宗派主义者、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斗争中加强了社会主义立场，确保了列宁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之所以要批判斯大林的滥用职权，是因为它粗暴地违反了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因为它不仅打击了敌人，也打击了自己人；因为它歪曲了列宁的遗嘱。

中国领导人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挡箭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粗暴错误。看来，他们是把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所采用的那些下流做法也借鉴到自己的实践中了，而这就必然要违背马列主义原则。

斯大林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人物，并一直想从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依据。他崇拜彼得大帝，也迷信伊凡雷帝。斯大林说过：“伊凡雷帝是一个聪明的男子汉，如果说他做过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是他应当再多杀几十个波雅尔家族，那么情况就可能会更好些。正因为伊凡雷帝没有这样做，因而一度使自己成为教父。”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伊凡雷帝时代，而是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因此，依然使用伊凡雷帝时代所采用的方法开展党的教育和整顿党的工作秩序，那将是极其荒谬的。

苏联人民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经过了列宁主义的党的教育，我们将捍卫和坚持这些原则。任何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侮辱人，任何人都不行！（热烈的掌声）

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生活规范，集体领导原则，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由党选举的领导干部都

有向党汇报工作的义务并归党领导，而不是相反——党向他汇报工作和由他支配党。（掌声）

如果你们询问任何一个苏联人，问他如何看待清除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以及恢复列宁主义的我们苏联生活的规范和原则，那么，每一个苏联人都会答道，他欢迎和完全拥护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

中国领导人当然也不需要斯大林。他们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并对其提出批评。中国领导人需要的只是斯大林曾推行的那些秩序和管理方法，需要斯大林曾用过的那把斧头，以便吓唬党和人民，进而指挥党，而不是领导党。这样一来，就潜伏了巨大的危险性，同志们！危险在于，中国活动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泥淖。小资产阶级大吹大擂、自高自大、傲慢和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优越感日益渗透到了他们的整个身心。他们走上了错误的、危险的道路，并因此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力量。

可是，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立场，不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宣言和声明以及苏共党纲所指明的道路。（掌声）

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国领导人在近年来要日益加紧攻击苏联、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施一系列分裂活动？

公正地说，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日益转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越来越公开地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如果要深究中国领导人如此行为的原因，就必须从中国的国内形势入手。 [155] 由于感到自己无力解决国内所存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便试图把民众引上一条虚伪的歧途，而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也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其目的就是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58年以前当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但毛泽东患了夸大妄想症，中国领导人想在最短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苏联。他们开始宣称，虽然自己胜利得较晚，但要更早期地建成共产主义。为了急于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和开展“大跃进”，并开始兴建小型炼铁炉和实施了其他一些举措，但结果却破坏了国民经济。 [156]

如今，中国人口的年增长速度为1300万—1500万。这些人都是要吃饭的，但中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养这些人口。

中国人民是勤劳的民族，他们曾忍受过比这更沉重的苦难，而他们也一定会经受住自己当前所面临的、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不明智举措而导致的困难。中国人民经受的困难是严峻的，许多人被饿死，可能现在正处于饿死的边缘。但我们关于当前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但我们依然希望，现实生活迟早会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是经过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去克服分歧，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热烈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50-103

№099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1963年12月13日)

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的措施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年12月13日通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并一致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展的政治活动和进行的实际工作。

全会确认，今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及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的实质所作的评价，赞同苏共代表团1963年7月会晤中共代表团时开展的活动，并对会谈由于中共方面的原因中断，而苏共中央多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未得到肯定答复，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过去和现在都一贯认

为，对目前出现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来解决，而应通过1960年兄弟党声明中规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相互磋商、交换意见来解决。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了公开论战并进行了其他活动，其形式和方法都是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容许的。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变本加厉地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转移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问题和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与注意力，破坏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同H.C.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重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就该问题对中共中央发出的呼吁。

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以我党为榜样，并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加强兄弟党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以促进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总是怀着友好的情谊，今后仍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今后在所有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贯彻我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坚定捍卫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友谊，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产生的分歧的实质以及苏共中央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所采取的措施。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1-3

№2301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

会决议(1963年12月13日)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一致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C.赫鲁晓夫同志所进行的旨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统一，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已有分歧的政治和实际活动。(掌声)

全会批准了“苏共中央今年7月14日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分歧的评价，赞成1963年6月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期间所从事的活动，并对由于中共代表的原因而导致谈判失败，苏共中央多次提出关于终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未获得(中方)积极回应而表示了遗憾。

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为指导，苏共中央始终认为，业已产生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解决，而应以各兄弟党声明中所制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相互磋商和交流意见。

中共领导人所开展的公开辩论和其他行动，及其所采取的一些在马列主义者之间关系中无法让人容忍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感到深深地遗憾。现今，他们越来越把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转移到国家间关系上，分散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任务和反帝斗争的精力和注意力，动摇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自己多次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批准了苏共中央就该问题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的信件。

苏共中央期望中共中央能够仿效我们党的榜样，从自己方面也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以便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从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的斗争利益出发加强各兄弟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始终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将在今后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我们

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苏共中央全会委托中央主席团今后将继续在自身政策和实际活动中坚定不移地落实我们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诸决议，坚决地捍卫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并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苏中人民之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循序渐进、始终不渝地贯彻团结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对现存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导致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采取的举措做出解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们已有了一个可以表决的基础性提案。有人反对吗？没有。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变更的吗？没有。有人建议通过所有提案。有人提出如下建议：由我们全会的所有与会者立刻进行表决。(掌声)赞成通过所提交的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的提案草案的人，请举起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提案一致获得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想通知你们的是，我们刚才所通过的草案和决议，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同志的发言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就中国问题所作的那部分发言内容将不予以公开。

赫鲁晓夫：你们大家都知道..... [157]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掌声)

同志们，我们全会议事日程上所列问题已全部结束。

所有应邀参加中央全会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走了，但请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留一下。

РГАНИ，ф.2，оп.1，д.679，л.150-154

№20821-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

稿(1963年12月13日)

未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讲稿

C.A.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158]

同志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获悉，目光短浅的中国领导人继续对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及忠实于列宁和为了和平不断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忠心爱戴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实施攻讦。

不顾及人民的意愿和意见，以虚伪的言辞为掩护，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进行不断的诬蔑和诽谤。

他们企图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方式将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们以蔑视的态度回击中国领导人所做的各种攻讦，向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保证，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列宁的党中央周围的坚定信念。

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团结起来!

.....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96, л.120-121

№0990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1963年12月1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3年12月16日第257次会议第90号记录

关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绝密

一、内部印发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二、这些材料发至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党委、各州党委、各自治区委、各市委、各市区委、各工业生产部门党委、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北方地区以及原始森林地区和山区的党委、拥有区党委权力的基层党组织。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勃列日涅夫(签名)

发送：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马林同志

РГАНИ , ф.2 , оп.1 , д.665 , л.4

1964年

№25531 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 [159] (1964年1月14日)

.....

Ю.黑根 [160]：如何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作为党总书记的您提出这个问题：从国际观点来看如何才能解决这些意见分歧。

邓小平同志：我们在与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十分清楚地向苏联共产党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一直坚持不将我们内部之间的分歧成为社会舆论的产物，也不将它们在敌人面前展示。.....可别人却宣称在敌人面前讨论思想分歧并将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方面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如果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此十分感兴趣，那就需要在这里将其彻底弄清楚.....

那些现在赞成停止公开辩论的人也正是以前声称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方式的那些人。某些呼吁停止公开辩论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一方面说停止公开辩论，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我们进行攻击。在你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的。最近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2000多篇对我们进行攻击的文章。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相互间讨论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刊登了自己的公开信。为什么他们要急于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会议结束后再刊登这封信？我想，要是他们想对美国方面作姿态的话，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黑根：可现在有哪些机会呢？.....

邓小平同志：我们以前已经阐述过我们的观点。对方不同意这点，认为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所以我们曾声明，以及在双边会议期间也声明，如果该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既然公开辩论已经开始，那么就该遵守平等。这意味着最好是双方各自刊登对方的文章.....可只有苏联报刊超过2000多篇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并没有刊登多少文章。如果这里应该有平等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刊登2000多篇

文章.....我私自在想，也许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总而言之，不应该有不平等。总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这不太好。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议，早晚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至于国际会议，我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首先提出了这项建议，然后苏联共产党也同意了。我们与苏联共产党遵循一种意见，当召开国际会议时，就必须保证会议成功。这应该是团结的会议，而不是分裂.....至于我们双方的看法，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尽管我们以前反对公开辩论，可从发展角度来看它，也不是件坏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将得到团结。而这种团结只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

.....

主要的是必须保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兄弟党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只要能够正确地对待所有这些主要问题的话，就能达到团结，如果脱离了这个基本观点，那就只能走向虚假的团结。而我们呢，必须要真正的团结。现在进行争论的问题正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意义非同小可。有希望，但发展将是曲折的。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6, л.14-18

№2578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1964年1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掌握的情报：中国领导人积极利用对苏广播进行分裂运动的宣传。北京的对苏俄语广播的容量和时间不断增加，目前他们通过8个频率每天进行8小时15分钟广播。

中国电台俄语广播宣传的主要方针是歪曲事实，诽谤和破坏苏联的内外政策，引起苏联人民对苏共中央执行的列宁主义方针产生怀疑，使苏联人民与自己的党和政府相对抗。

为此，北京电台除了使用其他反苏的材料以外，最近多次用俄语播送《人民日报》、《红旗》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中央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

民主主义的辩护士》、《战争与和平问题中的两条路线》、《两条正相反的和平共处政策》。

除此以外，北京电台有系统地播送阿尔巴尼亚报刊杂志上的强烈敌对的材料以及有些兄弟党叛徒和分裂主义者的演说和声明。

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正确对待北京电台的节目，谴责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的诽谤性的污蔑，对他们的分裂路线表示愤怒，认为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

在给中国领导人和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苏联公民痛斥反苏宣传的组织者，要求他们停止这一活动。例如来自波多利斯科的钳工叶尔莫拉耶夫在给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说：“我们深信，你们想在我国找到你们政策追随者的愿望是徒劳的，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北京不改变政策，等待你们的将是悲剧。我国的工人不听你们的广播……”

库利亚布斯克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给北京电台写了一封信，代表苏联青年要求停止对苏共中央及其制订的政策进行肆无忌惮的污蔑。

许多苏联公民对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极大的愤慨，另一方面表示困惑，为什么苏联政府不采取措施切断这样的广播，声明要制止这样的广播。

莫斯科无线电与电机学学院一名叫谢尔吉耶夫斯基的学生写信给北京电台说：“我认为最好永远停止你们的广播，你们广播中的乌七八糟的话听起来很难听，尤其是听那些宣誓永远效忠的人讲这些话……”

来自巴甫洛达尔的一名叫乌里扬诺娃的学生给中国写信说：“我一听你们的广播就火冒三丈，苏联政府竟然允许听你们对苏联政府的异端。”

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一名列车员莫伊谢耶娃声称：“为什么我国政府不发布命令，制止北京的俄语广播，他们讲的关于我们的都是胡说八道。”

伊尔库茨克机场的工作人员塞尔玛申科、博戈亚夫连斯基等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莫斯科、赤塔、滨海边疆区和其他地方也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听到北京电台广播，马上愤怒地把收音机关掉。

但是也有少数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受到中国广播的影响，他们开始散布一些不健康的言论，做一些与我们敌对的事情。例如：伊尔库茨克大学一名副教授叶戈罗夫经常收听北京广播，在周围人群中试图证明这些广播内容与苏共的宣言不同，内容清晰，观点有理。叶戈罗夫在人群中所散布的关于苏联社会小资产阶级变质、苏联政府缺乏明确的革命路线的言论都来自中国的捏造。

“吉尔吉斯建筑工程”学院一名叫奥斯莫洛维茨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受到它的影响，在同事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活动，并复述中国广播的诽谤和谣言。

撒马尔罕区“红色发动机”工厂的工人布鲁克受北京广播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开始对苏联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并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路线。

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伊尔库茨克机车库车工伏德杨宁、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大学教师克纳、军官科祖林、切列姆霍夫斯基剧院的演员科布泽夫、火车司机西多罗夫等走上积极反苏鼓动之路。

个别人甚至自己写了匿名信，制作了传单，其内容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

住在文尼察区的加夫里连科被查明写了一封内容反动的匿名信，他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预防性的谈话中承认他的反苏观点是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产生的，他决定在苏联公民中传播这些观点。

新西伯利亚绝缘制件工厂的司机帕夫柳克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了苏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共的观点。在对他进行预防性的教育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些观点是受北京广播宣传的影响。

乌斯基卡缅诺戈尔斯克冶金工厂工人邦达连科在中国电台的影响下制作了反苏传单，因此被开除了苏联共产党党籍。

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共和国、鞑靼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和古比雪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伦堡、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区都出现过匿名信和传单，作者支持中共领导人的观点。

在中国电台广播的影响下，有些敌对分子给中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信，有倾向地列举苏联的一些现实情况，对苏联领导人进行诽谤和污蔑。

原党的干部费多谢耶夫因发表污蔑性的声明被开除出党，他多次写信给中国，恶毒攻击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费多谢耶夫建议将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或者作为无线电广播稿件。

中共中央收集到了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匿名信，写信人恶毒污蔑苏共的政策和苏联的生活条件。信件的作者支持中共的分裂行动，请求将此信作为稿件在电台里播放。

一些敌对情绪较大的人给北京电台写信，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以好像是苏联存在的反苏组织和反苏小组的名义写信。他们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敌对行动，请求供给他们用于在苏联进行反苏宣传的资料。

鄂木斯克工厂的工人巴尔别辛在写给北京电台的信中说：“……在收听你们的广播之前，我是不同意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收听你们播放的一系列节目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有许多熟人，可以在他们中散发你们的文章。一个月中我可以散发二三千份。”

阿拉木图的一名人士给北京广播台发了一封匿名信，其中对苏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诽谤。他以“思想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名义声明，北京广播台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的节目“促进了组织的迅猛发展”。然后他对于敌对的广播宣传采取积极的活动，并尽力证明与北京广播台的秘密关系。

莫斯科也有人给北京电台写同样的匿名信。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采取措施揭露、制止反苏分子的敌对行动，找出匿名信材料的作者。

关于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受中国宣传影响的苏联公民，我们正在与党和社会组织一起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签名)

1964年1月14日

№25530 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 ^[161] (1964年1月25日)

1964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与从中国回柏林赴任外交部副部长的Ю.黑根共进午餐时，契尔沃年科同他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黑根反复强调，任何情况下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的方针都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中国人显然是在搞分裂，让兄弟政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黑根说，他觉得站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人搞的分裂活动斗争中，最近表现得有点消极，这可能使反对中国领导人分裂方针的共同阵营因此而迷失方向。

黑根认为，匈牙利驻中国新大使哈拉斯的想法值得注意。哈拉斯宣称，如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求统一和团结时应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回顾，分析自己的错误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方面的失算，要公开地承认这些。在回答黑根的问题时哈拉斯表明，他哈拉斯对“我们”的概念是指苏联共产党和与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党。……黑根着重指出，匈牙利大使在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谈话中作了以上的表述，还不时看看自己记在拍纸簿上的一些提纲。黑根为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进行辩护……黑根讲述了他与波兰驻中国大使E.克诺泰的谈话。

克诺泰说，所有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共产党应该更积极地反对中国分裂主义分子……是该提出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纪律问题的时候了。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6, л.1-3

№25533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62] (1964年1月28日)

在莫斯科，克诺泰从北京回华沙的途中。

克诺泰指出，最近他自己以及其他一些驻北京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的同志都有一种印象，好像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在与中国激进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派别方针斗争中表现得有些消极。而且他还强调说，在中国领导人就一些争论问题有可能取得相互谅解方面，有些共产党显然存有幻想。谁这样想，谁就犯错误：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克诺泰同时还说，对中国人有利的是其他共产党中会有尽可能多的人被这样的幻想所感染，因为这会产生一种等待希望的局面，一种不是去寻找斗争方式，而是削弱在兄弟党队伍中揭露中国立场的局面……

总之，克诺泰强调道，谁珍惜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惜所有建立在真正的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他就应该以刻不容缓的、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出发点，不仅与中国的分裂主义方针，而且要与有危害的、危险的也是中国领导人竭力要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进行斗争。“我想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与…… [163] 同志、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会的同志讨论这些。”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6, л.30-31

№20278 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1964年1月30日)

绝密

仅1份

关于中国领导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求

(情报资料)

苏共二十大之后，米高扬同志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会谈。1956年4月7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米高扬同志会谈中，提出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回忆说，1949年米高扬同志在中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向斯大林提起过将蒙古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之后，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同志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并问到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之一。 [164]

周恩来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他自己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即斯大林给出的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了回应米高扬同志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周

恩来正式说：斯大林给出的回答，即蒙古是否合并到中国应该问问蒙古人民，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与党的原则一致的话，斯大林的回答本应有所不同。周恩来推测斯大林本应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当时是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会谈，他本可能说中国应该与蒙古人民对话。周恩来认为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表达他的观点。米高扬同志解释说：斯大林的这个回答应该解释为，斯大林事实上是在反对提出将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因这个问题与中国同志卷入争论之中，他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蒙古人民来解决。

依照在同一会谈中刘少奇所表述的，中国人民对蒙古脱离中国很痛心。刘少奇说在苏联举行俄国和乌克兰合并300周年的庆典上，（有些人）说蒙古在300年前就已是中国的一部分，问到蒙古能否重新合并到中国。刘少奇接着说，中国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湾一样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米高扬同志认为把蒙古和台湾等同是错误的。中国人生活在台湾，但在蒙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蒙古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以后蒙古要求以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蒙古人民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再也不想放弃独立。米高扬同志接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蒙古合并到苏联的想法。当日本占领部分中国并试图攫取蒙古时，我们举起手中的武器来保卫它。危险过后，我们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武力，帮助蒙古人民建立自己的军队来保卫国家。并且，当时许多蒙古同志提出将蒙古作为苏联共和国合并到苏联的问题，我们无条件地拒绝了。最后，米高扬同志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脱离中国而后悔的情绪，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担心。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脱离中国的行为是由蒋介石政府执行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它起因于实际情况。

周恩来和刘少奇总结说，他们不是在提把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这些可以以后再做。但是他们认为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适宜的。同年4月，当米高扬同志在乌兰巴托的时候，他把以上提到的与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对话内容告诉了蒙古朋友。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宣布，他们同意米高扬同志所主张的立场，并强调他们将拥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1964年1月30日

CWIHP Working Paper №42, 2003, pp.23-25

№10400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 苏关系部分(1964年2月14日)

.....

五、关于苏中关系

同志们!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认为，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完全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劳动人民，支持他们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为争取独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我们认为，兄弟般地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保护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自己的职责。

我们党、苏联人民都清楚，苏联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规模和性质。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期内，建造并以最新设备装备了大约200个大型工业企业、车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系列工业部门，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工业部门。例如航空工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动力、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仪表制造工业、无线电技术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各种部门。

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企业，使中国能够每年生产870万吨铸铁、840万吨钢、3220万吨煤炭和页岩。我们国家协助建立的企业所生产的锡占整个部门产量的70%，而在合成橡胶产量占100%，电力生产占25%—30%，载重汽车和拖拉机产量占80%。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国防企业，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1950—1960年期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各种期限的苏联专家达1万多人。1951—1962年期间，在苏联学习、培训和实习的中国工

工程师、技术员和专业工人大约有1万人，学者大约有1000人。在这段期间，有1.1万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于苏联的高等院校。

自1953年起，根据苏共中央以及H.C.赫鲁晓夫同志的亲自倡议，消除了我们两国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平等因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表现之一。在此之后，中苏之间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毛泽东在1957年说：“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和积留下来的问题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

1959年，中苏经济联系的范围比1953年扩大了几乎1倍，而在此期间，给工程项目供货数量增加了7倍。自1954—1963年期间，苏联转交给中国24000多套科研文件，其中包括1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草案。这些文件包含了苏联人民以及它的科技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全部科技文件实质上是为无偿提供给中国的。

苏联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条件极其优惠的贷款，总计8.16亿卢布。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地取得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坚定不移地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经常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最重要的举措，竭力使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协调一致。

应该说，在给予中国人民以帮助的同时，苏共中央也非常珍视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出口给苏联的一系列贵重商品，传授中国科学积累的经验，而且还有为巩固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进行的斗争。

1950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不仅对两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对巩固远东和平都是重要的促进因素。

苏联神圣地信守该条约中自己的全部责任。每一次，当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苏联都表现出准备彻底履行自己同盟者的责任。例如，1958年秋天，苏联政府首脑H.C.赫鲁晓夫同志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进攻我们国家的好朋友、同盟者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进攻苏联。”1962年的7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声明。从所说的可以看出，苏联政府是怎样认真地对待加强中苏友谊这项事业的。

但是，很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58年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采取各种措施，破坏中苏间的友谊，并以一些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困难。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单独的不友好的行动，转入坚决地压制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1960年各兄弟党的莫斯科协商会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向苏联提出要求，要求重新审理以前签订的，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全部协定和议定书，拒绝苏联计划供给的一大部分设备，将中苏贸易规模弄到最小的程度。

苏联政府，尽管也明白，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方针将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带来危害，但是，除了同意这一点，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结果是，1962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和技术协作)的总规模，从1959年的水平降至36.5%，而成套设备和材料的供给减少了97.5%。1963年，经济合作和贸易规模继续缩减。

自然，对于中苏合作的急剧缩小，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中央，呼吁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还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建议没有反应。怀着自己特殊的目的，他们一步一步地恶化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关系。

中共领导人在采取压缩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方针时，最初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

“第一，由于苏联的帮助，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初步基础，因此，今后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的建设与设计工作，将由本国力量来完成，我们想减轻苏联援助中国的负担。但是，对于那些我们自己不能设计、建造和装备的工程项目，今后我们还将请求苏联的帮助。

第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最重要的工程项目，缩减基本建设工程的总数量以及压缩那些不是很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以便更好地实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内的建设规模今后还将扩大，速度还将更快。

第三，由于最近两年农业自然灾害，给我们收支差额方面造成了一

系列困难，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缩减苏联援助建设的一些工程项目，为我们两国之间更顺利地合作创造一些条件。”(摘自中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人顾卓新在1961年2月10日中苏谈判时发表的声明)

现在，正如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忘记”自己过去的一切表白，并断言，似乎中苏间联系的缩减是苏联方面倡议的，仿佛这一点也正是造成中国国民经济最近一些年来处于困境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宣传机关拼命想证明，仿佛所有这些不是苏联援助中国，而只是普通的贸易业务。为了抹去人民心目中苏联援助的印象，中国甚至不择手段，将苏联的机床和机器上的出厂商标撕下，并造谣说，仿佛苏联将已经老化的设备供应给中国。恰恰相反，不仅中国人自己，就连外国的报刊都断言，苏联援建的这些企业，如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都是现代工业的优秀典范。

类似行动是与最起码的道德品质相违背的。让中国领导人去思索吧，但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苏联的指责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说，苏联缩减了自己的援助，这引起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布谣言说，苏联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那么，援助的缩减又怎么能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损失呢？

这些都是中国同志惯于使用的表达方式，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呢？事实表明，所有这一切，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尽管中共领导人表现出这些公开的敌意，我们国家仍然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以前承诺的责任，仍然继续协助中国建设80多个工业企业，和从前一样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学者和大学生们还在苏联进行生产实践和业务学习活动。对于1960—1961年期间中国出现的经济困难，苏联的反应是兄弟般的。当中国极其缺乏粮食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中共领导建议，相互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白糖。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在5年时间里按贸易结算方式分期清偿所欠2.88亿卢布债款的机会。

如果说苏联，正如中国领导人断言的那样，竭力压缩自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那么，它为什么还要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一次又一次地向中

方建议扩大互利贸易和经济合作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没有给予答复。他们也无法给予答复，因为正是中共领导人自己竭力压缩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的。

为了尽量给由于“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辩护，中共领导人总是经常地提出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尽管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这个问题已经多次阐述过，但现在，不得不再一次谈一下这个问题。

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自己的专家，出发点是：援助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国民经济缺乏相当数量的专业干部。这绝对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对中国人民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

考虑到，对外国专家的需要具有暂时性，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专业人才很快就会成长起来，苏联政府先后于1956年、1958年提出了召回自己专家的问题。当时，类似的建议对有苏联专家工作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提出过。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专家，这些建议被其他所有国家接受了，而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专家再停留一段时间。

在坚持留下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当局又故意非难苏联专家，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正好遇上了“大跃进”，它破坏经济发展比例，违反一切技术规则。苏联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政策的危险后果，他们对于违反技术要求的事向中国的组织多次提出警告，但是，没有任何人重视他们的劝告。由于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以及中国工人粗暴违反技术规则造成了重大事故，并时而伴有人员伤亡。例如，新安江水电站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忽视技术条件，造成凿岩坍塌，工程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在新丰江水电站，也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过梁中断，基坑下陷。在这两起事故中都有人员伤亡。可以理解，苏联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人理睬我们的专家，因此，他们开始申请允许他们返回祖国。

况且，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教唆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引起我们理所当然的愤怒。

苏联政府多次提请中国当局关注所有这些令人气愤的事实，并坚决请求为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但是，对此的答复是，中国当局

开始更加不友好和侮辱性地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开始千方百计地辱骂苏联的经验和技術。对苏联人的监视加强了，经常性地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在这种情形之下，召回我们的专家是摆脱业已形成的状况的唯一出路。

现在，当众多事实开始明了时，有理由认为，自1959年起，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激化自己与苏联的矛盾之时，与其说他们需要专家，还不如说他们需要关于专家们的问题，即能否利用他们来作为与苏共进行斗争的理由。

为了巩固中苏之间的友谊，苏联政府在召回自己的专家之后，努力调整这个问题。1960年11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A.И.米高扬同志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声明，如果中国确实需要苏联专家，并且为专家们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么，我们准备让专家们返回中国。关于这一点，H.C.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在与周恩来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会谈时也说过。在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双方会晤时(1963年7月)以及在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中，我们再一次正式声明，如果中国需要我们的专家的技术援助，那么，苏联政府准备研究派他们前往中国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建议，中国领导人没有作任何答复，而为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却继续利用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他们试图利用我们召回了专家这一点，来解释重新审理经济计划、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的困难。

但是，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困难还是在召回苏联专家之前就出现了，是“大跃进”危险的试验造成的后果。第二，最大的困难正好出现在那些完全没有苏联专家，或者苏联专家为数不多的部门。

1960年，在煤炭工业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只有2人，国营农场和生荒地部门3人，农业和林业部门各1人，召回他们怎么可能对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林业、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作产生影响呢？事实上，最大的失策正是出现在这些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

是时候了，中国领导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的党、中国人民以及社会舆论继续引入歧途，应该诚实地说明将中国人民置于困境的真正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忽视了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客观规律。

该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中国领导人的逐年努力，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中苏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是文化交流，社会团体的往来都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对苏联人民的谗言中伤和挑唆诽谤之辞却增多了？只有一个解释：中国领导人竭力使自己的人民与苏联人民隔绝，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真相，害怕知道苏联就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兄弟般的无私建议，于是就到处散布无耻的谣言，以此来诬蔑我们的党，诬蔑苏联人民。中共领导人担心，与我们国家的合作可能会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这股清新的风吹送到中国，而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消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掌声）

我们还认为，必须向全会说明，只是由于中方的错误才使中苏边界遭到破坏。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文件里，都讲过这件事。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

苏联政府已经提出倡议，就中苏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我们的出发点是，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苏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

为破坏中苏友谊的基础，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国内以及国外肆无忌惮地组织反苏联的宣传活动。中国的报刊充满了挑唆诽谤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苏联的现实进行指责，对苏联人民进行无耻的诽谤。在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里，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评价：“与一切战争势力联合以进行反对和平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联合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彻头彻尾的诽谤性谬论，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朋友，还是对于我们的敌人，这一点都是绝对显而易见的。苏联的共产党员们，全体苏联人民都会愤怒地批驳这种无耻的谎言。诽谤者所能干的只是这样肮脏的勾当。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执行列宁的方针。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20, л.31-36

№25777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 ^[165] (1964年2月14日)

M.A.苏斯洛夫于1964年2月14日在2月中央全会的报告

(晚上召开的会议)

苏斯洛夫：……没有一个国家不向我们求援，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援助他们。(掌声)只是近期我国给阿尔及利亚、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锡兰、老挝和许多其他国家给予巨大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除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和恶毒的谩骂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同志，我想插一句，请原谅。他说得对，但他没有说，这点我知道，他的报告做得很好，很详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具体表现在哪里？当苏加诺打算反对荷兰人，我们廉价出售给他们驱逐舰、巡洋舰、装备火箭的舰艇和其他武器、鱼雷艇；而等要走的时候，苏加诺说：我们没有会掌握潜艇的人员。请把你们可同我们一起战斗的人派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潜艇艇员给他们。(掌声)这不是口头上的支持，而你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设备。后来他说，我们有装备导弹的轰炸机，但是没有能够发动攻击的机务人员。请给你们装载有导弹的轰炸机的机务人员给我们。后来，我和苏班德里欧讲话的时候说：好的，我们的人会去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击沉荷兰航空母舰的排演。(掌声)

再次抱歉。也门发生暴动时，这些您在报上也见到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打击了那些妄图恢复也门王国政权的反革命军队。

苏斯洛夫：上面提到的这些武器英国支援了没有？

赫鲁晓夫：谁给他们呢？纳赛尔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有人，他们有我们出售给他们的飞机，可就是没有机组人员，请支援我们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请售给我们一些运输机，可以将武器和士兵运送到那里，再支援一些武器，我就将机密告诉您。”马林科夫同志说，他要什么我们都给，但是必须打着纳赛尔的招牌。我说，咱们就打纳赛尔的招牌。(掌声)这样我们给他们“AH 12”飞机，我们支援了机组人员，送去也门的有武器和轰炸机，轰炸机上喷涂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星号，机上的人员是我们的，炸弹是我们的，飞机也是我们的。(掌声)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喜欢打仗，我们只是坚定地站在不干涉的立场上。(掌声)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上面的例子不足够说明问题，你们看，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是名副其实的，我们信奉基督教的信条。(掌声)

菲德尔·卡斯特罗碰到我，对我说了许多话。我对他们说：“您听

好，讲到美帝您很恼火。他们做的就是帝国主义做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您也像他们一样强大，您也会像美国那样。他们美国人对我们却不会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反对我们，应该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不起，我在您做那么精彩的报告时，与您一起唱起双簧起来。请把我们的这些话从您的报告中删去。

苏斯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新报告中有些内容解释得很透彻.....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一点，例如，我们给中国贷款，有意思的是，如果经济学家能注意到，我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谈判，他们自愿向我们提供贷款，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机会的话，我们会接受贷款.....

РГАНИ, ф.2, оп.1, р.6321, ед.хр.720, л.67-95

№25776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 (1964年2月15日)

请赫鲁晓夫同志作这次会议的闭幕发言。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作些解释。两个月前我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过一封信。中央委员们都知道，因为这封信我们是写给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检察委员会全体委员。这封信我们也寄给了一些兄弟党。这样它就是我们的路线，也是与其他兄弟协商过的，我们希望停止争论，希望中国人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同意信中的意思。

报告人和其他同志在发言中都讲到中国对此信的态度。他们对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加强进攻，继续执行分裂的路线。

在目前进行的中央全会上我们也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进行分裂的问题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党的信件不予答复，我们商量的这个问题并决定对此给予还击——将我们的报告、决议和所有文件刊登在报刊上。

有些党(认为我党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党)的代表请我们拖延几天，不要将决议和报告公之于众。他们说——这几天之内我们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争论。

如果他们不接受呼吁，我们认为应该公布那些在全会上通过的文件，到那时我们也将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同志们，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委员们、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党组织的代表们能理解，明天我们不会将第二个问题的报告内容、第二个问题的决定公布出来。我们还将召开关于本次全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讨论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也会讨论。何时公布有关文件，何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以后会有通知。如果这个过程会延迟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这些资料公布，就召开积极分子秘密会议，会上将讨论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如果讨论的时间不长，最好公布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资料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全体中央委员、积极分子通报的内容。我们还是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有没有人反对这种策略？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有结果，那我说，我估计不会有结果，但是有些同志还是相信中国人会善意地接受我们的意见，应该给这样的同志机会。我们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争斗，就不要装成是好斗的公鸡。让我们表现出骨气、耐心并给这种机会，即如果争斗，那就不是为了争斗而争斗，而是为了团结而争斗。所以我们应该和那些与我们的理解和观点一致的党最大限度地加强联系以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同志们，我想解释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为什么暂时我们不会公布这一切。昨天我们想，该问题应该以非公开的形式来讨论，因为如果6000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一些人会这样说，其他人会那样说，这样会导致整个党都会知道。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通过党组织得知，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党组织告诉你们。

一共有8个人讨论了苏斯洛夫的报告。

РГНИ, ф.2, оп.1, р.6321, ед.хр.721, л.154-156

№23019 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1964年2月15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昨天当我听完了M.A.苏斯洛夫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之时，我感觉，

该报告的第一部分不够有力，甚至还带有防御的意思。而当听完了报告的第二部分时，我才开始明白，我的判断下得有些过早了。

我认为，所有共产党员们早就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即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给予坚决的回击，而其分裂主义思想观念也将受到我们强大的宣传，我们强大而坚定思想的压制。

中国分裂主义者们最大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就是试图使您脱离中央，使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脱离党和人民。

我国人民对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的热爱是早就公认的，在会议厅里，您受到人们满怀热爱和喜悦的欢呼，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我这里要重复的，这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这封我请您读的信中的东西，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甚至可以说是我的隐私。我想说的是关于离这个大厅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拉丁美洲的人们对您的热爱。几个星期以前，我因公务去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数十次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对苏联和您所表现出的热爱和友好情谊的著名事例，我就不再一一重复了。

这里，我只想对您说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是在1963年11月24日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走近加里波第广场之时，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在人群中的一个高台上站着一个手举美国国旗的演讲者，在结束讲话之时他高呼“美国万岁，洛克菲勒万岁”。此时人群发出一阵鼓噪之声，出现了另一位演讲者并高声讲道：“你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佬，强盗。苏联——我们的朋友，那里有我们的兄弟。”与此同时，他忽然摘掉萨姆博列诺克帽子，挥拳朝那个拿着美国国旗的演讲者打去，而后者瞬间便消失了。而此时整个人群均站立着，以纯粹的墨西哥人的冲动情绪一字一顿地高呼着这样的口号：“俄国万岁，赫鲁晓夫万岁。”

此时，人群发出一字一顿的高呼声——“赫鲁晓夫万岁”，甚至比我们会议厅里的欢呼声更积极、更响亮。

这里还有一个实例。您当然晓得所有记者们的语言——当然包括我们的记者在内——都是非常尖刻的。在墨西哥，我们曾组织了一次与墨西哥记者的新闻发布会。我要重复的是，这都是些语言尖刻而性质外向的人们。他们请我们谈谈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由于担心他们会厌烦，我原本只想作一个简单的答复。可实际上，就这个题目的谈话竟用了近

3个小时。请相信我，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尤其是女记者们在赞扬我们的立场的同时，又一次激动地开始高呼“万岁苏联，万岁赫鲁晓夫”。如果当时有一位毛泽东的拥护者也在场，如果毛的“思想”拥有些许成绩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国家中墨西哥的记者们可能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到他，哪怕只有一个字。可实际是，当时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只有“赫鲁晓夫万岁”的强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房间里轰鸣。

我对您说这些，完全不是为了贬低我们与中国分裂主义者斗争的意义，也不是为了以此来恭维您，完全不是这样！我甚至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地承认，我们——苏联人，当听到远在这个会议厅15000公里之外的人们对您、对苏联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的时候，都激动得流泪了，甚至还有人由于幸福而像男子汉那样大哭起来。

苏共中央委员

A.A. 韦尔边科

1964年2月15日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06, л.1-2

№23020 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1964年2月15日)

苏斯洛夫同志！

请就如下问题提出中央的意见，即是否应当答复中国同志——我们在中国一起工作的熟人——发来的贺词和问候。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在革命节日和新年之际发来此类贺词。

别图霍夫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06, л.3

№2553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166\]](#) (1964年2月18日)

彭真在谈到苏联2月12日写给各兄弟共产党的信件时说：“你们在这份文件中说中共中央至今没有回复苏共中央11月29日有关停止公开辩论

的信.....的确，对你们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我们是没有答复。可难道这封信是最后通牒，难道那有期限要我们必须答复你们？我们不可能顺从地执行你们任何指令。”

彭真说：“我想提醒一点，你们在1963年11月29日的信之后并没有停止辩论.....这算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是‘沙皇’？而你们说的话和声明就是命令？你们是不是认为啥时想公开辩论就开始，啥时想停止就停止，而我们就也应该沉默不语？”

АВР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6, л.35-37

№25774 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 散发反苏传单(1964年3月23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

1964年3月26日

第124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科夫同志：

据运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苏联的“北京—莫斯科”苏联列车长反映，1964年3月23日中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站满洲里从货运车厢里搬出大量的反苏俄文书籍。

已查明，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检验后向来自苏联的乘客散发这类书籍，特别在那些俄语掌握得很好的回国越南留学生中间散发。

中国职工平常还把反苏期刊整齐地放在满洲里车站上的专业书架上。

我们采取了严格检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重点检查在苏联外贝加尔站工作的中国公民。

特此告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代理局长

甘科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10, д.18, л.22

№1039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4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4月13日会议第97/102r号记录

第102项关于延长苏联的无线电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长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从6个小时增加到9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提供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采取措施保证能够在中国境内清楚地收听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

ЦХСД, ф.4, оп.17, д.575, л.32

№25762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 [167] (1964年4月14日)

.....

1964年4月14日外交部给中央执行机关寄去一份题为《中国分裂分子在古巴的宣传活动》的材料，材料由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编写。

宣传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基本上是从中国运来的，因为宣传印刷品在古巴必须得到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的批准。“这里这类印刷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不受欢迎，其理由是公开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会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

害，会破坏人民中间的团结，尤其在此时，正在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去年年底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北京周报》和1963年最新发行的明显反苏的书刊运进古巴，其他书刊只得存放在书库里，不得出售。”

“涉及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刊物不得出售。”(这种刊物只有在中国人私营的书店才能买到)

РГАНИ, ф.5, оп.58, р.7745, ед.хр.116, л.93-95

№25790 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1964年5月29日)

根据苏共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指示所开展的工作 [\[168\]](#)

1964年5月29日

.....

.....事实证明，中共领导人为了分裂，早就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诱导。

.....有一次我们跟艾地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讲了他写一本关于他苏联之行的书。但此后艾地借口工作繁忙说，如果有人帮他收集资料，这样工作就会快一些。这类资料被收集好了，翻译为印度尼西亚语，但是工作没有进展。

.....有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故意不参加我大使馆的招待会。

.....在中共与苏共分歧问题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采取保持平衡的立场，站在无原则的立场找自己有利的看法。有时候印度尼西亚中央领导人说争论有害，其他时候说，争论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大学，还有时候明显地在讨好我们，试着开中共领导人的玩笑.....但从所有这些情况，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中都能感觉到亲中国的情绪。

.....至于苏吉斯曼，他的亲中国思想为人知之甚少。他是一个支持三驾马车的人，因此必须研究他在1963年给苏联写的那份报告。

.....为了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苏联、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摆脱苏联共产党，中国分裂主义分子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采用贿赂、收买的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公民中物色可靠的人物，中国经常给总统身边的领导人送礼。

.....大使馆在执行2月中央全会指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出版方面，出版部门尽量广泛地刊印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出版了印尼版苏斯洛夫报告1000册，作为《苏维埃国家》(Нерери Совет)杂志的副刊(共10万册)；

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刊登在这份杂志上，也刊登在《苏维埃新闻》(Вери Совет)报纸上，共2500份；

另外还有通告各种展览会散发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

印刷这些文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我们已于今年5月通过外交部提出再拨出一部分资金。我们相信在这上面的钱会有一定的回报。

我们大使馆有不少青年通晓印尼文，确定的人数为8名。他们可以用印尼文给大家作讲座。

应该指定并提供文件，报告纪录片和电视片的发行计划，以便介绍苏联的生活以及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1964年6月8日《红星》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加入揭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活动、反列宁主义路线行列的请求。

.....1964年10月19日H.梅夏采夫报告北京电台8次播送中国领导人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电报的全文。

.....

РГАНИ, ф.5, оп.55, р.7745, ед.хр.116, л.154-191

№21930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

日来信的回复(1964年6月1日以前)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回信”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169]

1.批准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回信内容(附录一)。 [170]

2.批准给苏联驻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指示(附录二)。 [171]

3.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向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的上述回信内容。

4.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附录三)。 [172]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476, л.20

№21931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1964年6月1日以前)

苏共中央就中国领导人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的立场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173]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174]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已于5月7日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信中包含着你们对我们今年3月7日去信的答复。在这封信中 [175]，你们不仅拒绝了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党派提出的旨在消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所有建议，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与各党代表会面、举行谈判和共同与之讨论全世界共产党员所忧虑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

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3月7日自己的 [176] 信件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3月7日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目前，多数兄弟党都已赞成立刻召集会议。一些党原则上同意召集这次会议，但与此同时，鉴于你们对此次会议的举办持反对态度，他们均对会议举办的时间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5月7日的来信中建议，将此次会议的举行推迟“4—5年或更长时间”，而且声称，“不召集会议比召集会议要更好些”。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10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在反对这样做。当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等国的共产党建议在1962年夏季召集会议时，你们是最先对此表示同意的。 [177] 1962年4月7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1962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1963年3月9日和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 [178] 最后，你们在1964年2月29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79]

由此可见，还在不久前你们仍赞同召集会议，并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 [180] 然而，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请问，在近2个月以来——从1964年2—4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中央有什么正当理由来重新考虑在召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看起来，问题在于：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在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上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181]

虽然对其他党的意见，你们极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声称不害怕他们的“坚决回击”；但实际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并极力避免这种诚实而直接的对话，避免将自己错误的纲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比。

你们最近提出的反对召集会议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82] 例如你们断言， [183] 国际会议的召集只会与中共和苏共代表之间的会谈一样，“导致激烈的争吵和大家四分五裂，从而最终无法得到任何结果”，“引起公开的分裂和各走各的路”。

在事先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做出上述臆断的同时，中共中央显然已决心将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与会者们，并且不打算谋求与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次会议的确已转变为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如果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克服困难，如果中共代表愿意寻求与所有兄弟党的相互理解并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此次会议就可能成为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转折点。 [184]

在提议召开会议时，苏共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打算首先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共同的问题上，这将会把所有的兄弟党团结起来。 [185]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

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绝大多数兄弟党所支持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领导人及其少数支持者所坚持的、与上述路线相对的、错误的纲领。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的话，这种情况将会成为分裂的严重威胁。而召集国际共产党会议，正是此类最重要举措之一。相对于在国际会议中集体交流意见的方式，兄弟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制定出统一的立场，使所有的兄弟党在完整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参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路线的制定。 [186]

我们认为，虽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开，一定能在维护团结，防止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最终完全走向分裂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需要所有兄弟党派及其领导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对我们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及其可能导致分裂的后果。 [187]

此次会议有可能消除所有那些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带有诬蔑性和臆断性并引起论战的东西，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兄弟党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总体任务的讨论方面。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与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谋求共同语言的本领。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目前我们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又有什么理由断言，我们就不能在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达成相互理解和约定呢？

苏共认为，召集各共产党国际代表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在当今世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需要我们进行集体性分析并在评价、立场方面相互协调的问题。在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国家极其友好团结的发展、国际工人运动中以及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进程，都要求各共产党采取一些新的政治举措，以动员群众，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平、民族独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而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斗争。而新的国际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188]

中共中央信件中的如下论断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 [189]：在当前条件下，任何人都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因为没有类似于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性机构。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

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1957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190] 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14日的晚间会议^[191]上也声称，“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争论的课题，^[192]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首先，^[193] 参加过1957年和1960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194] 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议。^[195]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反党派别小组。^[196] 但是，第

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197] 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某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198]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1960年声

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宣传运动，[\[199\]](#) 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在5月7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200\]](#)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样，我们对中共反对各种关于消除已有分歧的建设性建议的动机进行了研究。[\[201\]](#) 应该确认，[\[202\]](#) 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5月7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

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 [203]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

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204]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 [205] 的信 [206] 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

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表现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207]：会议应该尽快召开，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以转交给预备

会议进行审议。 [208]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1960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 [209] 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 [210]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 [211] 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至于26党代表预备会议的问题，则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职能范畴，因此，只有他们才可能解决该问题，而不是我们两党能够说了算的。 [212]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集体解决 [213] 涉及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

骤。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476, л.21-36

№21932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1964年6月1日以前)

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214\]](#)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中共中央，并递交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476, л.39

№138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6月4日会议第14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П.鲁达科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的复函。 [\[215\]](#)

赫鲁晓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

1.....

2..... [216]

3.中国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

当他们提议召开协商会议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合乎逻辑。 [217]

如果召开协商会议和不能达成统一的话——这并不代表着分裂，而仅仅是明确了立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如果他们将决定，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争取不召开会议。

已经拥有统一的纲领——让我们召开会议，并明确现实所证实的那些情况——保留。 [218]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着，应该做出总结。

在殖民主义制度衰落的最后阶段，进步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谨慎地指出与反动力量的接近。

基本上赞同。

同志们应该参考报告内容完成工作。 [219]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35-38

№208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6月4日会议第147号记录第2项

绝密

基本上赞成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回复信函的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制定附函文本。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56, л.3

№1039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1964年6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4年6月8日会议第101/6r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在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以及在绘制地图方面，对苏中边界划分历史的错误说明问题。

(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同志)

苏共中央注意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于中苏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于俄中17世纪到20世纪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给予的评价不确切。历史地理地图册、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帝国的版图里。

一系列苏联学者的著作，明显地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于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人民的影响，并说在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过去就有中国人的存在。

苏共中央决定：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国家地质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教育部修改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地图册，删除其中对于中苏边境线确定问题所进行的不正确的评价，并将改正后的中学和大学教科书予以出版。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整理出版学术资料，在这些资料里，要以正确的立场阐述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国境线划分的历史。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ЦХСД, ф.4, оп.17, д.579, л.4

№23047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1964年6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年6月24日

第1495-c号

机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共领导人继续利用北京广播电台积极向苏联宣传自己的分裂观点，与以前一样，其播报时间为每昼夜8小时15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报内容变得越来越具有诬蔑性和恶毒用心，其中除了跟以前一样包含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报刊中的敌视性资料外，还播放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以及外国共产党中的叛徒和分裂分子——如威尔科克斯 [220] 和格里巴 [221] 的流氓言论。来自越南和朝鲜的亲中国报刊的资料以及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所发表的此类内容的言论，在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放内容中占有一定比重。

北京广播电台通过不同的频率向外播报，其中一些频道借助日常使用的无线收音机便可清晰而稳定地收到，尤其是在苏联国家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苏联人对北京广播电台的敌视性节目持否定态度。他们愤怒地谴责该电台的诬蔑性质，能够对中共领导人极力促使苏联人民对抗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挑拨离间阴谋图做出正确的评价。苏联人民各阶层，在自己给北京广播电台的去

信、发言和声明中，均对中共领导人给予了驳斥并要求其停止这种活动。

例如，杰米尔塔乌市的工人А.И.帕索奇尼琴科在给北京广播电台的信中便写道：“我们全家都听过你们的广播，我们感到无比地愤怒。你们想干什么？是想证明我们的政府错了吗？我们希望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否则，将如何解释你们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性攻讦。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相信亲爱的党，谁也别想迫使我们去相信你们的诬蔑。”

塔什干的工程师热利亚兹科在给中国广播电台的去信中将他所听到的广播内容评价为：胡说八道、诬蔑和谎言的大杂烩。他依据真实材料论据充分地驳斥了中国的指责：如“苏联蜕化变质”，“苏联资本主义泛滥”，苏联“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等。在信的结尾，他建议道：“请抛弃你们的诬蔑，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让我们的敌人们高兴。”

马拉干金州“彼得罗夫卡”国营农场工人П.Г.克里梅尔曼对自己周围的人们说道：“竟卑鄙到如此地步，硬要把苏联人民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都说成坏事。有必要对中国的广播实施干扰。因为他们所说的针对苏联政府的谎话都是些垃圾，不应当让他们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尤其是当苏共中央2月中央全会资料和М.А.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公布之后，苏联人民对北京广播电台节目的兴趣大幅减弱。

..... [\[222\]](#)

.....团员指出，正是在中国广播电台的影响下他才起草了这份传单。

卡拉干金斯基出租汽车停车场工人弗多维琴科1964年5月13日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批评是对的。在苏联就是没有自由。”

上述类似不健康现象在以下地区的苏联公民中同样存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阿穆尔、伊尔库茨克和苏联其他诸州。

另外，北京广播电台的诬蔑性广播也被国内个别带有敌视情绪的人所利用，他们定期收听该广播，并在苏联人中传播广播内容，为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进行辩护。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广播在常驻苏联的中国公民中拥有相当的市场，这些人中包括那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人和华侨。在中国广播的影响下，其中一些人也开始从事敌视我们的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与党和苏维埃机关一道，采取进一步举措以消除中国广播宣传的危害性后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B.)(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35, л.59-62

№21934 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1964年6月27日)

H.C.赫鲁晓夫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性一些思考的口述记录

1964年6月27日

(“巴什基尔”号船 [223])

遇事一定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周围到处充满了蛊惑人心的玩意儿。

如今，在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阶段，就曾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一些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国家的作用问题。那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们，是否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个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因为那时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只是在随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建，并制定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才建立了党，并以该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工人的党。有人一会儿对你们说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提出哈里曼式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本·贝拉式等。有人说：“我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如奈温 [224]、莫迪博·凯塔 [225]、恩克鲁玛 [226] 等。

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气质和认识方面不尽相同，可谓形形色色，却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其中多数人都真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

但这些人 anywhere 都没有说过：他们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能，他们连自己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不愿意纠缠于具体的争论。可是，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才能够表露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真正认识以及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差异。

我们是从建党的斗争中开始的，我敢说，我们是在某种清心寡欲的，在沉重的、沙皇专制的地下严峻环境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事斗争，说实在的，需要的是这样一些人——能够抛弃尘世中的一切，并整个献身于斗争事业。

至于如何看待宗教，我们遵循的是列宁所做出的结论，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针对这些麻醉品，即对人民的认识只起欺骗作用的手段，我们当然必须与之斗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当年的俄国沙皇是教会的首脑，因此教会也就成了沙皇的宪兵。教会虽然只效忠一个主人并从这一个地方获得指令，但它却拥有各方面的职能。教会控制着大量地产，拥有巨额财富。另外教会在思想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说，或者如果要在当时的俄国寻找某种思想的话，那么教会——便是专制和沙皇恣意妄为的奴仆。

因此，当我们的革命忽然爆发时，与宪兵相比，教会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革命后沙皇时代的宪兵没有了，但教会依然存在，因为它依靠并利用了民众的支持。教会一度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因此，为了战胜它，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以揭露教会所起的作用并与之展开斗争。教会的神父们不止一次，也不都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地方成了富农暴动等活动的组织者。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正是在经历并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历史之后，才走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如今，一些新出现的国家正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而其他一些国家才只是走上独立道路，才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上所有业已形成并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

№2193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 间领土争端的原则(1964年8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领土和边界纠纷的原则》 [\[227\]](#)

第155号记录第2项

1964年8月19日

绝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和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安德罗
波夫同志)，参考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相关意见，制定主要的原则
性章程，以作为和平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和边界纠
纷的指导思想。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73, л.1-2

№13854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 苏边界问题(1964年8月19日)

你们已经看过了关于边界问题的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228\]](#) 昨
天，我也读了这份文件，感到很气愤。整个昼夜我都在思索着，该怎么
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些工
作，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文件中。这就是我打算采取的方
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该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边界争端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与中国之间就存在着这个令
人敏感的问题，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存在着这个敏感的问题——关于
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 [\[229\]](#) 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而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人那里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230\]](#) 在中国，与所有邻国之间，与朝鲜人
和越南人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都处于航道上，
所以也就没有提出来。与我们没有分歧。毛泽东曾经说过：在1954年，
当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 [\[231\]](#) 他们当时还说，你们
看，蒙古曾经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我当时就回答说：是的，是这样
的，但是，现在，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未必愿意回到中国的怀
抱。

总之，这是蒙古人的问题。而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中
方问。我记得，当时葛罗米柯也在场。我回答说，我们怎么能够说呢，
他们未必愿意。 [232]

安德罗波夫：还说过，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国家观念。

赫鲁晓夫：就这些。

安德罗波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控制了蒙古。毛泽东是这样对日本人说的。大家都
清楚：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拥有大使和其
他人员。

在伊塞克湖逗留期间，我参观了普尔热瓦利斯基博物馆。那里的馆
长——一位残废军人告诉我，主要展览品都保存在列宁格勒。我想说的
只是，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里保留着普尔热瓦利斯基对中国
民族的鉴定。你们可以阅读一下这些资料。不是所有的人都读过普尔热
瓦利斯基的作品，即使读过了，也不是都能够理解的。H.M.普尔热瓦利
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中国人的丑恶、伪善、野蛮和狡猾。

葛罗米柯：恩格斯也曾经写过这样的内容。

赫鲁晓夫：吉尔吉斯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此我就不想多谈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边界的认识，关于对国家
以及国家消亡的认识。国家何时消亡，镇压工具——军队和警察——何
时消失。由此，边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消失的。让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
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这就是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发
展。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经历的过渡阶段。我们胜利了，走上了建设社
会主义的道路，并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为它创造一切基础和条件。
在这个过渡阶段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对这份文件进行研
究，将会是非常有益的，这里已经提出了问题，有理论也有实践。

在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最高阶段里，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呢？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我们也就应该这样解决吗？我们继承的遗产，自然也包括纠纷，这
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引起的纠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传播着，我们不

可能一下子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遗毒，令我们饱受了痛苦。

由此可见，我们也将依靠武器来进行重新划分。边界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而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就这样答复他们的信和他们的建议。我们应该使这份文件成为公众财产。 [233]

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每个国家都继承了边界。如果现在我们开始回到某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回到哪个阶段上，才能够确定正确的和公平的边界线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中国人说：“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 [234] 让我们来弄清楚吧。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而现在俄国沙皇没有了，中国的封建者和中国的帝王也没有了。他们同样掠夺了这些土地，就像俄国沙皇那样进行的掠夺。在那里居住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毛泽东也知道，是中国帝王掠夺了这些土地。那些被确定的与中国的边界线，可以这样说，分割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是哈萨克人、蒙古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的领土。 [235]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以战争的途径解决争端问题，尤其是关于边界的问题。这是理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什么区别呢？我强调一下，这种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在，我们是13个国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有50个、100个和所有的国家都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遗产是要保留的。我们将是这些遗产的拥有者。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争端问题呢？显然，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通过被边界线分割的居民进行表决的方式，或者通过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仲裁机关。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好。让我们来问一下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他们愿意去哪里。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中国人通过枪毙愿意来我们这里的人的方法，来阻止居民。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拥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正如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不仅仅是歌里所唱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这里有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秩序，等

等。

这一点将会被正确理解的，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世界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此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这样，把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作为中国方面建议的基础。不必惊慌，因为接受问题只是一个方面，随后就是应该如何进行表述。应该对这一切进行发挥。他们承认边界，然而，他们却说，请承认这些边界是俄国沙皇通过不公平的方法获得的。那么，让我们也来这样说，从哪一方面是不公平的，让我们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法。

我们承认这些边界，我们也承认，以前，无论是俄国的沙皇，还是中国的帝王，都实行过反人民的、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政策。因为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强者战胜弱者。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里通过的边界线，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到中国公民。我们这里没有中国公民。因此，话题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谈到领土的话，那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属于哈萨克人的领土，是乌兹别克人的领土，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在中国的吉尔吉斯人，要比我们这里的多。^[236]这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该说什么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让吉尔吉斯人自己决定，让哈萨克人自己决定，如果哈萨克人愿意脱离我们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哈萨克人(他们居住在中国，并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愿意的话，你们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意这一点，你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应该打仗的。让我们给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吧，让他们通过民意测验的途径，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里不是两个德国。在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这里只有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概，这就是你们的解决办法。

伊利切夫：非常好。

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它在未来也许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而且将会适合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也不可能进行，因为在毛泽东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不会研究它的。

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让我们随后公布所有这些文件。我们建议这样解决问题。同志们，这将会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我考虑，应该更好地加工它，应该仔细地收集和整理材料，吸收我们的理

论家和历史学家参加这项工作。

葛罗米柯同志就这个问题已经找过我。我打算给他这个建议。

全世界都承认，100个国家支持我们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意见。中国、朝鲜和越南——出于客观方面的考虑——没有支持我们。 [237]

我们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我们应该依靠理论原则，依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原理。让我们来解决问题吧——或者把它抛到一边，或者站在约翰逊的立场上，而他因塞浦路斯和越南问题受到了指责。 [238]

这就是我要讲述的内容。

同志们，不要着急，谁也没有逼迫你们，需要一周就用一周，需要两周就用两周，如果需要一个月，那么，就用一个月的时间，谁也不会讲坏话的。

安德罗波夫：在罗马尼亚人那里可别出问题。

赫鲁晓夫：这些问题肯定会出现的，关于这点我想过，在匈牙利人那里可能会出现。我们有12万人。让我们这样说：正像他们想的那样，有12万匈牙利人同意希望通过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仔细考虑一下。把他们交出去或许对我们有利。没有任何问题比政治上的胜利更重要了。

他们侵入乌克兰人的境内，排挤乌克兰人，占据了最好的土地，而乌克兰人却迁移到山区里。我对卡达尔说过：“你们掠夺了我们祖先的土地。”在议会里有一幅装饰画。阿尔巴特公爵带着自己的军队向斯拉夫人讨要水、土地和草场。斯拉夫人给他了。公爵又说：“你们要交出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拥有武器，公爵就这样在那里定居了。 [239] 我对卡达尔这样说过。他说：“我们是从乌拉尔来到这里的，请把乌拉尔后面的土地给我们吧。”当然，这是与卡达尔开玩笑的话。

自然，这也将涉及罗马尼亚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相就应该是真相，对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安德罗波夫：也将涉及保加利亚。

赫鲁晓夫：应该附带说明一下，通过仲裁机关进行裁决，如果双方

都同意的话。而如果其中的一方反对的话，那么，最好是推迟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交给时代和历史来解决。这就是全部。

葛罗米柯：暂时不召回代表团，也不交付文件？目前，有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发表了声明，如果需要举行下一次全体会议的话，那么，将推迟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此后，关于这些问题，外交部长是如何考虑的呢？我现在还不能说。他应该如何考虑，而我应该如何考虑？应该考虑到，他们将在那里待着，要待很久。也许，可以说，我们前去与政府进行磋商。现在交通条件很好，只要定下来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就会立即赶到的。从会议到会议需要1~2个星期。我们浪费了时间。责任全在于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也听说了，教授已经离开了。勃列日涅夫将进行汇报。

勃列日涅夫：他们提出了请求，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向隆哥教授转达几句感谢的话。我们将会面，科里奥诺夫同志将转达，还请求转赠礼物——帕列赫艺术盒和镀银搪瓷餐具。这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同意的话，就这样做。

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同志，让我们的同志以我的名义给教授写一封短信，应该表达我们的同情。在信中还要提到陶里亚蒂。我们尤其要向您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把您牵进来。这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我们没有以我们党的名义说过任何事情。这将是借口，现在这将成为所有报刊的财富，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在此，还可以通过教授对陶里亚蒂说一些热情的话，可以让他来治病。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是非常宝贵的。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4, л.1-70

№25973 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1964年8月29日)

1964年8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K.苏达利科夫：

按照伊斯坎达罗夫同志的要求，向您提交驻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以及含有“迪克公司”银行分理处信息的广告手册，它是上述旅游公司的所有人。

附件：小册子1份，报告1页。

东方国家局副局长

M.帕杰尔斯基

关于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

“艾尔敏旅行中心”隶属美国银行办事处“迪克公司”，它成立于1945年，主要在远东和东南亚国家从事金融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办了一系列作为“独立”公司存在的分支机构。

“艾尔敏旅行中心”专门推销游客不多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游，也是组织欧美国家旅游的服务站。1963年8月同国际旅行社建立业务联系后，开始从事欧美国家游服务。公司对同国际旅行社合作很感兴趣。

公司经理季尔克·布林克(美国公民)去年两次来过苏联。

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是乔治·昌格。

公司共有14名员工，全部是华人。

去年该公司这条线路共兜揽了40多位游客前往苏联。

苏联驻东京、德里和卡拉奇大使馆为公司送往苏联的游客建立了发放苏联签证的简易手续。

公司对后者提供的服务付款很及时，苏联为方便付款在苏联对外贸

易部设立了自己的账户。

公司在当地报纸刊登了苏联旅游的广告。由于居住在香港的华人表现出对前往苏联旅游的兴趣，却困于没有国民身份，公司向国际旅行社提出了这些人领取签证的问题。

国际旅行社会同“艾尔敏旅行中心”建立业务关系，引起了香港其他一些更大公司的兴趣，来国际旅行社做工作，使之产生同3家香港公司进行合作的意愿。

东方国家局资深监察员

B.列别杰夫

1964年8月2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п.218, д.30, л.2-3

№25786 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 中学高年级班(1964年9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

伊利切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作为一种例外，从1964年10月1日起在北京的八年级制学校里开设九年级班级，指的是今后如果形势需要，可以将这个学校改为中学，其类型完全可以与我国的中学相匹配。

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政治角度的考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的八年制学校现有157名学生，其中80名是人民民主国家、中立国家(印度尼西亚、阿富汗、摩洛哥)等14个国家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

上述国家的大使强烈请求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高年级班，以便他们的孩子在念完苏联学校的八年级以后能够在他们尊敬的、比北京的其他学校有许多优势的苏联学校继续学习。对于在北京开办的

英国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许多原因，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都感到不满。必须注意的是，刚在北京成立的法国大使馆宣称，他们要开办法国中学，所有外交工作人员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地)上该所学校。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同苏联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共同商量的这个问题，认为在现今中国的情况下，从1964—1965新学年起要开办九年级的班级为了接下来教学计划和大纲修改为符合中学的标准。这样苏联的学校会引起更多不仅仅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立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国家代表的注意。

.....苏联外交部认为，根据上面所述的，关于在北京八年级的苏联学校开办九年级的班级应视为我们对外关系的措施。

A.奥尔洛夫

1964年9月14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р.4652, ед.хр.451, л.135-136

№20803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 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1日)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报告关于应中国的领导机关1964年9月16日所发邀请派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办公厅提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决议。

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信中应该暗示，这一邀请是伪善的，特别是中国官方代表对这一邀请做出的口头解释。这样做是重要的，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企图利用信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很可能会发表这些信件。

认为也应该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报道，报道中要阐述我们复函中的主要内容，但不要直接提到这封信。

在这篇报道中，同时也要指明受到中国邀请的其他国家，指明苏联

对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的态度。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给中国领导人的复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的报道以及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的指令都在附件中。

请审议。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

1964年9月21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各中央书记

B.马林

1964年9月21日

在给赫鲁晓夫的文件上的手写批注：

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H.C.赫鲁晓夫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538, л.102а, 103

№20806 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1964年9月22日)

绝密

1964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196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我们建议举办一些活动来庆祝这一节日。

根据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正式消息，今年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将组织游行和国宴。北京将不会举办隆重的聚会活动。

据此认为，苏联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国相应的国家机构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根据合作计划前来苏联访问的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在《真理报》、《消息报》、《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和材料。

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240] 请审议。

Ю.安德罗波夫

B.库兹涅佐夫

1964年9月22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便表决。

B.马林

1964年9月23日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538, л.179

№2080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绝密

1.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一个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扎利波沃伊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缅霞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2.批准给中共领导人复函的文本(附件)。 [241]

3.委托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附后)转交给中共领导人的信。 [242]

4.批准在报纸发表的关于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通报的文本(附件)。 [243]

5.批准给派往中国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活动的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附件)。 [244]

6.中央秘书处要确定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解决代表团访问中国相关的组织问题。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2, л.17-18

№21938 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60号记录第46项的附件

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中共领导人的信：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庆典活动。

1964年9月23日

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收到了您们的邀请函，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中国副外长王炳南和中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在转交邀请信时，做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解释，他们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或者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社会组织代表团”，或者“不派遣代表团”。他们都强调说，不要派遣“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团长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兄弟般真诚友好的感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和发展进行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决定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B.B.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B.П.叶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T.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H.扎里波娃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H.H.梅夏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C.B.契尔沃年科同志。

代表团前往中国的日期将另行通知您们。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高扬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84-85

**№21940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
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就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1964年9月23日 [245]

北京

苏联大使(收)

请拜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并将(苏共中央)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参见附件 [246])转交给他。

将上述信件文本同时也会被递交给中国驻苏联使馆。

请电告执行情况。请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期间各外国代表团在中国的行程安排的大致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2, л.86

№21939 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1964年9月23日)

第160号记录第46项

给前往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4年9月23日 [247]

我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当强调我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的真诚情谊，并对中国人民为争取革命胜利和发展所作斗争的高度评价。必须利用每个机会以展示我们对中国劳动者代表们的热情。

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苏联代表团是在苏中关系极其复杂和关键的时期去中国的，此时的中共领导人已对苏联和苏联政府采取了敌视的政策，并试图引起苏联人民和党与苏共中央和我国领导人的对立。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极力利用此次苏联代表到中国的机会来达到上述政治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代表在自己的言行上一定要坚持以苏共中央二月(1964年)全会决议和我党出台的关于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和反对中共领导人分裂的新托洛茨基方针等问题的相关文件为指导。

必须对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发出的攻击性言论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苏联代表团结束中国的行程之前，针对中国代表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人身攻击应提出严正抗议，在个别情形下针对中方发起的具有反苏性质的活动应拒绝参加。

在适当场合下理应强调我们对中国领导人现行路线的关心，宣传苏共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努力，广泛普及苏联的爱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我们国家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弘扬列宁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成就。

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代表团应与坚定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场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行动上与之保持步调一致。 [248]

如果中方就党际关系、继续进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双方会谈、由26个共产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对我方进行试探，我代表团应以苏共中央关于此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听取中国代表的意见并向中央通报相关情况。

苏联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可以基本遵循中国方面提出的行程安排计划，同时也可视具体情况或在征得中央的同意之后对自己的行程做出必要的调整。

№2080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1964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5日会议第160号记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0月1日)庆典活动采取如下措施：

1.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国务院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贺电的文本在1964年10月1日的中央报纸上发表，关于是否发表对贺电的回电要根据收到这些回电的情况而定。

2.委托苏共莫斯科市委、苏联对外文化联系和友好协会、苏中友好协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文化部，于1964年9月30日，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

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中央报纸要发表关于这场晚会的报道，其中要指出出席这次晚会的官方代表。

晚会开支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支出。

3.委托《真理报》、《消息报》发表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的文章。委托《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刊登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照片和报道。

4.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2, л.22-24

№1385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 (1964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5日会议第16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米高扬、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马利诺夫斯基。

发自北京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米高扬、波利扬斯基。

进行了归纳总结。自己承担很多。 [249]

指出：在结论中应该更加谨慎，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应该避免冲突。委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再考虑考虑，但是，不能失去分寸。中国人不希望发生冲突，我是这样认为的。可能会发生边界冲突、交火。也可能，已经派出机动部队，严格核实这些情报，核实他们的来源。谁说的，同谁说的。密码电报已阅，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进行研究，并与安德罗波夫同志的部门机关共同研究。

关于罗马尼亚代表团(毛雷尔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250]

应该弄清楚，陈毅关于罗马尼亚对我们有领土要求的声明，是否属实。 [251]

关于前往中国的代表团的名称。

米高扬同志说，怎样为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命名。

赫鲁晓夫同志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团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说：如果将举办“音乐会”的话，那么，就应该前往。

波德戈尔内同志：也可能会做出卑鄙的事情。

波利扬斯基同志：没有写给所有的人，这不是最高级别的。可以称代表团为党和政府代表团。

关于给中国人的贺信。 [252]

批准。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45-47

№20805 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周年(1964年9月30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外交部部长

陈毅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请接收我们真诚的祝贺。

借此机会，请转达我们对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愿望!祝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

让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让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

苏联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柯

1964年9月30日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2, л.104

№20770 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 核武器(1964年10月3日)

..... [253]

下田：现在在这里谈谈中国。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国将在近期进行核试验。非常想了解您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是否有实际力量搞这样的实验？

H.C.赫鲁晓夫：核爆炸，我想，中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认为，他们应该已经制造出来了。在关系密切的时候，兄弟关系的中国学者被允许进入我们很多秘密的工程，他们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做的。制造核弹最主要的不是看到了如何制造，而是要有基础。我们给了他们生产核燃料的机械设备。

A.И.米高扬：我们给他们设计了工厂并提供其他帮助。

H.C.赫鲁晓夫：这样，他们从我们这获得很多，也了解了如何去制造。我们当时希望他们应该这样去做，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但困难的是技术、工业和科学研究基础实在非常薄弱。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是用一些军事信息来交换的。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空对空”导弹。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他们相互开火射击，他们(中国人)用我们的导弹打落了飞机。得到之后，要仿制也要有基础才行，中国当时基础很薄弱，生产了600万桶[254] 石油，能源基础弱。

A.И.米高扬：说是他们石油贫乏。

H.C.赫鲁晓夫：这个可不好，如果只有600万，那是不足够的，这就说明了工业水平。我们有22.3亿还尚且不够。这不是说，中国人生活得比我们好，这只能说是非常低的水平。如果集中力量，正如陈毅所说的：我们可以没有裤子，但我们不能没有原子弹，那么就能拥有。如果你们想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另外，你们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说，你们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日本有科学技术的基础。

..... [255]

谈话持续了2个半小时

翻译：Л.А.斯特里扎克

记录：H.加夫里洛娃

1964年10月4日

第2号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97, л.115-151

№25632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 离间苏蒙关系 [256] (1964年10月7日)

绝密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年10月7日

策伯格米德说，9月30日陈毅在接见代表团时，多次表示感谢蒙古政府和泽登巴尔同志本人能派代表团前来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策伯格米德叙述道，当蒙古代表团抵达北京时，陈毅与其他中国同志努力营造一种特别热情的氛围，拥抱、亲脸等。

.....

策伯格米德对我解释道，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托鲁布桑利用参加中国国庆节之际试探一下中国人与蒙古就一系列问题——有关中国人对领土的诉求、关于派遣中国工人去蒙古等问题方面的诚意.....

而后，策伯格米德又通报了有关周恩来今年10月3日会见鲁布桑的情况(这次会见时除他们俩外，只有策伯格米德参加)。

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一开始就说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分歧，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团结。周恩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可能产生分歧，但这是次要问题，而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这才是主要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侵犯，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在这场斗争中团结起来。对此，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回答说：蒙古以前是、目前也是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鲁布桑接着说，众所周知，蒙古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后我们也要友好相处。接下来在谈了关于中国人提供的帮助后，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指出，从某个时候起中国政府开始对蒙古采取了些不友好的举措。他将召回中国

工人作为例子。现在我们不得不从农村动员年轻人去建设工地，而在农村，那里也出现了自己的困难。鲁布桑当时就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蒙古的请求，派1万多名畜牧人员去蒙古，为期3—5年。同时鲁布桑还强调，最好是派遣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中国畜牧人员。

当来自中国各不同地区的工人被派来后，促进了许多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则一定会遇到的(出现了日常生活方面和语言上的困难，穿越整个中国的路费等)。策伯格米德解释说，提出派遣边境地区的畜牧人员问题，其实质意味着试探中国人对内蒙问题的立场，因为实际上讲的就是蒙古人——来自内蒙的牧民。

策伯格米德说，可以看出周恩来没有准备答复，因此他开始提出许多次要问题，同时考虑自己的答复。然后，周恩来说，他理解泽登巴尔同志的想法。他接着说道，新中国成立后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前，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国与蒙古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而现在来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有了边界，交换了这方面的报告，就像主权国一样存在。周恩来接着又说，我们也有了双方应该共同遵守的友好条约。

至于经济援助，周恩来接着说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向蒙古提供援助。同时周恩来还提到泽登巴尔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是毛泽东接待的，当时毛泽东对泽登巴尔同志说：“应该向该国提供援助，直到它能在经济上独立为止。”周恩来接着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我们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援助，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策伯格米德说，这时周恩来就开始细数中国对蒙古提供的种种援助)。

策伯格米德而后又说，周恩来特别注意到了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同时强调指出，以前在实践上存在各种误解，可中国政府并没有关注这些误解，因为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周恩来接着说道，最近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在蒙古变得尖锐了，这是蒙古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造成的。周恩来说，我们努力不将党之间的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去，但我们是以一种精神教育自己的人民，而你们在蒙古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教育。所以当中国工人碰到蒙古工人时，他们会发生意见分歧。这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特别是现在，当意见分歧变得公开时，因此而加入到分歧中的人群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经发生了不幸事件(周恩来指的是在蒙古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中国工人被杀害的事件)。

周恩来继续说道，因此才产生了把中国工人召回国的想法。我们的出发点是召回中国工人就能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如果现在派遣一批新的中国工人，而他们是以我们的思想教育的，这就可能引起比以前曾有的更深更大的分歧，有可能会发生冲突，事情会导致更多的中国工人被杀害。

因为你们的报刊在批评中国，如果中国工人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们该怎么办？更何况你们已经批评中国领导人了。如果派遣牧民，这意味着分歧会传播得更广，将转移到农村，所以最好是将派遣中国工人的问题暂时搁置。周恩来说，当然，这会给建设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可与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不如延缓建设。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想帮助你们，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困难。他突然说到，你们是苏联的邻国，该邻国向你们提供很多的援助。然后周恩来开始说，可是分歧将逐步解决，关系将得到改善，到那时中国就能向蒙古提供援助。要有耐心等待，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我们将友好共存，而此刻，当分歧还未消除之时，我们应该努力使分歧不再深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反复说蒙古人有权请求中国的帮助，中国一定会提供帮助，可现在不是时候，对此的条件也不合适，需要等待。周恩来说，我们尊重泽登巴尔同志有关派遣中国牧民的想法，可现在不是派遣的时候，中国政府将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蒙古驻中国大使转告这些答复。我们将不认为这是个简单次要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不会将问题搁置一旁，请将这些转告泽登巴尔同志。

策伯格米德讲述道，周恩来在午宴代表团时说，尽管分歧将会持续很久，可必须友好相处，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要团结。他说，这一点我们要服从于解决中国与蒙古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所有问题。同时，周恩来几次说到，提出的具体问题(如工人的路费等)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并不是主要的，是次要问题。策伯格米德注意到周恩来在暗示，主要的是蒙古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性质。

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对待蒙古代表团尤为礼貌客气，会谈时努力不引起任何细微的激化，并不止一次请求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他的问候与祝愿。

策伯格米德说，作为主要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会见代表团时也说过，他也请代表团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问候。策伯格米德说，当代表团坐飞机启程回国时，中国领导已经在机场，并不止一次

地表示，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应该友好共处，相互尊重等。

策伯格米德在概括上述内容时说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与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国人好像是在谨慎地让代表团明白，如果蒙古能放弃在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强硬的原则立场，他们就准备向蒙古提供大量的援助。大使继续说道，很显然，蒙古严重妨碍了中国人人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实现自己的方针，因为，比如说，在许多方面蒙古的做法让中国人感到十分讨厌。策伯格米德表示，遗憾的是蒙古的力量太小了点，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经济，要真实、鲜明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和亚洲其他国家面前展示繁荣的典范，更有力地动摇在亚洲以及其他各洲的大汉沙文主义和冒进主义的各种计划。

策伯格米德同时还说，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谈话时的声明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和毛泽东本人的威信，甚至那些对蒙古领导层的内外政策并不完全赞成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蒙古领导层在对待中国领导人方面实施的方针表示怀疑，现在他们极其愤怒地谈论上述所说的毛泽东声明。

.....

通报上述内容的同时，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今中国在与蒙古关系方面的尝试，是中国领导精心策划的新一轮阴险的而且更为准确的战略步骤和行动的重要部分，旨在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使兄弟国家脱离苏联(他们顽固地试图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的“真诚捍卫者”，并多次在所有级别的场合表示，他们说，“分歧，这不是主要的，通过争论谁也死不了的，主要的是团结”，等等。10月6日彭真与波兰活动家就这个方面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国人重新试图对德国人暗送秋波，他们对德国人说：“你们是西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而我们是东方的前哨，所以我们要团结。”对罗马尼亚活动家，中国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也在全力进行工作，尽管正如当时的乔治大使说的那样，没进行任何相互的讨论)。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有必要专门地，也包括暗示性地提前几年研究蒙古的问题(还包括让其他人，除泽登巴尔外，特别是一些有威望的有影响力的蒙古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们向苏联共产党靠拢的问题，要让苏联和蒙古关系的牢固程度不仅仅依赖于现在当政在位的一两个

人)，要进一步巩固它作为苏联忠诚盟友的立场，更为有效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它去冲垮中国领导的各种计划，特别是他们玩弄的所谓亚非“团结”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把戏。

也许时机已成熟，可以考虑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出访蒙古的问题，把这一问题作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与蒙古的联盟而对蒙古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同时，应当考虑必须减轻蒙古人因中国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而产生的某种恐惧，这点是蒙古同志在与我们的谈话中微微透露出来的。

比方说，蒙古大使策伯格米德秘密地通报说，蒙古国内正进行局部的动员(尽管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能说，借口动员参军而征集青年去建筑工地)，从蒙古方面建立了专门的岗哨用以监视中国人在边界的活动.....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08, д.7, л.25-35

№25635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 [257] (1964年10月7日)

绝密

.....

契尔沃年科说，对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交有关缔结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国际协议一事，他想要弄清楚中国方面的看法。

王炳南：我们认为当前在解决边界和领土这样复杂的问题时，恐怕不能仅采用一种方式，因为这样会限制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式。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18-24

№25636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 [258] (1964年10月8日)

1964年10月8日契尔沃年科会见了波兰驻中国大使克诺泰，后者向苏联大使通报了有关1964年10月6日波兰代表团与彭真的会谈内容。

彭真表示，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支持波兰人，但没有转达官方声明。

雅罗辛斯基(代表团团长)强调说，波兰人在等的答复就是毛泽东是否对日本社会党人说过，苏联使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分裂了出去，而作为补偿将把东德的部分领土转交给波兰。

而后彭真解释了中国在与苏联边界谈判中的立场。

“同时他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教条主义者，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修正主义，因为我们在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彭真：“我们现在遭到原子武器的威胁，目前苏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拥有原子武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有脑袋、双手，用两条腿走路。他们造出了原子弹，那我们也会造出原子弹。我们应该有原子弹……因为如果我们造不出原子弹，他们就要消灭我们。”

关于起草委员会的问题：

彭真：“现在试着召集这个委员会，其实这是项非法的工作。如果苏联领导人还不停止，那他们就是在搞分裂。我们现在有争论，可没有分裂，这比要搞分裂的要好；如果可以保持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为什么还要搞正式的分裂呢？”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36-44

№13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4年10月8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И.沃罗诺夫、А.Н.柯西金、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В.И.波利亚科夫、Б.Н.波诺马廖夫；会议由Н.В.波德戈尔内主持。

1.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措施。 [259]

苏斯洛夫、柯西金、波诺马廖夫、波德戈尔内。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基本的和主要的文件——名称有些狭隘(在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

柯西金同志说：都准备了什么文件，从来没有谈到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问题。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对文件进行编辑。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8, л.48

№219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1964年10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举措》 [260]

(М.А.苏斯洛夫、А.Н.柯西金、Б.Н.波诺马廖夫和Н.В.波德戈尔内)

第162号记录第1项，1964年10月8日

绝密

1.批准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修改 [261]，给澳大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民主德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的信件文本(参见附录1)。 [262]

2.批准给苏联驻意大利、英国、罗马尼亚、巴西和古巴等国大使的

电报内容(参见附录2)。 [263]

3.批准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信件内容(参见附录3)。 [264]

4.批准中央主席团会议 [265] 对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提纲所作的修改(附录4)。 [266]

5.责成苏共中央国际司、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司,在今年12月1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为起草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草案。 [267]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4, л.1-2

№25637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 访华情况 [268] (1964年10月9日)

.....

哈拉斯在与我见面时主动谈到,在与匈牙利代表团进行的所有会见和会谈中,中国方面从毛泽东到代表团陪同人员的所有级别的人员都不止一次的重复这么几句话:“匈牙利和中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中国和匈牙利是好朋友”等。

彭真在接见时表示:“匈牙利人和中国人本来就是好朋友,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分歧。”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45-49

№10273 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 赫鲁晓夫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以前)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

不晚于1964年10月14日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现在应当向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报告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不正确的行为而

在中央主席团内部造成的局面，以便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使我们党的领导情况健康化与正常化。

大家知道，近些年来，我们党在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然而，如果领导不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种种严重错误，我们的成就不知要大多少。问题的实质在于下述几个方面。近些年来，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赫鲁晓夫同志把无限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却完全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他粗暴地践踏领导党、领导国家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实质上是完全放弃了这些原则和准则。列宁主义要求党的一个领导人必须服从领导集体的意志，要求领导人之间要有正确分工，要求他们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内外政策上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他忘诸脑后。

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赫鲁晓夫同志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最近以来，甚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也都由他一个人做决定，而任何一项合理倡议，只要不是出于他本人，则一概予以压制。他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待同志高傲自大，粗暴无礼，缺乏容忍态度，已习以为常。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列宁主义方针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胜利，他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最近以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摆在第一位的，不是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是他本人的利益。我国任何一项多少有些重要的措施，都必须盖上“系赫鲁晓夫所为”的印记。

至于说工作方法和作风，在这个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的领导实践。现在，在主席团会议上，除了他，已经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如果有谁想谈谈自己的意见，立刻就被打断。是啊，谈也没用，反正第一书记我行我素。

怒气冲冲的吼叫，强迫命令，粗暴淫秽的污辱，恶毒的谩骂，这样一些“方法”，已经成了他习以为常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完全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狡猾手法：先打一个人，过一阵子则用甜言蜜语去拉他一把。然后，又如法炮制去对付另一个人。

他的这种做法，往往把同志们搞得意志消沉。

他使用的一种最可怕、最阴险的“方法”就是，不给主席团任何委员以工作，而对那些真想干些事情的人，则是给予打击。甚至连出差也禁止，在他看来，这是游手好闲和游山玩水。他想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切全靠他一个人，只有他在真正地工作，而所有其他人都是懒汉；第二，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干部。

与此同时，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个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他公开提倡巴结献媚、阿谀奉承、放肆鼓吹、赞扬个人、美化甚至歪曲事实这样一些令人不能容许的风气，并助长此类现象。

对于不合他的心意或者敢于反对他的人，他越来越采取威胁的方法。而人们又不能不理睬这种威胁，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手中掌握着何等巨大的权力，他在性格上是何等放荡不羁和专横霸道。他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和行为准则也不顾及，满嘴脏话，令人厌恶。正如俗语所说，他的话难听得都不堪入耳，就连铁石般的蠢货听了，也会脸红。什么“笨蛋、二流子、懒汉、臭气包、臭苍蝇、落汤鸡、臭狗屎、粪便”等，不一而足。这还仅仅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他所用的那些侮辱人的话，而他经常“通用的”那些话，则是根本不能见诸报章，也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他不分场合，甚至当着妇女的面也满口吐脏话。

在此没有必要去证明，只有那种完全丧失一个领导人的全部品质的人，才能下流到这种地步。仅需强调的一点是：一位领导人如果无视集体的意见，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然，这种事并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发生的。他一天一天地脱离现实生活，不再听取现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在怎样地生活。有些同志可能会反问：怎么会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经常在国内走动嘛！是的，他的确常常下去。但他在下面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他现在下去视察，已经不是去向人民学习，不是去听群众说了些什么。不是，他是没完没了地去教训大家，他自己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

正因为如此，由他主张推行的一些措施，都造成了严重挫折，致使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党政建设、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种种措施以及解决国内外政策中其他若干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缺点。不得不令人痛心承认，由他倡议提出的某些措施，执行的结果不止一次地使我们党、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国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党和祖国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

简而言之，赫鲁晓夫同志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把自己置于党、党的领导机关和全国之上。他个人专权表现得十分明显。现在已经很清楚，党现时与之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实际上是提出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以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他这样做时像个恶意的煽动家，在口头上反对个人迷信，主张严格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然而在行动上却相反，采取个人迷信时期的做法。因为现在此种做法已暴露无遗，而且采用此种做法已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坚决反击再生的新的个人迷信崇尚者，也就是说，要按伟大列宁的遗嘱来做的时候了。

我们决定走这一步，并不是突如其来，而且心情也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之前，我们不得不一再反复地仔细思考和衡量。我们长时间地、耐心地寻求方法，讨论各种可能性，以便于纠正。何况赫鲁晓夫同志早在以前就有过不少不良品质、行动和行为，他的一些危险的毛病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暴露出来。

我们曾经指望他能够纠正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过失和失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同志改掉他的行为失当，克服他的坏性格。

促使我们这样的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是赫鲁晓夫也有他的功绩，这是任何人也不想否认的。共产党人和所有苏联人，都一致赞同和拥护我们党致力于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以恢复党与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这一列宁的方针。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性给予应有的评价。谁也不想否认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尤其是在担任领导初期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和正确的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想使他改弦更张，表示我们不同意他的一些不正确建议和决定。我们曾经希望他能够悔悟，能够像一位真正

的共产党人和领导人那样，从我们的意见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愿望并未实现。

总的来说，以上所述就是促使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将此问题提交党中央全会的几点缘由。现在，请允许我开始分析由于赫鲁晓夫的过错而在经济、国家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执行方面所犯的各种具体错误和严重缺点。

关于在对内政策种种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请允许我从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讲起。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党的新纲领已经3年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果我们骄傲自满，夸大我们的成就与成绩，掩饰严重的缺点，那就不对了。

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在我们这里制造出一个所谓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还在无限制地大肆吹嘘。试图证明，在赫鲁晓夫同志执政的10年中，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奇迹。他本人在其无数次讲话和意见书中，无休止地硬说，我们的事情都搞得很好。报刊、广播和电视也跟着他这样说。听他们这样说，好像我们这里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而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道路简直就是一曲成功与胜利的凯歌。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自然我们大家都高兴不已。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正视现实。而现实，同志们，竟然是：恰恰在这所谓“伟大十年”中，在我国最重要方面，各项指标急剧地恶化了。我用某些事实加以说明。

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的规定的各项任务都未完成。

最好是从苏共纲领中阐述的各种任务完成的情况谈起。只要很快浏览一下3年总结，就能确信纲领中规定的许多指标的完成期限是不实际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事先没有进行深入的经济论证和计算，便由一些只在理论上懂得经济而远远脱离生活的人们制定了。更有甚者，主席团委员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参与纲领的制定。他们拿到的是现成纲领。

苏共纲领规定的一切计算，都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先在工业品总产量方面，然后在人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其计算也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那么，1959年2月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关于这一指标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的呢？

请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年 份	社会产品年均增长速度(%)
1950—1953	10.6
1953—1956	11.1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5.0

上面的统计表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直到1956年底，社会产品增长速度一直是提高的，其后就开始下降了。1956—1963年时期，增长速度总共降低了6.1个百分点。这并非偶然。8年当中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多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社会产品的高增长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如果说在“伟大十年”当中我们开始在增长速度方面交出了我们的阵地，那么很显然，其原因就在于经济领导上的失误和严重错误。

这也从工业工作质量指标，尤其是固定资产利用指标的急剧恶化得到了证明。在七年计划的4年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个百分点，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个百分点。

或者我们可以再举工业生产部类“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发展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来看一下。这些年来，这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了。

赫鲁晓夫同志这位工业管理改革思想的倡导人，当初曾经热情地说服我们，要求我们相信恰恰是改革才能在这方面迅速地带来有利的变化。^[269]然而，事实说明，改革以后，比例失调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严重了。这种比例失调到1963年已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10%)比“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5%)高出一倍。因此，1963年就整个工业生产水平而言，苏联是美国的65%(美国为100)，可

是其中就第二部类的对比来讲，我们一方仅为45%。

可见，就“第二部类”来说，我们较美国落后一半，我们要想赶上他们，看来需要15年时间，也许更长些。

同控制数字相对照，七年计划关于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任务，现在并未完成。大家看得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的提议也破产了，上述部门的发展速度根本没有接近。相反，工业管理的改革很遗憾却加深了比例失调，使局势更加恶化了。

劳动生产率速度不断下降这种危险的趋势，也令人严重担心。下面两个数字很说明问题：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7%—8%，而在现行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上下降到了5.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196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为5.5%，1963年则为5.2%，到1964年上半年只有4.2%。

然而，按照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即使在技术进步，即在生产中发展和采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问题上，我们做得也远非如此，并非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不应闭眼不见，在某些生产部门中，我们的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落后不是在缩小，反而在扩大。

这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对于技术政策的领导不断干预，而且是外行的干预。数年以前，他曾疯狂地反对对于领导技术进步的机构实行集中和垂直组建。过去被他否定过的一切，他现在居然都加以维护，把它们视为某种新事物。他设立了大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却没有权力，它们脱离生产，它们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对于企业没有约束力。结果，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严重受阻，机构更加重叠，而统一技术政策的推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这仅仅是工业发展领域中几个最重要的例子。

下面简单谈谈建筑业方面的情况。不可否认的确凿事实是：所谓“伟大十年”的一切改革，也使建筑业的状况恶化了。我们未完工的建筑项目年复一年地增加。它从1958年的175亿卢布逐年增加，到1963年已超过260亿卢布。建筑速度降低，建筑规模缩小，5年中的成本仅仅降低了

0.5%，而计划规定应为4%。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现在全国一切工程项目表(指列入基本建筑投资计划的在建与改建项目名录)，毫无例外都得报送莫斯科审批。但这里来不及审批，而没有方案就不能开工，结果项目施工计划就得拖延下去。

例如，他做出的建设4—5层住房的指示，其代价恐怕是难以计算的。他解散了苏联建筑科学院，只是因为该院不同意他的这样一个结论：4—5层住房造价最便宜、使用起来最方便，而且可使居民分散，在遭到原子弹攻击时能够保护居民，等等。

生活证明，科学院里的人员都是有真才实学的。现已查明，盖4—5层住房，每平方米的造价，如果加上市、区交通建设费，要比盖9—12层住房高得多。由于推行建“5层”的方针，城市中的建筑密度大大增加了，交通、供热、地下水以及其他管线都令人不能容忍地延长了，城市的外观恶化了，根本谈不上舒适，住房里连电梯都没有。

现在，这位新冒出来的总建筑师在打退堂鼓了，又号召盖高层建筑了。然而，第一，他这种荒唐指示造成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第二，改行多层建筑并非易事，这种建筑需要重新为它建立工业基础。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任性，更正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在农业方面犯了更多的错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大家都知道，他到处宣扬，使人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懂得农业，是他把几乎落入深渊的集体农业和国营农场挽救出来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农业问题，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国农村的状况，就在现在也是令人极不满意的。

去年，国内甚至连面包都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建议实行凭本供应制度。现在战后已经过去20年了。我们不得不被迫拨出860吨黄金，用于向资本家购买粮食。如果农业果真兴旺发达，那么在“伟大十年”过程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一次歉收就使得我们越出常规，想在全国实行可怜巴巴的口粮配给制，动用国家的国防储备粮，迫使向来卖粮的苏联用黄金去买粮。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况与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已大不相同了。 [270]

真实的情况是：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

为负增长。总产量按产值计算低于1958年的指标。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

严重缺粮和缺饲料，迫使我们不得不大量屠宰牲畜。其结果是现在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从一切情况看，今年的牲畜与家禽的采购与去年相比，将大约减少190万吨。今年下半年肉的销售量将比去年下半年少35%。现在，肉类产品的销售各地几乎普遍长时间脱销，而某些工业中心城市今年几乎就没有肉类产品。

我们的农业严重地落后于国家向它提出的要求。我们还远没有满足人民对于粮食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于面包、肉类、牛奶、土豆和蔬菜这类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们尚未解决对农业工作人员实行物质利益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多次演说，征求了不少意见，却毫无结果。

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产品合计为1卢布56戈比，而5年以后，到1963年，则为1卢布89戈比。你们看，5年当中，一共才“增加”33戈比，也就是说，一个工作日每年才增加7个戈比。

如果每个集体农民平均一年劳动230—250天，这就是说，他每月平均收入37—40个卢布。这要比其他劳动者每月平均少收入一多半。这还是仅就平均数讲的。而我们现在许多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仍然只发50—60个戈比的货币与实物产品。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从集体农庄外逃。

在此，有必要再指出一点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在引用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长的数字时，总是避开1953年前的指标，不愿意去回忆他们战前的收入是多少。然而，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分析对比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请看下面说明集体农庄发给庄员主要产品粮食的变化情况数字。

作为劳动报酬，平均发给每个集体农户的粮食如下：

1940年8.2公担

1953年7.2公担

1959年7.1公担

1961年5.8公担

1963年3.7公担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发给实物的真实数字。它排除了随机应变、玩弄价格、任意确定收入多少的可能性。它彻底地批驳了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声称的战前和战后至1953年以前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没有得到报酬的说法。这个数字说明，情况恰恰相反。它证明近10年里集体农庄庄员从农庄作为劳动报酬领得的粮食在逐年减少。

正因为如此，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直到现在眼睛盯着的主要是自己那块宅旁园地，而不是集体农庄的公有生产。而我们这些人没有搞清农村中由于我们的过错而出现的种种情况，就开始指责集体农庄庄员迷恋自己那土宅旁园地。

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农业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其劳动成果这个问题的真正态度，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不久前，听说有些地方优秀牧羊人每月挣到180个卢布，他动怒了，大声喊叫说：“这简直是腐败，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下令清除“腐败”。

再举一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取消了农业专家们的保证工资。其结果是最近5年里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的23万大学生中，只有4万人即占17%的人前往农村工作。

总的来说，我们是在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的意愿，在农业中由一方摆向另一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他到处(包括北方地区)强迫种玉米，而在种玉米烫了手，花费了大量资金与劳动力并无所获之后，就打退堂鼓。于是他又向各地普遍发布指示禁止种草。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打退堂鼓，说必须种草。他时而声称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是不适当的，时而下令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时而大声疾呼在畜牧业中要推广“Z型挤奶器”，时而又要推广“旋转型挤奶器”。这才真是转来转去呢！

这些年来，由于他的过错，真不知还干了多少其他蠢事，犯了多少其他错误！请大家回忆一下可耻的“梁赞州事件”。^[271] 他不能不知道，这是冒险行为，但他还同意了，结果许许多多老实人，虽然与此诡计无

关，却大受其害。在他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竟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农庄，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在他的坚持主张下做出决定，要求限制私养牲畜头数，缩小宅旁园地的规模。 [272] 其结果是：牲畜遭屠宰，肉奶大量减少，而减下来的宅旁园地则长满了野草。那些先前通过集体农庄或者由本人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或商店去卖的人，现在则换了一个角色，自己变成了买主：这就使得城市劳动者所需食品的供应状况更加恶化了。

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声称：国营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要比集体农庄生产的农产品几乎便宜一半。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对于国家来说，实际上集体农庄的产品要比国营农场的产品大约便宜45%时，他大发雷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为国家对于集体农庄产品的生产没有花费，这同国家对于国营农场的支出不同。看来，赫鲁晓夫同志连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也不懂。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国营农场的经营制度是最先进的，我们党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国营农场的生产。

在访问埃及 [273] 期间，他强迫纳赛尔接受水栽培法 [274]，在我国国内他也宣传水栽培法。但在苏联水栽培法是很昂贵的，而且是没有前途的事情。而在埃及，每年两三熟，为什么要用水栽培法呢，谁需要它呢？

简单谈谈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宣传必须认真研究解决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然而，在10年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未用来哪怕搞清一个落后农庄。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模范农庄，譬如卡里诺夫卡农庄(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州卡里诺夫卡村)。然而，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而已。要知道，这个村子是得到国家的巨大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国家勾销了它的大笔欠款，在该村进行了所谓试点建设，给它提供的援助是任何农庄都没有得到过的。难道能够以卡里诺夫卡为例来得出有关我国农村情况的结论吗？很明显，是不能的。而赫鲁晓夫同志恰恰是以卡里诺夫卡为依据做出他的论断的。

简单谈几句他最后一次在国内的视察，这次视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两周之内访问了足足几十个州、边疆区及共和国。 [275] 可效果怎样呢？没有任何效果。1963年，正当国内粮食情况极度危机时，他没有下去视察，因为这对他不。今年收成情况不坏。于是机会立刻来了，也

就有情绪去视察了。但他去哪里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只去收成好的地方。

但是，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清楚，虽然今年收成总体来说好于去年，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理由像报刊、电台和电视上在他视察的日子里那样无节制地乐观和吹嘘，因为农业情况目前并不好。

赫鲁晓夫同志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才能真正搞好农业，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改革。他在去斯堪的那维亚访问 [276] 的前一天，还火急地照例写给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一份意见书，提出改革农业的新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个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完全取消各生产管理局 [277] 党委的作用，把这些党委变成经济机关的附庸。不然，怎样理解不久前他在中央主席团里说过的下述一段话呢。他说：“好就好在党委现在已经坐末把交椅了。在我视察中，到处都突出向我介绍生产管理局局长。这很好嘛。这就是说，人们已经从我的意见书中得出了结论。”

恰恰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没有抽出来，哪怕是去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党组织的一位书记，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的一位书记谈谈话。同志们，这难道不是一位党的领导人已习惯于对党委坐末把交椅感到高兴吗？他在口头上甚至提议根本取消生产管理局党委而用设立政治部主任取而代之，其职位相当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不久前，他又说过，也许应当根本撤销生产管理局。这就是说，农村里党的机关也应撤销。你们看，他已经谈到什么地步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农业领域整个活动的特点，是极端主观主义，经常超前和过火，不愿意考虑现实情况与农业发展规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多次声明中的一次，他说：7年中，整个农业重要产品按人均产量计算，要超过美国的现在水平。 [278] 实际上，我们与人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

要想证明农业情况不佳，证明他在领导上犯有种种粗暴错误，还可举出一系列其他事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再继续容忍他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了，不能再让一个人在全苏范围内，而且是在如此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去搞那些考虑欠周的危险试验了。

国民收入逐年下降

请允许我下面谈谈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既定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方面的材料也是令人担心的。下面苏联科学院的统计数字，它表明了最近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年 份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0—1953	11.0
1953—1956	12.0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4.0

可见，直到今年年初，在8年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你们看得出，是在逐年降低。显而易见，这并非局部，并非偶然，而是施加一定影响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对经济的领导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赖以提高的主要来源。由于国民收入速度的下降，我们每年损失的净产值与1956年以前时期相比，高达80—100亿卢布。显然，这会大大减少国家的消费基金与生产基金。

苏共纲领规定的1961—1970年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速度超过9%，使国民收入在10年当中增加一倍半。然而，实际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1963年仅为4%，即较党的二十二大的规定低一半以上。为了弥补下降部分，国民收入现在必须在1970年以前每年增长至少13%—14%，但这是一项非常困难，更正确地说，是不现实的任务。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规定的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增长任务完成得不好。按七年计划规定，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必须增加大约40%。而实际上，5年中他们的实际收入平均只增加了20%。

应当指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严重影响了职工实际工资额度。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在上述时期内提高了17%，而在消费合作社里，这类价格也高出1963年国家价格13%。于是，我们不得不延长执行下述各种措施的期限，如1962年调整工资，将最低工资提高50

—60卢布，对工资收入低于70卢布的职工免于征税等项措施。 [279]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事实都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使他們不相信我們规定的措施有执行的可能，破坏了我们党及苏共中央的威信。对于实际涉及的问题，党中央和政府现已收到大量来信，我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上面所述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最重要的倾向与现象，而这些倾向和现象所涉及的，则是10年来我国经济带有根本性的、主要的方向。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等增长速度的降低，许多其他计划任务未能完成，以及各项社会性措施没有执行，都证明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严重的，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越来越落后，虽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优越性，但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优越性的利用却越来越差。

同志们，我们提醒你们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构成严重威胁的挫折，恰恰都是管理工作改革之后这年中出现的，而且在继续起作用。在这些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实行改革和推行种种“新的”管理制度，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明显地处于解体状态。而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无视这一点，把国内情况吹得如何美好，简直把我们这里说成是人间天堂。这难道不是蛊惑人心吗？

关于大规模改组的性质和特点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1953年以后的10年，是在不断改革、各种改组、改造的标志下度过的。结果，整个经济管理结构以及党政机关结构，打个比喻来说，简直是从上到下，从广到深地被翻腾了一遍。而每一次这种改组都叫做革命性的、根本性的改组。这些改组都被赋予某种理论依据，都被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改组，都被贴上取得某种神奇效果的标签。

是否真的如此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大量的改革实际上是些什么货色吧。谁都不会说不需要搞任何改革。生活在前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机构都不会是永远不变的。它们需要完善和改进。但必须严格遵循列宁的指示，就是说不能仓促从事，切忌鲁莽行为。而且，往往有许多同改革有关的问题，是需要拿到全党和党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的。

然而，列宁的这些指示却被忽视了。甚至就连成立工业州党委和农

业州党委以及与其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这样理应由党代表大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却通过另外途径去解决了。 [280]

其结果又是怎样呢？在他看来，新的党政管理机构系，似乎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状况。可是，分析表明，结果恰恰相反：由于欠考虑和不完善，新的管理体系未能如愿以偿。

管理改革之后，国民经济的状况，如前所述，是恶化了。这是对新管理体系的无情判决。它们产生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领导机构重叠、一团糟、官僚主义，或者简直是杂乱无章。领导和管理机关的结构并未精简，反而复杂化了。整个国民经济，我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没有从这种种花样翻新的措施中得到任何好处。

总的来说，工业领导的改善事实上并未做到。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般都管辖几个州，整个经济管理权集中在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手里。因此，工业州党委管辖地区如与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区域不相符时，工业州党委实际上也成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附属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委，也被剥夺了干预农业领导的权力，因此也变成了生产管理局的附属物。

这种情况在我国还从来没有过。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自下而上的所有机关和组织，从来都是由党来领导的，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我们摧毁了部一级主管部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委员会一级的主管部门。然而，洋姜并不比萝卜甜，并没有达到精减机构的目的。如果说在撤销部委局之后的第一年，机构还有些减少的话，那么在实施改革之后部委局的数量则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国内管理机关的总人数仅在5年当中就增加了50多万人。而且，仅在最近一年半之内，机关的开支就几乎增加了8亿卢布。

已有的老缺点未能消除，却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非常可怕的缺点。工业与农业各自为政，实质上是两者已经分离。而列宁则要求我们组织领导必须做到“大工业更快地同农业结合，以使产品正确交换”。此外，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科学也都脱离了生产。

尤其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是按所谓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的党政机关进行的改组。这项措施被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政机关

的组建原则，而实际上却是背离列宁的指示和苏共纲领关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设立工业和农业的州党委与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党、政、经机关的职能、权利和义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混同和彼此替代，造成了工作的重叠。总之，出现的混乱是我们苏维埃国家在其整个存在期间所不曾有过的。至于说问题的理论和政治方面，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说得不客气些，简直是绝对行不通的。

同志们，请你们自己想想：苏共纲领和章程中写道，我们党已经成了全民党，而领导作用仍然属于工人阶级。这就是说，党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党，否则还谈什么领导作用。改革的结果怎样呢？从工厂到州和边疆区，所有的工人都在同一些组织里，而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者则完全在另一些组织里。这好像是一个党里有两支队伍：一支工人队伍和一支农民队伍。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因为这种改组：

第一，违背了列宁关于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统一，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要求，削弱了工人阶级对于全体居民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第二，违背了列宁关于大力加强构成我们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的思想，导致工人阶级同农民相分离；

第三，将党一分为二，降低了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政治思想上的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改组是同苏共党纲中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长的规定背道而驰的，党纲规定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此，请大家搞清楚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苏维埃怎么能够按生产原则组织呢？

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形式，要是没有领土，就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职能可以改变，但是，作为国家象征的领土则是不能改变和取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苏维埃是最具群众性的政权机关。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一部分属于工人、另一部分属于农民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不只管经济，也管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切方面。这就是说，苏维埃拥有全权。

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改组是前进的革命步骤。但是，我们并未前进，而是大大后退了，已经倒退到革命初期的情况，那时工人、农民(即贫雇农)、士兵和水兵都分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苏维埃。然而，恰恰是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才被列宁称为党的最伟大的成就。

列宁从来没有把地域原则同生产原则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此应当指出，我们建立起生产性的州党委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所建立的并非是生产性机关，而是地区性的部门机关。工业州党委——这怎么理解呢？工业是生产部门，而州则是个地域标志。这是无法回避的。

简而言之，改组——不论这次改组或其他种种改组，把我们的全部工作统统搞乱了，妨碍了我们的前进。在10年当中，进行了如此多的改组和改革，以致人们现在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说他们是在不断变换花样的改组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的。党、政、经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一样，都是怨声载道。人们公开讲：“改组实在叫人讨厌极了，搞得人们没有时间工作。现在是既缺面包和蔬菜，也缺牛奶和肉类，可改组是绰绰有余。”他们说得对。现在是结束这种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应当讲讲下述一点。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常说：“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列宁对所有这些改组会说些什么呢？

下面就是列宁的原话。他说：“我们许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281]这句话真是切中要害！你们看到，列宁认为，大多数轻率的改革是灾难。列宁还指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282]

我们怎样才能从所有这些改组和改革中摆脱出来呢？这只能按照列

宁的劝告去做。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应当及时醒悟过来……从我们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学到了一些东西……” [283]

伟大列宁所指引的这条路当时是正确的。而今天，它仍然是唯一正确的。

关于对外活动方面的种种错误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扼要地谈谈党所制定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在解决最重大的问题方面，是怎么贯彻执行的。

我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对所有对外政策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指示。它创造性地制定了为实现和平和防止核战争而实行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政策的途径和方法，以便解决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证在和平条件下建成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和进一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我们这样一条富于经验而又可靠的对外政策路线。然而，有一条路线是一回事，而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最可靠的路线，如果实行时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不妥当，其结果也不会好，而会带来坏处。

凡是留心观察各种事件发展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按照党的方针去做，而往往是提出了和实际上推行了另外一套方针。在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涉外政策上，党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耐心和冷静，别上敌人可能把我国推向核战争边缘的种种挑衅的当，不要采取讹诈和威胁的政策，在捍卫与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攸关的根本利益上，要表现出坚定和果断。

可我们看到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拖入忽而这种、忽而那种处于战争边缘的危险局面。

请你们回想一下苏伊士运河危机吧。 [284] 当时，我们距爆发一场大战只差一步呀!有何理由非要打仗呢？那时，我们同埃及之间甚至连互助条约都没有。对方也没有请我们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采取行动而投入战斗呢？

我们国家当时尚未从反希特勒的战争中真正恢复过来。人民不要战争，也不希望打仗。战争会像晴天霹雳一样。如果事件真的发展到这种结局，苏联人民是不会感谢我们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打仗。如果这样，那就不是政策，而是政治冒险和讹诈，是不负责任地玩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和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了。所幸，一切都安然过去了。可赫鲁晓夫同志立即把这说成是他的天才所取得的结果。

还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柏林问题”。^[285] 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谈时^[286]，由于柏林问题，事情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肯尼迪声称：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欧洲的气候将变得令人厌恶。他在此是指爆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发出了最后通牒：无论如何，在某个限期之前，柏林必须变为自由城市，就是说，即使发生战争，也不能阻挡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期望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这里并没有那种蠢人，认为应该为争得“自由市柏林”而打仗。自那时起，不止一个限期过去了，但柏林并未成为自由市。是的，建起了柏林墙^[287]，但为此无须发出最后通牒嘛。现在，这一点也被说成是个伟大胜利。然而，不论你怎么变着法说，其结果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赫鲁晓夫同志本想吓唬一下美国人，但是他们并未被吓倒，反而是我们后退了，使得我们的国家、政策和武装部队的威望和声誉受到不小的打击。

下面谈谈加勒比海危机。^[288] 赫鲁晓夫同志洋洋得意地说，斯大林都没能进入拉丁美洲，而他做到了。但是，第一，“进入”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的政策；第二，只有冒险主义者才能说，在当代条件下，我国是能够给予那个大陆的各国以实际军事援助的。因为它距离我们数千公里之遥，而且隔着大洋。怎样向那里运送军队，怎样向他们提供给养呢？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没有用的。它只会把应当帮助的那个国家毁掉。你们可以问问我们的任何一位元帅和将军，他们都会说，对拉丁美洲实行军事“进入”那是胡言乱语，是充满大战危险的。如果我们为了帮助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而对美国首先实行核打击，那么不仅我们自己会受到反击，而且所有人都会同我们断绝往来。

由此种种，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对于古巴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如果美国动一下古巴，我们就将对它予以打击。他坚持把我们的导弹运往古巴。这就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把世界引向了核战争的边缘。这也吓坏了提出如此可怕主意的组织

者本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得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要求和条件，直至令人可耻地由美国人来检查我们的军舰。导弹以及大量部队也都按照美国的要求撤出了古巴。

这件事也损害了我们国家、党和军队的国际威望，同时却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威信。苏古关系也严重恶化了。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都把撤除导弹看作是让古巴去听凭命运的摆布。在古巴人对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重大裂痕，直到现在还时有表现。

然而，你们知道，就是在古巴危机中的失败，赫鲁晓夫同志也把它说成是胜利。而且，他还想继续走这条冒险的老路。就在不久前，他还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声称：“应当同古巴签订互助条约，人们会叫，这是冒险。那就见鬼去吧，让他们去叫。”没有比这再露骨的了。

大家都看见，在最近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通过战争来威胁帝国主义的途径去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制度、一种特殊“方式”。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出路时，对帝国主义者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武力给予威胁，以便使他们清醒，但却不能把这变成一种制度。

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不放弃对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正义战争的各国人民给予帮助。帮助是必要的，但要考虑到他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利益，要考虑帮助的实际可能和干预的后果。应当永远牢记列宁的下述指示：我们必须表示出最坚定的和平意愿，因为帝国主义者会利用任何机会来恢复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宣称：“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对此，我想讲几句。

这个口号是不对的。美国急着想称霸世界，企图强使所有人都接受似乎美国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和领导人。这个口号就意味着，我们把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看作只是俯首帖耳执行美国人意志的国家。然而，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例子说明，事情并非如此。这种口号会违反我们的意愿，也会使欧洲的一些小国臣服于美国。

而我们的任务在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的争吵与矛盾，来证明美国并不是这个阵营的盟主，它没有权力争做盟主。最后，如果这样来说明问题，那就会恶化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此，请允许我就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讲几点意见。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令人非常担心的局面。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跟着苏联走的国家；第二类是跟着中国走的国家；第三类是超脱于这两类之外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和近期加入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面临着完全现实的分裂的威胁。

出现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在这些原因方面，赫鲁晓夫同志是有过错的。他在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

他当众称毛泽东是“老套鞋”，后者知道了，当然大怒。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他同乔治乌德治谈话出言不逊，粗暴干涉罗马尼亚的内政，叫喊他们对农业一窍不通，尽管这并不符合事实。^[289]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卡斯特罗的好友本·贝拉谈话中，他说卡斯特罗是一头见到任何一块红布都会猛扑过去的公牛。^[290]类似这种令人不能容许的评语，他还不止一次地用在其他如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等一些同志身上。而且，对于他们，他是今天骂，明天就把他们捧上了天。当着大庭广众和本人的面，他说的是一套，而在背后，他说的则是另一套。这种做法不会有助于团结。无怪乎列宁当年曾经告诫说，个人的品质是会造成分裂的。

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我们的关系上保持警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想法。例如，他策划出一些要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愿并入苏联的计划。

当向蒙古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根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当人民获悉这个传闻时，当即爆发出颇使我们的朋友们感到意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打着“我们不想变成莫斯科的一个省”的旗号，把不少人联合了起来。

赫鲁晓夫同志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主张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采取设立仲裁机构或进行民意测验的办法。这个主意是他不久前提出的。试问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能根据第三国的判决而把自己的领土交给另一国呢？或者说，某一领土的归属问题怎么能够不

由该国全体人民、该国政府来解决，而只由住在该领土上的居民来解决呢？这是同载入我们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切原则相违背的。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他时而下令要给予坚决反击，时而又建议停止争论。这就在各国兄弟党的队伍中造成了惶惑不安和惊慌失措。一些党同中共进行论战，另一些党则沉默不语，总之是各自为政。可是，中共领导人却未浪费时间。它制定了计划，精心准备，对我们进行了有组织的进攻。

应当承认，在激化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我方在中印边境冲突 [291] 期间的行为，起了负面作用，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迷惑不解。中国人发动战争，是做了蠢事。但不管怎样，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尽管百般标榜中立，它也是个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本不应该向它供应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

不能把事情看成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思想混乱和行动摇摆的局面中，我们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同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我们一方面不能放弃原则性立场，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智地、更明确地、更细致地实行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列宁主义政策。应当永远放弃诸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并入”苏联，就各种领土争端实行仲裁与民意测验等的主张。这些主张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因此，任务就在于纠正已经出现的局面，善于用列宁主义的政策来恢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也必须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给其他国家首先是那些不久前才获得民族独立并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以经济和财政援助。

对于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杰出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后仍将一如既往给上述国家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与其他援助，仍将宣传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外介绍我们已有的建设经验，帮助他们培养干部和发展文化。

然而现在，在这方面存在着任性，缺少深思熟虑的政治态度，往往考虑不周，而有的只是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主观愿望。他总是企图牺牲

国家的利益来做好人，以此给自己争得威信。对于这种慷慨的，然而对于我国人民却是沉重负担的赠予以及其他经济援助，他总是以还须帮助这些国家更迅速地发展其独立自主的经济为理由进行辩解。

然而，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事物。事实是，数百年来，是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直在统治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在那里建有经济和军事的堡垒，熟悉那里的情况、风俗习惯和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干部。那些国家的人民也使用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则往往对那些国家毫无所知，却给他们以广泛的财政、经济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援助。

在许多情况下，结果是令人可悲的：其中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吃光了我们给予他们的东西，就转脸离开了我们。资本家们嘲笑我们，他们嘲笑得对。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往往不能做政治和阶级分析，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分得清什么是卢布，什么是侮辱人——握住拳头，将大拇指从食指与中指中间伸出，但他们却不能区别共产党人与叛徒，而跟着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亦步亦趋，可就是对于这样一些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我们却给它们以援助和贷款。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在几内亚，由苏联帮助，建起了飞机场、罐头工厂、锯木厂、发电站、广播电台、冷库、容纳500个床位的医院、宾馆、综合技术学校和畜牧场，并正在进行地质勘探等。向那里供应了多少机器设备呀！所有这一切都白白丢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塞古·杜尔把我们在那里赶了出来，甚至连我们帮他们在克纳里科建的飞机场都不准我们飞往古巴的飞机使用。

在伊拉克，我们把宝押在了卡塞姆的身上，在那里大兴土木：建起542公里铁路（可1963年在苏联一共才建了673公里铁路），截至1963年建设了200多个项目。这时，卡塞姆被推翻，公开敌视苏联的人掌了权，他们血腥地镇压了伊拉克共产党。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当权的也是些露骨的反动派和民族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在获得我们的大量援助之后，不想偿还我们的贷款了。

作为无偿援助，我们给了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将近2亿金卢布，还不算拨给他们武装部队的大量装备和武器。如果把我们的

钱哪怕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最重要的事情上，那还说得过去。然而，用于诸如雅加达的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仰光的宾馆、加纳的设有同位素实验室的原子能研究中心、马里的体育场、几内亚的旅馆等，就未必可以称作最重大的事情了。这类例子也是很多的。

目前，苏联仅仅给予20个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就已达34亿新卢布。在苏联协助下，这些国家已建起数百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10年中，我们在各个国家一共建了6000多个企业。在阿富汗、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苏联给予的贷款分别占它们各国借款总额的12%—50%。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公然昧着良心，已经不是请求，而是要求：没二话，给钱！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做：富国必须帮助穷国。

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已经帮助而且应当帮助各国兄弟人民，但给予援助要合情合理，要精打细算，要履行严格的政治路线。理所当然，我们在给予此种援助时，不能以牺牲苏联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为代价。

不能不提请你们也看看赫鲁晓夫同志主持对外政策时所采用的方法。在此，有必要谈谈他去外国的访问、接见活动、所谓的“亲属外交”，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是竭力让我们的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而力图由他本人去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他宣扬有效的外交手段是“最高级会谈”，而这一政策的实际体现就是他去国外的访问。

外国报刊对这些访问的反应很有意思。美联社记者夏皮罗这位聪明、刻薄而又不失幽默的记者，关于我国政府首脑赴斯堪的纳维亚的访问，做了如下评论：“这次访问基本上带有家庭野餐的性质。苏联最高统治者，又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访问20国的名单上增加了3个新的国家 [292]赫鲁晓夫喜欢携家眷到国外旅行.....其他任何一位著名国务活动家都不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放下自己国内的公务，到全世界去旅行。”

的确，任何其他著名活动家都不可能进行花费如此高昂且往往毫无结果的访问。无怪人们表示不理解。许多人说：“果真他在家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吗？”这是值得考虑的。仅去年一年，赫鲁晓夫同志出国访问和在国内视察就用了170天，而现在，1964年还未结束，他已经又有150

天不在家了。如果再加上1963年他举行的128次盛大招待会、午餐和早餐会，也就是每3天一次，那么还剩下多少时间工作呢？

他出访总是带着一大批随行人员，而且有些出访除了亲属外，还要带上许多其他人。例如，访问美国时同他一起去了150人。 [293] 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莫洛托夫想偕夫人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想赠送德国人两辆大公共汽车。 [294] 他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去美国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了一大批礼物。他去巴黎，也带上夫人、女儿、女婿，并带去了礼物。 [295] 他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是由家属陪同。 [296] 他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带上夫人、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

而且，他每次出访都带去许多贵重礼品，例如：飞机、汽车、皮货、特制枪支等，有时，他送礼不看对象。譬如，赠给塞古·杜尔一架伊尔18飞机。去埃及时，他带去两辆海鸥牌高级轿车，还送给纳赛尔的孩子几辆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以及其他礼物。反过来，主人也向他和夫人、女儿、女婿回赠了汽车。

尽管他的多次出访对于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每次都大肆宣扬一番。《真理报》和《消息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把这些访问吹得天花乱坠，把它们说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刊登和转发大量照片。1952年一年，《真理报》上刊登的斯大林照片只有6张，而仅1964年一年，该报发表的赫鲁晓夫照片就有147张。你们看，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真正战士的一例！

历次访问以及进行的喧嚷叫嚣和自我吹捧，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国内外的人们，相信赫鲁晓夫同志似乎真正具有超人的品质和在群众中拥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威望。

举行招待会、早餐或午宴等，也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每天都有大批可来可不来的外国活动家、实业家以及游山玩水的资本家等到我国访问。不管需不需要，他对这些人一律予以接见。

这一切使大家都感到厌烦。为了接待外国客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有数万人脱产。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此也很厌烦。要知道，苏联人——无论负责工作的人员、部长或其他同志，要想出席赫鲁晓夫同志的招待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在自己的即兴讲话以及同外国人的谈话中，往往把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的信息泄露出去。有一次，他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炫耀起导弹的数量时，向一名外国记者讲出了有关宇宙摄影的秘密材料。在各种会议上，应该说在请了大量根本不该请的人出席的会上，他也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东西。而他在国外就更加放肆不羁了。他这样做了之后，却反过来指责克格勃，说它的工作人员不会保密。赫鲁晓夫同志践踏国际礼仪的最起码准则，也给我们的外交和国家的威望造成了巨大危害。在联合国会议上，他脱下皮鞋，用它敲桌子，以示抗议。^[297]这一可耻行径，至今还被他说成是勇敢。另外，你们也会想起这样一件事：他作为一国总理，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听到一些什么人从大厅内喊了什么话时，他立即高声喊道：“掘地三尺，把他们埋掉。”在西方，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说：“身为苏联总理表现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该怎样呢？”确实，他连最起码的自制力都没有。例如，他在出访斯堪的纳维亚之前，讲到同联邦德国大使的谈话时说“我把他痛快地大骂了一顿，向他说——我们要把你们德国人都干掉，从地球上消灭光”等。同志们，你们大家想想，假如有人同我们的大使这样讲话，你们会怎样，你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

现在，说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外国活动家谈判方面的创新。最重要的谈判，他不是委托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和外交官们进行，而是越来越多地委托给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谈。阿朱别伊同肯尼迪、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艾哈德总理等人进行了谈判。^[298]可以说，政策成了家族的事。阿朱别伊现在是他最信得过的人。赫鲁晓夫同志每天，甚至往往每天几次地援引阿朱别伊的话：阿朱别伊说了什么什么，阿朱别伊劝他怎么怎么办。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在干部的安排上，成了阿朱别伊许多主意的执行者。应当坦率地指出，阿朱别伊在这些方面是个完全不称职的人，甚至是个信口开河、有冒险习气的危险人物。

不久前，奉赫鲁晓夫的委派，阿朱别伊访问了联邦德国。^[299]他同西方记者们的谈话很不负责任，他的声明给西方报刊以借口，把事情说成似乎为了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苏联宁愿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人民而向军国主义分子做出让步。这不能不引起德国和波兰同志们令人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满，他们坦率地声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正当复仇主义甚嚣尘上，而德国军国主义者又公然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联总理打算访问西德呢？

前俄国沙皇们或者肯尼迪、丘吉尔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过去或现在采取此种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党内，这种广泛流行于王公与皇帝宫廷的家族朝廷外交，也复活了呢？难道我们这样做体面吗？这不是我们的路线，它是一条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严厉谴责的路线。

上述种种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在我国对外政策活动中，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性质相左的轻率鲁莽、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则成了一条基本方针。很明显，这一切将会削弱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会使我们国家遭受一定孤立，会破坏我们党的威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容忍这种情况，不能再加深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必须坚决地清除这一切，使这一领域也得到净化。

关于新的个人迷信的出现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

前面已经指出，他在工作中践踏集体领导原则，在决定对内对外政策最重大问题时实行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法。他采用的有害做法是，许多原则问题不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而是在吃午饭时，仅有部分领导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决定的。难道在吃午饭时能够认真讨论问题吗？难道可以设想，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谈点什么吗？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吗？

请允许我用赫鲁晓夫同志的埃及之行为例，说明他为所欲为，不尊重领导集体的意见，在做出这些或那些决定时走得多么远。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不受监督的言行，把决议强加给中央主席团的惯用手法。

动身之前，他在主席团提出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 [300] 大家都表示反对。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中途，他突然发来密码电报：“应该授予英雄称号，让格奥尔加泽带着奖章来开罗。”大家都很惊讶：纳赛尔有何功勋，为什么授予他如此崇高的称号？要知道，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摧残共产党人，把他们投入惨无人道的集中营。

有人说他释放了共产党人。但这是他传出来的信息。他消灭了许多共产党人，那里的共产党遭到破坏，被禁止活动，被宣布非法，而且纳赛尔并不打算废除这项法律。另一个理由，说纳赛尔似乎在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我们是第一次遇到民族主义者抓社会主义这面神圣的旗帜吗？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纳赛尔本人不止一次声称，这是“为了伟大的、慈悲的真主”的社会主义，它的基础似乎是《古兰经》。

有人还说，纳赛尔开始“左倾”，几乎是在实行集体化。请你们看看他的全部言行和他对苏联的态度。当苏伊士运河出现致命危险时，他是我们的朋友。当狂风暴雨似的危险过去后，他唱的是另一个调子。他说，“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粉碎了敌人”。他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阿斯旺水坝。^[301]这确实是苏联人民赠给埃及的最伟大的礼物。开始纳赛尔先向美国请求援助，只是在遭到拒绝后才请我们援助。而且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叙利亚退出)，强劲的对手出现(伊拉克的卡塞姆)，严重的国内局势，美国拒绝兴建水坝，等等。

有根据认为，他现在是个心怀鬼胎的人。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埃及期间，阿列夫^[302]紧跟其后也访问了埃及。他发表了一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演说，而纳赛尔为了洗清自己，说“阿列夫是个民族主义者，目光短浅”。其实阿列夫讲的话，都是纳赛尔讲过的话。他们是连母亲都难以区分的两个孪生兄弟。有些纳赛尔不便讲的话，由阿列夫去讲。这就是谜底所在。

现在要授予埃及的这样一位活动家以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

对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电报还未来得及答复，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在同纳赛尔谈论授勋时，他请求给他的副手阿梅尔元帅，也授予同样的称号。”请想一想中央主席团的处境：已向纳赛尔宣布，这个消息自然也透露给报界。如果不授予阿梅尔这个称号，那将是件丢脸的事，使我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不得已只好同意采取这个步骤。

再看向埃及提供3亿金卢布新贷款这件事，赫鲁晓夫同志发来电报：“埃及请求提供5亿卢布贷款。我知道，很困难。请讨论，能提供多少。”他担心主席团会拒绝，立即又发来第二个电报：“我同纳赛尔已谈妥提供3亿卢布贷款。”随后，没有经过任何请示，他擅自宣布向埃及国

营农场赠送价值300万卢布的设备。

还有一件事，他在埃及发表了反对民族主义的讲演。^[303]这类讲演只有经过中央主席团同意后才能发表。因为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几乎能把阵脚搞乱，会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发生争吵，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害。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用这个题目发表了一篇含糊不清的讲演，使许多年轻国家戒备起来。

同志们!请大家仔细想想，所有这一切他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呢？这一切以及所做出的决定，他都是背着主席团一个人出主意，然后制造出使主席团没有回旋余地的局面，再把一个又一个的个人决定强加给主席团，如不同意，我国的威望会受到严重损害。难道这是他大肆宣扬的列宁主义准则吗？完全不是。这是他对列宁制订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准则的粗暴践踏。请你们来判断，他在破坏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走得多么远。

在他访问埃及期间，还有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在同纳赛尔谈判时涉及到对埃及共产党的血腥野蛮镇压。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却说服了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使他相信，埃及共产党是一个“不正确”的党，它的工作“不对头”，没有考虑纳赛尔的进步作用，“方向不对”，“走的道路不对”，总而言之这个党简直是由清一色的以色列代理人组成的。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个埃及共产党人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逐字逐句重复纳赛尔对他讲过的话，并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替埃及共产党制订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请你们想一想，纳赛尔成了共产党的审判官!带着这样的“指南针”我们将走向何方呢？如果这件事被传播出去，而他自己也会无意说出去，如果有人知道我们似乎企图从莫斯科把路线和策略强加给其他党，那么这就正中了中国分裂主义者的下怀，他们正在这方面指责我们。这样，怎么能保证埃及共产党，随后还有非洲和中东各国共产党不同中国分裂主义者组成一个阵营呢？非常明显，他的这些行动是不明智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

必须指出，近来米高扬同志也胆敢干赫鲁晓夫所干的那些事。例如，在访问印尼期间，他同苏加诺讨论了印尼共产党的内部情况。^[304]难道这能允许吗？他儿子，谢尔盖，也参加了所有的秘密谈判。你们可

以看到，恶劣的榜样是容易传染的：“家族外交”越来越蔓延。

下面谈谈赫鲁晓夫同志是如何履行他分内的职责的。直截了当地说，近来他实际上是放任不管。中央主席团的许多会议他没有亲自主持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一次也没有主持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也没有主持过，只有在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时每年到部长会议去一次。按照他本人的计划，他今年的工作不超过5个月。

这都是在一切领导大权集中于他一身，而他又闭目塞听的情况下发生的。赫鲁晓夫同志总喜欢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干部，但他自己却占据了所有重要职位：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最高统帅部。他还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和国防部。

这里还应当谈谈他的恶劣的干部政策。他对干部是很粗暴的。在此期间我们有多少干部被撤换，或者因为他不喜欢，或者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或者因为他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支持一些可疑的甚至危险的人物，支持一些骗子和滑头滑脑的人。举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贝利亚的亲密战友谢罗夫为例。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沾满了鲜血，他亲自主持过150次“三人小组”^[305]会议，杀害了几万名无辜的苏联人。有文件揭发他是迫害党的干部的“特别监狱”的组织者之一。^[306]谢罗夫的罪行是数不胜数的，但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307]令人不解的是，中央第一书记却不断地提拔这个人。

赫鲁晓夫同志不做干部的工作，也不了解他们，他几乎不接见任何人，其中包括部长们。共青团中央和全苏工会中央的书记们到不了他那里，苏共中央各部部长们见不到他，甚至党中央的书记们，被他接见过的也实属罕见，正如常说的，只是“一小会儿”。甚至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各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们和各州州委书记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试问这样怎么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呢？

在中央主席团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主席团委员们的作用被降低了。主席团委员们对此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所有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最小的不同意见，都遭到粗暴的拒绝。中央书记处的处境就更糟了。如果它决定了某一重要问题，马上就会遭到训斥。看来，他担心中央书记处，想限制它的权力，近来已开始谈论要改组它。

请看看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召开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仅仅举行过有数千人参加的中央全会。^[308]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听到批评或不同意见，也不会有人提出大胆的建议。

在苏共中央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化学委员会、重工业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也是无权的，不能决定任何问题。这样的委员会是不需要的。未必需要建立现在这样的中亚中央局和外高加索中央局。^[309]但这些问题需要单独研究。

我们苏维埃机关的作用降得太低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解决属于苏维埃机关职权范围的哪怕是最普通的问题时，都不通过这些机关。例如，授予基辅市、基洛夫州以及其他地区勋章的仪式至今尚未举行。^[310]由最高苏维埃主席授勋，这是制度。但赫鲁晓夫说，他要亲自授勋。因此必须等待。

他对待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是令人气愤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没有他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甚至不能就纯属它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通过决议。乌克兰人因为在基辅建设了一座体育馆被他臭骂一顿，格鲁吉亚人也因为同样的问题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在几次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他嘲笑过白俄罗斯人。他对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了解甚少。他对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还必须请你们注意他对我国武装力量 and 国家安全机关的错误态度。实际上，他瞧不起军队，不尊重我们光荣的军事长官。他妄自尊大，自称为军事理论家，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军人们并不支持。他毫无道理地让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退休了，其实，他也让莫斯卡连科、扎哈罗夫、崔可夫等人退休了。至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近来对他也经常谩骂和凌辱，说国防部长似乎游手好闲，什么也不懂，对问题不深入研究，需要解除他的职务，等等。的确，这些话不是当面讲的，而是背后说的。为了保持“平衡”，当国防部长在场时，却常对他讲些恭维话。坦率地说，这难道不是政治娼妓的手法吗？

至于一般军官，赫鲁晓夫把他们称为不折不扣游手好闲的人，他提议撤销他们的各种优惠待遇。此外，在解决同国防有关的重大问题时，他忽视军人的意见。例如，在签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311]之前，中央主席团没有讨论过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意见。结果，在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行动协调方面造成了严重失误。

总之，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谨慎和关怀的态度对待我们引为自豪和光荣的苏联军队。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他们，不能冒冒失失和主观主义地解决同建设和加强我国武装力量的防御能力有关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容易出大问题，搞不好会弄得焦头烂额。

实际上，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已不再重视国家安全机关。他很少关心这个机关的工作，不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送给他的大量调研资料。

国民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正是赫鲁晓夫同志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突出的失败只是可悲的事例之一。1958年前，苏联的学校教育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世界上被理所当然地称为较好的学校。但我们的领导人认定，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好，必须进行改革，尽管没有任何现实条件来保障改革的胜利。 [312] 请看5年的工作总结：普通教育水平降低了，学习兴趣下降了，高等学校招收不到质量较好的大学生。

为什么把学习年限由10年改为8年制，为什么重视夜校而轻视一般学校，在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和缺乏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等问题，改革的创始人或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回答。这种改革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的。但那个既不懂学校又不懂教育学的人，硬要动手进行改革。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人的如此重要的社会问题上，难道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进行试验吗？

苏联科学院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突出的。在最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我们的改革家猛烈地抨击了苏联科学院，甚至扬言要解散它。 [313] 什么原因呢？原来在选举新院士时，那个投靠李森科的努日金，由于137人中114人投票反对而没有当选。仅仅因为这件事，就对享有世界声誉的、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苏联科学院——科学的摇篮进行威胁！从罗蒙诺索夫创立科学院近250年来，它忘我地和忠实地为我国的利益服务。苏联科学大军的司令部和组织者为我们祖国建立的大小功勋不可胜数。有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并想严厉制裁科学院。不用说，苏共中央不会姑息这种恣意妄为的人。我们有责任要求他遵守制度，要求他明白是在向谁动手。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过去和今后都非常重视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视我们光荣的科学家，因为没有科学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请允许我向苏联科学院及其领导机关保证，苏共中央不会让科学院受委

屈。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一个充满独裁野心的人可以发展到何种地步。产生这种独裁欲望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同志深信，他比所有的人更高明、更聪明和更有远见。在任何地方他都想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重工业中他想当主要的冶金专家，在农业中他想当最高农艺师和畜牧专家，在建筑业中他想当总建筑师。他不明白，他仅仅是领导人之一，他的工作是党委派的，我们党不是他创建和为他而创建的，他仅仅是党的公仆。

请允许我谈谈同这个人谦虚的认识有关的几个问题，顺便也谈谈他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创始人列宁的特点是非常谦虚和俭朴。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因此我国人民已习惯用列宁这把尺子去衡量每一个领导人。很遗憾，赫鲁晓夫同志无论如何也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不知羞耻地说，他的名字是深受欢迎的，他的这种声望具有重大意义。报刊，首先，是《真理报》和《消息报》，成了他的家庭报刊，充满对他歌功颂德的东西。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胡说八道的话，都在报刊上发表。究竟出版了多少册赫鲁晓夫的书和小册子，甚至无法统计！更准确些说，这些书和小册子不是他撰写的，而只是他署名的。他本人根本不会写作。

为了追逐名望，他不择手段。不久前报纸上发表消息说，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审议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纲要，他似乎作了非常重要的批示。实际上，这一天没有举行主席团会议，而是开会讨论居民肉类供应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一篇空洞的讲话。后来报纸上把这次会议说成是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并公布了会议总结报告。 [314]

在不久前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如此杂乱无章的讲话，建议把五年远景计划扩展为七年或八年计划，甚至更长期的计划。 [315] 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便于掩盖五年计划的失败。报纸上却把这个建议描绘成伟大人物的新发现。

总而言之，应该说，他总要经常显示自己，经常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和自己的名字的愿望，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每天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他的消息。如果没有什么可供发表，那就发表他在某地旅行的消息。他在这方面总能找到出路，如发表

他同某人谈话的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中阐述的思想，充满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报纸却几乎把它说成是名言警句。

对他的国内旅行和出国访问，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广泛宣传，大肆张扬。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手拿面包和盐欢迎他，而他认为这是应当的。各州和共和国领导人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这样做，正如人们所说的，会给你点厉害看。

赫鲁晓夫经常断言，他是个列宁主义者，似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但实际上，他像个庸俗的市侩，竟然干出一个党员完全不应干的事，有时甚至干出连沙皇都不敢干的事。举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在克里米亚和皮聪达(高加索地区)他的别墅里，修建了耗资约500万卢布的游泳池。

请你们再看看，他家有多少辆轿车！儿子4辆，女婿2辆，妻子和女儿每人至少1辆。另外，专供他家使用的还有4辆。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共110人。瞧，这就是“列宁式的谦虚和俭朴”！

他在攫取奖章和礼品方面是何等卑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从所有的人(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那里索取这些东西。他搞到的奖章之多无处悬挂。当谈到他70寿辰的礼品 [316] 时，他甚至连虚假的谦虚都没有，声称要从各加盟共和国收取礼品，尽管那里没有任何人打算这样做。不久前他获得了舍甫琴柯奖金，不知道为什么奖励他，难道仅仅因为他引用过别人事先替他挑选的舍甫琴柯的作品。 [317]

他接受奖章时，也没忘记自己的亲属。他的儿子谢尔盖，一个无知的孩子，肩上还没有挑起过任何重担，竟然获得了列宁奖金和社会主义英雄称号 [318]，还被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女儿拉达也获得了勋章，尽管她经常不去上班。女婿阿朱别伊获得两枚列宁勋章以及列宁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319]

他的讲话通常持续几个小时，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长达13个小时。 [320] 他在这方面也是不谦虚的。不禁要问，在我们1000万党员的队伍中难道找不出第二个报告人吗？试问，为什么要发行那部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321] 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赫鲁晓夫同志竟敢放肆地议论列宁，攻击列宁，这个事实说明他骄傲和妄自尊大到何种程度。在一次大型招待会上，有近2000人参

加，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他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似乎不是工人阶级和武装士兵，而是些婆娘们进行的。这是什么话，难道不是企图贬低列宁的作用和抬高自己吗？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在这方面还应当批判性地评价赫鲁晓夫同志反对个人迷信的立场。难道能把斯大林仅仅描绘成精神病患者、狂热者、靠斧头和断头台进行统治的独裁者吗？这样，把容忍他当权这么多年的党和人民摆在什么地位上了呢？不错，斯大林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重大的罪行，为此我们严厉地谴责他。但不能言过其实，不能歪曲事实真相。事实说明，斯大林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为巩固和增加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些是人所共知的。确认这些事实真相无论如何也不能看作是恢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企图。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但不能贬低斯大林的功勋，更不能一笔勾销这些功勋。

这里理所当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做是否是为了抬高自己？很像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近来他经常把自己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引起人们的警觉：今天仅仅同他对比，明天则要求其他东西。这种羡慕之心是很危险的。

简单谈谈他周围的在政治上同他亲近的人物。他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不信任和持怀疑态度，但他另外接近一帮人，同他们结成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内阁”，他们不尊重任何机关，甚至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他们企图通过赫鲁晓夫同志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施加独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成了他的支柱，他们加工(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使之具有政治和理论的外貌。简言之，他们制定和决定赫鲁晓夫同志实行的政策。

这些人巧妙地取得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并使他相信，没有他们将出现不幸。他们不断为我国的所谓第一号人物唱赞歌，使他相信，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他似乎具有独特的实践甚至理论方面的天赋和其他的优秀品质。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无私的，而是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而且他们都恬不知耻地获得了各种奖章、学位和荣誉职位，这都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报答他们的热心效劳而慷慨赏赐的。

现在，当大家都已知道赫鲁晓夫同志错误言行的许多事例后，会提出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问题。有人会问：这是什么，是否是对赫鲁晓夫

的新的个人迷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更确切些说，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是重新复活的个人迷信。

在共产党员和人民中，早就对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行表示愤慨，并且公开说，他树立了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这个事实对所有的人都不是秘密。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明。当然，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考虑当前的形势，因此不得不对自己的真正意图进行伪装和掩盖，施展各种招数，进行蛊惑宣传。他反复强调说，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存在的秩序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列宁的工作作风。然而，你们大家看到，现在伪装已经剥去，蛊惑宣传帮不了他的忙。

同志们，认识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尚未最后完全形成是重要的。在个人迷信形成过程中，在它开始复发的阶段，我们就着手消除它。如果从另一种立场去评价这一可悲的事实，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会给我们党的威信带来严重的损害，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似乎我们党及其中央在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没有能够阻止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的树立，在个人迷信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恰恰是不对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请允许我谈谈这一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赫鲁晓夫错误行为的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个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背离这条路线呢？这首先是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你们记得，列宁早在他著名的《致代表大会的信》^[322]中就指出了这种过分集中的严重危险。他看到的危险正是：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对此表示怀疑。生活表明，列宁是何等正确。

党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323]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

我们党遵循马列主义理论，过去和现在都反对个人迷信。与此同

时，党主张需要有威望的领导人。我们一向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有权威的、深受党和人民尊敬与爱戴的领导人，正像列宁说的，他们能够做出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认为是正确的决议，并能够提出这种建议。

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及其主席团正是这样的有威望的领导人集体。如果列宁当年曾幻想拥有几十个天才的、经过职业训练和长期学校教育的、相互很好配合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那么今天我们党拥有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有威望的领导人。仅仅我们党中央就有近400人。况且在党中央周围正在成长着一批能够接替我们的、有能力的新的组织者。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

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望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个人都为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性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我们在关心提高这个人的威望时，显然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如何超过了应有的界线。

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發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324]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了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无疑，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险，还需要一个条件，即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列宁指出：“这些或那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预防中央分裂的角度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325]

我们党和人民也曾赋予列宁真正无限的权力。但列宁具有我们过去

和现在都称为列宁式的品质。所有深刻了解列宁的人都一致认为：同列宁一起工作，完成他的指示是何等幸福！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同志不具有这些品质，哪怕是与此相似的品质也没有。相反，他具有列宁曾经批评过斯大林的几乎所有的那些不良品质和素质，他甚至还发展了其中某些不良品质。

实际上，我们这位领导人的特点不仅是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而且他还热衷于发号施令，匆忙行事，判断问题时先入为主和偏颇不公，易于发怒，动辄侮辱性地指责他人，尤其是最近表现出来的过分自夸和自信。此外，他还具有列宁当年形象地称为真正粗暴的大俄罗斯警察的特点。

在初期，赫鲁晓夫同志虽不能控制自己，但总还能掩盖这些品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品质占了上风，成了他性格中主导的东西。在他思想上很快发展了这样的信念；现在中央内部似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人，周围似乎都是些侏儒，只有他自己才是鹤立鸡群的大人物。

[326]

当然，我们都记得，赫鲁晓夫同志从前并不是这样。当年，在党和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是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的确，从前和现在一样，他不擅长理论，更确切些说，他在理论方面不甚了了。党内集体的工作弥补了他的这个弱点，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严重的缺陷，能够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然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谈论赫鲁晓夫同志的个人品质时，还不能忽略他的年龄。或许，他的许多不良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已进入暮年，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服气，还硬说他似乎刚过中年。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句体贴人的话，我们理解那些不愿成为老人的人的心情。但事业应当高于一切。我们在评价问题和事件时，恰恰应当从事业的利益出发。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由小事已变成具有决定意义因素的局面。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同党的整个领导对立起来，他的行为束缚着中央的工作，因而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实际结论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呢？我们认为，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是扭转形势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你们大家记得，列宁在谈及斯大林时写道：这个人“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327\]](#)

你们看到，除撤职外，列宁没有找到其他办法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认为所有其他措施都不能达到目的，因为领导人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已拥有滥用权力的本领。我们现在也形成了类似的局面。

有人会问：这种措施是否太严厉了？我想，恰恰应当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为什么一定这样处理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 [\[328\]](#) 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代表们认为列宁的要求太过分。斯大林当时表示忏悔错误，并保证改正错误，因此代表大会保留了他的总书记职务。生活表明，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代表们，他们犯了错误，为此不得不付出极昂贵的代价。现在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形势。

我们在全面考虑问题的这个方面和权衡一切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之后得出结论：这次必须无条件地和严格地执行列宁的指示，必须听列宁的话。

我们认为，最明智的处理办法是赫鲁晓夫本人提出解除他所担任的各项职务。在我们党内，在劳动人民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人们将能正确理解这个步骤。同时，这将有助于提高苏共的威望，并将表明，我们党不是把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声誉问题，而是把事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最后，这也符合赫鲁晓夫同志多次说过的话，即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到老年他打算退休。

这样，现在把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提交大家审议，这些措施可归纳如下：

- 1.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职务。[\[329\]](#)

2.制订和通过有效的补充措施，来保障完全消除党和国家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恢复个人迷信的可能性。

党纲中规定的措施不能保障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前面已经指出，列宁认为，一个人手中集中无限的权力是能够产生个人迷信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应当限制个人的权力。出发点必须是，权力应当集中在党中央及其授权的中央主席团手中。

为达到此目的，必须：

第一，今后绝对禁止一人身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设置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职务；坚决提高党的中央全会的作用，举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而在必要时举行全苏会议，但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它取代中央全会。

第二，实行每年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一次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报告的制度；完全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严格划分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之间的职权，扩大他们的权利，提高每个人对具体委托给他们的工作的作用和责任心。与此同时，制止个别领导人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吹捧自己的任何企图；保证在主席团内部对一切原则问题能够进行自由的、公开的与认真的讨论和集体审议。

第三，取消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和有益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把党一分为二的做法。撤销两个州党委和两个边疆区党委，即农业党委和工业党委，恢复原来的领导机构，即在边疆区和州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也作相应的调整。

第四，大大提高农村党组织的作用，扩大其领导机关对农村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在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中，除这些措施外，还必须关心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首先必须关心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作用。

为此目的，必须扩大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和间接处理问题的范围；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定期听取部长会议主席团简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向政府，向部长们系统地提出质询，等等。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地方苏维埃应建立同最高

苏维埃类似的工作制度。

在最近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先应当听取中央主席团关于党和国家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措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报告，然后听取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其对劳动成果物质利益关心的措施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大家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去坚决和勇敢地扭转目前的局面，消除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的义务是毫不拖延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捍卫党的纲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我们党是一个强大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明确，我们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苏联人民沿着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顺利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可靠保障。

АПРФ, ф.2, оп.67, Пакет №223

№20286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1964年10月14日以后 [\[330\]](#))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手稿)

卷宗名称，出处：《B. M.莫洛托夫的科学理论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状况。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列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大小国家，人口超过人类的1/3。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进入了广泛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人民带来了真正发挥人类创造力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社会主义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内在力量是何等伟大，从资本主义奴役的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人民力量的增长是何等的迅速。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捍卫自己已赢得的权利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并时刻准备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中去。任何干涉他国事务

的企图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应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后，人民取得的成就也在与日俱增，这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压迫劳动人民的剥削者感到十分恐惧。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统治集团仍赖以维持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末日正在到来。

“美国垄断资本及其英、法同盟者公开帮助西德帝国主义，这个西德帝国主义恬不知耻地鼓吹复仇主义的侵略目的，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动战争。在欧洲中心，威胁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危险的侵略温床正在死灰复燃。在远东，美国垄断资本正在扶植另一个战争温床——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它的日本军国主义，它正在威胁着亚洲各国，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深刻的矛盾把帝国主义国家与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的国家区分开来。”(引自苏共纲领)

帝国主义国家一方，它们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不仅建立了军事集团，而且还组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政治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与政治危害性曾经被错误地淡化。但是，这些集团并不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而改良主义者们，企图通过充当帝国主义的仆从，帮助他们的事业，只起了有限的效果。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做法常常引起劳动者们的积极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

不管建立多少帝国主义集团，它们无法克服销蚀和削弱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在这些集团内部，争取更有利的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斗争以及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甚至在那些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和非军事集团内部，参加集团的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有时使用“帝国主义阵营”这个词，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从而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建立了一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基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分裂的、世界帝国主义矛盾系统的遗留物，从来也不能建立起像业已建立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建立在深刻的政治意义和

历史意义基础上的世界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基础不仅在于经济基础的一致性，而且还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与目标的深刻的一致性。这些利益和目标，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为纽带，以兄弟友谊与社会主义合作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团结，兄弟国家的人民正在这种革命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现在西方国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说明，帝国主义集团对自己地位的稳固性和稳定性缺乏信心。这种军备竞赛绝对不能巩固已经腐蚀的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能保障帝国主义国家的未来。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其他诸多侵略措施也是没有前途的。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年，美国拒绝与苏联进行贸易，以此表明它不愿与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企图给苏联制造严重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做有没有达到它力图削弱我们国家的目的呢？当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走这条公开的侵略道路，相反，却日益发展与苏联的贸易联系。只有不愿正视事实的人才会否认，美国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已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圈内，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一种倾向是要加速发动世界大战，另一种倾向则要推迟世界大战。但是不能不承认，那一事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即越来越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侵略集团对社会舆论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势，正在日益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正视真相，看到这个现实的危险，不允许存在消极的自我安慰情绪，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的警惕。但同样，也不能让来自帝国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仆从们的恐吓得逞，任何软弱的表现以及警惕性的不足只会鼓励侵略者。在过去，和平和进步的力量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强大的物质技术手段和保卫和平与人民的发展的自由以及彻底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其他巨大可能，世界上没有能够制止人类走向这条光辉道路的伟大运动的力量。

……最近几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疯狂展开的军备竞赛要求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经常的警惕，并不断采取自觉的、坚决的行动。如果

不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现在，各国人民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越来越紧密地与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军备竞赛引发新的战争的危险，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置于国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中心。

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呢？

H.C.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在当代防止战争可能性”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说：“全世界千百万的人在问：新的战争能否避免，难道人类除了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以外不得不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最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历史变化，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不能不承认，战争问题使千百万的人感到不安。也不能不承认，战后时期发生的世界历史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分析世界形势，说出自己的话。不妨提醒一下，工人阶级过去也只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听到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真理的。众所周知，修正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问题上也是不全部讲真话的。他们或者隐瞒这个真理，或者极力用战争来吓唬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所扮演的都是帝国主义奴仆的肮脏角色。

在上面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中，战争问题是提得含糊和不明确的。要知道，阻挠和防止一场不大的、所谓局部战争的发生是一回事，这在过去就曾发生过，防止爆发世界大战的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会卷入世界大战。把这些问题混淆起来，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次党代会上的和后来的讲话的一个特点。

在上面所引的话之后，赫鲁晓夫同志说：“众所周知，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在转到问题的理论方面，然后再转到实践方面之前，必须排除这些话所造成的一个虚假的印象，似乎列宁的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帝国主义存在时期战争不能避免的主题，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的时期，也就是说，只适用于十月革命前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的。不论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以后，列宁都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一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上面所引的说法的主要缺点，在于歪曲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观点本身。在这一说法中，列宁的观点是被简单化地、片面地，因而也是不正确地加以阐述的。

只要熟悉一下列宁的话，就不难确信这一点。

列宁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没有不发生世界大战的保证，但他也指出了摆脱战争的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引用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则论断，但是他不说列宁讲的摆脱战争的道路。

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就是在过去也从不承认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而是号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培育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推翻产生现代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旗帜，不局限于发表一般的口号，而是号召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和资本家在俄国的统治，我们祖国才挣脱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火，也向其他人民指出了摆脱战争和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可靠道路。难道这一光辉的事实，不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防止战争的道路的学说的明证。

列宁的学说，并不像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那样，归结为承认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时的不可避免性。这个有关战争的学说的第二个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列宁关于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即各国人民如何和通过何种途径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终止战争，并且终止产生战争的原因本身。不讲这第二部分，不谈摆脱战争的道路问题，就不能正确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列宁的学说，为如何真正防止战争的问题，提供了在科学上明确的和在实际上有根据的回答。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时，走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粗暴地歪曲了列宁关于战争的学说，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

.....但是，人们说，不能那样看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只

要资本主义还在一个国家中，甚至在像上衣的纽扣那样小的国家中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摆脱战争。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1960年)就是这样俏皮地说。可能，这句俏皮话在有的人看来是有趣的，但是试图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是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的，且不去说，这也不能掩盖思想上的空虚。

犯近视症，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的进程中发生的世界历史进展，和其后，对在欧洲和亚洲以及后来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中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前所未有的高涨估计不足，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忘记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已存在于一个和几个已不能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小国中那样的时代，同样是错误的。

我们的最大胜利是苏联走出了战前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正不断得到巩固。但是能否忽视那个事实，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这个体系与某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上衣的纽扣”相比是不合适的，即使是为了开玩笑！在继续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能否认为，战争危险的问题是一个“简单、明确和比较容易的问题”，列宁在他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次最后的讲话中，在1922年12月写的《关于我们代表团在海牙的任务的笔记》中，曾专门对这种不严肃的议论提出过警告。

必须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关于摆脱战争的道路的理论学说是否适用于现在的条件——这些原则性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而资本主义还作为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是否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且更公开地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发言中肯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论断已经过时了，它在“现时代”已不适用了。

而且，赫鲁晓夫同志在谈到列宁对战争问题的观点时，重又认为列宁曾讲过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使人民摆脱战争的问题，对此不能默而不谈。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论不仅与事实，首先是与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的事实明显矛盾的，而且也是与对马克思主义者无可争辩的一个理论观点明显矛盾的。这个观点认为，列宁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论断，在国际帝国主义的

还存在的时候，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像现在这样只生活在两个世界体系之一的人民，都具有并非暂时的意义。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言论是一种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性论断之一的号召。如果说这不是修正主义，那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是明显的。而且在他言论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赫鲁晓夫同志通常避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作公开的攻击，多半是用赞扬列宁的词句来掩盖他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对革命的倾向。他在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的近视和自信的声明，看来是他这类言论中最轻率，也是最使党和广大的社会人士迷失方向的言论。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662，л.6-20

№20006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 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5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
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谈话记录

1964年10月15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请求与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会面。我们得到通知，将与苏联大使会面的是伍修权，后者接见我的时间，安排在10月15—16日的午夜24时。

我向伍修权通报说，10月16日苏联报纸将公布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H.C.赫鲁晓夫同志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的决议。苏共中央会议一致强调，苏共将继续坚持以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以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为基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不懈奋斗。苏联政府将继续根据列宁主义诸原则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

而斗争。

在听取我的通报之后，伍修权说，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关于苏共将继续坚持以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是苏共的内政。关于苏共继续遵守历次莫斯科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我们对此给予肯定，因为这些宣言和声明都是真正的历史性文件，理应成为所有共产党行动的指南。

随后伍修权又说：至于我们党(即中共)，她将坚定地遵循这些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如果苏共能够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坚持这些文件中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原则，我们将给予相应的评价。

伍修权预先声明，此次苏方所通报的内容——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国际问题，只有中共中央才能对此给出正式答复，他能说的仅限于上述内容，因为此类问题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伍修权的各方面举动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早在此次会谈之前中国人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我们通报的实质性内容。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苏联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A.A.勃列日涅夫和三等秘书Ю.M.加列诺维奇等。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手写批注：

苏共中央联络部已了解了文件中的相关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O.罗满宁

1964年12月24日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60-361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56-57

№25399 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6日)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致以敬意，并且荣幸地通知：今年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满足了赫鲁晓夫要求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并且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使馆利用这次机会，再次向中国外交部致以最高的敬意。

北京，1964年10月16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

АВПРФ, ф.0100, оп.51, д.3, п.215, л.41

№25763 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1964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4年10月21日

第831/ДВ号

关于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 [331]

一、关于中国

近来中国的宣传攻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内外政策的声调压低了一些。看来中国正在研究局势，以便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局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个时候要适时地采取一些措施，表示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意，支持建设性的观点，如果中方有这样的观点的话。当然，我们应当研究中国对我们举措的反应，考虑他们在消除现有苏中分歧时与我们配合的准备程度。

其中首先采取的措施可以提到以下几项：

1.逐步对一些牵涉到两国利益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例如向中方详细地通报即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2.在答复今年10月17日周恩来的信件时，根据我们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可以原则上不反对召开禁止核武器大会的思想，同时指出这一思想苏联早已提出过。

3.暂且急于继续进行边境谈判，要记得，中国在最近声明中提到过中国代表团要来莫斯科的时间是通过外交途径来协商的。

4.允许中方提出关于中国公民进入苏联某些岛屿从事生产活动(捕鱼、采集柴火等)的请求，这无疑会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河(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形势正常化。

5.不急于执行1964年7月17日“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科学、社会团体和旅途联系”的决议中还没有执行的条款。今后根据中国的态度对决议再作修改。

6.逐步恢复在我们中央报刊上登载中国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文章。考虑暂停对中国的广播节目的禁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取决于中国今后播出节目的性质。

7.研究关于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问题。

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1954年12月30日签订的航空协定的照会给予肯定的答复(关于允许中国人在苏联过境飞行)。

二、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适时地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报苏联政府在第二十次联合国大会对主要问题的立场，并通报我们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2.在苏联报刊实际上已经停止刊登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第二十次大会上讨论涉及面尽量更广一些。关于人民共和国生活的报道停止了刊登，也停止了刊登揭露美国在南朝鲜的政策的文章。建议刊登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3.研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加强他

们的国防。

4.定居在苏联的朝鲜公民不愿返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会
给苏朝关系造成隔阂，也许应该不让那些不愿返回自己国家的朝鲜公民
定居在苏联。

.....

三、关于蒙古

1.关于建立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

今年来我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很快，包括其国内生活和
外交活动方面。特别是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范围扩大了。今年
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缓慢，特别在畜牧业方面，苏联援助的资源
使用不当。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一些组织，有时候是一些部门，主观地、不
用科学态度对待与蒙古关系中一些原则问题，在采取措施的时候，不考
虑这个国家根本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之蒙古在经济方面缺乏足够的经
验，在向我们请教时许多方面估计错误。

这些问题可以像苏联一样通过一个机构集中解决。较合适的是建立
苏联式的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这样可以通过一个机构来集中解决
蒙古的问题，这一机构可以考虑当今的问题，也可以确定国家发展的远
景规划，彻底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

2.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

泽登巴尔同志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邀请
我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邀请原则上同意，就是访问的
时间尚未确定，一直拖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40多年与苏联并肩
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至今没有一位苏联元首和苏共第一书记去那
里访问。当前正在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和使蒙古人民共和国
摆脱苏联影响而进行的剧烈斗争，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或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

3.关于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的问题。

苏蒙边境个别地段早已确定，但不符合苏联国家边境保卫的新情况(特别是沿河的边界地段)，现在必须弄清蒙方的意向，他们是否愿意在目前就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交换意见。

四、日本问题

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主要表现在贸易方面(今年与日本的贸易额为3亿美元，占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第三位)。除此以外，我国与日本开展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今年计划加快政治关系方面的步伐(国会代表团互访，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互访)。

为了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和巩固我国在日本的影响，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 1.进一步开展正式的会晤、接触，为以后的政府代表团互访作准备。

根据今年9月18日双方发表的关于日本国会代表团访苏的精神，继续做好发展两国国会互相交流的工作。

- 2.苏联和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已恢复，1965年苏联代表团已与日本商谈互派领事事宜。出发点是：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根据1956年12月的共同宣言已经得到了恢复，同日本方面进行互换领事馆的谈判。

- 3.建议寻找苏日直接空航的途径。

- 4.与日方商讨捕鱼业科技合作的问题，签订相关的协议。

- 5.建议苏联对外贸易部和其他团体提出3—5年内与日本贸易的意向，必须特别考虑广泛吸收苏联东部地区广泛参加贸易的问题。

.....

АВРРФ, ф.0100, оп.57, л.510, л.209-216

№25764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332] (1964年10月27日)

.....

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之前，大约从9月28日起，中国中央报纸上反苏的文章减少了一点。同时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城市)公共场所的书架上已经撤去了反苏的外文书籍。可是在庆祝15周年期间，无论中央出版部门，还是地方省的报刊上反苏的言论重新激烈起来了。

.....

АВРФ, ф.0100, оп.57, п.510, л.217

№20771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1964年10月28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4年10月28日

10月28日早晨，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大使馆说，周恩来想在15点30分会见苏联大使。然而，在大约15点钟的时候，大使馆又被打电话通知说，由于周恩来忙于一些事情，这次会见要推迟一段时间。在推迟了很长时间之后，大约在17点钟，苏联大使被要求赶快到周恩来的官邸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谈。

互致问候以后进行了具有记录性质的短暂会谈。之后周恩来开始阐述实质性事务。他说，今天已经是10月28日了，在最近2周发生了许多变化。在10月15日夜晚苏联大使接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通报。中国发了贺电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封电报也表达了中国的问候和期望。正如他，周恩来，在接到的通报中所反映的，苏联大使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明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这一点。(确实，在缅甸大使

举办的招待会上，徐明在同我的谈话中想知道，大使馆将会怎样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莫斯科将采取什么措施庆祝这个节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是进行了笼统的答复。徐明几次提议为苏中人民的友谊干杯。他立刻就引用了中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的贺电中的内容。对于中国同志送来的贺电和问候我表示了感谢。并且说，苏联共产党历来而且现在仍然坚持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中苏人民的团结。)

周恩来继续说：同时，我们还不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苏联政府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就党和国家的路线进行接触。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可以向苏联派遣我国的党和政府代表团以便表达我们的问候，同时，我们也可以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

周恩来建议说，如果你们对这个建议的实施感觉有困难，那么中国方面可以提出第二个建议：我们欢迎苏联相关代表到中国来同最高领导人进行接触，这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途径，这都取决于苏联同志感觉哪种形式合适。

如果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感觉这两个建议都不合适，那么中共中央准备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

我对周恩来的接见以及他所提的建议表示感谢，我说，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强调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遵循统一的立场，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找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途径。

之后周恩来说，中方在贺电中也表达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愿望。然后周恩来谈到了调解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进行接触。事情应该一步一步来。”

我也说道，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方面打算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的级别事先有什么打算？当然，这或许是预先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样，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应当会具有一定的级别，因为中国方面的打算是同苏联领导

人进行接触。他也说，他知道到十月革命纪念日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建议苏联大使在这次会谈之后尽快把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好像很匆忙一样。

我答应周恩来立即把他的谈话内容报告给莫斯科。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建议，我们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这一点必须通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即最高领导人对于他们原先所持的总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并未改变。我们得到了关于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和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彭真进行的发言的消息。当地的苏联公民以及同我们友好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的代表向我们通报的信息也证明，中国领导人强调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改变，其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代表团积极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其目的是让他们对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产生怀疑和失去信心。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通报。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形势下，打算在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上改变他们的态度。

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开始，中国人停止了在官方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中的反苏言论，减少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同时，近来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商店、饭店、机场和车站重又出现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报》以及其他报刊出版的著名的9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期间产生的。

考虑到新的局势，最高领导人无疑在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产生了一些战略性设想并采取了一些步骤。最近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策方面。或许，这个消息是由中国人散播的。这个说法好像是彭真在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周恩来在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谈话以及其他的场所也表达了这种说法。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积极主动的依据是，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同苏联共处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等。

这样，不排除中国领导人会按照这个计划采取措施。但是，他们的实际意图怎样还有待实践和事实来证明。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新的局势主动采取措施，来表现我们想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当然，应当强调在这些关系的原则基础上。

我方采取的这些措施，包括其他的一些措施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希望改善同苏联关系上的发言和意图的真诚性以及他们希望在什么条件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研究周恩来提出的具体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有关会谈的建议中，其中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们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只能在如下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如果我们邀请其他兄弟国家的代表团，这样中国代表团也不会突出起来。

自然，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的访问会削弱苏中关系的紧张程度，可以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并且可以尝试搞清楚双方在新的局势下关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或许，也应该再次建议他们参加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的工作。这对于我们对其他兄弟党可以产生好的影响，特别是可以影响那些已经产生动摇的兄弟党，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良好意愿以及一贯为维护统一而斗争的行动。

然而，应当强调，我们认为仅仅邀请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以被中国人利用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访问就会有一些困难，也会对苏联采取不同的措施造成困难，其中包括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真实观点的情况下对会谈纪要的准备。

如果整个局势不允许在11月7日前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如果这一建议是不合适的，那么就建议中国方面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之后派遣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建议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是完全合适的，特别是考虑到苏联现在正同兄弟党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和磋商。可以建议这个代表团在11月中旬访问，但是它不应该被拖延到预定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开始的时候。

如果中国人拒绝按照我们指定的条件到苏联访问，那么作为一个预备方案我们可以考虑关于到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然而，关于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应当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关于进行双方会谈建议的回应，而且，这次访问应当在11月份以前进行。这个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中国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认为，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我们对北京进行秘密访问的建议(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会谈，其中包括在莫斯科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样的访问会被兄弟党错误理解为我们在背着他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如果决定让兄弟党知道这样的访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他们开展大量复杂的、推心置腹的解释工作。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些想法，当然，这只是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观察为基础。我们也有可能没有考虑到最近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的所有状况，也可能没有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同兄弟党在磋商过程中产生的因素。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53-359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68-74

№25640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 [333] (1964年10月29日)

1964年10月29日契尔沃年科再次应周恩来的请求与其会面。

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他作为代表团领导。

周恩来：“我们想……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建议，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共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在这些国家的兄弟党之间建立联系。”

(没有提到南斯拉夫)

周恩来说，这天他已经与提及的上述国家的大使们交谈过了。

“他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转达，说万一要是苏联同志向他们发出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他们能接受邀请并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周恩来还表示，同时告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主动提出派自己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话，那就更好了。”

周恩来同时还对苏联大使说，他“恐怕不得不要暂时在节日期间留在北京了，现在不能离开北京，因为在北京的大会上要作发言的”。

周恩来最后的倡议(有关兄弟国家)，未经苏联共产党同意，“更令人深信，中国人做出的姿态是不真诚的，他们企图束缚苏联共产党，使它失去主动的精神，并使召集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受挫”。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08, д.7, л.75-79

№207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1964年10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29日会议

第168号记录第1项

关于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

第1170—1175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就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2, л.1

№200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组织——起草委员会参加者通报有关中共中央的建议。

决议的起草和递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0日

绝密

兹决定将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起草的下述文件内容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领导人——起草委员会的参加者作出通报。

不按顺序

苏联驻各国使节 [\[334\]](#)

迅速以口头方式向与我们友好的领导人转达苏共中央如下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经可靠渠道向你们通报如下情况：

苏联驻中国大使10月28日应邀与周恩来会面。借中国领导人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同志当选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之机，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两党和两国人民紧密团结的方针路线。他声称，中共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保持正常联系。

有鉴于此，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建议派遣党和国家代表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如果落实此建议有困难，那么中方欢迎苏联派相应代表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接触。

随后，他又说，如果中方关于派遣党和国家代表前往莫斯科的建议被接受，那么，该代表团的领导人为周恩来。中方将以建议的方式邀请除南斯拉夫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代表来莫斯科参加庆典。中国领导层将把自己的这一倡议通报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除南斯拉夫外)，并表明自己的诚挚愿望，以便这些政党在来莫斯科的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主动性。

苏共中央讨论了中国领导人的上述建议，并认为，苏联理应尽力利用这一建议来恢复双方的联系。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协商之后，我们将向这些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发出邀请，以便其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在向你们党的领导人通报上述情况的同时，我们还想真诚地表明一点，即我们党永远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在马列主义、莫斯科历次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关于我们在这方面要采取的后续步骤，均会及时向你们作出通报。

苏共中央”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3, л.5, 62-63

№20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2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0日

绝密

请各苏联使节确认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内容(附录第一、二、三、四、五号) [335]

附录二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请拜访周恩来同志，并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其通报，莫斯科将乐意接受中国党和国家代表团来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请转告周，莫斯科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来访将有益于双方的接触和交流。我们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

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安排如下：

11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召开盛会，11月7日——阅兵式，劳动者红场游行，晚间——招待会。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愿意，他们便有机会在11月6日召开盛会期间发表祝辞。

请向周恩来同志询问关于中国代表团来访的日期及其人员组成情况。我们建议对外公开报道中国代表团来参加11月4日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情况。

如果周恩来同志询问，是否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来莫斯科，请转告他，我们已邀请了如下国家的党和政府代表团来访：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政府代表团以及通过苏联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渠道邀请的经阿尔巴尼亚来访的一些代表团。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3, л.5, 65-66

№2000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1964年10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1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9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因中方询问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期间的活动情况而给苏联驻中国使节的指示”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Б.波德戈尔内，Ю.Б.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请确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参见附录)

附录

机密

北京

苏联(驻中国)大使(收)

其一，中国代表将参加的所有与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有关的活动均应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会谈和招待会的组织工作都应给中国同志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们已为与他们接触和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当然，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将参加招待会，那么，你们应对其和其他主要中国客人给予特别关照。如果中方在谈话中涉及苏中关系等重要问题，你们在答复时应当以自己已知的、我们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路线为指导，并强调，我们党，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准备为发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们期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将给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带来积极成果。你们可以根据招待会的气氛，以祝酒的方式，向中方表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一贯立场：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胜利。

我们同意你们附录中关于邀请参加招待会的人员组成名单。

其二，你们通报中说，将应邀在北京的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我们的答复是：你们应当表示同意，并做好发言的准备。发言内容应以Л.И.勃列日涅夫和А.Н.柯西金同志10月19日接见宇航员们时的谈话精神为指导。其中应指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友谊的坚定决心；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兄弟般友谊和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表明我们党将为巩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一切努力。

你们的发言应属于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21171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1964年11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年11月2日

第2584-с号

机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安全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活动及其对今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反响的补充资料。

在全会资料公布之后，最初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只是对这些事件表露出喜悦之色并相互展开议论，而与苏联公民一起交谈时则往往对这方面话题避而不谈。

近期，中国学生开始就这一话题与苏联人积极交流，在个别情况下还会与其展开辩论并认为，(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是中共领导人正确政策的胜利。

今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班便与苏联大学生之间出现了一场这样的辩论。

在辩论期间，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五年级的(中国)大学生唐宾明(Тан Бин-Мин)便声称，在中国发展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在苏联盛行的是修正主义和与帝国主义的妥协。赫鲁晓夫正是因为修正主义才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时间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唐宾明还断言，苏联采取的揭露和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举措体现了赫鲁晓夫政策的盲动主义，而在具体行动上采用的是法西斯方式。他接着还说：“如今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一切都清楚了，还有什

么可争论的呢？我们是对的。”

唐宾明和其他中国人在反对苏联大学生观点的过程中以粗暴的方式叫喊说，后者也都是修正主义者。

唐宾明的观点得到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研究生韩金庆(Хань Цзинь-Чин)和齐忠涛(ЦиЧжун Тао)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后者的举止极其放肆无礼，他与唐宾明一样，在歪曲事实的同时还对苏联实施了粗暴的攻击。其中，当涉及著名的纳乌什金事件时齐忠涛声称：“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安静地坐在车厢里，这时一群苏联士兵闯了进来，将他们(中国学生)带下火车并围了起来。这是军阀作风、法西斯主义，你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上述中国人批评苏联的行为，并对我们的报刊进行污蔑性攻击。他们声称，似乎这些报刊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歪曲的，《真理报》早已不再讲“真理”了，等等。

中国大学生在写给祖国的信件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Н.С.赫鲁晓夫被免职是中共领导人政策的胜利。

例如，一位在莫斯科一所大学中求学的姓张的(中国)大学生在一封给自己在中国的同志的信中便写道：“.....许多人都向我们表示祝贺，都说中国胜利了，现在毛泽东成为了世界的领袖。

.....在了解赫鲁晓夫的命运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正确啊.....”

还有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向国内发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其中写道：“.....我立即便知道了两件令人高兴的新闻：中国爆破了原子弹和赫鲁晓夫在苏联被解职(这里使用了污辱性的表达方式)。这表明，西风最终还是落败，东风变得更加强劲。真正的马列主义终将战胜自己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阻碍.....”

一位在列宁格勒上学的方姓中国人在今年10月18日写给祖国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和前天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的事件。第一件是修正主义头子下台。这说明修正主义者们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自己国内都已是举步维艰，他们已不能团结一心了。当然，新的(苏联)领导人依然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所奉行的仍是修正主义路线。(当前苏联国内)所出

现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我们国内的形势更好。我们的外国朋友变得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队伍变得日益强大。真理在我们一边，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而修正主义者终将彻底垮台……”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正在加紧搜集关于苏联人对H.C.赫鲁晓夫同志被免职事件的态度，以试图搞清楚这一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否跟自己所说的一样。

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学院预科生(中国人)吴耀武(Уяо-У)，便曾多次向认识自己的苏联公民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沈友才(Шэнь Юн-Цай)便就此问题向一位苏联大学生询问，在未得到满意答复之后，便声称：“目前，关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党组织内部向(苏共)党员们传达。”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谢米恰斯内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1卷，第34—36页

№10141 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1964年11月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Г.苏达利科夫同志：

一、今年11月3日17时10分(北京时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中央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长雍文谦，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代表团成员中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文镜，代表团随行人员共14人。

在机场上欢迎代表团的有：邓小平、王震、陆定一、伍修权、罗贵波及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等。参加迎接的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国少先队员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人员向代表团成员献了花。

该代表团飞往莫斯科的时间将另行通知。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说，代表团11月4日将不会出发飞往莫斯科。

二、与越南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老挝联合政府部长冯维希，他打算11月5日与越南代表团一起飞往莫斯科。

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受范文同委托询问，在莫斯科机场上双方是否发表讲话，特别是范文同是否发表演讲，请向北京发来通知。

范文同同志还让转告，他预计在莫斯科逗留7天。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送：葛罗米柯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鲁萨科夫同志)、奇斯佳科夫同志、档案室

阿尔哈罗夫发

克拉耶夫斯卡娅收

1964年11月3日14时40分

АВПРФ, ф.79, оп.19, п.19, д.11, л.53

№25406 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年11月3日)

苏联驻华贸易办事处

北京

1964年11月3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中贸易关系 [336]

.....

以下是有关苏中易货贸易的数据：

(单位：百万卢布)

年份	1950 年	1952 年	1956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互换协议	519	871	1 348	1 849	1 498	827	675	540	422
向中国出口额	350	499	660	859	735	331	210	168	144
从中国进口额	169	372	688	990	763	496	465	372	276

.....

.....1950—1955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5亿卢布的贷款。根据1950年的协议，第一笔贷款为2.7亿，以设备和原料的形式支付。.....中国在1956年开始以供货方式偿还贷款。

下一年的剩余债务是1.379亿卢布，到1965年，剩余债务将会是1690万卢布.....

.....

对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协议总额	百万卢布	350	859	735	331	168.5	144
机器设备	百万卢布	37	537	454	97.4	38.0	71.5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0.6	62.5	61.8	29.4	22.5	49.6
完全交付的企业设备	百万卢布	1	359	336	71	13.1	23.5
燃料、矿物原料、金属	百万卢布	106.9	166.3	171.7	91	84.3	43.4
所占比重	百分比	30.5	19.4	23.4	27.5	50.0	30.0
石油	千吨	161	2 409	2 392	2 928	1 408	448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	百万卢布	6	9	10	5.2	4.2	6.3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7	1	1.5	1.6	2.5	4.5
农业原材料	百万卢布	0.5	2	1.2	3.5	8.2	11.1
所占比重	百分比	—	—	—	1.0	4.8	7.7
原木	千立方米	—	—	10	133	454	555
食品原料及食品	百万卢布	4.6	1.7	1.5	57.7	0.6	—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3	0.2	0.2	17.4	—	—
谷物和面粉	千吨	—	—	—	201	—	—
糖	千吨	21	4	—	501	—	—
其他的工业产品	百万卢布	4.5	5	3.6	0.5	12.2	3.9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1	0.5	0.5	0.2	7.2	2.7

对华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协议总额	百万卢布	169	990	763	496	372	276
燃料、原材料、金属	百万卢布	33	134	118	166	49.5	28.6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9.2	13.5	15.4	23.0	13.8	10.4
钨精矿	千吨	8	25.6	19	18.3	12	6
钼	千吨	0.6	4.8	4.6	2.2	1.4	1
锡	千吨	3.8	20.8	17.7	11.2	4.3	1
汞	千吨	—	1.4	1.4	1.3	0.4	0.1
化工产品肥料、橡胶	百万卢布	3	30	35	9	10	13.1

续表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9	3	4.5	1.8	2.7	4.7
硼砂	千吨	—	10.1	18.6	14.4	6.9	14
建筑材料	百万卢布	1	11	11	12.1	8.7	1.3
所占比重	百分比	0.6	1.2	1.4	2.4	2.3	0.5
混凝土	千吨	79	561	552	594	373	—
农业原材料、畜产品	百万卢布	41	147	92	31.6	13.7	15.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29.5	14.9	12	6.4	3.7	5.7
木材	千吨	8.6	13	11.2	5.8	4.5	4
生丝	千吨	0.7	1.7	1.3	0.5	0.05	0.05
小件生皮毛	千片	0.8	3.1	1.1	0.5	0.5	5
烟草	千吨	—	36.3	15.1	4.9	—	—
桐油	千吨	5	21.7	10.5	3.7	1.75	1.75
食品生产原材料	百万卢布	60	100	59	4.5	2.8	2.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35.6	10.1	7.7	0.9	0.8	1.0
茶	千吨	4.3	17.3	10.2	3	3	3
食品	百万卢布	19	170	96	12.6	19.0	38.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1.6	17.1	12.3	2.5	5.1	14.1
米	千吨	9	658	416	23	—	—
苹果	千吨	0.3	73.2	63	24.3	44.6	60
柑橘类水果	千吨	—	48	27	10.8	17.3	20.5
出口工业产品	百万卢布	2	387	352	310.9	262.1	170.9
所占比重	%	0.9	39.1	46.1	62.7	70.4	62.0
缝纫用品	百万卢布	—	76	79	86	79	52
服装	百万卢布	—	47	54	48.1	40	36.35
毛纺	百万米	—	12.6	14.6	14.5	10.8	5.76
皮革鞋	百万双	—	9	9.5	2.9	1.1	0.75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д.29, л.512, л.26-32

№09907 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1964年11月4日)

通过高频线路寄发的电报

发自北京

1964年11月4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苏达利科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刚刚通知我们，康生、伍修权等人乘坐的飞机于明天，即11月5日北京时间8时30分起飞。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将于北京时间9时由北京起飞。与周恩来乘坐同一飞机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老挝情报部长冯维希。

苏联驻华使参赞

克里夫佐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78页

№25407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年1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4份

1964年11月5日

第889/ДВ号

苏中贸易关系 [337]

(清单)

.....1949年以来苏联与中国的贸易

协 议	1957 年	1959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易货(百万卢布)	519	1 849	647.7	540.2	420.8
百分比 1959=100	28.16	100	36.5	29.2	22.8
对华出口商品(百万卢布)	350	859	210	168.5	144.3
百分比 1959=100	40.7	100	24.4	19.6	16.8
对华进口商品(百万卢布)	169	990	464.7	371.7	276.5
百分比 1959=100	17.1	100	46.9	37.5	27.9

.....

.....1959年后，中国的易货数额全面缩减.....

估 算 单	1957 年	1959 年	1962 年	1963 年	所占比重
易货(百万卢布)	2 609	3 748	2 322	2 304	100
百分比 1959=100	69.6	100	62.0	61.5	
社会主义国家(百万卢布)	1 660	2 571	1 177	971	42.1
百分比 1959=100	64.9	100	45.8	37.8	
资本主义国家(百万卢布)	940	1 177	1 145	1 333	57.9
百分比 1959=100	79.9	100	97.3	113.3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6677 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8日)

机密

越南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与波兰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会谈资料

1964年11月7日、8日，范文同 [338] 与哥穆尔卡主动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与波兰同志讨论越南南方问题。

首先，范文同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积极活动向波兰方面表示感谢。他高度评价波兰人直接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为越南人民解放越南南方和全国统一而斗争事业中所做的贡献。范文同满意地指出，他与波兰代表团团长之间有着密切接触的事实。

接着，总理描述了越南南方的局势。按其发言来说，南方正越来越多地朝着爱国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南方政权虽有武装力量，常规部队及其他部队编制(40—50万人)，但已不能采取多大的有效措施来反对爱国者的斗争。傀儡军队正在瓦解，士兵士气极端低落，大批开小差，阮庆部队的大量军事文职人员改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与此同时，范文同继续说，众所周知，美国人深陷越南南方，实际上已进入死胡同。甚至西方报刊，其中也包括美国报刊对此不得不承认。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情况，由于其在该地区的侵略得不到它的许多盟国首先是法国的支持而深陷困境。

在此期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越来越巩固，阵线获得了越南南方居民最广泛阶层的支持。现在，它控制着越南南方三分之二的土地，居住该处的居民占南方一半左右。阵线的纲领满足了居民各个群体的利益。现阶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加强对南方的影响，同时，很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范文同说，我们指望合理地加强南方的斗争。我们相信这将促使越南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调整。我们真诚地期望这种调整，

不拒绝任何方面，哪怕是细小地推进越南南方问题的政治解决步伐。我们觉得，严格地履行1954年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是达到调整的最佳途径。必须回到这些协议上来。我们反对越南南方问题拿到联合国来讨论。

在进一步会谈过程中，范文同不止一次地回到越南南方问题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同时他强调，越南人真的关注这个问题。“要知道南方人民已经受20年的战争，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他以间接的方式赞同比较可能的是召开新的日内瓦越南会议。

总理还谈到印度支那及老挝日内瓦会议的协同主席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对苏联撤掉越南和老挝的协同主席职位的意图持反对意见。

对此，哥穆尔卡指出，波兰人，他们知道苏联方面的这个意图，但不赞同它。根据他们的意见，保持协同主席席位似乎有利于利用它来谋求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

这个意见明显使范文同高兴。

结束越南问题时，总理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行动的必要性，首先是苏联、中国、波兰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南南方的政治调整成功。他希望，波兰人将能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询问哥穆尔卡对所谈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他有意见的话。

感谢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活动的高度评价，哥穆尔卡使范文同相信，波兰人今后将利用他们的一切力量帮助越南人民为解放越南南方和国家统一而斗争。但我们对此，哥穆尔卡说，除了继续我们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外没有其他手段。

您所述的越南南方政权武装力量人数(40万—50万)，他继续说，我看这个证实了这个政权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部分越南南方居民的支持。军队似乎尚未瓦解，他们仍在反对爱国者，没有调转枪头反对越南制度。可见到的是，阮庆及其拥护者似乎在国内尚有基地。美国人，若在南方的兵力没有2万以上，不可能做到反对爱国者运动。

与此有关的，哥穆尔卡说，产生了一个问题：越南南方阵线合理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您似乎预料事件会发展成这样：在某一阶段将

准备选举成立越南南方临时政府，然后，再组成永久的联合政府。阵线在选举中能指望获胜？

阵线的地位是强大的，范文同回答说，他们十分巩固。由于阵线得到了南方居民的广泛支持，可以有信心地说，他们进行选举的话，会在选举中获胜。阵线准备与任何阶层和集团的代表合作，只要他们有意爱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若成立联合政府，各种政要人物及各个社会集团都会加入。这个政府愈广泛愈好。阵线的这个政策我们支持它。当我们说越南南方应是中立时，我们是真诚的。如果美国人同意南方中立并撤离，我们准备做出任何保证尊重这个中立。这不是战术行动，要让越南南方保持10—20年的或更长时间中立，我们对此同意。至于说到国家恢复统一，这已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将由越南人民来解决，什么时候进行？看来，要很长时间。

但是美国人，哥穆尔卡说，未必在越南南方会轻易让步。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来看。这里主要是，越南南方问题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互相紧密交错。假定，美国人离开南方的话，那时他在其他地区的盟国会说，美国不可信。美国人会这样处理？恐怕未必。

我们对此能够理解，范文同着重说。但是，我们好像觉得美国仍会被迫走上政治问题的调整。也许这将经过3—4年，或更长时间来发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意与美国人谈判，但条件是越南南方阵线作为主要的爱国者参与美国的谈判。

哥穆尔卡说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要特别关注阵线在阮庆部队内部旨在进一步瓦解所进行的工作。

根据范文同的说法，这个工作正在进行：越南南方政权的军队中有阵线的人员，这既是指一般人员，也指军官。甚至在指挥人员中也有阵线的拥护者。借此，大大地帮助了爱国者袭击边和机场的战斗行动。

哥穆尔卡感谢范文同告知此信息并重新指出，在国际监督委员会中波兰人今后将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虽然波兰代表团留在委员会内也使波兰有所不便：开支大、与美国的外贸摩擦等。但尽管如此，他强调说，我们在越南朋友面前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有关越南南方问题的任何其他想法或具体建议，哥穆尔卡补充说，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建议，我们会乐意地提出。

迄今我们也没有，范文同回答说。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同志通报有关越南南方的形势和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

之后，哥穆尔卡说，按他的意见，要顺利解决像越南这些具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如果我们的阵营不团结，整个运动不一致，那么就难以用共同力量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所以，要想一切办法保持和巩固团结。对此，最好的方法是召开兄弟党会议。谁都不准备“革除”任何党，将其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应该是加强团结。

我可以坚定地声明，他继续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追求团结。我们不止一次地与苏联共产党领导活动家们谈论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并相信其诚意。对此问题，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是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怀着巨大希望尽可能巩固统一和团结。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没有原先的乐观。在这里，苏联同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因中国领导的行动引起的。我们刚从北京获悉说，中国的报刊要刊登反苏内容的文章。说真的，我们可以事先抗议说，这些文章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但是，第一，是谁给了中国人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解除赫鲁晓夫的职位，这是苏共的内部事务。如果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那些不时发生在我们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变动，我们将给予十分坚决的回击。第二，这是很主要的，中国人是否在下阶段准备发表类似争论来引向反对苏联共产党？这将会导致什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乐观不起来。

从北京到莫斯科，范文同指出说，我与周恩来一起飞行，可以坚定声明，中国同志是真诚要巩固统一和团结。

我不相信，哥穆尔卡说，他们会与其他一些党一样地希望？我要再次重申，没有了整个团结，很难接近和达到具体问题的解决。

范文同提出异议。我认为通过具体问题取得一致可以逐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统一和团结。

之后，看来总理希望终止这个问题的谈话，同时表示遗憾说：“会谈结束时，不得不谈到这个主题。”随后，他感谢哥穆尔卡、波兰同志给他这么多时间的关注。

参加会谈的，越南方面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阮文镜、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及代表团翻译柯耶 [339]；波兰方面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克里施柯、波兰外交部长拉帕茨基和波兰驻苏大使普休尔科夫斯基。

根据范文同的建议，会谈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P.哈米杜林翻译。

资料编制者哈米杜林(签名)

1964年12月8日

АВІРФ, ф.5, оп.30, п.107, д.451, л.154-159

№20773 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1964年11月8日)

会谈开始之前，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中周恩来主动谈了一些问题。

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谈论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勃列日涅夫同志谈谈决定怎样处理我们的贺电。您曾经对我说，要同你们的同志商量，请告诉我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将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由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的同志也表达了向我们祝贺的愿望，我们的意见是：出版一本集子，包括所有的贺电。也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并答复你们。

同时，我想对你们发来的温暖的贺电表示感谢，这些贺电是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发送给我们的，这份贺电已经发表在我们的报纸上。

周恩来同志：很好。我想谈论的第二个问题很严肃。你们知道，我们党和政府派遣以我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友谊并参加隆重的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你们也认为，这次访问是友好的表现。

然而，昨天克里姆林宫举办了招待会，其中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方国家的记者，这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向我提出了

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这是对我的侮辱。首先他对我说，希望我们中国人不要搞政治游戏了。我明白马利诺夫斯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决定转入另外一个话题。我对他说，这些游戏很简单，揭开幕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然而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就此止住而是走得更远。他说，我们不当让任何恶魔妨碍我们的关系。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他指的恶魔是谁，他就继续说，苏联和中国人民希望幸福，就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

这个问题很清楚：这是挑衅和侮辱行为。我忍受了这一挑衅，走向了另一方向，我要离开，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记者就站在我们旁边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时，其他一些苏联元帅走了过来，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仍然在继续说。然而我们没有再听他的话，我的翻译也没有翻译这些话，但是另外一名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的话。事实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我们苏联人已经推翻了赫鲁晓夫，而现在你们就把毛泽东推翻。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继续同贺龙会谈。他对贺龙同志说，他的元帅军装很漂亮。对此贺龙说，穿上弗伦奇式军上衣更好。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同意了这一点并补充说，穿上棉袄更好，然后又说：“这就是斯大林给我们的军装，而你们的军装是毛泽东给的。”

他还对贺龙同志说，以这种方式进行谈话是错误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已经对米高扬同志说过，我亲自听到的只是马利诺夫斯基说话的第一部分，他说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我本来可以做出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回答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继续我们的谈话，这必然会在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人们中引起震动，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任何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这样做。”周恩来强调说：“何况，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侮辱了我们代表团，侮辱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也侮辱了我个人。”

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从我的方面来说，这是正常的、公平的也是必须的。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昨天在招待会上就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当时看起来就会产生争论，因为必须当场查清所有的细节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是有权力这样做的。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上述事件是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的祝酒词之后立刻就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在祝酒词中批评了美帝国主义。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开始向所有的出席者祝词，而我也走向苏联的元帅们，以便向他们提议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而

干杯。这时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了那些污辱性的挑衅的话。如果我们立刻就回敬他，这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将是他们的一顿“大餐”。

我经常说，对于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们要谨慎并认真思考。我指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之后，怎样理解他马上就对我们的污辱性言论呢？很显然，他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些话使他的祝酒词丧失了意义。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我亲自看到，美国大使是怎样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发言。然后，正如米高扬同志对我说的，你们就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祝酒词交换了意见并得出结论说，他的发言太强烈了。

米高扬同志：我对您说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同志：这些发言只是证明了在敌人面前的软弱。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却在平息这件事情。我会想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被邀请到了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发言时而软弱，时而强硬。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这只会损于苏联的威信。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是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

这就是我当场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第一个原因。如果处在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那么我就会立刻这样做。但他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们对你们访问的目的是表达我们的祝贺和友好情感。如果这是我们内部的谈话或者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只有兄弟党的代表，那么我就会立刻回敬他。然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是各界受邀的人，因此我决定今天说出这件事情并表示我们的不满。这不是小事。这是因为应当解决共产党员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为什么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言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搞清所有的细节问题，在招待会上我们问贺龙同志，他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是怎么结束的，而只是后来才知道了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们原来也不知道细节。

周恩来同志：如果我要弄清楚招待会上发生的所有状况，那么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这个问题不是通过抗议就能够

解决的。如果只是通过抗议可以来做出反应，这个问题的性质就会更加严重，这个问题的意义也将更大。从招待会回去之后我研究了整个细节并得出结论：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我指的是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因此我今天决定向苏联党和政府三位领导人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这件事？难道你们同意我国代表团来访问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儿对我们进行公开的侮辱和挑衅吗？然后，难道就可以认为，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你们希望我们像你们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一样也这样对待毛泽东吗？关于这一点苏联另外一位元帅在昨天已经对我们说了：“任何蔬菜都有自己的时节。”

米高扬同志：是哪位元帅？

周恩来同志：我没有亲自听到这样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或许这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吧？

周恩来同志：这些话同时有两层意思，关于撤掉赫鲁晓夫并希望也撤掉毛泽东。这些言论可以被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

贺龙同志：我们背后不远就站着两个美国记者。

周恩来同志：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这丝毫也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的权威，但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侮辱。难道这有助于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吗？这只能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我们两党之间的争论和原则分歧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这两位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个人素质。帝国主义者这样确信。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中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应该在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我们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同志：首先我想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并且同意你们的建议。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们才对你们代表团的访

问问题有了正面看法。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改善党和国家关系而进行的接触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没有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主席团会议，因为他既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主席团候补成员。

米高扬同志：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个元帅参加。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并打算今后继续遵循这个原则。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的决定看作是克服现有分歧、促进局势正常化而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代表团来访的态度。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才从米高扬同志那儿了解到了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第一部分内容。

柯西金同志：我昨天晚上也了解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对此很愤怒。

勃列日涅夫同志：因为我们谈话的精神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这件事很愤怒。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不仅没有反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甚至也没有权力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上的言论，周恩来的表现很有分寸，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您开诚布公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给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打了电话并在电话中询问了他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解释说，他除了对我们两国之间友谊的关心之外，没有想表达其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他也说，领导人的更换有助于改善关系，他也同意，或许他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关于这一点他个人准备道歉。至于您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意见反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这种看法，我们要对您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领导人的意见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把这看作是对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对你代表团的侮辱。我再次重复说，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知道我们的元帅们和国防部领导人的情绪。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都很好。比如，崔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扎哈罗夫同志都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扎哈罗夫同志说了“任何蔬

菜都有自己的时节”这句话，那么我可以很确信地说，这只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话。

周恩来：我不能确切地说，这是谁说过的话，但是我很了解扎哈罗夫同志，在北京我同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 [340]

勃列日涅夫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同我的谈话中说，对他的理解不够准确，但他还是准备进行真实的道歉。我认为，他是会进行正式道歉的。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遗憾。我想，您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点，并且这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共同努力。

周恩来同志：这个问题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如此大范围的招待会上出现的，这次招待会是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在昨天举行的。此外，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国防部长，并且是在他谴责美帝国主义者的祝酒词之后说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已经表述的想法。至于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是喝醉了酒，他所说的话没有表达他的感情，那么这只会增加我的怀疑。

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都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他没有过这种想法，那么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我们有格言：“酒后吐真言。”我有时候也喜欢喝酒。有一次赫鲁晓夫把我给灌醉了。关于这件事你们可以询问一下莫洛托夫。诚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外交部长了，或者询问陪同我的费德林同志。我当时是完全喝醉了，但没有说出一句不适当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想法，他是不会说出来的。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昨天的话说得有逻辑、有条理。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费德林同志仍然健在，并且还在工作，可以通过葛罗米柯同志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米高扬同志：我和你们也喝了酒，但是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周恩来同志：作为一名国防部长，他是不能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国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在对朝鲜同志关系方面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为此我们撤了他的职务。我们没有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至于彭德怀，他确实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企图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你们可以记起，关于这件事在1956年我们的同志和米高扬同志一起到朝鲜进行访问。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企图撤换金日成。

周恩来同志：我们也得出结论，应当免除彭德怀的职务，而赫鲁晓夫不同意我们的这个意见。

米高扬同志：不对，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支持你们关于彭德怀的看法的。他支持的是彭德怀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周恩来同志：让我们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是，彭德怀想干涉朝鲜同志的内政，我们认为这是他反党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他还有其他重大错误。因此我们多次向朝鲜同志解释说，彭德怀犯了错误应当为这些错误负责。我举了我们党实践中的一个例子。至于兄弟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犯了错误的同志的，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首先，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说，主席团成员们关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交换了意见，也就是说，这是在我说出所有这些细节之前。而你们却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存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表述的意思。

米高扬同志：在最近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没有这个意思。

柯西金同志：通过人民的情绪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毕竟你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同志：第二，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按照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本人的说法，他没有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这两点中我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谈话。同时，我保留我们代表团在讨论这个问题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力。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我们代表团将会讨论这些情况并告诉你们。

米高扬同志：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关于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之后，因为我知道主席团的意见，马上就谴责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把参加招待会的客人送走之后我才了解到了这次谈话。

米高扬同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见，那么我就不会马上谴责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柯西金同志：今天的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你们代表团在谴责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向你们正式声明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完全相信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话，你们应该相信我们。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令人烦恼。我们完全不会维护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对他感到愤怒。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没有维护马利诺夫斯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起站在列宁墓的讲台上谈论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这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我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来访以及努力消除分歧，他本人和苏联元帅们都非常高兴。我相信他完全同意我们党关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意见。他对你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意外的。或许你们发现，他说祝酒词时非常激动，并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周恩来同志：对于敌人是可以这样的。

柯西金同志：我告诉你们一些细节。我们自己也在考虑所有的情况并寻求解释。

周恩来同志：柯西金同志请我们注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驳斥。但是我想坦率地说，我相信，如果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进行了谈话，那么对我说得更多。

米高扬同志：他说得已经够多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不关注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是这样评价的。

康生同志：我没有参加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吃惊。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也感到非常吃惊。

康生同志：这使我想起5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是在庆祝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侮辱了毛泽东同志。

当赫鲁晓夫侮辱我们的同志时我不感到惊奇，因为赫鲁晓夫胡说八道。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当我们来庆祝你们节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当然已经习惯了各个地方的人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污辱性言论。这不会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带来任何损失。但我非常不安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直接同我们代表团领导人说了这些话。我们在不断追求克服分歧，团结对敌。难道在美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有益于我们的团结吗？我们来访问是打算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对我们领导人污辱性的言论对这一点没有好处。我相信，苏联人民对我们代表团的来访是热情的、赞成的，是不允许这样的污辱性言论的。如果我重复了在这里已经说过的话，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昨天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当周恩来同志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时候，我在同基里连柯同志谈话。基里连柯同志是这样评价我的，他说：“康生同志，您过去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而现在是个不好的朋友。”我当然不愿同基里连柯同志争论，就回答他说：“我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将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如果我们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我们就不会到你们国家来。至于针对我的侮辱，每次到你们国家来，我都能从赫鲁晓夫那儿听到。每次我都会回击这种侮辱。但是昨天基里连柯同志说我已经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不愿引起争论。当安德罗波夫同志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当我们邀请你们代表团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整个领导集体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以及新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难过。关于康生同志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关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信任和尊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邀请中国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在你们到莫斯科之前我们就把这件事通报给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友好的。

周恩来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知道了勃列日涅夫同志

的两点意见，知道了柯西金和米高扬同志的对这些意见的补充，也了解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意见，也应当认真对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并请求转告中共中央，在同你们的关系中我们希望真诚相待。无论是会带来多大痛苦的事实我们都要互相告知，我们要真诚和诚实。我希望以今天的谈话为我们做到这一点奠定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谈开始的时候，我表达了我们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可能采取的另外一种措施，并谈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建议讨论我们会谈的日程问题。我建议再进行几次会谈，或许是2—3次。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是否有时间。

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准备进行几次会谈。

周恩来同志：或许，一开始我们就达成了关于进行2—3次会谈的一致意见。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谈话也许需要延长。举行会谈的时间取决于你们。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题是，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想同我们举行会谈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尽量使这不妨碍我们的谈判。

周恩来同志：我们理解你们。或许，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们每天举行会谈。我们没有任何困难。

勃列日涅夫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招待会欢迎那些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而访问我国的外国代表团。这不允许我们进行工作谈判。

康生同志：我们有一个痛苦的经验——我们同你们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在午饭的时候开始发生。

柯西金同志：现在就让我们不再这样。

周恩来同志：我们请求你们在今天晚上通知我们关于明天会谈的时间。

会谈后进行了午餐，所有参加会谈的人员都出席了。

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尽力营造一种温和的气氛，他们提议为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干杯，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干杯。

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说，中国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中共中央在今年9月确定，中国政府将审议在今年12月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其余的谈话都具有记录的性质。

参加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乔冠华、潘自力同志和代表团顾问姚晨(ЯОЧЖЭНЬ)以及4名中国翻译，还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局领导人О.Б.罗满宁同志和翻译Р.Ш.库达舍夫、И.А.罗高寿。

这次谈话由库达舍夫和罗高寿同志记录。

РГАНИ，ф.3，оп.16，д.562，л.25-37

№2234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1964年11月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1月9日会议

第171号记录第3项

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主席团对这次会谈工作表示肯定。

РГАНИ，ф.3，оп.18，д.296，л.2

№2077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1964年11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1月13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9项

1.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中国代表团是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7周年到苏联的。

委托勃列日涅夫同志通报这一情况。

2.审议Ф.П.科兹洛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意见。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9, л.3

№20010(25734)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 [\[341\]](#) (1964年11月14日)

摘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关于与一些兄弟党的谈判和协商” [\[342\]](#)

1964年11月14日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进行的与许多党洽谈和咨询的问题。

10月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无疑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全会的决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们朋友和敌人广泛议论的话题。

反动的政治集团、资产阶级的报刊竭尽全力歪曲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意义，在群众中散布各种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被解职后苏共内外政策改变的推测。应该说，10月中央全会以后资产阶级的报刊在前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国家蒙骗了一些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部分兄弟

党领导人的声明中感到有些不信任，感到有些紧张。

几天内情况都明显地改变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解释，苏联报刊登载的关于苏联不变的列宁方针，关于我党忠于第二十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讲话以及苏共的纲领，都受到进步社会舆论，受到一切坚持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欢迎。

苏共中央发给兄弟党的有关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秘密通报帮助他们正确地评价苏共中发生的事情。有些兄弟党要求我们给他们提供关于苏共10月中央全会结论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莫斯科接见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我们主动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举行了欢迎会，在莫斯科与正在苏联的泽登巴尔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的立场是，类似这样的会谈也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举行。但是，这样做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关于10月中央全会的情况如何通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最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众所周知，近3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已经转为公开。这样的争论对许多兄弟的活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这样的争论也不能不影响我党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印尼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考虑与这些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共商我们的共同问题。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提出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个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近期邀请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

苏共中央主席团当然清楚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这个要求有其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中共和苏共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使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局面健康化，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预先与有关国家的兄弟党商量以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法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党政代表团。而阿尔巴尼亚通过与外国友好协会的名义来邀请。你们都知道，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

邀请，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接触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但交谈和咨询的主要大致有3个问题：

——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

——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

——我党、我国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我简单地谈一下上述每一个问题。

关于10月中央全会的问题。

会谈的结果说明，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决定，完全支持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没有一个党怀疑我们的决定和动机。但是会谈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对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做出了另外的评价，这集中表现在意大利共产党方面。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赞同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定的同时，对这样突然的决定和通报方法感到不满。

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与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同志的会谈中我们尽量解释，他们的看法不符合苏联当前的实际条件，解除赫鲁晓夫职务恰好说明第二十次大会决议、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符合实际的。许多问题由于会谈的结果被澄清了，虽然在有些细节问题上还存在差异。可是，不管是苏共中央主席团还是兄弟党的同志们都充分肯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绝不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兄弟党团结的阻力。

关于加强团结的问题。

中心问题是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根据协商，编委会应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中国、越南和朝鲜共产党对会议和编委会持反对立场。实际上，罗马尼亚同志也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声明，只有在全体与会者的同意下，编委会才能开始工作。英国、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认为，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但他们并没有拒绝参加会议和编委会的工作，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会开始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到，情况很复杂，赞同召开会议的有61个党，而26个中的19个党愿意参加编委会工作。很明显，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参加，会议和编委会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考虑到这一点，并为了把中国代表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过程变得简单，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提出不一定要坚持编委会在12月份开始工作。

看来，此事不能忽视。最重要不是编委会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始，而是编委会工作的目的是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够巩固，这样，给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决定，我们将与兄弟党进行协商。

关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问题。

在会谈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有共同性，大家都提。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虽然还有些问题需要补充、明确和改进。在与亚洲国家和古巴的关系上，问题复杂些。例如：古巴同志在会谈过程中提出要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他们要求我们在古巴驻扎军队。他们提出，苏联政府能否向公众发表正式的声明，声明侵犯古巴就是侵犯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的设备，甚至火箭、核武器全力击退敌人的进攻。越南同志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越南南部活动频繁。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进行全面的，包括军事方面的援助。我们进行过，现在还在进行这样的援助，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应该谨慎从事，防止事态发展到引发世界热核战争的地步，因此必须跟古巴同志进一步商洽。

关于苏中谈判。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特别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关于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情况。

中央委员们从11月初给他们的通报中已经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恢复苏中两党间联系的建议给予积极回应之后，还得出一个结论：中共领导人在上述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个目的——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方向。据我们所知，中共领导人将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

议看作是在自己在(苏中之间)意识形态论战中的胜利，借此，进而可能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苏共)和其他兄弟党。

就是不久前举行的会议上，中共声称，“赫鲁晓夫的退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方针”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10月24日，艾地 [343] 同志说，在苏联和中国重新接近的道路上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原因在于：苏共仍将一如既往地坚守本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既定路线”。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党应当对这些大会的决议重新加以审视。

尽管苏中关系的改善面临重重障碍，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应利用一切可能来与中共进行接触，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准备采取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实质性举措来促使苏中关系正常化。

我们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向对方强调，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照苏共近期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纲领和莫斯科会议诸文件所确定的方针行事，任何改变这一方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其二，在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形势方面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的同时，我们认为可以利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来提出如下建议：停止公开论战，终止针对兄弟国家的宣传，放弃对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双方在促进苏中两国间关系正常化方面联合采取一些步骤。

我们完全是怀着良好的愿望来进行这次谈判的，并极力希望从一开始便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我们想通过双方面对面的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以便发现双方分歧的关键症结。与此相关，我举一个虽不十分重要，却相当典型的细节：此次谈判期间并未出现以前那样的情形——双方只是朗读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大论，却不作正面的接触。

谈判是从11月8日开始的，随后在11月9、11、12日继续进行。由于全会与会者们都已从速记资料中了解了谈判的情况，我这里将不再详

细地描述整个谈判的过程，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主要内容和最终结果。

从一开始，各种迹象便表明，我们的谈判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中国代表极力利用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对(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持肯定态度，并强调，这些决议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中共代表还极力证明，我们党的总路线——已不是“赫鲁晓夫式的路线”，因此我们应当与后者决裂。他们甚至声称，不应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与苏共(以往)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我们代表团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向中共代表解释道，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所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我们整个党的意愿，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此次谈判的重点并非是重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路线问题，虽然中共的路线中有很多问题苏方并不同意。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可能只有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我们认为我们都应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形下使我们的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至于那些仍存在争议的原则性问题，在我们看来，仍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和认真细致的研究。而现在，我们只能为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心静气地讨论所发生的分歧创造条件。

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我们建议中国代表具体地讨论，苏共和中共如何通过联合行动来加强反帝国主义阵线。我们还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双方均停止公开的争论；关于中共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作准备。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在谈判初期，完全拒绝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他们以苏共继续坚持原来的总路线为由，拒绝了苏方关于双方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于，他们还说，如果苏共继续坚持二十大方针，保持自己的既定纲领，那么中方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在拒绝讨论关于巩固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明显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极力阻止苏联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尤其在苏美关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

显。例如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便指责柯西金同志说，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声称，“我亲眼看到，柯西金同志带着友好的表情走向美国大使。这表明，苏联政府在此类问题上持双重立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向他做了充分的解释，此举不过是外交场合的惯例，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脑都必须如此行事，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同志。谈判中出现的这个小插曲很直观地说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解决，以便能与中国同志达到相互理解。

关于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问题，是此次谈判的重点。

中国同志坚定地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参加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说，“如果你们希望讨论问题(关于召开协商会议)，但又将之与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硬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明显带有神经质的威胁和最后通牒的口吻，很显然：他们明白，如果拒绝参加兄弟党的集体会议，可能会使其陷入被动。因此，在坚持原则上必须召开协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在这一问题表现了应有的灵活性。

我们向中方做了耐心的解释，即关于首先召集该委员会会议，然后再召开兄弟党协商会议的决定，这体现了61个党派的一致意愿。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代表团强调，我们并没有将召集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非固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以便通过兄弟党派的共同努力来克服(中苏间)分歧，那么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以便让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与会成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认为，今后在解决有关起草委员会的问题上，应极力让尽可能多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争论，关于参加协商会议，关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等都使中共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但又不便于一概予以简单的回绝。于是，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便借用各种理由，极力使谈判局面复杂化。例如，当周恩来同志断言“赫鲁晓夫的指令”似乎仍对苏共中央发挥作用时，米高扬同志答：在涉及与中共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我们中央与赫鲁晓夫同志不存在分歧，或者说甚至是观点上

的细微差异也不存在。

中国代表立即揪住这句话不放，并由此断定，既然如此，他们便不再期待能与苏共改善关系，因为双方继续谈判的基础已不存在。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真正成为了中国方面用来提出蛊惑性指责的口实。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谈中说了一些欠考虑的话。他说，赫鲁晓夫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都不可能妨碍我们”。中国代表对马利诺夫斯基的鲁莽举动反应异常强烈，认为此话是公开号召“推翻毛泽东”。他们极力渲染这些话，似乎他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欠思考的言语提出批评，并强调，马利诺夫斯基的个人言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代表中央的观点。中国代表已被告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将为自己错误的表述请求原谅。尽管这样，中国代表团仍不断重复提出这一问题，似乎认为，这样便可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

在谈判末期，中共代表的语气已变得非常平静了。这尤其表现在11月12日最后一次谈判之时。在得到了根据其请求我们所提供的苏共10月中央全会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声称中共将严格保守资料的机密性。与此相关，周恩来同志指出，保持(两国间)互信——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他重复了当格里申同志率领的苏共代表团今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话：“我们的争论——是暂时的现象，而团结应当是永远的。”

苏共代表团建议，在中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举行两党和两国代表的高级会晤，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循序渐进地达到如下目标：恢复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举行此类会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无论是将会晤地点定在北京或莫斯科，是采取公开的方式还是秘密的，均可。

我们指出，在提出上述建议时，苏共中央遵循着一个指导原则，即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争取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的名义，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

周恩来答复道，他将把苏共中央的上述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还作

了如下补充：（今后）我们双方都有必要在创造新环境、寻找新的交流渠道方面下工夫。“如果当你们认为，举行两国高层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你们便可就如何讨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他在最后结论中说，好在我们两党之间协商的大门仍一直敞开着。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与中共初次谈判的成果有限，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它的积极作用。完全可能，中国领导人将这些接触只当作是“火力侦察”，借此以考察我们在捍卫苏共原则路线上的坚定性。虽然目前仍很难预料，在经过此番“侦察”之后他们将采取怎样的策略。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放弃一些幻想之后，中共领导人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10月中央全会所创造的客观前提，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而这样的前提无疑是存在的。苏共全会的决议将使中共可以不失体面地与我们接近。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在与中共的争论中苏共的原则路线是正确的，但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言论和举动对原本已相当复杂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关于他针对毛泽东同志所发出的污辱性言论，关于他匆忙将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尽管这里有必要指出，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挑拨离间的事）。随着赫鲁晓夫同志离开领导岗位，类似这些对苏中关系产生了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存在。

这不论是对我们，还是中国领导人都是件好事。显然，目前和今后我们都要实行灵活的政策，通过党和国家等渠道与中方保持联系。如果中方重新激化争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我们也将坚定地通过谈判，以平静而非谩骂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与此同时，我们今后将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原则立场，绝不允许放弃。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我们不会去激化国际紧张局势，主动挑起军事冒险。

我们不会放弃在我们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继续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无论我们多么珍视与中共的友谊，但也绝不会以放弃上述理想为代价，因为党、人民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允许我们那样做。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坚信，终有一天，中共会与其他兄弟党派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前

景的同时，对我们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争吵，而是成熟、谨慎行事和多用智慧。

同志们!

最近几周以来，主席团和书记处在与兄弟党代表会晤和谈判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看来，这项工作是有必要的、有益的。与兄弟党的接触和会晤让我们再一次检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合作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政策的基本方面。在会见过程中我们深信，我党在这方面的总方针也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发现，对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实践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在尊重平等、独立和领土主权的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互助。众所周知，过去就是这些原则经常被违反。

.....

今后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保卫这一伟大的学说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

应该学会了解各国的具体条件和考虑兄弟党活动的具体环境。

马列主义政党希望独立，成为自己国家的主力。这些想法不应该妨碍，而应该帮助我们在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力量的总任务。

同志们!我党和我国人民完全赞同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这次决议得到我们外国朋友的理解。可是我们决不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存在的困难熟视无睹。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身边有头脑敏捷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我们的困难。他们能否成功，一切取决于我们在国内进行的事业。尽管对兄弟党和革命力量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无论

从国家的观点还是从国际主义观点来看，最主要的是加强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

过去我们看到了，现在更看清楚了，我们面临着国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党的集体智慧和意志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保证全党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组织性以及共产党员在为实现纲要规定总路线斗争中的坚定性。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9-18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326, ед.хр.758, л.3-20

№25920 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1964年11月16日)

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杰柳辛(Делюсин)通过高频电话进行的会谈：关于谢尔盖耶夫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件

1964年11月底

他读了这封信，甚至读了几次。他对这封信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封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他的一些同志也阅读了该信件。信中的许多内容都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他思考的一些问题与信件中提出的今后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封信件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发来的正是时候。

В.А.谢尔盖耶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信(副本)

1964年11月16日

敬爱的尤里·弗拉基洛维奇：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14年多，从事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外交工作者，我当然对当前的苏中关系的状况感到不安。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能

够非常近距离地对苏中关系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后来这种关系的复杂化和恶化的过程进行观察。由于我在工作中就我们处理中国问题的工作方式以及为反对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观点和行动而采取的措施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大使馆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应当向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阐述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符合我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客观需求。我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美国明显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性和冒险性)也要求我们坚定地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这就使我们必须使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进步力量加强联系，并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冒险家，防止世界大战。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一重要的目标首先会给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再次得到巨大的增长。

我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问题在于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恢复和加强苏中友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客观需要不仅是我们国家，而且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需要。

调解苏中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正常化首先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体系的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这无疑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向前进，在健康的合作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发展速度，加强我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统一，加强我们对中立国家的影响。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强大国家，拥有大量的国内资源，同我们存在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并且正在致力于制造原子武器。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东部边界出现这样一个敌视我们的国家，这一点无须证明。我们自然希望中国成为我们的友好邻国，而更好的情况是，使它成为我们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者的盟国，成为一个不是威胁到我们，而是我们在东部的屏障的国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向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但

是这种影响只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或者“平静的”的条件下进行。

毫无疑问，我国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感兴趣，以便用于我国的工业和作为我们所需的一些原料、矿藏和一些农产品的来源。现在，当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把他们的目标瞄向中国的时候，使中国滑向同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加强稳定的经贸关系的方向对我们是不利的，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积极地，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开展工作。

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实现这些目的无疑就不得不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当然，这需要同中国、中共领导人开展一些艰巨而紧张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可以由中国的一些复杂性反映出来，而且，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使这种复杂性得到了增强。我认为，在最近几年，我们在对中国的工作中经常所持的都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立场，而苏中关系的状况越来越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必须尽快再次对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审议，再次对所有的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研究的原因。

最近几年，我们中间非常盛行的一种看法是，同中国的破裂不可避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不可避免地同中共在组织上划清界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诚然，苏中关系的状况，同苏中关系相关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状况，以及国际共运状况近来都变得非常复杂。公开的论战以及同这些论战相关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这场斗争的逻辑驱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敌视我们。

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径众所周知，因此我将不予谈论。毫无疑问，苏共对中国领导人就一些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行的主要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所有复杂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行动，关于我们对华施加影响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我认为，需要好好地考虑考虑，为此我们以前对华施加影响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否妥当。

我认为，苏共中央在今年7月15日信件中所提出的如下内容是完全

正确的。“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言论，这些言论妨碍了相互理解”。确实，在我们同中共和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双方都积累了非常多的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各种不健康的言辞，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同中国关系的破裂。

这种看法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呢？日积月累，这些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在此方面，来自我们驻北京大使馆的原始情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些情报则是非常不足的。而中央则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些认识。我认为，近年来，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抱有成见，有倾向性，过于单方面强调一些负面的东西，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相关的政策，特别是对其对外政策都一概予以谴责。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言论中所正确地强调的，把每个国家的利益同整个阵营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认为，在对中国的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进行研究的时候，对这一原则考虑得不够。

诚然，正确地实现这一原则的必要的前提是应当对该国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处境予以客观、科学的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基础首先就要确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基本的和共同的东西；其次，要确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国际处境，这种特点和处境在现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的一些有别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第三，要准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这些倾向不仅会给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损失，而且还会给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总路线造成损害。

如果我们在制定报告的时候都逐步遵循这种有区别的方法，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可以都接受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主要的、能够作为共同基础的东西，并把这种东西巩固下来；这就要求在我们的政策中必须考虑到中国国内发展的客观特点及其国际处境，并把由此产生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相协调，而不是把中国的特点同这些总路线对立起来。至于第三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冒险倾向，那么，在明确确定其形式和表现之后可以平静地同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许，主要是秘密地进行斗

争)，以便消除这种倾向，使他们“默不作声”，进行秘密讨论。同时，我认为，经验表明，现在我们有可能会产生影响，使中国人在国内克服民族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错误，但只能间接地产生影响，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微妙，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我清楚地记得，当您，尤里·弗拉基洛维奇在从对河内进行访问回国的时候，在我们的大使馆内作了发言，并且特别说，把这些共同的东西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即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随后会出现苏共同中共恢复友谊的共同的、基础，以及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我们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当有人试图这样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总会被看作是“客观主义者”，“对人们的情绪漠不关心”，甚至被看作是“维护中国的人”。

近年来，大使馆在制定报告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而只是描述一些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健康的现象和不健康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对中共的活动一概予以谴责，而不考虑到同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特性和状况；大使馆所描述的东西通常都只是一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冒险倾向。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和描述中国内外政策中表现出的冒险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不足、劣迹(众所周知，中国的这种错误表现是足够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中国同我们在客观上联合起来的一般的事实经常被无视和忽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采取如下先入为主的论调：中国人生来就偏向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且他们总是以朋友和共产主义者为伪装。从这一公式出发，他们所撰写的所有报告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揭露”、“展示他们奸诈的图谋”，他们的民族主义、冒险主义和沙文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难，但是，我认为，我们报告的任务应当更多一些，这些报告应当是全面的。

对中国的局势及其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是片面的方法(在挑选材料时采取的相关方法——对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有倾向地进行加工，对一些东西进行拼凑，断章取义，利用一些个别的、有时候是偶然的事件，对一些材料和言论没有进行足够的核实，采用一些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比如，采用当地苏联籍移民的言论，以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材料进行推断，以及新华社半公开发行的材料——《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夸大当地外交使团的一些传闻等，以此作为其结论的主要论据。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信息通常会增加一些在逻辑上不合常规

的结论，增加一些无谓的猜测，做出更加“尖锐”的评价，寻找更加强烈的表述。

中国方面的一些重要材料以及中国政府的一些官方声明事实上却被忽视了，被看作是“谎言”和“虚伪”，却没有关于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的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在中国外交部之外，同中国代表进行的非正式的联系、会谈和接触事实上完全没有。事实上没有对中国代表开展工作，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客观上的困难。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而且甚至认为这样的会谈没有必要。同外交使团的联系基本上是同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外交使团建立的联系。

因此，在了解大使馆的报告材料的时候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些轻率的、论据不充分的内容。通常反映的关于中国人的所有行动的都是一些阴暗的方面，而没有一些主要是健康的方面，反映的通常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幻想。中共和中国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言论要么被看作是冒险主义(常常喊叫的反美主义)，要么被看作是企图突出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便“为自己辩护”，“应对我们的批评”，“欺骗和误导其他党”……中国方面所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必定被看作是沙文主义、冒险主义，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被看作是反苏分子。

中国一些正面的东西及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仅被看作是“中共领导人为了巩固其在国内反对苏共和苏联的立场，为了推行其冒险主义路线”等，也就是被看作是不利于我们的事情。无论中国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这样就使自己“不能自拔”。

如果根据我们的报告材料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同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已经不存在和中国进行团结和接近的任何的基础，甚至是联合起来共同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声明。从这种立场“自然会”得出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政策“根本对立”的结论，中国对我们采取的都是敌对的政策，任何使关系正常化的企图都是无望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不存在共同基础的时候，当中国的社会制度遭受怀疑的时候，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代表的声明完全都不相信的时候，而一切都被看作是虚伪的表现的时候，自然就谈不上关系正常化和加强团结了。

正是这样的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提出的建议使两党关系向分裂的方向发展，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多次坚定地强调了这一点。大使馆

提出的建议主要都是建议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向中国人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来“劝服”他们，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手段，“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更大的打击”。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孤立”他们，可以通过中国内外困难的加剧和深化来迫使中国领导人改变其政策。我们的工作人员遵循的正是这样的方针。事实上他们没有寻找现实的途径来使关系正常化。

无疑，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开论战开始之前，我们有时候表现得过于急躁，耐心不够，扩大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把中共和中国的政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对立起来。而我们为对中国施加影响而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未必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从国家政策方面来说，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过于匆忙了，过于情绪化，比如，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这导致中国对我们工业设备的购买减少了，整个贸易也减少了，还引起了其他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没有履行已经签署的合同等。另外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公开批评中国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这导致了在推行对中立国家已经协商一致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使情况更加复杂。这还被印度右翼大肆利用来挑拨苏中关系，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就巩固亚非团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正确的。

近来，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总是充斥一些有失风度的、刺耳的论调，而“论战”本身有时候也变成了对骂。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同志侮辱中国人的一些言论，其中包括他多次重复说，在中国“几个人不得不只穿一条裤子”。这是在挖苦中国人的贫穷，在中国确实存在饥荒和重大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无疑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只会对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

我认为，在论战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尽管遭受中国的攻击)论及一些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共的党内政策问题，特别是不应通过政府发表声明。

我产生的印象是，这种反对中国领导人错误想法和行为的斗争方法是无效的。这反而会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素材，使他们来开展反苏宣传。这种斗争方法在客观上只会激化情绪，使事态更为严重，削弱相互信任，使关系更为复杂；而不是克服分歧，最终导致不仅在意识形态

上，而且在组织上双方都划清界限，有时候还会使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复杂化。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人对我们以牙还牙，甚至做得更甚。随着情绪的激化他们从对我们的一些行为和发表的一些声明的批评转而对我们整个对外政策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否定和贬斥，后来开始对苏共的党内政策进行诽谤，开始从多方面在政治上对我国和我党展开斗争。尽管中国人也试图强调说，他们的斗争和批评是为了“反对赫鲁晓夫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远远超出了批评赫鲁晓夫的范围，并且开始对整个苏共进行攻击。在中国掀起了反苏的热潮。这种状况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敌视和仇恨被转到了我们整个党和苏联人民身上。毕竟，民族主义浪潮是自发的。遗憾的是，甚至许多以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受这一浪潮的影响也转到了我们的对立面。

由于事态的这样发展，在我国的东部边界上不再是对我们友好的盟国，而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凶狠而狡猾的对手。在我国的东方出现了以中国以及与其相邻的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为代表的第二条战线，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西部战线。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还加剧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的离心倾向和动摇情绪。随着苏中关系的恶化这种倾向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人那些令人憎恨的分裂主义行径加剧了这一进程，他们利用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企图“打入楔子”。

中苏双方的这种互斗是徒劳而无益的，它只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利。这越来越多地分散了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和资源。

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中推行的一些民族主义行为和歪曲事实的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是存在问题的，并且应当被我们逐渐注意。但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过去采用的反对中国冒险主义的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是否正确？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打击”和“孤立”未必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我认为，他们只是深深地受到了民族主义的伤害，就把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对我们进行反击，并且在实践中甚至鼓励民族主义者，使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影响。这种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反过来被用于反对我们自己，给我们带来了危害。采用这些斗争方法和方式的结果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只是遭受了损失。

看起来，应该对我们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中需要采取的新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进行好好的考虑，它们应当有别于以前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但是应该更加有效。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更加容易寻找这种斗争策略。

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以及双方事实上公开停止论战，尽管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仍然没有消除，但现在仍然是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转折时期。当然，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存在重大分歧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应最大程度地巩固已经出现的“和解”趋势并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转入公开论战、采取以前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后者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今后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或许还会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随后削弱我国的国际地位。

看起来，较为有利和对我们较为有益的方法是采取一切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发生根本的转变，来使我们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相接近，来巩固公开论战中的“休战”状态。我还认为，最好不要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等待“中国人反思自己”，而应相反，应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使中国“不能脱离”我们。

毫无疑问，苏中关系的巩固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中国方面。但是，根据中国人近来的一些行为(周恩来到莫斯科访问，中国报刊事实上停止了对苏联和苏共的攻击，发布了我们的一些主要的政治文件，不再散发那些我们众所周知的用外语出版的出版物等)来看，中国方面在同我们的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和主动。无论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看起来，中国人立场中出现的这些新因素都反映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转变，而对此我们是能够利用的。

我认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存在巨大的客观可能性。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对此都感兴趣。我们两国存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针都为苏共同中共、苏联同中国之间恢复合作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推动着中国与我们接近。

首先，对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

必须恢复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和联系。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做了许多蠢事，犯了许多唯意志论的错误，生活给了他们惨痛的教训。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尽管他们没有公开谈论(中国想“保存脸面”)。现在他们在试图使国内的经济生活正常化，在逐步转而实行较为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中国基本上正在从“大跃进”中得到回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未能使主要的工业领域得到恢复。中国急需现有企业中使用我们的设备的配件，急需一些设备来建设被搁置起来的企业，急需建设新的工厂的设备。每拖延一个月都会给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中国人试图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相关设备和得到相应的帮助，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效。

对工业设备和科技经验的需求推动中国恢复同我们的良好关系。这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条件再次成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我们不应放弃这种机会，应当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前，重返中国市场。

我认为，推动中国人急于同我们恢复关系的第二个具体的因素是中国坚决加强国防能力的需求。军事技术老化和陈旧，现代航空工业极弱，原子弹的制造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些都使得中国面对美国对其东南沿海进行的侵略活动事实上无力防御，特别是在拥有现代化空军的美国面前。尽管中国人很勇敢，但他们明显感到自己在军事上的落后。他们所有的关于原子弹是“吹出来的”的口号以及进行350次“严重警告”都表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落后。

中国当然不能指望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新的军事技术的唯一来源就是苏联。这又为我们使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于”我们、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总的来说，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趋势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客观意图、愿望或者是“真诚”，而且是由一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的一些表现。因此，我认为，把近来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一些措施看作是针对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虚假的意图”、“奸诈的图谋”，看作是被授意做出的“不真诚的意图”是不正确的。中国的民族利益驱使其领导人趋向我们，尽管他们都很自负。

我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中国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趋势必须

得到支持并被我们所利用，因为这种趋势对我们有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形成了新的局势，并出现了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新的趋势。这使我们处于主动的地位，还使中国方面不致丧失许多威信。尽管中国人把苏共领导层的变更看作是赫鲁晓夫政策的破产造成的后果，尽管他们看起来将会企图对我们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或许会在一些具体的舞台上提出各类“最后通牒”，但是，他们未必愿意主动采取措施使苏中关系更加恶化，因为他们明白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毫无前途的。

但是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必须在对外政策中改变对中国的策略，其中包括转而采取一些不致使中国疏远我们的方法，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我们。以前的策略、方法和方式未必能达到这一点。在此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希望能够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采取一些措施，以便逐步加强中国同我们的联系，不必匆忙，不必一蹴而就，要沉着冷静，考虑到各种“支持”和“反对”，要考虑到尊严，循序渐进，以便不引起我们朋友的不安，但同时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迅速采取行动，不把扩大这种关系的主动权转到中国人手中。看起来，在这一工作中，在开始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把在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同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区分开来。因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

我完全赞成最近我们的所有发言以及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外，我还想谈论一些关于我们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认为，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在党的关系方面：

1. 尽力使目前的状况稳定和巩固下来，也就是事实上双方都停止公开的论战，使两党关系转入秘密谈判阶段。在这一问题上，在此阶段希望我们的报刊不要发表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的材料，也不要发表关于兄弟党进行的这样的批评的材料，因为这会带来再次爆发公开论战，使局势的发展陷入以前的轨道的危险。

2. 因为停止公开的论战本身并不能导致现有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最好应当做好今后进行谈判和同中国的错误作斗争的准备，应当对导致分歧的每一个问题的原因再次进行仔细研究，再次客观而毫无成见地对

中共和中国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采取的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和内容进行研究。在这一工作中应当着重指出中国发展中及其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方向中的一些总的、积极的因素。这些总的和主要的方向应当被看作是苏共和中共团结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进行会见后制定的共同宣言和联合公报中可以以相应的条款记录下来。

同时，最好对中国对外政策中固有的民族主义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些特点)，以便在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的时候正确地考虑到这些特点。还应当明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对其予以研究(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根本上同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是有分歧的)，并对其继续从原则上给予这种趋势和不良倾向进行严厉的批评，在有针对性地对其予以沉痛的打击的同时，在这些问题上未必要牵扯到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

3.当然，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当继续同那些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尖锐批评的兄弟党领导人一起开展工作，或许，在短短的时间内难以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改变他们的策略和斗争形式。毫无疑问，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谨慎，采取一定的策略，以便不使我们的朋友们为难，不使他们脱离我们，但同时不使他们陷入关于同中国打交道的形式的这些问题中。

4.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像以前一样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来解决争论以及一些成熟的国际问题，并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应当强调，现在各国共产党团结的基础应当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这些都是集体制定和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只有通过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来增加或者修改。

5.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在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呢？是否应该同其他的兄弟党进行磋商，把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后一段时间呢？为了我们的利益，是否应当让关于起草委员会召开的时间这一问题产生阻碍作用呢？使我们失去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机会，失去同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联系的机会呢？或许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共产党追随他们，由于中国人的自负，或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这些党的破裂。

6.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试图再次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再次举行的双边会谈的过程中团结中国共产党呢？而随后在这些谈判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及追随中共的其他党的情况下来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和共产党国际会议呢？

我谈论的这些都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因为中央当然会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在国家关系方面：

非常可能的是，在新形势下中国方面可能愿意扩大苏中贸易、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在这些方面中国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来促进这种合作，扩展在此方面与我们有利的联系。

1.在此方面现在应该就如下一些问题拟定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向中国供应什么样的工业设备和零件，还应当向中国方面征询他们的需求。

2.在科技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以前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供应设备和物资的请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到了我们的搁置，或许应当满足其中的一些请求。

3.如果中国方面感兴趣的话，或许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再次声明说，我们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

4.我认为，今后应当希望再次审议关于向中国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共同建设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由中国东北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输油管道(这也是使中国在经济上依赖我们的一种手段)。而这也可能保障我们在太平洋沿岸向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输出石油。通过中国领土建设这一输油管道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更不用说这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理由，向中国派遣我们的专家。

5.由于我们希望中国“依赖”于我国强大的经济，希望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一旦苏中经济关系正常化，看起来，应当对关于接受中国加入经互会的问题进行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对关于大力扩大经互会的市场问题进行研究。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中国人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件中提出来关于扩大经互会的建议。这给了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

6.我认为，由我们主动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其国防能力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建议非常重要。当然，只有在中国人同意同我们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在此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可以成为加强苏联同中国联盟关系的基础，还可以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业技术上“依赖”我们。此外，我认为，应当认为中国未来必定会在所谓的“新技术”领域取得进步，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在对外政策领域：

毫无疑问，应当特别注意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如果不能恢复团结的话，至少苏联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这种协调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的对外活动不仅会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力反对，而且中国也会发表一些言论和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反对，而或许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追随他们。

1.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把苏联和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区分出来，并在一次或几次政府的联合声明中巩固下来，这可以成为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比如，为和平和防止世界大战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反对美国的侵略冒险政策，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以及在关于现代国际局势的一些问题上——德国问题、越南局势问题、老挝问题、刚果问题、古巴的安全保障问题、在马来亚问题上的立场等。

2.应当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始阐述(要考虑到相关性)中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政策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对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对外政策路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应全文或者以节录的形式发表中国政府的一些声明，或者中共领导人就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声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些主要文件中国方面都是全文发表的)。

3.在一定的阶段应当表现出我们的报刊对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支持，这些建议对于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应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当基本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路线。比如，我认为，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提议可以一般地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强调，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且从

来都没有收回这一建议。

由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已经完全是一个事实，我认为，为了我们的利益应当主动表现出愿意帮助中国进入所谓的“核大国”行列，尽管徒有其名。在就这一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一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核大国”参加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共同的为实现完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

4.可以再次尝试通过磋商，同中国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总路线。我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比在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加容易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同时，看起来在印度支那地区上美国最近更加可能进行挑衅，推动我们同中国在此共同行动(美国在老挝问题上积极采取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在此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展广泛的运动，制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拒绝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斗争，不应该放弃担任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角色。放弃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还会被美国用来破坏日内瓦协议，该协议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束缚了帝国主义者。

5.或许应当审议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延期批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合国宪章进行变更的问题，利用这一问题通过亚非国家对美国及其追随者施加压力，以便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宣布说，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为扩大他们在联合国这一组织的代表权而进行的正当的斗争，但是不能批准有违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直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权利。

6.最好我们还能够主动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停止在各类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相互进行批评的问题，以后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应当努力事先进行协调，确定共同的发言的方针。

有理由认为，所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导致中国以及倾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支持我们其他的对外政策措施，或者至少不会努力破坏这些对外政策措施。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偏离我们的总路线，可以逐步贯彻这一路线，同时能够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外政策活动“纳入”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中，并以此加强斗争的主要方

向。

无疑，今后的实践活动会提出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改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中央会更加清楚，在此方面应当在什么样的时间内、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循序渐进地采取这些措施。

当然，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加强这种关系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看起来，这一过程最初会遭遇到中国旧的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他们最近鼓吹反苏宣传，设置一些障碍，而一旦同苏联改善了关系，他们将会被迫退后。同时，我们在苏中恢复关系方面采取主动还可以对中国的健康力量提供帮助，使他们压倒民族主义者。

一些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党试图继续积极地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阻碍因素，看起来必须对他们开展工作。使他们转而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方法，同中国的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作斗争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同时，我认为，采取新的对华工作方法中的一个客观上的困难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部分从事中国问题的工作人员出于惯性对中国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信任中国，不能明了加强苏中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采取以前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苏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意味着他们以前的看法和结论得到了证明：我们同中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我认为，不相信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会使一些同志出现一种趋势，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遵循以前的准则和判断，不由自主地寻找论据来证明这些判断，以中央提出的必须“警觉”，“提高警惕”为借口，以反对中国人的“虚伪和狡诈”为借口，夸大和鼓吹现有的一些消极因素和事实，而不顾其一般的联系，然后他们会以此不由自主地妨碍我们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苏中合作，阻碍利用一些新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认为，现在在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上就存在这类现象，他们受以前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影响太深了。受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他们难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难以看到苏中恢复合作的可能性和前景，难以随后促进这种合作的实现。

或许，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这种工作方法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教育工作中，一旦明白并揭露了中共领导人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看起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就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种总的对中国人感到厌恶的情感，因此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条足够明确的界限——中共领导人行动的界限在哪里？中国人民的界限在哪里？在这一问题上值得深思，为什么在我们的集体中会发生类似扎哈罗夫(贸易代表处的科员)同志的行为？他在今年10月25日在喝了一点酒之后，先是试图用手枪，后来用猎刀刺向了一名中国警卫。这是不是深深地表现了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呢？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应当好好地考虑一下，可以让一些同志暂时脱离涉及苏中关系方面的工作，而在随后，如果可以的话，当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再返回这一工作领域。

我认为，这些同志，其中也包括契尔沃年科大使，在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情况下，他看起来也非常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形式和工作形式。我认为，即使在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体会议之后，他仍然在极力强调和证明说，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新的变化，“一切仍然照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工作形式。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大使馆的工作产生影响。他对大使馆对外工作方面的态度也是这样。

同时，老实说，对于任命Φ.B.莫丘利斯基同志为大使馆的顾问令我感到吃惊，该同志从今年6月份到大使馆工作。

当然，在此谈论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中央是英明的，将会明白，这是否正确。

最后想就我们对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工作的形式和采取的策略谈论一些总的想法。

现在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正在不断发展，在这一体系中的各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利益，这些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这种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经常会赋予对外政策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使对外政策转化成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形式。

当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的时候，它们自然被迫在政治和经

济上会更更多地依赖我们。但是，随着它们的发展和巩固，它们这些国家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它们特殊的民族利益会对它们的对外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尽管这些都是一般自发的趋势，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国际领域协调总路线变得更为困难，而这些总路线是完全能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这首先会使我国的外交活动变得更为复杂，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先锋作用是得到了承认的。大家都还承认，苏联的政策和行动同坚如磐石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统一的有机体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事实上，为了使我们能够起到先锋作用，看起来就必须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集中并融合进我们的政策中，把它们汇聚为统一的总路线和统一的行动，尽管有时候这些政策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一任务使得我们这一先锋国家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不干涉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善于找到并强调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善于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在现阶段消除这些情况是不现实的。无疑，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对外政策的手段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的对外政治联系的状况，比如在联合国的地位等)。

当然，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太强大，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不大的时候，相对容易达成协议，而随后它们完全会失去先锋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但是当它们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国际地位的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就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致它们经常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我们的政策，更何况这些特点被作为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和激进的观点和行动被予以强调和鼓吹。

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国的大小及其对外政策的特点，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耐心地选择一条共同的、协调一致的立场，如果不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具体的问题就应当暂时被搁置起来。

这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加强协调，把每一个国家的政策纳入共同的总路线中，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状况和特点，通过定期地交换意见和进行协商，尽可能避免采取那些尽管总的来说是共同的和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适合某一个或某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措施，这些措施随后

仍然会是准备不充分的，从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还不是成熟的措施。

在这一问题上，看起来有必要成立一个合作组织，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组织各种“劳动分工”，该组织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对外政策上进行“乐队扮演和演出”，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并演奏它所拥有的乐器，由于它们被统一指挥，那么就会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的。

在新的局势下，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工作形式相对简单，比如向一些共产党中央及其政府通报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的意图(也即是说，这只是我们行动的一个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它会被其他所有的国家效仿)，在我看来，这些做得都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制定总的路线的立场的方法，其途径就是事先就我们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和措施进行协调，事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交换意见，要强调它们的平等地位，以便随后在仔细地考虑到它们的意见和想法的基础上就实施该项行动或者发表的声明的方法、策略途径和方式问题通过最终的决议，以便不损害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看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站在同一阵线并采取共同行动。在整个问题上，我认为与其做得慢一点，不如做得漂亮一些，以便我们采取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措施都能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然，这需要我们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我国驻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代表都更加积极地展开工作，或许，苏联外交部领导人需要更加经常地到相关国家进行访问，来协调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途径，它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出现新的分歧，避免使事态复杂，它无疑首先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不仅不会束缚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动性，反而会保障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采取统一的行动。苏共和苏联的先锋作用决定提出对外政策的主动权将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

是否会出现如下问题：根据上述所述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路线是否会过多地束缚我们自己的行动，丧失我们的先锋作用？不，这是不可能的。苏共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在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是由一些不可遏制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它已经积

累了最为丰富的经验，现在正在指引其他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是国土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正在以高速度继续向前发展，在马列主义理论上也不断向前发展。苏联和苏共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赶上。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无论是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或是在国际安全方面，我国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威望。

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是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其他共产党中发挥先锋作用的客观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我们的正确政策下中国领导人会危及我们的先锋作用。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主观上有发挥先锋作用的意图，但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现在没有，或许将来也不会拥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来发挥像我们国家所发挥的那种先锋作用，中国既没有发达的工业，也没有在整体上发达的经济，没有像苏联所拥有的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中国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教训，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失败，这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忘记的。

因此，苏共和苏联完全可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而且，我认为，在现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全力充分利用各个机会，以便达到如下这一伟大的目标：恢复和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共同行动，这要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基础，而事实上，这当然是以我们的总路线为基础。

在该信件中我难以更加具体和详细地阐述我的一些想法。或许，并非所有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其中的一些想法是值得关注的，并且需要澄清的话，我愿意另外进行解释，另外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谢尔盖耶夫

1955年入党，哲学副博士

1964年11月16日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70, л.83-114

№2077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

结果(1964年11月16日)

..... [344]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在现任中央委员会168名委员中共有146名出席了本次中央全会。其余未到会的委员都有正当的理由：出差、生病等。149位中央候补委员中到会的有137人，监察委员会委员到会的有54人。

那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宣布本次全会开幕。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报告：对于同一些兄弟党谈判和磋商的总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体会议决议的国际反响；兄弟党请求苏共中央对10月全体会议决议更加详细的解释，苏共中央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同兄弟党进行了谈判。讨论同兄弟党之间产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挑起的中苏争论的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建议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支持中共中央的建议。勃列日涅夫认为他们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活动。

关于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

.....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下面进行下一个问题——关于11月在莫斯科(我们)与一些兄弟党派谈判和协商的结果。

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同志。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苏共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与一系列兄弟党派之间进行的谈判和协商情况。

在10月中央全会上我们讨论的当然都是我们党内的的问题。不过，由于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因而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密切关注的焦点。

一些反动政治集团和资产阶级报刊也不遗余力地歪曲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含义，企图在群众中散布各种的谣言，即似乎苏共由于解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职务而随即也改变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全会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一些外国人迷失了方向。在那一段日子里，从个别兄弟党领导人的言论中我们甚至已感了些许担心和不安。

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报刊均作了相应的解释，以表明苏共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方针，忠诚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党的路线以及我们党的纲领。我们所作的这些解释性说明得到了所有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而所有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立场的马列主义政党也对我们表示拥护。苏共中央通过秘密方式向各兄弟党通报了10月中央全会的相关决议，以帮助其正确地评价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一些兄弟党还要求我们提供关于全会结果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在莫斯科接待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我们还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泽登巴尔 [\[345\]](#) 同志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应当与其他社会国家兄弟党举行会谈。我们还讨论了关于如何向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通报10月中央全会情况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党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近期，这场辩论已变得完全公开化了，并经常采取的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方式。该辩论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我们党与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兄弟党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思考了关于与这些党的领导人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以便相互讨论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十月革命节前夕，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并建议派一个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庆典。

在向我国大使通报上述建议的同时，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想借此与苏共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接受了中方的这一建议。中方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即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此期间，除了南斯拉夫外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都前往莫斯科。而针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除了南斯拉夫”，这是否是中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中国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这应看作是中方给苏方的一个建议。

我们认为，利用一切可能来谋求中共与苏共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改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的环境，这是我们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初衷，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事先与相关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协商之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给阿尔巴尼亚发出的邀请是通过对外友好协会的渠道进行的。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团。我们还考虑应当同时邀请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来访。

在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涉及了广泛的问题。但双边协商和谈判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召集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

下面我们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

一系列会谈情况表明，各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称赞我们党的列宁主义路线。

许多外国共产党组织表示要坚定地、无条件地与这些决议保持一致。许多共产党在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祝辞中均表示支持10月中央全会决议。

与此同时这些会谈也证明，个别共产党领导人依然对免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问题抱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意大利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在称赞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该党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理由是意大利同志们对这些决议的性质及其通报的方式感到意外。

持上述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在会谈期间极力向各兄弟党代表作了解释，即一些兄弟党的观点并不符合苏联国内现有的实际情况，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是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模式的真正体现。通过这些会谈我们解决了与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仍存在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上的差异。但最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各兄弟党的同志们都极力强调，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观点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妨碍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友好团结关系。

总体而言，我们与来访的各代表团所举行的会面和会谈是非常有益的。通过这些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向朋友们解释一系列与10月中央全会相关的问题，并与其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一些问题。

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和几个月以前已协商过的准备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的编辑委员会等问题，在我们与各兄弟党的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等共产党对该国际会议和委员会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跟从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仍与上述党派联合起来，并声称只有在全体与会者都同意的情况下编辑委员会才可以开始工作。英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认为，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他们并不拒绝在召集时参与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情况是相当复杂。已有61个党表示应召集此次国际会议，而在26个党中已有19个决定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至于一些代表团是否赞成将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定于12月15日，这倒不是什么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个问题仍需要与各兄弟党进行研究和商议，并最终确定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期限。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关于我们与中共代表的谈判情况。

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收到了中共关于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建议之后，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中央主席团便立刻向中央委员们作了通报。从通报中大家都已知道，我们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建议。当然，我们很清楚，中国领导人在这一

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打算，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继续制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件。

我们已了解到，中共领导人把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自己在这场思想论战中所赢得的胜利，从而能够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派。

就在不久前，中国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期间他们宣称，“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胜利，是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中国报刊转载了艾地同志的发言内容，即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新的相互接近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困难和阻碍，这都是因为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依然继续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艾地认为，对我们党的大会决议应当重新加以研究。

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些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次与中共接触的机会，来了解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已准备采取一些最起码的实际步骤，以促进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自己应当坚决强调，我们党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苏共历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苏共党纲和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中国代表团采取一些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设性步骤，并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认为，利用这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将有益于我们向其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停止反对兄弟党的宣传活动，放弃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另外，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以便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以促进苏中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

我们的确是带着良好的意愿来进行这些谈判的，并极力使谈判进程走上建设性的轨道。

我们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于11月8日开始，并在11月9日、11日和12日继续进行。

其中一些会谈常常是连续进行7个小时以上，会谈的内容既复杂又沉重，根本无法用速记的方式来记录。

会议伊始，情况就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谈判将是复杂而沉重的。中国代表试图利用当前形势对我们施压。他们对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反应积极并强调，这些决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又极力证明，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利于改善苏中两国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依然维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他们甚至宣称，不可能将中共的正确路线与苏共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会谈期间，我方代表团始终以平静而坚定的态度向中共代表解释，苏共行动纲领和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我们全党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我们代表团并没有在谈判期间向中方提出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人路线的问题，虽然对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均持不同见解。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代表团都要求其他党重新研究自己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必将走入死胡同，而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应总往后看，而应当着眼于未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存在分歧的条件下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至于那些涉及原则性的有争议问题，我们认为，双方都应当努力创造条件，留出足够的时间和创造更多的一起工作的机会，以便能够通过正常的、平心静气的方式来讨论这些已产生的分歧。

我们建议中共停止公开论战，并参加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我们还建议中国代表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苏共和中共应采取哪些共同举措以巩固反帝阵线。

讨论这些问题占用了我们谈判的许多时间。我们代表团极力以各种方式建议停止论战和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并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正常化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是在谈判初期总是极力回避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而当涉及苏共中央将坚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的问题时，他们表示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还说，如果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方针和维持自己的党纲，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应当说，同志们，我们并不害怕论战。我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是强大的，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拥护。我们认为，公开的论战，尤其是采取那些近一段时期所表现出的那样的论战方式，只能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也正是因此，苏共中央才建议停止公开论战。

在表示不愿意讨论加强反帝战线团结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身上还相当明确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领导人依然极力阻止我们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这在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与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甚至说，中共和苏共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直接取决于苏联是否仍继续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关键要看，苏方提出这一问题的语气和性质如何。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甚至指责柯西金同志的如下行为，即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竟然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宣称，“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走近美国大使时，我都感到脸红。他(柯西金)对待帝国主义分子的态度表明，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具有两面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康生同志作了通情达理的解释，即这不过只是约定俗成的外交礼仪罢了，任何一个政府首脑都会这样做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我这里提及这件事的目的在于，这个细小的插曲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同志所坚持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苏联肩负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责任。我们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而这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可是，当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讨论关于在反帝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时，他们却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我有些跑题了，请不要把这些话记入速记记录……(勃列日涅夫同志脱离报告讲稿所说的那些话没有被记入速记记录。)

关于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也在谈判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同志坚决地声明，中共将不参加已计划于12月15日召集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宣称，“如果你们想要讨论问题，而同时又想将12月15日举行的编辑委员会与前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这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中明显透露出神经质。从谈判

的过程中可看出，他们也清楚，拒绝与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可能会置自己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在坚持必须召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我们对他们说，关于召集这次委员会会议以及随后的各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决定代表了61个党的意愿。我们强调，召集会议的日期并不是非要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共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并愿意与各兄弟党共同致力解决所存在的分歧，那么关于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以便使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我们打算，今后在解决编辑委员会的相关问题时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尽可能多的兄弟党都能够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参加会议和共同致力于反帝斗争的建议是不可以被简单地拒绝的，因为这将置中共领导人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与我们会谈期间，中国代表极力使用各种借口以使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我们代表团始终采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论据充分地提出其他建设性建议，应当说，最终，中国同志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对我们说出了实情，即他们无权进行谈判。他们宣称，“我们的使命在于，建立与苏共的关系和研究目前的形势”。这一正式声明是由周恩来同志做出的。

在谈判的最后，中共代表们也开始采用比较平静的语气了。这尤其表现在11月1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在接受了我们根据其要求所提供的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承诺，中共将会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保密。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相互信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苏共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只要中方做好了准备，就可以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代表之间的高级会谈，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一步步地使事情向好的方面推进，从而恢复我们之间的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此类会谈的地点既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在北京，既可以采取采用公开的方式，也可以是秘密的方式。

我们还说，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为了赢得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和反帝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

周恩来同志答复道，他将会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一建议。他还补充说，“我们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营造新的环境和谋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我们与中共的首脑接触和讨论的情况复杂，但这些会谈毕竟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些接触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可能进一步看清当前的形势。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是否仍会坚定地捍卫苏共的原则性路线。至于其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目前仍难以预测。但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共领导人会放弃自己的一些幻想，并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利用苏共10月中央全会所营造的客观前提条件来促进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在与中共争论中，苏共所坚持的原则性路线依然是正确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自己的一些尤其是涉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言论中，说了许多欠考虑的、即兴创作式的不成熟的话，而这些话均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

(赫鲁晓夫同志的)此类声明以及针对一些国家领导人所发表的污辱性言论，违背了我们党的原则，给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从而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担忧。我们认为，10月中央全会已结束了这种情况。

同志们!

看来，我们今后仍将继续执行灵活的政策，坚持走通过党和国家渠道与中国接触的路线。如果中方要重新激化论战——我们不能排除这一情况，那么我们将会以自信和平静对话的方式来应对，而不是谩骂。

与此同时，我们仍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性立场。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可能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团结。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中共将会与其他兄弟党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发展前景的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不要使这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理由。而做到这一点就会在任

何情况下巩固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在与各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和谈判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今，我们已完全清楚地看到，这项工作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党和人民完全赞成10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而这些决议也得到了我们国外友人的理解。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所存在的那些困难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忘记敌人们正在极力利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今后仍将继续坚持斗争，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和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防力量。我们知道，此举不仅对我们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均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全体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以确保我们党坚不可摧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和国家的纪律，在落实我们党纲所提出总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掌声）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我们是否需要以上报告展开讨论？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了。

波德戈尔内：有人想发言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同志们，如果大家允许的话，这里有这样一个提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听取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与一些兄弟党谈判和协商的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通过相应决议，以表示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与各兄弟党代表团谈判期间所做的工作。

从会议厅传来许多声音：正确。（掌声）

波德戈尔内：大家接受上述提案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接受。

波德戈尔内：有必要表决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

波德戈尔内：有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一决议正式表决吧。赞成我所读提案(决议草案)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一致通过。

勃列日涅夫：对此我还想说几句。我们在对外通报中央全会的情况时，将不提及关于勃列日涅夫曾作过报告。因为这没有必要。这是其一。我想，大家都会对此表示同意的。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是的。

勃列日涅夫：其二，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根据我们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我们再次提请大家，当然这里既包括你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今后针对所有问题都要最严格地遵守我们党的相关规定，因为这些都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的财富。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即提请大家注意，并希望你们也相互提醒并引起注意。因为就曾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因为遗憾的是，就曾发生过此类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实，我们还未来得及)讨论的一个不需要国内，尤其是外部(不相干的外人)知道的重要问题，却在次日由“路透社”公布了所发生的一切。要知道，这种情况有时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的(给我们造成不小的)困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并相信今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制度(我相信，作为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我们一定会严守党的秘密，尤其是当中央正在强调不要泄露某个问题的重要性的时候)。尤其是当中央刚刚强调了这方面问题之后，大家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不向任何人泄密。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想，我们这样做是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受了委屈的。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们提交给本次中央全会的问题到此结束。如果同志们对本次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没有意见，也没有其他特别声明，那么全会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同志们！谁对苏共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有什么声明或特别声明吗？

表决：没有。

勃列日涅夫：那么请允许我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62, л.1-133

[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有些内容难以辨认，以省略号表示。——编注

[2] 正如1963年3月12日《真理报》所报道的那样，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信中阐述了关于兄弟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意见”。苏共中央还指出了，再一次强调H.C.赫鲁晓夫在1963年1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的党的立场，即“共产党之间应该停止辩论，并提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兄弟党代表进行双边会晤，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的建议”。由于这封信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2月23日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并与他进行了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中共中央对2月21日信函的答复函。正如3月12日《真理报》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信函中，都表示赞成必须举行双边会晤，以讨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问题。这些信的全文发表在3月14日的《真理报》上。——原注

[3]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关于H.C.赫鲁晓夫的立场，可参阅：1963年11月10日会议速记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也被改变了。——原注

[4] 在标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文中，继续活跃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文章还指出了，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里，“已经出现了正面的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近的过程”。——原注

[5] 可能指的是H.C.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12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当代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或者是在1963年1月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讲话（《真理报》，1963年1月17日）。——原注

[6]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是在1958年春天通过的。这个纲领被苏联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原注

[7] 自1964年起，南斯拉夫开始积极地与经互会组织进行合作。——原注

[8] 参阅：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963年2月21日信(参见：1963年1月2日第76号会议记录)和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文章(《真理报》，1963年2月10日)。

[9] 在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0] 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有误，斯大林阻止周恩来访问是在1949年12月16日的会谈中。——编注

[11] 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是对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于3月9日交给苏联大使C.B.契尔沃年科的信的答复函。苏共中央答复函所标明的日期是3月30日，于4月2日转交给中方，发表在4月3日的《真理报》上。参见：3月13日关于给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大使的电报的决议。——原注

[12] 在致苏共中央的3月信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H.C.赫鲁晓夫顺道来北京，以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根据中方的情报，赫鲁晓夫计划访问柬埔寨。而计划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Л.И.勃列日涅夫对柬埔寨的访问，也没能成行。4月，柬埔寨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双方签署了关于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协定。——原注

[13] 1963年7月5—20日，以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并没有消除双方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原注

[14]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1963年3月30日的信中谈到：从南斯拉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出发，可以把这个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领导人努力争取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符合兄弟党团结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路线。考虑到近期在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良好倾向，苏联共产党接着指出了，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认为必须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那些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观点(参阅《真理报》，1963年4月3日)。——原注

[15] 指的是M.图尔松扎德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代表Л.马克苏多夫的以下文章：《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和平斗争中巩固团结！实现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真理报》，1963年3月23日)。——原注

[16] 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于1963年2月4—10日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主席M.图尔松扎德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H.C.赫鲁晓夫向会议的参加者表示敬意(参阅《真理报》，1963年2月4日)。关于会议的总结情况，可参阅M.图尔松扎德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真理报》，1963年2月20日)。——原注

[17] 本决议是196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投票表决方式通过的。相关档案中没找到表决单。决议起草和提交人为Ю.Б.安德罗波夫。决议摘要于1963年3

月13日发送给Ф.П.科兹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以及给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电报已由Ю.В.安德罗波夫加盖印鉴。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留有用蓝墨水笔所作的签注：“已获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1963年3月13日。印鉴，1963年3月13日，В.马林”(РГНИ, ф.3, оп.16, д.241, л.146, 147)。——原注

[18]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19] 即朝鲜人民军代表张平山将军。——编注

[20] 在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与不扩散核武器以及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原则性分歧，出现在1963年，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的论战期间(可参阅《真理报》，1963年3月14日；4月3日；7月4日和14日；8月4日和21日；9月21—22日。还可参阅За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2е, доп.изд., М, 1964)。中国方面尤其反对1963年8月5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在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把这个条约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63年7月5—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公报可参阅：《真理报》，1963年7月22日)。——原注

[21]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22]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会议主席苏斯洛夫同志”。——编注

[23]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24]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25]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宣言”。——编注

[26]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声明”。——编注

[27]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第五条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的问题及其他问题”，而无第六条。——编注

[28]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希望”。——编注

[29]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句为“各国党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取得一致通过的宣言”。——编注

[30]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31]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编注

[32]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段内容为“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制定的共同意见反映了共同斗争的政策，苏共中央便在3月30日的复信中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阐述了表明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总路线的原则问题”。——编注

[33] 在收集的俄国档案中，该份文件的以下内容缺失，为便于读者阅读，根据解密的中方会谈记录文本补出了缺失的内容。——编注

[34]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脚注。——编注

[35]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斜体字表示的内容。——编注

[36]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同时也回答”。——编注

[3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基本上也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编注

[3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没有这一段。——编注

[3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10月1日”。——编注

[4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有如下一段内容：“实际上，对斯大林问题，对过渡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多次向苏共领导同志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编注

[4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不是“至”而是“和”字。——编注

[4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地名写作“海参威”。——编注

[4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4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4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4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以下会谈仍然是第二次会议的继续。——编注

[4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两句内容。——编注

[4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3月12日”。——编注

[4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5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波诺马廖夫的这句话为：“那么，格里申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该是多少公斤呢？布加勒斯特会议是由北京开始的。”——编注

[5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号。——编注

[5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5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苏共同志感觉到”。——编注

[5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这里没有分段，且本无此句。——编注

[5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内容。——编注

[5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同时说：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波诺马廖夫：这种话讲了好几次了！伊利切夫：什么赞成不赞成，应该愤慨！邓小平：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编注

[5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如下三句：“安德罗波夫：这算什么发明？苏斯洛夫：这是个好的发明。邓小平：好，今天就这样吧。”——编注

[58]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59] 中方解密的文件为第四次会谈记录。——编注

[6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解密。——编注

[6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邓小平：讲完了。怎么样？下一次，明天怎么样？苏斯洛夫：你们有什么建议？我们建议明天下午两点会谈，像今天一样。邓小平：可以。”——编注

[64]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6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为第六次会谈。——编注

[6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三行内容。——编注

[6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邓小平：现在休息，休息后接着讲，下午一点钟多一点可以讲完。”——编注

[6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对中国”。——编注

[7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分段。——编注

[7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你们不应该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编注

[7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否星期三(17日)上午10时继续会谈？”——编注

[73]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74] 中方解密文件为第八次会谈记录。——编注

[7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以上两句内容。——编注

[7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7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7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编注

[7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政府”。——编注

[8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是“组织中”一词。——编注

[8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事先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事后又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编注

[8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马克思文选》2卷52页)”。——编注

[8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5卷400页)”。——编注

[8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2页)”。——编注

[8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卷26页)”。——编注

[8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卷154页)”。——编注

[8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20—21页)”。——编注

[8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58页)”。——编注

[8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37页)”。——编注

[9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3页)”。——编注

[9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2卷317页)”。——编注

[9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55页)”。——编注

[9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228页)”。——编注

[9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休息20分钟”的内容。——编注

[9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表述。——编注

[9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可以由我再讲几句”。——编注

[9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苏斯洛夫：请允许我先讲几句。邓小平：好。然后是苏斯洛夫的发言。”——编注

[9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一句：“现在我们就我们会谈本身的问题讲几句话”。——编注

[9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无此句。——编注

[10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邓小平：好。苏斯洛夫：明天上午10时。邓小平：好。”——编注

[101]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批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参阅РГАНИ, ф.3, оп.18, д.177, л.1)。——原注

[102] 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于1963年8月5日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签署的。——原注

[103] 苏联关于缔结不进攻公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7月3日发表声明说：苏联关于缔结两个集团互不进攻的公约的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因

为签署这个公约，就等于美国承认战后东德和整个东欧地区的苏维埃化。——原注

[104] 8月5日签署条约结果的公报，参阅《真理报》，1963年8月6日。——原注

[105] 1963年7月25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及政府首脑，在莫斯科举行了协商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原注

[106] 参阅《苏联政府的声明》，《真理报》，1963年8月4日和8月21日。——原注

[107] 问题的措辞借用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内容(参阅ПГАНИ, ф.3, оп.18, д.188, л.81)。——原注

[108]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苏联外交部因中国公民于1963年9月7—8日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照会文本。——原注

[109] 参阅发表在9月21—22日《真理报》上的苏联政府的声明。无论是在以前的声明中(尤其是1963年8月4日和21日的声明)，还是在这份声明中，都阐述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整个范畴以及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立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争论的内容。1963年10月25日和11月7日，H.C.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放弃公开论战的建议，这个演说稿已经在报刊上发表。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再一次建议停止公开的论战，并提出能够使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的纲领。在苏联已经单方面地停止了反华宣传活动。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有所缓和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在中国的报刊上继续发表对苏联进行激烈攻击的文章。——原注

[110] 指的是署名为“电力厂”钳工队长B.穆拉维耶夫的标题为《谣言不可能战胜真理!》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9月10日的《真理报》上)。在这篇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转载的文章里，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攻讦。——原注

[111] 1958年，苏联从中国撤回了自己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担心在台湾危机尖锐化的情况下，北京将会针对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使用原子弹。——原注

[112] 指的是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尖锐地批判了这个条约，把它视为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并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原注

[113] 指的是新华社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的声明，其中谈到了所签署的条约的妥协性和毫无根据性，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这个条约掩盖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必要性。——原注

[114] 在中苏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之前签署的苏联与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许多协定，在1963年仍然被继续地执行。——原注

[115] 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都拒绝了在1963年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法国这一立场的基础，是夏尔·戴高乐的安全学说，这个学说赋予法国拥有自己核能力以重要的意义。——原注

[116] 指的是苏联政府的声明，发表在1963年9月21—22日的《真理报》上。1963年10月6日，为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收获量，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致全体工人、职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化学工业企业、科学研究和设计院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建筑组织、化学机械制造厂以及生产农业化工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各企业关于扩大化肥和保护作物生长的化工产品生产量的信(参阅《农业生活》，1963年10月6日)。稍晚些时候，还发表了一组学者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就提高农业产量和化肥生产量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同时还阐述了关于通过对作物本身的改良和对其采取保护措施的途径来减少化肥用量的想法——《真理报》，1963年11月17日。——原注

[117] 指的是毫无成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963年7月5—20日期间的莫斯科会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有：M.A.苏斯洛夫(代表团团长)、B.B.格里申、Ю.В.安德罗波夫、Л.Ф.伊利切夫、B.H.波诺马廖夫、П.А.萨秋科夫、С.В.契尔沃年科。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双方协议暂时停止代表团的工作，以便过一段时间继续举行会晤。自1963年9月6日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报刊《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批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原注

[11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9]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0] 巴苏陀兰(Basutoland)，莱索托王国的旧称。——编注

[121] 贝专纳(Bechuanaland)，从1884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后来成为殖民地(由南非管理)。1966年独立，改名为博茨瓦纳。——编注

[122]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123]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124] 马拉维的旧称。——编注

[125]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2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7] 大约从1963年开始，古巴代表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参加了几次经互会在布拉格召开的会议。——原注

[12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129]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最初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1964年3月7日的信中，包含了以下内容的建议：在1964年5月，举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晤；在1964年6—7月期间，举行1960年莫斯科会议筹备起草委员会组成成员的共产党代表的会晤；1964年秋季，举行全体兄弟党的会议。——原注

[130] 弗拉霍维奇，1940年曾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1963年时的身份不详。——编注

[131] H.B.波德戈尔内，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132] 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局面没有出现，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苏中冲突中，与北京站在了一个立场上，并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批评。——原注

[133] 在1963年12月9—13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Б.安德罗波夫、Б.Н.波诺马廖夫和Л.Ф.伊利切夫，就苏中关系问题进行了发言，阐述了双方分歧的实质。由于已经规定了单方面停止论战，没有在《真理报》上发表他们的演说稿。——原注

[134] 该文件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35]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36]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137]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138]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39] 原稿将“匈牙利”手写改为“某社会主义国家”。——译注

[140] 在原稿中将最后一个句号改为省略号，并手写加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及其委员会断然拒绝这些图谋”。——译注

[141] 此段在原稿被划掉，代之以手写文字，但字迹不清，无法翻译。——译注

[142] 括号中内容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143] 在原稿中用笔钩掉了这段话的引号。——译注

[144] 原文如此，未见题号“(二)”部分。——译注

[145] 此段在原稿中被全部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放弃”。——译注

[146]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47]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148] 此处原文还有被删去的一段话：“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个拥有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异己分子。资本主义一直试图把我们地球上消灭掉，但没有成功。我们……于是，便开始了和平共处。二战以后，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译注

[149] 这一段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你们不想让他们到自己这里来，就得相应地采取自己的阶级政策。”——译注

[150]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151]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152] K.阿登纳，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编注

[153] 本段括号内的文字是手写体填加的。——译注

[154] 这句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现在意大利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提出关于武装起义和内战的问题，那么第二天他们便会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译注

[155]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中国的形势极其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极其贫困。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译注

[156]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导致人民挨饿，如今事实证明‘大跃进’是一项冒险主义的政策。现在，他们不公布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统计数据。但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而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是极其严重的。”——译注

[157] 原文如此。——编注

[158] 有关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5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0] 约瑟夫·黑根，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编注

[16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3]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164] 参见以上文件№16472、№16476。——编注

[16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9]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该报告已散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原注

[170] 参见以下文件№21931。——编注

[171] 附录二未公开。——原注

[172] 参见以下文件№21932。——编注

[173] 这个草稿在编辑时根据1964年6月15日的文本做过校订。——原注该信件的中文本，作为1964年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表在1964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2版。这里的译文是按照信件草稿原文翻译的，苏共中央对草稿的修改，均有俄文编辑所加注释说明。读者可对照《人民日报》阅读。——编注

[174] 这里所标注日期是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报告的日期，而信件草稿是这个报告的附件(参见РГАНИ, ф.3, оп.16, д.476, л.19)。

[17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这封信件”，而是“自己的信件”。——原注

[17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自己的”一词。——原注

[17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先”一词。——原注

[178]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发现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和1963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原注

[179]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1964年2月29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原注

[18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18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提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好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原注

[18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近”一词。——原注

[18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例如”一词。——原注

[184]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将会导致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裂。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得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原注

[18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裂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像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原注

[18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

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原注

[18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原注

[18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两段文字被如下段落所替代：“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得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1957年和1960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

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像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原注

[189]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句表述为“中共中央断言”。——原注

[190] 这一委托是在会议上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决定下来的，不应在公开的媒体上公布。——原注

[191] 在《人民日报》中，此处为“下午会议”。——编注。

[19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争论”一词，而是“分歧”一词。——原注

[19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首先”一词。——原注

[194] 指的是1957年11月14—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真理报》，1957年11月22日）和1960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真理报》，1960年12月6日）。——原注

[19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是新的国际会谈”。——原注

[19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反党派别小组”一词，而是“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原注

[197] 校订后的文本中，“扶植”一词前有“人为地”一词。——原注

[19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此后填加了如下一句话：“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原注

[199]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宣传”一词前还有“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的词句。
——原注

[20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之后还有一句“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原注

[20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202] 在《人民日报》的文本中，“确认”一词前有“再一次”一词。——编注

[20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段最后还有如下一句话：“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原注

[204]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本段和上一段之间没有分段。——原注

[20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5月7日”一词。——原注

[20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本身”一词。——原注

[20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达成协议”一词，而是“商定”一词。——原注

[20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句为“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原注

[209] 在米高扬的批注中，此处有“考虑到形成的局势”一句。——原注

[21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不是如下内容：“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而“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原注

[21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有“苏共和中共代表的”一词。——原注

[21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原注

[21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用的是“共同解决”一词。——原注

[214] 该指示上标注的日期源自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参见：РГАНИ, ф.3, оп.16, д.476, л.19。——原注

[215]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复函所标注的日期是1964年6月15日，并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1964年第10期)。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在将达成协议的任何期限内，举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其目的是使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建议(曾经在3月7日信中提出过)：在近期的未

来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26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举行新的大型会议的前景问题。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磋商会晤是在H.C.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1965年3月1—5日进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新的大型会议是在过了几年之后，在1969年6月5—17日进行的。——原注

[216] 在俄国发表的档案中，此两节内容空缺。——编注

[217] 在致苏共中央的1963年3月9日、6月14日及1964年2月29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赞成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而在5月7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立场，建议推迟举行这种协商会议，最低限度推迟4—5年。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没有及时地召开这种会议，担心在苏中论战尖锐化的情况下，不能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而最终只能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分裂局面(H.C.赫鲁晓夫的立场，参阅：1963年11月10日会议速记记录)。临近1964年春天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给中共中央3月7日的信函中。两党立场的前后不一致性，取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有利于其中的哪一方，并与担心在会议过程中将不能获得对苏联共产党有利(或者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原注

[218]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会议的声明(参阅：《真理报》，1960年12月6日)。——原注

[219]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1964年6月15日的信中，谈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分裂局面，帝国主义分子将是多么的高兴，根据他们的意图显示，已经找到与那些能够实现这种分裂的人员接近的某种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注意到了，正是在现在，当中国宣传机关积极地叫嚣‘关于革命’和‘关于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执政集团尤其表现出准备与北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原注

[220] 威尔科克斯，时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221] 雅克·格里巴，时任比利时共产党书记。——编注

[222]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编注

[223] 赫鲁晓夫1964年6月15日至7月4日乘“巴什基尔”号船前往丹麦、瑞典和挪威访问，该文件为在此期间的口授记录。——原注

[224] 奈温，时任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政府主席。——编注

[225] 莫迪博·凯塔，时任马里共和国总统，苏丹联盟党总书记。——编注

[226] 克瓦米·恩克鲁玛，时任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创始人。——编注

[227]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包括：H.C.赫鲁晓夫、Л.И.勃列日涅夫、瓦罗诺夫Г.И.、Д.С.波利扬斯基、А.П.基里连科、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原注

[228] 1964年6月底，经过长期磋商，中苏边界工作小组双方达成了关于中苏东段

边界绝大部分走向的协议草案。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说到，苏联与中国也有领土问题，外蒙古比千岛群岛的面积大得多，还有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的领土，这笔账是算不清的。（见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37—46页）7月12日，参加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发表了毛泽东谈话的情况。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并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还提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编注

[229] 根据1920年的特里亚农和约，按照战胜国的意愿，把特兰西瓦尼亚(面积大约为10万平方公里)地区划归罗马尼亚国家所有，这个地区历史上属于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东部的一个州。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在民族意识中极其痛苦地接受了当时丧失这个地区的事实：要知道，自中世纪以来，传统上属于匈牙利“神圣的伊斯特万”国王的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命运，始终与匈牙利本身的命运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并不奇怪。霍尔蒂当局旨在修改匈牙利边界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打算)，在匈牙利相当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获得了支持，因这它也在极其努力地改写着新的地缘政治局势。1940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当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无数的匈牙利人把这个事实视为恢复了历史的公正性。1947年签署的巴黎和约，确定了匈牙利国家战前的、“特里亚农”边界线，仅对其做了不大的修改(不是有利于匈牙利的)，这样一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仍然被留在了罗马尼亚人的手中。1948年1月24日与罗马尼亚条约的签署，对于匈牙利来说，不仅是承认了在边界问题上的原状，而且还承认了那样一个事实，即几乎200万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于罗马尼亚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莫斯科关于有利于“人民民主阵营”团结的压力下，自4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修改边界的要求，连同批判性地提出罗马尼亚民族政策问题的内容，在匈牙利的报刊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当局，完全继承了自己权威性的前任的传统，极其慎重和小心地对待不仅是在匈牙利社会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开的民族统一情绪，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对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民族文化过去与现在的共同性给予了关注。大马季亚尔人修正主义的主观幻想，致使布加勒斯特官方也出现的幻觉，经常给两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造成麻烦(参阅匈牙利党领导人拉科西的回忆录：Людямя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8, №5-6)。正如从1956年秋天(还是在匈牙利发生起义之前)撰写的致苏联外交部的标题为《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罗匈关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54—1956年期间，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曾经多次向苏联外交官抱怨，在他看来，匈牙利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本人在内，所表达的两面派意见：仿佛他们有理由不承认战后的边界(АВПРФ, ф.077, оп.37, пап.191, д.38, л.56-6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出现打着复兴社会主义口号的社会意识的高涨，伴随着公开提出以前禁止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倡议者，自然不是共产党领袖，而是他们的论敌——共产党人革新派)。这引起了罗马尼亚领导人极其不良的反应。罗马尼亚领导人完全不倾向于在改革的道路上采取最畏缩的步骤，他担心复兴现有制度的思想，不仅会“传染”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而且会活跃匈牙利少数民族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追求使国家免受匈牙利变化之风的影响，乔治乌德治及其同僚，在自己的对内宣传活动

中，越来越开始强调大马季亚尔人沙文主义的危险性。自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起义爆发之后，这个方针被特别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在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其对内宣传活动中继续弹奏民族主义这根弦，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利用了对于全体罗马尼亚人来说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共同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联合是公正的。——原注

[230] 指的是使保罗关系出现麻烦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自两国人民摆脱了土耳其枷锁之后，两国相互追求多布罗加地区引起的，在历史上它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之间的一个州。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就曾经由于多布罗加地区发生过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中，无论是对于罗马尼亚人，还是对于保加利亚人。现在，北多布罗加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而南多布罗加地区则属于保加利亚。——原注

[231] 以H.C.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于1954年9月末和10月初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并积极参加了其成立5周年的庆祝活动。——原注

[232] 《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的内容。该报写道：中国首脑说，苏联打着保障蒙古独立的幌子，以《雅尔塔协定》为借口，实际上是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参阅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方面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根据《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希望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H.C.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同志于1954年秋季访问北京期间，曾经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作为对此的回答，苏联领导人声明说：“决定蒙古人民的命运，不是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而是在乌兰巴托，关于蒙古的国家性问题，只能由蒙古劳动人民自己决定，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做出决定。”(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独立的蒙古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至此仍不承认在现有界线范围内的蒙古主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苏联，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条件是：通过全民公决的途径确定蒙古人民追求独立国家存在的意图。1945年10月20日进行的全民公决，是全体蒙古人民支持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的证据。同时，在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蒋介石手中不仅继承了对蒙古国家性的怀疑态度，而且还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谋求。但是，现存的一个没有档案材料证明的说法是：1954年秋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以H.C.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在讨论因个人崇拜引起的错误时，中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只是在1962年12月，才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条约。在中苏关系尖锐化的情况下，希望使乌兰巴托成为自己与莫斯科论战时的盟友，北京才同意签署这个条约的。然而，在1964年9月的论战中，蒙古方面坚决地、以非常强硬的方式，支持了苏联关于1954年事件的说法，并把中国的声明评定为对苏联的“无耻的中伤”，同时指出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觊觎蒙古主权的意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参阅蒙古电讯社的声明，《真理报》，1954年9月10日)——原注

[233] 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声明说，毛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

至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中国关于在苏联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的理论遭到了批判，这个理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而是争取霸权的斗争：“在毛主席的中间地带里，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被他纳入到了中间地带里，并获得了‘反帝战士’的证书……除了把克虏伯康采恩、蒂森先生、洛希尔财团，或许还有弗兰科将军本人迎进自己的队伍之外，没有给革命运动留下任何东西。”毛关于千岛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为了大国的目标而与阶级敌人结盟并发挥作用的意图引起的。谋求苏联领土(远东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地区)的理由是，这些领土曾经属于过中国，这些谋求已经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借助于类似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线最初只是沿着距北京不到100公里的长城一线。要知道，中国的边界线的确曾经是在那里经过的，长城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文章中还写到，从历史权利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苏联远东地区领土的谋求也是毫无根据的，要知道，兴安岭以北地区从来也没有进入过中国的版图中，居住在那里的居民都是满洲的逃难者和向他们纳贡者；实际边界线划分的过程，伴随着俄国占领了阿穆尔水域的北半部，而中国占据了它的南半部，这在19世纪中期被《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固定下来了。现有的边界线是“历史上就形成的，并被生活本身所固定下来，而关于边界的条约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基础”。按照《真理报》的看法，把领土谋求视为普遍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仅是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而且还破坏了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签署的国际条约的体系，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原注

[234] 《真理报》以如下方式转述了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时所说的话：“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以东的地区是俄国的领土，而从那个时候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和其他地点，也变成了苏联的领土。我们还没有就这份清单算账呢。”(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毛演说中的这条内容被加上了以下注解：“无可争辩：沙皇政府实现了那种侵略政策，准确地说，这也是中国帝王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所实现的政策。在不同的时代里，有时是这一方，有时是另外一方更强大一些，他们相互占据着上峰”，但是，仅仅根据“在古老的年代里，一个帝王曾经战胜了另一个，然后自己也遭到了失败”这个理由，怎么就能够怀疑工人和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呢？要知道，他们世代居住和劳动在这些土地上。“那些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苏联领土的属性提出质疑的人们，是否会想到：世代生活和劳动在这片土地上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对待这种谋求的，要知道，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先的土地。”(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原注

[235] 根据稍晚些时候的资料显示，在中国居住着350万蒙古人，93万哈萨克人，11.5万吉尔吉斯人，1.3万乌兹别克人。(参阅С.И.Брук, 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2-е изд., М, 1986, с.373)——编注

[236] Н.С.赫鲁晓夫的资料不准确。根据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资料显示，在苏联有215万吉尔吉斯人，而在中国仅有10万多人。(参阅С.И.Брук, 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2-е изд., М, 1986, сс.143, 373)

[237] 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H.C.赫鲁晓夫致世界各国国家(政府)首脑的1963年12月31日信函。其中包含了关于签署国际协定(条约)以及关于在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时不使用武力的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北越领导人,对这封信函没有表示支持,他们竭力追求使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到这些国家的整个领土上。——原注

[238] 1963年12月底的时候,在塞浦路斯岛上,在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在美国的积极参加下,企图在该岛上部署联合国的军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64年3月4日做出决议,确定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性,根据该决议向该岛派出了联合国的军队。约翰逊政府促进了美国参加到越南的冲突中,其目的是阻止在南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西贡的军事顾问人数扩大了,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干涉阻碍了南越游击运动占领西贡的意图,然而,北越当局越来越被卷入到冲突的游击队一方。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到了北越军舰的攻击。过了几天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东京湾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有海军参加的针对北越的公开军事行动。这是使越南战争升级的决定性步骤,它导致了美国与北越的直接军事冲突。临近1964年底的时候,在南越已经驻扎了2.3万名美国军人。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的人数超过了50万人。——原注

[239] H.C.赫鲁晓夫弄错了。匈牙利人(马季亚尔人)迁移到现在的匈牙利境内,是在9世纪与10世纪的交界上,当时乌克兰人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话题可能指的是,马季亚尔人排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部落。当时匈牙利部落的首领不叫阿尔巴特,而是叫阿尔帕德(死于1907年)。——原注

[240] 参见以下文件№20802。——编注

[241] 参见以下文件№21938。——编注

[242] 参见以下文件№21940。——编注

[243] 俄国发表该档案时没有刊登该附件。——编注

[244] 参见以下文件№21939。——编注

[245] 草案所标注日期源自1964年9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所召集会议的日期。
——原注

[246] 参见以上文件№21938。——编注

[247] 该指示上所标注日期源自1964年9月23日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日期。
——原注

[248] 在发送给A.И.米高扬的那份指示草案中留有一些修改印迹。在“运动”一词之后用蓝色铅笔写了如下文字:“以我们所需要的行动路线对之施加影响。”在该页的左侧空白处与上述蓝色铅笔文字相对留有“A.M.”等字样。在校订后的指示文本中,“运

动”一词之后所加的文字已不存在。——原注

[249] 可能指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C.B.契尔沃年科。——原注

[250] 1964年秋季，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1964年8月，正值罗马尼亚摆脱法西斯分子20周年之际，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中国代表团可能谈到了关于罗马尼亚对苏联领土要求的问题。——原注

[251] 可能指的是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不包括第涅伯沿岸地区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敖德萨州的南部地区)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切尔诺夫策州)的要求，在1940年以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罗马尼亚方面没有正式提出关于重新审理与苏联的边界的问题。——原注

[252] 196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标注日期为9月30日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致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贺信。在贺信中指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上，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始终是，并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的、无私的和忠实的朋友。”同时表示坚信：“任何力量也无法破坏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原注

[253] 此前的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54] 原文没有带任何单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石油累计生产的数量，因为1959年中国的原油年产量是373.3万吨。——译注

[255] 以下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5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9]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26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消除现存的分歧和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苏共中央的包含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提议的1964年7月30日信函，已经分别寄发给了80个共产党。其中45个共产党在临近10月初的时候，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提议，与此同时，有许多共产党表示犹豫，也有些共产党的决定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

公开表示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朝鲜、阿尔巴尼亚和日本共产党也是如此)。苏共中央联络部预料,在编辑委员会组成中的26个共产党,将会有19个共产党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有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及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代表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和И.И.乌达利佐夫签名的致苏共中央的1964年10月6日的报告中,包含了关于举行会议和编辑委员会工作程序的具体建议。在报告中还建议采取措施,弄清楚那些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7月30日信函的共产党,对于参加编辑委员会工作问题的立场,并着手开始准备编辑委员会应该通过的那些文件的草案(《当代局势和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战争的斗争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致中国共产党的信函;致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致已经获得解放或者正在为争取摆脱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呼吁书,阐明在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原则》的文件)。在Н.С.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出现了希望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自己以前立场的愿望(包括在召开会议这个问题上)。然而,这些愿望落空了。在1964年11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此后,代表团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不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11月底,苏联共产党建议推迟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期限,把它从12月15日延迟到更晚些时候,以便有可能更好地准备这些会议,进行补充磋商。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了组织1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协商会晤,这次会晤是于196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上就消除分歧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忠诚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还讨论了关于准备和进行共产党的新的大型国际会议的问题,并确认参加了1960年会议的共产党代表进行预先磋商会晤是必要的。在1965年3月集会的共产党,针对越南事件发表了声明,谴责了美国对这个国家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原注

[260] 针对苏共中央决议的附带证明,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用蓝色墨水笔书写:“针对第162号记录。证明。针对记录第162号第1项的决议尚未出台。指示文本仍将继续进行加工整理。М.索科洛娃,1964年11月3日。”以上着重线由М.В.索科洛娃所加。——原注

[261]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蓝色铅笔加注有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修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这些文字。——原注

[262]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词之后的“附录一”被用普通铅笔勾掉。在修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3]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二”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4]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三”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5]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普通铅笔加注了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

这些文字。——原注

[266]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的“附录四”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7]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参见：РГАНИ，ф.3，оп.16，д.541，л.22)。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在一单独纸张上用蓝色墨水笔写有如下证明：“针对第162号记录第1项的决议未散发。电报内容仍将重新编定。1964年11月4日，М.索科洛娃。”——原注

[26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69] 在1957年5月7—11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并对苏联宪法中关于组织管理结构部分做了修改。——原注

[270] 因1962、1963连年歉收，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严重匮乏。烤制面包品种减少，规定出售杂粮，于是国内农产品消费受到限制。苏联向一些友好国家出口的粮食减少。因此，提出实行粮食凭卡配给问题，但未实施。1963年8月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主要从加拿大，部分从美国进口。——原注

[271] 根据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的倡议，梁赞州提出1959年度该州采购和向国家交售肉类计划超出计划两倍的过高保证。由于大力调动该州的一切资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两个计划。然而在报告中，他却采取谎报、从邻近各州购买牲畜和欺骗等手法，上报说已全面完了所承担的保证。1959年12月里奥诺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后，于1960年9月自杀身亡。——原注

[272] 根据赫鲁晓夫倡议，1959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与工人村镇的公民私人饲养牲畜的命令”，并要求国营农场在两三年内将职工个人饲养的牲畜收购完毕。由于各地完成这个命令不力，赫鲁晓夫在1963年7月31日的意见书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59年11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提议将国营农场的工人和专家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营企业的职工所拥有的宅旁园地面积减至0.15公顷。1963年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去研究。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提议撤销关于禁止个人所有制成分饲养牲畜与减少宅旁园地问题的决议，认为该项决议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原注

[273] 赫鲁晓夫于1964年5月9—25日对埃及进行了正式访问。——原注

[274] 水栽培法是在人造培养基中对植物进行无土栽培。——原注

[275] 赫鲁晓夫1964年8月4—18日到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北奥赛梯、鞑靼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库斯塔奈伊和垦荒州，以及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等地视察。——原注

[276] 1964年6—7月间赫鲁晓夫访问斯堪的那维亚三国：丹麦、瑞典、挪威。
——原注

[277] 为便于领导某些产品(谷物、甜菜、棉花等)的生产，1962年3月成立了地区性集体农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原注

[278] “在按人口平均的肉类、黄油和奶类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最先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22日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西北地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6月2日，赫鲁晓夫在1957年全苏农业和全苏工业展览会上，又第二次宣布了这个口号。——原注

[279] 根据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规定，计划提高和调整职工工资。第一阶段拟于1962年结束，但并未实现。——原注

[280] 关于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即按生产原则划分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决定，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1962年1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做出的。与此相适应，也改组了苏维埃机关。苏共中央1964年10月中央全会撤销了这些决议。——原注

[281]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2卷第351页。——译注

[282]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404页。——译注

[283]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79、383页。——译注

[284] 指1956年英、法、以色列三国对埃及发动的侵略战争。它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埃及政府对运河实行了国有化。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10月31日英法联合海军从海上封锁埃及，空军则对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当天，苏联政府即就英、法、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发表声明。11月5日苏联政府致函英法以三国政府首脑，指出苏联准备采取武力保卫埃及(1956年11月6日《真理报》)。1956年11月7日，军事行动停止。——译注

[285] 指赫鲁晓夫对确定西柏林地位问题所持的立场。1958年11月2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苏联政府就柏林问题向美、英、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照会。照会中声称：6个月后，将把苏联所有关于它同西柏林相互关系和关于驻德苏军在交通方面的一切权利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要求给予西柏林以非军化自由城市的地位。柏林问题曾经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然而苏联政府的提议均未被采纳。1961年6月21日，赫鲁晓夫发表强烈声明，宣布：如果西方大国不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将采取坚决的步骤。——原注

[286] 指赫鲁晓夫于1961年6月3—4日在维也纳同约翰·肯尼迪的会谈。——原注

[287] 将西柏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隔离开来的墙，建立于1961年8月13日。——原注

[288] 指1962年秋，因赫鲁晓夫倡议将苏联弹道导弹部署在古巴和美国随之封锁古巴而造成的国际局势急剧恶化。苏美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对抗，有发展成核战争的

危险，后经外交途径解决。——原注

[289] 指1963年6月24—25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
——原注

[290] 看来是指1964年4月25日至5月7日本·贝拉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同他的一次谈话。——原注

[291] 指1962年10—11月间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原注

[292] 1954—1964年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阿富汗、缅甸、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丹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挪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南斯拉夫等国。——原注

[293] 指1959年9月15—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原注

[294] 指1955年7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苏南谈判结果”问题时的发言。——原注

[295] 指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原注

[296] 指1960年2月11日至3月5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阿富汗。——原注

[297] 赫鲁晓夫曾经两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讲过话：1959年9月18日在联大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和1960年9月23日在联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原注

[298] 指1961年11月阿朱别伊访美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谈话，以及他1963年2月访问意大利、1964年7月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2—1964年访问古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芬兰。——原注

[299] 应西德报社之邀，阿朱别伊于1964年7月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朱别伊时任《消息报》主编而主要是赫鲁晓夫的女婿的这次非正式访问，被利用来推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阿朱别伊拜会了联邦总理艾哈德。在谈话中，讨论了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方在两个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可能性。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密切注意此次非正式接触，对于阿朱别伊的某些言论反映不好。——原注

[300] 1964年5月23日，纳赛尔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为巩固本国的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加强同苏联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同一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统阿梅尔也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原注

[301] 指在尼罗河兴建的阿斯旺水坝第一期工程完工(1960—1964)。——原注

[302] 1964年5月20日赫鲁晓夫在开罗接见了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卜德·萨拉姆·阿列夫元帅。——原注

[303] 指赫鲁晓夫1964年5月16日在阿斯旺市举行的向阿斯旺水坝建设者授勋大会上的讲话(载1964年5月18日《真理报》)。——原注

[304] 指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964年6月22日至7月5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原注

[305] 指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命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中央的共和国、州、边疆区内务部机关建立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部部长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同案件有关的处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驱逐、流放或在集中营关押5年以内的处罚。由于1937年7月31日开始了大规模镇压，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也建立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人民委员、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长和边疆区和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和州的检察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包括枪决在内的任何惩罚。1938年11月“三人小组”被撤销。——原注

[306] 指1950年在列福尔托夫组建的特别监狱。该监狱属联共(布)监察委员会管辖。——原注

[307] 谢罗夫1945年5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63年3月，在国家情报局工作人员别尼科夫斯基案件被揭露后，谢罗夫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其军衔由大将降为少将。——原注

[308] 指举行有为数众多的党、政和经济工作人员参加的扩大的苏共中央全会的做法。——原注

[309] 指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为了“协调和配合党组织的工作”而建立的苏共中央中亚局(1962年12月20日)和苏共中央外高加索局(1963年2月7日)。在赫鲁晓夫退休后，上述两局于1964年末撤销。——原注

[310]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基辅市列宁勋章的命令于1961年7月21日通过，关于授予基洛夫州列宁勋章的命令于1959年12月25日通过。——原注

[311] 指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原注

[312] 1958年6月2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一份意见书，建议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载1958年9月21日《真理报》)。根据这个意见书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8年1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取消了7年普遍义务教育制，代之以8年普遍教育制，8年毕业后实行义务生产劳动教育。——原注

[313] 指1964年7月1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按照全会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即解除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央的工作上，并推荐米高扬担任这一职务。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谈到农业发展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脱离农业和工业迫切需要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原注

[314] 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7月24日讨论了关于保证完成采购肉类、牛奶和禽蛋的国家计划的措施问题。但在1964年7月25日《真理报》上却发表了这样的消息：“1964年7月24日，在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下，举行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研究了制订1966—197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基本方向问题。”——原注

[315]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从1963年5月起开始编制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中1964—1965年的调整计划。1964年8月31日，苏联计划委员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送了五年计划草案。为了讨论发展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编制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9月26日举行联席会议。赫鲁晓夫没有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任何委员商量，就在开幕词中建议编制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或八年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原注

[316] 1964年4月17日，大规模地庆祝了赫鲁晓夫的70诞辰。为了表彰赫鲁晓夫的“杰出功勋”，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最高级奖章。——原注

[317] 1964年3月，赫鲁晓夫被授予1964年舍甫琴柯奖金，以表彰他在乌克兰进行的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原注

[318] 1963年4月，赫鲁晓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原注

[319] 1960年阿朱别伊被授予文学艺术列宁奖金，以表彰他的著作《面向美国：赫鲁晓夫访美记》。——原注

[320] 指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即苏共中央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7日)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1961年10月18日)。——原注

[321] 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赫鲁晓夫70诞辰时在苏联发行。——原注

[322] 指列宁于1922年12月口授的意见书。——原注(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37—343页。——译注)

[323] 在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1958年)上，赫鲁晓夫被推荐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原注

[324] 指1957年6月22—29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被从党中央机关清除出去。——原注

[325] 中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注

[326] 指英国作家斯维福特著作中的主人公，他在旅行时进入了小人国。——原注

[327] 中译文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

[328] 指1924年5月23—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原注

[329] 1956年2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建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以便改进对俄罗斯联邦党的工作和经济的领导。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兼任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原注

[330] 该文件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应在1964年10月14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编注

[33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4] 文件建议,根据所附目录向各地发送。得到相应通报的各国共产党有: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英国、德国、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原注

[335] 第一、三、四、五号附录未在这里公布。——原注

[33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8] 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因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于11月5—12日逗留莫斯科。——原注

[339] 上述越南同志只在11月8日参加了会谈。——原注

[340] 朝鲜战争期间,扎哈罗夫曾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常驻北京。——编注

[341] 该档案部分来自俄国发表的内容(关于苏中谈判),部分摘抄自俄国档案。省略号表示未抄写的内容。——编注

[342] 该发言稿曾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等阅读。在编辑过程中文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动:例如“缓和”一词的表述;还有一些段落被删节,如苏联国防部长П.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声明中的一些片段等。这里所公布的经过编辑的文本是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РГАНИ, ф.2, оп.1, д.762, л.114 131)。——原注

[343] Д.Н.艾地(1923—1965),从1959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

记，从1961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思想立场的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1965年9月30日，因发动军事政变失败被打死。——原注

[344]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345] 尤泽登巴尔，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第十一卷(1964.12—1969.6)

1964年

№16678 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1964年12月12日)

摘自B.B.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64年12月12日

第03525/TC号

绝密

文本第6份

与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谈话记录

1964年12月12日

应O.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请求接见了。

大使说，大使馆受布拉格委托，通报关于在莫斯科咨询捷克斯洛伐克武器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接着，大使告知如下：从1955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米格15战斗机、伊尔14运输机及其他武器，和供这些军事装备用的备件。从1961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事装备，除了备件外，其他已中断。

目前，中国人除了关注苏联方面早先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供应他们的T55型坦克外，已转向要求供应他们普通的射击武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由于自1961年起，捷克斯洛伐克不再供应中国这类武器，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要向苏联政府咨询中国的这个建议。

在谈到解决这个问题时，大使要求考虑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出售射击武器给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阿拉伯东方国家、非洲国家等。如果正面解决中国的要求，中国人准备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原料。

询问大使，从捷克斯洛伐克供应武器给中国有多大规模的问题。

大使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知。

大使答应立即将这个问题报告政府。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二等秘书А.Ф.波列佩契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АВРФ, ф.5, оп.30, п.107, д.451, л.163

№20776-1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生日的方式(1964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关于向毛泽东贺寿的报告

1964年12月15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1964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71岁生日。

在毛泽东65岁和70岁生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给他发了问候。贺词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

1960年和1962年驻中国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委托，被容许拜访毛泽东并转达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对他的口头形式的祝贺。

在当前的情势下，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祝贺其生日的简短问候是适宜的。

这件事在报刊上是不可能报道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纪念领导人生日纪念日的，并且在报刊上没有刊登过任何这方面的情况。

附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贺词和给苏联大使的指示。 [1]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В.安德罗波夫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593, л.61

№207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 (1964年12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2月23日会议

第183号记录第6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向毛泽东祝贺其生日”的决议

1964年12月23日

绝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一、同意给毛泽东同志的贺词(见附件)。

二、同意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见附件)。

附件一：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北京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生日到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谨向您致以热忱的祝贺，祝愿您健康长寿。我们真诚地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2]

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和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及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之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致以党的崇高的问候！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附件二：

北京

苏联大使：

请在12月25日拜访毛泽东同志，并把生日贺电转交给他(或是他所指定的其他人)。

如果您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则在会谈时请说出消除分歧和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希望。请强调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近来的多次关于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团结的必要性和关于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讲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请说出尽管形势复杂了，考虑到条件的变化，但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地朝着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道路迈进。

请呈报完成情况。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309, л.67, 119, 120

1965年

№207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65年1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5年1月14日会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决议

1965年1月14日

绝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Б.Н.波诺马廖夫。)

1.赞成外交政策委员会根据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上所说的意见而提出的建议，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见附件)。

2.认为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即将参加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大会的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谈话中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形成的有关措施同他们交换意见。

附件：

苏共中央外交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报告

1965年1月7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委员会10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使中苏两党之间和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停止在苏联报刊中的公开争论、建立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联系、就国家间一些个别问题做出有益的决定)。

然而，在1964年11月间，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见和谈话中，中国的代表没有对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有任何准备，回绝了我们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拒绝讨论与召

开起草会议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有关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克服分歧的建议。

中国领导的下列行为(刊登《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转载来自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来源的反苏联的材料，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党团活动)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尽力利用新的形势来改善同我们党的关系。所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同志下台和中国原子武器试验成功之后，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实力”处理同我们党和国家的事务。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内外政策的原则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使苏联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关系尖锐化，尽管他自己巴结一系列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他们还极力离间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党的关系，所有这些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即尽力利用一些党的调和政策的态度来最终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彻底的两国政治路线关系的正常化和逐步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方针，显然应该是当前我们对中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方针。在10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进行的、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触的尝试说明，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斗争中，不能认为存在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在近5—7个月时间内，以合适的方式，实施一系列措施来达到掌握主动权并逐步得到缓和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紧张状况和苏中关系正常化。当然，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加强苏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西欧、亚洲、非洲、美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工作，以便不给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意愿的机会来动摇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性。

就我们意见来说，考虑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在现今不应集中注意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分歧所导致的尖锐性问题，而应强调在为和平而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任务。同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互相交流信件、会谈、会见)适当表现出主动性、提出改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提出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同时就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具体的建议。

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受我们的建议，这将符合两国人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如果这些建议被拒绝，则在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表明，中国领导人将承担分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的责任，显示自己的观点的软弱无力。

这些步骤甚至允许苏共巩固自己同那些试图担当“调停人”(罗马尼亚工人党和其他党)作用的共产党的关系中的地位。我们在表现出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良好愿望的同时，要使把我党变成克服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敌人的企图变得困难，要阻止把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责任强加在苏共身上的企图。

当然，有关我们改善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步骤应当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党运动的领导人。为此，可以利用即将在1965年1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机会同他们)会面。

加强同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加强我们同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共产党关系的措施都具有特别意义。这些党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10月中央全会之后，表现出利用已经形成的局势来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的很大兴趣。同这些党的关系的正常化甚至能为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提供有力的帮助。

提出建议后，同时制定出措施，来反对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及在国际组织中建立的集团和采取的分裂活动。另外有必要在我们党内进行解释性的工作。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M.苏斯洛夫

Ю.安德罗波夫

В.波诺马廖夫

附件：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建议

1.苏联政府应致信中国政府，提出在1965年的1—2月间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举行政府首脑会见的建议。信中可以建议讨论苏中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含发展经济、商贸、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甚至可以就我们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从而达到更加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行径的目的。

引证在莫斯科的11月的会见是有益的，并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承认逐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将可能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起草信件文本。

2.依据第一点在实施过程中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恢复1963年7月 [3] 中断的关于党的路线的双方会谈的建议，从而有机会讨论消除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3.不管中国政府对于我们提出政府首脑会见和进行双方谈判的信件如何答复，我们都将继续实施以恢复苏中关系为目的的步骤：

(1)根据苏联外交部的路线，简短地向中国方面通报葛罗米柯同志和约翰逊与腊斯克会谈的内容。 [4] 利用这些机会，向中国方面建议恢复交换外交政策信息的做法，甚至可以提出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就一些重要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建议。

(2)在苏中两国1965年缔结有关商贸、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合作议定书和计划的谈判之时，责成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文化联络委员会发展和扩大在这些领域内的苏中关系的事务。

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军事物资和提供非公开选题范围的文件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同意。

在1965年我们两国之间商品流通的议定书谈判期间，提出扩大流通重要性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是长期协议的基础。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发展苏中贸易的意见。

在1965年1—2月举行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提出扩大苏中科学技术联系的重要性的建议。

(3)现在不要在中方面前坚持尽快解决边界线划定问题，而应加强谈判的准备工作。为此，委托苏联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一起，再次仔细研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边界线问题，确定边界可能性的方案。

(4)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双方议会代表团互访的建议。

4.既然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歧直接触动了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利益，那么就有必要在举行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谈判前举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咨询会，以便使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观点。这可以通过相互交流信件的方式进行，甚至也可以在1965年1月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进行。

5.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研究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所准备行动的措施，也就是防止同中国代表在这些组织中发生不希望发生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政策的斗

争中、在一起公开发表维护世界和平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宣言中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中国代表对苏联的外交内政进行攻击，则应该平静地以多种方式对这些攻击的实质给予回击。

6.委托苏共中央国际和意识形态部，向中央委员会准备并提交刊登在中央报刊的文章，在文章中，根据实际计划表明我们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观点。

这些资料的精神今后将刊登在中央报刊(《真理报》、《共产党人》)上，限制其他报纸从这些出版物中转载。

要有系统地在苏联的定期刊物和广播中刊登、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和外交政策。这些情况应纳入情报计划中。

7.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研究中国的工作萎缩了，甚至刊登中国的作品也大大减少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与意识形态部共同研究，如何改善研究中国的工作和保证出版中国书籍的有效措施。

8.鉴于1965年2月14日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15周年纪念日，因此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值此周年纪念日时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建议，并预先制定一定高规格的措施。

9.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党组织准备和提供公开的苏共关系状态的信息，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政府为这些关系正常化所着手实施的措施的信息。

10.在实施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同时，应该调整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的关系。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

11.我们在公共线路上恢复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效果。但是，不要放弃积极的行动，要在两国政府间寻找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应该邀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实际体验在苏联所实施的各种不同的国际主义措施(文化的、科学的、体育的，等等)。

甚至还可以通过驻阿尔巴尼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双方互换外交代办的可能性问题，以作为苏阿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委托苏联外交部提出合适的建议。

12.在近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来交换经验，加强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必要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曾在1957年访问苏联，而我方至今没有回访，虽然蒙古的同志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准备好建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РГАНИ, ф.3, оп.18, д.316, л.22, 31-34; оп.16, д.610,
л.116-118, 120-123

№207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1965年1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5年1月14日会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5]

1.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以及柯西金同志给周恩来的信的草案。

关于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波德戈尔内同志：未必有必要寄送。

勃列日涅夫、谢列平、柯西金、苏斯洛夫同志：赞成寄送。

寄送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从华沙回来之后进行的讨论。 [6]

柯西金同志：我赞成派遣党政代表团去中国。

关于起草委员会——取消赫鲁晓夫所期望的在国际运动中的羁绊，例如，中国依赖自身的力量，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

召开会议以代替起草委员会，这对我们的威信没有任何打击。如果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则只能讲讲某某规则——我们没有表现出自信心。期待在我们党内有真正的联系。

给代表团这种权利以支持华沙会议。

米高扬同志：关于3月1日(会议) [7] ——如果我们取消，则涉及我们的威信，会造成我们是在发号施令的印象。

我想，3月1日照常举行，同时指出——应当停止公开争论并要求(提出)专业意见。

我们使中国人处于自我保护的境地。

这时代代表团出访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计划，即两党代表在此会见的计划(在1965年的5月或稍晚的时候)。

不必派遣党政代表团。或者政府代表团。也不要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有关3月1日会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再失

去朋友了。在1964年10月就曾出现过困难，之后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才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将坚持还是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将起草委员会会议改期，那么我们将会处于困难的境地。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能(为此)失去更多的朋友。

建立起草委员会是否合适——不合适。但这对我们有压力。召开、讨论，就如同正常那样做，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会议中来。那时就不对所有的党提出建立起草委员会和听到来自所有党的呼吁。而提出建议——停止公开争论。

代表团——党政代表团就不要派遣了。

波德戈尔内同志：建立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不是靠降低我们的威信来得到的，不仅赫鲁晓夫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也同样。

仅仅是取消召开会议的呼吁。我们会失去很多朋友。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指柯西金)，请你重新评估一下我们同中国关系问题所引起不安的所有内容。

应当在华沙谈谈如何更好地进行会议。

关于政府代表的到达——大概不早于3月1日是合适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起草委员会对我们是有害的，但问题却是存在的。

分歧直至起草委员会的和其他分歧的存在，多年来，他们觊觎远东沿海地区，他们在党内实施分裂路线。中国人的快速侦察在1964年10月时曾有过：他们可不可以推翻(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如果进一步深入，则问题所引起所有不安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路线和我们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做出让步。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的)目的？

中国人能够(进行)欺骗，利用(这些)来达到离开共产党。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要以让步为代价。

关于代表团——估计不会得到成功，相反我们会打自己的嘴巴。

这里要小心。

不要接受任何决定。

限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

关于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 [8] (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和波利扬斯基)。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途经中国时进行停留。

谢列平同志：26个党的“起草委员会”名称本身是来自赫鲁晓夫的称呼。

在很多方面我同意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等同志的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3月1日(的会议)召集所有愿意来参加的人，来准备给81个党的准备会议提出呼吁。延期——不理解。

波利扬斯基同志：而如果只有40个党来，则把代表分开来准备会议。

安德罗波夫同志：主要的区别是——召开3月1日(的会议)将不进行资料的准备工作而是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延期3月1日(的会议)不是那么简单。

格里申同志：中国人将反对会议(无论是17个党、26个党，还是38个党召开的会议)。改变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改善关系，他们想在我们拒绝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来改善关系。3月1日(的会议)——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

谢列斯特同志：改善关系不依赖原则性的观点。召开3月1日(的会议)，3月1日之前不去北京。

基里连科同志：派遣党政代表团，就是解决起草委员会和三月会议

这个绊脚石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方确实如此。

今天，考虑到新的方案，并让柯西金同志进行分析审查。

柯西金同志：交换意见是有益的，问题使党的每个成员感到不安。

关于派遣政府代表团——3月1日之前不会出发。

柯西金同志：不要取消党政代表团问题。

每一次的谈判——就是一次让步。我不同意。

分歧是存在的，没有任何人认为他们不存在。

不同意赫鲁晓夫所期望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都没有变化。这方已经发生变化了。

任何人都没有意见即是党是支持我们的。

州委还在等待什么？(波德戈尔内)

柯西金同志：等待在原则问题上的让步还是丧失威信——从来没有人这样考虑过。

我没有看到召开起草委员会的好处。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谢列平同志：既然说毫不让步，我不反对召开3月1日(的会议)，但我不同意的是，为什么会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阿尔巴尼亚问题 [\[9\]](#) ？

关于专家问题——尽快召回。

为什么我们不想承认？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进行了讨论这个很好。我们的这次会议同赫鲁晓夫时期的会议是有区别的。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有害的

事：阿尔巴尼亚问题、莫洛托夫集团和有关斯大林问题。

柯西金同志的关于给北京的信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关于去越南，由柯西金同志在去(越南的)路上准备到北京会见的材料。

原则上赞同有起草委员会发出给兄弟党的信。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9, л.22-25об

№25559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 ^[10] (1965年1月14日)

刘晓向契尔沃年科C.B.递交了中国政府对1964年11月21日苏联照会的答复。

.....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是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大会，而正如大家都承认的，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非洲国家，因此它没有任何根据参加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接着照会中讲到其他国家也反对苏联参加大会，因为苏联不是1955年的代表大会参加国，“预先决定苏联无权参加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可改变的”。

照会中又说，苏联的立场变化多端，即过去不想参加，而现在想参加：

“我们有资格问一下，苏联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怎能取得大家的信任？”

“苏联无权参加，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契尔沃年科指出，苏联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刘晓说：“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真正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不一定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还有支持斗争的其他机会，并且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继续提供这样的支持而不参加这一会议的话，会更好一些。”

在这一问题上，刘晓解释说，他谈论的是他个人的意见。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4-19

№207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65年1月28日)

绝密

..... [11]

5.委托代表团利用可能的机会，在北京会见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来交换有关苏中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和国际局势的意见。这些主要依据1964年12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记录中的意见、说明(附件四)。

附件四：

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两国政府关系问题交谈的材料

绝密

应该指出的是，1964年11月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期间，苏联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之间进行了有意义的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交换。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双方都意识到，有必要努力使苏中关系逐步正常化。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认为，为克服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所做的和将要作出努力的同时，现在重要的是讨论促进改善苏中两国政府关系的措施。

在同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谈话过程中，试探他们对新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会谈的态度。这是为了讨论恢复苏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是为了交换国际形势问题的意见的问题。

通知中国同志，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贯彻苏共10月中央全会和11月中央全会决议的行动。谈谈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关于联合工业和农业州委党的措施，有关准备采取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提高农业经济生产的措施。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措施、有关工作和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决议，甚至还可以通报有关近期苏联所采取的重要的外交政策战略。

通报中国同志，有关苏联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目的，使他们产生对印度支那半岛局势问题的思考的兴趣以及对将来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奋斗，反对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问题思考的兴趣。

一、我们可能主动提出的问题

我们认为近几年来苏中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交流严重减少是不正常的。接下来应当说明存在的一系列的严重缺陷，在实践中存在的那些不足，这些活动是在国家间协商所得的结果。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1959年我们两国的贸易额为18.5亿卢布，而在1964年同期为4亿卢布，也就是说下降了3/4多。对比这两组数据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领域的事务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像这样的经贸联系的缩减不仅不符合我们两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而且也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并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额外的好处。毫无疑问，在最初的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经贸联系，是我们两个政府间关系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然，在近几年商品外贸结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建立同第三世界国家这样或那样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我们国家另外的要求。但在双方的意愿下，是能够找到很大的可能来尽快恢复苏联和中国广泛的商贸关系的。

1965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了商贸谈判。我们希望根据两国利益，尽最大可能的方式增加贸易额。

例如，无论是苏中缔结普通的长期商贸协议，还是某一类商品贸易协定，都将在发展商贸联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协议中可以预见以后几年的相互供应的广阔前景，从而为后来发展贸易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

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协调我们两国的商业活动和交换对外经济信息是发展我们经济合作的重要措施。苏联一方应该提出合适的建议，或许我们值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苏联与中国在相互发展的基础上扩大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问题。至于在这些领域内的扩大合作问题的具体计划，可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定期会议上进行研究，我们提议，在1965年1月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1965年文化交流计划谈判时进行研究。

根据情况，允许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谈及中国政府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向中国提供T-55型坦克请求的问题。可以告诉他们，苏联政府没有改变以往的希望扩大同中国进行合作的愿望，现在准备考虑向中国提供T-55型坦克的问题。

有关在国际舞台上协调苏中之间的行动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由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和为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而奋斗的努力是必要的，并且共产主义也要求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采取一致行动。

以前，苏联和中国政府广泛地协调各自的国际政策战略，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就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正常的信息互换。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我们之间的行动协调遭到了破坏，咨询和交换信息实际上是停止了。由于这样，苏联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行动往往不能协调一致，这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许多的损害并可能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

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有必要采取保障协调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行动的措施，并为此目的在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框架下恢复实际的咨询和相互交换信息的措施。这样的咨询将会及时预防发生许多误会和将会大大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有关不容许有相互攻击的公开论战和言论

如果在同中国代表交谈中涉及有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问题，则说，工人阶级的国际

主义利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特征和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的精神都要求我们两国不容许有相互反对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苏联方面将采取措施，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刊登这样的言论。

我们再一次建议达成有关不容许有攻击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的协议。这将改善苏中关系整体氛围，有利于巩固我们的团结。

有关苏中高层代表的会见

可以高兴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最近几个月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恢复。我们认为，1964年11月，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有益的。我们当时提出了有关进行双方高层会见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对此原则上持积极态度。

在1964年11月形成的扩大交流的意见中，我们建议你们举行苏中双方高层代表会见，以便探讨涉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等问题。

会见将可以作为相互理解的成果的一个良好基础，并逐步推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同志关系的恢复。如果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则这样的会见可于近期在莫斯科或者北京举行。

二、可能由中国方面率先提出的问题

苏中关系中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由我们首先提出未必合适。同时，中国方面也有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被提出，则在交谈中可以根据下面表述来进行。

有关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

如果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谈话过程中涉及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时，则像同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时所谈的那样，甚至可以根据1964年11月24日所转交的信件作出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继续向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就准备会议的形式和方法等相关问题征求意见。对中国同志来说，我们把即将在3月1日举行的、同兄弟党代表的会晤看作是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我们所指的是，在这次会晤中可能要求所有兄弟党积极参与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中国同志能为召开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准备事宜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爆炸装置

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原子武器是一个积极因素，这一因素将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防。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开世界主要国家讨论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原子武器问题的会议的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苏联政府，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思想，并指出苏联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样的会议能够召开并以积极的成果结束。

应该指出的是，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中印冲突的苏联立场

如果在交谈中涉及有关中印或苏印关系问题时，则应指出，苏联政府同印度发展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如同发展与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关系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的任务是帮助它们巩固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尽快结束过去殖民主义的遗产，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它们的多种形式的压迫，帮助它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苏联政府多次采取措施，以促使印度政府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为此，还同印度政治活动家举行了相关会谈。苏联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1962年10月24日所提的建议方案，即以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调整冲突。

应该指出的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咨询，可以在我们两国关系中预先防止发生不希望发生的误会。

如果中国代表团提出向印度提供苏式武器的问题，则说，给印度提供一些种类的苏式国防武器也不可能改变中印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接近。如果我们不给印度以武器帮助，那么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帮助它。我们的拒绝将可能会促使印度进一步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联系，这将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利益。

有关苏中边界

苏联政府的根据是苏联和中国之间没有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长期以来在我们两国之间边界是友好的和合作的，并且这种状况应该保持下去。

基于国际主义的立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与边界安置相联系的问题不能成为它们之间争吵的对象，也更不能成为它们关系恶化的理由。而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应该以兄弟合作的精神来进行调整。

有关提供成套设备

如果中国方面提出有关苏联恢复完成有关援建68个企业 [12] 的1961年6月19日协议的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国方面的倡议，完成这些义务的期限被延期了两年，至1964年。如果中国方面不提出恢复供应或延期完成的问题，则苏联方面也不正式提及这些义务)，则可以不给以明确的同意，如果中国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关于提供成套设备的愿望，则指出，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有关1962年大批新疆居民迁移到苏联

关于1962年中国大批居民迁移到苏联的问题非常复杂，对苏联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所谈的问题涉及几万人的命运，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妇女、老人和孩子，已经来到了苏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俄罗斯或苏联出去的苏联公民。

从那时起，过了两年多时间，这些人来到了苏联。在这期间他们已经分别安顿居住下来，得到了住房，也被安置了工作，他们的孩子上了苏联的学校，很多年轻人已经和苏联公民结婚了，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让所有人回到从前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求我们对这些人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将会引起不良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在也将申明，我们准备提供所有的措施，帮助那些表示愿意回到中国的人。现在表示愿意回中国的大约有1000人左右。中国方面同意接受这些公民，将可能为逐步解决这些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的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那些人所希望的。

有关叛逃者和未回国者

如果在谈话中，中国方面提出有关中国公民在完成学业之后拒绝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有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叛逃到苏联的人的问题时，可以这样回答，苏联政府从来没有赞同过也不会赞同这些中国公民的行为。这些人没有被容许享有政治庇护，也没有被接受为苏联公民。苏联政府机关经常做解释性的工作来说服他们返回祖国。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返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前采取的一切措施就是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610, л.110, 116-123

№25767 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 [13] (1965年2月6日)

2月6日我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

我向他通报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

……说“打算广泛隆重地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

2月12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隆重的报告会。如果潘自力大使和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想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将提供这种机会。张德群表示感谢，说这是“大好消息”。声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定参加活动。

据我们所知，与外国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向中苏友好协会的中央理事会建议互派代表团。苏中友好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也有意提出与友好城市上海互派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建议。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准备组织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活动。

张德群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也要举行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正在发出邀请函。

АВПРФ, ф.0100, оп.57, п.510, д.7, л.13

№11466 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1965年2月10日以后 [14])

苏联代表团关于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的报告

1965年2月6—10日

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今年2月6—10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Б.安德罗波夫，苏联民航部长Е.Ф.洛吉诺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空军主帅К.А.韦尔希宁，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Г.С.西多罗维奇上将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И.С.谢尔巴科夫。

1965年1月31日，苏联报刊关于苏联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刊、电台和官方宣传立即开始广泛报道关于苏联和越苏人民友谊等方面的各种材料。

2月6日，苏联代表团抵达越南的当天，所有中央级的报纸都在通栏标题“热烈欢迎由А.Н.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用越南文和俄文写的)下，发表了社论，柯西金同志的照片、简历和其他材料。

数千名河内居民的代表，来到装扮一新的嘉林机场，与范文同、黎笋、长征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欢迎苏联代表团。范文同和柯西金先后发表了讲话。

在从机场到苏联代表团下榻的主席官邸，沿途有首都10万居民欢迎代表团。到处都挂着苏联和越南的国旗，欢迎苏联代表团访问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标语和口号。

代表团到达驻地后受到胡志明的接见。

当天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欢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2月7日，为庆祝苏联代表团来访，河内中央广场举行了首都8万人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河内市长陈维兴向代表团致欢迎词。А.Н.柯西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当天早晨，由А.Н.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向英雄公墓献了花圈，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浏览了河内市容。

2月7日下午，由柯西金和胡志明同志分别率领的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在2月9日继续进行，最后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1965年2月10日)。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阮维桢、黄文欢——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阮文镜——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黄文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2月8日，代表团参观了河内郊区的合作社，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群众集会。A.H.柯西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K.A.韦尔希宁及其陪同人员当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举行了会谈。

2月8日晚上，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苏联代表团下榻处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

2月9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参观了河内机械厂。

越南少先队员在主席官邸拜会了苏联代表团。胡志明也参加了拜会。

晚间苏联代表团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官员，此后胡志明设晚宴。

2月10日，早晨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此前柯西金与胡志明举行了长时间的告别会见。

在嘉林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苏联代表团仪式。范文同、黎笋、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

苏联代表团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逗留期间，范文同一直陪同代表团。胡志明出席了所有招待会、会见和音乐会。

企业集体、社会团体和一些公民向苏联代表团发来100多封贺信、贺电。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为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向柯西金同志发来电报。A.H.柯西金复电阮友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85—4287页

No13866 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1965年2月11日)

绝密

柯西金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65年2月11日

这次谈话在位于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楼里举行。

毛泽东一边同柯西金打招呼，一边说，苏联代表来到东方是很好的。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是应该来看看的。

柯西金：您说得对，但有一天您也应该来西方看看。

毛泽东：没有人邀请我们去。

柯西金：我们现在就邀请您。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接下来，当谈及他的工作，毛泽东说，他是党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很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也很少参加中央全会的工作了。他说他很老，快死了。

柯西金回答说，所有现在活着的东西，都是有生死的；这就是生存的辩证法。很难说，哪个会先行一步。然后他说，毛泽东肯定在关于建党和建国的理论问题以及辩证法和其他重要理论上给予了很多关注。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人能够逃避。

毛泽东：您说得对。我对辩证法尤其感兴趣。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

举例来说，越南人中，有哪个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面临的情况逼得他们不得不打。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之下，法国人从越南逃走了；他们撤离了军队，大概有20万人。然而吴庭艳开始杀人了。这些血腥的镇压引起了仇恨，结果民族解放阵线形成了。有时候，南越人民试图进行政治斗争，那时游击战扮演了补充的角色。然而现在很清楚了，只通过一场政治斗争并不能获得所有东西。有些人认为必须同时进行政治和

军事斗争，这显然不对。谁能说事情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意志呢？

柯西金：美国人想到处移植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只有愿望是不够的。特定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必需的。

毛泽东：现在越南的主要问题是游击战，政治斗争成了次要角色。战争范围越来越大。现在美国人开始轰炸北越了。但是，这又怎样？死掉一些人又有什么可怕？今晚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南越的游击队空袭了位于14度以南的防御区，摧毁了3个伪军连，还杀了几名美国人。

柯西金：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很有效的，包括提供武器。关于向北越提供地空导弹，我们与越南同志达成了协议，用来防御河内和其他地区遭受美国人空袭。我们还打算提供大炮、坦克、鱼雷艇和许多其他武器。显然越南人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会遇到困难，我们还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派出我们的军官去训练他们的士兵。虽然我们与越南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将越南抛在一边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吸取经验。飞机现在毫无用处。

柯西金：在和周恩来谈话时，讨论了在越南问题上我们协调行动的问题。我们也和越南人谈了这一点。我们感到在这件事上我们意见一致。至于美国人，他们逞强和挑衅的方式只能是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强大的信号。

毛泽东：他们有什么强大？现在13艘航空母舰里有4艘在南海。1958年我们开始炮击美国人占领的岛屿时，他们派了更多的航母来。我们继续打炮，他们甚至派了部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来，甚至后来旧金山的第一舰队也来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南海，我们已经停止打炮了，他们无所事事。水手们在新加坡休息了两周，就回母港基地了。现在中国拖住了第七舰队这支最强大的舰队。

柯西金：苏联军队在德国遏制着美军。我们不得不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就像亚洲这边，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只要稍有松懈，帝国主义马上就会抓住机会。

毛泽东：那么，你们照看好西方的阵线，我们在亚洲这边保持斗争。是美国人迫使我们协调行动。

柯西金：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我们的军队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美国军队遍布世界。他们总共有270万，其中欧洲和亚洲就有100万。

柯西金：他们不得不分散兵力，这不会增加他们的实力。

毛泽东：他们只有18个师，其中一半部署在国外。

柯西金：从人数上说，美国的师是我们的两倍，但是在技术上比不上我们。比如，美国的师装备的坦克比我们少，大炮比我们多。

毛泽东同志，我想问问您，有一次您通过我们的大使询问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些成熟的问题。您那时说如果是最高层的会谈，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许多一般会谈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这个机会？

毛泽东：我还说了其他的话，那就是，我不赞同你们的方法。我说如果继续公开论战，天也塌不下来。我说过，现在也讲，天塌不下来，树照长，鱼照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这些都跟我们的论战没关系。毕竟，公开论战就是用钢笔、毛笔和纸的方式进行的斗争，死不了人。就是说，我(毛泽东继续讽刺地)喜欢你们的公开论战。我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和罗马尼亚同志们谈过。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大概再过15年，因为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会弄清楚。你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说必须停止论战，不允许分裂活动，到时候我们再出价。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都要再持续一万年——少一点都不行。

至于所谓的分裂活动，既然我们是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你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排除的一些共产党人。当前，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新的共产党，比如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比利时、巴西和其他国家。你看得出，他们都是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条主义者无条件支持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做，就是你们指出的(分裂)活动。不用比较也知道，你们会更积极地支持你们的马列主义政党。

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而且，

我必须指出即使在我们党内也有人站在你们一边。比如，陈毅、周恩来——他们就站在你们一边。他们敦促你们不要在3月1日召开会议。我个人赞成你们开这个会。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和我，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赞成你们开这个会。你看看，我们这里也是有派系的。他们总是督促你们，我认为一个人说服不了你们。将会期从12月15日改在3月1日没有必要。毕竟，这对你们不利，会削弱你们的权威。我认为也没必要改掉会议的名字。比方说，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你们最好用原来的名字。你们总是改来改去，这样不好，毕竟你们是伟大的列宁的党。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你们这边。我尊重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开这个会。是周恩来和陈毅反对你们。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你说的树啊、鱼啊、女人啊都是正确的。毕竟，进化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这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继续公开辩论的事实。这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问题存在于另一面。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 and 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很重要。我们党赞同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和人民非常珍视的。

毛泽东：当然，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柯西金：我并无讽刺之意。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我说的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出于客套。当我说对中共的尊重时我没有违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团结。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您说钢笔和纸杀不死人，但是它们是意识形态，比任何武器都厉害，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巨大影响。您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另外，当我们谈到与你们党的代表会谈，消除我们分歧的时候，我们遵从的事实是情况在改变，形势在改变，和平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当然，一些事情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也认为解决它们需要在一个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但是毕竟很多问题是次要的事情。我们应该从中解脱出来。论战也可以发生。但是必须是一种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的论战，必须是踏实的，以一种友好的精神进行，而已经存在的分歧必须通过科学的，建立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讨论。

毛泽东：您所说的这些论战，没有任何意思。我倾向于你们在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1964年2月的大会上所进行的那种论战。

柯西金：您以为我们不害怕公开论战？我们的确不害怕。但是当人

们斗嘴的时候，至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争吵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和你们进行一场争论，有关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谴责我们说苏联违反了这一点。是的，这是一场制造出来的争论。毕竟我们所有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还能依靠谁？也许你们认为我们在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不是正是我们澄清这些故意制造出来的分歧，会见并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吗？我们现在没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你说要把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到一边，推迟一万年。如果这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推迟两万年。然而，革命运动存在，而我们正在这场运动之中，我们应该一同走出来，而不是相互反对。我们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超过把我们分开的力量。

毛泽东：应该推迟一百年。

柯西金：可以顺其自然地推，比如说，X年。但是这将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有一次我在一个欧洲国家会见一群西欧共产党人。他们一直在说，中共和苏共的分歧正在把他们的运动引向反面，使他们不再解决主要矛盾。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拉开，来考虑谁在争论中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还是苏共？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不行？我相信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我们两国的人民——他们正在等待我们解决分歧的看法。这些分歧现在没办法解决，但是可以通过一种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甚至可以创造一份理论报纸。

至于理论上的争论，可以不损害我们的团结而进行，在我们任何一份理论报纸的专栏里。

毛泽东：你们在布拉格已经有这种报纸了。

柯西金：它叫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但是那不只是我们的报纸，而是所有共产党的报纸。

现在说说3月1日的会议。我们不打算召开这次会议，但是一系列共产党都希望召开。是通过咨询的形式还是通过起草委员会见面的形式召开这次会议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您反复说在现有条件下有必要召开一次由81个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

毛泽东：我们在过去说过，要准备一次会议，我们需要4到5年，而

现在，显然，需要8到10年或者更多。毕竟，争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见面？你们，比方说，还在支持范燕东。你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带领，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对印度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我们没有派遣一个代表，我们甚至没有送给他们一个电报。在斯里兰卡也是这样。我们提供不充足的支持，而你们提供了全部支持。

柯西金：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北京访问了你们。这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时间会流逝，到时候会有接触，多边和双边协商。

柯西金：3月1日的会议正是一次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各党进行多边协商的会议。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成这次会议。请开会吧，别改日期也别改名称。把26个党的代表叫到一起；只有少数人不会来。毕竟你们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柯西金：但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反对几个党见面商讨何时以及如何召开一次81个共产党参加的大会？您认为这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什么害处？如果有人想要为将来的会议出台某些统一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在你们7月14日的来信以及后来11月24日的来信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加，你们就会无视我们继续开会。

柯西金：您应该考虑到在10月中央全会后莫斯科的新情况和形势。毕竟，你们不想这样。

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一些。

柯西金：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你们适应，像同志们之间做的那样，我们对你们是尊重的，我们正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

毛泽东：不一定。你们在报纸上不会发表我们的文件。

柯西金：我们正在发表一切对我们来说合适的文字。我们已经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的详细内容。但是，没有提到

这是来自苏联最高委员会的报道。

毛泽东：这说明我们犯了个错误。但是你们打算对阿尔巴尼亚怎么做？毕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开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只能在阿尔巴尼亚和你们之间解决。绝不能折磨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那样是很不好的。我们很高兴你们会恢复之前的关系。

柯西金：你们没有注意到吧，在10月的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负面评价了。当(华沙条约)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在(1965年1月)华沙举行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也是被邀请了的，但是他们对此的回复是一封侮辱性的回信。无论如何，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没有回应这些谩骂，并且和阿尔巴尼亚人沟通，表示这个邀请依然有效。告诉你们的同志们准备好所有材料，看看是不是在10月的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声明是针对阿尔巴尼亚的，再来和阿尔巴尼亚那一次说的话比较一下。我们愿意恢复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写给他们的派遣书都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评论呢？

毛泽东：首先，我会建议你们把之前所有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事情放在一边。很有必要让你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毕竟，你们在你们党的大会上公开地批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破坏了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那么，必须宣布这些都是错的。但是你们更想不再讨论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宣布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2月的会议都是错误的，把它们废除。我们反对你们的纲领。

柯西金：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真的赞成减少分歧，如果你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应该会面。如果要严肃地讨论这些分歧的事情，以特定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谈，那么结果就是你们将不得不否定你们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当你们谈到阿尔巴尼亚，你们说的不准确；你们显然依据的是不真实的消息。不是我们破坏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而是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

彭真：那么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怎么攻击阿尔巴尼亚的呢？

毛泽东：我就是在攻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我不同意这些会议的纲领，说斯大林如此的坏，还有某种个人崇拜。而现在你们说赫鲁晓夫也

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很难搞清楚到底在搞什么。你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好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台？我们都没有拿掉他的画像，他的著作还在传阅，但是告诉你们实话，不幸的是没什么人看。

我们从没有撤掉斯大林的画像；我们还支持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有什么感觉？

柯西金：应该去问他。

毛泽东：我同意。我通过您向他发个邀请。让他来访问我们。我要和他进行论战。

柯西金：当然由您自己决定和谁进行论战。赫鲁晓夫既不代表我们党，也不代表我们政府。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从他的位置上下来，我们已经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详细地告诉他了。

毛泽东：但是他过去是代表。毕竟赫鲁晓夫做过许多好事。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全都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里不缺乏马克思主义者。另外，我们是好斗的人。这也是正确的描述。首先，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其次，我们是好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们在世界各地抨击我们。他们叫我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者。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邀请我们去开会？你们应该巩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团结教条主义者？

我们的确是好战的人。和你们不同，我们不相信广泛和彻底的裁军。在现实中，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世界各处发生。因此，你们尽可以继续会面讨论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世界各地，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发生。如果你们的同志看重广泛和彻底的裁军这样的幻想，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怎么能够接近？

柯西金：您真的相信你们比我们更多地进行了反帝斗争？

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比你们少。

柯西金：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指责你们没有怎么进行反帝斗争。同时，事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反帝斗争在哪里都不可能进行。这些斗争到处都有我们的贡献，有我们的武器和我们所

冒的风险。然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你们特有的好斗，除了言论。言论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光是言论在反帝斗争中是不够的。

毛泽东：我们两党可能在10年之后再聚在一起。客观的形势会逼着我们团结。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违背人民意愿的行动；他们对你们和对我们一样，都不会客气。

柯西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团结推到一万年之后，而必须现在就团结。

毛泽东：我们会在10到15年之内团结起来。紧张气氛会减缓。毕竟，紧张关系还没有放松；这也是一个幻觉。你们每天都在做关于减少紧张气氛和裁军的宣传，而这全都是谎言。在某些情况下，帝国主义会同意任何条件。他们会支持一个协议吗？比如，他们可能重视波茨坦公告吗？

柯西金：他们也不会重视日内瓦协定。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不仅要吞掉我们，还要吞掉你们。

柯西金：我们，在军事上最强，应该是第一，帝国主义仅有想法是不足以发动战争的——我们的团结是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道路上很大的阻碍。

毛泽东：他们最可能先攻击我们。毕竟，我们只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我们还只是在实验。另外，我们不相信原子弹，那只是一种吓唬别的国家的办法。还是得依赖传统武器。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我们对此很了解。

柯西金：每个人都打过仗或者见过打仗。我们国家已经受够了战争，已经到了忍受的边缘。

毛泽东：但是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消灭。为什么你们要带来一个元帅或者将军？很显然文官已经没法解决问题了。必须依靠军队，主要是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让军队和国家失望。在你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内都有些修正主义者。他们写小说，他们拍电影，一点不鼓舞士兵的战斗精神。他们减弱了士气。很不好。必须准备战争。如果我们能够保

证10到15年的和平，将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这是为什么我说在10到15年内，当帝国主义举起手反对你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战争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争吵？因为我们活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果帝国主义用你们“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之类的口号武装自己，那是很糟糕的。现在美国和苏联的口号没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和苏联正在决定世界的命运。请尽管决定吧！但是在10到15年内，你们不可能决定世界命运。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的手里，不在帝国主义、剥削者或者修正主义者手里。

柯西金：既然您提到这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我要说，我不懂您提到加强军队和积累武器的必要性的目的是什么。您真的以为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毛泽东：我刚才说的是到处，包括我们，都在全面而彻底地进行军备。

柯西金：进行军备的确正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进行着。我必须说，如果我们要比较国民收入中用了多少进行军备，很显然苏联比你们国家要多。我们国家在军备上承担着更大的负担。而且，我们正在将20亿卢布用于和安全相关的教育中，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正在苏联进行安全问题上的工作。我不是要炫耀，只是为了回答您说的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好像我们自己不懂这一点一样。

毛泽东：我所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于全面而彻底裁军的言论——那只是一个说法，是为了骗人而说的。自然，他们甚至可以欺骗美国人，但是，这些幻觉也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会解除自己的武装。

柯西金：您说——“必须武装”。我们说，我们正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做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毛泽东：你们预算中百分之多少用于军事目的？

柯西金：我不会说这个数字，因为它不能完全反映我们在安全上的支出。但我重申，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谁要在安全上花费得更多，那会制约他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近年来你们在军事支出上减少了500万卢布。

柯西金：我不会具体谈减少花费是什么意思。至于您的话，毛泽东同志，里面有矛盾的地方。您一边说10到15年没有战争是好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动战争。

毛泽东：在接下来10年到15年内没有战争是很好的。

柯西金：谁都会同意这点。我深信，在现实中，您是反对世界大战的。

毛泽东：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赞成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

柯西金：我想在场的中国同志们没有一个是赞成世界战争的。我相信这一点。

周恩来：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就应该打仗。

柯西金：那还能怎么样？1941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发动战争，占领了最重要的工业区，我们的国家没有投降，没有把手举到空中。我们向帝国主义发动了残酷的战争，最后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那时候苏联打得好。

柯西金：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苏联会打得更好。关于革命战争，我们也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战争。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向进行这样战争的国家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知道。

柯西金：那么为什么您要公开地提出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对南越只帮了很少一点。

柯西金：我们在地理位置允许的条件下帮助到这一步。现在美国已经轰炸了北越，不是越南南边。不幸的是，我们在那里没有能够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的空军力量。只有你们可以做到，但是你们不做，你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驱逐美帝国主义，虽然你们可以做到。为什么？显然这里面是有些原因的。我们早就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指责你们不去轰炸在

南越的美国人。有人会认为你们最熟悉那里的情况而你们有自己不去的理由。

毛泽东：南越的人民没有我们也会战斗得很好，他们自己会把美国人赶出去的。

柯西金：可是美国人已经在轰炸北越了。

毛泽东：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愚蠢的。他们的轰炸没造成什么伤亡。

柯西金：我们深信必须要赶走美军。现在我继续说刚才说的。您说如果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里获得和平的机会，是很好的。同时您说只有战争才能团结我们。这两点是有矛盾的。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的。

柯西金：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时间表，是您提出的。

毛泽东：我刚才提到这点是因为一些人来向我们提议结束公开论战。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同意。但是随着时间，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同意结束论战。我们正在接受敌人的教育，但是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老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有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毫不掩饰讽刺之意)。

柯西金：还有毛泽东？

毛泽东：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们是在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下成长起来的。

柯西金：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要提起尼古拉二世。

毛泽东：我们是跟着日本人长大的，接着又是帮助蒋介石以及在朝鲜打我们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有很多老师。

毛泽东：你们有14个国家的加入。你们国家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德国两次侵略你们的领土。所有这些都是让你们骄傲的历史。当你们国家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推翻了在那时有着最先进武器的政府。您多大了，柯西金同志？

柯西金：我马上61岁了。

苏联人深知战争是什么样的。至于您刚才说武装力量必须在比较高的层次维持以及必须支持革命斗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们之间都没有分歧。当您说，你们是好斗的民族而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你们一样好斗。

毛泽东：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最近没有再将你们称为教条主义者。然而你们却经常叫自己为教条主义者，而显然你们认为我们是修正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同时与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作斗争。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毛泽东：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必须对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作斗争。

柯西金：在河内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在我的发言中说，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样说，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延长和平的环境，不制造战争的局面。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至于对帝国主义，我们也不怕他们，但是我们反对制造战争的形势。

毛泽东：必须创造革命战争的形势。

柯西金：每个民族的人民会表达他们自己，当他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和为了他们的目标进行斗争的时候。具体情况和客观因素在这里起作用。

毛泽东：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样的斗争，应该支持。

柯西金：在这件事上我们没你们做得多吗？

周恩来：你肯定是搞错了。

毛泽东：我们认为你们在支持革命斗争方面做得太少了。

柯西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如果您不带外交辞令地这样说，显然你们害怕一场革命斗争。

柯西金：如果我不带外交辞令地说，那么你们在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上比我们做得少。你们只是说空话，不做事。

毛泽东：你们帮助印度的空军，你们给他们装备武器来对抗中国。就这个问题你们和周恩来有过冲突。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最多，发生的只是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你们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刚一来访问我们，周恩来就和他争吵起来。很显然是有事情要争吵。比如，刚果问题。你们投票让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柯西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毛泽东：这是后话，但是刚开始你们投票赞成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库兹涅佐夫：当问题在联合国提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苏联一直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刚果。

毛泽东：现在您看到你们已经面临了一场广泛的战争。

柯西金：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真实和具体的信息，而周恩来同志给了错误的信息。我们从不赞成联合国干预刚果。

康生：但是你们也不支持在刚果进行自由斗争。

柯西金：现在，我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我们的飞机正在刚果，全都由苏联的驾驶员操作。有了这些帮助，苏联的武器可以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运到刚果。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刚果人民操作这些武器。我们绝对支持刚果民族的斗争。我们正在动员公众舆论。除了这些，在您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

周恩来：是的，你们的飞机正在刚果飞，但是我们正在为这些飞机

交租金，我们交了不少。

柯西金：周恩来同志，您为什么要扭曲事实呢？您为什么要故意使讨论升温呢？毕竟，你们不是在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飞机交租金，你们一分也没有付，而你们和这些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让本·贝拉总统将相关消息发给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不愿相信我们的话。你们把两件事都搞混了。周恩来同志建议给阿尔及利亚4架安12飞机，以礼物的形式，你们的政府让我们把这些飞机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送给阿尔及利亚。我们马上就同意了。是你们在扭曲事实。当我们收到这样的询问后，我们马上指示外经贸部立即卖掉这些飞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不同的飞机。我们谈的是正在非洲由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飞机，他们正把武器运给刚果反叛组织。因此你们说的和事实不符。给人的印象是有人为了挑拨的目的在散布谣言，并制造文件作为证据，以便把我们之间的，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搞复杂。我很了解阿尔及利亚那些飞机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莫斯科就负责这件事。

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负责这件事。你和他之间有一场战斗，你可以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柯西金：我不想赢周恩来，我觉得他也不想赢我，因为我们在为同样的理想而斗争。

毛泽东：不不，应该攻击他。他有很好的借口；他想成为赢家。

柯西金：我不认为周恩来同志想这样。

毛泽东：你太小看周恩来同志了。

柯西金：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毛泽东：是的，毕竟，你在莫斯科就见过他。的确，真理就在争论中产生——针锋相对——就像你和他进行的那样。如果只是谈论天气，那么这样的对话毫无帮助。

柯西金：我们只在北京待一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论天气。在您看来，应该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如何总结呢？

毛泽东：今天进行了一场真的战斗。对于一些事情的共同观点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世界大战来说，必须尽力保证在未来10到15年不会发

生。我们之间的争吵本质上是我们为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途径。为了在争吵中解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需要整个时代来做这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不是在争端中证明的，而是在实践中证明的。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联系是有益的？

毛泽东：见面和联系总是有用的。我们不隐藏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考虑外交。

柯西金：那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也是坦率地说我们的想法。对我们这边，我们认为，我们两党和国家代表之间的见面和谈话是有用的。我们同意应该更多见面，我们认为应该比一万年要早一点解决争议。

毛泽东：可以缩短期限。

柯西金：那么就让我们这么做吧。

毛泽东：如果从10000年里减去9000年，就还剩1000年。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最好能够从1000年里剪掉三个零。

毛泽东：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期限减少至10到15年，甚至7到8年，都是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又会在了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分开。我们接受你们，但是我们不接受美帝国主义。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代办。不久前这里还有英国的贸易部门，我拒绝接受他们。

柯西金：如果是您，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在莫斯科的客人，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对比。

毛泽东：为什么？

柯西金：如果你们来访问我们，我们会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并准备和你们像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样讨论所有问题，我们不会把你们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代表作对比。

毛泽东：我经常唱高调。我是个好斗的人，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我已经得罪了苏联政府的总理。

柯西金：我们不是爱生气的人。

毛泽东：不。你们应该被得罪了。还有，我们的情况不同；你们还和美英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我们没有。

柯西金：你们和法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的确是。

柯西金：你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会到来的。

毛泽东：但是不会这么快。当时赫鲁晓夫劝我们加入联合国。我们回答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过去想，现在想，没什么理由要加入这个组织。

柯西金：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想强加任何立场。

毛泽东：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更多的自由。只有帝国主义才想加入联合国。

柯西金：我们相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就继续做你们觉得合适的事情吧。

毛泽东：我们瞧不起联合国。最好能摆脱整个组织，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厨房。

柯西金：最好能立刻除掉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就算到那时也会有人想出点事情造成我们之间的争论。

毛泽东：会有争论，也会有停战。你们会看到没过多少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10到15年——这是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这样提。你们做不到。

柯西金：您喜欢“教条主义者”这个词。

毛泽东：是你们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在冬天我既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在巩固越南团结的集会中我们就没有穿大衣，

我们也没有感冒。你看我们是如何磨炼自己的——一下冷，一下热。

柯西金：我在西伯利亚待了6年。在那里人们折磨自己更甚：他们在浴室里取暖，然后直接进入雪地，然后再回到浴室。这是为什么西伯利亚人是强壮的人民。周恩来同志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他也没有穿大衣，他说他在磨炼自己。但是我选择另一种方式磨炼自己。陈毅在我们住的地方安装了很好的浴室，我先洗热水澡，再洗冷水澡。

毛泽东：您为什么不带着胜利离开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您赢了周恩来。

柯西金：这可不是我的目标，我怀疑这不现实。整个世界都说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现在他们会因为我们的会面而推测。

毛泽东：应该采取适当的反帝措施了。就这件事，我们都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之间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就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各有差异一样。

之后，毛泽东同志表示对安德罗波夫同志以及其他代表团同志的简历资料感兴趣。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到此结束。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指了指自己的手表，提示毛泽东该结束谈话了。不过很显然，毛泽东看上去并不着急。

参加此次谈话的还有，苏方：Ю.Б.安德罗波夫、Е.Ф.洛吉诺夫、K.A.韦尔希宁、B.B.库兹涅佐夫、Г.С.西多罗维奇、С.В.契尔沃年科，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陈毅、罗瑞卿、刘晓晓…… [15]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88—4299页

№25648 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 抗议照会 [16] (1965年2月12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与朝鲜驻苏联大使金炳稷会谈记录

1965年2月12日

费留宾向大使介绍了苏联外交部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关“中国公民在今年3月4日游行时暴行”的照会内容。

金炳稷听完通报后说，他个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前组织游行，在报刊和广播上号召集会，在报纸上刊登挑拨性的文章是错误行为。大使接着说道，如果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应该在安静的氛围中去解决。像中国同志那样利用报刊和广播轰动了整个世界，让共产党员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不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金炳稷然后表示想知道是否会登载照会。

答复是肯定的。

金炳稷表示刊登照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步骤。

在向大使解释了刊登照会的必要性后说道，正如大使十分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刊登了旨在反对苏联的挑拨性文章，试图将公众舆论引入歧途。正义需要还原真相。

金炳稷无论怎样也无法作答，但在谈话结束时“表示想知道能否将自己的孩子安排到音乐学校。我表示答应帮助他解决这个要求”。

.....

АВПРФ, ф.0102, оп.21, п.105, д.2, л.15-16

№25679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 无助于反帝斗争 [\[17\]](#) (1965年3月16日)

余湛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对苏联外交部1965年3月12日照会的答复照会。

契尔沃年科不接受认为“苏联政府在美国人面前有些卑躬屈膝”的说法。

契尔沃年科指出：中国方面围绕游行示威在宣传上开展的喧嚣活动无助于调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要提醒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

会谈时建议讨论具体的计划，制定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正是在这里需要寻找一致的行动，而不是像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搞挑衅。

契尔沃年科着重强调，围绕中国人自己在莫斯科挑起的事端而在中国报刊上掀起的喧嚣和其他行为是旨在反对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无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

余湛要求刊登中国的照会并在苏联报刊上进行报道。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33-36

№25950 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1965年3月22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喀布尔期间在阿拉木图作短暂停留的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陪同人员于莫斯科时间3月22日6时15分乘专机抵达阿拉木图。

陈毅同志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А.沙里波夫同志、阿拉木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Е.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Г.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副主任Н.费多托夫同志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А.沙里波夫同志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政府官邸欢迎了陈毅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并招待了早餐。

中方出席早餐的有陈毅同志，其随行人员(14人)，中国大使馆参赞张德群同志，二秘王荃卿同志及工作人员唐世嘉(ТанШиЦзя)同志。

苏方出席早餐的有阿拉木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Е.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Г.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和部长会议其他相关工作人员。

早餐期间，陈毅同志对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阿拉木图地区的经济情况，哈萨克斯坦的州的数量，以及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其他共和国的情况，都表示出了兴趣。

A.沙里波夫同志对陈毅同志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早餐结束前，陈毅同志举杯祝愿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友谊。

早餐在温暖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前来迎接的官员随后送别了陈毅同志。

临行前陈毅同志再次感谢A.沙里波夫同志，祝其身体健康并请他转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热情诚挚的招待的谢意。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礼宾领事司司长

Г.别尔德古洛瓦(签名)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一等秘书

Д.拉马扎诺夫(签名)

1965年3月31日

ЦГАРК, ф.1955, оп.2, д.282, л.49-50

№25681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 [18] (1965年3月23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5年4月17日

第199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契尔沃年科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的会谈纪要

1965年3月23日

按照中央的指示拜会了刘晓并向他作了口头声明(参阅库茨涅佐夫

B.B.同志1965年3月20日的电报指示)。

听完口头声明后，刘晓说，对苏联方面针对他在今年3月10日按照中央和中国政府指示所作声明的回复，他表示十分遗憾，该回复中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改变自己行动的立场，从当前的局势和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出发这种行动是不利的，反而对“中国政府今年3月10日的答复提出完全没有根据的和荒谬的指责，那是无中生有”。

为了弄明白，刘晓提出了如下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武装力量——武装人员？你们是否打算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和空中走廊？”

我回答，从今天所作的口头声明中无法得出结论。因为中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定的。这本身实际上就给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调拨防御物资造成了阻碍。因为在现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方面反对实施上述步骤，苏联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确实存在的事实。

刘晓接着说道，“尽管我们有详尽的根据说明目前不应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计划，可你们认为我们是不愿意进行协助”，这样的情况让中方感到非常遗憾。随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这个方面：“中国方面永远赞成以军需物资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甚至表示愿意尽快调拨并将物资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刘晓强调中国方面是按进度表来执行运输计划，并且部分物资已经运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还强调，“尽管还没签署任何正式的议定书，可2月25日后我们就预先准备好尽快将军需物资运送至越南民主共和国”。按刘晓的话说，“有几批物资已经运抵指定地点”，“我们同样也将在4月按进度表规定的运送物资”。刘晓继续说道，“从这点可以看到中国是在竭尽全力协助运送指定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物资，这样的协助对运送武器起到卓有成效的作用。您根据什么理由说，我们是在拖延运送并给运输制造困难？”刘晓接着说道：“中国方面从各种渠道得知散布的谣言，说中国好像在给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上制造各种困难，说中国把运输价格搞得太高了等等。”刘晓肯定地说：“在有些国家甚至普通人都知道苏联做的这些秘密事。”同时刘晓企图归罪于苏联方面，他肯定地说：“除了故意利用这些谣言达到反华的目的外，不可能有其他可解释的了。”他说，3月10日中国的答复中表示，中国方面不同意未经协商而采取未经详细考虑和轻率的军事行动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对援助越南制造阻碍。他继续说道：“由于突然

提出与特别计划相关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这不符合保密原则，有损于越南人民的利益。我们依旧坚持我们在3月10日答复中所表述的论据，我们认为这些论据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立场，而有关协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特需物资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刘晓说，苏联的建议似乎有点突如其来，A.H.柯西金同志和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协商。他肯定说：“苏联一方面对越南进行军事援助，而另一方面为进行和平谈判积极活动，这只能迫使我们得出在今年3月10日的答复中所表述的结论。”刘晓援引资产阶级报刊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正准备和平谈判，对此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声明，塔斯社对此也作了报道。

刘晓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要说我们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的报刊，那为什么苏联不出面反驳呢？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苏联大使甚至没有提到要美国人从越南撤走自己的军队。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纸都在宣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为什么要如此仓促地急于实施军事行动计划？”刘晓强调说：“应该考虑到越南和中国政府的看法，而后再采取某些措施。”他又问道：“当美帝国主义继续对越南进行轰炸，搞战争升级并扩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时，当敌人在威胁而试图使我们投降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刘晓还说，必须动员国际社会将美国赶出越南，迫使他们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现在不是谈论和平谈判的时候，必须坚决地要求美国停止侵略并从越南撤出自己所有的军队。他试图指责苏联方面“在向越南提供如此不多的援助时，却大肆宣扬自己的计划，不遵守保密原则，为了自己能控制局面而背着中国和越南与美国人进行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他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所做的并不都考虑越南方面的看法，并举例说，越南同志不同意苏联派遣4000名军事人员，不要求派米格21PF战斗机，他们想要越南的飞行员能在苏联接受训练，只要米格17飞机，还要求派遣地对空导弹装置的专家。刘晓表示，“奇怪的是苏联方面请求在昆明划分出一个机场，因为按这批飞机的技术特点看来，它们的活动半径无法在越南境内完成飞行”。他也否认是由于中国人拖延解决具体问题的原因而导致几批急需的武器未能及时运抵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人民因此遭受了损失。同时刘晓还表示：“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军事援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可认为还不够，如果你们能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方面将感到高兴并将全部及时地运送。”当越南人民面临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时，仅靠军事援助是不够的。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在越南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定

性因素是越南人民，他们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而我们的援助能鼓舞他们的斗争精神，所以不应该说服越南人去跟帝国主义者进行和平谈判。

在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刘晓说，中国人采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做好准备并尽一切所能去支持和援助越南”。刘晓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将像在朝鲜与朝鲜人那样肩并肩地同越南人站在一起。”他着重指出，中国的方针是要孤立美帝国主义，“我们反对越南在美国人的武力威胁下前去参加谈判”，只有“一些人故意试图离间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宣称好像我们中国人只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支持越南，使我们惊讶的是这样的想法也出现在你们的答复中”。刘晓证实，3月10日的声明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是正确的，充分答复了苏联大使口头声明中所触及的所有问题，中国方面保留在仔细研究苏联声明后再作补充答复的权利。

对于我们的问题：中国方面是从哪里得到谣传说中国过分地提高了军用物资的运输费，刘晓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他表示，“你们自己知道从哪儿得知的。我们到处都能得知这些谣传”。刘晓说，世界上有许多谣传和诽谤在流传，政治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为基础。

.....我表示，苏联确实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了实际上相当可观的援助，如果像A.H.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会见时建议的那样，我们联合的行动协调一致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效。中国方面以各种借口开始阻挠苏联加快援助物资的运送，这就降低了苏联向越南人民曾经打算提供的援助和现在正在提供援助的效果。同时我指出，即便不是军事专家也该明白，当美帝国主义者采取进攻性的轰炸时，当越南普通人的鲜血在流淌时，一种是按作战程序将飞机运到指定地点，另一种是将飞机拆散，然后用火车运走。

但是，苏联方面在表示已经准备好立即援助的同时并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它严格遵守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它的政府才能决定与其国内相关的问题，它有权按它认为需要的去做。苏联方面以前和现在都很重视这点。

对于刘晓提出的关于苏联方面在建议将昆明市作为基地时没有考虑到飞机能否利用的问题，我说，刘晓的这些话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要是中国方面认为昆明不适合作为这一用途的机场，就应该提出更合理的方案，而不要对提出的机场方案适当与

否进行抨击，因为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为指定用途在自己境内部署航空兵部队。我说，难道那些伸出兄弟般的国际援助之手真心想帮助斗争中的人民的人是这样做吗？还补充道，如果对每一种立场都进行这么具体的研究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已经降低了苏联能够对越南进行援助的效果。这些是事实，是任何泛泛而谈和长篇大论所掩盖不了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已经很清楚谁确实正在战斗和想去战斗，谁只是在口头上和谁实际上在提供援助。我们认为，越南人自己是明白这些的。

刘晓认为，苏联背着越南和中国推行与美国和平谈判的方针，我坚决地对这一推断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方面无法否认对任何人都显而易见的事实：在A.H.柯西金同志的北京和越南逗留期间、在苏联政府的正式声明和我们报刊的文章中、在苏联的各种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上，都曾表示过而且现在也在表示：将坚决抗议国际反动派的头子美帝国主义者的行径，揭露它是日内瓦协议的破坏者；以前主张现在仍要求停止侵略，美军从南越撤出，以及应该由越南人民自己而不是由某些美国人来决定越南自身的命运。我着重强调说，在中国和越南没有支持苏联方面以协商方式提出的诉求后，苏联方面没有在任何地方背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进行和平调解的工作。

我坚决地拒绝了刘晓有关苏联以自己的行为似乎竭力要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表示，指出：我们没有从越南同志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指责，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说苏联将越南不需要的东西派送给他们。

我说，由于与苏联无关的原因，非常遗憾，我们这些国家不能在同一支队伍中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势力作斗争。美国人正竭力利用这点，这只能使无论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是反美斗争的共同战线遭受损失。但不管已经形成的局势如何，苏联将走自己的路，将继续向与美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将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所有人，包括越南人，都能看到苏联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不管你们说多少写多少，在这方面你们无法遮掩住苏联真诚的、明朗如同太阳般的面貌。

会谈结束时，我请刘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口头通报并加以研

究。中国方面将看到里面有事实可证明的每一行内容都表明苏联公正的国际立场。

.....“中国领导人建议苏联领导人改变一下对帝国主义和对召开3月1日会议的策略，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倾听这些建议。我们怎么会走在统一的队伍中？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苏联明朗的太阳将走向落日”，刘晓这样说道。

.....

АВ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45-54

№08116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1965年3月26日)

同志们!

正如诸位所知，今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有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协商会议。这一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莫斯科会议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期举行的。评价1960年会议以来世界事件的进程，应该肯定，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困难，但它还是大大地前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增长了。苏联顺利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获得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倾向越来越大。许多共产党的人数不断增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和平力量。

但不能不看到，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在许多情况下越来越活跃，企图加剧世界各地的紧张形势，采取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侵略行动。

美帝国主义扩大它在印度支那的武装侵略。美国空军对民主越南的野蛮轰炸激起了全世界的极大愤怒。对革命的古巴、对老挝和刚果人民

不断进行挑衅。事实表明，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实现它的侵略目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捍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具有特别的意义。近年来共产党员队伍中十分尖锐的分歧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苏共中央在其10月中央全会之后，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具体的措施以促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巩固，促进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在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之后，苏共中央得出了必须对一系列对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团结具有第一位意义的重要问题，采取新的态度的结论。

自然不能轻视现实的形势，即在共产党员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存有严重的分歧。但在这种条件下最坏的方法是互相要求对方投降。我们坚决抛弃这种强迫和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其他党的做法。解决现有困难的立场原则在于，尽管存在分歧，应集中精力探索途径，以便把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制订和实施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保卫工人阶级利益、支持人民解放运动、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统一行动纲领。列宁教导说：“政党内部的和政党之间的分歧通常不仅靠原则的辩论，而且靠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列宁选集》，俄文第9卷，第125页。）自然，指望短时间内克服现有的困难是幼稚的。重要的是逐渐地、坚定地、一步步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首先理顺所有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统一行动的各领域里的合作。各共产党的紧密团结为当代各主要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大家庭、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团结创造着基础，而这对于顺利地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本着这一考虑，我党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实际步骤。最近几个月，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议和座谈。其目的是探索新的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途径和方法。

今年1月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多边核

力量的计划，而且也是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的贡献。

最近，我党和政府积极地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进行接触。同志们知道，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发表的河内谈判和平壤谈判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共同的政治问题上，我们这些党的立场是一致的或接近的。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同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新的努力。还在去年11月，在同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要求在国家生活方面和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方面调节关系。

10月中央全会之后，中央主席团认为，为准备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采取新方法。其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有这种想法。问题是：准备国际会议是否还用老办法，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必须借助起草委员会，还是采用新的方法？我们党和大多数其他兄弟党一样，主张采取新的努力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起来，主张探索新的方法和形式准备会议。

在这方面提出了关于改变3月共产党会议的性质和任务的建议。其实质在于，参加3月1日会议的各共产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

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在华沙会议时概括地讨论了3月1日会议的新方法，并表示同意。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德意志、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蒙古共产党的代表也同意这些建议。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领导人的同意参加协商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古巴的同志们对我们的邀请好长时间没有给予回答，直到会议前不久才决定参加，在会议过程中积极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意大利共产党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虽然他们认为召开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曾动摇不定的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后来它的代表团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关于3月会议的新特点通知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但它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议。

出访越南和朝鲜的苏联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把拟定的3月1日会议的特点通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共领导人坚决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准备召开会议协商建议。而且，毛泽东同志还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说，国际会议不仅4—5年内开不了，再过8—10年也不能开。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所有兄弟党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在1963年6月14日著名的中共中央复信中所阐述的所谓的总路线（“二十五条”）。

苏联代表团还把3月1日进行会议的新建议向越南和朝鲜的同志们作了通报。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声明，说在苏共中央代表解释了3月1日会议的性质之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人也不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理由是中共代表不参加会议。

苏共中央还把自己改变3月会议性质的建议及时通告了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3月1日协商会议开幕了。

协商会议的工作贯穿着完全民主、真诚自由交换意见的精神，贯穿着友好和团结的精神。在会议中各兄弟党表示出了多为共同事业作贡献的愿望。实际上所有党都很积极，他们的代表都给公报提出了自己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众所周知，与会的各党代表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议公报。

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表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声援英勇的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协商会议表明，尽管各党与会代表之间在观点上还有分歧，但他们都有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意愿。能一致通过公报，这证明，在态度灵活和考虑各种意见的情况下，可以就重要问题通过共同决定。

与会各党强调，当前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对顺利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一团结的利益坚决要求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正如公报中指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所有共产党表现出对自己国际主义责任的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统

治，为积极支持解放运动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族人民，为争取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普遍和平而团结起来。”

与会者坚信，“使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的因素大大超过了现在使他们分离的因素”。公报还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

在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方法问题上，也表示了共同的意见，即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争取共同目标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共同行动——这是克服现有分歧的最可靠的道路。与会者同时强调，必须积极地为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

遵照1960年声明的原则，参加会议的19个党的代表一致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为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制定共同立场的有效形式。遵照完全平等和每个党独立的原则召开这些会议，可为克服分歧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服务。所以，与会者认为，积极和全面地准备并在适当时候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所有党的代表团都一致承认，现在必须真正做到改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同志们指出，必将改善各党关系的重要手段是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议。

19个党的代表关于采取最民主的集体方法准备全世界会议的愿望，在公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3月会议的参加者们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想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国家的党代表。他们承认，不宜确定81个党预备会议召开的期限以及确定它的具体任务。关于解决这一预备会议的召开问题和确定它的任务需同所有党协商。

在新的会议召开的期限问题上，协商会议参加者们反对两种倾向：反对过于匆忙，反对在为新会议召开创造条件问题上无所事事。

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有利的气氛，19个党的代表们主张停止不友好的对兄弟党带有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同时指出，他们认为采用同志们式的方法，不进行攻击，继续对共同关心的当代重要问题交换看

法是有意义的。会议参加者呼吁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确定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谴责一些党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这也具有原则的意义。

这样，可以确定地说，苏共中央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提出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新方法，得到了19个党的完全支持。当然，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

在3月会议期间，意大利和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问题上持有某些不同的立场。意大利的同志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现在只应该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感觉到，他们实际上不同意召开新的共产主义国际会议，尽管他们说原则上同意。这引起了所有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不能放弃召开这一会议的想法，不能把它推到遥远的将来。这一立场在公报中也有反映。

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对公报中提及的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持保留意见，说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

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苏共和中共举行会议和关系正常化。他们主张，在公报中不要有关于所有兄弟党会议组织准备的任何原则。同时应该指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积极参与了公报草案的修订工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最后的文本。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把莫斯科会议的成果看作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反帝事业的重要贡献。会议的基本成果是，会议的参加者表示该党决心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在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兄弟党的接近和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开辟了新的前景。它取得的成果受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蒙古、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的赞许。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完全同意协商会议的结果，但对通过的公报保留某些意见。英国

共产党执委会也会对会议结果保留一定的意见，实际上它还想“纠正”自己会议代表的立场。

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智利、印度、黎巴嫩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积极评价会议的结果。会议中提出的建议还继续在兄弟党中研究。应该指出，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没有反对莫斯科会议和它通过的文件。罗马尼亚报刊也与此一样。

所有对反帝斗争感兴趣的人都把莫斯科会议看成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向预定的目标前进——从协商会议达成的统一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还是遥远的事。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中共领导人仍在继续努力，企图把国际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协商会议的积极成果上引开，努力贬低它的影响，歪曲所通过的文件实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也疯狂地攻击会议。对会议参加者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共领导的立场。中共领导针对协商会议大发文章，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似乎会议导致分裂，尽管每一个认真阅读过会议文件的人都清楚，文件中，除了殷切关心在反帝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和共产主义队伍的统一之外，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东西。

为了理解中国党和政府领导的立场，我们特意举出这个例子——他们拒绝进行协调行动保卫越南。中国同志否定我国代表团关于苏联、中国和越南共同发表声明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协定(该协定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安全的保证，其中规定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的建议。他们还拒绝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行动的建议。

中国领导人摇唇鼓舌，把自己描绘成反帝的斗士，描绘成越南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我们不知道中国援助越南的实际步骤。而中国领导对苏联援越的态度却十分令人震惊。一方面，它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尽力妨碍这一援助。

应越南同志们的请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做出援助越南巩固国防，尤其是对空防御和海岸防御的决定。越南总理范文同同志在3月

11日的信中写道：“我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我们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援助我国巩固国防。”

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能用铁路运输，这需要很长时间。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

与努力贬低苏联对越军事援助意义的中国领导人不同，越南的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援助的友谊性质，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

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同志所通报，“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苏联以前提供的装备基本上都运到了越南”。

3月22日，胡志明和范文同同志在同来到河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座谈时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装备中，基本上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新提供的这些装备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建立了现代化的正规军……他们高度评价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让我们放心，他们一定能掌握这些装备，这些装备将操纵在可靠的人的手中。他们将不辜负信任，与美帝作殊死的斗争。

越南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援助的。这种援助还在继续。苏联一定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怀疑。

至于中国方面给予越南的实际援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清楚它的援助数量。但是，据以上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中国领导人所说的

大话未必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符。

中共领导人最近又活跃起来，接连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我党和我党中央。从去年11月初开始，中国报刊广泛刊登从外国拣来的诬蔑我党和我国的材料。1964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大加歪曲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之后又是新一轮的中共领导正式代表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攻击反对苏共。为了攻击我党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甚至利用人大例行会议的讲坛。看来，为了给新一轮反苏浪潮制造国内舆论，中国报刊从2月底开始加紧散布谎言，似乎苏联正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尽管众人皆知，我国已有5个多月没有发表同中共论战的材料了。

3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表明，中共领导想在报刊上展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斗争。^[19]这篇文章被电台用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俄语广播。这篇文章对19国党代表协商会议进行了恶毒攻击。文章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词句，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等。

中国领导人完全否定协商会议公报中所包含的一切积极建议。它彻底反对同兄弟党一起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扬言根本谈不上同苏共和其他党“共同对敌和统一行动”。下述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为了追求自己超级大国目标完全轻视人民的意志——共同反对在世界各地加紧活动的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还拒绝关于召开81个党的预备会议和兄弟党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他们首次公开宣称，召开这样的会议至少还得8—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文章公然煽动公开论战，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中共领导不仅公开支持兄弟党的宗派集团，而且扬言“今后必须大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共领导把同苏共和其他党的分歧说成是“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所以他们拒绝关于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一切意图。

最后，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向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

主义政党提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我党的不是别的，而是让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最近这篇文章的基本方面就是这样，它只能被看作是想要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

苏共中央，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坚决批驳对我党和我们国家的这种蛮横态度。中国对协商会议批评的调子完全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暴露了中国领导的虚弱立场，它找不到一点儿像样的论据反对这一会议，于是乎走上了诬蔑和谩骂的道路。一些兄弟党的报刊(如意大利《团结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已经开始批判《红旗》杂志这篇文章了。

中国领导人不仅企图给苏中关系正常化制造困难，而且公然允许对我国进行挑衅。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那次完全不能容忍的行动——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侵略越南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苏联外交部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里指明了这一行动的实质。必须强调指出，这次我们碰到的是有计划的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中国的“示威者”全都装备了匕首、铁棒、铁拳套，这说明他们绝不是准备进行政治游行反对美国人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是准备同苏联警察打架，以便为新的反苏行动找借口。的确，北京报刊已奉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指责苏联政府“镇压”莫斯科反美游行示威。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利用中国留学生挑起的事件以便在中国掀起空前的反苏歇斯底里。只举一个例子便够了，3月6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爆发了所谓的抗议“殴打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游行。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再出现类似的反苏挑衅事件时，看来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同时把情况通报全国。与此同时，真诚希望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正常化。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耐心地，不受挑衅事件的影响，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关系，自然，必须在原则的基础上。要向中国人民表明我们同他们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我党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总路线，彻底地为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

本着千方百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援助我们兄弟党的愿望，我们认为必须一如既往给越南提供援助。我们将继续努力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和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国和中共，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同志们!莫斯科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是争取共产党人反帝行动统一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和团结的重要步骤。

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以及我党纲领的基础上，继续彻底贯彻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路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广泛地实行多边和双边会议，发展同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形式的合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所有活动中，我们党的出发点是：加强这一运动团结和影响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我国顺利地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提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列宁的党和她的中央委员会，所有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将不遗余力地把共产主义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还要讨论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吗？

出席者：不需要。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对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

出席者：没有。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中央主席团拟定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决议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请你们审核草案。现在请波诺马廖夫同志宣读草案。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报告，完全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会议公报和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同意苏共代表团的行动。

全会认为，该会议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

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从而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会议总结表明，与会的共产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决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确定的路线的基础上，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会议参加者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途径就是每个共产党提高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心，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统治，采取普遍和平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等共同斗争。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民主力量，为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保卫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而共同行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会议参加者通过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要意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继续援助和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能力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苏共中央主席团所采取的同越南劳动党领导相协调的措施是正确的，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中所包含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促进这些意见和看法得到实际的体现，从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

苏联共产党同意会议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我们党同参加会议的党一样，认为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

中央全会支持会议参加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所有党的意见的条件下制定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提案规定：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共同行动，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议和多方会议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们式的公开论战。同时还应该提倡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要采取同志式的方式，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所确定的政党相互关系准则。

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党的代表的事先协商会议，符合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利益。这种会议是能够以最民主的方法，确定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准备的途径和方式。积极而全面地准备新国际会议并在适当时候召开这一会议，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参加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同意中央主席团在10月(1964年)全会之后所采取的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其中包括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系和合作的措施。

苏联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贯彻反映在苏共纲领、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的列宁的路线，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其他共产党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有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

主席波德戈尔内：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草案？

出席者：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可以？

出席者：完全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有没有意见和补充？

出席者：没有。

主席波德戈尔内：现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一提案请举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我们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公布这一中央决议。有反对意见吗？

出席者：没有。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00—4327页

№20826-3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1965年3月26日)

1965年3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M.A.苏斯洛夫同志关于196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结果的报告，一致同意此次会议上所通过的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公报和声明以及苏共代表团的行动。

全会认为，此次会议是通向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为宗旨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的道路的重要步骤。

会议结果表明，与会的各共产党组织都在以彻底的坚定决心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所确定路线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与会者们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方式——提高每个共产党组织自身的国际主义责任感，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积极完成如下总的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为争取世界和平而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当前，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力量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捍卫越南民族共和国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民族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也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会议与会者作出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全会认为，中央主席团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御力量和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所采取的援助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措施是正确的，并完全赞同这一做法。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的观点和思想。我们党单方面使用了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便它们得以落实并进而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与会者所得出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在削弱了自身团结的同时，也会对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我们党和其他与会的兄弟党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恢复其队伍的团结。

中央全会支持与与会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党派意见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方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具体包括：在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联合行动，通过集体努力的方式来改善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利用双边、多边会谈和党的其他联系渠道，禁止包含有诋毁内容和采取非同志方式的公开论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弘扬以同志式的方式就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交流意见的做法，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所确定的党际关系模式。

如期举办的、由参加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个政党代表的预备协商会议起到了加强兄弟党团结的作用。这次会议使我们能够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来确定筹备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的方式和模式。积极而全面地做好新的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恰当的时间举办这次会议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与会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共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中央主席团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之后所实施的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举措，其中包括为进一步发展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友好团结而采取的举措。

今后，苏共仍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在苏共党纲、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列宁路线，坚决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与其他共产党一道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列主义政党和所有当代革命力量，共同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РГАНИ, ф.2, оп.1, д.786, л.41об-55об

№23049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1965年3月29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

我们的通报内容是，北京对苏无线电广播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协商会议期间和之后越来越多地充满针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国内政策，

尤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诬蔑性诽谤。必须指出的是，此类造谣中伤如今主要集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身上。

在今年2月下旬，北京无线电广播27次全文播报了在中国出版的《赫鲁晓夫发言稿第三卷》的绪言，并多次播放了已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的名为《赫鲁晓夫的幽灵并未消失》的报道。

今年3月，北京广播电台节目单中每天播放的材料也都具有上述倾向：3月1日，转播了新华社就B.H.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所作的报道文章；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题目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无处不在》；3月3、4和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从苏联报刊上有倾向性地挑选出来的材料，题目为《请看，苏联报刊最近都在宣传什么》；3月4、5和6日——关于从中国报刊中节选而成的文章集合的出版报道《关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而发生的论战》。

尤其激烈的攻讦主要包含在北京广播电台关于“3月4日在莫斯科镇压外国大学生反美示威游行”的材料中。期间，该电台多次重复了中国就这一问题给苏联外交部的照会以及给“受伤”中国大学生的慰问电和《人民日报》于3月15日发表的评论《最强烈的愤慨，激烈的抗议》。

与此同时，北京广播电台还在自己的节目中广泛采用了从日本和澳大利亚分裂主义者报纸上所刊登的文章。例如，3月10和11日，便转载了《赤旗报》于2月26日所载的文章《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3月11日——来自《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关于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立场而斗争》；3月12和13日——《赤旗报》于2月25日所载的一篇文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幻想的破灭》。

今年3月下旬，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宣传资料。3月19和20日，转播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报道，题目为《苏联领导人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重大步骤》；3月20和2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针对一些协商会议与会者所发声明的评论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对这次会议的反应；3月22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26日，北京广播电台开始详细报道来自阿尔巴尼亚报刊的一篇文章《3月1日的修正主义分裂会议——反对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

个大阴谋》。

所有这些和其他事实均证明，中共领导人正积极加紧宣传和极力再次把苏共拖入论战，而不这样的话，中国领导人便无法在自己国内和国外实施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图谋。

国家委员会主席 [20]

Н.梅夏采夫(签名)

1965年3月29日

第172cc号

РГАНИ , ф.5 , оп.30 , д.462 , л.26-27

№25685 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 [21] (1965年4月 [22])

与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科尔特、匈牙利驻华大使和波兰驻华临时代办斯塔霍维亚克的会谈纪要

契尔沃年科：“如已得知的那样，中国官方人员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代表以及中立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竭力歪曲事情真相，利用中国政府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中国铁路运输特需物资的协议和今年3月30日签署的相关议定书，以掩盖自己在加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运各种合适的有效武器问题上拒绝苏联的丑陋事实。”.....

科尔特说，刘晓在3月29日与他的会谈时说：“越南人民的斗争同样也是对民主德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

刘晓接着说道，如果美国人在越南扩大战争的话，这将使美国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这也将会导致美国力量的削弱，美帝国主义会被更多更长久地陷在这个地区。刘晓继续说道，当然，如果美国人开始扩大军事行动，这不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国来说都将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方面也好，北越方面也好，都将做出很多的牺牲，但中国人在此面前不会停止不前，他们将派遣自己的人员，因为南越的斗争被他们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国际阵线。

然后，在预先声明想利用他们之间纯粹同志间的关系，想对科尔特

通报一些已不算官方范围里的信息后，李强开始讲述有关通过中国运送苏联武器的问题。首先他说外界有些传言，说中国好像在阻挠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他强调说，这是不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对中国的诽谤。刘晓接着说道，我们一直在说，苏联方面对斗争中的人民的援助还不够，我们赞成苏联扩大援助，关于这一点已经对A.H.柯西金同志开诚布公地说过，当时他在北京。……至于通过中国用铁路运输武器，中国政府同意这点，至于空运航线，问题还不明确。

刘晓接着说道，在签署议定书之前，从今年3月上旬通过中国境内经铁路开始发送装有武器的专列。为了更顺利地发送这些专列，中国政府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授命解决与此相关的所有具体问题。刘晓重又回到了有关空运航线的问题，说苏联曾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45架飞机及相应的技术装备，可美国人可以完全公开这个秘密，因为他们对此有足够的手段。正是从这观点看来应该全面地斟酌这样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武器性质的合理性……

刘晓而后通报道，近日就将与苏联代表签署有关通过中国境内运送武器的议定书，中国人将全力以赴，比能够通过空运航线更快地通过铁路运输各种合适的武器。

刘晓与匈牙利大使举行了类似的会谈。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78-93

№25682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 [23] (1965年4月5日)

……

余湛说：“要是向前看的话，可以充分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将会友好相处，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两党和两国必须要团结。在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两党和两国都珍惜团结，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之间的争吵绝不可能使我们感到快乐，所以他和中国外交部的其他同志都愿意为恢复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尽自己一份力量，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愿望，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63-67

№25684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 [24] (1965年4月8日)

.....

伍修权说：“我们党、党中央、老党员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友谊是永久的和牢不可破的，这点我们坚信不疑.....应该去克服我们两党之间在相互关系上出现的困难.....它不会自行消失。”

伍修权说：“我们明白，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有真诚的地方，但我只想表示，苏共中央领导人还有更多应该做的事情。”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70-71

№25686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 [25] (1965年4月10日)

.....

契尔沃年科提出，葛罗米柯和柯西金邀请陈毅访问苏联。

“陈毅对邀请他访问苏联表示感谢。他答应在万隆会议回来后再答复，那时将能看到情况如何.....陈毅表示谈一谈总有益处。”

“然后陈毅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前景是明朗的。归根结底我们将联合一致，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希望这样，帝国主义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尽管现在有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等。”——陈毅说道

“之后陈毅强调说，他相信我们彼此团结的时刻会来的，这会发生帝国主义，要么在欧洲，要么在这里，开始发动更大攻击的时刻。”

陈毅还说道：“可为什么我们应该等待别人的进攻？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团结的前景总还是存在的。必须要竭力追求团结，而不取决于帝国主义的进攻。”

“陈毅接下去说道，大使提出可以从具体的问题开始。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在主要的问题上没得到协商的结果时，而在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文化合作、贸易往来)——这也很好，这也是向前的一步。”

“陈毅提出，如果这次(黎笋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大的援助就好了。中国人没有想过、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利阻挠你们援助越南。陈毅说，这种援助更多更大，中国人将更高兴。毕竟，那里是在打仗，规模和范围正在扩大。陈毅重复说道，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苏联和越南劳动党之间能达成协议。毕竟越南人是在最前沿，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84-89

№25687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1965年4月13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0日

第212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
会谈记录

1965年4月13日

1965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即将离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共赴晚宴。晚宴设在人民大会堂，在晚宴前在周恩来建议下举行了一次交谈，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注：据我们观察，整个会谈过程都用录音机记录，能听到录音机磁带的沙沙声。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好像特意地重复了几句毛泽东反复提到的经典语录。)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及夫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同志、大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甘申同志、杜波罗夫斯基同志、克里夫佐夫同志及各位夫人、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同志。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代秘书长李琦涛，中国国防部办公室主任肖向荣中将，中国外交部官员李凤林和刘莎等。一些中国同志偕夫人参加。

周恩来：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使同志？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接到其他的指示，我打算4月24日离开。

周恩来：我们那时就不会在这里了。您是一个人离开吗？其他同志会留下来吗？

契尔沃年科：是的，他们会留下来。不久，新大使拉宾 [26] 同志会抵达中国。

周恩来：他什么时候来？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他不会晚于5月初来中国。

周恩来：那时我们都已经回来了。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个假期期间，有10天我们都会在雅加达。

契尔沃年科：最近您一直非常忙碌，得去其他很多国家进行访问。

周恩来：这些访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人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尤其是越南的情况。在西方报纸上，不少文章都是有关越南的，然而这些西方国家没有收到充分的关于亚洲国家情况的资料，特别是越南的。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同一个出版物，一份报纸

的同一页上，有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报纸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辨别哪一方说的是真话。

在我访问过的这些国家里，(人们)对越南斗争的残酷性、英雄主义和越南人民斗争的坚定性，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访问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提起并谈论这些事件时，将对此予以澄清。

我们拿阿尔及利亚举个例子。阿尔及利亚人取得了与法国侵略者长期斗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也关注越南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接受美国人正在压迫越南人民的看法。阿尔及利亚人的这种关注也是由于他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面对轰炸，越南可能会选择谈判。当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们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说，在越南南方的形势和当时阿尔及利亚是一样的。毕竟，阿尔及利亚人也抗击了法国殖民者80万的强大军队，但他们并不畏惧。而越南比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多。仅仅越南南方就有1400万人，越南北部还有1700万人。因此，越南总人口超过了3000万。人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越南人民对在反侵略的斗争中充满了决心。在我们的交谈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对越南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他继续说，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现在在越南南方，常规军和半常规军加起来不超过50万人。而现在那里有大约3万美军。当我跟本·贝拉 [27] 谈话的时候，我说，那里大概不会超过2万。越南南方蔑视美国侵略者，他们将会继续斗争，即使新的部队抵达越南。

最近，胡志明主席说，即使在越南南方的美军士兵达到了数万人，他们也要继续斗争，将战争进行到底。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起初是政府一些成员主张妥协，主张谈判，但主要领导都主张抵抗，将斗争进行到底。结果，这部分领导在那天获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人在战争爆发7年之后进入了谈判并取得胜利。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开始时那些主张议和妥协的人赢得了胜利，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了。阿尔及利亚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阿尔及利亚目前的领导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我上一次在阿尔及利亚时，本·贝拉本人告诉了我这些情况。这一次，我告诉他南越正处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数年前同样的斗争阶段。我建

议本·贝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过去被法国侵略者压迫；而越南人民过去也被法国侵略者压迫，现在他们正在被美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人民怎么可能不会取得反对美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越南同志们相信，如果一个人谋求妥协，它会造成比斗争到底更多的伤亡。当本·贝拉听到我的解释时，他明白在越南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越南停火并进行谈判，就会对南越造成很大的伤亡，而他们那时是无法实现独立的。

然后本·贝拉说，他觉得他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是个错误。如果有了这样的关系，当17个不结盟国家呼吁他签字时，他就不会同意。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纳赛尔总统，他也承认自己签署17个国家的呼吁是一个错误。

这一呼吁显然是由铁托编造出来的。是谁欢迎它？是约翰逊！这不是支持越南人民，这是在帮美帝国主义的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我想说的事归结到一点。几天前，约翰逊发表讲话中谈到他无条件谈判。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毕竟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怎么能进入讨论？

首先，他不打算从南越撤军，而事实上这是写在日内瓦协议上。他也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他的部队撤出南越。

谈判甚至还没开始，约翰逊就已经提出了条件。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不遵守日内瓦协议。毕竟法国按照日内瓦协议撤出了部队。而约翰逊非常明确地表示，即使达成协议，他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撤军。

其次，约翰逊宣布他要求南越独立。这意味着他要阻止南北越统一，这也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因此，约翰逊要将越南的南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约翰逊的第三个条件相当于是他希望防止南越被侵略，这个侵略指的是北越的侵略。这简直是一个荒谬的条件！这根本就是强盗逻辑。原来不是美国人在侵略，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侵略南越。

可以看出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

也不打算讨论。这是强盗逻辑!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大会发表了对约翰逊声明的有力回绝。

此外,我想说第三件事。美国正试图把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去解决。可是越南的问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就解决了的,和联合国拉扯到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你们苏联,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国之一。通过试图将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吴丹 [28] 通过阿尔及利亚询问中国的意见。我曾通过本·贝拉总统向吴丹表示,我们坚决拒绝他这个意向。我们拒绝联合国介入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举一个例子,还是阿尔及利亚,那时联合国也准备干预。幸运的是,法国人反对。如果联合国干预,美国最终将也要影响阿尔及利亚。我举了这个例子后,本·贝拉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三次重复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因此阿尔及利亚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干预,越南的情形会变得和刚果、塞浦路斯、韩国、马来西亚一样糟糕。

但是当本·贝拉将我们的意见转达给吴丹,我们的立场在联合国就被扭曲了。记者们甚至开始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开始准备支持谈判的想法。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吴丹发表了一篇社论。越南同志们也多次表示,他们不支持谈判。越南报纸写道,美国在对本地区的侵略中花费了40亿美元。约翰逊怎么还能指望用1亿美元就收买东南亚呢?

然后我们谈到另一个和本·贝拉有关的事情。当阿尔及利亚进行反侵略的决定性斗争时,阿尔及利亚最近的邻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因此到现在为止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斗争,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尤其是当美国帝国主义准备侵略越南的时候。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为了告诉您,当我们在访问中向这些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解释,基于他们自己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他们为什么必须了解情况。我们的解释促使他们对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呈上升趋势。您可以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道和我们的报纸上知道这一点。越南的同志们需要我们尽力来传播他们决心取得斗争胜利的真相,尽力来揭露美帝

国主义及其帮凶——他们一边进行残酷的战争一边还在玩花招，让人们认识到他们谈判只是阴谋。我们必须进行宣传 and 解释所有这一切，使得局势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更加清楚。

越南人民，当然，需要物质支持以及更多的我还不能说的支持。

我为什么要在大使您离任的时候告诉您这些事情呢？

您可能还记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彼此谈到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您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想请您向柯西金同志转达我说过的这些话。您还可以从我们的报纸上了解这一切。我们还会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外交措施。

然后周恩来转向苏联大使，问：“也许您在这方面有些看法？”

契尔沃年科：您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中国和苏联，涉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革命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进步的民族。美国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强行侵略，粗暴地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结果他们遭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我们当然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越南人民展现了勇气，并树立了斗争的榜样。越南人民用他们的勇气激励着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其他民族。

周恩来：而且(从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汲取力量。

契尔沃年科：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越南爱国者进行这种斗争的技巧，甚至我们的敌人和对手阵营都不得不承认越南爱国者的战术技能以及在这场斗争中越南人民的顽强不屈。

当然，我们认为您刚才谈话中对越南的局势和情况的解释，对整个事件给了一个完整的概括，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认为，接触本·贝拉、纳赛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越南的情况以及更好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要总结一下您刚才所说的，最终都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是：政治的或军事的——这自然是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您和越南同志们，和我们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了广泛的军事行动，包括轰炸，现在真正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

权。美帝国主义从而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军事斗争。苏联自身，如你所知，在过去以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当敌人入侵我国领土，苏联人民就摧毁他们。我们坚持着原则：如果敌人不投降，其必将被摧毁。这是苏联不会改变的一贯立场。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不仅同情英勇的越南人民，也在实践中帮助越南爱国者，通过援助武器，或者其他手段，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人力。苏联这些援助是真实的，在此之后也会继续提供。

至于约翰逊的讲话，及其与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那些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约翰逊，把他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您，周恩来同志，集中谈论了约翰逊的讲话。约翰逊在苏联被看作是煽动分子，但约翰逊的煽动并没有能混淆视听，他不能迷惑任何一个苏联人。

同时，我认为，也不应该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和平方式是可以接受的。最终，任何战争都是以谈判和一个和平协议告终的。而您，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的光辉榜样，而且如你所知，军事与和平的方式也都使用了。如果是谈论越南事件，问题是：在谁的条件下和平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我们坚决反对在约翰逊的条件下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如果说问题可能得到和平解决，这也只能是越南的爱国力量提出的条件，对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阵线的条件，对社会主义阵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支持这条路。因此，可以进行谈判，但决不能在敌人提出的条件之下进行。

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也许知道的具体情况比我们多。因此，当苏方向你们提出建议时——或许可以召开一个印度支那会议(这次以协商的形式进行)，你们说，现在不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你们的意见得到了理解。

你们认为目前对于解决越南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说，继续使用军事方法是更有利的。苏方高度重视和对待你们的发言。此外，苏方还向你们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和苏联一起协调(他们)与越南事件有关的行动。

您，周恩来同志现在主要是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是非常有益

的。那么为什么，当敌人站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门口时，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聚集在一起协商？这项工作必须首先由3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进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代表没有聚在一起讨论和协调它们的行动，并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阴谋斗争到底？

任何级别的会议都可以仅仅是一个协调会，如果条件不成熟，不足以批准任何文件，我们可以只是简单地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样的会议上可以批准一个文件，一个协调行动的成熟计划。

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事件的逻辑和国际主义的感情都能够且必然决定这样一个会议的必要性，共同讨论此问题的必要性。

我和所有的苏联同志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您刚才描述的局势的特征。这是很有益的，对我们非常重要。感谢您，周恩来同志。我会向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转达您所说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将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件，并思考如何使苏联能够快速和有效地援助英勇的越南人民。

周恩来：刚才我提出的事实，只涉及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外交步骤，因为我想让您将这些传达给你们的政府。

您谈到了一个会议的问题，但是这已经涉及了中苏关系。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澄清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得由刘少奇同志和余湛同志具体处理。但是，作为总理，我不能不回答这些主要问题。

就在刚才，大使关切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同情。我认为苏联人民的这些感受是真诚的。

大使同志谈到了伟大卫国战争的问题。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震撼了整个世界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苏联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1000万人。中国同志们始终高度评价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人低估了战争的意义，或者是斯大林和他的领导。何况，并不是中国人在扭曲和污蔑他们。如果坦率地说，这都是赫鲁晓夫

主义者干的。

第三，你谈到了越南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军事方法是由美国人强加的。从1954年开始，美国人违反日内瓦协议已经超过11年了。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人们不应该反对政治和战争。

南越的民众被迫拿起武器，奋起抵抗美帝国主义，现在不会有和平的方式。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以迫使帝国主义投降或彻底消灭他们。

在卫国战争期间，当德国逼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谈判还有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只剩一种方式，就是继续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卫国战争是这种情况，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是这种情况。朝鲜战争还是这种情况。我们胜利后，谈判才是可能的结果。就那么简单。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问题正是当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当时谈到了越南问题，而您，大使同志，也在场。柯西金同志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之后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回到北京后，柯西金同志告诉我们，你们愿意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说，你们提供的援助越多越好。

然而，当柯西金同志返回莫斯科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2月16日你们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你们希望与美国人进行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答复说，现在不是一个能参加谈判的时候，此时谈判就意味着投降。

在同一天你们告知我们，你们决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一项建议，也告知我们打算进入谈判的意向。我们说我们会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磋商后给予答复。

然而，不顾越南政府的反对，也不等我们的答复，苏联政府在2月23日通过驻在巴黎的大使与戴高乐接触并且进入谈判。作为这些接触的结果，你们宣布苏联和法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完全一样。

然后，法国政府以一个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他们与苏联政府意见的一致。你们在法国的大使告诉我们的大使说，法国政府的意见和苏联政府

是相同的。

团结在哪里？这正是在达成无条件谈判和无条件停火的协议。但越南的同志们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这个！

20天之后，我在北京会见了法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同样的事情。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一切。

就这样，背着中国和越南，不顾越南同志们的意见，苏联政府和戴高乐保持着接触，讨论和美国人谈判的事情。这还不是恶意？这还不是空头支票？

我认为举这个例子足够了。至于苏联一面和英国，一面和美国接触，你们接触的内容，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保留在适当时候进行评论的权利。

其次，你们笼统地告知我们打算援助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我们曾经同意当这些武器到达我们领土上的时候，会尽快通过铁路运输这些武器。然而，从2月25日的消息内容来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消息)没有谈及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援助。你们打算出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你们心里打算让4000名士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500名来中国昆明，那是你们选定的一个机场所在地。

这一切的目的是通过派出两个营的防空部队和一个中队的米格21来控制中越边境。

此外，第二，在2月27日你们突然提出45架安12飞机要飞越中国上空的问题，以便向河内运送75架防空机枪和18个37毫米高炮连。

我们拒绝了这两项建议，因为第一个超越了一般军事援助的范围，相当于一次军事行动，对此你们并没有与我们和越南协商，第二个造成了一种越南同志无法接受的情况。

你们传递给我们的建议，有关消息立即泄漏到西方，通过西方机构散布谣言，说我们妨碍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器援助。

在达成(武器的)运输协定之后，根据这项协议，从4月到10月，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日程安排允许大约60列列车通过。

这也被泄露给西方，有人说，中国在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

想想看，大使同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以谈论？你们不但不保守秘密，还在诽谤我们。

第三，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正在以一种丑陋的方式继续进行，而你们却一定要把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议拖到联合国。特别是，有关建立联合国军队的建议以及在联合国创建一个维持和平的特别委员会。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联合国常规军队。现在只有临时(部队)，人民已经不能再忍受他们了。这是在朝鲜半岛的情况。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军队残酷地镇压刚果人民，现在他们仍然保护以色列，还停留在塞浦路斯。现在，你们想创建一个永久的、合法的联合国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军队来共同统治世界。

吴丹的计划是派遣联合国部队到越南，以加强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现在您能看到，仅仅因为越南问题有多少事情发生。我们怎能相信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出的话？

至于你们建议的三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高级别会议，我们以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名义对此建议已经给出答复。因此我不会再谈这个。

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如果像这样的问题再出现，我们将直接与越南同志们协商解决。

如果苏联需要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那么我们建议你们举行双边会晤。越南已经同意本次会晤，也已经访问过你们。就中国而言，你们当然必须先获得我们的同意，而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没有必要开一个三国或三个政府的会议。

起初我希望告诉您，希望把我在一个声明中所说的话转达给你们的政府。但是，你挑战我，让我做了第二个声明。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做出声明。

论战可能围绕这些问题会继续下去，但我建议将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的新大使和代办以及我们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讨论。

余湛：莫丘利斯基 [29] 同志已邀请我在大使离境后进行一次5小时谈话。

契尔沃年科：我不敢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了。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因为我现在是向您告别了，我不希望纠缠这些问题。我只想用一两句话说明以下要点：

我不知道苏联大使和戴高乐之间谈话的性质，也没有在北京与法国大使进行交谈，因此我不能对您今天说的做出评价。

至于我们对越南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不变的。

至于援助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包含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在您出访期间我已经转达给刘晓同志了。现在您，周恩来同志，亲自描绘了苏联为越南提供援助的美好途径，并列出了所有苏联政府希望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到越南的东西。

至于您说苏联想控制中国的意图，这当然是很可笑的。500名士兵怎么可能控制6.5亿人口呢？

苏联政府已经为你们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上运送苏联武器到越南表示感谢。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帮助越南。苏联人民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是，这没有给你们权利诽谤苏联人民，说他们没有给予什么帮助。柯西金同志给中国政府的来信对越南的紧急援助提出了具体的问题。苏联政府将与你们磋商如何更好地提供援助。如果苏联没有和你们讨论，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不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运送任何东西。苏联政府愿意更快地运送更多的武器。现在您批评说应该向越南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苏联政府与越南人商讨过并运送了越南所需要的东西。您说你们要派志愿人员，但只有当越南需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苏联要派4000名专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可以被称为志愿者，或者任何称呼，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本质是什么。

周恩来：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有关志愿者的。越南同志并没有要求这些，你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不是你们的建议，你们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些设备的清单。

契尔沃年科：您告诉我们，你们反对派遣飞机，反对在你们的(领土)上停留500个专业人员——就是飞行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你们是

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与你们商讨之前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指责苏联，尤其说它企图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于吴丹，我们不会回应他或者他的行动。我们也批评了联合国，并认为它必须重组。当试图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都不该使用资产阶级的资源。

您，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应该会见和坦率地进行讨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们正在谈论越南人民的命运，人们正在那里死亡，消失。有什么理由能拒绝一个关于召开会议和协调行动的建议？

我们认为，柯西金同志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见，是有益、坦率和直接的。这不会伤害任何人。现在为什么不能会见并讨论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问题，讨论防止挑衅越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

周恩来：可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柯西金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

我举出了一些例子，您无法推翻我的例子。

4000人和3000万越南人相比是少数，但是在他们控制下有2个营的防空武器；毕竟，你们的人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

契尔沃年科：但这些都是苏联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不是美国人。

周恩来：但你们在古巴的导弹都没有使用。现在有一种“地空”导弹营在古巴，但他们也没有使用。

500人在昆明机场，当然无法控制整个中国，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昆明。12架米格21飞机本来已经驻扎在那里。他们可以控制中越边境。越南没有要求你们做这些。在这个阶段，越南飞行员不能驾驶这些飞机。在昆明有一个军事基地，米格21飞机不能覆盖河内，因为它们的飞行半径到不了河内。如果你想用这12架飞机培训越南飞行员，你在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可以做到，不一定非要在中国。至于要保护中越边境，12架飞机将不会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你从来没有就此征询我们的

意见，而我们也并没有要求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你把这些(东西)搞到设备清单里来？难道这些不是赫鲁晓夫之前的主张？

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但因为这是一次告别访问，也许我们不应该进入论战。

契尔沃年科：我同意。

周恩来：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帝国主义真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国家的人民都会站在一起。在与柯西金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将这个提法反复说了几次。

我们相信，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者，苏联人民都保持着光荣的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再次重申，与美国寻求一项协议和妥协的意图——目前你们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们所主张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契尔沃年科：我不想继续争辩下去，但我坚决不同意您，周恩来同志，对苏联政府立场的说法。

周恩来：我知道，作为大使，您不同意。这次讨论是您提出来的，我不得不给出回答，这样您可以转告你们政府。

契尔沃年科：您让我对您的发言作出评价，我就这样做了。我们将把您今天所说的一切都转达，如果苏共领导认为有必要，将会回复给你们声明。

周恩来：没关系。我们并不害怕讨论。

契尔沃年科：我们希望进行洽谈。

Л.С.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夫人)：我，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与所有在座的苏联妇女一样，听取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很生气。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苏联？

周恩来：这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你们的领导人。

在场的苏联同志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我们同苏联政府是一致的。

契尔沃年科：您，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话，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了。

斯拉德科夫斯基 [30]：我是个老党员，周恩来同志，但我不能告诉苏联人民您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因为这将造成极大的愤慨。

周恩来：我不会责备你们中的任何人。我和我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新领导人真的非常不满。

斯拉德科夫斯基：我们的领导人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人民的党。我们不是在国外选出来的。

余湛：也许，您本人相信苏联领导人，但不是所有的苏联人民都相信。

契尔沃年科：太糟糕了，你们正在把这件事变成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争吵。

罗瑞卿：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我们的看法吧。

周恩来：我们敢(发表你们的)。

罗瑞卿：你是老共产党员，我们也不是年轻党员。

陆定一：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要求他们停止与美国以共同统治世界为目的的合作。

鲁索夫：这是诽谤。

契尔沃年科：只有不现实且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这样谈话。

周恩来：赫鲁晓夫多次指出这一点。目前的苏联领导人给美国人的电报中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契尔沃年科：我们尊重您，周恩来同志，但同时，我坚决拒绝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坚决抗议您的那些关于苏联和苏联新领导人的发言。我们没有给您任何理由这样做。我们不允许对贵国政府的指责，虽然我们也要讨论其政策。您允许自己关于苏联政府的指责。我们抗议。你们试图分裂苏维埃政权、我们党中央和苏联人民。你们不会得逞的。

周恩来：您问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举行会谈。我们的反应是有理由的。此外，我还没有谈及3月的分裂会议。因为我们以政府名义有一个接待部门，我还没有接触到本次会议的事情。1965年3月中国没有出席的那次莫斯科会议，聚集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我只能阐述我们的看法和外交行动，但是你挑起了这些讨论。我们总是对苏联人民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合适的评价。起初，我们也将希望放在苏共新领导人身上。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去参加纪念活动，为什么我们还建议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相反。新的领导人继续赫鲁晓夫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在3月的分裂会议上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还寄望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的可能，特别是越南问题，与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过的有关的那些问题。刚才我是在我们对新领导人感到不信任的基础上提出那些观点。我要对你们的抗议表示抗议。我宣布抗议你们的挑衅。我们应就此结束去吃晚饭。

谈话持续了约两小时，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总理宴请苏联大使和他的妻子，领事和他们的妻子。

在晚宴上祝酒的时候，周恩来特别指出：尽管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有信心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会站在一起。虽然我不信任柯西金，我也不喜欢他，但他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即认为，如果美国摧毁中国，苏联也将受到影响，反之亦然，如果他们摧毁苏联，中国也不会存在。契尔沃年科同志说，现在我们共同的死敌是美帝国主义。它会试图强加战争，它会使局部战争升级。所以我们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会站一起。正是这点昭示着我们两党团结的光明前景。

周恩来举酒向苏联大使，他的妻子以及晚宴上所有苏联同志的健康祝福。

接下来是契尔沃年科同志祝酒……

注意到，周恩来看上去非常疲惫，在谈话过程中有时当他缺少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会表现出紧张；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他对自己所说内容的一种内在的坚强信念。他一直在控制自己，这一次他并非情绪低落，而是为某些事情感到难过。

当苏联大使祝酒的时候，他(周恩来)鼓了2—3次掌.....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8, д.5, л.101-127

№25778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 及应对办法 [31] (1965年4月20日以后 [32])

.....

供应给古巴的主要书籍主要是西班牙语、汉语和英语版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小册子。

除此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将装帧非常精美的汉语、英语版的书籍免费分送给各团体.....(必须指出，目前英语版的书籍在古巴很少见到，而许多古巴人都懂英语)

目前《新华文摘》是宣传分裂的主要武器，除周日外每天都出版。

1963年11月中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科学工作者阿拉杰涅斯邀请中国大使去他那里，向他通报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关于缩减《新华文摘》的印量的决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免费接受《新华文摘》的确定的个人和团体比以前减少了。与此同时，塔斯社的文摘印量也减少了(200份)。

古巴人不太愿意接受中国的文艺影片，主要是因为这些影片文艺水准太低。电影院的上座率很低，观众经常中途离场。报纸的电影广告中一般不注明影片的名称，只注明放映中国影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的问题上，至少在对外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宣传鼓动工作人员持这样的立场可以解释为古巴领导人尚未公开表明自己对分歧问题的立场。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进行公开的争论，最好保持一种平静的

心情，宣传中多做些解释工作。可是我们还是要加强正面的反宣传，重点放在宣传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共处、解释民族解放运动与和平共处给进行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民带来的益处，解释现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害处。除此以外，还应该强调工人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国际意义、联系为亚非拉国家提供的援助、苏联的武装力量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作用以及许多具体的问题。

1964年5月4日，苏共中央收到了《真理报》特派记者M.多莫加茨基赫和Л.波奇瓦洛夫关于印度、缅甸、泰国、日本和香港之行的汇报，主要是收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进行破坏活动的材料。

这次东南亚之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从与那里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记者、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我们觉得，亚洲正在经历的过程应该反映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上面。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定期去那里积极活动，把苏联作为世界第一号敌人。

记者们建议：加强苏联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影响，碍于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他们不敢反抗北京的大国沙文主义计划。

与泰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不要反对马来西亚；

扩大泰国的记者人数，以收集情报；

在东南亚组织当地语言和华语的广播宣传；

在东南亚出版一些杂志，宣传我们的思想；

加强苏联驻东南亚国家大使馆的工作；

在东南亚的中国殖民地中散发中文版的苏联书籍；

在中国看中的国家中发行群众性的报纸；

对中国反苏的积极活动必须给予有力的回击；

.....

№25688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1965年4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6日

第225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5年4月21日

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将离任回国，1965年4月2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见了。

会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下午3时45分到下午5点30分。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康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刘晓，中国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湛，中国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李藿林(ЛиХой-линь)、李凤林、陈广才。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公使衔参赞Ф.В.莫丘里斯基同志、参赞Г.А.甘申同志、一等秘书А.А.勃列日涅夫同志、三等秘书Ю.М.加利诺维奇同志，以及译员Р.Н.列别金斯基同志。

刘少奇说，他们说您这几天就要回国了。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以回苏联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在中国已经有5年半了。时间不短了，可我对同志们说，为研究像中国这样如此伟大的国家，可以住上10年，甚至更多时间。

邓小平(问刘晓)说，你在莫斯科待了多长时间？

刘晓说，7年。

刘少奇说，论工作时间您比刘晓少啊。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总的说起来不止5年半。我是从1959年9月开始与中国直接打交道，当时来这里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

刘少奇说，您已经在这里5年多了。您当然对中国有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复杂的是中国的历史。要很详细地了解中国，5年当然是不够的。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我刚刚说了10年也不够的。

刘少奇说，并且这是在我们双方之间产生问题的5年。当然，谁也不希望出现这么些问题。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意识上准备与苏联争论、吵架，与苏联共产党争辩，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些。但既然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既然是已经客观存在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像对待客观存在那样去面对它们。我们相信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是永存的。两个如此伟大的国家、如此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会轻易分裂。我们深信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现象，它们只会存在于某一段时期，将来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

接着刘少奇谈到了自己在192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1921年去莫斯科学习，还是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从那时候起，也就是1921年，我就留心所有苏联发生的和在报纸上报道的情况，因此我能肯定对苏联、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员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刘少奇着重说道。我们可以对长时期进行比较，比较不同的时期。当发生了你们的十月革命，我们对苏联就产生了同情和友好的感觉，我们的目光投向了莫斯科，所有人都想去莫斯科。可没人能够去那……

1920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次旅行。然后绕道从上海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可当我从船上下来时，就发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都是日本人，而我无法找到那里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所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住着许多中国人，那里，可以说甚至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那里出版中国报纸。我们住在中国宾馆。我们向中国报纸的主编打听，如何才能找到我们想见到的布尔什维克。他说大概能找到他们。然后他领我们去了秘密接头处，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给我们写了推荐信，于是我们5个人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那里已经有红军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特别注意在这条线上乘坐列车的中国人。火车上甚至有专门的车厢，上面写着“中国人专用”。那里只有中国人乘坐，不管俄罗斯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去那。日本人仅仅朝车厢里望望，就走了，根本不注意我们。我们在包间里找到了位子，从日本人身边悄悄地溜过。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住了约一个月。那儿有座桥毁坏了，所以我们无法继续坐火车了。从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一伙人坐渡船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从那坐火车到了赤塔。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姓卡拉达什的红军将军。他乘坐的是专列，他的司令部也在这列火车上。他的部队中有一至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师，和一个中国人组成的旅，也就是说除了俄罗斯人，那里还有这些兵团。

这个中国旅的旅长见火车上有5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学生，就想把我们留在他身边。我说我们是去莫斯科，可他劝说我们留下。最终我们同意留下。可为了留下我们5个人，中国旅的旅长只得去向指挥官报告，于是他将我们带往那列专车。我对指挥官说，我们想去莫斯科学习，我们5个人都是我们青年组织的共青团员，现在中国旅的旅长请我们留下。

而卡拉达什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莫斯科。他可以说是个更为冷静的人。他决定了，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们在部队里也没什么可干。他是个非常诚挚的人。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见卡拉达什看得很远。他预见到您将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

刘少奇说，他为人很诚挚，对中国年轻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对我们又是接吻又是拥抱。他拨出一节专车，将车厢挂上列车，于是我们就继续出发了。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这些东方地区，一路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那里住的都有中国人。他们还在商店里工作。那时中国人在那里还可以做生意。当时那里还没实行共产主义原则。

在赤塔我们去了当地党委员会。那里给我们开了去莫斯科的介绍信。

我们一到伊尔库茨克就看到那里的情况不一样。那里的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里已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了。

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地到达了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一路上我们用了3个月，第四个月就到了莫斯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革命后苏联人民面临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深信工人、农民、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唤起了我们深厚的情感和同情。

也许，在最困难的时刻会产生最牢固的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能考验人们之间的关系。当时苏联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干部和列车长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中。我们作为外国人势必就更困难一些。当我们没有面包时，当我们没什么吃的时候，他拿自己的面包与我们共享，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幸亏于此我们才顺利地到达莫斯科。我们来到莫斯科后，情况开始好转，可面包还是不够。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那有很大的餐厅，可我们明白怎么回事，我们明白这些困难。我们亲眼看见并对工人、农民、劳动者、红军和苏联共产党员这样的精神状态确信不疑。我们与他们所有人都接触过，我们深信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都能被克服。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加入共产党。

此后，我去了苏联好几次。不管领导人有哪些变化，人民依旧没变，工人和农民没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关系中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会尽快消除。

邓小平说，有可能，需要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契尔沃年科说，您提到的问题，当然也感动我们的党，这也就是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我现在很高兴，在我告别拜会时，您回忆起了自己去我们国家的经历并提到了当时在十月革命后最初时期的情形。当然，您完全正确地觉察到在当时，革命初期，就让您注意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更晚一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您也到过苏联。

刘少奇说，是的。

契尔沃年科说，当然，这是中国与苏联关系发展中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连，产生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它扩大了十月革命的突破口。

最近的5年，我不由地成为中国与苏联关系以及我们两党之间关系的亲自参与者。我还记得您，刘少奇同志最近一次去苏联访问，当时您带领党政代表团在1960年访问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城市，重新认识了莫斯科。这是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后。我有幸与苏联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周游祖国的行程，我经常回忆这次旅行。

您，刘少奇同志，看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多么的热爱和友好，我们的党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友好。

所以，我们越是更多地深入到过去，更多地回忆我们两国之间的互访和会晤、具体的事情和各种关系，就越感到所有这一切只能证实一个结论：我们拥有所有使我们两国的党和人民一起走在最前列的基础。我们的党和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政府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过去和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所说的，我们的分歧很小，但团结更牢固。今天，您，刘少奇同志同样好像证实了这个议题，在开始会谈时就表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困难将被克服，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将团结起来。

从我自身的角度我想强调，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现今的领导人认为在自己的外交活动中主要的方针是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我们党、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总方针。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反驳一句，说帝国主义者能帮助我们团结。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苏联共产党员，想必有信心将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去等待帝国主义向苏联或中国进攻的最为紧要的关头，而是现在就该坚持不懈地和坚定地去克服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间的困难，我们的团结之日就将提前到来，在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进攻之前就去，在极其危险的局势出现之前就去。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两个国家各自发展的客观过程本身，两国关系

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出现了由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更为广泛的阵线，这些国家在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建立起广泛的反美阵线，所有这些新的情况让我们毋庸置疑地有权利说，我们拥有一切基础以使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一起。

所以我想真诚地表示，相信不管有多难，不管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之间出现多么复杂的情况，最终这些都将被克服。我们希望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刻将不再拖延，而是尽快到来，这样的时刻不仅符合我们的人民和党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体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刘少奇说，当然，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困难会被克服，这就很好。这是我们共同力求达到的目标。

团结需要基础，需要共同的基础。这共同的基础，首先就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其次在于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最后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相互帮助。只有忠实地遵循这三个条件或这三点，才有可能建立团结的条件。还是在1960年81国共产党会议上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声明，你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和平共处。我们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和平共处。我们认为总方针应该包含上述三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现合作与相互帮助；第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第三，赞成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作斗争。但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不愿意同意这个想法。你们就是只坚持和平共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进一步发展了这条路线，并表示国际问题可以通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合作来解决。

今天您表示，你们的总方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问您，那过去你们党的总方针怎么办？你们党是放弃了总方针还是没有？它还有效吗？

我认为只有以上述三点可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在你们以前的总方针依旧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团结的共同基础。

利用您回国的机会，我想请您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和中

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同志转告我们的看法，你们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将得不到任何好处。我想让您将这样的看法转告给你们的领导。

诚然，与对外政策总方针问题并存的还有关于革命原则的问题、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问题。缺少这个基础，关系就很难得到改善。

至于我们对此的信心，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

您说到我在1960年的莫斯科之行，那时，在访问期间，我不仅有机会与各机构的领导同志，而且与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接触。我很熟悉，了解群众的情绪。

出访结束启程回国的前一天，我回到了莫斯科并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私人会谈。我对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我们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苏联人民都绝不允许有任何有损于我们两国人民、有损于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牢固友谊的行为。当时，赫鲁晓夫同志赞同我的看法。对此他还补充说道，不仅是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而且是整个世界人民，所有革命人民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伊尔库茨克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我讲述了这些。我是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后，在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作了这个发言。可是，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次接待中我作了讲话后，我的发言被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报纸上，而莫斯科的报纸却没有刊登我的发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不好引起中国人民的不安。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关系不好也会在你们人民中引起不安。无疑，你们的人民为此担忧。可对中国人民而言，情况与你们的有些不一样。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将有关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方面的所有重要事件的情况、你们批评我们的所有文章，以及回应你们批评的文章都刊登在报刊上。这样我们的人民就能从自己的需要去弄明白情况。

你们却是相反。你们刊登的只是你们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不刊登我们的文章，也不呈报给你们的党。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心情不可谓不沉重，要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领导人要反对中国，不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哪里，不知道归根结底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你们不向苏联人民讲这些，苏联的人们不可能安心。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比你们那边更好。

至于你们的情况，依我的看法，在你们的领导人中和人民中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你们没有对人民说我们犯了哪些错误，中国真正的情况如何，我们真正的观点和看法是什么。这些你们都不对人民讲，只给你们的人民一些单方面的情况报道；我表示怀疑，建立在单方面报道情况的信念能维持多久。不告诉人民事情的真相，是无法让人民信服的。有些明显的事实是白的，而你们却要硬说是黑的。比如说，在莫斯科大街上你们的人殴打了我们的学生。许多苏联人都是目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遭到殴打并受伤。一些医院和学校都知道这件事。而你们却声明他们没有遭到殴打。可是那些看到你们是如何对待学生的人们(路过的行人、学生等)，他们怎么还能相信你们呢？！

甚至当你们强迫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人员签字声明，说中国学生没有受伤时，毕竟这些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做法是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如果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击者在数量上是少数，可真相还是在尽管是少数的人这边。

如果党和国家，如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在真相面前、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俯首听命，不听从真理，不正视这样的事实，那就很难说他们的地位就会牢固。

如果你们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不改变的话，那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实行合作。这里起特别的作用的就是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建立密切关系的方针，通过密切与美国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将导致你们自己深受其害。

契尔沃年科说，我不认为现在应该对提及的问题作进一步地深入，因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多次就此交换过意见了。但我想简要地说说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和平共处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尽管这是有意义的，有时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这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列宁主义原则，也曾得到你们的赞同。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60年的声明、万隆会议宣言，说起来还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有记载。这是个不应放弃的原则。与其他我现在所说的有关原则一样，我党将遵循和平共处原则。

第二点，和平共处原则与您所说的有关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个客观的范畴。我们一直希望今天美国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可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无法做到。必须要考虑到帝国主义的存在，必须要寻找与其相处的方式。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有损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合作的行为。

我还记得在您的正式报告中，也就是您，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您说你们国家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再说，当我们两党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些立场最近也已经作过表示。这个问题很明确了。

第三点，说到公开的辩论，柯西金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会谈时，当您、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在场，他重新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党不想继续公开辩论，因为苏联共产党非常珍惜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这就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公开辩论的主要决定性原因。你们抱着另一种观点。而我们不想教导你们。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表示我们不同意，但我们不想教导你们。

第四点，至于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您这方面来说，刘少奇同志，来充当好像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党方面的裁判是不合适的。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自己决定他们怎么做。可我想告诉您，我们国内的情况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并且还将更好。中央委员会和党、苏联政府和人民将更团结。还想补充一句，我们深信这种团结将成为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团结改善特别重要的因素。

说到总方针，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想说生活会表明什么样的方针是正确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而我们一直听从列宁的，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立场是正确的，与其说不仅仅是要靠辩论本身，不如说是由具体的实践、生活来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党现在不要求你们领导人改变你们的总方针。可以将有些问题暂搁一边，我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我们的共同点的基础上而团结，我想再次强调，不管有什么样的暴雨，什么样的狂风，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针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与中国人民团结。

刘少奇说，生活与事实、实践的确将指明这点。这是正确的。对我们而言实践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将团结起来。我们永远不会去做对帝国主义有益的事情。

邓小平说，说到事实，我们见得多了，不用说远的，就在眼前。例如，你们不久前重复了赫鲁晓夫原来的立场，你们在建立“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上证实了他的立场。美国人“双手”赞成这项提议。这项提议是什么意思？为谁派遣这些部队？是反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民主德国、日本吗？我想不是。

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帮助美国建立国际宪兵以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退出后，这个事实表明了你们的实质：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你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联合国部队已经被调往刚果，而你们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派遣部队去刚果。柯西金同志对我们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否决了。我们查了一下，不得不确信我们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就这样当着我们的面撒谎！一方面，你们表示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事实上与它共同建立国际宪兵。

还有个例子，是你们对西柏林的态度。以西德的总理艾哈德为首的几百名西德议员坐美国飞机到西柏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毕竟这就在你们边上。这事直接关涉民主德国的主权。当时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正好去波兰出访。就此事他们表示了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还能做点什么，尽管放的是空炮，可你们这次甚至连空炮都没放一发。

你们在越南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们在到处叫喊，说中国不让你们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运送你们的物资。我们对此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反驳。可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事情真相。如今时间还没到，我们也还没说，因为你们还没有说出所有一切。最好在你们将所有这一切完全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说。围绕你们承诺向越南提供物资的问题，你们掀起了一片叫嚣。但是，甚至拿你们承诺提供的所有物资，包括在苏联最后一次会晤时答应的，也构不成是难以置信的重要物资。你们对离你们那么远的事情议论纷纷，而对你们身边的事情却沉默不语。关于这点我们也打算纷纷议论起来。你们说谁教导谁。我们不想教导任何人，可提到对待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待现代的修正主义，

我们不会沉默，我们会作出自己相应的评价。你们说自己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为什么今年4月3日在列宁格勒要镇压支持越南的人拥护者的集会？那里没有可以朝它扔石块的美国大使馆。多少越南拥护者都受伤了！甚至撕破了越南的旗帜。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声明，你们是最革命的，你们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那就要问了，为什么你们要采取类似的行动。你们希望要在行动和事业中团结起来，而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你们做出的事情和行为。

刘少奇说，正因为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得多了，所以我们表示对你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对你们明确指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永远表示赞成。

刚才您否定苏联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合作，但是你们的领导同志刊登在报刊上的无数发言，尤其重要的是你们在这方面(邓小平插话：新的)具体的行为就是这种合作的证明。我们遵循的是相反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需要与美帝国主义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我们也不将与美国开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们想以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越南问题是这些国际问题中的一个。你们想通过与合作解决越南问题。这不会成功，也不会造成什么好的结果。

契尔沃年科说，想引起你们注意，当艾哈德和其他西德军国主义者在进行挑拨离间时，苏联方面在揭露这些不仅反对民主德国，而且反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拨离间的同时，正式并坚决地表示坚决反对西德帝国主义者们的这些行为。至于具体的事情，你们很清楚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条约，以及不久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签订的条约的价值，所有这些事情都旨在反对复仇主义的主要实际力量——西德军国主义。你们中国领导人很清楚有多少苏联部队在民主德国，他们用的是什么装备。这些部队面对的是最危险的和现代帝国主义最好的武装力量。可以列举出许多其他的事实，你们也知道的。

你们说得对，越南问题具有国际意义。你们也很清楚苏联领导人多次正式向你们呼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至于与美国的谈判，苏联政府就该问题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只要求一点：美国军队从越南南部撤出和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苏联领导人建议与之进行会晤和谈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与美国。

对苏联是如何履行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越南同志知道得很清楚，关于这点刊登过一系列越南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其中包括最近苏联与越南的公报。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我想重新强调，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现实迫切需要寻找通向团结的道路。需要讨论具体的问题，为此需要我们两党和两国不同层次和级别的代表更经常性地会晤。领导们的会晤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特别是现在存在极大的必要性。在这些会晤过程中许多问题都会更清楚，许多误解也会消除。

我在这里已经有5年半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远远不能说完全了解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党和人民，我非常珍惜在中国度过的时光，尽管它曾经，很遗憾，是复杂的和困难的，我们的关系也曾经是非常尖锐的。许多有关你们的国家、中国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将随我而去。你们用15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有许多是非常重要的和珍贵的，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两国之间各个不同领域中广泛开展经验交流做得还不够。我相信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看到了党的活动能力和中国人民那种紧张而又近乎自我牺牲的劳动。值得钦佩。为此我衷心祝愿中共中央委员会、你们党和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多新成就。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认识使我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困难将被克服。你们现在也说到了这点。将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的力量和微薄的工作都将以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利益为目标。

我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所给予我的关怀与厚待。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和所有领导同志，为了在你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为了整个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祝你们身体健康。

刘少奇说，我们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和敌意。我们之间出现的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涉及方针和政治、涉及这类问题的分歧。我们把这些问题的放在一边的同时，应该(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保持对你们的领导人、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友好之情。

我认为，不管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世界上所有追求革命的人，

都是不会对帝国主义者宽容的。

契尔沃年科说，这是肯定的。

刘少奇说，让我们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事业中团结起来。

契尔沃年科说，我们赞成。

刘少奇说，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将不断地发生。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因为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因为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因为有许多苏联人和我们怀着同一个希望。将来在具体的事业中将证实我们两国、我们两国人民将走在一起。

请在回国之际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其他苏联领导同志转达我们的问候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您作为大使，这些年里过得不容易。请转达我们对您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友好之情，我们不想让他们受到损失。至于辩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和方针问题。是另一码事。就这些问题也可以在将来进行争论。

当然，在辩论之时，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人都不会轻松，但如果进行了辩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谁或者不同意谁，都应发展友好的关系。

邓小平说，感谢您在发言最后部分对我们的人民和我党的评价。祝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取得成就。

契尔沃年科说，我一定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转达你们的问候。

新任大使拉宾同志不会晚于5月初来到北京，也可能在5月1日之前到来。

刘少奇说，我将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您的祝愿。我们很高兴新任大使的到来。

会谈到此结束。

刘少奇、邓小平表面上保持平静，尽管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准备跨出限度，可能会展开激烈的争论。

康生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一直沉默，全神贯注并若有所思。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考虑到是告别性的访问，我们努力避免发生激烈的争论。

会谈记录：加利诺维奇同志、列别金斯基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C.契尔沃年科

АВ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33-152

№25689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 [33] (1965年4月23日)

绝密

.....

哈拉斯先讲述了自己与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会谈的情况以及对中国与叙利亚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而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在4月23日当天同余湛举行的会谈。

余湛说到越南问题：如果我们.....关注目前越南的局势，将看到这（显然是指慕尼黑的历史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逊“提议无条件谈判”。余湛着重指出，接受约翰逊的这些条件就等于出卖和平。

约翰逊今年4月7日的讲话证明美国的政策是孤立的，它受到来自世界舆论的压力，可这项政策终究还是没有改变其侵略的性质。

今年2月15日，余湛继续说道，柯西金同志回到了莫斯科，而2月25日送交给了我们一份物资清单，是苏联打算发往越南的物资。3月10日中国方面答复准许转运越南人民急需的所有物资，这也是根据越南同志的要求做的。

按余湛的话说，当3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协商会晤时，会晤时所说的是好像中国方面在苏联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事上制造了些困难。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的：2月28日中国方面提出了解决该问题

的方式，可直到3月8日之前苏联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送任何急需的物资。

然后苏联向我们表示.....想通过中国向越南转派4000名苏方人员，可不管是在曾北京逗留的柯西金同志，还是越南同志都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按照余湛的看法，转运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员意味着真正的干涉。作为对中国人的答复，越南人表示至今还没提起过有关这4000名人员转运的话题，不需要这些人员。所以我们.....不赞成上述提议。

随后余湛讲到了有关苏联请求中国方面在离昆明不远处安排一个机场，用来停放12架米格21飞机和500名人员，从空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掩护。经研究后该项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因为米格21的作战半径无法掩护越南民主共和国。

如果苏联的想法是认真的，为什么谈的只是12架飞机，而当时美国几十架飞机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

苏联同样还打算向越南发运导弹.....这里提到的导弹长度约15米。用飞机无法运送，苏联请求用铁路进行运输，对此中国方面在3月15日表示同意。4月7日第一批导弹运抵中国，也就是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但是.....不能将这么长时间的耽搁归罪于中国。

余湛说，那时苏联通过法国为和平谈判牵线搭桥，“苏联请求向越南运送武器。造成一种印象.....这些关于运送武器的请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和平谈判而‘支付大量的预付款’”。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53-165

№25757 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 [\[34\]](#) **(1965年4月27—29日)**

.....

1965年4月27—29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执委会紧急会议，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拒绝进行1967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运动会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因此，

4月12日体育协会和组织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Л.尼古拉耶夫写信给中央。信中写道：“新兴力量运动会第二届运动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可能会引起国际体育局势尖锐化，因为中国许多体育团体退出了大多数国际联合会，而且在比赛中会忽视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尼古拉耶夫请派一个苏联代表团维护苏联的观点。

4月17日B.斯纳斯基、A.舍夫利亚金和K.鲁萨科夫建议中央派代表团为了：

1.“采取……防止国际体育运动可能产生分裂的措施”；

2.“支持国际比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建议，但提出必须遵守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的意见”。

РГАНИ, ф.5, оп.58, р.7748, ед.хр.126, л.60-62

№25690 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 **[35] (1965年4月30日)**

在递交国书后会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进行了1小时1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代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外交部工作人员李藿林、陈广才；苏联方面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大使馆参赞雷索夫、武官罗曼诺夫、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

C.Г.拉宾说，勃列日涅夫同志让我转告您，说他很高兴回忆起曾和您一起去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斯科的情形。

刘少奇说，对！对！很久以前我就与勃列日涅夫同志成为朋友了。

……(刘少奇重又讲述自己在1960年的苏联之行，说他的发言没有刊登。)

81国党代表会议后我们的确想改善我们的关系。总之，从我们这方面讲这样的举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会以后，当时取得了一致，

我们竭力要改善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是在81国党代表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上同样也取得了一致，我们力求取得改善。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恶化。

对此我们没有准备，我们甚至没想到我们将要跟苏联共产党展开争论。但面对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进行争论——

拉宾说，……我想指出的是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这段时间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体会议。在到达这里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柯西金同志谈过。他们让我转达我们新领导层对巩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真诚祝愿。我们的人民希望这样，这也是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以及政府的愿望……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报道说签署了我们两国的1965年商品贸易协议。这是很好的一步，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贸易联系。

中国方面建议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经济合作……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合作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不久将在北京签署我们两国在1965年的文化合作计划。

……有发展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切基础。当然，我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看来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但不管如何，作为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不管在哪里出现，进行共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并应该发展友好的邻邦关系。

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让我转告，我们将非常乐意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任何有关我们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情况……(请求经常会晤)

刘少奇说，这很好。今后我们能够并将会这样做。

对于苏联同志……我们没有个人恩怨，我认为我们事业的基础是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是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后，刘少奇谈到了周恩来1964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因赫鲁晓夫被撤职而不想说出真实情况”。刘少奇说，同时也清楚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依旧跟以前一样，情况没有变化。

刘少奇说，可为什么，是因为哪些原因使我们以前非常好的关系变

得不好，开始恶化？不消除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就无法消除分歧，无法停止出现分歧。这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我认为在莫斯科签署对外贸易议定书，以及我们提出的涉及发展我们两国经济联系的建议，这都是很好的基础，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基础。我们要发展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出口超过70%都是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苏联，超过50%。为什么现在急剧缩减？应该是有一些原因的。

所以我认为，发展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是可以的，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搞。在保留和存在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分歧、理论分歧的情况下，经济关系还是需要发展的.....

同样也有可能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接触和文化交流。政治关系问题依旧不明确。

刘少奇说，政治问题方面的看法很难取得一致.....

刘少奇说，如果你们方面有意愿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这里指的当然是内部讨论。

.....您刚才强调苏联方面准备向我们转达有关对内政策的情况。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向你们通报我们的内部情况，有关我们实施的各项指令.....

刘少奇说，如果已经谈到了这点，而我指的当然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同志般的关系，那我们对你们的内部指示也产生了某些看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产生了不是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你们谈的，主要涉及对外政策问题，我们认为能够公开地跟你们谈对你们内部政策看法的时机还没到.....

拉宾说，要消除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需要许多时间.....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点。至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外政策，我感觉对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更乐观一点。

我们两国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后者既威胁到你们，也威胁到我们国家。

(接着拉宾谈了苏联的国内情况和提高农业的必要性。)

.....我向您提一个个人请求。我想在五一节之际或以后与毛泽东同

志认识一下并拜访他。刘少奇说，尽管毛泽东同志现在不在北京，节日之前可能不回来，可今后您肯定要会见他的.....

我们很高兴看到苏联向越南提供援助。提到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经手，我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知道在不同时期你们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怎么处理方式，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或多或少地积极提供援助，数量是多少。就越南问题我们也有对你们的不满。过去和现在也都存在一些不满。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66-179

№25691 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 **[36] (1965年5月8日)**

.....拉宾再次请求会见毛泽东。

拉宾说：诚然，我们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按照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必须在所有可以做到的领域——经济关系、对外贸易、文化合作、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巩固我们的关系。

(朱德并不支持这个谈话方向，而将话题转到了分歧问题。)

朱德说，而现在，正如您，大使同志，所说的那样，是时候不让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影响我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发展.....

我们应该使这些关系仍旧与发生分歧之前一样。

但是，我们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消除了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使我们两党和我们两国团结起来。只有当基本问题解决以后，那时剩下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我希望您能够在这里比您的前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个人愿望。

.....

拉宾说，可我们主要的目标是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这使我们有责

任更多地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具体方面。据我所知，现在运送武器的军用列车很快将通过中国境内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与周恩来同志进行会谈时，柯西金同志说了“我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还说我们10月全体会议(1964年)的意义远比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要深远得多。

(朱德谈有关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

朱德：“这场战争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吗？这个问题涉及对革命的评价。越南人现在正取得胜利，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这样一来就延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应该不只是向越南提供具体的物质援助，还需要提供政治精神上的支持，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凶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提高人民的觉悟、鼓舞人民起来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比用步枪和武器援助所起的作用更大。”

……

朱德说：“……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战争时，我们将团结起来……”

拉宾说，我认为要是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帝国主义者将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朱德说，反对斯大林，这意味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所以，你们应该恢复斯大林实现的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应该放弃修正主义路线、放弃赫鲁晓夫路线。

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时你们的威信就将提高到20年前的高度。

……现在正是给予美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而我们能够战胜它。

……

拉宾说：“说到斯大林的作用，我可以告诉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

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政府自己会认识清楚，对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作用会给予应有的评价。”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80-190

№25692 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37] (1965年5月15日)

会谈开始时谈到了周恩来与契尔沃年科的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坚持认为，是契尔沃年科自己挑起争论的。而后拉宾说，最近在发展苏联和中国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有益步骤，如经济合作、向越南运送武器、情况交流。

周恩来说：“我认为在任何会谈时都会产生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该发展什么样的国家之间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哪些分歧。

……只是有关友谊的抽象会谈无助于事业。”

周恩来谈了他与柯西金讨论的具体办法：“柯西金同志请我的翻译记下这些问题，并将这笔记转交给他。”

第一个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发表“庆祝苏中条约签订15周年”的贺电和祝词。

柯西金说：“让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吧。”

可是，周恩来说，苏联报刊刊登的是苏联不同意的部分(反帝国主义斗争)。

周恩来接着说到苏联和中国的条约，说条约旨在反对日本，而日本身后站的是美帝国主义。“如果要庆祝我们签订结盟条约周年纪念，如果有准备要证实这次谈话还继续有效，那怎么可能不揭露美帝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贸易关系。“必须说的是现在这个领域的事情进行得还顺利，但我们当然不该满足于这个。所以我们提出了增补必须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签署的有关附加长期关系的建议。”

第三个问题，苏联援助的项目建设。周恩来说，未完成的项目必须建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将没有建设完的要建设完。

第四个问题，“至于有关文化合作的协议，这样的协议过去履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将会更好”。首先谈到的是有关友好协会方针方面的措施。

第五个问题，有关学生的问题：“我们打算派遣我们的学生去你们那学习……我们也将接受你们的学生，如果有这方面申请的话。”

第六个问题，有关旅游。周恩来表示希望履行签订的协议。

“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在两国关系方面还能做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两国的人民要求发展和巩固这些友好关系。”

“应该说中国人在两国关系方面一直是说话算数的。我该说我们的政府说话也是算数的。”

“我向柯西金同志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两句话：‘交流情况，行动一致。’”

“我当时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应该就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情报，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发现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甚至当发现不可能一致行动的时候，通过情报交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在哪里。”

周恩来说，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给契尔沃年科讲述了自己与本·贝拉和其他人的会晤情况。

拉宾说，苏联本来就与美帝国主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他开始成为国际宪兵。对它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任何我们背着越南、刚果以及其他人民进行的谈判。”

周恩来答道，尽管我们之间不只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还在一些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性的、严重和深刻的分歧，但苏联和中国应该竭尽全力团结起来。

说起有关党的路线，“应该说，三月会议是苏联共产党新领导人在我们两党之间设置的新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接着周恩来批评柯西金就有关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

“当苏联代表在4月16日与范文同会谈时，范文同直接就表示现在不能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屈从于敲诈。”

而后周恩来再次指责苏联与法国的合作。

拉宾答道，这是“误会”。话题谈到的是呼吁戴高乐，“要法国政府反对侵犯越南主权”，当时没有涉及谈判的话题。

周恩来说：“既然你们呼吁法国政府协助制止对越南的轰炸，那就无法想象同时不涉及南部越南的中立化问题。”

拉宾说：“没有，我们没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只是在1963年提出过，“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提起过”。

周恩来还是重又回到了2月23日的事件：“向法国政府呼吁的事实本身说明你们是赞成谈判。”

周恩来谈到苏联与美国的接触：“你们的外交官们一句厉害的话都没说，而美国的国务卿则表示，会谈和接待是友好和很有意思的。”

“给人的印象是：在那个时刻，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在屠杀我们的兄弟时，你们的大使却与美国人维持着隐秘的关系，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这里常说的‘如胶似漆’。”

接着周恩来说到了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声明中没提到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出访法国巴黎时)。

周恩来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扩大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参与。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印度支那，我们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声明，如果美国人将战火烧到中国，那我们这一关对他们来说将是无法逾越的。”

周恩来随后谈到了他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所做的事情。

1.“我说了，劝说越南同志屈服于美帝国主义者的恫吓是错误的。”

2.“第二点，只要越南战争一旦扩大就将成为世界大战，我驳斥了这种观点。

如果美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应付不了，他们怎么能够将越南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他们在实施升级战术，也就是逐步地一级一级往上升的战术。

只有脑子最迟钝的失败主义者才会这样扩大战争。”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美国全球“扩军”的错误军事战略。

“所以，如果他们要进一步这样做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应付中国，也谈不上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发动世界大战。(印度支那战争)不能成为世界大战。”

周恩来补充道：“现在不必害怕爆发核战争。”

3.“我们说了，如果他们要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回避自己的国际义务，但我们不会将苏联拖入战争。”

拉宾说：“谈判的时机反正应该是越南同志自己决定的，而不是我们，也不是其他同志的，这点我们完全同意。”

拉宾谈到苏联领导人：“他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们希望我们两国友好和相互谅解。”

周恩来继续说到越南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批评苏联没有对印度的提议进行批评(有关亚洲和非洲部队在两个越南边界驻扎的提议)。批评苏联对印度的援助。

“我不是外交家。我是军人，我在战争中得到锻炼。也许我也好战。”

拉宾说：“我们的根据是，应由越南人民去解决和平调解的问题。他们在战斗，在进行谈判，那是他们的事情。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援助越南人民。”

周恩来：“可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外交活动和宣传方面做这些事情。”

周恩来：“美帝国主义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你们能否定这点吗？”

拉宾：“从来没有。”

周恩来：“既然你们不否定这点，那你们的外交活动就应该旨在孤立和批评美帝国主义。”

拉宾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问道，那么为什么不反驳有关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传言？

拉宾答道：“那只得经常不断地进行反驳。我们顾不上做这些。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

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在4月的艺术展览会上表示，“越南南部是件很小但伤脑筋的事，可要是不制止它的话，它会转变为世界大战。这事怎么讲？”

拉宾说：“赫鲁晓夫已经退休了。”……

周恩来说：“这一切是一场计划好的有人指挥的闹剧。我们明白你们和我们的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拉宾说：“看来是我们的体制也运转不规律。”

周恩来还是在说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的友谊。

拉宾说：“我希望，您不会是想要我们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吧？”

周恩来问，那如果美国人想断绝与你们的关系，你们将如何对待？

拉宾说，如果美国人打算这样的话，如果他們要干涉我们的事业，这点大家知道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时刻准备作战。

周恩来说：“现在进行战争也还靠舆论。要去进行揭露，这样别人才会正视你们。现在根本没把你们当回事，别人也不怕你们。”

对美国“你们应该保持更冷淡一点，不要搞隐秘关系”。

接着，周恩来与拉宾开始谈论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苏联在联合国

的工作问题。

拉宾说：“也许我们的代表有必要相互见面并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联合国的策略。”

而后说到了有关柬埔寨问题。周恩来呼吁支持西哈努克，以便将有关柬埔寨问题会议与老挝和越南问题会议分开。周恩来说，必须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会议，而不是西贡政府。“如果你们这样行事的话，那你们就将开始抵抗美国 and 英国。”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191-227

№2305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 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1965年5月18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1094 c号

1965年5月18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国当局，继续大量以私人名义，通过邮政渠道，从中国向苏联公民发送诬蔑性小册子《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

目前判断，上述小册子已进入苏联绝大多数地区。

根据截至今年5月17日的情况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查明并没收了带有此类小册子的信函和邮包近2000件。多数小册子都被发往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格勒诸州以及乌兹别克、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诸共和国。

除了通过普通信封投递外，通过大量事实，我们还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所采用的狡猾手段：将小册子夹带在外国和苏联出版的科学、艺术和儿童书籍里，隐藏在本子的封皮里，艺术明信片的装饰里，保价包裹里，等等(实例参见附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小册子都是通过带通知单的挂号信的方式交给收信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并没收了1000多封带有敌视性的阿尔巴尼亚资料的信件，它们均发自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继续对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邮政方式发入苏联的敌视性资料进行监控。所发现的资料均将予以没收和销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23052 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1965年5月24日)

苏联科学院

机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现阶段的情况和发展前景)给苏共中央报告 [38]

1965年5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М.М.……同志：

兹发送给您“中国经济状况”札记——内容涉及……是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根据相应工作计划编制的。

其中，分析了中国近十几年以来，尤其是1963—1964年间的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由于“大跃进”，截至1962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比1960年下降了30%。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所确立的任务……只是到了1965年，国家工业才可能接近1962年所计划的产品实际增长指数。1962年，工业生产总量才达到1957年水平的100%。农业方面所情况尤其严重：不仅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且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都无法落实。1964年的中国农业生产总量，在经过1961年的严重下滑后能够重新达到1957年的水平。

国家的工业发展极其缓慢：1958—1962年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即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还要低，也比全世界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要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正如不发达国家……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64年粮食生产数量人均比1957年少了15%以上。近3年以来所生产的粮食几乎被所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

当前，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不协调成为了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主要障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比，1962—1964年间农业生产的恢复速度较为缓慢。新的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从而可能使国家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农业的不良状况也对工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无法为工业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和从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最近四年以来，中共和国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国内的粮食状况，而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粮食倒是在这方面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必须进口粮食——此举更加限制了中国资本积累和向外国购买设备的可能性。

中国的顺利发展，主要取决于如何能够迅速地使国家的农业生产获得稳定的增长；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技术改造和生产集约化的速度以及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中国虽然在技术改造、生产集约化和引进现代农业机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具体实施的进程却相当缓慢。原因在于，国家工业暂且无法保证向农业供应所需要的技术和化肥。例如，根据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拖拉机的增长总数来看，1958—1964年间新增加的15马力的拖拉机共有95000台，其中50000台是通过进口获得的，只有45000台——来自国产。1958—1964年间所生产的15000台拖拉机只有6000—7000台被列入拖拉机增加总额，其余——用以替换报废车辆和其他领域。以这种生产速度，中国要达到自己所需要的100万台拖拉机总量可能得经过14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国家工业所产生的产品在质量上都非常低下。

还有另一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因素，即集体经济在一些最重要类型产品的生产上缺乏物质利益的驱动。现存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比例关系以及与生产投入相比显得低廉的农产品采购价格，均阻碍了农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寻找资金以扩大再生产是农业生产队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说，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无法补偿农业生产的损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仍钟情于与多种经营市场联系微弱的集体经济(根据“自力更生”的方针)，指望通过集体经济来发展各种副业和渔业。

最后，农村没有文化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增长极其缓

慢——这些都是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1963—1964年间，中共和国政府在农村政策和措施上的积极内容具体如下：1.在一些数量不多但自然条件好和农产品商品率相对较高的地区，集中力量提高农业生产。他们首先在这些地区兴建了水利工程，运送了农业机械、工具和器材，向这些地区发送了占国家生产总量99%的化肥。2.组织农民参加夜校教育，建立学校，从而使农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不过，所有重大的举措暂时都是在生产队和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必须归国家机关直接领导。3.在农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家组织的影响力：出现了国家的灌溉经济，增加了机修场的数量。农业技术站也开始培养农业干部，以掌握运送到农村地区的农机工具和器材。这些举措，虽然不足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毕竟可以对促进生产发挥一定的作用。

通过分析农村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电气化、机械化和所谓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以及农业化肥供应的发展和现状表明，中国暂时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得极其缓慢。通过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前景规划表明，中国在农业技术水平方面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相当简单的，与苏联的现有水平相差20—25年。不过，即使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中国仍必须相应地大量增强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

近四年来，在整个重工业一系列主要部门生产增长速度急剧缩减，甚至停滞的情况下，中国为了首先确保农业生产而对工业生产重新定位，无疑是一项客观的正确举措，从而有助于纠正在编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当前，中国重工业落后于经济需求已演化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其甚至导致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严重(普遍)不足的情况。

为了确保各重工业部门——尤其是矿山采掘、电能、黑色和有色金属等——的振兴，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培养更多的懂技术的熟练骨干。但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欠缺。而在没有来自国外——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帮助的情况下，中国将无力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确保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

中国依靠自有资金增加基本投资的重要储备可能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降低对军事工业、原子武器和其他军事研究方面的拨款。目前，

与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上述目标上所花费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其次，通过改变“自力更生”的政策可能腾出大量资金以用于基本投资，因为这一政策导致中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国家所需要的各类型产品，从而花费大量目前对中国来说极其宝贵的时间。其三，放弃以零星投资的方式建设大量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明显落后的小手工业和半手工业企业的政策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重要储备之一。最后，(在经济投资和生产增长方面)采取坚决措施，以便以最快速度提高工业品的质量——这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一个重要源泉。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品的质量是极其低下的，并在多数情况下都导致扩大生产规模显得缺乏效率。而产品的低质量是由现行政策所衍生的生产组织本身以及缺乏足够的技术骨干等因素所预定的。近年来，大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导致个别的、小批量生产大量和普遍出现，从而恶化了企业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

1963—1964年间，国家在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下了很大工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在未实现向大规模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全面转变，未实现深入的社会化、合作化和引进现代技术，未能迅速提高工人文化素质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只能是相当简陋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改进的速度极其缓慢。与此同时，不论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合作化，还是发展夜校教育，目前暂且都是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积极主动的结果。这些措施仍没有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意义和可能产生的结果将远远超出了主动精神的范畴。

至于生产的增长速度问题，中国工业的现状表明，近期其可能出现一些加速发展的趋势。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因素如下：1.中国工业生产的负荷能力的增长(这主要取决于重工业主导部门的增长速度和消除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失调)；2.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的深入发展(这方面将主要取决于原料和能源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3.众所周知的群众政治激情的促进作用。近期，生产的一定增长，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964年，一些企业已出现了劳动竞赛再次兴起的征兆。

最近几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当然，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确保重工业各主导部门——矿山采掘、煤炭和电力、黑色和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工业建材等——生产的高速增长就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在关注以上所述的同时，我们认为在解决苏中关系问题时还应从中国经济现状中所表现出的以下诸方面予以重视：

——现在和今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需要得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帮助；

——国家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均允许中国略微加快工业发展速度；

——目前，中国关注的重心必然是重工业——尤其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决定着为农业提供必需商品和产品的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间(包括1965年在内)，中国将有能力从国外获得总价值不低于1.25亿美元(以1964年的汇率水平计)的成套工业企业，而如果在农业方面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一价值总额还存在逐渐增长的趋势；

——在许多年内，中国仍将不得不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

——中国(在偿还了欠债之后)仍存在继续向外国寻求借贷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如下特点：

其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中极力构建自己的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购买商品和设备，在必要情况下也会利用外贸作为对(贸易)伙伴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

其二，极力支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其三，为了建立和加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国会同利用互惠贸易和政治支持手段，如动用(推动、维持和加强等)手段来加剧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对苏联、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和国家实施攻讦。中国领导人不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极力使中国置身于上述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之外，以维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一立场就是所谓的“……”政策，而这也正是西方目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试图采取的立场。在继续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同时，中国

领导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也不会反对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甚至还会试图以帮助为手段确保自己对个别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附原文共计115页。

第МП085号

机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负责人

C.齐赫文斯基(签名)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1, л.1-125

№16679 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1965年5月27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市党组织就苏共中央的秘密信件《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而开展的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

在莫斯科市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了关于《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秘密文件介绍的党组织会议。到1965年5月27日止的情况是：已有7690个组织召开了会议，与会共产党员人数达510042人。

在所有的组织会议上，共产党员一致赞同苏共中央在10月会议(1964年)之后就加强社会主义联合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进行的活动。

首都的共产党员们完全支持二十大、二十二大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情况正常化而采取的措施。

在党的会议上，赞成苏联具体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面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其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以及为改善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所做出的新行

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能深刻认识和积极支持苏联共产党为消除分歧、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进行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坚定、始终如一的积极活动，全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所以获得了来自整个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热烈支持。

701邮政信箱的企业党组织在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时，工长雷奇科夫同志声称：“我们单位的共产党员和我个人一致支持和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合作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实际活动的政治路线，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列宁主义行动。他们要霸居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在兄弟党之间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这是不能容忍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是完全正确的。”

红色十月工厂车工杰明同志说：“我们一致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宣传中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我们的党，好像已没有人民的信任。但是，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必须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实际。在我们车间党组织里仅仅一年就有12人入党。这些人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与党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证明党和人民的团结？我们是工人，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出来说话，并加入到工人阶级友好的国际大家庭中，为和平团结奋斗。”

368邮政信箱的单位技术科学博士、教授、国家奖金获得者杜勃诺夫这样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以单位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宣布，我们完全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旨在加强各国人民的交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的行动。我们的党，对朝鲜共产党表示巨大支持，我们共产党员们一致同意协商会谈，同意苏联政府宣布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反侵略英勇斗争的公报文件。”

其他党组织也反映了上述相似意见。

对于中国领导重新开展反对我们党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斗争，试图冲击共产主义运动，偏离由莫斯科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莫斯科的共产党员

们深为愤慨。在共产党员的会议上发言者说道，中共领导人提交给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最后通牒”侮辱了我们。我们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分裂活动的愤怒”——第五纺织厂工长加里宁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最近几年来用其危险的把戏，不仅在党性上越过了界限，而且简直不懂礼节。他们顽固地不理睬、不答复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停止公开破坏的倡议。在中国领导人那里无不证明其进行蓄意的分裂活动。他们的唯一武器是对我们党进行下流的诽谤。所有这些都激怒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各兄弟党、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所采取的措施。”

戴尔别涅夫斯基化工厂工艺师叶廖明同志说：“中国领导人极力设法在共产主义及工人运动中打入楔子，但是，这不会成功。中国领导人拼命地要用别人的手打击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明他们‘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已处在叛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路上。他们的活动应予指责。”

所有会议都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

党的会议提出了下列问题：

中国对越南做出了什么样的帮助；

非洲国家怎样对待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反对苏联代表出席；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分歧中起了什么作用；

什么时候召开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

目前是否允许支援越南用的苏联军用辎重经过中国领土；

中国的报刊电台公开进行反苏宣传，我们为什么停止公开讨论。我们必须给他们坚决反击，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实面目；

在苏联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原则性的分歧是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来消除它们；

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消除分歧有无什么进展；

是否全部中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列宁主义分裂

政策；

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

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立场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是否给越南军事援助；

在我们那里是否居住着越过边境的中国人；

我们党与罗马尼亚工人党之间在乔治乌德治死后的相互关系如何；

目前，首都的共产党员们正在继续熟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文件。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书记

..... [39] (签名)

1965年5月27日

第ИСХ58号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110, д.461, л.42-45

№25693 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 [40] **(1965年5月31日)**

在就一些问题进行礼节性的谈话之后，拉宾讲述了自己随外交使团一起的中国之行。陈毅评述了中国的情况。

陈毅说：“非常需要和平的环境，可是这取决于美帝国主义者是否给我们这样的和平环境。”

接着谈话提到了以前的战争。讲到了越南。

陈毅说：“当斗争达到一定阶段时，当美国人再也无法进一步推进时，当美国人只能撤走自己的军队时，看来到那时谈判的条件就成熟了。”

“世界上没有一场战争超过100年的，而要是有这样的战争，那到第

101年就开始谈判了；曾经有过持续30年的战争，可到了第31年就进行谈判了。”

“而我们暂时还认为谈判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拉宾证实谈判是越南人民自己的事情。

“近日我们将葛罗米柯同志与腊斯克和斯图尔特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了你们，那上面讲的就是这个(越南)问题。葛罗米柯说，苏联不打算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进行谈判，苏联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越南政府的立场，必须立即停止侵略并将军队撤出越南。”

陈毅说：“要中国与美国合作，也许再过20到30年。但目前不可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人占领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对越南进行侵略。有关这些我在内罗毕与腊斯克、哈里曼以及美国内务部长都谈过。”

告别时，拉宾问陈毅：“还能称您为元帅同志吗？”陈毅回答，还有半天可以这样称呼他，但过了6月1日就该称他为“战士同志”了。^[41]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228-235

№24354 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1965年6月2日)

机密

文本第4份

1965年6月2日

第217/уви号

一、关于会议邀请程序

1964年4月，应印度尼西亚的倡议，第二届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在雅加达召开，2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公报中说“决定邀请”如下国家参加会议：

1.参加过万隆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

2.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成员国；

3.第二届亚非会议召开前将会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

4.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塞浦路斯、科威特、西萨摩亚、安哥拉临时政府。

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会议公报中说：“向会议提交了邀请苏联的建议。一些代表团支持该建议，一些代表团反对。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需要与本国政府商量。经过讨论，这个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代表团持这种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转交给国家或政府首脑们去研究。另一些代表团反对这个意见。因此，这个问题未能达到一致意见。”

众所周知，关于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是在印度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同时还表示邀请马来西亚参加会议。中国政府反对该项建议，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几内亚支持中国的意见。

中国政府方面尝试这样解释这件事，似乎在雅加达会议上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被否决了。

在1965年1月中国向一些亚非国家分发的备忘录中说：“在这次会议上(说的是雅加达会议)没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味着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被否决。这样，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

从去年10月阿尔及尔会议开始，由15个亚非国家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就开始定期召开会议。按照阿尔及尔会议的代表声明，最终确定参加会议的成员组成不在委员会权限范围内。按照他们的话说，外交部长会议没有讨论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将提交给政府首脑会议研究。我们是从印度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5月末，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向亚非各国发去了参加今年6月29日晚上5点召开的会议的邀请信。随信寄发了雅加达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

二、亚非各国对邀请苏联的态度

最近几个月，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数量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增长。其中对苏联政府近期声明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声明中阐述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据今年6月1日收到消息，可归纳为如下内容：

在同我国大使会谈时，阿富汗、加纳、印度、伊朗、埃及、老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锡兰政府对邀请苏联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和坚定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印度仍继续提出在邀请苏联的同时也邀请马来西亚的问题。除了印度，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更为明确地表示准备支持邀请苏联的国家有：约旦、喀麦隆、肯尼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利比亚、尼日尔、叙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赞比亚。

在雅加达筹备会议上，几内亚同中国一起反对苏联参加，现在外交部长贝阿沃吉对苏联大使表示，为了能让苏联参加会议，几内亚将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摩洛哥在给一系列亚非国家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谢克在今年4月末对苏联大使说，土耳其政府无法想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将据此出发在这个问题上确定自己的步伐。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去年就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苏联参加会议是符合愿望的。但是，在本·贝拉访问苏联发表的公报中，应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今年5月29日，外交部长布杰费里卡对苏联代办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当时认为，阿尔及利亚作为会议参加国，在邀请苏联的问题上如果不事先表明立场会更好。按照布杰费里卡的话说，阿尔及利亚人在同友好国家会谈时都表达了赞成苏联参加会议。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今年5月27日听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后，表示担心由于一些国家立场不同可能会导致会议夭折。按照他的观点，会议筹备委员会应该格外谨慎，通过决定时应该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事务合作的利益。

缅甸、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不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同时声明说，它们将遵从大多数意见。

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和黎巴嫩支持邀请苏联，它们声明说，它们的立场要在阿拉伯国家首脑开罗会议后才能最终明确，那时将会就此问题进行意见交换。会议将于今年5月30日闭幕。

柬埔寨和尼泊尔领导人在今年5月末对苏联大使说，他们原则上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会议，不会发言反对这一邀请。同时他们还表示，他们也不准备发言支持这一邀请。

很明显，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也持类似立场，尽管这些国家政府拒绝直接答复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尝试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阻碍邀请。苏联驻摩洛哥大使馆的消息值得注意，5月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访问该国，似乎向外交部长本西马表示，中国默认多数与会者的意愿，如果他们同意邀请苏联的话。

根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日本的声明来判断，不排除这些国家对邀请苏联一事持反对态度。菲律宾就公开反对苏联参加。

大部分国家(加蓬、冈比亚、西萨摩亚、利比里亚、毛里求斯、马拉维、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乍得、南越、南朝鲜)完全不表明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要么避免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象牙海岸、布隆迪、上沃尔特、达荷美、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表示，它们不打算参加会议。

这样，根据这些资料，50个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有24—26个国家准备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可以期待，还会有一些国家倾向于这个观点。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负责人

A.布拉托夫(签名)

No25655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1965年6月4日)

1965年上半年朝鲜与中国关系的一些新情况 [\[42\]](#)

.....

从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在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总体上可以说是朝鲜领导人在试图摆脱一味地跟随中国。

这个过程始于10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当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特别是在1965年2月以A.H.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朝鲜之后。

众所周知，1964年中期朝鲜在热烈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尽管劳动党试图把自己的宣传显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独立的方针”、竭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所有的攻击都是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内外政策。

中国的宣传可以在朝鲜民众之间广泛地传播。朝鲜的报刊登载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有主要的论战性的编辑文章。

1964年朝鲜《国际生活》杂志第1、3、8、15、16期曾经刊登了那些中国文章“和平共处政策中的两条对立路线”，“苏共领导人——当代最大的分裂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

宣传中首次开始强调的论题是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在与“当代修正主义者的”共同斗争中得以巩固，是以各民族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为基础的。见1964年10月25日《劳动新闻》社论《以鲜血凝固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可到了1964年年底，朝鲜领导层开始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一味跟随中国给朝鲜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

由于1964年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广泛接触，对于朝鲜领导层而言，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在自己计划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并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亲中国政党联盟方面让其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领导人一样，朝鲜领导层将分裂集团认作“独立的马列主义党”。所有这些从北京来到平壤的集团的领导层都受到最高层次的接待。可所有这一切都使朝鲜领导层开始明白，尽管有中国领导人的巨大努力和他们巨额的财政援助，可分裂集团越来越暴露自己。看来，朝鲜领导层越来越深信与这些集团的“亲密接触”并不能增加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

朝鲜领导层不能不警惕中国领导人明显的大汉民族主义和政治冒险主义，而发现自己与中国人单独相处时，这样的前景只会让朝鲜人感到不安。

朝鲜也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领导人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建立联盟的宣传造势运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更何况中国领导人在10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后对苏联共产党的愚蠢攻击反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更大限度的孤立。比如，1965年5月在与苏联大使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承认，仅仅只有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还跟着中国领导人，依旧支持公开辩论。（参阅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片面地向中国靠拢导致了朝鲜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恶化。而这本身也成为了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那些迫使朝鲜领导调整自己的政策，尤其是调整朝鲜与中国关系方面政策的原因中，由于美国入侵和扩张造成越南局势的恶化，朝鲜半岛三八线可能爆发严重冲突以及事件如此发展对朝鲜造成的后果，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继续支持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的同时，朝鲜领导人对在朝鲜传播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作了些限制。

他们重又开始特别强调有关劳动党独立政策的论题。

而且在朝鲜领导的各种声明中现在已经表现出有关独立的论题，好像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在承认自己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因此，金日成在今年5月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中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意义。金日成在抱怨朝鲜推行独立政策遇到的困难时说，考虑到朝鲜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交界，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公开辩论不得不执行这项政策。

与中国领导人相比，在关于兄弟党三月协商会议方面，朝鲜领导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劳动党领导人和中国人一样不同意参加会议工作，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攻击这次会议工作的结果。

最近，劳动党领导人甚至开始对继续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的中国领导发表批评意见了。

金日成在今年3月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说：“我们不同意目前继续公开论战的一些人的观点。”(参阅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在朝鲜领导层活动家的发言中已多少有些以新的方式发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的号召。如果以前朝鲜领导对统一的理解仅仅就像无条件承认中国的“总方针”那样，那么现在由于朝鲜的宣传中去掉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口号，而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为统一的基础。

过去朝鲜领导人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在种族基础上建立联盟并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努力扩大自己与解放了的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将注意力集中在亚非国家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果。1964年朝鲜与7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关于亚非团结的问题上，现在朝鲜领导人已经不总是支持中国人了。朝鲜领导人支持所有反美力量，包括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国家的联合行动。

在对待越南事件和帮助民主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上，朝鲜领导人现在更多的是以批评态度评价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

朝鲜领导人不可能不明白，中国领导人竭力追求的越南局势进一步尖锐化有可能导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分界线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根据劳动党领导人的声明来看，苏联向战斗中的越南人民提供的援助没有被中国领导人诽谤。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说道：“有些人试图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宣传。”(参见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朝鲜领导人向参加斯德哥尔摩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下

达指示，在讨论援助越南的所有问题上不能支持中国的决议草案。

在讲述这件事时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中国人硬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决议草案，可我们没同意。”(参阅同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期间，朝鲜报刊在叙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没有刊登其所有的诬蔑造谣的言论：“有些人不帮助正在战斗的越南”，并与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竭力推行和平共处。

.....

中朝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的一定的标志是，朝鲜报刊今年2月6日对中国代表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经济研讨会上所作报告进行阐述的性质。朝鲜报刊没有刊登他所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内容以及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内容。(《劳动新闻》，1965年2月26日)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关注的是，金日成在雅加达社会科学院作讲座时讲的如下一些话：“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们将根据我们的现实、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来进行这场斗争。”(《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口头上继续紧跟中国人表示反对“大国借口‘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遏制其他国家独立综合发展的倾向”，也看到“修正主义者”通过经济合作竭力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于自己，朝鲜领导人实际上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合作，同时在此情况下利用一些批评作为“独立”判断的标志、作为有利于获得更优惠的经济援助的政治压力杠杆。(《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朝鲜与中国军事合作的规模是两国严格保密的，这方面的问题看来对朝鲜与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接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1962年12月以内阁副首相金光侠为首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紧随其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领导就利用这点开始着手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可以根据在此之后的二年里大批中国军事代表团

去朝鲜、朝鲜和中国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军人去中国军事学校学习以及中国武器装备供应等方面去判断合作的规模。

这一切让劳动党领导有机会认真地了解中国国防工业的状况。(在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1963年夏天去中国时，让他参观了很多的军事工厂。)

此外，朝鲜领导人仍旧妒忌地注视苏联对古巴、印度尼西亚、民主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1964年朝鲜军事代表团对这些国家的访问看来证明了苏联援助相对于中国援助的优势，而东南亚局势的复杂化、美国坚决持续地试图促使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它们在东方建立新的侵略集团的努力、美国对韩国军队军事援助的规模——所有这些都迫使朝鲜领导人在继续扩大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寻找重新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理由。

最近朝鲜与中国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从整体上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们为改善苏联与朝鲜两国的关系创造了客观的先决条件。这个过程的强度明显直接取决于来自苏联方面对朝鲜的各种援助的总量。

同时，朝鲜领导看来将继续表现出自己与中国的特殊友谊，还将避免对所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援助的性质和总量产生的影响。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第一秘书

A.博鲁诺夫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随员

B.戈罗沃伊

АВРРФ, ф.0102, оп.21, п.106, д.20, л.14-27

№24353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1965年6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今年6月即将召开亚非会议，现提交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方案，在苏联受邀请参加会议工作的情况下使用。

附决议案。

请研究。

1965年6月17日

第1957rc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利用会晤及会谈建立并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努力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的意见：放弃强加给他们的使他们失去主权和损害他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的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利用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以及培训民族干部

工作的材料。

(4)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消除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得以体现。

3.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绝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年和1964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如果某国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的决定。

(3)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因塞浦路斯引发的阿以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

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此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应修改的国家。

(2)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19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

(4)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對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和开罗会议(1964年)的决定。

..... [43]

.....新的国际机关与联合国相对抗，不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必须采取措施让会议关注目前国际局势问题，如越南问题，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欧洲安全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尽管上述问题不一定会列入会议议程。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努力在会议过程中进行实际研究。

在此从如下原则出发：

1.越南问题

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支持蒙古朋友提出的会议通过《致世界人民书》的思想，呼吁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统一和团结，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帮助蒙古代表团实现这一思想。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日常联系。

(2)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例如，本·贝拉总统通过秘密渠道提出的计划(成立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由该政府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军撤离，在南越举行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2.关于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问题

为了能让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建议把这个问题列为个别条款，或者在讨论议程第4条款“普

遍和平与裁军”，或者第5条款“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和拒绝使用武力或威力威胁”时，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附件)。

(1)使用具体材料(刚果、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指出，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经常地使用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以及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2)要特别强调目前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方针的危险性，强调其轻视国际权利准则(破坏了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同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等等)，不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放在眼里，不顾国际社会舆论。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作为干涉的借口可以引用几句典型的话：保卫外国公民及其财产的需要，未经协商就进行内部改革，等等。为了对其他国家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镇压，美国要求拥有选取手段的充分自由，以引确保美国的利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3)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4)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3.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以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的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企图。

(3)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果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1.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将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促成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议。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更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到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3.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4.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并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5.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

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格外关注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事实。

会议据此出发，各国人民有权独自制定自己的政治方针，自由组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了本国利益自由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这些权利不容抹杀。限制主权国家的意志和阻挠其独立发展，通过使用外国武装力量，或使用武力威胁以及在违反有关国家意志的情况下保留或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侵犯各国不容侵犯的领土，或者为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解放斗争制造障碍，这些企图是对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严重践踏，给各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

亚非国家会议

1.谴责使用外国陆军、空军和海军，或以使用军事威胁来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不管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借口保护外国公民及其财产和利益的需要，借口一些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或变革，借口出现或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任何类似的借口都不能成为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理由。

2.采取警告措施，其中包括武力警告，在国际关系中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决定，并按

照该组织的目的和原则进行。

3.为了保障各国和民族主权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支持清除在独立国家或所谓独立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民族国家边界。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98-120

№24351 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1965年6月18日)

机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除外)的指示，责成他们同各国(政府)首脑就第二次亚非会议议程的主要问题进行会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安卡拉、阿尔及尔、安曼、.....巴格达、巴马科、.....达卡尔、.....突尼斯、乌兰巴托、喀土穆 [44]

苏联大使馆

副本：纽约

致苏联代表：

拜访国家(政府)首脑或副职时说，您受委托通报苏联政府对阿尔及尔第二届亚非会议(阿尔及尔)拟打算讨论的问题的意见。

1.第二届亚非会议是在国际局势极其紧张，对一切自由民族、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条件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格外嚣张。美国协同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该政策的锋芒不仅指向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也指向获得独立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遭到严重破坏，美国扩大并强化了在南越的武装侵略，继续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也遭到轰炸。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开始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对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内部事务的干涉也没有停止。正在组织对取得独立的古巴共和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干涉。

在越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刚果，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对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打击，压制人民追求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努力。如果今天亚非国家同其他追求和平与自由的力量，不

心协力地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活动予以还击的话，那么，明天他们将变得更加嚣张，将会尝试使用武力反对其他一些亚非拉独立国家。

今天，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开始公开抛弃公认的国际权利准则，提出各种形形色色“学说”，号召建立起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干涉某国发生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把国内战争与国家间的战争等同看待。作为进行干涉和侵略的借口，可以摘引几句殖民主义者的经典：保卫外国公民及他们财产的需要，不赞同内部改革。这样，国际权利就会被专横和不法行为取代。

为了有效地开展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爱好和平国家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阿尔及尔会议的召开为巩固这种统一，为制定旨在坚决摧毁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的有效措施提供了可能。

毋庸置疑，会议将坚决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和实践，论证对越南人民、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和正在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全面援助是一件正义、合法和庄严的事业。至于苏联，它一直站在为争取本民族独立、捍卫自己主权的人民一边，这种立场是始终不渝的。

2.苏联政府把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列入会议议程，赋予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剥削仍是许多民族肩上的沉重负担。

爱好自由的国家有权严厉谴责那些消极执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取得独立并准许他们立即清除殖民主义制度的宣言的国家。

苏联政府坚决拥护清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对南非共和国适用最严厉的国际制裁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有必要组织国际运动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罪行，以揭露他们的保护人萨拉查和维沃尔德在这些罪行中的不光彩角色。

必须继续努力迫使英国政府尊重南罗得西亚土著居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准许该国在公民权利平等和全国大选的基础上独立。苏联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想让他们霸占的权力永垂不朽和在国内建立类似目前南非共和国制度的企图。

苏联政府完全赞同阿拉伯国家会议旨在援助南阿拉维人民反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决议。

取得独立的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消除过去殖民主义统治的后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政策造成的。因此，反抗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目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亚非国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不受限制地使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对外国银行和企业收归国有，清除外国军事基地，让外国军队撤军，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它们越来越坚决地同新殖民主义现象——破坏它们的主权，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军事封锁，从事反合法政府的密谋——进行斗争。它们支持改变纵容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亚非拉人民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制。

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的经验，制定组织发展中国家反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广泛纲领，毫无疑问，这将给亚非拉人民提供有效的帮助。

3.亚非会议打算抽出精力关注裁军问题，这是现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苏联是关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的倡导者，并为达成相应的协定进行了积极斗争。与此同时，苏联准备就制止武装冲突和缓和国际局势的个别措施——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他国领土撤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达成协议。

裁军措施首先涉及的是军事强国，因为年轻的独立国家在裁军之前被迫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以防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方面的日常威胁。

苏联支持禁止任何形式的核试验，多次表示赞同对禁止陆地、太空和水下核试验的莫斯科协议进行补充，达成关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议，利用本国核查设备对核禁试情况进行监控。

为了各民族的利益，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扩散，既有防止以直接途径由核国家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也要防止以军事集团、联盟或其他途径，其中包括成立多边核力量，或北约大西洋核力量，转让核武器。北约组建核部队的计划是进一步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苏联赞同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大国停止造成核扩散的“形形色色的政策”的呼吁。

苏联政府支持在地球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的建议，积极评价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关于成立无核区的决定。苏联准备承担责任尊重无核区，如果其他核国家也承担这些责任的话。

苏联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签订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或者拒绝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将具有重要意义。苏联积极对待其他国家就此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提出的建议。

实施裁军可以释放出大量物质资源，现今许多资源都被用在了军事冲突上。这样，节约出的开支可以用在年轻的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这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的战争，争取尽快克服殖民主义学生后果的斗争，争取快速进步的斗争。

苏联支持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呼吁，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的建议。

众所周知，关于召开由世界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在今年6月得到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十二届联大会议上研究这一建议。

4.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将列入会议议程。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决拥护每个民族都应该是自己家里的绝对主人，本国现存政治制度不容许外在任何力量的干涉。

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被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亚非人民依据自身经验确信：和平共处政策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护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目前非常迫切，因为此时帝国主义分子在世界一些地区正在从事侵略活动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为了使那些诉诸武力践踏他国主权和领土的人能够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全体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苏联准备从自己这一方为了使国家间关系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作一切必要的努力。

依据和平共处原则，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支持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同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5.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对欧洲局势无动于衷。德国帝国主义筹备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各国人民，也给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各国人民关切欧洲能建立稳固的安全保障的原因。

今天还没有建立这种稳固的保障。的确是这样，西德复仇主义力量再次积极活跃起来，他们阻碍德国问题和平调解，向邻国索要土地，为此目的，急切地想拥有核武器。西德在亚非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慷慨地向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供应武器，帮助东方

阿拉伯人民的敌对势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完全追求另外的目的，该国反对重新研究现存欧洲边界，支持两个德意志国家放弃拥有核武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在欧洲存在两个都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军事集团对立的条件下，如果欧洲出现军事冲突，就可能爆发世界核战争，这将在整个世界造成前所未有的牺牲和破坏。

亚非国家可以为了防止欧洲事业向危险方向发展和巩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从两个德意志国共共存这个事实出发的政策就是该目的的体现。

6.苏联支持加强联合国，作为重要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工具，它建立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仍是联合国活动最好的基石。

20年的经验表明，当联合国依据宪章进行活动时就是富有成效的，当帝国主义国家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决定强加给联合国时，该组织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效果，同时它的活动对各国人民来讲甚至具有了危险性。

由于许多年轻的独立亚非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在这一组织内开始出现了新的形势，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允许它们在安理会和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设立代表处的要求，苏联是安理会成员国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作相应修改的国家。苏联政府坚定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支持赋予该组织真正的广泛性质。

但是，不得不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向联合国发动了攻击，它们想摧毁联合国的基础。恰恰是基于这个目的，美国人为地提出了所谓的“财政危机”问题，事实上这是以非法的程序把联合国卷入刚果和中东的结果。

现在，关于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的问题非常迫切，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存在两条路线。美国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努力破坏联合国宪章，绕开安理会。它们想用联合国的旗号掩饰自己旨在使主权国家屈从自己的行动。与此相反，苏联认为，必须杜绝任何出于殖民主义目的，去干涉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破坏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而不顾联合国宪章就使用联合国部队的可能。联合国只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出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目的，为了帮助侵略的受害者，保卫一些民族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横行时才能使用联合国部队。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权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和财政拨款的决定。

加强联合国而不是重新审查宪章符合爱好和平力量的利益，正相反，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站在和平、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上国家应该加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克服联合国活动中的严重缺点。

至于克服联合国财政困难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全体会员国在自愿缴费和取消关于使用宪章第19条的问题的基础上解决联合国的财政问题。

7.苏联政府赞同亚非国家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抽出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意见。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和密切合作下，会议通过了“明确了贸易关系原则和促进发展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决定，这些是在成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关系道路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当前，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支持它们的目标和努力的国家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将能促使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果变成现实，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看来，首先应该集中精力实现旨在根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强加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系，摆脱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垄断以及实现旨在满足亚非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的协定。

现在，亚非国家正集中力量争取在有生之年和凭借下一代的力量消除殖民主义给它们造成的经济落后局面。自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经济关系中的后果和表现消除的越快，这一

任务实现的时间也就越快。

苏联政府期待亚非会议能就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通过具体的协定，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更快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自己方面来讲，苏联政府准备在这场斗争中援助它们，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

本消息文本留给交谈者。

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81-92

№24352 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1965年6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副本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给苏联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的大使就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下达的指示

批准上述就此问题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华沙、布拉格、柏林、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菲亚、贝尔格莱德、哈瓦那

苏联大使馆：

拜访外交部长或副外长，说受委托通告如下内容：

众所周知，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于6月29日在阿尔及尔召开。苏联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收到相应邀请的话。根据收到的情报，多数亚非国家表达了有利于邀请苏联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态度。在此，它们强调了我国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突出贡献，苏联为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提供的全面援助。

一系列国家在认同苏联参加亚非大陆代表会议的权利时，打算纠正多数国家的立场，放弃目前坚持的路线，不想同中国人商量，或者受对中国的某种诺言的束缚。

这样，事实上只有中国，加上菲律宾和一两个亲美国国家反对我国参加会议，它们提出了一些杜撰的理由(如苏联不是亚洲国家，因为它的首都在欧洲)。 [45]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可能近期在与会国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决定。从自己一方来讲，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向亚非国家政府解释了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的

立场。如果我们未被邀请，我们致信给会议，阐述我们对提交给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就算是以这种形式支持会议也将会促进亚非国家在反对美国对殖民地民族和人民的政策，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

考虑到你们以前表达的关于有必要就重要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愿望，莫斯科认为向你们的政府通报上述内容是合适的。如果你们能同我们交换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我们将表示感谢。

电告结果。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94-96

№11467 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1965年7月27日)

与越南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阮曼卡的谈话记录

1965年7月27日

1965年7月27日，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我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与阮曼卡谈了话。他告诉我，越南民主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已经结束访华，7月25日已经到达平壤，在那里逗留6—7天。然后开始访问蒙古，也在那里待6—7天。8月9日至10日将到达莫斯科。

大使馆认为，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除了莫斯科之外，最好能访问第比利斯、里加和列宁格勒。代表团团员也有这个意见。阮曼卡说，代表团领导对会见苏联国务活动领导人没有特别的愿望。越南将解决这个问题留待苏方考虑。

阮曼卡受大使委托，要我转告希望给予越南大学生迎接代表团的会。如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那么将由500名大学生迎接，如果乘火车，这个数字还要增加。阮曼卡同时说，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数百名莫斯科劳动者们代表”曾与越南大学生一起欢迎。

阮曼卡在谈话结束时说，大使馆请求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考虑安排会见即将访问城市的社会各界代表。如果会见(群众集会)能在工会圆柱大厅或者克里姆林宫举行则更好。阮曼卡说，大使馆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越南问题是当前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问题”。

我告诉阮曼卡，我将把他提出的所有愿望和要求转告苏联最高苏维

埃的领导。

谈话持续30分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B.Д.谢尔巴德赫同志参加了谈话。

苏共中央国际部高级顾问

Б.托克马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79, оп.20, п.22, д.16, л.9

№25754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46] **(1965年9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边界问题的声明

(答复苏联外交部1965年8月17日的照会)

- 1.边界条约；
- 2.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两国边界；
- 3.关于1963年的条约；
- 4.关于边界争论问题。 [47]

“我们认为，目前两国应该首先保持现有的边界线，避免发生边界冲突，而不是双方为边界条约的立场而争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两国应该严格遵守已经签署的条约的规定，交换各自的意见，取得一致的看法。”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25695 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 [48] (1965年9月14日)

.....

1965年9月6日拉宾休假后回来，请求与周恩来会面，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拒绝，因为周恩来“非常忙”。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会见了拉宾。

拉宾说，他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亲自委托”，他希望他本人与周恩来进行一次会谈，同时还要与“一些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看来首先是要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他没有告诉王炳南所受委托的实际内容，只说“我的问题可以等到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谈”。

.....

АВІ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242-245

№25696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 **[49] (1965年9月19日)**

拉宾转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9月18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有关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

.....

伍修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是非不分的苏联有原则性的分歧”。

.....中国立场的出发点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者的牺牲品。

伍修权.....坚持试图重新回到有关“苏联与美国勾结”的话题。

拉宾说，他“不打算听到对苏联政府的诬蔑言论。并表示希望中国方面抛开检察官式的和侮辱性的口吻方式谈论苏联”。

.....

АВІ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250-252

№25697 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

改善 [50] (1965年9月21日)

1965年9月21日C.Г.拉宾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林枫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的特点是双方看法显而易见的完全一致。拉宾赞扬中国人打下了美国飞机。说美国人“只认武力”。

拉宾确认“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交流在今年得到了改善”。并说，夏天苏联的医疗工作者、铁路员工、煤矿工人去了中国，“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经验”。

郭沫若说：“这很好。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没有任何困难。”

林枫说：“的确，中国与苏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没有人能够动摇这种友谊。以前当我们说这样的友谊牢不可破，这不是简单地加以修饰形容，它的确就是这样的。”

拉宾单方面表示希望议会代表团能开始互访。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5, л.253-261

№24368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1965年9月27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5年9月27日

第2214 c号

近几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代表就防卫苏蒙国家边界时加强接触和协同动作的问题多次致信苏联边防代表。

今年8月10日，第..... [51] 边防部队(达斡里亚哨所)首长同蒙古边界

代表乔日巴兹中校举行了会谈。后者主动介绍了蒙中边界形势，表达了蒙古边防军人广泛学习苏联边防守卫经验的愿望。

考虑到这一情况以及西部与社会主义国家为邻的边防守卫积极经验，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邀请蒙古边防军人代表团(由3人组成)于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期间访问莫斯科，同他们讨论关于苏蒙边境守卫措施的协调问题，进一步完善两国边防部队的协同，以交流边防业务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对此表示同意。

请予批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

手写批注：

同意。

..... [52]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2, л.110

№24330 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1965年10月1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我报告：

1.据美国电讯社记者发自东京的消息，今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革命委员会命令印度尼西亚政府各部部长在组建新内阁之前继续履行自己的日常义务。

10月1日10时(莫斯科时间)，革命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条指令，宣布解散苏加诺政府和成立由45人组成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任命翁东

上校为委员会主席。前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欧、空军副司令奥马尔·达尼、海军少将马尔塔季纳塔，以及警察部队首长和第二副总理，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剩下一些进入委员会的人的姓名暂时还不知道。

2.根据谍报材料，今天美国开始紧急应召15万名预备役军人。

M.扎哈罗夫 [53] (签名)

1965年10月1日

第136540号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79, л.67

№24355 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1965年10月16日)

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驻印度尼西亚记者舒雷金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的报告。

编辑部于今年10月16日收到这份报告。

《真理报》主编

齐米亚宁

1965年10月16日

分发：勃列日涅夫、杰米切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

附件：

致《真理报》编辑部：

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

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国内，或者至少在雅加达，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

第一个是由纳苏蒂安和一些将军领导的雅加达中心，第二个是由苏加诺领导的茂扬中心(总统的郊区宅邸)。前者努力利用目前局势争取彻底击败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但是打着苏加诺的旗号这样做的，因为总统的威信有助于更轻松地完全这一过程。此外，纳苏蒂安明显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反抗苏加诺的程度。同时，在他的将军拥护者——苏哈托和其他

一些人——中的许多人都要求杀掉陆军中将亚尼，而由苏加诺本人正式接任这一职务。

所有的伊斯兰政党都支持该集团，其中最大的政党是“伊斯兰联盟”，自然，重新活跃起来，而被解散的“马斯美友党”和“印尼社会党”的残部还未组织起来。

该集团现在控制了首都的实际权力，通过广播和报纸在爪哇岛各大城市就此事发表评论。其他几个岛得到的消息只是说那里发生了武装冲突和维持“原状”。的确是这样，马来西亚广播的消息是，在苏拉威西和亚齐(苏门答腊北部)发生了反共游行。

最终，该集团控制了中央报刊和广播。现在雅加达有13份报纸出版，都是反共的。

第二个是苏加诺领导的茂扬集团，他们努力在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冲突，以确保总统能重新推行平衡政策。关于苏加诺本人在“九三〇”事件中的作用，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弄清楚。例如，为什么总统的私人卫队团长倡议逮捕将军们，私人卫队不从属于他本人，却能以他的名义活动么？为什么10月1日苏加诺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了哈利姆军事机场，按照他的话说“可以随时前往雅加达”？空军司令达尼意外出现在那里是否是偶然的，根据10月1日的命令，他实际上是支持翁东的。最后，为什么10月1日深夜逮捕和杀害将军们恰恰发生在哈利姆军事机场。那里是对来自共产党青年和妇女组织中的志愿者进行培训的地方。

按照外国记者的观点，如果考虑到这个“将军委员会”确实存在，那么就不排除苏加诺对“九三〇运动”至少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现在向军队投降就等同于他失去了任何实际权力。

所有亲近共产党的人都聚集在茂扬。据可靠资料，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也在那里。该集团的力量主要是借助苏加诺的威信。弱点是孤立、分散。如果总统的私卫队是承担独立宫内部守卫的，那独立宫的外面就是由陆军来守卫的。苏加诺没有发表广播讲话的可能，也许是他暂时不想这样做。10月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由苏班德里约透露给报刊记者，被称为“公开讲话”，雅加达广播站只是在有利于纳苏蒂安的时机才播放这次讲话。

现在，雅加达的报刊和广播充满反共运动的叫嚣。在军队的明显纵容下，游行示威、抢劫猖獗。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向苏加诺施加压力，迫使他向纳苏蒂安投降，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祭物。为了让苏加诺更容易接受这个要求，采取措施成立了新的共产党组织。关于这一情况，“伊斯兰联盟”控制下的晚报报告了这件事。

按照我的观点，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因素影响的话，这里我指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那么，这种对抗将会以协调方式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这符合共产党的利益。

谈几句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事件中的作用的话。根据各种来源的消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的领导层把党的命运完全而彻底地寄托在苏加诺身上，期待他能挽救党。注意到，党在坚定行动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慌张和无丝毫准备。现在，当雅加达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时，没有在被逮捕时进行武装反抗的消息，甚至是传闻。

对事件进行分析后，看不到有关共产党在夜里1点和10月1日事件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证据。仔细研究翁东的声明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无法证明共产党是9月30日事件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在现形势下，共产党人不可能“忘记了”苏加诺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不可能不发表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越南人民战争的声明，而可能谩骂“修正主义者”。

研究“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具有像翁东那样政治眼光的军队营级指挥官组成的混合体。

最后，共产党不能“忘记”对官僚政客的谩骂，而只是局限于对将军的批评。

暂时很难解释10月6日鲁克曼和尼奥托出现在内阁会议现场以及艾地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关于艾地在哪里，现在有一些说法在流传。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艾地同翁东一起在爪哇中心。还有一种解释，说他被捕了，或者在中国大使馆里。但是，任何一种说法暂时都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由于最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在同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上述内容令人萌发出一个想法：很有可能共产党人策划了类似“9月30日”的事件，他们想把苏加诺和亲近他们的空军拉入这个事件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事件的过早发生令他们措手不及。同时，在危急时刻，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触动事件如此发展的诸多原因之一，可能是苏加诺的健康状况在1965年10月1日夜急剧恶化。完全有可能，在这种情势下，翁东中校决定扮演布迈丁的角色。当然，此时我所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很遗憾，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关于新的共产党的问题，它组建的消息能被宣布出来么？问题在于，关于这件事的初步消息是来源于报纸，而这份报纸是共产党敌对力量的刊物。事实上这是反共斗争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共产党领导层的亲中国方针，来证明其非民族性质。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来到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他们对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亲近中国，事实上是反对苏联的方针不满。因此，必须指出，按照我的观点，可以期待印尼共产党中的一些假共产党分子——他们努力把右翼力量拉入党内，和党内的健康力量之间建立某种对比关系，正好是对成立这种组织的一个事先反应。显而易见，尽管从一开始，领导层就没有强调党的亲苏方向。

还有一些对外政治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在这里感觉极不舒服。在人群中流行一个传言，他们以新兴力量会议大厦的建筑材料为幌子为共产党人运送武器。10月5日，中国记者没有出现在5位将军的灵柩前。一系列报纸对此表示不满，中国外交代办处也没有为将军被害事件降旗。雅加达的广播和报刊对沙列赫率领的代表团在中国签署的公报闭口不谈。各建筑物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到书写着“解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组织”。

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问题上，雅加达和先前一样站在巴基斯坦一方，谴责印度进行侵略。

今天，马来西亚广播播放了阿布杜尔·拉赫曼给苏加诺的信，号召利用目前形势清除国内的共产党人。

所有这些就是我想同您交流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想法。当然，雅加达不是整个印度尼西亚，但现在想去哪里都不可能了。

《真理报》记者

舒雷金

1965年10月10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34-141

№24357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1965年10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

今年8—10月期间，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馆和苏联驻纽约外交代表机构做了亚非国家政府代表的工作，促使这些国家政府更坚定和积极地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这项工作开展的条件是，当时中国政府领导层向亚非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改变自己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正面态度。除了使用外交渠道外，中国政府这一时期还安排陈毅出访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对乌干达、索马里、缅甸、柬埔寨国家首脑做工作，邀请他们在这一时期访问中国，等等。在这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向中国领导层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根据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定于今年10月18日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态度如下：

1.有32个国家的政府(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加纳、几内亚、赞比亚、也门、印度、约旦、伊拉克、喀麦隆、塞浦路斯、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拉维、摩洛哥、蒙古人民共和国、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塞拉利昂、突尼斯、土耳其、锡兰、埃塞俄比亚等)再次确认说，它们打算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由于苏联方面做工作的结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快速提高。如果说在今年上半年就此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只有5—6个国家，那么，到现在发表这样声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3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约旦、塞浦路斯、土耳其、赞比亚、索马里、摩洛哥、利比里亚、塞内加尔)。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政府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会谈时开始更为明确地表示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应该指出，像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府)、阿富汗、几内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压力做出答复时直接声明说，它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将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2.有5个国家(阿富汗、刚果〔布拉柴维尔〕、伊朗、乌干达、肯尼亚)的代表在今年1—6月期间多次声明说，他们的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

加会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新的这种性质的声明。目前还没有关于上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材料。

缅甸、马里、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政府通报说，它们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问题上的态度将追随多数亚非国家的意见。

毛里塔尼亚和乍得政府声明说，自己对邀请苏联问题的态度稍后些时间再确定。今年10月5日，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乌尔德·谢赫在听取了葛罗米柯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相应解释后，对他说：苏联参加会议是积极因素，毛里塔尼亚政府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时会注意到这一点。

3.一些国家的政府持回避态度。柬埔寨政府再次声明说，对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不会投反对票，但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投“赞成”票。不排除西哈努克在拒绝了苏联政府访苏邀请后，可能会改变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向对苏联不利的方向发展。

今年8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声明说，巴基斯坦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如果多数国家支持的话。同时他解释说，巴基斯坦很难公开发表关于自己支持苏联的声明，如果这个问题将通过投标来表决的话。

据日本和菲律宾代表的消息，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早先对苏联参加会议一事持反对态度，现在正在重新研究自己的立场。

泰国政府声明说，支持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建议的条件是，如果苏联在亚非会议上对泰国不采取不友好态度的话。

4.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苏联大使保证，它们仍坚持自己先前的立场，即苏联最好不参加会议。

5.加蓬、冈比亚和上沃尔特驻联合国代表通告说，这些国家还没有确定要参加会议，稍晚些时候都能决定，这取决于非洲马尔加什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至于他们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他们对此表示赞同。

南越、南朝鲜、刚果(奥波德维尔)、新加坡、马尔代夫半岛和马来西亚政府没有表达就此问题的态度，因为关于邀请它们参加会议的问题

还没有最后解决。

尼日尔、多哥、马尔加什共和国、达荷美、象牙海岸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它们声明说自己准备拒绝参加会议。到目前为止，西萨摩亚还没有表达自己参加会议的愿望。

苏联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92-195

№24358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 亚非会议的态度(1965年10月18日)

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

(1965年10月18日报告)

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两次向报刊和广播代表发表关于想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在今年9月的苏联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谈判公报中指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声明说，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将有助于会议完成任务。”

2.印度。印度政府代表多次公开发表关于苏联必须参加会议的声明。1964年8月21日，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仍坚持苏联应该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1965年4月初，印度周刊《闪电》刊登了总理沙斯特里的讲话，他指出，如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做到让俄国和马来西亚不能参加会议，那么，印度可能会离开会场。今年8月末，印度政府在致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官方复信中重申了印度在苏联和马来西亚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

3.尼日利亚。1965年6月2日，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巴马利在机场同苏联外交副部长马立克会谈期间对记者表示：“尼日利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对我们来讲，这不是问题。”

4.卢旺达。今年10月9日，外交部长Л.姆帕卡尼耶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一封今年10月8日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信，信中指出，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决定无条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5.苏丹。今年6月，总理马赫古卜对喀土穆新闻通讯社表示，按照新

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苏联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6.约旦。今年9月11日，路透社记者转告来自阿曼的消息说：“约旦外交部代表图坎对报刊表示，约旦支持邀请苏联定于11月5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会议。图坎是今天同苏联大使斯柳沙林科会谈后谈到这个问题的。”

7.塞浦路斯。据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的消息，今年10月，塞浦路斯外交部在致筹备委员会的信中含有塞浦路斯政府有利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内容。

8.土耳其。今年6月，土耳其报刊援引土耳其外交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说，土耳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9.赞比亚。今年5月28日，赞比亚外交部长卡普韦普韦对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说，赞比亚已经确定了自己对会议工作的态度，我们向自己的非洲朋友以及亚洲的一些朋友——印度、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朋友表示，苏联同赞比亚一样，有权参加会议。

10.索马里。今年6月19日，外交部长杜阿勒向苏联大使通报说，索马里政府决定公开支持苏联。外交部长还向新闻报刊通报了这一消息。

11.摩洛哥。1965年5月，摩洛哥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给苏联和一些亚非国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9月16日，副外长绍尔菲对苏联大使说，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摩洛哥代表团在讨论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再次表达了自己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立场。绍尔菲说，我们不仅支持苏联，而且还要让其他国家相信苏联参加会议的必要性。

12.利比里亚。1964年中，杜伯曼总统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指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必须参加会议，那么就没有任何可阻碍的理由。今年10月，利比里亚驻联合国代表在同苏联代表会谈时确认说，利比里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

13.塞内加尔。今年9月23日，在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共同讨论期间，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杜杜·蒂亚姆声明说，他的政府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注：在上述清单中不包括这样一些国家，其政府在同外国官方代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会谈时，和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形式的会谈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达了自己的积极态度。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96-198

№25698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 [\[54\]](#) (1965年10月19日)

伍修权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0月18日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9月18日信件的复函。

.....

拉宾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政策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很难说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它的方向是哪里。”

有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国同志看来对军事行动的停止很不满意，并且对苏联进行了各种指责。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国增加朋友的。”

.....

附件：

1965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

.....提出的论据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的牺牲品。”

.....你们(苏联)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上给自己戴上了中立的假面具，而事实上与美帝国主义共同支持印度侵略者。

在信中你们想要中国共产党跟你们“立场一致”.....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想要我们与你们一起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路线？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致兄弟般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6, л.1 4, 5-11

No24356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1965年10月28日)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我提交给参加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草案供你们研究。

葛罗米柯

1965年10月28日

分发：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鉴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提交为苏联代表团准备的指示草案，在苏联受到与会邀请时使用。

附决议草案。

请审阅。

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

波诺马廖夫

葛罗米柯

谢米恰斯内

舍夫利亚金

1965年10月_日

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附件)。

附件：

机密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利用会晤和会谈建立和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努力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

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和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意见，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放弃强加给它们的使它们失去主权和损害它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地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关于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关于培训民族干部工作的材料。

(4)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解决清除从资本主义那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找到相应内容。

3.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绝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年和1964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如果某会与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

的会议的决定。

(3)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阿以因塞浦路斯的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都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这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

应修改的国家。

(2)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19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

(4)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和开罗会议(1964年)的决定。

利用会议发言和讨论时机解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把大多数与会者团结在我们的立场上来。

强调指出，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把它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指出，和平共处政府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限制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自由，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巩固，也为和平共处原则成为所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关于遵守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的问题目前极为迫切，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世界各个地区发动侵略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团结起来，争取让那些使用武力粗暴地干涉他国主权和领土的国家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

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关于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样做，要让会议接受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宣言，关于保障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该方案已由苏联提交联合国大会研究，或者赞同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

使用具体材料指出，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近段时期越来越频繁地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诉诸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它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

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发言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0.关于成立常设秘书处以促进亚非国家有效合作的问题。

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会提出关于建立常设秘书处的建议，它们努力用新的国际组织对抗联合国，不能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目前形势最重大和迫切的问题有越南问题、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这些问题在拟定的会议议程中没有出现(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遵循如下方针：

越南问题

1.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向会议派遣自己的代表团，那就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1)如果某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的建议，那就反对该提议，持这一立场的原因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各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以及研究越南问题应按照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的特殊国际机制进行。

(2)但是，如果越南问题最终被列入了会议议程，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遵循第2项内容。

(3)如果多数与会者坚持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案，那就争取让该决议案的内容符合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如果这样做办不到，那就投票表示反对，或者对于我们反对该决议案提出保留意见。

2.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出席会议以及越南朋友在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表现出关切，那就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

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承认四方协定作为未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举行谈判，美军撤军，在南越组织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依据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定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这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5)对某些代表团谴责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渗透”和“干涉”南越内部事务的任何尝试要予以坚决驳斥。还要驳斥那些可能在发言中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看作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干涉南越内务事务的言论。在此要指出，这种看法事实上意味着对侵略者的纵容，美国破坏了1954年日内瓦协定，粗暴地干涉越南人民的内部事务，美国才是侵略者。

(6)在讨论越南问题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日常接触与合作。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计划的企图。

3.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4.代表团要根据会议形势，相机使用上述内容(在会议的公开声明中，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等等)。

1.关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问题应遵循如下方针：

(1)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苏联代表要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绝对维护中国领导层的错误立场，在实施自己的行动路线时不要使会议成为苏中分歧的舞台，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

苏联代表团首长在自己的主要演说中要强调指出，苏联坚定地支持亚非人民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必将促进反帝力量的团结。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信的建议，那就予以支持。我们自己不要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进行谴责的建议，那就要反对类似的提议。

如果一些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诽谤，或者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立场直接进行批评(进行核试验、印中边界冲突、印巴关系、印度尼西亚事件)，那就发言反对这种性质的尝试和建议。考虑到印度的强烈倾向性，苏联代表团应该在会议开始前就找个理由，要通过信任渠道让印度人明白，苏联代表团不仅不支持反对中国的攻击和建议，同时将会发言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会议的主要目的。

在会议上要再次谴责美国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揭露美国所谓“两个中国”的谰言，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在与亲近我国的代表团进行信任交谈时，必须指出中国领导层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诽谤是站不住脚的，要以事实揭露他们把个别国家(越南、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或遇到的困难归罪于苏联的企图。

(2)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成为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使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定。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考虑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决定不参加会议，我们的代表团应发言谴责美国对朝鲜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正义要求，美国在南朝鲜驻军是朝鲜在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

3.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4.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5.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

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6.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未来几年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宣言(样稿)

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展现了亚非人民在万隆会议后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巨大成绩。与会各国对这段时间摆脱了殖民制度取得独立的36个新共和国表示敬意。亚非国家在巩固国家独立和经济自主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团结、相互支持和共同行动是亚非国家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

但根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殖民主义国家齐心协力地继续奴役亚非大陆近3000万人民。对许多独立的亚非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保存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与公认的人权不相符，它们与大量的和平与安全受到破坏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在短期内消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提供了客观条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大型垄断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允许落后国家走上现代文明，达到先进国家水平。这阻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的进步。哪怕只要有一个民族还没有实现自由，那所有的民族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是现代人类的耻辱。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责任扫除地球上的殖民主义耻辱。

会议规定了近期在这方面联合行动的任务：

(一)

会议庄重地宣布拥护1955年通过的万隆决定，首先是确定现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准则。

与会国证实了自己执行万隆会议决定和完整而毫不拖延地招待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坚定性。

会议对正在为本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开展斗争的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肯尼亚〔比绍〕、亚丁、阿曼、南阿拉维、西南非洲、南罗得西亚、法属索马里、巴苏陀兰、斯威士兰、贝专纳、英属圭亚纳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表示问候。会议要求殖民国家立即停止殖民战斗、镇压和恐怖，取缔殖民制度。

会议对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旨在为在非洲大陆殖民地国家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援助的努力表示支持。

会议承认殖民地民族有争取自己解放，包括使用武器进行斗争的权利，会议号召与会国向这些民族给予各种援助。

与会国认为必须对拒绝履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国家进行严厉制裁。

谴责葡萄牙敌视各民族的政策，会议号召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与会国立即中断同葡萄牙的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同葡萄牙的一切经贸关系。他们号召其他国家能以此为榜样。

会议要求葡萄牙在北约的盟国——它们继续向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立即停止这种活动。

如果葡萄牙政府继续推行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会议建议与会国将全力援助葡萄牙殖民地的爱国主义力量开展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会议号召所有和平与民族自由的拥护者、亚非所有的朋友，开展广泛的国际运动反对葡萄牙萨拉查政府在殖民地的实施的强暴活动。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援助阿拉伯各国，它们联合行动支持亚丁、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二)

谴责一些国家仍存在对尼格罗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和其他一些人种实行种族和民族歧视和隔离的事实，会议一致支持联合国关于根除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宣言。会议要求无条件地、毫不拖延地中止任何种族和民族歧视现象，取缔一切与此要求相悖的法律和规定。

会议宣布，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共和国维沃尔德政府和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府，在人类面前犯了罪，它们不受法律保护。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拒绝向南非共和国供应任何武器、弹药和石油，中断与其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停止与南非共和国的贸易活动。

会议强调了南罗得西亚殖民主义者使用的手段对非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威胁，那里少数白人掌权，企图建立一个种族主义共和国。

与会国家要求英国对那里的形势承担主要责任，保证释放所有政治犯，取缔1961年反民主的宪法，宣布1965年5月的选举不具有法律效力，召开有非洲组织参加的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保障多数居民权利和利益的独立的南罗得西亚国家的问题。

如果在少数种族控制的条件下宣布南罗得西亚独立的话，那么，会议将建议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承认这样的南罗得西亚共和国，并研究对其采取国际制裁的问题。

与会国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旨在把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块纳合并到南非共和国的要求和计划。

(三)

从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出发，会议坚持让殖民主义国家放弃保存殖民统治时期或依附时期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关系和制度保存的尝试，严格遵守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其人民的民族尊严。

与会国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尝试使它们从属于自己的意志和使用武力或其他方式把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制度强加给它们的企图。会议断然拒绝任何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干涉亚非拉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要求。

会议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尊重1954年日内瓦协定，立即停止对南越的武装侵略活动，从那里撤军，不阻碍南越人民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会议谴责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进攻，要求立即停止这一侵略活动。美国应该停止对老挝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柬埔寨主权和领土的破坏。

会议表示同多米尼加人民团结在一起，要求美国停止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会议呼吁所有与会国和其他国家向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及军事支持，帮助他们解放。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与会国认识到，形势要求它们必须通过独立的或集体的程序采取相应的措施反击侵略。

会议坚定反驳新殖民主义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破坏一些主权国家边界、界河或领空，进行外交或军事封锁的现象。

隆重宣布发展中国家充分享有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推行内外政策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实施抵制各种形式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时想到援助，其中包括：

——重新审查和取缔殖民主义国家或大国强加给它们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某些义务，直接或间接违背解放国家的主权、经济或民族利益的东西；

——返还解放国家的领土，这些领土是这些国家的组成部分，却被殖民国家以某种借口夺取，和目前仍处于殖民地状态或未独立的领土；

——清除在解放国家的外国军事基地和据点，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从那里撤出；

——同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实施的秘密活动、组织、财政和反政府密谋煽动和恐怖活动作斗争；同官僚买办作斗争；同间谍和破坏活动作斗争。

(四)

会议满意地指出了亚非拉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经济关系中的各种新殖民主义现象，争取快速消除殖民国家遗留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状况的共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

会议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支持它们目标而努力的其他国家联合努力的结果，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通过的一些重要决定是制定新的正义的国际经济政策道路中迈出的第一步。会议批准了“促进发展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的原则”以及一系列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积极建议。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无条件地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决定中包含的决定和建议付诸实施，和共同筹备1966年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

会议再次重申了所有摆脱了殖民制度的国家拥有因殖民经济剥削给它们造成的损失而损失补偿的权利。会议认为那些过去有过，或现在仍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有道义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的援助，帮助它们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认为，根除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保障解放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条件之一，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国家利用现存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限制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包括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不受限制地支配自己的一切自然资源和财富；

——对所有的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金融和保险公司、工业企业、公共服务业、交通和商业企业、农牧场实行国有化，它们的活动与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或民族利益不相符；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在提供贷款时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签订商业和其他经济协定的斗争；

——提高自己在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和合资公司、银行、企业、农业企业、贸易和其他企业利润中的份额以及限制外国所有者把利润拿走；

——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抵制、破坏签订的协定和其他经济惩罚手段。

强调根除文化和思想领域存在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必要性，会议号召与会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解放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国民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民族干部队伍。

(五)

会议高度评价万隆会议后欧洲和美洲的议会、政府、人民、政党、组织和个人，对亚非民族解放斗争和新独立国家的组建过程中提供的支助和帮助。会议以亚非各国人民的名义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会议期待，在亚非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方面力量对亚非各国和人民的有力支持不会减少，甚至会加大，这符合新时代的条件。

快速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新的形式和在新的领域——首先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提供援助，将有利于在全世界确立正在兴起的自由、平等和各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的原则，巩固世界和平。

会议号召所有与会国全面援助和支持其他大陆的解放斗争，这是时代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让世界上的全体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结与合作日益巩固、统一！

让世界处处充满真理、正义、民族自由与和平！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42-176

№2569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 [55] (1965年11月5日)

(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0月21日有关越南问题一信的回复)

.....

.....你们到处传播.....各种各样的谣言，诬蔑性地断言，好像是我们对你们过境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物资加以阻挠。

.....

在8月26日的信中，苏联方面请求中国方面按照补充方案解决1965至1967年度发往越南物资的过境运输，包括：

10个军事技术修配厂

40门高射炮

在1965年10月23日的信中，苏联方面指责中国耽搁了这批物资。

.....但是，在收到你们的请求书后，我们通过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

国大使朱其文在9月2日将此事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并询问了越南方面有关转运的想法。9月17日我们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9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告知我们说，确有其事，但对有关转运的事情没有答复。所以，10月7日我们再次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但是直到目前我们仍旧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十分自然也很清楚，越南方面无法对组织安排两年多的物资转运作出迅速的答复。

.....上述两项物资耽搁的责任在于苏联方面，因为在得到越南同意转运后，中国在1965年10月12日建议苏联方面以单独协议的方式办理他们的转运。

.....发往苏联与中国边境的货物没有提前30天的预先通知，这给中国的运输系统带来了问题。

.....如果中国的确是在阻挠，“为什么你们不利用自己众多的海运船来运输你们向越南提供的军需物资”？

.....“提出过境运输这个话题是为了制造反中国的阴谋”。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6, л.17-25

№25700 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56] (1965年11月6日)

.....1965年11月6日С.Г.拉宾与对外联络部(兄弟党)副部长赵毅敏举行了会谈。

.....在谈到关于中国领导人坚持硬要我们用海运方式向越南运送武器这一企图时，我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已经研究过了，而且我们都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有自己特别的用意。

赵毅敏说.....中国人的目的在于把更多的武器尽快运往越南，无论是陆运还是海运。不能说.....陆地运输是唯一的方式。

我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飞机过境，从河内运送受伤和死亡的苏联专家回国，而无需提前5天预先通知，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表示，

希望中国方面在其他问题上能在相互谅解和国际主义方式的基础上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6, л.12-16

№24370 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1965年11月6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我们从苏联驻中国武官罗曼诺夫同志那里获悉的、关于(苏联)红旗歌舞团在中国巡回演出的情况。

歌舞团的表演进程一切正常。在天津表演了4场。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表演。届时到场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和陈毅，后者在演出休息期间接见了歌舞团全体成员。

11月2日，出席表演会的有郭沫若，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及其副手丁西林。

11月3日，歌舞团为北京卫戍区军队作了一场表演。到场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承担着各军种指挥任务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们。

歌舞团表演的反响情况并不一样，而这一反响只是根据歌舞的内容和名称，而非取决于表演质量。观众只是根据约定的信号来鼓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内容反映苏联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歌舞节目。

尽管该歌舞团浏览了许多地方，但演员们却不允许与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报刊在报道关于该歌舞团演出的情况的同时，仍继续刊载反苏内容的文章。

在苏联演员下榻的宾馆到处都充满了针对苏联的污蔑性标语。

我歌舞团全体成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随后，我仍会依照相关程序通报这方面的情况。

A.叶皮谢夫(签名)

1965年11月6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2, л.116

№25631 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 的交流活动** [57] (1965年11月9日)**

.....

总的来说彭真没谈到苏中关系。会谈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彭真也谈到了有关“大分散小集中”的政策和目前中国共产党正竭力紧缩城市居民以防范核战争的情况。

.....帝国主义者^们为你们和我们准备了氢弹。所以我们对城市和工业都进行了分散。

拉宾也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互派代表团的交流活动。

彭真表示接受这项建议，说将来有可能实现。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8, п.516, д.6, л.26-32

№24333 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 西亚的局势**(1965年11月2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稿

致苏联驻雅加达大使馆：

从大使馆收到大量关于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情报，这些情报考虑了应对印度尼西亚事件采取相应的步骤。但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形势依然复杂，很多问题还未弄清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方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使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朝我方需要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注意到，苏加诺因确定原因不准备同您会谈。只能通过军事联络途径进行军事专家层面的联络，无论是纳苏蒂安还是苏哈托，暂时都未与苏联代表会晤。

有鉴于此，您是否可以借口您受委托要与总统进行会谈，再次尝试一下利用某种可能性同苏加诺进行一次会谈？按照您的意见，如果现在不能指望同苏加诺进行会晤，那是否可以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给苏加诺去一封信？

在复杂的条件下，由经济联络委员会派遣代表前往印度尼西亚可能行得通，还可以派遣负责向印度尼西亚供应武器的军人前往，名义上讨论供应军事物资问题，事实上是向印度尼西亚相应的领导人阐述苏联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印度尼西亚合作，以及联合开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的观点。但此时应该看到，这些代表在印度尼西亚能否被接见，他们能否同苏加诺和纳苏蒂安举行会谈。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与您商量，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事件的进展情况，我方可以采取什么新步骤去支持左翼力量，相应地影响这个国家的局势。

您必须想想这些问题，同我们的军事人员商量一下，把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汇报。考虑过程中要解决关于我们对印度尼西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

当然啦，从您那里得到的依据近来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必须弄清楚，苏加诺的阵地稳固到什么程度，苏加诺和军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简言之，印度尼西亚近期的局势发展前景如何。

1965年11月17日

第3553/гс号

№21167 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1965年12月20日)

摘自И.Г.卡拉布霍夫的工作日记

1965年12月21日

第927/де/не号

与中国驻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唐坦义(ТанТэни)的谈话记录

1965年12月20日

应唐坦义的请求，我于10点30分接待了他。

1.唐坦义说，他在此之前便曾提出过关于以М.И.卡尔什名字命名的列宁格勒政治技术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唐俊飞(ТанЦзюнь-Фэн)的问题。该生至今仍未按最初确定培养计划投入学习，而是被建议学习另一课题：“金属切削机床的稳固和震动”。

唐坦义继续道，我们请求按照最初制定的培养计划，即根据原定研究课题“金属切削机床上的精确走刀”来安排唐俊飞的学习。

2.根据今年12月17日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信件第3865с号，唐坦义说，从今年7月至9月，苏联驻北京使馆，已向中方递交了51名苏联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计划，这些人都是准备派往中国高校学习和进修的。截至目前已得到中方同意接受的进修生共计22名，其中18名目前已到了中国，2人将于1965年2月1日前往中国。总之，关于29名进修生的接收问题目前还未得到中方的答复。中国方面已答应将会向苏联驻中国使馆通知关于自己是否接收其余29名苏联进修生的决定。然而，至今仍未收到中方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

唐坦义请求(我们)就接收其余苏联进修生问题向北京方面询问。

依照既定惯例，所有与派遣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由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决定，而所有与派遣苏联大学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应由苏联驻北京使馆决定。唐坦义建议苏联驻中国使馆就这一问题向中国职能部门咨询。

他还说，我们抛开惯例把这一请求直接上报北京相关组织。

3.(唐坦义)说，鉴于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今年12月11日第4143号和12月18日第4789号信件，我们根据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的请求向中国使馆作了如下汇报：

1.据列宁格勒国立大学通报，被派来苏以“常用微分方程式的恒定理论”为课题接受研究生学习中国公民唐诗因(ТанШи-ин)，由于专业修养不足和俄语知识欠缺无法准备和进行论文答辩。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建议将她转为进修生，为期一年。

2.自1963年10月5日起，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系火棉胶化学教室的接受研究生教育中国公民孙曼林(СуньМань-лин)，在研究生学习开始阶段便不具备相应的化学基础知识修养，再加上他毕业于建筑学院，因而也没有在物理和火胶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实际经验。

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曾以1963年11月20日第BC10855号备忘报告的方式，向苏联使馆通报了如下情况：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孙曼林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学位答辩。可是，中国使馆仍然以1963年12月19日第C202/63号备忘报告的形式请求(苏方)将孙曼林作为研究生来培养并保证说，他(指孙曼林)完全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己的论文。

可如今根据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的报告，尽管研究生孙曼林能够吃苦耐劳，但仍不可能在既定期限内完成答辩。

唐坦义指出，所有中国研究生和进修生，在被派往苏联(留学)之前，均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他们都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至于上述两个实例，唐坦义答应，将向他们本人了解情况并随后做出答复。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B.M.穆拉托夫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金庆方(ЦзиньЦин-фань)。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

И.卡拉布霍夫(签名)

给中央的文件共6份，分送：B.B.库兹涅佐夫同志、B.П.叶留金同志、O.B.罗满宁同志、总书记处、苏联驻中国使馆和档案室

1965年12月2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1卷，第20—22页

№24334 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1965年12月20日)

机密

今天同金炳稷举行了会谈。

大使说，他刚刚从平壤回来，他回去了半个月。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朝鲜期间，他同金日成会谈了三次，他向金日成报告了自己在苏联的工作情况。他详细介绍了我们莫斯科营造了形势和苏联方面为改善苏朝关系的氛围所做的努力。

按照大使的话说，金日成对他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苏共10月中央全会后，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改善苏朝关系开辟了前景。金日成在自己的谈话中对莫斯科怎样解决同朝鲜进行经济合作和进行援助的问题很关心。朝鲜领导人平壤热电站建设中出现的不和情况很紧张。

在大使返回苏联之前，金日成责成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

大使强调说，他想在年前同勃列日涅夫会见，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同志要去蒙古，他有金日成的委托，他想在1966年1月1日能完成金日成的委托。

我告诉大使，会将他的请求予以报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苏达利科夫

1965年12月20日

1966年

№24381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1966年2月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提交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的工作计划。

计划对下列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苏美关系、削弱北约的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南亚和东南亚局势，拟订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建议，苏联同非洲和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行动和计划，进一步发展苏联和法国之间关系的一些问题。

考虑到制定远景外交行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事先规定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在准备材料时可以利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部、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相应各部门的情报，并进行咨询，以及吸收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参与工作。

请审阅。

葛罗米柯

1966年2月14日

附件：

机密

1966年度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一、苏美关系问题

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

些客观因素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

美国在发展美苏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和美国统治集团中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力量对比。评估约翰逊行政当局在苏美关系领域的定位和实际举措。今后5年苏联同美国之间在军事、经济和科学领域竞赛的前景，这种竞赛对美国统治集团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念的影响。

在构想苏联对美国外交政策总方针时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涉及美国 and 苏联的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分析美国 and 苏联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哪里，分歧在哪里，冲突在哪里。

构想我们对美国的方针时应从如下几个国际问题出发：

欧洲问题。美国在西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美国同欧洲国家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可能性。

美国对联邦德国推行军事化政策背景下的德国问题；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法国削弱美国在欧洲作用的政策。

美英关系；美英矛盾和利用此矛盾来削弱美英军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破坏和削弱它们与苏联合作及它们彼此合作的企图。对我们采取措施制止这种企图的考虑。

远东和亚洲问题。中美关系。分析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最为可能的步骤，及我们对每一步骤的立场。

美日关系，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日本关于返还冲绳岛的要求；美军撤离和清除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发展美日经济关系，等等)。

分析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政策中涉及苏联利益的方面，考虑我们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上述国家的影响应采取的可能性步骤；为此目的利用美国在印巴冲突中的处境。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问题。分析美国对非洲大陆的总政策，对非洲部分地区和个别国家的政策。构想我们就某些问题和在出现紧张形势和威胁和平的那些国家积极开展反对美国政策的措施。

巩固古巴共和国的问题。美国对社会主义古巴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方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保障古巴共和国在和平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措施。

国际关系问题。分析美国对普遍和彻底的裁军的一系列问题(总体的和部分的)的立场。未来几年同美国就这一问题中的个别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同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我方可能采取的策略方针。

联合国。关于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维护和平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考虑到该组织的力量对比和力量进一步变化的前景。

苏美双边关系。构想苏联采取旨在发展美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往来与合作的可能性措施。

准备苏联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指的是我们感兴趣的最广泛地发展，首先是对我国经济有益处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往来的材料。

这些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对于我们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美国对苏联政策目的的敌视将产生有益影响。

期限：在1966年10月15日前准备好。

二、北约组织和我们削弱它的措施

评估北约集团存在期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活动。北约组织的活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产生的负面结果。18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实力的变化，以及在北约政策的反映。

分析北约内部，以及北约同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为了进一步削弱北约，揭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

在政治领域：北约成员国的一些国家(法国等)为削弱美国在这一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的斗争；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在加强自己在北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努力之间的分歧；北约组织成员国在德国问题、西欧联合问题、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以及在其他的主要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

在军事领域：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争取削弱美国在北约武装力量中的领导作用和争取扩大自己影响的斗争；一些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防止欧洲战争和保障欧洲安全(华沙成员国与北约成员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在欧洲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等)的建议的态度。

在经济领域：北约欧洲成员国家及它们追求经济统一的努力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的矛盾；北约成员国中在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问题上的矛盾。

北约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北约与未加入北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鉴于1969年为北约组织成立20周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宣布退出北约，一年后宣布废除这一条约，此时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对该集团的前景计划。

构想未来2—3年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利用北约组织中的离心力削弱北约的可能性措施。

期限：1966年9月1日。

三、核不扩散问题

分析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其中包括对成立多边核力量部队和大西洋核部队计划的立场。美国提出了成立“麦克纳马拉委员会”作为吸收西德参与解决北约使用核武器的相关问题的可能性方式之一。该计划与上一个计划是有区别的。与目前的地位相比较，在“麦克纳马拉委员会”成立的条件下，联邦德国将拥有更多的优势。关于西方国家解决联邦德国核武器要求的其他可能性方案。

构想我们在核不扩散问题的下一步立场，出发点是必须为联邦德国装备原子武器制造障碍。苏联与法国和北约其他一些对西德装备原子武器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进行协调的可能性。

在北约通过关于吸收联邦德国加入“麦克纳马拉委员会”的决定的情况下，我们表明在签订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拒绝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时可能出现的后果。联邦德国在直接或间接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沿华沙条约路线应采取的可能性应对措施。

期限：1966年5月15日。

四、东南亚局势和制定我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建议

地区的主要问题：争取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及贫困——长期殖民统治的后果的斗争，反对新形式的经济削弱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成立民族工业、培训民族干部、保障居民需求。

地区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这些国家内部围绕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的斗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景。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经济贸易和财政联系。

这一地区国家的相互关系性质、争议问题。中立主义的作用和性质。

地区国家政府对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追求的利益和目的。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南亚和东南亚表现出关心的性质。这一地区的军事公约和外国军事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地区国家的计划和活动。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基本成果；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困难；达到相应水平的成果所需的努力和开支。

构想我国对这一地区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时，要考虑到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效果，同他们进行合作的各种可能形式和某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

期限：1966年11月1日。

五、苏联和亚非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分析目前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和发展趋向，此时要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区别，它们的经济潜力，以及军事战略意义。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和立场(资本投入的范围及其规模、原料剥削和市场、军事基地)。前殖民主义国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包括美国 and 联邦德国对这些国家的新形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贷款、无偿援助、参与知识分子培训、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宣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为了苏联的利益，构想利用这些矛盾采取可采取的措施。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成果；合作中的不足。

构想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不结盟国家就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政治合作的措施，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也可以在该组织之外。

确定要集中我们的精力与之开展全面合作的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具体国家，此时要考虑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和前景，它们在削弱帝国主义阵地中的作用，以及战略地位。构想关于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援助，以及同它们进行贸易的主要方面和规模，此时要注意到我国1966—1970年5月计划的现实财政和物质水平(贷款总规模、设备的品种和数量、机制、材料和专家)，还要考虑到，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确定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适合的方式，以便巩固和扩大我国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例如，由我国的企业供应设备原料，再把这些企业的产品运往苏联，等等)。

期限：1966年7月1日。

六、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和计划，鉴于此我国的外交任务

分析现阶段以及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意义，此时要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并明确：

第一，中国的立场在哪方面符合或接近苏联的立场和利益；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与苏联利益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这给国家的社会体系带来哪些危害；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同苏联的立场区别在哪里，其中包括历史发展的特点、国际关系特点和中国的内部局势。

指的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下列问题的立场：

1.对待美国(包括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美关系的反应；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对苏中分歧的利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2.对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包括香港问题、中日关系接近的可能性)。

3.对待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立场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中国侨民的作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和矛盾，首先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中国在亚非合作问题和三个大陆团结问题上的立场)。

4.对待联合国及其专门组织(包括远东经济委员会)。

5.对待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问题。

制定我们对抗中国领导层追求霸权主义的努力、制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和增强苏联的影响的措施。

期限：1966年11月15日。

七、进一步发展苏法关系的一些问题

1.苏法在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前景。

分析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从利用这种观念的视角来考察削弱美国在西欧的影响和不允许进一步强化联邦德国的军事政治实力。苏法合作对其他西欧国家的可能性影响，指的是削弱它们参加北约的念头。弄清楚法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欧国家围绕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关系发展开辟了前景。关于苏法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构想，此时要考虑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2.在法国目前对亚非拉政策背景下的苏法关系。

分析目前戴高乐有关致力于巩固法国实力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方针。

研究利用法国对这些国家推行的相对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可能性(提供经济和科学技术援助，同时强调尊重民族自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些非洲国家对外政策倾向的影响)，以便对抗美国向非洲的渗透，削弱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

济独立。

3.评估未来2—3年法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前景，提出我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发展苏法关系的采取可能性措施的建议，指的是强化法国独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自主倾向。

期限：1966年5月10日。

第453/TC号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9, л.32-42

№24376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1966年2月14日)

敬爱的列昂尼德·伊利伊奇(勃列日涅夫同志)：

近期，在一些社会言论和报刊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倾向，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部分地或间接地为斯大林平反。

随着党的二十三大的临近，我们还不清楚上述倾向究竟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拥有多么牢固的基础)。但是，即使这些倾向只是部分地涉及关于重新审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会议决议的问题，也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安。鉴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给您。

在此之前，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谴责个人崇拜有什么错；相反，我们很难对被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所确认的、关于斯大林的大部分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和绝对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事实尚未公开。

问题还在于，我们认为，任何为斯大林鸣冤叫屈(平反)的企图都潜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导致苏联社会的严重分裂。斯大林不仅要大量无辜民众的死亡，苏联国家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以及背离列宁的党和国家生活原则则承担责任，而且还以自己的犯罪和错误活动歪曲了共产主义理想。斯大林所做的这一切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民原谅的。我们的人民不会理解，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即使是部分地背离(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

而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尝试，都只会导致我们内部各阶层民众在思

想上的普遍混乱和分歧。例如，我们坚信，为斯大林平反必将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骚动，并导致我们青年一代情绪的严重复杂化。与整个苏联社会舆论一样，我们也对青年的成长而担心。任何解释或文章都不能驱使人们再相信斯大林，而相反只会激发人们的混乱和愤怒。鉴于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形势，这样做显然是危险之举。

为斯大林平反还存在着另一个也相当严重的危险。要知道，它不仅只涉及我们的内政，而且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在为斯大林平反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无疑会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又一次分裂，即我们与西方共产主义党派之间的分裂。此类举措将会被后者首先认定为：我们对中国人的投降，而在任何情况下西方的共产党人们都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我们一方面受到美帝国主义者和西德复仇主义者们的积极威胁，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搞分裂的)中共领导人，因此我们与西方兄弟党派的分裂，即使关系的复杂化便意味着冒险，至少也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

为了不浪费您的精力，我在以上所述中只涉及一个问题，即反对采取任何为斯大林平反的举措。因为这样做首先存在两个分裂的危险。这里，我们还未涉及如下一些危险，即任何背离二十大决议的举动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们文化活动家们的国家交流局面的复杂化，其中包括我们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和国际合作诸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构成危害。

还有一点，这里我不能不再加一句。显而易见的是，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不能被认为是其日常工作中所做出的一个普通决议。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决议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均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引起(国家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签名者姓名及其身份：

Л.А.阿尔奇莫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О.Н.叶夫列莫夫——《当代人》剧院总导演。

П.Л.贾丕才——科学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国家奖金获得者。

В.П.卡塔耶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П.Д.科林——苏联人民艺术家，列宁奖金获得者。

М.А.梁托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奖金获得者。

И.М.麦斯基——科学院士。

В.П.涅克拉索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Б.М.涅缅斯基——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К.Г.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

Ю.И.皮缅诺夫——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М.普利谢茨卡娅——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А.А.波波夫——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И.罗姆——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С.Н.罗斯托夫斯基(艾伦斯特·盖林)——作家协会会员，沃罗夫斯基奖金获得者。

А.Д.萨哈洛夫——科学院士，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С.Д.斯卡斯金——科学院士。

В.А.斯卢茨基——作家协会会员。

И.М.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影业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И.Е.塔姆(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金、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В.Ф.坚德里亚科夫——作家协会会员。

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М.胡齐耶夫——功勋卓著的俄罗斯联邦艺术家。

С.А.崔可夫——苏联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К.И.丘科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1966年2月14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7, л.40 44

№25972 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66年2月16日)

1966年2月16日

第92号/ДВ-НС

香港和澳门

(简报)

香港是被英国占据的中国东南海岸的领土。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即所谓的新界构成。殖民地领土包括香港岛(83平方公里)、九龙半岛上不大的一块地方(距离香港岛800米)和一些小岛(面积为124平方公里)组成。在九龙半岛上的“新界”及其附属一些岛屿(面积为888平方公里)。面积总共有1012平方公里。居民有369.2万人(1965年末)，主体居民是华人(98%)。

香港是在1839—1842年英中战争期间被英国人占领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南京条约》强加给了中国，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56—1860年英法中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从中国抢占了九龙半岛的南端，并把它与香港合并。1898年强迫中国签订租借协定，租借九龙半岛的另一部分和一些附属岛屿，与香港合并，租期99年。

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第3条)，“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以便立法治理”。

在英国书籍中把香港的司法地位明确为“英吉利王国所有的殖民地”。1964年4月英王签署任命了现任香港总督的委任状，其中谈到“任命的是我们的香港殖民地及其附属领土的总督和总指挥”。

香港由英国总督、总督任命的执行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来管理。殖民地设有城市委员会、警察、地方武装力量，以及驻扎在那里的英国海、空军殖民军队。

香港是一个开放口岸，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贸易中心。有700多家外国银行、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其中包括4家美国银行分支机构。每年城市接待外国游客近100万人次。许多国家在香港建立了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等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经济中占有极大的地位，它在香港拥有许多各类企业。据英国报纸《星期日电讯报》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有5家银行，管理9家其他银行，3家医院，8家大型贸易康采恩，其中3家是与当地商人联合创办的，31家百货公司、食品厂、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出版社和4家大型报社(塔斯社，1956年4月26日，第33—34页)。

香港作为贸易代办处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消息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从香港获得的自由货币达50亿美元(联合企业的收入，华侨的兑换、同香港的贸易顺差)。据香港资料，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224.95亿港元(近40亿美元)。

澳门是南中国海海岸的中国领土，位于香港西部。葡萄牙人控制着澳门半岛及其两个附属岛屿(凼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16平方公里。居民25.5万华人和1080名葡萄牙人。

1557年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了澳门用来作为海外商站，条件是中国保留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但是，从1843年起，利用中国在对英战争受到削弱之机，葡萄牙拒绝支付租金和拒绝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1874年，葡萄牙迫使中国放弃了对这一块领土的主权，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澳门行政权力掌握在葡萄牙总督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否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地位，把它们看作是被英国和葡萄牙从中国强占的领土。把这些领土问题列为历史遗留问题，等条件成熟时再解决。

中国政府在解放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立场，在《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文章《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中找到反映，文章中说：“至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一直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待条件成熟时再解决，而在条件成熟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必要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展现自己的武力”。

中国政府反对在联合国把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列为“殖民地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该组织“没有权力”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由于香港被用来作为美国侵略越南的供应基地，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英国政府(1965年9月1日照会和1966年2月1日照会)。在最后一次照会中，中国外交部指出，1965年出现过300余次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军舰，包括核潜艇进入香港口岸的事件。照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准备。

苏联的立场

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联合国机构无权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内部事务问题和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的问题。

在第19届联合会议讨论特别委员会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在1964年11月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提醒说，苏联代表团的立场在1964年4月20日召开的特别委员会第245次会议上的声明中阐述过，其中说：

“自然，某些小块殖民地领土存在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些领土现今仍被殖民主义者占领，但毫无疑问这些领土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例如，香港和澳门。这些脱离其母国的领土应予归还，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

同时苏联代表认为，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三秘

P.伊斯坎达罗夫(签名)

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п.226, д.25, л.2-6

№23022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1966年2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1966年2月19日第22次讨论苏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信函
及一些农业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主持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按照约定，请允许我们就此结束辩论。
有人坚持继续辩论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放弃致闭幕词。

建议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通过如下决议：

“中央全会决议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1966—1970年间苏联
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草案。

1.赞成《苏共二十三大关于1966—1970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
计划的指令》草案。

2.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1966—1970年
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

3.将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的指令》提交各级党组织和劳动者会议讨论并见报。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正确。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让我们表决吧。赞成该决议草案

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没有。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们建议责成中央政治局，参考会议期间同志们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对五年计划指令草案进行最后编辑整理，并打算在明天的报纸上公布该草案全文。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照此办理。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简单谈一下，关于党内讨论苏共中央就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方针和苏中关系问题所发秘密信的情况。正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和许多来自地方的领导干部向我们所报告的那样，这次讨论是在健康的环境下进行的。以我们在处理与中共关系过程中所采取的平和的路线，党员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完全赞成苏共中央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党中央在国际政策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如今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再次证明一点，即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依据的是各州委书记、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军队干部们从各地方发来的报告，从这些报告可明显看出，苏共中央所执行的方针得到了所有党组织的赞扬。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本次大会上不应当再进行与中国领导人的辩论。我们所执行的克制而平和的路线，在相当程度上已满足了此次与会的我们一些客人们的愿望。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虽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必要时不会采取坚定的立场。

同志们！我们已打算在全会闭幕后再就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流意见。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便是关于粮食采购的问题。在中央9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经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在粮食采购问题上所采取的片面态度，即对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超计划采购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今天，柯西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对该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原则上说，我们并没有对3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任何的改变。粮食采购计划依然是稳定的。不过，我们必须按照提高的价格和以需要的

规模完成粮食的超计划采购。如今，重视这一问题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考虑到，由于气候条件比较差，我们尚有500万公顷的土地播种不足，虽然还可以补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春播准备工作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如何更好地利用为春播作物所保留的土地，如何更好地使用矿物质肥料——是否不对某些作物使用这些肥料或将之用于秋播作物。在这方面尚存在许多需要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解决而不能拖延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在五年计划中筹划所有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关于完成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和粮食采购计划的问题，始终是我们最应关心的问题，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党为了粮食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而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决定着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认为有必要把弗洛连季耶夫和马茨凯维奇等同志的报告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原因。这两位同志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国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范围内农业生产计划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正是因此，我请求大家再次全面地看一看在各共和国和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内农业生产五年计划的发展方向是如何制定的，应当如何对其中的一些偏差进行纠正。这些偏差可能表现为个别农业领导干部片面地执行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所制定的路线。

而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一请求只局限于全体中央委员范围内，我认为，就是希望这方面问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重视。

我们的工作已进入实践阶段，苏共中央全会，就五年计划所通过的指令性草案，已列入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大会和党代会的议事日程。我想这一次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指令来做。在各州和边疆区党的会议上，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我们的工作作一总结，第二个问题——通报一下关于上述指令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正确？

众人道：正确。

苏斯洛夫：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将分发到基层。该决议将更加详细地阐明关于指令性草案在各级大会、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程序问题。

众人道：这样做很好。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同志们对全会的进程没有其他问题或意见，那么全会工作到此结束。有问题和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宣布全会闭幕。

РГАНИ, ф.2, оп.1, д.816, л.90-93

№20282 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1966年4月11日)

绝密

谈话记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于1966年4月11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谈话。

参加谈话的有政治局委员、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阮维桢，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阮文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报总编黄栋。

黎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所有越南人民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这种支持特别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勃列日涅夫：您在大会上听到了，大部分发言的代表和几乎所有兄弟党的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这样或者那样提到了越南人民的战斗。这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不仅是动员我们国家的人民加入到团结和支持越南人民的实际过程中去，而且也是从世界进步舆论的角度，加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黎笋：我想指出，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我们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需要物质支援，但是对于北方和南方我们的人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来自我们的苏联朋友和世界所有朋友的道德以及政治援助。

借此机会，我想告知您越南形势的总体特点。

我们反对美国侵略战争战略路线的主要方针是：1.使美国在越南取得失败；2.限制现在的战争在南越范围之内，不允许它扩张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区域；3.以最小的损失获得胜利。

在南越的侵略行动中美国帝国主义者试图依靠三种主要力量：1.“战略村”；2.傀儡制度及其武装力量；3.南越城市。他们在越南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太平洋第七舰队。但是这个因素起的是辅助作用。美国人主要寄希望于上面提到的那三种力量。但1965年证明，这些力量已经不再是美国在南越政治依靠的希望了。比如，已经在1965年初，南方被消灭了四分之三的“战略村”，尽管我们建议先在这个时间内消灭一半。傀儡军队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城市中也不安宁，情况让人联想到起义前的气氛。

根据对南越形势的分析，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65年初得出了结论，南方可以在2—3年内取得胜利。但事件比我们想象的发展得更快。面临西贡体制彻底崩溃的危险，美帝国主义者向南越派去了军队，把人数从1964年底的3万增加到去年年底的20万。

坦白说，在最初的时期我们处境困难，因为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针对美国军队进行行动。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们一定要被打败。作为尝试，我们派了正规军的1000人分队到岬港和丘莱(Чулае)美军的重要基地。美国为此派来了8000士兵和军官。战斗在万道(Вантыонг)附近激烈展开。结果我们消灭了800名美国军人，我们损失了50人。这个战役的尝试说明，我们不仅可以同美国人打，而且能够打败他们。

到目前，美国在南方有美国和仆从国的6个师。但在反对前线力量的战斗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空运师。当然，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用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但是美国士兵的精神和战斗能力是极度低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接连失败。

西贡体制试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在南方施行“安抚”的政策，也就是说，用经济许诺和收买的方式来吸引人民向着自己一边，并削弱民族解放战线。但这样的政策没有在西贡和美国得到预想的结果。

南越今年年初的形势是火奴鲁鲁召开会议的原因。 [58] 我们的评价是，这个会议没有给出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指出美国方面以及他们在南越的傀儡任何新的行动。

在我们看来，美国人现在正想走出不能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状态。他们确信，我们不会在南越给他们决定性的打击。不排除因为这点，美国将在南越扩张自己武装力量的人数，以使南方的局势对自己有利。他们可能增加到30万—40万人或者50万人。

勃列日涅夫：您谈了傀儡军队的崩溃。这说明什么？这个军队的很多士兵都投降“阵线”了吗？

黎笋：西贡军队大量的临阵脱逃。仅在1965年，根据美国的数据，南越军队的逃兵就有1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家了。我们暂时还很少利用这些人来补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解放阵线地方机关分给了这些人土地。

勃列日涅夫：我想应该积极地和这种人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武装力量的后备军。给他们土地，很好。但是让他们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男人应该去战斗！

黎笋：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有过这样的情况，傀儡军队的整个分队都投降到“阵线”这一边。比如不久前，加入到我们力量中的南越武装力量装甲运输车团。

勃列日涅夫：南越的爱国武装力量人数有多少？

黎笋：如果加上正规军、游击队和当地的自卫队，人数为60万。敌人力量(美国和傀儡军队的武装力量)和我们的力量对比是1.3：1。

勃列日涅夫：您想过给前方供给所有必需品的困难吗？“胡志明小道”发挥作用了吗？从北方走向南方是否有其他的途径？

黎笋：关于给在南部的省份，也就是在南越的南部行动的武装力量的供给，保证粮食和弹药的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拥有所有的必需品。比如，那里协调了弹药生产。给泰昆(Тайнгуен)，也就是和老挝接壤的、南越西北部的力量供给更难一些。这些地区的货物是通过你们的“胡志明小道”得到的。道路起着作用，但是遭到严重的轰炸。我们需要一些高射炮，掩护这条小路不被空袭。这条小路，众所周知，相当长的距离是通过老挝的那些由巴特寮力量控制的地区。

南越，我们面前有敌人的军队80万。我们想在2—3年的时间里挫败

敌人。为此我们需要消灭敌人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今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面临的是消灭8万—9万美国军队和15万—20万傀儡军队。在已经过去的1966年的三个月里，我们的力量消灭了4万以上的美国军队和傀儡武装。

可以说，我们想让美国人吃败仗。同时我们也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取得胜利。

近来，美国的统治集团经常在政治领域对我们让步。如果以前他们是满口声称不退出南越，而现在则是说，准备好从那撤出自己的军队。不久前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现在他们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代表参加谈判的机会。我们认为，在某种形势下，美国可能会同意将军队撤出南越。但是他们希望一定要在南方留下永远忠实的傀儡体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在南方存在这样的体制。可以建立一个有个别亲法和亲美人士参加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不应该依赖美国。

我们明白，面临相当长的战斗。为了让美国人做出下一步的让步，我们还需要时间。整个过程将是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斗争规模，同时也取决于西贡制度内部和美国内部发生的危机。不管怎样，我们都将与美国接触，不会回避这样的接触。

勃列日涅夫：这些接触以什么方式实现？

黎笋：美国驻仰光大使在缅甸与我们的代表见面。在莫斯科也有会见，是我们的临时代办与美国大使的谈话。这样的接触我们将在未来继续维持。

我们的总结是，美国可能会针对北越加强自己的行动。从自己的角度，我们自然希望限制实现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希望减少美国空袭给北越造成的损失。但是显而易见，南方爱国者的战斗越是积极，美国则越会加强对北越的空袭。我们不排除美国飞机袭击河内和海防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人遇到的困难。除了对他们侵略的谴责，美国越来越处在政治孤立的位置上，美国不得不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在南越供给部队的问题。很清楚，他们为自己的士兵供给必需品有困难。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大规模使用“格拉德”大炮去打击美国在南越的主要基地和最大仓库时，这些困难会更加突出。

勃列日涅夫：感谢您的信息。我们希望越南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消灭南方的美国人将是最好的结局。至于我们，我们现在会帮助、今后也会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关1966年提供货物的义务我们努力按时完成。如果可以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将很快给你们三个导弹团，就是我这几天和您说的。我们认为，向越南派遣的这些导弹团将进一步促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能力的加强。利用这些补充团，你们可以更有效地与侵犯北越领空的美国空军交战。此外，在我们看来，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同时也是对南越爱国者的援助。

黎笋：我们通知了河内，苏联给了我们三个补充的导弹团。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希望，上面提到的团将派到越南来，并像已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导弹团一样被使用。这样，和中国同志们达成协议，通过中国领土将这些导弹团运送过来将会更容易。

勃列日涅夫：给你们提供补给的导弹团，他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在战斗中使用。我和您说过，和导弹一起我们将给你们相应的掩护。和这些团一起派往的还有一个最新的地面掩护设施，使用它必须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现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在实践中使用这个设施。因此，我们觉得，应该派苏联专家和教官过去，以便教会你们的人使用这种新式武器，同时也是为了在必要时候应用。

黎笋：我们希望，所有的有关派遣上述三个导弹团的具体问题都将在两国的国防部长之间得到讨论。

勃列日涅夫：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同意在任何时间举行这样的谈判。

在政治层面，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不会做与越南朋友的看法和立场相矛盾的事。让所有关于我们在越南的挑拨和流言都留在那些作者的良心里。

我们为你们的成绩高兴。美国不仅在南越处于困境，而且在欧洲，严重的分歧动摇着北约。需要注意的是，消灭南越的美国军队，现在说是22万人，而您说了很快将是30万—40万，也许这么快不可能。这需要时间，需要力量。战争可以带有长期的性质。北约的分歧对我们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将让美国在越南处在更强硬的位置。为了不在

南越失败，美国会不惜一切，否则他们的盟友，包括北约，就会停止信任他们。这是需要注意的。

很显然，美国人面临给南越供给军队的困境。但是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因此，美国看来要越过这些困难。而我们也有不少的困难。

黎笋：我们从自己的方面全力以赴战胜目前的困难。

勃列日涅夫：在我们看来，必须保护北越的经济免受破坏。当前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有这样的积极因素，就是反对美国在越南侵略的广泛运动。这个运动要在整个世界活跃起来。运动将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以及世界的进步力量得到开展。

也许现在需要想想，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使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政治斗争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美国不会在南越的战争中胜利，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应该帮助他们离开南越。就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权威，但是要离开。可能美国会在越南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要他们立刻离开有些不现实。关键是必须彻底拔掉傀儡体制的根源。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应该是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

黎笋：就是1954年的协议。就让美国人严格执行这些协议的条款吧。

勃列日涅夫：我们认为，你们支持与美国接触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自己正在寻求接触。这证明了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立场的正确。美国由于在南越的艰难处境不得不寻找某种形式的接触。

黎笋：现在我想陈述一些具体的请求和有关具体问题的想法。

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的“格拉德”大炮，促进了南越爱国者战斗的成功。今年4月我们结束了向南方运送和集中所有的大炮和炮弹。我们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我们提供同样数目的大炮和炮弹，就是给我们与已经在南越安放的数量一样的炮弹。

勃列日涅夫：我会将您的请求向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报告。我们研究一下，再考虑一下，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当然你们知

道，这样的大炮我们实际上是专门为南越的爱国者生产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武装力量来说，它们是不合适的。

黎笋：我们同时请求苏联同志研究，如果美国包围河内并且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港口，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我们会让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个问题。也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给你们海防炮。

黎笋：我们很高兴，在代表大会上您的报告中，早些或者在别的发言中，听到您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很好的论述。达到这样的统一，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首先是对于我们。我们支持统一。在这方面，作为措施，为了减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希望，在我们之间，越南和中国方面之间，通过中国领土向越南运输苏联的货物援助的所有问题将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会比苏方更容易协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意。您知道，我们真诚地渴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同时也渴望与中国恢复良好的关系。如果在返回的途中，您还将和中国的同志们见面，那么可以对他们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都希望苏中关系有所好转。同时还可以说，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我准备好了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的形式，官方的、非官方的，与他见面，迫切地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并乐于回答所有问题。在我们看来，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是加强与帝国主义斗争道路上有效的一步。

黎笋：如果我在中国有会见，那我一定向中国同志转达您的话。

当我们飞往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委员的见面。您知道，这个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可以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执行的是独立路线。现在，日本共产党内笼罩着恐怖和镇压的威胁，这些有可能使日本共产党人被日本当前的政府攻击。苏联共产党帮助日本共产党与国内的反动派斗争是有用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团还对我们说，党的领导试图通过战争建立广泛的反帝战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战线，包括亚洲和世界的进步力量在内，对活跃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具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正面看待日本同志的这个想法。

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得到邀请，他们准备好到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见面。

勃列日涅夫：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我们希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考虑到越南和朝鲜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在最近的时间里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不久前，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B.B.库兹涅佐夫访问了东京。他被委托与日本共产党代表见面。但是，很遗憾，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见面没有举行。我们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邀请，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众所周知，代表团没有来。

我们认为，我们还可以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采取措施，同时支持日本同志面对反对党的威胁。不能不提到印度尼西亚的教训，据目前的数据，牺牲了多于20万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反对党的进攻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还想补充几句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问题。我们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中国同志表现出忍耐，对他们的攻击不予回击了。这一点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可以证明。我可以和您说，接下来我们还将克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当然，我们不高兴每天听到中国的报刊和电台对我们的侮辱。但我们没有回应这些侮辱。我们遵照的是，当前最主要的是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斗争。而其他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

黎笋：再次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我们的代表团参加你们党的大会。胡志明同志非常遗憾，不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但他一定会找到机会访问苏联。在送我们来莫斯科时，胡志明同志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勃列日涅夫：请带我们向胡志明同志、范文同同志和其他越南同志们转达兄弟般的问候。请转达，我们邀请他们和您——黎笋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休息疗养。

黎笋：我们一定会到您这来，也包括休息。我们在苏联的时候，实际就是精神休息。我们也希望勃列日涅夫同志能到我们国家去，当越南

统一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开玩笑)：为什么不早些呢？

黎笋：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将是全越南人民的喜事。而现在的情况并不安全。我要说，因为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占有这么高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想和您说几句关于在河内举办不同国家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的国际会晤。苏联的代表团将参加其中的工作。据我所知，一些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派自己的代表团来河内参加会晤。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对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战斗中的越南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最后还想强调，关于越南问题，我们以后也会支持你们的立场。同时，我们认为应该更为关注政治上的斗争。

黎笋：完全同意您的意思。鉴于去年10月您和范文同同志谈的意见，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的行动。1966年1月24日胡志明主席给政府和国家首脑的信函就是实现您想法的具体步骤。

谈话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P.Л.哈密杜林记录。

АПРФ, ф.3, оп.83, д.284, л.6-20

№16680 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1966年4月20日)

机密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呈上《真理报》记者曼科、切斯诺科夫、波奇瓦洛夫同志关于阿穆尔河地区范围内的远东局势的秘密信函。

《真理报》总编

M.齐米亚宁(签名)

1966年4月20日

《真理报》编委的呈文

目前，远东的局势是这样的，这个辽阔的边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广袤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区领土上人烟稀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及居民点，公路铁路数量微不足道。这个蕴藏无数宝藏及有远大前景的地区，占有它就注定有经济利益。此外，还有迅速掌握该地的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常常具有政治及军事性质。

远东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这个边界上的局势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如同苏联边界政府告知我们的那样，近来中国人经常企图挑起边界上的武装冲突，袭击苏联哨所，组织中国农民在割草期临时抢夺，并在苏属阿穆尔河的岛屿上进行捕鱼。在边界官员会谈时中国官员常常声称，不仅是黑龙江上的岛屿，而且沿江两岸所有土地以及乌苏里江边区均应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居民也坚持这种想法。特别引起警惕的是，中国一方明显地增加了军人数量，边界区内建造公路，居民军事化。

想来，如果可以从我们远东未来的战略点来说，那么，这些事实理应严重注意。这个遥远的边区经济上要大大加强，要建立良好的交通线，首先要住满居民。

虽然近几年来远东移民显著，但人口密度，例如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几乎是国内中部地区的七分之一以下。人们在此滞留不了。人员大量流动。有几个原因：气候条件恶劣，最低生活费比国内西部地区高，缺少按地区差别率津贴规定给各类专家、工人、职员，没有年限奖励工资补贴。

由于远东林场人员流失，在冬季不得不从欧洲国家地区组织招募2000左右的工人及达3000人的季节工。通常他们是哪里来就返回哪里。实际上，这对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只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新林场就要1.1万个家庭。比较合理的是方法是不组织招募，建议有序移民。到1957年止，已实现将工人家庭转入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林业。这些人员已固定，成了常住者。虽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移民和组织招募工人局认为移民阶段已成过去，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论。

哈巴罗夫斯克企业及建筑工地和滨海边区的劳动力流动十分巨大。在1964年，原来远东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劳动力流动是28%，符拉迪

沃斯托克建设局的建筑工地为37%。其中青年工人流动特别明显。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干部、教师和医生的轮换是毁灭性的。如果当年实行附加工资20%，那么，离开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平均为3位教师，而现在每年平均为300位。教师说，在共青团城教18课时所得100卢布，而在梁赞也能得到。对医生来说，在工资方面，远东地区也不免税。人们离开了，甚至丢弃造得很好的住宅。近三年来，离开共青团城的医生有150位。人员离开，而医疗单位治疗网却发展，每位医生的治疗负担就加重。近2—3年来，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许多区医生大换班，现在边区的医护配套人员只是68%。

这些远离国内中心区的劳动者，像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劳动者，直到现在劳动工资比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的工人及职员并无更多。在滨海地区，大多数轻工业及食品工业单位的工人职员、教育工作者、保健人员以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者，均无地区补贴工资。只有40%的边区劳动者享受了这个补贴。

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曾提到，将提高国内边远地区工人及职员的工资和规定其免税。这无疑会大大促进人们向远东流动。但是，还要做很多事，要认真巩固来自国内西部的外来者。

逻辑上说，哪里发现人手缺少，哪里就应该改善生活条件。否则，人员留不住。生活的物质基础，居住条件是不能不考虑的。出路在哪里？通常，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常被忽视，起码的方便设施，如浴室、洗衣房、医院、俱乐部，那里的居民都没有。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十万平方米的住房已不适用，实际上应修缮了。这些住房，2—3年内应该换以新的。

是否以新城阿穆尔斯克为例，这里有外来建造的纤维板联合工厂。但是，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住房不足，来了多少人，离开的也是多少人。这里是共青团城建筑工地，多数为年轻人，显然，要建立年轻的家庭，但年轻夫妇不能住在一起，因为没有住房。现在439对年轻家庭，男的住在宿舍里，而妻子住在另一宿舍里。通常的最终结果都只有一个：人们都离开了。

在滨海边区，住房保证做得也十分糟糕。1965年1月1日住房总数是680万平方米，每人6平方米。根据边区工会理事会资料，有75800个家

庭在等候获取住房，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为42147个家庭。

公共设施方面，滨海地区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平均指标落后，代表性的数据是：

住宅总数保证百分比：

	滨 海 地 区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给 水	26	46
排 水	25	44
中央采暖	27	42
热 水	2	13

要给约2.5万名孩子建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边区几乎三分之一学校是2—3班工作。在滨海有伐木者居住的林间村落中总计4所中学上课。在富津(Фудзин)林场中央的农庄有3000人左右，但这里没有中学。

边区里少有俱乐部和图书馆，最近六年建造的企业没有一家有俱乐部。

滨海地区的食品国家牌价大大高于国内中央地区，集体农贸市场中的价格也高。

在远东，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是渔业，约15万人从业人员，这里主要由年轻人工作，大量的部队和舰队退伍人员补充进来，这些人都未成家，出海归来，每个人有70到80昼夜休息(休假+超时补休+节假日)。何处给年轻的渔夫休假？没有一个地方。在远东，渔夫没有任何落脚处(类似任何供膳宿的公寓)。船舶修船时渔夫不能住在船里，但他们没有住宅。这样，小伙子离开到其双亲居住的地方，或者到能够很快找到居住的地方。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里居住着约4万名渔夫，但这里对他们甚至一个偏僻的俱乐部、运动场和体育馆都没有。

渔夫的学习组织得不好。在整个远东只有1所远方渔业高等专科学校(2000名大学生)、3所中等职业学校，分别在纳霍德卡、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和涅韦尔斯克。这就不难看到，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实际上是

没有任何培养一般海上作业人员的基地。从堪察加半岛到滨海的广大地区总共有3所不大的厂属综合技术学校。1965年学校毕业930位海员，而这个时期渔业船队需要补充的海上作业人员7000人左右。出海人员临时匆忙培训。其中许多人未培训好，经受不住残酷的考验(6小时工作、6小时休息、常受暴风骤雨、长期离岸)而离船和远离远东。

对人民的休闲生活，在远东组织得很差。疗养所和休假处在这里也少。去西部休假远非每人都有可能。如果乘火车，路上就要半个月。飞机票的价格十分贵，来回要250卢布。显然，这对国内远东的固定人员不利。

最终，看来解决了人员固定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掌握和改造我们的远东。

Е.曼科

К.切斯诺科夫

Л.波奇瓦洛夫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9, л.197-203

№104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1966年4月2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6年4月20日会议第2/18r号记录

第18项 关于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租无线电台，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广播。

一、责成苏联邮电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邮电部进行谈判，并签订租赁发射机和通讯线路的必要的协定，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转播。为此目的，允许邮电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两名负责人员，期限为10天以内。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关于把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各增加2小时的提议。

三、责成苏联财政部在苏联通信部年度外汇计划中，规定出必要的

外汇拨款，用于租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线电技术设备以及自1966年起，补充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资金，用于支付节目制作和苏联邮电部租赁的无线电台、通讯频道的费用。

ЦХСД, ф.4, оп.19, д.426, л.7

№128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1966年6月24日)

致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等同志

1966年6月24日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6月24日会议第8号记录

绝密

特别文档

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1.1966年给予财政援助

波利维亚共产党——数额3万美元

(乌拉圭共产党)——数额30000美元

波利维亚民族解放阵线——数额20000美元

马达加斯加独立斗争党——数额8000美元

苏丹人民民主党——数额10000美元

塞拉利昂全民党——数额500美元

2.上述资金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谢米恰斯内同志)转交。

中央委员会书记

资料应在24小时内返还，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55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 [59] (1966年5月27日)

.....

近来，勃列日涅夫说，我在滨海边疆区非正式地接见了金日成。

.....金日成强调说，经过多次的政治局讨论，他们深信，他们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

.....关于越南，他们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和我们的一切政治举措。他们清楚地知道关于武器、建设项目和资金，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做些什么。他们反对、谴责中国的诽谤性的政策，中国人说什么我们的援助微不足道，效力低下，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帮助。还污蔑我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包围中国。

.....金日成主要是说，要使北越免受轰炸，想出一些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日益加强的空中挑衅的方法，就是派遣飞行员。特别是当前越南朋友已向朝鲜提出这方面的请求，他们也在招募支援者飞行员派遣到越南去。但这件事并不仅限于派遣人员。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如果那边有朝鲜的志愿者，也会有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他请我，也请其他人想一想，怎么对付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推行的政策是要使朝鲜 [60] 只象征性地驻有一些外国军队。

金日成同时也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需要理解目前越南在对华关系方面的困境，越南靠近中国，中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向金日成提起了朝鲜报刊上出现的一些反苏文章。)金日成表示，今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并说，近两年来他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会过面。

.....(接下来谈论了日本共产党的问题。)金日成请求我们采取措施处理好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金日成还说：日本共产党也不同意中国领导人最近采取的政策。

不久前的意见交换以及对立场、通报和观点的总结使我们相信，日本共产党也明显的感到了危险.....它想与我们接近，与我们会晤。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步骤配合日本共产党，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在谈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共产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出：)这三个党已经看清，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上走得是多么的远，沙文主义的狂热是多么的严重，他们需要与苏联共产党统一观点，需要更加全面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勃勃的挑衅政策。

但是，这三个党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

.....

РГАНИ, ф.2, оп.3, д.13, л.77-89

№25473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 [61] (1966年6月27日)

196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就苏联外交部1966年5月11日关于中国无线电广播宣传问题照会的答复照会：

.....

世界各国无线电广播电台的工作频率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仅任凭自己随意占据频率，而禁止别人使用，这难道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外交部想要提醒苏联政府，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你们就借口说北京广播电台“侵占”了额外的广播波段的频率，对所有频率的中国无线广播进行了疯狂的蓄意干扰。但这丝毫不能阻止真相的传播，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АВПРФ, ф.0100, оп.59, п.525, д.2, л.15-17

№2595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

印尼的关系(1966年7月8日)

秘密

文本第85份

1966年7月11日

第2055/TC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中国领导人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持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利用印度尼西亚来强化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破坏苏联以及印度的阵地。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对接近同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计划——企图在东南亚居于领导地位，把印度逐出这一地区，苏加诺把中国看作是可供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这场游戏中，苏加诺和北京起了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权转到就当代的主要问题持亲中立场的人手中。

在强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时，中国领导人支持印尼统治集团的民族主义要求。在中国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印度尼西亚实质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存的问题上持前后不一致的态度。由于苏加诺政府及其拥护者的冒险行动，造成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坏。印度尼西亚尝试运用中国自力更生的经验没能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支持苏加诺的“新兴力量”(НЕФО)思想，反对苏联参与该地区事务，鼓励马来西亚所谓的“对抗”政策。苏加诺在推行这项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本国的现实力量及可行性，结果导致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中国和苏加诺政府竭尽全力推动组建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以实现其构想。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联合努力筹备第一届亚非会议一事达成协议，其中中国极力督促印度尼西亚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在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尼西亚支持中国的立场，站在巴基斯坦方面，把印度评价为“侵略者”。苏加诺和共产党发言支持中国试验核武器。印度尼西亚报纸发表了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评论文章，强调这一事实对亚洲人的“重大意义”——亚洲国家能够生产核武器。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越来越积极和广泛地互派代表团交流。1965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陈毅、彭真和全国人大代表团等两次到印度尼西亚访问。1965年，苏加诺(两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沙列赫，以及主要是来自左翼组织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应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在“九三〇事件”前夕，中国人邀请了近600名印度尼西亚活动家访问(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活动)。其中包括6位部长、40位副部长、15位将军等。

至于经济往来，从1954年到1964年近10年期间，印尼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5倍多。1965年中国、印尼之间签订了关于航运、经济技术合作和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在9月30日政变前夕，在北京签订了关于经济计划合作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将在10年内向印尼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根据中国贷款义务，到1965年末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180万美元贷款。但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实施得非常缓慢。只是在1964年才着手建设一些工程，而这些工程早在1961年就应依靠中国贷款建设了。(现在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印尼关系现状，中国停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中国领导人选择印度尼西亚(拥有300万名共产党员和“右翼”总统)作为论证自己关于推动亚非拉国家革命的狂妄观念的“正确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中散布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他们毫无根据地论证说，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形势”似乎已经成熟了，并把这样的政治方针强加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利用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来广泛宣传中国的特殊观点(例子之一是1965年5月彭真在阿利亚哈姆科学院的讲演)。中国的积极宣传支撑着艾地的所有行动，其中包括他向苏加诺总统建议武装1500万工人和农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利用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影响来破坏苏联的阵地，削弱印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注定了“九三〇事件”期间的形势的不可避免性。

1965年之前，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最终站到了中国领导层怂恿他们在国内制造革命形势的立场上。作为第一步，决定对军人集团中的右翼进行打击，以便在行动时让使其中立。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中国领导层准备好了政变方针。如1965年10月下旬中国政府副总理陆定一在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泽弗林会谈时表示，中国人考虑了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可能性，期望印度形势在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能出现国内战争。

在“九三〇”政变失败后的第二天，雅加达居民收到了中国特务机构通过为新兴力量会议大楼工地运送建筑材料时秘密运输武器的消息，而运送建筑材料无需检查，从9月30日到10月1日，这些武器分发给支持翁东中校的青年团体(中国方面没有提出反驳这些消息的论据)。印度尼西亚的许多报纸都谈到中国参与了“九三〇事件”。其中谈到，在大学生进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时找到了陈毅和苏班德里欧签署的秘密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中国方面唆使苏班德里欧及其团伙揭露印度尼西亚军队中一些将军的密谋活动。1956年4月25日，印度尼西亚报纸《武装力量报》开始刊登系列文章，论证中国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政变的尝试，似乎去年毛泽东在同艾地会谈时建议用其他人来取代苏加诺，对反动派军队进行毁灭性打击。

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都避免触及上述涉及中国参与“九三〇事件”的问题。

军事集团掌握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后，乘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国内的进步力量进行镇压，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势力。蓄意挑起居民心中存在的强烈的反中情绪和印度尼西亚人对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势力的华侨怀有反感的传统，随后，反动力量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地开展反中运动。右翼政党在煽动反中游行示威过程中，当局直接纵容攻击中国大使馆、贸易代办处和领事馆，开始屠杀和追捕华侨，号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华侨的财产和把他们驱逐出印度尼西亚。1956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报了关于“临时关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消息，全面关闭华人学校，开除各机关中的亲中分子。

政变失败后，中国持观望态度。只是到了1965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标题为《印度尼西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消息，明确指出支持“九三〇运动”追求的目标。在报道中援引了《人民日报》(Харианракъят) [62] 对运动的评价：“是一次爱国的和革命的运动，毫无疑问，人民将会继续支持这一运动。”

在催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在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发生政变后，中国领导人处于观望态度，当时在镇压政变后开始在国内追捕进步力量，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了一系列沉重打击。正如稍后西方媒体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请求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进行干涉，以便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媒体直至今年3月才对迫害华侨提出抗议，而没有关注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牺牲和损失。

中国递交了20多份抗议印度尼西亚当局行动的照会。在中国外交部1966年4月12日的照会中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应义不容辞地维护中国侨民的权利和利益”，“有义务允许那些受到迫害，同时表达了返回祖国愿望的侨民回中国”。照会中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提供船只运送那些希望回国的中国侨民返回中国”。

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尼方面的行动可能破坏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由印度尼西亚方面负责。在1956年4月15日的照会中，鉴于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受到冲击，中国外交部声明：“印度尼西亚政府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

在对印度尼西亚事件持观望态度半年之久后，中国领导人期待能防止印尼中国关系恶化，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势力和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局势持续恶化和因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行动造成印尼与中国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中国持更为坚定的立场。

中国媒体开展了直接抗议印度尼西亚新政府领导人，抗议迫害和杀害共产党人的运动。

在1956年5月11日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军官的法西斯暴行，他们篡夺了印度尼西亚政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活动家进行血腥镇压，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攻击中国和迫害中国侨民的暴行。”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把印度尼西亚事件评定为“左翼军官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政变的形式夺权行动”，而新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被评价为“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军事集团”，“忠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反动的军事制度”的行动“甚至比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行为更为恶

劣”，等等。在《北京日报》和《工商日报》中把纳苏蒂安评价为“印度尼西亚军事集团的匪首”，而苏加诺被评价为“沾满印度尼西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看来，此时中国领导人尝试采取措施为自己在“印度尼西亚事件”中的投降路线平反。正是这里应该看到中国尝试把印度尼西亚的悲剧归罪于苏共和苏联共产党。在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材料中，中国媒体把苏联报刊介绍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消息评价为论证“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行动”的正确性。在中国报刊刊登了新西兰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会议材料，摘自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报纸谈到“关于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支持和声援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官集团”的文章。今年5月14日，《工商日报》刊登了标题为《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全力扶植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事集团》的文章，强调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指出：“苏修不仅不反对印度尼西亚右翼军事集团的血腥罪行，同时还把杀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纳苏蒂安称之为‘革命领导人’。”

事实表明，印度尼西亚事件是对中国最为沉重的打击，是中国去年外交战线的巨大失败，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期望的破灭。鉴于目前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反中运动，极有可能采取改变同中国关系性质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开始制定新的对印度尼西亚策略。

至于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如事件所显示的，他们不想公开从事进一步恶化中国、印尼关系的活动，不想承担中国、印尼外交关系破裂的责任，他们担心中国会走上直接支持国内反对派运动的道路，动员转入地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今年4月18日，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表示：“和以前一样，印度尼西亚希望保持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此时印度尼西亚人明白，北京—雅加达轴心不复存在了，印度尼西亚应该采取独立于中国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已经在修正苏加诺的外交方针——开始同马来西亚就协调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采取措施让印度尼西亚重返联合国，印度尼西亚政府极为重视巩固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便得到新的贷款，等等。

同时不能不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内关于未来印尼、中国关系的观点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如果说苏加诺总统及其拥护者支持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印尼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右翼政党则要求重新审视同中国的关系，以便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同西方的联系。中国、印尼今后关系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中国领导层对这个国家将会采取的政策。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年7月8日

M63750/rc

第843号

ЦГАРК, ф.1955, оп.2, д.295, л.214-217

№11469 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1966年7月9日以后)

7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同苏联驻河内大使谈话时说，根据越方的意见，希望能将下述条文写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声明：

华沙条约成员国声明，自己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如果越南人民表示同意的话。

范文同认为，这一条文可以这样写：

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

范文同在说明这一建议时指出，关于志愿人员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曾发表过声明。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空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同以前一样，他继续说，主要是指政治目的：以最有力的形式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斗团结——声明准备派遣志愿人员。至于这一点的实际实行情况，那么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同其他兄弟国家讨论这一点。

关于可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Л.И.勃列日涅夫1965年3月23日在红场庆贺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最先说过。Л.И.

勃列日涅夫声明：“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感情。”

后来，这一思想在1965年4月17日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得到了反映：

“如果美国强化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斗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1965年4月29日在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向世界各国议会的呼吁时也有类似的话。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苏方的官方声明中，关于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一问题又提了两次：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A.A.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提起过。

比如A.A.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为了回答美国黠武主义的强盗行径，有数千人及一些部队的人员都要求：随时准备作为志愿者去越南，为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中指出，“代表大会以苏联青年的名义声明：如果需要，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国家的千百万志愿者决心挺起胸膛同越南兄弟肩并肩地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政府也发表声明，准备派志愿人员去越南。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公报(1965年9月)指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同越南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侵略。”

无论是越南领导人的讲话，或是越南政府及外交部的声明，一般都未提及外国志愿人员的话题。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无疑经同河内协商后，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1965年3月22日提出有名的5点建议的阵线声明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1965年6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名义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擅自授权，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在南越的军事行动，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就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呼吁北越和各友好国家派志愿军来南方抵抗美国的侵略。”

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曾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志愿人员。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ЦХСД, ф.5, оп.58, д.262, л.82-85

№11468 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1966年7月18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大使从海防发来的第690—691号电报，海运部将报告海上航行的态势和海防港的工作条件。

海军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20—22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作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保障。截至7月18日，向越南运输的形势特点如下：在越南各港口停泊有8艘船只，载货总量约4万吨。正在开往越南各港口的船只有8艘，载运各种货物约有5万吨。在苏联各港口正在装货运往越南的有3艘船只，货运总量有2万—2.5万吨。有4艘船只在从越南返回时，部分运载碎石，另一部分运载

越南的货物开往日本。

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10—15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只越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月7日，“苏维埃茨克”号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350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100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5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比如：7月13日，当“印古尔”号冷藏船开出东京湾的时候，一群飞机在其60—80米高的上空直接进行长达20分钟的观察飞行和俯冲。在中国的海南岛和越南的海岸间，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有2—3艘航空母舰在值勤。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在围绕着这些航空母舰连续不断地航行着。苏联船只实际上是被迫在飞机连续不断地观察和舰艇不断跟踪的情况下，通过被航空母舰、驱逐舰和飞机从空中封锁的海域的。

通过对苏联船只最近在海防地区工作条件的分析，海运部认为必须报告如下情况：

1.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因此，6月25日就已抵达海防的“古利阿”号轮船实际上是7月12—13日才开始卸货；运载1万吨汽油的“共青团”号油轮自6月20日起就停泊在海防海域，至6月28日仍未卸完货，自6月28日至7月5日卸了3500吨货，7月5日起再次未卸货并停在泊地，说是卸完货不会早于7月底。

其他船只的情况也是如此。

2.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防空岸炮连旁，显然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

3.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还有停在旁边的中国船只用自动步枪开火的情况。

4.在一次空袭时，一些不明物从美军飞机上被投到海防水域。可以认为这是深水水雷。我们请求越南朋友进行检查。越南朋友对我们的请

求非常冷淡，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检查。同时7月10日越南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而7月11日却有意让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直通过危险水域，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检查是否真有这种深水水雷。这明显地使苏联的船只置于危险之中。越南引水员并未通知苏联的船长有否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公告自由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

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

海运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通知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不会停止向越南各港口派遣满载货物的船只，同时提请越方注意必须不让海运当局和港口当局延误苏方船只并对他们构成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快苏联船只的卸货和装货。

2.委托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向越方讲明，在当前战争条件下那些不可能使用的货物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运送，以便减少海防港不必要的负担。现在，从苏联运来的大量货物堆放在海防市内的公园里、街道上，并没有被利用。

3.鉴于美国正不断加强通往北越的海上通道的侵略行动，或者通过专门的照会，或通过联合国要求美国停止在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军事挑衅行动，以便把美国这个无端不宣而战，在法律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国家，置于世界舆论面前。

海运部长

B.巴卡耶夫

ЦХСД, ф.5, оп.58, д.262, л.38-41

**№25952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1966年7月20日)**

1966年7月21日

第2162/TC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情况报告)

越南局势的发展向着更危险的方向转变。这涉及不仅是北越的局势，也包括南越。美国加强了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并计划把军事行动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之上。

虽然苏联政府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量军事援助，首先是在组建防空力量方面，这使北约的一些主要地区免受轰炸。但是美国人的空袭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仍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大量的工业企业、桥梁、道路遭到了破坏，交通部门和工业企业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铁路与河内的联系也经常中断。事实上，北越的所有大城市，除了河内和海防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最近美国人扩大了对北越城市的轰炸范围，飞机轰炸已经接近了河内和海防。实际上，从6月底到7月初，大量的空袭都针对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美国飞机对北越的空袭造成了大量物质上和人员上的损失，同时也引起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中某些意志薄弱者的悲观主义情绪。

南越的局势持续恶化，美国人和西贡政权顺利地、有步骤地发动了针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役。爱国者的根据地经常遭到大规模的空袭。为了避免损失过多的有生力量，阵线领导人把一定数量的正规武装撤到与南越交界的老挝人的区域里，以便他们能够得到休整。南越民族

解放阵线的控制区域在逐渐缩小，尽管在官方宣传中越南朋友仍然坚持说，爱国者控制了南方4/5的领土。

目前，美国人显然没有坚决的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南越的爱国者力量。他们尽量增加自己在南方的军事力量，到1966年底将达到28万人，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则要达到35万—40万人。到越南的雨季结束，在越南的美国人，大概就将对南越的爱国者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了。

近几个月，在西贡政权控制的地区政治局势相当紧张，但是不应该对这种政治局势有过高估计。阮文绍、阮高其军事集团在美国人支持和帮助之下仍然控制着南部，越南同志在越南劳动人民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指出，傀儡军队共计有60万人，他们还保有实力来镇压南越居民。

越南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解决越南问题可以走这样的道路，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发展武装力量来反对美国人和西贡政权。

同时越南的同志们提出了别出心裁的对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美国接受它的话，可能会为实现越南人民斗争的基本目标提供保障。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在1965年4月8日著名的范文同的四点纲要中表现出来。

这些要点所表达出的观点反映了对和平的兴趣，这是讨论在越南政治调停的首要基础。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补充其他的一些条件，也没有在政治调停方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除此之外，做出了一系列十分坚决的官方声明。这些声明事实上已经否认了在现阶段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1965年底到1966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政府有过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越南方面仅仅局限于四点纲要的表述，拒绝对对方的提议进行讨论。

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政治调停的态度更加严苛。例如，胡志明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他在今年7月17日河内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越南人民准备战斗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河内和海防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城市都有可能被毁灭，宣布在越南北部进行局部动员，也就是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倾向于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解决问题。

越南同志似乎反对把越南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讨论，他们不接受纳赛尔、吴丹和其他人提出的所有有关调停越南冲突的计划和建议。

越南同志们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同时也是越南方面可以接受的问题(美国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美国和他的盟友们从越南撤军等)，还包括了这样的条件，在南越实现“停火”。

除此之外，越南同志反对亚非国家提出的任何有关解决越南问题的提案。在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言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者。结果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都不再积极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越南的军事政治环境越来越糟糕，亚非国家和国际舆论开始对越南问题失去兴趣，显然，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不能不认真考虑与越南政治调停的可能性有关的这些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为首的(其中包括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阮基石)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权全方位地研究越南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考虑兄弟党的建议，对越南劳动党今后的路线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消息称，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原则，根据他的意见，目前，他们的条件并不好。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对待调停路线的意见并不统一。

对近期事件的分析可以证实，美国政府将重新审视越南问题，并考虑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力量，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将更加严厉。

尽管美国人继续说准备在越南实现“和平调停”，希望“谈判”等。但是美国官方代表一贯认为，他们能够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并用“朝鲜模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越南问题拖延下去，把越南的统一纳入不确定的时间。

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政策。尽管他们不完全赞同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具体的方式。事实上，威尔逊并不同意不久以前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英国官方认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召开一次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议或者签订某项条约。根据英国人的意见，召集一次类似1954年那样的国际会议，英国人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约翰逊也表达了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和越南进行谈判的意思。

法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恢复和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治活动。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回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的情况不一样，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

法国官方承认，在未来的谈判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为一方，没有他们参与不可能解决越南问题，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在未来会谈中的参与不应该作为一项先决条件，阵线代表在会议开始之初可以被邀请来参加会议。

范文同的态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纲要)，如果他们接受这些(指四点纲要)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这将不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越关系的改善十分不满。同时，他们担心战火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仍然反对任何寻求在越南进行政治调停的途径。中国人目前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实际上，中国在越南冲突中采取的路线可以表述如下：中国人在极力展示从越南局势中退出的意图，如果美国人不对中国领土构成现实威胁的话。

越南问题被中国报纸所利用，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诽谤性的指控。

客观地说，中国现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在迎合美国人，会使美国人轻松地实现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1966年7月20日

M63947/rc

第895号

№2594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1966年7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32号

711/ДВ

1966年7月27日

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对苏联驻华大使馆1966年第二季度政治信函的评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力于团结的方针，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统一行动的实施不仅为苏中关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民族主义和其他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障碍的现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由勃列日涅夫署名的、苏共中央委员会1965年11月28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讲道：“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一样，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摆脱殖民压迫中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支持了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的分裂立场，以侮辱性的口吻提出了荒谬的最后通牒，即“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彻底结束你们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期间以及在赫鲁晓夫离任后犯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6年1月以A.H.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经越南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大会前夕进行个人之间的接触提供了另一次机会。然而中国人示威性地不肯利用这次机会，而仅限于对代表团进行礼节性的会见。

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显示诚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携家人来苏联休假。此信并未收到

回复。

3月1日向中国人转交了1966年2月24日由勃列日涅夫同志署名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及毛泽东的信，信中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在3月22日对这封友好来信作了回复，他们不仅拒绝了邀请，还诽谤性地指责我们党及其领导人。中国人在这封信中声称所谓“苏共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当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共中央似乎将自己放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人民阵线的队伍之外”等。这封信中尤其要注意的是，结尾部分提到，当遭到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苏联如果“进行坚决的抵抗”，中国将会和苏联肩并肩共同与敌人作斗争。 [63]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试图着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反对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某种阵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缅甸、马来亚、泰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共产党拒绝向我们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虽然在关于处理与苏共二十三大关系的事情上中国人成功地拉拢了那些抱有指责态度的党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努力并未在这个方向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人不仅未能扩大自己盟友的数量，而且也无法阻挠那些当时拒绝参加1965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党派来参加苏共代表大会。越南劳动党于1966年1月在以A.H.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河内停留期间宣布向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这一决定严重打击了那些分裂分子们。虽然中国人继续向河内和平壤施加压力，然而他们并未能防止除阿尔巴尼亚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党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根据已经掌握的消息，最后就连中国人向越南领导人提出的哪怕降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

苏共代表大会前夕，中国人安排了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宫本显治在这里受到了政府首脑级别的招待。中国对此次日本代表团访问大肆宣传，试图欺骗自己的人民，蒙蔽他们的意识，让他们以为在同苏联共产党的斗争中中国有很多盟友。然而，虽然宣布要进行正式的“谈判”，但宫本显治对北京的访问没有发表任何阐述共同立场的协议。根据报刊消息，宫本显治返回日本后证实，北京并未迫使日本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代表大会。

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缅甸、马来亚和泰国的共产党对于拒绝派代表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并未说明原因，在他们的回复中并未包含任何对苏联的攻击。

中国为反对苏共二十三大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企图向中国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主义领导的正确性，在自己的拥护者面前展现自己反对苏联方针的决心和必要性，给自己的兄弟党派施加压力。中国的宣传开始声称，正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想法都是与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因此应该视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对象。

中国的宣传试图毫无根据地向干部和平民暗示，苏联开始走向了“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90%的苏联人民想要革命”。对此，中国的报纸不停地进行愚蠢的(包括致苏联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的攻击和恐吓。比如《人民日报》1966年2月2日写道：“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苏联人民也不会原谅他们。他们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他们还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和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进行变本加厉的辱骂。

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前夕和召开期间，中国大肆宣传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攻击。苏联政府几乎所有的关于巩固和平和全世界合作的对外政策都遭到了抨击。很明显，通过歪曲这些政策，中国的宣传希望把此作为“中国包围”的一个手段，并且宣称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蒙古“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塔什干的谈判“是美苏合作的成果”，“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帝国主义的削弱”，今年年初，一些苏日协议(关于航线等)的签署是“对日本反动派的妥协”，是“苏美合作在苏日关系中的扩大”等。

中国还试图中伤苏联对越南人民提供的帮助。1965年12月30日，陈毅在日本记者的采访中说，苏联的帮助似乎“存在着特殊的目的”，并非发自内心，而是企图“控制越南，以此将越南问题的解决拉到美苏合作的轨道上”。陈毅说，苏联给予的帮助“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与苏联的实力不符”。带着明显的教唆目的，他说道，苏联的军事装备“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苏联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牵制美国，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未这样做”。

怀着所有类似的想法，中国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目的是“与美国一起占领全世界”建立“包围共产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与美帝国主义组成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等。

中国领导人向党和人民隐藏了苏共二十三大的材料和决议。在官方报纸上甚至没有刊登代表大会开幕和闭幕的消息，没有提到外国代表参加会议的内容。

并且，通过半公开报纸《参考消息》不断发布关于苏联，苏联共产党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虚假报道。

中国领导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且还暗示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社会，声称这并不会把中国和革命力量隔离开，中国拥有全世界广泛的支持，处于“政治进攻”的状态。为了制造这种有利的假象，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手段。二十三大召开前期，他们派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中国举行了很多大会(尤其是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期间)“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他们这一边，不是中国人被孤立了，而是“当代的修正主义者”被孤立了。

中国领导们想出来了一个作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回答的政治举动，那就是邀请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这次访问被称为“对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它导致了中阿的反苏好战主义。1966年中国的五一劳动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打起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苏讲话。他们不断重复中国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虚假宣传，似乎在争相毁谤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重复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可分割性”。邓小平在上海的一次大会的讲话中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建立“唯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阵线”的“革命”口号的反苏内容。邓小平说，这个阵线应该“不是狭隘的，而是最广阔的”(中国人去年还说不会拒绝与“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代表”和西方“部分资产阶级垄断者”隔绝)。他还说，这个阵线应该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集体……当然不能进入这个阵线”。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中国期间，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威胁通过“力量的展示”得到了加强。5月9日胜利日这一天，中国进行了“含有聚变材料的核爆炸”。在官方的“公告”中宣称，这次爆炸是“为了反对美国在与苏联的勾结中实现的核垄断和所有被压迫人民和民族革命斗争受到的核爆炸威胁”。同时还刊登了巴基斯坦报纸《黎明报》采访周恩来的

文章，文章强调，中国不会主动发起对美国的战争挑唆。

在访问中国期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凯莱齐、卡博对自己的主人随声附和，谈到了“对抗意识形态系统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并声称斗争将持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等等。

阿尔巴尼亚人非常愤怒地指责那些持“中立”立场的党派(显然首先指的是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向所有党派证明他们必须确定站在斗争的哪一边的必要性。

5月15日发表的中阿联合声明充斥着反对苏共二十三大和苏联领导的言论，这些言论来自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访问期间的讲话。声明的作者要求“以双倍的努力将”反对苏共的“斗争进行到底”，“毫不放松”，决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停止“辩论”和党派斗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要划清界限”，“无论如何绝不走统一行动”的道路，等等，完全公开地表明了颠覆苏联事业的企图。声明还说道：“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确信，修正主义在苏联的统治是暂时的现象，并相信伟大的苏联人民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两党宣称“对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帮助是崇高的责任”。

大使馆认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特定时期出自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考虑。

在“调整”时期，中国的领导成功地清理了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冒险主义实验的严重后果，使工业状况趋于规范化，恢复了农业生产，保持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

然而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没有弥补“大跃进”时期浪费的时间。根据我们的评估，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1770亿—1800亿人民币，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指标的83%—85%。其中工业产值低于90%，而农业产值大约为75%。1965年在工业上的投资额不到1958年的一半。居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增加25%—30%，实际上在过去的8年中，工人和职员名义上的平均工资仅仅涨了大约3%—5%，而他们的实际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甚至只是持平。粮食问题则尤其严重。人均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282公斤下降到1965年的267公斤，只是1952年的水平。在军队以及军事尤其是原子工业的加速发展上的支

出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很早之前承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至今还未公布，也未确立。没有关于中国1966年的预算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信息。报纸评论道，现在还找不到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的新的解决方案。

想通过“拧紧螺丝”的办法来改善复杂的国家经济状况是中国紧张的内政形势采取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不惜任何代价要证明自己方针的正确性，并且紧握手中的权力，用独裁的手段管理国家内部，越来越趋向于用镇压措施来抑制不满情绪和可能存在的反对力量。故意制造“阶级斗争形势恶化”的局势，搜寻镇压所有的“敌人”、“反党分子”、“内部修正主义者”。同时还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基本要求的忽视。将近10年没有召开中共代表大会，自1962年起不报道关于全会的消息，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例会。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更迭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文化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干部。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中，第一步就提出了发现和清除所有同情苏联和苏共政策的人员的要求，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这条道路被中国的宣传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朱德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会谈中讲到，中共最主要政治任务“是完全清除内部修正主义者，防止中国走苏联道路，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的影响被视为当前制度和政策方针的最大威胁。6月4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反对形成于10年前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和平共处的关系”。还指出，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大公报》7月13日宣布：“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报纸上，广播里，会议上经常揭露“内部修正主义分子与苏联在中国国内进行犯罪活动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后，中国进行清洗目的是为了压制党和国家内部出现的对中共与苏共关系方针正确性的怀疑，并引发对苏联的敌意的增加。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做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派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那么现在我党的

思想和关于苏联的真相将必然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同时，中国领导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显示了我们党对团结的错误估计。尽管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三大有路线上的部分调整，中国人还是不愿停止通过讹诈和威胁、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发动攻击、通过进行政治阴谋使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妄想，哪怕是部分改变对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三大的路线的看法。

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及拒绝的形式，显然都是在试图利用国际主义对苏联人民——他们非常关切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问题，对我党施加压力。他们显然是在打算迫使苏共二十三大在中心工作中提出中国问题，从而将大会的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上转移开，引起分歧和矛盾，得以有机会将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分裂的罪名加到苏共的头上。

在共产党确定其同苏共二十三大的关系时，其对外政策上的目标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向西方国家展示自己反苏政策的不动摇性来换取西方与中国关系的扩大和鼓舞国外的拥护者，从而制止那些在我党推行的团结政策的影响下的“马列主义力量的分化”，拒绝参加二十三大还是对兄弟党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企图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和那些与北京的霸权主义图谋背道而驰的进步力量实现团结。

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开始的一个新的阶段的斗争。这个目标是党和国家最近几个月以来政治方向上的一个质的转变。

在内政方面，这一转变包括拒绝走苏联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走过并正在走的发展道路。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道路和之前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已经互相抵触，而原则上，就像是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经验”，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具有代表性的是，不仅苏联1956年之后的政策遭到批评，被批评的还包括苏联共产党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等）。中国推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其实就是中国的反苏主义加强，就是同打着“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口号根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的加强。

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掩盖，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将只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发展，根据这一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到“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能解决。

在对外政策方面，体现在对“美国是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口号修改以及正式宣布苏联具有和美国一样的敌对性的方针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以苏共为“中心”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被当作“两项不可分割的任务”。邓小平发出了现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口号，也就是既不和美帝国主义联合，也不和苏联联合。然而他接着又说，更不愿意的是与苏共联合，因为“当代修正主义扮演着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反动分子和老牌修正主义叛徒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恰恰就在苏共准备召开二十三大期间，美国开始加强了中美关系的改善，采取了协调相互关系的步骤，提出了向中国出售粮食的建议。

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为了划清界限而走的重要一步。这一路线于1965年11月11日的一份文章中被提出，并在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被证实。

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反应，以及最近一年半以来对苏共在苏中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否定证明，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将自己的命运与深化自己的方针联系在一起，与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领导人虽然通过在国内发起广泛的政治运动，通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通过中国领导人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来加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在内政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而且完全有理由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类似于“大跃进”失败时期全国经历的政治危机，它表现在为了权力而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加强。

中国领导人没能够完全向干部和人民掩盖苏联的政策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的真相。他们不得不加强对那些表现出反对、动摇或者怀疑中共的特殊方针的人的镇压。中国在我们的二十三大之后开展的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旗帜的大清洗说明，中国的领导者无法压制和清除党和国家内部对苏联的同情，对苏联经验以及我党二十三大之后的生活

和活动所怀有的兴趣。

中共领导人拒绝团结苏联、苏共、其他兄弟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破坏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分裂主义路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越来越明显。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在与越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处中经历的困难越来越明显。

所有这些再一次证明了苏共(1964年)10月中央全会和二十三大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尽管现在的中国反苏民族主义分子更加嚣张，但是可以确定地说，在与中共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的平稳和坚定的方针现在已经有了回报，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我们将来团结反帝国主义力量 and 把中国稳固在社会主义阵地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分送：伊利切夫，第二欧洲司；马立克，第四欧洲司；奥尔洛夫，第五欧洲司；谢苗诺夫，..... [64] ；费留宾，..... [65] ；维诺格拉多夫，第一非洲司；格鲁比亚科夫，第二非洲司；茹科夫，第三非洲司；扎米亚京，近东司；科瓦廖夫，中东司；科尔尼延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南亚司；诺维科夫，乌克兰外交部东南亚司；罗曼诺夫斯基，白俄罗斯外交部情报司；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司；档案室

第944ДВ号

1966年7月25日，КЧ/ес

第915号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95，л.1-15

№11783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

绝密

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 [66]

一、战争准备及战争第一阶段

自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进行选举，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来，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即急剧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汉城政权都宣称对整个朝鲜享有主权。苏军和美军于1948年从朝鲜撤出后，三八线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起来。

此时，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已下定决心，以武力方式统一朝鲜，而未对当时存在着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通过南朝鲜广泛发展的民主运动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给予必要的注意和考虑。

当时朝鲜人民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南朝鲜的武装力量。至1950年1月，朝鲜人民军总数已达11万人，一批新的战斗师正在迅速组建。

由于估计美国不会介入在南朝鲜爆发的战争，金日成一再坚持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他用武力统一国家的计划。（第4 51、233号电报，1950年）

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朝鲜政府预计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把部队集结在三八线附近；

（二）向南方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

（三）在南方拒绝和平统一建议之后开始军事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鲜人有关提供武器装备以组建人民军新的战斗部队的一切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给予了满足。中国领导人也向北朝鲜移交了一个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师，这些朝鲜籍士兵曾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中国还许诺提供食品援助，并调一个军驻扎在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以防日本人站在南朝鲜一边介入战争”。（第62号电报，1950年）

至1950年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在三八线的军事集结已经完毕。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

起时间定为1950年6月25日。(第408号电报，1950年)

在进攻即将开始时，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南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1：2；步枪1：2；机关枪1：7；冲锋枪1：13；坦克1：6.5；作战飞机1：6。朝鲜人民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预计，每天向南推进15—20公里，整个军事行动在22—27天内基本完成。(第468号电报，1950年)

〔此处有一段对1950年10月之前战争进程的简短叙述，从朝鲜人民军在6月、7月和8月的最初胜利直到9月美国人在仁川两栖登陆后他们几乎被彻底击败。〕

在朝鲜人民的这个最严峻关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竭尽全力组建新的部队，并利用中国边界地区来完成这一任务。被包围于南部的人民军各部队，则在山区坚持分散作战。

二、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

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北朝鲜。

1950年8月，美军飞机开始对靠近鸭绿江的中国领土进行轰炸。1950年10月，也就是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不久，战线很快移至接近中朝边界的地区，敌方的大炮开始轰击中国一侧。美国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此时，朝鲜人民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逃出包围圈的残余部队正在夺路向中国退却，以便重新整编。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只是在中国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1950年10月的下半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随后不久，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100万人，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员被派往朝鲜做运输工作。至1951年底，朝鲜人民军总数约33.7万人。在敌人一方，约有70万官兵加入地面战斗，其中包括38万南朝鲜军和28万美军，

而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未计算在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苏联军事顾问的积极介入——他们参加了所有重要战役的组织和筹划——在军事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突破。美军和南朝鲜军被迫退回三八线，在有些地段向南后撤更远。在西线作战的中国部队于1951年1月初占领了汉城。

然而，中国军队按照中共领导人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放弃汉城实施北撤。他们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的作战提供支援。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鲜人民军驻中国志愿军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只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他试图诋毁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中国人煽动各种阴谋，利用朴一禹来反对金日成。彭德怀大言不惭地发表对金日成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地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

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在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

尽管如此，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扭转战局和使战线保持在三八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军在参战的第一年伤亡超过30万人。

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在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驻扎了5年多。直到1958年10月底，在朝鲜人的压力之下，志愿军才最终撤回国内。

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

三、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干涉

〔此节为一段简短的概述。〕

四、停战谈判

至1951年中，朝鲜的局势已清楚表明，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朝领导人都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在同中朝方面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苏联政府于1951年7月23日提出解决朝鲜军事冲突的建议。苏联代表指出：“第一步，应进行停火谈判，为此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一建议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1951年6月27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拜访葛罗米柯(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就有关这些建议的大量问题向他提出要求。葛罗米柯向柯克阐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指出停战谈判必须是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为一方代表，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代表的情况下，才可以举行。葛罗米柯同志特别提出，谈判必须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并且首先是停火问题。

6月29日，当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向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呼吁，建议开始停战谈判。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电台发表联合声明，对李奇微的呼吁做出答复。答复表示他们同意与美军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实现和平进行谈判”。

战争各方司令部的代表于1951年7月10日举行谈判，以后时续时断达两年以上，直到1953年7月底。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讨论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详细

制定实行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包括监督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的一个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责。

到1952年5月初，除了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外，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后来，战俘问题也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停战协定的缔结。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同苏联领导人就朝鲜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 [67] 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

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停战协定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并规定双方的军队从这条线后撤两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还规定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之内，双方军队都撤出非军事区。

〔此处列举了协定的条款。〕

五、停战后的朝鲜问题

朝鲜停战为这个国家实现和平的重新统一建立了前提条件。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必须召开停战协定中设想的政治会议。

由于美国的破坏，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直到1954年4月26日才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竭尽全力阻止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朝鲜半岛建立单一的、真正民主的政府为目标的各项建议。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对朝鲜有建设性的决议。

朝鲜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联合国机构中被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每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反对在联合国讨论所谓朝鲜问题，主张撤销“重新统一和恢复朝鲜委员会”，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政府的这一主张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

文件送：勃列日涅夫(2份)、柯西金(2份)、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科瓦廖夫、科尔尼延科、苏达里科、外交部外交历史档案管理局、外交部国际问题司、外交部东南亚司、存档(2份)

ЦХСД, ф.5, оп.58, д.266, л.122-131

№10254 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1966年8月23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

陆军上校Ч.Дж.菲茨杰拉德，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最近在与国防部外交事务局的官员们的讨论中，系统地、坚决地阐述了这一观念，作为谈判的发起人和积极的调解人，苏联在解决越南冲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在这方面他认为，苏联谴责这场战争持续不断这一事实是有意图的：“当两种势力冲突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和越南共产党，就需要第三方力量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只有苏联才是这种第三方力量。”

经过思考，菲茨杰拉德上校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解决越南冲突的方法：

——越南和平能够通过美国、北越、越共成员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组织谈判的主要的障碍是北越的政府，虽然在现在的形势下，北越是谈判的最大受益者。同时，我们认为，越南的战争对苏联有利，因为它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力，否则，苏联与中国在边境问题和其他的问题上有很多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主要目标正像它逐渐显露的那样，维持其威望——“体面地”撤离越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断地寻找谈判机会的原因。这是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苏联的使命，但是不幸，他没能从苏维埃代表那里找到谅解。——不久前总统任命A.哈里曼为他的特别助理，赋予他的任务是找到谈判的道路。他已经被指定利用所有最微小的可能性来实现这一目标。

——总统会见美军司令官威斯特摩兰后在得克萨斯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人民必须知道并不像他的前任断言的那样，胜利将会很快到

来。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

菲茨杰拉德上校在美国进攻越南问题上表达他的个人的态度：“我是军人，因此必须维护我的政府的政策，服从命令，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也许有时对美国被逐渐削弱的威望感到惭愧。”

П.伊瓦舒京(签名)

1966年8月23日

第46722号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经用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工作。

И.波兹尼亚克

ЦХСД, ф.5, оп.58, д.262, л.237-238

№25716 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 [68] (1966年8月26日)

.....

Л.伊利切夫宣读了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周围发生事件的抗议照会。

张德群宣称，他“坚决”反对苏联大使馆的抗议照会，它似乎在“污蔑中国的革命群众”，“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里，他声明，是在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其宗旨是根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流毒等。人民群众的.....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合法的。

.....Л.伊利切夫说，“干涉”中国的内政，“污蔑”中国人民，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臆造出来的。并说，不能回避那些流氓年轻人在我大使馆面前众所周知胡作非为的事实。

张德群开始纠缠不断反复地说，照会是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污蔑，“干涉中国的内政”，等等。

.....

№1040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1966年9月1日)

为了改善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加强各有关部门的中国学干部，为在国内广泛培养具有各种专长的中国学干部，兹实施以下措施：

一、在苏联科学院内，以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问题研究所秘密的中国问题处为基础，组建非公开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公开的报刊和通信中以及进行对外联络时，称该所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后，在2个月期限内，制定和审批当代中国问题内部研究所的章程、机构，确定其科学工作人员为200人。责成苏联财政部，自1966年起，相应地扩大对苏联科学院的工资基金拨款以及与组建研究所有关的其他开支拨款，以上拨款均计入苏联科学院预算的总的拨款中。

二、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以下各种问题：

中共党史及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社会组织中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国家的建设情况；

中苏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特殊方针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的对内和对外宣传活动，其内容、方法和形式。

研究所还应该进行：

翻译、整理和出版有关中国当代历史、中共党史、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材料；

加工整理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材料以及台湾、香港、日本和西方

中国学的书籍；

撰写关于中国国内外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活动的详细报告。

三、责成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定期向苏共中央以及中央的有关各部和各组织提交情报资料，并研究制定关于中苏关系迫切问题的建议。

四、在有苏共中央其他相关部参加的情况下经与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确定研究所的科研题目，审核其工作计划以及挑选科学工作干部。

五、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工资待遇、物资保障以及工作条件方面与一级研究所相同。

六、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新闻社、塔斯社，有责任向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提供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具有机密性质的情报资料。

七、苏联财政部每年应拨给研究所2500外汇卢布和3000元人民币，用于订购和购买外国书籍和期刊。

八、允许研究所的领导人吸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中国及其邻国方面有知识但没有学位的人员来所任高级研究员，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6月5日第660号关于高级研究员——具有10年以上科学工作工龄的科学副博士薪金的规定，确定其3年之内的职务薪金。

九、责成莫斯科委员会(普罗梅斯洛夫同志)，在1966—1967年期间，为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建造一座考虑到其专业特点的大厦。在大厦建成之前，采取临时安置研究所的措施。

十、批准研究所自1966年起，以印刷机关的身份出版内部学术通报，每年为6期，规模为20印张，每一期都将分送给研究所的有关组织和学术机关以及各图书馆专门保管机密文件的部门。在通报上刊登研究所工作人员和相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著作以及对中国的和其他外国的中国学工作的评论文章。责成科学出版社，为在学术通报上刊登的文章以及由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学

术著作支付稿酬，金额为每印张100卢布以内。

十一、根据苏共中央1965年11月18日的决议，必须广泛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工作分配问题，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查明国家、科学和社会各个重要机构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并以中央各级组织和部门的长远利益以及深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和在苏联高等院校扩大中国学专业授课为出发点，采取措施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以满足这些部门的需求。

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应该采取措施，自1966—1967学年开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扩大中国学学科的招生名额。

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以及拥有专业学校的其他部门，应该注意广泛培养相应专业的中国学干部。

在3个月期限内，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苏共中央。

十二、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吸收有关部门、组织和机关参加，研究国内东方学干部培训的现状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建议。

十三、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开设1—2所汉语专业学校。

十四、委托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教育部协同苏联科学院，研究在高级和中级学校相应的年级开展中国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思想课程的问题。

十五、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学校和苏联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机密学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教程里，应该规定专门的章节，用于研究中国的状况以及对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

十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应该系统地组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状况，简要介绍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书籍。委托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出版内部刊物《中国科学技术》通报。

十七、出版委员会：

应该保证系统出版中国学书籍；允许苏联科学院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不经书刊检查而获得关于中国学的外国书籍。

十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利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见习学校以及与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交换，加快培养中国学专业人员，以此满足有关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

十九、提交政治局审批。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库拉科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ЦХСД, ф.4, оп.19, д.439, л.3 6

№25474 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 [69] (1966年9月21日)

.....

在12年内只有苏联方面在使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北京航线的经营权，而当中国方面在自己完全公正合法的权利范围内提出关于使用北京—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整条航线的问题时，苏联方面便开始加以阻挠。这再一次暴露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

АВІРФ, ф.0100, оп.59, п.525, д.2, л.29

№25470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70] (1966年10月17日)

.....

直至今年9月之前，越南官方宣传机构都以缄默回避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与苏联驻河内大使馆以及其他欧洲兄弟国家代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越南负责人都回避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时在秘密会谈中有些越南同志表示困惑不解，甚至不赞成在中国开展的这场运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北越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特别的不安，担心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开始这样的“革命”.....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和干部们对中国“红卫兵”的行为表示愤慨，把他们形容为“真正的土匪、横行不法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注意到越南劳动党宣传机构类似这样的情绪，今年夏天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的解释工作，着重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内政，不适用于越南，也不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任何影响。9月中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干部们传达的文件中指出，“不应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但也不需要大声疾呼，来表示我们不同意这些思潮。出发点必须是：这首先是中国的内政”。

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讯社和越南劳动党的克制，很可能引起了北京的不满。根据某些资料，早在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就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议，希望像中国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势力那样支持“文化大革命”。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从今年9月份最初的几天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就组建了一些体验战时生活模式的青年队。正如报纸中所指出的，这些青年队的任务是，在青年中开展教育工作，在公共场合监督人们对战时生活方式原则的遵守，并向相关的单位提供帮助，维持城市的安定和秩序。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指出越南的青年队与中国的“红卫兵”之间的相同之处。但是要警惕这些青年队行为方式的一些类似之处，还要警惕的是，越南青年队成员自己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革命。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9, п.529, д.37, л.72-75

№25951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6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20份

1966年10月24日

第2975/Т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情况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威望得到提高。到194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主革命，坚定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如果说1948年以前只有苏联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到了1950年下半年，已经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战后初期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和制造的紧张国际局势不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更为广泛的国际联系。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和影响的增强，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急剧改变了世界形势。这一状况，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坚定地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同亚非国家的联系。一些新独立国家在寻找摆脱长期落后的道路过程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从1950年代下半期起开始了亚非国家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

第一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是印度(1955年12月建交)。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蒙古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蒙古印度关系最具生机和活力。这首先得益于蒙印关系建立后，在德里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代办处。1956年12月蒙古驻印度大使馆的建立(在蒙古历史中，这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建立的大使馆)，毫无疑问，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活跃起来。

蒙古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在蒙印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7年9月，应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Ж.桑布的邀请，印度副总统С.拉达克里希南(现任总统)访问蒙古。会晤结果签署了会谈公报，在公报中可以找到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有共同利益的表述。

1959年9月，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由Ю.泽登巴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是蒙印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代表团组成有：部长会议

副主席C.鲁布桑和外交部长П.沙格达尔苏伦。代表团在印度各地访问，先后去了加尔各答、阿格拉、班加罗尔和孟买。在访问期间同印度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会谈，讨论了扩大两国往来，其中包括贸易往来的问题。

此行对于巩固蒙印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处受到欢迎，被看作是古代亚洲的代表，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今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会谈公报中强调了蒙印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往来传统。在会谈公报中指出：“两国总理在会谈中都提及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并愉快地指出，今后这种联系将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巩固。”

同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国务及社会活动家的会谈，泽登巴尔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度和国际社会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了解蒙古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泽登巴尔的印度之行表明蒙古领导人访问发展中国家来宣传蒙古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总体来看是有益的和有效果的。

1965年夏天，先是印度通信与无线电广播部长英迪拉·甘地，随后是外交部长拉克什米·梅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两国议会往来得到发展。1962年9月，由人民会议主席辛格率领的议会访问蒙古。同时，蒙古议会代表团于1962年11月访问了印度，代表团团长B.什兰德布院士此行受到印度领导人热情的招待和关注。代表团受到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接见。

作为亚洲重要国家之一的印度和蒙古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互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信的提高。

印度是第一个同蒙古签订为期5年的文化协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蒙和蒙印文化协会在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前者是1957年12月建立的，后者是1958年下半年建立的。在庆祝民族节日时，协会倡导组织电影播放、照片展览等活动。两国之间经常组织文艺团体、学者，以及宗教界活动家访问活动，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保持着某些联系。如不久前印度工联大会就邀请了蒙古工联代表参加。

蒙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在双边联系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

合作的形式。印度政府对扩大合作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情况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在乌兰巴托没有建立印度常设办事处。印度驻莫斯科大使每年都前往乌兰巴托一两次。自然，这种情形不允许他定期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确，应该说问题并不多，通过蒙古驻德里大使馆完全可以解决。因此，印度大使把自己在乌兰巴托的驻地只用于纯粹象征性的目的。

蒙古政府多次向印度人表示，希望印度从相互对等的原则出发，在蒙古建立自己的大使馆，包括去年英迪拉·甘地访问蒙古期间，也向她表达了这个愿望。今年3月，在德里召开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会议的蒙古代表团在同印度活动家会谈期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印度议会开会期间讨论过在乌兰巴托建立公使馆的问题，但直至现在也没有做出积极的决定。印度官方解释说是外汇不够。显然，这种解释说明，由于蒙古已在德里设立代表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看到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大使馆的必要性，他们的考虑是，两国总的联系不多，并且也没有扩大的趋势。

印度方面放弃了关于扩大经济，首先是贸易联系问题的讨论，现在这种联系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蒙古人表达了自己购买印度黄麻的意愿。按照蒙古人的话说，印度也表达了对购买蒙古出口的矿石的兴趣。但是，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格姆博扎夫在同苏联驻蒙古商务代表会谈中在谈到向印度出售矿石问题时承认此举没有可行性，他指出：“过境中国运输很困难，而经敖德萨转运在经济上又不合适，况且印度方面还要求商品包装，而包装的价钱比矿石本身还要贵。”这样，蒙古和印度之间扩大贸易往来的现实可能性暂时还不具备。

第二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是缅甸。起初关系(1956年9月)确定在公使层面，而后，在1962年9月，蒙古和缅甸政府都做出了关于本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决定。两国委派的大使均系兼职——蒙古大使由蒙古驻德里大使兼任，缅甸大使由缅甸驻北京大使兼任。

蒙缅关系的建立总体上是有利的，具有友好性质。目前，缅甸领导层对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兴趣。但是，蒙缅关系暂时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

1957年12月，由副总理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在发表

的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公报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扩大双边友好关系，建立和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是合适的，双方商定进行贸易谈判，互派文化代表团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该声明到目前没有实现。

1956年9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蒙古。在会晤期间就蒙古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一致。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大使的常设驻在地都在北京。

蒙古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暂时不会有什么进展，哪怕是互派代表团方面。甚至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40周年的活动，也只是委派印度尼西亚驻蒙古大使率领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

去年8月，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20周年时，蒙古驻北京大使馆参赞萨姆丹作为代办前往雅加达。需要指出，有意思的是，在机场未受到任何人迎接，甚至没派汽车，尽管事先就接待蒙古代表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尼西亚人的这种行为，看来可以被看作那一时期蒙古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表现。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访问期间萨姆丹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表达了在雅加达建立本国常设代办处的愿望。

1961年6月，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邀请，由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代表团访问蒙古。谈判结束后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公报，号召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近来蒙古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蒙古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具有友好性质。

第一个同蒙古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几内亚(1960年4月)。当年在科纳克里建立了蒙古大使馆。(从1965年起，委派蒙古驻阿尔及尔大使兼任驻几内亚大使。)自然，蒙古驻几内亚代办处在发展同该国联系方面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确实，几内亚暂时没有，也没打算近期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代办处，委派驻莫斯科大使兼任驻蒙古大使。

1960年9月，由总统和政府首脑塞古·杜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第一位来到蒙古的非洲国家首脑。在联合公报中强调了蒙古和几内亚开展经济和文化往来的必要性。作为对这项内容的实施，蒙古和几内亚外交部长签订了文化合作的协定。从此时起，在这

项协定的基础上每年在科纳克里签订关于文件合作的备忘录，据此交换文学作品、电影、图片资料等。

在塞古·杜尔访问蒙古期间，蒙古政府决定向几内亚提供无偿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蒙古政府的这一举措展现了早先处于落后状态和被压迫地位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允许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也吸引非洲国家对蒙古给予更多的注意，提高了蒙古在非洲国家的威信。

但是，这种援助的方式——在科纳克里建设一家医院却遭到了失败。在实施蒙古义务时遇到了一系列客观困难，被迫拖延了几年，最终是以其他形式履行的义务。决定向几内亚赠送苏联生产的汽车来代替建设医院：25辆“莫斯科人”牌汽车，5辆“伏尔加”牌汽车和2辆“嘎斯”牌汽车，总共价值80万图格里克。几内亚政府决定变卖这批汽车，利用获得的资金来建设医院，认为这是蒙古人民的礼物。

1960年11月30日，柬埔寨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几天以后，西哈努克访问了蒙古。在乌兰巴托访问期间，西哈努克对蒙古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把蒙古所取得的成就评价为“亚洲人民巨大生命力的例证”，亚洲国家取得快速的社会进步的例证。

在谈到柬埔寨同蒙古的相互关系时，西哈努克强调说，他们是亚洲团结的组成部分。在离开乌兰巴托时他表示：“高棉、蒙古团结是亚洲人民团结的组成部分。”1964年他在金边再次向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强调了这个思想。

确实，蒙古和柬埔寨之间未能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联络关系。只是在庆祝民族节日和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时进行了电报交换。只是在去年9月在乌兰巴托签订了关于文化与科学合作的协定。据来自金边的消息，柬埔寨人现在按照自己的倡议实施去年签订的协定，制定同蒙古文化往来的计划，采取一些像交换影片、广播稿等形式的实践措施。

在1960年发表的蒙柬联合公报中指出，西哈努克邀请泽登巴尔访问柬埔寨。1964年初，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在柬埔寨短暂逗留期间打探了如果蒙古领导人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造访柬埔寨的可能性。西哈努克多次向泽沃格米德答复说，柬埔寨人非常乐于随时接待泽登巴尔或其他蒙古领导人。

1961年1月蒙古和尼泊尔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协议。是年10月尼泊尔国王访问了蒙古。会谈结果签订了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持有一致观点，以及关于蒙尼文化交流的协定。协定中确定双方互派文化、艺术、科学和体育活动家访问。事实上协定中关于合作的内容没有实施，除了宗教联络渠道外。

在公报中指出，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接受尼泊尔国王关于在其合适的时间访问尼泊尔邀请。访问暂未实现。确实，1964年12月，由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B.什兰德布率领的蒙古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尼泊尔。代表团受到国王接见。

蒙古和尼泊尔之间没有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文化或经济往来。两国委派的大使均为兼任——尼泊尔大使由驻北京大使兼任，蒙古大使由驻德里大使兼任。

1960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关于承认马里共和国的声明，表示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1月，外交关系建立。但是直至1964年以前这种关系仅具形式，只是局限于互派的大使到彼此的首都访问，交换国书。1964年春在巴马科签订了关于蒙古和马里之间文化合作的协定，以及1964—1965年双方文化合作计划，规定交换摄影、文学和其他材料。1956年5月签订了该年文化合作计划。马里外交部文化司司长Д.瓦塔拉在签订这项计划后在谈到蒙马关系时指出，“双方都致力于巩固和扩大两国间的团结和友谊”。

蒙马关系和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1964年10月马里总统和政府主席莫迪博·凯塔访问蒙古。在访问期间就蒙马友好关系发展情况和其他一些相互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交流经验。莫迪博·凯塔邀请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他们合适的时候访问马里。

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奉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始终不渝地持赞同立场。1958年9月，亚非团结委员会蒙古委员会支持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秘书处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号召，几天后蒙古政府正式发表了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声明。随后，蒙古方面多次采取同阿尔及利亚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系的尝试。只是在经过3年后，1961年1月蒙古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才建立了外交关系。起初双边关系仅限于任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

兼任。蒙古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是1964年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10周年之际。

根据蒙古积极开展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活动的意愿，以及准备参加第二届亚非会议的意愿，1965年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大使馆。毫无疑问，这一步骤将促进蒙古发展同马格里布 [71] 关系的发展。

1962年2月1日，在同一天蒙古同阿富汗和锡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蒙古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停留在友好层面，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实际关系仅局限于大使在相互国家递交国书进行的简短会晤。

1962年蒙古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第一步措施，1962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发表了关于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声明。这份声明在蒙古得到积极反响，紧接着巴基斯坦提出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建议，1962年7月实现。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加入了侵略集团的国家。但是，暂时巴基斯坦和蒙古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联系。

蒙古密切关注老挝事件的发展和老挝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1960年11月，蒙古发表了关于承认梭发那·富马政府为老挝第一届合法政府的声明。努力向从事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老挝进步力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1年4月蒙古政府向老挝人民援助了1万米布和30万吨大米。

1962年6月，应蒙古人民军事事务部的邀请，老挝前军事委员会主席贡勒将军访问蒙古。这次会晤为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1962年9月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蒙古和老挝互派大使，均为兼任。美国恢复干涉后，美国反对老挝侵略行动引起老挝内部形势复杂化，影响到了蒙老关系的发展。

1966年3月，由冯维希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HeoJiaoXakCat)代表团访问蒙古。蒙古方面满足了代表团关于以毛毯和肉罐头的方式提供援助的请求。在会晤期间还就苏发努冯访问蒙古一事达成协议。

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1963年4月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事件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望的提高。经济联系为这一行动奠定了基础，双方经济往来的基础是1957年签订的蒙古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贸易和支付协定，安排各种性质的代表团互访。

1965年12月，蒙古和加纳建立了大使级别关系。蒙加关系有不错的发展前景。早在正式建交之前，在第四届亚非团结大会(安卡拉)期间，蒙古代表团就同恩克鲁玛举行了会晤，并转交了邀请加纳议会人民党代表团访问蒙古的邀请信。恩克鲁玛接受了这次邀请。稍后双方重申了这个问题，恩克鲁玛预定前往乌兰巴托访问。但是，加纳政变中断了两国关系。

蒙古是第一个承认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国家。1964年夏天，向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递交了访问蒙古的邀请信。阿卜杜拉·萨拉勒在复信中表示，他愉快地接受这次邀请，同时表示准备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在同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中非共和国、乍得、上沃尔特、加蓬、喀麦隆、尼日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已迈出步伐。

1962年2月，蒙古和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掌权后蒙伊关系急速恶化。1963年7月，由于蒙古向联合国提出关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府对库尔德人执行种族灭绝政策问题，伊拉克中断了同蒙古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进步力量支持尽快复交。1965年夏天，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蒙古，对蒙古支持国内民主力量的斗争表示感谢。考虑到伊拉克近来发生的事件，蒙伊关系正常化值得期待。蒙古朋友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这样，蒙古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极个别的除外，总体上处于正常状态，甚至具有友好性质。如果考虑到10年前蒙古还没有同这些大陆上的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有官方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同14个亚非国家保持着联系，毫无疑问，这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重大成绩，是它在发展中国家威信提高的证明。

蒙古是亚洲前殖民地国家中最为落后的一个，它通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蒙古的榜样对亚非国家起到了促动作用。在这些国家眼中，蒙古的经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定向标。在不久前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在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时，塞浦路斯劳动进步党主席表示：“我们认为，你们的努力和经验对摆

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和正在寻找告别殖民主义遗留的赤贫和落后状况的人民来说特别重要。”南非共产党代表强调说：“在所有方面，蒙古的先进经验对我们的人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蒙古参加亚非团结组织对蒙古在亚非国家威信的提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蒙古被接纳参加亚非国家各种会议工作，参加联合国亚非组织等。蒙古在这里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反对非洲一些国家少数白人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在这方面，蒙古总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出发，同苏联密切协调自己的活动。如果考虑到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或其他原因，苏联不可能总是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会议，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不久前蒙古代表团参加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时，努力开展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发展经验，消除中国代表团敌对活动的影响，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这一组织的要求。

与此同时还需要指出，最近一些年来，蒙古同一系列亚非国家的关系不仅没有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而且积极性也降低了。如果说最初几年只是举行一些国家和政府首脑会晤，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接触主要是在庆祝民族节日或其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时互致贺电。大使很少前往相互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是兼任的，通常具有礼节性质，在发展蒙古和亚非国家政治关系方面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

蒙古同大部分亚非国家的经济联系没有取得进展。在很多时候维持的这种联系实质上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的资源出口极为有限，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实质性进步。同时，蒙古的大众消费品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进口。一些亚非国家对于扩大同蒙古的贸易往来缺乏兴趣：第一，是由于交通运输不便；第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主要是进口工业设备，而不是成为蒙古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原料。

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制约着蒙古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

现在蒙古同这两个大陆的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只在3个国家的首都(德里、阿尔及尔、科纳克里)建立了外交代办处。没有任何一个亚非国家在乌兰巴托建立常驻外交代办处。

在很多时候蒙古拒绝参加沿着亚非团结路线举行的各种会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专业技术干部不足和外汇不够。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家，蒙古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1957年和195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纲领文件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从社会主义国家对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的利益出发安排自己在国际舞台的活动。

在亚非国家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条件下，那里不仅憎恨殖民主义国家，同时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信任，把他们归为“白人”一类。因此，一些亚非国家高度关注蒙古，在他们眼中蒙古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亚洲“有色”国家。

这不足为怪，因为发展中国家同蒙古发展关系时看中的是“亚洲”国家，有时是同自己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上面谈到的新加坡。

蒙古朋友明白亚非国家对自己持这种态度的优势。例如，今年2月，蒙古外交部长杜格尔苏伦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谈到，显然，在联合国各机构中经常把蒙古列为亚洲国家的候选人是合适的。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领导层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政策是直接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相对抗的，在对待亚非国家的政策上，中国拒绝推行统一路线，总是竭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的阵地。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无可争议的亚洲国家的蒙古对亚非国家积极开展为我所需的活动，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扩大蒙古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将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中国关于“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唯一可接受的道路的宣传。

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请求蒙古向科伦坡指派常驻外交代表的请求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中国人加强对锡兰不友好的宣言为自己要求的依据。作为亚洲国家的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有利于揭露中国方面的宣传，因为众所周知，在北京的宣言中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属于亚洲国家这个因素。此外，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克尼曼和魏克玛沁格表示，还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锡兰和蒙古同属佛教国家，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对锡兰政府和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提

供了可能。

这样，蒙古同亚非国家发展积极关系存在非常好的前景和可能性。必须扩大蒙古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实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活动需要苏联在这方面提供实际援助予以巩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年10月21日

M65397/гс

第1250号

ЦГАРК, ф.1955, оп.2, д.295, л.56-64

№25717 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 [72] (1966年10月27日)

.....苏达利科夫宣读了照会：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近日来又不断受到中国公民有组织的无端挑衅和侮辱。

.....10月23日起苏联大使馆的入口被堵。在大使馆附近结集的人群威胁、侮辱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到我使馆来访的外国客人。捣乱者大耍流氓腔、骂出一些脏话、做出一些低级下流的手势和姿势、吐痰等。

.....使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印象，国与国之间相互公认的原则、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和外交代表机构的豁免权在中国竟遭到粗暴的破坏已经变成一种惯例。

张德群说，他“反对照会中”对中国革命群众的攻击。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的事件是.....由苏方的行为引起的，.....苏方毫无理由地决定将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

张德群继续发挥说，好像苏联报刊天天刊登一些污蔑和攻击“伟大的

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和甚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临时代办认为，“革命群众”的举动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п.223, д.5, л.110-112

№25475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 的反苏骚乱 [73] (1966年11月1日)

(对苏联外交部1966年10月27日照会的答复)

.....最近苏联领导集团一方面与美帝国主义大肆勾结，竞相出卖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掀起新的反华浪潮，他们正走向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毫无理由地驱逐正在苏联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这必然引起广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慨。革命青年自发地聚集在通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反修路”上，张贴大字报，对你们毫无根据的驱逐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表示抗议，并谴责你们的行径.....这些完全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就将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写的所有大字报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让苏联人民评价一下这些大字报中有什么内容是针对苏联人民的。

最近这几天我们国家的广大革命群众表现得非常克制，并保持秩序井然.....你们的临时代办及其夫人，以及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去“反修路”看大字报，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你们还有什么权利就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夸夸其谈？我们倒想建议你们最好表现得更为诚实一些，否则，你们越是拼命伪装，就越充分地暴露你们自己反华的嘴脸。

АВПРФ, ф.0100, оп.59, п.525, д.2, л.38-39

№25482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 协代表团的访问 [74] (1966年11月26日)

致H.Г.苏达利科夫：

.....总体来说，中国认为我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审慎态度，好像证明了“领袖”的力量和绝对正确，使得“修正主义分子”都非常怕他。

.....我们一直以拒绝与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论战为出发点。可问题在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的论战。中国人致力于大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宗教式的狂热，教育青年参与任何的冒险行为，他们进行的不是论战，而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反击这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时所碰到的困难表明，我们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唯一的立场，就是进攻式的强硬立场。

.....

《真理报》政治评论员

马耶夫斯基

1966年11月26日

АВРРФ, ф.100, оп.53, п.224, д.33, л.26-27

№25546 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 [75] (1966年11月底)

致П.Н.杰米切夫：

.....

无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观点和反党的中国“红卫兵”流氓行为有什么样的不一致，从现代性的进程来看，这些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是毫无根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错误认识和“红卫兵”的行为按其起源、思想和目的来看，他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错误的左倾看法在很多方面是对新的，尚不为人知的革命艺术的某些方面歪曲的反映，这经常会导致片面的歪曲和判断。

“红卫兵”的破坏行动已经不是什么错误认识，而是一种对社会主义

的原则和精神财富的“否定和侵蚀”。

这里指的是C.科瓦廖夫的文章《社会主义和文化遗产》(《真理报》1966年9月16日);Э.巴勒的文章《关于列宁主义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苏联文化》1966年9月29日);Л.阿拉尤的文章《旁注》(《法国来信》1966年8月8日)。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代所长

B.谢尔比纳

РГАНИ, ф.5, оп.58, д.24, л.217-218

№25705 1966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 **[76] (1966年12月 [77])**

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给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与你们相比，充其量是一堆烂泥，而你们是直上云霄的山峰。他们是一群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走狗；而你们是敢于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者。……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颜色，实现了或正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1965年12月

摘自陈毅答日本报纸《赤旗报》问：

“……如果他(苏联)真正想援助越南人民，全面、有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那他可以在各方面采取各种方法，牵制美国力量，为了不断地揭露美国在谈判问题上的阴谋。”

1966年4月

摘自刘宁一1966年4月9日在新西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领导人‘扮演‘救火队’的角色，试图扑灭越南人民反对美帝的斗争”。

1966年5月

摘自周恩来1966年4月30日在北京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严重损害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同时也给所有国家的千百万群众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反面经验，人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蜕化变质。

.....为了蒙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苏共领导集团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叛变；假团结，真分裂。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修领导集团无论怎样设法支撑快要倒塌的门面，也无法掩饰自己各种尖锐矛盾和严重的困难。苏共领导集团正坐在火山上。”

摘自邓小平于1966年5月6日在上海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共领导集团堕落了，蜕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救药的叛徒，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谋破坏者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我们决不能和现代修正主义团结在一起，应该彻底干净地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决不能对他们手软，而应该与他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我们决不能对他们妥协，而应该将与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决不能与它‘统一行动’；决不能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决不能美化他们，不应该给他们投下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1966年6月

摘自陈毅1966年6月27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上开幕式的讲话：

“我国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他们除了失望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可以问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你们敢不敢在你们的国家发动像中国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我肯定地说，不敢。”

1966年7月

摘自周恩来1966年6月27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阵营中霸权主义的地位越来越削弱了，他们的指挥棒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威力。”

“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在原则问题上不可以立场不鲜明。”

摘自周恩来1966年7月9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后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决不能让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印度反动派加入统一战线，相反，他们只能作为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的对象。”

摘自刘宁一1966年7月22日在支援越南人民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来不忘美苏合作的轨道上的越南问题，串联地为美国帝国主义提供帮助，因此他必定成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斗争目标！”

1966年11月

摘自康生1966年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他们妄想阻止中国的革命潮流，共同玩起了新的反共、反华的把戏。……他们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帮帮腔的人，他们通过歪曲事实，制造各种谎言，将攻击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跑到其他国家去，到处造谣，制造阴谋，妄图拼凑叛徒、工贼集团，达到赫鲁晓夫没有达到的孤立中国和反对中国的目的。……在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中间路线。必须与以苏共领导集团为核心的苏联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无情地揭露其叛

徒的真面目，决不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п.228, д.11, л.8-87

№25471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 **[78] (1966年12月1日)**

.....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驱逐了匈牙利学生。匈牙利决定让中国学生回国。

今年11月17日在得到又一次的提醒之后，中国学生离开了在匈牙利的宿舍。正是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召见了匈牙利大使，并向他提交了如下抗议：“驱逐中国学生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与此有关的是，你们固执地跟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后面，与中国对立。执政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驱逐了我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在仿效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内容都是猛烈攻击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内外政策。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将不会有好的结果。”

.....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

Ю.波诺马廖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59, п.529, д.37, л.79-80

№25547 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 **发表的反苏文章 [79] (1966年12月2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安致远的会谈记录

1966年12月2日

.....苏达利科夫说，《中国画报》在苏联发行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可是最近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中方将这份出版物变为一种对苏联进行恶意诽谤活动的工具。.....如果继续发表文章，苏方将被迫停止

在本国发行这本画报。

参赞试图证明《中国画报》上没有刊登过反苏的文章。他说，办这本画报的目的是想向苏联读者介绍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当前中国发生的事情。现今的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自然，要在《中国画报》上谈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安说，驻外大使馆在所驻国家推广正式的出版物是合法的、正常的。大使馆这样的活动是履行职能的一种形式……参赞大声地说，“如果不这样做，大使馆还能做些什么？”

……强烈地反驳了安的说法，说，如果他无论在工厂或集体农庄，发表自己荒谬的言论，就会被按俄罗斯的旧俗坐上小车被撵出去，像以前对待工贼一样。

……

РГАНИ, ф.5, оп.58, д.30, л.238-240

№25668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80] (1966年12月2日)

最近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朝鲜在与中国紧密亲近的时期没能巩固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中国领导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向朝鲜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1964年)向朝鲜领导打开了与苏联重建友好关系的远景……

朝鲜与苏联恢复联系……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领导人开始企图对朝鲜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不得不使朝鲜领导人修正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最近的一年半里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淡。

……

从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来看，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所作的报告，其特点是表明了朝鲜领导人摆脱了一些错误的亲中国的观

点.....和对一些诸如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作用、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方式问题回归到更为正确立场的过程。

比较一下两个报告很有意思：“捍卫社会主义阵营”(1963年11月)这篇文章和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的报告。同时特别明显地看出与三年以前朝鲜领导人立场的区别。

朝鲜领导人1963年11月在题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该文好像是金日成亲自修改的)的文章中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文章从头至尾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内容包含了粗鲁的诽谤和对苏联的诬蔑。

其中，文章还说道：“有些人冒充自己是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进行谴责和诬蔑，对它们进行猛烈地攻击。这是一件可耻而又十分危险的事情。”

金日成在1966年10月的劳动党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批评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第一次刊登劳动党领导人反对中国执政集团政策的发言。报告中有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批评的暗示，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捍卫和平、裁军、劳动党对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态度)，但总体上报告带有反对中国的倾向。

有哪些主要原因促使了朝鲜领导人对自己与中国领导集团的关系做出修正？

随着越南事态的发展，劳动党领导人越来越深信，中国领导集团是在关于反帝斗争方面用一些夸夸其谈的辞藻来进行掩饰，但实际上却是在妨碍这场斗争。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的会见和会谈、劳动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81] 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越南人民的各方面援助都具有重大意义。对朝鲜领导人而言，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为了自己的大国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越南局势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

不排除美国和韩国对朝鲜挑衅的可能性，朝鲜领导人现在怀疑中国以前做出的将始终不渝地与朝鲜人民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保证。

朝鲜领导人担心，一旦中国领导人实现了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在与亲中国的分

裂主义者进行的运动中单独面对中国领导人了。这将有可能动摇劳动党的威望，并将加强中国领导人对劳动党领导人的压力。

中国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完全失败使朝鲜领导人完全清醒了。金日成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谈论了中国领导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确信了中国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

.....

就如劳动党大会指出的那样，朝鲜领导在有关建立亚洲反美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达了与中国领导相反的看法。随着越南局势的复杂化，劳动党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行为的看法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1966年年初朝鲜领导人只是在秘密会谈时说，他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金日成在1966年10月劳动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明显针对的是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地说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事实上却不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以制止侵略”。

据金日成说，劳动党领导人试图利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和朝鲜，使中国领导相信建立统一的反美阵线的必要性，但他们没有成功。

.....

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根据朝鲜同志的声明，中国人不考虑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教条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并打着最革命的口号怂恿人们做出极端的行动。

朝鲜领导人认真地关注着与中国进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件。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金日成说：“中国人想一下子实现‘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左倾’机会主义的例子吗？”

朝鲜报刊上的文章、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的发言、金一在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对此做出的阐述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过程，需要整体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普通教育水准。金一在今年11月的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其中在谈到朝鲜进行文

化革命的方式与形式时着重指出，劳动党“反对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主观急躁冒进、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根据朝鲜同志主动要求，更改了转播中国朝鲜语广播的波段。转播的时间也改了，对听众不是很方便。

.....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说劳动党好像在“脚踩两条船”，朝鲜领导予以激烈的反驳，金日成在劳动党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那些对我们造谣中伤的人，自己的脚踩在其中的一条破船上。”

……朝鲜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朝鲜领导人的立场及其实行的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

朝鲜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对他们采取的经济制裁以及由此给朝鲜带来的沉重经济后果。

……在此以前，朝鲜领导人的军事理论是以中国的所谓“人民战争”为基础的。轻视各种现代武器的意义，其中包括核武器和火箭武器，不考虑主要对手美国及其同盟者军事和经济的潜在能力。

如今在战争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方面和在军队教学中朝鲜同志对自己的宗旨作了一定的修正。

在这方面苏联军事设备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苏联军事专家的观察，在掌握新技术的教学过程中，朝鲜军人开始理解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

这是派遣朝鲜军人去苏联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撤回所有在中国军事院校学习的朝鲜人员。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好像不止一次地建议朝鲜人重新派遣自己的军事专家来学习，但朝鲜领导暂时没有答应。

由于派遣朝鲜志愿军去越南(现在这支部队人数达100多人)，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据非官方的消息，中国领导人劝说朝鲜领导人相信，朝鲜方面对越南最好的帮助就是在朝鲜半岛对美国人开展军事行动。为此中国领导人答应在各个方面向朝鲜提供援助。尽管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可朝鲜同志在拒绝这一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相反计划——派遣志愿军去越南。

.....看来，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朝鲜领导人将竭尽全力继续展示自己的独立性。

看来朝鲜在与南斯拉夫、印度关系上的立场，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的让步。尽管朝鲜人现在也没有因为苏联与印度的合作发展而批评苏联政府，可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归罪于“印度的反动势力”。

同时，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中国人不去寻找如何正确解决这个冲突，而是相反使它复杂化了，并因此不仅阻碍了在印度，而且是整个亚洲的革命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获得统一的前景，朝鲜领导人的看法是怀疑的。看来，对中国领导人很了解的朝鲜领导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批评，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就如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的那样：“别去管中国人”，到那时“他们自己相互打起来了，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式”。朝鲜领导由此看到了如何从已形成的复杂局面中摆脱出来的办法。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

A.博鲁诺夫

АВПРФ, ф.0102, оп.22, п.109, д.22, л.38-49

№25548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1966年12月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领导下的电影事业委员会搞到了一部关于所谓在中国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波兰纪录短片。广播电视委员会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是适当的……

放映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苏联的社会舆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和直观的了解。

已与A.B.罗曼诺夫同志协商过。

恳请得到苏共中央的同意。

委员会主席

H.梅夏采夫

1966年12月6日

РГАНИ, ф.5, оп.58, д.25, л.123

№25472 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 [82] (1966年12月12日)

……

对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以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等问题，罗马尼亚同志的看法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好像这些分歧主要是在苏共和中共之间产生的，并且现在主要存在于他们之间，首先涉及的是这两个政党。对于这些分歧，苏共和中共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们的这种中立的、有时候倾向于中国的立场并不是以有原则的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为基础，而是在竭力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形成的分歧局面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便更加容易地推行自己的更加注重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罗马尼亚同志试图直接调解分歧，为此，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И.Г.毛雷尔在1964年对北京进行了两次访问，并在后来采取了一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宣传性质的措施，因为很难设想，罗马尼亚同志指望获得成功。

由于中国领导人日益激烈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言论，他们面临的孤立日益加剧，近来，罗马尼亚同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领导人的活动重新进行评价。

.....在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会见和会谈时，其中包括，И.Г.毛雷尔在今年年初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访问、И.Б.铁托在今年5月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以及其他各种场合进行的会谈，罗马尼亚同志都说，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时表达了如下看法：分歧是有可能克服的，可以取得相互谅解，为此必须忍耐，要有耐心，其他兄弟党完全不应发表任何会促使情况更为复杂的言论。

最近罗马尼亚同志开始承认，仅仅有耐心和忍耐还是不够的，并谈到了在实践中采取行动，首先就是在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斗争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表示.....对中国消极立场的担忧，今年5月，以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访问越南后的回国途中在北京做了两天的停留，罗马尼亚同志主动提出，试图与越南和中国领导人就关于共同采取行动的问题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事进行协商，同时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试探。他们对中国采取的消极立场感到担忧。罗马尼亚领导人真正地指望中国的立场能够缓和，但是他们的尝试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今年10月И.Г.毛雷尔对河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北京，以便尝试着再次说服中国人，但这次访问也没有成功。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秘密会谈中，罗马尼亚同志声明，罗马尼亚共产党党中央不赞成这场“革命”。.....同时他们强调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的国内问题。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关于中国局势的一次谈话中说，“比如，不能对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进行‘辱骂’，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好同志，不能对他们所有人给予同样的评介。”

关于周恩来的访问(1966年6月16日至24日)：

“最初，周恩来的出访定在1966年3月，据一些资料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坚决坚持的，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做出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进行磋商的一种假象。罗马尼亚方面花费了许多努力才使这次访问延期，这引起了中国人一定的不满。”

.....在对当今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看法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得这次谈判十分艰难.....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行动、对越南人民进行支持的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十分坚决地对中国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苏活动。在关于在越南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上，进行的讨论异常紧张。罗马尼亚方面建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会议来就这一问题制定共同的路线。中国人不同意这样做，并像平常一样发表了对苏联进行指责的言论，同时夸大了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的作用。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

A.希特罗夫

АВІРФ, ф.0100, оп.59, п.529, д.37, л.90-103

№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速记手稿

会议主持人：Л.И.勃列日涅夫、Н.В.波德戈尔内

报告：“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报告人——Л.И.勃列日涅夫

会议程序：

Л.И.勃列日涅夫——会议主持，致开幕词

М.А.苏斯洛夫——宣布由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Н.В.波德戈尔内——会议主持，宣布会间休息

第一次会议

(1966年12月12日)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此次党中央全会由于正当原因——主要是疾病原因而缺席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15人，中央修补委员11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人。

谁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会工作开始。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政治局提交全会讨论的问题有如下三项：

1.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关于报告人，你们均已知道。

2.关于1967年苏联国民经济国家发展计划。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同志。

3.关于1967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情况。报告人——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同志。

这样，全会正式进入(既定)议事日程。

鉴于有人建议，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报告人没有限定具体的报告时

间。我这里提前声明，让我们大家在报告中间来一个短暂的休息。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让我们这样来安排今天的工作：在午饭前结束报告，而午饭后便开始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有人建议，在讨论期间把给同志们的发言时间限定在15—20分钟之间。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我们今天的工作应在晚上六点以前结束。

苏斯洛夫：还应带有中间休息时间。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会议有什么希望吗？！

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

我们的会议程序和议程就这样确定。

会议主持：苏斯洛夫同志。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于我们党的国际政策及其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这次全会讨论。

问题在于，国际政策诸问题在我们党的活动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能，中央还从来没有在对外政策事务上给予过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力量。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该报告的内容。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该报告所反映的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修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一致观点。

由于我们这次全会，是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几个月之后举行的，因此这里便不必再涉及我们国际政策的总方针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的国际政策总方针已在(苏共二十三大)会议文件中有相关表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国际舞台上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自己的实际活动中。

苏共二十三大诸文件说明了现代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其中一方面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帝

国主义不断地企图以各种手段来阻碍革命的进步发展、阻挡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进程。

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如此剧烈的交锋和对抗相提并论。

上述双方主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采取了极其多样化的方式，从而使国际生活呈现出迅速变化的矛盾景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的同时，就可能由于事件的意外转折而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失败。因此，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便为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日常活动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甚至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至今的短暂期限内，在国际发展中便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并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鉴此，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向中央全会做出报告。

一、当前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国家最重大的对外政治活动

我们全会召集的时间正是50年以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际。正是我们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从而为自身与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分水岭。正是十月(革命)改变了国际发展的整体进程。还在半世纪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将牢固耸立，就像是树立在全体劳苦大众面前的一把国际主义火炬和榜样。”(《列宁选集》，第26卷，第429页)

如果说，如今在世界上已存在不是一个，而是14个拥有人类1/3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历史发展结果的基础，则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如果说如今在那些曾属于殖民帝国的区域已产生了70个正建设各自生活的独立国家，那么促使世界发生这一变化的最终根源仍应归功于伟大的十月革命，应归功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巩固。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斗争赢得稳固的阵地，而共产主义运动也已成为当代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那么所有这些最巨大成就的源头仍要追溯到1917年10月，因为这些最重大成就与赢得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国家——国际舞台上一支巨大的力量。苏联——是一个拥有

2.35亿以上人口的巨大工业国，我们的经济实力仍在不断增长。

我们在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和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这是提高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最有力手段，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牢固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满意地说，近两年间以中央在国民经济领域所制定的新政策为基础，我国的劳动者们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的工业和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今年，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收成都很好。这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不间断地确保居民的各种主要粮食品种供应和满足工业的需要，而且补充了我们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而这，同志们，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处于斗争条件的我们国家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农村的情况无疑是有所好转了。我们认为，这首先应归功于我们落实了1965年3月中央全会、党的二十三大和今年5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各项决议的结果。我们实施的关于振兴农业的举措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畴。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举措将会全面促使我们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工业方面的情况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国工业正稳步达到预定速度，并在采用新的、经实践证明有效的生产计划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改组。今年首批11个月的预测结果表明，我们五年计划第一年度工业方面的任务总体完成情况不错。

我们的经济成就对外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许多兄弟党代表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均强调，国外劳动群众都看到并高度评价苏联经济的振兴，称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方针。他们对我们说：如今人们都在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与中国领导人的方针相比较。后者断言，根本没有必要建造新的工厂和创造其他物质财富，而据北京的理论家们说，因为一切都必将被世界大战所毁灭。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苏联各民族兄弟友好的发展，具有无可估价的国际意义。各民族友谊——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最重要源泉之一。不久前，我们各民族对塔什干地震遇难者们所给予的全面救助就直观而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以及我们这种友谊的巩固和温暖。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这场救援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对所有

联盟共和国民众对塔什干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兄弟情谊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无疑自身也是非常需要建设大量的住宅的。但由于意识到帮助遇难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自己的首要责任，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建筑骨干工人派往那里。在帮助发生地震的达吉斯坦以及在今年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水灾)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诸边疆区的过程中，我们伟大祖国各共和国和城市的苏联人均在积极的、同志式的团结方面树立了榜样。同志们，这些事实均表明在苏联人的心里对自己的遇难者们，对我们国家各民族怀着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

我们在国内建设领域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都会对我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经济越雄厚，人民生活越富裕，我们的武装力量越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就会越顺利，越能更轻松地向自己的朋友们提供帮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民众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有力手段。

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将成为苏维埃政府向国际展示自己成就的舞台。我们将自豪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那些巨大成就，以便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敌人们都看到，布尔什维克——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不仅能够从剥削者手中夺取俄国，而且有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走在社会进步的最前列。

同志们，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许多忠实的盟友，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从殖民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世界各民族、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稳固的，并会继续得到加强。

苏联在全世界上的影响和威望从来没有如此的强大。资本主义强国小看我们的时代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承认或不承认苏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们都在寻找机会与我们接触，并极力与我们建立关系。如今，关于是否承认或不承认某个政府的问题已是由我们来决定。

如果说还在不久前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仍认为自己享有威望并可以对莫斯科指手画脚的话，那么如今他们都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声望，那他们就必须有能力保持与苏联的

关系。

我们党把苏维埃国家的所有力量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用来服务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来支援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活动提供和平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支持所有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

与对内政策一样，我们的对外政策也需要遵循正确的工作方式。既不能忽左忽右——没有后劲，也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论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我们都要作全面而深入地分析。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更大的精力。我们极力使自己的国际政策尽量变得更加稳定、更自信、更有连续性，同时也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所有国际问题我们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并积极贯彻自己的路线。在对外政治活动方面我们展开全面活动并利用一切力量——外交工作、对外经济联系、对外政治宣传、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我们将以广泛的民主组织方式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党中央制定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实施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将严格遵照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与党和国家的路线——两者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关系实践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统一的，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意愿。

现在，请允许我就近期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当前，我们最尖锐的国际问题是越南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面对帝国主义者针对世界上一个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发动的武装入侵活动。这个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尖锐问题表明，美国自1964年起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进攻。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因素将会在那里同时发生作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就是为何苏联从一开始便要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在后续年间不断地向越南，尤其是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政治和道义以及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为了使同志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近期在这方面所给予帮助的规模，我这里将列举这方面一些具体而可靠的数据，当然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散布这些资料。

在近两年间，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威力强大的对空火箭武器，它们足以装备7个半团。我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送了近2000门高射炮、530套高射机枪装备、1500挺高射机枪、144架喷气式飞机、300多辆坦克和1000多辆火炮牵引车、近千门野战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和燃料都是从我们国家得到的。我们向越南人发送了大量的粮食、军用(士兵)制服、装备和其他物资。苏联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给予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实质性帮助。

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价值已达13亿卢布..... [83]

.....美国继续扩大自己对越南的侵略。

在苏联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大量援助坚持斗争的越南人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显然也不希望越南战争迅速结束。不过这会进一步增加我们国家在越南和整个亚洲的声望。从许多迹象来判断，北京并不反对使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人发生冲突，而他们自己则站在一旁渔翁得利。难怪中国领导人中非常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坐山观虎斗。”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样做，当然还有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越南战争将有助于中国统治集团使国家一直保持紧张状态，从而分散人民对国内混乱局势的注意力。另外这场战争，似乎正印证了所谓毛泽东理论所断言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武装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北京领导人所推行政策的恶劣影响，都导致越南人民不得不长期坚持斗争并忍受巨大的战争苦难。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1954年日内瓦条约签署之后，越南劳动党采取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建设新社会和以和平、民主方式统一整个国家的方针。通过坚持这一方针，越南朋友取得了不少成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楷模的鼓舞下，越南南方人民开展了广泛的解放斗争。而被人民运动吓坏了的西贡傀儡政权向自己在华盛顿的主子求救，随后美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干涉越南的内政。这样，美国针对热爱自由的越南人民便发动了一场肮脏的、血腥的战争。

应当说，同志们，近一段时期越南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加严峻。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加紧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大部分设施，尤其是交通线的集中轰炸。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南越人民运送援助物资的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型工业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许多连接河内与中国的铁路都被摧毁，只有个别区段的铁路尚能使用。从河内到南越边境道路上的许多桥梁被毁，渡口遭到了敌人不间断的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城市被炸毁，近两天敌人又恢复了对河内郊区的空袭。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无法及时安排农业生产，导致越南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张。在国家南部地区，正如越南同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不日益经常性地将大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小部队游击战术。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敌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还由于得到了大量中国顾问的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在多次与越南同志会谈期间所了解到的信息，加上我国驻越军事、外交人员所作的信息通报，关于越南的形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越南人民要将自己的英勇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目前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为此我们已不止一次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尤其是在今年8月份，当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同志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来我国访问之时，我们曾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会谈。在其3天访问期间，我们的3位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均与越南同志就越南形势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公开向他们表明了我方的态度，即拒绝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对的；必须打破美国政府所玩弄的政治把戏，从而使约翰逊无法继续扮演呼吁谈判的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我们认为，在继续坚持自己在著名的第四点和第五点中所表述的原则性立场和南方的武装斗争的同时越南同志仍可以就某些问题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以争取时间。即使谈判没有获得大的成功，至少也能够向世人揭露华盛顿所玩弄的欺骗伎俩。通过运用这一斗争策略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国际运动，有助于进一步孤立美帝国主义。

当前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采取上述策略的。因为美国统治集团虽然现在的军事资源本身是非常雄厚的，但深陷越南战争的处境毕竟使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感到非常的尴尬。如今，已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正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而约翰逊和拉斯科已多次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发

出了关于协助调解越南冲突的请求，这绝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们的上述请求可能又是在玩弄政治把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是真心希望寻求某种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已日益临近的现实。

关于将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除了我们向越南朋友提出了此类建议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对于此类建议，越南领导人每次都这样回答：原则上承认开展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其中不排除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但眼下，按他们的话说，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他们认为，必须首先赢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然后我们举行谈判的地位才会牢固。于是，这样的谈判就被延迟到了第二年才开始举行，可这时越南的军事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了。

试问，难道越南的同志自己没有看到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吗？他们当然是看到的。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无疑与中国领导人有关。正是他们向越南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阻止其同意举行和平谈判的。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个星期以来，越南同志的立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事件，现在中国领导人已暂且顾不上管越南人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据越南的朋友说，自己已开始进行与谈判有关的试探性活动。至于他们的这些活动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目前仍很难说。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们通报与越南问题相关的各方面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感到很棘手。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置陷入灾难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于不顾。在继续给予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越南人以各方面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越南朋友通过政治途径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我们党和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我们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采取如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越南冲突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对此，我们已当面并肯定地向越南同志作过声明。他们在答复中也认为，自己理解并完全同意苏共的这一立场。

停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或直接通过军事方式将美国人赶出越南，或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不论是借助哪一种方式来达到上述目标，其最终结果都将是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都将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失败——承认自己无力战胜捍卫自身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同志们！我们党已多次声明，自己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发展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关于上述这些问题我还会作特别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转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我们所有的对外政治活动始终遵循了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对抗我们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因此在确定自己在世界任一地区的政策之时，我们始终考虑的是该政策是否符合我们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断斗争的原则。我们从来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矛盾来削弱其与自己盟友的联系，帮助执行反美路线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对美国所实施的政策给予有力的打击。

美国是一个强大、有经验和狡猾的对手。他们依靠自己强大而发达的经济。它手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中包括帝国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核导弹储备。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的斗争中，它使用了各种外交手腕和狡猾的阴谋诡计。鉴此，我们也要采取相应复杂、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来面对。针对华盛顿的军事准备，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并将全力以赴地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处于全面的战斗准备状态。

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苏联人民，以及朋友和盟友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们今后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执行一条明确而持续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其一切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企图等给予坚决的回击，阻止其在全球各地的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不放弃与美国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妥协的机会。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也坚持和平共处的立场。

全会与会者们都知道，当前我们对美关系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侵略越南问题上对其施加压力。众所周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并相应在一系列领域冻结了我们与美国的接触。与此同时，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相应的主动性

之时，我们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例如，你们显然都知道，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召集期间葛罗米柯同志根据我们的委托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拉斯科举行了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我们了解到，美国领导人对自己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处境极其忧虑。如今，他们由于侵略越南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谴责。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才会在上述会谈期间，一再表白自己正极力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作为对美国领导人的答复，我方指出，只口头表达和平的意愿是不行的，还必须付诸实际行动，而美国首先应当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停止越南战争。

同志们，下面请允许我重点谈一谈，关于(苏美之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条约的谈判情况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

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签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就可能阻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核武器。这当然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有利的事情。

我们通过与美国人的谈判得出如下结论：近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有松动的迹象，其如今似乎已准备同意我们就该条约所建议的那些内容。我们当然明白美方在这里一定隐含着一些鬼把戏。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甚至以使自己摆脱目前的孤立困境为条件，而不惜用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来诱惑我们。至于以后，我们就要看美国人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究竟会采取多少实际的举措，从而使该条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联邦德国谋求核武器的企图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统治集团对自己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寄予了厚望的。其中包括，他们极力利用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企图借此来加深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他们通过使用各种花招和狡猾的手段，来瓦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已深刻洞悉了这一点，从而为自己明确了如下任务：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盟友——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均完全支持

我们在苏美关系方面所提出的路线。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也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也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为了参观航天发射场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听取了我们专门就苏方代表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上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拉斯科之间举行会谈的情况通报。我们的朋友们均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苏联的对美政策。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坚定贯彻自己既定路线的同时，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如下情况，即美国的统治上层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间无疑有一些强大的集团极力支持继续侵略越南，甚至准备冒发生核冲突的危险，但其中毕竟也有一些影响巨大的人物，始终坚持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关于华盛顿内部存在的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前不久，来访问苏联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已对我们讲过。从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一定会考虑和充分利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所存在的这些矛盾。

在苏美关系方面，我们执行的是一条坚定而灵活的路线——这是我们在解决当代主要问题——防止世界核战争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共二十三大已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防止世界核战争是有可能的。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所制定的对美政策，就是上述工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们！在从苏共二十三大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对这样一个问题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即确保欧洲的安全。我想这是人们都能够理解的。

欧洲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主要地区。西德复仇主义集团也在这里积极活动着。西欧的军事基地在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规划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已把自己核弹头的一多半都部署在了欧洲诸国的领土上。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战火就可能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并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核战。

总之，欧洲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苏联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和盟友们，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问题。

(苏共)中央政治局还考虑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目前条件下，西欧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要贸易伙伴，西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

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会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作用。

简要地说，苏联所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在于，巩固前一场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有利于我们的成果；削弱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结盟关系，瓦解北约，防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死灰复燃，其中首要任务是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在此基础上，稳固我们西部边界和对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并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广泛、互惠合作创造条件。

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诸国会与我们并肩战斗。广大人民群众会支持我们，欧洲进步力量，尤其是我们大陆上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会积极向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提出的巩固欧洲安全的目标，还得到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理解和积极响应。

1965年1月，在华沙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加强欧洲安全为目标的联合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一致以坚定且毫不妥协的方式反对北约精心杜撰的所谓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要允许联邦德国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此次华沙会议对西欧列强所发出的警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它促使北约内部围绕多边核力量而发出的喧嚣明显低落下去。尽管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使北约彻底放弃这些计划草案。

在苏共二十三大期间，我们就欧洲事务的新步骤——关于提出广泛的、有利于加强欧洲和平的建设性纲领问题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经过交换意见，我们决定在下一次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将通过相应的文件。

根据这一约定，我们起草了这一文件的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于今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和平的宣言。该宣言在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广泛的、有利于解决当前那些使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忧虑的问题的纲领。内容涉及：从承认现有边界不可动摇直到在欧洲形成一个所有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的互信、平等合作的局面。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即使帝国主义者

们至今也无法对之提出异议。

布加勒斯特宣言的力量究竟何在？首先，它对当今欧洲正在发展着的那些积极(健康)趋势产生了新的推动作用。这里所谓健康的趋势指的是，西欧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极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自己的独立政策，以加强自身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其特点是：不仅只有这些国家内部的在野(反对党)力量出现了上述趋势，而且一些欧洲大国的统治集团也表现了这方面的强烈意愿。而促使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美国冒险主义政策的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随着欧洲经济独立的增长，与美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不愿意再受到美国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强制，等等。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这也始终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重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今年夏天，我和A.H.柯西金、H.B.波德戈尔内等同志应政治局的委托，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我们当然知道，戴高乐代表了那些阶级力量。而法国总统自然也很清楚，他这次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将要跟谁打交道。但结果显示：我们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成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这里并非仅仅指我们在公开发表的苏法声明中就一些问题所达成的那些共识。事实上，苏联和法国对如下一些问题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如德国的战后边界问题，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等。戴高乐说，法国同意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希望其发生改变。关于德国的统一问题，他声明，法国不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于着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戴高乐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必须让美国人离开欧洲。他说，法国不赞成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并将遵守日内瓦协议。

此次莫斯科谈判无疑增强了戴高乐的信心，并会促使他在法国脱离北约的方向上，继续实施相应的步骤。法国人已于今年7月1日之后，从北约统帅部撤出了自己所有部署在联邦德国境内的部队，从北约司令部召回了自己的军官，不再参加北约高级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的活动。在法国的坚持下部署在法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基地和司令部也都撤出了该国。

苏法关系的不断密切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促使许多西欧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使

得所谓的旨在将北美和西欧转变成敌视苏联的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即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法国采取上述行动的重大意义。在这种新形势下，旨在反对华沙条约诸国的北约战线实际上已沿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士一线和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法国被分为两半。北约西欧战场的南、北两翼如今已是首尾不能相接，其武装力量的管理体系因此而遭到削弱，后勤保障也趋于崩溃。

苏法谈判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即扩展了我们与法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联系。A.H.柯西金同志刚刚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期间受政治局的委托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首脑蓬皮杜举行了一系列认真而富有成果的谈判。这些谈判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我们在莫斯科与戴高乐会谈的成果，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更深入的进展。

我这里指的是，我们与戴高乐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将可能促使其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如在不允许联邦德国获取核武器和与德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方面。实际上，戴高乐此次不仅坚定地表明了法国反对西德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并且他还做出了如下肯定的声明，即在必要情况下，法国将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采取统一行动。虽然法国依然不承认民主德国，但在谈判期间戴高乐已明确向我们说明，法国将会根据两个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的事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相对以前所持立场，此举对法国而言，已经是为了一定的进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已邀请我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于1967年正式访问法国。虽然关于此次访问究竟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现在还一概不知，但法国方面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的事实本身已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法方已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广泛开展两国间各种经济联系的建议。

总体上我们应当指出的是，柯西金同志此次访问法国及其在巴黎所举行的谈判，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其谈判的结果也与我们政治局所设想的基本一致。这些活动再次表明，在与我们接近的过程中，戴高乐表

现了一定的谨慎态度。例如，在法苏两国政治关系谈判的基础上，他才决定采取上述步骤。不过，总体来看，我们与法国关系的发展还是相当成功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对法政策从一开始便与法国共产党做了相应的沟通。法国同志认为，苏法两国关系的转折有利于促进其所进行的斗争的成功，有利于推动法国左翼民主力量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欧洲所执行的路线，使西德军国主义者们深陷困境。也正是由于这原因，西德现任军事统治集团，在存在的这其间，首次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危机。那么，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致使其陷入目前的困境呢？其中包括：我们成功地制定了欧洲和平共处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法国转而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联邦德国与英国以及美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淡化——因为继续无条件地支持波恩的过时政策已明显对英、美不利。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导致现在波恩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分裂。

当然，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们依然会继续执迷不悟。凭借美国的支持，西德统治集团正在加紧自己的军事准备。以前，他们曾发出过关于西德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叫嚣。而如今其联邦国防军已拥有50万人，并可能还会将70万经过培训的预备役人员再增加一倍。今年，其军事支出已达到近190亿马克，即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30%。如今，联邦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潜力，已完全有能力迅速掌握核武器技术并生产出此类武器。

正如不久前在西德一些大的地区——黑森州和巴伐利亚所进行的选举情况所显示，两年以前在西德由公开的法西斯分子组建的合法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长。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依然要提出关于西德复仇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以便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提高他们的警惕性。

如今，在波恩已组了一个新政府。该政府成员除了以前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代表外，还包括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至于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代表谁的利益，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民主德国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与最保守的右翼资产阶级党派区别很小。因此对于他们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开展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我们的德国朋友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

做，主要是考虑到以下情况：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党派，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后者不可能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在联邦德国只有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近期，在各级工会、部分青年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反战和要求民主的情绪正在不断增强。关于此，来自德国共产党的同志已经对我们说了，虽然所有这些目前仍都处于非法状态，但毕竟都是实际存在，它们为我们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

我们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新情况的现实意义。但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根据国家所制定的路线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促进西德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孤立其中最保守的沙文主义者，削弱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

可以满意地指出，在德国问题上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策略路线均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所持立场是一致的。

在实现我们针对欧洲所提出的那些目标的斗争中，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也具有巨大的意义。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曾多次接待了英国首相Γ.威尔逊——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是在今年夏天。我们的代表团也出访过英国。在双方所举行的谈判期间，依据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我们始终致力于如下目标：促使其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削弱英国对美国的依赖，防止其与西德接近。

我们与威尔逊的会谈是在没有外交常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会谈期间，我们提醒他道，虽然在以前来访时他曾说过——随着自由党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会执行更具有独立性的政策，可实际上如今英国仍是欧洲唯一的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的国家。

当然，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批评该国政府所坚持的立场。因为我们很清楚，英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依然对我们国家怀有好感，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虽然现在依然需要强烈地依附于美国，但他们并不打算自愿地屈从于美国资本。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对英国施加积极影响提供了良机。

针对意大利，我们也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而且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已获得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一些国务活动家近期对该国进行了访

问。应意大利总统的邀请，波德戈尔内同志将于今年1月前往访问。我们尤其明显地注意到，意大利实业家们对发展与我们的经济合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在这方面，应当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发展相当顺利。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对外政策方面目前依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当前在欧洲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即我们与该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特点。作为我们之间贸易的补充，我们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联系。目前业已实施的合作项目有：今年8月我们与意大利康采恩菲亚特签署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年产量为60万辆(即日产2000辆)的汽车制造厂的协议。我们还与法国的一些汽车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关于建设通往意大利的天然气管道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该管道的天然气运输量为每年100亿立方米，作为交换我们将从意大利方面获得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商品。

利用这些联系来加速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这本身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我们当然不仅仅只为获得这些商业上的利益，我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借此掌握一些真正有力的杠杆，以便对西欧国家中的统治集团施加影响。

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关系依然是我们欧洲政策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我们近期所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不久前波德戈尔内同志正式访问了奥地利。而与我们的北方邻国——芬兰保持真正友好的关系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其具体反映在：进一步发展双边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扩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等方面。

关于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我们必须强调，波德戈尔内同志在奥地利和苏斯洛夫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在芬兰所作的大量而富有成果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在东部和南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明确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侵略方针以及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敌视我们的路线。

大家都应记得，二战前夕我们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因为当时日本已准备随时从东面向我国发动进攻。即使如今，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我们怎么都不能不对这个国家加以防范，再说现在那

里又有了美国人，从而使日本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中国领导人也在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这方面他们借助了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有利条件，再说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中央认为我们的如下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削弱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促使其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同盟。这就是我们为何特别重视发展苏日关系并制定了扩大与之互助合作的方针的原因。如今，日本已成为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至于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政治变化情况，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去年，我们两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在互惠基础上在土耳其境内参与一系列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协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冶金联合体。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得以恢复。我们今后将继续坚持改善苏土关系的路线。

有理由指出，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年3月份，我们两国签署了广泛而有利于我们的关于建设从伊朗通往高加索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协议，计划年输气量为100亿立方米。随后，我们又签署了关于在伊朗境内建设大型冶金工厂和其他工程的协议。伊朗政府还请求我们向他们出售大量苏联武器，我们对此作了积极的回应。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如下可能性，即进一步扩大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其中包括通过购买伊朗石油的方式。

由于我们改善了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关系，西方刻意制造的针对我们的军事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实际上已经被瓦解。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放松对发展我们与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这将决定着70多个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究竟跟谁走——是跟着社会主义走，还是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问题，决定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人口未来社会进步的前景等许多重要问题。

而我们如何处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内开展对外政治工作，苏共二十三大已为我们党明确制定了如下主要目标：加强我们的影响力，粉碎帝国主

义已占据的阵地，全力支持各民族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巩固年轻民族国家的独立，对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党派提供帮助。

在此，我们当然会考虑到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各集团的特点。我们尤其会考虑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我们首先把那些选择了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区分出来。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等。我们与这些国家不仅建立了国家间关系，而且还有党际关系。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针对年轻进步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这里我们可以把埃及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与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近一段时期已取得显著的发展，并具有了密切而可靠的合作性质。我们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存在共识。纳赛尔总统和其他埃及领导人已开始定期与我们就其国内、外政策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并时刻准备听取苏方的观点。近来，苏联和埃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不会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的先锋力量。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这一地区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巨大意义。这里濒临苏联的南部边界，是通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咽喉，是北约军事机器所需燃料的主要供应地。

我们都能看到，近期帝国主义正采取积极的旨在反对革命—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总体来说，帝国主义的阴谋遭到了革命—民主国家人民的不断增强的反击。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加纳，帝国主义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应当说，加纳事件使其他进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感到忧虑。对此，我们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们还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我们已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以便其克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困难。当该国于1965年6月实现了领导层的更迭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详细地分析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并随即做出了支持布迈丁的决定。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阿尔及利亚继续坚持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苏阿友好合作关系也得以继续发展。

我们对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全力支持那些坚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巩固其现有体制。这些国家绝不当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猎物。

至于那些已赢得了独立，但暂且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他们，以削弱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支持其政策中所包含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并向这些国家内部的进步革命力量提供帮助。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印度。你们大家都清楚，使印度始终坚持不结盟立场以及坚持反帝和反殖立场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尼赫鲁死后，尤其是当夏斯特里去世之后，明显可以看出，印度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呈现出向右转的现实危险，印度亲美派势力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印度总理甘地和印度国大党主席K.卡马拉季访问莫斯科期间公开向其说明苏方对印度政策中所出现的上述倾向的关切和担忧。我们对他们说，此类倾向将会威胁到印度国家自身的独立性，而且也会对苏印关系造成损害。

我们也没有忽视那些已被拉入侵略集团的国家。例如，近两年来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便明显积极起来。而这种积极政策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阿尤布汗政府减弱了自身与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系。巴基斯坦拒绝参加美国侵略越南的活动。该国领导人还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进攻苏联。

苏联主动参与调解印巴冲突的活动对苏巴和苏印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塔什干宣言无疑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正因为此，我们国家的威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1965年9月30日的著名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分子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并试图将该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印度尼西亚的新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开展了反对共产党的恐怖运动，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保证说，(印尼)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不会向西方列强让步。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极力采取措施以阻止印度尼西亚彻底倒向西方强国一边。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前不久在莫斯科接待了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并对他说苏联准备在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印尼国内正在不断增强的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危险倾向，并强调我们坚决谴责印尼国内出现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这将成为苏联和印尼两国之间合作的巨大障碍。

近年来，我们对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会对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更多的实际帮助，并削弱帝国主义的后方。

这里，我还想简单谈一谈关于我们对已获得解放国家的经济援助问题。此举是我们对世界上这些地区事务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目前，苏联已与亚洲和非洲的31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为了让全会与会者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将作如下通报：我们向亚、非洲26个国家提供了防御武器，其中军队完全或主要使用苏联武器的国家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绝大部分军火供应均采用直接贸易或商品信贷支付的方式进行，也有一部分军事援助我们不得不采取无偿赠送的方式。

民族解放运动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重要战线。我们党不可能，也不会放弃这一领域的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来确保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力量的胜利，以便最终彻底摧毁殖民主义。（掌声）

同志们！苏联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帝斗争，坚定维护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既定方针，彻底粉碎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恶毒谣言，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并为瓦解和削弱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队伍创造条件。

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参与这方面工作。我以及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许多同志不得不经常到国外访问和在莫斯科接待外国代表团。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出国访问的同志便有：基里连科同志——前往智利，谢列平同志——越南和蒙古，波利扬斯基同志——加拿大，马祖罗夫同志——巴基斯坦，沃罗诺夫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国，П.Е.谢列斯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А.Я.佩尔谢同志——罗马尼亚，等等。还有一些同志不得不在国际工作

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杰米切夫和乌斯季诺夫等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和库拉科夫等同志，而我在这里已不用说那些长期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同志：如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

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书记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工作方面。近期，根据政治局的委托出访国外的同志有：B.П.姆扎瓦纳泽、П.М.马谢罗夫、Б.Р.拉希多夫、B.B.谢尔比茨基、Д.А.库纳耶夫、А.Е.科奇尼扬、Б.奥维佐夫、Д.拉苏洛夫、Р.库尔巴诺夫、B.П.鲁宾、Н.Г.叶戈雷切夫、B.C.托尔斯季科夫、B.Ю.阿洪多夫、И.И.鲍久尔、А.Ю.斯涅奇库斯、И.Г.凯宾、Т.乌苏巴里耶夫、А.П.利亚什科、Ф.А.苏尔加诺夫、Т.Я.基谢廖夫、А.Э.沃斯、B.И.科诺托普、А.В.格奥尔基耶夫、К.Ф.卡图谢夫、С.Д.希特罗夫、Ф.А.塔别耶夫和З.Н.努里耶夫，等等。我已很难把所有人都在这里罗列出来。我们将会增加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在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的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州的州委。

同志们，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举行会谈——这是一项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与此同时这项工作又是一所能够丰富我们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好学校。派遣代表团去外国访问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数百人出去，而每一个出访的同志，都将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很好的宣传员，有助于为我们国家赢得新朋友。与此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良好素质——谦逊且具有求知欲，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

谈到我们在国际政治活动方面的成绩，就必须强调，我们负责对外政治事务的那些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在这次全会上，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同志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正在履行的，是党所赋予的重要职责，他们的工作是繁重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都是着眼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此同时仍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每次当在政治局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国际问题时，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大量潜力没有得以充分利用。这就是说，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不同方向和部门——具体包括外交、外贸、对外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等——并没有始终做到应有的紧密结合。要知道，所有这些对外领域均应始终把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都应当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我们对外宣传活动并非总是能够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而了解这些新可能和新途径，以便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中央国际部、外交部、外贸部和相关委员会等工作人员，总之一句话，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全体人员的首要职责。

同志们！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巩固世界和平的路线，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准备和高度的警惕性，以便随时回击任何针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活动。政治局一直在研究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国防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对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力量，是其他国家实施军事讹诈和恐吓的对象。但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必须知道，他们对我们所玩弄的任何伎俩，都将遭到我们的毁灭性打击。（掌声）现在，必须要求我们的军事专家、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苏联的武装力量——士兵、水兵、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们都要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进，要求他们更好地掌握军事知识，发展军事技术、科学和艺术，以便使我们的国防实力远远超过帝国主义所掌握的水平。

..... [84]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关于波兰与苏联友谊。

众所周知，我们与华沙条约成员国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保持着尤其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我们始终关注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蒙古等，如果出现了困难情况，便会经常就诸多经济合作问题向我们提出请求，其中包括经济援助问题在内。我们与他们，首先协调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在世界舞台上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我们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等国，签署了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已达成协议，并准备于1967年签署新条约。

我们党，也对在华沙条约国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框架内加强多边合作，赋予重要意义。近期，我们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大的举措，以便完善这些组织的活动。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集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在维护欧洲安全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会议在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应当说，我们在军事合作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华沙条约国目前已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拥有多个统一的、在协商基础上制定的战略计划，其所有武装力量均使用的是我们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计划，都是通过近期在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土内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检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华沙条约国框架内，我们经过协商，确定了各成员国获取军事装备和维持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开支。其中每个国家都要承担一部分开支份额，虽然必须坦陈，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开支和整个社会主义合作的费用支出方面，无疑主要都是由苏联来承担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其边界也极其漫长而广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不久我们向兄弟国家的朋友们，展示了我们研制的最新型飞机、火箭和其他军事技术，演示了导弹的远程目标攻击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应当说，这次军事技术展示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苏联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表示惊奇，对我们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付出的巨大开支以及这些举措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表示称赞。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是协调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最重大问题上制定各成员国统一行动路线的可靠工具，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该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今年10月份，与各兄弟党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期间，我们讨论了对外政治问题以及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期所发生的事件等。

依照传统，此次兄弟党会议有众多国外代表团前来参加，期间各党

派广泛地交流了意见，从而使会议具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在前不久召开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会议上，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亲眼看到，在各兄弟党中向往团结和以统一行动来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总路线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也在不断增加，即各兄弟党都向往团结和兄弟友谊，及其对我们党，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纷纷表达的那些爱戴言辞。

我们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继续发展和加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立的这个相互关系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然而，许多兄弟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过去都是落后国家、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因而在没有广泛而发达的经济关系体系，在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此关注，并提出了，发展和加强我们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各兄弟国家盼望扩大与我们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迫切心情，我们也极力向他们展示发展这种关系的稳定前景。与筹备我们新的1966—1970年五年计划密切相关，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对兄弟国家，还是对我们来说，相互协调各自的发展计划指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1970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确保各自工业所需要的燃料以及各自所生产的产品的顺利销售。在落实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各兄弟国家签署了一系列长期贸易协议。

苏共中央对改善经互会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针对这一组织，我们提出了其所肩负的主要职责，并要求其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工作模式和方法加以变革。在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同时，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会议，以便经互会领导人就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问题交流意见。会议期间，大家均表示，要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认为，有必要在协商基础上采取一些举措，以加强经互会和提高该组织的工作效率。

在完善经济关系机制方面，苏联已提出了许多建议。我们始终致力于提高责任感和对那些违反协议义务者实施制裁。但遗憾的是，此类违反协议义务的情况仍是屡有发生。每当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

社会主义国家欺骗了我们并违反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之时，我们都会提请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此加以关注。

但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我必须提到的是，根据经济合作相关规定，兄弟国家经常也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证据确凿的索赔要求，下面我将举一些实例。

几年以前，保加利亚曾建议向我们供应微型电动起重机。我们的相关组织对此表示同意。而此后两年间，国计委也编制了生产此类起重机的计划。最终保加利亚人被告知，他们建议向我们提供的此类产品我们不再需要了。但要知道，保加利亚人为了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产品已专门建造了一些新工厂。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曾与匈牙利人，就汽车生产协作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其中，匈牙利人负责生产汽车后桥，而我们则是前桥和板簧。匈牙利同志严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修建了必要的设施，而如今根据相关协议开始向我们供应自己所生产的汽车后桥。然而，我们的相关机构却延误了自己工厂的建设工期，因而不仅无法向匈牙利提供自己已承诺的制造汽车所需要的那些关键零部件，而且还拒绝购买匈牙利方面所生产的产品。

遗憾的是，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要知道，我们苏联无疑是社会主义体系中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中心，因而我们自己首先得按规矩办事。在遵守协议期限和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它们将成为我们发展本国经济、建设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补充。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机制，也是具有国际主义意义的大事。而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这项工作也是一所在实践中培养人们国际主义观念的学校。

在全面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同时，我们将与之形成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我们党尤其重视发展，与那些在某一时期我们国家之间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下面，我将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从阿尔巴尼亚说起。(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期促使苏联与阿

尔巴尼亚关系的正常化，但我们的这些举措均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绝重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最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1月召集的一次会议表明，该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及其亲信依然不愿放弃其既定立场，并继续追随北京的路线。

众所周知，有一个时期，越南劳动党的许多领导者也是紧跟中国领导人的。但现在已发生了变化。虽然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越南同志尽量不想恶化与中国人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正逐渐转向更加独立的立场。他们现在并没有参与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反苏活动，已停止印刷中国人的那些充满诬蔑性言论的资料，忠实地坚守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相关规定。

同志们，这里我们必然要注意到，在历次不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越南和朝鲜同志在行为上，及其对中国代表所发出的分裂性、诬蔑性言论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如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已不再紧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在会议上起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忠诚地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工作。例如在刚刚于索菲亚结束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事实已充分而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我们曾向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于是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便采取了实际的举措以改善我们国家与朝鲜的关系。针对朝鲜，我们制定了一条总的政治路线：支持其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其军事援助——为此我们得到了朝鲜同志的高度评价；给予其经济援助——这主要是因为该国一直在这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困难，而我们的这些援助更加巩固了苏朝关系。

如今，可以说朝鲜同志脱离中国人的路线——已是既定事实。他们谴责了中共领导人在支援越南的联合行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消极立场，批评了中共领导人所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政策和把毛泽东思想强加给全世界的做法。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遭到了朝鲜国内的一致反对。朝鲜报刊刊载了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明显就是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奉行的路线。近日，在与我们的秘密会谈中，金日成同志直截了当地声明，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下是他的原话——“简直愚蠢得让人不可思议”。(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这可能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金日成所作的)这一定义刚好也符合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不过，我们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仍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为此，仍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需要灵活性、需要讲究策略和坚持不懈的耐心。但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其正常化。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积极。朝鲜同志非常想向我们出售一些稀缺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对苏销售近年来一度急剧缩减。我们两党间已开始进行高层谈判，期间我们均采取了公开、坦诚的态度，对此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以秘密方式来访的金日成同志正在莫斯科，今年我已与之举行了两次会谈。这些会谈证明了，我们对朝鲜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表明我们加强与该国和该党的合作和友谊一定会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其他一些我们之间关系中存在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国家。

比如罗马尼亚，便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前，我们与这个国家，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我们这里并不想分析其中原因。问题是还在这之前，据我们所知，罗马尼亚便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积极分子和党组织会议，期间不断抨击我们党和国家。该国领导人对我们所持的不友好态度也对我们使馆人员和到罗马尼亚出差的苏联人的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在许多问题上罗马尼亚人均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并开始执行自己的那一套独特路线。

10月中央全会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我们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极力试图改善这一情况。我们尽力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并通过耐心的工作方式，极力弱化我们之间的尖锐分歧，以期实现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为了恢复我们之间真正的、同志式的兄弟关系，我们无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虽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的关系中仍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困难。

我们曾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关于这方面情况，全会与会者们想必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便已有所了解，即罗马尼亚人希望我们在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文件中，不要对联邦德国提出口气过于强硬的批评，他们还就其他一些问题提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在与其磋商上述文件草案以及随后的关于支持越南的文件草案的过程中，我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均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我们的坚定不移和全体与会者的团结一致才最终迫使罗马尼亚在上述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接着，我们又发现

罗马尼亚领导人对进一步完善华沙条约的军事和政治机制也持否定态度，在经互会中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阻碍了许多业已成熟的问题的解决。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类似于否决权的東西，并借此来阻碍我们解决许多与发展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只是涉及其他国家。

如今，罗马尼亚领导人依然继续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即使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但至少是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虽然罗马尼亚领导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国家的支持。但这也导致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罗马尼亚国内经常会爆发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些罗马尼亚历史学者在自己撰写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均不客观地描述了过去我们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贬低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了错误的阐释。不过整体来看，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还是令人满意的。

今后，我们当然仍将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既从党的层面上继续改善我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又从国家层面上谋求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以便最终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实现完全的正常化。

下面再谈一下我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南斯拉夫通常都会支持苏联的行动。近期，南斯拉夫方面已更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从党际层面上与我们建立联系。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三大会。去年，他们向苏联派遣了由托多洛维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以交流党的工作经验。今年秋，又有以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访苏。今年夏，铁托同志曾邀请我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南斯拉夫。我们最终派安德罗波夫同志去了。我们认为，通过党的层面谋求此类接触和建立此类关系是有益的。

当然，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我们与南斯拉夫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最近南斯拉夫在领导经济方面便做得有些过火——积极实行所谓的分权制度，这实际上必将导致自发的市场关系的泛滥，并为外国资本向该国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南斯拉夫国内明显出现的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

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党的领导模式和方式以及经济政策等问题都是每个国家的党和人民的内政，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以同志式的方式把自己的担忧向南斯拉夫同志说明。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于今年9月与铁托同志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会谈。据我们了解，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曾向南联盟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南斯拉夫同志在答复我们时做了如下保证，他们绝不会允许贬低党和国家的作用，并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说，自己将会认真地思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很难对南斯拉夫局势今后的走向做出判断，因为该国的情况相当复杂。至于我们，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促使南联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强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近两天，我收到了铁托同志的来信，后者表示希望于1月份对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以便就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和协商。我们将利用这次来访，以进一步推进我们针对南联盟领导人的工作。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述来信内容表明，如今南斯拉夫共产党原则上已同意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们与古巴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在处理与该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会考虑该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一系列特殊条件，而对此，古巴同志已多次向我们提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给予了古巴巨大的政治支持，全力帮助古巴同志加强自己的国防，并向他们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

我们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发展。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合作，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过，这里我仍要指出的是，我们古巴朋友的国际政策时常会出现一些我们无法苟同的情况。我们认为，向他们公开说明这一点是在我们作为同志的分内职责。

在与古巴领导人的会谈中，我们曾认真地讨论过，关于确保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条件和加强其国际安全的问题。期间，我们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古巴的支持和帮助等因素的重大意义。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古巴将执行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政策，必将加强其外交地位，并使美国对古巴革命的干涉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还请古巴朋友注意加强古巴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这些党派过去一直都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所有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为了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其本身意义上来说都是着眼于一个目标——建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涉及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体系，它以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同时又是真正的兄弟式合作、互助和友好关系为基础。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和困难，那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困难中，有些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成功举措和欠考虑的活动造成的。当然，导致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所处的复杂而多样的客观条件。

这里我首先指的是，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高度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这样一些，如中国、越南等——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水平的国家。这些差异，首先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不同的国家在客观上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其次问题还在于，在那些无产者人数较少的国家中，政党的政策就可能受到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如果说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仍存在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条件下，为了反对内部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而需要紧密团结，从而使这些差异暂时变得不明显(退居幕后)，那么当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成为事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得以巩固之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存在的这些客观差异便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自己国家过去的沉重历史遗产——民族敌视、冲突和对抗，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变得复杂化。列宁曾指出，各民族的融合问题只有通过其中每个民族的全面发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列宁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正在进行世界性社会主义合作的各民族。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均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因此，每个共产党派首先要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巩固，其独立性和主权意识也自然会不断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之上的这种健康发展进程不要对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国际主义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以便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取得繁荣的同时，又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互助合作，并最终使这一合作在整体上也实现繁荣。

现实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倾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多么的巨大。而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会迅速地对自己国家，甚至国外民众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对民族主义寄予厚望，据他们说，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被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而帝国主义在自己的政策中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极力加以鼓励，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向这些国家渗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各种手段。

在处理与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相互关系时，苏共中央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坚持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利益相结合，并追求权利上的真正平等。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党与各兄弟马列主义政党一样，都已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虽然我们目前仍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任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民族未来社会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和平和进步的结晶。为了它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此，我们绝不当怜惜自己的力量。（掌声）

三、苏共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国际活动不仅仅只依靠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实力和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结盟。还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说过：“我们拥有国际联盟，虽然这一联盟并不曾签署，也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如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可实际上在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出（这个联盟的存在）。”（列宁文集，第40卷，第243页）列宁这里所言，指的是我们与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如今，该联盟最完整的体现可以在各种兄弟式的、相互支持关系中找到，而正是凭借这些关系使我们党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加强其队伍的团结而共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均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自身的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就是1957—1960年间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完全

有理由说，从那时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已充分证明了这些会议的召集本身及其所通过的马列主义文件的正确性。这些文件使我们有可能从宽广的视角来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各支队伍的积极表现，及其在不同民族条件下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斗争模式和方法。与此同时，这些文件还为各兄弟党在反对同一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原则性基础。

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集，使我们有可能共同讨论和解决现实生活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业已成熟的那些问题。会议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团结及其目标的一致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今后，此类会议仍有必要继续召集。

我们党对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共同制定的路线，坚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中贯彻落实这一路线。我们坚决抵制任何使我党背离这一路线的企图，始终不渝地与我们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这方面，苏共的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倾向，有助于各兄弟党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辨明自己的行动方向。绝大多数兄弟党均坚定地捍卫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行动纲领。我们通过集体努力而制定的总路线，则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以每个普通人都感到亲切和能够理解的口号从事着斗争活动。这些口号便是：为了和平和反对核战争、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反对垄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口号反映了最广大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各共产主义党派正是以这些口号为基础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并促成了工人阶级与所有民主力量的联盟，从而表明一个群众性政治军队业已建立。共产党人们正是带领着这支军队，在各自相应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

如今，正是和平和民主的口号孤立了那些最具有侵略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全面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体系。而人民群众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下则更坚定地反对“战争集团”，更加顽强地面对帝国主义的劫掠和专横，及其每一次侵略行径。当前，国际上兴起的大规模的声援越南的运动——便是这方面明显的证明。

如今，最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越来越专注地倾听共产党人发出的

声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包括14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组织，另外还包括一些仍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心坚持斗争的党派。这些共产党组织都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其活动主要依靠的是农民群众，其中许多党派仍在坚持武装斗争。在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半共产党组织——37个党派仍在从事着地下斗争，而其余党派已可以开展合法活动。后者中的一些党派已善于利用这种合法活动的机会，使自己转变为群众性政党，并在国家议会、市(镇)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中拥有了大量的政治代表；有一些党派仍面临这样一个任务——探索与广大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途径；有一些，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党派目前只是由少量职业革命家和马列主义学说的宣传家们组成的组织；还有一些党派已转变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下面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在西欧聚集了近900万工人和职员，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都能够成功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以法国共产党为例。

法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方面表现得很坚定，与此同时在斗争策略上他们也不乏灵活性。大家都记得，法国共产党在近期的国内总统选举中的成功表现。尽管法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法国共产党仍是成功地将国内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从而确保自己赢得了45%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对法国总统戴高乐所采取的旨在改善法苏关系的做法给予赞扬的同时，法共方面也为加强法苏友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共威望的提高。

今年8月份，当我与法共总书记瓦里戴克·罗歇会谈期间，我们两党不仅在苏法关系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内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该党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群众性政党，目前其党员数量超过150万人。意共在国内选举中经常获得25%以上的选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意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

地下斗争之后才获得了所有这些成绩的，而当初其人数仅只有数万之众。而其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原因主要在于该党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群众密集的地区，正是该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从而能够确保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

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当今没有发生尖锐的经济或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共产党同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有可能在自己国家内部赢得稳固的地位，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芬兰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该党代表于今年5月成功地进入了政府。这是自1947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退出政府以来，共产党代表首次重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此举是对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这里，我还想对正在法西斯制度下从事艰苦斗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做一特别强调。在熟练地将合法和地下斗争方式密切结合的同时，该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最近几年内，西班牙共产党人数增长了近3倍，已达到10万人。而该党的这些成绩，同志们要知道，都是在地下状态下，在充满恐怖和镇压的环境下获得的！

在艰苦的非法条件下坚持工作的还有希腊共产党。该党与合法的联合民主左派政党合作，从而在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如今，希腊之所以是北约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我们的希腊同志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无关系。

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这样一些党派——暂时在工人运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地位非常微弱。这其中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我们从来也不隐讳这方面的情况，如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等。上述党派的工作环境尤其艰苦，它们必须面对(当局)强大的宣传、军事—警察机关，经常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人还必须面对势力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均坚持强烈的反共立场。

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该运动在亚非拉各个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众所周知，战前在这些地方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屈指

可数的，而如今已达到48个。

这些大陆上的共产党工作的条件尤其复杂而艰苦。那里生活着20多亿人口，但工人阶级的数量却不多。农民构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他们贫困、没有文化，又大多处于宗教的影响之下。农民阶层为那里的反帝斗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小资本主义思想。那里的反动势力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对待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战后时期伊拉克共产党政治局的6位委员几乎全部被杀害，而南非共产党中央的几位委员也成为了当局警察恐怖政策的牺牲品。

这里特别需要说的是关于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情况。20年以前，该大陆许多共产党组织才刚刚建立，而如今整个拉丁美洲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组织存在。虽然其中多一半党派均在非法条件下开展工作，近年来其人数已增长了两倍半。这些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都是一个，那就是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后者在该大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赤裸裸的国际宪兵和剥削者，就是各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最重要支柱。因此，拉丁美洲人民对帝国主义“美国佬”的仇恨随时可能以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共产党组织，如果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制定的总路线，那么就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我们的经验也证明，如果背离了这一路线，就会遭遇失败和坎坷。

我们所有人都对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以艾地为首的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的影响下走上了冒险主义道路，脱离群众并采取了盲动策略。最终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此一个巨大的政党，按其领袖们的话说，党员近200万人以及工会、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等，实际上均被彻底摧毁，成千上万名党员死于非命。而要再重新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少也得需要许多年才行。印尼共产党人之所以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关键在于该党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而走上了中国领导人所指引的歧途。

..... [\[85\]](#)

.....在我们之间。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只承担着观察员的角色，尤

其是当涉及我们运动的普遍原则性问题之时。在当代条件下这里有一个政治艺术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将如下两方面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尊重政党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同时又要能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支队伍中所发生事件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既要善于坚定地贯彻我们自己的原则路线，同时又要表现出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性。

在我们与各兄弟党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

苏共中央曾多次主动以同志式的方式向各党派领导人提出过一系列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与这些党派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去年，我们便曾从党的层面上与铁托同志就意大利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举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期间，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对上述思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当代条件下实行这一思想将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做出原则性的退让并可能导致共产党丧失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作用。我们认为，上述会谈、我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友好的建议都得到了意大利同志们的重视。

我们曾多次与各兄弟党代表讨论过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如何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而就这一问题，我们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既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也原则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共产主义党派。对于这些党派而言，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既考虑民族特点和自己国家的传统，同时又要善于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本国人民的立场——民族利益出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近一段时期，一些共产党表现出民族孤立的倾向。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试图采用民族主义者们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扩大本党的地盘。其中有的党派已不再谈关于国际主义义务的问题，有的党派甚至走得更远——以不友好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批评。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近来，他实质上是停止了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接触，拒绝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这里，该党领导人已表现出滑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迹象。

遗憾的是，我们在瑞典和挪威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中也看到了上述

民族孤立和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迹象。近来，他们也减弱了与其他兄弟党派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坦白地说，与其他兄弟党相比，常常显得虚伪。

我们党是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若罔闻的。我们认为促使那些发生动摇的党派重新坚定马列主义立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说到我们与各兄弟党的国际主义团结，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么一点，即不仅是我們帮助了它们，而且它们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正是由于非社会主义世界那些兄弟党的革命活动促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正是由于它们的帮助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向世人展示我们所取得成就的意义，解释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以及我们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数百万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共产党员们，都是苏联政策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自愿、坚定而热情的宣传员。他们常常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坚定不移而勇敢地坚持十月(革命)思想，并把关于伟大列宁的政党的真理带到广大群众中间。对于我们阶级兄弟所做的这些无私而忘我的工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世界工联、妇女、青年、拥护和平者运动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利用这些联系来宣传苏联和苏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

同志们!在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我们党更加稳固了自己与民族解放运动各力量的联盟和合作关系。苏共二十三大决议对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代巨大革命力量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明确的原则性评价。

要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亚非拉各国，就必须探索一些新的、经常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道路。在这些国家中尤其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使共产党转变为能被民众认可的民族力量。当前殖民地人民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他们立刻便要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其今后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就在于，其以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的形式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以适用于当代条件的思想。这样一条

发展道路使各民族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那些痛苦和贫困。

列宁的上述思想经过了实际生活的检验并首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所证实。该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而同时又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也表明，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的那样高的生产力。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国家的全体人民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并进行繁重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后者势必会尽力阻碍这一发展进程并极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这些已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因此这些民族要想取得成功就只能，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

针对这些选择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全面的支持，向它们并不轻松的斗争活动提供帮助。为达此目的，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与它们的关系外，我们还与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保持了接触和合作的关系，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埃及、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

这些党派对外均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们清楚它们与马列主义的立场仍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际的革命行动纲领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本国资产阶级为目标的。这也就使得我们所开展的，针对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工作，既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又是一项具有前途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作，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我们靠近。这无疑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在工作期间，我们还必须充分体谅这些经历了长期压迫的民族内心所怀有的那种激烈的民族情感。

我们正逐渐地与这些党派和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互信的关系。在与他们会谈期间，我们极力强化他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信任感，极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以下方面：必须团结所有进步力量和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完成建立稳固的革命党的任务，而该党则要善于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展活动。

苏共也没有忽视与一些革命—民主派活动家建立联系的工作，如纳赛尔，即便此人当时还没有放弃反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我们认为坚决捍卫我们的兄弟共产党人的利益是本党应肩负的义务，尤其是当这些兄弟党遭到镇压之时，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当时便属于这一种情况。

对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中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力量给予支持，也是我们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往往极其复杂(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但在解放整个国家方面他们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领导作用，并在自己的政策中仍坚持反帝路线。因此，针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党要像对待这些国家中的马列主义者一样——对其政策中的进步方面给予支持，并在这方面发展与这些执政集团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积极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畴，而应当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继续朝着清除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劳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当然要全力支持我们的阶级兄弟制定这样的斗争路线，并极力帮助其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但这样的话，就难免会与那些我们正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发生冲突。

关于此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所遇到的困难情况，我们这里以印度为例。印度共产党遇到的是一个强大而有经验的政治对手——印度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印度国内形势的复杂之处在于，该国“左”倾分子们也组建了一个所谓的、与印度共产党平行的共产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插了手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度共产党人是在何等复杂的处境中开展斗争活动。近两年半以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曾八次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在表示将支持其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公开对他们说，印度共产党方面也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在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兄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当代三股革命力量的伟大联盟。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一联盟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强化，而这将有助于以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并对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志们!如何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评价呢?马列主义政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积极地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基础的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

斗争。

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而展开公开的争斗，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苏共。为了收买人心，他们可谓是不遗余力，不惜金钱。他们在30个国家中建立了分裂集团和政党组织，而后的积极活动都是针对各马列主义政党的，但均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如今，对中共领导人所执行的分裂、反马克思主义政策提出公开谴责的已有57个政党。

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上，我们党所做的多方面、大量和耐心工作的结果，已在我们党二十三大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二十三大标志了一个转折点，即各兄弟党为巩固自身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展开了一场积极的斗争。

如今，许多兄弟党都更坚定地提出了，关于召集新的国际会议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过去的6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现象和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各兄弟们进行集体性地讨论，以明确我们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

为了有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关于召集国际会议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意地拖延了一段时间，目的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可是，如今我们已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支持召集这次会议的想法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自从中共领导人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起，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便产生了诸多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能够一起从事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苏共中央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不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分歧或不同观点，各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在反帝斗争中，尤其是在当代一些特殊尖锐的问题上(如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我们的这一建议为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的联合提供了可能，并得到了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的赞许。大多数兄弟党也都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当前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

今年10月中旬，当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在苏联聚集之际，我们与其协商了如下问题：是否取消我们提出的关于召集新的各共产党

会议的禁令，并公开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条件业已成熟。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此后所发生的情况，正如你们都知道的，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日夫科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而同时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言的其他党派的许多代表。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党代表大会，明确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加强国际团结、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路线以及支持我们党的政策等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从这里，我们再次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在革命运动中所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

四、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新阶段

同志们!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所有共产党都感到担心和忧虑。我们的运动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有一个大国的执政党越来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该国所确立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共领导人将强烈地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所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并试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强加给该运动。

如今，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制定的大国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在中国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与中共领导人近年来所执行的政策紧密相关。如今，我们已尤其明显地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置客观条件于不顾，中国领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特殊的、非同一般的地位。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1958—1960年间有意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试图使中国跨越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正是因此而发动了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

至于这一政策的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中国经济平衡严重失调，工农业急剧倒退，国内开始出现饥荒，并导致成千上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

自196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期暂时阻止国民经济的不断下滑。这些官方所谓的“政策调整”性举措虽然略微起到了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但其经济水平依然十分低下。截至1965年底以前，中国工业品生产总额只接近于1958年相关指数，而农业——近似于1957年水平。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依然落后，形势相当严重，然而同期国内居民人口却又增加了7000多万。

19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并从属于自己的大国目标。在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对外政策背道而驰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日益将反帝矛头转而对准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尤其强烈地反对苏共，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泽东将我们党视作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霸主地位的主要障碍。这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对此，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里斯杰尔同志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苏联、列宁的党——我们最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伟大的堡垒。也正是因此，中国领导人才在自己的分裂战略中将苏联及其政党视作自己的主要攻击、恶意诬蔑的目标”。

上述话语过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现实证明，中共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并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谴责。而那些为数不多的、紧跟中国领导人走的人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北京对最高领导权的觊觎，遭到了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拒绝。同志们，你们都应当记得，就在前不久为了招募同盟者，周恩来和陈毅曾到亚、非洲一些国家转了一圈，并许诺给予这些国家慷慨的援助。可这些最终都成了空头支票。于是，中立国家的民众，很快便识清了中国政治家这些许诺的真正价值及其丑恶目的。而中国原本就不高的国际威望也急剧下降，并实际上已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困境。

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特殊路线”的破产，从而引起中国内部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导致无产阶级民主的歪曲，而后者又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所坚持的民族主义路线的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又引发大规模的镇压和不间断地清洗。中国领导人试图

以此来压制国内的不满分子，而此举自然会使其国内的反对情绪进一步增长，并在中国社会更广大的阶层中间蔓延。

截至1966年初以前，关于今后国家和党发展道路的问题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其集团并不是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既定政治路线、放弃霸权主义方针，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继续试图以各种压制手段来对待国内反对情绪，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大国路线，更加起劲地鼓吹反苏论调，并进而企图以毛泽东政策来代替马列主义思想。如果说，以前他们这样干时，还会极力以马克思的美丽辞藻来遮掩遮掩的话，那么此时已是彻底地明目张胆了。

任何“革命的”口号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绝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实现真正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不彻底消除愚昧、无知和文盲的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都记得，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国家的内战尚未结束之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向青年人发出过“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列宁还谆谆告诫我们道：“(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所遗留的所有文化，并用之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所有科学、技术，所有知识和艺术。而非此，我们就无法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选集》，第29卷，第52页)

列宁的上述教导正契合中国的实际。该国至今仍保留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有3亿多人处于文盲状态，3000万学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条件。

可是，中国领导人所谓的“文化革命”却是别有用心，而与(提高民众的)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这样说，这场所谓的“革命”从一开始发动便与文化背道而驰，是一场大规模的洗劫知识分子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发动以来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国内中学和高校都停止了教学工作，戏院和电影院都被关闭，大量书籍被焚毁，报刊被严禁出版。所有当代文学和艺术著作和中国精神财富以及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遭到批判。

在当前的中国所有文化，全部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所替代(均归结于

毛泽东思想)，后者被宣布为人类知识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非此似乎人们便根本无法再生活下去。

《光明日报》(甚至)直接宣称：“(人们)可以不吃，可以不睡，但不能不读毛主席著作。”(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以下是中国的军事家之一林彪不久前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发表的言论。

他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替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书籍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都读完，而且离我们也有些太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站得)更高。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个，而在中国——则是几千年才有一个。”(会场气氛活跃。)

同志们，在此类言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表现出的个人崇拜，而且还包括有公开地改变党的思想基础的企图，极力以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点替代马列主义思想的图谋。而这便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内涵。

这里并非只涉及思想问题。“文化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标。照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话说，这一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于是，党的领导机构被以最快速度摧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党和国家机关、共青团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展开了越来越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日益广泛。所谓的“红卫兵”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并积极地展开活动。后者在中国被描绘为“毛主席的突击队”。在这支队伍的背后则站着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

同志们，从那些分发给积极分子的报刊和情报资料中，你们大家都已知道“红卫兵们”在活动中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我这里只列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前不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的苏联无党派学者罗霍夫采夫同志从中国回来。该同志从一开始便亲眼目睹了“文化革命”的发展进程。如下是他写给中央的信的内容：“6月3日，‘左派们’(‘红卫兵’最初的称谓)包围了学校党委所在的行政大楼。我亲眼看到，在大楼门口举行的群众集会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真正的)浩劫。声嘶力竭地喊了一整天的演讲者们找来了一根圆木，并用它的力量撞开了行政楼巨大的、铜制的一排前门。于是，由150—200组成的人群蜂拥着进入了大楼内。不久，从楼内便拖出了被打的党委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其中许多

人都是被沿着楼梯拽着手、脚拖下来的，并一路遭到殴打，身上血迹斑斑。也有一些人从楼上自己跑下来，但立刻便遭到了楼外(红卫兵们)争先恐后的围攻。从这些受害人的脸上我看到了明显的、难以言喻的恐惧，我认出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校领导。当晚，无线电广播站播放的消息称，‘左派们’已夺取了学校的整个权力。”这封信比较长，其中讲述了许多恐怖的事情，我这里只给大家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镇压的规模是巨大而广泛的。受害人涉及20个省的党委领导人，中央党和政府机关主要部门的多位部长，各部门的所有领导干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的领导层被免职。清洗还向基层蔓延——各县党委以及企业和机关的党委。

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之后，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尤其巨大的变化。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等均不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这一职务的目前只有林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人领导小组也进行了迅速的改组，进入这一小组的新成员包括康生、陈伯达和陶铸等——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忠于毛泽东的人物。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还有彭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陆定一，几乎整个书记处成员都被替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半人或被禁止政治活动或遭到了公开的残酷攻击。

关于中共领导机关的现状，我们并不掌握详尽的信息，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共部分领导人出于各方面考虑早就下定决心要反对毛泽东的极端政策。

我们现有的非官方资料证明，今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以毛泽东的名义，建议免除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刘少奇拒绝辞职。于是，林彪建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出乎毛泽东集团的预料，多数与会者均投票反对刘少奇辞职。这样，毛泽东和林彪便成为党内的少数派。

还有信息表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具体包括如下三点：1.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但应当由党来进行，而不是由那些孩子们来做；2.不同意毛泽东在反对苏共和苏联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斗争方式；3.中国一些近来表现良好的经济并非是由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是由于纠正了“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所犯的那些过失和错误的结果。

当然，我们目前无法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可靠性，至于刘少奇的真正立场我们也依然不甚清楚。然而，这一信息至少可能使我们从总体上得出这样一个相当正确的印象，即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正在经历着显而易见的危机。综合各种情况来判断，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虽然这些人的立场已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毛泽东至今仍无法完全败坏自己的对手们的声誉并将其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难怪陈毅在自己的一份公开发言中声称，“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防止国家的政变，捍卫毛主席。可如今，显而易见，毛泽东首先必须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最亲密战友们。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为什么决定要首先对党和党的干部们实施打击。因为这些经过革命锻炼的党的干部不仅了解“毛泽东思想”，而且了解马列主义，内心充满多年来养成的对苏共和苏联的友好情谊，因而毛泽东不能不把这些看成是自己政策的阻碍。

毛泽东集团已很长时间把党组织排除在政策的积极参与和制定的范畴之外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已有10年没有召集了。但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决定继续沿着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路线走下去，以便使党成为自己手中顺从的工具。

由于得不到人民牢固的支持，毛泽东很早便试图依靠军队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党。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楚，军队公开地反对党组织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不良反应。也正是因此，他才策划和煽动了青年学生运动，以便造成群众普遍支持毛泽东倡议的假象。而实质上，如今的中国正再现了托洛茨基当年臭名昭著的所谓青年学生就好像“革命的晴雨表”的论断。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由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组成的“红卫兵”只受到毛泽东思想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极其薄弱而且已被歪曲，对马列主义则完全没有认识。另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一些因素——长期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等——对一半多的中国青年学生的负面影响。

这些就是对党组织发动猛烈冲击的主要突击力量。而如今，这些从中国这场大浩劫中脱颖而出的非党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青年人竟被

看作党的骨干的主要后备力量，并被用来顶替在“文化革命”过程中被免职的那些人。(中共领导人)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试图改变党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原先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政治机关只留下一个外壳。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瘫痪党和国家机关，破坏社会法制的同时，“红卫兵”的活动也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导致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威望。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工人阶级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工人们的物质待遇水平持续下降，工会活动陷于瘫痪，军队纪律被引入企业，工人被迫“自愿”放弃奖金，并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国家。广大农民也被要求从事无偿的强制性工作，农业居民的生活也被彻底军事化。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阶级的地位没有发展变化，那就是资产阶级。该阶级没有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其特权也重新得以确立，并继续享受着国有财富的利息。

加强整个国家生活的军事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显著特征。中共中央八届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提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全民皆兵”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该党所制定的行动纲领。

为了分散国民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当局在人民中广泛进行备战宣传。城乡所有成年居民都被要求加入民兵组织。在所谓“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兵营”的号召下，每个中国人都被变成毛泽东的“听话的好战士”，而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及其作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等观念则被完全抛弃。

在穷尽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以及加速增强自己的核武潜力的同时，毛泽东及其集团根本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我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即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便曾宣称：“坏事——也有其相反的，积极的一面。穷苦人敢于干革命，就是因为太穷。很难想象，人们要是都富了会是什么样。这未必是个好现象。”又正如中国报刊所写的那样，毛泽东要求：“生产要追求高标准，而生活则要保持低水平。”中国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坚定实行合理的低工资体制。”这就是中共官方当时提出的口号。

还在十一次全会前夕，毛泽东便曾要求将军队、工业企业、人民公社和国家机关转变为拥有自给能力的综合性单位，而其中每一个单位都

应同时具备以下功能：军事、工业、农民和文化，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均实行“义务劳动制”，而这种劳动都是无偿的。所有这一切都确保了国家积累的高水平，及其军事工业的相应迅速增长。

中国领导人毫不隐讳地试图使自己的“文化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林彪和康生便曾公开宣称，“文化革命”应被看作是毛主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一项“伟大创举”，必须将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推广。而为此，北京甚至已组建了“红卫兵国际司令部”。

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中国“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突出的反苏倾向。毛泽东及其集团知道，如果人们了解了苏联和苏共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的成就，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失败。因此，即使民众对苏联表现出最微弱的好感，都会被中国当局扣上“民族叛徒”的帽子。而以此，当局试图在中国四周再修筑一座新长城，以严防各种中共领导人自认为危险的外来因素对民众造成影响。

为了营造一种“非常状态”，中共领导人就需要杜撰一个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即指我们国家对中国的威胁——的故事。但要用似乎苏联对中国构成威胁，似乎“苏联与美国结盟就是为了进攻中国”等说法来说服中国人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当局便开始向民众灌输如下思想，即苏联似乎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占据了大量领土。

中国领导人极其虚伪。他们虽然口头上声称，似乎自己“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友谊，才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仅从中国的报刊上我们便可坚定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蓄意侵犯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苏联的最根本利益。

同志们，你们都读过曾于今年11月份到中国访问的苏联社团组织代表团所作的报告。因而知道，在该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人在会谈中做出了许多挑衅性举动，说了大量挑拨离间的话。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进行直接的反苏破坏活动。中国代表的放肆无礼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将与你们在红场相逢，而那时苏联将爆发第二次革命。”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曾写道：“克里姆林宫上空将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我们代表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这些挑衅性的进攻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关于中国领导人现行政策的敌视性质，从其意图来看，我们需重视

这一敌视性质在中美关系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在反对苏共和我们国家的同时，毛泽东似乎在向美国人招手示意，以便后者明白，中美之间已拥有了彼此接近的基础。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我们感到忧虑，即中国外交人员正极力寻求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例如，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官方顾问在与苏联代表会谈中便承认，美国政府“除了与中国人在华沙举行了会晤外，还在与北京进行各种非正式接触”。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不体面的游戏中(有人)正在积极地打反苏牌。

应当说，中国宣传机器极力将“文化革命”推向国际范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进步和思想健全的人们均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而对“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只有个别几个可怜的，得到北京援助的变节者。

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评价“文化革命”，然而众所周知，其均对之持否定态度。甚至连毛泽东最亲密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只是以最一般的方式提及这场运动，更没有表示出将之运用到本国的意愿。总之一句话，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冒险事业在国际上遭到了惨败。

以上便是目前在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展情况(趋势)。所有情况均表明，这场政治运动并不仅仅只是中共的内部事务。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大量党和国家机关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尊严遭到凌辱和践踏，而且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能像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做的那样，对社会主义事业(理想)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中国领导人的“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做出评价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该国对内政策发展的前景问题。毛泽东集团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计划，目前仍很难说。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红卫兵”。不过，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国内反对这一路线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长。尽管出现了“红卫兵”针对各级党的委员会而进行的大规模恐怖和恐吓情况，但他们的行动在一系列地方都遭到了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的坚决反击。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也发生了工人和“红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下面，让我们看一些苏联工作人员从近期在上海街头所得到的一份

新奇文件中节选出的片断。据该标题为“致世界公众”的文件称，“毛泽东完全歪曲了马列主义，结果导致他不仅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而且也与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国家经济瘫痪，民众不满情绪强烈增长，普遍发生工人罢工和大学生罢课现象，经常出现流血事件……(人们)一想到中国的未来就感到可怕。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情况刚刚有一些好转，如今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灾难和大混乱)之中。(民族)前途暗淡，民族处于危险之中。对于诚实的中国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向全世界呼吁，并发出奋起保卫中国的号召”。

该文件再次证明了当前中国国内的复杂和矛盾形势。一方面，许多人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劳动方式等都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客观前提条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显看到这样的迹象——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及其大量的组织和机构，某些民族主义腐化堕落集团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又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折以及各斗争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果毛泽东及其集团将长期顽固地坚持当前政治路线不变，并继续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将难免发生重大波折。

当然，事件的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依然存在有健康的力量，为了使党重新走上马列主义道路他们将不会停止斗争。为了维护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分裂活动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将坚持斗争。而与此同时，所有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也将得到我们的帮助。

同志们!在马列主义党派的文件中已多次指出，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特殊路线”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目前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工人阶级(群体)曾经，即使现在依然是一座不大的孤岛。即使如今在革命成功的17年之后，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没有超过1500万人。

这些都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向中国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导致其容易形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动摇、不坚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等等。

要正确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纲领，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上层都在给人民灌输着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和世界文明中心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均与中国的实际地位，与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现实相矛盾，进而导致中国民族情绪的激化并促使其不惜一切代价以重新实现以前的辉煌。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透过古老的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其精神深处的大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棱镜来进行的。毛泽东本人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说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看作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口众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因素都对许多中国领导人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人口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传统的高人口出生率可以使损失的人口得到迅速的补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得出了如下冷酷的判断：未来一旦爆发世界性核战，地球上的人口就会死1/3、一半，甚至更多。他的上述论断使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震惊。可是，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典型思维模式。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不仅个别人的生命，即使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也都是毫无价值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了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看到和考虑到的。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虽然上述困难导致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相对复杂，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如果中共领导人善于利用这些条件，中国仍是能够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拥有稳固而可靠的后方——苏联。我们国家不仅在物质和政治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确保了中国不受侵犯和阻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涉。当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然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均向中国提供了全面的经济和科技援助。

总之，当时中国已拥有了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能否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否正确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来建设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

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没能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策抵御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如今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观点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还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骨干便与党内其他本质上属于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发生了冲突。而上述两者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了中共整个历史的显著特征。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消灭了中共的多数领导人及其积极分子。这一情况对上述斗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截至1935年即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之前，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集中在军队和个别根据地，而后者均远离国家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在脱离无产阶级的同时，补充到中共党内的新党员几乎只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者和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人员结构上的这一特点使共产国际感到担忧，因而曾多次向中共指出这一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6年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中便写道：“我们尤其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做出的)这一决议，即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凡有意愿者便可被吸收入党。难道党就不害怕一些只求功名地位者混入自己的队伍……我们认为让一些有产阶级代表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忽视共产国际发出的这一警告，继续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阶层入党，从而进一步稳固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的地位。

毛泽东对民族和政治问题所持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滋生了其对工人阶级及其力量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有显著表现。例如，1949年12月，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联共(布)中央代表И.В.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国家成立之后，中共领导人依然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截至目前，工人阶级党员数量的增长仍微不足道。在吸收工人入党的问题上(中共)尚未采取任何积极举措。在党组织中大量充斥着各类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一系列地区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执行得很笼统。”

而当时正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维里奥·斯帕诺同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曾对我们在北京的外交人员说道，“中国的工

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斯帕诺带着忧虑的口吻指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却不能给本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指出明确而清晰的前途”。

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上述这些危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并非空穴来风)。在登上党的领导岗位的同时，毛泽东便开始广泛地利用强暴的、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虚荣的图谋。苏共中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表明，1941—1944年间，在中国解放区所进行的所谓“整风运动”便是第一次清除国际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大规模运动。当时，一些正在延安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苏联军官便曾指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日常行为就跟军阀一样，而不像共产党员。权力体系是纯粹独裁式的。所有异己者实际均被消灭。当时，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负责人便是康生——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这些，同志们，还不是今天的或近来以来的材料。

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反苏情结还反映在如下一个典型事例中。1941年当苏德前线情况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中共军队将可能采取哪些行动以阻碍日本发动针对苏联的进攻。

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呢？如下是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一委托的苏联军官基斯连科同志在1941年9月3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所写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几个混乱的、不清楚的、不直截了当的答复，而且还不断地使用‘如果’一词”。毛泽东对这位苏联军官说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在日本人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之时，我们将采取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大部队作战，因为要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再说我们如今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日本人发动了反对苏联的战争以后我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基斯连科同志继续道，“当我不止一次地重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依然是作了几个令人费解的答复，而且依旧使用了几个‘如果’：如果苏联援助我们，如果国民党不反对我们，如果目前反对我们的日本军队的兵力有所减弱。总之一句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涉及关于向日本开战的问题。而至于他们将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

最终我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稍后，关于这一情节基斯连科将军又作了如下描述：“我说：毛泽东同志，您很了解我们目前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能够放弃如此之多的条件！我们目前显然是无力满足您所提出的那些条件的。因此，我请求您放弃那些‘如果’，就说今天，如果日本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话，你们能够做什么？而毛泽东，不是答复我提出的问题，反而指责我不懂辩证法（缺乏辩证思想），在关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谈话中竟采取如此无礼的（提问）方式。”

从以上整个叙述可看出，中共领导人当前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方针的根源是由来已久的，该方针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共中央不止一次研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与中共和中国领导人活动有关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系统地向党通报，我们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局势的正常化而采取的那些实际举措以及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情况，是自己所肩负的义务。如今，回顾过去，已得到中央委员会肯定的那些文件和实际活动，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过去（对形势）所作的评价，我们（所执行）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们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原则性方针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加强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一致，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自从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密切注视着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的危害性，并极力阻止事件朝着（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苏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极其克制的，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同志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在苏共中央的倡议下，196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1965年2月又于北京举行了我们代表团与毛泽东的会谈。期间，我方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双方现存困难的建设的建议。

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领导人，其中表达了我们为了双方共同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尤其是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业而致力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苏共中央多次建议举行苏中两国最高级别的谈判。

虽然中共领导人仍在系统地实施针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性运动，我们仍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二十三大，在会议期间(从本次会议的讲台上)我们再次确认自己随时准备与中共领导人一道研究现存分歧，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寻求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所提出的所有倡议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正确理解，我们的任何一条建议都没有被中方所接受。甚至于，我们每次所采取的友好举措，最终得到的都是针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恶毒诬蔑性攻讦、污辱和谩骂。

在拒绝接受苏共提出的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建议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还中断了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苏中贸易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而与此同时，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流转(贸易)却增长迅速。

苏中边境的局势也不能不让人担忧。中国是我们的邻邦，我们与之的共同边界总长度达到7500公里。从今年1月至11份，已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以集体和单独方式侵犯我国国界的事件，而且其中多数均明显带有蓄意挑衅性质。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我国东部边界地区的行动具有挑衅性质，目前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以反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挑衅。这里，在此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坚定地宣布，苏联国家的所有边境线都将得到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的警惕而可靠的维护。苏联人民会继续平静的劳动，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掌声)

鉴于这里涉及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想再谈一谈关于1950年签署的为期3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严格地说，根据该条约只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双方)才会在军事上履行互助的义务。不过，在1958年和1962年，在公开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我们又就该条约扩展了我们的军事义务，其中规定：我们将把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行为及其后果视作对苏联的攻击。同志们，你们请记住上述声明。

正如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关于苏中条约的问题仍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我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由于我们所承担的条

约义务而被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拖入世界性的军事冲突之中。但与此同时，即使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依然认为苏中条约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发挥着扼制帝国主义侵略力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何我们至今仍不提出关于废除该条约的建议的原因，虽然中国政府的行为早已破坏了我们联盟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在必要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同志们!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路线，他们的分裂活动和反苏运动对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危害。中国领导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阻碍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所有反帝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助长了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滋生。虽然我们不应过分估计北京领导人的政策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但如果对其负面影响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无疑是不对的。

我们党和所有依然忠诚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兄弟党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将当今中国领导人对捍卫和平、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进程的负面影响缩减到最低。

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一定要对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向着那些为了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给予帮助。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我们绝不允许，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所给予的此类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恶化国际局势和挑起新的世界大战。苏共中央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力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们并不打算在我们国家内煽动反中国情绪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恶感。所有诚实的中国人都应当清楚地看到，苏共和苏联——他们的可靠盟友，发展与我们国家和党的友谊和兄弟关系将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开拓广阔的前景。

在开展针对中共领导人的反苏阴谋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担心出现如下情形，即毛泽东集团会在某个时期赢得我们党和我们人民中某些阶层的支持。北京倒是想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但他们的这一政策就是要放弃共产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福利的方针，放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实行兵营式制度。难道在我们国家里会有人支持这样的政策? !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宣传家们并不仅仅只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针对他们对我们国家所作的恶毒宣传、教唆我们个别人的落后情绪及其在我们各民族间制造不和的企图，我们不可能置若罔闻。与北京的诬蔑性宣传作坚决的斗争，提高民众的政治警惕性——是我们所有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和全党的必要职责。

在国内、外加强向民众解释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党的纲领和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政策，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一样，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来替代之。

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公开批判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一样，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均要求我们对毛泽东集团的思想理论纲领及其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而这也是捍卫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要使中共重新回到马列主义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这一进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我们自己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继续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这不仅是我们理论战线的工作人员，而且也是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我们全党的最重大任务。

中央政治局坚信，中央全会会赞成我们在国际政策领域和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所制定的路线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对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党二十三大路线是正确的。在坚持这一路线的同时，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为了摧毁新的世界大战计划，为了和平事业和各民族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展开积极的斗争。

在当前形势下，在依据1957—1960年间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而制定的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基础上团结马列主义各党派的任务，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党认为积极参与并完成这一任务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将始终以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确立的立场为指导——在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反帝斗争问题上全力与各兄弟党

采取共同行动，加强与其他马列主义党派的关系。

目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日益成为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已有60多个党派要求召集该会议。苏共认为，有必要在本次全会上真正落实这一问题。就召集会议的问题我们将与其他党派进行协商并全面地对之加以研究，以最终达成统一的决定。对此，我们认为该会议并不是以将谁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应当在于：研究当代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反帝斗争，为捍卫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定出一条总路线。

我们坚持要求所有共产党都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是，我们不会同意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党派阻挠会议的召集。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在经过认真的准备和与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必要的协商之后就应当届时举行，而不应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参加与否。

同志们!

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柱。而决定其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的立场和理论以及善于在解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每个历史转折，并对当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马列主义的答案。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理论骨干提出如下任务，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筹备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将使我们深入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促进和加强我们党和苏联在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准备迎接自己光荣的50周年的我们国家，即便在遭到我们的所有敌人和马列主义的叛徒们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完全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思想以巨大的力量造福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并对之产生革命的促进作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沿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而沿着这一道路我们苏联人民、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夺取一系列新的伟大胜利。(雷鸣般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根据我们约定的议事日程，现在

应当宣布休会，然后是两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样，在全会工作结束之前就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鉴此，我们建议，把此次休会时间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十点以前。

台下来代表们的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想，已没有必要表决了，因为同志们的情绪已经表明，我们的上述建议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明天，全会将讨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第一位发言的是Д.А.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宣布休会到明天。

РГАНИ, ф.2, оп.3, д.49, л.3-18

№22988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第二次会议记录

讨论Л.И.勃列日涅夫的《关于苏联的国家政策和苏共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报告(未修改的速记记录)。

(1966年12月13日)

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和А.П.基里连科

А.Н.柯西金——会议主席，建议由Д.А.库纳耶夫发言

Д.А.库纳耶夫——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Н.Г.叶戈雷切夫发言

Н.Г.叶戈雷切夫——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由П.Е.谢列斯特发言

П.Е.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Н.柯西金——建议由B.C.托尔斯季科夫发言

B.C.托尔斯季科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A.Н.柯西金——建议由A.П.希季科夫发言

A.П.希季科夫——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A.Н.柯西金——建议由И.П.拉希多夫发言

И.П.拉希多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Н.柯西金——宣布休会

A.П.基里连科——会议主席，建议由格列奇科发言

A.A.格列奇科——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A.П.基里连科——建议由B.B.格里申发言

B.B.格里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A.П.基里连科——建议由И.И.鲍久尔发言

И.И.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П.基里连科——建议由M.B.凯尔迪什发言

M.B.凯尔迪什——苏联科学院院长

A.П.基里连科——宣布休会

苏共中央全会，1966年12月

第二次会议

(12月13日早上)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同志们，让我们继续进行全会会议，我们将进行报告讨论。

第一位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叶戈雷切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详细报告有力地证明，党的二十三大所确定的我党对外政策方针以及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执行的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的重大贡献。我们中央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斗争，并以灵活、深思熟虑的策略和行动原则把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各民族吸引到自己一边。

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完全、彻底地符合列宁的遗训，促进了苏联国际声望的进一步巩固，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对世界性事件的整体进程和世界革命发展过程的作用。

在这次全会上，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党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问题的讨论，再次证明，苏共中央始终坚决而不断地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团结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胜利而斗争。

这一路线的正确性也得到了生活本身的证明。我们党致力于巩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给予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巨大而全面的支持，从而得到了各兄弟党和全世界进步舆论的拥护。

当前在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对如下事实感到深深的忧虑，即以共产党员自称的中国领导人所宣扬的特殊方针。这一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方针的实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彻底分裂，破坏了保卫越南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统一，并对中国自身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造成了损害。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带有沙文主义狂热和公开的法西斯野蛮暴行的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镇压中国劳动者对毛泽东及其集团冒险主义方针的不满；而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方针——不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将面临深刻的失败。

完全显而易见的是，反对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斗争已是苏共最首要的当务之急。如今已到了坚决揭露中国领导人危险图谋的时候，后者就是

想在全世界面前以自己的托洛茨基政策和实践破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世界的革命性变革的伟大事业。

该报告还直观地展示，北京分裂主义者对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他们赤裸裸地诬蔑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并对世界其他民族实行沙文主义政策。

与这一诬蔑相关，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自己是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不争的事实证明，正是现任的中国领导人是少数民族自由的摧残者，毫不掩饰自己压迫少数民族的大国主义种族政策。该国在许多方面均存在激化民族主义情绪的诱因。

与此同时，许多兄弟党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利用并高度评价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丰富经验，这与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两样。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沙文主义政策，践踏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教导。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事实吧。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共中央的一份纲领性决议中便指出，“全国领土解放以后，将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东干地区建立联合政府，即组建民族联盟共和国”。

然而，这些慷慨的许诺最终并未实现。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在自己的《关于内部矛盾》的小册子中便宣称，“少数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这一伪命题提出之日起，便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已从国际主义立场转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之上。换言之，中国为了“清除”毛泽东所臆想的“矛盾”已采取了强制性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在实际中，这一路线最终演化为奴役和残酷镇压非中国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

我们共和国直接与中国相邻。其边界长约2000公里，与新疆相邻的边境地区居住有许多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鞑靼和其他一些属于哈萨克斯坦居民亲属的少数民族人口。还在194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久以前，上述少数民族便在苏联的帮助下驱逐了蒋介石分子并建立了东突厥斯坦政府。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

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进入新疆，并以反对“三股势力”为借口开始

对1944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子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许多人均被逮捕，当地爱国人士遭到大量屠杀，监狱和劳改营人满为患。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还在那个时候，中国当局便开始在新疆追捕那些对我们国家抱有些许好感的三种人。这再次证明，毛泽东从来就不是苏联和我们党的真诚朋友。

中国当局针对土著居民所实施的沙文主义政策，不仅导致经济凋敝、贫穷和饥饿，而且还完全剥夺了中国这一广大而富饶省份中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

如今，新疆的情况是无法无天，各非汉族的少数民族遭受奴役，因此人们纷纷从这跟监狱一样的地方出逃。

由于担心受到中国沙文主义者的污辱和压迫，饥饿和贫穷，近年来许多中国边民越境进入哈萨克共和国，其中哈萨克族人有16万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超过2万人。每天都有数千人从不同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经常是整个生产队和公社在农场主席和党组织书记的带领下越境，从中国出走苏联的甚至还有军事人员。

从中国出逃的人在当地的处境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越境后基本上都是光着脚、衣不蔽体，甚至赤裸。难民中有许多人身患疾病，身体极度虚弱。这激起了哈萨克民众和全体劳动者的极度愤怒：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领导人怎么能够如此不人道地对待少数民族劳动者！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共和国领导人要求聚集在边境地区的数万难民返回新疆。然而，针对我们的要求人们都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再重返中国。

难民们还给苏共中央发出了许多声明书，以下便是其中一份声明的具体内容：

“我们违法越过了两国国界。中国当局压迫、污辱我们。由于饥饿，我们公社中不断有人饿死……对于越境之事我们随时准备承受任何惩罚，但只是恳求：不要把我们遣返回(中国)。”

事情很清楚，为何这些人不愿意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在公社中被强

迫像奴隶一样无偿劳动，吃的是“大锅饭”，被禁止拥有个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果有谁试图偷着为自己单独做饭，中国监工便会立即出现并强行没收人们可怜的一点食物。在城市，所有对当局政策不满者均被剥夺领取食品票证的权利。

从中国越境来到苏联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前军长——少将M.伊斯卡诺夫、新疆国家安全局局长T.马赫穆多夫同志、喀什噶尔军区前司令员M.尤苏波夫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新疆当地民众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残暴污辱抱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所有这些抗议均遭到了当局的无情镇压。1962年5月29日，在伊宁城里，数千群众到市委大楼前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或允许其前往苏联。游行者被控犯了“反革命罪”，中国军队用机枪向集会群众开火。结果导致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我们认为，大量哈萨克、维吾尔以及中国民族人口从新疆逃跑——这是不争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劳动人民不赞成北京领导人所实行的政策，并反对这一政策。如今，关于此即使在中国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近期所出现的一些迹象已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中国难民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了跟亲兄弟一样的待遇。他们的劳动安置和物质保障以及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均得到了(苏联有关方面)的全面关心。如今，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苏联找到了真正的祖国，并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关怀。

我们还掌握着其他大量的事实，它们充分证明中国领导人已彻底背离了以民族友好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

新疆的土著民族经常受到当局的歧视和污辱，被称作持亲苏观点者，并强迫中国人称之为老兄弟。针对那些反对此类做法的人，则被扣上“反中国分子”的帽子并发往所谓的劳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疆还出现了强力压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即使表现出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思想也会受到当局的追究。难民们说，当局以与“民族主义”作斗争为借口，把绝大多数哈萨克和维吾尔等民族的负责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均撤销了职务。

在对少数民族实施粗暴镇压的同时，当局强奸民意(对人的个性实施强制)。问题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当局强迫哈萨克、维吾尔等民

族的父母只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中国人)。而不愿意把姑娘嫁给汉族人的，就被认定是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当局还强制向各少数民族引进自己不熟悉的、汉族人的典礼仪式：在婚礼上强迫人们向毛泽东肖像祷告。只有在举行了这样的仪式之后，婚姻才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当时，为了尽快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水平，新疆的进步社会人士作出了关于边疆地区各民族——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等采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的决定，就像苏联许多共和国所做的那样。为了阻止新疆各土著居民与苏联哈萨克和其他已采用俄字母的民族接近，北京沙文主义者取缔了这一决议，而且连一些已被当地居民普遍接受的族际术语也强制用汉语语汇替代。在民族教育系统中教科书只使用汉语讲授。

为了加速对土著居民的同化过程，当局以各种借口向新疆地区迁移了数百万汉语人。与此同时，土著人口将被从边境地区驱逐至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

如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大量前中共党员，都对中国沙文主义者怀有无比的愤怒。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悲愤地指出，如果(中国当局的)强制同化活动继续以目前的规模进行，那么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四百万维吾尔人就可能在几年之后不复存在。

试问，这种强制各少数民族汉化(中国化)的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何共同之处!

中国各级政府的无法无天在臭名昭著的“文化革命”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红卫兵”摧毁了新疆几乎所有党委会。他们闯入居民家中，砸毁苏联生产的收音机、器皿和家具。他们甚至还砍掉了位于乌鲁木齐市的以前苏联领事馆大楼附近的树木，理由是这些树都是由苏联人栽种的。中国当局还强迫所有对自己的行动不满者每昼夜工作16—18小时。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活动还表现在，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公民蓄意侵犯我国边界的事件。而且，此类侵犯还伴随有针对苏联边防军人的粗暴、污辱性行为。例如，曾有约200名中国公民在谢米帕拉金斯基州扎满旗哨卡区域侵犯我边界，并在中国军人掩护下开垦我方土地。只是当我们采取了有力措施后，中国人才狼狈撤退。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例：中国当局向我国派遣中国公民，目的在于

搜集、侦察关于苏联边境形势、防卫和军队部署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在本共和国领土上实施破坏活动。

中国当局还在新疆沿苏联边界修筑防御工事、居民点、堑壕和掩体。

功率强大的中国无线电广播每昼夜平均13—14小时用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播放节目，至于俄语播音就更不用说了。其目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培养中国各阶层的反苏情绪，瓦解苏联民众的信念。此类宣传，在违反了基本常识的同时，竟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

例如，中国理论家们粗俗地编造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他们从数个世纪以前的尘埃中连最反对的统治者都搬了出来。吹嘘什么中国的奴隶制度似乎比欧洲的要好。他们以最严肃的腔调断言，中国封建主义曾经是世界上的“典范”，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经典，而其发展只是“由于来自欧洲的白种人”才暂时停滞。

他们的宣传违背了历史事实，其中包括宣称哈萨克斯坦的诸多广大地区，直到阿拉木图为止，自古便属于中国。

中国当局敌视我们党和国家的狂妄活动自然激起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以及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回击北京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路线。

正如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方面如今正确的做法是开展进攻性的反宣传。本次全会文件将有助于我们全党了解当前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形势。我们当前要做的，不是大叫大嚷，而是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走狗们的真实嘴脸。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要告诉中国人民如下情况：关于苏共的政策、苏联人民的生活及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情况，苏联落实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就。

在采取上述步骤的同时，我们还要展示自己与中国所有健康力量的团结意愿，而这将抗衡中国领导人的带有严重后果的政策，并以此履行我们对伟大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开展针对中国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广播。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充分展开这方面工作，原因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没有功率足够强大的无线电广播站。事实上自

从1960年中国广播电台日复一日地开始进行针对苏联的诬蔑性广播起，我们各部门之间也开始就在阿拉木图地区建设广播电台的问题进行谈判。

鉴于中国领导人明显地不断加紧反苏宣传力度，我方也应采取措施，以便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整个思想工作。众所周知，振兴思想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全力改进我们的文化教育机构、电影、广播、电视、报刊和其他能够对民众思想发挥影响的手段。然而，目前上述活动实际上均处于分离状态，因为他们隶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这种文化机构领导职能上的分离，不但不能适应哈萨克斯坦的实际需要，而且相反只会导致宣传机构的分裂和原本就不多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这就正如现在新流行的一句俗语：“一位演员——三个部长管。”今后，最好能把文化建设方面的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机关并由它统一解决。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思想工作。

同志们！

我们为捍卫共产主义运动马列主义总路线，而即将采取的那些举措将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我们即将面临的斗争是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但我们相信，这场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终将有一天，中国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会与我们一道前进。

我们完全拥护苏共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政治纲领所采取的路线。

我们完全、彻底地拥护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本次中央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理论原理和实际结论。

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将始终与全党站在一起，将在各方面积极、坚持不懈地深入落实我党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列宁主义原则路线。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下面发言的是叶戈雷切夫同志，谢列斯特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 ф.2, оп.3, д.43, л.1-15

№2298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

苏边界问题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第三次会议记录

(1966年12月13日晚上)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让我们继续全会工作。下面发言的是乌苏巴里耶夫同志——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作发言准备。

乌苏巴里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对当代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分析。从该报告也可极其清晰地看出，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自己的各方面活动中，都毫不动摇地以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为指导，这一方针的实施必将带来显著的成果。

吉尔吉斯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热烈拥护和一致支持我们党中央及其政治局以确保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巩固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为目标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同志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教导说，全世界共产党人应当严格地维护自己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在当前条件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加紧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以及世界一系列国家均出现了复杂的局势之际，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团结问题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可是，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开始了前所未闻的反对苏共和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劳动者们，都无法不对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荒谬决议感到无比的气愤。该决议实际上把苏共中央和苏联宣布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也只能称作是对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

每个人都清楚，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论是与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以野蛮的精神狂热，毁灭伟大的文化遗迹，大规模地镇压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党

的骨干，并带有肆无忌惮的反苏倾向，势必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造成巨大的危害。

同志们!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作了清晰的评价。我们衷心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反苏政策。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北京领导人们正在日复一日地加紧自己的反苏运动。

尤其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发动针对我们国家的直接破坏活动。例如，在中国与我们共和国相邻的一些地区就发生了这方面的事件。我们共和国与中国相邻的边界长度约有一千公里。

从1962年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国家边境附近集结大量军队。他们沿边界线修建了数百个(土木质)火力点和军事设施。经常发生中国地方当局针对苏联军人和边境居民的挑衅活动，并占据了我们的一些领土。

近两年来，已发生了30多起中国公民和边防军触犯国界的事件，相当一部分此类事件均具有直接挑衅的性质。下面便是其中一个事实。

今年8月，中国边防军以奥绍基州乌兹盖斯基区西多洛夫集体农庄社员牧羊人阿萨诺夫侵入中国边界为由抓捕了他。他们把阿萨诺夫拘押了15个昼夜，讯问了关于苏联边防哨卡的数量及其分布、苏联境内公路和乡间土路的路况、通讯线和苏联人的情绪等情况。只是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要求下，中国当局才被迫放回了阿萨诺夫。

近年来，在苏中国界线上我们边防军拦截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难民。其中许多人都带有特殊任务——搜集关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

中国当局在从事反苏活动中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即使采用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如今，大量苏联公民都在从事向中国运送出口商品的活动。而在这方面中国当局便使用了各种手段，加强对苏联公民的反苏影响。在边防检查口岸中国人开设了专门的商店和食堂，并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向苏联工人提供工业品、食品和酒以及免费的反苏宣传品。去年，中国向我共和国境内许多私人和机关发送了上千份

载有反苏内容的出版物。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该省边境居民点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当地居民均被大量迁往中国内地，其中包括荒漠地区在内——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把国家中部地区的中国人又迁往上述居民区。

中国当局还在这里实行了强制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东干等中国化的政策。正如来自中国的一些公民所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接受列宁的民族政策，因为据说中国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

中国国家机关的主要工作用语是汉语。在东干族报刊《十月旗帜》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信中，有一位东干族人写道，中国政府之所以镇压了大量东干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原因仅在于这些人要求创建东干民族文字。

一些在苏联拥有亲属或其他关系的中国公民受到严密监视，那些同情我们国家的人们均遭到了中国当局的镇压。例如以下的一些事实：据一位1963年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中校伊斯马伊洛夫说，他与其他一些人被控为民族的叛徒，因而被开除军职并发往农村参加劳动；伊犁—哈萨克斯坦州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哈季耶夫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理由是他有亲属在苏联；去年9月，中国红色卫队将新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86] 包尔汉·沙希迪开除公职，原因仅在于他似乎过去曾说过称赞苏联帮助中国的话。仅仅由于这方面原因，许多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被(中国当局)撤销公职并发往所谓的劳动教养集中营。

据亲历者讲述，在新疆地区的集中营和劳教所内关押着数万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满者。从北京和乌鲁木齐市，昼夜不停地用俄语、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播放着反苏内容的广播。在我们共和国全境都能非常清晰地收听到这些节目。苏联人民极其愤怒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诬蔑性言论。不过，我们也不能轻视这些恶毒的敌视性宣传的危害。据检查发现，一些居住在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经常收听这些反苏广播，并在苏联人中间传播这些广播内容。

甚至个别中国公民还定期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写信，并根据其工作

人员的指示搜集居住在本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相关信息，收取用于在我们居民中开展宣传的反苏资料。我们必须对北京的此类直接反苏活动予以重视。

吉尔吉斯党组织认为，针对北京所实施的顽固反苏活动和发出的诬蔑性言论，给予坚决的斗争，因此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大量工作，以便向劳动者解释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还加强了针对共和国居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工作。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将采取相应举措，以进一步改善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日常生活服务条件。人们应当注意到，我们正在这些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居民住宅和文化日常生活设施建设，扩大中学教育、医疗机构和贸易网络的分布。

共和国党组织仍将面临的任务是：依据本次中央全会所要求的标准，投入更大精力，以加强针对居民的思想特别教育工作。

我们的意识形态机构应当展开积极的工作，以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图谋。正是在这几年间，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所谓关于某些中国领土的挑衅性言论，似乎这些领土都是被苏联侵占的。

甚至于，一些北京出版的地图竟把新疆的边界向西远远地推进到了巴尔喀什湖沿岸。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广大地区均被(中国当局)涂上了中国色，并宣布为暂且尚未统一的(中国领土)。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赤裸裸的觊觎没有任何历史的、民族学的，以及政治方面的根据。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在18世纪下半叶，对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草原的短暂掠夺式侵袭，并不足以作为这些土地已归入中国清帝国版图的依据。清朝历代政府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并多次承认这一事实。

然而，北京却伪造历史事实并极力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是，甚至连18世纪的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们对历史事实的研判，都比当代自称共产党的中国领导人客观得多。

与全体苏联人民一样，吉尔吉斯人民以愤怒的心情谴责中国领导人赤裸裸的大国沙文主义觊觎，并宣布苏联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

要说的是，至今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刊登一篇揭露中国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的赤裸裸的觊觎的文章。而与此相关，还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历史书籍方面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在著作中，对于在不同时代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作了错误的阐释。让我们以1957年出版的《吉尔吉斯历史》一书所刊登的地图为例。如果依据该地图来判断，那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大部似乎在19世纪初已属于清帝国范围。这些关于中国边界问题的错误资料在其他一些由我们苏联史学家出版的书籍中也同样存在，如《塔吉克民族史》、《世界史》第五卷等。

我们必须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没有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个别苏联作家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中亚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有时，他们把纯粹属于暂时的、可能随时变化的现象当作了永恒，把微不足道的缘由当作了吉尔吉斯和中亚其他民族与中国亲近的证据，但这些所谓证据都是虚构的。

我们共和国在纠正这些错误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迫切的工作需要继续做。

为了加强揭露北京领导人的挑衅性反苏活动，我们认为，理应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共和国境内，组建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广播电台。我们认为，这些广播将有利于中国劳动者们了解关于苏联、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成就的真实情况。

我们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在巩固我们与中国的边界和确保我们各民族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同志们！苏联人民正在筹备自己亲爱的苏维埃国家的50周年庆典。吉尔吉斯劳动者将跟全体苏联人民一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将以自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新的劳动成就，致力于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节日，并将继续积极地为落实我们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而奋斗。吉尔吉斯共产党员们一致拥护Л.И.勃列日涅夫所作报告中的全部论断和结论，坚定不移地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执行本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下面发言的是葛罗米柯同志，白俄罗斯共产

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 ф.2, оп.3, д.44, л.1-48

№22986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 (1966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1966年12月13日)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落实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方针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循序渐进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同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苏联为捍卫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各民族的安全，为劳动群众争取自由、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强国，尤其中美帝国主义以及联邦德国复仇主义集团也在国际环境正常化和加强和平的道路上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今后，我们必须给予帝国主义好战势力及其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和挑拨军事冲突的活动以坚决的反击。

全会称赞了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认为有必要今后继续全方面地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犯罪式侵略的英勇斗争。

在赋予加强欧洲安全事业以重大意义的同时，全会认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实现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华沙条约国政府首脑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文件中所表述的那些原则而斗争。

中央全会特别强调，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巩固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与民族解放各力量的联盟的方针——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全会完全赞成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领域所采取的路线和实际活动。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均证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领导人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所执行的方针，他们针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性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活动——所有这一切均与马列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的政策，如此的行动只会给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利益，给中国人民自身的社会主义胜利带来损害，并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

中央全会批准了我们党的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与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与此同时，全会认为必须坚决揭露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观点、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针，加强捍卫马列主义以及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历次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

在当前复杂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团结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而斗争，便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意见，即现在就着手为召集新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大会创造有利条件，在各党派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好。

苏共中央全会号召各党组织、苏联全体劳动者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功地落实党纲和苏共二十三大所确定的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计划，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光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到来。

(用于记录)

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研究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决议。 [87]

№25980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1966年12月20日)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环球快递订购服务

香港邮寄商品 邮政信箱：4705号

1966年12月20日

俄罗斯 [88]，莫斯科

外交部部长

尊敬的先生：

鉴于贵处有良好的渠道，我们很荣幸能写信给您，寻求贵方是否可向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 驻在贵国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名称和地址。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外使馆、领事馆和贸易代表处的名称和地址。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同贵国进行如下商品的贸易：苏联古玩，礼品和工艺品，人造珠宝，皮毛类商品以及俄罗斯民族服饰等。

我们希望能够从贵国进口这些商品，如果贵国能够给我们提供良好的供货渠道，从而使得在香港同苏联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非常感激。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贵方在用英文写作方面存在困难，我方亦可接受西班牙文的回复。

感谢您的耐心，希望尽快得到贵方的好消息，同时，再次表示我们的诚挚敬意。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

经理(签名 [89])

№25554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 [90] (1966年12月24日)

关于中国“北京广播电台”

中国对苏联的广播始于1962年。最初广播的时间为一天5次，每天两个半小时，至今广播的时数达到每天14小时，有22个电台同时广播，如北京、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天津。一天同时广播的总输出功率4000千瓦(BBC——700千瓦，美国之音——3700千瓦)。

中国人不承认广播波段的国际分配，不仅利用广播波道，而且还利用短波、中波进行广播，这样就干扰了其他部门(航空部门、海事部门)。为了进行反苏宣传广播，中国动用了大量技术设备，他们的广播内容在全苏联范围内都能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中总是可以听到击鼓声，荒谬透顶的“革命”口号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休止的、接近荒谬的赞誉、对中国情况进行精心的美化，以及对反苏编造的“造谣污蔑声”……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广播电台”俄语广播始于1961年11月……电台的总输出功率约100千瓦。广播内容明显是反苏的，广播被通讯部通过播放音乐节目的技术手段而覆盖。

РГАНИ, ф.5, оп.58, д.25, л.159-160

№25555 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 [91] (1966年12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西方广播电台将中国文化革命与苏联历史现象作比较

……

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谴责并尖刻地嘲笑中国所谓的“文化革命”，嘲笑对毛泽东进行的大规模的荒谬崇拜、“红卫兵”的专横和不法行为的同时，与苏联历史上反常现象相提并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共产党思想抹黑，让苏联人民相信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邦达连科

1966年12月26日

РГАНИ, ф.5, оп.58, д.25, л.133

№10403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1966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12月28日会议第16/15r号记录

第15项 关于加强对华广播采取的措施。

一、提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邮电部、苏联无线电工业部、俄罗斯联邦建设部、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注意：在解决进一步发展苏联对华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缓慢的现象。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采取措施提高苏联无线电广播的效力和作用，在以下几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进行系统的宣传：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

——阐明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目前的状况；

——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渐被孤立，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反帝斗争的危害性以及这种危害性已经表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中，揭露中国领导人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缺乏理论根据以及该政策给劳动人民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揭露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党内民主的现象；

——广泛地利用以前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其他全会所做出的决议以及毛泽东以前的讲话，揭露毛泽东集团在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苏关系问题上以及世界革命运动问题上脱离了中共以前做出的决议；

——加强对中国军界的专门无线电广播宣传；

——定期吸引各类苏联人，首先是老职工对中国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以便更具体地揭露臆想的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抱有好感的谎言。通过代表苏联社会组织的《和平与进步》电台，转播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三、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以下建议：

(一)关于在委员会内成立一个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总编辑部以及一个由6—8人组成的编外评论员专门小组的建议；

(二)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建立无线电监听站分部，以便收听北京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电台华语广播的主要内容；

(三)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编制内增补一个记者名额，以便其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用于对中国的广播中；

(四)1967年将开始对中国进行昼夜广播。

四、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必要数量的定员编制和相应的资金，以便实现本决议中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同时拨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用于建立无线电接收站的用地以及该站工作人员必需数量的住宅。

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选派10名苏联中国学大学生前往新加坡高等院校学习，期限为3—5年，以便培养中国上海和香港方言无线电播音员和编辑人员。在3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六、采纳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的建议，在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额限度内，压缩短波广播站，建设大功率的中波广播站，并在1967—1969年期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依靠上述期限内中波电台投入使用，扩大对中国广播的中波电台的功率，至少增加一倍，在斯沃博德内市——功率是1000千瓦，在新西伯利亚市——500千瓦，在杜尚别

市——500千瓦，在伊尔库茨克市功率是500千瓦，并带有高效率天线。

七、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苏联无线电工业部(波格丹诺夫同志)、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雅库鲍夫斯基同志)、苏联电力电气部(涅波罗日尼同志)、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部(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为在斯沃博德内、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和伊尔库茨克等城市建造的无线电台及时提供无线电发射机；保证必需的金属和制造成套的塔式桅；架设电力输送线路和建造变电站；进行必要的配套工程建设和专项工程建设，此处指的是1967—1969年指定投入使用的广播站。

八、考虑到完成本决议中规定的建设无线电广播站工程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责成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和阿穆尔州州委员会，对这项工程进行特别的监督，在保证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及时投入使用方面给予通信和建筑上的必要帮助。

九、对于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关于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的补充措施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与相关的各部和部门共同研究这些建议，并注意加快其他无线电广播站建设(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已经作了规定)，注意保证无线电建设工程当务之急所必需的设备、机械和材料，同时还要关注在本五年计划中完成额外大功率的无线电中心的建设。

在两个月期限内，将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十、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梅夏采夫同志)，定期向苏共中央通报本决议执行的进程。

十一、提交政治局审批。

文件送：普苏尔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沃罗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鲁萨科夫同志、西佐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37—4339页

1967年

№2571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 ^[92] (1967年1月10日)

.....

美国和中国都是在谨慎地试探对方的意图，寻找调解双方争论问题和今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苏的分裂方针是1966年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新动向的基本原因。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弱势，千方百计地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使美国有机可乘进攻中国。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逻辑.....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在斗争中利用美国，甚至试图挑起苏联与美国直接冲突。

腊斯克于10月7日与匈牙利的佩特尔部长举行的会谈中宣称，美国“与北京的外交接触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1966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动向并不表示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发展得很快”。存在一些重大的客观障碍，它们暂时难以克服，首先是台湾问题、越南问题等。

.....中国领导在越南问题上追求自己特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目的。他们想借越南人的手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手破坏美国的军事威信，将美国从东南亚排挤出去，而中国人把东南亚看作为他们传统的势力范围.....

陈毅于1966年8月23日在与波兰大使克诺泰的会谈中直截了当地说，不相信“美国会对中国进行侵略”。

.....

№25478 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 [93] (1967年1月12日)

.....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相比，中国的权力机构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武官公开表现出好感。比如，1966年9月30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建国17周年招待会上，所有武官中仅邀请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官。

.....1966年11月底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处的邀请，我驻华武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参观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就现代革命问题进行“授课”。在我武官问参观是否已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回答，参观博物馆已经结束，但计划中还有关于现代革命内容的会谈。

.....

АВІ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3, л.3-4

№25484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 [94] (1967年1月20日)

.....

可以推测，将大量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从驻外机构召回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努力清洗自己驻外机构中不合适的工作人员，即那些因某种原因得不到政府信任的人，并将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拥护者派去充实驻外机构的空缺。

.....

АВІ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1, л.8

№25704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

近的遭遇 [95] (1967年1月25日)

.....

69名留学欧洲的中国大学生途经莫斯科时，向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墓敬献花圈。悼祭仪式以后，学生们朗读了毛泽东语录。苏联军人和民警推搡和殴打中国女学生。我们学生正唱着国际歌的时候，苏联一群军警和便衣警察包围了他们，并残酷地殴打了我的同胞，制造了一次闻所未闻的严重流血事件。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п.228, д.11

№25721 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 [96] (1967年1月25日)

.....

中国留学生得到允许(安放花圈)后.....排在苏联公民的队伍后面，他们安静地走向列宁墓前。在入口处将花圈安放在警察给他们指定的地方以后，他们不愿进入陵墓，拥挤在入口处，拿出毛泽东语录后，他们开始高声朗读.....对要求他们别拥挤在入口处的建议，他们拒绝了，并开始唱国际歌。后来在民警队和苏联公民的积极参与下，他们离开了陵墓，被挤出了红场。

.....应该指出的是，只是警察的介入才防止了苏联公民对中国人进行更多的肢体攻击。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2, д.12, л.1-2

№25975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1967年2月3日)

..... [97]

苏联的立场。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1951年以前和1956年，当时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边境是开放的，随后到1962年有100多万人移居香港)。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并表示，在香港生活的华人并不是政治难民，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生活的干涉。

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的执行情况报告时，苏联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像香港和澳门这类脱离祖国，现在仍处于殖民主义占领下的领土，毫无疑义，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应该由后者收回，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还应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以前，联合国的任何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在1962年12月1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怂恿中国采取一些其自身认为不合适的行动是不正确的。中国政府考虑到了目前形势和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当到了中国朋友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容忍时，他们会厉声说：‘收拾东西，滚蛋！’我们将对这一步骤表示拥护。但在做这件事时，要让中国朋友自己去做。我们不能催促他们”。

从1948年到1962年，苏联代表只是在前往日本和其他国家中途过境时到过香港。苏联驻中国商务代表在1962年5月、1964年2月和1966年末到过香港。入境签证是从英国那里拿的。苏联记者一直驻留在香港。在回国后他们发表过关于香港的报道。(《消息报》1964年4月29日，《真理报》1964年5月27日)

苏联对外贸易组织全苏联合公司各类商品出口公司、医疗器械出口公司等同香港一些公司有过商业接触(年贸易额达200万港元)。还要指出的是，全苏对外贸易公司“国际旅行社”、“民用航空公司”和其他一些机构同香港公司之间在空运和旅游等问题上有过接触。苏联机构在进行这类接触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香港是被“强占”的中国领土，而不是“殖民地”，或“自治地区”。所有的接触都未超过商务问题的界限。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文号102/ДВНС

1967年2月10日

文本10сэ/зс , аа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АВПРФ , ф.100 , оп.54 , п.231 , д.31 , л.10-11

№25707 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 围攻 [\[98\]](#) (1967年2月4日)

.....从今年1月26日起，白天和夜里都在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了激烈反苏的集会，并组织了这样的示威游行。

.....被反苏的宣传蒙骗的一群中国居民肆无忌惮地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举行了篝火集会，焚烧苏联领导人的肖像。

2月2日，在首都的大街上挑衅者拦截了两辆汽车.....汽车里的外交人员想为使馆和其他驻京苏联工作人员的妻儿购买车票.....在16个小时内肆无忌惮的人群对这些外交人员采用了挖苦、污蔑、人身攻击的恐吓和其他心理恐怖手段。

.....苏联临时代办十多次要求会见外交部的代表。

.....对苏联临时代办的请求给予了示威性的拒绝.....甚至切断了苏联大使馆试图与外交部联络的电话。

.....中国当局的行为引起苏联人民的义愤。苏联政府认为必须警告中国政府，苏联人民的忍耐是有限的。

苏联将保留根据当前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和合法利益。

АВПРФ , ф.0100 , оп.54 , п.228 , д.11 , л.105-107

№25738 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 [99] (1967年2月4日)

2月4日，H.П.费留宾接见了一些驻苏的大使和临时代办，其中有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向他们通报A.H.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以及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已刊登在报上)。

H.П.费留宾(对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声称，“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我们决定对中国的挑衅予以回击”。

.....

2月2日，苏联外交官乘坐两辆汽车去为自己的家属购买回苏联的机票，被红卫兵扣留了16个小时。

2月1日，苏联大使馆附近有4名大使馆工作人员遭到袭击。

1月31日，运载专家的苏联客机降落在北京加油，被革命群众包围。

.....

АВПРФ , ф.0100 , оп.54 , д.227 , л.9-15

№25710 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 [100] (1967年2月6日)

.....当地时间2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我们发出了“重要通告”。

“现在我们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能离开大使馆。否则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由此引起的后果由苏联大使馆自负。”

大使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保证去机场为妇女、孩子送行的使馆工作人员安全返回使馆驻地，对乘坐21名工作人员的汽车放行，

让它返回使馆。汽车已经被拦截了3个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接受抗议，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坚决支持我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都对中国外交官在莫斯科遭受的迫害感到愤怒。所有离开了机场的使馆工作人员，由于不能进入使馆驻地，都待在波兰大使馆。

葛罗米柯将此电报分发给政治局的各成员。

.....

АВПРФ, ф.0100, оп.54, п.228, д.11, л.125-126

№25959 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1967年2月15日)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近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阿特巴什、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乌兹根和阿赖等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和国防工作已得到很大改善。在适龄入伍和入伍前年龄青年中，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更具有制度性。但对于其他人口，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系统，并不总能满足相关要求。

应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和这些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之要求，各区党委、共青团、区执委、区军事委员会、社会组织在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工作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仍无法完全胜任他们所面临的任务。

究其原因，当然很多：这些地区所占面积大，道路网络薄弱、交通工具不足，区党委、共青团、区军事委员会在编人数少，懂行、善于从事国防工作的骨干匮乏，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及这些地区距离共和国中心大城市太远，等等。

为了强化这些边境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整个国防工作，在短期内提高人们的军事素养，我们应在国防动员和防御能力方面采取如下举措：

- 1.最近，召集党和共青团会议，通过说明中国事件的本质，动员各

居民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企业和机关积极分子，提高上述地区全体居民的警惕性。

在所有居民点人口中开展解释工作，尤其注意提高人们的警惕性。

为开展这项工作，应重视素质较高的党员积极分子，提前对其作相应指导。

责成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通过定期召集座谈会、报告会和讲座等方式，宣讲党和政府决议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成就，揭露毛泽东分子的反苏宣传，加强民众的政治军事警惕性，教育人们与间谍、特务和各种破坏分子作斗争。

及时、准确地向党和苏维埃上级机关通报边境各居民点形势、居民情绪及其政治思想动态。

在所有地区建立印刷所和区报编辑部。

2.把军事教员列入固定编制，强化上述地区区党委班子。在位于边境的奥什州党委中设立军事部。

3.把军外训练处列入区兵役局固定编制(配置军官2—3名，士兵2—3名)，责成其负责兵役适龄青年和兵役前青年的军事训练，以及当地居民的军事培训工作。

4.组建丘普斯克区军事委员会，以便杰特奥古兹斯克区军事委员会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本区工作上。

5.为提高征兵纪律，兵役人员登记的真实性及其动员准备，应在各边境地区村苏维埃设立兵役办公室，并安排固定兵役登记人员。

6.在所有中学、技校和职业学校设立军事教导员。确保边境地区学员军训教学课程的必要物资供给。

7.用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到边境地区的全苏支援陆海军志愿协会组织。在各地区中心设立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教学点，并配备必要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在边境各地区集体农庄和企业建立射击武器研究、汽车修理、无线电技术基础等小组。

对当地居民进行必要的普及性军事训练。

8.为提高各地区的动员准备能力，应给各村苏维埃部门开设动员集训班，培养其完成信息通报和物资供应等工作的能力；给汽车运输企业、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负责人开设集训班，培养其为军队提供技术保障的能力。

9.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的电话联络，区中心与伏龙芝市，以及阿赖和乌兹根等区中心与奥什市的无线电通讯联系。

加速建设丘普斯克区的通讯枢纽。建立边境附近所有居民点的二十四小时通讯值班制度。

所有区兵役局都要建立能与伏龙芝和奥什市保持联系的无线电站。

10.体育协会和组织应采取针对所有——尤其是边境各地区——青年的体育训练，并授予综合素质达标者“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徽章。

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军事爱国主义素质教育。举办运动会、军事游戏和组织青年到军事名胜地行军。

11.要使位于雷巴奇耶、普热瓦利斯基、纳伦、乌兹根等城市和阿赖地区的民用机场能用于军用飞机起降。为这些机场装备必要的导航和防空设备。

12.改善道路网络，尤其是那些能够通往边境的居民点线路。扩大桥梁的载重及其通过能力。

13.扩大客车停车场，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之间乘客能够更宽松、稳定的通行。

14.实现所有居民点的无线电化，确保与外界联系通畅，以便必要时立即向居民发布相关信息。

15.组建地方自卫队。由预备役军人和适龄入伍青年组成。从部队军官和军士中选拔经验丰富者作自卫队的指挥官。

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由区党委和区军事委员会与边防军指挥员一起共同制定自卫队行动计划，以便与边防部队的行动相互协调。

16.在区军事委员会或边防警备队储备用以武装自卫队的武器和装甲布雷车弹药。

17.事先研究，当遭受进攻情形下在可通往国土腹地的山路、山道上设置鹿砦的可能性。为此，须预先勘察当地地形。在边防部队储存必要炸药和其他引爆装置。

18.应建立预案利用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快速向遭到进攻威胁的自卫部队空投武器和爆炸装置。

19.责成医疗机构严密监视水源，尤其是源自边境的河流和小溪的卫生状况，检测其污染状况。

20.每个居民点都要有由当地人组成的志愿卫生队。

建立能够提供基本救助的药品“应急储备”。预案撤退方式。

21.在区中心储备充足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22.各地区都要预备把儿童和妇女撤往国家腹地的计划。为此，应事先预备必要的交通工具。

23.边境居民点义勇队保卫通讯枢纽，以便在通讯线路故障情况下仍能以其他方式确保与区中心的联系。

24.加固主要的，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抵达我国边界的边境居民点的工事。

25.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应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各边境地区国防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等所有行动。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委员

萨姆萨利耶夫少将(签名)

1967年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1—1076页

№25962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

传的措施(1967年2月16日)

特别卷宗(手写)

绝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7年2月16日第3次会议第38号决议记录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决议的措施

1.接受苏共中央今年2月10日“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决议，并责成相关领导予以落实。

2.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附属电视广播委员会确保无线电宣传工作的切实有效开展，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揭露“文化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

——对成为“文化革命”牺牲品的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其他集团的现状进行报道；

——展示中国在国际舞台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日益孤立，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对反帝斗争和反击美国侵略越南诸事业的危害，中国领导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经济政策的不切实际、违背社会主义规律和党内民主，以及对劳动者利益造成的损失；

广泛利用以前的，尤其是中共中央第八次、第十次及其他全会决议，以及毛泽东发表的言论，以揭示毛泽东集团背离了中共以前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决议；

——强化专门针对中国各军区的广播宣传；

——通过广播定期播放各行业苏联人，尤其是劳动英雄的言论，以具体事实揭露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事业抱以同情的谣言。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25723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年1—2月中国的反苏运动 [101] (1967年2月25日)

.....

中国领导集团把反对苏共和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斗争作为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目的，并把它们作为实现霸权与大国主义目标最主要的阻碍，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进行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与苏联作斗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定，该决定巩固了反苏为党和国家的官方政策。就是这些决定成为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组织的挑衅以及1966年8月20日开始的其他反苏活动的基础。中国方面在1967年1月底在北京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挑衅和敌对行为.....是中国发动的民族主义及大国沙文主义逻辑的延续，为加强该民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去年12月底以及今年1月它们指责苏联“军队在中苏边界进行集结”以及“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

新的反苏运动的开展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是毛泽东与其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斗争。反苏挑衅组织者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人民对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中的失败和错误产生的不良情绪，为了表明冒险的反苏方针得到全面的支持，以便在反苏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把意志不坚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在中国国内加强反苏尽快建立起一堵中苏人民之间的“万里长城”，使之完全消除苏联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思想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在中国的影响。按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设想，这样可以减轻对敌人的斗争，以便掌控权力和证明军事官僚独裁手段的正确性。

中国领导集团燃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火焰，目的是完全置两国之间的关系于不顾，甚至与苏联彻底决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到过与苏联分裂，甚至打仗的可能性。今年2月5日，陈毅在接见西安高等院校联合兵团和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代表时说，“苏联问题可能有所发展，可能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可能打仗。你们这里(西安)以及东北和内蒙古会成为前哨”。

.....可见中国在实行分裂方针的同时，也担心走这一步棋所引起的后果，试图让苏联首先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可以认为，这就是他们在这时期使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反苏的举动也是有预谋的，它们得到政府和当局的鼓励。众所周知，新的反苏浪潮的起因是今年1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中国挑起“痛打”中国留学生的事件。第二天傍晚时分，市中心和通往我们大使馆的街道贴满反苏的传单、招贴画和大字报，在这次挑衅性运动过程中，这些宣传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恶毒。

从1月26日傍晚到2月13日无数人群拥堵了大使馆的大门，有时候也阻止大使馆的交通工具。人群中装在宣传车和装在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对面的每隔40米的电线杆上的高音扬声器日夜不停地传出俄文和中文的叫骂声、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诽谤声、对苏联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威胁声.....他们要求苏联人出来向中国人“低头认罪”。类似的威胁和要求在中国官方人员的声明中随处可见。例如，今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副主任声称：“中国人民绝不会任人欺侮，在修正主义没有承认错误之前，我们决不罢休。”.....

.....大使馆遭受了物质损失.....大门里面挂着苏联领导人形象肮脏的肖像、各种模型、标语等。大使馆驻地满是燃烧的物品和反苏传单。使馆工作人员.....靠近大门的时候，中国人就往他们身上扔石头和其他杂物，洒涂料.....

.....为了使反苏的歇斯底里更加高涨，与1966年8月对围绕大使馆的胡作非为者的态度不同，他们对待这次事件更加正式，中国政府为“受害者”派两架专机去莫斯科.....

.....让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反修战士”表示“深切的同情”。今年1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代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林彪给参加莫斯科挑衅的留学生发去了一份电报，把学生的行为看作“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

为期17天的狂热反苏活动刚一结束，今年2月11日在北京体育场组织了一场10万人的大会，大会的名义为“反对苏修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中国留学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匪徒冲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并毒打中国外交官的法西斯罪行”。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说，中国人

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他无视明摆的事实，说：“我们不应该采取他们采取的暴力手段。我们没有冲击过他们的大使馆，也没有殴打过他们的人。我们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

……只有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和坚毅精神才使我们在机场发生的拥堵和殴斗中避免了牺牲。此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想挑起一桩血腥事件。

……在机场，流氓胡闹了三天三夜，用俄文和中文广播了命令：“这里正进行反苏修的斗争。谁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走，否则我们不负责任。”

……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声明，流氓不放走被扣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们决不回去。

……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确保我们大使馆的生活需要(食品供应等)。

……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

……法国、英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瑞典、丹麦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我们一定的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2月6日声明，“革命群众的反抗是完全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断言，“革命群众的行动是正义的”。

……对我们的抗议以及保证2月6日护送妇女、孩子去机场的苏联工作人员安全进使馆的要求，外交部代表说，“绝不接受你们的抗议，我们坚决支持我国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对中国外交官员受到法西斯镇压义愤填膺”。

……在三周规模巨大的反苏运动期间，毛泽东及其一伙人使苏中关系更加尖锐，几乎达到断交的边缘。为何他们在此悬崖勒马了呢？

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意见不一。看来，里面有一股势力认为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在现阶段对中国有利。毛泽东及其一伙为掌控权力的尖锐斗争，其结局尚不明朗，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可能也影响了这个。中国人没能使苏中关

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是苏方坚定的原则立场，即1967年2月4日苏联政府的声明、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的发言以及他今年2月2日给周恩来的信件，苏联外交部的声明以及苏联没有受中国进行的挑拨而表现出的极大的耐心。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2, д.12, л.20-35

№2548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102] (1967年3月1日)

.....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是由毛泽东集团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中国的国家机关和民众各阶层出现强烈反对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派的时候，作为对付自己政敌的斗争工具。

.....在与反对派势力的斗争中利用了在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人，按毛泽东派的打算，本应制造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幌子以针对他们的反对派，假借斗争以“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蜕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自1966年年底开始，当时毛泽东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更为尖锐，毛泽东集团给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彻底夺取党、国家和经济的所有权力”，中国到处出现了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意为“造反”.....毛泽东派的用意是，“造反派”应该是来自各阶层更为广泛的毛泽东派拥护者，是一个更为“成熟”——与“红卫兵”相比——更有力量的组织，它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夺取政权”并摧毁反对派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

“造反派”组织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集团，是对国内实施“军事恐怖”专政的幌子，其主要依靠的则是军队。

.....

手写批注：

该报告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25961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1967年3月2日)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7年3月2日第17次会议第40号决议记录

苏联国防部致函吉尔吉斯奥什州党委，吉尔吉斯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等区党委、区执委和其他清单上的组织，以及丘巴罗夫、图尔古诺夫和加尔金等同志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政治局1967年2月4日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如下：

1.兹批准，加强附录所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界地区居民和义勇纠察队的群众性保卫工作的举措。

2.责成奥什州党委和州执委，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区党委和区执委，以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各部委和部门，制定和采取具体举措，以强化本决议所列边境地区的群众性国防工作。

3.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共和国社会秩序保卫部，认真研究边境地区的居民构成情况，必要时可建议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迁移那些不愿在边境地区居住的人口。

4.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财政部和共和国国民保卫部，研究关于将国民保卫后补单位列入边境地区区执委固定编制。

5.就在丘普斯克区组建兵役局，以及把由2—3名军官和2—3名公务员组成的军外训练处列入边境地区兵役局固定编制等问题，请求苏联国防部批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附件：

关于加强与中国交界边境各地区居民和志愿义勇队的群众性国防工作的措施

编号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1	依据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 12 月中央全会决定,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 1967 年 2 月 4 日“关于加强与中国交界边境各地区居民和志愿义勇队的群众性国防工作的决议”,将在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有计划地坚定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长期	州党委、区党委
2	无条件地落实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 1966 年 7 月 7 日“关于改善边境地区居民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决议,以及 1966 年 7 月 21 日“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 1966 年 5 月 7 日‘关于全苏支援陆海空志愿协会(ДЮСХАФ СССР)现状及其改进措施’的第 349 号决议”。	长期	州、区党委,执委,区苏维埃,共和国各部委及部门
3	在居民中经常举办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报告、讲座和座谈会,与战争老战士、苏联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生产先进者和科学-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	经常	州、区党委,党的基层组织
4	尤其关注针对青年的群众性国防组织工作,开展军事化游戏、突击工作接力赛和提高警惕性突击检查,在战争阵亡者纪念碑旁举行群众集会、紧急集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共青团基层组织与边防军战士的联合会议,给那些在保卫祖国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扫墓。	经常	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共青团州、区委,党的基层组织
5	在 5—6 月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团体和机关的共青团基层组织书记,以及边防哨所共青团委员会书记举办进修班。长期就群众性国防工作问题在青年报刊上开设专栏。通过广播和电视经常报道国防军的生活情况。解决关于夏季为高年级中学生举办军事化夏令营的问题。在 1967 年夏天,就“关于促进青年和边防军少年之友成员参与保卫国境”问题召集共和国边境地区青年义勇队和边防军少年之友(ЮИ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准备参加为纪念苏维埃政府成立 50 周年而举行的第五届全苏边境各区共青团青年突击接力赛。	1967 年	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人民教育部,边防军政治部,吉尔吉斯工会理事会,共青团区委
6	在与中国交界地区举办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电影节。	1967 年 3—7 月	州、区党委,电影艺术委员会,文化师
	组织话剧、戏剧和芭蕾舞,共和国首都和奥什市高校、企业和机关的业余优秀艺术团体的演员到这些地区慰问演出,在边境地区的居民点举办军乐演奏会。	经常	

续表

编号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7	采取措施,加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组织在促进针对居民,尤其是青年的群众性国防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此,应充分利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学校和教学单位的俱乐部和文化宫。为使每位青年人都能掌握一项军事专业技术,颁布了“随时准备保卫祖国”徽章奖励标准。定期举行摩托车赛和根据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计划而举办的各种体育类军事-技术比赛。区、村劳动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和区军事委员会应研究和解决关于向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各委员会和基层组织提供实际帮助的问题,确保其必要的物资-技术装备和活动场所。	长期	州、区党委,区苏维埃执委会、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吉尔吉斯共青团中央,吉尔吉斯军事委员会,吉尔吉斯工会理事会,体育协会联盟理事会
8	为所有中学和职业教育学校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广泛吸收学生参与模型制作、射击武器研究、汽车维修、无线电基础和其他军事技术专业类小组。	1967年	人民教育部,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区委员会
9	抽调苏共和共青团积极分子加强志愿义勇队。在区党委机关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讨论义勇队的工作问题。召集区义勇队大会。人民志愿纠察队和警察机关共同制定切实措施,加强维护社会秩序。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义勇队必要的活动场所、值勤期间的电话通讯和交通工具。改进义勇队的思想教育,培养其与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和违反边境规定的行为作斗争。	3—7月	区党委,各行业工会联合会,边防军司令部
10	确保电话联络,针对所有居民点的无线电广播,以及区中心与伏龙芝市和奥什市的稳定无线联系。在边境附近所有居民点设立固定的昼夜通讯值班,以及此类对外无线电广播,确保稳定、可靠的通讯联系。	3—7月	通讯部,州、区、村苏维埃执委会
11	为提高各区动员准备能力,将召集区、村劳动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工作人员,承担通报和物资技术供给工作的汽车运输公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负责人会议,举行由国民经济民防项目相应机关和组织参加的公民国防指挥演练。	4—5月	区苏维埃执委会、民防指挥部和吉尔吉斯军事委员会
12	加强卫生防疫工作和居民医疗知识宣传。监控水源,尤其是源自边境的河流。系统监控污染状况。在每个居民点组建义务卫生队并对其进行培训。确保放射性和细菌监控主体网络的必要设备供给。	长期	地方苏维埃执委会、民防指挥部卫生部、农业部、水文测量局
13	依照35点指令纲要,完成民防国防的筹备组建工作,在各地地区国民经济所有工程进行首长指挥培训。重新审议共和国居民分散避计划,划定“特殊时期”从与中国交界地区“居民疏散”的界限。	1967年3月	区苏维埃执委会、民防指挥部、共和国疏散委员会

续表

编号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实行期限	执行者
14	出版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编写的民防国防手册《每人都知道》10万册,并在边境各地区散发。为此,向民防指挥部调拨10吨纸张。在边境地区举行国防题材的电影放映月活动。	3—6月	民防指挥部、国计委、电影艺术委员会、邮政委员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9—1084页

No25677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

.....

现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朝鲜领导人在逐渐脱离以前单方面地跟随中国”。

在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朝鲜与中国之间相互比较亲近。

.....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如下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经济和军事合作方面。

.....

.....中国领导为了加强自己对朝鲜的影响，竭力扩大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自1962年年底起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关系特别积极活跃，当时苏联没能满足朝鲜人要求增加无偿军事援助的请求。1963年3月，中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平壤，签署了关于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据某些资料称，中国人承诺一俟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将派遣100多万名自己的战士去那里。

可是很快朝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越南事件对朝鲜领导起到了很大的觉醒作用，越南的例子使朝鲜人深信，毛泽东及其集团为了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目的不仅会牺牲越南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会牺牲朝鲜人民的利益。中国方面不止一次地企图推动朝鲜人以“援助越南的方式”加剧南朝鲜的紧张局势，而不考虑现实状况及后果。

苏联与朝鲜关系的改善引起了北京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试图阻挠朝鲜脱离亲中国的方针这一令他们不愿看到的过程。在1966年4月6日谢胡访问北京之际，中国人对参加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各党提出了“修正主义、宗派主义”的指责，金日成将中国人的这些攻击看作是对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苏联与朝鲜的经济协议签订后(1966年6月)很快作为回应，中国人开始使中朝关系发生困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开始对朝鲜商品的质量提出各种投诉，要求供应稀缺

产品并拒绝提供部分生活上对朝鲜十分重要的商品。1966年中国急剧削减了对朝鲜供应的植物油、大豆，1967年1月削减了硫黄和几种工业原料的供应。中国当局禁止朝鲜渔民在中国沿岸捕鱼。

.....劳动党领导人不同意中国人反对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派遣志愿者，不顾因北京阻挠带来的困难，以专家的形式向民主越南派遣了将近100名朝鲜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

.....平壤对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相关的事件进行了谴责。朝鲜的报刊不直接说中国人，却发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金日成在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容许有“左”倾过火行为，人为地展开猛烈的阶级斗争.....

.....金日成在秘密会谈中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置信的发傻”。金一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大致也是这样消极地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据获得的消息称，在劳动党的党组织内部会议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看来也是同样目的，朝鲜领导人在1966年罢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金昌满、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安权(ХаАнЧен)以及其他一些朝鲜领导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

最近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红卫兵报纸的报道，对朝鲜和劳动党领导的对内政策方面散布了诬蔑性的言论。开始使用“朝鲜的修正主义”这一术语。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红卫兵时表示，“朝鲜也很快要滑向修正主义”，中国的东北部是“面对三个国家的前沿阵地，即苏修、蒙古和朝鲜修正主义”。

报纸和红卫兵的传单上散发的关于朝鲜似乎发生了军事政变的消息引起了朝鲜领导人的激愤。今年1月26日刊登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官方声明中，红卫兵企图“将世界公众舆论引入歧途”等诬蔑之词遭到了朝鲜的强烈谴责。朝鲜公共安全机构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2月先后两次禁止中国大使馆准备的让中国学生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周围举行反对苏联的游行。

劳动党偏离北京立场的行为使中国领导人很气愤，他们已经开始采取极端措施。根据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消息，中国人开始加强自己与朝鲜的边界，人为地制造边境事件，破坏有关和平解决叛逃者问题的协

议，重又开始对白头山(即长白山)上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进行争论等。

与此同时，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对北京分裂主义冒险行为方针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彻底地站到了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立场一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劳动党的观点并不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路线相一致。朝鲜领导人对待苏联共产党十分警觉，毫无根据地放肆地批评它的政策，又常常是虚伪的。在秘密会议上金日成和其他劳动党领导人基本上支持我们党的所有对内和对外政策，包括他们积极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966年)的全体会议。但是没有向劳动党的广大党员群众通报这次会议，朝鲜的报刊对苏联共产党全体会议只字不提。

劳动党10月(1966年)会议正式宣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既反对“当代修正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着重指出，劳动党永远不会“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与所有的兄弟党“建议”实行严格独立政策。强烈地强调自己立场独立性的同时，朝鲜领导人以此表现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分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关系，竭力与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保持正常关系。

АВПРФ, ф.0102, оп.23, п.112, д.24, л.5-12

№25974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1967年3月14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第391号文

关于香港的报告

香港是英国在中国东南海岸的殖民地，坐落在九龙半岛、香港岛和其他几个小岛上。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构成。

1.概述

领土——398.25平方英里(九龙——3.75平方英里，香港岛——29平方英里，新界——365.5平方英里)。

居民——382.3万人(1965年末)；98%的居民是华人。

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维多利亚(居民——约100万住户)。

语言——英语和汉语。

2.政治发展和领土管理

香港从1842年起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所谓的“新界”是位于中国沿海的一块土地，根据1898年协定，中国把这块土地和一系列小岛及其附近水域租给英国，租期99年。1941年12月，英国殖民地被日本军队占领，日本军队在那里占领了三年半。在日本占领期间香港人口减少到60万人。赶走日本人后，恢复了文官统治，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到1947年时已达180万人。1950年，香港政府开始限制华人进入殖民地，但是，秘密移民仍在持续，人口过于稠密一直是香港的重要问题。

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管理，在总督之下有司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在1964年7月扩大，现在由4名当局代表、8名官方指派代表和13名非官方代表组成，其中华人9名，印度人1名。法律由总督颁布。司法委员会履行总督治下的咨询职责，对殖民地的财政和开支实施监督。

执行委员会由5名殖民当局代表，1名官方指派代表和5名非指派代表组成，其中华人3名，葡萄牙人1名。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就各类管理问题向总督提供咨询。总督既是司法委员会主席，也是执行委员会主席。

政府通过香港殖民地行政长官总的领导下的各司来实现其行政职能，香港殖民地的行政长官要协调约30个司的工作。

就连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多次承认，香港当地居民被完全排除在领土管理之外，尽管在类似的非洲国家居民参与某种程度的管理已有20年时间。英国议员詹姆斯·琼森去年到过香港，不久前他在下议院表示，香港是少数白人统治百万华人的典型例子。他说：香港同南罗得西亚之间有所谓可比性。

联邦国务大臣哈尔特在答复琼森时说道，她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香港在其他各殖民地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它同中国存在的关系，所以

不能考虑香港自治和司法委员会选举的问题”。(《每日电讯报》1967年1月)

英国政府在香港拥有大量武装力量：海军、志愿兵兵团和空中辅助力量，军费主要靠殖民地。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书记官李告知，未来4年香港每年需为英国军队缴纳军费452.25万英镑。香港还承担防务工程加固的责任，香港每年防务开支总额达500万英镑。(《每日电讯报》1966年12月21日)

3.经济和贸易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集散中心，地理位置奠定了香港经济的基础。战后时期香港建设了一系列各类工业企业，但和以前一样，由于自然资源有限，必须进口粮食和本地工业所需的原料及设备，其经济继续依靠港口。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在香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产品的一半以上供出口。铁矿、铅矿、钨矿、石墨和陶土开采量不大。1965年企业工人数量有60万人。旅游业是殖民地的主要收入来源。有40万人从事服务业。

捕鱼业发达。拥有联邦国家各港口中最大的渔业船队，渔船的数量共有9400艘。

农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不大。几乎所有的可耕地都集中在新界。主要的农产品有：大米和蔬菜。养殖牛、猪和家禽。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内部需求。1965年从事捕鱼业和农业的工人数量有11.26万人。

对外贸易额(亿港币)(1港币=1先令3便士)

1951 1961 1964 1965

进口 48.64 59.69 85.5 89.64

本地商品出口、转出口 44.32 99 13.55 15.02

主要进口种类：工业品(占进口总额的31%)、粮食(23%)、机器和交通设备(13%)、原料、化工业品等。主要出口种类(不包括再出口)：服装(35%)、纺织品、鞋子、电工器材、金属制品、水果罐头等。

1965年香港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美国(34%)、英国(17%)、新加

坡(3%)、日本(3%)、加拿大(3%)、澳大利亚(3%)。商品再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是：日本(17%)、新加坡(14%)和印度尼西亚(10%)。

1966年香港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按照该协定，美国进口香港纺织品的限额是英国的两倍以上。

4.教育和医疗卫生

1965年殖民地共有2281所学校，91.4万名学生和3.07万名教师。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小学学习(62.76万)。大部分小学都是为华人居民设立的，中学英国人的孩子占多数。香港还有技术专科学校(全日制学生1270人，半脱产学生10288人)和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建立于1911年，系别：艺术学系、科学系、医学系、建筑工程系和东方学研究所。1965年有2203名学生在大学学习。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于1963年，有3个系：艺术系、商务系和社会科学系，1965年有1871名学生。还有3个师范学院(2170名学生)。1965年9月，有2319名学生从香港前往英国留学，981人——美国，383人——加拿大，213人——澳大利亚。[《联邦实况》(Fact Sheets on the Commonwealth)，香港，第4页]

殖民地有39家医院13000张病床。将近2%的成年人患有肺病。每10万居民中有3359人死于各种形式的肺病。霍乱定期爆发。

5.劳动人民状况

同其艰难的生活水平相适应，香港华人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英国议员琼森在发言时表示：“香港工人的状况与目前掌权的自由党所标榜的原则不相适应。”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60小时，每年加班量达到100小时。琼森说：“对于总督治理下的殖民地和最终向议会负责的当地政权来讲，这是极其令人气愤的事。”(《每日电讯报》1967年1月)英国政府暂时只是希望在调整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方面，近期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卫报》刊登了议员J.耶格尔从香港发回来的信件，他讲述了香港居民简陋的居住条件，近400万人居住在面积不足400平方英尺的住宅内。通常家庭成员都居住在同一间房里，尽管有2万间私有住宅处于空置状态。学校常常设在住宅的顶楼，供孩子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学习，而晚间则又是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卫报》1967年1月6日)

英国资本家威廉·戈登在《星期日电讯报》刊登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守住香港的》中写道：如果英国不向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提供帮助，那么，他确信他们将会成为共产党人，香港将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星期日电讯报》1966年4月17日）

6. 英中关系中的香港问题

1966年，中国政府两次抗议美国利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作为军事基地。在最后一份抗议书（1966年12月末）中指出，英国允许美国第七舰队把香港作为一个辅助的基地，就意味着允许对河内和位于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中国大使馆进行空袭。在照会中，中国政府暗示，英国此举可能招致香港华人的“反感”。

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及其在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强烈谴责美国 and 英国之间卑鄙的帝国主义合作。他们对英国自由党政府听从美国的要求把香港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表示严重的不满和强烈抗议。如果英国继续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每日快报》1966年12月30日）

英国政府在回应中国的抗议照会时狡辩说，香港永远不会被用来充当美国海军的军事基地，美国远东部队只是利用香港来“休息和给养”。

同时，1966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发生的事件令英国非常紧张，它开始对自己的殖民地香港感到不安。《每日电讯报》在评论中国事件时指出，英国密切关注着任何一个信号，距离中国海岸40英里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清单里的下一个目标。

但是，看来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同英国的关系严重恶化，剥夺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权，因为香港位于东南亚海空交通线上，是最大的货运中心。香港是中国获取大量外汇的来源地，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基地。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B.丘季诺夫(签名)

发送4份，送：欧洲司(2份)、军事情报局，归档

1967年3月11日

№25976 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 难民问题(1967年3月2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

1967年3月22日

第539号文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

现把葡萄牙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今年3月4日及蒋介石政府要员在今年2月15日分别就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致秘书长的信件副本发送给您，以便加以利用。

附件：上述文本。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顾问

Е.纳西诺夫斯基(签名)

文本2份：发送，归档

1967年3月_日

附件一：

纽约

1967年3月4日

第9号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做出如下告知：关于中华民国常驻代表在1967年2月15日信函中(参见第56 168号)所提及的问题，我方所采取的措施，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完全符合其职责范围的；实施这些举措，旨在有效抑制和阻止非法活动以及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机构和组织。大量自称为“难民”的人员并不具备良好的信用，并且隐瞒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这无疑将危及澳门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毫无疑问，葡萄牙政府既没有违背任何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无视于任何国际公约，并

且..... [\[104\]](#)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

附件二：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 168号

1967年2月15日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告知阁下：1966年12月23日，葡萄牙政府澳门殖民当局强行关闭了澳门的华人难民救援机构及学校。随后，澳门当局还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行将7名华人难民驱逐至中国大陆。近日，另外两批华人难民——其中一批为14人、另一批为5人——也同样被强行遣返给中共当局。

葡萄牙当局的这些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公约和惯例，并且完全无视人权原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缔约国之一的葡萄牙，其举措显然是对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不推回”原则的公然挑战。根据公约的第33条规定，任何缔约国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至可能对其人身安全和自由构成潜在危险的领土境内。

由于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请求将该议题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附件三：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05\]](#)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368号

尊敬的阁下：

关于在澳门的中国难民问题，其中涉及1967年2月15日我方信函(56 168号)以及葡萄牙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在1967年3月4日递交阁下的信件(9号)，根据指示，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1.根据1967年1月29日同中共当局签署的协议，葡萄牙澳门殖民当局已经承诺，将任何试图在澳门寻求避难或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驱逐或遣返至中国大陆。截至目前，总计36人的7批难民已被驱逐或遣返。

2.这些难民中，绝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仅仅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当局的压迫，然而，在葡萄牙代表团的信函中，指控他们试图在澳门从事任何可能“危及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活动，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我国政府明确否认了相关指控。

3.葡萄牙政府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缔约国，曾庄严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国际义务。驱逐和遣返这些难民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这一公约，而葡萄牙代表团在其信函中将其行为称作“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其正常职责范围内”的举措，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4.根据澳门当局同中共签署的双边协定，驱逐和遣返中国难民并非是偶然事件，已然演变成葡萄牙当局的一项既定政策。这一政策是对1951年公约中关于对难民的“不推回原则”的公然蔑视，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

我请求将该信函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АВІРФ, ф.100, оп.54, п.231, д.31, л.12 15、23-24

№25726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 [\[106\]](#) (1967年3月28日)

.....

1966年上半年中国政策的特点是坚持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积极地在世界舞台上开展活动，这一特点体现在刘少奇、陈毅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方面以及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方面。

但是，战略上的改变并不能掩盖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只是他们过去推行的强硬方针的继续和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从“强权政治”的立场来谈论问题的企图反映在1966年的三次核武器试验中。这种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扫地，削弱了它的国际地位。

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不断的核武器试验使东南亚国家闻风丧胆，这“证实”西方人士说的关于中国人为了达到目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至今尚不清楚，对外政策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被纳入中国现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活动。

.....现阶段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与苏联公开斗争、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阻挠苏联政府一些重要的国际行动；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获取领导人的地位；与美国接触为了避免与美国军事冲突，中美关系正常化.....

АВІ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1, л.52-85

№25977 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

民航部

国际航空局

莫斯科，A167，列宁格勒大街，37号

电话：K4-18-31

1967年5月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В.И.利哈切夫同志：

苏联民航局收到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关于签订商务合作协定和在中转站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的建议。

民航局认为，同上述航空公司签订这样的协定是适宜的，因为该公

司可以飞往18个国际航空港，其中包括民航局飞机可以飞抵的雅加达、仰光和东京。

请告知您对同国泰航空公司签订上述协定的意见。

苏联民航部国际民航局局长

A.别谢金

АВІРФ, ф.100, оп.54, п.231, д.31, л.17

№25978 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29日)

1967年5月28日

第454/ДВНС号文

苏联民用航空部国际航空交通管理局局长

A.B.别谢金同志：

对您第24/4 52号信件的复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原则上认为，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签订关于商务合作和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是可行的，其条件是，在条约文本中不能含有可能被解释为我们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或香港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术语。

同时，考虑到香港的现今政治状况，同公司签订协定的时间应当稍后确定。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B.利哈切夫(签名)

20B/АД

1967年5月27日

АВІРФ, ф.100, оп.54, п.231, д.31, л.18

№25979 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1967年6月10日)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

1967年6月10日

第317号文

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报告)

最近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出现了骚乱，形势严峻。按照当地(香港)消息灵通的华人和著名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香港骚乱是由北京方面的教唆引起的，他们利用九龙地区两个工厂突发的罢工，试图在香港制造“第二个澳门”。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所追求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宣传目的，即因英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向英国施加压力，转移中国居民对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苏联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提醒英国人，中国在这一殖民地的影响力是很强的，并在适当的时候向英国提出自己的打算。

事件表明，英国当局并没有像葡萄牙在澳门的政权那样满足北京的要求(立即满足工人的要求；停止法西斯式的迫害；释放被捕游行示威人士；向受害者道歉，补偿他们的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人没有实现预期的计划，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英国在香港的势力要比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势力更强，英国人还得到香港大多数倾向台湾或持反共和亲英观点居民的支持。

在遇到挫折后，北京开始寻找有利的解释，以便挽回面子。有一个传闻，说香港骚乱的组织者是从中国和澳门派到那里的，事后组织者被召回北京，好像是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探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时，组织者将其归罪于“群众动员”方面。从广州派往香港的代表，他们严厉批评在香港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他们没能争取到居民的支持，在动员居民时首先不是使用政治观念，而是用钱(参加游行示威和罢工的人，每天发放10—15港元)。此外，在香港的领导人还向北京许诺，他们在行动中将会得到当地华人的广泛支持。只是根据这一许诺，北京就发表了致英国政府的声明，在声明中提

出了上述五条要求。

根据香港亲北京人士提供的消息判断，现在香港各企业和机关中的亲北京分子都在秘密集会。他们向华人解释说，目前的局势不利于开展反对港英当局的积极活动。据此提出了新的方针：停止冲突；使用秘密手段制造令英国人不安的局势(其中包括小规模罢工和抗议)；全力揭露英国当局的残酷手段；培养香港华人对英国人的憎恨情绪；全力支持和赞美中国；在组织方面采取措施团结力量。

可以把这些行动看作是中国放弃了最初的打算，策略变更为：在较长的时间内北京将坚持“制造小麻烦”，对英国人进行口头威胁(在中国组织抗议集会、发表声明等)，但考虑到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不会采取坚决行动。香港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中国可以在这里通过出口自己的商品换取外汇。1964年中国对香港出口额为5.16亿美元，1965年——6.08亿美元，1966年——7.3亿美元。(《星暹日报》1967年5月21日)境外华人(在亚洲有1700万人)每年向自己的亲属和朋友汇款约2亿美元。(《曼谷邮报》1967年5月28日)

中国和外国评论家的共同观点是，香港局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近几年内北京不打算对香港采取激进的行动，不会为追求政治目的而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评论家确定，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是另外一种情况：北京事实上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控制，葡萄牙当局满足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要求现在没有不得解决的，暂时不会再听到北京的意见了。香港和澳门联系紧密，澳门的大部分生意都掌握在香港人手里。按照《纽约时报》的评价，澳门每年给北京带来4亿美元的收入。实际上，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边界形同虚设。在去年12月澳门事件期间，这条边境线上没有一名警察存在。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清除中国土地上的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是广州的郊区)，但是，在短期内中国将保持克制，不会采取这一措施。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二秘

B.阿扎鲁什金(签名)

发送4份，送：东南亚司、远东司、军事情报局，归档

№25982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1967年8月3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1967年8月3日

第1415号文

香港事件发展态势和英中关系

(参见报告《香港事件与英中关系恶化》，№1127/A，1967年6月17日)

今年6—7月，注意到在香港涌现的反英行动加剧了，这一行动始于今年5月，是由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劳工矛盾造成的。在各企业工人和雇员举行罢工的同时，出现了群众性反抗英当局的行动，罢工人员同警察和军队之间的冲突经常转变为对抗。

香港骚乱初期已现冲突形态，香港官方和报纸一致把它定性为政治性质的事件，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英国人的资料，骚乱是由“香港红卫兵”和各组织(包括工会联合会)的亲中领导人领导的。随后，北京积极支持香港的行动，导致英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确定自己对香港反英行动的态度时，英国人既要考虑自己对保存这一殖民地的关切，还要考虑北京方面的打算。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一系列各类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了解事件的态势，派遣英国外交部代表率工作组前往香港本地；香港总督和香港警察署署长被召回伦敦；在香港本地，英国远东部队司令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等等。

因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英国人不想放弃香港，对它来说，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个殖民地作为英国在东南亚和远东的金融和银行业务中心起到重要作用(香港有75家银行和325家支行；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英国对香港的投资约5000万英镑，英国银行中的香港资产达1.2亿英镑以上，极大地“巩固”了英镑的地位。英国在香港购买了大量廉价纺织品。香港还是一个大型交通中心。香港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站点，英(美)可以从那里得到关于中国情况的完整情报。按照《星期日电讯报》的说法，香港是中国的“窗户”，从那里“可以观察和听取”在这个极度疯狂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星期日电讯报》

1967年7月17日)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保存香港主要取决于中国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意图。这种意图在什么时候会明确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而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是引起日常不安的对象。在会谈中英国官方人士公开表达了意见，“占领”香港对中国没有好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观点在报纸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论据是：香港是中国获取所谓“硬通货”的主要来源，是中国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粮食的保障(例如，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购买粮食)。一般认为，香港向中国提供的“硬通货”不少于中国得到的“硬通货”总额的一半(仅贸易就提供了约2亿英镑)。

基于对中国意图的这种判断，英国人打算眼前不仅要“留”在香港，而且不能把这种变化写入香港法律，因为这可能导致“华人对殖民地当局影响力的增强”(仅打算采取某些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等的措施)。5月末，时任联邦事务部副部长的贝兹维克在下议院直言，香港“不适合”类似于其他殖民地那样具有自治形式。

关于中国现在不会去占领香港的判断，显然，成为英国对反英行动采取“强硬路线”的基础(7月20日，宣布“免去”香港警务处处长戴磊华的职务。报纸的看法是，他是因为反对“强硬路线”才被免职的)。

至于6—7月香港事件的态势(比5月更为猛烈)和与此相关的英中关系情况，按时间先后顺序有如下表现：

6月12日，殖民地政府和私人公司管理机关解雇了数百名罢工工人，其中包括112名邮政雇员。

6月13日，中国中断粮食供应支持香港商贩为期1天的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汇款62.5万英镑，“支持左派工人”，号召他们在殖民地继续开展反英国压迫的斗争。

英国报纸已经指出过，香港6月“突发的暴乱具有政治性质，并非工人不满的结果”。

香港还出现了示威游行和集会，有时会与警察部队(共有11000人)发生冲突。由于借助警察行动对游行示威参加者执行“强硬路线”，6月27日，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霍布森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并向他宣读例行的中国政府抗议照会，指责英国对香港华人工人实施新的“法西斯式挑

衅”。照会中指出，港英当局应该立即接受华人的“正义要求”，执行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15日抗议照会中阐述的5点内容。因其“粗鲁的非外交语言”，霍布森拒绝接受抗议照会。

6月27日，中国减少了对殖民地淡水的供应。

从6月27日到7月2日，食品工业企业工人宣布举行为期4天的罢工。但是，根据英国报纸评论，罢工组织者试图阻断交通，并把罢工变成总罢工，但未获成功。报纸报道说，在这次罢工期间，中国的出口单位损失了100万英镑。

鉴于街头反英行动的加强，英国当局把廓尔喀雇佣兵(800人)从马来西亚调到香港，外加驻扎在殖民地的9000人部队。英国人明显准备同反英行动的参加者进行“决战”，期待着反英行动的规模因北京的“革命性声明”而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声明(7月5日)后的一个表现是香港的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被捕，他们响应号召“作为反英斗争的先锋部队开始行动”。

当时，《泰晤士报》在评价香港局势时写道：“北京期待制造出类似澳门的形势，到那时这一块领土同中国之间的财政大门将会被打开，而管理机关也将处于共产主义的有效控制之下”。(《泰晤士报》1967年7月6日)

由于今年7月8日的事件英中关系紧张到了极点。英国报纸报道说，这一天约有3000名来自中国的武装华人袭击沙头角边境检查站的警察哨所。在冲突中有5名英国警察被杀害，14人受伤。驻香港英军司令紧急向沙头角派遣了600名廓尔喀雇佣兵，占领了那里的阵地，尽管有报道指出，他们没有参与同“红色华人”的冲突。

在中国关于沙头角事件的官方声明中说，7月8日，沙头角和九龙新界边境村镇的中国居民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港澳同胞”开展反对英国当局在香港犯下的血腥罪行的正义斗争。报道说，集会后中国居民返回九龙新界时遇到了港英当局的武装警察，他们实施“早有预谋的血腥镇压”，使用了催泪弹，既向集会人员射击，也向中国边境领土方向射击。声明接着说，中国边防军人进行了警告射击，但是香港警察继续向集会人员开枪。结果1人被打死，8人受伤。随后，中国边防军人对香港警察进行了公开还击。(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今年7月9日，联邦事务部部长鲍登在下议院说，香港边境的游行示威人员起初得到了中国警察的支持，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军队。鲍登还说，英国政府完全支持港英当局针对游行示威人员的行动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障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从英国官方和反动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对这次边境事件感到不安。从英国外交事务办公室官员在私下会谈中表达的意见来看，他们对中国不会“占领”香港这个结论再次进行了“检查”。

但是，边境形势并没有继续恶化。关于中国把自己一个师的兵力调到香港边境的消息没有引起英国的特别紧张。看来，是掌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某种情报。一些英国记者报道说，调动这个师所追求的目的不只是向英国进行军事示威，还为了防止边境形势失去控制。报道说，例如，这个师接到命令“防止边境地带出现骚乱”，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会(《星期日泰晤士报》1967年7月23日)，禁止武装的共产党农民越过边境(《星期日电讯报》1967年7月14日)，即切断中国与香港的边界。

所有这些事件都伴随着双方大量的抗议与反抗议，既针对香港事件和英国驻中国办事处的言论，也针对双方互扣各方记者。例如，7月9日，中国外交部向霍布森递交了反对英国在香港“制造新的武装挑衅”的抗议照会，在照会中，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

- 1.对7月3日在沙头角的武装挑衅进行公开道歉；

- 2.立即惩罚罪犯，赔偿沙头角居民以及被害和受伤人员的一切损失，释放24日在沙头角所有被捕人员；

- 3.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当天(7月9日)，英国临时代办就数百名中国游行示威人员进入香港领土，致使5名警察遇害和12名警察受伤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霍布森驳斥了中国关于香港警察制造事件的论据，拒绝接受中国的抗议照会。

中国外交部(7月11日)和新华社(7月16日)就2名新华社记者(其中1名被判处2年监禁)和5名香港“爱国报纸”的记者被捕一事向英国当局和香港当局提出抗议。

7月12日，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组织了抗议逮捕中国记者的示威活动。据报道说，当时代办处的一秘和二秘从小门出来接收示威人员的请愿书，但后者向他们投掷石头和西红柿。

作为对逮捕香港华人记者的报复措施，北京当局逮捕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当时格雷正在家里。报道说，格雷被带到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逮捕他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多次就其在香港实施的法西斯式镇压提出的警告”。

7月21日，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英国临时代办沈平抗议格雷在北京家中被捕，要求立即予以释放。但是，格雷暂时仍被羁押。

根据对英国人采取的另一项措施，中国当局中断了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导致这个城市对水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

至于示威人员和香港警察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从7月13日起当局增派军队援助警察。英国报刊报道了关于几名华人警察被害、英国士兵被从中国边境方向投过来的手榴弹炸伤、“亲北京的华人”攻击在香港的英美海员的消息。殖民地警察局加大了对罢工工会和游行示威人员的镇压力度。反英行动参加者陆续被捕，行动领导中心(党组织和工会)受到攻击。

同时，7月15日，香港街头再次出现示威游行。英国报刊写道：示威人群号召交通运输业举行总罢工，共产党报纸号召进行反英国“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人民战争”，暗示人民夺取警察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击警察。警察和军队对这次大规模的反英行动进行了镇压，而在7月16日，他们尝试捣毁反英运动领导中心，进行了大规模袭击和逮捕。仅这一天就有600人被捕(从5月起到现在，总共逮捕了2000人，其中似乎约有650人获释)。

随后香港的消息证实，英国当局努力巩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7月20日，香港政府宣布了“非常措施”，根据这些措施，“任何散布虚假消息和言论，以此号召制造恐慌和骚乱，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香港政府的新措施赋予警察和军队利用武器镇压“制造骚乱分子”的权力，居民有义务向警察出示自己的居住地址和姓名，禁止集会，无论是在私人场所，还是在公共场所，等等。

英国针对香港事件采取各种措施时，尽管进行了强烈抗议和交涉，

仍努力不要走上同中国关系恶化的道路，关系恶化可能会促使后者对香港采取“坚决”行动。他们努力强调，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存在任何反对中国的倾向，都是通过“正常程序”进行的，这些措施可能会被中国人解释为挑衅(例如，把军舰调往香港)。英国暂时不打算同中国关系破裂。7月17日，在下议院答复保守党人道格拉斯·休姆的提问——英国政府是否曾考虑到出现针对英国驻中国官方代表的反英行动的可能性？议员、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杰斯回答说：“有一些因素和可能性，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机会。但是，在一些方面我们应当尽力以我们的代表为榜样，表示坚决的反对，但与此同时，在困难的形势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如果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话。”

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士，对香港局势“正常化”没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官方公开承认，当时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反英活动。在他们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对香港的路线。总体上仍从中国不打算占领香港的这个前提条件出发，英国人在这方面始终感觉不安，对此的解释是：中国自身的局势都非常不确定，很难讲毛泽东周围的哪一个集团在什么时候得势。同时，这也牵扯出了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打算进行“检查”的必要性。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秘

Б.丘季诺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欧洲司(2份)、远东司，归档

1967年8月1日

АВРРФ, ф.69, оп.59, п.239, д.31, л.115-123

№25620 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 [107] (1967年9月25日)

.....

李周渊说，在我们的代表团工作期间，朝方想与您商谈煤和盐的问题。就像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一样，因为中国的情况，我国煤的供应发生了困难。至今我国每年从中国进口200万吨煤。但中国煤的供应急剧减少。因此我国的冶金工业、生产烧碱的企业发生了困难。

我们建议像在哈巴罗夫斯克区组织木材生产那样组织煤炭生产。朝方提供劳动力，苏方提供设备和物质。生产出来的产品按比例分配。

.....朝方认为，煤是讨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当然，可能中国方面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我们又可从中国进口煤。但目前没有人能预言中国的混乱状态要持续多久。

.....

我想告诉您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上存在的困难。过去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硫黄、石膏、锰、矿和石棉（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进口锰、矿和石棉）、石油、煤炭（石炭砂）、锡、硝酸钾、棉花纤维、糖、大豆等的数量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可是现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商品数量很有限。

目前很难完全说明中国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对我国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朝鲜方面恳请你们认真考虑我们的困难，给我们援助，以免我国工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您知道，“大国”的局势使我们产生了巨大困难。没有必要讲些每天在边界地区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没有必要谈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进行的不友好的宣传。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的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方希望苏联购买下列商品：车床、拖拉机（目前中国拒绝购买朝鲜的拖拉机。我们和中国把拖拉机交换为四吨货车）.....

.....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公开地同志式地与您交换意见。现在中国有困难，我们不能直接声明不准备与他们进行贸易。要进行贸易。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可以与之进行贸易谈判的对象。中国的外贸部里坐着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那些不懂贸易的中学生、红卫兵。我们不能直接说，我们不相信中国能履行自己贸易方面的义务。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相信中国能给我们供应商品。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准备与中国做生意。

.....B.H.诺维科夫问，中国供应你们多少盐，李周渊回答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从中国进口20万吨盐。但现在供应不正常。他

们不想，而且也没有东西供应。

.....我们现在灾难性的局面是因“大国”而造成的。

.....

АВПРФ, ф.0102, оп.27, п.53, д.2, л.75-91

№2572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 [108] (1967年11月5日)

.....

在与许多国家关系尖锐化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削弱是一种因在国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客观的过程，是中国人民被迫为毛泽东一伙的冒险、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付出的巨大代价。毛泽东一伙内部无原则的斗争以及他们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深刻地反映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上，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有效影响和操纵亚非拉国家的能力和机会。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1, л.241

№25719 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 [109] (1967年11月20日)

.....

.....由于目前驻北京大使馆收集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情报的可能越来越受到限制，希望外交代表机构利用外交关系及当地在纽约的机会，进行收集和分析中国国内局势的工作。

远东司请求给他们寄关于中国的英文和中文的参考资料、个人传记手册、有关中国政治人物的报刊、中国经济手册等。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2, л.55

№25720 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 [110] (1967年11月20日)

.....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指出，(收集中国情报)这项工作应该由驻美国大使馆以及驻日本、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驻在中国邻近国家的大使馆负责。目前由于驻北京大使馆和其他机关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大使馆需要做的是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情报(主要来自美国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的核试验以及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评估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这些材料寄过来。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2, л.92

№2572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 [111] (1967年11月28日)

苏共中央于1966年8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国宣传并反击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家进行的反苏宣传”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驻河内、平壤、东京、雅加达、拉瓦尔品第、曼谷、仰光、巴黎、伯尔尼、布鲁塞尔、开罗、阿尔及尔、达累斯萨拉姆、哈瓦那以及苏联驻联合国办事处的15个机构拥有汉学专业并在该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交官，建议让他们在所在国家系统地研究中国领导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并提出抵制毛泽东分子影响的具体建议。

目前在上述这些大使馆和联合国办事处都有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工作范围的工作人员。我们向16个国家中的12个国家派去有中国工作经验和熟悉当前中国问题的外交官.....

在所有苏联大使馆(除北京大使馆)里今年10月已经有了40名在不同程度上懂得中文的外交工作人员。

.....

驻16个国家的大使馆送来的情报资料证明，各大使馆在加强工作，对所驻国家中国人的行为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解释，制订反对毛泽东分子积极活动的措施。在许多国家还吸收其他苏联外国机构(在开罗的苏联亚非委员会的代表、在东京的苏联记者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

大部分大使馆(苏联驻美国、日本、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家的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有益的方面是，对中国代表的行为方法和手段，以及中国领导人对所在国政界和社会各界进行影响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通常，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记录都表明，与所在国的代表以及外国人的接触都被积极利用，以便获得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以及为了揭露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

今年9月，在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大会上执行决定的部门作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报告，当时听取了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关于中国的情况以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也指出，除了在决定中提到过的大使馆以外，还有苏联驻英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驻中国一些邻国的大使馆都应当特别注意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建议苏联大使馆加强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工作。会后，远东司委员会准备了关于自己对研究和解释中国问题的一些建议的报告，并把其发送给了决定中提到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

АВПРФ, ф.0100, оп.60, п.534, д.31, л.211-214

1968年

№106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1968年2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2月28日会议第45/10r号记录

第10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基里连科同志、罗满宁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

一、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根据“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而撰写的3组编辑部文章。近期，在《真理报》、《消息报》、《共产党人》、《党内生活》、《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杂志上，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按照附上的题目刊登一组理论性文章。在中央各报上转载各兄弟党报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无论是在进行对内广播还是对外广播中，定期播送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并在转播时系统地使用各兄弟党的有关资料。

三、塔斯社、新闻社以及其他进行对外政治宣传的部门和机关，必须保证在国外广泛传播苏联公布的以“关于中国事件”论题为基础的材料。

四、苏共中央宣传部、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全苏知识协会，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在居民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揭露反苏维埃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毛泽东集团。为实现以上目的可以广泛使用口头宣传的方式。

五、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告报刊、广播和其他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中国问题的宣传时要以“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论题精神为依据。

No1040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1968年3月12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3月12日会议第47/1r号记录

第1项 关于与兄弟党协调中国问题宣传和研究的决议。

批准就中国问题前往柏林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附录)。

附件：

第47/1r号记录

前往柏林就中国问题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

一、向与会者通报，苏共中央关于在我们党的实践活动中使用共同的资料——《关于中国事件》的决议。

二、建议在会晤时，讨论以下附件——兄弟党在中国问题上开展宣传和科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一)组织措施：

——为交流加强与协调反毛宣传活动方面的意见，1968年4—5月间，在莫斯科会晤参加国其中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报刊、广播、电视、新闻机构以及出版社代表会议。

(二)在广播和电视领域：

——交换广播电视材料，以便在对内和对外广播宣传时使用；

——组织共同广播，其中包括对最重要和最迫切问题的有力的反宣传讲话；

——近期制作出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纪录片；

——在国际广播电视组织和国际电视组织中，协调我们各国的力量；

——互派专家，以便交流中国问题宣传的经验；

——就中国问题广播宣传中的主要方向互通信息；交换参考资料，特殊情报资料等。

(三)对第三国报刊宣传领域：

——在向第三国发放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中，协调兄弟各国新闻机关和其他对外政策宣传机关的力量；

——共同整理编制“关于中国事件”的文件汇编手册。这本手册应译成各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并在第三国发行；

——共同出版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照片文献，并在第三国发行；

——协调关于反毛宣传方面的前景计划；

——定期交换有关中国问题的业务材料和情报信息；

——在收集和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方面，加强我们各国驻外新闻代表的合作。

(四)在科学研究领域：

——1968年底举行题为《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这次讨论会的材料；

——协调即将参加1968年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次中国学专家代表大会的兄弟国家各位中国学学者们的立场；

——互派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实习生和大学生；

——在今天的春夏之际，举行我国各个科研机关领导人会议，交流信息以及协调出版、学术研究计划。

三、在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时，在与中国有关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协调的具体问题上，除多方接触外，还要指出双方接触的适宜性；指明兄弟国在上述领域里进行合作，一切实际问题都在非外汇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解决。

ЦХСД, ф.4, оп.19, д.504, л.115-117

№10257 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 舆论宣传工作(1968年4月5日)

机密

特急

优先拍发

维也纳(致莫洛佐夫同志)

布拉格(致波泽尔科、列别杰夫、叶罗费耶夫同志)

柏林(致拉希姆巴巴耶娃同志)

布加勒斯特(致格拉乔夫同志)

开罗(致阿卜杜拉扎科夫同志)

苏联大使：

兹委托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一步开展和强化为争取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而斗争的世界性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就采取共同行动问题与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扩大接触时，应该指出，约翰逊的声明只是个迫不得已的步骤。这是越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的结果，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对越南卓有成效支援的结果，是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碰到的社会困难和经济困难增长的结果，是世界各国进步的社会舆论和爱好和平力量对美国政府压力日益增大的结果。

同时必须强调，约翰逊宣布的措施，还远不符合越南人民和国际舆论希望达到的目标，即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谈判。在各种国际社会舆论范围内不容许出现幻想，即似乎可以放松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进一步施加日益增长的压力的必要性。这种群众性压力的目的仍然是：停止美国侵略并在此基础上按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条件，政治解决越南问题。

从当前局势出发，全世界的和平拥护者运动、工会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亚非团结运动、所有的国际民族、民主主义组织，都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今年4月3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

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以更大力量、更大强度开展要求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的世界性运动，以此造成开始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的有利条件。鉴于美国空军不顾约翰逊的许诺，继续对非军事区以北200—300公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进行狂轰滥炸，在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爱好和平”保证的虚伪性，这样做显得尤其必要。

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任务是要对美国新的战争行动保持警惕，进一步发展支持越南人民的行动，实现早先通过的决议。今年3月23—24日，为协调各爱好和平的组织和运动支持越南人民、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召开了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要千方百计努力发展这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号召书，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采取共同行动的很好的基础，是把国际社会新的、更广泛的阶层吸引到这些行动中来的很好的基础。

您应采取措施，使您所在的国际组织从自己方面，对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行动之决议和建议表示支持(首

要的是以号召书为基础)，并对自己国内的组织发出相应的呼吁。要注意必须使这个运动对社会产生最大的动员影响，要利用所有渠道和手段使这些文件得到广泛传播，做到家喻户晓。在准备这些文件时请以上述意见为指针。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尽可能使赞成停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各种组织和运动广泛参加进来。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送：葛罗米柯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

附件：

第71号记录第50项

机密

第00139号

第2处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现将为进一步开展和加强为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斗争的世界性运动，所拟订的对苏联驻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所发指示的草案提请你们审议。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112]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A.别利亚科夫

1968年4月5日

第25-c-536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45—4349页

№22993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绝密，不得复印

在3个月期限内必须返还

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

(1968年4月9日上午)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因正当原因——生病和到国外出差等未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党中央委员8人，中央候补委员——6人，监察委员会委员——6人。还有什么建议吗？

会场上有人道：开始开会吧。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么，请允许我宣布此次中央全会开幕。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委员们都已知道了会议的议事日程，有人对此有意见吗？

会场上有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打算对会议程序作如下安排……

[113]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同志们!

当我们面对不断变换的外部形势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在促进整个反帝阵线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12月中央全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定期与各兄弟国家和党派领导人会面，与其讨论世界政治的现实问题以及我们国家间关系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问题。这些也是政治局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动员劳动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上各社会主义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并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这里并非指的是所有与发展 and 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关的

那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会汇报关于一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尖锐的问题..... [114]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下关于中国的情况。这不是个新问题。我们曾在12月(1966年)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1967年6月中央全会也涉及它。前不久，向党的积极分子都发放了“关于中国事件”的详细资料。因此，这里我们不再涉及细节问题，而只想简短地谈谈，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最严重的后果以及当前中国形势的最重要的特点。

在经济领域“文化大革命”导致生产大幅下降；1967年的工业品总值与1966年相比下降了15%—20%。中国各地区间的国民经济联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劳动者，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状况继续恶化。

在政治领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政府和管理宪法机关被摧毁，各级党组织和党委被解散。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党实际上已不存在。

如今在经历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场运动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指出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及其集团至今仍不能够完整地落实自己的路线，彻底消灭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方针的反对派。

应当说，虽然毛主义者作了绝望的努力——在所有省份和自治区以所谓“革委会”替代政权宪法机关和党委，但时至今日此举并不成功。目前只在3个大城市以及26个省和自治区中的15个建立了“革委会”。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革委会”的建立绝不会导致毛主义者所期望的结果——终止对毛集团政策的反抗以及内讧和冲突。如今，首都的北京“革委会”已发生了分裂，而上海和其他一系列省份的“革委会”也面临分裂的威胁。虽然当局实施了空前规模的镇压，但对抗依然在继续。国家许多地区在毛的拥护者及其反对者之间仍在不断发生着公开的、经常带有流血性质的冲突。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增长。例如，1968年3月1日广州的《南方日报》对公社内部的情况便做了如下描写：“在春

播工作前夕，农民中出现了大量不遵守纪律、拒不服从领导的情况。所有人都只想参加会议，而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没心情工作——只愿四处闲逛，即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议厅响起一片笑声)在青年学生中这种情绪更加强烈。此时，多数高校的课程实际上都未恢复，虽然大学生们基本上都已被从大街上召回并借助军队的力量被约束在各学院的高墙内。

由于面临对事件发展失去控制的现实威胁，又担心成为自己所发动的社会大混乱的牺牲品，毛泽东的拥护者们近期开始改变策略。从前，他们号召造反，那么现在则威胁性地宣称要对“无政府和宗派集团”采取“惩罚性态度”。从前他们呼吁“对各司令部开火”，那么如今则开始劝说干部们“要忘记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污辱”。根据现有资料，当局在坚定地联合所有所谓的“革命团体”的运动的同时，各企业和机关已得到指令——要求停止向相互敌对的集团成员发放工资，如果他们在今年5月以前不结束斗争和实现联合的话。在一些仍继续保持混乱状态的组织中，作为过渡举措，其成员工资数额已被削减了一半多。

为了试图稳定局势，毛泽东集团采取了各种可能的举措。这期间，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把这一期望寄托在进一步加强军队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方面。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军队和军队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针对军队干部的不间断的攻击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在前不久，即今年3月25日在北京便出现了有组织的群众游行，其口号是：“打倒军队中从事破坏活动的上层！”这一次成为毛主义者迫害对象的有：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的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近期，中国制定了所谓党的“整顿和改组”方针，其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构成，让数百万红卫和造反派加入进来。可能，毛主义者是打算在维持原有名称的同时，而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党，从而使党在组织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完全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实施军事官僚主义专政的工具。完全可能，也正是因此才确定了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据一些资料表明，中共计划于今年秋季召开这次大会(虽然也有消息说，这次大会不在今年举行)。

关于毛泽东集团对外政策活动的结果，可以确定地说，其提出的使中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谓“第三世界”领导者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如今，中共领导者和中国倒是享受了“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首脑的

殊荣，其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依然极力试图挑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利用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中的困难和社会主义合作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每当我们遇到某个巨大的国际冲突——如越南问题，印巴冲突和近东问题等——都会出现毛泽东集团的身影。他们极力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局势。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会导致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进一步孤立。

中国的政治危机仍在继续。目前，我们还很难说，这一切需要经过哪些阶段才会告一段落。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以前已批准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政治路线。在不给中国领导人的挑拨以可乘之机和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观点、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以维护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友谊。与此同时，同志们，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集团仍在继续其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北京正在发动一场真正的反对我们社会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宣传战，试图败坏我们对外政策的声誉。针对这些敌视性的活动，我们的路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始终给予其有力而坚定的回击。（掌声）

同志们！在12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提请大家关注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古巴领导人的国际政策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全会通报如下情况，即最近古巴领导人的一些行动使苏古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应当说，如今古巴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道路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特殊观念，日益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和政策相矛盾。事实上，上述特殊观念还在几年以前便开始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例如，他提出关于通过加快发展速度的方式，仅仅依靠革命热情便可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

..... [115]

РГАНИ, ф.2, оп.3, д.101, л.1 2、56-61

№22994 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

(1968年4月9日晚)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全会工作继续进行。由格里申同志发言，谢列斯特同志做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在党的二十三大之后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已是第三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始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关注的重心。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展示了苏共中央在团结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苏共中央所做的上述工作受到了党和苏联人民的高度评价。

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在布达佩斯的召开，是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党领导层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结果。在此次会议上所达成的，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约定，是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苏联积极帮助英勇的越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在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均表示，要与越南人民团结一心，完全支持政治协商会议对所有国家和政府所发出的号召，坚决要求美国立刻停止侵略越南；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政府就以色列军事集团不断的军事挑衅活动所发出的声明，表示随时准备为了公正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们如今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领导人和毛泽东集团的分裂、反苏和民族主义活动给革命团结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危害。

毛泽东集团的政策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首先在于，他导致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使中国演变为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这一危害还体现在，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的活动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其所执行的分裂革命力量和激化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更便利了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在践踏国际团结原则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拒绝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的这一做法只会有助于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无耻的反苏活动甚至让美国统治集团都感到意外。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们为此而不断地发出欢呼之声。例如，前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凯南便写道：“我们方面曾一度摊着手傻坐着，竟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冲突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

苏联人民和所有国家的马列主义者们均坚决谴责蛊惑人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它导致党、共青团和工会的骨干遭到污辱和被毁灭，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并贬低了其作用，以敌视态度对待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只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敌人去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视作实现自己霸权目标的主要障碍，毛泽东集团集中力量以巨大的规模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发起了攻击。与以前一样，他们动用数十部广播电台开展针对我们国家的工作。可以说，他们以粗鲁的、很不体面的、有辱苏联人民尊严的方式播放了大量反苏材料，恶毒诬蔑苏联的实际，极力试图促使苏联人民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

与从前一样，与苏联的领土争议问题在中共领导人的反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近期，在一系列边境问题上他们又对我们发起了新的积极进攻。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是想对两国现有边境进行重新界定。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公民违反边境规定，已进入我方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上的诸岛屿。

我们，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相邻边疆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居民们，是这场由中共领导人目前正在发动的赤裸裸的、反苏运动的亲历者和证明人。

经常会有人数不等的红卫兵组织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上的我方岛屿上出现，并挥舞着毛泽东语录，高喊反苏口号。

仅在1967年和1968年的三个月间，在由远东荣获红旗勋章的边防军区所保卫的区域内便发生了112起由中国人发起的粗暴挑衅性行动，参与者达到4000人以上，其中既有平民，也包括军人在内。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违反边界制度共计1665起，参与者近9500人。1967年渔汛期，在乌苏里河上中方共计1800多艘快艇和渔船侵入我方水域。

近期，在乌苏里和阿穆尔河边境地区沿岸中国人正大量修筑防御工事、掩蔽部、公路、通讯线，露天观察哨，重建了日本人当年的所有防御工事，新建了一些村落并从中国南方诸省向这里移民。

据中国叛逃者证实：中国国内目前粮食不足，人们经常挨饿，燃料匮乏，许多省份和城市都出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办公大楼、商店和铁路站被毁，火车运行不按时刻表，许多城市中匪患横行。

中国劳动者谋取更好生活的合法意愿，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受到严厉谴责和严肃追究。毛泽东集团顽固地断言，“人民越贫穷，就越革命”，并以此口号作为处理一切事情的依据。

作为对经济困难的解释，中国宣传媒介说，本来就应当这样，“为了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打一场大战，准备克服空前的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家们也一直在宣称，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拥护。

同志们，在这个讲台上我必须说的是，这些关于我们苏联人民的话都是赤裸裸的谎话，不论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还是整个远东，反正都不可能找到一位苏联人会赞同毛泽东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反苏和分裂主义政策抱有即使一丁点儿的好感。

边疆区的党员积极分子和所有共产党员们坚定而彻底地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和民族主义方针，系统地向全体居民解释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实质和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

边疆区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民不付出巨大的劳动和不加速积累我们国家的经济潜力，要巩固我们祖国的国际地位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整个国家一样，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任务，边疆区也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便能够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卡尔·马克思150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

..... [116]

No22991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1968年4月10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

(1968年4月10日通过)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及其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由于坚定不移地落实苏共二十三大所定的方针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央(1966年)12月中央全会、(1967年)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更加稳固，苏维埃国家更加强大，威望不断增长，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维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通过与各兄弟党的密切合作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全会完全赞成布达佩斯共产党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117]。苏共中央全会认为，近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筹备计划于1968年11—12月间举行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全会委托政治局在布达佩斯会议联合公报所达成的既定立场的基础上与各兄弟党进行密切的接触，全力争取新的国际会议的胜利。

全会高度评价和赞成苏联代表团在索菲亚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活动，并对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由于美国对越南侵略的扩大化而导致世界和平受到威胁的宣言”表示欢迎。该宣言是对美帝侵略者发出的、新的严正警告。它再次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战斗的越南人民的国际团结。为了正在遭受帝国主义进攻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尽快恢复越南的和平，我们将全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给予援助。

中央全会一致赞成六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采取的共同立场。全会特别强调六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领导

人所举行的德累斯顿会议的意义。全会再次批准我们党准备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在指出由于以色列右翼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导致近东局势依然严峻的同时，全会赞扬政治局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举措——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解放阿拉伯被占领土，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中的进步力量。

中央全会肯定了中央旨在揭露西德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的正确性，强调苏共与兄弟党所采取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以及所有反帝力量，从事反对西德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的重要性。

全会指出，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极其尖锐。整个反共产主义的庞大宣传机构的目的，就是要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瓦解当代进步力量，并试图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在自己的内、外政策都遭到了严重动摇和失败的同时，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除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实施冒险外，还将更大精力投入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自身民主运动的具有一定破坏作用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

在这种条件下与敌对思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对苏共党员和全体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所有党组织的主要责任之一。其职能就在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积极反对个别文学、艺术作品的腐朽思想和其他错误观点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思想。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运用一切思想教育手段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使每个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具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从而使人们能够从思想上抵御任何形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我们为庆祝卡尔·马克思150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而采取的举措，理应成为促进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和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宣传的有力因素。

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活动应当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积极性，与每个苏联人在顺利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生产任务中的实际贡献紧密

联系起来。

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防，促进整个社会的更全面发展，在自己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去赢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全会委托政治局制定和落实一系列举措以改善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18]

中央全会认为，当前国际形势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苏共自身也将继续执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防止世界战争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的政策。

РГАНИ, ф.2, оп.3, д.89, л.1-12

№25772 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 [119] (1968年5月12日)

.....

1968年4月25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军人在奠边府地区残酷迫害苏联地质专家И.В.瓦西里耶夫。他们将他从汽车里拖出来，采用暴力手段折磨他两个小时：他们要求苏联专家低头，亲吻毛泽东语录，用脚踢他，用拳头、铲子打他，并用武器威胁他，甚至朝他头顶上开枪。虐待狂将失去知觉的瓦西里耶夫抛到带刺的铁丝上.....类似的事件以前也发生过。

.....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

1968年5月12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52, п.220, д.3, л.26

№25771 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

任务全部完成(1968年7月22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Ю.И.拉兹杜霍夫：

兹向您通知：

根据1967年3月28日的中苏意向书和1967年6月20日、8月8日和9月6日互换的信件，中方已于1967年至1968年1月全部完成了运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专用物资的铁路运输任务。中国政府为此支付了984.8822万卢布40戈比。

上面提到的经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李强

1968年7月22日

于北京

АВПРФ, ф.0100, оп.55, п.232, л.47

№1040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1968年12月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12月4日会议第62号记录

关于责成新闻出版社出版并在国外发行王明同志题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的文章的决议。

(基里连科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罗满宁同志)

决定交政治局协商。

1969年 №10406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1969年1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9年1月21日会议第65/84г号记录

第84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中央代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

1.同意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1969年1月17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见附件)。

2.批准以A.M.鲁缅采夫、O.B.罗满宁、B.T.库利克、B.И.拉扎列夫、B.M.佩什科夫、M.И.斯拉德科夫斯基、Л.П.杰柳辛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的会议。

3.批准关于代表团出席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指示。

4.有关代表团赴民主德国的有关一切开支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1969年1月21日

附件：

关于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不准公布

1.在同各兄弟党代表讨论材料过程中，代表团应遵循苏共中央1968年4月和7月中央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评价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1968年11月22日，第П108/18号)；并运用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拟定的“现阶段的中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的政策”提纲。

2.利用这次会议协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的国际及国内政策等问题的观点和评价，交流各兄弟党协调对中国问题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

3.如同1967年12月莫斯科会议一样，尽可能争取在苏共中央国际部门拟定的草案基础上，

以提纲的形式，制定出协同一致的材料。如各兄弟党代表团不认为可能制定出共同的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坚持己见，则限于对讨论主题的原则问题进行协商，达到一致思想和评价。

4.力求同其他与会者达成协议(像在莫斯科会议一样)，在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工作时，运用共同提纲作为正式发言、党的文件、本党信息的工作材料。

5.向与会者通报，苏共如何运用在莫斯科会议制定的关于“中国事件”提纲，苏共在反对毛泽东集团的反马克思反人民政策、在实行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团结和友谊的政策所作的努力中，达成了相互一致的协议。

6.提出关于协调各兄弟党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具体措施清单见附件)。

7.在同各兄弟党谈话时着重指出，协调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多边和双边接触同样具有合理性；并提示，各兄弟国家在指定范围内合作的一切具体问题，希望在对等、非外汇的条件下解决。

附件：

协调对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内容

不准公布

1.组织措施

——1969年6—7月，在这次与会的某一国首都举行报刊、电台、电视、通讯社及图书出版业的代表会议，交流关于加强和协调反毛宣传的意见。

2.在广播和电视方面

——交流可能利用的对内和对外的广播电视材料；

——组织共同播放，尤其是针对最重要和迫切问题的干练的、反宣传的讲话；

——在近期内制作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新闻片；

——协调我们的国家在国际无线电通讯和国际电视组织中的努力；

——互派专家交流在宣传中国问题方面的经验；

——相互通报关于无线电宣传中国问题的基本方向；交流咨询材料、独家新闻等。

3.关于报刊对第三国进行宣传方面

——协调各兄弟国家通讯社和对外宣传机构推进宣传中国材料的努力；

——用共同力量准备出版“关于中国事件”的材料汇编。把这本汇编译成外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并在第三国散发；

——在反毛宣传方面协调远景规划；

——定期交流关于中国问题的精干材料及情报；

——组织我们国家报刊的外国代表对搜集和交流中国情报进行合作。

4.在学术研究方面

——1969年底举办研讨会，主题是“现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随后出版这次研讨会的材料；

——互派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见习人员和大学生；

——1969年夏，组织我们国家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会议，交流情报并协调出版和学术计划。

ЦХСД, ф.4, оп.19, д.525, л.29, 107-110

№01843 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1969年1月23日)

摘自Г.Б.切谢夫的工作日记

1969年1月31日

第3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波兰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杜拉的谈话记录

(1969年1月23日)

本人应邀访问了巴杜拉。

从驻西贡大使多布罗沃利斯基那里得到的由其说明的消息是有关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北京与越南南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越南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问题。

一、据1月22日的消息说，“法新社”西贡分社副社长在与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谈话中说，1月21日阮文绍与在西贡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进行了会晤，据说达成了有四项内容的美国西贡计划，该项计划应在巴黎会议首先进行讨论。

- 1.西贡当局释放战俘。
- 2.对渗透地区进行监督。
- 3.对不设防的地区恢复原状。
- 4.停火。

据说，美国人在释放战俘问题上对西贡施加压力，而阮文绍在这个计划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宣传的数字与在越南南方实际存在的越共战俘有极大的出入。

美国新闻记者罗斯和贝姆证实了这个法国人的消息，他们强调说，在巴黎最先提出的将是关于不设防地区和停火问题。

根据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资料，约翰逊向新闻记者们证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说，他约翰逊不会建议尼克松去改变政策。

二、据1月22日消息说，多布罗沃利斯基从与一位不久前访问过柬埔寨的美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侨民起着中间人作用，他们用中国武器和粮食供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观察到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有参加阵线武装力量队伍的情况。

驻金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层领导人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柬埔寨购买大米并将它运送到阵线去，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

根据波兰大使的报道说，他也掌握中国大使馆与解放阵线部队联系消息的其他资料。

三、据1月21日报道，1月19日迟到一星期的消息说，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全国民族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倡议者是越南南方天主教教会的主教黄琼(Хоанг Куынь)和从北方逃走的天主教的领导人。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这个大会应该在“和平”的口号下，在得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广泛的民族支持下，和建立在佛教徒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来进行。但是事件说明，越南南方绝大多数政治和宗教团体无论是对天主教最高层想达到和平的想法以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政策上都持否定的态度。“大会”遭到了惨败：预计有1500个参加，结果仅有200人；有战斗力的佛教徒团体、越南国民党、大越党、越南劳动会议都拒绝参加。

据观察家意见，“大会”的失败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败，它打算把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为表面上给人看看的措施，这一措施似乎想证明越南南方人民对现有制度的广泛支持。佛教徒们有自己在越南达到和平的计划，但是仅在政府的“和平计划”公布以后他们才打算公布自己的计划，当时西贡的领导人关于这项计划曾有过声明。

№10256 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1969年2月21日)

摘自B.A.佐林的工作日记

1969年2月28日

第203号

今天拜访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官邸，在那里与春水 [121] 同志和陈宝剑 [122] 同志举行了会谈。

一、我简要地向越南同志通报了今年2月15日美国代表万斯在与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奥列姆科同志谈话时表达的最新意见以及法国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德拉伊今年2月18日与大使馆参赞乌特金同志谈话中，就越南的调解问题阐述的法国人的看法(没有直接引用他的话)。越南同志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介绍并对通报表示感谢。

二、我借口说，我最近将对参加巴黎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洛奇进行回访，询问越南同志，在尼克松来巴黎之前，有没有越南同志感兴趣的问题需要我们向洛奇提出来，以便我们在政治解决方面对美国施加影响。我还问，考虑到戴高乐很可能与尼克松讨论越南问题，越南同志有没有希望向法国人提出的问题。

越南同志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谈了以下意见。

(一)陈宝剑同志指出，现在美国不愿意在谈判中讨论实质性问题，他说尼克松正努力加强西贡政权及其军队，然后才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南越的局势将会发生变化，美国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美国正采取措施以保证自己在城市中的安全。美国人现在不得不面对由于城市各阶层居民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困难。城市居民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更加广泛，它指出的基本要求是在国内恢复和平，让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等所有人一起下台并组建“和平内阁”。

他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要政治解决问题，就必须予以讨论的一些建议，并且明确阐述了自己关于解决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立场。但美国却试图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努力改善自己在南越的地位，以便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

(二)春水同志同意陈宝剑同志的看法，他强调，尼克松和约翰逊一样，都想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所以美国继续加强傀儡政权，打算即使自己的军队撤出之后也继续留在南越，以便利用傀儡继续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美国人暂时还没有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在头几次会议上提出的那些具体建议(指洛奇建议开始讨论关于非军事区的问题、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不过是为了进行对话，而不是为了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是在拖延解决问题。美国人明白，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将给他们提供加强西贡傀儡的机会。美国之所以硬要讨论军事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加压力。

至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据春水同志说，法国人希望美国从南越离开，而法国返回那里，但不是像他们以前那样。很显然，法国人在与尼克松谈判时将在这个方面对他施加影响。

往后，春水同志说，如果我与洛奇谈话，让我转告他以下情况：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希望在达到真正独立的基础上，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在美国希望的基础上。

——如果美国想继续从实力地位行事，那么越南人民不会同意这样做并将继续反对美国的侵略斗争。

——如果美国想解决越南问题，它就应该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如果不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越南问题将得不到解决。暂时美国和西贡在谈判中还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而不愿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

——如果美国不同意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南越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就将遭到更大的军事失败。

至于具体问题及解决它们的立场，春水同志和陈宝剑同志认为，现在还不到与美国人讨论它们的时候。

三、在就越南问题的某些方面交换意见时根据我们主动(为了弄清越南同志的立场)谈到了“和平内阁”的问题、分阶段撤出美军的问题、消灭美军基地和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越南同志谈了以下自己的意见：

(一)陈宝剑同志解释说，反对政府的西贡政权只是一个战争政府，它只能为战争服务。反对派运动及它提出的要求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建立“和平内阁”的思想，所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这个运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反对派运动作为“和平内阁”候选人提出的人士。被推举的候选人都是些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过去与美国人有关联，但现在已站在进步的立场。

(二)春水同志补充说，西贡当前的政府不希望和平并继续奉行支持美国侵略战争的政策。所以西贡、其他城市 and 美国人占领地区的居民都要求推翻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这个要求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要求，而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从下面提出的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这个要求。

他继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当前对建立“和平内阁”没有什么具体建议，但我们欢迎将进入新政府，并愿意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人进行对话。如果越南南方居民方面提出要求，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参加政府，那这是件好事。如果不提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和平内阁”的希望，而只是表示准备与其谈判，那这也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接受的。主要的任务在于，在这个“和平内阁”中，应当实现各阶层居民的民族大联盟，并在内阁成员中包括进“民族、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联盟”的代表。当这样的“和平内阁”建立起来之后，有可能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组建临时政府。

(三)当我提出，为了解决军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是否应该提出某些具体建议，比如，关于缩小某些地区军事行动的范围或者关于分阶段撤出美国军队和在一定期限内消灭美军基地的建议，春水同志说，还不到讨论军事问题的时间。美国人想从实

力地位进行谈判并想使用这种实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迅速、完全(而不是分阶段地)、无条件地撤出美国军队。美国人现在认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耗尽,他们已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行动。所以,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现在提出某种具体建议,比如说关于缩减军事行动的建议,那就会被美国人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软弱的表现。

陈宝剑同志对此补充道:“我们要狠狠教训一下美国人,并且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春水同志要我在与美国人谈话时暂时不要涉及这个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将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稍晚些时候与(苏联)大使馆交换意见。

(四)我以探讨的方式向越南同志提出,为了迫使美国人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是否应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依据4点和5点提出一个巴黎会谈的具体纲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对此表示支持。

越南同志对此想法表示感兴趣,而且春水同志说,两个代表团将研究这个建议。

参加该次谈话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何文楼同志、梅文蒲同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成员阮文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工作人员阮玉蓉同志,我大使馆参赞泽连佐夫同志,大使馆二等秘书戈里茨基同志。

参赞B.A.泽连佐夫同志为谈话担任翻译,二等秘书B.A.戈里茨基担任记录。

苏联驻法国大使

B.佐林

共打印6份:科济列夫同志、苏共中央、第一欧洲司、东南亚司、沃姆普(УОМП) [123]
, 存档

1969年2月24日

ЦХСД , ф.5 , оп.61 , д.460 , л.56-60

No10282 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1969年3月8日)

1969年3月2日，当地时间11点整，中国在达曼斯基岛上组织了一次挑衅行动。该岛位于比金和伊曼之间(普里莫尔斯基地区)，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的乌苏里江上。

据已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这次行动是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发起的。在1968年12月和1969年1—2月间，成批武装的中国士兵从虎林方向出动，几次入侵达曼斯基岛。遭到苏联边防军的抗议后，中国军队返回他们的边防哨所，或沿中苏之间指定的边界线行进。

在1969年3月2日事件中，驻虎林地区的边防部队仅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一支200多人的经过特殊训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被用来发动这次挑衅行动。这支队伍于3月2日天明前秘密进入达曼斯基岛，其成员均配有特殊装备，并身着伪装服。从中国一侧岸上还架设了一条通往该部队的电话线路。在此之前，炮兵部队以及后备队、军备物资和地雷、自动火炮、重机枪等军火都已汇集于中国一侧江岸附近。事后找到的那些稳定器、炮弹、地雷和手榴弹碎片以及遗弃在被击毁坦克中的木板箱等物，证明这些武器确曾被使用过。

莫斯科时间约2点钟左右(当地时间9点)，我们的观察哨所发现，达曼斯基岛上有30名中国军人在前进。为此，我边防站派出一支队伍前往中方越界地。我方指挥员带领一支小分队向侵界地点靠近，打算如以往反复做的那样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未使用武力)他们从苏联领土上退出去。但是，在双方交涉的最初几分钟内，我边防军就处于对方的交叉火力之下，中方未提出任何警告便在暗中开了火。与此同时，中方还从岛上的灌木丛中和中国一侧江岸上向我边防军余部开火。我边防部队接到战斗命令，并获边防站附近留守部队的增援，阻击中方的突然袭击，并采取果断行动，将入侵之敌驱逐出苏联领土。

双方均有伤亡。

当对岛上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军事装备、电话和通向中国大陆的电话线以及大量散在的空酒瓶(这些酒显然是中方奸细及这次冒险活动的参加者在鼓足勇气开始行动之前所饮用的)。

达曼斯基岛既无居民，也毫无经济上的重要性；其附近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人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岛之所以被选为入侵的地点，是由于在那里可以秘而不宣地暗中为此次行动做准备，然后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有利于该行动组织者的舆论倾向。

在挑衅行动中，中国军队对苏联边防军伤员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残忍的暴行。根据对事发现场的检查和医学委员会对阵亡苏边防军人尸体检验的鉴定报告，表明这些伤员都是被中国人用刺刀和匕首从近距离(或较近距离)击中的。一些伤亡人员的面部被毁得几乎难以辨认，还有一些阵亡者的军服和靴子被中国人扒走。中国人对苏边防军人犯下的暴行只能与20—30年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部队的极其残忍的暴行相比肩。

毛主义新的危险的挑衅行径暴露出，北京意欲加强同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西德的机会主义政治调情。正当波恩在西柏林举行的联邦总统选举中挑起事端时，中国军队发动了对苏边防分队的伏击，这并不是偶然的。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挑衅行动是毛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并使其国家转化成为一个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敌对的政权。毛泽东集团很久以来就准备组织对苏中边界地区的武装侵犯。1960年以来，中国当局人为地制造了苏中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从那以来，中国已制造了几千起带有挑衅目的的边界入侵事件。

1967年初，中国当局的边界入侵次数急剧增加。在一些地区，他们试图在属于苏联的岛屿和那部分河流上进行边境巡逻。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中国方面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卡萨克维奇运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挑衅行动。1969年1月23日，中国发动了一次对达曼斯基岛的武装攻击。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边界是根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63年6月俄中双方代表签署的附件地图确定的。根据这些文件所划定的分界线，达曼斯基岛位于苏联的国土上。这条线一直处于苏联边防军的警戒内。

与中国的边界挑衅行动相反，多年来，苏联方面一直在采取步骤使局势正常化。

1964年8月22日，(苏中边界)磋商中断。尽管我们一再提出会谈的建议，中国也不恢复会谈，甚至当1967年8月31日苏联外交部备忘录提出这一问题时，中国方面依旧毫无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严重违犯1951年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在1967年和1968年，他们还造成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谈破裂。该委员会是根据1951年达成的协议成立的。

中国在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备战(修建机场、通道、营房和仓库，训练民兵等)。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进行挑衅活动，有意识地造成边界冲突局面的形成。而在我们方面，则是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边界冲突事件的发生，避免冲突局势逐步升级。苏联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不得使用武力，如果可能，要避免武装冲突。尽管中国人在许多情况下，玩弄骗人的鬼把戏，找碴儿斗殴，用刺刀一类武器、铁棍和其他类似器械攻击我们的边防战士，行为极具挑衅性，但不使用武力的命令仍被我方严格地执行着。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武装挑衅行动是中国当局的路线、方针所致的逻辑性结果，是北京旨在加强反苏运动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1969年3月3日以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再次遭到经过特殊训练的毛主义团体的有组织的围攻。反对苏联驻华机构代表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在全中国每天都有发生。中国全国上下燃起了激烈的反苏运动的烈火，其特点在于，整个运动蒙上一层军事色彩，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气氛中。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鉴于所面临的这种局势，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防止边界入侵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挫败毛泽东集团制造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的罪恶计划，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去做一切必要做的事情。

苏联政府通过表示友好的感情来引导其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并打算在将来继续实施这种政策。中国当局这种恶意的挑衅行为将遭到我方的断然回击，同时，我方决心结束这种局面。

No2289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1969年3月11日)

3月11日。

午餐的时候，我与基辛格两个人在我们的大使馆举行了会谈。

1.基辛格说，由于美苏即将就近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希望能够找到稳定近东局势、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方面将由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参与这次会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但是，如果下一阶段双方进行交换意见的会谈需要转到莫斯科举行时，将由美国驻苏联大使比姆参与会谈。第一次会谈于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在这里举行。为了同美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今天，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到了美国，当他离开华盛顿的日期比较明确的时候，西斯科将会立刻另行向我通报这件事情。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委托向我转告，如果在同西斯科进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助理国务卿过于外交化的辞令”而产生了“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并且需要确定“美国方面更为真实、更具权威的意见的时候，或需要就某一微妙的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的时候”，我可以秘密地向他基辛格——尼克松总统的助理寻求帮助。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说，尼克松总统真诚地希望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解决近东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采纳这一提议。

2.基辛格推心置腹地说，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建造有限的导弹防御体系，尽管下周才会宣告这一决定。

3.基辛格想了解苏中边界事件，我根据现有指示的精神向他做了说明。

基辛格指出，美国人做出的评价是，只要毛泽东还活着，苏中关系将不能实现正常化，但是，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北京领导人现在就直接同苏联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

在谈到关于他们现在对苏中边界冲突这一事件的评价时，基辛格

说，对这一事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评价：短期性方面的评价和长期性方面的评价。

如果从短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对苏联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军事威胁，“无论中国人会挑起什么样的事端”(他没有明确说出这种事端可能具有的性质，只是说“中国人的行动总的来说很难预料”)。

如果从长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成为敌对国家，中国的长期威胁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因素，这是苏联未必能够忽视的，尽管考虑到现代化武器，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种因素将不会像在常规武器时代和军队的数量起作用的时代那样具有决定性。

基辛格自己主动保证说，尼克松政府“不打算利用”中苏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基辛格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改善关系；关于改善关系下一步应该由他们(中国方面)提出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现在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要求”)。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新政府确信，只有通过同苏联进行合作，苏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互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成功：调解近东冲突，调解越南问题以及保持欧洲的稳定(关于保持欧洲的稳定这一点，基辛格指出，他们完全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维持欧洲现状、增多西方大国进入柏林的通道的提议，关于这一点“可以另行交换意见，并考虑到苏联方面在1959—1963年提出的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一揽子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现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明白，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至少在尼克松政府的这届任期内)，中国都不会在解决上述问题中起到主要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政府将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将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将避免介入他们有争议的问题和矛盾，因为那样做将会反过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言论以及其他的迹象判断，对于中国人近来采取的行动，尼克松政府愿意向我们保证美国的“中立”，甚至愿意表示对中国人某些行为的“不赞成”。同时，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苏

中关系的发展，并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尽力考虑到苏中关系，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

在同基辛格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以及在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进行的谈话中)我们都在努力增加美国人对中国人行为的谨慎和警惕，向美国人显示，中国在达曼斯基岛的军事挑衅行为是北京对外政策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培养中国人民对邻国人民的仇恨(并且还不不仅仅是对邻国人民的仇恨)，为他们新的、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亚洲国家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创造一种氛围，并以此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

4.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也提出了关于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谈判的问题。

基辛格援引前不久，我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这次会谈是根据罗杰斯的提议于1969年3月8日举行的)说，我在同罗杰斯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对美国政府的立场产生完全正确的印象，他对此表示“担心”(当时罗杰斯对我说，洛奇正在准备新的指示，以便对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四方将要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提出建议，美国打算在这次会谈中不仅仅讨论军事问题，而且还打算讨论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政治问题，并且，他们美国人根本就不愿意把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至今他们仍然持这样的观点)。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在巴黎谈判中的立场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议举行一次秘密会谈或一系列的会谈(基辛格说的“再过一段时间”的意思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确定今后南越军事局势的发展：游击队是否继续对南越的城市展开猛烈的攻击，如果继续攻击的话，他们美国人就会一直反对提出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

在这些会谈中，美国方面将会“务实地”提出相互撤军的问题：美国从越南撤军，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南越撤军。基辛格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而且他们甚至愿意提出关于他们准备撤出的军队的数量、撤军的日程和日期等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此之前能够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和西贡代表同时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关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辛格说，他们有材料显示，对于同西贡进行接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不会坚决反对，而西贡方面也不反对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论这种接触和对话是否公开进行。

在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这些双边会谈可以被纳入四方秘密会谈中同时进行，以便就各个问题进行讨论。

基辛格关于这两场双边谈判的计划和构想以及他为这两场谈判确定的任务是：在尼克松政府看来，这一构想以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讨论撤军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对参与会谈的双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施加压力，这可以“很好地提醒越南人，他们应该抛开个人的情绪，现实地寻找相互妥协的途径”。基辛格说，这指的是，美国 and 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谈判，除了具有其直接的意义之外，还将对越南双方的代表施加压力。

基辛格说，美国新政府和尼克松总统本人，都很关切关于从越南撤出美军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将不会使这一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失败，看起来好像是由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就得不到白宫的支持。”

至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又重述了早先对我说过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容忍在刚刚签署协议之后，就立刻使南越政权发生变更，或立刻就在南越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这将为人们指责尼克松政府提供口实，人们会指责他同敌人进行了“密谋”，背叛了“盟友”等。

另一方面，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或是在“正常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推行了某些政治变革，并且这种变革是由越南人自己推行的，那么美国将会认可这样的变革，不管到时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或取代它的其他组织在这一变革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基辛格也指出，他们很清楚河内关切的是什么，很清楚莫斯科很关心越南干部今后的命运，也很清楚谁会支持他们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仅仅清楚这些，而且还准备讨论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以便撤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危险的领导人，以便不发生类似最近几

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不希望，支持我们(美国)的人都被屠杀殆尽”。

基辛格和其他美国的官方代表一样，他们都表示，非常希望苏联在解决越南问题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又向基辛格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如果美国想使巴黎会谈取得成果，那么，就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不能再把解决军事问题同解决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考虑西贡政权的时候，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事实上起到的作用。基辛格试图掩盖自己的图谋，他说，尼克松政府和尼克松本人都“热爱和平，但是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着越南的另一方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企图通过说这样的话对我施加压力，我也果断地引开了他提出的这个话题。

应该说，基辛格事实上是在尼克松总统的许可下宣布取消罗杰斯的代表资格，这显然证明，尼克松政府内部在对外政策的选择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持不同意见的各派相互进行着斗争，试图对总统施加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基辛格在很早(这指的是，其中包括，1月份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以前就提出了上述计划，即进行两个阶段的会谈，或者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同时进行会谈。正如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样，他至今仍然确信，他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使得对于美国来说比较重要的撤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同时这个计划还可以使美国人最低程度地卷入这场就政治解决南越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而现在看来，这场谈判是毫无前景的(正如他暗自想的一样)。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他们声明说，不应该完全不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与谈判，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那么，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不会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秘密谈判，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不会同西贡的代表进行谈判。我们对这些声明表示了支持。看起来，这对罗杰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A.多勃雷宁

АВРРФ, Ф.0129, оп.53, п.399, д.5, л.143-149

军战斗准备的问题(1969年3月2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部边境军区军队管理局

1969年3月24日

第14/059号

阿拉木图市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部队司令部和政治部，鉴于苏中边境局势继续恶化和联盟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关于加强边防军战备的指示，拟研究和积极解决如下问题：

——在边防区党委例行全会上讨论“关于通过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分裂活动和培养劳动者警惕性来强化党组织工作的问题”；

——在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共产党员在培养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反苏宣传本质方面的任务”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本质和提高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对边区劳动者开展解释工作；

——在中央机关、州委和共青团区委全会上讨论关于吸引青年保卫边界和在边境地区展开共青团青年警惕性突击检查等问题；

——今年5月，以边防工程技术装备为主题举办共和国共青团青年宣传月活动；

——派遣演讲报告团、音乐队和艺术家团体前往边防部队、工厂和边境居民点，给予部队政治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实际帮助，加强当地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指示区党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根

据道德思想品质、业务能力和健康状况在各边境居民点选拔纠察队员，培训其使用武器，以便在局势复杂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执行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小组人员清单)。

每个此类人民志愿纠察队战斗小组均固定配备必要数量的交通工具。

边境地区各医院须配备医疗救护车辆、药品储备和通讯工具，以便在边境局势恶化时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医疗救助。

各战斗组要进行日常学习、培训和作战射击训练。鉴于此，应指示各区委、区招委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对于此类活动积极予以协助。

附录：1页。 [124]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司令

梅尔库洛夫中将(签名)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政委

拉斯波平上校(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5—1086页

№10463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25] (1969年4月 [126])

苏联政府责成苏外交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3月6日，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京代表打算预先通知中国方面，大约10天后的3月16日，苏联军列将抵达满洲里火车站。这次军列是根据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就通过中国国土运送苏联军备物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发出的。

苏方代表曾三次要求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一处会见他，以使他能就此事通报情况。但是对方以该机构官员“忙”为借口，拒绝见他。

这次会见直到3月8日才举行。会见中，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

会的代表詹勤泽(Jan Cin-dse)断然拒绝接受此通知，并争辩说这个消息传递得“迟”了。为答复此种说法，苏联代表指出，他曾几次要求获得接见，以便能通报关于这批货物符合1968年2月10日中苏协议提出的最后期限的情况，而中方两天来却一直回避与他会见。对此，詹勤泽解释说，“任何时候他都愿意接见苏联代表团”。这次会谈是在中国代表粗暴的腔调声和可恶的反苏激情中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代表的这种行为，其目的在于为将苏联的武器和军需物资运送给战斗中的越南人民制造障碍，并构成对中苏2月10日协议的违犯。

苏联政府再次提请中国政府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对中断将苏联物资运送给正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的越南人民，负有重大责任。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5—4366页

№10277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 ^[127] (1969年4月 ^[128])

.....

最近，中国当局重又开始为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武器及军需物资经中国境内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置障碍。

越南朋友对越南和中国就1969年将援助物资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运送至越南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他们强调说，“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问题也将变得非常困难”。越南同志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出现这种可能，即苏联军备物资经中国运往越南的货物运输活动将会完全终止。

自1969年1月以来，中国人拒绝运送苏联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由于中国的这种做法，迫使苏联在1至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

.....

№2289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1969年4月2日)

4月2日。

同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所有欧洲国家发出的呼吁。我依据我国对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们所下达的指示向基辛格详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一行动的原因。

基辛格仔细地听取了我的解释，然后问道，(苏联)期望美国在全欧会议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因为这对尼克松政府对上述呼吁做出评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回答基辛格说，大使馆得到的指示的精神是，因为谈及的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因此应当由欧洲国家自身来讨论关于美国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他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作为非欧洲大国的美国应当参与这次会议中关于哪些问题的讨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次会议。(在解释我们的指示时也应指出，不应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参与全欧会议。)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这一解释非常重要，他今天就将同尼克松(他已经去了佛罗里达过复活节)联系，并告知他这一点。

基辛格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他们已经对华沙条约国发出的呼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且事先认为，这一呼吁是非常克制而郑重的，白宫认为这份呼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然后，基辛格解释说，或许，一周后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委员会会议将会审议这一呼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在会谈中指出，欧洲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整个国际局势，应尽快采取行动，消除世界其他地区(近东、越南)的紧张局势和危险的根源，为缓和和巩固欧洲安全创造条件，并协调相关国家的行动，达到这些目的。基辛格说，至于近东问题，他认为最好是在

过一段时间后能够同我另外进行详细的会谈。

2.越南问题。关于越南问题，其中包括巴黎谈判问题，基辛格说，美国代表团已经同北越人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基辛格说，“也许，你们对这些会谈都很清楚”)，但是这些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我问道，目前美国的实际立场是什么。基辛格回答我说，他们仍然认为，应该同时举行两场会谈，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军事问题举行会谈，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政权之间就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在经过一定的阶段之后，再把这两场会谈合二为一。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还不准备让达成的军事协议生效，直到就政治问题的主要框架达成协议，尽管看起来，不需要等到把所有的问题都完全确定下来。基辛格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愿意最终和平解决问题，这是具有一定的保障的，他们不必担心类似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的那种事情，但是另一方面(西贡方面)毕竟还是希望他们得到一定的保障(关于这一点，基辛格抱怨说，对于“说服”阮文绍、阮高其等人，他是多么困难)。

关于军事行动，基辛格说，美国不打算在进行巴黎会谈期间扩大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另一方(北越)加强了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有不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的义务”。

基辛格补充说，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扩大军事行动的计划。

基辛格说，“我们也非常清楚，加剧军事行动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因此，如果局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么，看起来，我们将不会再通知苏联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动机，这些措施不是特别地针对苏联的。在任何情况下，莫斯科都不要把我们在越南采取的某一行动，看作是华盛顿忽视了从苏美在越南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或进一步把这看作是华盛顿不重视美国同苏联发生关系，而尼克松政府认为，美苏关系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基辛格补充说，然而，他们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基辛格也顺便提到，并且略带强调的口吻多次强调说，在对待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条件上，尼克松总统“不能完全不考虑1972年的总统选举”。基辛格说，“美国政治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基辛格说，在公正的条件下把美军完全从越南撤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比起固守和拖延战争，将会给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带来更多的选票。这在上一届政府身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暂时还不愿意抛弃西贡的阮文绍和阮高其政权，并且仍然指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同他们在巴黎或其他地方进行的接触中会最终作出让步。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我同基辛格进行的一段简短的谈话。基辛格说，在巴黎进行接触或许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另找地点进行接触，取代在巴黎进行的会谈。

对此我答复他说，问题不在进行接触的地点，而在于西贡政权本身，他们仍然不愿考虑南越的现实状况，仍然像以前一样指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基辛格在最后说，他们将继续研究关于越南问题的各个方面，看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同意我就这些问题提出的这些想法。

3.中国问题。有消息说，白宫成立了一个以基辛格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同中国最近的关系，基辛格确认了这一消息，尽管他补充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样的委员会他已经领导了大约六个，而且都是为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设立的。

基辛格接着说，他同尼克松总统就中国问题交换了几次意见，因此，他知道，在同B.B.库兹涅佐夫举行的会谈中 [129]，尼克松总统已经非常开诚布公地说出了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就是：现在世界上有美苏两大强国，两国都拥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军事潜力，但是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强国，这就是中国；因此，苏联和美国要利用一切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制定和作出一些决议，使国际事务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在现在正在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美国和中国是否存在改善关系的某种可能。

基辛格说，他还利用他们的一些欧洲朋友的帮助，对北京的意图进行试探，确定在哪些领域可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贸易方面、互换报刊代表方面、文化联系方面等)。

基辛格补充说，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把台湾交给中国。除此之外，他们在处理有关美中关系事务的时候，“都是非常灵活而没有成见的”。

基辛格继续说，总的来说，大部分美国专家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中美关系就未必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仍然要尽力为双方今后关系的发展打好基础，他们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无裨益的。无论怎样，中国都是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

基辛格继续说，尽管他们的专家还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具体会怎样发展，因为这将取决于谁来接管北京政权。但是，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死后，美国仍然比苏联更容易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到那个时候，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仍将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为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和领土分歧。中国同苏联接壤，并且拥有漫长的边界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基辛格补充说，美国方面，当然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华盛顿方面目前还不会抱太大的幻想，因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央，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重大的生存利益，美国完全不会在这些利益上向北京让步，尽管“我们不希望北京无事生非”。基辛格说，因此，位于亚洲大陆中央的中国，其政治如何发展，绝不是美国可以漠然置之的。

基辛格说，因此，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着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因此，华盛顿组建了一个拥有大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小组，对北京现在发出的“每一点声音”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确定中国领导人现在想的是什么。白宫认为，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可靠资料。

在会谈过程中，当谈到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援引了尼克松本人的意见，他强调说，美国现政府不打算打中苏关系牌，并且认为，第一，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美国现政府最为重要的任务，第二，企图利用中苏矛盾将不利于美国，会使苏联和中国都更加疏远美国，特别是，在目前北京的政策还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

顺便说一下，基辛格也指出，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打苏联和中国牌，这些人认为，美国同中国接近首先可以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主党内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例如小肯尼迪、索伦森等人现在在谈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时候都持这种观点。看起来，这种观点可能会引起莫斯科的警觉。

基辛格确信地说，然而，尼克松政府不同意所有这些观点。（基辛格的这些话显示，美国两大政党出于选举斗争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看起来，同他们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相比，自由党在对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们更加有利的地位。）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些谈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尼克松政府现在非常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在盘算着，在不使美国同苏联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同时找到同北京改善关系的途径，并且不排除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但是，现在感觉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对于中国能否现在就急剧地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们明显还没有信心，第二，他们的考虑是，在尼克松执政期间（4年甚至8年），苏联在军事上将比中国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相对于同北京的关系而言，同莫斯科的关系对美国来说仍然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苏中分歧这个问题，尽管目前事态只是渐渐地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已经向我们谈论了关于美苏关系优先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对我们强调说，他们的行为是“慎重的”，希望莫斯科在对外政策方面能够对此予以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在谈到美国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不希望把这看作是企图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举动。因为远远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而且这种看法本身也显示，他们同我们的关系的发展“还不完全顺利”。基辛格再次说，这所涉及的利益众所周知。他再次向我强调了尼克松总统早先就美国对东欧政策相关问题委托他转告给我的话：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仍然完全有效（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完全没有提及最近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4.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中，我问基辛格，美国社会研究所的一

名领导人哈里斯是否有全权代表基辛格同苏联代表在纽约就越南问题进行接触。

基辛格非常肯定地说，他没有给哈里斯任何权限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诚然，哈里斯曾说，他同苏联在纽约的代表进行了很好的接触，并答应，保证把他从苏联代表那里得到的信息马上就发送给基辛格。基辛格说，他当然没有反对哈里斯这样做：如果这些信息是有用的，为什么不得到它们呢？

基辛格说，但是，哈里斯对苏联代表所说的话完全不代表白宫的意见，而是纯属个人看法。对此莫斯科方面应当明白。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给他有明确的指示：只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同苏联代表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基辛格只执行这一指示。

在会谈的最后基辛格表示，希望在4月10—11日，北约理事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之后，能够同我进行非正式的会见，两人能够共进晚餐，就如下问题进行略谈：欧洲事务问题、近东问题、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苏美关系的其他问题。

我的答复是同意进行这次会谈。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3, п.399, д.5, л.177-184

№2595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1969年4月3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9年4月3日第12次会议第106号记录

关于在吉尔吉斯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共和国的劳动者们对苏联政府就中国政府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挑衅发表的声明高度一致地予以欢迎，他们热烈地赞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赞同为保障我们祖

国的神圣边界的不可侵犯和完整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的危险行动，党组织应当在广大的居民中加强教育工作，保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为了加强边疆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的实质和北京领导人的挑衅行动，使居民对苏中边界局势的加剧保持警惕，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定：

1.责成奥什州、阿赖斯基、乌兹根州、阿特巴希、天山、贾特奥古兹和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地区的党委：

在1969年4—5月的地区党委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

在边界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基层党组织中就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分裂活动问题召开会议；

在边界地区的所有居民中开展大规模的解释工作，解释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政治军事挑衅的本质，以及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的任务。

2.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央局、奥什州委和边境地区的共青团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保卫国家边界、就青年共青团员的警惕性开展突击检查的问题。

今年5月，就边界地区的工程技术装备在加盟共和国开展青年共青团员月活动。

3.应向边境的一些队、哨所，以及边境的居民点派遣一些作报告的小组、举办音乐会的工作队、艺术家小组对部队的政治机关及当地党组织提供实践上的帮助，在居民和边防战士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

4.各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 [\[130\]](#))。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5.责成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

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6.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决议认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设立先进红旗奖项，每年授予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

委托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行政和贸易机关对该决议的执行进行监督。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7—1089页

№25957 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1969年4月16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1969年4月16日第2次会议第34号记录关于落实
实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9年4月3日

“关于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会指出，本州劳动者一致赞成苏联政府就中国当局在苏中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所发声明，热烈拥护和支持苏联政府和共产党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及其为确保我们祖国神圣边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危险行动，各级党组织有责任加强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确保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鉴于中苏边境局势恶化，为加强边境地区党组织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和北京领导人挑衅活动的本质、提高民众的警惕性，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执委机关做出如下决议：

1. 责成阿尔泰和乌兹根区党委：

——在1969年4—5月举行的区执委全会上研究这个问题；

——在边境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基层党组织中就共产党员在提高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本质等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实质和提高劳动者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在各区全体居民中开展广泛解释性工作。

2. 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奥什)州执委，在州执委机关和边境各共青团区委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参与捍卫国境和开展加强警惕性的共青团—青年突击检查活动。

本年5月，在全州范围内举办边防工程技术装备共青团—青年月活动。

3.责成奥什州执委，通过空中交通管理局采取措施，加强州边境地区的交通制度，确保应有的通关秩序，以便夏季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安迪让斯克和费尔干纳诸州，塔吉克共和国各地区和奥什州因公来访的畜牧专家的旅途顺利。

整顿通往国境附近各居民点的道路和专线，在本年5月份建成直达乌兹根区克孜勒扎尔村的电话线路。

4.责成州文化局(马杜马罗夫同志)向各边防部队、哨所，以及边境居民点派遣演讲——报告组、音乐队和艺术团体，以实际行动帮助部队党政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加强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5.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 [131])。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6.责成州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7.据悉，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设立了吉尔吉斯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先进红旗奖项，并将每年向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颁发。

责成吉尔吉斯共产党州执委宣传、行政和财政贸易机关等部委负责监督上述决议的落实情况。

吉尔吉斯共产党州委书记

С.ИБРАИМОВ(签名)

№1040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 和科研工作(1969年4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9年4月28日会议第71/1r号记录

第1项 关于加强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改善中国学科学研究工作。

(基里连科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H.米哈伊洛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罗满宁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1.赞同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附件)。

2.责成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该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附件：

第71/1r号记录

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

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里林同志)应该在培训科学教育干部的年度计划中，规定高等院校和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生部，每年招收研究生达50人。

二、批准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每年招收5—7名中国学研究生。

将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专题课纳入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高级党校以及州际的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中。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同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在科学文化联系年度计划中规定派研究生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前往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学实习(每年派出人员20名，期限6—12个月)。

四、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以及苏联教育部，应该组织提高专业水平以及中国学教师的进修活动，保证专门住宿学校汉语学习的完善。

五、为了协调和完善中国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克尔德什同志)、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叶留金同志)与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苏联科学院科研院所和国家高等院校1970—1975年期间中国问题研究和出版的综合协调计划并将其提交苏共中央。

整个科学研究活动的协调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负责。

六、1969—1970年期间准备完成以下出版工作：

(一)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加富罗夫同志)，负责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科普读物《中国历史》；

(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费多谢耶夫同志)和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季莫费耶夫同志)，负责出版《中共党史概述》；

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保证以上著作的出版。

七、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并作出决定，公开出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信息公报的资料。

八、委托苏联科学院，在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设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分支机构。

九、苏联科学院在今年的6月1日前，应该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加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物质基础和改善该所研究人员物质保障的提案。

ЦХСД, ф.4, оп.19, д.543, л.2, 37-38

№10408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1969年5月13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13日会议第72/111г号记录

第111项 关于加强苏联在香港的地位的一些措施。

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海军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有关组织一起，共同研究苏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在一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

ЦХСД, ф.4, оп.19, д.544, л.33

№22347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1969年5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会议第73/185r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185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一、同意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见附件)。

二、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以及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该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三、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同有关组织一起，在两周期限内提出关于与实现本计划有关的一切开支(包括外汇)的资金来源的建议。

四、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就其代表例外会晤问题进行磋商，以对“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作出一致评价，并为此准备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资料。

附件：

第73/185r号记录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在党的教育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领域：

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各级教育组织中，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研究，加强苏共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加大力度揭露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固定下来的中国领导人反社会主义的方针。

规定进一步扩大初级政治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校、党的骨干分子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和理论知识进修班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同时考虑将一些补充课程和专题课列入其中，举办座谈会、理论性代表会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学习，使学员能够更深入地学习和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同中共领导人政治方针和立场作斗争的迫切问题。

二、为提高培养在各级组织中从事党的学习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宣传干部的思想理论水

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开办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和州的进修班和学习班，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问题的宣传组织及其内容，并特别注意毛分子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的危险性。

三、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一起，在今天的6—7月份，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塔什干举办报刊编辑人员和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以及与中国相邻的州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代表会议，讨论反宣传和对居民进行军事爱国教育问题。

责成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在10天期限内，制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军队中开展工作以防备出现武装冲突的建议并提交苏共中央。

四、《真理报》和《红星报》报刊总局，应该系统地保证向地方报纸的编辑部提供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

五、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宣传部、边疆区委员会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州委员会，应对中国越境人员进行经常的解释和教育工作。

考虑到应在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之中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在《共产主义旗帜》报纸中增添阿拉伯文插页的问题，该报是用维吾尔语在阿拉木图市出版的，请于1969年6月30日前提出本问题的提案。

在报刊宣传领域：

一、《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在5月份和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应该发表编辑部文章，分析“中共九大”决议、揭露“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性质以及毛分子对内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

在关于“中共九大”的材料中，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揭露林彪报告以及中共“新”党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试图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将加强反苏主义作为毛集团的正式方针；修正列宁关于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放弃根据事实制定的经济建设纲领；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组织地建立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毛分子中心的方针，等等)。

二、委托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和进步出版社，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苏联国内和国外共产主义报刊重要文章的专题汇编，揭露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共同出版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以及同毛主义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针进行斗争的学习材料。

政治书籍出版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今天的第四季度出版以“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敌人”为题目的文件汇编手册。思想出版社、知识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应该系统地出版关于中国当前的形势、中苏关系、中共党史、毛分子在一切革命队伍中的破坏活动等内容的书籍。

在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一切出版物里，应该揭露“中共九大”方针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民主性质，及其反苏倾向。

三、责成新闻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撰写准备在国外散发的系列小册子，揭露毛泽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实质以及它对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危害性(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一)。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新闻社，共同准备在中国及其邻国散发的、揭露毛泽东集团反人民性质和揭示中国人民愿与苏联真诚友好的宣传小册子(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二)。

五、责成新闻社出版社同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准备并在1969年第三季度用俄语、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出版关于中国当局在中苏边界进行挑衅的“白皮书”。

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保证有效地出版并大批发行由《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编辑部编辑的题为《今日中国》的书籍。

七、新闻社应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并大批发行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分子反人民犯罪活动的照片集，并配上俄文、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的文字说明；从每周一次的《今日中国》电讯上摘录资料翻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国外报界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材料。

八、为了扩大出版和印刷基地，用汉语进行系统的出版宣传活动(出版书籍、宣传册子和传单)，责成：

(一)新闻社(布尔科夫同志)扩大和加强国际情报总编辑部专门小组，增配中国学专业干部——记者和编辑人员在现有的定员范围内达到8—10人。专门小组的任务如下：整理出版业务材料(文章、宣传手册和传单)以及书籍和随后翻译成汉语的反宣传材料。

新闻社出版社保证将指定的材料翻译成汉语。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新闻社出版社成立汉语翻译编辑部，并根据工作量确定其人员数量。

(二)《真理报》出版社和印刷厂(费尔德曼同志)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汉语的排版能力达到每月50印张。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应该扩大第7号印刷厂排版车间能力，使其汉语排版每月达20印张；设立中文打字组，采用轮转印刷的方式，扩大印刷能力，达到每月20—25印张。

为保证实现上述工作量，规定购买相应的设备、培训排字工人和打字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补充吸收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批准《真理报》出版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购买铅字、纸板和必需的生产设备，并用超计划积累支付以上开支。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在中国、与其相邻的且有大量中国居民居住的国家以及在苏联境内居住的中国人中间，组织提供并散发汉语宣传书籍。

九、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研究，在某第三国家以中国健康力量的名义(或者是反毛的进步组织)用汉语出版报纸或者周刊的可能性，目的是把他们散发到有中国居民的国家和中国。1969年6月10日前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采取措施，在反对毛集团的斗争(对中国进行反宣传等类似活动)中利用从中国迁出居住在苏联的侨民，尤其应考虑成立这些侨民的相应组织(同乡会、学校等)。关于所采取的措施应于1969年7月1日前报告苏共中央。

十、为了提高杂志编辑部和中央出版社编辑出版委员会对中国问题出版内容和方向的责任心，在一系列杂志编辑部里成立由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问题著名专家组成的出版委员会。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于1969年6月15日前将该问题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影视宣传领域：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艺术委员会，拍摄制作揭露毛主义、展示自十月革命之后直至今日苏联对于中国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立场的大型纪录片。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在今年的8月1日前夕，筹备制作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的挑衅活动以及中国现代领导人觊觎邻国领土等内容的电视纪录片，并采取措施在国外广泛宣传这部影片。

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文件。

国外宣传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为什么毛分子诽谤苏联以及苏联的现实？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选中苏联作为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帝阵线的最强大的可靠支柱。十月革命的思想、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于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诱人的力量。毛分子猛烈地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人民认识到事物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就会坚决地批驳毛泽东集团冒险的、反人民的方针。

二、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大公无私的援助

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和援助。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及其集团一笔勾销了两国兄弟人民和党的关系历史中所有这些光辉的篇章，用忘恩负义回报苏联。

三、毛分子手中的核武器——威胁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扩张主义——是毛分子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紧建成核导弹部队的目的，正是极力追求扩张。中国的核潜力不是一块盾牌，而是一柄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利剑。

四、毛分子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毛泽东及其集团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破坏活动，力图使其与兄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脱离。毛分子拒绝参加制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共同行动，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越南的援助加以阻挠。试图使古巴陷入孤立，使其脱离社会主义国家，让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拒绝参加给阿拉伯国家援助的共同行动。拒绝对南非共和国采取经济制裁。

五、毛分子正在走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结盟的道路

中国重新确定对外贸易的方针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有57%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是：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给予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境内开采矿藏的权利(台湾、香港、澳门)。

与波恩复仇主义(臭名昭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政治调情。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特权。

六、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对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的打击

毛分子在中苏边境上的武装挑衅行动，削弱了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使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打击，使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西方国家的反动军事集团利用中国对苏联的武装挑衅活动，号召加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欧洲、印度尼西亚和近东的仆从国的进攻。中国的武装挑衅行动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

七、目前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叛卖角色

毛分子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越南人民的共同行动——实际上是在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动。毛泽东集团挑拨苏联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力孤立正在斗争的越南的企图，使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于中国当局百般阻挠苏联以及其他的社会

主义国家援助物质的运送，给越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于政治调解越南问题毛泽东集团持捣乱立场。

八、毛分子在东南亚共产党和民族、民主党派队伍中活动的有害后果

现今的中国领导人视东南亚为自己的世袭领地。毛分子以牺牲东南亚人民的民族利益来换取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些国家的中国侨民都是为毛泽东服务的。北京领导人在东南亚政策的实质是——加剧紧张局势、忽视现实情况、推动共产党和民族、民主党派过早地进行没有准备的武装进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毁灭——应归罪于毛分子。

九、毛分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毛分子企图在批驳毛泽东反列宁主义的方针的大多数共产党内，建立反党集团和反党宗派，从内部分裂共产党。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中伤，而这些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并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中享有威信。毛泽东集团实际上脱离了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毛泽东主义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狂妄的反共产主义行为非常吻合（鼓励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拒绝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协商会议，阴险地攻击参加筹备和举行会议的绝大多数党。

十、毛主义——反帝力量团结的敌人

毛分子竭力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毛分子在国际社会组织里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毛泽东及其集团一贯否定整个爱好和平力量为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所进行的共同行动。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它的霸权主义方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削弱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地位。

附件二：

对中国进行宣传的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苏联——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兄弟

苏联——开辟了东方人民解放道路的十月革命的国家。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支持。在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过程中，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争取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所进行的斗争。

二、世界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敌人

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的长期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分子掌握着中国领土上的矿产资源（台湾、香港、澳门）。帝国主义者反人民中国的阴谋意图。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中国处于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亲美的军事集团包围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主义阴谋。当今中国领导人与西德帝国主义分子亲昵的危险性。

当今中国领导人造谣诽谤，说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这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三、毛泽东及其集团鼓吹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阶段战争的性质。热核军事冲突对于中国人民的命运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武装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

土的觊觎——这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相违背的。毛泽东集团利用军国主义化和对军事行动的狂热追求来替代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集团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主义意向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创造性劳动。

四、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否需要占领新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本身就有很多新的土地还没有条件进行开发。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满足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另一条道路——觊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与其根本的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五、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中苏之间的分歧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体系、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以及世界革命力量的地位。煽起对苏联人民的敌对情绪，疯狂地反苏联的行动，给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牵扯了中国人民解决迫切的经济任务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被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以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力量的进攻。

中苏之间的分歧不带有对抗的性质，因此是能够也应该是在平静的状况下，通过谈判的途径解决。这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六、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这是迷惑中国人民的方法

毛泽东分子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宣传说，在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苏联“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阴险的谣言都具有故意诽谤的性质。苏联已经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切胜利的领导和组织者——将自始至终地与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与修正主义的“左”右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奋斗。苏联永远站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全世界都知道：正是苏联的全面援助是越南人民取得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的现实以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进行造谣诬蔑，毛和他的集团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反对十月革命的国家，并借此压制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派。

七、中苏边界关系的真相

目前的中苏边界，是俄国和中国在两国边界地区历史性划分的结果。苏联政府永远是根据中俄两国关于边界条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根据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是：尊重苏联领土的完整。

中国领导人对于边界问题立场的改变证明，他们已转入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方针。在北京1964年的协商会议上，苏联就边界问题表现出了良好的意愿，力求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毛泽东集团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加强在中苏边界的挑衅活动。珍宝岛的挑衅事件就表现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竭力激化中苏关系，在中国加强反对苏联的行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5—4409页

№2289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1969年6月11日)

在我6月12日返回莫斯科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先生给我打了电话。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离开之前同我进行一场会面。我同意了这次会面。我们的这次会谈是在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内进行的(像以前同他进行的各次会谈一样，这次会谈也是秘密举行的)。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知道我将返回苏联，我们的这次会谈就是他安排的。以便我返回莫斯科向苏联政府进行报告的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把美国总统在各个国际问题、特别是苏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亲自报告给苏联政府。

基辛格说，他可以完全负责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越南问题，尼克松总统认为他应该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苏美关系。他认为他在苏美关系领域的主要目的是：必须避免出现会导致美苏发生直接冲突这样的局势。总统认为，这一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尼克松总统都不允许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出现危险的局势，导致我们两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希望，并且他认为，苏联政府也会这样认为。

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1972年之前，或许是1976年之前，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的话)苏美关系能够进入建设性的阶段，使苏美关系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关系。遗憾的是，冷战时期的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两国现在的关系。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并且这些分歧仍将存在，因为这些分歧太深刻了。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我们两国关系完全会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双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利益，耐心地工作。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在各方面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还要有一定的谨慎，这主要是由于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和全世界的反应。因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噪音，引起各种各样的轰动效应，一些人会仓促地做出预测，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会对会谈产生所谓的“巨大期待”，但是随后将是非常大的“失望”，尽管在2—3天的高层会谈之后很难预测到马上就取得重大的成果，何况重大的国际问题未必就是一下子能解决了的，因为日积月累的障碍和阻力需要一步一步地清除。遗憾的是，大众舆论期待这些高层会晤“创造奇迹”，因为这些“奇迹”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就评论这些会晤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会晤。

这无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反而会给参与会谈的领导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这些领导人在会谈之初就不由自主地在考虑，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向报刊发表什么样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确信，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同苏联领导人不应该只是组织一次会晤(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都是组织了一次会晤)，应当在一定的时期内举行一系列的会晤，他们的意思是，一年举行一次。那时这些会晤将不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将会更加具有务实的性质。在这些会谈中不必一定要寻求对外做出一些圆滑的说法，而应在实质上推动事情缓慢地向前发展。应该定期举行务实性的会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寻求相互都可接受的途径，而不必担心报刊随后对这些会晤扣上的帽子：苏美领导人没有“达成协议”，或他们的会谈“没有成功”，因为所有人都将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举行新的会谈，继续讨论问题，而在这些会谈的间隔期内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做出相应的努力。

基辛格接着说，在这些会谈中，不仅仅应该寻求途径，解决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下子总能够解决的)，而且还要就潜在的危險局势进行磋商，相互交换意见。这些潜在的危險局势会把美苏两国卷入冲突中。双方即使没有就这些潜在的危險局势达成一致看法，还可以理解彼此的动机，不使自己的行为越过危险的底线。当然，这些高层会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先进行精心的准备，这指的是，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这些会谈必须取得最大的效果。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关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想法的看法。我回答说，根据我自己的意见，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想法应予以重视。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具体问题和关于一些地区的局势问题上。基辛格说，在欧洲问题上，不应该企图改变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局势，尼克松同意这种看法。众所周知，美国在原则上赞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如果现实地谈论这个问题，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将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尼克松政府不打算重提德国统一问题或加剧局势向这一方向发展。相反，尼克松政府感兴趣的是使西德能够得到一定的稳定，以便苏美关系不因德国局势而发生动荡。基辛格补充说，他们期待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这是由于考虑到今年2月份苏联政府对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呼吁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反问道，美国方面能否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基辛格对此回答说，他们仍然首先想得到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同时，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会考虑采取一些措施，使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行动“中立化”，以换取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这个问题是民主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苏联）同联邦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美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原因。然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华盛顿现在还不准备使西柏林获得“自由市”的地位。

在就欧洲事务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考虑到苏联在东欧地区的特别利益，美国不打算在这些地区采取任何被莫斯科看作是对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进行“挑战”的行动。基辛格确信地说，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因此不应该特别在意“尼克松总统对东欧某国公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因为这只是为了安抚美国一些阶层的情绪，但这些情绪会对美国的选举产生影响”。

基辛格又提出了罗杰斯在此之前提出的关于双方都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这正如几个月之前尼克松总统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苏联和美国同时批准这一条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自他担任总统以来苏美共同采取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在他看来这些行动的意义超出了这一行动本身。

第二，在尼克松看来，苏美共同批准这一条约，会对那些现在仍然没有签署这一条约的国家施加压力。

我也阐述了我们就这一问题的立场。我提醒基辛格说，正如我们向美方通报的那样，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正在审议这个条约，根据苏联法律这是批准这一条约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接下来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对联邦德国政府施加必要的影响和压力，联邦德国政府公开反对签署这一条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这项条约显得很空洞。然后我表示，希望尼克松政府对波恩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使他们尽快签署这一条约。

基辛格实际上也没有否认，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他们还没有对波恩施加什么大的压力。他尽力对此进行辩护，其理由是“我们拖延”答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苏美同时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波恩领导人除了援引联邦德国选举前的运动之外，似乎还对他们说，如果苏联都不急于批准这一条约，那么他们也不必着急。

总之，关于这个话题的会谈给我的印象是，对于我们拒绝尼克松提出的关于尽快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尼克松把这看作是：我们不愿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苏中分歧加剧)就采取这一共同行动，以显示我们和他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尼克松比较确信地认为，我们没有批准这一条约会对联邦德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基辛格千方百计地要说服我，他说，苏联和美国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刚好帮了联邦德国那些反对签署这一条约的势力。)

总之，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信，美国近期不打算最终批准核不扩散条约或者向联邦德国施加强大的压力，直到我们同意尼克松的上述建议，或者对他的建议做出更加具体的反应。(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最高苏维埃对外政策委员会不应该拖延对这一条约的审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批准条约的同时保留特别的条款：联邦德国也必须批准这一条约。)

在谈及其他领域的关系时，尼克松的意思是苏美应该加强接触，相互交换意见，基辛格指出了调解近东问题、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今后逐渐发展贸易关系问题。

在谈及近东问题时，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如果现在可以做一些工作、有助于解决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美苏双方只能秘密地相互交换意见，美苏都知道，他们的“当事人”想的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但都不应该以自己的当事人为借口行事。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打算在不远的将来——他在前不久就越南问题制定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希望尽快审议和批准关于苏美即将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而下达的指示之后，他本人能够对关于具体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除了同约旦国王举行了会谈之外，他还打算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美国政府打算同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其中包括就目前形成的局势问题、特别是就苏美双方相互交换的意见举行会谈，有鉴于此，华盛顿非常期待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也许，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开罗并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们将会得到答复(同基辛格举行的这次会谈刚好是在葛罗米柯访问开罗期间)。

在接下来就近东问题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拒绝就我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举行会谈，他说，由于他忙于越南问题，暂时还没有对这些具

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大约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将“亲自介入”苏美就这些问题进行的会谈。但是他介入这些会谈的条件是，他不会在所有的细小事情上都替代西斯科。他(基辛格)可以同我进行秘密会晤，就调解近东问题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可以由我们提出)进行全面的会谈，同时也将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及尼克松总统对这些报告的意见。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其他的一些状况，这份报告将会成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指示，成为国务院今后同苏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基础。基辛格补充说，在他看来，为了取得成功，双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必须“吞下苦果，做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基辛格没有再详细地谈下去。

基辛格还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国务卿能够就调解近东的所有问题进行会谈。

在说完这些话之后基辛格转入了越南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总统及其顾问们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越南问题。

在会谈中基辛格详细阐述了他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他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和论据实质上都是在重复今年5月尼克松在白宫同我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谈中所说的内容，也是早先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向苏联领导人转告的那些话。

然而，基辛格说的一些新的内容就是更加直接地号召我们帮助他们走出巴黎会谈的死胡同。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苏联政府为保证巴黎会谈的举行所做的一切工作。基辛格接着说，如果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现在产生的印象是，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对谈判进行的干预减少了，这看起来是为了让河内领导人完全任其所为；苏联对谈判的影响明显减少，这与苏联对河内和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影响是不相称的，毕竟苏联是对他们进行武器援助和经济援助的主要国家。我们当然知道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不引导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但是他仍然顺便提出说，他所说的上述情况使尼克松总统的一些顾问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这些顾问们越来越经常地问他：“莫斯科现在是否认为，由于一些原因，越南战争的持续最终是有利于他们，因此他们就应不急于调解这场冲突？”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本人和尼克松总统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他们认为，莫斯科对结束越南战争是感兴趣的，因为这场战争花费了他们大量的金钱，这也是考虑到越南冲突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不清除这块绊脚石就谈不上真正地改善苏美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立刻又提到了中国问题。他提请我们注意尼克松总统早先提出的一个观点：他们不打算介入现在苏中发生的冲突，并再次确认这一原则。基辛格说，他们当然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愿意为此采取一些理智的措施，但是这一过程应该具有双边的性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和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还没有证据来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实行比较和解的路线。

基辛格用半带讽刺的口吻说道：“诚然，现在苏联已经取代了我们成为中国攻击的主要对象，而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也处于被攻击的第二位，但是北京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北京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台湾转交给他们。但是美国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的，尽管我们不反对他们自己同台湾就这个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会谈，但是台湾方面暂时还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愿，而尼克松政府将不会在这件事上施加什么压力。在遏制北京扩张的意图方面台湾仍然是防御链中的重要一环。”

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这些还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拥有主要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不仅仅现在是这样，而且在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内都将这样。从这一意义上开诚布公地说，如果谈到全球范围、特别是在爆发核战争给美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来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因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保持良好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适当的关系，不使这种关系激化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具有首要的意义。”

基辛格继续说：“我们知道，看起来，在莫斯科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反苏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从各国以往经验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在现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如果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想法首先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基辛格继续说：“当然，如果说你们同中国日益加剧的分歧使我们非常难过，你们会认为这是假仁假义，而无论怎样你们都是不会相信我们

的。但是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情况，尼克松总统认为这一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尼克松总统相信，对他来说比较好的政策是：既不倾向于苏联，也不倾向于中国，要特别注意不使苏联政府认为美国支持中国的反苏政策或寻求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同中国达成协议。尼克松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的逻辑非常简单：相对中国而言，苏联有更大的机会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这种对抗会造成冲突和危险的局势，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作赌注。而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其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还不会对美国造成这样的威胁，但是苏联就会。”

基辛格接着说：“此外，毛泽东的行为不合逻辑。对他还要观察一下，尽管迄今为止他显然在避免中国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指的是不在第三国的冲突)。而苏联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苏联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关切的是本国人民的福利。同苏联领导人可以达成符合两国利益的具体协议，而且这些利益不仅仅符合两国的利益。因此尼克松总统曾对苏联领导人表达了如下思想：如果我们两国在今后的10—15年能够共同努力，至少两国的政策不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把世界卷入冲突和战争，直到中国‘成熟起来’，比较负责任的人掌握了北京政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并且苏联在调解越南问题上就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河内，因为河内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只是从自身狭隘的角度出发的，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客观上符合的首先是中国的利益”。

基辛格接下来的所有发言几乎都是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给人的感觉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受尼克松的委托而说的，尽管基辛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看法一样。

我又向基辛格重述了我们对解决越南冲突问题的原则立场。我强调说，我们确实希望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必须考虑到整个越南人民的法律地位和利益。我还说，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不现实的，这种政策正符合毛泽东及其团伙的心意，在事实上妨碍了建立一个独立、中立的南越，这正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他们的十项条款中阐述的一样。这十项条款众所周知。华盛顿尽快接受这些条款，不仅会使越南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对美国自身，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基辛格仍然在重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冲突的计

划，他多次强调说，如果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终开始进行谈判，并不再是“只是重复他们的最后通牒”的话，他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并寻求妥协”。当谈及“妥协”的时候，基辛格指出，可以“秘密讨论各种不同的方案”，但他补充说，“他们现在还不能抛弃阮文绍，因为这将意味着向越南投降”。

在讨论的过程中，基辛格又放话说(像尼克松之前说的一样)，如果河内再没完没了地在谈判问题上进行“捣乱”，那么几个月后尼克松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的措施来说服越南”。

基辛格坚定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现在的尼克松政府不想重蹈上届政府的覆辙，那么就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和平谈判与和平调解问题的选择。但是，上届政府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前任总统的例子就让人足够明白了。

基辛格明显是不想让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就把谈话转入了另一个话题。但是，不能不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会谈中坚定地提出的关于“采取其他选择”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尼克松会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或者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尽管看起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试图对越南和苏联进行讹诈的性质，但是，总的来说，如果在尼克松看来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他采取这些行动的话，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

对于局势的这种发展仍然要作好准备，特别是如果北京针对苏联的挑衅政策加剧的话，华盛顿将不再会认为，局势的发展会对河内产生不利的影响。看起来，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放出那些话也不是偶然的，基辛格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得不采取“其他的选择”，那么他们希望，这不会使苏美关系降到“危险的底线”，因为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给苏联造成损失或损害苏联的威信。我对基辛格说，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的这种政策无疑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从这些会谈中可以得出的一些看法是，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首要问题是：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找到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确保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从各方面来看，基辛格今后还会试图“说服”苏联帮助他们调解越南冲突，在我们今后同尼克松政府就其他的国际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要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

众所周知，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延缓谈判或延缓解决其他问题的速度。

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去之后，他还能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和总的国际局势问题进行会谈。我对此表示了同意。

关于对基辛格本人的几点看法。通过对尼克松及其主要的对外政策顾问(而我现在实际上已经都认识了他们)的活动进行的观察，可以确信地说，现在基辛格对总统的对外政策事实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总统个人的和发给白宫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所有报告(包括侦察部门的报告)基辛格都可以得到。他同其他25个各方面的专家一起组成一个小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会议日程及其需要讨论的材料，总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尼克松上台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定期工作，每星期至少召开1—2次会议)。正如尼克松本人最近在同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所承认的，相比他的任何一名助手，基辛格每天都更会让他感到“厌烦”(也就是说他经常使尼克松感到“厌烦”)。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比较，相比约翰逊和他的助理罗斯托的关系，可以说，在总统面前，基辛格要比他的前任自由得多，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信，已经在白宫获得了牢固的地位(国务院就直接说，如果亨利反对某一项建议，那么尼克松就一定会否决这一建议)。

基辛格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喜欢在和我进行会谈(我已经同他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吃饭时进行两个人单独会谈的时候夸耀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毫不谦虚地说，整个华盛顿“现在只有两个人能够对美国对某一问题的立场做出准确的答复，这两个人就是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因此他对我说，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搞清楚某些重要的问题，“以便莫斯科可以正确地理解尼克松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秘密地直接找他。

应该说，在我方提出相应的建议之后，他总是愿意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苏联大使，或者到苏联大使馆进行单独的会谈。他自己也经常主动提议进行这样的会谈。可以看出，他在利用一切类似的机会来巩固自己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强自己在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对于尼克松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同我们大使馆进行的所有联系，基辛格都予以严密的监视，并密切关注，使这些会谈能够向他个人汇报，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就会亲自再向总统报告。最近很

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他限制了这种联系的范围，把这种联系转入他个人同苏联大使进行联系的轨道上。

可以看出，今后应该积极发展和利用基辛格这个渠道，同他进行会谈，以便对尼克松施加影响，或者通过基辛格把我们在各个重要问题上的相关观点传达给尼克松，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微妙的情况下，在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在通过国务院远远不是总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所有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事务，特别是那些反映我们立场的事务，应该像往常一样通过通常的外交渠道进行。罗杰斯国务卿的作用明显在不断增强，他依靠国务院各部分和各驻外机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开展了更加积极的活动。但是仍然应当注意，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得到的资料，可以断定，目前基辛格对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制定仍然产生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A.多勃雷宁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9年7月12日，A.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0129, оп.53, п.399, д.6, л.98-111

№208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969年6月26日)

1969年6月26日会议。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由于正当原因(因为生病、或出差、休假和出国等)来参加全会的人有：中央委员13人，中央候补委员10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3人。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没有。

表决：会议开幕。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正如已通知的那样，今天全会的议事日程只有一个问题：“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有人对今天会议的议事日程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波德戈尔内同志。

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

同志们！

6月5—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6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这次会议充分显示共产党人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在不断增长。会议再次表明，共产党人是领导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锋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列宁已全面揭示了，在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过程中，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和共产党的团结的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党和其

他马列主义政党要始终坚持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可以相信一点，前不久闭幕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强大动力。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在历经了严峻考验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步入一个新的高潮期。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召集此次会议的过程是复杂的。如果说其间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最终被克服，会议得以召集并顺利举行，那么在其中作出最大贡献者，正如许多代表团在会议中所强调的，应当是我们的党（掌声），应当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正是苏共是现在这个会议的倡议者，正是苏共是确保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会议宗旨为指导并团结起来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同志们，这次会议的召集及其工作成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成功，同时也是所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的成功。（掌声）

鉴于这次会议本身及其所通过文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此次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向中央全会报告。

政治局已经多次就这次会议召集的各个阶段及其筹备工作情况向全会作过通报。关于会议本身的详细经过我们已在报刊上披露，因此这里请允许我只对几个与会议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会议的筹备、经过和总结（结果）等来讲述。

一、苏共在会议筹备方面的活动

为了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新的共产党会议做出评价，我们就必须让自己的思绪返回到几年以前，回想一下在196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运动的形势。当时的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1960年会议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我们运动的主要危险。在针对多数共产主义党派开展了公开的思想政治斗争之后，为了传播自己的冒险主义思想，北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分裂共产党、破坏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诋毁苏共的政策。

尽管北京的分裂活动未达到目的，但这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分歧和动乱，“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党派在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逐渐失去了明确的阶级标准；开始怀疑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民族主义自我封闭倾向开始潜滋暗长。其对政党的独立性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诸原则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就意味着轻视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从而严重危害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事业，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行动制造了困难。一些党派的活动表现消极，对自己的力量不自信。

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各类背离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自然使帝国主义分子们感到高兴。后者开始加紧活动，试图利用这一情况来削弱社会主义、整个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我党中央和全世界马列主义者的严重忧虑。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除在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阻碍我们凝聚力的绊脚石，实现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这一转折。正是基于此，我们在所有路线和最广泛战线上展开了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斗争。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64年)之后不久，我们便采取了措施，并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试图调解与其分歧。在此期间，我们提出了关于共同筹备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然而，中共领导人并没有与苏共合作的打算。中国代表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放弃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我们的党纲，换言之，中共就是要让我们脱离马列主义立场并接受中国领袖们所制定的思想和政治方针。针对这些要求，我们自然予以坚决拒绝。

当自己的企图遭到回击，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试图对我们党施加压力并加紧从事反苏、分裂活动。

与此相对，为了在实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能够统一行动，即使当苏中双方在各种不同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依然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关于此我们曾作过强调，即共同行动——这是消除分歧的最好办法。我们的这一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尽管当时的形势依然复杂，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符合当前各共产党开展直接斗争的需要，而且为各共产党的团结及其国际主义统一战线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党中央提出并召集此次新的国际会议的初衷。

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要求付出大量而繁重的劳动，克服各种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中共领导人已对此采取了公开敌视的立场。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对会议持消极态度。其中一些党派竟提出关于是否召集此次会议取决于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的问题。至于我们党，则坚决反对给中国领导人对召集此次会议说“不”的机会。

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并依靠许多兄弟党的支持，我们坚决贯彻了筹备此次会议的方针。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问题还与我们的第二十三大有关。1966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到了该采取具体举措以筹备新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的上述建议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这样就到了公开谈关于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必要性的时候了。1966年11月，该问题再次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提出。苏共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召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已日益成熟。

整个事件的进程表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越来越多的党派宣布了自己准备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1966年)指出，“举办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各党派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此次会议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筹备”。

依据我们党中央全会的上述决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未来会议的相关问题与60多个党派的代表举行了100多次双边协商，与一些政党的代表团也多次讨论。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几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在这些会谈过程中，我们集体性地讨论了与会议筹备有关的最重大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认为，在如何正确选择会议的议事日程和确定会议的筹备方式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主张，会议的议事日程应当这样来安排，目的就是要为与会者的团结创造最良好的条件。在斟酌各种情况并与朋友们协商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议事日程，其目的就是要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任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各兄弟党的支持，我们提出的关于在集体主义和平等诸原则基础开展会议的整个筹备工作的一系列建议也受到了积极的响应。最终我们成功地清除了许多反对召集会议的思想，说服了犹豫不定者，从而确保苏共的立场得到了几乎所有赞成召集会议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支持。

于是，通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道路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

当然，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总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各兄弟党的广泛支持。后者对我们的一贯做法——维护和平、国际安全和援助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诸民族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苏共在捍卫和发展我们的革命理论方面所开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活动，对一些政党的立场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苏共中央4月中央全会(1968年)上，曾详细地提到关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协商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支持苏共提出的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及其筹备方式的建议。从这时起，便进入了会议筹备的最后阶段——集体实际工作阶段。4月中央全会以充分的论据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近期，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中心环节”。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筹备会议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仅在制定会议文件的过程中便提出了约上千次不同的修改和建议，而所有这些修改和建议都需要经过最细致的研究。对此我们已说得够多了。

这里可以说的是，未来会议的基本思想和结论性文件的主要方向，都是由苏共中央制定的。在坚持了所有原则性条款的基础上，我们在协调了自己与兄弟党代表的行动的同时，完全有能力带领他们经过各种争论，经过所有的讨论阶段。为了消除文件中所混杂的各种容易令人产生疑虑的内容和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我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会议筹备工作的每个阶段，政治局都要讨论事情的进展状况并对苏共代表团发出明确的指示。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代表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党曾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会议专门通过一个文件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我们认为，该文件应当被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思想基础。筹备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最初我们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定在去年11月份的。但是，形势迫使我们对此作了修改。问题是一些政党的代表，试图利用兄弟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捍卫社会主义的集体行

动来干扰会议的召集。由此便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不少预言家，其中不仅只包括那些断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召集这次会议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甚至预计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本身也会走向崩溃。

我们当然对自己路线的正确性，对各兄弟国家及时采取的果断措施的正确性充满了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11月前夕关于是否召集会议的问题的争论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按原定计划行事，就可能在会议期间使形势严重复杂化。于是，我们便考虑把会议召集的时间挪到现在，此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被人们所接受，而这为我们举办会议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如果要从整体上对会议筹备工作的结果加以评价，就不能不谈我们的匈牙利朋友在这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尤其体现在当会议的筹备机构在布达佩斯开展工作之时。另外，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如下国家的兄弟党：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苏丹等，而与这些党派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会议筹备工作的具体积极成果之一，便是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如果说在布达佩斯协商会议召集时共有66个党派的代表参加，那么到了莫斯科会议之时已有75个党派的代表出席。

这里，我还想就14个未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说几句。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党派(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发与会邀请。关于第一个党派——是因为我们与之关系遭到了破坏，至于第二个政党——是因为该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境外委员会请求允许其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于是印度尼西亚同志们便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与会，虽然根据一些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不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文件中均不提及他们与会的情况。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便对此次会议持敌视态度，而与其相勾结的有叙利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共产党领袖们——这些人一直居住在中国，另外还有亲中国的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

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日本和荷兰共产党。

而这主要与这些党派领导人政策中所包含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不愿意承担任何因签署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性文件而产生的相应义务有关。

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均对我们发出的与会邀请表示感谢，但由于他们害怕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因而要求我们理解他们无法派代表与会的苦衷。但与此同时，上述两党同志均强调，他们总体上并不反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持上述类似立场的还有老挝人民党。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上述党派不来参加会议的原因都是很不一样的，由此说明他们绝不是某个反对此次会议的统一的集团。

同志们!极其繁重的筹备工作的主要结果——当然是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具有独立的政治意义。在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经常举行集体性的会谈，在此期间讨论我们运动中相对重大的现实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事思想方面的斗争。这一切必须促成这样的结果：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当前形势评价方面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立场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动摇分子们，即使在表面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已是被迫放弃了原有立场。

在会议筹备的所有阶段始终充满着民主和平等的精神。这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信任，增强了兄弟党对会议的兴趣。总之，整个筹备工作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会议的工作进程

同志们!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的主要方向和政治内容是由其议事日程和提交给会议审议的文件题目所确定的。

这次与会者关注的重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帝国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世界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这一最重大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会议一致认为，上述统一行动，是我们赢得反帝斗争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会议讨论期间，我们极其广泛地涉及了一系列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当然，与会者在发言中主要谈的还是本党的经验及其活动，同时他们还还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理论和纲领性一般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集体性地分析一般问题并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这即是我们赢得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特点。

不论是会议期间对一般性政治问题的讨论还是会议各个机构的工作，苏共代表团都积极参与。例如你们——同志们读过的我们党代表团的所有发言稿，这便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凝结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心血。

我们在发言中，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形势和最近十年来世界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进展，评价了现代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以及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和活动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及其团结的巩固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尖锐而有原则地提出了关于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与任何歪曲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活动作斗争的问题，并就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道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之，从苏共中央全会所讨论和制定的那些立场出发，我们以坦诚的方式向会议展示了苏共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所坚持的政治路线。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受到了会议的热列欢迎。各兄弟党代表们纷纷指出，苏共表明自己立场的举动，对会议的整体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代表团均强调了我们在发言中所指出的，苏维埃国家的各方面外交政治活动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意义，如进一步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支持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确保欧洲安全、消除世界各地的战争和侵略的方针，为避免人类遭受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而积极斗争，等等。

关于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整个讨论过程，应当毫不犹豫地指出，总体而言这是一次有意义、有内容的交流意见的大会。

发言的多数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新问题，并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针对一系列

主要的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党派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均与苏共的立场相一致。

显而易见，我在这里是不可能对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所有内容都进行详细的分析的，而只能对他们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主要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从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期间围绕帝国主义诸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会议文件草案中所提出的思想的同时，同志们从总体上广泛而全面地描绘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景象，并对之进行了批判。在一些同志——如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 and 意大利等的发言中，就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其强调，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重要性，指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活动特点就是导致该社会的总危机不断深化。在分析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而依此揭示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明从事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就是着眼于各民族的未来。

仍想要指出的，是乌拉圭、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圭亚那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拉丁美洲各国劳动群众的斗争所作的分析。从这些发言中可看出，近年来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南美大陆已转变为一个巨大而紧张的社会政治斗争的策源地。

通过分析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影响，一些党派代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包括：关于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及其同盟者队伍的扩展——这不仅体现在反对垄断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还反映在为了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变革成功的斗争中。

在很多发言中，都包含关于青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内容。兄弟党们正确地估计了青年在未来革命战斗中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极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以便尽可能完整而迅速地把青年们引导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轨道上来，使之接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主要敌人和革命斗争的主要

力量等问题的发言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切关注。

在我们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的发言中，都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继续成长的前景作了广泛的分析。会议还提出并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利用科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民主基础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经验宝库。

代表们在发言中，着力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均指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所有革命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落后世界的影响和深刻促进作用，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国际舞台上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运动进程。

例如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代表便宣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每一个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苏丹共产党代表宣布，“捍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最重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这一体系的命运不仅事关该体系内的所有国家，而且涉及全世界工人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利益”。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说，“每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事斗争活动的共产党的成就，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成功和支持，及其成功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同志们，在会议发言中提出的，涉及当代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印度、锡兰等国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团在发言中，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化，这些国家兄弟党针对农民群众而开展的工作，有必要将民族解放斗争与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相结合，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前景，等等。

此次会议，还就如何评价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些发言揭示了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客观原因：一些带有各种特殊心理和政治观念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加入到了反

帝斗争行列；由于处于不同的斗争条件之下，各共产党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不同的斗争任务；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作用，有时导致一些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与此同时，会议发言还着力指出某些党派领导人的政治错误也是导致诸多困难的原因。一些发言强调，共产党人开展斗争的可能性是极其巨大的，只有在善于执行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完善党的策略和全面拓展与群众联系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几乎所有发言，都对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巨大意义，表现出深刻的理解。而事实上关于团结的议题和各兄弟党紧密联合起来的强烈呼吁也一直贯串了整个会议工作的始终。

我还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就如会议讨论进程所显示的那样，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借助于我们党很久以来就坚持的、为了团结而斗争的思想才保证了自身的步调一致。至于一些由于个别问题所导致的分歧，绝不应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体斗争，而共同积极参与斗争自然会有助于我们观点的接近，并最终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已有分歧。

如同其他所有问题的讨论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团结问题的讨论带有公开的、同志式的性质。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直接地、把各种观点进行广泛对照的讨论问题方式已很久没有采用过了。会议期间，我们并没有回避那些存在争议并引起分歧的问题。相反，我们把这些问题的都摆在了桌面上。就结果来看，我们认为总体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回答。这样做不仅使会议本身充满了同志式的良好氛围，而且无疑促进了与会者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团结。公开性质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揭示个别党派与多数兄弟党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的那些分歧。应当强调的是，总体而言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虽然也有个别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但并未获得与会者明显的支持。整个讨论过程再次表明，有原则地对一些错误观点给予反击，再加上在坚持正确观点的基础上更多一点耐心、更多一点坚持不懈，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就会使我们成功地影响那些与我们运动中的多数在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党派。

那么，究竟是哪些党派在会议发言中表明了自己特殊的立场呢？

确定与会者立场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如何对待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的文件。

众所周知，只有多米尼加党的代表拒绝签署这个文件。其在会议上发表了极其杂乱无章的“左”倾言论，让人明显感觉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该发言贬低为和平而斗争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政策的作用，否定将各种——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的必要性。针对多米尼加代表的“左”倾论调，许多同志均在发言中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志在内。这表明各兄弟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反对“左”倾斗争的必要性。

同志们知道，有四个兄弟党只同意会议总结文件的第三部分，即表述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的那部分内容。这四个党派就是意大利、澳大利亚共产党、圣马力诺和(非洲法属)留尼汪共产党。

还有两个代表团——英国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还在讨论关于反帝斗争任务的会议文件之前，便在本党中央全会上提出对该文件持保留意见。

还有几个签署了该文件的代表团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与会议多数观点不同的保留意见。这样的共产党代表团包括：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劳动党。

必须坦诚地说，同志们，上述党派所持立场某种程度上是中了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观点和思想的流毒。

以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们为例，其所持立场就比较典型。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党领导人时常会犯众所周知的脱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极力迎合意大利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希望增加自己对此类人口的影响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的烙印。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同时存在政治在野党，并提出“教授自治”、“文化自治”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以资产阶级民主来暗地取代社会主义民主。也正是因此，在国际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才绝非偶然地发出如下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以由民族—民主政党、左派社会主义党派、各种民主组织和运动等组成的更为广泛的联合，来替代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持上述类似立场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瑞士等。

其所持立场的特点都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估计不足，只片面强调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外以上所列各党派在人数上都不多，与群众的联系微弱，在本国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批判。B.哥穆尔卡、Γ.胡萨克、T.日夫科夫、B.罗歇、Γ.霍尔等同志均严厉地指出，与此类倾向作斗争是各党派健康发展的条件，是现代革命进程最主要的要求。

如果要对会议所有发言作一总结的话，可以说，关于国际主义、关于在当代条件下国际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关于国际主义与我们运动中每支队伍的民族任务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在会议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兄弟党针对这一问题均采取了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霍尔同志便说：“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在我们的无产阶级观念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认为它是一种负担、一种让步或一具自己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它是我们阶级斗争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我们革命的必要内容。”

在揭示了我们当代国际主义原则的内容和本质的同时，多数同志，还把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联合行动，作为自己重点论述的主要方面。例如，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巴哥达什便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意味着要支持和维护任何一个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我们党认为，无限忠于与苏联和列宁的党的友谊是拥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主要标准之一”。巴哥达什同志继续道：“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这样做就是依附。我们答：否，这才是完全的独立性，这才是完整的共产主义的独立性，是独立于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宣传，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到，在会议讨论期间，也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对国际主义问题作了歪曲的阐释。

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所坚持的立场。该代表团的发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本立场，极力限制

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以自己所理解的狭隘民族利益与之相对，他们针对一系列问题所坚持的立场均背离了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根本利益，具体表现为：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主权、权利平等，同时否认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集体保卫社会主义的实际成果等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必要性。

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错误解释，还首先体现在一些党派代表在会议发言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认识方面。

鉴于整个该问题，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事件的过程所解决。因此这里，我们只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一点，即针对这方面的社会舆论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性，要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要深刻洞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活动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危害性。我们强调，帝国主义分子们正在积极地利用所有这些因素，以企图迫使社会主义从自己已占领的阵地上退却。

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们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认为并早就预言说，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争论，必将使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变成一个谴责苏共及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等国兄弟共产党的讲台。

可是，他们的这些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只有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等党的代表团以及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等党派的代表以间接的方式对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但他们的做法均遭到了应有的回击。许多党派的代表在会议上就此作了坚决、坚持原则的和进攻性的发言。他们指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对社会主义的危害。他们强调，为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们和捍卫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针对那些批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的言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该党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同志也作了权威性的驳斥。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呼吁广大共产党员们要对帝国主义分子所采取的破坏活动的新方式给予清醒的认识。在提请人们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之后，胡萨克同志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了惊讶，即一些兄弟党派只是在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事态和形势发展有了肤浅认识的情况下，便就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做出了草

率的结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请求他们不要在这方面表现得过于仓促。胡萨克同志对一些坚持类似上述路线的党派作了评价，即这都是由于这些党派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压力所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所表现出的坚定而坚持原则的立场，充分反映了近几个月以来，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发展进程。而对于这一进程，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的友好帮助，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同志们，你们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出于我们对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始终不渝的高度责任感，都是基于4月、7月和10月等苏共中央全会所出台的相关决议——强调必须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今，所有那些不对事实持先验臆断态度的人们，都已逐渐了解了近几个月以来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人们已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才挫败了颠覆该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才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有可能重整旗鼓并组织针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们的反击(热烈的掌声)。

这一事件的过程最终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右派们与党外那些得到境外帝国主义分子资助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之后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果断采取摧毁社会主义的敌人及其帮凶的举措又是多么的必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必须采取切实举措，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的人员组成。

近两个月以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组成、党的领导层得到加强，对各部门党机关的领导工作得以健全，通过采取一定举措清理了反苏的社会主义的最凶恶敌人所使用的各种大众性宣传手段。这些措施，加强了捷共新领导层的威望和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如今，我党领导层与新的捷共领导人之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事务性的、同志关系。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活跃起来。我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加强与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友

谊和合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国际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当然，要说全面地实现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双边关系的正常化，现在还有些为时尚早。因为在该国内部右倾势力、社会主义和捷苏友好的敌人们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他们绝不会停止自己的活动，虽然现在他们的活动被迫是以各种经过更巧妙伪装的方式在进行。这就要求捷共领导人仍需花费不少精力，果断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路线，从而使国家转到正常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至于我们，我们将会一直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与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作斗争是多么的重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从这次会议公开讨论的资料中你们已知道，多数代表团在发言中，均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及其分裂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之持批判态度。

同志们，你们都已了解了一系列事件的经过。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九大。会议期间，中共正式确定了公开反对苏联、苏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方针。中国人在苏联边境上组织了武装挑衅，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了敌视苏联的运动并号召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北京正加紧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所执行的类似路线也是极其危险的，而在该国内部出现并日益发展的迹象，就如我党中央在1966年12月的全会上曾指出的那样——已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鉴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此次国际会议，如果要我们对毛等人所执行的政策采取回避态度不仅不合适，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北京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反帝斗争中团结各方面力量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对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经过与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诸党派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协商，我们决定，在此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明确地对中共领导人的路线提出批评，虽然我们已预见到，我们针对北京的批评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反对。

事实上，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会议上自己的两次发言(一次是在依照会议程度回答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另一次是在主题发言中)均坚决要求不要对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提出批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关心。

不过，会议的进程充分表明，毛等人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其分裂活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及其对反帝斗争事业的危害，已几乎被所有兄弟党很好地接受了。而罗马尼亚人在会议上试图使毛泽东一伙免遭火焰式批评的努力，只是公开得到了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左翼党派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响应。实际上，罗马尼亚代表团由于这个问题已在会议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多数代表团积极支持我们提出的意见，列举了大量北京针对个别兄弟党而实施的有害的分裂破坏活动，愤怒地谴责了北京对苏共和苏联的诬蔑，强调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放弃了一切反帝斗争。可以说，同志们，除苏共代表团外，在此次会议上几乎60个兄弟党代表均对北京的政治方针作了批判。

包括罗马尼亚和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在内，出席此次会议的所有党团没有一个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为毛泽东的政策进行辩护。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此次莫斯科会议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毛等人所执行政策进行威严地、公开谴责的大会。(掌声)

同志们，问题在于，关于抨击北京领导人的背叛式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能够使大家在本次会议上团结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兄弟党也对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和苏联政府在相关文件中所表述的我们党在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所执行的路线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在这里，我们显然已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如下问题，即关于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以及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等等。你们对这些问题都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立场已在苏联政府的相关声明和会议发言中作了表述。该立场在涉及捍卫国家利益和苏联安全的问题上是果断而坚决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沉稳而克制的，因为我们并不打算使苏联陷入某种欠考虑的挑衅行动之中。针对北京方面的谩骂和污辱，我们依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以坚

持原则的、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作为回应。我们依然真诚地而非作秀式地准备与其进行谈判，因为我们坚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解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针对苏联的上述立场，不仅是出席此次莫斯科会议的兄弟党，而且连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表示赞许。

这里涉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无疑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就不妨就此问题再多谈一点。

在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路线急剧尖锐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关注着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旨在侵犯我国利益的敌视性政治活动，苏维埃国家首先应当在世界各地区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东部的边防工作。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这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举措。远东地区的同志们可能对此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边防越牢固，那么在我国东部边境上爆发真正的、严重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就会越小。

当然，我们制定的对华关系的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依然是恢复和继续发展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如苏共代表团在各兄弟党会议上以及苏联政府和相关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长期前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始终牢记一点，即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些利益的一致，终究会使中国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同志们!在评价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之时，可以不打任何折扣地说，会议进行得很好，很有成果。就像共产党应当做的那样，会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各党派公开表述各种观点的做法不但没有恶化会议气氛，反而更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极力使会议工作富有建设性的性质。

就我们这方面而言，应当直言不讳地讲，参与这项巨大而不轻松工作的不仅有苏共代表团成员，而且实际上连所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也包括在内了。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即尽可能地让我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出席这次国际会议。

应当说，这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工作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东西，比以前更清楚地了解了各党派的立场。而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成功地促进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有益手段和可能性。

三、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请允许我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及其意义做出评价。

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此次大会的重大任务之一，是根据十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我们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经过协商的反帝斗争纲领，从而有助于取得我们反帝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会议的另一个任务是，在中共领导人积极从事分裂活动和我们运动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向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一致的局面之转折。

今天，我们已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样的话，即会议已圆满地解决了上述任务。这不仅指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的这次为期11天的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包括此前为召集会议我们所作的长期准备、多次的讨论、多方接触、思想斗争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所通过的各种文件的政治影响，等等。

事实上，所有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都对会议持有类似上述的评价，具体如下：“历史性的会议”，“巨大的成功”，“是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反帝斗争的新阶段”，“是恢复我们运动团结的重要转折点”，“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的著名事件”。(掌声)

具有同样典型意义的是，我们的敌人对这次会议做出的评价。大家都还记得，他们最初是预言会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召集。之后，资产阶级报刊又胡说什么，会议可能会召集，但其最终唯一的结果便是分歧的

加剧。如今，在用尽了各种方式以贬低会议的意义之后，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所取得的毫无疑问的胜利，首先是苏共的胜利。例如，在拥有影响力的英国周刊《观察家》上关于会议写有如下内容：“全世界共产党会议是苏联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分析与会者的立场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就本质而言与会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太大。”又据最大的美国通讯社——美联社报道，“各种建议将成为这次会议的满意成果”。《纽约时报》指出，“苏联希望并获得了多数对自己普遍立场的支持”。总之，近期此类五花八门的评价逐渐出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上。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界领导人对此次会议的评价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是苏共和苏联的胜利。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会议成果。

首先，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会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有能力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政治立场和能够将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联合起来的总的行动纲领。我们所做工作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其中有这样一些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关于越南问题，保卫和平呼吁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另外，根据各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又通过了一系列文件以表述会议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态度。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几乎所有与会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统一，我们才成功地就如此广泛的问题达成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尤其是当回想到，我们是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在分歧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的。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所列文件中的第一份文件的意义。关于该文件的内容，你们——同志们想必已是非常了解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份文件的特殊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在各兄弟党的集体努力下该文件对世界形势作了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重要结论，指出了革命力量在反帝斗争中所拥有的

新的后备军和可能性。文件还把对世界发展问题的分析与反帝行动的具体纲领紧密结合了起来。

这份实际上已获得了几乎所有与会者赞同的行动纲领，囊括了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直接、最终目标而奋斗的主要战略和策略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方针。它们将有助于共产党员们与那些试图把毛泽东路线和其他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的做法作斗争。该文件还包含了许多适用于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内容，从而使其成为共产党人与其他反帝国主义战士们结成广泛团结的行动纲领。

可能认为，该文件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中表述了马列主义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立场，也正是由于一些党派对这些理论问题阐释上的错误成为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我们之所以赋予该文件以重大意义，是因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个论题，并由此得出“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员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该论题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些党派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关问题作了错误的解释。

总之，此次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已远远超出了就(各党派)在反帝斗争中联合行动的有关问题进行简单协调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该文件为我们克服在个别思想和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我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进一步顺利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奠定了根基。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也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是本次会议出台的一份最重要的思想文件。它极其坚定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列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思想纲领。这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回击，是对中国试图以“毛泽东思想”替代列宁主义的觊觎的回击，是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回击。尤其重要的是，在本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代表团表示反对通过这份文件——该文件在会议闭幕式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掌声中获得一致通过。(掌声)

另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会议成果是：会议强化了各兄弟党要求团结的意愿。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在发言中发出的个别不和谐声音并没有改变整个会议的和谐氛围。马列主义者们从会议讲台上发出了坚决反对机会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呐喊。这充分表明了多数兄弟党政治上的成熟。

忆往昔，我们坚信，本次会议将从思想和政治上促使那些尚处于迷茫状态，倾向于错误立场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为这些人提供了新的多种可能性，以帮助其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而如今，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应当说我们还提到了一项重要的会议成果，而这对所有苏联共产党员都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再次在本次会议上令人信服地发挥了自已的作用。(掌声)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关于苏共和苏联的作用问题，关于如何看待我们党和国家在几乎所有代表团发言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哥穆尔卡同志的发言为例。后者宣称：“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苏联在世界反帝战线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的这一作用——便是头号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预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苏联人民巩固了这个国家，又以巨大牺牲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赢得了对法西斯暴君的伟大胜利，而这场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为中欧、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苏联是当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保卫人类免遭帝国主义的核恐吓，支持和帮助了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所有为获得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坚强支柱.....”

卡达尔在会议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我们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但他们自己身上却肩负了无法估量的、比我们任何人都重大责任。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各民族的自由和防止世界战争，以及未来人类的福祉，在以共产主义精神指导自己行动的同时，他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无私地承担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牺牲。”关于此发表了诚挚和热情讲话的还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美国、加拿大、智利、乌拉圭、葡萄牙、丹麦、以色列、印度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古巴共产党代表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苏共和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成为整个地球发生巨大变化的源泉，我们党和国家在当今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给予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在各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而关于上述事实，甚至连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会议多数持不同立场的代表们也不否认。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作和斗争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而感到自豪。加强各兄弟党与苏共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将是整个运动和全部反帝斗争的重要力量保证。

这里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其他队伍的工作环境、斗争条件和所面临问题所表现出的深刻理解，给各兄弟党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各兄弟党均给予了如下评价：苏共在会议上始终致力于民主的工作方式。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报刊相比，苏联报刊对会议工作情况所作报道都更为全面和客观。这再次证明我们对各方面问题所持的严肃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立场正确无误的自信，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由于我们依靠的是马列主义真理的力量。

通过总结我们所做的各方面工作，可以罗列出如下主要成果：

——会议认为，虽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是反帝斗争的先锋队，这一运动将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理论性任务；

——在制定了经过协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反帝斗争力量的统一行动纲领之后，会议便为赢得现阶段反对反动派和战争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明确目标和任务，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会议称自己为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重要阶段。而会议顺利召集的事实本身及其成果便是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发出的所谓“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诽谤的毁灭性打击；

——会议再次表明，苏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运

动的领导力量(掌声)；

——在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党派一起做了大量的政治、理论和组织工作，克服了所有会议召集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之后，苏共表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原则性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肩负的责任。也正是因此我们列宁主义的党才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会议本身自然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无论这次会议以多么完满的方式结束，它都不是我们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阵线团结的斗争的终点，而仅仅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会议帮助我们登上了一个新的基点，而我们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同时，即将从这一基点出发开始向帝国主义发起更加广泛和积极的进攻。

与此相关，我想强调一些从会议工作中引申出来的、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我这里指的是会议期间通过的一些决议，如关于召集各民族反帝国主义国际大会，关于召集维护欧洲安全的各民族国际会议等。我们将与其他党派一道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一些党派拥护我们提出的，关于就我们运动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包括那些引起尖锐争议的问题在内)组织创造性的讨论和理论性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落实这一建议。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定期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其中既包括世界性的，也包括区域性的。而提出这些建议的事实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的。这说明大家正极力倾向于集体式的工作模式，倾向于将各兄弟党的努力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在以后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并采取相应的方式以促其落实。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具体的措施性计划，以便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和发展会议所得出的那些成果。而当我们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商议之后，便将由政治局负责这个计划的编制工作。我希望在此次会议的预备程序中关于我们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问题谈几点想法。

会议及其成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方针，我们旨在团结社会主义力量、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将继续积极贯彻这一政策。

该政策的最重要环节依然是必须坚持以下措施：在坚定维护马列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联系。我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运动核心的团结，增强其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总体情况表明此次与会的各兄弟都积极倾向于团结起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这些成果过于陶醉，无论它们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因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依然相当复杂，而团结的进程将不会是自然而然式的自己成为现实。关于这一点，即便从会议上表现出的一些事实便看得出——这次依然有一些党派没有与会，依然有几个与会的党派对会议文件提出了保留意见，最后还包括一些党派在会议上所作的(异类)发言，等等。

而且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发展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针对个别尚处于动摇状态的党派，及其背离马列主义路线的做法我们绝不应听之任之，并被迫与之妥协。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对这些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进程施加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这无疑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而且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非总能在短期内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只有我们在今后更顽强、更善于和更策略地落实这项工作，它才会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与罗马尼亚同志的关系上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你们知道，罗马尼亚代表团一度示威性地退出了协商会议的会场，而如今它也签署了会议文件。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近期，罗马尼亚领导人已开始在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会范围内更加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了。在关于与苏联友好互助的新条约文本的问题上，当我们拒绝了罗方建议的我们无法接受的文字表述之后，罗方做了一定的让步——实际上是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约草案。最近我们就要签署该条约。所有这一切当然并不表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已然放弃了自己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错误立场，但正说明我们针对他们的工作必须更顽强地继续开展下去。

我们必须继续顽强地开展针对意大利、英国同志以及其他党派代表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

同样也可以谈一下关于我们与那些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的关系问题。就拿越南和朝鲜同志为例吧。显而易见，我们不能说减弱我们党

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他们的联系的话的。即使在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下，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对于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上都持实际上的沉默态度，也不能使我们的上述立场发生任何改变。相反，由于我们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势必要求我们加强与这些党派的关系并发展与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我们认为，有理由发展(苏共)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众所周知，近年来该党在活动中起初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左”倾、亲中国思想，然而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例如，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明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其实际上是加入了关于要求将千岛群岛归还日本的反苏复仇主义运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丧失阶级立场的举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明显表现出来。然而近期，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已趋于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声称，尽管与兄弟党之间仍存在分歧，但它已准备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与各党派采取一致行动。我们认为，应当引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这样做将有助于逐渐克服该党与我们运动的多数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我们过去所做的停止开展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政治工作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个错误。我们认为，在从原则上批判南联盟错误的理论和思想方针的同时，我们今后还应当从国家层面上坚持正常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方针，也可从党的层面保持与南斯拉夫同志的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对南联盟施加影响。

我们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诸问题的态度是：将耐心开展工作与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其中包括在处理我党与那些出现动摇和犯了错误的党派的关系方面。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坚定地捍卫马列主义的政治原则，循序渐进地与各种错误观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我们仍将面临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根据会议所制定的路线，我们将强化这方面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进一步广泛展开马列主义反对其所有敌人的进攻。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有区别地进行。当我们从事反对阶级敌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是一种情况；而当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斗争，涉及与那些有时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但依然是我

们的盟友，或者我们想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的人们的斗争之时，则是另一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反对错误和有害的观点，而且斗争的首要目的——在于说服、在于引导，即通过斗争的方式把那些暂时迷失了方向的同志引导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里既经常会进行有益的、同志式的、友好的争论，而有时则要表现得相当克制。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各党派之间所存在的许多分歧都可以通过实践经验、事件的过程本身、对站不住脚的错误方针的揭露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因此，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便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的成功便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会议期间，我们在推动并开展了尖锐而公开的争论的同时，也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收获。总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做就能够加强我们的立场，因为要回应一个错误的发言，就会有几十个正确的发言紧跟其后。

这里还有必要从政治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在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北京领导人便会极力把所有那些被我们赶走的、受了委屈的人们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可能利用这些人的不满来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做有助于其实现此类伎俩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同志们！截至目前，我们谈了关于我们活动的方向和任务等问题，而这些均与会议的工作及其决议直接相关。不过，全会的与会者们都了解本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挫败中国领导人的敌视阴谋。这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任务，它实际上涉及了我们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活动。

我们大家首先都认识到，目前积极开展和完善思想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加强团结斗争过程中所发生事件的进展情况，以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导，来培养教育所有苏联人民就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为自己的党和国家而自豪的情感、深刻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国际主义意义、尊重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有这些都成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有觉悟的苏联公民的特征，这在当前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正是这样来

加强本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兄弟情谊的——而如今这方面内容，正如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显示的那样，也具有了巨大的国际意义。我们是在持续不断地与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过程中，在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群众的进程中培养教育所有人，以使之获得这些(优良)品质的。今后，我们仍需将所有这方面工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会议为我们展开这方面工作奠定了极其有价值的基础。如今，相关会议资料理应成为我们从事思想教育活动和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这次会议工作的成果使我们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事业获得了新的进步。会议文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财富。如今，我们的思想战线应当遵照会议文件所确定的方向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工作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干部的积极创新，有成效地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积极分子直接参与了苏共在国际许多领域的活动。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尤其应当认真地学习会议资料并用之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对于(国内)各报刊、全军所有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言，与以往任何时间的不同在于，其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苏共的根本路线，尤其是与中国问题，与中共领导人所执行政策有关的内容。因为正是在这里，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斗争战线，而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这条战线将会长期存在。而我们党在国防和外交领域所采取的那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采用各种思想教育手段来强化，在坚信我们事业正确无误的基础上以全体苏联人民的新团结来强化，从而掀起一场强大的爱国主义高潮。(掌声)

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不仅要以我们的宣传机器来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阴谋，更重要的是还要揭露中国领导人整个国内、外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整个揭露过程要深刻、论据充分和全面。这已是我们所有参与反对北京的敌视政策的同志们的责任。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论工作的意义正变得更加重大。会议再次向整个运动表明，苏共——是一个在理论领域拥有巨大力量的政党，有能力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在高举马列主义理论旗帜的同时对世界

形势进行创造性的分析。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我们在兄弟党中的威望，将更多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水平如何。

我们的外交政策面临着重大的任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对外政策都在整个反帝国主义斗争力量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是打破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维护和平、捍卫和平共处原则、支援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最近，党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政治活动的相关问题，将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进行讨论。届时，我们会向民众详细解读这次例会的相关资料。

我还想简要涉及这样一些重要且复杂的任务，即我们将如何解决与加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相关的问题。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这样一个任务，即在发展一体化的同时，(苏联)如何与经互会成员国在经济上进一步拉近距离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能够更紧密地互动。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未来，这就是要为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团结建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把与首先包括苏联在内的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那么我们盟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国土规模有限、市场狭小和原料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都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现代经济的。而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自然就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并促进社会主义体系牢固的政治团结。帝国主义针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破坏活动计划就是想要把这些国家纳入到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的范围之内。

今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经互会第23次特别例会，各兄弟国家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均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关重要决议。而要实现这些决议内容则仍需要所有兄弟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我之所以把所有这一切在本次全会上提出，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从事与兄弟国家经济联系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从而在兼顾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一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经济成功和科技成就，苏联国防力量的加强对反帝斗争和发展革命进程，以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你们，同志们完全可以在会议资料中找到许多与该问题有关的明确表述。这些内容激发了

我们情不自禁的自豪感并再次向我们证明，我们日常所从事的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文化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等相关事务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但与此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所肩负的这方面工作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应当让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以及各级党组织和成百万的苏联劳动者们都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精力应当首先投入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效率方面，投入到加快我们国民经济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方面。

如果说到我们目前最紧迫的国民经济任务，那首先必须说的是：顺利地、按时完成当前所面临的五年计划。各企业集体、各部门和共和国都要很好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从而能够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来庆祝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而是否能够无条件地完成五年计划和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使1969年成为真正列宁式的突击工作之年——这是一个关系到所有党组织，所有国民经济工作人员的荣誉的问题。

今年，我们在农业领域仍需要解决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在国家一些地区气候条件不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这就需要我们更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如有组织地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等。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畜牧产品，尤其是肉类的生产速度。

各级党委和所有党组织的责任，就是要动员共产党人和所有劳动者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不仅是我们对自己国家所肩负的责任，而且是我们对全世界革命者所肩负的义务。我们必须使国际主义责任感转化为新的鼓舞我们人民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忘我劳动。

简要说来，以上便是从第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今后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向和我们党的主要任务的相关内容。

同志们！苏联人民始终密切关注着本次国际会议的工作情况。会议收到了数千封我国劳动者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为反帝斗争事业做出新贡献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及其对苏共政策的一致拥护。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以极其满意的心情接受了会议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间里，会议文件和资料正在民众中间进行广泛的讨论，

并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议题。在众多发言和声明中劳动者们均对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此次会议本身标志着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各民族的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会议的顺利举行，在国家内部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劳动高潮。这就是——对会议成果的良好评价。同志们，这就是对我们在巩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方面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最好支持。这种支持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中表达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意愿。（掌声）

同志们！我们党对所有国家共产党生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

会议的成功必然会对我们在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过，我们满意已完成的工作与盲目乐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坚信，会议的成果将会更加激励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任务，鼓舞我们党为了共产主义的新胜利而争取新的伟大成就。（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场休息之后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全会继续进行。下面发言的是П.Е.谢列斯特同志——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里申同志作发言准备。

谢列斯特：同志们！如今，整个世界都密切关注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巨大成果。地球上所有进步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促进。

我们在思想领域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分子以及马列主义的变节者和叛徒们——事先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企图干扰各兄弟党会议的召集。他们近乎疯狂地夸大个别党内部以及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挑拨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

这其中便有美国国务院。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全世界范围内共

产主义党派”的报告。在反对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他们把各类叛徒们联合了起来。他们唾沫四溅地诬蔑马列主义政党，高喊什么不必维护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似乎各党派的存在只是个形式，而其心灵都是死的。

当会议召开之后，共产主义的敌人们又开始不遗余力地试图抹杀和贬低其历史意义。他们指责说，会议尖锐地激化了分歧，甚至将发生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其最终结果似乎必将削弱苏联的对外政策立场。

不过，所有上述企图都在共产党人不可遏制的、追求反帝斗争团结的压力下被瓦解，化成了过眼烟云。现实使所有这些虚伪的预言家们成了人们的笑柄。如今，许多资产阶级报刊和广播机构不得不承认，破坏和抵制会议的思想破产了。

众所周知，曾几何时在个别党派领导人中存在有一些怀疑论者和信念不坚者。他们对举办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适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均怀有疑虑。只是在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做了大量而耐心的工作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党派才改变了看法并参加了会议。

有一些党派拒绝参加会议。但如今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可以说，已处于来去两难的困境。因为他们现在很难向广大党员们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和为什么要对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采取那样的态度。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在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作为与会者，我们亲眼见证了该发言在所有参加共产党国际大会的党派代表中间引起了多么巨大的关注和多么由衷的赞叹。

该发言论述深刻而具说服力，内容详尽而务实。其中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和薄弱等两方面都作了客观的评价，坦诚地叙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困难，对毛泽东集团的分裂活动作了清晰而明确的评论。共产党员们都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称作我们党和各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听取这一发言的同时，我们为我们党及其光荣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此次全会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工作、所通过决议及其所确定的我们党要实现的具体任务。

让我们——苏联共产党员们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我们党成了会议的倡导者。尽管存在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难和政治分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仍是通过进行大量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确保了共产党人们的团结。而在这次会议上，众多党代表团在发言中，给予我们党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也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正确路线的胜利。

近两天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一致、完整、全面地赞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所通过的文件。

同志们!与会议的举办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相关，乌克兰共产党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任务：广泛开展学习和宣传各兄弟党会议成果以及本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资料的工作。乌克兰共产党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斗争团结，显著提高自身以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和所有劳动者的水平。

乌克兰已在以国际主义、民族友好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今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以对我们共产党和苏联祖国的自豪感，对各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所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尊重等内容，把我们教育所有劳动者的工作做得更好。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措施，而这些必将极大地促进在人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和各种思想工作。我们必须加紧揭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观点和观念，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敌视共产主义的宣传的毒害。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宣传家、中国和其他分裂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均用已破产的托洛茨基主义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一些国家中托派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了工人运动中的第五纵队，并给各兄弟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敌人。

毛主义者——当代的假革命者。他们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武装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投降变节者和叛徒。难怪帝国主义们会认为他们是自己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斗争中的后备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维护马列主义的斗争中一定要加紧揭露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我们的人民知道和认识到他们的反列宁主义本质。

近期，反共产主义和反苏宣传开始将矛头集中到所谓民族主义问题上，并试图以此来对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思想。他们竭尽全力的目的，就是要在个别人的思想意识中激起和挑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渣余孽。美国报纸《芝加哥每日新闻》不久前曾写道，“‘民族主义的复兴’，当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胜利之后，就可能跨向乌克兰，然后再向其他14个苏联共和国扩展”。

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初露头角的民族问题“理论家们”，他们就像盗窃粪球的屎壳螂一样，竟试图把马列主义按自己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极力对之进行肆无忌惮的篡改和伪造。

境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积极从事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分支网络，拥有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及国际旅游等，大规模从事反苏宣传活动。但是，无论资产阶级宣传机器采取何种方式，其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关键是我们——共产党人要能够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学说，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并善于一针见血地揭露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马列主义——共产党员最强大的武器，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会使用它。

在西德，法西斯和复仇主义黑社会势力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要求修正二战之后所确定的国界，并执行着一项危险而不明智的政策，而该政策正得到国际反动派，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们的支持。

西德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竟公开声称，一切有害于苏联的东西都对他们有益。因此他们愿意与所有人作任何交易，其中包括中国分裂者在内。以此为目的，他们极力建立某个欧洲国家集团，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团结。

所有这一切，自然会引来那些在反对法西斯奴役者斗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的苏联人民的忧虑。

乌克兰共产党和所有劳动者，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

家的和平和安全将取决于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和国防更加稳固，乌克兰人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兄弟党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该文件再次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它是揭露包括毛集团在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以各种疯狂思想取代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企图的最重要文件。

该文件鲜明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与全世界劳动者们是多么的亲近，我们的同志是如此之多，同志们对列宁学说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

乌克兰正在为庆祝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日进行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以动员劳动者们把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付诸实现。在各工厂、矿山、建设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正更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提前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第四年度的任务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意味着，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开始了一次新的强劲的发展高潮。

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人民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计划的建设之中，并将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和纪念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是B.B.格里申同志——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历史意义，展示了苏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会议筹备和团结共产党、工人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和劳动者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与我

们全党一样，莫斯科市党组织完整而全部地支持会议结果、苏共代表团的的活动、我们党中央所坚持的旨在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和统一的路线。

近期，在莫斯科的各企业和组织中都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会议，莫斯科人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成果一致表示称赞。

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议令人信服地表明，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正走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在同志式的、民主和平等的氛围中讨论了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明了不同国家和大陆的共产党人谋求行动上的团结统一的意愿，并得出了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一致性结论。

关于反帝斗争的任务，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性致辞的，支持越南人民的呼吁书和维护和平的倡议书等——所有这些文件均具有重要的原则性意义。其中包含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战争，维护和平、各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行动纲领。

会议结果表明，各共产主义党派已深刻了解了自身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世界和平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必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促进反帝战士们更积极的活动及其国际团结。

在经历了前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召集一次(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以制定一个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以及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纲领。

如今当全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圆满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说，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成果——是我们党的路线在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真正重大的胜利。这也是那些始终坚持维护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有兄弟党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我们党中央倡议和召集了此次会议，并尽一切可能使这次有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世界性会议得以成功举行并圆满结束。自1966年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在会议的筹备、吸引多数兄弟党来参会和制定会议文件等方面政治局做了大量的、并不轻松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与各兄弟党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持有错误或动摇立场的党派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的会面和谈话。正是在这些会面和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地清除了过去与一些党派在双边关系上所积累的隔阂，克服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种种困难。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集和成功举办，相当程度上是在我们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积极促成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落实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的同时，我党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其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确保良好的和平环境，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在国际政策方面，我们党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诸原则为指导。

近年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华沙条约组织，扩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付出了重大努力。我们党对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始终执行反对殖民压迫和全面与已获解放国家合作的方针。

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方面，我们党严格遵守团结和相互支持、尊重(各自)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这对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我们党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与会者们对苏联及其共产党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诸多兄弟党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发出的热情赞誉言辞，使我们由衷地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央而感到自豪。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坚定而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列主义诸原则。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其深刻的发言中，所阐述的我们党的立场，对会议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共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

国际形势、当代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明确了我们反帝斗争的主要任务。苏共代表团发言中所包含的评价和结论，是我们党在革命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制定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方针，以及毛泽东集团坚持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路线的危险性等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对维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对各共产主义党派、具有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觊觎他国的领土、史无前例地诬蔑苏共和苏联，及至最后在边境上向苏联发起武装挑衅——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毛主义者与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已是多么的巨大。

在中共领袖们以自己的主要路线反对苏共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况下，坚定地揭露毛主义者们的冒险主义政策，便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和各国共产党员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多数兄弟党代表们，把中共现任领导人所执行的反列宁、反苏和大国主义方针，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类并给予了坚决的谴责，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会议对毛泽东集团的危险方针所作的原则性批判，必将有助于动员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力投入与中国领导人的敌视性政治活动的斗争之中，必将有助于加强中共内部那些依然坚持马列主义立场的人们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对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形势、帮助捷共的稳定和使捷共中央返回到与国内右倾修正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的轨道上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正是由于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和我们党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才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得以向好的方向转变。

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充分证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相关的举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多数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对上述举措的坚定支持和赞同，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都着力强调，捍卫社会主义既得成果以使之免遭其敌人的蓄意侵犯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制定了共产党员的统一行动纲领，这是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如今，各兄弟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会议所通过的相关决议。而与会议结果相关，关于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自己的报告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前，莫斯科党组织正在会议资料的解释宣传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宣传家、鼓动员、政治时事宣传员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

在研究和学习会议资料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热烈称赞会议结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同时表示根本不赞同澳大利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党派代表的发言，及其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问题所作的解释。他们还表示，不同意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领导人发言中的一系列观点，并要求会议坚决批判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政策。

莫斯科共产党员们表示对如下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即近年来在我党中央全会上除了一系列国内生活问题外，还讨论了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苏共中央会定期向党内通报这些问题。这表明，我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模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定期向广大党员通报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将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相关问题，进而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从而能够更有目的性地在群众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莫斯科党组织从事所有与宣传和解释会议资料有关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提高广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完成各项经济任务。莫斯科工业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作者们，以提前结束五年计划的干劲，正在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生产计划和义务。当前，莫斯科人正处于即将完成上半年产品销售额和主要工业品生产的阶段。城市建筑工人们，根据首都的设计规划，正在完成大量的住宅、文化生活和工业设施建设项目。科技工作者们也在加紧工作。而为纪念列宁诞辰所做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广泛地一天天开展起来。

莫斯科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所有劳动者们，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和党中央周围，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了顺利实现党的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历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国家的

五年计划并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他们将不遗余力。

这里，我以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名义提出建议，让我们完整而全面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在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会议所通过的文件，赞同苏共代表团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执行的路线及其实际活动。（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费多谢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详尽而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莫斯科会议工作的主要政治成果，向我们党提出了，关于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具体任务。

此次会议的召集及其举办过程，充分展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以苏共为核心而形成的巨大团结，展示了我们党列宁主义路线的重大胜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次会议完全证明了，我党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中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及其主要发展趋势所作的马列主义分析的正确性。

莫斯科会议及其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沉重打击，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对形形色色反列宁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显而易见的是，正如与会者在发言中所显示的那样，此次会议，必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纲领的基础上，促进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莫斯科会议的意义还在于，它以新的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宝库，研究了世界历史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增长前景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并将之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明显已被会议普遍公认为——是对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重大贡献。哈萨克斯坦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接受了我们伟大的高举光荣的列宁主义旗帜的党，并为之感到由衷的自豪。该发言以深邃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所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被所有进步的舆论评价为进一步强化共产主义队伍行动一致的战斗纲领。

这里仍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众所周知，甚至连最广泛的资产阶级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会议的成功，而这一成功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大量的会议筹备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党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开展了积极的、富有成果的实际活动。正因为这样，如今我们才可以勇敢地说，正是由于苏共采取了既灵活多变而又固守原则的立场，才使会议有了一个好的结果。这也再次印证了列宁曾提出的一个论题的正确性，即“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以及在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在此次会议上受到了与会者们高度的评价，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对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高度评价表明，苏共是公认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先锋队，而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

同志们！正如你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对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与该运动相关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许多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借此，会议以应有的方式对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作用作了评价。而这与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始终执行的路线是完全相符的。

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全面支持年轻的民族国家和所有遭受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正是由于苏共的活动，才使得帝国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和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制造分裂的计划以及毛泽东集团在各民族解放运动之上建立自己霸权的企图屡屡受挫。苏共所进行的这些需要智慧和远见、原则性和策略性、灵活性和坚定性的活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人们正确的理解，这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正因此，难怪来自亚、非、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发言中要强调苏联和苏共在被奴役国家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事业中的巨大作用。

会议表明，我们在从事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有许多忠实的战友和可依赖的朋友，我们永远能够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与此同时，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今天的报告中所坚定揭示的那样，在我们的运动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而要克服这些分歧仍必须作大量的工作。一些党派，尤

其是他们的领导者们，正在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条款；而另一些——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则极力依照“本民族的住宅”模式来“肢解”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和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更紧密团结的斗争中，我们党仍需无条件地付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同志们!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完全同意政治局在报告中对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现状所表达的忧虑。

毛泽东分子们的奇谈怪论竟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避免战争，他们公开而赤裸裸地觊觎苏联领土，中共九大也制定了向苏联开战的方针，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是世人皆知的。目前，仅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苏联边境地区，中国领导人便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中国的战争贩子们已经多次在谢米巴拉金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等地区侵犯我国边界，并不断挑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武装冲突。只是由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谨慎做法，他们才暂且没有成功实现将我们拖入其挑衅圈套的计划，即使这样，中国人仍无耻地把自己的入侵活动说成是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领土。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周恩来前不久访问新疆之后，中国人在我们边境上的挑衅活动更加猖獗。在该地区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号召采取积极措施以准备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随后，新疆伊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地方领导人也发出了类似指示。

在新疆，目前(中国人)正在集中进行所谓消除各敌视集团之间分歧的运动。问题在于，在这些地区仍然存在有毛主义者与其敌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导致其至今仍无法在个别地区成功建立革命委员会。

在极力禁止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与苏联接触的同时，中国加紧了将土著居民从边境地区迁往国家腹地、贫瘠的草原和沙漠地区的行动。他们在通往苏联边境方向地区铺设了具有纯军事目的的道路。尤其是近期，中国人用一批新部队——已证明“忠诚于”毛泽东的军队替换了原先在边境驻防的老部队。

在新疆居民中也正在进行一场明确的、关于中国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要与苏联开战的宣传活动，其借口是：似乎是要解放被苏联侵占的中

国领土和进行那个在我们国内已然是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人为所有当地居民组织放映了含有诬蔑性的反苏内容的电影，以煽动民众对我们国家的仇恨，混淆数百万民众的思想意识。

当然，我们不当过分夸大那里的情况。但鉴于当前形势，我们仍必须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当前应制定和实施这样一条与中国叛徒们斗争的路线，即最终促使中国内部健康的力量赢得胜利，从而使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重新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轨道上来——就像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实现上述目的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事业的顽固叛徒——毛泽东及其集团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后的活动已日益成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威胁。不过，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把毛泽东集团与中国劳动群众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这样来提出问题：即中国分裂主义者很早便已丧失了被称作共产党员的权利；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伪社会主义者，而从本质上说，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他们在国内所建立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在(从肉体上)消灭数百万现存制度的敌人，而少量的部族和民族也难逃灭绝的命运，所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应当现在就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公开，我们完全有充足而严谨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即使在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也极其坚定地揭露了北京叛徒们的活动对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事业的深刻危害。

在此次全会上很适宜宣布这样一个消息，即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收到了维吾尔民族代表大团体的来信。后者带着惶恐的心情，在信中通报了关于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所经受的苦难。他们还报告说，当地居民已对饥饿和毛主义者的嘲笑绝望到了极限，并准备发起针对毛泽东集团的解放斗争，以便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组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显然，所有上述情况仍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及时强调了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必要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方

面。的确，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机构的活动中仍有一个主要缺陷需要克服，那就是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视思想的疯狂压制的情况下，我们往往总是过于强调防御和固守已有阵地，而不是在各条思想斗争战线上发起全面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有效地揭露，毛泽东分子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恬不知耻的诬蔑、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和各种攻讦，与此同时我们还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对我们的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展开宣传工作。

同志们!这些天，哈萨克党组织正普遍开展学习会议资料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打算以实际行动来改进自身在所有阶层居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共和国党组织正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以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深化我们对劳动者的培育教育工作。

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宣布，他们将一致、彻底和完全地赞同我们党的明确、始终如一和深刻的原则性立场，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哈萨克斯坦劳动者们，将与所有苏联人民一道竭尽全力，以全面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事业。在消除由于上一个严冬所导致的些许落后的同时，共和国各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们正在弥补损失，加快生产速度，以便以在共产主义建设所有领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П.Н.费多谢耶夫同志——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奇里亚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费多谢耶夫：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有理由对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功，当然也是我们党在为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会议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虽然在近几年以来的国际会议中已经强调，在共产主义运动

中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根据普遍的观点，苏共仍被公认为兄弟党中的首位和居领导地位的党派。

我们国家的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都可以为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困难、崇高和责任重大的使命而感到自豪。所有代表团都是知道的，即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立场的同时，积极参与了会议文件的准备工作。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从马列主义高度分析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任务，从而使苏共的政治思想威望不仅得到了加强，而且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党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所表述的观点对其他许多代表团的发言都产生了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我们党所表述的观点促使了会议文件的产生及其被采纳，正是它把问题具体化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反帝斗争文件的主要条款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证。因此，要从事对会议所通过文件的解释工作，就一定要充分利用我们代表团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性分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否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

个别党派的代表，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代表在内，并没有充分借鉴这次国际会议文件草案中关于帝国主义分析的内容。他们以帝国主义问题和新现象的复杂性为理由拒绝签署会议文件的相应章节。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尝试去对这些新现象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这里，我将不过多论述毛主义者们的谬论式论题“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目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存在两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在一些党派中广泛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似乎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危机，已排除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思想和政治渗透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而且它也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加紧从事自己的侵略活动。于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便认为，关于在现代世界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尖锐化的论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竟被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就和生产增长所迷惑，以至于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论断丧失了信心，就其实质，他们实际上更倾向于趋同论的拥护者们的立场，即主张两种社会政治体制的进化和融合。

在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并没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进步条件下获得的那些成就和可能性视而不见，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代表团也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和缺陷，并强调只是在一些国家中而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进步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在个别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被经济落后、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贫乏所笼罩。

必须指出，那些认真从事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党派代表们，都是完全赞同我们党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上述评价的。而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的发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必须承认，我们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所持立场的强大之处在于，始终不渝地、令人信服地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列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验，揭示了阶级斗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规律。他的主要结论是：剥削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他们将进行绝望的抵抗，而阶级斗争将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我们国家已经历了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过渡期，而其他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曾经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时期。如今，在两大体系对抗的条件下，我们正亲眼目睹这一规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主义占据上风。但这个问题只有在两个世界体系的激烈交锋中，在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才能够得以解决。

在两大阵营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不论是在个别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必然会出现一些在这个阵营之间动摇不定的成分。列宁指出，“我们知道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人们通常总是会转向这个或其他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预计，在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那些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动摇不定者们，可能不仅仅只是个别人群、个别社会集团和政治党派，而且还可能有个别的国家。如今，我们看到，比如南斯拉夫领导人便以自己的“不结盟”政策或“非集团”政策及其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的“自由世界”之间。

在对那些没有原则的领袖们进行抨击的同时，列宁教导我们在对待这些动摇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方面要表现出克制和灵活性，以便消除他们的动摇并最后与之结为盟友。列宁说，“我们现在给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将动摇者吸引到我们一边来——这是整个世界的任务”。

如今，列昂尼德·伊里奇刚刚在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发言与列宁的上述指示是完全相吻合的。其论题要求我们：对待那些动摇者和迷失方向者，我们的斗争应当遵循“不但不反对，反而要支持”的原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人的迷茫和动摇，并把他们争取和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帝国主义是历史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阻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只有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才能够明白，解放运动所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的巨大，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的压力和以各种方式与民族主义共同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现阶段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作出全面的评价。

以各种变种方式存在的修正主义，不论是其右的还是“左”的派别，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异化现象。

世界范围内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群众的一系列新阶层的加入，都为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传播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些观念并不是新事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在他们那个时代便曾遇到过类似的社会主义变种。还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便揭露了这些变种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僧侣社会主义，等等。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已搞得非常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一个，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而对它的曲解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模式。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各种阶级派别。如今，他们已不仅只是一些理论观念。在个别国家中新露头角的社会主义预言家们，都在极力把这些与劳动者利益对立的观

念付诸实践。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关于此类冒险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时常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例如，直到最近，以前在国外和我们一些著作中仍认为，毛主义的出现是由于数百万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如此来解释毛主义的社会根源必定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一方面，其认为毛主义反映了农民的观点——这无疑是对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诽谤。我们应当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和原始无政府主义偏见与农民的最终根本利益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如果毛主义果真是反映了数亿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家农民的思想和利益，那么亚、非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前途可言。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是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依靠后者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列宁主义揭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转折时代社会出现危机的条件下，政权可能落到军人或政治集团的手中，而后者会利用工人阶级的软弱和无组织性，以便时常在各不同阶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列宁曾以克伦斯基政府为例，来比喻经过伪装的反革命势力。列宁称这种社会现象为波拿马主义并明确了他的如下特征：依靠黠武主义，随机应变于各阶级之间，毫无节制地从事社会蛊惑。难道毛主义者们的国内、外政策不正体现了这些特征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不正是独特的波拿巴类型的反革命政变吗？

如今，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主义者运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依靠黠武主义，或利用青年学生，或利用一部分工人，保护和供养资产阶级，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农民和各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偏见，即诉诸民族主义的冒险主义倾向。

共产党人们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得出如下结论，即我们面临着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共产党代表在会议上，积极支持苏共提出的积极展开反对“左”、右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歪曲的斗争路线，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理论和思想工作中，应尤其重视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修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思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年已很好地揭示了这种联系，而目前的现实也再次证明，机会主义滋养了民族主义，而本身又从民族主义中吸取营养。究其本质，就是放弃阶级

观点，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观点来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

近期，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反苏主义的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宣传中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况且，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加紧宣传自己执行反苏主义政策的原因。例如，南斯拉夫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们便断言，似乎反苏主义是对苏共和苏联所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反作用。而对于上述说法，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绝对自治”拥护者们均持默认态度。

实际上民族主义转变为反苏主义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苏联一直坚定不移地高举国际主义旗帜，苏联始终真正地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落实到本国建设和对外政策之中。因而苏共和苏联才成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敌视的主要堡垒及其主要攻击目标。而那些苏共和苏联的最忠实朋友们——自然也就成了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这尤其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如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乌布利希、盖斯·霍尔 [132]、阿里斯门迪 [133] 及其他国际主义的积极贯彻者们，都极其坚定地公开反对反苏主义。而与此相反，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狂热地钟情于“自治”和“独立”的活动家们，即使以搪塞的、支支吾吾的方式提到“国际主义”一个字。

作为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旗手，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时刻准备着向修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一次又一次新的冲锋。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将不会与举止庸俗的人们以及社会民主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们的见风使舵做法相妥协。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代表团完全胜任地代表了苏联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当前，我们政治思想和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我们党在世界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威望。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各兄弟党的理论骨干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思想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在这方面存在着可能落后的危险。

如果说通过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能够高水平地对当代一些现实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总结和概括，再加上我们各科研机构的工作，就一定能够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与党的国内、外政策，与党和国家的建设，与思想工作和斗争需要等直接联系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其中具体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进展情

况，关于右倾和“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发展方向上的原则性区别，关于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各种评价，关于对党内生活规范和原则的不同理解，关于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正如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许多代表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所有科研机构都应当与各兄弟党的理论干部一起以系统性而非间歇性的方式来共同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党和所有苏联人民，都高度评价这次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的文件。在当前修正主义者加紧攻击列宁主义并指责其已经过时或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之时，当中国大汗的拥护者们试图徒劳地将其拖上当代理论思想的顶峰之际，列宁主义——这一国际主义学说无疑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根本需要。

在最后结束时，同志们，请允许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的代表团顺利完成会议筹备工作并成功举办了这次会议表示祝贺。这次会议，完全称得上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开创事业的继往开来。（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Г.И.奇里亚耶夫同志——苏共雅库茨克州委第一书记。准备发言的是库里贾诺夫同志。

奇里亚耶夫：同志们，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会议上讨论了当代一系列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今天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全面、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这次共产党大会对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积极开展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团结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全世界统一战线力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世界解放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展示了当代革命力量阵容的强大。其成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重大胜利。会议显示了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与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斗争中共产党队伍团结的不断增强和巩固。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国家，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故乡召开的。整个会议

进程以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为指导，以纪念伊里奇的百年诞辰为标志。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的文件。这更直观地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

上述致辞热烈地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所有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奋斗的战士、进步和和平事业的所有拥护者，都要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伟大列宁的百年诞辰。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对我们所在的时代和加强针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前景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该文件是我们为争取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强大武器和战斗纲领。它将对我们的动员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帝斗争发挥巨大作用。这就是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成千万共产党军队和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对会议主要文件的评价。

我们，所有此次中央全会的与会者都很了解政治局在会议之前及其举办过程中所作的大量工作，而这些都是会议成功举办并通过那些完全符合我们预定目标的文件的决定性因素。

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对全体与会者、共产党员们和世界公众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深刻的科学性极其坚定地陈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作了详尽的马列主义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本质，为所有反帝革命力量指引了团结的道路，及其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行动方式和方法。

国际会议的与会者评价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是对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分析当前世界形势的样板，从而为我们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性任务奠定了基础。

关于雅库茨克劳动者们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正如“阿尔丹佐罗托”联合企业工人在发言中所道：“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所有苏联人民的心声。我们对此期待已久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我们党中央与我们，与全体苏联人民的密切联系。中央非常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因而能够完全正确地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同意前面的发言者们所提出的建议，即完全彻底地赞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活动。

这里，我想报告一下雅库茨克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致意见：与全体苏联人民和国家的所有共产党员们一样，我们始终抱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我党代表团在此次国际会议、在多次群众性宣传集会和其他会议上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回应中热烈称赞了会议的成果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雅库茨克全体共产党员说了许多支持、热烈称赞和感谢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的话，感谢他们在这次国际会议为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全世界共产党队伍的团结、统一所进行的积极而坚持原则的斗争，感谢他们在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涉及反帝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

同志们！

这次刚刚结束的国际会议所提出问题的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贯穿了整个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这就是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会议鲜明地表达了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愿望，而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充分体现我们运动的力量，才是我们未来赢得胜利的保证。

苏共代表团把此次国际会议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迫切需要克服的分歧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分歧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各种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渗透所致。苏共代表团的上述做法也赢得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

这里，我们不得不愤怒地指出，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反马克思和反社会主义的分裂活动，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的大国沙文主义方针及其公开的反社会主义目的，实际上是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只能使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感到高兴，并终将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所谓的中共九大，在将毛泽东集团的现行方针合法化之后，又在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中增加了新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此次全会的报告中以及许多代表团领导人在发言中都针对所有上述内容提出了尖锐的原则性评价。揭露毛泽

东集团政策和实践活动的本质对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反击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只有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试图维护毛泽东集团，反对揭露其活动的反社会主义性质。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徒劳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许多代表团的善意谴责。

会议表示，今后将继续坚定地寻求各种可能，从而为消除现存分歧和加强各兄弟党的团结、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完全赞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为消除与一些兄弟党的分歧，而制定的路线和所进行的实际活动。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共产党拥有争取团结斗争的久经考验的武器。该武器曾在光荣的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的战斗中使我们赢得了胜利，它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是非常了解的。为了隔离和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寄希望于民族主义并极力败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声望。

这次国际会议特别强调了，每个与民族主义倾向做不妥协斗争的共产党在自身活动中，遵守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任务紧密结合的重要性问题。会议讨论期间，一些政党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从而再次证明了上述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以列宁遗训为指导，其所制定的政策是国际主义的样板。在处理与其他党派和国家的关系上，苏共真正地贯彻着国际主义政策，坚持以这一精神来教育全体苏联人民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对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当前自己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部族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搞好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毫不妥协的精神，培养教育苏联人民有关的工作。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全会着重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必要性。

而这样做的原因源于，我们在会议主要文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基础上所制定的反帝斗争，以及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任务。

在当前条件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全力揭露那些旨在欺骗广大群众，瓦解其警惕性和麻醉其意识的思想神话。

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用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武装全体劳动者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将对中央的上述决定给予高度重视。

这一段时期，我们州党组织在向广大劳动者解释会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将努力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每天的劳动并不仅仅是在完成地方上的任务，而且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在为已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堡垒的强大祖国的经济和国防稳固作贡献。这是我们从此次国际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正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钻石、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采掘以及农产品和毛皮的生产方面，以确保其产量的不断增长。如今，共和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们正在加紧完成产品销售的半年计划。正是在我们会议召集的这些天里，雅库茨克的地质学家们又在和平山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储量丰富的钻石矿，并将之命名为“国际主义矿”。“雅库茨克钻石”采掘第五联合企业选矿厂的工人们又发现了一块精致而巨大的金刚钻石晶体，并称之为“团结”。

共和国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和建筑工人们正在为高质量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社会主义义务而奋斗，准备以此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他们一定会以高度的荣誉感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伟大领袖的周年纪念。

共和国的党组织也将根据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今天报告中的内容得出如下具体结论：在今年必须坚定地为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改进投资建设和取得农产品生产的增长而奋斗。

同志们，在发言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完全赞成共产党和工人党

莫斯科会议的成果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请中央相信，雅库茨克党组织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以圆满落实此次全会的相关指示。（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Л.А.库里贾诺夫同志——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管理局第一书记。叶皮谢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里贾诺夫：同志们！现在，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国家的银幕上正放映着为我们纪念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摄制的纪录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挤满了我们的电影院，亲眼目睹了这次大会的工作进程。这次大会，是人类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伟大军队的一次盛大集会，会议的举办地是莫斯科——这个列宁曾工作过的城市，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首都。

苏联人民满怀激动的心情亲眼看着这些骨干们——地球上最先进和革命运动的代表、领导人通过红场前往列宁墓，并再次将自己的尊重和敬爱献给自己的伟大领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即使我们看不到列宁，但他依然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因为正是列宁的思想确定了整个会议的工作进程及其所通过的历史性决议，而后者无疑将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苏联文化界的活动家和所有我们从事创作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其关切和激动的心情关注了会议的进程及其相关资料，而这是尤其需要强调和广泛宣传的。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帝斗争、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以及联合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功。

会议以新的历史经验丰富了共产主义运动并对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发展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而我们，对于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的积极活动在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和联合革命斗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

意。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党中央领导人在此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作了多少大量、缜密而细致的工作。通过始终关注会议的讨论过程，我们所有人想必都能够就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在反帝斗争中肩负着主攻责任的苏联和我们党，与会者们采用不同语言都说了同样的非常有分量的话：所有国家真正的革命者们都很清楚，只有苏联，只有苏联共产党是当前反帝斗争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决定性力量。这些话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苏联知识界以热烈赞扬和满意的态度接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纲领性发言。该发言极其清晰而直率地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表明了苏共的立场。

其中，对于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代表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那个涉及当今世界思想斗争的段落中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该段落中说：“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大斗争武器。我们非常了解这一武器的威力。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正在群众中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如今，马列主义正处于进攻的状态，我们应当把这一攻势开展得更加广泛。勃列日涅夫同志警告道，无论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共产党在思想工作方面有任何的放松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我们——苏联的艺术家们已把这些话看作是直接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就是党在谋求世界和平，在培养新人和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事业上的忠诚助手。

苏联艺术文化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而服务于伟大的目标——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才是苏联艺术家的生活意义和幸福。

革命性的目标，是苏联艺术家创作活动的无可争辩的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就是要展现那些，在当年曾沦为战场的土地上，正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民的生活，揭示几代人民之间存在的

政治和道德关系——从当年冬宫的猛烈进攻，直到今天西伯利亚电站建设者们、宇宙的征服者们、新型现代机器和企业的创建者们所创造的劳动功绩，而后者则直观地体现了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步精神，体现了苏联科学和技术思想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会议资料不仅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在培养新人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向党提供帮助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我们的艺术思想要反映现代人的思考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适应我们党在政治、组织和教育工作方面的需要。

我们认识到，自己在那些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多么的重大。如今，在拥有了会议的经验 and 榜样的同时，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即进一步弘扬始终存在于我们艺术之中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以便我们的艺术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当前的思想斗争之中。

我们需要各种艺术类型的关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反映马列主义者自身团结、战斗友谊内容的新书籍、电影、戏剧和作品，以便全面地反击帝国主义及其表现、反击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我们需要新的带有共产主义激情的作品以展现苏联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劳动和斗争的国际主义意义。

请允许我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保证，苏联艺术家和所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这些最重大任务，并将会尽一切可能来完成它们。

请允许我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宣布，苏联知识界热烈赞成和支持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马列主义路线，而这就是苏共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工作中所非常清楚地表现出的那一路线。
(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下一个发言的是叶皮谢夫同志，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作发言准备。我想提个建议，我们是否将继续进行讨论？

表决：不要。所有问题都清楚了。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有没有持反对意见？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那么在托尔斯季科夫同志发言后我们将结束讨论，现在由叶皮谢夫同志发言。

叶皮谢夫：同志们！

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我们还没有一次在自己的全会上详细分析过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状等问题。现在，我们又重新回顾这些与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结果相关的问题。

我们很难对我们党旨在坚决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在全面加强反帝斗争力量，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进行重新评价。

随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已特别明显地证明，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其中包括与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系的问题，无论他们有时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在解决的过程中存在多么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我们的党中央和政治局总是能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和深思熟虑，总是能够从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分析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进程及其趋势，总是能够对自己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的现实可能性作出清醒的估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效率。而正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下才决定性地确保了这次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功。

我党中央所采取的举措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本质，具有深远的国际主义意义并与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目标相适应。正是因此，我们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所有苏联军人与所有苏联人民一样都热烈地、发自内心地一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毫无疑问，现在正在进行的全会的决议也将会对之表示深刻的理解和赞同。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明确且论据充分地表述了我们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筹备工作期间所坚持的立场。其中不仅包括对当

代国际生活中各种复杂进程和现象所作的全面的马列主义分析，明确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而且还依据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清晰地制定了我们今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步骤。

这使我们不仅能够对我们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前景和力量部署等问题进行深刻地思考，而且可以在这场斗争中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适当的地位，并为落实党的政策承担自己应有的职责。莫斯科会议的工作过程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已成为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所引起的国际反响一样，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成果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战斗先锋队——苏共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已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斗争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当从会议的讲台上听到与会者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加强各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团结和给予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解放运动全面援助等方面的作用所作出的高度评价之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共产党员、非党派人士都为我们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的自豪。

会议成果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就我们党对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坚持的明确而毫不妥协的立场在国家武装力量全体人员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与全国人民一样，我们对此表示最热烈的拥护和一致的赞成。

国家武装力量和陆、海军的各军事委员会、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党和共青团组织将尽一切力量努力把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结论和此次全会的各项决议落实到实际。

同志们！目前所出现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分子们的军事图谋正在愈演愈烈，反对派们正在全面地积极展开活动。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疯狂的军事竞赛和策划反革命政变。

图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者，每年用于侵略目的的资金动辄近千亿美元，并在其他33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以侵略目的为指针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和援助。在近东，以色列侵略者在美国的帮助下试图摧毁各阿拉伯国家的先进制度，点燃新的战争之火。美国发动的针对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挑拨离间活动，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在这方面谋取自己的狭隘阶级目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指望自己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分裂以及利用世界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困难。

在帝国主义试图转入进攻，其中包括借助于武力的情况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加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将各自的国防力量联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式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如会议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华沙条约诸国的国防力量不仅是条约成员国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障，而且也符合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的利益，符合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利益。

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具有复杂的性质，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活动导致世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坚决地为争取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斗争。

苏联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对当前帝国主义战略和策略的危险性及其阴谋诡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后者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从企图采用直接的武装侵略到使用构思最为缜密的意识形态牵制活动，等等。国际上的反动派更广泛地利用机会主义的头脑发昏的社会残渣余孽们，如右倾和“左”倾集团来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知道机会主义不仅在“纯粹的”理论领域，而且还直接地对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一直在对全体陆、海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以使其充分认识到坚决与各种歪曲马列主义和背离革命理论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实现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通过教育我们要使他们明白，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要信仰这样一个真理，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赖以生存的共同阶级基础，他们拥有共同的改造社会的任务。不论是在个别国家里还是在国际范围内，这都是社会主义力量赢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必然就要求我们不折不扣地遵守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环节上所出现的事实和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忧虑。在一些党派的领导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忠诚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

际主义，打着为谋求“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独立、民族主权和平等各类幌子，可实际上却越来越背离阶级立场，滑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局限、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泥淖，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原则，蔑视各兄弟党在争取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斗争过程中所长期积累的经验。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在会议前夕及其进行过程中，意大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后者所持立场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极其痛心和愤怒，是因为他们已严重脱离了列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理解。不难看到，所有这些党派代表“深思熟虑的论断”，就是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与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争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反对一党“独霸”，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削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及其党内的纪律性；导致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表面化并四处泛滥，其中包括致使这些党派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利益，并在口号和行动上均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

更为遗憾的是，上述类似现象也存在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国家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无助于当代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看来，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破坏分子仍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保持更大的克制和耐心。而在这方面，刚刚召集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无疑曾经而且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自己得出了如下结论，即阶级敌人正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的暗中偷袭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的叛徒们、各类沙文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们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敌人是善于从事各种挑拨离间活动的。但更为危险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各类妥协主义分子、伪革命家和修正主义者在客观行动上已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并在实际上借此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其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共领导人所坚持的，脱离马列主义和与国际主义分裂的立场，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后果。尤其令人担心的还在于，毛主义者不单单要修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路线并将自己所谓的“特别方针”与之形成对立，而且还要公然展开反对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是极其激烈和尖锐的。

毛主义者在苏中边境地区赤裸裸地实施武装挑衅，这必然引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和不满。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反动集团却对此大加称赞。他们极力挑动苏中关系的激化，利用当前形势积极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并制造新的紧张策源地。

毛主义者们不论是在会议召集前夕，还是在会议工作进行过程中，都一直在企图挑起严重的边境冲突事件。

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应当从由于毛泽东集团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目前新形势中得出怎样的结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对我们国家东部边境所构成的实际威胁。

不断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挑衅，在所谓中共九大之后加紧歇斯底里的反苏活动，极力把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纳入同一类型，公开号召准备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进行一场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怀疑北京领导人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党要求我们作好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时刻准备反击毛主义者们更大规模的挑衅性举动。不过，正如会议所强调的那样，苏联完全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拥有坚强意志的苏联人民也是不会被任何叫嚣所吓倒的。任何人如果试图使用武力方式来与我们对话，必将遭到我们坚决的回击。

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与我们全国人民一样，都对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在巩固远东边防方面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持完全赞同态度。我们在完善边防和提高远东军区部队的战备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太平洋舰队保卫国家海疆的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后贝加尔军区时刻严阵以待。我们在土耳其斯坦地区也采取了严格的组织措施。

就在这两天，一些大规模的训练课目已经结束。其目的就是要制定出必要的举措，以成功解决我们南部和远东边境地区的防卫问题。在这些战术训练过程中，在参考了军事行动所在战场的各方面特点和具体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同时，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研究了在大规模作战情况下如何开展部队和集团军的动员，从事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和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

训练表明，我军战备和军事素养的不断增强，已能够满足当前军事的需要和有能力完成确保祖国安全的军事任务。尽管情况依然复杂，但

我们全体指战员仍在这种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战术训练任务且表现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我们的战士和军官都非常了解当前形势、共产主义思想并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坚定地说，在坚持搞好战备训练和时刻保持警惕性的同时，苏联军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履行自己巩固国防的爱国主义义务和职责。

在这方面，我们来自预备役的士兵和军官也有良好表现。这反映了党和苏维埃各机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训练使我们再次坚信一点，即我们在国防方面对苏联人民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训练工作产生了多么大的积极成果。现代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积极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共产党国际会议发言中，公正地强调了广泛开展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的问题。而与这些对劳动者思想产生着消极影响的思想作斗争，无疑是我们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极力阻碍历史的规律性进程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一直试图对我们的队伍实施思想渗透，腐化我们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破坏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由于自身精神准则的薄弱，他们便广泛采用了意识形态影响和精心设计的阴谋诡计等各种手段。而我们的军事历史领域、国家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武装力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准备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即将来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5周年纪念日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在篡改历史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关于他们所编写的这段历史的全部内容的阶级意义，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基于这样一种最起码的认识，即承认苏联在摧毁法西斯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促使年轻一代对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产生疑虑，从而削弱苏联国家对世界性事件发展进程的影响力。他们的上述如意算盘无疑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我们这方面对于敌视性宣传的影响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估计不足。如果我们不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这些敌视性宣传便会对我们中的一些不成熟人群，其中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人在内，造成消极危害。虽然我们在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等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事实上这种敌视性思想的影响

仍然在我们中间有所反映。

如今在举国上下正越来越广泛地筹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我们更应当关心我们整个宣传工作、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和艺术创作的思想性、方向性、纯洁性和战斗性，从而确保我们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这一任务具有全国意义，要求我们以全部的责任感和极其严肃的党的原则性来对待它，从而使任何敌视我们的阴谋诡计都没有可乘之机。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中央全会报告如下内容，即苏联武装力量全体指战员完全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所肩负的重大负责，而这与国际形势的尖锐以及毛主义者所进行的反苏主义和冒险主义活动的不断加剧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军队将尽一切可能来巩固我们军事力量的强大。

现在，在各部队和舰艇上都在进行紧张的战备训练。鉴于准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我们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对加强国防事业的不断关怀，国家为进一步完善军队的作战技术、强化军队纪律和秩序、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而创造的各方面良好条件，等等，从而激起了我军广大士兵、水兵、军士、尉官、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等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度的政治积极性。

在为纪念列宁诞辰而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过程中，我军陆、海军中都在战备和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涌现出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时期的英雄的优秀分子，与此同时先进连队、部队和舰艇的数量也在增加。

请允许我以苏联军人，陆、海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作出如下保证：苏联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地有效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边境，无论威胁来自何方，我们都随时准备予以坚决的回击。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下面发言的是B.C.托尔斯季科夫同志——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们！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全体劳动者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进程。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代表团在召集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克服了多少大的困难，在编制会议主要文件方面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当时，政治局曾面临着一个最复杂的任务——从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着手，对现实生活本身向我们提出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做出恰当的分析，举行坦诚的对话，反对那些由于故意或缺乏理智而以响亮的语句粉饰自己的民族主义错误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和头脑不清者，反对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与那些在关于如何以辩证唯物方式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特殊和统一相互比例关系的问题上已完全丧失了具体概念的人们作斗争。

会议成果鼓舞并使所有苏联人民感到高兴，使他们充满了对我们党的自豪感。它们也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使共产党员们掌握了强大的理论和宣传武器，并以共同的目标为反帝战线的战士们确定了统一的战斗立场。

请允许我以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名义对整个会议工作的成果以及苏共代表团团长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明确的我们党的立场表达最热烈的赞同。

通过学习会议资料，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一点，即列宁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的伟大和巨大。

列宁的遗训及其学说——他毕业所追求的事业——不仅没有丧失自身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在此次国际会议工作和文件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这次全会报告中所完全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党组织都面临一个任务，即深入学习会议所有文件，学习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关于改善党的政策通报的决议已经收到应有的成效。精练而客观地报道会议进程使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都能够对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立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再次坚信苏共总路线的正确性。我们的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些天里已变得更加灵活、富有创造性，更讲究效率。

如今，我们州党委已制定并开始实施关于深入学习和解释莫斯科会议资料的实际工作计划。

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宣传干部、讲师和政治通信员的培养方

面。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首先必须面对并答复劳动者们提出的大量问题，向群众解释阶级斗争和与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相关的许多复杂问题。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国际会议发言中所发出的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此类发言并不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会议中已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广大共产党员都要求团结，倾向于国际主义。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向我们的人民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意大利代表别尔林古埃利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关于“国际主义危机”的话是从何而来的；而一些党派的代表们又为何要试图使毛集团以及“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避免遭到会议的严厉批判，其这样做的本质何在，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第一个搞清楚了这种病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精确地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它们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是民族主义。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更准确地说就是其领导人，堕入机会主义泥淖的事实本身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

会议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在最广泛且多种多样的革命斗争中出现，并往往被掩饰的堕落的客观原因，即它们的滋生时常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胜利进程相伴。事实上，在当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融入了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农民、大学生、革命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等阶层的代表。所有这些数量众多的人群都会对共产主义运动施加影响。作为一些党派的新加入成分，一旦该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效率低下，这些人便必然会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发生动摇，滋生犹豫不定、怀疑、立场不坚定、政治近视等不良情绪。他们时而一厢情愿地极其热衷于议会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此同时却对包括革命斗争在内的其他斗争方式估计不足或甚至抱以轻视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共产党及其“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还有其他一些党派的领导人，如意大利共产党，这些人也钟情于议会斗争方式并大力宣传反对资本家政府的改良主义斗争道路。

每当涉及这方面的话题时，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19年3月末就第三共产国际问题所作的讲话，他说：“……多数党派的工人领袖们已习惯了和平时期，从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活动的能力。”

当然，他的这些话当时是针对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派领袖们而言的。但是，事实上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存在着某种类似：都处于和平状态、（领袖们）都钟情于已习惯了的、不危险的斗争方式——所有这一切便滋生了温情脉脉、无忧无虑、庸俗市侩的感伤主义情绪。

我们的共产党员们，对一些党派遵循社会主义的和平斗争方式的正确性问题，一直存在许多疑虑。由此可见，我们的科研干部和共产主义运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分析所积累的经验，以便能够把这一问题说清楚，并进而以此来帮助其他兄弟党的共产党员们。

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我不得不经常了解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那么，我们能从他们——如挪威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得出一条怎么样的结论呢，该党领导人非常热衷于研究全球性问题，而忽视内部问题。其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该国共产党逐渐停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从而丧失了自身在本国劳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

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这样一个思想，即必须创造性地研究会议提出的所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兄弟党的联系，从而增强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

我们——各级党委所面临的任务是：系统地组织深入而广泛研究莫斯科会议资料，研究我们党就国际和内部，尤其是青年问题所作出的所有最重大决议。

这里，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关于青年问题的决议？因为首先，青年们没有生活经验、不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是资产阶级宣传的主要对象，并非总是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和国际政治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

如今，我们已拥有了成规模的政治教育体系，它既拥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明确的教学进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连续性。不过，该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无法对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进行充分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看来，我们现在应当在不影响现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再补充一些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的课程。在学习我们党的文件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利用其他一些学习方

式。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要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际部制定并向各级党组织下发相应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这将使我们的政治教育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对当前所发生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并将这些事件创造性地和学习党的基本纲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高校、技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高级中学中也开展类似的工作。我们也可能把这一想法落实大学生升学考试和中学生的一般性考查当中，其内容会涉及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党的主要文件以及国内、外最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学教研室以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大学教师们更加关注这些文件，并从苏共中央近期的一系列全会要求出发更有力地加强针对青年的整个思想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全会报告中相当公正地指出，会议再次证明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是多么迅速、多少坚定地增长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得到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机会并有幸亲眼看到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旗帜如何重新被高高举起。而这一切均得益于苏共中央在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内——所采取的坚定、讲究原则和始终不渝的路线。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我们的帮助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扶持，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健康力量和捷共才重新以自己的力量恢复了国家的秩序。

我们针对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罗马尼亚人和一些其他与会者试图使执行冒险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路线的北京分裂主义者们免遭会议的批判，但他们均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谴责。这再次证明苏共立场的正确性，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熟性。

我们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和平解决(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争议性问题和加强我们远东边境地区的国防而采取的举措。在不激化矛盾的同时，我们应当继续揭露毛集团，全力促使中国人民返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同志们！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激励我

们继续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赢取新的更大胜利。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我们将全力发展经济和完善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应当向中央全会宣布，列宁格勒工业企业明天将完成自己的上半年生产计划。

共产党国际会议为我们转向第二阶段——共产党和工人党思想上的团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列宁格勒人与全党一道，在列宁主义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准备尽一切可能以争取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同志们，讨论到此结束。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拒绝作总结性发言。

与通常的做法一样，下面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由政治局制定的(决议)草案已分发给了全会的全体成员。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完了没有？

表决：是的。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有人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请大家表决吧。赞成将所分发草案作为决议文本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体通过。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意见吗？那么，(该草案)就可能是全体通过，责成中央政治局最后(对草案)进行编辑。

表决：正确。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那么，)决议通过。

表决：(决议)将于明天公开见报。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建议明天(将决议)公开见报。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全会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在会议日程之外，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有些话要说。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对我们所有人，中央委员、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以及区委——这里所有的与会者都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以应有的方式，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资料来武装我们党、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国家全体劳动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的人民如此关心会议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把从事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看作自己的首要职责。政治局已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如下决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都有几天时间可以下到基层，以便亲自与当地的积极分子们见面。我们准备这样做：从星期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及其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将按照事先的约定前往国家各地区并就莫斯科会议成果问题作相关报告。

明天将举行莫斯科市和州(一起)的积极分子会议，其间我将作报告。这将作为我们广泛工作的开始。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基层党组织，然后再落实到工人和公务员会议。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建议的是，在今天全会闭幕之后，我们这里所有到会的，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边疆区委书记和边疆区执委会主席等，最好能再留下一下，以便主要就农业状况相关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当然，有一些问题仍需要在作了相应准备后才能够作出决定，就是说，应首先由国家上层来决断，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来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让我们(这里多数同志都是最高苏维埃代表，而那些目前仍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我们届时将向其发出邀请)开个会，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粮食收割的准备工作问题。

我们开会期间，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畜牧业生产和此类经济产品在国内的供应情况。近期，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而造成这些困

难的原因可以从如下方面来探寻：我们的计划数据有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地方上相关部门检查力度不够和歪曲事实以及个别部门牲畜大量损失，等等。集体农庄社员的劳动报酬转为有保障的支付，也导致该部门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里所出现的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充分考虑到。当然在这方面，还存在其他一系列原因，而关于此我们将在会议上作细致的交流。

因此，我们请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州党委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边疆区执委和州执委主席、各土地机关，以及所有与此相关同志，就所有这一系列问题认真准备并将进行严肃讨论。不应认为这次会议只是作作发言而已，而是要让同志们在进行了深刻思考后再对我们在这一部门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提出建议，而关于这些举措，显然我们能想出的一定不会少。我们一定会纠正所存在的问题，我对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

不过，我想现在预先声明的是：我们有一些同志表现出这样一些情绪，即所有事情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而1970年畜牧业的生产情况将会更糟糕。对于这种情绪，我敢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言论。作为共产党员，是怎么都不应当说这样的话的。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手段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

你们可以只列出这样一些数据：一年我们能繁殖多少畜仔，有多少能够存活，又有多少可以出栏(以生猪业为例)。假如我们每年生猪的出栏率即使只有50%—60%，那么我们的生猪供应情况就会比我们1至1年半以前所估计的情况要好，甚至还会好得多。因此我们绝不当再发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牢骚话。我们家禽业的情况与此类似——而这一经营行业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议上一定有实实在在的话题可以说。

我们目前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无法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供应，我们的政策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可能将我们的现行政策与实际中的失误混为一谈。我认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遗憾的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错误。我们应当对这方面问题给予关注。

总之，我们决定今天暂不举行关于农业问题的会议，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我们将再邀请你们，以便就这些问题来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此次中央全会便宣布闭幕了。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所通过的决议

(1969年6月28日)

在倾听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于1969年6月5—17日期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工作。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共产党、工人党和整个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会议将对世界上所有民主、进步力量在最广泛团结行动的基础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议标志着以马列主义诸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有如此多与会者参加的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充分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意识到自己对我们的与人类未来紧密联系的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整个过程也反映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急切要求加强团结和统一的倾向，因为大家都知道，各个党派的利益是与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密不可分的。上述倾向的发展和加强均得益于我们在会议筹备和举办过程中采用了如下一些工作方式：以广泛、公开、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合作态度自由、民主地讨论问题和集体式地制定文件，等等。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反映了加强反帝斗争、争取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实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各项任务。

会议文件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的意义最为重大。该文件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世界发展的主要路线依然是由革命、社会主义、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诸力量决定的。文件为所有反帝斗争在新的、更高水

平上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步伐一致在实际组织方面指明了方向。

文件内容把对世界发展、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本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的马列主义分析与统一行动的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紧密结合起来。这使我们把当代三股主要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团结起来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会议再次确认，社会主义体系是全世界反帝革命运动的成果。新世界在与旧世界的对决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主义体系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并继续不断取得成就，取决于执政党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新社会制度中所拥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由此也就相应地向我们提出了如下要求，在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的同时，也要关心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关心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

会议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事业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发展兄弟式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会议竭力宣称，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强调工人阶级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其是我们运动和可以动员的主要力量。会议指出，劳动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参加革命的巨大可能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民主和反帝运动的意义，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长。

会议尤其强调，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帝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与其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斗争和为赢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本国的胜利而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都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通过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具有重大的意义。该文件确认了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并强调了自身普遍的国际主义意义。文件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基础。致辞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纪念列宁诞辰为契机广泛宣传列宁主义思想，加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苏共中央全会也指出了其他会议文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会议通

过的“争取越南独立、自由与和平”的呼吁书向世界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战斗团结，及其今后将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决心。

“保卫和平的呼吁书”继承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帝战斗传统。该文件就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表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性立场。该立场旨在团结广大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以投入到防止世界核战争的斗争之中。

全会对会议文件和与会者发言都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全力支援那些坚持反帝斗争、为争取自身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确保和平和国家安全、防止热核战争，遵守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给予广泛支持的情况感到满意。

会议肯定了党的克服已有分歧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马列主义路线的正确性。该路线所追求的目标——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全面拓展各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总结党的理论工作，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会议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即坚持不懈地为纯洁马列主义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巩固共产党队伍、共产党国际主义团结和加强共产党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先锋模范作用的必要条件。

苏共中央指出，会议期间广泛的意见交流坚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的现行外交方针及其分裂政策遭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坚决反击。

全会一致赞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议发言中所表述的立场。苏共将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反列宁主义思想、分裂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方针作毫不妥协地斗争，并会竭尽全力保卫苏联人民的利益和击退任何蓄意侵犯。与此同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角度出发，苏共今后将会继续极力维护和支持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感情，而中国人民心中无疑也会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怀有同样的情感。

全会指出，苏联广大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表达了自己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结成国际主义团结的意愿，完全支持我们党的政策。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再次显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在自身的发

展中仍存在一些困难，但它依然是整个反帝斗争力量的战斗先锋，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内容，具体如下：

1.批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联合行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给予越南独立、民主与和平”的呼吁书》、《捍卫和平倡议书》。

2.遵照会议成果，继续坚持苏共的一贯路线：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各方面全力发展与各共产党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右倾、“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纯洁马列主义学说而斗争。

3.苏共中央全会赞成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在各反帝力量的共同斗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友好团结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都将是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企图，维护和平，捍卫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诸原则以及支持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手段(真正工具)。

4.鉴于，经济成就、科技成就和巩固国防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和革命进程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全会特别提请苏联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一定要保证完成国家五年计划和任务，争取在科技、文化和艺术各领域的新胜利；集体企业、建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要集中力量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尽快实现生产能力的转化和更好利用以及现有资源储备向生产领域的投入。

5.与会议成果相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开展关于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文件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讲座等各种宣传手段。

6.中央全会肯定了苏共的路线，即坚定不移地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以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与所有为了本国的社会和民族解放、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兄弟互助和团结的精神，来培养教育我们的人民，从而激发人民对自己的党和国家的自豪感、时刻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繁荣而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并深刻认识到苏联共

产主义建设的国际主义意义——所有这些，作为有觉悟的苏联公民在现代条件下应具备的特征，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7.由会议成果中可以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而其中之一便是要大力发展科研工作，具体包括：从理论高度深刻总结当代诸问题，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特点；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最重大理论问题，以及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反帝斗争；并以此为目的广泛而经常地举办国际理论会议和讲座。

8.应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民族区、市和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并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学习会议资料。

鉴于苏联在建设新社会过程中所取得各项胜利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号召所有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以更加积极的忘我精神投入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蓝图的斗争之中，从而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

РГАНИ, ф.2, оп.3, д.161, л.3-20об

[1] 参见以下文件№20776。——编注

[2] 此处在校订贺词时删去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您的多次讲话——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性，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РГАНИ, ф.3, оп.16, д.539, л.59)。——原注

[3] 1963年7月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关于计划讨论两党关系问题的会谈，但是最终北京和莫斯科交换的《公开信》，双方口气异常尖锐，导致谈判失败。经过两周后的相互指责，7月20日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双方对此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谈判中断。此后，双方在党的路线方面没有再重新恢复谈判。——编注

[4] 这里所谈的是苏联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Л.Б.约翰逊和美国国务卿Д.腊斯克的谈判的背景即是在越南的军事冲突在扩大。给自己亲近的同盟者通报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实践是苏联共产党政府的一个政治特点，这是从1950年后半期开始的。从1963年开始，莫斯科把北京从得到上述情报的名单中剔除。——原注

[5] 记录是由领导苏共中央总务部的В.Н.马林整理。——原注

[6] 所指的是苏联代表团出席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原注

[7] 括号内的文字均为俄国公布该档案时编辑所加。下同——编注

[8] 苏联代表团去越南两个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经济的积极民主化和在军事冲突扩大以及美国积极参与其中的条件下支持河内的局部战争，改善党际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劳动共产党这些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问题都一直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6—10日访问越南，同时去河内的途中和返回途中的2月5—6日和10—11日在北京做了停留。柯西金A.H.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却无果而终。——原注

[9] 这里所谈的是1961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讨论的苏阿关系问题的H.C.赫鲁晓夫的决议。这个事实是H.C.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而遭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其“党内”代表大会上的尖锐的公开的批评，这引起了多数共产党的抗议，并建议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1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 档案以上内容未公布。——原注

[12] 原文如此。根据1961年6月19日中苏协定，苏联援建中国的企业和其他项目共66个。——编注

[1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4]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5] 所收集的文件系俄国档案的英译本，这里的人名标示为Jian Chen-yu，不知何人。很可能是英文翻译时出现了拼写错误。——编注

[1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9]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北京时间1965年3月23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译注

[20] 原文如此。梅夏采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编注

[2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2]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2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6] C.Г.拉宾，1965—1967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27] 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28] 吴丹，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29] Ф.В.莫丘利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使馆顾问。——编注

[30] 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经济学家。——编注

[3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2] 该档案摘录时漏掉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3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3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3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8]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注。——编注

[39] 此处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1] 中国宣布自1965年6月1日起取消军衔。——编注

[4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44] 此处列出约48个亚非国家首都，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45] 括弧内的文字被手写划掉。——译注

[4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7] 以上四点为档案摘抄者的归纳。——编注

[4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1] 此处档案原文复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2] 此处有4个手写签名，但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3] M.B.扎哈罗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编注

[54]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58] 1964年5月在火奴鲁鲁(夏威夷岛)举行了美国高级将领关于南越形势的会
议。——原注

[5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括号
内的文字是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60] 原文如此。看内容这似乎应该是“使越南……”。——编注

[6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62]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注

[63] 下划线为原文所有。——编注

[6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6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66] 该文件是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在俄国档案馆工作
时手抄的，后以英文发表(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No.4)，其中部分内容威瑟斯比在抄写时省略了，但做了简要说明，并用方括号加以标
示。该文件译自英文。——编注

[67] 原文如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对苏联新领导人提出的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感到惊讶，并认为这样的突然“转弯”令中国很难接受。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转交苏共领导人建议接受美国条件、准备停战的信函。经商议，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苏联的意见(参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编注

[6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1]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西方”，这里指阿拉伯西部地区。——编注

[72]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3]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5]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7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9]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1] 原文如此，显然应是二十三大。——编注

[8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4]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5]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6] 原文如此。包尔汉长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但未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注

[87] 在这两行文字旁有打印的文字：不在报纸上发表。——编注

[88] 原文如此。——编注

[89]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9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3]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4]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7] 所收集的档案以上缺页。——编注

[9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3]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4] 原文如此。——编注

[105] 该档案是一份单独文件，未发现其主件，但显然与№25976文件所述事件有

关，故作为附件安置于此，以便读者了解难民问题的结果。——编注

[10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0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0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0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1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1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1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113]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4]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5]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6]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7]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8] 这段话旁有一行打印文字：“不发表”。——编注

[11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编注

[120]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21] 春水，越南出席巴黎谈判代表团团长。

[122] 陈宝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

[123] 查不到该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这里是音译，可能是内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编注

[124]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25]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126]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7]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128]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9] 库兹涅佐夫带领苏联代表团参加了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总统同苏联代表团在1969年3月31日举行了会谈。——原注

[13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3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32] 霍尔，美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133] 阿里斯门迪，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编注

第十二卷（1969.7-1991.12）

1969年

№01841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7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17份

致K.B.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7月19日9时

第167号

中国

目前在中国唯一的生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铀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

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峻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

..... [\[1\]](#)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近一个月来，在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加强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国内形势仍然很复杂。右派势力、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在竭力不让新的领导得到巩固。在卫戍部队和居民点中散发传单和传播挑拨性的谣言说，政府在“领导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在执行废除私有制和消灭伊斯兰宗教的政策。居民被号召进行武装抵抗。亲英情绪的人或者支持沙阿比的军官，在6月事件的转变关头，没有冒险去反对新政府对国家的领导，他们大规模地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部族去进行教唆性的活动。目前已有150多名军官擅自离职。中国在亚丁

的一些人士企图在一部分居民中组织“与中国友好团结”的游行示威活动，想以此在苏联与南也门的关系上给人们造成警惕心理。

在亚丁的外交界人士中有人认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在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时，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新领导人最近就想向这些国家提出请求。

巴基斯坦、中国

从今年7月12日到17日，空军元帅努尔汗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曾试图证明说，巴基斯坦参加旨在反对中国任何形式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合作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他们承诺将很好地研究巴基斯坦人要求拨款在塔克西拉和达卡建设军事工业项目以及供给预备部队和某些类型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根据拉瓦尔品第政治界人士的评价，巴基斯坦政府在派努尔汗去访问北京后，国家对外方针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巴基斯坦人仍然打算执行“保持平衡”政策来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双边关系。

越南

1.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西贡行政当局内部的分歧明显地加剧了。民族议会下议院要求陈文香政府辞职。资本输出增加，侨居国外的大企业家和官僚们的人数也增多。从越南南方军队中逃跑的逃兵在增多。西贡的政界认为，阮文绍总统不能稳定国内形势。

西贡行政当局在采取紧急措施来巩固其阵地，对反对派加强镇压手段，进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贡的美国人士担心新的政府会发生危机，将会促使提高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威望。

2.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为供养美国战俘的开支的增长而感到忧虑。粮食和医疗保证的问题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据来自河内的资料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准备在最近与美国方面重新讨论关于交换战俘问题。

中国、日本

中国领导人继续支持与日本进行经济贸易的交流，这种交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商品总额中占第一位。1968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数量

估计为3.26亿美元。这段时期内从日本进口的主要货物是：钢100万吨、铜4400吨、锌5000吨、铝约1000吨、矿物肥料1800万吨以及机器和工业设备数额约3300万美元。中国供应的主要项目是：煤27万吨、铁矿6.9万吨和生铁3.1万吨。根据贸易协议两国间的商品贸易额到1969年计划总数约为6亿美元，这超过了1968年水平的9%。

美国

在美国军事工业集团人士中表现出焦急不安的情绪，因为即将举行的苏美两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会导致废止许多大的军事合同。据这些集团的人士估计，在签订苏美协议的情况下，航空火箭和无线电子工业将要损失总数不少于160亿美元的订货，这些订货是近几年来由美国国防部规划的。也可以看出，在未来的10年中，取消对加工比较精良的战略武器类型的订货将会导致这些工业部门损失达1000亿美元。

“阿波罗11号”起飞

在今年7月18日期限内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基本上按预定的计划继续飞向月球。计划中的第三次校正方向没有进行。在23时43分，规定时间前1小时，宇航员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从指挥舱出来走向月球座舱，在这里检查各种仪器装置和生活保证系统。

今年7月19日5时30分，“阿波罗11号”飞船停留在距离地球约34.3万公里的地方，运动速度每小时为3308公里。

П.伊万舒金

1969年7月19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3页

№1040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 抵制中国的宣传(1969年8月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8月6日会议第76/77r号

第77项 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一、责成《真理报》编辑部撰写并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发表编辑

部文章，新闻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就毛分子对苏蒙关系进行诽谤性宣传撰写系列文章，并准备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

二、责成《真理报》、《消息报》和《在国外》杂志编辑部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系统地转载蒙古报刊揭露中国领导人诽谤苏蒙关系的材料。新闻社保证在国外传播这些材料。

三、责成《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应蒙古朋友的请求，定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在国际问题方面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评论员，期限2—3周，帮助蒙古新闻记者提高专业水平。

四、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年互派从事中国问题的两国新闻记者1—2名分别在苏联无线电台和蒙古无线电台进行实习；

——以相互的方式，向蒙古有关组织提供从中国无线电台截获的涉及蒙古问题的资料以及涉及当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材料；

——为了协调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宣传活动，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月交换一次关于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对中国广播的主要信息情报。

——为保证有效地交换信息材料，同苏联邮电部一起进行关于在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之间建立直接电传联系的谈判。

五、责成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蒙古朋友通报所采取的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组织合作以抵抗中国的宣传的措施。在会谈时表示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在蒙古和苏联报刊上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具体事实说明苏蒙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对于毛分子的诽谤中伤给予具体的反击。

ЦХСД, ф.4, оп.19, д.545, л.58

№11882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8月15日)

致K.B.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8月15日9时

第190号

中国

今年8月14日期间，同苏联和蒙古接壤地区的中国军队，其战斗成员、部署和行动性质，均未发现有重大变化。

捷克斯洛伐克

1.党和国家机关基本上在执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7月24日关于纪念8月事件1周年的决定。但是拟定的措施几乎完全没有按照民族阵线和工会的路线去实现。军队、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心在8月的日子里采取坚决措施来对付破坏秩序的人和挑拨者。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要求，希望他们的严厉行动都应是为党和政府领导完全明确核准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其原因是，在国内不顾提出警告，还是继续散发反党反苏的传单，也发生公开的挑衅，或是破坏行为。

最近几天，姆拉达·博利斯拉夫市汽车制造厂发生火灾时，市内的供水也遭到破坏，而且对苏军司令部的提供帮助的建议，地方当局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清除阻塞期间，把苏联商品换装到提索河上的契梅尔纳的过程中，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两辆火车相撞的事件，铁路运输中断。

从8月8日夜到9日在布拉格地区，1945年牺牲的苏军战士墓上的石板被用200克梯恩梯的炸药块所炸毁。向载有苏联旅游者的公共汽车投掷螺母，玻璃被砸得粉碎。当在一家捷克人的企业里安装玻璃时，聚集起来耍流氓行为的一群人不让进行维修。

8月12日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斯基广场上，在周围贴满传单的地方聚集了人群，其中有外国的采访记者。当某些捷克公民向站在旁边的安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出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群人时，他回答说，他“没有接到处理这种事的有关指示”。在“阿列特玛”工厂到处散布

反党反苏的传单(“可耻日”、“拥护克里格尔的发言”)。这些手段得到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部分青年和管理处的支持。在分子化学研究所的工会布告栏上贴着支持克里格尔的信件，表示不同意苏联军队驻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会的材料和文章。

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党支部反对捷共5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将近14%的共产党员退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很多党员不交纳党费。在固体材料物理研究所和其他某些科学研究所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2.今年8月13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捷共党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报告。他比较具体地和明确地对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给予了定性，指出他们(右派)的行为给社会所带来的整个危害。

胡萨克强调了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出，去年8月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党没有把这些力量动员起来。胡萨克说，面临的这些天是相应一次检查，检查中将查明，谁真正在从事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活动，谁在迷失方向并成了骗局的牺牲品。

胡萨克声明说，党的耐心已到极限，它将进行最坚决的和无情的斗争来对付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

..... [2]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领导人懂得，如果它执行旨在与中国相接近的政策，就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那些数量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而这些数量对装备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是必需的。因此，目前正在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西巴基斯坦省长向伊朗国王递交了叶海亚·汗的一份请求，希望国王在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过程中，请求尼克松卖给巴基斯坦一定数量的航空和坦克装甲的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幻影”飞机和一些坦克。巴基斯坦省长向国王保证说，为了回报这种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准备在今后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政策。

越南民主共和国、泰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力图加强其对泰国共产党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间举行了关于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发展泰国起义者运动中给予帮助的会谈。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同意向泰国派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以便就地研究形势并制订计划在泰国开展游击斗争。为了与泰国游击队的力量协同行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派送越南的军事专家和地面部队分队，总数量共约7000人。同时将向泰国的爱国主义力量援助粮食、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双方达成协议到1969年底扩大爱国主义力量数量达2万—2.5万人，拟于1970年5月开始展开战斗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发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函，信中中国人表示支持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坚持必须用战争的方法取得胜利，可以看出，从越南劳动党方面没有一贯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因此，信中“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包括呼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团结一致，因此，建议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与越南劳动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一起举行会谈，目的是为召开国际会议作准备。信中呼吁越南劳动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方针，原因是在其执行中，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范文同和长征与林彪进行了会晤。在三次谈话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指责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说，他们在支持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越南代表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对越南的有效帮助未能成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对1969年的援助协议，半年里中国人仅完成31.4%。中国人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对越南南方爱国主义力量的援助变得复杂化了。

..... [3]

П.伊万舒金

1969年8月15日

РГАНИ, ф.89, оп.54, д.19, л.1-7

No11883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9月1日)

绝密

文本第16份

致K.B.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9月1日9时

第204号

中国

1.根据美国专家的估计，尽管毛泽东集团企图整顿国内秩序，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最近时期以来明显地尖锐化了。可以看出，在许多省各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武斗的性质。其中今年8月，一些大规模的反毛主义的行动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发生了动用武器的事情。工人及军事人员更多地参加了反政府的行动，这一事实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不安。

2.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府打算在西欧国家购买一些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的种类。这引起了意大利的垄断组织的浓厚兴趣，这些组织要求政府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国家银行“意大利信贷”同意意大利向中国出口载重汽车和化工企业设备的很多商行提供贷款。

3.日本政界倡议于1969年底召开会议来讨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问题。预计，除日本外，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会议。

..... [\[4\]](#)

越南

1.今年8月30和31日，美国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与老挝毗邻的边境地区和南部的目标进行了空中侦察，两昼夜中进行了60架次以上的侦察。

在越南南方境内双方陆地上的部队大规模的战役没有进行。人民解

放武装力量小股部队同美国及西贡部队小分队之间的部分冲突主要发生在岷港以南50公里的中部沿岸一带，波来古以西地区(中部高原)以及在湄公河三角洲。

为了打击爱国主义力量的目标和决定其他的战斗任务，B52战略轰炸机在过去的两昼夜中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战术的和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出动了800多架次。

2.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对提高南越军队的战斗力和用必要的武器装备它继续给予高度重视。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访问南越之后不久，今年8月20日至28日美国国防部长里索来到西贡。据他估计，把进行地面战役的重心转移给南越部队可视为满意的。但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成立参谋部，培养技术熟练的军官和军士骨干和建立有效率的系统从物质上和技术上保证对南越武装力量的供给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П.伊万舒金

1969年9月1日

РГАНИ, ф.89, оп.54, д.18, л.1-7

№25457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5] (1969年9月11日)

对苏中关系现状感到担心的苏联领导人曾坚定不移地探索改善苏中关系的途径。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进行高级会晤、协调边界问题等项建议，但中国方面对我们的所有建议都置若罔闻。

1969年9月初，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也在那里，就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在河内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柯西金就起飞回国。在9月10日夜间，我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并被告知，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见。我们迅即将此事通知中央，而柯西金尚未飞抵莫斯科，就从塔什干飞往北京。9月11日在中国机场大楼举行了两国总理会晤。我出席了这次会晤。

中方出席这次会晤的，除了周恩来，还有他的两位副手李先念和谢富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

长余湛。

谈话是在善意的气氛中开始的。柯西金指出，双方积累了这么多要讨论的问题，而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需要不少的时间。柯西金强调指出，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势力都在不遗余力地促使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并把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点上。因此，苏中相互关系问题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于是我们想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同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还记得，柯西金接着说，我曾想在电话里同您谈谈，可当时你们说，问题应当通过外交渠道研究。我们苏联觉得，应当找到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这无论对我们两国人民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利害关系。因此我想同您，周恩来同志，就一些最近切的问题交换意见。柯西金请周恩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弄清那个时期苏中关系处于什么阶段和应当如何解决所积累的全部问题。

周恩来同意柯西金对中苏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声称：我们应当力求中苏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从而不给帝国主义因中苏关系紧张而兴高采烈的机会。他声称，中心的问题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还早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形成的，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当然很好。在边界上发生的冲突，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才发生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停止边界上的武装冲突，双方军队都必须撤出争议地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正在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我们在国外没有任何军队，并且我们也不希望在国外驻扎军队。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紧张状态。美国开动整个宣传机器，意在使我们两国发生冲突。苏联在远东、在哈萨克斯坦都集结了军队。你们的飞机在那里飞行，那里有我们的飞机。我们没有主动搞边界式的冲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挑起冲突。我们试验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并且我们已经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周恩来继续说，正在流传着有可能对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传说。我们不希望事态如此发展并建议召开会议，以便禁止这种武器。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通过谈判、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并且我想能够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周恩来再次强调，应当使争议地区摆脱双方军队在那里的存在。苏联方面说，在新疆，边界的走向是向东，而我们说是向西，于是就形成了争议地区。像我们所建议的那种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是能够找到的。应当解决

这些问题，缓和我们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情况，从而不给帝国主义为紧张局势的加剧而兴高采烈之机。苏联方面，周恩来继续说，7月26日给我们发来了同级会晤的信件。这项建议是在我们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提出的，因此我们没有采纳你们的建议。我们不能同意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转移至国家关系方面。关于在新疆的冲突，我们认为，发生武装冲突的那个地区在我们一边，而你们却认为是在自己那边并在那里打死了我们20名战士。中国没有任何要把你们的军队赶出这些地区的意图，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但是，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的那些有争议的岛屿是我们的，并且我们的人历来都在这些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

仔细听完了对话人的话之后，柯西金同意此时把边界问题放在首位加以讨论。针对周恩来的关于中国任何人都不希望战争的议论，柯西金宣称：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任何一份文件中都没有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告诉人民：勒紧腰带，准备打仗！而是相反，总是讲要和平。我们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有许多事情，因此，要发动战争就是冒险主义。当然，谁也不相信中国人在准备战争。

如果您在今天还要让我相信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苏联同样有许多问题，因此在我们这里任何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我想，柯西金接着说，中国很清楚，苏联没有准备战争，但在相互关系中紧张状态是存在的。接着，柯西金同意周恩来关于在中苏间现存的边界问题上，既没有苏联人民的过错，也没有中国人民的过错的议论，说道：如果我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又回到500年前，即使是100年前的事情上来，那就会乱套了，因而赞同周恩来的研究边界问题要从现存状况出发的态度。

苏联总理在强调了双方都有足够的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之后说，除了经验，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愿望。苏联既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愿望，也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意向，如果中方也有相同的见解，那么就应当组成权威性的代表团就要谈判的问题达成协议，在哪儿开始这些谈判，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对我们反正都一样。

如果我们和你们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我要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他接着说，你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就可以为进行边界谈判委派双方的高级政府代表团。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

而转向其他问题。咱们以你们同意谈判并委派代表团来结束会谈。我们不会耽搁答复你们的时间，当然是要给你们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发生任何边界冲突。我们互为这类冲突的坚定的对手，这种情况只能使仇者快。柯西金说，我请您把这一点告诉毛泽东同志。

周恩来宣称：理论之争是对马列主义原则问题的争论。在党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有严重分歧。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继续哪怕一万年，但这种争论不应当使国家关系受损失。柯西金打断周恩来的话，宣称，如果我们被卷入理论问题的争论并互相扣帽子，那光干这个3个月也不够。我想利用这次会晤有效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周恩来开始谈相互关系的各种客观因素，重新回到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上来，宣称报告侮辱了中国。柯西金不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报告侮辱了中国的说法，争论激烈，他声称，这并非侮辱。

可是，周恩来继续说，我们可以争论到晚上，因为我们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要比我们对苏联的攻击多。柯西金又重复一遍：您，周恩来同志，想激我进行争论，因为我不能对您的任何一句话避而不答。我们在失去我们不多的时间。

我们知道，周恩来继续说，苏联人民不想战争，并且把话题又转到边界上有大量的苏联军队上来，声称：苏联空军要比中国空军强大得多，又说，为了防御，中国方面曾不得不进行某些动员。至于边界，这是历史。我们有边界条约，并且我们两国人民都不对这些条约负责。我们并不要求废除这些条约，应当考虑这些条约，也要考虑在边界上已经形成的现状。有争议的地区，有的地区有苏联居民，而有的地区有中国居民，所有这些情况都应当考虑。一俟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人们就签订新的条约，但这需要时间。接着，他简单扼要地谈了几条原则，他认为应当以这几条原则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

- 1.维持边界现状；

- 2.避免武装冲突；

- 3.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并从那里撤出双方军队；零接触，使之避免面对面的对峙。

柯西金问：怎么能确定争议地区的存在？中国方面所说的有争议地区指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回答说：应当根据谁在那里居住来确定争议地区，于是拿起铅笔和纸，想画个地图表示出中国方面所说的争议地区指的是什么。柯西金止住周恩来的话，声称：确定这一点不是两国总理的事情。如果我要拿起铅笔，那么铅笔就会画到中国那边去，而您的铅笔就会画到苏联这边来，因此我们还是建议解决开始谈判的原则问题。我们两国之间有条约，并且应当研究这些条约。应当首先就谈判代表团人员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代表团应当由详细了解情况的人组成，他们携带地图及其他文件认真地研究问题并提出建议。至于撤走军队，苏联方面不能这么做，因为在我们这些地区住有居民，我们不能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柯西金坦率地宣称，我们走，而你们占领这些领土，那我们怎么办？唯一明智的出路是，利用有关边界问题的所有现存的文件开始心平气和的、有高度专业技能的边界走向谈判。关于争议地区的问题，如果谈判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谈判在对等基础上加以解决。

关于边界冲突，柯西金说，如果你们的人(中国人)不再到我们领土上来，也不再破坏边界，那就什么冲突也不会有。如果需要就赶牲口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也准备这样做。在互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如果我正确地领会了您的意思的话，您也赞成谈判。我们建议立即开始谈判。我们今天和你们说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应当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用把话题扯到千年历史上去了。这种态度是建设性的，双方都不受委屈。柯西金问：您是否同意这一点？

周恩来回答说：如果考虑条约和边界问题的现状，那还有什么谈判可言？周还忆起有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长城延伸的，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提醒说有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当年沙皇俄国从中国手里夺去的，宣称：我们不想废除这些条约，但必须考虑问题的实际情况，我指的是有中国居民捕鱼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地区。鉴于这两个因素，可以进行谈判。我们不想把苏联居民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但也不能同意把中国居民赶走。周恩来又一次强调，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必须让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柯西金再次表示，中国方面要激他进行他不想进行的争论，因为没有这个时间。他注意到了周恩来的下列说法：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

沿着长城延伸的，而现在谈到了似乎是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去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我不想就这些问题掀起争论，苏联总理说，争论是无益的，但你们总是把我们往这上面拖，接着柯西金就周恩来所建议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几项原则发表了意见：

1.边界现状。我们赞成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任凭双方在谈判时各持己见，某某岛属于某某方。

2.从有争议地区撤出军队，使之脱离接触。假如说，我们把军队撤走了，你们的人就会占领这些领土。到那会儿怎么办？我们请你们给你们的军队下命令，让他们通过谈判解决在边界上产生的一切问题，以避免武装冲突。让双方边防哨所会晤并以建设性的精神解决所产生的问题。如果边防哨所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应当把问题交由团队研究等，以期没有痛恨、没有侮辱地把问题解决。

周恩来表示，由边防哨所解决边境问题，这是临时措施，并且又重复一遍自己的关于中国方面应当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条件，强调必须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和从争议地区撤出军队。

柯西金回答周恩来时表示，关于生产活动问题，我们在这儿解决不了，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并再次请周恩来回答他是否同意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周恩来肯定必须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柯西金表示，他不反对这样做，并且建议，在边界走向谈判开始之前，一直维持边界现状；要是我们维持原状的话，为了使双方不相互射击，凡是有争议的地方，谁都不要到那里去，如果双方到有争议的领土上去从事生产活动，那么边防哨所都应当与人为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了顺利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应当修复迄今一直存在的那种良好关系。

在就这些问题又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柯西金给谈话作总结并重复应当以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几项原则：

——维持边界现状；

——与为生产活动而进入有争议领土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得到我方边防当局同意；

——采取一切措施不让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在遵守前两项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排除冲突。

周恩来回答说，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很多，但中国居民要去的有争议地区不多。从事生产活动的所有人员都将不携带武器。

柯西金再次强调必须善意地解决有关边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问题，而某个岛的归属问题应当在边界谈判时加以解决。

副总理谢富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余湛声称，允许还是不允许中国人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向苏联方面请求批准，那就意味着预先承认了岛是你们的。

谢富治和李先念接着宣称：怎么，为到有争议领土上进行生产活动，中国方面每天都要被迫请求苏联方面批准吗？

柯西金回答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说：要是就批准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那就不用经常询问允许不允许了。

周恩来同意双方对生产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同时还建议军队都不进入争议地区并重提撤出军队、不让军队对峙的问题。

柯西金再度声称，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所能同意的只是让武装边防军人都不到有争议的岛屿上去，而双方在岛上的生产活动可继续进行。

周恩来提示了界河上的国界线应当沿着它延伸的航道问题。

柯西金回答说：这是代表团要谈判的问题。根据国际惯例，快艇可以在河上航行，而生产活动，他再次强调说，则应当征得边防总队的同意再进行。

周恩来提起了在界河上打鱼的问题，声称，捕鱼的优势在苏联方面，因为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水域，这是你们的水域，我们在捕鱼的时候就得越过航道。

柯西金在答复这一问题时说：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1963年签订的捕鱼协定。双方说好再一次研究这个问题。

在给边界问题会谈作总结时，柯西金表示：苏联方面将给自己的边防军人下达指示，要求他们解决在边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时要谦恭、有分寸，照顾到双方的利益。中国方面也这样做。我们将下达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不向对方射击的坚决指示。这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愿望。柯西金说，我感觉到，中国方面也有这种愿望。过两周我们通知你们苏联参加副外长级边界谈判的代表团人选。谈判可以像中国方面希望的那样在北京开始。我们希望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周恩来赞同这种愿望。

如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柯西金回答说，我准备飞来北京并研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同志也可以这样做，飞往莫斯科。

如果一切都进行得正常的话，那么就无须这么做，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过问一下谈判，坏的和睦也比好的不和睦强。我希望中国方面注意到：我们的文件没有骂谁，我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而我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文件却带有辱骂的话。让我们都本着不让关系尖锐化的精神行事。

在这之后，柯西金转向以下一些问题：关于苏联与中国的铁路和航空交通问题和高频电话通信问题。他在指出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现存的困难之后问道：中国方面有没有在这些领域转向良好的同志式的关系的愿望？在铁路和航空交通方面我们将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使用双方的领土。当我决定能通过高频线路同中国领导人谈谈的时候，中国方面把电话切断了。我们想恢复高频通信线路，作为工作线路。

周恩来回答说，在铁路交通方面，应当履行这方面的现有协议。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周答应将此问题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两国间的航空交通问题，柯西金提出建议，让两国的部长会见并研究现存的一些问题。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他说：我们对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抱怨。假如你们认为这条线路应当恢复，我们会表示感谢的，但今天要用这条线路通话是不可能的。

接着对话双方把话题转向经济联系问题的研究，双方都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有兴趣。在进行了有关的讨论之后，结果，两国总理在双方都感兴趣的、经济联系方面达成了协议。同时柯西金还诚实地强调苏联方面在这一点上欠债很多。

商定根据由双方经济机关在1个半月至两个月后准备的建议来研究1970年的经济联系计划；把对未来5年(1971—1975年)的经济联系计划问题的研究放在1970年。

柯西金接着请求研究互派大使问题。周恩来答应就此项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柯西金提出可通过两国外交部就尖锐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问题。这项建议是提给中国方面斟酌的。如果这将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就请通知我们，如果什么也不能通知我们，那就算是没有提过这问题。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没有提出过这问题，尽管，当然啦，在国际政策问题上进行磋商是件好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问题会有更慎重的解决办法。

柯西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他希望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正常关系阶段的愿望。苏联方面将为调整所有尖锐的问题和逐步消除这些问题作出一切努力。毫无疑问，我们的关系中有过什么积垢，我们就会为清除所有这些积垢而作出一切努力。

我们不全力以赴地使关系正常化，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变好了，那么就有助于我们遏制帝国主义，而如果相反，那么，帝国主义只会从中得到好处，况且帝国主义已经从苏中关系紧张中得到许多了，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周恩来同意这一点。柯西金继续说：我们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曾是复杂的但这些困难教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们懂得了：为了使我们的关系牢固，为了不让帝国主义从中捞到好处，我们应当怎么做，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

周恩来在会晤结尾时说：最近，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积累了许多困难。当然，要同帝国主义斗争，不让帝国主义因为我们的冲突而感到高兴。曾经有许多行动把我们引向冲突，引向对峙。你们表现出了很好的主动精神，来到这里，并且我们的会晤产生了某些成果，当然，我们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当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答应报告毛泽东。

两国总理商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会晤的消息并同意如此行文：“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商定，在北京举行了从越南民主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的会晤。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商定于1969年9月12日发表协商一致的新闻稿。协商完稿件，柯西金表示：他对所举行的会晤非常满意，如果周恩来能到苏联去，他将很高兴。

谈话结束时，为了对柯西金表示尊重，周恩来在机场设了便宴。所有参加会晤的人都出席了便宴。在宴会上继续就国际局势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交谈。我记得讨论了近东事件。1967年近东发生武装冲突时，苏联曾通过外交努力制止了那里发生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行动。中国人当时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根据他们的人民战争观点，军事行动应当继续下去，如果需要的话，应当后撤，一直到喀土穆(苏丹首都)，而这就将意味着要失掉整个埃及。柯西金告诉中国人，阿拉伯人因为军事准备薄弱，不能再继续军事行动。当时除了停止军事行动，没有其他任何出路。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加上便宴，从北京时间上午11时持续到下午4时。

指出下面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就在同一天的北京时间大约下午7时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说，明天(即9月12日)中国报刊要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稿件，协商一致的文稿要有一些改动。“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从消息中删去了。

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单方面是不能这么做的，更何况新闻稿是得到国务院总理同意的，对话人对此避而不谈，宣称：明天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删掉上面那句话的文稿。我把此事通知了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刊登与中国一致的稿件。

稍后一些时候，我询问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对话人意味深长地向上一指，暗示说，在中国，没有最上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之后，时光过去了，但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扩大经济联系、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恢复高频通信线路——的任何答复。一切都适得其反。中国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权利恢复之后，极力在联合国攻击苏联的外交政策，高频通信线路未曾启用，经济关系继续收缩。

№10284 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69年9月11日)

苏共中央经考虑后认为，必须把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谈的情况通报你们。

众所周知，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方面不断谴责是苏联破坏了中苏友谊。而实际上是中国当局在不断地加剧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中国甚至准备公开与苏联宣战。到目前为止，两国贸易关系已基本断绝，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已全部取消，外交通话也已受到限制，两国之间已有3年之久没有互派大使。中国领导集团采用对帝国主义的武力斗争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清楚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对处理苏中关系的方针与政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奉行改善苏中关系的宗旨，并一再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出可行的措施来改善苏中之间的关系，使其正常化。苏联政府今年3月29日和7月13日所发表的声明中，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今年7月份发给中国国务院的贺电中，再次为改善苏中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以及为首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完全是从苏中关系的原则出发的。我们坚信缓和苏中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并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支援英雄的越南人民及其他国家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独立的斗争。

苏共领导人为了大局的利益，采取了主动行动来缓和苏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对我们的建议很快作出了反应，决定由周恩来参加与苏共柯西金同志的会谈。虽然在接到中国方面同意进行会谈的意见时，柯西金还在越南参加胡志明同志的葬礼，但苏联方面还是很快就派出了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与直接抵达北京的柯西金会合。

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以柯西金为首，中国方面出席的人员有周恩来、李先念和谢富治，会谈大约进行了4个小时。苏联方面采取了真诚的态度，为解决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建议。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却千方百计地将会谈引向歧途，说双方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根本无法调解。苏联方面坚定地表示，在外交政策上，我们的原则立场和政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会谈必然要涉及达曼斯基岛 [6] 的归属这个焦点问题，双方都为此申述了各自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分歧的途径。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苏联。”与此同时，他还一再重复了以前的观点，认为有关达曼斯基岛归属的条约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签订的。尽管如此，周恩来也承认中国政府不能否认条约本身的存在，他说：“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条约中是这样划分的。”苏联方面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方法，要求为此在两到三周内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地点可以由中国方面确定。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希望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谈中双方商定，在两国边界未最后确定之前，为保证两国之间的谈判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应当共同遵循以下原则：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后撤军队，防止在边界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对抗。由此而造成的两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经济损失，由双方政府代表协商解决。双方同意抱着善意的态度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有关地区居民的困难。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方面诚挚地提出，为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应当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成现有的各种合同，其中包括已经签署的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协议书，继续坚持已确定的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与贸易合作方向。周恩来答应将此提议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表示同意对1969年的协作项目提出修改意见。

我们建议中国恢复两国间铁路与航空的正常往来，并重新恢复被中国当局在今年3月份切断的两国高层领导间的热线电话联系。

苏联方面将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苏联将向中国派出大使，并主动派出谈判代表，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

周恩来表示将把苏联方面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还表示，在中国考虑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期间，中共领导同志不打算停止发表对苏共及其他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周恩来强辩道：这种“辩论”已成为中共领导层讨论有关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形式，这来自并关系到毛泽东理论的发展，要把这种“辩论”持续一万年。

我们强调指出，苏共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这种讨论应当以一种适当的语气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谎言与谩骂没有说服力，只会损害人民的感情和加剧两国关系的破裂。

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不同观点之争，将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和为国家与社会解放而战的阵营的力量，这只能是对帝国主义有利。在此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对苏联造成如此之深的伤害，使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收获。这仅仅是由于中共与苏共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不在于苏联，而在于中国。

我们申明，虽然帝国主义就边界地区发生的挑衅事件宣传说，苏联正准备防御中国的侵袭，但是苏联党和政府都没有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由此号召人民准备进行战争。我们所有的文章与报刊都是在号召人民热爱和平，我们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民说必须为准备战争而勒紧皮带。对此，周恩来回答中国没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强调说，中国方面不会对苏联使用武力。

尽管涉及的问题非常尖锐，双方针锋相对，但会谈是在建设性的、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们认为让中国方面选择举行会谈的地点对他们是有利的。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决定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会谈的时间、地点、采取的形式都由中国方面确定。

现在谈论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还为时尚早。反苏攻击目前仍在中国国内继续进行。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报刊都没有登载双方决定举行一次“建设性会谈”的消息。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消息所作的这种修改，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疑问，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是否真心想要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此我们也会认真地加以考虑。如果中国领导者因为国内斗争的加剧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而在此耍了一个花招，

他们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我们将进一步密切注视中国的动态，对北京领导人在中苏关系领域内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保持警惕。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坚信，如果中国领导人理智地、认真地对待我们提出的建议，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加剧中苏之间的争端，煽动两国之间发生冲突，削弱反帝斗争力量的阴谋。

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地以实际行动促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将一定会推动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势力的力量，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的，也将促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420—4424页

№13862 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1969年9月22日)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市

1969年9月22日寄出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党务工作部：

通报

该文件通报的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访问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消息讨论的情况。

1969年9月22日党的积极分子代表边疆区会议使他们了解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以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在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情况。

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读了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消息。

7人在会上发言。与会者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本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加强对

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困难和内部分歧采取强硬立场。与会者一致同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倡议，旨在对苏中关系正常化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通过北京会议的谈判和组织解决有争论的问题。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书记B.C.帕斯特纳克在他的讲话中说：

“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共产党人和所有工人特别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的消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居民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关系发展，并且强烈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的冒险主义行为。毛主义者在苏中边界发动的武装袭击，对我们的苏联人民、我们的国家、共产党的恶意诽谤，给这里的工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当前这样一个困难的局势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稳定苏中关系，倡议在北京举行会谈，再次生动地证明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党明智的政策。

市党组织的目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工人中改善思想政治工作，以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会议这种有价值的方式，动员集体企业、建筑公司和机构履行社会主义职责。

苏共边疆区委员会委员、哈巴罗夫斯克热加工厂铣床工И.П.卡多奇尼科夫指出：

“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观望中国的事态，其领导人不断地恶化与我国的关系以及苏中边境的局势。我们远东人，急切地赞同我们的党和政府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采取实际步骤。我们工人能安心工作，是因为对祖国的强大力量和苏联边界的稳固有信心。在工厂这个数千人的集体中工作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到这些。”

哈巴罗夫斯克市师范学院校长H.B.斯维尔德洛夫指出：

“通知简明地说明了苏联的所有建议，即解决苏中关系中的争端和冲突，改善苏联边境的局势，扩大中国同我们的国家经济关系。这些及时、合理、公正的建议，以我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与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相结合，能够制定出正确解决政府间的争端的决定，当然，对方表达了对局势类似的理解，并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形势更有利。”

苏共边疆区党委会成员、哈巴罗夫斯克耶尔柯玛什厂建设局主任E.A.普罗特金指出：

“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非常短暂的，但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对于中苏人民来说很重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我国政府在之前寻求的能够稳定、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外交政策在我们厂中得到一致赞成。”

克拉斯诺兹纳姆斯克边境地区政治部主任И.К.沃康表达了边防战士的想法和感受：

“远东边境地区克拉斯诺兹纳姆斯克边境站的部队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报告做出反应，他们感到深深的理解和满意，并认为这次会晤是缓解苏中边境局势的关键。

边界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例证。中共在中苏边界的蓄意挑衅和他们对于苏联领土的干涉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边境部队在祖国面前以一个堪称楷模的方式决定在该地区有必要履行其神圣职责。在筹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这几天，我们为了不辜负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将通过不断提升的军事装备的水平(包括陆军和海军)，以保证我们敬爱的祖国的远东边界不可侵犯。”

与会者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完全、充分赞成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苏中关系的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倡议，并认为本次会晤是有益的。

2.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对华关系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并抵制中国领导层对我们国家利益、我们人民利益的任何侵犯。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A.希季科夫

№1041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1969年9月2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9月24日会议第80/3r号记录

第3项 关于Ю.Б.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О.Б.罗满宁同志1969年9月8日的报告，第1714/гс号。

(基里连科同志、卡图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一、同意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罗满宁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所附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和教科书中，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并使苏联科学院系统的社会政治研究所、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教育部、教育学院、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杂志编辑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机密出版管理总局等单位的领导知悉该报告的内容。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6个月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以文件为依据的著作，并用俄文和外文出版。

三、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半年期限内，撰写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

四、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2个月期限内，筹备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后确定。

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之前筹备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联外交部共同商定。

六、委托《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对于上述所说的关于中俄边界形成历史和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

和文章给予评论。

新闻社负责将这些著作在国外散发。

七、委托苏联科学院采取措施开展基础研究，阐明俄罗斯在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所起的历史性进步作用，并加快撰写和出版苏共中央1966年7月28日决议规定的那些学术著作。

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新闻社在适当的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公布并在国外散发1861年交换地图某些地段的影印件，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影印件以及边界冲突地区(达曼斯基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界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的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准备必要的地图资料。

苏共中央

附件：

第80号记录第3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教科书中正确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措施

目前，北京的领导人竭力使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确信，自己对苏联大片领土的觊觎是合理的，并竭力使人们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西方的宣传机关，力图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也竭力地为其提供新的补充论据，以此来支持中国首领的大汉族觊觎别国领土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在战后苏联历史学家许多著作中，对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某些因素的错误解释，引起了一定的不安。在苏联绝大部分学术著作中，有关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问题，都根据列宁著作的精神作了正确的论述，其中也包括对于中国问题。同时某些作者只是把中国视为包括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目标，完全没有说明17至18世纪中国清朝的对外扩张和领土占领问题以及中国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问题。

在B.Г.舍宾科夫(《18世纪的中苏关系》，莫斯科，1960年)、Л.М.西蒙诺夫斯基(《中国历史概述》，莫斯科，1956年)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出现了不正确的评价和措词。

对于中苏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评价，还出现在一系列普及性的著作中。例如：在《苏联历史概述》(17世纪卷，莫斯科，1955年)一书中谈到1689年签订的“平等条约”，根据该条约“阿穆尔留在(!)中国管辖范围之内”。《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6年；第6卷，莫斯科，1959年)对于尼布楚条约没有给予准确的评价，但指出：“根据条约，阿穆尔河左岸归属满族人”，也就是承

认，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在尼布楚协定之前仿佛是属于中国的。《世界史》的作者们认定《爱辉条约》(1858年)是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9卷)在“尼布楚条约”一章中宣布，该条约是“俄国外交上的巨大成就，使得俄国东方的西伯利亚得以巩固”。但是，对于俄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土损失，该章节却没有提及。

在1948—1950年间第一次出版的由A.Я.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词典》中，关于俄中17至18世纪条约的章节也不符合现代的要求。

在《苏联史纲》18世纪第2个25年(莫斯科，1957年版)、《苏联史纲》18世纪后半期(莫斯科，1956年版)、《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所附的地图上，阿穆尔以北的领土，根据强加于俄国的尼布楚条约在某些时候曾正式划归中国所有，尽管这片领土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中国，这无条件地表明了这里是清朝帝国的领地，而在西部边界的地段，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领土，仿佛也属于中国。

许多著作的作者总是绕开中俄关系史中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复杂的方面，这首先是边界问题。多卷本的出版物《西伯利亚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通常，教科书也回避中俄关系问题。在B.Д.达秋克主编的(《苏联历史》，莫斯科，1963年)高等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爱辉条约》只是附带地提一下；对于条约以及签订时的情况没作任何描写。中学里的学生得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知识。由M.B.涅奇金娜和П.С.莱宾格鲁勃编写的、并于1968年出版的七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里，对于与中国的边界划分问题没作任何说明，而俄国新疆土开拓者的活动只是被看作地理发现。当时，在中学的一些教学参考书里，向来都是直接指责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东方的侵略政策。例如，由A.A.瓦金和H.B.斯佩兰斯卡娅编写的7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指出，西伯利亚是夺取的，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在哈巴罗夫军事远征行动之后“归服的”；同时，参考书的作者还声明说，俄国人是极其残酷地使当地民族归服自己的。

没有关于中国清朝侵略企图和中国满族军队抢劫和杀害当地居民的资料以及意在强调俄国执政当局的反面行动，导致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显然，对于中俄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20、30年代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M.H.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学派)对于战后苏联历史科学的影响有关系，根据这种思想，中俄关系(也可以说是俄国的对外政策)就是沙皇俄国不断进行领土掠夺的历史。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经通过了决议(1964年6月3日，第101号记录，第6项)，指明苏联教科书、学术书籍以及历史图集对于苏联与中国边界划定的历史有不正确的阐述，但是，从1967年和1968年出版的以上所说的教科书来看，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改正决议中指明的错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苏共中央“关于采取中立化方式对中国进行领土问题的宣传”的决议(1966年7月28日第112/4号)，该项决议还规定撰写和出版关于中苏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

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方面最适当的做法是：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并以文件加以论证的著作，用俄文和外文大批量出版；还应该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作，撰写并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同时，无须等待上述著作的出版，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在今年的10—11月份，筹备出版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集，这些文章的基调应是平静的、富有建设性的，而不要批评苏联学者以前所犯的错误。还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筹备出版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应该表明，这种扩张政策的直接继承人是毛泽东集团。

应表现出，必须着力揭露中国伪造篡改中苏边界线走向，其中包括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两岸地区。中国宣传机关在国外广泛传播他们绘制的示意图，在这份示意图上，沿乌苏里江的国界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主航道上。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声明，对中方关于边界线走向的这些解释予以有力的回击。但是，必须利用新事实和文件继续揭露中方的说法。从苏联驻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大使发回的报告中看出，由于缺乏我方的文件资料，外国舆论的某些阶层，对苏联在中苏边界走向问题上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并在国外散发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边界走向的文件资料，以此来加强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的声明。

在政治上尤其有利的是，公布1861年交换地图上某些地段的照片复制件，在苏联政府声明中也提到了这份地图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公布这些地图复制件的同时，还可以公布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的复制件。同时，还可以整理出版边界冲突地区(珍宝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境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公布这些材料可以赋予目前正在根据苏共中央今年5月28日决议(第73/185rc号)准备的那些关于中苏边界中方挑衅行动的书籍、电影和文章以更重的分量。

Ю.安德罗波夫

A.葛罗米柯

O.罗满宁

1969年9月8日

第1714/rc号

15д1651

ЦХСД, ф.4, оп.19, д.555, л.2-3, 23-27

№11959 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1969年9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465/IOBA号

1969年9月25日

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调查报告)

根据日内瓦协议，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并于1962年恢复工作。委员

会由印度(主席)、加拿大和波兰的代表组成。

国际监督委员会是1962年日内瓦协议解决老挝问题的机构，它负有使命执行其重要的具体职权来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后果，并保障履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议定书的原则，众所周知，这些原则应该保证老挝的独立、和平、中立及领土的完整。

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了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工作的重要特点，其特点表现在委员会进行工作时要与老挝政府紧密合作，并取得其同意。对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取得老挝参加民族统一政府三方面政治团体的同意(爱国战线党、中立派梭发那·富马及右派力量)。

把这一原则列入协议书中是值得肯定的因素，因为这为民族解放力量提供了条件，以便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依靠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制止右派势力和美国的破坏活动。

国际监督委员会曾与代表老挝的政府机构——民族三方委员会联系过，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履行日内瓦协议于1962年底成立的，由爱国战线党、中立派及右派势力的代表所组成。民族委员会各方一致同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境内进行两次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检查协议书中有关外国军事人员撤离条款的执行情况。1962年12月29—30日和1963年4月14—15日在爱国战线党地区及右派地区进行了检查，这在1963年1月31日和1963年7月20日两位主席的两份报告中都有反映。结果表明有蒋介石分子军事集团的存在，还间接地证明了在右派地区停留过美国军事人员的事实。同时在两份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国际监督委员会所视察的爱国战线党地区的两个点中有外国军事人员存在。

1963年3—4月间的事件影响到贡勒中立力量的分裂，促使以丁上校为首的所谓“左派中立者”在老挝朋友协助下出现，导致各方对国际监督委员会态度的重大变化。梭发那·富马力图消除分裂并恢复原状，呼吁协助国际监督委员会，而右派和美国人支持富马，他们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谴责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行为的可能性。老挝朋友们反而对保存并巩固“左派中立者”控制的地区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理由是3—4月间的事件属中立者与爱国战线党的内部事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介入将招致对两个集团内部事务的干涉。内部政治形势的复杂化，由于部长们从越南离开爱国战线党，爱国战线党并拒绝与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都破坏了三方机构的基础，而三方机构是委员会全部工作的依据。从1963年5月开始，国际监督委员会已不能行使所赋予的职权，停止了工作。这里已显出了老挝同志们想使国际监督委员会不定期长时间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一点为扩大对老挝内部事务干涉的美国人所利用。

根据议定书第19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期限定为3年，在这期限内两主席应向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提交建议研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到1965年7月，3年期限已过。不容置疑，尽管委员会还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继续为捍卫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需要，美国已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协议。

考虑到老挝、越南、中国和波兰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苏联方面继续延长委员会的工作一年。英国人同意这样做。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致函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政府，信中通知说，他们认为，目前停止国际委员会对老挝的考察和监督工作是不适宜的，为了拟定进一步的建议，他们提出应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间不应晚于1966年7月23日。两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其中包括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赞同。

但是1966年初(1966年1月10日)老挝爱国战线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8日)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有关在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下一步的命运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老挝三方政治力量未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他们主张暂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

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获悉，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的建议无效。但委员会继续存在，因为关于停止它工作的意见不一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对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态度，1963年7月23日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越南和老挝的朋友们继续向国际监督委员会提出一些关于美国干涉老挝的抗议。

1965年以后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加拿大奉行美国和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路线，这条路线想达到目的是使委员会调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1962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事情并证明北越军队来到老挝境内并参与了军事行动。波兰代表团在与苏方磋商后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其出发点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委员会目前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工作。日内瓦会议规定，委员会应该按照倡议或者取得老挝王国政府的同意时在合作中进行工作，波兰代表团指出此点时声明说，现在由于所指的联合政府不存在，只有在对立各方——参加联合的人同意下委员会的活动才是可能的。印度代表团采取中间的立场，有时支持波兰代表团的建议，有时支持加拿大代表团的建议，并竭力强调其态度的客观性。

委员会成员们及有关方面的矛盾立场决定了其近年来的工作结果。委员会日程上的主要问题如下：关于委员们调查和走访武装冲突地

区的问题；准备向两主席提出关于过去几年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问题；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及裁员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尽管波兰代表团反对，印度和加拿大的委员们还是在1968年2月和1969年1月在老挝南方发生武装冲突地区进行了走访，但走访后没有作任何声明。

对根据加拿大倡议得到印度支持的第二个问题，委员会继续工作向两主席写报告，其中包括由印度人写的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波兰代表团打算拖延使这个报告达不成一致意见，作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完全同意了修改意见。现在波兰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批准这份报告并不将它送达给两主席。

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复杂还因严重的财政困难。许多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履行议定书第18条款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66年9月欠款已达497—500英镑。委员会不止一次讨论过财政问题，1968年仍未得到实际解决，虽然有了新的特点，因为苏联关于裁减委员会人员的建议实际上已在执行：军官联络小组的人数、警卫人员和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人员都大大减少。按波兰代表团的意见说，进一步裁减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看来已不可能。

目前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未定。爱国战线党的领导声明说，不应再工作，只能存在，因为关于下一步的规约问题是由日内瓦协议全体参加者决定的。看来，他们懂得，委员会今后还是需要的。

苏联方面主张保存委员会，其出发点是，因为在美国扩大对老挝事务干涉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У.Ю.米赫也夫(签名)

1969年9月25日

РГАНИ, ф.89, оп.54, д.17, л.91-95

№01838 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1969年9月29日)

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调查报告)

根据老挝朋友们的资料说，在老挝爱国战线控制和管理下及与其相毗邻的老挝地区的左派中立集团包括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人口近80万。

解放区是在老挝游击队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并于1945—1962年期间在与法国殖民者及美国人斗争过程中建立的。

目前在老挝16个省中的14个省都有解放区和爱国力量的游击队根据地。他们分散在全国，相互间没有联系，通常住在难以通行的深山密林地区，居民40%—50%为少数民族，如苗族、卡族、傣族等，这些居民也有住在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机关集中在桑怒省的桑怒市，它是解放区行政和政治中心。老挝朋友们认为建立解放区是爱国力量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并多次强调说，他们把解放区看成是今后革命斗争的基地和将来在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老挝爱国战线党近年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执行一条全力巩固解放区的路线，首先是从军事观点上考虑，也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考虑。

保卫解放区是老挝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1968—1969年作战的主动性基本上掌握在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支持的爱国力量手中。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战役，从而解放了南白、孟水和老挝北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

但是政府军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对朋友们的阵地，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查尔平原以及车邦地区(中老挝)进行了令人难受的打击。

美国空军对解放区的轰炸使我们的朋友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68年

底开始，轰炸的强度增加了3—4倍，最近以来已达到每天400—500架次。据一些材料报道说，为了免遭轰炸，从解放区投到政府方面来的人已有数十万。一些居民点和道路被摧毁，大部分播种土地无法耕种。

描述国内军事政治形势时，苏发努冯在与苏联大使弗·伊·米宁同志谈话中强调说，人民军队对解放老挝所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卫解放区并使他们中过去被敌人抓获过的那些人回归。没有提出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苏发努冯同时说，爱国力量不想放弃手中的主动性，在万象行政当局控制的地区今后将发动部分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限制敌军的运动。

РГАНИ, ф.89, оп.54, д.17, л.100-101

№21507 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 (1969年10月2日)

摘自B.A.索良斯基的工作日记

1969年10月10日

第694号

《国际政治》杂志主编兰科·彼德科维奇在青年广场(贝尔格莱德)就苏中关系发表的讲演

1969年10月2日

彼德科维奇演讲的题目是《苏联与中国》。约有30名南斯拉夫公民来到讲演现场。讲演的内容如下。彼德科维奇在演讲伊始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一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立即作出了苏中冲突不可避免的推测以及苏联将被迫为自己在西方寻找与中国进行斗争的盟友。20年前的这些声明被视为挑拨离间，没有赋予其什么意义。但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呢？苏联出版了许多指责毛泽东的书，说他与马列主义决裂，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中国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口号中提出了16点内容，号召世界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反对分子而斗争。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对双方的关系都思考了很多。他说，2—3年前他在苏联期间，一些苏联人在同他交谈时表示，苏联不怕来自美国方面的进攻，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以就一些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联人把中国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威胁。

随后彼德科维奇谈到了未来苏中关系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掌权，两国使用同一种思想或主题的思想进行鼓动，它们有相同的社会体制。按照马列主义学说，这两个国家应该和平相处。从中就得出了苏联与中国在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种可能性。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列主义共同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这种发展情形就能够实现。但在苏联这种情形就无法实现，因为那里形成了“国家主义结构”，在那里国家利益至上。在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无法实现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在对外政策领域，他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可以说，苏中两国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根源，是由这两个国家社会结构不同决定的。

苏中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它们共同的超国家利益基础上是有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采取“神圣同盟”的形式。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此的解释是两国的政治和民族利益不同。近10年来中国居民人数达到了10亿，这些居民需要新的领土。苏联的西伯利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是中国扩张的天然出路，在这里民族利益的不同被掩藏。在苏联的政治计划中，要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中国自身不想扮演二流大国的角色，致力于既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中心，也成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新的中心。这样，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中友好合作的设想就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苏中关系的另一条道路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通常认为，这一冲突将会给社会主义世界和进步世界带来损失。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个概念化的解决方式，它可能是错误的。苏中冲突可能也具有正面结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国家在纠纷中遵循马列主义原则，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防范其他国家的反社会主义政策，就可以帮助它返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纠纷中彼此都不打算使用那样的原则。彼德科维奇表达了一种观点，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比“神圣同盟”类型的协定是更为人所接受的解决方案。

解决苏中纠纷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

下，两国间的冲突不符合世界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敌人的积极活动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观点，苏中纠纷的原因归于以下几点：第一，苏联要保存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在各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这在不久前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再次得到证明，尽管出现了苏联的地位受到侵蚀的明显征兆。苏联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不想离开自己占有的阵地，当时，中国成为苏联在亚非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势力得到增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苏联在那里的地位受到削弱。第二，中国不想让莫斯科作为自己永恒的领导。毛泽东早在1930年代就不听从莫斯科的劝告，现在他更不打算做这些，当时有一切理由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在亚非国家起到更大的作用。第三，中国，尽管现在存在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但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什么步骤。正相反，中国领导层把人口出生率的提高看作是自己实力的基础。尽管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向居民提供必要的保障提供了可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看到只有从苏联得到新的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国冲突的前提条件。

彼德科维奇随后讲到，目前有个消息，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后出现了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和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边境冲突表明，中国和苏联都处于衰落的边缘，采取扩大冲突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准备挑起大规模战争，苏联把战争强加给中国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取得胜利，但任何人都不能这么做。

在做中国工作期间，苏联不准备发动战争。中国没有足够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自己就会被消灭。

苏联和中国还看到，它们的纠纷导致美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得以放开双手在世界各个地区推行自己的政策，为在那里确立统治进行战争。因此，在利益层面，苏联和中国应该后退一步，现实地观察两国目前的关系。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谈说明了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它们不可能是长期的和稳固的，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和平，它们之间争论的温度可能会降低一些，建立经济关系，甚至党际联系，但所有这些都处于火山口，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苏中纠纷中持什

么样的立场。目前，苏美对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这些实力对手都支持世界平衡，乐于进行谈判和在个别时候推行一致的政策。一些人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靠拢的可能性。但这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不会威吓它，而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拥有核武器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将变成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不可能从中期待出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中国担心苏联与美国结盟，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如果不进攻中国的话，也会建立封锁，限制中国的影响，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领导层将在外交领域开展一系列旨在分裂美苏的活动。

美国与中国存在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可能。如此苏联的形势就会变坏，因为中国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时，就可以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只是个方案，而三个大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则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每一方都起到自己的作用，努力得到另一方的支持而反对第三方。

在苏中冲突中，南斯拉夫从联合国宪章出发，支持和平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支持通过对话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苏联在中国边境集结武装力量和他们欧洲力量的削弱对南斯拉夫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应该考虑到，苏联忙于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削弱了它在其他地区的存在。例如，在中苏冲突之前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但近几年来，罗马尼亚得到了独立处理自己对外政策的可能性。罗马尼亚领导层尝试在苏中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自然没有成功，但罗马尼亚人善于利用苏中冲突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积极起来。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苏中冲突引起了苦痛感。共产党人以前从他们所遵循的共同目标出发，而在国际计划方面他们是同盟关系。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20年的实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列主义学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首领国家的带领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忽略了政治力量。

在回答中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不能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人民免受饥饿，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考虑到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具有神明的色彩。

毛泽东也不了解欧洲。在亚洲的条件下奉若神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南斯拉夫，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人民尽管“讥讽崇拜”，但他们期待铁托，他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保障国家统一。在中国，崇拜毛泽东起到组织作用，能够团结群众不允许蒋介石或者美帝分子反攻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泛滥。但按照演说者的观点，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拥有多个世纪的智慧，不可能把一切神奇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按照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想打碎在中国形成的官僚结构和与中国人民利益相对抗的东西。彼德科维奇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在苏联实力很强大，在南斯拉夫也仍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强力党和国家机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随后，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一机关开始对人民群众的主要目标造成威胁，决定代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打碎它。如果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这一目的，那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国不要出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在进行夺权斗争，但没有看到，这一斗争掩盖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对抗，刘少奇代表其中一种倾向。

关于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彼德科维奇回答说，看来中国在口号上表达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支持。中国没有盟友，因此中国人努力强调他们与阿尔巴尼亚的结盟。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放弃了非斯大林化道路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也被迫为自己寻找盟友。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合作的共同支点，他们的供给制和领导层不同，因此没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在回答中国同联邦德国接近的可能性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近来关于这种可能性谈得很多。对联邦德国来讲，中国是亚洲的一个大市场，而中国感兴趣的是在欧洲有个盟友。如果成立这么个联盟，苏联处于这两个国家之间，那他就更担心了。现在已经说过平衡被破坏的问题，而苏联的实力在削弱。美国利用这一情况为自己在远东、在越南、在裁军问题上的目的服务。据传，H.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同尼克松会谈时，提示尼克松美国不要利用中苏冲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要展现自己准备巩固和平。罗马尼亚人证实了尼克松在罗马尼亚进行了会谈。

关于美国总统在罗马尼亚会谈的问题，彼德科维奇说，这次会谈有自己的内幕。从罗马尼亚方面来讲，这是“胆大包天”的一步，而尼克松

善于很好地准备和利用这次会谈。苏联方面指责尼克松总统，说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打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存在于外部，它取决于美国总统的会谈情况。罗马尼亚人对同尼克松会谈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想如果在布加勒斯特出现1968年苏联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时，可以把美国当作自己潜在的盟友。尼克松前往布加勒斯特是为了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来的那种努力——稍后被镇压下去。尼克松还想展现自己对欧洲事务的关注，让世人知晓他不会从事中立立场，去年8月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尼克松还想让罗马尼亚人充当美国与河内和北京关系中的中间人。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应期待苏联突然进攻中国？彼德科维奇回答说，中国原子弹的威力还是很诱惑人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但要从事这种进攻，苏联应该得到西方的同意，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占领北京，但它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和怎样对待自己的立场，考虑到民族和种族差异以及越南战争的经验，苏联不会进攻中国，但它推行幕后政策，在确定的中国圈子里寻找支点，这些人可能会结束中苏冲突。因为苏联报刊指望这些人可以使中国人民远离毛泽东，期待中国出现保障苏联利益的那些力量。在回答是否可以期待苏联在土地问题上会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的问题时，彼德科维奇给予否定。他说，南斯拉夫是个不大的国家，对自己的土地是寸土必争，而大国，按照他的话说，都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土地。尽管俄国沙皇以前占领了新的领土，现在这些占领的土地都成为大苏联的组成部分，任何人也别想让他们作出什么让步。苏联与中国之间很久以前就存在着复杂的边界问题，依据联合国宪章不允许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纠纷问题。

记录：苏联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索良斯基

АВІРФ, ф144, оп.30, пк.70, д.6, л.202-209

№2289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 苏三角关系(1969年10月9日)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越南问题。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

谈到了越南问题，他的建议是，他们美国人，“不打算在越南问题上使我们更加厌烦”，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请求帮助等，因为他们坚信，在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以后，苏联对尽快结束越南问题失去了兴趣。

对于他的这些意见以及基辛格在上次会谈中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我按照我所得到的关于同他进行会谈的指示，对他说了如下的话。

苏联反对关于越南问题的上述说法，苏联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尊重越南人民的权利和民族宿愿的基础上尽快和平解决越南冲突。我们的越南朋友们提出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的、现实的计划，他们的立场也是这样。

应该考虑到南越现实的力量对比来组建联合政府，但美国方面坚决不希望成立这样的联合政府，这就说明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存在着问题：美国政府声明说他们希望结束越南战争，希望政治解决越南冲突；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在进行巴黎谈判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对越南继续战争。

莫斯科当然也注意到了基辛格的多次暗示：美国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些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然而，苏联一如既往地坚信，美国的这种“选择”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首先不会给美国自身带来好处。毕竟美国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越南问题。

美国方面仍然企图把解决越南问题同解决国际关系中其他问题(近东问题、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等)的前景联系起来，这也不能证明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对这种不良行为的看法。就苏联方面来说，我们愿意推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不会把一个问题的解决同另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

对于我提出的这些说法，基辛格确信地说，美国没有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越南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在就这个话题(在会谈的过程中他几次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展开的讨论中，看起来，他事实上仍然没有突破他刚才的那些论断。

尽管美国的态度是，不把所有的问题都联系起来，但是越南问题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气氛的营造，而这种气氛的营造对于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基辛格否认

他的立场倒退了，但事实上，白宫对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从对这些问题的狭隘理解出发的。

我提出相应的论据，驳斥了基辛格关于苏联对尽快调解越南问题失去兴趣的说法，此后，在略作沉思之后，基辛格大致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完全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谈论如下观点，因此请求你们把这些观点完全看作是我个人的、非正式的看法。尼克松总统已经两次向苏联领导人详细阐述了他关于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方法，一次是通过苏联大使转达的，另一次是通过我本人转告的。我们期待着苏联领导人对这些看法提出详细的建议(通过那些秘密渠道)，这些建议或许可以使我们一起找到建设性的途径。但是尼克松总统就是没有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许，莫斯科现在还不想同他们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你们的权利，尽管我们仍然期待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呼吁能够得到答复，苏联方面反而时不时地把北越方面提出的十项条款送给我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曾经认为，同尼克松总统的前任简短地交换意见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比如，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进行巴黎谈判的建议。但是尼克松总统却没有收到一份这样的直接呼吁，尽管尼克松总统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把自己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些想法告诉了莫斯科。”基辛格在说这些话时显得非常恼火。

关于这一点我对基辛格说道，“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们授权给我，要我一定把我们在越南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向你们说明，在同你们进行初次会谈的时候我也向你们进行了解释”。我明确地说，当然，这些立场首先就是对尼克松总统本人说明的。

基辛格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不希望使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何况他也没有被授权谈论这个问题。他请求我“忘掉刚才他自己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并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莫斯科”。

我对此回答说，确实没有必要制造问题，特别是制造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良好的接触和联系的途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质立场。

2.近东问题。基辛格多次表示，美国总统希望调解近东问题。但是他拒绝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他提出的理由是，这个问题已经在苏联外交

部和美国国务卿之间，以及苏联大使和西斯科之间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在就中东问题进行会谈(然后谈论了关于扩大美苏贸易的可能性问题)的过程中，基辛格好像是顺便提及一样，又提及了越南问题带来的影响，他说尚未解决的越南冲突酿造了不良的气氛。但是，他马上又坚持说，美国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阐述了我们为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并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但是基辛格事实上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避而不答，他只是说，美国准备同我们一起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尽快让亚林格安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进行对话。

3.关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清楚地记得葛罗米柯对罗杰斯所说的话，美国政府不应该催促苏联作出答复。基辛格说，“我们愿意非常耐心地等候你们的答复”。

4.中国问题。然后基辛格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实际上是非常认真的)，华盛顿正在流行一个传言，说的是，苏联在拖延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不给予我们答复，据说，这主要是由于前不久苏联和中国开始了对话，如果这次对话进展顺利的话，那么，苏联同美国进行的谈判就要被延缓一些时间，以便“不惹恼中国人”。

我答复基辛格说，在华盛顿流传的这个传言到底有多可靠，他无疑是应该非常清楚的。然后我很认真地向基辛格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不是随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众所周知的原则之上的。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不妨碍我们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方面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事实上真心愿意同苏联改善关系。

然后我说，如果华盛顿受到了一些诱惑，想依靠苏联从苏中关系中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而这还是有一定的迹象的，那么“我们要事先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你们的盘算将会完全落空。无论怎样这种政策都与改善美苏关系的目的不符”。

基辛格一再重申，美国对中苏冲突不感兴趣，尼克松政府没有任何利用苏中关系的想法。基辛格说，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考虑是，尽管现在美国也许可以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游戏注定是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的。

至于华盛顿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前不久向北京提议在华沙或其他地方恢复美国和中国会谈，基辛格说，华盛顿没有直接向北京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外交试探，这件事是经他允许的，由第三国引导。他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有兴趣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尼克松政府也愿意进行会谈。

当谈到柯西金和周恩来会谈之后苏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包括中国愿意同苏联举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说，从他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苏联会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核试验中心进行打击。

我反问道，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事实上有什么考虑呢？基辛格答复我说，苏联去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情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将是否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华盛顿，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如果苏联认为，苏联最高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现实的威胁，那么苏联政府的反应无疑将很坚决。因此，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问题完全在于：苏联领导人自身认为，苏中边界局势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了苏联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还没有得到足够可靠的资料。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3, п.399, д.6, л.175-180

№2299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1969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69年12月15日)

同志们!

我们在这次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的实际上是每一年的年计划和预算问题。因此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说的必然是那些作为国家整个经济活动基础并决定着其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利发展的那些文件。我可能并没有说错，如果我这里指的是计划和预算对未来一年所具有的特别

重大的意义的话。其意义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在于，首先：1970年是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这最后一年将决定着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五年计划的最终结果如何。其次，在即将到来的1970年中将发生一系列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和即将召开党的例行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谈了关于未来一年的主要任务的问题，并指明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重大成果。

在全会工作临近结束之时，我认为还有必要谈一谈那些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四大具有特别现实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近年来我们活动结果的预测以及我们在编制未来计划(其中包括新的五年计划)时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至于如何评价这个五年计划4年来的工作，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 [7]

.....被迫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以迫使其他国家签署没有明确要求的、不确定的宣言。

与此相关，我还想简单谈一下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的情况。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对我们说，他们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只是有一个条件，即美国和加拿大必须从最开始便参加这次会议。经与社会主义国家协商后，我们确定了如下立场：不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条件是民主德国将与联邦德国一样与会，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

苏中关系问题，自然在政治局的对外政治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尽最大可能争取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防止事件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造成危害。

苏共中央政治局已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在北京谈判开始前我们预先所采取的那些举措，我这里指的是A.H.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于今年9月11日的会谈以及我们为了边境局势的正常化而预先采取的一些举措。

中国领导人被迫举行谈判的事实——这是挑衅者们得到了坚决反击的结果，是苏共中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所采取的克制、坚持原则的政策的结果。当然，各兄弟党的立场无疑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在1969年的国际会议上对中国领导人的路线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我们当然对北京的立场并不抱任何幻想。还在参加谈判的时候，我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指望谈判会迅速地取得结果。因为中国国内的形势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明确苏中两国边界线各区段的问题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一个新的关于边界的条约(以替代现行条约文件)以及一个关于边界制度的条约，以便彻底消除苏中两国间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和分歧。

从谈判一开始，苏联代表团便建议中方立即进行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遗憾的是，长达一个半月的北京谈判至今仍未取得实际的进展。问题在于，在研究关于边界线的主要问题之前中方总是试图强加给我们一系列歧视性的条件。

以所谓“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为幌子，中国人希望还在讨论关于边界实际问题之前便取得这样的结果——苏联军队单方面地从被中国人认为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已预备夺取的、苏联领土的许多区段撤军。中国的上述建议实际上是使谈判双方偏离了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地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

在拒绝了中方的觊觎的同时，我方代表坚持将谈判转入务实地讨论如下问题：关于边界和边界线的划定以及签署相应的条约。

.....在极力促使谈判成功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双方的主要分歧可能在于中国居民在苏联边境区域的经济活动方面。因此我们两国边界地区的政府应尽一切可能维持边界地区曾经有过的友好邻邦局面.....

可是，即使在这一方面中方依然没有作出应有的答复。事实上，虽然在北京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国当局仍然继续在国内施压，教唆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军事狂热，示威性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向边境调遣了部分军队、装备和弹药，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平民在一些边界地区侵犯我边境的事件。与周恩来所作出的承诺相反，中国人经常登上

一系列苏联岛屿，试图在那里建立前沿据点，并配置了一些火力点、掩蔽部和掩蔽工事。

尤其需要讲的是，北京要求签订所谓的“临时措施”——这实际是一个协议，内容涉及双方有义务不相互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

在这一最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其实质在于，我们始终赞成裁军，并准备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作出决定，直到各个国家最终都清除核武器，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核国家都同意签署这一协议。

苏联代表团依据政治局对其所制定的方针，建议双方高层达成协议并签署专门性的国家间文件。该文件将作为一个范例，以便双方最终能够同时签署一个关于边界的新条约。然而，中国人拒绝讨论边界调解的问题，继续坚持其提出的“临时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人…… [8]

同志们！政治局详细斟酌了所有这些情况并得出结论，与北京的挑衅行动相对，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场谈判。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检验中国的真实意图，并向世界公众舆论展示我们政策的爱好和平和建设性质。

从我们方面来说，出于善良的意愿真诚希望解决边境紧张局势以及其他苏中关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在当前现有条件下我们必须警惕地关注中国当局的举动。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中国领导层中的某一个人只是想以谈判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以巩固国内的体制和为新一轮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作准备。我们也必须为事件的这样一种转折做好准备。

我们应当继续开展思想斗争以揭露北京领导人理论和实践的反马克思本质。在苏共中央历次全会决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6月会议上，我们针对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至今仍没有过时。与此同时，北京的政治方针和中国国内目前的形势仍没有任何向好的迹象。

总之，同志们，谈判进程表明，中国的局势不可能像神奇的魔棒那样瞬间便使一切发生改变。只有在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尤其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下，才有可能消除中国领导人活动的消极后果。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将坚持既定的原则性政策，并将之与恢复同中国友好的路线相结

№2289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1969年12月20日)

在晚饭的时候同基辛格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早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基辛格对举行这样的非正式会谈就表现出了兴趣，他的理由是，我们定期就美苏关系问题和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我同意同他进行这样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我的谈话主要是依据10月份给苏联大使下达的关于同尼克松会谈的指示的主要内容而进行的，即继续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涉及美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施加适当的压力。同时，在会谈中我也考虑到了近来又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前不久基辛格秘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一个记者小组通报了关于尼克松执政第一年的年度总结报告)。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基辛格试图试探我们对他们各项政策的看法，想了解苏联的政策是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细微的差别。

这次会谈非常富有特色，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问道，对于我同尼克松总统10月份会谈之后到现在这段时期的美苏关系，我是怎么评价的，并且补充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事件，比如在赫尔辛基举行了预备性的会谈。

我对基辛格说，苏联方面对赫尔辛基谈判的看法是正面的。苏联方面打算继续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次谈判能够继续顺利进行下去，这是由于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以及它们给我们两国带来的后果，而且还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两个国家。我们期待美国方面也采取这种态度。我接着说，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些负面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非常警惕，比如，美国加强了在战略武器领域开展的工作(我援引了报刊的一些报道，并举出了一些事例)，这就必然会触及到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相互信任的问题，如果我们两国都希望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那么就on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向基辛格提到了我们最近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那次会谈。[当时，我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对尼克松总统开诚布公地说，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感到不满；我的印象是，尽管美国方面宣称愿意同苏联谈判，但是，美方不愿意就一些大的、整体性的问题进行会谈。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与改善美苏关系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违背了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宣言；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警惕，也不能使双方相互信任。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打破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在过去形成的)，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消除国际危机、解决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那么，在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需建立起信任关系。]

我对基辛格说，自从我们上次同尼克松总统会谈以后，发生了一些积极的现象。除了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之外，美苏两国相互配合，都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就不在海底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达成了协议草案，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愿意批准关于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公约，尽管这份声明附带了许多保留条款，顺便说一句，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还反对这些保留的条款。我补充说，然而，总的来说，如果要开诚布公地说，那么我作出的上述评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美苏关系的现状。

基辛格向我保证说，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总统个人也希望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希望相互能够理解对方的目的。之后，基辛格请我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提出的后一点意见，即，正如我们所认为的，美国方面的某些行为与美国发表的关于改善美苏关系的声明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这一点，我举出了以下一些例子。

——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尽管北约的一些成员国——西欧国家理解并支持这一建议。

——苏联方面向美国政府提议(苏联大使同罗杰斯在北约例会前夕举行的会谈 [9] 中提出的)，就召开全欧会议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就欧洲事务签署联盟协议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政府对于这一提议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在布鲁塞尔还公开发表反苏的冷战言论，而且，在北约例会上美国代表团坚持在公报中谴责苏联，反对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为紧张的时候，

上届美国政府也没有这样做，然而，尼克松政府又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需要呢？尽管现在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捷克斯洛伐克坚持了下来，并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可靠的、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只是由于西欧国家的反对，才阻止了美国把反苏声明写入北约的联合公报中。

——尼克松政府公开反对美国国会的如下希望：使美国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贸易自由化。即使国会中的一些保守党成员最终也认为，对苏联实行的贸易歧视政策明显不利于美国，并且认为应当改变这一政策。因此，国会认为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一些修改，尽管白宫坚决反对修改这些政策。就此不能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尼克松政府开始广泛地宣传说，要采取措施放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范围。

——美国现政府加强了“美国之音”的敌对活动。而每当我们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事实上进一步加强“美国之音”的活动，增加敌视苏联的节目，向苏联派出一些特别的人员，使用相关的设备来检验这些节目在苏联各地的通透性。

我顺便也指出了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一些关于苏美领导人可能举行高层会谈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尼克松政府的个别高级代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而作的秘密报告写出来的。

然后我举出了一些关于越南问题和调解近东问题的例子，举出了一些关于美国图谋分裂东欧国家，离间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的例子，等等。

当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基辛格直接问我，莫斯科是否很“关切”尼克松总统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补充说一句，尼克松总统不希望引起莫斯科的这种“关切”)。

我回答说，对于这次访问，莫斯科没有任何的“关切”。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它们共同审议和解决它们所关切的问题，有时它们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暂时还不一致。总之，社会主义大家庭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对此都很满意。我对基辛格说，至于您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问题，莫斯科当然不能容忍美国政府的这种离间行为，这事实上是在离间罗马尼亚同他的邻国的关系，如果公开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比，这实际上是在离间他们。对于美国来说，罗马尼亚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尽管当时尼克松总统曾主动说，美国必须理解东欧的特殊地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了华沙条约组织。

最后我对基辛格说，因此，这涉及的不是莫斯科“关切”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是涉及了一些令人警惕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涉及对美国的行为和对尼克松总统的信任问题。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最终必定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再次强调说，如果我们确实想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想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那么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正如我刚才对美国方面所说的，苏联愿意向这方面努力，但是这还要取决于美国方面。

然后我对基辛格说，我现在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开诚布公的，这是他自己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要求的。

在会谈中我谈话的语气都是平静的，始终是务实地澄清我们所提出的那些事实，而不是显示我们的恼怒或者对他们那些行为神经过敏的反应。

在稍作停顿之后，基辛格说，或许，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美国方面的一些行为确实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在他看来，关于信任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巩固和发展这种信任关系，及时打消对另一方行为的误解。

基辛格强调说，不管怎样，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这些话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想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另行再谈论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进行的谈话中，基辛格再也没有对我所举出的那些事例进行评论，只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下一次会谈”。他只是谈到了两个问题。

报刊有时候会就苏美举行高层会谈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作出错误的报道，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记者们喜欢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确信，白宫的官方代表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当记者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给出一个答复：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能够举行这样的会谈，而尼克

松总统也确实希望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在会谈之前应该做好仔细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会谈结束的时候能够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

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一些自由贸易的新法案，尼克松政府表示了反对。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企图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这一法案的一个条款上：如果政府拒绝就一些商品和产品(其中的一些商品和产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出口发放许可证，那么政府应该在每个季度就此向国会进行解释。根据基辛格的说法，政府在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的时候，都会谈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政府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随后基辛格对这项法律草案作了解释，并对尼克松政府反对这项法律草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是总的来说，他作出的这些解释显得不太具有说服力。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整个过程中，他还就其他个别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如果对这些谈话还要加以关注的话，那么，还应该指出如下几点。

关于欧洲事务。我直接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些问题：尼克松政府是否承认欧洲的现状？是否承认现在的欧洲边界？这些边界是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正如我们从上届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负责代表那里所得知的，美国当时是承认欧洲的现状，承认这些边界的。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同其前任的政策一样。

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时在布鲁塞尔反对关于举行全欧会议的想法，罗杰斯认为，这种想法会导致现状的巩固(其言外之意是，美国政府不承认欧洲的现状)，并以此来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对于这一问题，基辛格无以为答，只是说，他上述所说的话仍然有效。

基辛格提议，在同我进行下一次会谈时，我们再就一些欧洲问题进行详细的会谈。

在同基辛格就欧洲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我采取的方法是，不给基辛格留下如下印象：我们承认美国完全是个欧洲国家，或者我们试图同美国一起解决欧洲问题；同时我们承认，根据波茨坦协议和盟国间达成的其他一些协议，美国对和平调解欧洲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

关于越南问题。同上次会谈不同，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很少提及越南问题，他只是说，“越南问题越南化”的进程非常顺利。他补充说，他们不排除他们的对手在今年冬末或明年春季的时候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司令部向白宫“坚决保证”，美国军队会打退这样的进攻，并将会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我说，美国报刊上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进攻不是立刻发动的，而是在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发动，届时，美国的大批军队将被召回，西贡军队对于这些进攻不能予以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对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这是尼克松政府最大的一项难题。“越南问题越南化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或许主要的风险也在这里，但是，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使白宫没有其他的选择，第二，美国政府将进行努力，使西贡军队具有完全的战斗力。

我简要地重申了我们的立场，重述了我们对他们现在实行的政策的看法。基辛格只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这一政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尽管这一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他们还将实行这一政策。

中国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出的一切外交试探都没有反对苏联的图谋。华盛顿非常清楚，在尼克松执政的七年时间内(他们的出发点是，尼克松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要比中国强大。因此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相对中国而言，必然会更加关注苏联。

同时，尼克松政府也想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因为不能忽视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在70年代中国的作用将会逐渐增长。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长远的打算，而不是出于短期的考虑。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使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但是他们很清楚，这些措施在实践上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这些措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显示华盛顿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无论北京领导人作何反应，他们都将继续采取类似的措施，他们希望，北京领导人的态度能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毛泽东死后，希望美国的这种“善意”最终会有所收获。

美国国内政治状况。基辛格非常详细地向我解释了美国的国内状况。他的意思是：在越南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国

内舆论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国民情绪正在向有利于尼克松政府的方向转化。尼克松认为，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将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他的这种自信是有理由的，除了1968年支持他的那些选票外(他相信还会拥有这些选票)，他还会另外得到部分保守党选民的一些选票，而这些人以前是支持华莱士的(这些选票有1300万)，因为尼克松已经顺利地夺回了美国南部的最后一个选区。民主党暂时还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能够吸引选民的纲领。

根据我们的观察，应该说，基辛格的这些分析比较贴切地反映了美国国内现在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国之前，在同尼克松总统在加利福尼亚会见的时候，他还能同我进行会谈，再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3, п.426, д.1, л.25-33

1970年

№1041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1970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70年7月29日会议第104/1r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1970年7月29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1项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同意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1970年7月16日的报告所阐述的建议(附后)。

附件：

机密

关于第104号记录第1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1967年12月26日决议第39/4c号)，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编撰整理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该书是在对历史资料，包括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进行全面的 research 基础上，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真实面目的第一次尝试。

由研究所编制整理的《简史》一书，包括了自1921年到1970年期间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兴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一系列特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反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根源。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利用这个特点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的宣传，破坏共产党人队伍中的团结统一。毛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吹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寻找论据。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极端必要性。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简史》一书中，揭露了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伪造，表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其胜利事业的贡献。

《简史》一书中的材料，对于我们党在揭露毛分子的反列宁主义政策的工作方面，将提供无可怀疑的帮助。

我们认为以下是适宜的：

——支持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管理处的关于在《真理报》出版社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建议，发行量为3000份；

——委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以现有的材料为基础，考虑一些意见，在一年期限内编撰整理好《简史》，在征得中央委员会同意后，供公开出版。

C.特拉佩兹尼科夫

O.罗满宁

Ю.斯克利亚罗夫

P.乌里扬诺夫斯基

1970年7月16日

第15Д1252号

ЦХСД, ф.4, оп.19, д.584, л.12, 53-54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1970年8月28日)

摘自И.С.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0年9月4日

第53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记录

1970年8月28日

我们应邀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会谈。

1.范文同通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前往苏联和中国。该代表团受委托与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讨论一系列关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局势的重要问题。越南总理强调，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有一些话需要对苏联同志说。另外，越南代表团也要提出关于苏联在1971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问题。

据范文同讲，与以往不同，这次以主要为了讨论经济问题而派遣的代表团的领导人不是黎清毅，而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昆。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此次(越南)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访问活动应当保密，而由阮昆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的的活动则可通过正式渠道。

至于代表团的行程期限，据范文同的通报，越南方面觉得安排在9月后半期比较合适。对此，他表示理解，最近越南方面一直在等待中国同志的答复，并向后者也通报自己的计划和希望。

在会谈结论时，范文同留下了一封希望转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的信，即关于请求苏联在1971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我们)答应会立即向莫斯科通报上述情况 [10]。我们又说，正如越南同志所知，苏联正有计划地给予越南人民全面的援助。至于此次越南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行期，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苏方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上述声明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之后再作答复。

接下来，我们主动提出了关于苏联对越经济援助的利用效率问题。我们说，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河内代表的统计，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集中了大量苏联为越南90多个工业企业和其他工程项目提供的设备，而且其中一半项目需要由苏联帮助建设。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已被闲置了不止一年了。鉴此，我们建议越方，在上述工程项目的建设方面理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便能够使这些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之后，范文同说，他们也正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仍需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在上述那封希望由苏联大使转交给柯西金同志的信中也部分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对范文同说，苏联专家可以给予越方所需帮助。

2.根据中央的委托我们向范文同通报了柬埔寨的有关情况。在表示了谢意之后，越南总理说，上述信息很重要，越南同志有可能借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获得的事实和结论加以核实。苏联同志所讲的多数情况均与越南所掌握的资料相吻合。另外，按范文同的话说，该情报还包含了一些新的他们并不掌握的信息。例如关于美国向朗诺政权提供军事和

经济援助等。对此范文同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关岛主义”，但他们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

3.在随后的会谈中，还涉及苏联与联邦德国所签署条约的问题。越南总理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积极方面”对待该条约，并已在越南报刊上表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他继续强调道，无论西德人对过去的25年历史如何闪烁其词，他们终究都要到莫斯科来并与苏联签署该条约。这体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过，范文同也认为，今后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西德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不放过任何“对其施加压力”的机会。

我们回答，苏联清楚帝国主义分子的恶习——总是极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苏联与西德签署条约只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分子实现自己的侵略企图。

4.我询问了越南总理对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感受，对他谈了关于我们筹备苏共二十四大、苏联的农业丰收和收割运动的过程等情况。

在听取了我们的通报之后，范文同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并带着极大的兴趣看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农业问题所作的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和外交部副司长拓友康、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М.Г.波德戈尔内。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谢尔巴科夫

ЦХСД, ф.4, оп.62, д.489, л.150-152

1971年

№2290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1971年1月9日)

1月9日基辛格在我们大使馆对我进行了访问。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特地从加利福尼亚赶过来停留一天的时间，以便在我返回莫斯科之前同我进行会谈，使我把尼克松总统的一些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人。

第一，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表达了尼克松总统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大楼爆炸一事深深的遗憾，他们坚决谴责这一野蛮的行为。

尼克松总统请求秘密地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委托美国司法部部长米切尔亲自处理关于苏联大使馆遭到攻击一事，并提出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米切尔下周开始就会很快处理这件事情。

我对基辛格说，我们将等待具体的结果。

基辛格还向我通报说，在尼克松政府的鼓励下，欧洲的一些主要组织都对激进分子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第二，基辛格然后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在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想法。他说，在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的两天时间里，尼克松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对苏美关系的现状及其今后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总统请求向苏联领导人转达如下的话。

苏美关系的现状现在还不算好，莫斯科无疑也会这样认为。一些问题造成了苏美关系今天的这种状况，对这些问题进行谁是谁非的争论毫无意义。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有改善关系的前景，如果有这种前景，那么具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苏美关系。

总统个人的看法是，尽管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2年美国将开展总统选举运动。正如美国以往的经验所证明的，通常在总统选举期间很难指望进行一些重大的国际谈判，因为任何

一位总统及其政府通常都会把他们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国内事务上。

因此，实际上只有1971年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将决定苏美双方能否通过它们之间相应的谈判成功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其结果也将决定苏美关系能否在总体上得到改善。

尼克松提出了目前苏美在各方面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且还尽力考虑到莫斯科在哪些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之后尼克松总统请苏联政府对如下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现在是两国关系中的首要议题。当然，还应当包括近东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说。

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尼克松总统还考虑到，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的，这个因素对苏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辛格暗示苏联即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而美国要举行选举)。

尼克松总统的具体设想随后再说。

第三，近东问题。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前不久苏联就近东问题发出的呼吁，这份呼吁是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他的。

关于这份呼吁，尼克松总统想确认，苏联方面对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话的印象是否正确。

他们(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对四大国大使最近在柏林举行的会谈过程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对苏联方面在12月10日的会谈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拉什(Раш)在送往华盛顿的报告中对这些报告曾进行了评价，拉什认为，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现在他们不同意拉什的这种评价。拉什过于匆忙地得出了结论。他们现在认为，尽管苏联还没有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如果苏联方面同意的话，尼克松总统愿意使苏美双方都严格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预先交换意见，以便双方事实上能够立刻确定，四大国大使在近期将要举行的谈判中能否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从各方面判断，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

是有的。但这还需要双方核实一下。事实上美国方面的立场可以被简单地归结如下：苏联现在关注的问题是削减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重申了他对葛罗米柯外长所说的话。此外，他还要说，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愿意接受任何得到联邦德国赞同的立场，他们知道，苏联代表同联邦德国代表已经直接开始就这个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及其盟国最感兴趣的首先是运输和通道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问题是时而造成紧张的根源。但是尼克松总统个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将来签署的任何一项协议都要使他作为签署这些协议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从“另一方面”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总统现在担心的是：在某一时刻会出现困难的局面，比如，因为通道问题。后来应该怎么办呢？苏联方面那时就可以说：请找民主德国政府去吧。然而他很难向乌布利希抱怨，或直接向他请求，特别是还要考虑到日益临近的美国总统选举。那时，尼克松的竞争对手们就会指责他签署了诸如巴黎协议这样的协议。

尼克松总统同时想对我们说，他首先想确保国内战线，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苏联给予他签署协议的保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他再向苏联寻求帮助，对于作为总统的他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作为总统，他不反对德国人就他们感兴趣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他非常希望四大国随后能够给予某种保障(对于美国来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只有苏联方面的提供的保障才是重要的)。比如，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关于四大国对近东问题进行保障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这无论怎样也不会限制埃及和以色列的主权。民主德国的主权问题也属于这样的问题——尽管两者还不完全相似，美国根本就不打算侵犯他们的主权。

主要的问题在于，找到签署这样的协议的相应的形式。美国方面还没有准备妥当的、可以使大家都接受的这种形式的协议。但是他们准备同苏联方面一起找到这种协议(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顺便说了几句话，其意思是：他觉得，最近在12月10日苏联就过境运输问题提出的建议暗示了怎样打破在民主德国问题上的僵局的办法：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当时苏联谈到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基辛格没有继续谈论下去)。

基辛格补充说，当然，在双方事先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可提出他所关心的、要在四大国柏林谈判过程中讨论的任何问题。

基辛格说，根据他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建议(上述提到的建议，苏美双方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交换意见)，那么这种交换意见的时间将不会超过一个月。为了使双方达成协议，这些时间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随后在四国大使会谈中进行，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

基辛格接着补充说道，经尼克松总统同意，他打算在一个星期之后邀请巴尔(Bap)从波恩到华盛顿访问，他本人很早就认识巴尔了。

得到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是在下周给出原则性的答复。一旦我们同意，到时候他们就会同巴尔举行会谈，对今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对我们感兴趣的那个问题——关于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将不会告诉巴尔关于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

不久四国大使将恢复在柏林举行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大使拉什(和整个国务院的人一样)对尼克松总统向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建议是被严格保密的。因此，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可以不必考虑拉什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他们请求我们注意这一点。

第四，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尼克松总统对苏联在赫尔辛基会谈中提出的立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首先签署单个的反导弹防御协定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想向苏联方面提出如下折中方案。

尼克松总统同意，首先只是就战略防御武器问题缔结和签署一份单独的协议。同时，他建议，在此之后双方马上恢复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的谈判(在签署防御武器协议的时候就要写下这点内容)。

尼克松总统提议，在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期间(关于进攻性武器)，冻结美苏双方所有类型的陆基进攻性武器。他认为关于海基战略武器的问题暂时还不要谈论：如果苏联方面认为也需要冻结这些武器的话，那么尼克松总统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在签署防御性武器的协议的时候最好明确提出诸如冻结进攻性武器协议的原则)。

还需要指出，对于达成协议所需的大致时间，双方可以进行秘密的或公开的协商，在这段时期内，双方可以在谈判中努力就某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是全方面的协议，或者是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一方面的协议。

冻结武器协议相应地在商定的时期内生效。

基辛格说，他的这些观点都是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阐述的，现在他还不能提出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具体的时间，而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如果苏联方面在原则上认可这种想法，那么到时候就讨论关于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时间这个问题。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走出目前苏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困境。尼克松总统认为，他提出的计划首先可以使关于防御性武器的协议获得突破，而他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一些建议的实质在于：在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再寻求关于签署进攻性武器协议的途径。

基辛格说，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将恢复谈判(3月15日)以便两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就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那么，就可以在这次谈判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在3月中旬之前签署相应的协议，比如，可以通过两国政府非常秘密地交换信件的形式达成协议，终结这次会谈。双方通过交流意见的形式对两国在维也纳的代表团下达指示，也有助于他们今后就其他问题进行会谈。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期待着苏联方面对这个具体的建议做出答复。基辛格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尽快得知苏联领导人对他就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上所谈的那些想法的态度非常重要：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都不知道尼克松总统的这些建议。

第五，近东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后应该恢复苏美双方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对话。

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应当在今年，也就是1971年，在调解近东问题上作出主要的努力，因为到明年，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展公开的选举运动，将对调解近东问题造成影响，也会对尼克松总统本

人造成一定的压力。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对国内的选民进行解释，但是这还是将会引起相关选民一定的不满情绪。

基辛格继续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就准备进行努力，以便今年同苏联一起通过秘密渠道为调解近东问题奠定基础，尽管看起来，这项工作将会非常困难。

他们指的是在短期内制定他们的立场，同我们恢复谈判。他们建议这些谈判首先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进行，然后在苏联大使和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之间进行。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种想法现在还在酝酿之中。

关于调解近东问题，基辛格就此还说了一些观点非常超前的话，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将会对此进行报告。

第六，越南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注意到了日本《朝日新闻》报上刊登的关于苏联总理的一段采访记，也注意到苏联总理的声明：苏联政府愿意“帮助美国人退出越南”。

基辛格还预先说明了他在非正式会谈中所要进行的谈话的内容。他说，他想“大声地说出”尼克松总统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考虑，以便苏联政府能够了解，他们同尼克松总统仍然在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越南问题。

如果河内现在或不久就针对南越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话，尼克松政府仍然将会进行坚决的反击，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现在他们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和平解决问题方面。

尼克松总统知道，撤出美国军队这个问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们同尼克松总统现在讨论以下这种可能性：

——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内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关于这一具体的时间他们将怎么对越南人说呢？

——美国可以不要北越也从南越撤军，因为河内明显不会接受南越，河内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在南越有自己的军队。

但是，北越要保证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美军撤出之后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火，这一点非常重要。

基辛格没有说出撤军的具体日期。但是，从他那刻意模糊和非常谨慎的言谈中可以使人明白：尼克松在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选举运动，这起到了很大作用。尼克松的考虑是：在选举运动的关键时期内要履行停火协议。此外尼克松还有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在撤出美军之后，南越的局势不能马上就再次恶化。

基辛格说，如果美军撤出一段时间之后，越南人之间又爆发了战争，那么最终这将不是他们美国人的事情了，而是越南人自己的事情。首先，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不在越南了；第二，尼克松政府相信，如果南北越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话，南越人不是很快就能够被打败的，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管怎样，如果“越南人自己不早先达成理智的妥协”的话，在尼克松总统的整个任期内，这场新的战争都将“困扰着”他。基辛格说的这段话非常奇怪。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接着又谨慎地表达了以下看法：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再就南越问题进行长期的、事实上是毫无成果的政治调解，因为一旦美军从越南撤出，所有的事情直接涉及的都将只是越南人自己。

基辛格的想法事实上可以被归结如下：如果美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军事上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关于美军撤出南越)，那么，那时候尼克松政府就不再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政治调解负责了。美国将继续关注越南问题，正如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其他大国一样，但美国将不再是作为“直接参与越南冲突的一方”。

基辛格特别说明，他所说的都不是什么正式的建议，而只是他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了解这一点对于苏联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越南问题将是有益的。

根据基辛格的谈话，我同时也感觉到，看起来，白宫也愿意让我们把美国人的这些想法告诉越南人，然后再以间接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河内对这一外交试探的反应。

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说，他本人愿意在任何时候恢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会谈，愿意在巴黎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

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知道，在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是否会改变立场。他继续向我通报说，他们从瑞士人那里

得到消息说，中国的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代表曾对他们说，对于召开这次会议中国的态度是比较肯定的，同时他们还说，他们不反对把这种看法告诉给美国人。

基辛格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可靠。还没有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情报的证实，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通过瑞士人传递过什么信号。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瑞士人把这件事情想象得过于乐观了。

我回答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第七，远东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说，他们打算从苏、美、中、日四方的角度对远东局势的发展作出长远的评价，他的这些谈话令我很感兴趣。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在对外政策上考虑的是：在70年代，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将在远东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到80年代，中国将会同日本竞争。使他们特别担忧的是：中日会联合起来，或组建了针对该地区某一大国的联盟。到那时候，这种联盟将是非常难以战胜的。它们已经在暗自考虑成立这样的联盟了，但是从长远看来，事实上还不需要过多地考虑这些消极因素。

第八，关于麦斯基参议员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微妙，但是，如果苏联政府现在对某些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或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苏联政府把这些建议直接告诉给美国政府，而不要通过麦斯基。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没有直接提到关于举行高层会谈的问题，尽管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都暗示了需要进行高层会谈这个问题。但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看起来是忍不住了，就对我说，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他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多勃雷宁

АВІРФ, Ф.0129, оп.55, п.426, д.1, л5-15

№1159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971年2月12日)

1971年2月12日

第3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

(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杰米切夫、鲁萨科夫、罗满宁等同志)

1.批准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团出席每年例会。代表团成员为：O.B.罗满宁、M.И.斯拉德科夫斯基、Б.Т.库利克、B.И.拉扎列夫、Б.М.佩什科夫、M.Л.季塔连科、Г.А.契尔年科等同志。

2.批准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3.有关代表团赴保加利亚的费用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附件：

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关于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谈的指示

1.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中遵循如下原则立场：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和12月中央全会决议(1969年)、勃列日涅夫1970年8月28日在阿拉木图的讲话，苏共中央关于国际部代表华沙会谈的结果的决议(1970年4月9日，第96/14rc号)，给苏联驻华大使馆下达的指示(1970年10月15日，第II180/73号)。

2.利用这次会谈就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新趋势，特别是就北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交换意见。同时在关于对华政策、对华宣传和对华科研工作方面协调立场的可能性提出建议。

3.要遵循如下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证明了上次1970年3月华沙会谈材料《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国问题》(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会议或者在与会各党书记处进行了审议)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和结论是正确的。这些看法和结论在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应当指出，对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制定我们国家对中国具体的政治路线，这对我们深化科研工作也起着重要作用。

4.在对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应当注意，经中共中央二中全会(1970年)确认的中共九大决议以及近期的一些指导性文章(例如，关于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苏联西德条

约、波兰事件等文章)非常明确地证明,当今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方针没有改变。

根据这一方针,北京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积极进行破坏、分裂的工作,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自己的霸权主义、大国主义的目的。尽管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作过一切尝试,但当今中国领导人在大喊反帝口号同时,坚决反对反帝的协同一致的统一行动,从而客观上造成有利于激活帝国主义力量的形势,并使它们的图谋转向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反攻。

与此同时,最近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力图在国际舞台上避免孤立和占据有利的地位,在策略上随机应变,给自己的政策添加了更温和、诱人的色彩。在这一新策略的范围内,他们在外表上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摆出友好的姿态,企图利用各兄弟党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而力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以达到恶化各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目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明显特点是:区别对待同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同个别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ЦХСД, ф.4, оп.19, д.605, л.3, 40-42

№1041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1971年2月12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71年2月12日会议第123/4r号记录

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送苏斯洛夫同志、基里连科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鲁萨科夫同志)

一、批准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附件)。

向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各边疆区和各州党委员会委员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相应级别的军政干部传达通报的内容。

委托苏联外交部把通报的内容通知给苏联驻外大使。

二、提交政治局审批。

附件:

机密

第123号记录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性立场，苏共中央的各种决议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多次阐述了这种原则性的立场。苏共中央委员会早些时候，也向党的骨干通报过苏中在北京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以及苏中关系的现状。

不仅中苏之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和友好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联合他们的力量，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直高瞻远瞩，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对华政策。在一贯地执行这个方针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密切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事实表明，通过耐心的工作和长久的斗争，中苏关系会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其结果应是中国方面放弃反苏、反列宁主义的方针。

在采取使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领导人准备响应苏联方面的建议并排除在恢复中苏睦邻合作方面存在的障碍，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对中苏关系的原则性立场，能够使中国领导人难以推行反对苏联的路线，有助于中国各阶层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两国之间友好联系的可能性仍抱有信心。苏联共产党的这种方针，还有利于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得到了世界各国所有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消除受中方宣传误导的一部分国外舆论，对中苏关系紧张起因的错误认识。

由于苏联方面的主动行动和中国当局的对应措施，边界局势有了几分缓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还在北京继续进行。中苏阿穆尔河流域界河航运联合委员会也召开了例行磋商会议。签署了1971年中苏两国易货贸易协定。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和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能。

但是，中国领导人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对应行动，而且举步谨慎，以便不使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遭到攻击，因为在这些决议中，反苏主义作为中国国策的一个基本方面被固定下来。因此，他们在与我们继续谈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反苏的恶毒宣传和采取旨在反对苏联的军国主义措施。

在北京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仍然拒绝讨论谈判议程的主要问题，即确定个别地段中苏边界的走向。中方继续坚持作为先决条件签署一个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其中规定：在开始确定边界走向问题的谈判之前，在中国代表声明的“争议”地段，在有些地方苏联应单方面将实际守卫的边界线，向苏联领土纵深后移数十公里。在北京的谈判中，中方力求使苏联代表团承认边界上存在“争议”地区，企图以此对大部分地段的中苏边界线的法律基础以及他们提出异议的地段属于苏联领土提出疑问。

为了力促谈判有所进展，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基于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于1969年9月2日所达成的协议之上，并考虑了中方的某些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否决了苏联的建议，继续拒绝讨论关于确定边界走向的问题，顽固地坚持签署实质上他们在一年多以前就提出的那种根本无法接受的“临时措施”协议。这就是尽管我方代表团做出了一切建议性的努力，但实质上谈判没有丝毫进展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事情有所进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于1970年7月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名义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重要的倡议。在这封信函中，我们从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路线出发，建议在北京进行谈判的同时，两国政府专门代表团就起草中苏两国关于不以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核力量相互进攻、禁止针对另一方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的协议草案，在莫斯科开始谈判。

同时，为了消除谈判中的许多争议问题，还建议以国家间协议的形式，把约占中苏边界一半以上(4300公里)也是边界事件多发地段的东部边界(从苏联、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交会

点向东，然后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继续向南)的走向固定下来。这方面有一个相应的先决条件，即1964年谈判时按工作程序几乎就全部地段达成的协议。

在这封信中还表明这样的意见：为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再次举行会晤是适宜的，这次会晤可以在苏联境内进行，信中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中方对此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宣传方面，北京继续利用存在所谓来自苏联方面的“武力威胁”大做文章，散布反苏谰言。

为了使中国领导人编造的这些谰言站不住脚，促使他们转入对作为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苏联于今年的1月15日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一项建议，建议中苏之间签署一个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导弹和核武器的合同，并将该合同的草案通过驻北京的苏联大使转交给了中方。

将合同草案提交中国政府审议时，苏联方面表示坚信，落实我们的建议，即尽快签署不诉诸武力的协议，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对正在北京进行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恢复中苏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若中国方面对苏联的新倡议给予肯定的答复，那么将会使谈判出现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中方至今没有对这个倡议作任何答复。越来越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北京仍旧希望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保留“边界领土问题”，力图通过不正当的、有时甚至是挑唆的手段，利用这一问题来达到反苏的大国沙文主义目的。

是什么原因使苏联采取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措施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呢？正如我们党的文件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其主要原因是：反苏主义现在仍然是中国现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1970年8—9月)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21周年庆典的特点，在国外，尤其是通过国内渠道继续进行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造谣中伤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报刊也加大了反苏活动的力度。仅仅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中央机关报就刊登了数百份粗暴攻击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文件。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各大城市建筑物的墙上，写满了号召进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标语。在中国，反苏小册子和宣传画册大量出版，并进行广泛传播。例如：不久以前出版了一套内容明显反苏的系列小册子，并且推荐为儿童教材的辅导资料和俱乐部及文艺活动小组演出用的剧本。影剧院也经常上映反苏内容的影片。在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中，也经常对中国居民进行反苏教育。

反苏主义和臆想的来自苏联的进攻，被中国领导人积极地用来继续进行战争宣传，准备反苏战争和加强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方面建设性的步骤以及调整两国关系方面的进步，将破坏他们的基本思想方针，即使中国人民确信，他们目前所处的困难状况，似乎都是苏联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本身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中国方面的挑唆行动遭到的坚决回击以及其后我们提出的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倡议，对组织新的冒险行动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中国领导人已开始努力摆脱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实行红卫兵外交，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的孤立境地。中国已开始积极地与许多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并得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7个国家已经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甚至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而以前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使用了这种献媚并不奇怪。

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国，转绕着中国耍起了复杂而又狡诈的把戏。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利用毛分子的反苏主义，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中国这个广阔市场上扎根。从这些强国中越来越响亮地传出一个呼声：积极“吸收中国参加世界友好大家庭”。

最近，中国领导人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很明显地作出了对外友好的姿态，许诺在贸易、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领域为其开辟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成

效，它们之间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在解决国际政治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的相互协作，明显地使中国的首脑人物感到不安。北京领导人竭力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的宣传机构不停止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挑唆性言论。对不久前发生的波兰事件，北京的表现也恰恰如此。

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看清了北京旨在分离社会主义友好家庭和孤立苏联的策略手段，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1969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给了中国首领的分裂计划以沉重的打击。确信自己将一些国家的亲华分裂小组变成政治上有影响的政党并将他们拼凑成反列宁主义派别的企图站不住脚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下了赌注：或者是把某些共产党拉到自己一边，或者是使它们拒绝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为此目的，北京的宣传机构和中国共产党官方代表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在国外共产党员面前，竭力诋毁、诬蔑和编造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以及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局势。同时，中国的活动家们还企图激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他们利用一切借口，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煽动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反苏主义情绪。

北京企图将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对抗的策略，似乎苏美正“达成一致”，“瓜分世界”，中国领导人竭力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脱离他们的可靠支柱，即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改变自己以往的沙文主义方针。

在国内，中国领导人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镇压了自己的政敌之后，目前试图消除现统治集团近年来的行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面军事化和保持“受困要塞”气氛的道路上，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军队在国家中仍然占据关键地位，是当局的重要工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旧盛行，个人统治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定下来，目前国内正在讨论该宪法草案。当然，这对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

中方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与苏联代表直接接触时虽然口头上宣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仍然强调说，中苏之间在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目前，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与我们为敌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苏联与中国国家关系的调整及其正常化，不得不在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条件下争取实现。

苏共中央认为，在向党的骨干通报目前阶段中苏关系的状况时，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与中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长期方针范围内采取实际措施的同时，必须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衅采取应有的措施，还必须持续不断地与中国领导人反列宁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这项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同核心是反苏主义的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继续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创造牢固的前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ЦХСД, ф.4, оп.19, д.605, л.13, 43-50

题(1971年3月17日)

摘自B.A.佐林的工作日记

1971年3月29日

第31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法国代表团总代表武文松的会谈记录

1971年3月17日

今天会见武文松作礼节性拜访。

1.在举行的会谈中，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度评价苏联对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给予的援助与支持。

武文松指出，根据越南同志的看法，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遭到挫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侵略，等待美国人的只有新的惨败。而尼克松放弃“实力政策”，那么政治协调的大门就会是敞开着的。在指出尼克松政府企图利用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武文松说，这些飞行员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被俘的，如果有必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对美国施加压力，让全世界都看看美国人在北越领土上所犯的罪行。

2.武文松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与法国发展合作，不过他强调这不单取决于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相关的是法国仍坚持戴高乐确定的立场，尽管现在法国政府的立场不十分坚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的。他表示赞成继续与苏联共同努力对法国的立场施加影响。

3.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代表团总代表说，周恩来是在印度支那冲突危险尖锐化的时刻访问河内的。越南同志向中国代表团陈述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他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同意这一估价。

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援助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美国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因此，中国人民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能够保住自己的独立，准备给予必要的支援，不惜作出牺牲。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1971年补充援助。

据武文松说，越南代表团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并希望沿着这个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接着说，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是全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苏采取共同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在国家间进展，这有助于在援越问题上苏中协同行动条件的成熟。

武文松肯定地说，中国人在河内的会谈中向越南同志指出，在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方面，中国和苏联的行动并行不悖，中国表示完全愿意保证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运输通过本国的领土。

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既符合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也符合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

武文松说，党的代表团，就他所知，将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首，即将前往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向苏共领导人全面通报印度支那的形势。

从我们方面，提请武文松注意，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我们强调指出，苏共中央与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全面的支持。我们向会谈对方表示，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准备与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武文松称，越南劳动党的领导高度评价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上，驻巴黎大使馆给予越南同志的帮助，并希望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将持续下去。

№2290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 苏三极格局(1971年5月10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在白宫对他进行了访问。

1.基辛格说，巴尔同法林大使进行了会谈，他想知道，今天我们是是否从巴尔那里得到了关于他们对所提出的新的立场进行的一切必要的解释：在就柏林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之前，注重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得到这些建议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对他们的呼吁是否作出了答复，因为，正如他们已经向我们通告的，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很快将举行会议，如果苏联政府对这次会议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同联邦德国代表一起提出相关的建议，让西方大国进行审议。现在，我们的答复对于他们为此会议制定相关的指示非常重要。

我提醒他说，我们已经同意了关于苏联、联邦德国、美国代表在波恩举行会谈的建议，并建议在四国大使柏林会谈之后举行这次会谈。我接着说，就我所知，关于美国就西柏林举行谈判问题的“新立场”，巴尔尚未完全阐述。

2.基辛格问道，对于他们最近就导弹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莫斯科是否有什么反应。我回答说没有。

3.然后基辛格说，他想简短地谈一下中国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期待着在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能够提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自己认为需要向我们强调一点，这一点对苏美两国政府今后的关系非常重要，即美国的一些报刊出于反苏的动机不时地在操弄舆论，他们关于尼克松政府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些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基辛格补充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在4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需要就这件事作出特别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当然，他们非常清楚，中美“乒乓球事件”以及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员的接见，是中国对美国作出的外交姿态，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同莫斯科继续进行竞争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他们也不愿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不可避免，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一事实，他们今后将继续在美国—中国—苏联“三极体系”的框架内发展这种关系，并会考虑到日本因素。

同时，基辛格还援引尼克松总统的意见确信地说，他们愿意同中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反苏的基础上开展这些对话的，他们在中美关系领域有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希望恢复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这将有助于越南问题的逐步解决，还可以向日本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最近日本在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方面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

最后基辛格强调说，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在他执掌白宫政权的这段时期内，决定国际局势最为重要的因素仍将是美苏关系，而不是中美关系。这完全是国际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他们应当考虑这一点。

我不愿过于详细地谈论关于中国的所有话题，同时，我也简短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基辛格说，他们的这些保证将会被转告莫斯科。接下来我强调说，如果美国想因此打苏联牌——而他们企图打苏联牌的征兆还是有的，那么我想事先公开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基辛格回答说，白宫非常清楚这一点。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感觉，最近华盛顿同北京之间正在进行调情，白宫是希望以此来平衡苏美关系，但是他们还非常谨慎。我们知道，根据国务院和白宫的政策，他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使苏联围绕中美关系的预测而进行的议题更少一些。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1, л180-182

题的任务(1971年5月21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绝密

文本第5份

1971年5月21日

第302号

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
所面临的任務

(政治信函)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极为关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就个别国家的问题做出特别决议，还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问题由苏共代表大会做出特别决议，这是第二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这一切表明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在苏共的国际活动中占有何等地位。对于我们，重要的是预见印度支那所有事件今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能对这一地区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也确定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纲领，促进印度支那的政治协调，在武装斗争中与和平劳动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然能够得到苏联兄弟般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共二十四大有关印度支那的决议向我们指明，现在越南劳动党在自立的道路上已经强大巩固，党的路线总的来说(虽然尚为缓慢)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拥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确立我们的政策。并不排除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何况除越南而外，在这一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更可以依靠。

关于我们目前在越南具有较为有利的前景这一点，可以越南劳动党

近几年在其立场中所发生的两大进展为证。第一，自1968年起，越南劳动党不无成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第二，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进步。

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我们将来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实施我们的路线有可能会容易些。这个地区是各种最为对立的影响与倾向的焦点，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都是绝不应该的。何况，越南劳动党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中，还有许多尚待克服的消极方面。

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极度紧张状态，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力量为一方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首先是印度支那各国的反动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范围的扩大。如果事态仍然继续朝1970年和1971年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越南劳动党未必能够长期顶得住那样的战争速度与规模。印度支那其他解放力量(越南南方的、老挝的以及柬埔寨的)就更加不可能承受。因此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这一点似乎已为越南同志所懂得和认清。正如黎笋同志指出的，在现阶段，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西贡入侵老挝的军队于今年3月受挫之后，军事行动似乎消停下来，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却又活跃起来。

在巴黎，朋友们对停火和战俘问题作了若干说明。老挝各战斗力量之间已经恢复了联系；越南同志已经与西贡政权的某些人士建立了接触。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在1971年再次撤军10万人。如果事态真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战争激化危险性就有可能减弱。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人滋生着一种黩武情绪，酝酿着在1972年给予“决定性打击”和“推翻尼克松”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重新激化。

目前，在印度支那已经形成了各解放力量斗争的统一战线，覆盖着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全部疆土。这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100万人的武装力量。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尽管斗争因而大大复杂化，并给印度支那所有解放力量造成了严重困难。虽然1970—1971年的军事行动仅在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展开，但是越南同志认为主要战线是越南南方，因为在那里对峙着斗争各方的主要力量。

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在顶住柬埔寨与老挝境内的军事压力以后，在1970—1971年“旱季”的结束阶段给予越南南方北部诸省、下寮和柬埔寨等范围内的敌军以显著的打击，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则改善了在战争中的地位。爱国力量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粉碎了侵略者切断“胡志明小道”的企图，从而保证了连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老挝与柬埔寨各解放区之间的交通线的相对安全。此外，不久前在下寮“越南化”的西贡军队的一支相当大的集团军被击溃，严重削弱了西贡军队甚至凭借美国的支持，与爱国武装力量对抗的能力。从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各个方面抵抗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支那各国，相互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分化与集聚的过程，一个各种内部政治矛盾深化的过程。在越南南方，朋友们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政治斗争，将越南南方的城乡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削弱西贡政权的政治基础，达到孤立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并将其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目的，从而在西贡建立“和平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同志竭尽一切可能粉碎“越南化”与“绥靖”计划的实施，将工作深入到政府人士、社会团体、军队中去，与西贡的各种政治与宗教派别建立接触，并安排与之合作。越南同志保持着与反对派活动家杨文明将军联系，此人目前被认为是今年秋季即将进行的南越大选中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越南朋友眼下还没有就对他的态度确定官方的立场，但是，显然认为在与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斗争方面，杨文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他一旦掌权的情况下，可以与他进行有关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越南人竭力阻止在当前执政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广泛的反共联盟（这一点美国人正在逐步得逞），并竭力以一个由各政党和各团体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与之对抗。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寄希望于与佛教徒，尤其是集聚于安广佛塔周围的佛教徒之间的合作。

越南同志日益认识到，在敌人营垒中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于越南南方各工会组织扩展联系的必要性，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越南南方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西贡周围、湄公河三角洲等）失去控制；由于敌人实施“绥靖”行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西贡政权（在国会等）的合法反对派大多数目前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持相当保留态度更谈不上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朋友们遭遇到大量非常

严重的困难。反对派只赞成在支持西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同时与阵线对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积极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活动，给予他们政治与物质的援助，保持与他们的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关系近年来在以越南劳动党、老过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间直接全面的互相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得到了巩固。印度支那各国解放力量不断增长的团结的外部表现是，在广州举行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高级协商会议，西哈努克1970年5—6月和1971年1—2月，老挝人民代表团1970年10月以及宾努1970年11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些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密切协同行动显示在美国—西贡下寮战役期间。

现在，河内已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解放阵线交流意见、协同行动与合作的中心。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总的来说，承认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越南劳动党保持一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它丰富的经验和支持。然而，有时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的朋友们暗中不满。在越南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曾发生过某些分歧，例如在对待“越南化”的问题上，南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它的实施对于解放斗争的未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此类负面现象迄今未对印度支那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统一行动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支那解放运动队伍中的向心倾向无疑超过离心倾向，而这一情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越南同志维护着自己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方针，目前并不急于对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各解放力量进行组织定型的工作。他们显然对于根据党的路线与老挝朋友和柬埔寨朋友在直接合作的基础上目前所达到的相互协作的程度，对于他们在印度支那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眼下还是满意的。

越南朋友认真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它是印度支那半岛事态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加强自己影响的意图，这一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遭受到了挫折。在印度支那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企图将自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独特方针强加于人。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及时认清了北京的图谋，包括利用建立所谓“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达到自己目的意图，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一样，在其框架中，中国利益传导者以及越南人抗衡者的角色都落在了西哈努克的身上。印度支那的同志们事实上拒绝了北京和平壤建立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他们审慎地对待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一个类似广州协商会议的新的印度支那协商会议的提议，明显地回避在印度支那事务中，与西哈努克实现比现在更密切的协调与保持步伐一致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误，在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世界舞台上威望的下降，迫使北京不得不对自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方针做出某些修正。北京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和缓和某种程度的灵活，其表现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显示性地提供了一笔1971年补充援助；公开承认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是协调越南问题的公正基础，进而间接地“恢复”巴黎谈判以及周恩来今年3月对河内的访问。在北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步骤以后，中越关系似乎开始有些热乎起来。越南同志看来产生了某些幻想，以为中国人可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但是，越南人的希望很快便由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的调情而产生动摇。越南同志，把这看成可能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摩擦的开始，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施压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朋友的策略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人的达成妥协的姿态，而在对自己比较重大的事务中，首先是在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事务中，避免对他们作出让步，捍卫自己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

越南朋友在竭尽全力从军事、政治与外交诸方面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同时，也把实现这些任务与接受援助，首先是外援，主要又是接受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相联系。在苏越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道路上，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对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所给予道义政治支持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评价。他们期望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支持将会更为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也极力保留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特殊权力，阻止——至少在现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参与印度支那的协调事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越南人也就无意在与苏联交换有关越南与印度支那协调问题的意见与信息方面再向前迈出信任的一步，无意与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充分的协同动作，

尤其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

越南劳动党领导为赢得确保在尽可能充分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有利国际条件，将其对外政治活动的目标，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停止印度支那半岛战争的斗争统一战线。越南同志为达到自己对外政治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社会主义各国的声望与支持，并竭力将世界的，尤其是已解放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同情争取到印度支那解放运动这方面来，并促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站到自己这一边。越南人明显地扩大了与国际上民主公众组织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各不同阶层中也开展着一定的工作。

越南朋友的主要要求是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南方。由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反对，因此，越南人就将自己的全部努力放在敦促美国人宣布彻底撤出自己军队的日程表上。美国人为确定准确的日期提出了先决条件，即停息在越南南方对美国军队的战火，开始与美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以及讨论战俘问题。越南方面迄今为止提出的是，在197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现在朋友们提出了更加建设性的建议。看来，如果现在另外确定一个较晚的期限，越南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确定这样一个日期的事实本身。可以设想，朋友们也完全可能同意，将美国撤军的期限定为半年甚至还更长一些。

越南同志的一个原则性要求是，将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排除于政权之外，因为这个集团被认为是不适宜于与之就协调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当然，西贡政权将会有类似杨文明将军这样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导致在越南南方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承认致力于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准备与之进行有关在南方组建以三方(三分之一为爱国力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三分之一为现政权的各界代表，三分之一为中立的政治与宗教派别的代表)为基础的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临时政府可以安排越南南方的大选，然后再把政权移交给“正式的联合政府”。越南同志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希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在越南南方合法化之后，随着临时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把越南南方相当多的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大选的结果又会导致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期，越南北方和南方将会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建立起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进入关于国家

统一的谈判。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期内，越南就不得不保持分割状态，这是对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大选之后立即统一国家这个基本原则之一所作出的瞩目让步。

越南人对于自己同意停火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的日期；另一方面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西贡政府之间排除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就组成“临时三方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此时，与美国军队停火和与西贡军队停火是分别进行的，因而预料可能出现越南南方的交战行动仅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西贡部队之间进行的局面，例如，在美国人单方面停火，撤出交战行动的情况下。

越南人把讨论战俘问题与达成停火协议联系在一起，放在美国宣布全部撤出自己军队的日期之后。双方都特别看重美国战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和在越南南方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俘虏的军事服务人员。朋友们认为美国人是犯下反越南人民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战俘地位表示怀疑，显然要释放这些美国人，将取决于对监禁于越南南方集中营和牢狱中的所有政治在押犯的大赦以及对轰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失的赔偿。

越南同志原则上承认在越南问题协调过程中国际监督与观察的必要性。这一点可由他们对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态度证明。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尽管其活动现在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越南人强调应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协议已不能反映目前越南出现的形势，在当前局势下，个别问题甚至可以不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办。

越南人并不排除以后再召开类似1953—1954年关于越南或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它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政治协调的实施。在将来也不排除召开印度支那各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会议，以协调地区问题。然而目前，朋友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协调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样的会议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赞成召开那些能确保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和谴责美国侵略的会议。

越南同志也反对让联合国参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越南问题在政治解决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可能出现在印度支那对协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有利的局面。显然，老挝问题的解决在回到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道路上将现实可行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由苏发努冯在今年5月致梭发那·富马信中提出的老挝爱国阵线关于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的两点新倡议是经受得住检验的。至于在柬埔寨的协调，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在很多特征上将是与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协调相似的。越南同志支持老挝爱国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老挝与柬埔寨进行协调的纲领，但是在现阶段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老挝或柬埔寨先于越南达成协调。越南同志极力强调没有越南的协调就不可能有老挝和柬埔寨的协调。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随着越南问题的解决，将有可能讨论那些在他们看来目前还仅具有“理论兴趣”的问题：在东南亚组织国际关系的新体系；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中立化；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建立无核区等等。对于我们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同志也持相似的立场，据可能的判断，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对当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要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要历经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和谈判。迄今为止，各方都拒绝一切由对方提出的政治协调倡议；由于各自立场的重大差异，双方眼下都无意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而唯有在具体步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

以下陈述几点导向性及实践性的意见：

1. 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国内对我们不友好的势力也活跃起来，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也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应当成为本年这一趋向的重大事件。

2. 近些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独立自主的倾向、探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越南具体实践更正确结合起来的倾向日益增强。例如，在文化领域正进行着独特的越南化过程，亦即是清除那些贬低越南文化、民族尊严和独特风格的毫无用处的中国和法国积淀。越南劳动党日益坚决贯彻执行加强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这种意向我们看来必须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当然，个别情况也存在着发展成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但对此可以进行斗争。

在这方面，对于越南同志来说最为敏感的当数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明说，越南劳动党作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解决涉及这些国家的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既应独立自主，同时又应与老挝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密切结盟。

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肯定，越南劳动党依靠苏联顶住了中国领导人的粗暴压力。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表面上同意越南劳动党关于在越南协调的纲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当然，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改变越南劳动党的方针，使之朝着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企图。从去年春季起，他们变化策略，开始向越南人送秋波。即使这样，中国人眼下也还是没有捞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前，毛派分子又给越南同志上了新的一课，毫不顾及他们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人亲近的步骤。越南人不便公开反对中国人的这些步骤，但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用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对他们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3.认真考虑一些新措施以提高和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合乎时宜的。例如，在东南亚的宣传问题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援助；安排在外交部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地交流关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形势的信息，而在党的层次上则可以交换有关东南亚各共产党内部状况的意见。交换意见与信息的结果便可能产生越南劳动党有能力付诸实施的建议。

最近一年，越南同志以谨慎的形式重新提起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有关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论点。这个问题是极其微妙的，但未尝不可将它利用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

4.在整个战争期间，越南同志都在致力于实现建立支援越南人民、而现在已包括支援整个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为此比任何其他人，其中包括越南人自己，做得都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这个团结的战线。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越南劳动党应该摒弃在筹备世界反帝大会这件事情上的旁观者立场。这方面还应对越南劳动党另外再做一些工作。

5.至于进一步帮助越南劳动党消除模糊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是错误观点的问题，则应当更积极地吸引其他兄弟党来做这一工作，更密切地协调我们的行动。目前，华沙条约各国已协调了支援越南人民斗争

的共同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不同点。越南人虽然谨慎行事，但确已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事情的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幸的。

6.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的其他形式领域内，大使馆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谈某些个别的意见。

我们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加强苏联在越南地位的巨大杠杆之一。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由短期(每年)援助朝着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的任务。我们已经积累了在越南进行经济活动的经验，制定出了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只是希望我们参与援越的经济组织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不要让经济与技术的援助脱离政治路线。我们已经用解决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充实了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这是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对我们来说合乎时宜的事情显然就是继续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武装力量建设。对这一问题正在准备国防部层面上的个别建议。

7.根据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给印度支那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号召，就更加要求加强我们对印度支那军事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影响。必须努力使越南同志充分懂得现在应该设法阻止战争的激烈化与扩大化，政治协调已经是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在其他各点中)将展开这一基本论题。在这方面，苏联党政代表团即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有许多事情可做。

8.如上所述，越南同志已着手蓄积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难道就不会适得其反吗？我们认为恰当的办法是委托驻美国大使馆、近邻和远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表我们的意见。越南人冒的风险太多、太大了。

9.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向越南同志阐明，在反击美国侵略的同时，必须将事态引向协调；始终将外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制定解决

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倡议和途径的过程中，似可与越南人讨论将美国撤军问题与建立越南南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区分开来的合理性。一系列迹象表明加以区分是明智的。这样的划分以及制定各个别纲领所提出的每项任务的实现途径，似有助于推进以和平手段进行协调。

10.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与以临时联合政府更换西贡政权的任务似可分开解决，根据可能甚至无需美国人参与，而作为越南内部问题处理。既然在西贡政权的领导人物中间出现分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倾向于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那么以越南自己各方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为基础，就协调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就一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同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秘密会晤也不无裨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在这类会晤中，可以讨论诸如停火、战俘、美国撤军之类的问题。

11.考虑到(今年10月)南越总统大选，需要劝说朋友们提出和平、消除美国霸权以及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新纲领。这会有助于在大选中动摇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地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7年的纲领已被遗忘，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过时，而众所周知的十点纲领又尚待进一步确切说明。

12.越南同志似乎开始明白，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抛弃了停火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们稍为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劝告同志们自己拿起停火的主张以用于武装并且更加明确地对这一主张发表意见，此时可动员起新的力量以支援协调。

13.当初越南同志说，他们在一定阶段愿就从越南南方撤军的问题达成对等的协议。这个问题是协调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可能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以某些方式让美国人了解这一点，从而促成美国撤军。

14.似也应考虑一下就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新步骤。例如，在对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获得相应赔偿的条件下，为换取在西贡的政治在押犯，可允诺摘除俘虏的罪犯标签，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用在他们身上，并保证在达成协调时释放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15.近几年来，越南同志已不再反对利用联合国讲台揭露美国在印度

支那的侵略。似可以就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利益，扩大利用联合国的问题交换意见(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集体控诉和谴责美国的决议案)。

16.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与老挝人民党和爱国阵线以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接触。这些党接近越南劳动党并形成东南亚的兄弟党群体，在很多问题上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相一致。

应建议越南同志鼓励柬埔寨朋友过渡到不仅利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而且也利用其他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形式的策略。

17.显然还需要与越南人就现在如何对待召开类似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新国际会议的意见交换看法。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对召开新日内瓦会议的意见也不宜断然拒绝，在将来，那样的会议可能会有好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一定阶段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达成政治协调，就必然要求国际保证，而这一点只有一个有关国家参与的会议才能办到。

18.就印度支那各种问题在高层与越南同志进行详尽商谈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此，在这种例行会晤中，妥当的做法是，协商一致，责成双方外交部进行会晤并讨论整个范围内的问题，交换信息与意见。此时，正如早先多次强调的，越南同志应自己作出决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行动。

19.在与越南同志的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在印度支那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的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再一次得到苏共二十四大令人信服的确认；后者则由近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意欲接近美国的明显迹象所证明。但是，当然，始终应当考虑到越南人的微妙处境。在这方面有两条措施值得注意，必须一贯实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人通报苏中关系的状况；请越南劳动党继续起到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谢尔巴科夫

No22907 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1971年6月8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在尼克松总统的城郊官邸戴维营举行。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希望能够平静地就两国关系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行“全面审视”。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阐述了我们就相关问题的一些立场。如果对基辛格的谈话进行简单的总结，那么这些谈话可以被归结如下：

1.基辛格特别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希望改善同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

2.关于这个问题他首先援引尼克松的话说，要就柏林问题“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他们提出的在波恩机制(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的框架范围内交换意见。基辛格援引尼克松总统的话说，关于柏林问题还有2—3个条款没有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愿意听取我们对这些没有达成协议的条款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努力在德国总理勃兰特对美国即将进行的访问之前达成妥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于周二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同巴尔和拉什大使进行会谈，专门商讨那些尚未达成一致的条款。总的来说，对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们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甚至同意在北约最近举行的一次例会的公报中声明说，今年有望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详见以下的第11项内容)。

3.苏联和美国就协议的重要条款事先进行秘密的协商促进双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或达成协议的前夕，可以解决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正如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葛罗米柯所说的那样。

4.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约最近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包括就欧洲裁军问题发布了公报，其目的确实是为了赢得时间。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讲话以及这些讲话引起的广泛反响，使华盛顿有些措手不及。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指示，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便制定出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在

4—5个星期之后，这个委员会将会向尼克松总统提出建议。在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赞许之后这些建议还要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协商。到那个时候(大约在9—10月份)他们将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

5.基辛格表示，希望苏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能够逐步深化。按照尼克松总统的指示，他们对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持肯定的态度”，这些要求是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

6.基辛格事先向我们通报说，最近几天他将秘密地飞赴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政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举行秘密会谈。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他不能再作出更大的让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没有立刻对这些建议进行批判(他们过去通常都是马上批评的)，但是他对基辛格说，他们需要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并且将会把这些建议报告给河内。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想把他们采取的这些步骤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7.明天，也就是6月10日，美国将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的限制。但是，相比那些允许向苏联出口的商品来说，允许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将会受到广大的限制。或许，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条款将是，在向中国出口粮食方面将不再使用至今仍然适用的规则：50%的粮食应该用美国的船只运输(美国船只运输这些粮食的费用实际上要比其他国家的船只更贵)。这条规则也适用于苏联。总的来说，明天将宣布取消对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实行的限制，但这一举动将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实际意义则不大。因为中国已经有机会从欧洲进口这些商品了。美国不希望这么做，但是这些限制性条款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保持下去，这些条款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经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怨恨，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现在同中国没有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只是通过第三方进行接触，并且这种接触都是不定期举行的。“齐奥塞斯库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他进行这次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没有向他特别委托什么。”当齐奥塞斯库到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只是泛泛地对他说，希望逐步实行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并且他也说，如果齐奥塞斯库希望的话，他可以把自己(尼克松总统)的这些愿望通报给中国领导人。但是，关于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美国方面没

有对他提出什么特别的请求。

在美国看来，北京现在对日本的迅速增长非常关切。美国专家认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日本逐渐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而美国成了中国的第二号敌人(如果不考虑苏联的话。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北京的头号敌人)”。

在东南亚地区“抗衡中国的重大力量是印度尼西亚”。

8.基辛格说，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仍然非常不安。“根据华盛顿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东巴基斯坦进行武器援助的想法，前一段时间，在德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之前”，美国政府秘密地向英迪拉·甘地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看起来，这次交涉起到了作用，消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直接爆发武装冲突的威胁。在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考虑的是，苏联对预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同样感兴趣。

9.基辛格说，华盛顿知道，对于中国向印度洋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导弹试验一事，德里非常关切。印度政府在秘密地讨论，是否向美国和苏联请求援助，帮助印度建造反导系统。然而他们还没有在原则上向美国发出呼吁。

10.基辛格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国内的某些政治状况。他谈论的中心思想是：尼克松总统的地位正在逐步得到巩固。他举出了对美国居民进行秘密调查的一些数据来对此进行证明，这些调查是白宫根据总统的命令定期进行的，就总统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尼克松总统相信，1972年总统选举前的斗争将主要围绕国内问题进行，特别是围绕失业问题。

尼克松总统现在认为，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汉弗莱最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肯尼迪在个人智慧和个人发展方面来说都不及他已经亡故的两个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但是他还是能够非常轻松地击败汉弗莱的。肯尼迪的“分量不足”以及他与淹死一名姑娘有牵连这件事将妨碍他进行竞选。“白宫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基辛格明显是在渲染关于民主党人重返白宫的暗淡机会，并以此来向我们宣示和强调尼克松本人竞选总统的状态和前景，尽管如此，应该

承认，根据我们大使馆的观察，现在尼克松当选总统的机会确实要比民主党人大一些。

11.详细谈论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过程，无论是三方在波恩举行的谈判(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还是四国大使在柏林举行的谈判。

基辛格特别强调，“就白宫向波恩三方会谈提出的建议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巴尔和拉什同基辛格都直接保持着单独的联系，并抛开了其他所有的联系渠道。只有尼克松总统一人非常了解这件事情，尼克松总统亲自委托他“尽一切努力，以便在各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最近几天，基辛格分别向巴尔和拉什进行询问，了解他们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这一问题的看法。巴尔回答说，看起来，还需要三方在波恩举行4—5次秘密会谈，才能最终达成协议。

拉什的看法是，为了达成协议还需要举行5—6次会谈。因此白宫做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这些谈判的看法。

我说，我们对最近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会谈持肯定的看法。现在已经明白了各方立场的分歧所在，应当努力消除这些分歧。我向他提及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同时我也使他注意，近来，法林巴尔拉什于6月5日在波恩会谈期间，拉什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而看起来，巴尔则是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让步的。我也举出了相关的例子。

然后我表达了对拉什所持立场的不解，何况，基辛格本人当时曾对我说，他们美国人愿意接受联邦德国接受的一切建议。我也使基辛格注意到，拉什曾公开承认，对于积极地解决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直还没有进行研究。但是基辛格当时曾对我说，美国方面愿意作出大的让步，承认苏联的这些利益。

基辛格说，他阅读了拉什和巴尔的一些电报，从这些电报中他没有感觉到拉什所持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然后他又大声地把这些电报读了几次。在他所读的这些电报中，拉什和巴尔都对同苏联大使举行的这些会谈作了乐观的评价，并且他们都表示，希望最终能达成协议。接着基辛格说，拉什宣称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对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这个问题

进行研究，这令他“吃惊”，因为白宫曾命令拉什研究这些问题。

在我同基辛格会谈结束，并返回大使馆之后大约2个小时，基辛格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把我们的这次会谈报告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授权他告诉我，当拉什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将“使他重新想起”关于命令他研究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基辛格说，他可以保证，当拉什返回波恩的时候，他将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们会满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部分愿望：目前有待解决的只剩下关于总领事馆的问题。尽管拉什现在请求休假，尼克松总统不打算批准他。从各方面来看，拉什将在勃兰特总理访问华盛顿后不久，在6月24—25日返回波恩。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委托他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同拉什和巴尔一起再研究一下关于三方波恩会谈和四国大使柏林会谈的事情。下周二他将同拉什和巴尔在白宫秘密进行会谈。

关于这件事情基辛格继续说，如果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是有益的，那么请我们在举行这次会谈的前2—3天，把那些尚未达成协议而我们认为对达成整个协议比较重要的主要问题报告给他(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最好是已经做出了妥协后的立场)。当他同拉什和巴尔在举行会谈的时候将会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基辛格又另外说明说，他指的确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还没有达成协议的一般性问题，因为他认为，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短短时间内，应当使勃兰特和巴尔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确实关键的问题上，而不是不适当地做四国大使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工作，他们现在正在拟定协议的整个文本，何况尼克松总统未必能够关注所有的细节问题，这些细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从技术上来说非常容易使谈判陷入误区。

我具体地提出了我们首先最感兴趣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包括禁止召开各党会议和联邦议院委员会会议；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设立的联络局问题，该联络局是全权代表联邦德国的唯一机构；国际政策的适用问题；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

基辛格再次说，对于莫斯科现在认为必须转告给他们的这些主要问题，他们确实准备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并且在他同拉什和巴尔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之前，他们就将特别地研究这些问题。我的感觉是，白宫是为了让莫斯科了解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现他们

的“良好意愿”。

看起来，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在调解西柏林问题上，就那些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施加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同勃兰特进行会晤前夕。

12.在经历了6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重又提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并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本人希望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举行会谈。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他们对整个苏美关系进行“全面审视”，就是为他们在会谈中提出这个主要问题，即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做准备。

接下来基辛格对举行苏美领导人高层会晤的意义展开了论述，他说，这次会晤不仅对两国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来说、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设性地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近东问题和欧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说，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时候，他准备同苏联领导人讨论关于欧洲事务的一些问题，以便共同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提到了关于裁军问题和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基辛格接着强调说，现在近东问题造成了复杂而危险的局势，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就近东问题交换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补充说，尼克松总统以前曾提议把近东问题列入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现在这个问题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就近东问题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的会谈，美国方面就他一人参加这次会谈。他希望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对近东局势的看法，阐述他对调解近东问题的途径的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非常微妙，尼克松总统不信任国务院官僚机构中的任何人，哪怕是国务院的翻译人员。如果在这次“有益的、开诚布公的会谈”中同苏联领导人秘密地达成了重大协议，尼克松总统就无需向其他人进行报告，就可以找到办法，履行在近东问题上达成的部分协议。

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请求我把尼克松总统的建议转告给苏联领导人(如果莫斯科接受了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这一原则性问题)，即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日期问题。

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不希望莫斯科认为，他有意把这次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美国大选临近的时候。因此，他提议在9月份进行访问，何况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议，让他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访问苏联。除了他们指定的那些日期，在其他月份进行访问对尼克松总统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1月份的时候，他还要每年一次地例行向美国国会作“关于美国国内局势”的国会咨文。但是，他当然也愿意考虑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任何建议。

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给他答复，如果可能的话，在本月月底前答复，因为他应当确定今年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确定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中相应的优先任务。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某一具体的访问日期，他建议到时候公布双方就这一访问日期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不是马上公布，而是在这一协商日期前的4—5周公布。

听了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之后，我对他说，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苏联政府的观点原则上早就告知了尼克松总统。这次高层会晤不应该仅仅在组织方面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还要营造有利于举行这次会晤的氛围。接着我向他提到了我个人对举行高层会晤可能性的一些怀疑：如果到时候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的话，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关于这一点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已经告诉过他。

基辛格开始着急了，他说，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把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和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问题与西柏林问题相挂钩，并且这些要求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如果苏联领导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他们会怎么办呢”。

我回答他说，苏联政府没有，当然也不会对尼克松总统下达任何最后通牒。接着我请他注意我们以前就这个话题进行的会谈。

基辛格的语气已经平静了下来，他说，尽管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预先设定的条件，不能接受必须要正式地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尼克松总统非常清楚，苏联领导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使双方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转入建设性的轨道，以便使这次谈判圆满结束。尼克松总统本人将继续关注这些谈判的进程，并且希望在他所希望的、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能够结束这些谈判，或者使这些谈判达到可以被确保圆满结束的阶段。

№22908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1971年6月30日)

根据基辛格的提议我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

基辛格说，他希望就东南亚相关各个问题交换意见，因为他马上就要对东南亚进行一次为期很长的访问，当他从东南亚访问回来的时候，将会马上回到加利福尼亚，届时尼克松总统将在那里，因此他将不回华盛顿，也不能在7月20日之前能同我举行详细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提到了如下问题(我简要概括地阐述一下，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将作详细的阐述)。

基辛格对东南亚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

1.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基辛格对东南亚总的状况和军事局势进行了评价。随后，他将在这些评价的基础上就今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提出一些建议，提出一些将要采取的可行措施。在这几天，基辛格在巴黎会见了参加越南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布鲁斯，或许，他还将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基辛格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北越人最近将会提出新的建议。但是他没有更加明确地说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基辛格所说的这句话应当予以注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巴黎进行的谈判中提出了新的建议；而基辛格是在昨天对我说这些话的)。

2.印巴冲突问题。白宫认为，印巴冲突是非常现实的威胁，有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危险。印度现在处于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边缘。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印度军方司令部认为，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印度人可以占领全部东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方面可以成功地抵制住巴基斯坦人可能发起的反攻。

美国军方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对这种预测表示同意。诚然，印度担心

中国会支持巴基斯坦，介入冲突。美国认为，中国人未必会直接介入印巴军事冲突，但是将会提高武器、弹药和粮食援助。

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下达指示，要他访问德里，并且秘密地、但是以最强烈的语气告诉英迪拉·甘地，提请他注意美国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印度实行的这种危险政策，这种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基辛格将会告诉英迪拉·甘地，如果局势向再次爆发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今后将中止向印度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

出于这种考虑美国政府拒绝了印度坚持的提议：对出入巴基斯坦的所有物资进行正式的禁运(用于援助难民的粮食援助除外)。

尽管华盛顿打算在事实上遵守这种禁运(如果不考虑不久前派出的一些输送武器的船只的话，事实上这些船只只是根据去年的决定排除的)，美国人也不愿“在印度鲁莽行事的情况下”向他提供援助。

简短地说，基辛格概括地说，美国政府支持维护印巴之间的领土现状，同时支持寻找政治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联政府能够配合他的这一政策，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在基辛格进行这次访问之后，他们将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

白宫认为，最近几天在波恩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会谈使他们更加确信了他们以前的看法：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谈判将在7月份顺利结束，而四国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也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

我同基辛格就可能达成协议的个别条款进行了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基辛格说，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已经对拉什大使下达了指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满足苏联在经济上的愿望，但还不能满足苏联关于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处的愿望。但是他(基辛格)可以说，如果其他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就剩下关于设立总领事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美国方面将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找到相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考虑是，即使在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这个问题上也

将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协方案，并使各方的要求得到满足。

五个核大国会议

美国政府将继续对苏联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看起来，2—3周之后将会给予苏联答复。他们仍然还不明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为一方，英国、法国和中国为另一方，双方在核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的差距，考虑到这一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将提出什么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呢？而且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仍在进行，现实地说，也只有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他们才能够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根据美国事先掌握的情报，中国明显是不愿参加这次会议的，并且，看起来，中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中国还不愿意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同其他四个核大国一起进行谈判，而更好的选择是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显示，中国同它们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属于“无产阶级国家”，不愿参与“美苏之间的阴谋”。何况，事实上中国人明显担心，在这次会议之后它们的核能力将被冻结起来，停留在目前较低的层次上。

正如尼克松总统已经对苏联大使所说的，白宫愿意在这次会议上同苏联方面讨论与这次会议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但问题是，这些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次会议将怎样进行？

关于欧洲裁军问题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已经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建议，美国政府期待着苏联方面对这些建议作出答复。9月份北约各成员国外交部副部长将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看起来，10—11月份将会进行谈判。

近东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同调解近东问题或者同解决近东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没有关系。这次访问的目的只是对有关近东军事状况的情报进行总的评估(还包括就这个问题同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以色列政府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将会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是否正如以色列所说的那样，目前近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白宫现在认为，以色列人的这些言辞是被夸大了，因而，美国没有必要再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而以色列人现在则坚持

要求美国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

基辛格确信地说，白宫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所谓的“贝格斯备忘录”。基辛格秘密地说，整件事情都是西斯科在罗杰斯的同意下做出来的，“希望首先从埃及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然后再从以色列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并以此来支持“罗杰斯提出倡议”，这一倡议正在逐步破产。基辛格确信，他本人一开始就不相信罗杰斯国务卿单方面提出的这个倡议会取得成功。他现在仍不相信。但是他不愿阻止罗杰斯，因为罗杰斯说服了尼克松总统，要尝试一下“苏伊士方案”。这个方案的结果怎样呢？这一点众所周知。现在这伙人(罗杰斯、西斯科)正在准备一些新的建议，并打算随后提交给尼克松总统审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

很明显，基辛格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在尼克松总统把近东事务交给罗杰斯办理，这将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当白宫(准确地说是基辛格)再抓起这件事的时候，才有望使这件事情获得进展，“西柏林问题就是这样”。

基辛格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他不认为有理由认为，调解近东问题会有所进展。他再次强调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即，只有当苏美两国政府就近东问题直接达成相互的谅解，调解近东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并获得成果，他的这种看法我们都已知道。

中国和联合国问题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尼克松总统尚未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总的立场是：他们不打算，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阻止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其中包括，不再坚持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投票才能通过这个提议的要求)，但是，同时，他们将利用各种程序和规则，使台湾不被联合国开除出去。如果这件事情得以顺利进行的话，美国在原则上不反对同北京就这个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使中国以后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行使两个投票权(包括台湾)，这就像苏联在联合国有三个投票权一样(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是关于这一构想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并且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

关于贸易和海运问题

对于苏联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设备的一些新的要求，美国政府将继续予以“建设性的”研究。7月底将会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同时，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希望简化驶入美国港口的苏联船舶的入港程序的要求，白宫也愿意予以研究。

关于就导弹防御问题举行谈判

基辛格非正式地事先(他特别请求我不要援引他所说的关于赫尔辛基谈判情况的话)向我通报了尼克松总统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他指示美国代表团不久后恢复在赫尔辛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

1.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自己的一些总的建议，这些总的建议的内容还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草案的一些条款以及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一些设想。

美国代表团然后首先愿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份草案进行协商。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基辛格的意思是在2—4周之后)美国代表团希望，同时就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形式和程序应该依据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大家都知道，两国政府都同意，现在首先集中精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方面认为，两国代表团的工作都应该严格遵守这一协议。基辛格说，他们美国人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同时还希望讨论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些问题，这一点已经写入了两国的联合公报中，并且这一联合公报已经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

2.美国代表团对就导弹防御协议问题进行的谈判的立场的实质是，看起来是，应该同意，让每一方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反导体系是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首都还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战略进攻武器系统。简单地说，双方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自然相应地是要考虑到双方军事技术的平衡。

我向基辛格指出，两国政府需要就今后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的程序达成协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导弹防御体系作出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应享有某些权利。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项条款，在双方交换的信件中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这项原则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把双方相应的具体地

位联系起来。

基辛格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说，如果以苏联提出的原则作为基础，只是对行政和工业中心进行保护，那么受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城市就只有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就与以上所说的平等原则相违背，因为莫斯科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是华盛顿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的1.5倍(美国首都有100万人口，而苏联首都有700万人口)，而它所保护的工业力量也几乎是华盛顿的2.5倍。从历史上来说，华盛顿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工业。出于对导弹防御体系进行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这种考虑，美国专家已经研究出了具体的数据，对以上列举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差异情况进行比较，在赫尔辛基会谈期间，美国代表团会提交这些相互比较的数据。

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找到导弹防御的条件和限制范围，并且使它们对美苏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

3.基辛格顺便指出，在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该问题他们正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重新向苏联方面提出关于“零导弹防御”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双方都完全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问题。

基辛格补充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指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首先犹豫了，要不要给美国代表团下达这个指示呢？因为这个指示会给莫斯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完全是为了进行宣称而采取的措施。但是他基辛格被授权向我们作出保证，如果(苏方)愿意认真考虑“零导弹防御”问题，那么美国方面也愿意务实地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非常有把握地作出一种假设：看起来，美国人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在美国参议院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集团——由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赛明戈通等人组成，这些人坚持认为，现在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只会白白地花钱，因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在爆发核战争的条件下导弹防御体系是起不到作用的，不会有什么益处。这个集团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因此这个问题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些人对他施加了压力的话，他就有理由说，他已经提出了关于彻底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议，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实质上，正如我们所知，尼克松政府

和五角大楼都不愿意停止美国的导弹防御建设。我们的代表团在制订方案、在赫尔辛基就“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以便不给美国人制造机会，使他们既可以反对我们，又可以反对那些支持削减军费的美国人，他们也反对五角大楼在导弹防御领域制定的军事计划。）

4.关于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突然产生了“内部矛盾”，关于这一点他想以非正式的方式告诉我。

史密斯是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史密斯都了解美苏两国政府秘密交换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们完全都不知道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双方秘密交换的另外一些意见。关于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举行的会谈仍然只有尼克松一个人知道。

因此五角大楼和以史密斯为首的美国裁军处起草了一份指示草案，提交给尼克松总统，让他批准，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份指示草案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的意见“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两国政府通过交换信件所体现的思想”：双方接受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思想，并准备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指的是，赫尔辛基谈判将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关于战略武器的范围等问题。因此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拟定的指示草案考虑的不仅是冻结陆基进攻性战略武器，而且还包括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希望，马上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排除出去，因为在美苏双方秘密达成的协议中没有直接包含这一点。但是，他随后决定不把这一点从提交给他的指示草案中删除，而是逐步地进行删除，以便不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产生强烈的怀疑。

尼克松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是，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海基武器很快将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赶上美国，他们今年已经多次向白宫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尼克松总统直接反对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将会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感到奇怪和不解，因为尼克松总统不能向他们公开基辛格与莫斯科秘密会谈的所有内容，因为这些会谈都是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

但是，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后不久，白宫将采取措施，逐步回归到他们在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中所采取的那些立场上。

我直接对基辛格说，使谈判发生这样的波折不符合他们早先达成的协议，而且，这样还会使人对莫斯科产生一种不好的印象。我接着强调说，如何在这种两难处境下作出选择是尼克松政府和美国相关部门自己内部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严格地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回答说，双方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但是他们请求注意一下他们国内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类似于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方面都只有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本人两个人参与了秘密谈判，就两次谈判中比较微妙的一些问题进行协商。

他可以保证使赫尔辛基谈判代表的会谈向如下方向发展：在美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其他的提议之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下次会谈或者在最近的会谈中否决这些提议，(苏方)可以说这一提议与现阶段进行的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不相符合。到时候白宫将给史密斯下达指示，要他不要坚持这一提议，然后赫尔辛基谈判就会步入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内，也就是说，这次谈判将只是围绕着陆基进攻性武器进行会谈。

整件事情要发生这样的波折。基辛格补充说，尽管看起来，这件事情会引起莫斯科的不满，出现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尼克松总统希望采取这种战术手段，避免五角大楼的直接反对，五角大楼将会与美国国会中一些有影响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尼克松总统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的政策。如果尼克松总统马上说他决定不把冻结海基进攻性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根据与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那么他就会遭到反对。因此他要把这个问题隐藏起来，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那时候将会冒着被指责的风险，一些人将不会理解他对俄国人作出的让步：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之前就拒绝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谈话，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如下看法。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方面同时在进行两场会谈，一场是关于限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另一场就是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都决定保险行事，因为就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不同于就柏林

问题进行的谈判，就这次谈判签署的条约将来是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这就意味着参议院要就这一条约进行相应的听证，要了解这一条约是怎么签署的(特别是现在围绕所谓的五角大楼报告闹得沸沸扬扬)。总的来说，在进行秘密会谈的时候，甚至白宫也没有暗示会出现现在这种“波折”的可能性，这也是事实，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也是由于担心，这件事情会使他们达成协议更加困难，甚至使谈判进程中断，大家都知道，这些秘密协议是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达成的。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即将举行的赫尔辛基谈判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再次指出，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美国舆论界对苏美关系的看法会对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辛格说，当然，现在应该给我们在赫尔辛基的代表团和专家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高水平的会谈。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返回到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但这取决于赫尔辛基谈判的进展。尼克松总统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次强调说，美国方面，首先是白宫遵守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抛开这一协议而为自己单方面捞取好处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只会危及到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基辛格说，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A.多勃雷宁

ABПРФ, Ф.0129, оп.55a, п.426, д.2, л.42-53

№22947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1971年7月17日)

优先发送

北京和华盛顿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无疑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对东南亚、远东地区以及对“苏—中—美”三角关系都会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比尼克松更加没有原则。正如驻美大使馆全体人员所一致认为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的

基础是：北京奉行的反苏政策；北京对其国际角色的追求，首先是他们对自己民族主义目标坚持不懈的追求，他们对民族主义目标的追求要比对意识形态上追求强烈得多。

尼克松对中国态度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有一些原因的。

经常起到作用的因素是：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苏中分歧，尽可能地深化和加强这种分歧，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择手段。现在已经明白，长期以来，尼克松不仅就他个人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而且同时还就他同北京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表示愿意同他举行最高会晤，而重要的是，他们同意事先公布关于举行这次会谈的通报，美国总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如果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也是照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话，毫无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做的。

在美国，现在总统的作用是如此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有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条件下，总统事实上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这些问题上把美国的社会舆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就作出了选择。

决定尼克松现在这样做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非常希望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总统。对他来说，这个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他对北京或者对莫斯科进行的这种访问，首先就是在总统大选前采取的行动。

另外一种状况也很重要：现在对尼克松来说，关于退出越南战争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比较迫切的国内政治问题，为了退出这场战争，同北京领导人就举行最高会晤问题达成协议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做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这种宣传现在可以极大地减缓社会舆论对他个人造成的压力，有利于他迅速解决越南问题和撤回美国军队，也有利于舆论界对最近在巴黎提出的普遍裁军计划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多亏了中国人，尼克松现在可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真正地喘上一口气了。但是，除了宣传上的考虑之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白宫现在是真正地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为此，他们希望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帮助使他们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几乎就可以保证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了。

当然，由于就尼克松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而这种博弈的言外之意非常明确，它实际上首先是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暗中进行的。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的一项主要的任务是，根据我们以前制定的方针和下达的指示继续开展工作，不使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日益接近。

中国领导人把苏联看作是最大的敌人，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认为，对美国直接施加这种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向仍然应该是利用一切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利用美国希望同苏联发展关系的这种因素，来阻止美国在反苏的基础上同北京发展关系。

另外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尼克松个人也希望同我们保持关系，这个因素对他在1972年开展总统选举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美国的社会舆论也希望避免同苏联发生冲突，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同苏联发生冲突比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美国的商人也非常希望同我们发展更加牢固的联系，等等。

出于多种考虑，首先是出于选举的考虑，对尼克松来说，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他来说，举行这次会晤的迫切性已经小了一些。

尽管美国和中国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并且还很深刻，多年以来这些矛盾一直在使它们相互敌对；“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是出于反中的考虑，这一点将仍然起作用。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举行会晤之前也存在很多的议论；我们都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晤的结果怎样。这些因素也很重要，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

尼克松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现在，这件事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轰动一时，大家私下都在议论纷纷，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美好，但是，看起来，尼克松总统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义，并不比美国在实际承

诺中采取的措施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些议论中，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中双方都有意夸大美中关系的作用，并利用这个因素，以便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们远远低估了美中两国现在所达成的这份协议的重大意义，但是以上列举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至于我们对美中两国达成的这份协议所作出的实际反应，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对于尼克松总统就他访问北京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而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回复，回复的意思应该是：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上，企图损害苏联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对此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其中包括在同尼克松个人相互关系方面的看法。

在作出答复的时候，不能让尼克松留下一印象，好像我们对这件事非常关切或者是恼怒。重要的是，不能使华盛顿认为：我们害怕他们同北京达成协议，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会对美国作出某些让步。在给尼克松的答复中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对待这件事情很平静也是很自信的，要让他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2.在外交上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继续对美国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应该遵循苏联领导人就苏美关系特别作出的决议(在今年1月份最后作出的那份决议)和下达的指示，应当遵循苏共二十四大作出的决议。

应当继续同尼克松政府进行接触，首先应当关注欧洲问题的解决，实施我们的欧洲政策和计划。

不应该给中国人机会，使他们积极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在欧洲的利益将更难得到保障。

我们现在同美国就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着谈判，首先是就柏林问题进行着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了关于准许联邦德国同我们签署条约的问题。尼克松在7月15日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中表示，美国同北京的接近并没有削弱他打算同我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协议意愿，并希望“证明”这一点。在谈判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

点尽快达成使我们感兴趣的协议。

3.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尼克松还担任着总统，他都会认为，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作为总统的他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利用这一点。

为了阻止华盛顿和北京在反苏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应该在经济(贸易、船舶运输、互访)和科技领域发展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后将是有利的。

4.至于苏美高层会晤的前景问题，我们认为，不宜直接拒绝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要使这个问题成为尚未确定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使尼克松今后还对高层会晤寄予希望，以此作为我们对他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而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将继续讨论下去，要使这次高层会晤能否举行与欧洲问题的顺利解决、与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

5.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我们对美国和对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应当继续努力，避免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接近。对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有损苏联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利益的任何行为都要予以揭露。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利用一切客观因素对苏—美—中—日“大四角”施加我们的影响。应当继续努力(利用秘密渠道和宣传手段)促进美中两国矛盾的激化，使他们相互更加怀疑和不信任，而现在，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他们彼此都是存在这种怀疑和不信任的。

总的来说，所谈论的是要继续实行我们现在对美国实行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反映在苏共中央的决议里，但应当更加关注美国和中国最近的调情，并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

最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是施展各自的阴谋诡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我们同美国这个西方最先进国家的关系，今后对我们来说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A.多勃雷宁

No22910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1971年7月19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午餐的时候和他在白宫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我故意不主动提出关于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基辛格从会谈开始的时候就在焦急地等待着我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基辛格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谈话(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几点。

1.关于前不久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基辛格主要作了如下声明：这一协议无论如何都没有被用于反对苏联。在尼克松总统看来，苏美关系仍然重于中美关系。这种看法是从现实出发的，因为从经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由于这一现实情况，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具有全球的性质。尽管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关系目前只具有地区的性质，只是局限于亚洲地区(东南亚和东亚)。

基辛格为他们最近同北京达成的协议进行了辩护，在进行辩护的时候，基辛格又详细地重述了我们两国就领导人高层会晤问题进行的谈判的整个过程，基辛格说，在7月初他们又一次收到了我们(对高层会晤问题)“不完全确定的答复”，只是在此之后，尼克松总统才作出访问北京的决定。

如果当时收到苏联的答复是“最终的肯定的答复”，那么，在基辛格看来，尼克松总统将会毫无疑问地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他确信地说，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只是在他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他们从来就没有实际地考虑过这一问题。

基辛格不断地抱怨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困难，从心理层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私人之间必须要相互理解，能够对对方的动机毫无偏见地作出评价。迄今为止，双方还是对对方作出的保障和许诺“过度的怀疑”和不信任(比如，关于尼克松总统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的保证)，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危

害极大。今后，双方最好都能够“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

2.尼克松总统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继续沿着它们最近努力推进的那个方向发展。

——他希望柏林问题能够在我們指定的日期之前早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美苏两国大使和巴尔进行的波恩秘密谈判将在本月底结束，而四方柏林谈判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根据最近几天白宫得到的最新评估，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谈判是完全可以结束的。尼克松总统刚刚得到了勃兰特本人对这些谈判作出的评估，他们可以秘密地把这一评估告诉我们：勃兰特认为，他们同民主德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将在年底结束，他们希望在今年年底或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同苏联就批准条约问题举行谈判。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美赫尔辛基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他认为这对改善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尼克松总统对两国之间大量的贸易合同持肯定的看法，他打算继续审理这些合同。其中包括，他也赞成现在向苏联提供封闭式铸造循环机，用于卡姆斯基汽车厂的汽车生产。

——我们提议为美苏两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对于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下令予以研究。

3.尼克松总统关于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如果这一提议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在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就可以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但是，在尼克松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之前，还必须宣布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达成的协议。

正如你们以前向我们提出的(在第二个方案中)，尼克松希望，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间是1972年4月份或者5月份。关于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日期，我们同中国人还没有达成协议，尽管已经提出了一定的期限，也就是在1972年5月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如果能够很快同你们达成协议，把访问的日期定在4月份，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工作，把他们对中國进行的访问定在明年年初的前几个月进行。

现在，尼克松总统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那么他们非常想知道，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可以定在什么时候进行。

第二点，根据我的要求，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把他的这些谈话概括在一起，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内容。

在白宫和中国领导人事先进行的接触中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基辛格对一些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以便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没有拟定出特别的会谈议程，大家都只是知道，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事先没有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在事先进行的接触中完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诚然，周恩来现在宣称，这个问题是尼克松总统首先提出来的。这句话指的只是，在公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尼克松只是泛泛地说，他希望并且也愿意到中国去。当时他自己也不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只是一种演说术。

在基辛格出访前夕，尼克松总统“没有收到莫斯科最终的答复”，他对基辛格说，他当然愿意对北京进行访问，但是他不想使中国人产生一种特别的印象，好像他对访问中国特别感兴趣。因此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不要主动提出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而首先要考虑的是关于周恩来就其他问题作出的反应。

但是在进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中国总理就问他，为什么尼克松总统不到北京来，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谈。在周恩来看来，进行这样的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就促使两国产生冲突的所有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更加清楚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基辛格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接受了这项建议。基辛格说，确实，随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协商，拟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联合公报的文本。中国人希望，使这份联合公报看起来完全是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了呼吁，请求进行会谈，而中国领导人满足了这

一请求。周恩来甚至对基辛格说，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进行会晤的时候，他应该理解的是，中国人现在“在各个方面”面临的一些巨大困难，而且今后还将面临这些巨大的困难。最后，就制定了现在的这份联合公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会谈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谈到关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只是有一次，当周恩来在谈论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时候，他提到了苏联领导人，他说，苏联领导人喜欢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想象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狂热主义者”。此外再也没有提到苏联。

基辛格提到了关于美国报刊和美国一些观察家的报道，这些报道说，周恩来曾告诉他说，苏联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于这种威胁周恩来非常担心。这些报道都“纯粹是对舆论的操弄”。

总的来说，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相比苏联来说，中国人现在更加担心日本。对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非常紧张。他们相信，日本人暗藏着一股潜在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强烈，并且，他们显然很担心日本成为一个核大国。相应地，他们同时也在批判美国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他们表示，希望美国把日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其越过一定的界限。

就印度支那问题，其中包括就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在这次会谈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就越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基辛格不愿谈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细节问题。他只是谨慎地指出，看起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同中国人面临的都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基辛格还说，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他从这次会谈中得出的一些印象是，北京同意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但是基辛格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非常克制。

总之，基辛格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中得出的印象是，尽管在东南亚问题上将面临“一场艰难的、并且是非常漫长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但是，这些问题终究是会得到解决的，并且会找到一条途径，使这一地区中立化，以便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使该地区可以摆脱外部势力的干

预。

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不是联合国问题，或者类似的其他问题。华盛顿不愿现在，或在今后2—3年内（中国人坚持要让他明白这一点）放弃同台湾的联盟，尽管愿意表示，美国不反对双方，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达成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

关于基辛格对他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会谈的论述，还必须指出如下两点。

基辛格说，他同周恩来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没有谈论关于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而只是说，在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关于他就解决越南问题提出的看法，白宫早已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

基辛格不愿具体地谈论这件事情。然而，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他指的是他以前（1月9日）向我们提出的一些设想，对于北京和华盛顿现在进行直接谈判来说，这些设想是不错的会谈基础。

我们都知道，当时基辛格向我们谈到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完全具体的日期之前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他们将怎么向越南人通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或许不会要求双方都撤军，也不会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军。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使北越方面承诺，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他们撤出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停火非常重要，尽管这段时间不是很长。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美军撤军的具体日期。然而，从他那谨慎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出于对美国大选的考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停火协议基本上要被遵守；此外还有尼克松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如果南越的军事局势再次严重恶化，那也不是在美军撤出以后就马上发生的。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是西贡政权的责任了。

基辛格当时还谈论了另外一层意思，越南局势的这种发展进程，可

以使他们不必再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而进行那场事实上“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因为在美国撤出军队的情况下，整件事情都只与越南人自己直接有关。

我们知道，关于基辛格“放声说出的这些想法”，我们都已经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他们对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并且表示，愿意直接同基辛格讨论这个问题。此后，就在巴黎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整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不管怎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后提出的“七项条款”同基辛格提出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希望它们能够成为今后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因此不应该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美国和中国现在也许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并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秘密地达成某种妥协。问题只是在于，在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充分商量的情况下，北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美国进行妥协。

基辛格也简短地谈了一下关于他本人对周恩来的印象(这是他们的初次会面)。周恩来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周恩来“显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也愿意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说教隐藏起来。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局势，尽管很明显，对于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些特点他还“不是那么容易地明白”。

同时，引起基辛格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核导弹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认为 he 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落后了大约10年时间。并且基辛格也说，看起来，整个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显然也都是这样。周恩来“远远不能总是理解”他(基辛格)作出的解释，因此有时候请求(基辛格)向他“解释和说明”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细节问题和术语。基辛格说，在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接触中，双方很快就会都明白这些问题。

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在核导弹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和思想落后说明，中国的核导弹能力还非常不完善。基辛格确信，中国要想“真正地被看作是第三个超级大国”，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更加“成熟”。现在，中国对核武器相关问题作出的评价，其中包括对核裁军问题作出的评价显得过于简单。他们这些简单的想法有时候简直就可以被称作是原始的想法。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在核导弹问题上的思想是落后的，老实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起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的过程中也确实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问我，关于他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关于他同中国总理进行的会谈，我是否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问。

我对他说，没有问题要问了。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如果莫斯科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他愿意开诚布公地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他这样说完全是在故意惺惺作态。基辛格强调说，他们“没有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触及到苏联利益的谈话”，用他的话来说，这也正是尼克松总统给他下达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今天接见了美国所有亚洲盟国和大部分欧洲盟国的大使。罗杰斯概括地对他们保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点)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丝毫不会减弱华盛顿履行美国承担的同盟义务或条约义务的决心。此外，罗杰斯还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美国的一些盟国，受报刊和其他大众舆论的影响，这些国家或许会对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产生“不完全正确的想法”。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罗杰斯把有关基辛格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给了美国盟国的那些大使们，但是罗杰斯所通报的内容还不及他(基辛格)向苏联大使通报的内容的十分之一，他是在尼克松总统的授权下向苏联大使进行通报的。因此，他也请求我们严格保守这个秘密。

关于美中关系总的发展问题，关于这种发展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利益问题，我也在会谈的过程中向基辛格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和态度。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都是使用官方语言平静地进行谈论的，以便不给基辛格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对他们达成的、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感到不安。

同时，我也感觉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然也非常期待现在就得知莫斯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第三点，关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这次访问，基辛格简单地谈论了他的印象。

基辛格说，白宫担心印巴局势可能会严重恶化，在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这次访问之后，这种担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或许是增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两国领导层都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抱定绝不让步的决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印度高层代表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非常不安。印度高层代表曾向他暗示，一旦印度半岛爆发冲突，并且在局势总的发展不利于印度方面的情况下(暗示的是中国因素)，苏联似乎已经向印度政府作出了承诺，一旦收到印度方面的书面请求，苏联就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

我要基辛格澄清这个问题，就问他，印度领导人是否确实以某种形式说出了这样的话。基辛格在思索了一会后说道，尽管他很难直接证明印度某位领导人这样说过，但是印度领导人的一些谈话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基辛格还说，在他同巴基斯坦总统的谈话中，巴基斯坦总统对印度人进行了抱怨，在印巴冲突的各个方面都指责印度人，指责他们使局势复杂化。根据巴基斯坦所掌握的情报，印度人仍然在进行着重大的阴谋活动，企图对东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以便使它脱离西巴基斯坦。叶海亚汗对基辛格说，他决定武力捍卫巴基斯坦的完整，并强调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国外请求援助”。

基辛格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巴基斯坦人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叶海亚汗提到的“国外”明显就是指中国。

基辛格自己也怀疑，在印巴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派出军队。但是，中国将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对此，他们美国人没有太大的疑问。

基辛格明确地说，对于苏联实行的和平解决印巴冲突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是苏联的政策)，白宫是同意的，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也会实行这样的政策”。

看起来，对于基辛格就印巴争端问题所说的话应该持一定的谨慎态

度，因为在印巴争端中美国偏向巴基斯坦，而不是偏向印度，因为他们担心，印度采取的行动会破坏这一地区的现状。美国人所希望的是保持印度半岛目前的力量平衡。何况巴基斯坦还在帮助华盛顿同中国进行接触。

第四点，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向美国的一些公司订购设备(主要是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订购设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还没有把所有相关的供货问题都审议完毕。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的是，白宫将在最近几天，在本周同意进行相关的谈判，商议关于我们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购买新型的铸造循环机工艺一事(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

正如他所知道的，苏联方面对这一设备比较感兴趣。

对有关苏联订货的其他问题进行的研究还需要2—3周时间。他们仍将“本着良好的意愿”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他有个问题要问我们：苏联的贸易组织是否认为，现在就应该就供应铸造循环机设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在等到其他问题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还是认为等待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较好。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种方案。他们让我们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基辛格请求把我们的答复通知给他，因为白宫要根据我们的答复对美国相应的部门下达指令，关于尼克松总统事先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这些部门现在一点也不知道。

第五点，基辛格援引我们上次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说道，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努力签署政府间的协议，同时现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撤销美国对我们的船舶实行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两国专家可以进行会晤，就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这指的是，在专家的层面上能够更加具体地研究上述问题。在此方面，苏联方面既愿意讨论比较宽泛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也愿意讨论与解决美苏在海上船舶运输领域相关的问

题而采取的部分措施。如果美国方面认为通过外交渠道讨论一些实际的措施比较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提出如下问题。

另外开放以下港口，为苏联船舶的入港开辟通道：

(1)太平洋沿岸港口——朗维尤、斯托克顿、圣地亚哥、塔克马(优先)以及萨克拉门托、阿斯托利亚和库斯贝伊。

(2)大湖区港口——托莱多、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密尔沃基。

(3)大西洋沿岸港口——伯恩赛德、杰克逊维尔、莫比尔、帕斯卡古拉、皮德蒙特、查尔斯顿。

这指的是，苏联船舶享有与其他国家的船舶平等的机会。我们要通知你们的是，苏联方面在原则上也愿意保障美国船舶享有类似的机会，一旦美国船舶到达苏联港口的话。

2.废除现行的关于入港通告的一些做法，(如果美国方面不同意这样做的话)或者在对苏联船舶开放的所有港口，把入港通告的时间缩短为7天。

3.废除苏联船舶进入美国港口前所需的提交船舵程序。

4.在圣弗朗西斯科为苏联远东轮船公司或者全苏外国船只联合公司设立代办处。

5.开辟列宁格勒和纽约之间的旅客航线。

6.也愿意同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解决关于驶入美国港口和通行巴拿马运河的苏联船舶支付能力的证明书问题(这是由于1970年底美国通过了相关规定，旨在预防由于事故或其他原因导致美国国内或美国控制内的水域受到来自船舶上的石油或石油产品的污染)。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行单独的谈判(在商业船舶部和美国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之间举行)。

基辛格说，在原则上，尼克松总统愿意放宽苏联和美国海运船舶运输的相关条件，并且愿意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下同苏联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一段时间之后，在美国相关的权威部门进行研究之后，就可以对苏联提出的各项建议给予具体的答复。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 ф.0129 , оп.55а , п.426 , д.2 , л.60-72

No2291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1971年7月22日)

关于美国宣布的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所要谈论的这些想法考虑到了我就这个问题同基辛格和罗杰斯国务卿举行的会谈，也考虑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界对这一通报的反应。

尼克松宣布了他同中国领导人就他访问北京一事达成的协议，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随着这件事情尘埃落定，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件事今后将会给白宫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而到明年5月份之前才最终有可能把这次访问的日期确定下来，也就是说，距现在还有长达10个月的时间。

没有确定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对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缺憾。

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情报来看，当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就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显然发生了争执。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明显想尽力把这次访问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进行，而且越快确定下来越好，但是，中国方面却想尽力把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些，想尽力把它推迟到明年举行。

正如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斯科特参议员在同我们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关于同周恩来举行谈判，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领导人进行谈话的时候说，基辛格受他的委托向中国总理提出，在美国初选前，也就是在3月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然而，周恩来虽然在原则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拒绝把这一日期写入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并坚持让尼克松在1972年5月份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近同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在谈及尼克松仍然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4—5月份举行这次会晤，并顺便说，这可以使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接受在更早的时间——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对北京进行访问。

简短地说，从各方面来看，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这一问题上，中国人是不会作出让步的。美国人不得不作出让步，目前只能接受这种更宽泛的表述方式——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也就是说还要等待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

2.为什么尼克松想尽早对北京进行访问，而中国人则希望把这一访问的日期向后推迟，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

在更晚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比如在1972年春天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有一个方面的好处——美国的选举运动将会临近，这种轰动一时的访问会对这次选举产生影响。但是，从宣布进行这次访问到实际上进行这次访问有为期几个月较长的时间间隔，这样就使美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为自己采取的一些主要的行为，特别是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采取事务行为承担“责任”，在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前就不能使局势复杂化，否则的话这次访问就不能进行了。

而中国人，除了可能会泛泛地作出一些保证之外，不必承担这样具体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同于美国人，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诸如在东南亚这样的军事行动。

简短地说，华盛顿的政策现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对北京进行访问，在对这次访问进行准备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在东南亚问题、联合国问题等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好好地表现自己”。

此外，白宫还要在美国国内承担一些义务，其中包括兑现继续撤出美军的承诺。对北京的访问进行得越早，就越能巩固他们“强硬的政策”(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有这样的偏好)，他们也能在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表现出这种立场。这次访问的日期越靠后，美国留在越南的军队就越少，美国就越没有指望再实行“强硬政策”。

这样就可以理解，这次访问的时间越是往后推，就越不利于白宫。

3.根据我们的观察，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已经使华盛顿开始非常不安起来。

其中包括，美国现在不得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保持极大的克制，克制自己的军事行动，不能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放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权力，而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则

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采取的行动，等等。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不破坏尼克松企图打中国牌的图谋，为了不给中国人以口实，使他们宣布尼克松破坏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气氛。这些都使得五角大楼内有一定的不满情绪。

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此期间北越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印度支那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该怎么办呢？这对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许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从中、海上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或许还会派出地面部队来拯救西贡政权，使它免于重大的失败。

美国人还会暗自担心南越军方采取一些“冒险”行动，准确地说是挑衅行动，这也会对美国实施美中两国会谈的计划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也会希望北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军队施加影响，使他们在此期间也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还不完全明确。需要担心的是，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只是有限的，而不是很大，这将使白宫现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打算和考虑遭受一定的风险。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能否完全达成协议，在目前的局势下还不能作出评价。

而且，正如在我们所得到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同斯科特参议员进行单独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本人曾经承认，他自己目前也不完全清楚，他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将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访问。

从各方面来看，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这件事情证明：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还没有找到途径，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越南战争问题、老挝问题、柬埔寨问题，并且还有台湾问题，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已经接近，双方也都不愿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使这次会谈能够尽早举行。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

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美中双方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折中方案。无论怎样，基辛格已经在白宫成立了相应的“专家队伍”，为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做准备，该“专家队伍”以基辛格为领导。在这一“专家队伍”中也有熟悉中国导弹防御问题的专家，以便在

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所准备。

美国方面在做准备的是关于越南问题和关于整个东南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尼克松来说是首要的问题，而正如所显示的，尼克松希望中国人帮助他“体面地”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保证他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

尼克松愿意访问北京，进行这次冒险的访问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此尼克松也愿意在中国人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简短地说，尼克松显然愿意投下一定的赌注，同中国人达成一笔交易。

当然，上述分析远远不能说明美中之间就尼克松访问北京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所达成协议这一事件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协议证明了中美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

同时，另外一种情况是，看起来，尼克松急于在国内政治方面取得好处，急于公布关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他还没有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必要的保障，使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这个情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可能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化(这些复杂化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产生影响。

如果抛开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失败不说，那么中国人现在取得了比美国人更加有利的地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后顾之忧”，而美国事实上则必须在亚洲事务上，首先是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克制”。

当然，对于在这段时间内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以及他们的华盛顿伙伴的行为举止，北京的“革命者们”并不是毫不在乎的，特别是在中国人对美国进行了多年的谩骂之后。美国人以某种理由重新加强对越南的轰炸，通过其他手段来继续消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是中国人所未必会喜欢的，他们也未必会喜欢美国人对南越采取越来越多的野蛮行径。白宫现在对他的一些盟友作出的保证不能不刺痛北京领导人，特别是白宫对日本的佐藤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作出的保证使中国人特别不快。

诸如此类问题自然将会使局势复杂化，会影响中国领导人“盛情欢迎”美国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当这些问题被社会舆论广泛了解之后。而在将近10个月的漫长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事

情。

这样，在进行总结的时候可以肯定，在美中两国对北京会谈进行准备期间，我们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这指的不是现在就从国家的层面对美中两国就进行北京会谈所达成的协议进行批判。如果好好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做未必是明智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使那些能够对美中两国政府的动机和行为产生非常负面影响的问题和事实一直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不应该总是喋喋不休地纠缠这些问题。同时应该使美国和中国继续为它们面临的问题闷闷不乐，阻碍它们接近，特别是要阻碍它们在反对我们的基础上接近。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59а, оп.7, п.13, д.9, л.91-98

№2291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1年7月27日)

同基辛格在白宫进行了会谈。基辛格说，美苏两国代表团现在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赫尔辛基进行着讨论，这次讨论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因此，美国方面认为，现在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该协议随后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在莫斯科签署。现在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负责人，比如通过现在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的代表团负责人来做这件事情。

美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些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如果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其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签署这项协议的地点的建议，还是关于所要授权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员的建议，美国方面都愿意讨论。

基辛格预先声明说，当然，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提议都不应违背两国政府在今年5月20日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仍然是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的基础。

我指出，苏联代表团已经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发出声明，关于减少

爆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在协调相应的立场之后就可以讨论如何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

然而，基辛格又再次提及了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说，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以后很快就签署协议，而不是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不论是美国高层还是苏联高层，现在都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然后，经过两国相互协商后作出决议，随后再根据该决议对两国的代表团下达相应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非正式地、但非常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白宫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暗示最近美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果这件事情符合苏联的看法，那么这当然是非常好了，双方可以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取得进展，这种进展也会成为今后美苏关系中非常重大的积极因素，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消除美苏关系中的“各种投机行为”。

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关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尽快签署单独协议问题，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在当前的局势下，在白宫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这一意义已经超出了最初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从现在的苏—美—中三角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从我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说，预防苏美之间意外爆发核战争这个问题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也应该从对美中接近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其后果未必就是单方面的。

A.多勃雷宁

АВР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75-76

№2294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1971年7月29日)

应基辛格的请求在白宫拜访了基辛格。在同基辛格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如下问题。

西柏林问题。基辛格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谈论了这个问题。基辛格援

引了美国驻波恩大使拉什就波恩秘密谈判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他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基辛格以前在同我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了结束这些谈判的日期(7月底)，现在，可以令人非常满意地确定，这一点实际上是实现了。

基辛格接着提及了最近就苏联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馆问题进行的讨论，他说，美国方面现在将履行在波恩就这个问题达成的谅解。但是，他(基辛格)需要7—10天的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履行这些秘密协议，因为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对这些秘密协议毫不知情。

他们仍然认为，四方柏林会谈可以在8月底或9月初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取决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自身需要多久才能达成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能够履行对苏联领导人秘密作出的承诺，会努力使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顺利结束。

贸易问题。基辛格说，今天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苏联的卡姆斯基汽车厂向美国购买价值1亿美元的铸造循环机。还需要大约3周的时间来审议苏联的其他订货要求。总的来说，对于苏联的这些订货，他们的态度仍然是“乐观其成”。

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仍然还没有商定下来。一旦这一日期确定了下来，他将迅速告诉我们。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件事情上，现在又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特别的研究和商议。应该注意基辛格所说的如下的话，他说，最初是中国人自己急于解决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原则问题，并急于宣布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倒不急于把这一访问的确切日期确定下来。

基辛格又再次详细谈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一些想法，他说，尼克松总统主要考虑的是，应该改善同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关系，并希望以此来摆脱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为他自己随后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创造良好的条件。

基辛格再次重申，在这件事情上尼克松总统不打算反对苏联。即使他愿意同毛泽东建立“这种不可思议的联盟”，那么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他将如何现实地面对苏联呢？是用战争来威胁苏联吗？但是一旦苏美爆发战争的话，这将是一场核战争，即使毛泽东以及7亿中国人

也帮不上美国什么忙。白宫还没有这样的疯子，将来也未必会有。

基辛格又提出了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又提及了苏美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举行的历次谈判，以此来进行辩护。

基辛格最后的谈话就好像是代表尼克松总统说的，好像是在对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现在还不要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关于苏联对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敌视态度)，等待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意《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思想，这篇文章众所周知，其谈论的是必须“睁开眼睛”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都不是“事先就注定的”。^[11]

如果苏联领导人愿意的话，尼克松总统也愿意同苏联就各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不受第三国因素的干扰签署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符合双方利益的话。

他们希望的不仅仅是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而且还希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尽管这还面临一定的困难。

他们再次提出了他们前不久提出的建议：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不应该长久地拖延下去，应该尽快结束这一工作，因为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问题不仅对苏美两个主要的核大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此外，苏美两国共同采取这一行动还可以制止由于投机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过度恶化，“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国际上的这种投机行为现在非常盛行。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简短地指出，他们仍然希望，他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美国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能够得到解决，仍然希望苏联方面能够作出某种回应。

然后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尼克松总统计划在8月10—15日到加利福尼亚去休假，并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进行工作。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也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其中包括我们就美中关系问题的立场。

总之，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尼克松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保持接触，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宣布他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一事而恶化同苏联的关系。

越南问题。基辛格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向苏联政府转告他们对目前越南局势的看法。他在向苏联政府阐述这些看法时，不会提出任何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建议，无论苏联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同河内进行接触。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调解越南问题，那么这除了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以外，还将有助于苏美两国改善关系，因为越南冲突的持续无疑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基辛格接着说，他在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黎德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向他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立场。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总计划是可以持续操作的，这一计划的内容如下：

- 1.接受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这一宣言可以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团团长(黎德寿)秘密地讨论和拟定。

- 2.签署最终的协议。该协议要以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为基础，由双方参与巴黎谈判的代表来拟定。

- 3.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除了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还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参加这次会议。新的国际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为这一协议提供相应的国际保障。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在同他进行谈话的时候，黎德寿原则上没有反对这一计划，其中包括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最后一项条款。

为了继续澄清美国的立场，基辛格又阐述了关于发表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他认为关于这一宣言可以包含如下几项条款。

——指出美国最终从南越撤出军队的具体日期。

——美国没有义务对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提供支持。

——美国限制自己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协商，把这些援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双方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停火。

——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释放和遣返战俘。

基辛格说，在这份宣言中还可包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7项条款中的一些条款(基辛格在同黎德寿举行的会谈中提及了这些条款)。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政府在形式上不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战争赔偿。但是美国政府愿意秘密地向河内承担这一责任，愿意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些建议，并采取一些行动，使国会能够同意相应的法律草案，在5年内向印度支那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相当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将直接提供给河内。

基辛格接着说，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主要分歧仍然是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北越方面的要求，他们要美国政府以武力来推翻阮文绍，尽管美国政府还不确定，今后是否还要承担起支持阮文绍的义务。基辛格再次重复说，今后随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南越现政府的权力将会被剥夺，但是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能武力来推翻阮文绍。

基辛格接着说，在南越10月份举行的选举之前，如果双方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取得的这一重大进展将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效果，而正如上述所说的，在发表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将会强调美国没有义务把自己同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义务介入南越的事务，而这将会导致“强大的”胡志明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到时候，关于阮文绍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要确切地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还有些困难。

他们白宫认为，如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在此之后，在巴黎进行的会谈将会制定出详细的协议，并在几个月内结束谈判，到时候，在1972年就可以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尽管还有些遮掩，但是基辛格就那些有争议的关键问题(关于南越政府的组成问题)进行的谈话，同他受尼克松的委托在今年1月份向我们事先通报的一样，这就是：他们现在需要体面地退出越南，而在今后，在经过几年之后，至于谁掌管西贡政权，尼克松就不关切了。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在会谈中表达了如下思想：现在北越完全不必担心1954年的局势会再次重演。当时曾就越南问题达成了国际协议，但是后来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阻碍了这一协议的实施。

基辛格说，如果杜勒斯仍然幻想着控制河内，而从各方面来看事情正是这样，那么他基辛格就要使人们注意，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完全不同于1954年的时候。美国现在已经从自己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中得出了沉痛的教训，在此之后，现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能再派出军队到越南地区作战了。

基辛格强调说，换句话说，无论怎样，从军事干涉的角度来说，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是真正地完全撤出。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会首先被正式写进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然后被写入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中。

我问道，对于美国的上述立场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的。基辛格答复道，他可以向我保证，无论是同北越人，还是同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细节问题，他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都没有进行谈论。他们也没有详细地讨论关于阮文绍政府今后的命运问题。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他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即中国领导人主要关切的是关于美国军队尽快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这个问题，至于目前由谁来掌管西贡政权，则处于次要地位。并且，看起来，他们期望的是，关于西贡局势今后的发展进程问题需要他们予以修正。

基辛格随后表达了如下一种思想：他正是尽力用这种看法来对黎德寿施加影响，但是正如他所认为的，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是他们同美国的主要分歧。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请求莫斯科了解美国政府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看法，他们通报的这些消息都是保密的，请求苏联政府考虑一下，怎样更加妥当地利用这些信息。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通过秘密渠道同我们交换看法的时候，白宫都没有提及越南问题。最近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详细讨论还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进行的。

尼克松决定同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关于他的北京之行，他明显想显示，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此外，这一姿态看起来也加强了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公开支持)。

——这同时也强调了另外一种看法：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现在还不能确信，仅仅借助于中国人的帮助他能否顺利地解决越南问题。

——白宫事实上承认，他们同中国人和北越人的立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中国人现在关切的主要是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而北越人除了关切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还关切关于废除阮文绍政府的问题)；因此他们就非常关注苏联的立场。

应当同北越人就所有的问题进行接触。这将能更加强调我们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施加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尼克松同中国人现在进行的游戏施加影响。

近东问题。我在会谈的过程中提出，想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场访问的目的。

基辛格答复的意思是说，对于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他本人目前也不期待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西斯科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使以色列同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题交换意见。

对于同以色列政府举行谈判，现在西斯科有了两项收获：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继续讨论关于调解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同意美国进行斡旋来进行调解，也找到了一个妥协方案，可能达成一些妥协，这一妥协方案是由美国国务院，准确地说是西斯科本人制定的，他向以色列提出了这一妥协方案，来调解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存在争议的一些条款。

西斯科应当努力得到关于以色列对这些方案的一些建议。在此之

后，他会前往开罗。

基辛格说，他本人也不知道，西斯科现在在以色列的进展是否顺利，阿拉伯世界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内讧，以色列人对此非常幸灾乐祸。

关于调解近东冲突问题，我对美国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基辛格拒绝更加详细地讨论美国的立场，只是在总体上说，白宫“不太相信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之间能够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处理近东事务。

基辛格说，关于近东的这些事务，现在仍然主要属于国务院管辖的领域，确切地说，是罗杰斯和西斯科在处理这些事务，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不允许破坏停火协议，并继续努力，力求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达成妥协，作为调解近东问题的最初阶段。

然后我同基辛格就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涉及什么新的内容。

A.多勃雷宁

АВВРФ, ф.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77-85

№2291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1971年8月9日)

今天基辛格同我谈论了如下问题。

基辛格说，前不久，A.A.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比姆进行了会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这次会谈中，苏联外长提出了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理解问题，也提出了他个人对苏美关系的一些评价。

关于这次最为重要的会谈比姆直接向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作了汇报。

考虑到这个问题是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来的，国务院根据现行的政策，指示比姆对A.A.葛罗米柯进行访问，并提出一些答复性的建议。

基辛格请求转告莫斯科，这些答复性的建议具有非常总括的性质：尽管白宫授权比姆进行这次访问，但是他的这次访问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得到的唯一的一项任务是，在形式上谈论涉及比姆大使和国务院的一些问题，但是，关于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和国务院一点也不知道，而如果华盛顿对苏联外长的这些重要的言论不予答复的话，这只会引起误解和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请求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比姆所转达的答复的性质及其特别的目的，并对此采取相应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些建议都同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的那封信件没有任何关系，尼克松总统在他的那封信件中把他的所有真实的想法都转告给了苏联领导人。

基辛格请求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同比姆进行会谈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关于尼克松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一无所知。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还谈论到了两个问题。

1.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于7月26日在巴黎进行的秘密会谈。关于这次秘密会谈，他的谈话与北越人向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进行的通报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基辛格的谈话还有另外一些补充的内容。比如，基辛格说，他向北越代表详细地阐述了可能实行的调解计划，其中包括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在此之前不久白宫已经向我们通报了这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越南人“非常关注”。

然后基辛格较为详细地谈论了两个尚有争议的主要问题，即：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问题以及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的问题。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使北越人有理由认为，美国企图在越南保留自己军队。关于这两个问题北越人向我们驻巴黎大使馆进行了通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难题”。比如，撤出美军的最后日期可以被定在明年7月1日或8月1日。但是，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主要分歧似乎在于，北越人不愿意承担一些责任，而在美军撤出之前，他们美国人则是愿意承担这些责任的，也就是说，要把就最为实质性的问题举行的谈判推迟到美军全部撤出之后，届时白宫将没有什么理由在谈判桌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关于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中，他就美国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这一问题向北越人进行的解释，基辛格确信地说，他对北越代表说，美国军事顾问只会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留在西贡，在撤出美军之后，美国驻西贡的武官机构“只有为数很少的代表”。

基辛格说，不久后，他将再次同北越代表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他将尽力消除北越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担忧，并向他们提出留驻西贡的美国代表具体的人数，这些代表将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在后方进行服务和提供保障)，以便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不认为美国通过军事顾问的形式来掩盖在越南继续驻军的事实”。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现在白宫在努力加强同北越人的秘密接触，看起来，他们在尽力对北越人施加相应的影响：一方面对北越施展相对怀柔的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这件事情对北越施加压力。

为此，基辛格不久以后将同北越代表再次举行秘密会晤。

2.基辛格说，他们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目前还没有最终商定。从各方面来看，这次访问不会在今年举行，而是可能会在1972年初，在1月份和5月份之间举行，5月份是他们举出的关于这次访问的最晚的日期，但最有可能是1月份举行。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白宫很清楚，他们即将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样结束这次谈判，签署什么样的文件，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比如，其中他们准备的一个方案是，签署的关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的宣言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这份宣言只会在总体上掩饰较有争议的台湾问题。

基辛格说，白宫得到了一份重要报告，其内容是关于《纽约时报》副主编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一次会谈。

基辛格随后说，使他们还感兴趣的是，中国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表示，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中，中国愿意讨论关于签署美国、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尽管中国总理还说，签署这一条约的机会看起来非常渺茫(今天，《纽约时报》就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这次会谈的纪要。这次会

谈非常能够反映中国对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问题的立场，最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通过对中国总理进行相应的采访的形式，通过美国的大众舆论来不断地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基辛格还说，在他自己同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A.多勃雷宁

АВІ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103-106

№22916 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9月7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收到了您在8月5日写给我的信件，正如您一样，我也想就苏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和重要的，我同意您的这一看法，并且我认为，交换这些意见自然会涉及苏美关系中一些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当然，在交换这种意见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状况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如果在这么宽广的范围内非常直接地谈论两国关系——而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么，首先就必须明白，我们双方是否都理解以下这个主要的问题：应该怎样制定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在决定对外政策的时候是否从保持和加强和平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或者是遵循其他的想法，是否使事态向推动着人类创造新的财富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更加沉痛的过去。

我们的答复非常简单，这种答复反映在我国对国际事务的总路线中。对外政策方针的实行可以加强战争的危险，也可以与我们社会体系的实质格格不入。我们坚决认为，不应该通过武装对抗的途径来解决国际问题。

正如您无疑所知道的，我们党前不久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再次确认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还确认，我们准备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相信，在目前双方都有良好意愿的情况下，苏美关系能够成为巩固和平、保障所有国家都更加安全的重要因素。

我也很清楚，您，总统先生也曾表示过，相信美国与苏联改善关系是可能的，正如您在给我的信件中所说的，您也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持久和平的世界转交给下一代”，我对此做了一点补充，不仅仅是我们的后代，而且如果使现在这一代人有机会生活在这一美好的世界就更好了。

我们在确定对美国的政策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确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一样，我们既没有忽视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也没有忽视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这种差异和分歧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的客观因素。我们通常也会考虑到我们的盟国和朋友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国在相关的国际问题上达成谅解所完全必需的，这样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将更加有效和持久。而我们则希望积极地做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当两国都努力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么这种解决方案就可能找到。

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开始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点令人感到满意，关于这一点您在自己的信件中也谈到了。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总统先生，您本人曾为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取得成功作出了一切，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价一下。当我们两国最高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弄清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在原则上取得了相互谅解之后，我们两国代表应努力使他们达成的协议具体化。这样就做了一件较好的、有益的事情。

您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具有务实的性质，我同意您的这种评价。重要的是，我们和你们都得出了结论，我们都认为，如果双方都能谨慎地对待那些涉及他们安全利益的问题，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那么，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就可以达成协议。关于这次谈判首先应该集中解决哪些问题，现在双方已经有了共识，这为实际上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仍然希望就限制反导系统这一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只是应该在完全对等的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关于采取措施，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是这些谈判达成的首批具体的成果，这一成果无疑是苏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两国可以利用这种积极因素，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就禁止和摧毁化学武器问题协调立场。

然而，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尽管我们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征兆令人欣慰，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仍然是两方面的，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仍然期待两国关系在更多的领域更好地向前发展，但是美国方面的一些立场却使我们感到为难。

就此我想谈论两个问题，即印度支那问题和近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国际事务中以及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占据着特别的地位。

我们国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共产党都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民都遭受了来自外部的直接侵略。成千上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无数的住所被摧毁，我们一直都坚决地反对这种行径，今后也将继续反对。这些行径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的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外部入侵的后果应该被消除。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调解问题。无论对于印度支那局势，还是对于近东局势，我们的原则立场都是这样。事情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我们还非常关注这样来解决问题，其原因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兄弟国家，而近东地区有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这一地区同苏联直接接壤。

同时，我们完全不会侵犯某一方在印度支那地区或近东地区的利益，不会破坏某一方的国际威望。我们希望根据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合法利益来建立和平。

在这些地区，有哪些地方不合美国的意愿呢？难道这些地区也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吗？

我认为，我们双方现在进行的接触的意义不是为了争论。我想，您也会认为，进行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应该谈论一个问题。

您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就调解近东冲突的途径和手段进行着对话。一年前，确切地说是在1970年6月初，这种对话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已经确立了调解近东冲突的基础，其中包括确立了以色列撤军的条件以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确立和平的条件，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立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失去了寻找途径进行协商、解决问题的兴趣，并且转变了自己的政策。难道这不会对苏美关系产生影响吗？很明显，是会产生影响的。

如果近东事态的发展导致了这一地区局势的再度紧张，甚至导致了冲突，这就非常令人痛心了，我相信，您和我们一样，是希望避免这一点的。

至于印度支那战争，您自己也说，这场战争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情确实是这样。你们曾发表声明说，希望努力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好像也说过，为此你们要撤出部分美军。或者你们关心的是怎样延长这场战争。老实说，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加符合实际。

如果美国的政策是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我们觉得，美国就不应该不提出完全撤军的最后日期。如果美国确实想翻开自己对印度支那政策新的一页，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关于在南越组建民族协调政府的想法，组建民族协调政府完全可以使越南人自主地解决问题；毕竟越南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您说，希望苏联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印度支那地区获得和平。当美国方面表现出现实主义思想，表示愿意停止直接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愿意就和平调解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曾帮助双方克服了一些障碍。现在你们同越南方面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接触，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我们当然也非常了解你们正在进行的这些接触。我们认为，停止印度支那战争、寻找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件事情上越南方面最近提出的建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希望美国方面最近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真正为调解越南问题开辟道路，这也是所有人的期待。是否应该说，这将对苏美关系的现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您谈论了关于您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您对这件事情作出的解释。我们当然不会在原则上反对美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整个问题在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显然，不久后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得到答案。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历史早就教导我们，要把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自然进程同建立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联合区别看待。

您提出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政策的看法，您向我们保证不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不企图破坏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您的这些

看法和保证对我们来说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您在自己的信件中谈到了关于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方也愿意使苏美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中包括发展双方的贸易，在太空研究领域进行合作，在国际海域研究问题上、环境保护问题上和卫生健康问题上进行合作。对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来说，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在进行的军备竞赛花费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果不停止这样的军备竞赛(哪怕首先暂停这种竞赛，然后减少这种竞赛的速度)，不减少军费的增长，那么，无论在国际会议上发布多么重大的声明，来要求各国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现代文明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样声明也将不会起到作用，这种合作也不能持久，而其成果也只能是有限的。

这意味着应该寻找更加可靠的途径来解决裁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如果直接地说，那么裁军问题的责任首先是落在我们两国的肩上，我们两国的责任极为重大，尽管其他国家当然也应该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作出贡献，特别是那些也会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总统先生，人们有时候会说，尽管共产党人奉行的是唯物主义哲学，他们的行为是理想主义的，提出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而且我们也确实认为，裁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签署的一些重要条约以及取得的一些其他成果加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因此，双方都应该作出努力，而我们是愿意为此努力的。

如果我们和你们能够真正地对对方总的政策方针予以相互理解，那么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简单得多了，两国之间的不和因素将会被减少，在一些迫切的、具体的问题上，双方将会减少他们含糊其辞的表述，减少他们提出的保留条件，而我们两国的安全、国际和平和安全则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总的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当我们在最高级别的场所和国际舞台上宣布这项原则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的这一方针不受当今某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事态现在产生的影响可能非常重大，但是它们以后将会被完全忘却，我们不是狭隘地考虑问题，去取得战略上的利益——这样做是不认真的，我们考虑的是根本的

和平利益。

这就是我根据您的来信，对苏美关系的状况产生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我认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苏美关系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期待着同您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将是非常重要的，而它越重要，就越有利于局势的发展，有利于这次会晤的举行。而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

致以敬礼！

Л.勃列日涅夫

АПРФ, ф.80, оп.1, д.814

№22917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1971年9月26日)

纽约

优先发送

9月24日午餐的时候，在罗杰斯那里进行了一般性的会谈，苏美双方代表团的成员也参与了这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谈论的是欧洲问题。有关同罗杰斯单独举行的会谈的那部分内容将单独进行报告。

全欧会议问题。我对罗杰斯说，美国方面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在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现在美国政府对召开全欧会议的态度更加积极了。我强调说，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开全欧会议应该追寻的目标是：扩大合作，促进欧洲局势的缓和，这一目标不仅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我说，希望现在能够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来准备全欧会议，就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问题和会议的议事日程问题达成协议。关于这个问题我说，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相关各方现在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这次会议。我提及了芬兰政府提出的关于在赫尔辛基召开多边磋商会议的提议：以多边磋商的形式集体准备全欧会议，当然，这种形式不排除继续进行双边磋商的

可能。

我对罗杰斯说，我现在能否向苏联政府报告说，美国政府同意在1972年召开全欧会议。

在会谈中罗杰斯始终都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罗杰斯说，召开全欧会议是一次重大的事件，美国政府在原则上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积极的。罗杰斯问道，对于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是怎么认为的，其中包括关于多边磋商的问题，是否所有即将参加全欧会议的所有国家都应参与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应该开展实际工作，对这次会议进行准备。

我对罗杰斯说，我认为，既应该从政治上，也应该从实际上进行考虑，以便将来的与会国家都参加欧洲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这指的是所有愿意参与会议准备的国家。至于与会代表的层次，那么，未必就一定要采取非常死板的形式，与会代表可以是外交部副部长、特别代表，而如果某些国家认为，委托自己驻芬兰的代表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比较好的话，那么也没有理由对此表示反对。

总的来说，罗杰斯对于这些想法的态度是肯定的。同时，他也特别地问道，我们认为，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还是在此之前。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罗杰斯说，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事情的发展是，全欧会议的召开看起来应该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根据各方面判断，苏联和波兰将在1972年初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就我们所知道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也认为，全欧会议应该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召开。但是没有理由把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集体准备工作以及其他的准备工作推迟到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这些准备工作应该尽快进行。

对于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关于欧洲会议的准备工作，罗杰斯对这种做法在事实上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我对罗杰斯说道，即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也应该同时进

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如果在开始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等到上个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的话，那么就会把一些迫切的问题推迟到数年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罗杰斯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关于全欧会议的多边准备工作。随后就这个问题继续交换的意见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罗杰斯说，在下次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可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对此表示同意。

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罗杰斯总是提到“召开预备会议”，他的谈话使我觉得，在他们看来，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不仅仅应该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还应该预先研究关于全欧会议日程的一些实质性的条款。

助理国务卿希伦布兰德主管欧洲事务，他在同我方成员进行的会谈中确认，美国的立场就是这样。他说，美国方面认为，最好是在“预备会议”上商议关于全欧会议的一些主要文件草案，然后，全欧会议再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研究，在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加工”之后予以通过。

希伦布兰德也明确指出了关于美国方面认可的进行多边磋商的日期。他说，北约成员国在北约委员会里斯本会议上“共同决定”，在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生效之前，不可能召开对边会议，来准备全欧会议。同时，希伦布兰德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支持这一决定，1971年12月，在北约委员会例行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因此，关于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交换意见，可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可以预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将不会怀疑召开全欧会议的合理性，甚至将会尽力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政策将是，拖延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甚至会将在赫尔辛基就组织问题举行的这种多边会谈变为某种形式的“预先会议”，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全欧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预计在近期进行，全欧会议也预计会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指出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在1972年召开，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在

这个问题采取的拖延政策，我们应当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予以明确的反对。我指的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我们要坚定地执行这种政策。

同时我想指出另外一个状况，这一状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罗杰斯强调说，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此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对于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罗杰斯不仅没有表示某种怀疑，而且还认为批准这个条约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条约很快就会得到批准。

欧洲裁军问题。在会谈中，我向罗杰斯阐述了我们对欧洲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并特别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不仅应该就裁减在国外的军备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裁减在国内的军备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认为，应该在不结盟的基础上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罗杰斯说，今后可以就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交换意见，而且相关各方可以在全欧会议召开之前，或者在这次会议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根据我们的立场，我反对在全欧会议上讨论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使全欧会议承担更多的议事日程，因为这只会使这次会议更加复杂，会影响这次会议的成功。无论是在全欧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解决，更加现实的做法是，把这些问题分开讨论并予以解决。

总的来说，对于我作出的这些解释，罗杰斯的反应是积极的。是否所有参加全欧会议的国家都应该参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的讨论？罗杰斯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对罗杰斯说，看起来，对于欧洲裁军问题，所有国家都很感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都应该对解决这个问题承担责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其应该予以考虑。

关于召开全欧会议，关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罗杰斯没有表示反对。希伦布兰德助理国务卿也曾对我们的同志说，美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灵活的：他们愿意在全欧会议的范围内讨论欧洲裁军问题，也愿意在全欧会议范围之外讨论这个问题。

罗杰斯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的谈话表现出的明显是一种集团对抗的思想。比如，罗杰斯问道，北约方面委托某位将军同华沙条约成员国家事先交换意见(希伦布兰德说，这指的是北约前

秘书长曼里奥·布罗吉奥，他被委托参加在今年10月初即将举行的北约国家副外长会议)，对此我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以坚定的语气答复罗杰斯道，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程序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采取了集团对抗的态度。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其中不仅仅包括对中立的国家(罗杰斯明白，这暗指的是法国，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问题上法国坚决反对采取集团对抗的态度)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没有理由的。我说，应该找到更加适宜的形式事先进行接触，苏美双方也不排除以这种形式交换意见，但是这是在两个相关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华约和北约的代表之间进行的。当然，在这种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苏联和美国都可以同自己的盟国交换看法和交流情报，但仍然不能说，这种交换意见的形式是在两个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的。

罗杰斯对我们的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是他没有具体地谈论自己的看法，并且他说，看起来，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签署最终的协议的程序问题。罗杰斯建议由四大国外长在西柏林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终协议。他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很感兴趣。

我对罗杰斯说，他的这一建议值得注意，并且，看起来，这一建议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从罗杰斯以及美方成员，其中包括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帕尔马、美国国务院总顾问佩德尔森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现在正密切关注着最近几天有关中国局势的报道，并在努力搞清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但是，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对于大部分美方成员的谈话的意思可以作如下概括：在北京最高领导层中，现在可能正在进行某种斗争，而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清楚，这种斗争将会对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杰斯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提出了如下问题：关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问题，能否“接受”两种立场。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双重代表”的建议，并不意味着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这一建议只是反映

了“客观现实”。

我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在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我问罗杰斯，应该怎样看待如下情况：如果事与愿违，美国提出的关于“双重代表”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而如果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不退出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那么中国是否会接受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罗杰斯回答说，尽管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不接受”关于双重代表的建议，他既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也不能作出否定的答复。

美方的其他代表(布什和德·帕尔马)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比较确切一些，他们说，哪怕是不接受关于驱逐蒋介石驻联合国代表的决议，如果不是在今年，那么在明年中国最终也会接受在联合国的席位。

关于印巴地区的局势问题。罗杰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主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在同我方同志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谈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西斯科说，美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方都有接触。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不允许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如果由于东巴基斯坦事态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的话，军事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美国的评估，比较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反击”孟加拉游击队在印度领土上日益加强的军事行动。

西斯科继续说，在这些条件下，美国政府将努力使三方之间以某种形式进行谈判。如果三方开始了这种谈判，那么美国将作出一切努力，使谈判取得成功，使东巴基斯坦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并为遣返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创造条件(美国认为，难民的人数不是像印度人宣称的那样，有800多万人，也不像巴基斯坦所确定的，有200多万人，而是有500万—600万人)。

用西斯科的话来说，美国方面关于政治调解问题的设想如下：在东巴基斯坦逐步恢复“正常局势”(西斯科认为，首先应该由主管民事事务的总督马利克替换主管军事事务的总督蒂基汗，这一点已经做到)。指定在今年11月份，在东巴基斯坦另外进行选举，选举之后组建新的政府，新政府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应该是亲近穆吉布尔·拉赫曼的人(西斯科说，现

在，美国方面同这些领导人已经建立了联系)，但是，不要求成立独立的东巴基斯坦国家。新政府在“穆吉布尔·拉赫曼提出的六项条款”的基础上同中央政府签署协议。在此之前开始向东巴基斯坦遣返难民。

西斯科说，美国方面认为，事态完全会这样发展，但是“苏联和美国必须为此共同采取行动”。我问道，这指的是什么。西斯科解释说，美国政府的考虑是，苏联和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不存在利益冲突，并且，防止这一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很关切。因此，美国方面认为，苏联可以利用自己对德里的影响提醒印度政府，首先，使印度政府不要对孟加拉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支持，停止在印度领土上组建孟加拉游击队的活动，并且，第二，不要坚持免除穆吉布尔·拉赫曼的职务，并以此作为政治调解问题的先决条件。

我方说，苏联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印度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没有打算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而我们也相信他们的这一保证。而巴基斯坦方面的答复尚不清楚，他们的答复也很含糊，这使人产生警惕。我方强调说，苏联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行保持该地区和平的政策，对于东巴基斯坦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方认为，进行政治调解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担忧印巴地区局势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关于同苏联协调行动的想法，这种想法证明，美国方面希望协调美国和苏联的某些行动。显然，对于美国在印巴相关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的性质和目的，并且，我们今后在制定应对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

A.葛罗米柯

АВПРФ, ф.059а, оп.7, п.13, д.10, л.58-70

No22919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1971年9月29日)

1971年9月29日同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会谈，参与前半场会谈的人员还有：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多勃雷宁同志。然后我同尼克松举行了单独的会谈。

(一)

在我们开始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说，从我们进行上次会谈至今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里，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其中包括在西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苏美两国外长明天签署的协议将证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接着说，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进行的评价。而他也愿意谈论一下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一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我同意在这次谈话中谈论这些问题。并且说，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一个委托，代表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向尼克松总统表示问候。

1.在转入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提议，首先开始讨论涉及苏联和美国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我说，尽管我们已经多次阐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但是，考虑到自我们上次会谈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概括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两国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两国还没有共同的观点。这些问题既涉及两国关系本身，也正如其他的许多问题一样，同两国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现在想强调的主要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愿意寻找途径，克服他们之间现存的、现在可以克服的一些困难。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很难找到共同的观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避免迎头相撞，或者，正如美国方面经常所说的，能够避免冲突，并且进行努力，以便在就某些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顺利地解决那些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

正如您所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两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都存在分

歧。但是近来——从我们首次会谈以来的一年里，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征兆。我们对此予以积极的评价，尽管这种进程涉及的还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领域。如果更加具体地说，那么首先就应该肯定四大国就西柏林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同您上次进行的那次会谈，在当时进行那次会谈的时候，您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美国政府和您，总统本人，都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作出了贡献，我们对此都很满意。

现在，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征兆，尽管这些征兆，或许才刚刚出现。但是，我现在想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如果您能够就这个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谈论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及其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意义，那就更好了。

在对我所说的话进行总结的时候，我想代表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再次声明，过去，我们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今后，我们将继续维护和平，其中包括发展同美国的和平关系。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战争不仅损害我们的短期利益，而且还损害我们的长远利益，战争与我们的国家基础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不相容的。我们希望，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正如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都是超级大国，我们完全理解两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我们两国都有着重大的责任。如果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两国都可以说，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友好的关系，那么这样就更好了。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两国的政策都必须要向这方面发展，我要强调的是，两国都要实行这种政策。

最后我说，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够从当今局势发展的角度、从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角度对苏美关系发表一些看法。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观点。在对局势开始进行评价的时候，他说，如果谈论我们所提及的关于柏林问题这一具体的问题，那么，就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或许是最近十年来最为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欧洲国家、对于德国来说，柏林问题都一直是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现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证明，我们同你们是能够就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尼克松接着说，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美苏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的重要性的看法，他们是同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其他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们希望同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平关系。比如，我们希望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并且愿意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我们是否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最终并不取决于全世界是否和平。但是，国际间的和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个大国之间是否保持和平关系。对此谁也不会怀疑，而我们自己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美国政府和我，美国总统，都赞成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举行这类的谈判，前不久就柏林问题成功举行的谈判就是类似这样的谈判。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致力于发展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我们已经签署了合同，向卡姆斯基汽车厂提供美国的一些设备。今天我还同意同苏联签署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这样一来，我们已经同意，同你们签署价值大约为4亿美元的合同，向苏联的汽车厂提供设备。对于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美国的实业界人士自然也表现出了兴趣。此外，我们认为，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有助于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而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则是两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还需要克服一些法律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的存在是由于一些政治问题、首先是越南冲突问题尚未解决。我谈论这一点不是为了把这两个问题挂起钩来，而是由于国会的法规所造成的一些实际情况。总的来说，我作为美国总统，是支持更加稳定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就贸易问题交换意见的建议(是根据相关决议提出的)。他开玩笑地说，那就应该对这些代表进行一些筛选，因为希望到莫斯科的人有很多。

2.尼克松接着说，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美国政府和他个人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诚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共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能使目前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关于迈出的这一重要的一步，他指的是今年5月20日我们两国共同发表的宣言，这份宣言的发表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美国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该宣言的发表反映，美苏两国政府都愿意努力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两国的国家安全利

益。现在他不想谈论关于一些细节问题，而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们觉得，关于应该受到限制的武器的类型，无论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还是关于防御性战略武器的类型，他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公正的，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他们将提出什么建议呢？

实质上他们建议的是，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甚至可以在进攻性导弹的数量上稍有优势，同时，美国不发展一个地区——首都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而是发展两个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但不包括洲际导弹。而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事实上苏联拥有的陆基洲际导弹比美国拥有的要多500枚。同时，苏联舰载导弹在数量上也将很快赶上美国。但是，美国好多年都已经没有增加自己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的数量了，事实上是单方面冻结了自己的进攻性武器的数量。

尼克松接着说，当然，苏联政府完全有权利做他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随意地加强自己进攻性武器的规模。在此方面美国政府不会对苏联方面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两国政府实际上都会考虑到如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容忍对方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美国方面的估计，现在美苏两国的战略武器状况已经大体均等。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才建议双方都不要为了把对方远远地抛在后面而拨出巨款进行这场毫无结果的军备竞赛了。反正另一方是不能容忍对方这样做的。

现在美国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们民主党的人都在谩骂我，谩骂美国总统，因为在我入主白宫的3年时间内，我没有开展什么工作来增加美国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结果是美国的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没有变化，而同时苏联的战略进攻性弹道的数量则迅速增加。

尼克松接着强调说，开诚布公地说，现在两国政府都应该对各方面的情况予以权衡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希望，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使双方在战略导弹问题上达成协议，保障双方现在的大致平衡关系。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明确地表示，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们的必然选择将是，恢复美国战略导弹的建设，生产新的陆基和海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以便在战略导弹领域不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的这些话指的是，苏联在战略导弹领域已经赶上了美国，并且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越美国，尼克松已经不能忍受了，他必须尽快作出选择：美苏双方达成协议，要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谈话的最后，尼克松呼吁双方共同努力，以便在这一领域达成协议。用他的话来说，这对苏美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两次主动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许，这部分是由于他对这些谈判结果的预测过于乐观，他曾发表过一些非常乐观的公开声明，而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他希望以某些具体的谈判成果来证明自己的那些公开声明。何况，美国军事工业体现在施加的压力上明显在增长，他们要求实行新的军备计划。

在对尼克松进行答复的时候，我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就反导问题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进行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顺便说，这些谈判促进了明天将在华盛顿签署的那些协议。没有这些谈判，那些协议要么是不可能达成，要么只会长期处于研究阶段。我提请尼克松注意法国外长舒曼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舒曼声明说，关于进攻性武器问题和反导问题，法国事实上同意我们提出的那些目标。法国外长还说，法国愿意加入苏联和美国制定的协议，采取措施减少未经批准的导弹偶然发射的危险。我再次说，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立场是认真的，我们的意愿是真实的，对此不应怀疑。

接着我提请尼克松注意苏联最近就反导问题提出的建议。我说，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是否已经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将会为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建设性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简短地阐述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

我接着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我们同意，在维也纳举行的例行谈判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我们希望双方真正地把谈判进行下去，无论怎样都不应丧失进行协作的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谈判取得成功。

尼克松表示，同意我的这些谈话，并且说，他想再次强调，必须一揽子地研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所有问题。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反导

问题和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分开讨论，并就某一问题达成相应的协议，那么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随后认为，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类型方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仅不能限制这些武器的增长，而且这些武器还会以更加快的速度被生产出来，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我们的全盘考虑。我们必须共同研究这份协议，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代表苏方再次说，看起来，现在双方都应该对以往开展的工作总结一下，并认真地制定出关于下一阶段维也纳谈判的计划。我强调说，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的维也纳谈判中，我们将会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并提出我们关于就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想法。

3.然后，根据我方的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和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说，关于欧洲问题原则上需要谈论很长的时间，需要谈论很多。我首先想强调说，欧洲局势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可以令人满意地说，近来欧洲局势有了一定的改善，而没有恶化，欧洲的紧张局势缓和了。我们认为，就西柏林相关问题签署的协议为欧洲今后的缓和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和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当我们去年就这个问题同您举行会谈的时候，您没有否认这一建议。但是，美国以及参与西柏林问题谈判的一些代表却对我们说，首先必须解决西柏林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讨论全欧会议问题，尽管他们没有理由这样说。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提请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注意，现在已经为召开全欧会议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总统个人现在能够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促进这次会议的召开。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再次声明，苏联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谋求单方面的利益。我们相信，全欧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将会符合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也将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益，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您本人也曾公开说过，要促进世界的缓和、特别是要促进欧洲的缓和。

尼克松同意，现在就解决柏林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应该更好地研究欧洲其他的、也可以取得进展的那些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他认为，一旦柏林问题最终解决之后(他说，要最终解决柏林问题，毕竟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着手研究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在同其他国家，无论是北约国家还是华约国家一起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我们两个主要的大国事先应该秘密地交换意见。对于这一点，他认为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和自己的盟国进行磋商。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就召开会议，那么，看起来这将是错误。换句话说，正如我所说的，对于那些我们希望在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你们事先进行秘密的磋商。

罗杰斯说，最终，最主要的是苏联和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尼克松对此表示同意，同时他还风趣地说，否则，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这次会议将被变成类似联合国召开的会议。

我请尼克松总统确认一下，我们的如下理解是否正确，我指的是：苏联和美国将就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进行双边磋商，这件事情不会被拖延。我就此指出，我们认为，把类似这样的磋商看作是北约代表和华约代表之间进行的磋商，也就是说以集团对抗的方式来准备这次会议是不正确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反对就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及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磋商，其中也不反对同美国进行磋商。接着我问尼克松道，我是否能够向莫斯科报告说，美国政府支持召开全欧会议，美国认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无须拖延，现在就可以进行，以便这次会议明年就可以举行。

尼克松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美国倾向于认为，首先同我们就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在经过双方交换意见之后，能够证明，这次会议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那么美国愿意在实践上采取措施召开这次会议。至于这种预先交换意见的形式，尼克松再次强调说，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单独的秘密的磋商。关于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遵守秘密磋商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因为任何所谓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主宰世界的议论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尼克松说，现在已经签署了苏德条约，就柏林问题签署了协议，并采取了其他一些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预先就这个问题开始交换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说，他相信，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希望只是为了这次会议而召开会议。

罗杰斯补充说，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情况是，柏林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两个德国之间尚在进行谈判。他说，他完全知道，关于柏林问题同召开全欧会议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个问题，我们不愿谈论，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

尼克松就像是接着罗杰斯的谈话继续说道，他们不想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是在柏林问题上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还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也就是“柏林问题”，就很难在实际上着手讨论另外一些欧洲问题。

关于尼克松和罗杰斯的这些谈话，我要强调，我们坚决认为，美国在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上提出的条件越少越好。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那么这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然后我问尼克松道，我想知道这样说是是否正确：美国愿意在近期就他刚才所谈论的那些问题进行秘密的磋商。

尼克松回答说，如果把这些磋商看作是事先进行的秘密的磋商，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些磋商。但是就此不能得出如下一种印象：好像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已经由我们两国最终解决了。我不想被人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已经决定要召开全欧会议。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进行磋商，经磋商后或许会召开这次会议。同样重要的是，在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关于进行秘密磋商这件事情不要公开。

在对这段谈话进行总结后就可以断定，尼克松总统同意，苏联和美国近期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秘密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再次说，关于这一点他认为不存在困难。

4.在接下来进行的会谈中，我们同尼克松就中东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方指出，中东的局势不能不令人担忧。或许，局势的发展会超出人们的预料，使苏联和美国也难以控制。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和危险：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是以色列的消极立场使得在调解中东问题上现在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调解中东问题没有基础，如果开诚布公地说，前不久美国向埃及提出的建议也没有依据。

我方接着说，我们不愿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并强调了如下一种重要思想：在讨论近东问题的时候，回避关于使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完全撤军的任何建议都不能为调解近东问题创造条件，都不能持久地巩固和平。只有以色列从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才能解决问题，才能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才能营造和平，这也符合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个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其中包括关于所有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提供保障的问题、以色列的船舶通过运河问题、中止战争状态问题以及其他所有问题。我方最后说，我们想知道美国总统本人对近东局势如何进行评价，对今后近东问题解决的前景如何进行评价。

尼克松就这个问题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说，关于近东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我方作出的评价，他是完全同意的。他说，当然，如果就以色列撤出所有的军队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近东问题。但是，以色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简单地同意这个问题。这一地区的状况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调解问题。他认为，他们和我们都非常清楚，从原则上来说，即使一个小国也可以使他们同我们发生对抗，这是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此外，近东局势使双方都很深地卷入了该地区正在进行的那场军备竞赛。在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会受到国会的压力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事情不在于是谁首先向该地区提供了武器，或者谁有权利这样做，或者谁对谁错。关于这个问题会进行长久的争论。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该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将有助于近东问题的解决。

尼克松接着概括说，他认为，现在签署拓展协议已经有了较好的前景。遗憾的是，他们同我们都不能像双方所期望的那样，在全面调解近东问题上取得进展。目前近东的局势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努力保持停战状态。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应该对自己在该地区的友国施加压力，使他们保持克制。第二，应该努力限制近东地区国家武力的增长。第三，应该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应该考虑到，要求以色列宣布从所有被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完全撤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罗杰斯在谈话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关于使以色列完全撤军的问题，安理会在1967年的决议中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了激烈而长久的争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阿拉伯国家的，并且认为，除了对边界问题稍加调整之外，

以色列应该撤出军队。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着说，事实上，美国的立场更加接近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立场。但是美国仍然不能断然宣称，美国支持“完全撤军”的建议。至于签署中期协议问题，罗杰斯强调说，毕竟不是美国，而是萨达特总统首先提出来的。美方仍然认为，签署中期协议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宜的地方，会使埃及完全得到一定的利益，尽管在形式上看来只是恢复了埃及对运河的控制。

我方对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的这些谈话作了答复，我们主要强调的是：签署中期协议显然应该同和平调解近东问题这一总的任务联系起来，否则签署的中期协议看起来就像是使以色列对其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得到了巩固。阿拉伯国家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它们的反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同意它们的看法，并且支持它们。

接下来我问尼克松总统，为什么不能在一些基础上达成协议，比如，在第一阶段签署领土协议，并且在签署这一协议时明确考虑到：该协议中规定的一些措施应该成为整个协商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协商计划应该分阶段地实施，应该考虑到，使以色列在一定的期限内完全撤出军队，并指明撤军的期限。如果某一阿拉伯国家，我具体指的就是约旦，愿意同以色列自由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共同确定它们的一些边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以色列也愿意的情况下，约旦当然是有权这样做的。

我向尼克松总统问道，这个计划对以色列有什么不适合的呢？何况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会提供严格的保障。我们想，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可以说服以色列接受这一明智的立场。美国越快说服以色列就越好。

尼克松回答说，美国政府愿意毫无成见地研究和讨论任何一项建设性的建议。他风趣地说，但是，如果苏方认为，美国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他只能以一句欧洲的俗语相赠，这句俗语来自圣经，说的是“男人是用柔软的黏土做的，而女人则是用硬材料做的”(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的)，如果我们亲自会见了果尔达·梅厄，那么，他认为，我们完全会相信这句俗语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严肃地说，总的来说，他们自然将会继续努力，积极地解决问题。

尼克松接着表示，他希望继续就近东问题进行单独的会谈(关于这一点将另行报告)。

5.接下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讨论了印巴关系问题以及印巴紧张局势问题。尼克松指出，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两国有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这使美国政府非常关切。尼克松接着说，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不采取一些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动，是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的。当然，他也知道，许多人会说，巴基斯坦不能同印度作战，因为印度在人口上占据优势。但是，如果印度施加了过于大的压力，那么巴基斯坦方面也会采取玉石俱焚的行动。对于苏联过去在调解印巴冲突中曾经起到的作用，美方将给予应有的评价，并且希望，苏方今后在此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我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很关注印巴问题，在努力避免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对此我们非常满意。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也不希望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力所能及地作出一切努力。看起来，尼克松总统是知道这一点的。

当然，就国土面积来说，巴基斯坦确实小于印度。但毕竟并非一定都是强大的一方挑起了冲突和事端。如果没有保持应有的克制，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智慧、丧失责任感而不顾及该地区的局势，那么，面积较小的国家也会挑起冲突和事端。苏联的立场是，对印巴双方都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它们之间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本人(最近几天她在莫斯科进行访问)都坚决向苏联政府保证，印度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措施。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也向我们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但是，如果直接地说，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这些保证。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向尼克松总统阐述了我方的立场，希望美苏双方都对印巴施加压力，以便印巴不发生冲突。我们是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苏美双方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共同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应该“首先”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

尼克松同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接触。我们没有反对这一点。

然后尼克松表示希望继续进行单独的会谈。

(二)

尼克松说，他想单独地谈论一下那些对双方来说都是敏感的问题。

首先他想说，通常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是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的。他过去和现在的看法都是，只有通过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创造稳定的和平。

尼克松说，其他国家仍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国家，而是取决于苏联和美国。或许，通常在公共场合不适合发表这样的讲话，这是另外一回事。但重要的是，在政策中承认，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如何，美国是承认这一点的，并且今后将会继续承认这一点。

尼克松总统说，当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在某些问题上会存在分歧。但重要的是，两国都应该避免冲突，并寻求途径在最大程度上就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谈论时尽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努力同苏联达成谅解，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阐述了我们对于美政策的原则和计划。我主要强调的是，苏联致力于和平事业，愿意寻求途径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同时我也强调说，苏联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侵害各国人民合法权益的国家，坚决反对那些不仅损害苏联利益，而且也损害苏联的友国和盟国利益的国家。

尼克松接受了我的这些看法，没有进行争辩，并继续提出了我们曾经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开始谈论关于四大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尽力强调了这份协议的意义，该协议不仅会对苏联和联邦德国、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条约的批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甚至也谈论了这份协议对发展苏美双边关系的意义。

关于苏美两大国之间取得谅解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尼克松对他进行的谈话作了总结，他说，在他看来，应该利用目前形成的良好形势，加快苏美两大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应该进行努力，至少使今后25年的和平得到保障。

尼克松接着强调了关于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说，还有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被相关方面提了

出来。他顺便说，或许，美国方面将会就苏美经济关系问题发表一份声明。

我问尼克松总统，什么时候将会发表这份声明。尼克松回答说，或者在苏美高层会晤之前，或者在进行苏美高层会晤的时候宣布。他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尽力表达的一种思想是，在经济关系领域采取的上述措施，对苏美两大国整个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尼克松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高层会晤问题，我的答复是，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次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双方都应该进行一切努力，使这次高层会晤取得成功，并签署协议。为保障这次会晤取得成功，双方现在进行的一些努力也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次会晤是会取得成功的。至于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明确的，并且多次被提了出来。

尼克松接着说，他还没有让白宫知道美苏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所有协议，他再次请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考虑到这一状况。对于在美国国内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尼克松进行了解释。

我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完全考虑到了这一点，对此尼克松总统无须任何怀疑。尼克松说，对此他没有任何怀疑，因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相互利益。

尼克松接着谈到了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关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来函的答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是直接谈论的。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复函以及这份复函的内容都是非常积极的，他一定会继续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这种接触，直接地交换意见。他非常清楚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的国家地位及其在决定苏联政策中的作用。尼克松说，在我们举行这次会谈之后，他很快将会再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信件，在我们这次谈话的基础上谈论他的一些想法。在我们同尼克松举行这次会谈之前，今天早上基辛格在同多勃雷宁会见的时候也把这一点告诉了多勃雷宁。

尼克松说，他不愿谈论所有的话题，他指的是在会谈的第一阶段，在有其他与会人员的情况下就近东问题举行的会谈。接着他说，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苏联和美国两大国应达成协议。他不认为这对局势的发展是无所作为的。他委托基辛格明天在华盛顿，在这里举行会谈，以便更加具体而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对尼克松说，对于苏美两大国进行合作，迅速地解决近东问题，我们像以前一样，是积极地对待的。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我们。只是应该考虑到，如果以色列不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军队，近东问题就不能解决。撤军问题是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就撤军问题达成了协议，调解其他的问题将不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一点。

在就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就以色列和近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我说，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难道以色列认为，苏联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国家 and 安理会一起提供的安全保障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两个大国都支持他们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胆敢破坏对他们提供的这种保障。总统先生未必会否认这一点。难道由于一个国家毫无理由地绝不妥协，苏联和美国就要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吗？而以色列的行为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对于我所说的这些话，尼克松没有进行争论。

尼克松不愿过多地谈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从原则上来说，他对解决近东问题是乐观的，这不同于在今天举行的上半场会谈中，在有其他与会者参与的会谈中罗杰斯发表的谈话。

从尼克松的谈话可以看出，在谈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时候，在谈论关于推进近东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的时候，尼克松还提到了关于苏联的军事人员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问题，还谈论了关于一些国家向近东国家提供武器的问题。

我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意愿，我愿意在明天早上接见基辛格，同他进行会谈，关于这个问题将会通过多勃雷宁告知基辛格。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在近东问题上的发言，他说，对于我方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将会认真考虑。对于我们同罗杰斯进行会谈之外，还即将同基辛格进行会谈，他表示了满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就近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同我们举行会谈。

尼克松强调了多勃雷宁—基辛格秘密渠道的意义。他赞成今后利用这一渠道。

我答复说，我们也高度评价这一秘密渠道的意义，并认为今后应该

利用这一渠道，其中包括在就近东问题举行会谈的时候。

尼克松说，关于近东问题和调解近东事务的主要内容正是应当通过这种秘密渠道进行讨论。

在会谈结束、尼克松送我们上车的时候，他顺便又简短地谈了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

关于越南问题，尼克松说，看起来，在今天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很难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认为，越南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向前推进的。

关于中国问题，尼克松说，他采取了措施，同北京达成了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就不会追求有损苏联利益的目的。关于同北京进行合作的意义，他今天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尼克松补充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打算通过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说，通过中国来施加压力的这种企图是坚决要被放弃的。尼克松好像是对我的这一看法作出的回应，他补充说，当然，双方都不利用中国对另一方施加压力，那就最好了。

在就要上车的时候罗杰斯、多勃雷宁、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也走到了我们这里，他们在白宫的另一个房间里等待我们。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罗斯福战时用于观察世界军事局势的那个房间，战时，这个房间用于观察世界的军事局势是适合的。

当我们走到汽车旁的时候，尼克松指着驶向白宫的许多汽车说道，这里现在正在召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议。他风趣地问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我们也风趣地回答说，从各方面来看，参加这一组织的首先都是亿万富翁，而我们毕竟都还不是亿万富翁。

同尼克松举行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АВП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153-174

№22920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1971年9月30日)

昨天，尼克松在同葛罗米柯外长单独进行的谈话中说，要委托基辛格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根据尼克松总统的这一意愿，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访问了葛罗米柯。

多勃雷宁也参加了对基辛格的接见。

(一)

基辛格说，关于我们同尼克松总统单独进行会谈的情况，尼克松总统已经告诉了他，并且认为，这次会谈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次会谈，其中包括在近东问题上进行的会谈，尼克松委托他代表自己就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另外再谈论一些看法。

如果把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的内容进行总结，那么可以作如下概括：

近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的会谈的结果大致是这样的。考虑到我们在同他进行的会谈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尼克松总统原则上同意，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事先交换意见，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进行非常秘密的会谈，这指的是弄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所要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和计划，正如我们同基辛格在会谈中所讨论的，可以作如下描述：首先(第一阶段)达成中期协议，关于中期协议的内容我们双方应该达成协议。最终解决近东问题应该包括确定最终的边界问题，而这意味着以色列在撤军问题上要有具体的政策，考虑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目的都不应该是马上就希望就这个问题协调立场并制定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文本，目前未必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应该是，努力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非常秘密地达成谅解，这些谅解与中期协议是密切相关的，是中期协议的秘密条款，这指的是，这些谅解要在第二阶段执行。

至于执行这些计划的时间，基辛格说，尼克松面临着国内一些复杂的政治程序。在1972年，美国将会积极开展选举运动。考虑到亲以色列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美国的大众报刊，尼克松总统很难在选举期间采取一些会招致这些人严重不满的措施。这甚至会妨碍他再次当选总统，因为民主党正在进行一切努力，以便利用这种情况影响事态的发展，为自己谋取利益。选举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尼克松还将会有4年时间，而他也将不会考虑再次竞选了，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不允许总

统有第三届的。因此到那个时候，尼克松就不必过于理会美国的犹太阶层，就能够解决近东事务。而在此之前，可以和苏联方面一起制定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方案。

出于这些考虑，白宫认为，到时候，调解近东问题(如果到时候苏联和美国能够就调解问题达成协议的话)的时间表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第一阶段(中期协议)可以在1992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达成，第二阶段(最终的调解方案)在美国总统选举后达成。

苏美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预料，它们是：拟定中期协议的内容；同中期协议密切相关的、关于最终调解协议的秘密协议(在公布的时候其中的联系不应过于详细)；最终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其中包含的撤军问题。

基辛格援引尼克松的看法说，如果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秘密协议能够顺利达成，那么就应该作出相应的准备，在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进行私人会晤的时候巩固这份秘密协议。

我们同基辛格商定，大约两周之后就开始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协商，就上述计划的各项具体内容预先交换意见。看起来，一个月后双方就会明了，在上述计划中提到的协议能否达成。

要注意，在苏美进行的讨论到了某一阶段的时候，要同埃及和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进行谈判，但是现在还无需通知他们，还需要非常严格地保守这些会谈的秘密，使苏美双方都只有尽可能少的人知道这些秘密会谈。

我们商定，只要美国方面愿意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讨论问题，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就准备进行会谈。

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昨天尼克松总统就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我)，基辛格谈了一些想法。在他看来，这些想法可以成为一种妥协方案，他的这些想法的实质如下：

——签署和平条约。

——在商定的期限内撤出美军，关于撤军的期限美国愿意进行协商。

——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留在南越这一具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协商。

——预期的选举工作。这段时间(从签署和平条约到开展选举运动)会持续5—6个月，成立过渡政府，监督选举的准备工作。同时成立开展选举工作的机构。

可以商定，阮文绍总统既不参加过渡政府，也不参加为选举工作作准备的组织。民族解放力量的代表完全有权参加为选举工作做准备的组织。或许，在选举之前，他们不能参加过渡政府，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再讨论。

基辛格说，换句话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日期问题、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问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怎样进行选举问题、由谁来监督选举的进行以及关于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份额进行公正的分配问题，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就这些问题秘密地达成协议。

基辛格说，所有这些建议都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也还没有被转告给北越人，以某种形式进行讨论。或许，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可以秘密地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莫斯科认为，鉴于苏联主席对河内进行的访问，应该把白宫现在的一些考虑通报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尼克松总统也不反对莫斯科这么做。如果北越认为可以的话，将会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甚至也愿意把基辛格秘密地派往莫斯科，以便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继续进行非常秘密的谈判，而他们美国人当然也不反对在巴黎继续进行这样的谈判，如果北越人认为在巴黎谈判比较合适的话。

要达成的妥协的总的轮廓就是这样，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将很难作出更多的让步。他努力在1971年底之前使协议尽快达成，因为对尼克松政府来说，1971年底以后，同北越人现在进行的这场谈判很快将会失去价值，因为到那个时候，关于撤出美军的计划将会基本结束，“主要的负担”也会转交给西贡政权，美国政府事实上将无须再亲自参与今后的谈判，到那个时候，参与谈判的将只会是参与冲突的越南各方。

基辛格同时表示，尼克松总统相信，结束越南冲突将会为改善苏美关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结束越南冲突对尼克松总

统来说，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同时，尼克松当然也知道，苏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简洁而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也提请基辛格注意，尼克松总统和美国政府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行动迟缓，美国应该果断地结束越南战争，并撤出军队。

中国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言论，并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些言论。尼克松总统想再次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因为自己同北京进行接触而损害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至少在今后的25年里，苏联对于美国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打算干涉你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且我们也不会简单地这么做。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我向苏联领导人坚决地作出保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在同中国人进行谈话的时候，更不用说在其他的情况下了，美国现政府都不会作出什么行动，被莫斯科(更不用说被中国方面)看作是美国对苏中边界争端的干涉。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意图，证明自己对中国实行的总的政策方针，对于将来中美关系发展中可能发生的、莫斯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秘密地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最终日期至今仍然还没有确定。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其中的困难还在于，白宫同北京之间没有像他们同莫斯科之间一样建立这种可以经常接触的秘密渠道。因此，同中国进行谈判非常复杂。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政府前不久建议，要尼克松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商讨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愿意接受中国人的建议，从各方面看来，基辛格很快将会同一到两名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一起再次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基辛格说，在委托他把这一信息通报给莫斯科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还表示，希望随着高层会晤的临近，他同苏联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工作关

系能够更少的形式化，能够使他们就各个问题更加深入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避免目前的一切障碍，避免对已经开始进行的良好接触造成障碍，避免最终可能出现的重大争论，避免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就一些复杂的问题出现不必要的论争。尼克松总统认为这很重要。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很清楚，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提出各种借口，希望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这一已经开始积极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使一切都再次退回到过去。

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在双方的关系中要及时消除对对方行为的怀疑，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时候，怀疑是由于第三方产生的。基辛格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今后，如果莫斯科产生了某些怀疑，那么就可以通过多勃雷宁大使向他基辛格直接询问，要求作出相应的解释。这不单单是尼克松总统作出的良好的姿态，而是一项实际的政策，尼克松总统相信，这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的任务的基础——对高层会晤进行建设性的准备，这次高层会晤将是复杂的苏美关系顺利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尼克松总统也知道，目前我们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也知道这些分歧是不能很快解决的，而一些分歧看起来仍将存在下去。但是，总的来说，他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同苏联领导人发展关系的时候能够遵循上述方法。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于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我进行了总结。我说，现在，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思考的时候，双方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现在主要的事情是，把我们共同的任务和良好的想法转变成具体的行动。

在会谈的过程中，根据尼克松提出的建议(通过基辛格转达)，我们商定，今后我们首先通过罗杰斯，然后再通过秘密渠道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在进行交换意见的时候，要依照我们同尼克松在白宫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的精神。

我们还向基辛格阐述了我们的如下观点：四大国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必须同时生效，波恩必须完成最后的程序，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并请求基辛格把我们的这一观点转告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从总体上对我们的这一态度表示理解，尽管在此之前，谢尔

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四大国应该就柏林问题签署最后的备忘录，或许同时还要互换照会，确定这份备忘录的生效，同时确定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生效。

(二)

10月1日基辛格给多勃雷宁同志打了电话，并且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就我们昨天同他进行的会谈请求我转达如下内容。

1.对于昨天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商定的一切事项，尼克松总统完全赞同。尼克松总统把这次会谈看作是他自己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继续，把这次会谈看作是我们取得的另外一项成果。尼克松确认了昨天基辛格代表他所说的一切话。

2.总的来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他尼克松在白宫交换的意见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单独会谈时交换的意见，他把这看作是为明年5月份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前所作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3.对于白宫准备就调解越南问题提出的新的妥协性建议，如果苏联领导人决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知道这些建议的话，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让北越人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并且在同北越人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基辛格强调说，如果在河内出现了一些公开的报道，对白宫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进行评论的话，那么，对于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准备今后秘密同北越人讨论的一切事项，白宫将会被迫公开予以否认，并中止为寻求妥协方案而进行的所有准备工作。

4.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对于他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即将就中东问题交换意见一事，对于苏联和美国可能就中东问题达成协议一事都必须严格保密。这是由于考虑到这一话题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美国方面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两个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

АВІ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175-182

№2292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1971年10月4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会见了她。

第一，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说，根据他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谈话的精神，根据这次谈话的后续会谈的精神，尼克松总统想秘密地告诉苏联领导人如下几点：

正如他基辛格本人已经向苏联外长通报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建议，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访问，进一步讨论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星期六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于明天，也就是10月5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基辛格博士将在10月底对北京进行访问，以便同中国政府讨论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的准备工作。”

基辛格说，关于他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一日期很快将会确定下来。关于这一日期到时候他会另外向我通告。

基辛格接着说，他这次访问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商议尼克松到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需要讨论的问题，确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期，讨论关于这次访问的组织工作以及关于会议记录的细节工作。（根据基辛格的谈话，将会有3—4名随行人员，他们都是从事有关尼克松访问的准备工作的人员。）

基辛格承诺，在他从北京返回之后，将会根据尼克松的委托，把他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向我们进行通报。

基辛格强调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他通报给我的信息以及今后将要通报的信息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并请求我们也严格地保守这些秘密，不要让中国人知道。

最后基辛格说，尼克松委托他通过苏联大使转告莫斯科，他尼克松是说话算数的，对于他同葛罗米柯外长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就他对中国的态度问题向苏联领导人作出的所有保证，他是会践行的。

第二，基辛格建议我继续同他就近东问题事先进行秘密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是在尼克松总统和葛罗米柯外长之间开始的。

基辛格提议，在下个星期(10月14日或15日)同我举行这次秘密会

谈。

同时他也表示，他需要更加仔细地了解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情绪，为此他计划安排里亚德外长在纽约同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在他的一个朋友的私人住所里，在午餐的时候进行这次会谈。他也注意到还需要同以色列大使拉宾进行这样的会谈，他认为，相对于埃班部长而言，拉宾是个更具影响力的人(从他同果尔达·梅厄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也会会见埃班。

基辛格强调说，当然，在进行这些会谈的时候，关于同我们进行的会谈他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

在我们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详细地阐述了尼克松对前不久他同苏联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看法(关于这些看法的实质内容已经通报过了)。

第三，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提出了那项建议：秘密安排他基辛格在莫斯科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代表进行一次会谈，以便就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基辛格曾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在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过这项建议。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现在要补充说，如果河内对这些建议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派遣某一拥有全权的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这次秘密会谈，真正愿意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那么，他基辛格也将拥有尼克松总统授予的全权，并且，将会依照当苏联外长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对苏联外长所说的那些话的精神，努力在3—4天的时间内就解决越南冲突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

第四，基辛格援引H.B.波德戈尔内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访问，说道，尼克松总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在白宫进行了秘密会谈，他(基辛格)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他想知道，关于这些秘密会谈我是否有一些情报。

我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情报可以向他通报。

A.多勃雷宁

No2292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1971年10月15日)

午餐的时候在我们大使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

第一，我转交给了尼克松总统本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对于就举行苏美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非常满意，这一协议巩固了在10月12日达成的相关协议的成果。

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中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谈论的——已经聚集了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在高层解决。为解决那些尚未成熟的问题现在还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些问题还不能在高层会谈中进行讨论，当然，它们还不得被留待以后解决。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看待的，这种看法可以从今年9月底在华盛顿交换意见的会谈中体现出来，这次会谈的成果得到了莫斯科的肯定。我们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如果在实施这些谅解的过程中、在寻求途径解决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两国领导人都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希望达成两国都可接受的协议，那么，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仅将符合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且也将符合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

基辛格马上说，他应该把这一重要的看法报告给尼克松总统，他现在正在市郊戴维营官邸里。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努力，以便完成他写给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最后文本。看起来，最近几天他会最终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星期六早上，基辛格给我打电话说，关于举行高层会谈问题莫斯科方面转交给他个人的通报他已经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这份通报作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他请求转告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他完全赞同苏联方面对高层会晤的态度，并且他可以保证，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期间，他本人将会本着这种精神讨论相关问题。对于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他非常满意，并认为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补充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决定，今天就完成他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

由于基辛格在中午12点将要飞往夏威夷，前往中国访问，尼克松总统将会通过黑格(基辛格的助手)转交自己写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尼克松请求到时候立刻就转交这封信件。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会立刻转交这封信件。

第二，我也向基辛格说，根据受到的委托，我想请求转告尼克松总统如下通告：

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前不久，苏联外长在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的过程中，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苏联方面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必须防止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冲突，促进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政治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是由于东巴基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政府将会采取措施阻止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苏联政府方面也曾多次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发出呼吁，呼吁他们采取措施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再次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发出呼吁。

我们对他们发出的呼吁当然是有区别的，在发出这些呼吁时，我们将会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的立场。应该直接地说，莫斯科非常相信，印度政府和英迪拉·甘地总理个人能够保持克制，相信他们作出的关于努力避免同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的保证。我们对巴基斯坦方面作出的这样的保证就很不相信，其中，这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巴基斯坦方面在作出这种保证的时候，还以发动“总体战”对印度进行直接的威胁。因此，我们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说服叶海亚汗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政治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也非常重要。东巴基斯坦问题是由叶海亚汗政府的政策引起的，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企图挑起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企图以此来阻止东巴基斯坦问题的解决。如果能够推动事情向政治解决问题的方面发展，那么，这无疑将会为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的图谋。

在听完了我们的这一通告之后，基辛格说，他将会把这一通告报告给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继续说，美国方面还想作如下通告，前不久，白宫收到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复函，对尼克松总统向他发出的呼吁进行了答复。巴基斯坦总统在这一复函中表示，他愿意把所有的军队都撤离到距印巴边界一定距离的地段：无论是在西巴基斯坦的军队，还是在东巴基斯坦的军队，撤出多少公里要进行协商，如果这一相互撤军的建议也被印度政府接受的话，那么这将会缓和印巴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

因此，尼克松总统又给英迪拉·甘地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说，他们刚刚收到印度政府的复函，这封复函的内容很多，但是非常含糊其辞，实质上印度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们提出的建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印度方面作出这样的答复，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加剧了印巴边界的紧张局势。基辛格继续说，他们尊重我们提出的，关于各方都应该为这一冲突负起责任的观点。同时，白宫越来越担心印度政府(基辛格说他指的不是英迪拉·甘地)会倾向于用武力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政府的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时机适合他们对巴基斯坦公开采取军事行动。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给英迪拉·甘地又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再次确认，他们愿意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事先同我们继续交换意见，这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允许印巴半岛发生武装冲突。

应当指出，今天，10月16日一大早，美国的广播在头条报道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新闻：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在大规模地向边界地区集结部队。美国驻这两个国家的观察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预料，近期将会爆发军事冲突，而这场军事冲突的理由或借口则不是那么重要。

第三，基辛格说，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请求苏联外长把他们提出的建议转告给河内。基辛格想知道，H.B.波德戈尔内在河内访问的时候是否讨论了这个建议，我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我说，现在我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基辛格说，最近几天，他们已经向北越人提出了他们的这些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华盛顿事先告诉了葛罗米柯。美方在这些建议中告诉北越人，基辛格愿意

同北越高级代表举行秘密会谈，愿意在任何地方讨论这些建议，无论是在巴黎或者是在莫斯科。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越南人的答复。

在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会谈中，基辛格用非常坚决的语气强调说，这些建议是他们对北越人提出的最后的建议，如果北越人不愿意现在就同美国方面讨论这些建议的话，以后白宫不会再向他们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同时，美国将继续实施自己的“越南化”计划，特别是会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但是，如果北越在美国进行撤军的过程中，在“对于美国来说最为敏感的时刻”（暗指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在南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便给尼克松总统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造成困难，那么，到时候尼克松总统将会对北越采取“严厉的措施”。

基辛格继续说，关于这一点他也告诉了中国人，在他同周恩来再次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他还要再次重复这一点。

他们希望，苏联方面现在也明白了这一点。这不是威胁，而是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反击行动，一旦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尼克松总统将被迫采取这种反击行动。基辛格接着说，他们认为，如果苏联方面和中国方面现在都知道了所有事情，考虑到自己的特别利益，就会关心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这对于美国同苏联、美国同中国直接发展关系来说也是较为有利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可以保证，他本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剧南越的紧张局势，他将继续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他已经答应美国人民要这样做，并且他打算履行自己的承诺，何况这是在总统大选的年份。但是，如果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北越方面迫使他采取反击措施的话，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特别是如果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他就不得不暂停美军的撤出。如果在美军已经撤出的时候爆发了战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军将会在明年基本上全都撤出。

接下来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都是简短地重复曾经表明过的立场。

第四，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葛罗米柯同尼克松总统和基辛

格举行的会谈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的。

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目前，基辛格还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实质性的建议和想法。

基辛格说，由于他现在正在准备对北京进行访问，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深入地思考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各个方面。

基辛格再次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决定同莫斯科一起秘密研究关于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现在能否就最终调解近东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建议继续通过两国之间的秘密渠道，从11月2—3日(也就是在他从中国返回之后)到11月20—23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11月20—23日，尼克松总统将会到加利福尼亚去，在自己的住所里待一段时间，基辛格也将在这段时间陪同他。

我对此表示同意。

在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最近，他同以色列政府代表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他觉得以色列人非常不愿意让步，看来，以色列人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对美国的政治家施加影响。他列举最近的一个例子说，当尼克松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决定，是否恢复提供幻影战斗机时候，参议院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已经开始争相就这个问题签署决议草案，呼吁立刻向以色列恢复提供这一类型的飞机，并用最近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作为借口。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从总体上说要加强对埃及的军事援助。

基辛格突然对苏联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的实际情况感起了兴趣，但是没有坚持让我们具体说明什么。

我说，不应该把当前的局势同长远的任务混为一谈。并强调说，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就近东问题签署最终的调解方案，如果双方都能高度重视这一任务并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当我们在讨论关于最终的边界问题的时候，应当指出基辛格在会谈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开罗是否同意把以色列的军队从沙姆沙伊赫撤出，这个据点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同意建立一条从西奈半岛通往沙姆沙伊赫的“国际通道”？

我对他说，这些建议是不可被接受的，因为它会损害埃及对自己领土的控制。

基辛格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他就没有再谈论这两个问题。

同时，基辛格表示，希望继续详细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关于这种保障的方式问题，继续讨论非武装区问题和边界问题。

我说，我愿意同他们进行这样的讨论。

基辛格说，他越来越相信，以色列的主要立场是不愿意交出所占据的领土，希望继续占据这些领土，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考虑。比如，以色列人曾经向白宫提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让阿拉伯人同意停止战争状态，签署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关于“和平状态”的一些条款。但是，当萨达特刚刚同意这样做的时候(在答复亚利尔格的时候)，特拉维夫方面马上就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现在埃班又再次说，要同阿拉伯人进行“直接的谈判”，他明显是希望阿拉伯人拒绝他提出的这一不可接受的提议。

此外，基辛格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以色列人未必会归还领土。需要对以色列政府施加直接的压力。但是以色列政府很清楚，在美国现在的条件下，任何一届华盛顿政府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基辛格说，白宫现在也在寻找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办法，同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关于这些办法的效果，特别是在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前的情况下。这指的是，在考虑到美国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在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以色列的真正利益之间怎样找到一个结合点(特别是在美国的国内宣传方面)，因为以色列领导人会采取一切手段使以色列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采取的这些手段经常会得逞)，他们会故意把这个问题同获得美国亲以色列的实业界的人士的积极支持混淆起来，而这是华盛顿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我说，美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越快找到办法，对调解近东问题就越有利，而且最终也会对以色列有利。我再次强调说，如果制止了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归还所有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那么所有的问题将都能得到解决。近东局势向这方面发展符合近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也必将会对苏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确认了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继续加强对有关近东事务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研究就调解近东问题达成的协议的可能性。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在今年11月初开始进行的。

第五点，关于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问题，基辛格同我们交换了意见。

1.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基辛格说，他将会向北京提议，尼克松在明年，也就是在1972年1—2月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会对这一提议作何反应。

2.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将沿着基辛格这次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进行，不同的是，尼克松总统将不会在夏威夷群岛停留，而是首先到圣-克莱门特，在自己的家中过夜，然后飞往关岛，他将在关岛再过一夜(这是为了习惯从华盛顿飞往中国的巨大时差)，然后从关岛直接飞往北京，或许首先在上海着陆，以便带上中国的导航人员，正如基辛格这次前往中国的飞行路线一样(他是乘坐总统专机前往中国的，驾驶员是尼克松的私人驾驶员，以便让他进行练习)。在从北京回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将经过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

3.在基辛格现在乘坐的总统专机上配备了必需的、功率强大的无线电信设施，以便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尽管基辛格认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不必同白宫进行联系，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同尼克松总统取得迅速的联系，以便得到另外的指示。基辛格说：“最后一个星期，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在饭后同尼克松总统讨论几个小时，演练到北京同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各个方案。”

4.基辛格说，关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安排工作，尼克松总统已经确定了下来。

他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首先从美国飞往爱尔兰，在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僻静的庄园里过一夜，他在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息并适应时差，然后从这里直接飞往莫斯科。

关于工作会谈的安排还要考虑如下因素：必须考虑到时差，能够在飞往莫斯科的第二天开始进行就好了。尼克松打算从苏联直接飞回华盛顿。

第六点，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主动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1.基辛格说，他要谈论的这个问题没有受到尼克松总统的任何委托，但是他个人想“私下友好地”向我通告一件事情，美国政府高层现在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

这件事情与苏联的一个海军舰队有关，该舰队还带有一些潜艇，目前正在经过大西洋驶往古巴。美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非常系统地”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关于这个舰队的航行情况。关于这件事情他私下对尼克松总统说，在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之后，苏联马上就排出了这个舰队，“因此，在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晤这个问题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不能不使人产生警惕”，因为，“众所周知”，古巴问题对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军人们提请尼克松总统注意如下事实，在他同苏联外长举行会谈的时候，对于驶往古巴的海军舰队，苏联外长“闭口不谈”。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说，他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故意把他们宣布举行高层会谈和派遣舰队前往古巴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以便使美国总统处于尴尬的境地。看来，苏联外长也不知道关于苏联派遣舰队一事，苏联的海军长官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他，或许，苏联的海军长官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关于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的报道。简短地说，苏联国防部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进行联系。

基辛格强调说，他谈论的这些看法纯属个人观点。尼克松总统和他个人都认为，苏联完全有权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往古巴。要说的只是，他们认为，在宣布苏美高层会晤的消息之后就马上采取这一行动，苏联方面对时机的选择“非常失败”。

基辛格说，他们不请求，也不期望我们召回我们的海军舰队，如果白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投下阴影。而他们则是不会为这次会谈投下阴影的。

关于苏联驶往古巴的舰队，在进行谈话的时候，基辛格突然说，两国可以达成秘密协议，相互限制向外派出军舰：它们可以限制它们派往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舰，而苏联则限制它们派往古巴的军舰。但是他没

有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对于苏联的舰队出现在大西洋(我说，关于苏联舰队前往古巴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所说的话还是完全有效的)，不应该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顺便说一句，毕竟不要忘了：美国的舰队在所有的海域中，其中包括在距苏联海岸线不远的海域中都随意航行。

我接着强调说，当然，我们没有针对尼克松总统直接开展任何阴谋诡计，而且，在莫斯科，还没有人对两国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表示反对，将来也不会有人反对。尼克松总统做得很对，没有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因此，对于基辛格所提到的、美国军事指挥官中的那些“挑拨者”的真实动机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看法。

然后，我表示，我同意基辛格所说的话：双方都应努力避免采取有碍高层会晤进行的任何行动，同时，我还使基辛格注意，由于他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宣布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第二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莱伊尔德说了关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在增长以及其他类似的话，无论如何，这些话是不符合关于举行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协议的相关精神的。我问基辛格，应该怎样理解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这些话呢？

基辛格说，至少莱伊尔德说这些话的时间和场所不合适。基辛格表示，希望，类似在今天的会谈中提出的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将来会少一些。

2.然后基辛格说，他受委托还想谈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个令人不快的问题。

这指的是，关于苏美两国秘密地作出的一些决定，应该及时达成双边协议。

基辛格提到了前不久白宫和莫斯科之间就通报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进行的一场对话，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把关于即将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这个消息提前通报给了日本外交部，基辛格说，“但是他们后来得知，关于这一协议的通报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几乎提前了一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巴黎”。

基辛格说，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日本人面前又显得非常尴尬。当白宫从其他的渠道得知，法国总统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通报之

后，尼克松总统马上亲自(没有通过国会)给美国驻巴黎大使下达了指示，要他赶快访问蓬皮杜，并把这一信息通报给他。

但是，法国总统没有接见美国大使，而是委托自己的办公室主管接见了。这位办公室主管冷嘲热讽地说，他当然会把这一通报向蓬皮杜报告，但是，蓬皮杜已经从其他国家获得了这一通报，而且这个国家在形式上还不是法国在北约的盟国，他们得到这个信息要比美国的通报早得多。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表示，这些事情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双方应该商定以后不再发生这些事情。关于类似的事情今后我们应该事先达成协议。

我向基辛格提到了前几天从莫斯科转交给他的复函(关于“日本事件”)，我们在这份复函里表示，显然，今后我们应该在这类问题上协调我们的行动，以便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 [12]。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些看法。因此在得到我们的解释之后，当他们得知苏联方面把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消息还告诉了法国人之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

白宫认为，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件现在都结束了，今后，双方都应该事先协调自己的行动。

第七点，我向基辛格通报了如下几点，请他转告尼克松总统：

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收到了对古巴共和国进行访问的邀请。因此，在结束对加拿大进行的正式访问之后，柯西金将会对古巴进行短暂的访问，以便讨论有关苏联和古巴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

我强调说，我受到委托向尼克松总统通报这个信息。

我还补充说，关于柯西金对古巴进行访问的通报几天后将在报刊发布。

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对我的这一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无疑，尼克松总统将会高度评价这一通报，并将认为，这表示，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这是尼克松总统要努力实现的。

然后基辛格说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勃列日涅夫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对古巴进行访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A.多勃雷宁

АВІ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3, л.14-26

№2292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1971年10月30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同他举行了会谈。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他们的信件中提到的精神，尼克松总统委托他现在把有关他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绝密情报通报给苏联方面。

关于即将对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高层访问，尼克松总统首先想谈论一个总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对这两次最高会晤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他打算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方面，尽管，他当然也会谈论关于总的国际局势问题以及个别的国际问题。他希望这一点在同中国最后签署的联合公报中也能重点反映出来。从基辛格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来看，中国人明显希望把他们同美国总统进行的会谈看作是两个大国进行的一场会谈，赋予这场会谈影响深远的国际意义，把这场会谈看作是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各个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拟定联合公报，并把双边关系推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

他们白宫“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打算附和中国人的意见的”，因为美国应该明白，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同中国不同，而在许多情况下两国还存在明显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

尼克松总统认为，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候，当然会讨论有关美苏双边关系的各个问题。但是他希望，他们会晤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被用来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这些地区性问题都与其他国家有关，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深深地卷入了这些问

题。

尼克松总统认为，无论是在他们进行的谈判中，还是在他们高层会晤之后将会发表的最终联合公报中，所有这些考虑都应有所反映。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关于尼克松总统总的想法的言论明显再次确认了他早先的时候曾对我们说过的类似的话：在进行访问期间，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同苏联的关系具有全球性，会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对于华盛顿来说，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比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其中包括在同我们的关系中愿意利用对北京进行的访问)。

但是，在基辛格最近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在他的谈话中另外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差别。

第一，基辛格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如下看法：他们白宫不愿使中国人通过同尼克松进行的会谈，“就这样”帮助他们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中国人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进行“交换”。基辛格还说，如果毛认为，他刚刚答应会见尼克松，美国就开始从不利于中国的所有地方撤出军队(他说，这具体指的是从朝鲜半岛撤军)，如果他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白宫现在在不断地说，他们坚持主要在双边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全球事务的基础上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至少现在他们是这样说的。

看起来，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使白宫认为，中国人希望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

从各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中国能够同美国进行“交换”，尼克松希望借助中国来解决越南问题，并把这看作是他同北京进行直接对话的主要原因。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在访问北京返回美国之后，基辛格马上就在白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基辛格说，美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或者通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来解决，或者通过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但是，不会通过北京来解决越南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基辛格回答得非常含糊其辞，但是他说，中国人的立场“从原则上来说与苏联的

立场比较接近”，看起来，他还不得不同北越人再次举行会谈。基辛格补充说，对于白宫最近提出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没有予以答复，尽管“中国人，就像你们一样”，告诉他基辛格说，河内愿意同他们继续进行谈判。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可以看出，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在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还没有最终商定。基辛格诚恳地说，关于访问的日期，他们现在达成的协议是，在明年1月到3月15日之间进行访问。今年12月1日之前将会最终商定并公布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

基辛格接着说，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另外一些细节问题，尼克松总统也委托他向我们进行通报。如果对基辛格就这个问题的谈话进行总结的话，那么，这些谈话的要点可以被归结如下：

1.基辛格同周恩来谈论了自他们今年7月第一次会谈以来国际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2.关于同苏联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没有讨论。只是中国人曾两次提到了关于苏中边界的状况问题，两次都是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是在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周恩来认为，美国必须从靠近中国的所有地区(从日本、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撤军。在这个时候，中国总理“非常严肃地”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蒙古的驻军问题。苏联在蒙古驻扎的军队“与中国的北部边界接邻，长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总理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很“傲慢”，不愿意考虑中国提出的正义要求，从靠近中国的地区撤出他们的军队。

周恩来第二次谈到苏联，是在详细地谈论苏中边界的状况的时候，他说“俄国人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企图在谈判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国”。基辛格好像对中国总理说，尼克松总统直接给他下达指示，要求他不要谈论有关第三国的問題，更不要讨论苏中关系问题。之后周恩来就没有再提出这个问题。

3.在公布关于苏美举行高层会晤的通报的前24个小时，白宫已经把这一通报告知了中国人(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北

京；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信息)。

在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周恩来只有一次问道：你们(白宫)是否希望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不再重蹈上次会谈的覆辙？基辛格说，他的答复是，他们希望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4.在会谈中，周恩来坚持讨论关于日本经济能力增长及其重新武装可能存在的危险这个问题。看起来，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出现这种危险。中国总理显然希望讨论(尽管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一下，美国和中国能否一起考虑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上述危险的出现。基辛格说，他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美国)同日本现在的紧张关系是难免的。”

5.关于朝鲜问题，周恩来坚持要美国撤出军队，并且他认为，美国必须中止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基辛格说，他的回答是，美国不打算废除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而且日本也认为我们同南朝鲜的军事联盟非常重要，华盛顿认为，现在比较正确的做法是，让南北朝鲜之间开始进行的接触继续下去，这指的是，必须从总体上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

6.中国人给予他基辛格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为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餐，这使他非常荣幸。(基辛格向我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照片。)此外，他还同中国总理在内宫 [13] 观看了京剧。当他们走进大堂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基辛格风趣而认真地说，他没有想到，在北京他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周恩来说，对他进行这样的欢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周恩来接着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我们正在使他们转变思想，接受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事实，但是这需要时间”。中国的报刊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看起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基辛格说，顺便说一句，表演的京剧明显具有反日的性质(接着他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日本人，否则他将会很尴尬)。

基辛格还风趣地说，看起来，在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中，他成了“教导中国人转变对美国人的看法”的对象。当他访问一个博物馆以及其他这类场所的时候，总是有5—6个人组成的一个不大的人群向他鼓掌，而到

访的其他中国观众在迅速弄清情况之后也马上鼓起掌来，这些人群显然是根据指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和其他人一起鼓掌。简短地说，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第二次访问没有被隐瞒起来，而是他逐步被安排到一些公开场所抛头露面。

基辛格说，中国人还“迎合他的要求”，在他要到的那些地方撤下非常令人讨厌的反美招贴画。

7.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就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谈判。所有这些技术性问题他都不得不同周恩来进行讨论，因为其他的中国代表都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作出最终的决定。比如，关于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美国和中国进行电话和无线电联系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可以通过他的专机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他的随行人员，特别是记者将很难同华盛顿取得联系。与基辛格随行的白宫联络部的长官，在了解了北京现有的无线电设施之后对基辛格说，白宫拥有的这种无线电设施比中国整个首都所拥有的还要多。

8.基辛格说，现在他还不清楚，北京政权幕后现在是否在进行权力斗争，白宫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对外政策领域，周恩来现在享有必要的威望。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通报的这些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并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

基辛格多次强调说，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些信息告诉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代表，无论他们是苏联的盟国还是美国的盟国，以免被中国人知道。他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基辛格请求我们采取措施，以便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尽可能限制这些信息流传的范围，并且在今后也对这类秘密信息进行限制。

总的来说，从各方面看来，尼克松尽力显示，他想履行对葛罗米柯作出的承诺：他将尽可能地向苏联领导人通报关于他同北京取得的谅解。

当然，他们所通报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而且使尼克松在同中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更加谨慎。从这一意义来说，即将举行的苏美莫斯科高层会晤现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

第二次会议

(1971年11月22日, 晚间)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下面由勃列日涅夫同志发言。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这次全会——实际上就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研究五年计划草案和最重大国际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讨论党的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要问题，评价在二十四大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进一步落实二十四大相关决议中的具体任务。

关于政策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说的是，我们党、所有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句话——所有苏联人民都将(二十四大)大会决议视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并以英勇而忘我的劳动作为自己的回答。

关于经济成果方面，依靠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业、交通、贸易和经济各领域党组织，我们的经济各部门均顺利完成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各项任务。

下面简单谈一下农业的情况。众所周知，今年我们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尽如人意。这从粮食采购计划的完成方面便可反映出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的主要畜产品采购(除牛奶外)增长速度均超过了预定计划。在籽棉生产方面我们今年赢得了一个好收成。通过客观地分析农业生产状况，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们工作得很好，即便在1971年遇到了极其困难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当然，我们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在我们的工作中仍存在不足和失误，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所有潜力，而关于这些我们也必须指出。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在1971年已经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今年的经济成果证明，二十四大决议所确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符

合我们的实际的。

所有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的劳动者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而这就是我们对在二十四大后的第一年里党的活动的实质性评价。

同志们都已经知道，各计划性机关、各加盟共和国、苏联部长会议和党中央政治局为准备我们在今天全会上即将讨论的文件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草案才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严整和更加讲究各方面的平衡。所有那些在指示中只是略微提及的方面如今已补充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数据性说明。

当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还想做得更多一些，而针对各经济部门或个别州和共和国我们也想采取一些更为坚决的举措——对于地方上在这方面所表达的愿望，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相信，一些将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及那些将在最高苏维埃例会发言的代表都会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而所有这些建议我们将会加以认真的研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下情况，即一些重大的变化(暂且)仍无法添加到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中去，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

政治局认为，当前所提交的(计划性)草案已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需求情况和我们实现这些计划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想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如下主要内容：这些草案完整地反映了二十四大就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最重大指标和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问题所确定的目标及其发布的指令性任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相关决议(掌声)。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局基本同意此次所提交的会议文件草案。而通过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将有理由认为，中央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上述评价(掌声)。我们也相信，这些文件一定会被即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所接受。

同志们，巴伊巴科夫同志已就五年计划和1972年计划的基本情况作了报告。因此，我这里自然也就不必重复他的发言内容及其所提到的相关数据。当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该五年计划及其所明确的任务落实到实际。而与此相关，我这里想提请大家注意如下两个极其重

要的情况。

其一，根据二十四大相关决议，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整体和谐发展并保持发展速度的平稳。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家的计划性原则。计划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优越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及时地完成(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这里既包括整个国家计划和平均计划，也包括我们国家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企业、工程项目和各个环节的计划在内。

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况：如今与以前任何时候一样，如果我们的某些具体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必然导致我们的许多其他经济环节陷入困境，导致我们的整个工作陷入瘫痪，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我们与其他兄弟国家一道实现向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转轨的过程中，不和谐的工作状态和合作供应制度的缺陷等都会对上述进程的实现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从而对我们与兄弟国家的互助关系造成危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是的，可是即使如此，关于这些我们还必须反复地说。须知，正是因此，我们今年有许多部委都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重要指标性任务，如采用新技术等。在这次全会上我想指出如下事实，在过去的10个月里我们有1/6的工业企业没有完成产品销售计划，而1/4没有完成利润计划。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相当严重的结论。在总体状况良好的背后是我们许多企业的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是因为其他一些工作状况好的企业掩盖了那些工作状况不好的企业。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潜在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态年复一年地持续存在。而由此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的许多领导已安于现状，不愿意知道这种情况，这对于一个按当今世界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经济领导干部来说，是根本无法忍受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央今后也应当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就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加严格地向所有领导者发出质询。

其二，我们目前的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既依据了自己所确立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考虑到了如下因素，即希望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状况将会比过去更好。正因为此，我们首先对自己的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科技进步。我们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在于，将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完善国民经济各环节的管理工作。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所有这些能够确保我国经济集约式增长的因素，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将无法完成自己的经济计划。如果我们学不会比以前更好地工作，那么我们的计划必将变得极其繁重；如果我们学会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比原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为我们的经济未来更迅速的向前发展奠定必要的前提。

这里我们首先谈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对此我们以前就说过。我记得，九五计划中87%的工业品增长和100%的农业增长都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九五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是我们历次五年计划期间从来没有过的。

鉴于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迅速增长，我们通过了相关决议以重新为各部委和企业确定了生产增长任务。其目的就是要让各企业、联合体和部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国家任务，从而把(增加)效益作为自身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考查和评估相应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活动)(掌声)。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即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里我就不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了，只遗憾地提一下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目前，该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是我们的两倍。

那么，在如今已开始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如何解决劳动生产率问题呢？据相关报告，1971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将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这很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而言我们197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要低于1970年，而1971年第三季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比该年度第二季度要低。我们应当学会使用统计学知识，要尽可能经常地看一看这些统计数据，以便能够及时地得出相应的结论。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来提高工业品生产总额——远远不是所有承担了这一任务的州和共和国都能胜任。例如，俄罗斯联邦在今年的9个

月期间便有28个州没有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其中包括布良斯克和古比雪夫诸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采取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但工业品生产增长速度低于总体水平的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另外，未完成相应任务的部委企业还有：天然气、化工、机床制造和工具制造业等。

要注意到，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所承担的生产计划是被压低了。例如，我们1971年为工业部门制定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必须完成的总体年度任务为5.9%，但根据企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该劳动生产率总共只达到4%。

显而易见的是，各企业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充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此事关系到党所通过的生产集约化方针能否真正得以落实的问题。生产的集约化方针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生产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成社会主义宏伟计划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是当前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应成为所有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各级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应时刻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

加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基础——科技进步。而加速科技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将会一如既往地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我们打算在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专门讨论该问题。

劳动，尤其是辅助劳动的机制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尖锐问题。虽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已说了多年，但进展相当缓慢。让人感到忧虑的是，近年来我们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的比重每年下降速度还不到1%。而从绝对数量来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此类工人的数量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有许多工人仍在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而工作环境往往又极其恶劣，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还必须关注其他一些问题。许多部委和企业仍没有提高生产率、改良所生产的产品和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能源、劳动和物质资源的计划。要知道，所有上述问题均应与系统性地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一起，始终成为我们经济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和完成五

年计划过程中的工作重心。

政治局在研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基本建设领域的严峻形势。必须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在最近期限内不能在这一国民经济领域实现一个坚决转变，那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必须在基本建设方面确保我们计划的稳定。我们所制定的五年计划安排是相当紧张的。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额外的资源，突破现有计划安排并在计划外补建这样或那样一些新的、时常还相当昂贵的配套设施，——这样的任务无疑是相当艰巨的。

如今，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即更完整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我们在五年计划期间向基本建设领域所调拨的资金。这笔钱的数量，同志们，可是不少——共计5010亿卢布。

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由于我们在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动力设备的引进计划，从而导致一些极其重要的工业品生产任务无法完成。其后果即使现在我们仍感觉得到。而今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今年10个月期间，引进新的、主要生产基金的任务仅完成了年计划总量的45%。要知道，主要基金和动力设备的引进——这是评价我们基本建设部门整个工作状况的主要、最终参考指数。

如下一个事实有助于同志们理解我们为何会对这方面情况如此的忧虑，即一些部委，如肉类加工、食品和轻工业等在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方面极其迟缓，而这些部委所涉及的领域都是我们人民消费品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多数情况下上述部委都不能严格遵守自己所承担的基本建设项目计划的施工期限。一些工程的建设进度令人无法忍受地缓慢，往往拖延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可能会有人认为，我这里不值得谈这方面问题。可是，由于这一问题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如此的尖锐，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提到它。我这里只举两个实例。

例如，从1961年起，在赤塔开始建造一个精梳毛呢联合企业。即使按照我们现有最宽松的建设计划来进行，该企业的建设工作最多也应在5年期限内彻底完工。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工程至今仍在继续，并说什么只能到1972年才可能彻底结束，这就是说该工程从开始建设到彻底完工需要花费11年时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从1955年起开始在基洛

夫建设一个皮鞋联合体。其完工期限一直被拖延到了1972年，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不多不少整整用了18年。同志们，请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数据和这些事实吧。这一切绝不会使我们的中央机关，尤其是国计委以及直接负责这些工程建设的相关部委、州党委和托拉斯等感到光荣。

我上面只举了两个实例，可是遗憾的是我们此类例子还有许多。这对我们的上层和下层领导者都不是件荣耀的事。看来，针对类似情况已不仅仅只是采取批评和谴责的方式，而是应动用更为严厉的举措。我们绝不当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每当涉及国家向居民住宅、文化生活和城市福利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建设等调拨资金的问题，我们大家常常都会振振有词地大发议论，每个人都极力想让国家向这些方面尽可能多投一些资金。大家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政治局对此也是持完全赞成态度的。可是，至于我们这些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大家的期望值可能都不会太高。例如，在今年的10个月期间我们的居民住宅年计划就只完成了57%，而一些幼儿设施和学校的建设工程则根本没有完成原定计划。我们应当把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完成大量而紧张的基本建设规划方面，必须切实动员广大工人、工程师、经济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我甚至认为应当把全党和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建设任务。

众所周知，党的二十四大高度关注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大量而复杂的任务，并设定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我们与你们大家一样，过去还从来没有掌握过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也从来没有像这次五年计划那样——要完成如此之多的任务。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首先在农业领域我们必须向各苏维埃政府发放资金1286亿卢布，如果再加上我们帮助集体农庄社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建设生活住宅的76亿卢布，那么我们这次所发放的资金总量便达到1360亿卢布。请想象一下，这是一项规模多么浩繁的工作。仅从数字来看，就知道我们——包括上层领导者和基层领导者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将面临多么艰巨的任务。

如果我们的政治局，部长会议，农业、土壤改良和“农业机械”等相关部委，如果我们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甚至在基层的州委和区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干什么，什么时间干，谁来干，依据什么计划干，这样干是否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当今世界最新科技进步的要求，等等。那么，我们就必然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因此，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不谈其他，只要求我们所有人都

将精力集中到如下方面，即党中央、部长会议、相关部委和部门以及各地方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谁将负责什么，将干什么，谁将负责建设方面的事务，物资从哪里来等问题。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自己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一整套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期望，我们向这次五年计划所作的投资将会带来自己所预期的成效。

关于提高(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搞好相关组织工作，从而彻底清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员中所存在的懒散和无纪律性等不良习惯。

同志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能忘记党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宗旨——关心人民的福利。

在起草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问题。在将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五年计划法律草案中，我们确定了在该五年计划后续年间自己将要实施的一些重大社会举措的期限。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整履行。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计划安排和目前政治局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疑虑。我们相信，我们为这次五年计划所制定的那些社会举措都将会得到完整的落实(掌声)。

所有苏联人都应当知道，列宁主义的党始终都是言行一致的，始终都将关心人民的福祉——看作我们党活动的最高法律(掌声)。

在讨论会上已有许多报告人和发言者都涉及关于我们要完成任务的复杂性问题，如尽力向群众供应更多的商品，防止国家经济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等。

我与你们大家——不论是上层领导还是基层骨干，都要竭尽全力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生产出所需商品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关于住宅建设问题，我们不论是在二十四大召开以前还是在会议举行期间都讲了许多。但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中央委员、政府和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没有理由自欺欺人。在我们许多城市居住问题依然相当尖锐并对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情绪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花大力气增加住宅建设。这里我就不谈相关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如引进先进的建筑方法、新的建筑结构、施工材料、寻求和节约资金等。

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劳动者们建造新房屋和新住宅。

要顺利地完 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新的、复杂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的整个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改进。现实生活和二十四大向我们提出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模式和方式。而对此，在党的二十四大上我们已作了详细的说明。

可是，负责关于完善经营机制问题的提案的制定工作的国计委、各部委和部门等，却一直在拖延这方面的工作进度。而对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在这次全会上指出。

这里让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党的二十四大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联合企业将必定在今后成为我们社会生产的主要经济环节。我还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有许多发言者多么热烈地谈到这一问题，他们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实例。

可是，建设联合体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况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截至目前联合体暂且只在我们的工业中占有很小的比重。更主要的是，当更深入地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我们都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遗憾的是，我们的多数部委时至今日手中也没有一个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条件和特点而制定的、经过深思熟虑和经济论证的、按时间阶段分步进行的联合体组织的完整计划。由此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我们的一些部委中存在着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成分，这些人不愿意依照新方式开展工作。而要完成我们的新任务就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不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像俗话所说的全凭碰运气。当然，碰运气有时也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导致事情的发展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同志们，我们所有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首先取决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党的骨干、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经济部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等的工作水平，取决于这些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落实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另外，这当然也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上述这些人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工作情况及其所担任职责进行评价的根据。

总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这些数据落实到实际中。如果需要对以上所述作一个整体性的总结

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关于党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强化党的监督职能并以党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至于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可以作如下归纳：

其一，针对所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要从始终不渝地落实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出发，而该政策的宗旨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其二，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论证，以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解决方式是不能被采用的，从而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减少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并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要坚定地与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良现象作斗争。

其三，严格要求各级别领导干部增强对自己职责范围内各项事务的责任心，要求其不断掌握现代领导方式、学会以高瞻远瞩的视野来解决当前问题、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的灵活性和坚定地清除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违背党和国家纪律的各类不良现象。

后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将讨论和通过我们的五年计划草案。然后该计划将对外公布，从而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与此相关，我们也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工作。我们必须向每一位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所有劳动者们解释清楚我们五年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具体含义和伟大之处，及其在巩固我们祖国的强大，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加强我们国家国防力量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宣传和鼓动机构和所有政治教育网络都必须以全部力量来完成上述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重心就在于使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彻底完成五年计划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我们第九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有劳动者是否拥有积极性、纪律性、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及其艰苦顽强的劳动。

先进工作者的经验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源泉之一。不论是我们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财富，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其来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想法，即召集全苏先进工

人大会议。此类会议既可以采取各职业工人联合大会的模式，也可以按行业分类举办。我想，此类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对我们完成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同志们!苏共二十四大对近年来我们国家所形成的广大群众政治和劳动热情普遍高涨的良好、健康形势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力借助相关组织的力量来加强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热情，以求提高我们所有工作的务实性和具体效益。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上我只是简要地就我们议事日程第一项中的主要问题谈了谈，下面请允许我继续进行我们议事日程的下一项——作关于在我们党二十四大以后苏联共产党国际活动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的国际活动情况

同志们!说起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活动情况，我想首先作如下强调，这些活动都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伟大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苏联人民和平的创造性劳动，落实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以及我们全会正在讨论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所有这一切都将确保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福利得到新的提高，进一步增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提高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和在道义上的威望。

苏共二十四大相关文件已对我们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际政策作了极其完整和明确的表述。我们的这一对外政治纲领既得到了党的二十四大的肯定，同时也被当今许多国家称作苏联的和平纲领。

该纲领具体、务实、酷爱和平，并继续坚持为了各民族的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路线。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纲领，并始终捍卫和忠诚于列宁的遗嘱。该纲领得到了所有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并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我们党和国家将该纲领视作自己对所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力量和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我们所发出的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政府的热情响应和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不过，如果一切只是些写在书面上的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纲领也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我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的力量就在于，其被实际运用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实践之中，而且该纲领的现实性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国际生活进程的检验。

自我们党二十四大至今已过去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情况。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采取不同策略，改变自己的工作重点和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也面临一些新机遇和一些新任务。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之后的国际活动相关情况。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分析世界发展状况。因为我们在二十四大上已作了此类分析，而这一分析即使至今也没有过时。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在前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就当前国际问题相关情况已向中央委员们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作了一系列信息通报，因此现在我的报告也就更轻松一些。

凭借我们党在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两次大会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我们在广泛的战线上展开行动，极力对世界各地的政治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外交行动，我们政治局的所有委员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党和国家代表团还对许多国家进行了高层访问，这些国家具体包括：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朗、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摩洛哥、蒙古、法国、南斯拉夫、日本，等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往这些国家访问的人员具体包括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政治局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各书记等。其中许多同志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我们与外国代表团的一系列谈判。

在一如既往地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始终与我们的盟友——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与进步的已获得解放并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保持友好的接触，与其他爱好和平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就相关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近期苏联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主要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均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业已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以后所从事的国际活动的个别问题作一阐述。

(一)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至今的几个月里，政治局继续对东南亚和近东等地区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但其在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安全方面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上述两地区的形势目前依然相当尖锐。清除这里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局势恶化的业已成熟的战争根源，使当地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失败。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工作的本质认识。我们在这里开展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所有革命力量的根本利益。

下面，请允许我首先谈一下东南亚的情况。

利用各社会主义国家持续不断的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在取得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美国的军事干涉则越来越明显地陷入困境。

在巴黎谈判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团经常主动出击，提出各种揭露美国侵略计划的提案，从而时常搞得美国人很被动。这些提案包括：越南同志还在夏季便提出的由著名的“七点”组成的纲领，与此同时该纲领也吸收了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如今，美国政府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更难再玩弄阴谋诡计了。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已开始逐渐收缩自己在越南战场的军事活动：如果说1969年3月美国在南越拥有军队54.4万人，那么如今——只有约20万人，另据华盛顿确认截至1972年秋季以前美国在越南兵力将继续缩减至5—8万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印度支那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各种迹象均表明，使用政治调解手段解决越南冲突的前提条件正越来越趋于成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幻想着仅仅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要知道，尼克松政府即使被迫减少了自己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队数量，他也依然不会完全放弃通过军事方式解决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出现问题的打算。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臭名昭著的所谓“越南化”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即主要由南越士兵来继续进行战争。在极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美国不顾自己所作出的承诺，继续对其领土实施轰炸。这表明，越南军事形势再度趋于尖锐的可能性目前依然存在。

根据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越南朋友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在军事、外交和各条政治战线上积极开展斗争。他们对坚持斗争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在以该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的同时，也以此来动员人民。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就尤其显得不友好。如果说还在前不久北京仍极力强迫越南只通过军事方式解决问题并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话，而当美国人已流露出撤出印度支那的明显迹象、以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的前景已在某种程度上渐趋明朗之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在北京宣布将邀请尼克松访问本国之后，人们才明白，北京是打算与美国人讨论“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显然证明，北京正极力利用印度支那的当前形势来加强自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和中国正企图以越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达成某种交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派遣以H.B.波德戈尔内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项合理而重要的举措。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们代表团热情的兄弟式接待。我们在河内举行了谈判，并与黎笋和范文同等同志举行了亲切的会谈。这一切均表明，该国领导人正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针对中国所奉行的政策，越南同志向我们谈了自己的态度。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时常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自己北方邻居的意见。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让北京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充当中间调解人的角色。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北京邀请尼克松访问的举动持怀疑态度。正因为此，周恩来才不得不到河内，安慰越南同志并极力使后者相信中国与美国的谈判不会损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首都时，周恩来曾致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议就印度支那问题协调双方立场。对此，越南同志答复道，自己的立场只有一个并均已在著名的“七点意见”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至于中国人应当做的，那就是继续对上述立场提供支持。

我们在东南亚从事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依然在于继续坚持斗争，以阻止美国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给予越南及其英勇的武装和政治斗争全方位的援助(掌声)。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使印度支那各民族赢得独立，并在不受到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面，请允许我谈一谈中东局势的发展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中东冲突一直处于久拖不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以色列统治集团以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并充分而明显地利用了美国的支持。

近一段时期，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纳赛尔去世。他死后，埃及局势趋于复杂化。一方面，该国家领导人，更难以抵御右翼分子极力使埃及脱离进步发展道路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更难以阻止部分军人和政治激进主义者以军事方式解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的倾向。

的确，在1967年以后，埃及的军事实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得到我们的决定性帮助以及那些带有高度责任感的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积极参与，埃及军队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其还得到了现代的武器装备，从而可以有效地确保埃及的国防。经过培训，埃及的多数军人都学会了使用这些最新装备，从而巩固了阿拉伯人的现有阵地。所有这一切，以色列及其盟友不可能不有所顾忌。不过，我们当然还不清楚，如果一旦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埃及军队及其盟军是否能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今年5月，埃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结果导致一些著名政治家——纳赛尔以前的战友退出国家领导职位。其中许多人都是我们曾在开罗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认识的。我们知道，这些人一直都在维护与我们国家的友谊。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试图利用所发生的事件，来改变该国的内、外政策，鼓动对苏联的不相信感，从而达到破坏苏联阿拉伯国家友谊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举措。其中包括派遣以H.B.波德戈尔内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开罗。我们在那里举行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签署了苏联和埃及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一份新型的文件。此类条约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以前从没有签署过的。

苏埃条约并不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但在政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巩固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埃及国内的进步力量回击反对派和破坏后者的计划。从这一角度来说，第二个条约的相关内容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其中写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在保证维护和继续发展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将紧密和全面地进行合作。”

在签署了上述条约后不久，我们便在莫斯科接待了来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与之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极力达到的目标是：强化埃及领导人的反帝立场并促使该国一些具有亲美国倾向的集团保持中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萨达特继续执行如下路线——维护和发展纳赛尔时期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巩固苏埃友谊。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不希望看到埃及人仅凭武力方式来解决近东问题，应当向他强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埃及领导人来访期间，我们便指出，通过政治途径调解阿伊冲突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

总结我们与萨达特的会谈成果，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均得到了他的理解。萨达特表示将在各领域与苏联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反帝路线。他还强调道，自己将对谋求政治方式解决近东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即不论在萨达特访问莫斯科期间苏埃两国所签署的联合公报中，还是在苏联代表团今年7月逗留埃及期间与埃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对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就此事的性质而言，此类声明是所谓第三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领导人首批签署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举行上述谈判不久前苏丹也发生了一系列事

件，而关于此次全会的与会者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促使该国背离进步路线并顺利地将其纳入反苏轨道的企图。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容忍苏丹当局所进行的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活动。为了改善苏联、苏丹关系和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目前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使苏丹政府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反帝斗争路线上来。关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均已直接而坦诚地向萨达特作了说明，从而希望其能够对苏丹总统——尼迈里施加影响。

与萨达特所举行的谈判无疑有利于巩固我们两国的互信关系和加强我们的立场。埃及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对该国给予关注，并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做出灵活的反应。针对萨达特本人，我们仍应继续做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对其施加影响，以便其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前进。

近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能否团结一致，以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斗争。不过，时至今日关于如何解决现有问题这些国家依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即使在实际行动上也常常是各行其是。

近期，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今年夏，成立了由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组成的联邦。我们并不反对成立该联邦，因为其有助于联合所有阿拉伯力量以共同参与反帝斗争。更重要的是，埃及——该地区最先进和进步的国家在这一联邦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当然，目前该联邦只采取了自己的首批举措。至于其以后将如何发展，会采取哪些实际的行动，仍需要时间的检验。我们将对此给予密切的关注。

至于我们，在巩固与埃及友谊的同时，我们还将极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此举无疑会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团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与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目前正与埃及并肩战斗。我们继续拓展了与伊拉克的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改善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大影响，即使至今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并不太顺利。现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宣称将与苏联继续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愿意在协调民族解放阵线各党派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此，众所周知，我们双方已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声明中达成了共识。而该声明是A.H.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出访阿尔及利亚期间，在做了大量的工作

之后才由双方签署的。

对西方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施加影响是我们积极参与近东危机的调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极力使自己在近东事务中发挥独占鳌头的作用，似乎自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事务的公正仲裁者，并试图给阿拉伯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解决近东冲突问题的钥匙似乎是由华盛顿掌握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图谋，美国实际上一一直在暗中破坏近东四个强国之间本已协调好的关系。

我们非常了解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阴谋诡计，因而竭力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我们计划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对其所持立场的压力，这其中便包括我们在筹备尼克松即将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另外，我们还利用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

当前的近东形势是这样的。虽然人们都认为，开放苏伊士运河和撤退以色列军队是和平解决整个近东冲突的第一步。不过，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埃及人希望，在将本国军队移至运河对岸的同时，还要使以色列军队尽可能多地撤往离运河更远的地区。而以色列人的观点则相反，他们极力想占据离运河最近的地方，另外他们还拒绝将运河问题的解决与整个近东冲突的最终调解问题挂钩，而这一观点又是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的。

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应依据联合国1967年11月22日决议彻底解决近东冲突。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也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同志们!近期我们还为解决世界上另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是印度支那，这里的局势也是极其尖锐而紧张的。

关于这一地区局势的实际发展进程，同志们可能都是知道的。因此，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今年春季，巴基斯坦军事统治集团上层对国家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出现的广泛的人民自治运动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这期间，有数万人被政府军打死，地方政府机关被解散，大量地方议会代表被关进监狱，并有近1000万东巴基斯坦居民被迫迁往印度境内寻求庇护。由此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迫在眉睫。

苏共政治局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关系作了评估，认为其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该两国间的深刻矛盾已是由来已久，其中包括在其一系列边境地区——尤其是东巴基斯坦地区所存在的尚未解决的大量民族问题以及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议和宗教纷争。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这一地区还交织着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利益。这些国家都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以试图加强自身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就在前不久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那么谁也不准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论这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无疑都将是极其残酷的，而且还会把其他一系列国家也拖进去。

鉴于以上所述的这些情况，苏共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立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目标就是防止印度战争的爆发。

从东巴基斯坦发生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起，我们便已多次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致函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我们对他说，解决目前该国内部诸多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停止镇压并确保东巴基斯坦人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我们还对其明确说明，在针对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印度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从而使两国之间因此而发生一场战争。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复中承诺，自己也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巴方将极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过，我们非常清楚，在巴基斯坦国内的各集团中也有不少入极力想促成该国与印度的军事冲突。

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始终保持着与印度政府的联系，并极力向其提供支持。我们很了解印度在当今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政治局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最大的南亚国家坚持反帝斗争立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

印度国内的形势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在近一个时期，印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在继续进行着针对政府的破坏活动，这其中便包括一些势力极力对政府施压，以促其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

鉴于国内的复杂形势，英迪拉·甘地寻求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我们建议其访问莫斯科。甘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首次对我们国家进行了访问。在与之会谈期间，我们建议甘地继续坚持维护和平的路线并表现出必要的沉着。英迪拉·甘地向我们保证，印度政府将反对战争并极力确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

印度总理强调，今年夏季签署的印苏和平友好互助条约在这一困难时期对本国的巨大帮助。就本质而言，该条约的初衷在于强化印度政策中的进步路线并推动印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虽然该条约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我们在爆发冲突时必须承担支持印方的责任，但巴基斯坦方面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条约的存在。

鉴于印度地区所出现的情况并不仅仅只具有区域性质，而是全球性质的，因而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达到如下目标，即促使各个国家对世界这一问题所持立场相互接近。我们已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后者声称，自己对印、巴间爆发军事冲突不感兴趣。我们还与铁托同志、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讨论了这方面问题。应当说，后者实际上也基本同意我们的观点。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印巴事件的后续进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总之一句话，我们正竭尽全力以避免在亚洲出现新的战争策源地。然而，印度地区的形势无疑依然十分严峻。印、巴两国均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队，并经常发生相互枪击事件。这一切均表明，我们在以后时期仍需要倾注更大的精力以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继续滑向武装冲突的边缘。

促使那些正在进行战争或存在军事冲突的地地区的局势转向正常化，这当然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但与此同时，政治局仍希望向中央全会报告的是，我们目前对整个东部以及所有亚洲国家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我们很清楚如下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和中国等在当今国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家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仍将会不断地增长。

在亚洲大陆上生活着人类一半多的人口，但亚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而且在其中很多地区形势依然相当紧张。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积极地展开活动，以谋求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军事冲突策源地。这一切，尤其是在那些直接距离我们祖国边境不远的地区所发

生的此类事件，无疑会使我们备感忧虑。

因此，亚洲问题在我们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改善与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帮助亚洲革命力量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扶持那些对我们国家持友好态度的力量的壮大。

我们已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阿富汗、伊朗和叙利亚。正如我前面已指出，我们正顺利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而要解决它们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局认为，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侧重点之一，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就经济实力而言，我们的这个邻国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第二位，其在军事方面的潜在实力也是相当巨大的。该国对亚洲所执行的政策明显具有经济扩张的性质，因而必然会引起亚洲其他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的担忧。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签署了军事条约，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势力极力试图在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妥协；而北京领导人当然也明显不拒绝谋求这样一种可能性——与日本达成某种勾结(协议)。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政治局决定把发展苏日关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们极力寻求各种途径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与该国建立长期的互惠经济关系。为此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与日本的经济贸易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近几年我们两国的贸易增长尤其迅速。如今，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大型贸易项目，以便扩大对日本的石油、森林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而日本方面也将向我们提供一些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自然资料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当然，确保促进我们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过，要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其中，首先便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所形成的军事政治关系，其次便是日本人不断向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领土问题。

在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我们认为，近期派遣葛罗米柯同志出访日本是一项合理的举措，而后者也已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邀请。

在研究苏联与个别亚洲国家关系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制定一些更宏大的计划，而这些计划的落实势必从根本上改善整个亚洲大陆的形势。例如，还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我们党便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想法。而如今我们对实现这一思想的兴趣更加强烈。当然，要实际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因为还从来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先例。但关键在于，我们要使这种亚洲集体安全的思想工作起来，并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利益。

(二)

同志们！我们近期所研究的那些对外政策问题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现在和未来以及欧洲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局所坚持的战略路线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和平，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路线要求我们完成在战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根本性任务，即巩固战争所遗留下的那些有利于苏联人民和所有革命力量的社会、政治成果。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确保各欧洲国家的现存边界不可更改，解决与现存两个德意志国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国际社会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前，上述任务一直是我们政治局的工作重心。而如今，我们仍将继续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赢得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成为了我们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鉴于这些谈判的重大意义，我下面将就这些问题谈得更详细些。

战后数年间，围绕西柏林问题曾多次发生严重而复杂的事件，而每次发生此类事件我们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为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美国、联邦德国、英法等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西方列强对此势在必得。他们利用西柏林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实现自己的破坏目的。为了使欧洲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在西柏林做了大量挑拨离间的勾当，而且其所选择的发动这些罪恶勾当的时机都是对我们最不利的。

解决西柏林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样一个原因。联邦德国政府不听我们从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拒绝批准与苏联和波兰签署关于共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条约。为了清除批准该条约道路上所存在的阻碍，不使西方强国

插手和决定该条约的命运，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对西方强国的立场施加影响，以便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而该协议将有效地确保苏联、民主德国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将有助于促进其他一系列欧洲问题的解决。

该协议强化了对我们很重要的一项条款，即柏林的西部地区不是联邦德国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今后也将不由联邦德国管辖，这样便彻底结束了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双方还根据国际常规就过境交通问题达成了民主德国能够接受的协议。民主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也得到了确认。另外，该协议还包含有其他一些旨在确保民主德国国际法律地位的条款。协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已能够满足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多年的需要。

如今，要落实西柏林协议，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必须就该协议所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正密切关注着这一谈判进程并极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然，在这期间我们都是持全力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的。我们注意到，在波恩没能顺利达成四方协议的问题上联邦德国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有表现并不反对向民主德国作出让步的迹象。于是，当今年10月末在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后，我们便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关于谈判期间的策略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德国朋友一直与我们进行着定期磋商。

近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以及联邦德国与西柏林议会之间的谈判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朋友们均对这些谈判今后的发展前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勃兰特政府也对谈判进程感到满意，因为对该政府而言，如果能就西柏林问题与民主德国达成共识将有助于其与内部反对派力量的斗争。

勃兰特很清楚，是否批准莫斯科条约将决定着——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及其所领导的联邦德国现政府的命运。而如今他所剩的时间已不太多，联邦议院选举即将在1973年开始。他必须使自己所执行的对外政治路线见到实际的成果。而要得到这样的实际成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行的。

今年夏季，勃兰特表示希望前往苏联并与我们进行非正式会谈。我们考虑了他的这一建议，鉴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实现与是否能够同联邦德

国现政府搞好关系密切相关，政治局决定满足他的这一愿望。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勃兰特在克里米亚举行的这次会谈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我们很想了解联邦德国在发展与苏联关系方面的近期和更长远计划。其中首先便是(联邦德国政府)批准苏联和波兰与联邦德国条约的期限问题。在提出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波恩要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那就首先必须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并承认后者的主权。

勃兰特承诺，联邦德国与苏联条约以及联邦德国与波兰条约都将在不晚于1972年春季获得批准；联邦德国政府将严格落实这些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勃兰特表示同意，准备让自己的政府集中力量在权利完全平等、不存在任何歧视、相互尊重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促成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政府将帮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加入联合国。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承认目前欧洲形势已为召集全欧会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同意游说自己的盟友为这次会议的召开进行全面的筹备工作。通过与勃兰特的会谈，我们了解到两国在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问题上均存在有一些共同的立场。

勃兰特赞成与苏联保持广泛而长期的合作。他要求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必须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消除沉重的历史创伤。而对此，我们对他说，(联邦德国政府)应当以和平共处的思想严肃对待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勃兰特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总之，我们与勃兰特所进行的谈判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谈判期间，我们涉及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都对今后的苏联与西德关系及其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一定意义。我们之间所通过的文件将对欧洲，甚至其他国家的事件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该文件得到了民主德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高度评价。当然，这一成果未必会让美国和北约其他一些成员国感到满意。法国人也带着醋意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克里米亚谈判的发展进程，因为他们担心当批准了相关条约之后联邦德国就可能成为苏联的首要合作伙伴，而法国就可能退居其次。

依据所取得的谈判成果，我们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

当然，对此我们也不能过分炫耀，这一方面是因为勃兰特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国也有一些人对其持不信任态度。不过，在此我们已为自己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国家将以斗争方式瘫痪军国主义和其他侵略势力的活动，从而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团结的立场。我们绝不允许西德一些集团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利用当前欧洲的政治形势来从事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其团结的活动。我们也要注意社会民主主义者政策中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就所有涉及联邦德国的问题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行动上的一致。

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与法国的关系，该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中唯一的一个退出了该集团军事组织的国家，并在欧洲和国际政策许多问题上都执行着一条与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的路线。

法国政府及其总统蓬皮杜本人都主动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法国一直坚持的与苏联接近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与苏联接近的路线是由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执政时开始实施，并在蓬皮杜去年访问我们国家时得到了延续。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认为法国人的这一路线对苏联是有益的，因而我们一直积极地支持和利用它来为苏联谋取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苏联领导人访问法国是有好处的。马尔舍同志和法共中央政治局极力说服我们接受这一邀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们对此当然是言听计从。

我们在访问法国期间受到了该国总统及其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从而充分说明了法国人对发展与我们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都在相关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其中，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对我们两国今后的关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该文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该文件包含了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诸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坚持的。这是在战后时期为了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利益，我们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共同政治纲领性文件，而此前我们还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签署过类似的文件。

该文件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如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坚持平等、独立，拒绝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而当前的法国政府正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欧洲事务。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普及上述这些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欧会议上通过相应的决议。

尤其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完全同意在欧洲范围内各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无疑表明，法国政府已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不可侵犯和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有边界。

这份涉及诸原则的文件还成功地包括了其他一些与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纲领内容相符合的条款。例如，苏联与法国将继续执行缓和路线和加强欧洲安全，致力于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促进各冲突地区重建和平，消除以军事、政治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分裂局面，增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两国都将全力推动裁军问题，尤其是核裁军问题的解决。两国还讨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协商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采取一致行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义务在国际实践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该文件中还包含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条款，即苏联和法国将以协商和合作的方针作为处理两国间关系的固定政策和在处理国际生活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固定因素。类似这样的义务，不论是当年的戴高乐还是去年访问莫斯科的蓬皮杜都不曾承诺过的，而如今这项义务实际上已具有了无限期的性质。

这份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涉及了广泛的国际生活和两国双边关系问题，规定了两国相互所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并认为如今所签署的文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该文件以极其重大的意义。苏联与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国家——法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合作关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以上所述便是我们在巴黎签署文件所确定的苏法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蓬皮杜谈判期间——主要是在单独情况下进行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简单说几句。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全欧会议诸问题上达成了高层的共

识。法国将会继续谋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立场鲜明地迅速投入全欧会议的筹备工作，以便促成会议于1972年举行。法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还提出了关于法国对民主德国所执行的路线问题。蓬皮杜说，法国正等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最终谈判结果，而法国自然将不会是最后一个承认民主德国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蓬皮杜指出，法国赞成和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虽然与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蓬皮杜表示相信，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将会被批准，并强调法国期望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谈判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与蓬皮杜坦诚而信任地讨论了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相关问题。我们强调，任何涉及联邦德国裁军问题的讨论，苏法两国都应给予密切关注和保持高度警惕。不论是对以前的勃兰特还是现在的蓬皮杜，我们都明确表示，苏联人民对所有与希特勒进攻我们国家有关的情况都极其敏感并将对苏联—联邦德国条约的精神和字面意义的落实情况给予密切的关注。联邦应当拥有这样的军事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拥有核武器(掌声)。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

我们还讨论了法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蓬皮杜说，这些关系是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并不想改变它。但在法国谋求彻底独立自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困难。蓬皮杜说，“应缩减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应当结束美国对西欧的保护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是在战后强加给西欧的。

这里，我将不详细叙述我们就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近东和印巴冲突等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结果。因为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基本上都与苏法声明中所反映的观点相近似。

针对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自然应当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应当考虑到该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决定了其今后政策的总体性质。

在对法国访问期间，我们尤其直观地感到，法国共产党的确是本国一支巨大的民族政治力量。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法共的存在，才使得法国人对苏联人民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发自内心地对列宁主义的政

党和我们代表团抱以同情和尊敬。我们在巴黎和马赛的大街上多次看到带有苏联标志的红旗在飘扬，不止一次见到法国劳动者以高唱国际歌的方式欢迎我们代表团，这充分反映了那里的良好政治氛围。

总体说来，巴黎谈判及其所通过的相关文件使我们拥有了新的能够对欧洲和国际形势施加影响的手段，而借此我们将达到如下目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涣散北大西洋集团、维护各国安全以及始终不渝地把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治纲领落实到实际之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一直在为已于1972年召集了的全欧安全和合作会议展开积极活动。我们并没有把该会议看作是一次单个的活动，而是作为我们今后将要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开端。实施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使欧洲实现真正的和平，就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以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发展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认为，上述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我们必须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这方面已与勃兰特和蓬皮杜达成了共识。在与他们两人的会谈中我们已事先谈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可能采取的方式问题。

我顺便在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加拿大也已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也同意举办这次会议。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为会议的筹备铺平道路。当然，这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们协调立场。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同时，还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今后的前景加以评估。目前，我们正在起草相关文件草案，它们将成为我们与兄弟党以及随后的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等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要维护和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就有必要召集国家级会议，而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近期，我们更加积极地进行着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是一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

在准备全欧会议的同时，我们还预先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利于实现我们关于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建议。即便是这一建议的提出本身，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对西方那些鼓吹依靠北约扩张

武力和增加“欧洲”对北约军备的“贡献”立场的集团作了有力的回击。

针对裁减欧洲武器军备的问题，我们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和盟友的利益。关于以什么方式来削减欧洲军备的问题，我们自然应当首先在华沙条约国范围内进行磋商。然后，我们才可能向西方各国提出具体的提案。

裁军，即使是少量的削减，也可能只是从中欧地区开始进行象征性的武力限制，都可能对整个欧洲大陆局势的缓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紧张局势缓和的直接结果便是军费开支的下降。欧洲裁军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其必须与联邦德国的军备削减相联系。我们曾就此问题与勃兰特谈过，后者对此表示同意。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落实自己的对欧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志们！近期，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因此，下面，我将谈谈关于我们对西半球一些国家所采取的举措。

政治局对智利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该国已走上独立、进步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对南美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当说，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反美帝国主义立场的强化，智利当前的国内形势极其尖锐。鉴此，该国领导人请求我们给予帮助并提出建议。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与智利共产党政治局代表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智利同志提出的问题，最终决定给予该国民族团结政府一定的援助。

我们将继续开展和加紧针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此举完全符合我们自身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我们与另一个美洲国家——美国的邻邦——加拿大的关系也取得了新进展。你们知道，加拿大一直承受着美国垄断阶级的压力。加拿大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目前已充分认识到与苏联发展各方面关系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要想摆脱美国而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加拿大统治集团而言，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已看到该国内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特鲁多访苏并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访问加拿大。为了发展苏加关系，根据政治局决议，A.H.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对该国进行了访问。

通过访问，苏联和加拿大对如下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的个别方面、裁军、印度支那局势、中东形势和印巴冲突等。双方立场上的接近均在苏、加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特鲁多的讲话及其前不久发表的声明均反映了渥太华在自己立场上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其中都强调加拿大将执行“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

在对美国关系上，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通过其他国家——包括通过他的盟友——对美国施加压力，谴责其所执行的强制政策和滥用武力，动员世界舆论与美国政策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谋求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实际上还在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起，即在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很早以前，尼克松便已开始试探举行苏美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原则上不反对举行此类会晤的同时，我们从一开始便向尼克松表示，要会谈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即我们必须有理由相信，这一会谈将会促进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美国被迫考虑了我们的上述立场。他们参与了西柏林问题的协议活动，应当坦诚地说，其间他们甚至还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得以顺利结束。近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美国已开始某种程度上顾及我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访问莫斯科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判断，美国统治集团已清楚地认识到，1972年5月苏美高层会谈的结果将对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尼克松本人而言，此次对苏联的访问将关系他的个人威望。因此，他当然想以此作为自己在总统竞选中的一张王牌。而我们也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能够对美国当局施压的手段，以便使事情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理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兄弟党派均对我们就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问题达成协议持欢迎态度。

于是，这次会晤即便现在已开始对我们有利起来。美国总统必须时刻关心着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而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其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作为产生威慑性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的会谈涉及与苏联

的关系之时。

即将举行的(我们)与美国总统的谈判——将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它来取得一些具体的结果，以便有益于我们国家的广泛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的利益。

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对苏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还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所举行的此类谈判期间，我们已成功签署的协议有两个：关于完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联络的措施和关于防止核战争意外爆发的举措等。

在此类敏感问题——如限制战略性武器等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我们将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阻止美国发动一轮新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政治局详细而全面地评估了“正”和“反”两方面的各种情况，其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是苏联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问题。而这些利益，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评估任何问题的一个固定标准。

同志们!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斗争。我们正就全面裁军问题提出关于召集世界性会议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在联合国内、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当然与此同时也置裁军的反对者们于尴尬的境地。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关于停止细菌武器的生产和清除此类武器的储备的协定即将成功签署。而该协定的草案正是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

以上便是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政治局和苏联政府一直在处理的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何原因促使这样一些国家，如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等摆脱“冷战”思维，转而与我们、与苏联举行谈判并进而就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相当重大的问题签署相关协议呢？究其原因，具体如下：首先，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强大实力，世界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它们越来越难以对抗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其次，我们国家所执行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对各个国家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今，关于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谎言再也无法欺骗和蒙蔽任何人。最后，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等开始发挥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积极开展国际活动、提出和解决所有那些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对外政治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在它们中间制造不和并阻止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的这一政策是否是正确的呢？——列宁当年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无论我们是与勃兰特会谈，与法国统治集团代表就一系列政治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还是筹备与尼克松会晤——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我们都是在利用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存在的这些契机来达到如下目标：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地位，推动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持续不断的掌声）。

（三）

同志们！在为实现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始终以该纲领中所提出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并不仅仅属于我们国家，而且属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正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不论是涉及欧洲问题，还是涉及近东、印度支那、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始终都是与各兄弟党和国家携手并进的。

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的同时，我们尤其重视执行团结的路线，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完善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的活动机制。

随后，我们又针对那些在政策上受到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绪影响的党派开展了耐心而艰苦的工作。

最终，我们与毛主义者领导层的思想政治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在今年春、夏季节，我们党代表团分别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和德国等共产党大会。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便是所有这些兄弟党代表大会都是在苏共二十四大深刻而全面的积极影响下举行的。这些会议的举行再次证明，我们党和人民的经验已成为了国际主义的共同财富。

其二，所有这些会议实际上都成为了广泛的共产党国际会议。而且，其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团对当代一系列最为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均持极其一致的立场。

苏共代表团自然会利用参与这些会议工作的机会与各兄弟党派进行新的广泛的接触。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根据我们的建议又举行了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性会谈。这期间，我们就一系列国际问题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还是根据苏共的倡议，今年8月初各兄弟党领导人又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我们认为必须向朋友们通报我们即将计划实施的一些主要外交举措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谈中就一系列最重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方向。

会面期间，我们对欧洲事务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关于采取政治行动以促使与联邦德国的条约得以批准以及使该国在我们能够接受的立场上得以巩固等问题上，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还谈了关于法国、关于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的途径等问题。我们再次讨论了筹备欧洲会议的各方面问题。

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关于尼克松即将对中国的访问，近东和印度支那局势等。与会者们完全同意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原则性评价和所采取的相应实际立场。

克里米亚会谈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成果再次证明，各党派领导人集体会谈是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多边政治合作模式。

同志们无疑注意到罗马尼亚代表没有出席克里米亚会谈。这不是偶然的。应当说，各兄弟党派从罗马尼亚领导人所执行的路线中得出的结论是，该党领导人的路线除了自身政治策略的需要外，还与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还在克里米亚会谈举行不久以前，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无原则性便在H.齐奥塞斯库对北京的访问中充分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政治局和朋友们便形成了如下统一的意见——不邀请罗马尼亚人参加克里米亚会谈。不过，各兄弟党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这样一种做法，即针对罗马尼亚人我们应当继续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利用一

切可能——其中当然包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会谈方式在内——对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和实际政策施加影响。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我们在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今年7月，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例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一揽子计划。目前，我们正在具体落实这一计划。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一体化无疑是符合苏联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同时也将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结的有力手段。正是由于一体化符合了我们现在和今后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党要对所有与落实这一重大任务相关的国家和经济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当然也不会忽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兄弟党派的双边关系。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认真研究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特殊问题。我们会思考这些问题正在或即将对我们与相应国家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处理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志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帮助捷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克服党内秩序方面所明显存在的危机；而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我们主要侧重解决经济问题，以期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效率。

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首要问题都是在外交方面，而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还向我们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你们都知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乌布利希同志健康方面的原因，该党领导人发生了变化。而对此，乌布利希同志和昂纳克曾与我们商量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性和加强该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模式。波兰朋友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针对那些在各种问题的立场上与我们有别的国家，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此相关，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关于我们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最近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些年来苏南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问题的复

杂之处在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对西方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斯拉夫国内的右倾主义者希望该国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极力夸大这样的传闻，即似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面临遭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兄弟国家“干涉”和“入侵”的危险。为达此目的，他们借助了臆想的所谓“主权有限”理论，各种关于华沙条约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敌视性宣传以及关于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央”等投机性说法。于是，这些造谣中伤式的言论开始大量地充斥南斯拉夫的各种宣传媒介。

鉴于这种情况并考虑到有必要直接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施加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接受铁托的邀请并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贝尔格莱德。

访问的结果表明，政治局的上述决定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很难期望仅凭这一访问便会使南联盟领导人的立场立刻发生急剧的转变，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政策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波折。但通过这次访问期间我们与铁托同志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举行的坦诚、甚至是激烈的会谈，毕竟使我们有机会向南斯拉夫同志表述了苏共的原则性立场，充分揭露了该国流行的那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挑拨离间式言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发表的言论使广大民众有机会了解苏南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即南斯拉夫劳动者也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

通过在南斯拉夫所举行的谈判，我们也确认了自己所得到的如下信息，即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南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并非都持同一立场。部分领导人——如铁托同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卡德尔在内，都对南—苏关系的现状感到忧虑。他们均以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评价由于“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南联盟威望和领导作用的下降等情况，并试图寻找某种——在我们看来并非十分有效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目前的现状。

还有一些人，试图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并促使其与西方接近。他们破坏国家和南联盟的团结和统一，强化市场经济原则。

目前，我们仍难以明确判断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正尽一切力量，加强那些持拥护与我们进一步接近立场的人士在该国领导层中的地位。而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苏联和南斯拉夫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该声明的内容，贝尔格莱德曾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辩论。最终，我们所有的原则性评价均被纳入了该声明。在强化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中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该文件还强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是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围绕不结盟政策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南斯拉夫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极其模糊，同时也没有以阶级斗争标准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尺度。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借用这一说法，而对于其中内涵，苏联只是支持该政策中那些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内容。

在我们代表团的坚持下，苏—南联合声明反映了马列主义对在不同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理解，并强调不允许这些方式之间相互发生抵触。

总之，我们认为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成功的。它有助于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阻碍，并为发展这些关系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

同志们，在评价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前景之时，我们应当从整个巴尔干的总体形势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人和毛主义者们在该地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及其通过幕后交易导致巴尔干国家分裂，从而损害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企图。虽然，铁托也向我们作了十分坚定的保证，即南斯拉夫永远都不会参加这样的(以反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联盟。但即使这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关注巴尔干局势的进展情况。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们与古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近期古巴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与我们对该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今，该国领导人已经能够更加成熟地面对许多问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与毛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其立场

实际上已与我们一致了。古巴领导人高度评价我们党的外交政策，而在近两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访问智利期间的讲话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与古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和建议古巴领导人循序渐进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成功地发展古巴的国民经济。

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尖锐，是因为古巴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极其沉重。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计划。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混乱，货币供给方面虽然能够保证，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生产率低下。民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都要凭票证分配，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每当与古巴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和谈判，我们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古巴以及苏古双方政府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们都会反复提请古巴领导人关注上述这些问题。政治局还采取了如下不同寻常的举措：我们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发了一封信，其中内容是以巴伊巴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所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对古巴经济情况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改善古巴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

前不久，应政治局的委托，A.H.柯西金同志也访问了古巴，并与该国领导人讨论了苏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问题。最近，为了继续进行与苏联的谈判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即将访苏。而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访苏事宜我们也已达成协议。可能，其对苏联的访问将于明年5—6月份进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与古巴领导人就如何解决古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尖锐且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同志们！目前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对外政治问题是政治局始终关注的，那就是中国问题。就苏中关系本身而言，近期除了两国贸易方面略有起色之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坚持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的同时，我们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巨大的努力。至于中国人，他们也以共同郑重声明的方式表示打算保持和发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但是，每当涉及要讨论具体的建设性问题时，中国代表往往都会拒绝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即使这时已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这些问题既包括从整体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两国边境问题的谈判事宜，后者已持续了两年多了，但至今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极力扩展自己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积极地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政治地位、甚至领导地位。在针对发达国家的态度上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高潮便是中美两国就尼克松访问中国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在公开讲话中和给我们的致函中均宣称，其(对中国)的访问不会被用来对付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访问莫斯科对自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是很懂得政治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完全排除中国和美国在我们背后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与北京和华盛顿直接外交关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就在这届例会上中国已被正式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在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之后，中国将可能对该组织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而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起，苏联便曾积极地要求联合国接受中国为正式成员并从那里驱逐蒋介石分子。不论苏中关系如何，我们的这一原则性立场都是始终不曾改变的。

但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另一个方面并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毛主义者们的外交政治路线在策略方面如何经历波动和转折，但其坚持反苏和追求大国主义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

在密切关注毛主义者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同时，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对其与世界形势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并在欧洲、在与印度、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执行积极的爱好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将以此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抗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反苏路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预测，即中国积极地、拥有完整权利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包括参加联合国在内，将有利于促使中国人

以更加健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与中国代表进行合作。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仍存在着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即中国人正极力促使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巩固与“第三世界”代表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统一行动。总之，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消除由于中国人的活动所导致的一切消极因素，并对他们可能发动的新的、旨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予以回击。

很显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部将发生什么事。至于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暂且还不能看得很清楚。北京正仔细地掩盖着这些事件的原因和本质，虽然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已初露端倪。

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荡之后，近期中国国内形势正逐渐趋于稳定。但大约从今年9月起，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中国统治上层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深刻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即于1969年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25人，而如今已有一半多人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林彪已被解职，而根据另一些资料——林已被击毙。在秘密会议上当局正在向广大干部和民众解释，林彪——中共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是一个“叛徒”，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叛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而正是关于此人，就在两年半以前所通过的中共党章中还这样写道，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在这份文件中林彪被称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其事业的接班人，即实际上已被宣布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如果的确是毛要求立即罢免自己的“战友和接班人”的，那么这就充分说明了北京肮脏的幕后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把中国领导人中出现的新一轮冲突的原因仅仅看作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不少根据认为，中央斗争反映了北京政策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高级领导人的调整将会给

北京的政策带来那些具体的变化。虽然从官方层面来看，北京依然坚持中共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国内的形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内部斗争和反苏运动仍在继续，好战的军事歇斯底里仍在不断升温。

关于针对中国的政策和宣传问题，我们都会定期地在不同水平上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协商，以便协调各自的行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据说，毛泽东及其亲信对苏联政治家、学者、报刊和其他共产主义党派就毛泽东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忧虑。这些批判性言论在对世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内产生了影响，从而有助于那里的各种力量了解毛主义者所坚持理论及其实践的没有说服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更加具有进攻性地展开这项工作。而这方面工作，当然主要是由我们驻各个国家的使馆来负责。

在针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揭露毛主义者的反苏政策，及其反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本质，针对北京对苏联民族利益、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蓄意侵犯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来阻止其旨在损害我们利益的任何企图。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苏中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路线。针对北京的反苏活动，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积极政策，以确保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进一步团结(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合作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当前解放运动的强大支柱。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继续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一切，我们认为都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掌声)。

(四)

同志们!在制定和落实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同时，苏共中央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立场，因而也受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的称赞。正因为此，他们与我们一道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其中一

些党派已明显具有了对本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能够完全地与苏共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保持一致。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党派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已变得日益强烈。

共产党员们对苏共所开展的“世界性进攻”的阶级性问题作了正确的评价。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及其随后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西方一些统治集团承认直接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反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势力的重大打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开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正好符合那些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的民族利益。因此，共产党人们公开宣布，苏共的积极外交政策帮助各共产主义党派加强了自身的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我们致力于执行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在理论活动方面，苏共与各兄弟党派代表进行坦诚的会谈，其间以党的工作方式率直地指出其工作中的优点和错误，帮助那些坚定捍卫马列主义、始终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现象作斗争的党派加强自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现实生活已在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曾导致我们与那些反对我们行动的党派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过去3个年头了。历史已经对谁对谁错给出了答案。一些党派正式撤消了自己的错误决议。但也有一些党派，在知道争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但对事情的实际进程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且会对自己本身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只是偶尔地提及自己以前所发表的声明。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与1968年，甚至1969年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捷共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态度已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出席此次大会的68个党派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均高度评价联盟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式帮助，并表示支持捷共现任领导层(掌声)。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我们党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的情况下我

们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果当时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放任自流并任其走向另一方向，那么如今我们就不可能在欧洲局势的缓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取得那些我在这次全会上所提到的良好的成绩。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良好成绩已充分地证明了一切(持续不断的掌声)。

在过去的半年间，在落实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的同时，政治局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其主要目的包括：与各兄弟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达成一致，始终不渝地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力量提供支持。

今年7月，我们在莫斯科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意义已超越了我们两党关系的范畴。双方代表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并从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做了研究。苏共和法共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

今年9月初，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鲁伊兹·隆哥举行了会谈。由于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组织之一目前正面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正是从解决这些任务的角度出发，在与隆哥同志会谈期间我们着重讨论了意共与苏共的关系，苏联和意大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意共的一些立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应当说，我们政治局已不止一次提醒意共领导人关注自身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我们这样做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该党内部仍继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并时常公开表现出来。尤其危险的是，目前该党还表现出谋求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并拒绝从根本上对中共路线进行批判。我们对此绝不能置若罔闻，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我们将继续针对意大利同志开展耐心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对加强西德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寄予厚望。我们与西德共产党领导人也建立了兄弟式的互信关系。今年夏，苏共中央将举行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根据后者的请求，我们将就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在这次大会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的共产党就将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德国共产党。到那时，以前处于非法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们也就实际上成为了该统一共产党组织的

成员。

应当说，我们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宫本同志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之间曾举行了长期而艰难的谈判。就在前不久，我们与该党的关系曾几乎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最初该党领导人一直坚持亲中国、反苏和民族主义立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党关系形成了许多隔阂。不过，如今我们已有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如今，拥有30万党员的日本共产党已开始积极地反对北京的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日本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试图在大国主义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勾结的做法。我们认为，不论是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还是发展与日本另一个巨大工人党——社会党的关系，都将是我们对该国政治形势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述会谈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还在莫斯科会见了葡萄牙、英国、芬兰、叙利亚、黎巴嫩、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们首先会见了智利的执政党之一，以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同志为首的智利社会党代表团。

根据中央所制定的总路线，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先后来苏联访问的共有60多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代表团。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有20个代表团前往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中许多人都知道的，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作。要知道，每一个被中央派往国外的代表团以及那些根据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或州委等负责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肩负着中央所赋予的一定的任务。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我们党针对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制定的相关政策的积极实现者和参与者。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在与各种背离马列主义原则倾向作斗争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党派做得不够坚定，不够彻底。在个别党派中修正主义者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共产党组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经常背离正确的路线。因此，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彻底赢得马列主义原则的胜利，我们还必须继续坚持毫不松懈的斗争。在这方面苏共一直都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对此我们也从没有拒绝的打算(掌声)。

你们都记得，关于克里米亚会谈的联合公报曾再次强调了1969年国际会议的思想和结论的意义。我们的经验表明，这次国际会议所提出的思想及其结论，将有助于将苏共的外交努力与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为了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近期国际工会运动已在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已与没有加入世界工联的一些工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在经历了1949年的分裂之后，前不久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们约定开始筹备全欧工会组织大会。而我们则打算利用这次大会来建立一个全欧工会组织。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不久，我们便针对社会民主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其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斗争。我们对这方面工作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随后，根据中央所制定的路线依照工作程序我们又与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举行了会谈。而在当前有利条件下，这些接触表明，我们比以前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社会民主人士施加影响。当然，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必要性，即我们仍必须坚定地与社会民主党派右翼领袖政策中的反共和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总而言之，同志们，过去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渝坚持的是一条灵活、坚定、讲原则，在哪里都行得通的路线(掌声)。

同志们，以上所述便是二十四大以后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所从事的国际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旨在解决对外政策中最重要和业已成熟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党的二十四大发出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来争取和平，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促进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经验也说明，要赢得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的团结，同时也要沉着、有灵活性和讲究策略，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等方面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党的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决议真正落实到实际中去。

大家当然也很清楚，我们的事业并不容易和轻松。例如，英国保守政府便完全坚持反苏立场，而北京统治者目前所坚持的立场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破坏我们前不久通过采取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其中包括使用各种挑拨离间式的卑鄙手段和在报刊上的大肆诬蔑。我们也知道，还有大量的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势力正在反对批准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完全不赞成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众所周知，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中一些最反动的亲美集团正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其中包括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来重新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要实现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那些目标，我们就需要继续坚持不懈地、顽强地与各种侵略、反动和反苏势力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并相信自己一定会最终赢得胜利(掌声)。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实呢？不久前苏联和我们党所采取的外交举措而赢得的胜利——这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托利党徒们反苏冒险事业的破产及其目前在欧洲实际所面临的孤立地位——这也是事实。而在联邦德国现实主义力量的影响力无疑是在不断地增长着。最后，中国统治集团，自从走上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时候开始，尖锐的内部斗争便使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对于反苏分子们来说，当前形势明显是不利于他们的，而我们国家所制定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却越来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和拥护(掌声)。

同志们，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把我们业已开始实施的那些举措继续进行到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包括目前我们与这样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关系，如南斯拉夫、法国、印度、各阿拉伯国家、联邦德国、加拿大，等等。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发展那些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新机遇。政治局相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党的各级机关、负责国际事务的各部门、外交部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负责发展与外国关系的其他部委、部门和社会组织都会积极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对外政治任务如下：

——继续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开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积极阻止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和阿拉伯东部各民族的侵略活动，防止印巴军事冲突；

——使我们与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得以批准，使联合国接受民主德国为成员国；

——确保西柏林协议顺利发挥效力；

——展开全欧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并促使其尽可能在1972年召开；

——与各兄弟党协商上述举措，并在欧洲裁军问题采取共同立场。为达此目的，可能需要尽快召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或社会主义阵营诸国领导人会议；

——继续展开积极工作，以确保那些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顺利签署该条约；

——为与尼克松的会谈作好各方面准备，以便最大限度地“促使”这次会晤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我们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利益；

——为在远东和整个亚洲进一步展开活动制定相应计划，其中包括积极促进与日本的关系，因为这对当前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在近期与各兄弟党派就当前最迫切问题进行讨论，以应对中共的分裂路线和协调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宣传活动；

——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尤其需要强化苏共及其队伍的理论和思想工作。

同志们!虽然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但我们仍有理由满意地指出，我们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必将取得成功。由于“冷战”的寒风早在10年以前便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肆虐，两个主要的军事政治集团狂热地为相互之间的直接对抗而积极准备，从而导致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重大国际任务，确保苏联人民拥有稳固的、牢不可破的和平，保障各个国家的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当今世界的整个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均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在各条战线上推进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同志们，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情况。也正是关于这些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本次中央全会作出报告(持续不断的掌

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刚才我们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就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国际活动情况所作的报告。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明天早上才可能对该报告进行讨论。而现在，我们建议就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问题通过一个已经中央全会讨论过的决议。同志们，有人对这一程序持不同意见吗？

没有。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将送交你们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内容。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

赞成1971—1975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和1972年苏联国家预算基本草案，并同意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审议。”

这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有人有意见吗？没有。

那么，同意中央全会这一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

有人有异议吗？

有人弃权吗？没有。

决议一致通过。

那么，现在宣布休会，直到明天早上10点以前。

РГАНИ，ф.2，оп.3，д.255，л.3-29

1972年

№2292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苏联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1972年1月21日)

1月21日，我同基辛格在苏联大使馆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最近一年半到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而主要讨论的则是关于今年5月份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高层会晤这个问题。

第一，转交了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件。

基辛格说，他将立刻把这封信件报告了尼克松总统。关于尼克松总统对这封信件的详细反应他会随后另行通报。基辛格说，他非常了解尼克松总统的情绪和想法，因此他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尼克松总统同意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信件中提到的主要观点：现在应该开始做一些实际工作，为高层会谈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做好准备。

因此，基辛格提议我们同他们进行定期会谈(一周一次)，做好这项工作。从3—4月份开始这些定期会谈将会更加频繁地举行。

我回答说，苏方愿意就相关问题开始会谈。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无疑同意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信件中提出的如下建议：委托相关部门开展工作，为两国政府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领域签署协议做好准备，这些协议可以在5月份举行高层会晤的时候签署。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组织工作，基辛格已经事先向尼克松总统提议，这次访问的时间为5—7天。他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除了访问莫斯科以外，尼克松总统还想访问列宁格勒和苏联另外一个城市，当然，这还要看苏联方面的考虑，如果苏联政府不反对这样的访问日程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的建议，提出2—3

个苏联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除外)供他选择，他再从中挑选出一个城市进行访问。

基辛格风趣地说，尼克松总统挑选对哪个苏联城市进行访问，这完全取决于苏联领导人，因为尼克松总统“担心他指定要访问的地方凑巧靠近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地方，而这是不被允许的”。显然，他这样风趣地说也不是偶然的。

我事先向基辛格通报说：在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之前，他基辛格可以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基辛格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并且说，从各方面来看，在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之前，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将是有益的，这一访问可以在3月下旬进行(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如果苏联方面对此不反对的话，稍后可以确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期。

第二，基辛格确认，关于调解近东问题，他们将背着尼克松和葛罗米柯在去年秋天举行会谈的时候提出的精神，努力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对双方已经协调过的一些想法进行讨论。同时，他还多次提到他们将会面临的一些困难，这指的是在同以色列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将会遇到的困难。基辛格还援引了同果尔达·梅厄(前不久她在白宫访问)进行的会谈。现在他们正在同以色列就达成中期协议(解决苏伊士问题)的可能性问题举行谈判。

关于这些问题基辛格都没有详细谈论。基辛格说，星期四或星期五我们将举行下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将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第三，全欧会议问题。会谈中，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苏美双方都已经表明过的那些立场进行的。表面上来看，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显得比较具有和解的性质，但是华盛顿的实质立场仍然和以前一样：在最终签署柏林协议之前，在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上，美国什么事情也不愿做。

第四，同基辛格在1月21日进行的这场会谈的相当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的状况这个问题。

从基辛格的谈话可以看出，对于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中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尼克松总统仍然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毫不妥协。此外，在证明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的好处的时候，对于制止军备竞赛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事实上是避而不谈(还要考虑到，现在白宫向国会提出了新的发展军备的计划)。

显然，在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上，基辛格特别注意的是政治问题，甚至还有宣传问题——一定不能辜负国际舆论(以及美国的国民)的希望，“在苏美经历这么长时期的谈判之后，他们期待着签署这样的协议，或许，他们还会夸张地把这些谈判看作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在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时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投机行为”。

最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军备竞赛，其中包括加强在战略武器上的军备竞赛，尼克松总统最近的发言以及他刚刚宣布的新的军事预算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新的军事预算计划比去年的军事预算增加了60亿美元，在战略武器上的投入增加了16%)，我对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进行了批评。

我特别强调说，美国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苏联没有增加自己的军费，这从苏联新的军事预算计划中可以看出。更不要说美国采取的上述措施与苏美谈判的主要任务(限制在战略武器上的竞赛)明显相矛盾。我问基辛格，尼克松政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基辛格尽力解释说，美国军费总量得到了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军人的工资提高了。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现在确实计划增加自己的战略武器，特别是增加海基战略武器，在考虑恢复建设新的、更加先进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

基辛格尽力为美国新的核潜艇建设计划进行辩护，他说，在维也纳——赫尔辛基举行的谈判中，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苏联“总是拒绝”关于暂时冻结海基战略导弹的提议。6个月前，尼克松总统秘密地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关于“相互均等”的建议是个“非常真诚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该建议希望通过对建造新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进行限制，使两国这类舰艇的数量都为41艘(不包括不太先进的潜艇，如果苏联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保留这些不太先进的潜艇)，对于这个建议他基辛格是特别同意的，“但是莫斯科没有对这一建议作出任何回应，尽管尼克松总统个人认为这一建议非常重要”。

基辛格详细地说，尼克松执政以来，也就是在3年的时间里，为了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美国没有建造一艘新的核潜艇。但是苏联在不断地加强载有导弹的核潜艇的建造——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在最近同苏联外长会谈的时候已经详细地谈论过了，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现在决定恢复建造新的载有导弹的潜艇，以便在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域不落后于苏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对苏联外长说过。

基辛格试图把美国加强军备竞赛的责任几乎都推到苏联身上，对此我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我再次批评了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说，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未必能够为正在进行的、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营造良好的氛围。

随后，在我同基辛格就这个问题举行的讨论中，美方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基辛格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愿意接受如下方案：

1.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和苏联都把他们的最新的和较新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的数量都限制在41艘的建议仍然有效。苏联可以建设和改造自己最新的载有导弹的潜艇，使其达到41艘。到时候美国所拥有的这样的核潜艇的数目也将不超过41艘，这指的是，这41艘潜艇不包括那些将被逐步卸除武装的潜艇，随着新的建设的开展，这些潜艇将由新的潜艇来替换(这指的是美国的载有导弹的潜艇在结构上不太先进)。当然，在不超过41艘潜艇的情况下，苏联也可以用他们最先进的潜艇来替换这些潜艇。简单地说，两国的舰队都可以拥有数量相等的比较先进的潜艇，在不超过商定的潜艇数目的情况下，都可以对这些潜艇进行改造。

基辛格确切地说，美国现在才决定建造新型潜艇，在1975—1976年之前，这些新潜艇将不会服役。

2.按照两国在战略导弹问题上确定的同一标准暂时冻结进攻性武器，无论是陆基进攻性武器还是海基进攻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潜艇的最大数目为41艘或商定的其他数目)。

3.第三个方案是，确定两国最多可以拥有的陆基和海基进攻性导弹的数目，但是在不超过这一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每一方都有权利把一种类型的战略进攻性武器转化为另一种类型的战略进攻性武

器；尽管这个方案他们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

基辛格仍然断言，如果在就反导问题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上，在关于暂时冻结进攻性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不考虑关于载有导弹的潜艇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不能同意进行这样的谈判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只是同意冻结一个陆基导弹基地，使其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苏联在这类武器上将会占据比美国多几百枚导弹的优势，这是美国国会未必会同意的)。

然而，如果把美方在两个月之前所说的话进行比较，把美国在宣布建造新的导弹潜艇计划之前所说的话进行比较，现在看起来，基辛格的上述谈话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绝对了。

看起来，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是：在5月份莫斯科高层会谈之前，白宫不会提出，必须把载有导弹的潜艇列入需要暂时冻结的进攻性武器的范围，这是由于美国现在已经提出了建造新型潜艇的庞大计划。

在反导防御问题上，基辛格所谈论的仍然是美国以前的立场，在维也纳举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立场。

第五，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多次谈到越南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来说，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越南问题仍然是较为迫切的一个问题，引起了白宫的密切关注。

令基辛格特别担心的是，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前夕，或者是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前夕，北越和南越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会直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基辛格说，正如他们曾经多次声明的一样，他们将会使用新型的轰炸机对这样的进攻进行反击，其中包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进行轰炸，所采取的这些行动都将会给尼克松对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带来严重的影响，或者会完全破坏这些访问。

但是，对于尼克松能否对中国进行访问，基辛格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担忧，这是由于距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2月21日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基辛格说，而且，2月份是越南最为干旱的一个时期，比较适于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到5月份的时候雨季将会来临，这会妨碍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

在一番含糊其辞的谈话之后，基辛格非常明确地表示，遗憾的是，

他们白宫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前夕，苏联事实上会鼓励北越对南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基辛格说，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印象，中国人要基辛格把他们的这种印象告诉华盛顿。从基辛格的一些言谈可以看出，他同周恩来讨论过这个话题。

基辛格说，有一些“征兆”使他们和中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关于这些“征兆”，基辛格举出了一些事例：苏联报刊急剧加强了对中美接近的批评，并且特别暗示，中国和美国背着越南相互勾结。

关于苏联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援助这个问题，前不久莫斯科公开地进行了解释，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所选择的时机“不能不使人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是被安排在了完全特定的时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前夕)，这是否会鼓励河内采取一定的行动”。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些看法，我坚决予以否认，并且我强调说，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意图，认为我们要破坏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这完全是对我们恶意的中伤，我们坚决反对。我接着说，基辛格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这些言论使人感到非常奇怪，这理所当然地会使人产生一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判断的目的是什么呢？

同时我也强调说，我们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其中包括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援助的原则立场，世界各国和美国政府都早已知晓，在我们的原则立场中没有任何秘密，也将不会有什么秘密，我们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并且不会取决于干旱的季节还是多雨的季节，也不会取决于美国总统要到哪儿进行访问。

看起来，基辛格显得有些尴尬，于是就匆忙地结束了这个议题。但是，在我们的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企图巧妙地解释他所说的那些话，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担心“中国人恼怒起来”，并“唆使河内采取危险的行动”(在尼克松对莫斯科进行访问期间)。

我马上说，像以前所说的那些话一样，他所说的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中伤我们，我再次拒绝接受这些解释。

在会谈中基辛格确认，在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详细地讨论了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和平解决越南的

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向北京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他们以前也向我们阐述过。

基辛格说，周恩来承诺同北越领导人讨论美方提出的这些建议。但是，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越南人会认为，中美就越南问题在北京进行了如此详细的讨论，他们会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基辛格说，但是，他和尼克松总统没有打算绕开越南人讨论越南问题。

基辛格说，他同周恩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下半年，他基辛格同河内代表之间的秘密联系被中断了。在11月份，曾经多次就关于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的日期达成了协议（最后一次商定的时间是在11月20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是所有这些协议都被北越人给破坏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会谈。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愿意在访问北京之前，通过他基辛格继续同河内进行对话。到访问北京的时候再同中国人讨论越南问题，将难免会失去意义。而他们现在这样做“将会在事实上减少河内的恼怒”。

基辛格说，为了同越南人继续进行谈判，他基辛格愿意前往任何一个城市同黎德寿或者同北越其他重要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到巴黎去（看起来，他也不反对到河内去）谈判。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考虑把他所说的这些话都转告给河内，其中包括他们愿意同北越人再次举行秘密会谈的讲话。关于这些问题，他们白宫愿意听取北越领导人的任何想法。

在谈论越南问题的时候，基辛格说，如果北越同意释放全部美国战俘的话，他们打算向河内提出关于他们完全从南越撤军的确切日期。至于其他的问题，可以在另外举行的谈判中进行讨论。

基辛格说，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现在恢复他们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的建议，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苏联作了答复，请求我们把这些答复通报给他们。

第六，印巴冲突问题。尽管基辛格对他们在印巴冲突期间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但是他也承认，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成功。基辛格也承认，在印巴冲突期间，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轻率的，对我们采取的行动反应过度。

同时基辛格也说，导致他们采取上述轻率的措施的原因，部分在于以下这个情况：当时他们从莫斯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答复”，说的是印度不打算进攻西巴基斯坦(这个答复使“尼克松总统松了一口气”)，几个小时以后，印度大使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澄清说，当他们谈论关于西巴基斯坦的某个问题时，克什米尔问题不在其列；但是白宫认为，苏联就这个问题作出的答复是包含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准确地说，克什米尔是西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会承认孟加拉国，但是现在还不能承认。

第七，苏美贸易问题。对于苏美发展贸易关系问题，白宫在原则上是积极看待的。对于斯坦斯部长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他们是积极地看待的。但是，随后基辛格试图把他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实际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对以曼茹洛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前不久在华盛顿谈判中取得的一些成果的落实，同我们两国就政治问题举行的谈判结合起来。这暗示，他们希望，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

基辛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我的坚决反对。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坚持再讨论下去，而是答应，在2月10日之前，白宫将会决定，是否同苏联贸易代表团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但是，从基辛格的潜台词中可以感觉到，白宫打算继续控制苏美贸易谈判问题，打算把苏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同两国总的政治氛围结合起来。基辛格还回答我说，当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打算在贸易领域采取重大的措施。但基辛格也表示，希望同时这也能促使政治问题在莫斯科会晤中得到解决。基辛格说，他们打算在3月份派遣一个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继续讨论两国的贸易问题，为在5月份举行的高层会谈做好准备。

第八，曾透漏出消息说，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拉什将会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代替前不久离开这一职位的帕卡德)，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证实了这一消息。

基辛格说，尼克松很早前就熟识了拉什，他认为，把这样亲近尼克松的人安排进国防部是有益的。基辛格认为，拉什是个“精明的活动家”，在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期间，他很好地显露出了自己的才能，能够完成白宫交付给他的一些复杂的任务。

№2293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中美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1972年1月26日)

优先发送

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告诉我们，他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恢复美越之间的秘密谈判(这在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之后得到了确认，我们在1972年1月25日得到了这个建议)，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作出反应。

关于这个问题，或许首先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

一方面，美国现在提出的“新的和平建议”(声称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应该秘密交换意见)，无论是其性质还是其形式都清楚地证明：从各方面来看，白宫还没有考虑在近期内就进行秘密会谈，他们现在提出这个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进行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在总统大选前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

另一方面，美国现在采取的战略是，更加倚重中国，他们明显希望，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美国能够同中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为此，美国人将会拿出他们的主要筹码，因为中国人非常希望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军，因此，华盛顿愿意以完全撤出美军来换取中国人的秘密支持，使美国，准确地说是使尼克松总统能够“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不给他在美国的总统选举运动中制造麻烦。为此，尼克松无疑也愿意秘密地对中国作出一定的补偿。

对于我们和越南人来说，美国人现在提出的这个建议(向我们提出，并请求我们把该建议转告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外交斗争。不能完全排除事态会按上述提出的方向发展。

现在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面临如下问题：对于美国 and 越南就越南问题进行接触，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改变我们的政策。

我们认为，白宫对我们发出的呼吁使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时机，在把

美国人提出的建议转告给越南人的时候，首先同他们讨论关于越南今后的政治和军事计划问题。

我们应该力求达到这一重要的目的，以便通过同越南人进行讨论，使北京在对美国所提的建议的实质立场上更加紧密地站在河内一边，防止中国人随后在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耍什么阴谋。

我们的战术目的或许可以是，向河内提出在三边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国)进行讨论，根据越南目前的局势，并考虑到尼克松对北京和莫斯科即将进行的访问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对尼克松政府施加压力。

或许，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战略，但是所有这些战略都应该是：尽可能地阻止白宫和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勾结起来，在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和苏联在越南的利益的同时，不要关上我们同华盛顿进行对话的大门。

因此，可以说，无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会作出如何答复，我们应该向河内转告尼克松提出的建议，应该向白宫转告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所提建议作出的反应，这些都将证明：华盛顿会认为，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仍然不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同美国的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要考虑到。

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所提建议，作出的答复的性质以及今后越南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以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写信的形式对美国提出的建议作出答复，同时也对美国总统前不久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作出答复。

A.多勃雷宁

报告：1972年1月25日多勃雷宁同志报告了他同基辛格举行的会谈。会谈中基辛格说，他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黑格将军向苏方通报了关于尼克松即将就越南问题发表的讲话，也向苏方转交了尼克松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尼克松总统即将发表的电视讲话的文本以及前不久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秘密提出的总的建议的最后文本。

No2293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苏高层会晤、中美会谈等(1972年1月28日)

1月28日，同基辛格举行了例行的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进行上次会谈的时候商定的。

1.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勃列日涅夫在1月17日的来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正在准备给勃列日涅夫回信，在最近的10天里，他都在准备这件事情，尼克松总统请求事先转告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同意勃列日涅夫来信中提出的主要思想：现在应该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5月份举行的高层会谈做好准备。

基辛格接着说，根据他的提议，他同尼克松总统就莫斯科高层会谈将要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会成为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成果)事先交换了意见。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应该及时准备好相关文件的文本，并委托基辛格代表美国方面做这件事情。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认为，关于高层会谈的最终文件应该是联合公报，这份联合公报应该包含在高层会晤中讨论的问题，特别应该包含就那些讨论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或许，关于一些问题，应该在高层会谈中准备单独的文件。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非常希望，5月份能够在莫斯科签署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协议，两国政府从去年5月就开始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为达成协议双方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基辛格说，此外，在莫斯科高层会谈期间，还可以就美苏两国关系的原则发表共同的声明(就像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精神一样，当然，两国在发表这一共同声明的时候，要考虑到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发展关系具有特别的性质；但是基辛格说，这是他最近才产生的想法，他事先说了出来，但是，关于这些想法，“尼克松总统还没有考虑成熟”)。

他们想得到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基辛格说，在他们从北京返回之后，就可以逐步开始着手准备两国高层会晤所要签署的文件的文本。

我答复基辛格说，对于美方阐述的上述原则，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应该把这些原则具体化，并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也答应愿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2.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请求我向苏联领导人转告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如下建议：在莫斯科高层会晤前夕，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即将中止，在此期间仍然可以努力就所要签署的协议的原则和框架达成秘密协议，待恢复谈判的时候双方代表团再就这些问题制定出方案，并且随后在5月份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

关于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的问题，基辛格又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说明，他的这些说明都是根据他在上次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三个方案谈论的，只是又确定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他在上次谈话中提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方案，要在具体的日期之前，比如，在今年上半年对进攻性武器的层次进行确定)。

他现在就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三个方案，但是还要秘密地进行讨论，他期待着我们对此问题作出答复。

基辛格指出了美苏两国现在在反导防御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一些分歧，他说，美国的专家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成员尼采在维也纳同苏联代表进行的讨论中提出的一个想法：如果苏联最近就反导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美国保留一个反导基地；苏联保留对莫斯科进行防御的基地，另外还要建立基地防御我们其他的战略导弹)能够允许美国在自己的洲际导弹基地部署安保反导体系以及哈尔德赛特反导体系的话，那么双方就能够在苏联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当然，苏联方面也有这样的机会。

基辛格说，如果尼采对苏联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会好好地考虑这些问题。基辛格突然说，美国最优秀的一些专家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安保反导系统，还是苏联类似的反导系统，它们的技

术目前都还不完善，还不能对它们的洲际导弹基地进行有效的防御。美国最近采取了一些行动，加强对反导发射井的保护，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洲际导弹防御体系的能力，尽管这还不能完全保证。

基辛格说，他现在还不是正式地提出这个建议，关于这个建议白宫还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的谈话反映的是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苏方代表的谈话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基辛格将会准备一份更加详细的建议，以便达成妥协。如果他们的理解有误的话，白宫将不会再考虑这些问题，尽管美方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现在认为，或许，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

基辛格说，简短地说，他请求非正式地答复他，他们对苏方立场的理解是否正确。他绕过美国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直接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考虑到美苏高层会谈的日期日益临近，双方寻求途径，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多了。

3.在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我再次提出了近东问题。

我问基辛格，什么时候他才能提出就近东问题进行谈判的时间表(他曾多次承诺，将向我提出就近东问题进行谈判的时间表，类似这些话是在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我说的)，以落实尼克松总统和葛罗米柯在去年秋天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回答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并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讨论，在果尔达·梅厄去年底对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实际情况仍然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起就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还要更大一些。

基辛格接着说，在果尔达·梅厄对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和他曾明确地对果尔达·梅厄说，在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于今年5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无论怎样都将会讨论近东问题，因此，他们想听听以色列对调解近东问题的具体想法。关于这个问题果尔达·梅厄非常坦诚地说，现实的逻辑是，无论以色列是否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莫斯科进行的高层会谈中必定都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以色列总理也不怀疑。因此，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她将秘密地向白宫阐述自己对调解近代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因此，他们同果尔达·梅厄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且，基辛格也使她明白，美国会考虑满足她提出的关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其中包括提供幻影飞机的请求)，白宫认为，她现在不会反对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讨论近东问题，而是将会认为，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具体讨论的将主要是关于就签署中期协议和“苏伊士方案”达成协议的问题，该协议同最终调解近东问题密切相关。果尔达·梅厄答应就这个问题向华盛顿提出更加详细的建议。

现在西斯科代表国会正在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但是西斯科(和罗杰斯)还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关于今后同莫斯科进行交换意见的问题，而他们只是在准备恢复国会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中介作用。特拉维夫曾经承诺的、所要提出的具体的建议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这些建议。

基辛格说，他们没有期望西斯科和罗杰斯举行的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自己还不愿进行干涉，这就像在就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一样，他不愿干涉国会的“有效工作”，而且，国会也没有解释进行这次谈判的原因，这就使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产生了怀疑，并且他们想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经尼克松总统同意，他基辛格愿意给国会一个机会，继续“尝试着”进行谈判，而同时他将同我们秘密地进行非常务实的会谈，这些会谈是有望最终达成协议的，尽管他现在还不能完全保证最终达成协议。在进行这些会谈的时候，他将考虑到果尔达·梅厄直接向白宫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关于这些想法和建议国会将不会完全知晓(国会知道的只是以色列初步提出的建议，而不会知道以色列的后备方案和计划)。

我提醒基辛格说，葛罗米柯在同尼克松总统和同他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曾明确地强调说，中期解决方案和最终调解方案之间必须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苏联和美国之间就不能达成协议。目前基辛格谈论的只是关于中期解决方案。我问基辛格：根据他的安排，苏美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详细地讨论关于最终调解方案的问题？莫斯科高层会谈在5月份就要举行了，毕竟，在这次会谈中不可能只讨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中期方案，而不讨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最终方案。

基辛格回答说，以色列总理在白宫同我们讨论近东问题的时候，她所谈论的确实主要是关于中期方案的问题，她明显不愿意讨论关于近东

问题的最终调解方案，尽管就最终调解方案问题她仍然谈论了一些看法。基辛格接着说，但是，尼克松总统和他本人没有坚持这个问题，以便能够找到途径就近东问题达成协议，并最终解决近东问题(在葛罗米柯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以便不给美国亲以色列的势力以口实来制造麻烦，反对以此来解决近东问题。同时，他们也在尽力通过果尔达·梅厄搞清楚以色列政府对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立场，因为他(基辛格)了解他同苏联外长所达成的协议的实质。

基辛格继续说，同时，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萨达特总统很快将会到莫斯科进行访问。他想知道，莫斯科是否将会同萨达特总统讨论关于葛罗米柯同他基辛格在华盛顿会谈时提出的那些想法，让他基辛格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基辛格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会自己决定怎么做，但是白宫现在仍然还有些怀疑：在必须保守他们所谈论的那些话的秘密之前，埃及人能否向报刊保守这些秘密。因此，美方认为，在苏联和美国基本上达成协议之前，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在两国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基辛格接着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苏联领导人信任萨达特，现在就把他们所谈论的那些话全部都告诉了他，那么白宫也不会特别反对；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话，他们只是请求在萨达特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就近东问题达成中期协议的问题，关于“苏伊士方案”问题。基辛格说，在同苏方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时候，埃及总统可能会谈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埃及对今后讨论中期方案的态度问题，他们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方案的态度和反应。

从逻辑上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的态度将有三种可能。如果苏联领导人想知道白宫对萨达特在这三种情况下的态度所采取的立场的话，那他基辛格想提出一些建议。

1.萨达特可能会说，他不愿意再借助美国的帮助讨论“苏伊士方案”。

白宫将不会特别反对埃及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因为埃及方面的这个决定只是意味着，要中断的谈判只是国务院(西斯科和罗杰斯)再次积

极准备进行的那些谈判。而他们白宫方面将会通过秘密渠道同莫斯科继续讨论“苏伊士方案”，正如协议中所规定的那样。

2.萨达特可能会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他是否应该通过美国继续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谈判。

当然，苏联领导人将会自己决定，对萨达特作出什么样的答复。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白宫只是想提出如下看法：可以向萨达特建议，让他不要对举行新的谈判的建议采取坚定的态度，在答复美国的时候同意继续进行谈判，但是可以反问美国国务卿，在就“苏伊士方案”继续进行谈判的时候，美方将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并以此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美国所提的具体建议中具有什么新的内容？然后再决定萨达特是否愿意进行新的谈判。

3.如果萨达特说，他仍然愿意继续进行谈判，那么白宫当然是不会反对的。

基辛格再次强调说，如果局势的发展是向着上述三种方案中任何一个方案指定的方向发展的，那么美国都不会反对。

(在作出上述建议的时候，基辛格明显考虑的是关于宣传方面的问题：应该使开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便使他们对社会舆论有所交代。)

基辛格的谈话仍然使人感觉到，由于一些原因，尼克松和基辛格现在还不是非常急于对调解近东问题的最终方案进行具体的讨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将会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拖到莫斯科高层会谈临近的时候再进行。

如果从基辛格上述所说的“安排表”进行判断，在就中期协议问题或者就“苏伊士方案”进行的讨论中，美国国务院现在实际上能够向埃及人提出的建议很少，因为，如果他们也向以色列作出让步的话，那么，白宫就打算通过秘密渠道同我们进行交易。

关于萨达特对中期协议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基辛格提出了上述三种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国内斗争，各派之间企图互相拆台，基辛格和国务卿现在的关系就是这样。近东问题同美国国内的选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白宫的行为非常谨慎，比他们在就西柏林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还要谨慎。从中还可以看出，基辛格在近东问题上的优

柔寡断。总的来说，确定和实施美国关于近东问题的时间表绝非是他基辛格一个人所能做到的。

还有一种情况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就是从总体上说，我们觉得，白宫现在对近东事务不太着急，或许，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仍然没有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如果再发生新的军事冲突的话，以色列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尼克松是知道我们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想法的，知道我们为协调这个问题将要采取的方法，他也知道，我们对近东地区军事局势的态度是负责任的，不会允许这一地区现在爆发新的军事冲突，这就使得他更有理由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近东问题上，使得他为了自己的选举运动而不愿破坏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不愿破坏他同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政策的那些较具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萨达特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推动白宫更加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近东问题的话，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同华盛顿进行接触的时候，使和平解决近东问题再次被重视起来。

为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两方面同时采取行动，并协调这些行动。

——一方面，在我们今后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的时候，向尼克松转达我们对调解近东问题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我们以前提出的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制定出来)，以便使白宫同我们就这个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修改意见(关于这个修改意见的内容，大使馆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进行更加具体的会谈。

——另一方面，以相应的方式向尼克松展示，以色列和美国在近东事务上并非总是那么一帆风顺，继续拖延近东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加快事态向不良的方向发展，其中包括可能会加强我们在近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了显示这一点，看起来较好的做法是同萨达特达成协议，好像苏联正积极行动起来，以便在埃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或者其他类似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众所周知，美国人现在明显加强了行动，增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正是他们所担忧的。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某种途径，使白宫知道我们所要采取的上述行动的意图，这将有助于推动白宫加快同我们就近东问题进行秘密会谈，并且，进行这些秘密会谈是双方都已经商定了的。

同时，还应该对基辛格施加压力，以便就近东问题开展更加具体的对话，但是，在同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苏联对有关近东的所有问题都显得非常关切。

4.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尼克松总统打算在2月16—17日从华盛顿飞赴北京，中途在夏威夷群岛停留2—3天，在关岛停留一天，以便适应巨大的时差，集中精神进行即将举行的谈判，并抛开日常繁琐的事务。

基辛格说，现在正在同中国人确定关于会谈记录的细节问题，双方已经商定，中国北京政府将为美国总统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而尼克松总统随后也将为中国领导人举办答谢宴会。基辛格说，但是，双方还没有商定这些宴会是否纯粹限于在美国和中国双边之间进行(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还是邀请驻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也参加这些宴会。现在由中国方面来决定这个问题。中国方面要首先举办宴会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白宫同意任何一种解决方案。

应该注意基辛格的如下谈话：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最后文件，他们和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文件不像是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这次访问的成果，也不像是关于尼克松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而发布的共同声明。根据基辛格的谈话，尽管关于这次访问的最后文件的一些细节问题仍然还没有解决，但是其主要内容已经商定。基辛格接着说，这次访问的最后文件事实上回答了报刊现在提到的许多问题，也回答了“那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公开回答的问题”：由于最近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对于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可能取得的结果，尼克松总统现在是否担心？

基辛格说，关于这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是不愿意靠运气，也不喜欢冒险的，但是他事先也不知道他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关于这次访问所要取得的成果已经有了最低的保证”。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所要签署的最终文件目前还没有涉及越南问题，但是如果这份文件中提到了越南问题，那么从各方

面看来，这也将是简短的几句话，因为美国和中国很难就这个问题协商一致，发表一份共同声明。但是，双方当然会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实质，尽管中国人声称，越南问题最终应该由美国和河内解决。

基辛格补充说，美国和中国发表的共同声明或许由尼克松和毛泽东签署，但是这还没有最后商定(这份共同声明或许也将是没有署名)。根据周恩来向白宫通报的信息，毛泽东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美国人对于这两种方案都是同意的。

5.基辛格再次详细地谈论了美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但是他所说的这些话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他本人和黑格近来就越南问题同我们所谈论的那些话。

或许，应该注意的只是基辛格的如下谈话：无论如何，白宫都会在今年从南越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这只是为了让北越释放所有的美国战俘，关于在东南亚停火的问题，美国不会再提出什么条件，但是应该明白的是，美国在商定的期限内撤军，在此期间，河内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进攻行动(这句话暗指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北越不能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再次重申了我们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以及我们对调解越南问题的途径的看法。

6.基辛格说，美国新任贸易部部长彼得森现在正在更加具体地对苏美贸易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彼得森现在在白宫是“经济事务上的基辛格”。彼得森是亲近尼克松的人，因此他将比斯坦斯拥有更大的权力。根据尼克松总统的个人请求，斯坦斯将要做的工作是：为尼克松进行的总统选举募集资金(通过大商人募集，他同大商人们有着很好的关系)。

7.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的机会，基辛格也秘密地作了评价。

基辛格就这个问题作出的评价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现在比较有胜算机会的是麦斯基参议员。汉弗莱次之。汉弗莱已经为他进行总统选举募集了大约20亿美元(这些钱主要来自他的有钱的朋友)。但是尼克松个人认为，汉弗莱在政治上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无论怎样，尼克松都“绝对相信”，如果他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

他一定能够打败汉弗莱。

同麦斯基进行的竞争将会比较困难。麦斯基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而主要的是，“他在电视上的形象较好”，这在美国的国内条件下非常重要。麦斯基的弱点是：在对外事务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尼克松本人相信他会“战胜”麦斯基，尽管这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尼克松再次竞选的主要困难在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和失业问题。但是，他希望今年年中之前，关于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会有所好转。

白宫认为，肯尼迪确实已经决定今年不担任候选人。而至于其他的候选人(麦戈文、杰克逊、林赛、哈特基等人)，尼克松将“不会把他们视为对手”。

我同基辛格商定在2月4日星期五我们再举行下次例行会谈。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6, п.418, д.5, л.22-35

№2293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及印象(1972年3月1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今天，3月1日在白宫同基辛格举行了会谈。

1.基辛格援引在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访问期间我们通过黑格将军向美国方面转达的通报说，尼克松总统请求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转达他个人的一个保证，他完全同意苏方的如下主要立场：如果双方都确实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晤中，建设性地解决两国存在的问题，那么，他相信这次会晤将会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一次会晤。

然后，基辛格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仍然是他上述所表明立场。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的最后，基辛格说，下周尼克松总统将会对我们发出的呼吁作出书面的答复。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中，我再次从总体上向基辛格阐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强调说，莫斯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2.基辛格谈论了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我故意不提出关于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这个问题，尽管从各方面看来，基辛格在期待着我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基辛格忍不住说，或许我们希望知道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

我回答说，在他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前，曾主动对我们说过，在他返回之后将把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告诉我们。如果他现在就这个问题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会非常认真地听他的这些谈话。

在基辛格谈完这个问题之后，可以从中看出，基辛格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很不连贯，并且总是在不断地离题和重复，他就这个问题谈论的主要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尽可能用他实际上所说的话进行概括)。

在就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谈话的时候基辛格说，报刊报道说，美国好像对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条件下就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这种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基辛格说，首先，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所声明的只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从台湾撤出全部的美军。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在同中国人进行会谈的时候都没有提出关于我们完全撤军的具体日期。

第二，尼克松曾明确告知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方面事实上是把台湾问题的解决同其他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同越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尽管在最终发布的联合公报中没有提到这种联系”。这种联系的意思不是说中国人应该帮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而是说：只要越南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东南亚的局势仍然紧张，那么美国将“很难从台湾撤出美军”。

基辛格总结说，简短地说，我们公开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同时尼克松也非常明确地说，这个问题是同东南亚局势的总体改善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也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在条约上的义务仍然有效。

在谈到东南亚的局势的时候，基辛格说，经过同中国人进行的长时

间的讨论，现在或许可以说，两国在东南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共识：今后关于东南亚地区问题的解决应该在该地区相关国家的政府逐步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而首先应该通过使他们中立化来解决问题。

基辛格接着说，中国人不反对东南亚局势向这方面发展，他们非常确信这一点。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尽力使中国人明白，如果中国试图侵略东南亚地区的某个国家，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到时候中国人将不得不“再次同美国发生冲突”。

基辛格再次说，但是美方同意使该地区中立化。或许，今后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尝试着就东南亚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当然，苏联应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苏联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在东南亚地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基辛格还说，如果今后能够就东南亚的中立化问题达成协议那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就这个话题再深入谈论下去。

关于越南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同中国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其中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用于双方相互阐述和解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谈判中，尼克松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我们向中国人阐述的立场都曾经详细地告诉过苏联方面。”

基辛格说，中国人的立场也没有明显超出北京曾公开阐述过的那些立场的范围：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关于中美双方就越南问题在北京进行的讨论，从基辛格的谈话中或许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因素。基辛格说，他们最后明确地对中国人说，“正如在此之前对您所说的一样”，如果北越现在(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能够采取一定的灵活政策，那么在越南局势今后的发展中将不会遭到美国方面的重大干涉，就能够使北越人在两年、最多三年的时间内事实上得到南越，北越现在坚持要从美国得到南越，但是尼克松总统现在还不能让他们得到。基辛格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对河内也没有好处，这只会使冲突持续下去。

美方还对中国人说，一旦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整个局势的发展都有利于他再次当选总统)，他将履行对北越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否则北越将不得不同美国再对抗四年，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在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使越南局势继续紧张下去未必符合相关各

方的利益。最好是“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说，他们曾告诉中国人，他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话都转告给河内。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承诺，但是他们相信，中国人是会把这些话转告给河内的。

从基辛格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可以看出，美国坚持把越南问题看作是他们在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基辛格只是说，或许可以说，双方都同意朝着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关于朝鲜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

基辛格说，中国人想从他们那里得知关于美苏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日程问题。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告诉中国人说，他希望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哪怕是签署一份协定，同时，他还希望能够解决贸易问题。尼克松也向中国人指出，他希望在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时候能够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达成最终的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然而，关于美苏双方在莫斯科高层会晤中可能就调解近东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中国人完全没有提到，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就近东问题举行的会谈是非常秘密地进行的。

在谈到关于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的时候，基辛格说，关于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中国人没有公开说出什么消极性的看法，但是关于成立欧洲经济联盟这个问题，他们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生活中的“一件好事”，他们也不反对让美国人把他们的这些看法转告给美国在西欧的盟国。

基辛格说，关于近东问题中国人的立场仍然是：强烈要求满足巴勒斯坦民族的要求。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没有同中国人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核能力同美国的核能力“没法相比”（根据美国谍报机构各方面的情报以及美国专家的评估，在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内，即使是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中国的核能力都不会对

美国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

基辛格接着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最新情报，中国核导弹计划的实施仍然非常缓慢(其中的原因美国人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比美国最初作出的预测要落后1—2年的时间。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主动说，报刊发表了许多“极具轰动效应的报道”，报道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所有这些报道都是不合实际的。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谈论了很多。

关于这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如下：

——根据美国从各方面作出的评估和进行的观察，要对抗苏联的话，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在中国同苏联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答应支持中国，试图推动中国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完全是疯了”，更不要说中国了。基辛格说，他们知道，一旦同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那么苏联将不会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进行这场战争，而是会使用他现有的一切强大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早就给尼克松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答案：如果认为，一旦苏联同中国真正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苏联“必将陷入中国而不能自拔”，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所有这些看法都没有充分的依据。如果苏联同中国确实发生了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中国必将被打败。可以想一下，中国领导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尽管中国人当然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告诉他们。

——基辛格还说，美国也没有承诺对中国进行重大的经济或财政上的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可能会极大地增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前不久马尔罗在同尼克松进行会谈的时候，法国曾强烈要求向他们提供这种援助，但是我们在北京就没有谈到这种援助。基辛格说，关于这个问题，只要对今后事态的发展进行观察，苏联很容易就会相信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是隐瞒不了的。

——确实同中国人讨论了关于发展贸易的问题，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外汇能力，在今后的几年内，中美贸易的总量将会是很小的，是不能同美苏之间的贸易量相比的，特别是在举行莫斯科高层会晤之后，这种贸易量就更加不能相比了。

——他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争论，这是苏联和

中国之间的重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仅不会给中国提供什么帮助，甚至还会完全相反。在中国领导人同“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尼克松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现在中国人将很难像以前那样对苏联进行指责了。

基辛格说，无论怎样，在尼克松总统今后的任期内(也就是还有5年时间)，即使美国还会希望一味地支持中国反对苏联，那么某种“相互勾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勾结”的效果也将是非常有限的。基辛格自问道：“而且在最近几年中国人能够做些什么来对抗苏联呢？”从各方面看来，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联合国辱骂你们，并利用其他类似的“机会”来刺激你们。或许，他们“将继续在边界问题上同你们争论”。

基辛格说，在北京的时候中国人曾向他们抱怨说，苏联在苏中边界集结了上百万的军队。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表达了对苏联这一意图的担心。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因为这涉及的是苏中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是“不愿意进行干涉的”。但是，总的来说，尼克松和他基辛格都有这么一种感觉：毛泽东和周恩来真的都非常担心(不是为了宣传)，担心苏联会针对他们采取一些出乎意料的行动。

根据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人的理解”，中国人的看法是：中苏即使在边界地区发生“偶然的冲突”，这也将会“直接引起”苏联方面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从这方面来说，苏联人的举动将很难预测。而在中国政治领导人看来，苏联的军事学说是：一旦形成了严峻的局势，就不应该使自己卷入到持久的、小规模冲突中，使未来不能确定，而是应该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然后再果断地把这种行动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感觉这是在暗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还说，中国人还向他们提到了在达曼斯基岛发生的那场冲突，他们说，在进行这场冲突的时候，苏联人对他们“野蛮地使用了”某种先进的武器，但是，基辛格说，他们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关于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印象，基辛格说，中国全体国民的纪律性给尼克松总统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他们认为，毛泽东现在仍然还控制着中国的军队、国家安全、党的事务以及国家机构，在中国仍然处于最

高地位，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在进行直接会谈的时候，毛泽东的个性也给尼克松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尽管可以看出，毛泽东现在明显正在衰老，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清晰。毛泽东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不像他们预先设想的那样：毛是一位激进的革命领袖，而是哲学家和实用主义者的完美结合，在推行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采取那些会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行动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

周恩来主管中国国内的实际工作以及中国的涉外事务；尽管在各种情况下，周恩来都强调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他们(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的印象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周恩来在很多方面都是自行其是，善于对毛泽东总的方针进行解释。周恩来现在是中国的“总管家”。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他所说的这些话都只是为了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他请求不要把这些信息告诉给其他人，尤其是外国人。

当然，关于同中国人举行的会谈，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应该从这一立场出发来看待他所说的这些话。白宫愿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并且要求我们对这些话进行保密，从这方面来说，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也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进行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也举出了基辛格所说的许多原话。

3.在会谈过程中，我对苏美双方就莫斯科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相关各个问题而举行的会谈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

基辛格作出的答复的主要意思是，在他们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现在，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本人都能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晤上，在今后2个半月的时间内，尼克松总统工作日程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为这次会晤做准备。基辛格向我保证说，美方现在加强了对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在更加具体地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同基辛格的下一次会谈将在3月9日星期四进行。

基辛格说，同我举行的这次会谈结束之后，他马上就要前往佛罗里达，尼克松总统今天早上已经到了他在佛罗里达的官邸，以便在对中

进行访问之后休息一下，并处理一下在他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期间搁置下的一些事务。基辛格将在佛罗里达待到星期天。

令人非常好奇的是，在这些天里，罗杰斯国务卿会一直待在华盛顿，他将向“友好国家”的大使们通报关于同中国举行的谈判。他作出这种安排的原因最初是由于日本大使的询问，日本大使已经正式请求美国政府把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成果向他们进行通报。

戏剧性的事情还在于，大家都知道，罗杰斯没有参加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谈判，基辛格是真正知道这些谈判所有细节的人，但是现在基辛格却悄然离去，前往佛罗里达去了。

4.关于美国同孟加拉国的关系问题。基辛格说，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月内他们将会正式承认孟加拉国。他们打算向孟加拉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5.关于美国和印巴冲突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说，他们打算在这一地区采取“平衡”的政策。他们将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上，尽管这会招致巴基斯坦的严重不满。

基辛格接下来的谈话事实上是承认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同像印度这样一个亚洲国家产生了对抗。白宫打算改正这一错误，并希望，“经过两年之后，能够把美国同印度的关系恢复到印度同苏联的关系那样的程度”。

总体上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正在对他们印度实行的政策重新进行评价。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不希望把印度“推到”苏联一边，而是在尽一切努力把印度争取到自己一边，或者无论怎样使印度在苏美关系中保持中立，并同印度的一些亲美国的实业界人士更加积极地发展经济关系，美国推行的亲巴勒斯坦的政策阻碍了这种关系的发展。

6.关于近东事务。基辛格再次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依照他同葛罗米柯谈话中所提出的精神，同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讨论关于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方案。

同时他也抱怨了他个人所面临的一些特殊的困难。在就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可以依靠拉什大使和勃兰特·巴尔参赞，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与柏林谈判不同，现在他基辛格事实上只能靠自己。他不能委托

任何人来准备某一具体的建议，因为那些国会议员，包括西斯科及其领导的有经验的机关完全都不了解情况，而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向果尔达·梅厄寻求帮助简直是不现实的事情。

因此基辛格向我们问道，能否在他同苏联外长进行会谈的基础上，提供给他一个关于今后会谈的大致轮廓，该轮廓可以成为今后同我们进行秘密谈判的基础，而最终或许还可以为莫斯科高层会谈做好具体的准备，以便使这次会谈取得成果。

我答复基辛格说，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提出一个关于今后会谈的轮廓，而是白宫要明确答复如下重要问题：美国承认1967年的边界，并采取行动使以色列在商定的期限内把所有的军队都从他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我问基辛格：我能否向莫斯科报告说，白宫明确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长时间的思索之后，基辛格说，实际上是这样的，但在形式上还有一些困难。基辛格对他所说的这些话进行了解释，他说，他相信，以色列最终会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上的顾虑，白宫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总的来说，以色列仍然会接受1967年的实际边界，“但是将对这些边界做一些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不会引起埃及人的强烈反对”，但是，由于以色列要在1973年进行选举，让他们再承认1967年的实际边界，他们未必会接受。此外，“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以色列政府将会坚持以色列在沙姆沙伊赫和“距1967年边界不远的”一些战略据点的“存在”（在“完全承认埃及对这些战略据点保持主权的条件下”）。

我回答基辛格说，应该讨论的是关于以色列撤出所有的军队这个问题，而不是让他们以各种借口把部分军队留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关于以色列的“安全考虑”，那么他们不应该通过占领领土来获得安全，而应该通过公正地最终解决近东问题来得到安全。

我说，关于苏联方面的立场，他基辛格无疑是非常清楚的。当苏联外长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苏联的立场，而且他基辛格也曾经参加了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会谈。

基辛格确认了我说的话，并且说道，他应该对整个近东问题再好好考虑考虑，并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谈，然后再制定今后的方针。或许，

2—3周之后，他将准备就整个近东问题再次同我交换意见。

我对基辛格的答复是，离莫斯科高层会晤剩下的时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或许，我们应该加快速度，以便为莫斯科高层会晤达成相关的具体的协议奠定基础。

基辛格说，他明白这一点。

7.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请求我们尽快答复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关于就双边关系中的各个问题进行的谈判，我们是愿意继续进行以前已经开始进行的谈判，还是愿意开始新的谈判。这一建议是在勃列日涅夫2月15日来信的基础上，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向我们提出来的。基辛格说，如果我们不能更早地答复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请我们尽可能在3月9日进行下次例行会谈之前答复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认为，应该对举行这种双边会谈予以肯定的答复，特别就那些我们较感兴趣的问题(贸易问题、海运问题等)举行的双边会谈。这样将会为高层会晤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会使这次会晤转入实践轨道，并且可以使美国人也加入到这些具体的准备工作中来。

8.在同基辛格就其他问题举行的会谈中，我们也简单地讨论了关于租借物资的归还问题。

我问道，关于就租借物资的归还问题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美国方面将提出什么建议。他基辛格提议，把这个问题委托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比姆来做，而美国国会提议，在华盛顿举行谈判。美国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基辛格说，从原则上来说，白宫愿意接受上述任何一种方案。他本人提议由比姆大使来做这件事情，这只是由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没有为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承担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工作，但是后来国会认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无须“卷入”这种业务上的谈判，因此他们就提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次谈判。

因此美方就正式通过了上述最新的建议：请(苏方)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举行谈判。这一建议通过国会转达给了我们，并且现在仍然有效。

№22936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估(1972年3月8日)

急电

现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显然成了美国国内轰动一时的事情，美国人对这件事情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白宫、华盛顿和新闻报刊都已经开始忙于其他的事情，首先是开始忙于国内政治问题了。本月，美国舆论的注意力将会越来越被吸引到关于在一些州进行初选这个问题上来，在这些州进行的初选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舆论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5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晤上。对于中国问题，舆论界的态度比较明确，没有太多的争论。

在通过对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围绕这些成果形成的总的局势现在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这次访问使美国和中国今后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持续了20年的军事政治对抗关系转变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随后，两国关系将会得到改善，两国之间的接触将会加强(尽管还没有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这种转变已经被两国领导人确定下来。华盛顿官方甚至已经声称，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在关于印巴半岛问题上。

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面临的一些主要的具体的问题，那么，从各方面看来就是，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中美双方曾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相互讨价还价，不过，争论的结果最多是，双方都愿意寻求途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仍然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尼克松这次访问的成果是不大的。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使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也就是说华盛顿抛弃了他以前曾提出的关于“两个中国”的构想。看起来这是美国向中国作出的最大让步，但是，在中美谈判中，美国并没有承认那个最为实质性的问题，^[14] 关于这个实质性的问题，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公开承认许多年了。关于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美国

从台湾直接撤军的问题，美国方面则把这个问题同关于解决越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美国同蒋介石在1955年签署的援助协议仍然有效。

根据现在所掌握的情报，在北京，中美就越南问题确实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越南问题对于两国来说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中美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配合”美国，使美国从越南撤出军队。我们现在还没有相关材料，据此可以证明中美在北京在越南问题上进行直接的勾结。

中美在贸易领域以及在加强科学交流和记者之间的接触等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他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使中国处于同苏联同等或者接近苏联的地位。但是未必有理由可以认为，中美在这些领域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其中包括在贸易领域。最近几年，中国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外汇基础来有效地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并且美国仍然有一些限制性的法规(包括在对外贷款和对外贸易方面，其中包括对那些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如果中国今后在对美关系中“表现良好”的话(这实际上就是华盛顿提出的条件)，那么中国将会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捞取不少好处。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产生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这次访问使美国人的对华心理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美国的社会舆论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好感，并且这种好感还在增长。尼克松今后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因素为自己的总统竞选服务，而这一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积极而重要的，他们将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利用这一因素实现他们的目的(首先实现他们反苏的目的)。

因此，尽管在事实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的谈判中确实协调了他们的对外政策，但是这次访问的结果可以被明显地感觉到，或许就是，这次访问为整个亚洲、包括远东地区新的战略力量的分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当然希望能够利用这一重要的进程(“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游戏”——这句话现在在美国的政治界很流行)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另一深远的目的是，推动北京今后推行反苏政策，并使北京把这一政策固定下来，以此来“束缚”苏联的亚洲政策，甚至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

同时，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所更加关切的，这就是：美国和中国进行的游戏会使美国丧失许多盟国，首先是丧失日本的信任，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美国的威望，而这反过来也会限制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根据我们的观察，无论是在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还是在这次访问之后，华盛顿都没有考虑，同中国在军事上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并以防万一。白宫仍然在尽力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应该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很深的、难以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美国领导层和中国领导人对对方意图的暗自担心，担心对方会统治亚洲，随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追求世界霸权。美国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只是出于反苏的战略目的现在才愿意接近美国。美国人也明白，这种接近是不会长久的，华盛顿也认为，他们现在对中国政策的基础是北京领导人的反苏倾向，这种政策至少在整个70年代都能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

第二，关于美中关系的这种转折以及两国达成的协议，美国政府成员私下里和公开地都有许多议论，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

首先，中国国内局势今后的发展。尽管现在周恩来(他是中国推行的亲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的地位非常牢固，但是中国总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国内斗争的结果现在看起来仍不十分确定。

其次，直接参与这次北京会谈的领导人很快就会退出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尼克松无论怎样都会在1976年之后退出政治舞台，由于年龄因素，毛泽东最多也到这个时候退出政治舞台。在此之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将会怎样呢？这一点还不清楚。

再次，今后美国和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将会怎样，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由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是否将会紧张？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上是否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成为一极？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是极其复杂的关系(在苏美矛盾中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扮演中立的角色)？在这些相互关系中会有斗争，同时有可能就个别问题达成协议。

第三，华盛顿当然很清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在国际舞台上使

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力量开始进行新的分配，这当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关注。他们甚至也愿意利用这一点(诚然，他们将会比较谨慎)来对我们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以便在苏美关系中捞取好处。因此，很明显，关于尼克松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白宫现在尽力给人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同时又使人觉得这次会谈非常重要。

同时，尼克松及其亲信都非常清楚，上述所指出的、国际舞台上战略力量的重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反制措施以及其他行动。华盛顿在利用北京领导人的反苏倾向的同时，也愿意同我们达成一定的协议。美国政府也不隐瞒，他们同苏联进行的谈判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因为解决世界大多数问题的关键仍然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白宫仍然明白，至少在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最终要比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如果他们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的话，对于他们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对美国总统选举斗争的影响和意义，他们也不愿作出过高的评价。尼克松明白，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西欧的大部分盟国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以牺牲美苏关系为代价的。

第四，因此上述所阐述各项内容对于即将在5月份举行的苏美莫斯科高层会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件事情已经开始迫使白宫在打中国牌时有所节制，并经常“回头看看”苏联的反应，白宫今后仍然还会这么做；尼克松显然在避免把自己同某种责任或者同某些讲话联系起来，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责任或者讲话会事先导致他随后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不会顺利。在“北京之行”以后，尼克松现在显然也在尽力为自己辩护，尽力向我们证明，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就在心理上迫使尼克松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之前采取守势，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因此，我们实行如下政策是完全正确和适宜的：今后在为举行莫斯科高层会谈而做的实际准备工作中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对我们的作出让步。根据相关指示，对于白宫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否愿意就诸如贸易问题、海运问题、租借物资偿还问题、太空领域的合作等双边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今后几天我们将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此外，可以预料，就这些双边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将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对美国人、国际舆论留下一种较好的印象，甚至可以抵消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产生的影响，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是：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并且，以美中联合公报的形式把这一协议确定了下来，但是该协议模糊不清，并且具有概括的性质。这也将会使中国人警觉起来，而北京对美国的最终目的产生的这种怀疑对我们将是不无裨益的。

当然，最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是：通过秘密渠道同美国人建设性地讨论问题，甚至在莫斯科高层会晤中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这些重大的国际问题是：近东问题、欧洲问题(包括对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提供保障的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以及两国高层会晤将要签署的最终文件的文本(联合公报或者是宣言)。

在对高层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为此，我们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自己的大众媒体)，以便通过这种社会舆论，推动美国政府马上就同我们一起解决一些重要的双边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在美国进行的宣传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由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整体上来说，这是个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或许，“关于北京的话题”应该逐步让位于“关于莫斯科的话题”，也就是说让位于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的话题。当然，在相关问题上还应该对美国继续进行批评。但是，如果尼克松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那么我们也要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对两国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进行宣传这个问题，大使馆今后将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对上述所谈问题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可以果断地说，对苏美莫斯科高层会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使这次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仅会让我们在解决我们同美国关系中产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获得利益，而且还可以非常有效地削弱美国和中国开展的游戏，这个游戏始于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A.多勃雷宁

No2293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1972年3月9日)

3月9日同基辛格在我们大使馆举行了例行的会谈。

第一，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转交了经尼克松批准的美方复函的文本，该复函对我们向尼克松总统作出的通报给予了答复，我们的通报是尼克松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于2月23日通过将军转交给他的。

以下是尼克松复函的文本：

“苏联于1972年2月23日向白宫转交了一份通报，当时尼克松总统不在白宫，在收到该通报后，尼克松总统对其内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尼克松总统想向勃列日涅夫先生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保证，他完全同意苏方在通报中所阐述的立场，即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方都应该真正地努力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看法在他写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信件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尼克松总统仍然完全坚持这些看法。

他把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看作是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建立在新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关于美国前不久对苏联发表的声明，苏联方面进行了一些报道，对于苏方的报道提出的一些意见，尼克松总统指出，自从双方都宣布关于即将举行莫斯科高层会晤以来，苏联权威机构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批评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现实状况，毫不夸张地说，一方不一定要接受对方的某些表述。尼克松总统仍然相信，真诚、务实是建立持久而良好的苏美关系的牢固基础。

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明白我们两国关系现在所处的阶段：双方都同意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重大谈判，事实上，通过这种途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尼克松总统希望，在这些领域取得的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其他领域。正如苏方在通报中所说的，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为此，对于现在就莫斯科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而进行的谈判，尼克

松总统非常关切，并且他将继续关注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苏联报刊发表了一些评论，对于这些评论，尼克松总统想再次确认，除了是为了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之外，他们在中国公开地或私下里所说的那些话都没有其他的目的。尼克松总统认为，这一目的同苏美关系的改善完全没有冲突，同我们两国都希望全世界都取得和平的总目的也是一致的。

尼克松总统期待着今后同勃列日涅夫先生继续交换意见，也期待着同勃列日涅夫先生在5月份即将举行的会谈。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次会谈将会展示，两国决心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进行合作，来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我说，我将会把尼克松总统的这份通报转达莫斯科。

第二，关于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前夕我们对这次会谈所作的准备工作问题，关于会谈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苏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向基辛格转交了苏方作出的答复。

基辛格对我们这一建设性的答复表示满意。他说，他将把我们的答复向尼克松总统进行报告，之后，关于今后准备同我们举行的谈判相关问题，白宫将对美国的相关部门下达相关的指示。

基辛格说，大约两天之后将会另行通知我，根据美国国会和对外贸易部的政策，我们有哪些答复将会被正式转达，以便开始进行会谈，或者是继续进行以前已经开始的谈判。到时候，美国的这些机构将会得到白宫就这些问题下达的相关指示。

基辛格再次确认了他以前受尼克松的委托就双边关系中的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所说的那些话。

第三，在这次会谈中谈论了关于5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的一些组织工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作了如下通报。

几天前，他们收到了波兰政府发来的一份紧急信件，邀请尼克松总统在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或者在进行这次访问之后对华沙进行访问。白宫还收到了一些北约国家的信件(目前还是非正式的)，邀请尼克松总统在对莫斯科访问之后马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例行会议，并

就他对莫斯科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进行通报。

基辛格说，但是，尼克松总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例行会议会被苏联误解。因此，尼克松总统不打算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像往常一样，派罗杰斯国务卿参加这次会议。在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结束之后，罗杰斯将会去参加这次会议。

现在，尼克松总统也不打算到华沙访问。

基辛格继续说，但是，在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尼克松总统想马上访问德黑兰(这意味着他也收到了伊朗国王的特别邀请)，然后从德黑兰直接飞回美国。

基辛格特别强调，现在他们请求，不要把尼克松总统的这些计划告诉任何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因为除了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以外，关于这些计划现在谁也不知道。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总统在苏联的访问计划，尼克松总统表示，除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他希望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第三个城市介于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其中的任何一座城市。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具体地提到了第比利斯和埃里温，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安排的是其他的城市，他们也会同意。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在苏联访问期间所作的安排如下：

——在莫斯科停留几天；

——在列宁格勒停留一天(过一夜)；

——返回莫斯科结束谈判；

——离开莫斯科，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用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访问苏联的另一个城市。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方面告知，关于他5月份对苏联进行的访问，这样的日程安排苏方是否同意。

第四，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所要签署的文件的形式及其内容，基辛格说，他们认为，或许在联合公报中除了写入和平共处原则之外，还应

该写入更多的内容(正如美中联合公报一样)。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也愿意考虑我们提出的其他任何想法。

关于勃列日涅夫对巴黎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采取了苏法共同宣言的形式,或许,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形式,当然,也要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特点。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加详细地进行讨论。

关于5月莫斯科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以什么形式公布这个问题,他们白宫认为,根据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的进程,逐步公开这些成果较为适宜,也就是说,关于苏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应该事先准备相关的协议和协定,这些协议和协定的公布应该逐步增加,比如,可以从谈判的第三天开始公布,在这次高层会晤结束的时候,把这些公布的协议和协定载入联合公报,作为这次高层会晤取得的成果。如果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能够签署协议的话,也要把我们就这个问题签署的协议作为这次会晤取得的一项成果。

基辛格说,如果采取的这种方法,那么,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将会具有建设性的、不断取得成果的性质,还可以避免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把那些就相对不重要的双边问题达成的协议同那些在会谈中就重大的问题达成的协议混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就中东问题达成的协议,在联合公报的文本中也只能泛泛地提到,对于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具体的、实质性的协议仍然要保密。

第五,关于一些具体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今天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过程中,我们讨论了欧洲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同时,四方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也应开始生效,要使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能够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接着,我举出了一些相关的论据,以便使基辛格明白,美方必须公开声明支持这些条约生效,因为美国的立场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在联邦德国创造条件,确保这些条约得到批准。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首先他说“美方担心这是对联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然后他对我说,他将尽力邀请巴尔到华盛顿就这个问题进行秘密会谈,讨论一下美国能够做些什么,以便这些条

约能够得到批准。基辛格说，巴尔比较了解各方的实力、批准条约的内幕和程序，他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同他进行协商将会是有益的。

但是，关于巴尔可能返回华盛顿这件事情，基辛格坚决请求我们(法林大使)不要同巴尔进行接触，因为巴尔本人现在对这件事情还毫不知情。

第六，在同基辛格进行这次会谈的时候我告知了他以下一些事情。

苏联相关专业机构已经确定，爱德华·杰伊从事了一些被禁止的活动。爱德华·杰伊，1941年生，美国国籍，是麦哲尔门特·因科尔伯列士计算机公司的主席代表，作为一名旅行者在1971年8月和1972年2月来到苏联。以无线电爱好者为掩护，爱德华·杰伊同利西恰斯克市的一名居民建立了联系，并采取各种措施使该居民有了反苏情绪，同时，教唆他背叛自己的祖国，逃出苏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答应给这名苏联公民提供物质帮助，并安排他到美国工作。为了给这名苏联公民的叛逃创造条件，爱德华·杰伊于1971年12月向他发出了到美国的邀请。

由于这名苏联公民没有被获准前往美国，爱德华·杰伊于今年2月再次来到美国，企图加强同这名公民的联系，企图查探出一些信息，并非法地向这位苏联公民提供了一个电台进行联系，他的这些行为都具有间谍的性质。

现在已经查明，爱德华·杰伊还企图唆使居住在车里雅宾斯克市的另一名苏联公民背叛自己的祖国。

爱德华·杰伊从事的这种犯罪活动是被明文禁止的，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7—64条的A项规定，他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且考虑到尼克松总统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苏联方面认为，可以不追究爱德华·杰伊的刑事责任，并允许他自由地返回美国。

在听完我说的这些话之后，基辛格说，他将指示相关部门迅速弄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将向我通报这件事情的结果。

我答复基辛格说，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让他知道，我上述所说的话以及苏联当局对这件事

情采取的态度。

基辛格再次问道：“你们只是告诉我这些信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

我向他确认了这一点。

基辛格说，那么这是苏联方面采取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姿态，关于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向尼克松总统报告。

基辛格没有提及关于苏联公民马尔可洛夫的问题。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我当时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在下次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我将再谈论这个问题。

第七，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莫斯科从中国得到一些消息：美国通过自己的侦察卫星得到了关于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苏军部署情况的资料，去年10月美国方面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了中国领导人。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使中国人特别满意的是，美方转交给中国的资料包括一些关于苏军导弹部署的材料。

我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消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我想知道基辛格对这件事情有何看法。

在听完了我说的这些话之后，基辛格马上说，如果上述消息是中国人提供的，那么这“完全是挑拨离间”。

基辛格显得很激动，他以非常坚定的语气保证说，去年10月他没有同中国人谈论这类问题，尼克松总统在前不久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也没有谈论这类问题。总之，他们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谈论军事问题。

在同我会谈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基辛格已经到了白宫，他再次同我谈起了这个话题。

基辛格说，在会谈时，尼克松总统曾提到关于中苏边界地区的苏军，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他是一掠而过，这是唯一一次谈论到军事问题。有一次，在一次气氛非常紧张的讨论中，周恩来对美国进行了指责，说华盛顿实际上是和莫斯科、东京站在一起的，企图孤立中国，在经济上

削弱中国，在军事上使中国两面受敌：美国在南面，有美国的陆军，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苏联在北面，聚集了上百万的军队。同时美国还鼓励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企图使日本反对中国。

尼克松总统都否认了这些指责，在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他说，中国总理“显然是喜欢夸张”。尼克松总统还举出其他的例子说，在中国北方的边界地区没有上百万的苏联军队，在美国看来，这些数据也被夸大了。

基辛格马上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数字。他只是泛泛地提到这一点，关于军事问题再没有说出其他的话。

基辛格特别强调说，在同中国人进行的任何一场谈话中，美国方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关于苏联导弹的部署问题。因此，美方没有向中国人提供关于苏军部署情况的情报。

最后，基辛格说，他可以向莫斯科转达尼克松总统“最为坚决的”保证，他们同中国人没有讨论军事问题，关于同中国人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如果中国人对你们说了与此截然不同的话，那么他要再次说，这是挑拨离间的行为，他可以这样直接地说。

第八，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很遗憾，在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他未必能够到莫斯科访问了。

基辛格解释说，这是由于华盛顿的“官僚们”现在加剧了活动，围绕“基辛格—罗杰斯问题”，国会和美国报刊现在正在进行辩论(他们两人究竟谁是国务卿？)。

基辛格接着说，他不想再火上加油，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因为这将证明，在为尼克松总统的第二次重大访问所作的准备工作中，罗杰斯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基辛格说，今年年底总统大选之后，这个问题“将不再存在”。

我问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将不再存在，基辛格直接回答说，“我们将有一个人不会再留在政府内”。从中可以看出，基辛格自己是不打算退出的。

第九，基辛格向我通报说，今天将会公布一份通报：美中联合公报规定两国外交代表要进行接触，现在，双方“进行接触的地点”已经选定了。这个地点就是巴黎(中国人从美方提出的5个城市中选择了巴黎)。

因此，美国大使沃特森和中国的黄大使将会保持联系。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0129, оп.56, п.418, д.5, л.87-95

№22938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美苏关系及越南问题(1972年4月21日)

从12时到16时30分

苏联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人员还有：А.А.葛罗米柯、А.Ф.多勃雷宁、А.М.亚历山德罗夫和翻译В.М.苏霍德列夫、Т.Ф.德米特里切夫；美国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人员还有：白宫工作人员索南费尔特、罗尔德和里迪。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表示欢迎，并问他安顿得怎么样，休息得怎么样。

基辛格回答说，他安顿得非常好，休息得也好。对他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的感觉怎么样？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的感觉很好。他向总书记，您，转达他最为亲切的问候。尼克松总统认为，同您进行的接触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急切地期望着同您在莫斯科即将举行会谈。

勃列日涅夫：谢谢。我也向他转达最为亲切的问候。老实说，我已经认识了尼克松总统，曾同他进行过会见，尽管会见的时间很短。但这是在很早之前的事情了，是在1959年，并且，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地位都不同。或许，尼克松先生已经不记得那次会面了。但是前不久我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最近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报纸上都刊登过。

基辛格：当时进行的所谓“厨房辩论”^[15]的时候您也在场吗？

勃列日涅夫：遗憾的是，当时我也在场。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将不会再有了。您是第一次到莫斯科吗，基辛格先生？

基辛格：几年前我作为美国科学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曾来过莫斯科。我们当时同苏联科学院成员就裁军问题进行了会谈。

勃列日涅夫：就让我们进行努力，以便可以更加经常地对对方的首都——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访问。这件事取决于你们。

基辛格：是的，我们两国现在都面临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勃列日涅夫：当然，在我们举行的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求您转达我对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表示的欢迎。但是，我今天就想请求您向尼克松总统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良好祝愿。您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尼克松总统即将举行的会谈的意义，我想对这一想法再做一些补充。

我们知道，并且也相信，尼克松先生和美国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应当使这次会谈取得圆满的成果，应当在这次会谈中建设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对于这次会谈我们应该抛开一切顾虑和怀疑。双方都是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才决定进行这次会谈的，并且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会晤具有真正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或许，甚至还具有时代的意义。

在这次会谈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相互都作出了不少让步。在这次会谈的准备过程中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的坎坷和挫折，但是我们双方都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胜利召开、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都希望为这次会谈创造良好的条件。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对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的态度就是这样。

如果要进行争论的话就不需要进行任何会谈，只要我们在莫斯科，你们在华盛顿就可以了。而且在进行了争论以后，事后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和解。要进行争论是不难的。

基辛格：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而且，对于这种争论的“成果”任何级别的领导人都能够取得，不必一定要通过最高层领导人。要使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找到好的办法，增强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需要国家领导人拥有智慧和远见，能够预见未来，具有宽广的胸怀。应该指出，在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整个国际局势起到的不是最终的决定作用。

如果坦诚地说，我们希望，最高会晤能够在总的良好的气氛中举行。这次最高会晤现在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关于这次会晤人们有许多的议论和好奇。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抛弃一切消极的、有害的因素，并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在剩下来的一个月里积极行动起来，为这次高层会谈取得成功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在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世界，世界政治会发生迅速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国家及其领导人，更不要说各个民族了，现在都希望缓和，希望世界和平能够得到巩固。但是，也有一些势力认为，加强国际紧张局势会给他们带来利益。因此，最近的国际局势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恶化。我不愿说，这将妨碍我们已经决定的、将要举行的会谈，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

我认为，在我们今后进行会谈的时候，关于政治氛围这个问题还需要详细地谈论谈论。我现在只是想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今后开始会谈的时候不应该严格地受到时间的限制。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我们同您以及今后将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会谈都是坦诚的、直接的会谈。如果我们都希望相互谅解，都觉得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不吐不快的话，那么进行这样的会谈是完全必要的。坦诚就是信任。我们打算完全坦诚地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我认为，我们同您进行的会谈也应该是坦诚的会谈。

您告诉我们说，尼克松总统授予您全权就许多领域的问题同我们进行会谈，这很好，对此我非常满意。

关于我们在举行高层会谈的时候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为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中已经都指出来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明白，无论如何都是回避不了的，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显然，在我们同您进行会谈的时候也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当然，我也不排除就其他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您或者我想提出这些问题的话。

如果您能够同意我提出的这些想法，那么我将非常高兴。

基辛格：当然，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这些想法。

勃列日涅夫：我知道，我们即将就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会谈，我不愿为自己准备一些书面材料进行会谈。这样会使人在进行会谈的时候思绪更加自由，特别是在同像基辛格这样的聪明的外交家进行会谈的时候。一句话，我希望在会谈的过程中能够更加自由，不受束缚。

应该就我们会谈的日程发表一些看法。我愿意为这些会谈花出最多的时间，对这次会谈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重大，应当努力搞清楚所有的问题，而这则需要时间。

坦白地说，是我首先提出，让您早先过来。遗憾的是，我今天只能在这里待到16时，之后我们将有一次隆重的会议，以纪念列宁诞辰，而晚上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是明天和后天我可以全天都参加谈判。

因此，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讨论具体问题。

基辛格：这样的日程安排非常好。

勃列日涅夫：或许，您基辛格先生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有许多话要说，您自己或许也想谈论许多看法。我愿意洗耳恭听。

对于勃列日涅夫同他谈论的这些想法，基辛格表示感谢，并且说，这些想法与他所收到的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也完全符合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目的。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抛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进行坦诚的会谈，直接地回答任何问题。他保证说，在这里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流传到白宫之外，并且将只有尼克松总统一个人知道。为了自由地、毫不拘束地进行会谈，我们在进行会谈时都必须坦诚。

勃列日涅夫：是的，就应该这样。顺便说一句，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并且我们不怕这些谈话的内容被他人知道。

基辛格表示，希望首先谈论一些总的想法，然后再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谈话的精神也反映了尼克松总统对举行这些会谈的态度，尼克松总统还认为，他们即将举行的会谈将会为历史的发展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两国作为盟国并肩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两国领导人也曾多次举

行会谈。但是，这些会谈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再能反映出苏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合作精神。这些会谈都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正如苏方一样，我们也认为，现在是时候为美苏关系的新时代奠定基础了。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民仍在缅怀美国总统罗斯福。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没有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受到苏联人民如此大的爱戴和尊敬。使人们总是能够记住的要么是非常好的事情，要么是非常坏的事情，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的、平平常常的事情总是很容易被忘掉的。领导人完全也是这样。因此，载入史册的一方面是诸如拿破仑、威廉大帝、希特勒这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像罗斯福这样的人。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说，美方现在打算在苏美关系中恢复罗斯福精神。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在过去进行的一些会谈之所以没有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参与会谈的领导人在会谈时谈论的都只是关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表面上的话，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主要障碍在于，在同你们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在力量上应该占据优势。

勃列日涅夫：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也是空想。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说，苏联方面的障碍在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经常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苏美关系。只要发生了一些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具体事件，那么，以前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都被化为乌有，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这次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现在我们同你们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都不祈求对对方施加压力。

勃列日涅夫：是这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的这些话非常重要，即必须从对抗的时代转入谈判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时代转换的过程被延缓了。

基辛格接着强调说，现在美国愿意依据完全相互对等的原则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同你们今后签署的任何一份协议都应该得到双方的支持，使这份协议完全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对这些看法表示了同意。并且补充说：我们应当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应该具有多重意义。这些协议应该被我们两国的人民所理解，应该为国际关系带来安定因素，应该引起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尊重。

基辛格说：这些看法同尼克松总统的看法完全一致。美国方面认为，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会晤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次会晤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些重大决定的作出不应该受到那些为制止国际局势中出现的危机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您的这些话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看法，本来我是不打算提出这个看法的。您说我们两国是两个最为强大的国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却说，世界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手中。我觉得，这好像是失言，或者也许是由于报刊的错误报道而引起的。你们说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大国，我们同意你们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掌握在某些国家的人民的手中的看法。主要的事情在于，我们要以自己的行动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以此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支持。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想听听您对我的这些看法发表的意见，或许，您也可以在稍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基辛格：对于您提出的这些看法，我现在就想直接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首先，应该说，关于尼克松总统所说的上述那些话的报道是正确的。第二，尼克松的这些话是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说的，在那顿丰盛的午餐中他喝了许多中国粮食酿造的酒——茅台酒。尼克松总统所说的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不能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

勃列日涅夫：或许，尼克松总统当时是不是非常难受？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说的这些话是为了表示友谊，我要再次说，这些话不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我早晚都打算同您谈论一下中国问题，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或许现在就应该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我希望您稍后再谈论这个问题。我也想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转入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其他的国际问

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应该讨论苏美关系问题。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其他的会谈程序较好的话，那么，也可以按照那样的程序进行会谈。

基辛格：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的事务以及全世界的进步首先取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美国和苏联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两个主要国家。现在还没有其他两个国家能够以这种全球观来看待世界局势，或者能够洞悉未来，这正如总书记所说的。

勃列日涅夫：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还想做点补充。我们要起到这么重大的作用是有一个条件的，即我们推行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如果我们推行的不是和平政策，那么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就不是这样了。对这一点进行强调非常重要，并且必须要牢牢记住，这是因为，本世纪基本上都是在战火中过去的，时而在这个地区，时而在那个地区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和痛苦，战争造成的创伤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当然，这些创伤是挥之不去的。

基辛格说：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在许多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也知道，我们两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即使存在这些分歧，我们都必须表现出克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立场，那么我们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中一定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美方愿意进行努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签署协议。我们愿意努力，在解决欧洲安全相关问题以及欧洲其他相关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愿意讨论近东问题。我们愿意讨论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问题，在这些地区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

在贸易领域，我们愿意讨论关于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关于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愿意讨论其他的双边关系问题，其中包括科技问题和环保问题，愿意讨论能够取得进展的其他所有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利用即将举行的这次最高会晤，以便使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能参与进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以便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够一致，而不是相互对立。

我愿意同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并且拥有全权讨论这些问题，直到这些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或者有了获得解决的最大可能。此外，对于即将在高层会晤中签署的文件，我们也应做好准备工作。

勃列日涅夫：我同意这些看法。

基辛格：但是，我想同总书记事先讨论一个问题。您在这次会谈中说，在举行最高会晤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我们应当克服这些障碍。我现在想谈论的正是关于消除这些障碍的问题。我指的是东南亚的局势，特别是越南的局势。我想向您坦诚地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1963—1964年的战争不是苏联发动的。自那时候起就犯下了许多错误。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危机局势。我想谈论关于1972年4月的局势。当离我们两国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只剩下4周时间的时候，当我们准备从越南撤出所有的美军并彻底脱离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直接面对的却是来自北越方面的大规模进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遇到新的危机。

现在请允许我坦诚地谈论一下我对北越人的看法，尽管你们对他们的了解或许更加深入。越南人非常英勇，但遗憾的是他们很不明智。他们有时候更加害怕的是被欺骗，而不是失败。他们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我知道，他们曾认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们被欺骗了。但是，1972年的客观条件与1954年时的客观条件截然不同。在1954年的时候主管美国对外政策的是杜勒斯，他致力于营造抵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屏障。而当时我们也在努力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存在。

1972年领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是尼克松总统，我们希望同苏联(以及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国家)不发生冲突，而要进行谈判。现在我们不支持在各国营造抵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屏障，而是支持发展合作关系。

具体到越南，我们不希望在那里长期建立我们的军事基地。我们要追求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我们希望有尊严地从越南撤出我们所有的军队。第二，在我们完全撤军和越南将要开始的政治进程的启动之间应该设一个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按照越南各派真正的力量的对比，愿意在此基础上解决越南国内所有的问题。我们没有义务总是介入越南事务。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出保证，我们将履行这些保证。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军撤出的期限，您是否有什么想法，还是这只是您所阐述的总的原则？

基辛格：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可以在数月内而不是在一年内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越南人是否知道你们的这些计划？

基辛格：知道，但是我们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问题在于，越南人在没有释放我们的战俘，在越南未来的发展局势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同意从越南撤军。但是，越南人不同意我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如果他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那么我们在今年底就可以从越南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并最终关闭我们在越南的所有军事基地。我们完全撤军所需要的期限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在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将从达成协议之后的6个月内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国在越南战俘的人数你们有没有准确的数据？

基辛格：我们的数据还没有越南人的数据那么准确，越南人在尽力避免同我们直接打交道，并且他们主要追求的是激怒我们(在对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略上)，他们已经向我们的一些反对派通报了一些战俘名字。他们举出了500名战俘的数据，但是，关于他们所公布的照片上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没有通报。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国战俘的人数你们认为有多少？

基辛格：至于越南人所提到的500名战俘，可以由我们的材料得到证明，但是大约有上千名美军在越南仍杳无音信。因此，可以说，在越南的美国战俘最多有1500人，最少有500人。真正的战俘人数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将不断努力，达到我们所提出的上述目标。无论我们在军事上经受多大的压力，我们都将会为此而努力，不会满足北越人的最大要求，承认西贡政府。他们向我们宣称说，他们不追求这一点，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提出的建议的客观目的正在于此。

我想再次重申，我们愿意使越南目前已经开始的政治进程持续下去，使越南的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尼克松总统在5月份同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也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也会对目前的越南局势进行解释。

目前的危机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当时北越人展开了进攻。他们在

这些进攻中使用的几乎全都是苏联武器，这就使局势复杂化了。这次进攻从4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第一，这次进攻涉及了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

第二，这次进攻涉及了苏联在这次进攻中的作用；

第三，这次进攻对目前的局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将涉及苏联，关于这一点我随后再说；

第四，这次进攻涉及了我们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以结束这场危机。

首先我想阐述最后两点。如果北越人现在发动的这次进攻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来判断这件事情，那么我将会对这种后果非常不安)，那么，无论我们的愿望怎样，这将会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如果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得逞了，那么这将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是：还有69000名美国士兵将会被越南人俘虏。应该说，这是北越人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南越的军队遭受了失败(而北越人将会努力达到这一点)，那么这件事造成的后果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是不会允许局势发生这样的逆转的，也不能容忍这种逆转，我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得逞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尼克松总统还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依照建设性的精神进行这次谈判，那么，他必将会丧失威信。

现在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中，我们正在讨论苏联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未来达成的协议中不包含潜艇问题。

我已经对多勃雷宁大使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军方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在越南遭受了失败(是否会失败还令人怀疑)之后，尼克松总统前往莫斯科访问，那么在双方举行的谈判中他将会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毕竟他回国后不能宣布说，苏联的武器使美国遭受了失败，而他则向苏联作出了让步。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更为现实的一种可能是，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将不会得逞，但是，他们会因此继续破坏我们在国内的地位，到时候，当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高层谈判的时候，越南问题将不能得到解决，到时候北越人将会继续进攻，我们也将继续抵抗他们，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将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还不得不考虑美国的社会舆论。

正如苏联大使所知道的，每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内都会有一些游行示威，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是每年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能妥善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都会佩戴有美国国旗的胸章。在美国的各个阶层中，至少大学生不是很好的革命者，但是反动派会对此大肆渲染。因此，为了使美国国内的反对派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总统大选的年份里，我们的政策不得不发生右转，向那些通常会投选票给华莱士的选民们寻求支持。

越南是个小国，越南人都充满狂热的英雄主义，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小国却企图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使两个大国不由自主，走上对抗的道路，使两个大国面临它们所尽力避免的局势。这就是我们坚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长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暂时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打算讨论和解决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不是依据对抗的精神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我们什么要求也不会提出，除了要求满足我们提出的上述两个目的。

我应该坦诚而直接地说，如果北越人不停止进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会威胁到最高会晤的举行，或者，即使这次最高会晤仍然举行了，那么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我们也会丧失选择的自由，尼克松政府把解决越南问题看作是自己的一个主要目的。对于最近你们发给我们的信件，我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如果我们还没有对你们在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的话，那么这只是由于我们知道即将要同你们举行会谈。我们承认，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原则的，因此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出卖自己的盟国。我们愿意依照公正、毫无成见的精神来研究问题。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能够为苏美关系的根本改变奠定基础。

勃列日涅夫：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更好地明白，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尼克松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毕竟最终在越南作战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我想再就这个问题作如下补充。基辛格先生，你能否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中止了在巴黎进行的谈判？这场谈判恢复的前景怎样？毕竟你们总是不得不同越南人，而不是同其他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您，和尼克松总统一样，也都了解这一点。

今天，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收到越南人发来的如下通报(勃列日涅夫同志宣读了苏联驻河内大使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越南方面作出了如下通报，对基辛格提出的建议进行答复。

——北越仍然认为，越南问题应当通过在巴黎举行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在其他地方进行谈判，越南问题只应当由越南人和美国人来解决。

——关于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的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

——越南方面坚持，正式谈判和秘密谈判应当同时进行。在黎德寿同基辛格进行秘密会谈之前应当恢复正式谈判，正如美国方面所认为的一样，首先举行秘密会谈，一旦秘密会谈取得成功就进行正式谈判。

——越南人仍然建议，在4月27日恢复正式谈判。他们提议在5月6日进行秘密会谈，但是，关于进行秘密会谈的日期美国方面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美国人表示愿意在4月27日进行正式的会谈，那么黎德寿将会马上飞赴巴黎。

——无论怎样，越南人都要求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轰炸。

——委托春水在4月20日向美国方面阐述这些内容，如果苏联同志们认为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把这些答复转告给基辛格。”

基辛格：这就是说，即使是通过苏方转交的这些答复，它所反映的仍然是越南人以前在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表明立场，这种立场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越南人从来都不说“我们建议”，而只是说“美国应该”。如果这些话只是出现了一次，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在所有的建议中都一再重复这些说法的话，那么这看起来就已经像是最后通牒了。他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一个大学生一样，就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意义对我进行考核，但是，对于我们提出的建议，他们却断然拒绝进行讨论。

您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问我，为什么美国中断了在3月23日开始的那次谈判。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第一，已经举行了147次会谈了，但是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哪怕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无论怎样，越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谈判导致破裂，以便使我们在国内政治方面遭受更大的困难。

现在请允许我在回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凭自己的记忆阐述一下导致这次谈判破裂的诸多事件的前前后后。今年2月15日，北越人提议在3月15日之后的任何时间举行秘密会谈。2月18日我们对他们作出了答复，同意进行秘密会谈，并建议在3月20日举行，我们挑选这一具体的日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日期是3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并且在周末的时候我才能够更加秘密地前往巴黎。2月29日，北越人同意在3月29日举行秘密会谈。3月7日他们撤消了这次会谈，并提出了举行秘密会谈的新的日期——4月15日。对于这次会谈改期的原因他们作出的解释是，我们在2月19—20日、3月2—5日对北越进行了轰炸。在2月19—20日我们确实是进行了轰炸，但是早在这次轰炸的前十天，越南人就接受了我们就举行秘密会谈提出的会谈日期。因此，这次轰炸同举行秘密会谈没有关系。至于在3月2—5日进行的轰炸，这完全是他们提出的借口，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对北越进行轰炸。

3月13日，我们同意进行秘密会谈，并提议在4月24日举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答应在4月15日到日本访问。我们提出的这个日期仍然是在我从日本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对于我们的这个提议越南人没有作出答复。10天之后我们决定中断例行的会议。我们认为，在例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再让越南人在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问题上继续捉弄我们没有任何意思。

3月27日，北越人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关于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他们刚刚答应我们的建议，我们就马上通知他们说，我们愿意从4月13日起恢复例行的会谈。换句话说，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愿意恢复例行的会谈不是由于他们发动的进攻，而是由于他们同意举行秘密会谈。当时他们还没有开始发动进攻，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开始发动进攻之后，我们撤销了例行的会谈，但同时向他们确认我们愿意举行秘密会谈。

在此之后，北越人就撤销了这次秘密会谈。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继续进行这场就像小孩子才玩的游戏。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找到一

个解决方案，可以在商定的日期内既举行例行的会谈，又举行秘密的会谈。或许，明天我将会向您提出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想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有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说，今天他还不能说出一些具体的办法，但是，他希望明天能够阐述美国方面的计划。他解释说，上述提到的越南人的信件他们前不久才收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北越人在利用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问题，以便掩饰他们打算发动的进攻。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们选择秘密会谈的日期的考虑是要发动进攻，他们推迟例行会谈的日期是由于他们发动的进攻要改期。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在4年的时间里，北越人推行的战略是，以答复同意同我们举行谈判为条件来迫使我们向他们作出让步。应该说，他们对于这种战略非常娴熟。但是现在他们应当明白，他们的这一战略在我们这里将不会再行得通了。我们关注的不是会谈本身，而是会谈的结果。我个人还是喜欢黎德寿的，他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好感的人，但是我同他进行会谈的目的不是为了同他进行交往，而是为了取得具体的会谈成果。他们的通报看起来是，他们同意举行谈判，愿意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

现在我们只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会谈不能在5月6日举行，因为这一天我没有时间，而且在这时举行会谈也太晚了。第二，5月份是我能够进行这次会谈的最晚的日期，在此之前举行会谈才有意义。我们希望随后向他们通报我们的这些建议。

勃列日涅夫：恰好，越南人在他们的信件中也谈到，美国方面可以提出举行这次会谈的日期。

基辛格：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明天我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比起作出进行轰炸的决定，这个决定更容易作出。

基辛格：对我们来说，关于对越南进行轰炸的问题是个困难的问题，也是个重大的问题，但是您根据自己的经验应该知道，有时候领导人不得不面临一些复杂的局势，这些局势使他们很难作出决定，很难采取措施。我曾经私下对多勃雷宁大使谈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强调说，在

难以作出决定而又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您应该果断地采取措施，不要有所顾虑。我是在前不久才说出这番话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无论面临什么具体的局势都应该这样。

勃列日涅夫：您或许暗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暗指得非常巧妙，就像一名优秀的大学老师。而我听得也非常认真。

基辛格：您说我像是一名大学老师，但是我却要讲，您是一个辩论的高手，并且多勃雷宁大使也可以证明，我私下向他谈论了这件事情，并且我个人认为您行事非常果断。

勃列日涅夫：您在利用机会强调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外交家通常都这样做。

基辛格：我认为，您在战时是一位专家，善于从侧翼发动进攻。

勃列日涅夫：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教会了我们从侧翼发动进攻，从正面迎头打击。但是战争也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牺牲。因此，我们现在在讨论任何军事问题的时候都要经常想一想，什么是战争，战争会给人们带来什么。

基辛格：我认为，这个看法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发生冲突并使和平得到巩固。

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都支持这样做。无论我们同尼克松先生进行的会谈将会怎样，我们都将进行会谈。我们应该确定处理国际问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态度。在会谈的过程中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通过会谈要比通过书面文件写出的东西更加容易使人明白。文件还是必要的，但是不必要对一些问题都加以修饰。

在考虑某些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狭隘的框架内，不应该脱离现实，脱离世界局势，脱离巩固和平这一主要的任务。我想，如果我同尼克松总统能够就所有这些问题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达成相互的谅解。或许，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但是一定要相互说出他们的真正想法。而这也有助于双方达成谅解。

我之所以说这些话还因为，我认为，同您基辛格先生进行的谈判所

讨论的问题，如果不会多于我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判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话，那么至少也会涉及我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判所要讨论的一半内容。如果我们现在就某些问题的解决有了共同的看法，那么，这将会减轻我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时的负担，使我们少付出一些努力。

基辛格：这也可以使您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更多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是的，这将使我们进行的会谈更加具体，可以直接讨论关于这次谈判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反映我们这些谈判的成果。

基辛格：我同意，和平不能靠一纸文件来保证，所有问题都不在于签署文件，而在于达成谅解，在进行这样的会谈之后就可以达成谅解。会谈本身应该有助于国家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气氛：当我们在作出某一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能够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谈到越南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说，如果我们解决了关于举行正式会谈和举行秘密会谈的次序问题，那么之后将会产生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举行秘密会谈。令我们不满的只是黎德寿也要参加这次会谈，尽管正如我所说的，我个人还是乐意同他交往的。

我向您通报一下关于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会谈达到如下目标：

或者完全解决军事冲突，这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

或者停止军事行动，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军事行动，哪怕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军事行动。如果军事行动能够停止的话，那么，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对越南采取的政策，并且也可以把现在派往越南的援军撤回。

勃列日涅夫：你们向越南派出援军了吗？

基辛格：我们派往越南的基本上都是海军和空军。

勃列日涅夫：您指的是海军陆战队吗？

基辛格：不是，是海上航空兵，现在我们还没有再派出陆军。

我还想再次阐述如下客观事实，即，如果敌人对我们开展了大规模

的军事行动，我们将不得不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敌人进行战斗，而在美国国内，我们也将不得不更加指望得到那些我们本不愿意与之进行合作的人的帮助。

因此，我们想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恢复谈判；

第二，使会谈取得一定的成果，哪怕是临时性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越南人也想通过举行秘密会谈来恢复在巴黎举行的谈判。因此，问题只在于，首先应该开始进行的是哪种会谈——公开的会谈还是秘密的会谈。但是在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是非常大的障碍。在关于贸易问题进行的谈判中，关于应该怎样进行会谈，可以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但是，当谈到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时候，如果就他们进行谈判的形式这个问题不能达成妥协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秘密会谈就比较容易了，这种会谈不会使双方的威信受到伤害。

基辛格：这不会使我感到为难，正如我所说的，明天我们将会提出我们的建议。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进行会谈的时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勃列日涅夫：我想，或许基辛格先生对这次会谈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基辛格：是的，但是黎德寿是否也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关于这个问题我还一无所知。明天我们将倾听您提出的建议。

基辛格：但是我明天要谈论的建议将涉及程序问题，也就是双方对会谈的组织问题。

勃列日涅夫：关于会谈的内容您是否有一些计划，或者您是否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向我们进行通报？

基辛格：我想坦诚地说，北越人通常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他们采取的都是如下的形式：每当我同黎德寿进行会谈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总会放着一份文件，

上面列着8项、7项或者其他数量的条款，而且当开始论及每一项条款的时候他都会说“你们应该”如何如何。听完他的没完没了的“你们应当”如何如何之后，我都会对他作出答复，并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对于我提出的这些建议，他总是会说：“您说得还不具体。”这句话翻译成英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我提出的建议，甚至也不愿意讨论这些建议。如果我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建议中的某一条款，他们就会说：“现在您谈论的就具体了。”因此北越人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可以被看作是最后通牒。我再次强调说，今后无论他们进行什么样的威胁或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不会再像现在一样了。我说的这些话都是非常真实的，是为了说出真实的情况。

如果同越南人举行了秘密会谈，那么谈论的就应当是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今年大规模地减少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是，应该直接地说，如果越南人在这次会谈中的表现还像以前一样，那么这次谈判将会是一次非常困难的谈判，也未必会有什么意义。

正如我上述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恢复谈判(明天我们将通报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第二，我们希望在剩下的短暂的时间内使这次谈判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谈论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将很乐意听取你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任何看法。这些看法不仅仅同越南问题有关，而且也同整个国际局势有关。如果我们现在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那么事情的发展将会使局势更加恶化，这就不能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我们不想在越南拥有军事基地。你们也不希望在越南拥有军事基地。我们想撤离越南。你们也不想到越南来。如果我们在那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地区发生了争论，这才是真正荒谬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看来，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将会更加具体一些。我愿意倾听你就这个问题向我们进行的通报，尽管这个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不愿详述以往的历史。美国人发动了越南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特别是没有想到当柯西金1965年初在河内进行访问的时候，你们加强了军事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进行的事业是正确的事业，我们当然要公开而明确地支持他们反对侵略，支持越南人争取自己解决自己事务的权利，我们的这些立场早就广为人知了。

我要直接地说：我们这些苏联领导人以及全体苏联人民都很难理解，美国在越南捍卫的是什么，他们为了什么要付出8年的时间，牺牲无数美国人和越南人的生命，他们浪费了这么多的资源是为了什么。这确实是一场可耻的战争。在八年的时间里各国的舆论都在反对这场战争，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侵略性的大国。你们应当非常清楚，在多少个国家曾经开展过反对这场战争的运动，对于这些运动我们都没有组织，也没有指使什么人进行领导。但是世界各地都在说你们是“侵略”，是“帝国主义”。而最终这些话都会被用来针对美国的领导人，针对美国总统。

难道美国人就不明白，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轰炸都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以前通过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通过这种方法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你们可能会压制住人民的反抗，但是随后他们将会再次起来进行战斗。这种方法不会给美国带来荣誉，不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留下好的名声。

而在目前的条件下，你们进行的轰炸具有特别的性质，这次轰炸是在苏美正在准备进行高层会晤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次高层会晤是我们就许多问题达成协议的一个机会，不仅对于我们两国，而且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这样的轰炸或许还会对美国的国内舆论产生影响，而且也不利于尼克松总统，不能增加他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

我们绝不是为了阻碍尼克松总统开展竞选运动。我们愿意进行高层会晤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们能够给予尼克松先生的最有效的支持。

我要再次说，要把现在的一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区分开来。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你们的意思好像是说，有过错的是我们，是苏联。是你们发动了战争，进行了轰炸，加剧了国际局势，而过错却是我们？！给人的感觉是，这是在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有人使您和尼克松总统迷失了方向。现在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有许多势力在企望着我们同尼克松总统之间的会谈不能举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使一些人幸灾乐祸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请看，美国和中国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但是莫斯科什么也没有得到。

至于我们，我要再次说，我们坚决决定要举行这次高层会晤，尽管我们在一些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

我想澄清一些事实。

现在美国有许多人在喧嚷说，苏联或许是要通过向越南人提供武器来“组织”越南人发动进攻。应当对您说，在越南人发动进攻之前，我们同他们没有签署任何特别的、关于向他们提供武器的协议。我也想强调说，越南人的军事计划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关系。我们对越南人的条件也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在他们那里什么时候是干旱的季节，什么时候是多雨的季节。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他们的需要自己制定的，而他们显然也会利用各种季节的因素。

基辛格：遗憾的是，他们对这些事情考虑得是太多了。

勃列日涅夫：但是我请您注意如下几点。尼克松打算到北京访问。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河内进行了访问(我们没有去河内进行访问)。在周恩来对河内进行访问之后，越南人就没有再发动进攻。在您和尼克松总统离开北京之后，周恩来又再次到了河内，而在他的这次访问之后越南人就开始发动了进攻。关于这件事情您能否做个解释？

我还想提请你们注意另外一个新现象：中国的报刊突然写道，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种报道还是第一次。迄今为止，北京仍然在宣扬说，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而美国的报刊基本上也在配合中国的宣传，在反对尼克松先生。你们在国内的反对派也喧嚷说，苏联向越南人提供了如此多的武器，以致越南人不仅可以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还可以扩张到印度……基辛格先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破坏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这一点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对当今局势提出的这些看法。

昨天，在我对我们现在进行的这次会谈进行准备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我请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份关于我们对越南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量

报告：以前我们向越南人供应了什么武器，根据1971年签署的协定每个季度向越南人提供了什么武器。在了解了这份报告之后(还不能把这份报告提供给您，但是请您相信我所说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有人喧嚷的所谓苏联“组织了越南人发动进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中国人都在反对我们即将举行的最高会晤。对于他们来说，破坏这次会晤将是个重大的收获。您对北京进行过访问，但是我怀疑您是否了解了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方法。然而在过去，俄国的一些科学家和外交家都对中国人的特点作出了非常深邃而准确的评价，或许他们作出的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是现在的任何一个研究所——无论是我们的研究所还是你们的研究所作出的评价都不能比拟的。中国人是非常复杂的。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们时而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取霸权地位，时而跑去同美国接近，时而向我们保证发展兄弟般的友谊关系，时而称我们为社会帝国主义，时而说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时而夸大我们对越南的援助……对于同中国人处理好关系，我们大家都还有许多困难。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话绝不意味着我们在指责你们对北京进行的访问。我们没有指责你们进行的这次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如果这种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话。我所说的这些话都不是我个人的立场，而是我们全党的一致看法。

主要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你们进行的轰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还会破坏整个政治氛围，无论你们和我们的意愿如何，这客观上都会使局势复杂化，其结果可能是尼克松总统不能参加高层会谈，而且也会为我们参加这次高层会谈带来困难。

您应该很清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轰炸在美国国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看起来，使尼克松先生感兴趣的是，在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他仍然主政白宫。我不知道扩大对越南的战争是否会对他有利。我想如果苏联不出席的话，也会为这次庆祝活动投下阴影。

因为我们最为关注的仍然是发展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请允许我把我们起草的《苏联和美国相互关系基础》共同文件的草案交给您，我们认为这份文件非常重要。请你们研究一下这份文件，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尼克松总统将会乐于接受，这将会为即将举行的最高会晤取得成果提供保证。随后我将同您谈论这些建议。

基辛格：我将会对这份文件进行仔细的研究，并且在我们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把我们对这份文件的看法事先通报给你们。

勃列日涅夫：最好在我们同您进行的会谈中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谅解。如果需要对这份文件进行补充和修改的话，我们也将欢迎。勃列日涅夫风趣地说，但是，如果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为了降低这份文件的作用的话，那么我将会说，也将会公开地说，基辛格阻碍我们通过一份很好的文件，这份文件对于我们两国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如果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很好的修改意见的话，那么我将会说，苏联外交部没有能力准备一份完美的文件，因为他们对美国现政府的良好意愿估计不足。

抛开玩笑的话不说，我要强调说，这些建议是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提出来的。我们请求你们对其进行仔细的研究，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

现在谈论一下关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明天4月22日和后天4月23日，我听从您的安排，如果需要的话，那么4月24日，星期一，也可以听从您的安排。

基辛格：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我准备在星期一也留在这里，但是不能再停留更长的时间了。

（双方商定在4月22日上午11点钟进行下一轮会谈。）

基辛格：我知道，今天是你们的一个隆重的节日。你们要庆祝列宁诞辰，列宁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人。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尼克松总统和中国人民对你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勃列日涅夫：非常感谢。再见，明天见。对于今天的会谈我很满意，这次会谈是一场开诚布公的、生动活泼的会谈。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明天进行的会谈更加富有成果。

会谈记录：A.M.亚历山德罗夫

T.Φ.德米特里切夫

№22941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记录：如何结束在越南的战争(1972年5月24日)

1972年5月24日

20—23时

奥加列沃城郊别墅

勃列日涅夫：让我们继续谈判。今天我们将谈论什么呢？

尼克松：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完，就是关于导弹防御和冻结战略武器协议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谈判代表今晚能够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协议，那么，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再次举行会谈。

勃列日涅夫：我想，经过昨天的会谈他们是完全能够达成协议的。葛罗米柯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希望会见基辛格先生，并把我们的参加赫尔辛基会谈的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通报给他。遗憾的是，在离开这里之前，基辛格先生都一直在忙，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我们的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在稍晚的时候——今天晚上同他会见。我认为，事态不会复杂，当然，如果基辛格先生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不使事态复杂的话。

尼克松：这次的讨论是困难的，而且这种困难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讨论的将是涉及美苏双方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问题，因此，双方自然都会极其谨慎。这是为了随后达成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所必需的。我觉得，原则上我们已经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相互谅解。然而，为了能够在星期五签署这一协议，还需要一些努力。

勃列日涅夫：最好是这样。

尼克松：今天我们关于欧洲问题的讨论进行得不错。或许我们可以在星期五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明天我们将继续讨论贸易问题。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样的公开声明。或许，可以

宣布关于成立经济联系委员会的声明，而在星期六宣布关于进一步达成的协议。

勃列日涅夫：可以这样做。现在已经确定的事情，当然要进行到底。

在国际问题中我们尚没有解决的是诸如越南和近东局势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尼克松：我想，在这样小的范围内讨论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存在重大的分歧。我们要设想一下，这些分歧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取得一定的谅解，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在同我们进行的会谈中，总书记先生多次说越南的局势是棘手的。越南的局势确实棘手，并且对这次会谈造成了很大麻烦。我知道，你们在考虑越南局势的时候也不会轻松，然而，我们仍然就其他问题进行着会谈。

另一方面，我认为，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我们双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在某一方面发生这样的冲突，这种冲突阻碍了我们两国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发展关系。

我想向您保证，我们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刻加剧越南的局势。是北越人选择了在这个时刻加剧越南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几乎没有可能作出其他的反应，尽管我知道，我们的这种反应会给苏联领导人带来一定的问题。6万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已经为我们采取强烈的反应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此外，还有1000多美国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北越俘虏了。

尽管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我们已经撤出了大约50万以上的军队，并真诚地建议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同北越代表进行的149次正式会谈和13次秘密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在完全不可接受的条件下撤离越南。

现在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并且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是公正的。总书记自己在4月份同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也谈到了关于停火和进行谈判的想法。我们现在所希望的正是停火、向我们提供关于美国战俘命运的情报并遣返他们。在此条件下我们愿意在4个月内撤出我们在越南的所有军队。否则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的。

在此我们可以继续谈论关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否明智这个问题。我们非常了解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我相信，这正如你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迷恋于对单个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毫无意义。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千方百计尽力结束的这场战争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并且对美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建议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必须有良好的意愿。问题的解决应该建立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不应该是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并把一些条件强加给南越政府，这些做法只是有利于北越方面。如果北越不同意这一点，那么我就不得不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无论怎样我都不愿因此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复杂化。因此我否决了关于封锁的建议——建议封锁通往越南水域的苏联船只。我还下达了一项命令：在我们进行莫斯科会谈期间不对河内地区进行轰炸，以便不使局势复杂化。但是，除了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对北越人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北越方面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公正的和平。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将使用我们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结束战争。

我很清楚，苏联是北越的盟国，你们同北越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我也知道，苏联在向越南提供军事物资。这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在这个地区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两个大国在许多领域都有良好发展的机会。我认为，如果能够尽快顺利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也认为，苏联作为北越的盟国、作为一个向北越提供武器的国家可以对越南施加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劝说他们进行明智的谈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然而，还需要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目前的局势是：我们不得不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直到我们有了进行谈判的保障，感觉到重返谈判桌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只要我们还没有这种保障，我们就不得不继续采取行动，正如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一样。

我不能确信，苏联是否为北越开始发动进攻承担责任。但是北越已经开始了进攻，而我们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这种反应将对我们今后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某个不负责任的盟国会从我们那里得到武器，摆脱我们的控制，并企图使我们双方发生冲突，激化我们两国的关系，可以说北越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知道，您不同意我现在对您所说的话，但我完全是开诚布公地说这些话的。

提出一些能使我们今后做得更好的各种想法，我们当然欢迎。但是我也想请求你们从另一国的角度，也就是从我们国家的角度考虑一下。毕竟苏联也曾经认为，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利益。我们不赞成你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尽力不让事态的发展破坏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应该努力，应该尽可能、尽快消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当然，在存在一些困难的情况下美苏关系现在仍然在发展，我们也将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越南问题的话，美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更快。

有人对我们说：请停止战争吧。而我们也不想继续战争，想继续战争的是北越人。我们愿意停止战争，我们为此甚至已经准备了3年的时间。北越人现在应该作出决定：停止战争或者为继续战争承担责任。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总统先生，我们现在的谈话涉及的是一个非常棘手而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棘手，是因为它是关于战争的问题，是关于人们生命的问题，也在于这场战争加剧了国际局势、严重影响了苏美关系。现在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因为你们又恢复了对北越的残酷轰炸，正在对越南人采取军事行动。

在同基辛格先生的谈话中我已经谈论过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想强调说，不仅仅是我们，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把你们在越南的这场战争称之为场可耻的战争，称之为场侵略性的战争。或许，确实没有必要详述往事的各个细节，但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你们把越战升级并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正在河内。要知道越南人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刚刚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评价，并做出了一些解释。我们应当果断地说，原则上我们对这场战争是另外一种评价。从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声明中您也可以了解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或许，今天没有必要对我们的评价展开论述。但是我想说，我们将不会退让，因为我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或许，没有必要追溯太远，但事实是：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被

粗暴地破坏了，当时这一协议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确定了所有前提条件。为什么没有在越南推行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选举，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你们很清楚，获得大多数越南人民支持的民主政府将会在这些选举中获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为什么不是越南人自己而是由另外一些人来决定越南政府的组成？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华盛顿的指示？

这些逻辑非常奇怪。总统先生，毕竟谁也没有请求你们到越南去。你们向越南派出了大量军队，而你们现在却说你们是在保护自己在越南的士兵。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有哪一条法律和哪一条国际关系准则能证明你们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和准则的。你们进行的纯粹是侵略行动。您说，您想结束战争，并把这种想法同你们残酷的轰炸联系在一起，你们轰炸的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而且还有平民，而您却说这是结束战争的手段。这种手段会毁灭一个国家，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您说，不会轰炸我们的船只，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你们对越南人开展了残酷的战争，但是是为了什么呢？你们侵入了越南，进行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而且侵略的是一个远离美国的小国，它对你们国家没有产生过任何危害，你们是为了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你们的这种行为。因此，全世界都把你们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称之为侵略性的战争是完全正确的。在此我不想重复那些形容美国侵略的词汇，这些词汇已经够多了，并且您或许也是知道的。但是，你们现在的行动方法怎么能被称为结束战争的方法呢？总统先生，现在还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迷惑人民的时候。

我也不得不强调说，你们采取的一些措施直接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给我们的远洋船只和国际航运带来了危险。

柯西金：今天我从海上运输部得到报告说，美国飞机飞到我国在越南水域的船只上方并投下了炸弹，这些炸弹落在距苏联船只500米和300米的地方，甚至有一枚距苏联船只只有120米。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们正在莫斯科同我们进行着会谈！

勃列日涅夫：如果你们所说的关于希望停止战争的话是你们真实的意图，那么我们深信，像美国这样拥有巨大政治资源和外交手段的大国早就找到了停止战争的方法了。但是你们所提出的建议都包含这样一种思想：越南人只应该接受你们美国人的条件。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和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呢，总统先生？

越南人没有向你们美国提出领土要求，也没有向你们要求任何特权。他们希望的只是获得独立。他们同意在南越建立由三个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构成的联合政府，最近他们重又提出了关于在巴黎举行谈判的建议。是您和西贡方面拒绝了这一建议。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呢？这些都显示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此外，很难有其他的说明。这正是我们的看法，而我也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会持这样的看法。如果您，总统先生，能够容忍美国和美国政府的这种可耻行为，那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谈论这个话题了。

你们在同我们的这次谈判中打着和平的旗帜。我们已经签署了一些有益的协议。应当对此表示欢迎。总统先生说过，我们能够进行这次会谈是不容易的，这样说是正确的。您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我们将把我们的同盟义务履行到底。无论你们怎样轰炸都不能解决问题。

显然，美国在南越捍卫的是自己一些自私的利益。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进行切合实际的谈判，那么，我想越南人将不再会扣留你们的战俘。

波德戈尔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战俘一般都会被遣返的。通常都是这样。其中包括，我们在战后把德国战俘遣送回了德国。

勃列日涅夫：当然是这样。总之，应该说，你们把关于归还战俘问题的要求或条件作为停战的前提，这是在做作，是虚情假意。通晓事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越南战争是苏联人民的重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不久，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2000多万人口。众所周知，这场战争对你们造成的损失不大。如果美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愿这不会发生)，那么你们的政府，毫无疑问将会很难在越南进行另外一场战争了。

您说，您理解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同意进行这次会谈的困难，您的话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愿意进行这次会谈，我想对其中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认为，会谈前进行的工作使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希望。美苏两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及其他条件，我们希望不仅仅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利用自身的影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预防今后出现复杂的局势，缓和一些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我们指的是越南局势。我们原以为，你们最近在越南采取的措施是偶然的，是在气头上采取的措施。但是现在在听了您的话之后，恐怕我们的看法会发生改

变。一方面，美国看似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希望改善整个国际环境，另一方面继续在越南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这是矛盾的。我想，如果我们只是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写进我们的共同文件里，那么这将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许多国家将不会理解我们。它们会认为，你们打算继续战争，而我们则同意你们继续战争。你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在联合公报中写下了双方对各自立场所作的阐述，但是，可以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政治原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我们同你们、同其他国家发生争执。诚然，您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不用我们说你们也是很清楚。然而，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多次向总统先生发表了声明，在给你们信件中也多次说过，越南战争任何时候都不会给美国和美国政府带来荣誉。如果您真的想结束这场战争，那么，我相信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也能同越南人达成协议，和平解决问题，并且不失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看起来将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想同您签署一份重要的文件，向全世界说，应通过和平途径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我们将建议其他国家接受这一原则。而正是在这个时刻你们却继续进行战争，杀死一些无辜的人——母亲和孩子，摧毁一些学校和医院。这些该怎么解释呢？我们一贯推行各国之间和平友好的政策和原则，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为此我们愿意帮助美国、愿意同美国进行合作。但是在越南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在你们滥杀无辜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你们一起谴责了希特勒的罪行。当时我们两国是盟国。数十年后，人们至今仍然认为发动那场战争的人是可耻的。现在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这让人很难理解。我也不是自以为对所有的美国人都了解，但是，未必所有的美国人都一致认为必须继续越南战争。

柯西金：根本就不是！

勃列日涅夫：牺牲的美国士兵的亲属、因战致残的美国人当然是不支持继续进行越南战争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美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轰炸来解决问题，总统的威望就会下滑了吗？相反，总统的威望将会提升，而我认为，所有的美国人也都会希望这样做。如果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智慧并带来了和平，那么美国的威望无疑也会提升。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您这样做。这确实会给您带来荣誉。

波德戈尔内：关于这一点可以以戴高乐为例。当时戴高乐使法国退出了阿尔及利亚，结束了为期七年的战争，因此他也成了民族英雄。

勃列日涅夫：我们都是政治家，因此我们对您所说的话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们不向您提出其他的条件，但除了一点：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不能把任何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这是越南人自己的事。毕竟越南人自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越南是否建立共产党政府或建立其他政府都不是我们的事，让越南人自己决定吧。前不久基辛格先生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曾对我说：“如果在调解问题后的几个月内越南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美国对越南的兴趣就会降低，然后就让越南人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们确实持这样的立场并把它告诉了越南人(我们没有参加巴黎谈判，也不知道你们是否告诉了他们)，那么我相信，他们将支持这种解决方法，或许就不会有战争了。结束战争对于美国政府的稳定、对于巩固美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轰炸行为是起不到作用的。

越南的邻国中既有大国，也有小国，它们或许都不能容忍越南的失败，这种可能性也应该考虑。通常无论人们想得有多周到，他们都不能预见到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你们选择的结束战争的方法是要杀光所有无辜的人，谁委托你们这样做了？希特勒想扩展“生存空间”，其结果是任何空间都没有得到。这一点要好好想想。

我曾经对基辛格先生说过，逻辑是一门科学，并请他把这句话转告总统先生。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运用一定的逻辑对局势进行分析。

柯西金：总统先生，我完全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越南问题的谈话，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5年前苏霍德列夫同志翻译了我同约翰逊总统在葛拉斯堡罗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同我们今天的这次谈话非常相似。当时约翰逊总统对我说，他想结束战争，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经过两天的谈判后我对他说：“很显然，您根本就不愿结束战争；好吧，请试试看，事情会是怎样的结果。”他当时对我说，他想迅速扼杀越南，他是从强权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的。现在您又从强权的立场来谈论这一问题，这是多么可悲呀！

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在这5年里美国军队残害了大约100万越南人，自己也损失了大约10万名士兵，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你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现在同你们进行的这次谈话同我与约翰逊总统进行的那次谈话

非常相似。当然，你们那样做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重要。北越可能会让其他的国家介入战争。已经有一些国家就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比如，中国军队就强烈要求进入越南同你们作战。然而，尽管面临许多困难，越南人从来没有让其他国家的军队参与这场战争。还需要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段历史也还没有公开。美国人在越南就像占领军一样，而谁也没有让你们到那里去，除了自称为“政府”的一些爪牙。尽管其他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建议向越南派出军队，但越南政府都没有同意。应当了解这一点并对其作出评价。对越南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利于他们的举动。

勃列日涅夫：他们想，他们那样做有助于和平解决问题，避免挑起更多的战争。越南战争就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

柯西金：总统先生，我们觉得，您现在对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能性评价过高。一旦危机时刻到来、一旦他们愤怒，他们就不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您不能保证避免这一点。到时候战火将会更大。

尼克松：我们完全不怕这样的威胁。就让他试试看。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所说的是威胁你们，您这样想是不对的。扩大战争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们对您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威胁你们，而是为了对局势进行分析，这要有用得更多。当您执掌政权的时候，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是一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可以利用有利的机会(您现在仍然有机会，因为您没有参与对这场战争的组织)停止这场战争。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是坚信这一点的。如果您试着按照您所说的那种方法解决问题，也就是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迫使越南人接受你们的条件，那么这既不会给美国，也不会给您自己带来荣誉。

问题在哪里？在于您撤出军队。这将得到越南人的欢迎。您说要北越释放战俘。前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曾说(他对我也这样说过)，一旦战争结束将立刻释放战俘。至于未来政府，越南人同意组成由三个政治力量的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您需要那位所谓的“总统”，尽管那位总统谁也没有选他担任。为了那位可以卖身投靠别人的“总统”，你们准备断送数十万越南人和许多美国士兵的生命。

尼克松：而北越的主席是谁选出的？

柯西金：全越南的人民。

波德戈尔内：南越也认为胡志明是主席。

柯西金：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越南领导人，至于我们，我们同胡志明相识已经许多年了，我们还认识黎笋、范文同及其他同志。这些人都非常认真，忠于自己的祖国，都经历了多年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在越南人正式提出的建议中，他们甚至没有提出统一北越和南越的问题。他们愿意付出相应的义务。因此为什么要屠杀他们呢？请回答这个问题。

柯西金：你们要求越南人，让他们给你们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却在等着你们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您在这里，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如果您提出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转告给越南人。您可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带着胜利的果实返回美国，而不是为了维护那位可以卖身投靠别人的“总统”。您还有4年的总统任期，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只是短暂的时间。

尼克松：谁知道会留下什么呢？

柯西金：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的方法，您就会作为一位打开僵局的人物被载入史册，这是您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没能做到的。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同您还可以在各个领域发展合作，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难道为此还不值得牺牲西贡腐朽政权吗？

波德戈尔内：今天我们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这次谈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直接听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比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他们的声明总是要好一些。在座的各位同志中，我比其他各位晚一些到过越南。去年秋天我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受政治局的委托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正是那个时候，越南人首次从我那里得知，我们就同您在苏联举行会谈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越南人对此充满了期望，因为他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会对美国总统公开说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并且可以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我们和您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越南人觉得，苏美两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达成协议，这将有助于巴黎和谈的进行，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思维健全的人，他们不会有非分之想。他们曾明确对我说，不打算现在就同南越统一。他们希望

的只是保障越南的自由和独立，以便越南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他们曾说，可以成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政府，由这个政府在南越实施相应的选举。

没有必要再说，越南是个小而英勇的民族。您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越南人都不会放弃自由和独立，无论有多少飞机来轰炸他们。这些人事实上终生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他们同中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然后同法国人进行战斗。最终，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越南人产生了独立并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遗憾的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正如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所说的，美国最近针对越南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侵略行为，遭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美国人采取的这些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越南，还针对那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正常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美国增加空军和海军力量、采取其他措施使越战升级，这些都不能解决越南问题。您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应该寻找其他的途径，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结束这场不光彩的战争。看起来，美国只是在宣传中才能说，最近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护在越南的6万美军，也是为了使被俘的美军获释。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逻辑的，谁也不会相信。总统先生，您已经阐述了您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的动机。我们也阐述了我们对此的态度。我担心，我们没有说服您，然而，您也没有说服我们，使我们认为您所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但是，应该说，您对我们国家的这次访问贯穿了缓和局势的思想。我们想让您好好想一想，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结束目前的局势，这种局势日益严峻、令人难以容忍。越南局势也使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最后说一点。如果美国采取了结束战争的措施，那么，毫无疑问，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会认为：美国投降了。

勃列日涅夫：总统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了许多实质性的看法，我想，今天我们可以结束这次会谈。您将会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愤怒，了解他们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要求。您也会了解他们对美国侵略行为的愤怒，了解他们关于停止轰炸、和平解决问题的要求。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我国人民的这种愤怒是不能通过命令根除的。我们和您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就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的这种开诚布公的谈话是在最高层的会晤中进行的。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把越南问题抽象出来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这次会晤讨论的不仅仅是双边问

题，而且还有国际问题。不久前在午餐的时候您曾经说过，对我们和你们来说，最复杂的问题是越南问题和近东问题。

今天谈论的不仅很多，而且话题也很尖锐(由于问题的性质这是自然的)，但是这样进行会谈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财富就是智慧。如果一个人不是自私自利地分析问题，而是客观地分析问题，那么他当然会找到明智的出路，摆脱困境。我们同意您的意见，即不能认为今天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已经结束。我提议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去吃晚餐，明天或后天我们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

柯西金：同时也应该好好想一想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尼克松：这是当然了。我还想说如下几点。我们在讨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会谈是非常有益的。你们直接而开诚布公地告诉了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受欢迎，并说出了原因，对此我很感激。正因为如此就应该进行这样的高层会谈。甚至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这个问题将会被解决)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尽管我期望这些问题不要太尖锐，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直接就这些尖锐的话题进行会谈。或许不是由我们，而是由接替我们职位的人来进行这样的会谈。我想请你们相信，我们将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有能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为此已经努力了3年半的时间。

基辛格访问苏联之后我们有些失望。在基辛格同越南人恢复秘密会谈的过程中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后我们逐渐发现，越南人在这些会谈中的立场比以前更加强硬了。总书记曾说我直接接受了他关于停火的建议。我们当时也声明说，4个月后将把越南撤出军队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建议完全被拒绝了。然而，总书记的想法是好的，并且我们将继续向这方面努力。

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我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借助温情脉脉、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进行解释。我不喜欢这样做。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是个诚实而讲求实际的人，我希望您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并理解我的观点。正如您所說的，不是我向越南派出了军队，您这样说是正确的。是肯尼迪和约翰逊向越南派出了军队，而我则把五十多万美军从越南撤回。这不是战争行动，而是和平行动。1972年复活节前我把驻越空军军事飞行的数量削减了40%，尽管有资料

显示，越南方面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并对我们在北越的部队构成了威胁。

正是由于考虑到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前景，我表现得非常克制，没有在前线作出强烈的反应。北越却违犯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1968年达成的关于停止轰炸的协议，在复活节期间派出大量部队越过非武装区。我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停止侵略。这就谈到了一个假设：这些行动可能会引起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成了一位危险的总统。我要强调说，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冷静和客观，并考虑到了所有的政治后果。

我知道，我国的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我希望您能够理解，对于北越扩张的威胁我是多么的认真。谢尔曼是我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将军，他曾说过：战争就是地狱。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比苏联人民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悲剧。同这些战争相比，越南战争只是一场小的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却有5万名士兵牺牲，25万名士兵受伤。我也想提醒一下：在北越军队最近发动的一次进攻中，有3万名北越平民被北越军队残害在南越境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北越人使用的是苏联武器。我不是要说，苏联领导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只是想在这次高层会谈中，在历史中的这一重大时刻说，我们想结束战争，我们不想把什么政府强加给什么人。我们希望停火。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缔造和平。

最后，关于柯西金先生所说的关于好好想想办法的建议，我们会努力的。或许，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不认为，苏联领导人真的期望，或者建议我们派基辛格参加巴黎秘密会谈，我们事先知道，谈不出什么结果。另一方不应该是为了要求我们投降才来参加会谈，而应该是希望进行谈判而来参加会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至今他们仍然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谈判，那么僵局很快就会打开。我们不请求苏联领导人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但是你们对自己这个盟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谈判中我们会很理智，但我们不会被人操纵。至今他们仍在企图把他们的条件强加给我们。无论怎样，我和基辛格都会好好考虑，或许还会想出一个新的建议。

柯西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如果什么都想不出的话就不是聪明的

人了！

勃列日涅夫：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谈话。我认为，这次谈话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谈话开诚布公，非常有益。我感觉，您的意思是：这次谈话还没有结束，应该再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每个问题都有很多的解决方法，只是应该找出那个理智的方法。我们认为，您最后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在您来访前夕，我们已经知道，您决定在这次访问期间不使轰炸越南问题复杂化。遗憾的是，这一点你们没有做到。您应该了解我们国内的状况，了解我们国内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看法。

基辛格：这指的是什么？

勃列日涅夫：就是轰炸海防和整个越南民主共和国。

基辛格：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的大使，海防周围一定的区域将不会被轰炸。你们说我们没有遵守这一点，你们说的情况我还不知道。

柯西金：我国海上运输部部长今天特地同那些船长进行了联系，这些船长向他报告说，美国的炸弹没有炸中他们纯属偶然。美国的飞机向我们的船只俯冲下来，在这些船的周围投下了炸弹。

尼克松：我们将调查这件事。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是违抗了我的命令。

勃列日涅夫：关于这件事你们应该理解我们的感情，但是我们仍然考虑到了我们要同您举行的这次会谈。当你们的轰炸造成了我们的一艘船只着火的时候，我们向你们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在报刊上报道这件事情。

波德戈尔内：尽管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柯西金：总统先生，您很清楚，在海防港口或驶向这一港口的苏联船只运送的是粮食和其他的非战物资，而不是武器。在这些苏联船只上没有一发子弹，没有一支步枪，对此您应该非常清楚。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亚历山德罗夫、瓦维洛夫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罗尔德、内格罗蓬特

会谈翻译：苏霍德列夫

会谈记录：亚历山德罗夫

瓦维洛夫

АПРФ, ф.3, оп.89, д.21, л.42-60

№06767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美苏解决越南问题的讨论(1972年5月27—28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1972年5月27—28日A.A.葛罗米柯与基辛格就越南问题举行的会谈

基辛格就美国对越南立场问题所言及其对我们在这方面希望明确的问题的答复，可以作如下归纳：

1.如果从纯粹务实的角度出发，就越南调停一揽子问题(包括军事和政治性质的问题在内)立刻达成协议可能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是那些可以而且必须在近期内达成协议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那些在前者实现之后变得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因为这时候——尤其是在美国完全从越南撤军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政治环境或新的政治现实，而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越南彻底和解问题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2.美国不认为自己与南越某个具体的政府有瓜葛。该国目前内部形势的发展及其进程显示，不但一些新的政治势力有可能问鼎政权，而且也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届时，美国将不会妨碍这一发展趋势，即使现在美国不会插手这方面的事务。

3.另外，在(谈判双方)就军事管制的一些举措(关于此我们将在后面提及)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人可能准备就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发表声明或宣言，其中他们会表示将单方面地承担一定的义务，以作为对所签署协议的补充。这些义务具体包括：

(1)同意南越必须保持中立。

(2)美国将不干涉这个国家内部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

(3)美国将准备限制自己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关于这些援助的规模将会详细地向签署协议的另一方作出通报。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就以前时期的情况而说的，而随着南越内部的形势发展进程，一些新上台的政治力量将会完全不希望得到此类援助。

美国也可能会发表共同声明，即根据协议与谈判的另一方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

——南越必须执行中立政策；

——越南联合政府必须在越南人自己内部(即没有外来干涉，由南方和北方)相互协商的条件下运转(这里基辛格补充道，这项内容实际上是著名的、由越南人提出的《七点》要求之一)。

4.综上所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已有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事件发展的这种总趋势，要求我们在关于军事管制一些问题的决议作出之前便采取行动，以便为后续事件的整体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5.涉及双方利益的最主要军事问题如下：

(1)停火；

(2)释放美国战俘；

(3)美国军队撤出南越。

关于停火，双方不一定非要采取签署正式协议的方式。如果美国得到苏联对此作出的必要保证，那就可能成为事实。

还需要事先考虑的是，最好能使释放美国战俘和美国军队从南越撤出——这两个过程保持同步并最后同时结束。

6.所有这一切可能为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营造更好的条件。在就上述问题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开始实施)之后，随后的6个月期间南越就可能举行选举。

在选举前一个月内，现在的西贡总统和副总统将离任。

将有专门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对选举的准备工作及其自由举行实施监督，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方式如下：“越共”(民族解放力量)代表占三分之一，中立集团——三分之一，目前的西贡政权——三分之一。在军事问题相关协议签署后，该委员会便可立刻开始工作。

7.为了协助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展开和确保南越自由选举活动的正常进行，(我们)打算事先便组织专门的国际观察团或由国际人士届时参与这些选举的准备和举行过程。此类观察团或国际人士的构成必须包括经双方协商后确定的国家(与此相关，基辛格具体指出，只有美国和苏联是可能的参与者)。

8.美国认为，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军队完全撤出，阮文绍辞职，签署相关协议，美国就诸原则发表声明等)将为南越的自由选举创造良好的条件。

9.已处于建立进程中的选举委员会将以联合原则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该委员会本身实际上是具有过渡性质的，类似于联合政府的机构。

还在对所有这些问题开始协商的最初，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联合政府的思想成为这个以经过略加伪装但依然脆弱的方式成立起来的政府的基础，虽然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一定会成为谈判双方的议题。

与此相关，美国准备在上述其单方面打算发表的关于诸原则的声明中补充如下一项内容，即不论自己的初衷如何他们都将接受选举的结果。

10.在对相关问题作出回答的同时，基辛格说，虽然他已经单独地向北越方面讲述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但在对我们的讲述中仍包含有如下新内容：

(1)(我们)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解释，美国提出各种建议的依据是什么；

(2)(我们)在对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没有采用这种统一的集中方式；

(3)(我们)没有对他们讲停火与政治调停之间的关系问题；

(4)(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关于美国打算在美国战俘彻底遣返的同时才准备完全从南越撤退自己的军队(近期，美国坚持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先遣返美国战俘，只有这样美国才将开始彻底撤军)。基辛格说，如果河内同意美方的这一建议，那么美国军队在今年9月以前或10月以前，即美国总统大选以前完全撤出(南越)就有了实际的可能性。

11.基辛格断言，白宫坚定地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有意不想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其目的是故意给美国社会舆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巴黎谈判已陷入死胡同，以便借助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尼克松总统施压，从而迫使其对河内的要求让步，这种情况在美国大选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基辛格说，这表明不论是在巴黎会谈期间还是在秘密会晤中如今的北越都是从纯粹的宣传角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基辛格认为，北越坚决拒绝讨论美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即使这一建议具有折中的性质，而只一味坚持要讨论他们提出的“七点”意见。

在白宫看来，这正好可以解释如下现象：在基辛格的莫斯科4月会谈之后，北越一方面同意恢复与美国人在巴黎举行的公开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又开始向南越发动了一场新的军事进攻，以便与北越一直坚持的纯粹宣传路线相呼应，从而最终导致这些会谈的又一次破裂。

12.最后，基辛格表示撤消由美国人提出并一直坚持的那些条件，即在恢复巴黎正式谈判之前先举行与黎德寿的秘密会晤；提前取得北越作出的某种保证——北越将以严肃、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今后的谈判。

如今，白宫同意以理解的态度来恢复双方的正式会议，美方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计划，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也可以这样做。

至于秘密会谈，基辛格说，我们当然期待越南人能够确认自己已同意举行此类会谈，只是该秘密会谈将只能安排在6月后半期，即双方的巴黎正式会议开始之后进行。

另外，美国人希望不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当越南人了解了关于美国已同意恢复正式会议的消息之后，便开始大声宣称自己又赢得了胜利并成功地迫使美国人投降。这样的话，基辛格强调，就会使情况变得

极其复杂。

ЦХСД, ф.5, оп.64, д.41, л.115-119

№10413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成立中国问题 顾问专家小组(1972年10月2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60/49гс号

机密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72年10月20日会议第60号记录第49项

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

一、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今年10月13日的决议，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属下成立一个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非长期脱离本职工作)。

责成顾问专家小组于1973年1月20日之前，就中苏关系问题准备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应该详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领导层中各派力量的对比，北京在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活动，中国问题发展的可能前景。

允许顾问专家小组视情况需要向各主管部门和学术机关索要必需的资料和文献，同时可吸收有关问题的专家参加该项工作。

二、今后，应视工作需要，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委托，吸收顾问专家小组参加研究某些方面的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为根据1969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决议(第149号会议记录第一项)成立的委员会准备材料。

三、批准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О.Б.罗满宁同志(组长)、Р.А.乌里扬诺夫斯基同志、Н.Н.伊诺泽姆采夫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Ф.В.莫丘利斯基同志、О.Т.博戈莫洛夫同志、Н.Т.费德林同志、В.И.拉扎列夫同志、М.Л.季塔连科同志、К.Е.谢西金同志、В.В.沙拉波夫同志、И.А.罗高寿同志。

№06768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谈话记录：越南通报与美国谈判情况(1972年12月27日)

摘自И.С.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3年1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所述情况记录

1972年12月27日

应黄文进之邀，(我)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接待大楼。

根据委托，副部长(黄文进)向我通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举行谈判的情况。他指出，越南总理范文同就这一问题已向苏联大使通报了基本情况。黄文进接着向我讲了如下内容：

今年12月18日，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函，建议黎德寿和春水与基辛格举行新的谈判，与此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实施了密集轰炸。期间，美国人前所未有地动用了大量空军，其中包括数百架B 52轰炸机，野蛮地杀伤和平居民。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美国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升级步骤，充分证明了其12月18日发来的建议函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

在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同时，黄文进解释道，美国在发来的函件中要求越方签署已由美方作了变更的协议。否则，华盛顿声称，将很难预料事件继续发展下去的后果，这就是说，美国人正以继续战争相威胁。

总之，副部长继续道，白宫撕毁了美方以前所承诺的义务，即在双方举行谈判和直到谈判结束期间，美国将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实施轰炸、射击和布雷等军事行动，减少对北纬20度以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地

区的轰炸和射击。

然而，美帝国主义所发动的这场新的战争升级行动，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遭到了惨败。侵略者们受到了严正的回击。在短暂的时间内，便有许多包括B-52轰炸机在内的美国飞机被击落，大量美国飞行员被俘。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包括美国一些盟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社会舆论都对美国的不明智行动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并立刻在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民众对越南人民正义事业的积极支持，鼓舞了越南人民和军队，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在巴黎专家会议上，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行动并恢复到今年12月18日美方声明所确定的状态，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双方才可能继续举行专家谈判以讨论签署协议的相关事宜。

1972年12月22日，在继续加紧轰炸北越的同时，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发来了新的函件，其中说明：美国空军将从12月30日半夜起停止轰炸北纬20度以北地区，但条件是越南方面同意让黎德寿与基辛格在1973年1月3日举行会谈。

12月26日下午，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方的上述两封来函作了答复。在自己的复函中越方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战争升级的残暴行径，拒绝了在美方来函中所包含的最后通牒式的所有要求，揭露了尼克松当局在巴黎谈判中的背信弃义。越南民主共和国还要求美国立刻停止战争升级的侵略行动，放弃以威胁恫吓谈判进程的幻想。只有在美国同意恢复到12月18日以前状态——在谈判举行直到结束期间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所有轰炸、射击和布雷活动并减少对北纬20度以南地区的轰炸和射击——的情况下，双方代表和专家在巴黎的会谈才可能继续，而美方建议的黎德寿与基辛格的会面才能够举行。

不过，由于黎德寿同志的身体健康原因，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华盛顿通报，双方的会谈只能于1973年1月8日举行。越南方面在去函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严肃态度，目的就是让对方明白，越方正竭尽全力与美国代表一齐解决所有遗留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也采取同样严肃态度，并指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双方的谈判才可能获得结果——尽快签署停战协议和恢复越南的和平。 [16] 如果美国仍将顽固地继续推行其战争升级政策并企图以武力来要挟谈判进程，那么由此所导致的战争进

一步深化的责任将由美国方面完全承担，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将会以全部的决心继续这场斗争。

越南同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所有威望和影响对美国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停止新的战争升级行动，立即返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的状态，并为解决所有遗留问题和尽快签署(停战)协议举行严肃的谈判。

在向对方的通报表示感谢之后，我答应把上述情况通报给莫斯科。我又询问对方，苏联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该信息来对华盛顿进一步施加压力。

黄文进答，苏联同志可以充分利用该信息。要让美国人相信一点，即在双方举行谈判直到结束期间只有在北纬20度以北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减少在北纬20度以南的军事活动，双方才可能恢复巴黎会谈。越南副部长顺便指出，尼克松以前也正是这样向越方承诺的。

在谈话结束时，黄文进说，越南同志请求苏联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尤其是其轰炸河内和海防的活动，以便动员世界社会舆论来谴责美国的侵略。越南朋友还请求我们，委托苏联驻世界各国使节也开展相应的工作，以便这些国家也能够声援越南。苏联领导人的发言也将有利于阻止美帝国主义干涉越南内部事务。

对此，我说道，苏联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在广大公众的面前Л.И.勃列日涅夫在发言中曾严厉谴责了美国的活动。近期，在发言中表示支持越南的还有А.Н.柯西金和П.Ф.巴季茨基元帅。顺便说一下，这些发言均曾被刊登在河内的报刊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苏联使馆参赞И.А.诺维科夫，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单德浩——译员。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С.谢尔巴科夫

ЦХСД, ф.5, оп.66, д.783, л.9-12

1973年

№1041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兄弟党中央国际部 代表会商中国问题(1973年4月9日)

绝密

第77/41rc号

1973年4月9日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73年4月9日会议第77号记录第41项

关于7个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就中国问题举行例行会晤事宜。

一、同意苏共中央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关于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各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于1973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例行会晤的建议。

二、批准给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附件)。

三、若蒙古朋友同意将会晤地点由乌兰巴托改为莫斯科，责成苏共中央联络部与其他参加会晤的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进行必要的协商。

四、会晤的组织和技术保障工作由苏共中央联络部、苏共中央国际部以及苏共中央总务管理局负责。会晤将在“沃伦斯克1”号别墅进行。

会晤的一切费用从党费预算中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77号会议记录第41项

乌兰巴托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说受委托就7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进行中国问题秘密会晤的地点问题与蒙古朋友进行协商。

考虑到，据蒙古朋友通报，即将举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已经传到外交使团，为确保机密，可研究今年将上述磋商改在其他地方进行的问题。

从我们一方来讲，我们准备建议拟定中的中国问题会晤于商定时间内在莫斯科进行。

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这一建议没有异议，那就该问题与其他兄弟党中央国际部进行非正式协商，可由蒙古同志自己出面协商，如果他们认为合适，也可由苏共中央联络部出面协商。

电告执行情况。

ЦХСД, ф.4, оп.22, д.1077, л.21-22

№06770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的会谈记录：巴黎会谈情况及越南局势(1973年6月14日)

摘自И.С.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3年6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的会谈记录

1973年6月14日

应黄文进之邀，我前往越南政府大楼与之会谈。

副部长向我通报了最近一轮黎德寿与基辛格先生在巴黎谈判的情况。此次谈判是在萨利文从西贡、基辛格先生从华盛顿各自返回之后举行，时间是从今年6月6日一直持续至6月9日。谈判期间，双方就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最终达成了相关约定。然而，6月7日美国人竟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说，西贡当局不同意联合公报的内容并在6月9日对其作了一些修改。越南方面坚决地谴责了美国的不严肃态度并积极反对美方拖延签署联合公报的举动。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人建议把双方下次会谈的时间推迟48小时。6月12日，基辛格先生返回巴黎，恢复了双方的谈判。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坚决立场，美国人撤消了自己对联合公报最初文本的修改和补充，并由四方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西贡当局)和双方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分别在相当于巴黎协议的联合公报上签了字。

接下来，黄文进又讲述了如下内容：

与原始方案相比较，联合公报和所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不同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辑、签字和公布的日期、根据协议落实一系列举措的期限等方面。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无误的内容包括：关于美国重新开始清除越南民主共和国水域的水雷，重新恢复混合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释放公民和战俘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近一阶段的斗争任务相当复杂而艰巨。从一开始，我们便对美国人声明，新一轮会谈的目的——与美国一道总结谈判期间所获成果并寻求措施以严肃、坚持不懈的态度履行双方协议的内容。越南民主共和国视这项工作为一场外交斗争，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和西贡当局执行巴黎协议。在谈判期间，美国试图使谈判获得一定成果的目的在于，转移美国社会舆论的视线，从而使尼克松当局摆脱由于水门事件，以及在印度支那，尤其是在柬埔寨所陷入的困境。在整个会谈期间，美国都企图把履行协议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联系起来。越南方面坚决地驳斥了美方的上述观点并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即印度支那两个越南邻国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人民的内部事务。越南民主共和国始终不渝地支持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老挝爱国统一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王国政府的正义立场。越南方面要求美国停止轰炸老挝和柬埔寨，严格履行万象协议，必须停止支持朗诺政府并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和抵抗力量举行谈判。

联合公报的签署是越南为履行巴黎协议而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新的重大胜利。联合公报并没有对原有协议作任何变更和补充，只是集中叙述了确保该协议得以履行的措施。尤其重要的是，联合公报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签署的，即美国和西贡当局经常性地严重违反既定协议，诬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企图将违反该协议文件的罪名强加到后者身上。如果联合公报中所列各项条款能得到执行的话，就可能为南越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并再次确认越南南部的现状：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和两个地区共存。该文件(指联合公报)为南越双方共同解决国家南方的内部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对美国而言，只有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承担的义务。为使联合公报中所达成的协议和约定得以切实履行，我们仍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时刻保持

警惕，因为美国方面和西贡当局有可能刻意歪曲公报内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误导世界公众舆论。针对美国和西贡方面可能实施的各种旨在破坏协议和后续约定的活动，我们将继续予以坚决的斗争。

鉴于联合公报的签署，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交部将发表声明，其中将指出越南人民所赢得的这场新胜利的意义，明确双方对签署该公报所持的良好意愿和严肃态度，同时也将要求签字各方严格执行协议和联合公报中所列的各项内容。

黄文进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对联合公报的签署持欢迎态度，请求苏联领导人在发言中以及通过新闻报刊和社会组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交部所发声明表示支持，并要求美国和西贡当局严格履行协议，揭露后者对联合公报内容的歪曲，及时地谴责后者所制造的阴谋和旨在破坏协议和后续约定的活动。

黄文进向我转交了带有四方和双方签字的联合公报的文本，并指出签署联合公报是“我们整体上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我感谢黄文进所作的上述通报并承诺将向莫斯科作出相关报告。我向对方保证，苏联会以相应的方式来对联合公报，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给予支持的。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工作人员武蔻，苏联使馆译员B.B.谢拉菲莫夫。担任此次会谈翻译的是武蔻。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С.谢尔巴科夫

ЦХСД, ф.5, оп.66, д.783, л.146-149

1975年

№24836-2 雅科夫列维奇的回忆：关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17] (1975年)

1951年9月初，我被叫到了党中央，受命马上飞往中国。这是由于要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树。1950年冬到1951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的时候请求斯大林派遣一个专家小组来开办一个橡胶种植园。该小组由9人组成，其中两人是B.A.多加德金和П.И.扎哈尔琴科，他们是橡胶问题专家，其余人同橡胶问题有部分的关系。对于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派遣我前往中国，得到了如下不容反驳的答复：橡胶是从橡胶树中得到的，你是一名林业专家，请克服困难了解同种植橡胶园有关的一切问题。

收集和熟悉资料的时间只剩下三天。B.H.苏卡乔夫给了我一本植物学教科书，书中有关于橡胶的一点内容。我带领专家小组于9月13日抵达北京。从1951年到1959年我到过中国九次。前三次都同种植橡胶园有关。这些橡胶园被设在广东省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这一工作的规模很大。到1957年，经过我们的技术援助，在50名苏联专家的参与下种植了大约12万公顷的橡胶园。

以后几次前往中国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提供技术帮助，组织和开展林业工作。在中国的24个省份中我到过和工作过的有12个。曾经几次到过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哈尔滨、杭州、长春、雷州。每次到中国都会会见中国同志，并同他们一起工作，这都使我感到满意，并对他们充满友好的情感。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种植橡胶园非常感兴趣。党中央在工作上给予我们的巨大信任保证了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组织，即使在危险的条件下也很安全，苏联专家的生活也都得到保障。

我想谈一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陈云同志。他个子不高，瘦弱的样子，黑黑的，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为新的工业部门做了许多工作。随着中国以自己的力量、依靠苏联的工艺建造汽车厂，这些新的工业部门的意义增长了。当报刊报道说，当陈云被免职之后，我内心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位革命家的名字被红卫兵写在大

街小巷的大字报上进行辱骂。

另一个让我留下印象的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在北京政务院的院子里我同周恩来就橡胶种植园问题举行了会谈。我方参与会谈的有：苏联大使潘友新同志、苏联专家小组成员A.И.格拉乔夫、B.C.舒马科夫和大使馆译员B.A.克拉夫佐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财政部长薄一波、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和翻译马列。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谈。周恩来喜欢对一些看法提出疑问，在外交上非常仔细，对于我们关于种植园的状况令人不满的报告他感到不满，与其说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使他警觉起来。总理是位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是名老共产党员，曾在旅德和旅法的中国人中开展宣传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北京举办的招待会上以及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在维辛斯基的办公室举行的接待仪式上同他见过几次。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现在，周恩来都是毛泽东身边最为重要的人。他是名狂热的反苏分子，他以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隐藏起来，这是可耻的。

在满洲的黑龙江以及在苏联的远东进行考察的岁月里，同中国的林业工作者一起开展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对阿穆尔河流域的生产力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开发和植树造林的路线。在阿穆尔进行考察的时候，我带领了一个林业小队，其中有50名苏联林业工作者。

但是到1958年，在我们的关系中就出现了裂隙的征兆，到1959年这种征兆就更加明显了。仅仅通过两个事例，然后就表现出了中国人说得轻一点就是不友好的态度。1958年夏，中国的一个大约30人的专家小组到达了哈尔滨，以便根据双方早先通过的计划继续开展联合调查。除了科学家之外，该小组中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副部长冯(他的俄语很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张克侠(他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中国人坚持改变以前的协议，他们想沿阿穆尔河直接通往尼古拉耶夫斯科市，也就是直到阿穆尔河的河口，以便了解这一亚洲巨大的水路干线两岸的森林资源。在我们看来，沿阿穆尔河进行考察没有任何必要。我觉得，中国人有深远的图谋。我曾两次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坚持要及时征求莫斯科的指示(见我的日记)。我们的考察队领导人没有这样做。我们乘坐“谢尔盖·拉佐”号轮船沿阿穆尔河航行，中国水电部副部长冯在同我进行的谈话中想知道我国的森林储量。冯说：“在远东许多森林都消失了，腐烂掉了。森林资源被利用得太少了。”我回答说：“我们

利用的森林资源只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对木材的需求。森林任何时候都是不会被砍完的，也砍不完。森林会自我恢复。枯死的只是一些老树。”冯问道：“如果中国派遣100万个家庭来与俄国人共同开采森林，您觉得怎样？”我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在估量100万中国家庭的数量，想象中国人口的数量将达1000多万，而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苏联人口才为450万。远东将会怎样呢？我回答了冯的问题。“你们提出的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的职责只是做一些技术工作。如果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程序向苏联相关的部门提出。”这次会谈一年半之后得知：中国人绘制了一幅行政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我们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按照新的走向划分的。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到尼古拉耶夫斯科市阿穆尔河右岸的所有领土，也就是地图上标出的整个滨海区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南部都属于中国。

第二件事情。1959年9—12月，应中国方面的请求我到沈阳的中国科学院森林和土壤研究所工作，以便写一部关于中国东北森林资源及其加工和利用的专著。我需要查看40—45年前德国人在滨海区青岛收藏的一些主要文献。为此我到了北京。一天后，中国的翻译通知我说：经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协商，外交部请求转告我，我的青岛之行需要推迟到其他的时间进行。

РГАЭ, ф.538, оп.1, д.16, л.80-84

№25984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澳门情况及中国的立场(1975年5月5日)

供同葡萄牙外交部进行磋商而使用的材料

1975年5月5日

第202/Ідвнс号文

副本

关于澳门问题

供参考：

澳门位于中国的南端，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人，其中葡萄牙人只有1万人，其余的是中国人。

1557年，葡萄牙获得了对澳门的租借权。1887年的《中葡条约》确定了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地位。

葡萄牙新政府宣布了放弃自己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意图，但没有表明立刻将澳门归还给中国的明确的意愿，虽然它指出，澳门问题不应当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葡萄牙新政府没有正式确定这一地区的地位。1974年9月，外交部长M.苏亚雷斯没有将澳门称为殖民地，而是称之为“受葡萄牙管理的贸易港口”。葡萄牙外交部在今年1月6日的声明中强调，“在两国政府认为任何适当的时候，澳门地区可以成为谈判的对象，眼下，葡萄牙政府正担负起严格维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居民的权利的职权”。

中国领导人认为澳门(像香港一样)是“被强占领土”，并始终强调，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使澳门回归中国。北京领导人认为，收回香港和澳门是收回台湾的首要前提。同时，北京拒绝承认澳门和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1973年3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将香港和澳门从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列表中删除。

中国人不仅对葡萄牙新政府非殖民化方面的举措避而不谈，而且通过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对非洲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以阻碍葡萄牙在非洲领地的非殖民化，从而阻止这一进程波及澳门，随后是香港。不久前，葡萄牙协调领地之间关系的部门代表承认，葡萄牙和中国政府已经就今后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现在没有将这一地区转交给北京的任何计划。身为“武装力量运动”成员的新任澳门总督F.莱昂德罗上校宣称，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这是“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人以及中国和澳门政府的普遍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这种立场的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对收回澳门和香港(收回澳门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不感兴趣，因为这会使北京失去大量的外汇收入(每年澳门使北京获益约5000万美元，而香港每年使北京获益多达12亿美元)。

同葡萄牙外交部在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如果谈到了关于我们在澳门

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可以谈论如下内容。

作为非殖民化的坚定支持者，苏联真诚地欢迎葡萄牙民主政府使其前殖民地人民享有独立自主的愿望。我们认为，葡萄牙外交部今年1月6日的声明是非常自然的，是与葡萄牙政府的民主路线相符合的，声明中表达了愿意在任何对葡萄牙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合适的时间开始谈判，以确定澳门的未来。我们认为，关于澳门的未来问题可以并且只应由相关各方，即葡萄牙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解决。

但是，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及其在各种国际组织的代表们都曾郑重表示，赞同尚未获得民族独立的一切领地尽快非殖民化。当实施非殖民化纲要的葡萄牙政府宣布使葡属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举措时，中国领导人却违反自己的宣言，不仅不支持葡萄牙政府的这些意图，反而妨碍它们的实现。

至于澳门，为了掩盖向其他民族发出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号召与容忍在中国领土上存在殖民地的自身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早就反对承认澳门及香港为殖民地。显然，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密不可分，由于害怕失去从澳门获得的大量外汇(万一澳门出问题的话)，北京的领导人显然不打算提出这一问题。不排除中国人会对葡萄牙的政策进行攻击，以掩盖其在公正解决澳门问题中所设置的障碍，因为不这样的话，北京很难保持其作为争取殖民地国家各民族获得解放的“战士”的伪装。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 ф.0100, оп.62, п.268, д.28, л.1-3

№16061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出席各兄弟党 中央国际部代表会议(1975年6月13日)

绝密

第173/101rc号

1975年6月13日

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例会的指示及苏共代表团成员。

1.批准出席例会的苏共代表团成员为：О.Б.罗满宁、Б.Т.库利克、В.И.拉扎列夫、М.季塔连科、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В.Г.托尔斯季科夫、С.Н.莫罗佐夫、察连科等同志。

2.批准苏共代表团的指示(见附件)。 [18]

3.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费用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收到15天后应退回苏共中央(综合部二处)

苏共中央1967年3月28日规定

ЦХСД , ф.4 , оп.22 , д.242 , л.1-4

1977年

№08117 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年1月17日)

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政策的通报

毛泽东去世后(1976年9月9日)中国事件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存在深刻的国内政治危机，它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这是毛主义思想和国家客观需求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的反映。一个月之后，10月初，粉碎了极左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即毛的亲信，他们是近10年来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中国发生了军事政治变革——改革，结果导致以稳定发展国家经济和增加国家实力为目标的力量上台。“别说空话了，该干具体事情了”——如果按其声明来看，中国新领导的内政方针就是这样，其目标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康生、董必武去世后，自邓小平被解职和“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后，中国领导上层出现了新的形势。毛泽东所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2名委员中，被解职的有10人，他们主要是年迈的活动家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起来的人。结果，军人的影响明显增加了(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等)。现在，所有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公安部长，都集于华国锋一人之身，出于多种原因，他在中国领导层里安置了多方面的力量。政治局里保留了某些亲近江青集团的活动家(纪登奎、倪志福、吴桂贤等)。中国新领导人里不完全统一和相互信任，这使统治上层内部形势复杂，制约着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干部和其他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不稳定，现在全国已展开斗争。卷进去的是党政军干部。根据掌握的情报，“四人帮”一派的人占十大(1973年)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省、地区、县的党政机关中大体也是这个比例。实际上，在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企业里都很紧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人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全国许多地区(福建省、湖北省、河南省、江西省等)发现了广泛的政治斗争甚至武斗的征兆。

新的领导人至今不能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解决根本的组织和干部问题，看来暂时他们没能力制定和普及自己的政治和未来的社会经济纲领。从最近公布的文件看，其中包括华国锋讲话，谈的只是新领导最近的行动计划。新领导强调忠于毛泽东的旗帜，捍卫“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直接将其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对抗。华国锋和支持他的人所主要关心的是巩固他们的领导地位，稳定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报刊开始出现披露中国严重经济状况的材料。众所周知，这是毛泽东政策的结果，不过现在把这推到了“四人帮”身上。强调所有部门的产量都大大下降了。现在国家在寻找财政资金和物质资源以生产商品，尤其是食品，供应居民和保障出口方面正经受困难。

考虑到至关紧要的经济任务，现在北京已提出某些问题，表明要重新审核毛的一系列方针。最近重新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发出了号召——的确是一般号召，号召在经济中，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要根据中共八大决议行动(八大于1956年召开，所确定的方针基本上符合国家的客观需要)，正在采取理顺经济管理的措施。北京正在召开煤炭、石油、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以及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农业问题会议。领导人的讲话和出版的经济材料中都强调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对巩固政权、加强国防能力和逐步改善居民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

正在采取活跃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措施。恢复某些创作知识分子代表积极活动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但这些措施很不彻底。

新的领导在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问题上依然坚持毛的思想，同时努力避免对国家非常有害的方针。但新的领导在保卫毛的路线不受“歪曲”的旗帜下，把近年来一切过火行为的责任都推到了“四人帮”身上。现在的北京领导人明显的力图保护毛泽东的名望以为自己服务。已开始建毛纪念堂，作出了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北京新领导的对外政策方针基本没变。北京努力强调要忠于毛生前的外交政策方针。这首先是因为新的领导首先要处理大量的国内发展问题，另外，他们完全站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中国同美国政治结盟路线没有明显变化。依然在“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努力同美国接近。新的中国领导人努力扩大同日本的联系，表示近来出现的困难，尤其在贸易方

面，是临时的，是在“四人帮”影响下制定的“错误方针”造成的。北京同华盛顿和东京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以及美国和日本议员以及其他代表对中国的访问出现了某些活跃。同时，北京没有表现出准备放弃对美国(台湾问题)和日本(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的要求，这使它们最近的向前推进相互关系成了问题。新的中国领导人对美、日政策的实质在于企图加深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同时千方百计加剧这些国家同苏联的紧张关系。

对西欧，中国的政策是支持必须发展军备(由于所谓的“苏联威胁”)和一体化进程的概念；发展同西欧的经贸联系，以便获得新的技术和装备。

至于“第三世界”，中国没有放弃把这一地区变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为了这一目的，北京积极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高级活动家来访。在给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同时，把毛的概念强加给它们，其中包括敌视苏联的概念。

按照毛泽东的老公式——对苏联实施打击，同时对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怀柔”的方针，北京详细地审视了以前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策略。北京的首领们暂时克制自己不批评其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并单方面宣布中国打算同它们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但有一个条件，它们得表示出主动。北京想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有选择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以此破坏它们一致的对华政策，使它们脱离苏联。很明显，北京依然想让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对抗。

中国的新领导想起了——按照毛的特别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发展的因素，骤然加强了同国外亲北京集团的联系。近来，北京领导，其中包括华国锋，同这些集团的代表进行10来次会见。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的交往没有减少。

在苏中关系上，中国新领导没有采取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态度。不允许可能使苏中边界形势复杂化的行动。贸易和交通运输进行正常。中国官方人士同苏联人的交往有些增加，在讨论苏中关系问题上，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任何行动，表示想真正响应苏联的建设性步骤。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公开声明，说明政治上的反苏路线是连续

的。为了给自己的这一行为辩解，北京企图把我们的步骤说成是烟幕——其背后是侵华意图；依然肯定，似乎苏联“威胁”着中国；重新在正式文件中确定“坚决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依然在各个宣传环节上大力进行反苏运动。实际上，苏联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在国际场合敌视苏联的活动有增无减。在联合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在第三国家以及在同北京的各种外国代表工作时，北京的反苏积极性一点儿也未减弱。

在197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苏中边界谈判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僵持立场丝毫没有变化。中国方面宣布，苏中关系能否好转，实际上取决于苏联是否首先单方面采取“符合两国利益改善关系的实际行动”。而且强调，这些行动的关键环节“依然是苏中边界问题”，自然是让我们承认“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的领土要求。

北京领导们的反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问题联系在一起。放弃这一方针，不可避免地就要求中国领导改变对缓和、裁军、停止核试验问题的消极态度，根本改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立场，根本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反苏政策刺激着北京的大国欲望和民族主义欲望，后两者是毛主义学说的基础。同苏联的关系如果真的迈上正常化轨道——这将使新的领导人失去一个“论据”，即并不存在所谓的“外来威胁”，想以此转移人民对严重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

这样，在国内政策方面，中国新领导人一方面宣布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方面逐渐为更现实地，尽管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解决早已成熟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创造着条件。不过中国国内形势许多东西还未明朗，围绕国家进一步发展道路的斗争的结局尚不清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45—4553页

№08118 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1977年4月11日以前)

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

最近几个月中国出现的事件引起了普遍关注。毛泽东之死和中国最

高领导层人员的变动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动因，但还有其更为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即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决议中以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讲话中所原则指出的中国所存在的复杂的国内政治过程。苏共中央向二十五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毛主义思想和政策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评价现今中国领导的政治活动时必须看到，毛留下的反苏主义，歪曲科学社会主义，大国自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并且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国内客观存在着毛主义赖以寄生的因素，其中包括拥有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民，民族主义偏见严重，工人阶级相对薄弱而且分散，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很低。

1976年，在毛的丧事还未办完之前，中国领导内部激烈的夺权斗争就开始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毛的遗孀)和姚文元均被解职且被逮捕。被宣传界称之为“匪徒”、“反革命分子”的毛的4个主要亲信被解除权力——这是毛主义思想和现有国家政治制度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以华国锋为首的现在的中国领导清除“四人帮”的行动以及使“极左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名声扫地的措施，博得了大部分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一行动表明了党、军队和居民对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提拔和支持的极左分子的深深厌恶，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近年来的极左和动荡的否定态度，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所执行的毛的方针的反感。

尽管新的中国领导核心不是清一色的，其中包含有老中青党政军干部的代表，反映着各主要集团的利益，但他们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基础同这几年下台的那些人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他们基本上都奉行毛的概念，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尽可能短的期限里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也不排除他们有不同于这条道路的观点。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远没有结束。现在，25名中国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第十次代表大会，1973年)，只剩下16人了。其中只有9人经常在北京，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政治局常委会。5名中央副主席只剩下一位叶剑英。没有召开中央全会，因为它的成员30%是“左派”。许多高级国家领导岗位还空着，其中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位。

今天全部权力集中在华国锋一人手里，他控制着党政机关和社会安

全机关，控制着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叶剑英和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但华国锋的地位暂时还远未巩固。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的任命。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命。围绕邓小平和其他以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恢复名誉问题而持续的尖锐斗争将使形势复杂化。看来，华国锋把邓小平视为同自己争夺权力的潜在对手。但形势可能这样发展，邓小平可能有机会在领导集团中起作用。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一方面，邓小平发表过公开的反苏声明；另一方面，他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审时度势。

军队是推翻“四人帮”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是控制全国形势的实际力量。军队是反对“四人帮”运动、经济、文化、民族政策、干部安排使用的定调人。逐渐证实了毛泽东原则的正确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现在部队里并不统一。

在现阶段新领导提出了以下任务：把粉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开展人民思想教育的新阶段；整党；振兴经济。

除“四人帮”之外，在中央和地方，四人帮的爪牙和亲信也受到批判和清理。

清理和伴随而来的内部斗争使形势复杂起来，加剧了党政机关里的分歧，中央关于进一步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决定和指示常常受阻，在地方有消极情绪，在被废黜的人影响大的地方，出现对清洗运动阳奉阴违。看得出，这是因为，清洗涉及的领导干部面很广。顺便提一下，“四人帮”的追随者或他们的同情者占居民的1%。这也就是说，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

在中国，出现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党、国家机关、经济纪律松弛，甚至军队也是如此。中国报刊上承认，中国出现了“反对华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的行动”。地方上尖锐的派性斗争仍在继续。党的活动能力依然很低，工会、青年和其他组织仍无活动。形势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在保护名声已经很臭的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新的领导力图保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它作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制度的工具，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粉碎“四人帮”集团被说成是“完成毛的遗训”。完全与事实相反，说“四人帮”破

坏“文化大革命”和最近的政治运动，反对毛“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

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化的一个原因是严重的经济困难。1976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明显下滑。与1975年相比，1976年工业各部门减产5%—10%，农业减产5%。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同外国代表会谈时承认，中国经济现在已“全面崩溃”。工业、交通运输已经瘫痪。1976年中国仅生产2100万吨钢，即比1975年减少400万吨。正如中国领导人自己承认的，全国已感到“能源紧张”。粮食问题严重。根据中国政府宣布，今年农业形势严峻。中国已签订1977年向国外购买600万吨粮食的合同。外汇储备不足。1976年底，中国卖了80多吨黄金，换取3.5亿美元。

经济形势迫使中国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工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实行经济核算、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积累、加强劳动纪律等任务。但是提高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打算运用中国建国初期一些有效措施，暂时只不过是宣传一下而已，还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

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和在2000年使中国跨入世界强国行列的目标，需要巨大的物质资源。但是，现在近40%的预算拨款都花在了国家军事化上。继续这一方针和加快实现军人要求的军队现代化将大大制约与国防没有联系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使本来就渺茫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化为泡影。

现在的中国领导在各种正式讲话里，在其宣传和实践活动中，重申奉行毛生前制定的外交路线。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1976年12月25日农业会议上讲话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定地贯彻……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国其他官员在讲话中也多次表示这种态度。

现在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中国变成具有自己影响范围的世界政治中心。这一建立在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基础之上的在国际舞台追求霸权的方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恶毒的反苏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同苏联全面对抗；
- 颠覆社会主义大家庭，同他们发展关系时区别对待；
- 在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缓和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等方面

力图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盟；

——促进西欧军事政治一体化和军国主义化进程，促进加强北约，使其成为对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力量；

——把日本拉入敌视苏联的联盟；

——颠覆苏联在东南亚、中近东和南亚的阵地；

——继续加紧建立亲毛派别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抗；

——拼命把“第三世界”国家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代表积极利用国际讲坛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好和平政策。中国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继续猛烈地抨击苏联，而且他们发言的调子和内容同毛生前没有什么两样。中国依然反对任何裁军措施。中国代表团在三十一届联大会议上投票反对关于签订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决议，反对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决议，断然反对召开联合国专门裁军会议，尽管众人皆知，这一建议是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

新的中国领导不仅企图制止裁军措施，而且积极地发展中国的核潜力；在毛死后又进行了3次核试验，继续研制远程导弹。中国大力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和装备。

北京继续寻找机会，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结盟，并在实际活动中扩大同他们的联系。在同美国关系上，保留着中美在共同反苏的基础上互相接近的危险趋势。

北京没有放弃利用苏美矛盾为自己的大国目标服务。中国领导人力图使美国坚定反苏方针。在同美国代表会谈过程中，尤其是1976年10月在同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会谈中，中国新领导人宣布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国际利益”；断言美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安抚苏联的政策是短视的，必须在太平洋地区、亚洲(迪戈加西亚岛)、欧洲和近东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企图为苏美之间达成新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制造困难。

另一方面，北京正在探索接近华盛顿新的行政当局的途径，企图清除同美国进一步有效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北京暗示准备在台湾问题上采

取灵活立场。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著名三项条件(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宣布美台相互防御条约作废),同时强调,对中国来说,主要问题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与这个问题相比,解放台湾是第二位的,这个问题可拖到以后不定期的某个时候,只要美国愿同中国在国际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合作。

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就双方财产需求问题进行谈判。

新的美国行政当局还表示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存在这种可能性。顺便指出,美国各界不断议论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带有国防性质的设备和技术的問題。在这方面不能排除有作出什么决定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今年1月11日在国会上的声明)。

中国对日本也采取类似立场。加强两国交往的目的是促使日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把1972年共同声明关于双方反对第三国“霸权”的第七条写进条约——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按照中国人的设想,该条约应具有反苏的性质。同时,中国活动家们(如廖承志)竟然达到公开威胁的程度,暗示到本世纪末,“日本不得不同强大的中国打交道”。使用压力同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引诱”日本这种“细致”方法相结合,企图以此推动陷入僵局的条约问题。近来明显的企图活跃同日本的经贸联系,双方互派了重要的经济代表团(1—3月)。中国官方人士和报刊对福田赳夫今年2月5日关于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周围实行12海里领海的声明默不作声。

北京仍继续号召西欧国家加强“欧洲团结”,对抗“苏联对西方的威胁”。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同西方客人会谈中也散布这种荒谬的思想,如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同司法部长布罗德为首的奥地利代表团会谈时威胁说,似乎在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形势尖锐的情况下,奥地利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华沙条约国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他建议奥地利人提高国防能力,研究小国越南反对大国侵略的经验。

在反对与欧洲缓和、合作的斗争中,北京明显地寄希望于带有复仇情绪的右翼政治活动家们的帮助。今年以来北京做客的有英国保守党代表——保守党总部国际部主任男爵夫人埃莉斯和英国原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保守党议员埃默里;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被邀4月份访问北京。众所周知,近年来北京在欧洲臭名昭著,是主张重新划定欧洲边界、使

两个德国合并和猖狂反对大陆缓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同谋者。不久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之一，巴登符腾堡州总理菲尔宾格访问北京，受到华国锋亲自接见，中国领导想借此表明西德问题仍未“定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反动右翼集团以及北约南翼，尤其是西班牙，也是北京“关注”的目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人士，考虑到中国形势还未彻底明朗，因而在对华政策上很谨慎，许多西欧国家由于北京同极左集团调情已表示出警惕。

北京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把“第三世界”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活动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北京千方百计讨好他们。给他们亲自送礼，答应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以换取他们的反苏行动和支持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活动。

为了向近东和波斯湾地区渗透和扩大自己的影响，颠覆这一地区各国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利用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的俾路支斯坦和普什图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关于塞浦路斯、大陆架归属问题的分歧。

根据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一切活动的方针是，鼓励一些近东国家同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军事政治联系，阻止东地中海地区缓和紧张形势，为自己在这一区赢得巩固的阵地。北京继续搬弄所谓的“苏联威胁”命题，其主要目的是推动诸如伊朗等这些国家发展军事潜力，以此加剧这一地区孕育着战争危险的紧张形势。

北京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积极施展外交手腕，不久前周恩来遗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对缅甸的访问便是证明。在南亚，中国在同印度关系正常化的幌子下，保留着建立在反苏基础上的普遍的反印政策方针。可以相信，北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利用印度变化的形势颠覆苏印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况且中国人早就想使印度、孟加拉以及斯里兰卡的形势向右转。为了吸引人们对中国对南亚次大陆外交政策真正内容的注意力，中国将继续反对苏联在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洋的政策。中国没有放弃对东南亚国家内政的干涉，支持这里的反政府集团，为亲华的和以右倾为趋向的暴乱分队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领导人表示赞成赋予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军事政治性质，宣扬必须加强它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事同盟的联系，从而表明了自己对这一地区保持美国军事存在的兴趣。

在非洲，北京正利用年轻的非洲国家渴望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心情以及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和依赖别人的倾向，甚至利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为自己的反苏目的服务。北京打着反对“超级大国”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幌子，强拉硬扯，企图把这一切同其反苏活动联系起来。北京靠提供经济援助以在非洲推行反苏政策。到1977年初，中国人答应给非洲国家的贷款总额近20亿卢布(几乎占中国援外总任务的60%)，在20个非洲国家工作的中国专家有6000人。中国对扎伊尔、刚果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还补充以军事合作，企图以此缓解它对安哥拉问题上的政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而放手对非洲制度施加思想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形势用不了多久便会使北京失去这种优势。

中国领导把自己伪装成“安哥拉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实际依然同安哥拉国内外的反对派，首先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左倾集团保持着联系。中国没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近来由于扎伊尔事件，北京不断攻击安哥拉，想在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中损坏其中一个国家的名誉，以此分裂反对种族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对南非问题的立场表明，中国人对调解那里的重要问题不感兴趣。中国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是，扩大南非冲突，从而加剧世界矛盾和紧张局势，加剧苏美对抗；破坏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完全在同帝国主义“对话”的范围里“解决”问题。中国宣传只是表面谴责索洛贝里和比勒陀利亚制度，表示理解美国和英国在南非的政策，同时把苏联说成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

中国想通过“声援”和“支持”拉美国家的政治要求和倡议，尤其是在200海里领海、在特拉捷伦科两次会谈的基础上实现拉美无核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在地区合作问题(在拉美建立政治组织，建立加勒比海地区共同立场、建立拉美经济体系组织)上的要求和倡议，求得与拉美国家政治上的接近。

在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做工作的时候，重要的是应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密切协调，给他们解释我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意义，剖析中国领导旨在反对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利益的政

策，揭露中国在安哥拉、南非问题和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等问题上所持立场和所采取行动的真正目的。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上，北京努力实施“区别对待”策略，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一致的对华政策。

中国方面正加紧活动，试图把这种概念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中国保持反苏方针的情况下，它也有广泛的可能性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贸易、科学合作、文化和旅游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宣布，中国准备接待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派出所有部长级甚至国家代表团以讨论两国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他建议恢复文化和体育方面的交流，开展卫生领域和科学院系统的联系。中国方面的这种想法还向保加利亚和波兰代表讲过。中国领导把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波兰、民主德国)扩大联系，不仅看成是实现“区别对待”策略的重要手段，而且看成是克服中国经济短缺的一种途径。

与此同时，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北京运用宣传手段，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大家庭，其目的是刺激兄弟国家的民族主义离心倾向，播撒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体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不信任种子，从而推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特别方针。中国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企图“证明”，在经互会国家共同经济合作问题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高压”深为不满和怨恨(以保加利亚为例)，喋喋不休地描写这些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深刻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断言，似乎社会主义大家庭已处于“崩溃边缘”。大加宣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领导的“特别路线”，以此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把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积极参加下“调节巴尔干国家的合作”这一思想强加于人。

出于策略考虑，北京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回避思想论战。同时，中国报刊十分关注和详细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他们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所有接触、会谈和达成的协议，将其说成是反对苏联的“专制”。与此同时，千方百计掩盖同地拉那的分歧，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分歧更为明显了。

仍然坚持发展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方针。尽管采取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缓和关系的步骤(中越陆

上边界正常化；根据越南和朝鲜的代表说法，中国积极帮助越南和朝鲜恢复经济)，但在对越关系上，中国并未忘记南海岛屿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沉默之后，中国中央报刊于3月份明确声明，南海西沙群岛和其他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北京对蒙古的强硬路线丝毫未变，由于古巴在安哥拉问题上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北京对它的态度更是强硬。

很清楚，发展兄弟国家对中国的关系首先不应促使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立场得以巩固。其任务在于，打破北京的分裂主义方针，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同中国接触和发生联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根据几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一直采取措施使苏中关系正常化。苏联对中国贯彻积极的建设性的政策，尽一切努力使现在的北京领导转变，既然我们的意图是使苏中国家关系向正常化的方面发展。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苏共中央在毛去世后，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中国新领导人表示良好愿望，表示愿同中国改善关系。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发言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给他发了贺电。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祝贺中国建国27周年的贺电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文章，重申了恢复苏中睦邻友好和合作的愿望。

从1976年9月开始，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不再有公开批评中国问题的材料，这不仅向中国领导，而且向世界社会表明了苏联想同中国建立起睦邻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是我们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

从1976年11月29日至1977年2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苏联代表团在会上重申苏联以前提出的建议。

我们旨在呼吁中国放弃毛的反苏方针的善良行动没有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反苏主义仍是北京政策的轴心。

中国领导人拒绝接受苏共中央因毛泽东去世所发去的唁电和因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所发去的贺电，说“中共和苏共之间没有党的联系”。从1976年3月起中国大使便离开了莫斯科。中国方面关于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郑重声明(如欣逢十月革命59周年纪念中国发来的贺电中就有这样的表示)都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今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黄华在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会谈时承认，北京对苏联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建议态度是消极的。

现在的中国领导，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反苏方针，依然把边界调解放在首位，把它看成是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边界问题，黄华今年1月22日在同伊利切夫会谈时声称，“绝不能转入解决其他问题”。而解决边界问题，北京想按照这样的原则：即让苏联方面承认“有争议的地区”在苏联领土上，苏联军事人员应从那里撤出，允许中国公民永远在那里进行经营活动。这样，北京把所有改善中苏关系的路都堵死了。

中国的反苏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猖狂，肆意诬蔑攻击。仅半年时间，两份中央报纸刊登的反苏材料就有1600份之多。而且中国方面肆意干涉苏联内政，大肆诬蔑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进行颠覆性的充满谎言的反苏宣传，反对苏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反对苏联人民在列宁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歪曲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歪曲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劳动成果，千方百计谩骂苏联人们的生活方式，谩骂他们忠于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事业。

——采取卑鄙的注定要失败的手段，企图给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抹黑，破坏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关系，破坏苏联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

——搜罗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编造的反苏谎言，说苏联破坏人权。这种谎言的假仁假义和不严肃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不仅是由于它是编造的，还由于这种状况在中国自身就存在，在中国不经调查和审判镇压了数百万人。

——仍在企图粗暴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实施反对它们友谊和合作的破坏行动。

——利用各种手段，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互不信任。妨碍苏联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为了和平安全发展相互合作关系。千方百计歪曲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为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倡议，竟诅咒缓和思想本身，阻止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同时宣扬形势紧张精神和国与国之间对抗精神，无耻宣传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表示准备愿同随便什么人联合，共同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破坏缓和，与最反动的势力一唱一和，天天叫嚷所谓的“苏联威胁”。

——千方百计封锁，不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真相和苏联为改善苏中关系所作的努力。同时继续宣扬无耻的谎言，似乎苏联对中国有某种侵略意图。苏联被描绘成了某种吃人的老虎(甚至在中国正式文件中也这样说)，它正是要“奴役”、“恫吓”、“压迫”甚至“消灭”中国。

这样，事情不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是什么“论战”或“争论”，这是有预谋的恶毒的为正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不容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剧这种紧张关系，把反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强加给中国人民。

苏联共产党从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所反对的毛主义，在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人民自己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差。实际上，在中国，尽管没有公开承认，毛主义的许多方针都已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中国问题上，苏联路线的实质在于，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同时也不放过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如果它出现的话。这一立场能够继续积极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同这个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而奋斗。这一立场符合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54—4571页

№25985 驻葡使馆致梅德韦多夫斯基函：澳门和东帝汶的法律地位(1977年8月23日)

苏联驻葡萄牙共和国大使馆

里斯本

1977年8月23日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副司长

И.М.梅德韦多夫斯基同志：

对您1977年6月21日第383号信件的答复。

大使馆向葡萄牙外交部提出了通报葡萄牙对澳门和东帝汶法律地位的正式立场的请求。这一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说明。葡萄牙外交部的代表们则直接表示，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尤其是东帝汶的正式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

看来，确定上述区域的法律地位，应该遵循宪法和其他法令的规定。

1.依据1976年4月25日生效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澳门并未列入葡萄牙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处于葡萄牙行政管辖下的澳门地区，由与它特殊地位相适应的(机构来)管理。”

根据宪法第306条制定的澳门条例，于1976年2月17日以第1号法令的形式生效。条例第2条规定：“澳门是个集体法人，根据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和现行条例所确立的原则，它享有行政、经济、财政以及立法上的自治权。”

条例第3条规定：“1.葡萄牙共和国的主权机关除法院外，在当地以总督为代表。2.澳门在与外国国家关系方面和签署国际协定或条约上的代表权属于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如果只涉及澳门地区的利益问题，总统可以将代表权转交给澳门总督。”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提出收回澳门问题，虽然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联合国编制的殖民地目录当中也没有将这一地区列入进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澳门不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范围。

2.根据1974年7月27日颁布的第7号法令，葡萄牙给予包括东帝汶在内的所有的殖民地以自决权。

但是，由于东帝汶地区没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能享有自治权，其自治

权的真正实现需要一定的过渡期。1975年7月17日第7号法令确立了东帝汶新条例，该条例确定了管理这一区域的秩序并给予东帝汶独立。尤其是，这一条例规定于1976年10月选举人民议会，该议会应当解决东帝汶的政治和行政地位问题。有计划表明，截至1978年10月，葡萄牙将会把自己所有的主权交还给地方当局。

由于东帝汶局势的改变，这些给予独立的计划并未得到实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宣称东帝汶是其领土的组成部分。1975年12月7日，葡萄牙中断了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并将东帝汶问题诉诸联合国解决。

1976年在联合国大会第31次会议上，在谈到东帝汶问题时，葡萄牙外交部长德罗斯·费雷拉声明：“葡萄牙政府在法律上仍然不打算承认东帝汶从属于他国领土，不承认单方面解决决定造成的结果。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联合国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

今年8月，在第24次委员会会议上，葡萄牙代表宣称，他承认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所以不会承认“印度尼西亚从法律上强迫东帝汶从属于其领土”。他继续说，东帝汶作为最后一个没有自己政府的领地，在形式上仍然由葡萄牙负责，但它不能履行以国家管理者的身份给予人民实现其自决权的机会的职责。

宪法第307条规定：“1.葡萄牙继续根据国际法承担其所负的责任，保证和实现东帝汶的独立权。2.依靠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帮助，共和国总统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实现上述各点中提出的目标。”

因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东帝汶“法律上”仍处于葡萄牙的管理之下，但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3.在葡萄牙的地图上，澳门和东帝汶不是作为殖民地而被标出的。

附件：

1970—1982年间荷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 [19]

(以千荷兰盾计算)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96,722	-4	1970	79,316	-5	167,038	-9
122,239	26	1971	61,310	-29	183,549	10
145,425	18	1972	32,595	-47	178,020	-3
182,300	25	1973	89,700	175	272,000	53
260,636	43	1974	166,300	85	426,936	57
203,783	-22	1975	366,000	102	539,783	26

续表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235,274	15	1976	104,512	-69	339,786	-27
231,629	-1.5	1977	127,320	22	358,949	5.5
271,175	17	1978	284,805	123	555,980	55
313,779	16	1979	320,365	12	634,144	14
543,982	73	1980	294,100	-8	838,082	32
613,000	13	1981	238,800	-19	851,800	1.5
513,039	-16	1982	177,491	-16	690,530	-18

(Intermediair [20] , 1983年11月25日, 第9页)

1970—1982年间荷兰同台湾之间的贸易

(以千荷兰盾计算)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72,620		1970	42,261		114,881	
101,076	39	1971	83,963	99	185,039	61
123,520	22	1972	59,560	-29	183,080	-1
191,523	55	1973	118,324	99	309,847	69
275,568	44	1974	150,355	27	425,923	37
299,924	9	1975	123,782	-18	423,706	-0.5
334,970	12	1976	100,926	-18	435,896	3
357,423	7	1977	109,517	8.5	466,940	7
430,013	20	1978	133,470	22	563,483	21
539,311	25	1979	193,630	45	732,941	30
727,073	35	1980	191,210	-1	918,283	25
763,022	5	1981	204,439	7	967,461	5
685,289	-10	1982	340,069	66	1,025,358	6

(Intermediair , 1983年11月25日, 第9页)

ABПPФ , ф.0100 , оп.71 , п.314 , д.20 , л.1-4

№08119 苏共中央致兄弟党领导人通报：关于中国新领

关于中国问题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通报

苏共中央遵循定期同兄弟党领导交换中国问题情报的做法，想从最近事件的角度对中国新领导的政策谈几点看法。

毛泽东去世已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和政策方针已基本显露出来。北京的大政方针今天已很清楚了。

令人遗憾的是，不得不指出，中共领导人没有表现出摆脱毛的束缚，以批判的精神看待毛的有害方针和实现根本转变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轨道的意图。去年9—10月发生的类似上层政变的事件，除清除了几名政治活动家和他们走卒之外，并没有导致政策的根本改变。

毛泽东留下了最重要的遗产。近15年来，按照毛的意志所贯彻的外政策路线是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名声扫地的路线。北京抛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合作和相互援助，采取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开始全面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合作。

现在已很清楚，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导致毛主义这一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自行消亡。《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今年5月1日华国锋的讲话和具有纲领性的文章以及他在今年5月9日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明，中国的新领导直接地把自己同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联系在一起，承诺让中国沿着毛主义的道路前进。留在政权里的活动家们依然坚持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一、目前中国经受的经济和政治困难还不足以形成对作为泥足巨人的这个庞大国家的复杂影响。

十分明显，北京领导集团努力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准备，在此之前，中国的军事准备就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了。在国内形势严重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中国领导集团千方百计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197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达210亿美元，几乎占全国预算的二分之一。北京领导集团没有放松努力发展导弹核潜力，建立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1976年中国进行了4次核试验，而以前每年进行一次。在战略装备方面，目前中国是大大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乐意推进北京的军事工业潜力的发展，它们加强中国(它们打算，在对它们自己不构成威胁的范围里加强中国)，想使其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人。它们为住在他们国家的华人原子专家、导弹专家和有关领域专家前去中国访问大开方便之门。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可用于军事目的技术和设备的范围扩大了。

看待北京的对外政策路线，必须考虑到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和为新的领导人所批准了的任务：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这里指的是，为实现毛泽东生前制定的带有野心、大汉族倾向和领土要求的战略方针奠定物质基础。北京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明显地表现在所提出的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这一论点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大庆经验交流会议上，重申中国领导集团忠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在经济上用几十年时间超过美国”，使中国变得更强大，“对人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根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来判断，他们同毛一样，他们这个“贡献”不是献给巩固和平，而是献给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中国领导人公开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形势缓和是不可能的。”在今年5月9日大庆经验交流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发出了军国主义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国家第二号人物国防部长叶剑英对苏美关系紧张表示高兴，预言这“迟早会导致战争”。叶剑英把北京的好战方针同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平和进一步缓和的方针对立起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很快发生大规模战争”。根据这种方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的任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以挑衅口吻大谈北京所臆想的什么“苏联扩张计划”，说什么西欧将是苏联“进攻的首要目标”，其次将是近东和美国，而最后将“进攻中国”。

中国领导人每次接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来访者时，都重复他们臆想出来的所谓苏联“对全世界的威胁”。例如，今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接受英国记者加米尔顿采访时，宣扬“苏联对欧洲、非洲和近东的威胁”。他还宣称，北京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和它强大的国防”，并且许诺，“如果俄国人企图在世界某个地方实现扩张，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类似的话后来还说过。特别是今年4月在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谈时，李先念呼吁美国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加强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现今的北京领导集团对毛的“人民战争”学说进行了修正，用新的进攻概念代替了防御战略。据掌握的材料，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在今年3月，对中国科学家讲话时，要求加速研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运载工具。

北京领导集团依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禁止核试验和裁军等方面的建议。北京正在积极地备战，拼命反对任何裁军措施。中国是为数不多几个不承诺禁止或限制研制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之一。

二、根据毛主义“三个世界”的构想(这一构想排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华国锋在今年5月1日讲话中重申这一构想)，中国整个外交战略的目的是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利用冲突事件加剧国际紧张形势，使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

在评价国际舞台上的基本力量时，北京早就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现在它公开贯彻同所有反动势力结盟的政策，以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和达到它做超级大国的梦想。

中国力图在敌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同西欧的联系，唆使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破坏缓和政策，加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中国的宣传强调，赫尔辛基会议对欧洲形势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东西”，欧洲依然是世界灾难性大剧变的主要潜在策源地，来自“华沙条约组织的”威胁“越来越大”。

北京千方百计鼓励北约国家进行军事准备和军事竞赛，宣称必须巩固欧共体国家的政治统一，在“苏联威胁”方面，他们必须贯彻统一的对外政策路线。这充分地表现在北京敌视华约成员国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之间签订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的建议上，表现在北京支持北约侵略集团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中国报刊攻击我们在维也纳谈判中关于裁减中欧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新倡议，攻击苏联在整个谈判中的立场，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辩解，鼓励它们继续军备竞赛、发展军事实力。

近几个月的事实表明，北京在反对欧洲积极倾向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保守党最反动的政治家和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和社会同盟两集

团中的复仇主义分子身上。今年4月，基督教民主同盟副主席菲利宾格和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努力奉迎便是明显的证明。

中国领导人同西欧国家极右集团的代表接触，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签署赫尔辛基全欧会议最后文件的国家的代表举行贝尔格莱德会晤。

在削弱社会主义阵地、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问题上，中国不得不越来越指望帝国主义分子。依然存在着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为了颠覆社会主义阵地，北京进一步靠近华盛顿，扩大两国“共同的”或“平行的”国际利益范围，中国领导人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最富侵略性的集团结盟。中国领导人在同美国代表会谈时不止一次声明，美国和中国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这要比双方性质的问题重要得多。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形成了明确的角色分工。北京在自己的宣传中为美国开脱，它推卸所有抵制缓和进程和继续扩军备战的责任，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美国面对“苏联威胁”被迫发展军备，支持美国反动势力要求研制威力更大、更危险的战略核武器的行动，明确号召美国当局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京与华盛顿的共同性”不仅扩展到了欧洲问题，而且扩展到了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问题上，对这些地区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清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双方表现了共同的兴趣。北京和华盛顿正在讨论通过共同行动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北京和华盛顿的实际伙伴关系，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还特别明显地表明在联合国里。

在由于越南和老挝人民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在亚洲的阵地加强的条件下，北京不能不对日美军事同盟产生好感，对日本资本力图在东南亚扩大阵地、在反共基础上巩固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联系大加青睐。中国领导人仍企图说服东京统治集团建立反苏同盟，要求把实际是针对苏联的“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进同日本的和平友好条约里去。正如日本通讯社报道的，今年4月中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同日本防卫厅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晤，讨论军事问题。中国领导人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主张恢复日本的军事潜力，在东方反苏反社会主义阵线里，中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团结起来。

北京完全敌视社会主义大家庭。北京领导集团继续贯彻所谓“区别对待”的分裂主义政策，行动比以前更加谨慎。北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有“选择地同一些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而对其他国家保持敌对立场的方法，分裂兄弟国家的团结，破坏它们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中国企图说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北京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保留敌视方针的情况下，仍存在同北京“发展多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1977年初，中国领导集团实际上同帝国主义协调行动，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宣传攻势，企图鼓励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因素。为迎合西方反共分子，北京公开站在各种变节分子和叛徒一边(自然帝国主义宣传和北京宣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肉体上消灭了500万“思想异己分子”这一事实沉默不语)。中国宣传竟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俨如火山，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力图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合作机构的不信任，变本加厉地诬蔑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

苏联一直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且没有关闭解决苏中之间问题的大门。关于这一点，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上和其他文件中已讲得十分清楚。但苏联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善意的对待。在去年底今年初举行的一轮苏中边界谈判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谈判表明，中国依然站在对方不可接受的立场上。在谈判中，中国方面重申了它对历来属于苏联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

北京代表团断然拒绝重新研究边界走向，主张按照“有争议的地区”这一概念签订协议。接受这一概念意味着我们同意把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献给中国。中国代表武断地声明，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而他们建议将其称之为“有争议地区”是为了对苏联做某种让步。自然，苏联不能同意这种要求。

至于中苏之间的思想分歧，中国代表团声称，“原则争论”(他们这样称呼他们放肆的反苏运动)，在苏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前——似乎它已经犯了15年——不能停止。

今天的北京领导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依然采取以前敌视和分裂的路线。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北京企图重新支持和鼓励毛主义集团，把他们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武器。许多国家的毛主义分子在路德维希港(联邦德国)和罗马举行了会晤，拉美亲北京集团还在地拉那举行了会议。毛主义

思想还滋润着其他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

中国领导集团正在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动的右倾民族主义制度寻求相互理解，迎合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力量表现出敌视态度。

扎伊尔事件再一次表明，北京与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行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路线表明，北京对为了人民的利益调节那里的问题不感兴趣，它反对巩固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的进步制度。

北京赞许萨达特的亲帝、反阿拉伯的政策，实际纵容近东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扩大同智利皮诺切特法西斯集团的联系。北京领导集团企图分裂、削弱民族解放运动，颠覆它同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系。

由疯狂的军事准备做基础的北京领导集团的国际行动方针正在给和平、社会主义和反帝斗争事业带来损害，是对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现实威胁。

三、毛泽东去世之后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兄弟党对北京内外政策所作估计的正确性。毛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它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同毛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斗争的整个经验表明，兄弟党在直接对待中国的毛主义政策和它与这个国家有关的问题时，紧密合作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目前条件下，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事情的形势，因为这个大国所出现的过程将产生长远影响。各兄弟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在中国政策不稳孕育着突发事件危险和其积极反对缓和的条件下为争取和平和缓和紧张形势而斗争。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党的共同结论，即对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妥协将给社会主义大家庭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在兄弟党和所有进步力量之间进行协调工作，我们可以做到使中国成为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可接受的成员。我们没有丧失希望，希望深受唯意志论的毛主义实验之苦的中国人民自己发话，结束北京冒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针。但不能消极地等待。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这个涉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利益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

苏联对中国坚决彻底地奉行苏共二十五大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反击北京的挑衅政策，保卫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一如既往同毛主义作原则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关系，而在中国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和回到同世界社会主义合作和团结的道路上来的情况下，则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关系。

为了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策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平，我们认为，必须以我们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制定的一致的对华路线对抗北京的“区别对待政策”。近年来的事件表明，在中国问题上，兄弟党的协调政策贯彻得越彻底，北京领导集团对其就越重视，正是我们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团结最使毛主义分子害怕。

在同毛主义作斗争中，我们有了不错的结果和足够的经验。在这方面，兄弟党中央国际部和外交部的代表就中国问题定期会晤以及外贸部门的代表会议起着有益的作用。为了协调我们驻第三国和国际组织中代表的行动以反击北京的攻击诬蔑，我们认为，需要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定期磋商办法。可以扩大利用我们已有的能力，对第三国，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和社会主义各界施加影响，揭露北京领导集团对和平和国际安全事业有害的政策。

我们兄弟党所面临的任务依然是，坚决地彻底地揭露中国领导集团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戳穿毛主义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破坏行为。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79—4589页

№13723 葛罗米柯与卡特谈话记录：美中关系正常化等问题(1977年9月23日)

绝密

葛罗米柯与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谈记录

1977年9月23日，华盛顿

卡特：很高兴在这里、白宫会见您。感到很荣幸。

葛罗米柯：很高兴认识您，总统先生，很高兴就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会谈。

想借此机会转达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人对您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卡特：谢谢您。请您回国后代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在此次会谈中我首先想从总体上阐述一下我个人对美苏关系问题的看法。然后，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对我的这些谈话做出回应，而后可以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 [22]

卡特：我们打算经常向你们提供关于近东事件的发展以及与我们保持正常联系的国家的立场的情报。同时，我本人也希望，您也同样向我们提供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情报。

另一个同样引起我们不安的地区是朝鲜。我们希望南北朝鲜能兄弟般的和平相处。美利坚合众国打算在4—5年的时间内从南朝鲜撤出美国军队。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使南朝鲜处在我国的国防保障之下。

不久前，北朝鲜进入50海里海洋边界线引起了我们的担忧。我们也希望苏联能够促使北朝鲜表现出必要的审慎，以防止在这一地区出现不必要的紧张。

简单谈一下有关美国与中国关系。我们正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并不是打算与它结成一个旨在反对苏联的同盟，而是为了巩固和平，并发展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与台湾的相互关系能够走和平的道路，而不想拒绝自己在保障台湾和平生活方面的责任。

最近几年，苏联与我们的一些西欧盟国的关系有了改善，我们希望.....

.....到戴维营，会谈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但是到此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在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解决上取得

前进，这样的前进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在不断改善相互关系方面的努力。关于这一点，我公开地说过，并以此来表达对勃列日涅夫在出席舞会时的公开回应的感谢。

美国人民努力争取同苏联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我希望，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我和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要在我们的人民所努力遵循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会面对于这个计划是有益而又有建设性的。

葛罗米柯：我认真地听了您的发言，其中触及了一系列有关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我想从我这一方面阐述对您所提及的问题的看法，也可能谈到一些别的内容。

首先我想强调，所有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以及我国的全体人民都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我要强调的是，不仅仅保持务实的、正常的关系，而是保持友好的关系。我想，你们从勃列日涅夫的言谈中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其中包括你们在查尔斯顿会谈之后……

现在谈一下关于中国的问题。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而言，同样也是从美国(当然也包括苏联)的广泛利益来讲，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公开的或秘密地串通起来搞什么肮脏的游戏，并且旨在反对苏联及其利益，那么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认为在此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迟早这都会因其适当的后果而为人们所知，其中当然也包括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出发。应该寄希望于美国不要在用中国牌反对苏联利益的游戏玩得入迷。在更早些时候，前几届美国政府时，向我们保证美国并没有那样的打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这一切将如何实施将如何变化的吧。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带有正常甚至是友善的性质，而同时，中国与我们的关系则变得紧张。我们不反对在美中之间存在正常的关系。但请看一下，它们似乎已经将你们拉入到肮脏而对我们两国又是危险的活动当中。要知道我们和中国在当时也曾保持着好的关系。如果中国人能够使美国和苏联发生争吵，那么它们很乐意隔岸观火，并从中获得利益。那么这对美国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现在没有可以透过它就看到未来的“魔幻镜”，但是历史教会历史学家很多东西。无论怎样，它是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而且美国人都应学会这些东西。

您提到了印度洋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之间就相关问题能够达成协议是十分好的。客观地说，我们有达成协议的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是，你们一直顽固地占据印度洋一个名叫迪耶戈·加拉西亚的悬崖不放。根据我们的想法，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没有现实的必要性，但这样做却是在侵犯我们的利益。美国方面值得广泛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准备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看法。

我们现在正同美国就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合乎专家工作组所提出的、标准的军备限制问题。我们将继续这些谈判，并且相信他们将取得良好的结局。

关于核武器的不扩散问题，我们的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个问题在将来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我们也同样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事实就是如此，南非正一步步的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还有一些国家十分接近了成功研制核武器的目标。美国和苏联最好在切实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我们正在为此而准备。

现在，说一说您提到的关于您和勃列日涅夫的会面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人完全不反对这样一次会晤。我们认为，如果经过精心准备，这次会晤将取得巨大的政治成果，那么这次会晤就会成为重要的分界线。在这一点上，如我们所想，它也会极大地引起美国的兴趣。但同时，如果只是为了会面而会面，如果这是那种使我们的关系出现倒退的会晤，那就未必能给谁带来利益。

大概这与您刚才所讲的是一致的。

卡特：我简单地评述一下您的意见。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这一方面没有一句指向苏联或勃列日涅夫的批评。但同时，在苏联的报刊上却一直有针对我本人的批评。最近这样的批评明显地减少了，为此我表示感谢。问题在于，那种批评会在我国民众中引起严重的忧虑，所以我希望在将来它不会再出现。

我想继续强调一下，我深信，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可以解决一切顽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两国可以维持具有建设性的友好关系，并且没有公开的争论。我希望苏美关系在未来会不断得到改善。

.....

我想，您所公开表现出的对我国人民的人权事业状况的担忧，同样也是我国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普遍担忧，有可能促进我们两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我希望两国表现出必要的慎重，并且希望，您能尽量避免您在美国所公开表达的、对我国这一问题担忧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就像我所说过的，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团之间，能够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沟通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报。

关于中国，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成为苏美关系的障碍。我们从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秘密或公开地勾结中国来反对苏联。我们也将很快放弃那些为达到类似目的而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尝试。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72—4578页

1978年

№1372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国际局势(1978年6月8日)

绝密

第107号记录第3项

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罗曼诺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阿利耶夫、杰米切夫、库兹涅佐夫、马谢罗夫、波诺马廖夫、拉希多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多尔基赫、齐米亚宁、卡皮托诺夫、里亚博夫、扎米亚京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78年6月8日会议第107号记录。

国际局势若干问题：

1.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发言的文本附后)。

2.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考虑到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准备材料和文件草案，并提交给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政治局

第107号记录第3项附件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作的发言

同志们，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给我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驻美期间，在联合国大会例会上，葛罗米柯同志在与卡特和文斯谈判的过程中以及在双边会谈以及和很多国家的对话中做了大量并且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是值得称赞的，并应写入我们的决议。

但是，也许不能仅限于此。从葛罗米柯同志的报告以及最近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我们这里的大量信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发展中非常复杂的阶段。局势开始紧张并发生了严重的恶化。而这种恶化的主要来源，是卡特政府对外政策日益发展起来的侵略

性，越来越剧烈的反苏情绪反映在总统本人及其最亲近的合作者，首先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言中。

根据所有现象，卡特不只是受到那些最狂妄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业头目的影响，而是打着反苏政策和回归“冷战”的旗帜，为了要在美国新一任大选中获胜。

美国政府的这种路线，使西方大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非洲以及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政策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问题出现了，我们该对这一切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认为，这里不允许消极。为了和平与局势的缓和应该积极并顽强的斗争，应该尽全力阻止那种会引起新的世界革命危险的政策。为了世界和平，这里需要强有力且看得到的“步伐”。

如果具体谈到最近一段时间，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我们的出版物(同时所有重要的报纸)上发表郑重声明，称之为“卡特政府的政策”。不用任何署名发表这个声明——这反倒更会惹人注意。在声明里直截了当地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发生着威胁和平事业的变化。在谎言和诽谤烟幕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出现了反对和平和缓和的情况。有意地停止了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同苏联的谈判。企图粗暴地干涉我们的内政，事实上是要凝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新的军备竞赛的大计划，而10年以后，人民将如何希望裁军。美国现代政策的缔造者们似乎已经与中国领导人在反苏情绪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众所周知，他们把和平与缓和解释为欺骗，而战争才是唯一真正的前景。

美国政府成了非洲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鼓动者，即武力侵略、公开干涉非洲国家事务，成为对革命自由运动无情镇压的鼓动者。

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所有意向给华盛顿北约委员会的例会工作奠定了基调。带上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拉上那些还有些动摇和怀疑的人，给这个集团内部不同意的国家施加压力，美国企图重新唆使它们走上“冷战”道路并积极地为“热战”做准备。

卡特政府现在政策中，所有危险因素应该不需要多余的改写，而是应该清楚地在这个文件中显示。还要让其他国家和美国自己的舆论界知道，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人开始了多么危险的游戏。

结束这篇文章时，要用委婉但清楚的材料证明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缓和及发展友好互利关系上的方针。

第二，发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关于北约委员会例会总结的集体声明。注意到要让罗马尼亚人同意的必要性，这个文件要写得并不尖锐，但强调我们政策的积极因素。

遗憾地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例会的工作和它的决定，并不是为缓和和稳固世界和平，而是为了紧张国际局势和加强军备竞赛而服务的。增加军费，鼓动北约国家制造中子、化学、生物武器，推动各种形式武器生产的长久计划——这就是这次例会的真正目的所在。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谴责这种政策，并相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对其进行谴责。有人要把越来越广泛的军备竞赛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坚决支持遏制军备竞赛以及所有大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协议。苏联正在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与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成功地缔结和约。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灵活的立场，在威尼斯谈判上表现出具体且有建设性的主动精神。华沙条约国家坚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反对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无论是以武力侵略的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进行的破坏活动。

结束这个文件，呼吁回到缓和的道路上来，回到相互尊重和互利合作的道路上来，这条道路在赫尔辛基会议的文件中、在苏美以及其他双边签署的文件中、在联合国的很多决议里已经清楚地提到。

第三，发表苏联政府关于非洲事务的特别声明。在这份文件里，坚决驳斥和揭露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和非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在非洲的犄角地区——扎伊尔地区的政策的谣言。用简洁并柔和的语调说出它实际上都是些什么。同时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靠武力侵略、破坏活动以及其他形式干涉非洲事务的政策。指出，现代的这些新殖民主义者，如何利用“团结非洲”的口号在非洲为自己招募帮凶，即那些实行反动的、反人民政策的领导人。表明我们的自信，占上风的是非洲真正的团结，即非洲所有独立国家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一致意愿，坚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和内部的自由发展的决心。

就是这样3个文件，我想，可以在近期准备并发表它们。当然，一天做不完这件事，应该很好地分配时间。

同时，还可以为我们正在发展中的以及其他或多或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大使准备好指示，以便与他们的领导层开展相应的工作。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文件的精神，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展开工作，比如通过与兄弟党的联系、在国际社会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工作等。

至于联合国大会例会在裁军方面的工作，看来还需要在我们的报刊上继续表明苏联的立场。同时支持健康的、有建设性的、已经在联合国大会工作中出现的和即将出现的一切行动，以揭穿反裁军者的阴谋。

如果同志们同意，可以把我以上提到的材料的准备工作交给外交部以及中央委员会有关部门(国际部、联络部和对外政策宣传部)负责。

附文件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联络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准备相关材料和文件提纲，要考虑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交换的意见，同时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90—4597页

№1042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批准联络部反击中国领土要求的措施(1978年6月13日)

绝密

摘自苏共中央书记处1978年6月13日会议记录

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

同意苏共中央联络部1978年6月7日报告中所陈述的意见(见附件)。

中央书记处

附件：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

求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为了执行反苏路线，正在扩大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我国攻击的范围。最近，中国宣传机构开始特别注重伪造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类出版物急剧增加，其目的在于污蔑苏维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破坏苏联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燃起民族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情绪。这就证明，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企图正在不断加强，而且挑拨苏联其他邻国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久以前，中国出版了这样一些书籍和小册子，如《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观点》、《中国东北各民族反对俄罗斯侵略斗争史》、《苏联——各民族的监狱》等，宣布要出版两卷集的《沙俄侵华史》，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经常刊载上述问题的文章。

在中国，积极参加反苏材料准备工作的不仅有政府机关和宣传机构，而且还有学术组织，包括不久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数十所研究所和大学。它们都出版了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有关历史、地图和考古等等问题方面的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解职靠边站的经验丰富的资深的学者，现在也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了。在他们的参与下，详尽地研究了苏联和国外的文献，使历史资料适应北京现行政策的任务，用有倾向性选择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录，来硬套毛泽东的论点。

在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中国的宣传机构伪造苏联历史学的主要观点，伪造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中俄两国国际关系史和苏中边界的形成史，伪造俄国在巴尔干、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外交政策，伪造俄罗斯的陆海军史，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把俄罗斯硬说成是自古以来就是扩张主义侵略成性的，从而企图证明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政策。

实质上，这里所指的是反苏意识形态运动新阶段的开始。这场运动同中国对苏联领土要求相联系，其目的在于反对我国领土和国家完整的根本利益。中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出版物，也是现今北京领导人论证其以封建的和国民党中国的反动传统和观点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意图的重要工具，对邻国其中包括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在这些出版物中，妄图伪造中国和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的历史，千方百计地粉饰中国帝王和满清皇帝的侵略政策。实质上，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根据它的宣传，是以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精神蒙蔽中国人民，其目的是为让中国人民去进行军事冒险作思想准备。

中国宣传机构大量发行歪曲苏中历史的著作，其中包括外文著作，企图在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影响国际舆论。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某些外国汉学家，甚至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实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学者经常上当。

在苏联，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科学机构，首先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准备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有助于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维护我们的立场，并揭露毛的历史伪造。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内部发行，而公开出版的有关上述问题的个别基础研究和论文，由于印数有限(2万—3万册)，而且一般没有译成外文，因而，广大世界舆论界无从知晓。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我国驻其他国家的代表处的建议证明，有出版和传播这些著作的迫切需要。

我们认为，同意所附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的计划是适宜的。计划规定：

用主要外文编写和出版大量科普小册子，来表明中国领土和边界形成的真正历史，来论证和具有说服力地证明北京领导人陷得很深的对领土要求的缺乏根据和危险性。

用主要外文出版近年来苏联已出版的，苏联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著作；关于中国边界和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要在我国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并以主要外文出版以前在苏联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的论文集。

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实施旨在更深入研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现实问题的措施，以

抵制中国宣传机构对历史的伪造。

在阐述关于苏中边界形成问题时，首先要将重点放在，它是有19世纪到20世纪初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其他文件的结实的条约——法律基础的。现行的边界再一次地为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前俄罗斯各族人民民意所固定。

苏共中央联络部

1978年6月7日

附件：

机密

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计划

1. 苏联科学院应配合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内部出版的专著《中国边界的形成》的基础上，编写一本篇幅5—7印张，供国外广大公众阅读的科普小册子。

新闻社应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此书，并在国外广泛传播。

2. 苏联科学院应配合苏共中央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准备并由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两本曾在苏联刊物发表过的有关中国国际关系史及其在近代和现代扩张政策的现实问题的文章的论文集。

进步出版社应翻译并出版这些论文集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3. 进步出版社应翻译并用英文、法文和日文出版经作者适当加工的下列著作：《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2年版）、《俄中贸易—经济关系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4年版）、《满族人在中国的统治》（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古代和17世纪的中国和邻国》（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版）。

4. 委托苏联科学院准备并出版《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及其邻国》论文集，考虑到以后要用主要国家外文出版。

5. 全苏版权协会应采取措施，向外国出版社推荐苏联作家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和手稿。

6. 《历史问题》、《近现代史》、《远东问题》、《亚非人民》、《苏联历史》和《苏联民族学》杂志应定期发表关于中国边界形成问题，中国皇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扩张政策及其对邻国的领土要求的文章。同时，要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封建制度和清帝国的评论，并且揭露毛泽东“历史”观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沙文主义本质。

7. 苏联科学院应详细制订出旨在反对毛分子在历史学领域伪造的措施的远景规划，并将苏联科学院和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考虑在内。计划中规定以下主要科研方向：中国历代皇帝的扩张政策；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从俄中边界划分来看亚洲和远东各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俄罗斯人的地理发现和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远东的开发；从国际法观点看俄中关系中的边界问题；中国非汉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苏联科学院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合作制订一项计划，共同研究相应地区同中国的相互关系有联系的个别历史问题。

关于此项工作进展情况，苏联科学院应于1978年12月15日以前呈报苏共中央。

8. 苏联科学院应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在1978年12月举行一次研

讨会，讨论在历史学领域同毛分子伪造历史斗争的现实问题，邀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参加会议。

9.委托苏联科学院协同苏联外交部共同准备一份关于现代中国领土和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形成问题的历史资料，以供苏共党员积极分子了解情况和对访问苏联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代表团进行工作之用。

10.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应准备一系列关于苏联远东地区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并伴以旁白说明其开发和发展的历史，苏联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应组织在中央电视台放映和在国外推广这些电影。

ЦХСД , ф.4 , оп.24 , д.694 , л.81-86

1979年

№06018 马纳索夫同李善一谈话记录：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续签问题(1979年4月10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摘自M.A.马纳索夫的工作日记

1979年4月24日

第21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李善一的谈话记录

1979年4月10日

应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说，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特前来辞行，并对苏联大使馆领事司参赞们尽快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来访请求表示谢意。

李善一通报说，他打算在回北京途经莫斯科时，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在那里逗留几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馆临时代办由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李善一说，新大使的任命尚未得到驻在国政府的同意。

在谈话过程中他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问题。用大使的话说，“四人帮”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他接着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公社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城市中开始建筑住宅；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得到调整。这时(这位)中国人指出，国家边境地区职工的工资比其他地方的高。大使认定，从1959年起，中国食品的价格一直未变。他说，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受到国内居民的热烈欢迎。

大使说，目前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工业、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科学上

面。

我向大使介绍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他兴致勃勃地倾听我的讲话后说：“我们是邻居，我们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使用的河流。一些民族居住在边界两侧——这些都是睦邻友好的客观因素。”

在回答“您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延长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的问题时，大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即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将该条约延期。

我向大使阐述了人所共知的苏联政府声明的内容。

李善一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话后，改换了话题，并开始对苏联古巴合作现状，特别是外贸总额及古巴购买苏联石油和古巴向苏联出售糖的价格感兴趣。这时，李善一显示出消息灵通，熟悉情况。我在众所周知的数据资料范围内回答了他的问题。

大使问：“古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了许多企业吧？”我回答说，这要比我们在中国建的200个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少得多，然后列举了一些出名的苏古合作项目。

他对古巴工业、农业(包括畜牧业)的发展颇感兴趣。我对他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均包括在何塞·马蒂计划委员会主席乌·佩雷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讲话中以及他在不久前答《流浪者》杂志记者问中。

大使自己提议，谈谈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日本签订了和约，发展了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日条约性质的意见，大使说：“该文件并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他回避了有关越南的话题，仅限于指出不久将在河内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将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告别时大使说：“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着贸易，有定期的铁路和空中联系，但是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应当解决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的邻邦，理应和睦友好相处，我想将来会实现的。”

№06039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1979年10月11日以后)

第11项 关于苏联与中国谈判的过程。

苏斯洛夫：昨天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伊利切夫同志的记录已分发了，让我们听听他的讲话。

伊利切夫：遵照指示，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供研究。根据该宣言，我们发言阐述通过该宣言的必要性，即该宣言可以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苏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完全符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和一贯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团长作了内容广泛的发言，发言中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中国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如下…… [\[23\]](#)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05—1006页

1980年

№137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 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1980年2月1日)

绝密

第Ⅱ182/2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佩尔谢、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扎米亚京、鲁萨科夫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1日会议第182号记录

第2项 关于给社会主义国际联盟主席B.勃兰特和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K.索尔萨的材料。

1.批准给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的电文(附录一)。

2.批准转交给索尔萨的材料(附录二)。 [24]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182号记录第2项

机密

附录一

波恩

苏联大使：

单独和勃兰特会面，告诉他，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你奉命通知他几点意见并陈述下文。

最近，特别是由于北约12月会议决议引发了一些使国际局势急剧复杂的事件。

可能，你们和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式并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在目前的局势下，看来需要来自第一手的关于看法和打算的准确材料。重要的是在于找到一种解决长期以来成为贵我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巩固国际安全问题的共同语言。

我们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总评价和我们准备执行的路线，您已从今年1月13日刊登的勃列日涅

夫同志答《真理报》记者问中了解了。这个文件反映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立场，也是我们将来的出发点。

在此想把我们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观点通知您。

关于“卡特主义”。苏联方面对它的总评价在今年1月29日的《真理报》刊登的文章中已经公布。我们认为，在您所知道的美国总统讲话中所阐述的纲领集中地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的方针。这一方针不是今天由于阿富汗事件才实行，而是很久以前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事实。1978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专门会议上讨论了严峻的裁军问题，并且苏联所提出的详细行动纲领备受关注。

但当时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高层会议通过了一个为期10—15年的军备竞赛的“长期纲领”。那时卡特总统宣布了北约行动全球化的主张，把这一军事集团的“责任范围”扩张到更广泛的，远远超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建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实际上北约开始赋予自己军事干涉的权利，包括在非洲(请回忆在扎伊尔发生的事件)。最终，美国官方公开宣布自己利益、北约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众所周知中国公开反对缓和、公开反对巩固和平。

第二个事实。半年多之前，卡特总统签署了战略防御武器第二号协议，并谈论过它的巨大意义。然而美国行政当局还在去年就破坏了协议的批准。

第三个事实。去年秋天，美国政府以“苏军在古巴”为借口积极参与了组织一场挑拨离间性活动的喧嚣。为了煽起军国主义的热情，更加鼓噪起“苏联威胁”的神话，增加批准战略防御武器第二号协议的难度，并证明新的用于加强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潜力的措施是正确的，需要这种古巴的“小危机”。这是现在围绕阿富汗事件而掀起的、鼓噪的独特预演。

第四个事实。去年10月、11月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了欧洲军事缓和的总纲领，呼吁立即进行谈判，苏联同时也开始采取您所知道的旨在减少欧洲军事对抗的单方面行动。

苏联坚持倡议，在美国通过新的导弹决定之前就减少欧洲的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

而美国的回答如何呢？美国行政当局几乎是通过向其盟国施压的方式，达到了使北约12月会议通过在欧洲生产和部署新的导弹核武器决定的目的。这实质上是增加了美国原已部署的，旨在针对苏联的先进武器。

第五个事实。在北约会议后，卡特总统不顾那里发出的要求——降低欧洲军事对峙水平的呼声，立即通过国会实行了一项自动增强军备竞赛的五年纲领。

第六个事实。就在今年，卡特总统以阿富汗事件为借口，采取了恶化苏美关系的粗暴措施，甚至对苏联实行所谓的经济制裁。战略武器防御第二号协议被撤销审议，它的批准被无限期推迟。

这之后提出了“卡特主义”。

其中包括了，最近几年来美国行政当局所采取的使军备竞赛升级以及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所谈论的是企图重建“冷战”时期的思维——“遏制”和“打退”社会主义，“在战争边缘搞平衡”。

在与社会主义联盟工人小组会见时，曾谈论过卡特总统正在把事情引向何方，现在这已被完全证实。这里所谈的，的确是最近10年来人们所做的，通过有自由意志人们的努力所做的，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已被摧毁。

在这种局势下，必须证明缓和政策是正确的。现在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头脑，继续进行谈判”，“神经质不能代替理智的政策”，“必须避免与事件本质不相符并因此可能使局势更加恶化的不理智的过大的反应”，这些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立场是，要认真、负责、坚决地捍卫和平共处原则，及一切在缓和过程中取得的发

展国家间正常、互利关系的积极成果。

关于阿富汗事件。我们希望，您能不要带着美国行政当局所特有的偏见和神经质去观察。

我们认为，把下列材料通知您会是有益的。

事实上，在1978年反对阿富汗的四月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一场真正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由中央情报局和北京的金钱装备起来的雇佣兵匪徒，直接以武力威胁着这个国家的和平居民。巴基斯坦成了这一战争的主要基地，在这里建立了20多个基地和50多个据点。在这些基地和据点中，在美国、北京、巴基斯坦和埃及教官的领导下，培训恐怖分子和军队。仅从1978年7月到1979年11月，就培训了15000多人。他们被美式和中式武器装备起来，然后送到阿富汗。同时毫不隐瞒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四月革命，重建反人民的秩序，把阿富汗变成侵略与其有着2000公里边界的苏联的基地。

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联系的阿富汗前领导人阿明，迎合了这些计划。在与侨居外国的领袖建立联系后，阿明准备了一场反革命的政变，以空前的规模镇压诚实的爱国者。夺取政权后，阿明从肉体上消灭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反对阿富汗专制的老战士塔拉基。以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政府，像塔拉基一样，重新转向苏联寻求帮助。

应阿富汗政府帮助其进行反对华盛顿和北京所煽动的武装干涉行动的邀请，我们根据1978年签署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第四条的规定采取了行动。我们的帮助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它规定任何国家都有积极的自卫权，即为了反对侵略，有权请求任何国家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在阿富汗事件中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外来的侵略，这种侵略的形式根据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规定，就是“由国家或以国家的名义秘密派遣武装匪帮、小组和正规力量或者雇佣兵以武力反对另外一个国家”。

为了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的民族主权不受外来侵略。进一步说，当看到美国企图在中国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南部边界建立新的危险的军事战略基地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想强调，我们的行动丝毫不触动美国或任何他国的真正民族利益。我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扩张计划。我们拒绝类似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通向“温暖海域”或“控制石油产地”的恶毒诽谤。只要引起阿富汗政权请求苏联出兵的原因消失，苏军就将撤出。

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对阿富汗事务的武装干涉绝没有停止。华盛顿公开扩大向所谓的起义者提供武器。如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所证明的，北京并不落后于华盛顿。黄华向雇佣军的头目保证，中国将向他们提供“无限制”的帮助和支持。

华盛顿和北京竭力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参加反对阿富汗的侵略行动。这样，正是华盛顿和北京，把事情发展到使近东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的地步。

同时，高谈阔论什么我们武装侵占阿富汗或者说苏联篡夺了阿富汗的主权，完全是胡说八道。所有在这时到过阿富汗的人，其中包括西方新闻报刊的记者们，都承认那里的局势是正常的。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新领导，在努力消除阿明政策后果重新恢复民主自由的同时，从监狱中释放了政治犯、知识界和宗教界领袖。虽然坦率地讲，在东南部和东部省份，恐怖分子仍在活动，局势依然紧张，但和游牧居民、穆斯林僧侣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阿富汗政府宣布，坚决遵循各民族间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与邻国在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关系，它采取了一切措施。关于阿富汗的事情就是如此。

关于我们对北约12月会议的态度。我们对其结局的原则性看法您是知道的。还有几点补充意见。

众所周知，苏联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如果北约在12月通过决议，这就将破坏谈判的基础。在北约决议已存在的时候，我们同意谈判，就意味着在美国全力制造新的导弹核武器系统的同时仅进行限制苏联防御潜力的谈判。

北约会议公报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仅就美苏地面战术中程导弹核武器系统进行谈判的条件。尤其是美国的一切其他先进武器、西欧其他国家的核军火库，也就是一切与苏联中程导弹相对抗的核武器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并处于不受侵犯的地位。要求苏联急剧减少其现存的防御武器，同时又保存北约一切已有的、强大的、旨在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核潜力。不久前，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对《真理报》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北约国家现在的立场，使得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成为不可能”。同时，勃列日涅夫强调“我们拥护谈判，但我们拥护的是在遵守同等安全原则基础上的诚恳的、平等的谈判”。

关于我们进一步的打算。

很显然，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指望威胁苏联，孤立我国，并在可能的地方制造困难。这一路线注定要失败。因为威胁苏联、动摇它的坚定性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苏共领导并没打算实行“以强硬对强硬”的路线，以后我们也将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冷静和理智。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让卡特行政当局把我们拖入对抗，拖入破坏缓和的事件中来。我们不会像美国行政当局一样，采取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并对“冷战”同盟者有利的仓促行动。

美国方面忘了基本的忍耐和理智，使事情的发展破坏了最近几年才艰难地调整好的国家关系。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卡特行政当局竭力破坏西欧国家和苏联的关系，要求这些国家支持美国的危险路线，使自己屈从于华盛顿认为需要的那种政策。

鉴于目前欧安会代表在马德里举行的会晤，同时华约组织国家关于召开军事缓和及裁军会议的建议正在实现，可以取得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

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局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认为制止华盛顿行政当局所推动的危险的继续发展是有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情况都要求一切珍视缓和与和平的人们作出共同的努力。

在莫斯科，人们怀着温暖的心情回忆着和您在苏联会晤的益处，认为这些会晤是有益的。

如果勃兰特要文件，请把德文译本留给他。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606—4616页

№1668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揭露中国亲美方方针的指示(1980年5月8日)

绝密

第II195/56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等同志。

第56项 关于揭露北京亲帝国主义方针的工作给苏联驻发展中国家大使的指示。

批准给苏联大使指示的草案(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195号记录第56项

机密

亚的斯亚贝巴、亚丁(及吉布提)、阿克拉、阿尔及尔、安曼、安卡拉、塔那那利佛、巴格达、巴马科、曼谷、贝鲁特、比绍、布拉柴维尔(以及利伯维尔)、布琼布拉(及基加利)、达喀尔(及班珠尔)、达卡、大马士革、达累斯萨拉姆、德里、雅加达、乔治敦、伊斯兰堡、喀布尔、开罗、加拉加斯(及西班牙港)、加德满都、金沙萨、金斯敦、科伦坡、科纳克里、科托努、吉隆坡、拉各斯、洛美、罗安达、卢萨克、马拉博、马那瓜、马尼拉、马普托、墨西哥、摩加迪沙、蒙罗维亚、内罗毕、尼亚美、尼科西亚、努阿克肖特、普拉亚、路易港、拉巴特、仰光、萨那、圣约瑟、新加坡、德黑兰、的黎波里、突尼斯、瓦加杜吉、弗里敦、喀土穆、科威特、雅温得(及圣多美)

苏联大使

副本送：波恩、华盛顿、伦敦、巴黎、北京——苏联大使，维也纳、日内瓦、纽约、巴黎——苏联代表

近来，北京对外政策中危及和平事业的趋势在加强。它积极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阴谋，奉行刺激军备竞赛、激化国际局势的方针，同时把越来越大的赌注放在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伴上。

北京和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扩大着的相互配合，中国实际变成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同谋者，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不安。它们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表现出不满，特别是像北京与跨国垄断集团不断加深的合作，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从属于自己自私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好处，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组织的技术和财政机会，压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些方面。

在这样的条件下，务必利用现有的可能性来继续揭露当今中国领导的亲帝国主义方针。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实业界代表的座谈中，请注意下列几点：

1.由于华盛顿政策的侵略性增大以及北京霸权主义意向的活跃，当今国际形势出现了尖锐化，直接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面对挑起世界不同地区冲突的局势，培植国家和人民之间敌视和不信任的政策，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不把他们的力量和资金放在解决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中国领导同美国当局联合行动，或者采取同美国官方的对外政治路线平行的方针，着手试图挑起越南、老挝、柬埔寨同东盟成员国的对立，唆使与毗邻的国家，首先是巴基斯坦反对印度，推进埃以勾结，号召组织广泛干涉、反对阿富汗，竭力使欧洲局势复杂化，推

动北约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使美苏关系尖锐化。

北京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努力从有利于华盛顿的方面来想象美国的政策，实质上有助于实现美帝国主义的目标(中国领导正面地对待美国在伊朗、阿富汗、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行动，正面地对待美国海军增兵印度洋区域和波斯湾以及正面地对待美国在非洲和近东建立新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也赞成和支持北京反对发展中国家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北京试图在不结盟运动中制造分裂，减弱它的反帝方向，削弱它的战斗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北京和华盛顿在对最重要国际问题的态度上，对评估世界事件的发展前景上，越来越表现出一致性。领导那个或另一个国家，预言80年代的暗淡局势，在“苏联威胁”的虚假借口下加剧了军备竞赛，进行加强的军事准备。决定中国政策的那些人，对问题的积极调整不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挑拨离间路线背道而驰，使北京失去玩弄国家间现有矛盾和制造新矛盾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领导努力和美国一起，围绕所谓“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制造紧张气氛，将其变成国际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剂”。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安排了外面发动的反对阿富汗的侵略行为，将和平事业和阿富汗周围地区的稳定置于威胁之中。

2.中美的“合作”，如今不仅包括政治和外交领域，而且包括军事领域(特别是华盛顿关于向中国提供美国军事装备的决定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合作”的加深，会给国际和平造成严重危险。中国一方面接上美国在中近东、南亚和东亚的战略，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竭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做到用“别人的手”来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计划。中国政策的危险性之所以加深，是由于北京把自己的算盘和两体系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了。

随着中美步步接近规模的扩大，加强了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的趋势。这种在中国领导看来有利的形势，他可用于强化自己政策的侵略性。如果今天在华盛顿的教唆下，北京试图威胁越南、阿富汗和其他一系列亚洲国家，那么明天范围还要波及大的亚洲国家，要是谁的对外政策可能被北京认为不合意，就会成为它从事敌对活动的对象。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接近，已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越南与东盟国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印度，泰国与柬埔寨，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挑拨离间恶化了这些国家间的关系，为帝国主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制造了土壤，不言而喻，这会大大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考虑到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处于中国影响下的那些国家，中国 and 美国的互动特别危险。将这些国家吸引到中国政策的轨道上，意味着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机动范围缩小了。

3.与谴责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政策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背道而驰，北京与华盛顿在声明自己平行战略利益的同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协同一致的立场，以达到自己霸权主义的意图，特别是为了建立世界不同地区自己的影响范围。至于北京所宣传的“反霸权主义”提法，它背后掩盖的不是别的，正是力求从帝国主义伙伴那里得到承认中国的影响范围，首先是东南亚的权利。中国和美国为自己获取宪兵职能，有权“惩罚”主权国家，利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制裁反对它们的企图，创造了国际关系中随心所欲的危险先例。

4.扩大中的中美接近过程，“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有负面反映。向北京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到1979年底，资本主义国家放贷总额在280亿美元以上)，事实上导致中国变成出口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竞争者，变成吸收许多发展中国家多么需要的大量资本的巨大财聚(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中国为了到2000年实现现代化纲要，可能需资金达3500亿美元)。

根据来自西方的数据，中国每年用于军需超过350亿美元，同时竭力获得各种国际组织的援助，损害了许多急需这种援助的国家的利益。例如，据联合国资料，1982—1986年间，中国方面希望援助2亿美元。北京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积极努力获得世界银行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信贷组织的大笔贷款。

北京集中努力建造强大的军工综合体，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或者缩减援助规模，如果这种援助不带来小算盘估算的政治红利。不仅如此，北京努力利用同它们的经贸关系，以获

得购买外国技术和武器所必需的外汇(据现有资料,1970—1978年间,中国靠这种贸易“挣了”60亿以上美元)。

试想一下,北京继续钻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阵营,我们就要把更坚决地对抗中国领导的霸权主义方针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必须用具体例子指出北京手腕的实质和性质,说明对中国目前政策保持“中立”立场的危险性,强调这样做只会鼓励中国领导进行新的冒险。经验证明,中国通常把破坏活动的矛头指向下列地方:它认为碰到风险较小的地方,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行动将不会与它对立的地方。因此,重要的是回击建立疏远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墙”的计划以及回击使发展中国家脱离其天然同盟者的企图。

发展中国家代表人物中间的解释工作,应考虑到现有特点按计划经常进行,并把所做工作的总结以及所在国政治人物关于中国的最有意义言论通报给中央。

РГАНИ, ф.89, оп.34, д.9, л.1-8

№1668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对抗美中军事合作的指示(1980年10月2日)

绝密

第П217/57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80年10月2日会议第217次记录

第57项 关于为了对抗美中军事合作进行补充工作的指示。

批准给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指示的草案(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217号记录第57项

机密

致所有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

目前,美帝国主义和北京霸权主义结伴作为世界政治中危害全人类的负面新现象,越来越积极地波及军事领域。华盛顿为了希望把“强大稳定的”中国用于自己的战略利益,扩大了在军事技术方面帮助北京的规模。特别是美国官方同意将可广泛用于军事目的的现代装备和技术供应

中国，就是证明。

随着美中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中的破坏性因素将有所增加。

根据你们先前得到的指示，考虑到所在国的特点，请继续开展揭露西方侵略集团，首先是美国同中国领导进行中接近的危险性质的工作，并注意以下几点：

1.美国统治集团在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合作时，希望有可能从“有利”方面影响中国，把中国的政策引入他们能接受的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往往作为国际舞台上的“稳定”因素出现。中国领导人本身不反对随身附和类似的谈话，而且为此目的，不取下“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命题，开始利用更灵活的空泛词藻。不过，在假惺惺的“热爱和平”、希望赋予中国对外政策更大“可敬性”的借口下，北京只是希望赢得时间来实现加速武装国家。事实上，中国领导越来越经常使用强制，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政策，担负起不能容忍的“授课”和用武力“惩罚”不听话者的职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像以前一样，避开接受裁军的任何国际法义务，企图贬低该领域所取得结果的意义，拒绝参加限制和中止核武器竞赛的措施。北京着手生产和试验能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火箭，进行创制中子武器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加速了世界的军备竞赛，直接抵触到缓和紧张性的利益。北京的这条路线，对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美国或是日本都带来严重威胁，而不仅仅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3.认为似乎北京宣称的所谓“现代化纲要”是中国克服经济落后的政治新方针的那些人，其理由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事实上，这一方针的任务，首先是促进实现把中国加速变成军事“超级强国”的老计划，而解决提高中国人民极低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尖锐问题，又被推到无法确定的将来。中国并不掩饰，“现代化”是准备战争的最好方法。事实上，无节制的军事化，促使中国本身的经济衰退，不稳定性增加。这样一来，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纲要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帮助中国增长军事潜力，给中国人民本身帮了倒忙。

另一方面，国家军事化方针，必然产生不可预知的转折和曲折，进一步表现出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导致国际局势危险的不稳定，给国际紧张性增压。直接或间接促进中国军事化的任何注射剂，特别是美国帮助增加中国的军事潜力，会使中国获得必需的攻击实力，以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图谋。在北京不仅反对巩固和平缓和的所有建设性建议，而且直接挑起国际冲突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增加，对全人类包括中国和美国人民的威胁增加。

说计划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是“非致命性的”、“防御性的”、“两用的”等言论，都不会改变事物的状态。问题不在于类似的划分是极为有条件的，而在于促进武装力量现代化，会使中国腾出人力和财力来增加主要的攻击实力——导弹核潜力。

4.北京早就深思熟虑的改变全球力量对比、改变目前国际关系整个结构的计划，引起了严重不安。把任何军事技术或装备交给中国，这是破坏世界上已形成的军事战略平衡、新一轮军备竞赛方面的一步。打破军事力量平衡，动摇了关于限制战备武器谈判的基础本身，因为保证各方安全的对等原则是苏美协商好遵循的主要原则。

至于苏联，那么它有一切可能性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打消对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有打算的兴趣。谁试图把美中关系引向利用中国作为向苏联加压和成为军事对立面的工具的路线，他的算计是短视的。希望把中国的扩张政策转向北方的人，恐怕会大大失算的。鼓励中国增加军事潜力，会加强吸引个别国家进入北京政策轨道的危险性，而将来导致产生这些国家本身可能成为了自己的扩张政策牺牲品的局势。所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应该承认，“强大的”中国为了自己的扩张计划而将选择另外的方向：多半是开始吞并邻国，占领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地区，而绝对不会作为美国或某个别的国家手中的工具。

5.发展中美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已导致国际局势的明显恶化，使寻求巩固世界不同地区和平及安全及现实信息系统复杂化了。北京领导指望国与国关系尖锐化，

唆使一些国家反对其他国家，挑起军事冲突，从而希望建立有利于实现霸权主义计划的基础。北京没有掩盖使苏联和美国在热核战争中发生直接冲突的目的，北京希望在热核战争的战火中夺取世界统治权。

希望有必要“加强”中国的人，打着这样的算盘；北京将陷入与苏联的对立中，陷入亚洲自己的冲突中，所以对西方将不是危险的。但是注意到中国平静不下来的内部政治斗争，谁都不可能担保，5—10年后，北京将不会打反美、反日牌，不会利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反对那些不负责任地姑息和帮助中国重新武装的国家。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扩张程度上与中国军队的军事实力成正比。现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首先是东南亚国家，他们被中国领导人认作传统的影响范围，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威胁。当美国及其同盟者帮助中国购买更现代化武器的时候，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邻国，是可以很容易想象的。中国试图首先确立对东南亚的控制，并来到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沿岸。

在这种条件下，试图闭眼不看中国政策的危险趋势，竭力袖手旁观，只会鼓励北京进行新的冒险，扩大扩张。相反，亚洲国家的集体努力，可作为首先用于反对该地区国家的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道路上的障碍。

(下段仅用于德里)：

(姑息和直接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安排，不会不与印度的利益相矛盾。虽然中国领导也与印度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在中国战略家的军火库中，对这个国家施压的方法仍有一整套。在美中计划中，比以前还要重要的角色给了巴基斯坦，用作向印度施压的杠杆，美国和中国在西南亚侵略行动的立足基地。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北京将大批武器发至与印度邻近的国家，借助给军事变态心理气氛增压，试图在政坛上留住像如今巴基斯坦制度这样不受欢迎的制度。中国加速在中印边界上布置兵力，在西藏建设核基地和战略道路，积极支持印度东北部的分裂主义运动，那里事实上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个国家的“未经宣布的战争”。)

没有疑问，随着军工潜力的增强，中国将走上实现中国领导公开宣布的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邻国领土要求的道路。这不但导致亚洲局势的严重不稳定，而且会在某个阶段引起对其他地区的直接威胁。

在已形成的条件下，苏联不能不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不仅注意地跟踪美中军事领域合作的方向，而且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巩固我们边界的安全，我们不允许改变军事战略平衡，而向有利于敌视和平事业和力量发展。

(下段仅用于柏林、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索菲亚、乌兰巴托、哈瓦那、河内、万象、金边、喀布尔)：

(请通报所在国外交部下列情况：关于进行反对建立美中军事政治同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平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造成负面后果的工作的指示已发给苏联大使。介绍座谈者熟悉上述指示的内容。)

请和古巴、越南、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老挝、蒙古、波兰和捷克大使馆(代表处)协调进行自己的工作。

必须注意地跟踪实现扩大美中军事合作计划的所有对外政策步骤，随机应变地经常将这些情况报告中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制止我们利益所不希望的趋势。

РГАНИ, ф.89, оп.34, д.10, л.1-8

№25987 苏共中央决议：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

专题影片(1980年12月15日)

机密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1.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80年12月12日报告中阐述的建议。(附件)

2.责成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材料为基础，拍摄大型纪录影片，揭露中国特工机关的反苏活动。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80年12月12日，第2611-A号

机密

关于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近几年来，国家安全机构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特工机关积极开展反苏活动和向我国派遣间谍的材料。从被揭露的中国间谍那里得到一些证明材料，和借助录影机拍摄到的关于招募他们与中国特工合作，然后派往苏联，向他们部署任务，提出完成任务的方式的类似证明材料。

我们认为责成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现有材料为基础拍摄专题影片，揭露中国特工部门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合适的。

上述影片在政治上的好处是，可以在苏联国内放映，也可以传播到第三个国家，以此来削弱中国特工部门针对我们国家开展秘密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社会舆论。

苏联外交部(В.Ф.马尔采夫)和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С.Г.拉宾)已同意。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 [\[25\]](#)

请审阅。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РГИАНИ, ф.89, оп.43, д.13, л.1-2

№25963 塔斯社记者发自喀布尔的电报：中国人在阿富汗

汗(1982年1月30日)

1982年1月30日，塔斯社

中国人在阿富汗

BA.喀布尔，1月30日，塔斯社记者拍发

1957年阿中实现了首次高层联系，正是那时表现出一种趋势，即通过承认与巴基斯坦有争端的普什图问题向阿富汗施加压力。那些年，北京领导层已经表现出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经常强调指出，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现今地图上，瓦罕地区是作为“丧失”的中国领土标明的。

还是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签署了第一份贸易条约，以此为基础，1971年双方又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1965年8月，中国人向阿富汗提供2800万美元无息贷款，用于建设帕尔旺省的综合灌溉工程、巴格兰纺织工厂、喀布尔养禽厂、贾拉拉巴德养鱼业、喀布尔养蚕业和青金石加工厂。

应该指出，1972年，阿富汗外交部长M.沙菲克访问了北京。由于北京答应向阿富汗提供700万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两年后双方签署了官方正式条约。

在达乌德时期，阿富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开始建设喀布尔造纸厂、坎大哈医院等。中国人开始给达乌德政权施加压力，在对苏保持积极中立的情况下计划使其转向西方。中国人特别关注使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近。

经济援助的性质是中国正在执行的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主要贯彻到阿富汗。例如，中国专家参加建设坎大哈医院，特别关注做那些定居在中央阿富汗区的哈扎尔人的工作，经常穿过阿富汗南部地区去哈扎尔人散居的地方，那里有自己的文化。在达乌德时期曾创建了一些亲北京的小组，驻喀布尔的北京代表团就依靠他们。

1978年四月革命 [26] 后初期，可以观察到，这在中国人中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中国的宣传十分谨慎地评价了事件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

人的方针，另一方面，塔拉基和阿明政府也表明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谨慎立场，尽管存在着北京援助盘踞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反革命的具体事实。直至1979年12月事件 [27] 之前，阿富汗报刊都没有刊载任何讨论北京政策的重要资料，实质上，塔拉基和阿明政府不止一次地指出自己对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兴趣。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前领导人的立场，使得中国人开始采取影响阿明的政策，并通过阿明，阻止阿富汗转向苏联。通过仔细观察，中国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时阿富汗领导人对内政策中的一系列因素，包括民族主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分裂、落后的民众和宗教的顽固性。这里还要指出，在那一时期，特别是在阿明统治时期，中国人采用了如下策略：一方面揭露在亚洲“苏联扩张威胁论”，采取了直接煽动反政府力量进行游击斗争的政策，给予他们直接的物质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不公开与喀布尔对抗和决裂，他们没有正式宣告正在执行中的条约无效。此外，在1979年3月签署了关于建设巴格兰第二期纺织厂的协议，并为此提供总额为1.09亿人民币的新贷款。1979年12月初，双方在喀布尔签署了关于中阿商品流转和供应的备忘录，与之相联系的是完成第二期帕尔旺省灌溉工程。这些文件表明，北京以特殊方式承认了阿明政府的政策，并明显暗示两国进一步接近的政策。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和1979年，中国专家开始撤出阿富汗，没有完成项目建设。还在阿明当权时期，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就裁减了一半。

1979年12月27日发生的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根本改变。中国官方没有断绝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不承认卡尔迈勒政府。此外，从这一刻起，中国的整个政策方向不仅开始怀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新领导人，而且开始积极、公开参加反对阿富汗的秘密战争，完全与里根政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反动伊斯兰政权靠拢。

在阿富汗内部，中国人依靠毛派左翼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是“永恒光辉”小组瓦解、分裂后存留下来的。这首先是来自1980年被枪杀的颇有名气的卡拉卡尼的遗产——阿富汗民族解放组织，该组织经历了领导层和斗争战略的变更，执行暗中破坏、声东击西、恐怖行动的方针。由此可知，中国给予盘踞在巴基斯坦的各种反革命组织援助，并试图使他们联合到包括亲毛主义集团的统一战线里。1981年12月30日的《士兵真理报》指出，被称为“伊斯兰革命运动”领袖的穆罕默德·纳比“支持与

中国毛主义分子联合，创建‘爱国者—解放者组织’，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在阿富汗实行破坏活动”。

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开始与美国、巴基斯坦和英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代表接触，正如这里所指出的，举行会谈，制定行动方案，交换关于阿富汗国内的信息。比如，在解救去年3月被偷着从巴基斯坦开走并降落在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飞机上的乘客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和外交人员注意到，中国代表，几乎整个中国外交使团的代表，在机场公开与在那里的美国外交官格里芬和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进行磋商。

现今阿中官方关系实际等于零。1980年3月新华社代表被逐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拒绝给予空军武官入境签证，两国之间的任何形式的科学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学生交换都不存在了，贸易关系也完全改变了。如果在1978/1979年双方商品周转量为1580万美元，那么现今，正如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贸易部公布的数字，仅仅达到300万美元。中国人没有丧失从阿富汗进口棉花的兴趣，因为人们对阿富汗棉花的质量评价很高。贸易只是通过“阿富汗银行”(以可兑换的货币)与私人公司进行。个别阿富汗公司继续向中国人订购茶叶、自行车、布匹、器皿和金属制品。

正如这里指出的，恢复合作建设工业、农业项目的前景暂时还不存在。

P.穆欣

手写批注：

归档..... [28] 1983年5月13日

苏共中央已经知悉了这份送往国际部的资料

B.鲍罗金(签名)

1983年7月1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93—1097页

1982年

№26580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29] (1982年5月21日) [30]

中国问题。我与罗满宁的冲突。

早在5月初，作为《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我接到一篇署名为贾丕才的对于鲍里索夫 [31] 的一本书的评论文章。我没有特意去想鲍里索夫是谁，而是打电话给科索拉波夫 [32] 说，我反对这种类型的文章，通篇都是对这本书的辩护和对中国的咒骂，仿佛从未有过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在5月11日，又一届对华国际会议在索菲亚召开——由6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秘密出席。我方理所应当是由罗满宁代表，他先是对中央下达了派自己前往索菲亚的“指令”，而后又提出了协议(作为与会方宣传和科研的基础材料并准备公开)。然而，这次会议，他第一次未能如愿。德国代表(如布鲁诺·马洛夫)先是对协议草案提出了一百条修正案，最后拒绝签署这一协议。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马洛夫向罗满宁报告说，昂纳克已经“完全受够了”这个对华国际。据说，他15年来不断写下了各种谩骂中国的词语(独裁、军事官僚政权、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堕落、向帝国主义投降，等等)，但生活照样继续下去。据说，他说苏共对中国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或许到了该“道歉”的时候了。无论如何，我们既然有“自己的”利益，对中国也就应该有“自己的”政策。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回到莫斯科后，罗满宁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由4个部门签署的“报告”。他打电话给我——确实是他“雷厉风行”的风格——对我说：“签了这份报告吧，报告内容已经一致通过了。”我读了报告，然后对拿报告来的秘书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之后，我把这份报告拿给乌里扬诺夫斯基看，他看过后第二天告诉我他的“想法”，也是反对罗满宁的。

当天晚上，奥列格·鲍里索维奇 [33] “亲自”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报告哪去了？

——在乌里扬诺夫斯基那里。

——干什么？报告内容都得到通过了，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今天碰面了，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我的备忘录，甚至要我将亚历山德罗夫为《真理报》写的文章修改得更强硬些……

他表现出一种威胁的气势，不容反对。

——我是不会签署这份报告的。

他转身摔门离去。

顺便说一下，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 [34] ……在《真理报》发表之前是在政治局内部传阅的。我代替鲍·尼(即波诺马廖夫)为文章做了修改，去掉了所有提到中国领导人名字的地方和一些恶毒的评论——那些说法使形势看起来好像是重新开始了与中国的“冷战”。这篇文章不是罗满宁的人准备的，但很可能经过卢比扬卡的审查；文章是本着塔什干精神而写的，从根本上与罗满宁的备忘录以及会议协议不同。此文是在这种情形下于5月20日得到发表的……虽然……

的确，罗满宁恼怒异常(地进入我的办公室)，这一天也是中国委员会开会的日子。鲍·尼早晨告诉我，他们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他(鲍·尼)和安德罗波夫倾向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然必要时也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而令他俩惊讶的是，葛罗米柯居然说要对中国穷追猛打，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但他总的说来太直率了，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应该更具灵活性。

佩什科夫带来“令人担忧”的消息(可能是从助手的闲聊听来的，甚至可能就是从罗满宁那里得来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说政治局的立场比罗满宁备忘录中以及会议协议中的更加强硬。虽然他威胁我要向契尔年科报告，说国际部拒绝签字，我还是将备忘录还给了罗满宁，但是我还是没有签字。

然而，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简短地写一张字条，向波诺马廖夫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做(这也是职责使然)。

确切地说，这份备忘录背离了塔什干精神，它主要想揭露中国的霸权主义，而不是理性地考虑事情的前景，相反，是用宣传的方法营造不利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氛围。同时，备忘录还说中国局势的特点是“向右转”。我在给鲍·尼的字条里写道：“对于‘向右转’，每个人都知道，这在我们党的术语里意味着‘事情变糟了’。但是和什么相比变糟了？是与毛泽东领导下相比，还是与华国锋领导下相比，或是与一两年前相比？”

最后，不能允许罗满宁路线违背塔什干路线。然而，事态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因为政策的执行实际上完全是在奥列格·鲍里索维奇的操控中——虽然我在私人关系上对他很有好感。

我请巴尔马什诺夫在鲍·尼从共青团大会回来之后将这张字条转交给他。他读了我的字条后，本着“希望不要出事儿”的原则，马上交给我一份12页的材料，“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此决定文本的一半内容都是针对昂纳克的，结论是“必须采取措施”，尤其是他在德国问题、波兰问题……等所有问题上都有所谋划。

关于中国问题——除了以罗满宁的方式之外，还要求斥责“某些苏联共产党员”，因为这些人学院里以及大众报刊上涉及中国问题时对党的政策进行错误的解读，在谈话中称苏联党和政府没有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言论必须与官方机构的领导路线相一致。

因此，靠政治局撑腰，罗满宁决定压制所有他的敌人和对手，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把自己树立成如李森科这样的人物。

我明白为什么巴尔马什诺夫匆忙叫我看那份材料，因为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要惹祸上身。否则我有可能拆了波诺马廖夫的台，因为他也是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他也像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齐米亚宁、扎米亚京以及罗满宁一样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字，并准备在周四向政治局递交。

第二天，在政治局会后，波诺马廖夫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些事情，特别是需要为美国准备一个勃列日涅夫传记的新版本。

——噢，对了——鲍·尼突然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政治局委员刚刚碰面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打断了他——我读了中国委员会的报告，很多内容都让我感到惊讶。如果你已经读了我给你的便条，我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报告偏离了塔什干路线；里面根本没有提出政策——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提出我们想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此外，不能让罗满宁制定如此重要的政策……

——这回轮到鲍·尼想要打断我了，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过去的15年里，罗满宁一直在中央负责关于中国的事务，特别是在他成为第一副部长以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小册子甚至是书(当然是在斯拉德科夫斯基的研究所及其助手的帮助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一件事：如何击垮中国。他非常明白，如果中苏关系改变了，他全部的“著作”都将被丢进废纸篓。但他已提名自己为科学院选举的候选人，且目前没有打算放弃。他会尽全力确保我们的对华路线保持不变，正如他用自己的4个笔名写的那些文章和小册子中所说的。但我认为，让关乎我国利益的极其重要的领域屈服于罗满宁的个人私利是不适当的。

鲍·尼开始注意到问题所在了。他表现出了兴趣：他尤其能理解这样的理由，他喜欢这类(事情)。最终，他说：

——嗯，别着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与委员会的报告截然不同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把它写在这里——(他拿出一张纸)……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对中国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增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应该委托相关同志准备一些新的举措，以便在我的塔什干讲话的基础上改善关系。”

峰回路转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是这样的。安德烈收到了委员会报告，马上发现这些都是罗满宁的龌龊勾当，即刻宣读了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发言的要点。

鲍·尼怀疑罗满宁关于昂纳克的消息的真实性，等等。你们之前哪里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还是这个权力中枢完全自动瘫痪了？以权力中枢的名义，就可以对任何事情想当然，甚至是“批准”罗满宁对中国事务大权独揽，这也意味着党中央自己亲手将关于中国的客观消息(和研究成果)挡在了门外，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落入奥列格·鲍里

.....

АНБРФ, <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1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7月10日)

.....

我和罗满宁的战争升级了。正如我前文所写的，他设法在政治局使“对华国际”获得通过，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共产党人》上发表他反华的一派胡言，而这次德国代表拒绝签字了。

在病假回来后，我发现这些材料放在我桌上(因为我是《共产党人》的编委会成员)，而内容则使我再一次感到震惊。21栏(打印出大约是66页)内容全是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攻击。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国内事务的：关于党的、宪法的、经济的形势，等等。而且攻击方式之凶狠是我们对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西德都绝不会用的，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不要说外交政策了。

一句话：是对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的彻底否定。

由于这份材料中涉及中国内政的内容，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奇怪：这还能称之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或者说，如果中国如此深地(并且是不可挽回地)陷入了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泥沼，怎么还能指望和它关系正常化，甚至还增进合作呢？

这意味着，塔什干讲话要么是一个在策略上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虚伪的)举动，要么就是我们的内部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人在中国问题上出现了“斗争”。

西方世界首先会问的是：塔什干路线完了吗？而中国则会有新的理由更加严厉地谴责我们的对内政策和“霸权主义”。我打电话给科索拉波夫，向他解释了这些可以想见的问题。他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何况罗满宁还在我头上呢.....这个决定已经安排要出版了。

我又打给波诺马廖夫，他说：“我无法撤销政治局的决定。”

——但是，你是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你可以告诉安德罗波夫。我敢说，在政治局决定出版罗满宁的文章时，所有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没读过那篇文章。事关重大，但愿勃列日涅夫不会得到报告说，他在塔什干的讲话被颠覆了。

——你知道中国每天都在说我们什么吗？他们在联合国的发言是不怀好意的。

——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他们半年前已经停止对苏联的攻击了，全世界都看得出，看看塔斯社的报道就知道了。然而，罗满宁向党中央隐瞒了这些。而且重要的是，塔什干路线还要继续吗？如果继续，就不能允许偏离这一路线的宣传……

——塔什干讲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你是说……

——不，不，你误解我了(他害怕起来)。我没有暗示你什么啊。如果科索拉波夫接受你的想法，还是让他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吧……不过总体上还是小心为妙，不要让人感觉到好像我们(国际部)是倾向中国的，而只有罗满宁一个人在斗争……

——好的。

然而，科索拉波夫不敢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他说，我应该给我的直接上司齐米亚宁打电话。

早晨的时候我还是不知结果怎样了。(我不喜欢逼迫别人……不想让别人陷入艰难处境。)而鲍·尼反而打电话给我，问：结果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啊。(我告诉他)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亲自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弗拉基米罗夫(他也是苏斯洛夫的前助手)，他很担心，答应我说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他就去报告。

之后，科索拉波夫也告诉我他与齐米亚宁谈的结果，后者也很担心，他打电话给鲁萨科夫，两人共同建议科索拉波夫将罗满宁的文章在中国委员会内部传阅，而不将其纳入未来的决议中。

这件事情暂时就到此为止。

АНБРФ, <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8月7日)

日记中断的这些天发生的主要事情看来还是关于中国的。

一周过去了，波诺马廖夫不满地对我说，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对他说：你们的切尔尼亚耶夫针对罗满宁的那篇文章写了篇有点儿宣言式的东西……这事儿变成部门间的纷争是很不好的……让他们争论去吧。我——波诺马廖夫(明显惊恐地)回应说，据说，切尔尼亚耶夫仅仅是作为《共产党人》编委会的成员(以波诺马廖夫副手的名义是绝对不行的)写文章，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内政的批评，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我(无礼地)对他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总体上反对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与塔什干路线是相矛盾的，我已经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并交给科索拉波夫了。

鲍·尼把他与安德罗波夫进行的此类“限制性的”行为归咎于我。安德罗波夫对他说，他要求罗满宁“大大减少内政的部分”，并从整体上减少恶毒的攻击性语言。

让我生气的是，关于罗满宁的文章，鲍·尼再次说他想再管这事了，而且建议我也不要插手。

这期间，我和阿尔巴托夫 [35] 看了一场厄尔德曼在1930年编的讽刺剧《冒名顶替》，不断地进行暗示和“联想”。之后，直到凌晨两点，阿尔巴托夫拽着我围着他家附近的阿尔巴特路转，又开始为了与经互会国家有关系的大国政策而咒骂每一个人，咒骂一切……

我这边则是告诉他关于中国的事儿。作为回应，他继续骂罗满宁及其同僚，并提出帮忙：我可以，他说，打电话给拉普捷夫(安德罗波夫的另一位助手)，或是布拉托夫 [36]，他在南边离勃列日涅夫近，小心地让他们知道，他说，《共产党人》可能再次刊发错误的文章……你把你给科索拉波夫的评论给我，这样我就有话说了。这是周五晚上。

周一早上，我交给阿尔巴托夫一份我文章的副本。当天晚上发生了我前面提到的和波诺马廖夫的对话，从这些谈话让我觉得，我之后的所作所为会被看作是在密谋反对政治局的决议，同时还违反了党的原则。周二，我打电话给尤尔卡，请他不要拿我的文章做任何事儿了……原来，他已经和拉普捷夫以及马上要去南边帮助布拉托夫的希什林说过我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文章给任何人，所有事情都还只是口头上的。

这时，《共产党人》即将发表的那篇文章的二稿清样已经在我桌上放了不知多少天了。科索拉波夫把它给我可以说是违反规定的，因为这份材料只有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才能看。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变化，也许被删掉了五分之一，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甚至事实上都没有得到执行。这份传阅件自然送到了波诺马廖夫手里，因为他是中国委员会委员。作为助手的巴尔马什诺夫还将传阅件送给了科瓦连科(另一位副部长，主管东亚事务)，以便他向鲍·尼报告他的想法。他汇报了，就如这种情况下的正常程序那样。巴尔马什诺夫把报告放在鲍·尼的桌上。后者说：“我说过不再插手这件事儿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像平时一样吃了一记耳光后，萨恩·萨内什(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尔马什诺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然，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和这事儿有关，而且也是因为他已经将材料送给科瓦连科，并且还附言：报告切尔尼亚耶夫。无论如何，巴尔马什诺夫都不敢再去找鲍·尼说中国问题了。

怎么办？一方面，不能被人说是违反纪律，尤其是，如果阿尔巴托夫插手的事儿传到了安德罗波夫的耳朵里(此外的不利因素是：即使阿尔巴托夫受到很多人甚至是安德罗波夫及其幕僚的信任和接受，这也是把党组织机构外的人牵扯进来了。早在60年代安德罗波夫领导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尤尔卡在该部担任顾问组组长的时候，他就经常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去)。

另一方面，不能允许《共产党人》发表那篇文章，因为这是国家利益。

我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沙拉波夫，他负责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早先，在我得知与弗拉基米罗夫就第一稿清样问题的谈话未能奏效后，就曾和他谈过这件事。弗拉基米罗夫主要负责国内问题，但至少答

应替我向安德罗波夫报告，告诉他我认为《共产党人》上发表的罗满宁的文章是有违塔什干精神的。他有可能没这么做，或是让沙拉波夫去报告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沙拉波夫：

——你还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吗？(装作开玩笑一样)

——是的，你不是还答应给我你对二稿清样的看法吗？关于一稿清样，我已经告诉过你，尤·弗打电话给罗满宁，命令他“删掉写中国内政的部分再发表”。

——我正打算告诉你我的意见。罗满宁的文章，虽然变短了，可其核心内容和语气依然没有变。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写下来吗？

——请写吧。

我坐下来，写了两页语气礼貌但是立场坚定的内容，坚称至少在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之前不应该允许这样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把这一书面意见送了出去。

三天过去了，石沉大海。同时，科索拉波夫的副手布加耶夫打电话给我说，科索拉波夫决定赶快去度假，以便躲开是非。

——我还能怎样，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 [37] ？我只从乌斯季诺夫(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那里收到对第二稿清样的评论，嗯，他在这里、那里减少了几处恶毒的言辞，但一些地方的语句更加尖锐……没别的了……

然后，他说，结果是罗满宁(作为中国委员会书记)要求把所有的修订稿都交由他而不是编辑室审阅，再由他把最终的文本送给我们。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 [38] ……我已经竭尽所能，而现在，我甚至连把自己对第二稿清样的评论送给你的权力都没有了。

——顺便说一下，我接到过一个电话，是……(这里他停住了，没说出名字，但我知道他要说的是齐米亚宁)。他开始大声嚷道，你知道的，用“同志般的”(兄弟般的)语气：“什么！两个政治局决议，一个中央书记处

决议，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你干吗不发表那篇文章？”云云。我平静地告诉他：我无东西可发，罗满宁把什么都拿走了，我甚至连稿子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收到任何评论意见。此外，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39]，在我收到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文本之前，我不会刊发任何东西。因为，当编委会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反对这篇文章时，编委会事实上也就每次都被排除在事外了(这里他补充说：科索拉波夫给我看了你写的评论，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的意见)。有鉴于此，我和编委会都不会对这一重大事件负责。我是个老党员了，我不会违背我的信念，而且我确信，我们的政策将遭受重大打击。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把我的原话向中央书记报告了(不过，他有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是个率直、自信、千锤百炼，而且诚实的人)，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当心，当心啊。”

在与布加耶夫谈话结束后，我还是决定打电话给沙拉波夫，他说：我已经向尤·弗(安德罗波夫)报告过了，不过把这事说成是我的意见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认为不能提到我？毕竟，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只是觉得自己打电话不太合适……

——嗯，是这样。我认为，以我的名义来说更好。

——好吧，那结果怎么样？

——他说的差不多和以前一样——只要删掉关于内政的部分，然后就可将文章发表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但那已经是事情发展的最后阶段了。)不过，你对那篇文章的评论在我看来还是很有用的。

——可我甚至连把它交给《共产党人》的权力都没有！

——试着交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看看，他毕竟是委员会的成员。

——好吧，多谢！

我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波诺马廖夫，我说：我已经和沙拉波夫谈过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全部意见报告给安德罗波夫(附件!)，但他认为

对文章的评论是“重要”的。(也在附件中!)

两天过去了。巴尔马什诺夫来了电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把你的评论、备忘录和你文章的复印件都退回给我了，没说一句说。我会把这些都交给你……换言之就是，与那次送科瓦连科时的“态度”一样：我跟你说过，我不会再插手此事了，就这样了！

我明白，自己四处碰壁，徒劳无益，因此决定顺从地坐等那篇文章发表在下期的《共产党人》上。

然而，昨天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鲍·尼打电话给我(今天他去休假了)：他说，我们应该在他走之前谈谈。于是，我去找他。他看起来神采奕奕。我走向他的办公桌，他扔给我一些文件，说：“拿去看看吧，你赢了!”

我一看，是勃列日涅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张便条，很短，只有一段。我仔细读了读，便条上说：这是我的助手高利柯夫对中国事务的看法，我认为其中有些意见很有道理，我请求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

高利柯夫写的备忘录，大概15页，内容如下：给人的感觉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我们的宣传没有大力支持塔什干路线，而有时发表的文章事实上是在损害这一路线(除了别的事例外，备忘录还提及《真理报》7月20日发表的文章)。我们不愿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但是变化还是发生了。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因此枪口应该对准那里。否则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准许就很多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接触和交流(甚至在像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却不允许和中国进行同样的联系。我们需要对中国问题采取一些策略，类似塔什干精神那样的手段。应当每天都尽力来消除紧张关系，推动合作，达成相互理解，而不是把中国往美国方面推，等等。

这份备忘录根本没提准备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或是罗满宁的路线，而且完全是反罗满宁精神的。

关于波诺马廖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对这件事情了如指掌。他对我说：我送这份材料给科瓦连科，你知道的，前段时间我们就中国问题起草了一封给兄弟党的信，而现在要根据勃列日涅夫便条里的精神对其

进行修订。安德罗波夫本来已经同意我们的草稿了，可现在又说要再“看看”(当然，那封信虽然并不完全是按照罗满宁的精神起草的，但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草稿基本上是由罗满宁的团队撰写的，我们的人仅仅是负责编辑——“削弱”罗满宁主义)。

我立即给科瓦连科打电话，我们三人坐下来，鲍·尼甚至离开他的办公桌和我们坐到一起，在一张新加的小桌子旁。我变得十分无礼起来，说：鲍·尼，或许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给兄弟党的信发出去？那是什么论点啊？假如我们想要关系正常化，我们怎能劝别人不要这么做呢？……

——不是这样的，你别太得意忘形了！

然后，他去编辑室了。

当科瓦连科还在赶来的路上时，鲍·尼告诉了我“详情”……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关于这一点——当然是某种背景下：“罗满宁做得不对。我警告了他，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得给他另找个位置了。我还告诉他的沙拉波夫——他们和罗满宁是朋友，有段时间一起在中国待过，甚至可能一起读过书：你们要么尽到作为助手应尽的义务，要么干脆离开党的机构。”……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结果是，我有关中国的文章和所说的每句话立刻都被罗满宁知道了！

可是，是谁激发了高利柯夫灵感呢？或者，其实他才是想出塔什干路线的人。而且，他还“独立地”“准备好”了这份备忘录，甚或对《共产党人》上那篇文章的情况毫无了解。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对华国际”……关键是他的介入来得正是时候！

再来看看我的波诺马廖夫吧！“我再也不想管这事儿了！”一个已经做到党内小官的政治人物，一生花招儿玩尽，仅仅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АНБРФ, <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1192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缓和苏中关系
及国际局势的讨论(1982年9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82年9月9日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

出席者：Ю.Б.安德罗波夫、М.С.戈尔巴乔夫、В.В.格里申、А.А.葛罗米柯、А.П.基里连科、Н.А.吉洪诺夫、К.У.契尔年科、П.Н.杰米切夫、В.И.多尔基赫、В.В.库兹涅佐夫、М.С.索洛缅采夫、М.В.齐米亚宁、И.В.卡皮托诺夫等同志。

一、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克里姆林宫关于1982年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会晤情况的总结报告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在我们面前的秋季充满着紧张的情势。但是夏季，这是休假时期，也没有空休息。这样，也加上了我的休假。

像你们所知道的，我同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几次会晤。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不准备讲了。这些内容你们都已知晓。现在只谈几点情况。

首先是关于经济问题。

很不愉快，但却是事实，我们好些个部门患有社会主义国家合同供货不足的慢性病。于是我们的伙伴常常向我们讨债。这就不得不在高层会晤时互相替自己辩护。需要在对外经济交流中做出严格的规定：既签字，即执行！

我不能不讲，朋友们对经互会工作的不满情绪明显地增长。我们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这里的问题不是因为在那里努力工作的同志，对他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组织诞生30年前建立的形式。

希望我们拟定召开关于经济问题最高级别的会议，有助于经互会在

质的方面改组工作。迫切需要寻求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加速器，否则我们各个国家不可避免承担西方债务的重负。

还有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中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盟国竭力把管理经济的指令形式同利用经济杠杆和刺激更好地相结合，反对领导过度集中。

各兄弟国家采取努力的结果在实践中尚未完全显露，但有许多东西大概对我们不适合。但是对大家有利的，我们应好好地认识清楚。我讲这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着手改善经济的管理。

巴伊巴科夫和塔雷津同志不久前报告了这一研究的结果。这仅仅是开始，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点。这个工作很重要，要继续做。

我们的经济是巨大的。比如说，任何一个部——这几乎是整个大军。管理机构扩大了，于是失算和各种不协调就非常多，由中央规定细则无一例外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我们应当再三认真地考虑，如何提高劳动集体的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不给予工厂企业和联合公司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权利，那未必能达此目的。如果企业在经济技术和商务领域上有更多的权利，那么相应地在它们身上负有更大的责任。应考虑提高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解决区域性重大问题的作用。

今天对我们来说，怕是包括这个问题——这就是加强纪律。既有国家的纪律，也有劳动的纪律。关于这方面我们已有足够的号召和愿望。但我们就是常常不会整顿秩序。

我想，要从上面开始：经常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及相关共和国党的机关会议上检查执行情况。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常务委员会听取各工作报告的措施，有助于提高各部对加强纪律的需求。需要这样去做。

加强纪律要普遍地去抓，但不搞运动。可能，要准备这个问题的特别决议。

在8月初，我记得，政治局授权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吉洪诺夫、多尔基赫等同志准备关于经济的迫切问题的建议。希望

同志们也考虑我的这些意见。

关于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提到的国际问题中，我现在讲下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盟国对日内瓦苏美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以及战略武器的谈判表现出明显的关心。关于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倡议在政治上给了一定的加分。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但推动谈判的僵局，目前尚未成功。

政治局委员会授权研究这些问题，考虑如何发挥我们的立场，和已提出某些建议。但对核裁军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要继续。这是非常需要的，在这方面的也是很重要的。舆论应当得到关于我们谈判的立场和情况无论哪种形式的信息。这是压在美国人身上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与昂纳克会晤时，我相当详细地同他谈论中国。现在北京的政策似乎出现新的情况。好像我在塔什干的讲话继续做工作。

中国对我们备忘录的回复，总体上保持了平和的、公文式的语气。我们要看中国人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中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自己要认真地、广泛地、沉着地对待这次协商，当然，不要忘记我们国家的利益。对将进行协商的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目的——开始时试探出解除苏中关系不必要的尖锐化和成见的可能性。

不能容许在报刊上发表挑衅的言论，或采取笨拙的步骤使原来就困难的同中国的对话复杂化。很好，我们的中国委员会认真地关注这事。

这大概就是在今天会议开始我认为有必要触及的全部问题。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您非常清楚并详细地阐明了关于您在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会晤情况总结报告的问题实质。我们在这里也一直对此能感觉得出来。您确实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且内容非常重要。这些会晤对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联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也同其他国家会晤，因为关于这些会晤他们都知道。您的每一次会晤我们在政治局都讨论过，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我们赞成您进行的所有会谈，并记录了其他要点，委托那个或另一个组织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准备好建议，并将其送交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委托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吉洪诺夫：除列昂尼德·伊里奇进行的会谈外，他们根据会谈内容，起草并发送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报告。我不准备讲所有的报告，我要注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关于节约燃料和动力资源的报告。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报告，当然，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的基础上，部长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关于动力技术及其节约；关于保证1982/1983年冬季我国国民经济的动力资源等问题的状况。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根据部长会议的路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了缓和动力危机的紧张，并保证国民经济的动力资源，我们动员了不少资源。

格里申：列昂尼德·伊里奇会谈的内容非常重要，是在高层中进行的，毫无疑问，这对加强我们同兄弟国家的联系起着重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兄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会谈，还是发送政治局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这是很重要的文件，使政治局以及所有党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现在，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措施，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交办了非常重要的、严肃的任务，这些任务将根据报告去完成并提出建议。

契尔年科：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虽然是在休假期间进行的，但是非常积极的。实质上休假是富有成果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性的和公有经济意义的重大问题。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对巩固我们各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毫无疑问，值得最高的赞扬。

葛罗米柯：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所讲的。真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休假中在克里姆林宫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积极的、富有成果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我们要做怎样的决议？

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说，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讲述的意见。要向党组织通报会晤情况。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讲，要在准备关于经济的迫切问题的建议时，要考虑到您的意见。我们以契尔年科同志为首的委员会将会考虑到，同时我们还会考虑到您对政治局的波兰、中国和阿富汗等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通过决议。

二、关于苏联对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倡议步骤

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索科洛夫和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了关于我们对9月21日召开的二十七届联大常委会的主要倡议问题的意见。

我认为，主要建议的主题选择是成功的。全面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走上制止核武器竞赛道路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为此而斗争，要“快一点”对此达成协议。

我们这个步骤，我认为，是比较适当的，因为禁止核试验协议差不多已准备好。但里根现在开倒车，并想勾销已全部完成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要对美国施加最大的压力。

另一个问题是防止袭击和平核设施——电站、反应堆，等等——我也感到非常迫切。这表现在不久前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的反应堆。对的，我们把类似的行动看作是使用核武器。这促使可能的敌人当心点。我想，联合国大多数委员在这方面会支持我们。

葛罗米柯：我完全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观点，我想，提出这些问题现在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契尔年科：打算在葛罗米柯报告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具有很大的迫切性，现在大多数国家既反对核试验，也反对对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进行类似强盗的袭击。

吉洪诺夫：我认为，外交部和其他单位一起准备了非常正确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库兹涅佐夫和多尔基赫同志也支持这些建议。

通过决议。

三、关于对二十七届联大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我的意见是，对联大会议目前问题总的指示也是可以接受的。它符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立场。只指出一点。关于近东问题的指示中要补充一点：我们的代表团应在会议上对美国关于调解近东

问题近期提出的建议(所谓“里根计划”)作出有论据的评估。要平和地、但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建议中不足之处，及其真正的实质。这尤其重要，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像大家所知道的，已经被美国的诱饵“上钩”了。总的来说，同志们，(我在这里不是讲联大会议，而是讲更大的范围。)我们该考虑，把我们对近东的建议活跃起来，使这些建议更具体，切合实际，以及，我想说，对有关国家更有吸引力。对这些问题外交部要研究。对总的指示草案经补充我讲的意见后可以批准。

葛罗米柯：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补充很好，对此要考虑到。

契尔年科：指示准备得很详细，可以批准。

安德罗波夫、吉洪诺夫说，指示完全可以接受，制定得很详细，经列昂尼德·伊里奇补充后，应予以批准。

通过决议。

四、关于二十七届联大苏联代表团组成人员

勃列日涅夫：根据政治局意见分送了外交部呈报的关于出席即将举行的联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的报告。打算批准以葛罗米柯同志为代表团团长，当他离开纽约后，由特罗雅诺夫斯基同志任团长。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支持关于批准代表团的建议。

五、关于对苏联代表团在欧洲限制核武器谈判的补充指示

勃列日涅夫：由于9月30日在日内瓦恢复同美国进行关于欧洲核武器的谈判，委员会提出了补充指示的草案。总的来说，对我们极具建设性的立场还增加某些灵活的因素(我们提出，规定每一方的导弹在300个弹头的框架水平之下；决定在大西洋缩小区域的界线；以及限制射程500—1000公里的导弹数量的可能性)。这将是我們力求达成互相可接受的协议的新证明。

我想，指示要批准，但外交部和对外宣传部要考虑何时，用何种方式，把我们这些步骤通知到“第三国”政府，然后，可能也通知到舆论。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对我们原先批准的第一阶段谈判指示的补充，证明苏联政策的灵活性。

葛罗米柯：这些补充指示将给我们在谈判中采取更具攻势立场的可能性。

契尔年科：这些指示有利于推动谈判，虽然很难指望美国人会正确地接受这些建设性的建议，但无论如何，我们代表团手中有非常好的王牌。

吉洪诺夫、格里申、戈尔巴乔夫、库兹涅佐夫、多尔基赫等同志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意见。

六、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第二十六届(常务)会议

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和库利科夫同志建议今年10月下半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库利科夫元帅主持下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

会议规定审议1982年武装部队准备情况的总结报告，1983年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计划。

关于在报刊发表，电台和电视广播第二十六届军事委员会会议的通知草案已送请政治局批准。

如果同志们没有意见，让我们同意乌斯季诺夫和库利科夫同志提出的建议。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同意对此问题提出的建议。

通过决议草案。

七、关于对日本关系的几点实际措施

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索科洛夫、阿尔希波夫和费多尔楚克等同志提出了关于对日本关系一些步骤的建议的详细报告。

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步骤——葛罗米柯同志访问东京，两国外

交部协商，活跃会议的交流和执政党的接触，在日常事务中对日本人作某些不大的让步。

在商业经济方面——扩大一系列大项目的互利合作(开发铜、石棉、磷酸盐、亚库梯煤等矿床以及萨哈林的油田和天然气，建设一些纸浆厂)还有一些活跃商业和渔业的措施。

还规定了我们对于日本宣传的基本方向。

关于这一切还可以说些什么？

报告是需要的，及时的。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极为重要，但这种关系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报告中建议的措施是有益的，实际的，而且是，我可以判断，是深思熟虑的。看来，这些措施应当赞成。

我只想讲一点，报告中建议继续推动我们关于睦邻合作条约的方案，搁置提及任何所谓“领土的”(或“没解决的”)问题，这是日本人坚持的问题。大概在目前局势能想出一点别的什么办法是不容易的。但是，老实说，我不相信，简单地重复我们已提出5年的立场会导致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有所推动。看来，外交部、国防部，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寻求政治僵局的出路，其间表现出我们与这个对苏联利益非常重要的国家关系。

还有一点不大的意见。谈到对日本的宣传，重点是“揭发”、“加强暴露”、“强调美国的冒险主义”，等等。至于我们如何更关注对日本人民在各领域的生活、劳动和成就的描写？要知道，在这方面已不少了。还有我们同日本合作的描写。要让日本人从我们方面感到不只是批评，而且还有睦邻的关注。这大概是有益处的。

总的来说，这份报告应该批准。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关于促进我们对日关系的问题，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的路线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对这个工作积极地抓起来。

葛罗米柯：日本人不顾美国总统的制裁仍表示尽力在应有的水平上支持同我国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日本人历来在我们的水域捕鱼，因此他们对这方面非常关心，还有对发展经济关系以及其他方面。

契尔年科：对促进我们同日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关系的建议值得赞同，应予以通过。

通过决议草案。

八、关于基里连科同志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我们有一个问题。像你们想起的，在某一时间前查佐夫同志通知了关于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同志身体健康的严重状况。我们向政治局所有成员介绍了医生的诊断。后来进行了会诊，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证明文件。由此得出结论，基里连科同志病重，对他们的工作负荷可能加深严重的病程。我们常常很好地对待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像对待其他所有的同志一样。但是，很遗憾，医学断定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严重。这份诊断书是由查佐夫院士、施密特院士和纳札罗夫教授签署的。他们提出要解除基里连科同志脑力负荷的坚决意见。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明白自己的状况，并给我写了声明。我读给你们听。（勃列日涅夫同志宣读基里连科同志的声明。）

我认为，要听取医生的意见，谨慎地对待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并满足他的请求，基里连科同志可根据1976年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决定享受物质生活保障。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我们会一致支持勃列日涅夫所讲的结论和意见。真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严重恶化，这使他不可能完成他肩负必须去做的任务，特别是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工作的范围。

吉洪诺夫：我完全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关于满足安德烈·帕夫洛维奇请求的建议。既然疾病这样严重，病势逐渐加剧，这将使他很难继续工作，而且可能导致极其不利的后果。

契尔年科：医生提交苏共中央的诊断中强调，病情没有减轻，相反是在加剧。

戈尔巴乔夫：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葛罗米柯：当然，我们大家对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病情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祝他身体健康。但我们每人身上都负有一定责任。它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没有胜任工作的健康身体，毫无疑问，不仅困难，我想说，而且不可能完成这些责任。

基里连科：我要衷心地对列昂尼德·伊里奇许多年来与他共同工作以及当我在其他领域工作时对我的关怀表示诚挚的感谢。我对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表示非常高的评价，我有幸同他们一起工作。真的，疾病不可能让我继续留在这些崇高的岗位上。无论如何惋惜，如何难过，但是不得不走上这一步，辞去工作。

勃列日涅夫：请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对这个问题投票。

谁同意满足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同志免去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请求的，请举手。(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举手。)请放下。

我认为，我们还要根据1976年11月11日苏联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对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物质保障做出决议。大概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物质保障非常优厚。

全部结束。正确无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628—4639页

№26583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9月11日)

.....

在乌斯诺夫在古比雪夫市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出现了一段咒骂中国的内容。亚历山德罗夫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简直是无视勃列日涅夫的批示和中国委员会的决定！如果这是罗满宁的主意，那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检查后发现，之前的传阅稿确实没有这一段，这意味着它是在“评论”之后加上去的。果不其然，是奥列格自行建议恢复的！

但这也仅仅是一段插曲。在勃列日涅夫休假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对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中国问题(基于他的批示的精神)，以及在谈到关于应当冷静地善于评判国际局势时，勃列日涅夫说：“坏事情也会有好的方面。”.....

АНБРФ, [http : //www. gwu. edu/ ~ nsarchiv/rus/Index. html](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4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10月2日)

.....

莫斯科党委在圆柱厅召开了阅读会，鲍·尼作了题为《列宁的和平战略》的报告。他很开心。

在传阅中，罗满宁试图在报告中再次推销他的“恐华症”(即如乌斯季诺夫的发言那样)。鲍·尼为罗满宁的固执和傲慢而感到震惊，而这次他坚决表示了反对。罗满宁等人甚至等不及中国做出一些令勃列日涅夫“震怒”的事，以便让塔什干路线，特别是高利柯夫的便条之后政治局在8月份所采纳的路线方针见鬼去吧。他们根本不懂用历史的方法思考问题，不懂什么是国家政策。但是，我们和中国又无谓地争论了七八年，倒的确是罗满宁干的好事儿。

.....

АНБРФ, [http : //www. gwu. edu/ ~ nsarchiv/rus/Index.html](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1983年

№16691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1983年5月31日)

绝密

仅此1份

(工作记录)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83年5月31日

主持人：Ю.Б.安德罗波夫同志

出席者：Г.А.阿利耶夫同志、М.С.戈尔巴乔夫同志、В.В.格里申同志、А.А.葛罗米柯同志、Н.А.吉洪诺夫同志、Д.Ф.乌斯季诺夫同志、К.У.契尔年科同志、П.Н.杰米切夫同志、В.И.多尔基赫同志、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М.С.索洛缅采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И.В.卡皮托诺夫同志、К.В.鲁萨科夫同志、Н.И.雷日科夫同志

会议开始时，安德罗波夫同志对阿尔维特·雅诺维奇·佩尔谢逝世发言表示沉痛哀悼。安德罗波夫同志告知，阿·雅·佩尔谢的葬礼，正如中央决定确定的，将于11时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红场上举行。治丧委员会成员在出殡时到达联盟宫，其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11时直接到墓地。

现在，我想讲在我看来值得讲的问题，以便我们交换意见，并且拟出建议。今天，我同一些政治局委员谈了关于针对美国在西欧国家部署火箭“潘兴2”和巡航导弹我们政府的对策声明以及关于威廉斯堡“七国集团国家”通过的声明。我们就这个问题征求意见，交换看法、提出应拟出哪些建议是有益的。

如果看一下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事件，那么可以说，那里形成了反苏联盟。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是极危险的。现在威廉斯堡举行的北约国

家会议，发出了侵略言论。这次“七国集团”通过的声明本身，也是极为非建议性的和侵略性的。

如果分析一下西方国家对我们声明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声明给了他们强烈印象。在个别西方人士的讲话中微微流露出一种声调，对限制和裁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谈判的有利进程表现出希望。另一方面也有言论说，要无条件地执行北约的所谓双重决议，就是说要在西欧国家部署核导弹。

里根的行为，值得我们一方给以最严厉的驳斥。他是所有反苏谣言的核心人物和作者，是各类欺骗性言论中伤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作者。不过在报刊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和相应的回应。这当然是不对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想组成一个反苏集团。它们共同行动，而且正如你们能相信的真理在一系列情况下处于高压之下，里根成功了，迫使自己的“七国集团”伙伴签署声明，发言反对苏联的政策。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遗憾的是，我们在孤单地独自行动。我们中间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言，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联合起来做的。我们华沙条约国家以及没有参加条约的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务必表现出团结一致。与此同时，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陷入了自己的民族问题。如果允许这样说，这是无足轻重的举动。

所以我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莫斯科召集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开会来讨论目前的形势呢？在这个会议上也可就限制和裁减欧洲核武器谈判进程问题、北约国家最近的决议问题以及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旨在激化的国际局势的阴谋有关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当然，会产生罗马尼亚的问题。怎么对待它。我想，不邀请罗马尼亚是不合适的，看来没有它开会是不可行的，虽然大家知道，他们会发言，反对发表我们的声明。

有一个问题：何时召开这样的会议，结局是什么。我想：不可以把召开这样的会议长期拖下去，因为西方国家在行动。我们暂时的行动不够积极。我认为，现在已经需要在会议前全方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我们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可见，值得在这个会议上准备、通

过、然后公布我们对北约决议表示反应的文件。可能在这个声明中，重提我们以前说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间互不侵犯的建议，也可能产生其他的建议。

勃兰特不久前发表讲话，提出了关于限制欧洲核导弹和限制战略性核武器谈判合并进行的建议。可能，我们真的应该想一下这个建议，并且正式提出——把两种武器进行的谈判合并成一种谈判，既包括欧洲核武器，也包括战略核武器。同样应该想一下，在何处和何时提出这个建议，我想，由外交部联合国防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建议。

我们必须开展更广泛工作，争取社会舆论、动员欧美西方国家社会舆论反对发展欧洲核导弹、反对美国政府加紧进行的新军备竞赛。日本特别是中曾根康弘首相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不安，他完全站到了西方国家侵略阵营一边，并完全支持里根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们有可能应该想一下对日本的折中行为。例如可以考虑联合开发没有战略意义的个别小岛；也有可能提出其他建议，特别是，我想，日本可能在经济方面，同苏联进行更积极的合作。

下一个问题涉及中国。我认为，在和我们谈判中，中国人不会向前走了，停在他们现在停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资料说明，他们能够 and 苏联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要知道，他们自己发起、建议我们签订这一年的贸易协定、贸易额大大超过我们前几年同中国的贸易数字。有鉴于此，可能应该派阿尔希波夫同志去中国进行相关谈判，去试探一下。如果我们能和中国按文化、体育和其他组织的路线扩大经济合作，那么我认为这已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谈一下近东。有人说，近东的事件和我们无关，这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我们和叙利亚有着良好的关系，而叙利亚坚决反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签订的协议，它们同伊拉克的关系不好。近来，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特别是阿拉法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阻塞。一句话，我们这里有了也应想一想的问题。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宣传工作，那么可以认为，针对北约国家的军备行动还是十分平静的。当然，我们不应该用战争吓唬人民，但在我们的宣传中，需更鲜明地、更广泛地指出里根政府以及对其支持的西欧国家的军事行动，就是说，换言之，充分揭露敌人的侵略性质。我们需要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运用这些事实能够动员苏联人民来完成国家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我们不可以，同志们，在出现的局势中忘记巩固国防能力的问题。这些题目应该在我们情报手段工作中是经常性的。你们记得，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军事威胁临近了，因此我们应该进行坚决斗争反对西方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思想的影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里根打电话给参议员，如果他们支持苏联的建议，他会指责他们背叛。为什么我们的报刊不反对玩忽职守、旷工者、不好好工作者呢？我请同志们就提出的问题发言，可能同志们还没有别的想法。谁想发言？

葛罗米柯：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说的建议。首先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我认为，这样的会议需要开。我想，应该邀请齐奥塞斯库来开这个会。我想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安德罗波夫：他们恰恰请求进行咨询。

葛罗米柯：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求于我们。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将显示我们条约的团结，在核武器和裁减军备竞赛问题上确认我们的原则立场。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上通过文件，正如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40] 正确地说的。这个文件应该表达得清楚、明确。长篇声明不需要，但应该是尖锐的、具体的。这将是我们的华沙条约国家的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是需要的。

谈判怎么办呢？我完全支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把欧洲核武器谈判和战略武器谈判合并进行的建议。正如大家知道的，里根抱定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在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潘兴2”和巡航导弹。产生了问题：我们怎么办？是继续谈判吗？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是准备部署的。所以，应该提一点新鲜东西。因此，这个合并谈判的建议正好也将符合我们的利益。

安德罗波夫：应该邀请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参加这种谈判，让他们参加，他们是核国家。

葛罗米柯：在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定会拒绝谈判，但邀请他们仍然是需要的。这是对的。我想，主要建议是合并谈判。这个建议涉及限制整个核武器，就是说将包括这些谈判和战术导弹。在当时，西方国家本身提出过关于谈判所有种类核武器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这很好，让他们自己也说说是如何看这个建议的。

葛罗米柯：那时，我们接触说反对所有种类核武器的人要容易一些。我想，他们会来开会的，尽管我感到，他们将坚持在欧洲部署导弹。一句话，这件事情将有某种出路。

安德罗波夫：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由此失去什么。

葛罗米柯：美国人那里出现了某些想法，确实，它不是正式的，但很重要他们可能同意这种合并。无论如何，这条路线我们应该实行，不能迟了。我们将有备用方案——这是限制战略核武器和欧洲核武器谈判的继续。大家知道，美国说到，他们会发动第一次打击，那只是回应侵略。我想，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会发动核打击的。像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是反对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我们也应该在宣传和实际行动中灵活利用这一点。

关于日本。我有这样的建议：我们是不是同意就齿舞岛、国后岛和实质上只是一些弹丸之地的其他小岛提出的建议，并划分边界，也就是把边界确定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关威望的建议。

安德罗波夫：我说到日本时，不是指这个建议。我说的是联合开发某些小岛。

葛罗米柯：可把这个和那个建议结合起来。这些岛屿是海洋中的小点点，没有这样大的战略意义。

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希望扩大经济联系。甚至在实际上，它已在这方面采取了某种措施，例如扩大商品贸易额。

安德罗波夫：正如我说的，这还需要观察。

葛罗米柯：我想，中国人不会做更多的事情。他们提出部队撤离边界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点。但是之后，中国人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要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上。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看来我们不应提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关于蒙古。可能应该把部分军队撤离边境。近东有危险，以色列将打击叙利亚。如果叙利亚破坏了里根的计划，那么美国人将会失败。

安德罗波夫：我想提个建议，提醒叙利亚，劝它不要卷入这场冒险中。如果事件开始了那么我们应该要早一些将这件事告知叙利亚领导，并制订相关的计划。

葛罗米柯：叙利亚把坦克开往黎巴嫩。任务在于我们如何劝叙利亚领导人放弃卷入军事事件。

安德罗波夫：可能就这个问题写封信给阿萨德如何？

葛罗米柯：我们在防御方面做的一切，应该继续做。计划部署在我们这里的所有导弹，要提供，我们计划在那些点安排飞机，要定下来。看了“七国集团”通过的美国声明，应该说，这是很狡猾很强硬的声明。但声明中有小漏洞，我们应该想一下如何利用。不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是，它们将把所有导弹部署在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

我认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应积极开展工作，积极反对我们敌人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蒙古，应该说一下。如果我们把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撤回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将失去一块好的进攻基地，失去主防御阵地前的设施地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一切设备都安装好了。

所以在苏联边境上，做任何挪动，我们简直是无处可动。

关于柬埔寨和越南，我们需要保留那里取得的阵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措施，应该支持。我们将仔细地研究这一切，并且想一下我们的行动。也要考虑一下维也纳谈判。

日内瓦谈判，既有欧洲核武器谈判，又有战略武器谈判。我真的认为合并谈判是个正确的建议。由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建议可能是合适的，同时提出比如说核武器，其中包括法国和英国核武器裁减50%的建议。

吉洪诺夫：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同意这样做。

乌斯季诺夫：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们的建议发到全世界。对中程导弹，西方国家不会拒绝将其部署欧洲。

葛罗米柯：那么缩减什么？

乌斯季诺夫：可缩减所有导弹。

葛罗米柯：我们建议过这一点。

乌斯季诺夫：是的，建议过，但我们应该还要提建议。关于日本，我想说，只可看一下某些不大的岛屿，但至于像国后岛这样的大岛屿，那我们已在那里十分可靠地定居下来了。例如我们只能通过拉彼鲁兹海峡走出日本海，而且应该说，我们在这里十分拥挤了。

关于召开兄弟国家领导人会议。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意见。应该揭露西方国家，它们的军事声明和军国主义的声音。也许，安德罗波夫甚至应以某种形式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葛罗米柯：我在会议上将有个报告，看来在这个报告里也应该提出一系列建议。

乌斯季诺夫：我方可能对记者发表谈话吗？一句话，应该积极工作，召集兄弟党，和他们谈这个问题。

契尔年科：即使罗马尼亚不签字，那么没有罗马尼亚签字也可以通过建议。

乌斯季诺夫：日本暂时没有参加西方国家的军事组织。所以，我们应该不仅影响日本，而且影响其他国家。不仅我们表示反对里根政府、英国人、日本和其他人的军国主义意向，而且兄弟国家也要做这件事，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发言表示。顺便说一下，他们在这方面一言不发。我们应该，同志们，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但要善于这样做。遗憾的是，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尖锐。中国反对越南，指责它在边境挑衅；而越南在这方面指责中国。总的说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很紧张。

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建议，针对军备竞赛加强反战宣传，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错误建议。显而易见，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建立同宇宙相关的指挥部问题。大家知道，美国人已建立了宇宙指挥部——宇宙委员会。一句话，我想说，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宣传我们的建议，揭露西方国家的好战意图。

安德罗波夫：当然，我们无法改造里根，但要用最坚决的方式揭露

他的反苏军国主义言论。

吉洪诺夫：里根已经不会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反应。至于合并谈判，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建议，应该把它提出来。当然，他们会把导弹部署在西欧，但我们应把这一点广泛地、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政府的声明是一个很严肃的文件。现在应该开展宣传，揭露西方的行为，强烈影响人民。我想，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会议，应该无条件的举行。同时，应该设法提示给我们的兄弟国家，使它们每一个，比如说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分别发言，例如主张设立欧洲无核地区，或谈别的问题。比如说日夫科夫可以谈巴尔干的无核区。现在谈中国。扩大苏中商品贸易额的所有倡议，都是从中方发出的。这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分析关于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关系的基础，并派阿尔希波夫同志去中国谈判。

至于部队撤离边境，我想这件事是不现实的。

关于叙利亚，我认为，同志们这里说的完全正确。如果叙利亚陷入冲突中，那我们会失去在近东拥有的一切。而我们需要叙利亚留在我们的轨道上。所以，应该和叙利亚领导做大量工作。应该在我们的宣传中找到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形式及其实施方法，以便将核战争的真相告诉人民，但不是吓唬他们，这正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正确地说到的那样。

契尔年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今天召集我们是完全正确的，有关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建议是对的。如果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朋友——捷克人、民主德国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事情的现状没有大的担忧。所以，召开会议事实本身将有重大意义。我认为，正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发言中正确地说到这一点，需要在最近时间召开会议。

众人：支持召开会议建议。

契尔年科：在这次会议上，也可以谈及中国，谈及近东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局势问题。我认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发言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很好的。那里召集了西方侵略国家的“七国集团”，我们也是“七国集团”，我们需要召集起来，但这已经将是为裁减核武器、为和平而斗争的“七国集团”会议。

关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所说建议的拟订，我认为需要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好好准备并提交中央委员会。

格里申：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出现的形势很严峻、很危险。“七国集团”声明，它们将在欧洲部署导弹，这带有厚颜无耻的性质。在反苏的基础上，真的建立了集团。西方国家竭力在核武器方面建立对华沙条约国家的优势。还应该在北约会议召开前开会。

葛罗米柯：也可以在北约会议召开之后。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有些问题上的观点。

格里申：在会议上，我们应该号召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至于邀请罗马尼亚，我是赞成邀请的，虽然也没有保证它会签署这项声明。当然，它们表现得很差。大家知道，不久前，齐奥塞斯库接待了施特劳斯，并且在与他交谈中说了很差劲的话。我想，真的应该准备一个简短而尖锐的文件，交会议通过。

我完全赞成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及口头宣传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内容。

安德罗波夫：我们在这方面暂时还做得少。

格里申：我想，我们应该寻找一条路缓和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我们同中国，可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经济关系。当然，中国人不会放弃柬埔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他们将不会达成协议。我想，我们应该阻止叙利亚人采取没有理由的活动，以使他们不陷入军事冲突。

安德罗波夫：你们记得，我当时告诉古巴人，我们将不为他们战斗，也不准备派部队去古巴。还好，古巴人接受了这个意见。这一点也应该告诉叙利亚人。我想，这个声明将会阻止他们卷入冲突。

戈尔巴乔夫：您说得对，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现在这个时期，号召我们加强行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开展反对西方国家侵略阴谋的广泛工作。在内部计划上，我们也有重大的任务。也可根据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和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线路采取例行措施。我完全支持关于召开会议的建议以及这里说的其他措施，其中也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美国在进入欧洲，那我们不可以等待，需要行动。

阿利耶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所有建议，我是完全支持的。这是必须进行的一整套措施。我们的对外政策具有进攻的性质，而且是和平进攻的性质。帝国主义分子被我们的建议所激怒。您陈述的一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近东问题，特别是关于我们开展广泛宣传——所有这些建议都值得特别注意，并且应该通过。

杰米切夫：我们能不能以安德罗波夫的名义给里根写封信？

安德罗波夫：我将杰米切夫的建议稍加改动，先写信给“七国集团”参加者，而后可能的话，晚些时候也写信给里根。

波诺马廖夫：为回应“七国集团”的决议，我们需拟订我们的建议。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后，国内要举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群众集会。

乌斯季诺夫：这完全正确，但我们不能吓唬人民。

波诺马廖夫：例如6月20日，布拉格将召开和平大会。我们应该利用它来宣传我们热爱和平的建议。

齐米亚宁：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我请求允许从明天开始就实施这些建议。特别是召集主要报纸和信息工具的编辑开会，告诉他们这些任务，尤其是把我们宣传的锋芒对准里根及其侵略性建议。

库兹涅佐夫：我认为，也应该在议会联系这条线上积极工作，特别是我们议会代表团访问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方向上。显而易见，在会上葛罗米柯的报告中，应该就这些问题说一说。

安德罗波夫：现在，我想说，同志们，我想通报你们的最主要内容。说的是改进我们所有部门的工作以及提高我们领导人本身对被委托事务的责任心。这不只涉及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我们大家都要对领导的那些部门的事务现状亲自负责。吉洪诺夫同志应该把粮食问题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同志要少借口天气，而要组织争取丰收，动员人们不去说干旱，不借口坏天气，而是要更多地工作，为的是利用每个好天气、每一分钟来获得更多的产品，利用我们能够做的一切来增加粮食收成和其他动植物产

品。阿利耶夫同志的重要事情，是改善运输工作。卡皮托诺夫同志应该加紧生产居民消费品，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更好。杰米切夫同志应该更严格地对待剧院的剧目，我们在这件事上缺点已经很多，发展文化的其他问题也要求大大注意。对您，彼得·尼洛维奇 [41]，这方面有大量需求。我不说其他同志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部门、自己的任务。我在想，应该召集所有自己的下属单位，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今天说的那些任务。可以全体召集或者分组召集，要看怎样做更好。

乌斯季诺夫：可能，我和斯米尔诺夫 [42] 同志一起召集全体防卫人员，同他们说一下我们的防卫事务。

吉洪诺夫：我将召集部长和副部长，同他们说一下所有这些问题。

鲁萨科夫：显然，应该盘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做的一切，然后向它们说出我们的建议，并提出同志式的劝告。

安德罗波夫：同志们，这一切都可以做，并且我想，你们要积极地做这些事情。有这样的建议，委托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齐米亚宁同志总结我们在会上说的一切，并且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旨在激化国际局势的阴谋措施的建议。别拖延这些建议的准备，要把这些建议交给中央委员会。对此同意吗？

全体：同意。

安德罗波夫：请允许我们的会议至此结束。

РГАНИ, ф.89, оп.42, д.53, л.1-14

№25988 驻英使馆的情报：英国对待中英关系的态度及其趋向(1983年6月20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伦敦

第751号文

英国在对待中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趋向

1983年上半年英中关系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很顺畅。

去年9月撒切尔对中国的访问没能解决双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关于香港未来的地位问题和双边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大的问题。

尽管访问后伦敦和撒切尔表示将继续努力，但保守党领导层在今年最初几个月在推动中英关系沿主要方向发展上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果。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发生的事件令英国人无法相信：邓小平集团在稳定国内局势，其中包括各省局势方面取得了彻底胜利，他使军方从属于自己，普遍认为左派分子在军队中一直拥有强大影响。当地一些著名的汉学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的两位主要战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核心的独立集团，这可能是中国领导层内新一轮党派斗争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英国商人暂时不愿意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合同，首先是因为英国在中国的投资无法得到英国政府方面的财政担保。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双方接触的氛围上。4月，前商务部长考菲尔德在香港逗留期间特别强调增加英国私人资本参与的愿望，英国政府将努力在英中经济合作方案中予以明确。今年2月，北京决定放弃同英国签订总额为1亿英镑的对中国海军8艘军舰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提供“海标枪”导弹、雷达、作战指挥系统等)，撒切尔在访问中国期间曾单独讨论过这份合同，这事件被看作是中国领导层内部存在政治纠纷的新证据，它挫伤了英国实业界中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务实的伙伴的信心。

北京在对待苏联和美国态度中的一些新因素令英国人很警惕。当地许多汉学家认为伦敦官方事实上相信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反对苏联的“天然盟友”，有必要提醒中国从现有条件出发对自己的态度做某些改变。

目前，伦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挟持”中国站在亲西方立场上，利用现今中国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态度，保存对它的对外政治方针施加影响的渠道。

英国汉学中心，首先是现代中国研究所、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纳菲尔德学院、女王伊丽莎白学堂)最近几个月从新形势出发积极制定处理同中国关系的建议。

BBC的工作人员在最近同我们的几次交谈中承认，他们已得到建议，注意关于中国的正面材料，不要强调中英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培养当地实业界对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兴趣。

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承认，在英国汉学界出现了各种分工，围在撒切尔周围的，实质上是完成“政治指示”的那些汉学家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有针对性地营造关于有可能成为西方重要伙伴的中国的社会舆论。

近来当地的汉学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研究所的汉学家表示，英国外交部提出这样一条路线——似乎不应该期待苏中关系因有某种“戏剧性”发展而经受“过度不安”。英国人积极看待就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同中国进行双边协商的前景，从今年4月起，就在欧共体的框架内进行。胡耀邦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在这里被评论为北京方面就一些涉及西方利益的重要政治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的“有益”尝试。近来，今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后，中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非洲国家(向津巴布韦提供军用飞机，同安哥拉建立外交关系，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联系，等等)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对此，英国人不再大肆宣扬自己的关切。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一些亲近政府的政论家的言论，他们在秘密谋划在讨论一系列新的重要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亚洲核武器问题上把中国拉到西方一边的思想，包括在亚洲的核裁军问题上甚至可能会试图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展适用于远东的著名的“零点方案”。(例如，今年2月，女王学院教授J.弗里德曼就表达过这个意见。我们还注意到，6月13日，我们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所长^① [43]——他是应现代中国研究所的邀请在伦敦访问的——会谈时谈到中国想改善同苏联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阻碍这一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部署“SS 20”导弹。)

英国外交部代表，其中包括远东司司长M.艾利特，最近在同我们会谈过程中在评价英中关系前景时，强调出现了“新气象”。

他们的理由是，在邓小平集团推动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出

现了进步，巩固了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实用主义”形象，以及在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中的“开放”政策，展现了中国在其同美国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努力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愿望。此时他们期待在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有利的”决定，允许积极发展英中关系。

在今年3月国务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长陈慕华访问英国后，这里开始谈关于重新燃起的期待——伦敦能够克服中英贸易衰落的迹象，尽管英国武器出口的前景变得黯淡。(1982年英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96亿英镑。1981年为2.98亿英镑，1980年为3.22亿英镑；1981—1982年英国贸易逆差从4600万英镑增加到9000万英镑。1982年同台湾的贸易额提高到4.6亿英镑，同香港的贸易额达到16.05亿英镑。见《海外贸易统计》1983年4月。)

今年5月，中国同英国石油公司率领的外国财团签订的第一个关于在南中国海和黄海这些被认为石油勘探前景较好的地区勘探石油的协议被看作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英国人更期待与中国合作在广东省(大亚湾)建设核电站，为此在今年4月还签订了一项专门协定。期待同英国公司的贸易额能从6亿英镑增长到10英镑。今年4月，英国电力系统设备公司同中国草签在中国南部建设两家核电站的协定，被认为是第二项成就。

双方互访也活跃起来(详见附件2)。继陈慕华访问英国后，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深圳特区代表团、海洋石油开采专家先后访问了英国。8月，中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的访问值得期待。英国能源大臣和负责贸易与工业事务的大臣打算访问中国。

未来几个月，中国将在曼彻斯特开设总领事馆，英国将在上海开设总领事馆，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经济情报，推动英国公司和相应的中国组织进行联系(前驻北京大使馆商业参赞孟德惠被任命为总领事)。

近来，双方贸易联系的特点是，主要是在政府层面接触和在中国南方实施合作方案，广东也被包括在内。此时，英国观察家注意到，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在对待香港的态度问题上都出现了新变化。可以看出，在双方的大众传媒中香港主要是作为业务伙伴及中国和英国的中介被提到的。近来，英国人在回避讨论关于伦敦和北京在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态度的积极变化被认为是北京同意英国人关于香港总督尤德参加公开谈判的意图(去年尤德两次返回伦敦同撒切尔进行专门商谈)。当地实业界代表指出,陈慕华访问英国后,看来双方彼此同意不再把精力耗费在主权问题上,而是从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出发,集中在有香港参加的双方经济合作中来。

伦敦现代中国研究所,包括英国外交部的专家们近来公开表示,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包括两个殖民地领土)的主权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能通过书面协议的形式要求中国在移交主权后切实保障英国在这块土地的利益。英国专家们,以及一些中国问题外交家,最近在同我们会谈时表示,看来,北京6月会议后,会提供这种保障。这是伦敦的理由,还应该指出,今年5月末尤德就谈过,他认为今年就香港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是可能的。

从我们同英国人的接触中,在外交使团内部形成一种印象:依靠伦敦和北京的相互呼应的措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为此,双方极力避免彼此之间的政治摩擦。

英国人逐渐降低了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关于在香港的管理机构中保留英国人的地位的要求。看来似乎对英国先进技术经香港进入中国也持好感。

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英国的经济往来,英国提出的几个关于香港的建议也被接受,这被看作是中国想消除同英国保守党领导层关系中分歧的表现。

英国政府中一位主要的保守党分子C.什拉姆在同我们谈及苏中关系问题时指出,英国人认为,北京恰恰是对英国保守党政府发展关系感兴趣,英国政策把中国的注意力由苏联转到了西方,并为中国增强自己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势力提供了可能。

从最近我们同驻伦敦的中国外交家们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撒切尔获得6月选举的胜利给予积极评价。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期待伦敦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理解中国对于改善同英国关系的努力”。

这样,尽管英中有关系比较复杂,双方对发展经济和政治合作继续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不排除在双方都表现出积极推动双边关系意图的条件下，这种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АВПРФ , ф.0100 , оп.70 , п.309 , д.21 , л.5-10

1984年

№21961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会议记录：恢复苏中友好协活动的决定(1984年1月29日)

苏共边疆区委员会决定：

1.坚决贯彻和执行苏共中央《关于苏中友好协会各地分会工作》的决议。

2.定于今年2月15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举行有社会团体、科技文化、企业单位、国营农场和驻军等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恢复苏中友好协哈巴罗夫斯克分会的活动。区委宣传部部长B.M.萨利尼科夫将作主旨报告。

3.建议由阿穆尔河运局局长A.M.苏霍夫任边疆区苏中友好协主席。

4.此次会议由苏共边疆区委宣传部(B.M.萨利尼科夫同志)和苏朝友好协哈巴罗夫斯克分会(A.Г.季利琴科)负责筹备召开。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A.K.乔尔内

1984年1月29日

ГАХК, ф.п35, оп.111, д.48, л.3-4

№25990 拉古林的报告：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84年7月21日)

副本

澳门通常被看作与香港类似的问题。(澳门——中国东南部的领土，位于中国南海岸边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南端的澳门半岛和两个相邻的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0万人，其中中国人的比例超过98%，其余为葡萄牙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移民。官方语言是葡萄牙

语。)中英签署了确定香港未来地位的协定之后，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决澳门问题。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从197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之间就这一问题从未出现过什么冲突。(截至1974年底，澳门的短期殖民地历史概述如下：1555—1557年间，在同意中国保持对澳门主权的同时，葡萄牙正式从中国当局中租借出这一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但是，1680年葡萄牙违反协定，在澳门委派了葡萄牙总督。1849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依据1887年葡萄牙强加给中国的议定书，葡萄牙获得了澳门地区的“永久管理”权。1940年，日本侵占了澳门。1945年日本战败后，澳门被归还给葡萄牙政府。1951年，澳门取得了葡萄牙“海外省”的地位。)1974年4月，推翻法西斯制度之后的葡萄牙新政府向中国方面表示，准备进行双边的会谈来确定澳门未来的地位。

但是，中国当局回避了明确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同意在1975年阶段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根据这一解决办法，澳门成为了处于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葡萄牙新政府通过了承认所有“海外领地”的人民拥有独立和自决权的法律。根据葡萄牙1976年公布的关于管理澳门的“组织法”，澳门地区取得了行政、经济以及财政上的广泛自主权。

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时，1975年关于澳门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的特殊地位得到了确认。澳门总督阿尔梅达认为，澳门的这种特殊地位被看作是“最符合两国人民友好氛围的解决办法、是中葡社区生活的典范”(《亚洲周刊》1984年1月13日)。但是，澳门在行政上保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从属地位，本质上表明了在这一地区仍保存着殖民主义制度。

1984年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宣称，澳门现在的地位是令人满意的，且不会成为中葡关系复杂化的原因，同时，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这一地区应当维持现状。他表示相信，既然像香港这样复杂的问题都能够找到使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么，“找到解决澳门问题的办法也不困难”(路透社1984年7月17日报道)。与1983年中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恢复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且在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同时恢复这一地区的管理权相比，这份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澳门问题立场上的一定变化。

周南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葡萄牙行政机构(总督阿尔梅达)深信，暂时“没有理由相信，香港新的行政管理计划会自动适用于澳

门”，并且在中国方面把解决澳门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之前，也没有理由会使北京首先要求改变澳门的现状。

由于通过了澳门总督坚持要求下的旨在增加澳门立法大会中的中国社区代表的新选举法，亲北京的澳门中国贸易总局局长发表了如下言论：“我们不想违反现状。我们希望考虑到所有派别和各个阶层居民的要求”(《远东经济评论》1984年5月17日)，这些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北京对改变澳门的现状并不感兴趣。根据《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观点，北京对通过的新选举法并未给予赞赏，因为中国地方社区更广泛地参加立法大会似乎会动摇澳门地区的稳定性，或者会“将北京领导人置于为难的境地”，因为按照地区现状来看，澳门的政治问题应当由北京和里斯本来直接解决。

澳门地区形成的局势使北京感到满意，在这一局势下，葡萄牙事实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而葡萄牙行政机构在澳门的存在说明这一地区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北京则从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在澳门，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很多饭店和银行都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澳门进行过境贸易，包括用来走私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走私贸易，并且每年从中国人控制的商务、赌场、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企业中获得大量的收入(根据1975—1983年的资料，这一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从澳门获得的收入大约为5000万美元)(《国外》1983年第35期)。也就是说，现在澳门对中国来说即使不是头等重要，但也是兑换外汇的稳定来源。显然，保持澳门地区的特殊地位首先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施旨在积极吸引和使用外国资本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众多的经济特区中，建立了毗邻澳门地区的珠海经济特区。

近几年内，在珠海经济特区进行的工业、商业以及住宅工程项目建设正飞速发展。珠海经济特区在1984年用于建设资本投资的总额大约为1.75亿美元，几乎超过了自建立珠海经济特区以来过去4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的4倍。同时，这一年开始建设了10个大型的工业工程项目(1984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

不能把中国方面在澳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现在强化这一地区的发展看作是偶然的。北京致力于从临近澳门的珠海特区中获得收益。最近

几年，澳门同珠海之间经济的相互关系正在扩大，同澳门之间的联系被列入珠海经济特区活动的总计数字，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功能。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澳门在行政和经济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管辖下的区域，但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接近西方的背景下，它已经被北京广泛地利用。保留葡萄牙在澳门的行政机构，可以在符合北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对澳门地区的广泛利用，这显然说明中国领导人不想很快彻底地解决澳门地区的领土问题。

近几年内，澳门总督阿尔梅达的行政机构正着手采取某些使澳门地区经济生活集约化的措施。比如，打算在其中的一个岛屿上建设深水港口；由西德顾问进行研究建设国际航空港的可行性；由英国“有线和无线公司”在澳门地区铺设现代化的电缆系统。近几年内，出口总额显著增长，住宅建设计划得以实现，年度预算中45%的财政开支被用于行政支出(《国外》1983年第35期)。假如葡萄牙政府相信，在最近几年内将会失去澳门，那么这些使澳门经济活跃的措施大概不会被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也宣称，澳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当时机来临时，这一问题早晚会通过友好谈判的途径得到解决(1984年2月19日，新华社驻里斯本报道)。

据《里斯本报》报道，葡萄牙总理M.苏亚雷斯不久前曾说过，“澳门不会成为第二个香港”。注意到双方默认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解决澳门问题，可以得出结论，M.苏亚雷斯上述的言论意味着他相信，即便在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保持澳门现状的可能性。或者，葡萄牙总理在自己的言语中所说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同香港相比，中葡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能更快更容易地达成双边协议。

苏联在澳门问题立场上的结论：

应当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支持旨在彻底消除澳门地区殖民主义残余的行动。应当在报纸阐述事实和有关澳门的事件，从客观新闻报道的角度正面评价中葡双方各自解决澳门问题的打算。考虑到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在维持澳门现状上的共同兴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显然，不应当批评延期解决澳门问题。

在中央报刊出版物的文章中，不应当强调有关中葡澳门条约的不平等问题。因为，首先，1974年以后，尤其是葡萄牙通过了承认其海外领

地拥有独立自主权的法律后，这些条约失去了其本身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其次，为了不引起中国人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俄边界条约“不平等”问题上的观点。

为了苏联同葡萄牙进行对话，在对葡萄牙保持其在澳门地区的总督进行批评的时候，应当极其谨慎，因为葡萄牙并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地区的主权，也不坚持葡萄牙行政机构永久存在于澳门。

在官方报道中继续使用中国对澳门的称呼是合适的，必要的情况下顺便提提葡萄牙对澳门的称呼。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学术出版物中可以将邓小平“一国两制”(以香港和澳门为例)的构想作为资产阶级趋同论的一种变种，以适当的形式来进行学术批判。

该材料由萨夫罗诺娃Е.И.准备。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室代理主任、

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研究室室主任

Г.И.拉古林

АВПРФ, ф.0100, оп.71, п.314, д.20, л.114-120

№21960 乔尔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哈巴罗夫斯克与中国恢复往来情况(1984年11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地方组织与中国边境省恢复往来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边疆区各部门同毗邻的黑龙江山省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两地互换党、政、共青团代表团，地质专家、河运和铁路交通、林业等方面的代表团，还有旅游团。边疆区的边防部队和卫生保健部门给黑龙江省人民提供过各种援助，包括抗洪和救治病人。

1956—1958年边疆区有6个代表团访问黑龙江省，共36人，其中3个是党、政府和共青团代表团，另外3个是林业专家、阿穆尔河运局专

家和苏中边境铁路委员会人员代表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同黑龙江省没有互派过工会代表团。边疆区人员在黑龙江省访问时受到热情接待，参观了许多工厂、农业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单位。

自1956年5月至1958年6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向中国派出37个旅游团，共550人。

黑龙江省共有16个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共142人。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阿穆尔河的综合考察团，共50人，一直沿江进行科学考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和比金区、犹太自治州，参观了工业、农业、学校、幼儿园和文化单位。中国客人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参加了边疆区1957年第一届青年联欢节和共青城市委第4次全会为建城25周年举办的活动。

这一时期边疆区和黑龙江省的体育部门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举行过足球、冰球、篮球友谊赛。哈巴罗夫斯克市排球队和田径队也访问过哈尔滨。

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城和比罗比詹三地的地方志博物馆举办了苏中小学生画展、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代表团礼品展。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军区军官之家举办了电影节。边疆区电影院放映过中国电影，共青城一家剧院演出过13世纪中国戏剧家王实甫的《芙蓉亭》。边疆区图书社出版过一些介绍中国的图书。

1958年8月哈巴罗夫斯克市成立苏中友协分会，这是发展双方交流的重要事件。9月该市各界人士举行大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

1959年双方完成了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地质、经济、环境和水利的研究工作。这年6月黑龙江贸易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

1959年8月比金市各界与黑龙江省来访代表团举行友好晚会和体育比赛，中国旅游团第一次访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到中国的旅游一直

延续到1960年。1960年9月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边境地区贸易谈判。据统计，近3年来边贸增长4倍。1962年6月中国派一个15人组成的党政和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

阿穆尔河运局人员也同黑龙江的同行保持着友好务实的关系。苏中河运联合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委员会每年轮流在苏中两国举行会议，直到1957年委员会每年讨论河运问题和改善界河航运条件问题，并采取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措施。

50年代双方进出口商品是通过船运交接的。1958—1959年运输量每年达10万吨(出口占60%，进口占40%)，苏方船只占80%，中方船只占20%。自1962年起进出口贸易运输就中断了。

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77年，联合委员会未能定期开会，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970年的会议持续了5个半月，无果而终。1971—1972年的会议开了3个半月，连议程都没谈成。

1982—1984年阿穆尔河运人员同中方每年都有接触，联合委员会举行过3次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讨论并批准航运工作计划，总结了双方执行决议的情况，还讨论了双方船只间发生的事故。

1963年在双方对界河进行联合考察时，苏方应中方三个县中苏友协分会的邀请访问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三个地方。

这三个县友协的领导在谈话时说，以前中苏边界地区的人民来往密切，“恢复交往就好了”。

在1983—1984年联合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中方表示愿意发展双方河运人员的交往，并建议阿穆尔河运局与黑龙江河运局交换体育代表队。

1984年中方正式建议交换河运专家代表团，这年联合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时，中方一再表示希望黑龙江和阿穆尔河运局担负起外贸货物运输。

远东铁路局的格罗捷科沃边境站与黑龙江省铁路员工也有过合作，有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过低落。

最近几年，合作中出现新的情况。从1981年开始，双方恢复业务函

件往来，边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也开始定期开会。

边境铁路联合委员会开会要解决执行边界铁路协定和客运行李和货物出现的问题，会议轮流在两国举行，1981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1982年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基本上是在求实的气氛中进行的。目前铁路外贸货物运输量有所增长，1984年与1983年相比，中国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一倍。

目前边境站格罗捷克沃和绥芬河之间关系基本正常，两站站长每月会晤一次，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货物交接中出现的困难。

1984年中方铁路员工向远东铁路局员工祝贺新年，表示愿继续开展合作，加强友谊。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9月26日决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从1958年同黑龙江省贸易公司开展边境贸易。最后一份合同是1965年6月签订的，为期5年(从1958—1965年共签7个合同)，双方人员核对收支的最后一次会议是1970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1970年12月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对黑龙江的出口就中止了。

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出口的商品是：水桶、盆、铁锹、大镰刀、炉灶铸件、洗衣皂、制箍用铁、马拉式割草机、缝纫机、手表、木材等。进口的食品有肉罐头、苹果、西红柿酱、菠萝、西瓜、果酱、酸黄瓜、醋渍蘑菇、淀粉，还有纺织品、鞋、家具、瓷器、建筑材料等。

1960—1968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中国的边贸进出口基本持平，具体数额是：

1960年——214.7万外汇卢布

1961年——94.3万外汇卢布

1962年——107.1万外汇卢布

1963年——201.5万外汇卢布

1964年——112.8万外汇卢布

1965年——88.7万外汇卢布

1966年——199.8万外汇卢布

1967年——19.2万外汇卢布

1968年——15.6万外汇卢布

按1958—1965年签订的合同，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与黑龙江贸易公司贸易总额为1043.7万外汇卢布。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2月23日的决定，1983年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全苏远东外贸处分理处，负责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州、滨海边疆区与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边贸业务。哈巴罗夫斯克分理处行政隶属纳霍德卡全苏远东外贸处。

根据苏联外贸部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部1982年4月16日关于恢复两国贸易的换文，1983年10月至1984年9月，同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贸易公司举行过3次谈判，10次工作会晤。1983年3月会谈在中国举行，此后几次会谈是在外贝加尔斯克边境站、格罗捷科沃边境站和纳霍德卡举行的。

谈判商定了换货清单、供货条件和贸易额，签订了总额为277.94万外汇卢布的合同。

1983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向中国出口下列商品：水桶、锌皮水桶、“比留萨”牌冰箱，“伊日Ю4к”牌和“明斯克”牌摩托车、打字机、照相机、窗用玻璃、400号硅酸盐、水泥、锯木、造纸木材、煅烧纯碱、尿素、硝基安福钾、冷冻鱼，总额88.48万外汇卢布。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出售的商品不是剩余产品，而是为满足边贸需要专门储备的商品。

中方出口的商品是红烧猪肉、花生、酱油、糖果、皮帽、暖水瓶、毛毯、毛巾和纺织品，总额89.93万外汇卢布。

1984年前10个月，出口商品177.775万外汇卢布，进口商品190万外汇卢布。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进出口额是：

1983年——167.81万外汇卢布

1984年——367.775万外汇卢布

1984年中国贸易公司以及从事边贸的厂家希望全苏远东外贸处签订价值5000万外汇卢布的进出口合同。目前中国公司已提出明年进出口货单，价值约4000万—4500万外汇卢布。

苏方通过边贸进一步满足了远东居民对日用品和食品的需求。但在实施中也有一些困难。出口商品不能保证及时供货，消费合作社联盟没有边贸出口计划，这大大影响了供货。

1983—1984年，作为例外并经苏联财政部同意，全苏远东外贸处按零售价，而非批发价，与边疆区厂家对出口商品进行结算，从而严重影响了出口效率，不能向中国提供对方所需的商品。中国贸易公司购买的电冰箱、摩托车、打字机、汽艇等商品在使用期间需维修或更换零部件。但全苏远东外贸处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因没有储备，不能提供零部件。

为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和完善边贸，外贸部应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边境贸易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根据其掌握的资源以及共和国贸易部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市场储备，统一制订年度边贸出口计划；赋予边疆区利用自己的资源并根据中方的需要，制订出口年度计划的权力；允许边疆区境内企业，不论其部门归属，在获得相应部的同意后，可从事边境贸易；除消费合作社外，其他商贸单位也应列入边贸行列。

最近一个时期中方人员不只一次向苏方边防代表提出希望发展边境交往。对方多次转达了恢复各级，包括某些镇县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期待我方贸易部门的答复。

为了表示大规模开展边贸的愿望，中方多次邀我边防代表参观专门组织的商品展览会、日用品商店和食品商店。

为了同苏联开展边境贸易，中方在哈尔滨和呼和浩特专门成立了贸易公司，并在绥芬河与满洲里设立了分公司。

与此同时，中方积极开展活动，谋求与各地友协建立联系。

据我们观察，中方发展边境交往的目的是，加快解决中国东北地区迫切的经济问题，并不涉及对苏联的基本政策。

有鉴于此，有领导地开展边境地区的交往，从长远角度看对两国关系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居民也能对发展苏中贸易发挥一定作用。同时，边境贸易有助于改善我远东地区商品匮乏的状况。

开展民间组织、文体等方面的交往应有计划地进行，不宜匆忙，应谨慎从事，并保持高度警惕。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A.K.乔尔内

1984年11月1日

ГАХК, ф.п35, оп.111, д.196, л.19-38

№21962 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1984年11月12日)

致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A.K.乔尔内同志：

关于中国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代表团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情况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7周年之际，应哈巴罗夫斯克苏中友协邀请，中国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代表团于1984年11月4—5日访问哈巴罗夫斯克。代表团团长——省友协顾问陈剑飞，副团长——省友协会长、省外办主任王耀臣，代表团团员——友协理事、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孙梦彪(СуньМэнбяо)，友协理事、省社科院工作人员徐景学(СюйЦзинсюе)，省外办处长兼翻译李广(ЛиГуан)。

根据苏共边疆区区委办公厅批准的日程，安排代表团游览了哈巴罗夫斯克市容，参观了奥尔忠尼启泽工厂的技术检修厂、边疆区医院、铁道工程学院、“东方”缝纫厂、“苏联五十年”通用电缆厂、第30中学、地方志博物馆，会见了哈巴罗夫斯克苏朝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

应代表团请求，对哈巴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A.C.潘琴科同

志进行了礼节性拜会，王耀臣会长、孙梦彪副教授会见了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院长B.B.罗曼诺夫同志及其副手。所有会见从形式到内容都安排得很好，符合党和政府对中国总的政策精神。

中国客人所到之处洋溢着友好气氛，主人认真介绍情况，强调苏联人民愿与中国人民真诚友好，详细介绍了党和政府关心提高人民的福利。在边疆区医院同住院病人M.C.切坎的会见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切坎原是哈巴罗夫斯克造船厂工人，现已退休，曾参加过解放东北的战争。代表团团长对切坎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参观过程中，中国客人欣然接受了各单位的纪念品：边疆区医院——介绍该医院的画册，铁道工程学院——相册和该学院画册、徽章，“东方”缝纫厂——便帽、桌布，通用电缆厂——哈巴罗夫斯克胸徽、工厂介绍画册，第30中学——儿童画册，市苏维埃执委会——哈巴罗夫斯克画册、糖果、香槟酒，哈巴罗夫斯克苏中友协——哈巴罗夫斯克全景画和电动刮须刀。

中国客人回赠的纪念品是葡萄酒、果汁、老虎油、石膏制的陈设品。

代表团团员开始时有些拘谨，第二天就放松了，提了许多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劳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工资待遇、医疗制度、妇女的福利、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职权范围、处理各种矛盾的方法，包括党政领导之间的矛盾。

在参观过程中客人还提了一些专门问题。在参观通用电缆厂时询问该厂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新技术应用情况，该厂隶属哪个部门，有没有自主营销权。在奥尔忠尼启泽厂的技术检修厂询问了该厂生产能力，石油的来源。在会见远东地质勘察公司总经理B.B.希哈诺夫时，客人试图了解列宁斯科耶地区地下是否有石油，他们说，提此问题是因为黑龙江省松辽地区发现了石油。

应该指出的是，代表团成员在讲话时多次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同时也应指出，不论是正式讲话还是私下交谈，中方都没有谴责美国的政策和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方针。“日本侵略者”这几个字在代表团团长宣读的贺词里使用过，这是对方为庆祝十月革命67周年给边疆区苏

中友协的贺信，另一次是在友谊之家讲话时使用过。

代表团成员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没有涉及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他们讲得最多的是，黑龙江省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应该开展交往，黑龙江省和其他各省在这方面有很大自主权。他们自己交谈时提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都用中国名字，与苏方人员交谈时，都叫苏联用的名字。

代表团成员在提出交往建议时，一再表示甚至“显示”他们协会有权就合作签署任何协定，并且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做决定呢？我们向中国客人说明：对于与外国建立关系问题，全苏各地是有一定程序的，中方的建议可正式向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提出。

从交谈中得知，代表团团长陈剑飞曾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文革”中遭迫害，在八路军当过兵，1967年随阿穆尔河水资源考察联合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哈巴罗夫斯克，退休后任省友协顾问。据他说，顾问制度是新建的，目的是填补因“文革”造成的干部空缺，顾问制度是临时性的，各地年轻领导干部成长起来以后，这个制度使命就结束了。顾问人选由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提名，陈是黑龙江省委提名的。

在正式讲话和交谈时，陈剑飞向苏联同志祝贺十月革命节，祝愿取得新的成就，表示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处。在与苏朝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会见时，陈讲话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建设中苏联提供的援助。

代表团副团长王耀臣比团长活跃，他曾在苏联留学。1983年访问过莫斯科。他在讲话中积极宣传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他们的介绍看，这个政策就是放开对外交往。

据翻译李广说，代表团成员在文革时期都不同形式受到迫害，他自己曾被戴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坐牢1年，劳改6年。

除团长外，其他人都会俄语，对苏联文化艺术、科技、历史书籍兴趣很大。

告别时，代表团团长和全体团员对热情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苏方回访。在告别晚宴上，代表团团长对广播电台记者称赞苏联人民对代表团热情友好，并说对美丽盛装的哈巴罗夫斯克以及这里的人民印象

很好，他回去后一定要向别人介绍。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不够，没能看更多东西，还有许多问题没有问。

中国客人还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基础，而会见、交谈和参观一定为双方新的更有成效的合作、为巩固友好睦邻关系揭开新的一页。

中国代表团提出一项建议：双方联合投资在黑龙江省建铁路、煤矿，改造牡丹江冶金厂，扩大边贸和增加商品品种，中国提供劳力在苏联伐木，交换体育代表团、旅游团，高校之间开展交流。在拜访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时，代表团建议黑龙江省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尔滨和哈巴罗夫斯克市结成友好省区和友好市。

苏共边疆区区委就中国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了总结会。

苏共边疆区区委宣传部部长

B.萨利尼科夫

1984年11月12日

ГАХК, ф.п35, оп.111, д.170, л.99-105

№25991 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的报告：澳门 回归问题谈判(1986年11月27日)

苏联驻联合国分部及常驻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

1986年11月27日

第5500号文

文本第7份

副本

葡中就澳门问题进行的谈判

(对西方报纸材料进行的观察分析)

1986年11月27日

1986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葡萄牙进行第三轮谈判的结果，使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为了对协议草案进行详细的讨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根据新闻报道，双方取得了重大进展。

正如当地的观察家们所认为的，很有可能的是，澳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困难，因为不论是葡萄牙还是中国都对此感兴趣。澳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洛伊木马”，它可以使中国商品渗透到欧洲市场。葡萄牙从自身出发，意识到了自己的主要困难，这些困难存在于保持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和语言以及保证生活在澳门的少数葡萄牙居民的权利。葡萄牙准备在离开澳门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以实施众多的社会、文化计划，另据葡萄牙当局代表的发言，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公民的权利将会得到完全的维护。但是，当地居民中的葡萄牙人对于这些声明持怀疑态度，正如当地观察家们所指出的，他们已经在做离开的准备。

至于澳门的经济前景，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可以将澳门从赌博工业设施中心转变为商业和经济中心。最近几年澳门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每年约有600万外国游客来澳门旅游，而在1962年仅有25万游客。而最有利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外国银行都在澳门开设了自己的分部。今年(1986年)就有来自日本、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香港的25家银行在澳门开业。在寻找国外资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扩大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中国对澳门的关系政策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证据。为了将澳门的发展同中国大陆的发展结合起来，中国支持在澳门建设深水港口。与此相连的是，应当指出，中国在距澳门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包括珠海在内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内外国资本获得了大量的特许权。距香港较近也促使了外国贷款和技术的引入。

因此，澳门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根据西方观察家的观点，20年以后，澳门将同香港以及广东一起成为中国、亚洲以至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发展中心。

1987年

№25869 卢金的报告：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 (1987年12月16日)

关于我们就柬埔寨问题发出的倡议

我认为，应当提出如下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别代表应当就柬埔寨问题定期举行会谈。

在现代的局势下，这种会谈对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这些定期会谈会加强我们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积极作用；第二，这些会谈会同相关的外部主要力量建立进行磋商的渠道；第三，事实上会形成今后就柬埔寨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机制；第四，法国会积极起来(法国在该问题上可以起到非常有益的建设性的作用)；第五，这些会谈在客观上会对那些希望阻止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所有人(首先是中国人)施加压力。

这些会谈可以在巴黎举行，最初可以是非正式的，在较低的级别上进行。经五大国协调一致可以邀请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代表参加会谈，以便得到信息。

B.卢金 [44]

1987年12月16日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67, л.1

1988年

№25941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苏联要求中国 关注越南的照会 [45] (1988年3月30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凤林的会谈记录

1988年3月30日

我提请中国外交官注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在今年3月26日的照会，该照会确认了同中国就斯普拉特利群岛 [46] 进行谈判的建议，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反对使用武力。越方的这一措施被看做是积极的。我说，解决争议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进行对话的政治手段，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李凤林开始表达如下看法：在属于自己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在1975年之前，无论是公开，还是在进行的各类接触中，其中包括在进行的最高级别的接触中，越南方面都无条件地同意中国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文件为证。但是，在解放南越的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越南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发生了转变。当越南经济恶化，或者出现政治困难的时候，河内就时不时地就南中国海的所属问题发出鼓噪。现在看起来是在鼓吹他们的“超级爱国主义”情绪。

李凤林接着说，我们也注意到，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属的注解从苏联的地图上消失了。苏联报刊的论调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完全支持违背了自己立场的越南关于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属的立场。因此，无论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都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

李凤林承认，坦率地说，最近几天，中国驻苏大使馆从中央得到指示，把苏联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转达了”。李凤林说：“我们注意到，苏联没有就支持我们的立场发表声明。”当然，苏联国内对这些事件的阐述不能被看作是与苏中关系无关的。李凤林指出，目前大使馆把苏联的立场看作是“有节制的，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越南

的”。

关于中国和越南就这些岛屿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在尽力援引如下的话，就是说苏联拒绝同日本就千岛群岛进行谈判。

对此我回答说，苏联现在不反对同日本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这是另一回事。我强调说，我们相信，避免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非常重要，而这次越南刚好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因此我们会对他们予以支持。

李凤林说，中国不愿被卷入东南亚的大规模冲突，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利益。

В.Я.沃罗比约夫 [47]

АВІРФ, ф.0100, оп.75, д.3, л.53-55

№25863 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印度支那各国与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1988年5月4日)

关于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情报)

一、解决问题的途径

印度支那各国	中 国
柬埔寨冲突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只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柬埔寨问题。如果敌对双方不同意停止战斗的话，在某一时期，谈判和武装斗争会同时进行。	如果越南人承担了把其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责任，并宣布这一行动的话，那么在越南撤出首批规定的军队之后，中国愿意同相关各方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同越南人讨论关于全面、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的问题(1983年苏中政治磋商第3轮谈判)。 我们支持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只有越南完全从柬埔寨撤出军队(1986年苏中政治磋商第8轮会谈)。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的八项条款建议，赞同在此基础上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1986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声明)。 对于越南和柬埔寨来说，军事解决问题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3月对印度驻北京临时代办的谈话)。 我们认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去年提出的八项条款建议是公正合理的(1987年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在越南军队撤出之后)……应当使柬埔寨人民有自己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权力。中国赞同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也就是建立以 H. 西哈努克为首的、不排除任何一方的四方联合政府(吴学谦与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9月20日的会谈)。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寻找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单单使用军事手段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都同意，比较能够令人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形式是实现民族和解，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仍然坚持认为，事先

必须使越南撤出军队，并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提出的八项条款为基础来和平解决问题。

二、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参与者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同敌对的集团进行会谈，愿意把波尔布特罪犯以及在思想上较为倾向于他的那批人排除在领导人之外，以便最终消除再次出现种族屠杀的威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民族和解问题，建立各民族的联盟，在和平和稳定的条件下建设和保卫国家。 为了最高的民族利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愿意根据西哈努克亲王对和平事业、民族和解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使其在国家机构中担任较高的职务。 柬埔寨问题必须要通过所有冲突各方进行谈判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 ……现在柬埔寨实际上有三大力量：韩桑林、乔森潘和西哈努克。	……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认为，让诸如乔森潘这样的人参加谈判是不能被接受的，更不要说参加政府了（邓小平在1987年5月同德奎利亚尔的谈话）。 西哈努克亲王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可以由他30多年活动的经历来证明，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在海外他都享有巨大的威望。如果政府由他来领导，那么该政府就会得到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吴学谦同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9月20日的会谈）。 中国支持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也就是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不排除任何一方的四方联合政府（吴学谦同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9月20日的谈话）。 越南“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柬埔寨撤出自己所有的军队，通过与西哈努克亲王和联合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参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今年4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	---

双方都不反对让柬埔寨四方都参与政治调节进程的想法。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持强调西哈努克在这一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参与政治谈判和未来建立的政府，并建议让乔森潘担任“红色高棉”的代表。印度支那各方也没有确定西哈努克的具体地位，没有公开具体说明愿意同“红色高棉”中的哪位领导人进行接触，没有断然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参与政治解决的进程以及柬埔寨未来的政治活动。各方都对宋双的作用默不作声。

三、柬埔寨各方对政治谈判进程的看法

围绕柬埔寨问题最好的政治解决方案是苏联、越南、中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以及乔森潘集团达成协议（阮高查1987年11月27日在河内发表的声明）。 在越南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解决柬埔寨问题主要的政治方向，其途径是实现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三方联合出现分裂的问题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认为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自己要取得对其他所有集团的优势，在此之后可以谈论四方谈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线是，同西哈努克建立共同的阵线，并孤立“红色高棉”和宋双。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乔森潘迅速开始谈判不仅会引起柬埔寨人民的消极反应（他们仍然惧怕波尔布特分子），而且还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消极反应。不排除首先同宋双举行谈判。	中国赞同以越南和韩桑林为一方，与联合政党举行谈判（赫努佩克与胡耀邦在1986年12月的会谈）。 我们支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之后，柬埔寨四方通过进行磋商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1986年苏中政治磋商第9轮谈判）。 中国不反对西哈努克同洪森举行会谈，但主要的问题是：会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政权掌握在韩桑林政府手中，西哈努克就不能返回柬埔寨（李先念于1987年11月在巴黎的谈话）。 只有在越南人作为战斗的一方参与会谈的情况下，洪森同西哈努克举行的会谈才具
--	--

续表

中国和“红色高棉”应当在政治解决进程中起到自己的作用,但是不允许他们进行操纵的企图。只能同意他们参加政治方面的谈判,但是一定要撤出他们的武装力量。 斗争将是长期的,将会持续到达成协议的时候。 我们愿意同所有反对我们的三方集团的代表进行谈判……但条件是,一方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另一方是与我们对立的三方联合力量,或者是其中的单独一方,而不是中国人所坚持的四方谈判。	有意义(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发表的声明)。 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应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同越南就越南撤出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第二阶段柬埔寨四方之间解决未来柬埔寨的国家制度问题(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刘述卿^①在1987年12月的谈话)。 把越南人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柬埔寨有越南的军队(吴学谦同罗高寿在1987年12月22日的谈话)。
--	---

①原文如此。刘述卿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关于对“鸡尾酒会谈”的态度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无条件地参加非正式的“鸡尾酒会谈”,会谈可以在雅加达举行,分两个阶段展开:在第一阶段柬埔寨敌对双方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在第二阶段,相关各方为达成协议做出保证。 洪森同西哈努克举行的会谈是实现越南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的第一步。尽管会谈不在雅加达举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胡志明公式”的框架内。	中国不支持进行“鸡尾酒”会谈的想法,无论以何种形式举行,因为这样的会谈实际上将意味着承认韩桑林体制,并偏离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八项条款纲领。关于举行“鸡尾酒会谈”的想法会助长越南人的气焰,越南人希望利用这样的会谈来实现自己反对东盟的图谋(吴学谦同 C. 沙卫西拉在1987年8月的会谈)。 在进行“鸡尾酒”会谈的问题上中国只支持如下方案:要以东盟曼谷会议为基础(吴学谦同 M. 库苏马-阿特马查在1987年9月25日举行的会谈)。 中国支持在雅加达举行会谈的想法……如果可以确信越南人能够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谈,乔森潘和宋双可以参加雅加达会谈(刘述卿和阿塔拉斯1988年4月在雅加达的会谈)。
--	--

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唯一的共同点是:印度支那各方和中国认为,柬埔寨的四个派别应当参加政治谈判的进程,至于某一阶段进行谈判的形式、时间和与会代表的组成等问题,各方的看法存在重大差别。各方对“鸡尾酒会谈”的态度事实上与此类似,各方在形式上不反对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印度支那国家赞同在第一阶段的会谈中进行的对话中按照1:1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西哈努克要么是作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三方集团的代表,要么仅仅是自己派别的代表),而中国坚持按照1:3加越南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个派别,而且其中的每一方都可以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同直接参与冲突的另一方越南进行谈判)。

四、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越南志愿军将完全从柬埔寨撤出,同时终止任何外部势力对柬埔寨事务的干涉,并利用外国领土来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军队都将在1990年撤出。 越南军队或者在和平解决进程的框架之外在1990年撤出,或者在这一框架内在更早的时候撤出,在“红色高棉”同时削减武装力量,以便在24个月的期限内最终完全解散军队的情况下,越南在24个月内撤军(分三个阶段等量撤出)。	越南当局首先应当终止侵略扩张行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军队(黄华在1980年5月1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越南从柬埔寨撤出部分军队是试图促使东盟各国承认其对柬埔寨的占领,开展地区性的对话,削弱东盟对柬埔寨人民斗争的支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越南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无条件地从越南撤出军队(《人民日报》1982年7月9日)。 如果越南承担了从柬埔寨撤出所有军队的责任,并宣布这一举动,那么在越南撤回首批军队之后,中国愿意同所有相关各方,其中包括越南讨论关于全面、公正而合理地解决柬埔寨的问题(苏中政治磋商1983年第三轮谈判)。 检验越南人真诚性(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的唯一标准是他们能否立即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而不是拖延到1990年撤出(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5年8月20日的声明)。 中国和越南恢复传统友谊的纽带的条件是越南能够真正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不推行反华政策(1986年吴学谦在联合国大会第41次会议上的发言)。 越南人应当承担起从柬埔寨撤军的义务,并提出现实的撤军计划(吴学谦和罗高寿在1987年12月22日的谈话)。
---	---

双方同意,必须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但是印度支那方面认为这是政治调解进程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的因素紧密相连,并希望把这一进程同“红色高棉”同时解散自己的军队联系起来,而中国方面把越南撤军看作是一个前提条件,是真正开始政治进程之前不可接受的。

五、国际力量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坚决反对国际力量或者联合国军队进入柬埔寨,因为这会有把柬埔寨变为“印度支那的黎巴嫩”的危险。 如果西哈努克同意保留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结构和法律,国际力量在柬埔寨的存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选项。	中国暂时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	--------------------------

六、关于联合政府

在选举的基础上组成常设的政府之前,建立联合政府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任何人无论是通过军事的还是其他的途径都不能推翻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它也不允许在谈判的幕后进行这样的活动。建立四方联合政府(在选举前)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政治调解可以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西哈努克进行合作,在达成协议之后,邀请其他两个派别的力量加入它们。在第二阶段,在越南完全	相关国家应当支持和赞同能够根据民族统一和民族和解的精神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苏中政治磋商1987年第10轮谈判)。 中国反对仅由一方垄断权力的做法,同时反对排挤任何一方的企图(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中国没有在柬埔寨建立由“红色高棉”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的意图。而且,我们打算支持波尔布特返回金边来垄断权力(苏中1987年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如下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强调:金图以韩桑林政府为基础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无益的(钱其琛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87年12月4日的谈话)。
--	---

续表

撤军之后组建选举委员会,进行全面的选举,在其基础上组成议会,并由议会组成临时政府。在选举中可以设立外国的观察员。 在选举之前事实上唯一可以接受的行动方案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维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反对派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建立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西哈努克可以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西哈努克可以成为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主席。	在柬埔寨应当组成四方联合政府,应当保证西哈努克(而不是韩桑林或者“红色高棉”)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他应当得到实际的权力,而不是“像花瓶一样,被摆放在金边”(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的发言)。 中国支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其中指出,在建立联合政府之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应当解散;民主的柬埔寨将会在临时政府建立之前直接建立,而临时政府也将会在其建立之后不久自行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1988年2月的发言)。 联合政府应当不是在撤出军队的最终阶段到来之前建立,而是应当在完全最终的撤军之后建立(1987年中国外交部代表就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做出的解释)。
---	--

总的来说,双方不反对建立四方联合政府,也不反对联合政府由西哈努克领导,但是印度支那国家认为,联合政府将在全面的选举之后建立,而在此之前,联合应当以现今的政权为基础发挥功能,但中国坚持越南要事先撤出军队,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解散,各派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而在此之后进行全面的选举。

七、柬埔寨的政治未来

将在国际监督之下,在全国的国民议会举行全面的选举,制定新的宪法。只有柬埔寨人民及其全权代表才能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未来。 我们同意柬埔寨成为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国家。 对“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理解是:拒绝加入军事联盟,不允许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和部署外国的军队,禁止利用柬埔寨的领土从事反对其他国家的行动,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	我们希望,柬埔寨人民通过自己的民族自决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苏中政治磋商1986年底9轮谈判)。 中国不打算在柬埔寨追寻自己自私的利益,不打算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同其建立特殊的关系(苏中政治磋商1987年底10轮谈判)。 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柬埔寨人民的意愿……应当由柬埔寨人民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柬埔寨应当成为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国家,它应支持同越南、中国、东盟国家以及苏联保持正常和友好的关系(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越南的合法利益(在从柬埔寨撤军之后)当然会被予以考虑(T.日夫科夫同赵紫阳在1987年5月的谈话)。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柬埔寨都不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应保持“严格的中立”(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的声明)。
--	---

尽管各方都支持在将来建立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柬埔寨,但是各方都有自己的目的,都倾向于不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

八、关于国际保障

应当召开由柬埔寨敌对双方、印度支那国家和东盟国家、苏联、中国、印度、法国、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对和平	相关国家应当支持和赞同如下建议:使柬埔寨各方在以民族统一和民族和解的精神下组建联合政府,这些国家应当提供国际保障(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	--

续表

解决柬埔寨问题及保障东南亚的和平作出贡献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所达成协议的实现提供保障，为柬埔寨的国家安全和东南亚的和平提供保障。

另外，还可以提出如下国家可以参加国际会议：日本、澳大利亚、津巴布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国秘书长（以个人身份）。

中国非常希望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和解，以便在越南撤军之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开展自由选举。中国将尊重这一选举结果，并将同相关国家一道提供国际保障（苏中政治磋商 1987 年底 11 轮谈判）。

中国支持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制定和通过国际保障（戴秉国同费多托夫在 1987 年 12 月 11 日的谈话）。

中国支持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建立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并愿意为使柬埔寨成为一个中立、不结盟的和平国家提供国际保障（1988 年 4 月 6 日钱其琛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和印度支那国家在如下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应当为柬埔寨各方达成的协议提供国际保障。

现在围绕柬埔寨问题形成了如下共识：未来解决柬埔寨问题也应寻找政治解决问题的途径。无论是印度支那国家，还是中国的立场中都有的一些共同点，尽管每一方的立场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内容。这些共同点是：

——承认柬埔寨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国内事务的权利；

——同意柬埔寨互相敌对的四个集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

——同意按照民族和解的思想，以某种形式让西哈努克回国的可能性；

——认识到越南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撤军的必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再次掌握政权的可能性；

——希望为将来就实现民族和解和政治解决问题而签署的协议提供国际保障。

主要矛盾是由于中国人提出的如下要求引起的：在保留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情况下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同越南直接进行谈判。

印度支那朋友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现存的制度以及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特殊关系”，哪怕是在形式上做出某些变更和精简。对于越南来说，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防止其敌对的政权在柬埔寨复辟。同时。印度支那国家领导人明白，不考虑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最终达成解决方案的。在此方面不应完全忽视如下事实：越南同志

认为，前不久他们能提出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是乐观的，能够使越南与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考虑到了中国所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当然，“红色高棉”也作了让步)。

中国所采取的立场的基础是，企图继续和依靠与苏联合作的印度支那三方联盟加强关系。北京把这样的统一看作是扩大自己在该地区影响的主要障碍。中国领导人的考虑是，一些客观条件，其中包括“红色高棉”在事实上完全从属于北京，使得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柬埔寨问题，并企图保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中国方面的考虑是，提出自己强硬的解决条件，其中包括在不拒绝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八项条款的同时，支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但是中国仍然被迫考虑到印度支那半岛的现实，近来在他们的立场中可以发现上述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中国已经不再坚持强调要把越南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完全撤军作为西哈努克与洪森开始进行对话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他们同意只有政治途径才能解决问题，他们也赞同在西哈努克领导的联合政府中任何一个集团，其中包括“红色高棉”都不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承认，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考虑到越南利益的必要性。

苏联外交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

1988年5月4日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02, л.166-180

№25870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作的可能性(1988年6月6日)

关于苏联在亚太地区扩大经济合作若干问题及可能的方向(根据苏联外交部1988年3月30—31日工作会议材料：《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迫切问题》)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增强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太地区各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日本在工业生产领域占据了第二的位置，新兴工业国家(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在整个70年代(6%—12%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80年代都高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也进入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 [48]

顺利扩大苏联在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可以加

速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德里提出的保障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纲领的实现。

阻碍苏联积极加入亚太地区国际劳动分工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水平较低。现有的部门管理机制看起来不能消除亚太地区各国的迅猛发展与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停滞局面的巨大差距。1987年8月19日通过的远东经济区综合生产力长远发展纲要需要对其发展战略进行根本改革，并且没有考虑到地缘的、自然条件的、人文的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在制定纲要的经济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苏联远东地区在国际经济联系中的前景和意义，事实上指定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不仅向亚太地区发达国家，而且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原料的角色。事实上把同远东经济区发展贸易的优先权赋予了日本，甚至没有提到新兴工业国家和东盟，而这些国家则是苏联在亚太地区扩大经济合作的潜在国家。纲要中没有预测到在亚太市场的发展，因此建议苏联远东地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产这类出口的商品。由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首先是日本，它们的经济正在向高科技和节约能源的技术型转移，因而从苏联进口传统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在降低。

在苏联外交部就苏联对亚太地区一些迫切的政策问题召开的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如下看法：在制定国家发展纲要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在远东经济区建立致力于同亚太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大型的试验区的可能性。要进行这类实验不能不制定和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无论是同合作的国家之间，还是同国外的私人资本之间，贸易机构之间进行联系的相互规则都要与全联盟的规则有实质性的区别。远东经济区和全联盟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将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在远东地区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经济实验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因为这一地区是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无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处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加快远东地区的发展都是必需的。远东地区远远落后于苏联的中央地区，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这在客观上使得更加易于进行试验，因此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的消极的社会影响将不会非常尖锐，相对于我国的其他边境地区而言，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要小一些。

与会者指出，亚太地区明显出现了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威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不取决于军事力量，而取决于其科技和经济发展。其原因在于日本、新兴工业国家、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

该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在此问题上与会者表现出了对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不断被削弱的担忧。这与我们同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速度以及顺利的程度有关，要考虑到，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苏联融入这一进程一年比一年困难。

会议上提出了明确确定我们在亚太地区安全的优先方面，使苏联在这一地区有足够合理的军事存在，但不要过于明显，不要妨碍远东地区社会经济潜力的增长，同时要加强信任，扩大苏联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

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要积极努力，一方面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允许苏联与中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会上还提出了如下看法：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苏中边界军事对抗的程度，把精力集中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使两国经济能够相互依赖，这是某些军事决议所难以消除的。对于苏联远东地区参与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纲要的实施，中国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前不久就两国政府间签署“苏联加盟共和国、州和一些部门同中国的一些省市建立经贸关系”的协议的谈判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在研究关于在苏联建立生产保温设备的合资企业问题以及在中国建立纤维素联合加工厂等相关问题。在外交部参加会议的代表强调说，在这些方面必须更加积极地同中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前景的项目，比如建设从萨哈林 [49] 到北京的燃气管道，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 [50]、布拉戈维申斯克 [51]，年输送20亿—30亿卢布的燃气，在阿穆尔河建造功率为50亿千瓦时的水电站，在中国建立合资的船舶修理企业，对发动机、空气压缩机以及其他的设备进行维修。

会议着重强调，必须克服与新兴工业国家，其中包括与韩国发展经贸关系中的消极因素，韩国是我们在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与韩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有理由认为，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北朝鲜人会有一些消极的反应。匈牙利和波兰已经同韩国互换了贸易代表；民主德国的贸易部门同韩国的20多家公司保持着联系，其中两家公司已经获得准许在柏林开设代表处，尽管没有给予它们正式的地位，韩国的一些公司经常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展览会。苏联同韩国的贸易额大约为800万美元。韩国的一些企业家曾多次表示，希望同苏联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比如，为此目的韩国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朴永元通过希腊驻日本大使(兼驻韩国大使)在今年3月

份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并表明了他们的这些意愿。

首尔对苏联参加经济技术合作国际会议的积极态度就证明了他们愿意与苏联发展经济合作。1987年10月，在首尔召开的经济技术合作能源和矿产论坛上，韩国代表对苏联代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M.A.斯特里科维奇的报告《关于苏联能源的发展状况以及在该领域与亚太国家进行合作的前景》表现出了巨大兴趣。斯特里科维奇同志认为，韩国方面做出了积极回应，具体向我们提出来关于把计划敷设通往北京的燃气管道延伸到首尔或者韩国东南沿岸，并通过第三国同韩国建立合资企业。

我们认为，考虑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同韩国建立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担心由于苏联与韩国贸易关系的积极发展而使苏朝关系恶化，至少在苏联与韩国的直接贸易额低于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之前不会恶化，1987年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主要通过日本、香港和澳门)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

在外交部工作会议上指出，吸引国外对苏联远东经济区进行投资的较为有效的形式是在该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因此特地表示，希望能够重视日本东邦生命保险公司董事长太田清藏提出的设立苏日土地企业的建议。预计苏联方面提供其与中国和朝鲜接壤的一块面积为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期60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提供大约40亿卢布，用于建设国际机场、电视发射中心、海港、国际贸易中心设施等。该土地企业将向国外公司和苏日合资企业出租上述地段，并占有10%的股份，其收入应占日方投资的8%。

实施太田清藏提出的计划，以及建立其他的特区在原则上能够促进苏联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完成，有助于苏联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无论是在双边的基础上，还是在多边的基础上扩大苏联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合作，都将会使我们今后更加努力地加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今年3月份建立的苏联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E.M.普里马科夫院士被选为主席)，委员会成员中有政府代表、对外经济部门代表、社会研究机构的代表。

苏联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立，使得苏联可以更加积极地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这一较有威望的地区组织的活动。以E.M.普里马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以“客人”的身份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第6次会议（1988年5月17—20日在大阪召开）。这是可以接受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论的一些想法的具体实践，是政治新思维的表现。与会的苏联代表同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日本太平洋岛屿诸国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为解决苏联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及其工作机构酿造了较为有利的氛围。

为了与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成员国加强业务上的联系，应当在1988—1989年邀请中国、新西兰、泰国、马来西亚、加拿大和印尼的代表访问苏联，了解情况。相关部门、苏联科学院、科学生产单位将会积极地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工作机构的活动，要特别注意矿产原料和能源论坛，注意农业小组的活动……

与会者指出，苏联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但是获得承认的主要是其地缘地位，而其相应的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地区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却未得到承认。

在对国内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不断增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企业的经济自主性要增强，要有权同国外的合作伙伴建立直接的联系，建立合资企业，地方机构作用的转变、它们的巨大主动性以及其他的措施在客观上建立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加强苏联远东地区与亚太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良好条件。苏联在亚太地区在各个方面战略地位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循序渐进地贯彻这些措施，以及贯彻这些措施的广度和深度。

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政治经济处

1988年6月6日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67, л.2-11

№25936 法捷耶夫与李凤林会谈纪要：通报阿富汗的局势 [52] (1988年6月22日)

摘自Ю.Д.法捷耶夫的工作日记

1988年6月22日

邀请了李凤林进行会谈，受委托，向他说了如下的话.....

极端主义者认识到了与阿富汗正规军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是没有前景的，因此他们就努力采取恐怖主义破坏活动，首先是针对广大的阿富汗穆斯林居民。他们对一些城市、农村和国民经济的设施发动袭击。最近两个月在喀布尔发射了167枚火箭弹，此外，对.....发动了67次爆炸，这导致了138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此外有170人受伤。摧毁了大量的建筑、行政大楼和商贸大楼，造成的物质损失达数千万阿富汗尼(货币单位)，今年7月19日在喀布尔再次发生了枪击事件，发射了火箭弹，造成了15人死亡，23人受伤，阿富汗的专门机构在一些没有爆炸的火箭弹上发现了中国商标。

上述对阿富汗首都广大居民实施的恐怖和破坏活动的事实引起了强烈的愤慨。需要立即结束这些活动，作为对日内瓦协议的一项保证，苏联将不允许极端主义的暴行。

我使中国方面注意到上述事实，希望中国利用自己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保证对日内瓦协议的严格遵守，终止在喀布尔以及其他的城市和农村进行的恐怖活动。

李凤林回答说，他将根据规定转告这次会谈的内容。他指出，中国支持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反对对广大民众实施恐怖活动。至于发现中国商标的火箭弹，李凤林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的武器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不同的国家。关于此事，现在还不能对中国的正式立场进行评论.....

Ю.Д.法捷耶夫

АВГРФ, ф.0100, оп.75, д.3, л.17-19

№25945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中国决定与苏联举行高层会晤 [53] (1988年11月11日)

与中国驻苏临时代办李凤林举行的会谈记录

在非正式的会谈中，李凤林确认，中国领导人已经通过了在1989年上半年与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的政治决定。用李凤林的话来说，北京在原则上同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的关于可以在4月份、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举行这一会晤的意见。

接着李凤林说，他已经直接向高层完全通报了关于同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1周年时的简短谈话，李凤林说，他特别提到了如下看法，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两国应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出现一些突发的不愉快的事情。同时，就今后举行的高层会晤事先达成相互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凤林指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与美国、西欧领导人进行类似会谈的计划未必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事先曾非常详细地制定出了各种问题，以便签署许多文件。李凤林说，我们最好采取另外的做法。这次高层会晤应当推动今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会谈的范围应当很广，应当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对对方的意图、对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彼此都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比如，关于减少军事对抗的问题，他们中国外交家坚持认为，苏军进入蒙古这些问题对苏方来说是复杂而敏感的。因此，他们要听一听苏联对他们的决定是如何从总体上进行考虑的，而不是详细地描述一下，应当在哪些地方撤出和缩减军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专家，但最好是在举行高层会晤之后。

他提到了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的问题。李凤林指出，关于苏联对越南撤军的时间表的立场，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现在想知道的是关于苏联在停止对高棉人集团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的立场。他们提出，今后要在解决柬埔寨冲突问题上扩大共识。

中国方面把苏中两国副外长的互访看作是一个缩影.....

В.Я.沃罗比约夫

АВРФ, ф.0100, оп.75, д.3, л.49-55

1989年

№25871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保障苏联在亚太地区利益(1989年4月12日)

Э.А.谢瓦尔德纳泽同志：

苏联外交部正在继续努力，寻求能够保障我们在亚太地区利益的途径。

1989年4月12日，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管理局就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安全问题组织了一场会议，这次会议是与苏联外交部军控和裁军委员会一起召开的。苏联国防部、一些主要的科研单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的代表以及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管理局、苏联外交部军控和裁军委员会、教育政策管理局、莫斯科师范大学、紧急救援管理局、美国和加拿大管理局、国家文化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就如下问题出现了争论和实质性的分歧：实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提出的建议的问题上不够迅速的原因，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进行评价，在概念上和实践中(见附件)保障我们在该地区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的途径。上述部门在解决把亚太地区变为战略安全上进行战略互利合作的综合任务进行协调的努力不够，因此就出现了这些分歧。

我们认为，要实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裁军问题的发言中阐述的想法，今后苏联积极地参与到亚太事务，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实质上转变态度，同负责亚太事务的各部门和科学院工作者进行合作。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外交部之下建立常设的工作小组，定期就各部门间在亚太事务方面做过的工作召开会议，讨论和协调一些关于亚太事务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外交工作、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附件：

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

(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局势以及处理好军事政治谈判机制的前景)

1.根据国防部代表和一些科研机构的代表的看法，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是非常薄弱的。在该地区，苏联所受威胁的程度没有降低，美国企图在军事战略上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正在快速实现其军事现代化，日本的军事潜力也在提升。与苏联接壤的地带——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仍然是紧张的源泉。在非常的局势下，苏联不能真正地指望获得其盟国——蒙古、老挝、越南和朝鲜的支持。但是，美国却可以依靠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一些盟国——日本、澳大利亚、南朝鲜、新西兰等。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地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它不能依靠对远东的军舰以及其他的船只进行改造来加强力量，舰队通往作战区域会受到相关国家的控制。

在此方面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如果如外交部长所阐述的，单方面就削减苏联在远东的武装力量而另外采取一些措施不能不对苏联安全利益的保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旦苏联领土遭受攻击，在宣布削减陆军力量后剩余下来的武装力量只有可能进行旨在把敌人驱逐出苏联境外的反击，而不能对其发动进攻。太平洋舰队能够保护苏联的海岸线，防止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向苏联空投兵力，以便获取桥头堡，还可以阻止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从太平洋的岛屿用“战斧”巡航导弹对苏联境内纵深的军事和工业项目进行打击。

总的来说，提出了如下意见：近期苏联没有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加强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不能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程度。

2.由大部分科研单位的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以及外交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同意关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薄弱的结论，但是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15年内)，苏联的远东地区将不会直接遭受安全威胁。在这一问题上认为，苏联的核潜力对于遏制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统一的反苏联盟是有效的，并且认为，我们的潜在的对手难以开辟“主要的阵线”在远东地区反对苏联。

考虑到这些情况，提议利用上述“临时窗口”，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来发展苏联在远东的能源，作为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参与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劳动分工中，要注意到，这种经济“挂钩”对我们来说具有双重效应。首先，相互依赖的增强将有助于我们显著改善同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其次，将会使关于“苏联威胁论”消弭于无形，“苏联威胁论”挑动许多亚太国家同美国建立联盟，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合法化。

与会者认为，在军事政策方面应当强调确保苏联的核打击力量(战略核潜艇)，在苏中边界仅保留一些必要的地面设施，为在短暂的时间内把苏联军队投往局势严峻的地区提供保障。

在政治方面要注意发展同对我们利益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首先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苏中关系的发展能够引发“多米诺效应”，能够促使日本、东南亚国家甚至美国对苏联更加克制。

至于我们的战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考虑到美国不愿意就削减其在亚太舰只力量问题达成协议，应当更加坚持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提议首先解决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不规定减少军事力量，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增强信任。在第二阶段就限制海军和空军力量着手采取一些信任措施达成协议。

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接触。其中包括提议在双边的基础上，两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会晤，签署协议，避免其所辖领海和领空中发生突发事件。

研究另外采取一些措施的可能性，减少苏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同时不损害我国的安全利益。其中包括：

——要考虑到，我们可以主动提议，在2000年之前消除在国外的军事基地，还要考虑到越南方面可能会提出关于关闭在金兰湾的物质技术保障站的问题，以便越南改善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着手削减我们在越南的军事存在。

——削减苏军驻择捉岛的人员，但是，军事专家的最终撤离不能损害安全利益。

——公布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材料，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的力量进行对比。

更加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为此要积极利用苏联在其亚洲部分削减武装力量的事实，积极利用苏联单方面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提议组建“和平与安全海军上将”公共组织，利用这一组织来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与会者赞同建立一个由苏联外交部相关部门代表和国防部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人数为10—15人。以便讨论关于亚太地区的裁军问题，具体制定我们为缓和局势、降低军事对抗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处理好就远东地区的军事政治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作。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67, л.186-194

№2599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计划(1990年2月22日)

机密

第112/110r号

摘自苏共中央书记处1990年2月22日会议第112号记录

关于1990年度苏共同经互会成员国各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联络计划。

1.批准1990年度苏共同经互会成员国各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联络计划(附件)。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协同苏共中央其他各部同各国党就代表团、代表小组互访的议程和期限一起商谈，以便交流经验、磋商和讲演。

2.苏共中央各部应为实现苏共的交流计划提供有效保障，对代表团和工作组互访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在苏联各级党组织中积极推广朋友的积极经验。

要特别注意深入了解各国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如：社会主义新面貌、党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政治体制中的大众传媒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员干部培训，等等。

为此要利用党际联系的一切形式——从双边意见交流和成立联合研究工作组、委员会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活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到围绕我们这些国家党的建设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召开由党的领导层参加的多边会议、各国党代表会议。

3.委托苏共中央各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派党的科研单位代表、高校代表和出版机关的代表，接待前往隶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代表，莫斯科高级党校、各共和国高级党校、列宁中央图书馆、报刊出版社和苏共中央出版社进行经验交流、休养和治疗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和代表小组。

4.党际合作所需开支：苏共中央系统——由党的经费负担；隶属苏共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各共和国高级党校、列宁中央图书馆、报刊出版社——由上述机关经费负担。如果有必要，派遣代表团和工作组的全部费用由苏联方面承担。

苏联党务工作者同其配偶从莫斯科前往河内、哈瓦那、北京、平壤、越南、乌兰巴托以及返程的相关费用由苏共中央办公厅支付。

РГАНИ , ф.89 , оп.8 , д.79 , л.1-2

1990年

№25845 卢金与潘占林、李辉会谈纪要：俄罗斯联邦与台湾的关系问题(1990年10月31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潘占林和一等秘书李辉会谈纪要

1990年10月3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卢金同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潘占林和一等秘书李辉举行了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亚太地区分委会主席C.A.米哈伊洛夫以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部门主任C.C.齐普拉科夫同志。

这次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政治局势问题及其对外政治路线问题。会谈中还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与台湾发展关系的可能性问题。Г.Х.波波夫对台湾的访问以及叶利钦可能对台湾进行访问的传闻都使中国方面感到了特别的不安。因此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在这一问题上的计划的问题。

卢金强调说，中国方面是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路线的一个重要方向。他强调说，俄罗斯联邦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关系的时候的出发点是如下原则：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它还声明说，好像叶利钦正在对访问台湾作准备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并认为，中国方面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俄罗斯联邦在对中国的政策方面不会损害苏联和整个苏中关系的利益。同时，俄罗斯联邦希望独立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为进行这种合作首先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或者在国际事务委员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卢金提出了关于中国方面对俄罗斯联邦同台湾发展非官方的经贸关系的态度问题。

潘占林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遵循如下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成果的联合公报中已经确定了下来。用他的话来说，

近来台湾推行的所谓“弹性政策”的目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对台湾事实上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俄罗斯联邦采取一些有损苏中关系的措施。因此，叶利钦对台湾访问未必适宜。至于经贸关系，近年来苏联同中国东北各省的联系迅速增加，这种关系发展的潜力远未丧失。至于同台湾发展经济关系，潘占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同意在事实上发展这样的关系，但条件是，政治关系是在私人的、非官方的层次进行的，不能通过官方成员进行。中国高层不愿看到俄罗斯联邦的官员对台湾进行访问。

会谈纪要由C.C.齐普拉科夫整理。

ГАРФ, ф.10026, оп.1, д.2290, л.1-2

1991年

№25866 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报告：中苏关于台湾问题的磋商(1991年4月15日)

关于就台湾问题进行的磋商

今年4月12—15日，苏联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之间就台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中国方面对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根据这一立场，苏联历来都把台湾看作是中國的一个省，一贯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中国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倪耀礼强调说，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是有助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大因素，它能够使两国现在建立新型的关系。

但倪耀礼指出，中国注意到，最近台湾在积极地对苏联采取“弹性外交”。苏中在1990年7月就这一问题首次进行的磋商中，苏联的立场是令中国人信服的，当时中国方面明白，苏联和台湾之间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些业务往来。

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希望苏联能够明白：台湾的“弹性外交”的目的不仅仅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且是破坏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台湾实现了自己推行的“弹性外交”的目的，这就会对苏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代表呼吁苏联方面提高警惕，并且解释说，台湾的“弹性外交”首先追寻的是政治目的。为了进行伪装，这一外交被称为“务实外交”、“现实主义外交”、“全面的外交”，企图通过经济手段和贸易手段在政治上实现突破。台北在苏联方面更加积极而坚定，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苏联具有较高的国际威望，并且，苏联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从原则上来说，中国不反对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非政府的基础上同台湾发展贸易关系以及进行其他的交流，中国代表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态度绝不意味着北京鼓励其他国家与台湾发展关系。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同台湾进行接触，中国的态度是忍耐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代表强调了“历史的特点”。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解释说，中国方面不同意苏联的一些组织和部门在同台湾发展关系的时候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相类比。此外，他们明确表明了如下一种态度：中国把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特别态度”看作是由于目前苏中关系友好。

在我们同台湾发展关系和进行接触的问题上，中国方面提出了如下“四项指导原则”：

——不损害苏中关系；

——不危害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

——不给第三国提供不愿意提供的先例；

——不能被台湾当局所利用，来加强台湾的地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

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作了如下一些解释：中国方面不反对苏联与台湾的科学院、科学家之间进行接触，特别是在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时候。但是中国方面反对苏联具有官方身份的科学家和人民代表同台湾进行接触，反对他们参加这样的科学研讨会和其他具有政治色彩的科学活动，这些活动会被台湾利用，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中国方面反对苏联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对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访问，更加反对在台湾设立分社。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签署协议和合同，其中包括签署建立合资企业的合同，如果这些合同具有纯粹的私人性质的话。在这些协议中，除了“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台北”(通过逗号隔开)之外，台湾方面不能有其他的表述形式。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方面反对同台湾签署任何互免商品关税的协议、贷款协议、关于公债的协议、提供较为优惠的条件的贸易协议等，这些协议的签署需要联盟或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做出官方的保证。

在金融方面，中国反对苏联中央国家银行同台湾的金融机构和银行(至于苏联的商业银行，那么北京必须对其性质进行研究)进行接触。

对于苏联与台湾发展航空和海洋运输关系的问题，中国代表表现的立场是克制的，而实际上是消极的态度，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了“中国的主权”。同时中国代表表示，在发展空运方面可以另外进行磋商。

在台湾参与苏联的各个公司以及展览会的问题上，中国方面的总原则是不允许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局面，并注意到发行的一些印刷品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等。

中国方面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料。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对苏联方面反对进行此类交易的决定表示感谢。

关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各类活动；反对台湾参加有中国参加的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除外)，反对台湾参加“具有政治倾向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至于苏联演员、运动员到台湾进行比赛或进行商业活动，中国方面请求，不要让那些非常著名的团体、演员和运动员(特别是以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到台湾访问。

在磋商中，我方确认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如下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我方声明，苏联没有同台湾建立官方联系的意图或者同台湾建立“政治桥梁”的意图，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和平统一付诸的努力。这些立场，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参加磋商的代表所声明的一样，使中国方面感到满意。

苏联表现出了同台湾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兴趣。必须考虑到苏联新的现实，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各企业、联合企业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具有广泛的对外市场。

中国方面提出，制定可以接受的原则，以这些原则为基础使苏联与台湾的伙伴保持非正式的联系，这一原则不能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我们认为，这一原则的实质为：苏联不要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接触。至于贸易关系方面，那么这些贸易关系的形式、层次和性质总的来说可以依据大多数国家同台湾的关系的实践进行，不要承认台湾具有国家的地位，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特别强调说，在解决涉及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明确区分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为此他们支持在两国外交部和大使馆间在台湾问题上协调立场。

应我们的请求，倪耀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恢复接触问题上的进展进行了评价，他说：“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立场。”台北不同意通过中共和国民党的渠道进行对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进行政府间的对话，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台北政府。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有耐心的，并将实现其短期的和长期的计划。他们认为，台湾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台湾居民已经超过了200多万人。他们鼓励台湾商人积极到大陆进行投资。

这些磋商使得双方可以对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检讨。这些磋商表明，中国方面希望出现一种局面，使得他们可以控制我们对台湾的关系，或者较为可能的是禁止苏联在此方面主动采取一些行动。非常明显的是，相对于其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方同意在此问题上继续交换意见。

苏联方面参加这次磋商的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副司长M.M.别雷，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H.Л.拉齐伯林斯基，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顾问B.M.斯特奇科夫，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经济司B.Г.索罗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一等秘书E.Ю.托米辛。

中国方面参加这次磋商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倪耀礼，办公室参赞李惠琴，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等秘书李辉，大使馆随员朱少红。

苏联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

ГАРФ, ф.10026, оп.4, д.2805, л.34-39

№25917 库纳泽与于洪亮会谈记录：寻找中俄两国接触的共同点(1991年10月8日)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1991年10月11日

摘自Г.Ф.库纳泽的工作日记

与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的会谈记录

1991年10月8日

应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的请求接见了。于洪亮将要回国。

于洪亮指出，在俄中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睦邻友好关系。今天俄中关系必须适应苏联发生的剧变。尽管我们两国的条件不同，中国认为有必要寻找两国进行接触的共同点，加深相互理解，并打算在国际交往普遍适用的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同俄罗斯发展全面关系的路线。

我请于洪亮大使注意到如下问题：

1.确定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发生变化，赞成这个对所有国家在与台湾省发展经贸关系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我们很难向俄罗斯实业界的代表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实业界的同行一样，与台湾发展业务关系，而我们与这些国家一样，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与台湾发生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立场也是一贯的：我们不打算批准设立俄罗斯与台湾发展接触的官方的代表处。

2.尽快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和平统一是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从这一共同利益出发，我们呼吁中国方面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改变其在关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协议问题上的立场，不要把这一问题同美国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这一问题联系起来。

在对我所提上述问题进行回应的时候，于洪亮表示，希望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能够以苏中在1989年和1991年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的协议为基础。于洪亮大使说：“我们希望，同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不会采取一些会造成两个中国局面的措施。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反对俄罗斯与台湾发展非正式的经贸关系。”同时，于洪亮大使指出，俄罗斯从台湾采购的许多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以最优惠的条件向其

供应，其中包括粮食以及其他的食品，各种日用品。

于洪亮大使指出，在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协议的问题上我们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国也赞同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通过和平对话实现半岛的统一，禁止和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于洪亮转达了邀请，邀请俄罗斯外交部长A.B.科济列夫在其方便的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以便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的问题。

我对转达的这一邀请表示了感谢，并且指出，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打算同所有国家发展睦邻互惠关系，其中包括同我们伟大的邻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将承担起俄中关系发展的责任，并将利用其所有积极的经验，特别是自1989年5月苏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所积累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我强调说，在同中国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的时候，我们将遵循互相尊重的原则，承认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无意弄清某一国家在苏联企图发生国家政变的日子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认为，这都成了历史，并将从上述原则出发努力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在会谈过程中，中国大使提出了关于中国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领事馆问题得到拖延一事。

我通报说，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已经向政府请求加快解决这一问题，近期将会向地方当局下达必要的指示。

俄罗斯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亚太司副司长M.伊万诺夫，亚太司一等秘书E.托米辛，亚太司二等秘书И.莫尔古洛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随员袁斌。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Г.Ф.库纳泽(签名)

ГАРФ, ф.10026, оп.1, д.2290, л.36-38

№25890 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1991年12月13日以后 [54])**

1991年12月6—13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报告

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B.П.卢金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12月6—13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如下一种情况使这次访问具有特别的意义：代表团随身携带了俄罗斯总统B.Н.叶利钦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以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P.И.哈斯布拉托夫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的信件。考虑到这一情况，中国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对代表团的接待规格。其中包括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举行了会谈，这最初是没有被列入计划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廖汉生举行了会谈和谈判，并在中国外交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经济改革委员会举行了会谈和谈判。代表团对华南的广东省以及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访问。

代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在谈话中强调，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发展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如果最初谈论的只是关于发展“与苏联，其中包括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万里则强调说，“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邻国，同俄罗斯建立合作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他还转达了对叶利钦总统和P.И.哈斯布拉托夫最美好的祝愿，并接受了P.И.哈斯布拉托夫在信中提出的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邀请。

在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时候谈论了双边关系中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中国方面经常强调的是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与苏联的政治路线相比较，俄罗斯对华政策的继承性。中国方面经常强调说，他们愿意在1989年和1991年苏中联合公报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与俄罗斯联邦发展关系。在此问题上他们强调了如下一些原则：比如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显然，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白，以前苏中关系建立在国家间关系和党际关系的两大基础上，现在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中国还有一定的担心，担心俄罗斯把对中国的态度同其对人权问题、市场经济等问题的理解联系起来。因此，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化正在降低。可以认为，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采取实用主义，不与任何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第二，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担心俄罗斯会同台湾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系，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同时，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话来说，中国不反对与台湾发展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方面就台湾问题阐述的看法符合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叶利钦对杨尚昆的信件中得到了阐述。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在形式上都将不会阻止俄罗斯与台湾在非政府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俄罗斯与台湾联系的增多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处理好俄罗斯赴台公民的签证问题。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香港开设领事馆。就像匈牙利和波兰开设的这类领事馆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已经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尚未得到答复。

第三，经济问题。总的看来，中国方面愿意继续发展双边的经贸合作，首先是发展边贸。同时可以感觉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代表们感到困惑，他们要同俄罗斯的哪一机构打交道。因此，非常有必要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与中国的外经贸部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政府间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并就一系列广泛的经贸问题和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总的来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成功的，是俄中进行直接对话的良好开端。

ГАРФ, ф.10026, оп.5, д.1253, л.55-57

[1]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2]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3]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4]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5] 1969年9月，柯西金访问越南。他在越南时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当苏方收到中国方面表示同意的信息时，柯西金已回到苏联的塔什干市。于是，柯西金从塔什干起飞，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对会谈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后来，俄国学者C.贡恰罗夫和B.乌索夫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分两期发表了这个记录，并写了长篇导言和评述。这里刊登的是记录文本的译文。——编注

[6]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编注

[7]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不清，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8] 这一自然段看不清，只能译大意。——译注

[9] 这次会谈是在1969年11月19日举行的——原注

[10] 以电报方式向莫斯科通报。——原注

[11] 《真理报》，1971年7月25日——原注

[12] 1971年10月12日，受葛罗米柯的委托，多勃雷宁向基辛格转达了一封复函，对基辛格在10月11日的来信作了答复。这份复函的内容是：“由于某些原因，苏联方面应该把关于在莫斯科即将举行高层会谈这个问题通知给苏联大使。苏联驻东京临时代办认为，距公布这份通报只剩下1—2天的时间了，就擅自向日本外交部通报了这件事情，因此就犯了错误。当然，这没有给美国和苏联造成重大的损失。遗憾的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多次采取这种行动。我们认为，不应该认为这件事情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何况，今天就要公开通报关于举行高层会晤这件事情了。美国方面也非常清楚，苏联方面会严格遵守协议，保守在谈判中商讨的相关问题的秘密。显然，今后我们应该在这类问题上协调我们的行动，以便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原注

[13] 俄文原文ВнутреннийДворец，看来多勃雷宁指的是中南海的怀仁堂。——编注

[14] 指的是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译注

[15] 指的是1959年夏在索克里尼克展览会美国馆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所说的那些话，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正在苏联访问。——原注

[16] 插图旁标注：越南邯浩(Тханьхой)省一座铸铁厂的冶金工们，在午休期间收听越南通讯社发布的国内新闻。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1965年7月。——原注

[17] 科尔达诺夫·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1904—1985)，林业专家，曾任苏联林业部副部长。以上内容选自档案馆保存的雅科夫列维奇1975年的回忆，具体日期不详。——编注

[1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1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此表与下表均是附在上面文件之后的，但形成的时间却是1983年的。原因不明。因该资料比较宝贵，故保留于此。——编注

[20] 原文如此，未找到对应的报纸杂志。下同。——编注

[2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22] 所收集的该档案多处缺页，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23]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24]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2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26] 1978年4月26日，阿富汗达乌德政府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占领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编注

[27] 即苏联发动的入侵阿富汗战争。1979年3月阿明担任总理后，与苏联关系疏远，并发动政变，处死塔拉基，自己兼任总统。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处死阿明，扶植卡尔迈勒组成亲苏政权。——编注

[28]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29]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61—1986年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0—1986年担任部门副主任，1986—1991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助手。2003年切尔尼亚耶夫把他的这些日记的原件送给了国家安全档案馆。所摘译的档案来自国家安全档案馆，下同。——编注

[30] 日记原文日期写作“5月29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段日记叙述的事件大约发生在5月15日至20日，而下一个条目标明的是5月24日。——译注

[31] 鲍里索夫是罗满宁的笔名。——编注

[32] 大概指的是A.科索拉波夫，时任《新世界》文学月刊主编。——编注

[33] 奥列格·鲍里索维奇，即罗满宁。——译注

[34] 指1982年5月20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译注

[35] 大概指的是Г.А.阿尔巴托夫，时任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编注

[36] 大概指的是А.И.布拉托夫，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编注

[37] 即切尔尼亚耶夫。——编注

[38] 即布加耶夫。——编注

[39] 即齐米亚宁，时任《真理报》主编。——编注

[40] 即安德罗波夫。——编注

[41] 即杰米切夫。——编注

[42] 大概指的是Н.И.斯米尔诺夫，苏联海军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编注

[43] 此处人名的俄文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44] 卢金，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
——编注

[45] 该档案系摘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编注

[46] 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即南沙群岛。——编注

[47] 沃罗比约夫，苏联外交官，1989—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编注

[48]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49] 萨哈林，即库页岛。——译注

[50]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注

[51]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译注

[52] 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3]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4] 该档案未标明报告作者和文件日期，这里的时间是根据档案内容推断的。
——编注

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巴库莫夫, В.С.Абакумов

阿巴索夫·阿不都克里木, Аббасов Абдукерим

阿巴扎, А.Б.Абаза

阿波隆诺夫, Аполлонов

阿博拉兹佐夫, Образцов

阿卜杜尔加尼, 鲁斯兰, Руслан Абдулгань

阿卜杜拉·萨拉勒, АС-Саляль

阿卜杜拉赫曼, Абдурахман

阿卜杜拉扎科夫, Абдуразаков

阿布巴基罗夫, 阿布扎尔, Абубакиров Абзал

阿布拉希莫夫, П.А.Абрасимов

阿布罗西莫夫, П.В.Абросимов

阿登纳, Конрад Аденауэр, Konrad Adenauer

阿尔巴托夫, Г.А.Арбатов

阿尔费耶夫, Алфеев

阿尔哈罗夫, Ю.Архаров

阿尔杰费耶娃, Д.А.Ардефьева

阿尔梅达, АлмейдаЭКошта

阿尔齐舍夫斯基, Т.Арцышевский

阿尔奇莫维奇，Л.А.Арцимович

阿尔塔米拉诺，Альтамирано

阿尔希波夫，И.В.Архипов，Arkhipov

阿法纳先科夫，И.Я.Афанасенков

阿法纳新科，Е.Н.Афанасенко

阿夫季耶夫，В.И.Авдиев

阿夫列莫夫，Авремов

阿夫西莫维奇，Н.Е.Авхимович

阿夫西耶维奇，Авсиевич

阿夫谢耶维奇，А.А.Авсеевич

阿福奇尼科夫，В.Овчинников

阿盖耶娃，И.А.Агеева

阿贡，阿纳克，Анак Агунг

阿赫米德，Ахмид，Akhoed

阿洪多夫，В.Ю.Ахундов

阿基尔，Акил

阿基莫夫，И.Н.Акимов

阿吉尔必什，Д.Адилбиш

阿吉特罗普，Аджитроп

阿济佐夫(赛福鼎)，Сайфутдин Азизов

阿加宁，Аганин

阿加皮耶夫，А.Агапьев

阿加耶夫，С.И.Агаев

阿金佛夫，А.Г.Акинфов

阿卡里佐夫，Агальцов

阿科波夫，Акопов

阿克森，赫尔曼，Hermann Axen

阿拉贝谢夫，И.П.Алабышев

阿拉法特，Арафат

阿拉杰涅斯，Аратенес

阿拉克良，А.Аракелян

阿拉克洛夫，М.К.Аракелов

阿拉尤，Л.Арраюн

阿里，阿伦·阿萨夫，Арун Асаф Али

阿里，列札，Реза Али

阿里，穆罕默德，Мухамед Али

阿里芬，Арифин

阿里汉诺夫，Алиханов

阿里斯门迪，Арисменди

阿里斯托夫，А.Б.Аристов

阿里斯托夫，Аристов

阿利捷金，尤素夫，Юсуф Алитекин

阿利耶夫,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 Игорь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иев

阿列夫, 阿布德·萨拉姆, Ареф

阿列克赛,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西耶夫, Алексиев

阿列克谢延科, Г.В.Алексеев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Alekseev

阿列克辛, А.Алексин

阿列尼科夫, О.М.Аленников

阿列尼切夫, Ареничев

阿列申, Г.А.Алешин

阿列什金, П.Я.Алешкин

阿马佐纳斯格拉鲍斯, Амазонас-Грабойс

阿梅尔, Амер

阿梅尼茨基, Аменицкий

阿米尔, Амир

阿米拉斯拉诺夫, А.А.Амирасланов

阿明, Х.Амин

阿姆罗乌西, 阿里·法赫米·阿尔, Али Фахми Ал Амроусси

阿纳尼亚, 瓦赫坦, Вахтанг Ананян

阿纳尼耶夫, Ананьев

阿尼金, Аникин

阿尼西莫夫，А.И.Анисимов

阿尼亚，壮壮，Джуан Джуан Аня

阿努罗夫，Ануров

阿诺德，Арнольд

阿诺申，Аношин

阿诺索夫，Н.П.Аносов

阿沛·阿旺晋美，Апэй Аванцинмэй

阿恰里亚，Ачария

阿萨德，Асад

阿萨诺夫，Асанов

阿斯科琴斯基，А.Н.Аскоченский

阿斯科罗夫，А.А.Аскеров

阿斯萨达特，安瓦尔，Анвар Ас-Садат

阿斯塔菲耶夫，Г.В.Астафьев

阿索夫斯基，Н.Н.Ассовский

阿塔拉斯，Аталас

阿特马迪纳特，萨米，Сами Атмадинат

阿图里亚，Атулья

阿瓦尔吉德，Аварзид

阿韦林，Аверин

阿维尔齐德，Аварзэд

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Осипов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阿西卡林，М.К.Аикалын

阿尤布汗，АюбХан，Айюб Хан

阿扎鲁什金，В.Азарушкин

阿朱别伊，Аджубей

埃班，Эбан

埃夫罗斯，Л.С.Эфрос

埃格尔，列夫·叶夫根耶维奇，ЭгельЛев Евгеньевич

埃兰德，Эрландер

埃莉斯，Эллес

埃默里，Эмери

艾达拉利耶夫，А.Айдаралиев

艾德礼，克莱门特·理查德，Эттли

艾德林，Эйдлин

艾登，安东尼，Антони Иден

艾地，Айдит

艾尔本，赫尔曼·弗雷德里克，Херман Фредерик Эрбен

艾哈德，Эрхард

艾哈迈德，Ахмад

艾哈迈德，穆萨菲尔，Муссафир Ахмед

艾哈迈多娃，М.А.Ахмедова

艾哈迈托夫，К.Г.Ахметов

艾利特，М.Эллитт

艾伦，Р.Аллен

艾奇逊，Д.Ачесон

艾青，АйЦин

艾萨克斯，Айзакс

艾森豪威尔，Д.Эйзенхауэр，Eisenhower

艾斯比尔森，Есперсен

艾斯卡兰特，Эскаланте

艾伟，АйВэн

艾知生，ЭЧжи-шен

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1891 1967

爱新觉罗·毓彦，Айсендзеро Юй-Янь

爱新觉罗·毓章，Айсендзеро Юй-Чжан

安德列耶夫斯基，Андреевский

安德烈耶夫(米高扬)，Андреев

安德烈耶夫，С.Андреев，С. Andreev

安德烈耶夫，С.П.Андреев

安德留什科，Андрюшко

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Ю.В.Андропов，У. V. Andropov

安德罗索夫，Н.К.Андросов

安德罗雅诺夫，Андроянов

安德森，Андерсон

安德森，罗伯特，РобертБ.Андерсон

安迪让，Энтезам

安东尼，Anthony

安东诺夫，А.И.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Л.М.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С.М.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С.Ф.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娃，В.М.Антонова

安岗，Ань Ган

安季波夫，Антипов

安久洪，Ан Дя Хон

安库季诺夫，Анкудинов

安库季诺夫，В.М.Анкудинов

安禄山，Ань Ду-шань

安民，Ань Минь

安萨里，Ансари

安特罗波夫，П.Я.Антропов

安致远，АнЧжи-юань，Ань Кань

安子文，АньЦзи-вэнь

岸信健一，Кисикава Кэнити

岸信介，Киси

昂纳克，Э.Хонеккер，Erich Honecker

昂山，Аунг Сан

奥巴林，А.И.Опарин

奥比奇金，Г.Обичкин

奥别列姆科，В.И.Оберемко

奥博弗托，Обофто

奥布霍夫，Obukhov

奥布拉兹佐夫，Н.А.Образцов

奥尔登，Алден

奥尔洛夫，А.А.Орлов

奥尔洛夫，安德烈·雅科夫列夫，Андр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Орлов

奥尔洛夫，彼得，Петр Орлов

奥尔维德，Г.А.Орвид

奥夫奇尼科夫，В.В.Овчинников

奥夫恰洛夫，Овчаров

奥夫恰洛娃，А.Е.Овчарова

奥夫钦尼科夫，Овченников

奥夫相金，В.И.Овсянкин

奥格涅夫，Ю.И.Огнев

奥哈布，Охабу

奥赫洛普科夫，Охлопков

奥吉巴洛夫，П.М.Огибалов

奥加涅索夫，Оганесов

奥库洛夫，Г.Г.Окулов

奥莉加，林琳，Лин Лин Ольга

奥列霍夫，Ф.Т.Орехов

奥列依尼琴科，Г.Олейниченко

奥尼尔，О'Нейлл

奥尼尔，О'Нил

奥帕茨基，Л.Опацкий

奥沙宁，И.М.Ошанин

奥斯莫洛维茨，Осмоловец

奥斯塔片科，Остапенко

奥斯特洛夫斯基，Н.Островский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Р.Островская

奥斯特洛乌莫夫，Г.С.Остроумов

奥韦奇金，Н.К.Овечкин

奥维佐夫，Б.Овезов

奥西波夫，Осипов

奥西片科，С.Н.Осипенко

奥永德尔格尔，Оюндылгер

巴伯，Баба

巴德尔，加宁，Гань Батыр

巴杜拉，Бадура

巴尔，Бар

巴尔，Барр

巴尔，勃兰特，Брандт Бар

巴尔比，Барби

巴尔别辛，Балбехин

巴尔哈托夫，И.М.Бархатов

巴尔卡尔，С.Н.Баркал

巴尔科夫，А.С.Барков

巴尔马什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А.А.

Балмашнов

巴尔马索夫，Л.Бармасов

巴尔明，В.Бармин

巴尔沙伊，Баршай

巴尔谢吉扬，Барсегян

巴尔扎克，Бальзак

巴甫别科夫，扎基良，Бавбеков Закирья

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

巴哥达什，Багдаш

巴格达诺夫，格尔盖·卡斯托，Георгий Косто

Богданов

巴格达萨良，С.Б.Багдасарьян

巴格达萨罗夫，А.А.Багдасаров

巴格达什，Багдаш

巴格洛夫，Д.И.Багров

巴赫，А.Н.Бах

巴赫伦，Бахрун

巴季，尤真·约翰，Юджин Джон Баади

巴季茨基，П.Ф.Батицкий

巴济金，В.И.Базыкин

巴杰，Баджер

巴卡耶夫，В.Г.Бакаев

巴坎特，Бакэ́т

巴克，比尔，Перл Бак

巴克莱，Барклей

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Бакши Гулям Мухаммед

巴库里，Бакури

巴库列夫，А.Н.Бакулев

巴库林，В.М.Бакулин

巴拉巴伊金，Балабайкин

巴拉克，Барак

巴拉年科夫，Бараненков

巴拉诺夫，И.Ф.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Л.С.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亚历山大·尼基里弗里维奇，А.Н. Баранов

巴兰斯基，Н.Н.Баранский

巴勒，Э.Баллер

巴里佳，Балига

巴卢库，Бекир Балуку

巴马利，Бамали

巴貌，Ба Маунг

巴尼拉托娃，Панкратова

巴什曼，Башман

巴斯杜赫，Пастух

巴斯卡科夫，Баскаков

巴塔尼斯基，Д.С.Поданский

巴特里克耶夫，Патрикеев

巴托夫，П.И.Батов

巴伊巴科夫，Байбаков

巴伊巴科夫, Н.К.Байбаков

白崇禧, Бай Чунси, Бай Чун-си

白桦子, Bai Hua Zi

白善烨, Пэк СунЕп, Пэк Сон Е

拜科夫, Байков

拜叶尔, Байер

班禅喇嘛, Панчен-Лама

班达拉奈克, С.Бандаранаике

班达利, П.Бандари

邦达连科, Бондаренко

包晨际, БаоЧэнцзи

包尔汉·沙希迪, Бурхан Шагиди

包之静, БаоЧжи-цзин

薄一波, БайПо, БоИбо

薄祖基, ПоЦу Ди

鲍登, Бауден

鲍尔斯, 切斯特, Честер Боулс

鲍久尔, И.И.Бодюл

鲍里索夫(罗满宁), Борисов

鲍良(绪方太郎), БоЛян

鲍罗金, Б.Бородин

鲍罗金，М.Е.Бородин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

北野政次，Китано Масадзо，Kitano Masaji

贝阿沃吉，Беавоги

贝茨，Э.Пэйдж

贝尔纳奇，布鲁克，Брук Берначи

贝尔纳斯，Бирнс

贝戈维奇，Бегович

贝格斯，Бергус

贝科夫，Быков

贝克，阿里，Арли Берк

贝拉，艾哈迈德·本，Ахмед Бен Белла

贝利绍娃，丽丽，Лири Белишова

贝利亚，Л.П.Берия

贝利耶夫，И.А.Пырьев

贝鲁特，Берут

贝内迪克托夫，И.А.Бенедиктов

贝庆志，БеЧин-чжи

贝舍夫，Б.П.Бещев

贝斯特雷赫，Быстрых

贝斯特罗夫，Ф.П.Быстров

贝文，欧内斯特，Бивен

孛儿济特·巴德玛拉布坦，Борчугит Ватмалафтай

本巴耶夫，努苏普汗，Нусупхан Бунбаев

本西马，Бенхима

比布罗夫斯基，Бибровский

比利，Билли

比留佐夫，Бирюзов

比姆，Бим

彼得里切夫，Петричев

彼得鲁绍夫，Петрушов

彼得鲁舍夫，Петрушев

彼得鲁舍夫斯基，А.В.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Д.В.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

彼得森，Питерсон

彼得科维奇，兰科，Ранко Петкович

彼尔莱，Pillai

毕明齐，БиМин-ци

边金科，А.Бентинк

别尔德古洛瓦，Г.Бердыгулова

别尔纳，ДжонБернал

别尔乌辛，М.Г.Первухин

别格洛夫，И.И.Беглов

别赫金，Н.В.Бехтин

别雷，М.М.Белый

别里科夫，Беликов

别利亚科夫，А.Беляков

别利亚耶夫，Н.И.Беляев

别列尼卡娅，Д.Беленькая

别列尼娅，Е.И.Беленя

别列日诺伊，Бережной

别列维什克，Перевышко

别洛博罗多夫，Белобородов

别洛夫，Белов

别洛夫，Г.А.Белов

别洛乌索夫，Белоусов

别洛乌索夫，Г.Г.Беолусов

别斯科洛夫内，В.С.Бескровный

别斯帕罗夫，Беспалов

别夏斯特诺夫，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Нода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счастнов

别谢金，А.В.Беседин

别谢金，Беседин

宾努，БунУм

波昂显雅，БоАунг Зейя

波巴霍，Бобахо

波波夫，А.А.Попов

波波夫，А.М.Попов

波波夫，А.Я.Попов

波波夫，Г.Х.Попов

波波夫，М.В.Попов

波波夫，Попов

波波娃，Н.В.Попова

波波维，Ф.С.Поповин

波波维奇，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ич

波采罗布，Б.Ф.Подцероб

波德戈尔内，М.Г.Подгорный

波德戈尔内，Н.В.Подгорный

波德纳拉希，埃米尔，Emil Bodnaras，Боднэраж

波多利斯基，М.Подольский

波多维尼科夫，Подовинников

波尔布特，ПолПот

波戈列洛夫斯基，С.Погореловский

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夫，П.В.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娃，Э.Я.Богданова

波克罗夫斯基，И.М.Покровский

波克罗夫斯基，Р.Покровский

波赖科希茨，Б.А.Порай-Кошиц

波立特，Гарри Поллит，Harry Pollitt

波利卡尔波夫，М.С.Поликарпов

波利亚科夫，Поляков

波利扬斯基，Д.С.Полянский

波利扬斯基，Полянский

波列伏依，Б.Полевой

波卢博亚罗夫，Полубояров

波伦，Болен

波洛任科夫，А.Г.Положенков

波洛温金，Половинкин

波马兹涅夫，М.Помазнев

波诺马连科，Пономаренко

波诺马廖夫，Ю.Пономарев

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Б.Н. Пономарев

波奇瓦洛夫，Л.Почивалов

波儒昂，БоЖмуАунг

波塞，Бо Сэ

波斯科诺夫，А.А.Посконов

波斯克列贝舍夫，А.Н.Поскребышев

波斯佩洛夫，П.Н.Поспелов

波斯佩洛夫，Поспелов

波斯特尼科夫，М.М.Постников

波特，Поттер

波特鲁巴奇，Потрубач

波特鲁舍夫斯基，Потрушевский

波泽尔科，Подзерко

波兹杰耶夫，П.А.Поздеев

波兹尼亚克，И.И.Поздняк

伯恩斯坦，Бернштейн

伯劳乌特，Байроуд

勃克，Бок

勃拉文，Браун

勃兰特，Брандт

勃列日涅夫，А.А.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Л.И.Брежнев，L.I.Brezhnev

勃伦塔诺，Брентано

博布罗夫尼科夫，Н.И.Бобровников

博布罗娃，Г.М.Боброва

博德鲁日内，В.Подлужный

博尔德列夫，Б.Г.Болдырев

博尔沙科夫，Большаков

博戈罗茨基，Богородский

博戈罗季茨基，Н.П.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博戈莫洛夫，А.Богомоллов

博戈亚夫连斯基，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博古，Богу

博加蒂，Н.Е.Богатый

博加季科夫，В.Ф.Богатилов

博卡奇，Бокач

博利沙科夫，И.Г.Большаков

博鲁阿尔什诺夫，Г.П.Полуаршинов

博鲁诺夫，А.Борунов

博罗夫科夫，Боровков

博罗金，Бородин

博罗维科夫，Л.И.Боровиков

博尼，В.А.Бони

博钦，Боцин

博塔波夫，Потапов

博伊科，В.П.Бойко

博伊佐夫，Бойнов

卜瑞吉，Бриджес，Bridge

布伯科，Пупко

布尔加宁，Н.А.Булганин，N. A. Bulgagin

布尔津，Бурдин

布尔科，Бурке

布尔科夫，Бурков

布尔齐奇，拉特科，Ратко Брзич

布哈林，Бухарин

布赫洛夫，Пухлов

布加耶夫，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Евген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Бугаев

布杰费里卡，Бутефлика

布克，蒂姆，Тим Бак

布拉吉列夫，В.И.Благирев

布拉金，Б.И.Брагин

布拉金，Брагин

布拉诺夫，А.И.Буланов

布拉图斯，Братусь

布拉托夫，А.И.Блатов

布兰克，克列门特，Клемент Бланк

布雷切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Булычев

布里特，威廉，Вильям Буллит

布林克，季尔克，ДиркБринк

布柳赫尔(加伦)，Блюхер

布鲁克，Брук

布鲁克，弗兰茨，Franz Bruk

布鲁姆，索尔，Сол Блум

布鲁斯，Брюс

布鲁斯特，Брюстер

布伦戴奇，艾弗里，Эвери Брендедж

布罗德，И.О.Брод

布罗吉奥，曼里奥，Манлио Брозио

布罗克韦，Брокуэй

布罗维茨基，Буровицкий

布迈丁，Бумедьен

布尼亚，Пуннайя

布热津斯基，Бжезинский

布瑟金，Н.П.Бусыгин

布什，Буш

布斯洛夫斯基 , О.Е.Бусловский

布托玛 , Б.Е.Бутома

布瓦诺 , Бувано

布耶夫 , Буев

布兹科 , Будзко

采特林 , П.М.Цетлин

蔡畅 , ЦайЧан

蔡昉 , ЦайФан

蔡汉新 , ЦайХаньсин

蔡和森 , ЦайХосин

蔡斯 , 霍梅尔 , Хомер Чейз

蔡特金 , 克拉拉 , Клара Цеткин

蔡廷锴 , ЦайТин-кай , Цэй Тинкай

蔡学舟 , Цзэн Сюэ Чжоу

蔡雨田 , ЦайЮй-тянь

蔡壮壮 , Цэй Джуан Джуан

曹克强 , Цао Кэ-цян , Цао Кэцян

曹敏 , ЦаоМин

曹夏湖 , ЦаоСяхо

曹玉仁 , СаоЮй-жэнь

曹元 , Цао Цюань

策伯格米德 , Д.Цэвэгмид , Tsevegmid

岑石武 , Чень Шы-у

曾汉周 , Сюй Пань Цю

曾琦 , Цзэн Ци

曾秀夫 , Цзэн Сю-фу

曾学坤 , Цзэ Сюэгун

曾涌泉 , Цзэн Юнцюань , Цзэн Юнь-цюан

曾泽生 , Цзэн Цзэншен

曾昭抡 , Цзин Чжолун

查普曼 , Чепман

查万 , Чаван

查佐夫 , Чазов

察拉普金 , С.К.Царапкин

察连科 , Царенко

柴可夫斯基 , Чайковский

柴树藩 , ЦайШу-фань

昌格 , 乔治 , Джордж Чанг

常振海 , Чань Чжэн-хай

常芝青 , Чан Чжи-цин

陈帮臣 , ЧенБан-чен

陈宝剑 , ЧанБыу Киём

陈保罗(陈印) , Чен Павел

陈波儿 , Чэнь По-эр

陈伯村 , Чэнь Бо-цунь

陈伯达 , Чень Бода , Чэнь Бо-да

陈伯清 , Chen Boqin

陈伯涛 , Чень Ботао

陈曾固 , Чень Цзэнгу , Чень Цзян-гу

陈昌浩 , Чэнь Чан-хао

陈诚 , Чэнь Чэн

陈楚 , Чэнь Чу

陈传熙 , Чен Цуанси

陈达 , Чэнь Да

陈道生 , Чэнь Дао-шэн

陈定亮 , Чэнь Динлянь

陈赓 , Чэн Гэн

陈光如 , Чен Гуанжу

陈广才 , Чэнь Гуань-цай

陈国富 , Чэнь-Го-фу

陈国伟 , Чэнь Говей

陈果夫 , Чэн Гофу

陈皓 , Чен Хао

陈辉 , Чен Хуэй

陈济棠 , Чэнь Цзи-тан

陈家康 , Чэнь Цзя-кан , Чэн Цзякан

陈嘉庚 , Чэн Цзя-чэн

陈剑飞 , Чэнь Цзянфэй

陈江都 , Чэнь Цзянь-ту

陈江新 , Чен Цзян-син

陈进 , Чэн Дин

陈军 , Чэнь Цзюнь

陈利水 , Чен Ли-шуй

陈林 , Чэнь Линь

陈漫远 , Чэнь Нань-юань

陈枚山 , Чэн Мэньшэн

陈梅利 , Чен Мэри

陈明仁 , Чэнь Миньцзюнь

陈铭枢 , Чэнь Миншу

陈慕华 , Чэнь Мухуа

陈纳德 , Ченнолт

陈鹏 , Чэнь Пэн

陈丕显 , Чэнь Пиюань

陈庆益 , Чен Чини

陈秋安 , Чэн Цзю-ань , Чэн Цюань

陈全 , Чен Цюань

陈绍禹(王明) , Чэнь Шао-юе

陈维兴 , Чан Зум Хынг

陈文成 , Чан Ван Тань

陈文香 , Хыонг

陈希卫 , Чэнь Си-вэнь , Чэнь Си-вэнь

陈锡华 , Чэн Си-хуа

陈锡联 , Чэнь Си-лянь

陈秀莲 , Чэнь Сюлян

陈序经 , Чэнь Сюэ-чжунь

陈燕清 , Чэн Янь-цин

陈要财 , Чэнь Яо-цай

陈毅 , ЧэньИ

陈印 , Чен Ин

陈云 , Чэнь Юнь

陈云绍 , Цэйн Юй-шао

陈臧沪 , Чен Цанхоу

陈肇源 , Чэнь Чжаоюань

陈子平 , Чан Ты Бин

陈祖 , Чэнь Цу

陈祖涛·雅沙，ЧенЦу-Тао Яша

成吉思汗，Genghis-khan，Чингис-хан

程兵，Чэн Бин

程今吾，Чэнь Цзин-у

程鲁生，Чень Лу-шэнь

程明升，Чэн Мин-шэнь

程庆，Чэн Чин

程眺福，Чен Тяофу

程文津，Чен Вэнь-цзинь

程裕淇，Чен Юйчи

程州，Чен Чжоу

程子华，Чен Чжанэнь

迟浩田，Чи Хаотян

迟克昌，Чи Кэ-чан

楚查耶夫，Цуцаев

楚家杰，Чу Цзя-те

楚库洛夫，М.М.Цукуров

楚马钦科，Чумаченко

楚图南，Чу Ту-нань

川岛清，Кавасима，Kawashima Kiyoshi

春水，Суан Тхюи

丛秀吉，Цзон Сюй-ди

崔昌益，Цой Чан Ик

崔可夫，С.А.Чуйков

崔义田，ЦуйИ-тянь

崔庸健，Цой Ён-ген，Цой Ен Ген

崔元植，Цой ВонСик，Цой Юн Сик

崔月犁，Цуй Юэли

崔哲焕，Цой Чер Хван

措戈耶夫，维克托·巴特尔别科维奇，Виктор Батырбекович
Цогоев

达夫利亚托夫，Р.Давлятов

达格利奥，Даглио

达卡列夫，Токарев

达科维奇，Дакович

达赖喇嘛，ДалайЛама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Сокурбаев Далельхан

达姆巴，Дамба

达姆丁，Дамдин

达尼，奥马尔，Омар Дани

达什扬，С.Дашьян

达斯卡罗夫，斯托扬茨，СтоянЦ.Даскалов

达特，Датт

达特，巴里姆，Пальм Датт

达特，克列门特，Клемент Датт

达旺，Даван

达维多夫，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Давыдов Трофим Нефедович

达维伊，阿卜杜拉·哈迪，Абдул Хади Давей

达乌德，М.Дауд

代日，Деж

戴秉国，Дай Бинго

戴高乐，Де-Голль

戴维斯，Davis

丹古洛夫，С.А.Дангулов

丹吉，С.А.Данге，Shripad Amrit Dange

丹妙，Тан Мьяйнг

丹尼斯，Деннис

丹增嘉措，Даньцзин Джямцо

单德浩，Данг Дык Кхой

德波林，Деборин

德尔干，Дэлгэр

德奎利亚尔，Куэльяр

德拉贡，Драгун

德拉雅舍夫，Драяшев

德拉伊，Делайе

德雷布，Джебб

德列穆奇，Дремучий

德罗诺夫，Н.Д.Дронов

德米特里切夫，Т.Ф.Дмитричев

德米特里耶夫，С.С.Дмитриев

德尼先科，Е.Д.Денисенко

德钦丹东，ТакинТан Тун

德钦努，Такин Ну

德钦梭，Такин Со

德赛，М.Дж.Десаи

德赛，莫拉尔吉，Морарджи Десаи

德田秋一，Токуда，Tokuda Kyuichi，Tokuda Shuichi

德王，Дэ-Вань

德沃尔扎克，Дворжак

登金，Е.Б.Дынкин

邓初民，ДэЧумин

邓力群，ДенЛи-чунь

邓拓，ДэнТо

邓小平，ДэнСяопин

邓颖超 , ДэнИн-Чао

邓中夏 , ДэнЧжун-ся

邓子恢 , ДэнЦзы-хуэй , Дэн Цзыхуэй

狄超白 , ДиЧао-ба

狄潘 , Тер Phan

迪克逊 , Диксон

蒂尔迪·佐尔坦 , ТильдиЗолтан

蒂基汗 , Тикк-хан

蒂亚布日 , Тя бжи

蒂亚姆 , 杜杜 , Дуду Тиам

丁华 , Дин Хуа

丁凯文 , Дин Кай-вэнь

丁玲 , Дин Лин

丁西林 , Дин Син-Линь

东琴科 , Г.А.Донченко

董柏年 , Дун Бай-нянь

董必武 , Дун Биу , Дун Би-у

董朝 , Дун Джао

董辅弼 , Дун Фу-линь

董洪德 , Дун Хун-Дэ

董吉 , Дондик

董守义，Тун-Шу-и

董斯蒂尔(董吉)，Stell Don

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

董显光，Холингтон Тонг

杜阿勒，Дуале

杜比宁，В.Дубинин

杜比诺，Дубино

杜宾斯基，Ду бинский

杜斌丞，Ду Пин-чэн

杜伯曼，Табмэн，Табмен

杜勃诺夫，Дубнов

杜布拉温，Л.Дубровин

杜布罗夫斯基，А.Д.Дубровский

杜布罗维茨卡娅，Г.И.Дубровицкая

杜布洛维奇，В.Н.Дубрович

杜布切克，Дубчек

杜多罗夫，Дудоров

杜尔，塞古，Секу Туре

杜尔杰涅夫斯基，В.Дурденевский

杜格尔苏伦，Дугэрсурэн

杜金龙，ТуЦзеньлунь

杜拉索夫，Дурасов

杜勒斯，Фостер Даллес，John Foster Dulles

杜林，Дюринг

杜鲁方诺夫，Труфанов

杜鲁门，Трумэн

杜蒙仁，ДуМун-жань

杜米特鲁，奥尔加努，Олтяну Думитру

杜润生，ДуЖэн-шэн

杜特拉，玛莉亚·塔·格拉萨，Марияда Граса Дутра

杜特尼琴科，Дудниченко

杜威，Дьюи

杜维廉，Трепельян

杜心源，ДуСинь-юань

杜伊谢诺夫，Е.Дуйсенов

杜聿明，ДуЮймин

杜长志，ДуЧжан-чжи

多勃雷宁，А.Ф.Добрынин

多布罗夫，А.С.Добров

多布罗拉德尼克，И.Доброрадник

多德胡多耶夫，Н.Додхудоев

多尔蒂科斯，О.Дортикос

多尔戈夫，Долгов

多尔基赫，В.И.Долгих

多尔加切夫，В.П.Долгачев

多尔马托夫，里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Долмат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еонид

多加德金，В.А.Догадкин

多克希采尔，Т.Докшицер

多库金，В.И.Докукин

多列士，Морис Торез，Maurice Thorez

多隆丘克，Дорончук

多罗申科，Дорошенко

多洛斯波拉穆，Дороспалам

多莫加茨基赫，М.Домогацких

多姆尼茨基，Домницкий

多尼，Дауни

朵噶彭措饶杰，Токэнэнцо Жаоцзи

厄尔德曼

恩格尔哈德，В.А.Энгельгард

恩格斯，ФридрихЭнгельс

恩克鲁玛，К.Нкрума

恩维尔，阿布萨伊德，Абусаид Энбер

法尔卡什，Фаркаш

法基，赛义德-哈桑，Саид Хасан Факи

法季扬诺夫，З.А.Фатьянов

法捷耶夫，Фадеев

法捷耶夫，Ю.Д.Фадеев

法卡诺夫，Фоканов

法林，Фалин

法名科，Фоменко

法特万，Фатван

法伊萨尔，Файсал

饭盛重任，Иимори Сигато，Iimori Shigeto

范登堡，Ванденберг

范范尼，阿斯托明，Аминторе Фанфани

范弗里特，Ван Флит

范庆明，Фан Цинмин

范如深，Фань Жушэн，

范文同，Pham Van Dong，Фам Ван Донг

范雄，Фам Хунг

范长江，Фан Чанцзян

范之，Фан Чжи

方虎山，Пан Хо Сан

方学世，Пан Хек Се

方祖安，ФанЦзу-ань

房德中，ФанДэ Чун

菲阿尔科夫斯基，А.И.Фиалковский

菲茨杰拉德，Ч.Дж.Фитцджеральд

菲尔宾格，Г.Фильбингер

菲拉托夫，Филатов

菲拉托维奇，Филатович

菲利尔斯，Фриирс

菲诺格诺夫，Финогенов

菲沃特，З.Г.Фейвот

费奥多罗夫，В.П.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Федоров

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N. T. Fedorenko

费登科，Феденко

费多尔楚克，Федорчук

费多托夫，Н.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娃，М.С.Федотова

费多谢耶夫，В.Федосеев

费多谢耶夫，П.Н.Федосеев

费多谢耶夫，Федосеев

费尔德曼，Фельдман

费克图，Фекту

费雷拉，德罗斯，Медейруш Феррейра

费列夫，А.И.Филев

费留宾，Н.П.Фирюбин，N. P. Firyubin

费萨尔，Фейсал

费舍尔，奥斯卡，Oskar Fischer

费舍尔，里哈德，Рихард Фишер

费希尔，Фишер

费先科，Фесенко

费孝通，ФейСяй-тун

风见章，Коцзуми Акира，Kazami Akira

冯·勃伦塔诺，Фон Брентано

冯白驹，Фэн Бай-цзюй

冯伯仲，Фун Боджуин

冯乃超，Фэн Найчао

冯维希，Вонгвичит

冯文彬，Фын Вэн-бин，Фенг Венпинг，Фын Вэнбинь

冯义，Фуни

冯友兰，Фын Юлан

冯玉祥，Фын Юйсян

冯仲云，Фэн Чжун-юнь

弗多维琴科，Вдовиченко

弗拉迪金，Н.А.Владыкин

弗拉霍维奇，Влахович

弗拉基米尔，大宝，Та Бао Владимир

弗拉基米尔，继飞，Ти Феи Владимир

弗拉基米罗夫(孙平)，П.П.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В.И.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金，И.Е.Фрагин

弗拉尚，БенуаФрашон

弗拉索夫，Власов

弗拉索夫，К.А.Власов

弗赖德林，С.Я.Фрейдлин

弗兰采夫，Францев

弗兰古利斯，Форангулис

弗里德曼，Л.Фридман

弗林，伊丽莎白，Элизабетт Флинн

弗洛连季耶夫，Флорентьев

伏德杨宁，Фодянин

伏罗希洛夫 , К.Е.Ворошилов

符明 , С.Я.Фомин

福尔采娃 , Е.А.Фурцева

福缅甸科 , Фоменко

福缅甸科 , Я.И.Фоменко

福田赳夫 , Фукуда

傅秉常 , Фу Бинчан , Фу Бин-шан

傅金 , Фукин

傅泾波 , Фу Цзинбо

傅斯年 , Фу Сынянь

傅鹰 , Фу Ин

傅作义 , Фу Цзо-и

富布赖特 , Фулбрат

富尔顿 , Фултон

富尔索夫 , В.С.Фурсов

富马 , 梭发那 , Суванна Фума

盖达尔 , А.Гайдар

盖杰什 , 彼得 , Петро Гедеши

盖卡 , 里拉 , Лира Гега

甘地 , 英迪拉 , Индира Ганди

甘东 , Гендун

甘介侯, Гань Цзэхоу

甘申, Г.А.Ганшин

甘泗淇, Гань Сы-ци

甘野陶, Гань Е-тао

甘珠尔扎布, Ганьчжурчжаб

冈崎, Окадзаки

冈萨雷斯, Гонсадес

冈野(野坂参三), Окано

高仓辉, Такакур Тэра

高崇民, Гао Циньмин

高尔基, А.М.Горький

高放, Гао Фан

高峰起, Ко БонГи

高福(袁牧之), Гао Фу

高岗, Гао Ган

高戈, Гао Го

高集, Гао Цзи

高锦深, Гао Цзиншень

高京山, Гао Цзинь-шэнь

高开治, ГаоКэчжи

高利柯夫, Голиков

高洛霍夫，Горохов

高曼，Гао Ман

高帕兰，Гопалан

高旗云，Гао Циюнь

高桥龙太郎，Такахаси，Takahashi Ryutaro

高士，阿约艾，Аджой Гхош，Ajoy Kumar Ghosh

高树勋，Гао Шусюнь

高惜冰，Гао Си-бин

高英山，Гао Ин-шань

高卓雄，ГаоЧжо-сюн

戈宝权，ГэБаоцюань，Ге Баоцюань

戈德华特，伯利，Бэрри Голдуотер

戈登，威廉，ВильямГордон

戈杜诺夫，Д.А.Годунов

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ев

戈尔巴托夫，Горбатов

戈尔布诺夫，А.А.Горбунов

戈尔布诺夫，В.Горбунов

戈尔茨，Герц

戈尔拉乔夫，Горлачев

戈尔舍宁，К.Горшенин

戈尔什科夫, В.И.Горшков

戈尔什科夫, С.Г.Горшков

戈尔特, Г.Гортер

戈戈列夫, Гоголев

戈格里泽, Гоглидзе

戈兰斯基, 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 Дав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оланский

戈里茨基, В.А.Горицкий

戈利科夫, Голиков

戈利科夫, Ф.И.Голиков

戈连科夫, Голенков

戈列夫, Я.И.Голев

戈列金, В.С.Голегин

戈林, А.Горин

戈留申, В.Н.Горюшин

戈卢比亚特尼科夫, Голубятников

戈卢别夫, Голубев

戈卢别夫, Н.И.Голубев

戈卢布科夫, А.В.Голубков

戈卢诺夫, Голунов

戈伦斯基, С.Голунский

戈罗什金, И.В.Горошкин

戈罗沃伊，В.Горовой

戈洛瓦乔夫，Головачев

戈洛温，Е.И.ГОЛОВИН

戈梅拉，Б.Гмырь

戈什，Гесь

戈斯捷夫，Гостевой

戈沃罗夫，Говоров

哥穆尔卡，Гомулка，Wladyslaw Gomułka

哥特瓦尔德，Готвальд，Klement Gottwald

歌德，Гёте

格奥尔基耶夫，А.В.Георгиев

格奥尔加泽，Георгадзе

格尔什戈林娜，Э.Б.Гершгорина

格尔泽洛夫，Л.И.Грдзелов

格季克，Гедике

格拉德科夫，И.А.Гладков

格拉德舍夫，П.Гладышев

格拉乔夫，А.П.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В.А.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Грачев

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夫，С.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娃，玛娅，Герасимова Мая

格拉先科，Б.С.Геращенко

格拉先科，В.С.Геращенко

格拉扎切夫，Глазачев

格拉祖诺夫，Глазунов

格莱赫姆，Грэхэм

格雷，Грей

格里巴，雅克，Жак Гриппа

格里巴耶夫，Грибачев

格里芬，Дж.Гриффин

格里夫科夫，Гривков

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格里戈良，В.Григорьян

格里戈良，С.С.Григорян

格里戈罗维奇，Григорович

格里舍尔，В.А.Гришель

格里申，В.В.Гришин

格里申，М.Т.Гришин

格里斯金科，Н.И.Глистенко

格列波夫，Глебов

格列奇科，А.А.Гречко

格列斯津，卡尔维尔，Калвер Глейстин

格林察尔，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инчар

格林卡，Глинка

格林丘科夫，В.Б.Гринчуков

格林施泰因，А.М.Гринштейн

格隆基，Гронки

格鲁比亚科夫，Грубяков

格鲁济诺夫，М.Д.Грузинов

格鲁尼切夫，Н.А.Груничев

格鲁热，Гружий

格鲁舍茨基，Г.Х.Грущевский

格鲁特，保尔，П.де Гроот

格罗，Гере

格罗提渥，奥托，Отто Гротеволь

格洛莫夫，А.А.Громов

格姆博扎夫，Гомбожав

葛步海，ГэБу-хай

葛量洪，Грэнтэм

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А. Gromyko

耿树宾，ГенШу-бин

宫本显治，Кэндзи Миямото

宫崎章，Мия дзаки

龚丹，Гун Тан

龚普生，Гун Пушен

贡多宾，Н.А.Гундобин

贡多罗夫，А.С.Гундоров

贡勒，КонГЛе

贡恰尔，А.Т.Гончар

贡恰罗夫(康佳若)，С.Гончаров

贡恰罗夫，Гончаров

古埃尔，Гуэрли

古别尔，А.А.Губер

古博列夫，Губорев

古大存，ГуДа-цунь

古尔维奇，Гурвич

古海忠之，Фуруми Тадаюки

古雷，Гулый

古利亚耶夫，Гуляев

古利亚耶夫，П.В.Гуляев

古列维奇，Е.С.Гуревич

古林，Гурин

古尼杰维亚，Гундевия

古尼亚尔，Куньял

古普塔，布佩希，Бхупеш Гупта

古西科夫，С.В.Гуськов

古谢夫，В.А.Гусев

古谢夫，В.Д.Гусев

古谢夫，М.И.Гусев

古谢夫，М.М.Гусев

古谢娃，Н.В.Гусева

古依斯基(张锡涛)，伊万·尼古拉耶维奇，Гуйский

ИванНиколаевич

谷超豪，ГуЧао Хао

谷次亨，ГуМы-хэн

谷牧，Гу Му

谷正纲，Гу Чжэнган

顾，威利克汤(顾维钧)，Велликтон Ку

顾孟余，Гу Мыньюй

顾寅，ГуИн

关豪陶，Гуань Хаотао

关吉玉，Гуань Цзия

关良超 , Гуань Лян-чжао

关麟征 , Гуан Лин-чжен

关齐 , Куанг Ти

关向应 , Гуань Сян-ин

桂永清 , Гуй Юнцин

郭春涛 , Го Шэньтао

郭方 , Го Фан

郭峰 , Го Фын

郭高启 , Го Гоу-чи

郭化邦 , Го Хуа-бан

郭洁 , Го Цзинь

郭克朗貌 , Ко Кланг Маунг

郭亮 , Го лян

郭纶 , Го Лунь

郭敏(袴田里见) , Го Мин

郭沫若 , Го Можо

郭鹏 , Го Пэн

郭文魁 , Го Вэнькуй

郭文林 , Го Вэнь-лянь

郭云思 , Го Июньс

郭泽章 , Го Цзэ-чжан

郭志成，Го Чжи-чен

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

哈丁，Хардинг

哈尔拉莫夫，М.Харламов

哈尔特，Харт

哈基姆巴耶夫，阿利姆占，Алимджан Хакимбаев

哈基姆贝科夫，卡尤姆贝克，Каюмбек Хакимбеков

哈季耶夫，Хаджиев

哈拉哈普，伯汉努丁，Харахап

哈拉斯，Халас，Halas

哈里曼，А.Гарриман

哈里斯，Харрис

哈里逊，Гарисон

哈鲁金，Халутин

哈马尔舍尔德，Хаммаршельд

哈米杜林，Р.Хамидулин

哈奇森，Хатчисон

哈恰图良，А.Хачатурян

哈萨诺夫，阿布德拉赫曼，Абдрахман Хасанов

哈桑，莫赫，МохХассан

哈桑巴耶夫，雅库别克，Якуббек Хасанбаев

哈什，Харш

哈斯布拉托夫，Р.И.Хасбулатов

哈塔，Хатта

哈特基，Хартке

哈耶克，Гаек

海尔利耶夫，Х.Г.Хайрлиев

海特，Хейтер

韩安天，Хан АнЧен

韩光，Хан Гуан，Хань Гуань

韩金庆，Хань Цзинь-Чин

韩俊杰，Хань Цюн-цзе

韩乾祖，Хан Чэн-цзу

韩清石，Хан Чинши

韩琼，Хан Чен

韩桑林，Хенг Самрин

韩铁声，Хан Тье-шен

韩先楚，Хань Сянь-чу

韩相斗，Хан Сан Ду

韩友廷，Хан Ютин

汉巴巴耶夫，安瓦尔，Анвар Ханбабаев

汉弗莱，Хэмфри

汉森 , Хансен

郝贵陆 , Хэ Дуй-лу

郝治平 , Хао Чжи-пин

何安权 , Ха Ан Чен

何宝贤 , Не Бао-Xian

何毕然 , Хэ Би-жань

何兰阶 , Хэ ЛаньЦзе

何谦 , Хо Цянь

何思彤 , Хэ Сытун

何思源 , Хэ Сы-юань

何伟 , Хэ Вэй

何文楼 , Ха Ванлау , Хо Ван Ло

何香凝 , Хэ Сянь-нин

何一俊 , Хэ И-цзюнь

何应钦 , Хэ Инцин

何云川(听涛克巳) , Хэ Юм-чуань

何长工 , Хэ Чжан-Гуан , Хо Чан-гун

何哲 , Хэ Цзай

和谷岩 , Хэ Гуянь

贺 , 丹尼尔 , ДаниилХэ

贺麟 , Хо Ли

贺龙，Хэ Лун

贺绿汀，Хелу-дин，Хэ Лудин，Хэ Лутин

贺希明，Хэ Си-мин

贺耀祖，Хэ Яо-цзу

赫茨费尔特，Hertzfold

赫尔利，Харли，Хэрли

赫尔姆斯，Хелмс

赫盖尔奇，Хегерти

赫格居斯，Хегедюш

赫拉莫夫，Хламов

赫里亚普金娜，Хряпкина

赫利亚彼奇，И.Хлябич

赫连尼科夫，Т.Н.Хренников

赫列布尼科夫，В.Б.Хлебников

赫列布尼科夫，Хлебников

赫鲁廖夫，А.В.Хрулев

赫鲁尼切夫，Хруничев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
N. S. Khrushchev

赫梅尔科，М.И.Хмелько

赫努佩克，Хнеупек

赫奇逊，Хетчисон

赫脱 , Гертер

黑格 , Хейг

黑格尔 , Гегель

黑根 , Ю.Хеген

洪淳宽 , Хон СунГван

洪森 , ХунСен

侯赛因 , Хусейн

侯外庐 , Хоу Вайлу

侯镇冰 , Хоу ЧженВин

侯志通 , Хоу Чжи-тун , Hou Zhidung

胡德乔 , Ху Те-Чао

胡多宾 , Л.В.Ху добин

胡风 , Ху Фын

胡绩伟 , Ху Цзи-вэй

胡家骥 , Ху Ча Ган

胡阶森 , Хатчесон

胡厥文 , Ху Цзюэ-вэнь

胡克实 , Ху Кэ-ши

胡霖 , Ху Лин

胡明 , Ху Мин

胡齐耶夫 , М.М.Хуциев

胡乔木，ХуЦяо-му

胡萨克，Г.Гусак

胡绳，ХуШ эн

胡世泽，Ху ШиЦзэ

胡适，Ху Ши

胡万光，Ху Вэньгань

胡维泰，Хо ВьетТан

胡耀邦，Ху Яо-бон，Ху Яо-бан

胡一鸣，Ху И-минь

胡愈之，Ху Юй-чжи

胡志明，Хо Ши Мин，Но Chi Minh

胡宗南，Ху Цзуннан

华德，Уорд

华国锋，Хуа Го-фэн

华君武，Хуа Цзюнь-у

华莱士，Уоллес，Henry Wallace

华罗庚，Хуа Ло Ген

华西列夫斯基，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

化石，Хуа Ши

宦乡，Хуан Сян

黄斌，Хуанпин

黄达 , Хуан Да

黄丹斌 , Хуан Даньпин

黄栋 , Хоанг Тунг

黄富俊 , Хуан Фу-цзонь

黄华 , Хуан Хуа

黄汲清 , Хуан Цзицин

黄金鲁 , Хуан Цзи-лу

黄敬 , Хуан Цзин

黄克诚 , Хуан Кэчэн , Хуан Ке-чэн

黄洛峰 , Хуан Ло-фын , ЖуанЛе-фин

黄霁 , Хуан Нэй

黄欧东 , Хуан Оу-дун

黄庆发 , Хуан Цзиньфа

黄琼 , Хоанг Кунь

黄瑞 , Хуан Жэй

黄时明 , Хуан Ши-мин

黄舜 , Хуан Шунь

黄文欢 , Хоан Вэнь-Хоан

黄文进 , Хоанг ВанТиен

黄新民 , Хуан Син-Мин

黄炎培 , Хуан Яньпэй , Хуан Янпэй

黄一中，Хуан И-чжун

黄贻钧，Хуан Ицюнь

黄赞直，Хуан Цзэнчжи

黄镇，Хуан Чжэнь

霍布森，Гопсон

霍查，恩维尔，Энвер Ходжа

霍多斯，П.М.Ходос

霍尔，盖斯，Гэс Холл

霍尔蒂，Хорти

霍夫曼，Гофман

霍赫洛夫，А.Е.Хохлов

霍洛德科夫，Холодков

霍奇斯，Ходес

霍乌斯，Г.Хоудс

基巴利契科(韩铁声)，И.Н.Кибальчик

基巴利契科，莫尼亚，Кибальчик Моня

基哈德森，Герхардсен

基金，Кидин

基里连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А.П.Кириленко

基里林，В.А.Кириллин

基里洛克，С.Кирылюк，Кирелюк，Stanislawa Kiryluk

基里琴科，А.И.Кириченко

基里琴科，Кириченко

基里索夫，Кирисов

基连加乌捷，Киленгаузен

基列耶夫，И.И.Киреев

基帕里索夫，С.С.Кипарисов

基斯利亚科夫，И.П.Кисляков

基斯连科，Кисленко

基斯连科，阿列克塞·帕夫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сленко

基斯洛夫，Кислов

基塔耶夫，Китаев

基塔耶娃，Е.И.Китаева

基谢廖夫，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С.В.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Т.Я.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娃，О.С.Киселева

基谢洛夫，Е.Д.Киселов

吉奥迪，Гиольди

吉布桑，Гибсон

吉滴卡宗，乃他侏，Киттикачон

吉洪诺夫，Н.С.Тихонов

吉金斯，让，ЖанКиндинис

吉列耶夫，Киреев

吉伦，Гиллем，Alvan C. Gillem

吉田，Иосида

吉学霁，ЦзэСюэпэй

吉雅泰，ЦзиЯ-тай

吉耶尔马，Jacques Guillerma

纪登奎，ЦзиДэн-куй

季奥尔季察，А.Ф.Диордица

季霍米罗夫，С.М.Тихомиров

季卡姆巴耶夫，К.Д.Дикамбаев

季利琴科，А.Г.Тиличенко

季米里亚泽夫，Тимирязев

季米娜，З.В.Зими́на

季米特洛夫，С.Димитров

季明，П.Зимин

季莫费耶夫，Н.И.Тимофеев

季莫费耶夫，Тимофеев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季什科夫，А.А.Тишков

季斯利亚尔，Тисляр

季托夫, А.Титов

季托夫, Г.С.Титов

季亚科诺夫, Дьяконов

季亚科诺夫, Дьяконов

季亚琴科, В.П.Дьяченко

季庄, Цзичжуан

济金, Зинкин

济金娜, Л.С.Зыкина

济科夫, Зыков

济科夫斯莫洛夫, Н.М.Зыков-Смолов

济里亚诺夫, Зырянов

济明, В.А.Зимин

冀朝鼎, ЦзиЧаодин

冀福海, ТиФухай

加尔布佐夫, В.Ф.Гарбузов, V. F. Garbuzov

加尔金, Галкин

加尔金, Е.А.Галкин

加尔马舍夫, А.Ф.Гармашев

加夫里连科, Гавриленко

加夫里洛夫, Гаврилов

加夫里洛夫, 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 Гаврилов

СергейКапитонович

加夫里洛娃，Н.Гаврилова

加夫留克，П.П.Гаврюк

加富罗夫，Гафуров

加加林，Ю.А.Гагарин

加里宁，Калинин

加里宁，М.Калинин

加里宁，Н.Калинин

加利诺维奇，Ю.М.Галенович

加利佩林，С.А.Гальперин

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

加米涅夫，佐罗·克雷斯捷夫，ЦолоКрыстев Каменев

加莫乌斯，Гамоус

加涅夫，Х. Т.Ганев

佳普金娜，Тяпкина

贾，Джа

贾尔卡赛汗，Джаргал-Сайхан

贾库林，安瓦尔，АнварДжакулин

贾纳别科夫，拜穆尔扎，ДжананбековБаймурза

贾丕才，М.С.Капица，М. Kapitsa

贾丕才，П.Л.Капица

贾拓夫, ЦзяТофу

贾瓦西什维利, Г.Д.Джавахишвили

贾正操, Цзя Чжен-цао

坚德里亚科夫, В.Ф.Тендряков

江丰, Цзянь Фын

江培武, Цзян Пэй-у

江青, Цзян Цин

江世奎, Дян Шикуй

江洋清, Цзен Янцин

江泽民, Цзян Цзэминь

江哲星, Цзян ЧжеСин

姜椿芳, Цзян Чун-фен

姜贵银, Тянь Гуй-ин

姜健, Кан Ген

姜丽珍, Цзян Ли-чжэнь

姜茹, Дян ЖуЙ

姜信泰, Цзян Син-тая

蒋斌, Тянь Пин

蒋光鼐, Цзян Гуан-най

蒋介石, Чан Кайши

蒋经国, Цзян Цзинго

蒋南翔，Цзя Наньсян

蒋廷黻，ЦзянТин-фу，Цзян Тинфу

蒋英玲，Цянь Инлин

焦朝河，Цзяо Чжаохэ

焦尔诺夫，米哈伊尔·维肯季耶维奇，Зерно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Михаил

焦继辉，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

杰奥米多夫，М.И.Деомидов

杰杜什津，П.С.Дедушкин

杰多夫，Дедов

杰费里杰，М.Н.Де Фриде

杰格佳廖夫，В.А.Дегтярев

杰吉耶尔，弗拉基米尔，Дедиер

杰克逊，Джексон

杰利钦耶夫，В.Г.Делициев

杰列维扬科，Деревянко

杰柳辛，Л.П.Делюсин

杰米切夫，彼得·尼洛维奇，П.Н.Демичев

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

杰缅季耶夫，П.Дементьев

杰明，Демин

杰尼索夫，А.И.Денисов

杰尼索夫，Б.С.Денисов

杰尼索夫，Денисов

杰塞普，Джессеп

杰夏特尼科夫，Д.Т.Десятников

杰伊，爱德华，Эдвард Джей

杰伊波扎·阿利耶夫，Тейпджан Алиев

捷捷林，С.Тетерин

捷列宾(А.Я.奥尔洛夫)，Теребин

捷列尼诺夫，А.М.Зеренинов

捷列什金，Терешкин

捷普利亚科夫，В.Ф.Тепляков

捷普洛夫，Теплов

捷萨伊，Десаи

捷沃相(捷沃西安)，И.Ф.Тевосян

解方，СеФан

介光明，Цзе Гуан Мина

金炳稷，Ким Бен Дик

金策，Цзинь Чэ，Ким Чак

金昌凤，Ким Чан Бон

金昌海，Ким Чан Хэп

金昌满，Ким Чан Ман

金承化 , Ким Сын Хва

金城 , Цзинь Чэн

金达三 , Ким ДарСен

金料奉 , Ким ДуБон

金刚 , Ким Ган

金光侠 , Ким Гван Хеб

金炁炼 , Ким Че Рен

金洁群 , Цзинь Тецюнь

金京根 , КимТды Ген

金名世 , Цзин Мин-ши

金庆方 , Цзинь Цин-фань

金仁 , Цзинь Жэнь

金日成 , Цзинь Чжи-чень , ЦзиньЖи-чэн , КимИр Сен

金泰根 , Ким Тхэ Ген

金万山 , Ким Ман Сан

金雄 , Кин Сон

金一 , Ким Ир

金益诚 , Ким Ик Сен

金英柱 , Ким Ен Дю

金永南 , Ким Ен Нам

津琴科 , Зинченко

鳩山一郎，Хатояма

久科夫，А.М.Зюков

久兹，Зюзь

居普特纳，理查德，Richard Gyptner

峻青，Цзюнь Цин

卡巴列夫斯基，Д.Б.Кабалевский

卡巴诺夫，И.Г.Кабанов

卡比尔，Кабир

卡比耶娃，Б.Х.Кабиева

卡宾，Кабин

卡波拉诺夫，Капранов

卡博，修斯尼，Хюсни Капо

卡博特，Кабот

卡达尔，Кадар，Kadar Janos

卡德尔，Э.Кардель，Edvard Kardelj

卡杜莫夫，Д.Годумов

卡多根，Кадоган

卡多奇尼科夫，I. P. Kadochnikov

卡尔宾科，Ф.А.Карпенко

卡尔波夫，Г.Г.Карпов

卡尔波夫，Карпов

卡尔金，Каргин

卡尔迈勒，巴布拉克，Б.Кармаль

卡尔梅科夫，В.Д.Калмыков

卡尔斯基(师哲)，Карский

卡尔斯基·伊戈尔，Карский Игорь

卡尔斯卡娅·泰霞，Карская Тэйсса

卡尔扎乌巴耶夫，Г.Каржаубаев

卡夫塔诺夫，С.В.Кафтанов

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

卡冈诺维奇，Л.М.Каганович

卡库津，Кагугин

卡拉布霍夫，И.Г.Калабухов，I. Kalabukhov

卡拉达什，Карандаш

卡拉卡尼，Калакани

卡拉什尼科夫，А.Ф.Калашников

卡拉塔耶夫，Кортаев

卡里琴科，Н.Т.Кальченко

加利希扬，Г.М.Калишьян

卡柳日纳亚，Н.М.Калюжная

卡伦别尔津，Я.Э.Калнберзин

卡罗连科，Короленко

卡罗米耶茨 , А.В.Коломиец

卡马拉季 , К.Камарадж

卡米舍夫 , В.Камишев

卡明 , Камминг

卡纳平 , А.К.Канапин

卡诺尼辛 , Канонихин

卡皮托诺夫 , Капитонов

卡普拉洛夫 , А.Г.Капралов

卡普拉洛夫 , Б.В.Капралов

卡普韦普韦 , Капвепве

卡恰 , 哈罗德 , Harold Caccia

卡萨特金 , П.В.Касаткин

卡塞姆 , Касем

卡沙洛夫 , Б.Кашалов

卡什金 , Кашкин

卡斯顿 , Гастон

卡斯托尔斯卡雅 , Ю.Ф.Касторская

カタラワラ , Каталавала , Коталавала

卡塔耶夫 , В.П.Катаев

卡特 , Дж.Картер

卡图谢夫 , К.Ф.Катушев

卡托尔，Катор

卡瓦列罗夫，Каволеров

卡维拉兰，Кавиларанг

卡西莫，Касимо

卡西莫夫·艾哈迈德，Касы мов Ахмед

卡西斯，В.Кассис

卡伊洛夫，И.А.Каиров

卡赞采夫，Казанцев

卡赞斯基，С.Н.Казанский

凯宾，И.Г.Кэбин

凯尔迪什，М.В.Келдыш

凯莱齐，Келлези

凯洛夫，И.А.Каиров

凯曼，КэМэн

凯南，乔治，Джордж Кеннан，George Kennan

凯任，КэЖэн

凯塔，莫迪博，Модибо Кейта，Modibo Keita

凯文，Квинн

凯西，Р.Г.Кейзи

坎农，弗兰克，ФранкТ.Кеннер

康德，Кант

康敏庄，Кан Минь-чжуан

康纳利，Коннэли

康生，КанШэн

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康斯坦丁诺夫，Ф.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考茨基，Каутский

考尔，Т.К.Кауль

考菲尔德，Коуфилд

考夫曼，Кауфман

考涅楚克，А.Е.Корнейчук

柯都维亚，Кодовилья

柯克，阿兰，Алан Кэрк

柯乐博，О.Э.Клабб，О. Edmond Clubb

柯里杨尼斯，Колиянис

柯林，А.И.Клин

柯林斯，Коллинс

柯妮娜，Л.Ф.Конина

柯庆施，КэнЦин-ши

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А. I. Kosygin

柯耶，Кье

科贝尔，Кербер

科贝良斯基，Кобылянский

科布泽夫，Кобзев

科恩，希尔达，Хилда Коен

科尔巴科夫，Колпаков

科尔巴耶夫，К.К.Кольбаев

科尔达诺夫，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Колданов
Яковлевич Василий

科尔尼延科，Г.М.Корниенко，G. M. Kornienko

科尔沙克，Коршак

科尔特，Корт，Kort

科夫里基诺夫，М.Д.Ковригинов

科甘，Коган

科济列夫，А.В.Козырев

科济列夫，С.П.Козырев

科雷巴洛夫，Н.Колыбалов

科雷巴诺夫，А.Г.Колыбалов

科利亚(毛岸青)，Коля

科列罗夫，Г.Н.Колеров

科林，П.Д.Корин

科留金，Корюкин

科隆比，Коломби

科罗博夫，А.В.Коробов

科罗利, Король

科罗特琴科, Д.С.Коротченко

科洛杰兹诺夫, М.Г.Колодезнов

科洛廖娃(江青), Королёва

科洛米耶茨, А.Д.Коломиец

科马罗夫, ПетрКомаров

科马罗夫, Х.М.Комаров

科马洛夫, Комаров

科尼亚泽夫, Князев

科涅夫, Конев

科诺诺娃, Кононова

科诺托普, В.И.Конотоп

科普列尼格, Коплениг

科奇尼扬, А.Е.Кочинян

科奇耶夫, 米哈伊尔, Михаил Кочнев

科切加罗夫, Кочегаров

科热杜布, И.Н.Кожедуб

科热杜布, Кожедуб

科热夫尼科夫, В.Кожевников

科任, А.Кожин

科舍廖夫, А.И.Кошелёв

科斯坚科，Н.А.Костенко

科索拉波夫，А.Косолапов

科索拉波夫，П.И.Косолапов

科托夫，Котов

科托夫，М.Котов

科瓦利，К.И.Коваль

科瓦利斯基，Б.Е.Ковальский，В. Е. Kovalskii

科瓦利斯卡娅，Ковальская

科瓦连科，Коваленко

科瓦廖夫，Е.Ф.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И.В.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М.Н.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С.Ковалев

科瓦诺夫，П.Кованов

科瓦奇·贝拉，КовачБела

科伊，马克，МакКой

科兹洛夫，А.Л.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И.В.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И.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Ф.Р.Козлов

科祖林，Козулин

克贝尔，Кербель

克尔德什，Келдыш

克拉夫琴科，К.И.Кравченко

克拉夫佐夫，В.А.Кравцов

克拉夫佐夫，Кравцов

克拉夫佐夫，Кравцов

克拉克，Кларк

克拉马尔，Крамар

克拉马连科，Крамаренко

克拉米诺夫，Краминов

克拉奇科夫，Н.М.Клочков

克拉斯尼琴科，Красниченко

克拉斯诺夫，М.Л.Краснов

克拉索夫斯基，Красовский

克拉索夫斯基，斯捷潘·阿基莫维奇，С.А. Красовский

克拉塔休克，Кратасюк

克拉乌金，Ф.Клаудин

克拉耶夫斯卡娅，Краевская

克莱奇，Л.Крейчил

克赖涅夫，И.В.Крайнев

克赖诺夫，П.Крайнов

克劳夫，Клауф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

克雷姆金，Н.И.Крымкин

克雷奇，Крайджи

克里夫佐夫，В.А.Кривцов

克里梅尔曼，П.Г.Криммерман

克里姆，刘允斌，ЛюЮн-ПинКлим

克里帕拉宁，Крипалани

克里施柯，Клишко

克里沃夫，Кривов

克里沃鲁奇科夫，Криворучков

克里希扬，Э.Р.Кришьян

克利莫夫，А.П.Климов

克利莫夫·加尼，Керимов Гани

克利姆科，Н.И.Климко

克利斯，Корс

克列缅季斯，Клементис

克列斯尼科夫，Г.В.Колесников

克列伊梅诺夫，Ф.И.Клейменов

克林，К.Л.Келин

克留科夫，М.Е.Крюков

克留科夫，Н.Н.Крюков

克留奇科夫，И.П.Крючков

克柳奇尼科夫，Н.И.Ключников

克虐伯，Крупп

克鲁格洛夫，С.С.Круглов

克鲁季科夫，К.А.Крутиков

克鲁平，Крупин

克鲁普尼克，Ф.Е.Крупник

克鲁森，里查德，Ричад Крузон

克罗哈列夫，В.Т.Крохалев

克罗哈列夫，О.Крохалев

克罗帕切夫，М.А.Кропачев

克罗塔耶夫，Ю.П.Коротаев

克洛里，Кроль

克洛奇科夫，Н.М.Клочков

克梅诺夫，В.С.Кеменов

克纳，Кернер

克尼曼，Кейнеман

克努尼扬茨，И.Л.Кнунянц

克诺泰，Е.Кноте，Knothe

克奇鲁，S. Kitchlu

肯金，马德日特，Маджит Кензин

肯尼，Кенни

肯尼斯，Книсс

肯特，Кент

肯扎耶夫，У.Кенд жаев

孔采利泽，Б.М.Концелидзе

孔德拉季耶夫，Б.А.Кондратьев

孔德拉季耶夫，Кондратьев

孔庚，КунГэн

孔诺夫，Коннов

孔茹科夫，И.Б.Конжуков

孔祥铎，КунСяндо

孔祥熙，КунСянси

寇庆延，КоуЦин-янь

寇松，乔治，Джордж Керзон

库比谢克，Кубишек

库达舍夫(顾达寿)，Р.Ш.Кудашев

库德里科夫，Т.Кудриков

库德里雅舍娃，А.Д.Кудряшева

库德里亚夫采夫，В.Кудрявцев

库德里亚夫采夫，Кудрявцев

库德里亚夫采娃，Е.А.Кудрявцева

库德里亚绍夫，А.Кудряшов

库尔，斯特林林格，Стерлинг Кулл

库尔巴诺夫，Р.Курбанов

库尔别茨基，М.П.Курбецкий

库尔格洛夫，Курглов

库尔金，Куркин

库尔久科夫，И.Ф.Курдюков，I. Kurdyukov

库尔恰托夫，Курчатов

库季诺夫，И.Кудинов

库津，Кузин

库卡尔金，Б.В.Кукаркин

库克，Кук

库克索夫，Куксов

库库奇卡，Кукучка

库拉波娃，Е.Р.Курапова

库拉科夫，Ф.Д.Кулаков

库拉托夫，Т.Кулатов

库里贾诺夫，Л.А.Кулиджанов

库利科夫，В.Г.Куликов

库利克，Б.Т.Кулик

库列绍夫，А.И.Кулешов

库列绍夫，В.И.Кулешов

库罗帕特金，Kurapatkin

库罗奇金，В.Д.Курочкин

库梅金，Кумыкин

库纳耶夫，Д.А.Кунаев

库纳泽，Г.Ф.Кунадзе

库尼斯，Г.И.Кунис

库普里科夫，Куприков

库普林，А.И.Куприн

库切连科，В.А.Кучеренко

库丘里叶，克洛德·魏扬，Клод Вайян Кутюрье

库舍列夫，Б.Н.Кушелев

库什内利，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Кушнырь

ЕгорьЕфремович

库什涅鲁克，В.В.Кушнерук

库苏马阿特马查，М.Кусума-Атмаджа

库塔科夫，Кутаков

库特马纳利耶夫，А.А.Кутманалиев

库图兹，Кутуз

库西宁，О.В.Куусинен

库伊津，И.Т.Куйдин

库伊莫夫，Д.Т.Куимов

库兹缅甸科，В.Кузьменко

库兹明，И.И.Кузьмин

库兹明，Кузьмин

库兹明，М.Р.Кузьмин

库兹明内赫，Кузьминых

库兹涅佐夫，В.В.Кузнецов，V. Kuznetsov

库兹涅佐夫，К.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М.И.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Н.Г.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Н.И.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Ф.Кузнецов

库祖博夫，И.М.Кузубов

袴田里见，Сатоми Хакамада

旷伏兆，КуанФу-дао

奎杰胡，Кви Дье-ху

拉奥，Рао

拉宾，Рабин

拉宾，С.Г.Лапин

拉波辛，А.А.Рапохин

拉布，Рааб

拉布霍夫，Л.С.Лопухов

拉达克里希南，С.Радхакришнан

拉夫金，А.В.Равкин

拉夫里谢夫，А.А.Лаврищев

拉夫里谢夫，А.Н.Лаврищев

拉夫里谢夫，Лаврищев，Lavrishchev

拉夫罗夫，В.В.Лавров

拉格奇，Рагч

拉古杰克，В.Лагутенко

拉古林，Г.И.Рагулин

拉赫曼，阿布杜尔，Абдул Ракман

拉赫曼，穆吉布尔，Муджибур Рахман

拉霍夫，Лахов

拉科夫宁，Лаковнин

拉科夫斯基，Л.Н.Раковский

拉科西，Ракоши

拉里奥诺夫，Ларионов

拉里奥诺夫，Ларионов

拉林，Б.А.Ларин

拉马穆尔蒂，Рамамурти

拉马扎诺夫，Д.Рамазанов

拉姆，Лэмб

拉姆，查尔斯，Чарльз Лэмб

拉姆，贾格吉凡，ДжагдживанРам

拉姆苏伦，Лхамо-Сурун

拉南，Ratnam

拉帕茨基，阿达姆，Рапацкий，Adam Rapacki

拉普捷夫，Лаптев

拉齐伯林斯基，Н.Л.Рациборинский

拉齐斯，В.Т.Лацис

拉奇科夫，Н.А.Рачков

拉奇科夫，Рачков

拉琴科，В.А.Радченко

拉琴科，Радченко

拉什，Раш

拉斯波平，Распопин

拉斯卡托夫，А.С.Раскатов

拉苏洛夫，Д.Расулов

拉塔纳迪布，琅，Луанг Ратанадиб

拉特纳，Ш.И.Ратнер

拉铁摩尔，欧文，Оуэн Латтимор

拉希多夫，Ш.Р.Рашидов

拉希姆巴巴耶娃，Рахимбабаева

拉辛，Разин

拉伊哈德，Лайхад

拉伊克，Райк

拉扎连科，Б.Р.Лазаренко

拉扎列夫，В.И.Лазарев

拉兹杜霍夫，Ю.И.Раздухов

拉兹尼钦，Разницын

拉祖金，Лазутин

拉祖瓦耶夫，В.Н.Разуваев

腊斯克，Д.Раск

莱昂德罗，Г.Леандру

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

莱斯顿，Рестон

莱伊阿特洛夫斯基，Рейатровский

莱伊尔德，Лэйрд

赖赫曼，Райхман

赖嘉文，Рагаван

赖琰，ЛайЛянь

赖若愚，ЛайЖо-юй

赖亚力，ЛайЯ-ли

赖伊，特里格夫，Трюгве Ли

濑谷启，СеяХираку

兰季斯，Е.М.Ландио

兰金，Рэнкин

兰科维奇，Ранкович，Alexander Rankovic

兰纳迪夫，Ранадиве

兰尼兹尔，Лемнитцер

郎诺，Лон Нол

朗格，Лан гер

劳，Рау

劳埃德，塞尔温，Селвин Ллойд

勒祖，ХанЧэн Цзу

雷巴尔金，В.В.Рыбалкин

雷巴斯，Рыбас

雷宾，А.П.Рыбин

雷宾德尔，Робиндер

雷德福，Редфорд

雷列耶夫，Рылеев

雷曼 , Рейман

雷奇科夫 , Лычков

雷日科夫 , А.Д.Рыжков

雷日科夫 , Н.И.Рыжков

雷绍田 , ЛэйШао-дянь

雷斯科夫 , Лысков

雷索夫 , П.Н.Лысов

雷瓦 , Б.И.Рэва

雷震 , Лэй Чжень , Лэй Чжэн

黎德寿 , Ле Дык Тхо

黎清毅 , Ле Тхань Нги

黎笋 , Ле Зуан , Лу Зуан

黎万龙 , Ле Ванлонг

李安闻 , Ли АнМук

李弼奎 , Ли ПхильГю

李灿 , Ли Цань

李昌 , Ли Цян

李常青 , Ли Чанцин

李晨 , Ли Чэнь

李晨廷 , Ли Чжентин

李承英 , Ли СынЕн

李德才 , Ли Дэ-цай , Ли Да-цай

李德伦 , Ли Дэлунь

李德全 , Ли Дэ-цюань , Ли Дэчуань

李德生 , Ли Дэ-шэн

李德元 , Ли ДеЮань

李东冶 , Ли Дунвэй

李度 , Ли Дучунь

李敦白 , Ритенберг

李范五 , Ли Фану

李凤林 , Ли Фэн-линь , Ли Фэнлинь

李福德 , Ли Фудэ

李福林 , Ли Фу-лин

李富春 , Ли Фу-чунь , ЛиФу-цунь

李公朴 , Ли Гун-бо

李光武 , Ли Гван Му

李广 , Ли Гуан

李广龙 , Ли Вэнь-лун

李广儒 , Ли Гуань-жу

李贵山 , Ли Гуй-шэн

李贵新 , Ли Гуй-синь

李国富 , Ли Го-фу

李翰奋 , Ли Ханьфэнь

李何 , Ли Хэ

李亨根 , Ли Хян Кын

李焕之 , Ли Хуан-жи

李璜 , Ли Хуан

李辉 , Ли Хуэй , Ли Чуэй

李汇川 , Ли Гуй-чуань

李惠琴 , Ли Хуэйцин

李藿林 , Ли Хой-линъ

李济琛 , Ли Цзишэнь

李济深 , Ли Цзи-шэнь

李家珍 , Ли Ця-цзе

李嘉坚 , Ли Киан Тенг

李京文 , Ли Цзенвень

李井泉 , Ли Цзин-цюань

李军 , Ли Цзюнь

李克农 , Ли Кэнун , Ли Кэ-нун

李宽成 , Ли Куан-чен

李立三 , Ли Лисань , ЛиЛи-сань

李烈钧 , Ли Лецзюнь , ЛиЛе-цзюнь

李明 , Ли Мин

李乃宾 , Ли Най-Бин

李讷 , Ли Ла , ЛиЛу

李普曼 , Липпман

李奇微 , Риджуэй

李琦涛 , Ли Ци-тао

李启铭 , Ли Ци-мин

李强 , Ли Чан

李强 , Ли Чан , Ли Цян

李桥华 , Ли Чао-хуа

李青 , Ли Цин

李清漪 , Ли Цзин Цен

李茹华 , Ли Жуй-хуа

李儒林 , Ли Жу-линь

李森科 , Лысенко

李山东 , Ли Шэн-дун

李善一 , Ли Шаньи

李世超 , Ли Ши-чао

李守信 , Ли Шу-шин

李述中 , Ли Шу-чжун

李思赫 , Ли СыХэк

李四光 , Ли Сы Гуан , Ли Сы-гуан

李松云 , Ли СонУк

李苏 , ЛиСу

李天源 , Ли Чен Вон

李维诺娃 , Н.М.Литвинова

李文仁 , ЛиФу-жэнь

李文绚 , ЛиВено-Сюнь

李先念 , ЛиСянь-нянь

李相朝 , ЛиСа Чо ,

李孝淳 , ЛиХё Сун

李新八 , Ли Сан Чо

李彦 , Ли Янь

李叶阳 , Ли Еян

李一卿 , Ли Иль Ген

李永镐 , Ли ЕнХо

李云申 , Ли Юнжэнь

李在旺 , Ли Цзэван

李哲人 , Ли Чжэжень

李志林 , Ли Чжи-линь

李志民 , Лин Чже-мин

李志敏 , Ли Чжи-минь

李钟玉 , Ли ДенОк

李仲勤 , Ли Чжун-чэн

李周新 , Ли Чжоу-синь

李周渊 , Ли Зу Ен , Ли Дю Ен

李烛尘 , Ли Чжу-чэнь , ЛиЧжу-Чэнь , ЛиЧжочань

李准 , Ли Чжунь

李宗仁 , Ли Цзунжэнь , ЛиЦзун-жень

里迪 , Риди

里丁 , Рединг

里根 , Рейган

里津别尔格 , Ритенберг

里马尔 ,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 Римма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里斯杰尔 , Листер

里亚博夫 , Рябов

里亚博娃 , Е.В.Рябова

里亚布琴科 , В.Н.Рябченко

里亚德 , Риад

理查森 , Ричардсон

理查森 , 埃利奥特 , Эллиот Ричардсон

利别京斯基 , Ю.Либединский

利哈乔夫(李海秋) , В.И.Лихачев

利特维年科，П.Литвиненко

利特维纽科，Литвинюк

利亚什科，А.П.Ляшко

栗在山，Ли Цай-шань

笠原吉，КасахараЮкио，Kasahara

连科夫，В.И.Леньков

梁必业，Лянь Би-е

梁明章，Лян Минчжан

梁漱溟，Лян Сумин，Лян Шумин，Лян Соумин

梁思成，Лян Ши-чень

梁托维奇，М.А.Леонтович

梁希，ЛянСи

梁志书，Лян Чжи Шун

廖承志，Ляо Чэн-чжи

廖汉生，Ляо Хэшэн

廖岭，Ле Лиень

廖鲁言，Ляо Лу-ян

廖文毅，Ляо Вэньи

廖仲恺，Ляо Чжун-кай

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

列别杰夫，В.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В.В.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В.Д.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Г.П.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Г.С.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П.И.Лебедев

列别金斯基，Р.Н.Лебединский

列多夫斯基，Ледовский

列夫金，В.И.Левкин

列夫金，Левкин

列夫科维奇，Левкович

列加索夫，А.Легасов

列卡列夫，Л.Г.Лекарев

列克索阿特莫佐，哈尔索诺，Харсоно Рексоатмоджо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列佩申斯基，Лепешинский

列萨科夫，Лесаков

列什，Леш

列斯金，法捷伊·伊万诺维奇，Фатей Иванович Лекин

列瓦达，Ю.А.Левада

列维德林，埃尔默·弗雷德，ЭлмарФредЛлевеллин

列维娜, М.А.Левина

列文科, Ревенко

列谢奇科, М.А.Лесечко

林彪, ЛиньБяо

林伯渠(林祖涵), Линь Боцюй

林枫, Линь Фын

林广恒, ЛиньГуан-хэ

林海, Лим Хе

林亨元, Линь Хен Юань

林江琴, Лин Цзянь-цин

林李明, ЛиньЛи-мин

林立, Линь Ли

林利阳, Линь Ли-ян

林迈可, Майкл Линз, Mical Lindsay

林默涵, Линь Мохань, Линь Мо-хань

林铄, Лин Нао

林启茹, Лин Чи-жуй

林启喆, Лим ГиЧер

林赛, Линдсей

林蔚, Линь Вэй

林文, Линь Вэнь

林忠 , Линь Чжун

林祖涵 , Лин Цзухань

铃木启久 , Судзуки Хираку , Sudzuki Hiraku

刘皑风 , ЛюКай-фын

刘白羽 , ЛюБайюй

刘斌 , ЛюБинь

刘冰 , ЛюБин

刘伯承 , Лю Бочэн

刘步童 , Лю Бу-тун

刘成 , Лю Чжэн

刘大年 , Лю Да-нянь

刘导生 , Лю Дао-шэн

刘德启 , Лю Дэчи , Лю Дачи

刘鼎 , Лю Дэнь

刘广才 , Лю Гуанцзэ

刘贵良 , Лю Гуй-лянь

刘翰东 , Лю Хань-дун

刘浩昌 , Лю Хаочан

刘洪涛 , Лю Хунтао

刘鸿生 , Лю Хуншэн

刘环占 , Лю Хуанч жань

刘惠之, Лю ГуаЧжи

刘杰, Лю Цзе

刘瑾, Лю Дин

刘进忠, Лю Цзин-Чжун

刘敬雄, Лю Цзын-сюн

刘锴, Liu Chieh

刘澜波, Лью Ланьбо, Лю Ланьбо

刘澜涛, Li Lantao

刘利林, Лю Рын-лынь

刘连仁, Лю Лянь-жень

刘明辉, Лю Мин-хуэй

刘宁一, Лю Нинъи, Лю Нини

刘平, Лю Пин

刘谦, Лю Циэн

刘清栋, Лю Чен-дун

刘清宇, Liu Jingyi

刘群, Лю Цзюнь

刘汝明, Лю Жумин

刘莎, Лю Ша

刘少奇, Лю Шао-ци

刘绍学, Лю ШасСюз

刘叔模 , Лю Шу-мо

刘舒 , Лю Шуй

刘述卿 , Лю Шуцин

刘述周 , Лю Шу-чжоу

刘思齐 , Лю Эньци

刘松林 , Лю Сунлинь

刘文辉 , Лю Вэнькуй , Лю Вэньхуй

刘西元 , Лю Си-юань

刘晓 , Лю Сяо

刘晓秋 , Лю Сянь-цзюэ

刘孝亮 , Лю Сянь-лян

刘亚楼 , Лю Я-лоу

刘异云 , Лю И-юнь

刘元春 , Лю Юань-чунь

刘越山 , Лю Юэ-шань

刘赞远 , Лю Чжэньюй

刘长东 , Лю Чжань-дун

刘长胜 , Лю Чан-шэн

刘志坚 , Лю Чжи-Цзян

刘子载 , Лю Цзы-цзай

留里科夫 , Б.Рюриков

柳博夫，Любов

柳大纲，ЛюДаган

柳霞·土登巴塔，Леош Тубтенари

柳亚子，ЛюЯ-цзе

龙浦，ЛунПу

隆哥，鲁伊兹，Луиджи Лонго

卢比斯，Лубис

卢基扬琴科，Лукьянченко

卢金，В.П.Лукин

卢卡奇，Лукач

卢卡舒克，В.З.Лукашук

卢涅夫，А.Е.Лунев

卢绍英，ЛуШао-ин

卢元善，ЛуДань-шань

鲁宾，В.П.Рубен

鲁宾，Рубин

鲁布桑，Лубсан

鲁布桑，С.Лувсан

鲁达科夫，А.П.Рудаков

鲁道夫，М.В.Рудов

鲁多娃，М.Л.Рудова

鲁坚科，Р.А.Руденко

鲁坚科，Руденко

鲁金茹，ЛуЦзинжу

鲁克曼，Лукман

鲁克斯，洛艾维尔，Лоуэвелл Рукс

鲁露，ЛуЛу

鲁缅采夫，В.М.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夫，С.В.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夫，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Герм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Румянцев

鲁诺夫，Рунов

鲁然斯基，Ружаньский

鲁萨科夫，К.В.Русаков

鲁西，ЛуСи

鲁迅，ЛуСинь

陆兵，ЛуБин

陆定一，ЛуДин-и

陆洪恩，ЛиХунэн

陆明，ЛуМин

陆慕云，ЛуМу-юнн

鹿钟麟，ЛоЧжундин

路易斯，拉卡萨，ЛакасаЛуис

奎披汶，ПибулСонгхрам，Пибун Сонграм

伦茨代尔，Лендсдейл

罗巴捷夫斯基，Лобачевский

罗巴京，В.Н.Лопатин

罗伯逊，Робсон

罗尔德，У.Лорд

罗高寿(罗加乔夫)，И.А.Рогачев

罗戈夫，В.Н.Рогов

罗贵波，ЛоГуй-бо

罗果任，Рогожин

罗季奥诺夫，И.Родионов

罗加，布兰斯，Блас Рока

罗杰斯，Роджерс

罗津，米尔坦，Милтан Розен

罗隆基，ЛоЛунцзи，ЛоЛуй-чан，ЛоЛун-цин，Ло Лун-цей

罗迈进(洛马金)，Я.А.Ломакин

罗满宁(拉赫马宁)，奥列格·鲍里索维奇，О.Б.

Рахманин，О. В. Rakhmanin

罗曼诺夫，А.В.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А.О.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Б.С.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В.В.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Н.Н.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Н.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П.К.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С.А.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С.Д.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斯基，Г.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曼诺夫斯基，К.И.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曼诺夫斯基，С.К.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

罗姆，М.И.Ромм

罗慕洛，卡尔洛斯，КарлосП.Ромупо

罗宁哥，К.С.Роннинг

罗戚柱，ЛуЦу-чжу

罗日涅夫，Рожнев

罗日涅娃，М.И.Рожнева

罗荣桓，Ло Юньхуань

罗瑞卿，Ло Жуй-чин，Ло Жуйцин

罗塞罗，Рошери

罗莎，特特，ТэТэРоза

罗申，А.Рощин

罗申，Н.В.Рощин

罗舜初，Ло Шунь-чу

罗斯福，Рузвельт

罗斯拉维兹，Рославец

罗斯托，Ростоу

罗斯托茨基，В.К.Ростоцкий

罗斯托夫斯基(艾伦斯特·盖林)，С.Н.Ростовский(ЭрнстГенри)

罗素，勃兰特，Бертран Рассел

罗铁林，Ло Телин

罗伟，Ло Вэь

罗歇，瓦里戴克，Вальдек Роше

罗伊，Б.Ч.Рой

罗毅，ЛоИ

罗扎诺夫，Н.П.Розанов

罗志，Ло Чжи

洛巴诺夫，П.П.Лобанов

洛博夫，Г.А.Лобов

洛甫，ЛоФу

洛吉诺夫，Е.Ф.Логинов，Е. F. Loginov

洛吉诺夫，Л.А.Логинов

洛加萨文斯基，Лога-Савинский

洛马科, П.Ф.Ломако

洛莫夫, Н.А.Ломов

洛莫夫, Н.П.Ломов

洛尼斯, Ронис

洛奇, К.Лодж

洛桑三旦, Ласан Сумтен

洛松奇, Лошонци

洛维特, Ловетт

洛芝, Лодж

洛佐夫斯基, С.А.Лозовский

吕东, ЛюйДун

吕叔湘, Люй Шуцянь

吕正操, Люй Чжэнцао

马步芳, Ма Буфан

马成松, Ма ЧенСун

马春明, Ма Цунь-мин

马茨凯维奇, В.В.Мацкевич

马丁, Мартин

马丁诺夫, Н.В.Мартынов

马杜马罗夫, Мадумаров

马多尔斯基, Мадорский

马尔采夫，А.Ф.Мальцев

马尔采夫，В.Ф.Мальцев

马尔丁，费伦茨，Ференцей Мартин

马尔芬，М.И.Марфин

马尔季亚诺夫，Ф.Мартьянов

马尔柯夫，А.А.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И.П.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М.А.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斯基，А.П.Марковский

马尔科夫斯基，Марковский

马尔克洛夫，П.А.Маркелов

马尔莫施盖伊，Марморштейн

马尔琴科，А.Л.Марченко

马尔琴科，Марченко

马尔沙克，С.Маршак

马尔舍，Ж.Марше

马尔塔季纳塔，Мартадината

马海德，Махайдэ

马寒冰，МаХань-бин

马赫，Мах

马赫古卜，Махджуб

马赫穆多夫，Т.Махмудов

马恒昌，МаХэн-чан

马洪，Махон

马鸿逵，МаХунку

马杰尔，Маттерн

马卡里耶夫，П.П.Макарьев

马卡连科夫，Ф.Макаренков

马卡罗夫，М.Ф.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С.З.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С.О.Макаров

马康卫，Май-канци

马克萨廖夫，Ю.Е.Максарев

马克思，КарлМаркс

马克苏多夫，Л.Максудов

马库什金，А.Макушкин

马拉卡，坦，ТанМалака

马拉维亚，К.Д.Малавия

马拉先科，Малашенко

马兰金，Г.К.Маландин

马雷金，Малыгин

马雷舍夫，Малышев

马里内略，Х.Маринельо

马立克，Я.А.Малик，Jacob A. Malik

马利杰夫，С.Г.Мальев

马利克，Малик

马利克，阿达姆，Адам Малик

马利克维奇，Л.Малькевич

马利宁，М.С.Малинин

马利宁，Малинин

马利诺夫斯基，Р.Я.Малиновский，Malinovsky

马利琴科，А.Л.Мальченко

马利舍夫，Ф.П.Малышев

马利舍娃，В.И.Мальшева

马列，МаЛи，МаЛэ，МаЛе

马列文内伊，Малеванный

马列西耶夫，А.П.Маресьев

马列西耶夫，Маресьев

马列因诺夫，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 Малеинов

马林，В.Малин

马林科夫，Г.М.Маленков

马龙，Малон

马卢欣，А.М.Малухин

马罗奇金，Н.И.Марочкин

马洛夫，布鲁诺，Бруно Малов

马洛兹，Мороз

马明，Мамин

马明方，МаМин-фан

马姆米，Мамуми

马纳索夫，М.Манасов

马纳耶夫，Г.Г.Манаев

马尼泽尔，Манизер

马努欣，В.С.Манухин

马思聪，МаСыцун，Ма Си-цун

马思祖，МаСыцзюй

马斯连尼科夫，В.А.Масленников

马特科夫，Н.Ф.Матков

马特拉霍夫，Матлахов

马特维耶夫(扎哈罗夫)，Матвеев

马特维耶夫，Н.И.Матвеев

马万驰，МаВань-чи

马伟茹，МаВэньжуй

马歇尔，Д.Маршалл

马歇尔，Маршалл

马谢罗夫，П.М.Машеров

马叙伦，МаЖу-лунь

马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

马扬，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МаЯн

马耶夫斯基，В.Маевский

马约罗娃，Т.Г.Майорова

马扎洛夫，А.М.Мазаров

马占山，МаЧжаньшань

马贞，МаЦинь

马祖罗夫，Г.Мазуров

马祖罗夫，К.Т.Мазуров

玛里宁娜，П.А.Малинина

迈耶尔，奥托，ОттоМайер

麦菲，Мэрфи

麦戈文，Макговерн

麦金斯，Мейкинз

麦卡锡，Маккарти

麦克阿瑟，Макартур，Douglas MacArthur

麦克伦，Макрой

麦克洛伊，ДжонМакклой

麦克米兰，Макмиллан

麦克纳，Макконел

麦克苏伊宁，Максуинни

麦斯基，И.М.Майский

麦斯基，Маски

曼别托夫，Б.Мамбетов

曼多查，Мендоза

曼科，Е.Манько

曼茹洛，Манжуло

曼斯菲尔德，М.Мэнсфильд，Мэнсфилд

毛岸英，МаоАньин

毛铎，МаоДо

毛雷尔，扬·格奥尔基，И.Г.Маурер

毛升，МаоШень

毛希丁诺夫，Н.А.Мухитдинов

毛泽东，МаоЦзе-дун

茅盾，МаоДунь

梅德韦多夫斯基，П.М.Медведовский

梅德韦杰夫，В.С.Медведев

梅厄，果尔达，ГолдаМеир

梅尔格良，С.Н.Мергелян

梅尔库洛夫，Меркулов

梅尔库洛夫，Меркулов

梅尔钦特，Мерчент

梅海忠，МэйХай-чжун

梅捷列斯，Мендерес

梅拉尔希科夫，Мыларщиков

梅兰芳，МейЛань-фань

梅利尼科，Мельник

梅利尼科夫，Л.И.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П.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С.М.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Мельников ПетрАндреевич

梅利尼科娃，Н.И.Мельникова

梅列茨科夫，К.А.Мерецков

梅林杨，МэнЛинян

梅农，К.В.Н.Менон

梅农，К.П.Ш.Менон

梅农，克里希纳，Кришна Менон，V. K. Krishna Menon

梅农，拉克什米，Лакшми Менон

梅奇尼科夫，Мечников

梅什柯娃，Мешкова

梅文蒲，МайВанБо

梅夏采夫，Н.Н.Месяцев

梅谢里亚科夫，М.Г.Мещеряков

梅益，МэйИ

门捷列夫，Менделеев

蒙塔古，Монтегю

孟戴斯弗朗斯，Мендес-Франс，Mendes-France

孟德惠，Т.Маунд

孟奇玉，МэнЧи-юй

孟英，МэНИн

米尔曼，М.Б.Мильман

米尔琴科，М.Ф.Мирчинк

米尔斯，萨乌斯

米尔扎，Мирза

米尔扎艾哈迈多夫，М.З.Мирза-Ахмедов

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А. I. Mikoyan

米古诺夫，В.П.Мигунов

米哈尔科夫，С.В.Михалков

米哈尔科夫，С.Михалков

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Н.А.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С.А.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С.С.Михайлов

米海金, В.И.Михейкин

米基钦斯基, В.В.Микицинский

米捷列夫, Г.А.Митерев

米京, М.Б.Митин

米科瓦伊奇克, Миколайчик

米克拉舍夫斯基, Л.М.Миклашевский

米克拉泽, Г.Микеладзе

米库拉什, 苏利纳, ШуринаМикулаш

米拉乌什金, Милаушкин

米里谢普, А.А.Мюрисеп

米利切维奇, Миличевич

米林斯基, Т.Н.Миринский

米罗诺夫, С.С.Миронов

米罗诺娃, Д.Миронова

米罗什尼科夫, И.П.Мирошников

米罗维茨卡娅, Р.А.Мировицкая

米涅尔温, Минервин

米切尔, Митчелл

米丘林，Мичурин

米舒京，А.Н.Мишутин

米图索夫，Митусов

米玉道，МиЮй-дао

缅任斯基，Менжинский

缅希科夫，М.А.Меньшиков

缅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闵勇，МиЮн

明斯基，Е.М.Минский

摩勒，居易，ГиМолл

莫埃尔，Моуэлл

莫德惠，МоДэхуй

莫尔德文采夫，Мордвинцев

莫尔古洛夫，И.Моргулов

莫吉列夫斯基，Б.Могилевский

莫金，Н.И.Мокин

莫拉维克，Moravec

莫兰德，Морланд

莫劳扎蔑茨，Моломжамец

莫利亚科夫，Н.Моляков

莫罗，切斯特，ЧестерМерроу

莫罗佐夫, С.Н.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 Б.М.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 Морозов

莫洛托夫, В.М.Молотов, V. M. Molotov

莫宁, А.Монин

莫努诺夫·伊斯哈姆别克, МонуновИсхамбек

莫诺努托, 阿尔诺利德, АрнольдМононуту, Мононута

莫丘利斯基, Ф.В.Мочульский, F. Mochulskii

莫舍托夫, В.В.Мошетов

莫申采娃, И.И.Мошенцева

莫斯卡连科, К.С.Москаленко

莫斯科夫斯基, В.Московский, Vasily Moskovsky

莫斯科夫斯基, П.Московский

莫斯托维茨, Мостовец

莫伊谢耶夫, В.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夫, 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夫, П.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娃, Моисеева

莫扎耶夫, Можаев

姆哈诺夫, Муханов

姆利罗, 马罗金·索乌扎, Мурило Маррокин Соуза

姆帕卡尼耶，Л.Мпаканийе

姆扎瓦纳泽，В.П.Мжаванадзе

穆尔曼，Мурмен

穆罕默德·纳比，Мухаммед Наби

穆基尔日，Мукирджи

穆济列夫，С.А.Музылев

穆卡诺夫，Муканов

穆拉德里，瓦诺，Вано Мурадели

穆拉舍夫，Мурашев

穆拉托夫，В.М.Муратов

穆拉托夫，胡萨因，Хусаин Муратов

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ев

穆罗舍夫，Мурошев

穆萨巴耶夫，安瓦尔，Анвар Мусабаев

穆萨托娃，В.Л.Мусатова

穆索尔格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

穆欣，Р.Мусин

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

纳尔班江，Налбандян

纳吉，Надь

纳吉布，Нагиб

纳拉诺夫，Наранов

纳雷什金，Н.И.Нарышкин

纳里扬，Нарйян

纳赛尔，Насер，Nasser

纳斯洛夫·乌斯满，Насыров Усман

纳苏蒂安，Насудиан

纳苏蒂安，Насутион

纳西诺夫斯基，Е.Насиновский

纳席尔，Натсыр

纳扎尔别科夫，Назарбеков

纳扎尔金，Назаркин

纳札罗夫，Наджаров

奈尔，戈文丹，Говиндан Наир，G. Nair

奈温，НеВин

南布迪里巴德，Намбудирипад，Elamulam M. S. Nambudiripod

南丁，НаньДин

南尼，Ненни

南日，НамИр

南欣，НамСин

内格罗蓬特，Дж.Негропонтe

尼奥托，Ньото

尼采，Нитце

尼古拉耶夫，А.С.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Д.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Л.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С.Николаев

尼赫鲁，Р.К.Неру，Nehru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Джавахарлал Неру，Nehru

尼基福罗夫，А.Л.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А.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В.Н.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京，Никитин

尼基京，П.Никитин

尼基琴科，П.Д.Никитченко

尼科利斯基，В.П.Никольский

尼克松，Р.Никсон

尼库林，Никулин

尼迈里，Нимейри

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Ниткин

ВладимирКраснович

倪耀礼，Ни Яоли

倪志福，Ни Чжи-фу

聂春荣，He Чунь-юн

聂荣臻，HeЖун-чжен，He Юнчжэнь

聂希文，He Си-вэнь

涅波罗日尼，П.С.Непорожний

涅戈佳耶夫，Негодяев

涅格列维奇，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Сильвестрович Негеревич

涅霍罗舍夫，А.К.Нехорошев

涅加尔维列，切列斯捷，ЧелестеНегарвилле

涅科谢，马丁·安德森，Мартин Андерсен Нексе

涅克拉索夫，В.П.Некрасов

涅克拉索夫，Н.А.Некрасов

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涅列京，Д.И.Неретин

涅卢，Нерв

涅缅斯基，Б.М.Неменский

涅宁，彼得，ПьетроНенин

涅恰耶夫，Нечаев

涅斯捷罗夫，М.С.Нестеров

涅斯捷罗夫，Нестеров

涅斯梅亚诺夫，А.Н.Несмеянов

涅斯托尔，库尔斯基，КурскийНестор

涅韦多姆斯基，Неведомский

涅维罗夫，弗拉基米尔，НеверовВладимир

涅维罗夫，沃娃，НеверовВова(Владимир)

宁武，НинУ

牛英德，НюИндэ

努恩，Нун

努里，Нури

努里耶夫，З.Н.Нуриев

努日金，Н.И.Нуждин

诺尔斯杰特，Нерстед

诺格拉第，Негради

诺加，Нога

诺韦拉，Новелла

诺维科夫，В.Е.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К.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

诺沃提尼，Новотный

诺沃肖洛夫，Новоселов

诺先科，Нощенко

欧阳飞，ОуЯн-фэй

欧阳惠，ОуянХуэй

欧阳钦，ОуЯн-цин

帕蒂尔，С.К.Патиле

帕多克，保罗，ПольПаддок

帕尔菲奥诺夫，Ю.Ф.Парфенов

帕尔哈明特斯基，Пархаментский

帕尔马，ДеПалма

帕尔申，Паршин

帕夫雷切夫，Павлычев

帕夫柳克，Павлюк

帕夫洛夫，В.Н.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Г.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Д.В.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斯基，Н.О.Павловский

帕夫洛夫斯基，О.Павловский

帕夫洛娃，Е.И.Павлова

帕夫洛娃，Павлова

帕甫连科，А.С.Павленко

帕胡奇，Я.И.Пахучий

帕霍莫夫，Н.Л.Пахомов

帕杰尔斯基，М.Пазельский

帕卡德，Паккард

帕拉尔，Палар

帕拉尼契夫，О.С.Параничев

帕利古诺夫，Н.Г.Пальгунов

帕利古诺夫，Пальгунов

帕列茨基斯，Ю.И.Палецкис

帕蒙恰克，Памончак

帕姆菲洛夫，К.Д.Памфилов

帕尼卡尔，Паниккар

帕诺夫，А.Д.Панов

帕森科夫，В.В.Пасынков

帕申，Н.Пашин

帕什科夫，Б.К.Пашков

帕斯特纳克，V. S. Pasternak

帕斯图赫，Пастух

帕斯托里诺，Пасторино

帕斯托耶夫，Пастоев

帕索奇尼琴科，А.И.Пасочниченко

帕塔萨拉蒂，Parthasarathi

帕托利切夫，И.С.Патоличев

帕维尔，Павел

帕乌金，Н.А.Паутин

帕乌斯托夫斯基，К.Г.Паустовский

帕耶塔，詹卡洛，ЧжанкарлоПайетта

潘迪特，拉克希米，ЛакшмиПандит

潘复生，ПаньФу-шэн

潘汉年，ПаньХанънянь，ПаньХань-янь

潘捷列依莫诺娃，Пантелеймонова

潘科夫，Ю.Панков

潘克拉托夫，В.П.Панкратов

潘克拉托娃，М.Я.Панкратова

潘尼迦，Панникар

潘琴科，А.С.Панченко

潘琴科，П.М.Панченко

潘特，Пант

潘友新，А.С.Панюшкин

潘占林，ПаньЧжаньлин

潘自力，ПаньЦзы-ли，Панцун-ли

庞之江，ПанЧжэ-цзян

庞忠祥，ПанЧжунсян

裴丽生，ПэйЛи-Шэн

佩德尔森，Педерсан

佩尔菲利耶夫，А.Перфильев

佩尔米亚克，叶甫根尼，Пермяк

佩尔谢，阿尔维特·雅诺维奇，А.Я.Пельше

佩夫涅夫，Певнев

佩科夫，В.Т.Быков

佩雷拉，Перера

佩利申科，В.И.Пелишенко

佩列格里尼，贾科莫，ДжакомоПеллегрини

佩列佩奇科，Я.Б.Перепечко

佩列威尔泰洛，А.С.Перевертайло

佩列韦尔特金，Переверткин

佩罗，Ш.Перро

佩罗夫，Г.В.Перов

佩佩良耶夫，Пепеляев

佩什科夫，Б.М.Пышков

佩斯利亚克，М.М.Песляк

佩特尔，Петер

佩图霍夫，В.Петухов

彭德怀，ПэнДэхуай

彭济群，ПэнЦзи-цзя

彭锦秋, ПэнЦзин-цю

彭孟缉, ПэнМэнци

彭敏, ПэнМинь

彭瑞桑, ПэнЖуйсан

彭真, ПынЧжэнь, ПэнЧжэнь, ПынЧжэнье

彭祖秀, ПанЦзуншу

蓬飞, ПэнФэй

蓬捷科尔沃, Б.М.Понтекорво

皮杜尔, Бидо

皮尔逊, Пирсон

皮尔逊, 德鲁, ДрюПирсон

皮卡尔金, Пиголкин

皮凯津, В.Пикайзен

皮克, 威廉, Wilhelm Pieck

皮罗戈夫, Пирогов

皮罗什, Пирош

皮缅诺夫, Б.К.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 В.С.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 П.Т.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 Ю.И.Пименов

皮诺, Пино

皮萨列夫，Писарев

皮亚特尼茨基，Пятницкий

平杰三，ПинЦзе-сан

朴昌玉，ПанЧанОк

朴成哲，ПакСенЧер，Pak Song Chŏl

朴东朝，ПақДол-чо

朴光成，ПакКванСен

朴基永，ПакГильЕн

朴金喆，ПакКимЧер，ПакКымЧер

朴容国，ПакЕнГук

朴宪永，ПакХенЁн

朴勋一，ПакХунИр

朴一禹，ПакИрУ

朴永元，ПакЮнВон

朴正爱，ПақДенАй

普尔卡耶夫，Пуркаев

普津，А.А.Пузин

普拉东诺夫，Платонов

普拉霍夫，Прахов

普拉萨特，Прасад

普拉坦哈，Пулатэхань

普拉特科夫，Платков

普里别金，А.И.Прибегин

普里霍多夫，Приходов

普里马科夫，Е.М.Примаков

普里斯科，Ю.Ю.Плиско

普利特金，Плиткин

普利谢茨卡娅，М.М.Плисецкая

普利耶夫，Плиев

普利耶姆斯基，Д.А.Приемски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

普列斯杰斯，路易斯，ЛуисПрестес

普林戈迪格多，Прингтодигдо

普鲁切克，Плучек

普罗岑科，Н.Проценко

普罗科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

普罗列塔里耶娃，罗扎，РозаПролетариева

普罗梅斯洛夫，В.Ф.Промыслов

普罗琴科，Проценко

普罗塔耶夫，Протаев

普罗特金，Е.А. Plotkin

普罗特科夫，Прутков

普契尼，Пуччини

普什科夫，Пушков

普斯季利尼科，И.И.Пустильник

普苏尔采夫，Н.Д.Псурцев

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

普希金，Г.М.Пушкин，G. M. Pushkin

普辛，Пушин

普休尔科夫斯基，Пщулковский

齐奥塞斯库，尼古拉，Николe Чаушеску

齐白石，ЦиБай-ши

齐宾，Н.Цыбин

齐尔科夫，А.Ф.Цирков

齐菲·弗拉基米尔，ТиФейВладимир

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齐怀远，ЧинЮй-хуань

齐列辛科夫，К.Циренщиков

齐米亚宁，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М.В. Зимянин

齐普拉科夫，С.С.Цыплаков

齐世英，ЦзыШи-ин

齐坦科，Цитенко

齐英， ЧиИн

齐忠涛， ЦиЧжунТао

齐宗华， ЦиЧжун-хуа

奇尔科夫， Чирков

奇卡列夫， Чикарев

奇科瓦尼， С.И. Чиковани

奇里亚耶夫， Г.И. Чиряев

奇利金， Чиликин

奇斯佳科夫， А. Чистяков

奇韦尔特科， П.В. Чвертко

契楚林， Н.Ф. Чечулин

契尔年科， Черненко

契尔诺夫， Чернов

契尔特科夫， Чертков

契尔沃年科， С. Червоненко

契诃夫， А.П. Чехов

契列德尼琴科， 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恰达耶夫， Я. Чадаев

恰普雷金， Чаплыгин

千家驹， Цянь Цзяцзюй

钱俊瑞， Цзян Чуньюй， Чен ЖеЖан， Цянь Цзюнь жуй

钱其琛, Цянь Цичень

钱三强, Цан Сян-цань

钱伟长, Цянь Вэй-чан

钱信忠, Цянь Синь

钱永铭, Цянь Юнмин

乔巴山, Чойбалсан

乔北汉, Чзао Пе-хан

乔伯臣, Цяо Бэ-чен

乔尔内, А.К.Черный

乔克罗阿米诺托, 哈尔索诺, Харсоно Чокроаминото

乔克祥, ЦяоКэ-сян

乔立, ЧаоЛи

乔木, ЦзяоМу

乔日巴兹, Чойжмац

乔森潘, Кхиеу Самфан

乔斯, Джосс

乔晓光, ЦяоСяо-гуан

乔伊, 查尔斯·特诺尔, Чарльз Тернер Джой

乔治乌, 杜米特鲁, Думитру Георгиу

乔治乌德治, Георгиу-Деж

切布舍夫, И.Чебушев

切尔金, Л.К.Чиркин

切尔卡索夫, М.Ф.Черкасов

切尔内绍夫, Л.С.Чернышев

切尔内绍夫, П.С.Чернышев

切尔内绍夫, Чернышев

切尔尼克, Черник

切尔尼奇金, Д.С.Черничкин

切尔尼亚耶夫,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 А.С.

Черняев

切尔努哈, В.Чернуха

切尔诺娃, О.А.Чернова

切夫拉诺夫, С.В.Чефранов

切卡诺夫, Н.К.Чеканов

切卡希洛, А.М.Чекашилло

切坎, М.С.Чекан

切列诺夫, П.С.Черенов

切洛梅, Челомей

切斯诺科夫, Д.И.Чесноков

切斯诺科夫, Д.И.Чесноков

切斯诺科夫, К.Чесноков

切特韦里科夫, Н.С.Четвериков

切谢夫, Г.В.Чешев

切依斯, Чейс

钦迪, КимТит

秦邦宪, ЦиньБан-сянь

秦炳刚, ЦинБингуан

秦诚儒, ЦинЧънжуй

秦德纯, ЦинДэчунь

秦立真, ЦиньЛи-чжэнь

秦亦津, ЦзинИ-тин

秦聿震, ЦиньЮйчжень

琴佐娃, 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 Ченцо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琼森, 詹姆斯, Джеймс Джосон

丘巴罗夫, Чубаров

丘古诺夫, Чугунов

丘吉尔, Черчилль

丘季诺夫, Чудинов

丘科夫斯基, К.И.Чуковский

丘拉耶夫, В.М.Чураев

丘维林, Чувырин

邱杜易, ЦюйДуй

邱会作, ЦЮХуй-цзо

邱琴，ЦюЦин

邱山，ЦюШань

邱锡铭，ЧуСи-Мин

区棠亮，УТан-лян

瞿杜翼，ЦюйДу-и

瞿红，ЦюйХун

瞿秋白，ЦюйЦюбо

权友湖，ЧуанЮ-Ху

然娜，克鲁普尼克，Крупник Жанна

饶斌，ЖаоБин

饶伯森，W. S. Robertson，Робертсон

饶漱石，Яо Соуши

饶文森，Нао ВинСэнь

饶彰风，Яо Чжан-фын

热尔科夫，Жарков

热尔托夫斯基，Е.П.Желтовский

热尔瓦科夫，Е.И.Желваков

热利科夫斯基，В.А.Желиговский

热利亚兹科，Желязко

热列佐娃，В.Ф.Железова

热姆丘日尼科夫，Жемчужников

热振(活佛), Ра-Дренг

任弼时, ЖэньБи-ши

任光图, ЖаньГуан-ту

任坤一, Жен Кун-и

任友, ЖеньИё

日布利, М.А.Жибуль

日丹, Жидан

日丹诺夫, А.А.Жданов, Zhdanov

日丹诺夫, В.М.Жданов

日夫科夫, Т.Живков

日加列夫, П.Ф.Жигарев

日梅霍夫, И.Н.Жмыхов

日塔诺维奇, В.Г.Жданович

荣高棠, ЖунГао-тан

荣毅仁, ЖунИ-жэнь

容洪, ЖунХун

茹科, Жук

茹科夫, А.В.Жуков

茹科夫, Г.А.Жуков

茹科夫, Д.А.Жуков

茹科夫, 尤里, ЮрийЖуков

茹科夫斯基， Жуковский

茹科娃， Р.М.Жукова

茹拉夫廖夫， А.Ф.Журавлев

茹拉夫廖夫， Журавлев

阮高查， Нгуен Ко Тхатъ

阮昆， Нгуен Кон

阮林， Нгуен Лам

阮曼卡， Нгуен Мань Кам

阮庆， Нгуен Кхань

阮维桢， Нгуен Зуи Чинь， Нгуен Зуй Чинь

阮文进， Нгуен Ван Тьен

阮文镜， Нгуен Ван Кинь

阮文绍， Нгуен Ван Тхису

阮友寿， Нгуен Хьу Тхо

阮玉蓉， Нгуен Нгок Зуиг

阮振铎， Жань Чжонь-до

阮志清， Нгуен Тхи Тхань

若松有次郎， Вакамаду Юдзиро

撒切尔， М.Тэтчер

撒亚诺夫， В.М.Саянов

萨波日尼科夫， Сапужников

萨博利，阿里，Али Сабри

萨布里，卡迈尔·雅各布，Камаль Якуб Сабри

萨布罗夫，М.З.Сабуров，M. Z. Saburov

萨茨，Сац

萨达特，Садат

萨德科夫，卡马列特金，Камалетдин Садыков

萨多夫斯基，Ф.Т.Садовский

萨恩·萨内什(巴尔马什诺夫)，СанСаныч

萨尔基佐夫谢拉季尼，Н.М.Саркизов-Серазини

萨尔诺，Ю.Н.Сарно

萨尔托诺，Сартоно

萨佛诺夫，А.Н.Сафонов

萨夫罗诺夫，И.И.Сафронов，I. I. Safronov

萨夫罗诺娃，Е.И.Сафронова

萨夫琴科，Савченко

萨哈洛夫，А.Д.Сахаров

萨济科夫，М.Л.Сазиков

萨济科夫，Сазиков

萨拉博金，Н.П.Сарапкин

萨拉查，Салазар

萨拉瓦纳穆图，Сараванамутту

萨利尼科夫, В.М.Сальников

萨马林, Н.А.Самарин

萨梅特, 列昂纳德, Лео Самет

萨姆丹, Самдан

萨姆德, 阿不都拉, Абдул Самад

萨姆萨利耶夫, Самсалиев

萨姆索诺夫, Г.Е.Самсонов

萨姆辛, Самусин

萨纳科耶夫, Санакоев

萨佩格, Сапег

萨奇科夫, М.И.Сачков

萨秋科夫, П.А.Сатюков

萨特, Саад

萨瓦茨基, Завадский, Aleksander Zawadski

萨维茨基, Савицкий

萨维利耶夫, А.И.Савельев

萨维尼奇, Савинич

萨亚诺夫, В.М.Саянов

塞尔玛申科, Сельмашенко

塞菲, Т.Ф.Сейфи

塞穆尔, Сеймур

赛福鼎·阿济佐夫，Сайфутдин Азизов

赛明戈通，Саймингтон

赛姆斯，Семс

赛义津，Сейн Тин

桑布，Самбу

桑晨斌，Сэн Чэнпин

桑德森，Сандерсон

桑科夫，Санков

桑托，Санто

瑟维斯，Сервис

森迪斯，Сэндис

沙阿比，Щааби

沙布朗斯基，Шабранский

沙杜诺夫，Г.П.Шатунов

沙尔莫夫，Ю.А.Шолмов

沙菲克，М.Шафик

沙格达尔苏伦，П.Шагдарсурэн

沙赫马托夫，А.Н.Шахматов

沙胡林，Шахурин

沙拉波夫，В.В.Шарапов

沙拉夫，Шарав

沙里波夫，А.Шарипов

沙列赫，Салех

沙林，Шалин

沙罗夫，Шаров

沙马耶夫，Шамаев

沙米尔，萨耶德，Саяд Шамиль

沙皮罗，Шапиро

沙千里，ШаЦянь-ли

沙什科夫，А.П.Шашков

沙斯特里，Шастри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里，Али Састроамиджойо

沙图诺夫斯卡娅，Шатуновская

沙托诺，Сартоно

沙维里，让，Жан Шовель

沙卫西拉，С.Советсила

沙因，Г.Б.Шейн

山本，Ямамото，Yamamoto

山田乙三，Ямада，Yamada Otozō

上坂胜，УэсакаМасаху，Uesaka Masaru

尚楚飞，ШанЧуфинь

尚庆，ШанЧин，

邵从恩，ШаоЦунэнь，Шао Цунжэнь

邵福全，ШаоФу-цюань

邵家林，ШаоЦзялин

邵力子，ШаоЛицзы

邵美惠，ШаоМин-хуэй

邵天任，ШаоТяньжэнь

绍尔菲，Шорфи

绍尔莫夫，Ю.А.Шолмов

绍伊奇，姆拉登，Младен Соик

舍巴诺夫，Ф.А.Шебанов

舍别尔斯托夫，Шеберстов

舍夫利亚金，А.Шевлягин

舍夫佐夫，А.Шевцов

舍夫佐夫，Шевцов

舍甫琴柯，Т.Г.Шевченко

舍甫琴科，Т.Г.Шевченко

舍拉马诺夫，Шеламонов

舍里，Шерри

舍列伊霍夫斯基，Г.В.Шелейховский

舍斯捷里科夫，Шестериков

舍韦尔，Г.Г.Шевель

舍维亚科夫, Г.Шевяков

什比克夫, Д.Т.Шипиков

什捷缅科, С.М.Штеменко

什拉姆, С.Шрам

什利亚普尼科夫, Г.Шляпников

什马科夫, Шмаков

什帕托夫·谢尔盖(赵世克), ШпатовСергей

什佩季科, И.Ф.Шпедько

什特科夫, Т.Ф.Штыков

什韦多夫, А.А.Шведов

什韦佐夫, Н.С.Швецов

什维尔尼克, А.М.Шверник

什维尔尼克, Н.М.Шверник

沈观澜(沈志远), ШэнГуан-лан

沈鸿, ШэньХун

沈江, ШэнЦзян

沈钧儒, ШэнЦзюньжу, ШэньЦзюньжу

沈平, ШенПинг

沈彤, ШенТун

沈雁冰, ШеньЯнь-бин

沈友才, ШэнЮн-Цай

沈越，ШэньЮэ

沈志远(沈观澜)，ШэнДжи-иань(ШэнГуан-лаи)

沈忠善，ШэньЧжуншэн

盛华，ЧанХуа

师文·雅科夫，ШиВенЯков

师哲(卡尔斯基)，ШиЧжэ，ШиЦзэ

施德强，ЩиДэСянь

施蒂尔曼，Штильман

施洛夫，Г.Е.Шилов

施密特，Шмидт

施奈德温特，库尔特，КуртШнейдевинд

施耐德，М.Е.Шнейдер

施特劳斯，И.Штраус

施特劳斯，ФранцЙозефШтраус

施万，Шван

施永康，ШиЮнкан

石广平，ШиГуан-пин

石井四郎，ИсииСиро

石潘，ШиПань

石同敏，СиТунмя

石一申，ШиИ-шэн

史白夫(希巴耶夫), П.А.Шибает

史迪威, Стиллуэл

史蒂文森, Стивенсон

史蒂文斯, 罗伯特, РобертСтивенс

史俊弟, ШиЦзюнь-цзи

史良, ШиЛян

史密斯, Walter Bedell Smith

史密斯, У.Б.Смит

舒雷金, В.Шурыгин

舒林, ШуЛинь

舒马科夫, В.С.Шумаков

舒马乌斯卡斯, М.Ю.Шумаускас

舒曼, Шуман

舒米洛夫, Шумилов

舒伊斯基, Шуйский

司马文森, СымВэнь-сэнь

司徒雷登, СтюартЛейтан

司徒欧旺, СыТуОйВан

斯巴克, П.Х.Спаак

斯巴诺夫斯基, В.С.Спановский

斯彼哈尔斯基, Спыхальский

斯达汉诺夫，Н.П.Стаханов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斯杜尔姆，Стурм

斯多夫，维利，Willi Stoph

斯基捷尔斯基，Скидельский

斯捷潘诺夫，В.П.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Г.С.Степанов

斯捷平，В.Ф.Степин

斯卡奇科夫，С.А.Скачков

斯卡斯金，С.Д.Сказкин

斯科别利岑，Скобельцын

斯科特，Скотт

斯科里普科，Н.С.Скрипко

斯克鲁杰伊托尔，Скрутейтор

斯克沃尔佐夫，Т.Ф.Скворцов

斯拉博津，Ф.В.Слабкин

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

斯拉夫斯基，Славский

斯林甘贝尔格，Слинггенберг

斯柳萨列夫，Слюсарев

斯柳沙林科，П.Слюсаренко

斯卢茨基，Б.А.Слуцкий

斯洛博佳纽克，Слободянюк

斯米尔诺夫，Е.И.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А.А.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И.А.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К.Н.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Л.В.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Н.И.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斯基，Смирновский

斯米尔诺娃，Н.И.Смирнова

斯米尔秋科夫，Смиртюков

斯密特，Смит

斯密特，瓦德尔，Вардл-Смит

斯摩尔，Смолл

斯莫克图诺夫斯基，И.М.Смоктуновский

斯莫罗金诺夫，Смородинов

斯纳斯京，В.Снастин

斯涅奇库斯，А.Ю.Снечкус

斯诺，Сноу，Edgar Snow

斯帕诺，维里奥，ВелиоСпано

斯佩尔曼，Спеллман

斯佩西夫采夫，Спесивцев

斯皮里多诺夫，Б.М.Спиридонов

斯皮里多诺夫，Спиридонов

斯皮钦，В.И.Спицин

斯塔霍维亚克，Стаховяк

斯塔门科维奇，Стаминкович

斯坦尼盖特，Стенегейт

斯特凡斯卡娅，А.Н.Стефанская

斯特拉顿，Стрэттон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Страхов

斯特朗，Стронг，Anna Louise Strong

斯特里科维奇，М.А.Стырикович

斯特里扎克，Л.А.Стрижак

斯特利津，И.А.Стригин

斯特列利比茨基，Стрельбицкий

斯特罗卡齐，Строкач

斯特罗伊捷列夫，Строителев

斯特奇科夫，В.М.Стычков

斯滕斯盖特，Стенсгейт

斯通，约翰，ДжонСтон

斯图尔特，Стюарт

斯退丁纽斯，Стеттиниус

斯托凡，Штофан

斯托利亚罗夫，Г.И.Столяров

斯托蒙扬科夫，Стомоняков

斯托日科，阿列克赛·华西里叶维奇，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Стоженко

斯托亚诺夫，С.Н.Стойанов

斯托耶夫，Стойев

斯托伊科，基弗，КивуСтойкэ

斯维尔德洛夫，N. V. Sverdlov

斯维尔德洛夫，А.А.Свердлов

斯维里德琴柯，Свиридченко

松杰尔拉特，Сундерлад

松赞娃，Солнцева

宋槩卿，СунФэй-цин

宋鸿儒，СуннХунжу

宋琦，СунЦи

宋庆龄，СунЦинлин

宋双，СонСанн

宋涛，СунТао

宋希濂，СунСи-лянь

宋子文，СуньДи-жень，СунЦзы-вэнь

苏巴尔佐，Субарджо

苏班德里约，Субандрио，Subandrio

苏比亚克托，Субиякто

苏博京，Субботин

苏茨贝格，С.Сульцбергер

苏达科夫，С.Г.Судаков

苏达利科夫，Н.Г.Судариков，N. G. Sudarikov

苏迪罗，Судиро

苏尔加诺夫，Ф.А.Сурганов

苏尔科夫，А.А.Сурков

苏发努冯，Суфанувонг

苏根，班朋，БамбангСугенг

苏古尔巴也夫·达列力汗，СокурбаевДалельхан

苏哈托，Сухарто

苏霍德列夫，В.М.Суходрев

苏霍夫，А.М.Сухов

苏霍夫，Л.Г.Сухов

苏霍京，В.П.Сухотин

苏基曼，МашумиСукиман

苏吉斯曼，Судисман

苏加诺，Сукарно

苏江一，СуЦяньи

苏静，СуЦин

苏卡乔夫，В.Н.Сукачев

苏克舍拉宁，Сукселейнен

苏拉瓦底，Сухранварди

苏林，В.Сурин

苏伦扎布，Сурунжаб，Сурэнжав

苏罗索，Суросо

苏木，Тхум

苏纳约，Сунарьо，Сунарио

苏奇科夫，Сучков

苏什科，Сушко

苏斯林，Суслин

苏斯洛夫，Д.С.Суслов

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

苏斯洛夫，Суслов

苏伟明，СуВеймин

苏亚雷斯，М.Соареш

苏艳辉，СуЯн-хуй

苏振华，СуЧжэнь-хуа

素友，ТоХыу

粟裕，СуЮ

栗在山，ЛиЦай-шань

隋绍京，СыШао-тин

孙大山，СюйДашань

孙耕晓，СунКен-сян

孙继先，СуньДи-сен

孙科，СуньФо

孙立人，СуньЛижэнь

孙林，СуньЛинь

孙曼林，СуньМань-лин

孙梦彪，СуньМэнбяо

孙平(弗拉基米罗夫)，Суньпин

孙西岐，СуньСици

孙逸仙，СунЯт-сен

孙玉可，СуньЮйкэ

孙运茹，СуньЮн-жу

梭貌，СоМаунг

索巴诺夫，Собанов

索博列夫，А.А.Соболев

索博列夫，Соболев

索尔达托夫, А.А.Солдатов

索尔金, А.З.Соркин

索尔萨, К.Сорса

索尔塔托夫, Солдатов

索尔瓦切夫, К.Ф.Сорвачев

索菲亚, София

索夫罗诺夫, А.В.Софронов

索夫罗诺夫, Софронов

索古, 艾哈迈德, АхметЗогу

索科洛夫, Л.И.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斯基, В.Д.Соколовский

索科洛娃, В.С.Соколова

索科洛娃, М.В.Соколова

索良斯基, В.А.Солянский

索列达特, 桑恰, СанчаСоледад

索伦森, Соренсен

索罗金, Б.А.Сорокин

索罗金, В.А.Сорокин

索罗金, В.Г.Сорокин

索罗金，Сорокин

索罗科，Л.М.Сороко

索洛缅采夫，М.С.Соломенцев

索洛托夫尼克，Н.Солодовник

索洛维约夫，А.И.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А.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И.Т.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Л.Н.Соловьев

索南费尔特，Сонненфельдт

索尼里尼克，Сонильник

索斯科维奇，Сосковец

索苏尔巴拉姆，Сосорбарам

索先科娃，Г.М.Сосенкова

索辛，Сосин

塔别耶夫，Ф.А.Табеев

塔尔科夫斯基，Д.И.Тарковский

塔尔祖津，Тарзудин

塔盖尔，Тагер

塔哈耶夫，伊布莱，ИбрайТахаев

塔拉基，Н.М.Тараки

塔拉基，Тараки

塔拉索夫, А.В.Тарасов

塔拉索夫, Н.И.Тарасов

塔雷津, Талызин

塔姆, И.Е.Тамм

塔尼娅(李敏), Таня

塔诺维奇, В.Г.Данович

塔舍列夫, Ташелев

塔塔拉什维利, П.И.Татарашвили

塔托木, Татомо

太田清藏, С.Ота

泰勒, Тэйлор

泰里尔, Тайрер

覃振, ТаньЧжэнь

谭平山, ТанПиншань

谭淑云, ТанШеу-юй

谭伟, ТанВэй

谭震林, ТаньЧжэньлин

谭政, ТаньЧжэнь

坦布南, Тамбунан

汤恩伯, ТанЭньбо

汤普森, Томпсон

唐宾明，ТанБин-Мин

唐俊飞，ТанЦзюнь-фэн

唐克，ТанКэ

唐南平，ТанНаньпин

唐诗因，ТанШи-ин

唐世嘉，ТанШиЦзя

唐坦义，ТанТэни，ТанТэн-и

唐天际，ТанТяньдан

唐锡华，ТанСиХуа

唐钺，ТанЮе

唐珍，ТанЧжен

陶大盛，ТаоДа-шэн

陶行知，ТаоСинчжи

陶里亚蒂，Тольятти

陶立中，ТаоЛичжун

陶鲁笳，ТаоЛу-цзя

陶斯，Тауз

陶希圣，ТаоСишэн

陶峙岳，ТаоЧэйио

特尔洛夫，М.А.Тырлов

特卡切夫，Ткачев

特卡琴科, В.Ф.Ткаченко

特拉温, А.Ф.Травин

特里福诺夫, В.Трифонов

特列菲利耶夫, Трефилев

特列菲洛夫, В.С.Трефилов

特列季亚科夫, П.Г.Третьяков

特列季亚科夫, Третьяков

特鲁边科夫, В.Трубенков

特鲁宾诺,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Трубино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特鲁多, Трюдо

特鲁哈诺夫斯基, В.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特鲁京斯, Д.И.Трудинс

特罗扬诺夫斯基, О.А.Трояновский, О. Troyanovsky

特罗伊茨基, Б.В.Троицкий

特洛菲缅科, Р.Г.Трофименко

特万丘克, Д.П.Тыванчук

滕代远, ТэнДай-юань

藤山爱一郎, Фудзияма, Fujiyama Aiichiro

藤田茂, ФудзитаСигэру

藤田实彦(田友), Фудзита(Татомо), Fujita Sanehiko

田友(藤田), Татомо(Фудзита), Tatomo

铁托，约瑟普·布罗兹，ИосипБрозТито，Broz Tito

听涛克巳，КацумиКикунами

通金，Г.И.Тункин

佟衡，ТунХан

图尔古诺夫，Т.Тургунов

图尔松扎德，М.Турсун-Заде

图尔苏诺夫，Турсунов

图加里诺夫，И.Тугаринов

图坎，ТейзирТукан

图拉利耶夫，О.Туралиев

图马诺夫，Туманов

图马诺娃，З.П.Туманова

图穆尔奥奇尔，Тумур-Очир

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

土登晋美诺布，ТангцерДэнпрабче

托宾，ТобинГ

托多洛维奇，Тодорович

托尔宾科夫，Н.Е.Торбенков

托尔库诺夫，Толкунов

托尔斯季科夫，В.Г.Толстиков

托尔斯季科夫，В.С.Толстиков

托尔斯泰，А.Н.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列夫，Л.Н.Толстой，ЛевТолстой

托夫马相，С.Товмасян

托夫斯托诺戈夫，Г.А.Товстоногов

托卡尔，Токар

托卡列夫，С.А.Токарев

托卡列夫，Токарев

托克马科夫，Б.Токмаков

托里斯里奥，Торизльо

托列达诺，洛姆巴尔多，ЛомбардоТоледано

托马斯，查尔斯，ЧарльсС.Томас

托米辛，Е.Ю.Томихин

托普里亚，З.В.Топурия

托普奇耶夫，А.В.Топчиев

托瓦洛夫斯基，М.Д.Товаровский

托伊夫，Тойв

托伊贡巴耶夫，Дж.Тойгомбаев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瓦尔福洛梅耶夫，Варфоломеев

瓦尔拉莫夫，Л.Варламов

瓦尔塔诺夫，В.Н.Вартанов

瓦格纳，Вагнер

瓦拉金娜，Варакина

瓦里科夫，В.А.Вальков

瓦里科夫，О.Вальков

瓦罗乌夫，Вароув

瓦宁科夫，Б.Ванинков

瓦日诺夫，Важнов

瓦沙泽，Н.Г.Вашадзе

瓦塔拉，Д.Уаттара

瓦维洛夫，А.М.Вавилов

瓦维洛夫，Вавилов

瓦维洛夫，С.И.Вавилов

瓦西科，Васько

瓦西科夫，В.В.Васьков

瓦西科夫，В.Х.Васьков

瓦西科夫，О.В.Васьков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Г.М.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И.В.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Н.Г.Васильев

瓦西连科，В.Х.Василенко

瓦西连科，М.П.Василенко

瓦西列夫斯卡娅，Василевская，Vanda Vasilevskaya

瓦休科维奇，Васюкович

万南莉莉，ВаньНаньЛили

万斯，С.Вэнс

汪道涵，Wan Daohan

汪道涵，ВанДаохан

汪东兴，ВанДун-син

汪锋，ВанФын

汪精卫，ВанЦзинвэй

王宝金，ВанБоцзинь

王宝琴，ВанБао-цин，ВаньБао-чин

王保民，ВанБао-минь

王北超，ВанБэй-чао

王炳南，ВанБин-Нань

王承志，ВанЧенчжи

王崇古，ВанЧун-гу

王大军，ВанДацзюнь

王德广，ВанДэГуан

王福，ВанФу

王光宁，ВанГуан-нинь

王寒生 , ВанХань-шэн

王翰 , ВанХань

王洪儒 , ВанХун-жу

王洪文 , ВанХун-вэнь

王华馥 , ВанХуаФоу

王化南 , ВанХун-нань

王怀安 , ВанХуайАнь

王稼祥 , ВанЦзя-сян , ВанЦзя-сянь , ВанЦзясян

王江 , ВанЦзян

王杰 , ВанЦзэ

王荃卿 , ВанЦзиньЦинь

王昆仑 , ВанКуньлунь , Ван Кунлунь

王阑西 , ВанЛан-си

王力 , ВанЛи

王立中 , ВанЛи Чжун

王利浩 , ВанЛи-хао

王烈珠 , ВанЛе-цзу

王迈 , ВанМай

王满寿 , Ван Маньшоу

王明 , Ван Мин

王平 , Ван Пин

王琦 , Ван Ци

王乾石 , Ван Чень-ши

王巧波 , Ван Дзябо

王勤 , Ван Цюнь

王清河 , ВанЧинхэн

王秋民 , ВанЧжоу-мин

王群林 , ВанЧун-лин

王仁 , Ван Жэнь

王如业 , Ван Жусе ,

王汝琪 , Ван ЖуЦи

王若飞 , Ван Жофэ , Ван Жофэь , Ван Жофэй , Вани Фей

王实甫 , Ван Шифу

王世杰 , Ван Шицзэ

王思华 , Ван Сыхуа

王文晓 , Ван Вэньсяо

王喜章 , Ван Сичжан

王祥鸣 , Ван Сянмин

王晓晨 , Ван Сяочен

王效明 , Ван Сяо-мин

王新华 , Ван Синхуа

王新琼 , Ван Син-Чун

王秀唐, Ван СюТан

王勋, Ван Сюнь

王耀臣, Ван Яоцень

王揖, Ван Цзе

王应元, Ван Ин-вон

王友善, Ван Яошань

王雨田, Ван Юй-тянь

王毓宾, Ван Юй-бинь

王云五, Ван Юньу

王蕴瑞, Ван Вэнь-жуй

王战平, Ван Чжан Пин

王照华, Ван Жун-Хуай

王哲阳, Ван Чжеянь

王之成, ВанЧжичжэн

王之佑, ВанЧжи-ю

王志全, ВанЧжи-цюань

王忠义, ВанЧжун-и

王仲方, ВанЧжун-фан

王竹溪, ВанДзуСи

威尔科克斯, Вилкокс

威尔逊, Вильсон

威尔逊，Г.Вильсон

威斯特摩兰，Уэстморленд

韦尔边科，А.А.Вербенко

韦尔德什，Вердыш

韦尔霍夫斯基，И.М.Верховский

韦尔希宁，К.А.Вершинин，К. А. Vershynin

韦国清，ВэйЮцин

韦基洛夫，А.Х.Везиров

韦君宜，ВэйЦзюнь-и

韦利卡诺夫，П.С.Великанов

韦利克列茨基，А.Н.Великорецкий

韦列伊斯基，Верейский

韦特卢日斯基，Ветлужский

韦夏金，Н.И.Висягин

韦休诺夫，С.С.Вещунов

维比索诺，尤素福，ЮсуфВибиосоно

维尔凯耶娃，В.Н.Веркеева

维尔科夫，Н.Н.Вылков

维尔洛茨基，Верлоцкий

维基，贝尔，БеллУити

维克多，Виктор

维拉斯科，Веласко

维里加耶夫，Вильдяев

维里津，Г.П.Великий

维连斯基，Б.М.Виленский

维列缅耶夫，Веремьев

维美徐，让纳特，ЖанеттаВермерш

维诺格拉多夫，В.А.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В.Н.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Д.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И.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И.М.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К.К.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С.А.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库罗夫，И.К.Винокуров

维诺库罗夫，К.Д.Винокуров

维塞林诺夫，И.Веселинов

维什尼亚科夫，Вишняков

维什涅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

维特科维奇，Н.Е.Виткович

维特韦尔，И.А.Витвер

维沃尔德，Фервурд

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

维亚特金，А.Е.Вяткин

维约普拉诺托，苏卡佐，СукарджоВирийопраното

梶塚隆二，Кадзицука，Kazusika Ryuji

卫立煌，ВэйЛихуан

魏德迈，Ведемейер

魏克玛沁格，Викремасингх

魏列夏金，Б.Н.Верещагин

温克斯，Уикс

温尼茨基，Е.Е.Винницкий

温宁，ВэньНин

文建平，ВэньЦзянь-пин

文进勇，ВанТиенЗунг

文日，МинИр

闻柏山，ВэньБо-шань

闻江平，ВэньЦзян-пин

闻山，ВеньШань

闻一多，ВеньИ-до

翁东，Утонг，Унтунг

翁文灏，ВэнВэньхао

沃德，达德里，ДадлиУорд

沃尔科夫，А.Волков

沃尔科夫，А.П.Волков

沃尔恰尼诺夫，Волчанинов

沃康，I. K. Vokan

沃克，Уккер

沃连科，И.Воленко

沃龙科，Е.А.Воронко

沃龙科娃，Л.Воронкова

沃龙佐夫，Воронцов

沃罗比约夫，В.Я.Воробьев

沃罗比约夫，Воробьев

沃罗诺夫，Воронов

沃洛霍夫，Волохов

沃什尼亚克，Вошняк

沃斯，А.Э.Восс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П.З.Воскобойников

沃斯克列夫斯基，Е.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沃特森，Уотсон

沃先金，В.И.Вощанкин

沃伊诺娃，Воинова

沃兹涅先斯基，Д.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沃兹涅先斯基，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乌布利希，瓦尔特，Walter Ulbricht，Ульбрихт

乌达利佐夫，А.Д.Удальцов

乌达洛夫，Удалов

乌戈利科夫，Н.Угольников

乌格林，УГэ-лин

乌格留莫夫，Угрюмов

乌拉内切夫，Уланычев

乌兰达兰，Улан-Далай

乌兰夫，Улан-ху，Уланьфу

乌兰切夫，Уланчев

乌里扬诺夫斯基，Ульяновский

乌里扬诺娃，Ульянова

乌鲁蒂亚，弗兰奇斯克，ФранческоУррутия

乌姆，布恩，БунУм

乌萨切夫，И.Г.Усачев

乌斯季诺夫，Д.Ф.Устинов

乌斯满，Осман

乌斯片斯基，Г.М.Успенский

乌苏巴利耶夫，Т.Усубалиев

乌特金, В.М.Уткин

乌托约, 班朋, БамбангУтойо

乌托约, 库苏莫, КусумоУтойо

乌瓦洛夫, А.С.Уваров

吴巴瑞, УБаСве

吴波, УБо

吴潮涛, УХань-тао

吴传启, УЧуан-ци

吴丹, УТан

吴登佩敏, УТенПеМин

吴桂贤, УГуй-сянь

吴国贵, УГо-гуй

吴国祯, УГожэнь

吴晗, УХань

吴厚心, УХоуСинь

吴焕章, УХань-чжун

吴觉迎, УЧжоНейн

吴莱培, УЛакпый

吴冷西, УЛэн-си

吴茂荪, УМаосунь

吴努, УНу

吴全衡 , УЦюань-хэнь

吴瑞辉 , ВуЖунхэн

吴瑞林 , УЖуй-линь

吴铁城 , УДэ-чэн , УТэчэн

吴庭艳 , НгоДиньДьем

吴文涛 , УВэнь-тао , УВэньтао

吴学谦 , УСюэЦянь

吴耀武 , УЯо-У

吴业刚 , УЕган

吴云丘 , УЮньчу

伍修权 , УСютюань

武部六藏 , ТакебэРокузоо , Takebe Rokuzo

武汉周 , УХань-чжун

武蔻 , ВуКхоан

武元甲 , ВоНгуенЗиап , Vo Nguyen Giap

西多鲁克 , 格奥尔基·马丁诺维奇 , СилорукГеоргий

Мартынович

西多罗夫 , Сидоров

西多罗维奇 , Г.С.Сидорович , G. S. Sidorovich

西弗(刘少奇) , Сиф

西福罗夫 , В.И.Сифоров

西格蒂，Сигетти

西哈努克，Сианук

西季赫梅洛夫，Сидихмелов

西季赫缅诺夫，В.Я.Сидихменов

西卡切娃，Р.Н.Сикачева

西拉耶夫，В.Силаев

西林，Силин

西卢亚诺夫，Н.М.Силуянов

西伦凯维茨，Jozef Cyrankiewicz

西罗秋克，О.Ф.Сиротюк

西马科夫，И.Н.Симаков

西蒙诺夫，К.Симонов

西蒙诺夫斯基，Л.В.Симоновский

西米奇，Семич

西尼洛夫，К.Р.Синилов

西萨基扬，Н.М.Сисакян

西斯科，Сиско

西特尼克，Г.Ф.Ситник

西托洛夫，Сидоров

西泽，Нисидзава

西佐夫，Н.Т.Сизов

希巴耶夫, В.А.Шибает

希德万, 卡尔, Karl Schirdewan

希尔, Хилл, Hill

希尔, 特列沃夫, ТревофХилл

希尔曼, Ширман

希季科夫, А.П.Шитиков, Shitikov

希金, И.В.Шикин

希克逊, Хиккерсон

希里亚耶夫, Н.Ширяев

希利克维奇, Хилькевич

希伦布兰德, Хилленбранд

希罗基, Широкий

希马诺夫, К.И.Шиманов

希缅诺夫, Сименов

希姆萨, Б.М.Шимша

希涅茨基, А.Я.Синецкий

希什林, Шишлин

希特罗夫, А.Хитров

希特罗夫, С.Д.Хитров

熙洽, СиЦя

习仲勋, СиЦжун-сюнь, Xi Zhongxun

下田，Симода

下枝龙男，СимоедаТацуо，Shimoeda Tatsuo

夏尔马，约金德拉，ЙогендраШарма，Sharma

夏景光，СяЦзинь-Гуань

夏莉雅，СяЛи-я

夏蒙，Шамун

夏明，СяМин

夏皮罗，Шапиро

夏斯特里，Шастри

夏衍，СяЯнь

夏征农，СяЧжэн-нун

先科夫，Сенков

先诺夫，В.И.Сеннов

显雅，Зейя

向明，СянМин

向全，СяньЦаонь

肖斌杰，СяоБинцзэ

肖纪美，СяоДзиМей

肖荣泉，СяЛун-чуань

肖斯塔科维奇，Шостакович

肖向荣，СяоСян-жун

肖扬，СяоЯнь

肖应棠，СяоИн-тан

萧华，СяоХуа

萧劲光，СяоЦзинь-гуань

萧克，СяоКэ

萧三，ЭмиСяо

萧同兹，СяоТунцзы

萧也牧，СяоЯнь-мо

萧铮，СяоЧжэн

谢巴，Е.К.Сепп

谢本芝，СеБанчжи

谢澄平，СеЧен-пин

谢德利切夫，Н.Н.Седричев

谢德利亚列维奇，В.А.Седляревич

谢恩，米亚，МьяСейн

谢尔，Шеель

谢尔巴德赫，В.Д.Шербатых

谢尔巴科夫，А.М.Щербаков

谢尔巴科夫，И.С.Щербаков

谢尔巴托夫，М.И.Щербатов

谢尔比茨基，В.В.Щербицкий

谢尔比纳，В.Щербина

谢尔宾，Сербин

谢尔盖(毛岸英)，Сергей

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

谢尔盖耶维奇，Сергеевич

谢尔吉耶夫，А.В.Сергиев

谢尔吉耶夫斯基，Сергиевский

谢尔久克，З.Т.Сердюк

谢尔久克，Сердюк

谢尔曼，Шерман

谢尔秋琴科，Сердюченко

谢甫生，СеФу-шэн

谢富治，СеФучжи

谢光宝，ТаКуангБыу

谢赫，穆罕默德·乌尔德，МохаммедУльдШейх

谢胡，М.Шеху

谢季宁，Г.Б.Щетинин

谢拉菲莫夫，В.В.Серафимов

谢里维尔斯托夫，В.Г.Селивёрстов

谢利瓦诺夫，Селиванов

谢利瓦诺夫，Т.А.Селиванов

谢廖金，Серегин

谢廖沙(毛岸英)，Сережа

谢列布利亚科夫，Н.В.Серебряков

谢列平，А.Н.Шелепин

谢列斯特，П.Е.Шелест

谢罗夫，И.А.Серов

谢米恰斯内，В.Е.Семичастный

谢米恰斯特诺夫，Семичастнов

谢米伊金，А.С.Семейкин

谢苗诺夫，А.С.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А.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Е.М.Семёнов

谢姆科夫斯基，А.Семковский

谢皮洛夫，Д.Т.Шепилов

谢斯坦，Шестак

谢特列茨基，Седлецкий

谢瓦尔德纳泽，Э.А.Шеварнадзе

谢伟思，Сервис，John S. Service

谢西金，К.Е.Сеськин

谢祥春，СеОянЧунь

谢逊，СеСюнь

谢梓群 , СеЦзы-цюнь

辛博隆 , Симболон

辛格 , СваранСингх

辛格 , Сингх

辛威尔 , Шинуэлл

辛尊易 , СинЦун-и

邢国文 , СеньГовень

邢士廉 , СинШи-лынь

邢索 , СинСо

熊式辉 , СюньШи-хуэй , СюнШихуй

休姆 , 道格拉斯 , Дуглас-Хьюм

休斯曼 , Гюйсман

休特金 , Сюткин

徐波 , СюйБо

徐福林 , СюйФу-линь

徐辉 , СоХи

徐家福 , СюйЗдяФу

徐减哉 , СюЧэн

徐介藩 , СюйЦзэфань

徐景学 , СюйЦзинское

徐林正 , СюйЛинцин

徐明, СюйМин

徐向前, СюйСянцянь

徐晓, СюйСяо

徐以新, СюйИ-синь

徐永昌, СюйЮньчан

许德珩, СюйДэ-хэн

许涤新, СюйДэ-син, СюйЦзи-син

许哥而(许可仪), ХеГай

许季龙, СюйЦзи-лун

许杰, СюйЦзе

许琼谢莉莉, СюТюин-сейЛили

许世友, СюйШи-ю

许兴民, СюСинмин

绪方太郎, ТароОгата, Ogata Taro

宣马扬, СюаньМаЯн

宣淼, СюаньМяо

宣祥沃, СюаньСянь-уо

薛春圃, СюеЧунь-пу

薛暮桥, СаМу-цяо

薛岳, СеЮэ

雅科夫列夫, В.Г.Яковлев

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

雅克沙明，М.Ф.Якшамин

雅库鲍夫斯基，Ф.Б.Якубовский

雅罗辛斯基，Яросинский

雅沙，陈祖涛，ЧенЦу-Таояша

亚布罗吉娜，А.А.Яблокина

亚基姆科，П.Г.Якимук

亚历山大，В.Александр

亚历山德罗夫，А.В.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М.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Н.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П.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С.В.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娃，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亚林哥，Ярринг

亚罗舍维奇，Ярошевич

亚罗申科，А.И.Ярошенко

亚明，Ямин

亚纳耶夫，Янаев

亚尼，Яни

亚斯克维奇, А.А.Яскевич

亚斯诺夫, В.А.Яснов

亚斯诺夫, М.А.Яснов

亚斯特罗波夫, Г.Ястобов

亚塔, 阿里, АлиЯта

亚特采列夫, Ятцелев

亚特诺, Н.Ятно

亚佐夫, Язов

闫虎山, ЯнХушань

严济慈, ЯнЦзэнцы

严书夏, Яньшу-ся

盐津辰巳, СиодзиТацуми, Shiozu Tatsumi

阎宝航, ЯнБао-шан, ЯньБаохан

阎传绂, ЯньЧуаяь-фу

阎明复, ЯнМинфу, ЯньМин-фу

阎锡山, ЯнСишань

雁谒森, ИндинСэн

扬申, С.И.Яншин

阳翰笙, ЯнХань-шен

杨成武, ЯнЧен-у

杨芙清, ЯнФуЦин

杨富 , ЯнФу

杨格 , Янгер

杨格远 , ЯнГэюань

杨继池 , ЯнЦзицы

杨奎龙 , ЯньКуйлун

杨立铭 , ЯнЛиМин

杨琳 , ЯнЛинь

杨民志 , ЯньМин-чжи , ЯнМиньчжи

杨乃文 , ЯнНай-вин

杨培新 , ЯнПэй-синь

杨尚昆 , ЯнШан-кунь , ЯнШанкун

杨少玉 , ЯнСао-юй

杨世泽 , ЯнШи-цзэ

杨松 , Янсон

杨伟 , ЯнВей

杨卫华 , ЯнВэнь-хай

杨喜民 , ЯнШиминь

杨显东 , ЯнСяньдун , ЯнСяньдун

杨献珍 , ЯньСянь-чжэн , ЯнСянь-чжэн

杨晓云 , ЯньСяо-юнь

杨秀峰 , ЯнСю-финь , ЯнСюэ-фын

杨义臣, ЯнИЧэнь

杨英杰, ЯнИнь-цзе

杨勇, ЯнЮнь

杨云贲, ЯнЮнь-пэнь

尧东, ЙоХтут

姚立, ЯоЛи

姚溱, ЯоЧжэнь

姚庆祥, ЕКен-сан

姚文元, ЯоВэнь-юань

姚仲明, ЯоЧжун-мин

耶格尔, Л.Джегер

耶斯佩森, Есперсен

野坂, Нодзака, Nozaka

野坂参三, НодзакоСандзо, Носака, Nozaka Sanzo

叶成章, ЕЧенгченг

叶德友, ЕДэю

叶多文, Н.П.Едовин

叶尔马赫, Ермохин

叶尔马科夫, Т.Г.Ермаков

叶尔莫拉耶夫, Ермолаев

叶尔莫洛夫, В.И.Еролов

叶尔绍夫, В.С.Ершов

叶飞, ЕФей

叶菲莫夫, Г.Г.Ефимов

叶菲莫夫, Ефимов

叶夫多基莫夫, А.И.Евдокимов

叶夫列莫夫, Л.Н.Ефремов

叶夫列莫夫, О.Н.Ефремов

叶夫斯特拉托夫, М.Е.Евстратов

叶戈雷切夫, Н.Г.Егорычев

叶戈罗夫, Егоров

叶戈罗夫, М.С.Егоров

叶戈罗夫, П.И.Егоров

叶戈罗娃, Егорова

叶公超, ЕГунчао

叶海亚汗, ЯхьяХан

叶護生, Ye Husheng

叶季壮, ЕЦзи-чжуан, ЕЧзичжуан

叶剑英, ЕЦзянь-ин

叶利钦, Б.Н.Ельцин

叶利扎洛夫(蒋经国), Елизаров

叶廖明, И.А.Еремин

叶廖明，Н.Ф.Еремин

叶列梅耶夫，Еремеев

叶留金，В.П.Елютин

叶罗费耶夫，Ерофеев

叶罗费耶夫，Н.Г.Ерофеев

叶罗戈夫，М.С.Ерогов

叶梅利亚诺夫，В.С.Емельянов

叶梅利亚诺夫，С.И.Емельянов

叶皮谢夫，А.А.Епишев

叶青，ЕЦин

叶秋，ЕДзю

叶特科夫斯卡娅，Р.Едковская

叶韦利诺夫，Евелинов

叶西科夫，Л.Л.Еськов

叶西片科，Д.А.Есипенко

叶子龙，ЕЦзы-лун

伊巴露丽，Ибаррури

伊布赖莫夫，С.Ибраимов

伊顿，С.Итон

伊夫琴科，А.Н.Ивченко

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ьев

伊格纳托夫，Н.Г.Игнатов

伊赫捷依曼，М.С.Ихтейман

伊利切夫，Л.Ф.Ильичев

伊利亚什，Н.Ильяш

伊林，М.Ильин

伊柳申，А.А.Ильюшин

伊柳欣，В.М.Илюхин

伊敏诺夫·阿不都拉希特，ИминовАбдурашит

伊姆舍涅茨基，Имшенецкий

伊纽什金，М.Инюшкин

伊诺克，Инок

伊诺泽姆采夫，Н.Н.Иноземцев

伊萨科夫斯基，М.В.Исаковский

伊萨科夫斯基，М.Исаковский

伊萨延科，В.С.Исаенко

伊萨耶夫，А.А.Исаев

伊斯哈科夫，АсхатИсхаков

伊斯卡诺夫，М.Исканов

伊斯坎达罗夫，Р.Искандаров

伊斯马伊洛夫，Исмаилов

伊斯特万·道比，ИштванДоби

伊通，赛鲁斯，СайрусИтон

伊瓦舒京，П.Ивашутин

伊万尼，Иваний

伊万尼茨基，М.Ф.Иваницкий

伊万年科，В.И.Иваненко

伊万诺夫，А.А.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А.И.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А.М.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Б.С.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Б.С.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И.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Т.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Ф.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И.Т.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К.К.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М.И.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М.Иванов

伊万诺娃，Иванова

伊万丘克，П.П.Иванчук

伊谢克，Ишык

伊扎科夫，Изаков

伊扎诺夫, И.А.Изанов

易边, Yi Bian

易卜拉欣, 穆罕默德, МохаммедИбрагим

因诺肯季, Иннокентий

尹公钦, ЮнКоХын

英萨利, ИенгСари

雍文谦, УнгБанКъхем

尤德, Э.Юд

尤尔卡, Юрка

尤尔克维奇, Юркевич

尤尔奇克, Е.Т.Юрчик

尤哥夫, Югов

尤金, П.Ф.Юдин, Р. F. Yudin

尤开元, ЮКай-юань

尤里, 黄平, ХуанПинЮрий

尤努索夫, А.Юнусов

尤努索夫, 尤努索维奇·萨比尔, ЮнусовСабир

Юнусович

尤任, Южин

尤申, Я.В.Юшин

尤苏波夫, М.Юсупов

尤特克维奇, С.Юткевич, 苏联导演

有麻多罗尾, АримаТарао, Arima Taro

于北辰, ЮйБей-чэнь

于斌, ЮйБин

于洪亮, ЮйХунлянь

于杰, ЮйЦзэ

于静远, ЮйЦзин-юань

于镜涛, ЮйЦзин-тао

于林, ЮйЛин

于树中, ЮШу-цзун

于彦波, ЮйЯнПо

于毅夫, ЮйИ-фу

于右任, ЮйЮжэнь

余彬, ЮйБин

余光生, ЮйГуаньшэн

余江, ЮйЦзянь

余湛, ЮйЧжань

俞大维, ЮйДавэй

俞鸿钧, ЮйХунцзюнь

俞沛文, ЮйПэйвэнь, ЮйПэй-вэнь

俞平伯, ЮйПинбо

裕仁，Хирохито

袁斌，ЮэБинь

袁牧之，ЮанМучжи

袁齐贞，ЮаньЧжи-цин

袁世凯，ЮаньШи-кай

袁天琪，ЮаньТяньци

袁振，ЮаньЧжень

袁致勤，ЮаньЧжицин

袁仲贤，ЮаньЧжун-Сян

原弘志，ХараХироси，Hara Hiroshi

约多，Ньото

约夫列夫，Ивлеев

约甘松，Б.В.Иогансон

约翰逊，Л.Б.Джонсон

约翰逊，阿列克西斯，АлексисДжонсон

约诺夫，Е.А.Ионов

约西普克，Есипко

岳元，Юе-иань

越飞，Иоффе

云宇，ЮнЮй

云泽(乌兰夫)，ЮньЦзе

臧启芳，ЧжоуЦзин-вень

泽登巴尔，Цеденбал

泽狄布，Ценд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А.И.Дзенс-Литовский

泽弗林，Зефрин

泽连佐夫，В.А.Зеленцов

泽诺夫，Зенов

泽沃格米德，Цэвэгмид

扎博罗夫斯基，П.Т.Заборовский

扎博洛茨基，Н.А.Заболоцкий

扎布拉夫涅夫，Заплавнев

扎布罗金，Е.Г.Забродин

扎尔科夫，Жарков

扎哈尔琴科，П.И.Захарченко

扎哈罗夫，А.В.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В.Л.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П.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М.В.Захаров

扎赫瓦塔耶夫，Захватаев

扎基洛夫，阿布杜尔，АбдулЗакиров

扎卡托夫，П.С.Закатов

扎里波娃, Н.Зарипова

扎卢日内, В.И.Залужный

扎鲁宾, Г.Н.Зарубин, G. N. Zarubin

扎米亚京, Замятин

扎莫什金, А.И.Замошкин

扎姆布罗夫斯基, Замбровский

扎姆切夫斯基, И.К.Замчевский

扎斯洛诺夫, 康斯坦丁, КонстантинЗаслонов

扎特, 瓦尔特, ВальтерДжадд

扎瓦茨基, Завадский

扎沃龙科夫, Жаворонков

扎沃龙科夫, С.Жаворонков

扎夏迪科, А.Ф.Засядько, A. F. Zasyadko

扎伊采夫, В.А.Зайцев

扎伊采夫, Зайцев

扎伊采娃, Т.В.Зайцева

扎伊莫夫, Заимов

扎伊帕尔, Р.Джайпал

斋藤美夫, СайтоИосио, Saito Yoshio

詹勤泽, Jan Cin-dse

张爱萍, ЧжанАй-пин

张保英 , ЧжанБо-ин

张蓓飞 , ЧжанПын-фэй

张伯恒 , ЧжанБо-хэн

张伯伦 , Чемберлен

张弛亮 , ЧжанЧилян

张春桥 , ЧжанЧунь-цяо

张春山 , ЧанЧхунСан

张岱年 , ЧжанДай-нян

张道藩 , ЧжанДаофань

张德群 , ЧжанДэ-цюнь , ЧжанДэЦунь , Zhang Deqong

张东川 , ЧжанДун-чуань

张东荪 , Чжан Дун-сун , Чжан Дунсунь

张舵全 , Чан До-чуан

张凡 , Чжан Фань

张凡时 , Чжан Фынши

张方 , Чжан Фан

张非垢 , Чжан Фэй-гоу

张风 , Чжан Фын

张庚 , Чжан Гэн

张光 , Чжан Гуань

张国华 , Чжан Го-хуа

张国庆 , Чжан Гочэн

张国焘 , Чжан Го-тао

张化东 , Чжан Хуа-дун

张际春 , Чжан Ди-чунь , Чжан Цан-чунь

张家福 , Чжан Цзя-фу

张嘉璈 , Чжан Цзя-ао , Чжан Цзяо

张金镇 , 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

张景惠 , Чжан Цзинкуй , Чжан Цзин-хой

张君勱 , Чжан Цзюнь-май , Чжан Цзюньмый

张克侠 , Чжан Ке-ся

张澜 , Чжан Лань , Чжань Лань

张霖之 , Чжан Линь-чжи

张玛娅 , Чжан Мая

张明远 , Чжан Мин-юань , Zhang Menyuan

张莫潭 , Чжан Мо-тан

张宁和 , Чжан Нинхэ

张平山 , Чан Пен Сак

张琴秋 , Чжан Чинчу

张群 , Чжан Цюн , Чжан Цюнь

张如申 , Чжан Жу-Шень

张瑞华 , Чжан Жуй-хуа

张瑞杰 , Чжан Жуйц-зе

张申府 , Чжан Шэнь-фу , Чжан Шэньфу

张莘夫 , Чжан Синфу

张时雨 , Чан СиУ

张世之 , Чжан Шичжи

张寿钱(李兆麟) , Чжан Шоу-цян

张树元 , Чжан Шу-юань

张太雷 , Чжан Тайлый

张维桢 , Чжан Вэй-чэн

张伟烈 , Чжан Вэй-ле , Zhang Weile

张伟潘 , Чан Вэньпан

张文强 , Чжан Вин-чжан

张闻天 , Чжан Вэньтянь , ЧжанВэнь-тянь

张奚若 , Чжан Си-жо

张锡俦 , Чжан Си-чоу

张玺 , Чжан Си

张秀山 , Чжан Сюшан , Чжан Сюшань

张学良 , Чжан Сюэлян

张学思 , Чжан Сюэси

张扬 , Чжан Янь

张荫达(胡风) , Zhang Yinda

张英伏 , Чжан Инь-фу

张英志 , Чжан Инчжи

张映吾 , Чжан Ин-у , Чжан Инь-у

张友渔 , Чжан Ююй , Чжан Яюй

张玉香 , Чжан Юйсянь

张钰哲 , Чжан Юйчже

张云里 , Чжан Юнь-ли

张增敬 , Чжан Цзэн-цзин

张之毅 , Чанг Чи-и

张芝明 , Чжан Чжи-мин

张治中 , Чжан Чжичжун , Чжан Чжи-чжун

张致祥 , Чжан Цзы-сян , Чжан Чжисян

张钟伟 , Чжан Чжун-вэй

张仲良 , Чжан Чжун-лян

张仲实 , Чжан Чжун-ши

张子意 , Чжан Цзы-и

张作霖 , Чжан Цзолинь

张作相 , Чжан Цзосян

章伯钧 , Чжан Боцзюнь , Чжан Боцзюнь

章丁 , Джан Дин

章汉夫 , Чжан Хань-фу , Чжан Ханьфу

章乃器 , Чжан Най-ци

章树岑 , Чжэн Шуцзынь

章文晋 , Чжэн Вэнь-цзинь

章泽 , Чжан Цзэ

章志明 , Чжан Чжи-мин

长岛勤 , Нагасима Цутому , Nagashima Tsutomu

长征 , Труонг Шин , Чионг Тинь , Чыонг Тинь , Truong Chinh

赵白 , Чжао Вэй

赵大泰(赵世炎) , Чжао Та-те

赵德尊 , Чжао Дэ-цзунь

赵景强 , Чжао Цзин-чан

赵民新 , Чжао Минсинь

赵乔 , Чжао Чао

赵世晨 , Чжао Шичжень

赵世克 , Чжао Ши-кэ

赵守攻 , Чжао Шоу-гун

赵守义 , Чжао Шоу-и

赵树理 , Чжао Шули

赵万明 , Чжао Вэньминь

赵毅敏 , Чжао Иминь , ЧжаоИ-мин

赵仲时 , Чао Чжин-ци

赵朱琴 , Чжао Чжучэнь

赵紫阳 , Чжао Цзянь

真珠尔扎布 , Чжэнчжурчжаб

郑道儒 , Чен Дао-му

郑洞国 , Чжан Дунго

郑介民 , Чжэнь Цзэ-минь

郑群壁 , Чжэн Чун-би

郑汝骊 , Чжен Жу Ли

郑廷焯 , Чжэн Тинчжо

郑希申 , Чжэн Си-шен

郑一龙 , Тен ИрЛен

郑伊万 , Чжи И-ван

郑准泽 , Тен Дюн Тхяк

志野平仪 , Сея Хираку

中曾根康弘 , Накасонэ

钟杰民 , Чжун Цземинь

钟民 , Чжун Мин

钟庆发 , Чжун Цин-фа , Цжун Цин-фа

钟天新 , Чжун Тяньсинь

重光葵 , Сигемицу , Shigemitsu Mamoru

周保中 , Чжоу Бао-чжун

周彪 , Чжоу Бяо

周才凡 , Чхоу Цайфань

周大鲁 , Чжоу Да-лу

周恩来 , Чжоу Энълай

周凯申 , ЧжоуГэнь-шен

周璐芬 , ЧжоуЛу-фын

周楠 , Чжоу Нань

周戚微 , Чжоу Ци-вень

周琴 , Чжоу Цзинь

周秋野 , Чжоу Цю Е

周尚白 , Чжоу Шань-пэй

周巍峙 , Чжоу Вей-ши

周希汉 , Чжоу Си-хань

周夏冰 , Чжоу Сяпин

周小舟 , Чжоу Сяочжоу

周新民 , Чжоу Синьминь

周兴 , Чжоу Син

周岩苏 , Чжоу Янь-су

周扬 , Чжоу Ян , Жоу Янь

周毓麟 , Джоу Ю Линь

朱安达 , Онг Енг Ди

朱安达，拉登，Раден Джуанда

朱德，Чжу Дэ

朱光，Чжан Гуан

朱光，Чжу Гуан

朱光潜，Чжу Гуан-цян

朱济乾，Чжу Цзи-цян

朱家骅，Чжу Цзяхуа

朱经农，Чжу Цзиннун

朱列，Чжу Ле

朱敏，Чжу Мин

朱穆之，Чжу Му-чжи

朱宁河，Дю Ен Ха

朱其文，Чту ЦиВень，Чжу Ци-вэнь

朱瑞真，Zhou Zhucheng

朱少红，Чжу Шаохун

朱绍田，Чжу Шаотянь

朱升富，Чжу Шен-фу

朱世明，Чжу Шимин，ЧуСи-Мин

朱武三，Чжу У-сан

朱晓晨，Чжу Сяочен

朱学范，Чжу Сюэ-фань

朱应举，Чжу-Ин-Чжу

朱云海，Цзун Юн-хэн

朱之垠，Чжу Чжи инт

竺可桢，Джу Ке-дженъ

庄玲，Чжуан Лин

庄涛，Чжуан Тао

卓裴立，Чжо Пэли

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

兹古里季，А.Згуриди

兹洛宾，И.Д.Злобин

兹洛曼诺夫，Л.П.Зломанов

兹瓦雷金，А.А.Зворыкин

兹韦列夫，А.Г.Зверев

兹维亚金，Звягин

邹大鹏，Чжоу Липэн

邹继欢，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

邹鲁，Цзоу Лу

邹鲁风，Чжоу Лу-фын

祖巴金，Зубакин

祖布里林，И.С.Зубрилин

祖普卡，Зупка

遵，Туен

左琴科，Зощенко

左舜生，Цзо Шунь-шен，Цзо Шуньшэн

佐古龙佑，Сако Реосукэ，Sako Ryusuke

佐捷拉娃，И.С.Зоделава

佐林，В.А.Зорин

佐洛图欣，А.А.Золотухин

佐洛图欣，В.Золотухин，

佐藤，Сато

佐藤好夫，Сайто Иосио，Sato Yoshio

佐约苏哈托，西迪克，Сидик Джойосукарто

佐泽，科奇，Кочи Дзодзе

佐佐木到一，Сасаки Тоити，Sasaki Toichi

佐佐真之助，Сасса Синносукэ